# 文革史话

## 之第一部山雨欲来

上卷

刘朝驹 著

中国文化出版社

这是让一代人亢进，迷惘、失落、不堪回首，却无法忘怀的十年。这是中国历史上永远不可能磨灭的十年。

谨以此书献给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发动五十周年

# 文革史话

## 之

## 第一部

# 山雨欲来

上 卷

刘朝驹　著

中国文化出版社

# 写在前面

掌上千秋史，
胸中百万兵，
眼底六洲风雨，
笔下有雷声。
唤醒蛰龙飞起，
扑灭魔炎魅火，
挥剑斩长鲸。
春满人间世，
日照大旗红。

抒慷慨，
写鏖战，
记长征。
天章云锦，
织出革命之豪情。
细检诗坛李杜，
词苑苏辛佳什，
未有此奇雄。
携卷登山唱，
流韵壮东风。

这是山东大学高亨教授景仰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毛泽东

主席填写的一首《水调歌头》。

毛泽东,这位被中国共产党副主席林彪誉为“全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现一个”的天才,一生中做出了许多惊天动地的伟业。特别是在他生命的最后十年,更以世人罕见的气魄和胆略,发动了一场前无古人,后难有来者,史无前例的,旨在打烂自己政权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历史上留下了千古回味的话题。

# 目　录

写在前面 …… 1
引言:敌人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
　　伟业赋予谁,忧虑重重难寐 …… 1

## ◇上　卷◇

第 1 回:说起源,游泳池旁谈“四清”
　　讲“矛盾”, 两位主席起争端 …… 7

第 2 回:急召唤,陈伯达夜半领命
　　发感慨,生日宴伏笔玄机 …… 15

第 3 回:执《宪法》,一番话寓意深长
　　再通知,众书记重返北京 …… 21

第 4 回:生活会,刘少奇诚恳检讨
　　难求索,毛泽东重上井冈 …… 29

第 5 回:反特权,部队取消军衔制
　　忆往昔,胸中已酿万丈澜 …… 35

第 6 回:说海瑞,吴晗领命几多变
觉端倪,遍京城难觅知己 41

第 7 回:交任务,姚文元慨然受命
七易稿,陈丕显亦当信使 47

第 8 回:易德怀,大会堂拒不从命
亲相约,颐年堂促膝而谈 55

第 9 回:众相劝,“大将军”离京入川
批海瑞,九州地欲起风雷 63

第 10 回:“窃听器”,陈年旧案终未了
换“总管”,杨尚昆调任南粤 70

第 11 回:风乍起,似吹皱一池春水
未知情,望神州风云莫辨 76

第 12 回:单行本,看京沪南北较劲
姑苏城,副主席再三挽留 82

第 13 回:难放心,风起于青萍之末
众丘八,群起攻总政主任 89

第 14 回:罗瑞卿,医院先探刘亚楼
“要通气”,林彪也拿出党章 97

第 15 回:抓机遇,叶群慨然飞杭州
婆留城,面“圣君”侃侃而谈 106

第 16 回:急落实,中宣部调度安排
招成武,毛泽东再问详情 114

第 17 回:不服气,彭真又找刘少奇
事态迫,众常委齐聚华亭 122

第 18 回:寻长子,谢富治未见前任
闻危言,众头领惊诧申城 132

第 19 回:难落实,不承认“死无对证”
满腹冤,与卓琳泪眼相形 140

第 20 回:谈道德,北京城回避政治
点要害,西湖畔谈天论地 147

第 21 回:变策略,吴晗作自我批评
赶紧跟,中宣部哪敢稍停 159

第 22 回:广播局,周恩来部队调人
没商量,关锋说“一字不改” 167

第 23 回:苏州行,江青春节请尊“神”
“耳朵聋”,郭沫若恳请辞职 174

第 24 回:看电影,不夜城座谈文艺
交锋疾,五人组讨论方略 183

第 25 回:赶《提纲》,许立群彻夜未眠
示上方,一干人飞赴江城 190

第 26 回:游东湖,彭真发《二月提纲》
上三线,寻“海瑞”再作逍遥 197

第 27 回:改《纪要》,陈亚丁三飞上海
贯彻难,议《提纲》争执不停 204

第 28 回:再批判,罗瑞卿实难承受
三一七,第一次杭州会议 210

第 29 回:回首望,将军一跳身名亡
匿名信,陆定一又出问题 219

第 30 回:“女状元”,谁曾想出此下策
终敲定,《座谈会纪要》完稿 228

第 31 回:抓警卫,总理再查广播局
“大革命”,“上海谈话”震北京 236

第 32 回:急转弯,京城内一片慌乱
抛邓拓,是否能躲过此劫 244

第 33 回:出简报,许立群进退失据
齐声唤,批罗会再起波涛 252

第 34 回:写《通知》,新成立文革小组
聚西湖,二次开杭州会议 260

第 35 回:送彭真,飞机内一路无语
批李达,工作组进驻武大 269

第 36 回:表决心,发誓欲焚平生作
集北京,政治局开扩大会 275

第 37 回:“三家村”,呼“万岁”彭真不服
回羊城,陶铸中南局部署 282

第 38 回:飞上海,毛泽东紧急召见
绘蓝图,《五七指示》述心愿 289

第 39 回:部署忙,北京城调兵遣将
说政变,全党上下皆震惊 296

第 40 回:万念灰,邓拓家中辞世去
遭诘问,彭真会上检查难 303

第 41 回:怒难耐,林彪痛骂陆定一
保晚节,周恩来会上发言 311

第 42 回:批朱德,政治局小起波澜
设专案,田家英接受审查 318

第 43 回:难承受,永福堂悲剧呈现
闻噩耗,董边如五雷轰顶 326

第 44 回:忙喝止,安子文阻董再谈
华北会,袁振揭山西省委 334

第 45 回:泪洗面,昭衡廿天愁白头
翻烙饼,北大社教问题多 341

第 46 回:调查组,未名湖畔泛涟漪
怎么办?燕园左派串联忙 348

第 47 回:细斟酌,挥笔书就大字报
遭围攻,聂元梓匆匆离去 354

**第一部上卷各地文革章回索引** 361

# 引言：敌人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 伟业赋予谁，忧虑忡忡难寐

三国期间，诸葛亮尚未出山就预言天下将是三分之势，他与刘备的这次对话，成为后人广为流传的、著名的“隆中对”。

时隔1700余年后，公元1945年的夏天，抗战胜利前夕，中国共产党主席毛泽东与著名教育学家、中国民主同盟主席黄炎培在延安的窑洞里也有一次对话——“延安窑洞对”。黄炎培同样预见了抗战胜利后，中国的政局走势。

巍巍宝塔山下，潺潺延水河边，他们在毛泽东的窑洞里彻夜畅谈，黄炎培对毛泽东讲：

“延安的作风明显的不同于国民党的重庆：艰苦，团结，不断地要好，不断地求进步，正如毛先生所说：打倒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要向老百姓学习——你们主张有些书本知识的人，快回到实际工作里去；不求好听好看，切实寻觅民众的痛苦，政府对于每个老百姓的生命和生活好像都负责的，这句话做到，在政治上更没有其他问题了。总之，在你们这里，有一种向上的精神，这种精神充分发挥出来，前途希望是无限的。”

“是啊，历史是人民创造的吗。只有全心全意的为人民服务，人民才会拥护我们。”

“变化往往在胜利以后。”

“哦？”

“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

无法补救。也有为了区域一步步扩大了,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所驱使,强求发展,到干部人才渐见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趋于薄弱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

黄炎培似已料到,在抗日战争胜利后的国共两党对抗中,中国共产党会取得最后胜利,执掌全国政权。但是,他的经验告诉他,历史上,小到一人,大到一国,开始的时候,不管条件怎样艰苦,都会努力奋斗,有一种精神支撑着。而一旦胜利,就会松懈,懒惰,以至腐败下来,一发而不可收拾。从中国的历朝历代,到当时执政的国民党,没有一个能跳出这个周期率。中国共产党能跳出这个周期率吗?

毛泽东当即自信地回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真的能做到吗?

1949 年 3 月 23 日,太行山深处的西柏坡。武器落后,不足百万武装的中国共产党,即将打败了由美国支持和装备的 800 万国民党军队,正像 4 年前黄炎培所预料的那样,中共中央将在今天从这里走出大山,进入三朝古都——北平,执掌中国的政权。

当毛泽东走出门外,迎面遇见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来。

“主席没有休息好吧?”周恩来抬了一下手问。

“休息好了。睡四五个小时,精神就很好了。”毛泽东边掏烟边说。

“多休息一点时间,长途行军坐车也是很累的。”周恩来对毛泽东说。

毛泽东答道:“今天是进京‘赶考’,精神不好怎么行?”在场的人都笑了。

周恩来点点头:“是啊,我们应当都能考试及格,不要被退回来。”

毛泽东说:“退回来就失败了。我们决不当李自成!”

李自成,明末的农民起义英雄,带领一批饿得活不下去的灾民,转战十几年,九死一生,历尽艰辛,终于打败了明王朝,在老百姓箪食壶

浆欢迎下,走进了北京金銮殿。然而,他的皇帝宝座还没有坐热,就被满清军队赶出了北京,惨死在河南九宫山。

李自成是毛泽东心目中的英雄。却又非常为他的结局痛惜。早在1944年,文学家郭沫若写的《甲申三百年祭》,记述了李自成的这段历史。这本书,毛泽东作为中共中央文件发到中国共产党的每个高级干部手里,他不希望他领导的党成为第二个李自成。

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书记处的另外4个书记:周恩来、刘少奇、朱德、任弼时坐在吉普车上出发了。曲曲弯弯沙路上扬起烟尘。他们的前面是北京,是即将耸立起来的共和国的远景……

开国大典那天,毛泽东暗暗地流泪。毛岸英问他为什么流泪,他说,他想起了与黄炎培的谈话。

时光如梭,转眼到了公元1964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走过了15年的风风雨雨……

在此期间,中华人民共和国曾经和世界上最强大的美国在朝鲜打了一仗,居然迫使美国在朝鲜三八线上停战。美军司令克拉科将军在停战协议上签字时说:

“这是美国历史上第一次在没有胜利的协议上签字。”

中国人扬眉吐气,世界为此而瞠目……

在此期间,中国经历了三年罕见的自然灾害,全国缺粮,没有饭吃,饿死了多少人……老百姓居然没有造反,跟着共产党一起挺过来了……

建国之初,也出现了共产党干部贪污、受贿、腐化,堕落的现象,通过“三反”、“五反”运动,杀了刘青山、张子善两个共产党的高级干部,毛泽东坚决、严厉、毫不手软的给压下去了……他不想成为李自成。

进入六十年代,随着共产主义思想的普及和教育,大公无私、先人后己之风日盛,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好人好事层出不穷……雷锋、王杰、欧阳海,可谓是英雄辈出的年代。

共产党统治坚如磐石,毛泽东威望如日中天。几乎所有的人都认为,中国共产党已经跳出了黄炎培老先生预言的“周期率”。

然而,位于中国政坛最高峰的毛泽东,似乎并没有被这些现象所迷惑。此时的他更加忧心忡忡。他愈来愈强烈的感到,在“坚如磐石”

下面,“周期率”在涌动: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在斯大林死后发生的一切,让毛泽东觉得,此时的苏联政府,和他年轻时立志推翻的旧中国的政府,其实已经没有太大的区别了。他们已经不是为人民服务的政府,而是剥削、压迫人民的工具;五十年代的波兰、匈牙利发生了大规模的群众暴乱,他们也是社会主义国家。虽然社会主义阵营,包括中国共产党对外宣传都说那是美国和欧洲敌对势力的颠覆和煽动,其实,毛泽东很清楚,还不是因为共产党当权者脱离群众,搞特殊化,蜕变为剥削老百姓的新的资产阶级,老百姓不满意,造反了!

“苏联特权阶层控制苏联党政和其他重要部门。

“这个特权阶层,把为人民服务的职权变为统治人民群众的特权,利用他们支配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权力来谋取自己小集团的私利。

“这个特权阶层,侵吞苏联人民的劳动成果,占有远比苏联一般工人和农民高几十倍甚至上百倍的收入。他们不仅通过高工资、高奖金、高稿酬以及花样繁多的个人附加津贴,得到高额收入,而且利用他们的特权地位,营私舞弊,贪污受贿,化公为私。他们在生活上完全脱离了苏联劳动人民,过着寄生的腐烂的资产阶级生活。

“这个特权阶层,思想上已经完全蜕化,完全背离了布尔什维克党的革命传统,抛弃了苏联工人阶级的远大理想。他们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社会主义。他们自己背叛革命,还不准别人革命。他们唯一的考虑,是如何巩固自己的经济地位和政治统治。”

以上这段话,是毛泽东亲自加在与苏联共产党论战文章“九评”上的。

同样都是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难道中国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吗?

其实已经出现了,三年自然灾害刚刚过去,就有那么多的农民要分田单干,党内又有那么多人支持这种做法。田都分了,社会主义还要不要?和旧中国又有什么区别?还是列宁英明,他说,小生产每天都在产生新的资产阶级。怎么这么多的共产党人就看不到呢?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重提阶级斗争;毛泽东建议,在全国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教育农民和干部明白什么是社会主义,不要分田单干。

这次运动中反映上来的材料更加证实了他的判断:从工厂到农村,越来越多的共产党干部脱离群众,高高在上,当官做老爷。他们已经成为剥削群众的新的资产阶级了。

谁来监督他们?答应给予人民的利益和民主权利又怎么保证?“三反”“五反”虽然杀了刘青山、张子善两个高官,但毛泽东清楚:那只是治标,没有治本。朱元璋当年不也杀了很多贪官,朱家坐了200多年天下,最后还是亡了——“周期率”。

延安时期的边区政府哪去了?解放初期人民政府的形象似乎越来越遥远。旧的资本家不存在了,但是,这些靠人民供养的政府官员不为人民服务,只为政府官员服务,为自己的亲朋好友服务,为一小部分利益集团服务,这不就是新的资产阶级吗?这样的政府越巩固,是否就意味着强大的官僚机构越巩固?

毛泽东的担忧日益加剧:

农村的包产到户,企业的物质刺激,教育的双轨制,公共卫生事业集中于城市,文艺上的传统题材和表现形式,等等。这些政策,在毛泽东看来,正滋生着新的不平等、特殊化、特权阶层和不满情绪,也就是滋生着“修正主义”。尽管毛泽东采取过一些措施,希望阻止上述情况的发展,但是,情况并不理想。他不满中央一些部门的迟缓行动,他怀疑自己的一些主要助手半心半意,缺乏热情。他认为:社会主义革命成功后最大危险不是国外进攻和威胁,而是国内的资本主义复辟,正如列宁说过的:“堡垒是最容易从内部被攻破。”如果修正主义者在执政的共产党内部篡夺了权力,就可能发生资本主义复辟。

1964年2月29日,北京人民大会堂内,毛泽东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金日成亲切交谈。

毛泽东说:“天下大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一个党也是如此……我们党就有可能出修正主义。”

参加会见的朝鲜代表团中有人交头接耳。毛泽东接着说:“所以,我们要向全体人民进行反对修正主义的教育,要反对新的资产阶级,新出来的资产阶级分子,他们贪污盗窃、投机倒把,人数不多,但很厉害,神通广大,他们能够从广州弄到自行车用飞机运到河北高价出卖,这个人还是一个县的农村工作部长。”

金日成忍不住问:“中国将来情况会怎样?”

毛泽东说:“为了防止中国出现修正主义掌权,从现在起就要大讲特讲反修防修的斗争问题,大讲特讲阶级斗争和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我担心,我死以后,中国会出现资本主义复辟……”

金日成:“有这种可能吗?”

毛泽东熄灭手中的烟头,摆一摆手说:“什么样的情况都有可能发生……现在我还没有死,我们党中央内部就有人敢公开提出来搞分田单干,提倡少支援世界革命;如果我死了,这些人还在,他们还不闹翻天?为了防止中国出现资本主义复辟,我们才讲念念不忘阶级斗争,念念不忘坚持无产阶级专政。”

会晤结束后,毛泽东回到中南海游泳池。睡不着觉,仍在深深的思索着……护士长吴旭君给毛泽东送药,看到毛泽东忧心忡忡的样子,劝慰说:“主席,休息吧。”

毛泽东却说:“小吴呀,你不晓得,我对国内许多事情放不下心哪,党内要出修正主义怎么办?我在政治局会上多次提出这个问题,他们接受不了,阻力很大。我的话他们不听,但这不是为我个人,是为了我们国家,为了我们这个党,将来改不改变颜色,走不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我很担心,这个班交给谁我才能放心……我现在还活着呢,他们就这样!要是按照他们的做法,我和许多先烈们毕生付出的精力就付诸东流了!”

毛泽东叹了一口气,坐到沙发上,点了一颗烟,接着说:“我这个人没有私心,我不想为我的子女谋求什么,只想中国的老百姓不要受苦受难。他们是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所以我依靠群众,不能让他们再走回头路。建立新中国死了多少人?有谁认真想过?我是想过这个问题的。”

# 第1回：说起源，游泳池旁谈“四清”讲“矛盾”，两位主席起争端

1964年冬天的北京，虽然和往年一样，干燥、寒冷。北风咧咧的吹过城市，却没有在城市中刮起太多的尘土。大街小巷依然是那样干净，甚至连一片树叶也看不到。人来车往的长安街，还是那样的忙碌。行走匆匆的人们脸上，已经看不到几年前的饥饿菜色，闪烁的是一双双自信和亢奋的目光。人们可以感到，这个国家正在被一种精神凝聚起来，就像水泥将一盘散沙凝聚起来。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三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正在北京召开。中南海游泳池内，温暖潮湿的温度和外面的气候形成了强烈的反差，毛泽东正在这里游泳，这是他的一种休息方式。说起这种休息方式，还有一段故事：

中华人民共和国刚成立后的几年中，毛泽东日理万机，殚精竭虑更甚以往，经常是废寝忘食。即便稍有闲暇，也总是拿一本书，倚在床上，作为休息。这种状况让他身边的工作人员非常担心，于是动员毛泽东出去散步，或者跳舞，总之，想尽办法要让毛泽东多走出办公室活动活动。

一次，医生对毛泽东说：“主席，你知道生命的起源在哪里吗？”

毛泽东觉得奇怪，马上反问道：“你要干什么？”

“考考你呀？不能总是你考别人，也应该让别人提点问题呀。”医生说。

“哦，当然是起源于大海。”毛泽东答道。

医生又问：“那么，生命的最佳运动是什么？”

毛泽东试探性的回答：“是散步？”

医生说：“不对，是游泳。游泳可以直接与大自然接触，是一种全身运动，锻炼心肺，而且老少皆宜，好处很多。”

毛泽东明白了，他说：“是要我游泳呀，可以考虑。”

医生看到毛泽东松口了,马上自告奋勇的说:“主席您就放心的游泳吧,有我保护,您保险出不了事。”

“喔,出了事怎么办?”毛泽东不动声色地问道。

医生拍拍胸脯:“我救你。”

“是吗?我过去怎么没发现,你还有这么大本事?”毛泽东笑着对医生说,随即站起来说:“那就走吧。”

到了游泳池,医生拉着毛泽东要从浅处下水,毛泽东没有理他,径直朝深水区走去。

“不行,不行!凡事要由易而难,先从浅水开始。”医生急忙拦阻。

“深水为什么不行呀?”毛泽东问医生。

“危险呀!”

“不是有你保护吗?难道你害怕啦?”毛泽东边说边下到深水区。只见他一会侧泳,一会儿仰泳,潇洒自如。此刻,医生方才如梦初醒,原来毛泽东的游泳技术是这样的娴熟。

毛泽东对愣在那里的医生说:“我家门前就有个池塘,小时候我就在那里游泳。那时,你这个生命还没有起源呐。”

从此,毛泽东喜欢上游泳这种休息方式,他说:“游泳这种休息好,它最大的好处是可以不想事,让大脑很好的休息。吃安眠药、散步、看戏、跳舞都不行,就是游泳可以做到,因为一想事就会下沉,就会喝水。”

后来,中央办公厅在中南海游泳池的旁边盖了一个室内游泳池。毛泽东常到这里游泳,有时中央的其他领导人因急于处理公务,也会追到游泳池来找毛泽东商议。

这天,护士长吴旭君来到游泳池边,对池内游兴正浓的毛泽东喊道:“主席!少奇同志和总理他们来了!”

“好啊,他们来了,咱们就上去。”毛泽东说着,就向池边游过来。

上岸后,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中共中央书记处总书记、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已经走了进来。毛泽东和他们一起围坐在游泳池边的藤椅上。

刘少奇向毛泽东汇报说:“主席,前一阶段‘四清’运动中出现了打击面过宽、斗争过火的‘左’的错误……”

毛泽东打断刘少奇说:“不是‘左’,是形‘左’实右。”

“四清”是对当时正在进行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简称,是河北省保定地区在1963年农村整风整社运动中,通过对农村基层的账目、仓库、财物和农民社员和农村干部的收入工分进行清理,发现和解决农村基层干部多吃多占的问题。这种方式,非常直观、具体,与群众利益息息相关,很快就得到推广。由于这种方式是以清理账目、仓库、财物、和工分为基本内容,所以被简称为“四清”。多吃多占的现象很容易引起人们的公愤,因此,在运动中,出现了打人、捆绑罚跪、吊人等极端现象,也就是刘少奇说的“左”的错误。此时,他接着毛泽东的话说:“是的,我们想利用这次开人大会的机会,各大局的书记都在北京,开一次中央工作会议,纠正前阶段工作中出现的问题,部署下一阶段的工作。”

毛泽东看看周恩来和邓小平说:“是你们大家的意见?既然大家都没有意见,那就开吧。”

12月15日下午,人民大会堂河北厅,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在这里召开。会上,中南局书记陶铸、西南局书记李井泉、东北局书记宋任穷、西北局书记刘澜涛、华北局书记李雪峰、华东局魏文伯、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先后发言。可能是受6月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的一句话影响,从这些共产党“封疆大吏”汇报上来的材料看,中国大陆的阶级斗争形势已经十分严峻了,可以说,大陆基层的政权已经有三分之一,甚至更多都不在共产党的手里了。

这年的5月15日至6月17日,在北京召开中央工作会议。6月8日,毛泽东在那次中央工作会议召开后的20多天后第一次在会上讲话。当周恩来、彭真插话介绍了下面被敌人掌握政权的不少这一情况时,毛泽东接着说:“我看,我们这个国家有三分之一的权力不掌握在我们手里,掌握在敌人手里。”

刘少奇接着说:“现在下边发生的问题就是不追上边,恰恰问题就出在上边。抚宁县的农民说,不仅下边有根子,上边也有根子,朝里有人好做官。这句话引起我的注意。”

那次工作会议结束一个月后,7月14日,刘少奇来到南京,坚持不住设备完善的中山陵高级招待所,而是在省委办公大楼一间办公室住

下。他在南京讲了两个下午,在报告中强调“也许不止三分之一政权不在我们手里”,有严重问题的干部占基层干部的多数,并提出近一年的城乡社教都没有搞好。

于是,12 月 17 日,西北局第一书记刘澜涛在这次中央工作会议发言时说:“我们的调查情况,西北地区 328 个县市委和城市的区委,其中烂掉的、基本烂掉的、有严重问题的,共 149 个,占总数的 45.6%。基本形式是滥用职权,包庇坏人和反革命,有的自己可能就是反革命。有一个县的党委书记、县长,在国民党里头当过连长。”

18 日,华北局第一书记李雪峰发言说:“山西 8 个重点县县委,已烂掉的有 3 个,常委 72 人,有问题的 38 人;张家口地委整个都烂了……陕西省属于夺权问题的有 26 个。河北永年县我在的那个大队就要夺权!”

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说:“从我们了解的情况看,农村领导权不在我们手中的三分之一打不住!中山县 22 个大队,已经烂掉有 11 个,占 50%,公社一级,烂掉的和基本烂掉的不少于三分之一。基层干部中没有剥削的很少!”

东北局第一书记宋任穷:“我们那里有一个县,全县 21 个大队,几乎全部不在我们的手里,可以说,是在国民党手里。”

19 日,华东局书记处书记魏文伯:“从调查情况看,包产到户对贫下中农损害很大;好水田都被干部包走了,干部还利用职权搞腐化,两极分化严重;安徽省是单干占优势!”

1963 年,八一电影制片厂拍摄的电影《夺印》,就是讲述苏北的一个农村政权被地主在幕后实际掌控夺权的故事。这部电影在当时十分轰动。如今,通过会上汇总的情况更让人感到,基层政权被坏人掌控的现象已如此普遍,几乎到了谈虎色变的程度。

那么,这种现象究竟是什么性质?应该如何应对呢?20 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河北厅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继续讨论。

刘少奇问:“陶铸同志提出,说农村当前的主要矛盾是富裕农民阶层跟广大群众、贫下中农的矛盾。几个同志也这样讲,说农村里面已经形成富裕阶层了,已经形成特权阶层了。是这样提呢?还是讲原来的地富反坏跟蜕化变质的有严重错误的坏干部结合起来跟群众的

矛盾?”

毛泽东回答:“地富是后台老板,前台是四不清干部,四不清干部是当权派。你只搞地富,贫下中农还是通不过的。迫切的是搞干部。地富反坏还没有当权,过去又斗争过他们,已经搞臭过一次了。”“至于那些当权派,干部,从来没有搞过,没有搞臭过。他是当权派,又是共产党,他又给定工分,上面又听他的,群众拿他们就没有办法。所以,农村的中心问题是这一批干部,主要是大队和生产队的干部,他们骑在群众头上,群众就不好过,就穷的要死!我们要先打豺狼,再整狐狸。不能只打狐狸,不打豺狼。”

刘少奇似是附和,似是坚持的说:“对当权派,这是头一仗。但他们后头有地富反坏。”

毛泽东并不认同:“漏划地富变成中农,变成贫农,有的当了共产党,因为他漏划了。那也是一种当权派。”

刘少奇的看法,其实也是绝大多数共产党领导干部的看法,也是电影《夺印》所要反映的看法。他们认为:基层政权的演变,主要是地主、富农这些仇视共产党的人在背后起作用。共产党的敌人是谁?是国民党,是地、富、反、坏、右,他们要改变共产党的政权,这是顺理成章的,就像一加一等于二一样,很容易理解,因此,运动的矛头就应该对向地主、富农。

而毛泽东的看法则不然,他认为,地主、富农在农村早已经被斗臭了,没有权了,因此,在农村形不成气候。现在农村能够欺压、鱼肉百姓的只能是那些在台上掌权的干部、当权派,群众最有意见的不是地主、富农,而是这些骑在群众头上作威作福的干部。因此,农村的主要矛盾是群众与干部之间的矛盾,这次运动的重点也应该是整这些变质的当权派。

应该说,毛泽东的看法似乎不很合逻辑,但却更符合实际,也是更接近群众和老百姓的想法,但一时却又很难让各级领导理解和接受。

不管是理解也罢,不理解也罢,只要是毛泽东说的,那就是真理,大家就听,谁也不会去反对。接着,大家就按着毛泽东的提法,开始分析这部分掌权人的情况以及应该对他们采取怎样的处理办法。

毛泽东的意见,打击面不要过宽。他说:“我提出这个问题有点

右。我就是怕搞得太多了,搞出那么多地主、富农、国民党、反革命、和平演变的,划成百分之十几、二十,如果百分之二十,七亿人口就是一亿四,那恐怕会要发生一个‘左’的潮流。农民起来,红了眼睛,影响到你们,你们走群众路线嘛,就站到群众那方面,结果树敌太多,最后不利于人民。”

他建议:“把那些贪污几十块钱、一百块钱、一百几十块钱的大多数四不清干部先解放,我们的群众就多了。把贪污一百块钱到一百五十块钱的解放出来,就解放了百分之八十。”

这时,邓小平也插话说:“这次运动的打击面还是百分之几比较有利。在运动开始的时候,就要分化四不清干部,在斗争中分化他们,争取他们,教育他们,改造他们,最后的打击面是百分之几。”

毛泽东又转到另一个问题,他说:“过去那个‘四清’,清财务、清仓库、清工分、清账目,那只是经济,变成‘一清’了。我赞成眉毛胡子一把抓,把过去那个‘四清’的概念改变,现在就是包含一个思想,一个组织,一个政治,一个经济。还是‘四清’。”

在这里,毛泽东已经赋予“四清”一个全新的概念了,其外延已比原来的“四清”大大地扩展了。

刘少奇再次把话题拉到主要矛盾问题上:“主要矛盾就是四请与四不清的矛盾,行不行?”

陶铸说:“赞成!”

刘少奇是真的没有明白毛泽东的含义,还是已经意识到毛泽东的提法可能对整个政权带来的震撼?

毛泽东说了一句答非所问的话:“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中央书记处书记、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兼北京市市长彭真接着说:“总的提法,整个社会主义阶段,还是我们七届二中全会提的主要矛盾,就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间,是‘四不清’、贪污盗窃、投机倒把,主要整干部。整个矛盾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这个整个的提法和这次运动的提法要分一下。这也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矛盾的一种形式。”

刘少奇说:“有三种人:漏划的地主,新生的资产阶级,烂掉了的干部。有的干部出身好,犯有四不清错误,同地富反坏勾结在一起;有的

地富反坏操纵;也有漏划的地主当权的。”

毛泽东说:“一个新生,一个漏划,一个坏掉,这是对当权派的分析。”

他又说:“一个省委,一个地委,一个县委,一个公社党委,一个支部委员会,抓住这个东西就有办法。先搞豺狼,后搞狐狸,这就抓到了问题,你不从当权派着手不行。”

李先念:“不整当权派,最后就整到贫下中农的头上了。”

毛泽东:“根本问题就在这里。”

刘少奇:“一次搞不清,以后还会发生。”

毛泽东:“只要隔两三年不搞,就又来了,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一个漏划,一个新生,一个烂掉,那是当权派,要搞主要的。杜甫《前出塞》九首诗,人们只记得‘挽弓先挽强,用箭先用长,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这四句,其他记不得了。大的搞了,其他狐狸你 慢慢地清嘛!我们对冶金部也是擒贼先擒王,擒王鹤寿嘛!不要他当部长,下去当经理,擒下马来,然后改造。”

刘少奇:“重点是党。”

毛泽东:“重点在党。冶金部是党委,白银厂是党委,省委也是党委,地委、县委、公社党委、支委。抓住这些就有办法。你高扬文开始到白银厂也是庇护的,一蹲点变了。你王鹤寿庇护,变了吗?”“不管你过去是国民党共产党,反正你现在是当权派。发动群众就是整我们这个党。中心问题是整党,不整党没有希望。”

刘少奇说:“‘四清’与‘四不清’交叉,这是主要的,当然还有其他的。”

安徽省委书记李葆华问:“矛盾的性质是什么?”

刘少奇:“就是人民内部矛盾跟敌我矛盾交织在一起。”

毛泽东当即反问:“什么性质?反社会主义就行了。还有什么性质?”

刘少奇赶紧附和说:“总不是社会主义。”

毛泽东说:“是资本主义性质。还加个封建主义?帝国主义?搞个资本主义就差不多了。我们搞了民主革命,就是为社会主义开辟了道路。”

刘少奇还在坚持他的“交叉”理论:“政治、经济、思想、组织不清,有人民内部矛盾,有敌我矛盾,问题的复杂性就在这里。”

毛泽东不说话了,只是吸烟……

第二天,毛泽东在会上作了长篇发言,当毛泽东说到“这次运动的主要矛盾就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时,刘少奇插话说:

“恐怕不能太绝对吧。现在是党内外矛盾、敌我矛盾、四清四不清的矛盾,各种矛盾交叉在一起,有四清和四不清的矛盾,有党内外矛盾的交叉,矛盾很复杂,还是有什么矛盾就解决什么矛盾为好……”

毛泽东终于忍无可忍了,打断刘少奇的话说:“我们这个运动,叫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不是什么‘四清’‘四不清’运动,什么多种矛盾交叉的运动,哪有那么多交叉?所谓‘四清’、‘四不清’,什么社会里都能整;党内外矛盾交叉,什么党都能用。没有说明矛盾的性质!不是别的什么主义的教育运动,是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运动的性质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怎么来了个‘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敌我矛盾与人民内部矛盾的交叉?哪有那么多的交叉?什么内外交叉?这是一种形式,性质是反社会主义吗!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

一锤定音。

就在这天夜里,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陈伯达被急促的电话铃声惊醒,是红色机要电话,他拿起电话,里面传来毛泽东秘书徐业夫的声音:

“是伯达同志吗?”

“是我……”陈伯达刚刚服了安眠药躺下,拿着听筒迷迷糊糊的答应着。

“我是徐业夫,主席让您来一下。”

# 第2回：急召唤，陈伯达夜半领命 发感慨，生日宴伏笔玄机

对领袖的召唤，陈伯达不敢怠慢，他赶紧对徐业夫说了声："好的。"就匆忙下了床，穿上衣服，赶了过去。

看见陈伯达进屋，毛泽东对他说："打搅你的好梦啦？"

"没有，没有……"陈伯达赶紧回答。

"这次中央工作会议准备起草一份会议的纪要，你来负责。"

"好的，好的……"

"纪要的提纲你看这样写好不好？"

于是，毛泽东开始述说，陈伯达摊开本子就记……记着，记着，安眠药的药力发作了，他只觉得眼皮越来越沉重，努力强打精神，也只能机械地记下毛泽东的一条条意见。终于，他听见毛泽东对他说："就先这样吧，你回去整理一下，整理好后咱们再研究研究。"

"是。"陈伯达赶紧收拾好纪录，回到家中，倒头便睡。

第二天一早醒来，安眠药的药力退去，陈伯达连忙翻看昨夜记录，不由一阵叫苦不迭：昨夜迷迷糊糊记的笔记，连他自己也看不明白了。

陈伯达赶紧给中共中央理论刊物《红旗》杂志副总编辑、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王力打电话。

王力参加过当时中共与苏联论战文章的起草工作，是由中共党内公认的理论家、中央书记处书记康生推荐的。他还执笔完成中共中央以林彪的名义发表的《人民战争胜利万岁》一文，曾在大陆轰动一时，在台湾和美国也有一定的影响。从1964年起，王力受命列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

陈伯达的电话打进来时，王力还在睡觉，一听"大秀才"找他，连忙赶了过来。

陈伯达把毛泽东的指示和意图向王力简略地传达完后，又不无担忧地说："看来，毛主席是对刘少奇有意见了。"

王力闻言,大吃一惊,忙说:“这怎么可能呢?”

是啊,刘少奇向来以毛泽东的马首是瞻,是党内公认的毛泽东的接班人,毛泽东在接见外宾时曾多次予以肯定。此时,刘少奇的大幅照片已取代朱德的照片与毛泽东的照片一起悬挂。“刘主席万岁!”也已成为各种集会时的必喊口号。

陈伯达接着对王力说:“毛主席说,刘少奇想当秦始皇,我看还不够格。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上他是瞎指挥嘛,不了解中国的实际。在社会主义革命上,他代表不了无产阶级,代表的是官僚主义者阶级,这样下去,只能作革命的绊脚石。”

王力一听,也着急了,忙问:“你怎么看呀?”

陈伯达说:“方针政策我同意主席的意见。但是,少奇同志是很纯洁的共产主义者,两个主席意见不统一,对党对国家都很不利呀。”

王力表示同意,他说:“那是否想个办法,在两位主席之间调解一下。”

陈伯达点头说:“是啊,是啊……”

接着,陈伯达说了几个办法,都被王力否了。最后,王力说:“我看你办不了这事,还是靠别人吧。最好和彭真、陶铸他们说一下,让他们想想办法。”

陈伯达听了,默默的想着,半晌没有吱声。

随后,王力帮助陈伯达整理会议纪要,他到底比陈伯达小 17 岁,很快就从纷杂的记录中整理出了大概的眉目。

第二天,中央工作会议继续进行,讨论会议的纪要。

12 月 23 日,陈伯达拿出会议纪要的第一稿完成,题目是《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共 16 条。后来又加了一条:“以上各条原则适用于城市的‘四清’运动。”成为 17 条,于是这个文件后来被简称为“十七条”。

24 日,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这个文件。毛泽东批示:“照办”、“照发”。

但是,毛泽东对“十七条”中的一些提法还是觉得不很满意。既然大家都同意了,那就先发下去吧。

12 月 26 日,恰逢毛泽东生日。建国后,毛泽东从不公开为自己过

生日,但这次却提出要请大家吃饭。他亲自审定了请客名单,有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和各大区的书记,还有中国的导弹之父钱学森、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带头人邢燕子、董家耕、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大队党支部书记陈永贵、大庆油田的王进喜等。

这天下午,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会议要散之前,服务员分别通知董加耕、陈永贵、邢燕子、王进喜:“散会后就地稍等。”

会议结束后,大会代表和其他主席团成员纷纷离去,只有他们4位在原地等待着。不一会儿,周恩来从后台走来,向他们招手。他们随周恩来到后台北边一间休息室内,朱德已坐在那里。周恩来将这4人一一向朱老总作了介绍。

周恩来问邢燕子情况怎么样?

邢燕子说:“会议多、兼职多,与群众一起干得少了,这个我们受不了。”

周恩来说:“不能层层会议都让你们参加,要与有关部门联系,叫他们给挡一挡,保证你们在基层的时间,千万不能脱离群众,这不仅是你们的要求,也是党中央的希望。”

接着,周恩来又问陈永贵:“你家属住协和医院我去看过两次,向医生讲了要尽力治疗,现在怎样?”

陈永贵的妻子患乳腺癌,曾在北京协和医院治疗。周恩来的关心让陈永贵十分感动,他说:“感谢总理的关怀,现在情况还可以,请总理放心。”

周恩来看了看表后,对大家说:“跟我走吧。”

周恩来、朱德肩并肩在前面走,他们4人在后面跟着。又转了几个弯,大家在一间小宴会厅走廊内停下来。只见里面临时摆放的几张藤椅上坐着陈毅、贺龙、董必武、陆定一等领导人,他们正谈笑风生。周恩来向大家介绍陈永贵他们4人:“这几位是主席请来的客人……”

室内品字形摆了3张桌子,每桌中间放了一大盘苹果。陈永贵他们4人这才知道,原来是毛泽东主席请他们吃饭,这太令人惊喜了!

没过几分钟,周恩来陪着毛泽东走进宴会厅。老人家穿一件白布衬衫,衬衫束在长裤子里,满面红光、精神抖擞。

这时,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和夫人蔡畅走了进来,毛泽东一边和他们握手一边对李富春说:“富春来了,你们好啊,什么事情都不向我讲,搞独立王国!北京有两个独立王国,一个就是你们计委系统。”

大家不知道毛泽东这是什么意思,谁也没敢吭声。好在李富春和毛泽东是老乡,又一起革命多年,彼此十分了解,只当是毛泽东对他的批评,笑了笑,没有分辨。

毛泽东坐在上方的一桌,左右两边分别是邢燕子和董家耕,邢燕子右边是陈永贵,董加耕的左边是王进喜。他们这桌还有曾志、钱学森、彭真、罗瑞卿、谢富治。而刘少奇、共青团中央书记胡耀邦和各大区书记以及毛泽东的夫人江青则分坐另外两桌。

这时,董加耕瞥见毛泽东白布衫后边还有一块不小的补钉,这使他吃惊!

毛泽东说:“今天不是请客,更不是祝寿,我拿自己的稿费请大家吃顿饭,也算是实行‘三同’吧!”

“三同”就是指共产党的干部要和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

毛泽东接着说:“我的孩子们要来,我没有让她们来。我说你们没有资格。他们没有参加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实践,没有为革命做出贡献,所以没有资格。这里有工人、农民、解放军领导在一起,不光吃饭,还要谈谈话嘛!”说得大家都笑了。

他又挨个询问了回乡知识青年代表邢燕子、董加耕读了几年书,接着又问余秋里,余秋里回答:“3 年小学。”

毛泽东说:“3 年小学能搞出个大庆来,就不错嘛!不要像有些人,书读得越多,越蠢,猪碰了壁知道回头,有些人比猪还蠢,碰了壁不知回头。”

老人家转问陈永贵:“你是庄稼专家了,多大岁数啦?”

“50 岁。”

“五十而知天命。你们不要翘尾巴,一辈子不能翘尾巴,有些人不好,尾巴翘得太高了,要夹着尾巴做人!”

毛泽东又问董加耕:“你在乡里能看到《参考消息》吗?”

董加耕说:“一个公社只有一份《参考消息》,只有一把手能看到,并且一看完还要封起来退到县里。听说要保密。我是党委委员,偶尔

从书记那里看到《参考消息》,就是字太小……”

听到这儿,毛泽东马上对周恩来说:“《参考消息》要多印一些,纸(字)要大一些。反面教材就是反面教员,可以教育人,我们也可以出蒋介石选集,可以教育我们。”

彭真插话:“从孙中山开始就反对贪污腐化,至今也没有反对得了,贪污腐化也是反面教员,也可以教育我们……”

开始上菜了。桌上放着红、白、黄3种酒,大家是分餐制,每道菜是一个小搪瓷盘。除了一盘盐水虾外,基本都是黄瓜、苦瓜、青辣椒、包菜、还有胡萝卜等一些蔬菜。

毛泽东接着说:“帝国主义、修正主义说我是教条主义,就算教条主义吧。教条主义什么时候变?一万年也变不了。我们写文章打仗,不会死人的。今天是我的生日,过了年就71岁,我老了,也许不久就要去见马克思,所以今天请大家来吃顿饭……”他给陈永贵和钱学森递烟,然后继续说:

“现在用几盒香烟就可以把一个党支部书记给贿赂了。如果把女儿嫁给一个干部,那就要什么有什么。他们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5月、6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认为,全国基层有三分之一的领导权不在我们手里,我还担心党中央出修正主义!修正主义的出现标志着资产阶级在政治舞台上的兴起。这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领导人,已经变成或者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这些人是斗争对象,革命对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绝不能依靠他们。”

毛泽东喝下3杯茅台后,大声称赞钱学森:“钱学森不要稿费,私事不坐公车,很好!”

众人都神情紧张地听着。毛泽东似乎觉察到了拘谨的气氛,换了口气劝大家吃菜,并问身边的陈永贵:“湖南菜,辣啊,习惯吗?”陈永贵赶紧频频点头。

席间,毛泽东还不断给邢燕子、董加耕夹菜。当毛泽东知道董加耕是江苏盐城人时,便问他:“你是苏北盐城人,你知道盐城有两乔吗?”并向他竖起两个手指。董加耕直直地盯着毛泽东,怔了神。他心里想:“我们那里水乡桥很多,怎么只有两桥呢?”他一时没听懂毛泽东话的含意。

毛泽东提示说:“两乔,他们都很会写文章。”

董加耕一下子想起来了,便高兴地回答说:“我知道,他们是胡乔木、乔冠华。”

毛泽东高兴地笑了起来。

这一餐饭吃了大约两个小时。散席时,毛泽东和大家一一握手道别,当看到曾志时,他又向钱学森和陈永贵介绍曾志说:“曾志同志,井冈山的,现在井冈山没有几个人了。”他在怀念井冈山的岁月。

散席后,汪东兴召集董加耕4人立即把毛泽东的谈话记录下来,董加耕在4人中学历最高,高中毕业,就由他执笔,大家一段段、一句句回忆。当晚一式三份,交给汪东兴,由国务院、团中央、中央办公厅存档。

# 第3回：执《宪法》，一番话寓意深长 再通过，众书记重返北京

28日下午，继续在人民大会堂河北厅开中央工作会议，仍然是围绕“十七条”的内容进行讨论。这天的会议由毛泽东主持。会前，他向工作人员要去了两本书，一本是《中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文件》，一本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并将其带入了会场。今天开的会议，既不讨论宪法，又不讨论党章，毛泽东带那两本小册子来干什么呢？大家都觉得诧异。

在外交部长陈毅及总参谋长罗瑞卿、公安部长谢富治发言后，毛泽东讲话，对“十七条”中的第一条和第十六条发表意见。

文件的第一条是写运动的性质，是这样写的：

“几种提法：1. 四清和四不清的矛盾；2. 党内外矛盾的交叉，或者是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交叉；3. 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后一种提法较适当，概括了问题的性质。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毛泽东说：“性质问题，这么规定可不可以？有三种提法，是前两种提法较好，还是第三种提法较好？恐怕还是以第三种提法较好。我们常委会谈过，也跟几位地方的同志谈过，认为还是第三种较好。因为我们这个运动，它的名称就叫做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不是叫做什么四清四不清教育运动，也不是什么党内外矛盾交叉，或者是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交叉的教育运动。所以，提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较好。1962年，北京一个月，北戴河一个月，搞出一个公报，就是讲要搞阶级斗争，要搞社会主义，不要搞那个资本主义。”

“我们常委会觉得，大区同志也觉得，似乎你们也讨论了一下吧，小组也觉得，就是说，大家都觉得，第三条这样的提法比较妥当，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是主要的矛盾，概括了问题的性质。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毛泽东再次更加明确的提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但是,不知是什么原因,他的这番如此明白清晰的发言,并没有引起与会者的积极响应。接下来,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人的发言,对“十七条”提了一些具体修改意见。但是,对运动的性质都没有再说什么。

看大家没有什么意见了,毛泽东又开始说话了:“我是没有话了。如果要还讲几句,就是请你们回去找党章看一下,宪法第三章也看一下,那是讲民主自由的。有一本书,叫《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第100页到104页,你们去看一看。不要犯法呀,自己通过的,又不遵守。又有一本书,叫《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章的第一条,这个条文叫第八十五条,中间讲到,‘在法律上一律平等’。然后第八十七条讲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比如我们这些人算不算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如果算的话,那么有没有言论自由?准不准许我们和你们讲几句话?有没有出版自由?现在文化部它就只许那些人有出版自由。这个出版机关,我看得整顿一下,许多抓在坏人手里。集会自由,譬如我们现在这个河北厅不是在这里集会吗?这叫集会吧?不算呀?”

周恩来答:“算集会。”

毛泽东:“还有结社。现在我们要结社,就是要把那些四不清太严重的人弄出去,要结一个共产党。要把支部整顿好,把基层党委整顿好,把各级党委也整顿好。这叫结社。游行、示威,早几天我们不是在天安门搞过游行示威吗?那是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刚果。我是历来赞成对于我们官僚主义者举行示威的。”

最后他问大家:“同志们有话没有?有话则长,无话则短。不要耽误你们的时间,我又变成个官僚主义。”

这天,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彭真批发了中央811号文件:《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十七条”。

按原定计划,中央工作会议在这一天闭会,于是,各省委书记也开始陆续返回。但是,通过“十七条”和闭会时,毛泽东没有参加。

这天晚上,毛泽东的夫人江青请陶铸和陶铸的夫人曾志看她组织

改编的现代京剧《红灯记》。曾志是毛泽东前妻贺子珍的老战友,井冈山时就跟着毛泽东,与毛泽东无话不谈。陶铸是中共上层有名的直爽人,笔杆子也可以,一贯紧跟毛泽东。江青每次到广东都受到陶铸和曾志的热情接待,陶铸和江青说话也不拘束,是党内高层中为数不多的敢在大庭广众面前数落江青几句的人。

开演前,休息室内,毛泽东见到陶铸就问:“你们的会开完了吗?我还没有参加呢就散会啦?有人就是往我头上拉屎尿!我虽然退到二线,还是可以讲些话的吗!”接着又问陶铸:“你们开会的人是不是都已经走了?”

“有的已经走了。”陶铸回答。

毛泽东斩钉截铁的说:“告诉他们,走了的赶快回来!”

这时,服务员走了进来说:“主席,演出快开始了,入席吧?”

“好的。”毛泽东一边答应着,一边和陶铸他们向大厅走去。

戏开演了,江青一边向陶铸介绍着剧情,一边对陶铸说:“有人反对京剧改革,我就是要搞京剧改革!”

又是一个“有人”!指谁呢?陶铸和曾志隐约感到是说刘少奇,可又不敢往这方面多想。当年高岗就是因为毛泽东批评了刘少奇,以为刘少奇不行了,四处联络,想取刘少奇而代之,结果被搞下去了。

但是,需要把毛泽东“通知省委书记返回”的意见转告刘少奇。陶铸毕竟只是地方大员,还不能召集各省的领导进京开会。于是,演出结束后,他先找了主持书记处日常工作的彭真,并约了彭真一起来到刘少奇的家中,汇报了毛泽东的意见,并劝告刘少奇,要注意尊重毛泽东。

刘澜涛等人也深为毛泽东和刘少奇二人的关系而担忧,毕竟关系到党内的团结。他和中央组织部部长安子文求助于开国元勋朱德元帅和贺龙元帅:

“朱老总啊,您看主席为少奇同志在会上插话生气了。这样下去会影响工作,您是不是和少奇同志谈谈,以大局为重啊。”

朱德和贺龙一起来到刘少奇的家中……

12 月 30 日,毛泽东将《十七条》中关于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一段话作了修改:“这些当权派有在幕前、有在幕后的”,“在幕后的,

有在下面的,有在上面的”,“在下面的,有已经划了的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也有漏划了的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

12 月 31 日,毛泽东在修改稿上批示说:“照改的(第二面倒数三行)文字,重印。请少奇同志阅后交机要室办。这是伯达同志建议的,我同意。如你也同意,则请交办。”

刘少奇同意,中央办公厅发出了 814 号文件,通知停止执行中央 811 号文件,称:这个文件“中央尚在修改中,请停止下发,并自行销毁。”

1965 年 1 月 3 日下午,毛泽东出席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一次会议,会议选举刘少奇连任国家主席,宋庆龄、董必武为国家副主席。

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一次会议确定:国务院副总理林彪排名第一,取代了二届人大在副总理中排名第一的陈云。陈云退为其次,邓小平名列第三。

这天晚上,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河北厅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汇报“四清”情况,通知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也参加。再次当选国家主席的刘少奇走进人民大会堂北京厅时,发现夫人在场,愣了一下。

毛泽东在会上作了长篇发言,主要是讲《桃园经验》。

《桃园经验》是王光美在 1963 年 11 月至 1964 年 4 月间,带着河北省的“四清”工作队,在河北省抚宁县卢王宕公社桃园大队总结出来的经验。他们采取战争年代开辟新区的做法,先“访贫问苦、扎根串联”;进而在此基础上从小到大“组织革命的阶级队伍”;然后开展背靠背的揭发,进行清查,“洗澡放包袱”;再集中地和系统地进行阶级教育,开展对敌斗争;最后进行组织建设,掀起生产高潮。后来,王光美在河北省委工作会议上介绍了桃园经验,报告的题目是:《关于一个大队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经验总结》。

1964 年 8 月 19 日,刘少奇给毛泽东和党中央写了一封信,说:“王光美同志的这个报告,陈伯达同志极力主张发给各地党委和所有工作队的同志们。王光美在河北省委的记录稿上修改了两次,我也看了并

修改一次,现代中央拟了一个批语,请中央审阅,如果中央同意,请中央发出。”

8 月 27 日,毛泽东作了批示:“此件先印发到会各同志讨论一下,如果大家同意,再发到全国去。我是同意陈伯达和少奇同志意见的。”

根据毛泽东的批示,《关于一个大队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经验总结》及有关材料,又拿到中央局第一书记会议上讨论。大家都同意发出。自此,《桃园经验》风靡全国。

根据《桃园经验》的做法,工作队一开始就以对待“阶级敌人”的方式对待基层干部,因此,在实施过程中,肯定会扩大打击面,越搞越“左”,极大地伤害了农村基层干部。

在 1965 年 1 月 3 日晚间的会上,毛泽东一上来就用批评的口吻说:“有同志提出打歼灭战,怎么打?集中了 15000 人,搞一个小县。28 万人口,搞了几个月还搞不开。学习文件 40 天,不进村。我看是搞了繁琐哲学。我不赞成这种学习,到农村去可以学嘛。”

刘少奇解释说:“工作队集中学习文件是为了反右倾。”

毛泽东严厉批评说:“越学越蠢!反人家的右倾,结果自己右倾。我跟前的一个警卫员写信来说,学了 40 天文件,根本没有学懂。下去两个礼拜之后,才弄清了一些问题。听说还有好多怕,怕扎错根子,怕住错人家,怕干部捣鬼。怕这个,怕那个,那怎么行?”

毛泽东说的这个小县是河北省新城县,这是王光美正在抓的一个“四清”点。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也参加了新城工作团,下去前,毛泽东对他们提出三点要求:一是化个假名;二是不要当官;三是深入群众,了解真实情况。因此毛泽东对新城的情况十分清楚。

他继续说“你一个新城县,28 万人口,下去 15000 人,还说人少了。哪里来这么多的人?哪里要这么多的人?我看是人多了。搞人海战术不行。你只依靠工作队,为什么不依靠那个县的二十几万人?比如二十八个人中有一两个是坏的,还有二十六七个是好的嘛。为什么不依靠这些人?如果依靠好了,我看十几个人就行了。可能十几个人不行,但我们革命从来不是这么革的。你一万五千人扎根串连,什么扎根串连!冷冷清清。”

“……没有虱子不要硬找。没有虱子能找出虱子来?这样集中力

量打歼灭战,我看歼灭不了敌人。现在这个搞法同我们过去搞的不一样。”

他说:“一进村就宣布几条,开门见山。一条是对社员宣布,我们不是来整你们的,我们是整党、整干部队伍,不是整社员。”

“对干部也要宣布来意。小队、大队、公社干部,无非是大、中、小、无,多吃多占,有多的,有少的,也有没有的。贪污几十、百把块,两百块的,你们自己讲出来,能退就退,不能退的,群众批准,拉倒!其他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大的怎么办?坦白退赔的,不戴帽子,千把块的也可以赦免。表现好的,群众同意的,还可以当干部。”“真正的领导人要在斗争中才能看出来,你在访贫问苦中看得出来?我不相信。在斗争中群众会选出自己的领袖来。面上,有灾的救灾,无灾的清工分。要注意分配,抓冬季生产,‘四清’放在后面。有不清者清之,无不清者不清,没有虱子就不要硬找。运动的方法,一是不要读文件,二是不要人多,三是不要那样扎根串连。一去就开会,有事就开,无事就散。开会不要长,有话则长,无话则短。要让群众去搞。不相信群众,只相信工作队,不好。革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分子的命,要搞大的。反革命分子也要整那些最坏的最厉害的。干部有的不要撤职,而是调职,还可以到别处革命去嘛!总而言之,第一依靠群众,不能依靠我们这些工作队。”

毛泽东说:“要那么多工作队干什么,小站有一个陈伯达就行了。”转脸问刘少奇:“你在安源不是一个人吗?”

刘少奇说:“有群众。”

毛泽东接着说:“你只依靠工作队,为什么不依靠那个县的二十几万人?……要让群众去搞。不相信群众,只相信工作队,不好。‘四清’,要给群众讲清楚,是清干部、清少数人,不清社员。要搞大的,小的要刀下留人。反革命分子也要整那些最坏最厉害的。”

当刘少奇说“四清”运动的结果就是贫下中农占优势和建立一个好的领导核心时,毛泽东说:“这就行了。工厂里也是可靠的工人占了优势,就行了。”

接着,与会者一起议论,大家都同意毛泽东的意见。

邓小平说:“方法问题很重要,我赞成主席的意见。我们一些大干

部,如中央局书记、省委书记蹲在一个小队、大队,太长了不一定有利。至少要着眼一个县,还有你的全省嘛,全局嘛。蹲点的经验并不一定全面。现在蹲下去了,是好的。现在要慢慢上来管广一些,这也是可以搞快一些的方法。陷到里面出不来,就不好了。”

刘少奇在会上作了检讨。当他说道:“毛主席讲话时我不该插话,这是对主席不尊重的表现……”时,毛泽东说:“不是尊重不尊重的问题,而是重大的原则分歧——修正主义与反修正主义的重大分歧!”

1 月 5 日下午,再次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毛泽东继续不点名地批评刘少奇。

“七届二中全会指出,国内主要矛盾是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资本主义同社会主义的矛盾。那个时候还没有修正主义。八大一次会议、二次会议都是这样说的,杭州会议制定十条,一直都是搞社会主义,整个运动是搞社会主义教育。怎么来了个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敌我矛盾与人民内部矛盾的交叉?哪有那么多交叉?什么党内外交叉?这是一种形式,性质是反社会主义嘛!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1 月 6 日,与会的省委书记陆续又来到北京。中央工作会议继续进行,主要是分组讨论,修改“十七条”,由邓小平、彭真、陈伯达负责。毛泽东 1 月 3 日、1 月 5 日的两次讲话在各小组进行了传达。一些人已经意识到,这次要讨论的可能不仅仅是工作方法问题。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现在看来,有些问题是比较明白了,但还不是全都明白了!还得再听听,看看。总之问题是较大的,不只是方法问题。”

中南海迎春堂陈伯达家,几位“秀才”聚集在那里,由陈伯达执笔,整理这次中央工作会议纪要。

门前,一辆小轿车随时准备出发。

“秀才”们讨论一阵,陈伯达写出几页,马上让通讯员乘小轿车出发,驶出中南海西门,来到约一公里左右的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刷厂,立即付排。

小轿车回到迎春堂时,按照前几页手稿排出来的清样,已由通讯员带回来了。如此这般,陈伯达在紧张地进行“流水作业”。

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刷厂以高质量排版,连一个标点符号都不准排错。

文件全部写出,排好,陈伯达亲自步行给毛泽东送去。

从9日起,中央工作会议分组讨论新的纪要稿。一边讨论,一边修改。

# 第4回：生活会，刘少奇诚恳检讨 难求索，毛泽东重上井冈

1月13日下午15时30分，刘少奇召集了一个党内生活会。参加会议的有：周恩来、邓小平、彭真、贺龙、陈毅、罗瑞卿、陈伯达、李井泉、李雪峰、刘澜涛、宋任穷、谢富治、王任重、魏文伯、李葆华、谭启龙，共17人。刘少奇在会上主动做了自我批评，检讨了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自己在思想上与毛泽东的差距，并对运动中发生的问题承担了责任。

刘少奇是中共党内享有很高威望的领导人之一。开这样的生活会，使会议参加者深受感动。王任重当天日记的标题就是“难忘的一天”。他写道：“党的领袖和他们领导下的干部在一起开党的生活会，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这在全世界党的历史上也是少见的。”

经过毛泽东改定后的文件在1月14日交会议讨论通过后，便以中共中央名义印发全党。这份文件，充分体现了毛泽东的意志，否定了刘少奇的意见。文件的标题为《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集的全国工作会议讨论纪要》，总共二十三条，后称“二十三条”。

“二十三条”和“十七条”最大的不同，是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性质的认识：

在“十七条”中，对这个问题的表述有3种提法：(1)“四清”和“四不清”的矛盾；(2)党内外矛盾的交叉，或者是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交叉；(3)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

这3种提法包括了刘少奇和毛泽东的不同意见。

“二十三条”则明确指出：“十七条”的“前两种提法，没有说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根本性质。这两种提法，不说是什么社会里的四清四不清矛盾，也不说是什么党的内外矛盾交叉，也不说是什么历史时期、什么阶级内容的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交叉。从字面上看

来,所谓四清四不清,过去历史上什么社会里也可能用;所谓党内外矛盾交叉,什么党派也可能用;所谓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交叉,什么历史时期也可能用;这些都没有说明今天矛盾的性质,因此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最后一种提法,概括了问题的性质,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是同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从一九四九年七届二中全会以来关于整个过渡时期存在着阶级矛盾、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两条道路斗争的科学论断相符合的。”“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进一步地巩固和发展城乡社会主义的阵地。”这就充分肯定了毛泽东的提法,批判了刘少奇的提法。

会议结束后,刘少奇又找毛泽东谈话,作自我批评,并连续在家中举行部分中央领导参加的党内生活会,委托陈伯达把每天生活会的情况向毛泽东汇报。在不久后举行的一次小型会议上,毛泽东当着许多中央领导人的面说:“我批评少奇同志了,但你们今后还是要听他的话哟。”

众人心中提起的千斤巨石落了地。

1 月 14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集的全国工作会议结束。

随着“二十三条”的下达、贯彻,“四清”运动中的一些过“左”的做法得到了纠正,解放了大批基层干部,受到广大基层干部的欢迎,城乡一度紧张的局面开始有所缓和,有的地方出现新的生产高潮。同时,各地在开展运动中,强调突出政治,强调用毛泽东思想指导四清,掀起了学习毛泽东著作的热潮,从而构成了这一阶段运动的独特景观。“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开始逐渐成为“四清”运动的重点。

但是,此时的毛泽东业已感到,已经开展的“四清”运动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政权的巩固问题,群众没有发动起来,谁来监督这些当权者? 他对这场运动逐渐失去了兴趣。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时的讲话中,毛泽东已透露出这种想法:“你只要不触及全面问题,枝枝节节、修修补补不行。”

毛泽东在思索,他希望冲破现有的体制,找出一种方法,能给予人民最广泛的民主,监督当权者的权力,确保共产党的事业千秋万代继

承下去……

他翻阅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经典著作,企盼能找到答案;他研读了中国历代帝王留下的浩瀚文献,希望能从这些治国方略中获取灵感。

他似乎得到了某些启示,仔细想来,又很茫然……

老祖宗没有给他留下多少现成的东西,马克思、恩格斯对社会主义的描述甚少;列宁创建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遗憾的是,还没有来得及建设就过早的离开了人世;斯大林继承了列宁的遗志,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巩固和建设起来,可惜,却发展成了一个为少数人服务的、新的官僚国家机器。在苏联,马克思、列宁所期望的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政权荡然无存。

看来,还是要靠自己。

1 月 15 日,中央工作会议结束的第二天,毛泽东又在洛阳拖拉机厂蹲点的第八机械工业部部长陈正人 1964 年 12 月 4 日给国务院主抓工业的副总理薄一波的一封信上做了批示。陈正人给薄一波的信中说:

经过蹲点,“开始发现了厂里从不知道的许多严重问题。这些问题,如果再让其继续发展,就一定会使一个社会主义的企业有蜕化为资本主义企业的危险。”

“特别值得重视的是:一部分老干部在革命胜利有了政权以后,很容易脱离群众的监督,掌管了一个单位就往往利用自己的当权地位违反党的政策,以至发展到为所欲为。而像我们这些领导人,官僚主义又很严重,对下面这些严重情况又不能及时发现。这就是在夺取了政权之后一个十分严重的危险。”

薄一波在旁边批道:“这是个问题。所以成为问题,主要是由于我们多年来没有抓或很少抓阶级斗争的缘故。”

毛泽东批道:“我也同意这种意见。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这些人是已经变成或者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他们怎么会认识足呢?这些人是斗争对象、革命对象,社教运动不能依靠他们。我们能依靠的,只是那些同工人没有仇恨,而又有革命精神的干部。”

陈正人在信中还写道:“干部特殊化如果不认真克服,干部和群众生活距离如果不逐步缩小,群众是必然会脱离我们的。”

毛泽东在旁边又写了一段批语:“如果管理人员不到车间、小组搞‘三同’(指同吃、同住、同劳动),拜老师学一门至几门手艺,那就一辈子会同工人阶级处于尖锐的阶级斗争状态中,最后必然要被工人阶级把他们当作资产阶级打倒。不学会技术,长期当外行,管理也搞不好。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是不行的。”

陈正人在11月25日《关于在洛阳拖拉机厂蹲点的报告》上谈到,这个厂和农机工业部门相当多的一部分干部中,尤其是在不少企业的领导干部中,相当普遍地存在着对于敌情估计不足,对于企业内部存在的严重问题认识不足,特别是对于当前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性认识不足。

毛泽东在陈正人报告的这段话后批注:“这些人是已经变成或者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他们怎么会认识足呢?这些人是斗争对象,革命对象,社教运动绝对不能依靠他们。我们能依靠的,只有那些同工人没有仇恨,而又有革命精神的干部。”

在印发这段批注的时候,薄一波在“这些人”的后面加了一个注释:“指那些企业领导人中坚决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

陈正人是井冈山老战士,1928年任中共江西遂川县委书记,新中国第一任江西省委第一书记。1964年10月上旬,时任国务院八机部部长的陈正人到洛阳拖拉机厂蹲点搞调查研究。工厂领导考虑他是老同志、年龄大、身体有伤、蹲点时间较长,安排他住宾馆,他不同意,住招待所,他再次拒绝,自己把铺盖放进精密铸造车间生活间,和工人们住在一起。白天以装配车间工段作为劳动基地,一日三餐和工人一道排队吃大食堂,没有丝毫的特殊化。他在工厂学会了开拖拉机、操作和修理机床,交上了不少工人朋友,深得工人们的爱戴和拥护。

毛泽东深深赞同这位井冈山战友的认识,这几年,他感到不少领导干部当官久了,不愿意深入群众,做起了老爷…… 因此,他强烈要求领导干部深入工厂农村,与工人农民实行“三同”。但是,他觉得,他的话在北京很难真正的贯彻下去,很多人都是在应付他。

“官官相护呀!”他气愤,又有些无奈,还有一种大权旁落的感觉。

1965年3月,毛泽东离开了令他感到郁闷的北京,他的专列沿着京广线风驰电掣般地向南方驶去。3月16日下午,毛主席专列到达武昌,悄悄停靠在余家头一所战备物资仓库里。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省长张体学早已在此恭候,看见毛泽东下车,他们大步迎了上去,说了声:“主席好!”

毛泽东笑着和他们握了握手。

没有寒暄,也没有其他人迎接。毛泽东不喜欢那一套。几辆小车轻车简从、毫无张扬,驶出军用战备用品仓库。经小东门、中北路,开往东湖路,从东湖路驶进湖北省委东湖客舍大院,过“百花”、“南山”,最后停在东湖边上的梅岭一号。

沿途没有戒严,也没有一个武装人员。湖北省公安厅警卫处接到中央警卫团关于毛泽东将来武汉的指示后,只是迅速启动了一级警卫。所谓的一级警卫,就是省市公安厅、局、各区公安分局、派出所、户籍民警和居委会四级联网,对辖区内普通老百姓任其自由活动,“五类分子”,即当时的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劳改释放犯、右派都给予不动声色地监控,对外来人口予以疏散,布置“三红”,即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积极分子,监控“五类分子”。不用任何行政成本,效率极高。

梅岭一号是20世纪60年代初期湖北省委修建的一处平房。内有十间大小不等的房间,空间比较高大,内部装饰朴实无华。毛泽东、刘少奇、董必武到武汉,都在此下榻过。此时,毛主席一跨下车,迎面几张熟悉的面孔便开出灿烂的花瓣。梅岭一号的工作人员金文骏、邬素英、王天亮、化验员小周,站在大门口,像迎接亲人一样迎接自己的领袖,毛泽东则高兴地伸出右手,笑着说:“同志们好啊!”

“主席好!”“主席好!”几个青年人握住毛泽东的大手,笑得非常高兴。

王任重、张体学陪同毛泽东走进梅岭一号,穿过接见厅、小会议室,在书房里坐了下来。汇报大约一个多小时后打道回府,没有在梅岭用餐。梅岭一号、二号也没有任何“接风酒宴”。毛泽东坚决反对地方搞迎送接风这一套,谁也不敢献一点儿“殷勤”。

一天,毛泽东和几个工作人员漫步登上湖北的洪山,眺望山下滚滚东去的长江,他又陷入了沉思……

突然,警卫人员惊呼,“对面山上的房子着火了!”

沉思中的毛泽东望着熊熊燃烧的草屋,忽然冒出一句:“烧的好!”

随行人员十分不解,忙问:“为什么呀,主席?”

“不破不立嘛。旧的不去,新的不来。草屋烧了,可以盖瓦房,盖高楼。”不打碎现有的旧体制,人民享有真正民主的新体制又怎么建立起来呢?可是,要打碎自己亲手创建的成果,又会是怎样一种心情?

毛泽东面对滔滔江水,随口咏出:“霸主孤身取二江,子孙多以百城降。”

“主席又要写诗吗?”跟在身后的中央警卫局副局长张耀祠问。

毛泽东说:“不是。这是王安石的诗,是讲后继有人无人的问题。我们共产党人也要考虑江山将来变不变色呀。现在苏联已经变色了,我们党内也有修正主义……”

张耀祠说:“中国的老百姓在旧社会受苦受难深重,就是有人想叫他们走回头路,恐怕也难……”

“问题不是这样看,”毛泽东对身边的人说:“中国老百姓受苦受难深重,一旦过上好日子,也会忘乎所以。”

44 天后他离开武汉到长沙。

5 月 21 日,刚刚在长沙游完长江的毛泽东再从长沙出发,经株洲、醴陵、攸县、茶陵、莲花、永新、宁冈,沿着 1927 年秋收起义之路重上井冈山。

井冈山,毛泽东的事业真正的起步是从这里开始的。没有井冈山就没有毛泽东的今天,就没有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今天,就没有中国共产党的今天。站在井冈山黄洋界上,毛泽东望着茫茫云海,漫山杜鹃,心潮澎湃。38 年前,他将一支濒临破碎的共产党武装带到了这里,那时,是何等的艰难,多少人不辞而别;多少人壮烈牺牲;他不屈不挠,百折不回,硬是将这支弱小的武装由小到大发展起来,这才有了今天的政权。如今,他担心自己和战友们亲手创建起来的政权会重新变成欺压人民的政权。怎样防止这种情况发生?是否需要打碎自己亲手创建的政权另起炉灶?有多少人会赞成和支持这样做?他不知道。

但是,他仍然要努力!否则,井冈山的路不是白走了吗?38 年前那么困难都走过来了,现在比那时候的情况要好许多。

# 第5回：反特权，部队取消军衔制 忆往昔，胸中已酿万丈澜

在去井冈山的列车上，毛泽东特地邀请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和他的妻子唐慕兰到他的专列休息。

毛泽东兴奋地望着窗外一望无际的农田，在微风轻抚下，荡漾着层层叠叠的绿波。他心情舒畅地说："今年的早稻收成会不错吧。"

张平化认真地回答："主席对农业恢复时间的判断是正确的。"

毛泽东说："问题不在于谁的判断正确，在于包产到户还是农业集体化。这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如果无产阶级不加强领导，不做工作，就无法巩固集体经济，就可能走到资本主义的邪路上去。包产到户，短期内可能会增加一些粮食，时间长了，就会两极分化，资产阶级就会重新起来，剥削劳动人民。"

"所以主席在北戴河会上说，搞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是一种阶级斗争。"张平化答道。

"对。客观上就是阶级斗争。现在有些人不愿意承认它。我找了一些同志谈话，有人听说我国还有阶级存在，大吃一惊。资产阶级从来不承认有阶级存在，说阶级斗争是马克思捏造出来的。孙中山也不讲阶级，只说有大贫、小贫之分。还有没有阶级？对我们共产党人来说，这是个根本问题。一部文明史，就是阶级斗争的历史。现在无产阶级掌权了，不让资产阶级复辟。资产阶级掌权，不让无产阶级起来，不是你压迫我，就是我剥夺你，这就是阶级斗争嘛。不过形式有所不同，资产阶级嘴里不承认，实质一样。我们共产党的第一课就是阶级斗争，血淋淋的阶级斗争。"毛泽东继续说。

张平化用力地点头。

毛泽东笑了，吸了一口烟说："我的人生第一课也是阶级斗争。1906年底这条铁路上萍乡、浏阳、醴陵等地爆发了起义。声势很大，涉及周围十几个县，衡山、平江、万载、宜春、修水，好几万人，连韶山小山

沟都震动了,我父亲做小生意半路打道回府。可惜不到一个月起义失败了。火车运来清军,抓住造反的人,挖心而食,杀人像割稻子一样。起义军有个领袖叫刘道一,是个同盟会会员,20多岁,后被人出卖,宁死不屈,头被砍了四次才落下,惨烈得很。我从小印象最深的就是这件事,官逼民反。”

毛泽东的目光依然静静地注视着窗外,人民公社的稻田无声地伸向远方……他缓缓地回忆起1927年在湖南考察农民运动,回忆第一次大革命的失败……他的声音带着一种苍凉,一种深情。他说:“我们共产党人慢慢从血的教训中懂得革命要成功,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总结前人失败的教训。转回来说,当年安源大罢工吸取了萍浏醴起义失败的教训。秋收起义、井冈山斗争也是接受了大革命失败的教训。”

这个失败的教训是什么?毛泽东严肃地告诉张平化:“什么时候都不能忘记阶级斗争,阶级斗争从来都是你死我活的。”

张平化陪同毛泽东来到了井冈山。他本来准备在井冈山陪毛泽东多呆几天,因有会议,需要提前下山。他们夫妇前来向毛泽东辞行,毛泽东将他们一直送到门外。当张平化提出:“湖南的同志想和毛泽东在井冈上上照张相”时,毛泽东欣然同意。照完相后,湖南的小车队缓缓起步,这时,张平化从汽车的后视镜中突然发现,毛泽东也一步步地走下宾馆的台阶,随着已经启动的车队走起来。

“老人家是要步送我们下山,这如何担当得起。”张平化赶紧叫停车。他下了车,跑到毛泽东跟前说:

“主席,这可使不得,您一夜没睡,还是赶紧回房休息吧。”

毛泽东挥了挥手说:“有得关系。你们这么多人那么远送我上井冈山,我走几步送送你们,有什么不行?快上车吧。”

张平化知道再说也没有用,他含着泪对毛泽东说:“请主席保重!”却又迟迟舍不得上车。

毛泽东大声地对他说:“上车吧。你不要忘记我在火车上对你说的话,我为什么把包产到户看得那么严重,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农村所有制的基础如果一变,我国以集体经济为服务对象的工业基础就会动摇,工业产品卖给谁嘛!工业公有制有一天也会变,两极分化快得很,帝国主义从存在的第一天起,就对中国这个大市场弱肉强食,今天他们在各个

领域更是有优势,内外一夹攻,到时候我们共产党怎么保护老百姓的利益,保护工人、农民的利益?!怎么保护和发展自己民族的工商业,加强国防?!中国是个大国、穷国,帝国主义会让中国真正富强吗?那别人靠什么耀武扬威?!仰人鼻息,我们这个国家就不安稳了。”

张平化激动地望着毛泽东,大声地回答说:“主席,我懂了。”

湖南的小车队再次启程下山,张平化回头看见,毛泽东的大手还在摆着,大步还在走着……泪水在张平化的眼眶中转悠。

送走张平化后,下午两点多钟,在井冈山茨坪宾馆,毛泽东又约中央办公厅副主任、中央警卫局局长汪东兴、江西省委书记刘俊秀、王卓超谈话。他说:

“昨天散步回来想了很多。井冈山道路的探索是中国革命最关键的一步。为了创建这块革命根据地,不少革命先烈牺牲了。他们是一批有信仰、有抱负的年轻人。牺牲时都只有二十多岁呀!”毛泽东吸了一口烟,继续说道:

“一想到建立红色政权牺牲了那么多的好青年、好同志,我就担心今天的政权。苏联的政权变了颜色,苏联党内有个特权集团、官僚集团,他们掌握了国家的要害部门,为个人捞取了大量的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一般党员和普通老百姓是没有什么权利的。你提意见他们不听,还要打击迫害。”

“我们国家也有危险,官僚主义作风反了多次,还是存在,甚至比较严重,官僚主义思想也比较严重。打击迫害、假公济私的事有没有?这样的事情,你们知道得比我多。但报喜不报忧,这也是官僚和封建东西。做官有特权、有政治需要、有人情关系。县官不如现管,假话满天飞。”

“我很担心高级干部出现修正主义,中央出现修正主义怎么办?有没有制度管住他们?当然,像‘二十三条’讲的,这里绝大多数干部包括党的高级干部还是个认识问题、教育提高的问题。怎样教育提高?”

“现在高干子女特殊化成了正常化。我侄子毛远新在哈军工读书,他们那个学校高干子弟比较多,有些还是保送的。毛远新高中毕业时也被保送到哈军工,我不赞成,才又去考。考上了清华,第二年转过去。陈赓那时还活着,当校长。他们放假回家,黑龙江省委还请哈

军工高干子弟吃饭,工农子弟就不请嘛!这说明了什么问题?这和我们井冈山时期提倡的东西不一样。条件好了,共产党掌权了,过去的优良作风还要不要继承?怎样继承?”

他若有所指地说:“主要是看路线对头。战争时期,检验路线正确不正确,比较容易,王明说自己的路线正确,根据地是整片整片失去嘛!张国焘说自己路线正确,八万人过了两次草地,大队伍被打得七零八落。和平时期检验路线正确不正确,要难得多。这个胜仗和败仗,不光看有哪些成绩和错误,还要看举什么旗帜。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张国焘的路线不对,在一定的时间内,比我们的势力还要大,但长久地看,就不行了。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也可能会是这样。党内对这个问题,还没有充分认识。我们反复说,中国还存在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危险性。苏联已经是修正主义当道了嘛。”

汪东兴回答说:“我们国家谁走资本主义道路,全党全国都不会答应。”

毛泽东缓缓地说:“事情不是那么简单,人家资本主义制度发展了几百年,比社会主义制度成熟得多,但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中国的人口多、民族多,封建社会历史长,地域发展不平衡,近代又被帝国主义弱肉强食,搞得民不聊生,实际四分五裂。我们这样的条件搞资本主义,只能是别人的附庸。帝国主义在能源、资金许多方面都有优势,美国对西欧资本主义国家既合作又排挤,怎么可能让落后的中国独立发展,后来居上?过去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今天走资本主义道路,我看还是走不通。要走,我们就要牺牲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这就违背了共产党的宗旨和井冈山的追求。国内的阶级矛盾、民族矛盾都会激化,搞不好,还会被敌人所利用。四分五裂,危险得很。印度不是分裂了吗?”

毛泽东问:“井冈山的好制度、好作风是什么?”

几个人异口同声地说:“艰苦奋斗。”

毛泽东笑了,慈爱又无奈地笑了。

“你们再想想,”毛泽东说,“说艰苦奋斗只是一个方面,只是一点,还差两点,从制度方面想。”

汪东兴一拍前额,说:“支部建在连上。”

毛泽东点点头,继续说:“在井冈山时,我们摸索了一套好制度、好作风,现在比较提倡的是艰苦奋斗,得到重视的是支部建在连上。忽视的是士兵委员会。支部建在连上,随着我们掌握政权,现在全国各行各业都建有党的组织,成为领导机构。党的力量加强了。但自觉接受群众监督,实行政治民主,保证我们党不脱离群众,比井冈山时士兵委员会就要差多了。全国性的政治民主更没有形成为一种制度,一种有效的方式。井冈山时期士兵委员会是有很大作用的。”

他重新讲到《井冈山斗争》一文中他写过的话:“中国不但人民需要民主主义,军队也需要民主主义,军队的民主主义制度,将是破坏封建雇佣军队的一个重要武器。”他说:“全国都需要推行政治民主。”

刘俊秀用请教的语气问:“现在工厂不是有工会,农村有贫下中农协会,这和士兵委员会是不是差不多的组织?”

毛泽东说:“两者不一样,士兵委员会可以监督连长、营长、团长的,它有很大的权利。现在工厂的工会真的可以监督厂长、书记吗?谁又来监督我们的市委书记、省委书记?谁来监督中央的领导,中央出修正主义怎么办?我们的制度,我们的政治思想教育都有些不完善的地方,特别是在上层建筑领域。”

毛泽东继续说,早几年他就说过,绝不要实行对少数人的高薪制度。应该逐步缩小党和政府工作人员同人民群众之间的个人收入的差距。防止一切工作人员利用职权享受任何特权。井冈山精神不仅仅是艰苦奋斗,士兵委员会和支部建在连上这两条一样深远。它们是井冈山革命精神的三个支点。

就在这一天,5 月 25 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发表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取消解放军军衔制度”副题为“促进人民解放军更加革命化的重大措施”的文章。其内容提要:“国务院对解放军新的帽徽、领章和部分军服样式做出决定,国务院决定中指出,这一决定是为了充分体现我军是伟大的党、伟大的毛泽东思想领导下的伟大军队的革命精神和光荣传统,做到三军一样,官兵一样。”

从着装上,井冈山官兵一致的作风回来了。在思想上,井冈山的革命精神能不能够在全军全党重新焕发出“过去战争时期那股劲,那股革命热情,那股拼命精神”?党内军内各级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能

真心拥护取消军衔制,自觉放弃各种特权吗?……

毛泽东被崇高的理想所激励,又为党内军内某些现象忧虑着。

久有凌云志,
重上井冈山。
千里来寻故地,
旧貌变新颜。
到处莺歌燕舞,
更有潺潺流水,
高路入云端。
过了黄洋界,
险处不须看。

风雷动,
旌旗奋,
是人寰。
三十八年过去,
弹指一挥间。
可上九天揽月,
可下五洋捉鳖,
谈笑凯歌还。
世上无难事,
只要肯登攀。

毛泽东在井冈山上写下了这首《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抒发着自己的情怀:

“可上九天揽月,能下五洋捉鳖”,如此大的气魄和胆略,还怕什么呢?困难是会有的,越是困难越要试试,“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

湖南省委书记张平化在井冈山时要向他汇报一下湖南省“四清”运动的情况,毛泽东说:“不用汇报了,情况我都知道。现在看来光搞社教运动不能完全解决问题。”

毛泽东要为他的理想奋斗和拼搏,此时,在他心里正在酝酿着一场大的风暴……

# 第6回：说海瑞，吴晗领命几多变 觉端倪，遍京城难觅知己

1965年8月，北京中南海游泳池，江青拿着一摞稿件来到毛泽东身边，对他说："主席，这是上海姚文元写的批判吴晗《海瑞罢官》的文章，您看看。"

"哦？"毛泽东接过江青给他的稿件。

"这可只给你一个人看啊，你不要跟别人讲。"江青嘱咐说。

"为什么？"毛泽东问。

"总理、康生一知道，就要告诉刘少奇他们，他们会不让这篇文章发表的。"江青说出了她的担心。

毛泽东没有说什么，开始翻阅姚文元的文章。很快，他就被姚文元的文章所吸引。文章是用阶级斗争的观点分析了《海瑞罢官》中的问题，特别是结合1962年以后出现的"单干风"、"翻案风"进行批判，这和他的思路是一致的。最近，他一直在思索一个问题，也是要向全党、全社会回答的问题，那就是：资本主义在社会主义国家复辟的问题。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在中国，资本家被消灭了，资本主义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没有了，资本主义为什么还会复辟呢？毛泽东的理论是：资产阶级思想还存在，还在影响着人们的行为，尤其是在文化领域、教育领域，这都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而这些知识分子大部分是解放前培养的，是由资产阶级的思想培养起来的，因此世界观还是资产阶级的，这是产生资本主义的思想来源。要改造他们，不仅是要改造他们的思想，还有他们的理论、学说。因此，要在这些领域进行革命，就要触动这些权威、专家。

他叫来江青，对她说："文章写的还可以，不过，有些地方还需要修改……"

吴晗，北京市副市长、著名的明史专家、教授、民盟副主席，为人谦

虚、收敛、低调,解放战争时期就支持共产党,多次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毛泽东曾在家中请他吃过饭,邓小平常请他到家里打桥牌,他与周恩来、刘少奇等中共领导人均关系甚佳。

说起他写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那还要从1959年4月6日说起。那天,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毛泽东主席的秘书胡乔木,约吴晗到他家,对他说:

"八届七中全会昨天刚在上海闭幕。在这次会上,毛主席赞扬了明朝的海瑞,号召大家学习海瑞敢于批评嘉靖皇帝的精神,不怕撤职,不怕开除党籍,不怕离婚,不怕坐牢,不怕杀头。还特别指示我要找几个历史学家研究一下,从什么角度,用什么方法宣传海瑞刚正不阿的精神。教授是明史专家,我想请你为《人民日报》写一篇介绍海瑞批评皇帝的文章。"

吴晗闻言,赶紧说:"哪里,哪里,我哪是什么专家,只是多看了几本书。既然毛主席号召向海瑞学习,我一定响应。回去我就写一篇,也是我的学习体会。"

吴晗很快写出了《海瑞骂皇帝》一文,用刘勉之的笔名,发表在1959年6月16日的《人民日报》上。文章刊登不到3个月,就发生了庐山会议彭德怀事件。参加庐山会议的胡乔木一回到北京,马上又找到吴晗说:

"毛主席这次在庐山会议上讲了,我们提倡的是'左派'海瑞,不是'右派'海瑞;是真海瑞,不是假海瑞。为了表示我们同彭德怀假海瑞的区别,是否应该说明真海瑞与假海瑞的不同,划清海瑞与彭德怀的界限。"

吴晗明白了胡乔木的意思。很快,他又写了一篇《论海瑞》的文章,发表在1959年9月21日的《人民日报》。在文章的结尾,吴晗特别注明:"我们今天需要的海瑞和封建时代的海瑞在社会内容上有原则的不同。……有些人自命海瑞,自封'反对派',但是,他们同海瑞相反,不站在人民方面……太阳里面找黑子,十个指头里面找那个有点毛病的,不及其余。"

吴晗是按照"庐山会议"的精神,不点名的批判彭德怀。在文章中,吴晗还特别指出,彭德怀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根本不是什么

海瑞”,以示与彭德怀的区别。

吴晗的这些文章在学术界引起了一番关于海瑞的讨论热潮。后来,在著名京剧演员马连良的再三恳求下,吴晗又花了一年多的时间,创作出《海瑞罢官》的京剧剧本,于1961年发表并正式上演。毛泽东看了演出后,在家里请主演海瑞的马连良吃饭,对他说:“戏好,演的也好。海瑞是好人。”

毛泽东还对马连良说:“《海瑞罢官》的文字写的也不错,吴晗头一回写戏,就写成功了。”

那天晚上,马连良回到家里,特地给吴晗打电话,告诉他毛泽东的夸赞,这让吴晗激动了好长时间。

既然毛泽东都赞扬了吴晗写的《海瑞罢官》,江青为什么还要批判呢?因为她发现了问题:

1962年7月6日,江青应邀观看了北京京剧团演出的《海瑞罢官》。演出结束后,她一言不发就走了,有心人似乎有一种不祥的感觉。果然,江青觉得这出戏像是影射彭德怀的事情,因为在戏院,她听见有人议论说:“彭德怀就是现在的海瑞……”

回到家,江青立即向毛泽东汇报:“主席,我看《海瑞罢官》有问题,像是含沙射影讽刺我们。现在社会上正埋怨缺粮缺菜,没有肉吃。他们偏偏这个时候在舞台上搬出海瑞,臭骂皇帝,是什么目的?这是借古喻今,要批判。应该停止公演。”

江青一上来就要停止公演,毛泽东甚不以为然,对她说:“你说停演就停演?”

“那是在攻击我们!”江青强调。

毛泽东没有接她的话,而是说:“有工夫你还是多看几本书吧!我还想保护几个历史学家呢。”

“那我保留意见总可以吧?”江青执拗的坚持自己的看法。

“你保留意见当然是可以的。”毛泽东也很民主。

由于长期与毛泽东一起生活、工作,江青对毛泽东的一些想法和思路了解得肯定比其他人更多一些。八届十中全会期间,她根据毛泽东的意见,约见了中宣部、文化部四个正副部长陆定一、周扬、姚溱和许立群,向他们传达了毛泽东对文化工作的意见:“现在舞台上、银幕

上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牛鬼蛇神泛滥成灾,问题严重;应该很好的组织批判。”

陆定一、周扬等人均表示一定认真落实毛泽东的指示精神。

这时,江青又谈起《海瑞罢官》这出戏。她问陆定一等人:“你们对《海瑞罢官》怎么看?我个人认为很有问题,也应该好好组织批判。”

陆定一想了想说:“对海瑞进行研究是毛主席提出来的,吴晗是一名历史学家,能够跨行业写京剧剧本,也是一次尝试,还是挺勇敢的,不好说批就批吧。”

江青马上摆了摆手说:“既然你们不同意,那就以后再说吧。”

一天,江青来到康生的家里商量京剧改革的问题。谈话中间,她突然问康生:“有一出新编历史剧,叫《海瑞罢官》,是北京市副市长吴晗写的。不知道康老看过没有?”

康生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中共资深领导人之一,也是中共党内公认的“理论家”。此时他听到江青提到《海瑞罢官》,说:“我知道他们写了这个剧本,但是还没有看过这出戏。你看有什么问题吗?”

江青笑了笑说:“等你看完我们再讨论吧。”

康生很快就让人安排看了《海瑞罢官》。当江青再来到康生家时,康生已经有了自己的意见。他对江青说:“《海瑞罢官》这出戏,严重地违反历史事实。历史上的海瑞可不是那样的。尽管海瑞是一个清官。对清官我们现在也要作历史的和阶级的分析。他对明朝的嘉靖皇帝可是忠心耿耿呀!”

江青笑了笑说:“看来你这个肃反专家还是没有看出根本问题所在。在我们党内,有一个人可是自称海瑞的,你知道是谁吗?”

康生说:“那还用问吗?彭德怀嘛,这是个老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他有什么资格自称海瑞?他只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王莽似的人物。这一点,我曾经和主席说过,彭德怀好像王莽。”

江青说:“不管彭德怀是什么人,党内可是有人把彭德怀当海瑞了。我就亲耳听到过这样的议论。我在这出戏上演的时候,在剧场里就有人说彭德怀就是当代的海瑞,总有一天会有人给他平反的。”

康生马上回答说:“彭德怀够格吗?根本不够格!”

想了想,他又说:“但是这说明了党内路线斗争的复杂性。我早就

听说,彭德怀要翻案,我们政治局里也有人支持他站出来工作。”

江青点点头说:“许多人在主席面前吹风,主席把这个问题压了很长时间。看来这个问题未必能压得住。因为国内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上上下下的谣言很多。不是有一出叫《窦蛾冤》的戏吗?那是伟大的戏剧家关汉卿的名作。说窦蛾被冤枉处斩时,发下三桩誓愿,一是血溅白练,二是六月下雪,三是让楚州地亢旱三年。我们国家从1960年开始也是连续三年历史罕见的大旱,有人就把自然现象加到彭德怀一伙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原因上了,说我们反右斗争是冤枉了他们。于是,也冒出一些自称要学关汉卿的所谓秀才和作家,迫不及待地要写戏、拍电影、出小说,等等。为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和代表人物平反、翻案。”

康生马上说:“我同意你的看法,对文化界的这场阶级斗争和思想斗争,我们可是千万不能放松警惕呀!”

随后,他又补充说:“不过,眼下批这出戏还不行,时机不成熟。”

1963年一次开会时,周恩来见到吴晗,突然问他:“吴晗同志,有人说你写的《海瑞罢官》有影射,是这样吗?”

“没有!没有!怎么会影射呢?”

“这样吧,你写个报告说明一下。”周恩来说。

“好!”吴晗回家后,立即将写作《海瑞罢官》的前后过程写了一份报告交给了周恩来。

时光很快到了1964年,康生来到毛泽东的书房:

“主席,您在八届十中全会上讲过,利用小说反党是一大发明。由此,我想到当时演的一出戏,是不是也有这个问题?”

“哪出戏呀?”毛泽东一边问,一边抽出烟递给康生。

“就是《海瑞罢官》。我考虑两三年了,这出戏似乎跟彭德怀有关系。海瑞在戏中逼着土豪退田,当时彭德怀不是也嚷嚷着要我们准许农民单干吗?59年庐山会议我们批判了彭德怀,这出戏却把彭德怀说成是海青天,这是在为彭德怀鸣冤叫屈,是要翻案哩。”

起初并没有太注意的毛泽东,听到这里,神色变得严肃起来。

康生看到毛泽东面部表情的变化,他沉默了,想听听毛泽东的意见。等了一会儿,毛泽东仍然没有说话,只是盯住香烟上的一点火光

在思索,康生考虑了一下,又说:“这只是我的一点想法,不一定成熟,提出来供主席参考。”

1964 年,毛泽东指示,将用来批判资产阶级权威的 39 个《文学艺术资料》发到党内县一级单位,其中就包括吴晗的《海瑞罢官》和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邓拓等人编写的《燕山夜话》等材料。材料发下去后,没有引起什么反响。

1964 年 6 月 5 日至 7 月 31 日,北京召开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表演大会,演出期间,江青看到《人民日报》文艺部编辑李希凡。这是位年轻的文艺评论家,1954 年,在他大学刚毕业,还只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小人物”时,就能勇敢的站出来批判著名“红学”权威俞平伯,受到毛泽东的表扬,一时名扬天下。江青看到他很高兴,就和他谈起了批判《海瑞罢官》的问题,希望他还能像当年一样,站出来批判《海瑞罢官》。

李希凡很高兴,但他当时正有别的任务,抽不出时间,而且他对吴晗的《海瑞罢官》根本不了解。江青只得作罢。

江青曾想找中央办公厅的戚本禹一起来写的。但当时他正在参加批判李秀成的讨论。

江青在北京又找了几个人,都不理想。

7 月 29 日,江青和毛主席一起乘车前往北戴河。30 日下午,二人一起登门探望在北戴河养病的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他也是深受毛泽东倚重的中共领导人之一。不过,此时的柯庆施已身患癌症,在 1964 年 3 月底住进上海华东医院,4 月 20 日做手术,6 月初出院,7 月 14 日晚饭后离开上海,坐火车来到北戴河休养。

# 第7回：交任务，姚文元慨然受命 七易稿，陈丕显充当信使

江青将她的想法和柯庆施说了，果然得到柯庆施的支持。他指派张春桥具体负责此事。

张春桥抗战期间，曾在柯庆施手下任《晋察冀日报》副主编，很受柯庆施赏识。全国解放后，柯庆施将张春桥调到上海，任上海《解放日报》社长兼总编。1957年，张春桥为柯庆施在上海党代会上起草的政治报告《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受到毛泽东的高度赞扬。毛泽东曾拿着这篇文章问周恩来："这样的文章你能写出来吗？"

周恩来摆摆手说："我写不出来。"

1958年，根据柯庆施的提示，张春桥写出了《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一文，引起毛泽东的注意，他在郑州会议上把张春桥和陈伯达并提，声名鹊起，他也由此被柯庆施提拔为上海市委常委。

1961年6月31日，《北京晚报》发表廖沫沙赞扬昆曲《李慧娘》的文章《有鬼无害论》。江青看后认为是大毒草，这一想法也深得柯庆施赞同。于是，由张春桥组织，在1963年5月6日的《文汇报》上发表了批判《有鬼无害论》的文章。这是江青最早发表的文艺批判文章之一。而后，张春桥又积极配合江青开展革命现代戏的创作，深得江青和柯庆施的信任。

对于柯庆施和江青这次交办的事情，张春桥十分认真。从此在他的办公桌上又多了一套《明史》，这曾使一些干部纳闷，张春桥怎么忽然对明史感起兴趣？

不过张春桥这次没有亲自动笔，而是向江青另荐上海一位"青年文艺评论家"——姚文元。

姚文元是旧上海著名文化人姚蓬子的儿子，曾写过批判胡风、冯雪峰、丁玲、巴金、艾青等许多中国著名作家的文章，此时已是上海著

名的左派文艺评论家,在文化圈里有些名气。1957 年,毛泽东在《文汇报》上看到了姚文元的文章《教条和原则——和姚雪垠先生讨论》,十分欣赏,在一次谈及文艺界问题的讲话中说:“……最近姚蓬子的儿子叫姚文元,写了一篇文章,我看是不错的。……”由此引起了大家注意。

1957 年反右斗争中。姚文元凭着敏锐的政治嗅觉,写出了《录以备考——读报偶感》的千字文章,刊登在《文汇报》上。他的这篇文章又被毛泽东看到了,当即通知《人民日报》在第一版上加编者按予以转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新闻节目中摘要播发。全国各地报纸也相继转载了这篇文章。从此,他一跃成为上海作协党组成员,反右派领导小组成员。柯庆施特别召见了姚文元,并将他调入市委,任上海市委《解放》杂志编辑部文教组组长,直接由张春桥领导。

姚文元还是个理想主义青年,他于 1958 年 9 月 11 日曾经写信给出版社,要求出版社不要再给自己寄稿费。他在给出版社的信中写道:

“上次你们收入论‘约翰·克里斯多夫’一文,汇来了稿费。这次务请不必再寄钱来了。一篇文章出版社成集又拿一次钱,无论如何是不合理的,这是资产阶级稿费制度的残余。如果自己将来成书,岂不又多拿一次钱。有什么工人生产一样产品‘拿两次’钱的吗?不发稿费,书的定价也可以低些。如果寄来,我也可以退回的。如果说这是‘制度’,那我就例外一下吧,这个制度反正可改的。”

1965 年 3 月的一天上午,姚文元刚进《解放日报》社上班,张春桥电话就来了,要他马上过去一下。

姚文元答应道:“好,我给报社打个招呼。”

张春桥说:“不用了,你直接来吧,如果报社领导问起,你到时找个理由就是了,此事要保密。”

姚文元于是便找了一个理由,骑着他那辆半旧的永久牌自行车来到上海锦江饭店。当他走进张春桥告诉他的房间,看见张春桥正极为恭敬的和一位带着眼镜、神态严肃的中年女人谈话,看见他进来,张春桥立即站起来,向那位女士介绍说:

“江青同志,这就是姚文元。”

随后,他又向姚文元介绍说:“这是江青同志……”

姚文元不敢相信,面前的这个女人就是毛泽东主席的夫人——江青?!

江青站起来,一边和姚文元握手,一边上下打量着眼前这位34岁的年轻人。虽然他身着略有泛白的蓝卡其中山装,足蹬草绿帆布胶鞋,朴素中略显寒酸,但是,那双透亮的金鱼眼睛和已显秃顶的大头,可以看出这是一个有着颇深文学造诣的人才。

出身上海小开的姚文元没有一点大少爷气息。他在学生时代就积极进步,信仰共产主义,深受共产党革命传统的影响,日常生活十分朴素,甚至有些落拓。他常年穿一身蓝卡其中山装,脚上不是绿胶鞋,就是一双圆口布鞋。肩上的草绿色背包里,除了书以外,时常可以翻到早上吃剩下来的面包等点心。他就以这身装束,到处走动,有一次,曾经步行到上海锦江饭店去参加一个重要会议,在大门口就被“挡驾”了:不让进。

江青一边打量着姚文元,一边说:“哦,姚文元同志,听主席几次提到过你,是无产阶级的红秀才、金棍子。最近在研究什么?”

江青让姚文元坐下,和他聊了起来。

“没有研究什么,按照市委的布置,对一些旧戏和作品组织批判。”姚文元略显惶恐的回答说。

“哦? 看过京剧《海瑞罢官》吗?”江青颇有兴趣地问道。

“还没有。”姚文元如实回答。

江青随手将一本登有吴晗《海瑞罢官》剧本全文的1961年1月号《北京文艺》,交给姚文元说:“这是吴晗写的《海瑞罢官》剧本。你看看。看完后我们再交流。”

从江青那里出来,张春桥向姚文元交代了江青召见他的目的和任务,并对姚文元说:“你可以先接手下来,至于具体工作中有什么困难,到时给市委反映。”

姚文元感到十分的荣幸,这可是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夫人亲自给他下的任务。同时,他也感到巨大的压力。因为批判的对象不同于过去那些文化人,吴晗毕竟是北京市的副市长,弄得不好,会是什么样的结果还很难说。这些顾虑,可能就是中宣部不愿意接受任务的原因。但

是,姚文元曾将自己与李希凡做过比较,他说:“李希凡是搞学问的,我是搞政治的。论旧学底子,我不如他,他毕竟是科班出身;论政治敏锐性,他不如我。我最大的兴趣是写杂文。李希凡是属于学者类型,我只想做一个革命战士。”

姚文元接受了批判《海瑞罢官》任务,他立即向《解放日报》社请假:“市委要我写个东西,要花些时间。报社的工作就顾不上了。”

在此之前,张春桥已给报社领导打了电话,说姚文元一段时间在市委有一定的“任务”,让他们不要安排他的工作。

但是姚文元对明史不熟,他希望再有个熟悉历史的人,帮忙查阅和核对资料。几天后,张春桥告诉姚文元,人已选好,是朱永嘉,复旦大学历史系青年讲师,对明史很熟,当时借调在上海市委写作班历史组,任组长。

姚文元直接来到丁香花园——上海市委写作班所在地找到朱永嘉,说市委布置他写文章,请朱永嘉帮忙。

朱永嘉最初是与复旦大学历史系的另外两个青年教师王知常、朱维铮一起,用“罗思鼎”的笔名,即做革命的螺丝钉之意,写了一些关于清朝乾嘉学派的文章,发表在报刊上。后来,历史系的青年教师吴瑞武也加入进来,自发组成了一个写作集体。1964 年,他们被上海市委集体借调到华东局内刊编辑部,让他们写一篇与当时中苏论战有关的历史论文,内容是关于中国疆域的形成,以反驳苏联学者齐赫文斯基有关中国古代疆域以长城为界的论调。与他们一起借调去的还有复旦大学历史系毕业、时任复旦大学团委书记的金冲及,担任他们的组长。这篇文章发表在华东局内部刊物《未定稿》上,用的也是“罗思鼎”这个笔名,从此它就成了这个小组的集体笔名。当时兼管华东局的内部刊物的是上海市委文教书记石西民。因为《内刊》编辑部没有历史组,文章发表后,他们被集体留下来。1964 年,石西民调到北京文化部工作,金冲及也被他带走,这个写作组由张春桥接掌。因为张春桥不兼华东局的工作,上海市委属下的写作人员就与华东局《内刊》分手,单独成立了上海市委写作班,写作班的党支部书记是徐景贤。写作班有三个组,文学组由徐景贤负责,哲学组由复旦大学哲学系党总支副书记郭仁杰负责,“罗思鼎”就成了写作班的历史组,由朱永嘉担

任组长。

在此之前,朱永嘉对姚文元早闻其名,但未见其人,这是第一次见面。听姚文元这么一说,便很痛快的答道:“你有什么要求就说。”

姚文元说:“市委让我写明史方面与海瑞相关的文章,请你帮助找些资料。”

朱永嘉知道,姚文元这是奉市委之命,也就是以组织的身份来找他的,实际上也是组织上交给他的任务。

朱永嘉并不知道姚文元写这篇文章的目的和批判的对象,当时国内公认的明史权威当然是吴晗了。而且,1963 年冬,吴晗为编中国历史地图集一事到上海开会,曾和朱永嘉有过直接接触。这个会议是在锦江饭店举行,朱永嘉也参加了。会议期间,白天开会,晚上他有时间与吴晗聊天。作为明史权威,吴晗主要研究元末明初这一段。而朱永嘉研究的重点是明朝后期特别是明清之际。他向吴晗谈了自己对晚明和明清之际历史的一些基本看法,如明末的社会问题和阶级关系的变化,明王朝覆亡的原因,明王朝无法解决的经济问题与庞大的官僚机器内部的重重矛盾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等。吴晗听得很认真,并称赞朱永嘉对于明史的看法。之后他对复旦大学历史系主任、《中国历史地图集》的负责人谭其骧说,愿意收朱永嘉做他的学生。谭其骧将这话告诉了朱永嘉。但朱永嘉觉得自己在复旦已有老师陈守实,如果转而去拜当时担任北京市副市长的吴晗为师显然不太合适,所以没答腔。但吴晗对朱永嘉的印象确实不错,让朱永嘉以后到北京就去找他。

于是,朱永嘉首先给姚文元找了一本吴晗编的《海瑞集》,因为这本书将关于海瑞的基本资料都收进去了,另外还有吴晗写的《论海瑞》的文章。接着,朱永嘉又将从图书馆借出《明史》、地方志和自己笔记中的相关资料交给姚文元。

姚文元不是搞历史的,在看了这些材料后,就要朱永嘉给他谈谈如何看待海瑞这个人,谈谈嘉靖隆庆年间的历史背景。于是,朱永嘉又给他讲了海瑞的主要生平,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并讲了海瑞这个人耿直,敢讲话,廉洁,为老百姓做过几件事,还谈了学术界对海瑞的评价。

姚文元还求助于父亲姚蓬子为其指点。

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第一稿于1965年6月间完成。江青为此以观看现代京剧《林海雪原》为名特地来上海,亲自审稿。她对这个初稿不满意,认为没深度,不能就事论事批判。她要姚文元再修改。

以后,江青又几次来上海,审阅姚文元的稿子,与张春桥一起提出修改意见。

张春桥也多次将稿子夹在《智取威虎山》录音带内,用飞机送去北京江青处。历时数月,七易其稿。1965年8月,《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文章终于摆在了毛泽东面前。

得到毛泽东的肯定,江青非常高兴,她立即通知上海的张春桥和姚文元,按照毛泽东的意见对文章进行修改。

1965年9月,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和中共华东局秘书长魏文伯接到通知,准备参加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临行前,已是上海市委书记的张春桥找到陈丕显说:“陈书记,这是姚文元修改后的批判《海瑞罢官》文章,麻烦你带给江青同志。”

“好的。”陈丕显接过了稿子。

对于江青组织批判北京市副市长吴晗写的京剧剧本《海瑞罢官》的事情,陈丕显是知道的。1965年4月,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病逝,上海市委的工作由上海市委书记陈丕显负责,江青曾经找到他:

“阿丕呀,我要向你借两个人啊。”

“行啊,借谁?”

“张春桥、姚文元。”

“哦?”

“我让他们准备批判《海瑞罢官》文章。柯老对此事很支持,希望你也能支持我呀。”

“我怎么会不支持呀。”

“那就谢谢你啦。不过,这事要保密,对任何人都不要讲,特别是不能让北京市委的人知道。”

“写文章还要保密?”陈丕显心里想。但是,江青这人总喜欢搞点新花样,先对外保密,待发表时再一鸣惊人,让大家佩服她,这也难说。

江青与陈丕显关系很好。五十年代江青到上海养病,一直是住在陈丕显家里。陈丕显想:她是毛主席的夫人,她这样做,一定有她的道理,也没有多问。

如今,文章写出来了,陈丕显又要担任“通信员”,他有些不安:吴晗毕竟是北京市副市长,由上海出面直接批北京市的一个副市长,却不向北京市委打招呼,会不会影响两市的关系?

陈丕显悄悄将此事告诉了同行的魏文伯,魏文伯也觉得不大妥,两人商量来,商量去,觉得还是找机会向周恩来或他们的老上级陈毅汇报一下。

到了北京,陈丕显没敢耽搁,很快将把稿子交给了江青。第三天,毛泽东在中南海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首先由周恩来介绍了抗美援越的问题,然后各中央局书记汇报。当西北局书记刘澜涛汇报时,毛泽东突然问大家:

“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很可能出,这是最危险的。”

北京市委书记彭真随口说道:“中央出了,你们地方不出,不要紧。中央几个大人,把他一革,就完了。至于地方出了,中央照样出,那就不好了。”

彭真当时在党内的地位非常重要,除了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林彪、邓小平7个政治局常委,就要数他了。他是中共中央书记处排名于邓小平之后的书记,受命协助邓小平主持中央书记处的日常工作,一身而兼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和北京市市长,还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的副委员长,真可以说是身负重任。后来,1965年10月1日天安门上,有一张照片是彭真与毛泽东并排走上天安门,刘少奇明显的在彭真后面。这张照片,引起中共上层很长时间的议论,以至有人传言,认为彭真要当毛泽东的接班人了。

毛泽东这时把头转向彭真,问道:“吴晗的问题可不可以批判呀?”

面对毛泽东的问话,彭真愣了一下,没有马上反应过来。但他到底是在中央工作多年,经常与毛泽东见面,马上就回答说:

“吴晗有些问题当然可以批判。他最近参加访问朝鲜的代表团,在朝鲜时的一些讲话就有错误。”显然,彭真是为了迎合毛泽东的问话,他对毛泽东这句话的含义并不十分清楚。

陈丕显和魏文伯对视了一下,他们知道,毛泽东已经看过姚文元批判吴晗的文章了,并且是同意批判《海瑞罢官》的。毛泽东的提问,既是征求彭真的意见,也是在给彭真和全体参加会议的人打个招呼。

会后,魏文伯对陈丕显说:“阿丕,这下不用担心了,毛主席都问过彭真了,我看咱们也不用再找总理和陈老总汇报了。”

# 第8回：易德怀，大会堂拒不从命 亲相约，颐年堂促膝而谈

此时的毛泽东也在想这个问题：姚文元的文章已经修改三次，看来也只能这样了。能否通过这篇文章，对当前文化、教育和思想领域有所触动呢？他想试试。不过，这篇文章的重点是批彭德怀的。庐山会议后，彭德怀，这位抗美援朝时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一任司令，前任国防部长就一直在北京闲居。毛泽东心里很清楚，彭德怀对庐山会议的决议是不服气的，而且，党内有相当一部分人的想法和彭德怀是一样的，包括一些批判彭德怀很积极的人，他们的思想本质其实是和彭德怀一样的。搞民主革命，打土豪，分田地，这些人是真心实意积极拥护的。但是，搞社会主义革命，就不一定了。很多人恐怕连什么是社会主义还不很清楚。这些人积极批判彭德怀，不是因为他的思想和路线，而是由于彭德怀平时性格粗放，树敌太多，所以对他有意见。当然，很多人也是出于对毛泽东的信任和崇仰，他们未必真的理解毛泽东和彭德怀的区别。因此，要帮助他们过好社会主义这一关，包括彭德怀。彭德怀曾经要求给他安排工作，刘少奇和党内很多人也同意，于是，毛泽东找来刘少奇和周恩来。

“是不是可以给彭德怀安排些工作呀？黄克诚已经安排了吧？”毛泽东问。

“是的，他现在山西省当副省长。”刘少奇回答说。

“彭德怀呢？是不是也可以安排呀？”毛泽东继续问。

“我看可以。”周恩来表示同意。

“可以，让他们在实际工作中认识错误，改正错误嘛。”刘少奇一边思索一边表示赞同。

“安排什么工作呀？”毛泽东问。

“彭德怀一直想搞农业……”刘少奇刚说了一半，便让毛泽东打断了：

“我看还是让他抓一下‘大三线’建设吧,将来打起仗来也熟悉情况。”

毛泽东知道,彭德怀对庐山会议的结论一直是不服气的,让他去搞农业,说不准又闹出什么事来。

“这个意见好。”刘少奇表示赞同。

“同意。”周恩来也没有意见。

1965 年 9 月 11 日,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贾震来到挂甲屯吴家花园彭德怀的住处。庐山会议以后,彭德怀就一直在中央党校学习。

“彭总啊,中央要和你谈话,通知你去人民大会堂。”贾震对彭德怀说。

“是吗? 那就走。”

彭德怀扔下手中的锄头,和贾震一起坐车来到人民大会堂。当他们走进江苏厅时,看见彭真和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乔明甫已经等在那里。

互相握手问好后,彭真说:“今天我们是代表党中央和你谈话,中央希望你能到西南去抓大三线建设,决定派你去大三线任副总指挥。”

彭德怀看了彭真一眼,说:“要是不去呢?”

彭真说:“这是毛主席的意见。”

彭德怀倔犟地说:“党的八届八中全会《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定》还在,我彭德怀已在全党、全军、全国人民中被批臭了,这怎么干工作!”

彭真与乔明甫一时沉默无语。

彭德怀接着说:“自从平江起义喊出‘我们起义了! 为工农服务开始了!’以来,保卫井冈山革命根据地、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我早已将个人生死置之度外,对党和人民忠心耿耿,光明磊落,扪心自问,自己从未做过对不起党、对不起人民的事情,在党内也从来没有任何‘小集团’。1962 年 6 月,我曾给党中央、毛主席写过信,从我的童年、少年时代的遭遇,到出走当兵,平江起义,井冈山反‘围剿’,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国防部长,庐山会议,我什么时候搞过‘小集团’? 刘少奇说我里通外国,要有根据吗。我为什么给主席写信,就是希望党中央全面审查我的历史,给我一个公正的结论。中

央在北京召开七千人大会,对张闻天、黄克诚、周小舟进行了甄别和平反,并安排了工作,唯独对我,既没有被通知参加大会,也没有对我的问题提出来进行重新审查,刘少奇还说我有里通外国的问题。我怎么里通外国了?出国访问,在场的又不是我一个人,可以对质调查吗?现在让我出来工作,我怎么工作?……”

彭德怀讲完这些之后,长长地吸了一口气,然后对彭真说:“我只会带兵打仗,不懂工业。”

彭真说:“西南三线的工业,就是与打仗有关呀!”

彭德怀说:“我早已跟军队脱离关系了。作为一名党员,理应服从分配,但我犯了错误,说话没有人听。说错了人家怀疑,说对了人家也怀疑。再说,我对工业生产也没有经验,我不去三线,还是让我去农村吧,我到农村搞调查研究,到贵州的农村也行,那里没有外国人。”

彭真劝道:“彭德怀同志,这可是毛主席的意见哟!中央也是考虑了你的实际情况,将来战争起来,你也熟悉情况吗。”

“是啊,还是去‘三线’吧。”乔明甫也劝彭德怀。

“的确,我对工业不熟悉,我不能干这差事,我不去,要去也去农村。”彭德怀倔犟的坚持自己的意见。

“那先这样吧。回去我们向毛主席汇报一下。”彭真见无法说服彭德怀,只得作罢。

回去后,彭真打电话向刘少奇作了报告,并让贾震、乔明甫二人整理了谈话纪要上报中央。

回到吴家花园的彭德怀也安静不下来。9 月 21 日,难以入眠的彭德怀披衣起床,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请求允许他回到老家或到外地的国营农场去劳动,当一辈子农民,自食其力,不再拿饷,以减轻国家负担。

彭德怀自从被罢官后曾给毛泽东写过几次信,最后都没有结果,他不知道这次会有什么答复。

当天下午,彭德怀的信已放在毛泽东的案头上。

看到彭德怀的信后,毛泽东知道,只能由他亲自同彭德怀谈了。

23 日早上 7 时半,刚刚在挂甲屯果林中散步回到屋里的彭德怀,就接到了毛泽东办公室打来的电话,说毛泽东要与他直接通话。

甚感意外的彭德怀,很快就听见了毛泽东那浓浓的乡音。

“德怀,你有时间吗?”

“时间总是有的嘛!”彭德怀答道。

“你马上来一下,我等你。”毛泽东说。

“你工作太累了,还是另找时间吧!”此时的彭德怀,已经不是抗美援朝时不顾三七二十一,推开警卫员,直闯毛泽东卧室,掀毛泽东被子时的彭德怀了。他谨慎了许多。

“叫你上午来就来吧!”毛泽东坚持。

已经整整6年未听到这熟悉的湘潭乡音了,彭德怀显得有些激动,他没有说话。

毛泽东见彭德怀没有答应,在那边接着说:“你赶快来吧,我们好好谈一谈。”

彭德怀还有什么好说的呢?6年来,他给毛泽东写了几次信,朝夕都盼望着这一天,现在毛泽东主动向自己发出邀请,这是一个多么好的机会,就是自己不愿意到西南大三线去,那也是应该在毛泽东的面前实事求是地讲清其中的原因,以及自己思想上所顾虑的问题,希望毛泽东能给予自己以帮助和理解。

这天,秋高气爽,艳阳高照。

彭德怀换上了一件中山装,便赶往中南海丰泽园。

一夜未睡的毛泽东早已来到了颐年堂前,当看到彭德怀走出汽车的时候,他向彭德怀走了过去,伸出了右手,彭德怀也赶紧迎了上去,紧紧地握住他的手。

毛泽东拉着彭德怀坐了下来,当他的目光扫过彭德怀黑瘦的面容,斑白的两鬓,似生伤感:“几年不见,你显老了。”

彭德怀勉强笑了笑:“我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咯。”

毛泽东看着这位老战友认真严肃的表情,笑了:“我这里不是什么三宝殿,只要你愿意随时都可以来。”

接着,又说:“早在等着你,还冇得睡觉,昨天下午接到你的信,也高兴得一夜冇(音‘卯’湖南土语,没有的意思)睡着,一清早就给你挂电话……”

毛泽东顿了顿,又说:“你这个人有个犟脾气,几年也不写信,要写

信就写8万言。今天还有少奇、小平、彭真同志,等一会儿就来参加。周总理要去接西哈努克,不能来啦,我们一起谈吧。”

彭德怀说:“主席没有忘记我,我很感激。”

毛泽东听后很高兴,然后独自点燃一支香烟。

这时彭德怀也从衣兜里掏出一包香烟,抽出一支来点上。

毛泽东一见,感到十分奇怪,就问道:“德怀,我记得你不是早就戒烟了吗?”

彭德怀猛吸了一口,慢慢地将烟雾吐出:“可是,自从庐山会议之后,我却又抽上了,而且越抽越凶。”

“庐山会议”,彭德怀在这里首先提出了一个双方都不愿提到,但却又是不得不提的事情。他们吸着香烟,看着在面前飘散着的淡淡烟雾,各自都陷入了沉思。

良久,毛泽东站起来,十分大度的对彭德怀说:“德怀呀,你还是政治局委员嘛,我们可以好好谈一谈,哪怕拍桌子骂娘都可以。你这人呀,就是脾气犟,平时也不来找我,电话也不挂一个,总喜欢写信,而且一写就是上万言,你花了力气,我却不一定全看得明白,你不满意,我也不满意,这是何苦呢?”

彭德怀说:“主席,我彭德怀现在是一个农民了,每天种地、看书,但心中憋得慌,就把那些话都写下来了,那也是光明正大地向党反映问题吧!”

毛泽东沉思片刻说:“庐山会议已经过去了,可不能庐山一分手到底哟!你也不要发牢骚,也许真理在你那一边,也许对你的批评过了头,或者说是错了,那就只有让历史来做结论吧,相信历史是最公正的。你我从湘潭出来干革命后,风雨中共事几十年,我不会忘了你,日久见人心嘛!这次派你到西南去抓三线建设,我也是真心诚意地支持你。西南是主要的战略后方,你去把它建设好了,我就放心了,万一将来发生战争,你还可以带兵打仗嘛!”

彭德怀一听这话,倔劲又上来了,他说:“我不去,背一身臭名我去干什么!”

毛泽东笑着说:“臭了也可以香起来嘛!我们之间在一些看法上有分歧,这不要紧,但要顾全大局,在大局面前要先将个人的问题放在

一边。”

毛泽东希望彭德怀会服从大局,听从自己的安排。可是,这次彭德怀却没有服从,而是提出了一个令他没有想到的问题。

彭德怀说:“主席,我在庐山会议上是向你做过三条保证的,我得遵守我自己的保证。”

毛泽东想了一会儿,然后说道:“哪三条?我记得好像只有两条?”

“三条。”彭德怀认真地说,“一是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做反革命,二是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自杀,三是今后工作不好做了,那就回乡务农,自食其力。”

毛泽东听后点点头说:“我就记住了后面两条。不过这没有关系,让你出来工作是中央的决定,你搞军事工作多年,大西南的建设又与军事密切相关,你去是比较合适的。”

彭德怀固执地说:“我还是回乡当农民好,去西南不合适,我这样去怎么接触群众?群众又怎么敢接触我?”

毛泽东从桌上的烟盒里抽出两支香烟,递给彭德怀一支,两人各自点燃自己的香烟。

毛泽东简单地分析了当前的国际形势,又将鉴于苏联卫国战争时期的经验教训,准备建设大小三线的方案告诉彭德怀,并强调了西南大三线建设的重要性,以及自己对“依山、傍水、扎大营”的战略后方的构想,可说是情真意切,彭德怀一边听着,一边微微点头。

毛泽东又说:“我们井冈山就在一起,革命能有今天不容易,我们大家要团结。庐山会议,也许真理在你那一方,这没有关系,错了的我们就改,你今天能来,我很高兴,你还是去西南吧,你怕工作不好做,我让少奇、小平召集西南地区的同志开个会,把中央的意图讲清楚,让他们积极支持你的工作。你要给我写信,让他们不得有误,赶快给我送来。

“现在要建设大三线,准备战争。按比例西南投资最多,战略后方也特别重要。你去西南区是适当的。将来还可带点兵去打仗,以便恢复名誉。”

彭德怀答:“我搞工业是外行,完全无知,而且,我现在的情况,政治上也不好做工作。”

8时40分左右,刘少奇、邓小平、彭真先后来了。毛泽东说:“彭德怀同志去三线也许会搞出名堂来。建立党的统一领导,建立三线建设总指挥部,李井泉为主,彭德怀为副。还有程子华。”

彭德怀还是不愿接受:“我去搞工业是外行,时间紧迫,恐有所负,我还是去边疆搞农业吧。”

刘少奇、邓小平、彭真一起劝他,说搞工业大家都不懂,都在摸索。

毛泽东环视在座的人,斩钉截铁地说:“彭德怀同志去西南区,这是党的政策,如有人不同意,要他同我来谈。我过去反对彭德怀同志是积极的,现在支持他也是衷心诚意的。”

毛泽东这几句话深深感染了彭德怀。

毛泽东继续说:“对老彭的看法应当是一分为二,我自己也是这样。”

他谈起了往事:“立三路线时,三军团的干部反对过赣江。彭德怀说,要过赣江。一言为定,即过了赣江。在粉碎蒋介石的一、二、三次‘围剿’时,我们合作得很好。反对张国焘分裂的斗争中,也是坚定的。解放战争在西北战场的成绩也是肯定的,那么一点军队打败国民党胡宗南等那样强大的军队,这件事使我经常想起来。在我的选集上还保存你的名字,为什么一个人犯了错误,一定就要否定一切呢?我的意见:既往不咎,努力工作,做出成绩,树立威信……”

毛泽东转头对坐在身边的刘少奇说:“请少奇、小平同志召集西南区有关同志开一次会,把问题讲清楚。如果有人不同意,要他来找我谈。”

彭德怀不好再坚持了。他抬起头说:“好吧,主席,我听你的,去三线。”

刘少奇高兴地说:“老彭,你看主席是没有忘记你呀!重新振作起来,去大西南干出成绩来,我们也为你高兴。关于个别同志的看法,主席已经讲了,我们要打招呼,我一定照主席的要求,把西南的会议开好,让西南的同志都支持你的工作。”

邓小平说:“老彭,主席支持你去三线,就是相信你。一定要扔掉包袱,轻装上阵,重振昔日彭大将军的雄风。你去三线,肯定会干出名堂来的!”

彭真也对彭德怀说:“主席是关心你的,我早就说了,你迟早会想通。”

谈话进行了五个半小时。毛泽东工作一夜之后,还没有吃早饭,于是,留彭德怀和在座诸人共进午餐。饭后,彭德怀才依依不舍,起身向毛泽东和大家告别。

回到吴家花园,彭德怀仍然激动不已,“毛主席还是了解我的。”他似乎又有了以往那种豪气和自得。其实,在与毛泽东告别时,毛泽东曾经问他:“你在中南海游泳池对我说过要斗刘少奇同志,恐怕你是参加了‘高饶反党联盟’吧?”

彭德怀当时没有在意。

没有看到周恩来,彭德怀总有些心不甘。从毛泽东那里出来后,他给周恩来处打电话,说周恩来不在家。

他放下电话,颇为伤感:“个个都忙,总理更忙。可我彭德怀却闲呆了6年,惭愧呀!”

这天,他正在吃午饭,周恩来亲自打来了电话,请他马上去中南海西花厅。彭德怀立即叫车,可司机不在家。他急得团团转,只好给周恩来回电话:

“总理,我的车驮不动了,改日再拜访你吧!”

周恩来在电话里说:“你的车驮不动,就用我的车去驮你,这叫舍车保帅嘛!”

在西花厅,周恩来和邓颖超热情地款待彭德怀,询问了他6年来的生活情况。彭德怀把同毛泽东会见的情景叙述了一番。周恩来听后很高兴,感慨道:“是啊,庐山的事过去6年了,教训会使我们清醒过来。我们要认真地总结总结。主席说得对,不能分手到底,要团结。‘风物长宜放眼量’嘛,我们前面有很多很多的大事业等待我们去完成。”

彭德怀说:“这6年来,我日日夜夜都盼着能早点出来工作,我实在是闲不住啊!”

翌日,彭德怀正在一个农户家里拉家常,突然一名警卫战士跑来叫他回去接电话。

电话是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打来的,通知他立刻到中南海怀仁堂小礼堂去开会。

# 第9回：众相劝，“大将军”离京入川 批海瑞，九州地欲起风雷

彭德怀赶到会场一看，到会的大都是西南局以及四川、云南、贵州和中央各部委的负责人，其中有中共中央西南局书记李井泉，中共四川省委书记廖志高、省长李大章，中共重庆市委书记任白戈，铁道兵司令员吕正操，国家计委副主任程子华等。

主持会议的是中共中央书记处总书记邓小平。他见彭德怀来了，就立刻站起来向他招手，让他到前面去坐。

参加会议的人看到邓小平招呼早已被批臭了的“反党集团头子”彭德怀进来，都感到有些奇怪，没有一个人敢和他打招呼。

彭德怀也不理会这些人，按照邓小平指定的位子，到前面坐了下来。

这是由毛泽东亲自委托召开的一次特别会议。首先邓小平让三线建设的负责人汇报了情况，主要是由程子华汇报三线工厂的搬迁，吕正操汇报铁道兵对于成昆铁路的建设进度，李井泉等人汇报对于三线建设的支援情况。

听完汇报之后，邓小平宣布：“由刘少奇传达毛主席有关彭德怀同志到三线建设担任职务的指示。”

刘少奇说：“让彭德怀出来工作，到西南三线去，这是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决定，希望到会的同志们能认真执行，积极支持彭德怀的工作。”

“毛主席说了，如果彭德怀同志要给他写信，请井泉同志给下面的同志打个招呼，不准阻拦，要尽快地送到北京来，送到他的手里。彭德怀同志去工作，有什么困难，你们要支持他，给他的工作创造条件。特别应该注意，彭德怀同志对于工作中有什么意见，有什么看法，有什么想法和建议，都要让他提，让他直接送到北京来。这是毛主席的意见，让我在这个会上传达给大家。”

刘少奇说完之后,邓小平接着说:“你们三线建设的同志们表个态,同意不同意毛主席的决定,欢迎彭德怀到三线来工作?”

“同意!”

“拥护!”大家纷纷表示了赞成。

10 月 28 日,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奉命送彭德怀去四川任“三线建设”第三副总指挥。临行前,毛泽东特地找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西南局第一书记,“三线建设”总指挥李井泉,向他交待:

“彭德怀同志到三线去,是中央的决定。他去了以后,你们要支持他的工作,三线的企业他都可以去,不要对他保密。要让他有实际权力,有职有权。彭德怀这个人,让他有职无权他是不干的。”

彭德怀走了,开始投入三线建设的战场。他本想把自己的余生都献给这里的土地和事业。却不曾想到,一场更加巨大的政治风暴再次将他推上浪尖。

彭德怀到达“三线”后就开始了解情况,就在他独自在三线成都听取汇报时,在西南重镇重庆,却在召开另外一个会议。

这次会议是由中共中央西南局召开的,参加会议的有西南三省的负责人、三线建委的领导,以及部分三线建设重点工程的负责人。会议地点选在较为偏僻的潘家坪宾馆。

李井泉手中拿着一支粗大的雪茄烟,然后慢慢地点着,猛然地吸了一口,向到会的人员宣布了中共中央关于任命彭德怀担任西南大三线建委第三副主任的决定。

“彭德怀?”与会者都有些不敢相信,三线不是最需要保密的地方吗,连工人都要审查祖宗三代,怎么能让一个早已被全国人民批倒批臭的“反党集团头子”来参加指挥呢?

陡然的变化使许多人的思想一时转不过弯来,整个会场静得连针落在地上的声音都能听见。

李井泉接着说:“让彭德怀来三线工作,是毛主席、党中央的决定,我们要服从。他到什么地方去,大家都要向他汇报情况……但是,对于他的指示,认为不正确的也可以不执行。有关军工方面的事情,就不必向他汇报了,更不能让他接触,这是我们应该注意的……”

这些,都是彭德怀不知道的。

北京,已经听到风声的吴晗,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走进彭真的办公室:

“市长,听说有人要批判我……”

“是吗? 批判你什么?”彭真问。

“我写的京剧《海瑞罢官》。”

“没有啊,我怎么没有听说。”

“说现在正在准备呢。”

“吴晗同志,你是共产党员,应该相信组织,不要听小道消息。你的工作,总理、小平和我,都是清楚的吗。你要是有了问题,我这个市长不就是总后台了吗。放心吧,老吴,回去好好休息,有什么责任我来负。不要杞人忧天!”

“可是,我听说这次搞我,是有来头的。”

最近已经听到一些传闻的彭真,正为此事恼火,一听吴晗的话,有些激动:“什么来头不来头,真理面前人人平等。你不要理他们,脚正不怕鞋歪嘛!”

送走吴晗后,彭真给邓拓打了电话,让他晚上到家里来一下。

邓拓,北京市委书记处负责文教的书记、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北京市委刊物《前线》的总编辑、著名的诗人、学者。曾任中共中央党报《人民日报》的社长兼总编,因为办报风格不对毛泽东的思路,多次受到毛泽东的批评,不得不辞去《人民日报》社社长和总编的职务,到北京市主管文教、宣传。但是文人秉性难改,到北京后,创办了北京市委刊物《前线》,亲任总编。

彭真一见邓拓,便问:“吴晗上午找我,好像有什么事情,你清楚吗?”

邓拓说:“听说上海有人要批判他写的《海瑞罢官》。”

邓拓是听张春桥说的。他们是老相识,抗战时期,邓拓担任《晋察冀日报》社社长时,张春桥任副总编辑。因此,张春桥在北京曾向邓拓私下透过姚文元要批《海瑞罢官》的风。此前,张春桥曾给邓拓打过电话,邓拓当时不在办公室,没有联系上。

彭真又问邓拓:“是谁要批?”

“江青。”邓拓回答,他又接着说:“她在北京找过几个人,可能没人

答应写。所以,又到上海找人去了。”

“《海瑞罢官》有什么批判头?”彭真似乎有些不以为然的说:“吴晗不过就是一个学者嘛,能有什么了不得的问题?再说了,海瑞精神也是毛主席提倡的,有什么错?你说我说的对不对?”

邓拓听到彭真征求他的意见,立即答道:“我也是这个意见。吴晗咱们都了解,政治上可靠,人又老实。批判他说不过去吧。”

1965年11月8日,上海市委书记处开会讨论姚文元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在此之前,市委已经讨论过几次。这次参加会议的有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市长曹荻秋、主管此事的文教书记张春桥、分管教育卫生的候补书记杨西光、市委候补书记王少庸等,加上作者姚文元,协助姚文元写作的朱永嘉,还有市委写作班党支部书记徐景贤。

会议在康平路165号楼上朝北一间大会议室里召开。曹荻秋站在那里,很仔细地将姚文元文章看完,在资料引用上提了几个问题。陈丕显则在会议室里来回踱着步,对张春桥说:“这是件大事,非常重要,你要好好抓,抓好了是有功劳的!”

张春桥也站着,没坐。

分管教育的市委候补书记杨西光问:“你准备给吴晗带什么帽子?”

姚文元的文章中没给吴晗定性戴帽子,姚文元回答说:“看事实吧。是什么就是什么,何必我们给他戴帽子呢。”

杨西光又对姚文元说:“吴晗是秘密党员,你是否知道?”

姚文元答:“这就不管了。”

11月9日,《文汇报》北京记者站的负责人艾玲接到上海《文汇报》副总编辑陆灏打来的电话:“明天将要发表一篇大的文章,是一个叫姚文元的写的,你们‘北办’在文章见报后就出动,收集一下有关人士对此文的反映,”还说:“这篇文章实际上是上海市委让《文汇报》刊登的,但对外不能说,只能说是姚文元向《文汇报》投的稿……”

11月10日,经过毛泽东3次修改,由上海市委讨论同意的姚文元署名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终于发表在上海《文汇报》第一版。文章明确指出,《海瑞罢官》的作者是“要拆掉人民公社的台,恢

复地主、富农的统治。”

文章发表时,姚文元自己并不知道。11 月 10 日一早,姚文元还在睡觉,一个电话打到他家。他妻子金英拿起电话,没想到电话是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打来的,告诉说,姚文元文章今天在《文汇报》发表,他向姚文元表示祝贺。

这天,《文汇报》北京办事处即出动人员采访了北京有关部委和领导。

艾玲和记者李根第去采访了吴晗。吴晗对姚文元的文章很生气,说《海瑞罢官》不是他要写的,是毛主席叫写的。两人又去了《人民日报》社。《人民日报》的同行们也都普遍不同意姚文元的文章,王若水就向艾玲表示很反感。李希凡说,江青原来叫他写这篇文章,他表示自己是搞《红楼梦》研究的,对海瑞了解不多,江青就说那让别人来写。艾玲熟悉的一些老领导、老同事以及一些知名人士,在对待批判《海瑞罢官》究竟是“学术研究”还是“阶级斗争的反映”的问题上,观点认识不尽相同。当时社会上流传着这样的说法:“赞同批判《海瑞罢官》的是左派,不赞同的是右派”。对这些反映,“北办”没有太在意,他们把这些情况反映汇总上报给上海《文汇报》编辑部。

那时,《文汇报》北京办事处每天都有一个邮包装上他们手写的情况汇报,通过民航班机送往上海。报社有什么文件也通过这个邮包给“北办”。

当天,北京的彭真也接到了报告。虽然已有耳闻,但他仍然觉得不能接受,气得拍着桌子说:

“批判北京的一个副市长,竟然不和市委打个招呼,真是岂有此理!这不是对同志搞突然袭击吗?姚文元的文章简直是胡说八道!纯粹是学阀腔调!”

他立即给刘少奇挂电话,是王光美接的电话,问他有什么事?

“上海刊登了批判吴晗同志的文章,我想征求一下少奇同志对这篇文章的意见。”彭真问。

“少奇同志还没有看到这篇文章,再说他对吴晗同志不大熟悉,很难发表什么意见。”政治上已经十分成熟的王光美圆滑的搪塞了彭真。

放下电话,她问刘少奇:“彭真来电话,问你对批判吴晗《海瑞罢

官》的意见。你看,我这样回答可以吗?”

刘少奇说:“现在只能这样回答,《文汇报》发表姚文元的文章,是毛主席支持的。所以,对外人讲话要格外谨慎。”

彭真在刘少奇那里不得要领,又找到中央书记处总书记邓小平,邓小平一见彭真就问:“教授最近怎么不来打牌了?”

吴晗曾任云南大学、西南联合大学、清华大学教授,所以人们习惯称他为“教授”。

彭真回答:“有压力嘛。姚文元写文章批判他,吴晗现在心理负担很大。”

邓小平说:“就是马连良演的那个海瑞的戏吧?我看过,没什么错嘛。咳,现在有些人总想踩着别人的肩膀往上爬,对别人一知半解,抓住一点辫子就批半天,好自己出名,有什么意思?你告诉教授,没有什么了不起,我们照样打牌。哦,有一点要注意,政治和学术一定要分开,混淆在一起很危险,会堵塞言路的。”

忧心忡忡的吴晗又到邓小平家打牌了,邓小平一见吴晗就说:“教授,不用这么长吁短叹的,凡事都要乐观嘛。怕什么,天还能掉下来吗?”

吴晗说:“我不是害怕,而是姚文元的文章太不讲理!如果真是要讨论对海瑞的评价,我可以奉陪,写文章参加争论。但姚文元是在扣政治帽子,我只能保持缄默,以示抗议。”

邓小平继续劝道:“我今年61岁了,从我参加革命到现在,经历了那么多的风浪都熬过来了。我的经验无非两条,第一不怕,第二乐观,向远看,向前看,一切都好办。由我们给你往前顶,你可以放心了吧!来来来,打牌。”

其实,文章发表前,陈丕显和曹荻秋都提出向北京市委书记彭真打个招呼,张春桥不同意,也就算了。

这天,《北京日报》社社长范瑾听到姚文元批判吴晗的文章后,马上给市委分管《北京日报》工作的书记处书记郑天翔打电话请示:

“郑书记嘛?我是范瑾。《文汇报》第一版刊登了一篇姚文元的文章,是批判吴晗副市长的,我们要不要转载呀?”

郑天翔还不知道此事,忙问说道:“是吗?我还不知道,我先看看,

你们那里有这份报纸吗?”

“没有。我已经安排他们马上空运过来。”范谨回答。

“等我看完后再给你打过去吧。”郑天翔说。

“好吧。”范谨答应道。

郑天翔拿到报纸后,匆忙看了一遍姚文元的文章,没觉得有什么不妥,就给范瑾打电话说:“行啊,你们明天就转载吧。”

可是,第二天《北京日报》没有转载,郑天翔给范瑾打电话问:“范瑾吗?你们今天没有转载姚文元的文章啊?”

“对。邓拓同志不赞成登,他说不能轻易登,等请示彭真同志再说。”

“彭真同志什么意见?”郑天翔问。

“他不在北京。”

“那好吧,就先按邓拓同志的意见办。”

邓拓不同意转载,是因为他已经得到彭真不让转载的意见。当他和北京市委副书记刘仁一起去请示彭真要不要转载姚文元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时,彭真当即告诉刘仁:“不行!你通知北京各报,一律不准转载姚文元的文章。凡是有关点名批判的新闻报道,要向市委请示,让他们拿出党性来,我们要坚持真理!”

此时的彭真已经从邓小平那里回来了,他觉得心里有了底,还进一步指名道姓地说:“《海瑞罢官》这出戏我早就看过了,哪里是毒草?张春桥说《海瑞罢官》是毒草,上海不是也演过《海瑞上疏》,难道张春桥没有责任?姚文元的文章乱上纲,这也是错误,要批判!”

# 第10回："窃听器"，陈年旧案终未了 换"总管"，杨尚昆调任南粤

就在《文汇报》发表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文章的同一天，11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免去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的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职务，由汪东兴接替。

早在送走彭德怀的一个星期后，1965年10月29日上午10时30分，周恩来、邓小平、彭真3人约杨尚昆谈话，对他讲了中央的决定：免去他中央办公厅主任的职务，让他到下面工作两、三年。任命中央办公厅警卫局局长汪东兴为中央办公厅主任，同时，中央办公厅机要局局长李质忠为中央办公厅副主任。

是日，杨尚昆在日记中写道："10月29日，永远不能忘记的一天。上午10时半，周、邓、彭三人约我谈话。这是一次不寻常的谈话，十分值得记着，永远不要忘记！中午未睡好，下午也忐忑不安，去富春同志处谈了今天谈话的事！……"

第二天，杨尚昆"心情不安，什么东西都看不下去"。第三天，杨尚昆依然"整天没有精神，无心看什么"。

11月5日，彭真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宣布杨尚昆工作调动，离开北京到广东工作。

对于这次免职，杨尚昆似乎早有准备，自从1961年发生了震动中共中央高层的"窃听器事件"后，他就有一种预感，不知什么时候会离开中央办公厅主任这个他工作了近20年的岗位。但是，真的事到临头，他还是有些突然，好像有一种难以言状的委屈。他想在临走前和毛泽东见一次面。凭他几十年在中共中央中枢机关的工作经验，他预感到，如果这次不能和毛泽东做一次谈话，一旦离开了中南海，恐怕就再没有机会见到毛泽东了。

3天后，9日，中央办公厅召开厅务会议，宣布杨尚昆调任广东省委书记处书记，免去其中央办公厅主任职务。杨尚昆办理完工作移交

后,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

“主席:您好!

……

办公厅工作,我已同汪东兴同志谈过两次,昨天又约汪东兴、田家英、曾三、李质忠等同志开会作了交代。今天已在办公厅厅务会议(有办公厅多单位负责同志参加)上,传达了中央的决定。

我在中央机关工作已近20年,没有把工作做好,还犯了错误,辜负了主席和中央同志的期望。想到这些,我的心情是很沉重也很惭愧的。感谢主席和中央这次给我到实际工作中去锻炼和改造自己的机会,今后我一定尽自己的努力全心全意地把党分配给我的工作做好。以后还希望主席能经常给予指示和鞭策。

我打算把办公厅工作交代完了后去陕西省长安县原来我蹲点的大队(牛角村)看看,听说那里生产搞得不错,今年粮棉收成比去年增产40%以上;本月底即去广东省工作,近几天来因风湿性背痛正在治疗,还有几天才能走。

在去广东之前,如果主席有空,我很希望见见主席,得到主席批评指示。”

第二天上午,就是发表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文章的当天,毛泽东约见了杨尚昆。

一见面,毛泽东就问:“你出去到哪里了?”

杨尚昆回答说:“我到广东去。”

毛泽东对杨尚昆说:“下去锻炼两三年有好处。你下去,我给你个任务:第一、看中央和国务院下达的政策措施,有没有不适于当地实际情况的,如果有,你给我写个报告,提出你的意见;第二、中央各部门下达了些什么东西,有没有同中央、国务院相矛盾的,如果有,你给我理一下。就这么两个调查研究的任务”

“这是一个很大的任务,我可能完不成,我努力去做就是了。”杨尚昆答。

毛泽东问:“你决定到广东去?广东那么热,你跑那里去干什么?”没等杨尚昆回答,毛泽东又说:“既然你已经定了,你去两年到三年,把这个任务完成,先在珠江流域;以后,我把你调到黄河流域,再搞两三

年,主要是了解党政机关是不是按中央精神结合本地实际情况进行工作的,更主要的是条条下达的任务是不是打架。我知道有些架打得是很厉害的。”

“我努力吧。”杨尚昆说。

谈话将近1小时30分钟。

11月17日,杨尚昆奉毛泽东命,去看望王稼祥。次日,同样是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他又去看望了陈云。

11月19日,他到西华厅向周恩来辞行,顺便将这两次探望向周恩来作了口头汇报。杨尚昆对周恩来说:“由于我工作岗位特殊,涉及面很广,做了些工作,也犯过些错误。许多事情你都了解,有些问题只有你知道,我没有向中央其他同志说过;但也有你不了解的,我不愿意多说。只要你知道我是坦白的、无辜的,我就心安了。我决不计较个人利害,也不愿意说不应当说出的事。”

然后,他终于十分焦虑地问道:“照目前的事态发展下去,可能将来要处分我,甚至开除我的党籍吧?”

周恩来一直静静的看着杨尚昆,当听到他说这些话时,不得不安慰杨尚昆说:“不至于如此吧,你放心。”

杨尚昆在看望过王稼祥、陈云后的第三天,专门就此次探望给毛泽东写了书面报告。

让杨尚昆担忧的“窃听器案”,发生在1961年。

1961年4月初,毛泽东前往湖南长沙。一天,毛泽东在火车上跟专门负责冲印照片的摄影组胡秀云聊天。专列停靠在车站时,小胡从专列上下来,遇上机要室会议科的录音员刘吉顺,小刘笑着对她说:“小胡,刚才你在主席那里说了什么,我全知道。”接着他说了一点他们谈话的内容,使小胡非常惊讶。

小胡将此事报告了毛泽东,毛泽东也非常震惊。因为是在旅途中,毛泽东没有立即追究。

在长沙,毛泽东要接见外宾,汪东兴向他汇报哪些人随行。当汇报到还有搞录音的小刘时,毛泽东发了脾气。

到了上海,毛泽东说:“这件事马上给总书记打电话,让他查。”

1961年4月26日晚,正在河北省保定市做调研的中共中央办公

厅主任杨尚昆突然接到中办副主任龚子荣的电话,要求杨尚昆务必于第二天下午赶回北京。当晚,杨尚昆在日记中写道:“脑子中很乱,整夜未睡好。”

4月27日下午17时20分,杨尚昆回到北京。在永定门车站,他当即向邓小平、彭真简单谈了一下情况。

当晚,杨尚昆又找到中央办公厅机要室副主任、周恩来秘书康一民了解情况。第二天上午,他又和龚子荣、中办副主任兼中央档案馆馆长曾三、中办副主任兼中共中央直属机关事务管理局局长邓典桃、中直机关党委秘书长李鉴等人谈话。

4月29日上午,杨尚昆找中办机要室主任、毛泽东的秘书叶子龙、副主任康一民、中央警卫局副局长王敬先3人谈话。下午15时至17时,杨尚昆召集叶子龙、康一民、王敬先和毛泽东秘书高智、罗光禄及中办副主任龚子荣等人,商谈“关于录音问题的情况”。

4月30日上午,叶子龙、康一民和机要室副主任、刘少奇的秘书吴振英3人写出关于录音问题的报告,杨尚昆看了后,提出修改意见,让康一民再去改正。当天,杨尚昆在日记中写道:“惟心情紧张,极易疲乏。”他一改平时凌晨2时睡觉的习惯,当晚12时便上床了。

5月1日,根据汪东兴的通知,康一民、机要室副主任赖奎乘专机到上海汇报情况。毛泽东让人把从专列上拆下来的秘密录音装置放在一张桌子上,让卫士长在一张纸上写上“违反指示,非法录音”八个大字,压在录音机下作为背景,让康一民、赖奎、刘吉顺3人站在桌子边上,由新华社记者吕厚民拍照留存。当时共拍了4张照片,另外3张,一是汪东兴、徐业夫、康一民、赖奎、刘吉顺5人的合影;二是刘吉顺的单人照;三是录音机的照片。康一民、赖奎曾多次向汪东兴提出要“直接向毛主席汇报”,汪东兴没有同意,说他已经“受毛主席委托处理这个问题”。

5月2日下午,杨尚昆向刚刚返京的周恩来总理汇报了“录音事件”。当晚,杨尚昆仍感到心情不安、坐卧不宁。

5月3日、4日,杨尚昆两次与康生商谈“录音事件”的情况及其报告;差不多同时,杨尚昆也多次找叶子龙、康一民谈话。也是在这几天,杨尚昆染上感冒,身体畏寒,直到11日尚未痊愈。

5月8日晚,杨尚昆抱病提笔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对录音事的疏于检查作检讨并请处分”。第二天上午,杨尚昆乘火车,再去河北保定调研。16日下午返京。

5月17日,中央书记处批准了《关于录音、记录问题的决定》,做出了关于中央和地方党政军群一律不准搞录音等5项规定。中央书记处的这个会议,没有通知书记处候补书记杨尚昆参加。

5月20日上午,中央书记处开会。会后,周恩来、邓小平、彭真和杨尚昆又在一起商谈了关于录音问题的处理意见。

中央书记处批评中办机要室,并决定分别给予该室主任叶子龙、副主任康一民严重警告处分,副主任吴振英警告处分。

毛泽东为什么会对录音一事发这么大的脾气?此时还要从1958年说起。

当时,中央办公厅觉得毛泽东的讲话有时记录不全,于是,时任毛泽东机要秘书兼中办机要室主任的叶子龙,提出用录音机录下来后再进行整理。为此,他曾多次向上司杨尚昆和周恩来等中央领导汇报过这个建议。

他的建议似乎得到了领导的同意。毛泽东本人好像也是认可了。他曾对叶子龙说:“录音要搞个规矩,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嘛。”根据这一指示,中办机要室对录音范围和内容做出明文规定:中央政治局常委在中央召开的大、中型会议和其他重要会议上的报告、讲话;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与地方领导同志的重要讲话;中央召开的电话会议;中央领导指定的需要录音的内容。毛泽东看过这个规定,表示同意。

中办机要室自1958年11月始,对毛泽东外出时的一些重要谈话进行了录音。

然而,有些会议,恐怕不能录音,或中央领导人不愿意录音。如:1959年11月,中央在杭州召开会议,毛泽东在一次讲话中讲到中苏关系时,关照大家不要做记录。当时胡乔木插话:“还有录音呢。”

毛泽东当即质问说:“是谁让录音的,搞这干什么?”

叶子龙立即让录音员停止了录音。从此,机要室就再没有自行派录音员跟随毛泽东外出录过音。

既然1959年11月杭州会议后,叶子龙再也没有派人跟随毛泽东外出录音,为什么1961年春季又发生了“录音事件”?

1961年6月中旬,中央决定田家英任中办副主任,以加强领导。6月24日下午15时30分,杨尚昆召集有关人员,“交代洗掉过去的录音带问题,彭真参加”,后又“约汪东兴谈取消各首长处的日记问题,彭真参加”。

震动一时的“录音事件”,又称“窃听器事件”,似乎就这样过去了。但是,杨尚昆的政治生涯似乎也开始走下坡路了。

# 第11回：风乍起，似吹皱一池春水 未知情，望神州风云莫辨

姚文元的文章发表后的第三天，1965年11月12日，上海的党报《解放日报》在第二版转载了这篇文章。也就在这天，毛泽东再次离开北京，乘火车南下。

到了天津，毛泽东向前来汇报工作的河北省委书记林铁、省长刘子厚简单询问了一下“四清”的情况，然后问道：“我最近有什么指示吗？”

林铁和刘子厚不知道毛泽东是什么意思，刘子厚答道：“备战，备荒，为人民。”

毛泽东显然不很满意，说：“为人民讲了多少年了吗。”又问：“你们看，搞‘四清’好，还是不搞‘四清’好？”

林铁回答：“显然是搞‘四清’好。”

毛泽东又问了三线建设和机关精简的情况。

接着，毛泽东离开天津继续南下，经过济南、徐州、蚌埠、南京，17日到达上海。像往常一样，沿途都找当地党政军负责人谈话。大家所谈的，几乎还是集中在农业生产和粮食、备战和三线建设、领导方法、教育制度这些问题上。毛泽东10月在北京讲的：“如果北京出修正主义，你们地方怎么办？是不是学蔡锷起义，打倒袁世凯？我是感到要出问题。”一路上都没有听到这方面的反应。19日到达杭州。

这几天，北京可是风生水起。

批判北京市的副市长，谁有那么大的胆子？如果批判吴晗真是毛泽东的意见，不紧跟那是要犯错误的。即使是毛泽东要批吴晗，为什么要批？批到什么程度？这些都不清楚，执行起来，也是容易犯错误。

11月13日，北京市委书记邓拓召集市委宣传部部长李琪、《北京日报》总编辑范瑾等人开会，研究是否转载姚文元批判吴晗《海瑞罢官》一文的“转载”问题。研究的结果是，先向《文汇报》了解情况，如

果姚文元的文章是毛泽东定的,《北京日报》就登,否则就不登。

但是,他们从《文汇报》那里没有获得任何消息。

邓拓决定还是请示正在外地开会的彭真。彭真指示仍然是:暂不转载,待他回京再定。

中共中央机关党报《人民日报》对姚文元的文章也十分关注。突然点名批判北京市的副市长,此事非同小可。《人民日报》社内部,不少人看出姚文元文章大有来头。副总编辑李庄看了姚文元文章后说:“迷迷糊糊感到要出什么大事了”。其他编辑也有这个感觉,觉得好像应该转载,又怕承担不起责任,于是,都来请示总编辑吴冷西。

对“是否转载姚文元文章”的请示,吴冷西答复说,他要请示中央。但他没有像以往那样,直接去向毛泽东请示,而是请示了当时主持中央书记处工作兼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彭真。

这个“文化革命小组”,是1964年夏天由毛泽东提议成立的。当时在毛泽东那里开了一次会,有彭真、陆定一、康生和周扬、吴冷西参加。毛泽东在批评中宣部和周扬之后说:

“我看,文化部要彻底整顿。陆定一、彭真、周扬,你们3个同志组成一个文化革命领导小组,指导全国的文化革命。由陆定一同志主持,任组长。”

陆定一赶紧说:“主席,我见事迟,不能当这个组长。”

毛泽东笑着问:“那谁当组长呢?”

陆定一建议:“我看,还是由彭真同志挂帅吧。”

彭真没有表示不同意见,毛泽东说:“那也可以。”

过了一会,康生也谈到文化部的事情,毛泽东立即说:“叫康生和吴冷西同志也参加小组工作。”

彭真在1964年7月7日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汇报了毛泽东的意见,于是决定由彭真、陆定一、康生、周扬、吴冷西组成“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彭真为组长,陆定一为副组长。小组的任务是:“贯彻执行中央和主席关于文化艺术和哲学社会科学的指示。”

应该说,吴冷西请示彭真是正常的。但是,面对一篇极不正常的文章,却用极正常的程序解决,对于处在政治漩涡的人来说,本身就已经不正常了。而且,吴冷西在接替邓拓任《人民日报》总编后,凡事都

是请示毛泽东定夺。然而,到了 1965 年,又恰恰在这件事上,他没有请示毛泽东,而是请示了彭真。

正为上海发表姚文元的文章而恼火的彭真,在吴冷西请示的时候,十分肯定的要求:“不予转载。”

于是,吴冷西回复《人民日报》说:“不转载。”理由有三条:

一、姚文元的文章是上海市委搞的,不是中央的意思;

二、姚文元的文章联系“翻案风”、“单干风”,把学术问题拉到政治问题上,太勉强;

三、批评《海瑞罢官》涉及《人民日报》1959 年发表的《海瑞骂皇帝》和《论海瑞》,这两篇文章是经过胡乔木修改的,胡乔木是毛泽东的秘书,要慎重。

《人民日报》编辑部还派出多名经验丰富的记者,四出活动,探听消息,重点自然是上海和北京,但所获甚微。

中共中央刊物《红旗》杂志的工作是政治局候补委员陈伯达负责的。由于一直在毛泽东身边工作,比较清楚毛泽东的思路。姚文元的文章,在政治上,他已经感到很有背景,只是事前他这位“大秀才”对此事竟一点也不知道,让他感到有些失落和气愤。现在,他急于要弄清文章出台的来龙去脉,特别是毛泽东的态度。他手下的几位笔杆子都是支持姚文元的。

《红旗》杂志编委关锋对姚文元的文章十分赞同,他读了姚文元的文章后连声说:“好!”还表示:“要干起来,我们一定支持姚文元。”

戚本禹说:“历史学界一定要来个大风暴,否则,就触不动这些人。看来,学术界也是面临着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的形势。”他还讲:“若有人攻击姚文元,我们就出来反攻。”

由于北京的《人民日报》、《北京日报》保持沉默,由陈伯达主编的《红旗》,也没有对姚文元的文章做出直接反应。但是在 1965 年 12 月 8 日出版的第 13 期《红旗》杂志上,安排发表了戚本禹的一篇“左派”文章《为革命而研究历史》,作为对姚文元文章的一种呼应。

当时,《文汇报》北京办事处负责人艾玲,在“北办”记者李根底采写的情况汇报中,发现关锋、戚本禹,还有学部的尹达,是支持姚文元文章的少数几个人,就把他们的观点编入了给上海的报告之中。一

天,陆灏电话通知艾玲,设法把关锋、戚本禹二人秘密安排到上海。行动要绝对保密,不能让中宣部知道,也不能让“北办”的其他人知道,总之不能让任何人知道。

于是,艾玲亲自通知关锋和戚本禹。关锋向《红旗》杂志社称父亲病重,要请假回老家;戚本禹则以为《红旗》杂志组织工农兵学哲学文章的名义,前往上海。为了掩人耳目,艾玲不能用“北办”的车,又不便借用其他单位的车。想来想去,她只好向在军委机关工作的丈夫求助,请他派部队的车子送关、戚二人去机场。

时值冬季,艾玲半夜出发,乘军车悄悄开到关、戚家的附近等候。按照事先约好的时间,关、戚二人分别上车后,直奔首都机场,飞往上海。

事后,陆灏表扬艾玲这件事办得好,干净利落。

与北京相反,继11月12日上海《解放日报》转载了姚文元的文章后,11月24日,浙江的《浙江日报》、山东的《大众日报》、江苏的《新华日报》、福建的《福建日报》,而后是25日的《安徽日报》,26日的《江西日报》,这些受华东局领导的几个省市的报刊,先后转载了姚文元的文章。

而北京,按照彭真的指示,依然没有任何反应。

其他地区也没有反应。

很多人在揣摩上边的“意思”。例如:天津。

各报纸的请示报告堆积到天津市市长胡昭衡面前:“姚文元的文章,天津要不要转载?”

胡昭衡本能地把目光投向《人民日报》,等待《人民日报》的反应。

《人民日报》没有反应,却迎来了一位相交已久的老乡加战友、《光明日报》总编穆欣。

穆欣给胡昭衡带来了陈伯达的忠告:“伯达同志让我转告你,不要转载。”

穆欣私下同胡昭衡咬耳朵,“姚的文章是江青在上海搞的,背景还不清楚。北京的中央领导都不清楚,北京各报决定不转,你们也不要转,还不摸来头……”

胡昭衡很快通知天津各报:“不要转载姚文元的文章。”

姚文元文章发表的第九天,康生来到天津,住进“新三号”。胡昭衡马上赶去看望,并且作陪吃午饭。

午饭结束时,胡昭衡感到气氛已经松快些时,才谨慎地问:“姚文元的文章康老看了吗?”

康生脸上毫无表情变化,自顾自地说:“章士钊写了本书,想发表。他请主席看,主席叫我也看看,提提意见。”

胡昭衡只好随康生的话题转:“什么书?”

《柳文指要》。”康生说着便立起身,这是谈话结束的意思。

以后几天,胡昭衡又看望几次康生。康生还是闭口不提姚文元的文章,只是谈正在读《柳文指要》,或者是《红楼梦》。

康生走了,周扬年底过来了。

周扬关心的是敏感话题。他说:“评李秀成也罢,评曹操和秦始皇也罢,现在评海瑞也罢,都是学术讨论,学术批判,不能硬拉到政治上。往政治上生拉硬扯会产生许多严重后果……”

胡昭衡点头。

周扬走了,陈伯达过了年来到天津。

“有什么消息?”陈伯达一边握手,一边就问。

“朱老总来了,我上专列去汇报三线建设情况,又陪他参观塘沽码头,他对军工方面的研究生产作许多指示。”胡昭衡略一犹豫,接着说,“总理在八省会议上表扬了天津,治碱挖渠……”

“总理表扬的是天津市市长。”陈伯达显然早已打听清楚这个消息,他做手势阻止胡昭衡讲谦虚话,不用讲陈伯达也可以明白胡昭衡会怎么讲。他继续问:“还有什么消息?”

“北京的万里、郑天翔、邓拓和范瑾来过,我去看他们,谈了京津协作,联手赶上海的问题。”

“还有什么?”

“去年穆欣来,说了姚文元文章……”

陈伯达做个停止的手势表示亲近地靠拢胡昭衡,竭力跟上胡昭衡的步子走:“夫子,你还得帮我开个座谈会。题目是两个:干部参加劳动和农业机械化问题,要找明白人。”

陈伯达在津几天,除了谈干部参加劳动和农业机械化问题,就是

拉胡昭衡看美国或欧洲的电影,当然也不忘去逛古籍书店和艺林阁。

胡昭衡始终不得要领。

四川的李井泉对于是否在《四川日报》转载,也很伤脑筋。于是打电话给邓小平,邓小平不在。于是又给贺龙打电话。贺龙明确回答说:“不转载。”这样一来,《四川日报》一直拖到12月14日才转载。

1965年11月中旬,已经来到杭州的毛泽东在《光明日报情况简编》中的两篇文章上作了批注:

一篇是第362期中《吴晗看了姚文元批评〈海瑞罢官〉一文后的反映》,里面讲到吴晗在11月14日说:“姚文元说我的《海瑞罢官》作品产生于1961年‘刮风’的时候。这是错了。我的《论海瑞》发表于1959年9月21日的《人民日报》上。《海瑞罢官》是1960年写的,我没有那么大的本领预见到1961年要‘刮风’。”

他还说:“我不准备写答辩文章,正在给市委写个报告,直接送给彭真同志,只要领导了解就行了。我不怕。这样牵强附会的批评,乱扣帽子,这种风气很不好。谁还敢写东西,谁还敢谈历史?”

毛泽东在这篇材料后批道:“我都已看过。一夜无眠。这些都送江青一阅。看后,着人送杭州。”

另一篇是第367期《关于姚文元评(海瑞罢官)文章反应续闻》,里面说:“翦伯赞认为,现在学术界的顾虑并未解除,姚文元乱来一通,不利于百家争鸣。”

毛泽东看后在旁边画了三个圈。

# 第12回：单行本，看京沪南北较劲 姑苏城，副主席再三挽留

11月22日，毛泽东因为有外事活动来到上海。正在上海的江青，拿着一叠厚厚的材料，急匆匆地来到毛泽东的住处：

“主席，这是各地报上来的材料，说明有人封锁姚文元同志的文章，扣压左派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完全是有组织、有预谋、有步骤的阴谋。北京各报刊，几乎都接到了彭真的指令，不许转载姚文元的文章。”

“你有没有找过康生、伯达。”毛泽东问她。

“我把你的意见都向他们传达了，他们正在准备文章。可是他们也感到北京的压力很大。”江青说。

毛泽东说：“这个时候才是出左派的好时机，你告诉张春桥、姚文元，不要害怕。右派要跳，就让他们先表演表演嘛。北京的报纸不发表文章，就让上海先出单行本，向全国征订。让上海的同志下决心，一定要把这把火点起来！”

“北京市委现在成了老虎屁股，没人敢摸！”江青生气地说。

毛泽东倔强的说道：“是吗？那我偏要摸！”

毛泽东想了想，又对江青说：“我给你请尊‘神’吧。你去找林彪谈谈，看一下部队文化工作方面的事情。”

他对随后进来的陈丕显说：“北京不转载姚文元的文章，你们出单行本，看他转载不转载。”

然后，毛泽东在陈丕显、江青的陪同下走进了锦江饭店的接待室，参加他的老朋友——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八十寿辰的纪念活动。

这是毛泽东离开北京后的第一次公开露面。由于长时间没有和外界接触，世界各地有许多关于他的谣传，有说生病的，也有说病危的，毛泽东听到后只是淡淡一笑。他有意安排了这次外事活动，这样

在公开场合露一下面,让谣传不攻自破。他邀请了几十名外国朋友到锦江饭店与他共同进餐,庆祝美国左派战士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生日。

毛泽东仔细地观赏墙壁上的一幅竹雕,神情专注,旁若无人。欣赏够了,然后移到第二幅作品前,又走向第三幅作品。满屋子里的人全都站着,等他开口说话。

毛泽东走向已经准备好的午餐桌前,点燃一支香烟,慢吞吞地说:“医生让我戒烟,可是我不听那一套,从未想到过戒烟。”说着他笑了笑,请在场的客人同他一起吸烟。果然,有人掏出了烟卷,气氛活跃了许多。

过了一会儿,他发现吸烟的人不多,就大声说:“不要担心我们是少数派,放心大胆地抽好啦——真理有时候在少数派一边。”

一席话,说得在场的人都笑了。毛泽东擅长穷经据典,常常使他的听众如入云山雾海,不知所措。嬉笑怒骂皆文章,是真名士自风流,即使日常生活中的普通用语,毛泽东也保持他独往独来的风格。

在场的外国客人中有不少是他的老朋友,对毛泽东独特的语言表述方式很熟悉了。他们感到奇怪的是,在极力反对越南战争的美国朋友斯特朗面前,毛泽东对越南战争只字不提,他所谈到的所有国际问题,矛头全部指向苏联。

在毛泽东的心目中,中国的头号敌人已经由“美帝”变成了“苏修”。1965 年 9 月,他写了一首辞锋犀利的诗词:

“鲲鹏展翅,九万里,翻动扶摇羊角。背负青天朝下看,都是人间城郭。炮火连天,弹痕遍地,吓倒蓬间雀。怎么得了,哎呀我要飞跃。

借问君去何方,雀儿答道:有仙山琼阁。不见前年秋月朗,订了三家条约。还有吃的,土豆烧熟了,再加牛肉。不须放屁,试看天翻地覆。”

这首《念奴娇.鸟儿问答》是应周恩来的夫人邓颖超的请求写的。从中可以清楚地体会到毛泽东对苏联融于嘻戏之中的愤怒。

11 月 24 日,上海新华书店奉命急电向全国新华书店征求订购单行本的数字。

北京市委书记邓拓一接到北京市新华书店的报告,马上去请示彭

真,彭真沉下脸说:“我们一本也不订!”

恰巧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刘仁也在那里,他从邓拓手里夺过那张征定单,撕了个粉碎,说:“电报都不回,看他怎么办!”

彭真接着说:“中央开会,没有一个决议批判吴晗同志。为什么我们非要跟着上海跑不行?我们听中央的招呼,而不看什么人的眼色。”

在上海新华书店的几次催问下,北京都没有答复。

11 月 25 日,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秘书长、总参谋长、国务院副总理、国防部副部长、国防工业办公室主任、国防委员会副主席的罗瑞卿和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一起飞到上海,准备陪同毛泽东主席会见柬埔寨副首相、国防部长朗诺。上海市委书记陈丕显到机场迎接。周恩来上车后,陈丕显让罗瑞卿坐到自己的车里。罗瑞卿在中央分管警卫工作,陈丕显在上海市委也分管警卫工作,彼此工作来往很多,非常熟悉。

在车里,陈丕显问罗瑞卿:“最近《文汇报》登的姚文元批《海瑞罢官》的文章你看了吗?”

罗瑞卿说:“没注意。”

陈丕显:“是江青组织写的。文章登出后,除了我们华东地区的几家报纸转载了,北京和其他地区的报纸都没有转载。主席很生气,让我们出单行本。还不让跟其他人讲。这样下去,矛盾激化起来,主席不是更生气吗?我想让总理知道这事,你罗长子不是外人,你看是我直接向总理汇报,还是由你向总理汇报呢?”

罗瑞卿想了一下说:“我看还是由我来先报告总理为好。”

第二天清晨,陈丕显到锦江饭店南楼,周恩来和罗瑞卿正在吃早点,一见陈丕显进来,周恩来就站了起来,握着陈丕显的手说:“你让罗总长转告我的那件事,我已经知道了。感谢你,丕显同志!”

11 月 26 日下午,罗瑞卿在会见朗诺前,先去见了毛泽东。他对毛泽东说:“主席,评《海瑞罢官》的文章我找了一份,还没看。”

毛泽东悠悠的抽着烟,脸上略有笑容,没有说话。

参加完会见朗诺,周恩来同毛泽东谈起姚文元评《海瑞罢官》文章一事,毛泽东对周恩来说:“回去告诉彭真,要支持左派的文章。北京的报纸要立即转载姚文元的文章。”

“好的,我回去就安排此事。”周恩来回答说。

晚上,毛泽东离开上海回杭州,罗瑞卿送毛泽东,先去看看江青。

江青一见罗瑞卿就发牢骚:“北京报纸至今都不转载姚文元的文章,不知为什么。现在在北京看家的是彭真。”

罗瑞卿立即表态:“我马上通知《解放军报》转载!”

从江青那里一出来,罗瑞卿就给《解放军报》社打电话,要求他们立即转载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并要加“编者按”。

然后,他又给北京彭真打了电话:“是彭真同志吗?”

“是啊。”

“我是罗瑞卿……”

“罗长子,在上海吗?”

“是啊,有件事想和你通通气。《文汇报》登了姚文元的一篇评论《海瑞罢官》的文章你知道吗?”

“听说了。”

“我同主席提起这件事,主席笑了。估计毛主席是看了这篇文章了。我已经要《解放军报》转载了。你考虑一下,北京其他报纸能不能同时转载?如果不能同时转载,是否先指定一个报纸和《解放军报》同时转载?”

“这样吧,我安排一下。”

彭真放下罗瑞卿的电话,心里挺别扭,毛泽东为什么要批判吴晗?他不清楚。但是,他不希望吴晗被打倒。北京市的副市长被打倒,他就没有责任了?想了一会儿,他给康生打个电话:“是康生同志吗?我是彭真。上海姚文元的文章你看了吗?”

“看了。”康生说。

“你知道上海发表这篇文章的背景吗?”彭真问。

“一无所知。我也是文章发表后才看到的。”康生回答。

“上海张春桥前一段时间总往北京跑是干什么呀?是不是因为这件事呀?”彭真又问道,

“噢,他来是研究《智取威虎山》的修改和上演问题。他找我谈话都是说京剧革命,没有谈起批判《海瑞罢官》的事。”康生说。

“看来上海搞这些名堂连你也瞒着,这成什么话?老让我们处于

这样的被动状态,我们还怎么工作?”彭真对康生说。

“那你就赶快变被动为主动嘛,也开始批判那出戏算了。《海瑞罢官》确实有问题,我听好多同志反映过这出戏的问题,起码在政治上对我们是没有任何好处的。”康生回答。

“好吧,那先这样。”话不投机半句多,彭真听康生没有向着他的意思,就不再说什么了。

上海火车站,罗瑞卿按照他当公安部长时的习惯,一直把毛泽东送进车厢,然后,向毛泽东请示:

“主席,我准备明天去苏州,看看林副主席,汇报一下最近的工作情况。您还有什么指示?”

“去看看好,要他好好休养,要养得像7000人大会的时候一样,能够做3个小时的报告。”毛泽东说。

罗瑞卿应道:“我一定把主席的话转达给林副主席。”

毛泽东又说了一遍:“告诉林彪,要他好好养,要养得像开7000人大会的时候一样,能够做3个小时的报告。”

“是!主席,我一定带到。”一句话,毛泽东重复了两遍,罗瑞卿心中不免有些困惑……

列车徐徐开动了,站在站台上的罗瑞卿向毛泽东的专列敬礼送别。毛泽东隔着玻璃窗向他挥了挥手。他们都不曾想到,这一挥手竟会是二人之间的永诀。

11月27日,刚从上海回到北京的周恩来立即给彭真打电话:“是彭真同志吗?我是周恩来。”

“是总理啊,我是彭真。”

“我刚从上海回来。毛主席指示北京各报刊要立即转载姚文元同志的文章。我们是不是要开个会,研究一下?”

“总理的意思……”

“现在不是听我的意思,而是如何落实毛主席的这个决定。如果你同意的话,明天在人民大会堂西大厅,由你召集北京各报刊的领导同志和主管宣传的同志,商讨转载的问题。”

“好吧,我来安排。”彭真回答说。

11月26日,罗瑞卿在上海火车站送走毛泽东,第二天,11月27日

即赶往苏州去见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防部长,他的直接领导林彪。

到了林彪住处,林彪的秘书悄悄告诉罗瑞卿:

“林副主席还没有吃午饭。”罗瑞卿点点头,知道待的时间不宜太长。

一见面,林彪照例拉了拉罗瑞卿的手,然后让罗瑞卿坐下,还叫秘书拿奶糖出来招待罗瑞卿:“吃几块糖吧,这是上海的‘大白兔’”。

“林副主席身体好吗?”

“还可以。”

“按照林副主席的指示,我最近在广东和广西跑了跑……”

罗瑞卿把最近几个月部队的情况,战备工作的情况向林彪做了简要汇报。特别转达了毛泽东的嘱托:

“毛主席再三嘱咐,让您好好休养,要养得像开7000人大会一样,能做3个钟头的报告。”

林彪点点头说:“好,好,谢谢主席的关心。”

罗瑞卿怕影响林彪的休息,就要起身告辞:“林副主席先休息吧,我明天再来。”

“不慌,不慌,再坐坐,再坐坐,多谈谈,有什么问题一次谈完,不用再留了。”林彪一再挽留。

罗瑞卿有些奇怪,近几年,由于林彪对他的意见越来越大,两人的矛盾日益公开,向林彪汇报工作成为罗瑞卿一件很头疼的事,汇报细了,说他干扰林彪的休息。汇报少了,又说他封锁消息。像今天这样的热情招待和挽留是近几年很少有的。

于是,罗瑞卿又坐了下来,把他在广东、广西察看地形的情况及沿途部队情况、北京批判肖向荣、11月11日空八师飞行员李显斌驾机叛逃等情况向林彪做了详细汇报。林彪很平静,话仍然不多,只是偶尔点一下头说:“就是要突出政治。突出政治就是突出革命。突出革命,他就不去反革命了。”

最后,罗瑞卿问林彪:“林副主席还有什么指示吗?”

林彪说:“没有了。”

“那我先走了。过段时间我再来看望林副主席,向林副主席汇

报。”罗瑞卿起身告辞。

这时,林彪突然问罗瑞卿:“你最近身体怎样?”

“还好,只是常闹牙疼。”罗瑞卿捂了捂脸说。

林彪一边起身相送,一边关心地说:“牙痛要吃莲子炖鸭子,一吃就好。豆豆几次牙痛,一吃这个就好了。”

“谢谢林副主席的关心,我回去以后,一定按照林副主席说的方法办。”

# 第13回：难放心，风起于青萍之末 众丘八，群起攻总政主任

罗瑞卿一回到住处，就接到他妻子郝治平的电话："跟林副主席见面了吗？"

"见了。"

"谈了吗？"

"谈了。"

"谈的怎样？"

"感觉谈的还可以，比较轻松。"

"林副主席身体怎样？"

"看上去还可以，比我们在大连时见到的样子要好多了。"

"噢，那我就放心了……"

郝治平"放心"的是林彪的身体吗？显然不是。当时，总参和军委机关里，针对罗瑞卿的议论越来越多，诸如"罗瑞卿有野心，不尊重老帅"、"总是突出自己"、"有事不跟林彪商量"、"不尊重林彪"、"对罗长子要警惕"等等。

无风不起浪，作为妻子，郝治平担心的是罗瑞卿的政治前途。

罗瑞卿的能力和原则性都很强，这在中共党内是公认的。因此，他很受毛泽东、刘少奇、邓小平等人的赏识。刘少奇曾经说："将来国防部长的接班人就是总参谋长罗瑞卿嘛。"

罗瑞卿的兼职很多，又是中央书记处的书记，军衔虽然是大将，但见报时他的位置有时排在几位老帅之前。

他是军委秘书长，中央和军委开了什么会，要他去向各位老帅报告，实际上是传达。他不是中央政治局常委，却经常列席参加政治局常委会。同时他作风生硬的缺点也十分突出。毛泽东在延安时就送过罗瑞卿一句话："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就是对罗瑞卿这个人"原则性过强"的劝导。而他工作起来又从不推诿，因此，锋芒过露，

特别是在大比武、原子弹爆炸成功等一些重大事件的宣传报道上,国防科委工作的归口分工,以及前不久召开的全军作战会议上,都引起了诸多非议,尤其是一些老帅的不满。最近,更有不少人到负责军委工作的党中央副主席林彪那里反映罗瑞卿的问题。

在诸多老帅中,罗瑞卿和林彪、罗荣桓的关系曾经是最为密切的。早在红军时期,他们就在一起共事。罗瑞卿一直是林彪的下级。林彪当红四军军长时,罗瑞卿是11师的政委。林彪当一军团军团长时,罗瑞卿是军团的保卫局长。长征途中,他们曾同台演戏。到陕北后,林彪当红军大学的校长,罗瑞卿是教育长。1949年平津战役后,林彪就想调罗瑞卿到四野工作,因为中央任命罗瑞卿为公安部长,没有调成。1959年庐山会议后,林彪出任国防部长,主持中共中央军委日常工作,又主动向毛泽东提议调罗瑞卿任中央军委秘书长、总参谋长。

1962年秋,林彪的夫人叶群向中央反映,林彪指挥部队入闽,累病了,需要休息。毛泽东决定,在林彪生病期间,由八一南昌起义的总指挥贺龙元帅主持军委日常工作,要罗瑞卿多向贺龙请示工作。罗瑞卿因此同贺龙交往多了起来,来往也日益密切。

有一次,林彪在同罗瑞卿谈话时,突然说:“我们的威信不够吧?因为我们不是南昌起义的领导人。”罗瑞卿不太明白林彪的意思。总政治部主任肖华对他说:“林总是不是觉得你和贺老总接触太多,而和别的元帅接近得太少啊?”

1964年8月,毛泽东将主持军委工作的贺龙、罗瑞卿叫到北戴河,商量军队高级干部减薪问题。讨论中,贺龙建议:“是不是连军衔一齐取消算了?”

毛泽东立即回答:“取消!搞掉那块牌牌!我早就想搞掉它。”

回京后,罗瑞卿立即打电话给林彪的秘书,向林彪报告此事并请林彪指示,但是,一直没有得到答复。经几次催问,两天后,秘书回电话说:“林总同意。”

林彪所以迟迟才表态,决非对取消军衔有异议。对军衔制,他的态度和毛泽东是一样的,本来就不很赞成。红军时期,连军饷也没有,队伍也没有散,我们也胜利了。但是,对于如此一件大事,贺龙、罗瑞卿越过他直接向毛泽东建议,他是极不满意的。

在此之前,1964 年 6 月,罗瑞卿和贺龙在全军搞了一次“大比武”,毛泽东、刘少奇等在京的中央领导都前往观看,大加赞扬。报纸、电台纷纷做了报道,还摄制了电影,搞得十分热闹。当时,林彪正在养病,没有参与此事。

1964 年 10 月间,为了检查 1960 年军委扩大会议决议执行情况,总政治部组成三个工作组分别到南京、成都、武汉三个军区检查工作,然后集中到武汉,由总政副主任刘志坚主持研究起草调查报告。

刘志坚是随叶剑英到长沙参加推广长沙政治学校政治建校的现场会后,来到了江城武汉,在这里召集各路工作组汇总情况。他跟罗瑞卿通了一次电话,提出:根据工作组目前掌握的情况,要形成一个全面估价部队贯彻落实 1960 年军委扩大会议决议的报告,材料还不够。罗瑞卿说:“那就继续了解嘛,再找一些部队蹲一蹲。”

于是,工作组决定不返回北京,继续下部队。刘志坚拿起电话同广州军区一位领导协商,那边说:“去红军团吧,这个团各项工作不错,在军区比较拔尖。”

这个红军团历史上威名显赫。十大元帅从这个团出去的有四个,还出了百多名将军。林彪曾在这个团的“红二连”当过连长。于是,刘志坚带领一个工作组来到广州军区某师 379 团。他自己蹲在“红一连”,兼跑“红二连”,派总政组织部副部长胡友之蹲在团直,《解放军报》副总编辑唐平铸带一个组在七连,总政宣传部副部长姜思毅带一个组蹲在四连。这一蹲就是两个来月。那时工作组下部队很少在团以上机关活动,依当时的话说:“一个猛子” 就扎到连队了,和战士吃住在一起,没有什么专门的汇报,全靠直接同官兵接触中掌握第一手材料。

调查快要结束时,叶群带了三个秘书参加进来,并让三名秘书分别下到一、四、七连,组织干部战士座谈,召开民主会,了解了许多大比武的情况,发现了许多问题。叶群亲自找战士谈话,还与饲养员一起谈心。

12 月 24 日,叶群离开部队到广州,向已在广州的林彪汇报。28 日晚,林彪在广州召见刘志坚和《解放军报》副总编辑唐平铸时说:“今年的比武把政治工作冲垮了。明年要反对单纯军事观点,反对单纯技

术观点,反对单纯生产观点。比武挤掉了政治工作。第一步恢复比武以前的政治工作的地位,第二步提高政治工作。”

最后,林彪说:“今晚上把我讲的整理出来,明天我去上海之前送给我。再抄三份,一份给黄永胜;一份给罗总长,听听他的意见;一份你拿着,找五个军区级领导,给他们看看,看他们什么意见。”

刘志坚连夜整理了林彪的谈话记录,天一亮,送到了林彪那里。吃过早饭,他又给罗瑞卿拨通电话。先口头传达了林彪昨晚上的谈话内容。

罗瑞卿听了感到非常不安,也很不服气,当即对刘志坚说:“那今年我们不是犯了路线错误?”

12 月 29 日晚 21 时 50 分,罗瑞卿主持军委办公会议,传达林彪指示。在会上,罗瑞卿为自己辩解说:“我理解林彪同志的指示是指局部而言,不是指全体。如果那样,那就是路线错误了。”

当晚 23 时,林彪在广州再次召见刘志坚、唐平铸,讨论、审定了由林彪了提出的《关于当前部队工作的指示》的未定稿。林彪说:

“1964 年全军各方面的工作成绩是很大的,部队的政治情绪高,作风好,干劲大,毛主席思想红旗举得高。总的说来,成绩是主要的。但是,现在出现了不好的苗头,军事训练搞的太突出,时间占的太多,军政工作比例有些失调,冲击了政治。有的部队只抓军事技术,不抓政治思想,甚至弄虚作假,搞锦标主义和形式主义。这样下去,必然会把政治工作冲垮,把其他一切东西冲垮,也会把军事训练本身冲垮。要敲警钟,如果听其自流,不加纠正,那就不得了。明年的工作要突出政治,大力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大抓毛主席著作的学习,在全军掀起一个更大、更广泛的学习毛主席著作的高潮,把毛主席著作当作最根本的必修课。要赶快采取措施,使军政工作比例正常化,恢复一九六二、六三年的正常训练情况,纠正最近一个时期出现的失调现象。”

《关于当前部队工作的指示》指出:

“我们是毛主席创建和领导的军队,是以政治为特点,政治统率军事。毛主席一向教导我们,政治是统帅,是灵魂;政治工作是我军的生命线。只要我们的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稍微一放松,其他工作就会走到邪路上去。”

“我们从来认为,军事是主要的,但是,更重要的是政治。我军政治上一塌糊涂,敌人来了向后跑,即便军事技术上再好,有什么用!一定要突出政治,使政治思想工作真正成为我们全盘工作的基础。政治工作搞好了,其他工作才能搞好,军事训练也才能搞好。军事训练、生产等和政治工作发生了矛盾,要给政治工作让路。”

1965 年《解放军报》的元旦社论,罗瑞卿在北京准备了一个初稿,标题是《把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高举更高举,使创造四好连队运动落实再落实》。

这篇社论充分肯定了 1964 年军训成绩,肯定了郭兴福教学法。稿子送到广州后,林彪很不满意,让刘志坚、唐平铸重新修改,加进了“突出政治”的内容。

于是,军报便出现了两个元旦社论的稿子。《解放军报》工作人员将罗瑞卿主持,由《解放军报》总编辑华楠等人起草的稿子称为“北稿”,而由林彪授意,《解放军报》副总编唐平铸等人修改过的稿子称为“南稿”。

“南稿”送到北京后,罗瑞卿召集华楠等人研究,感到两稿很难统一,罗瑞卿打电话给刘志坚和起草“南稿”的唐平铸等人,对他们说:“你们的稿子看到了,和原来的稿子差距很大。你们赶紧回来一下,和华楠他们再研究研究。”

刘志坚觉得很为难,修改稿是按照林彪的意见改的,很多地方都是林彪亲自写的,他们回去怎么好擅动呢?于是就说:“林总这边现在离不开呀。”

罗瑞卿说:“你们不回来怎么办?两种意见走不到一起了。”

12 月 30 日,刘志坚等人赶紧回到北京,当天“南稿”、“北稿”起草人会合在人民大会堂研究修改问题。到 31 日,还是没有统一的意见。因为第二天就要见报了,罗瑞卿便拍了板,以“北稿”为基础,肯定 1964 年军训的成绩,同时参照“南稿”,加上了“一定要突出政治”,同时删去“军事、政治、生产等各方面,如果发生矛盾,要让政治突出,其他的让路”这样的文字。

1965 年 1 月 4 日,军委以[65]1 号文件转发《林彪同志关于当前部队工作的指示》至军以上党委。

1月3日至5日,在北京连续召开3次军委办公会议,传达林彪的指示,听取总政工作组汇报在广州军区蹲点的情况,讨论《1965年国防建设工作纲要(草案)》。

各大军区、各军兵种领导人对林彪指示和工作组的汇报,进行了热烈讨论。讨论的题目集中在如何评价1964年军训的成绩、如何看待大比武,如何落实毛泽东政治建军的思想和林彪突出政治的具体指示。

对于毛泽东政治建军的思想,军队的各级领导是衷心拥护的,因为他们都是跟着毛泽东一步步走过来的。没有毛泽东的建军思想,就没有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今天。他们每个人的亲身经历都告诉他们,只有毛泽东是正确的,其他人都不行。

对林彪,他们是从内心佩服的,"跟着林总打胜仗……"四野的干部、战士从东北的黑土地一直唱到广东的海南岛;抗战期间,首战平型关,威名天下扬,解放战争,出关20万,入关100万,这些都是全军全党有目共睹的。何况,林彪的指示是代表了毛泽东的思想,因此,大家在发言时一致表示:"拥护林总的指示"。

但是,涉及到对大比武的具体评价和前一年度工作中的成绩和问题,议论就多了。

当总政治部主任肖华说到:"去年的大练兵,大比武,冲击了政治,影响了四个第一,方向偏了。十三陵的军事表演是各地拼凑尖子,弄虚作假,欺骗主席……"

这时,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得志拍案而起,指着肖华问到:"哎、哎,哎,你给我讲清楚,谁说是假的?十三陵军事表演,我们济南部队来的尖子哪个是假的?民兵表演,祖孙三代上靶场,爷爷假还是孙子假?全是真的!他们打靶,一枪一个,百发百中,凡参加的人都口服心服,怎么是假的?谁说假的我就跟他辩论!"

北京军区司令员杨勇也不甘示弱,跟着站起来说:"你们说大比武以后不比了,我就比!不比就没个高低上下,就分不清先进后进",他扯开嗓门冲着大家说:"去年底军事训练真的打破了教条框框啦,技术训练达到了历史上没有过的高度。谁向林副主席反映军事训练冲击了政治,那是别有用心!"

对战功显赫,全军著名的“三羊(杨得志,杨勇,杨成武)开泰”肖华不敢正面交锋,但对这些资历相同的老大哥,他这个小弟弟也是从不示弱的。他说:

“你们就是用大比武挤占了政治教育的时间,用军事冲击政治!”一面指着主管军事训练的副总长张宗逊上将批评:“在这个问题上,你应该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和检查!”

和林彪同为黄埔四期出身的张宗逊也不是好惹的,一听肖华批评自己,心想:“你算老几,批评起我来了。我可不能被这个黑锅,弄不好是政治问题。”他马上站起来大声反驳:“我检查什么?我们安排的训练时间又没有冲击政治。既然你提出军事冲击了政治,那好,你们看看到底是谁冲击了谁?”

他向所有与会者展开了训练时间表:“军委有规定,军事政治的训练时间是三七开,政治三,军事七,现在实际情况怎么样呢?我这里有统计,政治占了60%以上的时间。你说是军事冲击了政治,什么时候冲击了政治?”

“是啊,你说到底谁冲击了谁?”

“十三陵大比武怎么欺骗主席了?谁这样说才是欺骗主席!”

丘八们在一起就爱起哄,沈阳军区政治委员赖传珠上将、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上将、南京军区副司令员王必成中将、福州军区副司令员皮定钧中将、昆明军区司令员秦基伟中将、成都军区副司令员黄新庭中将等各总部各大军区负责人纷纷响应,对肖华群起而攻之。

会议情况很快就传到了林彪那里。第二天,1月9日,林彪对罗瑞卿说:

“1964年的军训发动了群众,贯彻了以我为主的军事训练的方针和方法,打破了教条主义框框,创造了许多先进经验,成绩是主要的。”

他提出,由罗瑞卿组织一个班子,广泛收集下面对林彪指示的意见,对这一指示作进一步修改。

毛泽东虽然对“大比武”也有热情,但是,他的思想核心还是“突出政治”。在这一点,林彪和毛泽东是一致的。政治上的远见,罗瑞卿显然比林彪差一截。1962年7000人大会,罗瑞卿曾为林彪准备了一份

发言稿,林彪看后认为不能用,自己用了3天时间,只列了一个提纲,在会上讲了3个钟头,受到毛泽东的高度赞扬和与会者的好评。

下来后,毛泽东问罗瑞卿:“听说你们给林彪准备的发言稿他没用,林彪的这一篇讲话,你讲不讲得出来?”

罗瑞卿实实在在的回答:“我讲不出来。”

毛泽东:“讲不出来就要学嘛。”

罗瑞卿感叹的说:“可能这辈子也赶不上林总。”

对于“大比武”,罗瑞卿付出了很大的心血,也取得了十分明显的成绩,受到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中央许多人的好评。罗瑞卿不甘心轻易就否定了它。他顽强的坚持自己的观点,在“突出政治”的问题上,与林彪产生了很大的分歧。

# 第14回：罗瑞卿，医院先探刘亚楼 “要通气”，林彪也拿出党章

林彪在突出政治方面是很下功夫的。早在林彪接替彭德怀主持军队工作后不久，他就根据毛泽东的建军思想提出了“四个第一”，即：武器和人的关系，人的因素第一；军队各种工作和政治工作的关系，政治工作第一；政治工作中事务性工作和思想工作的关系，思想工作第一；思想工作中书本思想和活的思想的关系，活的思想第一。后来，人们把它概括为：人的因素第一、政治工作第一、思想工作第一、活的思想第一。

同时，他还将当年毛泽东为抗日军政大学题写的校训作为解放军的“三八”作风明确下来，即：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三句话和团结、紧张、严肃、活泼八个字。林彪说：“我们要树立一个作风，就要提出要求，就要有个标准，这个标准就是毛主席在延安提出的三句话、八个字。”

在林彪的鼓动下，全军掀起了大兴“三八作风”运动，这一运动对当时军队的建设起到了极大的作用。

毛泽东高度赞扬了林彪提出的“四个第一”和“三八作风”，他说：

“四个第一是个创造。解放军的思想政治工作和军事工作，经林彪同志提出四个第一、三八作风之后，比较过去有了一个很大的发展，更具体化了，达到了一个新的理论高度。”

林彪主持军委工作后，始终把学习毛泽东的著作和突出政治作为军队的中心工作来抓。

1月12日，林彪1964年12月28日与刘志坚等人的谈话记录，由罗瑞卿修改后，经林彪同意，冠以《林彪同志关于当前部队工作的指示》题目，于1月13日，由林彪报送毛泽东。同日，军委办公厅发出《转发<林彪同志关于当前部队工作的指示>重新印发的通知》，收回军委[65]1号文件。

1月15日,军委以[65]4号文件转发毛泽东当日对《林彪同志关于当前部队工作的指示》的批示及林彪1月13日给毛的信。毛泽东的批示是:

林彪同志:

此件早已看过,完全同意,照此执行。执行中逐步总结经验,大约一年总一次,至多两次也就够了。这是就军说的。中、下级单位,则要一年总结多次。

1月18日,刘少奇对林彪指示做出批示:

此件前次已经看过。完全赞成。退军委总参。

1月31日,适逢遵义会议三十周年,邮电部今日特发行一套共三枚纪念邮票,图案分别为毛泽东像和《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决战前夕》两幅油画。其中《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为彭彬根据毛词《忆秦娥(娄山关)》创作。画面是毛泽东与林彪长征途中在遵义娄山关上的形象。这当然是虚构,但却是首次将毛泽东、林彪并肩战斗的艺术形象公开呈现在全国公众面前。1月出版的《人民画报》1965年第一期,亦以两版的显著篇幅刊载了此画。

2月9日,军委以内部文件形式,重新印发经修改后的《林彪同志关于当前部队工作的指示》,公布了毛泽东1月15日及刘少奇1月18日的批示,公布了军委1月12日的《通知》:

林彪同志关于当前部队工作的指示,是一个很适时、很重要、抓住关键问题的指示。正如林彪同志指示中所说的,一九六四年全军各项工作都获得了很大成绩,成绩是主要的,是一片大好形势。但是,有些部队也出现了一些不好的苗头,林彪同志及时地敲起警钟,不使那些偏向得以发展,这是很重要的,应当引起全军的严重注意。全军一九六五年的各项工作,都应根据林彪同志的这个重要指示来进行安排,务必使之落到实处。

该文件要求发至连,向战士认真传达,组织讨论。

2月22日下午,毛泽东和周恩来、邓小平、彭真、李富春等接见出席海军干部工作会议、《解放军报》编辑记者会议的人员和第三批战士演出队时,毛泽东说:

四个第一好。我们以前也未想到什么四个第一,这是个创造。谁

说我们中国人没有发明创造？四个第一就是创造，这是个发明。我们以前是靠解放军的，以后仍然要靠解放军。

“四个第一”是林彪在1960年首次提出的在军队政治工作领域中要正确处理的四个关系：人和武器相比较，人的因素第一；政治工作和其他各种工作相比较，政治工作第一；政治工作中事务性工作和思想工作相比较，思想工作第一；思想工作中书本思想和活的思想相比较，活的思想第一。

林彪不希望罗瑞卿成为他的对立面。

1965年2月，罗瑞卿到上海向林彪汇报工作，林彪让他先去医院看看当时的空军司令刘亚楼。

刘亚楼，解放战争期间，在林彪手下任东北野战军参谋长，与林彪朝夕相处，配合默契。和罗瑞卿一样，刘亚楼也是红一军团出来的干部，也是军内十分能干的高级将领，俩人性格上有许多相似的地方，个人之间友情也是很深的。早在1929年刘亚楼由福建老家参加红军，编在红四军，罗瑞卿在四军任支队政治委员。有次刘亚楼的父亲来部队看望儿子，不巧，刘亚楼带部队外出执行任务，没有见到。老人离开部队时，罗瑞卿给了刘亚楼的父亲一些银元，让他回家度日。对此刘亚楼对罗瑞卿一直是很感激的。长征后期，毛泽东率红军一、三军团出草地后改编为陕甘支队，刘亚楼任二纵队副司令，罗瑞卿任二纵队政治部主任。到陕北成立红大，林彪任校长，罗瑞卿任教育长，刘亚楼是一科学员。红大改为抗大后，罗瑞卿任副校长，刘亚楼任教育长。庐山会议后，刘亚楼听说林彪要回部队主持军委工作的消息后，非常高兴，在第一时间里告诉了罗瑞卿，可见两人关系之密切。罗瑞卿回到军队后，两个人交往有加，成为无话不谈的知心好友。刘亚楼当时患肝癌住在上海华东医院，已经是晚期。罗瑞卿正好也想去看他，就先到了刘亚楼那里。

卧在病床上的刘亚楼看起来情绪不怎么好，显得有点烦躁。他见罗瑞卿进来了，便要坐起来。罗瑞卿快步赶到床边，将他按住：

“躺着吧，亚楼，别动了。早想来看你，一直脱不开身。这次正好来向林总汇报工作，他要我先来看看你。”

“坐吧，长子。”刘亚楼无奈地笑笑，躺下了。

“亚楼,我看你气色不大好,别着急,要想得开些,好好养病。”

“没有什么”

两位老战友四目相对,沉默了片刻,刘亚楼说:“总长,你跟林总的事,林总跟我谈了。不过,谈通了,结果出乎意料地好,林总对我说,1961 年那次发脾气,不是针对你的,主要是对罗帅不满而迁怒于你。林总还说:现在几个大将中,论身体,论资历,论能力,论对主席跟得紧,我不用他用谁呢?

我对林总说了:‘总长感到压力很大啊!’林总说,‘那是误会。’他要我向你解释,不要误会了,要你放手工作。”

罗瑞卿说:“你放心,我不会误会。”

刘亚楼歇了一会儿,又说:“我听他这样讲,也向他表示:只要你们的误会消除了,我刘亚楼上八宝山也安心了。”说完,刘亚楼叹口气,显出凄然的神情。

罗瑞卿伸出手去,握住了刘亚楼的双手。

“叶群是好人,是做团结工作的。林总还说,罗帅老躲着他。他说,就是肖华、杨成武他们跑了,他都感到不要紧,你们两个罗跑了,他就会感到很伤心的。”

罗瑞卿说:“亚楼,我能跑到哪里去呀? 大家不都是跟着毛主席干革命几十年了吗?”

“这件事不用再提了,现在既然已经谈通了,你到他那儿就只管汇报工作吧。”

刘亚楼正在艰难地走着人生的最后行程,心情十分沉重。他沉吟良久,又对罗瑞卿说:“我也有对不起你的地方,说了一些也许不该说的话。”

罗瑞卿紧紧地握住刘亚楼的手,说:“亚楼,你在病中,不要考虑太多的问题,要把心胸放宽,身体要紧,养病要紧。”

罗瑞卿看过刘亚楼后,林彪约见了他。一见面,林彪就问:“怎么样,跟刘亚楼谈的还好吗?”

“没有谈什么要事,只是简单地聊了聊。”接着,罗瑞卿开始汇报工作。

林彪听完了汇报,问道:“完了吗?”

“完了。”

罗瑞卿不说话了。

林彪看出罗瑞卿没懂他的意思,看到罗瑞卿情绪低落,便用安慰的口吻说:“64 年的军事训练有四好:即用心好、内容好、方法好、效果好。以后打仗或准备打仗时,也许还要搞突击的军训。但今年要突出政治,不突出政治,一切坏的东西,庸俗的东西都会出来。”

罗瑞卿认真地不做声地做着记录。

林彪又说:“你这个人优点突出,缺点也突出,以后你要做好两点,一个是心胸要开阔,容忍不同的意见,吴法宪说你独裁,不见得对,可是也有一点。第二,要养好病,身体保养好,继续跟着主席革命。论能力,你在大将中第一。”

在罗瑞卿看望刘亚楼之前,叶群已经多次去过刘亚楼的病房。

刘亚楼入住上海华东医院不久,林彪也打破从不探视病人的习惯,亲自来医院探视。随后,经常打电话询问刘亚楼的病情和治疗情况,写信要刘亚楼好好养病,还经常送些画刊和革命歌曲的唱片等给刘亚楼,以调剂生活。他希望通过刘亚楼做通罗瑞卿的工作,能够使罗瑞卿站到他这边。当然,他也做好了罗瑞卿站不过来的准备。

1965 年 4 月 12 日至 5 月底。全军作战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由罗瑞卿主持。作战会议开了几天后,由上海迁居苏州的林彪电召杨成武去,提出了军队取消军衔后的服装领章和帽徽的样式的主张:采用又红又大又鼓的五角星作为帽徽,并配以两个鲜红的平行四边形的领章,作为突出政治和革命化的象征。基本与井冈山时期红军的领章和帽徽样式是一样的。

4 月 28 日,罗瑞卿、杨成武陪同贺龙一起到武昌,向毛泽东汇报了作战会议的情况。毛泽东听过汇报后,对于作战会议的方针给予了肯定,对林彪建议的领章、帽徽样式非常满意,当即批准了军队取消军衔后的服装、领章和帽徽的方案。罗瑞卿一行向毛主席汇报后,回到北京后,罗瑞卿打电话给在上海的叶群,请她向林彪报告:“已向主席汇报。”并请示林彪,是现在还是过几天再去请示。叶群在电话中立即一迭声地说:“应该马上来,早就该来了,请杨副总长一起来。”

5 月 2 日,罗瑞卿和杨成武到上海去向林彪汇报,因为已接到刘亚

楼病危的报告,两位总长的夫人同行,准备一起再见一下刘亚楼。

到上海后,他们与林彪取得联系。林彪在电话中提出,先见罗瑞卿,后见杨成武,然后同时接见罗瑞卿夫妇和杨成武夫妇。

罗瑞卿立即去见林彪。进屋后,看到桌子上醒目地摆着毛泽东选集和党章。罗瑞卿刚落座,林彪就没头没脑地对罗瑞卿说:“要加强通气!嗯,你过去的通气是有的,但不够,要加强,这是组织原则。”

说完,他便打开《毛泽东选集》念了几段有关请示报告的章节,又打开党章,念了党章上有关组织原则的段落。

罗瑞卿默默地听着,感到十分的不自在。

林彪念完后,把书放到桌上,摆整齐,窝在沙发里,用柔和中透着森严的语气说:“要加强通气。现在规定五条,你也好办事。”

接着,林彪捻着手指说:

“第一条,加强通气,遵守组织原则;第二条,我在北京时,10 天通气一次;第三条,我不在北京时,一个月通气一次;第四条,重大问题,立即通气;第五条,来我这里汇报,用不着联系,也用不着打电话,随到随来。我已交代秘书,总长、主任、杨副总长来,随来随见,不准阻拦。”

接着,林彪批评了罗瑞卿在最近工作中出现的问题。

罗瑞卿默默地、仔细地用笔做着记录。合上笔记本后,他坐正身子说:“我知道主席和你都是最痛恨不通气的,我今后一定照规定做。”

“你能做到,就好。”

5 月 3 日晚上,罗瑞卿约杨成武在锦江饭店花园里散步,他对杨成武说:“昨晚我没有叫你,自己先去看了林总,林总见到我发了一通脾气,批评我,骂我,说我一是封锁他,总参封锁他,办公厅、总参作战部、政治部的文件不送给他。二是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的电影片子的解说词中,只提了在周总理和罗总长的领导下,没有提毛主席、刘少奇主席,没有提党中央、中央军委和其他老帅。三是在为庆祝原子弹爆炸成功举行的宴会上,将自己安排在首席——第一桌上,把各位老帅安排在第二、第三桌上。

林总对我说,今后要加强通气。对如何向他通气,规定了五条,主要精神是:如果林总在北京,要 10 日汇报一次工作,如果在外地,要 1 月汇报一次,我到他那里汇报,用不着联系,也用不着打电话,随时

可去。

林总的桌子上还放着毛主席著作和党章。在批评我向他封锁时，还引用党章和毛主席的话，一句句念给我听。我感到他这一次态度非同一般。”

杨成武说：“如果总参的文件没有送给他，有不妥的地方，我应该负责，因为我是做具体工作的，是管常务的副总长，我要作检讨。”

“不，我负责，我是总长。”罗瑞卿说。

5月4日上午，他们又一次去医院看望刘亚楼，这时刘亚楼已昏迷不醒，脸如黄蜡，医生正在忙于抢救，他们等了一些时候，见刘亚楼尚未清醒过来，想和他再说一句话已感到无望，大家怀着十分沉痛的心情，离开了医院，回住地去了。

当晚，罗瑞卿对杨成武说：“明天我们回北京。”

杨成武向罗瑞卿建议：“是否去林总那里看一看。”

罗瑞卿因为刚挨了林彪的批评，有点情绪，说：“一去他就发脾气，我不想去。”

杨成武说：“正因为林总发过脾气，你还是再去看一下好，否则他又批评我们总参不辞而别，更被动。”

罗瑞卿听后，想了想，说：“那你陪我一起去吧！”

“可以。”杨成武答。

第二天，他们让两位夫人由锦江饭店直接去机场，罗瑞卿和杨成武同车去林彪那里。

罗瑞卿回到北京，继续主持作战会议。

5月19日，林彪与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中央常委接见军委作战会议全体与会人员。在听取汇报时，罗瑞卿带头提出要求大量增加部队定额和合并军区的意见。他事先已布置各小组选出代表向中央常委提意见，所以在他发言后，各军区代表也相继发言，当即受到林彪和其他中央常委的严厉批评。因为合并军区和大量增加部队定额的主张，林彪多年来是一直不赞成的，并且向毛泽东请示报告过。毛泽东完全同意林彪的意见。

会议临近结束时，有人员建议由罗瑞卿做总结发言，并将这一情况写在会议简报六十三期上。

5月25日深夜,罗瑞卿刚踏进家门,秘书就送上了一份电话记录,记录的内容是林彪口授的关于作战会议第六十三期简报的指示:

“作战会议只能以主席、中央常委和会议多数人的意见和会议文件作为结论,不准任何个人以总结的名义讲话。元帅、总长和副总长都可以发言,会议上不能散布个人做结论的空气。如果散布了,要当众收回。在什么范围散布的,就在什么范围收回。63号简报,关于罗总长作总结发言的提法不对,要具体进行的问题,以后可以逐步用军委常委或军委办公会议的名义发出指示。明天要在各小组宣读。”

罗瑞卿心里一阵阵发凉:“关于作总结发言的事,要出问题……”

是啊,关于这次作战会议,军委主管训练的叶剑英元帅已经作了很长时间的准备,最后却由罗瑞卿来总结。此事自然又被告到林彪那里。

1965年6月29日,在罗瑞卿家中讨论林彪为总政再版《毛主席语录》起草的前言。当讨论到前言中关于毛泽东思想是“最高最活”的马列主义,是马列主义发展的“顶峰”时,罗瑞卿皱了皱眉头,他清晰地记得,1961年4月30日,罗荣桓和林彪在的军委常委会议上就是因为此事发生争论。林彪当时不是已经同意不这样提了吗?怎么现在又写上了?罗荣桓也是毛泽东信任和倚重的人,毛泽东对此事是什么看法?他示意大家停一会,到另一个屋里去拨通了给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的电话,想从田家英那里了解毛泽东的想法:

“是家英同志吗?我是罗瑞卿。”

“是罗总长,你好!”田家英问。

“你好!有件事要向你这个大理论家请教啦:我们听到一种提法,说‘毛泽东思想是最高最活的马列主义,是马列主义的顶峰。’这种提法准确吗?”罗瑞卿把遇到的问题向田家英讲了一遍。

“请教可不敢当,不过你提的这个问题提我觉得不确切。我和陈伯达、王任重、陶铸几个人在长沙协助润色毛主席的几篇文章时,大家曾考虑不用‘活马克思主义’、‘死马克思主义’、‘香马克思主义’、‘臭马克思主义’此类对仗性的词语,恐怕‘最高最活’的话也不宜用。这种提法也不好理解,外文怎么翻译呢?”田家英讲了自己的看法。

回来后,罗瑞卿兴奋得对大家说:“我问过家英同志了,理论家也

说最高最活的说法不确切,不好理解,外国人也不好翻译,最好不用。最高,那么今后再不能高了?是不是还有次高啊?最活难道还有次活?马列著作都是死的吗?也不是裹足不前的……说是顶峰,也不科学,到了顶峰,难道不能再发展了吗?从辩证法原理上,这话难讲通。”

当有人提醒这是林彪讲过的话时,罗瑞卿说:“林总说的也不一定对,谁有真理听谁的。而不是谁官大听谁的。”

1965 年 7 月 14 日,《解放军报》起草了一篇社论,标题是《突出政治就是在一切工作中用毛泽东思想挂帅》。罗瑞卿在主持讨论这篇社论时,发现里面也写上了“最高最活”,就问社论起草人:

“这个提法是不是林副主席的原话,还是你们的记录?以前公开见报没有?”

大家回答:“这是林副主席在上海说的原话,报上也用过。”

罗瑞卿走到另一个房间,这次,他没有问田家英,而是直接给中央当时分管理论工作的政治局候补常委康生打电话:

“喂,是康老吗?我是罗瑞卿……”

“是罗总长,有事吗?”康生问。

“是这样,现在有一种提法,说‘毛泽东思想是最高最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拿不准‘最高最活’的提法是否妥当,中央是否有这种提法?想请教一下康老。”罗瑞卿说。

康生不知道“最高最活”出自林彪,便表示:“这是新的提法,恐怕应该问问中央常委,最好还要请示一下主席。”

“那您个人的意见呢?”罗瑞卿继续问,康生未正面回答,想了一下说:“还是按中央原来的提法稳妥。”

于是,罗瑞卿回到会场,将“最高最活”这句话删去了,并在旁边批示:“这样的提法,毛主席知道也不会同意的。”

当林彪知道这些情况后,气得大骂罗瑞卿“太狂妄了”,“太不自量力了”。

林彪开始在军队一些单位设立联络员,让他们直接同叶群联系。

# 第15回：抓机遇，叶群慨然飞杭州 婆留城，面“圣君”侃侃而谈

10月25日，就在罗瑞卿到苏州向林彪汇报的前一个月，林彪收到总参作战部副部长雷英夫送来的一份材料和附信，信中写道：

林副主席：

最近期间，我多次想向你报告一件事，但因事关重大，未找到适当的机会，不便轻率。我觉得罗总长骄横懒散，心怀不测，值得警惕。我这个感觉，是经过六年的观察得出的。六年来，可以分为三个时期。1962年5月去上海修改“关于战略方针的建议”以前，我对罗总长极为信任和尊敬，认为他是坚决执行主席和你的指示的人，是主席和你最信得过的，因而也是最好的接班人。1962年5月到今年7月，从一些重要的事情上，我对他产生了怀疑，感到他的一些作法不对头，甚至他对你的指示也不是心悦诚服的。特别是你提出突出政治，他是不赞成的，实际上是带头抵制的，只是采用了两面手法，搞了一些伪装。但这个时期，我对他的本质还看不透，虽有上述怀疑，总是从好的方面去想他。直到今年7、8月，在参加写《人民战争胜利万岁》和修改罗总长9月3日的讲演稿时，我才大吃一惊，才发现他是心怀不测的人1。他不仅骄傲懒散，根本瞧不起军委常委的其他同志，而且对您有反感，竟然还想在文中造成和您并驾齐驱，甚至超过您的形式。

雷英夫曾是毛泽东推荐给周恩来的军事秘书，长期在叶剑英元帅身边工作。1938年8月，在6大队一队学习的雷英夫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11月份，他与同在抗大学习的学生学员张清化一起到抗大总校参谋训练队报到，在这里学习的干部几乎全是经过长征的红军老干部，像他们二人这样的学生出身的学员极少。

后来，周恩来从重庆回到延安，向毛泽东汇报工作时说：“叶剑英已经在重庆展开工作，眼下南方局工作任务艰巨，他那里急需两名得力的参谋帮助工作。”

毛泽东拍拍前额,然后又用手轻轻梳理几下长长的头发,似乎是经过深思熟虑地说:“那好吧,我给你推荐一个。”毛泽东点着头说:“抗大参训队有个18岁的娃娃,他叫雷英夫,很好,很突出,对军事有一定研究,特别在理论上很有前途……你看怎么样?”就这样,1939年8月,雷英夫和张清化来到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报到,给叶剑英做参谋,对外的公开身份是18集团军的参谋。

在重庆期间,雷英夫执笔为叶剑英在蒋介石召集的全国军以上参谋长会议上的发言稿,和“皖南事变”后,给《新华日报》写的《新四军皖南部队惨被围歼真相》的文章,深得叶剑英和周恩来的赞许,曾轰动重庆山城。朝鲜战争爆发前,他又被调到周恩来办公室任军事秘书。

虽然没有亲自带兵打过仗,但是由于自身的才智和长期在统帅部工作的经历,使雷英夫具备了极好的军事造诣和潜质。1950年朝鲜战争期间,他和几个参谋人员最先预测出来美军仁川登陆的作战计划及登陆时间,因此,一直深受毛泽东的信任和喜爱。他的这封揭发信,其份量可想而知。

收到雷英夫的信后,林彪没有立即送给毛泽东,他考虑了很长时间。

罗瑞卿是毛泽东一手培养起来的干部,素有毛泽东“大警卫员”之称。自从中共中央进入北京以后,凡是有毛泽东的地方,几乎都可以看到罗瑞卿的身影。对毛泽东的指示,罗瑞卿是言听计从,坚决执行。从批胡风,抓潘汉年,到庐山会议打倒彭德怀,只要是毛泽东说的,罗瑞卿就千方百计的落实做到。毛泽东喜欢游泳,为了他的安全,不会游泳的罗瑞卿虽然年已50岁了,仍然学会了游泳。以后,凡是毛泽东要到一个生疏的地方游泳,罗瑞卿总是先下水试探。难怪毛泽东说:“天塌下来有罗长子顶着。”“罗长子往我身边一站,我就感到十分放心。”

可以看出,罗瑞卿对毛泽东是忠心耿耿,而毛泽东也把罗瑞卿看成是自己的学生和弟子,对他十分信任。

11月15日,军委副秘书长、军委办公会议成员、军委办公厅兼国防部办公厅主任肖向荣,被宣布犯有“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突出政治、和林副主席‘唱对台戏’的严重错误”,责令停职检查。

18 日,被免去一切职务。杨成武任军委办公厅代主任,路扬任第一副主任,增加金涛、郑汉浩为副主任。并明确军委办公厅又是国防部办公厅,又是总参谋部办公厅。

11 月 27 日,就在罗瑞卿与林彪见面的那天,林彪又收到海军李作鹏、王宏坤、张秀川联名给林彪写的一封信,主要是讲 1963 年以来罗瑞卿反对突出政治对海军工作的影响,共 10 条,矛头直指罗瑞卿和海军司令员肖劲光、海军政委苏振华。这封信是叶群授意写的。

初秋的一天,叶群给李作鹏打电话说:“首长要我给你打个招呼,罗长子有野心,想当国防部长,要首长让贤休养。”又说:“罗长子要首长不要干涉军队工作,军队工作由罗负责。”她说:“老帅们对罗的意见也很大,罗的情况主席和首长都知道了。”“他正在组织新班子,又是提级,又是提职。”她提醒李作鹏:“对当前局面提高警惕。”

李作鹏当即表示:“请转告林总,请放心,我决不会做出对不起林总的事情。”

叶群又说:“你们那个姓苏的是反‘双一’的。”

李作鹏心里明白姓苏的是指苏振华,但反“双一”是什么意思,他未听懂,因此反问她:“什么叫反‘双一’?”

叶群解释说:“就是反一方面军、一军团。”

她又说:“你从海军角度看到有什么问题,可以写点材料送来。”

叶群的电话之后,李作鹏找海军副司令员王宏坤、海军政治部主任张秀川到他家,把叶群电话精神告诉了他们,并商量写材料问题。张秀川当即谈了海军的一些问题,主要是围绕罗瑞卿搞军事大比武,与林彪“突出政治”相对立和海军党委常委内部在纠正“军事冲击政治”问题上的意见分歧等等。李作鹏马上就让张秀川在他的办公桌上将他说的这些写出来。写完后,李作鹏看了一遍,然后交给王宏坤看,俩人都没有提出更多的意见。李作鹏说:“就这样吧,整理出来,用我们三人名义送去,以后想到什么问题再写。”

时隔不久的一天,叶剑英找李作鹏到西山他家里谈工作,说到罗瑞卿的问题。

叶剑英说:“这个人很霸道,目空一切,到处伸手,要注意哩。过去我们想巴结他,也巴结不上,这种人不会有好下场。”

稍后,叶剑英又提到肖劲光,说:“那也是个老虎屁股。”

李作鹏静静的听着,没有说话。因为他知道林彪对肖劲光是有好评的。

叶剑英接着又说:“苏振华这个人不错。”

李作鹏还是静静的听着。

再说苏州的林彪,此时他手里有了包括海军副司令员李作鹏、王宏坤、海军政治部主任张秀川、总参作战部副部长雷英夫等4名高级干部和叶群布置林彪的秘书等人写的9份揭发罗瑞卿的材料。

罗瑞卿从苏州走后,林彪急召正在苏北参加“四清”的叶群回苏州。

当叶群急急火火的回到苏州,林彪不紧不慢的对她说:“让你带上雷英夫、李作鹏他们的材料去向毛主席汇报,敢不敢去呀?”

叶群听说林彪让她直接去见毛泽东,不禁怦然心动,血往上涌,表面却不动声色的说:“那有什么不敢。”

林彪提醒她:“这可是有风险的。”

“那我也不怕。”叶群非常坚决。

“我给主席写了一封信。你到杭州后,不要和其他人联系,直接找毛主席的秘书徐业夫,跟主席约好时间,把这封信亲自面交毛主席,懂吗?”

“知道。”

“此事宜早不宜迟,让吴法宪派飞机送你去杭州。杨成武现在杭州休养,到杭州后,有什么问题,可以让杨成武想办法帮你解决。”

“行,我这就找吴胖子安排。”叶群立即给空军司令吴法宪打电话。

11月30日,叶群带着林彪给毛泽东的信和11份材料,在吴法宪的陪同下,飞到了杭州。毛泽东知道叶群到了杭州,让她先等几天。于是,叶群按照林彪的安排,找到住在杭州空军疗养院的杨成武,说:“林总有一封信要交给毛主席,你能不能和毛主席身边的工作人员联系一下。”

“可以。”杨成武立即给中央警卫局副局长张耀祠打电话,约他下午来空军疗养院。

张耀祠当天下午就来到杨成武的住处。俩人在会客厅还没有说

几句话,叶群就笑容满面的走了进来,对张耀祠说:“张局长,辛苦你了。我这里有一封林彪同志给毛主席的信,请你转交给毛主席,行吗?”

“行。我一定交给毛主席。”张耀祠接过叶群手里的信,放在口袋里。

“那你们先谈着。”叶群出去了,她来到另一个房间,拨通了苏州的电话

……

过了一会儿,叶群又返回来,对张耀祠说:“我给林彪同志打了电话,他说信要我当面交给毛主席。”

张耀祠说:“可以。”从口袋里掏出信还给了叶群。

杨成武见状,赶紧说:“很久没见毛主席了,我也很想看看他。”

张耀祠说:“行,我回去向毛主席报告一下。”

回到毛泽东的住地汪庄后,张耀祠将这些情况分别向毛泽东做了汇报。毛泽东听后“噢”了一声,没有说什么话。

晚上,叶群又来到毛泽东住处,特地给毛泽东写了一个条子,交给毛泽东的秘书徐业夫,要求与毛泽东面谈。

第二天早上5点钟,毛泽东的护士长吴旭君通知张耀祠,“给叶群打电话,主席要见她。让她快点来。”

张耀祠给叶群打完电话,不多会儿,叶群就到了。张耀祠迎了上来,告诉叶群:“谈话别超过两小时,主席还没有睡觉。”

叶群走进毛泽东的书房。工作了一晚上的毛泽东起身和叶群握了握手,让她坐在对面的沙发上。

叶群努力抑制住内心的激动,慢慢地说道:“主席,这是林彪同志让我面交给您的信。”

毛泽东打开了信,信中写道:

主席:

有重要情况需要向你报告。好几个月重要的负责同志早就提议我向你报告。我因为怕有碍主席健康而未报告,现联系才知道杨尚昆的情况,觉得必须向你报告。为了使主席有时间先看材料起见,现先派叶群送呈材料,并向主席作初步的口头汇报。如主席找我面谈,我

可随时到来。

此致

敬礼!

林彪

11 月 30 日

毛泽东让叶群谈谈情况。

过了两个小时,张耀祠看叶群没有出来,就走进毛泽东的书房说:“主席,该休息了。”毛泽东没有说话,仍在专注地倾听叶群的汇报。张耀祠悄然无声的退了出来。

又过了一个小时,张耀祠再次进去提醒毛泽东该休息了,毛泽东还是没有说话……

叶群已经同毛泽东谈了 4 小时零 20 分钟了。实在耐不住的张耀祠又第三次走进毛泽东的书房,这时,他听见叶群正在说:“罗瑞卿掌握了军队大权,又掌握过公安大权,一旦出事,损失太大。他的个人主义,已经发展到野心家的地步,除非林彪同志把国防部长的位子让给他。林彪的位子让给他没关系,但会不会发展到‘逼上夺权’的程度呢?我想是会的。主席,他是两眼盯着这个位置的……”

事情如此严重,张耀祠哪里还敢吱声,赶紧悄悄地退了出来。

叶群汇报了 4 小时 55 分钟,终于走了出来。毛泽东立即叫来汪东兴,对他说:“你用我的车,亲自将叶群送回苏州。路上要注意安全。”

“是,我这就去办。”汪东兴答应后,用毛泽东的专车亲自将叶群送回苏州。

叶群走后,毛泽东仔细阅读了她带来的材料,然后叫来徐业夫:“你了解一下,少奇同志现在在哪?”

“少奇同志病了,现在在北京。”徐业夫告诉毛泽东。

毛泽东很惊讶:“噢?厉害吗?”

“听说是感冒了,发高烧。现在烧已经退了,正在玉泉山休息。”徐业夫说。

“那就算了,你给总理挂个电话,我要和他讲话。”

“行。”

“叫叶帅来一下。”毛泽东继续吩咐,“杨成武在杭州,他想见我,你也安排一下吧。”

徐业夫一一记下了毛泽东交办的事情。

12 月 2 日,毛泽东在林彪送来的兰州军区党委《关于五十五师紧急备战中突出政治情况的报告》的报告上批示:

“林彪同志:

完全同意你的看法,五十五师的情况,可能和各师、各军种、各兵种大同小异。请你考虑,可否将此件转发到各军区、各军种、各兵种、各军,到师党委为止,供他们参考。那些不相信突出政治,对于突出政治表示阳奉阴违,而自己另外散布一套折中主义(即机会主义)的人们,大家应当有所警惕。如何,请酌定。”

林彪在报告上是这样请示的:

“主席:从这份文件中可看出,如果战争爆发,其他部队情况可能是与这个部队近似。”

同日,毛泽东在和浙江省委书记江华谈话时说:“我认为这是突出政治和反对突出政治的斗争深入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现在公开站出来反对突出政治,反对坚持四个第一,反对抓政治思想的人还有。譬如你们浙江省有个信用社主任说:‘政治就是理论,理论就是会说,会说就是吹牛。’但是这种人不多了。公开提出业务第一,数字第一的人大大减少了。他们学得比较聪明了,但是他们又不愿意突出政治,不愿放弃单纯业务观点这根‘腊肉骨头’,不是突出政治。形势逼人,于是就改头换面,来个折衷主义。

在政治和业务关系上,有三种摆法:第一种摆法是政治第一,业务第二,政治统帅业务;第二种摆法是业务第一,政治第二,政治为业务服务;第三种摆法,政治和业务都第一,叫两个第一。这三种摆法,第一种是正确的,第二种是错误的,这很明显。第三种摆法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不用说,是错误的。但是有些人就分辩不清,为什么有些人对‘政治和业务都第一’的错误观点模糊不清?这是他对折衷主义的面貌还认识不清的缘故。”

毛泽东还说:“罗瑞卿的思想同我们有距离,林彪同志带了几十年的兵,难道还不懂得什么是军事,什么是政治?军事训练几个月的兵

就可以打仗,过去打的都是政治仗。要恢复林彪突出政治的原则。罗把林彪同志实际当作敌人对待,罗当总长以来,从未单独向我请示报告过工作,罗不尊重各元帅,他又犯了彭德怀的错误;罗在高、饶问题上实际上陷进去了,罗个人独断,罗是野心家。凡是搞阴谋的人,他总是拉几个人在一起。”

“罗长子不是军委主席么!也不是军委副主席么!党内也不是政治局委员么!怎么由他做总结发言?有的老帅组织了一个班子,准备了一两个月的总结发言稿,怎么不让这位老帅做总结?听说罗长子的总结发言事先没有经过军委其他领导看过?大将也不只他一个么!现在许多元帅和大将怎么没工作干了?党政军的工作就靠罗长子一个人干?中央的五级干部定级的名单上怎么连国防部长的签批也没有?!”

# 第16回：急落实，中宣部调度安排 招成武，毛泽东再问详情

再说北京这边，按照27日周恩来与彭真的电话约定，11月28日下午15时，周恩来、彭真和中宣部三位副部长周扬、许立群、姚溱以及一些报刊和北京市委的负责人来到人民大会堂西大厅。

彭真一进来就问邓拓："吴晗现在怎么样？"

邓拓据实回答："吴晗现在很紧张，这次批判有来头。"

彭真大声说："什么来头不来头，不用管，只问真理如何，真理面前人人平等。"

周恩来面带笑容的说："解决意识形态领域里的矛盾和斗争，不能用谩骂和恐吓，鲁迅早就说过：辱骂和恐吓不是战斗嘛。"

邓拓说："姚文元的文章就是这种谩骂和恐吓的典型。"

周恩来望着邓拓说："那你们为什么害怕他的文章不予转载呢？发表出来让大家鉴别嘛。赫鲁晓夫反华的报告和文章，我们毛主席指示全文照发，让人民评价。而正是赫鲁晓夫及其现在的新领导，却对我们的文章怕的要死，拼命封锁。这能挽救他的失败命运么？"

中宣部副部长周扬说："关键是写好编者按。"

邓拓："我担心这样一来，吴晗的压力会更大。"

周恩来问："他现在的情况怎么样？"

邓拓回答说："很紧张，他很清楚姚文元文章的来头。"

彭真把手中的茶杯"砰"地往桌上一放，激动得说："又是来头来头！如果光靠来头过日子，那我们这些人还讨论什么？只听一个人或几个人的好了！"

周恩来注意到会场的情绪。他注视着大家，举起手说："讨论就此结束。根据中央指示，明天各报刊都要转载姚文元同志的文章，展开讨论，通过讨论来发展马克思主义。毛主席早就说过：同那些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进行斗争，就会使马克思主义发展起来。"

周恩来望着彭真问:“你看会议是不是就到此结束?”

彭真点了点头,没有说话。随后,他把《北京日报》和《前线》杂志社的负责人叫到身边说:“你们必须赶写几句按语,要写出水平来。你们一定要在历史唯物史观上下功夫。凡点到吴晗名字的时候,一律在后面加上‘同志’,这是分清敌我的大事。明白吗?”

大家点头同意。

为了让北京主动些,大家又商定,11 月 29 日《北京日报》先转载、30 日《人民日报》转载、12 月 1 日《光明日报》和《解放军报》等其它报纸转载。

从人民大会堂西大厅回来后,中宣部负责全国学术批判工作的副部长周扬立即部署,安排中宣部科学处组织写批评吴晗的文章。他约了中宣部科学处的龚育之和林涧青到他家具体商议此事。

周扬很清楚,在批判《海瑞罢官》的问题上,中宣部还欠着江青一笔帐呢:1962 年八届十中全会时,江青提出要批《海瑞罢官》,中宣部几个部长没有理她;1964 年毛泽东指示将用来批判资产阶级权威的 39 个《文学艺术资料》发到党内县一级单位,其中就包括吴晗的《海瑞罢官》和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邓拓等人编写的《燕山夜话》等材料,中宣部还是一直没有动作,这次必须要动了。

28 日下午,在周扬家的客厅里,周扬对龚育之和林涧青说:“根据彭真同志的意见,我想组织三篇文章,一篇是批评《海瑞罢官》的,支持姚文元的文章;一篇是批评吴晗的历史观,一篇是批评吴晗的道德继承观,从学术角度展开讨论。你们看行吗?”周扬的考虑可谓是面面俱到,即紧跟了毛泽东的思路,又兼顾了彭真的安排。

“没有意见。”“可以。”龚育之和林涧青都表示同意。

“不过,姚文元的文章对历史上的清官全盘否定,学术界似乎有些看法……”龚育之提出了他的看法,似乎对支持姚文元的文章有些想法。

“去年《人民日报》发表的‘星宇’写的《论‘清官’》评价挺好,分析比较全面。”林涧青说。

“是啊,你还给我和陆定一同志推荐过。这个星宇是哪个单位的?”周扬问道。

“人民大学的,是个笔名,集体写的。”林涧青回答。

“主笔是谁?”

“戴逸。”

“那就把他先借调过来。”周扬拍板定案。

“第一篇由龚育之执笔,再把科学院的林甘泉、邢贲思和人民大学的戴逸借调过来,你们5个人,怎么样?”周扬征求龚育之和林涧青的意见。

“行。”龚育之和林涧青二人表示同意。

“再请《红旗》杂志的戚本禹写第二篇,批判吴晗的历史观。他对历史很有研究,写的《为革命研究历史》主席很赞赏。第三篇,约请《红旗》杂志的关锋写。”周扬接着说。

“姚文元的文章中说《海瑞罢官》有政治影射,这个问题怎么写?很多人认为姚文元文章中联系现实政治中的‘单干风’、‘翻案风’过于牵强……”龚育之又提出了新的忧虑。

周扬若有所思的说:“要讲政治影射的话,最大的影射应该是罢官,那个时候罢了谁的官呢?这个影射,政治上就更严重了。不能这么写。不过,姚文元文章没有提这个问题,我们的文章也不去提这个问题。”

“但是要写政治问题呀?”林涧青提出。

“能不能这样设想,影射不写得那么实,那么死,可以从一种社会思潮的反映,从这个角度来写,写得活泛些。”龚育之建议。

“那这种思潮的性质是什么呢?”林涧青问。

“当然是反社会主义了。”周扬回答。

“你要从政治上批评吴晗反社会主义,可是他在抗日战争后期和解放战争时期是著名的民主教授,建国后也是拥护社会主义的左派。说他反社会主义,怎么说呢?”林涧青又问。

“列宁说过:‘历史喜欢作弄人,喜欢同人们开玩笑。本来要到这个房间,结果却走进了另一个房间。’这本来要到的房间,按列宁的说法,就是自以为‘也是马克思主义’、‘也是社会主义’的房间;这走进了的另一个房间,按列宁的说法,就是‘资产阶级实质’的房间。这样,既肯定了吴晗的《海瑞罢官》是‘资产阶级’、‘反马克思主义’、‘反社

会主义’的,又不否认他本来要到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房间的主观动机。”龚育之提议。

“这样很好。”周扬十分赞同。接着,他又十分感慨地说道:“咱们这篇文章中还要批判田汉和孟超的错误,田汉是我少年时代心目中崇拜的偶像呀,孟超也是上海左联时代的人物。不仅是我,当时多少进步青年都很崇拜他们。社会主义革命转变多么深刻和迅速,这些同志跟不上啦。”

“这篇文章用什么笔名?”

“用‘方遒’吧,毛主席诗词中:‘书生意气,挥斥方遒’。”

“‘遒’字不好认,还是用要求的‘求’吧。”

“正好,咱们总在会议室讨论修改文章,影响他们在会议室打乒乓球,‘方求’,妨碍打乒乓球。”

11 月 29 日,《解放军报》抢先和《北京日报》同时转载了姚文元的文章,各自都加了“编者按”。

《解放军报》根据罗瑞卿的指示,写了一篇 540 多字长篇按语。作为中央军委的机关报,这篇编者按语,将《海瑞罢官》定性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大毒草,大毒草必须进行批判。”又说:“《海瑞罢官》这个戏的出现,正是阶级斗争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反映。”要求读者“不仅要善于在战场上进行阶级斗争,而且要善于在政治思想战线上进行阶级斗争”。

彭真对《解放军报》的“编者按”很不满意,他在 1966 年 1 月 2 日的一次会上批评说:“《解放军报》在讨论没有展开之前,就说《海瑞罢官》是大毒草,谁还敢发表不同意见?”

《北京日报》的“编者按”是经过彭真亲自修改审定的,不表示支持姚文元的文章,而是强调对《海瑞罢官》这出戏有不同意见,应该展开讨论;讨论应该按照“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实事求是,以理服人。

看到《解放军报》和《北京日报》同时转载了姚文元的文章,《光明日报》也赶紧请示中宣部是否转载?中宣布答复说:“彭真同志考虑,如果北京各报同时转载,震动太大,决定《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迟一天转载,即 11 月 30 日见报,可以先写好转载时编辑部用的按语送

去看看。”

《光明日报》立即将事先已起草好的按语送中宣部审看。

当天晚上,中宣部将审改后的《光明日报》“编者按”清样退回《光明日报》,并通知说:“《光明日报》可以再晚一天,12 月 1 日见报。”

11 月 29 日,《人民日报》总编辑吴冷西亲自主持,集体起草转载姚文元文章的“编者按”,并送康生看过,由周恩来最后修改定稿。

11 月 30 日,《人民日报》在第 94 期《学术研究》版“学术研究”专栏里,转载了姚文元文章,并刊出编者按语。“编者按”指出:

“我们希望,通过这次辩论,能够进一步发展各种意见之间的相互争论和相互批评。我们的方针是:既容许批评的自由,也容许反批评的自由;对于错误的意见,我们也采取说理的方法,实事求是,以理服人。”

11 月 30 日夜里,中宣部又给《光明日报》打来电话:“《光明日报》转载姚文,应再推迟一天。”于是,《光明日报》转载姚文元的文章,比《北京日报》迟了 3 天。

《人民日报》转载姚文元的文章后,华东以外省、市、自治区的报纸陆续转载了姚文元的文章及人民日报编者按语。

也是在这种形势下,11 月 29 日,北京新华书店复电上海,同意定 2000 本《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单行本。作为中国的首都,中国第二大城市,2000 本的订单实在只是象征性的。当江青听到张春桥的报告后,生气地说:“我们这些人到底还有个讲话的地方没有?”

12 月 3 日,林彪致信毛泽东:

主席:

十二月二日主席有关五十五师突出政治一文的批示已经收到,主席的批示对于即将召开的政工会议与明年和今后的政治工作将是一个强大的推动。军队如不加强政治工作,不但打仗经不起考验,而且投敌事件还会更多的发生。其他如破坏军民关系等坏事还会增加。我完全同意主席的批示,决遵照主席指示送北京少奇、恩来、彭真同志阅和军委常委阅,然后发师以上党委。

祝主席健康并致敬礼。

这天,在杭州的杨成武接到毛泽东秘书徐业夫的电话,说毛泽东

要见他。一会儿,浙江省公安厅长王芳来亲自用车将杨成武送到毛泽东的住地。

徐业夫让杨成武先在客厅里坐着,然后他去报告毛泽东。

毛泽东出来了,杨成武赶紧站起来向他敬礼说:“主席,您好!”

“好,好。”毛泽东一面笑着说,一面用手指了指沙发,示意着:“坐下,坐下。”

毛泽东走到对面的大沙发上坐下,中间放着一个圆茶几。服务员随即端来两杯清茶,一杯送到毛泽东面前,一杯放在杨成武面前。毛泽东随即点燃一支烟,他一面吸烟,喝茶,一面和蔼地问杨成武:“到总参工作几年了,情况怎样?”

“从北京军区出来后,就一直在总参……”杨成武扼要地作了回答。

毛泽东又和杨成武很随意地聊起了部队的情况,当杨成武紧张的心情渐渐平静下来后,毛泽东问道:“各位老帅怎样?”

“老帅都有分工,刘伯承元帅负责军委战略小组,我协助他,贺龙主管航空和常规武器的研制,聂帅管尖端技术,徐向前任民兵组长,叶剑英抓训练。林总由于身体不好,在北京时间很少,大部分住在外地,上海、苏州等处。军委的日常工作,根据您的指示,由贺老总和聂帅主持。”杨成武如实向毛泽东作了回答。

“罗瑞卿的情况怎样,你们熟吗?”毛泽东换了个话题。

“熟。都是红四军的,开始他当支队政委,后来任纵队政委……”杨成武开始向毛泽东报告罗瑞卿的情况

“罗瑞卿和林彪的关系怎样?”毛泽东接着问。

“二位都是我的老首长,近来可能有些误会,”杨成武将5月3日罗瑞卿同他的谈话情况向毛泽东做了报告。

毛泽东听后对杨成武说:“我都知道了,找你之前,也找许世友谈过。”

12月5日,毛泽东到了上海,住进上海“414”招待所。这个招待所,因其门牌号为“414”而得名,位于上海市西郊长宁区一个僻静的花园地带,占地面积达1133亩。它有山有水,建有牡丹园、翠竹园、桂花园和腊梅园四个漂亮别致的园林区,代表着春、夏、秋、冬四季。在浓

密的树林中,掩映着三幢别墅楼,三楼连成一体。

毛泽东住的1号楼是一幢单层的湖绿色的别墅,横卧在绿树从丛中,宛如绿浪中的一个小岛。湖绿色的玻璃门,两侧是两排长长的玻璃窗。窗外看不见里面的陈列。

走进会客厅,绿色的窗帘、门帘和地毯与自上而下光线,产生了一种特殊的光感效应。会客厅里放了一大圈单人沙发和茶几。

毛泽东住下后,立即让秘书找周恩来赴上海。

周恩来刚从上海回京时间不长,又让秘书准备飞机去上海,邓颖超问:“这么突然去上海有什么事。”

周恩来说:“主席召见。”

“大概要多长时间?”

周恩来回答:“只说有事,不知什么事,大概一两天就可以回来。”

秘书从他俩的对话中估计时间不会太长。只是带上了洗漱用具,连换洗的衣服都没带。

6日深夜,与周恩来谈完话后的毛泽东寝食不安,他让徐业夫发出紧急通知,要中央政治局常委们8日都赶到上海毛泽东的住处开紧急会议,并点名让叶群参加会议,要在会上发言。

# 第17回：不服气，彭真又找刘少奇 事态迫，众常委齐聚华亭

《文汇报》和《解放日报》在12月6日这天，同时报道了全国各报转载姚文元文章的情况，并刊登了《解放军报》、《北京日报》、《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的编者按语。《文汇报》把《解放军报》的编者按语《一株大毒草》登在前面。

彭真的火又上来了，他拉着刘仁一起去找邓小平。

邓小平11月3日到大西南视察，12月6日才从昆明回到北京。彭真向他汇报说："你说要把政治和学术分开，有人就是要在主席身边吹风，硬要把《海瑞罢官》和彭德怀联系在一起，这就混淆了学术和政治的界限嘛。"

邓小平说："我们共产党人一定要讲究实事求是。没有根据怎么能随便给人下政治结论呢？政治和学术一定要分开进行，混在一起是最危险的。"

"你看现在怎么办吧。"

"咱们问问少奇同志。"

邓小平、彭真又一同来到刘少奇那里。

彭真对刘少奇说："不光是我，文化界有相当多的同志对姚文元的文章很不理解，大家都不知道该怎么搞。"

刘少奇沉思着说："毛主席没有和我谈过这个问题。说老实话，我也不晓得怎么搞才好。不过有一条你们要注意，学术讨论中，一不要乱扣帽子，二不要乱打棍子，要摆事实，讲道理。我们今天干的事，要能够经得起历史的考验，千万不要让我们的后代将来说我们！"

邓小平说："少奇同志强调的这一点很重要。我们党内出现过王明、张国焘那种'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错误，我们无论如何不能再犯这种错误了。"

"是，我回去就安排布置。"彭真回答说。

彭真回来后,叫来邓拓、李琪、范瑾,对他们说:“你们说姚文元的文章不好,我们能不能写出一篇好文章呢?比如从理论上,也就是从学术上分析一下吴晗同志的戏剧观,历史观,用具体的材料、具体的事实回答一下人们关心的问题。像封建道德能不能继承,古代社会有没有清官?到底是清官好,还是贪官好?把这些问题辩论清楚了,对大家的理论水平不也是提高吗?

邓拓,你在这场‘学术讨论’中不要消极观战,而要积极参战,北京的理论工作者要走到各省、市前面去!”

已经接到开会通知的林彪此时已来到上海,他坐在一件昏暗的房间里流泪,他是为即将召开的上海会议流泪。哎,1938 年 3 月 1 日凌晨,那个倒霉的阎锡山士兵的子弹,从林彪的前胸穿过,擦伤了他的中枢神经,使林彪落下了这么个怕光,怕风,怕水的怪毛病,被折磨得生不如死。

12 月 7 日,毛泽东几次批示身边工作人员,通知一些领导到上海:

“请用电话,告叶剑英、萧华、杨成武(在杭州)、谢富治四位同志,于本日下午到上海一谈。”

“宋任穷、陈锡联(东北)、李雪峰、杨勇、廖汉生(北京)、杨得志一架飞机共七人,于八日上午来此。”

实际上毛泽东此处列出来的是 6 人。

毛泽东还写到:“贺龙、董必武、王尚荣、李天佑、张爱萍、雷英夫、徐向前、刘伯承(如卧床,可不来)、朱德,共八人,于十二月八日上午来此。”

“许世友、韩先楚、陈毅、陶铸、王任重、李井泉、刘澜涛七人于十二月八日来上海。”

“邓小平、李富春、薄一波三同志:请于本日或明日到上海一谈。在四川,由成都转告。”

这天,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通知空军司令吴法宪:“毛主席决定,从八号开始,在上海召开一个小型会议,要你去上海参加会议,并准备飞机,把北京的一些主要领导人送到上海去参加会议。”

这天,正在北京玉泉山陪刘少奇养病的王光美接到毛泽东秘书徐业夫从上海打来的电话,通知刘少奇和周恩来马上到上海开会。第二

天,他们同乘一架飞机飞往上海。

飞机在上海虹桥机场刚停稳,毛泽东的秘书徐业夫就直接登上飞机,将两份装有会议文件的文件袋分别交给刘少奇和周恩来。

上海市委书记陈丕显在飞机旁迎接。他首先陪刘少奇来到兴园路别墅招待所。贺龙和叶剑英两位元帅也住在这里。

走进院子,刘少奇看见贺龙就问:“这次开什么会?”

贺龙惊讶的反问:“奇怪,你都不知道,我怎么能知道?”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们陆续赶到上海。刘少奇、周恩来等是从北京来的。邓小平是从昆明赶来的,林彪是从苏州坐汽车过来的。8 日上午,“紧急会议”在毛泽东住处继续进行着。毛泽东说:“罗的思想同我们有距离”,“他又犯了彭德怀的错误,对林、老帅不尊重。罗在高饶问题上实际上陷进去了。罗是个野心家。罗把林彪同志实际上当作敌人看待。林带了几十年兵,难道他还不懂得什么是军事,什么是政治?军事训练几个月的兵就可以打仗,过去打的仗都是打的政治。要注意防止罗的地下活动,注意搞八司马。”“罗把林彪同志实际上当作敌人看待”,“罗是野心家”。

他对林彪说:“罗瑞卿反对你,还没有反对我嘛!他反对我游泳,那也是好意。”“要恢复突出政治的原稿。”

会议中间,周恩来、邓小平从开会处出来,找到在外面待命的陈丕显说:“阿丕呀,中央马上要在上海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研究罗瑞卿的问题。你看能不能找一个地方给罗瑞卿住。他不能和大家住在一起。要分开。这个地方的安全、警卫工作由上海市委负责。房间里不要装电话,房门不要上锁,其他需要注意的问题,你们再仔细考虑一下。总之,要保证罗瑞卿的安全,不要出问题。此事要保密。”

听着周恩来、邓小平交待任务,陈丕显头皮一阵阵的发麻:“这是监护性居住啊,罗瑞卿出什么问题了?”他不能多问,更不敢怠慢,立即找了当时的市委书记兼公安局局长梁国斌和上海市公安局党委副书记、常务副局长王鉴,具体落实了几处地方,周恩来看了都说不合适。最后他们找到了建国西路 168 号,以前的波兰领事馆,60 年代中苏关系紧张后,波兰领事馆撤消了,这个小楼就一直空着。这是一个独立的庄园式建筑,与锦江饭店和丁香花园都很远。小楼坐落在院子中

央,与周围的围墙有一定的距离。周恩来看了后,认为可以。最后确定,罗瑞卿来了就被安排住在这里。

空军司令吴法宪一到上海,刚刚在锦江饭店住下,杨成武和肖华就来通知他,说林彪要找他谈话。紧接着,吴法宪接到叶群的电话,要他立即到她那里去。

吴法宪立即赶往林彪的住地。上楼时,恰巧碰到雷英夫从叶群的房间出来,他们打了个招呼,吴法宪就急忙走进叶群的房间。谁知刚进门,叶群劈头就问:

“吴法宪,你是跟罗长子还是跟林总?你要好好考虑考虑!”

吴法宪一时没有反应过来,喃喃地说:“我跟林总,我当然是跟林总啦!”

叶群:“你跟罗长子跟得那么紧,你能跟他划清界限?”

吴法宪急的眼泪都快掉下来了,连忙表白说:“我怎么不能跟罗瑞卿划清界限,我会的,一定会。”

叶群说:“好,那你在会上要做自我批评,而且在会上要彻底揭发罗瑞卿在空军的活动。你听到刘亚楼生前对罗瑞卿有什么意见也要交待出来。只有这样,才能表示你真正同罗瑞卿划清界限。”

叶群告诉吴法宪:“毛泽东决定召开这次上海会议,主要就是要解决罗瑞卿的问题。”

吴法宪十分震动,想不到庐山会议才几年的功夫,林彪和罗瑞卿的关系竟然发展到了这个地步!他不禁问叶群:“罗瑞卿究竟有什么问题?”

叶群说:“我告诉你一点材料,你好在会议上揭发和批判。第一、罗长子反对林总突出政治的观点,说什么既要突出政治,也要突出军事,政治、军事都重要,搞折衷主义。第二、长期以来不向林彪报告工作,对一些重大的问题不商量、不通气。有的事情林总根本就不知道。例如在北京十三陵搞的那次大比武,林总当时在外地,罗瑞卿就没有报告他。这种作法林总是根本不同意的。第三、逼林总交权让贤。有一次,罗长子到林总这里来汇报工作,林总身体不大好,没听完就让他走了。他在走廊里大吵大嚷,说什么‘病号嘛,还管什么事?病号就应该让贤,不要挡路’。把林总气得差一点晕过去。第四、罗瑞卿曾经对

刘亚楼讲了四条意见,包括要林总退居‘二线’,或者只搞中央工作,至于军委的工作,放手让罗瑞卿去管等等。还有,林总让我去参加‘四清’,好得到第一手材料来向林总汇报,但是罗长子就是反对,还说‘你何必去搞什么’‘四清’,主要是保护好林总的身体就行了’。”

她还说:“现在知道这些材料的只有杨成武、肖华、雷英夫和你,别人都还不知道。你们几个人要在会议上带头发言,把这些材料捅出去。”

吴法宪赶忙说:“感谢林总、叶主任对我的信任,告诉我这么多的情况和材料。请叶主任放心,我一定会在会上好好发言,向大家揭发罗瑞卿的罪行,决不辜负林总和叶主任对我的期望。”

罗瑞卿是总参谋长、中央军委秘书长、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身兼党、政、军13个职务,又曾担任首任公安部长,如果真像叶群所讲,他有野心,那么,是否有政变的企图?如果有,其政变的准备工作进行到何种程度?都有哪些人牵涉其中?这些情况,尚不得而知。为慎重起见,这次上海会议的内容严格保密,除毛泽东、林彪、周恩来、叶剑英、杨成武外,其他人都不知道。开会人员也是分批通知,陆续到达。

吃完中午饭,刘少奇接到叶群打来电话:

“是刘主席吗?我是叶群。林彪身体不好,毛主席让我向刘主席汇报。”

刘少奇表示同意,说:“行,那你下午过来吧。”

当院子里响起叶群的汽车声,王光美出门迎接:“叶群,你好!”

“你好!”叶群和王光美热情的握手,俩人寒暄着走进刘少奇的会客室,王光美让服务员给叶群送上茶水,正要离去,叶群拉住她的手说:“我一个女同志不方便,你也留下吧。”

于是,王光美也坐了下来。

叶群向刘少奇谈了她受林彪委托向毛泽东反映罗瑞卿问题的过程。刘少奇仔细的听着,没有说什么。谈完后,叶群问刘少奇:“我可以用一下你房间的电话吗?”

刘少奇说:“可以。”

叶群要通了林彪住处的电话:“找101。”

一会儿,林彪接听了电话,叶群只说了一句:“谈得很好。”就挂了电话。

这时,已经到了吃晚饭时间,王光美对叶群说:“开饭了,你好不容易来一次,吃完饭再走吧。”

叶群愉快的答应了。

“走,咱们洗手去。”王光美带着叶群来到洗手间,叶群兴奋地对王光美说:“中央就转发过两个女同志的文件,一个是你的《桃园经验》,一个是我在广州部队的《连队调查》报告。碰巧咱俩还是同学。”叶群和王光美都是北京师范大学附中的第一批女学生。

晚饭后,送走叶群,刘少奇和王光美顺道去看看同住在一个院子里的贺龙,恰巧西南局第一书记李井泉也在。刘少奇问贺龙:“事情真有些突然,贺老总,你是管军委日常工作的,这件事,你应该事先知道的吧?”

贺龙摇摇头说:“我也是刚刚知道。这么紧急,我以为是东南沿海的防务会议,这不,让秘书把作战地图都带来了。”

刘少奇甚感奇怪,又问李井泉:“你呢? 事先知道吗?”

李井泉说:“我也不知道。我和小平在昆明,还等着罗瑞卿一起去三线看看呢。罗瑞卿还没到,就接到开会的通知,这不,我还给罗瑞卿带了一筐桔子,昨天才送去。”

刘少奇吸着烟,自言自语说:“这么说,咱们大家事先都不知道喽?”

大家又是一声叹气。

12 月 8 日下午,正式会议在锦江饭店小礼堂召开。参加这次上海会议的除政治局常委外,还有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各大区书记、公安部部长、总参、军委、各军兵种负责人,一共 73 人,还有一钟说法是 61 人。其中政治局常委 6 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林彪、邓小平。陈云未到会;政治局委员 7 人:董必武、陈毅、李富春、贺龙、李先念、李井泉、谭震林,彭真在京留守未到会,刘伯承请假;政治局候补委员 5 人:乌兰夫、陆定一、陈伯达、康生、薄一波;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人 6 人:谢富治、徐子荣、吴冷西、汪东兴、李质忠、刘宁一;各中央局负责人 6 人:陶铸、刘澜涛、宋任穷、王任重、陈丕显、李雪

峰;军委、总部、军种和大军区负责人28人:徐向前、叶剑英、肖华、杨得志、张爱萍、吴法宪、李作鹏、苏振华、王新亭、张国华、秦基伟、刘志坚、邱会作、韩先楚、黄永胜、李天佑、杨勇、梁必业、张达志、黄新廷、杨成武、陈锡联、肖劲光、许世友、廖汉生、陈再道、张宗逊、郭鹏,聂荣臻请假,肖向荣未到会;另外还有总参作战部部长王尚荣、副部长雷英夫,林办主任叶群3人。

开会前,接替罗瑞卿担任公安部长的谢富治在休息室转来转去,没有看见他前任的高大身躯,有些奇怪,就问:“罗总长怎么没来?”没有人回答他。

他又朝另一群闲聊的人群走过去问:“罗总长怎么没来?是不是忘记通知他了?”

“主席不会忘事的。”叶剑英听见谢富治到处询问罗瑞卿,就回了他一句。

毛泽东没有出席正式会议,会议由林彪主持,先向与会者分发了会议材料,包括雷英夫的揭发材料;李作鹏等人写的关于海军两种思想斗争情况的材料,对“八六海战”和“一一一四海战”以后罗瑞卿、肖劲光的表现进行了揭发;还有其他人的一些揭发材料。林彪给毛泽东的信和那11份材料均作为会议文件印发。

接着,邓小平宣布了会议纪律,他说:“事先不知道开什么会,这样吧,分几个组,先分头开小组会。材料已经分给大家了,分组讨论。宣布一下这次开会的纪律:会议内容不能外传,不要纪录,文件由中央机要处处长直接交给大家,材料要自己拿着,不准交给秘书,当天看完当天交。会议期间不准对外打电话……”

会议印发了十一份材料:

1.1965年11月30日林彪给毛泽东的信;

2.1965年4月15日刘亚楼给罗瑞卿的信;

3.1965年5月20日林办工作人员的揭发材料;

4.1965年6月张秀川《罗总长对突出政治的错误看法》;

5.1965年10月15日张秀川给林彪的信;

6.1965年10月25日雷英夫给林彪的信;

7.1965年10月25日雷英夫《我对罗总长的几点具体意见》;

8. 1965 年 11 月 27 日李作鹏、王宏坤、张秀川给林彪的信；

9. 张秀川《罗总长对主席思想的错误观点》；

10. 雷英夫《罗总长对待主席指示的几个问题》；

11. 1965 年 12 月 6 日雷英夫电话报告纪要。

会议分为 3 个小组，据杨成武回忆：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分别担任 3 个小组的小组长。还有一种说法是：第一组召集人是邓小平、陈毅，第二组召集人是谢富治、李井泉，第三组召集人是周恩来、贺龙。

杨成武回忆：周恩来这个小组有董必武、朱德、贺龙、陆定一、总参作战部长王尚荣、副部长雷英夫、杨成武、华北局第一书记李雪峰及叶群等人。小组会由周恩来主持。他宣布开会后，叶群首先发言，她是作了充分准备的，分三次讲了约 10 个小时，说得有声有色：

“罗长子反对突出政治，他胡说既要突出政治，也要突出军事，军事政治都重要。搞折中主义。”

“翟月英对我讲，刘亚楼在病重时要她把罗瑞卿的四条意见转告我叶群。四条意见是：

一、一个人早晚要退出政治舞台，林总也是要退出政治舞台的；

二、要我照顾好林总身体，劝林总多管一管中央的工作；

三、部队的事情让他罗瑞卿负责；

四、这件事办好了，罗瑞卿不会亏待我叶群。

我当时就把她的话顶了回去，没想到后来刘亚楼又找 101，当面谈。”

翟月英是原空军司令刘亚楼的夫人。

总参作战部副部长雷英夫也揭发了罗瑞卿的不少材料。

事情太突然了，大家都十分惊愕，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叶群在小组会议上的发言，当晚就由主持第二小组会议的周恩来向中央常委会作了汇报。

其他两个小组就不像叶群所在的这个小组，冷场了。

刘少奇这个组看完材料后，长时间没有人发言。最后还是陈毅打破沉闷，指着分在这个组的副总参谋长张爱评说：“爱萍，你在总参工作，总长出了问题，你这个副总长应该清楚嘛！你就先给大家说说吧！”

张爱萍和叶群一样,也是刚从苏北“四清”农村赶回来的。11 月 23 日,林彪还在苏州听取了张爱萍关于苏北方巷大队“四清运动”的汇报,充分肯定了张爱萍的“四清”经验。张爱萍从 9 月到方巷,已有近 4 个月没有回家了,不知道北京发生了什么事情,他只好说:

“我不清楚这些情况,给我的感觉,林总对罗长子是很信任、很放手的,罗也总是说哪件哪件事都是经过林总同意的。谁晓得会出这种事,我是第一次听到。”

邓小平这个组开始也没有人发言,于是,他指着编在这个组的吴法宪说:“听说吴法宪了解一些情况,你先讲吧!”

吴法宪无奈,只好掏出事先准备好的一万多字的揭发材料,小声的念起来。

邓小平耳朵背,让吴法宪过去和他坐在一起。

吴法宪说完后,邓小平问:“没有啦,就是这些?”

吴法宪说:“我就是知道这些,别的确实不知道。”

于是,会议就冷场了。后来在邓小平的一再启发下,大家这个讲几句,那个讲几句,但都讲不出什么名堂来。时间刚到 11 点,邓小平就宣布散会了。

当天,周恩来找吴法宪谈话。吴法宪刚到周恩来住房的门口,正好碰到雷英夫从里面出来。吴法宪一进去,周恩来就问他:“罗瑞卿是怎么反对林彪的?”

吴法宪很惊讶,反问他:“你也不知道吗?”

周恩来说他也不了解情况。于是,吴法宪就把叶群告诉他的事情又说了一遍。说完后,他还补充说:“听说海军有一些材料。”

这天晚上,周恩来还向吴法宪交代任务,要他派一架飞机,配备最好最可靠的机组,到昆明把罗瑞卿接到上海来。周恩来特别交待,要吴法宪亲自掌握好这架飞机,作好应变措施,飞机只准往东飞,不准往西飞。

周恩来一再强调,罗瑞卿到上海的事情,要严格保密,不要告诉任何人。

听完周恩来的指示,吴法宪当即报告说,准备派空军运输 13 师的副师长时念堂去驾驶这架飞机。

周恩来表示同意。

吴法宪又告诉他,罗瑞卿曾经从昆明打电话到北京找他讲话。

周恩来马上问:“接电话了吗?”

吴法宪说:“没有接,我已经离开了北京,是留在家里的秘书打电话告诉我的。”

周恩来听了后说:“不要紧,就说你不在家。”

吴法宪刚要离开周恩来的房间,秘书进来告诉他,说是彭真从北京来电话找他。

吴法宪准备去接电话,周恩来阻止说:“不要接,就说找不到你。他可能是来了解会议情况的。”

吴法宪有些不解,心想:“彭真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为什么不告诉他会议的情况?难道彭真也有了问题?”但是他不敢问,只好带着这个疑问离开周恩来的房间。

# 第18回：闻危言，众头领惊诧申城 不及防，罗总长应声落马

12月8日，空军专机师的时念堂接到吴法宪下达的飞行任务：

一、明天上午从上海飞到昆明，后天上午11时30分准时回到上海虹桥机场落地，不准提前，也不准延迟。

二、罗到昆明机场后，要立即起飞，不准在昆明机场停留。

三、直飞上海，中途不准转弯，更不准降落，需要调整时间，也不准盘旋。

四、绝对保密，不准对任何人谈起此事。

五、要绝对保证安全。

吴法宪还特别交待说："这次专机飞行，配发给你们几把手枪。在空中如果有特别行动，你们要听中央的，你们要监视他们的行动。"

就这样，专机组配发了4支手枪，分别发给时念堂和另外3个机组成员。

为了让参加上海会议的与会者更好的了解情况，会议决定让叶群到各组发言。就这样，叶群先后作了3次长达10多个小时的发言，嗓子都有些沙哑了。但是她还是充分把握这次在中央高层的露脸机会，充满激情的说：

"同志们，因为我刚从'四清'点上赶来，没有做好准备，只讲一点我所了解的情况。"

"我过去对罗瑞卿是毕恭毕敬的，没有想到他和林彪的关系搞得这样紧张。以后，我发现了一些问题，又不敢轻率上报……"

"罗瑞卿掌握了军队大权，又掌握了公安大权，一旦出事，损失太大。他的个人主义已经发展到了野心家的地步，除非林彪同志把国防部长让给他。他当了国防部长又会要求更高的地位，这是无底洞……

1964年以后，罗瑞卿就逼林彪同志退位. 国庆节后，他到我们家见林彪汇报工作。林总身体不好，没听完就让他走了。他在走廊里就大

嚷大叫：

‘病号嘛，还管什么事！病号不能干扰，让贤！让贤！’

出门后又大声喊：‘不要挡路！’

林彪同志气的昏迷过去。我家里的人从走廊上路过，听到了罗瑞卿讲的这些话。

……

前空军司令刘亚楼生病期间，曾让我转告林彪同志‘四点意见’，他对我说：

‘六三年以来，我几次想和你谈几点意见，是罗总长交代的。四点意见是：一、一个人早晚要出政治舞台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我看林彪同志要上政治舞台的。二、你的任务很重，应保护林总的身体。三、再不要干涉军队的工作了，由罗总长去管好了。四、放手让罗总长工作，信任他，一切交给罗负责。’

我对刘亚楼说：‘每个人都上了政治舞台。林彪荣誉很高了，无意再进。这是中央决定的问题，不是我们应该谈的问题。’

刘亚楼说：‘你怎么这么迟钝，你如果办到了，林彪进入政治舞台，不管军队，让罗总长干，总长不会亏待你的。’

我说：‘这是对我最大的污辱。’

回来路上小孩都说：‘刘亚楼讲得不对，你答得对。爸爸又没有野心。’

回家后林彪说：‘你答得对，今后不准讲这个事，这是违背原则的事。’

这时林彪同志才说：‘罗长子是个野心家！’

……”

12 月 9 日上午，刘少奇又找吴法宪谈话。吴法宪又把叶群告诉他的话说了一遍。到了中午，刘少奇请吴法宪一起吃饭，吴法宪在吃饭时把在太仓搞“四清”的一些情况向他作了汇报。刘少奇听了很高兴，当即作了一些指示。回来后，吴法宪马上将刘少奇关于军队“四清”工作的指示进行了整理，并报告了总政治部。总政治部将这个材料下发全军。

叶群听说周恩来、刘少奇都找吴法宪谈话，也特地跑到锦江饭店

八楼吴法宪住处了解情况。

12 月 8 日,杨尚昆在日记中写道:“得知常委各同志都去上海开会去了!”开什么会?他不知道。作为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没有通知他到会。以他当时的处境,当然也不会通知他到会。

12 月 10 日,杨尚昆整装登上南下广东的火车。怀着半是凄凉、半是感慨的心情,杨尚昆在日记中写道:“16 年的北京生活。今天开始变了,一切只能等时间!”

杨尚昆的突然调动,在中共中央的上层又平添了一份神秘紧张的气氛。

12 月 9 日,罗瑞卿和他的妻子郝治平按照原来的计划飞往云南看地形。对正在上海召开的会议,他还浑然不知。

12 月 10 日,中央常委根据小组会的情况,认为很多事情需要向罗瑞卿核实,于是决定:通知他到上海开会。

毛泽东说:“罗长子回来好嘛,全体参加会议的同志都去机场接他。”

邓小平觉得:“这样会不会使罗瑞卿感到太突然?”

周恩来提议:“还是让陈丕显和他爱人谢志成去机场接吧,他们是东道主嘛。”

毛泽东说:“好,那就这样吧。”

邓小平找到陈丕显,对他说:“通知罗瑞卿明天来上海开会,你和谢志成到机场去接。”

陈丕显忙问:“罗瑞卿要问我开什么会,怎么回答呀?”

邓小平想了想说:“你先不要告诉他开什么会,就说总理和我在住地等着他,到那里会和他谈。”

罗瑞卿正在昆明接见昆明军区的干部。这时,昆明军区司令员兼政委、云南省委第一书记阎红彦接到上海打来的电话后,来到军区大礼堂的主席台上,对正在讲话的罗瑞卿说:“中央通知你马上去上海开会。”

罗瑞卿扭头问了一句:“开什么会?”

阎红彦说:“我也不清楚。”

散会后,罗瑞卿给在北京留守的彭真打电话,问是什么会?彭真

说:“我也不清楚。这样吧,我问一下总理。”

过了一会儿,彭真给罗瑞卿打回电话说:“你去吧,去了就知道了。”

罗瑞卿想了想,如此紧急和保密,可能是军事方面的会议。他让秘书准备飞机。

第二天上午8时,罗瑞卿来到昆明机场,轻松自如,谈笑风生。过会儿,他被告知,飞机定在上午10时起飞。罗瑞卿很奇怪,飞机起飞时间应该由乘机领导定,这次是怎么回事?对什么事情都很认真的他,这次也不例外,让秘书问一下为什么?机场回答:“上海虹桥机场有英国人的飞机要降落,碰上了不好办。所以定了这个时间。”罗瑞卿没有多想,坐上飞机后,看到飞机上多了几个空军的人,罗瑞卿也没有多问,又按他的老习惯批改文件。

飞机准时到达上海上空。郝治平碰碰罗瑞卿说:“不要看了,上海到了。”

罗瑞卿朝机舱外瞅了一眼,放下笔,伸了个懒腰说:“好快,这就到了嘛。”

他离开小桌,让秘书将文件收了起来。

这是上海初冬很阴冷的一天,天空一层灰暗的云霭。飞机停稳后,罗瑞卿走出舱门,朝机场四周扫了一眼,发现今天的机场异常平静。由于他身兼13职,每次到上海,总有一大群人到机场迎接,今天却只有陈丕显和吴法宪两个人孤零零的站在飞机前。

罗瑞卿见到陈丕显的第一句话就是开玩笑的说:“有劳大驾。”

陈丕显却表情平淡,没有说话,也没有精神。

罗瑞卿又开玩笑地说:“大战通宵,没有精神了?”意思是说陈丕显又打了一夜的麻将。

陈丕显回答说:“上车慢慢说。总理、小平同志在等你。”

同机来的还有陶铸的夫人曾志。一下飞机,郝治平就忙着给曾志安排汽车,吴法宪在一旁说:“不用你管,不用你管,有人来接她。”

这让郝治平有些奇怪。吴法宪一贯谦恭,每次到机场迎接罗瑞卿,连开车门,脱穿大衣这些警卫员做的事他都要亲自做,而且次次如此。他甚至对郝治平说:“苏联人把斯大林称作他们的父亲,我们这些

人还没有资格称毛主席为父亲,只能将林总和罗总长称作父亲。”今天,他怎么像是换了一个人?

大概是由于同机有一位空军师长一路“陪伴”,加上陈丕显、吴法宪一改平日作风,罗瑞卿觉察到有些不对劲,所以一上车便问陈丕显:

“阿丕,开什么会呀,这么紧张?”

陈丕显指了指前面的司机和警卫,意思是车上不方便讲话。但是又不能干坐着,一路上只好东拉西扯地谈谈天气啦、庄稼啦,工业生产等等不着边际的话。

罗瑞卿每次来上海都住在锦江饭店,快到目的地时,陈丕显对他说:“这次不住锦江饭店了,那里住满了,另外为你们找了一个地方。”

郝治平心里疑惑起来,觉得不对劲。她看看罗瑞卿,罗瑞卿没有说话。汽车很快开进建国西路168号。

罗瑞卿钻出车门时,看见二层小楼前有人站岗。陈丕显很尴尬地对他说:“你们就住在这个楼里。总理和小平同志在里面等你。”

这句话让郝治平的脸呼的热了起来:“不是来参加会议吗,怎么要先个别谈话?”

按照经验,个别谈话一般不会是好事,尤其是有两个领导参加的个别谈话。好事一个人传达就行了。坏事或难事就要有两人以上参加了,以免谈不下去或有人作证。

陈丕显把满腹狐疑的罗瑞卿送进会客室,便转身到里屋,对等在那里的周恩来和邓小平说:“总理、小平同志,罗总长到了。”

“那好,我们过去。”周恩来说。

“那我先出去了。”陈丕显请示周恩来,周恩来点了点头,然后和邓小平一起来到了会客室。

与此同时,郝治平也被人叫到楼上。她看到楼梯口和会客室门口都站着一些工作人员人员,虽然穿着便衣,但是,凭着她和丈夫在公安部工作10年的经验,她知道,这些都是保卫人员。上海市公安局主管内保的副局长王鉴也在场。她清楚自己和丈夫已被看管起来了。此时,院子里面的警卫人员都是周恩来、邓小平从北京带来的,小楼外面才是上海当地的警卫人员。这些工作人员有明确交代,罗瑞卿不能随便走出院子,出去、动用汽车这样的事情都要请示周恩来批准才行。

郝治平想听楼下会客室的动静,听不见。她想下楼,被工作人员拦住了。她知道祸事临头了。

罗瑞卿的秘书邓丁按照罗瑞卿一贯的作风,准备给罗瑞卿安装保密电话和挂作战地图。警卫人员请示陈丕显,陈丕显立刻把这一情况告知周恩来的秘书周家鼎,周家鼎直接给邓丁打来电话:

“是邓秘书吗?到上海啦?……好,到了好,先休息,罗总长的电话先不要装了,地图也不用挂了,让罗总长好好休息吧。”

邓丁秘书一下子愣在那里,半天没有说话,电话拿着好久才放下。

过了一会儿,他才走过来对郝治平说:“主任,他们说不让安电话。”

因为罗瑞卿的习惯,走到哪里都要先安电话的。

心乱如麻的郝治平对秘书摆摆手说:“不让安就不安吧。”

郝治平在楼上等啊、等啊,一直等到天黑,大约19点钟的样子,听到院子里汽车发动的声音,她知道,这是周恩来和邓小平已经走了。她急忙往楼下跑,在楼梯口,看见罗瑞卿正要上楼。只见他脸色灰暗,浑身疲惫,站在楼梯前迈不开步子。王鉴上来搀扶他,被他轻轻推开。他想自己上楼,可是一点力气也没有。郝治平三步两步跑下来,扶着他上了二楼房间。

两个人面对面地坐着,罗瑞卿轻轻的喘息着,一句话也没有。过了好一会儿,郝治平问罗瑞卿:“这是怎么了,到底什么事呀?”

罗瑞卿看了看桌上的茶杯,想拿又没拿,缓缓的说:

“开会了,说我反对林彪,封锁他,对他搞突然袭击,反对突出政治。说我伸手。我没有!”罗瑞卿声音大起来,满腔冤屈地说道:“我没有伸手。我的工作都是党中央和毛主席任命的。我没有封锁他。我该和他讲的都和他讲了。就是有些问题我向总理、主席直接讲,听他们的指示,这是应该的。而且林彪知道、谁都知道的……”说着说着,罗瑞卿眼泪夺眶而出。他神色有些激动:

“我没有反对林副主席,没有伸手,没有反对突出政治。杀了我的头也不能承认这些。我要见林彪!”说完,他叫来秘书说:

“你跟他们讲,我要和总理讲话。”罗瑞卿觉得,周恩来能够替他说说话。在会客室时,周恩来讲了这次上海会议的内容,随后转述了叶

群代表林彪在会上对罗瑞卿的指责,也传达了毛泽东说的话:罗瑞卿“反对林,还没有反对我。”

邓小平也传达了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意见:“一、情节是严重的;二、同彭、黄有区别;三、从长远看,还是有成绩的;四、中央未察觉也有一定的责任;五、党的方针仍然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只要认真地改,仍然准许革命。”

看着罗瑞卿痛苦的样子,郝治平心里难过极了。加上这几天碰上的一连串莫名其妙的事情,她也不禁痛哭了一场。但是,这并不能使他们稍微感到轻松一些。

周恩来的电话通了,罗瑞卿来到楼下警卫室,拿起电话,急迫地说:“总理,我要求去见毛主席,去见林副主席,我相信,我能把一切解释清楚。”

“这样不太方便吧……”周恩来字斟句酌的劝说道。

“如果不能见面,我现在就给林彪打电话……”罗瑞卿坚持自己的想法。

周恩来有些激动,他大声地说:“太天真,你太天真了。”

很少有人看见周恩来这样讲话,罗瑞卿反而平静了下来。

周恩来接着说:“你不要激动,不要到主席那里去,也不要到林彪那里去。你要到什么地方去,要告诉我们一声。”

“好吧。”罗瑞卿答应道。

周恩来又说:“这次开会,为了避免历来开会的副作用,采取背靠背的办法,你可以不参加会。”

放下电话,罗瑞卿默默地回到楼上。

为了防止发生意外,事先已经对罗瑞卿的住处采取了一系列保卫措施:门锁被拆下了,在楼下铺垫了一些草垫子。在周恩来、邓小平与罗瑞卿谈话的时侯,还不时让服务员和保卫人员送些茶水、毛巾以观察动静,预备好万一发生紧急情况时,立即采取措施。

关于罗瑞卿问题的“上海会议”还在继续,周恩来和邓小平特意安排一些与罗瑞卿熟悉的人,如陶铸、李井泉等大局第一书记去看望罗瑞卿夫妇。

陶铸也是和罗瑞卿性格相近的中共上层领导人之一,解放战争时

期任东北野战军政治部副主任,一直非常支持林彪在东北的方针、政策,和林彪关系很好。上海会议的内容让他很惊讶,他去看望林彪时,特地问林彪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林彪对陶铸说:“1960 年,罗瑞卿对我的合作是好的。但是从 1961 年起,就开始疏远我、封锁我,到 1965 年便正式反对我了。”

陶铸见到罗瑞卿时,向他转达了林彪这一段话。罗瑞卿十分委屈的说:“我什么时候反对过他,封锁过他呀?每次他批评我,我都注意改正了……”

李井泉来看罗瑞卿。罗瑞卿不解地问:“为什么要采取这种办法?我到底犯了什么错误?”

李井泉情急之下冲口而出:“太突出,你太突出了呀!”

是啊,“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堆高于岸,流必湍之”。也许,这些古谚会让罗瑞卿的痛苦平缓一些。

# 第19回：难落实，不承认“死无对证”满腹冤，与卓琳泪眼相形

上海会议的第四天，大家继续揭发罗瑞卿，发言的人比较多起来。

这天，12月12日，中央军委在上海开会，由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主持，贺龙、陈毅、徐向前、叶剑英和林彪都参加了。军委会上，免去了罗瑞卿在军内的职务，军委秘书长由叶剑英兼任，总参谋长由杨成武代理。

这天，叶群突然来到贺龙住处。薛明赶紧上前招呼。

客气了几句，叶群说：“林总已跟叶帅打了招呼，说这次会议与叶帅无关，所以，林总也要我跟贺帅打招呼。”

大家闲谈几句，叶群就告退了。叶群走后，薛明问贺龙：“叶群在这个节骨眼儿上来干什么？”

“谁知道。”贺龙也不清楚。

隔了一天，薛明前往林彪处回访。叶群也十分热情，拉着薛明的手，亲热得不得了。

其实，薛明与叶群二人矛盾很大，由来已久。

叶群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读书期间，积极参加学校共产党组织的学生活动，特别是在“一二·九”学生运动中表现积极，于1935年底，被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在北京师范大学的组织吸收，成为共青团员。

1936年夏天，叶群考入天津师范学院继续高中学业。她的组织关系也转入天津。在此期间，叶群考取了国民党的广播电台，担任广播员。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北平沦陷。平津抗日学生南撤流亡。叶群也于1938年从天津出发南下，先到了南京，在南京参加了国民党青训班学习。在青训班期间，她参加过三民主义青年团举办的“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演讲，而且获奖；还为国民党CC派办的壁报

写过稿,是个活跃分子。

很快,叶群又来到武汉,在那里通过党组织的安排,终于在1938年到达延安。

薛明就是在随平津学生南撤南京时认识的叶群。薛明也是1936年3月入党的党员,在天津担任地下党交通员,负责天津学联、民先、妇救会的联络工作。1938年,她随平津南下流亡学生到南京,当年夏天就到达了延安。

1942年延安整风时,本着"无事不可对党言"的方针,每一个人都要认真的说清楚自己的历史问题,写自传,包括党的军队的高级领导人在内。作为曾经与叶群一起南下流亡的同志,薛明认为叶群对自己在南下流亡期间的这段历史语焉不详,于是找叶群谈南京的事。叶群承认自己在南京参加过讲演,内容是三民主义,并说过"只有蒋介石才是我们惟一的领袖"的话。但当薛明要她去向组织上作交待时,叶群马上否认,死活不去。薛明硬把她拉到中央组织部组织科长王鹤寿那里。后来,薛明还将叶群在江西期间的表现,如:表达自己对蒋经国的崇拜之情,和当地县长李林的关系很近等事情,也向中共中央组织部写了书面报告。

贺龙知道薛明的这份书面报告后,不以为然,批评薛明说:"你搞的什么名堂,都是鸡毛蒜皮的小事。"

时过境迁,此时,当叶群满面笑容地拉着薛明的手时,薛明脸上笑,心里却对叶群十分警觉。

叶群对薛明说:"今年8月1日《人民日报》上登的贺总写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民主传统》,是林总决定以贺总名义发表的。因为林总考虑到贺总在群众中的威望高,特别是近几年来在国防建设上有功,林总对贺总印象很好,说贺总干了许多工作。"

薛明说:"感谢林总对贺总工作的支持。"

叶群把话题一转说:"贺总这人哪儿都好,就是爱骂人,所以我不敢去你家,怕贺总骂我。"

薛明说:"这怎么可能呢?贺总怎么能骂你呢?"

叶群想起什么似地说:"过去你说了我那么多坏话,只要你不说了,我就既往不咎了。"

薛明见叶群这么一说,心里很恼火,此时的她已不是延安时期的年轻学员了,只是微微一笑,没有答茬。

又过了一天,叶群再次来到薛明住处,对薛明说:“你知道吗?林月琴的弟弟是军统特务。听说你们来往很密切,还把党内文件给他们看。”

林月琴是罗荣桓的夫人,也是老红军。贺龙与罗荣桓同住在一个院内,彼此关系密切。薛明听了叶群的话后吃了一惊,随即解释说:“那是肖华让送给林月琴看的。”

叶群说:“我是关心你们才告诉你们这件事。”

薛明少不得说几句感谢话。叶群走后,薛明把叶群来的事告诉了贺龙。贺龙听了沉吟说:“不要小瞧这个女人,怕是来者不善啊!”

上海会议的第五天,大家讲得差不多了,实际上也没有什么可以讲的了,于是小组会宣布休息。同时,也宣布了纪律:不准上街,不准会见朋友。

第六天下午,在锦江饭店顶楼餐厅开大会,刘少奇、朱德、周恩来、邓小平等领导到会,只有毛泽东和林彪没有露面。大会由周恩来主持,邓小平做总结发言。他说:

一、这次会议初步揭发了罗瑞卿的一些问题,会议暂时告一段落;

二、罗瑞卿的主要问题是军事路线、组织纪律和工作作风方面的错误;大比武冲击了政治,没有坚决执行林彪关于突出政治的指示,犯了折衷主义的错误;重大问题不请示报告,是无组织无纪律的错误;关于罗瑞卿篡改林彪对1964年大比武冲击政治的批评,邓小平在会上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要恢复林彪同志‘突出政治’的原稿。”

三、会议上揭发批判罗瑞卿的一些问题,将转达到本人,给他一点时间来认识错误;

四、对罗瑞卿的问题,不能扩散,只限到会人员知道;

五、会后怎么办,回京以后由中央研究解决。

邓小平一共讲了半个小时。他讲完话,其他人全都没有再讲什么话,宣布散会。

这天,12月14日,毛泽东约中央办公厅新任命的副主任、中央机要局局长李质忠谈话说:“机要保密、警卫工作很重要,要保住党的机

密,不要被修正主义利用,并防止内部出修正主义,打起仗来要警惕牛鬼蛇神会出来破坏,要把这个意思告诉中央机要局、机要室,还要告诉军队的机要局、广播事业局的负责同志,都要注意”。

上海会议上,大量的发言是这种会议必不可少的表态。也揭发了罗瑞卿的很多问题,主要是: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突出政治;反对林彪,有个人野心和向党伸手;还有就是“不尊重老帅”等。也有人揭发了罗瑞卿工作作风中的问题,主要是说他揽事太多,锋芒太露,得罪了一些人。对于叶群提出的刘亚楼的四条和逼林彪让贤这两个问题,前者是死无对证,后者是无可对证,因为罗瑞卿不承认,又无第三者在场。

邓小平说:“请军队与地方的负责同志来,不是来人作一个决议,而是审查够不够?对不对?有出入的都可以提。谈到罗瑞卿伸手要权问题,林彪同志说有,罗瑞卿说没有,刘亚楼已死,死无对证嘛。”

会上,也有些人没有表态。还有些人,虽然表了态,但心里依然充满疑虑,只是在会上不好讲出来。

贺龙会下对薛明说:“叶群一个人在会上就讲了好几个钟点,中间还不断地插话。”“她说了罗瑞卿那么多坏话,好像罗瑞卿马上篡党篡军了,离奇得很。你看叶群说的那些,罗瑞卿真的会做得出来?我看叶群的话靠不住。”

即使有些人想为罗瑞卿辩护也无从开口,如:邓小平,仅“死无对证”四个字,显得十分苍白。就是罗瑞卿自己,也是有口难辩。

对雷英夫提供的材料,刘少奇说:“雷英夫有些能力,但意识不好。”因为身体不好,会没有开完,刘少奇就先回北京了。

朱德从上海开会回去后也是忧心忡忡,当他妻子康克清问他:“是不是因为上海会议”时,他叹了一口气说:“肃反肃到我们党的内部核心。是真的?是假的?弄不清楚。罗瑞卿那些事都看得见,他办的每件事都报告过中央,经毛主席同意的,说他篡军反党,无法让人相信。”他在屋里低头踱步,又说:“为什么要撤?这不是撤一个罗瑞卿的问题,像这样可靠的人都撤,今后党内要不平安了。”

15 日,周恩来嘱咐陈丕显和谢志成夫妇以东道主名义请罗瑞卿夫妇吃饭。

但是,罗瑞卿夫妇哪有心情吃啊。席间,他们很少说话,陈丕显夫

妇也不知该说些什么,这顿饭就是在这种压抑和沉闷氛围中度过的。

吃完饭,陈丕显夫妇立即赶到锦江小礼堂。上海市委正安排周恩来等人在这里跳舞。周恩来一见陈丕显夫妇进来,立刻对正在陪他跳舞的舞伴说:“对不起。”然后来到陈丕显夫妇跟前,对谢志成说:“我们跳一曲吧?”

谢志成由于多年患梅尼尔氏症,不能转圈,赶紧对周恩来说:“总理,我可不行,不能转圈……”

周恩来说:“小超大姐不能跳舞,你也不能跳舞,你向小超大姐学习啊?”

谢志成不好意思,只好陪周恩来跳了起来。周恩来一边和谢志成慢慢的踱着舞步,一边认真地询问谢志成:“罗瑞卿他们吃饭时都说了什么吗?”

“说话不太多,罗瑞卿看上去很沉重、很沉默.……”谢志成将吃饭的情况向周恩来作了详细的汇报。

16 日,会议结束。邓小平只说了一句:“罗瑞卿的问题还要继续调查研究,搞清楚。散会。”

这次会议,确定了处理罗瑞卿问题的五条意见:

“一、性质严重,手段恶劣。二、与彭、黄有别。三、从长期看,工作有一定的成绩。四、中央未察觉也有一定责任。五、党的方针仍然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只要认真地改,仍然允许革命。”“处理两步走,调动职务,不搞面对面,冷处理。”

会后成立了罗瑞卿专案组,组长由周恩来担任。

散会后,周恩来和邓小平又来到罗瑞卿的住处。他们受毛泽东委托,同罗瑞卿进行第二次谈话,向他传达了会议的精神:

“毛主席对林彪说,反对你,还没有反对我呢。就是反对我到长江里游泳,还是一片好意。这是一。第二,主席说,如果没有这三条(指反对林彪、伸手、反对突出政治),可以把问题先挂起来。中国有很多问题都是挂起来的,挂几百年不行,还可以挂一万年。有什么就检讨什么。”

罗瑞卿问:“别的还有什么呀?”

“你和别人的关系不好呀。这次会上,大家还从人际关系、作风、

工作、政治、组织等五个方面对你提了很多意见,你应该好好检查。主席讲,这个事,我们也有责任,没有发现,及时教育。他还说,告诉罗总长回北京,回北京再说吧。”

那天,邓小平叫他的夫人卓琳坐同一辆车也来了。周恩来、邓小平和罗瑞卿在楼下谈话时,邓小平让卓琳上楼找郝治平。

郝治平一见卓琳,拉着她的手就问:“你们是什么时候来的,发了些什么文件?”

卓琳摆着手对她说:“不要提了,不要提了。这次开会和过去什么都不一样,非常神秘。我们这些当秘书的都看不见文件。都是小平同志自己装在口袋里。看完了,谁交给他的就退给谁。”

正如卓琳所说,这次会议的规定非常严格,与会的大部分领导和工作人员都住锦江南楼,工作人员不得相互走串,不得离开酒店上街,会议严格保密,以防走漏风声。首长去开会,警卫人员只准把首长送到电梯口,不得跟随至会场,常委的警卫人员也不例外。随领导同志来上海的工作人员,谁也没估计到会开得这么长,也没想到这次会议会有这样严格的规定,连街都不能上。他们连换洗的衣服都没带,脚上的袜子只有一双。当时是冬天,上海不断地下小雨,较厚的尼龙袜,当晚睡前洗了,第二天又不会干。没有办法,上海接待处经请示会议批准,临时在锦江北楼设一小卖部,以便买一些换洗的衣、袜。工作人员也可以借去小卖部的机会,到院子里透口气。

郝治平又问卓琳:“你看到什么人了吗?”

卓琳说:“谁也不走动,不串门。不好串门呀。”过了一会儿,她又说:“这个问题本来可以不这样办,但是现在已经这样办了,那么就这样子吧。让总长好好注意身体。回北京后家里还有孩子,可以解解闷。”

她还特别对郝治平讲:“我跟你说的这些话,都不是小平同志的意思。也没有看见什么文件,是我自己有这么个感觉。”

郝治平满怀冤屈的对她说:“我想不通,怎么也想不通。”

她拿出随身带的大本《毛主席语录》,翻到关于要做老实人那一段话,让卓琳看:“毛主席说:陈独秀、张国焘等等不是老实人,不老实的人没有好下场。马克思、恩格斯是老实人。”

她说:“我说我这几天就靠这一段过日子,要是没有这句话,我这

日子过不了。”

卓琳劝她:“不要想那么多,还是照顾好罗总长的生活吧。”

说着说着,两人都掉下了眼泪。

海军是司令员肖劲光、政委苏振华和副司令员李作鹏3人参加上海会议。邓小平在小组会上,对李作鹏等人揭发罗瑞卿问题的材料,曾插了一句话:“海军那个材料没有什么重要问题。”

在离开上海的前一天,肖劲光接到林彪秘书打来的电话,说林彪请他去谈一谈。

对上海会议的内容,肖劲光事先一无所知,但对罗瑞卿有错误的议论,他却有耳闻。尽管如此,此次会议对罗瑞卿问题的性质定得如此严重,肖劲光一点也没有思想准备。在上海会议上,也揭发了肖劲光的一些问题,他很想与林彪谈一谈自己的思想,一方面检讨自己工作上的错误,同时对李作鹏等人揭发的问题当面向林彪作一解释。

待肖劲光如约到达林彪住处的时候,接待他的却是叶群。她说林彪近些天来身体很不好,正在睡觉,委托她来谈一谈。

对林彪避而不见,肖劲光心有不快。而且,他感到有些问题也不便与叶群谈。所以,当谈到李作鹏等揭发的肖劲光与罗瑞卿的关系问题时,叶群说肖劲光这些年来在突出政治问题上反对林彪,希望肖劲光起来揭发罗瑞卿的问题。肖劲光只是泛泛地说:“自己在工作上是有错误的。”同时,对李作鹏等揭发信中的一些情况做了些说明,请叶群转达林彪。

临走时,叶群对肖劲光说:“你身体不好,工作上的事情就不要多管了,让李作鹏他们干去。”“你放心,李作鹏不会夺你的权。”

在这次会议上,除了涉及海军内部的问题以外,空军也卷入其中,因为当时揭发罗瑞卿的问题,提到已故空军司令员刘亚楼,这在会议上影响极大。刘亚楼去世时,评价极高。他与林彪的关系也是非同一般的好,人死了才半年,居然爆出这么大的事情,如果他也牵涉其中,那还有谁不会有问题呢?

接替罗瑞卿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叶剑英在会议期间,代表中央打招呼说:“除了罗瑞卿问题,各单位自己的问题不要在会上扯。”会议结束时,又决定牵涉海军、空军以及高级将领的问题一律不向下传达。

# 第20回：谈道德，北京城回避政治 点要害，西湖畔纵论天地

在“上海会议”紧张进行的同时，北京关于《海瑞罢官》的讨论也没有稍歇。根据彭真指示，1965年12月1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邓拓以“向阳生”为笔名的文章：《从〈海瑞罢官〉谈道德继承论》。

这篇文章是经过北京市委书记处传阅定稿的，中心思想就是，不要把对吴晗的批判，硬拉扯到政治问题上去。

紧接着，北京市委宣传部部长李琪化名李东石的文章《评吴晗同志的历史观》等长篇文章也相继在《北京日报》和《人民日报》刊登，由此引起了对“道德继承”、“清官”、“让步政策”、如何评价历史人物、历史研究等学术问题公开、热烈的大讨论。

12月14日，彭真在国际饭店开北京市委工作会议时，把吴晗找去，对他说，“你错的就检讨，对的就坚持，坚持真理，修正错误”

彭真还通过北京市委宣传部办的《文艺战线》，连出了几期增刊，刊登了一些学术权威反驳姚文元的文章和北京京剧团提供的材料，证实吴晗写《海瑞罢官》不是自己主动的，是被北京剧团硬拉上马，不得已才写的；《海瑞罢官》是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写给毛泽东看的。彭真直言不讳说：刊登这些材料的目的“就是编给康生、江青同志看的”。

12月16日，毛泽东结束了上海会议，又回到杭州，住在西湖西南岸边的刘庄。

刘庄位于杭州西湖西南湖畔，丁家山南麓，坐落在西湖西面的杨公提上，现辟为“西湖国宾馆”，包括“水竹居”、“康庄”、“蕉石鸣琴”和丁家山等。

这里又名水竹居，是刘庄最初的雅号。原为晚清广东香山县富豪刘学询所建的别墅，故称“刘庄”。

刘学询是光绪年间的二品花翎举人。他在离京归途中游览了杭州西湖，感叹“故乡无此好湖山”，于是就于1905年在此购地构筑“水

竹居”,还特地从广东祖居搬来刻有篆隶文字、钟鼎图案的楠木门窗,红木家具等,装饰西湖寓所。

“水竹居”背山濒水,环境幽静,与苏堤隔湖相望。内有梦香阁、望山楼、湖山春晓等楼台水谢。曲桥亭廊、湖光山色,交相辉映。园内设置浑然天成,独具东方园林特色。面对迷人的西湖风光,一早一晚,从湖上吹来的微风凉爽且沁人肺腑,庭院里到处飘扬着浓郁的花香。四季美景,生趣盎然,历来就有“西湖第一名园”之誉称。

1953 年,“水竹居”的最后一位主人、刘学询的八姨太范媛英将刘庄献给国家,刘庄遂被定为浙江省第一招待所。1953 年 12 月 27 日,毛泽东率领宪法起草小组的成员胡乔木、田家英等抵达杭州,第一次住进刘庄 1 号楼。毛泽东在此期间,调集了国内的各种专家,在刘庄起草新中国的第一部宪法草案。1954 年 3 月 14 日,新中国第一部宪法草案初稿在这里诞生。

西湖刘庄

刘庄一号楼

一个月前,1965 年 11 月 19 日上午,毛泽东离开上海回到杭州,提出要陈伯达、田家英、胡绳、艾思奇、关锋 5 位秀才到杭州讨论为 6 本马列经典著作中文版作序之事。当时,毛泽东住在西湖的汪庄。

汪庄位于西湖南屏山雷峰塔之北,夕照山东北麓,南山路 37 号,原名青白山庄,又称今蜷还琴。广约 20 亩,背山面湖,风光秀丽,景色宜人,始建于 1927 年,原系安徽籍茶商汪裕泰茶庄老板王赐予的别墅,属私家园林。与刘庄、蒋庄齐名,列为西湖三庄之一。新中国成立后,汪庄主人只剩下妇孺,当家的姨太太艰难撑着家业,终因家道中落,于第二年将这座已经破败的庄园捐了出来。1958 年,国家在此投资建设了 5801 工程,开始接待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

西湖汪庄

汪庄1号别墅

21日,几位“秀才”乘专机赶到杭州后,不巧,毛泽东感冒了,就让大家先分头看看那6本书。第二天,毛泽东去上海参加外事活动,26

日回到杭州,没有几天,发生了叶群揭发罗瑞卿的事情,毛泽东又通知陈伯达,再次前往上海,出席上海会议。

陈伯达开始并不知道会议的内容。到了上海,会议紧张的气氛,使陈伯达想到1959年批判彭德怀的庐山会议。

在杭州的田家英、胡绳、艾思奇等人,并没有感到政治空气的骤然变幻,在等待毛泽东的一个月里,优哉游哉。田家英带秘书逄先知,重游了1961年搞调查去过的嘉兴等地,艾思奇与关锋结伴游览了杭州,胡绳则到上海探亲。

终于,12月21日上午,毛泽东又召集5位"秀才"开会了。关于为6本马列著作写序的事,毛泽东还是要按照原计划进行。为写序用的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大字本整整两木箱也已从北京运抵杭州。

这天,陈伯达、艾思奇、胡绳、田家英、关锋5人,走进客厅,毛泽东已经在那里等着他们。

一见面,毛泽东就说:"你们都来了,坐吧。"

老人家的兴致很高,他点了一支烟,坐了下来:

"昨夜睡得很好,今天可以多谈一些。"于是,他和大家海阔天空地聊了起来。

话题还是从选书和写序开始,逐渐谈到中国古代的几次战争,谈到中美关系,谈哲学,谈当时的思想界,也谈到了《海瑞罢官》。

艾思奇和关锋按照自己的习惯,一边听毛泽东的谈话,一边在自己的笔记本上作记录。难得有这样的机会,当面聆听毛泽东的教诲,大家都很珍惜,几乎没有人插话,只听毛泽东一人侃侃而谈:

"我在火车上,从服务员手里,才看到《毛主席语录》。那是军队编的。

"听说,中宣部要编,老夫子也要编。要编那么多的《语录》?"

"这一期《哲学研究》(指一九六五年第六期工农兵哲学论文特辑),我看了3篇文章。你们搞哲学的,要写实际的哲学,才有人看。书本式的哲学,难懂,写给谁看?

希望搞哲学的人到工厂、农村去跑几年,哲学体系改造一下,不要照过去那样写,不要写那样多。

南京大学一个学生,农民出身,学历史的。参加了四清以后,写了

一些文章,讲历史工作者必须下乡去,登在南京大学学报上。他做了一个自白,说:我读了几年书,脑子里连一点劳动的影子都没有了。在这一期南京大学学报上,还登了一篇文章,说道:本质就是主要矛盾,特别是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这个话,我也没说过。现象是看得见的,刺激人们的感官;本质是看不见的,摸不着的,隐藏在现象的背后,只有经过调查研究,才能发现本质。本质如果能摸得着,看得见,就不需要科学了。

要逐渐地接触实际,在农村搞上几年,学点农业科学、植物学、土壤学、肥料学、细菌学、森林学、水利学,等等。不一定翻大本子,翻小本子,有点常识也好。

现在这个大学教育,我很怀疑。从小学到大学,一共十六、七年,二十多年看不见稻、粱、菽、麦、黍、稷,看不见工人怎样做工,看不见农民怎样种田,看不见怎样做买卖,身体也搞坏了,真是害死人。我曾给我的孩子说:'你下乡去,跟贫下中农说,就说我爸爸说的,读了几年书,越读越蠢。请叔叔伯伯姊妹兄弟做老师,向你们来学习。'其实入学前的小孩子,一直到7岁,接触社会很多。两岁学说话,3岁哇喇哇喇跟人吵嘴,再大一点,就拿小锄头挖土,模仿大人劳动。这就是观察世界。……

大学的教育应当改造,上学的时间不要那么多。文科不改造不得了,不改造能出哲学家吗?能出文学家吗?能出历史学家吗?现在的哲学家搞不了哲学,文学家写不了小说,历史家搞不了历史,要搞就是帝王将相。"

"一些知识分子,什么吴晗啦,翦伯赞啦,越来越不行了。现在有个孙达人,写文章针对翦伯赞所谓封建地主阶级对农民的'让步政策'。在农民战争之后,地主阶级只有反攻倒算,哪有什么让步?地主阶级对太平天国就是没有什么让步,义和团先'反清灭洋',后来变为'扶清灭洋',得到了慈禧的支持。清朝被帝国主义打败了,慈禧和皇帝逃跑了,慈禧就搞起'扶洋灭团'。《清宫秘史》有人说是爱国主义的,我看是卖国主义的,彻底的卖国主义。为什么有人说他是爱国主义?无非以为光绪皇帝是个可怜的人,和康有为一起开学校,立新军,搞了一些开明措施。"

在这里,毛泽东又一次不点名的批评了刘少奇。因为,1950 年 2 月,影片《清宫秘史》在北京、上海等地上映后,很多报刊上作了宣传。毛泽东曾在一些场合多次指出:“《清宫秘史》是一部资本主义的影片,应该进行批判。”

当时担任文化部电影事业指导委员会委员的江青,按照毛泽东的意见,几次提出要批判《清宫秘史》。但是陆定一、胡乔木等人却进行了抵制。江青质问胡乔木:“你为什么要扼杀文化战线上这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重大斗争?主席的这个意见你们向中宣部党组汇报了没有?”

胡乔木说:“这个问题,我请示过少奇同志,他给我讲过:这部影片是爱国主义的。既然是爱国主义的影片,你要批判,怎么向少奇同志解释?”

江青沉默了,她只能向毛泽东作了汇报:“刘少奇在与胡乔木谈话中认为《清宫秘史》是爱国主义的影片。看来现在不好再批这部影片了。”

毛泽东笑了:“大概刘少奇是看到光绪皇帝可怜吧,现在不批就欠下账了。凡是错误的东西,100 年也经不起历史的检验。这个问题先放一放吧!”

这次,毛泽东是要算这笔账了。他接着说:

“清朝末年,一些人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体’好比我们的总路线,那是不能变的。西学的‘体’不能用,民主共和国的‘体’不能用。‘天赋人权’、‘天演论’也不能用,只能用西方的技术。当然,‘天赋人权’也是一种错误思想。什么天赋人权?还不是人赋人权。我们这些人的权是天赋的?我们的权是老百姓赋予的,首先是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赋予的。”

“研究一下近代史,就可以看出,哪有什么‘让步政策’?只有革命势力对于反动派的让步,反动派总是反攻倒算的。历史上每当出现一个新的王朝,因为人民艰苦,没有东西可拿,就采取‘轻徭薄赋’的政策。‘轻徭薄赋’的政策对地主阶级有利。”

他提到了《红旗》杂志 1965 年第 13 期上,戚本禹写的那篇《为革命而研究历史》:

“戚本禹的文章很好,我看了3遍,缺点是没有点名。姚文元的文章也很好,对戏剧界、历史界、哲学界震动很大,缺点是没有击中要害。”

毛泽东望着大家问道:“你们说,《海瑞罢官》的要害是什么?”

不等大家回答,他接着说:“《海瑞罢官》的要害问题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1959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庐山会议是讨论工作,原来打算开半个月,会议快结束了,彭德怀跳了出来。他说:你们在延安骂了我40天娘,我骂你们20天娘还不行!他就是要骂娘的。”

“这几年,青年有进步,就是一些老教授没办法。吴晗老当市长,不如下去当个县长好。”

“要改造文科大学,要学生下去搞工业、农业、商业。至于工科、理科,情况不同,他们有实习工厂,有实验室,在实习工厂做工,在实验室做实验。

高中毕业后,就要先做点实际工作。单下农村还不行,还要下工厂,下商店,下连队。这样搞他几年,然后读两年书就成了。大学如果是五年的话,在下面搞三年。教员也要下去,一面工作,一面教。哲学、文学、历史,不可以在下面教吗?一定要在大洋楼里教吗?

大发明家瓦特、爱迪生等,都是工人出身。第一个发明电的富兰克林,是个卖报的,报童出身。从来的大学问家,大科学家,很多都不是大学出来的。我们党中央里面的同志,也没有几个大学毕业的。

……

国民党的军官,陆军大学毕业的,都不能打仗。黄埔军校只学几个月,出来的人就能打仗。我们的元帅、将军,没有几个大学毕业的。我本来也没读过军事书。读过《左传》、《资治通鉴》,还有《三国演义》。这些书上都讲过打仗,但是打起仗来,一点印象都没有了。我们打仗,一本书也不带,只是分析敌我斗争形势,分析具体情况。

综合就是吃掉敌人。我们是怎样综合国民党的?还不是把敌人的东西拿来改造?俘虏的士兵,不杀掉。一部分放走,大部分补充我军。武器粮秣、各种器材,统统拿来。不要的,用哲学的话说,就是扬弃,就是让杜聿明这些人——。吃饭也是分析综合。比如吃螃蟹,只

吃肉不吃壳。胃肠吸收营养,把糟粕排泄出去。你们都是洋哲学,我是土哲学。对国民党的综合,就是把它吃掉,大部分吸收,小部分扬弃。这是从马克思那里学来的。马克思把黑格尔哲学的外壳去掉,吸收有价值的内核,改造成为唯物辩证法。对费尔巴哈,吸收他的唯物主义,批判他的形而上学,继承还是要继承。马克思对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英国的政治经济学,好的吸收,坏的抛掉。

马克思的《资本论》,从分析商品的二重性开始。我们的商品也有二重性,一百年以后的商品还有二重性,就是不是商品,也有二重性。我们的同志也有二重性,就是正确和错误。你们没有二重性?我这个人就有二重性。青年人容易犯形而上学,讲不得缺点,有了一些阅历就好些了。这几年,青年有进步,就是一些老教授没有办法。吴晗老当市长,不如下去当个县长好。杨献珍、张闻天也是下去好。这样才是真正帮助他们。”

……

写哲学能不能改变个方式?要写通俗的文章,要用劳动人民的语言来写。我们这些人都是‘学生腔’。”

陈伯达插话说:“主席除外。”

毛泽东接着说:“我做过农民运动、工人运动、学生运动、国民党运动,做过二十几年的军事工作,所以稍微好一些。”

谈话一结束,陈伯达就把毛泽东的谈话内容转告了正在上海的江青。

“向你致谢,‘老夫子’!”江青很高兴。年已花甲的陈伯达,连毛泽东都当面喊他“老夫子”,虽然也是中宣部副部长,却表明了与部长陆定一、副部长周扬完全不同的态度,江青很高兴,她马上和陈伯达商量道:

“主席的谈话很重要,应该赶快传达下去才对。”

“好的,我马上跟田家英讲一下,让他尽快整理一个谈话既要。”陈伯达表示赞同,随后就找到田家英,对他说:

“家英,你把那天主席的讲话记要整理一下,回来向中央汇报。”

田家英事先并没有想到要把毛泽东的谈话整理成为“纪要”,那天只记了些要点,整理纪要就不全了。于是,他赶紧求助于艾思奇和

关锋：

“老艾，老关，请你们两位辛苦一下，帮我整理一下主席的谈话纪要。”

艾思奇、关锋都是快笔头，第二天上午，就把整理出来的谈话纪要交给胡绳、田家英看。后来田家英说，关于彭德怀这一段和主题无关，不要吧，就勾掉了。艾思奇认为这是重大原则问题，提醒田家英说：“主席的谈话，恐怕不便于删吧。”

田家英回答说：“那几句话是谈文艺问题的，与整个谈话关系不大。”

他最终还是删去了毛泽东评价戚本禹、姚文元文章的那段话。

其实，田家英在1959年在庐山上就对彭德怀深抱同情，不是毛泽东保他，恐怕也和周小舟等人一样，被打倒了。他对姚文元、戚本禹的文章很有看法，毛泽东曾要田家英看吴晗的《海瑞罢官》剧本，田家英看后对毛泽东说：“看不出《海瑞罢官》有什么问题”！

# 第21回：变策略，吴晗作自我批评 赶紧跟，中宣部哪敢稍停

第二天，12月22日，毛泽东又在同一房间里同彭真、康生、杨成武等人谈到《海瑞罢官》的问题。他说："我又看了吴晗的若干材料，《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嘛。"

彭真马上插话说："主席，我们认真地进行了调查，吴晗与彭德怀没有任何组织联系和直接联系。"

"噢，康老，你说呢？"毛泽东征求康生的意见。

康生扶扶眼镜，想了一下说："组织上没有联系不见得思想上没有共鸣，起码是政治问题……"

彭真激动地打断康生的话说："怎么会是政治问题？充其量不过是学术问题和理论问题嘛。"

"理论问题和政治问题就没有联系吗？搞阴谋还要订个君子协定吗？"康生问。

毛泽东深深的地吸了一口烟。

彭真还要争辩，康生提醒他说："彭真同志，你是在主席面前，态度还是谦虚一点！"

彭真不说话了，他可能也意识到了，简单的死保吴晗是不行了，弄不好，自己也要搭进去。从毛泽东那里一回来，他就给北京的邓拓打电话：

"邓拓吗？我是彭真。你跟吴晗谈一下，让他写一篇自我批评的文章，争取主动吧。"

然后，又给毛泽东的秘书徐业夫打电话，要求和毛泽东单独面谈。徐业夫很快给彭真回了电话，毛泽东同意彭真第二天去他那里。

12月23日，彭真如约来到毛泽东的住处。

"主席，我还想谈谈吴晗的问题。"彭真说。

"好啊，说说看吧。"毛泽东没有反对。

“吴晗同志,您和总理都是了解的,解放前就一直坚定的站在我们一边,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蒋介石的斗争都很坚决。解放后很快就入了党,历次政治运动都表现很好,反右时是坚定的左派……”

在向毛泽东详细介绍了吴晗解放前后的表现以后,彭真说:“如果抓住吴晗的几句错话,就肯定他反党反社会主义,那么戚本禹、关锋、姚文元都有问题。他们写的一些杂文,上了纲都可以定反党。”

此时的彭真已经开始收集这些人的材料。

毛泽东认真听彭真的谈话。他深思一阵说:“看来,有些问题是不能马上做个结论的。吴晗的问题,最快也得两个月后才能作政治结论。我回到北京,再找少奇、恩来、小平他们议一议。”

毛泽东提到调查罗瑞卿问题,要彭真回北京后找公安部和中央军委的人谈,注意“地下活动”,并说:在党内军内永远不准搞地下活动。

从毛泽东那里出来后,彭真逢人就讲:“主席说了,吴晗的政治结论两个月以后再讲,现在还是学术批判。”“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要分开。”

12 月 25 日,《人民日报》发表亦鸣文章:“《评新编历史剧 < 海瑞罢官 >》读后”,文章指出:“姚文元同志说,吴晗同志的《海瑞罢官》是‘一株毒草,影响很大,流毒很广’。这个结论下得未免轻率。

海瑞,不管他的主观动机如何,他一生所作所为的客观效果是冲淡了当时的阶级矛盾。”

同日,《人民日报》还发表杨金龙的文章:《对农民形象的歪曲》,支持姚文元的文章。

12 月 26 日,彭真跟毛泽东一起来到上海。当上海市委向彭真汇报工作,谈到批判《海瑞罢官》的情况时,彭真当面批评张春桥说:“你们发表姚文元的文章也不打招呼? 党性到哪里去了?”

张春桥随即答道:“姚文元的文章是根据 9 月中央工作会议时毛主席指示发表的。”

彭真接着说:“对姚文元的文章也要一分为二。毛主席说了,对《海瑞罢官》的讨论目前还是要坚持‘放’的方针,吴晗问题要作为学术问题讨论。政治问题两个月以后再谈。”

然后又批评上海市委说:“《文汇报》刊登首都各报的编者按语,偏

偏把《北京日报》放在最后,为什么?”接着,问张春桥:“你们下一步有什么打算?”

张春桥拿出一份讨论《海瑞罢官》的计划。这个计划是在北京转载姚文元文章后,张春桥召集朱永嘉等人在他的办公室一起讨论和制订的,基本是按照彭真“学术讨论”的思路安排的。彭真看了很高兴,称赞了张春桥:“这个计划不错,你们就按这个计划安排吧。等这件事情搞完了,我请张春桥到北京吃烤鸭!”事后,张春桥曾对朱永嘉他们说,他将上海组织讨论的计划和报纸上的按语都给彭真看了,彭真看了很满意。

为了能将对《海瑞罢官》的讨论开展起来,张春桥是很下了一番功夫的。11 月 29 日,上海《文汇报》第二版以《读者来信要求讨论〈海瑞罢官〉问题》为通栏标题开始刊登讨论文章。《文汇报》为此刊发的编者按语是张春桥亲自写的,说要“开展百家争鸣,通过辩论,把《海瑞罢官》这出戏和它提出的一系列原则问题弄清楚”。这篇编者按连续登载了 6 天,这种做法是很罕见的。那天《文汇报》发表的有复旦大学历史系、华东师大历史系、上海戏剧学院戏文系和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的来信,主要介绍了各自单位对姚文元文章的各种反应,有赞成的,也有反对的。这几篇文章都是上海市委写作班历史组事先组织好的,待北京要转载姚文元的文章时才刊登出来。接着几天《文汇报》刊登的主要是不赞同或不完全赞同姚文元观点的文章,以期引起争辩,将对《海瑞罢官》的讨论开展起来。12 月 6 日《文汇报》又在第一版将各地报纸转载姚文元文章的时间排列出来,并转载了《解放军报》、《北京日报》、《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的编者按,以这种方式将对待姚文元文章的不同态度显示出来。12 月 7 日起,《文汇报》开始陆续刊登吴晗《海瑞罢官》的剧本和赞扬这出戏的文章,作为反面教材。为此,张春桥又专门写了编者按。

12 月 26 日是毛泽东 72 岁生日。这天晚上,毛泽东请彭真、陈丕显,张春桥等人和他一起吃饭。吃饭时,他特意把张春桥拉过来坐在自己的身边,说:

“让我们这位红秀才坐在我旁边。他是我们的理论家,批判《海瑞罢官》就是他和姚文元研究、组织的,我很赞赏他的文章风格。”

张春桥不失时机地说:“可是,姚文元同志的文章发表后,北京好长时间没有转载。”

彭真解释说:“北京未转载,是想看看动态。再说,对姚文元也要一分为二,他的文章也不是没有错误嘛。”

张春桥说:“《人民日报》那篇以向阳生名义发表的文章也有问题……”

彭真马上接过来说:“那是我让他们写的!主席说了要放,我们就要放他一阵子,政治问题以后再说也不迟嘛。我可以保证刘仁、邓拓是左派!”

12月27日,《北京日报》在彭真的多次催促下发表了吴晗两万多字的《关于〈海瑞罢官〉的自我批评》。吴晗在自我批评中说:

“我忘记了阶级斗争”、“用的是形式主义的方法,片面地、绝对地、主观地来描述海瑞和农民群众,这是思想问题,也是阶级立场问题,错误是严重的”,“效果是十分恶劣的”。对彭德怀的问题,他没有提及。

12月29日,《人民日报》发表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周扬主持写作、署名方求的文章《〈海瑞罢官〉代表一种什么思潮》。这篇文章的后边加了《后记》:

“在本文发表时,才看到吴晗同志的文章,文中的问题,我们尚未研究,留待以后讨论。”

就在方求的文章快要定稿时,周扬隐约的听到了毛泽东关于《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的讲话,他赶紧给龚育之打电话:

“小龚吗?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准备的怎么样啦?”

“基本写完了。”

“那好,你们辛苦了。罢官问题写了吗?”周扬问。

“不是说不写吗?姚文元的文章中没有提,我们也不提。”龚育之赶紧回答。

“我想,还是要写上,政治影射最大的问题是罢官,你们一定要加上,要抓紧。”周扬嘱咐说。

“行。”

方求文章送去发表的时候,听说了《北京日报》要发表吴晗的自我批评。中宣部赶紧请示周扬,方求的文章《〈海瑞罢官〉代表一种什么

思潮》是否按原计划发表？还是看看吴晗的自我批评后再作修改？周扬和中宣部的人事先都没有看到吴晗的这篇自我批评，但是，周扬认为，中宣部的文章不能再等了，毛泽东这几年本来就对中宣部的工作不满意，已经不止一次的点中宣部的名了，再拖下去中宣部就更被动了。于是，他说："你们的文章照发吧，来不及研究他这篇自我批评后再作修改了。如果有必要，就再写一篇吧。"这就有了方求文后的《后记》。

文章中，将吴晗的问题上纲为"反马克思主义"、"反社会主义"。其中将《论海瑞》、《海瑞罢官》称为"是假冒海瑞而被罢了官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精神面貌的写照和颂歌"。

由于文章中也捎带批评了田汉和孟超，周扬在与龚育之、林甘泉、邢贲思、戴逸等执笔者谈话时说："在我少年的时候，田汉在我心目中还是崇拜的偶像，孟超也是上海左联时代的人物，社会主义革命转变多么深刻，这些同志跟不上啊。"

不久，中宣部传达了毛泽东12月21日在杭州讲《海瑞罢官》的要害问题是"罢官"的谈话内容。为了紧跟毛泽东的指示，周扬指示中宣部又赶写了一篇评吴晗自我批评的文章，题目就叫《不能回避要害问题》，仍然署名方求。

12月30日，《人民日报》按照彭真的要求转载吴晗《关于〈海瑞罢官〉的自我批评》。

中国大陆就在这样一片扑朔迷离的政治风云中迎来了1966年。但是，老百姓对上层的这些角逐并不知晓，他们依然意气风发的"走在社会主义大路上"，积极响应共产党的号召，批判资产阶级，参加当时对海瑞的批判。此时，一部歌颂共产主义战士欧阳海的小说——《欧阳海之歌》风靡内地，大喇叭下，常常可以看见聚集的人群如痴如醉的收听播音员关山正在播讲的《欧阳海之歌》。舍身救人的解放军战士王杰的事迹早已家喻户晓，大公无私、助人为乐的共产主义之风仍然在神州大陆上劲吹。人们相信，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一个理想的社会一定会到来。

政治斗争依然按照自己固有的轨道前行。1966年元旦后的第二天，彭真在人民大会堂召集了文教、报刊、北京市和部队30多人参加

的关于学术批判工作的会议,彭真特别点名要《红旗》杂志社的关锋、戚本禹参加。

会上由胡绳传达毛泽东12月21日同陈伯达等人的谈话精神,主题是提倡读马、恩、列著作,着重谈了哲学问题,也谈到了对《海瑞罢官》和翦伯赞史学观点的批判问题,他特别解释说:“毛主席说的没点名,是说戚本禹写的文章《为革命而研究历史》批评的是翦伯赞,但没点翦伯赞的名。”

胡绳传达后,彭真说:“毛主席的这些话,是关于意识形态斗争的最新指示,大家要好好学习讨论。”“现在的问题是要展开,把各种不同的观点‘放’出来。像什么历史观、道德观、清官问题等等,都要讨论,扯得越宽越好,要扯多宽就扯多宽,要扯多久就扯多久。

“过去五人小组曾经规定:学术批判不要戴政治帽子,点名要经过中宣部同意,批判的调子要以中央报刊为准。还规定过对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吴晗、茅盾几个人不点名。对郭老不点名、范老不点名,有的就保护不了了。吴晗已经被点名,看来翦伯赞不能不点了。但是,还是要有党性原则,点名一定要按规定请示报告。”

他又说:“戚本禹的文章写得好,缺点是没有点名,郭沫若可以不点名,范文澜要保护,其他人就保护不了了。吴晗、翦伯赞要点名,吴晗要批判,两个月后再作政治结论。毛主席说,这一次同资产阶级思想、封建思想,要好好作一场斗争”

彭真特别指出:“任何人的文章都可以一分为二。我在上海讲,你《解放日报》、《文汇报》自己也发表了不少错误文章,也应该清理清理。”

这时周扬插话:“《解放日报》推荐《海瑞上疏》是加了按语的。”

彭真接住话头说:“上海只批评《海瑞罢官》,对《海瑞上疏》不作检讨,这也不对,有错误都要批评吗,首先要做自我批评。对于他们的错误,中央报纸也可以批评。”

“《北京日报》转载姚文元的文章,按语写得不那么凶,而《解放军报》的编者按直接点出《海瑞罢官》是大毒草,是对的。但是这样一来,就使得人们不敢说话了。这样就不好,你都下结论了,还怎么‘放’呀?。

“关于政治问题,主席说了,两个月以后再说,先搞学术。”

陆定一接着说:“是呀,上海发表姚文元的文章我也不知道,这样不好。应该先同中宣部打个招呼嘛。”

“……当前的讨论实际上是一场大争论,主要是思想范围内的争论,是学术性的。可以列出一大堆问题,如道德继承、形象思维等等,其中包括历史、哲学、教育学、美学在内。社会科学、文学方面的题目多得很。对古人的评价、历史主义、现实主义、形象思维、美学,一个题目、一个题目地来,解决这些问题,要一、二百年。”

陆定一明确提出:“就这次的讨论方法上来说,学术批判要先搞学术问题,政治问题以后再搞。一扯到政治问题,讨论就展不开。

“姚文元的文章,要是没有最后一部分(指揭露《海瑞罢官》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问题)就更好了。”

随后,康生讲话,他说:“批判吴晗要同庐山会议结合起来。庐山会议前,吴晗写了《海瑞骂皇帝》,9 月间写了《论海瑞》,以后又写了《海瑞罢官》,年底,也就是彭德怀罢官以后,开始着手写《海瑞罢官》。毛主席指出,《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1959 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就是海瑞。因此,罢官问题是我们批判的重点。学术界有资本主义思想、封建思想的人很多,没有清算过,也不是一次清洗得完的,要清算多久,至少一百年。”

他又说:“日前吴晗在《北京日报》上发表的自我批评实际上是自我批准、自我开脱,他的要害是‘罢官’。”

会议结束后,彭真将戚本禹和关锋留下来。一年前,彭真曾将关锋和戚本禹请到家里吃饭,这时,他像老朋友似的对他们说:“我们又见面了。”

戚本禹开玩笑说:“你又要请我们吃刀削面了?”

彭真说:“不,今天太晚了,不打扰你们了,咱们不吃饭。咱们就说一件事。这次,我在上海见到江青同志了,江青同志叫我来看看你们。江青同志特别嘱咐,要你们两位积极参加这场学术争论。”

彭真接着说:“吴晗一直是我们的团结对象,我们跟他关系很好,有些问题我也是经常批评他的。他这次又受了批评,态度尚好。姚文元同志那篇文章,提了很多问题,也引起我很多思考。对主席讲的吴

晗文章和彭德怀罢官的指示,我的理解还不深透。猛一下听了主席讲话,很吃惊,我以前没那样想过。你们好好研究研究,把它写清楚。”

对彭真的这一席话,戚本禹以为是他谦虚,可关锋却不这样认同。从彭真那里出来后,他对戚本禹说:“不对,他是不同意主席的意见。他其实是在暗示我们,让我们在写文章的时候要有分寸。”

关锋是《红旗》杂志社编委,戚本禹一直都很尊重他的意见,但此时觉得他的这个看法可能有点过分了。

1 月 9 日,彭真批发《毛主席 1965 年 12 月 21 日同陈伯达等同志的谈话纪要》。

陈伯达、江青看到纪要,发现里面没有“要害”问题的内容,非常吃惊,继而震怒。

江青打电话问身在杭州的毛泽东:“那一段话,是你删的,还是田家英删的?”

毛泽东不解地问:“哪段话?”

“就是关于《海瑞罢官》要害问题的话。”

“我没有删。”毛泽东在电话里对江青说:“谮言如水,渐以成之”。

谮言,诬陷、中伤的言语;谗言。“谮言如水,渐以成之”的原句为“谮人之言,如水之浸润,渐以成之。”这是东汉末年经学大师郑玄在批注《论语》“子张问明”时,解释“浸润之谮,肤受之愬”这句话时说的,意思就是谮言如水,渐渐滋润,令人接受而不自知。

陈伯达也去问关锋:“主席关于《海瑞罢官》要害问题的那一段话,怎么删掉了? 是谁删的?”

关峰回答说:“是田家英删的,他说是谈文艺问题的,和整个谈话关系不大。”

“主席的讲话怎么能随便删掉呢?”陈伯达埋怨说。

“是啊,我和艾思奇也是这样想,艾思奇当时还提醒过他呢。”关锋很有同感。

在陈伯达和江青的坚持下,“要害”问题的一段话后来又加进了《毛主席 1965 年 12 月 21 日同陈伯达等同志的谈话纪要》,但是,田家英删改毛泽东的讲话,追究起来可不是一般的问题……

# 第22回：广播局，周恩来部队调人没商量，关锋说“一字不改”

罗瑞卿和郝治平从上海回到北京后，因为家里正在修房子而暂时住在钓鱼台，孩子们都在学校寄宿。

他们在钓鱼台住了几天，罗瑞卿觉得自己目前的身份，住在那里很不方便，便向中央办公厅提出搬出钓鱼台，于12月28日搬到了新六所二号楼。

位于北京西郊翠微路附近的新六所是20世纪50年代为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五位书记盖修的五栋小楼；加上工作人员一栋，共六栋，因此称作新六所。

罗瑞卿携家人住进新六所后，就闭门不出，也没有人登门拜访。以前家中高朋满座，门前车水马龙的情景已然没有。与外界的电话联系几乎中断，只有和周恩来、邓小平、彭真的电话还能够接通。

罗瑞卿偶尔在孩子的陪伴下，到院子里散散步，听孩子讲讲学校里的事情。有时候，他也漫不经心的讲一些自己的身世和经历，但言语间不像在讲给孩子听，倒像在细细地过滤往事，检点自己的行迹，整理自己的思想脉络……他觉得他能够说清楚自己的是非对错。于是，提笔给周恩来、邓小平并转报毛泽东和中央常委写了一封申述信。他在申诉信中写到：

“你们第一次向我宣布的主席、中央对我的看法的第一个五条以及你们第二次归纳群众意见对我批评的第二个五条（关系、作风、工作、政治、组织），我完全拥护并深为感动。

我的错误，责任完全由我担负，主席、常委、中央没有任何责任。我一定忠诚老实地对我的错误事实、性质、根源向党作彻底地、毫无保留地交代。一个人如果还要革命，还要跟党、跟毛主席革命到底，犯了错误，除了认识、检讨和坚决改正而外，还有什么别的办法？

还有另外三条（伸手、反对突出政治、封锁反对林副主席）或者四

条(加挑拨)我确实没有。我有错误不承认、是没有党性,我没有的错误乱承认,也是没有党性。我不能反对有同志对我怀疑甚至很多同志怀疑,但是没有的事我不能承认,请求中央严格审查。如果证明确有其事,那算我对党隐瞒,应该算是错上加错,或者罪上加罪。

关于伸手。就我所知道的,这次揭发的是两件材料。一件是我向林副主席说老病的要让贤。我说过没有?如说过,是在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指什么说的,我完全记不得了。

不过,可以保证,我决没有暗示,要林副主席让贤之意。我没有这样坏、这样狂妄、这样愚蠢呀!一件是说刘亚楼说了四条,这个我完全不知道,是这次事情后才听说。"

1 月 5 日,毛泽东从杭州来到了南昌。他同江西省委书记杨尚奎、省长方志纯等人谈到了罗瑞卿的问题时说:

"这个人就是盛气凌人,锋芒毕露。""我也同罗瑞卿说过,要他到哪个省去搞个省长,他不干。军队工作是不能做了。要调动一下,可以到地方上去做些工作,也不一定调到江西来。"

"政治和经济的关系,矛盾的主要方面,政治统率经济。"

1965 年 12 月 28 日至 1966 年 1 月 18 日,总政治部召开了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出席会议的有陆海空军、公安部队、高等院校、科研机关等军以上单位的政治委员或政治部主任,以及部分师政治委员。会议中心议题,是研究如何贯彻执行林彪在 1965 年 11 月 18 日提出的《1966 年全军工作的五项原则》。

林彪在《1966 年全军工作的五项原则》中指出:

"毛主席的建军思想,从来都是把政治摆在第一位,政治领导军事,统帅军事,军事只是政治的一个组成部分,政治包括更多更多的东西,有更大的范围。"

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了出席会议的人员。各报纸发表解放军举行全军政治工作会议消息,提出"把毛主席的指示,当成各项工作的最高指示"。林彪题写的雷锋日记:"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传遍全国,家喻户晓。

上海会议结束后,贺龙不再主持军委日常工作,他和董必武等人一起到广州休息。随后,毛泽东交给他一个任务,让贺龙到四川西部

“三线”的攀枝花钢铁厂和正在施工的铁路隧道等地视察，直到1966年4月9日才回到北京。

1月8日，中共中央决定增补陈毅、刘伯承、徐向前、叶剑英为军委副主席，叶剑英以军委秘书长职务负责处理军委日常工作。

1月14日，周恩来约广播事业局局长、党组书记丁莱夫，代总参谋长杨成武，公安部副部长徐子荣谈广播电台的安全保卫问题。周恩来说：“广播事业局要成立电台安全保卫小组，要从部队调一个现职参谋长专管电台的安全保卫工作。”

1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王若水用“思彤”为笔名的文章《接受吴晗同志的挑战》，第一次在报纸上公开提到《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提到庐山会议。

1月13日至17日，经周扬确定，约请关锋、戚本禹写的文章，陆续交到了中宣部。本来，中宣部约他们写的是批判吴晗道德观和历史观的文章，是想把批判约束在学术批判的范畴里。但是，戚本禹送来的文章，标题就是《〈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的反动本质》。文章一针见血的指出，吴晗《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的“要害问题是罢官”。关锋则送来两篇文章，一篇是批道德继承论的，一篇是与林杰和写的，标题是《〈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两株大毒草》，也是专讲要害问题的，都上到很高的政治问题的高度。

三篇讲要害问题的文章，政治上都有很重的分量，能不能发，发不发这么多，中宣部没有把握。周扬这时被诊断为肺癌，住院准备作手术，全国学术批判工作由中宣部副部长许立群接手负责。龚育之和林涧青去向许立群汇报：

“关锋和威本禹的文章，讲要害问题讲得很明显，明显到在讲吴晗用‘兵部尚书’的历史人物搞影射时，特地注明‘兵部尚书’即‘国防部长’，彭德怀的名字呼之欲出了。你看怎么办？能不能发表？”

是啊，姚文元的文章还没有点彭德怀的名字，许立群为难的说：“这样大的政治问题我作不了主，彭德怀现在还是西南三线的副总指挥哩，三届人大会议时，军委的同志讲彭德怀的问题，只给人大代表听，列席的政协委员都不让听。能不能这样明显地在报纸上公开批评？我要向上面请示。你们把关峰和戚本禹讲要害问题的文章，还有

你们自己写的那篇《不能回避要害问题》的文章中,有关要害问题的提法做出摘要,送文化革命五人小组请示。”

龚育之接着说:“还有,关锋批道德观的文章,把吴晗讲道德继承,比之于蒋介石的新生活运动。吴晗不管怎么说,是反蒋的呀,怎么能把他同蒋介石等量齐观呢?”

“我看,把这段文字删了吧。”林涧青建议说。

“行吧,你去征求一下关锋的意见。”许立群表示同意。

过了一会,与关锋通完电话的林涧青黑着脸走了过来说:“关锋说了,一个字也不能改。”

“怎么这么霸道,还一个字也不能改。”龚育之和许立群听了,都十分生气。

“既然一个字不改,那么,这篇文章从政治上考虑能不能发表,我们没有把握,无权决定,要请示。你们也作一个摘要,向五人小组报告吧。”许立群说道。

这时,龚育之好像想起什么事,突然说道:“对了,我曾经读到过关锋用笔名‘何明’在《光明日报》上发表的杂文,题目好像是《人之有技,若己有之》,是讲道德继承的。他关锋也讲过道德继承嘛,为什么你讲就没有问题,吴晗讲就是蒋介石的新生活运动!我们是不是把这篇文章也摘录上,作为上述请示的附件。”

“你怎么断定何明就是关锋?”许立群问。

“北京学术圈子里都知道是关锋,一查就查出来了。”龚育之和林涧青回答说。

“向中央反映情况,事实得查准确。”许立群说。

“我们让图书馆找一本关锋的杂文集,看看里面是否有这篇文章。”林涧青建议。

“对。”龚育之表示赞同。

一会儿,图书馆就送来了一本关锋用真名出版的杂文集《边鼓集》,里面果然有几篇关锋在报纸上发表时,署名‘何明’的文章。

“那好吧,把这篇文章也作为附件送上去。”许立群表示同意。

接着,他又说:“还有,咱们部里向中央反映情况的内部刊物《宣教动态》,曾经摘录过关锋用庆云的笔名写的文章《从陈贾说起》和邓拓

(马南邨)的《伟大的空话》,认为它们都有影射现实的含意。你们再印一下,连同上面的材料一起上送。”

“听说《宣教动态》反映以后,关锋在《红旗》杂志作过自我批评,如果这样,那还上送吗?”龚育之问道。

“问问胡绳就知道了,他是《红旗》副主编。”许立群说。

龚育之给胡绳打电话:“是胡绳同志吗?我是中宣部小龚,向你了解一个情况,《宣教动态》登了关锋同志的一篇文章,《从陈贾说起》。听说关锋为此在《红旗》杂志社作了自我批评,有这事吗?”

“没有,关锋对此事很有意见,认为《宣教动态》的记录歪曲了他的原意。”胡绳在电话里回答。

许立群一听,就说:“那好,这次全部照送,一字不漏!”

许立群接手全国学术批判工作后,从上到下明显有两种声音:在上面,一边是毛泽东、康生的声音:《海瑞罢官》是政治问题!一边是彭真、陆定一的意见,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要分开,不要把吴晗的问题和彭德怀联系在一起。

在下面,一边是来自基层和左派年青理论家的呼声,急切地希望将对《海瑞罢官》的批判与政治问题联系在一起,以改变学术界由学术权威一统天下的局面;一边是那些学术界泰斗战战兢兢的辩白:我们有错误可以检讨,但决没有政治问题,我们不反共产党,不反社会主义。因为他们知道,如果是学术问题,那还可以讨论;如果是政治问题,那就和右派一样,在这个社会中决无立足之地了。即使共产党不说打到你,老百姓的唾沫星子也会淹死你。

许立群倾向于彭真的意见,他不想看到这些学术权威一下子全被打倒。但是,来自基层和左派的呼声那么强烈,他只好在1月17日召集《人民日报》王辑、《北京日报》范瑾、《光明日报》穆欣、《红旗》杂志杜敬、《前线》杂志(北京市委的理论刊物)李筠、《新建设》杂志(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所属的综合性学术刊物)的吉伟青6个报刊负责人开了一个座谈会,希望将最近学术批判过程中遇到的问题汇总一下上报彭真,请求指示。

许立群的意见仍然是:“学术批判目前还是要坚持‘放’,看看大家有什么意见?先不要集中搞《海瑞罢官》问题,要同时讨论历史人物评

价,历史剧,道德继承等问题,让各种思想都反映出来,有领导地造成‘一场混战’”。

会后,许立群将林涧青和龚育之留下,对他们说:“你们二位辛苦一下,把咱们这次讨论提出的问题整理一份简报。今晚就整理出来。”

林涧青说:“这好办,就按你最后讲的整理出来就行了。”

于是,他们将在学术批判中遇到的问题归纳、总结为四个方面:

一是关于“放”和击中“要害”的问题,在落实执行毛泽东提出的《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时如何掌握?在发表揭露吴晗政治性错误的文章时,应该把握到什么程度?文章发多少?怎么发?什么时候发?

二是关于讨论步骤和战线扩大问题。《人民日报》原来计划,《海瑞罢官》问题、历史人物评价问题、历史剧问题、道德问题,逐个问题讨论,这样安排是否合适?《光明日报》和《新建设》反映,《海瑞罢官》问题已经联系到让步政策;对吴晗历史观的批判必然牵涉到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宁可,《新建设》已经收到批判宁可的文章;对吴晗道德观的批判,已经联系到著名哲学家冯友兰和朱光潜。《光明日报》还收到文章,批评《十五贯》中对况钟的美化。这些问题是一个一个讨论,还是现在同时进行?

《工人日报》、《中国青年报》、《体育报》都向中宣部请示,他们是否应该参与《海瑞罢官》的讨论?怎样参与讨论?

三是面向群众的问题。《北京日报》反映,许多工人和干部说,文章太长,太深,没法看,文科师生现在已经下乡或正在讨论下乡,看的人也少。《人民日报》反映许多干部只看文章题目。

四是关于发表文章的数量与质量问题。

许立群将这四个问题综合成一份简报,上报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题目是:《北京六个报纸、杂志编辑部负责同志座谈关於〈海瑞罢官〉讨论的情况和问题》。

春节后,许立群亲自给张春桥打电话,通报了北京六个报纸、杂志编辑部负责人座谈会的情况。

张春桥在电话中对许立群讲:“是啊,现在有些人竭力想把郭沫若、范文澜拉出来;还有人想批评戚本禹。”

“批评戚本禹什么问题?”许立群问。

“因为戚本禹在吴晗主编的《中国历史小丛书》中也有一篇文章。”

“哪篇文章?”许立群又问。

“《孙承宗》,是明末的一个兵部尚书,相当于现在的国防部长。”

“哦。”

“另外,许多人对方求《〈海瑞罢官〉代表一种什么思潮》和向阳生的文章有不同意见。”张春桥接着说。

“是吗。”许立群未置可否。

随后,他找来龚育之,对他说:“你去找一下吴晗主编的《中国历史小丛书》,看看里边是不是有一篇戚本禹写的《孙承宗》的文章,看看有什么问题。”

龚育之很快找到了这本书,看了后,觉得没有发现有什么问题,就将书交给了许立群。

# 第23回：苏州行，江青春节请尊“神”“耳朵聋”，郭沫若恳请辞职

1月21日，是1966年的春节。但是，在北京和上海两地的中共中央上层人物却没有一点过年的意思。北京的彭真、许立群在忙着安排引导对《海瑞罢官》的批判；上海的江青也在春节过后，驱车前往苏州，拜访正在那里养病的林彪。当然，她不是去给林彪拜年的，而是遵从毛泽东的旨意前去请“神”的。

当江青来到苏州林彪的住处，早已恭候在门外的叶群立即迎了上去：

“哎呀，江青同志，大年初一您还过来，真是太感谢您了。”叶群边说边将江青迎入院内。

“我是受主席委托，过来看看林总。”江青继续着战争年代对林彪的称谓。

“太感谢主席了。主席身体很好吧？”叶群问。

“好……”说着，他们走进了林彪的会客室。已经在里边等候的林彪看见江青进来，站了起来，和江青握了下手，说：“欢迎你……”

“林总，身体好吗？我在上海，你怎么不来看我？”江青边握手边问。

林彪犹豫了片刻，回答说：“我身体不好，正在养病。”

江青向林彪提出想在上海召开一次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林彪表示支持，他对叶群说：“你给肖华打个电话，让他安排一下，一切按照江青同志的意见去做。”

“行，我马上布置下去。”叶群说。

江青临走时，林彪对她说：“有什么事情你直接找刘志坚联系。”

其实，两个月前，1965年11月，罗瑞卿在上海时，江青就和向他透露了在部队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的想法，并邀请罗瑞卿参加。罗瑞卿出事了，江青按照毛泽东的意见，直接来找林彪。

第二天,2 月 1 日,北京东城区拐棒胡同内一座四合院,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第一副主任刘志坚的住宅内响起了电话铃声,秘书告诉刘志坚:

“是苏州‘林办’的电话。”

刘志坚赶紧接过了电话:“喂,我是刘志坚……”

电话里面传来叶群的声音:“是刘志坚吗? 江青同志要找几个部队搞文艺工作的、管文艺工作的同志谈谈部队文艺工作问题。可能要研究三大战役的创作,你们准备一下。参加的人不要太多,只要四、五个人,去几个什么人,你同肖华商量,把名单报林办,最好肖华去。”

“好,我马上落实。”

叶群接着说:“101 有几句话要转达给江青,你记一下,

接着,她一字一句地念了林彪的话,然后问:“都记下来了吗?”

“都记下了。”刘志坚答道。

“你念一遍,咱们再对一下。”叶群说。

“好……”刘志坚逐字逐句与叶群作了核对。

“都对。101 特别交待,你到上海后,首先要当面把林彪的话转达给江青。清楚吗?”叶群再一次叮嘱刘志坚。

“知道了。”刘志坚答应说。

放下“林办”电话,刘志坚立即向肖华作了汇报。肖华说:

“我事情多,身体又不好,文艺方面的情况又了解不多,你是主管宣传文化的,了解情况,还是你去吧!”

“派谁去呢?”刘志坚和肖华商量开会的人选。

“文化部的谢镗忠、陈亚丁,两个正副部长,还有宣传部长李曼村,再加上你,正好四个人。”肖华说。

“行。再派两个工作人员吧,《星火燎原》编辑部的编辑黎明,正好熟悉三大战役的情况。还有秘书刘景涛,可以作一些文字工作。”刘志坚建议道。

“我看可以。回来开党委会再通过一下再往上报。”肖华表示同意。

肖华和刘志坚初步商定了人员名单,经总政党委讨论同意,确定了下来,报给了叶群,叶群又报给了江青,江青同意这几个人去参加

座谈。

没过几天,刘志坚就接到江青秘书的电话,通知他们2月2日到上海开会。刘志坚立即向肖华作了汇报,并安排了会前准备工作。

临行前,肖华又特意对赴沪的六名人员“约法三章”:

“你们这次去上海,还要特别注意三点:第一,部队文艺工作的方向是对头的;第二,只带耳朵——听,少发表意见;第三,对江青要尊重,不要和她争,对她的话要多听少说,有什么意见带回来汇报、讨论。对地方文艺工作情况,不要随便表态。清楚吗?”

肖华又再三嘱咐:“江青同志是个病人,她对部队文艺工作有什么批评,你们不要当面辩解……”

此时,全军政治工作会议正在召开。会上印发了揭发罗瑞卿问题的1964年12月《关于当前部队工作指示》的“三稿对照”和罗瑞卿的“三次讲话摘要”,即罗瑞卿于1965年1月9日上午在军委办会议第八次扩大会议上的讲话、1965年1月23日在全军学习军师机关革命化经验大会上的总结讲话和1965年4月3日在42军团以上干部集训队的讲话。

与此同时,揭发罗瑞卿的材料越来越多,内容集中为两点:

一是说罗瑞卿反对突出政治;

二是说罗瑞卿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其证据有三条:

1. 反对林彪指出的“毛泽东思想是当代最高最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顶峰”的提法。

2. 在为林彪准备七千人大会讲稿时,反对说毛泽东思想中有毛主席个人的天才因素。

3. 提倡学习三十本书就是为了反对和冲击对毛主席著作的学习。

会上,要求继续批判罗瑞卿的呼声甚高。

1月24日,回到北京的林彪在会上作了报告,他说:

“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是最高最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主席的书,是我们全军各项工作的最高指示,毛主席的话,水平最高,威信最高,威力最大,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对我军来说,最好的武器不是飞机,不是大炮,不是坦克,不是原子弹,最好的武器是毛泽东思想。”

“突出政治不是一项任意的政策,不是可以这样做,也可以那样做。这是根据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规律和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所提出的根本措施。不突出政治,就是违反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规律。”

林彪报告的第二天,1 月 25 日,全国各报刊登了林彪了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报告《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决执行突出政治的五项原则》。

1 月 26 日许立群给彭真写了一封信,汇报了大年初二他同张春桥通电话的内容。并把戚本禹在《中国历史小丛书》中的那本书,随函送了一册给彭真。

1 月 18 日至 27 日,由于一直未见批要害的文章发表,戚本禹接连给许立群打电话,问批判吴晗政治要害问题的文章为什么还不发表?

许立群答复说:“攻要害的文章不止你一篇,别人还有,现在都不能发表。”

关锋、戚本禹认为是中宣部许立群扣发了他们的稿件,于是,越过许立群,又把他们攻要害的文章直接送给彭真审查,彭真叫他的秘书打电话说:“彭真同志工作很忙,最近要下乡,没有时间看文章。”

1 月 28 日,许立群又给彭真、陆定一、康生、吴冷西送上一份材料,《汇报关锋等同志四篇稿件政治性的提法》。其中方求一篇,关锋、林杰一篇,戚本禹一篇是讲“要害”问题的,另外关锋送中宣部林涧青的一篇是讲道德论的。许立群认为,方求的文章,比较妥当,问题不大;关锋和戚本禹的,联系庐山会议很明显,问题比较多,发表出去担心影响大,需要请示。许立群特别将文章中的一些段落摘录持下来,请他们审阅,对政治性的提法,在分寸上应当如何掌握为好?这些文章何时发表为宜?请他们指示。

恰在此时,许立群收到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的一封辞职信,请求辞去中国科学院院长及其他一切职务。

郭沫若早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中国著名的考古学家、诗人、文学家、戏剧学家、五四运动的先锋,现任中国科学院院长、哲学社会科学部主任、历史研究所所长、科技大学校长等等,在中国乃至世界都很有影响。涉及历史领域的学术批判,不可能不涉及他。统战部的《零讯》

和《光明日报情况简编》,刊登了一些人主张批判郭沫若写的《武则天》、《蔡文姬》的文章。这两个内部材料,郭沫若都可以看到。而且,他还在海南岛祭拜过海瑞的墓,写过两首关于海瑞的诗。春节前哲学社会科学部负责人向他汇报工作时,曾说过历史学方面的学术批判,还要扩大发展下去。春节的科学院团拜和政协常委团拜,郭沫若就不愿意坐到台上了。春节后,他向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张劲夫递交了一封辞职信,信中说:"……自己耳聋,近来视力也很衰退,对于科学院的工作一直没有尽职。怀惭抱愧,每每坐立不安。因此,早就有意辞去有关科学院的一切职务,包括院长、哲学社会科学部主任、历史研究所所长、科技大学校长等等,务请加以考虑,并转呈领导上批准。"郭沫若的辞职信经中宣部科学处处长于光远转交到许立群手里。许立群不敢怠慢,立即上报了彭真。

1 月 31 日,张劲夫根据中央的指示,以征求郭沫若对科学院工作意见的名义,登门探视。郭沫若表示,自己的辞职和中科院的工作无关,只是从最近批判《海瑞罢官》运动开始以后,两相对照,感到自身问题很多,继续担任这些领导职务,怕影响不好。原来也考虑过辞职,最后才下决心写了这封辞职信。对组织没有什么意见。另外住这么大的房子,心中也常常感到不安。自己还考虑过是否应该下去锻炼锻炼,当个中学老师。

张劲夫当即表态说:"你的问题和吴晗等人性质不同,组织上希望你继续在中科院工作。"

中央收到罗瑞卿回到北京后写的申述信后,于 1 月 30 日,委托周恩来、邓小平和李富春在怀仁堂约见罗瑞卿,转述了一个多月来一些高级干部对罗瑞卿的意见,大家基本都认为罗瑞卿过于骄傲。

罗瑞卿再次提出要见毛泽东和林彪。周恩来对他说:"你现在还是不准见主席、不准见林副主席。主要是考虑自己的问题,好好写检讨。"

"我没有伸手,没有反对突出政治,也没有封锁反对林副主席,怎么检讨?我什么时间说过'军事就是政治','政治、军事同等重要','政治、军事要轮流突出'了,拿出证据嘛,我可以检讨。"罗瑞卿委屈地说。

“没有三条,就有什么就检讨什么嘛。比如:关系问题啊,和老帅的关系问题啊,还有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问题。”周恩来耐心的做着工作。

第二天,1 月 31 日,周恩来审阅关于批判罗瑞卿“错误”的文件时,建议文件“改由总政直接发下,作为内部文件,还可稍留余地”。同日,他又让秘书查查罗瑞卿申诉中提到的“军事就是政治”等三句话的出处。秘书去问总政副主任刘志坚。刘志坚查后答复:“军事就是政治”是林彪概括出来的,罗瑞卿在若干次讲话中讲过这一类话,但没有这样概括的说法。

1 月 31 日,由于一直没有得到彭真的具体指示,许立群又给彭真写了一封长信。

2 月 1 日,彭真将许立群的信及几次报送他的 7 份材料作为附件送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陆定一、康生、吴冷西阅。这 7 份材料分别是:

一、北京六个报纸、杂志编辑部负责人座谈关于《海瑞罢官》讨论的情况和问题;

二、汇报张春桥电话中的意见;

三、汇报关锋等人四篇稿件政治性的提法;

四、关于郭沫若一封信的汇报;

五、关锋在一九六二年写的几篇杂文,邓拓在 1962 年写的一篇杂文;

六、关于《海瑞上疏》和《海瑞背纤》的材料;

七、报刊发表参加演出《海瑞罢官》的演员的检讨文章。

彭真在材料上写了一个注:“拟于后日召开五人小组会讨论后向中央提出意见。”

2 月 5 日,毛泽东在这 7 份材料的目录页上写了如下批语:

江青:

这批材料阅后,暂存你处。

毛泽东

二月五日

2 月 1 日至 4 日,中央军委在广州召开第 51 次常委会议。据参加

这次会议担任记录的时任《解放军报》副总编辑唐平铸在《工作记录本》上的记录,出席的军委常委有:贺龙、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会议由肖华汇报关于罗瑞卿问题和1966年1月全军政治工作会议情况,由杨成武传达毛泽东1965年12月22日、林彪25日关于罗瑞卿问题等的指示。杨成武说:

"主席说,他又犯了彭德怀的错误,对林、老帅不尊重。罗在高饶问题上实际上陷进去了。罗是个野心家。罗把林彪同志实际上当作敌人看待。林带了几十年兵,难道他还不懂得什么是军事,什么是政治?军事训练几个月的兵就可以打仗,过去打的仗都是打的政治。要注意防止罗的地下活动,注意搞八司马。(去年二十二号说的)主席问许世友有多少兵,答有五十万。靠不靠得住,营以上干部靠不靠得住,北京发生政变怎么办?人家把主席、刘主席暗杀了怎么办?什么人看林总,什么人哭了,他都知道。

主席说,要恢复突出政治的原稿。康生你怕的三个人,你说对了(饶、罗)。他对特务老婆讲,你叫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你要我到哪里去,我就到哪里去,解放以后又和她见面了。(在南京市当小学教员)罗什么△△问题不向林报告。名单、领导小组、执行小组,三个步骤都是主席批准的。要产生一个决议。罗就是个人独断,从当总参谋长来未向我单独作过请示报告(林说他从来没有作过创造性的建议,都是吃现成饭)(罗说黄埔军官学校只培养了两个学生,一个林彪,一个罗)虐待公务员,罗搞这一套,总有几个人在一起,与外国的关系有些可疑。

刘主席说他没有阶级性,没有党性,反对林,反对中央。总理说反林就是反党,反毛主席。"

杨成武传达毛泽东讲话中提到的"高饶问题"是指高岗、饶漱石;

"八司马"则是前指唐顺宗时的"二王八司马事件",后指整风反右期间中央办公厅秘书室八名年轻科级干部因向室领导提意见挨整受批,毛泽东曾称之为新的"八司马事件";

"特务老婆"是指罗瑞卿延安时期的前妻拱平。

出席军委第51次常委会议的与会者对罗瑞卿问题发表了看法和意见。

叶剑英说:“我们在战略上藐视,他是纸老虎。在战术上要当作真老虎打,这个家伙是很厉害的。我们作自我批评,作了自我批评,并不是和罗一样,是认识问题,要划一条线。”

贺龙说:“这个人很坏,什么坏事都可以干得出来。他在公安部搞了什么?要防止暗杀。主席指示很重要,看得高,看得远,看得深。主席的话是灵的,对他要大大怀疑,防止出事。他的阶级本质是农奴主,在公安部就有问题。不应让他搬回去,怕他销毁证据。他要儿子学射击,家里那么多电话机子,十几条枪,总参总政要抓警卫工作,特别是林的安全。”

“这个人是没有改造的人。”

聂荣臻说:“这个人的弱点,长期以来看得很清楚,过去谅解,现在看不是作风问题,他自己不舒畅,我想找他说,说不进去。我们按党的组织纪律办事。对罗丝毫不能存在幻想,丝毫不能让步,让步军队就要变色,适当的时候要作出结论,将来下放不能到大三线。不要看他的表面,要看到他的本质,他是个危险人物,要防万一,这场斗争是不可避免的。”

刘伯承说:“对这个人不要低估了。”

陈毅说:“到一定时候,要面对面的斗争,要搞突出政治,两条路线的斗争,第二是伸手。”

徐向前说:“这是个危险人物,林总都不在话下,我们更不在话下。专门出风头,到处演讲。”

2月8日,林彪就罗瑞卿问题作出指示:“这是个危险人物,他是不会承认错误的,承认了也是假的,不会真正的承认。他跟一般的好同志不同,他要报复,反扑的。这个炸弹不搞掉,将来第二次爆发更难说。在战争爆发时,在党和国家发生困难时,他要造反的。这个人比彭、黄危险得多。不要小看,不能放松对他的警惕性。他到处欺负人。他的思想与阶级本质是农奴主,野心很大,先夺军权,然后夺政权,元帅都不在话下。他要造反的,不能放松警惕。要长期管制,到下面去,在党和群众的监督下进行改造。放松了警惕将来会出乱子的。他跟其他同志犯错误不一样。如果第二次爆炸,他要炸掉我们的国防,炸掉我们党的团结。要打他的张牙舞爪,要消毒。把材料整理出来,军

一级都要看。有些材料编出来,搞十条、二十条。批判以后不要留在北京,下放,不要放在大三线,十年也不能来北京。这是个危险人物,危险的炸弹。毛主席、刘主席健在,他搞野心阴谋,如果党发生了困难,他就会造反、出乱子的。”

# 第24回：看电影，不夜城座谈文艺 交锋疾，五人组讨论方略

2月2日上午，刘志坚一行六人从北京西郊机场，乘坐一架“伊尔-14”飞机，直飞上海。

到了上海后，他们住进上海延安中路上的上海警备区招待所，对外名称是“延安饭店”，是专门接待军中往来人员，出入那里的人差不多都是穿军装的。

刘志坚一行住进上海延安饭店的当天下午，江青就派人送来了几份文件——《毛主席于一九四四年在延安看了〈逼上梁山〉后写给平剧院的信》、《毛主席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以及《毛主席对文艺界的两次重要批示》。

文件送到不久，江青的“特使”张春桥就来了。刘志坚跟张春桥有过一段短暂的共事，那是1963年，中苏友协派出代表团参加苏联十月革命节，团长是刘志坚，副团长便是张春桥，不过，那次一起赴苏，只是一般的工作关系而已。

这一回，张春桥被是来接刘志坚去江青的住地——华山路丁香花园。这里是中共中央华东局一个高级招待所，在拥挤不堪的上海市中心，这里却拥有成片的绿草地和众多的树木，显得那样的幽静和高雅。以“丁学雷”为笔名的中共上海市委写作组，就在丁香花园之侧的一座小楼里，那“丁”便取义于丁香花园，而“学雷”则是学习雷锋的意思。

刘志坚在张春桥陪同下，走进江青住处。江青一见他们进来，立刻笑容满面的站起来和刘志坚握手，说：“哦，终于把解放军这座‘尊神’请来了！快坐。”

坐下后，江青接着说：“我们的文艺界不像样子了。让帝王将相、洋人死人统治了。毛主席的批评，他们就是不听，我的意见就更没有人听了。”

她又抱怨道：“我没有办法呀，我的处境很困难，所以我去苏州求

助于林总。要请解放军这座‘尊神’支持我。现在,林总终于给了我支持!”

刘志坚习惯于“公事公办”。他坐下后,立即打开公文包,拿出一份电话记录对江青说:“这是林副主席让我转达的一段话,也是对总政的指示。”

接着,他逐字逐句地向江青念道:

“江青同志昨天到苏州来,和我谈了话。她对文艺工作方面在政治上很强,在艺术上也是内行,她有很多宝贵的意见,你们要很好重视,并且要把江青同志的意见在思想上、组织上认真落实。今后部队关于文艺方面的文件,要送给她看,有什么消息,随时可以同她联系,使她了解部队文艺工作情况,征求她的意见,使部队文艺工作能够有所改进。部队文艺工作,无论是思想性和艺术性方面都不能满足现状,都要更加提高。”

这就是临行前,叶群让刘志坚记下的那段话。林彪不仅对江青作了很高的评价,而且要她“指导”部队文艺工作,这使江青非常高兴,她马上说:

“请你转达我对林总的感谢,谢谢他的支持。同时,也对刘志坚同志为筹备这次座谈会做了大量工作,表示衷心的感谢!志坚同志,听主席说,你是劫法场出来的。我要很好地向你们这些出生入死的老同志学习。听说你过去写过诗,写过不少文章,在文艺方面也是内行。”

“哪里,都是工作需要。在文艺工作方面,您为我们做出了榜样,我们这次来就是向江青同志学习。”刘志坚谦虚地说道。

“我们之间就不客气了。这次请你们来,不是开什么会,主要是看电影,在看电影中讲一点意见。”江青谈了她对座谈会开法的意见,然后说:“好吧,我们先去锦江小礼堂和同志们见见面。”

上海锦江饭店的小礼堂,是一座不平常的建筑。在锦江饭店的建筑群中,原本没有这座小礼堂。那是在1959年春天,以21天的神奇速度建成的!

原来,中共中央决定在上海召开中共八届七中全会。论住宿条件,首屈一指的当然是上海锦江饭店。遗憾的是,那儿没有会场。于是,中共上海市委、上海市政府决定以最快的速度、最好的质量,建造

一个会场。由于出席会议的中共委员、中共候补委员不过161人,加上列席人员也不过200多人,造个小礼堂也就够用的了。

当时定下“庄严、朴实、适用、保密”八字方针。设计方案经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审核,由周恩来审定。为着保密,小礼堂的窗玻璃是双层的,可以隔音。室内铺着红地毯、绿桌布、咖啡窗帘、灰色软椅。毛泽东曾赞扬了这座小礼堂的设计者、建设者。

当天下午17时,江青在张春桥的陪同下,在锦江小礼堂跟来自北京的一行6人正式见面。

江青首先宣布了几条会议“纪律”:

“我们这次开会,不要记录,也不要外传,先不要跟北京讲,要注意保密。你们都是军人,军人是最遵守纪律的,是不是呀?你们有人带窃听器了吗?就是那种录音机?不要带那个东西,中央有规定的,开会不要搞那个东西,容易泄密,给坏人机会。你们能遵守吗?

“我先自我介绍一下,我是山东诸城人,十几岁从济南到青岛,以后到上海。同主席结婚后,在延安时当协理员,进了北京主要是给主席当‘文艺哨兵’。为了搞调查研究,我经常自己亲自买票下剧场看戏,戴着大口罩到戏院……这时我发现牛鬼蛇神、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统治我们舞台,一塌糊涂。我就把这些情况报告了主席,于是才有了主席《关于文学艺术的两个批示》。”

她接着说:“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到现在已24年了,就是推不下去,文艺界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洋人死人统治着舞台,主席多次批评,他们就是不听,文艺界基本上不听主席的,听周扬、林默涵、夏衍这些人的。

“为什么会这样呢?我想了很久,想通了,这是在文艺方面,有一条与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建国17年来他们一直在专我们的政。

“你们都看了发给你们的材料了吗?为什么要印发毛泽东1944年1月9日关于平剧《逼上梁山》的信,那是信中有一段话: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但在旧戏舞台上(在一切离开人民的旧文学旧艺术上)人民却成了渣滓,由老爷太太少爷小姐们统治着舞台,这种

历史的颠倒,现在由你们再颠倒过来,恢复了历史的面目,从此旧剧开了新生面,所以值得庆贺。……”

江青借此发挥说:“尽管主席早在1944年就明确地指出了,可是解放后,我们的文艺界不像样,现在,该是彻底扭转这种‘历史的颠倒’的时候了!……”

此时,来自北京的军人们才知道,“座谈会”不是“研究三大战役的创作”。

当晚,中共上海市委书记陈丕显尽地主之谊,宴请江青和刘志坚等6人,张春桥依然作陪。

晚上,江青在锦江小礼堂请刘志坚等人看电影《逆风千里》。这是珠江电影制片厂1962年出品的故事片,是讲1946年秋,国民党“千里驹”师被歼。解放军指导员宋志刚和一支小分队奉命押送被俘的国民党校级以上军官前往辽东军区驻地。一路上,腹背受敌,小分队“逆风千里”,终于完成了任务。这部影片虽然不是部队电影厂拍摄的,但表现的是部队。江青一边看电影,一边指出这部影片的问题:

“你们看,这里边就是这样美化敌人,把敌人当成主人公来描写,让敌人占领了我们的银幕,……”

座谈会就这样在上海开始了,按照江青的安排,前后看了30多部电影和3场戏。期间,张春桥有时也来看。后来,陈伯达来到上海,偶尔也来看看。江青一边看电影、看戏,一边随时说一些意见。由于不准记录,刘志坚他们只能下来后,和李曼村、谢镗忠、陈亚丁一起回忆,由陈亚丁追记,以免日后忘掉。

2月3日,解放军报发表《永远突出政治》的社论。

此后,解放军报又于2月9日、2月14日、2月18日、3月2日、3月23日、4月5日接连发表论突出政治的社论,各大军区领导人纷纷表态,各部队层层进行突出政治的检查。

2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云松的文章:《田汉的<谢瑶环>是一棵大毒草》。这篇文章突破了彭真设置的不准谈政治问题的禁区。

2月3日,彭真召集五人小组成员在人民大会堂北京厅开会,讨论由批判《海瑞罢官》引起的问题。列席这次会议的还有中宣部副部长许立群、姚溱,《红旗》杂志副总编胡绳、范若愚、王力,北京市委第二书

记刘仁、书记处书记郑天翔等。会上印发了许立群上报的7份材料:《北京六个报纸、杂志编辑部负责同志座谈关於〈海瑞罢官〉讨论的情况和问题》;《1月26日许立群给彭真的一封信》;《汇报关锋等同志四篇稿件政治性的提法》;《关于郭沫若同志的一封信的汇报》;《关锋同志在一九六二年写的几篇杂文邓拓同志在一九六二年写的一篇杂文》;《关于〈海瑞上疏〉和〈海瑞背纤〉的材料》;《报刊发表参加演出〈海瑞罢官〉的演员的检讨文章》。彭真先让许立群介绍情况。

许立群根据彭真会前的特别交代,按照1月31日他写给彭真的信件内容汇报了几份材料的情况后。他首先肯定了一番当前这场学术大批判的成果,随后便转述存在的一些问题,他说:

"……目前的情况大致如此,老教授和学者很紧张,现在应该展开讨论,创造百家争鸣的空气,如若一谈政治问题,许多人就不敢讲话了……"

另一个中宣部副长胡绳也附和道:"61年和62年都曾采用借古论今的形式,影射是可以的,但是具体指什么,很难说。"

许立群接着说:"还有很多问题不好掌握,戚本禹和关锋、林杰一直追问点要害的文章为什么不发表?我担心,发表后会对'放'的方针有影响……

"有些人反映,左派也不是没有问题,关锋1962年写的几篇杂文就有错误,应该批评。另外,《海瑞上疏》和《海瑞背钎》等其他写海瑞的戏是否都要批判?《文汇报》刊登了京剧演员谭元寿、马连良等人演海瑞戏的检讨,是不是其他演过海瑞戏的演员都要检讨?"

陆定一举了斯大林1937年大清洗时犯了过火错误等例子,告诫说:"学术批判不能过火,一过火就会有反复。我们不能靠给人家戴帽子来解决问题,政治上戴帽子,是阿Q式问题,我们没有胜利,问题还是没有解决……"

康生则表示了不同意见。他说:"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同吴晗的斗争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吴晗的《海瑞罢官》是政治问题,要害在罢官,要联系庐山会议的背景来谈。……"

"批判《海瑞罢官》的讨论不要仅仅限制在学术的范围内,要和现实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结合起来"

康生接着说:“这次斗争就是要把锋芒指向吴晗,要打击右派,依靠左派,培养左派理论队伍。”

他指着许立群问:“你不收集吴晗的材料,为什么那么有兴趣搜集左派的材料?关锋他们是左派,是我们依靠的力量,必须保护。你也写过不少坏文章嘛,是不是也应该把你当成右派?……”

彭真最后作了总结,他先是肯定了许立群、胡绳等人的发言,然后说:“现在有些文章火气大,妨碍自由讨论,是一个偏向,不能发展下去,要纠偏……

“左派也要整风,不要当‘学阀’吗……

“目前还是要以‘放’为主。已经查明吴晗同彭德怀没有关系,吴晗是根据毛主席1959年4月上海会议上提出要学习海瑞精神,并在《人民日报》向他约稿的情况下,动手写文章的。那个时候,庐山会议还未开呢。庐山会议是在上海会议三个月之后才开的,也就是1959年7月才开的,而恰恰是在这次会议上,才罢了彭德怀的官。从时间上说,两个会相差几个月。虽然《海瑞罢官》这出戏的剧本,是在庐山会议之后发表的。但动笔确实在会议之前,这是事实。《海瑞罢官》这出戏上演之后,毛主席还把扮演海瑞的马连良,请到家里做客,主席当面称赞马连良演得好,剧本也写得好。这些并不是凭我脑子里想出来的,而是从调查中来的。我认为吴晗同彭德怀没有关系。

“还有人要批判邓拓。邓拓是左派,他署名向阳生的文章是我叫他那样写的。邓拓同志是拥护三面红旗的嘛,长期以来是坚定的。郑天翔同志对邓拓同志的情况比较了解,他可以证明这一些,你说是不是呀?”这时,他转过头问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郑天翔。

“是的,邓拓同志是一个坚定的左派,他是坚决拥护三面红旗的。”郑天翔连忙回答。

彭真又说:“为了‘放’,不要提庐山会议,不要谈《海瑞罢官》的政治问题。像郭老这样的人都很紧张了,因此,学术批判不要过头,要慎重……”

陆定一支持彭真的意见,他说:“学术批判不能过火,一过火就会有反复,一定要慎重。”

其他人也表示了同样的意见。

最后,彭真说:“为了加强对当前学术批判的领导,我建议:成立学术批判办公室,由许立群和姚溱负责,许立群任主任,将今天讨论的意见向政治局常委汇报。”

“同意。”吴冷西立即表示赞成,其他人纷纷表示同意,康生也未反对,只是强调了一句:“会议记录要把每个人的发言写上名字公布出来。”

会后,彭真将许立群、姚溱留下,对他们说:“你们今晚就不要走了,到钓鱼台,根据这7份材料,连夜整理一份汇报提纲。我让人安排一下警卫工作,不让别人干扰你们。一定要抓紧。《汇报提纲》要简明,要快。今晚一定要搞出来。”

“好的。”许立群答应道。

晚上,彭真让他的秘书给许立群、姚溱打电话,将他们二人唤到自己的家中,彭真向他们讲述自己对于《汇报提纲》的意见,两位副部长一边认真地听着,一边在小本子记下了要点。谈话进行了几个小时。

谈话结束后,他俩走出彭真的家门时,姚溱对许立群说:“这次谈得比较深,我们只照彭真一个人的意见写行了,别人的意见就不要管了。”

“当然,我们宁愿在政治上犯错误,也不要在组织上犯错误,即使在政治上犯了错误,还有个组织负责嘛。”许立群表示了赞同。

随后,他俩分别乘上自己的轿车赶回钓鱼台。

深夜23时许,彭真又打电话给许立群,询问《提纲》明天能否搞出来?

“行是行,只是会上意见不集中,不知怎么写法好。”许立群说。

“可以照我最后讲的话写嘛!旁人的话也吸收些就行了。”彭真停了一下,又道:“要以‘五人小组’的名义写,这样做比以我个人名义发表的好。”他再次强调:“要快,要快些写出来!”

“好吧,我一定尽力而为。”许立群答道。

# 第25回：赶《提纲》许立群彻夜未眠 示上方，一干人飞赴江城

许立群、姚溱没有辜负彭真的期望，经过一晚上的突击，第二天一早就提交了《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

《提纲》共分六部分，核心是第一部分，即“目前学术批判的形势和性质”，其他诸如方针、队伍、组织领导等，都围绕这个核心问题来表述。它强调要“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要坚持实事求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要以理服人”，“要准许和欢迎犯错误的人和学术观点反动的人自己改正错误”。“对于吴晗这样用资产阶级世界观对待历史和犯了政治错误的人，在报刊上的讨论不要局限于政治问题，要把涉及到各种学术理论的问题，充分地展开讨论，如果最后还有不同意见，应当容许保留，以后继续讨论。”而第四部分则明确谈到“左派要互相帮助”。这里说的“左派”，包括吴晗、邓拓及关锋、戚本禹、姚文元等人，因此需要“互相帮助”。《提纲》还特别强调：

“在报刊上公开点名作重点批判要慎重，有的人要经过有关领导机关批准”；

“左派学术工作者”要“反对自以为是，警惕左派学术工作者走上资产阶级专家、学阀的道路”。

“即使是坚定的左派（从长期表现来看），也难免因为旧思想没有彻底清理或者因为对新问题认识不清，在某个时候说过些错话，在某些问题上犯过大大小小的错误，要在适当的时机，用内部少数人学习整风的办法，清理一下，弄清是非，增加免疫力、抵抗力。”

由于这份《提纲》是二月份写的，以后就被简称为《二月提纲》。彭真把《提纲》看了一遍，非常满意，立即叫打印几份，发给2月3日会议的参加者人手一份。同时向刘少奇报告，要求向中央政治局常委汇报。

2月5日，北京的天色阴沉沉的，凛冽刺骨的寒风，在华北平原呼

啸着,虽然临近立春,气温仍低至零下十几度。这天下午15时30分,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在中南海听取彭真关于“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对当前学术讨论的意见汇报。

由于毛泽东还在武汉,会议由刘少奇主持。临开会前,彭真将《汇报提纲》送给每个常委一份,上面写着:“此件因时间匆促,来不及在五人小组传阅和商酌。”

会上,先由许立群和胡绳做口头汇报,彭真不时断断续续地插话:

“现在不敢写文章写戏是个问题,新华社每月收到文章很少,坏人不写是好事,好人不写就不好,范文澜、郭沫若都很紧张,他们写东西多,问题就多,但我们从政治上看,不批判他们。”

“有的人根本不研究学问,但批判起别人很带劲,借批判别人出名。学术批判要自己清理,别人扭住不放就是对方的问题了。批判应当是同志式的,不要把别人当台阶使。”

汇报刚结束,刘少奇就问:“吴晗和彭德怀究竟有没有组织上的联系?”

彭真说:“怎么可能呢?吴晗是1959年4月应《人民日报》之约写的文章,彭德怀是在1959年7月被免的职,中间差了好几个月嘛。他们两人之间根本不存在什么组织上的联系。”

“这样吧,先吃饭,吃完饭,我们再研究,”刘少奇说。

当天晚上,刘少奇继续主持政治局在京的常委在中南海家中开会。

彭真问刘少奇和邓小平:“少奇、小平同志,你们对这份《提纲》还有什么意见吗?”

刘少奇端起茶杯,呷了一口茶说:“没什么意见了。”

邓小平一边抽着烟,一边说:“对这个《汇报提纲》,我表示赞同,现在很多人,不敢写文章,怕犯错误。戏也如此,只能演兵。电影有的基本是好的,也不叫演,这怎么行?……什么叫红专结合?学物理的不懂物理,只读毛著怎么叫结合?很多人忽视读书,批判冯定为什么要用12个星期?……”

冯定是北京大学的党委副书记、副校长,著名的哲学家,是北京大学唯一的一位由毛泽东亲自点名进入北京大学授课的,也是北京大学

唯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授。1964 年 7 月,当文艺界大批判的浪潮涉及到其他领域后,作为哲学界的代表人物,冯定的两本书《平凡的真理》和《共产主义人生观》也受到了群众的批判。邓小平指的就是这件事。

大家对《提纲》没有再提出反对意见。

会议结束时,彭真请示刘少奇:“这个提纲已经在京常委讨论同意了,是否可以根据这个提纲向毛主席汇报?”

刘少奇马上回答说:“可以,就这样向毛主席汇报。”

2 月 7 日,《二月提纲》以电报形式发给在武汉视察工作的毛泽东。

这天,王力给彭真打来电话说:“听说在送主席的文件中附了关锋、戚本禹和邓拓同志的材料? 这事可要慎重啊。毛主席说关锋、戚本禹是左派。毛主席刚刚骂了杨尚昆,杨尚昆把左派打成右派,其中就有戚本禹。”

彭真一听慌了,赶忙说:“你提醒得对,我赶紧追回来。”

可是已经来不及了,文件已经送走了。

后来,王力建议彭真:“还是要注意和关锋、戚本禹处理好关系,别搞得太僵。”

彭真说:“你讲得对,等我回来吧。”

2 月 8 日早晨,北京西郊机场,一架专机已在那里等候。彭真、陆定一、康生、吴冷西、许立群、胡绳、田家英及田家英的秘书逄先知和龚育之等人共同乘机飞往武汉。一下飞机,他们就看见湖北省委书记王任重已在机场迎接。彭真等人没有停留,从机场直接乘车前往毛泽东住处汇报。

毛泽东住在武汉东湖的梅园宾馆,垂柳婆娑。乳白色的平房隐现在水杉马尾松、棕榈广玉兰、桃梅竹丛中。湖西,是湖北省委、政府的一片红砖灰粉建筑,以及党政军领导居住的茶港小区;湖南岸的珞珈、桂子,绿染岗峦起伏,金黄琉璃点翠,为参差不齐的高校房舍。碧波粼粼的东湖及周围的苍松翠柏给人一种幽静的感觉。午休后的毛泽东正在庭院里散步,他已经接到彭真要来汇报的电话,正在考虑如何对待这次汇报所要谈的问题。这是关系到党和国家命运的重大决策,不

能不慎重从事。

武汉东湖

几辆汽车鱼贯驶入宾馆。彭真带着五人小组的康生、陆定一、吴冷西以及胡绳、许立群、田家英等同志,来到梅园宾馆。

“主席,彭真他们来了。”秘书向毛泽东请示。

“让他们进来吧!”毛泽东点点头。转身返回屋里。

毛主席的秘书将彭真一行人领进客厅里,毛泽东从里屋走了出来,彭真立即迎上前去,问候道:“主席身体好吧?”

毛泽东和彭真握手说:“好。”

接着,毛泽东又和康生他们一一握手。

在彭真他们坐定后,彭真开门见山地说:“主席,我们这次来,是想把提纲的内容,向您汇报一下。”

“噢,你们谈吧。”毛泽东说。

“许立群、胡绳,你们先介绍一下情况。”彭真仍然让许立群和胡绳二人先讲,自己在一旁插话补充。

当汇报中谈及“郭老、范老要保护,不要批评”时,毛泽东不以为然地摇摇头说:

“郭老、范老当然要保护,但是,他们两位还是要在史学界工作,有个适当的自我批评表示为好。郭老和范老就不要批了,不过,还是要做一点自我批评,表示一点主动。”

谈到吴晗的《海瑞罢官》问题时,毛泽东问彭真:“《海瑞罢官》问题和彭德怀是不是有联系?吴晗这个人是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

彭真则马上做了否定的回答:“根据调查,没有发现他们有联系。”

毛泽东说:“我说过吴晗文章的要害是罢官,去年12月,我就同陈伯达、康生说过,姚文元的文章很好,但是没有打中要害,要害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1959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

彭真说:“2月5号,我们在北京向少奇同志汇报的时候,也提到您的话。少奇同志说,没有发现吴晗跟彭德怀有组织联系……”

这时,毛泽东看了看彭真说:“这是康生向我讲的,是康生的发明权。”

康生急忙解释道:“不,不是我的发明权,是毛主席的发明权。”

毛泽东再次说:“吴晗文章的要害是罢官,这是康生的发明权。”

康生没有说话。

毛泽东又问:“吴晗算不算反党反社会主义?”

彭真说:“吴晗过去是反蒋的,在反右派斗争中表现也好,只是在三年困难时期有点不满意。”

“邓拓怎么样呀?”毛泽东接着问道,

彭真回答:“邓拓是拥护三面红旗的,长期以来是坚定的。”

“吴晗算不算反党反社会主义?”毛泽东再次问道,

“那他总是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罢了官的人一边,不是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一边,可以说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在毛泽东巨大的威望面前,彭真不敢再坚持了,他婉转的回答说。

彭真停顿了一下,又说:“解放以来,我们曾经多次展开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批判,但这些批判都是虎头蛇尾,没有结论,这一次我们要做政治结论……”

毛泽东打断彭真的话,缓缓地说:“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斗争是长期的阶级斗争,绝不是匆促作一个结论就可以解决的。”然后接着

说:“吴晗不罢官了,还照当他的市长。这样,就不至于形成紧张局势,讨论就可以放了吧?不同的意见可以‘放’出来,可以比较鉴别。你们可以放,让不同的意见放出来。”

毛泽东也作了退让。是啊,他知道,这不是一两个人的去留问题,而是一场斗争,是一场阶级斗争,要让全党都能够理解和接受的斗争。

许立群接着汇报说:“何明也写了不少坏文章,例如他在62年88期《中央宣教动态》上刊载的《从陈贾说起》这篇杂文就有严重的问题……”

“写点杂文有什么关系?何明的文章我看过,还不错。写篇把杂文讽刺一下也可以嘛。这样的问题三年以后再说。”毛泽东说。

彭真接着说:“我认为左派也要进行整风,警惕他们走上资产阶级专家、学阀的道路……”

“这样的问题以后再说。”毛泽东依然这样说。

许立群又接着汇报,毛泽东没有再说什么。

听完许立群、彭真等人的汇报,毛泽东说:“好吧。关于我的选集第五卷的编辑出版,你们既然都同意搞,那就搞吧。不过,我不同意‘顶峰’和‘最高最活’一类说法,你们去上海的时候,顺道到苏州同林彪同志谈-谈。”

“我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王任重他们这次帮助做了些修改,主张发下去。我想再看看。你们的意见呢?”毛泽东又问彭真。

“我觉得还是发下去好,对全党都有教育意义。”彭真说

“那好吧,你们这次正好也帮助做做修改工作。”毛泽东说道。

“好的。”彭真回答说,接着又问:“这个五人小组的汇报提纲是不是写一个中央批语,请主席看过,发全党?”

毛泽东说:“你们去写,我不看了。”

下午三、四点钟,许立群回到招待所,高兴的对龚育之等人说:“现在好了,问题都解决了!《汇报提纲》主席同意了。只提了两点意见。一个是关于两个月以后做政治结论,毛主席说,两个月以后也做不了结论。一个是关于不要批评郭老和范老,毛主席说,他们两个还要在学术界工作,表示一点主动,做一点自我批评好。主席的精神是宽,对两边都是宽。”

从毛泽东那里一回来,彭真认为毛泽东、刘少奇和其他常委对汇报提纲都没有提出异议,立刻让许立群以中共中央的名义草拟了转发《汇报提纲》的批语:

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中央各部委,国家机关各部门党组、党委,总政治部:

中央同意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现将这个提纲发给你们,望照此执行。

这个提纲的内容,应当向党内主管学术讨论工作的同志,和从事学术研究工作的同志传达并组织讨论。在讨论时,应当把毛泽东同志一九五七年三月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作为学习文件。

中共中央

# 第26回：游东湖，彭真发《二月提纲》上三线，寻“海瑞”再作逍遥

从北京去武汉的一干人没有谁再为《海瑞罢官》批判的事情操心了。吃完饭，他们三三两两，沿着湖边散步，漫谈，海阔天空，无边无际。业余时间，逛逛旧书店，转过珞珈山。王任重他们还请陆定一去看了八七会议的旧址。陆定一是八七会议的参加者，八七会议的旧址大体已经认定，当时还有些争议，要陆定一再去看看。其他人也跟着去了。陆定一到了那里，边看边忆，记忆不很清晰，房子的内外格局也多有变化，但还是可以确认就是这个地方。

1966年2月3日，就在北京“五人小组”讨论通过《二月提纲》的同一天，毛泽东把他1962年1月30日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稿送给王任重阅读，并提出：“请考虑加以修改。”

王任重阅后，从文字方面提了一些修改意见，于2月4日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建议把这个讲话“重新印发给县委一级，由县委组织公社党委书记以上的领导干部学习”。

2月6日，毛泽东在王任重的信上写了一个批语给彭真：“请商在京常委及康生、定一、伯达诸同志修改一遍，并考虑是否应中南局的要求印发给县团级同志看（只发中南局，作为试点，别地不发）。看来此问题很大，真要实现民主集中制，是要经过认真的教育、试点和推广，并且经过长期反复进行，才能实现的，否则在大多数同志当中，始终不过是一句空话。王任重同志的修改是好的。”

按照毛泽东的要求，彭真就地在武汉，找康生、陆定一，还有王任重、田家英、吴冷西、胡绳、许立群，一起来做这“修改一遍”的工作。彭真主持会。大家对于“只发中南局”，觉得不好理解，不好办理，认为像这样的文件，还是发全党。对于讲话稿连同王任重的修改意见，大家边读边议边改，主要是文字，也涉及内容。

原稿中有一段话：“去年六月十二日，在中央北京工作会议的最后

一天,我讲了自己的缺点和错误。我说,请同志们传达到各省、各地方去。事后知道,许多地方没有传达。似乎我的错误就可以隐瞒,而且应当隐瞒。同志们,不能隐瞒。”

龚育之在议论时提出:“毛主席那次讲了自己的哪些缺点和错误?要不要在这里简单说明?不然干部看了会说,毛主席都讲了不应当隐瞒,可是现在还是没有告诉我们。”

彭真看了看龚育之,沉吟了一下说:“就是讲高指标、高征购那些。”就没有再说什么,其他人也没有置理。龚育之是第一次参加这样高层次的文字整理工作,是个新手,因此会提出这样的建议。其他人也不便跟他解释什么。

2 月 9 日,毛泽东在武昌东湖客舍听取康生、田家英汇报编辑《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工作。随后,吴冷西受在京常委委托,向毛泽东汇报外事工作。汇报时,他提到:“国际上对毛泽东思想有多种多样的提法,国内最近也有新提法,如‘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毛泽东思想是最高最活的马克思主义’,在京常委都不同意上述两个新提法,请主席考虑是否仍然按照 1960 年 3 月天津会议的提法,即一律提‘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毛泽东说:“外国人怎么说法,我们管不了,由他去,但我们自己仍然按照天津会议的决定办,林彪的两个提法都不妥。”

毛泽东指定彭真和康生离武汉时先去苏州跟林彪当面说清楚这个问题。

当天,彭真从武汉飞到上海,陈丕显前去迎接时,彭真把一份材料交给陈丕显说:

“这是‘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给党中央起草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在北京经政治局常委会讨论通过并专门到武汉向毛主席汇报过的,要作为中央文件发给全党。你和曹荻秋同志可以先看看,然后交给江青同志。”

陈丕显问:“魏文伯是华东局书记兼秘书长,是否让他也看看?”

彭真说:“可以。”

陈丕显和魏文伯、曹荻秋阅后,即在当天下午送给了江青,并告诉江青,彭真准备晚上同她面商。

当时江青正在和刘志坚他们开座谈会,也就是看电影。她翻看着文件,电影结束后,江青对刘志坚等人说:“我有些事,座谈会暂停几天,你们先休息休息。”

随后,江青找到陈丕显,责怪他:“你也没个条子说明和手续就把《提纲》送给我看。”

陈丕显转交的《汇报提纲》,江青虽然只是只简单翻看了一下,但已经感到了问题的严重,她立刻让陈丕显安排她赴武汉去见毛泽东。

刘志坚和李曼村也利用这段时间,飞回北京向肖华汇报。

彭真当天晚上没有见到江青,自然也没有听到她对《提纲》的不同意见。彭真将为中央草拟的关于转发《汇报提纲》的批语连同《汇报提纲》修改件送请政治局常委批转,却未将批语送给毛泽东审阅,而是将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讲话修改稿送给毛泽东。

2 月 12 日,毛泽东在送去的七千人大会讲话修改稿上批道:“彭真同志:都已看过,照此办理。”

这天,中央加上批语,把毛泽东这篇讲话整理稿发到党内。也是这一天,中共中央同意彭真写的批语,正式批转了《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

这天,彭真在听取上海市委汇报时说:“《汇报提纲》是常委讨论过,毛主席同意了的,问题都解决了,也不需要跟你们谈了。”

张春桥提出:“《提纲》中‘不要局限于政治问题’等提法是否还需要研究。”

彭真没有回答,继续他的讲话。第二天,2 月 13 日,彭真让胡绳同张春桥谈话。

胡绳说:“春桥同志,我们不能讲吴晗反党反社会主义,对《海瑞罢官》的批判也不要联系庐山会议,这是毛主席的意见。”

“毛主席不是说《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吗?怎么能不联系到庐山会议呢?”张春桥反驳说。

“这是彭真同志要我对你讲的,我们还是要按中央的指示办嘛。”胡绳解释说。张春桥不说话了。

随后,彭真等人回到了北京,立即组织安排在全国传达讨论“五人小组”的《汇报提纲》。

17 日晚,许立群打电话给彭真说:“明天就要开会传达《汇报提纲》,你看应该如何传达?”

彭真直截了当地告诉他道:“你按《提纲》讲,一切照《提纲》办吧,主席是同意这个提纲的。对吴晗的批判,不要联系庐山会议,不要提到彭德怀的问题,你就说吴晗是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被罢了官的人一面的……”

第二天,2 月 18 日,许立群、胡绳召集北京学术界和各报刊负责人约 80 人开会,传达《汇报提纲》。会后,分四个组讨论,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邓拓被指定为第一组召集人,北京大学党委书记陆平为第二组召集人。

许立群在传达时说:

“毛主席完全同意《二月提纲》的方针。”

“主席说,还要宽些。”

“主席还说,能说他(指吴晗)是反社会主义的吗?”

随后,2 月 20 日至 28 日,彭真又带着许立群和胡绳到三线参观去了。许立群在临走前对中宣部的同事们说:“问题已经解决了,让他们讨论讨论就行了。”

中宣部的人们也觉得没有什么事情了,彭真他们是去“三线”作“逍遥游”了。

彭真临行前,还没有忘记王力的建议,特别请关锋和戚本禹吃了顿饭。饭后,戚本禹给彭真写了封信,说过去对彭真了解不够,这次接触后改变了印象。他夸赞彭真有伟大的政治家的胸怀,等等。

是的,彭真也以为这次他又成功了,《二月提纲》批转全党了,应该没有什么问题了。于是,让副市长万里出面安排吴晗,化名李明光,到昌平大东流村去搞“四清”。而邓拓在讨论《二月提纲》时,则当了“第一小组的召集人”。但是,彭真还有一件工作要做。他还没有心情和时间作“逍遥游”。

他赶到成都永兴巷 7 号,已被“罢官”的彭德怀就住在这里,他现在是大三线建设的副总指挥。

见到彭真,彭德怀非常激动,连声说:“你们到底来了! 你们到底来了!”

还未等彭真坐稳,彭德怀就问:“党中央下一步要干什么?我实在是被弄糊涂了。批判《海瑞罢官》,怎么把我给联系起来了?”

“你别着急,我们五人小组搞了个《汇报提纲》,中央已批准并转发全党,你看看。”彭真将《二月提纲》递到彭德怀的手里。

彭德怀一口气看完并连连说:“好!好!就应该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充分让人讲话。不过,我的问题和吴晗的《海瑞罢官》有什么联系?”

彭真向他介绍了吴晗的情况,然后严肃地对彭德怀说:“现在不是吴晗一个人的问题,也不是你一个人的问题,而是牵扯到一大批人。所以我这次来是想请你配合一下。”

“我?我能配合你什么?”彭德怀瞪大了眼睛。

彭真盯着彭德怀说:“第一、建议你辞去三线副总指挥的职务,从此埋头一些研究工作,不再出头露面,这样可以减小目标,少引起别人的注意;第二、我劝你向毛主席再写封信,收回你的申诉书,把自己的功过是非留待后人去说,你服从党的决议就是了;第三、你向中央写个报告,实事求是地说清楚你和吴晗的关系,帮助我们解脱你和他的关系。”

听完彭真的建议,彭德怀一边喘着粗气,一边激动地说:“彭书记,我是准备忍辱负重的,也准备委曲求全。但我这个人你知道的,宁可让别人把我打倒,自己绝不倒下。第三条我可以照办,我不会让吴晗同志无辜受牵连。第一、第二条我坚持立场!”

这次三线行,彭真可以说是无功而返。

刘志坚和李曼村16日接到江青通知,重回上海,继续开座谈会。

2月19日,江青对刘志坚和李曼村说:“没有什么可说的了,我有事,暂告一段落,你们可以回去了。”

座谈会开完了,刘志坚觉得,看了十几天的电影,听江青断断续续的讲了许多话,总得整理出来,回去好向林彪和总政党委汇报。于是他和李曼村、谢镗忠、陈亚丁一起,根据江青多次谈话的“追记”,逐段逐句进行了讨论,并由黎明记录,陈亚丁修改,写成《江青同志召集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

这个《纪要》写了三个部分,约3000字。第一部分写召开座谈会

的经过;第二部分写江青在座谈中谈的“许多极为重要的意见”;第三部分写为了使江青的意见“在思想上、组织上、工作上落实”,准备采取的措施。

20 日晚,这份《纪要》由上海警备区打印了 30 份。

要不要把《纪要》送江青过目?刘志坚又陷于踌躇之中。不给她看吧,日后她知道了,肯定会发脾气,会责问为什么背着她搞,不告诉她?要是给她一份呢,事先未跟她打过招呼,而且这份记录只是供汇报用的,她不一定会满意。怪罪下来怎么办?

他和李曼村、谢镗忠、陈亚丁 4 人反复讨论,以为还是送一份《纪要》给江青为好,因为江青迟早会知道此事。于是,在 21 日,刘志坚把一份《纪要》交给了江青。

22 日,刘志坚一行 6 人乘飞机路过济南,给住在济南南郊宾馆的林彪送了一份《纪要》,并简要地汇报了座谈情况。林彪听了汇报,表示满意,说道:

“这个材料搞得不错,是个重要成果,这次座谈会在江青同志主持下,方向对头,路线正确,回去后要迅速传达,好好学习,认真贯彻。”

林彪如此一说,刘志坚心情轻松许多。23 日上午,刘志坚跟其余 5 人一起乘飞机由济南返回北京。

飞机在北京机场着陆后,刘志坚刚走下飞机,机场工作人员就跑过来通知他:

“刘副主任,上海来了长途电话,让您去接!”

刘志坚闻言,立即一拐一拐的跑向电话间。他的腿在抗日战争时受过伤,成了瘸子。刘志坚进了电话间,拿起电话,一听,是江青的秘书从上海打来的,电话中说:

“刘副主任,江青同志看了你们整理的材料,认为根本不行,歪曲了她的本意。没有能够反映她的意思,给她闯了大祸!现在不要传达,不要下发!”

电话内容无疑给刘志坚泼了一头冷水,好在从政数十年,已经验丰富,他冷静的回答道:“噢,好的。”

江青的秘书接着说:“江青已将此事报告了主席,主席要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参加修改。另外,请你们也立即派人来上海,一起参加

修改。”

这一突然变化,使刘志坚等感到意外。他马上给肖华挂了电话。当天下午,刘志坚一行向肖华作了汇报。肖华决定派陈亚丁去上海,因为每次谈话的回忆笔记是他整理的,由他去比较合适。

肖华再次关照:“江青要怎么改,你就怎么改。有什么问题,回来再说。”

这样,陈亚丁在北京只逗留了一夜,第二天,24 日,又匆匆再飞上海。这是他一个月内,第三次飞往上海。

# 第27回：改《纪要》，陈亚丁三飞上海 贯彻难，议《提纲》争执不停

陈亚丁返回上海后，张春桥立刻把他接到锦江饭店，商量修改《纪要》的事。江青见到陈亚丁就说：

“你来了，很好。我把你们搞的那个东西，请伯达、春桥推敲了一下，伯达有些意见很好，我要他写出来，他一会就来，一起商量一下。”

陈伯达到后，江青就主持讨论修改问题，陈伯达不愧为“理论家”，他拿出写好的几张纸，谈了修改意见，主要是两点：

第一，陈伯达说：“17年文艺黑线专政的问题，这很重要，但只是这样提，没头没尾。”“要讲清楚这条文艺黑线的来源。它是30年代地下党执行王明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继续”，“把这个问题讲清楚，才能更好地认清解放后17年的文艺黑线，这条黑线是从那个时候开始了。”

第二，陈伯达又说：“江青同志亲自领导的京剧革命，搞出了像《沙家浜》、《红灯记》、《智取威虎山》、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等，这些，真正是我们无产阶级的东西，这些都要写一下。这样，破什么立什么就清楚了。”

江青听后高兴地说：“伯达的意思很好，帮助我们提高了，击中了要害，很厉害。这一来有些人就不好过了！”

陈亚丁根据江青的意见，连夜把陈伯达写的和张春桥改的，还有他根据“追记”补充的，改写在一份稿子上。第二天和第三天，又讨论过两次和多次修改。这次修改稿，题目仍叫《江青同志召集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结构仍分三个部分，但内容作了很大增删、改写，加进了许多座谈时没有谈过的东西。全文由3000字增加到5500字左右。

这次最重大的改动，是按照陈伯达的意见，对“文艺黑线专政”作了理论上的阐述。修改稿在“被一条与毛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的后边，增写了“这条黑线就是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现代修正主义的文艺思想和所谓30年代文艺的结合。

‘写真实’论、‘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论、‘现实主义的深化’论、反‘题材决定’论、‘中间人物’论、反‘火药味’论、‘时代精神汇合’论,等等,就是他们的代表性论点。而这些论点,大抵都是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早已批判过的。电影界还有人提出所谓‘离经叛道’论,就是离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之经,叛人民革命战争之道。”这实际上是不公开点名地点了夏衍、秦兆阳、邵荃麟等人的一些论点。接着在下边还加了一段:“在这股资产阶级、现代修正主义文艺思想逆流的影响或控制下,十几年来,真正歌颂工农兵的英雄人物,为工农兵服务的好的或者基本上好的作品也有,但是不多,不少是中间状态的作品;还有一批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草。”

对30年代的文艺,也专门增加了一大段论述:“要破除对所谓30年代文艺的迷信。那时,左翼文艺运动政治上是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组织上是关门主义和宗派主义,文艺思想实际上是俄国资产阶级文艺评论家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以及戏剧方面的斯坦尼斯拉夫的思想,他们是俄国沙皇时代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他们的思想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资产阶级思想。”“那时左翼的某些领导人在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的影响下,背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观点,提出了‘国防文学’的口号,这个口号,就是资产阶级的口号”。这里又是不公开点名地点了周扬等人的“问题”。

根据陈伯达的意见,修改稿还增写了江青亲自抓样板戏的内容,全文近900字。

这次修改,还有一个重要的改动,就是将“江青同志极为重要的意见”,改为与会者的“共同认识”或“座谈的成果”;把落实“江青的意见”改成了落实“座谈会的成果”。

这一改动非常重要,江青尽管是毛泽东的夫人,身份特殊,但是她在党内没有担负任何职务,有些话,如果说是“江青同志的意见”,别人会认为是她个人的意见,要是以中央军委这样一级组织提出来,其分量就大不一样了。

《纪要》稿修改结束后,江青把它铅印后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很重视,亲自作了11处改动。其中最为重要的改动是在原文“我们一定要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

彻底搞掉这条黑线”一句之后,毛泽东加了一句:“搞掉这条黑线之后,还会有将来的黑线,还得再斗争。”而且,还再次批示“请陈伯达同志参加,再作充实和修改。”

3 月 10 日,刘志坚按照江青的通知,再度和陈亚丁飞来上海。一见到江青,她就说:“你们给我闯了大祸。”

张春桥接着说:“因祸得福嘛!”

江青给刘志坚看了毛泽东对《纪要》的修改。于是,江青、陈伯达、张春桥、刘志坚、陈亚丁一起,又对《纪要》逐条进行了修改和补充,全文由 5500 字增加到 10000 字左右。这次的修改稿印出后,江青又送毛泽东审阅。

2 月 19 日晚,毛泽东离开武汉,前往长沙。2 月 21 日下午、22 日上午,在长沙听取叶剑英、杨成武等人汇报军事工作。在汇报到全军总定额及其他军兵种等问题时,毛泽东说:“省公安部队拨归省军区领导,这个办法我赞成。单独搞一个公安部队,搞两套,这是从苏联搬来的,我从来不赞成。”

2 月 28 日,中央书记处召开第 407 次会议,周恩来、邓小平、李富春、李先念、康生等出席,谢富治、林枫、叶剑英、杨成武、肖华、汪东兴等参加。会议决定:“经请示主席批准后,决定撤销公安军这个军种。这是一个重大的决策,撤销后,分别划给各军区管辖,城市可留一部分归警备司令部指挥。具体问题,由杨成武同志和谢富治同志商办”。据此,中央成立了由谢富治、杨成武、李天佑、杨奇清、徐立清、李天焕组成的公安部队整编小组,负责提出整编实施方案。

也许是大动荡前的征兆,1966 年 3 月 8 日凌晨 5 时 29 分,邢台发生 6.8 级地震,8000 余人丧生。当天晚上,正在天津参加中共中央华北局书记处生活会的周恩来总理立即召开紧急会议,研究进行救护、救灾工作。第二天一早,即乘直升飞机赶往余震频繁的邢台灾区。

江青在上海组织召开军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的这段时间,彭真组织的《汇报提纲》也在全党有条不紊的布置传达。随着《汇报提纲》的下发,由姚文元的文章引起的又一轮大批判高潮,逐步呈现出学术讨论的趋势,局面趋于平稳。然而,表面的平稳下面,正酝酿着更大的风暴。

在北京学术界贯彻《二月提纲》座谈会的小组会上,《红旗》杂志

社的关锋明确提出:“前一段的政治批判是不是有什么问题,请学术批判办公室的同志指出来。政治批判还让不让搞?能不能联系庐山会议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一针见血的指出了《二月提纲》的问题所在。

3月1日,林涧青和龚育之向许立群和胡绳汇报座谈会情况,首先就谈了关锋的质问。

许立群说:“肯定不能联系庐山会议,这是主席当面点头同意了的。”

胡绳说:“关锋应该好好想一想,为什么主席上一次谈话,说吴晗要罢官,这一次谈话,重新考虑,又说吴晗不罢官了?主席这样站得高。关锋这个同志,思想太偏狭。”

胡绳这话,有很大的分量,他是亲自听到毛泽东两次谈话的人。第一次是1965年12月21日在杭州的谈话。那个谈话讲到《海瑞罢官》的要害在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1959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胡绳、关锋都参加了这次谈话,许立群没有参加。第二次就是武汉这一次,胡绳、许立群都参加了,关锋没有参加。

胡绳还说:“按照武汉谈话的新精神,那四篇送审的文章,都得彻底改写。”

这天,在许立群指定专人整理并以他自己的名义发出的《学术批判问题座谈会讨论简况》中说:“五人小组汇报提纲”是“学术界兴无灭资的纲领性文件”,是“思想斗争的二十三条”,“总结了过去学术批判和讨论的经验”,“中央这样直接地抓学术问题,过去还不多,说明中央很关怀,并且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3月3日,许立群召开座谈会的召集人会。会上,关锋批评许立群:“许立群同志说,‘放’不是钓鱼。这种说法不对……”

许立群大声说:“我讲的话,可能不只有一个指头的错误,如果是四六开,那就了不起。讲得不对的可以批驳。如果听到一点不同意见就蹦起来,那不就是‘学阀’吗?”

《汇报提纲》中提出“左派整风”,“警惕左派走上学阀的道路”,已经成为敏感的话题。此时,许立群又这样说,当然是话中有话。

3月8日,关锋又找林涧青说:“我的文章是根据毛主席的南方谈话写的,怎么不能发表呢?”

林涧青向许立群作了汇报,许立群有恃无恐的说:“他有一个‘南方谈话’,我也有一个‘南方谈话’!我那个‘南方谈话’还在他那个‘南方谈话’的后头呢!”

许立群接着说:“关锋自以为通天,自以为一贯正确。哪有什么一贯正确!你关锋一贯正确?你有个《从陈贾说起》。你邓拓一贯正确?你有个《专治健忘症》。我许立群一贯正确?我说过包产到户可以考虑。都有错误的时候嘛!”

陈伯达参加了《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的修改工作,因此,对毛泽东的思想了解得更为透彻,他负责的《红旗》杂志没有受《二月提纲》的太大的影响,3 月 2 日,依然发表了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所长尹达题为《必须把史学革命进行到底》的文章。这篇文章也曾被中宣部压了一年半。3 月 25 日第四期《红旗》杂志又刊登了戚本禹、林杰、阎长林的文章《翦伯赞同志的历史观点应当批判》。在《红旗》杂志社工作的关锋敢在中宣部组织的座谈会上与许立群公开争论,其背景也就可想而知了。

上海的张春桥对《二月提纲》也是很不满意的,因为这份提纲明显是与毛泽东发表姚文元文章的本意相悖的。但由于这个提纲是由中共中央发下来的,又是经毛泽东看过的,究竟是毛泽东改变了主意,还是彭真有意曲解毛泽东的原意,或者就是反对毛泽东,张春桥一时还没有把握。而且,彭真作为当时权倾朝野的中央领导人之一,他会反对毛泽东吗?他为什么要反对毛泽东?有什么根据说他反对毛泽东呢?这些问题不搞清楚,就无法把握对《二月提纲》的态度。如果彭真是反对毛泽东的,积极地落实《二月提纲》肯定要犯错误;如果是毛泽东改变了态度,《二月提纲》就是毛泽东的意见,那反对《二月提纲》就是犯错误。当然,张春桥觉得,《二月提纲》应该不是毛泽东的本意,这里面一定另有隐情。上海市委没有把握,让宣传部部长杨永直将上海传达讨论《二月提纲》中反映出来的问题汇总后,去北京找中宣部请示汇报,以便决断。

杨永直到北京后,找到了中宣部副部长许立群、胡绳等人,反复询问《二月提纲》中提到的“学阀”是否有所指,均不得要领。

许立群将杨永直提出的问题作了认真的记录,答应请示后即给答

复。杨永直觉得也只能如此了,准备返回上海。

3 月 11 日,许立群将杨永直提出的问题向彭真作了汇报。

许立群说:“杨永直问,学阀有没有具体对象,指的是谁?”

彭真:“你给杨永直打电话,就说我彭真说的,学阀没有具体指什么人,是阿 Q,谁头上有疤就是谁。”

许立群又问:“杨永直问,上海要批判一批坏影片,包括《女跳水队员》,行不行? ……”

彭真:“为什么?”

许立群:“因为有大腿……”

彭真:“你去问张春桥、杨永直,他们游过泳没有?”

许立群:“杨永直还问,重要的学术批判文章要不要送中宣部审查?”

彭真生气地说:“过去上海发姚文元的文章,连个招呼都不打,上海发姚文元文章为什么不跟中宣部打个招呼?”

然后,又怒气冲冲地补充说:“你问他们,上海市委的党性那里去了!”

许立群立即将彭真的答复用电话转告了杨永直。

当杨永直把电话内容向张春桥报告后,张春桥清楚了,他认为:“现在有把握了,这个电话说明中宣部和北京市委是反对姚文元文章的,《二月提纲》的矛头是指向姚文元的,也是指向毛主席的……”张春桥把这些情况报告了江青。

1966 年 3 月 11 日,林彪给“工业交通战线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会议”写了一封信。信中写道:

“我国是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有七亿人口,需要有一个统一的思想,革命的思想,正确的思想,这就是毛泽东思想。有了这个思想,才能保持旺盛的革命干劲,才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

毛泽东思想,反映了国内国际阶级斗争的客观规律,反映了无产阶级、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毛泽东思想并不是劳动人民自发地产生的,而是毛主席在伟大的革命实践基础上天才地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是综合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新经验,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

# 第28回：再批判，罗瑞卿实难承受 三一七，第一次杭州会议

罗瑞卿按照中央的要求写检讨。第一篇检讨交了上去，康生首先就说不行，认为只检讨了一些鸡毛蒜皮的问题，这个检讨过不了关，还要写。罗瑞卿实在检讨不下去，邓小平又来做工作：

“你检讨不出来，就好好读点书，把一些事情好好想想，从思想上提高提高，花上几个月、半年的时间。”

罗瑞卿觉得这样还可以，利用这段时间好好看看书，想想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但是，好景不长，2月22日，遵照邓小平指示，杨成武陪同叶剑英向毛泽东汇报关于讨论罗瑞卿问题的准备并听取指示。二人汇报说，准备召开小型会议，面对面地批判罗瑞卿的问题。叶剑英汇报了会议领导小组的组成、会议的开法和主要解决罗瑞卿反对突出政治、无组织纪律、个人主义思想作风三个方面问题，并做出结论。杨成武报告了2月上旬在广州出席军委第51次常委会议的常委对罗瑞卿问题的看法和意见。毛泽东表示同意。

3月1日，林彪指示：“彻底揭露，彻底批判。其他问题甩开，集中力量开好这个会。肃清党内的危险分子，去掉军内、党内的大炸弹、大地雷。”

3月3日，邓小平和彭真约见罗瑞卿，告诉他：“关于政治挂帅问题，军队政治工作会议对你反映很强烈，常委考虑要开个会，彭真报告主席，主席说，他考虑也要开个会。会议将于明天开始。你可以参加。”

邓小平担心罗瑞卿经受不住党内斗争的激烈场面，提醒他说：“我对挨斗争是有经验的。你要作充分的思想准备就是了。”

邓小平此处所说“挨斗争”是指在中央苏区他因支持毛泽东的主张，被当作江西罗明路线的代表而挨整。

第二天上午,在邓小平主持下,讨论罗瑞卿问题的小组会议在怀仁堂召开,参加者有军委各总部、公安部、国防工办、国防科委、军事科学院和大部分军区、军种、兵种的负责人,以及罗瑞卿本人,共42人。

据参加此次会议的《解放军报》副总编辑唐平铸的记录,邓小平说:“小组成立会,开张,还不是正式进行工作。小组42个人。为什么成立小组,为罗的问题。”

“12月中旬在上海谈了这个问题,根据主席指示,背靠背的方法,罗没有跟大家见面。常委指定恩来和我与他谈,把会议情况告他,要材料看,没有记录。这次会议就有记录,上海会议个人也不搞记录。开始讲了五点,常委、主席说的,一个是问题性质严重的;二是区别于彭黄;三是一分为二;四是方针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五,主席说有内疚,要负责任。常委同志说,书记处说,也有责任。这个问题我们没有察觉,感到有责任。告诉了罗。罗对这个问题表示不同意见,主要是对抗林总、政治挂帅、封锁,与老总的关系。有很多理由说不是事实。即使那方面的问题不说,罗在五个方面有错误,一是关系问题,二是作风问题,三是思想意识问题,四是工作做得不好,五是组织纪律。这五点,每点都承认有缺点,但都有辩驳。在上海,常委、主席决定,不谈上面那问题,就这五点,担任军队工作不适当,多方面的工作不适当,同志意见也很多。方法是调离军委系统的各项职务,罗本人写了封信,后来发了个通知,没有讲任何理由。

这问题不能说已经完了。上海三个小组分别进行,但是没有完。常委、主席指示周、邓、彭继续处理这个问题,帮助罗认识错误改进错误。在上海说过,还有谢富治、陶铸、李井泉也说过。回北京后,彭真、富春、恩来和我都谈过几次,帮助他认识错误的严重性。军队的同志传达了这个问题。政工会议势必接触这个问题,而且很强烈。罗也觉得不是如大家讲的那么严重,总觉得有出入,实际上带委屈的情绪。这个问题怎么办?根据党内向来的办法,摆事实,讲道理,讲清楚嘛。罗区别于彭黄,彭黄的问题也采取这个态度,对王明采取这个态度。”

这里的“彭黄”是指彭德怀和黄克诚。

邓小平说:“可允许同志们把对罗意见讲完,也允许罗把自己意见讲出来。最后怎么样,这总有一个统一的看法,中央做出自己的

决定。”

“还背靠背就扯不清楚了,”“不如花一点时间,把这个问题说清楚。在主要问题上搞清楚,枝节问题、无关紧要的问题,扯多了没有意义,特别是对方针、原则性的问题,大家要扯清楚。根据常委的讨论,向主席报告了,主席同意,考虑需要两步,一步上海式,一步是在一起谈一谈,包括各方面的负责同志,各军区都有人,说清楚对军队的工作也有积极的作用,对毛泽东建军方针、建军路线有益处的。”

“实事求是,对罗也是一看二帮,任何人准许革命,允许他们申辩。”“罗有什么意见都可以讲,不同意就不同意,党从来不强制哪个人承认错误。”

“42 个人小组,并不是哪个为一方,罗也是小组成员之一,有话就讲。”

“会议的进行,中央决定由彭、叶、我三个人主持会议领导小组。我们事情多,到外面去跑,总理要出去,不能靠我们天天搞。另外成立工作小组,叶、谢、肖、杨、王、廖、刘共 7 个人。叶领班。我们有空就听听汇报。”

邓小平说的三人小组,由邓小平任组长,组员是彭真和叶剑英。由于邓小平、彭真不能经常到会,军委还设立了一个 7 人会务组,叶剑英兼组长,成员有叶剑英、谢富治、杨成武、肖华、王新亭、廖汉生、刘志坚。

邓小平继续说:“已经发了十个文件,看一看。开始有些同志讲一讲,领个头,然后罗讲一讲,停一两天。两面的意见提出来,大家好议。”

接着,叶剑英说:“会议的指导思想,小平同志讲得很清楚,我们采取治病救人的方针,向罗提出意见”,“主要抓大的问题,枝节问题扬弃掉。这个问题解决,对罗是教育,对我们建军有非常之重大的意义,对全党全军的意义。希望罗真诚地站在党的利益上来,我们不是个人的意见,个人的恩怨,要抓住原则的方针。”

彭真谈了海军肖劲光、苏振华和空军刘亚楼的问题:“关于肖苏的问题,与主席交换了意见。海军工作是有缺点的,这几年有改进,领导同志有不同意见,这是另一个范畴问题。肖是个好同志,工作中有问

题是另外问题。苏是好同志,彭黄问题是站在中央方面的。苏与罗不是一个问题,工作问题是另外的问题,海军的工作是另外一个问题。与林总商量过。

刘亚楼的问题,从一生来看,是坚决执行主席的路线的。个人毛病相当大,后来有一段罗、刘之间不是没有问题的,一度受了骗上了当,最后向党报告。空军工作总的是好的,也要一分为二。吴法宪是个好同志。”

贺龙说:“这个人很坏的,什么怪事都可以干得出来,林总和中央的安全要注意。他在公安部搞了什么,要防止暗杀,主席指示很重要,看得高,看远,看得深,主席的话是灵的,要大大怀疑,防止出事。他的阶级本质是农奴主,在公安部就有问题。贺说不应让他搬回去,怕他灭证据。(他现在要严看)要儿子学射击,家里有 26 个电话机子。还有一个无号码的机子,十几条枪。总参、总政要抓警务工作,特别是林总的安全。”

肖华说:“这个人是没有改造的大地主。有些枝节问题不要在会上讲,重要问题是突出政治,组织纪律,个人主义,向党伸手。要讲的问题,都要有充分的准备。在大是大非面前,我们的态度和立场要非常明确,不能有任何自由主义,不能有任何的幻想。这个人是个纸老虎。戳穿了就是这么回事。他讲得不对头,可以插话。几个主要发言,其他同志可以补充。有些可以从正面说明,有些可以从反面说明。”

叶剑英:“揭露这件事是空前的,这件事的危险也是空前的,事情的恶劣性质也是空前的。公开在林总面前要国防部长,病人要像病人的样子,不要挡路啊!我是当接班人拥护的,林告我后,我对他的认识一百八十度转弯。这种人拿了军权就要拿党权,已经是书记,副总理,还要什么,这是大地主的集中表现。要用这件事情教育全党全军,要靠四十二条柱子撑着。”

叶剑英说的“四十二条柱子”是指参加中央工作小组第一阶段会议的 42 人,包括罗瑞卿本人。

叶剑英继续说:“要把这个仗打好,情况明,决心大,方法对。三个主题,其它问题就不搞了。材料要一件件落实,做到无懈可击。要明瞭罗的本质,明瞭罗的事实,还要明瞭中央的意图。主席说,搞这种事

的人,总有一伙人,刘、杨、杨、肖四个人经常去。”

叶剑英这里说的“刘”应该是指刘亚楼,肖应该是指肖向荣,二杨不知所指。

叶剑英说:“不可能希望他会好转,这不是一般性的批评自我批评。这个人不能拿枪杆子,也不能做单独负责的工作,只能在党和群众监督下做些具体工作。要看透他的本质,要到劳动中去改造。要狠狠地斗,对这种人就是要残酷无情,他对我们、对林总残酷无情嘛!我们自己有了错误,就作自我批评。通过自我批评揭发他更有力,搞得才深。”

聂荣臻:“这个人的弱点,长期以来看得很清楚,过去谅解,现在不是作风问题,他自己不舒畅,我想找他说,说不进去。”

“我们按党的组织纪律办事。对罗丝毫不能存在幻想,丝毫不能让步,让步军队就会变色,适当时候要做出结论,将来下放不能到大三线。不要看他的表面,要看到他的本质,他是危险人物,要防万一,这场斗争是不可避免的。”

陈毅说:“到一定时候要面对面的斗争,要搞突出政治,两条路线的斗争,第二伸手。”

刘伯承:“对这个人不要低估了。”

徐向前说:“这是个危险人物,林总不在话下,我们更不在话下。专门出风头,到处演讲。”

这次会议改变了上海会议“背靠背”的方式,进行了面对面的斗争,罗瑞卿也天天出席。

当天下午,会议移至京西宾馆。当罗瑞卿来到会场时,大家对他形同路人,没有一个人上前同他打招呼。邓小平主持完“开幕式”即和李富春去“三线”视察,未再出席会议。后来他自己说,是有意逃避了。

叶剑英首先说明了会议的目的和要求,要求罗瑞卿主动交代问题和深刻检讨,并要求其他与会者“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他还规定要对会议的内容保密,任何人都不准外传。

彭真在小组会议和工作会议上提出一些原则性要求:

“发言时要讲大问题,不讲枝节问题;只讲罗瑞卿的问题,不要牵涉别人;只讲站得住脚的材料,不讲无把握、站不住脚的材料。有一条

是一条,是三分不讲成七分,是七分不讲成十分。”他还针对在会上有些人表现得很激动的情况说:

“现在愤慨的人,将来冷静下来是会后悔的,人在火头上和冷下来的时候不一样。冷下来时,人们还想说什么,很难说。”

但是,罗瑞卿仍然没有估计到,会议对他的批判斗争竟是那样无情和残酷。

在第一天的发言中,以装甲兵司令员许光达大将的发言对罗瑞卿的震动最大。在发言中,许光达对罗瑞卿在延安的一些言行进行了揭发。罗瑞卿对此很吃惊,也很生气,想对质,叶剑英没有同意。

当罗瑞卿听到揭发他擅自组织大比武,没有向中央报告时,他申辩说:“不是擅自,是写了报告的。”

但是,当有人当场质问他:“是哪一天写的?”他一时哪里想得起来。让秘书给查,秘书此时也要和他划清界线,不给查。想找一个文件都不可能了。

有人揭发罗瑞卿在抗大任教育长时,作风霸道得很,“为此主席到抗大去开座谈会”,在学校工作的谭希林、张爱萍、王智涛、韩振纪等人对他意见很大,说他高高在上,他的马吃的马料比教员伙食还高,并说罗瑞卿常往女生队跑,马掌都换了几副。会后有人提醒发言人说:“你老兄嘴上没站岗的,那时林总是校长,提议罗为教育长,你是不是说林总护短呀,你是不是借古讽今呀?!”

会议的第二天,叶群从苏州给吴法宪打来电话,问他发言了没有。吴法宪说:“没有。”

叶群叫他赶快发言,同时在电话里再一次重复了上海会议时所讲的“四条”内容。她说,当她再次去刘亚楼那里核实这“四条”内容时,有刘亚楼的妻子翟云英在场。因此,她要吴法宪立即去找翟云英了解情况,还嘱咐他带上秘书,准备在一旁作谈话记录,以便作为旁证。她还叮嘱他,谈完话,一定要翟云英在记录上面签字,然后把这个材料立即送到苏州林彪那里。

吴法宪带着秘书找到了翟云英。没想到翟云英说,她在上海没有听见刘亚楼说到有关“四条”的事情。但后来她又说,当刘亚楼和叶群谈话的时候,她曾经看到刘亚楼伸出过四个手指。这次谈话,吴法宪

叫秘书作了记录,经翟云英签字以后送到了苏州。

会议期间,叶群经常同叶剑英、杨成武、肖华保持联系,了解会议上的发言情况。

在叶群的再三催促下,3 月 12 日,吴法宪和空军政委余立金都在会上发了言。吴法宪在会上扬着那张胖脸,指着罗瑞卿的鼻子怒斥道:“你就是大野心家、大阴谋家,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林副主席,向党伸手,阴谋夺取军权,你跑遍全国看地形,干什么?就是为将来你自己指挥军队,你准备……你……你必须再次做出深刻的触及灵魂的检查!”

吴法宪发言后,很多人认为他是放了一个“原子弹”。

当天,罗瑞卿作了长篇检讨,他在检讨中主要谈到了大比武问题和反对突出政治的问题,承认“这次大比武是我个人擅自决定的。现在看来,重开一次那样兴师动众的南京现场会议,就是一个错误的决定,而且把军委主管训练工作的叶剑英同志撇在一边。”“大比武带来的严重恶果,刘志坚同志归纳了八条,张宗逊同志归纳了四条,全军比武资料上归纳了十条,邱会作同志特别讲了经费、物资、弹药的惊人浪费,在军内外造成了恶劣的影响!”

检讨中,罗瑞卿还谈到了对叶剑英等老帅不尊重等问题。

虽然他对问题上纲很高,什么“严重的路线错误”、“反党性质的错误”等等,说:“我的错误是十万分严重的!有的同志说是犯罪,也不过分,党给我什么处分,我都接受。”“同志们这次所揭发的大量材料,我如果还不觉悟,不在真理面前低头认罪,就太不像样子了。”还表示“请求党重新宣布撤销我有关军事工作的一切职务,撤销我的党内外的一切职务!把我放到领导强的基层单位去改造我,考验我!……”最后大声说:“请同志们继续批判我!揭发我!”

但是他对“野心家”,“阴谋家”,“篡党、篡军”等帽子,均不认同。

罗瑞卿的检讨依然没有通过。有人站起来说:“罗瑞卿,你讲的这些都是‘小鬼’,你要把篡党篡军这个‘大鬼’亮出来。”会议要求罗瑞卿重新检讨。

罗瑞卿离开了会场。大会继续开,并自由发言。有的人提出,要罗瑞卿到会,面对面的接受批判,有的人对罗瑞卿的发言则加以赞扬。

接着,叶剑英讲话。他说:“罗的发言比在上海有进步,承认了错误,也有些自我批评。对罗的发言,要表示欢迎的态度。……对罗还是不搞面对面的批判,不到会也不妨碍大家发表自己的意见。”

从12日以后的几天里,大家纷纷发言批判“四条”,几乎是一面倒地批判罗瑞卿的“野心”。会议的气氛较之“上海会议”更加紧张,与会者的情绪也更加激烈。对罗瑞卿的揭发和批判已从反对突出政治,反对林彪,上升到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阴谋篡党篡军的高度。一些从来没有听说过的事情也出来了。例如:说罗瑞卿上林彪家去说,“病号嘛,就是要休息。”“不要占着茅坑不拉屎。”还在走廊上把猫踢了一脚,大声说:“走开!”

而且,还有人证。那就是林彪的妻子、女儿还有秘书,统统是这些人亲耳听到的。

广州军区副司令温玉成、总后勤部长邱会作在发言中还提出,坚决要求开除罗瑞卿党籍。

在党内斗争中一直是紧跟毛泽东斗争别人的罗瑞卿,真的站在被批判的位置上,面对昔日的好友、同事、部下对自己无情的批判、揭发和斗争,他无法承受,他的头脑快要爆炸了,所有到会的人,不仅见面不打招呼,不讲一句话,而且都是以十分敌对的眼光望着他,他感到太难受了!

最让罗瑞卿受不了的是说他反对毛泽东,反对毛泽东思想。本来林彪说罗瑞卿反对他封锁他、这些问题罗瑞卿还能顶得住。因为他觉得毛泽东是最了解他的,这一切一定是林彪告的状,毛泽东是会把这些事情弄清楚的。在上海会议时,毛泽东就说过:“反对你林彪,还没有反我。”还讲“没有就挂起来,可以挂一万年。”可是现在不是这样了,完全成了敌人,尤其是“反毛主席”的罪名更是他无论如何接受不了的。罗瑞卿生性刚烈,参加革命以来没有经受过这种侮辱。要他承认反对毛泽东,那真是生不如死。

他又听了两天发言,揭发牵涉的问题越来越多,所列举的材料也不少,但罗瑞卿此时手中无材料可查,又无法申辩。要他作第二次检讨,他实在写不出来,于是,给7人小组写了一个正式报告,请求会议发言结束后,停开若干天,给他写检讨的时间。

7人小组的书面答复很快就回来了,说不行。会议一定要在两个礼

拜左右结束,要求罗瑞卿一边听会,一边准备检讨提纲。白天没有时间,可以晚上在家里准备等等。叶剑英把大会揭发罗瑞卿的材料和梁必业副主任的记录稿,及罗瑞卿爱人写给林彪的信等都给了罗瑞卿。

至3月16日,与会者发言批判罗瑞卿的已有23人。3月17日,中央指示,扩大会议范围,请中央、国务院有关各部委及各大区中央局和有些军区、兵种、学院等派人参加。

批判罗瑞卿的会议在北京开得风风火火,江青在上海对那个座谈会《纪要》的修改工作也紧锣密鼓的进行。3月14日晚,江青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

“因为陈伯达同志乘的是下午四点多的火车,我托他带给你的那份座谈会纪要,没有来得及看,他走后我才发现没有加红杠。他那份大概没有来得及加。现送上加红杠的一份,请示。双红杠是你改的,单红杠是伯达、志坚、春桥、亚丁四位同志和我一块商量着改的。好处是有些问题比前一次说的充实一些,缺点是长了些。此外,也恐有不妥之处或不够策略的地方,请指出并修改。我只是不安,怕影响你的睡眠。志坚同志明天回京,亚丁同志尚在这里等。你不要赶,他们的创作会议四月初才开。”

毛泽东收到江青的信和稿子后,再次对稿子作了修改。并于3月17日对江青的信和报送的《纪要》稿作了批示:

“此件看了两遍,觉得可以了。我又改了一点。请你们斟酌,此件建议用军委名义,分送中央一些负责同志征求意见,请他们指出错误,以便修改。当然首先要征求军委同志的意见。”

3月16日,刚从邢台回到天津的周恩来接到毛泽东秘书从杭州打来的电话,通知他们到杭州开会。

3月17日下午17时,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在杭州刘庄毛泽东住处召开,参加会议的有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林彪和彭真等中央政治局委员及中共六大区书记,还有主管文教宣传工作负责人康生、陈伯达、吴冷西等人,国务院有关部委和一些军区派人参加。到会人数由42人增至95人。邓小平没来,他和李富春、薄一波等人,视察崇山峻岭中的三线建设去了。中央常委中,陈云也没有出席。

这天,主要谈罗瑞卿问题。

# 第29回：回首望，将军一跳身名亡 匿名信，陆定一又出问题

3月的北京，大风蔽天，风沙遍野，天昏地暗。从外面往室内看，连日光灯的灯光都变蓝了。罗瑞卿的心情就和这天气一样，灰暗到了极点。

3月18日，这天例外的没有刮风，但天仍是阴沉沉的。上午刚吃完早饭，会议打电话通知罗瑞卿说：今天会不开了。

难道会有什么转机？罗瑞卿苦笑着摇摇头。战时，打完一仗就要进行休整。休整完了，还要再打仗。会议停开，无非是一种休整。下一次开会还不知道有什么样的羞辱会降临他的身上。他怕开会，因为这种会让他有口难辩。但是，此时他更怕不开会，因为开会是大家批他一个人，不开会就更糟，因那意味着会议的主持者们又在研究下一步的计划，意味着对他的批判又要升级。

4个月来，罗瑞卿的脊背上已经承受了太大的压力，随时都可能倒下，他尽力支撑着。如果说，罗瑞卿一直期望着向毛泽东说明事实的真相，但是从这一刻起，从他接到再次暂时休会的通知这一刻起，他却忽然明白了，这一切是不可能的。不是因为事实真相无法替他辨清，而是他似乎感到是那些关键的人物根本不愿意承认这些真相。

这真是一种悲惨的经历。虽然他的感情仍然眷恋着那些他信仰了一辈子的东西，但是他的理智却指着活生生的现状告诉他，那一切都破灭了。他的灵魂的支柱，他的精神的殿堂，他赖以立脚的基础突然之间都哗啦啦地坍塌下去，变成一片废墟。他奋斗了一辈子的东西忽然变得无法理解。他一生中最珍爱的一切忽然变得面目狰狞。生命就是这样在一霎间失去了意义。他感到眼前一片黑暗，毫无希望。此时，种种屈辱、冤枉统统涌上心头，他有口难辩，感到已陷入无可名状的痛苦深渊，他突然想到了死。想求得永久的解脱。除此之外，别无出路。”

郝治平看见罗瑞卿一个人坐在办公室里面,就走进去跟他说:“怎么搞的,看东西也看不下去,睡也睡不着,坐也坐不住,这日子什么时候才能完呢?”

罗瑞卿说:“我也是这个样子。”

郝治平想让罗瑞卿松一松心,就对他说:“现在有一本小说,我看还不错……。”

罗瑞卿对她说:“你觉得那个书好,你就去看那个书吧,我一个人坐在这里想一想。”

郝治平拿着书到隔壁去了。

看到郝治平走出房间,罗瑞卿伏在桌子上写了一张字条。随后,将这张字条放在抽屉里,便到公务员房中取安眠药,尚未将药片从药瓶中倒出,公务员回来看到了,他又把药瓶放回原处。高岗自杀是他负责料理的,他很清楚,公务员要是反映上去,更不得了。于是又回到了郝治平的房间。此时郝治平还在看书,他深情地看了她一眼,说一句:“你在这里好好看书吧”,便走进卧室,脱去外衣,换了一身洁净的睡衣,然后轻轻地走上了通往这座三层楼的顶层的楼梯。

顶楼是储藏室,很少有人来,到处都积满了灰尘,有一扇窗户通往顶楼的平台,他推开小窗,高大的身躯费力地钻了过去,然后从三楼纵身跳下……

郝治平听到屋外有人喊:

“跳楼了!”

“快来人!”

“叫救护车……”

她心想不好,赶紧往楼下跑。当她跑到楼下院子里的时候,救护车已经开进了门。

昏迷不醒的罗瑞卿被送到了北京医院,经过检查,他的肋骨断了两根,因为是两脚朝下直着落地,180 多斤的重量都压在两条腿上,两个脚跟骨粉碎性骨折。

此时,五内俱焚、孤立无援的郝治平跟着人们把他送往三楼,迎面碰上了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汪东兴叫住郝治平对她说:“中央让我告诉你,中央和毛主席是爱护你的,是保护你的,是关心你的。这几

条对罗瑞卿也适用,请你转告。”

心慌意乱的郝治平一边答应说:“噢,”一边往楼上走。汪东兴又追了几步对她说:“你还是早点回家吧,我还有事要找你谈。”

郝治平答应着,还是先来到了罗瑞卿的急救室。她等到罗瑞卿慢慢苏醒过来,立即把刚才汪东兴说的话告诉了罗瑞卿。但是,罗瑞卿的脸上没有任何表情。他只是对郝治平说:“我的抽屉里有东西,是给你的。”

汪东兴见到罗瑞卿的秘书傅国祯,对他说:“你是老秘书了,你要注意,防止郝治平自杀!”

下午15点多钟,郝治平看到罗瑞卿的情况平稳一些了,就赶回家。她惦记着抽屉里的东西。

回到家里,汪东兴已在那里等候。看到郝治平,他又把上午讲的那三句话说了一遍,然后就对郝治平说:“先去吃饭吧。”

郝治平摆了摆手,她哪里还有心情吃饭。

汪东兴见此情景,就对她说:“那你先坐会儿。我上楼看看。”

郝治平突然想起罗瑞卿说的放在抽屉里的东西,就说:“我和你一起上去。”

汪东兴阻拦说:“你就不要去了……”

郝治平不同意,她说:“我就是要上去看看,这有什么关系吗?”一边说一边就向上走,走到三楼的楼梯口,汪东兴又拉住郝治平,说什么也不让她上去。是呀,毛泽东让他转达给罗瑞卿的话,是要罗瑞卿知道,他毛泽东还没有把罗瑞卿看成敌人,还是要用他的。希望他能经受住这次考验,不要做“傻事”。结果汪东兴还没有转达到,竟出了今天这件事,万一毛泽东追究起来,如何是好?

郝治平以为只是组织上对罗瑞卿的物品例行检查,只好作罢,站在楼梯口等着。

汪东兴等几个人上去看了一下,没说什么话,下来后,就坐上汽车走了。郝治平赶紧上楼,跑到罗瑞卿的书房,来开抽屉,急着找罗瑞卿给她留的东西。可是翻了几个遍,什么也没有。

郝治平跑下楼问秘书:“罗瑞卿在抽屉里给我留的东西呢?哪去了?”

“这……这……”秘书支支吾吾得说不出来。

“你说话呀！哪去了?”郝治平心急火燎的催问着秘书。

“我……”

“是不是你们拿走了？啊？说呀!”郝治平大声的逼问。

“我…我…我上交了。”秘书嗫嚅的回答说。

郝治平一听,更急了,她大声地喊道:“为什么？为什么要交上去?那是给我的东西呀!”

“这是组织上的规定。”秘书说。

“那也要给我看看呀！为什么不给我看？啊？我一定要看看!”郝治平坚持着。已经疲惫了一天,心力交瘁的她,此时内心更是上下翻滚,说不出来的滋味。

秘书和其他工作人员见此情景,没有办法,只好向上边汇报。经反复商量,最后终于同意将罗瑞卿给郝治平写的字条拿了回来。

他们对郝治平说:“这就是罗瑞卿给你留的字条。”

郝治平一听,冲过去就要拿。工作人员赶紧将拿着字条的手缩回身后说:

“你别急,你别急。字条是拿来了,但是不能给你。你不能碰。我们拿着,你看。”

“行！行!”郝治平答应道。

工作人员展开手中的字条,只见上面写着:

治平:会议的事没告诉你,为了要守纪律……。

永别了,要叫孩子们永远听党的话,听毛主席的话!

我们的党永远是光荣的、正确的、伟大的,你要继续改造自己！永远革命!

这是罗瑞卿写的那封绝命书。郝治平此时已经心碎了。

京西宾馆批罗会议的3人小组决定由肖华到医院探望,罗瑞卿对肖华说:“揭发我反对林总,真是天大的冤枉,你把我骨头烧成灰,也找不到一点我反对林总的东西。”

3月18日,杭州会议继续进行,毛泽东又问:“小平来了吗?”

秘书说:“回电报了,在大山里,一下子出不来,要走好几天才到飞机场。”

“那就算了吧。”

在回顾党内斗争历史时,毛泽东说:“我在去年九、十月份中央工作会议结束时,专门讲了北京有人要造反,你们怎么办?也不要紧,造反就造嘛,整个解放军会跟上造反吗?”

谈到学术批判问题时,毛泽东说:“我的意见,还要打倒什么翦伯赞呀,侯外庐呀等等一批才好,不是打倒多了。这些人都是资产阶级、帝王将相派。”

谈到编辑《毛选》第五卷、第六卷时,毛泽东说:“我也没有写什么,不如第四卷。毛泽东思想的提法,最高最活,不要那样提,也不要讲顶峰。”

谈到是否参加苏共二十三大问题时,毛泽东说:“我们去不去参加,是一个重大的原则问题。去参加是一个重大步骤,不去参加也是一个重大步骤,都关系我们对中苏关系采取的方针。依我看,我们不能去。我们不去,旗帜鲜明,不拖泥带水。也不必发贺电,只告诉他们说我们不参加就行了。至于十月革命节,那是苏联国庆,中苏之间目前还有国家关系,可以照过去一样发贺电。”

这时,秘书进来叫彭真出去接电话。过了一会儿,彭真回来向毛泽东汇报:“罗瑞卿跳楼,把腿摔坏了。”

毛泽东惊讶的问:“为什么跳楼?”而后,似乎又若有所悟的讲了一句:“真没出息!”

是呀,他知道罗瑞卿性格刚烈,担心他会做出类似于高岗的事情来,特意还关照过邓小平和汪东兴,要注意罗瑞卿的安全保卫工作,结果还是出事了。事情还没有结果呢,自己先挺不住了,毛泽东觉得罗瑞卿真是枉费了他的一番苦心。

大家知道罗瑞卿跳楼的消息,一时群情激愤,纷纷揭发罗瑞卿的问题,或批判他自杀的行为。声讨之声不绝于耳,情绪一边倒,与1965年12月的“上海会议”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上海会议”时,大部分人还是被动地听军队工作的一些人员揭发罗瑞卿的问题,这次则是纷纷主动搜寻、揭发罗瑞卿的问题,光听会上的揭发,罗瑞卿的问题就大了。刘少奇说:“跳楼自杀也要有讲究,应头朝下,他是脚先落地。”此时的毛泽东,即使还想对罗瑞卿留有余地也难了。

叶剑英借用辛弃疾《贺新郎》吟道:“将军一跳身名裂,向河梁,回首万里,故人长绝。”

这天的会议结束前,毛泽东突然转向吴冷西,批评说:“吴冷西、胡乔木,我看你们只是半个马列主义者,半个三民主义者。是不是?你们自己作结论,算不算马列主义?

“《人民日报》登过不少乌七八糟的东西,提倡鬼戏,捧海瑞,犯了错误,要从错误中得到教训。我过去批评你们不搞理论,批评过多次。我说我学蒋介石,他不看《中央日报》,我也不看《人民日报》,因为没有什么看头。你们登学术研究的文章是我逼出来的。你们的编辑也不高明,登了那么多坏东西,没有马克思主义,或者只有三分之一甚至四分之一的马克思主义。

“吴冷西,我看你是半马克思主义,三十未立,四十半惑,五十能否知天命,要看努力。要不断进步,否则要垮台。批评你是希望你进步。我对一些没有希望的人,从来不批评。

“不犯错误的报纸是没有的。《人民日报》要从错误中吸取教训。可能以后还会犯错误,说从此不犯错误是不可能的。问题在于错了就改,改了就好。《人民日报》还是有进步,现在比过去好,我经常看。但要不断前进。当然,你们有你们的困难,你们是知识分子成堆,又是‘公共汽车’,大家都去挤。中央给你们权力,对有问题的稿件,你们有扣压的权力,不管是谁看过的。解决知识分子成堆的问题,办法是要多下去,要蹲点,多接触实际,参加‘四清’是个办法。《人民日报》要考虑打仗的时候怎么办。打得稀烂,你们还要出报,那时候怎么出?”

大家听着,谁也不敢说话。

毛泽东难道仅仅是在批评他的两个秘书?应该不是。大家在心里猜测,都想互相试探一下,了解一些情况,但是谁也不主动,生怕不慎,又卷进一个新的旋涡。陶铸向来以敢讲话著称,这次也很谨慎,没有多说话。

从毛泽东那里出来,吴冷西的心里是七上八下的,自从他主持《人民日报》工作后,一直小心翼翼的,生怕犯错误,结果还是出问题了。问题出在哪里呢?他看见周恩来走在前边,赶快追了过去:

“总理,主席这次批评很重,我什么时候好好检讨一下。”

周恩来劝慰说:“不光是批评你,也是对我们说的。”

虽然周恩来这么说,吴冷西心里还是不踏实。回到西冷饭店,他又找彭真,觉得彭真一直是抓这项工作的,又经常主持中央工作,也许能帮助指点迷津。哪知,此时的彭真已经感觉到情况不对了,毛泽东的矛头很可能是对着彭真来的。彭真说:

“主席的批评不仅对你,也是在说我们。以后工作中多注意吧。”

虽然彭真和周恩来都是在宽慰吴冷西,劝说的话也几乎是一样的,但两人此时的心情和想法却是大相径庭。

随后,杭州会议公布了杨尚昆的问题,主要有两点:一是不顾中央多次关于禁止安装窃听器的决定,背着中央,私设窃听器,私录毛泽东和中央常委的讲话,盗窃党的机密;二是把大量的机密的文件和档案擅自提供给别人抄录,严重地泄露党的核心机密。

私设窃听器,是指1961年的“窃听器案件”。1965年10月,又发现中央办公厅下辖的中央档案馆有“失密”问题。两事虽相隔4年,但账却合起来一起算。杨尚昆调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一职的神秘面纱在中央上层彻底揭开了。

据公安部原副部长凌云1980年对曾任浙江省公安厅厅长王芳说,这次杭州会议后,中央组织有关技术人员,由公安部副部长徐子荣带着,到上海、杭州、武汉、广州等地进行秘密突击检查,没有发现窃听器等问题。

他们在杭州的刘庄、汪庄、南屏和谢家等几个地方,包括毛泽东的座车,都进行了严格的检查,未发现任何问题。随后,要浙江省委第一书记江华签字。江华在签字时说:“这支笔有千斤重啊!”“一块石头总算落了地!”

接着,杭州会议又公布了陆定一夫人严慰冰写匿名信的事情,这又是一件长期困扰中共中央上层社会的一件悬案。

从1960年3月开始,叶群、林彪总是接到内容淫秽、下流的匿名信。信的内容主要是骂叶群性生活淫乱,是延安著名“托派”王实味的情妇,说叶群同陆定一睡过觉,说林彪的孩子不是林彪的。有的信还寄给林彪的孩子们,描写叶群如何做爱等等。有时干脆写在明信片上。不论林彪一家走到哪里,匿名信总是跟到哪里。

有一次,林彪在上海,匿名信又寄到上海市市长曹荻秋的手里,让他转给林彪。

这是一首含有一至十的数字的打油诗:

“搂了一个臭老婆,生了两个兔崽子,封官进爵跳三级,终年四季怕光照,五官不正双眉倒,六神无主乱当朝,七窍生烟抽鸦片,拔(八)光了头上毛,机关算尽九头鸟,十殿阎王把魂招!”

这首打油诗,怎么看都像是在说林彪。他和叶群生有一儿一女,正好是两个孩子。林彪身体不好,害怕太阳晒,传说吸毒,秃顶,又是湖北人,“天上九头鸟,地上湖北佬”,这不是在说林彪还能是说谁呢?

信末的署名是“基督山”。

这些匿名信搞得林家紧紧张张,不得安宁。

一天,陆定一的妻子严慰冰与叶群在商场发生争吵,严慰冰一气之下跑到总政找总政主任肖华告状。

在此之前,严慰冰曾经为叶群的事情专门找过肖华,要向肖华汇报叶群在男女作风上的问题。

肖华一听,赶紧借故推托。严慰冰汇报的事情,至少牵连到两位政治局成员,而且还势必要涉及到其他领导人。严慰冰的父亲严朴和陈云的关系一直十分密切,严慰冰、严昭姐妹的成长也是受到了陈云的格外关注的。以肖华的政治经验,岂能不知这件事的份量?有的汇报可以听,有的汇报是不能听的。

遭到肖华婉拒的严慰冰楔而不舍,仍旧请求与肖华一晤,不得已,肖华只好找来罗瑞卿一起听严慰冰的汇报。严慰冰的汇报主要就是讲叶群的私生活上的事情,滔滔不绝,从延安一路说到北京,而且,还拿出了有关叶群的照片。严慰冰信誓旦旦的告诉肖华等人说,林立衡不是叶群和林彪的亲生女儿,这不仅让罗、肖二人大吃一惊,而且也感到无所适从。

以肖华、罗瑞卿和林彪家庭的关系,林家的一些生活上的小事包括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他们是知道一些的。林立衡和叶群的关系不好,他们也有耳闻。但是,事关林立衡的血缘问题,这还是第一次听说。这种事一旦传开,对叶群的影响自不必说,关键是当时身为中共中央副主席的林彪的脸面将被置之于何地?因此,肖华立刻制止了严

慰冰的谈话,对她说:

“林彪是政治局委员,陆定一也是,你还是要以大局为重。你今天给我们谈的这些事情,到此为止。不要再和其他人谈了。”

肖华这番话也是为了严慰冰着想,像严慰冰这种谈话的方式和内容无疑是要给她和陆定一带来很多政治上的麻烦。可是,严慰冰并没有听从肖华的建议,此后还把这些同样内容的东西写信寄给军委副秘书长办公室,一时搞的军委上下沸反盈天。

# 第30回："女状元"，谁曾想出此下策 终敲定，《座谈会纪要》完稿

这次严慰冰是来告状，肖华尽管头痛，也不得不见。

一见面，尚未坐稳，严慰冰就噼啪啪就连珠炮般地说开了。肖华是江西老表，严慰冰讲的是苏州侬语，气头上说话又快，肖华一个劲儿地摇头，表示听不明白她说的话。双方语言交流出现障碍，肖华拿纸过来，让她把事情写下来，于是乎改为笔谈。严慰冰在纸上写了争吵的经过。

当肖华便拿着这张纸去找叶群了解情况，叶群一看字迹眼熟，他们找出匿名信一对，可不，笔迹完全相同！

总政将严慰冰的笔迹交给了公安部。1963年夏，公安部派六局局长来到严慰冰的工作单位中共中央宣传部，调取严慰冰的档案，查对笔迹，经专家鉴定，确定匿名信是出自严慰冰之手。

其实，此案如果发生在民间，应该不难告破。从匿名信使用的信纸、信封，投寄地点及对林彪行踪了如指掌等诸多线索，都将矛头明白无误地指向中南海内。公安部也已通过对投信邮箱的排查，将作案范围基本锁定在中南海附近。但是，往下该如何进行？没有人吭声了。

更何况，匿名信中常用"王光"和"黄玫"及"王光X"的笔名署名，与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只差一字；有的信封地址干脆写的就是："按院胡同"。

按院胡同是王光美的母亲办的洁如托儿所的地址。

有的信中还写道："咱俩是同学，谁也知道谁"。王光美和叶群曾是北京师范附中的校友，谁敢再往下想？

严慰冰在中南海有"女状元"之誉。她是中共早期的老党员严朴的女儿。严朴出身大地主，和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党员彭湃一样，家道殷实却醉心于革命，而且首先动员农民分自己家的土地，被周恩来称为"三少爷毁家纾难"，在无锡一带农民中威望很高。曾担任无锡总工

会总务部部长、江苏省委特派员。1929 年 1 月参与领导奉贤庄行农民暴动。1930 年夏被调任中共浙南特委军委书记兼红十三军政治委员。1934 年 2 月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国民经济部副部长。此后任中共中央组织部第二科科长,八路军驻西安、重庆办事处秘书长。1949 年 6 月 5 日在北平逝世。6 月 9 日,陈云在《人民日报》发表《严朴同志传略》纪念严朴,并且高度评价了严朴的一生。

严慰冰出身这样的家庭,家学渊源,博闻强记。1937 年夏以第一名的成绩被中央大学中国文学系录取。1938 年 7 月辗转武汉、西安到达延安,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抗大学习。后经李富春介绍,与陆定一结婚。她的文学造诣很深,她写的散文优美动人。建国后,有一次陆定一到毛泽东处开会,中午回家时对严慰冰说:

“今天我们都交了白卷!”

严慰冰问:“怎么回事?”

原来会议间隙,毛泽东问到会的同志:“听说初唐王勃写《滕王阁序》时很年轻,你们谁知道,他到底是多大时写的? 在什么地方有这个证明?”

在座的陈伯达、康生、胡乔木以及中宣部、文化部的负责人等众多中共党内的著名“秀才”,竟面面相觑,一时语塞。

严慰冰听了笑着说:“这有何难! 一说是王勃 14 岁时写了《滕王阁序》,有书为证。”

陆定一惊讶地说:“你说有书为证,快拿给我看看。”

严慰冰从卧室的书橱中,翻开 15 卷的《唐摭言》交给了陆定一说:“你看,这不是。”

陆定一接过书一看,上面赫然写道:

“王勃著《滕王阁序》,时年十四。”

所言属实。严慰冰催促陆定一:“还不快把书给主席送去。”

陆定一却说:“这是你的答案,还是你送去吧,乘主席现在正在吃饭,快去。”

严慰冰骑上自行车,很快就从他们住的增福堂来到毛泽东住处。

毛泽东看到后高兴地称赞严慰冰:“想不到许多大秀才答不出的问题,你能回答。”

他详细问了严慰冰的学历、经历后说:“如果在古时候,你能中个女状元。”

从此,“女状元”作为严慰冰的绰号不胫而走。

但是,很多聪明人的神经也是很脆弱的。

1952 年开展“三反、五反”运动时,中宣部有人怀疑严慰冰和中宣部副部长徐特立的儿媳有贪污问题,在中宣部全体工作人员的大会上,要她们交代问题。后来事情虽然澄清了,但给严慰冰的刺激很深。

陆定一自 1944 年起任中共中央宣部部长。1952 年 9 月,突然被降为副部长,中宣部工作,暂由胡乔木副部长主持。陆定一 1952 年底从苏联回到北京,严慰冰就经常与他吵架。此时中央已调习仲勋任中宣部部长。

严慰冰为什么要写这些匿名信?据说是因为她怀疑丈夫陆定一和叶群有关系,说陆定一曾在延安时期追求过叶群。严慰冰先后写了 50 多封匿名信,其中百分之九十是写给林彪、叶群一家的。

严慰冰和叶群早在延安时期就认识,她们都在延安马列主义研究院学习,只是不同系。1942 年延安开展整风运动,薛明揭发叶群有隐瞒历史、虚报党龄等问题,严慰冰不知从哪里了解到这些情况,也向研究院党组织作了汇报。

后来他们就各分东西了。1961 年底,严慰冰去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看望在那里学习的大儿子陆德,正好林彪与前妻张梅生的女儿,叫林小琳,当时也在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学习。由于林小琳和后母叶群的关系紧张,不愿回家,即使放假也不回北京,只能在学校或到处游荡。严慰冰听到了这些情况,更是大写匿名信痛骂叶群及其一家,当然也包括林彪。

到了 1963 年夏,笔迹鉴定已确认匿名信为严慰冰无疑。此时,公安部六局副局长海宇也从北京医院、华东医院严的病历上了解到,从 1952 年开始,严慰冰就有精神病或偏执性精神病的记载。1961 年 3 月,卫生部保健局电告上海卫生局,通知华东医院院长薛邦祺和精神病科专家粟宗华到北京报到。薛邦祺和粟宗华到京后,又同卫生部副部长史书翰同机飞往广州,为当时和陆定一一起正在广州的严慰冰看病。粟宗华根据薛邦祺介绍的严慰冰病情和体检结果,以及自己所观

察到的,做出严慰冰患有“更年期精神病”的诊断。

根据这些情况,公安部副部长徐子荣、凌云和公安部六局副局长海宇都认为严慰冰的行为是病态,口头向彭真做了汇报。彭真也同意他们的看法,就把此事放下了。

1963 年 11 月,陆定一带严慰冰赴上海治病,仍由薛邦祺和粟宗华负责为严慰冰会诊医治。薛邦祺、粟宗华诊断严慰冰患有“多疑性精神病”,并和一位医生在陆定一的住所,为严慰冰做了 50 次胰岛素休克治疗。陆定一向薛邦祺透露了严慰冰给林彪一家写匿名信的行为。

说话到了 1966 年 2 月。一天,彭真约陆定一到他家,将一叠材料交给他,对他说:

“这是公安部转来的一批匿名信的照片。他们经过长期调查,认为这些匿名信是严慰冰所写。这些信绝大部分是写给叶群一家的。”

彭真接着说:“林彪是党的副主席,写他的匿名信,这个问题就被认为是政治问题。许多信署名王光 X,发信地址是用王光美母亲托儿所的地方,自然会被看作是挑拨中央常委之间的关系。而且,不少信是用明信片写的,等于公开的传单。”

陆定一对彭真说:“严慰冰写匿名信,我根本不知道。林彪有几个孩子,叫什么名字,今天看了匿名信才知道,以前不知道。她怎么会写这些匿名信,真是不可想象。有些字迹显然是严慰冰写的,有些字看不出来。为了确证,我可以去把严慰冰的笔迹取来,请您给公安部核对。”

“好吧,你自己也要注意安全。”彭真说。

下午陆定一回到家中,若无其事的问严慰冰:“你现在临帖有进步吗?给我看看你写的字。”

严慰冰拿了她写的毛笔字交给陆定一。陆定一看了一下,放在写字台上。

随即,严慰冰又拿了一张用钢笔写的字,这是一封未写完的信,也给了陆定一。

陆定一显出几分严肃,问严慰冰:“你知道不知道王光美母亲托儿所的地址?”

“我不知道。”严慰冰回答。

“林副主席有几个孩子,叫什么名字?”

这些严慰冰知道,一一说了。

“你是否常用明信片写信?”

“只写过一封,是给瑞儿学校里的。”

“写过匿名信没有?”

“没有写过。”

“精神好的时候没有写,精神不好的时候写过没有?”

“没有。”严慰冰似乎有点紧张。

第二天,陆定一把这些字迹送到彭真家里。过了几天,陆定一在中南海怀仁堂开完会后,彭真拿了公安部退回的字迹给了陆定一,说:

“公安部已查对,匿名信确是严慰冰写的。中央常委讨论过,认为严慰冰是危险分子,但决定保护你,要你离开严慰冰,住到医院去。”

陆定一说:“家里发生了这样的事情,我应当引咎辞职。我无大病,没有理由住医院。”

彭真说:“中央相信你不会参与此事,现在不要考虑辞职。你还是住院好,由卫生部通知你。”

陆定一回家后,把彭真退给他的字迹还给了严慰冰,其中一页的一角因彭真批字后撕去了,严慰冰问为什么被撕,他推说是他不小心撕破的。

2 月 4 日,彭真打电话给卫生部长钱信忠,说严慰冰和陆定一吵架,陆定一没法工作,要他安排陆定一住院。

2 月 8 日,陆定一同彭真、康生等人到武汉向毛泽东汇报和请示《汇报提纲》的事情,严慰冰也到机场送迎。回北京后陆定一直接住进北京医院,未回家中。陆定一本来就有消化系统不好的毛病,因此严慰冰没有产生怀疑,还常常到医院来探望。

陆定一住院期间,两次到中组部长安子文家,商讨严慰冰问题。

2 月 18 日,根据彭真、陆定一的指示,由卫生部部长钱信忠、卫生部副部长史书翰、卫生部副部长兼北京医院院长黄树则等人在卫生部某处为严慰冰会诊,会诊的目的:(一)“病人”这些表现是思想意识问题还是病态?(二)若是病,是什么病?如何解决治疗问题?(三)对病势的估计如何?(四)治疗方法,在什么地方治疗?病人不承认自己

有病,如何使她接受治疗?

医生根据严慰冰的病史进行讨论分析,都认为严慰冰患有猜疑性(偏执性)精神病,提出可去香山疗养加药物治疗,或用电休克等。

2 月 20 日,陆定一到彭真家向他汇报会诊情况。

2 月 21 日,钱信忠、史书翰通知卫生部医疗处请上海的粟宗华来京为严慰冰会诊。2 月 22 日和 23 日,仍在卫生部某处为严慰冰会诊。专家们同意严慰冰属于“歇斯底里性格基础上产生的偏执状态”。有的医生“提出是否可以去四清,加药物治疗”,还有医生则建议使用胰岛素休克加电疗等。

3 月 4 日晚,由史书翰出面组织一次大规模会诊,这次会诊专门讨论有关严慰冰的“治疗”安排的问题。会诊后,史书翰亦亲自带领医生去北医三院挑选精神病病房。

1966 年 3 月的一天晚上,周恩来将公安部部长谢富治、副部长刘复之和凌云找去,谈严慰冰写匿名信的事。

中央觉得陆定一住在北京总是不便。这时周恩来对他说:“你最好到外地去,时间越长越好。”

陆定一一直想去看看江西的劳动大学,这次他就想先去江西。他对彭真谈了自己的想法和周恩来的意见,彭真同意了。

3 月 6 日,陆定一离开北京,7 日到达上海,到车站迎接他的是主管文教的书记张春桥和杨西光。陆定一此时还没有忘记和他们讨论《海瑞罢官》的问题。他批评上海说:“你们发表姚文元的文章不跟中央打招呼是不对的,还是要遵守党的纪律嘛。”

张春桥说:“上海市委已经决定,把所有关于《海瑞罢官》的正反面文章,都在《文汇报》上发表,以引起重视和讨论。”

第二天是“三八”妇女节,陆定一听说上海已能生产坤表,但只有半钢的一种,男用表倒有好几种。他买了一个坤表和一个男表,并写了一封信,连同手表托华东局宣传部长夏征农顺便带回北京,交给严慰冰。还是夫妻情深,难舍难弃呀。

陆定一在上海只住了一晚,第二天即启程去南昌,这是他第一次来南昌。因此,在南昌安顿下来后,他就去参观南昌起义纪念馆。杭州会议自然是没有通知他参加了。

3月10日,中宣部副部长张子意找李富春,李富春不在,又找康生,送上严慰冰会诊情况报告。康生说,中央常委未委托他管此事,叫去找彭真。

11日,彭真打电话叫张子意、许立群去,给他们看严慰冰匿名信照片,指示要安排严慰冰离开中南海。

这就是在杭州会议上提到的严慰冰匿名信问题。

3月18日,江青通知刘志坚和谢镗忠、李曼村到上海,参加《纪要》定稿问题。

3月19日上午,刘志坚和谢镗忠、李曼村到达上海,下午江青就召集他们和已在上海的陈亚丁、张春桥一起,看毛泽东修改过的稿子,并征求意见。

刘志坚等人都表示没有什么意见,刘志坚只是提出:"'重新组织文艺队伍'的提法,涉及到对整个文艺队伍的评价,起码部队文艺工作方向是对的,队伍也是好的。能否把'组织'二字,改成'整顿'。"

江青说:"毛主席已经同意了,不能改了。"并把毛泽东3月17日批示拿给大家看。

张春桥也说:"不要犹豫了,改了这么长的时间了,我觉得可以了!"

江青说:"如果你们没有意见,这就算定下来了"。并交代说:"斗争很复杂,周扬在苏州养病,听说我在同你们座谈文艺问题,好紧张,跑到上海来看春桥,打听消息,春桥没有告诉他。你们回去后,没有正式传达前不许外传,要保密,这是一条纪律,定下来一定要守纪律"。还说"这个稿子要给林总一份"。

这时,毛泽东在标题上又加上了"林彪同志委托"六字,变成了《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集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这六个字,使"座谈会"的地位一下子提高了许多。

既然是"林彪同志委托",《纪要》必须得到林彪的首肯。于是,江青要陈亚丁为她起草了一封致林彪的信:

林彪同志:

根据你的委托,我于二月二日至二十日,邀请刘志坚等四位同志就部队文艺工作问题进行了座谈。座谈后,他们整理了个座谈纪要送

给你和军委其他领导同志,也送给我一份。我看了,觉得座谈会纪要整理得不够完整,不够确切。因此,请春桥、亚丁两位同志座谈修改,然后,送主席审阅。主席很重视,对纪要亲自作了修改,并指示请伯达同志参加,再作充实和修改。我于三月十日至十五日,请伯达、志坚、春桥、亚丁四位同志一起讨论修改后,已送主席审阅,主席再次作了修改,并于十七日批示:“此件看了两遍,觉得可以了。我又改了一点,请你们斟酌。此件建议用军委名义,分送中央一些负责同志征求意见,请他们指出错误,以便修改。当然首先要征求军委各同志的意见。”十九日,我又请志坚、春桥、镗忠、曼村、亚丁五位同志一起座谈,大家一致同意这一纪要。现将座谈纪要送上,请审批。

此致

敬礼!

江青

一九六六年三月十九日

# 第31回：抓警卫，总理再查广播局 “大革命”，“上海谈话”震北京

3月20日上午，毛泽东在杭州会议上谈到学术界、教育界的问题时说：

“过去我们蒙在鼓里，许多事情都不知道，事实上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在那里掌握着。我们对民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是区别于买办资产阶级的。这是改变苏区政策。这种区别是很灵的，把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同买办资产阶级等同起来是不对的。现在，大学、中学、小学大部分被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地富出身的人垄断了。解放后，我们把他们都包下来，当时包下来是对的。现在要搞革命。没有五年到十年的工夫批评一下，讲点道理，真正培养、教育出一批接班人，就都要控制在他们手里。现在学术界和教育界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掌握实权。社会主义革命越深入，他们就越抵抗，就越暴露出他们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面目。现在要保几个，郭老、范老是要保的，其他的人不要保了。发动年轻人向他们挑战，要指名道姓。他们先挑起斗争。我们在报纸上斗争。

“两种办法，一种是开展批评，一种是下乡劳动、半工半读、搞四清。再一个，我们的政策是不要压制年轻人，让他们冒出来。接班要那些年纪小的，学问少的，立场稳的，坚决的，有政治经验的。”

“我们要培养自己的年轻的学术权威，不要怕年轻人犯‘王法’。”

“宣传部不要卡死，不要搞成从前的农村工作部。”

中央农村工作部在合作化运动中表现右倾，1962年又主张包产到户，被毛泽东批评为“十年来没做一件好事”，于1962年被撤销。

“……这是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不然将要出修正主义。出修正主义的就是这一批人，如吴晗、翦伯赞都是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他们俩都是共产党员，共产党员却反对共产党。现在全国二十八个省市中，有十五个省市开展了这场斗争，还有十三个没有动。

“……还有你那个北京刊物《前线》,是吴晗、翦伯赞的前线。廖沫沙是为《李慧娘》捧过场的,提倡过‘有鬼无害论’。阶级斗争展开的面很广,包括报纸、刊物、文艺、电影、戏剧。阶级斗争很尖锐,很广泛,请各大区注意一下,学校、出版、报纸、文艺、电影、戏剧各方面都要管。

“尹达这篇文章发表出来了,写得好,各报都应当转载。尹达是历史所长,他是赵毅敏的弟弟。他的文章是1964年写出来的,压了一年半才发表。对青年人的文章,好的坏的都不要压。对吴晗、翦伯赞,不要剥夺他的吃饭权,有什么关系。不要怕触犯了罗尔纲、翦伯赞等人。”

在林彪谈到“要学毛主席”时,毛泽东说:“我在这里说一句,要突破,要创造,不要只解释,不要念语录,不能受束缚。列宁就不受马克思的束缚。不要迷信,要有新的论点,新的解释,新的创造,不然不行。”

20日上午,杭州会议结束。

23日,北京召开书记处会议,落实杭州会议精神,就是要在思想、文化战线开展文化革命。

林彪在上海收到江青派人送来的信及附来的《纪要》大字排印本,知道毛泽东已经亲自阅定,立即按照毛泽东的意见批转军委常委们。他叫来正在上海的刘志坚,要他代为起草一封给军委常委的信。3月20日,刘志坚让陈亚丁执笔起草了一个稿子送去,林彪认为调子太低,陈亚丁又改了一遍,加上一些对“纪要”评价的话,又送林彪审定。3月22日晚,林彪改毕定稿,全文如下:

贺龙、荣臻、陈毅、伯承、向前、剑英常委诸同志:

送去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请阅。这个纪要,经过参加座谈会的同志们反复研究,又经过主席三次亲自审阅修改,是一个很好的文件,用毛泽东思想回答了社会主义时期文化革命的许多重大问题,不仅有极大的现实意义,而且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十六年来,文艺战线上存在着尖锐的阶级斗争,谁战胜谁的问题还没有解决。文艺这个阵地,无产阶级不去占领,资产阶级就必然去占领,斗争是不可避免的。这是在意识形态领域里极为广泛、深刻的社会主义革命,搞不好就会出修正主义。我们必须高举毛泽东思想伟

大红旗,坚定不移地把这一场革命进行到底。

纪要中提出的问题和意见,完全符合部队文艺工作的实际情况,必须坚决贯彻执行,使部队文艺工作在突出政治、促进人的革命化方面起重要作用。

对纪要有何意见望告,以便报中央审批。

此致

敬礼!

林彪

一九六六年三月二十二日

林彪向刘志坚等人交待:“你们回去后,把这封信和《纪要》分别送给军委各位常委,看常委有什么意见,如果没有意见就送给中央,由中央来批发。”

毛泽东又从杭州来到上海,仍然下榻于西郊“414”的花园别墅。

3月24日,毛泽东再次审阅并修改了《纪要》。这次修改,又改动了四处。修改后,给江青写了封信:

江青:

各件都看了,都同意。只在《纪要》内的几处,增加了少数文字,或者改了几个字。请酌定。现在原件退还给你。

毛泽东

3月24日

毛泽东几次对《纪要》的修改,都是非常认真、字斟句酌的。他在修改时写道:“过去十几年的教训是:我们抓迟了。只抓过一些个别问题,没有全盘地系统地抓起来,而只要我们不抓,很多阵地就只好听任黑线去占领,这是一条严重的教训。”

3月27日,周恩来在杨成武、总参作战部长王尚荣、北京市公安总队总队长吕展及丁莱夫等陪同下,再次检查广播事业局大楼的安全警卫情况,当时广播事业局机关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北京电视台均在同一大楼内。周恩来指示要制定警卫应急方案、指定应急支援部队、播音室前要有战士守卫、大楼院内不能开门太多、广播剧场不能对外,等等。

3月28日及4月12日,周恩来又分别检查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位于北京市郊的两个发射台:双桥491台、沙河573台的安全警卫工作。

3月28日上午,毛泽东在上海会见宫本显治率领的日本共产党代表团,并共进午餐,康生、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赵毅敏、华东局书记魏文伯、中国日本友好协会秘书长赵安博参加。

这天,康生受中央常委会委托,向毛泽东汇报中日两党代表在京会谈的情况,汇报时华东局书记魏文伯和江青也参加了。康生报告说:

"主席,中日两党联合公报已经商定,日共总书记宫本显治再三坚持,不愿在两党联合公报里点名批判苏共。"

"少奇同志的意见怎么样?他在出国之前,是怎么处理的?"毛泽东抽着烟问,两天前,3月26日,刘少奇偕同夫人王光美和外交部长陈毅及夫人张茜前往巴基斯坦访问。

"少奇同志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讨论后表示同意了,认为应当尊重宫本显治的意见,照顾日共的困难。"康生回答说。

毛泽东看了会谈公报的草稿,很不满意地说:"这算什么?无头告示。不点名批评苏修,怕鬼,旗帜不鲜明,不痛不痒。"

毛泽东亲自在公报草稿上做了重大修改。他不仅在公报上,公开点了苏联共产党的名,强调反对以苏共领导为中心的现代修正主义是当前的主要任务,强调反对中日两党内的修正主义,并指出有人叫喊反对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实质上反对马列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

对毛泽东的修改,宫本没有同意,双方对公报最终未取得一致意见,这些是后话。

汇报完国际问题,康生搁下手中笔,压低声音道:"主席,还有一点情况,要向您汇报。"

毛泽东问:"什么事?"

"是这样的。"康生把身子倾向毛泽东一侧,低声说:"我觉得,《汇报提纲》下发后,全国的学术讨论方向有问题,不是在搞文化革命,而是向学术方向发展。如果按照这个提纲做下去,全国学术界,就会鸦雀无声,一潭死水。彭真同志是不是还是在保吴晗?"

江青插话说:“是有问题,彭真3月11日通过许立群给上海市委宣传部杨永直打电话,质问上海发表姚文元的文章为什么不跟中宣部打个招呼,上海市委的党性到哪里去了!这分明是整到毛主席头上了嘛。”

毛泽东看了一眼魏文伯问:“是这样吗?”

“是的。”魏文伯回答。

毛泽东听后,猛地吸了一口烟,十分恼怒地说:“再不发动文化大革命,老的、中的、小的都要挨整了。”

随后,他口气又稍微和缓一些地说:“《汇报提纲》是错误的,是非不分。当时没有明确指出,以为是常委讨论的,还是要尊重集体的意见。不过,在原则问题上,我是决不让步的。”

3月29日上午,毛泽东在上海再次会见由宫本显治率领的日本共产党代表团,康生、赵毅敏、魏文伯、赵安博在座。毛泽东说:“看来公报发表不成了。不发表公报没什么要紧,发个消息就是了。公报这种东西,是一种形式主义。你们原先是不愿意发表的,是我们向你们提出的。我说这样不对,应该由你们提。今天如果发联合公报,双方都不愉快。公报不发表了,双方都没有精神负担,轻松愉快。”

这天,毛泽东同康生谈话,说:“北京市委、中宣部包庇坏人,要解散。为什么批评吴晗不能联系罢官,不能联系庐山会议?告诉彭真,不要包庇坏人了,要向上海道歉。学术批判要走群众路线。当然不要像1958年那样否定一切,要发扬58年精神,去掉58年的缺点,要试点。”

3月30日下午,毛泽东又约康生、魏文伯、赵毅敏、江青、张春桥等人过来谈《汇报提纲》的问题。他说:

“所谓的‘五人小组汇报提纲’混淆阶级界限,是非不分,压制群众,包庇坏人,搞这个提纲是错误的。”

毛泽东接着说:“十中全会不是讲过嘛!中央不是决定各省成立反修小组?吴晗写过那么多谈论海瑞的文章,北京各报发表那么多宣传鬼戏文章,为什么中宣部不打招呼,而发表姚文元的文章却偏偏要跟中宣部打招呼呢?难道搞阶级斗争还要告诉中宣部、北京市委、彭真吗?十中全会做出的进行阶级斗争都不算数了?邓拓、吴晗、廖沫

沙三人写的《三家村札记》和邓拓写的《燕山夜话》,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北京市委为什么不批判?为什么学术界、历史界、文艺界可以不搞阶级斗争?孙悟空闹天宫,你是站在孙悟空一边,还是站在天兵天将、玉皇大帝一边?"

"什么叫学阀?那些扣压左派稿件,包庇反共知识分子的就是学阀,包庇吴晗、翦伯赞这些'中学阀'的人是'大学阀',中宣部是'阎王殿'。学术批判文章不要送审。你是阎王殿,小鬼不上门。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打倒党阀,解放左派。要支持小将,保护孙悟空。再不支持,就解散五人小组、中宣部、北京市委,不管哪个省市委。我讲的解散中宣部、北京市,你(指康生)告诉彭真没有?也不仅是中宣部、北京市,中央有些部不做事,包庇坏人,统统要取消。有些部长、副部长不做事,科长做事,改成科算了。我历来主张,凡中央机关做坏事,就要号召地方造反,向中央进攻。地方要多出几个孙悟空,大闹天宫。去年9月会议,我问各地同志,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

他转过头问魏文伯:"你们怎么不传达?中央出修正主义,很可能出,这是最危险的。现在有些人怕孙悟空造反,站在玉皇大帝方面,不站在孙悟空方面,怕字当头,就非垮台不可。我们要站在孙悟空方面,要保护左派,左派写文章,谁不犯错误。

"我写《新民主主义论》,改了几次,就是有错误嘛。列宁手稿也改得很多。许立群专门搜集关锋的文章,不搜集吴晗的文章,要批评。我们要保护左派。尹达有两句话是对的,学问少的打倒学问大的,年纪小的打倒年纪大的,历史上都是这样。我最近同乔木谈,书不可不读,多了也没有用。中国历史书太多了,我们有些军区司令,如许世友他们,也不懂宋元明清,但他们会打仗,会阶级斗争。解放后,我们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包下来,当时是对的,但革命越深入他们越反抗。他们实际掌握了文、史、哲、经、电影、出版等等事业,对他们一个是要驳倒,一个是给他们饭吃,有职无权。我也保过吴晗,但是因为不知道他的底,他少年时代就拍胡适的马屁。斗争要有策略,一个学校批评两三个人,他们就不能不讨论,不要太多。要区别对待。郭老、范老这两个老要保护。郭老是好人,功大于过。胡适讲共产党不懂学术,郭老搞古代史就很有成就。"

有人插话:“郭老在海南岛写了两首诗,发点牢骚。”

毛泽东说:“郭老写两首诗不算什么,他是个杂家、学术批判可找二、三个有代表性的人,不可过多。姚文元关于海瑞修吴淞江的事,海瑞修水利是榜上无名的,修水利还不如张居正。海瑞的平离策要好好批判,他还画了地图,很反动的,要好好加以批判。

我们面临着文化大革命。现在写文章的人许多我都没见过。李希凡写一篇文章,调到《人民日报》,做了人大代表,再没有写出好文章。关锋是不是人大代表?……但是也有危险,年轻人要注意,现在学校历史系不出历史,文学系不出文学。报刊编辑、记者很复杂,保皇党很多。中央机关还有保皇党,好比孙中山和康梁。必须进行这场文化大革命,反对修正主义。”

“谁也会犯错误。姚文元,放在市委,这个办法好。文化革命能不能搞到底,政治上能不能顶住?中央会不会出修正主义?没有解决。”

他转向康生,不无伤感的说:“我们都老了,下一代能否顶住修正主义思潮,很难说。文化革命是长期艰巨的任务。”接着,他又十分坚定地说道:

“我这一辈子完不成,你们也要坚持完成,必须进行到底。”他的话深深地感染了在座的每一个人。江青马上表示:“主席放心,我们一定会进行到底的。”

魏文伯、张春桥也纷纷点头表示赞许。

毛泽东又对康生说:“你告诉彭真,许立群的问题,他必须打电话向上海市委道歉。中宣部没做过好事,总是被动,压制别人的积极性,不准革命。”

“要支持左派,建立队伍,进行文化大革命。中宣部和北京市委包庇坏人,压制左派,不准革命,如再包庇坏人,中宣部要解散,北京市委要解散,‘五人小组’要解散。”

3 月 31 日,康生从上海回到北京。他不敢怠慢,立即向周恩来、彭真详细汇报了毛泽东的谈话。周恩来非常重视,指示康生,马上召开书记处会议,传达毛泽东的指示。

彭真也意识到事态的严重,他本能的为自己分辨一句:“我没有要包庇吴晗,我只是主张‘放’的方针,‘五人小组汇报提纲’可以修改

一下。”

康生按照毛泽东的指示,组织左派队伍。他连夜又向钓鱼台的写作班子作了传达,并且,把王力留下来,帮助整理毛泽东的谈话记录,作为他向中央政治局传达的蓝本。

这时,王力提醒康生说:“现在是彭真在主持中央书记处工作,主席的讲话是批评彭真的,他怎么主持传达?还是要请邓小平同志回来,由他主持传达。”

康生想了一下,马上拿起电话,向正在宝鸡视察三线建设的邓小平报告说:

“小平同志吗?我是康生。主席有重要指示,是关于彭真同志的,……对……请你回来主持传达……是……”

还没有说几句,邓小平就回答说,他马上回来。是啊,如果说1965年12月解决罗瑞卿问题的“上海会议”是中国政局上层的一次强烈地震,那么,这次康生带回北京的“毛主席上海谈话”就犹如是放了一颗“政治原子弹”,对北京引起了更大的震撼。

# 第32回：急转弯，京城内一片慌乱 抛邓拓，是否能躲过此劫

3月31日晚，周恩来听完康生的传达后，又赶往石家庄、宁晋、冀县等地，视察并部署抗旱和邢台地震后的救灾工作。但是，他并没有忽略毛泽东的上海谈话。4月2日，他给毛泽东打电话表明了自己的态度：

“主席的指示康生同志回来后已经向我和彭真同志传达了。我完全同意主席的指示，《五人小组汇报提纲》是错误的。我已经安排康生同志准备召开书记处会议，讨论毛主席指示。”

当晚，他在邯郸致信毛泽东并中共中央书记处。信中说：

“31日康生回京，传达主席指示。与彭真、康生商定，拟开书记处会议，遵照主席指示，提出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大旗，彻底批判文史哲方面的反动学术思想，彻底揭露这些学术权威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立场，并拟按此方针，起草一个中央通知，送主席审阅。”同时，周恩来在信中指出：“前送主席审阅的五人小组报告是错误的，拟由书记处召开五人小组扩大会议，邀集上海、北京有关同志加以讨论，或者进行重大修改，或者推翻重写。”

“我31日晚到石家庄，4月1日到第二次地震重灾区五个地方看望群众和伤员，晚到邢台……2日到6日我在邯郸，视察各地打井抗旱春播生产工作，拟每隔10日回北京一次。如有急事，当由彭真同志告我赶回。”

4月1日，彭真指示刘仁、万里召集市委常委兼市委教育部部长张文松、宣传部长李琪、《北京日报》社社长范瑾等人在北京市人委交际处开紧急会议。北京市委书记万里在会上传达了彭真的话：

“‘三家村’的事情要解决，不解决不利，否则更被动，对邓拓的本质要有一个认识，这是个好人，但是世界观有许多不正确的认识。”

会上，决定由刘仁、郑天翔、万里组成“市委三人领导小组”，由张

文松、李琪、范瑾、市委大学科学工作部副部长宋硕组成“四人办公室”。

“三家村”是北京市委刊物《前线》在1961年开设的一个专栏,由邓拓发起,联络吴晗和北京市委统战部部长廖沫沙3人主笔,全名叫《三家村札记》。

毫无疑问,解决“三家村”的问题,就是解决邓拓的问题。

邓拓,年仅24岁就完成了第一部《中国救荒史》,署名“邓云特”,被列入商务印书馆著名的“中国文化史丛书”之中。他在26岁那年当上《晋察冀日报》总编辑,37岁成为《人民日报》总编辑,是中共党报史上最出色、最富有个人魅力的人物之一。当时传说要邓拓去给毛泽东当秘书,被他谢绝了。邓拓私下说过一句:“伴君如伴虎。”但中央还是决定让他列席政治局会议,以便了解中央精神,及时在报纸上宣传贯彻。

可惜好景不长,1956年春夏之交,刘少奇、周恩来意识到经济过热,基本建设规模过大,导致财政赤字和原材料紧张。于是,刘少奇主持中央工作会议,明确经济发展要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既反保守又反冒进的方针,实际上是以反“左”、反冒进为主。刘少奇指示中宣部按照会议精神写篇《人民日报》社论。

中宣部对《人民日报》的社论初稿很不满意,组织人重写,陆定一部长亲自在部里召集讨论,多次修改后送刘少奇、周恩来审阅。刘少奇和周恩来都亲笔做了修改,并提出一些斟酌意见。陆定一根据这些意见又把社论打磨了一遍,最后呈报刘少奇、毛泽东审定。

毛泽东在社论清样自己的名字处画了个圈,批下4个字:“我不看了。”

面对毛泽东退回来的社论清样,邓拓犯难了。以往只要是《人民日报》的重要社论送审,毛泽东都会发表意见。富有党内工作经验的邓拓当然明白:这一回毛泽东是不赞成发表这样的社论。但不发吧,反冒进又是刘少奇和周恩来以中央工作会议做出的决定,《人民日报》加以宣传义不容辞。最主要的是,邓拓本人内心是同意社论观点的。

想来想去,最后邓拓下决心从中央的两种声音中做出选择,发表社论,只是悄悄留了个心眼:过去社论排4号字,他改成了较小的5号

字,避免特别醒目。

社论在1956年6月20日刊出,仍然深深地惹恼了毛泽东。他后来在1958年1月南宁会议期间解释说:“骂我的东西我为什么要看?”“文章好像既反左又反右.但实际上并没有反右,而是专门反左,而且尖锐地针对我的。”

1957年春天召开了最高国务会议和全国宣传工作会议,毛泽东在这两次会上都作了讲话,以一代雄才的胆略,借“百家争鸣”,鼓励“大鸣大放”,号召对共产党进行整风。

邓拓依照党内传统理念,不能接受这种体制外的“大鸣大放”。当《光明日报》《文汇报》等民主党派报纸畅所欲言,热议时政的时候,《人民日报》在宣传造势上表现得十分消极。对毛泽东鼓励“鸣放”的最高国务会议报告只发简要新闻,不发社论;对毛泽东在中共宣传工作座谈会的另一篇讲话,连新闻都没有发。还发表了不赞同“鸣放”的文章。

这年的4月10日,毛泽东对邓拓的积怨终于发作了。他在中南海召见《人民日报》几名负责人,对邓拓劈头盖脸一顿痛骂:

“过去我说你是书生办报,不对,应当说是死人办报。”

毛泽东说,《人民日报》对他的最新讲话精神“按兵不动”、“无动于衷”,是“同中央唱反调”。

邓拓解释说:“过去中央曾有规定,党的会议不发消息,主席讲话未公布前,也不引用。我对这件事没有抓紧……”

毛泽东打断邓拓的辩解,不留情面地说:“不是没有抓紧,而是根本没有抓!”

毛泽东当面质问几位副总编为什么不起来造邓拓的反。他越说越生气,指着邓拓的鼻子尖刻地评价道:“我看你很像汉元帝,优柔寡断。你当了皇帝非亡忘国不可!”

事已如此,邓拓只好提出辞职:“我不知道自己像不像汉元帝,不过我实在是感到能力不够,难以胜任,希望主席撤掉我的职务。我几次诚心诚意提出过这个请求。”

毛泽东说:“我就不相信你那么诚心诚意!你只知道汽车进、汽车出,养尊处优。”

时过不久,5 月,邓拓又在《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杂文《废弃“庸人政治”》,开篇即说:“看到最近发生的一些事情,我突然领悟了一个道理,这就是唐朝的陆象先所谓‘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的确,我们有的同志,不知道为什么,天天忙忙碌碌,做出一些大可不必做的事情。他们不管对什么都不肯放手,都要抓,而且抓得死死地。”

他说:“凡是凭着主观愿望,追求表面好看,贪大喜功,缺乏实际效果的政治活动,在实质上都可以说是‘庸人政治’。”

接着,他引用陆游的诗句“庸医司性命,俗子议文章。”将“庸人政治”与误人的庸医相提并论,批评“那些天天怕出乱子,天天喊叫‘放不得’的人”是“庸人自扰”、“瞎操心”。

在他看来,“一切主观主义,不可一世的夸大奇才,其实不过是真正的庸人而已。”矛头所指,清晰可见。难怪此文一发表,邓拓又向胡乔木作了检讨。

1957 年底,毛泽东将吴冷西从新华社调到《人民日报》任总编辑,邓拓改任社长,实际上是靠边站,不让他管事了。1958 年 1 月,南宁会议上,在邓拓走进会场时,毛泽东当着与会者,又批评邓拓是“教授办报、书生办报、死人办报”。当年 8 月,他即被免去《人民日报》社长职务,调到北京市委担任书记处书记,主管文教。

1959 年 2 月,在报社为他举办的欢送会上,他当场吟诵了《留别人民日报诸同志》一诗:

笔走龙蛇二十年,分明非梦亦非烟。
文章满纸书生累,风雨同舟战友贤。
屈指当知功与过,关心最是后争先。
平生赢得豪情在,举国高潮望接天。

邓拓对毛泽东对他的批评,不以为然。他离开《人民日报》后,有一次《人民日报》理论组编辑王若水和一个同事去看他,谈到 1957 年被批评的事,他仍然耿耿于怀,激动地说:“将来历史一定会做结论的!”“反右”之后,邓拓也曾私下说,幸亏《人民日报》当时“按兵不动”,不然,还不知道报社有多少人犯错误、被打成右派呢。

到了北京市委,邓拓办报之心难移,又亲自主办了北京市委机关刊物《前线》杂志。

1961 年,邓拓应《北京晚报》的要求,在该报上开设了一个专栏:《燕山夜话》,署名马南邨。邓拓曾解释说:“燕山是北京的一个主要的山脉;夜话,是夜晚谈心的意思。”

《燕山夜话》开篇的文章叫《生命的三分之一》,在这篇短文的最后,作者说:“我之所以想利用夜晚的时间,向读者同志们做这样的谈话,目的也不过是要引起大家注意珍惜这三分之一的生命,使大家在整天的劳动、工作以后,以轻松的心情,领略一些古今有用的知识而已。”

《燕山夜话》创办以后,颇为读者称道。受此启发,邓拓又打算在他主持的《前线》上开设类似专栏,对现实生活中的某些问题有所针砭。

1961 年9 月的一天,《前线》编辑部邀请吴晗和廖沫沙到北京四川饭店聚餐。在座的人并不多,除邓拓、吴晗、廖沫沙 3 位之外,只有《前线》编辑部的人。

入席前,坐在沙发上抽烟喝茶,邓拓似乎很随便地谈起:“《前线》也想仿照别的报刊‘马铁丁’‘司马牛’之类,约几个人合写一个专栏,今天就是请你们两位来商量一下。听说‘马铁丁’他们是 3 个人合用的笔名,我们也照样是 3 个人取个共同的笔名。既是 3 个人,就干脆叫《三家村札记》行不行?”

三家村,原指偏僻的小乡村。出自宋代诗人苏轼《用旧韵送鲁远翰知洛州》:“永谢十年旧,老死三家村。”

他所说的“3 个人”,就是邓拓、吴晗、廖沫沙。

3 人合用的笔名如何取法,最后确定一人出一个字,吴晗出“吴”字,邓拓出“南”字,因为邓拓的笔名叫“马南”,廖沫沙出“星”字,廖沫沙当时的笔名是“繁星”。专栏的名称与合用的笔名“吴南星”就这样定了。

从 1961 年 3 月 19 日“夜话”发表第一篇文章《生命的三分之一》开始,到 1962 年 9 月 2 日发表《三十六计》为止,邓拓在短短一年半中就在《北京晚报》的《燕山夜话》专栏,发表了 152 篇杂文。从 1961 年到 1964 年,他还在自己主编的中共北京市委机关刊物《前线》开辟“三家村札记”专栏,与吴晗、廖沫沙合作以“吴南星”的笔名发表杂文随

笔,其中他写了大约18篇。这些杂文都是在“大跃进”之后、三年自然灾害的大背景下发表的,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对当时的社会弊病进行了辛辣的嘲讽,虽是借古讽今,却遮掩不住批判的锋芒。

1962年9月,“三家村”中的邓拓以“把业余活动注意力转向其它方面”和“为了避免自己对自己老有意见”为由,首先中断了《燕山夜话》专栏的写作。1964年,“三家村”中的另外两家吴晗和廖沫沙,也分别因主张对传统道德应批判地加以继承和称赞了昆曲《李慧娘》,遭到批判。《三家村札记》被迫停止。这就是“三家村”的由来。由于“三家村”的锋芒过漏,很早就有人提出批判。同时又因为其文笔极好,很受年轻人的欢迎。

此时的北京,毛泽东的“上海谈话”不仅让彭真紧张和慌乱,《人民日报》社的吴冷西听了康生的传达后,同样惶恐万分。4月1日,他也赶紧向《人民日报》社透露:“彭真受到毛主席的严厉批评;毛主席说《二月提纲》是完全错误的。”

编辑部的工作人员听到这个消息犹如晴天霹雳,感到不可理解。自从姚文元的文章发表后,吴冷西一直是紧跟彭真的,《人民日报》也是按照彭真的意见执行的。虽然很多人隐约感到姚文元文章的后面可能有毛泽东的支持,但是,彭真毕竟是在主持书记处的日常工作,应该是代表中央的。如果彭真这次犯了错误,吴冷西也危险了,《人民日报》怎么办?

联想到3月份杭州会议毛泽东的批评,吴冷西后背一个劲儿的发冷,他很着急,现在能做的,只有和彭真一样,赶快在工作上做出姿态,紧跟毛泽东的指示,减轻自己的错误。他通知《人民日报》:

“要赶快抓从政治上批吴晗,从‘罢官’要害上批《海瑞罢官》的文章。五人小组办公室扣压了两篇左派文章,《红旗》和《光明日报》很快要发表,你们赶快派一位副总编辑亲自去《光明日报》商量,《人民日报》力争要同时发表。”

“《光明日报》要是不同意呢?”编辑部的人员考虑到《人民日报》此时的处境,为难的说。

“唉,我找康生同志商量一下吧。”吴冷西叹了一口气说。

由于康生出面,4月2日,《人民日报》总算求到与《光明日报》同

日见报。这篇文章就是戚本禹的《〈海瑞罢官〉和〈海瑞骂皇帝〉的反动实质》。

中宣部更加紧张,许立群慌忙找吴冷西商量,希望尽快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周扬在去年底布置“方求”写的那篇攻“要害”的文章。

此时,已经听到消息的邓拓也在4月2日找到彭真,询问毛泽东对他的看法,彭真劝慰他说:“事情并没有最后下结论,我还要再向毛主席解释,希望他能调查研究,改变他的看法。”

此时的彭真还要抓紧准备他自己的检查。4月2日下午,他亲自打电话叫来了吴冷西、胡绳,一起长谈了两、三个小时,商量修改彭真的检查。修改后,彭真立即派人把它送交毛泽东。

4月5日,《人民日报》又转载了《红旗》刊出的关锋、林杰写的《〈海瑞罢官〉和〈海瑞骂皇帝〉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两株大毒草》。《红旗》杂志在刊载这篇文章时特别在结尾处注明文章的完稿日期是1966年1月。告知世人,这篇文章被人扣押了两个半月。

4月5日这天,彭真在他家里开会,与会者的名单都是他亲自圈定的,有许立群、吴冷西、姚溱、胡绳、李琪、万里、郑天翔、陈克寒、林默涵、范若愚、王力、张文松等17人。彭真心情沉重地对大家道:

“我在合作化、镇反、工商业改造、农村工厂四清、国际反修等方面,都不是落后分子,‘四清’搞得也可以,唯独学术批判没有抓紧,在学术方面是落后分子。这是因为上学迟,知道的情况少。”

他说:“我的严重错误在于‘放’,吴晗的问题出来后,总想再放出来些,想再放出几个吴晗出来,结果是幻想。……

“现在看,新的观点不容易放出来了。‘放’的时期过去了,已经放得够了。现在要分头把过去各方面放的尖锐的东西清理一下。要取消清规戒律,不要受任何束缚,烧着谁就是谁。吴晗问题已经差不多了,到定案的时候了。”

对于左派,他说:“左派是革命的,有时发表一些错误意见,是难免的。小平同志讲,中央书记处会议上的发言,百分之八十正确就够了,斯大林还三七开呢。不要把次要的东西当作主要的。邓拓政治上拥护总路线,但思想上相当乌烟瘴气,对他还是要一分为二。他在1月5日开始检讨,不是个别的问题。多少年来写了许多文章,总会有错误

的。钓鱼台写反修文章,还写六七稿,修改十几遍呢。”

晚19时30分,北京市委书记处开会,由郑天翔主持,通过了北京市委关于邓拓所犯错误向中央、华北局的报告。在定稿时,彭真将报告中邓拓“反毛泽东思想、反社会主义”一句删去,又把“根据邓拓的请示,解除他书记处书记的职务”改为“最近邓拓同志要求免去他市委担任的职务,到下面去锻炼,我们准备在党内批评以后,再作组织处理。”

# 第33回：出简报，许立群进退失据 齐声唤，批罗会再起波涛

4月7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方求”那篇攻要害的文章。但是删去了文末所署的一月的日期。这是吴冷西的意见，他觉得，如果现在强调中宣部那时就写了攻要害的文章却不发表，对中宣部不好。此时，他还想着关照许立群。

但是，发表“方求”文章并没有为中宣部争得多少主动。报刊上再次掀起高潮的批判运动，其部署和组织，完全把中宣部抛在了一边。还传来各种各样的一些小道消息。

许立群十分沮丧，紧张。他叫来中宣部具体负责学术批判工作的工作人员龚育之和林涧青，郑重其事地对他们说：

“毛主席批评了《汇报提纲》，也批评了我。毛主席说，杨耳从前的尖锐性哪里去了？”

杨耳是许立群用过的笔名，当年贾霁、杨耳批判电影《武训传》的两篇文章，是那场批判电影《武训传》运动的发难之作，它的尖锐性大概给毛泽东留下了深刻印象。

龚育之和林涧青追问许立群：“在武汉汇报的时候，毛主席到底是怎么说的？”

许立群支支吾吾地说：“我可能没有听懂毛主席的意思。是我没有听懂毛主席的意思。”

许立群还说：“康生还批评我，说我专整左派的材料，不整吴晗的材料，为了整关锋，还用了考据学的方法，考证‘何明’就是关锋。”

龚育之赶紧说：“吴晗的材料部里科学处整过的呀！”

许立群一听，忙说：“是吗？你们赶快拿来我看看。”

当龚育之和林涧青将材料拿来后，许立群一看，又叹了一口气，说：“整了这些材料，又不署名，人家怎么知道？你们立即把这些材料开一个目录，注上整理的单位和印发的时间，印在这一期上送的简

报上。”

没有想到,这期简报又惹了麻烦。康生指责许立群说:“批评你不整吴晗的材料,你就送来这样的简报,是什么意思?你这是抗拒批评!”

这些批评,让许立群更加不知所措,简直有点精神恍惚。

4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编辑文章:“吴晗同志写《海瑞罢官》的政治目的是什么?”

暂且放下社会上批判《海瑞罢官》不表,回头再看军队的“批罗”情况。由于罗瑞卿自杀未遂,3月22日,北京的“批罗”会议进入第二阶段,根据党中央指示,增加了53人,包括党中央、国务院有关部委和各中央局的负责人和第一阶段未参加会议的军区、兵种、军事院校的负责人。第二阶段参加会议的共95人。这一阶段的会议,由于罗瑞卿不能到会,转为背靠背的斗争。

叶剑英在会上作了题为“彻底粉碎罗瑞卿同志篡军反党的阴谋,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奋勇前进”的主要发言。

其他人的发言也都是有准备的,言辞更加激烈。从杨成武、王尚荣、雷英夫3人在这次会议上的联名发言——《坚决捍卫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彻底粉碎罗瑞卿同志篡军反党的阴谋》中可见一斑。该联名发言材料称:

“罗瑞卿同志的错误,不是一般性质的错误,不是偶然性质的错误,不是个别问题的错误,不是盲目性质的错误,而是路线错误,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阴谋篡军,阴谋搞颠覆的严重罪行,他妄想用资产阶级世界观来改造我们军队,他企图通过各种阴谋手法,达到篡军反党的目的。我们和他的斗争,是党内、军内一场尖锐的阶级斗争,是两条道路的斗争,是革命不革命的斗争,是一场大是大非的斗争。

“罗瑞卿同志擅自决定大比武,反对突出政治,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毛主席的军事路线,推行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错误,很多同志已进行了系统的揭发和批判。大家都讲得很好,事实俱在,铁证如山,罗瑞卿同志不论如何狡辩,也是抵赖不了的。

“多年来,他目无组织,锋芒毕露,横行霸道,个人独断。他不尊重

毛主席、党中央、军委和军委常委各同志。对毛主席、党中央、军委和林彪同志所提出的许多方针政策和重要指示,不是阳奉阴违,任意歪曲,就是公开唱反调,拒不执行。……他公然反对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污蔑仇视我们敬爱的领袖毛主席。他千方百计地反对林彪同志,折磨林彪同志,向党伸手,逼林彪同志让贤、让权。……大量事实说明,罗瑞卿是一个根本没有无产阶级感情的人,是一个野心家、阴谋家、伪君子,是我们党内、军内的极端危险分子”。

联名发言举了众多事例,对罗瑞卿“在组织上的滔天罪行和伸手夺权等”九个问题作了“分述”。

公安部长谢富治在会上作了题为《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肃清罗瑞卿在公安工作中散布的资产阶级毒素》的发言。他在发言中说:

“我完全拥护中央这次会议对罗瑞卿的反党活动所作的彻底揭露和严肃批判。对于罗顽固地坚持反党立场,拒绝党的教育,可耻地用自杀的背叛行为来同党对抗,我们十分愤慨。”

谢富治的发言全盘否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任公安部长在建国初期10年的成绩。他说:

“罗在公安部工作了10年。他在公安工作中也曾经散布了大量的资产阶级毒素。现在,我就下面几个问题,发表一些意见。

(一)‘十无运动’是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阶级斗争,反对社会主义的

1958年,罗大搞‘十无’,……他在很多地方、很多场合,极力鼓吹和推行无反革命、无盗窃、无流氓阿飞、无火灾、无车祸之类的‘十无运动’。

(二)目无组织,目无纪律,对抗中央领导

(三)对公安工作必须实行党委领导的根本原则阳奉阴违

(四)一贯不认真实行群众路线,搞神秘主义和关门主义

(五)以罗为鉴,接受教训

罗是一个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者,……他过不了社会主义这一关,走上了反党的道路,是不奇怪的。”

会上除批判罗瑞卿外,还捎带批判了刘亚楼、中央军委原办公厅主任肖向荣、总政治部副主任梁必业3人。

总政治部主任肖华在会议发言时说：

“我们对刘亚楼同志的看法是一分为二的”，“刘亚楼同志是个极端个人主义者，也有个人野心，当了罗瑞卿同志的工具”。“还有肖向荣同志，是反对毛泽东思想的，在罗瑞卿同志的包庇怂恿下，帮助罗瑞卿同志干了很多坏事”。“梁必业同志和罗瑞卿同志的关系也是很不正常的”，“梁必业同志跟罗瑞卿同志跟得很紧，在许多重大问题上和罗瑞卿同志一唱一和，对林彪同志突出政治的指示采取阳奉阴违的态度”。

杨成武、王尚荣、雷英夫的联名发言，与叶剑英、谢富治、肖华在同一会议上的发言，构成了中央工作小组关于罗瑞卿错误问题报告的主要框架。从罗瑞卿反对学习毛主席著作，到坚持资产阶级军事路线，擅自决定全军大比武；从反对突出政治，搞折中主义，到向党伸手，进行篡军反党活动；从“一言堂”到封锁林彪和不尊重军委常委各位老帅；从这次会议上罗是“假检讨，真对抗，猖狂反扑”，跳楼自杀和遗书问题，到建议撤消罗中央书记处书记、副总理职务等等，全面、系统地揭发批判了罗瑞卿。罗瑞卿的不少事情是他们的发言中揭发出来的。比中央上海批罗会议详细的多。

接到康生电话后，4 月 4 日下午 13 时 30 分，邓小平很快从延安乘飞机回到北京。4 月 5 日，他看了彭真报送的处理罗瑞卿问题工作小组《关于罗瑞卿同志错误问题的报告（草稿）》。4 月 6 日，与彭真一起到周恩来处谈话。4 月 8 日，出席中共中央处理罗瑞卿问题工作小组会议。邓小平在会上说：

“我同意工作小组的报告。我认为，解决罗的问题，是党的一个重大胜利。我们没有察觉，林总首先察觉，很负责地向中央、主席提出，嗅觉比我们灵敏得多。主席亲自关怀、指导这个斗争。罗的问题性质是严重的，比上海估计的还严重得多。我们还是帮，希望他改正错误。开始是背靠背、调离军队，他抵触情绪很大，只有面对面。来了个自杀，自己作了结论，无非是抵抗到死。”“是不是还有不可告人的事，最少说明抗拒到底。”

“让这样没有党性、作风这样恶劣、资产阶级思想充满脑袋的人掌握军队是极危险的。退一步说，即使没有个人野心，向党伸手，凭他那种思想作风也是危险的。他确实是个隐患，拔除这个隐患就是个大胜

利。何况他又有伸手问题。一旦天下有事,那就不堪设想。”

“罗瑞卿的错误性质,同意报告中指出的,是在社会主义革命斗争中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军内的反映。”

“罗是资产阶级极端个人主义者,不是普通的,而是极端的。过去只知道他锋芒毕露。他私心很重,我字第一,个人打算很多,不能得罪他,得罪他一句,成百倍地回敬你。”“他不守纪律是一贯的,走后门,不走正门,走邪道,不走正道,不搞党的正常生活,而且背后搞鬼。在我们党内,一切问题都可以经过党的原则来解决。”“罗的错误也没有什么,改正就行了。十年改正就行了。但是他是不会改的。我们不是因为他十年,犯了军事路线错误,而是他的错误与个人野心结合起来。他在党内不守纪律,发展到狂妄的地步,对林总那样恶劣、伸手。军队的大权已经到他手里了,放手让他工作,书记处也让他工作,希望他搞好,但他有个人打算,发展到伸手。高、彭也是这样的。”

“毛主席所以是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就是他始终抓阶级斗争。不抓阶级斗争,就不会不断革命。斯大林就是不抓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客观事物的真实反映,不仅现在,一百年,几百年以后还有。”“罗的问题提醒我们,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彭、高、罗的问题都是阶级斗争的反映。作为教训,不能忽略这个问题。”

“书记处对罗的问题,失于察觉,只知道一般的问题,我们有责任。主席了解得更深,林总提出,主席马上就抓住。”

“对罗的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结论,……我赞成撤消书记处书记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

彭真说:“这次会议取得了大的胜利。其实他一跳就作了结论,目的是为了消毒。”“军队一定要掌握在忠实于党的人的手里,决不能掌握在罗那种人手里。”“这个会开得好,方法好,领导得好。有人说太文了,我们是抓大问题,不抓细节,表现了高度的原则性和严肃性。”“罗善于造谣、抵赖,在铁的事实面前他也无法抵赖。”“将来是不是罗会说冤枉了他?我看不冤枉他。说他是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反对毛主席军事路线,反对四个第一,说他是资产阶级个人野心家、品质恶劣,逼林总让位,篡军反党,是不是事实?这些问题也是逐步升级的。他能推翻哪一条,我们可以取消。但是根本的、主要的问题,恐怕是准确的。”

“一定要守纪律,特别是高级干部靠谁来监督,如果不守纪律,不按组织原则办事,那是极危险的。”“罗喜欢听小话,不走正路,搞阴谋,搞地下活动。如果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为什么要搞地下活动?有了错误可以纠正,林总在1960年以来就批评过他多次,他不听,有意见也不对总理、总书记讲。”

“胜利以后党内出了不少问题。六年一次,有点偶然性,也是必然的,是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一百年,几百年都会有。罗的错误性质是资产阶级性质。”“吴晗这个人是反党的,我和老虎在一块睡觉,也未察觉。阶级斗争反映在各个方面,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我们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党,是战无不胜的。”

周恩来说:“这个会开得好,同意工作小组的报告。林总揭发了罗的反党问题,主席亲自抓了这个问题。罗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极端个人主义的野心家。他有修正主义思想,他是反马列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他坚持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必然反对无产阶级军事路线,反对四个第一,反对突出政治。个人主义到了一定气候就要向党伸手。”

“我支持这个会议,讲一点历史教训。我们党生于忧患,多事之秋,不是太太平平的。不仅帝反修阶级敌人包围我们,也在考验我们。我们生产力的发展也在初期,对自然力、天灾、地灾,我们都还在摸规律,这些都是好事,都对我们是考验。主席引用过一句话:‘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无论对阶级敌人,还是对自然敌人,我们都是在‘备战’,都在战斗。”

“我们党犯过两次右倾机会主义,三次左倾机会主义,前后12年,党还是战胜了,原因是有毛泽东思想。五次错误中,我在最后两次负有很大责任。武汉时期也有责任,受到教育。党在胜利中前进,在错误中受到教育。使我们认识了领袖。遵义会议,整风,七大,从思想上、组织上取得了胜利,错误不会影响我们前进。”“王明、张闻天这些人是反党的,我们党涌现了领袖毛主席。”

“不但是胜利,错误也从反面论证了主席的正确性,主席、少奇、小平同志都受过打击,历史证明他们是正确的。林总跟主席跟得很紧,有许多发挥,罗都要伸手。”

“罗这个野心家掩盖不住个人的欲望,他不是突然的,是由量变到

质变。在‘遗嘱’中要老婆孩子相信党,自己却不相信。自杀是反党行为,两封信就是反党。党是很信任他的,给他很高很大的职务。常委有责任。我们接触多,没有察觉出来。彭德怀有不同意见还可以保留。罗自杀不仅是向党示威,还证明他有不可告人的目的。双脚下地是不是自杀,还要继续考查。”

“我是犯过路线错误的。我们对罗没有察觉,要提高警惕性。当然也不可神经过敏,无中生有。”

这天,批判罗瑞卿问题的军队系统京西宾馆会议结束。

调往广播事业局负责安全保卫工作的陆军第63军参谋长王寿仁于4月8日这天,乘坐周恩来的专机赶至北京履任。5月30日,中央正式任命王寿仁为广播事业局副局长。

接着,邓小平主持了4月9日到12日的中央书记处会议。周恩来亲自参加了这次书记处会议。会上,首先由康生传达了毛泽东3月底在上海的谈话,并且,系统地批评彭真在这次学术批判中的所犯的一系列严重错误。他说:

“这个《提纲》是对抗文化大革命的,是反党反毛主席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我虽然也是五人小组的成员,但彭真偷偷摸摸地背着我,根本不同我商量,这完全是一种阴谋活动。”

尔后,陈伯达从政治路线方面批评彭真的‘严重错误’。他系统地‘揭发’彭真在民主革命的各个时期的‘错误’,进而说明在社会主义革命深入开展的今天,跟不上毛主席的部署的必然性。在讲到当前的阶级斗争形势时,他说:

“党的最大威胁来自混进党内的修正主义,来自邓拓、吴晗、廖沫沙一类的党内资产阶级代理人,他们是为国际上帝、修、反推波助澜的最危险分子”

彭真和周恩来等到会的中央领导人,做了初步检查,表示“一致同意主席的批评和指示”。

彭真在会上除了作检查,还一再表示:“我只是在这方面坚持我的意见,那就是我过去、现在和将来都不会反对毛主席……”

最后,周恩来和邓小平指出,彭真的错误路线,是同毛主席的思想对立的,是反对毛主席的。

会议初步决定:撤销《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王力奉命代中央起草了一个通知:

中共中央通知,1966年2月12日中央批转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现予撤销。

在北京的中央常委周恩来和邓小平等看了这个《通知》,并且电告在上海的毛泽东。

毛泽东对这个《通知》很不满意。他说:“这不说明任何问题,没讲为什么撤销。《通知》不应当是技术性的,应是理论性的。叫陈伯达重新组建班子,另行起草通知。”

陈伯达领会毛泽东所说的《通知》“应是理论性的”,也就是从理论的高度批判《二月提纲》,他说:“那是要我写一篇大文章呀!”

陈伯达知道,这是毛泽东对他的极大信赖。他选定王力合作,自己主稿,王力协助,两人很快在钓鱼台写出了初稿。

初稿出来后,陈伯达、王力和康生、吴冷西、姚溱又讨论、修改了几次。一次,在钓鱼台8号楼讨论《通知》初稿时,彭真也参加了。康生提出:《二月提纲》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文件”。

彭真听到这句话,苦笑着说:“那好吧,要提就提个够吧!”

3月30日,中央军委的请示报到了中央:

中央、主席:

军委常委同志一致同意《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认为这是一个在文艺工作方面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很系统很完善的文件,部队必须坚决贯彻执行。现送上这一纪要和林彪、江青同志的两封信,请审批。

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

一九六六年三月三十日

4月1日,毛泽东在彭真送审的中央转发《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集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的指示稿上写下批语:“已阅,同意。退彭真同志。”

到了4月10日,中共中央重新批发了《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撤销了彭真起草的中央的第一次批语,另换了新的批语。

# 第34回：写《通知》，新成立文革小组 聚西湖，二次开杭州会议

4月12日，书记处会议结束，会议最后决定：

（一）拟以中共中央名义起草一个通知，彻底批判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汇报提纲”的错误，并撤销这个提纲；

（二）成立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组，由陈伯达任组长，报毛主席和政治局常委批准。

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组组长由陈伯达担任是毛泽东提议的。当周恩来代表中央向陈伯达提出由他担任这一职务时，陈伯达却忸怩不肯接受，说：“我能力不行，不能胜任，还是换别人吧。”

如此再三，周恩来急了，对陈伯达说：“你作为共产党员，难道中央不能分配你的工作了？”

陈伯达赶紧说：“不是这个意思，不是这个意思。我是怕影响党的工作。既然中央相信我，那我就试试，努力做好。”

“好吧。你抓紧拟个名单出来，把小组成员定下来，报书记处研究。”周恩来进一步交代他。

陈伯达想：小组成员首先要有江青，从批《海瑞罢官》到《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能够看出，江青对毛泽东开展文化革命的想法是最清楚的，这次批彭真的《二月提纲》也和江青有关，因此，江青不能少。其次是康生、吴冷西，他们是原五人小组成员，又是毛泽东点名的《通知》修改人员，自然不能少。考虑到以后要大量的起草文件，他把几位得力的“左派”人物王力、关锋、戚本禹、尹达、穆欣列入名单。其实，4月1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张春桥在上海已经草拟了一份《对〈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汇报提纲〉的几点意见》，于是，又写上张春桥的名字。另外，再加上总政的刘志坚、陈亚丁，他们都参加了《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的起草和修改工作。

很快，陈伯达就将小组成员名单交给周恩来。

书记处会议一结束,吴冷西便找《人民日报》和新华社有关负责人吹风。吴冷西说:“中央正起草一个文件,彻底批判《二月提纲》,你们赶快写一篇批《二月提纲》的社论。在继续批判吴晗的同时穿插一些批判翦伯赞的文章……”并叮嘱:“以后学术批判稿件不要再送中宣部审定,要自己独立负责。”

吹风一完,吴冷西又飞往上海修改文件去了。

4 月 12 日,周恩来、邓小平、彭真联名,由邓小平执笔,将中央书记处会议情况及《中央撤销 < 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 > 通知稿》、《关于罗瑞卿同志错误问题的报告》一并报告在杭州的毛泽东。

当天,周恩来在视察北京某地电台时,嘱中央广播事业局党委第一书记丁莱夫把全国的电台布局图,包括中央直属台、战备台,分类分颜色在一张大图上标出送来。

陈伯达重新起草的《中央撤销 < 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 > 通知稿》送毛泽东时,康生又提出一个重要的建议:“光有通知还不够,应该搞一份大事记作为附件,一起下发。”

于是确定,陈伯达主持起草《通知》,康生负责起草《大事记》。

4 月 14 日,毛泽东对 12 日报送的《中央撤销 < 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 > 通知稿》作了一些修改,并写信通知江青:

江青:

送上北京来件二份,请你们研究一下,有何修改?我已请康生、伯达诸同志于今日或明日去上海同你们共同讨论一次,然后由康生、伯达二同志于十六日夜间来此地作报告,最后定案。

毛泽东

四月十四日上午八时半

同时,毛泽东写信给周恩来、邓小平、彭真,通知他们:

恩来、小平、彭真同志:

四月十二日的信及附件,收到阅悉。请康生、伯达同志和其他可能去上海的起草小组同志于今天(十四日)或明天去上海,同上海的同志商量一下文件问题,然后请康生、伯达二同志于十六日夜间或十七

日上午来此地。

你们可于十六日来此。

各中央局是否要来人,请你们酌定。

毛泽东

四月十四日上午九时

有一些修改,请斟酌。送恩来、小平、彭真、康生同志。

毛泽东

四月十四日上午

当天,周恩来放下毛泽东的电话后,立即把刘志坚叫到钓鱼台8号楼,对他说:

“中央确定你和陈亚丁到上海参加一份中央文件的讨论和修改,你们俩把工作安排一下,尽快去上海。”

从4月10日起至15日,彭真连续召开北京市委常委会议研究如何对“三家村”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以争取主动。他们要求所属各级党组织对吴晗、邓拓、廖沫沙进行批判。。

北京市委准备在4月16日的《北京日报》上组织批判“三家村”的文章,他们从10日开始就在起草编者按。15日上午,彭真再次召集刘仁、郑天翔、万里“市委三人领导小组”和张文松、李琪、范瑾、宋硕的“四人办公室”商定编者按的写法,下午18时许,市委常委又开会讨论关于“四人办公室”起草的“4.16”编者按。讨论后立即送到彭真的家里,由彭真亲自修正定稿,并决定明日见报。第二天彭真要赶到杭州开会。

担任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的邓拓被停止了工作,呆在家里。他和罗瑞卿一样,对党内斗争的残酷性没有充分的思想准备,期待着有一天能向党说清楚《三家村》和《燕山夜话》的创作思路和写作意图。

4月的一天,北京市委机关来了几个人到邓拓家,收走了中共内部仅供高级干部阅读的报纸——《大参考》,同时通知他,以后不再给他送《大参考》了。邓拓问为什么,他们说:是上级的指示。邓拓有点激动,希望今后还能看到《大参考》,来人没有理他,拎着那些《大参考》走了。邓拓跟在他们身后还在说:

“能不能继续把《大参考》给我一份。”

那些人走了,邓拓回到书房里。他坐在那里,一句话也不说。

一本《大参考》,不过是党的高级干部的一种待遇,但此时的邓拓却把它当成是一种象征,一种党仍然信任他、认可他的象征。现在这个象征已不复存在……

从15日开始,各大区书记及中央要员陆续接到通知前往杭州开会。

参加杭州会议的人员大部分仍然住在西泠饭店。彭真来的较晚,一到杭州,他就找到毛泽东的秘书徐业夫,说:“我要求和主席见面,只讲20分钟。请你转告。”

但是这次,毛泽东没有单独与他见面。

和彭真一起乘飞机到杭州的叶剑英,在西泠饭店看见华北局第一书记李雪峰,就问他:“这个会议是干什么,3月不是刚开了会?”

李雪峰说:“我也不知道。”

叶剑英说:“送彭真上飞机时,彭真和我讲了两句,说现在又出事了,他出事了?”

“书记处开会了,毛主席批评了五人小组的汇报提纲。”李雪峰是书记处书记,他讲了一下康生在书记处会议上传达的毛泽东的讲话精神,然后问叶剑英:“彭真和罗瑞卿的问题有没有关系?”

叶剑英说:“彭真实际上是保罗瑞卿的,这一点,我们都看出来了,但是没有什么具体的事实。林彪曾经给我打过招呼:要我注意彭真的言行,不要和他拉扯得太紧,没想到这么快就出了问题。”

4月16日,《北京日报》以三个版的篇幅,整理发表了批判《燕山夜话》和《三家村》的文章,并加了《北京日报》、《前线》的编者按。在编者按中检查了《前线》的发刊词。按语是由范瑾等起草,经彭真亲自审改定稿的。《北京日报》和《前线》编辑部还要邮局与八大城市联系增加发行数量。《北京日报》、《前线》的按语中,把邓拓、吴晗、廖沫沙的一些作品称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称他们3人是“党内外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代表人物”,指责他们“利用学术文章、杂文等形式反党反社会主义”。

彭真是想争取主动,主动检讨,向毛泽东表明他的态度,争取毛泽东的原谅。

当天早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新华总社未经请示,一早就把《北

京日报》的版面和按语播发全国,引起了毛泽东的震怒。他立即指示通报全国,明令禁止转载《北京日报》的材料和按语。当晚新华总社就接到通知,撤销了这份按语,并不再转播。

4 月 16 日,刘志坚和陈亚丁按照周恩来的指示再一次飞往上海,当天,参加陈伯达、康生、江青召开的会议,讨论修改《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此时,他们才知道,是毛泽东提议成立了修改《通知》的起草小组,组长是毛泽东提名的陈伯达,起草小组的其他成员早于 4 月 15 日就已齐聚上海锦江饭店。陈伯达在会上宣布了 4 月 9 日至 12 日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成立的文化革命起草小组名单:

组长:陈伯达。

顾问:康生。

副组长:江青、刘志坚。

组员:王力、关锋、戚本禹、穆欣、吴冷西、陈亚丁、尹达、张春桥、杨永直。

陈伯达首先交代说:"主席指示,请大家来批判彭真、许立群他们写的的《二月提纲》,要写个文件把它废除。""解放以后,将一个中央发的文件废除,并加以批判,这还是头一回。这样做,对中央威信肯定有很大的损害,但也没办法,因为这是原则问题。"

陈伯达做完动员,大家就开始对《二月提纲》逐句逐条地讨论、分析、批判,看哪一条错在哪里,哪一句话错在哪里。这样进行了一天。因为很多东西说起来也是冠冕堂皇的,仅从从字面上很难看出错误。这样一句、一条地分析、批判就有点繁琐。于是戚本禹在会上提出:

"我们能不能抓几个主要的问题来进行分析、批判,这样可能工作效率会高点,譬如,把左派当学阀来反对,这条就挺重要。但究竟这是不是主要的问题,我没想好,要请大家来研究。"

陈伯达觉得他的意见有点道理,就让大家说说自己的看法。

王力说:"《二月提纲》就是个纲要嘛。我们是要抓住要害,抓主要问题来批判,一般性的、似是而非、无关紧要的那些东西就放过去,不然这个批判文件就弄得太长了。"

吴冷西接着王力的话题说:"评判谁是学阀,和所谓'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问题,确实是个要害问题,我们首先要把这些问题辩清楚。"

从这天开始,除了吃饭和睡觉外,参加会议的人几乎一整天都在小会议室里讨论、研究、写作。会议一开就是十几个小时。

陈伯达、康生还要去参加杭州的政治局会议,在上海的起草小组的日常起草工作主要由江青主持。她每天最早来到会议室,看文件比谁都多、都细致。因此,她发议论也多,指令别人看文件和写作的口气也很严厉,每起草完一稿,她立即让人抄清样,由张春桥派专人直送往在杭州的毛泽东。毛泽东修改后将文件返回,由张春桥送回上海,江青立即组织起草小组再讨论、再修改。王力他们笑称张春桥是"秘书长"。

这样几经反复,毛泽东对江青主持起草的文件表示满意,对文件起草小组的人也感到信任,因而,就想以参加文件起草小组的人为主,组成一个直接隶属政治局常委的秘书班子,指导今后的文化革命的开展。这个班子的名称最初想叫"文化革命委员会",委员会"主任"自然应该是起草小组的"组长"陈伯达了。但是,陈伯达不愿"当官"。他说:

"别当主任了,我还是当小组长吧。"

于是,又改叫文化革命小组。

4 月 18 日,《解放军报》发表社论《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积极参加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它是根据《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的精神写的,社论宣布:"一个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的高潮已经出现,一个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的群众运动正在兴起。"社论的发表,极大地震动了文艺界、思想界,引起了人们广泛的注意。次日,全国各报纷纷转载了这篇社论。

这天,《人民日报》在发表题为《吴晗同志反党反社会主义反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思想的学术观点》时,写了一个很长的按语,其中写道:"对《海瑞罢官》的批判,首先应当抓住要害,从政治上批判吴晗同志站在被人民'罢'了'官'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一边,向党向社会主义发动猖狂进攻。同时也要从学术上清算吴晗同志的反动的资产阶级学术观点。这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之间的一场激烈斗争,是思想战线的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这是根据吴冷西的指示赶写的表态文章,但是,已经为时晚矣。

4 月 19 日,中央书记处通知首都各单位:

(一)《北京日报》十六日的编者按语和材料,因为北京市委毫无

自我批评,首都各报都不要转载。各报按原订计划发表学术批判文章。

(二)各高等院校、各机关、各基层单位,停止执行北京市委布置的那种制造混乱的措施。

彭真的政治前景已然可见。

4月18日,国家主席刘少奇偕夫人王光美及外交部长陈毅和夫人张茜出访巴基斯坦、阿富汗、缅甸三个友好邻邦国家后从缅甸回到春城云南昆明,住在震庄宾馆,原龙云公馆。当晚刘少奇与坐镇北京处理日常事务工作的周恩来通了电话。周恩来话语轻松的说:

“少奇同志,你们辛苦了。”

“还好。中央有什么事情吗?”刘少奇问。

“没什么特别紧要的事情,你们出访劳顿,就在春城休息几日再回北京吧。”

“好的,那我们就在这里呆几天。”

4月19日,刘少奇和陈毅准备去西双版纳看看。谁料这天,中央发来急电:“速至杭州开会。”

在专机未到达之前,刘少奇与陪同他一道出访的陈毅外长在宾馆草坪上一边散步,一边谈着话。

“究竟开什么会呀?什么事情这样紧急?”刘少奇显得惴惴不安。“昨天恩来来电话还什么也没说,还叫我们在春城多休息几日,谁知今天中央又来了这封急电。”

“是啊,这样紧急,莫非北边边境发生战事?”陈毅瞅着刘少奇的脸猜测说。他们知道,这几年和苏联的关系一直十分紧张,战争像搭在弦上的箭,一触即发。

“不知道,恐怕不会吧。”刘少奇陷入于沉思之中。

原来,4月19日,周恩来接到毛泽东秘书徐业夫的电话,立即到毛泽东处。晚上,周恩来叫秘书周家鼎了解刘少奇主席的行踪,通知他速到杭州开会。

刘少奇和陈毅就这样乘上专机直飞上海。

飞机上,王光美对卫士长贾兰勋说:“咱们从国外带回来的水果,你分一下。到杭州后给主席、总理等中央常委们各送一份。别忘了给

彭真也送去一份。”

飞到上海后,毛泽东的专列已经停在上海车站等候他们。因为,从北京调刘少奇的专列已经来不及了,只好从杭州方面紧急调用毛泽东的专列。刘少奇、陈毅同志和王光美上了专列直奔杭州。他们发现,列车上很多地方还没有清扫。估计是由于时间仓促,来不及搞卫生。这更增加了刘少奇他们的急迫感。

4 月 20 日,刘少奇他们到杭州刚住下,周恩来和谢富治就来了,带来一些材料,向刘少奇介绍这次会议的情况。谢富治主要是谈陆定一夫人严慰冰匿名信问题的进展情况。

周恩来他们刚到,刘少奇房间里电话就响了。王光美一接,是彭真打来的,说要向刘少奇汇报。王光美告诉他;“总理正在这里谈话,少奇同志现在没空,等方便时再找你吧。”

当刘少奇知道这次会议是毛泽东主持,主要就是批评《二月提纲》和彭真,觉得不便再让彭真单独汇报了,便没再给彭真回电话。

到杭州后,刘少奇的卫士长贾兰勋按照王光美的嘱咐给几位常委送水果。但是,彭真没有住在他在杭州经常住的别墅,谁也不知道彭真的住处。贾兰勋问到警卫局副局长李树指才知道:“住在西泠饭店四层。你去了以后,什么都不要问,看到的也不要对别人讲。”

整个西泠饭店四层一片寂静,见不到一个人。贾兰勋找到彭真的卫士孙孝连时,他惊奇的问贾兰勋:“我的天,现在是什么时候,你还来这里!”

贾兰勋说:“少奇和光美同志让我给彭市长送水果……”

孙孝连赶忙说:“谢谢了! 你赶快走吧,我不送了。”

4 月 19 日,毛泽东在杭州亲自主持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开始,毛泽东谈得很活跃、和缓,他说:

“北京的空气很沉闷,我不愿在那里住,愿到上海来。”

4 月 21 日,刘少奇主持了政治局常委扩大会。因为他从 3 月 26 日就不在国内,对这段情况根本不了解,所以会议实际是周恩来主持。在会上,刘少奇点名批评了彭真和陆定一。他在和一些大局书记谈话的时候还说:

“彭真在历史上就是反对我的,他是对我搞封锁的。我多次在毛

主席面前说过:彭真这个人可是不好领导呀,动不动就以什么功臣自居,其实他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东西。”

这一天,毛泽东将一批在中央召开的会议上批评揭发彭真的简报等7个文件送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刘仁亲收,批给北京市委全体委员。第二天,4月22日,刘仁召开市委全体会议,传达这些材料。一直到26日,北京市委连日召开会议,讨论彭真问题。

4月22日,毛泽东在杭州会议上作了长篇讲话,他说:

“我不相信只是吴晗的问题。这是触及灵魂的斗争,意识形态的,触及灵魂很广泛。吴晗问题之所以严重,是因为‘朝里有人’。中央有,各大区、各省、市都有,比如文化局、宣传部等等,军队也有。出修正主义,不止文化界出,党、政、军也要出,主要是党、军。党军出了修正主义就大了。”

“斗争要要逐步地展开,真正有代表性的,省、市都批评一、两个。军队也有。所谓朝里,不光中央,部门,包括各大区、各省市。朝里那样清?我不相信。”

“2月3、4、5、6、7,5天嘛,不忙那么不忙,一忙那么忙。2月3日急于搞一个五人小组文件,迫不及待。在武汉谈整左派,我不同意。”

“这些材料无非是对、基本对、不对三种。这个通知也是三种:3个月中央翻中央的案,无非是翻、不翻,对、基本对或不对。”

“各地方党委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都还没有提到议事日程。”

“过去没有系统管,首先从我起,没有全面地抓。只要你不全面地系统地抓,就不行。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现在抓嘛!”

“出修正主义,不只是文化界出,党政军也要出,主要是党、军。多搞一点,都搞干净不可能,如‘四清’一样,清不干净。中国出不出修正主义?两种可能:不出或出,早出或迟出。搞得好可能不早出。早出也好,走向反面。”

针对《二月提纲》关于“有破有立”的观点,毛泽东说:“先破后立,不破不立,彻底破,破中有立。你破就要讲道理,讲道理就是立。比如马克思破黑格尔就是立,破空想的社会主义就立了科学的社会主义。”

# 第35回：送彭真，飞机内一路无语 批李达，工作组进驻武大

4月23日，毛泽东在中央办公厅教育办公室编发的《关于高教部党委召开座谈会部署深入开展学术批判运动的情况简报》上批道："各地区大学师生，中学教员和高中学生，都应该参加到文化革命运动中去。"

4月24日，杭州会议基本通过由陈伯达主持起草、经毛泽东多次修改审定的中共中央《通知》稿。会议确定，撤消原来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直接隶属于政治局常委。《通知》稿和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名单，提交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

就在这一天，叶剑英与肖华、杨成武、刘志坚4人联名向毛泽东、中共中央报告，揭发彭真"在批判罗瑞卿会议过程中的恶劣表现"。

会上，叶剑英汇报了北京揭发罗瑞卿会议的情况，他说："会议从3月4日开始，4日、5日两天有7个同志发言，对罗瑞卿同志所犯的错误，作了深刻和实事求是的揭发和批判。之后，罗瑞卿同志在准备作检讨发言过程中，提出这样的要求：等到会的同志发言完了以后告一段落，即行休会，让各军区来的同志先回去，等他准备好了，再行召集会议，听他的检讨发言。工作小组同志没有同意他的意见。一直等了6天，到3月12日，罗作第一次检讨发言。这个发言是从上海会议就开始准备的，准备了3个月，但他的发言内容和态度是十分不诚恳的，是十分不能使人满意的。到会同志听了以后，极为愤慨，即席发言作反驳性批评的19人。3月14、15、16日，继续发言的同志有16人，连上次发言的共23人。3月17日，中央指示，扩大会议范围，请中央、国务院有关各部委及各大区中央局和有些军区、兵种、学院等派人参加。会议通知罗瑞卿休会两天后再继续开会，而罗瑞卿竟于3月18日晨跳楼自杀。因为摔伤住了医院，罗就不能参加会议了，以致会议又由面对面，转为背靠背。会议从3月4日到4月8日，共开了一个月又5天，参加会议的共95人。除事假病假外，发言的同志有单独发言的，

有联合发言的,共有86篇发言稿。从全部发言中可以看到,同志们对罗瑞卿同志的错误,有揭发、有批判,有建议。差不多全部的发言,都肯定罗瑞卿同志的错误,最主要的是篡军反党。认为罗瑞卿同志在工作上犯了这么大的错误,又加上跳楼自杀的叛党行为,已经不能继续摆在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岗位上了,应下放改造。”

“‘人之将死,其言也善’。这是古人说的话。看来这句话对罗说来,不恰当。罗跳楼前,写了两封没有签名没有月日的遗书,都印发给同志们看了。他说,‘自杀是可耻的’。但是,‘谁为为之,孰令致之?’他竟恶毒地说是会议把他逼死的,说他的可耻行动是被迫的。这简直是对会议的诬蔑,是垂死的反扑。证明罗对自己的错误是想抵赖,也可能是想掩埋不可告人的东西,想把错误带进棺材去。”

“批罗”会议军委7人会务组代表中央工作组写的《关于罗瑞卿错误问题的报告》于4月30日上报中央,并由肖华去武汉向林彪汇报,而后林彪带着肖华去杭州向毛泽东汇报。汇报后,肖华留在杭州参加正在召开的第二次杭州会议。

第二次杭州会议期间,毛泽东分别与邓小平、聂荣臻、陈毅、李先念、康生等及各大区负责人谈话。这次会议比上海会议还紧张。上海会议还只是叶群和军队的一些人发言揭发罗瑞卿的问题,这次开会,是毛泽东亲自点名批判彭真。开会期间,与会人员在西泠宾馆吃完饭散步时,六个大区书记没有一个敢和彭真并行,也不和他讲话。即使迎面碰上了,也只能讲些“天热了……”这样的废话,谁也不敢讲正题。

散会时,周恩来叮嘱:因为很快要开政治局会议,大家没有传达的任务。

杭州会议结束后,康生、陈伯达回到上海,参加起草小组的会。康生简单说了说杭州会议的情况,他说:

“到会的每个人都发了言,都作了自我批评,说自己对彭真的问题认识不够,没那么高。都批评了彭真,说彭真检讨不好,过不了关,说彭真作法恶劣,没有经过中央,突然搞了批判邓拓的两个版,以为把邓拓抛出来就没有事了。毛主席说北京针插不进、水泼不进。”

康生传达时,江青插话,对陈伯达说:“你这个伯达,主席讲《论共产党员修养》是唯心主义的,你还给他修改整理,重新发表在红旗上,

你也真够糊涂的。”

大家听了大吃一惊。康生也很紧张,因为他当时正在主持编辑《刘少奇选集》。

这时,周扬到上海休养,给陈伯达秘书打电话,说“方便的时候想看看伯达兄”。

周、陈二人私交不错,秘书将周扬的话告诉陈伯达,陈伯达问江青,江青生气地说:“你不知道现在要批判他嘛,你还见?”

陈伯达只好对秘书说:“保春,你替我去看看周扬同志,告诉他我现在不方便和他见面,叫他好好疗养。”

秘书向周扬转达了陈伯达的问候,周扬说:“谢谢伯达同志,我一定好好休养。”

4 月 25 日,毛泽东在杭州汪庄召集周恩来等开会。

杭州会议结束后,中央指定李雪峰和宋任穷与彭真一道乘飞机回京。26 日晚,他们在杭州到上海的火车上,27 日上海到北京的飞机上,都没话讲,3 个人就面对面干坐着。大家心里都明白,他们俩的任务是“护送”彭真到北京。

李雪峰刚回到北京,政治局候补委员薄一波、中央组织部部长安子文就相约登门拜访,打听杭州会议的消息。李雪峰得知薄一波、安子文在北京看了杭州会议揭发彭真的 7 个文件,唯独没有看到《中央委员会通知》草稿,但也不敢透露一点消息。薄一波、安子文很生气,薄一波一拍屁股说:“不说拉倒。”

薄一波、安子文是李雪峰多年老战友,李雪峰作为中央书记处书记也不敢造次,可见当时纪律之严明。

从上海会议揭发罗瑞卿,3 月会议点杨尚昆、陆定一,到 4 月会议批北京市委和彭真。中央上层的许多人似乎已经意识到,问题刚刚开了个头,远没有完。谁也搞不清下一步如何发展。这时的北京已经是人心惶惶,大家都很紧张,到处打听消息。

地方各省市中,对毛泽东的意图了解比较透彻的,除华东局外,当属中南局的陶铸等人了。还在北京刚开书记处会议研究彭真问题时,4 月 10 日,广州就召开了“中南局学术批判座谈会”。这个会,基本上还是按照《二月提纲》的要求,以学术批判为主。但在 13 日的会上,中

南局第一书记陶铸在座谈会上讲话时已明确告知说:“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反对我们内部的修正主义。”他在阐述了文化革命的形势、任务时,还专门指出在中南地区要挑选主要的批判对象,他点了武汉大学校长、中共“一大”代表李达的名,同时也点了中山大学教授容庚和刘节的名,并与王任重商量向武汉大学派工作组。

李达是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和早期领导人之一,1923 年秋季,因与陈独秀在建党路线上意见分歧而脱党。他与毛泽东是湖南同乡,关系一直很好。

1927 年春,毛泽东创办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时,邀李达讲授社会科学概论。抗战爆发前,李达曾把自己写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社会学大纲》寄给延安的毛泽东。1938 年初,毛泽东在一次小型干部会议上说:“李达同志给我寄了一本《社会学大纲》,我已经看了 10 遍。我写信让他再寄 10 本来,你们也可以看看。”毛泽东在信中热情地称赞李达是一个“真正的人”。

1947 年冬至 1948 年春初,毛泽东曾三次电示中共华南局护送李达去解放区,并通过党的“地下交通”带信给李达。毛泽东致函李达说:“吾兄系本公司发起人之一,现公司生意兴隆,望速前来参与经营。”这封信写得很巧妙,实际上就是请李达速去解放区参加重要工作。李达收到毛泽东的密信后,高兴得彻夜未眠。

1949 年 5 月 14 日,李达安全到达北平后,受到毛泽东的热情接待。5 月 18 日,李达应邀到毛泽东家里叙谈。在谈话中,李达首先向毛泽东检查了他早年离开党组织的错误。对此,毛泽东指出:“早年离开了党,这是在政治上摔了一跤,是个很大的损失。往者不可咎,来者犹可追。”接着又鼓励他说:“你在早期传播马列主义,还是起了积极作用的。大革命失败后到今天的 20 多年里,你在国民党统治区教书,还是一直坚持了马列主义的理论阵地,写过些书,这是有益的事嘛! 只要做了些好事,人民是不会轻易忘记的!”当晚,毛泽东就留李达在自己的床上睡觉,自己在桌前批阅了一夜文件。

毛泽东认为,李达思想上一直没有离开马列主义,可以重新入党,并愿意做他的历史证明人。1949 年 12 月,经刘少奇介绍,毛泽东和李维汉、张庆孚诸人作历史见证人,党中央特别批准李达为中共正式党

员,没有预备期。

李达1953年2月就任武汉大学校长,同时兼任中共湖北省委委员。毛泽东每次来武汉,总要见见他。作为东道主的王任重,自然非常清楚李达与毛泽东的关系。

在杭州会议之前,王任重曾试探询问过毛泽东:“能不能批判李达?”毛泽东未置可否。后来,王任重再一次询问毛泽东是否可以对李达进行批判,毛泽东仍未表态。

4月18日,按照与陶铸的商定,湖北省委派出工作组进驻武汉大学。

4月19日,王任重签发了一篇短文,于5月14日以“王任重”的署名刊登在《湖北通讯》增刊上。王任重在文章中检讨了自己1962年在《湖北通讯》(增刊)发表的两个读书笔记。他在文中写道:“审查一下,发现其中也有一些糊涂观点或者错误的观点”;本着“在斗争中学习,在改造客观世界的过程中,改造自己的思想,用毛泽东思想作武器,把一切落后的、陈旧的、错误的东西,通通从自己头脑里清洗出去”的愿望,以及四清中提倡的“洗手洗澡,放下包袱,轻装上阵”的精神,将自己1962年读《资治通鉴》的读书笔记序言二则重新刊登在1966年5月14日的《湖北通讯》(增刊)上,“清理一下自己的思想”。

1962年大家读《资治通鉴》是毛泽东带头提倡的,一些省区领导受其影响,欣然从之。湖北省委当时是群贤毕至,秀才荟萃,也一时兴起研读史书热潮。王任重在短文中说,当年发表读书笔记目的是使干部增加一点历史知识,也为了“使干部懂得正确执行党的政策,正确挑选干部,以及发扬党的民主的重要性”,实际上仍是“资治”之用。不过,“现在看来,当时不写这种读书笔记 ,而强调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就好了。湖北省委是一贯强调学习毛主席著作的,但是那时还没有现在这样的认识水平”。

4月19日,王任重再次参加杭州会议,他又向毛泽东谈及李达的问题,当询问可不可以对李达开展批判时,并说湖北的群众有这方面的要求时,毛泽东说了一句:“既然群众有要求,在校内批判一下也是可以的。但不要点名,也不登报。”。

王任重从杭州回到武汉,于4月25日召开湖北省委会议。他一

连3天,派车把武汉大学哲学系助教陆老师接到其百花村住所,听她汇报已经搜集到的关于李达等人的材料,并指示她:要将她当面汇报的材料再以给他写信的方式送省委,然后由他修改加按,印发省委和武大党委,并上报中南局。

陆老师原在政治系工作,1964年政治系撤销后才来哲学系。应当说,她并不怎么了解李达。但是,这并不影响她按照组织上的要求,搜集李达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材料。

王任重依据武汉大学陆老师提供的材料,点了武汉大学哲学系和中文系的名。他说:"武大哲学系,哲学史学四年,马列主义只学一年,毛主席著作只学六周。""工农调干学生为反对学哲学史,被迫退了学。这是共产党干的事么?"他断言,由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着文化教育界,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的目标要针对知识分子,文革的结果之一,就是要查出占总数5%—10%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知识分子作为新的右派。

湖北省委确定武汉大学为"教育革命"的试点,4月28日,派省委书记处许道琦和宣传部副部长史子荣来武汉大学领导运动,会同武大党委成立"教育革命领导小组"。

王任重特别指示:"要把李达斗倒,关键在于做好知情人的工作。"教育革命领导小组根据这个指示,对他们所确定的"知情人",包括李达的编书助手、秘书、警卫、司机以及与李达有工作关系的教员和干部,日夜追逼,要求他们按已经定下的框框写交待、揭发材料,"拿出定性的东西来","一句话也要"。在那种"知情不报就是对组织不忠,对毛主席不忠"的时代氛围下,一些人出于对组织的忠诚,或出于自我保护,都不得不揭发交待。于是,"教育革命领导小组"很快便编印了《关于李达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言行的初步材料》,并由王任重加上夹批按语上报中南局和党中央。

王任重在上报党中央的这份材料时又附信请示:"如中央同意,我即告武大党委首先印发给全校党员阅读讨论,然后发动全校师生进行批判。这是武大教育革命中要打倒的一个资产阶级权威,也是党内资产阶级当权派的主帅。"附信还说:"我看这一场革命不能再拖延下去了。省委决定先以武大作为试点,取得经验,逐步展开。"

# 第36回：表决心，发誓欲焚平生作 集北京，政治局开扩大会

4月28日、29日，毛泽东在杭州汪庄又两次同陈伯达、康生谈话，对彭真和北京市委提出更加严厉的批评，并在党内一些文件上删去彭真的名字。他对康生、陈伯达说：

“你们写了《通知》，我这次的增加，加油加醋。”

“北京市一根针也插不进去，一滴水也泼不进去。彭真要按他的世界观来改造党。事物是向他的反面发展的，他已经为自己准备了垮台的条件，这是必然的事，是从偶然中暴露出来的，一步一步深入的。历史教训并不是人人都引以为戒的。这是阶级斗争的规律，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对他的错误要攻到底！凡是在中央有人搞鬼，我就号召地方起来攻他们，叫孙悟空大闹天宫，并要搞那些保‘玉皇大帝’的人。彭真是混到党内的渺小人物，没有什么了不起，一个指头就捅倒他。‘西风吹渭水，落叶下长安’，告诉同志们不要无穷地忧虑。灰尘不扫不少，阶级敌人不打不倒，倒了还要起来反抗。

“我赞成鲁迅的意见，书不可不读，古书不可多读，但经史子集，也要硬着头皮读一下，不读人家会欺负你。

“现象是看得见的，本质是隐蔽的。本质也会通过现象表现出来。彭真的本质隐藏了三十年。”

他严厉地说：“出修正主义不只文化界出，党政军也要出，特别是党军出了修正主义就大了。”在毛泽东看来，当前最大的问题正是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必须当机立断，“全面地系统地抓”，发动一场大革命，来解决这个已经迫在眉睫的问题。

5月5日，毛泽东会见谢胡率领的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周恩来、林彪、邓小平、伍修权参加。毛泽东在会见时的谈话中，把自己焦虑心情表露得十分明显，并且说到要在他有生之年把这个问题解决好。他说：

“我的身体还可以,但是马克思总是要请我去的。事物的发展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马克思、恩格斯就没有料到手创的社会民主党在他们死后被他们的接班人篡夺领导权,变为资产阶级政党,这是不以马克思、恩格斯的意志为转移的。他们那个党开始是革命的,他们一死变成反革命的了。苏联也不以列宁的意志为转移,他也没有料到会出赫鲁晓夫修正主义。”

“事物不断地走向反面。不仅是量变,而且要起质变;只有量变,不起质变,那就是形而上学。我们也准备着。你晓得哪一天修正主义占领北京?现在这些拥护我们的人摇身一变,就可以变成修正主义。这是第一种可能。第二种可能是部分分化。”

“鉴于这些情况,我们这批人一死,修正主义很可能起来。”

“我们是黄昏时候了,所以,现在趁着还有一口气的时候,整一整这些资产阶级复辟。”

“总之,要把两个可能放在心里:头一个可能是反革命专政、反革命复辟。把这个放在头一个可能,我们就有点着急了。不然就不着急,太平无事。如果你不着急,太平无事,就都好了?才不是那样。光明的一面现在看出来了,还有黑暗的一面,他们在做地下工作。列宁说过,被打败了的剥削阶级还强于胜利的无产阶级。列宁又讲,农民、小资产阶级每日每时都生长资本主义。打败了的阶级是哪些人?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资本主义。而群众就是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还有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和他们的知识分子,我们都包进来了。还有地主阶级的儿女。过去我们的大学生大多数是资产阶级、地主阶级的儿女。工人、贫农、下中农都进不起学校,小学都进不上,进上小学进不上中学,何况进大学?旧的知识分子至少有几百万人。群众的文化教育掌握在他们手里,我们没有掌握。那么多小学,我们没有小学教员,只好用国民党留下来的小学教员;我们也没有自己的中学教员、大学教授、工程师、演员、画家,也没有搞出版社和开书店的人员。那些旧人有一部分钻到党内来,暂时潜伏不动,待机而起。等于赫鲁晓夫潜伏不动,待机而起一样。

第二个可能就是剥笋政策,一层一层地剥掉,剩下的是好的,把坏的剥掉。从一九二一年到一九六六年四十五年了,我们就初步地剥了

一遍,剥掉了不少反动的: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王明、张国焘、张闻天、高岗、饶漱石、彭德怀、罗瑞卿、彭真等等前后几十个中央委员,还有睡在我们身边没有发现的。”

“不要怕反革命。有的时候我也很忧虑。说不想,不忧虑,那是假的。但是睡觉起来,找几个同志开个会,议论议论,又想出办法来了。”

在讲到邓小平时,毛泽东说:“他是一个懂军事的,你看他人这么小,可是打南京是他统帅的。打南京是两个野战军,差不多一百万军队。接着打上海,打浙江,打杭州,打江西,打福建,然后他们第二野战军向西占领四川、云南、贵州。这三个省差不多有一亿人口。”

就在第二次杭州会议进行之际,4 月 14 日,全国人大常委会第 30 次会议上,文化部副部长石西民根据中共中央批发的《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精神,作了“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的主题报告,向与会人员通报了正在全国进行的文化革命情况。

人大副委员长郭沫若在会上发表了讲话,他说:“石西民同志的报告对我来说,是有切身的感受。说得沉痛一点,是有切肤之痛。因为在一般朋友们、同志们看来,我是一个文化人,甚至于好些人都说我是一个作家,还是一个诗人,又是一个什么历史学家。几十年来,一直拿着笔杆子在写东西,也翻译了一些东西。按字数来讲,恐怕有几百万字了。但是,拿今天的标准来讲,我以前所写的东西,严格地说,应该全部把它烧掉,没有一点价值。主要原因是什么呢?就是没有学好毛主席思想,没有用毛主席思想来武装自己,所以阶级观点有的时候很模糊……

我虽然已经七十几岁了,雄心壮志还有一点。就是说,要滚一身泥巴,我愿意;要沾一身油污,我愿意;甚至于要染一身血迹,假使美帝国主义要来打我们的话,向美帝国主义分子投几颗手榴弹,我也愿意……”

郭沫若的这个讲话,经毛泽东亲笔批示后,于 4 月 28 日,在《光明日报》上以《向工农兵群众学习;为工农兵群众服务》的标题,全文刊登,立即引起国内外的反响,称之为轰动一时的“焚书”声明。尤其是在日本,郭沫若享有很高的威望,日本的一些友好人士,如松村谦三、黑田寿男、宫崎世民等人,竟然要求亲赴中国,想当面询问郭沫若“焚书”的真意。

然而,郭沫若却一身轻松踏上了西去巴蜀的列车,与主管经贸口的副总理薄一波一起视察、参观成都和渡口,即现在的攀枝花市等地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这次行程,他还有一个微妙的私人意图,就是计划回久别27年的老家乐山沙湾镇看看。正当郭沫若在参观中准备返乡时,5月1日晚上,接到中共中央办公厅电令,回京参加5月4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作为一个没有党内职务的普通党员,能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显然表明郭沫若的特殊身份。

5月1日这天,北京全城洋溢着一派节日气氛。天安门广场和劳动人民文化宫、中山公园里,到处都是锣鼓喧天,载歌载舞。这一天的天气也格外晴朗,风和日丽。然而,5月2日,细心的人在报纸上没有发现彭真的名字。

彭真身为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兼市长,自从1949年10月1日的开国大典以来,每逢"五一"、"十一",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庆祝典礼,在天安门城楼上主持仪式的,总是北京市市长彭真。1966年5月1日,这个惯例被打破了。

5月4日,星期三。上午近10时,一辆辆小轿车陆续驶进人民大会堂西门。从车上下来的人夹着公文包,步履匆匆地走进河北厅。为传达、落实杭州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精神,中共中央在北京特别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即将在这里举行。参加会议的有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有关负责人76人。刚刚组建不久的"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组"成员:张春桥、王力、关锋、戚本禹等人也扩大参加会议。此时江青还在上海。

毛泽东没有出席这次会议,他仍在杭州西湖边那幢别墅里,5月1日,他看了即将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与会人员名单及有关材料,并批示:将所有材料都先发给与会人员看。5月3日,毛泽东从杭州来到上海。此后,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情况康生每天都会向他汇报请示。

刘少奇主持了会议,他宣布开会后,介绍了会议的起因、议程及出席人员的范围和会议的开法。

会议的第一个议程是讨论通过杭州会议讨论通过的《通知》,但大多数与会人员还不知道为什么要突然发这样一个《通知》。因此,先安排了几天座谈会,传达毛泽东最近的一系列指示,介绍相关情况。

首先由康生传达了毛泽东自1962年9月以来,特别是1965年11月以来的一系列指示,介绍了这次会议将要通过的《通知》的起草经过,也谈了他自己的一点体会。他从5月5日下午开讲,一个半天不够,6日上午又讲了半天,加起来差不多有8个钟头。

康生历数了《二月提纲》下发前后的过程,重点叙述了《提纲》下发后的重大事件。他说:

"4月9日、11日、12日,中央书记处开会。彭真要求首先发言,讲他从来不反主席,没有包庇吴晗,只包庇了邓拓,错误就是主张'放'。第二天,康生发言批判彭真,从1965年9月一直到1966年3月,主席说北京市连针都插不进去。第三天,陈伯达谈彭真在历史上的问题。

4月22日,在主席处开会。

4月28日、29日,毛主席又谈了两次话。林总说,《通知》的后一段,'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是惊心动魄的一段。"

在传达1966年3月底毛泽东的三次谈话时,康生说:

"我个人体会,毛主席这三次谈话,概括起来是两条:第一条是批评彭真、中宣部包庇右派,压制左派,不准革命;第二条是给任务,要支持左派,建立新的文化学术队伍,进行文化大革命。贯穿一个中心问题是中央到底出不出修正主义,出了怎么办?现在已经出了,罗瑞卿是一个,彭真是一个,杨献珍是一个,杨尚昆是一个,田家英、邓拓、廖沫沙也是。"

在讲到《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时,他着重强调:"这次运动要粉碎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式人物篡党夺权的阴谋,这个文件的通过不是斗争的结束,而是运动的开始。"

他自我检讨说:"王明路线的时候,我犯过错误,当时职工国际有一个文件,说少奇同志是右倾机会主义。当时我也相信了,攻击少奇同志在职工运动方面是右倾机会主义,还在《斗争》上登过反对少奇同志的文章,署名为谢康。这个谁也不能怨,只怨自己的思想错误,没有看到少奇同志是在白区代表毛主席的路线的。""在延安我向你做过检讨,在今天我还要向你检讨,将来还要检讨。不能像有的人,当时反对你,还代替了你,一点检讨也不做。"

康生说:"《通知》可以议一下。可以说原《提纲》是对的,《通知》

是不对的。顺便解释一下:这么重要的一个文件,叫《通知》好不好?我同伯达考虑过。少奇同志和陈总都考虑过。问主席,主席讲,还是叫《通知》。为什么?他没有解释,但他反复讲过,要大家议论:两个文件,哪一个是对的,哪一个是错的?22 日会上,主席讲可以允许推翻《通知》,赞成彭真的文件。允许讲彭真那一套是对的,是马克思主义的。”

5 月 6 日下午,由列席会议的“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组”成员张春桥在会上介绍情况,他讲了 6 个问题:

1、十中全会以后;

2、姚文元的文章发表的情况;

3、姚文发表以后;

4、彭真同志第一次到上海;

5、彭真同志第二次到上海;

6、许立群同志的电话。

他从八届十中全会讲起,一直讲到 1966 年,重点也放到 1965 年 11 月以后。他详细介绍了批判《海瑞罢官》的全过程。张春桥说:

“据我知,主席对吴晗的《海瑞罢官》早有意见,但我们也知道北京对此戏评价分歧很大,甚至有人说此戏是根据主席指示写的。我曾问过林默涵到底分歧有多大,他说很大,也未详细说明。我们还是想研究一下,一研究,就发现海瑞的宣传出乎意料的多,剧种很多,什么京剧、沪剧,各种剧都在演海瑞。上海广播电台 64 年还在广播此戏,《生死牌》搞了电影。出了盲人故事。中小学课本有海瑞,大学就不要讲,一大堆连环画、小人书,各种宣传工具都用上了。”

“我到北京请江青问主席,是否可以批判。主席说,他没有提倡过写海瑞,只是在湖南彭德怀叫他看《生死牌》,戏里谈到海瑞。主席回来就查明史,说海瑞未在湖南作过官。请同志们看看,如此而已。”

其实,在 1959 年 8 月 16 日庐山会议的闭幕会上,毛泽东就说:

“现在听说海瑞出在你们那个里头,海瑞搬了家了。明朝的海瑞是个左派,他代表富裕中农、富农、城市贫民,向着大地主大官僚作斗争。现在海瑞搬家,搬到右倾司令部去了,向着马克思主义作斗争。这样的海瑞,是右派海瑞。我不是在上海提倡了一番海瑞吗?有人

讲,我这个人又提倡海瑞,又不喜欢出现海瑞。那有一半是真的。海瑞变了右派我就不高兴呀,我就要跟这种海瑞作斗争。”

对怎样批判《海瑞罢官》,张春桥说:“我们考虑过,究竟批评哪一个?是《海瑞罢官》,还是《海瑞上疏》?我们认为《海瑞罢官》写得太露骨,应该批判影响大的。”

对于文章发表前为什么没有同北京市委打招呼,张春桥是这样解释的:“还有一顾虑,即和北京的关系。我们当时不敢打招呼。文章一送中宣部就登不出来,我们考虑不必要送审了,主席9月会议已经讲了话,可以批评吴晗嘛,这时如再问彭真好不好?我们反的是资本主义,如彭真说主席已批准,为什么还问我?所以就未打招呼,还有批评周谷城也没给上海打招呼嘛。虽不是副市长,周谷城的地位也很高,也是政协副主席。我们看到批判周谷城的文章以后,因为准备不够,也很紧张,周谷城要自杀,我们毫无准备,但无怨言,因为周谷城应该批评。”

张春桥接着说:“姚文章发表的前3天,先请周谷城、周予同、李平心等十几个人提意见。他们对最后一部分(关于政治问题),统统反对。这是我们估计到,斗争将是激烈的。文章发表后,反映强烈,除西藏外,全国各地来稿来信达到1万多件。意外地是三件事:

1、范瑾、沙英问背景;

2、北京各报都不登,这是谁向谁专政?

3、20日决定印小册子,24日印出,北京新华书店不表态。总之,封锁的严严的,姚文进不了北京。不是彭真统一布置,又有谁有这样大的权利,可以这样布置?我们实在气愤极了。”

“《二月提纲》中提到的所谓学阀,不是指姚文元,也不是指上海市委,而是针对毛主席的;所谓‘武断’,还不是指毛主席把《海瑞罢官》同政治问题、庐山会议联系起来,说要害是‘罢官’;所谓‘以势压人’还不是说毛主席以势压人,上海市委以势压人。许立群的这个电话,是彭真这个党阀的本质暴露。4月1日深夜,彭真同志给曹荻秋同志打电话,……4月2日,市委书记处开会,认为这个电话根本不是道歉的,而是把他说过的话统统赖掉了。我们觉悟到,一场尖锐的阶级斗争不可避免了。”

# 第37回："三家村"，呼"万岁"彭真不服 回羊城，陶铸中南局部署

就在人民大会堂内政治局扩大会议召开的当天，5月4日，《解放军报》发表了经毛泽东审定的社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社论指出：

"在当前文化战线上开展的大论战，绝不仅仅是几篇文章，几个剧本，几部电影的问题，是大是大非的斗争，是意识形态领域中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谁战胜谁的激烈而又长期的斗争。必须在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以及其它各种文化界中大兴无产阶级思想，大灭资产阶级思想。这是现阶段我国社会主义革命深入发展的关键问题，是关系全局的问题，是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命运和前途的头等大事，也是关系到世界革命的一件头等大事。一定要响应党的号召，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积极投入到这场斗争中去，坚决把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5月5日：《人民日报》转载《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一文，但做了删节。

5月6日，《中国通史》的作者、著名历史学家、中国史学会副会长、近代史研究所所长范文澜致信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长刘大年、黎澍："运动发展到惊人的程度，问题之广大之深，简直不可想象"。

范文澜请他们对自己匆匆写出的检讨草稿提意见。"高的调门不必减低，说理不妥处可改"。

接着的信，一封比一封更紧张。其中一封信说："有人从康老那里听说，郭老发表了谈话，得到主动，范某也该主动有所表示才好。我那稿子，比起目前形势来，已经大大落后了。希望嘱打字员快打出来，快派专人送来，以便交康老请批示。"

又一封信说："昨天我晤陈伯达同志，他直言相告，大意说我倚老卖老，没有自我批评，保封建皇朝，不要以为有些知识就等于马列主

义。郭老批评就主动了。更使我惊心的,是说你年老了,不能要求你有多的马列主义。似乎我要学也不成了。我看情况很不好,昨和黎澍同志谈,请他大大增加自我批评的文字,请他站在敌对方面大加抨击,打倒老朽昏庸之辈。大势所趋,不可有姑息原谅之心。请你助黎澍同志加强批评。愈过头愈好,不过头,别人会来补的,那就麻烦了。”

5月7日上午,政治局扩大会上,陈伯达讲话,仍然是批判彭真。他用“新账老账一齐算”的办法,着重揭发彭真历史上的问题。

康生、张春桥、陈伯达等人的讲话给了与会者强烈的印象,极大的震撼着参会人员。许多人没有想到,彭真的问题竟如此的严重,竟然敢反对毛泽东主席?!

5月7日下午,肖华发言批判彭真,共分4个部分:

1、关于彭真在东北问题上的错误;

2、彭真在批判罗瑞卿会议过程中的表现;

3、关于文化大革命问题;

4、彭真和罗瑞卿究竟是什么关系?

肖华说:“我认为是一个反党联盟,是一窝子,几个案子实际上是一个案子。”

在肖华发言过程中,李富春、陈毅、谭震林都插话批判彭真。

5月7日这天,刘少奇找华北局第一书记李雪峰谈话:“中央决定改组北京市委,由你去担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让吴德当第二书记,你们俩搭班子,要保持团结。现在北京的情况比较复杂,等部队调动完毕后,再公开宣布这个决定。”

连续3天的情况介绍,使政治局扩大会议的与会者受到强烈的震动。5月8日、9日,与会人员阅读文件。

5月8日,华北局按照中央的决定,派工作组进驻北京市委,工作组组长李雪峰,副组长华北局书记处书记池必卿。工作组召开大会,号召干部揭发市委领导。市委机关内部开始出现大字报。华北局书记处候补书记、宣传部部长黄志刚率华北局组织的另一个工作组进驻《北京日报》社。

5月8日这天,《解放军报》这天发表了署名高炬的文章《向反党反社会主义黑线开火》。这篇文章是军报的几名编辑奉康生、江青指

令撰写的,重点批邓拓的《燕山夜话》。“高炬”者,“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简称“高举”之谐音,是在那个年代,由军报领导人挂帅撰写重点文章使用的一个笔名。

江青还将《红旗》杂志社林杰等人早已编好的《〈燕山夜话〉摘编》交给军报,要求和高炬的文章同时见报,并交代军报批《燕山夜话》的口径应和《〈燕山夜话〉摘编》及其配发的编者按语保持一致。

文章其实早已写好,但没有马上发表。康生、江青交代:“先放一放,等时机最有利时再发表。”直到5月4日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就要揭开彭真的盖子了,康生通知军报于5月8日将文章发表。同时还用了两个整版的篇幅刊登了《红旗》杂志的林杰等人编的《〈燕山夜话〉摘编》及其所加的编者按语。

高炬的文章指出:“邓拓是他和吴晗、廖沫沙开设的‘三家村’黑店的掌柜,是这一小撮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的一个头目。他们把《前线》、《北京日报》以及《北京晚报》作为反党工具,射出了大量毒箭,猖狂地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

文章还说:《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和它的作者,“他们以谈历史、传知识、讲故事、说笑话做幌子,借古讽今,指桑骂槐,含沙射影,旁敲侧击,对我们伟大的党进行了全面的恶毒的攻击。辱骂我们的党‘狂热’‘发高烧’,说‘伟大的空话’,害了‘健忘症’,恶毒地攻击总路线、大跃进是‘吹牛皮’‘想入非非’,‘用空想代替了现实’,‘把一个鸡蛋的家当’,‘全部毁掉了’,在事实面前‘碰得头破血流’,极力为罢了官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喊冤叫屈,吹捧他们的反党‘骨相’和‘叛逆性格’,鼓励他们东山再起。诽谤无产阶级专政,极力煽动对社会主义制度的不满情绪。宣扬腐朽没落的封建道德和资产阶级思想,为资本主义复辟鸣锣开道。”“我们一定不放过他们,一定不放过牛鬼蛇神,一定要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把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不获全胜,决不收兵”。

同日,《光明日报》发表关锋化名何明写的《擦亮眼睛、识别真伪》的文章。文章主要是针对4月16日《北京日报》对“三家村”的批判。文章说:

“《北京日报》在4月16日,以三版的篇幅,在《关于‘三家村’和

〈燕山夜话〉的批判》这个通栏大标题之下,发表了一批材料,并发表了《前线》、《北京日报》的编者按。看样子轰轰烈烈,非常革命,并且好像是首先发难,对邓拓和他的《燕山夜话》进行批判。这是怎么一回事呢?阶级斗争是十分复杂的,我们必须擦亮眼睛,辨别真假,千万不要上当。”

“《前线》《北京日报》的编者按说,要‘对三家村和《燕山夜话》展开严肃的批判’。这是真的吗?不是,这是假的,是假批判、真掩护,假斗争、真包庇。邓拓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三家村’的一名村长,是他们一伙的一个头头。可是,编者按却不提邓拓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问题……这是对读者的欺骗”。

关锋在这里重新使用何明的笔名,也是针对彭真、许立群整理“左派”材料一事来的。

《光明日报》还同时刊载了《〈三家村札记〉摘编》,也配发了编者按语,与军报的高炬文章和《〈燕山夜话〉摘编》及按语相呼应。

5月9日,《人民日报》发表林杰、马泽民、阎长贵、周英、滕文生、靳殿良的文章:《邓拓的〈燕山夜话〉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话》。

5月10日,上海《解放日报》和《文汇报》同时刊出姚文元的《评“三家村”——〈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的反动本质》,全国各报立刻转载。这篇文章从标题到内容都经过毛泽东的亲笔修改。

文章发表的前一天,5月9日的晚上,《解放日报》党委书记兼总编辑马达接到上海市长曹荻秋的电话,让他立即到曹荻秋家里去一下。

一进门,曹荻秋即交给马达厚厚一叠清样稿,对他说:“我刚从毛主席那边来,他要我们《解放日报》、《文汇报》明天同时见报。”

马达接过清样一看,第一页上用铅笔写了两行大字:

即发,毛

标题要大些

原来的标题比较长:《评反党反社会主义大黑店“三家村”——〈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的反动本质》。上面有毛泽东用铅笔划掉的笔迹,只留下四个字《评“三家村”》和副标题。毫无疑问,这是领袖的亲笔指示。马达连夜带领报社的干部、职工一丝不苟的完成了毛泽

东和曹荻秋交给的任务。

5月10日下午,500份《文汇报》由上海空运抵京,一辆小轿车已等候在机场。转眼之间,这500份《文汇报》便发到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参会人员的手中,人手一份。

11日出刊的《红旗》杂志上,也登载了戚本禹的《评〈前线〉、〈北京日报〉的资产阶级立场》一文。

同日,《解放军报》发表社论,指出:"同吴晗等一小撮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

5月10日至14日,政治局扩大会议进行小组会讨论。

5月11日,政治局扩大会议继续举行全体会,刘少奇主持。

参加会议的人员发现每人的桌子上都放着一张文件,字有核桃大,是林彪的亲笔复印件,上面的字样是:

我证明:

1、叶群在与我结婚时是纯洁的处女,婚后一贯正派。

2、叶群与王实味根本没有恋爱过。

3、老虎、豆豆是我和叶群的亲生子女。

4、严慰冰的反革命信,所谈的一切全系谣言。

林彪

这是针对陆定一的夫人严慰冰的,这次会议的文件中就有严慰冰的匿名信。

华北局第一书记李雪峰坐在第一排,他正在看林彪的证明,彭真来到他身旁,俯身想和他说话,这时,就听到后面有人在念彭真的材料。彭真突然火冒三丈,回身就喊:"谁是第一个喊万岁的!啊!谁是第一个……!"

当年在延安,是彭真最先喊出"毛主席万岁"的口号。

坐在主席台上的刘少奇赶紧予以制止,彭真不说话了。

只见聂荣臻又拿起林彪的证明,生气的冲主席台上的人说:"发这个做啥?收回!"

接下来,开始分组讨论《通知》。此时,与会者已经知道《通知》是"大秀才"陈伯达执笔,由"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组"一起起草的,毛泽东从4月14日至30日先后对《通知》审阅修改8次才定稿。各小组

的讨论,众口一词,一致拥护。有几人,如郭沫若等,提出几处标点和用语不妥,建议在某处加一个“的”字,在某处去掉引号等。但是都被陈伯达、康生否定了,可以说是一字不改。

这些天,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也多次播出批判“三家村”的文章,点名批评的范围进一步扩大。同时,各级党组织纷纷布置本单位的人员写大字报,积极投入到批判“三家村”的斗争中,尤其是大、中、小学校都接到通知,组织学生批判《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瞬时间,全国各地报刊的批判文章、各学校和机关单位的大字报铺天盖地,大批判遍及全国。一时间,“三家村反党集团”正像周恩来在政治局扩大会上所言,是高山顶上倒马桶,家喻户晓,妇孺皆知。当时各地还传唱一些童谣,如:“邓拓、吴晗、廖沫沙,一根藤上仨黑瓜”等等……

大批判对全国文化领域产生了巨大的冲击,中国自春秋以来的文化、五四运动以来的文学作品、当代所有已出版的文章几乎都在接受人们的批判,文人骚客纷纷审查自己的作品,就是共产党的各级领导也不例外。从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到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天津市市长胡昭衡等等,凡是在文学领域有所著述的人,都在对自己的作品进行梳理,作自我批评,或接受别人的批判。

4 月 27 日,陶铸参加杭州会议回到广州,立即召开中南局常委会,决定召开三级干部会议。5 月 3 日,《羊城晚报》的《学习》周刊第五期,以编者按形式,提出学术问题必须和政治挂钩。编者按说:“只有从政治思想上划清界限,作为吴晗的外衣和武器的学术观点才能得到正确的解决。”

5 月 9 日,陶铸在广州珠江宾馆主持召开中南区文化大革命动员大会。出席的有各省市委第一书记、文教书记、宣传部长等。会议后一段吸收全区各地委第一书记参加。鉴于全国形势的发展,一日千里,如火如荼,会议圈定了中南各省准备点名批判的名单,决定在广东公开点名批判四个人:容庚、刘节、秦牧、柯麟。

容庚,著名考古学家、古文字学家。历任燕京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教授等职。从 1952 年起,任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至今。著有《金文编》、《续金文编》、《商周彝器通考》、《海外吉金图录》等书。

刘节,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任河南大学

教授,后在北平图书馆任金石部主任。又任教于燕京大学。抗日战争爆发后,先后在浙江大学、金陵大学任教。1940 年至 1944 年间,在重庆专心于古代史研究。1953 年到中山大学历史系任教。

秦牧,著名作家。1938 年开始在广州报刊上发表作品。历任广东省文教厅科长、中华书局广州编辑室主任、中国作家协会广州分会副主席、《羊城晚报》副总编辑。

柯麟,1926 年加入中共的老党员。1928 年,在上海开设达生医院,是为中共中央的秘密机关。他本人则为上海中央特科成员。1936 年到澳门,先后任澳门镜湖医院院长、镜湖医院慈善会副主席、名誉主席,1949 年任澳门南通银行董事长。1952 年才返回广州,任中山医学院院长兼党委书记。

这 4 人都是著名的知识分子。中南区其他内定准备公开批判的人,还包括广西的陆地、河南的郭晓棠、湖南的康濯等。那么,谁是他们在党内的代表?谁是他们的根子?在中南局会议上,赵紫阳突然提出:“秦牧这个人是有后台的,后台就是王匡。”

秦牧是《羊城晚报》的副总编辑,而《羊城晚报》是中南局主管的。时任中共中央中南局委员、宣传部部长的王匡几乎被这当头一棒打懵了。陶铸怒形于色地表示:“王匡这个人右,长期右倾。”

会后赵紫阳向王匡解释说:“我只是想把广东省委和中南局分开。”

陶铸还特别让人关照秦牧:“不要这么紧张,要有思想准备,文化大革命还是要检讨的。”5 月 13 日,由省委宣传部召开的文艺界、高校、报社负责人会议,布置批判“三家村”。在随后召开的文艺界声讨“三家村”大会上,秦牧仍然可以登台发言。

# 第38回：飞上海，毛泽东紧急召见 绘蓝图，《五七指示》述心愿

中央的《通知》文件起草完后，江青即让戚本禹回北京，并叫他不用再去《红旗》杂志了，直接回中南海，说："关于你的工作，中央有新的安排"。

过了五一节，戚本禹去中南海找汪东兴，中央办公厅已在原来刘少奇住的甲字楼里给他安排了办公室，并在钓鱼台也为王力、关峰、戚本禹他们安排了办公室。

5月12下午，毛泽东的机要秘书徐业夫打电话到钓鱼台找戚本禹，通知他说："主席要见你们，你和陈伯达、杨成武三个人明天一早赶到上海。"

戚本禹放下电话，马上通知了陈伯达。然后又打电话给杨成武，杨成武说，他也接到徐业夫的电话了，并且已经安排好飞机，让戚本禹和陈伯达明天一早去北京郊区的某军用机场乘专机去上海。

5月13日凌晨3时，杨成武就来电话催戚本禹他们出发。戚本禹和陈伯达坐车来到机场，与杨成武会合。他们刚登上飞机后，飞机就起飞了。

飞机上，戚本禹心里嘀咕："主席这么紧急地召见我们，究竟是为了什么事？"那时正在传说北京有发生军事政变的迹象，这次又有代总参谋长同行，他想，是不是与军事政变有关？

大约飞了三小时左右，飞机抵达上海虹桥机场。徐业夫已在机场等候他们，在去宾馆的汽车上，徐业夫把几份印好的文件分给他们，是林彪5月6日转呈给毛泽东的解放军总后勤部的一份《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农副业生产的报告》，以及毛泽东于5月7日在这份报告后写的一封致林彪的信。毛泽东通过对这份报告的批示，描绘出一幅他心中，也是很多中国共产党人心中理想社会的蓝图。信的全文是：

林彪同志：

你在5月6日寄来的总后勤部的报告,收到了,我看这个计划是很好的。是否可以将这个报告发到各军区,请他们召集军、师两级干部在一起讨论一下,以其意见上告军委,然后报告中央取得同意,再向全军作出适当指示。请你酌定。只要在没有发生世界大战的条件下,军队应该是一个大学校,即使在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条件下,很可能也成为一个这样的大学校,除打仗以外,还可做各种工作。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八年中,各个抗日根据地,我们不是这样做了吗?这个大学校,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生产自己需要的若干产品和与国家等价交换的产品。又能从事群众工作,参加工厂农村的社教"四清"运动;"四清"完了,随时都有群众工作可做,使军民永远打成一片。又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斗争。这样,军学、军农、军工、军民这几项都可以兼起来。但要调配适当,要有主有从,农、工、民三项,一个部队只能兼一项或两项,不能同时都兼起来。这样,几百万军队所起的作用就是很大的了。

同样,工人也是这样,以工为主,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也要搞"四清",也要参加批判资产阶级。在有条件的地方,也要从事农副业生产,例如大庆油田那样。

农民以农为主(包括林、牧、副、渔),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在有条件的时候也要由集体办些小工厂,也要批判资产阶级。

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商业、服务行业、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凡有条件的,也要这样做。

以上所说,已经不是什么新鲜意见、创造发明,多年以来,很多人已经是这样做了,不过还没有普及。至于军队,已经这样做了几十年,不过现在更要有所发展罢了。

毛泽东

一九六六年五月七日

这就是后来被誉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划时代的新发展"的《五·七指示》。

陈伯达他们在车上就看起了文件。清晨7时左右,汽车停在了毛

泽东下榻的上海西郊宾馆12号楼。护士长吴旭君叫他们在客厅里先坐下,她去告诉毛泽东他们到了。

客厅不是很大,在客厅的一端是两张单人沙发,对面是一张三人沙发,在两面沙发的边上都各有一把椅子。杨成武硬要让戚本禹坐沙发,他自己坐旁边的椅子。

戚本禹觉得杨成武是老革命,自己一个小青年,怎么可以让他坐椅子,自己坐沙发呢?经一番推让,最后还是戚本禹坐椅子。大家坐下后,依然都埋头继续看文件。

一会儿,毛泽东穿着睡衣从客厅旁边的一间卧室里出来,和他们一一握手打招呼。在和戚本禹握手时,还说了一句:“好久不见了。”因为自1964年夏,戚本禹被调去《红旗》杂志社后,就没有再见过毛泽东。

毛泽东又说:“上次讨论哲学问题,让《红旗》派人来,你没有来。”

毛泽东指的是1964年秋,他会见日本物理学家坂田昌一后,召集了一些人作了一次关于哲学问题的谈话。

大家入座后,毛泽东拍了拍他旁边的单人沙发,让戚本禹坐在他的边上。一会儿,江青从卧室里走了出来。戚本禹马上起身要让座给她,毛泽东用手示意,要戚本禹仍坐在他边上,江青就坐到对面的椅子上。

这时,护士长吴旭君给毛泽东送来了早餐。一杯加了点麦片的马奶,还有一小碟烤馒头。

毛泽东喝了几口奶,开始说:“今天找你们来就是为了研究你们手里看的文件。从远古以来,人类一直没有什么社会发展的长远计划,人类社会发展应该有个远景计划,这才是人类文明。我们讲的人类文明,是共产主义。它是马克思根据现代生产力发展情况设想的,马克思在批评哥达纲领等书中讲了一些关于共产主义的具体的设想。只有共产主义社会,才是文明社会。我以前谈过张鲁,张鲁是东汉末年的农民领袖,与黄巾一党,他也有些共产主义想法,这些想法大概来源于古书上讲的大同世界,只是古书上那个大同世界讲得很模糊,因为那时没有新的生产力,对将来的大同世界无法具体化。张鲁的时代社会进步了点,所以张鲁的大同世界就比以前具体化。在张鲁那里治病

不要钱,吃饭也不要钱,但不能乱吃,吃饱就可以了。有的人,例如一些贵族豪富,吃那么多,浪费那么大,总不好!”

毛泽东说:“我们现在找到比张鲁更好的办法了,解放军总后勤部总结的这个经验,就是一个共产主义社会未来的萌芽,每个人分工不是那么刻板,一业为主,全面发展。解放军战士除了军事,可以做工,务农,又能学习文化知识,发展艺术才能。劳动者的劳动不要那么紧张,不要一天到晚干活,要劳动与学习相结合,有分工、有合作。做领导的也要劳动,定期劳动一下,和大家打成一片。分配上要允许有点差别,但不要太大,不要搞特殊,成为一个特殊阶层。”

戚本禹注意到,“此前主席虽然说过现在官僚特殊阶级已在形成,但这次说的还是特殊阶层。”

毛泽东继续说:“林彪同志有个报告过来,我给他写了几句话,请你们来一起修改一下。”

随后毛泽东征求他们看了文件后有什么意见?

陈伯达首先发言。他说:“文件刚拿到,虽然是初看,但感到主席的这个批示非常重要。”“我们在大跃进时,探索过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模式,这又是一次探索,主席这次的指示非常明确,而且可行性很大。”“我们不久前提倡的‘半工半读’也是一种探索,不过做起来像是勤工俭学,没有提到共产主义理想的高度。还有河南嵖岈山人民公社的共产主义过渡,搞得太杂,不大可行。”

1958 年,毛泽东曾让陈伯达和张春桥去看过嵖岈山公社的共产主义过渡,他们回来后对嵖岈山也没有怎么肯定,只是说那公社的书记挺能吹的,态度明显有保留。

陈伯达接着说:“嵖岈山的设想没有主席这个指示好。主席的指示指出了在现在的生产条件下,怎样做到人的全面发展,完全符合马克思讲的在新制度下,人的全面发展的理论。”

陈伯达讲完以后,杨成武说:“部队搞生产意义很大,照这样下去,我们都可以不领军粮了,这对战备是很有意义的。”

毛泽东插话说:“我历来主张军队粮食自给。”

杨成武接着说:“战士学文化好,这样军队的文化水平可以得到提高。部队就是缺文化,又能打粮食又能学文化。这个好。”

他还说:“东北有个部队搞得比总后报告中说的还要好。”

毛泽东让他把那份材料拿来看看。杨成武回答说:“已经送上去了,可能还没有送到主席这里。”

戚本禹在这之前就抄过毛泽东对《张鲁传》的批语,并看了很多遍,一些词句已能背诵。此时,他从引述毛泽东《张鲁传》的批语开始说起,当说到张鲁统治的地区“不置常吏”时,毛泽东插话说:“就是不要当官的,‘皆以祭酒为治’。”

“祭酒为治”就是由群众公推出的人来管理地方的各种事物。接着,戚本禹说起在长辛店二七机车厂劳动的时候,看到工厂边上就有很多土地,如果也能用来搞农业,工人生活就会大大改善。他说前些天刚去“南京路上好八连”体验生活,“没想到,我们的战士也会批判《海瑞罢官》。原来以为那些古代的事情,战士可能不清楚,哪知道战士都很清楚。”

毛泽东很注意地听了戚本禹复述的战士的话,然后问:“会不会是知道你要去,他们指导员事先请人来跟他们讲课,做了些准备?”

戚本禹说:“这我倒不清楚,但战士们有些问题说得很好,比我写的文章还要好。比如战士们说,那个‘清官’也是压迫人民的,而且有些‘清官’压迫人民更厉害。因为‘清官’有民望,受老百姓拥护,所以他们镇压农民起义往往更没顾虑,也更残酷,来了就杀,比贪官更凶狠,曾国藩就是如此。”

毛泽东听了说:“对!曾国藩杀人厉害,范老(文澜)说老百姓叫他‘曾剃头’。”

毛泽东还说:“《老残游记》上也讲‘清官’杀人厉害。说‘清官’的红顶子是用血染的。”

陈伯达说:“太平天国洪秀全的《天朝田亩制》,康有为的《大同书》,都没主席的批示提得好。”

毛泽东说:“太平天国起初也是有理想的,但在定都南京后,它的上层很快就腐败了,领导人自己成了新王朝的统治者,他们还会认真去搞什么天朝田亩制吗?我们让大家都来批判资产阶级,就是要防止再搞出新的资产阶级来。共产党虽然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部队,要是脱离群众,不继续革命,甚至腐化变质,转过来压迫人民,那么人民也会

起来反抗的,也会出陈胜、吴广,瓦岗寨。”

戚本禹接着毛泽东和陈伯达的话说:“主席的设想挺好,人不能一天一天老是干同样的活,一边干活一边学习,学工的可以学农,学农的可以学工,还要学文化批判资产阶级,那样人就可以得到全面的发展。如果工厂、公社、机关、学校要都按照主席的这个设想去做,那这个社会就越来越理想了。”

戚本禹感到毛泽东描绘的这种社会前景,比陶渊明的“桃花源”和康有为的《大同书》都好。而且,都是可行的,起码它在解放军的部队里已经实现了。

毛泽东听了笑着对戚本禹说:“你是年轻人,你们只要贯彻不断革命的精神,把革命进行到底,也许能看到共产主义社会的曙光。”

到吃午饭的时候了,毛泽东让他们下午修改文件,回去后再向政治局做汇报,看看还有什么修改补充的,然后提交中央会议讨论一下,通过后,再以中央文件发下去。

那天,周恩来也到了上海。当晚,魏文伯、曹荻秋请周恩来、杨成武、陈伯达和戚本禹吃饭,周恩来说他晚饭后要去毛泽东那里,陈伯达就让周恩来把他们起草的中央《通知》稿交给毛泽东。周恩来还约戚本禹第二天早晨一起到锦江饭店顶楼阳台上去呼吸新鲜空气。

第二天早晨7点多,戚本禹去了。没想到,周恩来已经在那里等着他了。戚本禹不好意思的说道:“我迟到了,变成贪睡的小张良啦。”

周恩来笑了笑,谈了几句闲话,就问起戚本禹的家庭状况和工作经历,然后对他说,在李秀成问题的讨论中,他看到了毛泽东对李秀成“白纸黑字,铁证如山。晚节不终,不足为训”的十六字的批示,端正了认识。他对戚本禹说:“这件事情我对不起你,周扬开会批判你是我批准的。我其实也觉得你的文章写得好,有气势。可他们都要批,讲了好多理由。我也没有好好研究就批准了。幸亏主席及时发现了,不然要犯大错误”。

周恩来说的这件事是1963年,尚名不见经传的戚本禹在《历史研究》第4期上发表了《评〈李秀成自述〉》一文,开宗明义地指出:《李秀成自述》“是一个背叛太平天国革命事业的‘自白书’”,由此判定李秀成是“认贼作父”的叛徒。

几乎是在同时,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周扬肯定了一出正在排演的名为《李秀成》的话剧,赞扬李秀成“忠勇”。他自然不能同意戚本禹的“叛徒”之说了,于是指示专门召开会议讨论戚本禹的文章。到了9月14日,中宣部召集学部、近代史研究所及《新建设》杂志负责人开会,专门讨论戚本禹评价李秀成文章。除郭沫若以外,历史学界在北京的头面人物基本都到会了,如范文澜、翦伯赞、侯外庐、邓拓、刘大年、李新,等等。大多数与会者不认同戚文,认为不能简单化地判定李秀成为叛徒,应做全面的历史的分析和评价。尤以时任北京大学副校长的著名历史学家翦伯赞的发言最为激烈,他说戚本禹根本不懂得历史。

周扬同意与会者的多数意见。他认为戚本禹的文章是一种“翻案风”。他提出了两个“补救”办法:“第一,由中宣部在内部发一个通知,要各地对戚本禹这篇文章不要转载,不要公开评论或讨论,随后由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长刘大年写一篇正面评价李秀成的文章,仍由《历史研究》发表,作为史学界的基本意见。第二,刘大年的文章写出、发表需要一段时间。在此期间,北京史学界人士先开个座谈会,会后发个消息,在报上刊登一下,表示北京史学界不同意戚本禹的意见。让大家知道,戚本禹的文章不作准。”

这次会议后,中宣部下令,因戚本禹的文章而停演的话剧《李秀成》照旧演出,10月1日国庆演出了三场。

后来毛泽东那“十六字批示”下来后,戚本禹的状况才发生了根本的转变。

此时,在上海锦江饭店的顶楼阳台上,戚本禹对党的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为此事亲自向他作自我批评,十分感动。

# 第39回：部署忙，北京城调兵遣将 说政变，全党上下皆震惊

此时的中国，尤其是北京，已经处在剧烈的动荡之中。每天声讨和抗议的人群，络绎不绝的涌入位于北京建国门内大街20号的《北京日报》社和位于台基厂的北京市委大楼，院子和楼道内贴满了“打倒彭真”“砸烂独立王国”“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的大标语和大字报。

5月14日0时40分，正在上海的周恩来指示广播事业局代管北京市广播电台。当天上午广播事业局研究确定了代管方案，周恩来立即批示同意。

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都曾担任党、政、军要害部门的领导，他们接连发生问题，不能不引起毛泽东的高度警觉。4月杭州会议期间，他单独召见了周恩来和叶剑英，提出北京的安全保卫工作问题。而且，彭真的问题出来后，北京市委基本也瘫痪了，此时需要有一个机构把原北京市委的工作抓起来。

5月14日早上，周恩来在锦江饭店顶楼阳台上与戚本禹一起呼吸了新鲜空气后，当天回到北京，请叶剑英到中南海自己的住所西花厅，商讨如何加强首都的警卫工作。商量的结果是：尽快成立一个专门的工作小组，负责解决扩建北京市卫戍区和加强北京市要害部门的警卫。他们二人决定选调警卫部队及配备好卫戍区的领导班子。周恩来建议，这个小组就叫“首都警卫工作领导小组”，简称“首都工作组”。

5月14日，毛泽东关于陈伯达、杨成武、戚本禹三人起草的那份《通知》的批复下来了，说陈伯达他们写的东西可用，让他们带回北京。当天上午，陈伯达他们即坐飞机回到北京。回到北京后，陈伯达立即向中央政治局作汇报，戚本禹则向中央文革小组传达，杨成武也向林彪做了汇报。

5月15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一致通过了陈伯达、杨成武、戚本

禹三人起草的文件,向全党转发了毛泽东的《五七指示》,认为“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划时代的新发展”。8 月 1 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经毛泽东审阅过的社论:《全国都应该成为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摘要公布了这封信的内容。社论说,“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各行各业都要办成亦工亦农,亦文亦武的革命化大学校的思想,就是我们的纲领。”社论还认为,按照“五七指示”去做,那么,就“能够进一步又多又快又好又省地建设社会主义,能够更快地铲除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社会基础和思想基础”,“就可以促进逐步缩小工农差别、城乡差别、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差别”,“就可以培养出有高度政治觉悟的、全面发展的亿万共产主义新人”。

这是毛泽东对理想世界的一次展望。发动文化大革命,除了紧迫的现实政治目标外,还有他心目中美好新世界给他投下的动力。这里面有着许多中国共产党人曾经经历过的战时共产主义制度的烙印,所以也激起了许多老党员对自己曾经走过的光荣历程的回忆,激发了年轻人对美好社会的遐想和追求,激励他们更加狂热地投入到为这一理想而奋斗的文化大革命中去。

周恩来也在 5 月 15 日,和叶剑英联名,就加强首都警卫工作一事报告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常委,提出:组成以中央军委副主席兼秘书长叶剑英为组长,中央军委副秘书长兼代总参谋长杨成武、公安部长谢富治为副组长的“首都警卫工作领导小组”,简称“首都工作组”,负责保卫首都安全工作,直接对政治局常委负责。

“首都工作组”组员有:

总政副主任刘志坚;

华北局第一书记兼新北京市委第一书记李雪峰;

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

国务院秘书长周荣鑫;

北京军区副司令员郑维山;

北京军区副司令员兼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

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兼北京市副市长万里;

华北局书记处书记苏谦益。

5 月 16 日至 22 日,公安部队党委在北京饭店召开各省、市、自治

区公安总队领导干部参加的党委扩大会议,传达贯彻中央书记处第407次会议决定:撤销公安部队,归解放军系列。

5月16日深夜24时,代总参谋长杨成武向北京军区政委廖汉生传达了中央关于加强首都警卫力量的指示,并交代了北京军区的任务:调两个师到北京,归北京卫戍区建制。

要调两个师的兵力进京,此事重大而且紧急。廖汉生立即按照杨成武的指令,找到北京军区司令员杨勇、副司令员郑维山、傅崇碧等人,向他们通报了情况,连夜商讨落实的方案,初步拟定:调第63军第189师和第24军第70师进京,归卫戍区建制。

5月17日下午,廖汉生将北京军区拟出的方案向杨成武做了汇报。杨成武表示:同意63军调一个师,另一个师则可以提出几种方案来,再研究。

5月18日,周恩来就加强首都警卫工作及部队调动事,与杨成武和北京军区协商后,书面报告毛泽东:拟调陆军第63军189师和陆军第65军193师进京担任卫戍任务,卫戍区司令员由傅崇碧担任。部队到京后,将对北京要害部门和广播宣传机关的保卫任务重新调整。

毛泽东阅后批示:“照办。”

与此同时,5月16日上午10时30分,政治局扩大会议全体会议正式通过陈伯达等人起草的,经毛泽东修改的《通知》。该《通知》在“杭州会议”的常委会通过后,即由康生带回北京。但是他没有按惯例交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刷厂排印,而是给了公安部部长谢富治,让公安部印刷厂印刷。这是担心泄密,让彭真知道。

在表决通过这份《通知》前,陈伯达首先综合介绍了各小组讨论情况,接着刘少奇又简单解释了几句:“开政治局扩大会会议,叫大家讨论,有人提了些意见,建议改几个字。我原来考虑过改一点,现在大家意见还是不改的好,不如原来的好,那就不改了吧。”

接着,刘少奇征求彭真的意见:“彭真同志,你有什么意见?”

彭真平静的回答:“一个检查,一个改。”

刘少奇觉得彭真误解了他的问话,又补了一句:“你对《通知》有什么意见?”

彭真说:“没有意见。”

刘少奇又问:“是赞成还是反对?”

彭真低头看材料,没有说话。

刘少奇不再追问,环顾一下会场,说:“现在通过这个《通知》,同意的请举手!”

参会人员都举起了右手,一致通过。

刘少奇再向坐在后排的列席人员说:“你们也表表态。”

这样,列席者也纷纷举手,算是出席、列席会议的人“一致通过”,但后者不计入票数。

这次通过的《通知》,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五一六通知》,因为是在5月16日通过的。

《通知》说:“撤销原来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及其办事机构,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之下。”这是毛泽东亲笔加上的。

《通知》号召说:“全党必须遵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尤其不能信用这些人去做领导文化革命的工作,而过去和现在确有很多人是在做这种工作,这是异常危险的。”

“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

这最后两段文字,是毛泽东亲自增写的,其分量之重,可想而知。

接着,会议批转了中央工作小组4月30日《关于罗瑞卿同志错误问题的报告》,并且加了按语,指出:

“中央认为,罗瑞卿的错误是用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反对无产阶级

军事路线的错误,是用修正主义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错误,是反对党中央、反对毛主席、反对林彪同志的错误,是资产阶级个人野心家篡军反党的错误。中央认为,这个小组会议开得很好,贯彻执行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摆事实,讲道理,对罗瑞卿进行了耐心的教育和严肃的批判。罗瑞卿不但不认真检查自己的错误,反而于3月18日跳楼自杀(受伤),走上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的道路。”

17日下午,政治局常委召开生活会,刘少奇首先发言,他说过去填表时,家庭成分一直是填富农,后来到花明楼看看,应该是地主。

周恩来也说自己受封建官僚家庭的影响,对阶级斗争认识不够,对北京的问题事先没有觉察。

邓小平也作了检查,说书记处发生这么大的问题自己都不知道。

林彪最后也讲了几句,他说:“常委同志都检讨了,我没有准备,我的家庭也是地主,问题也看得不那么清楚。”

5月18日,政治局扩大会议安排林彪讲话。他说:

“本来是常委其它同志先讲好。常委同志们让我先讲,现在我讲一点。我没有写出稿子来,凭口来讲,有些材料念一念。

……

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有了政权,无产阶级,劳动人民,就有了一切。没有政权,就丧失一切。生产关系固然是基础,但是靠夺取政权来改变,靠夺取政权来巩固,靠夺取政权来发展。……无产阶级拿到了政权,百万富翁,千万富翁,亿万富翁,一下子就可以打倒,无产阶级就有了一切。所以,无论怎样千头万绪的事,不要忘记方向,失掉中心,永远不要忘记了政权。要念念不忘政权。忘记了政权,就是忘记了政治,忘记了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

毛主席最近几个月,特别注意防止反革命政变,采取了很多措施。罗瑞卿问题发生后,谈过这个问题。这次彭真问题发生后,毛主席又找人谈这个问题。调兵遣将,防止反革命政变,防止他们占领我们的要害部位、电台、广播电台。军队和公安系统都做了布置。毛主席这几个月就是做这个文章。这是没有完全写出来的文章,没有印成文章的毛主席著作。我们就要学这个没有印出来的毛主席著作。毛主席为了这件事,多少天没有睡好觉。这是很深刻很严重的问题。

政变,现在成为一种风气。……

世界上政变的事,远的不说,1960 年以来,据不完全的统计,仅在亚非拉地区的一些资本主义国家中,先后发生 61 次政变,搞成了的 56 次。把首脑人物杀掉的 8 次,留当傀儡的 7 次,废黜的 11 次。这个统计是在加纳、印度尼西亚、叙利亚政变之前。6 年中间,每年平均 11 次。

……

从我国历史上来看,历代开国后,10 年、20 年、30 年、50 年,很短时间就发生政变,丢掉政权的例子很多。”

接着,林彪列举了中国从周朝至民国发生的一些著名的政变事例,引经据典,讲得有声有色。

他说:“这些历史上的反动政变,应该引起我们惊心动魄,高度警惕。

我们取得政权已经 16 年了,我们无产阶级的政权会不会被颠覆,被篡夺?不注意,就会丧失。苏联被赫鲁晓夫颠覆了。南斯拉夫早就变了。匈牙利出了个纳吉,搞了十多天大灾难,也是颠覆。这样的事情多得很。现在毛主席注意这个问题,把我们一向不注意的问题提出来了,多次找负责同志谈防止反革命政变问题。难道没有事情,无缘无故这样搞?不是,有很多迹象,‘山雨欲来风满楼’。《古文观止》里的《辩奸论》有这样的话:‘见微而知着’。‘月晕而风,础润而雨’。”

“罗瑞卿是掌军权的。彭真在中央书记处抓去了很多权。罗长子的手长,彭真的手更长。文化战线、思想战线的一个指挥官是陆定一。搞机要、情报、联络的是杨尚昆。搞政变,有两个东西必须搞。一个是宣传机关,报纸、广播电台、文学、电影、出版,这些是做思想工作的。资产阶级搞颠覆活动,也是思想领先,先把人们的思想搞乱。另一个是搞军队,抓枪杆子。文武相配合,抓舆论,又抓枪杆子,他们就能搞反革命政变。要投票有人,要打仗有军队,不论是会场上的政变,战场上的政变,他们都有可能搞得起来。”

“笔杆子、枪杆子,夺取政权靠这两杆子。”

“现在毛主席健在,我们是大树底下好乘凉。毛主席已经 70 多岁了,身体很健康,可以活到 100 岁。”

“要念念不忘阶级斗争,念念不忘无产专政,念念不忘突出政治,念念不忘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不然的话,就是糊涂虫。不要在千头万绪、日理万机的情况下,丧失警惕性,否则,一个晚上他们就要杀人,很多人头要落地,国家制度要改变,政权要变颜色,生产关系就会改变,由前进变成倒退。”

# 第40回：万念灰，邓拓家中辞世去 遭诘问，彭真会上检查难

林彪还说："毛主席是我们党的缔造者，是我国革命的缔造者，是我们党和国家的伟大领袖，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

毛主席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毛泽东思想是在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时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全党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

"毛主席所经历的事情，比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都多得多。当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是伟大的人物。马克思活了64岁，恩格斯活了75岁。他们有很高的预见，他们继承了人类先进的思想，预见到人类社会的发展。可是他们没有亲身领导过无产阶级革命，没有像毛主席那样，亲临前线指挥那么多的重大的政治战役，特别是军事战役。列宁只活了54岁，十月革命胜利以后6年就去世了。他也没有经历过像毛主席那样长期、那样复杂、那样激烈、那样多方面的斗争。中国人口比德国多10倍，比俄国多3倍，革命经验之丰富，没有那一个能超过。毛主席在全国、在全世界有最高的威望，是最卓越、最伟大的人物。毛主席的言论、文章和革命实践都表现出他的伟大的无产阶级的天才。有些人不承认天才，这不是马克思主义。不能不承认天才。恩格斯说，十八世纪的天才是黑格尔、圣西门，19世纪的天才是马克思。他说，马克思比我们一切人都站得高些，看得远些，观察得多些和快些，他是天才。列宁也承认天才，他说要有十几个天才的领袖，才能领导俄国取得革命的胜利。毛主席是天才。我们同毛主席哪一点不同？一起搞斗争，有些人年龄比他老，我们没有他老，但经历的事也不少。书我们也读，但我们读不懂，或者不很懂，毛主席读懂了。看到很多人读书圈圈点点，把书都圈满了，证明他没有读懂，不知甚么是中心，甚么是主次。辩证法的核心，毛主席在几十年前就懂了，我们没有懂。

他不但懂了,而且还会熟练地运用。从懂到用,有很大的距离,懂了未必会用。打乒乓球,你懂得了规则,你也打不过庄则栋、徐寅生。打仗也一样,你懂一点书本上的军事知识,打的时候不一定能打胜仗。毛泽东思想全部贯串着唯物辩证法。毛主席广泛运用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在当代世界上没有第二个人。19 世纪的天才是马克思、恩格斯,20 世纪的天才是列宁和毛泽东同志。不要不服气,不行就不行。不承认这一点,我们就会犯大错误,不看到这一点,就不晓得把无产阶级最伟大的天才舵手选为我们的领袖。”

林彪的这些话,后来在文革中都成了脍炙人口的名言。

林彪继续说道:“私有制和私有观念是产生修正主义的重大因素。这种因素非常广泛。农村有自留地,有集体的地。一筐粪,是先送自留地,还是先送集体的地,都是有斗争的。这是两个阶级的心理,是两个阶级的思想,是两条道路的表现,是阶级斗争的表现。我们不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去战斗,资产阶级思想就会占领阵地,引起蜕化变质,出乱子。匈牙利不就有裴多菲俱乐部这批学阀吗?在他们的煽动下,20 万人围着国会,要纳吉当政。我们党内这些坏家伙,就是纳吉。一旦有事,他们振臂一呼,就会有些人跟着跑。”

“我们现在拥护毛主席,毛主席百年之后我们也拥护毛主席。毛泽东思想要永远流传下去。毛泽东思想是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是高度同实际相结合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全国人民最好的教科书和必修课,是全国劳动人民团结和革命的共同思想基础,是全国人民行动的指南。毛泽东思想是人类的灯塔,是世界革命的最锐利的武器,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毛泽东思想能够改变人的思想面貌,能够改变祖国的面貌,能够使中国人民在全世界面前站起来,永远站起来,能够使全世界被压迫、被剥削的人民站起来,永远站起来。毛主席活到那一天,90 岁、100 多岁,都是我们党的最高领袖,他的话都是我们行动的准则。谁反对他,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在他身后,如果有谁做赫鲁晓夫那样的秘密报告,一定是野心家,一定是大坏蛋,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

毛泽东思想永远是普遍真理,永远是我们行动的指南,是中国人民和世界革命人民的共同财富,是永放光辉的。解放军把毛主席著作

作为全军干部战士的课本,不是我高明,而是必须这样做。用毛泽东思想统一全军、全党,什么问题都可以解决。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超过我们一万句。

对毛主席的著作,我领会得很不够,今后还要好好学习。”

林彪的讲话通俗易懂,简洁明了,在会上再一次引起震动。许多人这才知道党内形势竟是如此的严峻,同时对林彪的发言表示由衷的钦佩。

1966 年 5 月 16 日,《人民日报》转载了了戚本禹的文章《评〈前线〉、〈北京日报〉的资产阶级立场》。文章点名说:“邓拓是一个什么人?现在已经查明,他是一个叛徒。在抗日战争时期又混入党内……1957 年夏天,他是资产阶级右派方面一个摇鹅毛扇的人物。”

在极度的孤独和痛苦中挣扎着、希冀着的邓拓看到这篇文章,如同迎头一棒。这是党报啊,是他曾经工作、奋斗过的地方,是他心目中十分神圣、严肃的地方。如今,党报也如次讲他,说明党已经彻底不信任他了。这对于一个从 1930 年就参加共产党的老党员,一个为自己的信仰奋斗了 36 年的共产主义战士,是很难接受的现实。他曾经两次坐过敌人的监狱;抗战 8 年,他经历过日本鬼子的铁壁合围,“五一”大扫荡,在枪林弹雨中,他坚持了下来。这是因为党相信他,边区政府支持他。可现在呢?他成了自己党组织的敌人,成了人民的敌人……

邓拓的精神支柱倒了。

那么,邓拓在历史上是不是叛徒呢?戚本禹的这篇文章是与陈伯达、康生、尹达、王力、关锋等人一起讨论写就的。在讨论这篇文章的时候,康生提到:“你们不知道吧,邓拓是个叛徒。”康生说,这是听彭真说的,邓拓在历史上曾经被捕过,在受审的时候,他把共产党的内部情况招供了。康生提出,要彻底批判邓拓,就一定要联系他的历史来批。所以,在戚本禹的文章里要加上“邓拓是叛徒”这句话,在场参加讨论的所有人都表示同意。

邓拓是叛徒一事,戚本禹也听彭真说过。那是 1964 年末,彭真请他和关锋到家里吃饭,其间谈到了邓拓的文章,戚本禹和关锋都说邓拓的文章写得不好。彭真悄悄跟他俩说:“邓拓以前叛变过,只是没有给党造成什么大的危害。本来八大要选他为中央委员的,是他自己给

中央写信,说他在历史上有问题,不能当中央委员。”

此时,康生又叮嘱戚本禹说:“关于邓拓的变节问题,你要跟安部长核对一下。”

于是,戚本禹就在康生那里用红机子给中央组织部部长安子文打了电话,一位姓陆的秘书接的电话,戚本禹认识她。戚本禹说:

“我想请示一下安部长,现在《红旗》杂志编辑部在讨论一篇批判邓拓的文章,在文章里要指明邓拓是叛徒。这件事需要跟你们核对一下。”“这是伯达、康生同志提出来要核对的。”

隔了一天,陆秘书给戚本禹回电话说:“安部长已经看过档案,据档案材料,他在敌人那里是招供了,所以可以说是叛徒。但是在批判文章中提不提这个问题,这个要由中央来决定。”

戚本禹说:“是要请示中央的,谢谢你的提醒。”

稿子清样出来后,戚本禹特意在“邓拓是叛徒”这句话下面加了横杆,由陈伯达签名后,直接报送刘少奇、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刘少奇、邓小平等中央领导都在清样上画了圈。

清样退回来后,戚本禹问:“还要不要请示主席?”

陈伯达、康生都说:“不用了。安子文都说是了,刘少奇、邓小平同志也看过了,都没有意见,这就是通过了。”

这就是戚本禹文章中“邓拓是叛徒”的由来。

5 月 18 日,对邓拓的妻子丁一岚来说,是一生中最黑暗的一天。她后来回忆说:

“我们家是三间房,我和邓拓分开住,各住一间。第二天早上,我去他房间,发现他已经去世了,全身都凉了。那时候,他有很多病,身体很不好,经常写东西,手出汗很多,写东西他总用一块手绢擦汗。我拿到他这个手绢,那手绢都是湿的,他当时写遗书时,心里有多么难过,就这样走了。”

邓拓并不知道此时的彭真已经被免职并接受审查,也不知道北京市委即将被改组,他留下了一封 6000 余字的遗书,是写给彭真、刘仁及北京市委的。

他在遗书中不厌其烦地为自己做着辩解,辩解实际上主要是围绕着有没有影射毛泽东这个主题展开的。

“……我的《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的出现,确实同当时的社会思潮和社会背景有关系的。大家都熟悉的“单干风”、“翻案风”,我就不说了。

……例如,大家强烈谴责,认为是最恶毒攻击党的《伟大的空话》。我完全没有把那个孩子的诗和毛主席关于东风压倒西风的英明论断联系起来。主席对于世界形势的这一精辟论断,我在各种讲话和文章中有二十多次加以阐述,有历次稿件可查。事实上,那个孩子的诗,并不是以阐明东风压倒西风为主题的,我当时正听到一个政治工作会议的传达,脑子里只考虑到政治宣传方面如何克服标语口号式的作品,要求更具体更生动,联系活思想、活材料,做到有血有肉。但是,因为是杂文,句子总想俏皮些,带点刺儿,这是出乱子的劣根之所在。

又如《专治‘健忘症’》。我是根据两封读者来信(是从晚报编辑部转来的,应该查得到)写的。其中症状的叙述便是概括来信人说明的情况,有一个说他常常受到别人的责备,非常痛苦。为什么要提到巫医呢?我认为像卜卦、算命一样,让读者知道有这种骗人的把戏,就不会上当。……

再如,《说大话的故事》、《一个鸡蛋的家当》和《两则外国寓言》,意思很明显,不应该引起误解。《说大话的故事》是听见当时又有的地方弄虚作假、谎报情况而写的。《一个鸡蛋的家当》是针对当时有些社队又出现搞投机买卖和进行剥削的行为而写的,文字表达的意思比后一篇更为明显。《两则外国寓言》写在苏修二十二大之后,所讲的竞技人的吹牛和山雀的夸口,显然是把‘古巴事件’以来赫鲁晓夫之流的嘴脸,比做‘在西方贵族老爷及其子孙们的交际场合中司空见惯’的一样。……

文章的含意究竟如何,我希望组织上指定若干人再作一番考核。《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中,我写的文章合计一百七十一篇,有问题的是多少篇?是什么性质的问题?我相信这是客观存在,一定会搞清楚的。”

“……许多工农兵作者都说:‘听了广播,看了报上刊登邓拓一夥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话,气愤极了。’我完全懂得他们的心情。我对于所有批评我的人绝无半点怨言,只要对党对革命事业有利,我个人无

论经受任何痛苦和牺牲,我都心甘情愿。过去是这样,现在是这样,永远是这样。”

在遗书的最后他说:

“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我本应该在这一场大革命中经受得起严峻的考验。遗憾的是我近来旧病都发作了,再拖下去徒然给党和人民增加负担。但是,我的这一颗心,永远是向着敬爱的党,向着敬爱的毛主席。

我要离开你们的时候,让我再一次高呼:

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我们敬爱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伟大的毛泽东思想胜利万岁!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伟大事业在全世界胜利万岁!”

给妻子的遗书里,邓拓这样写道:

“盼望你们永远做党的好女儿,做毛主席的好学生,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伟大事业奋斗到底!……此刻心脏跳动很不规律,肠炎又在纠缠,不多写了。你们永远不要想起我,永远忘掉我吧。我害得你们够苦了,今后你们永远解除了我所给予你们的精神创伤。永别了,亲爱的。”

要说邓拓反对毛泽东,他没有这个能力和胆量。如果说邓拓对毛泽东有意见,应该说,也不冤枉他。作为一个虔诚的共产党人,邓拓曾经对毛泽东、对毛泽东思想由衷的信仰、膜拜和赞美。他是中共党内率先提出“毛泽东主义”的人。1942 年 7 月 1 日,他在《晋察冀日报》亲自执笔写的社论《纪念“七一”,全党学习和掌握毛泽东主义》,称赞毛泽东是“杰出的伟大政治家和战略家、伟大理论家”,系统概括了“毛泽东主义”的思想方法、政治科学理论、军事科学理论等。1944 年他又主动请缨,主编了中国第一部《毛泽东选集》。

但是,1956 年以后,他对毛泽东的认识有了一些变化,从 50 年代私下说“伴君如伴虎”,到 60 年代写下《专治“健忘症”》等一系列杂文,暗讽毛泽东,都说明他对毛泽东的一些做法是有意见的。有一次,他在邀请《人民日报》副总编胡绩伟去潭柘寺散心时说毛泽东这个人“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自己讲过的话,可以翻脸不认账。”

可是,全党、全军、全国信仰毛泽东,不允许任何人反对甚至怀疑

毛泽东。在毛泽东的巨大光环之下,他的不满、他内心的真实看法,除了私下偷偷表露一点,还有就是通过含沙射影、含蓄隐蔽的方式,在旧体诗和杂文中有所表达。而这一切一旦揭露,无疑是大逆不道的。“文章满纸书生累”,他的这些作品谈古论今、引经据典、才华横溢,传播知识,自然很受读者的欢迎。但是,一旦读者知道他写这些文章是讽刺、反对毛泽东的,其愤慨之情,可想而知,口诛笔伐,自然是铺天盖地。人一旦发现自己成了这个社会的另类,其压力也就可想而知。

1960 年夏天,邓拓游历江南风景名胜。途径无锡东门苏家弄的东林书院,当即赋诗《过东林书院》:

“东林讲学继龟山,事事关心天地间。莫谓书生空议论,头颅掷处血斑斑。”

邓拓是文革中第一个自杀的高级干部。

5 月 18 日,中央决定成立由周恩来任组长的专门工作组,负责审查彭真、陆定一、杨尚昆 3 人的问题,罗瑞卿的问题则归军委审查,由林彪负责。

这天,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在北京会见越南共产党领袖胡志明。此时,他们都认为:“中国党内的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已经挖出来了”。

5 月 19 日上午,彭真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检查,他说:

“我承认自己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犯有极其严重的错误,我表示好好地检查自己的错误。但是,说我搞政变、颠覆中央、里通外国等罪恶活动,我连做梦也没有想到。至于我同罗瑞卿、同陆定一有没有反党的联系,请中央审查。”

康生立即站起来反驳说:“你这个话就是反对中央刚刚通过的通知!通知里面说得很清楚:‘这些人物有的已经被识破了,有的还没有,有的正在受到我们的重用。’这话是毛主席亲自加的,是主要的内容。林总的讲话已经发挥了主席的这个思想,你为什么还要这样讲话?你尖锐地同党、同主席、同林总对立!”

林彪:“其实做梦也没有忘记。”“你到处封官许愿,包庇坏人,实际上是招兵买马,招降纳叛,扩大队伍,组织政变的力量。”

刘少奇也说:“你彭真到现在还嘴硬,你的个人主义膨胀我早就看

出来了,你为什么要打着毛主席的旗号来骗我们?你就是一个阳奉阴违的两面派,中央的修正主义就是你!”

彭真一共只讲了5分钟的时间,却多次被人打断。

陈伯达说:“在我们党里面的一个地下的‘四大家族’,就是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叫‘彭、罗、陆、杨四大家族’。他们走的是高、饶的老路,对林总、对少奇同志、对恩来同志,他们现在的目的就是要搞掉这3个人,千方百计的攻击他们。”

贺龙说:“主席批评赫鲁晓夫出在我们身边,那还不是批评你呀?你就是没有承认赫鲁晓夫,你是一个大党阀也不假。”

康生对彭真说:“你就是睡在我们身旁的赫鲁晓夫这样的人物。”

张鼎臣、杨成武、李先念、陈毅、薄一波、廖汉生、聂荣臻、蔡畅、余秋里等都做了发言,对彭真的检查很不满意,认为不深刻,没抓住要害,还有对抗的态度。会场上出现了群起而攻之的场面。

彭真陷入孤苦境地。不久,中央派人通知他,停止出席会议。

# 第41回：怒难耐，林彪痛骂陆定一 保晚节，周恩来会上发言

5月19日下午，陆定一在政治局扩大会上作检讨，他是5月8日才从合肥乘飞机回到北京。

还在南昌时，陆定一就看到了中央于4月1日批发的《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纪要》中的内容使他深为震惊：他很清楚，这个《纪要》和《二月提纲》是针锋相对的。他深感问题的严重，立即写信给中宣部副部长张子意和许立群，要求在中宣部开展批评，首先是对他自己进行批评，愈尖锐愈好。

这时，严慰冰给陆定一打了长途电话，要他回北京看一个文件，文件是密封的，严慰冰没敢拆开，估计是重要文件。后来才知道文件的内容是关于彭真错误问题毛泽东同康生的谈话。严慰冰要陆定一打电话给康生。陆定一表示不回北京，也未给康生打电话。严慰冰将文件发往南昌，被中央机要局在路上截了回去。

4月18日，陆定一给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写信，声明他不知道严慰冰写匿名信一事。

陆定一从江西来到了安徽。4月30日，中宣部副部长张子意和公安部副部长杨奇清突然从北京来到合肥，告诉陆定一：严慰冰已作为“反革命分子”于4月28日逮捕。

严慰冰要出事，这是陆定一意料中的。但竟是“反革命分子”，还遭到逮捕？他没想到会如此严重，一时不知说什么好。

张子意和杨奇清还传达了中央的意见，要他遵守五件事，其中有：不要将此事泄漏；不与严家的人（严慰冰的母亲和妹妹等）来往；在外地逗留得久些，不要立即回京。

正式谈话后，张子意又找陆定一个别交谈，建议他写信向中央表示态度。陆定一接受了他的建议，写信给中央，表示拥护中央的措施和遵守五条规定。

就在张子意、杨奇清离开合肥后没几天,5 月 6 日,陆定一接到了汪东兴从北京打来电话,通知他回北京参加政治局扩大会议,并问他是坐飞机还是坐火车?

陆定一回答说:“如果事情很急,就派飞机来;如果不是那么急,我就坐火车回去。”

汪东兴没有透露会议内容和其他情况,只是定下派飞机来接他。

张子意、杨奇清代表中央要他在外地多逗留些时间,汪东兴也是代表中央要他立即回京,究竟北京发生了什么事?陆定一深感不安。5 月 8 日,陆定一从合肥乘飞机回到北京,参加正在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

5 月 19 日下午,陆定一在政治局扩大会上作检讨说:

“我是高级干部,40 年党龄。我手里只有笔杆。我年已 61,身体不好,眼睛不好,我会搞政变么?似乎不会。”接着,他又说:“阶级斗争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时机一到,自己不想复辟,资产阶级也会拥戴你复辟。辛亥革命,武昌起义,黎元洪怕得要死,钻进床底下,被当时的起义者拖了出来,当了领袖。袁世凯做寿,说自己别无所求了,可是,发表了这一通宣言后不久,他就做了洪宪皇帝。我有许多资产阶级思想,说我是定时炸弹一点也不冤枉。把我这个定时炸弹挖去,对党、对人民都是一次大胜利。所以,我对这次斗争,抱着欢迎的态度。”

谈到匿名信的问题时,陆定一再三声明与自己无关。他说:“我同严慰冰生活了 25 年,她写匿名信我知道不知道?这对于我,是有口难辩的事情。但是我只知道她同我吵架,确实不知道她写匿名信。在庄严的政治局会议上,我不能说假话。现在严慰冰在公安部,请审问她,如果我在看到公安部材料以前,就知道她写匿名信,哪怕只有一封,请把我当作反革命的主谋犯或同谋犯,加重对我的刑罚。”

林彪终于按捺不住心中的怒火,开口问到:“陆定一,我对你怎么样?”

陆定一回答:“很好。”

林彪说:“我对知识分子历来很尊重的。你为什么害我?我这人一直喜欢一点知识分子,对你陆定一我还是比较喜欢的,你为什么干这么坏的事?”

陆定一说:“严慰冰干的事,我确实不知道。”

林彪拍了桌子,说:“你老婆的事你会不知道?”

就连平时温文尔雅的周恩来也非常生气,拍着桌子骂陆定一是“伪君子”,说“你老婆干的事情难道你不知道?”

陆定一顶撞说:“丈夫不知道老婆干的事情的有的是。”

这时坐在主席台下的李富春走上前来指责陆定一:“你这是什么态度对待我们的总理? 这是我们的总理啊!”

大家纷纷批评、指责陆定一,说文人无行、纵容老婆胡闹等等,另外还批评陆定一反毛泽东思想,只反教条主义,思想战线的事都由他负责,中宣部一塌糊涂,成了阎王殿,文化部也一塌糊涂,学术批判他反对上纲,这是给资本主义鸣锣开道等等。

对有人指责他组织反党集团、搞复辟,陆定一坚持不承认。

会后,政治局常委继续开会。期间,邓小平走出常委开会的房间,将李雪峰叫了进去,对他说:“中央决定从现在起停止陆定一同志出席这个会议。由你和富春同志去跟他谈一下,通知他不再出席会议了。”

李雪峰说:“好吧。”

李富春对李雪峰说:“你领头吧。”

李雪峰:“你是政治局的,你领头。”

两人站起来,朝陆定一待的那个房间走去,虽然只有几步路,可是谁也不愿走在前面,一直并行,走得很慢。

到了门口,李富春推了李雪峰一下,李雪峰年轻,只好服从。

进门后,李富春又让李雪峰先说,李雪峰推辞说:“你说吧。”

李富春:“还是你说。”

李雪峰对陆定一说:“中央决定,从现在起停止陆定一同志出席这个会议。”

陆定一看着李雪峰,大声的说:“雪峰同志,我可是要搞共产主义的。我还希望我能看到共产主义!”

李雪峰劝道:“会议定了,休息吧。事情总会弄清楚的。”

李富春:“是啊,事情总会弄清楚的……”

中央《516 通知》的精神迅速在各地引起反响。就在彭真、陆定一在北京检讨的同时,中共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在广州也做了检讨。5

月19日,中南局在广州中山纪念堂召开中南区万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动员大会,陶铸以中南局第一书记身份,亲自在会上传达贯彻中央刚刚通过的《5·16通知》和中南局全体委员会的精神,强调"彻底揭露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夺取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同时批判混进党、政府和军队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正睡在我们身旁的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并在会上作了一个洋洋万言的动员报告。

在讲到"共产党员必须同一切剥削思想彻底决裂"时,出乎人们的意料,陶铸公开、诚恳地检讨了自己"没有紧紧抓住阶级斗争这个纲,而是想通过一些具体政策和经营管理的办法去巩固集体经济……这样并不能根本解决问题,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说还助长了搞自发、闹单干的倾向。"

他说:"解放16年了,我们跟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相处,对他们实行团结、教育、改造的方针,给他们一张选票,一个饭碗;他们也表示跟党走,走社会主义道路。但是,阶级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和和平平肯定不能解决问题……世界上只有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哪有什么和平过渡?思想文化领域更是如此,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只有你死我活的斗争,哪有什么和平过渡?"

回想5年前,陶铸曾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1961年5月,中共中央在北京举行工作会议,决定对几年来受批判、受处分的党员和干部,进行实事求是的甄别平反,规定以后不在不脱产干部和群众中开展反右反"左"的斗争,也不许戴政治帽子。陶铸参加了此会,他从北京返粤后,立即在中南地区贯彻会议精神,雷厉风行地开展甄别工作。9月28日,他邀请广东一批高级知识分子到从化温泉,参加高级知识分子座谈会。这是被广东知识分子称为"久旱逢甘雨"的座谈会。陶铸在会上说:"对于过去批判搞错的,应该平反、道歉,老老实实认错。在什么场合戴的帽子,就在什么场合脱帽子,不留尾巴。凡是三年来斗争批判错了的,我代表中南局和广东省委向你们道歉、认错。如果连这一点也做不到,哪能谈得上新的团结……同时,我还建议,今后一般不要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个名词,因为这个帽子很伤害人。其次,凡属思想认识问题,一律不准再搞思想批判斗争会。第三,不准用'白专道路'的帽子……"

过了不到半个月,10 月 11 日,陶铸又主持了中南地区高级知识分子座谈会。他在讲话中公开提出:“我们老是讲人家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我看要到此为止了。现在他们是国家的知识分子、民族的知识分子、社会主义建设的知识分子。因此,我建议今后在中南地区一般不要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个名词了,这个名词伤感情。”

此举当时为陶铸本人赢得极高的声誉,而 5 年后的现在,他又重提“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并对此作了自我批评,认为当时的讲话是错误的。他说:

“自己对思想文化领域里的阶级斗争,认识更差。1961 年到 1962 年,其中有一段时间,我产生过右的摇摆,主要表现在 1962 年春天,田汉在在广东开话剧歌剧工作座谈会,我在会上讲了话。那次讲话基本上是错的。一条讲我们党领导文艺所存在的缺点,批评了粗暴的做法,有些批评过分了。第二条讲创作自由,我说了不能写毒草,但是讲创作自由过了头。再一条,对知识分子改造也估计过高了。看来,那次讲话产生了不好的影响,我要负责任。”

他还重提 1958 年大跃进,“1958 年搞大跃进,缺乏经验,但是方向正确,所以成绩很大。现在看来大跃进的缺点只是一个指头的问题,这一个指头,还是由于我们这些人体会主席思想不深,缺乏经验所致。现在看得很清楚,没有 1958 年打下的基础,不可能有现在的大发展。而且现在很多经验是在 1958 年大跃进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如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大搞群众运动,打破洋框框等等。”

这类争论,早在庐山会议、七千人大会上,已经引起过党内思想的激烈动荡,陶铸旧话重提,无非是指出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渊源。

陶铸继续说:“文化革命不依靠工农兵为主力,不采取大破的方针,就一定要犯原则性的错误,要犯大错误。这也就是不愿彻底革命的错误,不敢彻底搞阶级斗争的错误。”“我们这样破,是不是就破得一塌糊涂了?是不是就天下大乱了?我看不会,不要杞人忧天,天是塌不下来的。相反,如果我们不把资本主义、封建主义的东西彻底破掉,人民的天下就会大乱。”

陶铸的检讨,结合王任重 4 月 19 日在《湖北通讯》上主动做的自我批评,在中南局干部中引起很大的震动。

动员大会其中一个内容是进一步部署打倒李达“三家村”。

5月19日,中共中央东北局召开为期20天的全体委员会议,传达《516通知》精神。会议认为东北地区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十分尖锐、复杂和激烈。认为长春电影制片厂长期以来存在着两条道路和两条路线的斗争。5月20日:中共吉林省委发出《关于立即在全省开展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的通知》。

北京,5月21日,周恩来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话。他说:“同意许多同志的讲话。完全同意林彪同志的讲话,讲的很好。”

接着,他讲了三个问题:(一)防止反革命政变问题;(二)领导和群众问题;(三)保持晚节问题。

在谈到防止政变的问题时,他说:“中国出了修正主义,修正主义上了台怎么办?地方可以造反。主席是有预见的,是天才的预见,主席早就有感觉,早有材料,感觉是正确的。2月7日那个提纲,5天之内就抓住了。主席抓得准,抓得狠,抓住不放,不能叫滑过去。‘四大家族’已经夺了我们很多阵地,主席说过这是党内正常现象。去年工作会议就问地方同志,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造反不造反?提纲出来后,主席说:你们攻不攻?不攻,我就发动地方攻,叫地方造反。”

周恩来说:“……修正主义搞政变,基础是一文一武,掌握笔杆子、枪杆子,两个都占领了就动手,但最重要的是党权,彭真是大党阀。”

他特别提到要“防止修正主义的军事政变。”

同林彪一样,周恩来高度评价毛泽东思想,他说:“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的顶峰,毛泽东思想是帝国主义、资本主义走向灭亡,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走向胜利的这个伟大时代的顶峰,就是最高峰的意思,毛主席与列宁一样是天才的领袖,是世界人民的领袖。”

对彭、罗、陆、杨的问题,周恩来说:“彭真是高山倒马桶,臭名远扬,激起公愤。彭、罗、陆、杨的问题,早有察觉,杨尚昆不能与那三个人相比。他自己成不了气候,只是抱了腿。彭、罗、陆都是得到中央信任,各把一方。”

“罗瑞卿的问题是林总发现的,彭真也是林总发现的最早。林总在东北讲的三句话最生动,最形象;见什么人说什么话,两面三刀没有章法,本质是政治掮客,投机分子。他们是在国内外形势大好的时候

搞起来的,他们三人在党内地位是相当高的,罗瑞卿实际上是国防部长,因为林彪同志有病,彭真实际上是第二书记。邓小平对他很放手,为什么他还要伸手。他们是资产阶级野心家。”

周恩来还高度评价了林彪:“全世界处在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的时期,毛主席的思想指导世界革命的意义越来越大,‘三家村’、《前线》反党反社会主义出现在这个时期,他们采取相同的立场、思想、主张,目标是向党向社会主义发起进攻,进攻的目标是林彪同志,针对毛主席,首先砍掉毛主席的左右手。这不是偶然的,不是巧合。罗瑞卿是大比武出现的,陆定一是夫妻老婆店发现的,他们的共同点是反对突出政治,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工农兵学习毛主席著作,在这个时期他们出来反对林彪同志。因为林彪同志对毛泽东思想提得最早,举得最高,发挥最多,用的最活,做得最力。”

周恩来特别指出党的高级干部要注意保持革命晚节,坚定信仰,过好社会主义这一关。他说:

“盖棺不能定论,火化了也不能定论,像瞿秋白就是一个叛徒,他临死时写了一篇《多余的话》,这篇讲话在香港的一个杂志上发表了,意思是说我不应该参加政治活动。李秀成也是一个叛徒,李秀成的自供就看出了,戚本禹同志写文章批判过,不因为他死了就是烈士,我提议把瞿秋白从八宝山搬出来,把李秀成的苏州忠王府也毁掉。这些人都是无耻的。

毛主席的一家,毛泽民、毛泽覃,毛主席的爱人杨开慧烈士,这些人是真正的烈士,这才是领袖的家庭。‘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要跟着毛主席。毛主席今天是领袖,百年以后也是领袖。晚节不忠,一笔勾消。学毛著,作笔记要和自己的革命历史联系起来,作总结,有的人摆样子,不读毛著,拿起来读一段就痛心了。要返回来读三十本书。”

5 月 21 日,康生通过电话向在杭州的毛泽东汇报正在北京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情况,请示准备组织一个审查委员会审查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问题,及江青等人提出让姚文元参加文化革命小组等问题。毛泽东表示同意。康生在大会上宣布了毛泽东同意组织审查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问题的审查委员会。

# 第42回：批朱德，政治局小起波澜 设专案，田家英接受审查

“首都工作组”虽然成立了，但还必须有一个常设的办事机构。周恩来决定成立“首都工作组”办公室。5月19日，周恩来找来总参作战部部长王尚荣和副部长雷英夫谈话，向他们简要介绍了杭州会议批判彭真的情况和毛泽东在上海会见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的谈话内容，并交待了任务：“为加强首都警卫工作，中央已经成立了一个首都工作组，现在需要组织一个精干的小班子，叫‘首都工作组办公室’，在首都工作组直接领导下，负责选调部队，加强北京卫戍区，保卫首都安全。”周恩来特别强调：“这件事是毛主席亲自交代的，很紧急，因此一要抓紧，二要严格保密。人不要多，几个就够了，要可靠、精干。”这一办公室随即在5月20日成立，进驻京西宾馆13层，以军委总参作战部的人员组成，为了保密，人数开始只有6、7个人。办公室主任由作战部部长王尚荣兼任，副主任由作战部副部长雷英夫、谭旌樵担任，日常工作由雷英夫主持。在他们下边，有处长左勇、参谋张志民、朱耀华和张民。没过几天，朱耀华因有一位亲属受彭真株连被调走。

5月21日，王尚荣在京西宾馆召开了“首都工作组”办公室第一次会议，传达了毛泽东、周恩来的指示。王尚荣强调：“这既是一项军事任务，也是一项政治任务。我们都是做军事工作的，但是一定要突出政治。”雷英夫则具体介绍了工作组的主要任务：“由周总理亲自抓这项工作，他直接对中央政治局常委负责。‘首都工作组’组长是叶帅，副组长是杨成武代总长和谢富治副总理。”“今天我们组成的这个办公室，是首都工作组的常设机构，在周总理和叶剑英元帅的直接领导下，完成保卫首都安全的各项具体工作任务。”“今天我们组建的这个办公室，绝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办公室，而是在总理和叶帅直接指挥下，完成加强首都警卫任务的一个指挥部。当前的任务是选调部队，下一步是勘查和确定重点保卫目标，部署警卫兵力。”

为了保密,“首都工作组”办公室对外只称“编写组”。

5 月 22 日,朱德在政治局扩大会议小组会发言时说:

“孔夫子讲,‘朝闻道,夕死可矣’。我也有时间读书了,读毛主席指定的 32 本马列的书,非读不可,准备花一两年的时间读完,连下来读就通了。毛主席也是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

他的话还没有说完,就被林彪打断:“毛主席岂止是接受?!是发展到了最高顶峰!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的顶峰,是当代最高、最活的马列主义。你不要拿外国的东西吓唬(我们)!上海会议上,你就说,‘不能说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列主义的顶峰,到了顶峰就不会发展了’你们看他对毛泽东思想是怎么评价的?!他这样讲,就是想借马克思主义来反对毛主席,有野心……”

康生接过来说:“反对林总提出的毛泽东思想是最高最活的马列主义,是当代马列主义的顶峰,就是反对毛主席思想的,在这方面和彭真等人是一样的。”

朱德辩解说:“我不会反对毛主席的,毛主席的书要读,马列的书也要读……”

康生又打断他的话说:“我希望你学学林总的这些讲话,比你学 32 本书要好得多。我看你虽然组织上入了党,思想上还没有入党,还是党外人士。你是想超过毛主席”。

接着,大家开始批判朱德,有人说他“是党内最危险的人物”,有人说他是“党内的一颗定时炸弹”。

第二天,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人民大会堂河北厅继续进行,朱德首先按照政治局集体的意见,在小范围内检讨自己对批判彭、罗、陆、杨持消极态度。他说:

“我过去的错误已经作过两次检查,第一次是在高饶问题发生以后,我在会上作了检讨。第二次是彭德怀问题发生后,在军委扩大会议上作了检讨,那次检讨比较长一点。”

接着,朱德又讲了他过去的错误,即二十年代井冈山上的问题和红军第四军“七大”的问题。他说:“几十年跟着毛主席,我的最大的错误就是那两次。”

张鼎丞、林彪、陈毅、周恩来在朱德发言时先后插话。陈毅就历史

上的问题对朱德进行了批判。

随后,林彪说:“彭德怀原来就是联合这个,联合那个,犯了这个错误又犯了那个错误,都是为了个人野心。对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必须彻底揭发斗争到底把他搞臭,否则不行。这样做对你对党都有好处,这样,你才可能改好,否则不可能。庐山会议揭发出来这个问题,解决这个问题,是一个很大的胜利。消灭党的一个最大的隐患。主席几次讲党有可能分裂,实际就指彭德怀和朱德。庐山会议也考虑到是否要彻底揭开,权衡利害,认为应该坚决揭开,消灭这一隐患,否则会继续发展,万一主席到百年之后,就会出现更大的问题。现在揭开,展开坚决斗争,保卫总路线,教育全党,巩固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这是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利益之所在。要揭发斗争到底,你改也好,不改也好。当然我们是希望你改的。

朱德你是有野心的,你检讨得很不够。有人当是他自己检讨的,不是的!是党中央决定让他脱裤子的,不检讨不行。你们是不知道的,陈毅批评他的并不过分。他也不服毛主席,他想当领袖。高岗事情,他也主张轮流,想当主席,自己本事行吗?

你一天都没做过总司令,南昌起义后,是无政府,乱走,是陈毅指挥到井冈山的;遵义会议前是李德指挥;以后是毛主席指挥;抗战时期在前方指挥。解放战争是主席指挥。你是不行的,但自以为还行。你脱离指挥,下井冈山向南打,三个营损失两个,打败仗没办法,还是主席接你回来的。”

林彪又把问题引导到彭罗陆杨问题上来:

“去年罗瑞卿问题发生以后,在上海会议上他还讲,不能讲毛泽东思想是世界马列主义的顶峰,顶峰还会发展吗?大概顶峰不是毛主席,而是你朱德自己,或者是赫鲁晓夫。”

陈毅:“朱德我要问你:你是不是要搞政变?”

朱德:“搞政变我没有这个力量,也没有这个胆量。”

陈毅:“我看你是要黄袍加身,当皇帝。你还大力赞扬赫鲁晓夫。你野心非常大。”

乌兰夫说:“更奇怪的是他还说,人盖棺了是不能定论的。我们讲赫鲁晓夫反对斯大林是错误的,是修正主义的。他说,咱们同苏联还

是要搞好,他也离不开我们。”

薄一波:“朱老总经常讲兰花。他说,自古以来,政治上不得意的人都要种兰花。”

朱德:“说到现在我是不是有野心?我80岁了,爬坡也要人家拉,走路也不行,还说做事?……事情我是管不了了,更不要说黄袍加身。我对于我们这个班子总是爱护的,总是希望它永远支持下去。”

周恩来:“反对毛主席我都领导过。宁都会议也是我领导的。虽然弼时同志从后方来了,因为我把毛主席的政治委员代替了嘛。这是我一生最大的错误和罪恶。王明路线我也犯了,四中全会我也参加了。所以我最大的过错是1931年到1935年遵义会议这四年之长。这是我一生最痛心的事。然后洛川会议,然后王明回来。1937年底到1938年武汉时代,这都是路线性质的严重错误。当然还有其他错误。解放后还犯过反冒进错误等等。这几件事都是朱德同志一起嘛。”

“至于朱德同志的账那就更多了。从井冈山一直打到梅县,都是盲动主义,军阀主义,流寇主义。然后是立三路线,你也犯了。然后是王明路线四年,然后又是洛川会议。那时王明没有回来,那还不是反对毛主席,你没有领导?然后王明回来。第二次王明路线一直到六中全会,以后还有一些‘残余’。几十年历史,朱德同志跟张国焘斗争,前一半应归功于刘伯承同志的推动。如果没有刘伯承同志在那里,黄袍加身,你顶得住吗?后一半是贺龙同志,弼时同志,关向应同志的共同推动,才北上了。如果没有这些,你甚至滑到河西去了。”

“解放以后,那多了。毛主席常说,高饶彭黄的事,你都沾过边嘛。你到处发表意见,是一个危险的事,我们不放心。常委中有这样一个定时炸弹,毛主席也担心。毛主席说过,你就是跑龙套,可是你到处乱说话。你要谈话,得写个稿子,跟我们商量。……所以你是不可靠的,是不能信任的。南昌起义,就是有错误嘛。我当着资产阶级国家的元首尼雷尔的面说:南昌起义,我有错误。他听了很为惊奇:你还有错误?那时错误嘛,城市观点嘛。所以,今天我把我对你的不满告诉大家,希望你们大家监督。”

5月23日上午,邓小平在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大会上宣布了中央对彭、罗、陆、杨处理的决定,与会者一致通过《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

“(一)停止彭真同志、陆定一同志、罗瑞卿同志的中央书记处书记职务,停止杨尚昆同志的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职务,以后提请中央全会追认和决定。

(二)撤销彭真同志的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和市长的职务,撤销陆定一同志的中央宣传部部长的职务。

(三)调陶铸同志担任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并兼任中央宣传部部长的职务;调叶剑英同志担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并兼任中央军委秘书长。他们的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职务,以后提请中央全会追认和决定。

(四)李雪峰同志兼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

(五)上述决定,地方通知到县委以上,军队通知到团级以上。”

5 月 24 日,中共中央发出中发[66]278 号文件:《关于陆定一同志和杨尚昆同志错误问题的说明》。

文件中说:“陆定一同志的妻子严慰冰,是现行反革命分子,现已查明,严慰冰在一九六零年三月到一九六六年一月的六年期间,连续写了几十封反党反革命的匿名信,其中百分之九十是集中攻击和辱骂毛泽东同志最亲密的战友林彪同志和他的一家的。这些信中充满了刻骨的反动阶级仇恨。

大量的材料证明,陆定一同严慰冰的反革命案件是有密切牵连的。在严慰冰的卧室内书桌上放着一九六五年二月十五日写的一封匿名信的四页底稿和寄给叶群同志的信封,时间达一年零两个月之久,陆定一不可能不知道。而且严慰冰写反革命匿名信达六年之久,在写的时候,陆定一几乎全都在家。当陆定一被告知严慰冰犯了反革命罪行时,陆不仅不表示愤慨,还想诳说严患有神经偏执症为严开脱。陆定一在这个反革命案件中究竟扮演一个什么角色,专案审查委员会将加以彻底查究。”

此时,陈伯达、江青呈送毛泽东的关于田家英删掉毛泽东批判《海瑞罢官》指示的信件和公安部关于田家英一个特殊问题的报告,已由毛泽东批交中央政治局处理,由于田家英作为毛泽东秘书的特殊地位,中央政治局决定,在彭、陆、杨的专案审查委员会之外,再设一个审查小组,专门审查田家英的问题,组长由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安子文担任,组员有新任中共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王力和戚本禹。工作由周

恩来直接领导。

公安部关于田家英特殊问题的报告是指田家英的海外关系问题。1961 年 3 月 22 日,中央工作会议在广州通过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简称《农业六十条》后没有几天,正在广州的田家英对身边的陈伯达说:“广州离香港很近,我们要能去香港看看多好呀!”

陈伯达听了觉得奇怪,问他为什么想去香港。田家英说他有个哥哥曾在国民党中央社工作过,现在可能在香港。

田家英的海外关系就是指此。

在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午休时间,周恩来通知戚本禹:“主席意见,由你接替田家英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室主任的工作,中央各同志均已同意。你即日把《红旗》杂志的工作交代一下,返回中央办公厅。”

戚本禹说:“我又要写文章,又要整理中央会议文件,还要处理秘书室的工作,恐怕力不胜任,耽误大事。”

周恩来说:“国务院秘书厅的童小鹏即将正式调中共中央办公厅任职,还有我的秘书许明都可以帮助你。”

周恩来还要戚本禹找一下公安部部长谢富治,让他配合田家英审查小组的工作。

5 月 23 日,继邓拓自杀后,在中南海永福堂又发生了第二起自杀事件。

5 月 22 日,是个星期天。上午,中央组织部部长安子文通知戚本禹和王力下午 14 时 30 分到中共中央组织部,安子文对他们说:

“总理交代马上要找田家英谈话,要他停职反省,由戚本禹同志接管他的工作,特别是毛主席的手稿,不要出差错。”

下午 15 时左右,以组织部长安子文为组长,王力、戚本禹为成员的中央三人小组,突然来到中南海永福堂田家英的寓所兼办公室。

习惯于一边散步一边谈事情的田家英,和秘书逄先知溜达到瀛台去了,只有妻子董边在家中。董边是安子文的老部下,两人很熟,她说:“田家英和逄先知出去了,一会就回来。”

于是,安子文他们就坐下来等。董边招待他们喝茶。约莫半小时后,田家英回来了,看到客厅在座的几个人,颇觉意外。这的确是个比较奇怪的组合:安子文,中央组织部的部长;王力,时任中央对外联络

部副部长,此刻已为能够列席中央政治局会议的中央写作班子成员;戚本禹,曾是自己的下属,原中央办公厅秘书室的一个处级干部,现任《红旗》杂志社历史组组长。

看样子他们要谈重要的问题,董边站了起来,打算回避。这时,安子文对她说:“董边,你也是高级干部,坐下来一起听听。”逄先知也留了下来。

随后,安子文对田家英说道:“家英,你犯了错误,中央收到反映,现决定即日起停止工作,进行检讨。你的工作、文件,特别是毛主席的手稿,都交给本禹,等一会儿就办交接手续。”

安子文又说:“你的问题多大,怎样处理,要根据调查结果和你的态度决定。你要相信中央,相信主席。这几天就在家里反省,不要出去了。”

安子文讲完,戚本禹问了一句:“主席的手稿有多少?”

田家英说:“主席手稿都退回档案馆了,我这里只有《毛选》第五卷的排印件。

这时,戚本禹接着问:“毛主席关于《海瑞罢官》的讲话记录,在你那里吗?”

“没有。”田家英很干脆地回答道。

田家英扭过头又问安子文:“我从哪些方面开始检查?”

安子文说:“你自己先想想,从庐山会议到现在,自己有哪些错误。”

安子文他们离开组织部前,曾与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通过电话,告知他们将去中南海找田家英谈话。汪东兴说:“行,你们来吧,我会通知门卫给你们放行。谈话后有什么问题再找我。”

这时戚本禹在田家英家用中央保密电话红机子告诉汪东兴,他们与田家英谈话的情况,同时让汪东兴派机要人员来协助清点文件。

很快,中共中央办公厅机要室机要员王妙琼来了。随后,中央警卫团政治部办公室主任张纯也来协助。戚本禹交代他们和逄先知一起登记、清点田家英处的文件。安子文和王力分别乘车返回,戚本禹也去了中央办公厅甲楼,找汪东兴通报谈话的情况。

戚本禹对汪东兴说:“我们只负责接管田家英的工作,永福堂的警

卫、人员出入和田家英的安全还是要由你们布置人管起来呀。”

汪东兴笑了,说:“这些本来就是我们的工作,当然由我们负责了。我早就安排了。”

接着,汪东兴又问戚本禹:“因为中央已决定田家英停职反省,所以我们要在晚上召集中南海各单位科级以上干部开紧急会议宣布此事。你能参加吗?”

戚本禹说:“我还要和王妙琼等一起查对田家英处的文件和《毛选》第五卷的各种资料,恐怕来不了了。”

汪东兴说:“那我们先开着,以后再把开会情况告诉你。”

# 第43回：难承受，永福堂悲剧呈现 闻噩耗，董边如五雷轰顶

临近晚饭时间，王妙琼给戚本禹打电话说："文件已清点完了，他们平时整理得挺好，很清楚。"

"那好，你和逄先知办好交接手续，等星期一上班，把中央文件交机要室，来信来访文件交给我，《毛选》第五卷排印稿存放甲楼。"戚本禹交代王妙琼。

晚上23时多，田家英用红机子给戚本禹打电话，说他又找到一些忘了登记的遗留文件要交给戚本禹。

戚本禹说："那么我派人来登记。"

田家英说："不，还是你来，我要亲自给你交代一下。"

戚本禹说："那好，我马上带王妙琼到那里。"

戚本禹的办公室离永福堂只有200米的路程，一会儿就到了。田家英看到他们来了，就向戚本禹交代遗留的文件。

因为文件交接要经过他的秘书，戚本禹便到永福堂东厢去找逄先知一起来。田家英马上跟过来，在卫生间拐角处紧张地问戚本禹："究竟出了什么事，是谁在害我？"

这显然是一种违反纪律的行为，他所以敢这样做，是因为戚本禹从1950年进中南海起，就在他领导下工作，他很器重戚本禹，在政治上、生活上都帮助过戚本禹。特别是在1957年"反右"时，戚本禹身陷中南海"八司马案"，田家英帮助过戚本禹。

二王、八司马是唐朝的事。唐顺宗永贞年间，王叔文执政，针对宦官弄权和藩镇割据，他采取了一些革新措施，颇得民心，后人称为"永贞革新"。但革新只进行了146天，随着顺宗逊位，宪宗即位，革新失败，王叔文集团随即垮台。为首的二王：王叔文赐死，王伾遭贬后亦中风死去。麾下的八名干将：韦执谊、柳宗元等，统统被贬至边远地区，担任州司马。史称"二王、八司马事件"。

而中南海的“八司马事件”发生在1957年至1958年全国整风“反右”期间,恰巧牵涉到了中央办公厅秘书室的8名科级干部,而支持这8人的领导又恰恰是俩人:田家英和彭达璋。毛泽东就把他们比喻为“二王、八司马”,说:“想不到我的身边也发生了新的‘八司马事件’。”

1957年全党开始整风,中央办公厅秘书室的群众纷纷给秘书室的负责人、中南海党总支书记何载提意见,贴出大字报,其中中央办公厅秘书室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林克、李公绰、吕澄、朱固、沈栋年、马芷荪、王象乾和戚本禹8人最为积极。反右运动开始后,给任何一个支部提意见,都被视为向党进攻,都可定为右派,中直机关为中秘室这8个整风运动中的积极分子是否是右派展开了激烈的辩论,田家英和彭达璋认为他们只是给领导提意见,怎么能是右派呢?1957年9月,“反右”告一段落,何载下放十三陵水库劳动,中办派王刚接替何载主持中秘室工作。

到了第二年的3月3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反浪费、反保守的指示》,全国又掀起“双反”运动的高潮。“双反”,很自然地和整风运动联系起来,当时叫“整风补课”。结果,中秘室这8个青年还是被打成反党小集团。

8人不服,毛泽东很快知道了此事,他认为年青人给领导提意见没有错误,为这8人“反党小集团”平了反。

田家英大概就是因为有这层关系,所以才敢如此大胆地向戚本禹打听。但由于戚本禹前几天刚为田家英的问题挨了批评,说他是“小资产阶级温情主义”,所以此时更不敢再多说什么。

戚本禹走后,田家英从抽屉里拿出一个纸质粗糙的小本子,对董边说:“这个交不交?交了是不是会连累你?”

董边说:“交,我不怕。”

田家英特意将小本子在董边眼前举了举,放进要上交的文件堆中。

这个小本子里记得是胡乔木在延安记录的周恩来在整风时期的讲话。建国初,田家英从胡乔木那里借来笔记,让董边帮他誊录了一份,就记在这个小本子里。

文件清点得差不多了,田家英稍稍喘息了一会儿,又打开了一个

此前看了好几眼,却一直没有打开的精制的蓝布面盒子,呈现出来的是一张张装裱得非常仔细、整齐的草书,那龙飞凤舞、气势磅礴的字体,一看就知道是是毛泽东的墨迹。这是田家英跟随毛泽东后,在日常的生活、工作中,一点点收集起来的。有的是毛泽东写给他的,有的是毛泽东当他面写下又弃置不要的,可田家英舍不得丢掉。一方面他酷爱毛泽东的书法,一方面他认为这些文字说不定什么时候会派上用场,例如毛泽东《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就是当年毛泽东写出后感到不满意扔掉,被田家英捡起收藏的。没有田家英的收集,世间将不会流传下毛泽东这首气势如虹的佳作。田家英时常抚摸着精制的盒子,对董边说:"这是咱们的传家宝,也是国宝。"

此刻,他呆呆地盯着盒子,难舍难弃:"是否也要把盒子交出去呢?"思虑良久,他又把盒子放回原处。或许,他认为这不属于"文件";或许,他太珍爱它们了,不忍交出。

董边见丈夫脸色不好,想到他还一直没有吃饭,就劝他先吃点东西休息,有什么事情以后还可以慢慢说清楚。田家英站着没动,过了片刻,他像是对董边,又像是自言自语:

"我的问题是江青、陈伯达陷害的。想不到在毛主席身边工作18年,落得如此下场……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我不相信这些恶人会有好下场!"

5月23日凌晨,心事重重的董边再也睡不着了,既惦记着突然横遭打击的丈夫,又为早已安排好的自己在全国妇联机关党组做检讨一事所缠绕。董边此时是《中国妇女》杂志社总编兼社长,《中国妇女》被认为跟不上思想文化战线发展的形势正在受到批判,她自然是责不可卸。

董边起身到田家英的卧室,见他斜倚在床上,似乎彻夜未眠,陷入难以自拔的思忖,便劝慰他说:"你的情况主席都了解,有什么事慢慢总会搞清楚的。"

妻子的抚慰,使田家英的内心更添一重凄楚,他欲言又止。几十年相濡以沫,他很了解自己的妻子,也很尊重她的观念和自强不息的精神。虽说她也是参加革命多年的老干部了,可长期从事的是妇女工作,没经历多大曲折。自己在中央核心部门接触的许多复杂的情况,

平时就没有向董边透露,一些深层次的问题也不曾同妻子探讨,此时此刻此情此背景,更难用几句话给妻子解说明白。他的工作性质,决定了他在一些问题上,无法求得最亲近的人的理解与沟通,这使他在某些特殊的情况下,内心分外地痛苦,但他没有让内心说不出的苦涩和凄怆形于颜色,只问了董边一句:“中午还回不回来?”

董边答道:“检查的事情完不了,可能就回不来。”

她感觉丈夫比昨晚似乎平静了一些,便匆匆上班去了。

董边走后,挂着清朝乾隆皇帝手书的“永福堂”小院格外的安静:田家英的秘书逢先知写材料去了,田家英吩咐他的勤务员陈义国出去买香烟。上午8时许,田家英的老友、原朱德的政治秘书何均上班路过永福堂,因听到田家英停职反省的消息,便急切地进来看看,想了解更确切的情况。

何均在延安中共中央宣传部时就和田家英在一起工作,并住在杨家岭上的同一排窑洞,一起帮助过毛岸英熟悉中国的国情和党内情况。几乎在田家英任毛泽东政治秘书的同时,何均担任了朱德的政治秘书。建国后,田家英所在的中央书记处政治秘书室,与何均离开秘书室后任职的中央办公厅“后楼”,都在一个大院落里,仍保持着不时的过往。

何均的本意是想安慰安慰老朋友,可两人心头都被山雨欲来的浓雾所笼罩,而且又都自感躲不过这场风暴,以往见面便滔滔不绝的他俩,竟久久相对无语;偶尔交换一两句,更添凄凉的气氛。他只记住了田家英当时说的一句话:

“士可杀而不可辱。”

何均在田家英处坐了好一会儿,才起身欲走,田家英又将他留下,非要他再坐会儿。可坐下后,两人依旧话语不多。过了片刻,何均又要走,田家英再度挽留,“如是者有三四次”。最后,何均见上班时间已经过了很久,还有些事情必须处理,就告辞了。

田家英把他送出很远,几乎要到了何均的办公室。

约10时许,陈义国从西单回来。临近午饭时,他叫田家英吃午饭,却找不到人。他找到秘书室副主任陈秉忱,告知“田主任不见了”。陈秉忱与秘书室行政负责人路辉、逢先知经商议后,一面让陈义国继

续找,同时分头往田家英可能去的地方打电话。最后汇集的情况仍是:田家英下落不明。他们有点慌神了。

这时,陈义国惊恐地跑到中央办公厅秘书室报告说:“永福堂毛主席的书房里像有人……”八司马之一的王象乾和行政科负责人路辉等飞快地跑到永福堂西厢,这里是毛泽东的藏书室,门反锁着……

他们顾不了许多,砸开锁进入书房,屏风后的情景顿时让在场的人都惊呆了,田家英将头悬在一根栓在两个书柜之间的绳子上,自尽了。

他们急忙把田家英解下来,松开外衣,用人工呼吸、口对口吹气进行抢救,但终因死亡时间过长,无法起死回生。在田家英的口袋里,发现了用红色铅笔写的遗书,文字并不太多,现在为人所知的部分只有:

“相信党会把问题搞清楚,相信不会冤沉海底。”

人们赶紧打电话向正在人民大会堂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的汪东兴等人报告。

汪东兴接到电话大吃一惊,立即报告会议主持人,随即和安子文、王力、戚本禹、杨德忠等人乘车赶回中南海。当他们确认田家英已经死亡后,商议的结果是马上通报周恩来,再由周恩来转告尚在南方的毛泽东……

下午约14时左右,汪东兴匆匆赶到人民大会堂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场叫出周恩来。过了一会儿,会议主持人向在座的人宣布:田家英自杀了。

下午15时左右,惦记着丈夫的董边,刚把机关的事情了清,正准备早些回去,电话铃就响了。董边拿起电话,听筒另一端传来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安子文的声音:

“是董边同志吗?请你立即来中南海西楼会客厅。”

“是西楼会客厅吗?”董边问。

“是的。”安子文确定。

“好的。”董边一边答应着,一边想:“西楼会客厅是刘少奇同志接待客人的地方,为什么要我到那里去?究竟出了什么事情?”董边猜测大概是与田家英的事有关,心里怦怦直跳。还没等她理出头绪,汽车已经开进中南海。

走进西楼会客厅,只见安子文、汪东兴、王力等人已在屋里。

安子文代表组织向董边直言宣布:“田家英畏罪自杀。”

这令人难以置信的消息,如五雷轰顶,董边一下坠入万丈深渊:“这是怎么了,早上还是活生生的,突然就与尘寰隔绝……”她只觉得天旋地转,无语凝咽……

等董边的情绪稍稍安定,安子文问道:“他临死前跟你说过些什么话?”

“我一点也不知道他会去死。如果我稍微察觉他有死的念头,我就不会去上班了!”

安子文对董边说道:“我陪你一起去看一看他。你看,要不要到医院去验尸?”

董边此时脑子里已是一片空白,只是机械地回答说:“一切由组织决定,我服从组织。”

从西楼会客厅到永福堂寓所并没有多远,出院墙东门,下高台阶斜对着的就是永福堂西门,但董边已不知自己是怎么走过去的,她无法接受“畏罪自杀”的事实……

院内平日存放毛泽东图书的西房内,田家英平躺在地上,身上盖着那条铺用了多年的蓝色床单。有人拉着董边的胳膊往前拽,非要让她看清楚一点,认可自杀的事实。床单被揭开,董边看到了田家英那僵滞铁青的面孔,双眼紧闭,但舌尖伸出嘴外。她再也无法抑制自己的感情,失声痛哭……

就在这时,董边耳边响起了立刻收拾东西离开这里的指令:“请你立刻离开中南海。”

她匆匆地拿了几件必需的生活用品,比出差还简单,连抽屉里的工资都未带走一分,就这样离开了永福堂。

董边向小院门外走去,看到田家英的秘书逢先知正朝她走过来。他在田家英领导的部门工作了近17年,自从担任田家英秘书后,他们几乎朝夕相处,关系如师长弟子一般。田家英的突然殉难,政治湍流席卷得如此之迅猛,自己随即就可能被牵连、被卷进漩涡,这对一个30多岁的干部来说,也是难以承受的打击。

但当他看见董边后,马上感到董边所负载的悲哀和痛楚,比他更

沉重,可他一时竟想不出适当的语言,更何况身后还有看押他的军人。他慢慢的向董边走过去,在两人擦肩而过时,压低嗓音哽咽地说了一句:“夫子是个好人!”

“夫子”,是中南海里与田家英相熟的同事对他的尊称。因为他博学多识又勤于诲人。他生性活泼,喜与人交往,或清茶一杯,或茅台一盏,品酌之间纵论天下,谈古寓今,于人于己,都是一大乐趣。但从此以后,他的故友至交们,再也无法听到他的侃侃宏论了。

董边被送到丰盛胡同中央办公厅的一座机关宿舍大院里。1965年迁出中南海的杨尚昆家,也在这所大院里。董边在随后的日子里,除了到妇联机关接受群众批判外,还常被中组部、中央专案组找去谈话,要她揭发田家英。问得最多追得最紧的就是田家英攻击中央负责人的言论。

田家英因为工作原因,几乎不同自己的家人谈论工作上的事情,更不会论及中央领导人的长短。因此董边感到在这个问题上,没有什么可揭发的。但出于对党的忠诚,她还是尽力冥思苦想,终于想到了一件发生在1962年的事情:

那是在7000人大会之后的1962年2月25日,毛泽东在杭州嘱咐田家英组织一个调查组,到湖南省的4个地方去再进行一次实地调查,了解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后,农村贯彻《人民公社六十条》的情况,及农村还存在什么需要解决的问题。这4个地方是:毛泽东的家乡湘潭韶山、刘少奇的家乡宁乡炭子冲、毛泽东的外祖父家湘乡唐家和刘少奇去年下乡蹲点的地方长沙天华大队。

毛泽东对田家英说:“要向少奇同志报告一下,问他有什么指示,他那里有什么人参加调查?”

回到北京的田家英遵照毛泽东的指示,很快组织了一个有17人参加的调查组。临行前,他向刘少奇汇报并请示工作。刘少奇表示同意毛泽东的意见。

3月22日,田家英率领着调查组的全体成员来到武汉向住在这里的毛泽东报到。当他们来到毛泽东居住的东湖宾馆梅花岭公寓时,毛泽东早已迎候在门口,满面笑容,慈祥和蔼的和大家一一握手。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和公安部部长谢富治参加了这次接见。

当毛泽东听说调查组中最年轻的宋士堂,时年28岁时,说:“历史上从来都是年轻人打败年老的,三国时代赤壁之战时,诸葛亮和周瑜两人的年龄都不大,两个年轻人联合起来打败了一个老曹操。”

这番话,让在座的年轻干部备很受鼓舞。

毛泽东意味深长地说:“都是些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好哇!知识分子成堆也不太好。”

他对大家提出了六条要求:“第一,要同当地干部,省、地、县、社各级干部相结合;第二,不要乱指挥;第三,头脑里不要带东西下去,只带一件东西,就是马克思主义;第四,要做历史的调查,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的观点;第五,看到坏人坏事不要乱说,好的可以说;第六,参加点轻微的劳动。”

最后,毛泽东应大家的要求,和调查组全体成员合影留念。

1962年3月22日,毛泽东在梅花岭公寓前与调查组全体成员合影

# 第44回：忙喝止，安子文阻董再谈 华北会，袁振揭山西省委

毛泽东的耳提面命，令田家英和调查组全体成员深为感动。此前，田家英受毛泽东委托，参与了《人民公社六十条》和基本核算单位下放等文件、指示的起草工作，受到毛泽东的表扬。他说："六十条"的发明权，是田家英的。此次又派田家英到自己故乡调查，显然也是寄予厚望的。田家英也希望通过这次调查，在如何恢复农业生产上作篇好文章，为中央草拟一个恢复农村经济的政策性文件。

但是，工作组下去数月，群众对要求包产到户、分田到户的疾呼，大大超出他的预料。特别是在韶山，毛泽东的乡亲的呼声，与毛泽东的主观意念，差距甚远。田家英原来也是不主张包产到户的，但他在调查中逐渐转变了原有的观点。当他们的调查接近尾声时，包产到户在全国已呈迅速发展之势，成为党内议论的重点。

田家英派人到最先开展包产到户的安徽无为县，了解推行包产到户的真实情况，反馈的结论是：包产到户对于解救遭到破坏的集体经济的危机，迅速恢复农业生产，肯定是有利和必要的。

6月底回京后，田家英立即向在北京主持工作的刘少奇做了汇报工作。刘少奇认为："现在情况已经明了了。"他还向田家英介绍了其他地方反映的情况和当前的形势，明确提出统一实行包产到户的主张，并说明要使包产到户合法起来，可以把调查得出的结论在"秀才"中间酝酿。还要田家英在毛泽东回京前，再征求一下其他同志的意见，还特意嘱咐说先不要说是他的意见，听听反应。

田家英在调查中，杨尚昆来电话，说周恩来询问农村的私有部分可否放宽；向邓小平汇报时，他的态度干脆，明确表示支持。经过一圈征询意见后，田家英感到中央主要领导的意见一致，赞同实行包产到户。

田家英急于将在下边调查取得的数据、群众的意见尽快向毛泽东

汇报。当他提出前往邯郸,向在此视察的毛泽东汇报时,那边传过来的答复是:“主席说不要着急嘛!”

毛泽东刚回北京,田家英就到游泳池,系统地陈述调查的情况和自己的意见。他谈得兴致勃勃,可毛泽东却一言不发。

田家英汇报完后,毛泽东第一句话就问:“你的主张是以集体经济为主,还是以个体经济为主?”

田家英一时没有作答,毛泽东又追问:“这是你个人意见,还是有其他人的意见?”

田家英跟随毛泽东多年,对他的脾气秉性很清楚。他不轻易发表完全否定他人意见的意见,他若是同意时,会发表自己的看法,进一步深化问题,揭示主题,阐发其中的道理;但若是不同意时,往往不做声,显出一种思考的神情。

田家英没再讲下去,只是对毛泽东的第二个提问,简单地回答说:“是我个人的意见。”

毛泽东听后没作任何表态,很快就让他走了。

田家英知道毛泽东不高兴了。回到家里,他情绪很不好,烦闷之情溢于颜表,让身边的董边感到他思想情绪明显地异常,便问了一句:“遇到什么不顺心的事了?”

一向对自己工作避讳不谈的田家英,此时已难控制自己的情绪,脱口向董边讲述了刚才发生的事情和自己一肚子的苦衷。

也是一方领导,在共产党内生活多年的董边,是个性情直率的人,听田家英这么一说,当即严肃地批评道:“政策上的事情,为什么少奇同志不去和主席说,而要你去反映呢?你只不过是个秘书,怎么能将少奇同志的主张说成是你的想法呢?”

田家英沉重且难过地说:“我是想原原本本地讲的,但主席从一开始听意见,就显出不悦的神情,看来他对包产到户的问题早在脑子里考虑过了。他直截了当地问是谁的主张,这不明白地说明他在猜疑这是其他领导人的意见吗?我如果再往刘少奇同志身上推,不是让两个主席之间的分歧明朗化,影响他们的团结吗?所以话到嘴边,没有说出来。”

时隔数年,此时的董边想起这桩事情,便向三人小组汇报。不料

刚说了几句,在场的安子文突然一拍桌子喝道:“董边,你不要再说了!”

董边戛然而止,几十年的党性培养,让她立即顺从,没有再说下去。但心里不服:“没的说时,一个劲穷追不舍;刚想到一点,又不让说了。”

临离开时,安子文再次要董边以党性保证,绝不再提此事。

包产到户事件,客观上造成了田家英和毛泽东之间的政治裂痕。在此后整整半年里,毛泽东既不理也不用田家英。田家英心里非常郁闷,有时甚至流露出消极情绪。他曾对董边说过:“搞政治风险大,一不小心就会跌到漩涡里。”他还曾几次同董边认真地商量,提出离开中南海,到下边去当个县委书记,认真搞点调查,研究中国的社会主义该如何搞。

性情耿直的董边,虽然并不认为丈夫在大的路线是非问题上总是那么正确,但她相信田家英的为人和他的出发点,相信他即便犯了错误,也是思想认识上的错误。她完全赞同支持田家英下去的想法,并愿意和他一起下去。她对他说:“你当县委书记,我当县妇联主任。我也一直在上边工作,很想多接触些基层的情况和同志。”

田家英的要求没有被批准,毛泽东不放他走。酷爱史学的田家英,又向毛泽东表露了离开现岗位,潜心研究清史的愿望。毛泽东说:“噢,你也是搞本本主义!”仍然没有同意。

后来,在整理毛泽东“杭州讲话”记要时,田家英又擅自删除了关于“要害问题”的内容,“篡改毛主席著作”的罪名是无论如何也无法逃脱了。

田家英自杀后,中央在原来的彭、罗、陆、杨专案小组基础上成立了政治局常委领导下的专案审查委员会,下设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四个组,专案审查委员会的主任是邓小平。另外又设立了田家英专案审查小组,由安子文负责。

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正在召开的同时,北京,还有一个在中共党史上必被提及的会议正在进行——中共华北局会议。

1966 年 4 月,中共华北局通知下辖的北京、天津两市,河北、山西二省,及内蒙古自治区:5 月召开华北局工作会议,重点解决北京、内蒙

的问题。

随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召开和《五一六通知》的通过,为了传达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精神和《五一六通知》,经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同意,5 月 21 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进行到第 17 天的时候,华北局工作会议也在北京前门饭店开幕了。这次会议从 5 月 9 日准备,5 月 20 日报到,23 日正式召开。

参加会议的有各直辖市委、省委和自治区党委负责人,地委、市委书记,盟委书记和部分县委、旗委、区委书记。两市两省一区的会议代表只有召开大会时才集中在一起,平时则分别住宿和活动在北京饭店和前门饭店两处。北京市在北京饭店召开,内蒙、山西、河北及天津在前门饭店,所以这次华北局会议,史称“前门饭店会议”。

会议按各省、市、自治区分组,华北局书记分别参加。

北京市委参加这次会议的是除彭真、刘仁及已自杀身亡的邓拓之外的其他书记、常委和各区、县、局及“四清”工作团负责人。

山西省参加这次会议的有省委、省人委的其他领导和各地、市的党政一把手和省直有关部门的负责人,共 198 人,由省委第一书记卫恒、省长王谦带队。山西的党政大员中,只有省委的书记处书记、副省长武光汤一人留在省内主持一般工作。

内蒙古参加华北局会议的有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处书记和自治区有关部门、部分盟市、旗县和农村、牧区、城市“四清”工作团干部,上上下下也有 146 人之多。他们是这次会议的重点,早在 1966 年 4 月,华北局通知内蒙古准备召开华北局工作会议时,华北局常务书记解学恭就带领几位部长、主任亲临内蒙古自治区首府——呼和浩特,找自治区党委书记、常委们征求意见,同许多人谈话。

内蒙古自治区第一书记乌兰夫出席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他是直接从会上赶来,参加华北局工作会议。

此时的乌兰夫身兼多职,是政治局候补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在少数民族干部中,他地位最高。在地方,他担任华北局第二书记、内蒙古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内蒙古军区司令员兼政委、内蒙古大学校长等要职,集内蒙古党政军大权于一身。

乌兰夫的汉名叫云泽,出生在大青山南麓的土默特左旗塔布村,青年时代即投身革命。从1947年内蒙古自治政府建立后,他便一直担任内蒙古自治区政府主席。

尽管常驻塞外边城,但乌兰夫由于在京兼职的缘故,频繁往来于呼市与京城之间,近来尤其关注着北京的形势。他这次先出席政治局会议,再三领会中央精神,对华北局会议心里早有准备,并已悄然做了布置。

在《海瑞罢官》的问题上,内蒙古也曾徘徊过,《内蒙古日报》当时没有及时转载姚文元的那篇文章。为此,主管文教的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处书记高锦明曾专门为此做过检讨。所以,这一回,乌兰夫决心跟上中央的脚步。

5月份的《内蒙古日报》上已经开始连篇累牍地转载姚文元、戚本禹等人批判吴晗、《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的文章。同时,乌兰夫还组织人寻找内蒙的"三家村黑店"。

"黑店"很快找到了,"店主"就是时任天津市市长的胡昭衡。

胡昭衡曾任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处书记,此时早已调任天津市委书记兼市长。胡昭衡在内蒙工作期间,曾用"李欣"的笔名出了一本名为《老生常谈》的杂文集。乌兰夫如获至宝,他带着《老生常谈》,来到北京的前门饭店。他有自己的小九九:胡昭衡是天津市的领导,政治地位低于彭真,高于邓拓。他准备仿照北京的做法,向内蒙古的这株"毒草"开炮!

天津离北京最近,5月20日午饭后,天津市委书记处的书记、常委及各区、局领导共53人一起出发,到北京参加华北局前门会议。

5月23日,李雪峰在与前门饭店仅隔一条街的北京工人俱乐部,向参加华北局会议的全体人员传达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的《5.16通知》。之后,又传达了林彪5月18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接着又传达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最新决定撤消彭真、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等人中央书记处书记和候补书记的职务,撤消彭真北京市委书记和市长的职务,撤消陆定一中宣部部长的职务的有关决定。

当与会人员突然听到中央出了一个"彭、罗、陆、杨反党集团",这

些昨日还是位已及天的中央首长,原来都是“反党”份子,其震撼和惊愕可想而知。尽管他们早已都是“运动”老手,但这次会议来势汹汹,前所未有,还是让人们一时摸不准方向,于是有人把矛头指向华北局,质问华北局为什么不声讨邓拓?!

在山西代表团中,时任省委书记处书记兼太原市委第一书记的袁振,第一个紧跟中央,站出来揭发山西省委的问题:

其一,山西省委《关于开展学术批判运动的通知》是根据彭真原先领导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搞的那份《二月提纲》泡制的,《二月提纲》提出“要坚持实事求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要以理服人,不要像学阀一样武断和以势压人,”把严肃的阶级斗争,说成是学术斗争,现在中央发出了《五·一六通知》,省委原先搞的那个《关于开展学术批判运动的通知》就必须收回;

其二,省委对领导文化大革命不够放手,对学习毛主席著作也不得力,省委给干部发了十五本马列的经典著作,实际上起了冲击学毛著的作用;

其三,省委宣传部在前中宣部长陆定一的影响下,支持举办《傅山展览》,出版了《傅山画集》,而且请“三家村”的头目邓拓为画集写了前言,是严重的政治错误。

傅山是明末清初山西的一代大儒。明崇祯九年傅山为其恩师袁继咸被宦党迫害入狱一事,率山西百余生员赴京伏阙讼冤,使崇祯皇帝终为袁继咸平反。明亡,清廷入关后,傅山于顺治十一年秘密参与反清起义被捕,抗词不屈,出狱后行走江湖,终身不仕,在清康熙十七年由康熙下旨举办的博学鸿词科恩科中,傅山被朝中汉官举荐而拒不参加,被山西地方官员押入京城后以死相抗,表现出一位明末士大夫的气节。其诗书画医在明末清初均达到了极高的造诣,被后人称为一代文宗。

袁振在会上还拿出了一个《关于筹划纪念傅山的若干问题》的文字材料,其中点名批判了从中央到太原,共30余位支持傅山展览的领导和专家、学者,说他们“对纪念傅山很热心,在5年多的时间内,一直在大捧傅山,表彰死人,歌颂封建士大夫,造成极坏的影响。”其用意很明白,那就是被中央点了名的“三家村”黑线人物邓拓,在山西有活动,

与山西省委有牵连。

山西省委第一书记卫恒当即在会上对袁振的发言予以反驳:“我们已经按照中央的指示,采取了新的措施,有什么必要再收回那个《通知》呢?北京是北京,山西是山西,硬要把山西省委和北京市委扯到一起,这究竟是想干什么呢?”

此时的袁振与卫恒相比,显然不在一个重量级上,势单力薄。上海的姚文元、张春桥,那是因为后面有毛泽东。而袁振的发言,并未“上达天庭”。几个回合下来,带头揭发省委的袁振,就被以卫恒为首的山西省委,一举打成了“野心家”和“伸手派”,华北局第一书记李雪峰指示要对袁振进行严厉批评,会上还有更猛的火力,说以袁振为首,在太原市委有一个反党集团。

为了表示紧跟中央的部署,会议期间,山西省委还决定对山西省副省长王中青、著名作家赵树理、李束为的所谓“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三反言行在《山西日报》上公开点名批判。

山西省委在“前门会议”上出现的情况是计划外的。在前门会议上,河北省对华北局第三书记、河北省委第一书记林铁进行了批判,指责河北省委对文化大革命“按兵不动”,“妥协情况很浓厚,盖子揭不开”,并取消了林铁领导河北组会议的资格。刘少奇、邓小平在会议期间与林铁进行了个别谈话,对他进行了批评。

6 月 24 日至 7 月 15 日,由华北局主持召开的中共河北省委常委扩大会议,河北省地、市、县党委负责人出席。会议对河北省委第一书记林铁、河北省委候补书记裴仰山、省委常委胡开明进行揭发批判。河北省委就林铁的所谓错误向中央写了报告。

两个月后,8 月 25 日,华北局通知:中共中央 8 月 16 日批准,撤销林铁河北省委第一书记、华北局第三书记职务,刘子厚接任省委第一书记兼河北省省长、河北省军区政委。

# 第45回：泪洗面，昭衡廿天愁白头 翻烙饼，北大社教问题多

再看天津的情况。天津组重点是揭发批判市长胡昭衡和宣传部长白桦，主管文教的市委书记王亢之也受到揭发批判。到京第一天，天津市市长胡昭衡便听到对他所写《老生常谈》的批评意见。一星期后，华北局领导正式通知他作检查，并面对面作了“严肃批评”。

5月30日，批判《老生常谈》的简报发下来。接下来的20天，便是4次“触及灵魂”的检查和大会小会的一次比一次猛烈的批判。开始是在天津书记处会议上接受批判，后变成“开天津大会，批判。”从胡昭衡日记上摘几段可见他当时的处境：

1966年6月3日……下午在书记处会议上检查，讲了两个半小时，随后大家提批评意见……

1966年6月4日……下午开书记处会议，对我继续批评……

1966年6月7日……开了一天常委会，继续批评我……几位同志重点批判《老生常谈》与我的作风……

1966年6月8日……下午开常委会，继续听×××等三同志对我的批判……

1966年6月11日……上午常委会，对我进行批判；下午常委会对我批判，晚上翻阅批判材料……

1966年6月14日……整日开常委会，对我继续批判……

1966年6月15日……上午写检查材料，下午开天津大会，批判。

1966年6月16日……上午准备检查，下午，大会继续批判，晚继续准备检查……

胡昭衡的小说《一个共产党员的诞生》中有一个党员名叫罗驴驹，有人说这是诬蔑共产党员是骡子和驴的杂种，何其毒也！

这20天，用胡昭衡的话讲：全是在泪水中滚过来。开始独个儿流泪，后来与妻子林以行相对流泪，再后来又加一个秘书崔广兴，3个人

默默流泪……

去北京时,胡昭衡满头黑发,红光满面,不到20天的时间,头发白了一半!他的妻子林以行是天津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抗战八年经受了火线上最严峻的考验,这一次她比胡昭衡晚到北京3天,又比胡昭衡早两天白了一长缕头发。传说伍子胥过昭关,一夜愁白了头。人人都知道这个故事,人人都以为传说不可信。胡昭衡和林以行20天愁白了头,可是与会上百人亲眼目睹。

然而,每天早晨仍然可以看到胡昭衡跑步、做操,晚上仍然可以看到胡昭衡与妻子林以行安详地散步。但只是他们俩人同行,其他人对他们避之唯恐不及,早已经没有人和他们打招呼、说话了。

内蒙古自治区会议的发展也完全出乎乌兰夫的意料之外,他把形势完全估计错了。

中央和华北局派了一个工作组参加并领导内蒙古组的会议。工作组由华北局常务书记解学恭领队,副组长是中央组织部副部长赵汉,组员有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兼国家民委副主任刘春,还有华北局财贸办公室主任李树德等人。

李雪峰也参加过两次内蒙古组全体会议,每次都讲了话。

按照华北局的布置,内蒙古的任务是集中火力向乌兰夫发难,根本没提《老生常谈》这类文艺问题!

本想拿老同事胡昭衡开刀的乌兰夫,发现风向不对,赶紧吩咐妻子云丽文给留在呼和浩特市的自治区办公厅副主任浩帆打电话,“立即把乌兰夫所有的讲话记录严密封装送北京。”

乌兰夫还不放心,又亲自打回电话,命令浩帆收回区党委制定的《1966年上半年工作要点》一文。

5月中旬,就在政治局扩大会议召开之际,吉林省委第一书记吴德接到中共中央东北局第一书记宋任穷的电话,通知他:中央决定,调他到北京市工作,让他立即到沈阳汇报和交代吉林省委的工作及分管的东北局文教方面的工作。

吴德来到沈阳,见到宋任穷,自然先是谦虚、客气一番,提出能否不去北京?

宋任穷说:“工作需要嘛,中央的调令,不能不去呀。”

吴德又问:“北京现在情况怎样?怎么说改组就改组了?”

宋任穷说:“彭真出了问题。”

吴德十分惊讶,继续追问:“彭真出什么事啦?”

宋任穷不愿多讲,只是对他说:“你到北京后,中央会同你谈的。”

5月24日,吴德到了北京。按照程序,他先去见了邓小平。邓小平对他说:“欢迎你来,中央决定你到北京市委工作,李雪峰任第一书记,你任第二书记。你先参加政治局扩大会议,了解下情况。北京的情况由李雪峰同志与你谈。”

吴德因此参加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因为前期的会议他没有参加,对陈伯达和其他人的发言听不太明白。

在会上,他见到了刘少奇,刘少奇对他说:“你是北京市委的第二书记,是协助李雪峰同志工作的。希望你们来演一出现代的《八大锤》。”

因为,中共中央除了调李雪峰和吴德到北京外,还分别从山西和华北局还调来了另外6个主要负责人,共8个人。

吴德和李雪峰见面时,李雪峰不无感慨的对他说:“他妈的,这个官儿可不是好坐的,放个屁也会让最高层闻见,我们的一言一行可是要注意呢。弄得不好,就会栽进黑洞里了。北京的问题严重,毛主席批评北京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

吴德又去见了叶剑英元帅,因为此时,北京市的工作主要由首都工作组负责,叶剑英是首都工作组组长。

叶剑英对吴德说:“在北京的秩序、安全工作没有搞好前,毛主席不能回来。”

5月25日,中共新改组的北京市委做出第一项决定:

中共北京市委决定

(一)撤销《北京日报》《北京晚报》原来的编委会;撤销范瑾的社长职务。

(二)成立新的《北京日报》《北京晚报》编委会,领导《北京日报》《北京晚报》的工作。新的编委会由翟向东、吴象、林青等七同志组成,翟向东任总编辑,吴象、林青任副总编辑。

(三)撤销《前线》编委会,《前线》暂时停刊,进行整顿。

也是在这一天,北京大学又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这天下午,在北京大学大饭厅的东墙壁上,出现了一份大字报,题目是:《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干了些什么?》

宋硕,北京市委大学部副部长;

陆平,北京大学校长、党委书记;

彭佩云,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

大字报的开篇,十分醒目的写道:

“现在全国人民正在以对党对毛主席无限热爱、对反党反社会主义黑帮无限愤怒的高昂革命精神掀起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为彻底打垮反动黑帮的进攻,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而斗争,可是北大按兵不动,冷冷清清,死气沉沉,广大师生的强烈革命要求被压制下来,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原因在哪里?这里有鬼!”

在这张大字报上署名的有7人,他们是:

聂元梓,校党委委员、哲学系党总支书记,一个在1937年,年仅16岁就参加革命的老干部,时年42岁;

赵正义,哲学系党总支副书记;

其余5人:宋一秀、夏剑豸、杨克明、高云鹏、李醒尘,都是中共党员,除了杨克明刚刚调出哲学系外,其他人都是哲学系教员。

一个系的党组织领导人和党员竟然给自己的上级党委领导贴出了大字报?难道仅仅就是因为他们对文化大革命领导不力吗?这张大字报的缘由还要从1964年7月,北京大学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说起:

当时,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张磐石带了一个工作组,来到北京大学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按照当时《桃园经验》的做法,他们到北大后,扎根串联,分别找各系的总支书记和党员、群众谈话,了解对北大校党委的意见和看法。在调查中,他们听到很多反映,如:北大资产阶级气味浓厚;不讲阶级斗争;学校领导特殊化;不抓无产阶级思想教育;工农干部受打击等等。

根据毛泽东近几年对教育战线的指示精神,张磐石认为,北大正是毛泽东所批判的那种“被资产阶级统治的学校”,执行的是资产阶级的教育路线,校长兼党委书记陆平和北大学校党委已经和平演变,用

当时“四清”中流行的术语:“烂掉”了。

1964 年 8 月 29 日,张磐石向中宣部写了《一号报告》,说:“最突出的一个印象是北大党委的阶级斗争观念薄弱。在北京大学,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进攻是很猖狂的,特别集中地表现在教学和科学研究领域之中。校内帝国主义、蒋介石、修正主义的特务间谍活动,贪污盗窃份子、流氓分子的活动也相当严重。北大党委对这些问题却没有认真抓。”《报告》声称北大党员干部队伍“政治上严重不纯”。《报告》中还特别提到:“哲学系聂元梓同志向我们反映,北大党委对中央的方针政策没有认真贯彻执行,提拔和重用一大批政治上不纯的干部”。

张磐石的这份《报告》引起了中宣部对北京大学的重视,决定就在北大搞“社教运动”的试点,并拟定了一份《计划》,准备“从 11 月起在北大开展社教运动,弄清北大在贯彻中央方针政策方面存在的问题,搞清学校各级组织领导权究竟掌握在无产阶级手里还是资产阶级手里,重新组织革命的阶级队伍等五项任务。”

这份《计划》经中央书记处总书记邓小平批准后,陆续调来中宣部、高教部几位副部长和局、处长、及各省市党委宣传部正副部长、省府教育厅的正副厅长、还有全国各高校正副党委书记和校长、高校党委部长和系总支书记等,总共 200 多人,组成以张磐石为队长的工作队,领导北大“社教”运动。

工作队浩浩荡荡开进北大后,动员全校师生起来揭发、批判陆平。哲学系首当其冲,作为运动的重点,张磐石亲自抓,先从哲学系入手。在一次大会上,张磐石说:“北大有几个总支的领导权在共产党手里?!人事处、组织部的问题就更乱了。”又说:“哲学系正在进行的大论战,就是一场阶级斗争,是北大阶级斗争的缩影。”他再一次表扬了聂元梓。哲学系党总支书记聂元梓及一些青年教师,自然是响应工作队的号召,参加了揭发、批判活动。

北京大学党委在中宣部工作队的沉重压力下节节败退,它的上级领导,北京市委开始出面抗争。彭真派北京市委大学工作部副部长宋硕参加“社教”工作队领导班子,派市委大学部办公室负责人彭珮云到北京大学兼任党委副书记,帮助北京大学党委顶住中宣部工作队的进攻。但这一切,都未能挽回局面。寒假过后,一些出身好的学生以家

庭出身划分“阶级阵线”,提前改选了班干部,校园里关于“陆平犯了路线错误”、“北京大学已经烂掉了”的传闻纷纭,甚至一些激进学生还提出退学当兵或退学到农村落户的申请。

1964 年底,毛泽东批评了刘少奇在社教运动中的方针,制定和通过了《二十三条》,要求纠正前一阶段社教运动中对基层干部打击过宽、过“左”的偏差。邓小平和彭真接替刘少奇负责社教运动的领导工作。

中央指导方针以及人事的变化,立即导致北京大学社教运动的转向。1965 年 1 月,彭真在北京市委的会议上批评北京大学的社教运动搞“左”了,推翻了原社教工作队的结论,撤销张磐石的北大社教工作队队长职务,全面改组工作队领导班子。中央宣传部副部长许立群接任队长,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邓拓任副队长,北大党委书记陆平、副书记彭珮云等人参加工作队领导小组,原工作队撤离北大。

邓小平主持中央书记处对北大的运动专门开了一次会,对北大社教运动提出了三点结论:“第一点呢,是北京大学是办得比较好的社会主义大学;第二点呢,陆平,北大校长、党委书记,是好同志;第三点呢,运动有成绩,但是有问题,主要是没跟北大党的领导结合,把北大当成一个烂掉了、夺权的单位,斗争方式有问题。”

1965 年“五一”节前夕,浩浩荡荡开进北大的社教工作队悄悄地撤走了。陆平扬眉吐气,他在工作队进校以来首次公开露面,在会上发表演讲,大声地说:“我陆平还是好人嘛!”

陆平,黑龙江人,典型的关东大汉,高大粗犷。解放前他是一个北京大学的学生,战争年代失去一只眼,所以平日总戴着一副墨色眼镜。1958 年,他由铁道部副部长的任上调到北大担任校长兼党委书记。

北大的“社教”翻了“烙饼”,那些响应工作队号召,起来揭发、批判北大党委的老师、学生怎么办?这些曾被称作“社教积极分子”,“左派”的人将会面临什么样的下场?

原工作队副队长,时任上海市委教育卫生工作部副部长,华东师范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的常溪萍,是最早向中央反映张磐石的做法过“左”,应该纠正的人,在工作队撤离前,他向彭真建议:

“工作队撤走后,不要批前一阶段社教运动的积极分子和那些被

动员起来给北大党委提意见的同志,不要整他们。”

因为积极分子是工作队动员他们那样做的,错误在工作队,不在群众。但是,彭真不同意,他说:“积极分子为什么批不得?打击都打击得!”

为此,北京市委决定利用暑假把北大的中层以上干部及四清运动中的积极分子集中在位于北京市委附近正义路的国际饭店进行整风,人员的出入都受到监视。会议由彭真亲自主持召开。他在动员大会上说:“要根据‘23 条’的精神,要一个系一个系地整,直到思想组织都统一在党的原则上。”彭真宣布,不管是什么人,“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统一了的就回校,统一不了的留在国际饭店继续整,直到统一为止。会上的一切费用由市委承担,不获全胜决不收兵。”

在这次会议上,追随原工作队的社教积极分子受到了严厉的批判和打击,要求他们人人检讨,挨个过关。不论是大会小会,斗争双方都很硬,每天都是唇枪舌战,针锋相对,斗争十分激烈。

聂元梓也是追随原工作组的积极分子,而且是全校的社教积极分子代表人物,自然也在打击之列。她很郁闷,通过爱人找到中组部长安子文,准备调离北京大学。

北京大学社教运动的反复,激化了北京大学的党内矛盾。

1966 年 5 月 11 日,毛泽东看到戚本禹呈送的原北京大学教师、此时已调康生负责的马列主义研究院工作的张恩慈,于 5 月 5 日写的《我对北京大学“四清”运动的意见》报告。张恩慈与关锋在学术上有过合作,所以将这份《意见》给关锋看过,关锋对他表示了坚决支持,并把这封信交给了戚本禹。戚本禹也觉得写的深刻,即呈送给毛泽东。这份《意见》对北京大学“四清”工作队、北京大学党委和北京市委在领导北大“四清”运动方面,以及北大在贯彻教育方针等问题上,提出了不少尖锐的看法。毛泽东审阅时把标题改为《张恩慈同志对北京大学“四清”运动意见》,并批示:“少奇同志阅后,印发有关同志。”

13 日,刘少奇批示:“此件请即印发政治局扩大会议各同志。”

毛泽东的批示及张恩慈的报告印发政治局扩大会议。此时的彭真,正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接受批判。

# 第46回：调查组，未名湖畔泛涟漪 怎么办？燕园左派串联忙

毛泽东对张恩慈报告的批示下来后，康生以中共中央理论小组的名义，组织了一个调查组，由他妻子、中共中央理论小组办公室主任曹轶欧任组长，高教部副部长刘仰峤为副组长，还有马列主义研究院的张恩慈，红旗杂志社2人，中科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哲学研究所1人，光明日报社1人，共7人前往北京大学开展调查。

在调查组人员基本到齐后，康生召集他们到钓鱼台开会，向他们透露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即将通过的《516通知》内容，并说："借调你们来是搞文化革命的调查，主要调查北大，调查批判《海瑞罢官》的情况。你们住在北大调查，不限于北大。"

5月14日中午，曹轶欧带着张恩慈到北大找陆平谈话。

那天中午，陆平下班回到家里，正在吃午饭，书房里的电话铃声就响了，是校党委办公室来的电话："陆书记，中央理论调查组的同志来我们学校搞调查，他们有7个人，由曹轶欧同志带队。"

"噢，我知道了，我就来。"陆平不敢怠慢，放下电话，赶紧吃完饭，乘上轿车赶到学校办公室。一进门就见曹轶欧已在那里等他。陆平赶忙说："不好意思，让你们久等了。调查组需要了解什么情况，我们准备一下，做个汇报。"

曹轶欧说："不必了。我们这次来，主要是了解你们学校学术批判的情况。"

陆平问："你们住下吗？"

曹轶欧说："住下。"

陆平："行，我让办公室的同志安排一下。"

陆平叫人将曹轶欧等人安置在未名湖畔的专家楼里，并再三嘱咐："一定要好好接待。"

晚饭后，陆平按照惯例，又去未名湖畔看望曹轶欧一行，却扑了个

空。屋里没人。经过“社教”风波的陆平,心里不免有些紧张:“他们到哪里去了呢?”

怀着淡淡的疑虑,陆平缓缓的沿着未名湖畔走着,湖水翻动的微波,也在他的心中泛起阵阵的涟漪……

此刻,曹轶欧正在具体负责北大学术批判工作的北京大学党委委员、法律系主任陈守一家里拜访。

“陈主任,是不是影响你休息了?”曹轶欧先向陈守一表示歉意。

“哪里,哪里,您能上寒舍来,是我的荣幸。快请坐,快请坐。”陈守一忙着让座。

“系里最近忙吗?”曹轶欧问。

“还可以吧。”

“学术批判进行得怎么样啊?”

“目前主要是按照上边的统一安排,组织师生查阅历史资料,为下一步进行学术讨论做准备,同时也兼顾教学进度的需要。”陈守一介绍了法律系及北京大学目前开展学术批判的一些情况。

“为什么还要查阅历史资料,不组织批判呢?”曹轶欧不解的问道。

“市委和校党委都反复强调,学术讨论要坚持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不能搞‘学阀’作风。只有充分的占有资料,才能做到实事求是,做到‘真理面前人人平等’。”陈守一依然按照北京市委和北大党委的要求向曹轶欧汇报。

陈守一的介绍,安全证实了毛泽东、康生的判断,北京大学就是按照彭真的意图执行的。于是,曹轶欧向陈守一介绍了正在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情况,明确指出:

“目前北京大学的学术批判是有问题的,学术批判方向错了。”

“那我们应该怎么做呢?”陈守一向曹轶欧请教。

“你应该勇敢的站出来,揭发和批判北京市委和北京大学党委领导的错误。”

“这样做不好吧?学术批判有错误,是我的责任,我不能诿之于人啊。”

曹轶欧耐心地引导他说:“你没有责任,你们这样做是上级领导安排的嘛。”

陈守一摇头:“不好这么讲吧。学校党委分工由我负责学术批判工作,有错误,首先是我的责任,推到别人身上不对。”

面对如此书生,曹轶欧哭笑不得,只好起身告辞说:“你再想想,咱们下次再谈。”

曹轶欧、刘仰桥住在朗润园的专家楼,调查组其他人住在一院。不过,曹轶欧、刘仰桥在朗润园的专家楼只住了一晚,以后都是将北大的人找到马列研究院所在地——西颐宾馆个别谈话。

曹轶欧也找了聂元梓谈话。

“听说你们这些社教运动的‘左派’都被派到农村去了?”曹轶欧问她。

“可不是,我过几天就去怀柔。”聂元梓回答说。

“你先不要走,北大的事情还没有完,彭真已经出问题了,他支持的陆平能没有问题?你应该留在学校里,继续与陆平他们斗争。”

听了曹轶欧的这番话,聂元梓甚不以为然,心想:“前一阶段的运动,是中宣部部长陆定一派张磐石到北大的,连毛主席都说,‘北大社教运动是姓陆的整姓陆的’。邓小平对北大社教运动做了三条指示,彭真却要煞住社教运动的车,调转了方向,顶住了中央和宣传部,召开‘国际饭店’会议,整社教运动的积极分子。这么多大人物都关注着北大,你康生再插手,未必就有多大的能耐?”

聂元梓想到自己前一阶段,头脑简单,紧跟工作队,得罪了陆平,在北大眼看是难以呆下去了,如今已被发落到乡下,估计回校无望,还不如尽快离开这块是非之地,还管那么多事?于是,对曹轶欧说:

“北大的事情,我看谁也搞不了,上边的人发指示,翻过来翻过去,到头来,还不是我们这些小干部们倒霉?”

“那你们就这样算完了?让人家整了一通,放下去搞‘四清’,说走就走,学校的事情不管了?”曹轶欧问。

聂元梓无奈的说:“我有什么办法。”

曹轶欧劝她:“先别急着走,你们都是北大的主人,对北大的文化大革命还是应该关心,积极参加。”

聂元梓勉强答道:“好吧,我考虑一下。”算是给了曹轶欧个面子。

调查组到北大后不几天,除张恩慈外,其余4人每天都到北京市

委摘抄内部大字报。回来抄清后交曹轶欧,再交康生。康生认为这些材料很有用。

5 月 15 日左右,曹轶欧又来电话,约陈守一到西颐宾馆谈话,刘仰峤副部长也在场。

曹轶欧问陈守一:“考虑得怎么样了?”

陈守一问:“你说北大学术批判的方向错了,能具体指出北大错在什么地方吗?”

曹轶欧说:“学术批判不得力……”接着,她问陈守一:

“聂元梓怎么样? 你对她印象如何?”

陈守一谈了自己的看法。

曹轶欧又动员他说:“你们应该揭发陆平、宋硕。最好你领头,你可以和聂元梓等人共同来搞。”

陈守一:“学术批判如有错误,首先应是我负责,如果我揭发陆平,我算啥?”

曹轶欧:“你没有责任,是陆平搞的鬼。”

陈守一:“我怎么能这样看问题、处理问题呢?”

至此,曹轶欧没再多说,只是嘱咐陈守一说:“这事不要对其他人说了,应该绝对保密。”

5 月 17 日,《516 通知》通过的第二天,康生领导的中央理论小组正式向北京大学发函,介绍曹轶欧、张恩慈等 7 人来校调查文化大革命的情况。

5 月 20 日,北京大学向校党委委员传达了中共中央《516 通知》。在此之前对《516 通知》已有耳闻的聂元梓,作为北大校党委委员,参加了传达文件的会议。

《516 通知》证实了曹轶欧所言非虚,批判矛头所指,首先是彭真。《通知》所用语句之激烈,火药味之浓烈,都大大出乎聂元梓所想象。她懵了,没有想到,建国以后这么多年,党内的政治状况竟然是如此地充满危机,还有人胆敢违抗毛主席的指示,打着红旗反红旗;而且,还组成了反党集团,有文有武,妄图发动反革命政变,推翻红色政权! 而进行这些反党反毛主席的活动的首领,竟然是近年来在政坛上深受重用又非常活跃的彭真! 更加严重的是,按照《通知》所讲,各省、市、党

政军各部门内都有一批这样的人物!

聂元梓好几个晚上都没有睡好,心想:《通知》批判彭真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包庇邓拓、吴晗。那么,在此前的社教运动中他不是也包庇陆平了吗?至于北大,在传达中央的这一系列重要文件以后,并没有再做出什么具体而深入的行动去批判彭真,批判"三家村"。这说明陆平他们是紧密追随彭真的。党中央毛主席发出《5.16通知》,就是号召每一个共产党员和革命者起来保卫党,保卫无产阶级专政,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

聂元梓想给毛泽东、刘少奇写个报告,汇报一下北大陆平等人的情况。她找到哲学系党总支副书记赵正义,谈了她自己的想法。赵正义非常支持,准备再找几个"社教"运动中的积极分子研究一下。

此时,哲学系的几位中青年教师也已经感到政治气候的变化,跃跃欲试了。

曹轶欧的调查组进校不久,"社教"后期受过批判的北大哲学系教师宋一秀、高云鹏就找到调查组成员张恩慈。

张恩慈在北大哲学系任教员时,也是"社教"运动前期的"左派",在"社教"运动后期受到打击。运动结束以后,自己找人,从北京大学调到中共中央高级党校工作,后又参加康生领导的中央理论小组,现在马列主义研究院工作,这次随调查组返回北大。

宋一秀、高云鹏向张恩慈谈起了他们对北大党委的不满,张恩慈说:"北大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有点死气沉沉,法律系组织师生整理古代平反冤狱的历史资料,埋头故纸堆,方向不对。"

"那么,怎样才能打开局面呢?"宋一秀、高云鹏问。

"还是要串联左派。"张恩慈提议说。

宋一秀、高云鹏说:"社教运动中的左派大多数被派到远郊区搞社教运动去了,很难串联,是否可以写大字报、小字报之类的东西?"

张恩慈拿不准,说:"你们如果写,也只能贴到党委办公室的门口"。

这天,哲学系的几个教师,宋一秀、高云鹏、赵正义和夏剑豸相约来到杨克明家。杨克明也是原北京大学哲学系教员,社教运动前期的左派,后期受打击,刚刚从北大调到中国科学院电工研究所工作,现在

仍然住在北大宿舍。

杨克明已经不是北大的人了,在他家里议论学校党委的事情别人不好干预。他们正在议论时,聂元梓来找杨克明,于是,她也参加进来。他们谈到中央的《516 通知》精神和近来的报刊批判文章,认为社教运动后期北京市委、北大党委批判他们时所依据的观点,如“真理面前,人人平等”、“左派整风”等等,正是中央《516 通知》批驳的观点。北大党委陆平、彭珮云不久前传达的北京市委大学部副部长宋硕的报告,强调学校党组织要加强领导、坚守岗位、遵守纪律等,实际是压制运动,北京大学运动的方向违背了中央的精神。

聂元梓提出她和赵正义的想法:“我和赵书记准备给毛主席、刘主席写一份报告,反映北大的情况。你们是不是也都写一份。写信的人多了,反映情况的人多了,毛主席他们总该听一听吧。”

杨克明说:“写什么报告,我跟张恩慈谈过,他说中央的报告太多了,根本看不过来,就写一张大字报吧。张恩慈说了,北京市委、《北京日报》社、教育部都有大字报,还是这样来得快。”

大家都认为这个主意好。

聂元梓说:“也行。在国际饭店受批判时,我已经给毛主席、刘主席写过报告,反映北大的情况,还是请田家英同志亲自转交的,到现在也没有回音。写大字报,可以让大家都知道,准能反映到上级领导那里去,这可能比给党中央、毛主席、刘主席写信还要管用。”

聂元梓毕竟是抗日战争时期参加革命的领导干部,有多年党内生活的经验,深知大字报的分量。青年教员提议写大字报,她认为不错,但是她觉得还要请示有关领导。

杨克明说:“那就找一下张恩慈,通过他问问曹轶欧吧。”

聂元梓给张恩慈打了电话,说:“我们想给陆平写张大字报,不知道行不行?想请示一下曹轶欧。”

张恩慈向曹轶欧做了汇报。

# 第47回：细斟酌，挥笔书就大字报 遭围攻，聂元梓匆匆离去

过了一、两天，张恩慈通知聂元梓：曹轶欧要见她和杨克明。

聂元梓和杨克明按时到达友谊宾馆，曹轶欧和她的秘书及张恩慈都在。曹轶欧问聂元梓："听说你们找我？"

聂元梓说："我们听了《516通知》，对北大校党委和陆平的工作有一些意见。想给陆平写一张大字报，贴在北大校园里面。因为陆平是北大的党委书记兼校长，这样做，不知道行不行，想请示一下领导。"

曹轶欧说："行，贴一张大字报，怎么不行呢？中央的《516通知》是纲领性文件，只要符合通知的精神就行。"

杨克明曾要张恩慈和他们几个人一起搞。张恩慈说他已被抽调参加到北大的一个调查组，参加北大的事不方便。因为曹轶欧曾嘱咐他："支持哲学系一些活动时，注意不要太明显，有些场合要有所回避。"

得到曹轶欧的支持，聂元梓他们很快聚到一起，讨论大字报的内容。聂元梓建议写"社教"运动问题，但是年轻一些的教员主张写现实问题，写文化大革命。于是决定从宋硕报告入手，批判北大党委书记陆平、副书记彭珮云。

大家商量，由宋一秀在赵正义的一篇批判稿基础上改写。后来感到修改稿不理想，宋一秀重新起草，算作第二稿。接着，几个人又用了两个晚上讨论修改文稿。讨论中有人提议，问题应当提得更尖锐有力，锋芒应当更犀利，要仿照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的笔法，逐一驳斥对方观点。

到了5月24日晚上，大家觉得修改稿还是不行，杨克明就说："还是我来执笔吧。这天晚上就不再讨论了。我开个夜车，明天早上，我上班时把修改稿留在家里，你们来取底稿就行了。"

杨克明很有把握，成竹在胸，大家就同意了。杨克明在北京大学

24 楼 112 号房间高云鹏的宿舍连夜赶写。他对文章作了很大修改,几乎是重写,完稿已是 25 日凌晨三、四点钟。杨克明稍稍休息,天已大亮。他把稿件交给高云鹏,就去电工所上班了。

5 月 25 日上午,高云鹏、宋一秀、夏剑豸、赵正义在北大 25 楼 204 号房间宋一秀的宿舍讨论杨克明的修改稿,集体推敲,边议边改,逐句定稿。快完稿时,聂元梓来了,她看了一遍修改稿,认为可以,只是建议对最后一段做了修改,并且加上三句口号:“保卫党中央! 保卫毛泽东思想! 保卫无产阶级专政!”高云鹏和夏剑豸找来毛笔,各自分别抄写了一份大字报。

看到抄写完毕的大字报,聂元梓作为哲学系党总支书记,毫不犹豫,第一个签下了自己的名字。她不会想到,这张大字报日后给她带来的是曾经无尚的荣誉和永久无尽的灾难……

接下来签字的是宋一秀、夏剑豸。杨克明当时不在场,由高云鹏做主代签。讨论临近结束时,赵正义去哲学系办事,委托宋一秀代签。再往下是高云鹏。6 个人签完名以后,宋一秀又叫来哲学系青年教师李醒尘,说明情况。李醒尘欣然签上最后一个,即第七个名字。

此时已是 1966 年 5 月 25 日下午 13 时 30 分左右,大家都还没有吃饭。但是,一种无言的兴奋和激动,也许是一种使命感使他们忘记了饥饿。

因为这天下午,北大校党委准备召开全校大会批判“三家村”,聂元梓他们觉得这是校党委为掩盖前一阶段“假批判,真包庇”的错误,试图掩人耳目,以争取主动。为了不让校党委的这一“阴谋”得逞,聂元梓他们决定立即将大字报贴出去,赶在大会之前,揭露校党委的阴谋。他们没有去吃饭,而是拎着浆糊桶,拿着刷把,来到北京大学大饭厅,把大字报贴到了饭厅的东墙壁上。

贴完大字报,已是下午 14 时,正是睡午觉起来的学生到教室或图书馆去的时间,他们都要从这里经过。但是,匆忙经过同学们似乎没有太多的人停下来注视这张大字报,只有一人站在大字报前认真的阅读,他是北京大学副校长周培源。这段期间,他正在市里参与筹备亚洲科学家会议。

周培源的脸面平静,没有任何表情,其实内心在剧烈的沸腾。因

为他对陆平很有意见,认为陆平“乱想、乱说、乱干”,把北大搞乱了,为此,他在北大“四清”运动中,给周恩来写过一封信,告了陆平一状。当他看完大字报,返回亚洲科学家会议筹备处时,便压抑不住自己的兴奋,向同事们说道:“北大爆炸了一颗原子弹!”

大字报确实像一颗原子弹一样爆炸了!它越来越多的吸引了过往的师生,人们一拨又一拨地围观这张大字报,议论纷纷,很快,北大校园内像炸开了锅一样,针对十几天前北大党委书记陆平讲话中“北大不宜贴大字报”所提出的质疑,这张大字报唤起了师生们的兴趣和复杂的感情。这是自1957年反右以后,北京大学再次出现大字报。

1957年北京大学的第一张大字报是质疑学校共青团代表大会的代表选举是否民主、公开一事。那张大字报,引发了北京大学的大字报热潮,受到毛泽东的高度重视,也是促使中共决心开展反右派运动的主要诱因之一。1957年的大字报就是贴在北京大学大饭厅的东墙。

当年贴大字报的谭天荣已经被打成右派大学生。今天聂元梓的大字报会是什么样的结局呢?

历史的巧合,让人产生联想。聂元梓的大字报,矛头直指学校党委,公开点了校党委书记、校长的名,火药味极浓。有人说,给党委领导贴大字报还不是反党?这是反革命大字报,谭天荣又出现了,写大字报的人不是右派也是反革命!

当然,也有赞成的。本来下午要去上课的学生们,教室也不去了,就在大饭厅外面,三个一群,五个一伙地,争论得热火朝天,而且像滚雪球一样地,越滚越大,人越来越多。整个下午,大字报前面人声鼎沸,群情激奋。

在贴这张大字报以前,聂元梓在哲学系的一部分教师、干部和学生当中已经讲了,根据中央的《516通知》精神,可以对校、系工作和陆平校长等领导写大字报。因此,哲学系也有不少人写了大字报,都是给校党委提意见,和聂元梓的大字报几乎是同时露面,都贴在大饭厅外面的墙上。而且,随后的三、四个钟头,又有几百张大字报跟着贴出来,绝大部分都是支持这张大字报的,只有六、七张大字报是反对他们的。到了傍晚时分,北大沸腾了,支持聂元梓的大字报贴满了大、小饭厅周围。文二(四)的男同学,颇为活跃,扛着贴在木板上支持聂元梓

的大字报,喊着口号,游行到了大饭厅。

面对哲学系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北京大学学校党委立即组织反击,当天下午,北京大学和北大附中召开了内部广播大会,陆平讲话说:“现在,右派又开始向党进攻了”,他号召全校师生奋起反击,等等。他们组织了一批辩论高手到现场和聂元梓他们辩论,在大饭厅里发表演说:

“同学们,阶级斗争是复杂的,千万不要上当,不要重蹈1957年右派分子反党的覆辙!聂元梓是反党的大阴谋家,是邓拓的忠实卫士,是别有用心的……”

在争夺话筒的过程中,高云鹏还受到一些人的围攻和推打。同时,1500多张反对聂元梓的大字报很快贴在校园内和大饭厅墙上,指控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是“转移群众对‘三家村’斗争的视线”,是“为邓拓一伙开脱”。

北大留学生工作办公室的宋柏年、高艾军等11人的大字报的题目是:《请看聂元梓的罪恶勾当——聂元梓大字报是反党的大毒草》,其中写道:“5月24日下午4点,党委扩大会上传达了党中央有关文化革命的指示,作为党委委员、哲学系党总支书记,你是亲自听见了的,你有话为什么不在党的会上说,却在不到24小时的时间内,迫不及待地把写有内部情况的大字报贴在大餐厅?你目无组织,目无中央,你还有一点点党性吗?你还有一点点共产党的气味吗?”

形式陡然逆转。

晚上,哲学系师生正在和郊区一部分工农群众开声讨“三家村”的大会,会议刚开始,一阵口号声由远而近,1000多名师生拥到会场外,要冲击会场,他们激动地高喊:

“现在已经不是下午的形势了!”

“我们要找聂元梓算账!”

哲学系的人企图把他们拦在门外,双方之间发生了冲突,一群人冲进了会场,他们前、后门都堵起来,要斗争聂元梓,而聂元梓则在支持她的一些学生的护卫下,离开了会场。

接着,反聂元梓的学生数百人又集聚在大饭厅开会,有人登台演说:

“聂元梓一伙人故意在全校声讨邓拓的大会召开前夕向校党委开火,是为了要转移斗争目标,是有领导、有组织、有计划地对抗党中央毛主席……”

当一些哲学系师生企图为聂元梓辩论时,遭到群众的攻击。

晚上,杨克明回到学校,看到了大字报贴出后的状况,又害怕又着急。他责问聂元梓她们:“是谁把我的名字签在大字报上了?”

高云鹏说:“你走以前不是交代了,要我们替你签名吗?”

杨克明着急的说,“光是同意我们写大字报,她知道不知道这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他是想指责曹轶欧,又不敢明说出来。

“聂书记,是不是赶快把张恩慈找来,看应该怎么办?”杨克明向聂元梓建议道。他的话,引起了聂元梓的共鸣,上一次社教工作队在北大,就是动员干部和教师给陆平、给校党委提意见,人发动起来了,工作队说撤就撤了,留下这些积极响应工作队号召的人挨整。想到这里,聂元梓说:“我去给张恩慈打电话,让他问问中央文革小组,看他们有什么说法。”

聂元梓在电话中对张恩慈说:“我们的大字报贴出来了,学校里乱了,群众对大字报有争论。中央会有什么态度,你能不能帮助我们请示请示。”

张恩慈下午已经知道他的这些老同事们搞出了如此大的动静。接到聂元梓的电话,他不敢怠慢,赶紧说:“你们不要着急,我马上请示。”

张恩慈立即向曹轶欧做了汇报。其实,当天下午,张恩慈就按照曹轶欧的安排,到北大看了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并拍了照片。此时,北大的情况早已通过不同的渠道陆续传到康生这里:周恩来得知北大的大字报后,考虑到北大有外国留学生,特别强调贴大字报要“内外有别”,派国务院外事办副主任张彦到康生那里通报北大的情况;教育部部长、清华大学校长蒋南翔接到指示,速到北大了解情况,就地指导,临出发前,蒋南翔到康生这里请示汇报,康生告诉蒋南翔,曹轶欧业已派人亲自前往北大了解情况。

聂元梓他们要贴大字报康生是同意的,但是,对大字报的具体内容他还不太清楚,而且,大字报引起的紧张局面和陆平他们对大字报

反击之强烈,康生始料不及。中央一班人对大字报的态度虽然还不明朗,但偏袒陆平,反对聂元梓大字报的态度是可以明显感觉到的。康生立即让曹轶欧将聂元梓大字报的底稿迅速送来。

接到聂元梓电话约一个小时以后,张恩慈来到北大22楼杨克明家里,聂元梓他们都在这里守候。张恩慈见到他们后就说:

“领导要你们把大字报抄一份给我,送给中央文革小组和党中央看看。”

看到张恩慈,杨克明又发火了,对张恩慈说:“你们现在怎么都不吭声?你们知道不知道这样做的后果会怎么样?”

张恩慈赶紧回答说:“我把大字报带回去,先给中央文革的领导看一看。你们等着我的电话吧。”

当天晚上,聂元梓他们等了很久,张恩慈的电话一直没有来。大家很紧张,心里没有底。对他们写的大字报,他们认为是正确的,首先,大字报内容是根据中央精神写的,是响应党的号召的;其次,从组织原则上说,他们请示了上级领导;第三,是出于保卫党中央、保卫毛泽东思想、保卫无产阶级专政,不使党和国家改变颜色的公心,因此,没有错误。但是,对大字报引发的这种混乱局面应该怎么解决?等待他们的后果是什么?他们茫然不知所措。

陆平等人更是不敢怠慢,他赶紧将大字报的内容和北大的情况分别向新北京市委书记李雪峰和高教部部长蒋南翔作了汇报,并在领导的提示下,报告了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

5月25日下午,北京大学的告急电话接二连三的打到刚上任的“文化革命小组”组长陈伯达那里,陈伯大又给新上任的北京市委第一书记李雪峰打电话:

“现在北大形势严重,很多人去看大字报,很可能要上街游行,也可能会有大字报上街,你快去看一下。在北大贴大字报要做工作,不要上街。”

李雪峰想,彭真刚出问题,北京大学的大字报究竟是对是错?毛泽东是什么态度?谁也不清楚。中央没有态度,去了怎么说呀?于是,便说:“我不能去呀,中央还没有下正式通知呢,我去师出无名啊。”

李雪峰的推脱让陈伯达更加着急,他接连给李雪峰打来三次

电话：

“现在北大形势很严重呀，非你老兄出台不行了。”

是啊，彭真已经免职了，新的北京市委书记是你李雪峰，北京大学党委是隶属于北京市委管，不找你李雪峰找谁呀？

李雪峰还是说：“不行呀，中央没说话，我怎么去呀？”

陈伯达百般无奈，只好说：“要不，我和你一块去。”

陈伯达是政治局候补委员，又已内定文革小组组长，是负责这场运动的，李雪峰一听，马上就答应了：“好吧，我陪你一起去。”

李雪峰刚放下电话，国务院外事办副主任张彦的电话就打了进来：“我刚从康老那里出来。康老让你和蒋南翔一起去一下北大。他原准备是和我们3个人一起谈。我去后，康老说，既然我来了，就先和我谈，请我转告你。康老的意思是，大字报可以出，但不要搞到各个学校去，不要上街。总理也指示了几条：正面讲毛主席的伟大决定，对大字报要做几条规定，工作要说服，不能压，要负责人亲自去做工作。我先和你打个招呼，康老还要找你。”

一会儿，康生的电话就打过来了：“李雪峰吗？蒋南翔已经来过了，你不来也可以。”

李雪峰：“陈伯达来电话，要我到北大讲话。”

康生：“可以。”

康生的电话才放下，陈伯达的电话又打了进来：“李雪峰啊，你什么时候过去呀？”

李雪峰说：“我等你哪。”

# 第一部上卷
# 各地文革章回索引

**北京：**

第1回；第2回；第3回；第4回；第5回；第6回；第8回；第9回；第10回；第11回；第12回；第16回；第17回；第20回；第21回；第22回；第23回；第24回；第25回；第26回；第27回；第28回；第30回；第31回；第32回；第33回；第34回；第35回；第36回；第37回；第38回；第39回；第40回；第41回；第42回；第43回；第44回；

**杨尚昆：**

第10回；

**罗瑞卿：**

第12回；第13回；第14回；第15回；第16回；第17回；
第18回；第19回；第22回；第23回；第28回；第29回；
第33回；

**“首都工作组”：**

第22回；第31回；第39回；第42回；

**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

第23回；第24回；第27回；第30回；第31回；

**《二月提纲》：**

第23回；第24回；第25回；第26回；第27回；第31回；
第32回；第33回；第34回；第35回；第36回；

**《三家村》：**

第32回；第34回；第37回；第40回；

**《五一六通知》：**

第33回；第34回；第36回；第37回；第38回；第39回；

**中央文革小组：**

第 33 回;第 34 回;第 35 回;第 39 回;第 41 回;

**陆定一：**

第 29 回;第 30 回;第 41 回;

**专案审查：**

第 40 回;第 41 回;第 42 回;

**北京大学：**

第 45 回;第 46 回;第 47 回;

**上海：**

第 7 回;

**天津：**

第 44 回;第 45 回;

**华北地区：**

**河北：**

第 44 回;

**内蒙：**

第 44 回;

**山西：**

第 44 回;

**中南地区：**

**湖北：**

第 35 回;

**广东：**

第 37 回;

# 文革史话

## 之第一部山雨欲来

下卷

刘朝驹 著

中国文化出版社

# 文革史话

## 之

## 第一部

# 山雨欲来

下 卷

刘朝驹　著

中国文化出版社

# 目　录

## ◇下　卷◇

第 48 回:讲纪律,李雪峰“内外有别”
搞文革,空军硝烟起正酣 …… 363

第 49 回:保安全,首都工作组开会
跟不上,军报竟指导党报 …… 371

第 50 回:“保旗论”,大院内“炮”声隆隆
陈伯达,亲掌管《人民日报》 …… 379

第 51 回:发社论,群情起举国欢腾
狂潮涌,惊涛声响遍神州 …… 387

第 52 回:昼夜间,北京大学人如海
干革命,中学生岂肯稍歇 …… 395

第 53 回:燃激情,红卫兵亮相舞台
工作组,陈伯达提出异议 …… 404

第 54 回:“不能乱”,刘少奇忧心忡忡
飞杭州,示方略未得要领 …… 412

第 55 回:匡亚明,溧阳县遭遇炮轰
稳局面,回南京汇报结果 419

第 56 回:六月三,青海湖又起波澜
轰领导,动荡在全国蔓延 425

第 57 回:六月六,匡亚明转瞬打倒
西北局,开会也揪“三家村” 432

第 58 回:飞西安,剑英出手援耀邦
义愤起,西安交大风云动 440

第 59 回:打压狠,遗书封封催泪滴
看西南,贵州文革序幕掀 447

第 60 回:六月七,兰州城又生事端
斗老师,学校“池浅王八多” 455

第 61 回:清华园,高干子弟冲在前
霎时间,蒋南翔迅即倒台 462

第 62 回:生疑问,工作组遭遇轰赶
请“尊驾”,众领导再聚杭州 470

第 63 回:激情烧,革命火燃在江城
六一三,南京市党报被围 477

第 64 回:人大反,孙泱辞职仍被斗
评校长,重庆大学闹翻天 484

第 65 回:麻雀方,动荡中不乏幽默
六一八,郑州大学起风波 490

第 66 回:蒯大富,清华质疑工作组
要改革,下通知废除高考 497

第 67 回:六一八,未名湖施暴疯狂
批大富,薄一波辨证清华 504

第 68 回:到一线,王光美亲临清华
六二〇,北京轰赶工作组 511

第 69 回:压不服,各地纷纷出事端
武汉市,“墨水湖中学事件” 519

第 70 回:发简报,陈伯达意见被否
女附中,卞仲耘屡屡被打 528

第 71 回:六二一,吉林省“红旗事件”
出奇文,造反精神万万岁 534

第 72 回:难抵挡,工作组辩论败北
不堪辱,江隆基命陨兰州 541

第 73 回:中科院,发生“应地所事件”
通情况,刘邓见民主人士 547

第 74 回:六二七,北航组织大辩论
陶铸忙,不断指导中南局 555

第 75 回:反压制,广东学校大动荡
急戒备,《北京来信》惊羊城 561

第 76 回:斗韦力,天津一中带头干
齐动员,津城声讨十六中 567

第 77 回:上措施,清华反击蒯大富
多数人,同意开除其团籍 575

第 78 回:不屈服,蒯大富绝食抗议
庆七一,《造反歌》传唱北京 581

第 79 回:邓小平,接见女附中领导
群情奋,吴法宪四面楚歌 588

第 80 回:联名信,要撤换空军领导
竞相同,海军开会批肖、苏 595

第 81 回:军委会,解决空、海军问题
烽烟起,毛泽东回到故乡 602

第 82 回:滴水洞,冷眼向洋看世界
望神州,热风吹雨洒江天 610

第 83 回:抓右派,王任重屡出经验
反鲁迅,任白戈《红旗》点名 619

第 84 回:华北会,乌兰夫真难过关
打游击,云成烈欲上青山 626

第 85 回:做工作,刘、邓亲自出面谈
文革火,熊熊燃烧在青城 632

第 86 回:外事口,工作组四处被轰
分歧大,康、陈顶撞刘少奇 640

第 87 回:访广院,一切权力利归学生
转弯难,北大重评“六一八” 647

第 88 回:游长江,壮志豪情贯苍穹
闻“收尾”,毛泽东颇为惊讶 656

第 89 回:历史所,少数派意外平反
回北京,刘少奇求见未成 664

第 90 回:是危言?要准备杀头坐牢
责任大,少奇雨夜莅清华 671

第 91 回:撤与留,常委会争论不休
要决议,确定文化大革命 678

第 92 回:再走访,文革组又临北大
微服行,周恩来深入二外 685

第 93 回:听呼声,一行人再访广院
答疑问,陈伯达盛赞江青 691

第 94 回:下决心,阻碍者统统驱逐
是与非,北大万人辩论会 697

第 95 回:争论急,风雨中无人离去
小太阳,彭小蒙备受赞扬 704

第 96 回:张承先,会后急往北大赶
动真情,江青忘情诉家事 712

第 97 回:刘少奇,与康生激烈争论
赴师大,解决工作组问题 720

第 98 回:工作队,诸领导接连被撤
义愤起,人大揪斗郭影秋 728

第 99 回:乱打人,团中央谎报军情
做决定,北京撤销工作组 736

第 100 回:苦难言,老革命遇新问题
红绿灯,工作组撤离北航 743

第 101 回:亲约见,周恩来会蒯大富
开全会,文革再掀新篇章 751

**第一部下卷各地文革章回索引** 759

# 第48回：讲纪律，李雪峰“内外有别” 搞文革，空军硝烟起正酣

放下陈伯达的电话，李雪峰马上找来华北局第二书记解学恭和书记池必卿商量：

“北大的形势看来很严重。一会儿我们过去，我在台上，你们在台下，万一被群众包围，彼此也好联系。聂元梓是太行山的干部，必要时，池必卿可以做做工作。”

安排完后，李雪峰又给陈伯达打过去电话：“伯达同志吗，我是李雪峰。咱们什么时候去呀？”

陈伯达：“我正在改一篇社论，去不了了，你先去吧。”

晚上23时，李雪峰和新北京市委文教书记、原人民大学党委书记郭影秋，以及华北局的三个书记处书记赶到北京大学临湖轩，陆平正在主持校党委会。教育部部长蒋南翔，副部长刘仰峤都在。

4个小时前，陆平已经召开了一次校党委会，研究下午发生的事情，校党委第一副书记戈华、常委崔雄昆主张支持群众运动，支持大字报，但大多数人不同意。

晚上21时30分，陆平又召开全校党员大会，强调内外有别，要有组织纪律性。

看到李雪峰他们到了，陆平先汇报了北大的情况，又准备重新召开全校群众大会，党团干部集中在办公楼礼堂，校内各单位通过有线广播，组织收听。此时已是夜里24时，李雪峰说：“已经开过了，那就算了吧。”

蒋南翔说：“雪峰同志你既然来了，我们就再开一次。”

在会上，李雪峰重申中央关于贴大字报的有关规定，要“内外有别”，运动要有领导地进行等等。他说：

“我们惊动你们，但你们也惊动了我们。你们贴出了大字报。大字报是最好的形式，是武器，是好事。北大是有革命传统的，在全国、

全世界都有影响。搞好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要按中央指示进行。中央和国务院指示,不要把内部和外部的大字报都贴在一起。

要把这场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彻底肃清修正主义影响是长期的事情。文化领域包括思想意识形态的各个领域,是要进行一个长时间的,要5年到10年时间。主席说:我这一辈子不行了,你们再接着来。我们要进行一场尖锐复杂但也是很细致的阶级斗争,这要有坚强的领导。最高司令就是毛主席,最高司令部就是党中央。因为这场革命涉及面很广,所以要一步一步来。要有领导,有计划,有步骤的进行,一个战役接着一个战役的打,打歼灭战。现在只是第一个战役刚刚发动。目标就是三家村黑店,别的还没有准备好。"

他还说:"斗争要有组织有纪律,不要弄得乱七八糟,要有秩序,有纪律。这不是束缚大家手脚。"

"周总理对大字报有指示。党有党纪,国有国法。党员要有民主权力,大小字报内外要分开,国内外党内外要分开。外部的外国人可以看,内部的外国人不许看。党内问题,涉及到党和国家机密的,不要在外面张贴。"

"同志们贴大字报是可以的,但要内外有别。北大出现了几份故意泄密的大字报,涉及到党和国家机密的,要注意。"

大会开始不久,池必卿在北大副校长戈华陪同下在会场内找到聂元梓,将她叫到楼上。池必卿一见聂元梓就说:"你也是一个老同志,写这张大字报,怎么都不请示领导呢?"他显然是憋着一肚子的气,还在尽量地控制着。

"我请示了。"聂元梓争辩说。

"你向谁请示了?"池必卿问。

"我请示曹轶欧了。"聂元梓将他们向曹轶欧请示的经过向池必卿作了汇报。

池必卿听后,不说话了。

大会快结束时,国务院外事办公室副主任张彦也到了。张彦说:"我是总理派来的。"他传达了周恩来的意见:"贴大字报可以,但是不要贴在外边,应该开辟一个室内的场地,用来贴大字报。因为刚刚过完'五一'劳动节,一些外宾还没有离开北京,让他们看到大字报,影响

不好。”

从北大回来后,李雪峰怎么也睡不着觉,对他在北大的讲话是否合适,实在没有把握。此时的政治形势,让他看不清楚,但有一点知道,这个时候,稍有不慎,就会重蹈彭真或张磐石的覆辙。天还没亮,他就给刘少奇打电话汇报,当说到:“在会上我代表中央、包括总理讲了话,……”

刘少奇马上顶了一句:“你不能代表。”

李雪峰一听,赶忙问:“那怎么办?我马上写一个检讨,需要公布就公布。”

刘少奇:“那也不要。强调、‘党有党纪,国有国法’是对的,文化大革命不能偏离这两个轨道,偏离一点都是错!”说完就挂了电话。

第二天,北大党委又组织各个系开会,要求赞同聂元梓大字报的老师和同学,都要检讨。学校在第三食堂内拉上了许多铁丝,专门供大家贴大字报。

法律系学生徐昭文等18人联名于5月26日贴出大字报,题目是:《你们是赫秃子式的阴谋家》。大字报指责聂元梓他们:“你们披着‘党干部’的外衣,干着叛党的勾当。昨天你们演出了一出反党反文化大革命的丑剧,我们认为这绝不是偶然的,你们早已怀上了取消党的领导的鬼胎!”

校办的工作人员周韵,在铁丝上粘了一张大字报,上面只写着一行字:“聂元梓是个好同志!”粘完大字报后,一言不发,转身就走了。但这毕竟是少数,大部分大字报是声讨、批判聂元梓的。

之后几天,第三食堂就成了人们观看大字报和表达不同意见的场所。

5月26日上午,北京大学校党委派副校长黄一然在临湖轩同聂元梓谈话。黄一然曾担任驻苏大使馆文化参赞等职,善于辞令,他娓娓动听地劝说聂元梓主动检查,自己去把大字报撕下来,聂元梓沉吟片刻,回答说:

“检查,可以,我检查。不过,把大字报撕下来,我不,我不撕。”

此时,1957年反右斗争的情景不断地在聂元梓的眼前闪现,历次政治运动的阴影凝重地笼罩着她。但是,她总觉得这次她对《516通

知》的理解应该没有错,不能轻易后退,还是要坚持一下。

遂后几天,愈来愈多的人纷纷指责聂元梓等人是反党的大阴谋家,甚至说是邓拓“三家村”的忠实卫士。

深感政治压力巨大的杨克明打电话问张恩慈:“我们写的大字报到底有没有问题?!”

很快,张恩慈打电话给杨克明:“我带你去见曹轶欧吧。有什么问题你直接问她。”

两人来到友谊宾馆曹轶欧住处,杨克明特地带上了大字报的底稿,曹轶欧看过大字报底稿以后表示:“这张大字报没有什么不对。”她询问了杨克明的年龄、工作,并说:“做这种事情要谨慎。大字报的底稿先留在我这里吧。”

这份底稿是杨克明在5月25日早晨交给其他人讨论的那一份原件,上面有聂元梓和其他人修改的笔迹。

5月27日,《红旗》杂志、《光明日报》总编室编印的《文化革命简报》第13期登载了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

那几天,江青经常跟戚本禹通电话,询问北大的情况。戚本禹把聂元梓等七个人写的大字报在电话里一字一句地读给她听。

江青问:“小组的人是什么态度?”

戚本禹说:“我们都支持。”

江青又问:“怎样支持?”

戚本禹说:“因为还没有同你商量,所以小组尚没有人出面公开讲话。但小组办事组的曹轶欧带人下去了,他们广泛与学生联系,并公开表态支持广大学生。”

江青說:“光曹轶欧去还不够,她又不知道多少情况。”

戚本禹说:“她知道情况的,康生把北大的情况告诉了她。”江青这才放心。

不久,曹轶欧来电话问戚本禹:“对聂元梓的大字报应该采取什么态度?”

戚本禹说:“中央文革当然要坚决支持群众大字报的,你是不是再去请示一下康生同志?”

曹轶欧说:“就是他要我来问你的。”

因为康生知道,江青和戚本禹一直保持着电话联系。

5月29日,北大校党委第一副书记戈华、常委崔雄昆正式写报告,汇报“陆平镇压革命的罪行”,要求中央、华北局派工作组来校领导文化革命。

动荡,岂止在北京市委和北京大学。5月25日,中央军委向全军发出《关于执行中央5月16日通知的通知》,总政治部于当天召开电话会议,向全军传达军委的这一通知,部署在全军开展文化大革命。

这时,空军司令吴法宪和空军副司令成钧正在甘肃省临洮县检查工作。他们是4月下旬赴西北地区执行氢弹投掷任务,完成任务后顺路到西北地区的航校、高炮、导弹和飞行部队检查那里的工作。很快,吴法宪接到空军政委余立金的电话,要他和成钧立即返回北京,说有重要的事情要商量,对《516通知》要立即进行讨论。

这个电话刚刚放下不长时间,余立金又再次打来电话,告诉吴法宪说:“叶群要我转告你,要尽快赶回北京,否则就会变成‘恩克鲁玛’了。”

恩克鲁玛是当时西非加纳的总统,1966年2月访问中国期间,国内发生军事政变,其政权被推翻,后流亡并定居于几内亚。加纳的这次政变,林彪在“518讲话”中也有提及。

其实,叶群已经直接给吴法宪打了电话。原来,叶群到总政副主任刘志坚家,正好碰到空军副司令员徐深吉也在那里。徐深吉不认识叶群,以为她是家属,所以继续和刘志坚谈空军的事情。他说:“吴法宪躲出去检查工作,迟迟不归,对《516通知》即不传达讨论,也不下发执行。”

叶群回到家,立即给吴法宪打电话,说“你后院起火了,你还不赶快回来。”

吴法宪哪敢怠慢,马上启程返京。

5月26日上午10时,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结束。周恩来主持了这天的会议,刘少奇在会上再次做了自我批评的讲话。他说:

“首先感谢会议专门给我安排这样一个重要时间讲话。在我们这次讨论发言中,对文化革命问题讲的比较少。对这个问题,我们过去也是糊涂的,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包括我在内。我最近这

个时期对于文化革命的材料看得很少。生了一次病,出了一次国,很多材料没有看,接不上头。但是我们还是要认真学习,努力跟上形势,保持晚节,革命到底。”

刘少奇在讲话中再次对彭真进行了批判,并批评了陈云在1962年提出的包产到户的主张。接着,他从1927年大革命时期,他在武汉同意解散工人纠察队讲起,讲到1949年在天津讲话中主张资本主义工商业可以发展,1956年反冒进,1962年对经济困难估计严重,一直到1965年制定《23条》时不主张提“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历数自己参加革命几十年的缺点错误。他还说到:“主席从揭露严慰冰匿名信时就讲政变,问我们会不会发生政变?”

就这样,刘少奇一直讲到下午13时30分才结束了对自己的批判,周恩来宣布散会。

5月28日,中央发出《关于设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通知》:

中发[66]281号

中央决定设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领导下。现将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名单通知你们。

组 长:陈伯达

顾 问:康 生

副组长:江 青、王任重、刘志坚、张春桥

组 员:谢镗忠、尹达、王力、关锋、戚本禹、穆 欣、姚文元

华北、东北、西北、西南四大区参加的成员(四人)确定后,另行通知。

文化革命小组成员基本是参加《通知》的起草人员。名单中原来有陈亚丁和吴冷西,他们也参加了《通知》的起草工作。但是,毛泽东在杭州会议时批评吴冷西是“半个马克思主义者”,此时的他已经是“四面楚歌”,无法正常工作了,只能从名单中删除。

而陈亚丁最初是江青提名的,他和江青一起搞过样板戏,也参加过江青主持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及会后《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的起草工作。江青说他在这几次活动中的表现都很好,所以提议他参加。但是,刘志坚不同意,说他政治上不坚定,个人作风方面也有些问题。于是换成谢镗忠。因为谢镗忠也参加了《部队文艺工作座谈

会纪要》的起草工作。陈亚丁是总政文化部副部长,而谢镗忠是总政文化部部长。把陈亚丁列为组员,不列谢镗忠,不合适;两人都列入,则总政方面的人太多。因此,删陈亚丁,加入谢镗忠。

江青、刘志坚任副组长,是陈伯达4月16日在上海锦江饭店《通知》起草小组第一次集中的会议上宣布的。

把康生列为顾问,从职务上讲,这是自然的。张春桥提为副组长是因为杭州会议时,确定陈伯达为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推辞,他跟毛泽东说:"主席,这个事我干不了,我是个书生,康生干比我合适,他原来是五人小组的成员,他干比我强。"

毛泽东回答:"你把那个书生气去掉不就可以了嘛!"

陈伯达曾向毛泽东建议让江青当组长。他的建议理所当然地被毛泽东否认了。于是,陈伯达又建议,如果他当组长,最好让江青担任副组长,毛泽东同意了。随后,江青又提议张春桥为副组长,获得通过。这样,江青就是第一副组长。

增加中共湖北省委书记王任重,则是因为王任重是省委书记中的"秀才",写了不少杂文。而且,他于1966年1月24日在中共湖北省委常委会上的讲话,关于政治挂帅的论述,颇受毛泽东重视,于1966年4月10日经中共中央批转下发全党。一次周恩来前来看望起草《通知》的小组人员,正好说起此事,周恩来说:"毛主席很信任王任重的。"此时的王任重和陶铸,很受毛泽东的器重。

姚文元进中央文革是戚本禹在上海时最先提出的,江青同意。陈伯达觉得不妥,他说:

"恐怕不合适吧。姚文元的父亲姚篷子是叛徒,很容易叫人抓住辫子。"

张春桥没有说话。

周恩来说:"对一个人的评价应该主要看本人表现,不应看他的家庭出身。"

后来,毛泽东在杭州说:"老子反动,儿子就不能革命啊?这是两回事嘛。老子反动儿子革命的很多。陈独秀后来叛党,可他的两个儿子是革命烈士!我们这些人也都是出身不好的,我还是富农家庭出身,还不是照样干革命?"

姚文元参加了《通知》的起草工作。

5月21日,康生打电话向在杭州的毛泽东请示江青等人提出让姚文元参加文化革命小组的问题,毛泽东同意。于是,“中央文革小组”便多了一名成员:姚文元。

《通知》下达后,中央文革小组并没有马上成立,原因是毛泽东不同意名单中的王力,因为王力是1964年彭真向毛泽东建议他列席中央常委会,并称王力是优秀干部。毛泽东对王力有看法,认为他不合适。可是康生、陈伯达力保王力,理由是:王力是钓鱼台“秀才班子”里的“老人”,起草文件比姚文元要熟练。如果过去的秀才班子一个不留,不好办事。从起草文件到印刷整个过程,新来的人不熟悉。他们请江青向毛泽东谈,说“留一个王力,不然就清一色了。”毛泽东最后同意王力为中央文革小组成员。

毛泽东提出,不仅是那些笔杆子要参加中央文革,各大区都要有人参加。华东局的张春桥、中南局的王任重已经是中央文革的副主任了,后来又增补了另外四个大区的成员是:

郭影秋,中共北京市委文教书记,代表中共中央华北局;

郑季翘,中共吉林省委文教书记,代表中共中央东北局;

杨植霖,中共青海省委第一书记,代表中共中央西北局;

刘文珍,中共中央西南局宣传部部长,代表中共中央西南局。

# 第49回：保安全，首都工作组开会 跟不上，军报竟指导党报

5月26日下午，叶剑英主持“首都工作组”第一次全体会议。为了保密，这次会议居然是在人民大会堂的一间茶炉室召开，出席会议的人有周恩来、叶剑英、李雪峰、谢富治、郑维山、刘志坚、王尚荣、雷英夫等人。会议研究和决定首都工作组的任务、组织、当前工作安排、工作方法以及增调两个陆军师加强首都警卫力量等问题，就调兵方案达成共识。扩编调入的部队，与5月18日周恩来与杨成武等商议后报告毛泽东的方案有所变动。

周恩来在会上讲话指出：“首都卫戍工作。既要抓紧，又要走稳，要有领导、有步骤她进行，头脑要清醒，不能急，一急就容易被坏分子钻空子。首都卫戍工作牵连全局，必须把形势观察好。反革命毕竟是少数，我们掌握着大权，有枪杆子，军队是可靠的。”

周恩来最后说：“今天的会议，研究和决定了‘首都工作组’的任务、组织、当前工作安排、工作方法以及增调两个陆军师加强首都警卫力量等问题。就这样定下来。卫戍区司令员拟由北京军区副司令傅崇碧同志担任。”

叶剑英强调：“北京卫戍部队的调动是一件大事，不能马虎，要按原则办事，按军委关于军队调动的规定执行，要有严格的程序。今后遇有紧急情况，需要调动警卫部队执行任务时，一定要经总理批准。”

会议决定：如遇有紧急情况需调动卫戍部队，周恩来不在时可报邓小平。

为了在毛泽东回京之前完成选调部队的工作，“首都工作组”办公室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很快就拟定了一份初步方案：（一）原中央警卫师改称为警卫第1师；（二）北京市公安总队改编为警卫第2师；（三）调第24军第70师作为警卫第3师，仍住怀柔地区；（四）调第63军的第189师作为警卫第4师；（五）卫戍区领导机关相应扩大编制。

5月27日,中央军委发布关于北京卫戍区部队扩编的命令:将原属公安部队总部指挥的首都警卫师、北京市公安总队及陆军第63军所辖的第189师,调归北京卫戍区建制。

根据中央军委的决定,除傅崇碧兼卫戍区司令员外,调北京军区政治部副主任黄作珍任卫戍区第二政委。

当天,公安部队司令部做出《关于加强广播电台武装警卫情况的报告》。报告称:"年初以来,根据周恩来总理、总参和公安部的指示,公安部队对加强重要广播电台的警卫工作采取了很多措施。各地98个重要广播电台普遍加强了兵力。各总队对电台警卫工作均指定专人负责。各重要电台的警卫部队还调整加强了干部,并有营以上干部重点掌握。各省、市、自治区对调动电台警卫部队的权限都作了规定,以防止发生问题。加强了通信联络,给警卫部队配备了无线电台。"

两天后,公安部队整编小组向中央提交《全国公安部队整编报告》,经周恩来审核后报告毛泽东,6月6日,中央、军委批转了这个报告。6月7日,军委发布命令:"撤销中国人民公安部队,统一整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

军委决定:除北京市公安总队已于5月27日拨归北京卫戍区建制外,其余全部公安部队自7月1日起,拨归各大军区、省军区、上海警备区建制领导,原中国人民公安部队番号撤销。以原公安部队领导机关为基础,和现炮兵管理导弹部队的机构合并,整编为第二炮兵领导机关。

5月31日,周恩来将5月26日的会议情况,以及增调两个陆军师加强首都警卫力量等问题以《首都工作组第一次全体会议纪要》报送毛泽东。6月1日,毛泽东批示:"总理:此件已阅,很好。"

6月3日,周恩来对"首都工作组"上报的首都警卫部队调整方案做出批示:

"剑英、成武、王尚荣三同志,同意这一报告中所提的警卫部队的部署调整方案,请即组织实施。望在4天内将部队部署和调整具体落实,并将营连的驻地和机动兵力驻地绘图标出送阅,其它三事均同意。"

当天,首都工作领导小组和北京军区在京西宾馆召开有总理、副

总理、军委副主席、解放军各总部、各军兵种、各院校参加的卫戍区营以上干部会议,周恩来主持了会议,杨成武宣读了中央军委关于调整、扩编北京卫戍区的命令,由原来的一个师另一个团,增加到四个师另一个团。调24军机械化第70师、63军189师归北京卫戍区建制,加上原首都警卫师改为警卫第1师,北京市公安总队改为警卫第2师,共有4个师,外加1个独立团,1个军乐团,1个干部大队,级别为兵团级。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第一政治委员谢富治、第二政治委员由北京市委书记担任、第三政治委员黄作珍。

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代表卫戍区全体官兵宣誓:“坚决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保卫文化大革命、保卫首都的安全。”

叶剑英也讲了话。他说:“担任首都卫戍任务的部队,同野战部队有许多不同的特点。小分队执勤和一两个人分散执勤的情况比较多,接触的环境比较复杂,会遇到资产阶级各种各样的诱惑和攻击。所以,必须加强对部队的政治思想工作和管理教育,把工作做到基层,做到每个战士的心上。林彪同志提出,在战斗中要发扬孤胆精神。今天在城市里执行警卫任务,我们要提倡孤忠执勤。在任何情况下,要对毛主席、对党、对人民无限忠诚,要成为党和人民的驯服工具,忠心耿耿地愉快地完成任务。”

北京卫戍区扩编后,第一件事就是按照毛泽东、周恩来的指示,清理整顿首都治安,以保证党中央的安全。

卫戍区重新制定了首都安全方案,清除不安全隐患。“首都工作组”提出了对卫戍区部队的部署调整和整编安排:

一、6月10日前完成保卫重要目标的卫戍部队的部署调整;

二、6月底以前分步完成师、团干部既担负保卫重要目标的连队的干部调配;

三、6月中旬大体完成所有卫戍部队的调整。

6月3日这天,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做出决定:对原北京市副市长、市委书记处书记兼公安局局长、现任陕西省委书记冯基平,原北京市公安局副局长、现任公安部十二局局长狄飞,现任北京市公安局局长邢相生,原北京公安总队总队长、现任首都警卫2师师长吕展,及阎塘、阎前江等人实行隔离反省,对李一平、张烈实行撤职反省,派李钊、

刘坚夫、程诚、马星五等人到北京市公安局,分别任局长、副局长、政治部主任等职。6 月 5 日. 在北京体育馆召开的 5000 名公安干警大会上,新上任的市委副书记吴德宣布了北京市公安局新领导班子的名单,同时宣布对前任局长冯基平、现任局长邢相生以及其他领导成员吕展、闵步瀛、阎塘隔离审查,张烈、李一平停职反省的决定。谢富治在讲话中说:“对一些反党分子、坏人撤销职务、停职反省,我们早有这个希望,今天终于实现了!”

5 月 31 日至 6 月 6 日,划归北京卫戍区的 63 军 189 师从石家庄获鹿地区进抵北京市郊长辛店、清河、南苑地区。

部队的调动是按临战状态调动,十分紧张。6 月 3 日接到命令后,189 师只用了 3 天时间动员准备,连夜搭乘专列进京。被认为有政治问题干部立即转业。排以上干部大都听到“二月兵变”的传闻,但不知道除了已经知道被“打倒”的人以外,在这次“兵变”中究竟还涉及谁?隐约听说,原北京公安总队总队长兼北京市公安局第一副局长,现任警卫 2 师师长吕展已被逮捕,原因是警卫 2 师参加了“兵变”,189 师进京就是接管他们的部分防务。

由于调动严格保密,部队到达驻地后,严禁单独与地方人员接触。

在中央电台等重要设施警卫的部队,都接到这样的命令:“夜间执勤如遇到回答不上口令的人接近目标,不经报告即可开枪阻止。”

结果有个排长半夜出门撒尿,一时没答出口令,就挨了一枪,幸亏打的不是要害处。

6 月 15 日,军委电令陆军第 24 军所辖第 70 师自 6 月 3 日起调归北京卫戍区建制,番号不变。从 6 月 20 日开始至 24 日,全部交接完毕。70 师的原驻地——北京以东顺义、通县及怀柔一线不变。

189 师为北方甲种师编制,辖三个步兵团、一个炮兵团和一个坦克团共五个团。

70 师为陆军机械化师编制,是陆军第 24 军以至整个北京军区的主力,辖三个摩托化步兵团、一个高炮团、一个加榴炮兵团和一个坦克团共六个团。

后来,根据叶剑英的指示,在高碑店的 112 师、在天津杨村的 196 师、在宣化的 193 师,必要时也可以由北京卫戍区直接调动。

军事调动在不露声色地部署中……

“首都工作组”成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加强中南海的安全工作,因为杨尚昆在中南海搞了近20年的警卫工作,担心这里会不安全。6月5日,周恩来就中南海、中央领导人的安全问题约周荣鑫、李质忠、童小鹏、汪东兴谈话,做了具体的布置和指示。

其次,“首都工作组”对政变时易受攻击的中央广播电台、电视台、国家通讯枢纽等地勘察,制定防范措施。对城郊的机场、水库、发电厂、监狱等重要设施,对建设中的地下铁路、可能进人的城市地下污水通道等要害处实地勘测,对玉泉山毛泽东战时指挥所,由汪东兴陪着看了个详细。

“首都工作组”的工作和一些工程用钱,周恩来特地向总后勤部长邱会作进行了交待:“这事不能转手办,你自己亲自管着,用多少,直接向我打交道,不要惊动别人。”

“首都工作组”实施的另一项重要工作是,清理整顿首都的治安,消除安全方面的隐患,确保毛泽东和党中央的安全。

曾参与“首都工作组”具体工作的邱会作回忆说:“对首都安全的任务暂定了两项:(一)制定对首都的设防、警卫、主要目标控制的方案;(二)准备对首都进行全面的清查清理。清查清理的对象包括社会人口、枪支弹药、电台、监狱、侨民等。为了具体进行工作,在首都工作小组领导下,组织了一个勘察小组。小组成员有杨成武、邱会作、汪东兴、万里(当时的北京市副市长)、李静(总参作战部副部长)等,杨成武为主持人。勘察小组对北京城进行一个多月的实地勘察。对远郊区曾经勘察过的有:南口、紫金关两个中央首脑指挥工程;房山、长辛店的广播发射台和劳改农场、秦城监狱等。对近郊区曾经勘察过的有:玉泉山(毛主席住地,中央战时指挥所),象鼻子沟(国务院战时指挥所),西山(中央军委战时指挥所);还勘察过密云、顺义、通县、长辛店等处卫戍区部队的外围部署地区。对城内曾经勘察过的有:电视大楼、电讯大楼、地下污水道和中南海周围的高层建筑。电讯大楼屋顶上,距离中南海毛主席住房直径只有几百米,肉眼看得很清楚。我们就在楼顶开会,研究过对中南海的保卫和安全问题。”

据参与勘察工作的张民回忆,6月上旬开始“首都工作组”对北京

各重要的警卫目标进行实地勘察,明确各部队的具体警卫工作。这次勘察先城区后郊区,首先勘察了广播电台、电视台、中南海周边的高大建筑物,外国使领馆。接着又勘察了广播电台的发射天线、危险品仓库、发电厂、水库,最后勘察监狱和劳改农场。在勘察过程中,了解有关情况,现场研究解决各种问题,当场决定兵力部署,并提出注意事项和有关要求。

“首都工作组”在6月6日后从京西宾馆搬到中央军委所在地三座门,有关工作全面展开,人员也增加到20多个。此时的“首都工作组”办公室下设7个组:(1)部队指挥组,主要负责警卫部队的调动,首都重要目标的警卫;(2)治安组,主要负责社会治安工作,清除和整治各种不安全因素;(3)枪支弹药清查组,主要负责对军队、地方和市民非法枪支弹药的清查和收缴工作;(4)电台组,主要负责对地方团体和民间各种无线电收发机的清查、整顿工作,特别是对私设电台的清查、清理和收缴工作;(5)社会人口清查、清理组,主要对非法居留北京和危险人口的清查、整顿工作;(6)监狱、看守组,主要负责北京市各监狱、劳改场、拘留所和看守所临时关押人员的安全警戒和清查、清理和整顿工作;(7)外事、侨务组,主要负责各国驻京大使馆和领事馆的安全警卫工作,负责北京华侨的清查和安全工作。

就在北京大学为聂元梓的大字报闹得不亦乐乎之时,《人民日报》社的大字报也越来越多,对《人民日报》不满的群众来信日甚一日。

文化革命开始后,《人民日报》一直没有发表什么对运动有指导意义的文章,只是紧跟在《解放军报》、《红旗》杂志、甚至《文汇报》后面转载他们的文章,党报在群众中的威信一落千丈。到了1966年4月,一次《人民日报》送审有关突出政治的社论时,康生发话了:

“以后《人民日报》的社论,要送《解放军报》总编辑唐平铸审阅修改,以免出错。”

党报是指导军报的,党报的社论要军报审阅,这是前所未有的怪事,但也决非偶然。

早在2月3日,《解放军报》发表题为《永远突出政治》的社论后,到4月5日止,又接连发表了论述突出政治的6篇社论,提出毛泽东的指示是各项工作的“最高指示”,“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克思主义的顶

峰,最高最活的马列主义”,各地的报刊纷纷响应。一时间,中国再次出现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热潮。

但是,“七大”以后,中共中央都是说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并没有讲过是世界革命的指导思想。而且在表述上有严格规定:不能同马列主义并提,必须写成“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中间必须是顿号,而不能改成逗号、分号或破折号,也不能用“和”字。

但是,《解放军报》的提法,其实就是林彪的提法,却深受群众欢迎。

面对全国掀起的“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热潮,《人民日报》要不要紧跟并引导形势发展?怎样引导?是按照林彪的说法引导,还是按照原有的规定引导?吴冷西没有把握,只好请示中央。刘少奇和邓小平的答复是一致的:关于毛泽东思想的国际意义,要考虑国际影响,怎样讲得更稳妥一点,恰当一点,在中央未做出决定之前,《人民日报》可以暂不宣传。

2月初,中央政治局在京常委的一次会议上,邓小平说:“对毛泽东思想的提法要慎重。毛主席过去只同意‘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提法,说‘顶峰’、‘最高最活’不一定很确切,要研究一个确切的提法。”

这次会议结束时,吴冷西问邓小平:“《人民日报》写了一篇关于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社论,你看了没有,可否可以发表?”

邓小平说:“关于毛泽东思想如何提法,还要考虑,这篇社论不忙发表。现在全国各地关于这个问题有各种说法,地方上怎么说,由他们去说,《人民日报》不能随便跟着说,党内可以各说各的,公开宣传还是根据过去的口径。”

但是,面对全国一浪高过一浪的“学习毛主席著作”热潮,《人民日报》总是无所表示也不合适,报社内部的工作人员意见纷纷,他们建议吴冷西当面请示毛泽东。

在杭州会议时,毛泽东听了吴冷西的请示后说:

“最高最活,不要那样提。也不要讲顶峰。这种讲法不妥。但报纸已经讲开了,不能马上改,以后慢慢改。”

“不妥”,说明中央是一致的,心中有了底。但“不能马上改,以后慢慢改”,操作起来相当困难,编辑部只好凭经验和感觉行事。

从4月6日到22日,为了紧跟形势,《人民日报》也发表3篇论述突出政治的社论。但是,一论突出政治社论中,没有引用林彪提出的突出政治五项原则;二论突出政治的社论,又说:“政治要落实到业务”,与林彪提出的‘政治可以冲击一切’相左。这些情况,《解放军报》副总编辑唐平铸都向康生作了反映。这才有了《人民日报》送审三论突出政治社论时,康生要求《人民日报》以后的社论“要送《解放军报》总编辑唐平铸审阅修改”的指示。

4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毛泽东思想统帅一切》三论突出政治的社论,送给军报总编辑审时,唐平铸在社论中加了“顶峰”、“最高最活”两句,发表时编辑部有意删去了“最高最活”一句,以示林彪的话也并非定论。这引起了唐平铸等人的警觉,他们再次向康生作了汇报。

# 第50回：“保旗论”，大院内“炮”声隆隆 陈伯达，亲掌管《人民日报》

5月3日午夜，在政治局扩大会会议即将召开前，为配合会议的召开，《解放军报》给《人民日报》送来社论清样，标题是《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希望《人民日报》4日与之同天见报。报社主持工作的副总编辑不愿听命于军报，于是决意推迟一天，等军报发表后第二天5月5日才登，并以新闻方式处理，将原标题改为新闻标题，并以一版登不下为由，进行删节。这在大抓阶级斗争，处理彭真等人问题的大形势下，无疑是大错特错了。这种做法不仅引起了中央的警惕，也引起了许多读者的不满和质疑。

5月7日，康生主持会议，追查并严厉批评《人民日报》。康生说：“人民日报出此大错并非偶然，同报社领导人长期处于中间状态有关”。

康生要《人民日报》写检讨，并要公开登报挽回影响。检讨由当事人、副总编辑起草，经总编辑两次修改，但是，都通不过。最后还得张春桥主持帮助修改。

5月9日，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北京几个主要新闻单位负责人参加的会议上，陈伯达、康生、张春桥更加严厉地批评了《人民日报》，之后说，考虑到国际影响，可以不在报上公开检讨。

5月18日下午，也就是邓拓辞世的同一天，陈伯达找《人民日报》社副总编辑王揖谈话。他首先向王揖询问道：“外界已经对《人民日报》社有许多批评了，报社内部的反响如何？”

王揖将报社的情况向陈伯达做了汇报。

听了汇报后，陈伯达强调说：“外边对你们《人民日报》社已经有了一点压力了，但你们内部没有动，还是一潭死水。”

王揖说：“编辑部同志感到很沉重。”

陈伯达说：“有什么沉重呢？沉重，又不动？你们要内外夹攻，要

学陈胜、吴广,揭竿而起。”

陈伯达在短短的谈话中,至少两次提到,“要学陈胜、吴广,揭竿而起”。“揭竿而起”就是“造反”,造谁的反呢?王揖理解,这是指要造总编辑吴冷西的“反”。

陈伯达追问王揖:“你们副总编辑中有没有不同意见?你批评过吴冷西没有?”

陈伯达还说:“国际反修斗争,容易接受。国内、党内的反修,反到自己身边来了,往往下不得手。”

王揖和陈伯达早年在延安就认识,他知道陈伯达是一个非常胆小的人,如今听陈伯达如此一说,心中不觉大吃一惊。第二天上午,他找到副总编辑胡绩伟,激动地说:“我参加革命二十几年来没有当过叛徒,对党忠诚,现在也是一点私心杂念也没有,如果有一点就是背叛。”

胡绩伟一听也非常诧异,问他:“你怎么说这些话?”

王揖告诉胡绩伟,陈伯达找他谈过话了,但是他不能说谈话的具体内容。从自己的感觉来说,现在他认为报社应该革命,要“学陈胜、吴广,揭竿而起”。

胡绩伟大惊,问道:“起来革谁的命?”

王揖回答:“这个不能说,你要仔细体会。”

胡绩伟追问陈伯达究竟说了些什么,而且他不愿意相信王揖说的是真的。他认为,吴冷西一倒,《人民日报》社的副总编辑们肯定在劫难逃。

王揖坚持不肯说,两人不欢而散。

胡绩伟是1965年春天去北京郊区房山县五侯公社搞“四清”运动的,1966年5月5日,《人民日报》转载《解放军报》社论出事后,吴冷西吩咐秘书室打电话要胡绩伟立即回报社,并且派车把他接了回来。胡绩伟以比较“局外人”的身份,开始处理乱成一团的社务。

王揖找胡绩伟谈话的当天下午,《人民日报》社召开编委扩大会议,总编辑吴冷西传达了《516通知》的产生和修改过程。他说,“文化大革命”是当前的中心,要集中力量进行宣传。吴冷西告诉大家,要再开一次编委扩大会议,自己作检查。

王揖看出形势已相当险恶,吴冷西处在非常危险的境地,弄不好,

《人民日报》社的副总编辑们也会被牵连进去,而现在大部分编委成员还都支持着吴冷西,这就使形势更加险峻。

当天晚上,思前想后,王揖怎么也睡不着。20日凌晨2时许,他给胡绩伟打电话,表示经过深思,要向他转告陈伯达谈话的全部内容。

20日上午11时,王揖找到胡绩伟,说:陈伯达认为现在的《人民日报》社一潭死水,按兵不动,应该"学陈胜、吴广,揭竿而起",起来革命。

王揖告诉胡绩伟,谈话的时候王力也在。王力说,不仅要清算邓拓在《人民日报》社的"阴魂",更要清算吴冷西的"阳魂"。

下午,胡绩伟召集编委成员陈浚、安岗、潘非、肖航、王泽民开会,通报了上午王揖说的情况。听者非常紧张,纷纷议论说,吴冷西可能已经犯下严重错误,他的错误就是报社的错误。

消息一传出,更加速了《人民日报》社内部的分化。

第二天,《人民日报》社举行编委扩大会议,吴冷西作了检讨。他在一开始就对与会者说:"在这次批评吴晗的斗争中,我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首先,在《文汇报》发表姚文元同志的文章后,我并没有把它看作是一场严肃的阶级斗争的开始,甚至认为这是一般的学术讨论。"

吴冷西说,他在两个问题上存在思想抵触。一是认为姚文联系"单干风"、"翻案风"等来批判,说服力不够。另一个原因,是他认为连同《海瑞骂皇帝》等戏一起批判的话,会牵连到《人民日报》和胡乔木。

5月23日,陈伯达召集首都各新闻单位负责人开会,再次严厉批评吴冷西。一开始,陈伯达的语气还缓和,他对吴冷西说:"你啊,千虑一失,但是往往失的这一点很重要。"

"《人民日报》对《解放军报》、《光明日报》不服气是不好的,是政治问题。你不挂帅,别人挂帅,应该表示欢迎。"

陈伯达越说越严厉,他冲着吴冷西说:"看来你的思想堡垒不易攻破,总有个鬼在脑子里没有挖出来,有个根子没有挖出来。要发动群众才能解决问题,不能把问题包起来。要割脑袋,也就是换灵魂,把旧灵魂挖出来,换上新灵魂,不换脑袋,就连人也要换掉。"

吴冷西沉默了,知道再说什么都已经无济于事。倒是胡绩伟还敢于发表意见。他在随后主持召开的《人民日报》编委会议上讲了一段

话,为吴冷西打气:“当我们这只船在大风大浪中,我们千万要沉着,不然会翻船。特别希望我们的掌舵人冷西同志要沉着。既要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又要沉着。工作千万不能急,但是千万不能拖。工作还要适当安排。”

5月24日下午,《人民日报》社召开全体党员干部大会,吴冷西作了长篇检查,检讨自己从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起所犯的错误。他在检查中主要是想摆脱和彭真的关系,结果越说越说不明白。

吴冷西检查之后,常务副总编辑胡绩伟走到前台讲话,心情十分沉重的说:“现在,编辑部处于比较乱的情况下,由于编委会吴冷西同志说的,在这个时候他自己章法乱了,在这场斗争中犯了错误以后,并没有很深刻地认识自己的错误,勇敢地起来改正自己的错误,戴罪立功,把工作做好,反而在严重斗争面前自己失掉了章法,使得编委会在相当程度上失去领导力量,因此编辑部同志们很焦急,有力气无处使,结果越焦急越乱,越犯错误……

《人民日报》的错误,我们大家都有份,但最主要是冷西同志,因为中央委托他来领导人民日报社。现在,中央还没撤他的职,中央、伯达同志还这样鼓励他,勉励他,关键在他能够深刻认识错误,勇敢地改正错误,戴罪立功。”

胡绩伟接着说:“中央同志、钓鱼台同志一直感到冷西检讨不深刻。认识错误一不深刻,改正错误勇气就不足,今天听他的检讨也有这个感觉。这就要大家帮助冷西同志革命,真正革掉资产阶级思想。现在《人民日报》一切问题的关键就是大家起来革命,来帮助冷西同志革命,这是最主要的关键。要动员报社全体同志都来帮助冷西同志革命。”

说到这里,胡绩伟讲了一句在当时很有名、随后又大有争议的一句话:吴冷西在《人民日报》社仍然具有核心地位,“只要他这一杆旗帜站起来,编委会和编辑部其他问题就好办”。此话后来被人们说成“保旗派”。接着,报社党委紧锣密鼓地召开各种会议,组织队伍,统一思想,对报社内有不同意见的群众施加压力,甚至还幻想使用反右时期的“引蛇出洞”老办法,策划搞“民主运动”,提出抓“四条黑线”:彭真

黑线、邓拓黑线、中宣部黑线、资产阶级思想黑线,让人们出来贴大字报,提意见。估计民主运动一起来,有人就要说话,就要行动,那时“黑线就自然出来了”,然后再抓“黑线”,抓“右派”。

随着报社内的大字报越来越多,越来越尖锐,有的大字报除了批评吴冷西外,还批评编委会的其他成员,指出编委会中有人不揭发吴冷西,反而散布揭发吴冷西的人的流言蜚语,责问这里有没有阴谋,“如果确有策划这种阴谋的人还站在领导运动的岗位上,就请求中央撤换他们,不让他们在斗争中挡道”。

面对《人民日报》和北京大学的局面,5 月 29 日,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人开碰头会时商量,是否由陈伯达率工作组去《人民日报》社,由原中共河北省委主管文教的书记张承先率工作组去北京大学,领导那里的工作。周恩来当场用电话请示在杭州的毛泽东,获得同意。

会上,邓小平认为,学生运动出问题了,有一些人在攻击党,跟 1957 年的右派一样。刘少奇也觉得,一些学生的言论与右派没什么不一样。会上基本上没有不同意见,陈伯达没有讲话,只有周恩来说:“我们当年搞学生运动也是有一点偏激的嘛,要让学生讲话,不要给学生戴大帽子。当年我在天津反对的校长其实是个不错的人,但我们的大方向对,校长却不对。当然,陆平也是个好同志嘛!”

当晚,戚本禹把会议情况向上海的江青作了汇报。江青说:“还是总理好。”

为慎重起见,第二天,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又联名致信毛泽东,正式请示派工作组问题。信中说:

“两个月来,《人民日报》的威信大大下降,对党和国家造成不利影响。由于报社编委会不能改变目前的局面,许多人要求中央派工作组去。我们今天开会讨论,拟组织临时工作组,在陈伯达同志的直接领导下,掌握报纸每天的版面,同时指导新华社和广播电台的对外新闻。在京工作组人员拟于 5 月 31 日即进报社工作。吴冷西和其他副总编辑的职务暂时不动。报社内部进行整风,学习文件,也可以继续写大字报,一部分态度较好、愿意积极工作的编辑人员,要集中力量维持每日版面。在报纸版面改观后,再进一步解决内部问题。”

信末附有临时工作组在京人员名单,除陈伯达率队外,这些成员是:《光明日报》社总编辑穆欣、总政治部宣传部副部长钱抵千、《解放军报》社党委委员、记者处处长朱悦鹏、《解放军报》社通联处处长李久胜、《红旗》杂志社杨丁。另从上海抽调2人,名单尚未确定。

4小时后,毛泽东于当天深夜在这份报告上批示:“同意这样做。”

第二天,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刘志坚召集钱抵千、朱悦鹏、李久胜谈话,对他们:“中央决定组织一个工作组去《人民日报》,工作组由陈伯达负责。中央要军队抽3个同志作为工作组成员,所以挑选你们3个去,希望你们能愉快接受任务,坚决服从陈伯达的领导。明天上午10时,你们去钓鱼台向陈伯达报到。”

5月31日上午10时,钱抵千、朱悦鹏、《解放军报》军事工作宣传处副处长尚力科3位解放军总政治部选派的干部准时来到钓鱼台八楼康生住处,接待人员将他们领进一个宽敞的会议室。原定的《解放军报》社的李久胜因有其他任务,改为尚力科。

会议室里,陈伯达和康生以及王力、关锋已在那里。

谈话开始后,康生首先说:“你们已经被指定为由陈伯达担任组长的中央驻《人民日报》社工作组成员。”

接着,陈伯达用他那极难听懂的闽南话说:“下午3点半在中南海怀仁堂开会,由中央领导人宣布中央决定,今晚工作组进驻《人民日报》。”

然后,他慢条斯理地讲正在兴起的“文化大革命”,说这场革命要从意识形态领域里打垮资产阶级的进攻,把资产阶级夺去的舆论阵地夺回来。要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要发动广大群众参加这场文化大革命等。

快中午12点了,康生表示同意陈伯达所讲的内容,没再讲什么。

陈伯达又说:“明天6月1日,要发表一篇旗帜鲜明的社论。办报要抓旗帜,这旗帜就是社论。”

他让钱抵千、朱悦鹏、尚力科3人起草这篇社论。

钱抵千问陈伯达:“社论的内容是不是就按你刚才讲的内容来写?”

陈伯达点头表示同意,并对这篇社论的要点和具体写法进行了指

点,特意强调:“社论是报纸的旗帜,是灵魂,今天一定要赶写出来,明天见报,这样使人们能够看到,工作组进驻《人民日报》以后,报社的情况有所改变,令人耳目一新。”

5月31日下午15时30分,邓小平在怀仁堂召开北京各报刊、新华社和中央广播电台负责人会议,宣布:“经毛主席批准,中共中央决定,派陈伯达带领工作组进驻人民日报社。今天晚上开始,《人民日报》由工作组领导。”

宣布完中央决定,邓小平接着说:

“党中央和国家的机关报、通讯社、广播电台近两个月不像样子了,读者意见很多,报社内部意见很多。帝国主义、修正主义也在揣测出了什么事。《人民日报》在文化革命方面没领起头,实际上是《解放军报》,某种意义上,《光明日报》、《文汇报》、《解放日报》在领导《人民日报》。长期以来,《人民日报》上,文化革命兴无灭资不是一点儿没有,可是没有把旗帜打起来。”

“书记处对报纸也没多管。康老管国际宣传方面,成绩很大。”

康生:“我管得也很少,只是用《红旗》杂志和《人民日报》编辑部的名义发表了一些反修文章。”

邓小平接着说:“主席对《人民日报》还是寄以希望的。文化大革命很多问题出来后,《人民日报》并不是不知消息,本应领导起来搞,找全国能写的写,谁不给写?主要看采取什么态度。转载姚文元文章不及时,转载《解放军报》社论,又把重要的东西勾掉,现在,版面撑不起来,靠东凑西凑。”

“从你们大字报看,4月15日以前,比其它报早知道‘二月提纲’有错误,你们4月就可有争取主动的机会却没有争取主动。”

“这不是几个人的问题,是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变成这个现状,人民看不顺眼,国际上也有反映。《北京日报》出了问题,根子在那里?好回答,可以告诉读者在北京市委,写‘过去市委’就交待了。《人民日报》呢?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这样子,是不是中央出了问题?”

“这样拖下去不行了。常委决定:还是帮,由伯达同志为首的工作组到《人民日报》,改变现状,改变版面,使它真正成为中央机关报,应

指导和宣传文化大革命,国际国内的政治生活,社会主义建设各个方面,改变群众观感,在于改变版面、内容。”

“第一抓业务!大字报可以继续出,精神状态要改变!”

最后,邓小平宣布中央工作组成员名单:组长陈伯达,成员有钱抵千、朱悦鹏、尚力科、杨丁和王力、关锋6人。然后对陈伯达说:“老夫子,你讲讲。”

陈伯达不讲。于是,由康生滔滔不绝地讲了近一个小时。

会议结束时已是下午17时多了,陈伯达来不及在会议上再多说什么,即率领工作组登车前往王府井的《人民日报》社。

# 第51回：发社论，群情起举国欢腾 狂潮涌，惊涛声响遍神州

《人民日报》社早已得到通知，当一大溜小汽车驶进了《人民日报》社时，人们发现，下车的基本穿着军装，还带来了10多名解放军战士。报社人员纷纷猜测："他们是来干什么的？"

陈伯达带着这群穿军装的人直上到办公楼三楼会议室时，报社部门以上负责人早已集合在会议室等候了。

陈伯达开门见山地宣布："从现在起，由工作组领导《人民日报》，报社的领导不得插手，各部门的领导也要调整。明天开始，各部干部推选新的部门负责人，报工作组批准。"

会上，吴冷西要发言，刚说了几句，陈伯达便打断了他的话，不让他再说下去。

陈伯达要钱抵千、朱悦鹏、尚力科3人赶快回去吃饭，晚上22时以前把社论稿起草好，带到《人民日报》社让他过目。

要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拿出能让号称"党内第一枝笔"的"理论权威"陈伯达满意的，向全中国、全世界广播的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的重要社论，钱抵千3人均感到压力很大。如果现在各自回去吃晚饭，再集中一块写社论，显然来不及了。钱抵千当机立断，邀朱、尚二人就近去他家吃点便饭，在吃饭时边吃边研究，丢下饭碗后立即动笔。

钱抵千当时有"军内才子"之称，中苏大论战时，曾参加起草"九评"的写作班子，与陈伯达、康生接触较多，所以他对陈伯达、康生在文字上的爱好和性格特点颇为了解，他对另外两人说："陈伯达有个脾气，他说照他讲的写，你就得尽量做到一字不漏。陈伯达上午讲的，我们各人都做了记录。"当下，钱抵千提议由他按照他的记录口述，朱、尚二人各记一段进行整理，然后串起来统改。

3人奋笔疾书，字斟句酌，到了22时，总算将2000多字的社论草

就。但颇费周折,有时为一句话、一个字乃至一个标点绞尽脑汁,搜肠刮肚。

钱抵千拿出林彪5月18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稿,要把林彪讲话中关于政权的那一段加进去。

朱悦鹏问:“这不是陈伯达说的,他会同意吗?”

钱抵千知道底细,他说:“林总这个讲话,陈伯达、康生参加修改过,可以写上。”

于是,社论第四个自然段,关于政权问题的论述,几乎全是林彪的讲话。

当钱抵千他们回家赶写社论时,《人民日报》社的广播喇叭也响了:“全社人员立即到五楼会议室参加大会。任何人不得请假。”

当人们匆匆赶到五楼会议室,只见主席台上几乎全是穿军装的,陈伯达坐在中间。他操着一口闽南话宣布:“党中央决定派工作组进驻《人民日报》社,负责领导报社的全部工作。”

然后,又神秘地向会场扫了一眼,颇为幽默地说:“我在你们报社搞了一个小小的政变。”

当晚22时,钱抵千、朱悦鹏、尚力科3人拿着社论草稿来到《人民日报》社陈伯达的临时办公室,陈伯达、王力、关锋等人已坐在那里等候。

陈伯达看着社论的初稿的题目:《再接再厉,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觉得过于一般化,没有震撼力和号召力。他开始绞尽脑汁地思考,在纸上写了一个又一个的题目,经过反复推敲,最后大笔一挥,圈定了其中的一个:《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陈伯达将社论用大号字排出,然后修改。排字工人工作效率很高,不大一会儿,小样送上来了。因为是按陈伯达的谈话内容写的,所以改动不大。他只是加上许多诸如“牛鬼蛇神”、“暴风骤雨”、“反动学术权威”、“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等词进行铺垫。果然,这些新名词,后来随着社论的发表,一时间风靡全中国。

社论定稿后,陈伯达特别吩咐:“社论要排楷体字,题目要做通栏,位置要放在头版最上方。”

6月1日,《人民日报》在一版以通栏大标题和从未用过的大五号

字刊出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这篇社论把《516 通知》的精神和林彪《518 讲话》的精神,还有毛泽东近几年的讲话综合在一起,第一次提出破除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这就是后来概括的“破四旧”。社论指出:

“一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高潮,正在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社会主义中国兴起。

在短短的几个月内,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战斗号召下,亿万工农兵群众、广大革命干部和革命的知识分子,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横扫盘踞在思想文化阵地上的大量牛鬼蛇神。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打碎了多少年来剥削阶级强加在他们身上的精神枷锁,把所谓资产阶级的‘专家’、‘学者’、‘权威’、‘祖师爷’打得落花流水,使他们威风扫地。

……

无产阶级文化革命,是要彻底破除几千年来一切剥削阶级所造成的毒害人民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在广大人民群众中,创造和形成崭新的无产阶级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这是人类历史上空前未有的移风易俗的伟大事业。”

这段文字,形象、生动地反映了当时中国的社会形势。

《人民日报》还发表了另一篇社论:《用毛泽东思想哺育革命后代》,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培养革命后代,一定要让他们到实际斗争中去锻炼,养成敢想、敢说、敢闯、敢做、敢革命的大无畏的革命精神。”

社论一发表,举国欢腾,几乎整个国家都“疯”了。

6 月 1 日,毛泽东看了周恩来 5 月 31 日报送的《首都工作组第一次全体会议纪要》,批示:“总理:此件已阅,很好。”

这天中午,毛泽东从《红旗》杂志、《光明日报》总编室印发的《文化革命简报》第 13 期上看到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大字报。那么多的高级干部、政治局委员对毛泽东的思路理解得是那样的含糊,而普通的群众却理解得如此透彻,这让毛泽东再一次感到,他和人民的心是相通的,他的想法是代表了大多数人民利益的。他提起笔来,在简报上面批示道:

“康生、陈伯达同志:此文可由新华社全文广播,在全国各报刊发

表,十分必要。北京大学这个反动堡垒从此可以开始打破。请酌办。”

中午,他又打电话给康生、陈伯达说:这张大字报是二十世纪60年代北京公社宣言,比巴黎公社意义更大。他要求当天就在电台广播。

放下毛泽东的电话,康生立即叫来王力、关锋和曹轶欧,对他们:“经毛主席同意,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今晚广播,明天见报!”

他又嘱咐曹轶欧说:“你亲自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安排播发大字报的事情。”

然后对王力和关锋说:“按照主席的指示精神,你们还要写一篇评论员文章,配合这篇大字报的发表。”

与此同时,康生还给李雪锋写了一张条子。

李雪峰正在华北局会议上传达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决定,他看到康生写来的条子,内容是毛泽东在杭州对聂元梓大字报的批示,并说今天就要公布。因为事关重大,李雪峰在会上念了康生写的条子。

这天中午,陆平正在中共北京市委开会。散会时,吴德通知他:“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今晚广播,明天见报。”

陆平心头一震,“一个小小的系总支书记的大字报还要在中央广播电台上广播?”他意识到,问题来了。

陈伯达接到毛泽东的电话后,当即把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安排印刷,准备第二天见报。同时考虑如何为大字报配发一篇评论。他还要亲自到北京大学去看一看,王力和关锋对他说:“你留在报社吧,这里现在不能出问题。我们去北大。”

“那好。”陈伯达同意。

当天下午16时,毛泽东的批示从杭州空运到北京,很快就到了康生、陈伯达手中。

6月1日晚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各地联播节目全文广播了北京大学聂元梓等7人的大字报。

这时,聂元梓不在学校。她母亲做手术,住在协和医院,她们兄弟姐妹几个人轮流到医院去看护她。这天轮到聂元梓在医院陪床,到傍晚的时候,她哥哥去接替她。当聂元梓从协和医院出来,走在王府井大街上,忽然听到街头的大喇叭响了,在“嘟嘟”地报过晚上20时以

后,一个宏亮的男声响了起来: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各地人民广播电台联播节目时间。……下面广播北京大学聂元梓等7个同志写的一张大字报,《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

播音员慷慨激昂的声调,让聂元梓不由地驻足倾听。

“现在全国人民正以对党对毛主席无限热爱、对反党反社会主义黑帮无限愤怒的高昂革命精神掀起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为彻底打垮反动黑帮的进攻,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而斗争,可是北大按兵不动,冷冷清清,死气沉沉,广大师生的强烈革命要求被压制下来,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原因在哪里?这里有鬼。请看最近的事实吧……”

这大大地出乎聂元梓的意料,她万万没有想到,中央会做出如此惊人的决定,把他们写的大字报向全国广播,进而传到世界各国的新闻界和政界。

白天里总是熙熙攘攘的王府井大街上,这时人已经不多了,但一簇簇的人们,都和聂元梓一样,停下脚步,认真地听着电台广播。

聂元梓此时的心快要跳出来了,几天来围绕着这张大字报的是是非非带给她心头的压力,一扫而光。正是华灯齐放的时候,她的眼前一片光明!

她没有停歇,立即赶回学校。宋一秀他们正在到处找她。

此时的北京大学“炸”了,北京“炸”了,全中国也“炸”了。千百万封声援聂元梓的信件和电报像雪片般飞往北京大学,这张大字报像一个火球投入了干柴,引起铺天盖地的燎原大火,其势如风雷磅礴,难以遏制。

6月1日晚,厦门大学、福建师范学院、福州大学、福建医学院、福建农学院、福建中医学院等高等院校师生听到广播后,纷纷集会、座谈、写大字报,并给《福建日报》编辑部写信挂电话,表示支持“北大无产阶级革命派的革命行动”。翌日,厦门大学经济系、中文系、外文系的少数学生贴出大字报,揭发厦大党委在工作中的“错误”和“问题”,点了学校领导人陆维特、张玉麟、未力工的名。当天晚上,有的学生就把党委书记陆维特揪到系里去斗争。

福州一中部分学生在6月1日当晚即贴出大字报,随后全市40所

中学和中等专业学校相继贴出大字报。有的单位还连夜发电报到北京,福建二师院一天内就发出14封电报,表示拥护党中央、毛主席的“英明决定”,声援北大师生“革命行动”。

吉林大学学生在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的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后,连夜贴出大字报,锋芒指向学校党委。6月2日,吉林大学、吉林工学院、长春地质学院、吉林工大等院校,贴出大字报,指责校党委和中共长春市委对运动领导不力。

6月1日晚,郑州大学像一锅开水似的沸腾起来。当天晚上,中文系一年级王相海、席占修、刘作舟等14位同学率先贴出大字报,题目是《请问学校领导,对文化大革命究竟持什么态度?》。大字报中批判学校党委压制群众运动,单搞学术批判,把学校弄得死气沉沉、冷冷清清,不像样子。这下子,郑州大学文化大革命运动轰地起来了,同学们再也学习不进去,开始关心国家大事了。

接着,政治系7人也贴出了质问校党委的大字报。

王相海等同学的大字报,不仅在郑州大学首当其冲,而且也是河南省文化大革命中的第一张大字报,在他们的影响带动下,郑州大学校园内的大字报铺天盖地到处出现了。

当夜,校党委书记、代理校长王培育立即派校党委宣传部长祝一清前往省委向省委书记处书记、省文革小组杨蔚屏汇报情况。

杨蔚屏说:“省委是相信郑大党委的”,“你们不是陆平,怕什么?”“1957年右派搞我们,现在我们搞他们,让他们放出来再说。”

有了省委的表态,王培育连夜召开校党委扩大会议,提出三条措施:

1、要立即反击,追查写大字报人的“历史表现”、出发点;

2、不准进行串联活动;

3、不准到校外工农兵中去宣传。

接着,校党委召开全体共产党员和团支书记以上会议,王培育在大会上进行部署,他说:“郑大不是北大,现在像1957年那样,右派分子向党猖狂进攻,一定要注意阶级斗争的新动向,要和党委保持一致,特别是对思想落后的学生要严加防范。”

他特别强调:不准在下边进行串联活动,更不准到校外工农兵中

去宣传。

6月1日晚,西安交通大学的师生听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北大聂元梓的大字报后,群情激昂。他们由北大想到交大,周先聪老师连夜执笔写出了一份大字报,他们仿效聂元梓,也有龚华仁、刘安福等7人签名。大字报内容同样是直指校党委书记兼校长彭康。而学校广播台不知什么原因,这天晚上竟意外地打破惯例没有转播。这一现象,很快就引起了同学们的怀疑,认为校党委这是有意"不转播毛主席亲自批示的大字报"。这是什么行为?义愤填膺的学生立即贴出了质疑彭康的大字报。

而此时,西安交通大学校长彭康正在召开党委扩大会,讨论该校马列主义教研室主任凌雨轩的问题,因为凌雨轩曾发表《反对个人崇拜》文章,成为批判的典型。在这次校党委扩大会议上,将凌雨轩的问题定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性质。正在主持校党委扩大会的彭康全然不知,此时的校园里,已贴出了针对他的大字报。

最热烈的还是北京。6月1日晚,没有动员,没有安排,没有布置,更没有各级领导的组织,北京各大、中学校的学生自己纷纷行动起来,"造修正主义的反",校园里铺天盖地贴出矛头指向学校"领导干部"和"学术权威"的大字报。

此时,北京大学内的大字报可谓是漫天飞舞。无论是三角地,或是大饭厅,甚至连图书馆以及各系、室的墙壁、门厅,都张贴着各式各样的大字报和漫画,全校师生一致声讨"陆平黑帮"。成千上万的北大师生包围了校党委,要和陆平等人"算总账"。有些人更是一不做二不休,冲到陆平等人的家里,跳窗夺门抄了他的家。

有人提议:"既然北大党委烂掉了,我们要求中央给我们派工作组,领导我们搞好文化革命!"

这个建议一出口,立刻受到很多师生的响应,他们又成群结队地拥向北京市委,拥向中南海……

这天下午,正在听传达《5.16通知》的中共河北省委主管文教的书记张承先接到李雪峰通知,晚上到北京饭店参加紧急会议,向北京新市委第二书记吴德领受任务。

晚上19时许,张承先来到达北京饭店,看见中共北京新市委负责

人吴德、苏谦益、池必卿、黄志刚等已经在饭店的一间会议室内就座。张承先发现他们个个面目表情严肃,只有吴德简单地伸手示意其坐下之后,便宣布开会。他对张承先说:

“毛主席决定要向全国广播北京大学聂元梓等7人5月25日贴出的大字报,广播后北大党委可能陷入瘫痪状态,中央决定任命你为北大工作组组长,由你代行北大党委书记职务。要赶在广播前进驻北大,领导那里的文化大革命运动。”

会议讨论工作组进驻北大的工作方针和行动计划,决定采取“放手发动群众,坚决依靠左派,争取中间、控制右派”的措施,肃清陆平等人的影响,保证运动回到中央规定的正确轨道上来。

说是要张承先在电台20时广播聂元梓大字报前进驻北大,而实际会议一直开到22时多才结束。当张承先陪着吴德走出位于紫禁城东侧的北京饭店,来到10里长安街时,发现街道两旁的行人已经个个豪情满怀、意气风发、斗志昂扬。

# 第52回：昼夜间，北京大学人如海 干革命，中学生岂肯稍歇

6月1日晚23时，北京大学党委书记、校长陆平接到通知，来到校门口迎接中共华北局、中共北京新市委负责人吴德、苏谦益、池必卿、黄志刚等带着以张承先为组长的华北局派驻北京大学工作组32人来到北京大学。此时已焦头烂额的陆平也急切地希望能有人来替他收拾局面。

工作组进校后，立即召开中共北京大学委员会会议，由华北局负责人宣布：北京大学党委抗拒文化大革命，压制群众，打击左派，包庇右派，北京大学是一个顽固的资产阶级堡垒。同时，华北局负责人向陆平等提出警告：必须老老实实地交代自己的罪行，必须停止一切非法活动，同时向北大党委宣布约法三章：一、不许搞特务活动；二、不许搞两面派；三、不许搞阳奉阴违。

校党委全体会议结束后，已是6月2日凌晨0时30分，陆平等人在夜幕下陪同华北局工作组来到北大办公楼礼堂，北大党团干部、学生干部早已齐聚这里，等待召开大会。会上，宣布了华北局决定：派工作组进校，领导北京大学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工作组组长张承先发表讲话，表示支持革命，并重复一个半小时前提出的约法三章。此时的陆平还不知道他家里也已经乱成一锅粥了。

6月1日的晚上，中南海，刘少奇已被一连串的电话包围，他赶紧通知在京的政治局常委碰头，研究如何应对突如其来的形势。

邓小平照例先到。

很快，周恩来、陈云、朱德都来了。大家谈起外面轰轰烈烈的情形，都有些吃惊。朱德问："北大的大字报到底是怎么回事？"

周恩来说："可能大家都会感到意外的。刚才陈毅同志到了我那里，问为什么这么大的举动不事先给个通知？我说：我也是在临近广播前才接到康生的电话的，看来我们都不了解详细内情。"

陈云静静地听着大家议论,等他们都发表完意见后,他才说:“现在最要紧的是加强党对北大和各大专院校的领导,要防止连锁反应,好像北大出了问题了,其他学校也必然有问题,如果都乱了,那就坏了。”

刘少奇说:“李雪峰他们已经给北京大学派出工作组了,其他地方是否也需要派呢?”

常委们觉得这是个好办法。是啊,从土改到四清,共产党不都是通过派工作组来领导运动的吗?

周恩来突然想起什么,他说:“我建议,我们几位常委今天只是商议,不作决定,因为没有文革小组的同志参加。最好在明天或后天召开一次常委扩大会议,吸收文革小组的同志参加,专门研究一下这个问题。”

常委们纷纷点头表示同意。

晚上,王力、关锋从北大回到钓鱼台,向陈伯达报告说:“大字报广播后,北大沸腾了,到处是游行的人群,欢呼、口号声不绝于耳,革命形势一派大好。”

康生在家里接到坐镇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曹轶欧打来的汇报电话:“电台刚播完大字报,采编部的几台电话,便一直没停顿地收到各方群众来电。”

“都有什么反应?”康生迫不及待地问说。

“有支持的,也有质问、抗议之类的。大量的是支持的。”

“这是好事呗,让各类人物都上场表演一番,阵线才见分明。”康生想了想,又说,“你让电台的同志,立即将来电内容整理一下,两小时送来。”

康生放下电话后,他点燃一支烟,一边抽着,一边思索着。过了片刻,他又抓起电话筒,接通中央文革办公室,说:“请王力、关锋、林杰同志立即来一趟。”

王力、关锋、林杰3人匆匆忙忙地赶到了康生的寓所,康生与他们打过招呼后,开门见山地说道:

“评论员文章准备好了吗?明天在《人民日报》和大字报同时见报。”

“康老,报纸这时已截稿划版,而且这文章如何写法尚未有头绪,是否放缓一天?”王力请示说。

“莫说铅版尚未上机,就是报纸印出来了,也可统统销毁重印。现在是什么时候,还容得磨磨蹭蹭!搞文化大革命,也须有当年武装斗争那股劲,拖一天,战机要贻误的。”康生提高了声音道,他想了想又说:

“可能你们的力量弱了些,由伯达同志和你们一起搞,等会我给他去个电话。”

这当口儿,曹轶欧送来了《情况简报》,康生草草地翻阅一遍,就在上面批道:

“这就是北京市委、大学部宋硕、陆平、彭佩云、北大党委长期欺骗群众的结果。”

然后,他将材料交与王力说:“这份材料,可作你们写文章的参考。明天再打印200份,以中央文革小组的名义,发中央各部委。”

当天晚上,中央文革小组在钓鱼台开会,讨论北大聂元梓大字报的问题。

6月2日,北京大学出现了全校师生一致声讨“陆平黑帮”的浪潮。一些参加过围攻大字报作者和支持大字报那些人的学生更是觉得自己被欺骗了,他们表现出更大的愤怒,行动也更为激烈,矛头所向,首先是前几天带领或鼓动他们围攻大字报作者的老师。

6月2日,《人民日报》第一版以《北京大学七同志一张大字报揭穿一个大阴谋》为题,全文刊登了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同时发表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其火力之猛烈,上纲上线之高,振聋发聩:

“为陆平、彭佩云等人多年把持的北京大学,是‘三家村’黑帮的一个重要据点,是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顽固堡垒……”

“陆平以北京大学‘党委书记’的身份,以‘组织’的名义,对起来革命的学生和干部,进行威吓,说什么不听从他们这一小撮人的指挥就是违犯纪律,就是反党。这是‘三家村’黑帮反党分子们惯用的伎俩。请问陆平,你们所说的党是什么党?你们的组织是什么组织?你们的纪律是什么纪律?事实使我们不能不做出这样的回答,你们的

‘党’不是真共产党,而是假共产党,是修正主义的‘党’。你们的‘组织’就是反党集团。你们的纪律就是对无产阶级革命派实行残酷无情的打击……”

评论员文章号召人们打破条条框框,向任何反对毛泽东思想的人进攻,不论其职位有多高、资格有多老。其中:“危害革命的错误领导,不应当无条件接受,而应当坚决抵制,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广大革命师生及革命干部对于错误的领导,就广泛地进行过抵制。”是毛泽东亲笔加上的。

同日的《人民日报》还发表了陈伯达早已准备的系列社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宣传《516 通知》精神。

《人民日报》是党报,《人民日报》社论代表的是党中央的声音。这天,举国上下,各大、中、小院校纷纷开会支持北京大学聂元梓的大字报,北京的院校和一些单位更是潮水般涌向北京大学。先是附近学校的人来,然后是远一点学校里的人来,最后是外地许多大学里的人,不远千里,不远万里,风尘仆仆地赶了来。他们声援聂元梓的大字报,声讨陆平等人。北京大学完全成了人的海洋,大字报的海洋。

聂元梓在北大讲演

6月2日下午,康生与陈伯达到北京大学看大字报。到处是游行的队伍和演讲的人群,许多大字报对当天的《人民日报》表示“热烈欢呼”。面对一片轰轰烈烈的革命景象,陈伯达高兴地笑了。在北大30楼与32楼之间的空场上,康生应邀向师生们演讲,他说:“聂元梓同志的大字报广播了,这是一个巨大的胜利,不仅使聂元梓同志解放了,我也解放了,更重要的是这张大字报完成了一项重要使命。”

这天,全国的形势更加高涨。

6月1日晚上,清华大学的同学纷纷走向与之毗邻的北京大学,支持聂元梓他们的革命行动。蒋南翔当天表态:“清华与北大不同,北大是反动思想的集中堡垒,清华是工科大学,教育改革成果巨大。”

6月2日凌晨1时,清华大学出现了该校第一张大字报。晨3时,清华大学研究生侯启孝以笔名景松贴出题为“关于反右斗争时人民日报摘抄”的大字报,告诫人们当心反右斗争重演。但并没有阻止大字报高潮的到来,很快,热002班的同学率先贴出了《蒋南翔究竟站在什么立场上?》的大字报,这是清华大学最早将矛头直接指向校党委书记兼校长蒋南翔的大字报。但是,当天晚饭后,清华大学保党委的立即大字报铺天盖地而来。同时,清华大学还重放蒋南翔5月11日庆祝五四大会上的讲话录音。

6月2日,北京航空学院也沸腾起来。上午,基础部物理教研室的教师写出炮轰院党委的第一张大字报。随后大字报如雪片般贴满了校园,内容主要是批评院党委不放手组织大家参加文化革命,只是跟着报纸批判“三家村”,而不触及院内存在的实际问题。

当天,贺龙的侄子、北航学生贺兴洲回家向贺龙汇报了北航的情况,贺龙立即向周恩来作了反映。

3日,北航批评院党委的大字报继续增多。下午,开始有人对给院党委提意见的人组织围攻,愈演愈烈。

4日,地质矿产部部长孙大光的女儿、六系2621班学生孙茜玲贴出一张大字报:《“放”还是“收”》,就一张纸,几句话,贴在八楼旁的警卫连后墙。

4日上午,在北航院党委常委会上,院党委副书记程九柯传达国防

科委指示,主攻方向仍是“三家村”黑帮,并要求在斗争中分左、中、右。国防科委八局副局长赵如璋参加了会议,并发表意见说:“学院的领导是不是黑帮也不要加以限制,要放手让他们讲,也不要怕讲,有人反驳,也不要限制。”“什么时候搞学校的牛鬼蛇神看时机,将来再研究。”“要指定专人去看大字报,指定可靠人摘抄起来,将来斗争是有用的。是不是黑帮将来会做出结论,叫大家放。才能放出右派。”他认为:现在放得不够,“没有七、八十度,牛鬼蛇神不会出来,尤其是是教师有反右斗争的经验,现在温度还不够。”

有些高干子女拿着照相机,拍摄他们认为是“恶毒攻击院党委”的大字报。

6月5日,贺兴洲传达贺龙讲话,让各大专院校党委引火烧身。

当时,北航的干部子弟正在讨论贺龙的侄子贺新洲能不能入党的问题,由于院党委没有审批贺新洲的入党申请,他们不满意院党委的立场,给国防科工委写信反映情况。6月5日晚,原北京军区政委、时任人大常委会委员朱良才上将的儿子刘克府,又叫朱新华,联络了国家计委副主任苏静的儿子苏晓前、总政副主任徐立清的儿子徐甘泉、建材部长赖际发的儿子赖锐锐、西南局第一书记李井泉的儿子李明清、军事科学院副秘书长王智涛的儿子王亚慧、地质部长孙大光的女儿孙茜玲及贺新洲和李新南等12位高干子女,聚集在赖锐锐家写大字报,并于6月6日贴出,标题是:《院党委应当积极领导革命》,点了党委书记王恒、副书记周天行的名字,矛头指向院党委,轰动了北航。这张大字报,从标题到口气,几乎就是后面61回提到的6月5日清华大学高干子女那张大字报的翻版。

6月2日,东北工学院、辽宁大学等院校有人贴出反校党委的大字报。

6月2日,西安交通大学师生贴出针对校党委的大字报已有万余张。上午8时,上课铃响了,可是西安交大没有一个学生去上课。校园里到处是大字报,人流攒动,学生群情激奋、摩拳擦掌、跃跃欲试,他们已经不再把学校领导、老师和学校的规章制度放在眼里,一切都要重新审视、批判。而大部分教职工则怀着惊恐的心情,回想1957年的反右,不敢轻举妄动,不知下一步该何去何从?

6月2日,上海科技大学出现了上海市第一张针对校党委的大字报后,同济、交大、复旦、等高等学校也纷纷贴出揭发党委和党委书记的问题的大字报。这些贴大字报的师生和拥护校党委的师生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后来又出现个别武斗现象。有人惊呼:“上海也出现了陆平们围攻左派的事件!”

6月2日,山东大学部分学生贴出大字报,提出校党委书记成方吾是山东大学一切牛鬼蛇神的总靠山。

6月2日起,杭州大学一批师生指责浙江省委大搞“纯学术批判”,转移运动的大方向。3日,浙江大学9位老师贴出了《横扫阻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切清规戒律》,揭露批判浙大党委所谓制定清规戒律,压制革命群众革命热情,对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领导不力等问题。

剧烈的动荡不仅在大学,中学更不安宁。自从毛泽东开始重视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以后,就不断有一些文艺作品,在报刊上被宣布为“大毒草”遭到批判。学校经常组织批判会,布置学生撰写批判文章,并在批判会上发言。在批判“大毒草”的政治活动中,学生们学会了如何运用毛泽东思想的“显微镜和望远镜”去逐字逐句地查找别人作品或言论中的“问题”,也使学生们切身体会到了什么叫“阶级斗争的复杂性”,养成了“用阶级斗争理论”去看待人和事。

6月2日,北大附中也炸窝了,课没法上了,学生们纷纷拥到校党支部,那里正开会。但学生们依然围住校党支部书记刘美德,愤怒质问她与陆平究竟是什么关系?为什么诬蔑马列主义大字报是右派向党进攻?

平时威严无比的堂堂学校党支部书记突然变得那么唯唯诺诺,面如土色。等到大家走出党支部办公室时,才发现外面的大字报已经铺天盖地了。

6月2日,北京师范大学女子附属中学3个学生党员刘进、宋彬彬、马德秀贴出全校第一张大字报,模仿聂元梓,批判该校领导,宣称要“誓死保卫党中央,誓死保卫毛主席”。这张大字报是由刘进起草,宋彬彬、马德秀共同署名。

刘进的父亲就是时任高等教育部副部长的刘仰峤,此时他正作为

中央理论调查组的负责人与曹轶欧一起参加北大的调查。在红色教育中成长起来的刘进对自己要求严格,积极进步。她每天早起要做一套哑铃操,在高教部家属大院跑三圈,冲冷水澡。6 点多到校,再带领同学长跑、做 60 个仰卧起坐、俯卧撑。每年 11 月入冬前从不穿袜子,下乡劳动同学们挑 50 斤,她却挑 100 斤……

曾为没有赶上战争年代,不能像父辈那样投身革命、献身革命而遗憾,后来又为学校不像北京四中、六中、八中那些北京的著名男校一样开展“四清”运动而心有不足的刘进,这次觉得终于有机会可以直接投身于自小就渴望的、轰轰烈烈的、神圣崇高的革命运动中了。

1966 年 5 月,北京市委大学工作部副部长宋硕作了一个报告,凭着平日刻苦学习报纸社论积累起来的政治敏感,刘进等几个学生党员已经可以感觉到宋硕的这个报告是压制革命的,和报刊上的社论讲的精神不一样。当她在党的生活会上谈出自己的看法,党支部的老师善意的提醒她说:“我们应该按照党的安排去做,要服从党的组织纪律,所以尽管有意见,我们还是在党内提出和讨论。”

1966 年 6 月 2 日早上 6 时,刘进在锻炼时听到早间的新闻正在广播聂元梓的大字报,就觉得一股热血上涌:“党中央发出号召,支持我们了,说明我们的意见是对的。看来在党支部内提出的问题和意见,也可以用大字报来公开表达。”

她内心那个激动呀,连广播都没听完,就跑去找住在同院的马德秀,也是她们学校高三(6)班的学生党员,对她说:“现在党号召了,咱们的意见可以说出来了,你愿意写大字报吗?”

马德秀也很激动,没有片刻犹豫就答道:“愿意!”

她俩一刻也没有耽搁,立即跑回学校。刘进又找到她的同班同学宋彬彬,她是住校生,1966 年 4 月入的党。刘进将她的想法对宋彬彬一说,她也非常支持。

这时,时间还早,很多学生都没有到校,她们就开始写大字报了。因为这些意见都烂熟于心,用不着打草稿,你一言我一语,刘进用毛笔直接写在报纸上,署名刘进、宋彬彬、马德秀,然后贴了出去。大字报的题目是:《校领导把我们引向何处?》内容以问话为主,头一句话就是“外界革命形势轰轰烈烈,而学校却是死水一潭,学校一心想引导的是

让我们进行高考复习……”大字报针对学校不让她们参加革命提出意见,对宋硕的报告提出意见,指出学校在教育路线上存在问题,等等。

她们原本来以为把意见提出来,然后和学校领导、老师共同想办法解决这些问题,按照毛泽东主席说的,将革命,包括教育领域的革命轰轰烈烈的搞起来就行了。没想到大字报贴出后,学校秩序大乱,同学都无心上课了,这和想象中的革命完全不一样。

刘进她们慌了,不知道该怎么办?校方也慌了,党支部担心影响扩大,主持工作的副校长胡志涛立即召开了全校党员大会,号召党团员站出来保卫党的领导。教师团支部还组织部分团员把给校领导贴的大字报撕去了。

会后,刘进3人被隔离到阶梯教室,党支部派老师们轮番上阵,苦口婆心,帮助3人认识问题的严重性,希望她们认清形势检讨错误。告诫她们如何危险,将要滑到右派学生的泥潭。

刘进她们很不理解:“广播里都肯定了大字报,说明这就是党的号召,为什么我们给学校贴大字报就成反党行为了?”

那天在阶梯教室内外始终围着很多老师和学生,可以说是群情激愤,既有指责也有同情。

# 第53回：燃激情，红卫兵亮相舞台 工作组，陈伯达提出异议

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发表，不仅让学校的学生激动，也让许多群众亢奋。正在《红旗》杂志社帮助工作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几个年轻人再也坐不住了，生怕错过这次革命的机会，他们向戚本禹要求回所参加运动，戚本禹同意。

其实，早在5月23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的《哲学研究》杂志总编吴传启和林聿时就已率先贴出批判学部副主任兼政治部主任杨述《青春漫语》的大字报，在学部引起轰动。

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简称学部。它和中科院的其他学部不同，哲学社会科学部名义上属于中国科学院，实际从1958年以后就由中宣部直接领导。学部的主任是由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兼任，同时还兼任历史所所长。他和人称“学部四大金刚”的经济所所长孙冶方、文学所所长何其芳、近代史所所长刘大年及历史所实际主持工作的副所长尹达，都能够参加宣传部定期举行的部长办公会议。

学部主任虽然是郭沫若兼任，但他实际上并不主持工作。主持工作的是学部党委书记、副主任刘导生。另外还有三位副主任潘梓年、张友渔、姜君辰。那时学部经常召开全体工作人员的大会，作报告的总是刘导生。1964年10月，又调来时任东北局宣传部长的关山复和时任华北局宣传部长的杨述任副主任，关山复代刘导生任学部党委书记，主持工作。

吴传启和林聿时都是学部哲学所的司局级干部，也都是解放前参加革命的老干部，与《红旗》杂志的哲学史组组长关锋是熟稔的老朋友。关锋、林聿时和吴传启3人曾用“撒人兴”，即“三人行”的笔名在《新建设》和《哲学研究》等刊物上发表了不少有关哲学史的文章，其中批判冯友兰的文章“量多而质高”。冯友兰在讲课时承认，尽管他不完全同意关锋的观点，但认为在所有批判他的文章中，关锋的水平是

最高的。

杨述曾任北京市委宣传部长,他是1961年1月离开北京市委的,与邓拓、吴晗、廖沫沙曾是同事关系,与北京市委又有密切的关系。《青春漫语》也是在《北京晚报》上开辟的专栏,由一系列散文组成。在报纸上开展批判“三家村”和《燕山夜话》的时候,学部就已安排批判杨述的《青春漫语》,并向各所印发了相关材料,要求各所召开批判会。

吴传启和林聿时的大字报指责杨述是“三家村”的一员“干将”,与吴晗、邓拓是穿一条裤子的,继而又牵涉到学部党委,说党委书记关山复与杨述是“一伙”的等等。

岂止是在学部,5月25日,国务院教育部政治教育司司长卢正义也贴出了一张大字报,揭发批判副部长刘季平。这张大字报与聂元梓的大字报是同一天贴出的。

卢正义原名卢树生,曾在如皋师范读书。1931年“918”事变后,他作为地下党员、学生领袖,率领如皋师范学生抵制日货。1935年被抓进“苏州反省院”坐牢,出狱后去延安,1945年任大连市教育局局长,1955年调教育部任小学教育司司长,后来任教育部政治教育司司长。他这张大字报和学部吴传启二人的大字报一样,并没有引起毛泽东太多的注意。不过由此可见,文化大革命中,首先贴出大字报的,并不是学生,而是一些政治嗅觉敏感的老党员和老干部。

对吴传启、林聿时的大字报,5月26日,康生在学部党委的一份报告上写下了四点指示:“一、贴大字报难道还要批准么?二、林聿时为什么不能贴大字报?三、学部的问题很多。四、哲学所的问题更多。”

5月27日,文学研究所的第一张大字报也出来了,签名有五、六个人,是1964年入所的陈骏涛为首发起并起草的。

5月30日早晨,中宣部的干部们惊诧地发现,在他们平时上、下班经过的办公大楼门厅处,醒目的贴着一张有14个人签名的大字报,标题是:《党委在文化大革命中为什么不起来?》。这是第一张在中宣部贴出来的大字报,签名的基本是中宣部的工人。紧接着,在同一栋大楼里办公的《红旗》杂志社的工作人员,也贴出了质问中宣部领导的大字报。6月2日,在中宣部机关办公室工作的阮铭贴出了《张子意是阎

王殿的一个活阎王》的大字报。

张子意,时任中宣部副部长。

运动开始升温,大字报先是在中宣部办公大楼内的楼道里张贴。随着大字报越来越多,又在机关大院里拉绳挂大字报。后来,办公大楼的外墙、图书馆楼的外墙统统都贴满了大字报。再后来,通往食堂的道路两旁、花园里的林荫道上,都被砸上木桩、钉上木条、铺上芦席,大字报可着劲的往上糊。

当那几个在《红旗》杂志社帮助工作的历史研究所的年轻人于6月2日晚上回到历史所时,这里的运动已经热火朝天。年轻人都很兴奋,当晚就贴出大字报,批判主持历史所工作的尹达,说他执行了"右倾机会主义路线"。谁知第二天风云突变,一大早办公楼里就贴满了反击的大字报,说这几个年轻人是"右派翻天"。要知道,尹达可是毛泽东在杭州会议上肯定的左派!这几个年轻人真不知天高地厚。此后几天,他们几个就遭到了大会、小会的批判。批判他们的理由是:尹达是历史学界的"左派",历史所一直贯彻的是从陈伯达、康生那里来的红线。尹达又是中央文革的成员,反对他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

6月2日下午,一张署名"红卫兵"的大字报十分醒目地出现在清华大学附中五楼大教室,这是学校腾出来专门作为全校师生贴大字报的场所。大字报的题目是《誓死保卫无产阶级专政,誓死保卫毛泽东思想》。大字报全文如下:

党中央、毛主席向全国人民吹响了冲锋号,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我们,无产阶级革命的后代,无限热爱、无限信仰、无限崇拜毛泽东思想。对一切反毛泽东思想的言行,怀着刻骨的仇恨。在大革命中,我们一定要树立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一脚踢开一切反毛泽东思想的所谓"权威",凡是毛主席指示的,我们就坚决照办,坚决执行,就是上刀山、下火海也在所不辞!凡是违背毛泽东思想的,不管他是什么人,不管他打着什么旗号,不管他有多么高的地位,统统都要砸得稀烂!

文化大革命,是两个阶级,两种世界观的决战。我们一定要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大搞世界观、人生观的改造,不准资产阶级在任何领域

中负隅顽抗！

资产阶级的老爷们，我们既然挑起了这一场斗争，那么好吧！我们来者不拒，坚持奉陪到底，不拔掉黑旗，不打垮黑帮，不砸烂黑店，不取缔黑市，决不收兵！

同志们，革命战友们：

誓死跟着党中央，誓死跟着毛主席，誓死保卫无产阶级专政！，

毛主席万岁！

红卫兵

1966 年 6 月 2 日

这张大字报的下部留有一大块空白，是给同意大字报观点的人签名用的。当天这张大字报上签名的有 100 多人。此时的他们，谁都不曾想到，“红卫兵”这三个字，以后会对中国，乃至世界产生那么大的影响，她的出现，恍若天空中的一颗新星，迅速吸引了越来越多惊奇的目光。

红卫兵的出现是在 5 月 28 日晚上，清华大学附中预 651 班的几个同学在宿舍楼酝酿他们墙报统一署名用什么名称时，学生张承志说：“我在一张小字报上用过一个笔名，是《红卫兵》。”

他的话引起了周围同学的强烈共鸣：

“红卫兵！……”

“太好了！《红卫兵》，这个名字太好了！”

“十月革命时，攻打冬宫的武装工人就叫赤卫队，列宁曾称他们是革命的堡垒、胜利的卫士。今天，我们投身参加的文化大革命，是又一次开创无产阶级新纪元的大革命，我们的名字也会像十月革命的英雄一样铭刻在历史的史册上。”

“对！就叫‘红卫兵’，我们是保卫红色政权的红卫兵，党中央毛主席是我们的靠山，解放全人类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我们今后就用‘红卫兵’署名，”学生卜大华最后总结。

第二天，5 月 29 日傍晚，卜大华、骆小海、邝桃生、王铭、陶正、张晓宾、张承志等十来个学生分别避开学校的监视，秘密来到学校旁边的圆明园遗址，继续商议如何在学校开展文化大革命的问题。

卜大华说：“目前的形势非常严峻，校领导执行的就是一条修正主

义的教育路线,我们和他们的斗争是一场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

骆小海紧接着说:“对!为了迎接阶级斗争暴风雨的来临,我们应该组织起来。”

“我看咱们今后应该告诉全校所有与咱们观点相同的人再写大字报小字报就用同一个签名,同一个笔名。”卜大华提议说。

“对对对,让学校也弄不清我们是谁,有多少人,而且这么一搞就会铺天盖地打他们个措手不及!”骆小海赞同道。

“现在学校的那些小字报上的笔名可多了,什么‘向阳’、‘华峰’、‘卫东’、‘海峰’、‘红心向党’,也不知用哪个好?”

“还是用‘红卫兵’!毛主席党中央的红色卫兵……”

“同意!”

他们于5月30日,在教学楼实验室召开红卫兵小组成立会,一起庄严地宣读了自己起草的《红卫兵誓词》:

“我们是保卫红色政权的卫兵,党中央、毛主席是我们的靠山,解放全人类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毛泽东思想是我们一切行动的最高指示。我们宣誓:为保卫党中央,为保卫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我们坚决洒尽最后一滴血。”

有人在会上朗诵了当时在干部子弟中流传的毛泽东的一段充满激情的话:

“今后的几十年对祖国的前途和人类的命运是多么宝贵而重要的时间啊!现在20多岁的青年,再过2、30年正是4、50岁的人。我们这一代青年人,将亲手把我们一穷二白的祖国建设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将亲自参加埋葬帝国主义的战斗。任重而道远。有志气有抱负的中国青年,一定要为完成我们伟大的历史使命而奋斗终身!”

不少人当场热泪盈眶,乃至泣涕不已。

在此之前,5月29日,北大附中以彭小蒙为代表的中学生,已经成立了“红旗战斗小组”。

随后几天,海淀区、西城区各个中学的学生听说清华附中的学生自己组织了“红卫兵”,都纷纷赶到了这里,写出大字报予以声援支持。几乎每张大字报的下首,都歪七扭八、龙飞凤舞地签着“红卫兵”的大名。比如“四中红卫兵”、“三十五中红卫兵”、“人大附中红卫兵”、“北

航附中红卫兵”。

面对如此局面,清华附中学校召开紧急会议,组织学生写大字报进行反击。高632班的干部子弟、团支部书记王家强和高633班的一些人纷纷贴出了保卫校党委的大字报,两边大字报都形成了自发的签名。但是,拥护校领导的是多数,几十个同学组成的“红卫兵”处于孤立状态。清华附中气氛大乱。

聂元梓的大字报也让北京师范大学沸腾了。6月3日早晨,北京师范大学北饭厅廊厅南墙上,贴出《砸烂大大小小的“三家村”——向程今吾黑帮猛烈开火》的大字报,是由已在1965年底抽调到《红旗》杂志社帮助工作的政教系五年级调干生谭厚兰领衔署名。

程今吾,时任北京师范大学党委第二书记、副校长,早年即从事教育事业。

紧接着,保卫校党委的大字报铺天盖地,反对谭厚兰的大字报一时占了绝对优势,许多人还要找谭厚兰辩论。

大字报规模不断扩大,辩论的人群不断增加。

6月3日这天,刘少奇更不敢稍懈,他于上午11时,再次在他家福禄居的会议室主持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听取李雪峰关于北京地区文化大革命情况的汇报,研究如何应对目前的局势。参加会议的除在京的政治局常委外,还有负责外交口的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负责工交口的国务院副总理薄一波、负责财贸口的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负责农业口的陶鲁茄、负责军队口的叶剑英、负责宣传口的陶铸和康生、文革小组陈伯达、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北京市委的李雪峰和郭影秋及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胡克实。

5月23日,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调陶铸任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兼中央宣传部部长,接替彭真和陆定一的工作。

陶铸没有参加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对中央调陶铸任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兼中央宣传部部长,他的夫人曾志和老部下赵紫阳都不以为然,认为他的性格不适宜担任这项工作。但是,在这风云变幻的动荡时期,能得到毛泽东的信任,毕竟是令人感奋的。6月1日,陶铸离开广州坐火车北上,刚到北京,就被急急忙忙地接到这里参加会议。

李雪峰在会上汇报了北京文化大革命的情况,他代表北京新市委

提出请求:“我们打算向北京大、中学校派工作组,领导学校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但是干部不够,能不能从中央各部委和共青团中央抽调干部,作为北京新市委工作组的成员派往各学校。”

“是啊,现在学校闹哄哄的,出现了乱斗乱批乱揪的局面,一定得控制住!”邓小平插话表示同意。

刘少奇也认同说:“我看可以。”“哪里出事,哪里就派人去”,“各校党组织不但要参加运动,而且要负起领导责任。”

他又对坐在前面的团中央书记胡克实说:“共青团应该发挥作用,中学主要靠团员队伍,克实,还要掌握好形势呀。”

这时,刘少奇收到底下送上来的一个纸条,打开一看,是陈伯达写的,上面这样写道:“目前正是放手发动群众的时候,我建议先不要搞工作组。”

刘少奇皱了下眉头,坐在他旁边的周恩来看了看陈伯达的字条,小声对刘少奇说:“是不是让伯达同志谈谈他的意见?”

“时间很紧,以后再让他讲吧。”他把条子递给了邓小平。

邓小平一看,当众就念了陈伯达的条子,并且不客气地反问道:“伯达同志,你说不要搞工作组,可是你自己现在就是进驻《人民日报》的工作组组长呀?”

面对邓小平的反问,陈伯达一时语塞,他结结巴巴地说:“不是的,不是的,这不是一回事!学校不是机关,学校里的许多情况很复杂的,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

邓小平说:“我看是你自己的头脑太复杂了。我就不信工作组进学校比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城市还困难!你呀,读书太多反而读蠢了,快变成书呆子了。”

其他人也纷纷表示同意派工作组,陈伯达陷入了孤立。他见势孤力单,不说话了。

接着,李雪峰提出:“现在搞运动总得有个办法……”他提出了对运动的八条要求:

一、大字报要贴在校内;

二、开会不要妨碍工作和教学;

三、游行不要上街;

四、内外区别对待,大字报不准外国人参观,外国留学生不能参加运动;

五、不准到被揪斗的人家里闹;

六、注意保密;

七、不准打人、诬蔑人;

八、积极领导,坚持岗位。

这就是后来说的“八条指示”或“八条规定”。

邓小平又首先表示:“这样很好,同意。”

陈毅听了也很高兴,他对李雪峰说:“你再说一遍,我记一下。”说着,拿出小本子边听边记。

与会者很快同意了这八条规定。

# 第54回："不能乱"，刘少奇忧心忡忡飞杭州，示方略未得要领

轮到周恩来讲话了，他首先分析和汇报了当前的国际形势，接着说："对政治局所作的各项决定，我完全同意，完全拥护。不过，在正式行文之前，我主张我们应该请示毛主席，尊重毛主席的意见。这次文化大革命，首先要加强政治思想工作，用毛主席思想去提高群众的思想。"

"我已经给主席打过几次电话。"刘少奇说。

周恩来笑了："我们应该亲自去杭州向主席请示，最好请他回北京来领导这场运动。我觉得，这场运动不寻常哪！"

刘少奇表示同意，他说："行，小平同志，明天我们就去杭州吧。陶铸、伯达同志也一起去。总理在北京主持一下工作。"

会议同意李雪峰代表北京市委向北京大、中学校派出工作组，领导那里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会议要求中央各部委和共青团中央抽调干部，作为北京新市委工作组的成员派往各学校。

散会后，刘少奇再次嘱咐李雪峰说："一定要掌握好北京的文化大革命运动……"

李雪峰对刘少奇表示："我绝对不会辜负党中央对我的信任，一定要竭尽全力把北京市的文化大革命搞好。"

刘少奇说："彭真这个家伙在历史上和现实工作中都是反对我的。他总是在一些重要的问题上，对我封锁，不讲真话。这一次把他揪出来也是我们党多年来争取党内生活正常化的努力。你要抓住对他的黑帮势力的清理和斗争。"

李雪峰回答说："彭真过去是从来看不起我的，多年来我们对北京市的工作无法过问。名义上北京市属于华北局领导，实际上是北京在指挥我们。"

"是啊，要不怎么说他是独立王国呢。"接着，刘少奇又问李雪峰：

“你对聂元梓的大字报怎么看?”

李雪峰随口说道:“毛主席不是已经说了吗? 我还有什么可讲的? 不过,我的水平比主席要差太远了,要是我处理这件事情,绝对不敢公开的。这么一来,北京的学生基本上无法控制,我担心这样下去会波及到工厂和农村。全国会不会乱了?”

刘少奇马上激动地说:“绝对不能乱,乱了毛主席会怪罪我的。现在北京这个家难当呀。我已经向毛主席说过,请他回来主持工作。他说:你们不是嫌我碍事吗? 你们放手干吧,天不会塌下来的。”

李雪峰附和着说:“是呀,最好让主席回来主持。”

见到走到门口的胡克实,刘少奇一边和他握手一边说:“克实,千万要把局面维持好。”

这天,《北京日报》登载了改组北京市委的决定和北京新市委关于撤销陆平、彭佩云一切职务,改组北京大学党委,派出张承先同志为首的工作组到该校领导文化大革命,并代行党委职权的决定。

李雪峰从刘少奇那里开完会,回到北京市委,立即召开市委工作会议,传达了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精神和八条规定。他针对一些工厂要停工闹革命的情况说:

“工厂写大字报、写信,有的工厂停了工进行声讨。发电厂几百个人也在酝酿停工,搞大革命进行声讨,拥护党中央、毛主席。发电厂一停工我们就开不成会了,我们自己乱了,对社会主义建设不利,我们不能乱,我们要革敌人的命。因此,我们要作解释,组织工作组,派人到有些工厂,宣传解释,帮助工作。……”

他对市委机关干部说:“和黑帮有关系的,要起义立功。如果不揭露,就不能划清界限。那伙黑帮,要他检查,他是不干的,宋硕就是这样。聂元梓揭露,确实有这个问题,他不但不改,还继续活动。有人现在还活动。我在北大讲一次,话虽不多,有人造谣,这就是阶级斗争。说我讲的和宋硕一样,给我贴了许多大字报。反面的东西贴它一年,对大家是个教育。”

这天,北京市委有人贴出批判李雪峰5月25日北大讲话的大字报,但很快被打成了“右派”。李雪峰提出“反对新市委就是反对党中央”。至6月5日,市委机关继续围攻给李雪峰贴大字报的人,收回他

们的大字报底稿。200 余人重点挨整,被迫检查。

下午,师大女附中的学生、邓小平的女儿邓蓉回家后,将学校刘进、宋彬彬、马德秀写大字报后的情况向她父亲邓小平讲了。

还在 6 月 2 日,邓小平就召见团中央负责人胡克实,指示“团中央协助新市委代管北京市中学文化大革命”。

6 月 3 日上午,团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胡克实列席了刘少奇在福禄居召集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会议。会后,他回到团中央立即召开了书记处紧急会议,传达政治局会议精神,决定组成北京中学文化革命工作团,各区成立工作队,当天就开始向中学派出工作组。

下午一上班,胡克实的秘书侯春山通知团中央的干部张世栋、马娴华、叶礼艳去胡克实办公室。3 人被告知,他们将组成北京中学第一个工作组,由张世栋任组长,今晚就进驻北京师大女附中。“胡启立同志也去,但不作介绍,他去看一看。”

6 月 3 日下午,师大女附中学校党支部召开全体会议,同学们都很关切,有不少人堵在会议室门外倾听。会议室里传出老师和学生激烈的辩论声。

当天,北京市委改组的消息传来,师生们突然就像是早就和“旧北京市委”有仇似的,欢欣鼓舞、绕着校园游行,表示热烈庆祝、坚决拥护!胡志涛副校长代表党总支传达新市委的指示:一不上街、二不开大会、三不要把大字报贴到大街上去,要注意内外有别,强调要相信党,相信党支部,相信区委,相信市委。

6 月 3 日晚饭后,团中央候补书记胡启立带着张世栋和马娴华来到师大女附中。他们在校门口,遇见了几个同学,张世栋向她们自我介绍说:“我们是团中央派来的工作组,想见一见你们的校领导。”

一个同学说:“他们在后面的阶梯教室开会斗学生呢!我带你们去。”这位同学就是邓小平的女儿邓榕。

他们来到阶梯教室,许多人都围在门口。胡启立他们让打开门,走进阶梯教室,老师们正在批评刘进、宋彬彬、马德秀。

张世栋简单介绍说:“我们是团中央根据党中央指示派出来的工作组,目的是帮助学校党政领导干部领导学校的文化革命运动。今天先来看一看,明天就进驻学校了。”并当场宣布:刘进等人的行动是革

命的,应该支持。还说“邓小平同志很关心,委托我们来看看。”顿时,刘进她们非常激动。

胡启立听说大家都没吃晚饭,挺生气。说:“不能以这种批斗的方式对待学生,先去吃饭,他们会了解情况后向上级和小平同志反映。”

随后卞仲耘书记宣布散会,胡启立3人在校内转了转就返回了。

第二天一早,工作组正式进校,张世栋是工作组组长,马娴华是副组长,胡启立是西城区中学运动的负责人。欢迎大会上,胡启立、张世栋、胡志涛副校长都讲了话,胡志涛在会上传达了前一天李雪峰关于改组北京市委的报告。接着,工作组宣称:“教师都执行了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按法律应该坐班房,应该判处死刑”。

工作组长张世栋在讲话时说:“看到对学生起来揭发批判校领导的形势,我的心情只能用四个字来形容,那就是,”他稍作停顿后,说:“欢欣鼓舞!”

台下顿时报以热烈的掌声和高亢的口号声。

6月3日,毛泽东审阅了新华社有关中共中央改组北京市委和北京新市委向北大派出工作组的两篇电讯稿,分别批示“已阅。同意。”

6月3日晚,北京大学工作组进驻学校的消息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电讯稿是由周恩来根据政治局常委的决定起草的。工作组原来是以华北局名义派出的,电讯稿中改称“中共新改组的北京市委决定”。毛泽东看了这条电讯稿并表示同意。

3日晚,陈伯达再度前往北京大学,看到一批反击聂元梓的大字报。陈伯达气呼呼地说:“保皇党!现在又出现了保皇党!”

6月4日凌晨1时30分,北京大学工作组召开全校党团员干部大会。吴德到会并作报告,宣布新改组的中共北京市委做出的改组中共北京大学委员会的决定。

上午10时,陈伯达在工作组成员张承先、曹轶欧等人的陪同下,再次来到北京大学看大字报。事先,工作组组长张承先建议清理一下现场,以确保安全。陈伯达说:“人不必清了,有你们在身边,相信陆平他们也不敢有什么小动作,再说我也想听听大家的真实声音。”

就这样,陈伯达在张承先等人的陪同下,悄无声息地来到了阅看大字报的人群之中。陈伯达看得极为认真,不仅每一张都看,而且每

一行都不错过。当他看了北京大学社会科学处几名工作人员写的,题为《北大成了资产阶级“权威”贩毒的市场》的大字报后和哲学系一名五年级学生的《北大黑帮反对党的教育方针的罪行》大字报后,突然大声对旁边看大字报的学生说道:

“同学们,看了你们的大字报我很受感动,也很受教育。因为你们已经清醒地意识到北大是地富反坏右的反动堡垒,他们是在为资产阶级反革命和叛徒培养接班人,是一个很顽固的堡垒。你们要冲破这个堡垒。”

然后,他又转过脸,对陪同他看大字报的工作组成员说:“你们要依靠群众,组织坚定的左派队伍,要争取中间多数,分化那些少数坏的,打击最坏的。”

6 月 4 日,刘少奇匆忙飞往杭州,向毛泽东汇报。

在杭州西湖边上的宾馆里,参加汇报的有刘少奇、邓小平、陶铸、陈伯达等人。刘少奇心情沉重地说:“北京各大专院校的党委领导人被揪被斗,党委处于瘫痪、半瘫痪状态。北京新市委为稳定学校秩序,依照中央向北大派工作组的办法,从今天开始向北京各大专院校派了少数试行工作组。现在许多学校的学生纷纷涌向中南海、国务院和北京市委所在地,要求派工作组进驻学校……。”

陈伯达跟着说:“我是提议不要派工作组的。相信群众,才是马克思主义。”

陶铸谈了他的看法:“我是积极主张派工作组的。做实际工作的人都懂得,派驻工作组,是我们党几十年来的成功经验之一。”

会议出现了两种意见,多数人主张派工作组。

毛泽东静静地听着,并不明确表态,他一口接一口地吸着香烟,把自己笼罩在淡蓝色的烟雾之中。依据多少年来的惯例,各种意见发表过了,最后归毛泽东拍板。毛泽东不开口,谁也不好再说自己的想法。

会场上,出现了短暂的沉寂。

毛泽东终于开口表态了:

“可以派工作组,也可以不派,不要急急忙忙派工作组。”

接下来毛泽东又说,派不派工作组只是形式,这个形式也许可以用,但更多的可能是不利于发动群众搞大民主。

刘少奇不无忧虑地请求说:“北京大、中学校的混乱局面,我们确实心里没数,不知下一步运动该怎么搞。希望主席尽快回京主持工作。”

毛泽东挥挥手,像是要驱散眼前的烟雾,但是刘少奇等人心里十分清楚,毛泽东那个动作的含义决不仅仅只是驱散烟雾:“我暂不回京,运动中的问题你们相机处理吧。”

刘少奇急忙赶回北京,召集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进行紧张的讨论。自从工作组进驻北京大学的消息公布后,北京许多学校的师生成群结队地涌到中共中央、国务院、北京新市委所在地,要求派工作组。会上许多人认为,目前大、中学校领导已经或者即将瘫痪,情况非常混乱,必须迅速采取措施,决不能允许学生们无法无天地再闹下去,要尽快结束这种混乱现状。

从6月5日起,北京新市委加快了派工作组的步伐,至6月中旬,共向北京地区51所高等学校和304所中学先后派出了工作组。大学工作组的成员是从中央和国务院有关部委抽调;中学是由团中央抽调。根据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团中央成立了北京市中学文化大革命工作团。团长、副团长分别由团中央书记处书记胡克实和惠庶昌担任。6月7日至9日,团中央从北京和全国各地抽调1800多名干部,组成300多个工作组,分成8个工作队,陆续向北京8个区的中学校派出。

6月4日这天,团中央派了两个人到清华附中进行调查。他们分别与包括红卫兵观点在内的各派学生代表进行了几次座谈,红卫兵在与他们的座谈中,感觉受到了鼓舞,斗志更加旺盛。6月5日,红卫兵在教学楼一楼门厅正面贴出一张题为《揭穿一个大阴谋》的大字报,开始公开点名批判校领导。

红卫兵还通过他们的长辈寻求支持。红卫兵的核心人物、高631班的团支部书记宋柏林6月5日在他的日记中写道:“王铭找了孔原,熊钢找了薄一波,还找了许多其他的老干部,都坚决支持我们干革命。”就在当天,宋柏林的父亲、解放军政治学院政委宋维轼也到清华附中看大字报。

孔原,时任中共中央调查部部长。薄一波,时任国务院副总理。

6月4日,教育部大院大约有30多名大院子弟也宣布成立“红卫兵”。他们自豪地宣称,教育部干部子女红卫兵是继清华附中红卫兵和北大附中红旗战斗小组之后,世界上第三支红卫兵组织。红卫兵成员是四中、八中、女八中、三十五中和二龙路学校等校的中学生。最小的上初一,13岁;最大的19岁,上高三。他们大多住在教育部大院里。他们中有近半数成员的家长是司局级干部。教育部大院里长大的孩子,对于谁的家长是什么级别,从小便耳熟能详。谁的父母级别越高,谁就越趾高气扬。红卫兵的头头是一名三十五中的高三学生。他的家长级别最高,母亲是部机关党组书记,父亲在海军大院任职。

不久,北京石油学院附中、北京二十五中、北京地质学院附中、北京矿业学院附中等校中学生相继成立了“红卫兵”。

北京市八中,外交部长陈毅元帅的儿子陈晓鲁就在这所学校就读。这里的学生们到清华附中抄录大字报后,忽然感到自己已经落在了运动的后面。回到自己的学校后,他们立即行动起来,将全校所有教职员工召集到一间大教室里,听他们的训导:

“老师们,过去你们在这讲台上讲,我们在讲台下听。那是三娘教子,今天是子教三娘。我们对你们是争取团结的;但是你们所执行的修正主义路线,必须彻底清算……”

教职员工们虔诚地听着,不时报之以一阵热烈的掌声。看着站在讲台上的那些普通的中学生们,不时还觉得他们只是些孩子,几乎一夜之间,他们长大了、成熟了,如此威严,如此具有震慑力。

学校成立了以学生为主的“文化革命领导小组”,推举陈晓鲁为文革小组主任。教师们开始还担心1957年的教训会在中学生身上重演,现在变为担心自己的前途和命运了。此时他们都自觉地把自己放到革命对象的位置上。

所有的课全部停止了。学生们聚集在一起,学习毛主席著作,唱革命歌曲,讨论革命形势的发展,进行军事训练、游泳等等。越来越多的学生开始“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他们纷纷从家中搬到学校的集体宿舍来住宿。双层木床上,塞满了十六、七岁纯阳之体的半大男子汉,充盈的血气和旺盛的精力转换成大咧咧的争吵、唱歌、欢笑和打斗。

# 第55回：匡亚明，溧阳县遭遇炮轰 稳局面，回南京汇报结果

6月2日早晨，南京大学溧阳分校的师生在新闻广播中听到了聂元梓的大字报。当天下午，分校学生周冠华、陈云绮、郑立业、王钟元、吴相乔等人贴出了第一张大字报，声援北大聂元梓。接着，二年级学生蔡琼、潘玉玲、李为华、施锐琴、王秀英、鲍玉花、周慧等人又联名贴出了《十问匡校长》的大字报。在他们的影响下，其他学生也纷纷贴出自己的大字报。一时间大字报铺天盖地而来，造成一股很大的声势。

学生们大字报的主要内容，除了对北大师生的革命行动表示声援外，主要是批判南京大学校长匡亚明在一位工人来信上所写的“按语”，并指责匡亚明搞溧阳分校的目的是将南京大学师生下放到农村去，与正在轰轰烈烈开展的“文化大革命”运动隔离开来，用建校劳动冲击革命大批判。

所谓“按语”一事，是不久前在全国“三家村”的高潮中，南京的一位青年工人也致信南京大学党委，批评该校中文系编著的《左联时期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一书，说这本书竭力吹捧“三十年代”文艺传统，抵制毛泽东文艺思想。匡亚明指示溧阳分校政治处印发了这封来信，并亲自撰写了一个“编者按”，一方面指出在群众性的自我教育运动中，“学生可以批评教员，青年人可以批评老年人，群众可以批评任何干部和领导”，另一方面又强调批评“要坚持摆事实讲道理，……弄清大是大非问题，尽可能避免在小是小非问题上纠缠不清”。这个“编者按”与彭真主持制定的《二月提纲》似乎有异曲同工之处。那时的匡亚明，还不知道中央对《二月提纲》的批判。

5月7日，江苏省委召集在宁高校党委书记会议，匡亚明虽然知道了“文化大革命不是学术批判而是政治斗争”，但是“政治斗争”的确切含义是什么？斗争的对象是谁？斗争究竟如何开展？中央和省委并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他和许多人一样，都不清楚。

5月11日,匡亚明在全校总支书记会议上提出了南京大学开展“文化大革命”的三个步骤:第一是批判“三家村”;第二是开展群众性的“灭资兴无”自我教育运动;第三是深入进行学校教学改革。这些,与当时大家对文化大革命的理解也是一致的。

溧阳分校又是怎么回事呢?应该说,这是南京大学响应毛泽东“教育革命”的号召的产物。1961年7月,毛泽东曾经致信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认为该校“半工半读,勤工俭学”的办学模式很好,希望全国学习他们的经验。后来毛泽东又发表了一系列关于“教育革命”的谈话和批示,主要内容包括减少课堂教学,加强社会实践,学习“抗大”经验,缩短大学学制等。他认为:“要改造文科大学,要学生下去搞工业、农业、商业。……大学如果是五年的话,在下面搞三年。教员也要下去,一面工作,一面教。哲学、文学、历史,不可以在下面教吗?一定要在大洋楼里教吗?”

为了贯彻毛泽东的这些指示,南京大学党委在中央高教部和江苏省委的支持下,于1966年1月17日做出了《关于建立溧阳分校的决定》,提出将文、史、哲三系迁往距离南京市大约90公里,位于宁杭公路边溧阳县属下的一个果园,在那里建立南京大学溧阳分校,将南京大学文科的文、史、哲三系合并组建成“大文科”,实行“半农半读”的构想。

在全校宣讲《关于建立溧阳分校的决定》的大会上,匡亚明雄心勃勃的提出,要让南京大学溧阳分校成为全国高教战线的一面旗帜,与工业战线的大庆、农业战线的大寨并驾齐驱。就这样,1966年2月底,南京大学文科三系师生在匡亚明的率领下,打着红旗,背着行李,走了3天,徒步行军来到溧阳果园,开始在这里建设他们的分校。

溧阳果园没有校舍,师生们就分散居住在当地老乡家中。然后集中3、4、5三个月的时间建了一批“干打垒”房屋,先让学生集中居住下来,随后又陆续建设教室和办公用房,开始了半工半读的教育改革实践。

建房子没有石头,师生们就到深山里去开采,每天劳动10个小时。拉黄沙,拉石子,都是学生自己干。

劳动的时间太长,不可能有时间上课学习了,唯一的学习就是每天早上听听广播、看看报纸,吃完早饭以后马上就要劳动。

劳动太累了,有的同学晕倒在地。

到了1966年6月,在这里参加建校劳动的有南京大学文、史、哲三系的500多位师生。

这里的日常生活也很艰苦,尤其是缺水。当地有一个小水库,原来供应当地几十户老乡的用水,问题并不太大,但是南京大学一下子去了500多人,用水就显得紧张了。地质系有一个找水专家叫萧楠森,匡亚明请他去找水,忙活了几天,就是找不到新的水源。盛夏即将来临,大家开始担心缺水的日子不好过。

还有就是蚊子。溧阳的蚊子比南京的蚊子要多的多……

条件的艰苦使许多学生都想回到南京去。另外,那些毕业班的学生还对自己即将到来的毕业分配问题忧心忡忡。这些学生对创办溧阳分校的抵触情绪愈来愈强烈。

作为一个长期从事教育工作、具有浓厚知识份子气质的大学校长,匡亚明有一整套鲜明独特的办学思想。第一,他主张依靠知识份子办学。第二,他认为高校应该加强科研工作。第三,他主张尽一起可能改善办学条件。第四,他赞同“又红又专”的口号,但是他强调“红”必须体现在努力掌握现代科学文化知识上。应该说,匡亚明是一位杰出的教育家和学问家。

但是另一方面,作为党的高级干部,一个坚定的共产主义者,匡亚明又十分赞同毛泽东的教育思想。到溧阳农村去办分校,他认为这是实现共产主义理想,培养共产主义事业接班人的必由之路。

当匡亚明获悉溧阳分校出现针对他的大字报后,立即赶往那里,认真仔细的看完了这些大字报,并用他所掌握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央文件精神分析了大字报提到的问题,最后认为,他所做的一切都是符合中央指示精神的,是无可厚非的。长期以来形成的“阶级斗争”思维定势和1957年的“反右”斗争经验,使他错误地理解了《516通知》中提到的“政治斗争”的具体含义。他执着地认为,他匡亚明就是“党的领导”化身;对他的任何批评指责就是对党的领导权威的蔑视和挑战。而大字报中那些“指责”就是对共产党的指责,因此,毫无疑问是反党的表现。他不能对学生的胡闹行为听之任之,必须立刻组织有效的反击!

一回头,匡亚明看见一个同学正站在那里,就向那个同学招了招手。那个同学赶紧过去。

匡亚明问他:“同学,你见过右派吗?”

同学答:“我见过,我们系就有一个,到现在还没有分配,一个月就拿18块钱。”

匡亚明说:“我告诉你,我在吉林大学,写我大字报的人都是右派!大概有两三千人吧,这些人写我大字报,都是右派!”

那位同学一听,吓坏了,心想:“哎呀,我也在批匡校长的大字报上签名了。这下惹了大祸了!”

接着,匡亚明在分校召开了党总支扩大会和全体党员大会,他把学生们贴出的大字报说成是“毒箭”,布置立即组织反击,并告诫大家“不能手软”。

到了夜里12点,全校紧急集合。各年级的党支部书记向师生们发表演讲说:“我们这里出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事件,和1957年差不多。”

党支部书记让写大字报的人站到右边来,没写大字报的都站到左边去。这样一来,那些写大字报的同学无形中就变成了右派。

然后,书记要写大字报的人回去反省,准备做检查。

这时已经是下半夜了,那些写大字报的同学哪里还敢睡觉?都坐在宿舍里,边遭受蚊子的叮咬,边写检查。

没有写大字报的同学也纷纷贴出反击的大字报。想入团、入党的同学更积极,他们甚至将大字报贴到了那些写大字报同学的蚊帐口上,使那些同学想睡觉也不敢上床了,因为他们不敢把这些大字报撕掉,只好整夜都在学习分校发给他们的学习材料。

6月3日上午,南京大学校长匡亚明再次召集党总支扩大会议,要大家“跟踪追击”,召开“讨论会”批判那些给校长贴大字报的学生和教师。

溧阳分校立即宣布全校停止劳动,召开批判大会。首先批判几个30多岁的年轻教师。因为匡亚明认为,学生们年轻,贴大字报肯定是这些老师策动的。老师批斗完了,就开始批斗学生干部。第一个被批判的是南京大学学生会主席、中文系的胡才基,他的年龄比较大,是调干生,共产党员。第二个受到批判的是中文系的孙家正,他是中文系的团支书。此外还有政治系的学生朱英才等人……。

批判大会声势浩大,残酷恐怖,群众纷纷站起发言,所有的问题统统往批判对象身上扣,上纲上线,甚至有的人开始动手。被批判者平时的各种言行表现,包括个人之间某些极为私秘的问题,统统被揭发出来,使人有一种被剥光衣服、赤身裸体的感觉,批判对象根本没有分辩的余地。

6月3日下午,匡亚明回到南京,立即召开党委常委会,通报了溧阳分校的"六二事件"及处理经过,他得意地宣称"粉碎了一次6小时的政变"。他还命令溧阳分校负责人对被斗的师生要"扭住不放"。

从6月2日至5日的4天时间里,在溧阳分校遭到批斗的师生多达70人,其中学生64人、教师4人、工人2人。分校4个团总支书记除1人不在家外,其余3个全被斗了。

溧阳分校的局势控制住了。6月5日,匡亚明踌躇满志的到江苏省委汇报他们学校发生的"六二事件"及处理经过。

这时,青海也出现问题。5月29日,青海省委积极响应中央的指示,发出《关于坚决贯彻执行中央五月十六日通知精神,继续深入开展文化大革命的通知》。这份通知尚未发到每一个基层党组织,6月1日晚20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就播发了聂元梓的大字报。第二天《人民日报》头版头条的文章是:《北京大学七同志一张大字报揭穿了一个大阴谋》,还有评论员的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

急剧发展的政治形势让人们应接不暇。6月2日下午14时多,《青海日报》总编兼新华社青海分社社长程光远把报社政文部副主任雷经农和记者陈逸叫到他的办公室,说有一项紧急任务要立即完成。

接着,程光远向他们传达了当时仍属高度机密的中央杭州会议和上海会议的大致情况,详细地复述了1966年4月24日杭州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中通过的《516通知》草稿的内容,特别是其中那段:

"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历产阶级代理人物,是一批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这些人物,有些已经被我们识破,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的重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睡在我们的身旁。要不断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这些领域的领导权。我们对他们的斗争也只能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

然后,程光远对雷经农和陈逸他们说:“作为党报,要尽快跟上中央的部署,及时发表一篇社论。社论的重点是发动群众,要有很强的鼓动性。”

接着,又对陈逸说:“这篇社论还是由陈逸执笔,雷主任把关。一定要带着感情写,越快越好,争取明天见报。”

陈逸是程光远在《青海日报》倚重的三支“笔杆”之一。另外两位是:上海复旦大学新闻系研究生毕业的王振业,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的孙正荃。那时,《青海日报》上的一些重要报道和重头文章,基本是由他们3人担任。而在当时那段时间里,《青海日报》的社论几乎都是陈逸写的,几乎达到了一天一篇,有时甚至一天两篇。

听完程光远的传达,陈逸依然觉得有些茫然:这“赫鲁晓夫式的人物”是谁?“发动群众”起来干什么,要“革”谁的“命”?他都不清楚。好在他已经习惯这样的工作程序了,社论一定要写,否则就是没有完成任务。中央的指示精神必须要宣传、贯彻,否则办党报做什么?

怎么写呢?既然社论重在“发动群众”,就在这方面做足文章,至于“革命对象”,先作为一个虚拟目标,总有其人,且不去管他。按照程光远传达的中央精神写就是了。

从程光远办公室出来,陈逸躲进了报社的值班室,锁上门,一个人开始酝酿、构思。他手上除了那份笔录程光远传达的《516通知》的草稿记录外,就是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因为他觉得,这篇文章的精神和当时全国批斗黑帮的气氛以及他们要写的社论的内容都是很吻合的。

经过大约半小时的思考,连续吸了4支烟后,陈逸开始奋笔疾书,题目是《大进攻、大反击、大革命》,这题目,也很有气势。

接近下班时间,他写好第一页,立即送给雷经农初审,再由雷经农送程光远终审,陈逸则回值班室继续写。当陈逸写完最后一个字时,已过了晚饭时间。他立即将最后两页交给雷经农。

等雷经农审完后,陈逸也顾不上吃晚饭,拿着最后几页初稿,到省委部长楼程光远家待其签发。程光远在终审时,把雷经农删除部分又全都恢复,还当着陈逸的面,说了一句:“乱改一气,文气都不顾……”

于是,陈逸的原稿几乎是一字不易地照发。

# 第56回：六月三，青海湖又起波澜 轰领导，动荡在全国蔓延

经程光远审定的这篇社论于次日，6月3日见报。社论中说：

“大革命就是大反常，就是要大反资产阶级之常态，踢翻反党分子的‘阎罗殿’，砸烂‘三家村’这座大黑店，创造一个无产阶级的新秩序、新世界；”“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行动！”这是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的一句话，当时，正风靡全国。

不曾想到，社论一发表，西宁市便炸了锅。编辑部电话不断。开始，大多数电话还是询问发表这篇社论的意图。因为，已经是共产党的天下了，怎么还会有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大革命呢？革谁的命？难道无产阶级要起来推翻共产党的领导？

到了第二天，6月4日，情势大异，西宁实验中学女学生李春荣带领一批中学生首先来到《青海日报》社编辑部所在地，省委办公大楼前楼四楼，给报社送来第一张措辞严厉的大字报，声称这篇社论是“大毒草”，要求报社做出“说明”。年轻的中学生们在走廊上高呼口号，要“程光远出来说话”，后经报社人员劝慰，他们把大字报贴在墙上后才离开，临走时还丢下一句话：“我们明天还来！”

接着，一拨一拨地学生、干部、工人涌向报社，有来探询这篇社论的“背景”、“用意”，也有来问“省委有什么部署”，其间也有携带来大字报的。有的认为社论是“大毒草”，也有的认为“好得很”，“说出了我们的心里话”。

编辑部闹哄哄乱成一片，社论的即时效应如此快捷、猛烈，是《青海日报》创刊以来未曾遇到的。编委中有人忧心忡忡地念叨：“闯大祸了！办报十几年来没有见过……”

当天下午，事态进一步升级，青海省委办公厅来电话质问《青海日报》：“你们这篇社论是什么意思？现在社会上炸开了锅，我们这里电话不断，你们打扰了省委的工作。”省委宣传部也来电话，要求报社解

释。《青海日报》社气氛更加紧张。

程光远和陈逸感到前所未有过的压力,内心的恐慌可想而知。

6月5日、6日,西宁市有更多的人涌进《青海日报》社,大字报越贴越多,青海省各部、委有人也写出了大字报,省委大院也开始参与到这股浪潮中来。陈逸在上、下班路上已经明显感受到那些奇异、刺人的目光和在背后指指点点、窃窃私语的尴尬。他感到要大祸临头了,就去找程光远。程光远让他去和省委宣传部部长午人谈谈,向午人说明社论撰写的真实意图和具体过程。程光远还示意,午人对文中所指,意见特别大。

6月7日傍晚,陈逸来到午人家,向午人详细诉说了社论写作的策划、撰稿过程,特别强调了社论是根据中央杭州会议、上海会议精神,本意是在"发动群众"。同时也检讨了在完稿、发稿中过于仓促、轻率的"错误"。

午人,如同程光远一样,对陈逸的才华一直是很欣赏的,曾以"笔杆子"称许赞誉过陈逸。就在不到一个月前的5月中旬,午人还亲自命陈逸执笔撰写追查"三家村"后台的长篇批判文章。当时午人对他说:

"目前全国都在批判、声讨'三家村'、《前线》和《北京日报》,我们青海不能没有态度。你要写一篇重头文章,不要停留在'三家村',要挖它的后台……"

作为文人,陈逸对邓拓的才华和文笔是十分欣赏的,但如同"六三社论"一样,对于"三家村"的后台是谁,陈逸哪里知道?既然组织上布置任务要写,那就写吧,这也是组织上对自己的器重。

陈逸熬了几个昼夜,几乎通读了《三家村札记》及当时的《前线》、《北京日报》和《北京晚报》,写出了《擒贼擒王》的长篇批判文章,以两版整版的篇幅在《青海日报》上发表。

但是,这次午人的态度就截然不同了,整个谈话过程,他始终板着脸,无论陈逸怎样解释,他都坚持认为"六三社论"是一篇矛头针对省委的别有用心的文章,他还强调"这样重要的社论,为什么不交省委审定,擅自发表?"

陈逸回答:"在最近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几乎所有社论,省委都

没有审看,因而这篇社论也是并不例外的常规做法。”

午人问:“社论里说的‘小脚女人’是谁?‘东郭先生’又是谁?”

陈逸说:“这只是泛指,并不特指哪个具体人。”

但不管陈逸怎么说明,午人始终铁青着脸,并且告诉他,省委很快就要就这篇社论开会讨论做出决定,要他“准备接受处理”。

接下来的几天,省委要求省级各机关就“六三社论”明确表态,每天都有一拨拨人携带大字报来到省委大院,以致省委办公大楼前楼一楼至四楼都贴满了大字报。因数量实在太多,每层楼走廊都拉起了几道长绳,大字报一排排张挂起来,如同飘舞的蚊帐,还贴出了“小心火烛”的告示。大字报的内容已经是“一边倒”,程光远和陈逸的“罪名”从“政治错误”跃变而为“反党分子”、“反革命分子”、“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资产阶级代言人”、“混进新闻界的地地道道的牛鬼蛇神”……最后,大字报由前一直延伸到院墙及省委常委楼。

这篇社论也传到了北京。康生看了这篇社论赞不绝口,认为是篇好文章。陈伯达则不以为然,认为社论捅了漏子,是大毒草,还叫办公室给中央文革小组成员、西北局书记杨植霖和青海省委书记王昭打电话,请他们追查社论的作者和报社的责任。

“六三社论”发表当时,省委第一书记杨植霖正在西安任中共西北局书记,主持常务工作,而且是西北局派往中央文革的成员之一。第二书记、省长王昭也在北京治病,为当时中央内部斗争而惶惶不可终日。

原来,王昭曾任公安部副部长兼政治部主任,与罗瑞卿关系密切。罗瑞卿当时的处境,使王昭预感自身的危机。西北局领导刘澜涛叫王昭不要回青海,安心在北京治病。可是,青海的“六三社论”引发了如此迅猛、强烈的反响,使他不得不匆忙返青,希望以最快速度解决问题。

王昭,1955 年授中将衔,1962 年从公安部副部长任内调来青海,是为整顿三年困难时期由省委书记高峰搞乱的青海政局和经济。他一到青海,就大刀阔斧地整查吏治,理顺经济,深入农村、山区,体察民情,在青海群众中有“王青天”之称,威信很高。

回到西宁的王昭了解了当时青海的情况,同意青海省委其他常委

们的意见,于6月11日,青海省委做出《关于<青海日报>六月三日社论所犯错误的处理决定》,确定“六三社论”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予以撤销”,并申明“社论”未经省委审定,“系由程光远授意、陈逸执笔”,事先“炮制”的“向党进攻”的“动员令”和“宣言书”,令“程光远、陈逸停职检查”,等待省委的“严肃处理”。

6月12日,《关于<青海日报>六月三日社论所犯错误的处理决定》经西北局批准。同时,以省委副书记韩洪滨为组长的工作组进驻《青海日报》社。

当天,工作组在报社全体职工大会上宣布由省委副秘书长薛可代理总编辑。同时,工作组决定:

一、程光远停职反省,陈逸监守隔离,雷经农争取“反戈一击”,以示政策区别。

二、由省纪委副书记张全志领导报社运动,要求报社职工(包括印刷厂)人人表态。

三、继续发动社内外群众声讨、批判《六三社论》。

四、组织专人专版于1966年6月中旬在《青海日报》连续近半个月载文批判程光远、陈逸。

五、继续对程光远、陈逸组织内查外调。

这天,陈逸家被抄,他也当场被带走隔离。临走时,他爱人急火攻心,晕倒在地。但是,不允许陈逸稍有逗留,仍然将其立即带走。

祸端一直殃及到陈逸当时正上小学的孩子,他孩子的作文被学校作为“大毒草”组织同学们批判。

陈逸从此开始从早到晚的大会小会连轴批斗。批斗间隙,罚他到省委大院北近湟水的菜地劳动。

与此同时,还勒令陈逸从省委办公厅干部宿舍楼搬到一个临时关押“五类分子”的处所。“五类分子”即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这在当时都是人民的敌人,人们都把他们作为另类看待。他们住的地方,条件自然是极差的,终年不见阳光,秋末开始,墙上就结满霜花。陈逸在监管人员看押下,与弱妻幼儿一起吃力地来回搬运家什。

此时的陈逸,一股冤屈不知从何说起。每当他夜半劳动完后,仰

头望着那高原清冷的圆月,一种悲凉之情就会陡然涌上心头,他想到了十七世纪因科场案被流放到宁古塔的吴汉槎,那苦味、苦况使他不止一次地背诵顾贞观赠吴汉槎的《金缕曲》:“魑魅搏人应见惯,总输它覆雨翻云手。冰与雪,周旋久。”“薄命长辞知己别,问人生到此凄凉否?……词赋从今须少作,留取心魂相守”。因文兴狱,劳身苦心,知识分子的命运遭际,大抵古今皆然。

因拥护“六三社论”而被打成“黑帮”,甚至是反革命的,在青海更是不计其数,他们也不同程度的受到与陈逸相同或更甚的遭遇。

6月5日,根据陈伯达两次去北大后的谈话精神,《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做无产阶级革命派,还是做资产阶级保皇派?》。从此,“保皇派”一词在“文革”中广泛应用。

动荡仍在全国加剧……

6月4日早上,位于桂林的广西师范学院中文系部分学生受北大聂元梓等人第一张大字报的影响,在学院后门处贴出了《李德韩副院长在文革中充当什么角色?》为题的第一张大字报,轰动了全院。消息很快就传到了院里,领导当即就组织了一批反击大字报,贴在后门。而学生们见院里贴出反击他们的大字报,马上又写出更多的大字报贴到了学校四周的墙上。

次日,6月5日,广西师院党委根据自治区党委宣传部的电话通知,宣布停课搞文化大革命。

消息传到柳州、南宁等地,各高校学生群起而动,组团赶到桂林支持广西师院。到了6月中旬,广西大学、广西医学院少数学生也纷纷开始贴出攻击校党委的大字报。

6月4日,福州大学召开全校师生员工参加的文化大革命动员大会,并成立“文革办公室”,当天,福州大学党委书记张孤梅、福建师院党委书记曾鸣以及其他领导被群众批斗。

6月4日,辽宁大学有人贴大字报反对校党委。结果,有四、五十人被打成“右派”。

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播出后,山西大学、太原工学院、太原重型机械学院、太原五中、太原六中等大中学校的学生起而效仿,这些学校的党组织及其负责人即成为“炮轰”、“打倒”的目标,不少学校

被迫停课。对此,省委规定:“不准大字报贴在校外”,“不准在大字报上随意点名批判”,“不准随便批斗”,“不准张贴涉及党和国家机密的大字报”,“不准跨校召开批斗大会”,“不准侮辱人格”,力图把运动引入以往政治运动那种模式之中,但是这些规定效果甚微。6 月 6 日,太原冶金工业学校的部分学生在省委门前张贴大字报,仿效聂元梓的大字报,称“山西省委和北京市委一样”,请求中央改组山西省委。

6 月 5 日,开封师范学院艺术系讲师伍秀芝的住室,被她所教的一群低年级的学生们查抄了。她保存的那些封、资、修的唱片、录音和一些诸如巴黎香水、口红、高跟鞋、海绵乳罩之类的东西,被学生们作了暴光式的展览。学生们批判她腐朽的资产阶级思想和糜烂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贴出了“打倒资产阶级学术权威——武秀芝”的大标语。开封师范学院一下子开了锅。不少学生说艺术系的学生们的行动是革命行动,是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向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猛烈轰击的第一炮,好的很,纷纷写大字报,大标语表示支持。

校党委的态度则相反,指责他们破坏了学院的教学秩序,破坏了师院文化革命的正常进行。责令参与此事的学生们承认错误,悔过自新,揭发闹事的右派、反革命。要求各系党总支都要切实加强对运动的领导,排除干扰,批判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密切注视运动的动向,严密掌握每个学生的基本态度。

学生们不服气,不认输。他们集合起来到院部要求招回在省里办展览的高年级同学,回来参加文化大革命。这又被院党委指责为请愿闹事,遭到围攻和非难。凡是参加请愿的和为请愿活动说公道话的,都被文革小组找去谈话,在班里接受批判。凡是在讨论发言中,涉及对党委有意见的,就一律斥为“攻击党的领导”,不但要给以批判,还要作为政治问题整理专案,内定为右倾学生,放到运动后期处理。这就是开封师范学院文化革命中爆发最早的“六·五事件”。

再看河南省会郑州。6 月 3 日,郑州大学就对那些给校领导贴大字报的学生开始了全校性的反击。那 14 位写大字报的学生被戴上“小邓拓”“小吴晗”“反革命”“小右派”“牛鬼蛇神”“三家村黑帮”、等帽子。进行专栏批判、点名广播,王相海、席占修还被拉到桌子上斗争,让其承认“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省委书记处常务书记赵文

甫也来到郑州大学作报告,公开提出对有问题的人要组织批判,同时对写大字报的人要进行反击。一霎时,整个校园贴满了“誓死保卫校党委”、“反对校党委就是反党”、“反对王培育就是反党”等大标语、大字报。当时郑州大学被打成反革命的有174人。一些保党委的人贴出了“郑大不是北大”“反对校党委就是反党”等大字报,校园内呈现一片恐怖气氛。

6月5日下午,太阳快落山时像血一样红。这天夜里,在强大的压力下,郑州大学率先给校党委贴出大字报的中文系一年级学生、共产党员、团支部书记王相海从文科楼六层高的顶端跳了下去,头破血流,横尸楼下。时间已是6月6日凌晨。

第二天凌晨,数学系青年教师刘光武也跳楼身亡。校内空气陡然紧张起来,一片恐怖,人人自危。这时,校党委召开全体党员、团支部书记以上会议,说他们是“畏罪自杀”“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还说他们“人虽死,心不死,鬼魂还在”,要把他们“批倒批臭”,使他们“永世不得翻身”!甚至派人到王相海的家乡濮阳开批判会,声讨他所谓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滔天罪行。他那贫农出身的老父亲被吓得浑身打哆嗦,说不成一句话。他妹妹哭喊着说:“俺哥啥时候也不会反对共产党、反对毛主席!”没几天,中文系资料室的两位1957年被打成右派的老师也相互拥抱着跳楼自杀,引起众多师生的恐慌和不安。

文化大革命刚开始,郑州大学就接二连三的死人,校党委无法控制学校的局面。6月6日当天下午,省委急忙派宣传部副部长党若平带领工作组进驻郑州大学。

工作组进校后,继续斗争学生。6月7日晚,中文系四年级学生党言川因声援王相海的大字报被斗争。6月9日,学生、共青团员、兰考县委副书记张钦礼的妹妹张凤芝因支持王相海等人的大字报被污为“反党分子”。在强大压力下,张凤芝写好《绝命书》决定走王相海自杀的路,被同学发现未遂。

6月9日,在河南省委召开的市委书记会议上,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刘建勋提出了“不论是什么情况,都不能反击学生”和“运动中不整学生的原则”。

# 第57回：六月六，匡亚明转瞬打倒西北局，开会也揪“三家村”

6月5日，北京师范大学西北楼男生宿舍，中三的一个班学生簇拥着和学生同住西北楼乔树桐老师下楼梯，边走边喊：“乔树桐！你是什么人？”“你有几条罪状？”

这窝“蜂”在宿舍楼前停住。

乔老师低头站在凳子上，有位女生站在另一凳子边哭边揭发：“四清时，他给我们讲故事，讲猴子和人相爱……”

听众高呼：“打倒大流氓乔树桐！”

很快，画漫画，贴对联，批判乔树桐。

这里正热闹，一阵锣声，人们视线转向北边林荫道上，数学系来了一支人马。一位老教授，纸糊高帽戴着，提一面铜锣，一边敲着一边吆喝：“我是牛鬼蛇神！”

一批批各系的“牛鬼蛇神”纷纷“亮相”，多为右派分子和学术权威，还有个别领导干部。

班长王洪泽是中共预备党员，他在西饭厅贴出大字报，声明“退党”，要和学校的“黑党委”一刀两断。大字报纷纷围剿：“你参加的是中国共产党，不是师大共产党！”他这个班长没有再当下去。

6月6日傍晚，孙友渔为组长的工作组进入北京师范大学，师生自发在东校门内外，夹道欢迎。

工作组进校第二天召开全校大会，工作组长孙友渔代表北京新市委支持师生革命造反行动，号召大家把斗争矛头主要对准校系“走资派”，“要剥掉程今吾层层老笋皮！”

就在南京大学校长匡亚明到江苏省委汇报他们学校“六二事件”及处理经过那天，溧阳分校二把手徐福基突然找那些写批判匡亚明大字报的人去开会，向他们传达了匡亚明的指示，说：“你们写大字报初衷是好的，是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就是把矛头搞错了。匡校长和南

大党委,还有溧阳分校总支,都觉得你们还是我们的阶级兄弟,还是我们的同志。”

听了这话,下面哭声一片,那些写大字报的同学感动异常,当场就有人表态说:“匡校长太宽厚了,我们对不起他。”

那天中午食堂还加餐。大家好几天都没有心情吃饭了,这次算放开了,感到没有事了。吃完饭,大家又继续劳动。

年轻的学生们哪里知道,上边的事情远比下边复杂。早在5月25日前后,省委就派了一个姓杨的干部作为联络员来到溧阳分校。“六二事件”爆发以后,这位杨联络员到处摸情况,然后跑到几里路以外给省里打电话,报告南京大学的校长组织对学生进行批斗的消息。

情况反映到了省里,省里不知该如何处理。匡亚明是1926年入党的老革命,与康生20年代同为上海大学的学生,而且一起加入共产党。在上海从事党的地下工作时,康生任中共区委书记,匡亚明任少共区委书记。行政干部6级,比江苏省委书记江渭清他们都高,所以他平时对省委领导也不太理睬。省委叫他去开会,他不能不去,去了以后又对会议没有多大兴趣,就带上一本英文的《资本论》,边开会边看。

此时,江苏省委听了匡亚明汇报“六二事件”及处理经过,立即向中央作了汇报。中央负责处理这些问题的康生,接到江苏省委的报告以后迅速做出批示:“匡亚明镇压学生运动是错误的,必须立即停职反省,接受群众批判。”

6月6日,江苏省委召开常委会议,决定撤销匡亚明的一切职务。

本来省委已经提出文化革命的斗争对象了,是吴天石、孙叔平、陶白、叶子铭这些人,想不到匡亚明为镇压学生自己跳出来了,江苏省立刻抓住不放。

6月8日,江苏省委向南京大学派出联络组。这天,溧阳分校的同学正在工地劳动,忽然来了两个人,问他们:“你们谁写大字报了?”

同学们不认识他们,没有答腔。

来人又说:“看样子你们是写大字报的,怎么没精打采的样子。”

同学们问:“他们是哪来的?”

他们说:“我们是江苏省委宣传部的。”

同学又问:“他们来干什么?”

来人说:“你们写大字报是对的,你们受委屈了。”

同学说:“你们胡说八道什么东西呀,匡校长都说我们不是右派了,我们都解放了,我们要好好干活,你不要和我们啰嗦。”

写大字报的几个人都认为自己犯了错误了,感觉对不起党。

这天晚上,学校广播站突然播放《东方红》歌曲,让全体学生到大操场集合。省委宣传部戴副部长在会上向大家宣布:“明天你们就看不到匡校长和分校的其他干部了,因为他们犯了错误被调走了。”

他还说:“同学们,你们贴匡亚明的大字报是对的!你们的行动是革命行动!你们不是反党先锋,而是革命先锋!”

听到这些话,那些写批判匡亚明大字报的同学都激动得哭了,中文系的团支书孙家正站起来带领大家高呼口号,而批斗过他们的那些同学都呆住了,不知是怎么回事。但是,那几个被批判、被拳打脚踢过的老师还不敢动,他们被搞糊涂了,不敢造次。

突然有人提出:“我们写大字报的人是革命急先锋,那些整我们的人是什么?”

省委的人就讲:“大家参加文化大革命,搞大批判,主要矛头要对准匡亚明,批判《二月提纲》。同学们互相之间不要再纠缠了。”

但是他们的这些话没有多少人听了,此时的溧阳分校实际上已处在无政府状态中了,不知应该听谁的。

第二天,南京大学党委常委、组织部长从南京来到溧阳分校。小轿车一进分校的大门,大家就把他围起来了。南京大学党委组织部长向大家传达了省委的指示:第一,匡亚明就是北大的陆平。第二,南大党委不等于北大党委,你们不要把南大党委和北大党委等同了。第三,溧阳分校的同学要坚守溧阳,一面搞文化大革命,一面继续劳动建校。

这时,不知道谁说了一句:“我们要求回校干革命。”这个提议立即得到大家的响应。马上就有人坐在小轿车的顶上,强烈就要求回校。

组织部长说:“不能回去,你们要在分校进行文化大革命。”

大家七嘴八舌地说:“匡亚明又不在这个地方,我们要回南大去闹革命。”

还有人说:“怕什么,我们自己走回去。我们学习红军长征,两万五千里。”

组织部长见控制不住局势了,想溜。同学不让他走,让他打电话反映学生的要求。

最后,江苏省委从南京军区借了几十辆军用卡车,把在溧阳的所有南大师生都接回了南京。

溧阳分校师生回到南京大学的时候,那边早已做好了准备,留在南京大学的所有理科学生都被组织起来夹道欢迎溧阳分校师生“胜利凯旋”。当溧阳分校学生乘坐的汽车开到汉口路的路口,整个南京大学就沸腾了!早已等候在那里的理科的学生,一看到溧阳分校的同学,又是敲锣打鼓,又是欢呼雀跃,真是人山人海!大家一起握手拥抱。

溧阳分校的同学以一种英雄凯旋式的姿态,受到火一般热情的夹道欢迎,心情那个激动呀!许多人都激动的哭了。南京许多单位也敲锣打鼓来到南京大学,对溧阳分校师生“倒匡”表示声援。

6月12日下午,南京大学举行万人大会声讨匡亚明的罪行。除了南京大学师生以外,参加大会的还有南京其他各大专院校推派的大批代表。

大会的第一项内容,就是宣布中共江苏省委关于撤销匡亚明的一切职务的决定。这一决定宣布以后,全场热烈欢腾,长时间地热烈鼓掌欢呼:“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紧接着,分校师生代表胡才基等人在台上以极其愤怒的心情,揭发匡亚明“镇压革命群众运动、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

校本部学生代表陈季平在大会上发言,对遭到匡亚明打击的师生表示亲切的慰问。

分校学生唐力行、王世泰、杨家玉、张秋良等纷纷表示:省委撤销匡亚明一切职务的决定,是对南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撑腰。

参加大会的各大专院校师生热烈拥护中共江苏省委的决定,坚决支持南京大学革命师生的斗争。

6月13日,江苏省《新华日报》公开报道撤销匡亚明同志党内外

一切职务,还开始了对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陶白、钱静人,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所长孙叔平等的点名批判。

在此期间,有20万人涌到南京大学“声援”批判匡亚明,校园里除大字报之外,还扯起了广播喇叭,操场上搭起了台子,一些人登台讲演,展开大辩论。6月13日,在南京大学大操场召开了批斗匡亚明的大会,中文系的学生胡才基等人是批斗的主力,他们起来揭露匡亚明的“叛徒”问题。就这样开始了对匡亚明进行武斗,戴高帽子,游街,泼墨水,有的学生还让匡亚明“坐飞机”,就是有两个人在匡亚明背后将他的两个胳膊从背后抬起,人也就被迫低头弯腰,形同飞机,或老母鸡,俗称“坐飞机”或“喷气式”。

就在中共华北局“前门会议”沸沸扬扬之时,中共中央西北局的第三次全体扩大会议也于1966年6月1日至7月11日在西安召开。会议后期扩大到西北五省区县委书记以上的领导干部。这是西北局成立以来规模最大、时间最长的大会。在这次会上,西北局第三书记兼陕西省委代理第一书记胡耀邦、陕西省委第二书记赵守一、省委书记处书记,省长李启明被说成是“西北三家村”。由于胡耀邦不归西北局管辖,西北局无权公开点名批判,会上公开的提法是“揭发彭、高、习在西北的黑线”,把赵守一、李启明作为彭、高、习的代理人,又把从未同彭、高、习共过事的胡耀邦作为头目,这样就成了一个“彭、高、习黑线”的“西北三家村”。

所谓“彭、高、习”,就是彭德怀、高岗、习仲勋。时任团中央第一书记的胡耀邦怎么成了“西北三家村”的头目了?

原来,1964年11月,中共中央任命胡耀邦为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三书记兼陕西省委代理第一书记,同时保留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原职。

当年的12月1日,胡耀邦到西安报到。当时西北局十分强调陕西“彭、高、习反党集团流毒很深”,“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很不彻底”。在这种思想指导下,社教运动中,大批干部和群众被当作敌对分子遭抓捕或被惩办。据统计,1964年逮捕6400余人,拘留5000余人,平均每天捕30人以上。受到开除公职和开除党籍处分的脱产干部660多人。长安县正副区委书记和区长受处分的占45%,生产大队党支部书记被撤换的占76%。这与刘澜涛1964年12月17日在中共中

央工作会议上汇报的情况是一致的。西安市一度打击了9500多名“投机倒把分子”;陕南凤县连上山砍柴、到集市卖鸡蛋、进城当保姆的收入也被当作剥削收入,都要退赔。在党政机关,政治空气十分紧张,半数左右的省级部、委、厅和各地地委、行署、县委、县政府领导班子被看作是烂了和有严重问题;一批未作结论的厅、局、处长被关押起来“隔离审查”。在文艺界,由于“反党小说《刘志丹》”一案的株连,一大批文艺作品被批判为“大毒草”,许多知名作家、艺术家遭到残酷迫害,不少人含冤而死。

胡耀邦来到陕西后,觉得这种做法对干部伤害过多,处理过重,因此委婉地提议:捕人暂停;“双开”暂停,留待运动后期处理;面上夺权暂停,待重新部署后再行动。根据他的提议,省委、省政府做出了“三个暂停”的决定。

两个星期后,1964年12月14日,胡耀邦返回北京,出席于12月15日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和20日召开的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会议期间,毛泽东对听到的一些意见都不满意,他要求大家“冲口而出”地讲话。胡耀邦连续写了几个晚上,最后在12月24日完成了《向西北局和中央、主席的报告:〈走马到职报陕情〉》。

在这份9000多字的报告里,胡耀邦说:“全省已经清洗了(即双开)660多个脱产干部。性急了一点。性急了就难免出差错。”又说:这种做法“看起来似乎是彻底革命的办法,实际上同样是一种消极的错误政策。”

对于补划漏划地主富农成份的问题,他说:“土改时确系地富成份,但几经沧桑,现在剩下孤老残疾,生活相当穷困的,和虽有劳动力但生活和家底已经一般,本人表现老实的,补划不补划?前一种属于可以不划的,后一种属于可划可不划的,我主张不划。”

显然,胡耀邦的材料与当时会议上各大局书记的汇报精神是相左的,最主要的是,这份材料等于是批评了刘澜涛的汇报。胡耀邦未曾料到,他这份直接向中央主席述说西北局工作中的问题的《走马到职报陕情》,为他在西北的政治命运埋下了伏笔。

会议一散,胡耀邦又马不停蹄回到西安,立即召开了陕西省委工作会议,在传达、学习《二十三条》和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指示

的同时,鲜明地指出陕西社教运动中的“左”的表现,提出了一系列旨在纠偏的政策思想。

2 月 13 日晚,胡耀邦在陕南安康起草了一篇《电话通讯》,于 14 日凌晨 2 时写毕,以急电向省委办公厅发出。在省委主持日常工作的常务书记冯基平,当即征得省委书记处各书记的同意,以电话会议转告到各地、市、县(区)委。这篇《电话通讯》提出了 8 个方面的方针政策性的问题,其中特别规定了解放干部的 4 条政策:

(1)凡属社教以来被处分过重的干部,一律实事求是地减轻下来。最好选择几个典型,经过大家讨论,重新做出决定,并在大会上宣布。

(2)凡属停止和撤消工作,但尚未处理的干部一律先到工作岗位上去,待问题完全查清或经过一个时期的考验再作结论。

(3)凡属去年以前犯有某些错误但已经交代过的在职干部(包括脱产和不脱产干部),不再在这次会议上“洗手洗澡”。只要做好工作,搞好生产,将功补过,就一律不究既往。

(4)凡属这次县的多级干部会议后,继续干坏事的人,不管职务高低,一律从严处理。只要我们掌握了这四条,我们就不会犯什么“左”的错误,也不会犯什么右的错误。

2 月 17 日深夜,胡耀邦在汉中地委,接到西北局第一书记刘澜涛打来的电话。刘澜涛电话语气严峻的对他说:“我把中央和西北局的意见通知你,你的《电话通讯》提出的四条干部政策不妥,可能引起翻案风。”

这突如其来的批评,使胡耀邦吃了一惊:如果不同意这四条,可以径直告诉他,为什么还要把中央抬出来,这中央究竟指谁?那一夜他辗转反侧,彻夜不眠。他不知道,此时,《电话通讯》一案已经闹到北京。刘澜涛在见到《电话通讯》后,立即印发给西北局书记并常委,接着以加急电报报给中共中央办公厅,并说:“西北局认为其中的四条干部政策不妥,可能引起翻案风。”

主持中央书记处日常工作的彭真看后,觉得那个“四条”不够确切,需要打个招呼。第二天,彭真到毛泽东那里谈工作时说了这件事。毛泽东说:“告诉耀邦注意一下。”

第三天,刘少奇看了《电话通讯》全文,说:“除了‘四条’,从字面

上看,阶级斗争也讲得少。胡耀邦就是搞阶级斗争的嘛,怎么会忽视阶级斗争呢?”

2 月 27 日,胡耀邦又接到刘澜涛的信,信中说:“干部四条是有片面性的,肯定会引起翻案风”。10 天时间,从第一次电话中说的“可能”,变为第二次来信写的“肯定”。同一天,彭真也打来电话,传达中央的指示,要胡耀邦“注意一下”。这使胡耀邦感到了紧张。

# 第58回：飞西安，剑英出手援耀邦 义愤起，西安交大风云动

2月28日下午，胡耀邦主持省委书记处会议，讨论中央和西北局的指示。晚上。胡耀邦在会上无可奈何地作了检讨，承认“干部四条”缺乏分析，有片面性。会上决定向地、县发一个通知，要求“正确执行干部四条”。

会后，胡耀邦给刘澜涛写信，检讨了“干部四条”的“片面性”。刘澜涛回信说：“工作中出一点纰漏不要紧，只要认识了错误，就会成为推动工作前进的动力。”

3月3日，省委发出《关于执行耀邦同志二月十四日〈电话通讯〉第二个问题的前两条应注意的几个问题的通知》，要求“确实处分错了的，改正过来；处分过重的，减轻下来；但处分正确的，不能随意减免处分。对于有些人的处分问题，如果大家认识不一致，或者一时弄不清楚的，就不要匆忙地改变处分”。

这个通知很快受到西北局批评，西北局认为：这个通知没有彻底否定“干部四条”，没有明确指出胡耀邦的错误，只作了修补；通知发出前也没有报送西北局审查，对西北局不尊重。

1965年3月10日，召开西北局书记处扩大会议，讨论陕西省委1965年1月以来也就是胡耀邦主政以来的工作，邀请陕西省委书记处全体成员和西北局各部、委、办主要负责人列席。正在陕西长安搞社教的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也被请来参加。他约胡耀邦作了一次长谈，了解他在安康究竟说了些什么，劝他不要对批评有抵触。

11日会上，胡耀邦汇报了省委一月会议以来的工作。同时，按西北局第一书记的批评作了检讨。

在接下来几天的会议里，批评胡耀邦的气氛不断升高。原来，西北局的书记、部长们事先都准备了发言稿，有备而来。大部分人的发

言都是剑拔弩张,劈头盖脸,对胡耀邦全盘否定,进行“上纲上线”的批判。有人甚至说胡耀邦是反对刘少奇、彭真。

胡耀邦实在忍受不了这些莫名其妙的“批判”。3 月 14 日,他去见参加这次会议的杨尚昆,想向老领导诉诉苦。他说:“西北局这样小题大做,我想不通。”他表示要向中央申诉。

杨尚昆安慰他说:“会议这样开法,我也没有想到。”他劝胡耀邦不要向中央申诉。他说:“要稳住。你的问题就是那个四条,我还要发言替你讲话嘛。”

在众人围攻之下,胡耀邦被迫写出《关于〈电话通讯〉中所提处理干部问题四条意见的检讨报告》,于 3 月 15 日在会上再作检讨。这已经是他在这个问题上的第三次检讨了。当时陕西省正召开贫下中农第一次代表大会,西北局又叫他到大会上去向与会的省级厅局党组、党委和各地、县负责人检讨。3 月 16 日,在大会开会之前,胡耀邦出来,忍气吞声地读了一个《口头通知》,说“干部四条”以及省委 3 月 3 日发出的《通知》都是“缺乏分析的,因而是错误的,应当立即停止执行”。他还表示责任由他负,“下面同志不要检讨”。

一连数日,胡耀邦受着揪住不放的围攻、刺激和压力,终于在 3 月 17 日病倒了。专家医生们经过两次会诊,诊断为突发大脑蜘蛛网膜炎,需要立即停止工作,住院治疗。

3 月 18 日夜里,他忧思难遣,无法入睡。第二天就要住院了,他觉得这件事情应该有个了结,于是决定再写一封信,再作一次更全面些的检讨。19 日凌晨两点钟了,他披衣起来,扶病奋笔。这封信断续写了 5 天,直到 22 日才完成。

3 月 30 日晚,西北局书记处讨论胡耀邦的信,即第五次检讨。刘澜涛对胡耀邦的信表示欢迎,说:“四条,从政治上、思想上说,都是错误的,但是采取了几个措施补救也就可以了。”

3 月 31 日,西北局书记处举行最后一次批胡会。杨尚昆在会上发言,带有居中调停的意思。他对胡耀邦作了一定程度的肯定,说:“耀邦同志确实干劲十足,想把工作做好,想把陕西省农业生产落后于邻近各省的局面迅速改变过来……是不是说耀邦同志的错误已经成为路线上与中央对抗和西北局对抗呢?我看还不能作这个结论。”然而

他认为胡耀邦错误的性质是“政治上摇摆”。杨尚昆还说:3 月 16 日的《口头通知》是个转折点,时间也不长,顶多一个月,没有什么了不起。“总而言之,时间很短,问题不大,问题的性质属于摇摆,不属于路线错误。……省委可以开一次会讲一讲,按胡耀邦的检讨水平写,不夸大,也不缩小,正面提,不提耀邦的名字。”会后,西北局办公厅认为赵守一在会上的发言仍然附和胡耀邦,希望他修改发言稿。赵守一断然地说:“我的发言不改了,我宁肯犯支持耀邦的错误,不犯出卖同志的错误。”

就在同一天,西北局要求陕西省委把胡耀邦的第五次检讨报送中共中央,并加发到陕西省各市、地、县委,把批胡问题在全省公开。

胡耀邦毕竟是“京官”外放,他在西北的状况自然引起了北京同僚和老战友们的关注。一天,国家计委副主任余秋里给胡耀邦打来电话,关切的问他:

“听说你在西安出了点事?”

“是,我已经受了几次批判,几次检讨还过不了关。”胡耀邦告诉余秋里。

“你在西安谈不清,你回北京谈,我跟贺老总谈谈。”余秋里给他出主意。

没过几天,叶剑英偕同总参副总长张爱萍和张宗逊来西安考察军事工作。当晚,西北局和陕西省委、省政府举行欢迎宴会。在西北局、陕西省委和省政府为叶剑英等人接风的饭桌上,张爱萍望着面色憔悴的胡耀邦说:“我们一进潼关就看到陕西的麦子长势喜人,看来又是一个大丰收。耀邦瘦了,陕西肥了,耀邦对陕西是有功的啊。”

宴会结束后,主人们向叶剑英告辞,叶剑英说:“耀邦,你留一下。”

胡耀邦单独留下后,叶剑英问:“我听贺老总说,这个地方在整人哪!怎么回事?”

胡耀邦说:“您不问我还不敢说呢!我已经做过 6 次检讨,还过不了关!”

叶剑英说:“老弟啊,你在旧社会少吃几年饭,你斗不过他们哪!在西安说不清楚,回北京去谈嘛!”

胡耀邦说:“我走不脱呀!”

叶剑英说:“我带你走嘛!”

于是,胡耀邦向西北局请假,回北京治病。西北局碍于叶剑英这层关系,只好顺水推舟。6 月 20 日,胡耀邦同叶剑英一行,乘飞机返回了北京。

就这样,胡耀邦主政陕西总共 200 多天,其中工作 100 多天,挨批 100 多天。

胡耀邦回到北京养病,西北局和陕西省委对他的批判却没有停止。1965 年 7 月 13 日到 8 月 4 日,西北局在兰州召开工作会议,议题是学习毛泽东思想,讨论社教问题、计划问题和工业生产问题,但是会议占很大份量的是揭发批判胡耀邦的问题。其后,中共中央鉴于胡耀邦再回陕西事实上已很困难,10 月间,免去胡耀邦在西北局和陕西省的职务,调浙江省委第一书记霍士廉任陕西省委第一书记。霍士廉到任后,即被要求召集会议,“肃清胡耀邦的流毒”。稳健的霍士廉推说需要熟悉情况,没有采取行动。文革开始后,胡耀邦还是被当作“西北三家村”的头子端了出来。不过此时,他已回到了北京团中央书记的位置上,西北局也奈何不了他。赵守一和李启明这两个西北局的干部可就没有他这样幸运了。

在此期间,西安还发生了西安交通大学“66 事件”。

西安交大自 6 月 1 日晚上出现矛头指向校党委的大字报后,到了 6 月 2 日,批判校长彭康的大字报越来越多,数以万计。学校秩序大乱。

彭康二十年代就在上海搞地下革命,曾加入创造社。郭沫若文集中两次提到“彭康后起之秀”。他三十年代被捕入狱,关押 7 年,抗日战争爆发,在党组织的授意下,写了“自首书”被释放,后任华东抗日军政大学副校长,校长是刘少奇。解放后,彭康一直在西安交通大学这个上万人的学校里担任校长,几乎没有听到过批评他的声音。6 月 1 日晚,他主持校党委扩大会,并不知道校园里已贴出了针对他的大字报。6 月 2 日,他来到办公室,看见学生的大字报已经贴到自己办公室的大门上了,气愤异常,立即召开党员干部大会,号召党员站稳立场,小心上当受骗。会后,学生会主席唐素等一批学生干部很快贴出“誓死保卫校党委”的大字报,但是,已无法扭转大势所趋。大学生在新闻

舆论的鼓动下,已经学会了自己用毛泽东的思想去观察和检验事情,而不是听从其他任何人的指挥。

当晚23时许,陕西省委紧急抽调正在西安参加西北局会议的西北5省部分县委书记,共300余名县团级以上干部,组成由省委书记处书记严克伦亲自率领的工作团进驻西安交大,领导学校的文化革命。

严克伦的工作团刚进校,受到了大学生们的热烈欢迎。严克伦随即向全校发表广播讲话,要求全校同学辩论"校党委究竟是红线还是黑线"。同时,校长彭康宣布停课3天,专门搞文化大革命。然而不到一天,工作团就受到学生的怀疑。

因为,在6月4日工作团组织的现场质询会上,学生提出的许多问题,如:

"文化革命如何搞?"

"彭康有什么问题?"

"工作组对当前政治形势有什么看法?"

等等。

工作团这300余名县团级以上干部,是在西北局会议刚开始一天,就仓促来到了西安交通大学。他们没有很好的准备,也没有时间认真的学习《516通知》,所以,他们自己还不知道文化大革命是怎么回事,又怎么回答这些问题呢?

面对学生们提出的一个个问题,工作团一时不知如何应对为好。但又不能在学生面前说"我不知道?"只能似是而非,模棱两可,含糊其辞的应付搪塞。

学生们当然要穷追不舍。

建国十几年来,一直是命令、指示别人该如何去做的省委书记严克伦,什么时候受到过普通学生如此的诘问?在学生的轮番逼问下,他终于恼羞成怒,开始摆架子、训人,这更加引起了学生的不满。本来就在四处搜寻黑帮线索的大学生们简单推理认为:北大——陆平——北京市委是一条黑线,西安交大——工作团——西北局、陕西省委也可能是一条黑线?!

6月5日晚,工程物理系二年级学生、班长李世英,首先带领本班

学生贴出题为“坚决赶走工作团”的大字报。一石激起千层浪,这张大字报很快就迎来更多的大字报响应。

工作团立即组织另一部分学生对李世英等人进行围攻。激烈的辩论,昼夜不停。

第二天,6 月 6 日,工程物理系 810(41)班学生也贴出大字报,列举工作团“十大罪状”,说陕西省委工作组是冒牌的,省委里有反革命黑帮。

这天上午,一部分学生与工作团辩论,一些学生则组织赴京代表团,跑到机场、车站,要去北京向党中央汇报,还有几十个学生冲出校门,分别到西北局、陕西省委、新华分社、陕西日报社提出省委工作组有黑线、省委有黑线的问题,并到电报大楼贴大字报。有的到电信局,打电报给党中央、毛主席,要求派人来校处理问题,其中一份电报有 1683 人签名。工作团慌忙阻拦,校园内一片混乱。

到了下午,学校一遍又一编的广播西北局、陕西省委《给交大全体师生员工的一封公开信》。信中说:西北局、省委和省委派到西安交通大学的工作团都是革命的,交大所发生的一切问题西北局完全可以解决。要警惕一小撮反革命分子的破坏。信中将这天西安交大发生的事情称为“六六事件”,并定性为反革命事件。

晚上,工作团开会认为:“漂”上来的一批闹事尖子,说明有一批牛鬼蛇神出笼了,要组织队伍追根子,并在《陕西日报》上点名批判。李世英等 5 个带头闹事的学生成了反革命分子,李世英则被工作组拘禁。

陕西省委听了情况报告,认为这是一起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彭康策划的反革命事件。

面对西安交大的动乱,中共中央西北局和中共陕西省委指出:西北局、省委和省委派到西安交通大学的工作组都是革命的;交大所发生的一切问题西北局完全可以解决。

事情报到北京,刘少奇、陶铸同意中共西北局、陕西省委的意见,要《人民日报》写一篇社论,揭露假左派,真右派。对陶铸的这一指示,陈伯达没有执行。

西北局、陕西省委向西安市各个单位下发文件通报此事,说交大

校内有一小撮反革命分子,企图反党,颠覆社会主义。

6 月 7 日早晨,西安交大学校行政楼前又新贴出一张大字报,标题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可笑!》,只有短短几十个字:

“昨天学校广播中声嘶力竭地反复大喊‘西北局、陕西省委是革命的’,这不由得让人想起此地无银三百两的故事,西北局、陕西省委的真面目不是不打自招,昭然若揭了。”

写这张大字报的是女学生刘维娜,她个头矮小、天真稚气。此时跳出来,一下子成了第六个反革命分子。

接下来的三天,驻西安交通大学工作团将闹事的“尖子”李世英、杨克剑、刘维娜、赵瑛、王永婷等 8 人打成“反革命分子”,召开会议进行批斗,要他们“查上当,放包袱”,并将李世英、王永婷、杨克剑、刘维娜、沈丙辰、赵瑛、白天勇等人戴上高帽子在校园内游街。

6 月 8 日,工作团宣布接管西安交大全部权力。此后,在工作团的领导和组织下,从 6 月初到 7 月在全校师生员工中,大搞“查上当,放包袱”,挖“六六”事件的幕后策划者,全校 1000 多人被批斗,44 名处级干部有 29 人被定性“黑帮”,912 名学生干部中有 680 人被定性“反革命”。

# 第59回：打压狠，遗书封封催泪滴 看西南，贵州文革序幕掀

李世英等人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下不得不检讨，但是要承认自己反党，实在有违心愿。无可奈何下，6月9日中午，李世英留下三封遗书，服安眠药自杀，被发现后经医院抢救脱险，关进医院隔离监禁。他在给党组织的遗书，给他的父亲母亲的遗书中说：他不埋怨党，而且告诉他的家庭也不要埋怨党。

第一封遗书是《最后几句话》："……对每个同学都有一肚子话要说，可是现在说不成了，将来永远也不能说了；假若我的细胞组织不破坏，我会永远怀念你们的！永远永远地怀念你们!! 永远，永远，永远怀念你们!!!

话像一眼泉，涌涌流不断。现在必须要断了！永别了！永别了!! 永别了!!! 祝您们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在战斗中成长，成为党所需要的共产主义的红色接班人！

老实讲，后台老板，我的确是没有后台老板。硬要说，可以说是党中央、毛主席！最令人感到痛心的，是没收了我的《毛主席语录》，这给我打击很大。"

第二封遗书是《终前碎语》："我感到太离奇了，这些天事情发生得生硬而又自然，痛苦而又有趣。连我自己也很难想象……倒是别人都受了我的骗了，是我'拉别人下水'，我成了现行反革命……现在，他们（指工作团）都是对的，都是从这个目的出发的，而我倒是从另一个反动的、反革命的目的出发了！事情是这样的离奇！……最奇怪的是，怎么我过去所作的一切事情都成了坏的……不过倒好笑，这几天使我增加了不少生活经验，增加了忍耐能力——可谓涵养者。也证明了这样一个真理——不作贼，则心不虚。无论他们大会斗争，小会斗争，游街，戴高帽子，加上挨拳头，口号的高呼，震耳欲聋，一个个紧握的拳头，直指眼前，可谓群众力量大矣。我丝毫不怕，因为我并没有反革命

思想,在斗争的过程中,戴高帽子的过程中,我也暗暗地说:‘同志们,你们斗错了!你们应该明白这意味着什么?!’

我心情十分平静,这时,我的头脑也相当地清醒……

谈这些还有何用呢?现在还是考虑考虑我现在的心情吧。恋恋不舍呀!祖国壮丽的河山;恋恋不舍呀!社会主义的宏伟建设;恋恋不舍呀!共产主义伟大远景;恋恋不舍呀!亲爱的同学;恋恋不舍呀!亲爱的妹妹;恋恋不舍呀!年迈的父母;恋恋不舍呀!熟悉的校园;恋恋不舍呀!今后我要做的事情;恋恋不舍呀!……

然而留恋无益,我也考虑过:活下去今后为革命事业还能尽力,但却还要人家监视我,这样,消耗别人的力量比自己贡献出的还大。所以留下来无益,还是去的好!马上就要发生一个质变了,这是生死的质变。迎接它吧,不过心中不舒,因生为革命人,死后却成了被戴上反革命帽子的鬼了!呜呼,呜呼,此冤何时伸也!去了,去了,远了,远了,永别了……冤枉啊!问题算不清,死难瞑目!”

第三封遗书是《给父母亲》:“……我一向不关心家里事,父亲、母亲操劳、教育二十余年,然未得粒米之报,盖不会感到吃亏吧,不要紧,我自己已将自己二十余年大部分贡献给党的事业。孩儿作得如此不好,父母亲该责孩儿不力!望父母亲多辛苦,自力更生。望……勤教三个小妹,使她们更好地成长。望……努力学习,力争上游,不可再舍不得自私的想法。望……在儿死后,不要埋怨党,不要埋怨同学,不要埋怨组织,心胸开阔,健身长命。千言万语,忍心截止。”

工作团要求被打成“现行反革命”的赵瑛考虑自己的前途与下场,赵瑛写出一首诗歌《前途与下场》作了回应:

“前途!前途!谁要这个前途!

为了个人前途,可耻!可耻!

个人主义是毒辣的怪物

它使人说话与事实不符

它使人费尽心思达到可耻的目的

它使人忘掉国家的前途!

受到打击我心中痛苦

但想起了共产主义的光明大路

看到了敬爱的毛主席像
我痛苦就完全消除!

我
对毛泽东思想无限崇拜信仰
伟大的思想给了我巨大力量
在一片喊打声中
我不能倒下
倒下了
我要爬起来!
起来!
一定要起来!

不顾个人利益
不管名声多臭
计较名声不是共产主义者
计较这些不是革命者
为了党的利益
为了共产主义
有什么可计较的呢?!

下场!下场!
管他个下场不下场
革命者不应该管自己的下场
若要考虑这些
就不是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者!
呸!个人下场,呸!个人前途
虽然我只有二十岁
但我要它们滚蛋!

过去的胆小鬼

今日却一切都不顾
什么缘故？什么缘故？
因为我信仰毛泽东思想
心中有了共产主义，有了革命
一切不顾走革命的路！”

7月9日，西安交大的校学生会劳动生活部部长王永婷，怎么也想不通自己怎么就成了反革命分子。往日的同学朋友都疏远了，反目成仇来揭发自己，更不能容忍的是，把自己的私人日记和与情人的通信公开亮出，进行人身攻击，王永婷的人格受到极大侮辱。她忍无可忍，从宿舍三楼翻身跳下，以死抗争，结束了自己年轻的生命。

对她的死，工作团说：“一个反革命的死是咎由自取”。即把责任推到王永婷身上，又强迫学生要保密，不准乱说。可是纸怎能包住火，王永婷的死很快传遍全校，震惊了广大学生。一个学生，不过就是给工作团提了些意见，至于把人逼死吗？学生们非常愤怒，但还是敢怒不敢言。其实工作团这时也已惊惶万状，毕竟出了人命。他们立即决定停止批判学生，抛出彭康“自首变节”的档案材料，召开全校批判叛徒彭康大会，以此转移学生对工作组的愤怒。

在西安交大发生“66事件”的当天，贵州也发生了著名的“66事件”，从而拉开贵州文化大革命的序幕。

6月5日下午，贵阳师范学院召开大会，省委宣布撤销该院党委书记、四清工作队队长、文化革命工作组长黄辅忠的一切职务，由省委统战部长王林岗任贵阳师院文化革命工作组组长、四清工作队队长、代理党委书记。但不到24小时，王林岗就被轰下了台。

因为6月6日上午，贵阳师范学院师生召开声讨贵州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长兼《贵州日报》总编辑汪小川大会，批判他直至1965年12月19日才刊登姚文元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但同时又刊登反面文章为《海瑞罢官》辩护，有意把政治斗争淡化为学术性讨论。当天的《贵州日报》用三个版面刊登了长篇署名文章《坚决拔掉汪小川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旗》和编辑部文章《彻底揭露汪小川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动本质》。

声讨会结束前，刚刚代理学院党委书记的省委统战部长王林岗在

作总结发言时,不知不觉的讲起汪小川的光荣革命史,说汪小川是老红军、老共产党员、红四方面军的宣传干事,他犯错误就是“毛主席的书读少了,钻到廿四史等古书堆里面去了,工作之余喜欢写点东西”。

王林岗尚不知道,他的话已经引起了广大师生的公愤。下午,声讨王林岗的大字报便雪片般飞来,“立即撤销王林岗代理党委书记”、“斗倒斗臭王林岗”的大标语也刷出来了。

省委立即派人来看大字报,各系纷纷召开紧急会议,这些都如同火上浇油,师院师生怒火越烧越旺,广播室反复播放声讨大字报、呼喊“打倒王林岗”的口号。一些系的同学还把大字报、大标语贴到大街上。

晚饭后,系与系之间开始串联,声势更大,调子越升越高,不少大字报的矛头指向省委。他们到省委贴大字报,质问省委,到省广播电台要求电台播送他们的大字报,向西南局、中央发电报反映情况,上千人到《贵州日报》社张贴大字报,提出“要彻底揭露省委‘舍车保帅’的阴谋”,“彻底揭开省委阶级斗争的盖子”,要求邮局停售当天《贵州日报》。

晚24时,学院广播室播送了省委撤销王林岗一切职务的决定,全院沸腾。

事情并没有随着王林岗的撤职而平息。6月7至8日,贵州工学院、贵州大学、贵阳医学院、贵阳五中、贵阳二十中、省机械厅以及中国科学院贵阳地球化学研究所等都出现了这样的活动。机关干部、厂矿企业职工也有不少人参加进来,许多人跑到报社、电台和省委去送大字报,给中央发电报、写信。

随着《贵州日报》向全省各地的传播,“66”风暴很快席卷黔贵群山,各州县也飞来了炮轰《贵州日报》的信件。

中共贵州省委向西南局汇报,说学生要“捣毁报社”、“破坏电台”、“上街闹事”,并叫公安厅派人前往省广播电台制止学生闹事。

6月8日下午,省委常委召开紧急会议,他们按照1957年反右斗争的逻辑推断:攻击省委、攻击党报的,就是反党,就是“现行反革命”,把向省委和报社写“质问信”、贴大字报等行动定为“66反革命事件”,决定进行追查、处理和反击。于是,“68反击”开始了。

省委抽调干部130人组成7个工作组,1个观察组分赴8所大专院校,其中贵阳医学院进驻观察组。

贵阳市、遵义、毕节、安顺、铜仁、兴义等市地和省级各厅局所属学校,开展文化大革命共计153所,向这些单位共派出工作组147个,704人。

省委派工作组进驻贵州大学,从6月10日开始反击“66事件”。据统计,贵州大学公开攻击《贵州日报》的有119人,公开煽动、议论的有135人。工作组组长刘震东宣布:“凡是参加了这次反革命事件的人,都是参加了反革命。这是必须肯定的。但其中有的是主谋策划,有的是充当帮凶打手,更多的是盲从盲动,要区别对待。”工作组点名,中文系教师曲沐是学校里攻击党报的现行反革命分子,物理系党总支委员会是攻击党报的委员会。系总支书记张同生成为物理系的主要批斗对象。物理系主任黄润荣、物理系62级同学刘庸都被列为攻击《贵州日报》的“现行反革命”。贵州大学的打击面,占当时在校学生数(不含下乡四清尚未返校学生数)的50%以上。

贵阳师范学院学生杨文华在他日记中的这样写到:

6月8日

晚自习时系上通知要交待重要事情,先通知几个人去开会。我们等到十时,工作队的老徐非常严肃地到班上宣布6月6日我院发生的事是“反革命事件”。我一下子蒙了,啥?我们热血沸腾参加的是反革命事件?还没等我回过神来,刘某(我班参加刚才小会的同学)拿出一张大字报底稿念起来。这张大字报点明写质问省委大字报的余开生是反革命。另外几个参加开会的立即附和。刘某叫大家签名却没人响应,毕竟把一个同学打成反革命可不是件小事。

质问省委的大字报虽然不是我写的(如果当初的分工是我写质问省委、他写顾惠之的大字报,那当反革命的就是我了,好险!),但我积极地帮着贴、帮着挂,干系是少不了的。我冥思苦想了好久,决定连夜写一张检查。

6月9日

一清早把检查贴了出去,走了十几步又忽然想到,这样做岂不是不打自招,自投罗网。管他的,反正贴大字报的不止我一人,等等看。

我返身把检查撕了下来。

上午的全院师生大会再次把六月六日师院发生的事定为反革命事件,大会发言人声色皆厉,简直把全院师生都当成反革命训斥。他详细介绍了六六那天我院校内校外的情况,这些情况有的知道,甚至自己是目睹耳闻者、参与者,有的则闻所未闻,但忍不住想如果自己在场会参加吗?总之头皮发麻,心有余悸。会场周围有不少从未见过的人在巡视,据说学院已被公安厅的人包围了。真可怕!

下午各系追查反革命,除上午系的大会点的五个人外,又追查出了不少人,我班就有佘开生、沈某、黄某、孙某等五人。我也很紧张,紧张得昏乱了,想不起自己在质问省委的大字报上签了名没有,想不起那天说过什么话,做过什么事。一天要去看几次大字报,唯恐自己被点名,被揪出来。

贵州医学院二年级学生李同庆在6月8日帮助贵阳五中一位同学写了一张大字报贴到贵阳五中,内容是批评贵阳五中按兵不动、冷冷清清、甚而压制群众运动,而且,写大、小字报要经党支部批准才能贴出。大字报号召"五中革命师生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在这张大字报上签字的有18个学生。

这张大字报被认为是破坏文化大革命,四清后留在医学院主持党委工作的省委工作组负责人陈远吉通知公安局在6月8日当天将李同庆逮捕,并对签名的18人进行斗争。与此同时,医学院一些贴过单位领导、政治辅导员大字报的教师、学生也被打成反革命。院党委规定"每个班都要挖出牛鬼蛇神",口号是"绝对信任党委"、"依靠工农子女,依靠革命干部子女"。严密封锁与校外、班与班、小组与小组、人与人的联系。检查来往信件、规定活动范围、不准交头接耳、不准外出,亲友来访需经党委批准,学院气氛恐怖,被隔离审查的有100多人。学生人人提心吊胆,写了大字报集体推敲,连标点符号也不轻易放过,一遍又一遍地修改。贴出后吃不下饭,睡不着觉,若听说有人批评,一寝室的人围着哭。有的同学把衣服、洗漱用具带在身边,随时准备坐牢;有的半夜梦中惊叫:"我不是反革命!"

到7月10日,贵阳地区被迫自杀的达189人,其中身亡107人。拘捕206人。在省级八个系统和贵阳市的3万多干部中,打击面达8.

1%。据不完全统计,全省共有7200多人被打成“反革命”。对他们开批斗会,还私设监狱关押,遣送农场劳改。仅贵阳医学院在“66事件”中抓“反革命”受株连273人,被逼自杀的有基础部主任朱清干和生化教师林敦英等2人,被逮捕的有3人。

# 第60回：六月七，兰州城又生事端 斗老师，学校“池浅王八多”

说完了西南，再回到西北，早在1966年4月杭州会议期间，甘肃省委第一书记汪锋就和西北局第一书记刘澜涛商量如何在甘肃开展文化大革命的问题。他们确定兰州大学校长江隆基为西北地区文化大革命的批判重点。

江隆基，1927年入党，原北京大学党委书记、副校长，著名教育家，1959年调兰州大学，在教育界和社会上有很高的声望。文革初期，他代表学校党委领导文化大革命，提出“五点意见”，想将运动控制在一定范围内。

5月20日，中共甘肃省委先后召开各种座谈会，号召各界积极行动起来，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5月24日，省委第一书记汪锋到兰州大学，批评了江隆基。5月28日，他在兰州作文化大革命的动员报告，批评江隆基所提出的要区分两种不同性质的矛盾是“糊涂观浆子观”，说文化大革命中不存在什么“左”的问题，而是一直要反对右倾。于是，5月31日，兰州大学历史系一些学生响应汪峰讲话的号召，贴出《驳“不准质问校领导”之怪论》大字报，还给省委写信，反映校领导有右倾思想，领导文化大革命不力。这时，聂元梓的大字报还没有广播。甘肃省委正在兰州饭店召开甘肃省文化革命积极分子会议，兰州大学历史系推荐李贵子参加这个会议。

李贵子是是兰州大学历史系五年级的学生，来自农村，正在积极要求入党。6月2日，他和历史系一些学生又贴出《我校领导的严重右倾保守思想必须立即纠正》的大字报。

6月4日，根据中共中央指示精神，中共甘肃省委向兰州市各高等院校派文化革命工作组。以张韬为组长的7人省委工作组来到兰州大学。

6月4日到6日,省委副秘书长程萍召集兰州高等学校一些学生在省委座谈,称李贵子为“左派”,并向他“交底”,表明省委对江隆基问题的态度。

6月6日,进驻兰州大学的工作组召开全校大会动员参加文化大革命。江隆基在会上检查了自己的右倾思想。

6日下午,程萍到兰州大学学生宿舍和李贵子谈话,授意“相同观点的同学可以打破系、班的界限,自动联合起来作战,并用滚雪球的办法逐步扩大自己的力量”。当晚,李贵子找物理、现代物理、生物等系一些学生开会,成立了“联合战斗小组”,后被称为“李贵子小组”。李贵子由于不是党员,被选为副组长,但始终由他和省委保持单线联系,后来担任了组长。

第二天,6月7日,李贵子小组就贴出《江隆基公开诋毁毛泽东思想》大字报,直接点明批判江隆基校长,当即在学校引起强烈震动。许多同学早就对李贵子等人攻击江校长的行为不满,认为他们歪曲事实、颠倒黑白,贴出大字报反驳。此时,还有大批学生拥到办公楼前进行辩论,并请了江隆基本人出来表态。由于人群越聚越多,后来辩论改到大礼堂内进行,省委工作组组长张滔主持,李贵子等人受到围攻。工作组正副组长相继发表讲话。副组长李磊甚至说:“你们斗争李贵子不如斗争我!”明确表示坚决支持李贵子。但是,同学不服,工作组直到下午18时收不了场,校长江隆基出面才解了围。

此时,院内师生议论纷纷,空气异常紧张,已有一些同学开始怀疑工作组。当天晚上,有学生向中央打电报、打电话、写信,反映学校的情况,还有200多名学生跑省委去争辩。他们在电报中说:“甘肃省委派来的7人工作组在领导运动中有严重问题,他们不依靠广大的革命师生,却站在少数的别有用心的人一边,造成我校运动的严重混乱。”

李贵子等人当晚也在工作队保护下到省委报告,并连夜写了《关于我校文化革命运动近两日状况向省委的报告》。省委当即准备反击。工作组长张韬布置记下写反对工作组和省委大字报的人名。在西安开会的汪锋打电话给省委传达西北局第一书记刘澜涛的六点意见:

一、兰州大学的工作组加强为工作团;

二、叫江隆基来谈话,指出他的“五点意见”是反对毛主席领导的文化大革命的意见。今天江在会上的讲话是支持右派;

三、分析明天会出什么事,准备对策;

四、给来省委请愿的学生照相,准备秋后算账;

五、搞一个文告,“指出江的错误,加强领导,放牛鬼蛇神出笼”;

六、若有学生给中央打电话、发电报,要将电话内容记下,将电报底稿留下。

根据刘澜涛、汪锋指示,主持省委工作的书记处书记胡继宗、马继孔等连夜召集会议,做出决定:

一、“67 事件”是江隆基煽动右派学生赶走工作组,反对省委的严重反革命事件;

二、抽更强大的工作团进驻兰大,发布“文告”;

三、如学生在发布“文告”后不服上街“闹事”,拟调工人对付;

四、到军区动员部队,不带武器,劝阻可能上街的学生。

以上各点,除去军区未同意调动部队外,其余皆迅速组织实施,争分夺秒,和指挥作战无异,只是要对付的敌人是学生。

6 月 8 日清晨 4 时起,甘肃省委陆续派了 150 人的庞大工作团进校。8 时召开全校师生员工大会,宣布后来称之为“六八文告”的公告。公告中说:“李贵子等同志批评学校领导严重右倾,及时揭露牛鬼蛇神破坏运动的罪恶活动,都是正确的。”

从此,对“67 事件”中反对过李贵子、反对过工作组、怀疑过省委的师生进行疯狂的迫害。各系各班追查每人在“67 事件”中的表现。大批师生被打为反革命。学校设立“自首台”,各处张贴“通缉”大字报,上面详细描绘了“67 事件”中的“牛鬼蛇神”容貌特征。

北京,6 月 6 日,北京师范大学女附中在工作组主持下,成立了“革命师生代表会”,其中,教师代表 2 人:数学老师李松文和生物老师陈大文;学生代表 5 人:刘进、宋彬彬、马德秀、耿丽兰、尹斐。刘进是学生代表会主席,其他 4 人为副主席。当天宣布复课,恢复正常秩序。所谓复课,就是学生每天在教室里读报纸、学社论,上下课铃照常响。老师不教课了,组织起来也是学社论。工作组的指导思想是让运动有序进行,先揭发,再慢慢梳理,找出问题的重点。

很快,工作组制定了从“普遍揭发”到“重点揭发”两大步骤的计划。对教师进行排队、整理材料,学校的老师和负责人都成了被“揭发”的对象。老师学生之间不再讲礼貌,学生对老师,直呼其名,进而咒骂喝斥。整个学校贴满了大字报,攻击学校原领导人和教师。几乎每个教师都被大字报攻击。有的学生在教研组门上贴上“鬼斋”、在教师宿舍区贴上“狼狗窝”。

在大字报上,揭发校长卞仲耘的一条“罪状”是参与前中共北京市委“搞军事政变的反革命活动”。且不论是否有这样一个军事政变阴谋,即使有,也怎么会让一个中学女校长知道呢?但当时没有人发出质疑,也不准本人辩解。

卞仲耘的另一“罪状”是“反对党的阶级路线”,主要证据之一是,在1962年,国家主席刘少奇的女儿刘平平曾经因两分之差未被师大女附中录取,后来进了北师大一附中。而实际情况是,当时重点中学有录取分数线,对入线的学生,优先录取高干子女。尽管这个分数线相当宽松,刘少奇的女儿仍然差两分达不到分数线。学校请示了中共北京市委和教育局,按照上级指示不录取。

卞仲耘还有一条“罪状”是“反对毛主席”,证据之一是,1966年3月北京的邻近地区发生地震,为学生的安全,学校领导告诉学生,若地震发生,要赶快离开教室。有学生问,如果这种情况发生,是不是要把教室里挂的毛主席像带出来,当时每个教室的黑板上方都挂有毛泽东的像,她未正面回答这个问题,没有说要也没有说不要,只是告诉学生说要尽可能快离开教室去室外空旷的地方。

工作组大力支持,推波助澜,大字报越写越多。这些大字报还被分门别类整理并用蜡纸刻写后油印出来,装订成册。

6月8日上午,清华附中西侧通往体育学院的路上突然出现了黑压压的一片自行车队伍,他们是海淀区的人大附中、北大附中、地质附中、北航附中等学校以及城区的四中、六中、八中、十三中、二十六中等学校300多人,相约前来声援清华附中的红卫兵。那时候,自行车是中国家庭上下班的主要交通工具,普通老百姓几乎没有人可以给孩子买自行车上学,只有工资收入较高的高级干部家庭才可能让孩子骑自行车上学。由此可见,这次来的几乎全是干部子弟。清华附中的学生

和学校领导哪里见过这种阵势,他们怕出事,便以“维持秩序”为名关了校门。前来声援的学生进不去学校,都拥挤在校门外。清华附中副校长、党支部书记韩家鳌,前两年刚刚切掉一个肺,此时不得不冒着烈日到校门外劝解外校同学回本校去,不要无组织地串联,以免发生意外。他站在校门口一个课桌上,大声呼吁:“我们搞什么活动都是要按照学校的安排。”

根本不起作用。

“17 级干部,我们家有好几个呢!”这是攒动在人群中的一句调侃的名言。在那些“以天下为己任”的干部子弟心中,是没有把他这个校长放在眼里的。在群情激昂的人群里有人开始对校长推推搡搡,这一下激怒了那些拥护学校领导的学生。高三二班工人出身的宣夏芳,就是在这种激昂的气氛中愤而站出的一位同学。她以“宣战”为笔名写了一篇大字报,题目是:《致×中的干部子弟们》,并且当众朗读,她说:

“什么是红卫兵,是反动组织黑卫兵”,你们“后面是靠不住的冰山”,“我们要用鲜血保卫党支部,保卫党!”

虽然宣夏芳出身没有问题,却为此在其后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外校的学生在校门外坚持了 10 个小时后,终于被允许进入校园。他们与清华附中红卫兵一起,在校园里刷了许多大字报、大标语。为了表示对清华附中红卫兵的支持,好几个学校的学生都在自己写的大字报和大标语上署上了 XX 学校红卫兵的字样。其中,人大附中红卫兵和四中红卫兵分别送给清华附中红卫兵一副对联,一幅写的是:

“先驱者,为革命,洒尽碧血;后继人,保江山,掏出红心。”

另一幅写的是:

“为革命,纵一死,又有何惧?! 捍专政,复永生,血染河山!”

这天,主持团中央工作的胡克实给中央团校哲学室主任、海淀区工作队副队长刘晋打来紧急电话,让他带工作组去清华附中支持红卫兵,并要求他每天晚上 21 时用直线电话汇报情况。

当晚,团中央派出的工作组没有声张的进驻清华附中。工作组组长章建华,组员多是在中央团校学习的各地团干部,工作组一共 15 人。同时,刘晋也常驻清华附中,指导工作。

次日,6 月 9 日晚,工作组在学校操场召开全校师生大会,刘晋在

会上旗帜鲜明地表示坚决支持红卫兵,称红卫兵是坚定的革命左派。他严厉要求以万邦儒为首的附中党支部老实交代自己的问题。

形势的突变使大操场一片愕然,红卫兵随即以胜利的姿态贴出题为《在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下团结起来》的大字报。

大凡当老师的都有个臭毛病,喜欢学习成绩好、举止文明的学生,而不喜欢那些学习成绩差、上课调皮捣蛋、三天两头缺课逃学的学生,所以,在选拔学生会干部或班干部、评三好学生等方面,总是有意无意地偏向前一类学生而排斥后一类学生,并经常给予训斥、歧视。直到这类事情被写上了大字报,很多老师和学校领导才大吃一惊地发现,原来他们一贯喜欢的那些学生有很多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而他们不喜欢的甚至惩罚过的那些学生,原来有很多是工农家庭出身的。这是什么"阶级感情"?这些校领导和老师们爱什么人?恨什么人?他们要为哪个阶级培养接班人?他们希望哪个阶级的子女学好文化知识以便将来骑在哪个阶级子女的头上?

学校自古以来就是学习的地方,因此,许多学校领导和老师只强调学习好而不关心政治。他们树立的榜样一般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学生,在课堂上宣扬最多的肯定是"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思想。那还要不要"突出政治"?

当时学校的中年以上教师基本上都是从旧社会过来的旧知识份子,在讲课时或平时与学生和青年教师的接触中,难免说出一些带有封建思想色彩或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色彩的言论。在课堂上宣扬"封、资、修毒素"的案例可以说是比比皆是。

招生中只重考试分数而不重阶级成分,把若干升学考试中成绩优秀但家庭出身不好的学生优先招进了学校,自然,相应地就把那些成绩较差的工农子女关在了学校大门外。这是什么阶级感情?

有的老师在上学期间参加过国民党的"童子军"或"三青团";有的人当过国民党政府的公务员,并且在当公务员期间为了保住饭碗而集体加入过国民党;有的人在解放前参加过进步学生运动,还加入过共产党的地下党或外围组织,但由于逃难、迁居、家人劝说(当时参加地下党活动是要杀头坐牢的)、党组织被破坏等原因而主动或被动地脱离了组织,主动或被动地停止了参加地下党活动;有的人在解放前

当过报刊编辑或记者,而在文革中被学生查出其在解放前报刊上发表的文章中有歌颂“蒋委员长”的语句,或“值此勘乱建国时期”、“共匪”之类字样,等等。

当这类问题一个接一个地被大字报揭露出来时,人们发现,隐藏在教师队伍里的阶级敌人越来越多,越来越感到触目惊心。而这些现象,恰恰印证了毛泽东3月“杭州讲话”中提出的问题。于是,有人就在大字报上写下了这样的对联:“庙小妖风大,池浅王八多”;也有人画出了本校的“百鬼图”。至于教师队伍中何以有这么多的“阶级敌人”,原因自然被归结为是学校领导“长期招降纳叛”的结果,如果学校领导者本人也有历史的或现实的“问题”,那结论自然就是:该校领导是个混进党内的阶级敌人,长期招降纳叛,网罗牛鬼蛇神,企图在学校实行资产阶级统治。这些“问题”,在当时的各大、中学校里是普遍存在的,几乎没有哪个学校是无懈可击的,没有哪一个学校的领导人是可以全身而退的。运动发展到这一步,几乎每个学校都发出了打倒校领导的呼声。

学校里批斗老师、领导、甚至学生的情况非常普遍,几乎每个学校都有,清华附中高六三二班团支部书记王家强、高三二班的宣夏芳几乎每天都会被批斗,而且很残酷。学校无人管理,打人的现象越来越多,先是打学校领导和老师,后来又有打学生的。

# 第61回：清华园，高干子弟冲在前 霎时间，蒋南翔迅即倒台

6月6日和8日，刘少奇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听取北京地区“文化大革命”情况的汇报。

李雪峰提出：“这次运动，应该制定一个决定，明确打击的重点是什么？黑帮和黑线的标准是什么？不然，群众心里没数，我们心里也没数。”

刘少奇说：“这次文化大革命，比57年反右还要规模大，意义也深远。现在还是要放手一些。我们要善于领导和敢于领导这次运动。首先要敢于领导，引火烧身，主动检查自己的问题和错误，自己站在运动的前面；善于领导就是要避免被动，避免领导落后于群众的那个局面。这次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是清除那些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人和资产阶级的权威人物，重点应该放在吴晗一类人上面，他们就是社会主义历史时期的阶级敌人。不管出现什么问题，不要转移了这个目标和视线，也不要分散目标，要让广大群众和吴晗、廖沫沙、邓拓一类的黑帮划清界限，明确政策。知识分子有左、中、右三类，通过这次运动，要把他们划出来。这样我们就可以明确将来依靠谁，团结和打击谁了。这样便于我们对广大群众采取团结、教育和改造的方针……”

针对各地纷乱的局面，刘少奇根据毛泽东“相机处理”的指示，在会上拍板说：“哪里出了事，就往哪里派工作组，要像消防队员救火那样快。”

6月9日，高教部部长蒋南翔被宣布打到。虽然6月2日，清华园已经出现了责问高教部部长兼清华大学校长蒋南翔的大字报。但是，6月3日，蒋南翔依然对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说：“周总理要我负责高教部、教育部两个部文化大革命工作，还要我亲自过问一下西安交大的运动。”似乎颇有信心。

到了6月4日上午8时,清华大学传达李雪峰的报告后,大字报内部馆开放。自控系廖先湜的大字报“清华党委是三家村黑店的分号”,再次将矛头指向清华大学校党委。

当晚19时,清华大学自9班学生刘涛等7人给校党委贴出大学报:《这些事实说明了什么?》

刘涛,刘少奇的女儿。

到了第二天上午9时,清华大学又出现贺鹏飞、乔宗淮、刘涛、胡劲波、袁塞风等高干子弟贴出的大字报:《清华党委应采取积极态度领导文化大革命》。虽然他们只是要求党委站到运动的前列,但大字报的语气却是居高临下,命令式的。

在人们的心目中,党委从来都是至高无上的,有谁敢于对党委发号施令?

贺鹏飞,贺龙的儿子;

乔宗淮,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的儿子;

胡劲波,团中央书记处书记胡克实的儿子;

袁塞风,总政治部保卫部副部长袁光的儿子。

一批高干子弟带头反对校党委,使许多人预感到清华党委可能要垮台。随即,清华大学贴出700多张大字报批评校长蒋南翔和校党委紧跟旧北京市委,反对文化大革命。但是,很快又有一万多张大字报反对批判蒋南翔,提出“保卫蒋校长、保卫校党委!”

上午11时,全校召开大会,听蒋南翔《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充分发动群众,将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报告。蒋南翔在报告中认真检讨,并表示要积极主动领导运动。下午,校党委组织“你这几年的成长说明了什么?”的讨论,以证明其一贯正确。实习工厂的工人师傅贴出拥护党委的大字报。

6月5日晚,就在北航12位高干子弟聚集在赖锐锐家写大字报的同时,贺龙的儿子贺鹏飞也在家里由他妈妈陪着写了一夜大字报,还由贺龙秘书帮助修改。

又过了两天,7日,工程物理系04班班长阎淮和阎承志、顾逸东、王国力等4名干部子弟团干部,贴出《这是为什么?》的大字报,批判校党委为压制运动而采取的各种做法。有同学贴出“清华的聂元梓站出

来了!”的大标语以示支持。这天,清华大学一些干部子弟:全国总工会主席刘宁一的女儿刘菊芬、刘少奇的女儿刘涛、贺龙的儿子贺鹏飞等人再贴大字报,反对蒋南翔和校党委。他们依然遭到大多数党员和党外群众的反对。多数派师生与少数派学生展开了大辩论。北京大学生物系学生杨涛不顾工作组的劝阻跑到清华大学张贴反对清华大学党委的大字报,声援批判蒋南翔,“揭露”蒋南翔在北大历史系半工半读班开学典礼上颂扬邓拓的“罪行”,与清华学生发生争论,而后升级到西阶、大礼堂成为辩论会。会上,邓晓岚、黄志冲、寇世琪、遇平静等发言成围攻杨涛之势。辩论会大长保蒋派志气,到12时30分方散。清华大学派人把杨涛等人押送出校。

到了6月8日,清华大学反蒋、保蒋的大字报、大辩论愈加激烈。一场关于清华党委是“延安”还是“西安”的争论趋于白热化。

这天,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艾知生接到北京新市委的电话通知,晚上工作组进校。清华大学党委3位副书记刘冰、胡健和艾知生接待了工作组负责人、时任冶金工业部副部长的周赤萍。周赤萍到清华大学的当晚即宣布:次日工作组将接管清华大学,校党委停止工作。

6月初,以教育部办公厅主任赵秀山、司长肖克杰为代表的左派们率先开始批判高教部长蒋南翔。但随后,他们这些炮轰蒋南翔的少数派在本司局都受到了压制。蒋南翔还在教育部干部会上传达了中宣部代部长张际春对教育部文革的几点指示。

然而,好景不长,6月8日晚,中央派人召集高教部、教育部两个部的司局以上干部开会,联合批判蒋南翔,批了一夜,说他是黑帮。

6月9日一早,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国务院文教办公室主任张际春的夫人罗屏于来到教育部“辟谣”说,蒋南翔所传达的所谓张际春几点指示纯系谣言。

初夏的这天天气炎热,人们簇拥着、呼喊着“罗屏同志”,争着和她握手。曾经反过蒋南翔的左派们一下子都成了风风光光的英雄,他们扬眉吐气地见到了救星。而保过蒋南翔的“保皇派”则声泪俱下地痛表反戈一击。人们情绪激昂地喊着“向罗屏同志致敬!”“罗屏同志的到来大长无产阶级志气,大灭资产阶级威风!”。蒋南翔闻讯赶到时,罗屏正在院子里热烈地讲演和慰问遭迫害的左派们。蒋南翔例行公

事地试图与罗屏握手,周围教育部大院自发组织的小红卫兵们急得满头大汗地喊,“别跟他握手!他是坏人!”罗屏立即缩回了手。从此,这些教育部大院红卫兵以立场坚定、爱憎分明的形象开始在教育部文革的舞台上显露头角。

这天,张际春在高教部宣布:蒋南翔是黑帮,已被停职反省。

蒋南翔成为中央定性的走资派,是文革前“十七年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总后台”。从此,他成了教育部大院里的头号敌人,被大会批、小会斗。在各司局和全部的批斗会上,他先是弯腰低头接受批判,后来被喝令跪下,常被推来搡去。教育部大院里批蒋的大字报、大标语铺天盖地。一次,一个初一的女红卫兵厉声质问蒋南翔:

“说!你和蒋介石什么关系?”

蒋南翔莫名其妙的回答说:“没有关系。”

“胡说!你不老实!你们都姓蒋,你们都反党反社会主义!怎么没关系?老实交代!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红卫兵怒斥道。

有几位小学三、四年级的小学生,也写了大字报贴在和乐堂后墙上。大字报全文是:“蒋南翔,大坏蛋,白吃人民大米饭”。那稚拙的字体得到了人们的啧啧称赞:“这孩子的革命精神多强!”“文化大革命真是史无前例呀!连小孩都发动起来了!”

6月9日,北京市委派出以国家经委副主任叶林为组长的528人的工作组进驻清华大学,接管校内一切大权。霎时间,清华园内风向大变,反蒋的大字报占了上风。

6月10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决定停止蒋南翔高教部部长、清华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的职务,并令其反省。清华少数派倍受鼓舞,欢呼雀跃,许多学生、教师认为自己受了蒋南翔的骗,纷纷起来揭发、批判蒋南翔和校党委,广大群众则对迅速变幻的局势茫然不解,多数派内部迅速开始分化。

这天,在学生宿舍附近的一条小路上,清华大学团委书记方惠坚流着眼泪对工程力学数学系的学生叶志江说:“我犯错误了,也连累你犯了错误。”

叶志江是当时清华大学闻名的高材生。他于1963年秋季入学。1964年上半年便在《数学通报》上发表了两篇论文,一篇是关于火箭

运行轨道的计算,另一篇是《对“正项级数判敛的一个方法”的进一步讨论》,他提出了自己的推论(定理)并加以证明,而国外一位知名数学家在1954年提出的同样的定理时则未加证明。杂志编辑对此表示了特别的鼓励。叶志江因此受到学校和北京市领导人的关注和接见,并被清华大学树立为“又红又专”标兵。他的事迹刊登在全国十几家报纸上,与当时另一位全国“又红又专”标兵,南京大学的温元凯齐名。

聂元梓的大字报广播后,方惠坚和叶志江几乎“形影不离”。在方惠坚的指导下,叶志江贴出保卫清华党委的大字报,受到了主管校共青团工作的校党委副书记艾知生的大会表扬,说他的大字报“很有说服力”。现在,这一切都已成为叶志江的罪状。年仅21岁,毫无政治斗争经验的叶志江无法猜测“犯错误”后会面临何种命运,但他知道很快会失去自由。于是便匆匆赶回家中看望了父母,然后独自一人来到北京图书馆,在石凳上默默地躺了几个小时。当他回到学校时,清华园已再次沸腾起来了,人们开始大规模批判蒋南翔。一夜间,各级党政干部,学术权威,乃至部分学生和教师都仿佛去阴曹地府领了封赏,一个个都头顶纸糊的高帽子,成了大大小小的牛鬼蛇神。叶志江这个闻名全校的“高材生”,校党委的“红人”也被册封为“叶鬼”,除了批斗,就是被关押在宿舍里供人观赏和羞辱。

6月11日上午,清华大学工作组副组长召集全校干部大会,宣布工作组来清华“夺权”,并要到会干部“老实交代”。系总支书记、支部书记全由工作组兼任或指派他们心目中的“左派”。工作组提出:“清华大学修正主义是一棵黑树,树干是校党委,树枝是下面所有的干部”,因此,应该“全部打倒”,否则“不能根除”。

于是,学生在教师、干部吃饭的食堂门口贴了一幅对联:

氦氖氩氪氙惰性十足

吃喝玩乐睡不问国事

横批是:一群混蛋

到底是理工科的骄子,巧妙地用元素中期表中的惰性气体讽刺教师和干部。

工作组刚进校,有同学贴出对干部的《十条通令》大字报,工作组说这张大字报“长无产阶级志气,灭资产阶级保皇派威风”,并在全校

广播,分别在各系宣布、传达到全体干部。这《十条通令》的主要内容是:

(1)必须彻底交代“黑组织”;

(2)必须交代假起义,交代幕后策划人;

(3)6 月 14 日以前向工作组交出“黑名单”;

(4)没有工作组的许可,都留在宿舍里,随叫随到,等待审问;

(5)绝对服从工作组的命令;

(6)不准动工作组同志一根毫毛。

这样一来,所有干部一律靠边站,都被关在屋子里,置于先“上楼”检查、再“下楼”过关的境地。所谓“下楼”,就是以“检查错误,交代罪行,自觉上纲,挖出黑心”为标准,人人检查,逐个过关。于是,干部们整天写检查,写思想汇报、活动汇报,交代材料。出校门要请假,连学生辅导员、级主任也不例外。清华大学工作组的做法基本是采用“四清”时《桃园经验》的做法,群众形容是:“游街一大串,斗争会一大片,劳改一大队。”

6 月 12 日,党中央和国务院正式宣布前高教部长、前清华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蒋南翔停职反省。北京大学师生前往声援时,张承先驱车前往,要求师生们返回学校并以“如不马上回校,就记下你们的名字”相威胁。

清华大学工作组成员接管学校各级组织后,将 112 人定为走资派,16 人打成反动学术权威,50 多人当成牛鬼蛇神。

清华处于混乱、瘫痪状态。从 11 日开始,清华园内出现乱抓“黑帮”戴高帽子游街的现象,这是学习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介绍的农民斗地主时给地主戴高帽子的做法。系里同学抢不到校级大黑帮,就把系领导和支部书记等小黑帮,以及一些辅导员和学生干部等保皇派,戴高帽子游街示众,甚至 出现谩骂推搡等野蛮行为。12 日,游街现象愈演愈烈,从早到晚,清华大学到处是自发游斗“黑帮”的散乱人群,工作组多次劝阻不能奏效。直至深夜,工作组还在通过广播台广播,劝说同学们回去睡觉。

6 月 13 日,叶志江第一次被学生揪出去带高帽子批斗。因为他不老实,故意弄坏三顶戴在头上的纸帽子,数力系的一个学生将一个装

了墨汁的痰盂扣在他的头上。他从头到脚都被泼上了墨汁,真正成了一个“黑人”。叶志江悲愤莫名。但就在此时,他看到站在面前的低年级学生陈育延眼中充满了同情的眼光,心中生出很大的安慰。

14 日,工作组为了结束基层的无组织状态,各班选举文革小组,系里选拔文革委员会。

15 日,在工作组和各级文革领导的共同努力下,清华揪斗乱象迅速得到制止,谩骂和人身攻击的漫画和杂文被禁止。清华园恢复了平静。至 16 日,清华大学有 103 名干部被戴上高帽子游街示众。

工作组力图把清华文革运动纳入他们的领导轨道,他们不同意学生们揪斗干部并将干部戴高帽游街的做法。一些工作组组员批评那些搞戴高帽游街的学生觉悟太低,没有政治头脑,是一群乌合之众。工作组的努力受到一些师生的反感或抵触。

起初,反对校领导的学生们对工作组进校是热烈欢迎的。因为,工作组一进学校,便宣布接管学校的党政大权,致使原先的校领导处在接受审查的地位,事实上“靠边站”了,这对反对校领导的学生来说,是重大胜利。其次,在中央和地方党政组织向各学校派出工作组的同时,也对少数在前一阶段的“揭批资产阶级教育路线”中被证明是“罪行”严重,且“民愤”很大的某些校领导做出了组织处理决定,例如:原高教部部长、清华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蒋南翔、南京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匡亚明等,被停职反省或撤销一切职务,而这些组织处理决定通常是由进校后的工作组宣布的。因此,工作组进校后,在全国校园中普遍又掀起一轮新的批判校领导的高潮。

但是,很快工作组就发现自己处在一种十分矛盾尴尬的境地中。

首先,他们在任何公开的场合都必须表明自己是热烈地、无条件地拥护文化大革命的,是支持革命师生将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否则的话,派出他们的前提条件就不存在了。而实际上,工作组甚至派出他们的各级党政领导人,绝大多数不清楚发动这场运动的意图和运动发展的方向,不知道这场运动到底该怎么搞,甚至对这场运动本能地有一种恐慌。正像刘少奇对李雪峰说的那样:

“这次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是清除那些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人和资产阶级的权威人物,重点应该放在吴晗一类人上面,他

们就是社会主义历史时期的阶级敌人。”

把矛头指向吴晗一类人,实际上是指向所有的知识分子及受这些知识分子教育、影响的学生。因此,工作组进校后,普遍在师生中“摸底”,对师生进行“左、中、右”排队分类,秘密召集所谓“左派”学生开会,或指派“左派”学生悄悄搜集其他师生的言行材料,等等。所有这一切,都引起了学生们的怀疑和不安。

# 第62回：生疑问，工作组遭遇轰赶 请“尊驾”，众领导再聚杭州

6月2日，北京新市委派出的工作组3人来到北京工业大学，学生们议论纷纷，有人质问工作组“是从哪里来的？”派遣机关“是新市委还是旧市委？”“为什么不带介绍信？”

工作组成员马上回答说：“这就派人回去取介绍信。”

这时又有学生登高大呼：“他们想逃跑！”

当天，工作组和校党委被包围，校党委自认“瘫痪”，无法召集会议，各系联系中断。直到6月6日，学生对工作组的怀疑仍未消除，工作组的一言一行都有人记录下来，更有甚者，还把工作组的讲话录音，然后逐字逐句予以批驳，并派代表携带录音到新市委和中央机关告状。

工作组进校伊始，各校都发生了拥护工作组和反对工作组两派相互之间的辩论、指责和批评，双方互不相让，对立情绪极重。拥护工作组派人多势众，既有《毛主席语录》为依据，又有工作组的支持，一时间占尽上风。反对工作组派势单力薄，但一方面他们也从毛泽东的讲话中找到武器，另一方面有中央报刊不断的鼓舞，虽然受压却绝不屈服。他们迅速组织起来，贴出了“学生运动天然有理”的大幅标语，根据《人民日报》连篇累牍社论的精神，大胆地向工作组展开了反击。他们说，中央“八条指示”限制了师生们参加文化大革命的权利，是背着毛主席搞的“黑八条”，“是套在我们脖子上的紧箍咒”。有人甚至援引宪法，认为学生应该享有言论和成立学生组织的自由，即使上街游行也是合法的。

某中学的大字报栏中贴出这样一张大字报，开头援引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下文据此论证说，学生组织是合法的，上街游行也是正当的权力。这张大字报被人框上了一副对联，上联为：奇文共欣赏；下联为：疑义相与析；横

批是:新天方夜谭。

校园里群众中的两派开始逐渐形成。工作组面临着相当严重的形势。拥护工作组和反对工作组的双方针尖对麦芒,互不相让,终于在部分学校引发了一场“驱逐工作组”运动。

6月4日,北京邮电学院的学生喊出“工作组滚出去”的口号。此时,该校工作组进驻时间仅仅4天。愤怒的学生赶走工作组的原因,是因为工作组公开要保校党委。少数学生高喊:“保皇的工作组快滚他妈的蛋!”有的学生把工作组的行李扔到墙外,连脸盆都砸扁了。

很快,邮电部又派出以邮电部政治部主任朱春和为组长的工作组进驻该校。中央工交政治部副主任陶鲁茄6月13日到北邮讲话,说明工作组是革命的。结果招致部分学生给他贴了一批大字报。

继北京邮电学院赶走工作组之后,几乎所有学校都出现了反对工作组的大字报。许多学生引用毛泽东《送瘟神》的诗词,在操场上、饭厅前焚烧纸糊篾扎的“瘟神”,高唱“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与此同时,一些学校的学生还刷出了大标语,如“革命不需要保姆!”、“踢开工作组,自己闹革命!”等。

但是,这些反工作组的学生们并不知道,工作组以及站在工作组背后的上级党政领导人早就张网以待,就等着“右派”学生们自己跳出来了。

6月10日,北京金融学院金融系10名青年教师和系里的一部分学生组织群众集会,揭发院系领导的问题,并把矛头指向了商业部派来的工作组。院党委书记陈如龙和工作组说这是“向党猖狂进攻”的反革命事件,10名青年教师被打成反革命。工作组召集金融系的教师干部在当天下午和晚上连续两次组织斗争会,强迫这10名教师承认自己是“反党”、“反革命”的行为,要求他们交代“反党纲领”。宣布对他们“实行专政”,“只许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在工作组和校党委的鼓动下,许多群众不分昼夜到那些被打成反革命的教师和学生的宿舍围攻、声讨、斗争、示威,在楼道走廊、宿舍内外、床上桌子上、书上,到处贴满了“打倒XXX”,“反革命”,“反党分子”,“混蛋”等标语、口号,甚至把标语、漫画贴在他们的背上。学校还让同学昼夜站岗放哨,拿着木枪、木棍看守他们,对他们实行隔离,限制自由,不准他们找

人谈话,监视他们的一切行动,即使到了半夜一点钟以后,还有人每过一会来敲打一次门,不让他们睡觉。

北京最早进驻北京大学的工作组组长张承先,力求最大限度地稳定学校的局势,以保障运动按照上级的意图发展。鉴于北大党委及所属党总支,除聂元梓掌握的哲学系外已全部陷于瘫痪,工作组首先吸收了原北大党委副书记戈华和原北大党委常委、教务长崔雄参加工作组领导小组。张承先认为戈华、崔雄和陆平"黑帮"不是一伙的,在旧党委内,与旧党委是进行斗争的、受排挤的。

紧接着,中央又从国务院部委、各省市和海军航空兵领导机关抽调大批人员参加北大工作组,进驻校、系两级机构。6 月 7 日,从校到系已全部实现了工作组的领导。到 6 月 10 日止,北京大学工作组已有成员 208 名。其中地方干部 122 人,军队干部 86 人;13 级以上高级干部 62 人,14 至 17 级干部 83 人,18 级以下干部 63 人。

由于 6 月 1 日后,来北大声援、参观、看大字报的人群络绎不绝,从未间断。6 月 7 日,北大工作组规定:外校人员不得自由出入学校内部。当天,北大校门口贴出公告,要求"外单位声援的代表和队伍,一律在学校门口接待室接待,请不要进入学校内部。校内大字报正在整理,暂不开放。"

这一公告引起许多学生的不满。

6 月 9 日,张承先在给李雪峰上报《北大文化大革命一周基本情况和初步打算》中表示:"要彻底摧毁北大这个被资产阶级长期统治的反动堡垒",把"领导权夺过来","批判和清洗好那些混进党内来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在报告的最后,张承先指出:"北大当前斗争的焦点是要挖掉钻入党内的以陆平为首的这一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黑帮。""集中力量对准反革命黑帮的核心集团大揭、大批。"

然而他并没能控制住局势……

6 月 10 日,北京大学的大批判开始从大字报的文字批判发展到人与人面对面地批判、揪斗、乃至动手打人的现象,首当其冲的是陆平与冯友兰、冯定、翦伯赞、朱光潜等人。他们被学生批斗、抄家后,又被关进了牛棚。从 6 月初到 6 月中旬,北大各系各单位发生的揪斗干部、教师的行为逐步升级。从戴高帽子、挂黑牌、推搡,发展到揪头发、坐

“喷气式飞机”、毒打、往身上贴大字报等。张承先让工作组采取了一些措施,但无济于事。据当时的北京大学工作组秘书处统计,到6月17日止,被乱打乱斗的干部、教师、学生达178人,其中有“黑帮分子”45人,有错误缺点的120人,属于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这“五类分子”的7人,斗错了的好人6人。

著名历史学家翦伯赞的住所被贴上“庙小神灵大,池浅王八多”的对联。有些前来北大声援的外校学生,随便勒令“黑帮人物”出来交代问题,稍有不顺,便以拳脚相加……

张承先忧心忡忡,深怕矛盾升级,再度发生更大的武斗。

面对如此复杂的局面,6月7日,周恩来电话请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康生、陶铸准备9日来杭州,毛泽东同意。

这天,康生电话请示毛泽东:有些文章提到周扬问题,要点周扬名。毛泽东说:“待常委同志来后再商定。”

当天,毛泽东还批复同意邓小平6月6日中共中央书记处讨论陶铸调任书记处常务书记后,书记处各书记调整分工的报告。报告说:邓小平负责中央调查部,陶铸负责中央办公厅、中央宣传部及文教办公室、中央组织部,李富春负责工、青、妇及中央统战部,康生负责中央联络部、中央党校,谭震林负责中央监察委员会,李先念、叶剑英、李雪峰因主管专门工作,故未分工管理中央部门。

6月8日凌晨1时,毛泽东在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6月7日关于重新调配中宣部副部长等问题的报告上批示:“九日会议拟请陈伯达、汪东兴及各大区负责人都参加,是否可以,请酌定。”

6月9日,刘少奇和周恩来、邓小平、陶铸、陈伯达、康生再次由北京飞往杭州,在杭州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康生、陶铸等汇报有关工作,研究当前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的问题。

会上,刘少奇恳请毛泽东回京亲自主持文化大革命。毛泽东谈笑风生,却说暂时不能回京。往年,他喜欢在冬日去杭州,毕竟江南暖和,气候宜人。如今,已是初夏了,他反而要住在杭州。他从1965年春离开北京后,几乎没有再回北京。

汇报时,刘少奇说:“学校的文化革命准备采取三种办法,一是夺

权,这是少数,也就是像北大那样把黑帮黑线篡夺的领导权夺回来;二是批判学术权威,如批判像翦伯赞、匡亚明那样的反动分子;三是搞教学制度的改革,解决考试和教材等一系列的问题。城市和农村的文化大革命,可以和四清结合起来搞,有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

这次文化大革命,要比1957年反右派的规模还要声势浩大,所定的右派人数要超过1957年。学校单位的夺权斗争基本上百分之九十以上,有的要涉及到中学。"

康生似有不同意见,他说:"这次文化大革命是否重点是整一些右派?值得研究。如果只是在学校和单位像1957年那样抓右派,是否扩大了打击的范围?也未必符合主席这几年来的指示。"

毛泽东说:"听听群众的意见吧,我们不忙着下结论,也不要匆匆忙忙地派人下去。派工作组太快了并不好,没有准备,不如让它乱一下,混战一场,情况清楚了再派。群众没有发动起来之前,任务是讲不清楚的。牛鬼蛇神和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搞了一些什么名堂?你刘少奇知道吗?你们这些常委们就都清楚?也不一定,我是不清楚的。但是群众清楚,人民清楚。只有把他们发动起来,把政策交给群众,我们这次文化大革命才能搞好。过早地派工作组对于文化革命并不利。"

"这场文化革命是资产阶级挑起来的,他们一定要和我们较量,你想避免也避免不了。我这人一直奉行三条政策:第一不为天下先,即不打第一枪;第二退避三舍,讲究一个'让'字;第三礼尚往来,君子动口不动手,小人动手我也动手。"

"吴晗这些人搞资本主义复辟,我看也可以。社会很复杂,只搞社会主义而不让搞资本主义,不是太单纯了吗?不是没有对立统一,只有片面性了吗?我看就让他们猖狂进攻,也可以上街游行,拿上枪来搞政变、搞叛乱,我都赞成。事情都是要有一定的限度的,到了一定的时候这些东西都会出现。出现了也好,也是正常的,我们无非退出城市,再到农村打游击,或者叫我们的后代再搞一次革命罢了。"

刘少奇认为毛泽东的这些话是极而言之的,无论如何不能让运动搞到那个地步,所以,该怎么办,一定要有决心和办法。当毛泽东说道:"所以派不派工作组不是主要的,可以不派嘛,乱就乱他一阵。不

要急于派工作组。你们看怎么样?”

刘少奇则坚持说:“还是不要乱,一乱就难以收拾了。最近西安交大也发生了一些事。工作组进校以后,引导学生们批判‘三家村’黑帮,但个别人对此不感兴趣,总想把矛头对准校党委。工作组让他们讨论校党委究竟有没有问题,是红还是黑时,他们又想搞工作组。”

“胃口越来越大!”陶铸说。

邓小平说:“对这些人来说,他们就不是要斗黑帮的问题了,而是要斗垮我们整个的党。”

“我就不信他们会整垮我们的党。”毛泽东说,“不过也有例外,就是我们党自己烂掉,像苏联和东欧一些社会主义国家那样。他们名义上还是叫共产党,其实已经变成社会民主党了,和我们的国民党差不多。所以,我们下决心要搞这场文化大革命,不能让苏联的悲剧在中国重演。”

6月10日,毛泽东在周恩来、林彪、邓小平、伍修权陪同下,会见越南共产党领导人胡志明。两人进行了长时间的谈心。毛泽东讲了他对当时的文化大革命的看法,说了一些更加振聋发聩、令人深思的话。他说:

“我是今年、明年就差不多了,因为我们中国说73、84。我明年73了,这关难过,阎王爷不请我自己去。杜甫有首诗说:‘酒债寻常行处有,人生七十古来稀。’”

“我劝你,你们的人不是都忠诚于你的。忠诚的可能是大多数,但小部分可能是只在口头上叫你‘万岁’,实际上是希望你早死。他叫你‘万岁’时,要注意,要分析。越是捧你的越靠不住。这是很自然的规律。一个党不分裂?没有那回事。一切事物都是一分为二,The division of one into two,对立统一。这不是我发明的,是列宁发明的。什么是我的发明呢?明明是列宁在《哲学笔记》里说的。事物总是有两个对立面。你们党如果只有完全的团结,没有对立面就不符合实际。全世界的党都分裂嘛。马克思、恩格斯没有料到他们的接班人伯恩斯坦、考茨基成为反马克思主义者,他们创立和领导的党——德国社会民主党、法国社会党等,在他们死后就成为资产阶级的党。这条不注意,要吃亏的。”

“中国现在也出现了修正主义,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都是你的朋友,也是我的朋友。你不是问,以前我们知道不知道?我们是知道的……罗瑞卿的问题,1959年整彭德怀时,有人提议他当总参谋长,我们有些人不赞成。后来,提他当总长的同志就挨他整,一共整了六年时间。提他的人是他的上级,现在反过来挨他整。”“彭德怀是国民党的团长,同我们打过仗,后来投机;历来都犯路线性的错误。罗瑞卿是同彭德怀合作过的。彭德怀、罗瑞卿、彭真、陆定一、杨尚昆,他们都是一伙,为什么这么久才揭露?我们是要看一看。他们还里通外国。”

# 第63回：激情烧，革命火燃在江城 六一三，南京市党报被围

6月11日，刘少奇在杭州文化革命汇报会上对李雪峰等人说：

“中央常委们的意见，是在北京用两个月左右的时间搞夺权。这是新的反右斗争，在局势明朗的情况下，学校党团组织可以及早改组，即整党整团。当然，这里主要靠我们抓对工作组的领导，没有工作组，我们的领导就断线了，学生中、教师中的那批右派分子就会翻天。政策还是要注意，对问题较少的干部要帮助，无非是检讨，尽量不至掉进三类，内外有别要注意。”

李雪峰问：“学生中的右派要定多少？”

“不要定框框，有多少就定多少。”刘少奇明确回答。

当晚，毛泽东继续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他先问各大区负责人，群众的情况，大家都在作什么？各大区书记相继作了汇报。

西北局刘澜涛汇报，毛泽东不太感兴趣。

华北局李雪峰的汇报，毛泽东也没有什么表示。

各地的汇报都一样，就是讲如何派工作组下去解决问题。

运动已经发动了，刘少奇讲要放手发动群众，谁放手？放手放到谁的手上？各大学的党组织都没有了，如何领导运动？对这些问题，各大区的负责人都不清楚应该怎么办。

当大家问到是否派工作组时，毛泽东态度和缓的说：“不要急急忙忙派工作组。”他说：“大乱一下再说。我们规定一下政策，现在还产生不出来，还看不清楚吧。”

他接着说：“关于文化大革命，要放手，不怕乱。放手发动群众，要大搞，这样把一切牛鬼蛇神揭露出来。不一定派工作组，右派捣乱也不可怕。北大一张大字报，把文化革命的火点燃起来了！这是任何人压制不住的一场革命风暴。这次运动的特点是来势凶猛，左派特别活

跃,右派也在顽抗、破坏,但一般不占优势。打击面宽是必定的,不可怕,然后分类排除。”

“要在运动中把左派领导核心建立起来,使这些人掌握领导权。不要论什么资格、级别、名望,不然这个文化阵地我们还是占领不了的。在过去的斗争中出现了一批积极分子,在这场运动中涌现了一批积极分子,依靠这些人把文化革命进行到底。”

针对学校中发生的动手打人现象,毛泽东指示说:“党的政策不主张打人。但对打人也要进行阶级分析。今后不许打人,要摆事实,讲道理。在同学中取消保皇派这个名词。”

他还说:“全国各地学生要去北京,应该赞成,应该免费,到北京大闹一场才高兴呀!”

6月12日下午,毛泽东在杭州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谈到文化大革命的搞法时,说:“先夺权,批评权威,再搞教学改革、学制改革。中央要搞个高中、大学入学考试制度,办法是学校推荐和选拔相结合。初中还要考试。今年大学招考推迟半年,闹半年文化大革命。高中、初中不变。教材要重编,初中、小学语文课本中,有毒的要去掉。过去教学改革、学制改革搞不动,改不了。这次要趁此来个大改革。大、中、小学如何教法,都要有典型。大学师生要互教互学。学生不读书了,半年之内我看不读书,最活的是读报纸。”

当有人谈到文革这样搞下去涉及的人会不少时,毛泽东说:“打击面也不会太多,百分之五就不少了。”

有人谈到派工作组的问题,毛泽东说:“派工作组太快了并不好,没有准备。不如让它乱一下,混战一场,情况清楚了才派。”

北京大学聂元梓的大字报广播和印发,同样引起武汉各高校的轩然大波。许多学校纷纷贴出大字报响应。

6月2日,武汉水利电力学院一年级学生游华生贴出大字报,批评院党委对运动缺乏热情。

华中工学院则流传:“北大有鬼,我院也有鬼!”

……

由于各学校均产生了对文革运动和领导做法的种种猜疑,6月3日,湖北省委指示各大专院校党委,要积极掌握运动的主动。

这天,武汉大学召开全体师生员工的紧急动员大会,传达了陶铸5月19日在中南局文化革命动员大会上的报告。武汉大学党委书记庄果在作动员报告时正式宣布:“我们学校也有一个‘三家村’黑店,李达、朱劭天、何定华是它的三个大老板,牛永年(党办主任)是‘三家村’黑店的总管。他们向党向社会主义发动了猖狂进攻,把武大的领导权篡夺过去了……我们一定要把这条黑线揪出来,把这个‘三家村’黑店彻底粉碎掉,把学校领导权夺回来!”“现在我们宣布:从今天起,运动正式展开!”

连陈独秀都敢顶的李达当然不服,动员大会后,他向庄果要他的“罪行”材料看,几经要求,6月5日,庄果终于将学校“教育革命领导小组”5月初整理的那份“初步材料”交给李达。李达看了三遍,逐条反驳。他说:“材料绝大部分是造谣,他们把话变了样,王任重看过加了按语,只听他们的,偏听则暗,兼听则明,不听听我的情况。”“他们讲我反党反社会主义,是反动派,我怎么能承认?我到死也不能承认是反动派!”

6月7日,在省委驻武汉大学教育革命领导小组的主持下,召开了全校三级干部扩大会议,决定进一步发动群众,揭开武汉大学阶级斗争的盖子,将目标集中对准校长李达、前党委书记朱劭天、副校长何定华3人。

从此,李达再也没有安宁过。他先是被“勒令”停止写书,交待自己所有的“罪行”。接着他的助手们也被强制性地“集中”起来,强令写出揭发检举李达材料;他家的保姆被不明不白地弄走了,电话被剪断,北京的来信也被拿走。

8日,王任重召集湖北省文化革命工作会议,并且重新提出1957年湖北省委关于划分右派分子的几点意见,作为当前文革运动的指导。王任重说:“文化革命是全党的事,工人、农民的事。运动的打击锋芒主要是知识分子。”

6月8日至9日,中共湖北省委召开贯彻中央《五一六通知》精神的会议,决定派出工作组到大专院校和文化艺术界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指出要把革命斗争的矛头指向“‘混进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反动学术权威’、‘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

但是,仍然有人按照自己对聂元梓大字报的理解,查询毛泽东发动这场文化大革命的锋芒所指。武汉大学经济系三年级学生、正在咸宁县参加四清工作队的工作队员杨家志在读了王任重刊于5月4日《湖北通讯》增刊上的文章后,颇认为王任重有些“煞费心机来遮遮盖盖”,于是在6月8日给王任重写信,下定决心公开批评王任重在“1962年的右倾”和1966年的企图“混关”,直书王任重书记,从“仅仅是美化帝王将相吗”、“你忘了阶级斗争没有”、“不准散布历史唯心论”、“是清理,还是混关”四个方面,穷追王任重的自我检查,认为他生怕触到事情的本质,并谈到“在这样一个伟大的文化革命激流中,来洗洗自己的头脑,这对我们都是必须的。你何乐而不为呢?你说共产党人的一生是战斗的一生,我们不仅仅和外界的一切牛鬼蛇神战斗,而且还要和自己脑子里的牛鬼蛇神斗。否则只会是一个口头革命派”。结果,杨家志同学被开除了团籍和工作队员资格,批斗一周,继而被打成“右派分子”。

6月9日,武汉二中学生贴出大字报《炮轰党支部》,消息在全市中学界不胫而走。省、市委召开了紧急会议讨论对策,24小时内派出600人的工作组奔赴部分中学,以加强对运动的领导。到这时,分赴各大专院校的工作组业已组织,陆续出发。至6月中旬,省、市委紧急动员派出的各类文革工作组组员已逾万人。

6月10日,中共湖北省委正式决定将李达与武汉大学前党委书记朱劭天、副校长何定华作为武汉大学的“三家村”。这是全国所有高校被“揪”出来的第一个“三家村黑帮”。

6月11日,武汉中原机械厂附属技工学校学生贴出针对武汉市委书记宋侃夫的大字报《敬告宋侃夫》,对市委表示不满;第一冶金公司附属第一中学学生,成立了“革命行动小组”。省市委对此感到十分震惊,他们最直接的本能反应,就是学校里出了反革命分子。宋侃夫亲自去了中原机械厂,省委派出160人的工作组到一冶一中,力图压制造次的中学生。

11日,陶铸匆匆指示中南局:“学校中提保卫校党委’口号是错误的,只能提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校党委是正确的,只能提拥护校党委’。”不过他的这个指示精神,并未传达到湖北基层群众,在中层干

部、教师、学生群众里对此仍然存在歧义和激烈辩论。

6月12日上午,湖北省委工作组的李凤祥组长,在武汉水利电力学院师生员工大会上动员开展文化大革命,传达了毛泽东《五七指示》中的一段话:“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话音刚落,没有任何人暗示或指点,集中在院体育馆里的3000多听众,轰地一下都站了起来,热烈鼓掌,并发出了长时间的“呵…呵…”的欢呼声。一种与天庭豁然贯通的神圣感,抽紧了大家的心,很多同学的眼边挂着泪花。

工作组进驻水利电力学院的7天,是不眠的7天。这里就像一堆干柴,轰然起火;沿校区大道匆忙树立的大字报栏,贴满了大字报。同学们的狂热、兴奋程度,超过了1958年大炼钢铁时期。武昌的工人给大学生运来了白纸和墨汁,他们的洗脸盆盛满了浆糊;人与人也好像一下子亲近了很多.感情冲动,思潮澎湃,激情与热泪相融。尽管李凤祥组长仅仅是中南民族学院的一位处级干部,但他代表了省委来领导运动,不少同学去找工作组,去述说党委领导运动的不得力,去述说自己的怀疑。尽管院党委没有靠边,但已有人写出大字报,说张院长、张书记、张副院长是“张家村”,主抓教学的张副院长,自然成了“反动学术权威”;特别是党委宣传部胡部长,鉴于他的工作属于性质敏感范畴,多年来在干部、学生中,又颇有不良印象和一些颇为出格的言论,自然成了众矢之的。当时学生并不真了解学校的历史、人事内情,所列举的领导罪状,无非都是“抵制毛泽东教育思想”、“抵制文化革命”之类,许多问题确实是捕风捉影。党委领导在公开场合,什么也讲不出来。而且有口也似难讲清白。

6月13日,武汉大学召开“声讨珞珈山三家村反动罪行大会”。先让李达在家听实况广播,散会前,保卫科让人把他揪到会场示众斗争,3次按下头,并被摄像。当天,武汉市118个单位十几万人来武汉大学声援和声讨,人流长达数里。接着又有数十万群众,夜以继日,敲锣打鼓来到武汉大学,持续半月之久。美丽如画的珞珈山校园成了节日盛宴场地,武汉大学作为湖北省委在这次运动中的样板,挖出27名“黑帮分子”,内部掌握91人;武大党委常委有13人,其中9人被斥为

“黑帮”。与此同时,湖北各地、市、县也召开各种声讨大会。

6 月 13 日这天,《湖北日报》、《武汉晚报》和省、市人民广播电台向社会公布武汉大学揪出“珞珈山三家村”,发表报道和社论,同时发表王任重 6 月 7 日对武汉大学的题词“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把教育革命进行到底!”

截至 15 日晚上 20 时止,来珞珈山声援武汉大学的师生员工的共达 2000 多个单位近 30 万人,送来声援书 10 万多张,声援信 5500 多封,从全国 67 个县市来电 784 份。

6 月 13 日,就在南京大学批斗校长匡亚明的同一天,南京发生了“613 事件”。

这天,江苏省报《新华日报》登出了一篇《坚决支持南京大学师生的革命行动》的文章。这篇文章是江苏省委文革小组审定的。但是,南京的少数大中学生对这篇文章提出很多批评和责问,认为文章把揪出匡亚明的功劳加在省委头上,说是省委及时发现的,从而给省委定下不容怀疑的调子。他们还对这篇文章中的“匡亚明在六·二事件中走上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道路”这句话不满,认为这个论断掩盖了匡亚明长期以来一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本质,有“包庇黑帮”的嫌疑。

6 月 13 日中午,南京农学院两位同学给《新华日报》贴了第一张大字报,题目是《这里有鬼》。不到两小时,报社内外贴满了大字报,要求《新华日报》和江苏省委对这个问题加以澄清,承认错误。报社部分工作人员虽然手拉手筑成好几道人墙,也阻挡不住到报社内贴大字报进行辩论的群众。江苏省委认为这纯粹是无限上纲、无理取闹,采取了坚决措施。于是,公安局的人员来了,很快增加到几百人,他们同报社的工作人员一起,把到报社内贴大字报和进行辩论的群众赶了出去,然后关上铁门,惟恐进来一个学生。门内外严阵以待,如临大敌。继而又组织了 100 多名便衣混杂于人群之中。接着,外边的公安人员和便衣不时从外边拉进一些认为是领头闹事的学生和青年工人。

事件延续到第二天,6 月 14 日,逸仙桥小学一位少先队辅导员因爬墙贴大字报,被公安人员拉进报社,最后用吉普车把他押到公安局。和这位辅导员同时被拉进报社、遭到围攻、被扣上“反党”帽子的人很多。

当晚,江苏省委召集南京高校党委书记会议,江苏省委书记处书记兼南京市委第一书记彭冲在会上说:“南大有人怀疑省委,怀疑《新华日报》。省委是正确的,《新华日报》也是正确的。谁怀疑省委、怀疑《新华日报》,要开除党籍。”

在省委的高压政策之下,所谓“新华日报事件”在3天后黯然收场,少数参与闹事的人回到各自单位后受到相应处理。凡是贴出和送进的大字报,不管内容、作者,报社都组织人整理了,贴在街上的大字报全部拍了照,照片洗出后,用放大镜一张张把内容整理下来。这是自觉地运用1957年反右斗争的经验来对待群众。

为了加强对运动的领导,江苏省委于6月15日向南京大学派出了由中共江苏省委工业交通政治部副主任汪冰石任队长,江苏省军区副政委梁辑卿、南京军区国防工业部部长杜方平、南京军区后勤部副部长吴大胜、原南京医学院党委书记林克任副队长的工作队。同日,省委工作队和南京大学党委发出《关于改组溧阳分校党总支委员会的通知》,赵复华、胡才基等人被任命为溧阳分校党总支负责人。

第二天,6月16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放手发动群众　彻底打倒反革命黑帮》,向全国宣告“南京大学革命学生、职工和教师,揪出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革命份子匡亚明,这是一件大快人心的事”。紧接这篇社论的,是新华社长篇电讯《革命师生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大闹无产阶级文化革命　南京大学揪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革命份子匡亚明　江苏省委决定撤销匡亚明一切职务,受到热烈拥护》,该电讯报导了6月12日南京大学批斗匡亚明的情况,并对南京的“六二事件”做出了简要说明。霎时间,地处东南一隅的南京大学成为举国关注的焦点,南大党委书记兼校长匡亚明成为路人皆知的“牛鬼蛇神”。

# 第64回：人大反，孙泱辞职仍被斗 评校长，重庆大学闹翻天

6月14日，回到北京的刘少奇、邓小平又召集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传达杭州会议精神，听取情况汇报，研究运动中出现的问题。此时，全国各大城市也都相继派出了工作组。

文化大革命的风潮也影响到部队，有些连队也出现了大字报。6月14日，解放军总政治部做出《关于部队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几项措施的请示报告》。6月15日，中共中央转发解放军总政治部《关于部队开展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几项措施的请示报告》。中央在转发批语中指出："部队在任何情况下，都要保持高度的戒备和集中统一。"

《请示报告》的主要内容有：在连队和师以下的战斗部队中，着重进行正面教育；各大单位党委要着重抓好宣传、文化、报刊、院校、出版、科研部门的文化革命，进行思想上和组织上的整顿；凡是确定要夺权的军以上机关的个别单位，须经上级党委批准；军队一律不准上街游行，一般不参加地方的批判大会、声讨大会；总政设立全军文化革命小组及文化革命办公室。

这份文件发至全国团级以上单位。同一天，叶剑英还向毛泽东、周恩来作了《关于建立军委常务会议的请示》。经批准后，凡涉及军队的重大问题，由军委召开常务会议讨论决定，以加强军委的集体领导。

6月8日，人民大学经济系教研室罗肇洪及经济系毕业的7个研究生贴出了全校第一张大字报，揭发校党委常委、经济系主任宋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

这张大字报的贴出，在全校引起强烈反响。人民大学热闹起来了。各系的大字报迅速像雪片一样贴到墙上。历史系党总支"揪"出了何干之、何洛、冯其庸等"资产阶级学者权威"；新闻系老师甘惜芬被当作"叛徒"揪出来了；研究所贴出党委宣传部长朱真与廖沫沙有联系的大字报；新闻系的一张大字报更令人触目惊心，说前北京市委负责

人借口加强民兵工作,通过北京卫戍司令部调一个团进驻西郊,一个营驻北大,一个营驻人大。真相如何?请校方回答……

大字报越来越多,但都没有指向校领导。校务部派人挖坑埋柱铺席,准备让更多的大字报上墙。

终于,6月11日,共同政治理论课麦农等29人贴出了关于孙泱副校长的大字报,说:“孙泱8号晚上的报告是前北京市委修正主义路线的翻版和发展。”“我们对孙泱领导不信任。”国际政治系以党总支书记为首的教工整理出孙泱的言论,说“贯穿了一条修正主义的黑线”。

文革初期,人民大学副校长、党委书记郭影秋调任北京新市委文教书记,人大的工作由副校长、副书记孙泱主持。

孙泱是烈士孙炳文的儿子。当年,孙炳文动员朱德脱离军阀,一同前往上海找陈独秀要参加共产党,遭拒后又一起赴欧洲寻找共产党,周恩来是他们的入党介绍人。后来,孙炳文在上海“412政变”中牺牲。因为这层关系,孙泱曾任朱德的政治秘书,其妹孙维世被周恩来收为养女。孙泱1964年春调来人民大学任副校长。见到同学们总是笑嘻嘻的,很和蔼,水平也很高。他看了群众给他贴的大字报后,于当天到市委找到郭影秋,主动提出辞职。

郭影秋经请示北京新市委后获准。6月13日,北京新市委正式发文,撤销了孙泱党内外一切职务。这天上午,人大的一些人突然把孙泱抓了起来,给他戴上高帽子,架着手臂,拎着衣领,时不时敲着他的脑袋,拖到文化广场。随之高呼“打倒黑帮分子孙泱”等口号。事发突然,崔跃先副校长立即赶了过来。一些人上台发言,会开了一个多小时解散了。由于事先没有准备,决定下午再开斗争大会。

下午,全校开斗争孙泱大会,孙泱低着头在台上站了3个多小时,会场群情激昂,学生的革命热情完全被鼓动起来了,“打倒孙泱”的口号声此起彼伏。

但此事还是引起了人大师生的种种猜疑。当天,刘梦溪、魏凯等中文系25人即贴出了题为《这是一个绝大的骗局——评新编丑剧“孙泱罢官”》的大字报。

6月14日,人大函授学院的5个人贴出了反对人大党委书记郭影秋的大字报,震惊全校。大字报说郭影秋和陆定一联系密切且深受陆

定一的信任。还说郭影秋是孙泱的后台等。

人大校长是吴玉章,因年事已高,日常工作都是由郭影秋负责,是人大实际上的一把手。郭影秋听说人大贴出他的大字报后,自己写了一份自我检查表明态度的大字报,说自己“犯了很多错误,执行了前市委和陆定一的很多指示,请同志们揭发批判。”

6月15日上午,人大全校的工人自动行动起来,为了表达对郭影秋、新市委及党中央、毛主席的拥护和爱戴!把6月14日贴郭影秋大字报的5个人拖到主席台上,弯腰90度,强迫他们向全校师生员工承认错误。参加社教运动的师生也纷纷上台发言,以大量事实来说明影秋是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左派,是贫下中农的贴心人。

此时,西南的重庆大学也已经热闹不堪。自1966年5月4日,重庆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的郑思群,向全校作了批判“三家村”的动员报告,点名批判了吴晗及其作品《海瑞罢官》以及北京市的邓拓等人后,政治激情被发动起来的学校师生,很快就将大字报贴满校系各大楼及学生宿舍,矛头指向邓拓、吴晗等“黑帮”人物。

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同样在重庆大学引起强烈反响。6月8日,以重庆市四清工作总队队长张种玉为首的重庆市委工作组进驻重庆大学。尽管他们率先肯定“重大不是北大,重大党委的主流是好的”,但同时强调:“揭发问题不得划框框,任何人的问题都可以揭露。”一时间,干群之间,师生之间,教职工之间,以大字报相互攻讦愈演愈烈,被点名者一时多达170余人。

这期间,校长郑思群赴北京高教部开会,回来又在成都参加了省委“文化大革命动员会议”。当他6月12日返回学校时,看到校内的混乱状况,心急如焚,认为这种无政府主义的状态绝不可再继续下去了,运动虽然要搞,但正常的工作和教学秩序也要维持。于是他召集党委成员和系、处干部开会,议定立即采取相应措施,把各个办公室内外的大字报转移到指定地点张贴,校园因此有了几天平静。

6月17日黄昏,在学生三宿舍门前出现了一张针对郑思群的大字报,大字报提到的唯一事实是:郑思群1965年到铜梁县去看望当兵训练的学生,带了一头猪,这是腐蚀学生纯洁的心灵。因为学生当兵锻炼是学习艰苦奋斗,带猪肉去给他们吃是物质享受。大字报在提出几

个捕风捉影的疑问之后断然宣布:“以郑思群为首的校党委是一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黑帮!”

在此之前,学校无线电系揭发出校党委背后整学生材料的事情,在群众中引起极大的愤慨。尽管如此,但郑思群在重庆大学的威信很高。他1926年参加革命,13岁加入共青团,15岁转入共产党。大革命失败后,奉命留学日本,继续从事革命活动。“九·一八”事变后回上海从事地下工作。“七·七”事变后,任八路军总政治部敌工科长,曾任著名马列主义哲学家艾思奇的秘书,冀鲁豫军区宣传部长兼军法处长。解放战争期间,任解放军二野一旅、三旅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重庆解放后,任西南军政委员会文教委员及西南人民革命大学总教育长。1952年10月,以省军级、行政七级干部之尊,奉调来到刚刚进行院系调整的重庆大学,比重庆市委第一书记任白戈行政级别还高一级。

郑思群在重庆大学一干就是15年。在他任职期间,重庆大学日新月异,发展迅猛,短短几年间,便将重庆大学从5个系、8个专业、1000多学生、200多教师发展到6个系、15个专业、7000多学生、900多教师。

他经常到学生宿舍楼里一间一间看望学生,嘘寒问暖,从不摆架子,绝不骂人;上课时,同学们会看见他悄悄坐在后排听讲,有时还掏出手绢擦拭玻璃窗上的灰尘;他还在食堂里当着许多学生的面,把饭桶边上的饭捡起来吃;他走在校园里的时候,会主动跟每一个认识或不认识的师生员工打招呼。当时在重庆大学,流传着许多关于老校长的佳话,其中一段是:

电机系67级有位叫郑志胜的学生,家穷没钱买鞋,只好赤脚上课。一天正好在教学楼阶梯上遇上老校长。老校长端详他片刻后,问他为何不穿鞋?又问他在哪个系?哪个班?哪个寝室?脚有多大?第二天,像奇迹发生般一样,一个和蔼的陌生人来到郑志胜的寝室,给他送来一双崭新的解放鞋。这位陌生的送鞋人,就是老校长的秘书。

炮轰郑思群的大字报顿时引起了同学们的极大关注,很快便被惊诧万分的学生围得水泄不通。张贴郑思群大字报的作者之一的冶金系四年级学生佘国华,趁机跳上三宿舍前一棵榕树的石台上大发演讲,重复大字报上那几条的捕风捉影的疑问,反复号召大家对郑思群

黑帮,要“狠狠地打!狠狠地打!”他说话舌头有点大,口齿不清,人们只听他在那里不停的说:“狠狠尼拉!狠狠尼拉!”

佘国华是学生干部,预备党员。很明显,大字报的作者是想学北京大学的聂元梓,一鸣惊人。

那一夜,全校师生无眠。那一夜,整个重庆大学校搅翻了天。有人认为,既然校长都是黑帮,整个学校岂不已危若垒卵?于是一群一群地冲到学校武装部,要夺取枪支保卫学校。

动力系食堂门前,学生们扛出饭桌搭成高台,该系67届学生周兴福站在台上痛心疾首地发表演讲,反复动员大家:“同学们哪!大家快回到自己的系班去呀!你们看这么乱糟糟的!怎么搞文化革命呀!”那动作和口气,很容易让人想起抗日时期北平的救亡青年。

机械系二年级7个学生还连夜徒步进城,要求市委书记任白戈接见。

那天晚上,重庆大学真正的舆论焦点是佘国华所在学生五宿舍。几乎各系各班都有学生涌到他房间要求公布郑思群黑帮的“钢鞭材料”。“钢鞭材料”是重庆土话,即“过得硬”的材料,有确切内容的材料。

由于去的人太多,以致该宿舍的学生不得不派人举着棍棒把守大门,问明来人身份和政治面貌,即家庭出身、是党员或者团员后,方可放行。

佘国华被前来走访的同学追问得无以对答,只能无可奈何地搪塞道:“48小时之内,保证向大家公布郑思群黑帮的钢鞭材料。”

这时,佘国华的中学同学、机械系67级学生、时任校文工团乐队队长的吴庆举发现:佘国华大字报的5个作者,全是校团委和校学生会的干部。吴庆举想:这篇大字报的出现,会不会是学校宣传部副部长邓时泽和团委书记刘稚民“金蝉脱壳”,为保护自己而让佘国华等人写这张大字报以将祸水他引呢?想到此,他似乎茅塞顿开,感到异常兴奋。

当时,重庆大学的文工团员和体育队员是集中居住的。吴庆举深夜从冶金系宿舍质询佘国华后回到文体大队,满面红潮地找到住在隔壁的文工团美术队队长周孜仁,情绪激动地将自己的想法对他说了,并坚信:“佘国华绝对没有任何资料。”

周孜仁立即表示赞同,忙问吴庆举:"那我们怎么办?"

吴庆举接着说:"等到48小时他拿不出东西,我们就写大字报揭露他的阴谋。"

说干就干,当天晚上,便由周孜仁执笔,起草好了一篇大字报,题目是:《千万,千万,千万警惕更大的阴谋》。

6月18日,对于吴庆举和周孜仁,是非常难熬的一天。一方面,他们跃跃欲试,急于向全校同学公布他们的发现,同时,又必须等待48小时的到来。这一天,佘国华的大字报已经把大学生的革命激情歇斯底里的激发起来,整个学校躁动不安。

6月18日上午,无线电系的同学听说电机系的一些同学因揭发校系两级的问题受到围攻,马上组织全系同学排着队伍冒雨前去声援。工作组副组长张海亭出来接见同学,他说:"你们的热情是好的,但是,这么多人,乱糟糟地来,解决不了问题……电机系的问题,他们自己解决,你们还是回去学习文件吧!"

同学们没有理他,而是诵读了给电机系同学的声援信,和电机系的同学一起唱革命歌曲,高呼革命口号,现场群情激愤。

当天中午,重庆市委派市委宣传部副部长何正清专程来到重庆大学,向正在召开的党委扩大会宣布市委决定:重庆大学的运动不再由党委领导,而由市委工作组领导。

市委的决定没有让亢奋的重大学生安静下来,反而使重庆大学的舆论大哗。声援电机系的无线电系的同学又去找市委宣传部副部长何正清,要求他对6月16日晚电机系反映出来的校党委整学生材料的问题表态。何正清认为工作组副组长张海亭上午对学生们讲的话是正确的。于是,学生们联系工作组到校后的一系列表现,认为市委工作组和校党委是串通一气,镇压学校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当天中午,有几个班的同学分别给党中央和毛泽东发出加急的联名求援电报,其中,有些电报被邮局截下来,未发出。

6月18日下午,张海亭代表工作组给全校党员和团干部作了一个报告,认为"共青团员要坚信市委,坚信党中央,对于上级组织的决定,即使是错误的,也必须坚决执行。"

这个报告被学生们认为是划框框、定调子、泼冷水的报告。

# 第65回：麻雀方，动荡中不乏幽默 六一八，郑州大学起风波

6月18日晚上，重庆大学无线电系1968届学生徐光明也贴出大字报：《向郑思群黑老头开火！》

这天晚上，重庆大学无线电系召开团员大会，传达下午张海亭的报告。在传达过程中，许多同学纷纷递上字条，对报告中的许多观点提出疑问，并要求发言对其进行批判。报告传达完毕，就有人跳上台去，准备发言。但遭到主持会议的系团总支书记高老师和工作组的拒绝。于是，在要不要继续把会议开下去，要不要批判这一报告的问题上，双方展开了激烈的辩论。恰在这时，有人切断了电源。工作组的人跑到台上，指责同学批判张海亭报告的行动是“资产阶级自由化”。还有人打电话请示住在松林坡的重庆大学工作组组长张种玉，问怎么办？张种玉十分不满地回答：

“你们实在要开就开吧。叫工作组成员全部回来开会！”

在场的人都知道事情变得严重了。一些胆小的人离开了会场，但仍有三、四百名坚定分子留了下来，大家推选出了几个人组成了会议临时主席团。主席团中的绝大多数是同学们上午推选出的学生代表。有人搬来了录音机，为大会录音，有人自动维持会场秩序，大会继续开下去。同学们争先恐后地跳上台，对工作组和校党委串通一气、压制群众的行为进行揭发和控诉，提出了“不信任工作组”、“在党中央毛主席没有派人来之前，自己组织起来闹革命”等口号。还有人提出：鉴于工作组和校党委串通一气、压制群众，为了保证文化革命运动的正常进行，必须“接管广播站”、“接管武装部”。最后，会议决定：“要把学校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向党中央、毛主席直接汇报，第二天要在全校公布大会材料，用放录音、大字报、演讲等方式揭露市委工作组。”也有人提出：“有人要切断我们和党中央毛主席的联系，电报发不出去，我们要杀出校门去，到工农兵中去宣传，争取工农兵对我们援助。”

发言的人一个接一个,会场的气氛越来越热烈,等待上台发言的人在台后排成了一条长蛇阵。电机系、机械系、冶金系和其他外系的同学也来声援,也要求发言,会议一直开到深夜两点钟。大会派人去邮局及当地驻军7788部队联系向北京发电,请求中央直接派工作组来校,均遭拒绝。

大会之后,学生们在校内进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揭穿市委工作组的大阴谋、大骗局!”“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等口号响彻夜空。汹涌澎湃至天明方止。

就在同学们自发继续会议的同时,市委宣传部副部长何正清也在党委礼堂宣布:“无线电系的正在进行的会议是反革命事件。”何正清和张种玉当时就研究制定了两项措施:

第一、调军队来,如果学生上街游行就镇压;

第二、立即把机械系的工人集合起来,拿上工具去“保卫”无线电系集会所在的第一教学楼。

重庆大学“618”集会的消息很快就传到重庆市委大楼,重庆市委第一书记任白戈和其他几位书记通宵未眠,共同商议解决的办法。工作组亲自布置对无线电系师生进行围攻,指定两个同学各筹一篇稿子,声讨无线电系“反革命事件”。

那一晚,吴庆举、周孜仁及重庆大学文工团和他们观点一致的同学集中在周孜仁的宿舍,他们看着无线电系游行的同学在宿舍外喧嚣而过,心情极其复杂紧张。佘国华承诺的48小时早已过去,他的“钢鞭材料”显然是没有了。但是,如果在这种气氛下张贴出为郑思群开脱的大字报,显然是逆流而动,其结果会不会和佘国华本人一样,遭致全校同学的反对甚至围攻呢?他们希望有更多人一起共担风险。当游行队伍过去后,他们马上拿着那份“警惕更大阴谋”的大字报征集签名。

开始,签名只在文工团内部秘密进行,后来,美术队队员代玉松自告奋勇,主动回到他所在的电机系宿舍挨户敲门,像地下工作者一样宣传观点,征集签名。那一晚,他很快征集到几十个同盟者,大家信心大增。

6月19日天将破晓,吴庆举、周孜仁他们壮着胆将大字报贴上一

块木板,然后横架于九宿舍和二、三宿舍之间的路的正中——这是学生们吃早餐必经之地。他们躲在房内窥视动静。

不久,曙色放明,打早餐的同学果然很快聚集在木板前叽叽咋咋,不少人还当场取出钢笔批注:

“坚决支持你们的观点!”

“我们受骗了!”

“找佘国华算账去!”

于是,吴庆举、周孜仁他们以胜利者的身份从宿舍里走到了大字报前,得意洋洋地公开自己的观点。

感到被嘲弄了的学生纷纷走访佘国华,人们开始围攻他,贴他的大字报,称他是“佘伟人”,可见大家晓得他是为了出名、想当伟人才写郑思群大字报的。其中有一组漫画《佘伟人跳梁记》,把他的三角眼画得惟妙惟肖,在梁上跳着,大脚拇指又大又圆。他的那间斗室又成了新闻热点。不过,佘国华却逃遁了。为躲避围攻,佘国华班上团支部的人帮助他藏匿在偏居一隅的学校实验工厂轧钢车间里的楼上。佘国华的室友无法招架纷至沓来的质询者,睡觉时候也不得不在自己的身上盖一张纸,上书:“我不是佘国华,请不要叫醒我!”

对徐光明,群众也极尽讽刺挖苦,认为他是疯子,还给他开了一剂处方:

狗阴二两、狗阳一只、墨蚊一钱、麻雀卵三个、蟋蟀一对要原配,阴干,碾末制丸,黄豆大,每服一粒,日服三次。

之所以麻雀配方,是因为1965年徐光明的班级去铜梁县驻军当兵锻炼时,徐光明提出要吃麻雀肉,炊事班长学雷锋,拿起弹弓赶到铜梁县城南门外豹子沟,满山遍野寻麻雀,为他炒了一盘麻雀肉。

火烧到徐光明身上来了,他倒坦然,也不在乎大家对他人身攻击,又写大字报呼吁:“停止打横炮!”

6月19日凌晨起,无线电系的学生在宿舍、在路上到处受到围攻,校园内贴满了“愤怒声讨无线电系一小撮人非法集会的反革命罪行”等巨幅标语和声讨大字报,这是工作组和校党委组织的。晚上,工作组和校党委又组织了斗争会,对“618”集会的参加者和支持者进行批斗。重庆市委、省文革小组专门为此事发了“情况简报”。

虽然大家已经认同“倒郑事件”是宣传部和校团委合谋的一桩诡计,水落石出,但是,郑思群也没有因此而躲过此劫。6 月 21 日,重庆市委书记处书记辛易之亲自到重庆大学宣布郑思群停职,这是西南局的决定。同时,市委决定撤回第一个工作组另派出新工作组进校。

当天,《重庆日报》头版头条正式刊登了重庆市委关于让郑思群停职检查并派工作组进驻重大的决定。

22 日,辛易之亲率以副市长余跃泽为组长的高规格工作组开赴重大。

23 日,工作组召开全校师生员工大会,宣布市委决定郑思群停职检查。余跃泽下车伊始,踌躇满志地发表演说,声称:“我们到你们学校来,就是抓郑思群黑帮的”,摸“郑老虎”屁股的。“重大运动的主攻方向是校、系两级领导干部”。就这样,郑思群由“遇到新问题的老革命”升格成了“黑帮”,校、系两级领导干部成为了“革命的对象”,其中 90% 左右的人立即靠边站,有些被看作是郑思群线上的人物进行审查、揭批。

郑思群停职再次把重庆大学的学生们搞懵了。不是才弄明白所谓“郑思群黑帮”是某些人的阴谋吗?为什么市委甚至西南局也跟着起哄呢?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一切结论只能产生于调查研究之后。”市委工作组下车伊始,什么情况都没有调查,为什么就匆匆忙忙宣布郑思群是“黑帮”,这中间莫非又有什么阴谋?

于是,质问《重庆日报》、质问工作组的大字报再次蜂拥而至。在报纸上表态拥护市委决定的“左派”学生受到普遍奚落。工作组驻地成了同学们最喜欢光顾的地方。他们天天围着工作组质询,辩论。

工作组员中的干部虽然级别高,但文化也不很高,有些人是从土改队起来的,讲话常前言不搭后语,但都是党领导惯了,自以为了不起,喜欢打官腔、作指示、指手画脚,讲话霸气。

大学生对报纸社论等的理解力肯定超过一些工作组员,因此很看不起工作组那些人。重庆大学是工科,向来比较野,这些年轻人又是出风头的年龄,就把工作组干部当靶子,抓他们的语言辫子。比如,当郑思群停职时,学生们问余跃泽:“你想不想当重庆大学校长?”

他说:“是共产党员,一切服从党安排。”

学生就风传余跃泽想当重庆大学校长。后来,余跃泽听到议论他整倒郑思群是想当重大校长风声,又说,自己现在是管几百万人口的副市长,意思是他的权利比重大校长还大得多,不想当你这个毬校长了。

余跃泽副市长常被学生抓语言辫子,没办法,用“言多必失”来为自己辩解,于是,“言多必失”又在重庆大学广为流传。

余跃泽在市里是分管财贸商业的,在重庆的工作很有成绩,没想到来到重大,被这些学生每天搞得晕头转向。学生们调侃他管钱、管商业,所以营养充足,身宽体胖,说话才中气十足。

工作组办公室接待小组组长孟凡均是工作组中难得的精明能干之辈,但每天面对满屋子能言善辩、把《毛主席语录》背得滚瓜烂熟的大学生,他除了用一些历史暗示对无知的年轻人进行威胁恫吓外,实在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工科学生在工作组大门口贴了一幅对联非常有名:

曲率半径处处相等

摩擦系数点点为零

横批:又圆又滑

重庆大学校园,这时已经是一团烈火。工作组成了救火队。为了领导这样一个大学的运动,工作组提高了级别,增加了人数。除了副市长余跃泽任工作组长外,增加了驻渝的54军副政委钟池为工作组政委,共青团重庆市委书记崔成礼为副组长。各个系也派了工作组,由地方的处级干部和军队的团职干部挂帅。整个工作组成员达300多人。其中,地方干部200来人,军队干部100来人。指定54军政治部的赵处长为办公室主任,市政府农财科张光明科长和市供销社的殷青锋为副主任。下设政工组、秘书组、专案组、接待组。54军赵处长分管政工组和专案组,市政府的张光明分管秘书组并与市委联络,殷青锋分管行政和接待组。

工作组一再要求学生们把斗争矛头对准校、系两级领导,而到现在为止,学生们的矛头偏偏对准了市委及其工作组本身。

工作组成竹在胸。他们有理由相信这次动荡不过是过去某次政治运动的翻版而已,面前这些跳得很高的糊涂虫,很快就会明白共产

党在1957年使用过的手段:“引蛇出洞”“后发制人”。他们抓紧在学生中“依靠左派,团结中间派,孤立右派”,始终把斗争锋芒指向以郑思群为首要目标的校、系两极领导干部。他们到机关各部、处和各系发动群众,组织写大、小字报,找人个别谈话及挑选积极分子等,抓“郑思群黑帮”。

但是,揭发郑思群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无非就是:

1、到铜梁去看望当兵锻炼的学生,带了一头猪,去腐蚀学生纯洁的心灵。

2、1966年6月12日从北京高教部开会回来,晚上身边工作人员陪他看了大字报,他说“弄得乱糟糟的”。对文化大革命不满。

3、1965年高考结束,参加监考的马列主义教研组老师向郑思群汇报工作,说他们为考生赶跑考场外面吵闹的“知了”,郑思群很满意;当汇报到他们在考场上为考生读毛主席语录“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时,郑思群大为不满,说:“你们这是脱了裤子放屁——多事!”工作组上纲上线,说郑思群攻击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毛泽东思想是“放屁”!

4、搞独立王国。郑思群是重庆市委委员,当重庆市委和高教部开会时间发生冲突时,他不参加重庆的会,而到北京参加高教部的会。

还是没有什么“钢鞭”材料。工作组决定调看郑思群的档案。

郑思群的级别高、资格老,档案不在学校里。要到上级组织部门查阅档案,不是一般工作队员所能胜任。工作组特地把机械系工作小组长张忠良抽出来做专案组组长,专门汇总郑思群的材料。张忠良是重庆市商业局人事科长,审查干部有经验。

一段时间,工作组控制了局势,师生们每天坐下来学习,揭发郑思群,写大字。可哪有那么多大字报写?于是,只要有人写了一张大字报,大家争着签名,往往一张大字报签名比内容多,有人为盥洗间写一张不要倒剩菜饭的告示,也有人去签了一长串名。

我们暂且将重庆大学放一放,再来看看此时中原大地上的郑州大学。

6月18日,郑州大学行政楼前又出现声讨工作组的巨幅标语:“打倒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党若平!”一整张白纸一个字。贴

大标语的是中文系学生党言川,在他的带动下,整个校园内反对省委工作组的大标语、大字报又到处张贴出来,一霎时,形成了反对工作组的高潮。

当晚,在历史系学生任延庆、郝秀仲的带领下,部分学生去找系党总支张书记,又到校领导住处“高干院”找党委书记兼校长王培育,均未见到,于是就自动聚集到王相海跳楼身亡的文科楼前,声讨王培育镇压学生运动迫害阶级兄弟的罪行。一时间,群情激愤,高呼“打倒王培育”、“枪毙王培育”等口号。这就是郑州的“6·18”事件。当天,省委决定撤销王培育郑州大学文化革命领导小组组长职务。

第二天,郑州大学政治系四一班邵维钧、贺长有、李春兰等 11 位同学向中央发电报,说郑州大学党委镇压学生运动,学校领导王培育组织反击写大字报的师生,造成 4 人跳楼自杀的根子在省委,要求中央派人来调查。这下捅了马蜂窝,6 月 20 日,省委对郑大工作组加派力量,书记处书记赵文甫亲自坐镇,先后在郑州大学召开党员大会,强调省委的领导是完全正确的。并采取种种手段,对邵维钧、贺长有等提出的“王培育的根子在省委”进行反击。工作组对政治系四一班加派了干部;翻查邵维均、贺长有、李春兰 3 同学档案;开辟专栏大字报对他们进一步施加压力;召开有全校各系各班代表参加的会议,号召全校揭发他们的“错误”。工作组组长党若平甚至说:“对邵维均等同学,什么时候有空隙,就踢他们几脚……”不少同学受到株连,全校 4 名团支部书记被撤职。

# 第66回：蒯大富，清华质疑工作组 要改革，下通知废除高考

此时，清华大学也出现了质疑工作组的大字报。6月16日，清华大学工程化学系6902班，简称“化902”班的蒯大富和孟家驹贴出大字报，题目是：《工作组往哪里去？》批评工作组：“我们要开斗争会，你们不准；我们抓黑帮戴高帽子游街，你们阻拦；我们画漫画写对联，你们不许。你们举起先立后破的大棒子压制群众！”

大字报认为，工作组进校后，学校大字报的数量急剧下降. 清华园内一片冷冷清清，运动大有趋于尾声之势，因此提出：“运动向左转了还是向右转了？”的质疑。

大字报批判了“我们无限信赖工作组！”的口号，称：“我们无限信赖的是党中央，无限信赖的是毛主席、是毛泽东思想。在工作组的性质未搞清楚之前，提出这样的口号是不负责任的，不也曾有人说过‘我们无限信赖校党委’？事实是怎样呢？是黑帮。我们学校的工作组究竟怎么样，还不能下结论，此时就提出‘无限信赖工作组’不能不算是阴谋。任何人都要在这场文化大革命中经受考验，工作组尤其这样。”

蒯大富是班上的文革小组组长，共青团员，父亲是老党员、老新四军战士。他一直在政治上要求进步。文革刚开始，他贴出的第一张大字报是保清华党委和蒋南翔的，题目叫“捍卫清华党委，就是捍卫党的领导；捍卫清华方向，就是捍卫社会主义”。

但是，很快他就感觉自己不对了。当时《解放军报》和《人民日报》社论连篇累牍，都是说资产阶级统治教育领域……修正主义分子就在我们身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资本主义复辟将是随时可能的，要大家擦亮眼睛等等。同班同学孟家驹和他商量说：“我们这种态度对不对啊？万一校党委真有问题怎么办？应该抱着对革命负责任的态度，考验考验清华党委吧。”

于是，他们写了“也向校长质疑”的大字报，对校党委提出了质疑。

当时蒯大富还在清华广播台工作,他给校党委贴了大字报以后,广播台的台长很快就通知他:“蒯大富,你回班上去参加文化革命吧。”让他离开广播台了。

工作组进校后,校党委靠边站了,蒯大富很得意,杀回广播台,临时写了一个稿子,欢迎党派工作组来清华大学。他还播放“毛主席派人来”那首歌,非常欢欣鼓舞,非常拥护工作组。

工作组让蒯大富当上了班文革小组组长。

可是,很快蒯大富他们就觉得工作组的做法,和他们理解的“毛主席放手发动群众”的做法相距甚远。工作组强调领导,强调秩序,说不能这样搞、不能那样搞。蒯大富等同学认为工作组对群众运动的理解和态度不对。这时,不知从哪传出一阵风,说工作组是旧北京市委派来的……

6 月 14 日,力学系学生王铁成贴出《新市委派来的工作组大方向错了》的大字报,刘泉等人也贴出题为《现工作组不可信任》的大字报。虽然也有不少人起来为工作组辩护,但是,6 月 15 日,蒯大富和同班的十几个同学开会,依然决定与工作组抗衡。这就有了 6 月 16 日《工作组往哪里去?》的大字报。

在此之前,自控系学生张根旺在三号楼也贴出一张大字报,其中提到工作组的人批评学生说:“你们大学生觉悟太低了,没有一点政治头脑。”“你们可以算是高级知识分子了,做法一点也不高级,不懂党的策略”,“组织性纪律性太差了”。工作组的人还说“戴高帽子是国民党作风,农民可以这样做,你们不能这样做,这是无能的表现”,“说明你们主席著作学得太差了”。

大字报对此表示了不满,并上纲上线说:“我们要告诉这位同志,你骂我们,我们不在乎,但是你骂我们贫下中农,我们不答应;你骂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我们就要和你拼命!

请工作队领导同志立即核查此事是否属实,如果属实必须马上开除这个工作队员,并向全校作检讨。”

蒯大富 6 月 16 日的这张大字报贴出时间不长,他就被叫到学校工作组办公室。工作组的领导人十分严肃地指出蒯大富最近反工作组的行为,要求他改正自己的错误,不要再继续与工作组作对。

开始,蒯大富静静地听工作组领导的指示,但听着听着,他就不耐烦了,向工作组负责人表示:“我们是革命学生,我们的行动是在响应毛主席的号召,积极进行文化大革命。工作组向我们施压,是压制学生,不让学生参加文化大革命。”

蒯大富能言善辩,他与工作组负责人你有来言我有去语,你一言我一语竞争吵了起来,一时间,双方僵持不下,谁也说服不了对方。这次谈话以极不愉快的结果结束。

革命的年代,出人意料的事情一件接着一件。6 月 17 日晚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北京女一中高三(四)班和北京四中高二(五)班学生给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的两封信,以及《人民日报》第二天要发表的社论《彻底搞好文化大革命,彻底改革教育制度》。同时播发的还有 5 天前,6 月 13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就已经下发的《关于高等学校招生工作推迟半年进行的通知》,通知指出:“鉴于目前大专学校和高中的文化大革命正在兴起,要把这一运动搞深搞透,没有一定的时间是不行的。”

此时,距离当年的高考只有半个月了。

《人民日报》的社论中说:“广大工农兵群众、革命学生和教师,早已对旧的招生考试制度,表示无比愤慨,迫切地要求把它彻底扔到垃圾堆里去。今天本报发表的北京女一中高三(四)班和北京四中高三(五)班学生给党中央和毛主席的两封信,以及没有发表的大量群众来信,提出了废除旧的升学制度的强烈要求。这两封信,反映了广大革命师生的心愿,代表了广大革命群众的呼声。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和群众的要求,决定废止现行的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办法,从今年起实行推荐和选拔相结合的新的招生办法,突出无产阶级政治,贯彻执行群众路线,把德、智、体三方面条件较好的学生推荐出来,从中择优录取。高级中学的招生考试也采取这种办法进行。”

北京市第一女子中学高三(四)班学生的信是 6 月 6 日写的。信中说:“我们是中学生,是即将高中毕业的学生。在这场文化大革命中,砸烂旧的高考制度的责任,首先落到我们肩上。我们想说说对于现行升学制度的看法。我们认为,现行的升学制度,就是中国封建社会几千年来的旧科举制度的延续,是一种很落后的、很反动的教育制

度。现行升学制度是和毛主席给我们制定的教育方针相违抗的。毛主席说。教育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但是现行的教育制度并不是按毛主席的指示办的。实际上是在扩大并延续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工人和农民、城市和乡村这三大差别。”

她们建议,废除旧的升学制度,高中毕业直接到工农兵中去,和工农兵相结合。

北京市第四中学高三(五)班学生的信写于6月11日,信中说:“我们看了女一中同学给您的信。我们非常赞成她们的观点。经过讨论,我们又补充了几点意见。这些意见在全校广播后。得到了全体革命师生的热烈响应。并一致决定,将它作为向全市师生的倡议。我们给您抄送一份,我们热切盼望您给我们指示。”“我们建议:一、立即废除高等学校入学考试。二、高中毕业生先到工农兵中去锻炼,在三大革命运动中得到工农兵的批准,取得他们给予的‘思想毕业证书’。三、大量从工农兵中吸收在阶级斗争中经过考验的坚强的革命者入学深造。四、加速实行半工半读、半农半读的教育制度,这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教育方向。五、从应届毕业生中挑选在文化大革命中立场坚定、表现积极的同学升学。”

信中还说:“现在北京四中全体革命师生向全市革命的同志倡议:立即废除高等学校入学考试制度。”“高考不作彻底的改革,没有党中央,没有毛主席的命令,我们坚决不进考场。”

当晚的电视台上,北京四中的学生王倩倩和北京女一中高三(四)班的一个女同学,双双还在中央电视台上宣读了他们为废除旧的升学制度,给党中央、毛泽东主席写的这两封信。

北京四中高三(五)班同学的信,是在他们班团支部书记、中共预备党员孔丹带领下,联名写的。

孔丹的父亲孔原,时任中央调查部部长,母亲许明,时任国务院副秘书长、总理办公室主任。在6月8日声援清华附中红卫兵的自行车行列中,就有孔丹和他的弟弟孔栋兄弟俩的身影。

6月的一天,北京四中初二学生刘源,把一封信悄悄搁在了父亲刘

少奇的案头。

信是四中高三(5)班的两位学长托送的。这两个当时的优秀学生,把信交给刘源的时候很郑重的对他说:“旧的教育考试制度让白专的学生留下来了,把闹革命的、工农兵都挡在学校外面。”

刘少奇有规定,不允许子女、亲戚给刘少奇捎信。刘源不敢把信直接交给父亲,但对学长们重托的革命事业又责无旁贷,只好悄悄地搁在父亲的办公桌上。

当时,学生中要求废除高考招生制度的呼声甚高,早在6月6日,广州六中高三乙班全体同学就给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写了一封信,要求取消高考制度。信中称:“一场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波澜壮阔的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在这场惊心动魄的阶级斗争中,我们实在是一刻也坐不下去了!可是,却有一些老师,要我们坐下来静心复习,准备高考。斗争正在剧烈进行,工农兵在奋勇战斗,敌人在张牙舞爪,负隅顽抗……我们能脱离这火热的现实,能脱离这尖锐的阶级斗争吗?”他们称高考制度是封建科举的变相,是与毛泽东思想对立的大黑线。

《人民日报》6月18日的社论,等于向全国昭告中央绝没有在短时间内结束文化大革命的意思。如果说,在此之前,各学校的校园里还不时可以看到一些学生躲在某个角落里偷偷复习功课的话,那末,从此以后,学生们,尤其是中学高三的学生,就对参加高考彻底死心,他们全副身心投入到文化大革命中来了。

6月17日晚上关于废除高考的消息,让全国上下再次沸腾。

本来,6月16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南京大学批斗校长匡亚明的消息已经引起北京大学一些同学的不满,他们说:“南大斗了校长,北大为什么还不斗?何况北大领导是第一张大字报点的名!”言外之意,认为北大工作组太右了。从6月17日早晨起,北大校园里,愤怒的学生就到处围斗“黑帮”分子,高呼口号。当晚,关于废除高考的广播让北京大学又是一片欢腾,热烈支持,一直持续到次日凌晨两点钟,喧嚣声才逐渐平息。但仅安静了3个小时,6月18日清晨5时,一阵阵无节奏的铜锣声又在古老的北大红墙校园内响起,只见一队队“黑帮”、“牛鬼蛇神”的队伍在校园里被游街,他们每个人的胸前都挂着两尺见

方的黑牌,头上戴着高帽,第一顶帽子写的是“牛”字,第二顶是“鬼”字,第三顶是“蛇”字,第四顶是“神”字,合起来便是“牛鬼蛇神”。

这天,北京大学校园内到处红旗飘扬,人山人海。上午,北京大学全体工作组成员都集中到教学区开会,布置学生们自己在学生宿舍区学习、开会。化学系、生物系、东语系、西语系、中文系、无线电系的学生利用工作组不在期间,在学生宿舍区先后斗了40多名正和同学们一起学习的教师、党员干部和两名学生干部,其中就有西语系的学生吴然。吴然是烈士子弟,系团支部书记。他的父母牺牲后,由北京市委大学部部长吴子牧抚养成人。此时吴子牧已被打倒,他马上也受到株连。

青年大学生们的情绪渐渐失去了控制。以一、二年级的学生为主,开始在39楼设了“斗鬼台”,后来,在哲学楼、大饭厅、三十二斋、三十五斋、三十八斋、校医院、二院、南阁的前面,凡是有一块空场地的地方都设立“斗鬼台”,拉来“黑帮”分子就斗。这一天校系两级和学校附属各单位的“黑帮”分子、“牛鬼蛇神”统统被揪出来斗,人数多达五十余人,有的人一上午被揪斗了几次,他们有的挨打、有的罚跪、有的反剪双手“乘喷气式飞机”,有的用墨汁涂面、剃阴阳头、揪头发、往身上涂糨糊,其手段之多,真是令人叹为观止。以北大中文系为例,几十个学生高喊“把程贤策揪出来”等口号到中文系办公室所在的“二院”揪斗中文系党总支书记程贤策。程贤策仓促中逃入一个女厕所。正在厕所中的一位女职工受了一惊,但是立刻又帮他藏好,并试图阻止学生闯进女厕所,但是学生不听,把程贤策从厕所里抓了出来。那一天,学生们把中文系的教授王力、吴组缃、王瑶等抓来,用拳头和棍子殴打他们。一个学生一皮带就把王瑶打倒在地。后来,又有学生从厕所里拿来放在马桶旁边的大便纸篓,扣在中文系副主任向景洁的头上,之后又朝向景洁身上倒了几瓶墨水,他的白衬衫变成黑衬衫。

化学楼前斗的是化学系党总支委员桂琳琳,……几个女生架着她,头发散乱,面色苍白,双眼紧闭,任凭愤怒的人群七嘴八舌地吼叫。

38楼东门被斗的有历史系20多人,其余是哲学系师生。被斗者有历史系团总支书记、年级党支部书记或辅导员,还有调干生等,罪名则是“修正主义苗子”、“推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之类。

这一天,乘坐“喷气式飞机”的还有著名历史学家向达,几个学生架住被迫剃光了头的向达跪在三院二楼外晒得发烫的房檐瓦上“坐飞机”,一跪就是几小时……

那些“黑帮”、“牛鬼蛇神”们有的木然地任人摆布,有的挣扎反抗着,有的大声抗议,然而,当时的青年学生们都发了狂,反抗只能带来更可怕的报复,有的被吐了一脸的口水,有的挨了响亮的耳光,有的女教师衣服被拉脱了扣子,露出了雪白的胸脯……

事件发生后,有同学赶快报告工作组。

“说理斗争不要打人!”还有的高年级同学站了出来,制止这些学生的行为,但无济于事。

听到消息后,工作组立即停止了会议,让各系工作组迅速回去制止混乱。张承先也立刻赶赴现场,在两处斗得最凶、最集中的地方讲了话,制止住了乱揪乱斗的现象。随后,张承先开车在校园里巡视。校园内秩序这才趋于稳定。11 时以后,情况缓和下来。

# 第67回：六一八，未名湖施暴疯狂 批大富，薄一波辨证清华

当天，张承先命工作组抓出4个打人最凶和侮辱女人的人：

一个是庶务科的工人，此人当过国民党部队的上尉连长，被解放军俘虏后隐瞒身份又混入北京大学，前几天曾带头打过3个人，这次又是他带头打人。

还有一个人在38楼前乱打乱斗，工作组到场讲话后，其他人随即散去，此人却又揪来几个女教师又打、又斗。工作组赶到后制止他，他却说："你们工作组凭什么不让我斗？"问他是哪个部门的，他说是北大附中的。到附中调查并无此人。后查明，此人1962年因偷窃被开除后，一直没有正当职业。

另外一个是"打鬼台"打人的主角，自称是东语系姓黄，带头打了8个人，还趁机猥亵妇女。后查明此人原名陈应复，有流氓习气，人称"小阿飞"。

还有无线电系学生夏林翰，混入生物系参加斗争会时，上台扯掉被斗女教师的裤子，后又在台下猥亵女同学。经调查，这个人也是一贯有流氓行为，曾在王府井大街偷东西被抓住，受过留校察看处分。

虽然工作组一直在大力鼓励学生和"黑帮份子"和"反动学术权威"进行斗争，并多次组织各系学生批斗原系里的领导，但是对于6月18日在北京大学出现的这次不受工作组领导的大规模暴力行动，工作组明确表示坚决反对。他们认为，这次事件的发生"主要是坏人有意捣乱，还很可能是有组织、有计划的阴谋活动"。下午13时，北京大学工作组领导小组召开各系工作组组长紧急会议，分析了上午发生的事件，提出这次事件与运动初期所出现的问题根本不同，决定以系为单位召开全体师生员工大会，揭露今天事件的阶级斗争的本质，号召大家提高警惕，严防坏人破坏。会后即分组讨论，要求19、20、21日连续3天组织学习、讨论、对照、检讨。

当晚,张承先又召开工作组全体会议,研究处理白天发生的暴力事件。晚上22时,工作组召开全校广播大会,张承先作广播讲话,首先表示工作组坚决支持真正左派的革命行动,但是,避开工作组进行乱打乱斗的做法是有害于革命运动的行为,是违反党的政策的,会被而且已被坏人利用。张承先揭露了当场被抓住的几个坏人的情况。并要求全体师生员工组织讨论。工作组还作了一些具体规定:斗争人要经过工作组讨论、批准,等等。

会议结束后,张承先又召集各系工作组主要成员会议,强调要加强革命秩序,提高革命警惕,防止少数人钻空子,强调"文化大革命"要在工作组的领导下进行。

这天晚上,李雪峰接到刘少奇打来的电话,刘少奇说:"我考虑很久,想让王光美同志到清华大学蹲点,以便取得运动的发言权。最好让她担任清华工作组的一个领导职务,给她创造一个提高和学习的条件。你看怎样?"

"很好,清华大学是北京运动的重点,王光美同志去那里最好,我很快办好这件事情。"李雪峰回答后马上作了部署。

原来,刘少奇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第一中学上学的女儿刘平平晚上回家说,她们学校有人正在写反工作组的大字报。其他几个学校也出现反工作组的苗头,而且这些人私下串连,有可能酿成风潮。

刘少奇听到后,若有所思地说道:"这是全国大分裂的开始,不可忽视,后面可能有高级干部。"他对王光美讲:"你去清华大学看大字报,了解一下那里的运动情况。"

说完,他就给李雪峰打了电话。

刘平平是高中一年级的学生。文革开始后,她积极响应党中央的号召,是学校中最早贴出批判学校领导刘超大字报的学生。工作组进校后,首先支持了刘平平等同学的行为,并在全校师生大会上宣布:"我们已经掌握了你校反革命集团'三家村'的全部资料,师大一附中,四类学校,党支部是黑党支部!"

刘平平被选为该校文革委员会的负责人。

很快,该校将近90%的干部被打成"牛鬼蛇神"和"黑帮分子"。77%的班主任被斗争。这些干部、教师被剥夺了参加运动的权利,被

迫进行“劳改”和体罚。

与此同时,邓小平的女儿邓榕所在的北京师范大学女子附属中学也出现了质疑工作组的大字报。

工作组进校后,对教师进行排队、整理材料,挑起了群众之间、师生之间的对立,有的学生在教研组门上贴上“鬼斋”、在教师宿舍区贴上“狼狗窝”。6 月 17 日,该校高三 4 班李黎黎等 13 个人贴出了大字报,题目是“工作组把我们引向何方?”认为工作组开展运动的方式和《人民日报》社论的精神不一样,阻碍了运动,质问工作组“是无产阶级革命派还是资产阶级保皇派?”

工作组当然认为大字报是错误的。你想,工作组一进校就组织批斗学校领导怎么能说是保皇派呢?按照毛泽东杭州讲话的精神批判那些旧社会留下来的知识分子、老师,怎么能说是把矛头指向群众呢?

面对学生“为什么还不召开揭批校领导大会”的质问,工作组组长张世栋在当天的广播中说:“现在转入重点批判的条件还不成熟……仍要进行广泛的、普遍的揭发”,同时他检讨了自己有“怕乱”思想,“还不够放手”,表示欢迎继续提意见。

李黎黎等 13 个人的大字报引起了全校各班的辩论。当晚学生自发聚在大操场宿舍楼的高台前,不少学生跳上台大喊:“在学生中也有 5%,也有右派,现在牛鬼蛇神在表演,反工作组就是反党!”等等。

刘进的同班同学梁二同等学生上台支持反工作组的大字报,说工作组压制了革命师生的积极性,把学校运动搞得冷冷清清。支持者为她大声叫好,反对者也毫不妥协。双方争先恐后爬上高台,慷慨陈词。场面非常激烈。

工作组呼吁同学们不要再辩论了,没有人听得进去。辩论一直到深夜 12 点才散。

事后,邓小平的女儿邓榕赶回家向邓小平汇报,问他:“反工作组对不对?”

邓小平说:“反工作组不对,这符合了社会上反工作组的逆流。”

第二天,6 月 18 日,师大女附中出现了学生斗学生的现象。一是批判围攻反工作组的少数派学生,二是斗争所谓“出身不好、有问题”的学生。高二 2 班率先在同学中揪出 12 个“牛鬼蛇神”,第一个就是她们班

的班长,说她是“反革命黑帮的大红人”的帽子。因为校领导是“反革命黑帮”,那么,“大红人”的帽子顺理成章的也就扣到班长的头上。这位班长为了证明自己忠于毛主席,把毛泽东的像章别在胸前的肉上。

还有一位自己承认是“反革命”的同学,其父母姐妹多在演艺界,她本人也面容姣好,多才多艺,据说因此受到一位干部子女的羡慕嫉妒恨,被划入牛鬼蛇神。

这个班的同学孙行玲的家离学校非常近,每天中午回家吃饭。那天饭后她返回学校,推开教室门,就见大家的目光齐刷刷地一齐射向门口。她不知道为什么今天午休同学们都老老实实坐在位子上?为什么这么安静?为什么表情都如此怪异?这时,突然听到从讲台边传来一个同学的命令:

“进来吧!”

她这才注意到,并不是所有的同学都坐在位子上,前边还站着几位,一脸严肃。

不等她走到自己的座位坐下,又有人以命令的口气说:“你对这张大字报什么看法?”

毫无疑问是问孙行玲,她这才发现黑板上贴了满满的大字报,说是揪出了班里12个牛鬼蛇神。

看到大字报上点的12名同学的名字,她只觉得脑袋“轰”地一声,心脏一下抽紧了,完全是下意识的回答:“我不觉得她们是反革命,平常没发现有反革命言行。”

她的话立刻遭到猛烈反击,有人说她是自己跳出来的小右派!

她吓哭了。有个同学说:“你爸爸是右派,所以你当然也会同情反革命,出身决定立场。”而说这话的人自己就出身资本家。过后班领导小组划定“左中右”,她是“中右”。

6月19日,北京大学工作组向中共中央和中共北京市委呈递了《北京大学文化大革命简报》(第9号),简报讲述了北京大学“618事件”的详细过程及工作组在事件发生后采取的措施。

这天,几辆红旗牌高级轿车驶进了清华大学的校园,走下车来的是一位华发苍苍的老人,他是国务院副总理薄一波。男女大学生们都不认识他,一见从小汽车里下来个老头,不用问,肯定是首长,立刻围

了上去,争相和他握手。

薄一波看了蒯大富、孟家驹6月16日的大字报《工作组往哪里去?》,便问:“这张大字报谁写的?”

蒯大富正好就在旁边,马上有人回答说:“蒯大富写的,唉,就是他,就是他。”他们指着蒯大富回答说。

薄一波便问蒯大富:“你叫什么名字啊?”

蒯大富回答说:“我叫蒯大富。”

薄一波说:“大富? 这个名字不好。”

蒯大富反问道:“这个名字有什么不好?”

薄一波说:“瞧你这个名字,就是资本主义的! 大富? 你想发家致富啊?”

“不对! 我这个名字是社会主义的。”蒯大富理直气壮。

“?”老头瞪眼。

“资本主义是小富,只有社会主义才是大富!”蒯大富得理不让人。

“好!”观众中有人起哄。

薄一波老道成熟,临危不乱,反问说:“为什么工作组方向错了。”

蒯大富:“15日以前工作组什么工作也没干,我们要游街,工作组都干涉。”

薄一波:“噢! 那你说说怎么办,工作组在清华园下了车,站在校门口就喊,大家斗啊! 这不解决问题,毛主席说:‘下车伊始,哇喇哇喇,’你知道吗?”

蒯大富:“我知道,但工作组来了后15日前不让我们斗人等等……所以大方向错了。”

薄一波:“你是左派?”

蒯大富:“这我自己怎么好说呢。”

薄一波:“革命者应该勇于承认自己是左派。”

蒯大富:“我以为自己是左派。”

在场的清华大学学生吕述祖问:“你认为错了,那么错在哪儿? 你认为的大方向应该是什么?”

薄一波:“这同学说的有道理,你叫什么名字?”

吕述祖:“吕述祖。”

蒯大富:“我们还有很多理由说明工作组方向有问题,我们信赖党中央、毛主席。”

薄一波:“信赖党中央和毛主席是对的,但毛主席不是孤立的,他有头发,有手,有腿……他做事情是通过这些做的。毛主席的指示,中央的政策是通过基层执行贯彻的,我们认为工作组是可信赖的,难道你连毛主席派来的人都不相信?”

蒯大富:“我们是有理由怀疑的。”

吕述祖:“你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那时我也希望斗他们,但我觉得是当时自己没跟上形势,斗争会要有‘孕育期’,这就是调查研究,调查是毛主席思想关键一点。”

薄一波:“对!来到清华园,说一声无产阶级革命派站出来,只把右派留在清华园里,用机关枪一扫,这不解决问题。真正革命左派不仅要敢于革命,而且要善于革命。”

蒯大富:“是的!我知道这一点。”

薄一波:“好!蒯大富我给你提三点建议:一、希望你能站在左派群众中来,站在工作组一边去,不要作左派中的左派,如果作左派中的左派,那就是带引号的左派,也就是右派了,一个圆分左半圆和右半圆组成,如果过左了就成了右了。”

说这句话时,薄一波形象地用双手在空中划了一个圈,左手划到最高点,就和划到最高点的右手碰上了。大家都笑了。

薄一波接着说:“二、希望你能好好学习主席著作和语录,多在用字上下功夫,毛泽东思想不仅对黑帮是照妖镜,对自己的错误思想亦是照妖镜。三、噢!上面两点就已经够了,希望你今天学了语录以后,明天贴一张大字报,表明一下自己的态度,澄清一下错误。不过关于这一点,你是否敢于写,我是怀疑的,你如果不写,就会像他们处境一样尴尬,”他用手指着爬在芦席上听他们讲话的同学继续说:“受到大家的围攻,起码他,”他又用手指着吕述祖说:“就会写大字报攻你。你能把我说的这三点重复两遍吗?”

蒯大富重复了两遍后,依然倔强的说:“被多数人反对的不一定是错的。”

薄一波:“这话对!但是陆平还不承认自己是反党反社会主

义的。”

蒯大富:“我觉得这个比喻是不恰当的。”

薄一波:“我认为是恰当的,难道你让我举中国受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围攻的例子吗?恐怕在这儿的同学都不会答应,那他们不都成了修正主义了吗!”

蒯大富:“你叫什么名字?”

薄一波:“这个我懒得说。”

蒯大富:“那你告诉我个姓吧!”

薄一波:“我有我的自由,不一定答。”

蒯大富:“我也有我的自由,但是我刚才把我的名字告诉你,你们应该告诉我。”

薄一波:“好!我走了!至于我的名字,我走后你们就会知道。”

薄一波走了几步,又问蒯大富:“6月9号和10号两天清华园形势大不一样,是为什么?”

蒯大富:“我觉得是毛泽东思想的威力。”

薄一波:“那么难道9号以前主席思想就没有威力了吗?我认为取得成绩其一是:毛泽东思想的威力,其二是由于工作组进校了。”

这时,又有一个学生说起基础课教研组李世权写了反动标语,薄一波问:“他写了什么标语?”

学生答:“拥护党中央,反对毛主席。”

薄一波:“拥护党中央,反对毛主席”好!好!让他写嘛;你们不懂策略,我就比你们多读一些,应该让他们先放出来……。”

当天下午,王光美也来到清华大学。开始,她准备坐小汽车去,后来一考虑,这样太显眼了。骑自行车吧?可是路太远,也不安全。贺龙听说后给王光美搞了辆卡车,让她把自行车放在卡车上,跟在小轿车后面。到了清华大学附近,再下来骑自行车进了清华园。

王光美到了清华大学工作组办公室门口,正巧碰上刚出来的工作组组长叶林。

叶林怔了一下,立刻反应过来,急忙迎上去说:“王光美同志,哎呀,想不到您骑自行车来了,这种精神真值得我们好好学习。快进办公室吧!”

# 第68回：到一线，王光美亲临清华 六二〇，北京轰赶工作组

叶林已经知道王光美要来，是薄一波在清华大学看大字报时告诉他的。当天晚上，王光美和各系工作组的负责人见了面，听取了他们的汇报。叶林说：

“现在，反工作组的声浪基本上得到了控制，但有几个代表人物是死硬派，其中最顽固的是蒯大富。他是化学工程系三年级学生，今年21岁。父亲是江苏省滨海县的一个农民，祖父是新四军战士，父母都是40年代的共产党员。对这样一位青年堕落成为右派势力，我们很难过。”

“这不奇怪。”王光美说，“根正苗红的好人最后变成反革命的例子多得很，这样才能从实质上理解阶级斗争的复杂性。这个叫蒯大富的学生我早就听说了。他连薄一波同志都敢顶，薄一波是国务院副总理、工交党委第一书记，今天和蒯大富谈话，苦口婆心地劝他认识错误，他就是不听。”

接着，王光美提出要到校园里看大字报，叶林立即安排。

刘少奇的女儿刘涛和贺龙的儿子贺鹏飞等人陪着王光美看大字报，当她看到一篇刘才堂同学写的大字报后，就问刘涛和贺鹏飞：“这篇大字报写得好不好？”她认为这篇大字报写的是有问题的。

清华大学的师生听说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来看大字报，都很兴奋，纷纷围了过来，很快就把王光美等人围在了中间。王光美很高兴，她对同学们说：

“是少奇同志派我来清华大学看大字报的。少奇同志很关心清华的运动。”

人们兴奋得鼓起掌来，“毛主席万岁！”“誓死保卫党中央！”的口号声四起。

工作队费了很大的劲儿才将王光美从人群包围中解脱出来。王

光美兴奋的将这次被围称为“拉合尔式”包围。

拉合尔是巴基斯坦的文化和艺术中心,素有“花园城市”之称。1966 年3 月26 日,王光美随刘少奇到巴基斯坦访问,拉合尔市居民几乎倾城上街欢迎。刘少奇他们乘坐的汽车刚跑到街道上,立即被从四面八方拥来的群众围住了。黑压压的人群,把街道挤得水泄不通。人们沉浸在震耳欲聋的欢呼声和鼓掌声中,他们的车子几乎是被数万群众抬担架似地抬到国宾馆门口。这种欢迎场景给王光美留下了深刻地印象。显然,她对清华师生对她的包围,感觉也是很好的。

晚上,在工作组的会议上,王光美对工作组进校 10 天还不能控制局势表示不满。她说:“现在乱子多,说明我们发动群众不够,要找出幕后人”。

清华大学工作组得悉蒯大富所在的化工系 902 班第二天要召开会议,便打电话给化 902 班说:“王光美要来参加。”

6 月 20 日上午,负责化 902 班的工作组成员曹欣通知蒯大富说:“今天下午王光美同志要参加你们班的座谈会,你们准备一下。”

化 902 班的同学听说刘少奇主席的夫人王光美要来参加他们的班会,听取大家对工作组的意见,兴奋异常。他们将三院的教室打扫干净,课桌围成一圈,准备好开水,等候王光美的到来。

下午,工化系工作组副组长、时任化工部某研究所所长的张茜薇和曹欣领着一位带黑框眼镜、40 多岁的女士走进教室,说:“知道化 902 班的同学对工作组意见较多,特来听取意见。”大家热烈欢迎。蒯大富主持了会议,同学们噼噼啪啪就讲开了。

会议结束,那位戴黑框眼镜的女士说:“我是强斋秘书组的,姓崔,大家叫我老崔好了。”说完站起来就走了。

强斋是学校工作组所在地。

“讲了半天,原来的她不是王光美!”一种被欺骗的感觉在同学们心中涌起。本来就对工作组有意见的化 902 班学生觉得事情蹊跷,就问张茜薇:“为什么王光美同志没有来?”

张茜薇回答说:“电话不是我接的,具体情况我也不清楚。”

有人十分气愤,认为这里面“可能有阴谋”,冒充王光美将他们班的“底”差不多都摸去了。于是认为“王光美要来参加会”是一则

谣言。

工作组进校后为了加强领导,稳定局面,曾有一则“谣言必追”的指示,蒯大富们就本着这条指示去追查“谣言”,追查的对象却是“工作组”。工作组以“接电话的听错了”为由搪塞,蒯大富等人认为“那怎么可能呢”?于是继续追,从晚上18时多一直追到23时多。工作组不理睬他们,蒯大富等人就坐了5个多钟头的“冷板凳”后,憋了一肚子气,回到宿舍。这一晚,这一班青春燥动的大学生们睡不安稳了。

第二天一早,以蒯大富为首的班里10个同学贴出《叶林同志,这是为什么?》的大字报,长达3000多字,将事情公布于众,认为工作组到化902班开会,是套取学生的情报。这张大字报点了工作组组长叶林的名,牵涉到国家主席夫人王光美。这还得了,清华园立刻沸腾了,大字报前围了里三层,外三层,满园子都在议论这件事:

“原来工作组骗人呀!”

其实,当时王光美还没有正式到清华大学工作组报到,当然也不方便以工作组的身份前去参加座谈会。这些,工作组不好向学生们解释。6月21日,王光美带着中共中央办公厅的介绍信,悄悄地来到清华园,正式成为工作组成员。

这天,蒯大富在一张大字报上写下这样的批语:

“革命的首要问题是夺权斗争,从前权在校党委手里,我们和他们斗,把它夺过来了。现在,权在工作组手里,那我们每个革命左派就应该考虑,这个权是否代表我们,代表我们则拥护,不代表我们,则再夺权。”

批语很快转到王光美那儿,王光美明确指出:右派学生蒯大富要夺权。

当天晚上,王光美就在她召集的工化系部分同学座谈会上,拿出蒯大富在大字报上做过批语的照片向同学们介绍说:“大家要注意,人家要向你们夺权了,这是一场阶级斗争。”

国务院副总理薄一波则打电话给工作组指示反击。

当晚,工作组就作了安排,要将蒯大富等人作为右派一网打尽,并且提出了“反蒋(南翔)必先反蒯(大富)”的口号。

此时,6月20日,北京各学校反对工作组的活动进入了一个高潮。

首先是北京地质学院。6月16日,地质部派到北京地质学院的工作组宣布该院院长高元贵停职反省,限期做出检查。工作组的做法受到许多干部、师生的反对。6月20日凌晨,北京地质学院院党委常委李贵和部分干部、教员上书党中央、国务院,指责工作组“起了黑帮们起不到的作用,强烈要求夺回我院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权。”他们的行动得到很多学生的支持,当天上午,数百名师生在校园内游行支持“李贵的革命行动”,并包围了工作组驻地教13楼,矛头直指工作组组长邹家尤。

这还了得,这不是反党吗?国务院工交政治部副主任陶鲁笳、地质部副部长兼党委书记何长工断言地院有个“地下司令部”,指示工作组“要沉着顶住”。

第二天,6月21日,地质部调来一批机关工作人员,协助邹家尤工作组。地质部副部长何长工、胥光义和工交政治部副主任李人林等人亲自到地院讲话,说:“工作组是革命的。”批评少数人闹事、围攻工作组是“右派”翻天,并组织地院的师生、家属和孩子游行,支持工作组,批判李贵等人。

第三天,6月22日,国务院副总理薄一波对地院“620事件”做出批示:

人林同志并长工、光义同志:

应该明确答复学生,李主任讲的话是对的。工作组是上级党委派去的,它是代表党组织工作的,要号召左派起来跟工作队一起进行文化大革命,如果院党委有问题了,派工作队去行使党委职权,这就是等于夺回了党的领导权。如果再有人非赶走工作队不可,那势必是夺工作队之权,亦即夺党的领导权,那么谁来掌权呢?工作队有缺点、错误,可以改正,但不能给工作队随便加上什么“保皇派”之名称。

薄一波

6月22日

他在地院工作组整理的李贵的材料上批道:“看来李贵至少是个右派,可能还是个反革命头子。”

薄一波的这一批示工作队没有公布,反工作队的师生对薄一波的批示一无所知。6月23日,王大来带着王大宾等47人签名贴出大字

报《大骗局、大阴谋、大出丑、大暴露!》在学校引起极大反响,同时也成为工作队围攻的重点。所有参与这张大字报签名的师生都成了重点批判的对象。

随之而来的是组织全校教职工,在教工之家对反工作队的教职工进行批斗。批斗会的声势很大,被批判人被强制性地按头接受批斗。

6 月 25 日,地质部副部长胥光义来到地院,先开会,将师生员工分支持工作组的,中间态度的,反对工作队的三批传达薄一波 6 月 22 日的批示。

薄一波的批示遭到许多学生的反对,还没念完,一些人就公开骂起来:

“放狗屁,薄一波是什么东西,他是不是黑帮还有待考察呢!”

“他和彭真的关系必须追查,我们不听他的,他倒是应该滚回来,听听我们的!”

不仅是在地院。6 月 20 日早上 6 时,在北京师范大学北饭厅北墙,数一学生高树奎等 17 位学生贴出了《孙友渔要把运动引向何方?》的大字报,对工作组提出三点批评,主要讲工作组进校后就把校党委一批干部集中在主楼办学习班,将他们与群众隔离开了,把运动搞得冷冷清清。

一石激起千重浪,在短短一、二个小时内获得了 500 多张大字报的支持。

上午 10 时,工作组组长孙友渔很快向全校师生发表了 20 分钟的广播讲话,肯定工作组的大方向是正确的,告诫人们警惕上坏人的当,严厉指责所谓“二月兵变”是造谣,是“要流解放军的血!”指出高树奎反对工作组就是反对新市委,就是反革命! 都是要孤立党中央和毛主席! 并提出“反工作组就是反党”,认为大字报“别有用心”,“他们的命运与牛鬼蛇神联系在一起”,是“有计划、有组织的预谋活动”,“要赶工作组下台”,号召师生们斗争这些学生。孙友渔的讲话简短有力,铿锵有声。

讲话刚结束,学生高树奎即被揪斗。

物理系 64 级的学生李庆林、赵惠中、武世文等 5 位同学也贴了一张支持高树奎的大字报。这 5 位同学就在自己贴的大字报附近听了

孙有渔讲话。孙有渔话音刚落,以教育系为主的一群人就在物理系64级同班同学的引领下,把赵惠中5人推上一个木台进行了批斗。

6月3日率先给校党委贴出大字报的政教系五年级调干生谭厚兰组织起一支游行队伍,她走在队伍最前面,高呼支持工作组的口号,在校内游行。随即,坚决拥护工作组和批判反革命造谣的大字报不断贴出。

中午,在东饭厅墙上又出现《孙友渔为何如此恐慌?》的反工作组大字报,大字报的作者是中文系64级(2)班王颂平和李先华。

李先华,同学喊他"李克思"。安徽人,瘦高个,喜欢背两个书包,穿梭于教室、图书馆和宿舍之间。小组发言,他总是出口不俗,有逻辑,富哲理,居高临下,"鹤立鸡群"。

毫无疑问,他们二人立即遭到围攻。

中文系64级(2)班骨干们在一间男生宿舍写大字报,批判"反革命小爬虫"王颂平、李先华,誓死捍卫工作组,旗帜鲜明。执笔者宣布:"在场的姓名都往上写啦!"

这时,在场的该班的女生孙碧琼却举手声明:"不写我的名。"

王颂平被孤立。她睡的下铺,多层大字报帐幕似的圈围起来。上床掀开大字报,不敢损坏。本班有女生随意训斥,外班有女生光顾批判。她去组里有人斗争,去食堂吃饭,会遭人辱骂,被吐唾沫,还要当心扔来的石子,真成了"过街老鼠"。

当天下午,因为支持高树奎大字报而被批斗的部分学生跑到北京新市委告状,但新市委说工作组是新市委派的,反对工作组就是反对新市委,反对新市委就是反对党中央。他们无功而退。但内心不服,就又到《红旗》杂志社告状。《红旗》接待站的工作人员热情接待了他们,说:"工作组就是工作组,新市委是新市委,党中央是党中央,不能混为一谈。对工作组有意见,贴大字报是你们的权利,怎么会是反革命呢?"还给他们引见了林杰。林杰也明确表示支持他们。

当天晚上,北京新市委郭影秋、武振平、袁智平赶到北师大调查,看大字报,同时应围观的师生员工要求在露天的场地上讲话,大意是:希望北师大的师生员工按照中央的部署,在以孙友渔同志为首的工作组领导下,摆事实,讲道理,把文化大革命搞好,对工作组有意见,可以

批评,可以帮助。但也要提高警惕,防止少数人混水摸鱼,扰乱阵线,把运动引向邪路,并指示要“信任工作组,支持工作组,帮助工作组”。这个讲话,被反工作组的学生批判为是“镇压群众运动的宣言书”。

同日,有学生转抄了北大以《二月兵变》为题的一张大字报。

这天,北师大还有人贴出《郭影秋你是什么人》的大字报,揭发北京卫戍部队准备在暑假期间进驻人民大学,质疑此举是否彭真的阴谋?郭影秋就是当时的人大校长。

6月20日这天,北京轻工业学院的学生撵走了一轻部政治部主任张万合为首的工作队。薄一波闻讯赶到该校,发表讲话,说“不要怕学生……”当他看到该校师生“反张”群情激昂,只好撤了张万和,另派两名工作组组长。但是轻院师生们依然不饶,说薄一波的讲话是“三大”:加大了革命阻力,大泼冷水,又跳出来一个大保皇派。

到了6月20日晚上24时,北京铁道学院师生也掀起驱赶工作组的风暴,学生们自己成立了革命师生委员会。

而在6月20日这天,有数百名北航同学分别到国务院、国防科委、北京市委反映、汇报工作组的情况。

以赵如璋为首的国防科委工作组是6月8日进驻北航,取代北航学院党委,领导全院的文化大革命。工作组进校后,首先支持干部子弟刘克府、李明清、赖锐锐等人的大字报,罢了党委书记王恒、副书记周天行的官,交群众揭发、批判,带高帽子游街,号召全院师生揭院党委的盖子。不久,又将以沈元副院长为首的一批航空专家、教授打成“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牛鬼蛇神”。

6月17日下午,赵如璋在全院大会上提出:“有什么问题就揭什么问题,谁有问题就揭谁的问题”的口号,出现了“全面开花”的局面,纷纷把矛头对准基层干部、辅导员、学生。

有同学开始怀疑工作组的做法,他们认为:按照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号召,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工作组号召“谁有问题就揭发谁,有什么问题就揭什么问题”,这是把矛头指向一般干部和群众,大方向肯定错了。6月19日晚上开始出现批评工作组的大字报。很快形成了炮火齐轰工作组的局面。6月20日同学们开始上访,反映工作组的问题。6月21日晚,3511班学生、班里的文

革组组长石兴国贴出一张大字报:《一条“无头”黑线》,分析了当时学院的运动形势,希望能发动群众揪出与北航有关的黑线及其后台。同时指出“工作组领导不力”,并提出工作组是揭盖子还是捂盖子、查黑线还是护黑线、靠群众还是怕群众,矛头直指工作组。

这一下,北航又开了锅,支持的、反对的大字报铺天盖地。工作组如临大敌,立即组织人马批判,围攻。这又激起了更多学生的不满:“彭真、陆平都能批判,你工作组为什么就不能批评了?”于是,3511 班学生、烈士子弟戴维堤又贴出了“鉴于赵如璋同志为首的工作组把矛头指向了群众,大方向错了。赵如璋同志已不适宜继续领导北航的文化大革命,建议国防科领导另派负责同志”的大字报。这是北航“赶走工作组”的第一张大字报。一时间,“谁反对工作组谁就是反革命!”“打倒戴维堤的嚣张气焰!”“揪出反革命分子戴维堤示众!”的大字报、大标语铺天盖地贴满北航全院。

就在 6 月 20 日前后几天时间里,北京市有 39 所高等院校发生工作组被群众轰赶事件,工作组和群众的对立情绪达到十分尖锐的程度。

# 第69回：压不服，各地纷纷出事端 武汉市，“墨水湖中学事件”

仍然是6月20日，这天早上，刘少奇的女儿刘平平就读的北京师范大学附属第一中学的两名学生陈永康、何芳芳也贴出了一篇《揪出钻进我们肝脏的牛鬼蛇神》的大字报，指出：

“自从6月9日工作组来了以后，我校斗争形势急转直下。无产阶级左派和广大革命群众倍受压抑。刘超之流的反革命气焰更加嚣张，现在斗争几乎处于停滞状态。6月17日以勾德元为首的新工作组的到来，非但没有改变这种不能容忍的现象，反而变本加厉，充分地暴露出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狰狞面目。勾德元之流是我们革命左派和革命群众不共戴天的阶级敌人，是披着人皮的豺狼！他们盗窃党的名义，利用工作组的职权，进行一系列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勾当。运动刚刚开始，群众还没有发动起来，勾德元之流就刮阴风、造谣言、煽风点火、挑拨分裂，用对待敌人的态度打击无产阶级左派和革命群众。”“他们根本不是执行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坚定地依靠革命左派，团结一切革命群众，集中火力，集中目标向反党反社会主义黑线开火。而是千方百计地制造纠纷，煽动、挑拨，好像对待敌人一样‘审讯’‘斗争’革命同志，转移群众的斗争视线。斗争革命同志，转移群众斗争的视线。”

大字报还说：工作组是“和他们主子一样玩弄一场假批判真包庇，假斗争真掩护的大阴谋。这绝对办不到！”“斗争起革命左派和革命群众，面孔板得这样凶，调门却喊得这样高，牙齿却露得这样长。你们和谁穿一条裤子，难道不是再清楚不过了吗！”

很明显，大字报的矛头直指工作组。

在陈永康、何方方大字报贴出的同时，该校高三三班范光义等7名同学也贴出了批评勾德元工作组的大字报，指责工作组入校后的做法不符合中央团结大多数人的方针。这张大字报是头天晚上，何方方

找范光义交换了对工作组的看法和意见,达成了共识后,约定第二天一起张贴针对工作组的大字报。

其实,以勾德元为首的工作组已是第二批进驻师大一附中的工作组了。6月9日,曾有第一批工作组进师大一附中。他们进校后,召开了一个座谈会,要求各班推选两名学生代表参加,商谈学校的文化大革命应该怎样进行?座谈会是在教务处的一间大房子里召开的。工作组组长根据四清的政策说明座谈会的目的后,同学们一时哑然,没有人发言,一时间出现了冷场。

这时,高三三班的范光义打破了僵局,首先发言说:"根据中央四清文件精神,既然干部队伍中95%以上的干部是好的,而犯错误的干部中,95%以上的是可以教育好的,那么,学校的干部和老师绝大部分也应该是好的,是应该团结的……"

他还没有说完,只见坐在离他不远的地方一位高一的女生腾地站了起来,大声的驳斥他说:"你说的不对,你说哪个老师是好的?"

范光义一愣,随口说出政治老师任允珍等几个老师,说明对她们的看法是错误的。

那位女生当即反驳道:这个老师出身不好……那个老师是右派……她还举了另外一些老师为例子,最后说:总之,老师中没有好的。

这位女生就是刘平平,刘少奇的女儿。接着,一些高一的学生代表纷纷发言支持刘平平的观点。

这时,工作组组长总结说,他同意并支持范光义的意见,干部、教师队伍中不可救药的坏人还是极少数的。

这期间,刘平平等同学揪出了校长兼党支部书记刘超。

但是,北师大一附中第一个工作组入校仅3天就突然撤走了。6月17日,以勾德元为首的第二批新工作组进校,他们进校不到10小时,就在全校师生大会上宣布:"我们已经掌握了你校反革命集团'三家村'的全部资料,师大一附中,四类学校,党支部是黑党支部!"

这就是陈永康、何方方大字报中提到的"6月9日工作组来了以后","6月17日以勾德元为首的新工作组的到来"的缘由。后来人们纷纷说,刘少奇就是通过刘平平,直接掌控着北师大一附中的运动。

接着,该校将近90%的干部被打成"牛鬼蛇神"和"黑帮分子"。

77%的班主任被斗争、被围攻。这些干部、教师被剥夺了参加运动的权利,甚至进行非法的“劳改”,排队用鞭子抽打。邓小平的小儿子、初一学生邓质方还恶作剧的在暖壶中撒了尿,令老师喝下。

工作组的作法引起了一些师生的不满,于是有了6月20日陈永康、何方方等人的大字报。

写大字报的这两人均是中共预备党员,陈永康出身革军,何方方出身高知。

大字报贴出的当天夜里,刘少奇在中南海家中接见了该校工作组组长勾德元和刘平平等几个参加工作组的学生。他说:

“校长刘超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基本可以定了。”

针对陈永康、何芳芳两人贴出的大字报,刘少奇说:“出现了你是黑帮的大字报。说你是黑帮工作组长,给你贴了十几张大字报,不要紧。大字报出来,证明内部意见不一致嘛,证明他们对运动不满,学生之间不团结嘛。你去了三天,和他们无缘无故,怎么知道是好人坏人呢?……为什么要斗你呢?是因为你靠近左派,要好好看一看,现在多数不同意他们了。”

“写大字报的人就是打着‘红旗’反红旗,大字报谁都可以利用。”

“现在,人家向你们进攻,人家向你们采取攻势了,这好嘛,敌人出来了,这个蛇出洞了,你消灭他就容易了。”

“当前,主要问题,是不知道怎么搞,我们也是第一次,不知怎么搞,我们和你们大家一起搞,一起学嘛,大家讨论走群众路线,先跟左派,积极分子商量,再跟群众商量商量之后再斗。”

刘少奇又谈到学生代表参加工作组的情况,他说:“高一、高二的同学不能骄傲。高一高二参加工作组的人多,现在高三没有人,现在你们受到信任人家不服气,不服气是有道理的。他们比你们高,被高一领导有意见,怕丢面子,要理解人家的心理状态。如果你们是高三,他们是高一高二,他们领导你们,你们也不服气嘛。高一、高二的人不要骄傲,不骄傲才能使他们服气。工作队可以跟他们讲清楚,为什么没有高三的人?因为你们当时选不出来人嘛,等以后选出来人再抽调。”

原来,师大一附中第二批工作组进校后,从学生中选了5名代表

参加工作组的工作。其中高一的学生3人,高二的学生2人。高一的学生刘平平就是那3名高一学生代表中的一位,是人气很高的学生领袖。工作组说:这是他们的全国首创:让学生参加工作组。

何方方、陈永康的大字报在北师大一附中引起了轩然大波。在这种情况下,刘少奇于6月24日又对工作组做出指示:

“两方面都在争取群众,你们要驳,他们到底对不对?什么人在指挥,不听党的话,听谁的话?肯定听黑帮的话,搞地下活动,非法地煽动群众,是非法的反革命活动。”

“辩论好,一条条地驳,他出50张,我出500张,但是在搞地下活动,违反工作组指导,利用群众情况(不明)乱斗一气,把文化大革命搞乱。”

他指示:要“揭露何方方反动面目,你是谁指使的,把她孤立起来,不要打人,让大家驳,大家出大字报,他们那边一定有刘超、前市委或高级干部,他们利用群众对黑帮的气愤情绪,把文化大革命搞乱,背着工作组、革委会搞地下活动。”“可以讲,何方方为坏分子,……”

“向大多数人讲清楚,以前打人是坏人捣乱,不要上坏人的当,向所有的人讲,打人是何方方捣乱,要宣布一条,一切牛鬼蛇神地富反坏右不许乱说乱动,如动就是现行反革命。”

6月20日清晨,北京林学院学生蒋书铭、曾宪均5人根据访问新市委接待站大学组许克敏后的记录,整理成大字报《与新市委许克敏同志谈话纪要》,也称《二十二个问题》。这份大字报回答了当时运动中所提出的一些问题,深受群众欢迎,广为传抄,不胫而走,到6月底,就贴遍了哈尔滨、呼和浩特、上海、广州、武汉、重庆、西安、长沙等34座大中城市。但是,很快《二十二个问题》就被薄一波和北京市新市委打成“反革命黑纲领”、“大毒草”,声言要“消除流毒,肃清影响”。薄一波还把林学院定为“反干扰”的重点学院之一。大字报的作者、林学院的5位学生被打成“反党小集团”,遭受长期的残酷斗争。尔后的一段时间里,4000余人因传抄这张大字报而被打成“反革命”,4人被逼自杀身死。7月9日,工作组召集12个院校4000余人参加的“批判反动的二十二个问题大会”,斗争蒋书铭等人达8小时之久,并宣布“取消蒋书铭等的预备党员资格”。同一时候,清华工作组把清华大学转

抄这份大字报的3个人打成“小三家村”、“反革命”,一位教师因翻印《谈话纪要》被打成反革命,忿忿服毒含冤而死。

轰赶工作组的事件不仅在北京。6月20日,吉林大学师生将大字报贴进市委工作组组长李一平办公室,勒令其退出学校。随之,学生开始驱逐工作组。

6月20日,大连工学院发生揪斗教员、党员干部的“6·20”事件。部分学生围攻、污辱、殴打该院造船系政治辅导员,并将其捆绑游斗,喊出“一切权力归学生”、“打倒党总支”等口号。接着又绑架5名党员干部游街,对其进行殴打。

6月20日上午9时左右,湖北大学政治系师生写了一张大字报,敲锣打鼓送到学校行政大楼,其内容是要求当时驻校工作组彻底揭开校党委阶级斗争盖子,彻底解决四清运动中的问题。当天,湖北省委向湖北大学派出以曹金祥为首的工作组,并向全校师生传达了湖北省委关于召开全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积极分子代表大会的紧急指示,宣布了代表名额的分配方案。

政治系学生要求增加政治系教工代表名额,减少党群、人保部门代表名额。他们敲锣打鼓给校党委、校文革送去大字报,贴满了行政大楼门前的墙壁。校文革办公室负责人说学生们的行为是无理取闹,要求送大字报的同学在组织部干部拿出的名单上签上自己的名字,还追问“你们谁是头头?”未曾想,送大字报的63年级10名同学毫无畏惧,勇敢地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为此,政治系张维荣和一批青年教师写了一篇题为《不准压制革命的大字报》的大字报,认为校文革办公室负责人的做法是压制学生革命。而且这一事件发生在南京大学匡亚明镇压学生事件后,发生在《人民日报》发表了关于革命大字报的社论以后,问题的性质显得更加严重,要求省委工作组严肃处理这一问题。

当天下午13时左右,政治系学生发现他们写的大字报被人用水冲掉了,其中一名学生蒋汉洲马上跑回政治系。当时同学们正在午休,蒋汉洲边跑边喊:

“革命的学生起来,找校党委评理去!”

学生们一听到自己写的大字报被人用水冲掉了,都很气愤,蜂拥

来到行政楼找校党委和工作组理论,他们把行政大楼围得水泄不通,同学们认为这是一起严重的政治事件,要求严惩冲掉大字报的人。情绪激动的同学们还向省委派来的工作组提出要求:“举行校内游行,反击当权派粗暴压制学生的嚣张气焰!要求撤销校文革办公室负责人的职务、把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权交给广大革命师生!”校内形势非常紧张。

工作组和校党委拒绝了同学们的要求。于是政治系学生一面在学校中心场地,校邮局旁搭起台子,向全校师生疾呼他们大字报被毁的事情,并要求严惩肇事者及向省委反应情况。他们还跑到校广播站,要求向全校广播校党委当权派压制学生的罪行,遭到校广播站负责人的拒绝,只好派人到各系呼吁全校师生支持他们的行动。一时间,很多同学都写了支持政治系师生的大字报。

与此同时,学生们还向省委打电话,找王任重,要求允许学生们在校内游行,抗议学校当局对学生的组织迫害。省文革领导小组办公室要湖北大学派代表到省委反映情况。工作组与省委联系后,同意政治系派代表到省委反映情况。于是,政治系按照家庭出身好,政治表现好,和共青团员三条标准在全系各班推选了马兴林,田海兰,柴玉本,蒋汉洲等15名学生代表。政治系党总支为防止学生代表到省委出现过激行为,派总支副书记陈嘉陵和团总支书记张维荣带队。他们于下午18时,由学校派交通车前往省委反映情况。

张维荣等17名师生代表来到省文革接待室,向省文革接待站负责人汇报了当天上午学校发生的事情,提出了18条要求,其中包括改组校党委、改组校文革、要求湖北大学校刊和广播站交由革命师生领导、省委派调查组调查湖北大学情况等。

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陈扶生和省委秘书长曹建国来到接待室,听取了湖北大学政治系师生们的意见后说:“赵抱一同志是王任重相信他才调来的,你们反赵抱一,还不是针对省委来的吗?”

赵抱一是湖北大学党委书记。

他们又说:“你们要夺权、夺枪、夺广播站,并向王任重同志发出最后通牒,这与57年汉阳一中事件有什么区别?”

陈扶生还说:“政治系有个核心小组,你们知道不知道?这个核心

小组进行了一系列反革命活动。”

同时,他们表示,会认真考虑学生们提出的严惩毁坏大字报者的要求。于是请愿师生满载希望乘车回校。

谁知他们回到学校刚下汽车,学校就将带头人张维荣、陈嘉陵和请愿的代表抓到了大礼堂的主席台上,此时,学校工作组和校党委早已将全校师生集中在大礼堂,只等请愿师生回来,召开批判大会。

就在政治系的师生代表离开学校后,省委派往湖北大学的工作组长曹金祥指挥工作组和校党委,对湖北大学的“反革命闹事”组织反击。曹金祥向师生宣布了省委镇压学生的命令,说:“政治系要夺权、夺电台,向王任重同志发生最后通牒,他们要游行,要斗争陈立国(校文革办公室负责人)。根据省委指示,权不能夺,电台不能交!陈立国是好同志,好党员、不能斗!政治系的事件是一小撮坏人操纵的,我们要揪出政治系的坏人!”

接着,食堂工人开始撕大字报,辱骂、殴打学生。同时学校还派出荷枪实弹的武装民兵驱散了辩论的师生,包围政治系教工住地24号楼和政治系学生宿舍,学校实行武装戒严,发动全校师生写反击政治系右派的大字报,组织反对“政治系坏人”和“右派学生”的示威游行,通过校广播台,不停地播送“省委指示”。

批判会上,学校工作组和校党委将6月20日这天发生的事情称之为反革命事件,并号召全校师生进行反击。开完会后,将张维荣和陈嘉陵分别关在学校一号楼旁边的一栋三层楼一楼的小房间里,并由校防空连的民兵轮流看守。当天晚上,校武装部给民兵发了枪枝和子弹袋,当然里面没有子弹,并要求他们都将子弹袋挂在身上,一副全副武装的打扮。

20日晚上,一个班的学生民兵被派往政治系学生宿舍,监视政治系学生。给他们下达的任务是:学生必须在夜晚12点以前回宿舍睡觉,防止闹事。由于天气比较热,到晚上23点左右,政治系学生还在宿舍前的广场溜达。学生民兵劝政治系的同学回宿舍睡觉。一个学生对他们讲:“心里有事,睡不着,我们到省委请愿,怎么会是反党呢?我家是贫农,我参加反党活动对不起毛主席。”

这就是发生在湖北大学的“620”事件,被称为“小匈牙利事件”。

此后,工作组以“620 事件”为分水岭,以师生们对“620 事件”的态度和立场进行区分。因为政治系师生代表到省委请愿前很多学生都写了大字报表示支持,一时间,学校师生人人自危,人人过关,被要求对“620 事件”表态。写了支持大字报的同学纷纷检讨,唯恐被打成右派。一场刚刚燃起来的烈火被扑灭了,再也没有人敢写批判校党委的大字报了。

“620”事件第二天,省委书记处书记王树成在武汉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上,号召把斗争的矛头指向“一小撮反党反社会反毛泽东思想的反动知识分子”,在全省范围开展“反右”运动的总动员,湖北大学第一批 11 名学生被打成“右派分子”,14 名政治系教工被打成“反革命分子”,被点名批判即将被打成“右派”的学生 40 多名,写下血书、准备自杀的学生 15 名。

与此同时,武汉还发生了“墨水湖中学事件”。6 月初,武汉墨水湖中学萧维业等人写大字报揭发学校领导压制学生革命的行为,遭到学校领导的威胁、恫吓,后来工作组进校,冲突进一步发展。6 月 16 日,墨水湖中学出现了“616”打人事件,王任重在“情况反映”里批示“这不是一般的打人事件,这是比 1957 年汉阳事件更为严重的反革命政治事件”;在关于安静街中学和人民中学事件的“反映”上,王任重极为气愤地批示说“工作组无能,流氓学生这样猖狂,无产阶级专政到哪里去了?”

王任重认为这些就是“反革命阶级报复”、“反革命暴乱的典型”,要中南局批发文件到基层,并上报中央。6 月 21 日,墨水湖中学工作组接到市委的指示,第二天就把那些起来造反的群众打成“反革命”,分别看押起来,组织群众斗争。7 月 21 日,公安局逮捕了他们,关进武汉监狱。不久,他们就被分别判刑,其中有的被判处死刑缓刑两年,最小的 3 个 16 岁的中学生,也被判刑五年和三年。同时,工作组根据王任重的指示,举办了“武汉墨水湖中学现行反革命罪行展览”,把这些群众说成是“假左派、真右派”、“法西斯暴徒”等等。这个展览会展出了两个星期,在武汉市造成很大影响。王任重还亲自指示,要为这件事写社论和报道,武汉市长亲自审稿,市委机关刊物《支部生活》已排了版,《公安报》抢先登载,还计划 8 月 5 日在汉口新华路体育场开公

审大会。

不仅在大学里抓“右派”,还在中学里大抓“右派”和“反革命”,王任重说“中学生的右派分子,是指那些流氓学生,这样的人要立即逮捕法办。”在 1966 年 6、7 月间,全省中学生至少被逮捕 180 多人,大的 14、5 岁,小的 13 岁,多数是因为给领导写过大字报。

# 第70回：发简报，陈伯达意见被否 女附中，卞仲耘屡屡被打

6月20日，刘少奇以中央名义批转了北京大学工作组的第9号简报，并加上批语："中央认为北大工作组处理乱斗现象的办法，是正确的，及时的。各单位如果发生这种现象，都可参照北大的办法办理。"

该简报在政治局传阅，康生、陈伯达都画了圈。曹轶欧20日晚上回到家里，将北大所发生的情况以及中央的批语向康生作了汇报。康生听罢老婆的情况汇报后说：

"这样吧，你们北大工作组首先拟一个报告，呈报北京市委及中央，主要讲半月来的革命大好形势及运动过程，然后再讲一下'六一八'事件经过，并且要说明原因，要上升到一定的高度。要强调这次事件，完全是由校内外敌人内外结合，对我们实行的突然袭击，制造混乱，企图打乱北大的文化大革命。同时，要表明你们的决心，号召全校师生起来揭发，用以教育群众，接受教训。要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按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办事。要建立无产阶级的革命秩序，要在工作组领导下进行斗争……把黑帮分子和一切牛鬼蛇神揪出来。明天，我再给伯达同志讲一下，要他对北大的工作给予支持。"

曹轶欧说："你这个方案好是好，可是由谁来写呢？"

康生说："找张德华，他既是工作组的成员，又是团中央候补书记，今后还要进步嘛！"

第二天，工作组的笔杆子们在曹轶欧的授意下用一天的时间写出了报告的初稿，且也真的由工作组成员张德华把关通过，最后张德华在这个报告稿上写道：

"请承先、大姐（指曹轶欧）审阅后印发。"

曹轶欧看到这个报告后，即作了如下批示：

"德华同志，报告写得很好，在策略运用上，很下了一番工夫，没有什么不同意见，曹轶欧，6月21日。"

工作组拿到曹轶欧的批示后,没有再给张承先审看,也没有请其签名,便将这个题为《关于北京大学二十天文化大革命情况的报告》送到中共中央和北京市委。

以后,北大运动趋于平稳,工作组加强了对群众的控制,北大校门戒备森严。各系、级之间不准往来,同学外出买东西,要两人同行,向工作组请假,回校后要汇报。来北大的外校师生一律被拒之门外。

6月20日,团中央书记胡克实通知胡启立,一起去见邓小平。胡启立吓了一跳,不知像邓小平这样的人为什么突然叫他去?

到了邓小平那里,邓小平对他们说:“那13个人并非积极分子。积极分子不同情那13个人”。

又说:“中学生也有反革命,最近枪毙的杨国庆就是中学生,只有19岁。对这种人就是要反击。”

杨国庆并不是中学生,其父解放前是地主,并且还做过国民党还乡团团长,解放后被枪毙。杨国庆认为,是共产党搞得他家破人亡,所以他成年后一有机会就搞破坏并以此宣泄仇恨。从1965年7月后,就策划偷越国境、投靠外国大使馆、刺杀外交人员和国外贵宾等阴谋。1966年4月29日11时50分,在东城区友谊商店内,他突然砍伤来自马里的新闻工作者代表团团长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驻华使馆秘书的夫人,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起伤害外国人的重大案件。1966年6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做出终审判决,判处杨国庆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邓小平说的“那13个人”是指北师大女附中6月17日给工作组贴大字报的高三4班李黎黎等13名同学。他的这几句话就给那13位批评工作组的同学定了性质。胡启立回来后,赶快通知工作组:“那13位同学不是积极分子,要坚决依靠支持工作组的大多数,打击反革命。”

6月20日,以高三3班梁二同为首的12名高中学生给江青写了封充满革命豪情的信并附上控告工作组镇压群众运动的材料。信中说“从现在我校及别的一些学校情况看,有很多理由猜测:这是一个新的有组织地、有计划地反对文革、反党的阴谋……而且我们更焦急、更深切地感到毒蛇就在主席身边。”

面对各地纷纷出现的反工作组浪潮,特别是北京6月20日发生的驱赶工作组的风潮后,6月20日晚,陈伯达代表中央文革小组在参加政治局常委召集的汇报会上提出一个书面建议:《中央文革小组的两项建议》。具体内容是:

一、建议全国大中学校、机关单位在适当时候成立文化革命小组,领导文化革命运动。小组成员名单由群众提出,经过群众充分酝酿,进行选举。票选或举手表决,由群众决定。

二、在最必要的地方,最必要的时候,可以由上级派工作组。工作组名单必须经过认真审查。应当是无产阶级革命派,不是资产阶级保皇派。工作组的工作方法,必须认真地走群众路线,不能包办代替,独断专行。

军队按中央批准的办法办理。

由于与会的大多数都是赞成派工作组的,会上没有讨论陈伯达的这个建议。那天深夜,陈伯达开完会回到钓鱼台,唉声叹气,满腹牢骚的说:"我这个小组长不能干了。今天晚上邓小平同志主持会议,我在会上写了一个条子,提出取消工作组。他对我的意见根本不理,把字条往旁边一扔,不在会上讨论。我这个组长还怎么当?我非辞职不可。"同时他还指责刘志坚说:"他是副组长,却不支持我。"此后一连几天,陈伯达在钓鱼台逢人就发牢骚,还说要到天津"休息"几天。

6月21日,刘少奇提出:特殊情况下,工作组可以代行党委职权,有的学校出现赶工作组、向工作组夺权,要夺档案、枪支、广播这些权,这不能允许,不准随便提出夺权。不好的工作组也可以撤走,但是不要党的领导、中断党的领导是不好的。邓小平也在会上提到了关于工作组工作方法的意见。

6月21日上午,北师大女附中工作组在全校大会上做了进校18天的小结,工作组组长张世栋在讲话中说,"进校18天了,学校运动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昨天我们对工作进行了群众性的总结,我们现在的任务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发扬成绩,克服缺点,将运动推入一个新的高潮。"他宣布,当天下午召开揭发卞仲耘的大会。

工作组进校后,卞仲耘在北京饭店参加新市委组织的集中学习。工作组叫卞仲耘回学校参加揭发批判她的大会,新市委开始不同意,

后来经工作组再三要求,说工作有困难,这才让卞仲耘回来了。

6月21日下午14时30分,北师大女附中工作组进校后的第一次揭批会在大操场召开。那天天气很热,卞仲耘一个人站在台上,身后是手持体育课用的体操器械木枪的几个从高三学生中专门挑出来的“贫下中农子弟”。副校长胡志涛(女)、刘致平,教导处主任汪玉冰(女)、副主任梅树民4个人站在台下。高三4班反工作组的13个人被单独安置在学生队伍后面,也有学生持木枪站在她们身后。

文化革命以前,卞仲耘主管党的工作,日常教学工作由胡志涛副校长主持,普通学生对卞仲耘不是很了解。

大会开始,卞仲耘首先作了检查,然后由群众揭发批判。

师大女附中英语丁老师的前妻袁淑娥第一个上台发言,手里还拿着一张照片,乍一看是卞校长和她前夫丁老师的一张合影,说卞仲耘生活作风有问题,破坏了她的家庭,动情处声泪俱下。除了揭发卞“乱搞男女关系”之外,还说卞过去曾对她说过许多反党反社会主义、羡慕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話,说卞仲耘是“漏网大右派”等等。

随后,袁淑娥又叫她在上小学的儿子上台念发言稿,控诉卞仲耘要“谋害”他的妈妈。袁淑娥的弟弟,也是一名高中学生跳上台去,按压卞仲耘低头。台下,学生群情激愤,振臂高呼口号,场面一度失控。卞仲耘身后手持木枪的学生,你一枪、我一枪就把她捅倒了。年届五旬的卞仲耘,完全没有心理准备,平时身体就不好,哪里经得起这样的暴力?当时就发生了呕吐。

袁淑娥是大连工学院的俄语老师,1959年与卞仲耘同住一所医院时相识。1963年女附中缺英语教师,袁淑娥的丈夫当时在北京空军,也有转业到女附中的意愿,经卞仲耘介绍,学校领导讨论通过,她丈夫调入女附中教英语。这期间,袁、丁夫妇经常争吵,卞仲耘从中做过一些调解,但袁、丁最终还是离了婚。袁淑娥多次向女附中领导提出要求,希望扣丁的工资补贴她的家用,卞仲耘认为应该按照法院判决书执行,没有答应她。于是,她开始向有关方面控告。1966年5月,她将上万言的揭发信,复写多份,给毛泽东、团中央、北京师范大学党委等寄去。揭发信把个人的所有怨恨都上纲上线到政治高度。

其实文革开始后不久,袁淑娥就经常来学校活动了,她的控告信

也转到工作组手上。

批斗会前,她曾找过工作组要求参加大会,工作组不同意,可她还是带着儿子和母亲来冲进了会场。她手里拿着的那张照片,粗看是卞校长和她前夫的一张合影,实际上是卞校长夫妇和袁淑娥夫妇四个人的合影,剪去两边的人,就成了卞、丁的合影。

袁淑娥此后一直在学生中间活动,包括学生去卞校长家贴大字报,都是她领的路。

袁淑娥的发言前后持续了一个多小时,学生的愤怒情绪一波又一波。除了袁淑娥,又有六、七位师生代表上台发言,其中一位管过人事的老师上台发言揭发说,卞仲耘是刘仁介绍入党的假党员,包庇原语文教研组长,并说语文教研组长是中统特务。一个说卞仲耘有生活作风问题,一个说卞仲耘是假党员,还包庇国民党特务,这就如同两颗重磅炸弹,在学生中激起了强烈的愤怒。

工作组组长张世栋会前去团中央开工作组组长会,胡克实说:"如果发生武斗,你们一定要挺身而出,坚决制止!"他赶回学校时,批斗会正在进行。面对突发的暴力行为,他说:"今天大家很愤慨,这是可以理解的,应该支持的。打她几下是不对的,今后注意不用打她,因为揭发就可以打倒她。为了继续斗争,要好好准备炮弹继续打,提高警惕,准备全歼,取得最后的胜利!要好好贯彻党的政策。……光荣、胜利归功于党,归功于伟大的毛主席!"

最后,工作组做了小结,认为"卞仲耘的问题,根据大家的揭发,是非常严重的,大家要提高警惕,她的检查根本不是检查,她想蒙混过关,想滑过去。我们绝不能让她滑过去!为了彻底清算她的罪行,我们请示了上级,决定从现在起停她的职。为了彻底弄清楚,为了清算她,我们要开大会,继续下去,不获全胜,决不收兵。我们的主要矛头是牛鬼蛇神,不是同学们,一切革命的师生团结起来,一致对敌!"

会后,有些学生自动押解卞仲耘回家,一路对她继续辱骂,往她身上吐唾沫,在公共汽车上有些乘客见到这种情形,都很惊恐。

胡志涛校长对袁淑娥参加学校的批斗会十分不满,散会后,工作组把她叫去,问她:"今天的会开得怎么样?"

胡志涛沉默了一会儿说:"群众发动起来了。但是,你们让校外一

个女人来控诉卞仲耘,这对吗?”

工作组长没说话,胡志涛走了。

反对工作组的老师和学生认为,让校外身份不明、政治面目不清的袁淑娥几乎独占了女附中革命群众发言的讲台,而李黎黎等同学的发言则数次被强行制止,以致迫使李黎黎等退出会场。她们认为,工作组迅速把斗争矛头转向卞仲耘是为了掩盖斗争群众的罪行,欺骗群众。

6月22日下午13时30分,批斗会继续,与会发言者继续揭发卞仲耘追随前北京市委反党集团的种种耸人听闻的“反革命罪行”。譬如把学校的各种备战措施说成是搞军事政变的反革命活动等等。会场气氛较前一天更加白热化,口号声此起彼伏,逼卞仲耘即刻交代现行反革命活动。卞仲耘被戴上高帽子、被强迫弯腰低头,一时间,她被身后看押的学生用木枪捅来捅去,发言者和临时跳上台的人们,对她推搡、罚跪、拳打、脚踢、吐唾沫……场面几度失控。

卞仲耘又回北京饭店开会,并向上级反映她被批斗的情况。她给上级写了一封长信。在信中,她检讨自己的“错误”,包括那些不是她的错误的东西。她也表示自己拥护文化大革命,然后她请求不要对她使用暴力。她在信中写道:

“在群情激愤之下,我就被拷打和折磨了整整四五个小时:戴高帽子,低头,罚跪,拳打、脚踢,手掐,用绳索反捆双手,用两支民兵训练用的步枪口捅脊背,用地上的污泥往嘴里塞,往脸上抹,往满脸满身吐吐沫。”

卞仲耘事后在给上级的信中说,她从58年起就不断患病,几度长期住院,动过手术,患有心脏病(主动脉硬化症)、高血压等疾病,在批斗会前几天她刚查过血压,是180 / 110毫米汞柱。突然遭受殴打折磨,身体实在难以支持,头昏眼黑,几度晕倒在地。更让她不能容忍的是袁淑娥不仅两天都参加了会,还上台直接揪她的头发。

6月23日,袁淑娥带领几个学生,去卞校长住处进行“调查”和“发动群众”。她还动员卞家从前的保姆去学校揭发和控诉,遭到拒绝。6月24日上午,女附中的学生一批又一批来到卞家所在的宿舍楼搜集材料,把大字报贴在大门上和楼道上,语言粗暴恶毒,画的不堪入目。

# 第71回：六二一，吉林省“红旗事件”出奇文，造反精神万万岁

6月21日，在吉林省长春市的东北人民大学，即吉林大学，发生了“红旗事件”。自南京大学校长匡亚明被揪出的消息公布后，东北人大的大字报开始揭发党委第二书记陈静波与原东北人大校长兼第一书记匡亚明的关系的大字报。6月14日，吉林省委派长春市委书记处书记李一平带领市委工作组进驻东北人民大学。此后，省、市工作组相继进驻吉林省各大专院校。

工作组进校后，与那些给校党委提意见的群众发生了各种冲突。6月21日，在一片“李一平滚蛋”的声浪中，市委工作队召开东北人大全校党员大会。会上李一平号召党员表态支持工作队。市委第一书记宋洁涵对工作队员讲：“往外赶工作队，说明有坏人捣乱。要准备斗争。”会上决定，晚上开群众大会，把市委工作队扩大为省、市委工作队，仍由李一平任队长。

全校党员大会的消息传出后，很多群众义愤填膺。当晚，大家从四面八方向校大礼堂聚拢，参加晚上工作组召集的群众大会。人们纷纷涌入会场，打破了工作队“凭票入场对号入座”的规定。群众进入礼堂后，发现台上无国旗，仅有毛泽东像，还歪挂在那里。同学们上前与工作队交涉，要求把毛泽东像摆正，挂上国旗。工作队的副队长说：“得请示省市委。”这一下激怒了师生，近300名学生涌上主席台，他们自己动手摆正了主席像，又登台扛起国旗。工作队对大会局面失控。

晚上23时，省市委紧急从郊区公安分局调来两汽车公安人员，帮助“维持秩序”，又由各工厂、机关、学校临时抽调270多名四清干部，以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韩容鲁为首组成工作队。全体队员进入会场后，强行登台，轰赶台上学生，这就是当时轰动长春市的“红旗事件”。

“红旗事件”被省市委定性为“打着红旗反红旗”的右派捣乱反革命事件。事后，宋洁涵指示工作队要详细调查“红旗事件”的参与者，

整理材料。省市委工作队对学生进行排队,把数名带头的学生打成“反革命”。

这天,吉林省不仅是在吉林大学发生了“红旗事件”,省体校也出现学生给主管体育工作的副省长张文海贴的大字报。同一天,长春市四中还发生师生揪斗本校领导的事情,这在过去都是不可思议的。四中的事情,被中共吉林省委与长春市委定为“匈牙利式的反革命事件”。

6月22日,北京师范大学带头贴出大字报的谭厚兰突然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贴出大字报要求重新评价高树奎等人的大字报,从支持工作组转而反对工作组。她当即受到围攻,而且愈演愈烈。

谭厚兰的这次翻跟斗使她的威信骤然下降,原来跟着她支持工作组的那些人感到受了愚弄和欺骗,而反工作组的一方说她翻云覆雨,一副投机政客嘴脸,骂得她狗血喷头,就连最初和她一起写大字报的那几个人都背叛了她,从此销声匿迹。

6月22日这天,刘少奇、邓小平再次致信毛泽东:“为了更好地推进全国文化大革命运动,帮助各级党委和干部贯彻执行党的民主集中制,发扬民主,改进工作”,准备在“七一”党的45周年纪念日公开发表毛泽东1962年1月《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并请毛泽东批示。毛泽东阅后说:“在党内发表就行了。暂不公开发表,再等一年。”

鉴于北京学校反工作组的风潮兴起,6月23日,北京市新市委书记李雪峰在北京饭店召开市委工作会议,作了著名的“623”报告,提出“抓游鱼”。

他说:“情况复杂,反革命、黑帮、保皇派,资产阶级的权威及其拥护者、右派学生跳出来,趁机制造混乱,浑水摸鱼,与工作组争夺领导权”。这是“打着红旗反红旗,利用群众的革命积极性和对黑帮的仇恨,企图反对无产阶级专政。”

李雪峰在报告中指出:“在现阶段,拥护新市委还是反对新市委是拥护党中央和反对党中央的标志。多数人反工作组是人民内部问题,但是确有坏人。对右派赶工作组一定要清理。在这个紧要关头,共产党员一定要站起来保卫党,不站起来,纳吉就要上台了。”

他说:“毛主席早就说过‘一个游鱼三尺浪潮’,有几个反革命分子并不可怕,抓出来就是了。现在我们对文化革命一定要加强领导,绝不能让各种‘游鱼类’制造混乱。党员干部要挺起腰杆来,加强党的领导。我们不可一日无党的领导!党组织垮了的那些单位,要像救火那样迅速派出工作队!”

北京各学校传达了李雪峰的报告后,先后开展了“反干扰”,局势开始稳定下来。据记载,在“反干扰”时期,仅在北京24所高等院校统计,工作组把10211名学生打成“右派”,把2591名教师打成“反革命”。

6月23日,中共中南局、西北局关于抓学生中“牛鬼蛇神”的请示报告送到了刘少奇的办公桌上,刘少奇当即做出了批示:

“当牛鬼蛇神出笼攻击我们的时候,不要急于反击。要告诉左派,要硬着头皮顶住,领导上要善于掌握火候。等到牛鬼蛇神大部分暴露了,就要及时组织反击。对大学中的反党反社会主义份子一定要揪出来。”

“学生中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一定要把他们揪出来。对高中应届毕业生中的一些人,经市委批准,可以批斗和戴帽。”“中学老师要集中交待问题,不管学生、老师,只要反党,就要给他们以专政”。

刘少奇自信地认为,这条批示一旦发下去,学生动乱就基本上能解决了。1957年反右不就是这样干的么?1964年“四清运动”也是这么干的。刘少奇相信,只要将闹得最厉害的那几个学生抓起来,其他学生自然会老实本份。中国的问题从来都是这样解决的。他在批转一系列中央文件时多次指示,要准备再打“几十万右派”。例如:他在《中央转发中南局“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和意见的报告”》中批示:

“大学生中,也要把右派分子(即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揪出来,但应放在运动后期进行;打击应当小些,一般控制在百分之一以内,高中应届毕业生,是打击个别最坏的,经过市委批准,可以批判斗争和戴帽子。高中二年级以下和初中学生中,一律不进行反右派斗争,不划右派分子,如发现行反革命或坏分子,可依法处理。”1966年,全中国有一百多万大学生和数千万中学生,再加上数百万教师,如果按1%的“右派指标”,将有近百万青年学子被打成“阶级敌人”。

最早成立红卫兵组织的清华附中,自工作组进校不久,与红卫兵的关系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承认独立于党组织之外的学生组织,在共产党当权时代还从来没有过。所以工作组虽然表态支持红卫兵是左派,仅仅是指这批以“红卫兵”署名的学生而已,但从未把红卫兵作为一个组织来承认。这一点他们得到过上级的指示,态度始终是非常明确的。

6 月 21 日,清华附中工作组召开清华附中全校师生代表大会,选举文化革命委员会。在文化革命委员会的人选问题上,红卫兵与工作组发生了分歧。工作组要求革委会有广泛的代表性,应该吸收一些红卫兵以外的左派参加。红卫兵认为那是“拉夫”,会使革委会背“包袱”。结果,清华附中文化革命委员会的 21 个革委会委员基本由红卫兵核心组成,王铭任主任,张晓宾、卜大华任副主任。通过这件事,工作组发现并认为,红卫兵领导核心对工作组的领导和团结大多数的问题上,存在不正确的认识。

在此前后,一些红卫兵违背工作组布置的学习、讨论内容,自己另搞一套;一些班级不顾工作组的劝阻,开了“整”右派学生的会;有的革委会成员在同学中公开谈论与工作组的矛盾。当时社会上也很混乱,有传言说“团中央有问题,三胡完蛋了。”“三胡是指当时团中央的三位领导:第一书记胡耀邦,常务书记是胡克实,候补书记是胡启立。

6 月 23 日,《中国青年报》发表社论《左派学生的光荣责任》,强调在文化大革命中团结大多数的问题。清华附中红卫兵认为这篇社论只讲团结,不讲斗争,是折中主义。红卫兵决定公开进行反击。6 月 24 日,一篇题目为《左派学生的光荣责任是彻底闹革命》的大字报贴在教学楼一楼门厅的左面,文章说:

“《中国青年报》6 月 23 日社论《左派学生的光荣责任》,是犯了严重政治错误的文章。它出来之后,立即受到我校右派的赏识,把它当作打击左派的一根大棒。”

6 月 24 日这天,红卫兵在教学楼一楼门厅的正面还贴出一张名为《无产阶级革命的造反精神万岁》的大字报。这篇大字报后来传播之广,影响之大,远远超过了他们那篇批判《中国青年报》的大字报。

大字报产生于 6 月 23 日下午,清华附中骆小海等同学在二楼办

公室聊天,说到了要发扬造反精神的问题。那天,他们谈得太兴奋了,一直聊到天黑,甚至忘记了开灯。最后,在场的两位女同学意犹未尽的:“讲得太好了,太精彩了,如果能写下来就好了。”于是,大家把任务交给了骆小海。

当时中国人的一般思路是不能说“造反”的,那可是大逆不道之极,简直就是罪该万死!在封建皇朝时是如此,在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天下里,更是如此。虽然文化大革命起来了,但那是为了保卫共产党的政权千秋万代永不变色。这时你说“要造反”,那是要造谁的反?造共产党的反?夺共产党的权?那不是右派又是什么?

但骆小海之所以敢说发扬“造反精神”,那是因为他知道,毛泽东曾经说过“造反有理”。出于一种戏弄或恶作剧的心理,骆小海他们决定暂时不提毛泽东曾说过的这条“造反有理”这段话,先写一张大谈特谈“造反”的大字报,看看工作组和其他人的反应。于是,就有了6月24日这张标题为《无产阶级革命的造反精神万岁》的大字报。该文全文如下:

革命就是造反,毛泽东思想的灵魂就是造反。我们说,要在“用”字上狠下功夫,就是说,主要在“造反”二字上下功夫。敢想、敢说、敢做、敢闯、敢革命,一句话敢造反,这是无产阶级革命家最基本最可贵的品质,是无产阶级党性的基本原则!不造反就是百分之一百的修正主义!

修正主义统治学校十七年了,现在不反,更待何时?

有些大胆的反对造反的人,今天突然变得忸怩起来,絮絮叨叨,吞吞吐吐。什么太片面了呀,什么太狂妄了呀,什么太粗暴了呀,什么太过分了呀。

这统统是谬论!要反对就反对,何必羞羞答答的呢?

我们既然要造反,就由不得你们了!我们就是要把火药味搞得浓浓的。爆破筒、手榴弹一起投过去,来一场大搏斗、大厮杀。什么“人情”呀,什么“全面”呀,都滚一边去!

你们不是说我们太片面了吗?你们要的是什么样的全面呢?看来你们的全面是“合二而一”,是折衷主义。

你们不是说我们太狂妄吗?我们就是要“狂妄”。毛主席说:“粪

土当年万户侯”。我们不但要打倒附中的反动派,我们还要打倒全世界的反动派。革命者以天下为己任,不“狂妄”怎么行呢?

你们不是说我们太粗暴了吗?我们就是要粗暴!对待修正主义怎么能缠缠绵绵,大搞温情主义呢?对敌人的温情,就是对革命的残忍!

你们不是说我们太过分了吗?老实说,你们所谓不过分,就是改良主义,就是“和平过渡”。这是妄想!我们就是要把你们打翻在地上,再踏上一只脚!

还有些人,对革命害怕得要死,对造反害怕得要死。你们循规蹈矩、唯唯诺诺,缩在修正主义的蜗牛壳里,一有造反的风声,你们就神经紧张。这些日子,无情的斥责声天天送入你们的耳中,你们天天心惊胆颤,你们不感到难受吗?你们怎么活得下去呢?

革命者就是孙猴子,金箍棒厉害得很,神通广大得很,法力无边得很,这不是别的,正是战无不胜的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我们就是要抡大棒、显神通、施法力,把旧世界打个天翻地覆,打个人仰马翻,打个落花流水,打得乱乱的,越乱越好!对今天这个修正主义的清华附中,就要这样大反特反,反到底!搞一场无产阶级的大闹天宫,杀出一个无产阶级的新世界!

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

一九六六年六月二十四日

果然,这份战斗檄文似的红卫兵宣言一经贴出,迅速引起了巨大反响,立刻产生了轰动效应,人们从四面八方涌来看这张大字报,连清华大学的教职员工和大学生也纷纷赶来看附属中学学生的这张“造反”奇文,与此同时,也招来了一批又一批的对这张竟敢在共产党天下“造反”的大字报的反对和批驳。

正如红卫兵所料,工作组看了大字报,觉得难于理解、不可思议。现在是共产党的天下,造谁的反呢?他们认为“造反”这个口号在社会主义中国不适用,是不确切的或者说是错误的。工作组认为:《无产阶级革命的造反精神万岁》这张大字报,“实际矛头是指向工作组的”。他们立即写了简报上报,一直报到刘少奇党中央那里。清华附中工作组将红卫兵与他们之间的主要分歧归纳为:“一是主攻目标的问题。

我们认为要首先集中火力打击极少数的牛鬼蛇神,而他们借口‘触及人们灵魂’、‘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清除一切旧思想’,想整同学,有的班已整了三次同学。二是团结绝大多数的问题,我们认为经过斗争,要逐步做到团结95%以上的干部和群众,他们却认为这是不可能的。有的说:‘我们班上起码有30%的人不能团结’。三是党的领导的问题,我们认为,党的领导通过工作组来体现,他们却提出:‘只相信毛主席’,要‘怀疑一切,打倒一切’,实际上是不要工作组的领导,搞红卫兵专政。”工作组当时确立要采取的方针是“保护左派的积极性,在旗帜鲜明、坚持原则的前提下,以最大的耐心来教育左派,提高警惕,仔细观察动向,注意左派核心是否有假左派真右派混入。”

# 第72回：难抵挡，工作组辩论败北 不堪辱，江隆基命陨兰州

6月24日，清华大学贺鹏飞、刘涛等人向清华大学工作组组长叶林汇报工作，王光美指示，要让知情人检查、交代、上阵。还让干部和群众背靠背揭发。工作组提出：要在两条战线作战，一条是斗黑帮，一条是批判蒯大富等人的问题。

很快，清华园出现一批反对蒯大富的大字报。这天，工物系一些同学在工物系工作组组长的安排下，围着蒯大富进行辩论。蒯大富到是毫不畏惧，大声说："你有什么事情讲，就贴大字报吗。"

"不行！一定要辩论！"工物系的同学不答应。

蒯大富发现前来和他辩论的人越来越多，知道这是有来头的，索性说："辩就辩，我们晚上开全校大会辩论，看谁有理。"

"好，晚上辩论。"

大家约好晚上辩论的时间、地点。蒯大富还特别贴出大海报，说：今晚要召开辩论会辩论"电话事件"，请大家参加，并特别指名要张茜薇和工作组组长必到。

王光美马上指示说："开辩论会好嘛，人家要向你们夺权了，是敌我性质的问题了，你们也应该说说话了。"

当天下午，叶林把贺鹏飞、刘涛等几个学校文革的主要负责人找去，布置了批判蒯大富的重点，又匆忙地把刘涛和贺鹏飞等人送到了万寿园，王光美在那里对他们又如此这般的讲了一番。

晚饭刚过，全校师生像潮水般涌到大礼堂听取辩论会。当刘涛、贺鹏飞他们赶到大礼堂时，门口已经挤满了人。

他们见安排的人进不去，又和工作组商量，是否取消晚上的辩论会？但是，来了这么多人，群众不答应。

辩论会按原计划进行，由校文革主任贺鹏飞主持。蒯大富这边出3个人：蒯大富、孟家驹和鲍长康，对方也是3个同学上台。工作组组

长叶林没有去,只由张茜薇一个人前去应付,王光美则在甲所听实况转播。

蒯大富首先上台,高声朗读毛泽东的语录:“最高指示:‘共产党对任何事情都要问一个为什么,都要经过自己头脑的周密思考,想一想它是否合乎实际,是否真有道理,绝对不应盲认,绝对不应提倡奴隶主义。’”

接着他讲了6月20日,他们班开座谈会,工作组通知王光美来却没有来的事情经过,然后质问张茜薇:“这是怎么回事?!”

台下的群众非常亢奋,立即报以一阵雷霆般的掌声,并纷纷督促张茜薇赶快澄清事实,张茜薇一个人面对如此场面,十分紧张。她慢慢地走上台,支支吾吾地说:“电话是我接的,……”

她刚说到这里,底下就大哗起来:“那你上次撒了谎,说电话不是你接的。”

待人声稍静之后,她又道:“电话是强斋打来的,说有人要来参加化九班的讨论会,我听成了王光美同志要来参加化九班的讨论会了。”

台下的学生仍然不依不饶,她只好再次上台解释说:“是我听说有人要来,我就理解为王光美要来了。”

但是,在场的群众仍然纷纷提出质问,张茜薇上台三、四次,一人难敌众口,愈澄清,疑问愈多。张茜薇,这位领导过海陆丰起义的烈士张太雷的女儿,实在有点招架不住了。

工作组几个副组长杨天放、周赤萍一看形势不妙,分别上台,想把蒯大富他们压住。但他们都当惯大领导了,已经不会以平等的身份参加这种辩论会了,上台后讲的话,就更没水平了。时任冶金部副部长的周赤萍说:“我们是党中央、毛主席派来的,我们是代表毛泽东思想的……”

说到这儿,台下哗然大乱,倒彩四起,嘘声大作,学生们质问他说:“你怎么能代表毛泽东思想呢?”

是啊,连彭真、罗瑞卿都有问题,被打倒了,你一个副部长就跑到这里来说代表毛泽东思想,凭什么呀?这位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老红军周赤萍无以为答,只好在一片哄笑声中下了台。

坐镇甲所的叶林见大势不好,只好亲自来到礼堂,他没有正面回

答学生们的提问,而是蛮横的定调说:“我们工作组是新市委派来的,是代表新市委的,蒯大富要夺工作组的权,这就是夺党的权,就是向无产阶级夺权,就是反革命!”

他要求全校学生表态,要么站在蒯大富一边,要么站在工作组一边。

叶林的讲话更加激起了广大群众的强烈反感,大家认为,蒯大富写的批语和大字报,只是表明他对工作组的不同意见,最多不过是缺点、错误,怎么能说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呢?工作组不是以理服人,而是以势压人,乱扣帽子,大家不同意工作组将蒯大富打成反革命。同学们哄起来,硬把叶林给哄下了台。

这时,化902班王大定跳上台说:“蒯大富这个大字报我是不赞成的,而工作组这种作法也是错误的,是挑动学生斗学生。”

虽然,拥护工作组的学生也组织了反击,如刘涛和贺鹏飞,纷纷上台表示应该拥护工作组的领导,但无济于事。刘涛在激烈的唇枪舌箭中甚至脱口而出:“我母亲也认为工作组是正确的。”

她的母亲就是身份显赫的王光美。但是,这种以势压人的做法更加引起学生们的反感。本来群众对工作组仅仅依靠高干子弟进行文革的做法从心里就不服气,刘涛的话一出口,立刻招来一片嘘声。

这时,主持大会的贺鹏飞和蒯大富商量说:“蒯大富,快11点了,明天晚上再接着辩论怎么样?”

蒯大富同意了。他在台上说:“贺鹏飞同志讲,今天晚上比较晚了,到此为止,明天晚上继续辩论。”

辩论会以工作组的失败告终,学生们兴奋异常。当蒯大富从台上走下来后,一个扎两个小辫的小姑娘一把拽住他的胳膊说::“蒯大富,向你祝贺!我们胜利啦!”

蒯大富问她:“你是谁啊?”

她说:“我叫刘刚。”

两只翘起的羊角辫年轻朝气的刘刚是清华附中的学生,她给了“书生意气,挥斥方遒”的蒯大富强烈的印象。但他不知道,刘刚在清华附中也是人们追捧的“英雄”。她作为清华附中排球队的主攻手和女排队长,在深受清华竞争精神熏陶的清华附中,高高跃起,带领她的

球队夺得海淀区排球冠军。那一刻,崇拜者躺倒在地,为她抓拍镜头。

蒯大富他们很兴奋,一屋子人,谈了两个多小时。

由于蒯大富发言有理,而工作组反驳苍白无力,在甲所收听辩论实况的王光美气的说:“这简直了不得,像资产阶级议会一样。”

散会后,工作组匆忙把刘涛、贺鹏飞、李井泉的儿子李黎风、乔冠华的儿子乔宗淮等人送到刘少奇家里,听王光美的总结。

王光美说:“肺都气炸了,蒯大富是打着‘红旗’反红旗的典型。积极分子为什么跟不上去,不能把他驳倒?要学习农村四清的经验,要‘亮典型’,‘打活靶子’,要把蒯大富作为典型、作为活靶子来打。既要在理论上把蒯大富批深批透,还要把他的组织活动查清。”

蒯大富他们还天真地准备6月25日再接着辩论。可第二天早上,学校就广播了:“今天晚上的辩论因故停止。”

6月25日这天,清华大学校园里反工作组的大字报铺天盖地地贴出来,有一个班一共30人,有26人贴了反对工作组的大字报。

“624辩论”造成了混乱,工作组已管不了人了。为了压下蒯大富为首的一些人的嚣张气焰,从25日开始,工作组利用传达李雪峰以北大“618事件”为依据所做的“623报告”的机会,根据群众对工作组的态度,将群众排成若干等,分成十几批,发票去听传达。反工作组、怀疑工作组的人都不准参加。这一天,校园里出现了“打倒反革命分子蒯大富”标语、口号。学校内凡有怀疑工作组言行的人,都成了批判对象,被称为“蒯派人物”,被看管起来。一场大规模的追查“蒯式人物”运动在清华大学展开,打击面迅速扩大。化902班被分到化9年级各个班看管,蒯大富是第一号人物,由上年级的学生看管。学校成立两个“专案小组”,一个是“蒯大富专案小组”,另一个鲍长康等“十人专案小组”。“蒯大富专案小组”是重点,集中了全系的精力整他的材料。

清华大学展开了“反蒯斗争”,各系,各班都批判“蒯氏人物”,铺天盖地,成了运动的中心。工作组召开全校大会、全系大会,批判蒯大富,说反对工作组就是反党,反对文化大革命,是反革命;说蒯大富是校党委留下来的定时炸弹,是校党委培养的修正主义苗子……

很多同学对这种做法都不理解,就在几天前,蒯大富还在写大字报反对校党委嘛,怎么一反对工作组就成了反革命呢?

6月25日,清华附中的刘刚和张庶平同学把《无产阶级革命的造反精神万岁》的大字报转抄到清华大学去,用来支持蒯大富与清华大学工作组的斗争,结果引来了清华大学一批学生对红卫兵的猛烈攻击。清华附中工作组则认为,这张大字报是针对工作组的,写了简报上报,一直报到刘少奇党中央那里,中央把这篇大字报定性为"反动"。

6月26日,团中央书记处书记胡克实听了刘晋关于清华附中红卫兵情况的汇报后,认为红卫兵"没有政策水平","相当不懂事"。他提出"要跳出红卫兵的圈子,团结红卫兵以外的左派"。他在6月27日的汇报会上说:"我看就是要消化红卫兵,能不能把党团组织恢复起来。对红卫兵的政策,采取教育提高方针,作为依靠力量之一,把红卫兵消化在党团组织之中,不能团外有团。"

一心想将运动纳入"正规化"轨道的工作组与红卫兵发生摩擦是在所难免的。因为红卫兵是自发成立的、自主性很强的学生组织。他们宣称:"我们的领导是党中央和毛主席!"他们对党中央和毛泽东的忠诚和服从已经是基于他们自己的政治理解,而不是像从前,或者像当时的一般群众那样,简单地把各级地方和基层的共产党的组织作为共产党组织来服从。有一个干部子弟在给同学的信说:万万想不到彭真、罗瑞卿这些老党员原来是这样一批危险人物。"现在我觉得我们只能相信毛主席,只能相信党中央(我指党内),一切人都应怀疑,只要不符合主席指示,什么人都要攻。如果我们的心软(我现在还有这样的心理),要会亡党亡国亡头。"

6月25日,甘肃再传噩耗:兰州大学校长江隆基自杀身亡。

6月17日,正在西安参加西北局会议的甘肃省委第一书记汪锋给兰州打来电话,传达刘澜涛的话说:"江隆基不是自己人"。当天,兰州大学工作组支持的一些"左派"学生便到江隆基家中。李贵子将江隆基从家里揪出来,一直拖着跑到操场,把鞋都跑丢了。他们让江隆基跪在层层叠起的桌子椅子上,头戴重十几斤的铁笼子,拳打脚踢,逼他承认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此时,学校图书馆和体育教研室也在操场斗争了图书馆馆长刘佛吾、图书馆馆员满达人、靖钦恕等3人。操场上人很多,场面已完全失控。

这天夜里,兰州大学大操场形成斗争风暴,几千人涌向操场,批斗

黑帮。没有统一组织,各自为政、各自为斗,场面十分混乱,根本无法控制。一次就在大操场揪斗了70余人,打人、戴高帽、跪桌子、跪凳子、揪头发,大操场上跪满了被‘揪’出来的人,有人把鞋都跑丢了。

当天,李贵子等人给省委写了一份《就六月二日——六月八日我校文化大革命情况向省委作的报告》。在这份报告中,他们开列了在兰州大学“67事件”中反对他们、反对工作组的同学名单,将他们打成“反革命急先锋”。名单上的人于6月8日以后,都在全校进行了批斗、辱骂和毒打。

第二天,兰州大学又批斗了117人。

6月22日,甘肃省委告诉兰州大学李贵子,他们已经做出撤销江隆基职务的决定。第二天,在兰州大学又召开斗争江隆基大会,再次对他使用罚跪、戴高帽子、拳打脚踢、游街等方式,强迫江隆基承认“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6月25日上午,中共甘肃省委召开万人大会,宣布“撤销江隆基的党内外一切职务”。当天下午,江隆基不堪侮辱,愤而自杀。

兰州大学当时在全国位列第四,仅次于北大、清华和复旦。兰州大学所以能在穷乡僻壤的大西北光芒四射,主要是因为教育家校长江隆基。

江隆基,陕西省人,1925年考取北京大学,1927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29年留学日本。1931年留学德国。曾任旅欧华侨反帝同盟书记。1936年回国后,在北京、上海等地参加革命活动,两次被捕,曾参与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任陕北公学副教务长、华北联合大学教务长、延安大学副校长,陕甘宁边区政府教育厅副厅长。1952年10月任北京大学党委书记兼副校长、1959年1月任兰州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1962年提出高等学校八条工作经验。

# 第73回：中科院，发生“应地所事件”通情况，刘邓见民主人士

6月22日，聂荣臻和陈伯达先后来到中国科学院，目的之一是讨论根据周恩来指示起草的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保护自然科学家的政策性文件，也讨论了“应地所事件”。

“应地所”是中国科学院应用地球物理研究所的简称。文革开始后，一些家庭出身好的年青人渴望追随伟大领袖干革命。在应地所，带头造反的是所里政治部的宣传干事、复员军人王锡鹏，还有一些研究室里的年青研究人员，大都是这几年毕业的大学生。他们在一种亢奋、猜疑的状态中，用审慎、怀疑的目光审视周围，察觉一切蛛丝马迹，希望发现和揭露任何可能是反党黑帮的政变阴谋。

很快，他们在所保卫科董如江科长身上看出了问题。当时董科长的神经系统发生一些障碍，经常说些不合逻辑的话，而且这些话还常常与政治有关。但在一些革命群众看来，这绝不是偶然的胡话。他们怀疑，董如江作为保卫干部，肯定知道某些涉及政变阴谋活动的内情，或简直就是参加者，而他之所以神经不正常，正是因为他作为知情人或参与者而受到压力或胁迫所致。他们推断董如江的生命安全正受到威胁，可能会被杀人灭口，于是就把董如江“保护”起来。

当时院里正在布置各所对人员作“政治排队”，院保卫部要求各所上报有问题人员，就是带头闹事者的名单，而董如江科长泄露了这件事。群众到院保卫部追问，院里否认此事，于是这也成了群众将董如江“保护”起来的理由之一。

恰在此时，中科院党委要求全体人员都下乡参加麦收。每年麦收，中科院都会派部分人员到郊区帮助农民干活，但是北京地区的冬小麦在6月上旬就已成熟，而这时已到20日左右，农村的麦子早已收割完毕，派那么多人去干什么呢？于是，王锡鹏等人怀疑这是院里的阴谋，企图用麦收对抗文化大革命。实际上，院党委也确实想通过麦

收使运动“冷一冷”。

应地所位于北京西苑。在6月19日这天,王锡鹏等人在所内擅自撬开了保险柜,控制通讯设备和交通工具,监控保卫干部董如江。接着,他们30余人乘卡车来到研究所集中的中关村,敲锣打鼓,宣传麦收是个大阴谋,号召大家抵制,并贴出了矛头针对该所所党委的大字报,这就是当年全院闻名的“应地所事件”。

他们的这些行动被院党委认为是不可容忍的反党活动,中科院连夜通知各所,说应地所有200多名右派上街闹事,要各所防范。当夜院党委扩大会议上,将王锡鹏等内定为反革命。

6月22日这天,在文津街科学院的小会议室里,陈伯达对院党委书记、副院长张劲夫说:“你要把权夺回来,不然一切后果你要负责”。

陈伯达批评张劲夫说:“王锡鹏把有原子弹爆炸资料的保险柜都撬开了,你还不抓他?要当反革命来抓!你太软了,你失职了,你要坐牢!”

张劲夫把陈伯达的指示编成了运动简报上报下达,并且把王锡鹏作为反革命进行了行政看管。

6月23日,中国科学院领导向李富春、聂荣臻两位副总理汇报文化大革命的情况,两位副总理也做出了指示。

当晚,应地所一位普通的行政干部吴智诚在所里贴出一张揭发王锡鹏等人的大字报。24日,科学院的《科学报》出版一期《号外》,除登载吴智诚的大字报外,还发了《应地所反革命复辟》的报道和一篇社论,说应用地球物理所发生了反革命事件。该所王锡鹏、赵子善、章公亮、范天锡、田淑清、吴蓉璋等6人不相信所领导,反革命夺权,非法扣压所保卫干部董如江。号召全院职工反击这些反革命分子的反党活动。

24日,王锡鹏等人在地球物理所门口被斗争,然后被行政看管,就是监禁。同时派工作组进驻应地所,接管各级党团组织的领导权。

25日,又在中关村召开声讨大会,声讨化学冶金所的反革命事件。这个所远不如应地所影响大,但是其领导人物李亚男家庭出身不好,有典型性,所以在全院范围内予以声讨。

27日前后,科学院参加麦收人员陆续回所,发现形势大变,大字报

铺天盖地,已不再针对领导,而是反击前一阶段给领导提意见的普通群众。周末不休息开会,学习《科学报》号外,讨论应地、化冶两所是不是反革命事件,麦收是不是大阴谋。在前一阶段给党委贴大字报的人全都遭到批判,大批群众被打为反党分子。

事后,科学院党委给陈伯达写了报告。陈伯达看到院党委的报告后,于6月28日亲自到应地所,当着群众的面责问科学院党委成员说:“你们为什么抓人?我接到你们的报告,说是根据我的指示进行了反击。我什么时候发过指示?”陈伯达要求将王锡鹏等放出,用辩论解决问题。他说:“他们的做法不对,你们也不对嘛!人家扣了你们一个人,你们就扣了人家6个人嘛!”但他到办公室听取院党委和工作组关于应地所运动情况的汇报时,又重申应地所这些人是反革命。

对文化大革命,群众是打心眼里欢迎的,因为可以通过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把自己对领导的不满、意见说出来了,这在过去是很难想象的。但是,对学校中出现的混乱现象,特别是打人,学生打老师,很多人不理解。6月25日,陈毅在外事口讲话时,谈到文化大革命的意义。他说:

“文化大革命历史上是没有的,只有毛主席、共产党敢于发动这次文化大革命,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揭露出许多问题,是成功的。可以看出牛鬼蛇神不认为头子揪出来了,就不出动了,出动的不少。

文化大革命马、恩、列没有预料到,历史上没有的。斯大林晚年也没有这样做。这么大规模的,触及到每个人的灵魂。假如斯大林晚年也搞这样一个大革命,彻底革命,就完全可能把赫鲁晓夫揪出来。也有些身居高位,老弱无能了。

这次大革命对每个干部都是一个考验。用火烧一烧,把毛病烧掉。主要干部有了锻炼,群众有了锻炼,思想改造了,这就是最大的胜利。”

对文化大革命的对象,他说:“从运动中暴露的情况看,不仅有他们的死党,还有地富反坏右兴风作浪。所以运动真正的对象就是这些人,就是这些牛鬼蛇神。他们有的钻进党内,钻进机关高校。”

对干部中存在的问题,他说:“我们的干部有一部分脱离群众相当严重,官僚主义到了相当严重的程度。高高在上,做官当老爷,群众不

满。因此给牛鬼蛇神一些借口,机会可以利用煽动,兴风作浪。有些同志与黑帮并无牵连,就是因为对黑帮五类分子丧失警惕,加上自己身上的灰尘又多。平时领导还不错,反动分子一煽动他就下台了。客观存在这个问题。如果说有些干部不脱离群众怎么能这样呢?有些领导干部脱离群众,特殊化,不民主。”

他认为,当时形势的混乱,就是因为群众对以上问题的不满,所以“有一股莫名其妙的怨气,所以要觉察到了立即改正。不要因为运动中被整倒就背起包袱。有的人不是黑帮,要保护过关。但这次过了关,不改,以后还会吃亏。有的人停职反省了,认为吃了亏,就是因为你不能领导运动。所以要多看大字报,多与积极分子谈心,多与群众商量,不要运动一过,万事大吉。”

对工作组的问题,他说:“有些单位提出撤销党组,赶工作组。赶工作组无论如何要顶住,有意见可以提,权在上边。怀疑中央负责同志是错误的,根本不对的。”

他特别告诫:“不要整群众,不要整一般干部。这个运动最多只能整科级以上,科级以下只能是牛鬼蛇神。在群众中不要鼓励互相贴大字报。如果要,劝说在小组会上谈。不要压,要说服,一定要贴就贴,要逐步把运动引导到正常化,……对牛鬼蛇神与一般有缺点、错误的干部有区别,不能混为一谈。不能不让批评,也不能一批评就得罢官。”

6月27日,中共中央召集民主人士座谈会,介绍中共党内揪出彭、罗、陆、杨的情况。邓小平主持会议。他开宗明义的告诉大家:“中共中央今天约请在座各位同志、各位朋友,谈谈大家关心的问题,谈谈我们党内发觉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几个同志的问题。大家已经看了党内的五个文件,大家都关心文化大革命的问题,现在就请刘主席同大家谈这个问题。”

在热烈的掌声中,刘少奇开始了他的讲话,他说:

“最近,在我们党内斗争中,揭露了几个负责人的问题,从性质上讲,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是严重的事件。这个事件,不仅影响到我们党内,而且影响到党外,影响到我们的国家、我国的人民,可以说就是我们党和国家的重大事件。这就是彭真、罗瑞卿、陆定

一、杨尚昆事件,进行地下活动、阴谋活动、反党活动的事件。因此,应当让我们各位党外民主人士,各民主党派,无党派的负责人,知道一下党内的这个情况。前几天,徐冰同志已经同各位谈了,并将党内的五个文件送各位看了,各位也举行了座谈。今天我就文件中的某些重要方面的情况谈一下。”

他说:“彭真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邓小平同志不在的时候,实际上他又是付总书记,他还是北京市的市长、市委第一书记,人大、政协他也都有负责的位子,并且也参加了不少国际活动,经常参加党和国家的核心领导,他虽然不是中央政治局常委,却经常参加常委会议。公安、政法,书记处分工由他管,人大常委、公安、政法方面(徐冰:还有统战部)的事务,都归他分管或是插手管的。彭真有些工作能力,但有许多缺点,过去也犯过不少大的错误,他有浓厚的宗派情绪,长期地进行了宗派活动;他没有自我批评的精神,有架子;他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不大懂的,又不大去研究。”

刘少奇历数了彭真在历史上的错误后说:“全国解放以后,在参加领导的活动中,他在重大问题上,提不出解决问题的意见,创造性的意见也提不出。对彭真,我们批评过他,毛主席也曾多次地批评过他,我们是要把他培养成为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对他基本上也是信任的。这几年来,他滥用了对他的信任,极力培植他的私人势力,他同毛主席、同我们搞两面派,背着毛主席、党中央进行了不少地下活动,与罗瑞卿、杨尚昆有密切关系,有些地下活动是联合搞的;与陆定一也有密切的联系,例如北大四清,最近在文化大革命上与毛主席对抗,就是和陆定一共同搞的。”

“他在同外宾接触中,有多次讲话是丧失立场的,送外宾礼品,外交部是有规定的,但他代表北京送的礼品,却超过了党中央主席、国家主席和总理,表现了北京的特殊地位。我和周总理合送三千,他却送四千、五千、甚至五千、六千。”

“彭真是长期隐藏在我们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者。”

对罗瑞卿,刘少奇说:“罗瑞卿是军委总参谋长。国防部部长是林彪,但林彪长期生病,经常工作实际上是由他来做的,可是他还是不满

足。林彪同志虽然有病,也还管些事,研究一些问题,讲几句话。林彪同志在军队里威望比罗瑞卿高得多,他讲话,大家都照办,这就触犯了罗瑞卿,认为干扰了他。他不愿意让林彪同志‘干扰’国防部、总参谋长的工作,因此,林彪讲几句话,他就跳起来了,他要林彪把国防部长的位子让出来;他长期不把国防部的情况向林彪同志报告,别人去向林彪同志汇报,他反对;林彪同志找人谈话,他也反对,甚至采取了恶劣手段反对林彪同志,可以说是虐待一个病人。他还反对党的军事路线,毛主席在军事问题上,有一套完整的路线,林彪同志和毛主席的军事路线是一致的,并且有些发展,罗瑞卿是反对主席、林彪军事路线的。林彪同志提出突出政治,他反对突出政治,要突出军事、突出技术,或者政治、军事、技术都要突出,有人批评他是折衷主义,实际上就是反对突出政治。他实行的是资产阶级的军事路线。此人盛气凌人,锋芒毕露,对老的元帅、老干部,都加以打击,他是专搞一言堂,不听别人的意见;他到处伸手,干涉地方工作;到处突出个人。罗瑞卿问题是在去年十二月揭露出来的,并作了处理,是毛主席亲自处理的。处理以后,在今年二、三月间,召集了几十个人,有地方、军队干部参加的会议,进一步讨论罗瑞卿的问题,他在会上讲了一次话,大家不满意,没有让他过关,此时他就在自己住的三层楼跳楼自杀,受了点伤,没有死,现在住在医院里,本来,自杀要有点技术,应该是头重脚轻,他却是脚先落地,脚坏了点,头部没有伤。”

邓小平插话说:“就像女跳水运动员那样,跳了一根冰棍。”

刘少奇继续:“他的这种行动,是对抗情绪,是严重地对抗党,对抗同志们的批评。在这次会议做出决议的过程中,发现了彭真的问题,彭代表中央参加处理罗瑞卿问题,但彭真在作结论时,在关键问题上,包庇了罗瑞卿,这暴露了彭真、罗瑞卿之间的不正常的关系。”

“陆定一的问题。首先是从陆的老婆严慰冰反革命案件上的暴露的。严慰冰是严朴的女儿。严朴在大革命时期参加了革命,很早就离开了家,他家是个大地主。抗战时期,严朴的老婆带了女儿到延安找严朴,严朴没有见他们。严朴是个好同志,现在已经死了。严慰冰的反革命案件,两年前就发现了,当时我们怀疑陆定一是否知道她的反革命活动。这事是交给彭真去处理的,因为这是一个具体案件,我们

没有直接去处理。两年以来,严慰冰的反革命活动越来直猖獗,她打入党内,探听林彪同志的行踪,林彪同志什么时候到什么地方,住在那里,这些事我们都不太清楚,但是她都打听得清清楚楚。严慰冰跟着陆定一,参与很多党内机密,知道很多事。几个月前,要彭把严慰冰的材料告诉陆定一。而陆定一回去却把情况全部告诉了严慰冰,并用多种方法来包庇严。最近已把严慰冰这个反革命分子逮捕了。根据各种材料判断,陆定一是知道严的情况的,陆严是合谋的,许多事陆定一如果不告诉严慰冰,严是无法知道的。”

“杨尚昆是党中央办公厅主任,当了二十多年,掌握全党的机密文件,各种重要的事情。近来发现他把党内重要机密、核心机密文件,让不少人抄走了,有几万件,不请示中央就让人家抄走了,到底抄到什么地方去了,不知道,是否出国了,很难讲。现在还查不清楚。杨尚昆历来是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的。毛主席鉴于苏联的经验和外国的经验,多次决定:不论党内、党外、对中国人、对外国人都一律禁用窃听器。搞这些东西党内紧张,党外也紧张,外国人也紧张。”

“最近世界上不是政变成风吗?亚非拉地区自60年以来发生60多次政变,其中有50多次搞成功了。有些国家的领导人被杀了,有的被赶走了,有的被推翻了,有的当了傀儡。社会主义国家,赫鲁晓夫就是用政变的形式上台的,波匈事件,保加利亚、捷克等也都是政变性质。

彭、罗、陆、杨事件是有发生政变的可能的,这是激烈的、国际、国内阶级斗争在我们党内领导机关的反映。如果他们政变成功,我们的国家就要变颜色。主席前几年同罗瑞卿、贺龙同志讲,我们国家是否会变颜色,如果发生政变,会不会把我们也抓起来?贺龙同志当时听了傻了。不要以为政变是没有可能的,是有这种可能的。”

“有这么一个问题,彭、罗、陆、杨搞政变,如果成功了,要各民主党派出来拥护,你们怎么办?他们占了优势,你们怎么办?这是个难问题。从中国的形势看,大概是这样,各民主党派自己来搞政变是不可能的,谈不上的,”

这时,陈毅插话说:“章伯钧、罗隆基是想搞政变的,但是没有力量。”

刘少奇接着说:“是没有力量,搞不起来的。但是我们党内有人搞政变,他们搞的政变,合你们的心意,与你们是一个味道,他们要你们拥护是可能的。我劝各位提高警惕,不要上当。你们如果同他们搞在一起,他们被消灭了,你们的结果是同归于尽。在这个问题上是不能轻易表态的。”

“这次大革命在历史上是空前的,来势很猛,对资产阶级,封建阶级的文化来了一个很大的冲击,最后是要摧毁,消灭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建立无产阶级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这次文化大革命反对的重点,是反对党内的反党、反中央、反毛主席、反毛泽东思想的当权派,彭、罗、陆、杨都是党内的,陆平是党内的,蒋南翔也是党内的,清华大学的运动起来后,他压制民主,怎么能压制的了。”

“毛泽东思想确确实实是当代马列主义的顶峰,是国内、国际阶级斗争最新的总结。毛主席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的发展了马列主义,不论在哲学、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建设、无产阶级革命方面,都把马列主义发展到完整的新阶段,最高的阶段。毛泽东思想和马列主义是同一个体系,是在马列主义体系上发展起来的。马克思曾经说过,他的思想体系还会有发展,还没有完结。马克思死了,列宁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体系,形成了列宁主义阶段。在列宁以后,毛泽东发展了马列主义思想体系。马列主义有三个阶段,即马克思主义阶段,列宁主义阶段,毛泽东思想阶段。”

“我们现在拥护毛主席,毛主席百年之后也拥护毛主席。毛泽东思想要延续下去,毛主席著作应该成为全国人民的教科书,成为全国人民的行动指南,全体党员的行动指南。毛泽东思想是人类的灯塔,是世界革命的锐利武器。毛泽东思想能改变中国的面貌,也能改变世界的面貌。我们用毛泽东思想战胜了一切反党分子,也能战胜国内一切反动派,也能战胜国外一切反动派。”

# 第74回：六二七，北航组织大辩论 陶铸忙，不断指导中南局

6月27日下午，北京航空学院召开全院大会，工作组组长赵如璋传达李雪峰报告，部署在全院开展大辩论，对象就是3511班学生石兴国写的那张《一条“无头”黑线》的大字报。他说：“《一条‘无头’黑线》是棵大毒草。毒就毒在无头，……，就是落实到军委、落实到中央，这才是大字报的出发点和真正的目的。”

这天，北航开展了“627”大辩论。石兴国、戴维堤被许多人轮番批判、围攻一直到深夜。戴维堤说话结巴，本不善言谈。但是，此时此刻，他也顾不了许多，“困兽犹斗”，被迫自卫，声嘶力竭地同众人辩论、争吵，一直到口干舌燥，声带失音。天快亮的时候，同班同学把他架回了宿舍。

当他一觉醒来的时候，出现了奇迹，同学们突然发现戴维堤说话不结巴了。困扰他多年的口吃毛病一夜之间没有了。

6月28日，北航3421班学生曹伟康贴出大字报：《几点粗略的看法》，公开反对赵如璋的意见。这张大字报当然也被工作组定为大毒草。

从6月27日至7月6日，在工作组亲自组织下，在3511班先后召开了三次辩论会对石兴国进行围攻。7月2日，赵如璋找石兴国谈话，说：“同学中和你持有同样的观点，怀疑工作组的人是不少的，你的文章正代表了他们的意见。”他要石兴国作检查并承认三点：一是反军委反党中央。二是主观上站在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立场。三是他的行动是有组织、有计划的反革命行动。

这三点当然被石兴国拒绝。7月3日以后，工作组又接连组织批斗会，北航一下子点出了十几篇“大毒草”，石兴国、曹伟康、戴维堤和许多学生被工作组定为“反动学生”、“牛鬼蛇神”。7月6日，在全院师生员工大会上，赵如璋作总结报告说：“大辩论性质是夺取文革领导

权。”“扫出了石兴国之流牛鬼蛇神。”会后,工作组在全院师生中进行“左、中、右”排队,按其对待工作组的态度,将师生划分成4类:好的、犯错误的、犯严重错误的、右派。有200多位同学被划进4类——右派。还有更多的人被划进3类——犯严重错误的。

我们继续看看北师大女附中的情况。6月25日,北师大女附中工作组组长张世栋布置了关于批判斗争校长卞仲耘的“十天计划”,但是被反对工作组的学生讥讽为闭门造出的“功课表”。她们认为,在分析学校当前的任务时,工作组不强调党的群众路线,而是说什么“要集中力量打歼灭战,利用矛盾各个击破,欢迎问题性质严重的人起义。”这直接违背了毛主席的人民战争思想。她们还认为,工作组一进校就收集了卞仲耘等人的材料,在14日已归纳为七大罪状。既然工作组已归纳好卞的问题是七大罪状,是“心中有数”了,又怎能发动群众打人民战争?只能是运动群众,工作组所说的“发动群众”根本就是假话!

6月27日上午,工作组向全校公布了“卞仲耘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的八大罪状。而以高三3班梁二同为首的18位高中学生当天贴出大字报,题目是《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直指工作组部署的斗卞“十天计划”,是反毛泽东思想的,“我们与工作组的矛盾,是无产阶级革命派与资产阶级保皇派争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领导权的斗争”。

梁二同的父亲在空军机关任职,她们的大字报都在梁家讨论、定稿,有时梁二同的父亲还亲自修改,这给了她们很大的鼓舞和自信。与梁二同住一间宿舍的三位同班同学,也都力挺她。

邓小平对梁二同等18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大字报十分恼火,他让卓琳打电话给刘志坚,要他了解梁二同父亲的情况。

邓小平还进一步下达指示,要求运用“群众运动”的形式来打击反工作组的少数学生。

6月28日,邓榕向工作组传达了父亲邓小平的意见,主要精神是尊重工作组的领导,对反工作组的少数“顽固分子”可以展开“辩论”,如果她们要坚持就让她们“放”,就让她们“暴露”,要恢复党团生活,团的组织可以改组。

6月28日,刘少奇、邓小平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提出:运动要有步骤,要制订一些便于掌握的具体政策。邓小平还提议8月份完成计划进度的三分之一。后来,刘少奇讲:在当时无政府主义泛滥情况下,“一开始就要业已发动起来的广大群众按照我们和工作组主观设想的计划和步骤行动。”

小道消息不胫而走,“要抓右派学生,严惩捣乱分子”,“对于大学生中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一定要把他们揪出来”,“应届高中毕业生,经市委批准,可以批判斗争和戴帽”。“8月份结束运动,不要影响9月1日开学”之类的首长讲话,在学校也开始产生影响。

一时间,沸沸扬扬的大字报、大批判浪涛不再汹涌澎湃。不少人开始转向,向工作组靠拢,特别是消息灵通的高级干部子女,从他们的家长那儿得到某些消息,立即改变立场。星期六离校时也许还是以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气势睥睨天下,星期天返校时就变成在工作组的领导下,当文化革命的顺民了。

6月28日,浙江大学1861名师生联合署名起草了给毛泽东、中共中央的电文,并集队到省委大院静坐,要省委予以转呈。电文指责省委派出的工作组压制群众运动,强烈要求撤销工作组。对此,江华代表省委明确表示拒绝。省委根据中共中央转发北京市委“八条指示”的精神,提出全省党政机关的运动“要分期分批进行”,“大字报不提倡、不组织、也不反对”但也“不能上街”,要“内外有别”。就在同一天,江华、李丰平、陈冰分别约见杭州市委有关负责人谈“文化大革命”部署问题等,强调指出:杭州市要全面部署,一定要分期分批、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要根据各系统、各单位的具体情况,作具体的研究部署。如公安机关就可以收一收,一些机密不能泄露,公安人员不能上街,武器弹药库要严加保管;关系生产和群众生活的水厂、电厂、交通公司等,时刻不能停;报纸广播电台等是无产阶级专政工具,决不能让坏人利用,等等。

南粤广州,到了6月7日,各学校的情况也发生了急剧变化。

当时,广东各大学的政治辅导员根据上级的指示,都在秘密地整理学生的“黑材料”。6月7日,中山大学各系党总支召集左派核心小组开会,决定在学生当中抓右派。

抓谁？事实上，在学生中抓右派，无论抓谁，都必然引起剧烈的震动和分化。数学系四年级学生代表黄意坚，对党总支提出的右派名单有异议，会上发生争吵。随后党总支召开紧急会议，认为抓右派抓不下去，是因为核心小组的领导权被右派篡夺，必须把四年级的权夺回来。于是，黄意坚被清除出核心小组，从左派变成了右派。

当晚，二年级的学生先闹起来，抄了党总支，吵着要去游行。

此时，很多学生对揪由党委点名的反动学术权威不感兴趣，而关心揪党内“打着红旗反红旗”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矛头直指校党委。学生们在食堂，在校党委会门口贴了炮轰党委的大字报，和政治辅导员也冲突起来，有的还提出要上街游行。

在一张以校党委名义贴出的大字报《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把牛鬼蛇神揪出来！打倒一切资产阶级权威》前，围满了抄写的师生。与此同时，校园内还出现了大量“坚决捍卫中大党委”的大字报。两派学生形成尖锐对立。

这天，广东省委第一书记赵紫阳得知北京工作队已经进驻北京大学，从湛江打电话给省委书记处书记区梦觉，十万火急地催促：“北京已派出了工作队，看来广州也要迅速派工作队，加强领导，不要使运动没有领导。”同一天，省委发出《关于组织文化大革命工作队的紧急通知》。通知指出，“立即从省级单位抽调九百人，组成一支高质量的工作队，分赴各高等院校帮助领导这场斗争，坚决把这些思想领域的重要阵地的文化大革命搞好，搞彻底。”

陶铸在同一天以电话指示中南局，“学校现在主要搞文化革命，不能代替四清。”“重点是大专学校和高中，初中不发动，起来了就搞。小学，肯定不搞。”对城乡运动，陶铸指示：“县以下，先搞一下声讨，教育，仍以学毛著为中心。同意紫阳意见。面上学毛著，搞一段。点上搞一段，结合四清搞。”“城市集中搞一段文化革命，长期还是搞四清。抽点人，不要影响四清。”

在谈到中南局宣传部部长王匡的问题时，陶铸说：“王匡，是否正式停职反省，请给中宣部写一报告，把王匡现有的材料汇集一下，中南局讨论提出个初步意见（性质问题）。”

这时中南局后院已经起火了。中南局直属机关政策研究室在6

月7日贴出了第一张大字报,有如巨石投入水潭,立即掀起层层浪花。机关内的群众纷纷互相串连,内查外调,准备材料,烈火逐渐逼近中南局书记处。

6月8日,中南局把宣传部长王匡的秘书从花县“四清”工作组调回,专责照顾王匡,其中一条任务,就是避免“刺激”王匡。用中南局书记处书记、中南局文革小组组长吴芝圃的话来说,“不要老对王匡谈政治,可以聊聊家常,让他脑子有休息的时间也可以嘛。”吴芝圃还特别关照:“你回去要好好鼓励王匡站起来,你对他说:‘希望你站起来,不要想到绝路上去,要同错误思想决裂,好好检查自己的错误,你过去的工作我们是清楚的,要好好注意身体,问题是问题,生病是生病嘛!’你就说是我讲的。”

6月9日,广东省委做出《关于文化大革命若干问题的指示》。此时,广东省委已经意识到,“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威力之大,来势之猛,范围之广,是人类历史上不曾有过的。”省委认为,“当前存在的突出问题是,各级党委和领导干部,尤其是文教战线各部门,大大落后于形势,跟不上群众要求,甚至处于被动的状态。这是异常危险的。”指示对运动作了非常详细具体的部署。

6月11日,广州市委召开全市中学教师大会,要求教师们行动起来,和学生们一道,横扫教育界的一切牛鬼蛇神。广东省委常委、省政协主席雍文涛在动员报告中说:“这次运动的矛头,就是指向大大小小的邓拓之流。”雍文涛要求“市委、市人委赶快提出名单,调一些质量高的干部”,组成工作组。并规定每个中学都要有工作组,组长要由正县或副县级干部担任。随后,工作组进驻中学。

6月12日,广东人民广播电台署名“千钧棒”、“红色观察家”的大字报,公开向全台号召抓真的“黑司令”,广东人民广播电台台长、王匡的妻子田蔚成为批判的靶子。

田蔚解放以前就在新华社总社广播部工作,解放后她一直在广东广播电台,后来又筹建了电视台。可以说广东的广播、电视都是在她主持下建立的。”

6月12日,陶铸通过电话,对小学的运动,作了一个补充的指示:“小学,起来贴大字报,也不要阻止,记下来,将来四清时解决。”同一天

下午,他又匆匆指示中南局:“学校中提‘保卫校党委’口号是错误的,只能提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校党委是正确的,只能提‘拥护校党委’。”

省委在6月12日召开工作队队长会议。区梦觉一再强调,“领导有问题的可以通过背靠背揭发,需要面对面斗争时,也要经过省委文化革命小组批准。”这是搞“四清”的办法。“大字报不要贴到别人家里去”,“要恢复党团活动,发挥党团员的作用”。区梦觉还要求,“一部分院校、厅局的文化大革命运动由原党委领导,工作队协助。”

# 第75回：反压制，广东学校大动荡 急戒备，《北京来信》惊羊城

随着群众斗争不断升温，广东省委吃惊地发现，在基层单位中，自杀的人数，正在急剧增加。6月12日，省委紧急发出《关于防止在文化大革命中出现自杀事件的通知》："目前，我省的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和全国各地一样，出现群众运动高潮，形势很好，运动的发展是健康的，但连日来广州一些高等院校和其他个别单位，在文化大革命中一再出现自杀事件。这是值得引起注意和警惕的事情。"通知指出，"特别重要的，是要在坚决放手发动群众，大力支持群众的革命行动的同时，教育群众正确地采取文斗的办法，不要采取武斗的办法，并且严禁打人等非法斗争。"

6月13日深夜，中山大学几名学生向广东省委常委、副省长、中山大学党委第一书记兼副校长李嘉人提出，他们研究了区梦觉几次关于文化大革命的讲话之后，认为区的讲话违反报纸社论精神，要求批判区梦觉。

中山大学的学生认为校党委压制运动，要求"反压制"。而且这呼声愈来愈高，压力愈来愈大，愈闹愈凶，无法控制。在政治辅导员、党、团总支书记、党委委员、文革办公室工作人员会议上，李嘉人希望"进一步把问题揭开，扭转运动局面，不要使运动老是纠缠在压制问题上。"这个问题，把他闹得身心俱疲，他哀叹"反压制是无底洞。"李嘉人对中大的党委和总支书记们说："你们顶不住，校党委顶不住，我顶不住，省委顶不住，就是中南局也会顶不住。"

6月16日，广东省委常委、文教部长王阑西来到中山大学，指示李嘉人要赶快改选学生代表。6月17日，王阑西又打电话对李嘉人说："群众如要求处理政治辅导员，就停职反省。"同时省委授权李嘉人，对中山大学干部停职反省可用个人名义宣布。

6月中旬，省委又匆匆增派了将近一倍的工作队员进驻中山大学，

十几名中大的政治辅导员被停职反省,并关进了管教队。全省以“压制运动”的罪名,处分了120多名干部和政治辅导员。

6月21日,省委召开文教战线文化大革命经验交流会。出席会议的有各高等院校的总支书记、部分中学的支部书记和文教厅局的负责人,工作队也派了代表参加。区梦觉在会上赞扬了广州市第十中学的经验。这所中学在100多教职工中,揪出了20多个“牛鬼蛇神”。区梦觉说:“十中的经验很好。我们要学习他们领导文化大革命的经验,要打破框框,有什么揭什么,全面揭发。”

6月22日,由王阑西主持召开的文教厅局全体工作队员大会,传达了相同的信息。华南师院工作队汇报说,师院总支书记19人,揪出17人,其中重点对象七人;系主任10人,全部被揪出来,其中重点对象五人;政治辅导员26人,揪出17人,其中重点对象五人;处级、副教授以上60人,揪出52人,其中重点对象八人;科级干部31人,揪出11人,其中重点对象三人。华南师院的工作队建议,在批判斗争中,要抓住三种人:一、老右派;二、反党反社会主义突出人物;三、政客。王阑西传达了省委决定,各厅局(除广播电台外)运动,一律由原单位领导,工作队协助。围攻重点,党内党外都要搞,反正是要广泛揭。

于是,广州1000多名中学教师被关进“牛栏”,600多名小学教师被斗,400多名一般干部被“重点批判”。许多教师被戴高帽、挂黑牌、游街,遭受惨无人道的摧残和折磨,有的残废,有的自杀,有的被迫疯,甚至一人捱斗,全家受害,或三代人遭受歧视,不论在精神上、身体上都受到极大的痛苦和冤屈,时间长达数月之久。

中学的工作队进校后,也开始在学生里面排左、中、右,引起了学生们的反对。

6月中旬以后,受工作队压制的学生,在中山大学张贴了许多“穷追王阑西”、“猛揪区梦觉”、“工作队滚蛋”的大字报和大标语。

广东省委在6月24日接到中央批转北大工作组第9号简报和刘少奇的批示,当天夜里,王阑西打电话通知各工作队长到文教战线听宣读传达,并指示今后应按北大工作组的方法,处理“乱斗现象”。

王阑西又马不停蹄地到各大专院校解释:“工作队是党中央和毛主席派来的,你们一百个放心,一切权利归工作队。”他告诫学生,“无

限相信党中央和毛主席,具体表现在相信工作队,不然,就是抽象的肯定,具体的否定。”他又严厉警告说:“工作队是绝对的领导,任何人不得干涉,任何不通过工作队的会,都是非法的。”

就在这时,一封《北京来信》又将南粤羊城广州搅了个不亦乐乎。

6 月 23 日,华南工学院五年级学生高翔,收到他妹妹高眉扬从北京医学院寄来的一封信,信中有这样的话:

“除了伟大领袖毛主席和党中央外,各级党组织及其领导都可以怀疑、批判。斗争矛头应集中指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

高翔出身于高干家庭。工作队进驻华工后,高翔是有名的左派学生,直到学生中划分左、中、右时,他还是工作队依靠的学生骨干之一。但他对学校斗教授一直有不同意见,认为运动应该整党内走资派,不应整教授,整教授是转移了斗争大方向,他妹妹的这封“北京来信”正好道出了他的想法。于是,高翔等学生在 6 月 24 日将这封信抄成大字报,在校内张贴,同时还贴出了一份《告全院学生党员书》,呼吁广州地区各大专院校革命同学联合起来,互相串连,互相支援。

这封信顿时让平静的华工校园沸腾起来,同学们奔走相告,争相传抄。很快,7059 班同学贴出倡议书,呼吁在广州地区建立一个由党中央和毛主席直接领导的联合指挥部。

工作队连夜将这封《北京来信》抄录送到广东省委,并汇报说:“工作队发现后立即采取措施,了解各系情况,封锁消息,调查情况,研究对策,当晚召开工作队员会议,进行布置,串联骨干活动,同时将原信抄送王兰西(副省长)和文教政治部”。

赵紫阳看到信后,大吃一惊,立即派张云到华南工学院了解情况。这时学生队伍的分化,已经相当严重了。对《北京来信》,有人支持,有人反对,形成水火不容的两种意见。校方组织反击,把《北京来信》指为“反革命暴动的宣言”,“是裴多菲俱乐部反革命纲领的翻板”,公安机关介入调查。原定在中山纪念堂召开的 66 届毕业典礼,因担心高翔在会上发表演说而临时取消了。高翔被开除出左派领导核心。这些举措引起许多学生的不满,省委派到华南工学院的张云在学院受到学生的围攻,有的学生提出要成立学生组织,有的学生组织大家上街

游行。

赵紫阳在6月24日白天召开的广东省委派驻各单位工作队队长会议上已明确表态:“上街游行,我们坚决不赞成。要向学生讲明,根本没有此需要。游行的矛头是对准谁呢?游行要达到什么目的呢?牛鬼蛇神在学校里,你为什么要上街呢?上街游行,搞大民主,就是矛头对准政府,这不是很明显的吗?”

张云好不容易摆脱了学生的包围,赶紧找到华南工学院工作队长叶向荣,对他说:“今晚学生要暴动,立即做好准备。”

工作队紧急动员,院保卫处副处长邱盛花马上到广州警备司令部报告请求支援;叶向荣命令全院所有武装警卫人员全副武装,一等战备,通宵守候;三个工作队长也身带手枪,如临大敌。

当晚,省委书记处书记区梦觉彻夜未眠,守候在电话机旁。

到了凌晨1时左右,工作队和学院党委第一书记把学生中的工人贫下中农、革干子弟从床上叫起,开紧急会议,对他们说:“敌人已冒出来了,我们要进行反击,必要时要付出鲜血和生命。”

在工作队布置下,同学们连夜赶写大字报,说“《北京来信》是反革命暴动的宣言书”,“是裴多斐俱乐部反革命纲领的翻版”,“是匈牙利暴乱的前奏”等等。

天亮后,反击《北京来信》的大字报已经是铺天盖地,对高翔等人的大规模的围攻持续不停。同时,工作队还布置对一些同学跟踪,盯梢,偷听电话,防止他们串联,组织“暴动”。

第二天,6月26日,华南工学院5名学生上北京告状。省委得知消息后,立即打电话给沿途单位,赵紫阳也亲自布置对这5人的拦截和监视,下令省公安厅打电话给湖南、湖北公安机关,希望中途拦住这些上京的学生。

省公安厅副厅长白云起给公安部打电话说:“广州有5个反动分子要去北京闹事,请求派人跟踪,并监视他们的行动”。

在当天的会上,赵紫阳说:“我们头脑要清醒,对形势要有正确估计。现在是有一些不健康的苗头,有些乱,还要准备继续一个时期。一些学校的运动,我们掌握不了领导权,一些不正确的意见占了上风,个别的甚至可能为坏分子所操纵……总的来讲,除了个别部位以外,

至今我们还处在被动状态。”

他承认工作队派得太仓促了,“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总的就是领导跟不上去。对这种大的革命风暴,中央通过报纸社论直接同广大青年学生见面,学生闻风而动,而我们感觉迟缓,行动得慢。学校党委跟不上,不敢革命,怕乱,怕引火烧身,顾虑重重,诸多限制。工作队一下子又组织不起来,组织起来了,也不够强,完全没有经验。总之是仓促上阵,看来这种形势很难避免。前一段时间,学校党委不敢革命,工作队仓促上阵,所以前一段情况比较乱。”

赵紫阳给大家打气:“今天开会,是有意义的,大的框框统一一下也好。因为大家都没有经验,有些是非界线也划得不清楚。前一段学校党委对学生的革命行动限制多,不敢领导;当然,《人民日报》6 月 24 日《党的阳光照亮文化大革命的道路》这篇社论发表以后,我们又不要忘记了总的方向。今天总的来讲,我们还是处于被动状态,还要经过一段时间,这种局面才能扭转过来。”

但这“一段时间”,究竟有多长,谁也说不清,局面很可能还会趋向恶化。对运动的领导权,赵紫阳提出三种可能性,“一是我们党所领导,这是我们要争取做到;二是自发、半自发状态,如像现在许多院校的情况那样;三是为个别坏人所操纵。自发久了,也势必被别人所操纵。对这些,我们要有所认识。”

赵紫阳说:“学生在这场大革命中,一定会有很大提高,一定会锻炼出真正的左派,但必然要经过曲折的斗争,不仅要靠正面教育,也要靠反面教育,跌了跤子,上了当,有了教训,辨别能力就高了。有些地方出现曲折、混乱现象,如被偏激情绪的人操纵一个时期,甚至被坏人操纵一个时期,那是可能的,这也是反面教训。”

省委认为,《北京来信》说明,确有一部分学生“被偏激情绪的人操纵”,“甚至被坏人操纵一个时期”。

6 月 28 日,赵紫阳在自己家里和主管政法口的省委书记尹林平、省公安厅长王宁碰头。赵紫阳说:“阶级斗争很复杂,出头的人有些是别有用心的,广州各大专院校可能会出现乱的情况。”他指示尹、王二人:“对乱后暴露出来的明显坏人,可及时揭露,一般的记下一笔账,很恶劣的,公安部门要配合。”

6月29日,公安厅侦察处向厅党委写了个报告,题目是:“广州市大专院校开展技术侦察工作的意见”内容说“为了掌握学生的思想动态,拟在石牌成立一个临时侦察组,对六间大专院校进行侦察。”

6月底,经赵紫阳同意,王兰西,焦林义,白云起等签名向广州公安局交办:要控制华南工学院高翔的《北京来信》。

华南工学院萧玉祥等18名学生写了一篇“各兄弟院校联合起来”的信件,提倡串连,也被定为反动信件进行追查。

7月3日,公安厅《关于对华南工学院七种人进行侦察工作的报告》,提出对200名对象进行技术侦察,有学生,教师,干部等。

华南工学院把贴《北京来信》的1016班和呼吁建立联合指挥的7059班档案逐一审查,认为里面有“反革命”,工作队特别对1016、1026、1038和7059班进行严密控制。

他们还了解高翔父母的政治情况,把高翔的材料送到公安厅,列举了高翔六大罪状。

# 第76回：斗韦力，天津一中带头干 齐动员，津城声讨十六中

北京的门户天津，自6月2日各学校听了北大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后，也开始给学校领导写大字报。但多数学生还是号召团结在党支部周围，保卫共产党，保卫毛主席！横扫一切牛鬼蛇神！霎时间，一切可贴大字报的地方都贴满了大字报。

接着，各学校纷纷召开声讨邓拓黑帮的群众大会。

6月2日早晨，天津十六中学的广播站，重播了6月1日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的《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及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第一节课后校园内即出现了高中同学贴出的第一张大字报，质疑为何十六中也有聂元梓大字报所提到的压制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问题。这张大字报立即在学校里引起了极大的轰动。第二节课后，学校前院各教学楼的墙上已贴满了各班同学的大字报，锋芒直指学校党支部，批判学校党支部“压制文化大革命”的行为，并且质问学校党支部所提出的“四项原则”的由来。

“四项原则”是指十六中学党支部根据1966年5月14日，天津市委宣传部发出了关于开展文化大革命“四点注意事项”的通知，制订的四项具体落实措施，内容包括：不贴大字报，只写小字报；不开大型声讨会，只开小型座谈会；加强领导；不用文艺形式声讨反革命黑帮等指示精神。

到了第三节课后，整个十六中就已经全都停课了，无法再上下去了，所有学生和老师都自觉地投身到文化革命的运动中。

天津市其他一些中学也出现了类似十六中这样的情况。天津市委高度重视。此时，市委主要领导都到北京参加中共华北局召开的“前门会议”了，留在天津主持全面工作的天津市委组织部长马瑞华于当天上午，即在市委召开紧急会议。参会者主要是市委文教部、市教育局和团市委负责人。会后，市委文教部部长王金鼎又在天津市幼儿

师范学校召开了天津市完中领导干部会议。中午,马瑞华再次召集十六中、一中党支部以及市委文教部、市教育局负责人会议,分别汇报了十六中、一中、女三中、女六中及二十中等学校出现的情况。当天下午王金鼎、柳宗祥、沙小泉等市委文教部、市教育局和团市委的负责人又到十六中、一中、河北大学附中等学校亲自去做学生和领导的工作。

到了6月4日,全市的学校基本都停课了,大字报、漫画、讽刺诗贴满了校园,尤其是图书馆、老师饭厅等处,大字报的矛头开始指向老师,指名道姓,十分尖锐。

天津市一中揪出了校长韦力。

韦力是1952年调到一中任校长。经过几年的刻苦努力,使这所普普通通、毫无声名的中学,变成一所在天津闻名遐尔的学校。1960年,天津一中被评为全国文教群英会先进集体。所以,韦力被揪斗在全市中学引起较大的反响。

6月5日开始,天津一些中学的校长、老师被戴高帽、挂牌子批斗、游街,有的身上还贴满了标语,脸上涂满了印油、墨汁。

与一中一河之隔的天津十六中的学生、天津警备区司令员朱彪的儿

子朱强与几个部队干部子弟也给学校领导贴了大字报,但受到学校有组织的围攻。6月6日早上,天津市一中的学生听到这一消息,立即给十六中送去声援的大字报,并同朱强“反对派”的一些学生交流了情况,认为十六中党支部确实存在着不少问题,至少是个右倾机会主义,怕同学起来,怕“乱”,就是怕革命。

当天,十六中的学生李罗力等人找到市一中的学生王端阳、胡国清,了解一中的情况,王端阳让他们到一中参观。

6月6日这天,天津市委成立了由市委文教部、市教育局和团市委负责人组成的天津市中学“文化革命办公室”和卫生系统“文化革命办公室”,并对一些学校派出工作队或观察员。是日,一批学生到“周家食堂”、“森记稻香村”等商店贴大字报,要求改变商店名称。

社会开始混乱,人们对学生们的革命行为既觉得新奇,又有些惶恐,不知所措。当天,中共天津市委召开紧急会议。针对社会上出现的混乱现象,提出:要劝阻学生不要上街贴大字报,工厂不能停产,医院不能停诊,学校不能停课,机关不要停止工作。

天津市委所采取的这些措施并没能起太大的作用。相反,在要“保卫毛主席革命路线”“要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激情鼓动下,中学生们投身运动的热情越来越高涨,行动也越来越“无畏”。

6月8日上午,天津市委向十六中派去工作组,解除十六中党支部的一切职务。天津市委秘书长李定也随工作组一同前去。这天,十六中的学生自发选举成立了以李罗力为首的由学生组成的“十六中文化革命委员会”,并且各班和各年级都相应选举成立了本班和本年级学生组成的文化革命领导小组,终止了校领导和党支部对学校文化革命运动的领导,自此学校运动进入了“学生自己管理自己、自己领导自己”的新阶段。不仅原来的校领导没有了领导权,而且市里派出的工作组也形同虚设。

李罗力就是时任天津市市长胡昭衡的儿子,此时他父亲正在北京经受批判的煎熬,不过他还一无所知,正全身心的投身于大革命的洪波中。

6月7日和6月8日这两天,天津市委不仅向十六中派出了工作组,还分别向十八中、十九中等学校陆续派出了工作组,并且工作组人

员的数量不断增加。6月9日上午,天津市委在天津体育馆召开文化革命积极分子大会,市委组织部长马瑞华在大会上做了报告。

到了6月13日上午,天津市委第一书记万晓塘专程从北京赶回来,在体育馆给干部和各校学生代表作报告,提出要分清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好好学习毛主席著作和《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的社论,在风雨中锻炼成长,学习阶级斗争,作革命接班人。斗争要有领导,有组织,有计划;青年有革命热情,敢于革命,这很好,但是要沉住气,斗争是长期的等等。另外市委决定发给天津学生每人一本《毛主席语录》,顿时搏得全场的热烈欢呼。

在传达万晓塘报告时,有学生指出万晓塘报告中有错误的地方。

进入6月中旬后,天津十六中的部分学生又贴出《宜将剩勇追穷寇》、《对工作组的几点意见》等大字报,追究《四项原则》的"幕后黑手",批判工作组的所作所为,矛头直指天津市委。随着中央宣布废除高考制度的决定公布,学校运动进入高潮,校园内贴满了"要把文化革命进行到底""要揪出天津市一条又粗又长黑线"的大字报。

十六中学生运动的发展情况引起了天津市委及各有关部门的高度关注。每天都有大批"陌生人"到十六中校园内来看大字报,学校周围也出现了便衣公安人员。不仅校园内的气氛越来越紧张,社会上对十六中学生运动也开始有了各种各样的传言。

6月21日下午17时,共青团天津市委和市学联在民园体育场召开"庆祝改革高考制度大会"。在这个大会上,十六中学生向在场的各中学分别散发了《致全市中学生的一封公开信》,批评天津市委、《天津日报》和正在主持天津工作的马瑞华。信中主要列举了天津市委各种"压制文化大革命"的"严重错误",认为天津市委像北京市委一样"存在一条又粗又长的黑线",呼吁全市中学生团结起来,"用生命和鲜血誓死捍卫毛主席,誓死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

会场的气氛十分紧张,甚至还有十六中的个别同学要冲上大会主席台,受到阻止,并被警告:如市委没问题,"你们要记住这次行动"。

许多学校对十六中的信提出抗议,说十六中的学生李罗力是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野心家。

其实,会前在民园体育场外已布满了警察和便衣公安人员。

这天在民园体育场发生的风波,被称之为“十六中事件”。

当晚,天津市委连夜召开紧急会议,将十六中这封《公开信》定性为是“反党黑信”,并要求严肃追查指使十六中学生进行“反党活动”的“幕后黑手”。

半夜24时,十六中所在的和平区召集工作队和平分团指导员、队长紧急会议,齐国俊在会上传达区委付书记李兆先从市委打来的电话说:

“十六中工作队不能领导了,十六中学生到处煽动讲演,矛头指向市委,说市委是黑帮,讲万晓塘、马瑞华报告不对,到一些学校后被顶了回来,看起来他们是不会罢休的。十九中到处发抗议书,抗议昨天大会是压制革命,最近几天可能闹凶一些,有的把工作队关起来,扬言上街游行,可能后面有人,这不是一般问题……”

“我们说市委不是黑帮,是革命的,不是照北京办事,而是按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办事,我们要讲。他们声讨,我们要保卫;他们要喊口号,我们也要喊;如果到我们学校,我们要站出来,如果挨棍子也要顶得住……。”

齐国俊在会上还说:“如果赶工作队,我们要讲文化大革命是三个横扫。我们不反党、不反社会主义、不反毛主席,为什么要赶我们?要工作队走这是什么意思?”

他还说:“……十六中学生要求去北京,多数是干部子弟,现在他们起来要革市委的命,说劳逸结合是阴谋……,我们工作队要说服教育,向群众讲清天津市是在党中央、省委领导下,并不是黑帮。北京烂了,我们天津市委没烂,因为北京不是领导天津,天津是在党中央领导下。”

他还提出:“他们贴大字报轰我们就是不能走,一定要顶住。”“敌人出来是不奇怪的,可是我们干部子弟反市委这是可惜的……。”

6月22日,天津十六中又召开大会,团市委组织许多学校的师生前去围攻,市公安局还去了两位局长。

当天下午,天津团市委召开了全市各中学学生代表和工作组代表参加的会议,会议由团市委副书记王仁主持,从下午15时30分开始,

一直开到次日凌晨5时左右才结束,主要是批判十六中《公开信》的观点。在会议过程中十六中学生和团市委组织的其他各校学生的人数都不断增加,并针对《公开信》中的观点展开了激烈的辩论。为了抓十六中事件的“幕后黑手”,会议还进行了秘密录音。会议进行到半夜24时后,参加会议的各校代表在会议组织者的授意下开始高呼“横扫十六中一切牛鬼蛇神”“揪出十六中一小撮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等口号,并对《公开信》和十六中学生的“反党活动”进行了猛烈批判。凌晨会议结束时,王仁讲话,宣布《公开信》是“反党黑信”,指出十六中“有一小撮反党反社会主义集团”,并且要求各校组织力量去声讨十六中的“反党反社会主义”活动。

团市委对各校团组织提出要求,要求团组织大抓活思想,通过组织了解不同人的思想问题及时向上级党委、工作队反映汇报情况,要积极开展文体活动,包括民兵、游泳、各种体育活动,大唱革命歌曲,同时加强对少先队的领导。

就在团市委召开的会议正在进行过程中,当晚20时左右,天津市教育局负责人于抗已经传达了市委的紧急通知,要求全市各中学23日起都要到十六中去进行声讨,贴大字报,并且要点名批判李罗力,要揪出“以李罗力为首的一小撮反革命集团”。

与此同时,6月22日晚20时到23日凌晨3时,还有部分十六中、十九中学生前往《天津日报》社,询问21日民园体育场大会情况和质询22日《天津日报》第四版刊头的事情。报社副主编、主任、记者、招待员、工人和女六中学生冒着大雨齐聚《天津日报》社,与十六中、十九中学生辩论,不时有人出来念:

“刚才接电话,十四中要倾校出动,来和你们辩论。”

“你们都受蒙蔽了。”

“变啦!形势变啦!八中精神来啦,干劲冲天,一夜写成600张大字报!”

“师院、八中已去你校声讨啦!”等等。

到了晚上24时,有人在十六中点了天津市市长胡昭衡的问题。

6月23日6时左右,天津市八中果然组织了几百名学生浩浩荡荡列队前来十六中进行声讨,由于他们估计可能会要打破大门,冲进校

园,与十六中学生发生激烈冲突,因而不少男生还手提大棒,头戴安全帽。没想到十六中大门完全敞开,十六中的学生们不仅没有对他们恶语相加,大打出手,反而对他们的“声讨”列队鼓掌欢迎。

市委、团市委工作人员,工作队亲临现场观,《天津日报》记者李夫、林逢源刚参加完《天津日报》社前与十六中、十九中学生的辩论大会,又赶到了十六中现场。外校给十六中送来更多的大字报,点名批判李罗力。其中一张大字报的标题就是:“看!李罗力等一小撮人在文化大革命中都干了些什么?”到了上午,外校给十六中送来的大字报越来越多,说李罗力是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野心家。各校来到十六中的人也很多,互相发表演说,场面激烈。32 名公安人员来到学校。十六中校门前的南京路那时是墙子河,一直到晚上 21 点多钟,十六中对面的墙子河桥上还都站满了人。

此后几天内,天津市各中学几乎全部都到十六中来进行了“声讨”,不断高呼“打倒十六中一切牛鬼蛇神”的口号,到处张贴“揪出以李罗力为首的一小撮反革命集团”的大字报和标语,但是十六中学生始终保持平静有序,没有与外校学生发生任何激烈冲突。

这时,天津市委也对十六中采取了几项重要措施。一是撤换了原来派入十六中的工作组,派出了以市委财经贸委负责人耿忱带队的人数多达 170 人的工作队,十六中的每个教学班都有一至两个工作队的人员进行负责。二是废止了学生自发选举的“十六中文化革命委员会”和各年级各班文化革命领导小组。耿忱在工作队刚刚进驻学校时就宣称:“我们是来夺权的,要一个班、一个班的把领导权夺回来。”此后由工作队重新组织安排进行了学校文化革命委员会和各年级及班级文化革命领导小组的选举,把学校领导权重新控制在工作队的手中。三是向市有关各单位下通知,凡是十六中学生的家长,都必须把自己的子女看管好,不但要与“十六中一小撮反党分子”“划清界限”,而且要把那些长期住在学校里搞运动的“积极分子”都领回家去。否则这些家长本人都将会受到“十六中事件”的牵连和影响。

6 月 25 日,工作队和平分团付团长李彤布置围攻学生的工作说:“目前形势好转,十八中、市师、八中反对十六中,左派起来了,李罗力被打的头破脸肿,越墙逃跑,我们要有组织地声讨十六中,要有组织地

给贴大字报,如果有十六中的学生到各校要‘粘住’,辩倒他们。”

至此,十六中“轰轰烈烈”的学生运动被“压制”下去。与此同时,市委也下了很大决心和力量要揪出十六中学生“反党活动”的“黑后台”。由于所有调查结果都证明十六中学生运动是自发组织和自发进行的,没有受任何“反革命黑帮人物”的操纵和指挥,这项工作最后不了了之。

# 第77回：上措施，清华反击蒯大富 多数人，同意开除其团籍

我们再回到北京清华大学。自从清华大学6月25日开展“反蒯斗争”后，第二天，6月26日，清华大学大字报区又是一片对工作组的赞扬声，同日，又举行了拥护工作组的大游行，高喊：“无限信赖工作组”、“拥护以叶林为首的工作组”、“反对工作组就是反党”、“坚决打退反革命分子蒯大富的猖狂进攻”等口号。

26日，蒯大富在给吴浩汀等人的信中说：

亲爱的同志们，你们好！

我在这儿，不得不说几句心里话。

现在的斗争形势特别艰苦！希望你们绝不要考虑个人，一丝一毫也不能考虑，豁出去！

在别人把我们当着“反革命分子”的时候，我们绝不能一丝一毫的退缩。在“反革命分子”帽子没有摘掉之前，我们绝不能向什么人承认错误，我们退一寸，他们就要进一丈！他们现在抓不住我们什么把柄，千万不要把关键性的“把柄”送给他们，这样，他们气势更高了，更能蒙蔽群众，就将给文化大革命带来巨大损失！

我先走访新市委，再走访华北局。如果此二处得不到满意答复，加上中央、国务院联合接待处我们就无处说话。那时，我将采取强硬措施，坚决求见中央高级首长。不听到党中央、毛主席的声音，誓死不回学校！

这天，蒯大富等人到党中央、国务院、北京市委上访，反映学校的情况。他先跑到北京市委，后来又到中共中央人民来信来访接待室，反映问题。回来后就住在孟家驹在北京市里的家里，不想再回清华大学。后来，工作组通过孟家驹给蒯大富传话，通知他回校，并说，绝对保证他的人身安全和自由。于是，蒯大富回到学校。刚进校门，就有4个人从两边强行贴上来，以后不管蒯大富到哪里他们都跟着。

27日,工作组召开大会批判蒯大富等人。在批判会上,蒯大富发表声明说:

(一)不管怎么样,这次大会起码在客观上是一次政治迫害大会。我希望这是由于工作组调查不周所犯的错误,但愿不是预谋的政治迫害。建议大家好好学习《做无产阶级革命派,还是做资产阶级保皇派》一文,对照我校目前情况,再认真分析、思考。

(二)我非常体谅、非常理解大多数师生员工对我采取的态度。如果对待反革命,应该这样。你们现在对我恨之入骨,骂我,你们做得对,做得好!

(三)昨天晚上大会的发言者(除我以外),采取了捏造事实、无中生有、造谣撒谎、歪曲事实、断章取义、小事化大、乱下结论等各种卑鄙手法。我将逐个澄清。不过这表明了他们是非常软弱的。

(四)高压政策,本身就是软弱的表现。不过,我再一次表明,对我的效果为零!要我承认我是反革命分子,这永远也办不到!就是上了绞刑架,我也将宣布,我是革命者,我是坚决革命到底的!

(五)现在是无产阶级专政,党中央和毛主席在我们身边。我有一千条理由、一万条理由相信,这股黑风将被压倒。我自己是什么样的人终会弄清楚。

(六)党中央和毛主席在群众中享有极大的、不可动摇的威信。毛泽东思想的威力是无穷的,群众的觉悟水平是很高的。我们的叶林同志,不要错误估计形势。

(七)再诚恳进叶林同志一言,这样的大会,从根本上来说,是否对文化大革命有利?望您考虑。很可能起着很大的压制作用。

王光美强调批判大会要开得很有声势,发言人要层层选拔,会前要练兵预演。王光美按照她"四清"的经验,亲自主持斗争大会之前的预演会,亲自动手修改发言稿。在她的导演下,"上纲"愈上愈高,一时,清华园内"反革命"、"反党分子"帽子满天飞,人人自危。但王光美还认为不足,她对工作组的几位领导说:"我看你们一个副主任,两个副部长还斗不过一个小小的蒯大富。"

工作组为了落实刘少奇、王光美的指示,斗倒蒯大富,想尽了办法。他们利用干部急于要"下楼"、"解放",的心情,动员干部"反蒯",

说这是干部“触及灵魂”“将功赎罪”的“大好机会”。曾老师是蒯大富的班主任,因“反蒯”需要,工作组让他提前“下楼”。为了“反蒯”需要,王光美要干部以实际行动表示支持工作组,要在与蒯大富“辩论”时,恢复党团组织,要党员表态,“下楼”。如不“反蒯”,就让干部长期“挂着”,不能“下楼”。

28 日,蒯大富再次发表了《关于六月二十七日大会声明》。

这天,清华大学又举行了斗争蒯大富等学生的大会。从此,根据刘少奇的指示,清华的文化大革命运动进入了长达 20 天的“反蒯”时期。在“反对工作组就是反对新市委、就是反对党中央”、“无限信赖工作组”等口号下,蒯大富等人成了过街老鼠,人人喊打。

但是,此时的蒯大富依然不屈不挠,与工作组顽强的对峙着。6 月 29 日,他致信工作组组长叶林,并在信中写道:

“说实在的,我压根儿没有想到,‘小小的’蒯大富竟有如此‘威力’,不得不使工作组要集中全部精力来把他‘压’下去。声势之大是空前的,全校写大字报对付一个人,游行、示威,开全校大会,广播等大手段都使上了。这样的声势对蒋南翔都没有使过,不能不使我感到‘幸福’。

殊不知蒯大富‘又臭又硬’,死不屈服。你大概有点心虚了吧?如果心中还很踏实,还有手段没拿出来,那很好,我等着。顺便说一句,我将用我使得出的一切手段应战。”

“你说过:‘向工作组夺权,这不是向无产阶级夺权吗?’‘向无产阶级夺权就是反革命行为’,‘蒯大富要夺工作组的权’,言下之意,蒯大富就是反革命。在您的启发下,‘打倒反革命分子蒯大富’的口号满天飞。

我想,您是老革命了。什么是反革命,您一定很清楚。那您凭什么说我是反革命呢?‘向工作组夺权’这句话我从未说过,是您强加的。那么凭什么呢?就凭我把毛主席关于政权的思想具体应用到学校来吗?难道就凭我提出‘要’考验工作组吗?难道就凭我提出‘工作组的大方向有严重的错误’吗?等等,就凭这些我看不能给我戴上反革命的帽子吧。

何况,你们并没有用大量事实和充份道理来证明你们的‘大方向

完全正确’,是‘毛泽东思想的方向’,反而让那些捏造事实、歪曲事实、胡说八道的人大放厥词,对我进行无耻的攻击,我不能不表示遗憾。

但愿这是您由于调查不周所犯的错误,而非常不希望是你安排的政治陷害。”

他不无调侃的对叶林说:“处于目前我们学校这种情况,叶林同志,我真替你担心,如果你不慌报的话,你怎么向北京新市委交账?怎么向党中央毛主席交账?”

“我希望你好好抓一抓工作组。尽快‘统一思想’。已有可靠的迹象表明,在工作组内,有同志支持和同情我们。要抓就抓在前面,抓晚了后,怕到一定时刻,工作组内真正的革命同志,要起来揭发你们领导所犯的严重错误。

敬爱的叶林同志,时间紧的很哪,赶紧安排好计划,准备下一步吧,我耐心地等待着。不知怎么的,我的信心越来越足。拿起毛选,就像毛主席在身边似的!”

和北京大学一样,从6月底开始,清华大学工作组也实行封校,不准教师学生自由出入学校。

工作组又召开团组织领导干部会议,研究蒯大富等人的情况,决定先由团干部找蒯大富谈话,然后再开团组织会议,帮助蒯大富。6月末的一天,在清华大学团委书记参与下,蒯大富所在班级的团支部召开全体会议,他们讨论了蒯大富近日的行为,然后,直截了当地对蒯大富进行批评,并且要求蒯大富服从团组织的意见,收敛自己的行动,不要再做驱赶工作组那样的事情。

蒯大富根本没有把学校团干部们放在眼里,论口才,论知识,蒯大富觉得自己比这些团干部们要高明得多,于是,蒯大富给他们上起了政治课,从“文化大革命”的意义讲起,说青年人应该与“修正主义分子”斗争,应该当革命先锋等等。只听他口若悬河,一会儿谈起当前的政治形势,一会儿谈起修正主义问题,一会儿又谈起校党委的修正主义路线,中心意思是:“我们的行动,是正确的,是革命行动,没有错。”他还在会上做参加会议的团员的工作,要求他们和自己站在一起。会议开到这份儿上,大家谁也说服不了蒯大富,只好动用组织表决的方式,来决定蒯大富还能不能留在团组织里的问题。

表决结果,班级团支部的团员中,多数同意开除蒯大富的团籍。

这个结果大大出乎蒯大富的意料。他当场在会上提出抗议,并表示仍然要和工作组斗争到底,即便被关押也不怕。

6月30日,蒯大富贴出《告全校人员书》:

全校革命的师生员工,

工作队同志们,

今天,我和大家讨论三个问题。

1.差不多全校人员都说我是反革命。什么是反革命呢?反对党中央、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反对社会主义的人,才叫反革命。这五"反"我一"反"也沾不上。外面大字报上、广播内容中,叙述我的"罪行",全是捏造事实、歪曲事实以后强加的。许多同志,见此信以为真,对蒯大富是反革命分子,坚信不移。

同志们,我要严正指出,如果你是真正革命者的话,如果你真正对党中央毛主席彻底负责的话,把话说绝,如果你还有一个普通中国人的良心的话,那末,我衷心地希望你们,(你们也有责任这样做)好好作一番深入地调查研究,按毛泽东思想认真分析。不能只听一面之词。带着"蒯大富是反革命"的框框去调查也是无济于事的。

我还请你们中一些人再次走访中央,反映学校详细情况,并把我的大字报抄稿交给中央。我是无限信赖党中央,无限信赖毛主席的。

孟家驹曾对我说过:"哎!上天无门哪!"我立即反驳他:"胡说八道!在北京如听不到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声音,那中国岂不完了?你是怎样无限信赖党中央、无限信赖毛主席的?"中国永远不会完!中国永远是无产阶级专政!我们天天听到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声音,那么宏亮有力,又是那么亲切!

一方面,我相信,叶林同志他一定能如实地向新市委和党中央反映清华情况;另一方面,即使万一叶林同志歪曲反映情况的话,那么他也不能一手遮天,倘大清华,岂是叶林同志一手能遮住的?请同志们切不可低估党中央和毛主席在群众中享有的极大的不可动摇的威信。我十分坚定地相信,党中央和毛主席一定能全盘了解清华情况。蒯大富是什么样的人?党中央和毛主席一定能作出绝对正确的判断!

2.同志们,你们注意到目前学校情况没有?现在,在全校范围内

大肆制造舆论,一方面,他们公布蒯大富莫须有的“罪行”,另一方面,他们又说,蒯大富“花岗岩脑袋”,“顽固不化”,“又臭又硬”,“反革命分子不会承认自己是反革命的”等等。

而且,我再一次严正要求,在没有判我是反革命以前,你们要坚决执行北京新市委指示,和履行你们自己的诺言:绝对保证我人身安全!

3. 有同志说:“不管你过去怎么样,起码你在文化大革命中把运动引入歧途,对人民犯下了滔天大罪。”

我说,何为歧途?望大家慎重考虑!我早说过,在运动中考查工作组性质本身,就是文化大革命一部分。我校目前之所以出现这种局势,完全是工作组所作所为造成的,要工作组负全部责任。如果说,这妨碍了打校党委黑帮,那大家去找运动领导叶林同志算账。我不负任何责任!

但是,我再一次声明,工作组是否是黑线的组成部分,这要全校革命师生员工,包括革命的工作组员,在运动中考查!我相信,只要他姓“修”,他就不会说出姓“马”的话来!

同学们,同志们,在这阶级斗争的大风大浪中,每个人必须坚定地站稳无产阶级立场。头可断,血可流,毛泽东思想不能丢!擦亮眼睛,辨别真假,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贡献出自己的一切!

砍头不要紧,

只要主义真。

杀了我一个,

自有后来人!

无产阶级专政万岁!

中国共产党万岁!

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六月三十日写成大字报贴出)

7 月 2 日,蒯大富再致叶林的信,冷嘲热讽,决不屈服。

# 第78回：不屈服，蒯大富绝食抗议 庆七一，《造反歌》传唱北京

7月3日，薄一波再次来到清华大学。在与学生们的对话时他谈到蒯大富，他说：

“他不是要夺清华蒋南翔的权，而是要夺工作组的权，工作组是党派来的，因而是夺党的权，现在，我们的国家是共产党的天下，要夺党的权就不对。

他大字报上写道：‘眼睛里看的，脑子里想的都是夺权……’同志们，你们看，我们的社论上是怎么写的？我们要念念不忘阶级斗争，念念不忘无产阶级专政，念念不忘突出政治，念念不忘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他和我们站得不一样，眼里看的不一样，他是念念不忘要夺权。

这一次，我们已经夺了权，清华大学以叶林同志为首的工作队一进校就改组前校党委，这还不叫夺权？蒯大富现在总想夺权，夺共产党的权，这叫什么？”

一同学答道：“反革命！”

薄一波：“他这个人不错！有点反革命的顽强精神，刚才举手赞成蒯大富的一个人也没有，怀疑的人就是蒯大富。”

当他看到蒯大富给师大女附中信时，便问大家：“我问你们，工作组能否代表你们，怀疑的请举手。”

蒯大富举手。

薄一波：“他自己对自己怀疑，但他还要坚决顽抗，蒯大富这些人是不足为奇的，自己对自己怀疑，但是他还要坚决顽抗，这种人就是不虚心一点。”

他又说：“那天我看到蒯大富说：我不认识你，碰到你也感到不错，告诉你几句话，他这个人不虚心，说我胖老头，我不反对我是老了，胖不是自己要的，其实当时他要问我名字，我说我不愿意告诉他，我很愿

意交朋友,我很愿意做你的朋友,如果你承认了错误,写大字报贴出来,下次来时我就可以和你作朋友。”

“今天为什么还来呢?因为上次我讲过一些话蒯大富给我贴了大字报,今天我有点空就来了。我想再看一个。对蒯大富同学不够礼貌,我看也不要过分地礼貌,蒯大富要挑战,那我们就挑吧!不这样不行。

工作组进清华只24天,我看工作搞的还算不错,好不好?“

一同学答道:“很好。”

薄一波:“很好还不能说,但工作组进校还是不错,你们说得好,那我就更高兴了。但蒯大富说还在怀疑,蒯大富说他最能夺权,我说你吹牛,有什么本事?六月十日以前人民日报发表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北大发表了聂元梓大字报,清华怎么样呢?清华处在压制反抗的情况,左派刚一露头,贴了七百多张大字报,牛鬼蛇神就出来反扑了,写了一万张大字报反扑,蒯参加了没有?”

一同学插话:“参加了!”

薄一波:“你吹什么牛皮,当时你是保皇派,你夺什么权!你并没有夺黑帮的权,你是保皇派而不是右派!工作队进校后,6月9日进来的,6月10日夺的权,你现在怀疑了,你想夺权了,你想夺共产党的权,6月9日你不夺权,6月10日你要来夺权了,错了一天,英雄做不成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只能算什么?大家说。”

一同学说:“反革命!”

薄一波:“大家作了结论,6月9日以后我们夺权了,你倒出来夺权!你这个逻辑倒很清楚,这是什么逻辑。”

同学回答:“反革命逻辑。”

薄一波:“我们工作组作的是对的,工作组一进村就支持左派,站在左派一边,反对保皇派,反对牛鬼蛇神,工作组作的是对的,当然工作组刚进校情况不熟,他们都是从上海东北来的,一进校他们就听毛主席的话按毛主席教导去作,起来调查研究,不能下车伊始就哇喇哇喇,蒯大富就抓住这一点说工作组来了以后不马上斗他们,蒯大富之流所说要斗保皇派,实际上要斗我们所说的真正左派,工作组没答应他们的要求,说要调查研究,调查清楚了才能斗。蒯大富不允许,我说

这不对,他就说一切牛鬼蛇神都揪出来了,当时我问他,他说都揪出来了还说自己是左派,当时我说:蒯大富同学你可能就是牛鬼蛇神,那天我是开玩笑,但是说对了,我说工作组基本上是好的,但一下子没把局势铺开,工作组是有些缺点,有些人提意见是对工作组的帮助,可你(指蒯)这是反扑。

我看清华现在的大辩论会很好,现在的局面是好的局面,只准蒯大富写,不准左派起来反击,那是不行的。左派可以起来斗争嘛。同志们不要把蒯大富估计的过高,把他估计的过高是要上当的,他不过是一个到处奔走的小卒子而已,他没本事。我们左派一定要把真正的黑线揪出来,不要把他看的了不起,他刚才跟我说的(指看大字报时和蒯的辩论),就是无理取闹。

今天我不是以胖老头资格,而是以一个普通人的资格讲的。欢迎你们贴我的大字报。蒯大富不赞成,我就高兴。蒯大富不高兴,我就落实了。如果大家都不赞成我,只有蒯大富同意,那我今天就出不了清华园了。"

蒯大富说:"信任蒯大富的还有一二百人。"

有同学立即反驳:"没有,吹牛。"

薄一波:"一二百没有,五六十总有吧!"

同学答:"没有。"

薄一波最后说:"今天,我给蒯大富抹了黑,但还要作保黑派,从团结愿望出发,经过批评,甚至斗争,再达到新的团结,蒯大富我是对的起你了,把你当作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对你的斗争才是真正对待矛盾。

对阶级敌人就不能这样,对阶级敌人要斗争,要专政,要逮捕。

我看他(蒯)的论点也不是很难驳倒的,他说了一些反面的话,这样欢迎他。如果这里没有蒯大富,我就认识不了你们,你们这里运动搞的好,就是由于你们这里出了蒯大富,这个反面教员是不易多得的。我们要这些人。将来斗他不要给他戴高帽子,也不要揍他,向他这个反面教员学习。这是政治课,白天跟你们讲政治课,多讲马列主义,毛主席的著作,有时还教育不过来,就是要有一些象蒯大富这样的反面教员。

讲的多了……(不清)今天就讲到这里,两个星期以后再来,欢迎大家贴我的大字报。”

清华大学在反蒯斗争中,有700多名学生被打成反革命。和蒯大富一起挨斗的学生领袖中,有一人自杀身亡。蒯大富曾跑到清华火车站,用卧轨自杀的方式表示抗议。为了防止意外,工作组决定单独关押蒯大富一段时间。从7月3日开始,工作组开始限制蒯大富的人身自由,把他关在新斋862号——蒯大富住的宿舍,不让他出门。但是,总有人来探访。于是工作组又把他挪到一号楼的四楼上,单独看押。搞了4个人一班,分四班看守,白天晚上都盯得死死的。为抗议关押,蒯大富开始绝食。

7月4日,蒯大富发出《绝食抗议非法政治迫害!》的公开信:

清华大学工作组:

我现在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我现在享有不可侵犯的人身自由权!

而现在呢?

我出门,你们跟踪监视;

我打电话,你们不准;

今天出新斋门,你们不准;

上强斋,你们不准!甚至动武,流血!

我要去中央,你们不准!

你们要犯法吗?你们要封锁中央吗?

办不到!一万个办不到;

现在我提出一个要求;

誓死明天去中央

你们可以派人跟着,但没有限制我行动的任何权利。

如不答应,我于一九六六年七月五日晨六点零分起,绝食抗议这种非法的政治迫害!

蒯大富

一九六六年七月四日二十三点

绝食第三天,北京市委副书记马力到清华园来看他,对他说:“蒯大富,你绝什么食啊?你写的信我们都收到了,你要转到中央的信我

们也都转了。不吃饭身体垮了,那你还斗什么?赶快吃饭!”

此时的蒯大富已经快支持不住了,听了马力的话后,7 月 6 日,蒯大富写出《向党、向全校革命师生承认和检讨错误》,文中写道:“采取绝食斗争的方法是严重错误的,我准备长期斗争”。于是乎,复食。

7 月 1 日是中国共产党建党纪念日,北京大学附中受工作组支持的左派学生,邀请在北大附中的海淀区各中学左派学生代表,参加他们组织的庆祝晚会。据宋柏林日记记载:“邀请上提出苛刻要求,一律是干部子弟,而且尽量穿黄军装。”清华附中红卫兵去了几个人。在那里,他们大开眼界。首先北大附中左派都是清一色黄军装,耀武扬威,与清华附中红卫兵的百姓装束,形成鲜明对比。另外,他们个个都是干部子女,清华附中虽然也以干部子女为主,但是毕竟还有一批非干部子女的元老。而且,在晚会上,北大附中把非红五类出身的学生隔离在观众席外围,大大突出了阶级界限。询问之下,才知道他们这样做是得到了工作组的支持。

在晚会上演出的《造反歌》从此跨出校门,在社会上广为传唱,并在传唱过程中被定名为《革命造反歌》,还配上肢体语言,成为简单夸张、热烈煽情的街头群舞。

7 月 3 日,北大工作组副组长张德华在北大附中召开座谈会,说“红旗”小组有“方针性”错误。提出用分化中间,先拉群众,孤立少数的方法打垮“红旗小组”。7 月 11 日,张承先在北大附中召开部分师生座谈会,批评红旗小组是“关门主义”、“宗派主义”。“红旗”小组几乎失去了存在的合法性,人数由 300 多人锐减为 100 多人。

风靡北京的“造反歌”作者,北大附中学生严恒公开宣布退出反工作组的“红旗小组”,并把“造反歌”火药味很浓的歌词改得符合工作组的要求。

“造反歌”最初的歌词是:

“拿起笔,作刀枪,集中火力打黑帮。敢想、敢说、敢造反,文化革命当闯将。

忠于革命忠于党,党是我的亲爹娘。谁要敢说党不好,马上叫他见阎王。”

后来加工定型、显得更加完整的歌词由三段构成:

“拿起笔,作刀枪,集中火力打黑帮。革命师生齐造反,文化大革命当闯将!

忠于毛主席忠于党,刀山火海我敢闯。革命后代举红旗,主席思想放光芒!

歌唱毛主席歌唱党,党是我们亲爹娘。谁要敢说党不好,马上叫他见阎王!”

在实际演唱时,通常要在结尾处加上呐喊声:“杀!杀!杀——嘿!”以渲染加强气势。

7月3日,北师大女附中校长卞仲耘分别给邓小平、李雪峰等领导写信,详细地讲了她挨打的情况。附文是关于袁淑娥破坏女附中文革的情况,希望上级派人调查、处理。

7月4日,清华附中红卫兵论《无产阶级革命的造反精神万岁》的大字报贴出已经10天,他们觉得戏已做足,于是卜大华等人又贴出早已准备好的《再论无产阶级革命的造反精神万岁》的大字报,并在文中转引了1966年6月9日《人民日报》第六版的一则国际评论《汉弗莱的哀叹》中引述的,毛泽东1939在延安各界庆祝斯大林60寿辰大会上讲的一段话:“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根据这个道理,于是就反抗,就斗争,就干社会主义。”他们还强调,他们提倡的造反是有阶级性的,“只许左派造反,不许右派造反。”

一看到“造反”二字竟是最高领袖说的,那些正在气势汹汹地批驳、斥责“造反”的人吓坏了,赶紧偃旗息鼓,溜之大吉,工作组更是楞住了,紧急派人去查证核实,结果证明那条语录是真的。

北师大女附中在批斗卞校长大会后,反对工作组的李黎黎、梁二同等学生还去广播电台告状。她们送去揭发材料,要求反映给党中央毛主席,要求康生、江青、王光美接见。她们的材料,转到团中央书记胡克实手里,胡克实转交胡启立处理。胡启立了解到,反对工作组的学生虽然基本上都是革命干部子弟,但也有例外,譬如李黎黎的父亲在反右倾中自杀,高滨滨是高岗之女、俞慧声是前北京市副市长范瑾之女 、杨团是前北京市委常委、中科院哲学社会科学部领导杨述之女。黑帮子女混入其中,他觉得问题很严重。必须对反工作组的学生认

真过细地做工作,整体上去分化瓦解,团结教育大多数,孤立极少数。

胡启立亲自组织反击,部署左派力量分头出击。毕竟,大多数人都站在当权者一边。工作组几位干部每天分别找反工作组的学生谈心,以关心、爱护的态度,启发他们具体谈一谈写大字报的过程。如果是革命干部或者军队干部之女,就通过组织找家长,让家长做女儿的工作。他们认为带头的学生,主要是高三年级的梁二同、李黎黎、王南芬3位。分化的结果,就是把她们3人孤立起来。经过十多天的分化瓦解,反工作组的许多同学都被迫放弃原来的观点。

7月5日上午10时左右,一辆团中央的小车开进中南海,车里坐着共青团中央书记处书记、西城区工作队负责人胡启立、北师大女附中工作组长张世栋和师大女附中"革命师生代表会"主席刘进和副主席宋彬彬。后两人是邓小平点名邀请的,他虽然不认识她们,可是和她们的父亲很熟。解放初期,邓小平主持西南局工作时,刘进的父亲刘仰峤是西南局副秘书长,当时秘书长空缺。而宋彬彬的父亲宋任穷当时则是云南省委书记。

到邓小平家当面汇报工作,这让张世栋真有点紧张,因为那是他第一次见到地位这么高的中央领导。好在有上级胡启立同行,他若有遗漏,胡启立可以帮他兜着。

进到屋里,邓小平的夫人卓琳给大家倒水让座,一一自我介绍。当邓小平听到介绍刘进后,就对她说:"刘仰峤是个好同志。"一句话,让刘进激动了半天,以致以后张世栋汇报的话她基本上没有听进去。因为高教部自6月初部长蒋南翔停职后,就由刘仰峤主持工作。但是仅一周后,6月15日,刘仰峤也成为黑帮被停职了。虽然学校和她家只一路之隔,可工作组来后,刘进跟着他们忙得天天团团转,根本不回家。有一天,有个同学告诉她:"你爸爸出问题了,赶快回去看看吧。"她回家一看,高教部大院小院里铺天盖地都是打倒刘仰峤的大字报,她大吃一惊,不明白父亲怎么转眼成了黑帮。几个认识她的人揪住她,要她当即表态。她说:"我相信组织,父亲的问题由组织审查、做结论,他是他,我是我,我还要革命呢。"现在,邓小平都说父亲是好人了,刘进怎能不激动?

# 第79回：邓小平，接见女附中领导 群情奋，吴法宪四面楚歌

汇报由张世栋为主，胡启立补充。邓小平详细询问了工作组在校开展工作的情况，张世栋一一作答。

张世栋在汇报卞仲耘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捧上天的问题时，举了卞仲耘对待学校两个特级教师的例子。邓小平说："究竟教得好不好呢？如果真有学问，还要团结他们。至于提级的问题，那不是他们的责任，中央也提倡过。中学教师名誉地位不高，教学有成绩，这种人要团结。要实事求是了解这些人究竟好不好？"

宋斌斌回答说："她俩教学还不错。"

邓小平说："她教学不错，是资产阶级世界观，要逐步解决。"

接着又说："师大女附中数学物理都不错。好的学校热火朝天、名气大，有一套。你们学校干部子弟多，左派力量大。运动搞起来，搞的快，另外一方面也要看看突出的是什么东西。如果没有好教师，也就教不出好学生。老师问题要慎重了解一下。如一些新老师，学生最不欢迎，因为他们没有经验，要教几年才会积累经验。老师是真好，还是专门捧资产阶级权威？每件事都要分析一下，要善于分析，不要只被一般冲动，冲啊！要学会战略、战术、政策、策略。工作组要教育帮助学生提高水平、冲容易，冲得好就不容易。每弄一条错误时，都要加以分析。如真有本事就不要弄一条了……"

"大红人、有本事的，就是资产阶级世界观也要保护，因为他们教课教得好么。"

邓小平对刘进她们说："不读书了？你们要毕业了，毛毛还要读书。读书是学生自学？数学、物理、化学都自己读？不要老师？半工半读还有个半读，业余学校也要有教员……"

"毛毛"是邓小平的女儿邓榕的小名。

邓小平询问斗了卞仲耘几次以及是否打了她。工作组汇报打了

时,邓小平强调不要打人。他谈到了卞仲耘的求助信,说:“卞仲耘只给我寄了一个信,承认她执行了前北京市委修正主义路线,说学校运动6月13日以前正常,以后就不正常了,主要是提出两件事:一贴了男女关系大字报,二打人了。说袁淑娥是个资本家女儿,领着学生到她家贴大字报。你们查袁淑娥怎么回事?本身不是好人,做出适当处理。学生里注意,不要被袁淑娥领导。”

他说:“对于学校的走资派批一两个就可以了,不要牵扯的面太广。要不然欠下的债太多,我们还不起。老师们都是好的,哪里有那么多修正主义呀?若有那么多,我们17年的人才是如何培养出来的?!毛主席的女儿不也是女附中培养的嘛!难道都是坏老师教的?”

邓小平说,要尽快恢复党组织的正常工作,要依靠学校的党组织,不能离开党组织。他说:“党员应当开会,党员在党内可以批判。党团组织要过生活。总支书记工作组代理。党团生活要恢复起来。把党搞垮怎么行,把团搞垮怎么行。如运动把共产党、共青团都打倒是胜利么?总是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么。

恢复党的作用是逐步的,最后要保证党的领导、团的助手。要在运动中恢复党团作用。恢复生活不等于恢复作用,最后目的恢复党的领导作用,团的助手作用。

革命委员会要好好讨论运动的目的,方针和政策。老师、学生要结合起来,没有运动领导的统一语言怎么行……”

因此,邓小平不允许在学生中成立党团以外的组织。那会儿海淀区中学已经有了红卫兵这种学生组织,处于地下状态。邓小平说,一定要由党、团组织来取代类似红卫兵这样的非法学生组织,要把学校里学习好、思想好,有威望和组织能力强的学生,吸引到团委或学生会里面,让非法学生组织没有领头人,没有市场,他们就闹不起来。

对学校里的反工作组学生,邓小平再一次指示要组织辩论。当刘进和宋彬彬说:“反对工作组的人都不愿意参加辩论了,怎么办?”

邓小平说:“他们不辩,你们自己辩,缺席辩论也可以。目的是为了大家懂得道理,受教育。他不在也可以辩论、讲道理。”

邓小平又问:“多少人反对工作组?”

同学答:“还有20来人。”

邓问:“你们全校多少人?”

答:“1600 多人。”

邓小平说:“1600 多人对 20 人,没关系嘛!”

邓小平还讲了在学生中间是分左、中、右的,运动后期都要排队。

7 月 5 日下午,北师大女附中工作组组长张世栋召开全校大会,遵照邓小平上午的指示,动员和部署“在师生中开展要不要争夺工作组的领导权”的大辩论。辩论对象高三 4 班李黎黎(代表 13 个同班同学)、高三 1 班王南芬(代表 9 个不同班级的高中生)、高三 3 班梁二同(代表 18 个高中生)。7 月 6 日,在工作组的布置下,校园内贴满了全校师生批判、指责梁二同 3 人的大字报。

7 月 7 日、8 日、9 日,师大女附中工作组召开了 3 天的辩论会,约 80 人现场参加,全校则以听广播为主。结果是,高三 4 班 13 位干部子女集体认错,她们反对工作组,完全出于共同的认识,与外界无关,也不曾受到海淀区中学的影响。但是,辩论会后不久,李黎黎成了哭笑无常的精神分裂症患者。

王南芬曾经是学校学生会主席,学生党员,有很高威信。此时,她只身战群雄……

3 人中,唯梁二同不到学校,拒绝参加辩论。此时梁二同在空军大院因反工作组已赫赫有名。空军大院也因她反工作组的做法而发生争论,机关内分为两派,各部门只要一开会就会说到师大女附中反工作组这件事,讨论梁二同这样做对不对?是不是该支持她?这一切,使梁二同她们更加坚定,不怕被孤立,觉得很光荣。她们对工作组的劝告置若罔闻,梁二同干脆就不到学校,把更多的时间用在自己干革命,经常去海淀区清华附中、北大附中等中学活动、交流。7 月初,受北大附中红旗战斗小组的影响,她们成立了女附中最早的学生组织“红旗”。

辩论会后,师大女附中学校开始部署下一个任务:老师集训和学生军训。把大多数学生集中起来赴邢台军训,把全体老师集中起来在“马神庙小学”集训,同时还把不符合军训条件的少数“有问题”的学生送到郊区劳动。然后就准备复课了。

我们再看看部队的文革运动,首先还是空军。

话说吴法宪在西北接到叶群的电话后,立即赶回北京。刚进家,就接到叶群给他打来得电话,将她在刘志坚家看到徐深吉告他状的事情告诉了吴法宪。

吴法宪不敢怠慢,回京后的第二天,6 月 4 日上午,就召集空军党委常委会议,讨论如何贯彻执行中央《516 通知》的问题。与此同时,还准备将他和成均这次西北执行氢弹空投任务的情况,以及检查空军部队发现的一些问题,一起向常委会作一个汇报。

谁知会议刚一开始,空军副司令员刘震首先向吴法宪提出:“你作为空军司令员、党委书记,对《516 通知》不主持开会,不组织学习、讨论,躲到外面检查工作,迟迟不回北京,不抓‘文化大革命’,这是为什么?对中央‘文化大革命’的指示按兵不动,是什么态度?”

吴法宪迎头一棒,当时就懵了……

接着,空军副司令员曹里怀、副政委王辉球也相继发言,指责吴法宪,上纲上线。特别是成均,本来和吴法宪的关系是很好的,在西北时,两人也配合得很好,可是此时,他也突然加入了指责吴法宪的行列,说“文化大革命非搞不可”,“空军按兵不动不行”等等,弄得吴法宪不知所措,赶紧分辨说:“据我了解,驻京的各部队机关和军委各总部,包括我们的邻居海军机关,都没有动。”

这下更热闹了,不仅徐深吉、成钧,连副司令员谭家述、常乾坤、也都跟了上来,相继对吴法宪展开了轮番攻击。

参加会议的 10 名常委,7 名攻击吴法宪,还有参谋长张廷发 1 人不表态,但是也不想和吴法宪靠在一起,常委中只有政委余立金和吴法宪两人是一致的,十分孤立。

刘震要求第二天召集空军党委全体会议。

吴法宪说:“来不及呀!空军党委委员有 50 多人,就是连夜用电话通知都来不及呀!要开也起码等到 6 号才行。可以要求参加会议的人 5 号晚以前赶到北京报到。”

于是决定 6 月 6 日召开空军党委第十一次全体会议。当天下午,吴法宪即向中央军委报告,获得批准。

6 月 6 日上午 8 时,按照空军党委常委刘震等多数人的意见,空军党委第三届第十一次全体会议在空军东交民巷招待所礼堂正式召开。

参加这次会议的有空军党委委员32人,各军区空军的主要领导和空军领导机关二级部部长以上领导30人列席了会议。

会前,已有两位副司令员给上级写信,其中一位给林彪写信告吴法宪,另一位则到叶剑英那里状告吴法宪。叶剑英给空军副参谋长何廷一打来电话,向他了解情况,并嘱咐何廷一,不要卷进他们的矛盾。

在这次全会上,吴法宪的开场白讲了大约有10分钟,刚讲完,刘震就上台发言,然后是成钧、曹里怀、谭家述、徐深吉、王辉球和常乾坤,他们一个接着一个地抢着上台发言。基本意思都差不多:空军的文化大革命搞迟了;吴司令在西北躲风,迟迟不回来,迟迟不作讨论,不作决定;对中央的指示,对《516通知》按兵不动,耽误了空军开展文化大革命的时间等等。此时,会议秩序大乱,有的对吴法宪、余立金义愤填膺;有的对刘亚楼痛心疾首;有的常委在说到刘亚楼一言堂、一长制、飞扬跋扈、压制民主时,竟痛哭流涕。会议一开始大家的矛头就异常集中:揭发批判刘亚楼、吴法宪、余立金的"罪行"或"错误"。7个常委齐上阵,搞得吴法宪、余立金狼狈不堪,根本压不住阵脚。

为什么又批判到刘亚楼?因为5月16日,中共中央批转了中央工作小组的《关于罗瑞卿同志错误问题的报告》中提到1965年2月间刘亚楼分别向叶群、林彪转达了罗瑞卿"四条意见",然后称:"林彪同志当时严肃地批评了刘亚楼同志,并向刘亚楼同志指出了一九六一年以来罗瑞卿同志的思想情况、恶劣倾向及近年来对罗进行批评的经过,刘亚楼表示他过去受了罗瑞卿的骗,上了罗瑞卿的当。"

这个报告所附的肖华3月25日在讨论罗瑞卿问题的小组会议上的发言中说:"罗瑞卿和杨尚昆、杨献珍的关系就很不正常,和刘亚楼同志的关系也极不正常。当然,我们对刘亚楼同志的看法是一分为二的。刘亚楼同志是个极端的个人主义者,也有个人野心,当了罗瑞卿的工具,直到临死才说出自己是受了罗瑞卿的骗,上了罗瑞卿的当。"

刘亚楼是个干事的人,作风强悍,也有脾气,对人对事要求甚严,批评人不留情面。空军这几个常委,在刘亚楼生前颇感压抑。现在看到中央文件说刘亚楼"是个极端的个人主义者,也有个人野心,当了罗瑞卿的工具",于是将矛头指向空军中与刘亚楼走得最近的、能对他忍气吞声的吴法宪和受刘亚楼器重的余立金,那几个常委也满有理由怀

疑他们与刘亚楼关系同样“极不正常”。此时,中央刚刚改组了北京市委和北京大学党委,还下发了《516 通知》,要在全国开展文化大革命。究竟空军的文化大革命怎么搞?是不是吴法宪也有问题?空军的领导班子是否也要改组?空军共有 11 名常委:书记是司令员吴法宪,副书记有政委余立金、副司令员王秉璋、成钧,其余副司令员刘震、曹里怀、谭家述、常乾坤、徐深吉、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张廷发和副政委王辉球 7 人是常委。王秉璋兼七机部部长,没有参加 6 月 6 日的空军全委会。

下面各军区本来对刘亚楼也有意见,见几个常委这么一闹,于是,大家也跟着一块儿起哄,像沈阳军区空军的黄立清、南京军区空军的聂凤智、广州军区空军的吴富善,都是些老资格,再加上成都指挥所的高厚良、武汉军区空军的傅传作、廖冠贤等人,和 8 位常委一起,哄啊、闹啊……

会议一开始,几个常委就要求军委派工作组来。军委没有派。后来,以总政的名义,由总政组织部副部长胡友之为组长,包括青年部副部长萧麦萍和叶剑英的秘书李文芳 3 人前来参加空军党委的十一次全会。住在空军招待所。叶剑英嘱咐他们:“只带耳朵,不带嘴巴。”

6 月 9 日,叶剑英为空军党委第十一次全体会议专门给空军常委写了一封信:“空军党委领导核心一定要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和斗争达到团结的目的。党委要经常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要经常思想见面,相互间要经常提意见。对其他同志的错误不要当作某种资料去收集,看到同志有了错误,要随时提出来,不要使问题成堆。希望你们这次会议是在高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大好形势下进行的胜利的会议,是团结的会议。”

6 月 14 日,南京军区空军司令员聂凤智在常委扩大会上发言说:

“用中央军委立空军为标兵的三条理由衡量,显然不够。一是抓两头好,毛泽东思想红旗举得高。实际上,‘上头’就没有抓好。刘亚楼主持空军工作期间,毛主席的许多指示,如关于未来战争战略方针问题的指示,大军区传达了,空军都听不到;有时传达了,又用自己的话讲,让人分不清哪些是毛主席的指示,哪些是刘亚楼自己的东西,搞得思想十分混乱。因此,空军党委并没有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

‘四个第一’也更谈不上‘落实’。二是党委班子团结好,有个好班子。什么好班子!党委常委内只有刘亚楼的‘一言堂’,根本没有其他成员的应有地位,本身就没有搞好团结。三是要求严格,雷厉风行。其实是打着严格要求、雷厉风行的旗号,通过生硬粗暴的做法,大搞惩办主义,形式主义,使得空军内部长期以来形成了一种相互吹捧,弄虚作假的不正之风。加上刘亚楼本人有些问题也影响极坏。”

“如果放到下面”,聂凤智最后结论说:“任何一级党委,都应属于烂掉了的单位!”

与会者对刘亚楼,特别是对吴法宪的作风问题、生活问题、工作问题、干部问题等等,列举了大量事实,提出了许多意见。吴法宪在会上是一副可怜挨整的模样,只是低着头在本子上默默地作记录。会下,他急得上蹿下跳,到处活动,希望拉拢一些人为他“保驾”。一天,他把空军政治部的王平水、王静敏两位副主任、军校部部长陈熙、直属政治部主任徐又彬、副参谋长何廷一找去,吴法宪对众人说:“他们拉了一帮人,我也要拉一帮人。我不怕他们,我要和他们斗……”在座的谁也没吭声。

一次,副参谋长何廷一去理发,恰巧吴法宪也在理发室,他见了何廷一,十分热情地说:“你的汽车太旧了,我准备给你要一辆红旗车。”

红旗车是大军区正、副职坐的,何廷一是副参谋长,还没有资格坐这种车。吴法宪又对他说,已给林彪汇报,准备直接提他当副司令员。面对吴法宪的公开拉拢,何廷一没有表示积极的响应。

与此同时,下面的部队,如武汉军区空军、广州军区空军、沈阳军区空军等,也纷纷打来电报向空军党委表达他们的意见和看法,当然也是炮轰刘亚楼。

# 第80回：联名信，要撤换空军领导 竞相同，海军开会批肖、苏

6月19日晚，空军党委在研究如何答复下面部队的意见时，大多数人认为精神是好的，是贯彻和执行中央指示，应该表示鼓励。只有空军党委委员，民航总局政委刘锦平说，电报中有许多严重的不健康因素。

聂凤智站起来大声说："不能同意刘锦平的看法！以前刘亚楼主持空军工作，下面不敢对空军党委提意见；谁提意见，谁有一点个人独立的见解，谁就会遭受打击。现在刚刚提了一点意见，就说人家是不健康因素，我认为这是不妥当的，是无法让人信服的！"聂凤智甚至提出，刘亚楼不能"盖棺论定"，而应"盖棺重定"！

晚饭后，成钧、黄立清、傅传作、廖冠贤等几个原红二方面军的干部到贺龙家里，贺龙问及空军党委全会情况，成均说："空军的问题很多，到现在，已经乱糟糟地开不下去了，吴法宪已经不能主持会议了。"

贺龙说："这个会，吴法宪、余立金他们不能开，你们就组织起来继续开嘛。有话就说，有问题就揭嘛。"

"看来，空军这个标兵是有些问题。过去不但你们受了蒙蔽，我们也受了蒙蔽，林副主席也受了蒙蔽。有问题揭开来好。有问题不揭，将来捂出大事来，那损失就大了！"

7月初，南京空军空四军所辖的驻江苏盐城的空31师和盐城基地，突然给空军党委发来一份电报，列举了刘亚楼的许多错误，以及提到刘亚楼就无法避开的空军党委其他一些领导人的错误。电报措辞极为强烈，最后向空军党委提了三条要求或建议："撤消刘亚楼的讣告和悼词，重新评价；将刘亚楼的骨灰搬出八宝山；改组空军党委现有的领导。"

于是，由刘震牵头，成钧、曹里怀、徐深吉、常乾坤、谭家述、王辉球署名，正式向中央军委递交了一封信，罗列了25条意见，基本上概括

了大家在会议上所提出的问题,其中有10条是对着吴法宪的。

正在大连休养的林彪收到了空军刘震等人的信,是刘震打电话到大连,找到“林办”的秘书,将信的内容转告了林彪。

林彪在得知信的内容后,于7月3日晚上与叶剑英通电话说:“空军这个情况不正常。刘亚楼、吴法宪有缺点、有错误,应该批评,但是这种作法不对头。这是有人乘‘文化大革命’之机,搞罢官夺权。”

叶剑英同意林彪的意见,并指出:“通过这样一个会议来撤换领导是极不正常的。”

林彪说:“此风不可长。”

在电话上,叶剑英还向林彪汇报了海军的问题:

5月27日,海军党委三届三次全体会议召开,海军政委苏振华主持。这就是后来海军历史上有名的“三.三会议”。按照预定的议程,会议有三个议题:一是按照中央的要求,学习讨论中央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指示;二是传达65年12月上海中央工作会议和66年3月中央工作小组会议的精神,批判罗瑞卿的错误,肃清其影响;三是传达贯彻毛主席关于战略方针问题的指示和毛泽东的“五七指示”。会议分党委会、党委扩大会、党委全会三个阶段进行。军委派叶剑英办公室副主任莫阳、总政组织部副部长刘德润、总政干部部副部长朱光3人组成军委联络小组,参加了会议。

海军副司令员李作鹏此时正在庐山养病。在3月份京西宾馆召开的批罗会议上,李作鹏曾写了一个书面发言稿,送给会议秘书组,请求印发。过了几天,秘书组负责人通知他说:“你的书面发言稿,经领导小组审查,认为其中埋伏有四根刺,不能印发”。

李作鹏不知道这“四根刺”指的是什么?但他认为,海军党委常委中,王宏坤、李作鹏、张秀川与司令员肖劲光、苏振华之间,在纠正“军事冲击政治”问题上有分歧,可能在他的书面发言中,某些言辞旁敲侧击涉及到了苏振华,所以主持会议的叶剑英不同意印发。

叶剑英在1965年底上海会议上看到过李作鹏、王宏坤、张秀川3人写给林彪的那份揭发罗瑞卿的材料,其中涉及到苏振华。叶剑英曾就苏振华的事专门向李作鹏打过招呼,说“苏振华是好人。”这次京西会议,李作鹏的书面发言又暗指了苏振华,李作鹏猜想,可能是因此不

准印发他的书面发言稿。

后来李作鹏又想改为口头发言,可这样同样会得罪叶剑英。但又考虑:上海会议时他就没有发言,京西批罗会议再不发言,林彪知道后肯定不会满意,可能要责怪他旗帜不鲜明。发言还是不发言?两个老帅对苏振华的看法截然相反,涉及还是不涉及?这个分寸到底怎样把握?他左右为难。

这时,李作鹏的心脏病发作,住进了解放军301总医院。几天后,叶群到医院看他,要他安心养病。李作鹏当时向叶群谈到"四根刺"问题。在医院里,他曾写信想见叶剑英一次,请求批评指示,结果叶剑英没有答应,只批准他离开北京到外地休养,"愿到南方就到南方,愿到北方就到北方",由李作鹏自己选择。

于是,5月中旬,李作鹏决定去庐山休养。5月下旬,他与夫人到达武汉,并于6月初上了庐山,因此没有参加海军的"三三会议"。但是他的意见都通过信件转达到了会上。

在"三三会议"上,海军第二政委王宏坤和政治部主任张秀川严厉的批评海军司令员肖劲光和政委苏振华不突出政治,肖劲光多次检查均没有通过,原因是上"纲"不够,检查不深刻。

在此期间,有人反映,张秀川背着多数常委,会外开会,找了若干人谈话,散布肖、苏问题严重,跟罗跟得紧,海军争论问题是路线问题,甚至违反会前党委不扯团结问题的决议,说"团结问题一定要扯,杀头也要扯。"

下边还有人给中央和军委写报告,要求扩大传达范围。为此,肖劲光在领导小组会议上拍了桌子,中途退出会场。

6月15日,海军"三三"会议领导小组开会。会上有人提出全会不要再延长了,因为常委思想不交锋,文件再改也只能作些修修补补,不会产生好文件,不如把党委检查材料作个"引子"、作个"线索"、作个"资料",印发扩大会议。同时做了撤销原来常委会议关于不扯团结问题的决议,认为该决议是压制民主,是错误的。提出在下一步的党委扩大会议上,要广开言路,畅所欲言,不管什么问题,不管对谁的问题,都可以大胆揭发批判,要突破一切框框,打破一切清规戒律,提倡有什么说什么。

6月16日,海军党委三届三次全会结束。

6月17日,海军党委全会转入党委扩大会议,除参加三届三次全会的代表外,增加了军、师一级的领导干部参加会议。扩大会议在传达中央上海会议和中央工作小组会议精神的同时,继续揭发批判罗瑞卿问题。

6月18日,海军党委扩大会议领导小组以海军党委名义给中央军委的报告中,根据海军第二政委王宏坤和政治部主任张秀川的意见,写了这样一段话:"海军内部长期存在着两种建军思想、两条建军路线的斗争,虽然1963年1月党委扩大会议和1965年12月三届二次会议等多次批判斗争,但始终未得解决……问题不解决与罗瑞卿的影响干扰有极大关系……海军问题不能再拖下去了……一定要在这次党委扩大会上,放手发动群众,充分发扬民主,彻底地揭盖子、摆问题……不论是谁,不论错误有多大,是什么性质,都要彻底查清楚,明辨是非……"

会上,有人在揭发批判罗瑞卿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和"军事冲击政治"时,联系海军的工作实际,或不点名的,或指名道姓的提到在过去几年中,海军也执行了罗瑞卿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海军也存在军事冲击政治,搞军事大比武等问题,作为海军的主要领导人是有责任的。也有人提出去年秋,海军党委召开三届二次全会,讨论加强政治思想工作的"三年工作基本总结"时,海军主要领导人之一的苏振华不参加会议,海军党委常委内部对"突出政治"存在思想不统一,工作不团结现象。有人也提出海军党委常委在纠正"军事冲击政治"问题上争论的根源在于罗瑞卿和苏振华。

在扩大会议上,肖劲光作了表态性的发言,提出:"为了节省时间,集中解决主要问题,这次会议重点是检查我们海军党委,特别是肖、苏我们两个一把手的问题,坚持真理,修正错误,通过团结——批评和自我批评——在新的基础上团结起来。"之后,肖劲光、苏振华都在会议上做了书面检讨。

肖劲光和苏振华结合自己几年来的工作,检讨了自己和罗瑞卿"特殊关系"以及执行罗瑞卿"错误路线"的问题。

随着会议的进展,肖劲光与苏振华的处境变得越来越被动。肖劲

光所作的多次检查均没有被通过,说他上“纲”不够高,检查不深刻。

以后批判的热度越来越高,甚至在简报上刊登这样的语录,要他俩“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会议也追究了海军参谋长张学思的问题,批他执行罗瑞卿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还要他交待所谓房产不清的问题,起因是1952年,国家因建政协礼堂,张学思的二母亲卢夫人以张家全体成员的名义,把北京顺承王府卖给政府。她把这笔钱平均分成18份,张家成员每人1份。当时,张学思说通母亲许夫人,把他们母子兄妹所得的5份,共八亿五千余万元旧币全部捐献给国家。1953年,张学思由大连调北京海军机关工作,他的母亲许夫人用自己的私蓄在北京买下一座四合院居住。张学思作为一名海军的高级干部本应享有一套公房,但他看到许多干部住房紧张,便主动提出他不要公房,自己全家和母亲住在一起。到1966年,他在这所私宅已住了十几年,一切费用完全自理,就连修缮费也没有用公家花一分钱,此时在会上追究的就是他这套房产从何而来?张学思气愤地写了一份关于自己房产问题的说明材料,拿到会议上散发……

7月2日,有3个小组提出肖劲光、苏振华是批判重点,要王宏坤出来领导会议。王宏坤提出让因病未出席会议的李作鹏回来领导会议。这个情况登在了简报上。军委联络小组莫阳、刘德润、朱光3人小组立即向叶剑英作了汇报。

第二天,7月3日,叶剑英给肖劲光打电话,提议会议暂停一天,并重新印发毛泽东1963年对海军党委扩大会议的批示,“团结起来,以大局为重,焕发精神,努力工作。”

7月3日晚,叶剑英在电话里与林彪交换了对空军问题的意见后,又将海军的情况向林彪作了汇报。

听了叶剑英的汇报,林彪说:“海军现在领导不能改变,肖、苏两同志的领导不能改变。”“通过这样一个会议,把肖、苏撤了,全军就会乱了,此风不可长。”

并说:“海军每个人”,“要自己洗澡,互相擦背,提高思想,但不能夺权。”

另一方面,他又说:“李作鹏、张秀川同志3年来工作是有成绩的,

工作上是好的”,“如果撤换李、张,实际工作又没有人做”,因此,他在电话中告诉叶剑英:“肖、苏要支持李、张去工作,李、张要维护肖、苏的威信。告诉他们,这是我们两个直接用电话讲的。”

叶剑英听了林彪对海、空军党委全会、扩大会议的意见后,当晚就报告了邓小平,邓小平说他完全同意。随后,叶剑英把海、空军的情况又报告了毛泽东主席。第二天,7月4日,又在刘少奇那里开了一次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专门研究了海、空军党委扩大会议的问题,周恩来、邓小平、陶铸和军委常委贺龙、聂荣臻、陈毅和叶剑英参加。会议由邓小平亲自作记录,集中了中央政治局常委讨论的意见,作了三条指示:

一、党绝对不能允许搞地下活动,刘少奇特别指出,犯错误,路线错误是第二位的错误,搞地下活动是第一位的错误。应该按照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公开讲自己的意见,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

二、肖劲光、苏振华、吴法宪、余立金四同志,已经进行了自我批评,不够的,以后还可以再讲。常委其他同志要利用这个机会好好的挖一下。

三、用党委全会和党委扩大会议这种方式撤换领导的做法是错误的。

7月7日下午15时30分,军委第52次常委会议在三座门召开,贺龙主持,聂荣臻、徐向前、叶剑英、陶铸等人出席,海军9名常委列席了会议。这次会议专门讨论海军领导班子团结问题。会上,叶剑英传达7月3日林彪的指示和7月4日政治局常委会议精神,并作了长篇发言,指出:

“肖劲光、苏振华两位同志,在海军工作十多年,对他们的成绩和缺点如何看?这几年,海军一开会就搞这个问题。……一个人,除非他不做工作,只要做工作,或多或少,或大或小,总会有错误。”

“但是,有人想把肖、苏推到黑帮里去。要是按照这种搞法搞下去,就是要把肖、苏搞成黑帮分子。是黑帮分子就要罢官,而且包括有人公开提出肖、苏是批判重点,应该由王宏坤同志来领导这个会议。这样肖、苏还能当司令员、政治委员吗?肖、苏罢官,王宏坤上台,黄袍加身,这意味着什么呢?”

“这种形势发展下去很危险,危险的不是肖、苏,危险的是引导会议把肖、苏搞成黑帮分子的个别同志。你们利用群众的压力罢了肖、苏的官,这说明了什么呢?今天我不是说王宏坤同志想伸手夺权,我不这样说。刘少奇同志在中央常委会议上指出,伸手夺权是第一位的错误,其他错误是第二位的。我看你们的会议已经到黄河边上了。这不怪群众,因为领导上有人在引导。在这种情况下,让你们休会一天。”

贺龙表态说:“搞地下活动是第一位的错误,有问题摆到桌面上来嘛,不要搞阴谋。”

# 第81回：军委会，解决空、海军问题 烽烟起，毛泽东回到故乡

7月8日，叶剑英根据邓小平的指示，亲自到海军党委扩大会议上讲话，传达了中央政治局常委和林彪的指示以及军委52次常委会议精神，提出：

一、肖劲光等是好同志，有错误可以检讨！

二、军队不能罢官夺权，会议本身作决议撤换领导是错误的；

三、按党的民主集中制办事，不准搞地下活动，强调分清是非，搞好团结，批评了某些人“抢班夺权”的错误。

他在传达中，连林彪说的“告诉他们，这是我们两个直接用电话讲的”都作了说明。

同时指示肖劲光和苏振华要高姿态，注意掌握会议，不要矫枉过正。

在以后的会议中，肖劲光和苏振华都主动检查了自己的错误。对前一阶段会议向异常方向发展承担了没有挺身而出的责任，并指出：“个别同志想把党内斗争搞成敌我矛盾的斗争，这是不对的。我们不能‘以牙还牙’，重复他们过去的错误。要坚持原则，要吸取这个经验教训，对他们采用党内斗争的方法，防止再来偏向。”

但是，海军党委扩大会议由此发生转折，在此后的40多天里，会议也由开始批判罗瑞卿及肃清罗瑞卿在海军的影响，转向一边倒的揭发批判王宏坤和张秀川搞地下活动、罢官夺权的问题。例如，揭发他们找了各舰队的领导个别谈话，打招呼，在张秀川家和其他一些地方开会、串联，用暗语打电话，操纵简报组等等。

会上揭发的所谓“地下活动”，是说当时的南海舰队司令员吴瑞林、南海舰队航空兵政委周志先等几个参加会议代表，带着从海南岛运来的西瓜，到张秀川家看他，边吃西瓜，边议论会议情况，后来被冠以“西瓜会议”。

于是,王宏坤、张秀川做了检查。

王宏坤在检查交代中说:“要不是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挽救,我就要从悬崖上跌下去,掉进黄河里去了。”“我越想越觉得问题严重,越想越觉得对不起党,对不起肖、苏。”

张秀川也检查交代说:“那些不正当的作法,这次会议发展最严重,去年‘三·二’全会有,平时也有,李作鹏等议论过肖、苏,没有议论怎么能写出‘十条’。”这些检查,尽管一再避重就轻,也还是暴露了他始终在窥测方向,顽固地坚持错误的立场,他说:“本来有多少次应该放弃自己认识上的错误……上海会议,肖、苏参加了,求应放弃,中央工作小组会议我参加了,中央打招呼不提肖、苏问题,而后彭真问题一揭,又加深了对问题的看法。当中央指示不扯高级将领问题,自己还不改变。本来中央有指示,‘十条’不向下传达,自己也没有放弃认识。”

“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挽救了我,把我从斜路上扭回来了,否则就要掉进黄河里去了。我对不起肖劲光、苏振华、刘道生同志。”他还表示:“今后永不再犯。”

会议也把矛头指向李作鹏。有人说:“李、王、张地下活动由来已久,早在1962年李、张到海军就开始了。”有人说:“海政是李、王、张地下活动的基地。”有人说:“三届二次全会常委内部争论和对苏振华、刘道生的批评是错误的。”有人说李作鹏是“摇鹅毛扇的”,“搞非法活动”,“在庐山幕后指挥会议”等等。总之,王宏坤、张秀川的后台是李作鹏。

因病未参加会议的李作鹏给海军党委扩大会议写了一封信,信中说:“如果李、王、张在过去几年的工作中有缺点、有错误,主要由我负责。”

此时,在地方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影响下,部队有些单位也跃跃欲试,尤其是机关、院校,个别师、团甚至也出现了大字报。情况反映到总政,7月8日,叶剑英在总政的《部队文化革命动态》上批示:同意军队文化大革命在23所高等技术学校中进行。于是,军队院校的学生闻风而动,堂而皇之的贴出大字报,开始文化大革命。

7月11日上午8时,中央军委第53次常委会议在北京三座门军

委办公厅召开,集中讨论空军问题。军委常委到会的有叶剑英、聂荣臻、贺龙、徐向前、陈毅,中央书记处陶铸参加。根据军委指示,空军党委常委全体成员参加了这个会议。

会议由贺龙主持。他首先说明:“最近中央常委召集军委常委同志开了一次会议,陶铸同志也参加了,专门讨论了海军和空军的问题。先请叶帅进行传达。”

叶剑英说:“今天这个会议,是专为解决空军问题而召开的。空军建军以来,据说已经开过六十多次全会了。中央、军委是很信任你们的,从来没有像这次会议这样来抓。”

他批评空军前一段会议,不像个老干部开会,像个小孩子开会,讲了些错话,作了些错事,弄得军委不能不出来过问。他说:“等到你们陷下去了,再要我们这些老年人来抬你们,就抬不动了。因此,这个会是非开不可的。”

叶剑英引用三国人物的典故,批评空军常委中有人搞小动作,企图撤换空军领导的问题时说:“真是‘天下英雄谁敌手,可惜今日无曹刘。’”

“可惜今日无曹刘”中的曹刘,既指三国时的曹操、刘备,也暗讽空军中的曹里怀、刘震。

叶剑英讲完后,贺龙和徐向前也各自批评了自己的老部下。贺龙还特别批评成钧说:“你成钧对吴法宪不支持,站在对立面,想干什么?”

徐向前也批评徐深吉说:“人家空军想要有四方面军的领导干部,才把你从华北调到空军去,你为什么要在空军里搞这些活动?”

聂荣臻说:“你们搞的这些都错了。”

空军常委11人先后表态发言,一致表示拥护中央、军委和叶剑英的意见。多数人主动检讨自己的错误。刘震说:“我们有错误”,成钧也跟着说了一句“我也有错误”。

张廷发在发言中,表示拥护中央的指示,说有人搞“串连活动”,批评徐深吉说:“徐深吉同志说他受到刘亚楼的害最深,其实刘亚楼对你和小姨子的问题,处理得是对的。”

最后,叶剑英说:“这样吧,明天召集空军党委全体会议,我到会讲

话,你们去准备吧。”

第二天,7 月 21 日,叶剑英来到空军党委第十一次全体会议,并在会上讲了 3 个小时的话。他首先传达了中央常委和军委常委的指示,指出了空军党委常委七个人的错误,并告诉大家,这个会议要转过来,不能再这样开了。

大家都表示拥护中央的指示和叶剑英的讲话。

叶剑英在会下个别对吴法宪说:“法宪,你应该先作一个检讨,这样才好将会议转过来。你不可能没有缺点错误,你这样一检讨,就主动了。”

吴法宪经过一个星期的准备,在会上作了一天的检查。林彪也给吴法宪打了电话,要求吴法宪作好空军内部的团结工作,对刘震等人的批评也要适可而止。

会上批评了广空的吴富善、沈空黄立清、福空李世安和南空聂凤智,说吴富善是“摇羽毛扇的”,聂凤智、曹里怀是“跳得最高的”。还说聂凤智有野心,“想当空军司令”,除了“罢官夺权”,还企图挑起军内一、四方面军的历史纠葛,并责令他迅速查清盐城电报。

就在北京及全国闹得热火朝天,烽烟四起的时候,毛泽东却在湖南韶山冲他老家附近的一个山洞里静静地思考着问题。

山洞叫滴水洞,是毛泽东童年时代常去玩耍的地方。山梁上,埋着毛氏宗族的祖坟。1959 年庐山会议之前,毛泽东回到故乡韶山。当时的湖南省委书记周小舟陪着他走到滴水洞的山梁上时,毛泽东说:

“小舟啊,这个地方倒很安静,我退休后,在这儿给我搭个凉棚好吗?”

“那有什么不可以的!”周小舟回去后向省委作了通报,又向中南局书记陶铸汇报了情况,大家一致同意为毛泽东在滴水洞盖幢房子。可是,曾经给毛泽东当过秘书的周小舟怎么也没有想到,在随即而来的庐山“神仙会”上,他遭到政治生涯沉没的厄运。

周小舟调离了湖南省委书记的职务,毛泽东要“搭个茅棚”的想法也就搁置了下来。很久之后,毛泽东巡视湖南,与接替周小舟的湖南省委书记张平化闲聊,又谈到了“茅棚”一事,毛泽东说:“韶山有个松林招待所,可是那个地方不安静。”

张平化奇怪地问:“主席,韶山还有更安静的地方吗?”

毛泽东说:“有个滴水洞,很安静,在那里修房子很好。”

张平化立即带人去滴水洞考察。

滴水洞在崇山峻岭中的一道苍翠的山沟里,位于韶山冲西南约5公里,从龙头山到牛形山、黄蜂山,形成了一道天然屏障,是一个三面环山的幽深狭谷,占地约5平方公里,只有一条公路蜿蜒而至,深幽清雅,三面树木林立,龙头山山脚有一股山泉流出,蜿蜒成溪。溪上曾建有小桥,桥头边有一石洞,洞内滴水,四时不竭,即使是大旱,洞仍滴水不断,回声悠扬,其韵如琴,滴水洞由此得名。这里不仅环境幽静,空气清新,而且便于警戒。

湖南省迅速拨款,组织班子,为毛泽东造“行宫”。当时被称为“203”工程,对外是绝对保密的。1962年底竣工。1964年初,滴水洞别墅开始接待中央领导人。

滴水洞别墅参照毛泽东在中南海居室的建筑式样,朴素,大方,实用。宽敞的房间,俭朴的家具,没有帝王行宫的奢侈派头。毛泽东曾很得意地对汪东兴说:“你看到这几所房子了吗?这是我让他们盖的,等我退休以后就住在这里了。”

1966年6月15日,毛泽东乘专列离开杭州,向西驶去。途经江西时,列车停靠在南昌站,他在车上接见江西省委几个负责人,谈到当时正在开展的文化大革命,毛泽东说:

“这次运动,是一次反修防修的演习。我们的青年人,没有经过革命战争的考验,缺乏政治经验,应该让他们到大风大浪中去经经风雨,见见世面,让他们得到一个锻炼的机会,使他们成为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我想通过运动,练练兵。”

6月16日,毛泽东专列直奔湖南长沙,当天,在九所3号楼住了一个晚上。

6月17日下午15时,湖南的气温高达摄氏35度,在湖南省公安厅副厅长高文礼、省委接待处处长肖根如陪同下,毛泽东一行离开长沙,直奔毛泽东的故乡——韶山滴水洞而来。4辆汽车紧紧连成一线,奔驰在长沙至韶山的公路上。高文礼和接待处长肖根如坐进前卫车,毛泽东坐在一辆灰色吉姆车上,另一辆白色吉姆和一辆吉普车上,坐

着中央警卫团团长张耀祠、湖南省公安厅厅长李强和新华社记者钱嗣杰等。他们把毛泽东的吉姆车夹在其中。

在滴水洞的万绿丛中,有一座青灰色的四屋脊平房,那就是被称作1号楼的房舍,是毛泽东的下榻处。汽车进了滴水洞,在1号楼的大门口停下。毛泽东下了车,一股清风吹来,他深深地吸进了一口清香的空气,沿着1号楼边走边看,望望葱绿的群山,他很高兴,对随行人员说:

“这个洞子天生一半,人工一半,怕是花了不少钱哪!既然修了,就要管理好,不要破坏了。”

滴水洞1号楼

毛泽东领着大家在那不太宽敞的水泥坪里绕着圈子,一个劲地仰视两边的高山,双手指指点点的。他用手指着右边的山脉说:

“那里是牛形山,山的形态像只水牛,小时候,我到外婆家去,就是走的这条山沟;东北边那个高山上有个大石鼓,过去常有老虎到石头上乘凉,所以叫虎歇坪。我的祖父母就葬在那块地方。”

毛泽东用一口地地道道的韶山话作介绍,把大石头说成“大晒鼓”,水牛说成“许牛”,当地的服务员只好向随行人员作翻译。接着,

他又以主人的姿态给大家摆起了龙门阵：

“这是个好地方，我小时候在这里放过牛、砍过柴、割过草，还和小伙伴们打过架。我们《毛氏族谱》里说：‘一沟流水一拳山，虎踞龙盘在此间；灵秀聚锤人莫识，石桥如锁几重关。’指的就是这里。喏，从这里上去是龙头山，龙头山过去是黄田坳，以前以黄田坳为界，山那边是湘乡，山这边是韶山，所以黄田坳又叫湘潭坳……”

毛泽东走进了1号楼。时值盛夏，气温较高，滴水洞别墅没有冷气设备，为此肖根如亲自跑到长沙，用卡车拉来几个大木桶和几块冰（每块重200斤），分放在木桶里，用电扇把冰块吹化变成冷气，使室内温度降低。毛泽东看了高兴得很，说“这种土冷气不错”！他喝着滴水洞龙口的泉水，品味着韶峰茗茶，觉得既甜又香。

喝完茶，毛泽东走进为他安排好的卧室。卧室里有一张木板床，长2.1米、宽1.5米。毛泽东不喜欢“席梦思”之类的软床，一直爱睡木板床，即使在中南海菊香书屋里的床，也是如此。他的床上放满了从北京带来的书和文件。毛泽东叫服务员将原先准备好的床罩、睡衣、毯子、拖鞋等撤掉，换上随身带来的旧床单、旧被褥和一双旧拖鞋……

毛泽东住进1号楼，高文礼、张耀祠、警卫住2号楼，8341部队住3号楼。滴水洞外围高山要道，由湖南负责警卫，内围警卫由8341部队负责。

这是毛泽东继1959年后第二次回故乡。但这次毛泽东住在滴水洞，任何外人都不见，是绝对保密的。外国情报机关想尽各种办法，也一直未能探测出中国的头号人物此时究竟去了什么地方。就连刘少奇等也只知道毛泽东到了湖南，却不知道他住在何处。只有周恩来明白实情。在这段日子里，周恩来每天从北京派专机为毛泽东传送文件到长沙，然后用汽车从长沙将这些文件送到韶山请毛泽东审阅，其中新华社有印着大红字的《内部参考》、各种报刊和红头文件、各种请示报告，也有中央文革小组送来的各种报告，又从毛泽东处带回批阅过的文件。因此，毛泽东在滴水洞小住时，消息仍然是非常灵通的。

中央办公厅副主任、中央警卫团团长张耀祠陪同毛泽东南下，与他形影不离。

毛泽东与韶山人之间,隔着戒备森严的警卫,看不到1959年那种热烈隆重的欢迎场面,看不到他与韶山人频频握手、与乡亲们亲切交谈。尽管他几次越过警戒线,想走进老乡家,却都被随从人员搀扶回来,与1959年那次形成鲜明对照。但保密工作还是出现了一点意外。平时,从韶山冲到滴水洞很少有车经过,那天,蓦然出现一支由3辆轿车、1辆客车组成的车队,引起了一个在山脚下打柴的小女孩的注意。她好奇地朝行驶在中间的轿车瞥了一眼,恰巧毛泽东正拉开窗帘向外张望,小姑娘兴奋得差点喊出声来。她一溜烟跑回家,对父母说:

"我看见毛主席了!毛主席住进滴水洞了。"

消息传开,淳朴的乡亲像过节一样高兴,等待着毛泽东再次来到他们中间。但是,很快就有公安人员找到了小女孩,郑重地告诉她:

"你看错人了,车里坐的不是毛主席,再不准你乱讲了。"

山村又恢复了平静。为了毛泽东在滴水洞期间的绝对安全和保密,有关部门还对工作人员规定了十不准:

不准主动接近主席,以免影响主席的休息与工作;

不准主动和主席握手;

不准主动和主席交谈;

不准直接向主席提出问题;

不准向外打电话与通信;

不准违反安全规定到自己工作以外的地方去;

不准随意出走,外出要经过批准等等。

另外,还把湖南省、地、县部分负责干部会议安排在韶山招待所举行,以分散人们对滴水洞的注意力。

# 第82回：滴水洞，冷眼向洋看世界 望神州，热风吹雨洒江天

住在滴水洞里的毛泽东寡言少语，不经常与工作人员交谈。每天除了看书和批阅文件，就是静思。他有时拿着书躺在床上看，有时又像烦躁不安。就是散步，时间也很短。住在滴水洞的毛泽东工作人员也生怕打扰他的思绪，连运送东西都尽量绕道走。不过有时毛泽东兴致来了也与工作人员打一打乒乓球。一号楼外有一水池，池中养了许多小金鱼，毛泽东见了很有趣，他向服务员说："捞一个上来看看，看谁捞得到？"

一个服务员俯身用手去捞，怎么也捞不到。有个服务员机灵，拿来一个"捞子"一下子就把一条金鱼捞上来了。毛泽东笑着说："捞上来了，不自由了，把它养在盆子里，供大家观赏。"

他每天凌晨4、5点钟睡觉，上午9点钟左右起床，一天仅休息4个多小时，只吃两顿饭，第一餐在下午一两点，第二餐在晚上11时左右。每餐不超过四菜一汤。韶山滴水洞的冬笋、香椿、蕨苗、地菜、马齿苋这类最具乡土味的菜，毛泽东更喜欢。一次，工作人员采到一点马齿苋，在韶河里捉到几条小鲫鱼，又在塘里捞了些小虾，毛泽东吃了很高兴。还有一次，厨师石荫祥特地为毛泽东做了一盘青椒炒鲜菌，端上桌后才发现菌子里藏有白蛆似的小虫，他想马上端走倒掉。不料毛泽东已走进餐厅，一切都来不及了。石荫祥歉意地说：

"主席，这个换掉吧！"

毛泽东却一边夹菜，一边说："为什么，不是蛮香的吗？"

情急之下，石师傅只好以实相告："真对不起您，菌子没洗干净，有小虫子。"

毛泽东笑了笑："没有关系，不干不净，吃了没病。再说，菌子中有小虫子，说明这菌子没有毒，吃了不会死人，不要换。"

石师傅这才松了一口气。

毛泽东偶尔也出来散步,但走得不远,都是从一号楼走到三号楼,然后折返。有次他想上龙头山看看,走到山边,一条小路又陡又窄,长了许多荆棘。工作人员怕他摔倒,连忙阻止。毛泽东有些不耐烦地说:“路是人走出来的嘛!”

有一次,毛泽东无论如何睡不着觉,便走到门口,看见卫兵陈长江在执勤,便问他:“你们哨兵带枪和子弹没有?有坏人,要提高警惕!”陈长江回答:“我带几十个人,能对付一、二百敌人。”毛泽东点点头,表示满意。

一天,他叫来张耀祠说:“耀祠,你去看看青年湖能不能游泳?”

“好,我现在就去。”张耀祠答应说。

张耀祠一个人去了青年湖。那里其实是一个大水库,在两山之间筑起一个大坝,储了很深的水,水面很清。张耀祠在这堤岸上边走边看,迎面走来一个中年农民,扛了一把锄头,他见张耀祠观看水库,以为他是大干部,便叹着气对他说:

“修这水库,把上面大片的土地淹了,这些土地都是很好的土地,如果毛主席知道的话,他是绝不会同意的。”

张耀祠回到滴水洞,对毛主席说:“青年湖可以游泳,水深,水面很清,是个游泳的好地方。”

张耀祠接着说:“我在那里碰见一个农民……”于是他把这个农民所讲的话学说了一遍,讲到“毛主席是绝不会同意的”时,毛泽东“嘿嘿嘿”地笑了。

一向爱好游泳的毛泽东,这次却没有去游。

22 日上午,毛泽东从房里走出大门,看见大门口旁摆着一个轮椅,感到好奇,想坐一坐。毛泽东刚坐上轮椅,高文礼和中央办公厅警卫局处长曲琪玉两人推着就向外走,张耀祠和新华社摄影记者钱嗣杰跟在后面,毛泽东坐在轮椅上,有一种天真的童趣。

马路左侧紧靠大山,上不去。马路右侧是一条 20 米宽的深沟,沟里一条小溪流过,水很小。再往右,仍是大山,大雨滂沱时,山洪直泻而下,汇入这条小溪,轰轰作响,直往韶山奔去。

毛泽东坐在轮椅上,左看看,右瞧瞧,都是青山和大沟、溪水。群山依旧,溪水如常,他没有多少兴味了,说:“哎,我们还是往回走吧!”

于是,4 人推着毛泽东,原路返回滴水洞,最多不过 300 米远。

回来后,在滴水洞口,钱嗣杰给毛泽东和张耀祠、曲琪玉、高文礼合了一个影。

滴水洞内宁静安谧,戒备森严。洞外却是另一番景象。毛泽东旧居、毛泽东旧居陈列馆前人潮涌动,欢声笑语。一天,一号楼外停了辆客车,一行人准备上车,毛泽东问身边服务员:“他们要去什么地方?”

服务员说:“去瞻仰您的旧居和陈列馆,您去不去?”

“你们去吧,我不去。”毛泽东回答道。

参观归来,大家感慨良多,特别对毛泽东一家 6 位烈士的事迹印象很深。毛泽东知道后,对湖南省委代理第一书记王延春说:“韶山的烈士很多,不要只宣传我一家,要宣传韶山党支部。”

在滴水洞,繁杂的批阅公文之余,毛泽东依然改不了他爱读书的习惯。那段日子,他又重读了一遍《西游记》,美猴王孙悟空大胆、敢斗和藐视一切的所作所为是毛泽东自少年时代起就十分赞赏的。他愿意当那个美猴王:拔根豪毛,吹口气,刹那间就能变出成千上万个小猴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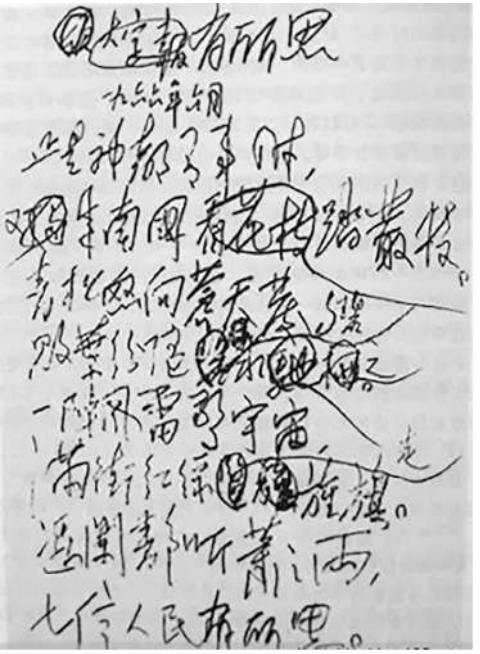
在南方这段时间,他写下了一首《七律——有所思》,根据 2013 年出版的《毛泽东年谱》第 5 卷记载是这样的:

正是神都有事时,又来南国踏芳枝。

青松怒向苍天发,败叶纷随碧水驰。

一阵风雷惊世界,满街红绿走旌旗。

凭阑静听潇潇雨,故国人民有所思。



但是我们从毛泽东的手稿上看，第五句应是“一阵风雷惊宇宙”，最后两句，应是“凭栏静听潇潇雨，七亿人民有所思”。不知《毛泽东年谱》所录是不是毛泽东后来修改的。

此时的神州首都北京正经历一系列重大的事件，从5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处理所谓“彭、罗、陆、杨反党集团”，到6月1日公布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正是神都有事时，又来南国踏芳枝。”而他却回到南方的家乡，似乎在做着“逍遥游”。

“青松怒向苍天发，败叶纷随碧水驰。”可以看出毛泽东对当时揭发出来的或将被揭出来的那些黑帮人物的心情，而“一阵风雷惊世界，满街红绿走旌旗。”则是当时中国国内形势的真实写照。

“凭阑静听潇潇雨，故国人民有所思。”既反映了毛泽东当时的心态，也可以体会到毛泽东对国人、对中国老百姓的殷殷期待之情。

毛泽东在南方6月的潇潇雨中，想得很深很远，他坚信，他领导的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将是人类历史上最彻底的革命，因为他是在

与人类的痼疾,人性的基本弱点——“私”作斗争,说到底,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所代表的就是“私”:在平庸的世俗生活的包围下,一些共产党人对发展生产的兴趣远远超过了对发扬革命精神的兴趣,而在发展生产的背后,则是与资产阶级精神相通的那些因素:追求舒适,追求物质,追求享受。毛泽东就是要和这种“退化”作斗争,他相信,“公字当头”的新社会是可以设计的,人性是可以改造的。当然,他所面临的对手是非常强大的,这个强大不仅是力量上的,更多的是精神上的:他们都是曾经和他一起为了新中国出生入死、立下过汗马功劳的革命家,他们都是各级手握实权的一方领导,他们是否能真正理解毛泽东的用心?他们是否能紧跟毛泽东过好文化革命这一关?这场革命最后能否胜利,这些都还难以肯定,自己被打碎也完全有可能,将来的革命是否也将取得胜利,现在更不知道,然而这一切都不能阻挡他的不容拂逆的意志,那些顾虑暂且放在一边,也许几百年后,人们会认为今天的这一切都是可笑的,但那是以后的事,眼下要考虑的是具体问题,即:这场革命将以何种方式来展开?

在滴水洞的十几天里,毛泽东似乎找到了领导这场革命的具体形式,他决心暂时将党的机器搁置一边,因为这台机器已经官僚化了,是这次革命的对象。他要重组党的宣传媒介,再建立一个领袖与人民直接对话的新渠道。在这个新形式中,将实现领袖与人民的直接交流,而他将以人民的化身来指导革命。他的力量就是一个巨大的集合名词——“人民”。当然,毛泽东十分清楚,人民是不会自发产生正确思想的,惟有人民的化身——毛泽东,才能给人民以正确的思想。

毛泽东住在滴水洞,湖南省委有意把工作会议安排在离滴水洞较近的韶山宾馆召开。湖南省委书记王延春得知毛主席 28 日要走,便请主席跟他们开会的同志照个相,毛主席欣然同意了。

6 月 26 日下午,毛泽东在滴水洞 1 号楼前接见全体参加湖南省委工作会议的同志,并合影留念。接见结束时,他对大家说:“以前我带你们长征,现在,我又要带你们‘长征’了。”

这时,省委接待处的工作人员也向张耀祠提出:“我们大家都想和毛主席照个相。”

张耀祠向毛泽东转达了省委接待处工作人员的这一要求,毛泽东

说:“好嘛。”

6月28日,毛泽东离开了韶山。原定是28日下午走的,那天清早,他突然通知张耀祠上午8时离开滴水洞。

按照张耀祠的安排,毛泽东先和省委接待处的工作人员照了相。照完相,毛泽东对大家说:“你们走吧!”说着他又转过身来往回走,步子迈得很大,很缓,边走边用韶山乡音低低地念叨:“我还不想走呐,我还要再住一夜呐!”

他回到1号楼内的办公室,坐下来,点上烟,凝神沉思……服务员见毛泽东又折了回来,便急忙端上茶。他呷了几口,把烟灭掉,慢慢地从1号楼走出来,和随从人员、省地负责人、工作人员握手告别。

警卫员打开了毛泽东的车门,他似乎还不想离去,走到车边,他又走了回去,对其他人说:“你们走,我还要坐一下!”

张耀祠、李强、高文礼等急得满头大汗,因为保密电话已经拆掉,毛泽东的行装也收拾好了。毛泽东在客厅的长沙发上一屁股坐下,东看看,西瞧瞧,一句话也没说。服务员立即给毛泽东递上一杯茶,毛泽东一口一口地品尝着家乡的韶峰云雾茶。服务员又洗了几个水蜜桃,毛泽东说:“我不想吃。”

服务员说:“主席,您老人家不吃!? 这是从您房子东头桃树上摘的,下次就难得吃到啊!”

毛泽东听后欣然吃了好几个,还吩咐服务员摘了两脸盆带去长沙。

这时候,工作人员又走到毛泽东身边,小声说道:“主席,一切都准备好了,走吧!”

毛泽东不耐烦地说:“还是要走,真是身不由己!”

他怀着依依不舍的心情,慢悠悠地站起身,一步一步地走出1号楼,步伐显得很沉重。

9时许,汽车马达响了,毛泽东离开滴水洞。汽车拐过一道弯,他朝祖籍地——东茅塘深情地望了一眼。汽车开到韶山毛泽东纪念馆门前,毛泽东叫司机赵师傅停了一会儿,他掀起窗帘,贪恋地看着小时候十分熟悉的毛氏宗祠。过了这段路,毛泽东就再也没有左顾右盼。

汽车开到长沙大托铺铁路支线后,上了专列,毛泽东自言自语地

说:“又要到白云黄鹤的地方了。”

6月28日,毛泽东在张耀祠等人陪同下,经长沙到达武汉。当晚,住在东湖宾馆梅岭1号楼。

这天,王任重在武汉起草《目前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和我们的建议》报告,强调了工作组的作用和在知识分子、群众中抓右派的重要性,试图作为指导运动的文件。

6月30日,毛泽东为他在1962年1月30日7000人大会上的讲话是否发表一事,给刘少奇、邓小平写信说:

少奇、小平同志:

来电早已收到。经过考虑,那篇讲演现在发表,不合时宜。在这次文化大革命过去之后,一定有许多新的经验可以对这篇讲演加以修改,那时再议是否发表不迟。王任重同志也不赞成现在发表。另外,请告伯达、康生、陶铸同志,将指导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十二条草案,扩成为廿条左右。因为十二条草案中有许多条混淆不清,有若干条,每条可分为两三条,使每一条只说一件事,明白晓畅,读者易懂,较为适宜。希望在一星期内,在北京讨论几次,并草成第二稿,给我送来两份为盼。另外,华东局廿一日给中央报告华东文化大革命的政策和部署那些方面,值得参考。

毛泽东

六月卅日二时

毛泽东信中说的“那篇讲演”就是他在7000人大会上的讲话。

信中说的中共中央指导文化大革命的文件草案十二条,后来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题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曾一度扩展为二十三条,最后确定为十六条。

毛泽东抵达武汉的第三天,6月30日,武汉大学校长李达被湖北的报刊、电台公开点名揭发和批判。当日《湖北日报》头版下半版,在通栏标题《打垮武大“三家村”黑帮把教育革命进行到底》之下,发表“编者按”说:“今天本报发表两个材料,一个是《李达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言行》,一个是《揭发武大的‘三家村’黑帮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罪行》。

各地出现反工作组的情况反映到毛泽东那里,6月下旬,江青从上

海给北京打来电话,传达毛泽东的意见:文革小组要积极活动,要直接去看大字报,支持群众起来革命。于是,文革小组全部人马浩浩荡荡集体去看大字报。

7月1日,王任重在向毛泽东呈报的《关于李达问题的调查综合材料》上写下一段请示的话:“请主席阅。李达是个地主分子,又反党反社会主义,立即清洗出党,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可否?请批示。”

但不知出于什么考虑,他又把写好了的这段“请批示”用红铅笔划去了。此后的几天,尽管他每天都能见到毛泽东,却始终没有向毛泽东递报这份材料。

7月3日,王任重给湖北省委常委写信,认为大中学校运动处于三种情况:“1、像武大,左派队伍初步形成,右派面目已被群众识破,开始向右派大批判。这种单位中学也有,但不多。2、水利电力学院,正处于大暴露阶段,左右派正在争夺领导权,中间派在摇摆,左派领导尚未形成,右派还没有孤立。目前这种单位占多数。3、前几天的农学院,少数右派挂帅,转移斗争目标,企图把运动搞乱。有的中学也有这种情况,但不多了,也不难解决”。

从王任重原来在武汉掌握情况和后来省委汇报看,他认为“多数学校像水利电力学院类型,左右派正在争夺领导权。目前着重研究解决这一类型单位,暴露牛鬼蛇神,彻底斗倒斗臭右派分子”;“首先打击最猖狂最凶恶的敌人……有的是干部、教师或大学生中的反革命分子。擒贼先擒王,枪打出头鸟。抓住根挖下去,把上上下下的根子都挖出来。水院可把最坏的右派学生揪出来,集中地斗,打掉他们的气焰”。这一基本估计和方法,决定性地指导了全省的运动。

在此影响下,武汉大学工作组的负责人提出:“文化大革命是五七年反右的最高阶段”。在这个思路指导下,工作组将武汉大学总数为1242人的全校干部和教师中,232人被打成“黑帮”、“黑线;,党支部副书记和教研室副主任以上的干部被打成“黑帮”的108人;有4个单位总支的一般干部被100%打成黑帮或靠边站。工作组抛出武大“三家村”以后,又在各系各单位大揪小“三家村”,有的单位硬性抓出三个来凑成一个“村”,全校有大小“三家村”十多家,总务处一个单位就有四个“三家村”,修缮组、机械厂的工人也成了所谓“三家村”的大老板。

王任重6月28日的报告《建议》和7月3日的信文《意见》,都被当时在北京主持工作的刘少奇、邓小平和陶铸转批到全国各省市,作为开展文革的指导性文件。当时毛泽东正在武汉,他们以为毛泽东对这两份报告是首肯的。

7月2日,毛泽东看了刘少奇、邓小平6月30日报送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工业交通企业和基本建设单位如何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通知(草稿)》。刘少奇、邓小平在送审报告中说:"目前文化教育方面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正在展开,如果工矿企业、基本建设单位一齐动起来,领导上顾不过来,容易出差错。在京同志讨论后认为,在运动的部署方面,重点放在文教部门、党政机关,对于工交、基建、商业、医院等基层单位,仍按原定的'四清'部署和'二十三'结合文化大革命进行。这是一个重要决定,请主席考虑决定。拟了一个通知稿,请审核。"毛泽东批示:"同意你们的意见,应当迅速将此通知发下去。"当天,中共中央发出这个通知。

# 第83回：抓右派，王任重屡出经验 反鲁迅，任白戈《红旗》点名

7月上中旬，武汉各高校先后展开了类似北京“反干扰”的，以打击学生、教师群众为主的“反右斗争”。

华中工学院抓“孝子贤孙”，扫“歪风邪气”37天，383人被划为“右派”。

武汉水院由省委批准批斗4名学生，其中以“杀人未遂”罪名逮捕一个团支部书记，全院点名批判百余人，两名教师自杀；一学生对院党委和运动有怀疑，不听工作组劝阻，先去省委找运动领导小组，既而自己买票上北京找王任重反映情况，也打成“反革命”。

武汉医学院，被斗学生62人。

华中师范学院被斗300多人，仅外语系就达64人，某小班批斗12人，发生被逼写血书和试图自杀的严重事件。

武汉邮电学院被斗23人。

武汉水运工程学院共1400学生，就批斗200多人，“反右”长达23天。

在武汉医学院，批斗学生62人，已确定性质的29人，一位讨过饭的贫农儿子被逼写血书。

在建筑工程学校，全校500多人逮捕18人，批斗30多人。

省委重点抓的（一类院校）武汉大学、湖北大学，和水运学院、钢铁学院、一冶一中，有一系列“反革命”事件，如“6.10”（化学系）、“6.11”（外文系）、“6.18”（哲学系）、“6.20”事件，涉及一大批师生。

这些活动，多是在工作组和原党委的组织下进行的，由学校各级组织和工作组拟定出左、中、右名单，通过组建“工作组保卫组”、“动态反映组”或原来的单位保卫科、“治保组”和内定的左派影子结构，监视、跟踪师生群众，收集、整理材料，冷落和边缘化部分群众，疏远打击一些因认识不同的学生干部，剥夺这些学生参加横渡长江和声援越南

游行的权利,以至公开批判斗争群众。

武汉全市以镇压“破坏文化大革命”的名义,批准逮捕学生和工人群众400多人,其中中学生159人。这些做法引起群众的恐怖和不满。本来群情高昂的政治运动,弄得十分恐怖。原来并肩一致参加文革运动的普通学生,从此被人为地划分为所谓“革命”与“反革命”的两大派,出现群众斗群众、学生斗学生的混乱局面。

在这种形势下,学校中普遍出现了对于形势的争论,各级领导和积极拥护共产党的大多数群众,根据湖北省委和王任重的指示精神,认为1966年是“57年加58年的形势”,就是要与“右派”进行斗争;但是,情绪逆反的少数学生坚持认为:文革是1966年的形势,是“23条”说的主要斗争走资本主义当权派的形势。二者针锋相对。

当时,毛泽东正住在武汉东湖客舍,但他好像对武汉高校发生的这些事情全然不知。

7月5日,湖北省以武汉钢铁公司工人庞玉来动手打伤贴他大字报的人的罪名,判处他死刑。

武钢综合经营厂有个“四清”运动的积极分子黄连生,响应厂党委的号召,将自己在“四清”运动中了解到的本车间工人、33岁的二级钳工庞玉来曾被资本家收养过的事情写成大字报,贴了出来。庞玉来很生气,扬言:“谁写我的大字报,我就和他拼了!”6月20日下午上班后,庞玉来来到那张大字报前,要撕掉那份大字报。黄连生等人闻讯赶来制止。两人发生争吵。庞玉来手指着黄连生喝道:

“你他妈的写的什么东西?你给我念出来听听!”

黄连生等人纷纷制止说:“这是革命大字报,你要敢撕就是反革命!”

庞玉来气得大叫:“你他妈的,写老子一千张一万张老子都不怕,老子要和你们拼了!”说着,就去搬地上二十多斤重的大铁块,一下没拿起来,便又捡起旁边的石头,疯狂地向黄连生扔去,黄连生慌忙躲开。

随黄连生前来制止庞玉来撕大字报的另一位积极分子蔡先梅见状,赶紧上前拦住庞玉来,庞玉来又拾起另一块石头向蔡先梅的头部猛击,蔡先梅当即被打昏在地,鲜血直流,当即送医院抢救,庞玉来当

场被大家制服。

这本来是一起民事纠纷,但在当时的政治氛围下,湖北省委却将此认定为是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现行反革命案件,应该“要血债血还”。按照王任重“枪打出头鸟”的精神,做出枪毙庞玉来决定,经报最高人民法院核准,于1966年7月5日,在武钢、一冶召开万人宣判大会,将庞玉来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7月5日这一天,本来是烈日高照、晴空万里的天气,当大会宣布判处庞玉来死刑时,突然狂风大作、惊雷滚滚、暴雨倾盆。

6、7月,武汉大学工作组在批判李达“三家村”的革命旗号下,在知识分子和干部中进行横扫“牛鬼蛇神”的运动。武汉大学群众要求五十年代的二刘书记,刘仰峤、刘真,回学校参加革命。刘真得到省委通知,从汉阳杜家台的四清第一线回到武汉,王任重正在东湖宾馆,见面就对他讲“你们是左派!”遂派往武汉大学,加强工作队。不久,刘真发现武汉大学执掌运动者并不真正欢迎他回来,在学校无事可做。7月上旬,代理第一书记、省长张体学让他立即去水利学院抓“三家村”,反击群众中的右派分子。7月10日,新组成的工作队在刘真的率领下进入水院。

7月1日,《红旗》杂志发表了中央文革成员穆欣署名文章《国防文学是王明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口号》。点名批判中宣部负责人周扬和他的“一些追随者”曾在30年代“围剿鲁迅”。在说到“周扬的另一个追随者竟然攻击鲁迅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是‘罪恶’”时,穆欣在注释中写明,这个“周扬的追随者”是任白戈。

任白戈,四川南充人,1925年参加共青团,1926年转为中共党员。曾任“左联”执行委员、秘书长。1935年夏因国内政治形势恶劣而避居日本,团结在东京的中国左翼文化人,建立了左翼文化总同盟。1937年回国,“七七事变”后到延安。先后担任过抗大总校政治主任教员、抗大附属陆军中学校长、晋冀鲁豫军区政治部宣传部长、十八兵团政治部宣传部长等。建国后先后任重庆军事接管委员会委员兼文教接管委员会主任、西南军政委员会文教部副部长、中共重庆市委宣传部长、西南文联和重庆市文联主席等,文革爆发时,他正担任着中共中央西南局书记处书记、中共重庆市委第一书记兼重庆市市长,是重

庆这个当时西南最大工业城市的“首席执行官”。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反复播放了穆欣的文章,重庆立即引起震动,许多干部纷纷打电话询问市委:被中央点名的任白戈是不是重庆市委第一书记任白戈?

重庆市委不了解上面的意图,《重庆日报》没有转载这篇文章。市委也无法回答下面的询问,只能请示四川省委。

7月4日,重庆市副市长、重庆大学工作组组长余跃泽召开全校团干部及左派学生的秘密大会。会上,他再次重申必须集中火力对准校系两级干部,同时大义凛然地宣布:“重庆市委是高举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坚强堡垒,书记任白戈是坚强的马列主义者,是经过考验的好班长!任何怀疑都是错误的!反动的!”演讲说到激昂处,他拍案而起,险些把茶杯震翻在地。

7月6日,《人民日报》转载了《红旗》杂志的这篇文章。

7月7日,《光明日报》刊登了穆欣的这篇文章。

很快,批判任白戈的文章、大字报或揭发批判材料纷纷寄往重庆市委及有关部门。重庆大学电机系6个二年级学生于7月9日写了批判任白戈1959年1月7日发表在《重庆日报》上的文章《创造出更新更美的作品》,寄给《重庆日报》。

穆欣的这篇文章,中共中央西南局和四川省委事先都不知道。西南局第一书记李井泉马上与四川省省长李大章、四川省委第一书记廖志高商量如何处理的此事。他们打电话询问中央文革小组陈伯达,陈伯达答复是罢官。请示中央办公厅,中央办公厅答复:等下午中央书记处开会后再答复。

任白戈是继彭真之后第二个被批判的大城市市委第一书记兼市长。不同的是,任白戈是在尚未被撤销职务并且其所在地区党组织及上级领导毫不知情的情况下突然遭到“代表毛主席、党中央声音”的中央权威刊物公开点名的,而这时彭真虽已遭到批判但尚未在报刊上公开点名,同一期《红旗》杂志发表的社论《彻底批判前北京市委一些主要负责人的修正主义路线》也没有点彭真的名。

李井泉决定,廖志高立即赶到重庆,了解那里的情况,同时等中央书记处会议答复后再宣布处理。

晚上,陶铸给李井泉回电话说:“邓小平的意见,任白戈过去是周扬的追随者,这十几年在重庆市工作还不错,要不要罢官还要看一看,你们写个报告来,中央再正式批一下。”

李井泉当晚即将陶铸的电话转告了廖志高,并安排人按照陶铸电话精神写了报告上报中央。

7月8日,已经赶到重庆的廖志高,在潘家坪高干招待所召开市委会议,传达由陶铸通报的、邓小平主持召开的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后的意见:任白戈的错误是30年代的问题,60年代的工作还是好的。并要求把这个意见用座谈会的方式传达到17级以上的干部中去。随即,任白戈以“请假检查”名义离开工作。

被安排“请假检查”的任白戈,和省、市委领导从市委办公厅、宣传部和报社抽调了几位干部和“笔杆子”,一起住进重庆潘家坪高干招待所,帮助他查阅资料,上纲上线“提高认识”,以便写出像样的检查“过关”。但用了近一个月时间,他的认识仍然未能“提高”,他始终认为,自己当年在日本得知国内文艺界发生“两个口号”之争后,写文章宣传“国防文学”,是因为那是党提出的口号,他那时年轻,在日本看不到毛主席的书,不知道党内有毛主席这条路线。那时周扬是代表党的,是领导人,而鲁迅是党外的,听周扬的,在组织上没有错。他还坚决否认自己有“攻击鲁迅”的错误,认为自己对鲁迅从来就很尊重、崇敬,鲁迅逝世时,自己在东京组织了追悼会,还写了诗进行悼念……他的认识无法“提高”,最后只好由“笔杆子”们按照当时报纸批判的调子帮他拼凑了一个检查上报中央。

余跃泽听了廖志高传达中央书记处会议精神后,认为应当给重庆大学的师生适当透露廖志高内部讲话的精神。他的想法得到了工作组其他领导的认同。

7月9日,工作组召开全校大会,余跃泽讲话。他讲得兴高采烈,讲到对任白戈评价那一段时,他说:“任白戈是坚强的马列主义者。任白戈是中央决定的,是省委任命的,是党代会和人代会选举出来的,是值得信赖的。任白戈在重庆当了十多年的领导,各方面都做出了巨大成绩,不是想抹煞就可以抹煞掉的。任白戈参加革命几十年,一心一意为革命,是坚强的革命派。谁要想打倒任白戈,那是痴心妄想!”等

等。态度明确,语气激愤。

当天中午,余跃泽召集各个系的工作组长开会,布置观察师生听了报告后的反映。当天晚上收集反映时,发现不少的学生跑到图书馆去了。工作组中有的人,觉得这是一个好兆头。因为学生到图书馆读书,正是工作组要求把运动引入学术讨论的大方向。

但是,为什么学生们一下子喜欢起读书来了?有人还是纳闷。散会后,余跃泽布置各个系工作小组派员到图书馆去观察,看看他们查阅些啥子资料。去的人返回来汇报:学生们不是在查阅图书,全都在查阅报纸、杂志。他们分别借出解放以来,中央、四川、重庆的各种大报和小报,包括各行各业各个部门内部办的报纸、杂志。按照年级、按照班组摊派任务,逐年逐月逐日翻阅、摘抄。图书馆内外,阅览室里,院坝里,路灯下都是查阅报纸的学生。有很多学生把报纸拿回教室、宿舍去查阅,态度非常认真。

工作组认为,学生的行动是有组织有计划的,值得进一步观察。

第二天,7 月 10 日,重庆大学校园里就出现了大量揭批任白戈的大字报。学生从各个报刊上,摘抄出刊载任白戈的文章、讲话、报道,按照当时的习惯做法,有目的地挑出一些字句来,上纲上线,以此来反驳余跃泽对任白戈的肯定。

第三天,学生们将校园贴过的大字报重抄出来,浩浩荡荡地送到市委去张贴,市委大院铺天盖地成了大字报的海洋。有些大字报学生还派人送到成都,贴到了省委机关和西南局机关内,质问省委和西南局:为什么工作组要给任白戈打包票?指责工作组为任白戈辩护是对抗中央的行为。要求省委、西南局表态:“任白戈是不是坚强的马列主义者?”

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对准了任白戈,指向市委、省委和西南局。责任追到余跃泽头上。

重庆市委大院搭了若干席棚,让学生贴大字报。学生为了“保护”这些大字报,占据了市委办公厅大楼的一些房间,在那里安营扎寨。一时间,来张贴大字报的,来看大字报,人群川流不息,市委机关不得安宁。市委领导进出大院时,人们拦车,要求答复“任白戈是不是坚强的马列主义者?”在省委,在西南局机关,也有这种情况发生。

省委、西南局要求迅速查明这股风是怎样刮起来的。市委分别找余跃泽、钟池、崔成礼谈话,找学校干部谈话,在学生中了解情况,这才知道,事情是余跃泽的讲话引起的。

出于政治形势的需要,市委要求余跃泽做出书面检讨。中共中央西南局驻在重庆的代表刘文珍、燕汉民,就地催促余跃泽检讨。面对这样的形势,余跃泽不得不作检讨。但是他认为自己的出发点是好的,讲话的内容并没有错误,只是时间和场合的问题。

# 第84回：华北会，乌兰夫真难过关 打游击，云成烈欲上青山

社会上，文化大革命搞得是热火朝天，前门饭店内，华北局会议开的是紧张非凡。6月1日，李雪峰专门到前门饭店向内蒙古小组全体会传达了政治局扩大会议的精神，接着华北局常务书记解学恭在会上指出内蒙古自治区问题的要害是：在四清中，不是“自始至终狠抓阶级斗争、两条路线斗争，狠抓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而是“宣传民族问题是阶级斗争的本质”，“反大汉族主义，不反修正主义”。各小组随即按解学恭的调子“揭盖子”。但是，人们所揭的多是以生产冲击四清等表面现象，甚至还有些人“捂盖子”。

为了统一认识，揭开盖子，华北局印发了内蒙古自治区党委的几个文件和内蒙古《农村工作队报》最近发表一些值得注意的言论，印发了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党组在《内蒙古历史研究参考资料》上译登的日本、苏联、蒙古的一些文章，尤其是抓住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在“四清”期间重印《三五宣言》一事。

《三五宣言》是1935年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以毛泽东名义于1935年12月20日发出的《对内蒙古人民宣言》，简称《三五宣言》。

该宣言主要是揭露当时日本侵华的“满蒙政策”，揭露国民党政府在内蒙古地区设省置县，是为了抢占蒙古民族的土地牧场，以消灭蒙古民族……宣言阐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和工农红军“要为解放其他的弱小民族而斗争，首先就是要帮助解决内蒙古民族的问题”，提出内蒙古应该实行民族自决。

时过境迁，到了六十年代，乌兰夫又重印《三五宣言》，并在内蒙反对大汉族主义，这显然为中央政府不能接受。

前门会议上重新印发了《三五宣言》是作为批判材料，将乌兰夫“反对大汉族主义”等错误上纲到“民族分裂”、“反党叛国”的高度。

学习了这些材料，各组反映强烈，会议开始进入“挖根子”阶段，那

些曾受到过排挤的东蒙干部和汉族干部,如:区党委书记处书记王再天、权星垣,党委常委雷代夫及宝音巴图、高万宝扎布、刘键等许多人开始揭发批判乌兰夫错误,指出区党委1966年上半年工作要点是修正主义的;批转呼市民族问题的报告是修正主义的纲领;印发“一九三五年宣言”是搞民族分裂活动;《农村工作队报》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工具。

此时的乌兰夫一方面为自己辩解,一方面向批判者提供证据,证明要求印发《三五宣言》的是另有人在,不是他。同时给李雪峰、解学恭写信,承认《内蒙古日报》不提阶级斗争犯了错误。

即使是在这种形势下,替乌兰夫说话、坚持反大汉族主义是正确的依然大有人在,如:呼和浩特市委书记李贵、土左旗旗委书记云瑞及陈炳宇等人。李贵的观点最有代表性,他认为:“就呼市的情况,大汉族主义是客观存在,而且是主要的,甚至小孩子也有大汉族主义。”“呼市郊区生产上不来,主要原因是存在大汉族主义,民族矛盾尖锐而得不到解决。”

6月7日,在华北局前门饭店会议上,除在北京饭店的北京市委外,在前门饭店的其他各省都热闹非凡。内蒙古批判乌兰夫,河北省批判林铁,山西省委批袁振,天津批胡昭衡,异常激烈。

这天,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在北京前门饭店召开常委会,中央、华北局工作组李雪峰、解学恭、华北局财贸办公室主任李树德出席会议。李雪峰将《5?16通知》和林彪反政变的讲话与内蒙古的现实联系起来,代表中央向与会者指出:“内蒙古党委的错误相当严重,强调反大汉族主义,不强调反修、反民族分裂主义;强调民族问题,不强调阶级斗争为纲;强调学习《三五宣言》,不强调学习毛主席在‘成都会议’上对乌兰夫的批评。闹民族分裂主义就是闹独立王国,就是反共。政治上有错误,组织上必然有错误。我怀疑内蒙党委有一帮修正主义分子在那里操纵。有一些组织变了。在会议上要放手发动群众,把问题揭透。”

会上,自治区党委书记处做出决定:“停止浩帆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副秘书长的职务。”

中共中央华北局办公厅于凌晨3时电报通知内蒙古自治区党委

办公厅:“谁要销毁档案,一律开除党籍。”

第二天,6 月 8 日,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决定:取消代理常委,对代常委讨论决定的问题重新审查。

6 月 10 日,区党委常委会采取进一步措施:“一、停止浩帆一切工作,实行隔离反省;二、要浩帆交出所有文件、工作笔记、资料等。片纸只字不准损失;三、立即拆掉浩帆家里的电话;四、收缴浩帆的所有大小枪枝。”

随着压力的加大,前门会议上的调门提高,乌兰夫的人马分化瓦解。有人公开反水,有人暗地倒戈。自治区党委代常委委员兼宣传部部长郭以青,揭发乌兰夫包庇他的地主老丈人、打击贫下中农的罪行;内蒙古自治区党委秘书长周明,揭发乌兰夫耍权术、搞阴谋、推行宗派主义组织路线等问题;中共赤峰市委书记方炎军揭发乌兰夫包庇他的反革命岳姑夫;乌兰察布盟盟委书记赵军揭发乌兰夫采取两面手法印发“三五宣言”的阴谋;包头的杨鸿文揭发呼市规定以反不反“大汉族主义”为依据的干部排队标准。浩帆则交待了从5 月 20 日到6 月 7 日这 17 天中,乌兰夫、云丽文、陈炳宇 3 人给他来过 20 次电话。其中乌兰夫 14 次,云丽文 5 次,陈炳宇 1 次。

在批判乌兰夫的“民族分裂”问题时,他的“宗派主义” 和在牧区实行的“三不两利”政策等也受到猛烈攻击。同时,有人提出:对内蒙古人民革命党,乌兰夫当年为何不按反动党团处理? 这是文革中第一次将内蒙古“内人党”的问题提了出来。

“男儿有泪不轻弹,只缘未到伤心处。”乌兰夫满腹怨愤无处倾诉,与偷偷来看他的老友王铎、区党委书记处书记、人委副主席刘景平抱头大哭。此情此景恰巧被内蒙古自治区书记处书记权星垣看到,即刻汇报上去,乌兰夫等人又多了一条罪状。

6 月 14 日,乌兰夫忍气吞声地做了第一次检查,给自己扣了两顶帽子,第一,有民族偏见。第二,有自卑感。

这种检查与会议的要求显然差之千里万里,因此,它理所当然地激起了人们的更大愤怒。大家继续揭发指出:“乌兰夫把大汉族主义当成敌我矛盾,提出控诉大汉族主义,还把大汉族主义所谓揭深、搞臭、用心甚毒。与邻省划界寸土不让,用‘1935 宣言’争地盘。”

乌兰夫在北京挨批被整的消息不胫而走,不几天就传遍了呼和浩特。这时,内蒙古军区正在呼市召集会议,军区各师和军分区的首长都到了。

那时,全国设有13个大军区,内蒙古军区也属于大军区之列。

昭乌达军分区副参谋长云成烈在呼和浩特开会期间,听说了乌兰夫在北京挨整的消息,不禁怒从心头起!云成烈也是土默特左旗人,是乌兰夫的远房侄子。他在呼市遇到几个土默特籍的蒙族干部,一同悄悄商议。他们猜测是华北局的李雪峰和内蒙古党委的高锦明等人联起手来整治乌兰夫。

李雪峰在三十年代担任过北平地下党的市委书记,抗日战争时期又做过中共中央太行分局书记和太行军区政委,算得上是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处书记高锦明的老上级。两年前,即1964年的夏天,李雪峰到内蒙古检查工作,在呼和浩特市做了三个半天的报告,狠批了内蒙古领导,说内蒙古不抓阶级斗争等等。

“李雪峰不是好东西,两年前,他从北京跑到呼市,开了3天会,大批乌兰夫的地方民族主义,不许他反对大汉族主义。说他破坏了‘四清’。但是乌兰夫并没有被他整下去。如今这‘枪崩货’又联合‘灰烂哥抛’(土默川老乡骂人的话)高锦明整治乌兰夫。不行,我们蒙古人得说话,土左旗得说话!”

经过一番秘密商议,自治区公安厅副厅长云世英等土左旗的同乡们决定:委托云成烈在回昭乌达军分区途经北京时找一下乌兰夫。

从呼和浩特到昭乌达盟军分区,每次往返都要从北京转车。而且,云成烈的妻子原就是北京人,所以他对北京十分熟悉。6月16日,云成烈到了北京,他找到另一位女同乡,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周仁山的老婆,请她设法转告在前门饭店的乌兰夫:“土默特旗人要顶住,让乌兰夫也要顶住。”“革命是有反复的,上大青山打游击也要革命!”

周仁山妻子闻听此言,如同晴天霹雳:这可是要谋反哪!她一刻也不敢耽搁,马上就去找人。但是,她并不是把云成烈的话捎给乌兰夫,而是直接去找了华北局副秘书长刘谦汇报。刘谦立即报告李雪峰,李雪峰上报中央!

前门饭店会议上,空气骤然紧张。

大青山是内蒙古自治区西部、呼和浩特北面的一座巨大山岭，紧靠京包铁路的呼包线北段，东西长四五百里，南北有四十至六十里，峰峦起伏，山势险峻。每至春夏之际，山区遍长青草，一派葱绿，大青山便因此而得名。抗日战争初期，1938 年，中共中央曾派遣 120 师 358 旅政委李井泉和参谋长姚喆，率队来大青山开辟抗日根据地。大青山地区地形复杂，交通不便，蒙汉杂居，人烟稀少，又靠近呼和浩特、包头这两个边城要塞，也的确是一个打游击的好地方。

林彪的“5.18”讲话人们还记忆犹新，果然，在内蒙古就应验了！人们似乎真地嗅到了火药的味道。

中央的指示很快就反馈回来，主持日常工作的刘少奇、邓小平马上指示华北局采取紧急措施。华北局立即召集内蒙党委开会，当然没有让乌兰夫参加。会上决定：权星垣“临危受命”，星夜赶回呼和浩特，掌握内蒙古局势。同时，决定内蒙古军区的领导们立即随权星垣返回内蒙古，稳住军队，并通知各“四清”点上的团以上干部，火速返回各自部队。决定中还有一条：乌兰夫的妹夫、军区副司令员孔飞不准回军区。

前门饭店会议上并未正式通报云成烈事件，但参会代表们却私下获得了消息，窃窃议论。

再说云成烈，事办完了，他转赴昭乌达。谁知，刚一下火车，就被拘押、隔离审查了。

内蒙古军区动作迅速，与此同时还隔离审查了其他几名土默特旗籍的军官，他们是骑兵第 5 师师长云一立、军区作战部部长李存义、独立第 2 师副师长李自勉。审查结果，没有发现他们和云成烈之间有什么串通谋反的活动。

说起来，云成烈也是从小参加革命的。他在延安读书上学，旋即参军入伍，当了一名小八路。在部队，他向来性格火爆、偏激。其实，云成烈在北京说的“上山打游击”，不过是在当时特殊环境和情绪下冲口而出的一句气话。他并没有做什么实际准备和部署，比如打游击必需的人员、武器、给养之类，都没有考虑过。他说完了气话，就自己回军分区了。可是，云成烈的这句话却引起了内蒙古地区的紧张。

6 月 17 日，内蒙古自治区常委会结束，内蒙古党委在北京前门饭

店召开全体大会批乌兰夫。

6月19日,与会者用了一天的时间讨论李雪峰第二次传达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报告。李雪峰在报告中对林彪“518讲话”的阐释和发挥,使与会者受到极大的启发,他们进一步认识到:文化大革命就是防止政变的斗争,与乌兰夫的斗争也是如此。于是,内蒙古党委书记处书记王再天、内蒙古党委常务委员雷代夫等人认定“乌兰夫是政变头子”,杨鸿文更煞有介事地证明,“呼和浩特市已经实现了反革命政变。”呼市市委书记“李贵就是反党黑线的急先锋”。在大会发言中,乌兰夫几次插话、辩解,均遭到当场驳斥。

从6月22日到6月25日,大会发言共21名,书面发言29份。会议印发了中央民委参加土旗四清的代表揭发乌兰夫反大汉族主义的材料,权星垣揭发区党委书记处书记、自治区副主席刘景平进行背后活动的材料,即区党委书记处书记友王铎和刘景平在看望乌兰夫时抱头痛哭的事情,以及区党委常委吉雅泰在4月常委扩大会议上恶毒地攻击党的发言、区党委常委克力更向土左、土右旗部分四清工作人员就反大汉族主义做的报告等等。

6月27日,自治区党委书记处决定,撤销李贵的大会呼、包二市组副组长的职务,此职务由积极揭发乌兰夫的杨鸿文担任。李贵、陈炳宇、石光华、墨志清、奇峻山、李文精、云瑞等乌兰夫死党的错误也受到了“系统的揭发批判”。

# 第85回：做工作，刘、邓亲自出面谈 文革火，熊熊燃烧在青城

6月28日，陷入了“人民战争”大海中的乌兰夫第二次在大会上做检查。

大会开罢又开中会，6月29日，在有盟、市委书记参加的常委扩大会上，人们对乌兰夫进行了面对面的批判斗争，发言者众口一词：6月28日乌兰夫的检查是“假检查真进攻”，“在要害的问题上避而不谈”。与会者七嘴八舌又揭出了乌兰夫历史、作风等方面的问题。如：

同反党分子李维汉志同道合，提出社会主义民族的反动观点，反对党的平叛方针。

抗战前，乌兰夫在国民党的新三师，执行王明路线使党组织蒙受重大损失。

解放战争时期与习仲勋关系密切。

乌兰夫的儿子与习仲勋的干女儿结婚。1960年，乌兰夫请习仲勋到内蒙古过春节，光招待费就花了一万多元。

另外，与会者还要他交待同杨尚昆、习仲勋、张闻天、李维汉等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关系。

乌兰夫实在满足不了这些揭批者的胃口，索性退到原来的出发点，只承认自己有民族偏见，有自卑感。其他如：修正主义呀，宗派主义呀，民族分裂呀，“一言堂”呀，索性统统都不提了。

大家的愤怒可想而知。经过一番严肃斗争，乌兰夫像一头执拗又无奈的老牛又被拴到了“修正主义”和“民族分裂”的木桩上。拴牢之后，更多的罪名加在他的头上：

1946年贪生怕死，和小老婆跑到内蒙古避难，从来就没有上前线。

1958年与邻省划界时寸土不让，暴露了领土野心。

推行斯拉夫文字是为统一内外蒙古，是为建立大蒙古帝国做准备。

1962年大量发给土旗“民族补助费”,人均20元。

大量印发乌兰夫领袖像,并和毛、马、恩、列、斯像挂在一起。编写《乌兰夫选集》、《乌兰夫言论集》、《乌兰夫领袖歌》。

像挤牙膏一样,第二天乌兰夫交待了他提拔自己的老婆云丽文及云世英等人的内幕,他的新班子也纷纷交待各自的“非法活动”。但是真正使乌兰夫在思想认识上产生飞跃,决心向讨伐者投降是在他受到刘少奇、邓小平的召见之后。

7月2日,刘少奇、邓小平代表中央找乌兰夫谈话。当时在座的还有区党委书记处书记奎璧、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兼国家民委副主任刘春等人。刘少奇和邓小平对乌兰夫进行了极其严厉的批评。他们指斥乌兰夫不搞阶级斗争,犯了地方民族主义和修正主义的严重错误。

刘少奇说:“同志们这次揭发了你很多问题,我们觉得很突然。是你违背了毛泽东思想,违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违背了中央的方针、路线。民族问题,中央历来是注意的。但不同于你所提出的民族问题。在内蒙你强调的是地方民族主义。中央强调的不是你所说的那个反大汉族主义,而是反对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民族问题,不外是地方民族主义、大民族主义。这两者都是资产阶级民族主义。都要反对,都要肃清。特别是要在干部、党员中肃清。解放以来,我们历来都是反对大汉族主义,内蒙也是反大汉族主义。全国都反过地方民族主义。新疆、西藏、宁夏回族自治区都搞过。差不多都是反过的。你们内蒙就没有搞过?

内蒙应该反地方民族主义,搞民族分裂那是不允许的。应该在几年内把地方民族主义作重点反一下。……在机关中、干部中不认真反地方民族主义,一定要犯错误。事实上现在已经犯了错误。搞地方民族主义,不可能走社会主义道路。你是不搞阶级斗争的,特别是不在蒙族中搞阶级斗争。”

邓小平说:“牧区阶级划分问题,内蒙落后于新疆、宁夏、青海、四川、还会落后于西藏。……不搞阶级斗争,生产是不巩固,经不起风浪,会退下来的。你们的纲落后了,什么纲?阶级斗争的纲。你不如赛福鼎同志,他还站起来反对地方民族主义。你现在走的路是包尔汗的路,刘格平的路,扎喜的路,达赖、班禅的路上去了。有这个危险。你

拼命强调地方民族主义,那里是前线,面对苏修、蒙修,不搞阶级斗争,你把内蒙引向什么方向?你不从这个地方深挖,是极其危险的。”

刘少奇:“在民族问题(大民族主义、小民族主义)、在阶级斗争这两个根本问题上,乌兰夫同志犯了错误。过分强调民族主义,不能团结汉族,少数民族也团结不了。因为地方民族主义只能代表百分之五的人的利益。到底大汉族主义压迫了你们没有?内蒙现在不是被压迫的,在国内是平等的。用民族问题代表阶级斗争问题,是资产阶级路线。是代表蒙古地主、牧主、资产阶级利益,不是代表蒙古工人、农民、贫苦牧民的利益。”

邓小平:“去年下半年以来,正是我们揭苏修揭的很厉害,泽登巴尔进一步反华时,你们不提反修了,把反修的旗帜降了下来了。”

乌兰夫比刘少奇小8岁,比邓小平小两岁。同是老革命家,同是中央级领导,同是一代人,在刘少奇、邓小平面前,乌兰夫大气不敢出,唯唯诺诺,点头称是,带着满脑袋的疑问,吞下满肚子委屈,违心地做了检查:

“我有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思想。”

“我从延安开始就接受了李维汉的思想。”

“我懂得了,这次回去,把地方民族主义思想好好整一下,这几年发生了不少叛国案件。自从1953年以来,特别是社会主义革命以来,地方民族主义不由自主就冒出来了。”

“这次要好好挖深。”

“检查不深刻再检查。过去思想不清楚。”

乌兰夫决心听刘少奇和邓小平的话,洗心革面,争取中央宽大处理。他经过5天的准备,在7月7日至7月10日的区常委扩大会议上,做了更彻底的“交待”,承认自己犯了路线错误,组织上搞了宗派主义,在民族问题上打起了地方民族主义的旗帜,走上了与党中央、毛主席相反的道路,发展下去必然走到反党叛国的道路上去。他还承认他在人事安排上搞了阴谋,他的贤内助“好名、好势、好权、没改造好。”他建议,党委把他提拔上来的人,包括他的儿子、老婆全部撤掉。与以前和以后的任何一次检查交待一样,这第三次检查照例引起了“同志们的极大愤慨”。王再天要求与乌兰夫“短兵相接”。区党委代常委兼宣

传部长、内蒙古大学党委副书记郭以青勒令乌兰夫“缴械投降”。

像跳高运动员一样,乌兰夫每次都以为拼命一跳就能跳过批判者高举的标竿,然而每次他都无功而返,他痛苦地发现,批判者在他起跳前一齐踩上了高跷。

7月9日到11日,高锦明全面揭发、批判了乌兰夫的“路线错误”。

7月12日,乌兰夫做了第四次检查。这一回,他豁出去了,共检查了7个方面的错误:

1、错误的性质及其历史根源;

2、在民族问题上的错误观点;

3、在阶级斗争方面的错误;

4、组织路线上的错误;

5、党内民主生活的问题;

6、改正错误的决心和办法;

7、我在错误思想的指导下造成的罪行。

此时,已经换了高锦明主持会议。

高锦明原名叫敖白枫,是辽宁省义县满族人。“9.18”事变后,他流亡到北 平,参加了北平中共党的地下活动。从1946年起,他就一直在内蒙古地区工作。

人们对乌兰夫的上述检查仍旧极为不满,各小组一致认为他在抵赖、在顽抗、在继续耍权术、安钉子,准备反扑。与会者的这种不合常理的极端反应其实是历次政治运动在中共党内形成了一种集体心理:任何对被批判者的同情、宽大,都是对党的危害。任何对被批判者检查交待的认同,都意味着革命立场的丧失。在这一心理驱使下,人们对乌兰夫的检查“异常气愤”,又向他提出了10个匪夷所思的问题:

1、搞加盟共和国、独立国以及印发《三五宣言》的目的和具体活动。

2、反大汉族主义的真实目的何在?搞了哪些阴谋活动?

3、搞反革命政变的阴谋权术。

4、同高岗、习仲勋、李维汉等反党集团的关系。

5、反对党中央、反对毛主席、反对华北局的具体活动。

6、1947 年至 1951 年间,为什么允许蒙修情报员留在内蒙古?

7、对以哈丰阿为首的“内人党”这个反动党派,为什么不按反党动派论处?对其骨干分子不做处理,居心何在?

8、为什么长期重用、颂扬旧官僚和民族上层人物?

9、积极推行斯拉夫文字,与蒙修成立“统一名词术语”的 43 人委员会,是何居心?

10、为什么对区内许多民族分裂案件和叛国案件不做处理?

听着这些连珠炮式的发问,乌兰夫瞠目结舌,更让他无言以对的是全区各地寄来的揭发信和高锦明对他的控告:乌兰夫想搞大蒙古帝国,想做当代的成吉思汗!

到了这种地步,乌兰夫已经十恶不赦,罪恶滔天,不齿于人类了。

7 月 15 日,在前门饭店的大会上,高锦明做了系统发言。他说:“我们现在没有把你当敌人看,你犯的是严重错误。你如果改正错误,我们仍然拥护你。如果你坚持错误,我们就坚决打倒你!”

7 月 18、19 日,解学恭总结:乌兰夫的错误是全面系统、由来已久、根深蒂固的。其性质是民族分裂主义、修正主义,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错误。其错误的要害是歪曲、篡改、反对毛泽东思想,另打旗帜,自成体系,积极推行民族分裂主义,妄图建立一个以乌兰夫为首的独立王国,在呼和浩特市已经实现了政变。以李贵为首的修正主义集团篡夺了党政领导权。改组内蒙古党委办公厅,控制组织部,在人委五大委中安插亲信,搞地下书记处,大体上可以看出以呼市、土旗为点,向包头、伊盟伸手,已经实现了部分政变,现正在继续扩张。

翌日,各组讨论解学恭的讲话,一致拥护。

7 月 25 日,旷日持久的前门饭店会议终于结束了。

两天之后,7 月 27 日,李雪峰就把一份《中共中央华北局关于乌兰夫错误问题的报告》递给了中央。报告“根据揭发出的大量事实”,确认乌兰夫犯有五大错误:

1、反对毛泽东思想,另打旗帜,自立体系;

2、反对阶级斗争,反对社会主义革命;

3、对修正主义卑躬屈膝;

4、以《三五宣言》为纲领,进行民族分裂活动,搞独立王国;

5、安插亲信,篡夺领导权。

报告给乌兰夫下的结论是:三反分子、民族分裂分子、修正主义分子、内蒙古最大的走资派、埋在党内的一颗定时炸弹。

《中共中央华北局关于乌兰夫错误问题的报告》递上去后,内蒙古党委一直在等着中央批发华北局的报告,因为中央不发话,内蒙古"文革"的下一步就不好走了。

这时,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已经换成陶铸了。他刚从中南局调到北京,任书记处常务书记兼中宣部长,走马上任才两个月。陶铸接到《报告》,对李雪峰说:报告需要修改。李雪峰不敢怠慢,连忙组织解学恭、高锦明等三人在北京饭店加紧修改。改过的报告对乌兰夫上纲更高,火药味更浓。改毕报送陶铸,从此石沉大海,被陶铸压下了。

当乌兰夫还在北京"前门会议"上一遍又一遍地检查交待的时候,文化大革命的烈火也随着北大聂元梓等人大字报的发表,烧到了内蒙古的阴山南北。内蒙古的首府呼和浩特,蒙语中是"青色之城",此时也和全国一样,很快就被红色风暴所席卷。6月3日,内蒙古的第一张大字报出现在内蒙古师范学院校园,题目是:《评纪之5月18日的动员报告》。

纪之原任高教司副司长,1959年"反右倾"时被贬到这里任党委书记。

大字报出自外语系俄语专业教研室青年教师高树华之手,署名还有刘朴、刘真、楼基立共4人。大字报指责院党委书记纪之用四清"查物资、查财务、查浪费"的"三查"压制文化大革命,批评他仅仅把运动限制在写批判文章范围内。

一时间,师院的师生议论纷纷,赞成和反对的大字报迅即铺天盖地。当晚,中文系汉三班贴出《揭穿一个大阴谋》的大字报,矛头直指高树华等人的大字报。纪之和院政治部代主任张学尧急忙布置,把大字报抄下来,漫画要临摹、记下名字以备后用。但究竟该如何应对?他们一时也手足无措。

这张聂元梓式的大字报引起了内蒙古师范学院以至整个内蒙首府的震动。大字报矛头明显地指向了院党委,这是非同小可的事,领

导慌了手脚,按照1957年反右斗争的经验看,这是典型的反党行为。但按照北京大学的情况看,这种大字报显然已受到毛泽东主席的支持。自治区文委主任赵戈锐、文委副主任布赫、韩明、文委干部人事处处长孙培卿立即赶到师院与纪之他们开会商议,尚未撤职的内蒙党委办公厅代秘书长浩帆也来院视察。

转天,师院团委在大字报贴出的转日召开全院团总支书记会议,肯定了中文系保卫院党委的大字报是对的。当晚又召开了全体党员大会,以求稳定局面。当天,内蒙古党委在呼和浩特召开自治区高等院校领导干部和部分师生代表会议,紧跟北京形势,动员深入开展"文化大革命"。

纪之是"老运动员",丰富的政治生活经验使他很快就在6月5日做了检查。多数学生被他的诚恳、谦逊所感动,报之以长达5分钟的热烈掌声。但这并不起任何作用。

6月6日,《内蒙古日报》发表社论:《做无产阶级革命派,还是做资产阶级保皇派》,按照《5·16通知》的精神,号召全区各族群众造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反。

6月7日上午,高树华等4人又贴出题为《不能掩盖修正主义路线的实质——评纪之6月5日的初步检查》的大字报。与此同时,以古东为首的4人工作组进驻内蒙古师院,公开与群众见面。师院师生热烈欢迎工作组进校。有毛泽东对聂元梓的赞扬在先,古东对高树华的大字报也只能肯定,但是,师生们很快发现,工作组在与他们见面前已与纪之、张学尧、肇那斯图等校领导先行接触,本来这也是正常的工作程序,但有人认为,这是工作组与院党委勾结的表现。外语系召开会议,韩桐同学义愤填膺,发动全班同学写了血书,表示"誓死保卫党中央、誓死保卫毛主席、誓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决心,并将此血书当日送交内蒙党委和文委。

工作组组长古东束手无策,去找自治区党委书记处书记王逸伦,王逸伦指示文委又增派陈觉生等19人来师院,前后共23人组成工作组,以古东为正组长,陈觉生为副组长。当天下午,全院师生在院内游行,要求撤纪之的职,罢纪之的官。

工作组做出的第一个决定就是撤销纪之党委书记的职务。但在

此时,这种泛泛的肯定和决定已远远不能满足学生们的要求,几天之内,反工作组的情绪日渐高涨。

学生们情绪激昂。这时已无法上课了,为谁学、学什么还没弄明白,怎么上课呀?很有可能学的都是些反动、错误的东西,越学越反动。更何况,面临国家安危、政权掌握在谁手里这种头等大事,学习与生产都显得无足轻重了。大字报栏在校园里赫然亮出一道道风景线,它让人兴奋,让人热血沸腾,让人燃起愤怒的火焰与反抗的力量。它同时带来一种赌博的诱惑,看你押对了哪匹马,你就可以享受到胜者的欢欣。热心政治的人勇敢地上阵了,全国六亿人民都卷入了事关福祸甚至事关存亡的政治旋涡里,那些敢于亮出倾向总还是个坦诚,即使夹进某种目的也无可厚非。但仍有不少同学处在观望之中,不敢轻易下注。

# 第86回：外事口，工作组四处被轰 分歧大，康、陈顶撞刘少奇

中国政治是深不可测的一门学问，事情绝不像它的表象那么简单。正当内蒙古师范学院外语系率先起事的时候，智者用大字报棒喝人们：不要忘了1957年反右前的大鸣大放，那是引蛇出洞，等蛇们都出洞了好一网打尽。这一警示确实让人一身冷汗，不得不想想坦诚的后果。

6月21日，高树华等四人贴出大字报《一切革命的同志要团结起来，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彻底摧毁“浩家店”》。同日，郭是海同学贴出《抓住黑帮，穷追莫舍》的大字报，进一步揭露工作组与黑帮的关系。《古东向何处去?》《陈觉生是何许人?》等大字报很快出现在师院校园。6月25日高树华等4人又贴出《工作组执行的是“浩家店”的修正主义路线》，中文系教师董文等贴出《要求派新的工作组或改组现有的工作组》等大字报。万炮猛轰工作组，工作组几近瘫痪。

高树华等激进派胆敢反对工作组，自然激起了多数学生的反对，他们或出于对党的信赖，或出于对1957年“反右”的恐惧，或出于随大流的安全感，纷纷聚集到保卫工作组的旗帜下。少数反对工作组的同学人少志坚，他们无路可退，只好拼死一搏。高树华也由此步入政治舞台。

其他院校的情况基本相同，在与党委、与工作组、与保守派的对抗中，一批造反组织脱颖而出。一批青年学生，如工学院的王金宝、农牧学院的那顺巴雅尔和师院的高树华一样，都先后登上了他们认为可以驾驭的战车，成为名重一时的领袖人物。

7月8日中午，中文系学生李福生贴出《陈觉生给我院黑帮分子的“再战动员令”》。有人向工作组报告说“生”字中有文章，认为是反动标语，因而工作组把李福生扣留。下午，支持高树华的200名师生写了一条巨幅标语，“支持高树华等革命同志，识破迫害左派的阴谋家”

和“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往主楼上贴。还未贴完，便有数百人围在楼前，声称压了“七一”的红字标语，已构成“反革命事件”，对贴标语的同学刘鸿印、韩桐进行围攻、殴打。有人带头高喊：“打倒反动学生韩桐”、“打倒反动学生刘鸿印”的口号，当场还有人照了相。工作组长古东责令贴标语的师生们撕下标语，直到晚上21时。这就是内蒙师院的“78事件”。

进入7月的北京乃至全国，从中央到地方，从省、市委到各大、中学校，甚至到工厂、单位都在为工作组的问题争得你死我活。7月1日，周恩来刚刚从阿尔巴尼亚访问回来，7月2日，陈伯达将一封反映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机关运动、揭发以张彦为首的工作组的来信转给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周恩来的办公室在最高峰时曾一天收到来自北大、清华、地质、北师大等大专院校的20多份措词激烈的报告，纷纷要求驱逐工作组。

7月4日，周恩来约陈毅谈话，了解国务院外办和对外文委在文化大革命中存在的问题。

《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发表后，外交部党委也动员大家写大字报，起来揭发本单位的牛鬼蛇神，并保证“不打棍子，不戴帽子，不揪辫子”，但同时又布置各级党组织和积极分子注意发现有“出圈”言论和大字报的，马上立案审查，有的立即打成“反革命”，有的准备“秋后算账”。很快，一批部、司、处级干部被定为牛鬼蛇神，组织大家揭发批判。这些人中有部党委成员、国际关系研究所所长孟用潜、副部长王炳南和陈家康等30多个人。他们也被关押或看管起来，随时接受批斗。像王炳南、陈家康等当权派或有现行问题的，则被集中关押在地下室，吃饭时排队进食堂，只能站着吃饭，不准坐。

外交部还派出工作组进驻几个部属单位，如北京外国语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等。

对外文委是外事口最早派去工作组的单位。这里，文学作品的翻译工作量大，期刊杂志多，与文化联系紧密，几千号人。文革一起，群众就纷纷给党组书记李昌及宋一平等几个副主任贴出大字报，要求撤换他们。陈毅很快抽调张彦、孔筱担任对外文委工作组正副组长。在张彦、孔筱二位下去前，陈毅特地找他们谈话。

孔筱刚从“四清”工作队回来，她一进门，陈毅就问：“孔筱同志感冒好点没有？眼带倦意，气色欠佳。真有点对你不起，刚参加四清回来，应该让你休息几天，无奈任务紧，只得劳你立刻走马上任了！”

孔筱略显为难地说：“陈总，我身体没啥大问题。只是在乡下呆了整一年，刚回北京三天，文革是怎么回事，一点也不了解，就怕……”

“边干边了解吧！”陈毅接口说，“其实，我们都是仓促上阵嘛！”他略微耸耸肩，随即以严肃认真的态度，开始对张彦、孔筱二位布置任务：

“对外文委摊子最大，几千号人，一日无人发号施令，就会影响外事交往，影响国家声誉。”

“你们这次去，第一要稳，要把情况搞清楚，不要轻易表态。李昌、宋一平都是老同志，又是候补中委，对他们不可轻率。都是革命多年的老同志嘛，有缺点错误，可以批评帮助，‘洗洗澡’，自己‘下楼’。第二，群众的积极性不要挫伤，你们要在群众中冷静地多听，多观察，多动脑筋分析问题。文化革命是第一次搞，会碰到许多意想不到的新问题，要有思想准备。

这次由你们二位担任组长和第一副组长，你们既要大胆领导，又要谨慎行事。运动的情况及时给我通气，拿不准的问题，要及时请示。我相信你们能胜任这个领导工作！”

对外文委工作组在欢腾的锣鼓声中，被群众夹道迎进对外文委的大门。谁曾想，仅隔一天，因为在欢迎工作组的大会上，对外文委副主任李昌和宋一平上了主席台，一部分群众就刷出批判工作组的大字报，理由是“死保当权派”。

第三天，对外文委又有一张大字报，标题是《彻底批判陈毅六二年广州话剧、歌剧、儿童剧编剧座谈会上的讲话》，吸引了大家的眼球。工作组副组长孔筱再一次走进陈毅办公室，将这张大字报的底稿交给陈毅陈老总。

陈毅戴上花镜，将大字报从头到尾看了一遍，坦然一笑，说：“写得不错嘛，就这样转报中央。”

“怎么？”孔筱很觉意外，“这种通篇污蔑谩骂的大字报还报送中央？”

“怕什么！”陈毅直率地说，“这算客气的嘞！你没看见外语学院贴

出的大字报,那才叫惊心动魄嘞!说什么外交部是个黑帮窝子,陈毅是个黑帮头子,是个大头子嘞!我原封不动地报到中央去,我怕什么?!我对那些娃娃们说:听说你们贴了不少的大字报,你们最好贴一张不要我当外交部长的大字报,这样,我就可以以此为据,向中央提出辞职了。搞外交工作太累人了嘛!"

孔筱和在场的其他同志都被陈毅乐观风趣的答话逗乐了。

"话是这么说,不过,群众提出意见嘛,还是应该给个回音的。"陈毅说着,自己摊开纸笔,刷刷刷写了一页半,递给孔筱说:"喏,这是我对文委同志的答复,请你转交一下。"

孔筱接过来一看,在"高价征求意见,欢迎同志们批评"的标题下,陈毅的真诚恳切地向大家征求意见。她被陈毅镇定的情绪、坦荡的胸襟深深打动了,进门时忐忑不安的心情一扫而光。当夜,她找了两张大红纸,将陈毅的公开信整整齐齐抄好,紧挨着批判陈毅的大字报贴了出去。

陈毅的表态使他在外交部的威信更增,但并没有丝毫减缓反对工作组的浪潮。不到一个星期,外交部系统派出的各工作组就先后遭到群众的轰赶,大字报上一片反对之声。如对外文委,工作组整了一批"牛鬼蛇神",李昌是大的,还有些小的。工作组同意批判对外文委副主任、党组书记李昌,但张彦的夫人杨纯是对外文委副主任,就没有事。所以有人说张彦去对外文委是保杨纯,不准给杨纯贴大字报,不准查对外文委的"黑线",群众要揭发领导,受到工作组打击。陈老总非常恼火,他召集群众大会,说张彦经过长期考验,是好干部,这是领导的看法,你们群众说他这样那样毛病,是群众的看法,这不对,要以领导的看法为准,不能轰走张彦,并说:"张彦是我派的。"

陈毅召集各个工作组的负责人交流情况,给他们鼓劲:

"工作组是中央决定派的,我是投的赞成票。你们一定要挺住,坚信党中央的领导。"

"路线斗争不是好玩的东西,不要乱猜,不要搞投机,不要今天猜这个下台,明天猜那个上台,不要做墙头草,哪边风大往哪边倒!在路线斗争中搞投机,是要犯大错误的!我再重复一遍,工作组是受党中央的领导,不要因为群众贴几张大字报,某个说句话,就跟着猜疑起来,动摇起来!与群众不要硬顶。但是,原则问题一定要坚持中央的

八条规定,一定要坚持贯彻落实!”

听说对外文委的群众要批判他们那里的工作组,陈毅闻讯后赶紧前去解围。当他来到批斗会场,看到一些人给工作组成员挂牌子、戴高帽子的过火行为,就禁不住登台仗义执言:“派工作组的错误是当时局面造成的。我是支持工作组的。……张彦有错误,应该进行批判。但我们无权把他整死——要帮他改正错误!”

台下有人高声指责:“陈老总你包庇工作组!你又在和稀泥!”

陈毅立即针锋相对地回答说:“哦,你说对了!我硬是要和稀泥嘞!人民内部不和稀泥怎么行嘛!把少数派压下去,我不赞成!把多数派压下去,我也不赞成!把工作组整死,我更不赞成!”

他越说越生气,禁不住冲着台下近乎喊叫地说:“你们把他们打成反革命,打成黑帮,你们不如把我打成反革命,打成黑帮。拿来高帽子,我马上就戴!”台下顿时响起长时间的热烈掌声。

陈毅扬起手摆了几摆,掌声戛然而止。他停了停,随后降低调门,语重心长地说:“总之,要成为一个革命者,就要随时准备挨斗或斗人家。毛主席过去也挨过斗,大家斗他,他受了委屈不报复,不急于澄清。遵义会议前批斗毛主席,那时鬼都不上门,到遵义会议后,他照样团结大家一道工作,他没有这样宽阔的胸怀,就不可能胜利!”

全场鸦雀无声。

忽然有人喊道:“陈毅!我问你!你到底跟不跟毛主席走?”

陈毅毫不示弱,冲着台下丁是丁、卯是卯地说:“有人向我提了一个问题,问我到底跟不跟毛主席走?我可以当众回答:过去我是一向跟毛主席走的。我决定今后还继续跟毛主席走!但是,我不敢保证将来就不反对毛主席的一些意见!”

会场上顿时出现了骚动与不安,有的瞪大了惊愕的眼睛,似乎怀疑自己的耳朵出了毛病,有的指名道姓地喊“打到陈毅!”

陈毅不为所动,依然按照自己的思路讲下去,讲得更缓慢更清楚,几乎使用了记录速度,说得极为恳切:“我陈毅,是维吾尔族姑娘——辫子多,不用费事,一抓一把。但是,我这个人有一个好处,就是情愿犯错误,不怕犯错误,非把问题讲透不可!你让我吞吞吐吐,模棱两可,钝刀子割肉,讲那种长不像瓠瓜、短不像葫芦的话,只求明哲保身,

恐怕这辈子也不会了!”

中央文革小组集体到对外文委找人谈话,群众对工作组有很多意见,贴了不少反工作组的大字报。康生、陈伯达都去看大字报,支持反工作组的人。

7月5日,陶铸、张平化给毛泽东写信,汇报中共中央宣传部的工作。信中提出:

一、彻底改组中宣部的领导。

二、今后中宣部最根本的任务就是集中力量宣传毛泽东思想。

三、计划在七、八两月,组织对处长以上重点对象的批判,把文化革命搞深搞透。同时,抓好九月召开的全国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和一些日常工作。

7月10日,毛泽东这封信上批示:“陶铸同志:同意你们的意见。请中央常委最后决定。”

7月11日,周恩来陪尼泊尔王子比兰德拉到武汉见毛泽东。周恩来向毛泽东汇报了访问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的情况,毛泽东让他再在武汉留一天。第二天上午,周恩来和王任重去见毛泽东,毛泽东把7月8日写给江青的一封信给他们看了。林彪“518讲话”中央准备下发,请示毛泽东。他在给江青的信中谈了自己的一些想法,并对当时的国内形势及所信仰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和自己与共产党的未来做了展望。这封信是徐业夫誊写的抄件,有些字抄错了,毛泽东修改过来。

周恩来阅毕,向毛泽东建议:“此信可否给林彪看一下?”

毛泽东说:“可以。”

周恩来先到了上海,将这封信转交给在上海的江青。14日,周恩来从上海乘飞机到达旅大市,即现在的大连市,向林彪转达毛泽东7月8日信件中的意见。林彪听了吃了一惊,表示接受“主席的意见”,答应回京后修改5月18日的讲话。

后来叶群对江青说:“我们那位对那封信感到不放心,怕以后被人利用来攻击他。”

江青就请示了毛泽东。毛泽东说:“那就把信交给叶群,放在他们那里好了。”

可是叶群还是不放心。因为放在他们那里,他们也不好随便处

理。江青再请示毛泽东。毛泽东说:“那就烧了吧。”

于是江青把叶群叫到钓鱼台,当着她的面,叫戚本禹和卫士大孙把信拿到窗外花坛上去烧掉。江青和叶群就站在窗前看着他们烧。

7月15日,周恩来在旅大市听取党政军负责人的汇报,就文化大革命的问题作了指示。同日乘飞机回到北京。同刘少奇谈了到武汉和旅大的情况。

7月12日,《人民日报》发表中国人民大学7名学生给中共中央和毛主席的信,这封信建议实行“崭新的文科大学学制”,信中列举了现行教育制度的“十大罪状”,建议现有学生一律提前毕业,到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大革命运动中去锻炼改造,长期地、无条件地与工农兵相结合。今后要招收广大工人、贫下中农和复员军人中的优秀分子入学,不一定非高中毕业不可。

7月13日,刘少奇在北京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听取共青团中央关于《北京市中学文化革命的初步规划》的汇报。在讨论中,刘少奇对中学进行文化革命的目的、要求和政策等作了指示:

(一)我们的教育,是从资产阶级教育沿袭下来的,所以,不能对所有具有资产阶级教育思想的人都批判,只是批判少数代表人物,大多数人从中受到教育,树立无产阶级的教育路线。

(二)建立、健全党团组织生活,恢复和发挥党支部的领导作用、团支部的助手作用。这应单列一条。不要把党、团组织放在一起,要在运动中观察党、团组织,看它能不能领导,同时也锻炼党、团组织。要明确地提出,把建立、整顿、健全党、团组织,恢复党支部的领导作用、团支部的助手作用,作为一条任务。

(三)清经济。政治清了,组织清了,思想也清了,趁这个机会把经济也清一下。

他还提出:第一段工作,初中在8、9月底搞完,争取10月上课,高中在9、10月搞完。

会上,为工作组事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几十年来一直对刘少奇笑脸相迎的康生、陈伯达,与刘少奇发生了顶撞,这是过去从未有过的情况。陈伯达批评工作组,刘少奇、邓小平等人认为工作组有错误可以批评、整顿,不同意撤工作组。

# 第87回：访广院，一切权力归学生 转弯难，北大重评“六一八”

根据刘少奇的指示，从6月24日到30日，北师大一附中工作组有计划地组织召开了3次大规模的“辩论会”，实际上是对反对工作组的陈永康、何方方等学生的斗争会，每次都有几百人参加，仅第一次斗争会就开了8个小时。当时负责向中央汇报中学文化革命情况的北京市中学文化革命办公室副主任石琪，亲临现场，宣布何方方为“牛鬼蛇神”，“反革命分子”，“假左派，真右派”……

三次斗争会后，全校1000名师生中，被打成“反革命”、“假左派，真右派”的就有150名之多。高三(3)班还被打成了“右派班”，该班“只有一个左派，一个中间偏左，其余全是右派。”该班的范光义同学被邓小平的小儿子邓质方带着几个初一的小学弟围攻达一两个小时，吐了他一脸唾沫。

被斗的学生在学校遭到极端的歧视，一天到晚谁也不和他们说话，何方方蹲在教室里的一个角落里学毛选，一蹲就是半天，7月底串连开始以后她去北大看大字报，竟被人告密说她是“反革命头子”，把她赶出了北大。

在这种情况下，何方方等人被迫检讨。7月11日，刘少奇又下达指示

“不要相信，只要不捣乱就行，开大会检讨，可以吆！让大家知道吆！(后台)能问出来就好，问不出来，就算了，让他们保留。看调查情况怎样，不会不跟外校联系，后边定有人，她说用意好的，不可能……。”

“不要让大家没事，没事就会闹事，不能几个人准备，大家没事，要提高警惕，何方方的检讨就是麻痹你们。反革命分子经常在红旗下进行更恶毒的活动，这次反下去了，下次可以起来，胜利了，不要骄傲，你大意了，他们就更精明了。”

刘少奇指示要追何方方后台,他把高三(3)班学生牛德龙当作何方方的后台了。他说:“危机已经过去了,那个问题基本上平静下来了,后台揪出来了吗?”

工作组组长勾德元汇报了总后勤部宣传部柳副部长和牛德龙情况,说正在追查中。

刘少奇问:“牛德龙是学生还是老师?”

答:“学生。”

刘少奇说:“跟何方方、陈永康是一起的,没出面就是后台,幕前幕后吗。他承认不承认是后台?他父母都是干什么的?陈永康、何方方承认不承认他是幕后?给他们出主意就是后台吆!你们没有斗他们这些人?没有打他们?他们现在还在学校?”

工作组勾德元汇报说:“陈、何等人经过我们三次大辩论,已打下了他们的气焰,现在还在学校检查。第二次辩论有一个左派学生打陈一个嘴巴。牛德龙这个学生,害怕辩论,吓得跑回家了,3天没来学校,还扬言要绝食,要以死来威胁我们。”

刘少奇说:“绝食,让他母亲劝一下,学校里没办法,他在家里绝食有什么办法?告诉他不要到学校来了,来了也可以,要认识错误,青年人嘛,只要改正错误,交待清楚。改正错误我们还欢迎嘛。如果有错误不改,就跟他辩论,摆事实,讲道理嘛。他们都检讨,假的不要紧,下次再来吆,他们是高二的……”

工作组说:“已经高三了。”

刘少奇:“快毕业了,毕业了还留在你们学校里,反动的交给你们学校几个,反正开除他也不行,到外边去,他还是要捣乱,没人管,就这几个办法,没有地方去,还是留在学校……只要争取了多数群众,把他们孤立起来,就可以了。孤立起来,可以不做什么处理。他们闹也是好事吗!可以教育大家,看看有多少人受骗。”

7月14日,刘少奇的女儿根据她对刘少奇指示的领会,在日记中写到:

“老师不许秘密开会。同学也不许。红卫兵是秘密组织,也是非法的,只许开一种秘密会,就是北京市委传达指示(只许党员的),工作队革命委员会的给群众排队,可以秘密,这是必要的,但也要少数学生

参加,告诉他们保守秘密。”“可以让大家学毛选,社论,准备材料,不要让大家没事,没事就会闹事。”

这时的清华附中红卫兵仍然人数不多,没有明确的负责人,不具有完整的组织形态。北京其他各大、中学校虽然出现了很多战斗队之类的学生群众组织,但除了北大附中、人大附中、地质附中、石油附中、四中、六中、八中、二十五中等学校成立了红卫兵,大部分中学基本还没有红卫兵组织。

而北京二十五中以李冬民为首的“东风战斗组”,因为写了一份《呼吁书》,说工作组不符合毛泽东提倡的“自己解放自己”的原则,结果被打成“反革命集团”。工作组召开斗争大会批判“东风战斗组”,并将其强行解散。李冬民则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遭到连续20个小时的批斗。

矿院附中红卫兵的杨冀平,是北京军区司令员杨勇的次子。他哥哥杨小平和中央统战副部长刘春的儿子、矿院学生刘歌是中学时的同学,因此,杨冀平和刘歌也很熟。受杨冀平的影响,刘歌于6月18日在矿院发起成立了大学第一个红卫兵组织——“矿院红卫兵”。不久,地质学院附中的红卫兵也被定为“反革命集团”,强行解散,大批红卫兵被戴上高帽子游街。随之,煤炭部工作组把矿院和矿院附中的红卫兵,都定性为反革命组织。刘歌、杨冀平不服,相约到煤炭部,求见部长张霖之,说明红卫兵的实际情况,得到张霖之部长的支持。在张霖之部长的干预下,矿院红卫兵不但被平了反,而且院党委还专门拨给了办公室和电话,红卫兵组织一下子发展到100多人。

清华附中工作组为了转变红卫兵的观点采取了各种各样的办法。他们多次召开红卫兵骨干会,进行思想工作,他们还发动一些红卫兵家长来教育红卫兵。但都收效甚微。秉承团中央负责人关于恢复党团组织的要求,在工作组一手安排下,工作组成立了一个并未包括红卫兵全部负责人参加的分团委,但在红卫兵的坚决抵制下,未能发挥任何作用。红卫兵与工作组的关系日趋紧张,但始终没有与工作组公开决裂,总是尽量取得工作组的支持;而工作组也一直力争通过诱导来解决红卫兵的问题。

这时,清华附中红卫兵内部又出现了一个意外的冲击:红卫兵发

起人之一的王铭,他的父亲、时任青海省委秘书长王仲方,因为在罗瑞卿任公安部长时曾任罗瑞卿的秘书、公安部办公厅主任,此时正受到批判。而王铭的爷爷、老同盟会会员、教育部参事王肖山也因此在公安部宿舍被批斗。王铭闻讯,跑回家,即公安部宿舍,阻止揪斗他爷爷的批判会。胡克实要求刘晋借王铭的事情,迅速解决清华附中红卫兵的问题。刘晋没有执行。在公开场合,红卫兵和工作组还是保持着比较正常的关系。虽然双方的争执,摩擦不断,却也没有立即反目为仇。

工作组为了分散红卫兵的力量,于7月17日把卜大华等大批红卫兵骨干分子调出北京,拉到沙城兵营封闭军训,逐渐夺回了主动权。清华附中的运动也一时冷清下来。

7月14日,陈毅、陈伯达、康生到对外文委讲话,宣布撤销以张彦为组长的工作组。这是在周恩来的指示下,报经毛泽东同意,国务院系统撤消的第一个工作组。陈毅在讲话中宣布了这一决定。

据后来戚本禹回忆,这期间,很多人向他反映学校打学生打得很厉害,于是他就拿着光明日报社的记者证到很多学校去看,然后将看到的情况用红机子电话向江青或毛泽东秘书徐业夫汇报,并通过中央文革小组编辑的《快报》将汇总上来的情况向中央汇报。有些材料则是专送毛泽东和刘少奇。后来学校不让校外人员进了,对他说:“你是党报记者,那还可以,《光明日报》不行。”于是戚本禹又换了《人民日报》的记者证才能进去。

7月5日下午15时,北京广播学院学生贾冀豫、杨逸鹏、高世英、肖定元、焦永刚、陈建文六人,在广播学院一号楼东头楼梯背面贴出大字报,题目是:“一切权力归文化革命委员会”,一时在广院引起了轰动。围攻的大字报铺天盖地,甚至贴到了他们的床头。什么“反党”、“反革命”、“现行反革命”……从7月5日到7月15日,广院对“一切权利归文化革命委员会”这种提法,展开了大辩论。

北京广播学院新闻65级学生、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邓典桃的女儿、学院筹委会主任、共产党员邓良宝与其他几个同学,对广播事业局派到广院当工作组长的一名副局长压制学生运动的做法十分不满,就联合朱武成、贺亚生等同学写了一封告状信,通过国务院信访室将信递了上去。7月14日,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顾问康生接见了

丁莱夫和工作组长李哲夫、王殿举。

康生开门见山问:“广播学院是一派学生同另一派学生之间的斗争,还是工作组同一派学生之间的斗争?……现被围的是什么人?工作组站在哪一边?”

工作组答:“被围的人,多数是首先发动进攻党委的人,工作组站在多数派一边。”

康生生气地说:“过去左派,现被当成反党的!”

丁莱夫解释:“这个问题我表示过两次意见……”

陈伯达说:“这样一个办法好吗?一部分群众围攻一部分群众不好。这样如何搞大辩论。要走上轨道,脑子放灵些。不对的话可以收回。组织群众打击一部分群众是不正当的。这不是正常的!对外文委29个积极分子,被打成反革命。到处说是中央谈的,假盗中央名义。”

康生说:“你们回去立刻出一个大字报,说明你们工作组不是党中央毛主席派来的,给我们贴大字报不能说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

陈伯达重复说:“反对工作组就说是反对党中央,这是错误的。要保护少数。”

陈伯达还说:“共产党毛主席开始也是少数,正确的有时可能是少数。……《一切权力归苏维埃》是列宁提出来的。《一切权力归农会》是写进毛选的。”

康生问:“‘一切权力归文化革命委员会’谁说是反动的口号?”

丁莱夫答:“是张彦说的。”

康生说:“你们为什么对张彦那么感兴趣?他是犯了错误撤了职的。”

陈伯达说:“‘一切权力归文化革命委员会’,不能说这是反革命口号。这是群众革命运动中创造出来的。文革小组权力,就是帮助群众嘛!党领导革命委员会,党组织要经过运动考验,要受群众监督,不能骑在人民头上。”

康生说:“你们要解围,不能再打击报复!丁莱夫,不罢你们的官,就要犯错误。过去你们给戴的高帽子都不算!所有过去戴的帽子都不算!不得再斗,不能受监视。如果有监视,就是残酷斗争,无情打

击。工作组要表明态度,不要在群众中搞阴谋。你们有上方宝剑,所有被监视围攻的一律释放。要向全体同志宣布,不许监视,不许盯梢,如果这样就是犯法的。不要对这些人实行专政。不管是谁这样办,工作组要坚决反对!你们工作组在群众中有反感的,要公开撤掉。”

陈伯达说:“回去出安民告示,说工作组是广播局党委派来的。来此学习的,同群众在一起,坚决执行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路线。对工作组有意见,可以贴大字报。现在有苗头,有些工作组有意无意地领导学生斗学生,所谓排除干扰这是错误的。”

“广播学院与某些学院情况有相同的。运动开展得很猛。工作组对文化大革命没有准备。对中央方针政策了解很差,5 月 16 日《通知》,有必要很好地学习。从四清立即到学校,不懂得文化大革命。怎么办?只有向毛主席著作学习。学习毛主席的群众观点,群众路线。”

他接着说:“这次你们运动主人是谁?是广大群众还是工作组?这 1400 余人(指广院同学)有什么权力,他们欢迎你们去,很热烈地欢迎。工作组考虑没有,在一定的时候,他们可以罢免你们,让你们滚蛋!这个权力归他们,不归你们。人大常委委员长可以罢,你组长副组长就不可以罢吗?!”

“另外,学生斗学生,大、中学都发生。形式上是学生斗学生,实际是工作组同一部分学生结合起来,斗另一部分起来的学生。结果把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放松了。不少地方如此,你们广播学院就是一个。”

北京大学自“618 事件”后也变得冷冷清清,与 6 月初的火热情景大相径庭。7 月 12 日下午,北京大学地球物理系陈必陶等 5 名同学,在大饭厅东墙北侧贴出了《把运动推向更高阶段》的大字报,批评工作组在运动中不敢放手发动群众,提出北大运动“冷冷清清,止步不前,左派队伍没有形成。”

陈必陶的大字报,如一枚重磅炸弹,立刻惊动了当时的北京市委。15 日上午,北京市委领导吴德、郭影秋来到燕园,听取领导小组关于围绕陈必陶等人大字报辩论情况汇报。工作组汇报完后,吴德说:“‘618’事件中,好人是多数,坏人是少数,但好人也做了检讨。好处是警惕性提高了。副作用是对工作组和左派的意见不敢提了。”

吴德还说:“主要原因是工作组控制比较紧了些,运动就死板了,(现在)正确处理陈必陶这张大字报是把运动搞活起来的关键,这个问题搞不好,就会变成过去北大党委那样的性质。”

这天,在钓鱼台8号楼会议室,康生主持中央文革小组和北京市委书记处联席会议听汇报。首先由北京市新市委的秘书们汇报北大情况。陈伯达未等秘书说完,就站起来大发牢骚说:

“我是政治研究室的主任。政研室人少,人家看不起,没有人找我们。人微言轻,我讲话人家不听。我要到天津去。”

他要李雪峰代他向陶铸转达他去天津的要求。

李雪峰觉得陈伯达是话里有话,其实是在批评北京市委及其派出的工作组,不把中央文革小组放在眼里。

没等陈伯达讲完,关锋就接过话头,系统、有论有据的述说北京市委及其派出的工作组不到中央文革谈情况等等。

接着,康生也发了一通脾气。他谈了北京师范大学工作组组长孙友渔的问题,并且很不满地说:他说话、文革小组的人说话不算数,没有人听,等等。

原来,自6月20日北京师范大学学生高树奎贴出孙友渔的大字报后,反工作组的同学就受到了打击和批斗。他们不服,多次到《红旗》杂志社上访,每次都得到了他们的支持。

一次,北师大物理系64级的学生赵惠中在物理楼被批斗后,一人逃出校门跑到《红旗》杂志社找林杰投诉,林杰也问得很详细。谈话结束时已是凌晨2时左右了,林杰问赵惠中:“现在已没公交车,你怎么回学校去?”

赵惠中说:“那就走回去。”

林杰说:“隔壁有个老大姐是个老革命,年龄这么大了,还在斗争,还在革命。我去问她一下,能否把你捎到学校去。”

在回校的路上,这位老大姐也向赵惠中详细询问了北师大的情况,当赵惠中说到他们到北京新市委上访遭到冷遇时,那位老大姐插话说:“你们找错地方了。”

赵惠中愣了一下,不知她说的什么意思。车到小西天离北师大还有一站路时,那位老大姐说:“为了安全,你就在这儿下车吧。”

这位老大姐其实就是康生的夫人曹轶欧。

7月12日,中央文革小组派曹轶欧到北师大调查“620事件”。7月13日,孙有渔被叫到钓鱼台,被中央文革小组的人七嘴八舌的批了了一通,然后让他回北师大向全校师生检查。孙有渔是从工交口调出,经文教口派到北师大的。他从来没听说过自己在北师大究竟有什么错误,因此,回到师大后,他拒绝检查。

7月15日晚上21时,从钓鱼台回到北京市委的吴德再次把北大工作组组长张承先叫到北京市委谈话,传达北京市委对北大工作组的批评,让他回去召开全校积极分子会议,对北大“618事件”的定性问题进行检查,把北大的运动搞起来。

按照北京市委的布置,次日,北大工作组召开北京大学积极分子大会,张承先在3000人参加的大会上作动员和检查,但对“618事件”,他依旧顽固地坚持自己的观点。他说:“618”事件中,确实发现了反革命分子与坏分子插手运动,破坏运动,当场抓住4个。尽管这样,还是极少数坏分子混水摸鱼搞“618”反革命事件……发现了破坏,反击是必要的。必须建立无产阶级革命秩序,要革命就应服从党的领导。

张承先的讲话于当天下午传到了北京市委。吴德听后甚是生气地说:“张承先如此冥顽不化是要栽跟头的。”

17日凌晨1时30分,吴德给张承先打电话,传达李雪峰的指示说:“对‘618’事件要重新估计。”同时,吴德又对张承先说:“你上午8点到市委来,我有话要跟你谈。”

上午8时,张承先准时来到北京市委。一见面,吴德就劈头盖脸地大加训斥,说:“你的立场哪里去了,你的党性哪里去了,竟然如此地顽固不化,如不改正,你是要栽大跟头的。”

此时,北京大学学校广播台已经全文播发了张承先在16日所作的检查录音,中午12时30分,张承先回到燕园即赶至北大广播台,又作了补充检查。

这天,下着瓢泼大雨,师生们冒雨来到大饭厅,听张承先做紧急报告。陈必陶大字报在北大引起极大混乱,对工作组持不同观点的群众,一直盼着工作组对陈必陶大字报明确表态。

“同志们,我今天的报告题目是,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把运动推

向更高阶段,”张承先在报告中,首先总结了前段运动,然后布置了今后的工作,点名批判了陈必陶等5人大字报,他用了很长时间,对陈必陶大字报罗列的工作组“五大罪状”,一一地予以批驳,说陈必陶等人的大字报完全是别有用心,北大的运动只能在工作组的领导之下,坚定不移地按照中央部署和要求进行,决不能让少数别有用心的人去左右,从而走偏方向。

北大工作组接着发出《通知》,宣布北京市委驻北京大学工作组领导小组名单:由中共河北省委书记处书记张承先任组长,海军航空兵部队政委彭林、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杨以希、国科院文教办公室秘书长武振志、北京军区政治部郑希文、团中央候补书记张德华为副组长,中央理论小组办公室负责人曹轶欧、中央监委研究室主任李芳林、海军后勤部副部长杨文漠、北京大学原党委第一副书记戈华、北京大学原党委常委崔雄、海军政治部保卫部副部长蔡润田为组员。

但这个名单的宣布,不仅没有起到工作组预期的任何良好的作用,相反,却给他们带来了某种程度上的负面影响。18日凌晨,吴德再一次打电话给张承先,以命令的口吻说:“你们工作组要组织学习南京大学、中山大学关于文化革命的报告,要对照检查工作。”

上午,工作队领导小组即进行学习,并对照检查,然而,与此同时,北京市委书记处召开会议,就北大工作组领导小组问题进行讨论。会上,李雪峰对北大工作组领导小组进行了批评,他说:“北大6月18日乱打人,被打的人都不是好人,有些人问题不大,但打人的有好人,这件事是万人革命的行动……整个估计这个事情是反革命事件是错误的。估计错了就应当进行自我批评,18天轰轰烈烈,1个月来冷冷清清,跟这件事有很大关系。”同时指示张承先必须向北大师生承认:

(1)陈必陶等同学的大字报是革命的,是好的。

(2)“六·一八”事件不是反革命事件。

(3)工作组的估计是错误的,“六·一八”事件是广大革命师生革命热情的表现。

# 第88回：游长江，壮志豪情贯苍穹 闻“收尾”，毛泽东颇为惊讶

7月18日下午，列席北京市委书记处会议的北大工作组武振声副组长向北大工作组领导小组传达了李雪峰的批评。北大工作组领导小组多数对重新评价“618事件”思想不通，张承先随即找到吴德提出不同意见说：“处理‘618’乱揪乱斗事件得到了中央的肯定并通报了全国，怎么能一下子又说成是革命事件呢?!”

吴德解释说：“你要转好弯子，‘618’以后，北大的运动冷冷清清，是跟对‘618’事件的处理有关系的。‘618’事件中好人还是多数吗。这样检查有利于争取主动。”

张承先最终还是接受了吴德的批评，他于晚上22时30分回到北大，立即按照吴德的布置，召开全校广播大会，代表领导小组做动员检查报告，历时30分钟。他说：

“‘618’事件确实有极少数坏人钻空子，制造了混乱；但我们对敌情估计过高了，对群众的革命热情估计不足，并采取了一些限制和束缚群众手脚的措施，影响了运动生动活泼的局面。工作组决心进行整改，用3天时间开展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集中批评工作组领导的缺点错误。”

张承先沉重地说：“前两次检查都不很深刻，有几个根本问题没有从本质上认识、检查。”

但他还是固执地认为：“关于‘618’事件，确实有极少数坏人钻空子，制造混乱。”同时，他又客观地说：“但我们分析时，把敌人估计过高，对群众革命热情没有充分肯定，高度评价，这样对整个‘618’事件的估计就发生了错误，认为这是一个反革命事件，并采取了限制、束缚群众手脚的一些措施。这就影响了运动生动活泼的局面。”“使我校前十七八天轰轰烈烈的革命群众运动，自18日以后，陷入了一个月的冷冷清清的局面。”

张承先在广播讲话中说陈必陶的大字报是“革命的大字报”。他当场宣布:“从现在起工作组实行‘618’事件后的整个运动就地整训,战前整训。用3天时间,开展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集中批评工作组的领导。”

张承先“醒”了,但为时已晚矣!

此时,已来到武汉的毛泽东,在黄鹤白云的故乡,又作一次惊人之举。

7月15日,毛泽东对张耀祠说:“你们去看看武汉大学,看他们现在干什么呢?”

张耀祠来到武汉大学,看到好多学生在扎木排,便问他们:“你们扎木排干什么用呀?”

一个学生说:“明天要横渡长江,这个木排用于插彩旗的。”

7月16日是武汉民众为亚非作家会议举行的横渡长江比赛。

回到东湖宾馆,他把这个情况向毛泽东作了报告。毛泽东没有讲什么。

7月16日早晨6时许,毛泽东说:“上午8点去游长江!”

张耀祠马上通知湖北省公安厅徐耘云副厅长和警卫部门分头进行各种准备工作,很快一切就绪。

上午8时42分,在王任重的陪同下,毛泽东穿着睡衣,乘坐卧车到了长江边,下得车来,他举目四望,当天是一个好天气。他迈步登上武汉警备区的一艘快艇。

9时整,横渡长江游泳比赛开始,毛泽东站在甲板上,高兴地向横渡长江的游泳健儿挥手致意。首先是武汉大学学生游泳方队,他们推着彩旗,迎风飘扬,向前游着,江水哗哗,伴着那时最时兴的革命歌曲。毛泽东站在船头上,兴致勃勃地观看着他们,感到他们是祖国的希望,他的脸上充满了笑容。

突然有人看见了毛泽东,直喊:

“啊,是毛主席,是毛主席,果然是毛主席!”他们情不自禁地高呼“毛主席万岁!”

毛泽东十分高兴,一会儿走到快艇这一边,一会儿走到快艇那一边,向大家频频招手,并高呼:

“同志们好!”

“同志们万岁!”

当200多小学生组成的游泳队伍簇拥着“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的语录牌向快艇游来的时候,毛泽东显得特别高兴,不断地向他们挥手致意。当小朋友们看到是毛主席时,激动地举手高呼:“毛主席万岁!”刚一举手,头就没进了长江的波涛里。过了一会儿,头刚伸出水面,又继续高呼“毛主席万岁!”

这时,长江两岸红旗飘扬,锣鼓喧天,汽笛长鸣,向毛泽东致意。顿时,整个江上欢呼起来。长江的潮水激动了,长江的两岸激动了,高音喇叭里的革命歌曲更加热情荡漾。口号声,欢呼声,汽笛声响彻云霄,整个江面一片欢腾!

在汉口等待毛泽东接见的三批外宾也感受到了来自长江的欢呼声。他们在外办廖承志、外交部韩念龙的陪同下也乘船观看了学生横渡长江。当外宾看见毛泽东时,都热烈地鼓起掌来,毛泽东转过头来也向外宾挥手致意。

看完学生渡江后,毛泽东乘船向长江上游驶去,渡船到达武汉大堤时,他说:“我最喜欢今天这样的游泳,走吧,我们都下去,都感受一下长江的浪涛。”

说着,身边的几名工作人员已跃入江中。毛泽东也兴奋地下水了,他仰着身体跷起双脚,双手交叉放在胸前,像躺在床上休息一样,动也不动地随着波浪一起一伏地飘着走,非常自由自在。有人以为毛泽东累了,哪知道他忽然一个侧身,冲破波浪,挥臂向前赶着,波浪叠起,把小伙子们撇在了后面。

游泳健儿们赶上了毛泽东,毛泽东对他们说:“游泳是很好的休息,轻松自在,没有其他任何杂念,一切都顺其自然。”

他又说:“长江又宽又深,水流湍急,是游泳的好地方。”“横渡万里长江,不仅可以锻炼身体,而且更能锻炼一个人的意志。大风大浪也不可怕,人类社会就是从大风大浪中发展起来的!要到大江大海中去游,到大风大浪中接受锻炼。”

“跟着毛主席在大风大浪中前进!”这句话很快成为全国家喻户晓的政治口号。

随行的新华社记者钱嗣杰摄下了这个历史性镜头,后来发表在《人民日报》上,轰动了整个中国和世界。

跟随毛泽东一起下水的湖北省委书记王任重几次请毛泽东上去休息,毛泽东问:“游了多长时间?”

周围的人回答:“45 分钟。”

毛泽东说:“还不到一小时嘛。”说着,继续向东游去。

毛泽东在汹涌澎湃的长江里,舒适自若地畅游了一小时零五分钟,王任重再一次请毛泽东上船休息,毛泽东笑笑说:“你是这里的省委书记,我听你的命令。”

毛泽东上了汽艇,和王任重谈笑风生。

王任重说:“主席的身体真好,我真不敢相信,您能游程近 30 华里!游了 1 个多小时。”

毛泽东说:“我知道有人一直盼望我死,但我在短时间内是不会去见马克思的。因为这场伟大的文化革命还没有取得最后的胜利,所以马克思不要我的。”

王任重笑着说:“主席万寿无疆才是全国人民的幸福呢。我看,中国的右派分子成不了气候,当前形势在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是一派大好的。”

“现在不说那样的话。”毛泽东摆了摆手,站起来,走出汽艇大舱,这时江里的游泳健儿和岸上的群众一下子认出了毛泽东,大家几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当确信这位身材魁梧、满面笑容的人就是自己的领袖时,大江水面顿时欢腾起来:

“毛主席来了!毛主席万岁!万万岁!毛主席和我们一起游泳来了!”

毛泽东频频招手,向身旁那些欢欣雀跃、争相竞看的健儿们高呼:

“人民万岁!”

现场那种人民无限崇敬领袖的场面,就是再大手笔的作家也是难以形容的。这里既有群众意识的作用,也有领袖威望的力量,还包含着人们渴望一睹领袖风采的那种心理和欲望。汽艇在警卫人员的催促下,很快地开走了。

毛泽东对王任重说:“长江,别人都说很大,其实,大,并不可怕。美帝国主义不是很大吗?我们顶了它一下,也没有啥。所以世界上有些大的东西,其实并不可怕。”

此时此刻的毛泽东,终于放弃了自己归田园兮的最后梦想。

此时此刻的毛泽东,正以这次畅游在检验着自己,检验自己已然老迈的身躯之中,还有多少仅存的生命。

此时此刻的毛泽东,已然“上了梁山”。

此时此刻的毛泽东,已经破釜沉舟。

此时此刻的毛泽东,最终做出了自己的抉择。

在他步入长江,开始自己一生之中最后一次的长江畅游之前,面对长江两岸千千万万的民众,他高呼:“人民万岁!”

他将把他仅存的一切、死后身名,以及,73 岁的自己最后仅余的生命,全部的、彻彻底底绝无反顾的奉献给他的人民。

武汉全城的老百姓倾城出动,在长江两岸亲眼目睹了毛泽东在长江中畅游的伟人形象。尽管离得太远,根本看不清楚,但是人们仍然非常兴奋。

当时的《人民日报》报导了这次畅游长江活动:

“七月十六日这一天,长江水面笑逐颜开,沿江两岸大堤上,无数彩旗,巨幅的标语,欢呼的人群,呈现出一片无比欢腾的节日景象。

“武汉全城男女老少,欢欣鼓舞,奔走相告:‘我们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这样健康,这是全国人民的最大幸福! 是全世界人民的最大幸福!’

“毛主席迈着稳健的步伐,从船舷的扶梯上走下来,先在水里浸了一下,然后便伸开双臂畅游起来……在浩瀚的江面上,他时而挥臂侧泳。拨开层层波涛,破浪前进;时而仰卧水面,看万里碧空。”

回到下榻的东湖宾馆,王任重看到毛泽东还无倦意,就坐在他的对面想说什么,没等他开口,毛泽东就问:“你对形势怎么看? 能否具体谈一谈啊!”

“主席 7 月 8 日致江青同志的信我看后,产生了这种感觉。主席说:‘全世界一百多个党,大多数的党不信马列主义了,马克思、列宁也被人们打得粉碎了,何况我们呢? 我劝你也要注意这个问题,不要被胜利冲昏了头脑,经常想一想自己的弱点、缺点和错误。’主席的这个估价是对的,但我总觉得中国不是这样,也不会是这样。”

“为什么呢?”

“因为有毛主席的英明领导。”王任重说,“不过,我还是同意主席的断言和预见的:“中国如发生反共的右派政变,我断定他们也是不得安宁的,很可能是短命的,因为代表90%以上人民利益的一切革命者是不会容忍的。那时右派可能利用我的话得势于一时,左派则一定会利用我的另一些话组织起来,将右派打倒。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一次认真的演习。有些地区(例如北京市),根深蒂固,一朝覆亡。有些机关(例如北大、清华),盘根错节,顷刻瓦解。凡是右派越嚣张的地方,他们失败就越惨,左派就越起劲。这是一次全国性的演习,左派、右派和动摇不定的中间派,都会得到各自的教训。’主席的这些活,写得非常精彩!”

毛泽东听着,暗暗为王任重的记忆力吃惊。自己的这封信写好后,正赶上周恩来到武汉汇报工作,便把信让他和王任重看了一遍。没想到这位秀才书记过目不忘,记得如此熟悉,几乎连字句都没什么错误。

“听说武汉也派了不少工作组。你把它撤出来吧。”毛泽东说,“让学生娃娃们闹腾一阵子嘛,不要怕乱。乱一阵子有好处。”

“乱不得呀,主席。”王任重说。

“噢?”毛泽东不动声色地问:“那你们这里的文化大革命是怎么个搞法呀?”

“根据中南各省报上来的情况看,我们这里的文化大革命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可以收尾了。”

“收尾?”毛泽东一怔,“你们都取得些什么样的胜利啊?”

“目前,各地已经揪出了一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头面人物,例如广东省作协主席、羊城晚报副总编辑秦牧,中山医学院党委书记兼院长柯麟、副书记兼副院长刘志明,武汉大学校长李达、副校长何定华、前党委书记朱劭天、武汉市文化局党委书记程云、文联副主席武克仁,湖南省文联副主席康濯,河南省郑州大学副校长、省社联主席郭晓棠,广西区党委宣传部副部长陆地,等等。随着运动的深入,可能还会有一些黑帮黑线人物落网。”

“我看有些人不一定是黑帮,将来要平反。”毛泽东说。“你是主张派工作组的吧?”毛泽东突然问道。

王任重并不知晓毛泽东的用意,他很诚恳地点点头说:“是啊,没有工作组不行。事实证明我们党搞群众斗争,离开工作组就会出偏差,这是成功的经验。当然,文化大革命来势凶猛。工作组出些偏差是难免的。正如少奇同志讲的:运动的主流是健康的,前进途中不可避免地会有曲折和错误,但这毕竟是支流。”

毛泽东笑了笑:“你倒是很会用辩证法来看问题哪。看来你这个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还没有深入到学生中去多了解些情况,可以多和伯达、康生同志交换一下思想,然后再表态好不好呵?”

# 第89回：历史所，少数派意外平反 回北京，刘少奇求见未成

7月17日，陈伯达和戚本禹等人再次来到广播学院了解情况。陈伯达在座谈会上讲了话，赞扬了广院学生的革命精神，提出工作组犯了方向路线错误。下午，戚本禹和关锋等人又来到社会科学院的历史所。

6月4日，学部在吉祥剧院组织了一次关于杨述“青春漫语”的批判会。会议发言不久，忽然哲学所部分青年学者打破惯例，冲上主席台抢夺话筒，强行发言，当场指责坐在主席台上的党组书记关山复、刘导生等人搞假批判、真包庇的把戏，一时间会场乱成一锅粥，争吵声、口号声此起彼伏。有人高喊冲击会场者：“滚下台！”有人则支持冲击会场强行发言者。最后，主持者只好宣布暂时休会。

第二天，在学部大院贴出第一批大字报，一部分人反击冲击会场者，维护党组领导；另一部分人则揭批党组，揭批“保皇派”。以哲学所和《新建设》杂志为首的一批年轻人最为激烈。而学部机关一些党员则写大字报予以反击。其他大部分人持观望态度。

6月中旬，吴传启、林聿时推出学部副主任兼哲学研究所所长潘梓年掌握学部文革的领导权。

潘梓年是潘汉年的哥哥，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9月，在上海北新书局主编《北新》、《洪流》等进步刊物和中共江苏省委主办的《真话报》。1930年任社会科学家联盟的负责人，后调任左翼文化总同盟书记，曾主持丁玲、田汉等人的入党仪式。1937年12月，根据中共的指示以社长的身份赴南京筹办《新华日报》的出版，抗战时期任《新华日报》社社长，被誉为中共第一报人。潘梓年还是很有名气的哲学家，是最早将形式逻辑引进中国的学者之一，他弟弟潘菽是中国现代心理学的奠基人之一，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国科学院心理学研究所所长。潘梓年1954年调中国科学院筹建社会科学部和哲学研究所，任

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副主任兼哲学研究所所长。在学部,在中国社会科学的圈子里,人们都尊他为“潘老”。

6月26日,时任中央宣传部长的陶铸,向学部派出了以国务院文办主任张际春为首的工作组。这个工作组进驻学部后,即与吴传启、林聿时、潘梓年相结合,共同领导学部的运动。

6月下旬,在学部召开的一次全体工作人员参加的批斗会上,张友渔夫妇双双被推到台上批斗。在群众质问他们的时候,张友渔夫人韩幽桐,一个“一二·九”运动时参加过卧轨栏截火车的蜚声学林的女战士,新中国成立初任宁夏高级法院院长,“文革”爆发时任法学所副所长,跳着脚愤怒据理反驳,毫不示弱,犹如一只好斗的公鸡。而张友渔则态度恭顺,从容应对。他还拍着怒不可遏的夫人肩头连声劝说:“正确对待群众”。

随着社会上革命风潮一浪高过一浪,报刊电台都是鼓励群众起来革命的文章。历史所当初给尹达贴大字报而受到批判的几个年轻人越来越不服气。7月16日深夜,傅崇兰、孟祥才、周绍泉、黄秉枢、栾成显、彭邦炯等6人在学部办公大楼门厅最显著的位置贴出大字报,批判历史所发生的斗争他们的事件,认为这是镇压革命派。大字报在学部大院引起轰动,这几个人的大字报立马又引来对他们更残酷的批斗,硬逼他们承认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年轻人终于还是屈服了。傅崇兰又在学部大楼贴出大字报,检讨自己的错误。

检讨的大字报刚刚贴出,第二天,即7月17日下午16时左右,历史所的秘书翟清福突然找到孟祥才,说有要事。他们一起赶到学部大楼的潘梓年办公室。进门一看,孟祥才吓了一跳,只见里面坐着张际春、关锋、戚本禹、曹轶欧和毛泽东的女儿李讷。

孟祥才脑子一大:“坏事了!肯定是有人将我的情况反映到戚本禹那里,他今天来肯定是批评我的。”

他僵在那里,不知所措,这时戚本禹大声说:“孟祥才这边坐,有人说我是他的后台!”他拍着靠近他的沙发,招呼孟祥才去坐。

孟祥才见戚本禹对他的态度不错,心里稍稍宽慰了一点,就走过去,坐在了他的旁边。戚本禹小声问孟祥才:“受苦了?检讨了吗?”

孟祥才说:“检讨了。”

戚本禹说:“检讨收回。你们革命是对的,重新起来跟他们斗!”

这时,关锋与张际春商量了一下说:“据我们了解,这几天历史所发生了严重的镇压少数派的事件。今天我们是按陈伯达和康生的指示,到历史所为少数派平反。请张老为首的工作组协助做好工作。”

张际春随即检讨说:“我对历史所的运动关心不够,认为尹达是中央文革成员,他领导的单位不会有问题,结果是少数派受了镇压。工作组要转过来,一起做好善后工作。”

这时已到晚上19时左右,关锋宣布晚上在历史所召开全体工作人员大会,要历史所有关人员负责通知,说完他们就到食堂吃饭去了。

约20时左右,在历史所小礼堂召开了全体人员会议。关锋、戚本禹为代表的中央文革小组人员、张际春为首的学部工作组都坐在主席台上。关锋当场宣读了陈伯达的三点指示:

一、郦家驹立即停职反省;

二、立即释放一切被关被斗的群众;

三、切断尹达与历史所的一切联系。

关锋代表中央文革小组宣布为历史所的少数派平反,要求大家一起揭露历史所学术秘书室负责人郦家驹等人镇压群众的罪行。他说郦家驹是个坏人,解放初曾因倒卖黄金被处罚。从此,尹达,这位早在1931年便已参加河南安阳殷墟发掘的历史学家,1938年在延安加入中国共产党,解放后成为中国科学院社会科学部委员、考古研究所副所长、历史研究所第一副所长,曾多次受到毛泽东表扬的左派,一顶“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就使他靠边了。

7月17日这天,毛泽东在武汉接见了三批外宾。接见完后,他即乘专列离开武汉,经郑州于午夜到达邯郸。

7月18日凌晨2时,毛泽东乘专列离开邯郸,上午回到了离开有半年之久的北京。当他走进丰泽园,发现园内的房子已经修葺一新,正房向阳一面还新修了一道双夹道走廊,安上双层玻璃。毛泽东大为不悦,这样未经他同意的修缮,毛泽东认为实在是在耗费国家钱财。为了表示他的不满,他很快就搬了出去,住到中南海怀仁堂东侧游泳池旁的房子里了。后来,人们把这里统称为“游泳池”。毛泽东住在室内游泳池之侧。他的住处,有一间不大的卧室,另有一间大厅,那是书

房兼客厅。后来在电影、电视和新闻照片中常常出现的毛泽东会见外宾的镜头,就是这间大厅。他在那里一直住到1976年唐山大地震,前后十年。

回到北京的毛泽东,立即接见了康生、陈伯达,听取陈伯达等人关于文化大革命情况的汇报。

刘少奇18日白天在怀仁堂主持会议,讨论教育革命等问题。听说毛泽东主席回北京了,晚上,他驱车赶往毛泽东住处,打算汇报前一段的工作,只见毛泽东住所门前停着几辆小轿车,屋内灯火通明,显然,毛泽东家里有客人。门卫进去通报之后出来了,告诉刘少奇:"毛主席刚刚回到北京,很疲劳,现在已经休息了,不便打扰。"

刘少奇吃了闭门羹,怏怏返家。

第二天,刘少奇再度来到毛泽东那里,毛泽东已经从陈伯达、康生那里听过汇报。没谈几句,他便对刘少奇说:"派工作组是错误的。回到北京后,感到很难过。冷冷清清。有些学校大门都关起来了。甚至有些学校镇压学生运动。谁去镇压学生运动?只有北洋军阀。凡是镇压学生运动的人都没有好下场!"

"'内外有别'是怕革命,大字报贴出来又盖起来,这种情况不能允许。这是方向错误,赶快扭转。把一切条条打个稀巴烂,给群众定框框不行。北京大学看到学生起来,定框框,美其名曰'纳入正轨',其实是纳入邪轨。"

19日至22日,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常委扩大会议,主要议题是讨论"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情况。

陈伯达在19日的会上率先提出撤销工作组。他说:"工作组起了坏作用,应当撤离。应当相信群众,放手发动群众,让他们自觉起来革命。"

陈伯达还书面对工作组的问题提出两条意见,认为工作组起了"坏作用"。他说:"工作组不会比学生高明,工作组都自称是党中央、毛主席派去的。有的工作组整学生。"

陈伯达的意见得到周恩来、康生、陈毅、陶铸的支持,但仍然遭到邓小平等多数人的反对。邓小平说:"对工作组要正确估计。我们对这样的运动没有经验,他们也没有经验。坏的工作组可以先撤,好的

工作组可以留,代理党委工作。”

主持会议的刘少奇也支持多数人的意见,他说:“工作组有好的、有坏的,他们在第一线,有他们的辛苦,要求不能过高。现在是如何帮助他们,教育他们,总结工作经验。学生中间认识不一致,行动不一致,可以再辩论。”

刘少奇在会上还说,大学里要不要派工作组的问题,是从当时怎样实现党的领导方面考虑的,派工作组比较机动。个别工作组的领导有缺点、出了毛病,但多数基本上是好的,现在还是帮助教育的问题。刘少奇汇集了在京的中央负责人对工作组的看法,并做出“工作组有三种类型”的结论。他认为,工作组一种是实行“三同”,同左派一起斗牛鬼蛇神;另一种是当官做老爷,脱离群众;第三种是更加脱离群众。然而,这么大的运动,来势又如此猛烈,依靠谁去抓?党的领导总得通过一定的形式去实现,这个形式就是工作组,有了工作组就比较主动。大部分工作组还是好的,因此对工作组不能采取消极撤换的办法。

与会者还就如何开展大辩论、辩论中如何领导、斗争的范围、如何明确斗争目标以及大学生能否串联等问题进行激烈的争论。

最后,刘少奇宣布:“主席已回到北京,这里的汇报会停止,今后直接到主席那里汇报。”

当晚,毛泽东在怀仁堂主持政治局常委会议,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人出席。毛泽东听取汇报。

7 月 19 日这天,北京地质学院工作组原定晚上开大会斗争 13 名反对工作组的干部和教师,这些人都已被定为反革命分子,并准备当场抓走两人。但是当天晚上,没有开会,平静地度过了。

这天,清华大学工作组原准备批斗蒯大富的大会也紧急刹车,改为批判黑帮大会。

头天晚上,北大工作组组长张承先对北大“618 事件”的处理做了检查,这种引火烧身的行动,在全校引起很大反响。北大的师生全都让张承先搞糊涂了,尤其是对陈必陶那张大字报,他 17 日还定性为“别有用心”,18 日晚竟然又说它是“革命大字报”,无论是拥护还是反对陈必陶大字报的人,听了都大骂张承先简直在开玩笑。19 日这天,北大掀起了批判张承先工作组的高潮。继陈必陶等五人大字报后,历

史系学生、胡耀邦的儿子胡德平贴出大字报,批评工作组“不应当做保姆。”历史系王复兴和徐森、张文虎、王渊涛、俞政等人在38楼北墙贴出支持胡德平的大字报,批评工作组。但也有许多学生表示支持工作组,说工作组是革命的,是在革命中出现的缺点错误。全校运动再次活跃了起来,连教授冯友兰都出来贴了大字报。

晚上,一些哲学系的学生征询聂元梓的看法,聂元梓称“工作组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晚23时,哲学系学生在大饭厅等处设立演讲台,传播聂元梓讲话,批评工作组是保皇党。聂元梓的话再一次在北京大学引起震动,为工作组问题,大饭厅里通宵辩论。

已吃过安眠药睡下的张承先突然被叫醒,他得知了聂元梓讲话的内容,立即召开领导小组紧急会议。大家对聂元梓的做法非常气愤,说聂元梓曾任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工作组所有工作情况她是清楚的,处理“618”事件时她也是表示同意了的,为什么又跳出来反对工作组。杨克明气愤的说:“聂元梓本身有很多问题,需要向领导反映,让领导了解聂元梓是个什么样的人,这个人是不能依靠的”。

关于聂元梓曾任工作组办公室主任一事,是北京大学工作组领导小组于进校后的6月10日研究确定的:由工作组副组长、团中央候补书记张德华负责办公室、资料、简报工作。办公室主任聂元梓,副主任杨克明。但是聂元梓没有接到参加工作组工作的通知,她一直都在哲学系自己的办公室里工作。到了6月29日,北京大学工作组确定的工作组负责人的名单已经是:

领导小组办公室(一)主任:李芳林,副主任:任小风、刘寄久、张恩慈。

大家认为,聂元梓的行为太无组织纪律性了,领导小组决定将这个新情况迅速向市委汇报,看看市委的态度。

7月19日晚召集的工作组领导小组紧急会议结束时已是20日凌晨,张承先赶到北京市委向李雪峰汇报此事。李雪峰听了汇报后却说:“你们不能把聂元梓的讲话简单看成是违犯组织纪律问题,要从政治上考虑问题,要考虑工作组本身工作上有什么问题。工作组听取聂元梓的意见,并广泛听取群众意见,多做自我批评,争取主动。”

邓小平也很快知道了这一情况,他急忙让妻子卓琳给在北京大学

上学的女儿邓楠打电话,指示她:“多给工作组提建设性意见,不要提破坏性意见。”

20 日,在北京大学历史系三年级学习的李雪峰校女儿李丹林和同班同学王海治等贴出大字报,提出:“批评工作组,拥护工作组。”接着,邓小平的女儿邓楠、贺龙的女儿贺小明、冶金部副部长吕东的女儿吕宏等 6 个干部子弟也在大饭厅东墙贴出《爱护工作组,保护工作组》的大字报,基本态度是保护工作组就是保护党的领导,不少人响应。很快,在这张大字报下边,又贴出历史系学生罗志刚、王复兴、徐森、张文虎、王渊涛、俞政、杨桂香、钱凤娟、虞赛莲、郑维生、李延龄等人联名大字报,针锋相对,批判工作组。许多人围观、议论这两份一上一下、对立的大字报。

21 日,校园内的大字报,大多是要求聂元梓澄清事实、回答问题的。还有不少学生找到工作组反映对聂元梓的意见。

已经从李雪峰、吴德那里了解到一些情况的张承先劝告这些同学说:“聂元梓的大字报是经毛主席肯定的,你们贴她的大字报,就把阵营搞乱了,决不能这样搞,希望大家还是帮助工作组进行整改。”

7 月 20 日,清华大学蒯大富他们班的团支书到关押蒯大富的一号楼四楼对他说:“唉,蒯大富,你回班上参加文化大革命,不要在这里了。”

蒯大富说:“不关我了?”

“没人要关你。”团支书说。

蒯大富出来后,不相信工作组真的会放他,故意绕清华园的围墙走,四面围墙他走了半圈,走到西北围墙时,看后面确实没人跟踪,这才放心了。

7 月 20 日这天,中共中央下发文件:

(1)《关于成立毛泽东著作编辑委员会的通知》,编辑委员会主任刘少奇,副主任康生、陈伯达、陶铸。

(2)中宣部已改组,陶铸任部长,陈伯达任顾问(仍是副部长名义)。

# 第90回：是危言？要准备杀头坐牢 责任大，少奇雨夜莅清华

7月20日，听了各方汇报后的毛泽东与中央领导人谈话，他说：

“5月25日聂元梓大字报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国的巴黎公社宣言书，意义超过巴黎公社。这种大字报我们写不出来的。”

“回到北京后，感到很难过，冷冷清清，有的学校大门都关起来了。甚至有些学校镇压学生运动。谁去镇压学生运动？只有北洋军阀。共产党怕学生运动是反马克思主义。有人天天说走群众路线，为人民服务，实际却是走资产阶级路线，为资产阶级服务。”

“团中央应该站在学生运动这边，可是他们站在镇压学生运动那边。”

“谁反对文化大革命？美帝、苏修、日修，反动派。”

“借口‘内外有别’是怕革命。大字报贴出去又盖起来，这样的情况不允许，这是方向性错误，赶快扭转，把一切框框打得稀巴烂！”

“我们相信群众，做群众的学生，才能当群众的先生。现在这次文化大革命是个惊天动地的大事情。能不能，敢不敢过社会主义这一关？这一关是最后消灭阶级，缩短三大差别。”

“反对，特别是资产阶级‘权威’思想，这就是破。如果没有这个破，社会主义的立，就立不起来；要做到一斗、二批、三改，也是不可能的。”

“靠你们引火烧身，煽风点火，敢不敢？因为是烧到自己头上。同志们这样回答：准备好，不行就自己罢自己的官。生为共产党员，死为共产党员。坐沙发、吹风扇的生活不行。”

“有的学校给学生戴反革命帽子。（外办的张彦跑到外面给人扣了二十几个反革命帽子。）这样就把群众放到对立面去了。不怕坏人，究竟坏人有多少？广大的学生大多数是好人。”

当有人问“乱的时候，打乱档案怎么办？”时，毛泽东说：“怕什么？

坏人来证明是坏人,好人你怕什么?要将‘怕’字换成一个‘敢’字。要最后证明社会主义关是不是过。”

“凡是镇压学生运动的人,都没有好下场!”

7月20日,江青从上海回到北京。她也没有住丰泽园,而是直接住进钓鱼台。

中央文革小组成立后,就在北京西郊的钓鱼台国宾馆15号楼办公。开始没设办公室,只是从中央联络部调来矫玉山一人做秘书,忙得几乎24小时马不停蹄。6月末,又从马列研究院调来王广宇做秘书,仍然忙得不可开交。其后陆续又调进来一些人,开始形成办公室。

随着调来的工作人员逐渐多起来,15号楼住不下,7月初将办公室搬往11号楼,由康生主持在11号楼开会,正式成立中央文革小组办公室,决定由穆欣、戚本禹、曹轶欧负责,穆欣为召集人。下设文电组,由穆欣兼管;简报组,由戚本禹兼管;调查组,由曹轶欧负责。第一任办公室主任是穆欣,副主任为戚本禹和曹轶欧。

江青回到北京后第一件事,就是立即建立文革小组的办公机构和制度,筹办文革小组刊物《快报》。她将中央文革办公室又从11号楼搬到16号楼,会议室也设在钓鱼台16楼,陈伯达、江青、康生和其他中央文革小组成员都在16楼议事、开会。这次指派王力任办公室主任,戚本禹、曹轶欧、穆欣为副主任。江青要王力和肖华、刘志坚商量,从部队调100个团以上政工干部到中央文革办《快报》,向政治局常委和毛泽东反映文化大革命的动态。《快报》暂时在《解放军报》印刷。这100人公开名义是《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光明日报》、《人民日报》记者,实际是作为文革小组的联络员、巡视员,到各地、各部门了解情况。文革小组人少,不准配专车,需要人临时调。

接着,江青又建立了文革小组碰头会制度,规定每天下午15时碰头,小组全体成员参加,另外需要谁就通知谁,稍微重要的事就通知周恩来和陶铸。后来几乎每次都通知他们二位。

在江青的一手操办下,中央文革小组有了办事机构的雏形。尽管陈伯达一直感叹人们不了解他的行政管理能力,不给他实际权力,但是,在江青回到北京之前,文革小组在他这个组长的领导下,也确实没有看到太大的作为。

接着,江青在一次文革小组会议上对大家说:“这次文化革命既然是革命,同志们就要做好杀头、坐牢和开除党籍的准备。愿意革命的请跟我们走,不愿意革命的现在离开中央文革小组还不晚。”

当时关锋、王力都说江青是在开玩笑,康生对他们说:“不,绝对不是开玩笑,完全有这种可能。我们的毛主席曾经准备好了被赫鲁晓夫那样的人赶下台的准备,他和林彪等同志谈话的时候,几次掉泪。同志们,是哭了啊。这场文化大革命可是史无前例的,要触动许许多多的人的既得利益,这些人不抵触那倒是千奇百怪的了。所以,斗争发展到一定的阶段的时候,很可能要流血,要发展到武装斗争。”

他甚至说:“脑袋掉了不过是碗大的一块疤,没有什么了不起。如果用我康生的血能换来群众斗争的胜利的话,我情愿马上去死。”

陈伯达把这话反映到毛泽东耳朵里后,毛泽东问他:

“你这个老夫子怕不怕呀?康生讲的这些是可能的。我这个人打了一辈子仗,习惯了。党内走资派要造反,我就上山和他们打游击去。这场文化大革命实际上就是第二次革命,是真正意义上的无产阶级革命,你没有这个思想准备是不行的。说是文化革命,也就是政治斗争。”

7 月末,王任重以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的身份住进了钓鱼台 2 楼,刘志坚也住进 2 号楼。当时王任重身兼中南局第一书记、湖北省委第一书记,加上不久前陪毛泽东畅游长江,名声显赫。他在中央文革的四位副组长中,排名仅次于江青。来北京时,王任重将自己的一套工作班子从武汉带来,在钓鱼台设立了自己的办公室,所以,他的一切事情都可以由自己的办公室办理,平时一切活动都在 2 楼,无需往 16 楼跑,只是在开中央文革小组会时才到 16 楼去。

毛泽东让王任重过问北京的大中学校的文化革命运动,因此,在钓鱼台 2 楼的王任重工作非常繁忙。清华大学是王任重关注的重点,他派了两批联络员进驻清华大学指导运动,后来,他用“北京新市委大学工委”联络员的名义,把他从湖北带来的秘书等派驻清华,又从解放军政治学院调来 12 名干部共同组成清华大学和清华附中的联络员,这些联络员由他直接掌控。

7 月 21 日,中央文革小组派王力、关锋到清华大学调查了解情况,

他们来到蒯大富的宿舍找到他,王力自我介绍说:“我们是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他叫关锋,我叫王力,请你讲讲你对工作组有什么意见?”

此时的蒯大富还没有听说过中央文革小组这个机构,也不知道关锋、王力是谁,有些茫然地看着他们,一时不知说什么好。

王力很健谈,他滔滔不绝地对小伙子介绍了文化大革命的发展趋势,越说越兴奋,甚至透露了伟大领袖在18日返回北京后对中央文革的表态内容。他的嗓门也越来越大,召来同学在门口偷看。关锋不时轻拍伙伴的肩膀提醒他。

蒯大富还是不大信得过他们。他简单地讲了一下情况后说:“对工作组的意见,我写一个材料给你们。”

中央文革小组派人探望蒯大富的消息闪电般传遍了清华园。左派激进学生欢欣雀跃,他们都预感到:一场新的暴风雨就要降临了!

王光美听到后说:“就这么谈一两次活,也不到群众中做更多的调查研究工作,就能认为他是革命的?”不久,王光美专门找蒯大富班上的其他同学座谈,说蒯大富是错误的,应当批判,继续“反蒯”。

后来,中央文革小组找王光美谈话,王光美坚持“反蒯”斗争是对的。接连几天,她亲自组织人整理关于蒯大富的材料,又写大事记,又写报告,而且亲自修改。报告有了一个初稿,她马上送给刘少奇看,希望能够证明“反蒯斗争”是正确的,“反干扰”是必要的。

7月2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从群众中来 到群众中去》。

这天,毛泽东继续关于工作组的谈话:

“开两天会,讲了一些文化大革命的工作,主要讲工作组要撤,要改变派工作组的政策。前几天讲工作组不行,前市委烂了,中宣部烂了,文化部烂了,高教部也烂了,《人民日报》也不好。‘六一’公布大字报就考虑到非如此不可。文化革命就得靠他们去做,不靠他们靠谁?你去,不了解情况,两个月也不了解,半年也不了解,一年也不行。如翦伯赞写了那么多书,你能看?能批判?只有他们能了解情况。我去也不行,只有依靠革命师生。现在总是怕字当头,总是怕乱。现在停课又管饭吃,吃了饭要发热,要闹事,不叫闹事干什么?只有依靠他们搞。照目前办法搞下去,两个月冷冷清清,搞到何年何月?昨天说,你们要改变派工作组的政策。现在工作组起了什么作用呢?一起阻

碍作用,二不会。一不会斗,二不会改。我也不行。现在无非是搞革命,一是斗坏人,二是革思想。文化大革命,批判资产阶级思想权威,陆平有多大斗头?李达有多大斗头?翦伯赞出那么多书,你能斗了他?群众写对联讲他是:'庙小神灵大,池浅王八多'。搞他你们行?我不行,各省也不行。什么教学改革,我也不懂,只有依靠群众,然后集中起来。

工作组改成联络员或是叫顾问,你们讲顾问权大,那还叫联络员。工作组一个多月,起阻碍革命的作用,实际上是帮了反革命。有的工作组是坐山观虎斗,看着学生斗学生。西安交大限制人家打电话、打电报,限制人家上北京。要在文件上写上,可打电话,可打电报,可派人到中央。党章早就有了嘛!南京《新华日报》被包围,我看可以包围,三天不出报,有什么了不起?你不革命就牵引到你头上来。为什么不准包围省市委、报馆、国务院?好人来了,你们不见,你们不出去,我去见。你们又派小干部,自己不出去,我出去。总之,是怕字当头,怕革命,怕动刀动枪,都不下去,不到有乱的地方看看。李雪峰、吴德你们不去看,天天忙具体事务,没有感性知识,如何指导?南京大学三次大辩论,我看不错。所有到会的人都要到出乱子的地方去。有人怕讲话,叫讲话就讲几句:我们是来学习的,是来支持你们革命的,召之即来,随叫随到,以后再来。

你叫革命的师生一点毛病没有?搞一、二个月一点感性知识都没有?你去就是叫围吗?广播学院、北师大打人问题,有人怕挨打,叫工作组保护自己。没有死人嘛!左派挨打受锻炼。总之,工作组是一不能斗,二不能改。半年不行,一年也不行。只有本单位的人才能斗,才能改。斗就是破,改就是立。教科书年年编不出来,我看可以去繁就简,错误的去掉,加来不及了,加要加中央社论和通知,那个是方向、指南,不能当了教条。如:处理广播学院打人,哪本书上有?哪个将军打仗还翻书?现在这个阶段要把方向转过来。

文化革命委员会,要包括左、中、右,右派也要有几个。如翦伯赞可以被右派用,也可被左派用,是个活字典,但不能集中,像中华书局那样。可搞个训练班,活字典,只要不是民愤极大的。代表会,革命委员会都要有个对立面,常委就不能要了。

除你(李雪峰),那个市委,人员不要多,多了他们就要‘革命’。打电话,出表报。我这里就一个人嘛,很好嘛。现在部长很多人都有秘书,统统去掉。我到延安前就没有。市委机关可搞个收发。你夫人不要当秘书了,下去劳动嘛。国务院的部有的可改为科,庞大机关,历来没有用。

有些人不想想,一不上课,二管饭吃,三要闹事,闹事就是革命。工作组出来后,有些要复辟,复辟也不要紧,我们有的部长就那么可靠?有些部、报馆是谁掌握呀!我回北京四天后还倾向保现成的,许多工作组就是阻碍运动,如清华、北大,文件要马上写上。行凶、杀人、放火、放毒的才叫反革命。骂人、写反动标语的不能抓。有人写‘拥护党中央,打倒毛泽东’,你抓他干什么?他还拥护党中央嘛!历史反革命留下用,表现不好的斗嘛!不准打人,叫他们放嘛!贴几张大字报、几条反动标语,怕什么?!

有人讲团中央‘三胡’糊里糊涂。明明白白站在资产阶级方面,什么糊里糊涂?团中央不但不支持学生群众运动,反而镇压学生群众运动,应严格处理。”

《516通知》虽然提出了文化大革命的纲领,但并没有具体解决如何搞文化大革命的问题,因此,各地的党政领导,包括中央的刘少奇等人,面对突如其来的群众风暴,不知如何应对。毛泽东曾指示中央文革小组起草一个具体指导文化大革命的文件,由陈伯达、康生、陶铸主持,陈伯达执笔,原为中共中央指导文化大革命的文件草案,最初为十二条。根据毛泽东6月30日给刘少奇、邓小平信中的意见,7月16日,陈伯达报送毛泽东审阅的印发稿已将内容扩展为二十三条,题目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和党的若干方针问题(草稿)》,共19页。

7月21日,毛泽东在陈伯达7月16日的送审稿上批道:“伯达同志:此件看过,很好。工作组开一二次会,然后经政治局会议(有各中央局及上海、北京两市负责同志参加)开两三天会,讨论通过,即可用中央委员会名义公开发表。以在八月一日发表为好。后两页有点修改。”

毛泽东在批示上说的“工作组”,是指文件起草小组,即中央文革

小组。

在陈伯达送审稿的第18页,毛泽东将“文化大革命,就是为的要使各项工作做得更好、更多、更快、更省”一句,改为:“文化大革命,就是为的要使人的思想革命化,因而使各项工作做得更好、更多、更快、更省。”

在第19页,毛泽东将“毛泽东思想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最高指示”改为“毛泽东思想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行动指南”;将“把毛泽东思想作为文化革命的最高指示”改为“把毛泽东思想作为文化革命的行动指南”;将“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一句,改为:“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将要取得伟大的胜利。”

这天的深夜,雨淅淅沥沥地落着,偌大的清华园里看不见什么人影,白日的喧嚣一下子变得如此沉寂,那大字报栏上的不计其数的红红绿绿黄黄的大字报都被一条条银线似的雨点打湿了,那上面的字迹湿得有些模糊起来。忽然,有两辆黑色红旗牌轿车沿着湿淋淋的光滑如镜的水泥石径缓缓驶来,一直开到一排大字报栏架跟前。只见车一停定,两边车门同时启开,跳出几个身穿干部服的魁梧青年,他们敏捷地将黑色洋伞撑开来,接着,熟练地把后座门拉开,从车里引领出一个满头白发的男人,他宽大的厚嘴唇紧抿着,脸上布满了许多饱经风霜的皱纹,脸色有些苍白,神情显得疲惫、忧虑,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

这位老人就是国家主席、党中央副主席刘少奇。一个撑伞的警卫员搀扶着他,来到大字报栏的面前站住脚,默默地观看起大字报来。这些日子,焦躁和烦恼扰乱了刘少奇的心,他没有想到毛泽东是反对派工作组的。虽然,派工作组的决定在京的其他中央领导、国务院各部委的领导、北京新市委、各地方的领导也负有一定的责任,但是,主要责任应该由他来承担,这一点他的心里是很明白的。今天,他深夜冒雨来清华大学看大字报,是想亲自了解该校的运动究竟是什么情况,以便加深自己的认识。

# 第91回：撤与留，常委会争论不休 要决议，确定文化大革命

刘少奇从清华园走后不久，7月22日上午，天安门广场举行百万人集会，支持越南人民的抗美救国斗争，学校的学生都去参加集会了。这时，在北京大学西门，又开来了三辆红旗牌轿车，那几辆车子也开到大字报栏前停住，在几个警卫人员的护卫下，从车里钻出了引人注目的一男一女，女的年龄约莫五十开外，戴着一副黑框眼镜。而那男的看上去年龄比她大几岁，身穿浅灰色衬衣，个子较矮，背略略有些佝偻，戴着一副深色胶框眼镜，这二人正是江青和陈伯达。他们一下车，就引起人们的注意，那些正在大字报栏前浏览的师生们不约而同地都把目光投向他俩的身上。

“是陈伯达、江青。”人群中不知谁脱口而出。

群众围住了他们，其中有一个喊道：“欢迎陈伯达、江青同志亲临北大指导文化大革命！”随即掌声四起。

接着，有人呼喊“向中央文革致敬！”“毛主席万岁！”等口号。

江青也跟着高呼：“党中央万岁！北大同学革命万岁！”

这时，有人提议：“请江青同志给我们讲话！”

“请江青同志讲话！”许多人都齐声附和。

面对大家的要求，江青说：“同学们，我没有多少话可讲，因为我对情况不了解。我代表毛主席来看看你们，听听你们的意见，看看你们的大字报。因为情况不清楚，也没有什么话好讲，是不是请陈伯达同志讲讲。”

江青的讲话博得雷鸣般的掌声。

陈伯达说：“我没有什么话好讲，因为情况不太了解。我是来调查研究，根据毛主席工作方针，要进行调查研究，工作组要走群众路线。要听大家的意见，你们看到昨天《人民日报》社论没有？”

同学们答：“看了！”

陈伯达接着说:“要好好看,我们就是那种态度,工作组要走群众路线。毛主席说: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要多听,多看,多想,多倾听群众意见,你们有很多不同意见,有不同的意见不要紧,这是很好的现象,还是要回去辩论,把问题弄清楚。我就说这些。”

江青点头微笑。

陈伯达接着说:“要采取辩论的方法把道理讲清楚。我们还要了解情况,回去要研究。

同志们,同学们,让我们宣誓:誓死保卫党中央、毛主席!誓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陈伯达的讲话也博得雷动的掌声。

“毛主席万岁!”同学们热泪盈眶地高呼着。群情沸腾,呼声震天。

约11时,江青、陈伯达在燕南园召集部分同学座谈,听取各种不同意见,并作简短讲话。

这时,生物系三年级的学生樊立勤递进条子要求见江青,很快就听传叫“樊立勤”的名字,他进去了。

屋中人很多,江青问:“你是樊立勤,你写条子说你有意见,要向上反映。”

樊立勤说:“是的,我是有话要讲,我讲给您,希望您向主席反映一下,这是我的意见。”

江青说:“好,请讲。”

樊立勤说:“我认为现在的运动有问题,方向不对。中央指示,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反动学术权威。可又把矛头对准我们学生了。不是中央号召广大群众和学生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吗,不是《人民日报》号召要‘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吗,怎么又扫到我们头上来了。我们算什么,凭什么又整我们。我认为这不符合中央精神,整学生是错误的。我很不理解,我绝不接受。我希望您向毛主席反映我的意见,有过火行为制止了就行了嘛,谁打人找谁,决不能一概抓。压制学生,再打反革命这怎么行。中央让搞就搞,不让搞就不搞,这事决抓不到我们头上。我对工作组的这种做法持坚决反对的态度,这就是我希望您传达给主席的话。”

江青说:“樊立勤,你很敢讲话,思想很解放,讲话也没框框,真有

意思。”

樊立勤说:“班干部带我们去批,我们就批,不批会犯错误,会成右派;批了又错了,还打右派。我们怎么都是错,让我们怎么办,我认为工作组的这种做法是完全错误的。搞文化大革命不是主席的意见吗?这还搞不搞文化大革命了?”

下午,樊立勤在校内贴了关于江青等来北大的“号外”。

这天,北航的学生也都去天安门广场参加支持越南人民的抗美救国斗争的百万人集会,但是,戴维堤等十大“牛鬼蛇神”没让参加。晚上,戴维堤站在北航六系楼顶上,遥望中南海,心里百感交集:“我一个贫农的儿子,烈士的后代,全家被敌人杀害的孤儿,怎么一夜之间成了反革命了呢?不就是给工作组提了几个意见吗?提点意见就打成反革命,这是哪家的逻辑?伟大领袖毛主席号召我们要关心国家大事。为了红色江山不变颜色,为了中国不出修下主义,我们响应毛主席的号召,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给工作组提点意见,有什么错?不知毛主席他老人家知道这些情况不?我要让毛主席党中央知道我们的情况,我要自己救自己。”于是,他割破了手指,写了一份血书:“誓死忠于党,誓死忠于毛主席,永远不变心!”并连夜写了万言书大字报,公布了自己的家史,呼吁工作组和全院师生不要把矛头对准他。

第二天一早,戴维堤推开工作组长赵如璋的办公室门,把血书交给了他,并让他转交党中央和毛主席。赵如璋眉头一皱,似乎有所感动,收下了戴维堤的血书,安慰了他几句,并把血书交给了身边一位女军人。此人正是毛泽东主席的大女儿李敏,她当时也是工作组的成员。

戴维堤的万言书大字报和写血书的消息又一次轰动了全院。许多干部、教师、同学纷纷到宿舍来看望他,并写大字报对他表示支持和声援。

7月22日晚上,刘少奇继续在怀仁堂主持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北京市高等院校文化大革命初步规划》。常委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等坐在前排,开始是汇报会,会议先是听取北京高校目前“文革”运动情况汇报。当时各大学都在酝酿赶走工作组。刘少奇、邓小平让大家讲讲学校的情况。吴德汇报了大学情况,胡克实汇报了中学

情况,陶鲁茄具体汇报了林学院的情况,薄一波同意陶鲁茄的意见,陈毅汇报了外文委的情况。谢富治没有说话。周恩来因为有外事活动,参加了1小时就走了。

会上,康生传达了毛泽东对派工作组的意见。接着,中央文革小组的人发言,批评北京市委工作组,说工作组怕群众,压制民主,给群众运动泼冷水。

刘少奇不服,他拍着桌子上的一摞材料,辩解说:“我怎么是偏听偏信包庇工作组呢?我收到北大等许多学校的同志来信,反映的情况与工作组汇报的情况是一致的嘛!总不能说打人、戴高帽是革命行动吧?照你们这个做法,才是真正挑动群众斗群众。这个搞法不成。我们这里有材料”。

这时,康生说:“少奇同志,我们也有材料。”接着,他列举了一些学校师生来信,反映工作组镇压学生的情况。口气虽然和缓,但实际和刘少奇顶起来了。

康生刚讲完,陈伯达接着说:各级党委不能深入到这场急风暴雨之中,不深入群众,不敢放手发动群众。他提出要从北京大学撤回工作组。

“派工作组是政治局会上决定的,你们也是赞成的嘛!”陈毅说。

“陈毅同志,你要知道,外文委工作组是全国最坏的一个工作组,外语学院工作组也是镇压学生的革命行动的。”陈伯达说。

“北大没有个党委代替,撤工作组我不赞成。”一直保持沉默的邓小平霍地一下站起来,一手叉腰,一手指着陈伯达,当即表示反对说:“我们要讲得客观一些,要了解第一线的困难。什么叫放手?!要不要政策?!我们不行,你们上去。你们那样行,我们统统撤出来。党委垮了,工作组没有了,党的领导在哪里?谁来放手发动?你们根本没有搞过群众运动,你们去试试看!”

他又说:“要教会工作组做工作。有的学校没有工作队恐怕不行。”

刘少奇也讲:“多数工作组是好的,还是帮助教育,改正错误。赶工作组,有的不应该赶。”“现在工作组还是要的。实在不行的,撤了。撤了还要换,因为没有其他力量领导。”

代表军队参加会议的叶剑英、刘志坚也明确反对撤工作组。

这个会议没有设专人记录。会议进行过程中,江青蹑手蹑脚进来了,在靠着记录席外边的沙发上坐下,把手里的包放在沙发上。她没有和主持会议的少奇打招呼。江青看到了争吵的场面。她没有记录,只是听。

23 日凌晨,毛泽东在钓鱼台 12 号楼约见各大区书记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此时,他已决定召开党的十一中全会,将文化大革命以党的决议形式正式确定下来。为此,他指示陶铸在文革小组起草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和党的若干方针问题》基础上,主持起草《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决定》。他将各大区书记召来,就是要同他们一起讨论这个《决定》,做他们的工作,统一思想。他说:

“今天各大区的书记和文革小组的成员都到了,会议的任务是搞好文件。主要是改变派工作组的作法,由学校革命师生及中间状态的一些人组成学校文化革命小组来领导文化大革命。学校的事只有他们懂得,工作组不懂。有些工作组搞了些乱事。学校文化大革命无非是斗和改,工作组起了阻碍运动的作用,我们能斗能改吗?像翦伯赞写了那么多书,你还没有读,怎么斗?怎么改?学校的事,‘庙小神灵大,池浅王八多’,所以要依靠学校内部的力量,工作组是不行的。我也不行,你也不行,省委也不行。要斗要改都得依靠本校、本单位,不能依靠工作组。工作组能否改成为联络员?改成顾问权力太大,或者叫观察员。工作组阻碍革命,也有不阻碍革命的。工作组阻碍革命势必变成反革命。西安交大不让人家打电话,不让人家派人到中央,为什么怕人到中央?让他们来包围国务院。文件要写上,可以打电话,也可以派人。那样怕能行吗?所以西安、南京报馆被围三天,吓得魂不附体,就那么怕?你们这些人呀,你们不革命,就革到自己头上来了。有的地方不准围报馆,不准到省委,不准到国务院,为什么这么怕?到了国务院,接待的又是无名小将,说不清,为什么这样?你们不出面,我就出面。说来说去,怕字当头,怕反革命、怕动刀枪。哪有那么多反革命?这几天康生、陈伯达、江青都下去了,到学校看大字报。没有感性知识怎么行?都不下去,天天忙于日常事务,停了日常事务也要下去,取得感性知识。南京做得比较好,没有阻挡学生到中

央来。”

康生插话说:“南京搞了三次大辩论:第一次辩论新华日报是不是革命的;第二次辩论江苏省委是不是革命的,辩论的结果江苏省委还是革命的;第三次辩论匡亚明是否戴高帽子游街。”

毛泽东接着说:“在学校,革命的是多数,不革命的是少数。匡亚明是不是要戴高帽子游街,辩论的结果自然就清楚了。

开会期间,到会的同志要到北大、广播学院去看大字报,要到出问题最多的地方去看一看。今天要搞文件,就不去了。你们看大字报时,就说是来学习的,来支持你们闹革命的,去那里点火,支持革命师生,不是听反革命右倾话的。搞了两个月,一点感性知识也没有,官僚主义,去了会被学生包围,要他们包围,你和他们几个人谈话,就会被包围起来。广播学院被打100多人。我们这个时代就有这个好处,左派挨右派打,锻炼左派。派去工作组6个月不行,一年也不行,还是那里人行。一是斗,二是改,斗就是破,改就是立。教材半年改过来不行,要首先删繁就简,错误的、重复的砍掉三分之一到一半。”

王任重插话:“砍掉三分之二,学毛主席语录。”

毛泽东说:“政治教材,中央指示、报纸社论是群众的指南,不能当作教条。打人的问题,通知上没写也不行,这是方向、是指南,赶快把方针定下来,改过来。要依靠学校的革命师生和左派,学校的文化革命委员会就是有右派参加也不要紧,有用的,可以当反面教员。右派也不要集中起来。北京市委不要那么多人,人多了就要打电话,发号施令。秘书统统砍掉。我在前委的时候有个秘书叫项北,以后撤退的时候,就没有秘书了。有个收发文件的就够了。”

康生说:“主席谈了四件事:一是改组北京市委,照办了。二是改组中宣部,也照办了。三是取消文化革命五人小组,也照办了。四是有一些部改成科,没有办。”

毛泽东说:“是啊!部长管事的可以不改,称部长、司长、处长。不管事的就改,改成冶金科、煤炭科。”

有人插话说:北大进行四次大辩论。“六一八”事件是否是反革命事件?有人说是,因为里边有流氓;有的说不是,工作组有错误。附中有40多人要提出撤销工作组长张承先的职务。

毛泽东说:“有许多工作组阻碍运动,包括张承先在内。不要随便捕人。什么叫现行反革命?无非是杀人、放火、放毒,这些人可以捕,写反动标语的暂时不捕,树立个对立面,斗了再说。”

由于毛泽东曾两次提到广播学院的问题,7月23日上午11时,陈伯达、康生代表中央文革来到广播学院,该校有100多人被工作组打成反革命,并被限制人身自由。他们接见了这些学生,对他们表示慰问。

7月23日下午,刘少奇在中南海继续主持召开“文化大革命情况汇报会”。会上,对于是否派工作组,周恩来、陈伯达、康生、关锋等人与刘少奇、邓小平、薄一波等人形成了巨大的分歧。邓小平同志说:“党的领导被打倒了,下面的组织瘫痪了,没有党的领导,运动怎么进行。因而,应该派工作组协助党委、党组织进行运动。”

周总理这时插话说:“我们年轻时搞运动,也没有什么组织领导,学生自己可以搞运动。”

刘少奇对周恩来说:“学校运动起来了,发生那么多问题,谁能办得好呀,让你去也解决不了。”

刘少奇认为:“这么大的运动,依靠谁去抓?党的领导总得通过一定的形式。工作组大多数是好的,问题是方法不当。现在谁也没有经验,新工作拿不出章程,对工作组是帮助问题而不是撤换问题。工作组不能不要,人不要那么多是可以的。”

会上自始至终对于是否应该派工作组的问题争论不下。

接着又开中央扩大会,包括华北局的书记、北京市委的几个书记,李雪峰、吴德、郭影秋、高扬文、马力等都参加了。会上依然为工作组问题发生了很大的争执。陈伯达在会上生气的说:“我陈伯达没有派过一个工作组,我派到人民日报社、新华社、广播局的都是学习组,不是工作组,我是请他们去学习的。”

他这么一说,许多人都不说话了。

这时曹轶欧写了个条子交给康生,上面写道:“我和戚本禹同志都建议北师大罢孙友渔及翁世功两人的官,伯达同志同意”,字条旁边有陈伯达写的“我也同意”。康生看后交给华北局宣传部部长黄志刚,黄志刚看后又交给郭影秋和吴德,吴德把这个条子又交给李雪峰,李雪峰又在条子上批了一行小字:“还要考虑派人到北师大工作的问题。”

# 第92回：再走访，文革组又临北大 微服行，周恩来深入二外

中央扩大会会后，北京市委开会研究北师大的问题，确定再派人到北师大，人员由三方面的人组成，一是北京市委，二是国家经委，三是教育部。而对于罢孙友渔官的问题，李雪峰没有明确布置，只是指示郭影秋对从三个单位抽调的人员进入北师大一事进行动员。郭影秋因为要到中宣部开会，就让李雪峰改派黄志刚去动员。

郭影秋正在中宣部开会，突然接到吴德急如星火般打来的电话，让他立即回去，他在电话中说："康老很有意见，请你快回来。"

郭影秋一听，知道事情大了，立即赶回市委，与吴德见面后话都没有说，立即上车赶到康生那里。到了那里，康生十分生气地对郭影秋和吴德说："孙友渔的问题老是解决不了，是为什么？我看孙友渔有后台，有后台！后台之后还有后台！"

吴德他们立即赶往北京师范大学，代表新市委宣布撤销了工作组组长孙友渔的职务。吴德在讲话中说：

"我代表北京新市委公布一个决定，撤销工作组组长孙友渔的职务，办公室主任翁世功的职务。因为孙友渔，没有贯彻中央的方针，路线，不是相信群众，依靠群众，集中力量斗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而是害怕民主，压制民主，拒绝革命同志的批评，打击了革命群众，把锋芒转向革命同学。

6月20日早6点，高树奎等17位同志贴出一张大字报，对工作组提出三点批评，这张大字报是正确的。孙友渔同志没有听取批评，检查自己工作组中的缺点，错误，反而把这些同学和牛鬼蛇神联系在一起，使这些同学受到委屈，实际上是压制民主，拒绝批评。22日谭厚兰等同志贴出大字报要求重新估价高树奎等人的大字报，这是正确的。但立即受到孙友渔指使的围攻，对这张大字报仍采取不正确的态度，使谭厚兰同志同样受到委屈，甚至发展到打骂，监视，扣押，被迫写

检讨。

用对待敌人的办法对付革命的同志,这是非法的,上级指出后仍然没有改。今天我指出应立即恢复他们的自由,有一些同学在孙友渔的蒙蔽下,围攻另一部分同学,这两部分同学都是革命的。同学之间有不同意见可以讨论,但发生这种不正当的事情,责任不在这些同学身上。还有些同学是受孙友渔错误思想,错误办法的影响,把他们当作党的领导。出现这些现象是可以理解的。责任应由孙友渔来负。我们的工作组不管来的人职位多高,官多大,都应该受到群众的监督,工作组有毛病,都是可以批评的。按中央指示办事,我们就拥护,不按中央指示办事,我们就反对。我们同学有责任提出意见,甚至罢他的官。即使我们新市委在工作中也常出错误,同学发现了也可以批评指出。孙友渔对自己的错误采取了不正确的态度。

中央很关心文化大革命,也关心师大的文化大革命。中央文化革命领导小组13号知道后就找师大工作组主要负责同志去汇报,汇报后指出了他的错误。回来后孙友渔思想搞不通,不肯承认错误,没有执行中央指示,一直到现在对一些同学的压迫还没有解除,这就是错上加错。过去,市委也曾对孙友渔的这些做法提出了意见,6月28日找孙友渔谈过话,指出问题所在,提出了市委的意见。孙友渔表面接受,实际上并不传达下去,按新市委的指示把这件事办好,而且还破坏党的民主集中制,用工作组名义给市委及康生同志写信,其他一些工作组员都不知道。根据以上理由,决定撤除孙友渔工作组组长职务,决定刘作级为工作组党委书记兼组长。”

7月23日,毛泽东在钓鱼台12号楼听取李雪峰、吴德汇报北京市文化大革命情况,陶铸、康生等参加。毛泽东说:“我考虑了一个星期,感到北京的运动搞得冷冷清清,我认为派工作组是错误的。现在工作组起了什么作用?起了阻碍作用。领导干部都不下去,不到有乱子的地方去看看。你们不去看,天天忙于具体事务,没有感性认识,如何指导?”

23日晚,周恩来、邓小平继续在刘少奇处开会,谈工作组问题。

当晚21时,江青、陈伯达再次来北大调查。大概师生们事先得到了消息,近万名师生拥挤在大饭厅门前。聂元梓亲自打开车门,将江

青和陈伯达接下来。江青笑吟吟地握着聂元梓等人的手说：

“我是代表毛主席来看看你们的，来听听你们的意见，来看看你们的大字报。”

陈伯达和他们边走边谈，询问了有关工作组的许多问题。聂元梓和孙蓬一的心情处于紧张的顶点，一边回答他俩的提问，一边汗流浃背地扇着扇子、走到饭厅门口，黑压压的人群中爆发出掌声，学生们不时向陈伯达、江青提出这样或那样的问题，陈伯达说：

“我们是来看大字报的，是来研究北京大学的文化大革命发展过程情况的，来看看你们提了什么不同意见，看看你们怎样提问题的，来向你们学习，研究一下你们怎样进行辩论。”

我是你们的学生，你们的热情非常好，这种革命精神是最可宝贵的。可是我们在看大字报，你们一围，大字报就看不成了，你们要给我们一个学习机会嘛！”

任何工作要做好，文化大革命也一样，都必须先做学生，再做先生。我们也是这样，在大辩论中互相做学生，互相做先生。先做学生，再做先生，才能把辩论搞好，要讲事实，摆道理，讲道理。

北大同学要从主席的学习工作方法中吸取力量，把文化大革命搞好。现在我要当学生去了！”

江青和陈伯达走向临时搭成的讲台前。这里什么样的大字报都有，他们不时地猫着手看大字报。

“你是支持工作组还是反对工作组的？”江青握着一位满脸稚气地姑娘亲切地问道，那位女大学生热泪满腮，激动地说：

“我仅仅是和学生们贴了工作组的一张大字报，就被打成了右派，连写四次检查都过不了关。”

江青竭力控制着内心的冲动，却又身不由己的说：“我和你们是同样的观点，你们在下面斗，我们在上面也斗呢，斗得可厉害哪！”

在听取了聂元梓等的汇报后，江青提出召开座谈会。

此时已是夜里12点，大饭厅内外人如潮涌，口号声、呐喊声交织成一片，人们在向主席台拥挤……江青显得十分沉静，她好像特别喜欢这种激动人心的场面，在聚光灯下她的才华得到了最好的发挥，她接过麦克风，热情洋溢的说到：

“革命的同学们,我和陈伯达同志是来做小学生的,我是和他一块儿来听同志们意见,看一看你们的大字报。这样我们可以懂点事,少犯错误,与同志们一块来进行这一场文化大革命运动。我们是一块的,不会脱离你们!你们什么时候有意见叫我们来,我们立即来。

现在我们所了解的还不够多,也还提不出什么具体意见,但现在是一片大好形势,你们的革命热情是好的,干劲是好的!我们都站在你们这个革命方面。我们一定把同志们的革命热情,革命干劲带给毛主席。

革命是个大熔炉,最能锻炼人了,谁不革命,谁就走开,革命的跟我们站在一块儿,我听说你们一夜没有睡,在辩论,今天还在辩论,本来是想听一听你们的辩论会的,可是来了就不行了,所以我希望你们要睡好觉,要吃好,睡好才能打好这一仗。好,现在来请陈伯达同志谈几句。”

每个在场的人几乎都被她的魅力吸引住了。那些年轻的学生,激动得呼喊、跳动,陶醉在这轰轰烈烈的浪潮里。整个人群溶为一体,只要这位女人一声令下,真可以把任何人撕成碎片!

在一阵掌声中,陈伯达也用他那难懂的闽南普通话讲道:

“刚才江青同志讲的话,这是我们文化革命小组给大家讲的话,我完全同意她的话。”饭厅内掌声四起。

陈伯达接着说:“我们想,还要继续来向你们学习,学习你们斗争的经验。在这个文化大革命斗争中,北京大学站在最前面。我想你们一定会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在毛泽东思想旗帜下继续前进。”又是掌声。“我表示个人的意见,就是对‘六·一八’这件事情说是反革命事件,就是不对的、错误的。”掌声再起。“但是我给大家说这么一点,我希望大家在这个运动中好好学习毛主席著作,学习他怎样分析阶级,怎样分析情况,把我们中国一步一步地引到胜利的道路。在文化大革命运动当中,我们最要掌握毛泽东思想的武器,好好学习毛主席著作,看他怎样领导革命的,我们应怎样在运动中做工作。这个革命道路是不平坦的,曲折的,是会有一些反复的。像你们就有一些反复,‘六·一八’以前,‘六·一八’以后,一直在最近几天就有几种反复,是不是吗?有一些变化。革命的道路是不平坦的,曲折的,总得斗争、总得

胜利!

毛主席万岁!

毛泽东思想万岁!”

江青最后讲:“我一定把同志们的革命热情,革命干劲带给毛主席。再见了!”

7月24日是一个星期日,清晨4时,周恩来到第二外语学院看大字报。当同学们早晨起床后,走出宿舍时,被民警拦住……

有人看见了周恩来,大喊了一声“周总理来了!”于是,大家不顾民警的阻拦一涌而下,冲出了楼门。开始人少,同学们给周恩来留的空间较大,后来人越聚越多,几乎把他紧紧地围了起来。周恩来看了看手表,又看了看周围的同学们,微笑着对大家说:

“看来今天我是看不成大字报了。你们这里有没有礼堂啊?”

同学们回答说:“有教工食堂,开会都在那里。”

周恩来把手一挥说:“走,去教工食堂,我给你们讲话。”

同学们立即自动拉起两道人墙,让周恩来从中间一直走到教工食堂讲台.

周恩来到了讲台那里,转过身对学生们说:“同学们!你们坐下来,不是要听毛主席的话吗?坐下来要有好的秩序……

今天早晨我看了一个半小时的大字报,你们的大字报贴在外面,我只能趁你们睡着的时候,天亮了,你们起来了,就不让我看了。我不能坐在办公室里乱发议论,我要来看,然后向毛主席汇报。

我把你们学校当作试点,我要来连看三天,你们每天让我看一个半小时。到六点三刻大家到礼堂去,我和你们讲几句话,你们不要打电话给其他人,这也是保密。不是我怕见人,我们还是不‘自由’的,我又不能化妆,丁国钰也来到调查小组加强工作,大家要听毛主席的话。最后,我建议一起唱个歌《东方红》和《大海航行靠舵手》好不好?”

周恩来指挥大家唱完《大海航行靠舵手》,很快离去。

回来后,周恩来给刘少奇、邓小平写了一封信,谈了对工作组的看法:“昨晚所谈之事,经再三考虑,并又看了一些文件,不同意见主要由于对形势的估计和问题的认识而来,其他原因非主因,以不谈为妥,因看法不尽一致。在北京,工作组的派出,有它普遍性和必要性,但各个

工作组在本单位所发生的情况又有其特殊性,这需要进行现场调查,作具体分析。工作关系,必须谈清,并做具体规定,否则不好工作。我今晨去外语学院看大字报,增加点感性知识。”

之后几天,周恩来天天到二外看大字报。他看得很认真,不仅看完了大楼墙上贴的每一张大字报,就连贴在杂草丛中烟囱上的大字报,也趟过没膝的杂草认真地看一遍。

7 月 24 日,关锋致信江青。信中说:“我认为,目前无产阶级文化革命,实际上存在两条路线斗争”,已经“出现了一个逆流”。江青接到关锋的这封信后,十分重视,马上转给了毛泽东。毛泽东看后,十分赞成关锋的观点,并把关锋这封信转给了林彪。林彪看后,也十分赞赏关锋的“眼力”。

这天,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准备召开八届十一中全会。同时,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改革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通知》,规定高校招生,取消考试,改用推荐和选拔相结合的新办法。通知指出:“从今年起,招生工作下放到省市自治区”;“高等学校招生,取消考试,采取推荐和选拔相结合的办法”;“高等学校选拔新生,必须坚持政治第一的原则”。这个通知的发布,标志着从 1952 年以来全国统一高考制度的取消。

同日,中央、国务院还批转教育部《关于改革高级中学招生办法的请示报告》和《关于一九六六、一九六七年度中学政治、语文、历史教材处理意见的请示报告》。中央批示:目前中学所用教材,没有以毛泽东思想挂帅。

# 第93回：听呼声，一行人再访广院 答疑问，陈伯达盛赞江青

7月24日下午15时，陈伯达、康生、江青等人再次来到广播学院。这次，他们召开大会与广院的师生员工见面，陈伯达说："我们来过一次，找几个同学了解一下情况，文化革命的情况，江青同志建议我们今天再来看看大家。下面请江青同志和大家见面。"

江青在群众热烈的掌声和"毛主席万岁！""向江青同志学习！""向江青同志致敬！"的欢呼声中，说道：

"同学们！我们的小组长陈伯达同志，我们的顾问康生同志，曾经到学院来过一次，给你们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提了很好的意见。我刚从上海回来，仔细地看了你们的建议，听了他们的意见，我完全同意他们两位的意见，另外副组长张春桥同志也同意，姚文元同志也都同意他们两人的意见。我们是来向你们学习的，当小学生的。我们要听听你们的意见。我们不是来做官当老爷。你们革命热情是很好的。革命热情应该更高地鼓起来。我们不是来泼冷水的。我代表毛主席来看望你们。"

下面群众激动地高呼："毛主席万岁！"

……

江青接着说："他很关心你们的革命事业，希望你们坚决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站在文化大革命的前头，进行这场伟大的文化革命斗争。你们一定很关心他的健康吧？——我可以告诉你们：他的身体很健康！"

全场欢腾，高呼"毛主席万岁！"的口号。

江青继续说："你们的情况，我们还要继续了解，还要继续做小学生，要向你们学习。你们之间有分歧应互相谅解。你们之间的意见是可以统一的。你们之间不会有很大的冲突，不许采取围攻，迫害。现在有的同学不被谅解，以后是可以谅解的。但是，不要采取这种迫害

手段。有人把我们的子弟看成特务一样,搞围攻、盯梢、迫害我们的子弟,我很气愤,我反对!这只能怪背后的人。这是我个人的意见,你们不同意可以给我贴大字报,用斗大的字贴!

你们大门关得紧紧的,门口贴着条说什么、什么人不准进来!你们广播学院的大门比中南海还要紧,比进中南海还要难。我要来放火,我要提出强烈抗议!如果你们不改,我就把你们的红门涂成黑门!"

陈伯达:"请我们的顾问康生同志谈话好不好?"

众人高声说:"好!"

康生笑着问大家:"同志们!你们欢迎不欢迎我讲话啊?"

众人齐声喊道:"欢迎!"

康生说:"同学们,现在我有几个问题问一下大家:在广播学院文化革命运动中间,谁是主人?是你们呢?还是李哲夫?"

下边有人说:"我们!"

有人说:"工作组。"

康生:"有两种意见,一种说工作组是主人,一种说你们是主人。你们有什么权力?你们对工作组有什么权力?比如说,工作组来了,你们有没有欢迎的权力?"

众答:"有!"

康生继续问:"你们有没有贴大字报的权力?你们有没有批评他们的权力?"

众答:"有!"

康生接着说:"实行这个权力没有?有的实行过,有的没有实行过。有没有绝对相信工作组的权力?"

下面又是两种回答:一种说"有",一种说"没有"。

康生继续问:"工作组有错误有没有批评他们的权力?"

这次的回答一致了:"有!"

康生肯定了工作组的错误,他说:"工作组有错误很严重。有的说严重,有的说不严重,总之,有错误,这是事实!是四两还是半斤,一斤,你们研究一下定。严重不严重,你们研究,因为你们是主人,你们要做主,我说了不算。"

他又问:“工作组不好,你们有没有罢免他们的权力?”

下面一致回答:“有!”

康生:“你们怕不怕这个权力?”

下面异口同声:“不怕!”

康生继续:“别人说你们反党,反社会主义,是黑帮,怕不怕?”

有同学答:“不怕!有党中央毛主席撑腰!”

康生问:“‘一切权力归文化革命委员会’这个口号对不对?”

下面有两种态度,开始争论。

康生:“有不同意见,平心静气地讨论一下。毛主席说过:‘一切权力归农会’,也是不要党的领导?列宁说过:‘一切权力归苏维埃’……”

这时,下边同学发生争吵,康生说:“当然了,我说的不对,你们可以反对,可以贴我的大字报,如果我们有不对,你们可以驳么!口号是你们提的,要向你们学习,你们不要骄傲,也不要瞧不起自己,工作组要好好向你们学习。

毛主席说,从群众中来。我们不向你们学习,怎样从群众中来呢?在这个屋里,你们就是群众。我赞成一切权力归文化革命委员会,因为你们是革命的。你们有没有毛主席著作甲种本?”

众答:“有!”

康生:“毛选甲种本有一篇文章,《人的正确思想是从那里来的?》你们说你们的正确思想从那里来的?”

下面答:“从三大革命运动中来,从实践中来!”

康生:“你们的正确思想只能从三大革命中来,辩论一下,真理越辩越明,要大胆地辩论。我向你们了解一个情况,说给工作组贴大字报都要规定一个地方贴,是不是?”

众答:“是!”

康生:“开辟专栏对不对?我觉得过去也好,现在也罢,既然你们有权力,应该行使自己的权力,有人不让贴是不对的,不叫你们贴不行,地方小也不行,你们就说我说的,要让往院子里贴。贴有两个贴法,工作组好得不得了,一定要你们贴,有没有?检查一下。如果工作组违反中央指示,违反文革政策,违反群众路线,压制群众,打击群众,

你们尽管贴,房子里院子里尽管贴。

中央文革小组建议,不同的意见,上来讲!不能压制少数人的意见,少数人的意见也许是真理。

现在澄清三个问题:

(一)有人说国务院有的同志认为'一切权力归文化革命委员会'的口号是错误的。这是造谣!没有这回事。那一个讲的,要追查他,质问他,问他为什么这样造谣?为什么拿国务院来压同学?是什么行为?是什么目的?要他回答。

(二)有的同志说,北京新市委反对这个口号。我代表李雪峰同志、吴德同志、新市委声明:新市委没说这口号是反动的,没有!不错,其中有几个人是认为这个口号是错误的,有个叫杨羽的到你们学校来,说口号是错误的,这个观点是完全错误的。当然新市委接待室里也有人说这口号是错误的。不管是谁讲的,谁这样讲都是错误的。我们中央文化革命小组赞成这个口号,拥护这个口号。广播局不管谁,丁莱夫也好,认为这个口号不对,他就完全错了。要质问他们,要他们回答,要贴他们的大字报,要他们公开承认错误。

(三)毛主席没有关于文化革命的'六条指示',根本没有!"

这时,江青说:"有人递条子,说有的人有张彦的报告,有人拿着胡克实的十三条指示。张彦是犯了错误的。他带着工作队,在对外文委,陈伯达同志去看大字报,张彦就追,一直追到家里,打电话追,陈伯达同志连看大字报的自由都没有了?有29个人在陈伯达看大字报时跟陈伯达同志谈过话,张彦就把这29个人说成是反党骨干分子,并对他们实行轮番作战,有一个神经失常,眼睛都歪了。康生同志去看他时,他痛哭流涕。这是相当严重的反革命事件!中央发现了,就把张彦撤走了。因此,张彦讲的话都是不正确的,都是错误的,不要听了上了他们的当。有胡克实的什么十三条指示?没有,他不是我们这个文化革命领导小组的,他的十三条我们不承认,你们也不要听,不要上当。不少人递条子要姚文元同志讲话,我们开了一个小会,会由陈伯达同志主持,要求姚文元同志讲话,可以。但是,今天时间很少了。我建议改天由姚文元同志来给你们做专题报告好不好?"

这时,陈伯达让几个同学上台讲话。

陈伯达:“听了大家的发言,撤回广播局派来的工作组,由你们这里的同学、革命师生员工自己成立文化革命委员会。你们的上级机关、党委派联络员、观察员,他们只有听取意见,了解情况,如实反映情况,而不是站在你们的头上。你们赞不赞成这样做?”

众答:“赞成!”

陈伯达:“你们的班、系、校的各单位,大家充分讨论文化革命委员会名单,酝酿后,采取适当方式进行选举。不要性急,要大家通得过的名单。当选的人如果他不好,不称职,可以罢免撤换。党信任你们,信任群众。你们一定能把这个工作做好。

文化革命是革灵魂的命,革资产阶级灵魂的命,革一切剥削阶级灵魂的命,只有群众自己起来才能革得好,不是外面可以包办代替的。文化大革命中,相信你们能自己教育自己,互相教育,做毛主席的好学生,使中国不出修正主义,不让修正主义当权,使我们的国家不变颜色,永远是红色的。”

“以上提出的建议,是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开了会提出的意见。不是我个人意见。”

接着,陈伯达开始回答下面递上来的纸条。其中一张条子揭发有人诽谤江青,陈伯达说:“我的意见,对中央负责同志的各种各样诽谤,我们要驳斥。今天就有人递条子,说有人诽谤江青同志。江青同志是我们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第一副组长。九一八就参加了革命。30多年来,为党做了很多工作。她是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江青同志是我们党的一个很好的党员。她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从来不愿意出头露面,所以很多敌人都诽谤她。江青同志在九一八事变后在天津入党,我认识江青同志入党的介绍人。

江青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起了重要的作用。京剧改革,是文化革命很重要的开端。京剧改革的成绩,外国人也不能不承认,好人宣传这个事,坏人也不能不承认,这是一个重大的事件,而江青同志就是这个京剧改革的首创者。(热烈鼓掌)京剧改革以前,在北京很少有人看京剧,京剧改革之后,有了很大变化,很多人爱看京剧。卖票也要定座了,要定到好久才能看到戏,这是我们文化生活一个很大变化,现在只是一个开端,不能小视这个开端。这个改革对每个人的生活都有关

系,差不多每个人都要看京剧吧!京剧的改革引起了一系列文艺的改革,京剧改革引起对三十年代文艺黑线的批判问题,这就引起了要检查我们的文艺究竟执行不执行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所规定的路线,马克思列宁主义文艺路线。是执行无产阶级文艺路线,还是资产阶级文艺路线?革命经常是由一个地方打开一个缺口的。文化革命就是由京剧改革打开缺口的。包括我本人在内,都很感谢江青同志。

这个条子使我想起了历史上的革命者,没有不受诽谤,不受迫害的。你们不是有一百多人受了迫害,被当成了反革命,被限制了自由,被围攻了吗?一个真正的革命者就是要在这样的围攻中站得住。刚才又递来一个条子,是揭露诽谤江青同志的。可见有的人在这里散布流言蜚语,散布诽谤,要警惕!

我们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很高兴听到被围攻同学的讲话。很多同志递了很多小条子要讲,没能讲。今天讲不完了。今后还有时间、有机会讲。有人说你们不要听一面意见,要听两面的意见,这个我们接受。今天已经来不及听了,因为他们已经讲得很多了,将来他们还可以讲,这不算不公平吧?时间不早了,耽误了很久,现在散会。希望同志们很好地前进,(掌声)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运动中,在触及人们灵魂的史无前例的运动中,每个人都能得到锻炼。我们一定会得到胜利!(掌声)耽误大家时间,谢谢大家!”

大会结束时,已经是半夜12点了。

第二天,江青、康生、陈伯达在广院的讲话传遍了北京城,学生们竞相传抄。

# 第94回：下决心，阻碍者统统驱逐 是与非，北大万人辩论会

7月24日上午，毛泽东继续在钓鱼台12号楼召集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及部分大区书记谈话，北京市委书记吴德也参加了。

毛泽东先让李雪峰汇报北京的运动情况，当李雪峰说到“北京大学7个人的大字报，现在7个人有分裂”时，毛泽东插话：

“分裂怕什么？世界万物都要有分裂！不在聂元梓这个人有缺点，这是政治，她打了第一枪。”

李雪峰没敢再多说。

毛泽东接着讲：“没有反映，没有报告。”

康生检讨说：“我们的汇报也不多。”

毛泽东说：“什么不多，没有！”

他说：“不要搞工作组，可以搞点观察员进行调查研究，不要发号施令。整风，关门整风才不行哩！过去《人民日报》不在我们手里，中宣部不在我们手里，文化部不在我们手里，北京市委不在我们手里，这些东西都不在我们手里，不发表聂元梓那样的大字报，那才不行哩！现在我们有些同志害怕群众，共产党员害怕群众那还了得？你们都要下去，下去搞两个钟头也好，不要老坐在屋里嘛！下去头脑就清醒一点。”

“把工作组一撤，把黑帮停职反省就完了，这样可以快点。有这么一段，运动冷冷清清，就是六月二十号以后。根本撤出来，另外派几个人去当观察员。……由学生、老师的左派组成革命委员会，自己来搞。……现在搞文化革命斗争，一斗二改。斗什么？斗争那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这些是你们清楚一些，还是学生清楚一些？还有斗争学术权威，对翦伯赞这些人谁了解？”

“这不只是一个北大的问题，而是一个全国的问题，如果照原来那样搞下去，是搞不出什么名堂来的。”

会议快结束时,陶铸请示:“主席,是否找少奇、小平同志谈一下”。

毛泽东口气非常平和的说:“你谈,你去传达。”

散会后,陶铸立即来到刘少奇家,向刘少奇和邓小平传达毛泽东刚才的讲话精神。李雪峰正好有事请示刘少奇,到他家里一看,陶铸刚刚开始和刘少奇、邓小平谈起毛泽东晚上的谈话。刘少奇一见李雪峰,就让他坐下,一起参加他们的会。李雪峰忙说:“我有事,马上要去处理。”谈完事就走了。

第二天,7 月 25 日上午,毛泽东在钓鱼台 12 号楼再次和各大区第一书记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谈话,主要讨论修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和党的若干方针问题》。会上有人讲到:“工作组的同志是从全国来的,多数是好的,有从解放军来的。”

毛泽东说:“什么海军、空军、陆军,什么张承先,学校是庙小神灵大,池浅王八多,所以要依靠学校内部的力量,工作组是不行的,我不行,你也不行,省委也不行,要斗要改,都得依靠学校本单位,不能依靠工作组。全国百分之九十五的工作组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起坏作用,阻碍运动,要统统驱逐之。……学生们停课,吃饭,就是要叫他们闹事的,闹斗、批、改的,不能怕闹事。”

“主要是要改变派工作组的政策。不要工作组,要由革命师生自己搞革命,成立革命委员会,不那么革命的中间状态的人也参加一部分。谁是坏人?坏到什么程度?如何革命?只有他们懂得,工作组不懂得。他们到了那里,不搞革命。”

“学校里的问题,一个叫斗,或者叫批判,一个叫改。工作组一不会斗,二不会改,起坏作用,阻碍运动。”

“最近一个月,工作组是阻碍群众运动。阻碍革命势力,帮助反革命,帮助黑帮。他坐山观虎斗,学生跟学生斗,拥护工作组的一派,反对工作组的一派。群众对工作组有意见不让向上面反映,怕人告到中央。打不得电话,打不得电报,写信也写不得,西安交大就是这样。要允许群众通天,…… 任何人都可以写信给中央!”

“我们有些人不革命了。你不革命,总有一天命要革到自己头上来。”

“现在到了这么一个阶段,要赶快改变方针了。文化大革命一定

要依靠各学校、各单位的基本群众,左派,包括中间派。

有一些部门,工作组,没有想一想:中央宣布了大学、中学停课,事实上初中也停了,又给他们饭吃。他吃了饭不上课,他不闹事才怪啦!……一斗二改,凡阻碍一斗二改者,统统驱逐之。你阻我驱,我们提出撤销工作组,代表广大群众的意见。”

“我到北京一个星期,前四天倾向于保张承先,后来不赞成了。各单位、各机关的工作组是起阻挠作用。张承先工作组、清华工作组,都起阻挠作用。”

这天上午,陶铸匆匆向刘少奇建议,“要考虑工作组怎么撤法”。他的意见是“高中撤,初中不撤”。晚上,他再次和刘少奇商议,“看来要变,变了再说。主席批示北京市的文件时没有讲中学,但主席是倾向于高中、初三不派工作组。”

7 月 24、25 日,陶铸开始主持起草《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决定》,陈伯达具体负责执笔,中央文革的人参加。

7 月 25 日,毛泽东在陶铸送审的新华社关于中宣部举行会议声讨周扬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罪行的电讯稿上的批道:“陶铸同志阅后,退张平化同志:此件看过,可用。在第五页上将‘最高指示’改为‘指导方向’。以后请注意不要用‘最高最活’,‘顶峰’,‘最高指示’一类的语言。”

这天晚上,天空黑沉沉的,一颗星星也没有,而在北京大学广阔的东操场上却是灯火辉煌,那里黑压压的一大片尽是万头攒动,这是汪洋浩荡的人头大海。今晚 20 时,北京大学将召开全校师生员工大会,辩论工作组错误性质问题。此刻,主席台上依旧空空如也,这意味着今晚可能有重要人物将出场,全场的人,高唱着革命歌曲在等候。

不久,一辆又一辆小轿车驶入北京大学校门,在夜幕中鱼贯驶进北京大学燕南园 64 号前停下,一个又一个大人物从轿车里钻了出来:朱德、康生、陈伯达、江青、张春桥、关锋、戚本禹、刘志坚、王任重、李雪峰、吴德等。聂元梓、孙蓬一等人在门口迎接他们的到来。

在燕南园休息时,孙蓬一看见张春桥在座,便对张春桥说:

“春桥同志,六月份,我们给上海市委转去一份常溪萍的材料,不知道收到没有?”

坐在一旁的江青把脸转向张春桥也问:“春桥同志,你们收到了吗?”

“收到了,正在市委领导中传阅。”张春桥回答。

“我们给常溪萍写了一张大字报,中央文革的领导能不能帮我们转一转?”孙蓬一又趁热打铁地问道。

“可以帮你们转,你们把大字报拿来吧。”江青脸露笑容答应说。

于是,孙蓬一急忙离开燕南园,奔向哲学楼,从办公室里拿了一卷早已写好的大字报,那大字报17个人签名,聂元梓打头。当孙蓬一风风火火地赶到燕南园时,那些大人物们已登上大操场的主席台上就座。孙蓬一奔上主席台,将那卷黄纸头的大字报塞到张春桥手中说:

“春桥同志,你是上海的,就托你转给上海市委。”

张春桥接过大字报道:“好的,保证转到。”

李雪峰事先并不知道北京大学今天要开辩论会。这天下午,他在北大历史系学习的二女儿李丹林打电话给李雪峰的秘书小黄,问他:“学校的大喇叭广播中央文革小组和北京市委到北大开会,听两派意见,你知道吗?”

黄秘书此时正在北大工作组办公室同张承先谈事情,他说:“不知道呀,没有听说。我问一下张承先同志。”

张承先说他也不知道。黄秘书赶紧给正在钓鱼台开会的李雪峰打电话,告诉他这件事。

李雪峰闻讯,立即和吴德、陶鲁茄商量参加北大晚上召开辩论会的事情。当李雪峰他们赶到北京大学东操场时,看见康生在外屋坐着,李雪峰就问他:“今天是开什么会?”

康生说:“我也不知道。”

提前进京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各大区的书记今天也都来了。这次的中央工作会议是为即将召开的中共中央八届十一中做准备的。从1962年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后,中国共产党已经有4年没有召开全体委员大会了,这次召开全会,毛泽东是要为文化大革命讨个说法。为了让各大区书记加深对文化大革命的理解,端正对工作组的态度,毛泽东特地让他们也来参加今天北京大学关于工作组的辩论会。

来的人很多,一些省的第一书记也来了,他们纷纷在主席台上就

座,近百米长的主席台上挤得满满的,三、四排座位都坐不下,不少人站着。

大会由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主持,首先是朱德朱老总讲话,他说:

横扫旧的习惯势力,要夺权,必须横扫一切旧的习惯势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总是利用这种势力,孤立革命左派,保护自己,而旧的习惯势力也恰恰起着保护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恶劣作用,陆平黑帮,张承先都是利用这种习惯势力欺骗群众,组织对左派的围攻。

我们要打倒折衷主义。折中主义是冒充辩证法,其实抽掉了辩证法的革命灵魂。这个月的事实证明,折衷主义影响很广,在需要夺权的时候有人站出来摆成绩大讲"一分为二",实际上是"合二而一",反对夺权。折衷主义是机会主义,不敢造反,忘记了革命中心问题——夺权问题。

我们要打倒奴隶主义。奴隶主义不分敌我,对敌人也讲服从,讲拥护,不敢反对,被那套资产阶级专政的"组织"、"纪律"死死地束缚了。奴隶主义也是机会主义,被奴隶主义俘虏的没有革命人民的思想了。他总觉造反无理,不敢造反,安分守己,成了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的奴隶。旧的习惯势力往往影响很多人。因此左派往往处于一时的孤立地位,成少数派,革命派决不向旧的习惯势力让步,革命派不要怕暂时的孤立,形势对他们暂时不利的情况,他们顶得住,用自己不倦的斗争,排除万难,争取群众。被暂时的少数与多数所迷惑放弃原则立场,就意味着向旧的习惯势力让步,这样习惯势力,一百年也肃清不了。

打倒折衷主义!

打倒奴隶主义!

打倒旧的习惯势力!

接着,康生介绍了中央文革的几个成员,他说:"我们是受毛主席的委托向大家问候。现在我介绍一下几位同志:中央文革副组长:江青同志、刘志坚同志、王任重同志、张春桥同志,文革小组成员姚文元同志、戚本禹同志……",他还介绍了几位大区书记,以及中央文革小组办公室的曹轶欧。

随后,江青讲话,她对着麦克风话筒说:

“同志们:毛主席向你们问好——”她的这句问候,引来的是一阵阵激动人心的欢呼声和口号声。

她接着说:“同志们,毛主席要我们做你们的小学生,就是说,做革命派的学生。革命派的同学,教职员工如果需要我们来,我们召之即来。我们小组如果有什么不正确的,也可以写大字报,也可以直接写信给毛主席,也可以直接去见他。我们是革命派的勤务员,革命的跟我们一块走,不革命的走出去。我听说你们有几派不同的意见,有争论。现在请他们来讲讲,我们听听。”

接着,康生说:“同志们,刚才江青同志讲了,毛主席叫我们来向你们学习,这话不是谦虚的话,因为主席说过,一切革命的正确领导,都从群众中来,才能到群众中去,只有先做群众的小学生,然后才能做群众的先生。文化大革命靠谁来做呢?北大的这场文化革命不是靠我们,首先是靠你们,同志们,同学们、教员们,你们大家一起来做的,因此我们想在你们这个伟大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学习、学习、再学习!

我们听说,同学们在若干问题上有各种不同意见。这是很好的现象,是正常的现象,是健康的现象。真理通过辩论更清楚了。比如‘6.18’,有人说是反革命的事件,有人说是革命的。到底是什么性质的?是革命的,反革命的?还是既是不革命的,也不是反革命的?比如对工作组,有人把北京新市委派来的工作组,说成是党中央派来的,毛主席派来的。你们不要听他那一套!你们别听那套!毛主席一个工作组也没有派。你们的工作组是新的北京市委派来的。从6月1日到现在快两个月了,工作组怎么样?听说有各方面的意见,有的说是好的,有的讲有错误,有的讲有严重的路线错误。到底是什么错误?你们大家敞开讲,不要害怕,什么都可以讲,不要有顾虑。有的说工作组在这里好,有的说不在这里好。文化大革命怎样搞?靠你们搞还是靠工作组‘包办’?文化大革命怎样做法?陆平、彭佩云又怎样斗法,剪伯赞、冯定之类的又怎样斗?怎么做法?可以辩论、研究。希望听听你们的意见。

今天晚上你们讲也好,共同讨论也好,我关照你们一句,北大的文化大革命你们是主人,工作组不是主人,我们也不是主人,你们要做主

人的。这正是毛主席要我们来首先要讲的一个重要任务。我的话不多讲,我们不能下去就下车伊始哇啦哇啦的讲话。你们不是批评张承先作报告讲4个多钟头吗?讲话也要精兵简政,所以我这话暂时结束。”

# 第95回：争论急，风雨中无人离去 小太阳，彭小蒙备受赞扬

会场上的人已经站得满满的，不仅有北大全体师生员工，还有闻讯赶来的外校师生。现场气氛异常热烈，辩论激烈紧张，扣人心弦，常常出现意想不到的情况，高潮迭起，宛若电影《列宁在十月》演讲场面的再现。台下的人不断地递条子，台上的人走来走去，熙熙攘攘，热闹非凡。7月盛夏，酷热异常，个个是大汗淋漓，主席台上不少人都扇着纸扇。台下的群众反倒比较安静，个个仰着头，看着台上的一举一动。

当有人发言不赞成说工作组犯了路线错误时，康生有时插话批评。下面就递条子批评说："你们说民主，为什么插话压制我们？"

康生说："民主嘛！你们能讲，我们不能讲？！"

突然，天上下起雨来，那雨虽然不大，但却很细，很密，像花针一样密密地斜织着。师生们和来开会的中央大员们都有没有带雨具，大家就这样淋着，任雨打湿衣服，会议坚持开到深夜一点半，就连平时怕风怕声音、失眠泻肚的江青也在风雨中呆了几个小时，与会群众谁也不想散去。最后，还是江青说：

"为了关心同学们的身体健康，宣布暂时休会。"

台下向主席台上递的条子太多了，江青离开时，用报纸足足包了一大包。

散会后，张春桥回到了钓鱼台，打开孙蓬一给他的那卷大字报，题目是《常溪萍是镇压北大社教运动的刽子手，是暗藏的反革命黑帮》。张春桥将大字报浏览一遍，便陷入于沉思之中：这张大字报该如何处理呢？

正好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市长曹荻秋也来北京参加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正住在北京饭店。第二天，张春桥拿着大字报找曹荻秋商量，曹荻秋也不知道如何处理为好？最后，张春桥建议说："还是去请示一下康老吧，听听他的意见。"

当天,曹荻秋见到康生,正谈这张大字报如何处理时,康生又临时被别的人找去,没谈成。

曹荻秋感到聂元梓他们的大字报老搁在自己那里不是办法,想到北大社教问题是由邓小平同志处理的,决定去请示他,8月1日上午8点多,他让糜秘书给邓小平的秘书挂电话,将近11点,邓小平的秘书回电话说:“请曹荻秋同志马上去中南海。”

11点多,曹荻秋来到邓小平家,邓小平抽着烟,听着曹荻秋讲述那张大字报情况说:“小平同志,对北大关于常溪萍的这张大字报,我想请示您应该如何处理?”

邓小平猛地吸了一口烟,回答道:“北大社教问题已经中央书记处作了处理,这个问题不要再挑起,大字报不要再送回上海。”

“那康生同志那里呢?……”曹荻秋显得有些犹豫。

“你不要再去找康老,我会告诉他的。”邓小平颇果断地挥挥手。

邓小平的意见,很快就从康生那里传到江青耳朵里,江青恼怒地道:“上海市委不贴这张大字报,我去贴!”

那时正值八届十一中全会期间,有一天散会,曹荻秋和华东局书记处书记魏老刚走出会场门外时,江青就从后面赶上来,对曹荻秋说:“荻秋同志,北大写给华东师大常溪萍一张大字报,如果不在华东师大很快地贴出来,你们上海市委就要被动。”

曹荻秋回到北京饭店后,赶紧嘱咐糜秘书说:“把那张大字报交给机要交通员带回上海,在教卫部和华东师大两个单位贴一贴就行了。”

曹荻秋还打长途电话到上海,将情况告诉了上海市委候补书记杨西光。

在八届十一中全会闭幕那一天,曹荻秋又收到了张春桥一封亲笔信,全文如下:

荻秋同志:

北大的斗陆平计划,有一条要把常溪萍揪回斗争,已经贴出去了。据康生同志告诉我,江青同志有一次在毛主席那里也说要把常溪萍揪回来斗。此事,请你回去后同市委同志好好议一议,不然很被动。

春桥

12/Ⅷ

曹荻秋一回到上海,就和上海市委的常委们议了常溪萍的事,同意常溪萍去北京,但要住到上海驻京办事处。不久,中央文革来通知说,常溪萍不用去北京了。

7月26日晨,陈伯达再次将修改后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和党的若干方针问题》稿子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在送审稿上批示道:“七月二十六日修正稿。供讨论用。”并在这次修改稿第七页“各单位党的领导要善于倾听群众的各种意见”和“党的领导要同群众一起”两句中的“党的领导”后面,分别加上了“和革命群众中的骨干分子”11个字。此外,在其他地方还有个别文字的修改。

7月26日,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由陶铸传达毛泽东前两天的谈话内容。会议最后决定撤销工作组。第二天,由中央文革小组起草撤销工作组的决定。

北京轻工学院的学生,汪东兴的女儿汪延群和同学、朱良才的三儿子朱新民等人作为轻工学院的代表,这天到国务院信访室上访,状告轻工学院的工作组镇压学生运动,中央文革小组戚本禹亲自出面接待了他们。

当天,江青、戚本禹会见北京轻工业学院反工作组的学生代表。

江青说:“这里都是自己人,谁也不会传出去。你们来的信,我们都看了,你们这样做,是热爱党中央和毛主席!我们有你们这样的接班人,中国不会变颜色。向你们说两点:

(1)你们是受迫害的,他们那样做,只有反革命才干得出来。要是再对你们进行迫害,就是现行反革命。他们对你们是怎么迫害的?你们回去准备材料,准备控诉。

(2)不应该死,应挺起腰杆革命,你们要是死了,问题就搞不清楚了。与其自杀,不如干革命,让敌人给一刀,这样还光荣。

你们学校是要夺权的!工作队、党委可以不信任嘛,反对工作队、党委,不一定是反对党中央和毛主席。党中央和毛主席根本没派过这样的工作队,一个也没派过。

这样的工作队光撤了还不行,还要斗它。

你们来时,他们知道不知道?要是知道了,他们又要布置了,又想溜了。你们回去后要串联,要准备材料,简单扼要,要击中要害。

你们敢不敢控诉?”

学生们齐声回答:“敢!”

江青说:“我们给你们撑腰!我们要排着队去。你们讲话后,我们还要讲话。

你们要注意斗争策略,你们之间的分歧是工作队挑起的。不要把群众放在后边,不要光靠你们几个人。不要互相斗争,要争取中间群众。工作队员也会起义。同学说了一两句话错话,做了一两件错事,没关系。那些大人物说了些错话不算,为什么要对同学抓小辫子呢!“

戚本禹说:“前一个工作队包庇黑帮,被他们赶走了。后一个还是这样。他们说开门整顿10天,实际想蒙混过关。邓是个不小的官儿呢,可这个人糊里糊涂,连话也说不清楚。上次做了报告,想把责任推到同学身上。上次我在那儿看大字报,点名的全是学生,有几十个,实际上都是他们指挥的。”

江青:“你们回去,把精确数字统计上来。他们不是要找‘后台’吗?我做你们的‘后台’。毛主席给你们撑腰!”

戚本禹:“你们学校还有‘党委领导万万岁’大字报,连这样的党委也保卫?!连反对毛泽东思想的院党委也要保卫?!”

江青:“你们回去要好好干,你们是主人嘛!”

7月26日晚上,北大的万人辩论会接着召开。会议开始前,北大附中的“红旗战斗小组”排着纵队,打着红旗走进会场,会场响起一片掌声。

会议由江青主持。康生、陈伯达、王任重、刘志坚、张春桥、王力、姚文元、关峰、戚本禹、穆欣等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员及李雪峰等参加会议。

江青说:“文化革命小组成员都来了!我们的小组长陈伯达同志,我们的顾问康生同志,副小组长王任重同志,副小组长刘志坚同志,副小组长张春桥同志,组员:王力、关锋、姚文元、穆欣、戚本禹、郑季翘,还有三个组员没有来,他们有工作。

我们今天来继续昨天的调查,继续听你们的发言,有同学递条子让我讲讲,希望有不同意见的人都能说说,这很对。什么意见都听,我

们不抓你们的辫子,希望你们百花齐放,最后,达到在毛泽东思想上万众一心。有同学递条子说‘让陆平、彭佩云滚蛋!’我们的意见是让他们听着!让他们靠边站着!现在请同学们发言。”

北大附中的彭小蒙首先上台讲话,她揭发附中工作组压制他们,不让他们革命,他们几次找张承先反映意见,有时静坐半天,张承先都不见他们,最后见了,不但不支持他们革命,反而批了他们一顿。

这时,江青插话说:“大家看看张承先的官架子有多大,我来北大,他就不见我。”

当彭小蒙说到:“毛主席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时,江青说:“你们是太阳,你们是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从此前后,彭小蒙被戏称为“小太阳”。

彭小蒙口才很好,做了充分准备。她的发言引起全场热烈的掌声。当她准备走下讲台时,江青把她拉回来,热烈握手,久久不放,最后还热烈的拥抱了她。

彭小蒙和台上诸位领导一一握手。后来,江青把彭小蒙7月26日在北大的讲演稿交给毛泽东。

这时,法律系一年级的刘昆林走上台,控诉工作组对他们的迫害,讲着讲着,由于过于激动,讲不下去了。

接着,技术物理专业的刘青华作了题为《彻底批判以张承先为首

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发言,并控诉技术物理系工作组对他的迫害。

康生说:“有人送条子给我,叫我说一下,叫各种意见上台来讲,我们一万多人可以达到千言万语,可以达到万花齐放,达到万众一心。”

江青说:“有人建议今天的辩论会应将专题出一下,我们今天就辩论张承先进校后所犯的是不是路线性的错误?赶走他还是不赶走他?同志们讲活要短,不要长篇大论。下面是聂元梓同志讲话,她昨天很谦虚,很想听一听大家讲活,放在下面好不好?”

台下众人答:“好!”

江青接着说:“反对聂元梓的贺晓明、雷俞平可以上台来讲,哲二有5个同学想发言,可以派一个代表,把你们鲜明的观点精炼地摆出来。”

这时,工作组组员、秘书处的孔立明上台说:“张承先是不革命的,应该赶走。”

康生说:“一个同志写血书说《我有苦、我要诉》。”

江青说:“一个写血书的同学,叫耿佩荣,叫她优先上台讲话。”

东语系越四班的耿佩荣来到台上,揭发工作组在“618”向题上对她错误的处理。她最后说:“张承先是怕死鬼,是文化大革命的绊脚石,我们要踢开他。”她刚一讲完,台上的首长们就热烈鼓掌。耿佩荣走下台时,首长们招手目送。

接着,大字报《舍得一身剐,敢把反党反毛泽东思想的张承先拉下马》的作者、西语系法一班的宋晓明作了发言。

这期间,也有不同的意见上台发言,如:生物系一年级的学生申叔南就说:“工作组成绩是主流,犯了错误正在改。”

另外,地球物理系二年级的同学崔建昆提出,不同意罢官论,对千篇一律一边倒的发言进行批驳。他认为,工作组安排坐下学文件是必要的。错误是由于没有经验,结论是:成绩是主流,还是有缺点的。

法律系牛忠林针对申叔南和崔建昆的发言上台反驳说:“我反对上述意见,我要控诉工作组对法律系工农子弟,和革命干部子弟的迫害。”他读了《告北大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干部子女的公开信》,最后说:“张承先不是我们的领导,让他滚蛋。”

这时,江青说:“有人建议把工作组领导介绍一下。”

台下一片反对声:“不同意!”

“618 事件”后,北京大学有31 名干部子女组成的讨论会。他们的一致意见是,北京大学是“延安”(共产党的天下)不是“西安”(国统区),不应当使用暴力,应该拥护工作组。

他们听说中央文革领导小组不支持北大工作组,于是这天开会时,她们几个女同学悻悻地躲开,没有去参加。当她们正呆在宿舍里时,一位女生突然急急忙忙骑车从会场赶来,上气不接下气地说:“江青说有不同意见,希望也上来阐述,她特意让人找我们去发言。”

这几个女生顿时精神焕发,以为江青是站在她们一边的,呼啦一下都跑进东操场。其中李扬扬和雷俞平被推举为代表,十分兴奋地走上台去,慷慨激昂地演讲起来,她说:

1、工作组犯的不是路线性错误,只是严重的右倾思想;

2、对工作组功过评价,她们认为,工作组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是举得不高,不是没举,更不能说是反对,突出政治不够;

3、“初步发动了群众,还存在严重问题,不能说是镇压运动”。工作组夺权夺得好。

4、斗陆平问题,他是犯了战略步骤上的错误,一直拖延是由于客观原因;

5、“工作组错误的性质”:是严重右倾,不是路线问题,是人民内部矛盾,是延安不是西安,是革命的不是反革命的,是革命党,不是保皇党;

6、错误的根源,认识与实践的必然差距,是新兵出现了老问题。

发言结束前,李扬扬还郑重地念出她所代表其他 29 个人的名字。其中有毛泽东的儿媳张少华(即邵华,毛岸青妻子,当时在北大中文系学习)和她的妹妹张少林。

李扬扬刚走下台,江青就站了起来,她向会场问道:“同志们,同志们! 刚才那个李扬扬,把‘工作组’当成救世主,我们需要救世主吗?”

台下纷纷喊道:“不需要!”

“踢开工作组,自己闹革命!”

“打倒工作组!”

江青接着念条子:“郭来舜、刘昆林要与李扬扬辩论。”

台下有人喊:“好!”

物理系的石小阳上台说:“不能将陆平与张承先同志一起相提并论。”

东语日二班的郭来舜上台表示:“反对李扬扬的讲话,要求罢张承先的官。”

彭小蒙上台表示:“反对李扬扬的讲话,坚决要求罢张承先、张德华、沈宁的官。”

康生手里拿着纸条说:“好,请大家先看看这张条子,说,张承先妄图控制北大的革命师生,妄图把北大当作自己的根据地,可是,张承先!我们要告诉你,你想错了,我们早已看清了你的真面目,坚决把你这个‘保皇派’——人民的敌人赶下台,张承先滚出北大!滚出去。”

7月26日那天,张承先出席北京市委召开的各工作组组长会议,听取了李雪峰传达毛泽东于24日至25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精神。李雪峰说,前天和昨天开了两次会,总的主要讲“文化大革命”运动,其中几乎讲的都是大学工作组要不要撤退、要不要改变工作组的政策的问题。李雪峰传达毛泽东的话说:“文化大革命无非是革两个命。一个是斗坏人,搞黑帮;一个是搞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搞他们(指‘学术权威’),你们(指与会者)行啊!我看你们不行,省委也不行,我也不行。”“要改变工作组的政策。现在工作组起的什么作用呢?两个作用。一个作用,阻碍的作用;一个是不会,一不会斗,二不会改。”“工作组一不能斗,二不能改,半年不行,一年也不行,只有他们本单位的人才能斗、才能改,斗就是破,改就是立,有破有立,只有依靠他们才行。”在谈到北京大学的情况时,毛泽东说:“我回北京的前4天(毛泽东于7月18日回京),我是倾向保张承先的,但是有许多工作组是阻碍运动的。”当有人谈及工作组是从全国调来的,多数是好的,有的还是从解放军抽调来的情况时,毛泽东又说:“什么海军、空军、陆军,什么张承先,你行?你行?(指与会者)我也不行。”在有人谈及贴第一张大字报的7人中现有四五人反对聂元梓现在的行为,并出现了分裂的情况时,毛泽东又说:“分裂就分裂,不在聂元梓这个人有缺点,这是政治,她打了第一枪。”

# 第96回：张承先，会后急往北大赶 动真情，江青忘情诉家事

张承先听完报告，往回赶。路上，张承先觉得毛泽东当时的想法就是要放手发动群众，不怕乱，在乱中暴露问题，然后一分为二地解决问题。按照这一指导思想，张承先觉得应当改变北大工作组前一段强调的有组织、有步骤地开展运动的方针，诚心诚意地检讨自己的错误，争取得到党和群众的谅解，顺利撤出北京大学。然而，他没有想到，回到北大后，发现江青等人正在组织召开北京大学的万人师生员工大会，他刚到会场，就遭到了一阵猛烈的口号的声讨。张承先不知所云。

哲学系二班的代表董小结上台提了两个建议：1、保留工作组；2、成立以聂元梓为首的文化革命委员会，领导文化大革命。

接着，江青念下面递上来的条子，她说："有同学递条子说毛主席今天来看大字报。我从早到晚忙着看文件，接见，还没有见到他呢。我了解，他没有来。但是同学们的每个条子，每个意见他都看的。你们看我不是装了一包吗？"

全场沸腾，"毛主席万岁！"的欢呼声经久不息

江青接着说："有同学递条子说'首长同志们'，我们不是什么首长，我们是来向大家学习的，这个条子是错的。他说：'你们对不同意见为何不鼓掌？'我们都是共产党员，我们有自己的立场，自己的观点，我们同意的就鼓掌，不同意就可以不鼓掌嘛！为什么非要我们都鼓掌呢？再说我们都是学生，是来学习的。就你们看书也得一页一页地翻，你们有的观点我们还没有听清楚，我们也得慢慢学嘛！所以，有时候就不鼓掌了。"

康生也说："有人写条子写'首长'，我们是你们的小学生，不是你们的首长。问我们为什么不对双方的意见都鼓掌。我们有自己的观点，叫我们都鼓掌是不行的，我们对双方都鼓掌，岂不成了中庸主义了吗？"

这时,请陈伯达讲话。他说:“我的普通话讲的不好,我请一位翻译。”

他请王力出来为他翻译。

他说:“今天在会上听到各种不同的意见,争论得很激烈,很尖锐,这是正常现象,是阶级斗争的规律。关于对待工作组的态度问题,这是一个阶级斗争问题。

在以张承先为首的工作组这个问题上,争论这么激烈不是偶然的,这是阶级斗争的反映。我们赞成许多同志的意见,撤销以张承先为首的工作组。这是一个阻碍文化大革命大路上的障碍物。我们应撤掉这个障碍物。”

顿时,台下群情激奋,雀跃欢呼。受到压制的学生有一种终于拨开云雾见太阳的感觉,一种翻身感、解放感在全身涌动。当场有不少人激动地哭了,千言万语汇成一句话:“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

北大的学生星夜奔赴各个兄弟院校传播这个消息,学校、机关纷纷到北大进行串连,北京市大中学校反工作组的高潮再次兴起。1966年不同寻常的50天至此结束。

陈伯达接着说:“这里好像有一些同志替工作组辩护,替张承先辩护,给他擦胭脂,不过除了一些别有用心的可以不说,在我们同学中,对工作组有一些迷信,就是说得像没有工作组,同学就不能进行革命了,实际上这个工作组是你们的盖子,我建议北京新市委把这个盖子揭开。”

“我们很多同志受了一种旧社会的影响,由于旧社会的习惯势力,受了资产阶级、剥削阶级思想的影响,好像没工作组就不能革命。我们要破坏这个习惯势力。任何革命都不能由别人包办代替。”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革在我们脑子里还存在残余资产阶级灵魂的命。正如毛主席所说:这个革命是触及灵魂的大革命,要自己动手来革这个资产阶级灵魂,革一切剥削阶级灵魂。”

陈伯达接着说:“我们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商量了一下,大家觉得在这次文化革命运动中,产生这样一些新事物,新东西,新问题,像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有许多地方还成立了文化革命代表会议。

这种组织形式才是由群众自己教育自己,群众管理自己,由群众起来革命的。

我们第一个建议是:撤销以张承先为首的工作组。第二个建议是:在你们这里成立文化革命小组,文革委员会,在全校成立文化革命总委员会,或者叫文化革命代表会议。

这个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文革总委员会,文革代表会议是文革的最高权力机关,这些成员不是由谁来指定,要由群众来选举,应该在群众里面充分酝酿候选人名单,酝酿它多少次,多少天,不要忙,酝酿以后可以把名单贴出来,大家再无记名投票。我同意这种做法。我们成员都是你们勤务员,要为大家服务的,不是骑在大家头上的。……这些成员、代表选举了以后,是不是要一辈子当下去呢?不是的。今天发现了他们不称职的,可以随时撤换,由群众来撤换,由群众重新选举别的人代替他。

……

我们这些只是建议,第一是向北京市委建议,第二是向你们建议。这些假如走得通,假如你们对工作组有不同看法,还可以继续辩论。我这样说是不是偏袒了呢?是不是不公平呀?是不是你们有同学递条子说我们没有执行毛主席关于调查研究的指示呀?可以不可以呀?

现在关于'618'事件还在争论,有人说'618'事件是反革命事件,这是错误的。反过来说,'618'事件是一件群众的革命事件。有很多同学说得对。我们党的标志是党中央的领导,是毛主席的领导,这是重要的,谁代表党的领导呢?党中央。同学们说'618'就是根据党中央的精神,根据毛主席领导的精神,群众起来斗牛鬼蛇神的。我想这种说法是妥当的。

我们文化革命小组要讲的就讲完了。很对不起,我不会讲普通话。"

康生说:"同志们!昨天我提出三个问题供同学们讨论,听同学们的意见:第一个问题,'618'事件,同学们怎样看法?我们听了各方面的意见,我们小组组长也谈了我们的意见。第二个问题,请同学们考虑以张承先为首的工作组是什么性质的错误,到底怎样?要呢,还是不要呢?这个问题我们也听了多方面的意见,我们的小组长也谈了我

们的意见和建议。第三个问题,北大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做法,我们表示了我们的建议,我赞同我们小组长的建议,不晓得同志们怎么样?同志们,我们是一个建议,再重复一次,是个建议,不是命令,不是指示,不是强加于你们,一切赞同不赞同的权利不归我们,而在于你们大家。

昨天我们问过,也调查过,在文化革命中,谁是主人呢?我听到两种意见:大多数说革命师生是主人,也就是说你们是主人;也有人说工作组是主人。

今天有很多条子,说很注意我们的一言一行,一笑一鼓掌,似乎我们一鼓掌,问题完了。不是的,同志们,问题在你们,鼓掌不鼓掌有看你们,对不对要通过你们的头脑来考虑。你们不要看我们的态度,这样很危险,要是我们鼓错了,那你们不是也错了吗?"

他讲了张承先工作组的错误,是"不相信群众,不依靠群众,不走群众路线","50多天中,北大整个学校连个文化革命委员会也没有组织起来,各系有的也是在工作组包办代替下进行工作的,不是真正放手发动群众,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因此,他在路线上,思想上,组织上都犯了严重的错误。"

康生还特别提到:"刚才有个叫李扬扬的同学讲了话,我很注意。好象我们北大离开了张承先就不能革命了,好象张承先是个'诸葛亮',你们都是'阿斗'。这种观点是完全错误的。你们不是天天唱《国际歌》吗?想想《国际歌》是怎么说的?要依靠自己救自己!为什么在文化革命中不依靠自己救自己,而是依靠别人呢?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不是口头讲的,是要依靠行动来体现的。张承先口头上讲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实际上是违反毛泽东思想。无数的事实,北大运动的事实证明了掌握毛泽东思想,按毛主席指示办事,那就能达到目的,达到胜利;若是违反了毛泽东思想,主席指示,就会犯错误,遭受挫折,遭受失败。"

他说:"有的同志也这样讲,你是不是不要党的领导了?陆平不是垮台了吗?那怎么办呢?你们北大是独立王国呢?还是接受新市委的领导,党中央毛主席的领导呢?真正接受党的领导,就要真正贯彻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如果不执行,就是张承先在这里也没有党的

领导。”

康生建议同学们学习毛泽东关于接班人的五条标准。

他说:“斗陆平要靠你们大家,”“斗了他们,下一步干什么?要斗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权威,要斗翦伯赞、斗冯定。”“把资产阶级权威斗倒了,那下一步干什么呢?整个计划想过没有?下一步就要搞建议改革。学制怎么样?课程怎么样?专业怎么样?教科书怎么样?这些东西都要靠你们了。是不是我随便说的呢?不敢。现在我解答几个问题。

有一个同学写了一个条子,没有签名,不赞成我们在会上质问张承先。条子上问我们:‘你们是干什么的?你们有头脑没有?逼供信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这是有损于文化革命的,有损于毛泽东思想的。我警告你们,如果继续这样下去,会脱离群众的。’

他还要我谈谈我的看法。我们的看法很简单,我坚决反对这种看法。张承先在这里犯了这么大的错误,我们不能问问吗?难道这就叫逼吗?为什么他们把人逼死,你们不说一句话,而我们一问就是逼呢?”

江青:“有胆量的就站出来说嘛,我们不怕!”

康生:“同学们让我把话说完,一个逼,一个供,我们问他应不应该答复我们?”

台下众人答:“应该!”

康生:“这叫什么‘供’?还有一个‘信’,我们恰恰不相信他哩!他上次检查你们信不过,这次检查还是通不过,我看你们不相信他嘛!他才是喜欢我们相信他,我们就不信。当然,写这条子的有两种人:一种思想糊涂;一种是不赞成我们,想保护张承先。你糊涂,别让我们糊涂!你出去讲讲。一种是想保护张承先,也可以,也允许嘛!这么多人还不允许有几个保留他们错误的?他们保留意见也就好嘛,这是教员,是你们的反面教员,世界上没有清一色的。你们会打麻将吗?有方子,有条子,有一万、二万、三万,世界上没有清一色的方子,总是一分为二的。他的意见是片面的,错误的,我们坚决反对。但也有好处,他是反面教员,我一念这条子,你们大家不是兴奋了吗?有好处的,从这点上讲,你们可以知道为什么大右派章乃器、章伯钧还请他们吃饭,

住房,还留在那里,如师大教授黄药眠还留在那里吃饭、睡觉、聊大天。那是我们花钱请的教员。所以,同学,你观点糊涂就上来讲,观点不糊涂就给我们上课,今天不愿讲,明天讲。”

已经是晚上23时10分了,江青:“刚才我跟要发言的同志商量,是不是今天发言就到这里,我们是日以继夜地干,他们也是日以继夜地工作,大家都要早点休息。伯达同志昨天上夜没睡觉,今天又来了!”

场上群众激动不已。

江青接着说:“有人说我们偏听偏信,我讲几点事实好不好?”

众人答:“好!”

江青说:“关于‘618’是革命事件,陈伯达同志已代表我们小组发表了意见,这是革命事件。”

场上再度沸腾。

她说:“我到北大有4次了,我们认为了解得不够全面,张承先是什么样的人,我们还没有见过,他也不来见我们。刚才他给我们来了一封信,也不签名,也不是亲笔。这是极不严肃,极不郑重其事的。21号我到了北大,找了聂元梓、郭兴福(东语系朝鲜科)谈了一个钟头,有5个同学在外面听着,后来这5个要找我谈话,说聂元梓、郭兴福不能在座。我说,刚才他们讲话,你们听了,现在你们讲不让他们听,这民主吗?最后聂元梓、郭兴福二同志只好退席。他们代表31人就是今天李扬扬代表的29人。20日张承先给他们开了会。我觉得他们是受欺骗、受蒙蔽。还以为张承先是代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他们是上了当。

下面我来讲讲张承先的干部路线。在他的干部名单里有个叫张少华的。这个人我是知道的。她是核心小组领导人物。她的母亲张文秋是一个全国通报的政治骗子手。她欺骗了中文系五年级同学。我不知道她用什么办法没到外地搞社教留在北京了。跟着郝克明反攻倒算。我的一个孩子有病,一个护士同志发扬了高度的革命人道主义精神,护理我的孩子,后来张文秋、张少华他们赶走了护士,跟他结婚!是骗他和她结婚的。”说到这里,江青又加大音量:“我从来不承认她是毛主席的儿媳,毛主席本人也不承认。”她边说边哭,气得说不

出话。

这时,下面有人喊:“把张少华揪出来示众!”

张少华当时就在会场上,她一看势头不对,赶紧悄悄地离开会场,接着和妹妹张少林,连夜骑着自行车离开了北京。后来,还是刘松林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毛泽东知道此事后,保护了张文秋和张少华母女。

会后的一天,李讷来到政治学院看望集中在这里整顿的国防科委工作组成员李敏。李敏问李讷:“是谁叫你来的?”

李讷回答说:“爸爸。”

李敏问:“爸爸叫你来看我,有什么事情?”

李讷说:“爸爸怕你卷进北大工作组里边去。”她向李敏讲了邵华在北大被江青点名的事情。

李敏回答说:“我知道了。”

再说此时的北京大学辩论会上,江青还在台上讲她的家事,陈伯达走到她跟前,想提醒她别把话题扯远了,江青却视而不见,又转而攻击毛岸英的妻子刘松林。刘松林是张少华的姐姐。陈伯达不得不上去碰了碰江青的肩膀:“这些事不要在这里说了。”

“我的确非常烦恼。”江青泪水迷离地昂起头,放低音量说:“这10年来我一直受着这个女人和她一家的气,这是我烦恼的原因。”

“还有一个郝斌,是现代史支部书记,也成了积极分子,这个人到乡下搞社教2个月搞不起来,跟地主右派勾搭。李讷给和另外一些人提意见,前市委派人攻李讷,这就是前北京市委的反攻倒算!李讷毕业后,我叫她作自我批评,对郝斌讲清楚,郝斌嚣张得很,李讷作检讨时他竟不见,他们说我的孩子态度不好,我容忍了好几年了。要不要我说一说?”

台下众人答:“要!”

“那天谈话的5位同志贺晓明、雷俞平,我讲得对不对?贺晓明来了没有?我们的子弟不能盛气凌人。我们的子弟如果不和工农子弟打成一片,工农子弟可以批评,但不能笼统地对待。我痛心,这是张承先搞的鬼名堂!这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革命同志们,教师们,4年来我们受尽了气,我是受他们害的,本来我没有病,我的心脏病就是被他

们逼出来的,我讲不下去了,现在请陈伯达同志讲几句话。”

江青虽然是在讲她的家事,但她讲得声泪俱下,让在场的许多师生深受感动。尤其是听说居然有人敢在毛主席家中装窃听器,这是人们从来没有想到过的,可见阶级斗争的尖锐和激烈。很多人觉得江青到底是毛主席的夫人,她能和群众坦诚相见,一般人还做不到哩。

# 第97回：刘少奇，与康生激烈争论 赴师大，解决工作组问题

会快开完时，江青走近李雪峰问："你讲不讲？"

李雪峰忙摆摆手说："我不讲了。"

江青说："你讲讲吧。"然后转身回到主席台，冲着麦克风说："请新市委书记讲话"。她带头鼓掌。

身材清瘦的李雪峰只好将手中的扇子折起来，站起来，依然是风度翩翩走到麦克风前说：

"同学们，同学们，我首先声明我完全赞同陈伯达同志、江青同志的讲话，我认为他们的讲话对同学们的辩论会作了严密的分析，他们用毛泽东思想分析了当前存在的问题，他们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做出的结论是正确的。他们总结了运动中群众创造的新形式：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文化革命代表会议，这是一个创造性的结果，这样的结果由他们总结了，这是科学的总结，今后将要把这些总结写进我们的文件里。其次，谈一谈工作队的问题。以张承先为首的工作组是坏的工作组，主要是他们阻碍了运动的发展，妨碍了运动的发展。他没有贯彻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放手发动群众；反而采取种种清规戒律，束缚了群众的手足，50天没斗陆平，彭佩云，没打击黑帮。实践证明是坏工作组，既然是坏的就要罢官撤职。

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对工作队敢于批评，也是个新的经验。派工作组原是老传统，这次文化大革命的实践证明派工作组是不适当的。伯达同志，康老不仅批评了北大工作组，他还总结了全市工作组的经验。同志们问，坏的工作组你们负不负责任？我们有错误，我们用人不当。一个人怎样，要在实践中考验，即使在历史上做过工作，也要在新的情况下考验？江青同志掌握的材料比我们多，有些我也是才听到的，我们发现慢，斗争慢，拖延下来，我们犯了官僚主义错误。党中央，毛主席没派工作组，这是新市委的责任。……我们没有像江青、陈伯

达、康老一样到群众中来,难道我们比他们还忙吗?

关于5月25日的报告,5月25日新市委还没有成立,就我一个人,当时我讲了两条,一条是内外有别,一条是不要上街,当时有点怕乱子,经验证明,当时主观想法是不对的。第二天6月3日,新市委宣布成立,6月4日那几天敲锣打鼓,声援北大,还不是上街吗?关于批评新市委,6月4日我说过'反对新市委就是反对党中央',我说一般不能这样讲,当时讲是因为在中央决定我来组织北京新市委时,6月20日市委大楼出现大字报,党中央叫我来当市委书记,他们要赶我走,所以我说反对新市委就是反对党中央,批评新市委可以,我们说过大字报可以贴,将来也可以贴,当时讲这样的话是有特定的环境,我又是一个光杆司令。

关于'618'事件,革命师生斗争了黑帮分子,但张承先颠倒黑白,说是反革命事件,也有的地方叫'618'事件。北大派了工作组后,各地纷纷报警,又要我派工作组,当时大学有,中学有,工厂也有,当然有的地方报的是假的,当时有点乱,后来开了会,叫领导引火烧身,结果很多单位没有传达到引火烧身这句话……

6月20日前后,工作组报告的多起来了,北大也是其中一个,开始发现班与班,系与系不能互通情况,23日开了会,总结了经验,要互相支援。6月1日后,到北大声援的不是很多的,我总结了经验,互相支援是必不可少的。过去我们在学校,城市也搞过,现在一当领导就忘了。北大工作组没有发扬四大,20日以后,个别地方发现了这种情况,以后别的同志讲过应该注意,以后改了。7月10日报告没有改变这样冷冷清清的局面,陈必陶的大字报贴出来了,来得快,我是见事迟,转得慢,是犯了官僚主义,思想方法上的错误,工作组现在看来不管好坏都不行。究竟谁了解情况?还是学生。黑帮分子的脑袋上又没有刻着字,搞教育改革,学术批判都要依靠群众。刚才康老的讲话不仅总结了北大的经验,也总结了全市的经验,今后怎么办不说了。工作队不一定三天都走完,郊区社教还要搞,等同学们将高等学校的文化革命搞完,还要去帮忙。那时你们更有斗争经验,就不会犯官僚主义的错误了。"

最后是聂元梓讲话:"我怀着对党中央对毛主席的无限感激来讲

话。从北大长期的尖锐的、激烈的资产阶级复辟和无产阶级反复辟的斗争中,我深深体会到没有党中央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我们的一切,我们50多天来,在这场文化大革命的尖锐斗争中,再一次证明了没有党中央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我们的一切,今天康生、陈伯达同志都讲了话,提了建议,我完全拥护他们的讲话。”

27日,聂元梓倡议建立北京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筹备委员会,并宣布实行巴黎公社式的选举。

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第一,巴黎公社存在的时间只有短短几十天,并没有形成一套成熟的选举制度和民主程序可借鉴。第二,巴黎公社只有人民才有选举权,北大师生近两万人,敌我的界限是什么?谁有资格鉴别、决定呢?第三,工作组撤走后,学校出现权力真空。中央文革小组希望北大成为全国的典型,以点带面,指导全国运动,必须在一天之内产生新的权力机关——校文革委员会筹备委员会。在当时情况下,最简单办法就是各系出一个人组成校委员会。根本来不及召开全系大会选举。于是,经济系里选了社教中的左派教师杨勋,技术物理系选的是邓小平的儿子邓朴方,历史系是吴惟能……聂元梓是当然的校筹备委员会主任。

28日,“北京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筹备委员会”成立,由聂元梓出任主任委员,白晨曦、聂孟民(学生)任副主任委员,牛皖平、徐运朴、廖淑明(均是学生)及戴新民任委员。同时,北大校文革筹委会也倡议建立了校园“劳改队”。“劳改队”这一形式立刻被确立,而且马上风行全国。前一阶段已经被工作组“揪出来”的人都被强迫进入“劳改队”,被迫与其他人隔离开来,在学校里“劳动改造”。

北京地质学院水文地质系四年级51621班学生朱成昭与51622班学生郑文卿于7月25、26日到北京大学听了那里万人辩论会的情况。7月27日,朱成昭与郑文卿共同成立的“爆破战斗队”贴出大字报《彻底清算工作队严重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锋芒直指工作队。

这天上午,探矿工程系学生王大宾与11632班的周永璋、伏庆是,11622班的殷维候,15632班的蔡新平、杜金山、庄一龙相约,一起到北京大学找聂元梓取经,了解中央文革小组对工作组的态度。在他们心中,聂元梓是一个得到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支持的大左派,她的话,她介

绍的情况应该是可信的。他们想亲自见见聂元梓,当面听听她的意见。他们翻过学院西面的围墙,逃出地院后,在约定的地点会合,然后来到北大。

在北大找聂元梓的人非常多,一拨接着一拨。聂元梓听说王大宾他们是北京地质学院的,非常热情,立即将他们请到自己的办公室,认真地听了他们介绍北京地院的文革情况,然后向他们讲了陈伯达、江青到北大参加大辩论,支持批评工作组,号召群众自己起来闹革命的情况。还表示支持他们反对工作队的行动,并答应他们的请求,将北京地院文革运动的情况向党中央、毛主席和中央文革汇报。王大宾他们深受鼓舞,回校后即贴出《走访北大的声明》的大字报。

当天下午,聂树人也贴出"李贵等十三名教员干部是革命的"长篇大字报。

工作队和一些人立刻组织围剿。据工作队统计共有 750 张大字报对此进行围攻。

7 月 27 日这天,刘少奇找康生单独谈话,他对康生说:"你应该在中央起团结作用,能够使中央求大同,存小异。"

康生回答说:"可我们之间的分歧又无法解决或变得一致起来,比如在清华大学的问题上,我们尖锐对立。我认为,蒯大富是革命的。"

"是吗?"刘少奇皱起眉头:"蒯大富对党中央,对我们许多老同志没有一点点阶级感情,动不动就骂人是'黑帮',这能是革命者吗?我看不是。"

"你们对人家实行镇压政策,人家不反抗行吗?特别是薄一波同志和蒯大富辩论时,开口闭口说人家是'右派',这能换来一个学生对他的尊重吗?"康生显得非常激动:"对薄一波,我想多讲几句,已经有揭发材料,说他和阎锡山的关系不正常。我看过他在抗战时期的一些文章,是露骨地宣扬阎锡山的反动理论的。比如他在一篇文章中说:'目前主客观的形势都要求我们执行这样一个任务,就是,加紧司令长官的理论学说的研究,决心培养出一些精通司令长官的全部理论学说和政治主张的专家,这对我们组织有特殊的作用,培养出一批山西通来。'他的这些观点和有些行动已经引起了毛主席的注意!"

刘少奇说:"你们说对蒯大富实行了镇压,这就不对,不是镇压!"

康生问到:“不是镇压是什么!是辩论?世界上哪有这样的辩论!把人家关起来,把团籍搞掉了,这叫辩论?”

“反正,清华工作组没有定蒯大富是反革命,肯定没有定,不过,工作组这样做法是不好的。”刘少奇说。

“不许蒯大富上中央告状,起码是不符合国法,违反宪法的。”康生坚持。

“当然,清华工作组是有错误的,叶林同志是有错误的,王光美同志也有错误,但是,事实决不是你们所说的那样危言耸听!”刘少奇说。

27 日,中央文革小组起草的撤销工作组的决定,毛泽东作了修改。这天,毛泽东两次召开会议,会后,周恩来到刘少奇处与他谈话。并约邓小平、陶铸谈话。周恩来审阅北京市委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做出的《关于撤销各大专学校工作组的决定》。

7 月 27 日到 30 日,召开中央工作会议,实际上是八届十一中全会的预备会,集中传达、讨论了毛泽东于 7 月 24 日、25 日批评工作组的讲话。会上发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草稿),征求意见。

在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上,为了使大家开阔眼界,还组织了两次参观活动。一是到北京师范大学参观大字报。那里从校园到课室楼梯,已成了大字报的海洋,内容主要是围绕着学生谭厚兰反对工作组展开的争论,多数是揭发批判,少数给予支持。另一次是到清华大学参加给蒯大富平反的大会。

在传达、讨论了毛泽东于 7 月 24 日、25 日批评工作组的讲话后,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与会者都表示拥护毛泽东撤销工作组的意见,赞成“打破旧框框”,“由群众自己选举文化革命小组或文化革命委员会来领导运动。”当时,不少人认为工作组的问题,仅仅是个工作方法的问题,派工作组的愿望还是好的。会上也有人提出撤销工作组后,怎样体现党的领导,党、团员如何活动等问题。

会上还讨论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这一《决定》几经修改,在 7 月 29 日作为全会文件印发时,已由原来的 23 条压缩为 16 条。讨论中,华东组提出:“最好把党组织是领导的核心力量、党员应当认真实行三大作风的内容也加进去。”西北组提出:“在文件中对

党的领导问题单独写一条,说明什么是党的领导和怎样领导。”

吴德7月23日宣布撤销北师大工作组组长孙友渔的职务,北师大3000多师生签名要求孙友渔留下来。7月27日晚上,陈伯达、江青、康生又带着文革小组来到北京师范大学。东操场,全校师生员工夜间集会。

陈伯达主持大会,他说:“你们现在不要搞保姆了,这么大了,保姆又不好。”他建议通过巴黎公社式的选举来成立文化革命委员会或文化革命代表大会。

江青讲得就更明确了:“工作组是石头,阻碍你们前进的道路。斗争矛头不是对准黑帮分子,对准地、富、反、坏、右,而是对着革命的师生,这是错误的。”她点了工作组组长孙友渔的名字,说他们在同学中制造分裂,号召同学们斗争他们。还说:“你们同学要求撤消工作组,我们中央文革小组讨论了这个建议,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建议。”

陈伯达说:“在文化大革命中,查档案这个问题的发生是有道理的。现在来查这些人的出身,这些人的历史,就是什么家庭出身,过去干了些什么事。修正主义者有它的社会基础。北京大学的陆平黑帮,你可以把他们的家庭、社会关系列一张表出来就可以清楚了,原来是这些人在这里掌权。为什么陆平这个黑帮要排挤工人、贫下中农子弟,照顾地、富、反、坏、右子弟?就是因为他们有社会基础,有了这个社会关系。所以,查黑帮的档案是很有道理的。查档案要有一定的手续,你们文化革命委员会可以订出条例,按照正确的手续、条例查档案。武器要保管好,有一些重要的技术资料要保管好,不要随便动。”

康生对学生说:“首先,程今吾是彭真、陆定一黑帮的亲信,师范大学斗黑帮分子程今吾斗得好。我们经过调查,孙友渔这个组长,没有把程今吾这个黑帮分子紧紧抓住,而是把矛头指向了我们同学。”

康生在会上说:“今年2月、3月初北京市彭真这个大黑帮阴谋策划政变,阴谋把无产阶级专政推翻,计划之一就是要往北大、人大每个学校派去一个营的军队,这个事实是千真万确的,并在北大、人大看过房子的。这件事包含着极其大的阴谋,这件事,北大团委组织部长亲自参加过他们的黑会,陆平黑帮给他们修房子,修食堂,人大校长郭影秋完全知道这件事,并且在人大也看过房子。这是一件明显的事,6月

1 日后,北大的同学用大字报揭发出来的,这消息也传到了你们师大,师大的一位同学叫王运民的,回去在 6 月 20 日贴出一张大字报本来是千真万确的,但是这个大字报,被工作组孙友渔歪曲了。孙友渔在 6 月 20 日的报告中认为,这张大字报是造谣,煽动同学说这张大字报是要使人民解放军去流血,胡说这是要孤立党中央和毛主席。在他 5000 多字的报告中,4000 多字要讲这个问题,为彭真辩护,有些同志不了解,被孙友渔蒙蔽,被孙友渔麻痹了,认为高淑奎、谭厚兰……等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革命,这完全是孙友渔一手造成的。……你们说孙友渔到底站在什么立场?同志们想想,这样的工作组能不能领导你们进行文化大革命呢?你们再想想,这样的为彭真大黑帮辩护的人,要不要罢他的官?”

康生说的政变,就是当时盛传的“二月兵变”,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6 月 1 日后,林彪的“518 讲话”开始在学生中广为传抄,于是,有些人开始四处寻找“阶级斗争”的蛛丝马迹。一天,北京大学有几个学生和工作人员在一起开串联会,会上有人揭发说,2 月间曾要在北大住一个团的部队,还说:“在当时的情况下,调动这么多的军队,很明显是要搞政变。”会后,北京大学团委丁健将这些师生议论的内容整理归纳,写出了一张题为《触目惊心的二月兵变》的大字报,认为在 2 月份时有外地部队调到北京来,是“彭真、刘仁企图搞政变的准备”,从此开始有了“二月兵变”的说法。北师大的学生王运民看见后,联想到卫戍区也曾派人到人大联系借房,也贴出大字报,质问原人民大学党委书记郭影秋知不知道在学校驻兵搞政变的事。

后来,在一次中央文革小组会议上,康生问郭影秋:“关于‘二月兵变’的大字报你知道不知道?”

郭影秋说:“没有看过大字报,这件事我知道。”

康生问:“你知道,汇报过没有?”

郭影秋说:“没有汇报,我认为大字报的事是不可能的,是没有的。”

康生“嗯”了一声,随手从包里拿出个材料给郭影秋看,原来是他的联络员给他写的一个汇报。材料中说:北大某某大字报揭发北大、人大都曾有过驻军,是要搞兵变。康生用红铅笔在材料上划了大杠

杠,他指着材料说:“‘二月兵变’明明是有的嘛!”为此,郭影秋不得不把事情的经过与原委向他说明。

1966年2月,郭影秋正在海淀苏家坨搞“四清”时,北京卫戍区曾派人到人民大学借过房子。据来人说是中央军委为了加强地方武装建设,决定北京市新建一个团,归卫戍区建制。该团组建后,一时没有营房。北京卫戍区便派人到市人委交涉。市人委答复:“由你们找有空房子的单位,找到后由市人委出面借用。”卫戍区先到大兴、房山、丰台等地,没有找到合适的房子。后来海淀区武装部介绍,有些大学的学生下去“四清”,有些空房,是否可去联系暂时借用。于是,卫戍区又到人民大学、北京大学、石油学院、农业大学等处联系。当时,人民大学和北京大学都同意拨出部分空房借部队暂住,人民大学在学校的工作人员还向郭影秋汇报过此事。但是,当时的卫戍区政委刘绍文知道此事后,认为部队住在学校不适宜,放弃了这个方案。让那个团组建后,住到了郊区一个靶场。这就是“二月兵变”的全过程。

# 第98回：工作队，各领导接连被撤 义愤起，人大揪斗郭影秋

这时，康生继续说孙友渔的问题："孙友渔要揪谭厚兰的后台。谭厚兰的后台是谁呢？是《红旗》杂志的编辑，革命的左派，你们的校友，林杰同志。今天我把他带来了。请大家认识认识。"

林杰从后台走到前台，戴着眼镜，个子不高，几乎没有停留，又退回后台。

康生继续："林杰的后台是谁呢？《红旗》杂志副总编辑关锋。关锋的后台又是谁呢？一个是《红旗》杂志总编辑陈伯达，另一个就是我啰。"

北师大的这次大会，让支持谭厚兰、反对工作组的人们真正感到重见天日，高呼"万岁"。

会后3天，政教系教师李春秋等人贴出大字报：《拥护还是反对谭厚兰等革命左派是真革命还是假革命的分水岭》，要人们"恭恭敬敬地做谭厚兰的小学生"，"跟着谭厚兰，彻底闹革命！"这时又有人贴出了《拥护还是反对李春秋大字报是真革命还是假革命的分水岭》的大字报，一下炸了锅，立即引起一场大辩论。

因为毛泽东在《青年运动的方向》中早已明确指出："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青年的最后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相结合"。而"分水岭"的大字报将是否拥护谭厚兰真假革命的分水岭，显然与毛泽东的"最后分界"格格不入。李春秋大字报帮了倒忙，这是这个大学政治教员始料未及的。欢喜老鸹打破蛋，他干了蠢事。

愤怒的，嘲笑的，失望的气氛笼罩着北师大。"踢开黑党委"、"踢开工作组"的拥谭口号犹言在耳，"踢开保姆闹革命"的反谭大字报、大标语铺盖了师大校园。

林杰亲自到师大压阵。在中南楼下面，他和谭厚兰被群众围住辩论，"分水岭"大字报成了他们的癞疮疤。在众人斥责、诘问、嘲笑声

中,他俩都透过镜片阴阴地盯着,沉默不语。留给人们的印象,只剩下“后台”硬,有“保姆”而已。林杰没能逆转李春秋大字报给谭厚兰带来的颓势。谭厚兰臭不可闻,她垂头丧气。

7 月 27 日,海淀区中学工作队在北京展览馆召开“革命师生代表大会”。北大附中“红旗”的彭小蒙在发言中介绍了江青等人 7 月 25 日晚在北大群众大会上的讲话内容,引起与会者的轰动和会场的混乱。正在大会上做报告的海淀区中学工作团团长周杰,被匆匆赶到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当场宣布罢官。消息传来,清华附中红卫兵决定将与工作组的矛盾公开。当晚,由清华附中革命委员会主任兼红卫兵负责人王铭匆匆写就的声讨工作组的檄文贴了出来,题目是《向清华附中工作组的错误言行猛烈开火》。王铭同时还起草了《三论革命造反精神万岁》,强调造反精神永远需要,由骆小海修改后发表。瞬息间,党的化身工作组成了过街老鼠。同学们觉得红卫兵又对了。校园里出现了“永远跟着红卫兵”的大标语。清华附中的红卫兵又活跃起来。

就在几天前,7 月 24 日晚上,在清华附中学校办公室召开了有工作组全体成员和革委会大部分成员参加的会议。工作组和清华附中革委会正式摊牌。此前工作组已经无法容忍红卫兵的我行我素,工作组的小叶曾冲进广播室,撕掉了红卫兵擅自播音的广播稿。会议进行了整整一夜,会上双方唇枪舌剑,你来我往,气氛非常紧张。在这次马拉松式的交锋中,胡克实三次打来电话,要工作组长刘晋直接点出王铭的问题,打击红卫兵的软肋。

进进出出的刘晋几次提起话头,又都咽了下去。一是发现王铭还有群众基础,二是他发觉红卫兵班子意外地团结,一点名,局势必然无法收拾。尽管刘晋在上司胡克实的质问和下属章建华的催促下几次拍案而起,但根据自己二十几年群众运动的经验,终于没有点名。

而红卫兵为这次摊牌作了充分沟通,策略地让王铭退出一线,以免让工作组抓住把柄。会上由卜大华据理力争,由张晓宾回旋守住底线。这里还有一个细节:在刘晋被叫出去接胡克实电话的时候,人大附中的徐浩渊跑来告诉了卜大华一个小道消息,“团中央已经把胡启立揪出来了。”两个都自以为摸了对方底牌的对决胜负难分。会后刘

晋把风传胡启立倒台的消息报告胡克实时,胡克实认定是红卫兵的谣言,命令刘晋到清华附中召开大会辟谣。

这天,彻夜未眠的刘晋终于在最后一刻取消了胡克实命令他在清华附中召开的与红卫兵彻底翻脸的辟谣大会。

7月28日这天,周恩来仍然早早地来到了二外,看完了尚未看过的大字报后,视察了学生食堂。当他走进食堂时,一位工人师傅正在和面,周恩来伸出手与他握手时,那位师傅举着两只沾满湿面的手不知所措,周恩来没有犹豫,仍然紧紧握住了他那沾满面粉的手。那位师傅激动地哭了,其他在场的人也都被感动得热泪盈眶。中午吃饭时,周恩来没有去可以点菜的教工食堂,而坚持在学生食堂就餐。开饭前他先是到厨房里找窝窝头,食堂的师傅告诉他,北京市民已经一个多月不吃粗粮了,周恩来又说,二外南方学生多,他们喜欢吃米饭,我早已习惯了北方生活,我吃馒头吧。吃完饭,他坚持按学生就餐的最高标准交了0.3元的饭费。

周恩来参加了二外两派学生的辩论会。在主席台上坐了几分钟后,他便拿了一个小板凳坐到台下学生们中间。

听完辩论会后,周恩来作了长篇讲话,他说:

“同学们,同志们!

我第一次来时见了你们一部分人,第二次见了你们全校师生员工,我讲了三件事,今天我就扼要地重复一下:

一、我谢谢你们给我自由和机会看了三天大字报,今天又给我机会听了你们的发言。

二、我是来向你们学习的,重新温习了毛主席亲手制定的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三、我是来支持你们革命的!支持你们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凡是原意革命的就有前途。

当然在运动中,在这过程中,在主观上革命的,不一定不犯错误,同样,能够革命还是有前途的。今天再补充两点:

四、只看看大字报,听听几位同学的讲话还是不够的,还要分别谈话,交换意见。我通过表面现象,看到了一些本质问题。……六条那样的提出是不对的,毛主席没有那样说,中央及陈毅没有授权张彦那

样说,张彦这样宣布是错误的。今天所做的仅是我工作的开始,我还不能多说,我想把这里当作典型。

五、确实在你们当中,大致有两类意见,但决不单只两类意见(一、三、五类,二、四类)其实一、三、五中间也不一样,二、四中间也不一样,任何东西都是一分为二的。百分之百的对是没有的,我就不保险,但毛主席的话是经过周密思考研究提出来的。我们都承认他是个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当代没有一个超过毛主席的。

你们拟定每系推出两个代表,也不太好,一个多数,一个少数,或许还有三类,要允许少数人的代表讲话。一个系如果少数只有两个人,那就不好推举代表,但是其他代表应该把他们的意见反映出来。

我今天下午不能来,我的事情都订满了,我准备看你们的笔记,明天上午来继续听。"

7 月 28 日,西城区召开的革命师生代表大会,江青派人去罢了西城区工作队队长胡启立的官。

由于康生 7 月 27 日在北师大的讲话中点了郭影秋的名,第二天晚上,7 月 28 日,人民大学部分师生兴师动众到北京市委去揪郭影秋。当晚 22 点多钟,吴德到郭影秋的房间说:"经与李雪峰商量,看形势你还是回人民大学吧!"就这样,郭影秋被学生们押回人民大学。

那天晚上下着大雨,郭影秋的车刚进入人民大学的大门,他就被人从车上拽下来,不由分说地推到一个会场进行批判。

时已深夜,人大的师生都已入睡,大喇叭把大家喊醒。全校师生立即赶到新饭厅。会场上群情激昂,"打倒郭影秋"的口号声震天动地。郭影秋被押上主席台,站在话筒前,低头弯腰,做"喷气式"。

主持人宣布:"斗争现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黑帮头子郭影秋大会开始!"

先是一阵口号,然后勒令郭影秋交待在人民大学犯下的"滔天罪行"。其中被质问的一个重点问题,就是让他交待"二月兵变"。郭影秋只好再原原本本予以说明。

接着,郭影秋对着话筒,微微躬着身子,开始交待自己的"罪行"。他说:"人民大学是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一块重要阵地,一直有三条黑线在争夺这块阵地,一是旧北京市委 ,二是旧高教部,三是旧中宣部。"

接着他说,来人大后,首先进行调研,发现人民大学存在诸多矛盾。接着逐一讲每一对矛盾的主要方面是什么,次要方面是什么?他的看法是什么?解决的办法是什么?结果是什么。

整个会场鸦雀无声,近3个小时的“交待”,口若悬河,滔滔不绝,吐字清晰,语言流畅,层次分明,逻辑性强,这那里是在交待“罪行”,分明是在给大家讲哲学,作报告。雄辩的口才,大量的事实、数据,征服了在场的所有人。许多人佩服得五体投地。大会结束时,主席台再领头喊“打倒郭影秋”的口号,几乎没有人举手了。

郭影秋的批斗大会长达4个小时之久,一直开到天亮。随后,部分同学强行把郭影秋拉到东风三楼一层法律系学生宿舍,手脚都被捆绑起来,就像一个罪犯囚徒。另有一部分学生自发地涌到楼门口,不断高呼“放出郭校长”的口号,强烈要求放人。

外面的人越聚越多。里边的人终于顶不住了,把郭影秋放了出来。当他走出楼门时,许多人夹道欢呼,目送他离开。

郭影秋,战争年代是刘邓第二野战军第十一纵队政治部主任。二野打到湖南时,他受命率部剿匪,出发前誓言:不剿灭土匪,决不生还。结果大获全胜。建国后任云南省省长。后调至南京大学任校长。1962年,人大第一副校长胡锡奎调任中央西北局书记处书记。此时,中央拟调郭影秋任国务院副秘书长。吴玉章得知消息后,特地找周恩来,要求郭影秋来人大工作,周恩来答应了吴老的要求。1963年,郭影秋调任人大党委书记、第一副校长,主持工作。

郭影秋不仅是一位德高望重的领导干部,而且是一位知识渊博的学者。他的专著《李定国纪年》在史学界颇有影响,被称为明史专家。1964年8月,毛泽东接见加纳意识形态学院高级讲师,郭影秋被邀参加。接见完毕,毛泽东单独和他合影。这幅照片一直被郭影秋放在家中的客厅中央。

他的诗词也写的非常好,其中一首《满江红》词是他40岁生日之作:

四十年华,随逝水,无端抛掉。回首处,云烟往事,空余涕笑。学剑不成书误了,拔毛未净神难肖。遥望天,独自立黄昏,心如绞。青山在,柴已少,黄花瘦,骨犹傲。怕秋虫夜语,孤灯斜照。蒲柳漫头摇落

感,烛火偏向黎明耀。挟长铗,纵手斩妖魔,风狂啸。

而且,郭影秋在学校里口碑甚好,不仅关心老师、学生。而且对他身边的工作人员以及工人师傅也十分关心。平时,上面发给他的营养票证和节日参加晚会的门票,他经常送给他身边的工作人员。逢年过节,亲自到普通工人家庭中慰问。他虽为高干,但生活简朴。红卫兵抄他的家,五间平房,就在校内。家中陈设非常简单,会客室中间放着他和毛泽东的巨幅合影。红卫兵本想去抄一些封、资、修的东西,结果一无所获。抄家后反而增加了师生对他的敬仰。

7月28日,中央决定由新市委做出《关于撤消各大专学校工作组的决定(适用中学)》,规定"在工作组撤销之后,大专学校之文化大革命,由全校师生员工分别选举成立各级文化革命的组织,负责领导。"并决定在29日新市委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万人大会上宣布这个决定。

这天晚上,在北京展览馆电影厅召开海淀区中学革命左派揭发批判工作组大会。清华附中的骆小海和邝桃生等人参加了这次大会。他们看见江青也在会场上,就商量要将"一论"、"二论"大字报托江青转交给毛泽东。正好邝桃生笔记本上还抄有《一论》和《二论》造反精神的大字报底稿,于是便撕下递给江青,还匆匆给毛泽东写了一张条子,意思是:"请毛主席看一看,我们的大字报对不对?是不是反动的?"

江青扶扶眼镜,点着头说:"小将的要求我一定办到。"

北大附中"红旗战斗小组"彭小蒙在会上作了控诉工作组的发言,她在讲演中引用了北大附中初三6班的刘京扬在6月写的一副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

江青插话说:"基本如此嘛。"

刘京扬当时写的横批是:"代代相传",后来就无人提及。

江青在集会上发表了讲话,她说:

"其实我要讲的话彭小蒙已经都讲了。我要讲的是文化革命小组对你们的态度,我坚决赞成你们这个造资产阶级反的精神,我们也相信你们自己组织起来,能够自己进行这场文化大革命的,你们想想看,谁最了解你们,是你们自己,我就不敢说我了解你们,"

下面有人说:“毛主席、党中央最了解我们!”

江青说:“你们这么多人,毛主席党中央只了解你们这种革命精神、革命干劲,具体事情他不能一个一个了解的,太多了,国家很大,对不对?”

众答:“对!”

“世界上也有很多事情要办,对不对?因为我们相信你们,刚才我听到许多同学的发言,我觉得工作组不了解你们,他们都是五湖四海凑起来的,我们同意你们的意见,建议撤销工作组,罢周杰的官。你们自己完全可以成立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或者文化革命代表会议。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是牢固的,我们不怕乱,乱与治是不可分割的,那是墨守成规,乌龟爬,把你们束缚在小天地里头,思想也不能解放,那是不好的。很多人递条子说:什么集训、军训,要求那些同志回来参加文化大革命,我们完全赞成,许多工作组都自称是党中央毛主席亲自派来的,并说:‘你们反对我们就是反对党中央毛主席!’这是不对的,据我们知道,没有派,就是党中央毛主席派的工作组也不可以拿这些吓唬你们,但对工作组的成员要一分为二的看待,他们有多数是好同志,但不了解文化大革命的意义,做了不妥当的事情,错误的事情,成了运动的绊脚石,对待这样的同志我们要说理,说服他们!我们不要提倡打人,但打人没有什么了不起嘛!以后不打就是嘛!对于工作组另一部分人犯了严重错误或钻进我们党里或是资产阶级当权派,要斗争他,要说理,你们说对不对?”

众人齐声回答:“对!”

周杰是团中央派到海淀区的文化革命领导小组组长。

江青接着说:“人的错误思想打是打不掉的,但革命风暴中,出现打人的事情不是坏事,毛主席说过:‘好人打坏人活该,坏人打好人,好人光荣。好人打好人是误会,不打不相识。今后不要再打人了。’

许多同学要求放假的同学立即回校参加文化大革命,我以为这是对的。你们想想看,放假吃饭这是两条,还有什么呢?就是要造资产阶级的反,现在有一些工作组和一些成员有意挑拨起一派学生斗另一派学生,我认为这是不对的,真正的左派善于依靠群众、充分发动群众,有团结,也是在斗争中逐渐团结95%,有人说要团结95%,这个问

题的提法,一开始绝不能团结95%,有人利用团结95%这个大帽子扣在左派的头上,说你们搞宗派,不团结别人,这是不对的。任何一个革命者都要讲究策略的,这就是坚定的左派要团结广大的中间派,孤立一小撮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黑帮,修正主义分子资产阶级,地富反坏右分子,我的话就这样,完了。”

陶铸在会上说:“我们建议大家串联,班与班,系与系,甚至到外校去串联。群众运动就是要运,要动。说不运,不动,几个人蹲在屋子里,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这是不行的。学生运动历来是各校串联,互相通气。”

# 第99回：乱打人，团中央谎报军情 做决定，北京撤销工作组

就在北京展览馆召开批判工作组大会的同时，胡克实带着刘晋、周杰等人来到胡耀邦家探望老领导，同时也述说他们心中的不满。

海淀区66所中学的工作组都是由中央团校派出的。这几天，从中央文革小组负责人的几次讲话，已经让他们清楚地预感到：工作组的末日到了。海淀区的许多学校已经发生了驱赶、殴打工作组人员的现象。打得最惨的是十九中工作组长缪子玲。她被打得遍体鳞伤，血肉模糊，血浆凝住了衬衣，衬衣根本脱不下来，只能一条一条地剪下来，在场的医务人员一边剪一边流泪。中央团校副校长马石江组织人员起草了给中央的信，报告了因王力罢周杰的官而引发学生打、撵工作组的情况。马石江还让被打的工作组成员到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华北局三处告王力的状。但这一切都无济于事。

和忿忿不平的客人相比，胡耀邦没有多说话，只是让他们沉住气观察观察，并让胡克实立即向邓小平汇报。

后来，胡耀邦在人民大会堂门口也向邓小平报告了中央团校老师被中学生殴打一事，邓小平又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江青派人调查后，向毛泽东报告“查无此事”，毛泽东因此批评邓小平“谎报军情”。

8月1日，康生、陈伯达、江青等人找胡耀邦、胡克实谈话，批评他们“谎报军情”。

7月28日的晚上，毛泽东看了江青转给他的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信和“两论”造反精神的大字报，当即批道：“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陶（铸）、（陈）伯达、康生、（王）任重、王力、关锋、戚本禹、李雪峰、吴德、江青、姚文元、张春桥各同志阅，请考虑是否正确，有错误，请指正。”后来，7月31日，他又将原所列名字尽行划去，代之以“各同志”三字：

“各同志：请考虑此件及附件是否正确。有错误，请指正。毛泽东

七月卅一日”

从7月27日开始,清华大学再次掀起反对工作组的浪潮。这天,清华大学学生,外贸部副部长雷任民的女儿雷蓉、王任重的女儿王小平率先贴出大字报:“向工作组错误路线开火”。接着,一部分同学陆续贴出许多大字报,指出清华工作组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而另一部分同学,特别是作为各系文革委员的干部子弟则贴大字报表示反对,认为工作组的大方向是正确的。反对工作组的同学与拥护工作组的同学形成了尖锐的对立,一场关于工作组大方向的激烈辩论在清华大学展开了。

7月28日,清华大学召开群众大会,王任重、关锋在大会上讲话。

王任重说:“有人说北大有股风,什么风我不知道,北大7月26日的会议我参加了,陈伯达、江青、康生、雪峰同志的讲话是代表中央方针,代表毛泽东思想的,我本人完全同意他们的讲话,当然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清华和北大的情况是否一样,我不知道,但是从方针来说,放手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彻底闹革命,这个方针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

关锋说:“回答一张条子。我先把条子念一下:‘王任重、李雪峰同志:我们工作组说,北大会只适合于北大,请示了新市委后,我校不放录音。而且领导人讲话要取得本人同意才能放,可是我愿意放,我认为中央领导人的讲话很有普遍意义。二物系一同学’。工作组请示了新市委没有?新市委如何答复的?我不知道。我不是李雪峰,我是关锋。我回答下面一句,陈伯达、江青、康生等同志同意放他们的讲话录音,当然,什么地方不愿放也可以,如果你们愿意放那就要求工作组拿来放吧!”

清华大学工作组这天撤出,指定各系文革会主任联席会议代行校文革临时筹委会大权,领导清华的文革运动。“文革临时筹委会”选举贺鹏飞任主任,刘涛为副主任。

7月28日,蒯大富连续贴出《致“保蒯派”的信》、《澄清几件事实》、《对学校从前几点异常现象的看法》、《三致叶林同志》、《向党、向全校革命师生承认和检讨错误》5份大字报。

当晚,当刘少奇听说女儿刘涛在贺鹏飞等人的一张批评工作队的大字报上也签了名时,异常激动地从客厅的这头走到那头,一个劲地

说:“你们出卖了我,你们出卖了我!”

王光美和刘涛都哭了。她们从来也没有看见刘少奇这么激动过。

刘少奇对王光美和刘涛说:“现在不是说要检讨吗?要我到你们学校去检讨也可以,去就去,没有什么可怕的。工作组的工作是当着大家面做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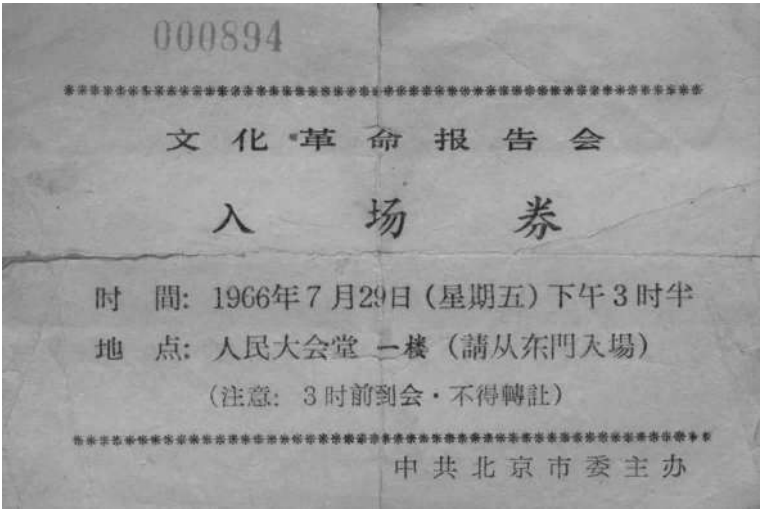
“工作组现在也没有什么事情了,你们就劳动,帮助抄大字报,扫扫地,这样别的同学也就不会说你们是当官做老爷了。”

“蒯大富是自己跳出来的吗,怎么是工作组把他打成反革命的?”

他嘱咐刘涛:“不要急于表态,真正认识到错了再讲,不要急于表示自己反对或者同意。”

7月29日凌晨,毛泽东在谈话时说:“明天召开北京市文化革命积极分子大会,持有不同意见的同学也可以参加,比如说清华大学的蒯大富。”

康生立即指示清华大学接蒯大富参加下午北京市委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文革积极分子大会”。当贺鹏飞将这个消息告诉蒯大富时,他兴奋得不行,因为当时他的反革命帽子还没摘呢。


000894

文化革命报告会

入场券

时間:1966年7月29日(星期五)下午3时半

地点:人民大会堂一楼(請从东門入場)

(注意:3时前到会·不得轉让)

中共北京市委主办

这是当年北航同学石兴国的入场卷

7月29日下午,人民大会堂里灯火辉煌,中共北京市委精心安排和准备的全市“大专院校和中等学校师生文化大革命积极分子大会”终于召开了。

蒯大富走进大会堂时,所有认识他和闻其名的学生无不为之惊讶而又敬佩。他今天能参加这样的会,本身就说明了他的胜利。

另一位引人注目的英雄当然是聂元梓了。她走到哪里,哪里都会围上一群慕名而来的学生,许多青少年都以为她也是一位豆寇年华的小将,涌上来一看她原来是位中年妇女时,不禁稍有失望。不过,大家还是七嘴八舌地问长问短,听她介绍经验。

紧接着人声嘈杂起来,原来主席台上出现了领导人。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在李雪峰、吴德等人的陪同下走向主席台的座位坐了下来。李雪峰举起手让大家安静下来,显然,他是大会的主持人。

“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北京市委决定:撤销各大专学校工作组,这个决定同时适用于中等学校。在工作组撤销之后,大专学校的文化大革命由全校师生员工分别选举、成立各级文化革命的群众组织,负责领导。”

李雪峰宣读完决定后,会场上既惊愕又振奋,立刻舆论大哗,说什么的都有。接着,李雪峰宣布撤销北京市委文教书记郭影秋的职务,也撤了张承先、孙友渔和周杰的工作组组长的职务。

接着,邓小平开始讲话。他说:“我本应站着讲,但是大家都坐着,和大家一样平等,坐着。”

他告诉大家,文化大革命正以前所未有的姿态出现在新中国,一切为共产主义奋斗的青年人一定要积极参加这场运动;并作为首当其冲的先锋来保卫文化大革命。他强调说:“同志们,我以中央工作者的名义讲几句话。现在市委宣布从大中学校撤消工作组。必须说明:在党的北京新市委建立以后,以新市委名义向各大中学派出工作组,这是根据中央的意见办的。”

“现在市委根据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撤销工作组,这也是完全正确的。这是因为经验证明,工作组的形式不适合大中学校文化大革命形势要求,必须加以改革。”

“北京市大中学校掀起了伟大的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声

势浩大,猛烈地冲击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资产阶级当权派,冲击着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冲击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冲击资产阶级的教育制度,这是很可喜的现象。在这样大的群众的自觉的革命运动中,不可能是温文尔雅的,难免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

“我们对待这样新出现的问题,采取了派工作组的办法,我们这个决定是比较仓促的……”

“有的同志说‘老革命遇到新问题’,的确是这样……”

“在一个多月中,把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搞得冷冷清清,有的学校甚至搞得很糟糕,这是一个很大的教训,也是一个很大的经验。”

他认为:“工作组撤销后,北京市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能恢复运动开始时的轰轰烈烈的局面。”

接着,周恩来讲话。他说:“刚才小平同志已经代表我们中央工作同志讲了话。我现在根据他讲的话补充几句,特别是站在做政府工作的这方面,更重要的是,我这个礼拜下去,向群众们学到一些东西,所以想讲几句。

这两个月来,我们全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轰轰烈烈地搞起来了。在毛主席号召下,在我们报纸上社论的鼓舞下,群众干文化大革命的劲儿很高,特别是我们北京,在我们最接进近的地方出现了高潮。但是刚才小平同志说了,就是运动起来两个月了,有些曲折,就是说,开始是轰轰烈烈,中间有点冷冷清清的现象,也有些地方转为各个学校或各个机关内部群众斗群众这样的现象,那么,现在又在转,又转到新的高潮。”

他说:“今后我们首先是下去学习,学习,再学习。跟着就是支持你们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学习你们的斗争经验,学习你们的创造,……中央工作的同志,中央文化革命领导小组的同志,北京市的领导同志,要到学校去接触,到学校去学习。只有学到东西,支持你们,才能说得上对你们有帮助。”

他最后说:“总之,这一个新的事情,新的运动,我们过去都不熟悉,我们离青年时代远,要到你们中间去学习,取得新的经验,老革命做新工作就年轻了,革命工作就能做得更好!(鼓掌)只有这样才能算

得上毛主席的战友和学生。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

台下响起热烈的掌声。

“现在请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同志讲话。”李雪峰话音还没落,掌声已经爆发了。这时刘少奇走向讲台,周恩来、邓小平首先起立鼓掌,全场都一起站了起来,掌声经久不息。

刘少奇十分注意在大庭广众场合下的形象,尽管内心很痛苦,表情却很自若,讲话的口气依然居高临下,具有不可抗拒的威严:

“同志们,刚才小平、总理的讲话,我完全拥护,完全同意。广大师生们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热情,党中央包括我在内,都坚决支持你们的革命行动,我们一定要支持你们把文化革命进行到底。许多革命的师生,对这场文化革命很不理解,说不知道怎么办,怎么进行文化大革命?你们不大清楚,不太知道。你们问我们,怎样革命?想让我们给你们想办法,问我们怎么革,我老实回答你们,我也不晓得,我想党中央其他许多同志、工作组的成员也不晓得……”

刘少奇继续讲话:

“……过去我们闹革命的时候也是这样,不知道具体怎么办,就知道要闹革命,在实际中学。现在的革命是在新的情况下,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情况下进行,我们是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我可以告诉你!就是深入广泛地发动群众,除了这一条我也不知道。中央决定全国的大专院校和中学半年不上课,集中精力搞文化革命。通过两个月的斗争,你们比我知道得多。学校不上课,就是为了干革命,我相信你们一定能把文化大革命搞好,至于在运动中遇到具体问题,就请教毛主席著作,希望你们在运动中更好地学习毛著。”

刘少奇正在讲话的时候,一位年轻军队干部匆匆走上来,俯在李雪峰耳边悄声说:“毛主席来了,在休息厅喝茶呢。”

李雪峰急忙说:“请毛主席上来给大家作作指示嘛。”

“不用了,毛主席等刘主席讲完话后出来接见全体代表。”

“好,好!”李雪峰冲着那位军人点点头后,急忙凑到周恩来、邓小平旁边,向他们传告消息。他还写了一个条子传递给正在讲话的刘少奇,可是刘少奇讲话比较激动,没有注意到。

“……这次文化革命的任务,一是斗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二是批判资产阶级学术‘权威’;三是改革教育制度、教育方针和教育方法。这些任务我们不会做,叫你们去做,只能做好。”刘少奇说到这里,眼睛向下扫了一遍,转了话锋:

“派工作组是党中央决定的,中央同意的。现在看来工作组的方式已经不适应于当前文化大革命形势的需要,中央决定撤出工作组。对工作组,你们要他们走,他们就走,如果不要他们走,就留下进行批判,给他们做出结论。搞文化大革命你们是主人,工作组留在那里就是听取你们的意见和批评。文化革命需要你们进行,党中央和毛主席支持你们,中央能帮助你们就尽量帮助你们。对我来说,进行一段学习,能提出意见再提,你们把文化大革命搞好了,我们想到你们那里去,但不发表长篇讲话。我有一条小小的要求,就是我们这些人下去的时候,大家不要围看,不要都涌了上来……”

“我们是想把文化大革命搞好的。文化大革命是伟大的,但我们用老眼光看待了新问题,工作组起到了对文化大革命发展不利的作用,我代表中央向红卫兵小将作检讨……”

说着说着,刘少奇动了感情:“有时没犯错误,人家也说你错了,是不是?连自己也莫明其妙。”

# 第100回：苦难言，老革命遇新问题 红绿灯，工作组撤离北航

尽管刘少奇竭力使他的口气充满着自信和幽默，但坐在台下的叶林敏锐地感觉到，他的精神全面崩溃了，音调里隐含着凄凉和悲哀，完全没有了往日讲话时的那种风采。

刘少奇端起茶杯呷了口水，润润嗓子继续说："我们提倡辩论，但不要把辩论会弄成斗争会，有时很难区分，我自己也有这样的体验，今天是少数，经过辩论，明天就可能是多数；正确意见，也可能是少数，不要强迫别人改变观点，他们可以参加辩论会，也可以不参加，也可以允许会上、会下、会内、会外辩论。这样主要是为了保护好人，但也可能保护少数坏人。因为他们虽坏们但还不是反革命，让他们充分暴露嘛。清华大学有一个学生写了这么一个口号，叫做'拥护党中央，反对毛主席'，大家认为不得了了，同学们就揍他，这是反动的标语。一揍他，那么多的人揍，公安部门只好暂时拘留，这是一种保护性的拘留。如果你们暂时保护他的自由，让他活动，就放回来。不妨大局嘛。保护几个月再作结论。不论是对于黑帮，对于牛鬼蛇神，对于反革命分子、右派分子、假革命、假左派等等，一般都要到后期来做结论。在作结论以前，暂时保护一下，让他活动一下。活动一个时候，我看没有坏处。我看没有什么可怕的，他起不了作用，搞不乱无产阶级专政。对这样的人，保护一下也没什么关系嘛。"

刘少奇显然要结束他的讲话了："总之，写反动标语，不是坏事，是好事，只要不是对群众有危害的活动都不要制止，让他们先行暴露和活动，当完全暴露了，可以作结论了，就对他们施行无产阶级专政。好了，我的话完了。现在呼几句口号：中国共产党万岁！文化大革命万岁！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

就在大家跟着刘少奇呼口号时，毛泽东突然从舞台东侧走上主席台，刚一露面，就被暴风雨般的掌声和万岁声震惊，瞬时间，整个人民

大会堂沸腾了,就像刮起了一阵巨大的风暴,会场全体代表起立,群情激昂,不断地高呼着:

“毛主席万岁!”

“毛主席万岁!”

身穿灰色中山装的毛泽东在陈伯达、康生、陶铸等人的陪同下,没有和主席台上的任何人握手,径直走到主席台前朝代表们招手、鼓掌。他来回在主席台前走了两圈,最后站在中央频频招手、鼓掌……

整个台下掌声雷动,齐声欢呼,最后变成了有节奏的“万岁! 万岁! 万岁!”的轰响……鼓掌长达10分钟,毛泽东的眼睛湿润了,他一生中得到的欢呼和掌声太多了,但没有一次像今天这样使他感动:眼前都是一些15、6岁,18、9岁的青年学生呀!

一位参加会议的中学生在15年后回忆当时的情景说:“事先没通知毛主席来,一看到毛主席,人们都疯了,又喊又叫,我站到了椅子上,喊的嗓子都哑了。”他说,他看到毛主席用手背拂了一下眼睛,但没有看到流没流泪。

毛泽东被这些孩子们疯狂的爱感动了。他几乎享受不了这太热的爱了,加快了脚步,从舞台西侧消失了。

毛泽东走了,全场还在鼓掌高呼:“毛主席万岁!!”

最后,大家一起唱起了“大海航行靠舵手”,周恩来站在主席台的中央,打着拍子,指挥全场高唱起《大海航行靠舵手》,会场气氛达到了高潮。

群众对毛泽东的感情和狂热崇拜是发自内心的。50天惊心动魄的经历,使一大批青年亲身领会了毛泽东代表着反压迫、反迫害,代表着翻身解放,代表着“造反有理”这一中国革命的心灵体验。一位文革亲历者后来这样写到:“遭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与血统论压制的造反派把毛泽东作为永生不背叛民众的革命家领袖,作为反抗特权阶层压迫的正义带头人。这就是为什么‘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这首歌在那一时代一旦唱起,在场者几乎无人不流泪的原因。”

会议结束后,负责大会纪录的中央办公厅工作人员陈宽宏从人民大会堂北门返回中南海,看到团中央书记胡克实正在北门内的一个电话机旁给团中央打电话,要他们赶紧撤销工作组,心情显得十分着急。

在毛泽东看来:派工作组不仅是一个领导运动的方式方法,而且是一个对待群众的立场和态度,是赞成还是反对搞“文化大革命”的问题。所以,他主张召开一次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以中央的名义正式就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做出决定。

7月29日晚上,陈伯达、江青率中央文革部分成员到北京轻工业学院参加他们的师生大会。在会上,汪延群念了孙宝鼎,怦国桂,苗宗奇三位同学写的血书。

“轻工业学院革命的同学们,教员们,职工们:我们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们来看望你们来了!”江青站起来刚说了这几句,会场立即响起一片“毛主席万岁!万万岁!”的口号声。江青接着说:“问你们好!我们受党中央,毛主席的委托,向你们问好!”

又是一片口号声。

“现在请我们的小组长陈伯达同志给同学们讲话。”

陈伯达说:“中央文革小组对轻工业学院所发生的问题,很早就知道了,就调查过几次。晓得你们这里发生了一些迫害的行为,工作组对同学们进行了迫害。”

这时,会场上有人喊:“没有!”

马上又有人喊:“有!”

陈伯达接着说:“你们可以有不同意见,有不同看法,现在我来听听大家的意见。你们两种不同的意见,或者几种不同的意见,都可以上台讲讲你们自己的意见,我们就是来听你们不同意见的。现在是不是就开始讲话?”

有人问:“有些同志刚才已经递条子要讲话了,现在是不是开始讲话?”

陈伯达:“你们有很多条子,说的又长又没有东西,只是空话,写很多的条子。现在有一个同学,写到他的一些问题,我们现在请我们的副组长江青同志给大家读一下。”

江青读条子后说:“据我看,这个条子是一个人的笔迹,但是他不说他自己的名字,我觉得这样的人完全可以站出来讲话。同学们!刚才汪延群同学所说的这样的事情是不是政治迫害呀?”

台下众人答:“是!”

江青:“可以容忍吗?”

众答:“不能!”

江青:“他讲得对不对?”

齐声答:“对!”

江青:“他讲的时候,我难过了,我掉眼泪了!你们哪?”

台下有人答:“也掉了。”

江青:“我们来了,我们坚决站到你们这边,坚决站到革命派这一边!”

口号声起……

江青:“他们这种做法是违犯党纪国法的。他们迫害3个青年人写了绝命书,还要说他们是反革命分子。这有没有共产党员的道德品质?”

众:“没有!”

江青:“工作队长叫万—东—哲。”

江青一字一顿地说出万东哲的名字后,接着说:“这个名字也很怪。刚才汪延群同学在这儿读这3份绝命书的时候,他笑嘻嘻的,你们要不要认识他?”

众:“要!站出来!”

江青:“我们不要武力,你们要认识他。”

有人喊:“低头,低头,低下头来!”

江青:“革命的主力应该是广大的革命的同学,革命的教职员,你们不应该上他们的当!他们挑拨离间,挑起一批学生来斗另一批学生,这是非常不能容忍的事情,做出这样的事情来!我20号回来的,没有一天停止,这是不能容忍的!

大道理,今天在中央召开的会议上,许多中央负责同志都已经讲过了,应该有录音,你们都听一听。但是严重违犯党纪国法的人,应该有所交待,你们说对不对?“

台下齐声答道:“对!”

接着,掌声四起,长时间呼口号:“毛主席万岁!”

江青:“革命的师生应该团结起来,认清是非,向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文化大革命的一切坏家伙作斗争!(掌声)

中国共产党万岁！

毛主席万岁！

毛泽东思想万岁！

无产阶级专政万岁！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我们一定要专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人的政！

请同志们原谅，我非常激动。我很早，20 号以前我就知道你们的情况了，我非常难过，我现在不能说话了。”

台下又是口号：“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陈伯达讲话：“我们现在会议继续进行。万东哲要向大家交待，现在请同学们继续发言。”

接着由受工作组迫害的杨文昌同学发言。

万东哲是中共中央工业交通政治部副主任，北京轻工业学院工作队队长兼党委书记。

从 7 月 27 日开始，北航工作组就宣布不再领导学院的运动文革，做好了随时撤离的准备。

听说中央批评工作组犯了错误并要撤走的消息后，北航被工作组整过和对工作组有意见的学生和教职工欣喜若狂，学院里再一次掀起反工作组的高潮，许多大字报要求赵如璋为首的工作组向全院师生做检查，为被打成“反革命”、“反动学生”、“一小撮”的师生们平反。这天，3312 班学生肖淑桃等贴出大字报《清除大辩论的后遗症》，批判工作组的错误。北航少数派几次集体前往中央接待站上访。

7 月 29 日，北航召开全院大会，工作组传达撤销工作组的决定，工作组组长赵如璋在会上指定孔令华、苏晓前等 12 人组成筹委会，毛泽东的女婿孔令华为主任。

部分师生贴出大字报，指出筹委会没征求广大师生意见，是非法的，要求改选。有人说工作组执行了右倾机会主义路线，要求工作组留校检查并听取群众意见。校园里批判工作组的大字报数量倍增。

北航筹委会上台的第一道通令就是让中层干部去挖游泳池，不准参加运动。也不允许看大字报。有的中层干部劳动过后路过大字报栏，想停下来看看，脚未站稳，就会有一只手从背后伸来突然抓住你的

肩膀,“戴草帽的?是不是中层干部?大字报不是给你们看的。”

之所以叫他们“戴草帽的”,是因为他们参加劳动,都戴着草帽。这样一来,就是劳动完了,这些中层干部也只好绕道回家,连大字报区也不能经过。

一天,石兴国、戴维堤等几个被工作组整得较厉害的学生,即所谓北航“十大牛鬼蛇神”被接替工作组的文革筹委会集中到北航六系搂开会。当石兴国等“十大牛鬼蛇神”来到北航六系楼不一会儿,几辆军队轿车开进了学校,从车上下来的是国防科委的钟赤兵中将、罗舜初中将、刘化清中将、陆杨少将等领导。他们来到会议室,亲自召见这些被国防科委工作组打成“反动学生”和“牛鬼蛇神”的学生。钟赤兵大发雷霆,一口咬定反工作组就是反党,就是反革命。他让这几个学生好好检讨,不准抓着工作组不放。他说:“聂老总是毛主席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国防科委也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国防科委没有任何问题,更没有什么‘黑线’,谁要胆敢反对国防科委,我就枪毙了他!”

钟赤兵是老革命,他在长征中娄山关战役时被敌人打断了一条腿,是有名的独腿将军,打仗时用担架抬着指挥战斗。长征途中,敌机轰炸,李敏的母亲贺子珍为了掩护钟赤兵,被炸成血人,浑身受伤17处,有的弹片陪了她终生。但他同样是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对文化大革命并不理解。

那些反对工作组的群众当然不服。他们认为自己是响应中央的号召起来革命的,不是反革命,他们要求工作组为他们平反。

工作组没有给他们平反,但是也不能在北航继续呆下去了,他们要撤走。可是,对许多被他们打成“黑帮”、“反革命”的师生,工作组没有一句交待就走了,学生们当然不干。他们认为:工作组不能走,筹委会是工作组指定的,解决不了北航的问题,反对工作组的师生们也不同意。于是反对工作组的学生、教师亮起了真正的红灯。他们中的许多人制作了各式各样的红灯笼,挂了出来。从学院大门一直到院内,到处是红灯笼,意思是工作组不把问题解决完不能走。而拥护工作组的人们,大部分是老工人、炊事员、司机、还有很多教师和高干子女们也不甘示弱,纷纷挂起了绿灯笼,为工作组放行。“红灯”派和“绿灯”派互相冲突了起来,这就是当时北航有名的“红绿灯大战”。

7月30日,北航工作组在院内集中学习。8月1日,工作组写出第一张也是最后一张大字报,欢迎提意见。院文革筹委会承认自己产生程序非法,决定重选。8月2日下午,工作组突然宣布,根据国防科委决定立即撤离北航,没有做任何检查,也没有重新选举筹委会。保工作组的人挂出了醒目的大标语“热烈欢送工作组!”,“老革命遇到新问题,真不简单!”有的人甚至高喊“工作组万岁!”北航文革筹委会和尚未正式对外宣布成立的北航“红卫兵”,把工作组送到南校门,在学院路南口依依惜别。以苏晓前为首、以高干子女为核心的北航“红卫兵”给工作组成员带上大红花。

以赵如璋为首的国防科委工作组就这样离开了北航。

7月29日这天,清华大学蒯大富又贴出了一张大字报:《站住!叶林,把帐算清再走》。他还给关锋写了一封信:

关锋同志:

请你把我这份大字报转给党中央。并请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派人下来,依靠清华广大革命师生,严格审查清华工作组、叶林同志和我本人。

致

敬礼

蒯大富

七月二十九日

29日,政治局常委会议,毛泽东布置周恩来过问清华大学的文化革命运动。

29日这天,王光美突然来到清华,说:“我不能在工作组困难时期放手不管。”

她这次来到清华园,一反常态,坚持要在公开场合露面,她原来是从来不到食堂吃饭的,但那天晚上,她一定要同别人一起到食堂去吃晚饭。

晚上,大礼堂开工作组问题的辩论会,她又一定要到大礼堂去,有人几次叫她不要去,她最后还是跑去了,她一跑上台就大讲她和刘少奇的生活上的关系,说群众“热爱”刘少奇。接着又大讲工作组是有成绩的,也有错误,她对工作组有她自己的看法,但现在不讲。

从那天以后,王光美就住在女生宿舍,到食堂参加劳动,为学生们打饭。回到工作组仍然坚持说:“不少同学还是有认识的,还是能肯定工作组成绩的”,又说:“让蒯大富上台也好,他上了台实行残酷镇压,可以教育大家。”

# 第101回：亲约见，周恩来会蒯大富 开全会，文革再掀新篇章

30日，周恩来约请清华大学工作组成员谈话，随后约请两批清华学生谈话。谈完话，周恩来又急急忙忙去参加科学院的大会。

这天，中央文革在人民大会堂召集科技界大会，主要是科学院、国家科委两系统，哲学社会科学部也有人参加。科学院的“反革命分子”王锡鹏、科委的“反革命分子”、时任国家科委政策研究室主任的张本不但出席了会，还讲了话，控诉国家科委和中国科学院领导镇压群众、破坏文化大革命。

“730”大会以后，围绕对待科学院党委和“应地所事件”的态度问题，在群众中形成尖锐对立的看法，不久又形成了对立的群众组织。

7月30日，中央撤消了郭影秋北京新市委文教书记的职务。消息传到人民大学，许多同学们纷纷涌向市委问为什么？统战部副部长张经武出来接见了他们，讲了四点：

（1）同学们都拥护中央决定。

（2）郭影秋有哪些错误，市委不讲。

（3）郭影秋错误性质同学们要辩论，可请示中央文革。

（4）尽速成立校、系文革小组。

张经武的这个讲话比较原则。后来，同学们们又和市委一位工作人员交谈，他说：

（1）郭影秋对北京师范大学工作组组长孙友渔问题的处理上有错误。

（2）近一个多月来，北京市文革运动冷冷清清，与他有很大关系，领导不力，不能继续任职。

（3）他本人原来有些问题，背思想包袱。

根据上述原因，再加上在人大犯了错误，故撤消市委文教书记职务。

7月31日,贺鹏飞通过广播通知:“请蒯大富同学晚饭后到甲所来。”

甲所是清华大学接待外宾的地方。晚上19时,吃完晚饭,天还没黑,蒯大富就来到甲所。他见到贺鹏飞,便问:“什么事?”

贺鹏飞说:“有人找你谈话,你等着吧。”

蒯大富在甲所北门外等候。后来,与他同系的901班三年级学生、团支部副书记、中共候补党员刘才堂也来了,他也是被工作组打成的反动学生。有人通知他晚饭后到甲所,说是有首长要见。

蒯大富和刘才堂俩人就在甲所门前徘徊,等待,互相间也没说什么话。一直到深夜,才突然有人开门出来让他们进去。一进门,他们就看到灯光下有一个高大的身影迎过来和他们握手,他们做梦也没有想到,原来是周恩来总理!二人当即高兴得叫了起来:

“周总理!”

周恩来与他们握手后,就将他们让进屋里。这是小院左侧的一个房间,里面有沙发,茶几。周恩来说:

“你们坐。”

蒯大富不敢坐,因为这反差太大了,此时他还戴着反革命的帽子,还没平反呢。

周恩来又说:“请坐,请坐。”

蒯大富还是站在那里。周恩来的秘书孙岳说:“总理叫你坐你就坐嘛。”

蒯大富这才坐下,也只是半个屁股欠在沙发上。

这时,学校保卫部的工作人员领着工程数学力学系05班学生、中共候补党员、时任班级共青团支部书记的刘泉进来了,他也是晚饭后接到通知的。

周恩来站起来,听了学校保卫部干部介绍后,和刘泉握手。刘泉激动的说:

“周总理好!”

周恩来说:“你好!”接着提议说:“我们到桌上谈吧。”

于是大家都围坐到与沙发垂直的长条桌旁的长沙发上。

周恩来逐个问了蒯大富他们每个人的姓名,所在系、班级、年龄、

是否党团员、担任学生干部等等情况后,说:“主席和中央派我来,想听听你们对清华大学文化大革命的看法。请你们把6月1号到今天,正好两个月,你们所看到的、想到的、听到的,原原本本、详详细细地跟我讲,我保证,听你们讲完最后一句话。”

几个学生觉得蒯大富当时受压制最厉害,斗争最坚决,于是都等他讲。

此时,蒯大富大脑一片空白,他努力使自己镇静下来,他要珍惜这次机会。

稍微镇静了一下,蒯大富开口说:“总理,我向毛主席和中央保证,我下面讲的每一句话都是我的真实的想法,亲眼看到,亲耳听到。”

周恩来说:“你开始吧”。

这时,蒯大富基本平静了下来,他打开笔记本,滔滔不绝的讲了起来。周恩来的秘书孙岳削好很多铅笔,坐在刘才堂旁边做记录。刚讲了两三分钟,周恩来也拿出本子来记,他有时会打断一下说:“这个再重复一下。”

一会儿,数力系的沈台平进来了,他也是接到通知过来的。

贺鹏飞进来了,他对周恩来说:“周伯伯,我想进来听蒯大富汇报。”

周恩来没有同意。

过了20分钟,贺鹏飞又进来说:“周伯伯,我们还想听蒯大富说。”

周恩来说:“我都跟你说了,你不许进来了。”

从31日凌晨2点到5点,蒯大富汇报了3个小时,始终没有停顿。不知不觉天都亮了,直到周恩来说:

“我们这次交谈,就先到这里吧。还有没谈完的,还有同学没谈的,我们晚上安排时间再谈。”

晚上,学校派车将蒯大富、刘才堂、沈台平、刘泉四人送到人民大会堂。他们在河北厅的一个长条桌子边坐下。不一会儿,周恩来带着谭启龙和江渭清进来了。学生们一见,都站起来说:

“周总理好!”

周恩来说:“大家好!”并示意大家坐下,然后说:“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位是山东省委书记谭启龙同志,这位是江苏省委书记江渭清同

志,我和他们一起来听听你们的意见。我们在文化革命中都要学习啊!”

然后周恩来又逐个询问几个学生的个人和家庭情况及所在系、班级等情况,大概是为了让两位省委书记也都了解一下。

他先问蒯大富:“你家在什么地方?”

蒯大富说:“我在清华大学工程化学系大三读书,老家是江苏的,滨海县,属于盐城地区的。父亲、母亲都是农民。”

周恩来说:“你们家在江苏啊,我们是老乡啊,我家在淮安。其实我13岁以后才搬到浙江去。”

他又问:“父亲、母亲干什么的?”

蒯大富回答说:“父亲、母亲都是农民,政治面目都是中共党员。我父亲是1944年入党的,母亲是1945年的党员。”

周恩来说:“你们家是革命家庭嘛,盐城是我们新四军总部的所在地。”

然后又问刘泉:“你父母是做什么工作的?”

刘泉答:“是干部。”

周恩来:“在什么机关当干部?”

刘泉说:“在浙江的省级机关。”

周恩来:“担任什么职务吗?”

刘泉:“我爸爸当副省长,妈妈当省妇联主任。”

周恩来:“哦,你爸爸,副省长,是哪一位啊,叫什么名字?”

刘泉:“叫刘剑。”

周恩来:“噢,我认识呢!”然后转头问谭启龙:“你认识吗?”

谭启龙点头说:“认识,认识。”

周恩来再转头问江渭请:“你认识吗?”

江渭清也点头说:“认识的。”

随后,周恩来又问了刘才堂和沈台平。

都问完后,蒯大富又继续开讲。周恩来说:“你们几位随时可以补充,因为蒯大富同志不知道外面的情况,你们在外边知道的就可以补充嘛。”

蒯大富从19时多讲到22时多,又讲了3个小时。

夜深了,一阵凉风吹过,大窗户边上垂下的长长的薄纱般的窗帘摇动起来,发出轻微的声响。周恩来回头望望,招呼服务员说:“服务员同志,请把玻璃窗关上吧,有穿堂风啊。”

一位女服务员过来关上了部分玻璃窗,未关玻璃窗的,也拉上了窗帘。

刘泉好奇地问:“穿堂风?什么是穿堂风?”

周恩来微笑着说:“就是穿堂而过的凉风,你们穿得少,容易引起感冒。”

刘泉明白了,说:“噢,是这么回事。”他感到周总理生活经验真丰富,而且关心体贴人那么细微!也觉得自己太孤陋寡闻了!

蒯大富讲得差不多了,语速放慢了。刘泉心想,这次可以发言了。谁知蒯大富发言一结束,周恩来就说:“现在十点多了,我们后面还有安排,今天就谈到这里吧。谢谢你们了。时间很晚了。给你们准备了夜宵,你们吃了夜宵再回学校吧。

蒯大富问:“那总理你们呢?一起吃吧。”

周恩来说:“我们后面还有会,不和你们一起吃了。”

蒯大富马上说:“谢谢周总理!”

周恩来、谭启龙、江渭清和蒯大富他们四人握手后就走了。

一个穿白大褂的女服务人员,带蒯大富他们到旁边的小屋子,一人一碗鸡丝汤面。

刘泉马上问女服务员:“要多少粮票?要多少钱?”

蒯大富悄声对他说:“哪里会要呢?不会要的。”

果然,女服务员说:“都不要。”

刘泉说:“我们吃公家的饭要交粮票,要付钱的。”

女服务员和另一位男服务员互相对笑一下,说:“周总理自己给你们付了。你们放心吃吧。”

7月31日,贺龙派薛明到人民大会堂向负责解决清华大学问题的周恩来反映他的意见:“解决清华问题,不要采取北大的方式,一定要慎重,要照顾党内的团结。把王光美负责的工作组说成是反动的,就等于向刘少奇开刀。”

周恩来问薛明:“这都是谁的意见?”

薛明说:“贺龙、李井泉、王任重他们一起研究的。”

周恩来记在本上,脸上毫无表情,见薛明说完,做了个让她走的手势。

毛泽东对工作组的态度开始对各地的文革运动产生了影响。7月28日左右,王任重一个紧急电话打回武汉,湖北各院校的工作组虽然未撤,但所有的批判、斗争群众的活动,都紧急刹车!7月30日,湖北省委常委按当时的认识也认真地讨论和回顾了前段运动。显然,他们业已感觉到运动出了问题,但又原由不清,处于矛盾和被动,举棋不定。

8月2日,湖北省委召开第二次文革积极分子代表会,听取了7月29日北京市第一次积极分子会议上中央领导的报告录音,正面地总结了前一段运动的成绩,表彰了各学校产生出来的运动积极分子。武汉市委决定逐步撤出各单位的工作组,并开门整队。

7月30日,鉴于毛泽东对工作队问题已经表态,到北京准备参加八届十中全会的赵紫阳、区梦觉从北京匆匆写信给广州的林李明、张云、王阑西,对撤退工作队,作了紧急布置:

“从现在开始,就要把学校的文化革命运动逐步地交给革命师生员工中的积极分子去领导,放手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工作队多的,逐步调出一些,或集中到工作队部学习,大学的一个系,留一两个人就可以了。”

7月29日至31日,郑州大学工作组即将撤离之际,根据省委文革领导小组组长杨蔚屏的布置,工作组在3天之内,仓促了成立“文化革命委员会”,即“校文革”。“校文革”没有经过群众的酝酿讨论,而是由工作组主要领导人商量之后提名通过。

7月30日,中共吉林省委确定:应尽快撤出大、中学校的工作队,对少数群众意见多的工作队,可留下听取群众意见;在学校中选举文化革命小姐或文革委员时,要充分发扬民主;工作队撤出时可留联络员、观察员、巡视员。

7月30日,辽宁省委撤出工作队。截至7月25日,辽宁大学有409人被打成“右派”,哲经系陈玉凤被逼疯住进精神病院。

7月31日晚上召开“八一”建军节招待会。中共中央统战副部长

刘春,接到出席“八一”建军节招待会的请柬后,不想参加。于是,他儿子,矿院学生刘歌自告奋勇替父亲出席。

刘歌到了军事博物馆四楼平台,碰到老同学朱佳木,一问他也是顶父亲的名字来的。朱佳木的父亲朱理治,时任中共中央华北局书记,他也不愿出席“八一”招待会,因此,将请柬交给朱佳木,由朱佳木替他出席。这时,他们已经风闻刘少奇、邓小平可能犯错误了。朱佳木对刘歌说:“毛主席、林彪向来不出席‘八一’建军节的招待会,刘少奇、邓小平应该出席,这是惯例。如果他们不出席,那就真可能出事了。”

对朱佳木的分析,刘歌深信不疑。朱佳木是刘歌弟弟小学的同班同学,这时已是人大党史系 65 级的学生,他们在八中上高中时的校友。

建军节晚会正在进行,解放军的许多著名将帅都已到会。天气虽然很热,但他们中间的大多数,都穿着整齐的新军装。叶剑英元帅到了,他没有穿军装,上身只穿了一件白色短袖衫,正热情地和各位老将打招呼、握手,然后在前排就座。时任广州军区司令员的黄永胜也没有穿军装,和谁也不打招呼,就大大咧咧地在叶帅身边坐下。朱佳木小声对刘歌说:“黄永胜不会为了建军节到北京来,中央一定有重要的会在召开。”

这时周恩来走出了电梯,看上去非常地疲劳。他向旁边的服务员要了一块热毛巾,在脸上敷了好一会儿,这才步入会场。这时,人们看到的周恩来,又是容光焕发的周恩来。一时,军乐齐奏,镁光灯闪烁,场面十分热烈。

刘少奇始终没有露面,邓小平虽然出席了招待会,但非常低调,远不如其他领导人那么活跃。难道他们真的出了什么问题吗?

8 月 1 日这天,刘少奇和李雪峰研究商定,刘少奇到北京建工学院参加那里的文化大革命。北京建筑工程学院少数派 200 多人在这天成立“八一战斗团”。第二天上午,学院的多数派 1100 多人也成立了“革命团”与之抗衡。北京建工学院是北京市高校中最早形成两派组织对立的学校。随后,在工作组去与留的问题上,及对领导干部批或保的态度上,北京乃至全国各单位都出现了互相对立的两派群众

组织。

8月1日,北京航空学院红卫兵成立。发起人是刘克府,北航第一批贴大字报造院党委反的人,也是北航筹委会委员之一。他和矿院红卫兵刘歌是中学时的同学,听刘歌介绍了矿院红卫兵的情况,非常赞同,于是和北航的几个干部子弟,也都是第一批写大字报的同学,于8月1日组织起红卫兵。随后,北航红卫兵各系组织也纷纷宣布成立。8月3日,北航红卫兵总部成立,以高干子女为核心,并发表了宣言和纲领。

北航的红卫兵一成立,工作组马上表态支持,还把小白楼二层拨给红卫兵使用。相比其他学校的红卫兵,北航红卫兵的处境无疑是最好的。

8月1日,轻院红卫兵正式成立。

8月1日下午15时许,中国共产党第八届十一中全会在人民大会堂东厅召开。出席这次全会的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141人,列席会议的有各中央局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及中央有关方面的负责人,还有部分北京高校的工作组组长和"革命师生"的代表共47人。如:北京大学工作组组长张承先、副组长曹轶欧、清华大学工作组组长叶林、北京体育学院工作组组长黄中、北京机械学院工作组组长王丰、文化部文革教育分组政委李光辉、北京大学的聂元梓、杨克明、学生高盛清、北京师范大学学生谭厚兰、清华大学教师王博文、清华大学学生贺鹏飞、花春荣、北京广播学院学生邓良宝、北京邮电学院学生王柏松、北京工业大学学生陆彩云、北京戏剧学院教师梁恩泽、北京第四中学学生孔丹等。

至此,神州大陆已风雷滚滚,一场更大的风暴即将来临……

# 第一部下卷
# 各地文革章回索引

**北京：**
第 49 回；第 50 回；第 51 回；第 56 回；第 66 回；第 73 回；
第 86 回；第 89 回；第 90 回；第 91 回；第 92 回；第 93 回；
第 94 回；第 97 回；第 98 回；第 99 回；第 100 回；第 101 回；
**中央文革小组：**
第 48 回；
**北京大学：**
第 48 回；第 51 回；第 52 回；第 54 回；第 62 回；第 66 回；
第 67 回；第 70 回；第 87 回；第 88 回；第 89 回；第 91 回；
第 92 回；第 94 回；第 95 回；第 96 回；第 97 回；
**空军：**
第 48 回；第 79 回；第 80 回；第 81 回；
**“首都工作组”：**
第 49 回；
**红卫兵：**
第 52 回；第 53 回；第 60 回；第 71 回；第 72 回；第 78 回；
第 87 回；第 98 回；第 101 回；
**北京航空学院：**
第 52 回；第 68 回；第 74 回；第 91 回；第 100 回；第 101 回；
**工作组：**
第 53 回；第 54 回；第 60 回；第 62 回；第 67 回；第 68 回；
第 69 回；第 70 回；第 71 回；第 74 回；第 78 回；第 79 回；

第 86 回;第 87 回;第 98 回;第 99 回;第 100 回;

**北京师范大学:**

第 57 回;第 68 回;第 71 回;第 87 回;第 91 回;第 92 回;
第 97 回;第 98 回;

**清华大学:**

第 61 回;第 66 回;第 67 回;第 68 回;第 72 回;第 77 回;
第 78 回;第 89 回;第 90 回;第 99 回;第 100 回;第 101 回;

**彭真、叛徒:**

第 63 回;

**人民大学:**

第 64 回;第 98 回;

**北京地质学院:**

第 68 回;第 89 回;第 97 回;

**海军:**

第 80 回;第 81 回;

**韶山:**

第 81 回;第 82 回;

**“二月兵变”:**

第 97 回;

**“对联”:**

第 100 回;

**天津:**

第 76 回;

**华北地区:**

**山西:**

第 57 回;

**内蒙：**

第 84 回;第 85 回;第 86 回;

**东北地区：**

**吉林：**

第 71 回;第 101 回;

**辽宁：**

第 101 回;

**西北地区：**

**陕西：**

第 57 回;第 58 回;第 59 回;

**甘肃：**

第 60 回;第 72 回;

**青海：**

第 55 回;第 56 回;

**西南地区：**

**四川：**

第 64 回(重庆):第 65 回(重庆);第 83 回(重庆);

**贵州：**

第 59 回;

**中南地区：**

**河南：**

第 56 回;第 65 回;第 101 回;

**湖北：**

第 63 回;第 69 回;第 83 回;第 88 回;第 101 回;

**广东：**

第 37 回；第 74 回；第 75 回；

**华东地区：**

**江苏：**

第 55 回；第 57 回；第 63 回；

**浙江：**

第 74 回；

# 文革史话

之

第二部

# 狂风骤雨

第一卷

# 目　录

第 102 回：聚京城，商讨文化大革命
下清华，周恩来调查研究
第 103 回：“鬼见愁”，对联更掀疯狂潮
谈“兵变”，邓小平予以澄清
第 104 回：盛赞誉，中央文革比舜尧
对与错，清华组织大辩论
第 105 回：再起步，北大成立筹委会
说“贫协”，康生讲“二月兵变”
第 106 回：心难平，提笔写就大字报
接林彪，中央重新排座次
第 107 回：不手软，女孩子打人更凶
卞仲耘，校长被学生打死
第 108 回：是黑帮，施救援医院犹豫
评是非，天桥再开辩论会
第 109 回：《呼吁书》，交穆欣广为散发
张春桥，接见天津大学生
第 110 回：津城反，兰州铁路局事件
说刘邓，主席炮打司令部
第 111 回：叶飞急，广东忙撤工作组
《十六条》，中央还有“司令部”
第 112 回：从天降，领袖在群众中间
众欢呼，十一中全会闭幕
第 113 回：抓贯彻，林彪主持工作会
雷英夫，材料揭发刘少奇
第 114 回：十万众，会场上公开打人
哈军工，两种观点大辩论
第 115 回：哈师院，学生自主开大会
哈军工，学院领导轰下台
第 116 回：大上海，保与反争论激烈
说鲁迅，校党委考察学生
第 117 回：丁香园，上海市委写作班
《红缨枪》，复旦培养接班人
第 118 回：抛徐震，校党委丢卒保车
“斗鬼风”，从复旦大学刮起
第 119 回：教授惨，上海市打人成风
去北京，西安学生结伴行
第 120 回：郑思群，一夜自戕松林坡
激民愤，重庆大学舆论起
第 121 回：接通知，工作组紧急撤离
难走脱，困校园生活维艰
第 122 回：八一五，重庆党委受攻击
温玉成，广州军区遭炮轰

第 123 回：有争执，桂林学生起斗殴
河南省，刘建勋炮打自己
第 124 回：李雪峰，北京工作交吴德
西安市，学生静坐建国路
第 125 回：斗陆平，外地学生集北京
开大会，中央设立接待室
第 126 回：急筹备，准备接见红卫兵
“新北大”，见清华三方代表
第 127 回：谈海军，地院“东方红”成立
聚广场，红卫兵人潮似海
第 128 回：心难舍，金水桥回首频频
情激荡，天安门前波涛狂
第 129 回：“要武嘛”，毛泽东戴红袖章
欲革命，却如此屡屡犯错
第 130 回：关故宫，王震回家被揪斗
改名称，北京学生“破四旧”
第 131 回：中山堂，打人风愈演愈烈
潘复生，冰城支持造反派
第 132 回：刘建勋，亮观点态度鲜明
曹荻秋，不主张建红卫兵
第 133 回：“三相信”，湖南省有人质疑
长沙市，八一九又起风波
第 134 回：八一九，全国都在开大会
荣毅仁，太平庄家中被斗
第 135 回：八二〇，“红旗战斗队”成立
谈出身，谭力夫口若悬河
第 136 回：辩论会，农民齐保郭影秋
西北生，纷纷向陶铸告状
第 137 回：再升级，清华炮轰刘少奇
破四旧，红卫兵涌上街头
第 138 回：令军警，绝不许镇压学生
禁旧习，发消息表示支持
第 139 回：同风雨，周恩来再访清华
发通牒，各党派停止办公
第 140 回：皇城根，文联斗牛鬼蛇神
难阻拦，女学生打人更狠
第 141 回：狂潮起，破四旧席卷全国
上海市，《新民晚报》先更名
第 142 回：青岛市，管风琴惨遭毁坏
闹绝食，地院一进地质部
第 143 回：八二四，清华“二校门”被毁
提疑问，北航轰中央文革
第 144 回：大祭日，龙华寺惨遭毁坏
做规定，上海市“不要抄家”

第 145 回：天津卫，欲铲尽殖民痕迹
飞峰麓，灵隐寺阵阵告急
第 146 回：传指示，北京电一锤定音
冒风险，王市长隐匿“第三”
第 147 回：法门寺，千年七音碑砸毁
火冲天，良卿护佛宝自焚
第 148 回：拉萨城，大昭寺惨遭洗劫
滇池畔，春城炮轰省市委
第 149 回：太平湖，一代文豪驾鹤去
讨说法，北航静坐国防部
第 150 回：旃坛寺，总参“八二五”事件
难预料，《陕西日报》出事端
第 151 回：援交大，上海也出“八二五”
反党委？青岛市亦发事端

## 第 102 回：聚京城，商讨文化大革命

## 下清华，周恩来调查研究

8 月 1 日下午 15 时许，中国共产党八届十一中全会在人民大会堂东厅召开。毛泽东坐在主席台的中央，他左边是刘少奇，右边是邓小平。周恩来、朱德也坐在前面。会议厅的两边各摆着一张小桌子，一边坐着负责记录的速记员，另一边摆着一架磁带录音机。

毛泽东的脸色沉郁，他在宣布会议开始后，说："这次会议要通过一个重要文件"，"现在全国到处都在搞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可能有很多人不赞成，要反对。我看反对也没有啥，牛鬼蛇神总要跳嘛。今天我不多讲，主要由小平、少奇和伯达讲。讲完后讨论，研究和通过文件么。好，请小平先讲。"

邓小平在掌声中站起来，微微一笑说："这次全会是在 1962 年 9 月 24 日至 27 日召开的八届十中全会后，近四年里很重要的一次会。会议的开法刚才主席讲了，要开 5 天，今天算第一天，正式开会的第一天，以后开 3 天小组会，最后一天再议一下，通过文件。除了林彪、陈云同志请了病假外，我们的常委都到了。"

"林彪同志现在哪里？"毛泽东突然问道。

"在大连。"邓小平回答。

毛泽东说："有必要的话，把他请回来。这次会议很重要，通过的文件将直接关系到下一步的工作，也就是明年、后年、大后年的战斗目标。"

邓小平接着宣布了这次会议的主要议程：

一、通过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

二、讨论和批准中央全会以来中央在国内、国际问题上的重大措施。

三、通过全会公报。

四、通过撤销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中央书记处和政府的职务,增补陶铸为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叶剑英为中央书记处书记。

他说："按法律手续要在这一次全会上决定。所以也请同志们讨论和研究，总之，一共是这么几件事。"

邓小平说完，毛泽东再次表示："对中央的这些决定，可以反对，也可以公开提出批评，只要是公开的，我们就欢迎。我还欢迎有人为彭真这些人鸣冤叫屈。现在请少奇同志讲一讲吧。"

刘少奇开始讲话，他说：

"同志们，主席在会议前的重要讲话中，非常严厉地批评了中央向首都大专院校派工作组的错误。这个错误的形成有当时的客观原因和条件。今年 6 月 1 日，毛主席批准广播北大的大字报后，北大和许多大专院校事实上等于瘫痪，许多学校的师生纷纷要求中央给他们派工作组。而毛主席不在北京，中央的工作由我和小平主持。在中央开会讨论派工作组时，陈伯达同志曾给我写了一个条子，上面写着：'不要搞工作组。'当时我没有认真听取陈伯达的意见。而大多数在中央工作的同志认为，大、中学校领导已经瘫痪，情况混乱，为了坚持党的领导，工作组非派不可，与会者纷纷说：'原学校领导不起作用了，谁来代替党的领导？工作组就代表党的领导，只有派工作组。'再说，

工作组这种形式是党一贯的传统，所以我们就决定派了。当时如果谨慎一点，或者多征求一下中央文革的意见，可能不至于会犯这种错误……”

“当时我曾考虑，这样大的运动，北京各院校部分组织已经瘫痪了，怕中断了党的领导不好。”

毛泽东插话说：“怎么会中断呢?”

刘少奇继续他的讲话：“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北京的情况，一星期向主席汇报一次。这一段我在北京文化革命中有错误，特别是在工作组问题上出了问题，责任主要由我负。另一点，我讲一下近四年来，中央在国内、国际问题上的重大措施。主要有：关于培养和造就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问题；关于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发扬群众路线的革命传统的问题；关于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学人民解放军，加强政治思想工作的号召；关于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战略方针；关于打破洋框框，走自己工业发展道路的问题；关于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体系……”

刘少奇讲完话，陈伯达接着发言。他说：“我只讲个人的意见，说一说工作组这种形式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起了什么样的作用，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是革命的，还是不革命的，或者是反对革命的？是好作用，还是坏作用？这一点，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已经作了裁定，我完全同意毛主席的决定，完全同意毛主席的看法，即工作组是起了反对革命作用的坏形式，是完全消极的东西。他们保护了走资派和黑帮、黑线人物，是地地道道的资产阶级老爷作风。”

他说，派工作组的做法是“想把那些朝气勃勃的学生都打下去，把真正积极搞文化革命的打下去。”

毛泽东插话说：”很多工作组，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完全是错误的，不到百分之十的是好的。以后必须撤销，这一点要肯定。工作组一不能斗，二不能批，三不能改，起了一个镇压运动的坏作用。”

陈伯达说：“我们很多同志当了官做什么事情就不容易听别人的意见，他的话不能侵犯……”

毛泽东插话说：“神圣不可侵犯，侵犯别人还可以，侵犯自己就不行。”

陈伯达接着说：“如果这一点不解决，我们是要发生修正主义的。”

当陈伯达讲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必然性，在大革命中有很多偶然性”时，毛泽东说：“必然性是藏在偶然性中间的。谁知道聂元梓出那张大字报，一广播，乱子就出来了。就是一个迷信，迷信自己高明，不相信群众高明。事实上我们没有什么高明，工人、农民、革命的知识分子比我们高明，只有依靠他们，我们什么都不知道。”他最后强调说，要由中央全会就文化大革命问题正式做出决定。他说：“要决定。要推翻这个决定，也要到下次全会。”

陈伯达继续说：“为什么有些人会在文化大革命中犯这种错误呢？一个主要原因就是自己的官做大了，脱离了群众，脱离了现实，不愿意听取群众的意见，把自己当作了诸葛亮，把人民群众当作阿斗。这是他们犯错误的根本原因……”

会议期间，毛泽东接见了列席会议的北京大学聂元梓、杨克明、张恩慈 3 人。康生、曹轶欧参加了接见。毛泽东表扬聂元梓他们的大字报写得很好。毛泽东还说，北大应该成立领导学校文化大革命的组织，要聂元梓负责成立北大文化革命委员会筹委会的工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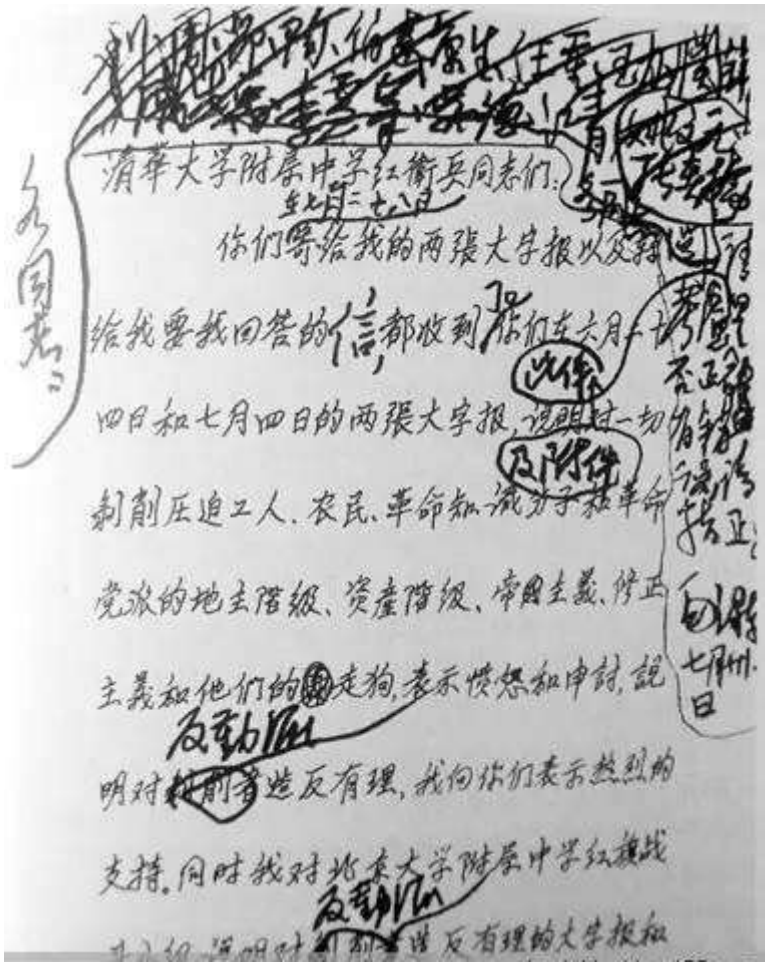
7 月 31 日，毛泽东给清华附中红卫兵写了一封信，赞扬他们的“革命造反精神”。信中说：

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同志们：

你们在七月二十八日寄给我的两张大字报，以及转给我要我回答的信都收到了。你们在六月二十四日和七月四日的两张大字报，说明对一切剥削压迫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和革命党派的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他们的走狗表示愤怒和声讨；说明对反动派造反有理。我向你们表示热烈的支持，同时，我对北京大学附属中学《红旗》战斗小组，说对反动派造反有理的大字报和对彭小蒙同志七月二十五日在北京大学全体师生员工大会上，代表他们《红旗》战斗小组所作的很好的演说，表示热烈的支持。在这里我要说，我和我的革命战友都是采取同样态度的。不仅在北京，在全国，在文化革命运动中，凡是同你们采取同样革命态度的人们，我们一律给予热烈的支持。还有，我们支持你们，我们又要求你们注意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们，对犯有严重错误的人们，在指出他们的错误以后，也要给予工作和改正错误重新做人的出路。马克思说，无产阶级不但要解放自己，而且要解放全人类，如果不能解放全人类，无产阶级自己就不能最后地得到解放。这个道理也请同志们予以注意。

毛泽东

1966 年 8 月 1 日


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衛兵同志们：

你们寄给我的兩張大字报以及

给我要我回答的信，都收到了。你们在六月

四日和七月四日的兩張大字报，说明过一切

剝削压迫工人、农民、革命知識分子和革命

党政的地主階级、资產階级、帝国主義、修正

主義和他们的走狗，表示憤怒和申討，說

明对他们造反有理，我向你们表示热烈的

支持。同时我对北京大学附属中学红旗战

并在此信抄件上批示："各同志：请考虑此件及附件是否正确。有错误，请指正。"此信印发时日期署为八月一日，当时这封信没有送出，但作为八届十一中全会文件印发了。同时作为八届十一中全会文件印发的还有关锋 7 月 24 日给江青写的那封信。

6 月 28 日，北京语言学院 7 名共青团员、青年学生给毛泽东写信。信中说："我们的父母都是革命干部、共产党员，过去他们在急风暴雨的阶级斗争中，在枪林弹雨的战场上经受了考验，不愧为英雄好汉。现在他们当了'官'，做了'老爷'，政治上有了地位，生活上有了特殊待遇，革命性也就远不如以前高了。长此以往，他们就会逐

渐失去在革命道路上前进的‘自由’，就会逐步蜕化成特殊阶层、修正主义者。为此，我们认为必须在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彻底的改革：

1、降薪，取消各种特殊待遇。

2、革命干部应该经常地参加劳动。

3、凡是违犯党纪国法，做出不符合人民利益的事，应一律予以制裁。

4、尽快在全国普及半工半读、半农半读的教育制度。

5、在假期，青年学生经常组织起来，到工厂、农村去参加劳动，或者到部队去当兵。”

毛泽东于 7 月 12 日将这封信转批给陈伯达、康生。他在批示中写道：“伯达、康生酌处。此件已阅，请你们看一下。他们所谈问题，确实重要，应在运动中解决。请你们通知他们：信已收到，看到，并注意了。毛泽东七月十二日”

这封信和毛泽东的批语，作为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文件之三印发。

时任北京军区司令员的杨勇上将，从小就参加革命，对毛泽东有很深的感情。但对文化大革命也是十分的迷惑。他不明白毛泽东为什么要支持娃娃们造反？和绝大多数高级干部一样，尽管不明白，仍然坚信毛泽东是正确的，肯定有他的道理。说盲从也不十分确切，主要还是源于他们几十年的革命实践。如果不是毛泽东，中国共产党怎么会这么快就取得了胜利！因此，他想向学生请教，究竟眼前的这些纠纷源于哪里？他知道自己的儿子杨冀平就是红卫兵，于是让他邀请北

大附中“红旗战斗小组”的彭小蒙和北京矿业学院的刘歌到家中做客。

杨勇家住在新街口航空胡同的一个四合院里。刘歌和彭小蒙到了以后，杨勇未回。直到天色将晚时，杨勇才回到家中，他马上来到客厅与刘歌和彭小蒙见面，先向他们询问了大学和中学运动的情况。听完刘歌和彭小蒙的介绍，杨勇说，“你们是毛主席的小红卫兵，我们是毛主席的老红卫兵，我们都要坚定地跟毛主席干革命。你们搞红卫兵要讲政策，不要乱揪乱斗。党内也有坏人，要千万小心，不要上坏人的当。”

杨勇留刘歌和彭小蒙吃饭，还特意让炊事员加了几个菜。饭后，他们又聊到深夜。因为刘歌、彭小蒙还要赶回西郊各自的学校，杨勇让司机开车送他们回去。考虑到影响，杨勇嘱咐司机把车停在距学校较远的地方，不要离学校太近。

按照毛泽东意见，周恩来负责处理清华大学工作组和文化大革命问题。8 月 1 日这天，他先后约王光美、蒯大富谈话。接着，在 8 月 1 日、2 日两个晚上，连续带领参加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各省委领导到清华大学看大字报，参加学生座谈会。江渭清乘隙向周恩来汇报了江苏、南京运动中的一些问题及他对形势的估计。他说：“各学校撤走工作队，运动会有反复，甚至出现很大的反复。”

周恩来对他说：“工作队撤走以后，一定会来个高潮。第一是不可怕，第二是要做好工作。要告诉青年学生，在革命中采取严肃谨慎的态度，学习党的方针政策，按照党的政策办事。……这样做不是‘清规戒律’，不是束缚群众，阻碍革命。该讲的不讲，就会造成不必要

的混乱。一定要在全体干部中讲清楚，要敢于发动群众，又要敢于领导；要支持群众，又要善于领导运动。这样做，对广大革命师生有利，对革命事业有利。”

8 月 1 日晚 22 时，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召集周恩来等人开会。会后，周恩来又于 8 月 2 日凌晨，先后约清华大学工作组组长叶林和蒯大富等人谈话。

刘少奇在工厂工作的儿子刘允斌回家，向刘少奇汇报工厂的情况。刘少奇奇怪地问他：“你们厂没派工作组，为什么也镇压了群众？把一些群众定为反革命，有没有死人呀？”

这些天来，刘少奇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了。即使回到家里，他的心情也难于平复。在饭桌上吃饭，儿女们谁也不说话，他们隐约听说父亲犯了错误，不知该怎么办。刘少奇看着孩子们忧郁的眼睛，似乎明白了他们的心事，微微笑着说：“你们的心情我知道，放心，爸爸会努力认识自己的错误的。”说完他脸上依然微微笑着，孩子们却潸然泪下。

一位跟随刘少奇多年的老工作人员走过来，迟疑了一下开口说道：“派工作组这么大的事儿，你怎么不请示主席呢？”说着老工作人员声音哽咽了，“我们盼着你为国家做更多的事，可你怎么就犯了错误呢……”

刘少奇默默听着，沉思着。一连几个小时，他不停地抽烟。最后刘少奇站起来说了一句话：

“我不理解，但我要跟上形势。”

第二天刘少奇开会的时候，把李雪峰叫到休息厅，悄悄地说："在工作组问题上，我看你们都检查吧，能够认识到多少错误就检查多少错误，不要违心地说什么，但是也不要公开地顶他们。连我的女儿都要和我划清界限，何况你们呢？等党内的这场风波平息下来以后，也可能我们会重新认识这个问题的。"

李雪峰对他说："我只认识新市委主持工作时的错误，我不会把责任往别人身上推的。这点，请少奇同志放心。"

8 月 2 日，杨勇的儿子杨冀平，给清华附中的卜大华打了一个电话，告诉他自己从父亲杨勇的嘴里得知的消息：

"大华，我听我爸爸讲，毛主席对清华附中的大字报，有一个批示，是支持你们的！"

"真的？"卜大华起初不敢相信这突如其来的喜讯。

随后，杨冀平一字不漏地将毛泽东给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信念了一遍。

第 103 回：“鬼见愁”，对联更掀疯狂潮

谈“兵变”，邓小平予以澄清

7 月 29 日，北京航空学院附属中学的干部子女，将彭小蒙 7 月 28 日晚在北京展览馆电影厅控诉工作组大会的讲演中引用的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贴在了学校，横批用的就是江青的那句插话：“基本如此”

对联一出现，就像滚烫的油锅里撒进了生水，引起了激烈的争论。

这副对联最早是在 6 月份出现在北大附中，在传播过程中，渐渐成为“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这样激烈的语言。这种语言不符合共产党的正统语言习惯，近似于流氓痞子的话，但却朗朗上口，使那些出身干部家庭的中学红卫兵油然而生出一种与生俱来的优越感，一下就受到这些学生的狂热追捧。他们到处张贴对联、组织辩论会宣传对联。但同时也受到大多数学生的反对，因为它的打击面太广了，因此，被人们称为“鬼见愁”。

确实是鬼见愁，因为围绕“对联”在学生中进行的这场辩论，根本不是严肃认真的讨论问题，只是要你表明“支持”还是“反对”。如果反对，对方的态度也很简单，一个字——“打！”

8 月 1 日，北航附中的学生又把对联贴到北大、清华、人大等高校，对联在北京迅速传播开来。结果，凡是对联出现过的地方，无不发生激烈的辩论，这种辩论往往通宵达旦，有些人甚至累晕过去。但即使这样，学生们的热情丝毫不减，青春的躁动与传统等级理念的浸润促使着他们采取更加激烈的措施。

8 月 2 日凌晨，陈伯达接见了辩论“对联”的红卫兵代表，指出“鬼见愁”对联“不全面”，“文化大革命不是一次打死老虎的运动”，重点是“整那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即：有权有势的“活老虎”。“我们没有必要再打已经倒在地上的死老虎”，“老子反动，只要儿子是革命的就要团结他”，他建议将对联改为：“父母革命儿接班，父母反动儿背叛。横批：理应如此。”

8 月 2 日上午，中共中央八届十一中全会开小组会。与会者纷纷谈了自己对文化大革命的认识，检讨“自己跟不上毛主席。”有的人还从革命和不革命的角度检查了自己。在小组会上，没有人能够就如何展开文化大革命提出系统的意见、建议或看法。

当天下午，全会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召开大会，刘少奇主持，周恩来、李雪峰、薄一波等人发言，各自检查了在工作中存在的错误和缺点。

李雪峰在发言中作了自我批评，他承认北京市在一个多月中“犯了方向性的严重错误”，“存在一条违反毛泽东思想，‘怕’字当头，害怕群众，害怕革命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

薄一波在发言中讲了自己对工作组作用的认识。

周恩来在发言中说：“从十中全会以后到现在，一切重大决定都是毛主席亲自制定的。这次文化大革命，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是毛主席亲自批登《人民日报》的。这一登，整个文化大革命就轰开了。这次决定撤销工作组，也是毛主席回北京后亲自决策的。这次文化大革命是史无前例。”

“派工作组问题，常委，特别是留在北京工作的我们几个人都要负责任。工作组里绝大多数的干部都是好的，我们没有很好的给他们交代政策。我们要替北京市委和工作组负起更多的责任来。主席一号说百分之九十的工作组都犯了方向性的错误，而我们直到主席回来，汇报的时候，还主张工作组不撤。投身到战斗中免不了犯大错误，我就犯过大错误，现在过问这个事情一定也要犯错误。要做这个精神准备，犯错误就改。要能够听不同的意见，多方面的意见来比较，如果自己想得不对，请教于群众，请教于主席，请教于中央。大家来想，总会做得好些。”

这天，中共中央下达通知，中发［66］392 号。全文只一句话：

“中央决定陶铸同志兼任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顾问，特此通知。”

周恩来当天再约王光美、叶林谈话，并提出，王光美应该回去，不要再待在清华园。王光美说：“我听哪个上级的？让我来参加劳动，是少奇同志要我来的，他也是我的上级。”

这天傍晚 17 时左右，北京市委书记李雪峰在家里突然接到刘少奇的秘书打来电话：“要李雪峰同志马上准备，少奇同志要他一起去建工学院。”

李雪峰还未来得及回答，电话就挂断了。等李雪峰再次打通电话，那边说：“少奇同志坐车子已经走了，到你那里去接你。”

李雪峰非常诧异：只有自己去见刘少奇的规矩，哪有中央领导人到他这里来接他的道理？

就这样，刘少奇在李雪峰和国家建委主任谷牧的陪同下，来到了

建工学院。事前，刘少奇也通知“中央文革小组”派人参加，陈伯达让戚本禹随刘少奇去。戚本禹说，江青叫他一起去北大。陈伯达对他说：“这是组织命令。江青那里我给你去讲。”于是，戚本禹也随刘少奇一起来到北京建筑工程学院。

李雪峰陪刘少奇在北京建筑工程学院看大字报时，师生们围了过来，见到刘少奇，都很激动，高呼：

“毛主席万岁！”

“刘主席万岁！”

“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

刘少奇和师生们谈话，听取了学院“八一战斗团”和“革命团”两派的不同意见。他说：“我对这里情况不了解，因此没有发言权。但是，我是来了解你们情况的。今天会议准备的不够，有同志讲是搞突然袭击，匆忙开这个会。错误的话是我的，这是我的错误。开这个会主要听听你们的意见，今天看来，同志们有不同意见，意见至少有两种。至少有两种不同意见，可能有三种不同意见。有没有第四种意见？有不同意见也好。看来工作组在你们学校是犯了错误的。这个错误也不能完全由工作组负责，我们党中央和北京新市委也有责任。派工作组是党中央同意的，市委跟上来了。因此看来，主要精神不派好些，派工作组不对。工作组在你们学校哪些做对了，哪些做错了？你们清楚，我们还不清楚。有党中央、新市委的错误，谁的就谁负责。

明天晚上有时间我还来，找你们不同意见的人谈话，有两种不同意见，找两方谈，有三种意见就三方谈。请你们准备一下，看哪些人参加？我也要提些问题，看哪些同志把你们意见讲完，看什么时候再开这个会？这个会不要叫辩论会，叫讨论会，叫讨论会好不好？有不同意见讨论么，有错误改正错的，对的坚持，错了改正，团结起来。如果我能够帮助大家做些团结工作，我就很高兴了。同学们希望我们听取你们不同意见，不论明天、后天，三、四次我都愿意。感谢同学们对我的信任。请同学们给我自由。今天见了没见够再见见，不能围住我们。你们还有行动不自由的吗？有就不对了。请你们不同意见的白天准备，明天晚上我来。不过，我还要留个后路，如明天晚上不行，就后天晚上来。”

8 月 2 日下午，北航附中学生组织了近千人到清华大学游行，不停地高呼“鬼见愁”对联。他们在大礼堂摆起了擂台，要辩论这副“红对联”。其实，这哪里是什么辩论，完全是一边倒的喧嚣。

“老子英雄——”领呼的女生一声长啸，“儿好汉！儿好汉！！儿好汉！！！”台下一片豪情澎湃。

“老子反动——”领呼的男生一声叱咤，“儿混蛋！儿混蛋！！儿混蛋！！！”台下一片杀伐汹涌。

有人没有跟着喊口号，大概是不同意对联的观点，他被人狠狠的捅了一拳，抬头一看，一位柳眉倒竖、满脸怒气的女红卫兵站在他的后边。这时候全场都安静下来，只听到一声呵叱：“什么出身？”

那人站起来，答道：“职员”。

女红卫兵愣了一下，突然喊起了一句：“老子平常，儿骑墙！”会场对这新口号还不太适应，应者寥寥。她马上回到会场熟悉的口号“要革命的，站过来！不革命的，滚他妈的蛋！”

旁边一个好心人低声劝那人说：“别待了，出去吧。”那人只好默默地向外走去。此人就是后来与刘少奇的女儿刘涛结为夫妇的“四通”公司创始人之一的万润南。

在这次会上，这些中学生开始酝酿成立“工农革干子弟协会”，后来简称为“贫协”，清华、北大等大学积极响应。这些红卫兵以出身为标准将人群分成两大等级，就是后来人们熟悉的红五类和黑五类。红五类，那不用说，是人民，自己人。对黑五类呢？这些中学生还是一个字——“打！”

面对社会上，特别是在中学出现的越来越多的打人现象，8 月 2 日，工交政治部主任陶鲁笳在接见北京铁道学院的师生时说：“‘好人打坏人，活该；坏人打好人，好人光荣；好人打好人，误会。’毛主席说过，毛主席说：‘为什么不把我的话全面讲呢？我后面还有一句话，今后不许打人’。今后要宣传打人是犯法的。”

8 月 2 日晚，人民大学在大操场召开郭影秋问题全校辩论大会。参加这次大会的还有北京工业学院、北京工业大学、北京外交学院、北京大学等其他院校的人。操场上人山人海，有几万人之多。

晚 20 时，邓小平、陶铸、吴德、陶鲁茄、张经武等人来到人民大学参加辩论大会，同时来的还有很多摄影记者。

吴德主持当晚的大会。他宣布大会开始后，首先介绍主席台就座的领导。

接着，辩论双方发言。虽然各执一词，但并不激烈。学校工人代表及郭影秋“四清”时所在的北京郊区苏家坨公社农民代表在大会发言，盛赞郭影秋，农民代表称“郭团长是焦裕禄式好书记”。

郭影秋在“四清”时担任工作团团长。他没有架子，始终保持战争年代时共产党的传统，深入群众家中，访贫问苦，与群众打成一片，为当地群众做了许多好事，深受农民的拥戴。

当人大国际政治系四年级的一位女同学吴庭嘉上台发言后，将辩论会推向高潮。

吴庭嘉堪称人大才女。她其貌不扬，个子不高，戴副眼镜，没有讲稿，对着话筒，沉着冷静，滔滔不绝，出口成章。她以大量的事实为依据，精辟分析，透彻说理，证明郭影秋是坚定的革命左派。

“保郭派”不断以热烈的掌声表示支持。

吴庭嘉的发言激怒了“反郭派”，他们争先恐后上台发言，称吴庭嘉为“吴老娘”，一时打乱了原定的程序。于是双方都争着要求发言。因时间已晚，吴德征求意见后请邓小平和陶铸讲话。

邓小平说：“今天会上提出了郭影秋同志的问题，今天这个辩论会开得很好，给我很大教育，使我更加相信党中央撤销工作组的决定是完全正确的。工作组这种形式是阻碍群众自觉革命的。今天不管哪一方的发言，都有相当高的水平，不管对的错的，经过思考辩论，最后一定能搞清楚问题的。工作组撤销以后，摆在革命师生面前有两个问题：一是敢于革命，一是善于革命。”

“对郭影秋同志我们还是比较了解的，他在抗日战争中的表现是好的，解放战争中的表现也是好的。到人民大学后的情况怎么样，我不很了解，但是，大家可以和他的前任比较一下，是否有进步和变化呢?”

郭影秋爱写诗，“反郭派”同学在批判郭影秋时，引证他诗中的一句话：“浓茶烈酒猛抽烟”，以此说他对现实不满，思想反动。邓小平在讲话时对这句诗巧妙地表态说：“郭影秋写的诗不是反动的，是灰色的。”

邓小平接着说：“文化大革命是一件新的事情，我们也没有经验。老革命碰上了新问题。开始派工作组看来是难免的，但后来应该感觉

到工作组这种形式是障碍群众运动。这点我们在北京的中央同志是犯了错误的。因此，我们中央在北京的同志要负主要责任。”

有学生递条，问他们“二月兵变”的事。邓小平说：“刚才纸条上问‘二月兵变’的问题，我们已查清了，没有这回事。那是因为当时有些军队要驻扎到北京，用一些民房，军队领导考虑学校不方便，军队和学生混在一起不好。在这里我郑重告诉你们，我们军队彭真调不动。这件事澄清了，以后就没必要提这件事了。以后辩论，这件事就不算个事了，就这样。”

这时，已是次日凌晨 1 点时分，陶铸最后做了发言。

8 月 3 日上午，八届十一中全会小组会，讨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草稿。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就是陈伯达等人起草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和党的若干方针问题》。7 月 29 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和党的若干方针问题》作为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文件印发时，标题已改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内容也压缩为十六条。

八届十一中全会继续讨论工作组问题，会期也延长了。

8 月 3 日，周恩来约王力、关锋谈清华大学问题，后又分别约叶林及清华大学学生和清华大学工作组部分成员谈话。

这天，刘少奇、李雪峰、谷牧、戚本禹等人再次来到北京建工学院，分别找“八一团”和“革命团”两派的代表谈话。

8 月 3 日下午，八届十一中全会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继续召开大会，由周恩来主持。刘澜涛、宋任穷、李井泉、魏文伯四个中央局的负责人先后发言。

连续两天的讨论，使西北局第一书记刘澜涛感到头脑昏昏，神经处于高度的紧张之中。当毛泽东问他：“刘澜涛你通了没有”时，神

使鬼差，他竟回答：“我至今认识不到工作组错在什么地方，我们在土改、四清时，不都派过工作队吗？为什么他们不错偏偏我们就错了呢？”

毛泽东反问道：“工作组镇压学生难道没错？把那么多学生打成‘反革命’难道是正确的吗？如果你们还追学生们的后台，那这个后台就是我！什么人和学生们过不去？在前清时代，以后是北洋军阀，后来是国民党，都是镇压学生运动的。你们站到什么立场上去了！”

周恩来插话：“主席把问题说得这么严重，就是要使大家猛醒，赶快回头。”

刘澜涛在发言时检查了他们在工作组问题上的错误。他发言后，毛泽东插话说：撤销工作组，成立革命的师生员工文化革命代表会、文化革命委员会、文化革命小组，让他们自己去搞，这是马列主义态度。他说：“你们的问题比较彻底。不破不立，不破工作组，不立革命师生代表大会以及它产生的文化革命委员会，不破除这个，就不能立那个。”

宋任穷在发言中表示自己对于让学生这样闹革命的方式还有不少顾虑。毛泽东说：“把架子放下来嘛，不要摆老资格。我们有很多同志有点架子，什么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什么中央局书记、省委书记，还有什么部长，可了不起呀。统统把架子放下来，当一个普通老百姓，群众就高兴了。”

李井泉发言说：“为什么我们毫不勉强地都赞成派工作组？看到报纸上一登北大撤销陆平校党委的职务，由工作组代理，就想到了这

个问题。我们的观点也是要派。中央并没有下命令，我们就这样干了。”

魏文伯发言说：“6 月初，华东局书记处开会的时候，我们做了决定，派不派工作组，什么时候派，要看具体情况。但是运动开展不久，这里党委烂掉了，那里党委瘫痪了，处处告急，纷纷要求派工作组，我们就忍不住了，陆续地派出了许多工作组。7 月 25 日以后，到北京几个大学学习，参加大会，以及中央决定撤销工作组，我们才开始觉悟。”

毛泽东插话问：“有些没有派工作组的学校的运动是怎么搞的？”

魏文伯回答：“由党委领导，党委没有垮。我们派的有两种情况：一是党委垮掉了的，派工作组去；一是党委瘫痪了的。其他的不派。”

陈伯达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8 月 3 日修正稿）送毛泽东，并在送审报告中说：“今日上午，康生、陶铸、王任重、张春桥等同志和我，考虑小组会上的意见，对这个稿子，又作了些修改。请审阅批示！”

毛泽东当晚 21 时阅后批道：

伯达同志：

改得很好，可即印发。

毛泽东

八月三日下午九时

这天，中央文革副组长王任重在钓鱼台约见清华附中学生王铭、卜大华等 3 个红卫兵代表。当王铭、卜大华 3 人走进王任重居住的钓鱼台二号楼时，王任重热情的迎接他们说：“小将们，欢迎你们！”

他将卜大华他们让到会客厅，亲热地说：“请坐吧。”然后从口袋里掏出一份文件说道：“同学们，正式通知你们个好消息，毛主席支持红卫兵。”

王任重说着，把文件递给卜大华他们，只见文件上方印着：中国共产党八届十一中全会文件之二《毛泽东主席给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信》，后面还附着清华附中骆小海写的“两论”，即：“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再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

这意料之中又意料之外，确有其事又唯恐是谣传的消息，顿时让卜大华他们一时语塞，随即是惊喜万分。他们当即打电话到清华附中红卫兵办公室，将这个振奋人心的“特大喜讯”告诉他们的红卫兵战友们。

连续几个晚上，清华附中的各个教室楼道都能听见这样的歌声：

敬爱的毛主席，我们心中的红太阳；

无论我们走到什么地方，

身上都洒满了你的阳光……

抬头望见北斗星，

心中想念毛泽东；

迷路时想你有方向，

胜利时想你心里明。

激动的红卫兵们用斗大的烫金字全文抄出毛泽东给他们的信，贴在北大、清华的校园里。他们饱含热泪，一次又一次吟诵着毛泽东的文章，回想他们在半月前，受到工作组的种种压制……

毛泽东的支持，使“红卫兵”一时间成为最令人羡慕的称号。在8月1日到8月18日的半个月时间内，“红卫兵”成为了北京每个学生组织的当然名称，他们纷纷放弃了原来五花八门的称谓而统称为“红卫兵”。“红卫兵”组织就像雨后春笋般地出现在首都的各大、中学校，并迅速蔓延到了全国各地，逐渐演变成有大中学校学生参加的，当然的青少年组织，在社会上急剧地扩展着并形成了相当大的影响。

清华附中红卫兵开始独立掌权。他们当中年龄最大的也不过18岁，但这并不影响他们按照自己的理想开始改造学校：拉回军训的红卫兵，按“巴黎公社的原则”不记名投票重选了革委会；组织全校武装横渡昆明湖；到圆明园参加劳动；把学校改名为“红卫兵战校”，并准备迁校黑龙江……

但这一切很快又烟消云散。失去工作组目标的红卫兵又将斗争的矛头对准老师和同学，清一色干部子弟的革委会也使平民出身的红卫兵元老寒心，这是后话。

## 第104回：盛赞誉，中央文革比舜尧　对与错，清华组织大辩论

8 月 4 日，北京地质学院“红卫兵”成立。

工作组撤离后，7 月底，北京地质学院拥护工作队的祝天惠、王秀英、程秀梅、程关林等学生应邀列席地质部党组会议。何长工主持会议，旷伏兆、胥光义、邹家尤、边固等与会。地院同学王秀英哭着问何长工：“工作组为什么要撤走？”

何长工长叹一声：“我也是最近才知道，派工作组时，毛主席不在北京！”

8 月 4 日，勘探系程关林和祝天惠发起，与张聪贤、黄凯生、王锡金、武玉印、陈生宝、王秀英、程秀梅等同学成立“北京地质学院红卫兵”，并在学九楼西墙贴出《宣言》。

《宣言》由程关林起草，祝天惠修改定稿，黄凯生用漂亮的宋体字书写。在此《宣言》中，保工作队的态度鲜明。

8 月 4 日，中共中央发出文件，同意陶铸 7 月 29 日给中央、主席的报告。陶铸在报告中说：“7 月 28 日上午，中央宣传部委托熊复、唐平铸两同志召集各报负责人，传达了主席 7 月 25 日关于今后不再用‘最高最活’、‘顶峰’、‘最高指示’一类语言的指示”。但是，文件发出后，无数充满个人迷信和个人崇拜色彩的语言文字依旧充斥了广播、报刊和各种媒体。

8 月 4 日，刘少奇继续在北京建筑工业学院，分别与工作组的成员和领导座谈。陈毅也来到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与师生见面，并发表讲话。

8 月 4 日下午，在福建厅召开了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毛泽东主持了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博古通今的毛泽东说：

“古之民不歌尧之子丹朱，而歌舜；今之民不歌中央书记处，而歌文革小组。”毛泽东引经据典的讲话略微深奥了些，但是其中有内涵有深意，并且直接关系到在场许多人的命运，不能不仔细听。“中央许多部，没有做多少好事，文革小组却做了不少好事，名声很大。”

“在前清时代，以后是北洋军阀，后来是国民党，都是镇压学生运动的。现在到共产党也镇压学生运动。这与陆平、蒋南翔有什么分别？！中央自己违背了自己命令。中央下令停课半年，专门搞文化大革命，等到学生起来了，又镇压他们。不是没有人提过不同意见，就是听不进去，听另一种意见却是津津有味。说得轻一些，是方向性问题，实际上是方向问题，是路线问题，是路线错误，违反马克思主义的。这次会议要解决这个问题，否则很危险。别看有些人唱高调，其实挂羊头卖狗肉。自己下命令要学生起来革命，人家起来了又加以镇压。什么群众路线，什么相信群众，什么马列主义，都是假的。已经是多年如此，凡碰上这类的事情，就爆发出来，明明白白站在资产阶级方面反对无产阶级，还唱什么高调？还有人说反对新市委就是反党，新市委镇压学生群众，为什么不能反对？！看你站在哪个阶级方面，向哪个阶级作斗争。”

李雪峰的脸色刷白，似乎惭愧地低下脑袋。

毛泽东接着说：“中央文革小组的同志天天下去蹲点，征求意见。我是没有下去蹲点的。有人越蹲越站在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有人

对中央6月20日的批语有意见，说不好讲。北大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巴黎公社宣言——北京公社。大鸣、大放、大字报，是很好的事，应该给全世界人民知道嘛！而雪峰报告中却说党有党纪，国有国法，要内外有别。大字报不要贴在大门外给外国人看见。其实除了机密的地方，例如国防部公安部等不让外人去看以外，其他地方有什么要紧？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也容许群众请愿、示威游行和告状。而且言论、集会、结社、出版自由，是写在宪法上的。反对学生贴大字报，这是什么立场？！”

毛泽东神情格外激动：“从这次镇压学生群众文化大革命的行动来看，我不相信有真正民主，真正马列主义，而是站在资产阶级方面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还有团中央，不仅不支持青年学生运动，反而镇压学生运动，应严格处理。”

刘少奇赶紧说：“主席，这事不能怪他们，我当时在北京，我应负主要责任。”

毛泽东冷笑道：“你在北京搞专政嘛，专得好！”

毛泽东接着说：“讲客气一点，是方向性错误，实际上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反对无产阶级革命。规定班与班、系与系、校与校之间一律不准来往，这是镇压，是恐怖，这个恐怖来自中央！为什么怕群众？让人家贴大字报，我说过无非是我们下台。……什么真正赞成民主、群众路线、马列主义，没有那回事。现在的民主是压出来的，我看垮台好，不垮台不得了。为什么天天讲民主，民主来了，又那么怕?”

刘少奇说：“无非是下台，不怕下台，有五条不怕。”

会场上十分寂静，没有人说话，大家都很紧张。

这时，叶剑英说了一句："我们有几百万军队，不怕什么牛鬼蛇神！"

毛泽东回了一句："牛鬼蛇神，在座的就有。"

所有的与会者为之一震，没人再说话。

会议结束时，毛泽东说："今天大会不开了，开小组会好了。把这里讲的传达给大家，你们分别去参加。"

全会议程随之改变。下午，原定召开大会，与会者到会场后才得到改开小组会的通知。刘少奇、邓小平在中南组，周恩来、李雪峰在华北组，陈毅、谢富治、魏文伯在华东组，陶铸在中南组。他们分别传达了毛泽东的讲话，其他组也相继作了传达。全会气氛一下子变得十分紧张。

刘少奇在中南组参加讨论时说："主席不在家的这一段，是由我主持工作的，我绝对不逃避责任。我的错误的中心问题，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反对群众运动。中央常委的同志，书记处的同志，也包括北京市委的同志，运动轰轰烈烈的一来，我们就同意派工作组去。这次文化大革命，群众起来要民主，毛主席又这样大力支持，把我们夹在中间，这也是上挤下压，看你是否支持群众。我们这些人，革人家的命可以，革我们自己的命可以不可以呀？这是个大问题。要下决心，革我们自己的命，无非是下台。我们这些人可以下台，你决心让他革，反而可以不下台，你不让人家革，非让你下台不可。"

刘少奇说："现在右派闹事，夺领导权，不要怕，你让他领导一

个时候，不就看得更清楚了，就可以抓反革命嘛。”

邓小平在发言中说：“1962 年七千人大会，主席讲民主集中制问题，主要讲民主问题，信任群众，放手发动群众问题，没有民主，当官做老爷，就要霸王别姬。无产阶级专政的特点是很集中，弄不好，走向反面，就要变成法西斯专政。我们不甚理解，恐怕还是在这个地方。”

由于各地的工作组将一些学生和群众打成了“反革命”和“右派”，一些被打成右派或“反革命”的青年学生认定自己是“革命”的，是被“黑帮”压制的。他们寄希望于党中央、毛泽东为他们平反冤情，因为他们是响应党中央的号召起来革命的，于是纷纷上京告状，北京每天都有很多外地进京告状人员。与此同时，北京红卫兵运动的如火如荼，也使得许多外地青年人羡慕之至。他们抱着好奇、欣喜的心情，怀着一颗追求“真理”的赤心，不畏千辛万苦，也踏上了进京的征程。

8 月 4 日这天，汪东兴在华东组会议上说：最近每天都有上千学生、上百批来中南海接待室反映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很多是外地来的。

当天晚上，北京市委在清华大学召开解决工作组问题的现场会，除清华师生员工外，许多外地来京串联的师生也都参加了这次大会。当时参加中央全会的那些中央委员，当晚除了去北大的，其他的都到清华来了，光是小轿车，就从东大操场一直排到二校门。周恩来、董必武、邓小平、李富春等中央领导和各大区的领导坐满了主席台，这实际是中央全会的一个现场会。台下草地上则密密麻麻地坐着清华师生。会议由李雪峰主持，他说：

“同志们：

今天我们开这个会，由新市委主持，请同志们发表各种意见，特别是批评工作组和新市委的意见，欢迎递条子，热烈欢迎批评，贴大字报。”

接着，李雪峰检查了北京新市委的错误。他说：“两个月来，新市委领导文化革命运动，犯了方向性的严重错误，缺乏彻底革命的精神，不敢放手发动群众，虽然也谈了放手发动群众这句话，但是群众起来了，就怕，怕这怕那，怕字当头，一句话，怕群众大民主。这不是叶公好龙吗？这就是资产阶级思想。我们说过北大‘618’事件是反革命事件；我们说过‘右派’学生、左派学生争夺领导权，因而发生学生斗学生的事；我们说过‘反对新市委就是反对党中央’，这是原则性错误。不论哪个时候都是原则性错误。因为新市委可以批评，也可以反对。新市委还有个错误是派工作组，而且在相当长时间内没有认识到，使同学长期迷信工作组，觉得没有工作组不行。这是不信任群众，这样不能搞好文化大革命，这个责任应由新市委负责。至于清华大学的工作组有什么错误，应由你们批评，应听你们的意见，他们应该欢迎批评。

今天大会先由叶林同志检讨，再由同学们发言，是不是可以？”

众答：“可以！”

“同学们发言后由周总理讲话。”

全场欢呼。

“还有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同志讲话。”

全场再次欢呼。

然后，李雪峰根据大家的要求，一一介绍了主席台上的各位领导。

叶林检讨后，是学生发言，反对蒯大富的和反对工作组的双方争论的非常激烈。清华筹委会主任贺鹏飞的发言比较系统，也因为他的相貌举止很像他的父亲贺龙，因此在会上引人注目。

贺鹏飞的发言稿是经过王任重审查批示的，他在批示中说："这个发言很好！"

王任重告诉贺鹏飞他们："叶林的检查稿是总理秘书和叶共同起草、总理过目的。"

还有一位反蒯的女生代表，用的语言比较夸张。她在发言中说到蒯大富的言行时讲："把我们的肺都气炸了"。这句话后来一段时间成了清华园里的流行语。

坐在台下的蒯大富收到有人递给他的纸条。坐在他附近小板凳上的一位 50 多岁的人凑过来对他说："我能不能看看你的条子啊？"

蒯大富说："能啊，你看吧！"后来又问他："你贵姓啊？"

那人说："我姓谢，我叫谢富治。"

蒯大富很吃一惊："噢，你是谢副总理。"

那天晚上，像谢富治这样的干部也只能坐在主席台下的小板凳上。但是，他的和蔼却给蒯大富留下了极好的印象。

为了开好这个大会，周恩来事先做了很多工作，在人大会堂分别接见了不同观点的人，他曾对支持工作组的同学朱金根说："你们发言不能再说蒯大富是反革命，否则我就要给他平反。"

会上，朱金银发言时脱离事先准备好的讲稿，即兴喊道：“蒯大富是不是反革命？”

会场一片：“反革命！反革命！”

他发言后，安排蒯大富发言。蒯大富跑步上台，他刚到台上，下面就一片“下去！下去！”的喊声，不让他发言。

蒯大富并没有把那些人的批评放在眼里，他情绪激昂地讲了一番，竭尽全力为自己辩护。

这时，会场上有一批学生呼喊“打倒蒯大富！”

蒯大富发言后，周恩来走到讲台前，他穿着短袖白衬衫，端着右胳膊，用带点苏北腔的普通话说：

“同学们、同志们、朋友们：我是以中央机关工作人员的身份来参加大会的，是来学习的，是来坚决支持你们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中央常委、毛主席让我到这里来过问一下清华大学的文化革命运动，这是一件光荣而又艰巨的任务。因为我对清华大学可以说毫不熟悉，没有接触，仓促上阵，搞不好也会像工作组一样，也要撤回的。”

“我是同意李雪峰同志讲的，我们派工作组犯了方向性的严重错误，也就在客观上给各个学校的工作组带来根本性的困难，因为当时各学校（北京的）对于前北京市委领导下的党政领导机构不信任，对党中央指定的新北京市委敲锣打鼓地欢迎，要求新市委对各个学校派工作组。我们仓促决定，仓促上阵，没有仔细地考虑工作组的根本任务是什么，当前的政策是什么，应很好地交待，甚至整个北京市派到

各学校，机关的工作组加起来近一万人，是从各个战线，各个方面，从全国各地调来的，没经过充分讨论，向他们交待政策，也没有交待任务，这就给工作组本身造成很大困难。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派到各校的工作组带着行政机关的老办法，……即使是很好的工作组，也很难取得很大的成绩。”

“有同学递条子上来，问今天这个会的布置是不是有很大的阴谋。我向你们回答，我是过问了这个事的，没有阴谋。可是会上的情况反映了大家还是互相对立，争论不休。这是把工作组引向错误方向的结果表现出来了。我在7天以前，到另外一个学校去，第二外国语学院，那里的工作组犯了更严重的错误，也批判了工作组，双方同学对立争吵，隔阂很深，互相争吵了两三个礼拜了，吵得眼都红了，我走了以后，看来还要继续吵。这是工作组引导错误的结果。”

“同学间争论激烈，隔阂很深，今晚清华的大会就是这种情况的最好表演。一部分同学与另一部分同学对立，北京市普遍地存在这种情况，这种情况应该结束了。”

“在会上的发言次序可能有错误，前一个，后一个还是对立的，如果有错误，这是我到清华来第一次犯错误，可是我没有这个意思。对蒯大富、刘泉同志的案件，还有刘才堂同学，我是主张解放的，平反的。”

说到这里时，台下有好多人反对，他们喊道：“蒯大富就是反革命！不能平反！”

周恩来说：“对抱有反对态度的同志，我想说服他们，但他们还

是要讲，讲一讲也好，听一听。今天全国来参观的同志很多，听一听嘛，看看理由，到底站得住，站不住。”

“刚才清华附中红卫兵年轻的同学说得对，就是要敢于在需要的时候，为了反对修正主义的领导，革命群众有革命造反的权利。刚才清华附中红卫兵《三论革命造反精神万岁！》的大字报起了带头作用，响应了毛主席的号召。在这个问题上，我可以老实说，我应该向你们学习，向你们致敬。毛主席看了你们的《两论革命的造反精神万岁！》很称赞你们的革命勇气和革命首创精神。同学们，他们有大无畏的精神！把斗争的主要矛头对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指向阻碍革命运动的工作组，有什么不可以？如果工作组阻碍运动的发展，压制群众运动，甚至镇压群众，那就有权利把他们赶走。学校革命的主人，很清楚，是革命的学生，教职员工。”

“清朝末年，就是在北洋军阀时50年前的‘五四运动’和30年前的‘一二九’运动，都出在北京，而且都在大学生之中。我们在主席台上的都是两代学生。我们那时幼稚得很，比你们幼稚。我们那时敢于闹革命，闹抗日运动，为什么在今天，在毛泽东时代，在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专政下，反而不相信你们这一代呢？这不是对你们的信心不足吗？不是对形势估计错了吗？对工作组估计过高吗？”

“听说你们清华组织了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干部子弟协会，并起草了章程。上午在中央书记处，文革小组开会谈了，党在学校的政策不是这样。相信你们这样想会有一定的考虑，更相信你们会按毛泽东思想，按中央政策办事，因为这样才能按党的要求争取团结。最后

达到团结百分之九十五的群众、干部。这个政策在清华园也不例外……。”

“工作组不负责任了，临时筹委会还不是自下而上推选的，但是总得有人办事！最后一位同学代表几位同学发言，进行了自我检查，如果你们认为可以，就让他们暂时工作几天，给他们一个考验机会，做给你们看看，不行就改选嘛！而且他们要马上筹办自下而上的选举，正式成立筹委会，总之要有人管事。清华园这么大，两万多人的事，还总要有人做，应该信任他们，考验他们，并且还要进行正式选举。”

由于周恩来事前找了各方面的代表，做了非常细致的调查，对清华的情况了如指掌，把清华自工作组进校23天里发生的大情小事，历历如数家珍，不用讲稿，全凭记忆，娓娓道来，入丝入扣，让清华大学的师生佩服得五体投地。他的讲话赢得一片掌声。

1966 年 8 月 4 日周恩来在清华大学师生员工大会上

孙树藩摄

会后，贺鹏飞对工程物理系04 班班长、学校红卫兵总部委员阎

淮说：“总理告诉我，今后由中南局第一书记、中央文革副组长王任重指导清华的运动。”

## 第105回：再起步，北大成立筹委会

### 说“贫协”，康生讲“二月兵变”

周恩来讲完话，已经80岁的共产党的建党元老，时任国家副主席董必武讲话。他说：

“同学们，同志们：

周恩来同志代表我们对清华文化大革命的工作的意见已经讲了，我本来没有什么话可讲了，有许多同学递条子关心我的年龄，要我早点休息，我不愿休息。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文化大革命，我几十年没有见过，我是来学习的。我参加这个运动，我不是老了，我是年轻了一个甲子！”

会场上响起热烈的鼓掌声。董必武继续说道：

“为什么要搞文化大革命？这个问题我们开始也想不清楚。但主席说要搞，那我们就搞。历史的经验证明，主席比我们站得高、看得远。遇到新事物，我们猛然想到的、脱口而出的，常常是错误的。按照主席说的去做，后来都被证明是正确的。当时虽然不理解，后来就理解了。

我和你们一道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个大革命，是触及人们灵魂深处的。对我来说，脑子里的旧思想不是比你们少，而是比你们多些。当然在旧思想方面，跟毛主席走了几十年，搞掉了一些，但是还有好多没有搞掉，现在应该搞掉。毛主席思想多一点，就把旧思想挤掉一点。脑筋是物质，物质旧，装进一点东西就可以挤掉一点东西，多一点毛泽东思想就可以把旧思想挤一点出来。

我祝你们彻底斗倒斗臭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我祝你们彻底批判资产阶级的所谓‘权威’，我祝你们建立一个大体满意，不是彻底满意，彻底满意不可能，”董必武说到这里笑了，他接着说：“只是大体满意的教育制度。我的话完了。”

全场热烈高呼“祝董老身体健康！”长时间鼓掌。

然后是陈伯达讲话，他的闽南话大家都听不懂，所以讲得很简短，他说：

“我代表中央文化革命领导小组，热烈拥护周恩来同志今天发表的一篇很好的革命讲话。”

掌声响起。

“让我们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风大浪中前进！”

又是一片掌声。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全场热烈鼓掌。

最后是邓小平讲话，清晰而圆润的四川腔，他说：

“陈伯同志讲了三句话。我也讲三句话。”

会场上响起笑声。

邓小平说：“第一句话，我不是来讲话的，我是来学习的，向你们取经。”

笑声再起。

“第二句话，我完全同意和拥护周恩来同志在这里讲得很好的讲话。”

这次是热烈的鼓掌声。

“第三句话要说的，就是这次文化大革命，在北京工作的中央常委同志决定派工作组，是完全错误的，阻碍了群众运动。我相信清华的文化大革命，广大师生会发挥自己的主动性，积极性和自己的智慧，能够纠正前一阶段由于工作组所犯的挫折和错误，把清华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得更好，搞得更彻底！”

第二天，8 月 5 日，刘少奇的女儿刘涛等人成立了“清华大学自控系红卫兵”。这是清华的第一个红卫兵组织。

8 月 4 日晚，就在清华大学召开辩论会的同时，北京大学“文革”筹委会也召开了成立大会，朱德、康生、江青等人来到了这个会场。

江青讲话时说：“同学们好！我感到北大的革命火焰已经高高地升起来了，要揭穿张承先，张德华之流的挑拨离间的罪行。你们要分清是非，站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原则立场上团结起来。不要被那些别有用心的人利用，我相信你们一定能把这场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也一定能取得胜利。

刚才一位工人说他受到同位素的毒害，我向他致以慰问。我也患有恶性肿瘤，受过放射性治疗，我知道它的滋味，浑身出汗，现在还四肢无力。同位素我知道是什么东西，可是这居然害了我们的工人同志，我们一定要清算这笔账。至于革命干部子弟，他们有何罪？他们有缺点，有错误是难免的，他们上了当，他们是我们的好儿女。张承先、张德华欺骗了他们。你们欢迎不欢迎他们归队呀？至于工作队员，我希望你们对他们要一分为二，不都是坏人，大多数是好人。我收到

他们很多信，特别是海军同志的来信，他们痛哭流涕，说上头压着他们，他们没有办法。对这样的同志，就采取不同的态度。至于张承先，张德华死不悔改，坚决执行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应该斗倒，斗臭，批倒批臭。大量事实证明他们不是来革命的，而是来镇压你们革命的，到今天还不老实，要他们交代，继续检查。什么时候你们不想听他们那一套了，就让他们走。”

在谈到成立“贫协”组织时，江青的意见与周恩来正在清华所讲的是一样的：“我刚才收到你们的条子，说要成立工人、贫下中农、革干子弟的什么协会，我建议凡是工农出身的子弟、革干子弟，坚决参加你们学校的文化革命委员会，不要再搞什么分裂活动，上人家的当了。我们怀疑又有什么坏人在叫你们上当了，他们对聂元梓这样的左派有很多的流言蜚语，进行挑拨离间，难道他们就不会对你们这样做吗？

阶级斗争是复杂的，革命道路是不平坦的，要识别他们是什么东西，揪出他们的后台老板来。聂元梓同志给我和康生同志一封信，有一要求，我念一念：‘康生同志、江青同志：我要求工作组二组和海军同志留下来继续担任北大的保卫工作。因为这些工作，目前我们一时很难接下来，他们全部撤走，会给工作带来损失。敬礼！聂元梓’

革命的同学们，教职工们，你们信得过他们吗？”

台下众人答：“信得过！”

江青接着说：“好，那我们就建议把他们留下来。我的话讲完了。”

随后，朱德讲话：

“北大革命师生员工同志们：

我是来向你们学习的，支援你们的。你们两月来的革命斗争，阶级斗争，是残酷的阶级斗争，也是夺取政权。两个月来夺取政权的这个反复，你们胜利了。这是北大师生的光荣胜利。你们夺下了北大的政权，也只有你们才能接收。我们无产阶级专政办事主要靠主体，主体是学生，其他人是为你们服务的。无产阶级专政十七年来还没有无产阶级的学校，怎么办？头一次靠我们夺过来，以后怎么办好，是你们的事。你们是接班人，接学校的班，今后世世代代传下去。这是你们的事业，要好好办下去，相信毛泽东时代的青年思想比过去强。以后学校毕业了不同以前的，专做官做皇帝，以后任何事情都得做，军的事要做，工的、农的事都做，同整个无产阶级专政联系起来，共同向前进。我希望你们大家更加努力，更加办好。完了。”

接着，康生追述了北大两个月来文化大革命的经历后，讲起了聂元梓大字报的历史意义。他说：“巴黎公社不是马克思发动的，但是发动后马克思就热烈支持，点燃了无产阶级革命的火焰。现在我们是在社会主义革命时代，北大‘525’大字报，毛主席使它点燃了全国文化大革命的火焰，掀起了全国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是什么性质呢？这是20世纪60年代北京公社的宣言！这是北大全体革命师生的一种光荣，也是我们党在毛主席领导下点起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火焰。这个革命，不仅关系我国的前途命运，而且对世界革命具有重大意义。我们革命师生要珍惜这个光荣，要爱护这个光荣。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下，坚强地团结起

来。”

接着，他说到张承先的错误：“我上次出了个题目，我问：张承先到底是什么样的错误？当时有的说路线错误，有的说路线性错误，有的说右倾思想。今天你们答复了，就是右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回答的完全正确。”

“什么是右倾机会主义呢？不单是阻碍革命，不仅仅是个绊脚石，绊脚石躺在那里不动，绕一个弯就过去了。而张承先不但阻碍革命，而且利用职权和工作组的名义，跑到北大来镇压革命。这是一条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他是代表资产阶级来镇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他来北大实行什么？‘618’以后，实际实行的是白色恐怖。今晚，西语系揭发有个女同学服安眠药自杀，这我们一点也不知道。要张承先你回答一下……”

张承先答：“开始不知道，后来知道了。”

康生质问他：“你为什么不报告？”

张承先回答说：“这是个严重的错误，在这个问题上，我有罪，有罪。”

康生接着说：“同学们，你们从这件事得到了什么教训？他对陆平、彭佩云这样关怀备至，对革命同学自杀了也不汇报，他站在什么立场上去了？这是阶级斗争的反映。他们这些镇压群众的活动，也集中地表现在北大 6 月 20 日的简报上，这个简报实际上说：‘618 事件’是反革命事件。还有一个报告叫什么《北大廿天工作经验》，（笑声）完全站在反革命立场上，把革命群众说成是反革命。‘618’后，根据

他的指示，班与班、系与系，不准联系，校外更不准联系，工人农民支援也不准进入校门。过去陆平不敢实现的事情，他却实现了。虽然有的同志直接受压迫，有的受蒙蔽，也是间接受迫害。今晚雷俞平，李仰杨自我检查讲得很好，我十分欢迎。他们有个时期反对聂元梓的大字报，赞成留下工作组，这事要由张承先负责的。是间接受迫害的，同学们应当原谅他们，这样才能在毛主席教导下，坚强地团结起来，团结得像一个人。”

此时，张承先在主席台上如坐针毡，额头上沁出的冷汗顺着脸颊向下流淌着，如同雨淋一般。

康生一拍桌子喊道：“张承先，你站起来，让大家看一看。”

张承先诚惶诚恐地从座位上站了起来。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北大教授后来回忆当时的场景时说：“康生说着，挥臂高呼着，吓得张承先周身颤抖，铁青的脸上汗流如泉涌。”

主席台有两排高大的台阶，张承先站在下边台阶的北端，北大附中的彭小蒙和另一个女学生突然走过去居高临下，举起皮带抽打张承先的头。

“你，你怎么可以打我?!”张承先一下子懵了，他用右手捂着自己的额头，左手指着彭小蒙质问道。

“打的就是你！怎么？你还不服气？”站在一旁的另一个女红卫兵大声说，然后，她振臂一呼：

“打倒走资派张承先!”

“张承先不投降，就叫他灭亡!”

接着，几个红卫兵上来，将张承先两个胳膊向后架起，让他坐了“喷气式飞机”。

张承先沉默了。他不敢再多说一个字。

彭小蒙开了在大会主席台上打人的先例。

后来，毛泽东听说张承先在北大被打的消息后，即对吴德说：“张承先可以和工作队一块出来（出北大），张承先有心脏病，有错误不要死，市委有错误，但不要过多责备市委，也不要过多责备工作组。”此后，在北大的批斗会上，张承先再没有被打过。

关于西语系女生自杀一事，后来查明，那名女生是因婚恋问题自杀未遂，与“618事件”后的大讨论无关。会后，西语系的同学立即贴出大字报澄清事实真相，并质问歪曲事实的人意欲何为。西语系的工作组组长方明也立即对此事进行了调查，以备查问。但此事的真相已明，也就无人过问了。

康生在北大的会上还回答了关于“二月兵变”的提问，他说：“有一张条子问师大工作组组长孙友渔利用一张大字报镇压左派，镇压革命的事。也是6月20日，师大的王运良同学贴了一张大字报说彭真要在北大、人大驻军，问郭影秋晓得不？题目是《郭影秋是什么人？》孙友渔立刻作了报告，有40个字，说这个同学煽动人民和解放军的关系，对这个同学进行打击。孙友渔利用这张大字报镇压革命。我说过在北大，人大驻军，这是千真万确的，我不是说‘二月兵变’是千真万确的，这件事调查的结果军委晓得，华北局晓得，不一定是彭真搞的。决不否认以下两件事：

一、彭真是否要搞政变呢？中央文件上说，彭真是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赫鲁晓夫是要搞政变的。中央文件上说彭真是修正主义分子，是反革命分子，在时机成熟时就要搞反革命政变，搞反革命复辟的。至于什么时候搞，我不知道，只是说是时机成熟时搞，没有说今年二月搞。

二、彭真是否要夺军权？搞政变不抓军权不行，秀才造反，三年不成，彭真勾结罗瑞卿就是要抓军权……，因此，我们答复这个问题：1，彭真是否要搞政变？要，什么时候？还不知道。2，彭真是否要抓军队？要，已经和罗瑞卿勾结起来。在北大、人大是否要驻军？军委、军区知道，现在还没有调查清楚，不知道是否要搞政变。

孙友渔利用这张大字报镇压革命，同学们怀疑是可以理解的，为什么孙友渔要利用这个来围攻同学呢？这件事实有，我没有说‘二月兵变’，看来彭真‘二月兵变’还没有准备好。

再有，同志们问我，工农革命干部子女是不是要建立组织？我很理解同志们的心情，要在北大贯彻阶级路线，这种心情是好的，是要贯彻阶级路线。过去陆平黑帮反对阶级路线。第一，我很理解同志们在陆平黑帮统治下受迫害，受打击，现在明白了要团结起来，不再受政治上的打击，这种心情完全是对的，我完全理解。第二，同志们提出这个问题，革命的左派队伍如何实行阶级路线，许多学校还不清楚。学校里是否有阶级组织呢？有！是共产党，是共青团。共产党你能说不是阶级的组织？这是无产阶级的阶级组织，共青团也不是资本主义青年团嘛。问题在于前市委统治下，党团组织有很多问题，北大校党

委，团委，都瘫痪了，但不能因为瘫痪了，就要另建阶级组织，我们的任务是彻底改造这个党团组织。是否需要再建立一个阶级组织呢？江青同志已经说过阶级队伍要通过党团组织来表现，不需另搞一套了，而且那样会被孤立起来的，使团结受到损害。

真正革命的工人，农民，干部子女怎么办？我建议好好学习毛主席提出的接班人的五条。第一条要成为一个真正的马列主义者，要成为一个很好地领会毛泽东思想的党团员，好同志。第二条是能真正地全心全意为中国，世界大多数人服务，离开了绝大多数人，就不能叫真正的革命者。第三条，我们工人，贫下中农子弟，要注意团结绝大多数人一道工作，团结他们向赫鲁晓夫式的人物，向彭真式的人物，向陆平、彭佩云黑帮作斗争。左派工人、贫下中农，特别是革命干部子弟要警惕，时时刻刻不要脱离群众。毛主席在给清华红卫兵的信里就讲到这个问题，要团结绝大多数人，是不是？我希望同志们能团结大多数人，是不是一个真正的革命左派，这是一个重要的标志。我很欣赏李杨杨在发言中的一句话，她说：要真正站在群众之中，而不是站在群众之外，现在的任务不是成立贫协，而是成立文化革命委员会，这是党中央的指示，毛主席的指示。”

他最后说：“我感谢同志们给我的教育，你们在工作组撤出后，能立即成立文革筹委会，我代表中央文革领导小组向全体革命师生和北大文革筹委会同志以革命的祝贺。”

## 第106回：心难平，提笔写就大字报　接林彪，中央重新排座次

8月4日晚，正在大连的林彪，看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第三修改稿。他给中央打来长途电话表态："这个决定是一个很革命的决定，它保证了能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保证了能够把运动坚决地扩大和深入起来和长期坚持下去，我完全同意中央全会的看法和方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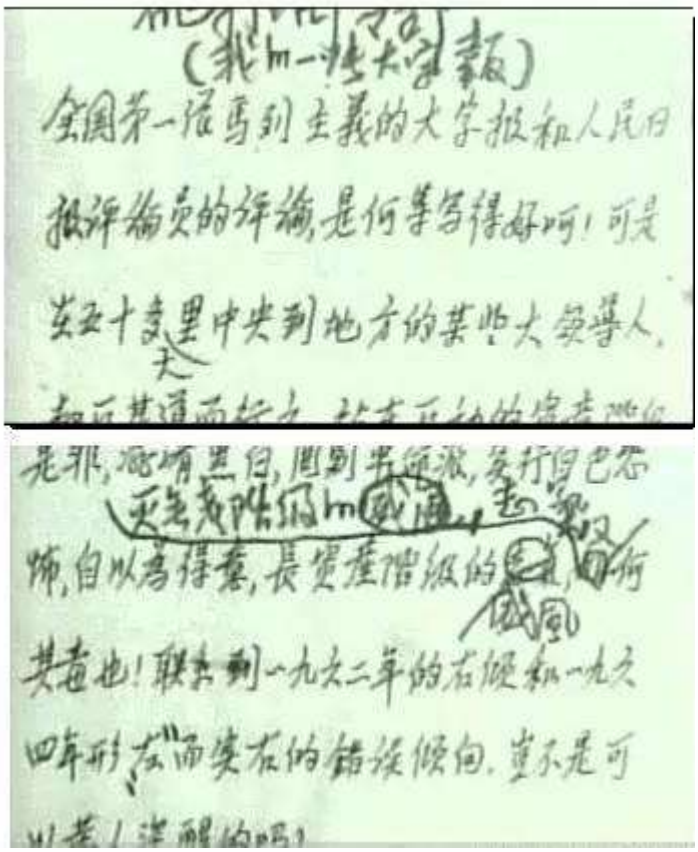
但是，各大局书记和各省的领导对文化大革命仍有许多忧虑，不清楚究竟应该怎么搞。当毛泽东问华东的江渭清对文革的态度时，他竟脱口而出："看不惯、想不通、吃不消"，这"三不"不仅令在场的副总理李先念、工程兵司令员陈士榘等人大惊失色，连毛泽东本人也是颇感尴尬。各组讨论时，对毛泽东 4 日讲话的热烈拥护者和随声附和者都不很多。云南省委第一书记兼云南军区政委阎红彦和四川省委第一书记廖志高在小组会上，都表示了自己对"文化大革命"的"不理解"。消息很快传到毛泽东那里，他见到西南局第一书记李井泉，问道："听说，阎红彦、廖志高的思想到现在还不通呢？"李井泉连忙遮掩说："通了！通了！"

8 月 5 日，回到住所的毛泽东心情无法平静。他想起了两个月前《人民日报》所发的《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找了半天，翻出了 6 月 2 日《北京日报》转载的这篇社论，与其同时转载的还有北京大学聂元梓等 7 人的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毛泽东看了《北京日报》转载的《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其中的一段文字写到："你们的'党'不是真共产党，而是假

共产党，是修正主义的‘党’。你们的‘组织’就是反党集团。你们的纪律就是对无产阶级革命派实行残酷无情的打击。”毛泽东用他常用的铅笔，在这段文字旁加了一条注：“危害革命的错误领导，不应当无条件接受，而应该坚决抵制。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广大革命师生及革命干部对于错误的领导，就广泛地进行过抵制。”

同时，毛泽东还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社论的边角上用铅笔写下了一篇更加震撼人心的文字：

“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是何等写得好呵!可是在五十多天里，中央到地方的某些大领导人，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志气，灭无产阶级的威风，又何其毒也!联系到一九六二年的右倾和一九六四年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醒的吗?”



这天，毛泽东将周恩来找来，给他看刚刚写好的这段文字，说这是自己写的大字报，让周恩来在大会上吹吹风。

周恩来看完后问毛泽东：“主席是不是指我那个‘马鞍形’的问题？我要重新加深认识吗？”

毛泽东摆摆手说：“那算不得一回事。”

他接着说：“看来刘少奇不行了，我对他观察了 21 年，完全失望了。对邓小平也观察了 7 年，也失望了。要把刘少奇拿下来，现在怎么办？副主席里面还有谁？”

周恩来说：“那就只有林彪了，由林彪代替刘少奇最合适。”

中央 7 名常委中，除了毛泽东，朱德年事已高，陈云长期称病，剩下的刘少奇、周恩来、林彪、邓小平 4 人，既然刘少奇和邓小平已经不行了，那就只有周恩来与林彪了。

5 日下午，刘少奇按外交部的安排，在人民大会堂河北厅会见赞比亚工商部长率领的友好代表团。会见结束回到家里，接到周恩来的电话，建议他最近不要露面，不要再出面会见外宾。

电话是刘少奇亲自接的，他就说了一个“好”字，什么也没问。随后，刘少奇通知李雪峰，不再去北京建工学院了。

这天，周恩来约贺龙、聂荣臻、陈毅、徐向前、叶剑英、杨成武、刘志坚等人第二天谈话。

8 月 6 日，毛泽东让秘书徐业夫给大连的林彪打电话，通知他来北京参加会议。

空军司令吴法宪很快也接到周恩来给他打来的电话，通知他派专机去大连，把林彪接回北京。周恩来特别交代：“要绝对保密。这件事情，只准你一个人知道，不能告诉任何人。”

他同时还强调，飞机返回北京西郊机场的降落时间，要直接报告他，他要亲自去接。其他的人，除了吴法宪外，任何人都不要去。至于大连林彪那里，由周恩来直接去电话联系，就不用吴法宪管了。

吴法宪当即表示：“一切遵照总理的指示办理，请总理放心。”

8 月 6 日这天，陈云致信毛泽东并中共中央,完全拥护毛泽东和中央采取的方针。

8 月 6 日，毛泽东、周恩来找江苏省委第一书记江谓清、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谭启龙谈话，征求他们对《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的意见。

毛泽东让周恩来先讲讲意见。周恩来说：“他们两位来自基层，

情况比我们了解得多，请他们先说。”

谭启龙让江渭清先说。

江谓清想：“文革搞了两个来月，已经乱成这个局面。当着中央主席的面，要敢于‘直谏’”，便说：“主席，运动这样搞法，很多同志有看法。延安整风时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批评从严，处理从宽，这都是您老人家倡导的方法。现在，学生群众同我们这些当领导的人之间，等于猫吃老鼠。戴高帽子，拖上街游行，打骂侮辱，把人都搞死了。完全不讲道理。”

接着，江渭清向毛泽东、周恩来汇报了江苏省教育厅厅长、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吴天石与妻子、南京师范学院党委副书记兼干部处处长李敬仪被斗死的情况：

那是 8 月 3 日晚上 21 时左右，南京的天气异常闷热。南京师范学院的一群学生闯进吴天石的家，他们本来是冲着吴厅长的夫人李敬仪来的。李敬仪当时是南京师范学院党委副书记兼干部处处长。学生们要带她到学校交出干部的档案，李敬仪拒绝。吴天石正好在家，一个西瓜打开刚吃了几口。他知道夫人身体不好，下楼来关心了几句。学生中有人认出了吴厅长，并知道他是省委已抛出的大批判对象，于是不由分说就揪着吴厅长夫妇去学校开“批斗黑帮分子大会”。

批斗会上，有人把成瓶的墨汁浇在他们身上，有人动手打他们，有人把装垃圾的铁丝纸篓做成的高帽子套在他们的头上。接着，又拉他们到大街上去游街示众。吴厅长穿了一件汗衫，衣冠不整。天气闷热加上两位老人身体不好，他们被人推推搡搡，没走多远就休克了。

有学生说他们装死，从路边居民家中弄来凉水浇在他们的身上、脸上，但没能把他们浇醒。然后学生开始架着他们走，最后干脆就是在发烫的马路上拖着走。就这样，李敬仪在游街过程中就已气绝身亡。吴天石在游街后又被拉回学校继续批斗。

江苏省委书记处书记刘顺元得到消息后，立即叫省委组织部长辛少波去医院探视。经检查，吴天石双臂被扭成骨折，另有五处骨折，双腿被拖成瘫痪，身体外露部分的汗毛孔被墨汁和灰尘封闭，形成了脑水肿，昏迷两天后，在 8 月 5 日也去世了。

李敬仪和吴天石当时的年龄分别是 53 岁和 56 岁。南京师范学院的学生们把 8 月 3 日当作重大的日子，成立了学生组织“八三师”。

吴天石，原名毓麟，笔名史坚。早年参加进步学生活动，“九一八”事变后投身到抗日救亡运动当中，他参加了苏中抗日根据地的开辟和建设，1943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江海公学校长、华中公学副校长、华中大学第二教务长。新中国成立后，历任江苏师范学院院长、江苏省教育厅厅长、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对语文教学改革有系统见解。著有《教育书简》，与夏征农、沈西蒙合编历史剧《甲申记》。

毛泽东听到这些情况后问江谓清：“照你的意见，应怎么搞法？”

江谓清说：“对学生群众要讲清楚党的政策，要文斗，不要武斗。”

毛泽东表示赞同说：“对，要文斗。”

江谓清接着说：“现在，学生已经把斗争目标从校党委、校长，集中到我们省委和各级党委，什么人都要揪出来打倒。我们这些当省

委书记的，都是走资派。对于这个情况，要有个说法。”

毛泽东说：“对你们要保护。运动中要文斗，不要武斗。”

江谓清又说：“搞革命，要有饭吃，有衣穿。现在学生已经闹出学校，走向社会，如果工厂、农村也乱起来，不抓生产怎么办？”

毛泽东说：“按你的意见，还是要抓生产。”

他又问谭启龙：“你是什么意见？”

谭启龙点点头说：“是要抓生产。”

8 月 6 日这天，江青在十一中全会上的小组会上，请聂元梓到她那里去吃饭。会议结束以后，聂元梓就坐江青的车子去了钓鱼台。

吃饭的时候，江青对聂元梓说：“现在阶级斗争很复杂很尖锐，过去，毛主席的指示谁也不听……”江青还说了刘少奇和王光美的许多事情，这些话让聂元梓大吃一惊。

江青对聂元梓说：“你们写的那张大字报，是我自己亲自送给毛主席看的，当时毛主席不在北京，住在杭州，我去送大字报，非常危险，还有人跟踪，是刘少奇派的人，你很快就会知道关于刘少奇的一些问题。”

她还说，以后聂元梓有什么事情，可以直接给她打电话，或者让李讷转告她，她随时可以接见，等等。

8月6日晚上，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召开会议，商量拟补选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委员、候补委员及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名单。政治局常委由7人扩大为11人，增补陈伯达、康生、李富春、陶铸4人为政治局常委。

吴法宪派赴大连接林彪的专机，于当晚从大连返回北京，降落在西郊机场。飞机降落时，周恩来已经先期到了。

按照周恩来的要求，飞机没有像往常那样进入停机坪，而是滑到机场跑道的北头停下。机舱门一打开，周恩来立即登机去见林彪。

就在这个时候，汪东兴也匆匆赶到了机场。他同正在飞机下等候的吴法宪打了声招呼后，也很快进入了机舱。

周恩来、汪东兴和林彪在机舱里谈了大约有半个多小时后，下了飞机。周恩来问林彪："是不是先到毛主席那里去一趟？"他还对林彪说："天气很热，是不是就住在人民大会堂浙江厅？"因为那里装有空调，并且已经通知大会堂作了准备。

吴法宪看见林彪下飞机以后，表情十分严肃，没敢上前问候……

8 月 6 日这天，周恩来找贺龙、陈毅、聂荣臻、徐向前、叶剑英等人谈话，就毛泽东大字报一事向他们吹风。

那天下午，吴法宪接到周恩来电话通知，要他晚上到人民大会堂的福建厅开会。那天晚上，来到人民大会堂的福建厅的有杨成武、张爱萍、肖华、许光达、肖劲光、苏振华及北京军区司令员杨勇、北京军区政委廖汉生等部队各军兵种的负责人，还有中央各部门的负责人，总共大约 20 多人，都是周恩来亲自通知来开会的，但都不知道开的是什么会议。大家坐在那里一边等，一边扯乱淡。一直等到将近子夜 0 时，先是陶铸来到福建厅，随后周恩来也进来了。他一进来，就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张纸说："这是毛主席在 8 月 5 日写的一张大字报，是手稿，我念给你们听听。"

接着，周恩来念了毛泽东 8 月 5 日在《北京日报》的边角上写下的那篇震撼人心的文字……他一连念了两遍。念完之后，他又说："现在看来，多年的事实证明，刘少奇不行了，他不能再主持中央的工作了。主席原来想培养刘少奇当接班人，现在看来不行了，他辜负了毛主席的希望。现在中央决定，把林彪同志接回北京接替刘少奇，担任中央第一副主席。现在先通知你们一下，暂时不要再往下传，就你们知道就行了。待中央决定往下传达时，再通知你们。"

周恩来根据8月6日晚上在毛泽东住处开会商定的情况拟出一份中央政治局常委名单草案报毛泽东和刚刚返京的林彪。此时，林彪作为接班人已由原来常委中的第6位升至第2位，而刘少奇则由第2位降到第8位。

毛泽东审定时调整了政治局常委的排列名次。陈伯达看到调整后的名单，他的名字排在周恩来的后面，就找到毛泽东说："我能力不行，无论如何不能把我排得那样靠前。"

毛泽东拿起笔，把排在名单后面的陶铸钩到陈伯达的名字前面，然后问他："你看这样行了吧？"

## 第 107 回：不手软，女孩子打人更凶
## 卞仲耘，校长被学生打死

打人风日益严重。工作组撤离后，刘少奇的女儿刘平平就任北师大一附中文化革命委员会主任。此时，老师、干部上台批斗已经是胸前挂黑牌、两手后翘做“喷气式飞机”了。学校的学生将所有被打成牛鬼蛇神的干部、老师都剃了光头，女老师则被剃成阴阳头。

8月5日这天，北京师范大学女附中党总支书记、副校长卞仲耘竟被自己的学生活活打死。

从 7 月 23 日开始，北师大女附中工作组将包括即将退休的老教师和半退休病号在内的学校所有干部、教师组织起来集训，按照四清的方式，集中解决他们“洗澡下楼”问题。每个干部、教师都跟着一个“左派学生”，工作组把干部、教师的排队类别和主要材料告诉这些“左派”，他们随时可以叫干部、教师交代问题。

集训期间，干部、教师的精神受到巨大摧残，很多人说，去集训就像进了“集中营”，有的教师说：“再过几天，我就要被逼疯了！”有的教师写了遗嘱、绝命书。

就在这时，北京市委宣布撤销工作组。7 月 28 日，北师大女附中工作组宣布集训结束，29 日，所有集训人员返回学校，30 日下午，工作组召开校会，宣布工作组撤出师大女附中，让学生自己解放自己，自己起来革命。

7 月 31 日，学校贴出一张成立“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的大字报，这一组织的前身就是那个坚决反对工作组的“红旗”小组。

也是在 7 月 31 日这天，在邢台参加军训的师大女附中学生突然接到通知：“结束军训，返回北京。”于是，她们军训所在的部队，临时将为庆祝八一建军节召开的联欢会改成了欢送会。这些女学生在军训期间受的是“正面教育”，由于部队的传统，部队班长很关心同学，对她们一视同仁，没有人因为出身问题受到歧视，学生们的心情都很舒畅。一下子说走就走，大家都很惊讶，有的人还哭了。带队参加军训的附中工作组副组长王润芝并不知道北京发生的事情。

8 月 1 日，军训大队伍乘坐的火车停在了北京永定门火车站，当王润芝领着学生从火车站走到学校门口时，看见学校大门口贴着大幅的“鬼见愁”对联，墙上贴的大字报基本是支持对联的。再看整个校园，此时已面目皆非。

一进学校，就有人向她们宣布工作组撤销的消息。王润芝一下懵了，不知道怎么回事。不仅是她，“对联”加上撤工作组的消息把所有的人都给震懵了。

下乡劳动的学生大都是有些“问题”的，她们比军训的大队人马回来得早。当时学校的气氛已经有些恐怖和惊悚了，宿舍楼大门口贴的“鬼见愁”对联特别醒目，看一眼就心跳半天。大字报也是“自来红们站起来”之类，都是在宣

传“对联”内容。

“对联”在学生群体中，特别是中学生中产生的影响如此巨大，它让出身“红五类”家庭的人觉得自己是当仁不让的革命后代，让大多数非“红五类”的人噤口，而出身“黑五类”家庭的同学更是人人自危。

当时校园里除了“对联”，还有批判工作组的大字报。工作组撤走才两三天，就有学生跑到团中央揪斗工作组的张世栋、马娴华，把他们押回学校关了起来，要求他们揭发问题。

8 月 3 日晚约 21 点多钟，突然有三、四个“红五类”同学来到师大女附中初一学生张鸿敏家中。非常严厉地对她说：“你明天早晨必须到学校，如果不去，格杀勿论！”说完转身离去。

8 月 4 日上午，张鸿敏心怀恐惧走进教室，只见课桌已经靠边，当中摆着几排椅子，全班 40 多个同学，被分成泾渭分明的三类。“红五类”坐在椅子上。张鸿敏等 9 个“黑五类”面对大家，背向黑板，站成一排。十几个出身不红不黑的“灰色”同学被指定坐在地上，让她们看批斗“黑五类”。她们可以发言，不能动手。

批斗会开始，教室门被砰然推开。一位姓董的同学被几个“红五类”推搡进来，呵斥着问她：

“你什么出身？”

“革军。”董说。

“革军”是“革命军人”的简称，在当时，是“红”得不能再“红”的红五类出身。但是，这位同学的回答立即遭到驳斥：

“革军？骗人！你生父是反革命！”

董的母亲是俄语教授，父亲是解放军军医，但那不是她的生父。董分辨不清，站进“黑五类”这排。

随后，“红五类”头头的郑重宣布：全班同学都要查三代出身，即本人、父亲、祖父。

接着，20 个“红五类”同学围上来，扯下“黑五类”脖子上戴的红领巾，并警告她们“永远不许再戴！”。

接着殴打开始，同班女生打女生，拳打脚踢，刷大字报的浆糊、紫色墨汁从“黑五类”同学的头上浇下来，要“黑五类”揭发父母的反动言行，承认自己是“狗崽子”。

8 月 4 日这天，师大女附中很多班级，同时召开这样的批斗会。在初二（四）班教室墙上贴了“打倒狗崽子”的大标语，全班 45 名学生，10 名“家庭出身好”的学生坐在椅子上，10 名“家庭出身不好”的学生站在教室前面，一根长绳绕过她们的脖子把她们拴在一起，其余“家庭出身不好不坏”的学生都坐在地上。10 名被绳子拴着的学生被强迫逐个“交代”她们的“反动思想”以及她们父母的“罪行”，结束的时候，还必须连说三遍“我是狗崽子，我是混蛋，我该

死。”

当天下午，一些戴着“红卫兵”袖章的学生，有的拿着用民兵训练用的木枪，有的拿着皮带，大声喊着“黑帮，不许动！”，冲进几位学校领导的那间办公室。她们狠狠地用皮带抽打学校领导。当副校长胡志涛晚上回家后，她丈夫看到她身上的伤痕，问道：“怎么打得这么狠？”

胡志涛回答说：“工作组不在了，没人管了。”

“你们学校怎么这样乱？！明天你暂时别去学校了。”

“我是校长，不去学校怎么行？”

那天晚上，学校党总支书记卞仲耘在家里对丈夫说，打死像她这样身份的一个人，“就像打死一条狗。”她知道可能会大祸临头，但是毫无办法。她丈夫劝她：“别去学校了。”第二天，8 月 5 日，她还是按时去了学校。

8 月 5 日，北师大女附中胡志涛副校长一大早先到了中共北京市委，找到分管文教口的负责人，向他陈述了工作组进校以来的情况，说 7 月底工作组撤走后，学校处于无人管的混乱状态。她特别强调了昨天的打人问题，她说：“这说明基层领导干部的人身安全已得不到保障了。请指示，我们该怎么办？”

那位负责人听后却用平静的口气劝说道：“你回学校去吧！”

胡志涛坐着没动。这时，她多么希望他能说出一句：“你

们回避一下吧，先不要到学校去了。”

那位负责人站起来看见胡志涛还坐在那里没动，又补充了一句：“回去吧！我们会向区委通报的。”

胡志涛怀着沉重而失望的心情，走出市委大门。她又找到中共西城区区委，也没有得到明确的答复。

一路上，胡志涛脑子里在激烈地斗争着，她拼命地说服自己：“回去！回去！回去！明知是凶多吉少。但我是校长，我是一个长期受党教育的共产党员。上级指示，我只有服从。无论如何，我得硬着头皮回去。”

这天下午 13 时 30 分左右，她走进校门，觉得学校“异样地寂静”，预感不祥，就主动拿起扫帚装着打扫女厕所，暗暗地观察动静。突然，有几个学生走过来，要押着她去开斗争会。胡志涛对学生说：“工作组离开后，开斗争会应该先报告中共北京新市委批准。” 她立刻挨了棒打。

8 月 5 日这天，阳光灿烂。在 8 月烈日下的那一幅画面，永远定格在北京师大女附中许多老师、同学的记忆中：

下午 14 时左右，突然许多人往操场跑，边跑边嚷：“斗校长了！斗校长了！”

只见学校锅炉房高台北侧的大操场边上，尘土飞扬，几个高一 3 班的学生拿着大棒，押着学校的 5 个负责人：党总支书记、副校长卞仲耘，副校长胡志涛、刘致平，教导主任汪玉冰和副教导主任梅树民从北教学楼里走了出来。还有语

文李老师和物理老师张继恒。当时这所中学没有正校长，卞仲耘是学校的最高领导。

这几个人都长着脸沉默无语，只有胡志涛，瞪着眼睛，眼光中是恐怖和愤怒。

接着，一个学生开始大声讲话。她说："这些黑帮分子在工作组的保护下躲在屋内，明为作检查，实际在享清福。今天我们就要打打他们的威风。"说罢，几个学生拿来了剪刀，开始剪校长们的头发。剪子尖戳着他们的头骨，剪子刃拉着他们的头皮。他们的头上流出了血。

由于卞仲耘是书记，因此站在最前面。她低着头，牙关紧咬任凭学生们在她头上扎着、拉着。

胡志涛争辩说"我不是黑帮！"

一个高个子学生说："我现在就让你变黑……"说着就将一瓶墨汁泼在胡校长身上。围观的一个五年制实验班的高中同学立即上前阻止说："斗黑帮也不能这么斗啊！"

她的阻拦立即被回击说："好久没有斗黑帮了，今天斗黑帮有什么不对？工作组在校的时候不让斗黑帮，现在工作组撤了，黑帮可都神气了，我们斗斗黑帮有什么不可以？"

学生们又拿来了墨水，从校长们的头上倒下去。卞仲云灰白色的头发加着墨水和血水流了一身。接着给他们戴上用废纸篓糊成的高帽子，往脖子上套了写有"反革命黑帮""三反分子"的牌子，把被斗者拖到操场边的水泥高台

上，强迫他们一字排开跪下，还被强迫着说："我是黑帮"。

"不行！大声点！"校长们又挨了揍。

这时，教导主任汪玉冰跪在台子的西北角。她突然抬起头声嘶力竭地大声哭喊道："我是黑帮……呜呜……"那声音撕心裂肺。

全校学生纷纷涌来，聚集在台下。人群中，有人在喊："到木工房拿棍子去！"学生们又向学校的木工房跑去，那里有待修的破旧课桌椅。还有人去开水房，从那里取来开水，要烫被斗者。

接着，被斗者被从高台上拖下来"游街"。游街的校长老师手里拿着脸盆，搪瓷盆之类的，都是从食堂搞来的，还拿着木棍或汤勺，有的老师拿着簸箕笤帚，学生们命令他们一边敲着脸盆簸箕一边喊着"我是黑帮，我有罪，我该死"，旁边的女孩子们则嚷嚷着："大声喊！""快走！"

队伍从礼堂西门出来，顺着操场跑道向西走，走到靠近校门该拐弯时，有点走不动了，天气晴朗，在阳光下站着都感觉热。卞仲耘在最前面，她首先就走不动了，步履迟缓，再说所有的老师在这种情况下心情都是备受压抑，也不可能走很快，而且也不肯大声喊自己是黑帮等侮辱性的口号，这样，那些女孩子就不耐烦，开始动手打人了。一个比较小的女孩子夺过一个老师手里的棍子照着老师头上打去，很快，很多女孩子都开始夺过棍子笤帚打校长老师或者拳打脚踢，

队伍开始乱起来。

“哎哟，打人了。”

“坏了，打人了。”大家纷纷向那里跑过去。

高三 2 班学生朱忠丹上前劝阻，无效。

高三 1 班学生王丽莎拉住一个低年级女孩子的手说：“别，别打人。”

那个女孩子回头瞪了她一眼，说：“你们站在什么立场上，什么出身？”

王丽莎一听，立即不再说话。

这时，“革命师生代表会”主席刘进和几个代表会的副主席正在东楼史地政教研室，原来工作组的办公室里，她们听到学生报信，急忙下楼，跑向大操场……

刘进和宋彬彬分别拉住打人学生的手，劝说她们停止打人。那些学生说：“这是斗黑帮！”

刘进阻止说：“斗黑帮也不能打人啊，有大方向还有党的政策呢。”

那些学生理直气壮地说：“工作组在时不让斗，现在可以斗了。你们是不是反对我们斗黑帮？”

刘进她们见状，只好说：“你们该斗斗，该游游，但不能打人。”

“行，我们不打人。让他们劳动改造。”

那些同学带着校长、老师走开了，围观的同学也陆续离

开，刘进她们也回办公室了。

那些学生将这几个校长从学校的大操场拉到小操场，要他们在这里“劳改”。那里有一堆砂土，是两个月前修操场时运来的。文革开始，修操场停了下来。“黑帮”被命令用扁担和筐子挑土。有人把卞仲耘挑的大筐里的沙土用铁锨拍了又拍，装得堆尖。卞仲耘挑不起来这么沉重的土筐，就被劈头打倒在地。有的同学抡着带钉子的破旧桌椅腿，打在她身上。铁钉刮破她的衣服，铁钉扎进皮肉，再拔出来，留下一个紫黑点。

副校长刘致平不常和学生打交道，他因为谢顶，常年戴着一顶帽子。有女孩子用棍子把他的帽子挑开，露出没头发的脑袋，女孩子们哈哈大笑骂道：“秃驴，秃驴！”有人就用棍子打他的头。

胡志涛副校长被一群女孩子拉去打扫厕所，那时的厕所很简陋，一排蹲坑，每个坑上面有一个带着长棍把手的木盖，防蝇隔味。胡志涛被命令擦洗蹲坑的木盖子。她被许多女孩子推来搡去，她上身是一件浅色的短袖衬衫，配一条很漂亮的黑色长裙。那黑色的长裙已被撕裂到腰部，露出了里面浅粉色的内裤。现场既没有抹布也没有水，不知道女孩子们要她如何“清洗打扫”，胡志涛无法，只好咬紧牙关用手指甲去抠那盖上黑色的污垢。就这样，女孩子们还是不依不饶围着她不停地连打带骂，几乎要把她推进茅坑。

汪玉冰被逼迫搬着一个大花盆从二楼下来，那花盆直径40厘米左右，种着木本花，相当的重，本来是摆放在后花园里的。汪玉冰体力不支，下楼时步履蹒跚一步一挪，后面女孩子们也是连打带骂催促着“快点”！结果她还差几个台阶时一个趔趄就整个人摔倒在地上，那不幸的花盆也“砰”地一声摔裂开来，女孩子们带着狂风暴雨般的叫骂声扑向汪主任，拳打脚踢。

教导主任梅树民，五十年代初从北京师范大学毕业，他的背部遭到带钉子的木棍打，那天穿的布衬衣上打出很多小洞，布丝深深嵌进肉里。他遭受的肉体折磨和精神惊悸导致了严重的心脏病。

卞仲耘是学校的最高领导人，也就是所谓“黑帮头子”，她被打得最重。下午17时的时候，卞仲耘已经失去知觉，大小便失禁，倒在宿舍楼门口的台阶上。但是，依然有一些女学生在那里踢她的身体，踩她的脸，往她身上扔脏东西，大声咒骂她“装死”。

17时多，有人叫来了校工，把卞仲耘搬上一部平常运送垃圾的手推车。学生们还在继续斗争另外4个人。副校长刘致平一度被强迫跪在这辆手推车旁边。副校长胡志涛看到躺在手推车上卞仲耘，两条胳膊红肿，上面布满一条条伤痕，眼睛张开，瞳孔已经没有反应，但是嘴巴还呼哧呼哧吐气。她告诉学生：“她有生命危险，应该送医院。”

学生对她吼道：“黑帮，你不好好改造，也是这个下场。”她被推进一间办公室关了起来。

工友把那辆手推车推到学校北侧小门旁边。马路对面就是邮电部医院。但不准工友把车推出学校。手推车停在北门边，卞仲耘的身体被用大字报纸盖了起来，黑字红叉一片浑浊，灰色的糨糊汤，和她自己昏迷失禁排出的黄色的秽物散发出难闻的气味。她躺在平板车上昏迷不醒，口吐白沫，白沫中还夹杂着粉红色的血丝，已经是有出气没进气了。

有同学见状，赶紧跑去向师生代表会主任刘进她们报告说：“卞校长快不行了，人在后院呢……”

第 108 回：是黑帮，施救援医院犹豫　评是非，天桥再开辩论会

刘进和宋彬彬等同学闻讯急忙跑下楼。在后操场，她们看到卞校长躺在一个手推车上，脸色特别难看，嘴里吐着白沫，身上有异味……

虽然已经是共产党员了，但毕竟还只是个孩子，刘进无论如何没有想到事情会变成这样。从来没有见过这种场面的她，只感觉就像天塌了一样，第一反应就是说："赶快送医院抢救呀！"

人渐渐多起来了，场面变得很乱。学校的后门有锁，刘进让身边的同学去找工友拿钥匙。工友王永海来开了后门，党办赵桂英老师通知了卞仲耘的爱人。

宋彬彬和高三 2 班朱忠丹等几人赶往小马路对面的邮电医院找大夫。值班医生一听是抢救黑帮，就说不来。宋彬彬和他吵了起来，说："解放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抓了俘虏还给治病呢。"

就这样，一个年轻医生和一个护士跟着宋斌斌她们几个同学从医院来到学校北门。女护士看上去 30 多岁，背着一个药箱。

进到学校，年轻的大夫一看卞校长昏死的样子，鼻子眉毛立刻全挤到一堆去了，口中念念道："怎么搞成这个样子？这还有救吗？"

宋彬彬说："那你也得想法抢救，不能看着她死呀！"

女护士看上去更有经验，她立即蹲下打开药箱，取出酒精棉给卞仲耘擦拭胳膊准备打强心针。她用了很多酒精棉才从那肮脏的胳膊上开辟出一小块清洁地，但是，打了两针强心剂都没有见效，卞仲耘还是昏迷不醒。医生说："不行了，送医院去吧。"

于是，刘进亲自推车，好几个同学在旁边帮着，把卞仲耘送到了

邮电医院。此时已是晚上 19 时多了。

师生代表会教师代表、数学老师李松文老师和其他几位老师闻讯也都赶到了医院。

院方听说拉来的是“黑帮”，不敢救治，又和学校发生了争吵。在场的李松文是工作组期间教师代表会两成员之一，也是临时党支部的负责人，他老实本分、不善言谈，这时也急了，让医院赶快救人。医院要求出示学校证明，因一时无法做到，李松文老师就问大夫：“签名作证行不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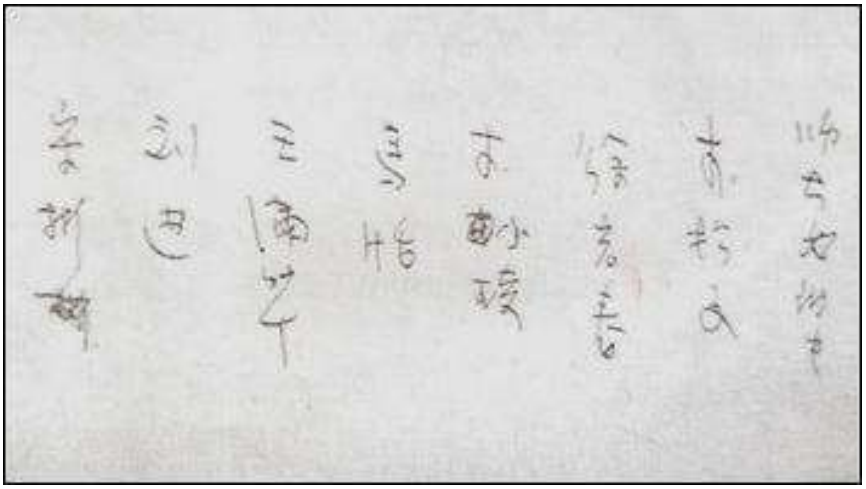
医生说：“不能让学生写条子，学生一毕业就没法找人了，要写也是老师写。”

于是，李松文老师在一张纸上竖着写下了学校名称：师大女附中，然后写上自己的名字，当时在场的还有其他老师和很多学生。

签名是要承担责任的，李松文又问几个高年级的学生：“我把你们的名字写上行不行？”

那几个学生都说行，李松文就把在场他认得的几个学生名字写上了。名单中第一名是李松文老师本人，也是 7 人中唯一的教师，接着依次是：徐岩春、李小琦、马怡、王海华、刘进、宋彬彬。

其中将王海华写成了王满华。



这是李松文老师在一张纸上竖着写下的 7 个人的名字。卞仲耘的丈夫王晶尧保存下来了这张有 7 人名字的纸片。

有了签名担保，医院才开始抢救。但是，当医生检查时，卞仲耘的尸体已经僵硬，人已经死亡多时了。可怜这位 1941 年就入党的老革命就这样死于非命。这是北京学校打死的第一个人。

卞仲耘的丈夫王晶尧闻讯赶到邮电医院，看到妻子遍布伤痕的尸体，特别是她的头部，肿得很大，而且全是乌青色，不由失声痛哭，情绪激动。

当时照相机是贵重物品，卞仲耘家没有照相机，王晶尧第二天就到西单商场买了一个，在医院的太平间里拍摄下卞仲耘的最后的照片。尽管是黑白照片，但尸体上的大片血斑伤痕也清晰可见。

为卞仲耘的尸体处置，王晶尧和他的大女儿见到了师大女附中红卫兵的负责人之一邓榕，她要邮电医院的医生给卞仲耘做尸体解剖。

王晶尧反对解剖尸体。他认为，学校的用意是要医生证明卞仲耘死于心脏病，而不是被打死的。死亡原因如此明显，他不愿让妻子这样惨死后还遭受无理的切割。

邓榕转而很严厉地责问卞仲耘的大女儿："你们什么态度？"

王晶尧的大女儿说："反正这不能由我们负责。"

邓榕没有再说什么就离开了。

结果，尸体没有被解剖。但是在医院开具的为火葬用的卞仲耘的死亡证书上，死因一栏填的是"死因不明"。

师大女附中的操场上，学生们依旧聚集在这里，8 月 5 日当天，还有的学生对关在这里的工作组组长张世栋和副组长马娴华说："不老实交代，卞仲耘就是你们的下场！"在揪斗校领导的过程中，张世栋还被勒令旁观，说："你不老实交代，也是这个下场。"

当从医院里传回"卞校长死了"的消息，那一大帮聚在操场上的疯狂女孩子们几乎当即全作了鸟兽散。校长老师们这才都瘫坐在路边喘着粗气，教语文的李老师在哭，梅树民主任低头忍着，唯有胡志涛副校长没有流泪，她即使在喘气也是抬着头，并不时向学生这边投来仇恨的目光。

刘进觉得情况严重，应该尽快向上级汇报。她听说中央正在北京饭店开会，到那儿一定能找到领导。于是，她们几个学生从学校一路走到北京饭店，到那里时，已经半夜了。起初她们想见新市委第一书记李雪峰，李雪峰不见，只好找第二书记吴德。吴德秘书出来劝她们回去，说有事明天再来，现在首长已经休息了。她们说："不行，事关重大，我们必须见到领导。"

看她们不走，秘书最后终于同意让她们进去了。吴德听完她们的汇报，半天没有说话，后来才慢慢说："这么大的运动，难免发生这

样那样的问题，人死不能复生，死了就死了。”

还说：“你们不要担心害怕，回去要注意保密，不要扩大影响……”等等。

刘进她们走回学校，一直坐到天亮，谁都没有合眼。校长死了，学校出了这么大的事，她们认为应该让全校同学们知道。由谁来说？有同学对刘进说：“你当过学生代表会主席，还得由你来说。”

刘进有些犹豫，“怎么开口呢？但自己不说让谁说呀？是我们把卞校长送医院的，是我们向市委书记汇报的。我作为党员应该出面向同学们说。”

8 月 6 日早上，刘进在广播里通报了校长去世的消息和向吴德汇报的情况。

8 月 6 日这天，文革前女附中学生会主席，反工作组成员之一的王南芬到校听说卞仲耘被打死了，感到非常震惊和气愤，当天就开始着手调查事情的经过。

卞仲耘被打死之后，中共北京市委办公室和周恩来总理办公室都派干部来到校中“了解情况”。他们跟卞仲耘的丈夫王晶尧谈话，告诉他，“要正确对待群众运动。”

8 月 8 日，刘进和一些同学商量，她说：“这样下去不行，咱们成立一个组织吧。”

大家同意。因为上边没有领导，这个自发成立的组织就叫“文化大革命筹备委员会”，简称“筹委会”。刘进任主任，有十几个副主任，各班还有联络员。

卞仲耘死后第三天，王晶尧收到师大女附中的一位女教师写给他的匿名信：

老王同志:

老卞在女附中为党工作十七年，她是什么样的人，我们心里清清楚楚。

……

我是一个普通的教师，我不愿意写下我的名字，也不愿意暴露我的笔迹。

师大女附中一教师　八月八日二时

写信人是语文教师张静芬，她目睹了卞仲耘被打死，写了一封信给家属，描述了事情的经过，并表示同情和愤慨。那样的深夜，提笔为卞仲耘之死作证，需要何等勇气。……但是，当时她不但不能署名，甚至还有意改变了笔迹，因为一旦被发现，可能给她带来和卞仲耘一样的命运。

就在卞仲耘被打死的这天晚上，北京中学生在天桥剧场召开“鬼见愁”对联辩论大会，康生、江青、王任重等中央文革要员出席。

开会前，江青等人在化妆室接见了中学红卫兵头头彭小蒙、国家副主席董必武的儿子董良翮、中共中央调查部部长孔原的儿子孔丹、邓小平的女儿邓榕、刘少奇的女儿刘平平等人，江青望着这些身着旧军装的孩子，亢奋之极，信口说道：

“同学们哪，你们怎么都穿军装呀？当然，我也穿军装，不过这

和你们不一样。我这一身军装是好不容易才争取到的，是我向林彪同志申请，才被批准了的。我对我们的解放军，对我们的部队是有感情的。彭德怀这个大军阀迫害我，不让我留在部队，是怕我把部队的事情向伟大领袖毛主席汇报……”

江青说着，竟情不自禁地哭泣起来，她哽咽道，“孩子们，你们不知道呀！革命，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解放前，我在上海时，反动派和那些党内的坏人就压迫我，不让我革命……”

这时，董良翮竟冷不丁问：“你那会儿在上海不是演电影吗？”

董良翮的问话让全场的人为之一惊。

江青很不高兴董良翮的插话，她接着说：“我跟你们说呀，中央内部也不一致。我们站在前台支持你们，可是有人背后捅刀子！有人谎报军情……”

她见到刘少奇的女儿刘平平，对她说：“平平，你是不是镇压革命同学了？你应该很好地向同学们检讨。”

江青看见有人在做记录，不像是学生，就问他是哪里的？回答说是共青团北京市委的。江青说：“呵！你是来做密探的吗？你回去告诉他们，就说我不怕他们！团中央胡耀邦原来是个红小鬼，现在我看是个胆小鬼！”她说的自然是胡耀邦“谎报军情”一事。

中学红卫兵簇拥着心中敬爱的旗手江青上台，要台下安静：“听江青同志作指示。”

江青说：“让我坐下来！

同志们好！毛主席问你们好！我们是接受同志们的邀请前来参加

你们的会议的，我受全组的委托讲一讲话。我们是向你们学习的。学习你们的革命精神，革命行动。我们很支持你们，过去，教育文化上面被一条修正主义、资产阶级思想专了无产阶级的政。现在我们要把它夺回来，你们做得对，做得好！今天因为是自己人，自己人说错了话，做错了事没什么了不起的。错了，我们改嘛，我相信你们是不会捉我的小辫子的。不过，我说错了，你们告诉我，我改。”

“我听说你们为一副对联争执不下，我觉得这是很好解决的。你们是为了某一个具体的人，匆匆拿出来的，我想讲一下‘老子英雄儿好汉’是从哪来的。有一出京剧叫《连环套》看过没有？”

众答：“没有！”

江青笑了，继续说：“是窦尔敦对黄天霸这个叛徒说的。他唱‘老子英雄儿好汉’。我们老纠缠在这个问题上就没法前进了。我们要随时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姚文元批判《海瑞罢官》那篇文章写出以后，上海书记处又改过十几次，他现在还有一篇文章，讨论了好几次，还不肯拿出来。我搞京剧改革两年了，谁有意见我都接受。你们现在若是还顶在这儿，就不能斗那些家伙了，内部老紧张。我们现在有好多成语是过去的，你们不改我们也不勉强。你们请我们来了，我们出点主意行不行？既然革命就不怕有什么错误缺点嘛！你们采纳我们的意见也可以，或另外改也可以，我觉得这样比较妥当：父母革命儿接班，父母反动儿造反。横批：理应如此。

我们只做个建议，你们去讨论。我们今天关起门来开会，没有外人怎么样？你们自己决定，我们不强加于人。”

“看一个人，第一要看阶级立场，这是本质问题。第二不要唯成份论，这是指某个阶级的个别分子背叛原来的阶级说的，第三重在政治思想表现，不是表面。”

她看了一张条子后说：“有一个外语附校的红卫兵写了一个条子，没写名字，叫我明确表态，同意不同意这副对联。我不完全同意，道理也讲啦，很简单，那种封建术语不能代表新的思想，这是匆匆忙忙拿出来的。我觉得应该不在枝节问题消耗精力，大敌当前，要对付敌人，要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我相信你们一定会干得好的。”

江青发言之后，王任重讲话，他说：“我是临时被拉上来的，我完全同意江青同志的讲话，她给我们指出中学今后如何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好，这是个伟大的任务。如果我们同学只在枝节上，在这副对联上争执不休，不再斗黑帮，你们想想是什么人高兴？高兴的是牛鬼蛇神，黑帮分子。对这副对联，江青同志提出建议，是不是可以修改，你们自己也可以修改。在总的方向一致下，按毛主席的决定进行文化大革命，我相信广大革命师生能团结起来的，只有团结起来，依靠左派，才能把被资产阶级所把持的学校和一切文化阵地夺回来，让无产阶级掌握。刚才我看了几个大学附中的紧急呼吁书，我拥护这些呼吁书。我很高兴，他们的观点是对的，我建议在大会上宣读。

有人提出‘红旗战斗小组’，‘红卫兵’还要不要？我们回答：还要！”

会场上响起热烈的掌声。

王任重接着说：“我们各个学校要按中央，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

在各学校，各系成立文化革命小组，革命委员会。红卫兵，红旗战斗小组在革委会的权力机关的领导下进行工作，团结起来，争取文化大革命的胜利！”

接着，康生讲话，他详细讲解了毛泽东关于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五个条件。他说：

“毛主席提出的接班人的头一个条件，要成为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也就是真正的毛泽东思想的拥护者。什么是马列主义，什么是毛泽东思想呢？就是要革命，要阶级斗争。同时我们要知道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在哪里呢？在善于分析。对每件事情要分析，善于把问题一分为二地来看，就是说辩证地看问题。

我很欣赏清华附中，人大附中，北大附中红卫兵的紧急呼吁书，这些呼吁书是什么呢？这是毛泽东思想的，马列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的，也就是一分为二的思想的。

毛主席的五条原则的第二条叫做全心全意为中国和世界绝大多数人民服务，这样一个革命者，他不是为一小撮资产阶级服务，也不是为一小撮宗派主义的小集团服务，是为绝大多数的人民服务，也就是为绝大多数劳动人民服务，不是半心半意而是全心全意为他们服务，这是我们的第二条。

第三条，真正的左派，真正的毛泽东时代的共产主义青年团员，他们必须善于团结绝大多绝大多数人。……

第四条，就是要有民主作风。……

第五条，就是要善于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一点青年同志们要学

会。”

## 第 109 回：《呼吁书》，交穆欣广为散发
## 张春桥，接见天津大学生

王仁重和康生在讲话中赞扬的“紧急呼吁书”是清华附中、人大附中、北航附中的红卫兵联合向社会散发的《红卫兵紧急呼吁书》。这份《呼吁书》是针对工作组撤离后，学校里日益严重的打人现象。

《呼吁书》说：“最近，中学文化革命出现了一系列极端严重的错误事件。一小撮坏蛋和披着革命左派组织外衣的人，打着造反的旗号，抗拒毛主席指示，压制打击不同意见的革命群众，到处殴打人，捣毁机关学校，进行流氓活动，进行反革命政治活动，严重破坏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破坏革命左派的威信，破坏党和毛主席的威信。”“我们向全市真正革命的红卫兵、红旗及其他左派组织呼吁：一、各校真正的左派联合起来，行动起来，立即采取有效措施，严格禁止乱打人，耍流氓，破坏国家财产等坏行为。提高警惕，监视、管制反革命分子，不许他们乱说乱动；二、认真学习党的政策，党的政策是党的生命，我们工农革干子弟，决不能去损害党的生命，要毫不留情地勒令那些故意破坏党的政策的混蛋们滚出红卫兵、红旗及其他真正的左派组织，假左派组织一律解散！今后谁还胆敢破坏党的政策，我们绝不答应……”

他们将《呼吁书》递交给了出席会议的中央文革小组成

员，康生当场表示了赞扬，王任重则建议在会上宣读《呼吁书》。

会后，王任重将《呼吁书》送给周恩来，建议公开印刷，广泛张贴。周恩来同意王任重的意见，即将此件报送毛泽东。毛泽东圈阅同意之后，又传回中央文革小组。江青圈阅同意，又批示在文革小组内传阅。传到王任重手上时，他亲自送给陈伯达，批交办公室办理。陈伯达第二次圈了圈儿，批示交穆欣办，并让秘书将批件给穆欣送去。

穆欣把经过周恩来写了批语、毛泽东划圈同意的原件收存起来，另抄一份送往中央办公厅印刷厂排印，并给中央办公厅领导写了便笺说："此件排出后请印一批先送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联合接待站散发。"

穆欣想将《紧急呼吁书》分送给参加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到会人员都看看，便在在便笺上又写到："我不懂得规矩，不知这种公开印发的传单可否作为不编号的文件，分发给参加全会的人员，请酌定。"

《呼吁书》铅印出来后，送一批到钓鱼台，除在中央文革小组内部分发外，又捡出几份送到王任重的办事机构，请他们广为印发、张贴。

天桥剧场大辩论，并没有制止住"鬼见愁"对联在社会上的传播，很多红卫兵组织甚至将对联作为一种指导思想，他们穿上老爹的旧军装，臂带红卫兵的红袖章，招摇过市，

蔚然成风。这不仅是一种服饰特征，更是一种能彰显红色贵族高贵血统的标志。这些稚气未退的娃娃们穿着并不合体的大人衣服，腰束宽皮带，脚蹬大皮靴，高挽袖口，满嘴的“老子、小子、狗崽子、混蛋”等污言秽语，一时间，竟成为青年们竞相模仿的偶像。

华北局会议结束后，7 月 23 日，天津市委决定在市、区机关和宣传、文教系统全面开展文化大革命。7 月 31 日，天津市委召开工作会议，学习中央《五·一六通知》，传达华北局工作会议和党的政治局扩大会议精神，专门讨论了天津市文化大革命的问题。

市长胡昭衡仍是这次会议批判的第一个重点。大会秘书处印发了《华北局工作会议天津各组揭发批判胡昭衡同志错误的情况》，一是“胡昭衡同志在天津工作两年半期间，在政治上组织上犯了一系列严重错误”；二是批判《老生常谈》的专题材料；三是批判胡昭衡写的《一个共产党员的诞生》、短篇小说《跳崖》、《乃红子》。

在会上，某区揭发胡昭衡一次视察工作，四次插话提到钱的问题。当区里汇报街道居民生产问题时，他问怎么给钱？某街干部汇报时，他又问青年干部收入多少钱？居民委员会汇报时又问保育员一个月收多少钱？居民代表汇报从工厂拉炉灰修胡同的路时，他又说工厂还得给你们拉炉灰的钱呀！这些都被批判为处处“宣扬金钱挂帅”。

在会上，胡昭衡的夫人、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林以行就胡昭衡的问题谈了个人的看法。林以行也是1938年参加革命的老干部。调天津工作以前，曾任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市委书记处书记。她在小组会上说："从《老生常谈》这书说也好，一贯看他也好，在组织上没有结论以前，我认为胡昭衡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分子，我对昭衡了解。我们是1940年在八路军120师认识的。我说一点情况，帮助同志们分析批判。根据毛主席的教导，研究问题不带主观性、片面性、表面性。胡昭衡在抗战前是学生，家庭是富农，父母参加劳动，也是剥削阶级。他于1933年参加过左翼作协，那时在北平汇文中学读书，爱写文章。1933年参加反帝大同盟，5月被捕，坐了一个月的牢。因为没有人证、物证，经学校取保释放。放出后继续在学校念书，后来到北京大学念了两年书。1937年参加八路军，在120师，没有被俘过。他在旧社会没有做过任何事情，是学生。抗战中做过两年组织工作，其他时间做宣传工作。日本投降后到东北，1946年到内蒙古，一直在内蒙古工作18年，当过骑兵师政委。1960年担任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处候补书记兼宣传部长，还分管农业，下去的时间多。从1961年开始写《老生常谈》。从他本人一贯历史表现看，是否有意识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我认为不是。他工作一贯积极，一帆风顺，助长了他个人主义的发展。后来调到大城市，在大城市当市长出头露面多，

助长了他个人主义的发展。胡昭衡是属于做过错事、说过错话、写过一些不好的文章、不好的作品的人。正如《十六条》中第五条说的那样，是属于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改造好的知识分子。”

林以行还说：“总的来看，这是好事，很好，欢迎。不是这一场文化大革命，不可能听到这些意见。大家毫无顾忌地讲出来，这是好事。尽管有些同志揭发出来的有些事实不是这样，也没有坏处，将来组织上查证、核实、结论。如有的同志讲，我们来天津后修房用了一万多元，实际上是我们来以前市人委修的。如‘简报’上说，家庭烧煤、家具都是公家出费。我们家庭烧煤从来是自费，家具也按规定交折旧费。订几份报是公家规定，每位书记家里都是如此。要说是错误，是制度不对，不是胡昭衡一个人的事情。”

林以行的发言以“简报”的形式刊登以后，立即遭到各组的声讨批判，纷纷出“简报”。有的说：“看了林以行的发言，义愤填膺。这是林以行公开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挑战，必须彻底揭露她，坚决反击她。”有的说：“大家情绪激昂，非常气愤，一致认为，林以行的发言是株大毒草，是公开地为胡昭衡涂脂抹粉，明目张胆地为胡昭衡进行辩护，是对揭发胡昭衡问题的同志进行反扑。”

有一篇“简报”有三个横标题：

“一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夫妻店”；

“坚持反动立场，为胡昭衡诡辩”；

“自己跳出来的反面教员”。

各组还贴了不少大字报，要求罢胡昭衡、林以行的官，对胡昭衡公开登报点名批判，同时把林以行列为“黑帮”，表示“有决心有信心彻底斗倒、斗垮、斗臭胡昭衡这伙反党反社会主义黑帮”。

市委工作会议上，胡昭衡夫妇都被戴上“黑帮分子”的帽子。

在华北局工作会议上，有人揭发市人委办公厅主任杨腾，在 1965 年胡昭衡进行“微服私访”活动时，说“胡昭衡是活焦裕禄”。杨腾从市委工作会议上印发的《华北局工作会议天津各组揭发批判胡昭衡同志的情况》中看到这份揭发材料，赶紧向大会秘书处写出申诉，否定此事。他说：“1966 年 2 月《人民日报》才发表了焦裕禄的报道，我怎么可能在 1965 年赞扬胡昭衡市长是焦裕禄呢？”杨腾提出“何时、何地、何人”听他说过此话？自然是无人能够答对。但杨腾的信发表后又遭到批判。有些人说：“不论杨腾是否说过这句话，作为办公厅主任，难道没有给胡昭衡抬过轿子吗？”

在这次会上，市委文教部部长王金鼎被公开点名批判，主管文教的天津市委书记处书记王亢之也成为重点。这次会议于 8 月 26 日结束。

8 月 2 日，中共天津市委发出《关于撤销天津师范学院

和中等学校文化革命工作队的决定》。3 日上午，天津市委召开天津市大专学校和中等学校师生文化大革命积极分子大会，听北京撤销工作组大会的录音，之后，中共河北省委书记处书记兼中共天津市委第二书记赵武成讲话，宣布天津各大、中学校撤销工作队，揪出天津市委文教政治部主任王金鼎。

工作队撤销后，大专院校和中等学校的文化大革命，由全校的师生员工选举产生的“文化革命委员会”领导。

天津南开大学、天津大学、河北大学的学生纷纷进京参观，学习如何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

8 月 6 日下午，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副组长张春桥、小组成员穆欣受周恩来的委托，接见了南开大学、天津大学及河北大学来京参观的全体同学。张春桥首先向他们介绍了北京的情况。他说：“文化革命并不是从现在开始的，如果说是从讨论《海瑞罢官》开始的话，从去年 11 月 10 日发表姚文元同志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开始，发展到批判‘三家村’，一直到 6 月 1 日北大聂元梓等 7 位同志的大字报广播。这期间，经过了 200 天。这 200 天里，全国都作了充分的思想准备，大家对国内阶级斗争，特别是思想战线上的阶级斗争，认识更深刻了。聂元梓等同志的大字报并不是偶然的，它对全国来说不是偶然的。而大字报由聂元梓写出去，可能是偶然的。她不出，别人也会出的。毛主席看了大

字报，立即就批了，让中央广播电台广播了。可见，文化革命的烈火是毛主席亲自点燃起来的。”

接着，他谈了工作组的问题：“工作组进来以后，没有领导革命师生进行文化大革命，没有领导群众斗黑帮，而是执行了一条错误的右倾机会主义的路线，运动不是斗陆平，到10日，连个斗争计划也没有，反而订了许多清规戒律，如你们刚才提出的那些情况，这里都有。例如：班级之间不准串联呀，门口也不准随便进呀，校系之间不准往来呀，兄弟院校，工农兵来声援还不让进去等等，同学们耐不住了，自己起来革命，就出了个‘618’事件，打了一批黑帮分子。学生里面有没有不太好的呢？有。但那天打人的多数是好的，而张承先却说这是一个反革命事件。那天打了人，戴了高帽子，当然也有一些不太好的同学做了一些不好的事，如撕破女同学的衣服。张承先借口说，这不是流氓行为是什么？是反革命事件！6月18日以前，运动开展得轰轰烈烈。但6月18日以后，却转过去镇压革命学生，把参加‘618’事件的革命学生当反革命来镇压。工作组本来应该领导同学起来斗黑帮，但他们却来斗革命的学生，完全把方向弄反了，影响很大。”

他说：“我们不提倡打人，但已经打了，怎样？只好解放这些学生。当时两派学生斗起来了，其实两派学生都是革命的。……好人打了坏人活该，好人打了好人是误会，我们

不提倡打人，意思是以后不要再打人了。这是第一句话。至于你们怎么办？你们自己讨论。戴高帽子，我们也不提倡，戴不戴由你们讨论，青年人就是要革命的，他们最富有创造性。他们现在还没有地位，也不是权威；不怕罢官，也不会罢官，因为你们还没有当官，顶多是挨斗，戴高帽子。我看戴戴有好处，挨斗也有好处，这样可以锻炼毅力。平时说是忠于毛泽东思想，轮到自己头上就不行了。你们不想给别人戴高帽子吗？人家也能给你们戴，不怕！”

当有同学递条子问道：“扩音器可不可以供同学辩论使用？”

张春桥答：“我看可以。文化革命委员会是文化大革命的权力机关。罢官都可以，连校长都可以罢，何况扩音器呢？”

有人问：“北京各院校的形势所以是这样，是不是因为北京市委烂了？”

张春桥答：“这个说法恐怕也不大妥当吧！在上海有些人也提倡上海市委在文化革命中是正确的，所以在上海市委领导下的校党委也应该是正确的。这种论调是错误的。第一，上海市委虽然是正确的，但也有不少缺点和错误。第二，更重要的是，即使上海市委是正确的，也不能保证你就没有问题。如果是这样，中央、主席是正确的，那前北京市委怎么烂了呢？党委如果在文化大革命中起作用，就一定起来革

命，如果不革命，就有人来革命。”

穆欣说：“你们还没有闹革命，你们闹嘛！”

张春桥：“上面还有很多框框压着你们，现在你们希望我们出来说话，替你们把盖子揭开，我觉得这个办法不好，我希望还是你们出来。中央指示很清楚，你们是主人。南开大学，天津大学的革命师生，你们是主人，你们起来革命嘛！我们头脑里也不是那么干净，有错误就改。如果你们学校的领导愿意革命，检查错误，也可以一起革命嘛！如果不革命就可以轰嘛，就闹革命嘛！”

一个同学提出：“北大发动群众的方法是适合全国的，回去是否可以讲？”

张春桥：“当然可以。你提出这个问题，反映你们还有框框，还没有起来革命，还没有！”

天大有人问：“调查材料时，受到人事部门，组织部门阻扰怎么办？”

张春桥：“革命委员会真正把权力抓在手里，是可以调查的。问题是现在还没有动脑子，你们还要想一想，怎么闹革命，权不在你们手里！又有委员会，又有代表，他们不代表你们，你们可以选一个委员会嘛！”

穆欣插话：“印把子还没有在你们手里。”

张春桥：“如果你们不知道革命怎么闹法，你们还是研究一下。中国共产党从十二个人的代表会一直到进北京，新

中国成立。革命怎么闹法，不能叫领导小组出主意。

给你戴了高帽子，你还革命不革命？是共产党，共青团员，开除了你的党籍，团籍，你还干不干革命？有人提出对市委有意见，你们既然可以到北京来，就不可以到天津市委吗？你们对市委就毫无办法？我这可有点煽风点火了。”

## 第 110 回：津城反，兰州铁路局事件

## 说刘邓，主席炮打司令部

8月6日晚19时30分，在天津体育馆召开了“天津市十六中全体师生员工和中等学校师生员工代表大会”，到会者一万多人。市委第一书记万晓塘在会上肯定了十六中学部分师生于6月21日《给全市革命青年的一封信》是革命行动。并说：“十六中事件完全由马瑞华负责”。 会上万晓塘代表市委对十六中问题作检查，并为“十六中革命小将”平反，号召全市中学生要向“十六中革命小将”学习，同时还代表省市委宣布撤销马瑞华组织部长职务。

8月7日凌晨1时，中共天津和平区委文革办公室召开全区工作队全体队员紧急会议，会上说：“对十六中的信应看作是革命的行动，学生敢给市委提意见是革命精神。”

8 月 10 日下午 16 点多钟，到北京串联的天津一中学生受北京批判工作组气氛的影响，联想到天津市委和工作组，于是来到《人民日报》社，反映天津市委和天津工作组的情况。报社叫他们将情况写出来。

11 日，天津一中的学生准备上午在天津体育馆召集大会，介绍北京情况，讨论工作组和天津市委的问题，在天津点起造反的大火。上午 10 时，他们直接给市委第一书记万晓塘打电话，要求借体育馆开大会。

电话是市委秘书处一位姓孙的干部接的。他可能从来没

有听说过，中学生自己找市委第一书记，借用全市唯一的体育馆，自发组织开会。他还用以前的惯用口吻对学生说：

“你们可以自己去体育馆借。不过，体育馆是国家的，你们借用得付租金。”

学生在电话中大声质问他：“你对广大革命学生的革命行动，管不管？！”

那位姓孙的干部哪吃学生这一套，毫不客气地回答说：“不管!”

一中学生也拿出“革命小将”的气势，警告说：“到时我们把群众叫到体育馆开会，你们如不给我们使用，一切后果由你们负责!”

那位干部马上答道：“由召集者负责!”

一中学生立即召集各校学生去体育馆开会。后因时间仓促，到会人数不多，又改在一中进行。

会上，一中的同学介绍了北京经验，提出要造天津市委的反，大家纷纷响应。与会代表争相发言，并要求再开大会，号召炮轰天津市委。同学反映热烈，有人还要求散会后去天津市委游行，把市委扣下的信交出来。

天津造反之火点起来了，第二天，市委、团市委已经贴满了大字报。

此时，兰州发生了“铁路局事件”。7 月 13 日，兰州大学的李贵子召开全校大会，斗争刚从北京告状回来的朱选和陆

保珍、张明生，对他们拳打脚踢，并宣布成立专案组。对支持这 3 个人的师生同样也进行了搜捕和斗争，并在 7 月 27 日、28 日两天，继续斗争学生 375 人，惨状触目惊心，目不忍睹。

7 月 29 日清晨，甘肃省委常务书记裴孟飞来到李贵子的宿舍，问他对工作团反映如何。李贵子说有右倾情绪。于是裴孟飞当即决定，当晚开辩论大会。会上对工作团的李磊进行当面揭发批判。最后裴孟飞讲话，肯定了对工作团的批判，并代表省委宣布撤出兰州大学工作团，由李贵子等“革命左派”领导革命。

李贵子被甘肃省委树为全省的标兵、群众运动领袖。8 月 1 日上午，李贵子派人到兰州大学附中，和他所支持成立的“红旗”小组成员一起，殴打反对他们的同学，搜捕工作队员。下午 17 时召开辩论会，工作队员被罚站或罚跪。省委组织部长丁乃光来校支持李贵子，并当场宣布撤出工作团，正副团长留下交群众批判。实际上工作团 11 名队员全部被“武装看管”。

由于兰州铁路局与甘肃省委素有矛盾，这天，李贵子带人冲击率先炮轰甘肃省委的兰州铁路局。

8 月 3 日，李贵子等人在不到 20 小时里，又在校外制造了四起流血事件。清晨 3 点半左右，他派人到兰州十六中，先封锁校门，再敲学生宿舍，惊醒所有学生，以代表党中央、

毛主席的名义要求他们在 3 分钟内赶走工作组。于是这些人和部分信以为真的本校学生砸坏工作组宿舍的门，将他们拉到操场和一些教师一起共 40 多人，全部跪下被殴打。

这一天，李贵子又指挥人打了铁三中和五中的学生。并在当天下午，通过兰州大学广播台，以筹委会名义要全校革命师生去“声援”铁一中，李贵子在现场任指挥，与铁一中发生严重冲突。该校有 299 名学生被打，39 多人重伤。省委马继孔赶到现场，宣布支持李贵子，把责任推给该校工作组。

李贵子带人冲击铁路局和一些中学，肆意打人，引起铁路职工不满，他们到省委静坐、绝食，由此爆发了“兰州铁路局事件”。

8 月 3 日下午，李贵子还召集兰州大学及附中大批人员到十六中开“辩论会”，对工作组正副组长残酷殴打，从高台子上推下来，逼他们承认反党，一直打到天黑。这天，在该校有 12 名学生、53 名教师、全体 13 名工作队员被打。

由于李贵子带着兰州大学学生与铁路职工、铁路中学学生屡屡发生冲突，8 月 5 日，兰州市公安局出动上百名警察，在兰州大学门前实行戒严。

8 月 6 日，裴孟飞在省市两级干部会上为李贵子张目，说：“对兰大的态度是革命反革命的分水岭。”又动员了社会上许多人员敲锣打鼓到兰州大学声援。

毛泽东的秘书徐业夫知道毛泽东 8 月 5 日写在 6 月 2 日

《北京日报》上的那段文字极为重要，但是用铅笔随手写在报纸上实在是不便于保存，于是他用毛笔誊写在两张信纸上，抄完后呈毛泽东确认。

这份抄件以及排印件放在毛泽东的桌上有一天多的时间。8 月 7 日凌晨，毛泽东在誊写稿上又作了认真的修改，把“长资产阶级的志气，灭无产阶级的威风”改为“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在“左”字上加了个引号，然后加了个标题《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后面还特别注明了时间是 1966 年 8 月 7 日晨 3 时。在铅印件上，毛泽东又作了修改和添加，将“是何等写得好呵”改为“写得何等好啊”，“可是在五十多天里，中央到地方的某些大领导人”改为“可是在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

他检查一遍后，又在前面加上了“请同志们重读这一篇大字报和这篇评论”，在“围剿革命派”后加上“压制不同意见”。这样改下来，语气更加凌厉。

当天，8 月 7 日，这张“大字报”就作为八届十一中全会的文件印发全体与会代表，并附有聂元梓等 7 人的大字报。

八届十一中全会还印发《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作为会议文件，毛泽东在其中的“对于无产阶级革命派来说，我们遵守的是中国共产党的纪律，我们无条件接受的，是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一句后

面，加括号写了一段批注：“危害革命的错误领导，不应当无条件接受，而应当坚决抵制，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广大革命师生及革命干部对于错误的领导，就广泛地进行过抵制。”

见到毛泽东写的《炮打司令部》，陈伯达、姚文元也纷纷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写出大字报紧跟。姚文元大字报的题目是：《永远跟着毛主席前进》，他在大字报里写道：

“炮打司令部，指的是什么呢？就是用马列主义的炮打，毛泽东思想的炮打，打掉司令部里一切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反动路线……”

可见，姚文元此时认为毛泽东炮打的“司令部”，还是无产阶级的司令部，是“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里的“一切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反动路线……”

陈伯达大字报的标题是：《拥护毛主席的大字报》。他写道：

“完全拥护毛主席八月五日写的一张大字报。一个共产党员在大的政治斗争关键忘记了群众，忘记了阶级分析，看不见阶级大变动的新动态，进行镇压群众，就脱离了马克思主义的轨道，脱离了毛泽东思想的轨道，同无产阶级政党的方针政策，背道而驰。这样做，不是把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引向胜利，而恰恰会把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引向失败，引向资本主义复辟。大海航行靠舵手——毛主席把党的领导从最近一两个月的错误路线引向到无产阶级的正确路线上来，这是党

的伟大胜利，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胜利，同时是国际无产阶级的伟大胜利。马克思曾经说过：社会主义革命可能由德国首先发动，而由法国来完成。但没有实现。列宁也设想过，社会主义革命可能由俄国首先发动，而由德国、法国、美国来完成，但也没有实现。现在的历史可否说明社会主义革命由俄国首先发动，而由中国来实现呢？看现在修正主义苏联篡军、篡政、把苏联引向资本主义复辟的道路。那里从革命走向反动，走向对列宁斯大林的背叛。难道这不像人们所说的国际希望在中国吗？”

陈伯达是在讲文化大革命的意义。此时的中国共产党已经在设想，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中心很可能就有此转向到了中国，全党、全民都为此而感到欢欣鼓舞。

毛泽东的大字报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掀起巨澜，大家都感到很突然。与会代表们心中无底，而小组讨论时还要表态。怎样表态？按一般的内部矛盾讲，怕调子低；按敌我矛盾讲，又怕过了头。这个夜晚，北京饭店大部分房间灯火通明，有的在独自思索，有的在互相议论……

后来，毛泽东身边的几位工作人员用毛笔将毛泽东的大字报抄在白纸上，贴到中南海食堂西大灶的墙上，一时间围了许多人观看。在中央办公厅秘书局收发处工作的周西斌到西大灶，正好遇到刘少奇在看这张大字报，旁边还跟着他的警卫员刘德凯。

周西斌向刘少奇问候道："刘主席好！"

刘少奇和周西斌握握手说："欢迎你们提意见。"

8 月 7 日上午，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召集周恩来等开会，讨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稿。毛泽东提出："在进行辩论的时候，要用文斗，不要武斗。"

8 月 7 日这天，中央政治局召开生活会，批评刘少奇。会前，江青曾找过陶铸，希望他能在 8 月 7 日的会上带头发言。

陶铸推辞说："不行，我不能开头炮。"

江青不明白为什么，因为陶铸在党内素以敢放炮闻名，历史上也曾经与刘少奇发生过三次冲突：第一次是在延安，陶铸曾经为遭受审查的柯庆施抱打不平，公开顶撞了负责柯庆施案的刘少奇；第二次是解放初期，因工作上的事情不同意刘少奇的意见，认为刘少奇不了解下边的具体情况，将"官司"一直打到中央；第三次则是在 1959 年，毛主席在表示不再担任国家主席的时候，陶铸对刘少奇的当选公开表示过不满。这次怎么退缩了？

江青再次鼓励他说："怕什么，主席给你撑腰，我们都和你站在一起，你还顾虑什么，你以前不是朝刘少奇开过炮么？"

陶铸说："我刚到中央,情况不熟悉，不能乱讲呀。"

无奈，江青又找到谢富治，谢富治同意。会上，谢富治第一个发言，批判刘少奇和邓小平。

接着，康生在会上发言说："在抗日战争中，正当毛主席号召群众打败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建立新中国的时候，1939年7月,刘少奇为了反对毛主席的革命思想和革命路线，抛出了他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大谈什么思想意识修养和为人处世的封建哲学，要人们离开当前尖锐的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而去做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修身养性。"

刘少奇清楚，当年高岗也曾借这个事攻击过他，毛泽东没有理睬，最终，高岗倒台了。

在这天的会上，朱德、陈云、薄一波也受到批判。

8月7日，周恩来、陶铸向陈云传达毛泽东关于调整政治局常委和排名顺序的提议。周恩来建议陈云找林彪谈谈，还通知周荣鑫，要求国务院的工作人员端正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

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在8月7日这天发出经毛泽东批准的电报：派往军事院校的工作组也要全部撤出。

8月7日，陈伯达将印好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在当天下午14时批道：

伯达同志：

《决定》中"无名小卒"，以改为"无名青少年"较妥，

请酌定。

毛泽东

八月七日下午二时

接着又在晚上22时再次批示：

即送伯达同志：

同意修改之处。在第10页上改了几个字，请酌定。

毛泽东

八月七日下午十时

陈伯达8月7日送审的决定修正稿第十页写道："对一般科学家、技术人员和一般工作人员，只要他们是爱国的，是积极工作的，是不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是不里通外国的，在这次运动中，都应该继续采取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对于有贡献的科学家和科学技术人员，应该加以保护。划这样一条大杠杠，是必要的。对他们的世界观和作风，可以帮助他们不断改造。"毛泽东审阅时，删去了其中的"划这样一条大杠杠，是必要的"一句，并将"对一般科学家、技术人员和一般工作人员"改为"对于科学家、技术人员和一般工作人员"，将"可以帮助他们不断改造"改为"可以帮助他们逐步改造"。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陈伯达在8月7日晚23时批示印发的决定修正稿第二页上，将"广大的工农兵、革命的知识分

子和革命的干部，是这场文化大革命的主力军。一大批无名小卒成了勇敢的闯将”一句中的“无名小卒”，改为“无名青少年”。

## 第 111 回：叶飞急，广东忙撤工作组

### 《十六条》，中央还有“司令部”

早在 8 月 1 日，即八届十一中全会开幕的当晚，正在北京开会的广东省委第一书记赵紫阳就工作组撤出一事电话指示广东省委：“现在工作队没有一个例外的包办代替，思想观点，无一例外。北京市比较严重，到校没有动牛鬼蛇神，就动员反击，如有学校都斗了左派学生。现在工作队不是撤不撤的问题，根本撤不出来，学生要斗争。这种情况有些城市也有。我们没有强调反击，没有发生这问题。比较困难的是华南工学院，我们也没带（戴）他们帽子，看来撤出来可能问题不大。”

其实此时广州的大专院校已经是沸反盈天了。但广东省委似乎还未意识到形势的严峻。广东省省长王阑西和组织部部长张云商量，决定“逐步撤出”一些工作队。张云建议把精神向机关工作队讲一讲，有的机关可以撤，有的可以暂时不撤。

8 月 6 日，广东省委正式做出撤销各大专院校工作队的决定。

8 月 7 日，广州市委文革小组在越秀山召开全市大、中学校师生六万多人大会。会上播放了北京市委撤销工作队的决定及中央领导的录音报告。广东省代省长林李明、广州市委代理第一书记焦林义分别代表省、市委在会上讲话。焦林义宣布，市委决定撤销大、中学校的所有文化革命工作队。林李明在讲话中，承认省委犯了方向性错误。

这天，正在北京开会的赵紫阳又听了毛泽东的大字报，他连忙打长途电话给广东省委，口授一份大字报，于 8 月 8 日张贴在省委大院

内，支持革命派的造反行动，并欢迎群众揭露、批判自己和省委的错误。大字报写道："省委机关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已经开始两个多月了，到现在还没有人贴我的大字报，也没有人贴书记处的大字报。这说明了什么呢？是我们没有问题可贴吗？不，完全不是。是说明群众没有发动起来。可能有思想顾虑，还不敢炮打司令部。我要求同志们解除思想顾虑，大胆起来贴我的大字报，向我开火。"区梦觉、林李明、尹林平等省委书记、常委们，也连夜写了一张联名大字报，在省委张贴出来，欢迎群众揭批省委问题。

福建省委第一书记叶飞在这次全会上虽然由中央候补委员递补为中央委员，但他的心情一点也不轻松。6 月份，福建省委也向各学校派出了工作组，叶飞在此之前虽然对工作组的问题有所耳闻，但没想到来北京后，听到毛泽东的言辞如此激烈，心中难免不安起来，他马上打电话向省委传达，要求立即撤出工作组。

8 月 2 日，叶飞在华东小组会上对本省开展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作了检讨。接着，在几经斟酌后，于 8 月 7 日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信中写道：

我最严重的错误，就是存在相当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意识没有改造好。骄傲自满，迷信自己，"我"字当头。个人和组织的位置没有摆好，开会"一言堂"，有时个人决定问题，违反了民主集中制，没有充分发挥集体领导的作用。

自己的错误长期没有改造好，近几年还有所发展，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没有认真学习主席著作，没有以主席的思想来改造自己的世界

观。没有放下臭架子，甘当群众的学生，向群众学习，而是高踞在群众之上，做官当老爷，受了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袭，思想就慢慢地变了，错误的思想不但没有改好，反而发展了。如果再不觉悟，再不痛改前非，就会犯更严重的错误。

最后，叶飞表示：决心狠下苦功，认真学习主席著作，以主席的思想来改造自己的非无产阶级世界观。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放下臭架子，甘当群众的学生，向群众学习，放手发动群众，“引火烧身”。

毛泽东看了叶飞的这封检讨信后，当即作了批示，在“我最严重的错误，就是存在相当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意识没有改造好”一句的“相当”后面批道：“不是相当而是极端”，在这句末尾批道：“不是没有改造好，而是根本没有得到改造。不然不能解释何以犯下了下述那些错误。”这封信立即作为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文件印发与会代表。

8 月 7 日这天，新华社宣布，为满足广大人民群众学习毛泽东思想的迫切需要，中共中央已决定，把加速大量出版毛泽东著作，当作压倒一切的任务。于是，《毛泽东选集》在此后两年时间里，发行量高达 3500 万册。

8 月 8 日上午 11 时，八届十一中全会举行全体会议，周恩来主持大会。会议通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因为内容共有 16 条，所以在文革中将这一决定简称为《十六条》。

毛泽东在 8 月 8 日的大会上讲话。他在讲话中提到："文件里'抓革命、促生产'这一条，是江渭清、谭启龙同志提的。'要文斗，不要武斗'这一条，是江谓清同志提的。"

江谓清当时站起来对毛泽东说："我提出您作决定，这就是您的指示。"

从下午开始，会议讨论毛泽东的大字报，继续批评刘少奇、邓小平的错误。

弯子转得太急，大多数人思想不通，有的仍只按毛泽东的口径空洞地表态，有的仍在派工作组的问题上就事论事地批判，也有的一言不发，保持沉默。在讨论刘少奇、邓小平的错误时，表示同情者有之，沉默不语者有之，亦赞亦批者有之。刘少奇在会上作了检讨。陈伯达那篇拥护毛泽东《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作为正式文件印发会议。

8 月 8 日晚上，林彪来到钓鱼台接见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他在陈伯达住的 15 号楼会议室作了长篇讲话，他说：

"昨天主席要我和同志们见一下面，认识一下。这次文化革命，最高司令是我们主席。在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下，在毛主席亲自领导下，同志们进行过紧张的劳动，你们的工作碰到困难，有很大困难，运动开始蓬蓬勃勃，轰轰烈烈，中间泼冷水，泼下去了。主席又把局面扭转过来，不然，文化革命运动就会夭折、中断，资产阶级就会占优势，我们就要打败仗。"

"运动开始蓬蓬勃勃，轰轰烈烈，中间泼冷水，泼下去了。主席又把局面扭转过来，不然，文化革命运动就会夭折、中断，资产阶级

就会占优势，我们就要打败仗。现在重整旗帜，再进攻，消灭资产阶级思想，树立无产阶级思想，改变人的灵魂，把旧思想打垮。”

他还说：“思想改造，思想斗争是长期的，……我们毛主席把无产阶级文化革命作为专题，作为大事，作为一个战略任务，是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创举，也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创举，是社会主义建设所必须的。几千年剥削阶级统治，旧思想深入人心，影响是很不简单的，不是一下子能解决的。”

“没收资本家的财产容易，改造人的思想，改变人的灵魂是不容易的，需要经过大震动，像这次是氢弹、原子弹，震动人心。要在运动中把资产阶级反动权威打倒，要使他们威信扫地。要弄得翻天覆地，轰轰烈烈，大风大浪，大搅大闹，这半年就要闹得资产阶级睡不着觉，无产阶级也睡不着觉。大家动脑筋，在灵魂上大震动，彻底打垮资产阶级反动权威，彻底建立无产阶级的权威。在这种基础上再改变一种缓和的形式，进行经常工作。质变的形式和量变的形式，革命的形式和进化的形式交替进行，相互渗透。”

“我们不是单纯从思想着手。一方面从物质上着手，发展生产，提高技术，一方面从精神上着手，改造人的思想。生产力主要因素是人。发挥人的因素，就要改变私有观念，提高对社会的责任感。”

“我是打仗的，对毛泽东思想，拼命想学，想用，但是了解很少。毛主席说，破旧的思想，用新的思想来代替。新的思想就是毛泽东思想，我们大学大立毛泽东思想，因为它是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最高水平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是能够改造人的灵魂的马克思列宁主

义。我国是 7 亿人口的大国，要使全国有统一的思想。用毛泽东思想统一起来，才能有统一行动。7 亿人口的大国家，没有统一的思想，还是一盘散沙。张三一篇，李四一篇，不能统一全国的思想，只有毛泽东思想的威力，才能把全国人民的思想统一起来。苏联没有把列宁主义思想灌输到人民中去，没有统一的无产阶级思想，是大错特错，必然向资本主义倒退。我们不要再犯这个错误，要把人民的思想用毛泽东思想统一起来，变成全党的指南、各项工作的指导方针。中国封建社会统治用孔孟之道巩固了它的政权。资产阶级有他们的思想体系巩固他们的政权。我们要用我们的代表无产阶级利益、人民利益的新的思想体系，就是毛泽东思想体系，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用毛泽东思想体系驳倒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用毛泽东思想体系代替他们的思想体系。”

“树立无产阶级思想，就是树立毛泽东思想。在部队这样做，大见效果，拿到全国人民中，也大见效。过去中宣部不让印毛主席的著作、语录，他们是大错特错的。陆定一、周扬，还有下边许多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他们不想革命，也不让别人革命，他们名义上是共产党，实际上是反共分子，名义上是革命者，实际上是反革命分子。”

“毛主席是当代无产阶级最杰出的领袖，是最伟大的天才，有最高的革命责任感，最现实的革命精神。毛泽东思想通过长期革命斗争的考验，是无产阶级最高的理论，是世界上无产阶级最高水准的著作，是我国有史以来最高水准的著作。我们不以此为武器，为动力，不重

视，要犯大错误。中央政治局、常委的一些人不重视这一点，就是很大的错误，如同苏联人丢掉列宁主义一样。”

“总之一句话，大破旧思想，大立毛泽东思想。要把我国变为强盛的国家，要搞物质建设，又搞精神建设，并且用精神建设带动物质建设，而在人民群众中，广泛传播、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就是我们进行精神建设。这种精神建设，如同总的火车头带动火车在双轨道上前进。”

林彪对中央文革小组的几个人进行了表扬和鼓励：“你们这些同志，这几个月起了作用，今后还要起更大的作用。”林彪的讲话，在全会上作了传达。

8 月 8 日晚上新闻联播时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文广播《中共中央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决定》，即《十六条》。全国各地的学生和群众自发的聚集在大喇叭前收听广播，学校的宿舍里几乎没有人。不仅是各级领导关心这场大革命究竟该怎样搞，老百姓也尤为关心。

《十六条》规定：这次运动的目的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以利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十六条》确定：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文化革命代表大会为文化大革命的权力机构，称这些组织形式“是一种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新事物”。“不应当是临时性的组织，而应当是长期的常设的群众组织。它不但适用于学校、机关，也基本上适用于工矿企业、街道、农村。”

毛泽东要用一种新的国家机器代替旧的国家机器，他对马克思所称赞的巴黎公社原则心仪已久。对实行全面的选举制，群众可以对代表随时提出批评，对不称职的代表可以改选、撤换等也早就津津乐道。

《十六条》刚刚播放完，全国各地再次出现类似狂欢的热潮，通宵达旦、络绎不绝的游行队伍，震耳欲聋的口号声、欢呼声、锣鼓声。人们手舞红旗，一路呼喊口号，情绪激昂。许多县城里的群众也抬着毛泽东的画像，举着红旗，敲锣打鼓地上街游行。

当天晚上，北京的工人、农民、学生、干部，源源不断地来到中共中央所在地和北京新市委门前，送喜报，送决心书。

8 月 9 日，全国各地主要报刊均在头版头条位置以套红大字标题全文刊登了《十六条》。更多的欢呼、报喜的人流涌向了各省、市委机关所在地。北京市有组织的群众队伍川流不息地涌到设在中南海西门附近的中共中央群众接待站祝贺。府右街人山人海，锣鼓声、鞭炮声以及“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声响成一片，声浪此起彼伏，连居住在中南海深处的人也为之震动。

中央办公厅秘书局信访处专门在中南海西门外搭起一个临时的报喜台，接受大家向中共中央、毛泽东递交的报喜信。报喜台以五星红旗为幕布，正中挂着毛泽东彩色画像，上联是“中国共产党万岁”，下联是“毛主席万岁”，横批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中央办公厅组织人员轮流在报喜台值班，代表中共中央接受群众的祝贺，并维持秩序。

群众对中央的决定表示了由衷的拥护和支持。

8 月 9 日上午，江青在八届十一中全会华北组会议上说：“北京有两个司令部，一个是镇压革命的司令部，一个是主席的革命司令部。主席的大字报讲得很清楚，有两个司令部，另一个司令部就是主席炮打的司令部，已经掌握了一切了，相当长期了。他不向主席汇报，也不请示。严重的问题，主席 7 月 18 日回来，一直未汇报。在他们主持的汇报会上，据说陈伯达同志和康生同志参加了四次，他们根本不听伯达同志和康生同志的意见。怎么把所有的同志都拉到那个司令部去了！”

戚本禹也在华北组的会议上说：“炮打司令部，就是打修正主义的司令部，打党中央领导核心中的保皇派。要造他们的反，夺他们的权。”

这似乎是对“炮打司令部”最终的诠释，那就是：在中央，还有另一个“司令部”。

8 月 10 日上午，张春桥在华东组会议上说："抵抗'海瑞罢官'的批判，不是彭真一个人的问题。彭真一个人不敢这样狂妄。五人小组的提纲是经过常委会议讨论通过的。5 月政治局扩大会……在'海瑞罢官'这个问题上，有的同志谈的轻描淡写，好像同自己关系不大。事情果然是这样吗？"

"从'清宫秘史'到'海瑞罢官'，一头一尾，情况既然只这样，中间的几次大批判，他的态度究竟如何？是站在那一边？过去没有想过，现在应该想一想了。"

"在 5 月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中央的这位同志谈到 1964 年对毛主席不尊重。我认为不是不尊重的问题，而是对抗的问题。他讲毛主席调查研究的方法不适用了，我在 1964 年看了记录，非常吃惊。这是第一个以党中央领导人身份敢于公开大庭广众之中攻击毛主席的人！毛主席还健在，不止讲一次，全国到处讲！攻击调查研究，实际上就是攻击毛主席思想的基础。完全是赫鲁晓夫在'二十大'的口吻！我看着问题太大了！"

康生插话："他攻击的不仅仅是一个调查研究，实际上他是攻击主席的整体思想。"

8 月 10 日下午，康生在华东组小组会上说："从去年 9 月到现在，整整 10 个月，接班人出了修正主义。在草拟中央《通知》的时候，主席加了一段话，说修正主义睡在我们身旁，有的已经发现，有的还没有发现。当时只想到彭真，没有想也不敢想到接班人问题。"

康生说的那个《通知》，即《五一六通知》。

8 月 10 日，刘少奇在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小组会上作了自我批评，他说：

"主席不在家这一段由我主持工作，我绝不逃避责任。中心问题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反对群众运动。这次文化大革命，群众起来要民主，主席又这样大力支持，把我们夹在中间，这也是上压下挤。革大家的命可以，革我们的命可不可以？这是个大问题，要下定决心，革我们自己的命，无非是下台。我们这些人可以下台。"

8 月 10 日，在东交民巷 30 号外交部大礼堂，外交部党委召开全体外交部人员大会，批斗部党委委员、国际关系研究所所长孟用潜。

大会由副部长乔冠华主持，副部长韩念龙、部长助理宦乡和已进驻国际关系研究所的工作组人员发言。会议作了周密准备，糊了十几顶高帽子。除孟用潜外，还将研究所其他领导人和业务骨干 10 多个人拉来陪斗，都戴着高帽子，手拄两根用白纸包的哭丧棒，在台前跪成一排。而孟用潜的高帽子里安有图钉，用手一按就鲜血直流。他们在办公楼楼道里排着队被游斗，经过人群时，人们可以随便打他们和羞辱他们。孟用潜在游斗时走了一半就晕倒了。

第 112 回：从天降，领袖在群众中间　众欢呼，十一中全会闭幕

8 月 10 日，林彪约见部队干部，再次谈到干部问题。他说：

“看干部，首先要看他是拥护毛主席的，还是反对毛主席的；是不是突出政治；革命干劲是不是高。要看到主流和支流。”

“拥护毛主席的，突出政治的，是头号的大好。不然的话，就是头号的大坏。其他都是中好中坏，小好小坏。到底哪一条是第一位，哪一条是第二位，这是两种干部政策。一种是注意小节，不注意大节；一种是也注意小节，主要是注意大节。”

“今后我们的干部政策应该是，谁反对毛主席，就罢谁的官；谁反对突出政治，就罢谁的官。不管他有天大的本事。这是我的话，请你们向军委常委报告，看看有什么意见。这个要到军队中去讲，这是方向性的问题，要把这个精神贯彻下去。”

下午，他又说：“干部有几种。一种干部，他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拥护毛主席，突出政治，有革命干劲，但是小节有毛病，有缺点。一种干部不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反对毛主席，不突出政治，没有革命干劲，但是小节方面没有什么问题。这两种人之中，应用那一种？要提拔第一种人，不用第二种人。对第二种人教育不改的、不可救药的，要罢官，大大的罢官。这样做，就使我们军队有朝气，有强大的战斗力，不能把我们的军队变成庸俗的腐败的军队，不能把

我们的军队变成北洋军阀的军队，当然，第一种人中间小节方面有毛病的，也要批评，要他改变，批评他是为了用他，信任他。”

“要通过这次运动，全面地审查干部，该升级的要升级，该罢官的要罢。我们军队干部如果再出现反对毛主席的，就是最大的耻辱。”

8 月 10 日晚上 19 时 15 分，毛泽东饭后散步，顺着中南海边的马路向南，到了宝光门折向西，来到怀仁堂门前，听见西门外人声鼎沸，便信步走出西门。只见西门外设立的中南海中共中央群众接待站灯火通明，锣鼓喧天，鞭炮声震天动地，一支支群众队伍络绎不绝地来到这里，前来庆贺《十六条》的发表。当满怀激情的群众看见毛泽东神话般出现在眼前时，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片刻后，他们“全身的血液沸腾了，千万双手尽力伸着，希望能碰一碰毛主席那神圣的身躯，更希望能同他握握手”。毛泽东连连说：“同志们好！同志们好！”

按照规定，毛泽东散步，只有 1 名警卫跟随，这时，他身边只有秘书老王和护士长吴旭君，而中南海西门的值班战士也只有 1 个分队，除去哨兵之外，只有 6 名机动人员。

刚刚吃完晚饭的中央警卫团一中队副队长陈长江正在中队处理公务，突然听到中南海西门声浪震天，仿佛爆炸一般……当他得知是毛泽东出了中南海，一下子急了，赶紧集合中队在家的几十名官兵，跟他一起拼命向中南海西门跑去。当他们出了西门，只见整条府右街人山人海。面对如此情景，陈长江的心“腾”的悬了起来，心想：“即使没有坏人，这样拥挤也会成灾，万一把毛主席挤倒了，那我们可成

了千古罪人。”他拼命往人群里挤，战士们跟在他后面，一个紧跟一个，排成人字形墙，像一个箭头插进人群。

他们边挤边解释，不知挤了多长时间，终于到了毛泽东跟前。望着千百只伸向毛泽东的手，陈长江他们劝毛泽东迅速离开。毛泽东不肯，他还要和群众握手交谈。

接待站的人请毛泽东登上接待站讲台，毛泽东被群众簇拥着登了上去，他操着地道的湖南腔大声说：“同志们好！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他的声音带着一种异样的颤音，在空气中颤动着。

后面的群众看见“从天而降”的毛泽东，短暂沉寂后，声雷四起，像潮水般涌动着，根本听不清喊些什么。

毛泽东从讲台的这头走到那头，不停地和挤在前面的人们握手。

四面八方聚集过来的人越来越多，致使府右街的交通完全中断。

陈长江做警卫工作的 10 年中，只要毛泽东到哪里，哪里就会出现欢呼的声浪，可是在家门口出现这样拥挤的场面还是第一次遇到。这时后续部队来了，在警卫部队的护拥下，他们总算保护着毛泽东，将他推进了中南海。

陈长江等人这才松了一口气，不过他害怕毛泽东批评他们。因为毛泽东对警卫制度多有不满，认为照抄苏联，妨碍了他接近群众，曾为此发过火。但这一次，毛泽东看着警卫团的官兵个个像水里捞出来的一样，只是笑着说：“要不是你们来解围，我回来就不容易喽。”

陈长江说：“我们没有一点儿准备，您就出去了……”

毛泽东说:“原想出去看一看就回来，一出门就把我们包围了……想看也没有看上，想回也回不来了。”

这次毛泽东不仅没有批评警卫团的官兵们，还说了肯定、褒扬的话，这可能是从未有过的一次例外。

毛泽东对吴旭君说：“文革中这些群众主要是年轻人、学生，正是杜勒斯们寄托和平演变希望的最年轻的一代。让他们亲身体验斗争的严重性，让他们把自己取得的经验和认识再告诉他们将来的子孙后代，一代一代传下去，也可能使杜勒斯的预言在中国难以实现。”“我考虑发动群众。我把批判的武器交给群众，让群众在运动中受到教育，锻炼他们的本领，让他们知道什么道路可以走，什么道路是不能走的。我想用这个办法试一试。我也准备它失败。现在看来群众是发动起来了，我很高兴，他们是同意我的做法的。”

毛泽东被推进中南海了，但外面的群众依然在激增，他们尾随毛泽东身后，朝中南海方向涌着。

后来，人群渐渐散去，仅地上的鞋和包，就收了好几筐。有几个人被挤伤，送到了医院。

8 月 11 日，《人民日报》以套红标题和激动人心的语言，报道了毛泽东昨天的即兴接见。当时的《人民日报》刊登的《毛主席会见革命群众》一文中，有这样的描写：

“许多和毛主席握过手的人，他们逢人就说：‘你们赶快来和我握手啊！我的手刚和毛主席握过的！’还有一些人随后赶来，他们说，能够走到毛主席刚刚同革命群众见面的地方，也是莫大的幸福啊！”

8 月 11 日，叶群找来总参作战部副部长雷英夫，对他说：“1965 年 12 月上海会议时，我向少奇汇报罗瑞卿的问题。把你的材料给刘少奇看，我刚说了一半，他就不听了，并说：‘雷英夫有些能力，但意识不好，他的材料不能相信。’林总说，这实际上是说你。你应该积极地起来揭发刘少奇的问题。”叶群拿了一份材料让雷英夫誊抄。这份材料，雷英夫抄了 2 页，林办的秘书抄了 7 页。叶群让雷英夫在抄好的材料上签了字。

8月12日下午，林彪主持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全体会议，有4项内容：一是通过候补中央委员递补为中央委员的名单；二是通过撤销和补选中央书记处书记的决定；三是选举；四是通过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

林彪宣布进行第一项，并说明：八届中央委员 97 人，八大闭幕后到 1958 年 5 月五中全会期间，黄敬、赖若愚病故，五中全会通过由候补中央委员杨献珍、王恩茂依次递补。五中全会到十一中全会期间，林伯渠、陈赓、李克农、罗荣桓、柯庆施、刘亚楼先后病故，缺额应由下列候补中央委员依次递补：杨得志、韦国清、罗贵波、张经武、谢觉哉、叶飞。全场中央委员举手通过。

大会进行第二项，通过《关于撤销和补选书记处书记的决定》：

（一）十一中全会批准 1966 年 5 月 23 日政治局扩大会议关于停止彭真、陆定一、罗瑞卿的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职务，停止杨尚昆的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的职务的决定。

（二）从已揭发的大量事实证明，彭真、陆定一、罗瑞卿、杨尚

昆的错误性质是极端严重的，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因此，全会决定撤销彭真、陆定一、罗瑞卿的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职务，撤销杨尚昆的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的职务。

（三）批准1966年5月23日政治局扩大会议关于调陶铸担任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调叶剑英担任书记处书记的决定。

全场举手通过。

大会进行第三项，补选中央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选举了政治局的常务委员会，补选书记处书记。总监票人李富春，监票人钱瑛、许光达、伍修权、陈郁。选举结果如下：

（一）补选中央政治局委员6人:

陶铸、陈伯达、康生、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

（二）补选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3人:

李雪峰、宋任穷、谢富治

（三）选举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11人:

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陶铸、陈伯达、邓小平、康生、刘少奇、朱德、李富春、陈云

（四）补选中央书记处书记2人:

谢富治、刘宁一

周恩来在会上就组织人事变动等事发表了讲话。

选举的得票情况：得全票的有4人：毛泽东、林彪、邓小平、康生。只少一票的有周恩来、陶铸、陈伯达3人，有可能是他们没有投自己的票。其他4人得票超过半数。

刘少奇在选举后当即表示："主席不在北京时，中央在文化大革命中所犯的路线错误，主要由我负责；我说过的话，做过的事，我都负责，决不推脱；其他同志所犯错误，我也有责任；我当遵守党起码的纪律，不搞两面派，不搞地下活动，有意见摆到桌面上来。"

刘少奇发言后，林彪立即说"好"，站起来主动同刘少奇握手。

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名单排列十分出人意料：一是刘少奇由原来的第二位降到第八位；二是林彪由原来的第六位上升到第二位，排在周恩来前面；三是陶铸由一名中央委员突然上升到政治局常委的第四位，排在陈伯达、邓小平、康生、朱德、李富春、陈云的前面。为什么这样超越提升？代表们见到陶铸便向他打听情况。陶铸说："我也不清楚，看到名单时我也很突然，立刻报告毛主席，请求把自己的名次向后移。毛主席答复说，名单已定，不更动了。"

常委的排列顺序，原先陶铸排在较后面，毛泽东亲自用红笔把陶铸勾到周恩来之后、陈伯达前面，陶铸刚从下边来到中央，觉得不好，就找到毛泽东说："我是新来的，排太前不好，我认为应把我放到富春同志后面，把陈伯达调到第四位来。伯达同志长期在你身边工作，对主席思想领会比我快。"

毛泽东说："已经定了，不变了，伯达那里我找他谈谈。"

陶铸、陈伯达、邓小平、康生在名单中分别排在党的副主席刘少奇、朱德、陈云的前面，而总书记邓小平却排在书记处常务书记陶铸的后面，从常理上讲，似乎说不过去。但是，对于已经大会确认是犯了错误的刘少奇和邓小平来说，职务上没有变动，只在排列上有所变

化，而且邓小平还从原来的第七位变成了第六位，应该说也算是可以了。选举结束后，林彪在会上说明："今天选举不对外公布，不上报纸。"

大会进行的第四项：通过公报。康生在大会上宣读了公报，并且作了说明。林彪在会上宣布："列席的都有表决权。"场上全体举手，一致通过了会议公报。

公报指出："当前正处在世界革命的一个新时代"，世界形势的总趋势是"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

公报还说：毛泽东关于文化大革命的一系列指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个重大发展"，"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林彪同志号召人民解放军在全军开展学习毛泽东同志著作的群众运动，为全党全国树立了光辉的榜样。"公报号召全党和全国人民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公报中特地写进了歌颂林彪的话："全会认为，林彪同志号召人民解放军在全军展开学习毛泽东同志著作的群众运动，为全党全国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公报经过毛泽东亲自审改。他在康生 8 月 5 日送审的公报稿上删去了一句话："全会热烈拥护刘少奇同志代表我国发表的声明"。

8月12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闭幕。毛泽东在闭幕会上讲话。他说：

"关于第九次大会的问题，恐怕要准备一下。第九次大会什么时

候召集的问题，要准备一下。已经多年了，八大二次会议到后年就十年了。现在要开九次大会大概是在明年一个适当的时候再开，现在要准备，建议委托中央政治局同它的常委会来筹备这件事，好不好？

至于这次全会所决定的问题，究竟是正确的还是不正确的，要看以后的实践。我们所决定的那些东西，看来群众是欢迎的。比如中央主要的一个决定就是关于文化大革命，广大的学生和革命教师是支持我们的，而过去那些方针，广大的革命学生跟革命教师是抵抗的，我们是根据这些抵抗来制定这个决定的。但是，究竟这个决定能不能实行，还是要靠我们在座的与不在座的各级领导去做。比如讲依靠群众吧，群众路线，还是有两种可能性：一种是依靠，一种是不依靠；一种是实行群众路线，一种是不实行群众路线。绝不要以为，决定上写了，所有的党委，所有的同志就都会实行，总有一小部分人不愿意实行。可能比过去好一些，因为过去没有这样公开的决定，并且这次有组织的保证。这回组织有些改变，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候补委员、书记处书记、常委的调整，就保证了中央这个决议以及公报的实行。

对犯错误的同志总是要给他出路，要准许改正错误。不要认为别人犯了错误，就不许他改正错误。我们的政策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一看二帮，团结——批评——团结。我们这个党不是党外无党，我看是党外有党，党内也有派，从来都是如此，这是正常现象。我们过去批评国民党，国民党说党外无党，党内无派，有人就说，‘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我们共产党也是这样，你说党内无派？它就是有，比如说对群众运动就有两派，不过是占多占少的问

题。如果不开这次全会，再搞几个月，我看事情就要坏得多。所以，我看这次会是开得好的，是有结果的。”

接着，林彪在中国共产党八届十一中全会闭幕式上讲话:

“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十一次全体会议已经胜利地结束了。这一次会议，从头到尾，都是主席亲自领导的。

今天，主席又在会议上同我们作了极为宝贵的指示。这次会议解决了重大的问题。在这次规模伟大的文化革命进行的过程中间，发生了严重的路线错误，几乎扼杀这一个革命，使之停顿下来，中断下来，倒退下来。在这种危险的时候，主席出来扭转了这种局势，使这次文化革命能够重整旗鼓，继续进攻，打垮一切牛鬼蛇神，破‘四旧’、立‘四新’，使我们社会主义的建设除了物质的发展以外，精神上、思想上得到健康的发展。今天又把组织机构解决了，保证了我们今后的工作能够更加落实。

现在如果是没有别的问题，就宣布散会。”

## 第 113 回：抓贯彻，林彪主持工作会　雷英夫，材料揭发刘少奇

八届十一中全会结束后，军队的干部纷纷去人大会堂林彪住处看望，实际上是祝贺他成为毛泽东的接班人。林彪对他们说："我是不想干的。既然全党委托，主席又一定让我来，硬是推，不会有好的效果。实在没有办法，只好试试了。"

全会结束时，姚文元看到全会的"不编号文件目录"中列有清华附中、人大附中、北航附中红卫兵的《红卫兵紧急呼吁书》，就告诉了江青。江青在文革小组开会时问："是谁把《呼吁书》发到全会上去的？"穆欣赶紧将他当时把《呼吁书》发到全会时的情况做了说明。江青听了大发雷霆，让穆欣到自己住的房间将毛泽东、周恩来及江青本人圈阅同意印发《呼吁书》批示的原件拿来。穆欣拿来批件，当众交给江青。谁知江青打开看了一眼，竟划了根火柴把那份批件点燃，然后向大伙说："烧啦！"

批件顷刻间化为灰烬。

随后江青对穆欣一顿斥责。散会后，康生也对穆欣说："你怎么敢向全会批发文件。我虽然是政治局常委，也不敢干这样的事。"

八届十一中全会结束后，中央军委随即举行了常委扩大会，由叶剑英传达了会议的精神。会议期间，肖华、刘志坚以全军文革的名义请中央文革的康生、江青、张春桥到会讲话。

8 月 13 日，林彪主持召开中央工作会议，研究贯彻八届十一中全会等问题。他说："前天晚上我同主席谈军队的文化革命问题，主席叫我向大家讲一讲，供地方工作参考。"

他强调："现在军队里师以下的单位，只搞正面教育。""军级以上机关，则发动群众搞大民主，大字报，大鸣大放，大辩论，大搞文化革命，大体上准备搞 3 个月。同时，在运动中解决机关的精简问题。过去我们提倡四轻四重，主要的是机关轻，连队重。但是，机关还是很大。主席说，地方上也要注意这件事。"

对正在开展的文化大革命，林彪是这样解释的：

"文化大革命，实际上是思想革命，就是大破一切旧思想，树立毛泽东思想。用毛泽东思想武装人的头脑，实现人的思想革命化，带动业务，带动经济建设，带动各项工作。"

他提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党，必须认真搞无产阶级文化革命。苏联没有搞，所以革命失败了。我们就要搞。要大搞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用无产阶级思想代替孔孟之道，代替资产阶级思想，代替一切旧思想。只有这样，才能防止反革命复辟，防止反革命颠覆。这方面的工作一削弱，资产阶级复辟和颠覆的可能性就要增加。"

"我们许多同志，容易埋头于粮、棉、油，还有钢铁、煤炭的指标，而忽视政治思想。其实粮、棉、油、钢铁、煤炭，怎么才能上去呢？只有把人的思想面貌改变过来。每行每业，如果都由我们想办法，不行，我们没有那么多办法。我们应该抓政治思想革命，从思想解决问题。把群众从思想上武装起来，动员起来，群众起来了，就会有办法了。亿万人思想革命化了，一切办法都会有了。这是我们党领导我们国家由弱到强，由落后到先进的根本办法。"

他说："这次文化大革命触及每个人的灵魂，党政军、工农商学

兵，三里五界都是我们斗争的领域，《十六条》是我们具体的行动纲领。不要重复压制群众、围剿左派的错误。要敢字当头，放手发动群众，坚定地依靠无产阶级革命派，集中力量，打击一小撮最反动的资产阶级右派，冲破一切阻力，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不要走过场，干脆大闹几个月，弄得人们睡不着觉。这一次一定要大搞，这是破旧立新的重大的战略措施。”

他又提到了军队的干部问题。他说：“这个问题我有些想法，报告过主席，主席也同意，叫我来向大家讲讲。

对待毛泽东思想有两种人。

一种人拼命学毛泽东思想。有的人学得好，挨打击。因为那时候管思想的最高机关中宣部，陆定一那一帮人，上边还有根子，反对学毛泽东思想，他们污蔑学毛著像吃宣威火腿，天天吃就腻了。污蔑立竿见影，说没有太阳，就见不到影子。甚至恶毒攻击，胡说什么现在学毛著好的人将来打起仗来，都是汉奸叛徒。这些黑帮对毛泽东思想充满了敌视、仇恨。

一种人不学毛泽东思想，处于落后或中间状态。

对待政治思想工作，也有两种人。

一种人重视政治思想工作。

一种人不重视政治思想工作，甚至捣乱。

我们的干部在对待工作问题上，也有两种人。

一种人有干劲，工作有成绩，但是性情急躁，得罪人不少，运动中大字报最多，过不了关，大家群起而攻之，要求罢他的官。

一种是老好人，什么事情也不做，什么斗争也不参加，谁也不得罪，人事关系搞得好好的，选举的时候能够得全票，运动中贴他的大字报也很少。

所以我们对干部，要来个全面考察，全面排队，全面调整。我们根据主席讲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五条原则，提出了三条办法，主席同意了。

第一条，高举不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反对毛泽东思想的，罢官。

第二条，搞不搞政治思想工作。同政治思想工作捣乱的，同文化大革命捣乱的，罢官。

第三条，有没有革命干劲。完全没有干劲的，罢官。”

他再次强调：“这次要罢一批人的官，升一批人的官，保一批人的官。组织上要有个全面的调整。那些犯错误甚至犯了严重错误的人，只要他们接受教育，坚决悔改，还可以在今后工作中继续考验他们。至于那些不可救药的，就坚决罢官。不这样，就打不破死气沉沉的局面，一旦有事要搞颠覆活动的就是他们。政权是革命的根本问题，组织问题就是政权问题。”

对他这次位置的调整，林彪还说：“我最近心情很沉重，我的工作和我的能力是不相称的，是不称职的。我意料是要出错误的，但是要力求减少错误，依靠主席，依靠常委同志，全体同志，文化革命小组的同志，以主席为轴心，我们做磨盘，一切按主席指示办事，不能有另外做法，不能有两个方针，两个司令部，不能以想当然代替主席的想法，不能唱对台戏，要一元化，紧跟主席。主席处理问题，有全

盘考虑，高瞻远瞩，还有他的想法，有很多想法我们是不了解的。我们对主席的指示要坚决执行，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我没有别的本事，就是依靠主席的指示。我没有别的本事，就是依靠群众的智慧。就是依靠领袖和依靠群众。要相信主席的天才，相信主席的英明，相信主席的智慧。一切请示主席，一切照主席指示办事。大事不干扰，小事不麻烦。我们就是这样去做，有时也免不了要犯错误，跟不上主席思想。怎么办？办法是朝令夕改，不坚持错误，随时修正错误。主席是世界的天才，我们同他比较差别很大，错了赶快改。中央给我的工作，我自知水平、能力不够。恳辞再三，但是，现在主席和中央既已决定了，我只好服从主席和党的决定，试一试，努力做好。我还随时准备交班给更合适的同志。”

海军党委扩大会议自从由批罗瑞卿变成批李作鹏、王宏坤、张秀川的“地下活动”、“黄袍加身”后，王宏坤、张秀川多次检查不能过关，病倒住院。在庐山疗养的李作鹏对会议转向批判“李、王、张”想不通。他原计划在身体稍康复后，到井冈山看看，并顺路回吉安老家看一下。再三考虑觉得时机不宜，因此到井冈山参观时，只在吉安老家停了三天，与家中兄弟小聚一番后，就回到了庐山。此时，海军会议简报已停送了一段时间，他对会议进展情况不甚了解。究竟发生了什么情况？该怎么办？心中无数。他知道林彪正在大连休养，因此想转到大连去请示林彪。于是便于 7 月底下山，经上海，8 月初到达青岛，一打听，林彪回北京参加中央八届十一中全会，已不在大连。

8 月 13 日这天，林彪在人民大会堂与军委领导商谈海军工作，

提到李作鹏、王宏坤和张秀川 3 人，他说：“李、王、张是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的，突出政治的，反对罗瑞卿有功的。”

8 月 13 日下午 17 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中共中央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举国欢腾。

8月13日，林彪在人民大会堂看了雷英夫写的揭批刘少奇的材料。

雷英夫写的“有关少奇同志的材料”。全文如下：

一、建国以来，特别是最近几年，从不宣传学习毛主席著作，也不传达执行主席的指示。例如少奇同志 1964 年 9 月给江渭清同志的信，就是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宣传毛主席指示的集中表现。他借口是江犯了教条主义的错误，没有蹲点，不了解情况，手里没有真理，实际上是说王光美桃园大队的经验是真理。而毛泽东思想的第一个十条却不是真理。因此，大家应该学习王光美的经验。不应该学习毛主席的指示，这是何等恶毒的作法。

二、自以为可以和主席“平起平坐”，可以当最高领袖。这里我印象最深的有四件事:

1、1964 年 12 月，罗瑞卿想在人代会上讲“以毛泽东同志、刘少奇同志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事前，彭真亲自定了调子。

2、1965 年 9 月，朱德同志在会议上提出，将来打起仗来，“最高统帅是刘少奇同志”，根本不提毛主席。少奇同志和朱坐在一起，不加反驳，还很得意，看来很听得进去，使人吃惊。

3、近多年来，每逢十一、五一等节日，报纸上都是刊登毛主席、少奇同志两张一样大小的照片，从未见少奇同志有谦虚的表示。

4、九评中提出，“以毛泽东同志，刘少奇同志为代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此事由来如何？不清楚。

三、少奇同志除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路线错误外，在历史上也犯过很多方向性的严重错误，他虽然背着“一贯正确”的包袱，但并不是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并不懂毛泽东思想。例如:

1、一九四六年所提出的“和平民主新阶段”完全是右倾机会主义的观点和政策，使一些地区和部门的工作受到了损失。

2、一九四七年在西柏坡土改时提出，“家家冒烟，村村点火”。使土改发生了大偏差。

3、1950 年在天津蹲点时，提出了资本家可以管理企业的政策，有严重错误。听说当时就是在王光美的哥哥在天津所开工厂蹲点得出的结论。

4、1956 年八大时，修改党章的报告中，把“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党的指导思想”去掉了，少奇同志说七大时有必要，现在可以不说了。

5、1962 年赞成陈云等同志的右倾意见。

6、1964 年农村社教中搞了桃园大队那一套完全不相信群众和广大干部的政策。这是资产阶级神秘主义和《福尔摩斯》侦探小说中的一套做法。少奇同志负责搞的后“十条”也是形“左”而实右的。

7、1964 年 2 月 12 日，少奇同志和越南黎笋的谈话，是和主席的谈话精神完全相反的，这是典型的大国沙文主义。

主席多年来一再说，越南人在南方打的很好，对游击战、人民战争有发展；少奇同志却说越南人民军没有学会打歼灭战，不会打仗。

主席历来说，我们要向越南同志学习，并说他要到越南南方去；少奇同志却说，越南同志要先承认自己不会打歼灭战，然后才肯学习，或者，越南派旅以上干部到中国来学习，或者中国派韦国清同志到越南去教。

主席历来说，要防止大国沙文主义，不要盛气凌人，干涉别人内政，越南的事归胡志明负责，我们做后方和支援；少奇同志却以老子训儿子的方法和人家谈话，并干涉人家内政，说什么你们两次歼灭战，都是陈赓和韦国清代替你们指挥的，这引起武元甲的不高兴，我这些话只能告诉胡志明、范文同同志，其他人不能讲等等。

主席从来不愿多讲自己，一谈到自己总是很谦虚。少奇同志却相反，他说“从1949年我就过问越南问题，陈赓、罗贵波、韦国清、乔晓光等，都是我派到越南去的。”

8、1966年2月，少奇同志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可以考虑派代表团到苏联参加二十三大，这样的好处是可以了解情况。（这个会上总理等多数人，是主张不派代表团的）

四、少奇同志的组织路线方面也有很多错误。

1、不传达不执行主席的指示；（如文化大革命）

2、对主席不请示不报告，搞独立王国；

3、安插私人，有宗派圈子；

4、包庇坏人（如彭真包庇罗瑞卿，对小型会所定的清规戒律，都请示过少奇同志），彭真在刘的支持下，非常狂妄，例如在65年彭

德怀调离北京时去西南前，竟对彭德怀说："如林彪同志身体不好，你还是国防部长。"

5、打击镇压革命左派，实行白色恐怖;（文化大革命就是典型例子）

五、思想作风

1、唯我独尊，一言堂，但又拿不出什么办法;

2、经常拿帽子、棍子压人、打人，很多人说他是阎王;

3、吹捧老婆，达到非常庸俗、低级的地步。如王光美在桃园大队蹲点后，少奇带着她到全国各地去作报告，要中央批发了她的报告，并加上很多按语，说她的经验"带有普遍意义"。要全国县以上各级常委和所有社会主义教育工作队的队员阅读。

少奇同志给江渭清的信中又提出要"学习王光美同志的报告"，因为她手里有"真理"。王光美作报告时，少奇同志也当众大肆吹捧，很多话说的肉麻。

4、少奇同志的岳母是资本家老婆，常住在少奇同志家里，享受常委的待遇，少奇外出时，也带到各地游山玩水。这是丧失立场的事，影响很坏。

六、攻击养病的老同志。

1963年5月底，少奇同志在昆明说："不做工作比什么错误都大。"又说，"这些人已经不是无产阶级了，现在他们已经有产了，有产不只是有钱，老资格、名义、地位、功劳、文章写得好都可以成为资本"等等。这些话中有无影射攻击林彪同志之意，值得怀疑。

同日，曹轶欧向中央写信，揭发王光美的问题，并指出刘少奇包庇王光美。这封揭发信在部分中央领导人中间作了传阅，最后也报到了林彪手里。

8 月 14 日，林彪在他的住处召见雷英夫，对他说：要用给林彪和毛泽东主席写信的形式，附上揭发材料，然后再由林彪批转毛泽东主席，“这样更政治化些”。雷英夫立即按照林彪的指示写好了信。当天，林彪就把雷英夫写的信和揭发刘少奇的材料批给江青，请她“酌转”毛泽东主席。

8 月 14 日，周恩来在接见即将离任的波兰驻华大使克诺泰时，对克诺泰提出的有关“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问题，回答说：“这次文化大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发展的自然结果，把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破除掉，改革掉，建立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这是个长期的工作。”

第 114 回：十万众，会场上公开打人

哈军工，两种观点大辩论

8 月 2 日，清华附中、四十七中的红卫兵到西城区三十中串连，在操场上开会。会议开始后，发生了争抢话筒的现象。后来，谁要拿话筒，必须先报自己的出身。最后，又发展到出身好的同学彼此争吵，看谁的出身更好：工农子弟说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干部子弟认为他们的父辈抛头颅、洒热血，对革命有贡献，更为优越。这时，高一学生唐畏上了台，他对这种报出身的做法提出了不同的意见，不少人认为他的发言有胆量，有水平。但他的父亲是历史反革命，已经死了，于是，一些红卫兵将他作为“现行反革命”拉到学校后院批斗、殴打，还把他当老师的母亲也揪来了。唐畏有个姓袁的朋友，找了几个人，当晚把北京四十七中红卫兵组织“红红红”的学生堵在三十中旁边的小窄胡同兵部洼，并用小刀捅了其中一名红卫兵。事情很快反映到北京市委，市委领导将此事定性为“狗崽子刺伤红卫兵”，是严重的“阶级报复”。经中共北京市委同意，8 月 13 日晚，北京中学红卫兵在工人体育场召开十万人大会，斗争 8 月 2 日用刀刺伤四十七中红卫兵学生的 5 个“小流氓”。警察参加了大会。

在这次会议的筹备过程中，北大附中及西城区几个中学坚持要把大会的主题定为斗争小流氓，反对涉及工作组和团中央的问题。清华附中“红卫兵”、四十七中“红红红”组织和师大女附中“红旗”则主张大会应当避免庸俗化，突出政治，以控诉工作组和团中央的问题为主题。两派发生了激烈的争吵。最后不得不投票表决，主张理性的

清华附中面对城里整齐划一的“红卫兵”肯定是微弱的少数，明显处于劣势。后来还是由负责北京学校文革的王任重出来打圆场，说可以斗小流氓，关于工作组和团中央的问题就不要发言了，由李富春代表党中央宣布胡耀邦为首的团中央书记“三胡一王”停职反省。于是，唐畏等 5 个“小流氓”就在多位中央大员的莅临下，被警察押到有 10 万人出席的体育场草坪上，接受辱骂和拳打脚踢。唐畏最后还被判了刑。

在 8 月 13 日的大会上，清华附中的红卫兵坚持自己的意见，反对打人。他们在会上再次散发了《呼吁书》。参加大会的北京四中学生负责人孔丹列席了中央八届十一中全会，他和四中的学生在大会上明确反对清华附中的《呼吁书》，并散发了批判《呼吁书》的文章《你们的屁股坐到哪里去了》。

李富春在会上代表中央宣布了团中央书记“三胡一王”停职反省。当晚，北京的一些红卫兵涌入团中央办公大楼，。21 时多，天下着大雨，胡耀邦家响起一阵强过一阵的砸门声。打开门，一群红卫兵湿漉漉地冲进来，把胡耀邦和住在后院的胡克实及团中央其他几位书记，都揪到团中央机关，接受批斗。当参加体育场 10 万人大会的胡耀邦儿子、目瞪口呆的胡德华在散会后，拼命骑车赶回家时，他父亲已被团中央的红卫兵押走，他一夜之间从红五类变成了“黑帮子弟”。

8 月 15 日上午，团中央召集全体机关干部在北京前门东大街，共青团中央机关内的大礼堂开大会，宣布：党中央决定胡耀邦、胡克实、

胡启立、王伟停职反省，另行成立团中央临时书记处。后来这 4 人被简称为“三胡一王”。

1966 年 9 月前后，北京石油学院等高校学生在北京前门东大街，共青团中央机关礼堂前，批斗共青团中央领导——胡耀邦、胡克实、胡启立、王伟。墙上贴满了揭发他们罪行的大字报。

此时，各地的文化大革命也在进行着。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和全国院校一样，也已停课。对于文革究竟要不要党委的领导？两种不同观点的师生，在教室、宿舍、马路上展开了激烈的辩论。

8 月 3 日晨，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的大路、小路上，人们正急匆匆地奔向学院俱乐部。今天，这里将召开全院的大辩论会，海报已在昨晚就贴遍全院各个角落，发起者是计算机系 62 级的部分学员。此时，虽然很多干部心里不服气，可两条腿还是听从海报的召唤，奔向那里。

俱乐部早已挤得满满的，连个插针的地方都找不到。高音喇叭一

直接到俱乐部外的广场，会场外也都是热烈激动的人们，整个军工大院都在沸腾。

俱乐部礼堂的舞台两侧挂着大红标语：“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横幅是“誓将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辩论大会的主题是“文革和各级党组织的关系”，主持人安排不同观点的人交叉发言，以保持大辩论的公平性。针对“什么是党的领导”，“如何看待群众的革命行动”，“什么是运动的大方向等问题”，两派唇枪舌剑，针锋相对。

“党的领导就是党中央毛主席的领导，就是毛泽东思想的领导，如果各级党组织贯彻毛泽东思想，我们就拥护，否则就坚决抵制！”批判院党委的一派如是说，他们常把毛主席《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作为理论根据：“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

对立的一派反唇相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各级党组织，难道是大革命初期的土豪劣绅吗？”

俱乐部大门口贴满了各种“北京来电”，介绍北京高校运动动态和“中央文革”大员们的讲话，围观的人挤作一团，人们小声啧啧：“高干子弟的消息就是灵通。”

组织者为辩论大会的成功而激动万分，批判院党委的一派迅速聚合，6 个系推出自己的代表人物，他们以当仁不让的姿态和胸有成竹的自信，发表着滔滔雄论。

此时，辩论大会的主题已改为“从前段运动看院党委能否领导文

化大革命”。

8 月 4 日，辩论大会继续进行，气氛也更为激烈，围绕着运动以来院党委是不是“绊脚石”，双方各执一词。

谁也没想到，下午省委书记李力安来到会场，当众宣布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院长刘居英停职反省，这无疑给熊熊火焰撒了一把盐，两派群众的情绪形同冰火。

第三天的辩论大会已呈一边倒之势，俱乐部舞台上方，换上了斗大的四个大字：“造反有理”。不知是什么神奇的力量促使持造反观点的学员们迅速形成大联合，并自称“造反派”，他们送给对立面的雅号是“保皇派”。对立面也不含糊：“对党中央、毛主席，我们就是要保，保定了！”

大会主持人是原子工程系 61 级一名姓杜的女学员，手里拿着一张纸条，沉着地扫视着黑压压的人群，朗声念道：“我向大家读一条毛主席的最高指示：‘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根据这个道理，于是就反抗，就斗争，就干社会主义。’”

大礼堂里一下安静下来，静默了几秒钟，突然响起一阵掌声。也有很多人不鼓掌，他们疑疑惑惑地张望着：”这是毛主席说的吗？‘造反有理’是什么意思？”

又上来几个学员，宣读北京来信和清华附中三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此时，俱乐部辩论大会如同一个传播新思想的布道大会,“先知先觉”们在台上大讲“革命就是造反”,“毛泽东

思想的灵魂就是造反”的新概念。“后知后觉”们瞪大了双眼，贪婪地吸收精神上的营养，暗暗埋怨自己缺乏“敢想、敢说、敢闯、敢革命”的精神。俱乐部辩论大会也如同一个洗脑大会，听会的老干部、老教员们面色严肃，惊讶万分地看着那些原以为天真幼稚的学生竟在一夜之间成长为雄才大略的政治家和知识渊博的理论家。

“造反派”的势头气冲牛斗，发言者大多是造反观点，对立面提出抗议，认为组织者偏心眼儿。学院四海厂的工人上台讲话，有两个学员上来抢话筒，电子工程系讲师孙仲康看不下去，张开大嘴，怒吼道：“让工人同志讲话！”会场一阵骚动，孙仲康愤然退出，扬长而去，一些对会议不满的学员也跟着纷纷离开，表示抗议，“造反派”以一片嘲笑声相送。

学员因观点分歧而日夜争论不休，两派都在聚集力量，阵线也越来越分明。哈军工的火爆形势迅速影响到全哈尔滨市，各大专院校和中学的学生代表朝圣般涌进哈军工，期盼获得那撩拨人心的“文革”启蒙教育。

8 月 6 日清晨，哈军工师生发现文庙东墙外的小树林里搭起一个露天讲台，上方拉起红布横幅，这分明是另起炉灶，和俱乐部唱对台戏，人们马上就叫它“小树林辩论会”。

看过海报的人们纷纷来到小树林，席地而坐，顶着烈日，耐心等待这个别开生面的辩论会，毕竟有相当多的人不赞成造反派的观点。

组织者一番忙碌过后，终于宣布开会，主持人是空军工程系女学员严延英，她高声说：“请第一个发言者，林晓霖同志上台！”

小树林里一下子安静下来，人们的目光一齐聚焦在一位身材不高，清瘦文弱的女学员身上，只见她从容地登上讲台，展开厚厚一叠讲稿。

天哪，她就是林彪的女儿！不少哈军工人都知道她，她的讲话必定非比寻常，她的观点是什么？小树林里的人们屏息静气，侧耳倾听。

林晓霖吐词清晰，声音响亮，她从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谈起，讲到当前的运动，她说："我们和造反派的根本分歧是要不要党的领导，如果各级党委都是'黑帮、黑线'，党中央不就架空了！？"小树林里响起长时间的热烈掌声。

林晓霖大声问道："现在造反有理成了最响亮的政治口号，请问，在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你造谁的反？造反有理是有阶级性的，我们千万不能上当！"

林晓霖的讲话赢得阵阵喝彩，不少人往上递纸条，上面写着"讲得好！""说出我们的心里话！"林晓霖演讲完，严延英收到 40 多张表态支持的条子。

"怎么办？很多人要你的讲稿啊！"严延英给林晓霖倒杯凉开水，"我看马上组织人抄写吧。"

林晓霖擦擦额头的汗水，浓眉一扬说："好啊，我把讲稿给你。"一群学员分头抄写这份讲稿，中午时分，已手抄了七八份。

林晓霖在小树林辩论会上的发言《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迅速流向社会，传遍全国。

由林晓霖打头阵的小树林辩论会开得红红火火，哈尔滨市机关和

学校的取经者不绝于道。俱乐部里的造反派领袖们紧急开会，商量对策。

此时的哈军工俱乐部早已是造反派一统天下，众多高干子弟纷纷登台，传达来自北京的振奋人心的好消息：

中央召开八届十一中全会，高校造反派师生列席；

毛主席给清华附中红卫兵写了一封信，支持他们的造反行动；

中央文革首长的讲话；

……

大礼堂里掌声连天，激动万分的学员们涌上讲台抢话筒，争着说几句：

“我们也要成立红卫兵！”

“我们要当毛主席的红卫兵！”

大会的组织者早有准备，造反派在院办大楼 4 楼已经开了几个晚上的联络会议，各个系推举出自己的代表，那个时候，被推出的学生领袖必须是品学兼优、有群众威信的好学生，德才资格不够的人是要被大家哄下台的。经过反复协商，决定成立“军工红色造反团”，同时成立红卫兵组织。当核心组宣布这一决定时，会场里掌声雷动，欢呼雀跃，革命气氛达到高潮。一位女学员登台，朗诵毛泽东青年时代的豪言壮语：“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

“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神圣的使命感烧得造反派学员们面红耳赤，热血沸腾：“跟着毛主席闹革命啊，上刀山，下火海，去打出

一个红彤彤的新世界！”

又有一条“北京消息”让会场气氛再起高潮，北京高校正在争论由北航附中红卫兵贴出的一副对联，就是著名的“鬼见愁”。

会场里人声嘈杂，造反派们的意见也不一致，几个高干子弟登台发表意见，他们引经据典，认为这个对联有鲜明的阶级性，符合“文革”的大方向，现在就是要重新组织阶级队伍，红卫兵就是要以革干、革军、革烈和工农子弟这个“红五类”作为骨干力量，在革命的领导权问题上，没有什么好客气的。

有个年轻的教员上台发言，认为那个对联不符合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是宣扬“血统论”，他还没有讲完，就被哄下台，有人大声吼道：“你是什么出身？”

8 月 6 日这天，哈军工的造反派学生到哈尔滨师范学院鼓动造反。他们一色的黄军装或蓝军装，斜背着黄书包或蓝书包，排着队伍，迈着整齐的步伐，雄赳赳，气昂昂，高举“造反有理”的大旗，一路还唱着造反歌：《鬼见愁》：

老子革命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

要是革命你就站过来，要是不革命就滚他妈的蛋！

（口号）要是不革命，就罢他娘的官，就滚他妈的蛋……

他们一路高呼：“钢气节，英雄胆；洒热血，捍江山。”高喊“革命无罪，造反有理”。高唱“老子革命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要是不革命，就罢他妈的官，就滚他妈的蛋”。这些话，壮怀激烈，豪气冲天，可又多少带着粗俗，或有一些流氓的习气，太过绝对。

另外，他们一边走一边跳，一边喊一边唱，既不是文艺表演，又不是文明讲演，更使人感到见所未见、闻所未闻，一时难以接受。

他们来到哈尔滨师范学院，在院子里召开“造反有理点火大会”，并在会上喊：“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到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他们在讲台上宣布要造院党委的反，要造省委的反。

在中国共产党控制了 15 年的高等师范学府，这些文质彬彬的老师和学生哪见过这样的世面。那些有这样那样政治历史问题或家庭出身不好的人，或在整风、反右派运动中受过伤的人，更是躲得远远的，生怕遭了连带，抖落不清。但是他们也有一种新鲜感、庆幸感，趴在门缝里观察，或暗自打听，这突如其来的巨变，到底是怎么回事？

哈军工到哈师院煽风点火的行动，遭到了哈师院党委领导下的有组织的大规模围攻。围攻的人们根本反对“造反有理”这句话，他们说：“造反有理是反动口号”，“单提这四个字没有阶级性”，“这是毛主席在白色恐怖时期提出来的，现在过时了”，“这是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你们造谁的反？”有的人甚至还在“造反有理”的横幅旁边贴上了“人民江山坐得牢，反动派想反也反不了”的白纸字条。人们采取了各种手段，毁他们的旗，分割他们的队伍，实行分片包围，一个个堡垒清剿式的围攻。指着他们的鼻子说：从哪里进来，还从哪里滚出去！

他们大讲三段论：

造共产党的反就是反革命（大前题）

共产党的地方党委是共产党的一部分（小前题）

所以，造共产党省委、学校党委的反就是反革命（结论）

虽然，哈师院的学生开始还难以接受哈军工的观点，只是在一旁观看，觉得他们多少有点粗俗、偏激、过火。但是，哈军工学生的造反豪气和勇气却深深地鼓舞了哈师院范正美等一些因反对工作组和省委做法而受到打击的学生。他们从哈军工学生过激的言论和思想锋芒中，感到他们击中了问题的要害。他们第一次觉得，哈军工的学生是路遇不平、拔刀相助的英雄好汉，是天不怕、地不怕的革命闯将！他们有一种自己在危难之中遇到了救援、被压抑之际替我呼喊、饥渴之时送来甘汁美食的感觉，心里说不出的淋漓痛快！

河出潼关，因有太华抵抗，而水力益增其奔猛；风回三峡，因有巫山为隔，而风力益增其怒号。对于受压迫的人说来，无论发生在什么地方，一旦觉醒之后，要反抗，要自由，要解放的冲劲，是谁也阻挡不住的。压迫愈深，反抗愈烈，蓄之既久，其发必速。这是中外历史反复证明的一条真理。范正美他们知道，与其坐以待毙，不如战斗而生。

8 月 8 日晚，党中央的《十六条》公布，哈军工小树林辩论会的组织者见好就收，在结束辩论会时宣布成立“军工八八红旗战斗团”，领袖人物是海军工程系的毕业留校学员、一位颇有才华和群众威信的工人子弟司锡才。

8 月 9 日上午，“八八团”的战士们高呼着“学习十六条，贯彻十六条，运用十六条”在院内游行，看不到头尾的队伍浩浩荡荡，声势之大，让“造反团”的战士们吃惊不小。

第 115 回：哈师院，学生自主开大会

哈军工，学院领导轰下台

8 月 9 日晚，哈尔滨工业大学礼堂也召开了“造反有理”大会，大会经过激烈的辩论，群情激昂，许多人愤怒地指出：“省委‘718 大会’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镇压了革命群众运动。”

“省委 718 大会”是指 7 月 18 日，黑龙江省召开“文革积极分子代表会议”。省委书记李力安在这次会上作了题为《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报告。报告列了四个大讲：大讲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大讲阶级斗争，大讲无产阶级专政，大讲党的领导，但中心是抓“右派”、“反革命”。

哈工大“造反有理”大会的主持人要求参加哈工大“造反有理”大会的省委常委、副省长陈剑飞对哈工大“造反有理”大会表态。陈剑飞在会上旗帜鲜明地表示：“今天这个大会开得好，大家给省委提出了许多批评，表现了同学们对党对人民负责的革命精神。我同意大家的看法，支持你们的革命行动！省委‘718 大会’犯了方向路线错误，省委向各高校派工作组是错误的。今天的大会是革命的大会！大会开得好！”

他的话就这么几句，却赢得与会全体师生的热烈鼓掌，使与会人们感到极大的满足。于是主持人便宣布大会胜利结束。

散会后，前来参加大会的哈尔滨师范学院学生范正美和魏醒学极度兴奋，他们在回学院的道上你一言我一句，边走边说。

范正美说："哈师院的主要问题就是对省委'718 大会'没有否定，至今还是冷冷清清，必须连夜把陈剑飞的这个讲话精神向全院师生传达。"

"对！"魏醒学兴奋地挥了一下拳头。

范正美进一步建议说："咱们现在回去就把人集合到礼堂，立即开大会，以传达陈剑飞的讲话的名义，把哈师院的文革烈火点起来，怎么样？"

魏醒学说："好是好，只怕太晚了吧？"

"不晚"，范正美看了看表回答说，"不到 10 点呢。革命吗，只争朝夕；早一天，师院文革早起来一天。"

"对！说干就干！"

范正美和魏醒学两人作了一下分工：范正美到礼堂去联系会场，安排麦克风这些；魏醒学到宿舍去通知杨桂宾、贾作富等人，再由他们去联络和发动其他系的人。

范正美的联系工作非常顺利，工人师傅一听说他们要开大会，进行文化大革命，便给他们打开了礼堂，准备好了麦克风。魏醒学也很快找到杨桂宾等人，大家一传十，十传百，整个哈师院能来的都来了，把大礼堂挤得满满的，连过道上都站满了人，二楼更是座无虚席。一些外校的造反派，主要是哈工大、哈军工的造反派师生也通过电话得知消息，纷纷赶来支持。

范正美他们原来以为把人一集合，一传达陈剑飞的讲话，大家准会高兴。谁知道他刚说明开会的目的，话音未落，会场上就有人领着

高呼口号，并有许多人冲向主席台，围攻、推搡范正美，有的人甚至向他直舞动拳头，要他下台。

贾作富、吴文中、郝忠、杨桂宾、魏醒学、王恩华等几个同学赶紧地保护着范正美，把他拥上讲台。范正美则将麦克风牢牢地抓在手里，但是在推搡中没有办法讲话。

台下一片斥责声，要范正美滚下去，现场乱成一片。支持范正美的韩光耀和董振山等人立即组织拉拉队。范正美跳下讲台，韩光耀拉开嗓门指挥喊道：

“一、二！”拉拉队齐声呐喊：“静一静！”

“一、二！——静一静！”

“请主持人讲完话，不同意见按顺序；我们讲完你再讲，机会均等莫慌张！”

对方见状，也组成拉拉队喊着：“主持人，通报姓名，你有什么资格开大会？”

十几人附和着，大声嚷着：“报你们的狗名，干什么的，有什么资格主持全校大会？”

是啊，自从哈师院建校以来，还不曾有过一次由几个学生不经学校当局允许擅自召开群众大会的先例，更何况深更半夜把人叫起来，岂不是翻了天？这还了得！真真是岂有此理。

但是拉拉队的喊叫，还是让整个会场暂时静了下来。范正美抓住机会，回答他们提出的问题：

“我们今天发起开会的人是：范正美，中共党员，政治系四年二

班学生，系学生分会主席；魏醒学，政治系四年二班学生，班长，共青团员；杨桂宾，政治系二年级学生，中共党员，院学生总会副主席……”

还没等他说完，又有人喊起来了：“你们凭什么开全院大会？”

范正美回答说：“我们是无产阶级革命派，凭的是文化大革命给我们的权利！我们只是向大家报告我们听到的情况，并不要求谁一定要参加我们的会议，谁都必须同意我们的观点。集会自由，这是宪法赋予我们的权利！”

会场暂时寂静了几十秒。忽然，学院保卫科的人跑到台上，大声吼道：“二楼挤满了人，严重超重，要出事的，赶快把人撤下来！”

范正美一听，倒吸一口凉气，心里真有点害怕：“如果把楼压塌了，我可负不了这个责任。”但是，他很快镇静下来，在韩光耀、董振山拉拉队的配合下，他对着麦克风郑重地喊道：

“二楼的同学们，请大家以安全为重，为了我们大家的安全，也为了你们的安全，请站在二楼过道上的同学们下到一楼来。”

根本没有人理他的话，会场又乱了起来，一些人再次跑到台上，围攻、推搡在台上指挥拉拉队的董振山，要他滚下台。

这时，贾作富、郝忠、吴文中等七、八个大高个同学，再一次把董振山保护起来。一个同学在范正美耳边说：“不要紧，这是吓唬咱们的，有一次演出，比这严重的多，谨防上当。”

于是，范正美铿锵有力地继续说道：“方才，也就是一个半多小时前，省委常委、副省长陈剑飞同志在工大礼堂召开的群众大会上讲

话，郑重宣布：省委召开的‘718 大会’犯了方向路线错误……”

未等他的话说完，会场上再次发生骚乱。站在范正美旁边的胡云飞老师小声对他说，“他们打的是程序，在程序上错了，会就开不成。他们的目的就达到了。”

“好厉害噢。” 范正美第一次理解了胡老师的法律术语。

将计就计。范正美提出：“根据《十六条》的规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只能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学院的师生大会，师生自己当然可以召开。集会自由，这是宪法赋予我们的权利。我们继续开会。有不同意见可以辩论，不同意见实行轮流发言。”

逻辑的力量在这里起了作用。范正美宣布的这种主张，是符合当时《十六条》规定的革命逻辑，无懈可击，因而得到各种观点的师生的积极响应，与会者报以热烈的掌声。不同意见可以辩论，这就争取了中间观望派。大会继续开下去。发言都是即兴的，这是一场唇枪舌战，基本围绕着三个问题展开了辩论：

一、时至今日“造反有理”这句话还对不对？

二、群众自己管理自己还要不要党委领导？

三、今天晚上的会开在半夜该不该？

大会辩论激烈、火药味十足，但秩序井然。不同观点的发言者，不时获得自己方的听众的喝彩和鼓掌。而那些持观望态度的中间派听众，则倾向于他们自己所立的规矩，凡是他们认为对自己心思的就鼓掌。

对学生自己召开大会完全持反对态度的人提出：片面强调自己管

理自己，是不要党委领导；不能把群众运动同党的领导对立起来，也不能群众想什么时候开会就什么时候开会，比如今天这个会就是不要党的领导，因此是错误的。

对于这个问题，召集大会的学生说："《十六条》明确指出，目前党的各级组织，对文化大革命存在着四种情况：一是能站在运动的最前面，敢于放手发动群众；二是有许多单位的负责人，对于这场伟大斗争的领导，还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因而，处于软弱无能的地位；三是单位的负责人，平时有这样那样的错误，他们是'怕'字当头，怕群众起来抓他们的辫子；四是有些单位是被一些混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把持着。又说，文化大革命，只能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不能采用任何包办代替的办法。要信任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首创精神。请问，目前，我们学院运动冷冷清清，我们按着《十六条》办事，自己出面传达省委领导在工大的讲话精神，这对我校的运动具有多么重要的意义！你们不是口口声声要党委领导吗，省委是不是党委？"

台下爆发出响雷似的掌声。于是，有人高喊："请院党委领导对今天的大会表态，看看院党委对文化大革命究竟是哪一类？"

台下掀起一片欢呼声，接着是一阵热烈的掌声。

这时哈师院机关干部已经各就各位，进入高度戒备状态，随时可以根据党委的指示，采取必要的应急措施。所以，当学生派人去找领导时，除了一把手之外，其他领导人俱在。学生代表问："院党委书记在哪里？"

回答是冷冰冰的："不知道。"

院党委派一位副院长出来应付。这位副院长平时说话，底气足，调门高；此时，却显得特别紧张，举止笨拙，讲话的调子十分低沉，既不敢说今天的大会是不对的，又不想说今天的大会是革命的，语无伦次，态度暧昧，只是语不连贯地说："这是学校部分师生召开的大会……"

几个会议临时召集人很快磋商了一下，这时工大的两名学生也过来出主意，他们认为大会开得很好，应该派人去找省委领导人来表态，争取全胜。

学生们商定，派杨桂宾、吴文中、韩光耀等人以最快的速度去到省委机关大楼找省委领导。哈军工的一个女同学陈淑兰也跟着一起去了。此时已到了次日拂晓，大家一路跑步，到省委大院时，天已大亮，还没有上班，找不到省委领导，正在焦急地等待着，忽然哈军工的陈淑兰高声喊道："看，陈雷同志来了！"

陈雷是省委常委、副省长。于是，大家赶忙迎了过去，向他作了简单说明之后，邀请他对哈师院的这个大会表个态。

突闻此事，陈雷有所犹豫，似觉不解地说："我去说什么？"

哈师院的学生杨桂宾等人："只要你在大会上说一声我们的大会是革命的大会就行了。"

陈雷哈哈大笑说："这么多群众开大会，革命造反，当然是革命的。这还有什么问题，不就是这么几句话吗，走！我讲。"说着，也没要车，就跟学生们一路走，一路闲谈，就这样来到哈师院院大礼堂

的主席台上。

这时，师院的党委书记杜若牧也出现在主席台上，他同陈雷握手后，站在一旁，显得被动和难堪。整个哈师院礼堂，门前大厅、各个道口都站满了人，比昨天晚上人更多了。

陈雷精神抖擞的地站在大会讲台上，对着麦克风，用平稳而略带激情的声调说道："哈师院的革命群众自己召开群众大会，传达陈剑飞同志的讲话，这是革命的大会。这个大会开得好！我支持你们!"

台下爆发出雷鸣般地长时间掌声。于是，范正美领呼"向革命领导干部致敬!""向革命领导干部学习!"然后，以胜利者特别激动的心情，登上讲台宣布大会胜利结束，又是雷鸣般地长时间地鼓掌。

这天上午，哈尔滨师范学院"红卫兵战斗队"成立，范正美被推举为负责人。

再回到哈军工。这天傍晚，在家里写检查的哈军工院长刘居英听说国防科委的政治部主任徐平来了，住在大和旅馆，便悄悄溜出大门，到大和旅馆去见徐平。

徐平把刘居英拉到没有人的地方，小声说："总理知道你被罢官了，学生还要打倒你吧？"

刘居英叹了口气，无言以对，低头听着。

徐平继续说："那次开会，总理听完罗舜初的汇报，问'为什么要打倒刘居英？'罗说，北大打倒了他的哥哥，军工就要打倒他。总理很生气地说：'这就没有道理，哥哥是哥哥的问题，弟弟为什么要受株连？要是我的哥哥有问题，我也要受牵连吗？'总理又对罗说：

‘你派人告诉刘居英，有错误就检查，没错误也不要乱说’。”

刘居英的哥哥就是北大的党委书记陆平。6 月 1 日晚上，院里通知各单位组织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全国新闻联播节目。20 时一过，人们熟悉的庄严声调从喇叭中传出：“宋硕、陆平、彭珮云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干了些什么？”

刘居英的家里犹如晴天霹雳。广播里一点到陆平的大名，刘居英只觉得脑袋里“嗡”的一声炸开了，他爱人许良毓脸色煞白，惊恐地看着刘居英，喃喃地说：“他大伯，他大伯出事了！”大女儿刘捷捂着脸跑到楼上，低声啜泣，另外 3 个孩子掉了魂似的呆呆坐着。刘居英努力使自己镇静下来，一字不漏地听完了广播，他擦了擦额头上的汗珠，长叹了一口气，对许良毓说：“把孩子们都叫下来，我有话对他们说。”

刘捷和弟妹们都静静地坐下来，刘居英说：“你们刚才都听了广播，知道大伯出事了，这对我们家来说非常突然，爸爸事先也不知道。你们明天到学校，要主动向学校党组织表个态，坚决响应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号召，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运动。如果大伯真像大字报讲的那样是修正主义黑线，那就与大伯划清界限，爸爸妈妈也得与大伯划清界限。你们要永远跟着党和毛主席干革命。”

孩子们似乎一下子成熟起来，都默默地点头。这时候，楼上传来一位老人的苍凉声音：“志诚啊，你上来一下啊！”

是刘居英的老父亲在喊他。刚才刘捷已经把陆平被点名的事告诉了爷爷、奶奶。

刘居英的老父亲半身不遂，卧床多年。刘居英赶快上楼，到父母的房间里，坐到父亲的床边上。

“我都知道了，”老父亲面色苍白，形容枯槁，颤巍巍地说：“你大哥怎么犯的错误？你得想法子，整清楚了……唉，我的大儿呀，这是怎么啦！”老人闭上眼，泪水顺着眼睑淌下来，刘居英的老母亲也坐在床边擦眼泪。刘居英当时没有料到，老父亲因惊吓、悲伤过度，没过几天，就去世了。

此时，刘居英听到周恩来关切的询问，眼圈儿一红，长吁了一口气，说：“总理还这样关心我啊。”

徐平又关切地问：“学生斗得狠吗？”

刘居英说：“现在还是批判，要我交代罪行，总的看，还算文明。”

“你可要有思想准备，”徐平警告说：“北京高校打人凶着哪！唉，真说不明白，这是怎么啦？”

刘居英忧心忡忡地回到家里，他悄悄告诉许良毓：“总理关心我呢……”

许良毓摸摸心口说：“我这心里好像有了点儿底。”

刘居英看了一眼日历，心神不宁地说：“听说 65 级有几个高干子弟造反了，到北京告状，明天 65 级学员从绥化农村回来。”

8 月 10 日，在绥化县农村参加“四清”运动的哈军工 65 级学员回院造反。

这天上午，导弹工程系的 61 级学员许延滨刚刚回校，就在辩论大会上作了 3 个小时关于北京的形势报告。他声色俱厉，慷慨激昂，

大谈中央内部尖锐复杂的两条路线斗争和全国阶级斗争形势的严峻性和危险性，他大声疾呼：“赶快起来，用生命和鲜血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砸烂反革命修正主义黑帮，把军工的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他突然发现和学员一起席地坐在舞台上听报告的刘居英，立刻大声喊道：“刘居英！你这个黑帮！我们要把你揪出来，打翻在地，再踏上一万只脚！”

许延滨的父亲就是时任装甲兵司令的许光达大将。已经靠边站的刘居英本想在群众中接受教育，现在，他只好站起来，黯然离场。

8 月 13 日，从绥化参加“四清”回来的 65 级学员游斗了在绥化领导他们搞“四清”的院办公室主任王序卿，开始了对学院各级领导干部的批斗。

8 月 14 日，院文化革命领导小组召开欢迎 65 级学员返院参加文化革命大会，坐在台上的领导干部全被造反派哄下了台。

## 第 116 回：大上海，保与反争论激烈

## 说鲁迅，校党委考察学生

我们再将目光从东北冰城转到中国的第一大城市----上海。

上海市委 5 月 21 日收到中央发来的《通知》，即《516 通知》，于 5 月 27 日至 30 日召开三届六次全体委员(扩大)会议，传达《516 通知》。

6 月 2 日，上海市委书记处开会，成立上海“文化革命小组”。组长是市委分管宣传的书记张春桥，副组长是市委分管教育和卫生的候补书记杨西光，组员有：市委宣传部长杨永直、市委教育卫生部长常溪萍、市文化局长孟波、市委办公厅秘书长李家奇、《解放日报》总编马达、《解放日报》编委姚文元、市委办公厅一室主任吴云溥、市委写作班党支部书记徐景贤。会上，张春桥传达江青的话：

“外地对大字报的底细不明，你们上海知道了大字报的底细，你们怎么搞？”

“要放手发动群众，要让孙悟空大闹天宫，不准设置障碍。我们相信群众是要革命的，绝大多数群众是革命的”。

会上决定全市各部门建立文化革命小组。

聂元梓大字报广播后的第三天，6 月 3 日，华东师范大学物理系 11 名学生给校党委副书记姚力贴出大字报，这是上海高校第一张针对校党委的大字报，立即受到校党委组织的大字报反击围攻，说这些学生想“一鸣惊人，当第二个聂元梓”。结果，大字报贴出不到两小时，便被众多的反击大字报批得没了声音。

接着，上海科技大学无线电系和数学系的学生以及部分教师，也贴出质疑校党委和市科委的大字报。

当天，同济大学也有学生给校党委贴大字报，同样受到围攻。

6 月 4 日，曹荻秋让市委副秘书长查阅 1957 年全国划右派的数字和比例。他说："在文化大革命中要出一大批右派，比五七年更多。"

6 月 10 日，上海市委在文化广场召开全市 17 级以上干部和基层党支部书记参加的万人大会，上海市市长曹荻秋主持并代表市委讲话，他列出了上海地区的批判对象：

《游击队歌》作者、上海音乐学院院长贺绿汀；

京剧《海瑞上疏》的海瑞饰演者、上海京剧院院长周信芳；

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总编辑李俊民；

电影剧作家、上海电影局副局长瞿白音；

历史学家、上海复旦大学教授周谷城；

历史学家、经济学家、上海华东师范大学教授李平心；

经学史家、上海复旦大学教授周予同；

作家、评论家王西彦。

八个批判对象，除了周谷城，其余 7 人在 4 月中旬就已经在报刊上批判。在会上被点名的还有原中共上海市委候补委员，市委宣传部主持日常工作的副部长陈其五，因"利用窃据的领导职位，推行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反动方针"，已在 1965 年被开除中共党籍，调到江苏农学院任教务处副处长。

曹荻秋在讲话中要求各级干部放手发动群众，用大字报形式参加

文革，他说：

对于阶级敌人在这次运动中，搞反党反社会主义活动，必须提高警惕。现在已发现有这种情况。对于那些隐藏着的牛鬼蛇神从地下冒出来，张贴反动的大字报，我们的态度是，第一条，反对；第二条，不怕。

曹荻秋在会上宣布：

市委已经决定组织文化大革命工作队，派到必要的单位去开展工作。

6 月 11 日，国棉 30 厂工人技术员王秀珍贴出批评厂党委大字报。6 月 12 日，国棉 17 厂保卫科干事王洪文贴出批评副厂长大字报。

6 月 22 日凌晨，上海戏剧学院表演系一年级学生赵全国贴出全院第一张矛头指向院党委的大字报，将院党委的一些看似平常的问题往纲上一提，院党委就成了保皇党了，令全院震惊不已。到天亮，大字报已被闻讯赶来的群众围满，许多人读了大字报都说当年右派分子向党猖狂进攻的情景历历在目，个别教师当场就哭了。人们除了驳斥赵全国的“无耻谰言”，还要表达对院党委的赤诚之心；除了大字报，还有大标语，墙上贴不下，干脆刷上了水泥路。

凡是有人群的地方就有左、中、右。上海戏剧学院也有同情赵全国的人。舞台美术系四年级蒋寄梦认为：“赵全国这人可能思想偏激，给院党委的结论也下得过于武断，但那也是一家之言，让他说就是，何必兴师动众如此对待？”

当时的年轻人个个认为自己应该以天下为己任，他觉得自己有必

要站出来制止乱局，“拨正”革命的航向。于是提笔写了一张大字报《不能刹车》，呼吁全院师生立即停止对赵全国的围剿，大家回归正道继续揭发院党委的问题。他刚写完，教室里又走进 5 名同学，他们同意蒋寄梦的观点，也都在大字报上签了自己的名字。

遗憾的是，他们的大字报一经贴出，立即遭到愤怒反击。于是，这些人的造反派生涯也就从那天正式开始了。

蒋寄梦对许多同学死保院党委的行为痛心疾首，于是创作了幅漫画：画面上党委书记头戴一顶厨师帽请学生干部吃粥，她一边把锅里的粥舀到学生干部碗里，一边问：“饱不饱？”

学生干部一个个摸着鼓起来的肚子连声说：“饱！饱！饱!”

“饱”与“保”谐音，漫画的题目就叫：《吃一顿，保一阵》。

此画一贴出立即招致轰动，蒋寄梦也因此而名声大噪。

从 6 月下旬起，上海一部分中等学校出现打人、罚跪、戴高帽子等情况。据当月统计，全市中学出现这类现象学校的比例达 40％；许多中学教师受到凌辱，甚至小学也有发生。

我们再看一下复旦大学。复旦在校党委动员下，6 月 3 日至 6 月 4 日，贴出经济史学教授周予同大字报 8000 多张。6 月 5 日至 6 月 10 日，集中声讨历史学家周谷城教授。

6 月 19 日，复旦大学哲学系一年级“孙悟空”小组胡守钧，将北京传来的“北京林学院与北京新市委许克敏讲话纪要”抄出贴在校园。校党委立即发出通知，说这个讲话纪要是“反革命纲领”，“否定党的领导”。

6 月 20 日，复旦大学化学系三年级一个学生贴出质疑校党委运动方向的大字报，不到半天，整个校园贴满反驳大字报，说那张大字报是“反革命的战略号召”，说校党委“是绝对正确的，对校党委的任何怀疑都是反动的、反革命的”。

6 月 25 日，上海复旦大学中文系四年级的安文江等 11 位同学以“过河卒”小组署名贴出《徐震是什么人》的大字报，接着又贴出了《二论徐震是什么人》、《三论徐震是什么人》。

徐震原任中文新闻系联合党总支书记，后调任校团委书记，此时任复旦大学校党委常委、宣传部长，具体负责复旦大学党委刊物《红缨枪》。

《红缨枪》是复旦大学党委办的一个内部刊物，由当时复旦大学党委直辖的一个“秀才大班子”主办。这个秀才班子共有 13 人：党委办公室主任王淼洋、团委副书记黄拔泉与胡爱本、党委宣传部秘书徐矛、国际政治系青年教师王邦佐、经济系青年教师蔡中兴、哲学系研究生姚介厚、新闻系研究生贾树枚、经济系研究生陶增衍、新闻系 5 年级学生彭斯英、经济系 5 年级学生胡炳麟、国际政治系二年级学生欧阳靖和新闻系谭启泰。

大学党委的写作班子里为什么还有学生？原来这是 1965 年底，复旦大学党委为了响应毛泽东提出的培养革命事业接班人的号召，制订的校党委培养接班人的计划，就是从文科每个系各选拔一名学生作为接班人培养，有国际政治系欧阳靖、新闻系谭启泰，另外还有哲学系、历史系、经济系各一人，共 5 人，以“写作组”的形式开展活动。

说起复旦大学这次挑选接班人，颇具戏剧色彩。

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是1964年根据毛泽东批示建立的，目的是为培养新中国第一代外交官和研究人员。全国同时建国际政治系的还有北京大学和人民大学，三个学校分别担负不同的教学和科研任务，北大是“民族解放运动”，人大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复旦是“资本主义国家政治经济”。

1965年11月一个落寞和寒冷的晚上，第十学生宿舍7号楼334室靠门的上铺，国际政治系学生欧阳靖正蜷缩在蚊帐里看书。之所以冬天还挂着蚊帐，是为了挡风御寒。这时，走道一阵急惊风似的脚步由远及近，接着是“乒乒乓乓的敲门声和女人的喊叫：“欧阳靖同学，欧阳！欧阳在伐？”

欧阳靖书正读得“入港”，气急，未及分辨来人是谁，便不由分说大声道：“谁谁谁？现在是十点半！这里是男生宿舍！”

使欧阳靖更加惊诧莫名的是，回答竟是如救火呼喊般的“我是潘玲娣！潘老师！快开门！”

这位颇受欧阳靖尊敬的潘老师，时任国际政治系64级政治指导员，是他的直接领导。

欧阳靖一跃而下：“潘老师有什么事？”

潘玲娣急切地对他：“快穿上衣服，跟我走！”

外面暗云低垂。复旦园万籁俱寂，唯见黄得耀眼的路灯光柱里细雪抖动，如缕缕丝绸飘摇零落。欧阳靖嘘着寒气，两手笼在袖筒中，一路小跑才跟得上潘玲娣，这位昔日学校女子运动健将的脚步。她郑

重地对欧阳靖说："今晚徐震同志要找你我谈话。"

欧阳靖的直接反应是："徐震是谁？"

在复旦文科不知"徐震同志"简直是无知。此人时为党委宣传部长兼中文系总支书记，擅长杂文，笔名"公今度"，出典于乐府"公无渡河，公竟渡河……"句。他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系，新中国成立前曾是活跃的地下党学生领袖，50年代任复旦团委书记，文思敏捷，且能言善辩。复旦人普遍认为徐震相当有才，关于他流传颇多故事，其中有一则说的是新闻系有女子因慕其才发誓"非徐震莫嫁"而独身半个世纪。

欧阳靖听说"公今度"三字，脑海里即刻闪出鲁迅曾用过的笔名"康伯度"，他觉得，"公今度"用名与复旦宣传部长、团委书记的身份全然不相符，丝毫没有那个年代每一个人必须具备的"革命气息"，倒似乎是哪一位没落遗少、资本家小开在新社会"验明正身"后不许更改的旧名。后来他曾打趣地对徐震说："公今度兮康伯度……"没想到徐震不假思索马上作上海滩大佬状，用手势将自己肚腩范围虚拟地扩大一倍，摇摇摆摆回应道："康伯度兮文公直！"可见他对鲁迅的作品很熟，到了张口就来的程度。

此时，欧阳靖随潘玲娣潘老师进入九舍45号徐震的"私宅"。令他大惊失色的是，徐震的形象竟与他的揣测毫无二致，果然是一派阔佬模样，整个人是"方"的，中等身高而体重至少有180斤，头也是"方"的，国字脸方鼻子，鼻翼很宽，甚至连嘴型都"方"，全无一般风流倜傥之人的"玉树临风"相。唯有那双眼睛闪着锐利机敏，头

发卷曲显示是个异类。着装极讲究，穿一条黑白相间鳄鱼条纹的棉裤，一双即使以今天标准衡量也不失时髦的黄色方头进口皮鞋。须知当年复旦是省军级的超等高校，党委宣传部长地位之显赫是今天的读者无法想象的。这位教父负责全校师生的灵魂教化，扮演校园精神导师的角色。他肯定应是这块土地上最政治化、革命化、无产阶级化的人物。但眼前的徐震却很不对头，整个一个油头白面、踌躇满志，犹如一个与新中国无关的资本家大亨、一部劳苦大众血泪控诉电影中的声讨对象。整套房子布置华丽，红漆地板锃亮如镜，茶几上放着冒热气的咖啡，只有望不到边际的满架的书表明此地乃书香门第。

容不得欧阳靖继续往下遐想，那边厢已发话了：

“叫什么名字？”

“欧阳靖。”

“哪一个中学毕业的？”

“华东师大一附中。”

“在那里读了几年？”

“6 年。”

“嗯？为什么是 6 年？”

“我……其实是从初中直升上本校高中的，考试只是走了个形式。”

“噢……”

话说到这里，徐震的眼光迅疾地从咖啡杯上抬了起来，落在欧阳靖的脸上，很关注地盯了片刻，似在研究一幅画或一件瓷器。

欧阳靖虽然也直视着他，心里却有些发毛，因为他不明白深夜里

问这些话的含义，而且在这么长的说话时间里，他就让欧阳靖和潘老师在他沙发的对面站着！

在目光对接的一瞬间，欧阳靖似乎正在游移之际，又一个问题发过来了：

“欧阳靖，今天我让你来，是要看一看你。我想问你几个问题。鲁迅的书你读过吗？”

“读过。”

“好。鲁迅有两个集子叫《准风月谈》《且介亭杂文集》，这是什么意思？”

“国民党政府不准国民谈论政治，‘莫谈国事，准谈风月’，只准谈风花雪月之事。鲁迅的意思既然你准谈风月那么我就谈风月吧，这是嘲讽，他谈的其实正是政治。‘且介’是半个租界的意思，当时他居住的地方是在租界与非租界的交界处，文章是在‘亭子间’里写成，故曰‘且介亭’。”

“第二个问题。唐诗、宋词，你喜欢哪个？”

欧阳靖说，中学时曾在学问渊博的顾荩丞老先生指导下，研习《文心雕龙》的同时，通读过《唐宋诗举要》，后来又曾将《全唐诗》中的边塞诗全部抄录一遍。在他看来，唐诗以“大气象”取胜，宋词以“辞工”见长。唐诗无边无际什么都能入诗，多的是雄阔狷狂随意为之的鬼斧神工，而在宋人那里，无论英雄末路长歌当哭还是国恨家仇万般无奈，抑或是红袖添香的缠绵，都是当成艺术品来“制造”的。唐诗处处是诗而全不着痕迹，宋词处处用心却脱不出一个“做”字。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是在刹那间随口哼唱出的信天游，而“尽挹西江、细斟北斗、万象为宾客”是埋首青灯苦思冥索刻意求工的结晶。二者同为豪放，但精神气质全然不同。唐诗是性情极致极率性极自由，宋词在文采的华美精致上明显超越唐诗，但在意象的自由创造力的浪漫上倒退不少。唐诗宋词双璧并世各有千秋，但以个人的喜好而言，他更爱唐诗。

说到这儿，徐震有点诧异地又瞥了欧阳靖一眼。

“是吗？”他拖长声音反问道：“有一个人叫徐懋庸你听说过吗？”

“我知道。徐懋庸是三十年代左翼文学青年，和鲁迅曾有争论。解放后当过武汉大学党委书记，1957 年用‘回春’的笔名写杂文，因一篇《小品文的新危机》被划为右派。”

“鲁迅逝世时徐懋庸写过一副挽联，你背给我听听可以吗？”

“可以。”欧阳靖脱口而出：“敌乎友乎？余惟自问；知我罪我，公已无言。”

话音未落，徐震一声喝彩:“好！很好！你可以回去了。”

欧阳靖扭头出去了。潘老师与徐震交流数句，也匆匆跟了上来。在欧阳靖与徐震的整个谈话过程中，她一直在旁边不停搓手，虔诚而紧张，如同一个生怕儿子考试不及格的小学生家长。回去的路上，她问欧阳靖平日里怎么读书，欧阳靖说，徐震的试题其实蛮“常识性”的，要回答关于鲁迅的问题连高中也不用读；鲁迅全集除《集外集》和《两地书》以外，其他都是他在 1959 年初二暑假时，在中州路第

一小学工会办公室的会议桌上读完的。进入复旦后，他又通读了 1956 至 1964 年间的每一篇《人民日报》评论、杂文和《文汇报》杂文，没有漏掉任何一篇，还认真做了笔记。

许多年后，潘老师还常对欧阳靖提到徐震。每次她必轻声叹道："欧阳呀，你不知道当年徐震对你真是欣赏得不得了呀！"

其实这天晚上的谈话，徐震是受复旦大学校党委之命约见欧阳靖的，用当时的专用名词叫"考察"。以徐震的自信，他认为只需提 3 个考题就够了。但当 3 个问题连珠发出后，徐震由冷淡直至喜形于色。当时徐震看上去是漫不经心的把玩咖啡杯细斟慢酌，而欧阳靖这边则是挨着冻兀立在发滑的地板上心怀愤然忙着回答问题……

在徐震与欧阳靖谈话的第二天上午第 4 节课后，第一届国际政治系学生的首任政治指导员，此时已在校党委工作的王邦佐老师，正站在教室门外等着欧阳靖。刚一下课，他就急急找到欧阳靖说："跟我走，王零同志要找你谈话。"

欧阳靖依然在问："王零是谁？"

他只知复旦大学的校长是陈望道，人称"望老"，党委第一书记是上海市委分管文教的书记杨西光。其实这两人都不过问学校具体事务，这个"王国"里的真正"国王"是党委书记王零。

当时复旦校门位于现今校门西侧 100 米处，进门就能见到 4 幢漂亮的黄色别墅式小洋房，这是复旦"首脑机关"所在地，人称"四幢楼"。王零的办公室在南面第二幢的二楼。王邦佐把欧阳靖带到王零办公室的门口，通报了一声："王零同志，欧阳靖来了"，便退了下去。

## 第 117 回：丁香园，上海市委写作班

## 《红缨枪》，复旦培养接班人

与徐震的办公室不同，王零这里很简朴，没有任何装饰品，阳光洒落一地。王零正在吃饭，他吃的也是学生餐，两块红烧排骨加一个荷包蛋，只是餐具较雅致。他吃饭速度很慢，似在品赏。吃完饭，他毫无顾忌把离办公桌不远的窗帘拉过来，用它擦拭啃排骨时沾了油腻的手。

他不像徐震那样漫不经心，而是很认真地始终正眼注视着欧阳靖，让他坐在办公桌的对面，开口道："我是王零。我负责领导这个学校。但总有一天我要离开这个岗位，这座位上会坐着另一个人。中央在《九评》中提出，需要培养无产阶级事业的接班人。经徐震同志推荐，党委会研究，我们在复旦 6000 个学生中选中了你。从明天开始，你到党委来，一边学习、一边工作。你的发展方向，是又红又专，既要有实际工作能力，在政治上过硬，又要在专业上很强。将来你应是优秀的党的干部，又是学术领域的带头人。"

欧阳靖对他的这番话感到十分突然，立即据实相告："我不是党员，我不能到党委工作。"

王零轻巧地说道："党员？那不是我王零一句话就解决的事情？"

接着，王零像个建筑师，向欧阳靖描绘他准备构建的宏伟目标："我们要培养一批无产阶级的秀才来接复旦这个班。那是有工作能力、能做能写能说的人才。复旦大学如果有 10 个、甚至 50 个这样的秀才来支撑起校系的领导责任，这个学校就不得了。这里的面貌就会

完全改变，复旦就会成为全国一流、世界一流的大学。”

他惋惜地自语：“解放以来，这样的秀才，复旦只出过一个，那就是金冲及。”

“金冲及你知道吗？”他随即问欧阳靖。

“不知道。”欧阳靖说。

王零：“金冲及是‘罗思鼎’写作小组的组长，后来被石部长带到文化部去了。”

欧阳靖有点想起来了，他读过罗思鼎写的文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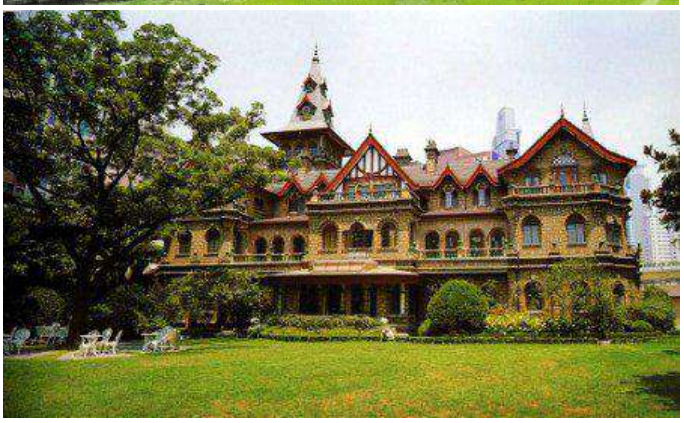
罗思鼎是上海市委写作组历史组的笔名，谐音“螺丝钉”，取义于雷锋名言“做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

石部长是原上海市委文教书记石西民，此时已调到北京任文化部副部长。

1963 年，中共上海市委根据毛泽东要加强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的指示，成立一个专门的写作班子，负责撰写各个领域的大批判文章，由市委文教书记石西民分管。

这个写作班的地点在华东局和上海市委合办《内刊》所在地——上海华山路丁香花园旁边的一座小洋楼里。

丁香花园位于上海静安寺与徐家汇之间的华山路上，是上海早期的花园住宅。原为李鸿章幼子李经迈住宅。



大门处的楼房间绕以蜿蜒起伏的矮墙，长百余米，共有 18 个起伏，素有“一条蛟龙卧半园”之称。这道围墙，被人们叫做“卧龙壁”，也称“龙墙”。

花园古色古香，因园内种植许多丁香，所以得名“丁香花园”。上海市委写作班因此又叫“丁香花园写作班”，后迁至徐汇区康平路89号。

写作班下面有文学组、哲学组、经济组、历史组、自然辩证法组等。其成员都是从社会科学各部门，各单位，各大专院校，各文艺协会、院团以及市委党校等处调集的，都是“笔杆子”较强的共产党员或共青团员。谁要是进了市委写作班，那就是一名受党信任的左派，是十分光荣的事。

文学组组长是姚文元，主要笔名是“丁学雷”，寓丁香花园学习雷锋之意。

历史组组长是1951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历史系、时任复旦大学团委书记、教务部副部长的金冲及，副组长就是协助姚文元写《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复旦大学历史系讲师朱永嘉。

1964年，石西民调北京任文化部副部长，上海市委写作班改由市委书记张春桥分管。1966年张春桥调到中央文革小组任副组长以后，上海市委写作班又由市委候补书记杨西光负责。无论是石西民，张春桥或是杨西光，他们对写作班都抓得很紧，传达中央的有关指示，部署一个又一个的战役，审查一个又一个的选题计划，直至审改一篇又一篇的重点文章。在他们的领导下，市委写作班在各条战线上主动出击．展开了全面的大批判：

在哲学方面，批判了杨献珍的“合二而一”论、周谷城的“时代精神汇合”论；

在历史方面，批判了忠王李秀成的“自白书”、影片《清官秘史》的历史观；

在文学方面，批判了周扬、夏衍、田汉、阳翰笙等“四条汉子”所代表的“三十年代文艺黑线”，批判了“国防文学”口号和“中间人物”论；在电影方面，批判了《中国电影发展史》和瞿白音的《“创新”独白》，批判了影片《早春二月》，《北国江南》、《林家铺子》、《舞台姐妹》……在戏剧方面，批判了“有鬼无害”论，批判了孟超的《李慧娘》、田汉的《谢瑶环》……

王零提到金冲及时欣喜之情溢于言表，他说金冲及政治热情很高的，但一旦他政治热情不那么高时就会马上吃苦头。例证是 1955 年社会主义改造运动时，金冲及站在卡车上带领学生高举标语呼喊口号，当口号喊累了停下来时他就趴在第一排看前面的姑娘敲锣打鼓扭秧歌，看得发呆走神了，卡车一个急刹车，“嘭！”只见金冲及大呼“不好！”，抬起头来，门牙没有了！门牙撞在卡车前沿挡板上碰飞出去了！“哈哈，你知道吧？小金为看女人扭秧歌牙齿飞出去了！”王零用手比划牙齿在空中飞行的轨迹，无声地笑起来，一直止不住，笑到后来捧着肚子说：“我肚子痛死了。”

说到肚子痛他想起了一件事，马上打电话唤隔壁党委办公室的一个工作人员进来，从包里取出一个连着电线的玻璃杯，吩咐说“你把这个给刘洁书记送去。她明天要出发到罗马尼亚考察教育。东欧那些地方我去过，冬天汽车走几百公里路上没有热水喝的。后来我到德国买了这个东西，把自来水放在里面插上电，就会变成开水。这样可以

让刘洁同志一路喝到热水。”

工作人员出去后，王零对欧阳靖说：“外国人冬天喝凉水！我出国时只好跟着他们喝凉水喝到拉肚子！”

说罢这些轶事王零又严肃起来：“你现在几年级？”他问。

“二年级。”欧阳靖回答说。

王零抬头扳着手指盘算起来：“二年级……还有 3 年。”他断然决定：“你回去找常铭同志，就说是我王零说的，让他给你办手续，从二年级跳到三年级。”

欧阳靖一时不解是什么意思？王零见状，又解释一句说：“你去三年级读书。”

欧阳靖大吃一惊，这个主意一点也没使他觉得荣幸，他争辩道：“跳级固然能提早一年毕业，但书不是少念了一年？这怎么能做到又红又专呢？”

王零不容分说地讲：“我有理论根据。邓小平同志最近提出要给有才能的学生跳级。”

这时，欧阳靖想出了一个拒绝的理由：“三年级目前不在学校。他们在奉贤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我跳到那里怎么来党委工作呢？”

王零连半秒钟都不假思索，立即命令道：“那就跳两级，由两年级跳到四年级。”

欧阳靖气急败坏嚷起来：“三年级我已经不行了，我怎么能去四年级？那要少读多少书啊！”

王零伸出一根手指指着他说：“我王零现在就可以向你保证，你

跳到四年级后，肯定仍然是四年级里最优秀的学生。这是可以立军令状的。”

显然，他对自己的说法非常欣赏。“快去办吧。”说到此地谈话戛然而止，王零端起茶杯，表示“送客”。

就这样，复旦大学党委从文科挑选了 5 名学生作为接班人培养。党委书记王零为这个 5 人小组起了一个名字叫“伍小虎”。这个组的主要任务还是学习，以徐震为文字指导，他出一些题目让他们作写作训练；以哲学系研究生姚介厚为政治指导员，负责思想工作，并为他们上经典著作选读课目，如《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等。王零为这个小组规定了几项特权：

一是可以从文科各系中挑选自己想要师从的任何学术权威作为自己的导师；

二是图书馆的全部藏书对他们开放，包括当时十分神秘的“内部书库”；

三是在小组活动与系里课程相冲突时，以小组的安排为优先。

但这个小组存在的时间不长，经过一段时期考察，哲学系、历史系、经济系的 3 个人又回到系里，仅留下了欧阳靖和新闻系学生谭启泰，归并入党委直辖的 “秀才大班子”。这个班子 13 人，每个人负责联系一个系或一个部门，平时半天集中学习、半天深入到基层工作，到了文革初期，被复旦人称为“十三太保”，实际是党委常委会的一个执行机构，其成员下到各个系都是党委的“钦差大臣”，负责上情下达、下情上达、考察调研、处理事件、指导工作，同时对学校重大

事宜提出规划和建议，并负责党委的文件、报告起草。

王零让“十三太保”办一个内部刊物，叫《红缨枪》。刊物的内容包括理论探讨、调研报告、时事述评等。文章的字数限定在 2000 字以内。一般都是拟定题目后，各自写出草稿，最后由欧阳靖和谭启泰对稿件做最后定夺。这相当奇怪，这两人还是二年级学生，在组内年纪最小啊。可能是由于王零的器重，加之他俩的文字确实让大家“服”吧，最后“太保”们都接受了这种情形，并视为当然了。这刊物以油印稿的形式办了几期，文革就开始了。于是，“红缨枪”结束了自己“内部理论交流”的使命，走到前台，试图扮演一个指导复旦文革、对复旦舆论举足轻重的新角色。

1966 年 7 月 3 日，上海《文汇报》发表复旦大学《红缨枪》成员陶增衍、欧阳靖、谭启泰的署名文章，公开批判“封建余孽”、“反共老手”周予同。这段时期，号称“复旦党委机关报”的《红缨枪》在校园主干道“南京路”集中张贴了“批二周”及十论“追穷寇”等一批墙报。复旦历史系教授周谷城、周予同合称“二周”。所谓“追穷寇”，就是批“二周”这样的“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对这些“穷寇”穷追猛打。

7 月 6 日，复旦大学新闻系一年级 12 位同学贴出评《红缨枪》十论“追穷寇”的长篇大字报，每一节都有个非常尖锐的小标题：“《红缨枪》握在徐震手里”、“《红缨枪》竭力回避主要矛盾”、“《红缨枪》要把我校文化革命引向邪路”、“‘揭’字当头，还是‘批’字当头？”、“《红缨枪》制造了种种清规戒律”、“《红缨枪》为谁效劳？”这张大

字报有 12 名同学签名，后来便组成“十二人战斗小组”。

当然也有为《红缨枪》叫好的，如电光源实验室的工人专家蔡祖泉等人就写了一张大字报：“《红缨枪》好得很！追穷寇好得很！”这显然是别人要借工人专家蔡祖泉的大名来保《红缨枪》。

7 月 12 日，新一轮《红缨枪》辩论开始了。复旦大学的造反派学生进一步把《红缨枪》与徐震问题联系在一起，提出“徐震问题必须挖根”的口号，并质问：“谁为徐震保驾?” 显然，这个矛头是指向代理党委书记王零的。

7 月 16 日上午，复旦大学新闻系二年级 11 位同学贴出长篇大字报《四十个为什么》，副标题为《关于我校文化大革命的一些疑问》，矛头直指复旦党委，点了校党委书记王零的名。

上午 10 时，市委政教卫生部常溪萍部长亲自到复旦大学召开座谈会，他在座谈会上对学生们说：“复旦党委是好的”，“如果你有材料证明王零符合牛鬼蛇神，那就可以派工作组。怀疑不能作结论”；“关于‘追穷寇’问题，就是不断革命，这个问题提得好”，“对于《红缨枪》，同学应当鼓励。追、揭、批，不要抓字眼，而要看它是歌颂二周，还是批判二周”，“究竟是不是党委领导的？不仅《红缨枪》，就是所有的大字报都是党委领导的。应当抓，应当领导，不领导是不对的。”“这个墙报主要是搞批判，这是市委的意思，是要创造重点批判的经验。复旦走得快，这不是坏事，而是好事。”“《红缨枪》与徐震又可以联系，又可以不联系”，“徐震有问题，《红缨枪》不一定有问题。”“假如复旦光这个东西，没有揭露其他的问题，

那就坏了，实际上复旦揭了不少党内外牛鬼蛇神。假如这个小组只搞这些东西，不参加其他同学揭露其他问题，那就有问题，这是阴谋。”又说：“运动发展过程，都是先从党外，然后到党内。”并“希望反映情况的同学自己考虑一下，不对的不要坚持，自己加以改正。”

7 月 19 日上午，以复旦大学以哲学系一年级学生胡守钧为首的“孙悟空”战斗小组用大字报，将“北京新市委大学部许无敏回答北京林学院学生提出的问题”的材料公布出来。有人说这是一个“反革命的大阴谋”，该材料“完全是造谣”，是由北京几个反动学生“别有用心地捏造”出来的，也有人说是“被人篡改”过了的。

7 月 24 日，外文系三年级孙月珠等 6 人小组贴出《就外文系存在的严重问题一问党委》这张在当时的复旦校园最有影响的大字报，就出身问题向复旦党委提出质疑。他们在大字报上把外语系的干部队伍的家庭出身全都开列出来了，从总支书记、副书记、总支委员、支部书记、副书记、支部委员、各党小组长，一直到各个班的政治指导员，家庭出身一窝黑。不是地主的子女，资本家的子女，反革命的子女，就是右派的子女。

孙月珠等同学还率先提出“一切权力归文化革命委员会，党委作参谋”的口号，引起一场大争论。很多同学贴出大字报，说这个口号是“反革命的”，说他们想“夺权”，等等。复旦党委面临直接的、尖锐的挑战。两派的大字报、大辩论针锋相对。

对于《一问校党委》，复旦党委没人出来回答。只是在私下里让政治指导员等人非议，说这是唯成分论，要重在表现。但是校党委已

经意识到“徐震问题”可能会成为冲决党委的缺口，在力保半个月后开始放风说：“党委对徐震问题早有察觉。”

王零说：“6 月中旬，我们就叫徐震考虑问题了。”

7 月 25 日，他又说：“决心下得晚了。”

第 118 回：抛徐震，校党委丢卒保车

“斗鬼风”，从华东师大刮起

7 月 26 日，复旦大学中文系党总支组织百余人贴出《彻底打倒徐震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恶阴谋》的综合材料。徐震成了复旦大学党委为保车而丢弃的卒子。这无疑宣告了中文系四年级学生安文江等人 6 月 25 日的怀疑是正确的，同时也激发了这些学生继续乘胜追击的信心，校园里一片“向中四小将学习”的欢呼。

“中四”即中文系四年级。

7 月 31 日,复旦大学“孙悟空”小组贴出《我校文化大革命处在十字路口》的大字报,指出某些校系领导批周予同、批前校党委副书记兼副校长、时任上海市高教局局长的陈传纲、批高教六十条、而不联系本校实际,这是一个“大阴谋”,是“错误的方向”。

陈传纲被要求回复旦大学来看大字报,下车伊始,就被团团围攻。陈传纲回去后即服药自杀了。

接着，“孙悟空”小组又贴出《复旦党委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严重的右倾错误，王零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严重的右倾错误》的大字报，认为复旦党委是文化革命运动的阻力，必须坚决搬掉这块绊脚石。

8 月 1 日，复旦大学外文系三年级学生孙月珠，劳元一等，贴出大字报《一切权力归文化革命委员会》，校党委书记王零看后对人说：“过去左派不发言，现在你们可以发言了，你们太不敏感了，现在这个情况下，至少可以写它二十个题目。”劳元一、孙月珠等被说成是

“否定党的领导”，遭到大字报围攻。

写大字报揭露校党委的学生背地里被称作“活跃分子”，政治上是有很大压力的。“反右派”、“秋后算账”的阴影或明或暗地笼罩着。校党委通过各系领导直到政治指导员给“活跃分子”施加压力，暗中整他们的材料，在同学中制造舆论，说这些学生是右派翻天，57 年右派就是这个样子，还有什么“57 年哪个系哪个年级 39%的学生被划成右派”等等。王零暗中放言，“现在在外面跳来跳去的就是这些人，让他们放，让他们跳出来，民主再发扬两个星期就收网。”王零宣称：“这次右派可能比 57 年还要多。”

但是，将矛头指向校党委的这些同学，仗着家庭出身好，基本上是“红五类”，总觉得没有什么辫子可抓。

8 月 2 日、3 日，陶增衍等《红缨枪》编委沉默了一个时候后，突然抛出一批大字报，以同“孙悟空”讨论学校文化大革命的方向为名，提出“重在表现”，攻击外文系同学的大字报是“列表式”，“唯成分论”，“把文化大革命引入歧途”等等。还有人以当初革命年代许多著名的共产党员出身大多不好作为依据。

这种议论受到了“活跃分子”的反驳，他们在大字报里说：难道工农出身的表现都是不好的？难道只有出身不好的表现才好？你们说我们唯成分论，可你们一窝黑才是唯成分论，是唯反动成分论，解放前，那时工农子弟被排斥在教育的大门外，正因为如此，那时学生的出身才大多不好的，不少学生参加革命，才造成共产党员中有不少人出身不好，他们参加革命背叛了家庭，现在那些干部有哪些行动说

明已经背叛了家庭？解放已经 17 年了，不少工农子弟有了受教育的机会，可你们还是光提拔出身不好的就说不过去了，难道出身好的就一个也选不出来？

8 月 2 日，“四清”中就被批斗的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党员主任吴泽教授不服对他的批判，校“中心战斗组”便贴出大字报，呼吁用各种形式声讨吴教授的反革命嚣张气焰。随即，其他系的一些学生，贴出大字报响应，8 月 4 日上午大字报说，应该给吴教授戴上高帽子。下午历史系便在系饭厅召开批斗大会。批判会很快失控，四五百个学生涌进会场，强迫吴教授戴上纸糊高帽，吴教授被强迫敲着畚箕，身上贴着“我是牛鬼蛇神”纸条，由几百个学生簇拥着，游斗到学校共青场。

见历史系行动，其他各系学生也马上动员，纷纷给本系“牛鬼蛇神”戴高帽，往脸上和身上涂黑墨水，以示他们是黑帮，也强迫他们敲着畚箕，拉到学校大操场领操台上跪下挨斗。领操台和领操台两侧，跪满批斗对象。校党委副书记到现场表示支持革命小将的革命行动，并要求各系将这些“牛鬼蛇神”拉回去有重点地逐个批判。于是有些系或部门，认为白天批斗得不够，当晚和第二天继续“补课”。据统计：这一天全校共揪斗 194 人，占全校教职工 11%，3 人自杀而死，2 人自杀获救。

8 月 5 日，上海市委召开全市文化大革命积极分子万人代表大会，各系统 17 级以上干部和大中学校师生代表参加。会上宣布撤走上海大中学校的工作队，播放 7 月 29 日北京大会中央负责人讲话录音。

大会后，又在全上海大中学校和机关，组织收听北京大会录音，包括江青讲话录音。就这样，中央撤销工作组意见一竿子到底，让干部与师生迅速直接地知晓。

复旦党委在这天傍晚 17 时开大会，传达北京周恩来、江青、刘少奇等人的讲话。第二天是星期六，下午大多数学生就要回家。这天一早，横贯复旦大学东西的主要大道北面的操场上热闹非凡，该操场的东面是学生宿舍八号楼。复旦大学的“斗鬼风”从这里开始，所有的乒乓球桌都改成了斗鬼台，桌上站着好多后来被称之为保守派的人，他们在批斗一、两个跪在那里的“牛鬼蛇神”，多的跪着三四个。正是盛夏，这些“牛鬼蛇神”大都是汗流满面，手里举着牌子，上面写着某某分子某某某。乒乓桌周围站满了人。有的“牛鬼蛇神”被架为“喷气式”，在他们背后的保守派学生则对他们拳打脚踢，有的还用手揪着头发。突如其来的“斗鬼风”好像一夜之间席卷了复旦园。

这个行动显然是有计划、有准备的。事先，在生物楼与学生宿舍之间的体育场上搭起高高的批斗台，然后各系拉出本系的“牛鬼蛇神”上台批斗。

第一个被斗者，是经济系萧纯锦教授，他担任过国民政府江西省教育厅长，学校党委原来就打算批判他。经济系教师吴若丹，当天就被斗死。

揪斗外文系教授黄有恒的场面声势浩大，只听组织批斗的学生大喊：“大家看到了，这就是《王若飞在狱中》里说到的出卖王若飞的大叛徒黄平！”人们纷纷涌向那里。那些保守派学生一边用拳头打，

站在后面的还用脚在踢他的头，同时大声说："叫他交代他的罪行！"

其实，黄平当时被国民党特务逮捕后，国民党并没有找到他的参加共产党的证据。党组织知道了，就去找宋庆龄，请她设法营救。黄平原来就有身份，宋庆龄赶到国民党那儿，说他不会是共产党，不料黄平已经自首叛变了，不但供出了自己是共产党员，还出卖了王若飞。这使得宋庆龄反而十分被动，一时无话可说。这些材料学生们哪里知道，当然是校党委提供给他们的。

叛徒是人人憎恨的，那些在台上紧跟校党委的学生对他拳打脚踢，台下紧挨着乒乓桌的人也在对他挥拳大打出手。接下去，他们说要黄平交代罪行，问黄平：

"你还出卖了哪些人？"

黄平说："还有周恩来"

"什么？你把周总理也出卖了？！"

接下去又是一顿拳打脚踢。

"说！你还出卖了谁？"

"还有刘少奇。"

"什么？你把刘主席也出卖了？"

又是一顿拳打脚踢。大家都被黄平的罪行激怒了。

一顿拳打脚踢和交代以后，主持批斗的学生就拿出早已准备好的墨汁，在他的衣服上写字，大致是打倒大叛徒黄平之类。又在脸上画花脸。多余的墨汁则从他的头上倒了下去。又拿出了准备好的浆糊，在他的身上贴上了写了各种字的纸，最后，也把多余的浆糊从他的头

上倒了下去。然后，拉他出去游街。一伙人拥着他高呼着“打倒黄有恒”一边打一边赶着走。

新闻系，没有重量级的人物，就拉出来一个写杂文的“反动杂家”林帆，戴着高帽子押着游街，他当时不过是个讲师。但报上大张旗鼓批判的邓拓及“三家村”是写杂文的杂家，于是学生们就认为杂文杂家必是“反动”的。

中文系学生批斗的徐震也是写杂文的杂家，他的笔名“公今度”也被附会为“攻击今天的社会主义制度”，斗得浑身上下是墨汁，一塌糊涂，真像个“鬼”似的。细数复旦园被揪斗的“牛鬼”，除了这个原任中文系党总支书记、现任校党委宣传部长的徐震可称作领导干部外，不见当时还有其他什么领导干部当权派被揪斗。

复旦大学中文系的批斗系主任朱东润和徐震时，令在场许多人大为惊讶的是，主持批斗大会的中文系四年级的团支书，一位质朴善良的女同学，不仅声嘶力竭地对这二人声讨、斥问，还突然把一瓶红墨水喷洒在徐震谢顶的头上，随即推到台下，责令他在晒得冒泡的柏油路上做狗爬……在场的许多同学被她的突变震愣了。这位团支书可是徐震当年做中文系总支书记时一手培养的班干部，现在她却对曾经培养过自己的领导下此狠手。倒是最早站出来揭发批判徐震的安文江小组的同学，明确提出反对这种做法。这个小组中有一位平时很腼腆的女生，这时勇敢地跳上台去，试图制止这种野蛮行为，指责他们这样做违反政策，而且是转移斗争大方向。

中文系主任朱东润在批斗时，硬是不肯低头下跪，荣获“反革命

傲骨”称谓。

生物系在批斗教授谈家桢之后，又用绳子捆着他在地上拖了很长的一段路，拖得死去活来。

而 70 多岁的化学系教授赵丹若，斗完之后，还要游街，残酷的学生用草绳捆住他从台上直接往下拉，当场就跌死了。

复旦大学校园内临时搭起的批斗台上站着周谷城教授。此时的周老，胸口挂着沉重的批斗牌，“周谷城”三个字，被歪写，并用红色打了叉，他的头衔是：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他头上戴着白纸做的高帽子，帽子的顶端还垂下一根草绳做的辫子。

有学生追问：“你为什么混到农民运动讲习所去？有什么反革命勾当？老实交代！”

周谷城答：“是润之兄叫我去的”。

有学生不知所指是谁，无知无畏，继续喝叱周谷城：“润之兄是什么反动东西？老实交代！”

这可犯了大忌，一时间全场无语……

周谷城上课时，常常称呼毛泽东为“老毛”。此刻，学生们又在就这一点对他进行批判。

周谷城脸色苍白，右脸颊已被打肿，声音沙哑，但是，他仍然用湖南普通话说：“我称毛主席为老毛，是因为，我跟他很熟悉，早在 1921 年，我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教书时，就认识了在一师附小任主事，就是主任的毛主席，并结成好友。我们朋友几十年，又是同乡……中国人称呼某人为老毛，表现了一种亲切和友好……”

“啪！啪！”两声，站立在后面的一个学生，突然冲上来，用一把扫帚对准周谷城的脑袋猛击了两下。周老的话被打断，他打了一个踉跄，尚未站稳，另一个学生从正面冲过去，对准周谷城的脸，“啪！啪！”又是左右两个耳光，同时吼道：“你，一个资产阶级臭知识分子，配做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朋友吗？不准你侮辱伟大领袖毛主席。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

事发突然，“斗鬼”进行了一个上午，大家的注意力完全被转移到这里。到了下午学生们就要回家，似乎经过一个星期天，昨天传达的中央精神就要冷场了。

临近中午，有人贴出了一张大字报：《斗鬼风从何而来？》文章不长却尖锐地指出，为什么早不斗晚不斗，昨天才传达了中央精神今天就出现了斗鬼风？大字报指出这场斗鬼风完全是预谋的，目的是为了转移斗争大方向，把大家的注意力从中央精神移开。

许多学生纷纷起来对这次斗鬼风进行了质疑，支持校党委的学生就说这些人是反对斗牛鬼蛇神，包庇牛鬼蛇神，是反对文化革命，专门反党。

在“斗鬼风”的高潮中，大字报栏上还贴出一张漫画：《牛鬼蛇神群丑图》，把周予同、周谷城、苏步青、谈家桢等人都丑化了一通。这张漫画在当天晚上就被“孙悟空”，即哲学系有名的造反派学生胡守钧揭下，他们反对这样做。

下午，保党委的学生押着牛鬼蛇神去劳动，手里拿着一根树枝当鞭子。制造了一块牌子，上面写着“牛鬼蛇神劳改队”，叫一个牛鬼

领头高举着牌子，而他们在后面赶着。真的就像赶牛那样，看不顺眼就抽几鞭。一路吆喝着。在那时，复旦校园内到处可以看到这类“劳改队”。

那些男学生在牛鬼面前自称老子，而女的呢？大概她们觉得自称老子不好吧！就自称老娘。可她们只是一些 20 岁左右的大姑娘呀！当他们自称“老娘”时，牛鬼们也不由得笑了，她们训牛鬼：“笑什么！”其他人在旁边看到了也禁不住笑了，她们又说这些人是与牛鬼不划清界限，帮牛鬼说话，包庇牛鬼蛇神。据说女性都是柔顺的，但是在她们身上你看不出一点温柔来。行凶打人她们一点不比男学生差。

接着，在 8 月 6 日、7 日两天之内，复旦大学接连批斗了 30 多名被抛出来的“牛鬼蛇神”，红色恐怖席卷整个校园。

红色恐怖虽然吊起了一些人嗜血的胃口，但是也遭到许多学生的反对。他们认为，这股红色风暴干扰了他们揭发党委的大方向，所以断定这是党委搞的阴谋，从而提出了谴责。于是党委有人放风说：“斗鬼是群众自发的要求。”但无法令人信服。因为学生们认为，这样一场有组织有部署的统一行动，岂是“自发要求”所能搞得起来的？于是王零又在全校大会上提出了对牛鬼蛇神应如何斗争更为有利的问题，又被一些学生指责为推卸责任，转移目标。

上海的“斗鬼风”很快就蔓延到其他学校。8月8日，上海财经学院播放了中央负责人讲话录音。几个学生上主席台点名，给一批学校干部和教授戴高帽子。各系学生纷纷仿效，临时做起高帽子。来不及

做，就以废纸篓、铅桶、痰盂代替。还将这些被批斗者“牵”往操场，逼他们跪下，捆绑，殴打，顶砖头，揪耳朵，逼他们在地上爬。据统计，当时被戴高帽者95人，占全校教职工总数的19％。

8月9日上午，同济大学建筑系学生，游斗党委书记，副校长和学术权威李国豪等15人，党委书记身上被贴“反党反社会主义”纸条，强迫戴上西瓜皮，其他人则被戴上土簸箕，废纸篓。

8 月 10 日，上海交通大学批斗 15 人，其中 13 人被戴高帽子。

8 月 11 日早上，复旦大学《红缨枪》成员、新闻系的谭启泰和国际政治系的欧阳靖两同学贴出万言大字报：《坚决罢掉复旦党委的官》。复旦大学党委书记王零精心培养的接班人、尖子学生反戈一击，自然石破天惊，震动了复旦园。这张大字报不啻是一颗重磅炸弹，把许多内部材料抖落了出来，揭露复旦党委“用‘斗牛鬼蛇神’的借口来压制群众揭露未揭露的牛鬼蛇神”，刮起一股“有统一组织，有统一领导”的“斗鬼风”。

一部分同学要求广播这张大字报，另一部分同学反对。有同学向党委请示，党委答应商量一下，在 8 点钟以前答复。8 点钟过后，党委未答复，外文系广播台要广播，一部分同学反对。最后，学校党委副书记郑子文答应在大礼堂广播谭、欧的大字报。这张大字报一经广播，坚决反对罢党委的官的大字报很快就纷纷贴了出来。但随之而来的声援、支持谭、欧的大字报也纷纷贴了出来。复旦校园里又是一场新的大辩论。依然出现工人的表态：“我们工人坚决反对罢复旦党委的官！”显然，这些旧招数已经不灵了。

听说北京成立了红卫兵组织，并受到了中央的承认，8 月 11 日，复旦大学外语系成立了上海第一个红卫兵组织“红卫兵战斗小组”。这是上海最早以“红卫兵”命名的组织，负责人劳元一。

外文系的学生孙月珠和劳元一提出要去北京告状，反映复旦大学党委压制学生的问题，全校少数派一致赞成，并且募捐筹集了路费，让他们作为红卫兵代表上北京。留在学校的少数派一方面尽力扩大联合战斗组，准备正式成立全校性的红卫兵，另一方面进行串联，到外校争取支持。

受“斗鬼风”的影响，8月11日这天，上海体育学院揪斗22名教师和2名职工，身上被浇了墨汁，贴着纸条，跪倒在食堂前示众，有的还遭受拳打脚踢。

同日，上海外语学院80多人身淋墨汁，背披字条，在煤屑跑道上爬行。

到了 8 月 12 日至 13 日，上海第一医学院有 123 人被挂上“牛鬼蛇神”的牌子遭受游斗。

8 月 13 日，上海天马电影制片厂的演职人员王丹凤、黄宗英、秦怡、白杨等著名演员、导演均被批斗。

据不完全统计：8 月 13 日至 15 日，上海各区有 30 多所中学发生打人、罚跪，共斗了 114 人。

第 119 回：教授惨，上海市打人成风

去北京，西安学生结伴行

8 月 12 日，上海市委书记陈丕显在华山路一幢洋房内找上海市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张文豹单独谈话，对他说："市委决定成立上海市红卫兵联络站，你担任主任。"

张文豹表示："我一直从事组织工作，对上海的学生情况不熟悉，难以胜任，是否由团市委书记张浩波兼任。"

陈丕显不同意，说："这是市委的决定，要服从。"并说："你是从中央机关调来上海的，你的条件比较合适。再从市委宣传部、团市委调两个副手，你们一起赶快把这个摊子办起来，有事及时向市委报告。"

14 日，张文豹领衔受命，在陕西北路 500 号市团校大院挂出"上海市红卫兵联络站"的牌子，在二楼朝南一间大屋内，召集担任副主任的市委宣传部副部长蓝瑛、团市委副书记郑均培和另外 3 位干部，共 6 人开了碰头会，作了简单分工：张文豹主要负责接待，蓝瑛负责宣传方面的事务，郑均培负责联系各大专院校，其他 3 人负责安排住宿，提供各种物资材料等具体事务。大家都感到责任重大，表示要认真诚恳地做好工作。但如何接待？他们心里也没数。

8 月 15 日，"上海市红卫兵联络站"以共青团上海市委所属市学联的名义宣布成立"接待首都和外地来沪革命师生办公室"，陕西北路 500 号的团校大院作为中心接待站。

此时在北京，又疯传一张大字报----《从对联谈起》，是 8 月 12

日，北京工业大学谭力夫与铁道学院刘晓玲合写的，并分别在各自学校贴出。大字报对“鬼见愁”对联提出了他们的看法，希望把它“提升为政策，上升到本本条条”，要将对联的内容当作全面的、策略的党的阶级路线来推行。大字报贴出的当天，北京各高校就陆续出现了只字不差的大字报，传播的速度之快，令人惊讶。是日，仅到北京大学观看大字报的人数就达 17.9 万人，可见在当时影响之大。

中央文革感觉到势头不对，他们组织力量到各高校张贴《江青在天桥剧场对红卫兵的讲话》，希望把此风压下去。但红五类们此时已不把任何人放在眼里，北京工业大学连续两天发生了强撕江青大字报事件，并引发了校园内宣传“血统论”的又一次高潮。

上海和北京我们暂时搁置，再来看看西安。

西安虽是著名的古都，却地处相对落后的西北地区，而且，肩上悠久文化传统的担子也较其他地区重得多。当这里校园内的学生们听到千里电波传来振奋人心的喜讯，多么想“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一番啊。然而四面古城墙，凝固了时空，学校的党委、工作队运用权力，控制局势，制止可能出现的各种骚动。

此时，那些被打成反革命的学生白天还在写检查、交代罪行；深夜，他们更是难以入睡。不知道是谁开的头，黑暗中有人愤愤地说：“上北京，找毛主席评理去！”

《抬头望见北斗星》，这首老歌在此时又被赋予了新的含义，就像一道亮光划过夜幕，给那些无所措手足的青年男女以光明、希望。当右派，这令人恐惧的后果，使他们对《十六条》，对“毛主席给红卫兵的信”中的某些段落感到无比亲切。他们忘了疲劳、忧虑。愤怒，一遍又一遍地学习文件中有关“造反有理”的词句。最后决定：“集

体赴京取经、告状！”

李明光，西安第五中学学生，被工作组打成右派学生。他后来回忆说：“当时真是全身心的投入，从心里觉得我们是掌握真理的少数，而且相信多数群众并非不理解不支持我们，只是受几千年‘从众’‘怕官’的传统思想束缚，敢怒不敢言而已。当我们做出北上赴京的决定时，真觉得我们是在写历史，好像感受到了当年被蒋介石围追堵截的红军决定北上陕北时的心境。可笑吧，坐井观天，夜郎自大？不过，那时我们是真诚的，今天该算事业有成了，但却没有了当初那份真诚。”

1966年8月10日晚饭后，李明光、张宝泉、武少敏等十几个人先后悄悄溜出学校，到火车站候车厅碰头。

他们不知道，他们自以为很机密的行动，早已被人向上汇报了，一张已经撒开的网，正有条不紊地收回。

“各人把自己的钱都拿出来，看能买几张火车票”。张宝泉说，“钱都集中起来，由罗江保管”。

罗江是足球队队员，体魄强健，快步如飞，而且粗中有细，深得大家信赖。此刻，他也不推辞，仔细地把众人交给他的钱收齐，清点。李明光、张宝泉几个把罗江护在中间，漫不经心地四下张望。

突然，李明光发觉气氛有些不对，候车厅里应该是男女老幼什么样的人都有，可是，在自己周围却都是20多岁的粗壮结实的小伙子，而且都没带行李、包裹，甚至连提包也没带，一个个故作漫不经心的样子比自己高明不了多少。

李明光悄悄踢了罗江一脚，说：“不好，有情况。”罗江忙把清点了一半的钱胡乱塞到兜里。李明光说：“离开车站，跟我往外冲。”

但为时已晚。几个乳臭未干的小狐狸，哪里斗得过老猎手。10分钟之后，在旅客的一片责骂声中，李明光等人被以流氓、盗窃团伙的名义，抓到铁路局保卫处。

李明光看了看表，时针指向7点30分，已是黄昏，一列开往郑州方向的火车轰隆隆驶出车站站台，他的心随着逐渐消失的隆隆声而消沉。

完了，一切都完了。

此时的他并不知道，就在15分钟前，北京府右街，中共中央国务院所在地中南海西门，一个巨大的身影出现了。像神话一般，四周的人群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不少人下意识地用手去揉擦自己的眼睛，仔细看去，没错，是他——人民领袖毛泽东突然降临在他们中间！在“毛主席万岁”的欢呼声中，毛泽东与群众握手。毛泽东在群众簇拥下登上接待站讲台。

被关了一夜的李明光等人听到这激励人心的消息后，又从消沉中振奋起来，李明光代表同伴向大沿帽提出了强烈抗议：

“我们要去北京向中央反映西安学生运动的情况，你们以莫须有的罪名扣留我们，就是压制革命，就是反对党中央、反对毛主席。由此产生的一切严重后果，你们要负全部责任。”

大沿帽下的面庞，连眉梢都没动一下，只是追问罗江：“既然钱是你的，你说是多少？”

可怜五大三粗的罗江，此时被问得满面通红，他不敢乱说。到底是多少钱，不要说罗江，5个人谁也不知道。因为当时大家都很激动，谁也没留心自己给了罗江多少钱。大沿帽微笑地说："连自己有多少钱都说不清，又怎么证明这钱不是你偷的？"

李明光决定单刀直入，他说："别绕弯子了，民警同志。你们的行动是有预谋的、有计划的。我没有说错吧？"

大沿帽矢口否认。

李明光继续问："是谁让你们抓我们的？他们到现在仍不敢露面，这说明了什么？他们害怕承担破坏文化大革命的罪名！可是，民警同志，你们愿意替他们背这个黑锅吗？我相信，你们是与人民群众心连心的。人民警察为人民嘛，刚才的广播您听到了。毛主席去的地方，您知道是干什么工作的吗？群众接待站，专门接待被走资派打成反革命的革命群众的。毛主席为什么不到别的地方，偏偏选中这个地方与群众见面？可能是巧合吗？高手下棋，哪一步不是选择最佳点。最紧急的场所落子呀？"

大沿帽下的脸庞有些变色了，李明光清楚地看到那张脸轻轻抽动了一下。他乘胜追击："我们几人确实不是流氓小偷，这您心里明白；同时，您心里也明白，我们几人是'游鱼'、'右派学生'；但也许您还不明白，或不特别明白，《十六条》中清清楚楚地写着：要保护少数，因为真理常常在少数人手里……"。

张宝泉悄悄推了李明光一下说："是'有时'"。李明光一惊，他把自己的看法说成中央文件了，连忙改口，纠正自己的错误，同时

生怕大沿帽抓住机会反攻。但他的担心是多余的。

大沿帽站起身，手下意识地拍一下桌上的钱，自言自语地说："无论如何，我不能放你们走。执行命令是我的唯一职责。"说完，他推门进入里屋。门没关严，他们看见，那门接通站台，一列客车正停在站上。

李明光对同伴说："机不可失，时不再来。"

罗江说："八成是大沿帽网开一面吧。"

武少敏飞快地掏出钢笔，撕了一张台历，写道：钱我们取走了。

几个人溜到站台上，果然那大沿帽没在门口，正在几十米外怒斥两个负重过多的小贩。他们几个装作在站台上散步的旅客，踱着方步溜到车门口，鱼贯上车。

火车一开，几个人心中的一块石头落了地。可是，没过多一会儿，就又提心吊胆起来。因为他们的钱不够买到北京的火车票，几个人商量一下，决定先不买票，能拖一会儿是一会儿，等检票时再补，就说是刚刚上车。

火车快到郑州时开始查票，李明光建议往后撤："万一要是没查到头，火车就到站了，咱们可以从车下绕到前面去。"

但外行难钻内行的空子，列车查票时选择的都是需运行近1小时的大站间隙来进行的，他们几个很快发觉已经没有退路了。罗江问："咱们说是哪一站上的？"

武少敏紧张得舌头都有点发硬，说："我想咱们还是说实话吧，一撒谎我的舌头就发硬"。

李明光几个终于被带到餐车里，他们正准备掏钱补票，却惊喜地发现，餐车里已经挤满了学生，看样子，都是没买火车票的。一搭话，果然都是无票乘车，要去北京取经、干革命的大、中学生。

众人听到李明光几位要补票，忙阻止说："补票？人民火车人民坐，干革命坐车还要票？法不责众，看他能把咱们这么多人怎么办？"

几十个学生挤在餐车里，感觉比在拥挤的车厢里舒坦多了，他们不由齐声高唱革命歌曲："拿起笔，做刀枪，集中火力打黑帮……"

列车员、乘警们果然没敢找他们的麻烦。学生们安安稳稳到了郑州。

火车刚刚进站，细心的武少敏就发觉有些不对头，十几个带枪的警察一列纵队随着缓缓行进的列车疾行，后面近百名青年工人，两列纵队紧随其后。火车停稳，这些人也停下来，刚好站在餐车车厢外面。

"不对头啊！"武少敏说，学生们都看出有点不妙，早有人探头到另一侧车窗外张望。好家伙，百十口子人，个个手握铁锨、木棍，虎视眈眈。

"完了"，不知谁叹气说，"全没戏了"。

李明光强作镇定说："同学们，别慌。咱们不就是无票乘车嘛，又没杀人放火，还能把我们怎么样。"

几十个学生都趴在窗口，朝外面喊：

"向工人阶级学习！向工人阶级致敬！"

"听毛主席的话，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不知谁对警察叫道："警察叔叔辛苦了！"

终于，车厢外的青年工人被逗笑了，紧张的气氛缓和下来，民警官衣在身，不苟言笑，一言不发，分为两队守着两个车门。

学生们喊道："警察叔叔放心，我们不会逃跑的，我们要去北京见毛主席！"

工人们一听，觉得有理，学生们对郑州火车站构不成危险。站台上的工人有的开始坐下聊闲天了，铁道上的工人不堪日晒，竟自散去。只有警察仍坚守岗位，把学生困在餐车里，而学生们谁也没想过逃跑，甚至不敢企图混到旅客中间，他们宁肯扎在一堆，互相壮胆。

几分钟后，一位50多岁的领导模样的人在两名路警的陪同下来到餐车，请同学们下车谈一谈。一名中学生迎上前去说："要谈就在这儿谈，我们是死也不离寸地！"

那位领导开始晓以大义，从国际形势讲起，到国内形势大好，铁路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最后落实到火车误点造成的严重后果。

正讲得兴起，一个学生插嘴说："您是不是说一列火车误点会引起连锁反应？"

"是啊，列车运行是一个整体，局部要服从全局，个人要服从……"

"您说，一列火车误点一分钟，就会造成上万元的损失？"那学生打断领导的话头问。

"那当然了，所以我恳切地希望你们以国家利益为重……"

"您说，我们几十个人的车票加在一起，也不过一千多块钱吧？而且我们一再表示，到了北京，找到亲友一定补票。可是您呢，尊敬

的领导同志，一说就是滔滔不绝的几十分钟，您可知道，您已经浪费了国家几十万元人民币了？毛主席教导我们：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而您，尊敬的领导，您明知故犯，以捡芝麻为借口，整篓地倒香油，我们——毛主席的红卫兵不能不问一个为什么？你……”

此时，他把“您”换成了“你”，并故意加重语气：“你到底安的什么心？”

不知是这套胡搅蛮缠生了效，还是话语中真的有哪一句击中了对方要害或敏感区，他只说了一句：“那好，你们自己考虑吧”，便转身匆匆离去。

两分钟后，列车一声长鸣，缓缓起动，学生们带着胜利的微笑，朝往后退去的民警挥手致意。“再见！谢谢”的喊声，随车远去。

李明光后来回忆说：“西安、郑州火车站两个回合下来。我悟出一个道理，用冠冕堂皇的大道理压住对方，让自己的私货堂而皇之地招摇过市，对方敢怒而不敢言，乖乖放行。后来，我们到了北京，出站时，又用了这招。我们20几个人，又加上一些四面八方来北京串联的学生，他们是在检票口碰了钉子返回来的，有100多人。我们排成两路纵队，手举毛主席语录，高唱造反歌，大摇大摆地朝货运出站口走去。不仅没人敢问我们要票，连邮件车都停下来给我们让路，顺顺当当地出了站，我们在广场上欢呼了一阵，便去各学校取经告状。”

第 120 回：郑思群，一夜自戕松林坡　激民愤，重庆大学舆论起

这段时间，重庆大学工作组在收集校长郑思群的材料方面也有了突破：虽然在工作作风，生活作风方面挑不出郑思群什么问题。但在亲属关系和与苏联专家交往方面工作组认为抓住了“辫子”，突出的有两点：一是指派妻子去跟从美国来的哥哥见面一事，详情不明；二是中苏关系破裂以后，没有严格按照涉外规定办事，仍然与苏联专家通信、通电、馈赠，且委托其照料在苏联留学的孩子。揭发者中有人怀疑，与郑思群联系密切的苏联专家，可能是“克格勃”。

7 月 29 日，专案组告诉郑思群：经过市委批准，需要对他实行监护审查，必须搬到松林坡招待所去住。郑思群向组织上也即工作组提出了他参加革命以来唯一的一次个人要求，希望在省党校工作的妻子回来同他见见面。当晚，他妻子吴耕书自省党校回到重庆大学，夫妻俩彻夜长谈。

早晨吴耕书告别丈夫郑思群刚刚出门，专案人员便进来将郑思群的领口、袖口、裤腰及裤脚检查了一遍，将他的腰带鞋带也悉数没收，甚至连茶叶筒也收走了。这是怕他自杀。如此还不放心，干脆让郑思群脱下长裤及衬衫。就这样，他们将上着汗背心，下着衬裤的郑思群从学校办公楼押解到松林坡招待所。

这一天是 7 月 30 日，全身被搜赤足而行的郑思群仅允许带《毛泽东选集》一册，而他恰恰将半片剃须刀夹带其间上山了。

郑思群在押解的路上，被当时重庆大学 7 个全优生之一、三年级学生、学校羽毛球队的队长周家喻看见了。一位老革命，7 级干部，

只穿着短裤、背心，打着光脚板，走在水泥路上，连鞋都不让穿。7月份的重庆，有多热啊！他看不过眼，一下喊来许多人，围住工作组的人质问，双方僵持了一阵，不了了之。周家喻等人因此被工作组作为有问题的学生内部控制，在阶梯教室隔离审查了一个礼拜。

7月30日，工作组召开全校大会，在会上宣读《关于郑思群同志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言行（初稿)》。要求大家进一步揭发、补充、修正。这份材料在学生中遭到质疑。

8月1日下午，工作组三个领导在工作组会议室与郑思群集体谈话。工作组办公室主任赵处长参加，专案组长张忠良做记录。谈话是向郑思群“提示”材料，宣布他有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和私通苏修等四大罪状。

郑思群态度坦然，但对与苏联专家交往问题也有些紧张。不过他没有做出任何肯定与否定的解释。末了，他要求与四川省委主要领导谈话，被拒绝。

8月2日凌晨两点钟左右，郑思群征得看守的同意后走出禁闭室。走廊上，他向值夜班的招待所所长张永胜要了一支香烟，一边吸一边同张所长随便聊了几句。这时看守催他回屋睡觉，他看了看守几眼，方才回到屋内。大约5分钟，看守听到郑思群房间发出声音。好像是在“呻吟”，又像是“卡痰”，床铺也在响动。他们进入房间，看见蚊帐的一头染满了鲜血，地下也一大滩鲜血，呼喊也不见答应。看守拼命惊叫：“遭了！遭了！出大事了！”喊声响声惊醒了张所长，他翻身起床，赤膊赤足冲向了与他相邻的禁闭室，眼前一幕让他触目惊

心：但见身材高挑的郑思群蜷缩成一团斜依在床头，他左手紧捂胸口，右手搭拉在床沿，满头满脸是血，篾席上全是血，连雪白的蚊帐也溅满了星星点点的血迹。张所长走近床沿，看到郑思群左颈动脉已然割破，顺着伤口还在流着血滴。

为了保持现场，监护人员不敢搬动，留下一人照看现场，一人跑去向工作组报告。张所长则立即摇通校医院电话，医生火速赶来，实施止血，进行人工呼吸，医生一阵忙活，几分钟后，医生起身揩了揩脸上的汗，毫无表情摇了摇头。郑思群心脏停跳，其时是凌晨 5 时 20 分。很快公安机关派员赶来，他们查勘了现场，检验了遗体。

工作组张光明在睡梦中被值班人员喊醒。按照办公室主任分工，专案组的事情应由赵处长处理。可赵处长住在后楼，黑灯瞎火的，不清楚在哪个床位。人命关天，值班员不敢怠慢，只好先向张光明报告了。

听说郑思群自杀，张光明大吃一惊！他立即派人去后楼向工作组领导报告。同时和秘书组长樊天铎，抓起衣服就同监护人员往松林坡狂奔。

监护人员是学校的保卫干部。他边跑边给张光明介绍情况。张光明意识到事关重大，他决定往距离最近的工人医院送。监护人说没有担架。张光明说："没有担架就放在棕板床上抬。要跑步前去，时间最重要。"

樊天铎跟监护人去现场组织运送。张光明在招待所打了 4 个电话：第一个电话打给汉渝路的工人医院，告诉他们，立即通知医院领导，

说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病人，因为出血过多，生命危险，必须组织力量进行抢救，一刻也不能耽误。

第二个电话通过市委总机（军线），打到西南医院值班室。告诉值班人员，马上向值班首长汇报：重庆大学有一个高级干部，因为刀伤大出血。请求野战医院立即派出最好的外科专家，赶到工人医院支援。同时告诉对方，自己是重庆市人委办公厅的。对方答应马上行动。

第三个电话打到市委值班室，请他们立即向王若秘书长或者任何一位值班领导汇报：郑思群自杀了，生命危险，正在送往就近的工人医院抢救，已经电话请求西南医院支援。同时也要求市委值班室给西南医院再打一个电话催促。

第四个电话打到工作组，叫值班人员告诉余跃泽等领导，郑思群已经在送往工人医院途中，请他们直接到医院，不必去松林坡现场。

打完电话从招待所办公室出来时，天已微明。樊天铎带着监护人员，已经将郑思群用棕板床抬到路边来了。只见他紧闭双眼，脸上没有血色，身上盖着一张白被单。张光明让监护组再去两个人，轮换抬着跑步奔向工人医院。

医院已经做好准备，领导和医生们等在门口。张光明向医院领导说明：伤者是重庆大学校长，高级干部，市里十分重视。要求医院全力以赴，务必挽救病人生命。医院领导立即给医生耳语，医生连连点头。

一会儿，响着警报的军用救护车，载着西南医院的几位专家飞驰而来。车还没有停稳，军医们就跳下车，冲进抢救室。

随后，余跃泽、钟池、崔成礼跑步而来，气喘吁吁。

抢救中，市委一把手鲁大东飞车赶到。随同鲁大东来的还有王若、张海亭两位秘书长。鲁大东询问自杀情况和发现以后的处置经过。余跃泽说：是张光明最先接触情况。

鲁大东叫张光明过来直接汇报。汇报中，有人提出应当直接送西南医院。张光明解释：当时天没有亮，没有担架，没有医生，没有救护车，甚至没有多的工作人员。事发突然，连喊司机调车都来不及。即使有车，也无法往轿车里放。为了争取时间，抢救生命，不能不先往最近的医院送。并且也考虑了西南医院的技术实力，故而电话向西南医院求援。事实上，郑思群送到这里后，西南医院的医生随即就到了。这比等着救护车来现场再送西南医院，更能赢得时间。

对张光明的解释，鲁大东等人认为处置得当。

医生们用尽了一切办法，并大量输血。但因出血过多，没能挽救郑思群的生命。直到 9 点多钟，才不得不停止抢救，宣布郑思群死亡。

郑思群遗体存放在医院太平间。鲁大东吩咐，通知工作组党委成员、重庆大学校党委成员，不是校党委成员的系总支书记，不是工作组党委成员的系工作组组长，专案组长，立即召开党委扩大会。趁着等人的间隙，大家草草吃了早餐。这时已快中午了。

鲁大东亲自主持这次党委扩大会，宣布郑思群自杀身亡。他说：郑思群虽然被审查，但他还是共产党员。按照党的纪律，不管什么原因，自杀都属于叛党行为。因此，郑思群是自绝于人民。然后，对于郑思群自杀的善后工作进行了部署：

第一，立即召开全校共产党员和有一定群众参加的大会，公布郑思群自杀。

第二，天气太热，遗体必须当天火化。火化之前，通知其妻子与遗体见面，同时请省委党校协助做好家属的思想工作。

第三，从现在起，学校党委与工作组党委合并组成联合党委。合并后，指定余跃泽任书记，钟池、张叶枫任副书记。除原来两个党委的委员外，补充张光明为联合党委委员。

第四，学校文化革命运动，不能因为郑思群的自杀而受到干扰。联合党委要团结全校师生员工，充分发动群众，把文化革命进行到底。

第五，立即通知公安机关派员勘察自杀现场，对自杀利器来源进行侦察，做出技术鉴定。

第六，为争取时间，市委直接向省委、西南局书面报告自杀及抢救经过。工作组无须向市委写简报，集中力量做善后工作。

8 月 2 日上午，正当重庆大学围绕郑思群的问题议论纷争之际，工作组在各总支分别召开党员紧急大会，宣布校长郑思群在当日凌晨 5 时 20 分自杀死亡的消息。

中午，就有人来到工作组，要求公布校长郑思群自杀的真相。

当天下午，各系工作组紧急召开系全体师生大会。先传达政府文件："8 月 1 日起大米涨价，从每斤 8 分 3 厘涨到每斤 8 分 7 厘。"工作组照本宣科了涨价理由，话题一转，通报郑思群当日早上 5 点自杀死亡。

学生们懵了，女同学"哇哇"哭了起来；工作组以为"左派"会

喊“打倒郑思群！”可党员骨干也都没有反应。寂静之后，会场一片嘈杂，秩序大乱。工作组怒吼：“郑思群是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是敌我矛盾，大家要站稳立场！”党员们这才想起帮工作组，维持秩序。

会一散，学生们拥到囚禁郑思群的小楼前，人山人海。校长办公室工作人员曹万华正在楼前对前来的学生们说：“……在山东战场，日本鬼子大扫荡包围了我们机关，警卫连打光了，我也受伤昏了过去，醒来发现他还有点气，我把他背到老百姓家救过来，从此我一直跟着他。他脑袋内还有一颗敌人的子弹没取出来，和他同级的战友在部队都是中将军衔，丁盛见了他都要立正敬礼，称他老首长，逢年过节来探望他，唯独重庆市委书记任白戈说他对他们爱理不理，搞独立王国，想方设法搞他。工作组不给他报纸看，不准他听收音机，每天在他们的监视下由我给他送饭，他们有组织有计划地在楼外贴满了标语，什么‘黑帮’，‘火烧’和‘打倒’，从精神上折磨他，恐吓他。昨天晚饭，他只吃了一个蛋糕。没想到日本鬼子没有打死他，国民党没有杀掉他，今天居然死在工作组手里。”

曹万华战争年代是郑思群的警卫员，一脸麻子，大家都叫他“麻子大叔”。麻子大叔一把鼻涕一把泪，边说边哭。男儿有泪不轻弹，一个男子汉大哭，感动得在场师生也都泪水涟涟。

麻子大叔骂道：“我是个大老粗，我他妈不怕，余跃泽是什么东西？老子在枪林弹雨中玩命时，他在干啥？什么地下党，玩女人！他们趁文化大革命之机专门整中央驻地方干部。”

余跃泽是地下党出身。骂余跃泽玩女人惹得师生们哈哈大笑，掌声雷动，麻子大叔像得胜的将军，得意洋洋，又讲述老校长对他的看重，说老校长对他说，“你不可能一辈子在我身边。从我身边出去的人，至少应当个县委书记。我这不是跟你封官许愿，我是希望你不断有进步。”

曹万华还说，郑思群在部队是正军级干部，应该拿 310 元的军队工资，考虑到国家困难，他主动要求只拿 240 元的地方工资。他平时一身黄军装，戴顶黄军帽，屁股上两个补丁，膝盖上又是两个，只有在公务出门或是见外宾时才穿好衣服。国家每月发给他香烟，两条中华一条牡丹，他只要一条中华一条牡丹；郑校长要求大家生活上平等，一次学校食堂分鱼，按干部行政级别分给一斤两斤三斤不等。食堂给老校长送去一条五斤的，他就问别人分得了多少，当得知他是最多的就坚决不要。

除曹万华煽情外，其他对郑思群有好感的工作人员、学生们也纷纷议论郑思群的优点。

群众中的不满情绪很快激化为对工作组的愤怒质问，有的学生还发电报去西南局和中央，指控工作组把郑校长迫害致死。紧接着，工作组大院外面，墙上、地上、电线杆上都贴满了质问工作组的大字报。到了下午，工作组院外已经是人山人海。有的高呼：

“还我郑校长！”

“工作组是杀死郑思群的刽子手！”

“血债要用血来还！”

“把郑思群专案组的人交出来！”

当天晚上，专案组送来公安部门的勘查结论：郑思群本人用左手握住刮胡刀片，切割其右颈部的动脉血管，出血3000－3500毫升死亡。是自杀，排除他杀。刀片来源是他夹在书中带入松林坡的。刑侦专家指出：一般来说，用左手握住刀片切割右颈部的动脉，只有懂得生理常识而又决心自杀的人才会这样做。因为切割皮肉产生疼痛时，痛的本能会自动松手而切割不深。人的右手灵活，松手较快，自杀容易失败。而左手笨拙，在慌乱中反而会切割得更深。郑思群使用左手而不用右手，割断了血管的大部，故而失血太多，尽管抢救及时，但抢救无效。

入夜，同学们都已酣然入睡，曾经对揭发郑思群持怀疑态度的校文工团美术队队长周孜仁依然激愤难平。他一个人伏案疾书，匆匆给西南局及书记李井泉写了一封状告重庆市委及工作组的信。信毕已近子夜，他急急敲醒了邻屋的吴庆举，给他看了信稿。出乎意料的是，吴庆举看后，非常紧张地把信叠起来，塞还给周孜仁说：“快收起来！快收起来！这样做太危险！”第二天，周孜仁一人上街，把信寄了出去。

第 121 回：接通知，工作组紧急撤离

难走脱，困校园生活维艰

8 月 3 日上午，重庆大学不少学生抱着一捆捆大字报走出校门。大字报上街了，郑思群的死，捅到社会上去了。大约 10 点钟，市委来电话，学生已经到市委大院贴大字报去了。

余跃泽被通知到市委参加紧急会议。大家以为，一定是与郑思群之死有关，吩咐专案组准备汇报材料。不料他从会上打来电话，指示张光明立即去新盖的机械系教学大楼，实地查看水泥地板是否潮湿？自来水通不通？厕所通不通？能够住多少人？如果有什么问题，立即联系学校行政处解决。他说，学校负责人张叶枫也在市委开会，已经给行政处打过电话了。

临近中午，余跃泽又来电话。要张光明通知各个系的工作小组组长，吃完午饭后，立即到会议室来等着，有重要事情要传达，一个也不能缺席。

这时，重庆大学采矿系三年级学生、美术队队员李远旭冲进宿舍喊着："惊人消息！惊人消息！"原来，8 月 3 日这天，重庆市委是在重庆人民大礼堂召开全市大专院校和中学文革积极分子大会，正式传达北京新市委召开的大、中学校文革积极分子大会精神和毛泽东有关撤销工作组的指示、刘少奇关于"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等讲话。重庆大学每班选派 3 人参加。开会的代表还没有回来，消息就已经先到学校了。

午饭刚过，火炉山城已是毒日当头，走在水泥地面如行炮烙。美

术队几位学生憋不住激情如沸，全都光着脚丫跑到二宿舍前的马路上写标语，一边铺纸一边写，四句话："拥护党中央，拥护毛主席，赶走工作组，自己闹革命！"

标语的轰动效应没维持多久，下午开会代表就回校了。余跃泽传达了市委撤出工作组的紧急决定。大意是，毛泽东从外地回到了北京，对派工作组的做法甚为不满。因此中央做出决定，全国各个省、市、自治区向学校派出的工作组，至迟必须在今天下午 6 点钟以前撤出。否则就是对抗毛主席。工作组撤出后，还不能马上离开学校，就地接受群众批评，清算错误，求得谅解。

余跃泽说："开紧急会议时与张叶枫商议，工作组撤出来全部住进尚未启用的机械系教学大楼。队员离开时，除了自己的行李外，不准带走学校的任何东西。工作中产生的文件、资料，全部带走，不留片言只字。工作场地和住宿地必须打扫干净。6 点以前进入大楼后，任何人不能踏出大楼半步，任何人不得接待亲友来访，任何人不得与学校的人接触。违犯者党员开除党籍，团员开除团籍，不是党团员的开除公职。军队干部违反了如何处理，请钟政委考虑。"

钟池说："也和地方一样，开除。"

余跃泽接着说："现在大家回去，各个系立即召集工作组员传达。除了毛主席批评的话不可以传达外，其余都可以给大家讲。传达后各自分头准备。准备好了以后就地待命，等待市委来电话，各个大专院校同时行动。接到通知后，以各个系为单位，直接去新大楼。不准向学校师生透露任何情况，不准和他们告别。如果他们问，就说集中学

习。”

下午 16 时许，市委打来电话，说是各个学校都已准备就绪，可以撤出了。张光明叫两个人分别给几个系打电话。到了 17 时，收拾妥当了，但是工作组大门也被学生堵住了。原来这些学生是见一些系的工作组员慌慌张张离开，不知出了什么事情，来问个究竟。

来访群众堵了大门，恰巧张叶枫带着一辆卡车来给工作组拉东西，进不去。而工作组的孟凡均、殷青锋被学生缠着，行李还没有收拾。眼看剩下的时间不多，张光明挤到殷青锋的旁边，向他耳语了几句。然后站在板凳上对大家说：

“老师们，同学们！我们接到上级通知，立即搬到新机械大楼集中学习。6 点钟以前必须报到。现在拉东西的车子要进来，我们的人要出去，请你们让开通道。有什么情况和问题，改个时间再谈。时间紧急，请大家支持。”

在张叶枫的帮忙下，工作组按时撤进了新机械大楼。

当晚，吴庆举非常着急地找到周孜仁问：“你那封信的底稿还在吗？”

周孜仁说：“在。”

吴庆举说：“行，时机成熟了。抄成大字报，公布出去！”大字报题目是：《就郑思群自杀事件给西南局、李政委的一封信》，由周孜仁、吴庆举联合署名。文章张贴出去已过熄灯时分。学生们闻讯从四面八方赶来，兴致勃勃地用手电筒照看、议论。几十个黄色光影在大字报上你追我逐，刹是热闹。

第二天一早起床，二宿舍和九宿舍之间的路边已一字儿排开体育队好几份杀气腾腾的响应文章。其中一篇的标题是：《我们要怒吼一声：郑思群事件必须重审！》接下来，各系各班的大字报也如潮再起，直扑工作组。

当晚，工作组紧急召开全校声讨大会，由市委代书记鲁大东代表市委宣布开除郑思群党籍，接下来将所有学生领回各自班级强行表态。同时连夜组织“左派”写拥护市委决定的大字报。

但是，这些努力已属徒劳，无非再给大学生对失败者的嘲笑增添一些笑柄而已。大家已经不满足于在工作组驻地来几张漫画、几副对联或者打油诗，不满足于把余跃泽、孟凡均弄出来围攻挖苦一通。有好事者从松林坡现场侦察回来，突然暴出一大堆只有福尔摩斯才能够解答的疑团，推论是：郑思群不是自杀，而是他杀！罪魁祸首不可能是别人，只能是工作组！

于是同学们纷纷涌向松林坡，在专家招待所附近的墙壁、草坪和石阶上到处查找疑点，有人爬上围墙，说是发现了血迹，于是把长满青苔的砖头撬回去，用报纸小心翼翼包好，准备送北京交党中央备查。为保护自杀现场，同学们完全不经意地便形成了某种组织，松林坡成了全校的政治中心。许多人自觉地昼夜轮流值守，有的负责与市委、市公安局进行交涉，有的则做些筹款工作以备不时之需。这个行动的领头羊，就是吴庆举。那几天，随时都会从松林坡上传下些耸人听闻的新进展，每一条新消息都足以把重庆市委确定为刽子手。

重庆大学工作组进入大楼后，除了 3 个领导外，全部都是打地铺。

水泥地倒还干燥，但是满地都是厚厚的尘土。没有扫帚，只好将毯子往地上一铺了事。白天苍蝇乱飞，晚上蚊虫成群，只有靠扇子驱赶。更要命的是排污管道不通，大小便冲不出去。几百人拉屎拉尿，堆积在那里，大热天气，几层楼臭气熏天。个别同志病了，没有医生，没有药品，也不能外出看病。除了三餐饭是由学校食堂送来外，就是每天送三四挑开水。

大楼里，前两天还有自来水，后来也没有了。不知道是有人搞恶作剧，把进水管关闭了呢，还是自来水厂停水？向人打听，说外边没有停水。请担开水的工人告诉行政处找人检修一下。回答说，“基建部门还没有把大楼交付学校使用，行政处无法检修。学校混乱中，施工的人回原单位去了。”没有办法，只好这样呆着。

工作组在这里住到第三天，8 月 5 日，重庆大学工作组宣布撤离学校。闻讯而来的师生员工，自发涌往工作组驻地阻拦，要求澄清郑校长的问题。众怒难犯，工作组被迫暂留学校。

生活条件如此恶劣，工作组员暗自产生了埋怨情绪。但是大家都明白：如果工作组不撤到这里来，就是对抗毛主席。如果出去上厕所，势必与师生接触，一接触就说明工作组还在活动，也是对抗毛主席。如果就此一拍屁股离开了，不检讨，不认错，不等到谅解，更是对抗毛主席。在那个年月，谁敢冒这个政治风险！乖乖忍着吧。

几百人住在那样一个环境里，实在不是办法。工作组想给市委请示，没有电话。等了两三天，市委派联络员来了解情况。工作组反映了住宿和生活方面的实际问题。联络员一一记下。说，今后有什么事

情，由他来联络和转达市委的指示。他是刚刚从附近某个工厂调去的，对沙坪坝一带路径熟悉。他从来没有到过学校，师生不认识他，便于进出。除了他来以外，工作组有紧急事情，也可以派一个学生不大熟悉的人到市委去汇报。市委有特别紧急的事情，就打电话给学校的张叶枫，由他来转告。他说，市委估计，如果十天、八天对工作组没有冲击，队员们即可陆续撤离学校。要求他们再坚持看看情况。市委要求，在这几天内，千万不要惹出麻烦来。

联络员走后，余跃泽召集大家开会，动员大家克服困难，再坚持三、五天。好在工作组人员中，绝大多数都是原单位的领导干部。在地方干部中，县处级以上要占到一半，其他也多是基层单位的头头。百分之九十五以上是党员和团员。在军队干部中，营、团以上干部也是绝大多数，全都是党团员，都有相当的组织性和纪律性。再怎么样的困难都能够克服。第四天，他们叫送开水的工人转告张叶枫，要求他多送几挑开水来，供妇女使用。此后不仅增加了开水，还送来 20 多个搪瓷盆。又过了两天，水龙头里有自来水了。校医室每天还派医生来巡诊。有水、有医、有药，积存的大便也冲走了，工作组这才算安定下来。

8 月 8 日下午，周孜仁和采矿系学生蔡增其秘密潜往重庆市委党校，走访了郑思群的夫人、重庆市委党校副校长吴耕书。

吴耕书听说是重庆大学的学生，便称病不见，而周孜仁和蔡增其则坚持不见不走。最后，吴耕书妥协了，她让秘书把他们领进了她的办公室。

吴耕书非常谨慎地把门窗严闭，这才开始同他们对话。

周孜仁首先出示了郑思群“十大罪状”的抄写件并自报家门，迫不及待地说明他们的观点及同学们“保郑”的凛凛决心。年轻人的幼稚和真诚显然把老太太征服了，那天下午，她向两个素昧平生的不速之客说了许多在当时看来十分危险的话，她对这些学生说：

8 月 2 日上午，重庆大学工作组通知吴耕书到学校告别丈夫遗体，却被吴耕书明确拒绝。周孜仁他们以为，老太太对郑思群的死因一定有足够的判断依据。不料老太太非常肯定地对回答，听工作组通知说郑思群自杀身亡，她就毫不怀疑事情的真实性。“我相信他肯定是自杀了。”她说。

这个武断的结论让周孜仁和蔡增其大失所望。没等他们再追问，吴耕书就很坦白地告诉他们，她和郑思群诀别那一夜，俩人都彻夜未眠。郑思群对她发了很多牢骚，还说了苏联对斯大林焚尸扬灰和其他一些国际共运史上和党内的事情，让周孜仁和蔡增其这两个刚刚走进政治幼儿园的大学生如听天方夜谭。最后，吴耕书劝他们：“你们还年轻，政治斗争复杂得很呢！你们就少过问吧。”

那时候，大学生目空一切，头脑发热，以天下事为己任，可面对老太太消极厌世的教导，他们二人竟无话可说。老太太的这些话如被告发，她的政治前途将十分可怕。从吴耕书的办公室出来后，这两位年轻的大学生相约：为了保护老太太，也不至于给学校里对工作组的斗争带来影响，把这次对吴耕书的访问以及她的谈话瞒下来。他们这一瞒就瞒了几十年，直到二人都已年迈，周孜仁才将这次访问公开出

来。

重庆大学工作组不管事了，学校彻底进入了无政府状态。大学生们无事可做，开始将“革命”引向社会。8 月 12 日晚上，已经初尝领袖滋味的吴庆举又找到周孜仁，商量到外校串连的事。重庆的大专院校，离重庆大学最近的是建工学院，当然应该第一个去串联。于是，周孜仁连夜起草一份大字报：“致全市大专院校革命师生的一封公开信”。

稿子拟好，又让文工团戏剧队毛笔字写得最棒的刘锡玉正楷抄好。这份公开信后来被说成是“轰动山城第一炮”“重庆市的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后来开会游行，有好事者还把它抄得老大，抬在队伍前面开道。

第二天，8 月 13 日，吃完早饭，大字报就由重庆大学戏剧队、舞蹈队和美术队的一些热心分子拿去铺在三宿舍门前的路上征集签名。大字报后的空白处签满了，又接一张纸继续签，完了，又继续铺纸。签名的人太多，纸张从三宿舍门口铺去，一直到民主湖还在继续延伸，足有百米以上，签字的人数很快上升至数千。事前，吴庆举他们只是打算几十个人到建院把大字报贴上就完事，没想到声势一搞就这么大，他们都有点不知所措。好在，那几年政治活动多如牛毛，开会游行多如牛毛，好些年级的学生还去部队作过为期不短的军训，开展大型活动的纪律准备和道具准备完全没有问题，于是有人提议：让乐队的同学把铜管乐器统统拿去广场耀武扬威地吹起来！所有签名的人一齐开出去！

这一招真灵！几千学生很快就举着毛泽东的画像和语录牌从四面八方涌来，按系按班整齐有序地排好了队伍，文工团的学生临时又赶写了些“革命造反精神万岁”之类的大标语，整个排场就很像一回事了，这就开出去，开进了建工学院的校园。

建院毫不设防，重大学生如入无人之境。也确实是无人之境，因为建院的工作组还把学生圈羊一样全关在房间里学文件。对这一帮天外来客般的不速之徒，循规蹈矩的学生只敢把头伸出窗外去偷窥片刻，作一番无奈的感叹。

重庆大学学生在兄弟学院顺顺当当走了一圈，又在建院广场草草举行个仪式，自拉自唱地把公开信念一通，便得意洋洋地打道回府了。

回到学校，余兴未尽的学生顺手捎带又把重庆大学的宣传部长邓时泽、团委书记刘稚民无辜地带一回高帽游一回街，侮辱一番，串联行动胜利结束。

当天下午，在文工团戏剧队的房间里，由吴庆举主持召开了总结会，各系派代表参加。到会的有校体育队周家喻、冶金系熊代富、查正礼、电机系黄顺义等。

这天晚上，建院一个叫何德林的学生就悄悄地来到重庆大学，找到吴庆举等人，对他们当天的游行表示感谢，还要他们帮忙转交告状材料。

第二天，8 月 14 日，重庆师范专科学校干脆来了一帮人，自称是该校惨遭党委压制的两个战斗队“排炮”和“轻骑”的代表，为首的叫唐忠明，是该校中文系学生，口才极好，后来成了该校造反派的一

号领袖。他们要求重庆大学声援、支持他们。吴庆举和周孜仁在九宿舍门外的地坝里和他们进行座谈。座谈会后，吴庆举马上把前一天总结会的各系代表约来文工团议事。有了 8 月 13 日的经验，他们很快制定好第二天行动计划，然后便各自回系分头行事。

他们贴出海报:“愿参加声援师专的革命师生，1966 年 8 月 15 日，星期一，早上八点半在新操场集合前往。”

周孜仁的任务是去师专和学校当局联络，安排场地茶水诸项事宜。接待他们的是一位女士——师专“文革筹”组长。女强人态度强硬，拒不接待，重庆大学的学生又挟势凌人，胡搅蛮缠，双方吵架至深夜，最后不欢而散。

## 第 122 回：八一五，重庆党委受攻击

## 温玉成，广州军区遭炮轰

8 月 15 日早上，重庆大学来集合的有 3000 多人，师专附中、重庆市六中又来了近千人，共 4000 余人，人数之多出乎意料。两队纠察维持秩序，摩托车开道，队伍整齐威风，秩序井然的向几里外的师专进发，一路秋毫无犯。师专“排炮战斗队”、“轻骑战斗队”壮着胆聚集在校门口迎接。

师专文革筹已知道重庆大学将前往闹事，也连夜作好准备。学校大门口的马路上，用石灰水写满杀气腾腾的大标语：

“我们不要救世主！”

“重大一小撮右派滚回去！”

“誓死捍卫党的绝对领导！”云云。

他们把大门关了起来，不准重大的学生进去。但重庆大学人多势众，加上有师专的内应，很快就像电影中十月革命工人武装冲进冬宫那样，人群冲开大门，几千人蜂拥而进。

群众在师专运动场排好队，准备开会。师专文革筹的人围在操场四周起哄，冲会场，师专文革筹还叫来正在师专施工的工人助威。重庆大学是工科，学生野蛮，纠察队员更是人高马大，师专的文弱书生哪能与重大学生论力！只能被挡在广场周围辩论。重大在学校广播站服务的学生张德昂等人一早就去师专广场安装高音喇叭和扩音机等广播器材，头天周家喻等人已和他们联系了，连汽油发电机也抬去了，各种专业的学生七手八脚，很快装好设备。

大会也邀请师专文革筹代表上主席台。文革筹代表不顾议程，上台呼喊："重大的同学们，你们受蒙蔽了，有坏人在挑动，你们别上当，快回去，坐下来，学习《十六条》，宣传《十六条》，贯彻《十六条》。要相信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

台下一片狂喊："狗坐篼篼不识抬举，轰下去！"

会场乱了，喧声如沸，热闹非凡。在一片嘈杂声中宣读了《重庆大学声援师专革命师生的信》，师专反工作组的代表致欢迎词。双方抢喇叭，话筒。"哇啦哇啦"，听不清楚。广场上一片叫骂、吵闹。操场中间红旗标语乱摇一片，重大学生窜动其中，歌声吼声雷涌瀑响。场地四周则全站满师专的学生和不知哪儿请来的工人，一派虎视眈眈，冲突随时有一触即发之势。

山城八月，"秋老虎"呈威，中午骄阳似火，气温达 38 摄氏度，大家在烈日暴晒下对峙数小时竟无退意。师专文革筹断水，操场上铺着煤渣，热浪闪烁，操场上像晒肉干儿，人们纷纷跑到街上茶摊买老阴茶喝。

主席台面向广场左斜对面是坡坎，坡坎上面是教学大楼，靠广场边坡坎壁上修着几个防空洞。太阳暴晒，好多人热得都躲在防空洞里。

重庆大学要师专文革筹表态："今天的行动是不是革命行动？"

对方毫不犹豫地说："是暴徒闹事！"

此时，又出了一件小事：操场前面一幢办公楼正在修缮，重大学生就想把毛主席像挂上楼前的脚手架，师专方当然反对，就让施工工人前去阻止，于是冲突在脚手架便开始发生，全场由此大哗而且双方

的争辩对骂很快提升到对毛主席、对毛泽东思想、对文化大革命的政治感情、政治立场的高度。攻击愈演愈盛而显然不可能有结果，党中央太远，只好先找重庆市委断个公道。师专文革筹和重大学生都向市委告急！

重庆大学有个摩托队，熊代富、黄顺义等人乘摩托跑了多次，市委和重庆大学的学生已有过几次接触，怕惹不起，躲着不见。事情一直到晚上，双方学生还不依不饶。已是下班时间，前来看热闹的工人和市民如赶庙会，越聚越多，市委担心事态扩大，局面将更难收拾。市委副书记辛易之临危受命，硬着头皮来了。重大学生要他宣布这是革命行动，师专学生要他表态为反革命行动。辛易之转弯抹角，含含糊糊，逼得实在没办法，他只好说："不是反革命行动"。不是反革命行动也行，"签字！"他死也不愿落笔，他劝同学们回去，说如果是大家心中有气，可以对他撒等等，讲完之后，他就准备离开。

参加大会的群众对辛易之不得要领的讲话当然非常不满，又见他准备走人，于是会场上就响起了"辛书记不能走"的呼声。当时辛易之已钻进了他的小汽车，这一下更激怒了在场的群众，于是在场的一些人便围住辛易之的车不让走，双方僵持到深夜 12 时，最后辛易之还是走了。

天黑了，学生们被太阳晒了一天，也不耐烦了，撤回学校。

回到学校已是深夜，而重庆大学却无人入睡。《辛易之是屠杀群众运动的刽子手》《打倒重庆市委！》之类的大字报，从那一夜开始，向诺大山城，铺天盖地地蔓延而去。

第二天，8 月 16 日，重庆大学的周家喻、吴庆举、周孜仁、王太康和师专的唐宗明作为学生 5 人代表准备秘密去北京告状。周孜仁和师专的唐宗明、重大文工团的王太康先行出发，周家喻、吴庆举二人后来因故未能成行。周孜仁 3 人于 8 月 20 日和 21 日两次受到陶铸的接见，进了中南海。

8 月 16 日这天，重庆大学的学生们又有几千人到上清寺重庆市委请愿，口号就是要搞文化大革命，实际上是要市委承认“815 是革命行动”，怕当右派。于是有了重庆市文革以来第一次大规模游行，也就是后来所说的“815 事件”。

当晚，西南局承认“815”是革命行动。

当留在重庆大学校内没去市委，跟着校文革筹反对“815 事件”的学生听说市委承认“815”是革命行动，纷纷跑到工作组驻地第七教学大楼，问：“既然 815 事件是革命行动，那我们反对 815 事件的就是反革命行动吗？”

工作组回答：“政治不是你们做算术，不是 1+1=2，‘815’是革命行动，你们反对‘815’也是革命行动嘛。”

这些工科学生对 1+1 不等于 2 感到无法理解。

此后，重庆各个单位的造反派开始纷纷赶工作组，于是都跑到重庆大学来搬兵声援，“815”的名声坐大了，重庆“815 派”就这样形成了。

以后一段时间，重庆市围绕“815 好得很”还是“815 好得要死”，就是反对“815”，两种观点到处在辩论。尤其是在市中心解放碑周围，

很多群众都出来聚在那里，自发地进行辩论，连六、七十岁的老太太也参加其中。此时重庆的群众是一片沸腾，起来揭发自己单位领导的人也很多，在马路上有人写了大字标语“八一五好得很”，一个字有几米见方。反对“815”的，不敢说“815”是暴徒，因为市委、中南局都肯定“815”是革命行动了，他们只能写大标语：“815 好得要死！”重庆人形容一个东西好，有说“好得要死”的，但这儿的“要死”，那是真巴不得它死，是诅咒。

8 月中旬，重庆市委大门外开始出现批判市委领导人的大字报。

重庆大学的学生走向社会，学校没有那么热闹了。趁着这个机会，市委决定工作组陆续撤出。8 月 20 日以后，重庆大学的工作组陆续撤出重庆大学。

在重庆发生“815”时，羊城广州也发生了“815”事件。不过，这个“815”是发生在广州军区大院。8 月 15 日晚，广州军区政治部上百名干部，手持质问军区副司令员温玉成的大字报，敲锣打鼓，涌入军区首长居住的司令部大院，齐集 1 号办公楼前广场，“勒令”温玉成接受并朗读大字报。有人手持扩音喇叭，不断高呼口号，还纷纷对温玉成厉声斥责、质问。司令部的不少干部，也表示支持政治部干部的“革命行动”。

温玉成是 1957 年调到广州军区任副司令员的。1957 年 11 月，广州军区司令员黄永胜在北京开会，总政治部给他送来一张温玉成的简历表征求意见，准备把即将从军事学院毕业的温玉成分配到广州军区工作。黄永胜对温玉成并不了解，不想接受他，于是在“意见”栏

写下了“听说此人很懒，建议不要分到广州工作”。但是总政没有采纳黄永胜的意见，一个月后，温玉成还是分到了广州军区。让黄永胜没有想到的是，经过一段时间，他发现温玉成并不懒，而是干劲十足，作风泼辣，工作中还常有独到见解，加之他又对黄永胜异常尊敬，黄永胜十分欢喜，对温玉成大加倚重，其权力竟然超过排在他前面的几位副司令员。温玉成由此在军区领导班子内颇为孤立，同第一副司令员、原38军军长、广州军区代司令员李天佑关系尤为紧张，曾多次当众对李天佑顶撞。李天佑论资历，论战功，都在温玉成之上，军区机关干部对温颇有看法。当时有一种说法：在广州军区 ，温玉成眼睛里只有一个半人，“一个”是黄永胜，“半个”是军区政委刘兴元。

林彪主持军委工作后强调突出政治，一时政治工作和政治机关的地位至高无上。温玉成却我行我素，对此漠然处之。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国民党军的P—2V夜航电子侦察机经常窜扰大陆，危害很大。解放军航空兵和高炮部队都把打P—2V作为首要的战备任务。温玉成公开讲：“什么突出政治？你能把P—2V打下来，就是突出政治！”很多人认为，这不就是早被毛泽东批过的“军事好，政治自然会好”的观点吗？在处理司令部与政治机关的关系问题上，温玉成也有一些很不利于团结的言行。军区政治机关不少干部对温玉成十分恼火，说他“什么思想都有，就是没有毛泽东思想；什么作风都有，就是没有‘三八作风’”！

这种不断积累的不满情绪，终于借“文革”之机爆发了。温玉成的尊严扫地殆尽，狼狈之极。此时司令员黄永胜正在北京参加中央全

会，这些干部便派代表向政委刘兴元请愿，要求“罢温玉成的官”。群情激愤，众怒难犯，刘兴元首先肯定了大家的革命热情，然后又表示他无权罢温玉成的官。不管代表们如何施加压力，刘兴元始终没有松口。这次行动，以后被称为“815 事件”。

刘兴元和在北京的黄永胜都连夜向中央军委报告了“815”晚间发生的事情，讲了他们的意见。第二天，传来了林彪的指示，对这次行动提出了批评，特别指出：要防止有人借机“捞一把”。后面这句话分量很重，很多人都被“震”住了。对刘兴元没有同意罢温玉成的官，林彪说“刘兴元同志是有原则的”。对温玉成，则肯定他“大节是好的”，而且说“温玉成同志是有干劲的”。“有干劲”是林彪选拔干部的重要条件之一，林彪的指示保了温玉成。

8 月 16 日这天，叶剑英主持中央军委第 54 次常委会议，讨论研究军队开展文化大革命等问题。会议认为：“军队的情况和地方学校，机关有所不同。军队的文化大革命一定要在党委领导下进行。”8 月 16 日,军委下发了《军委常委扩大会议纪要》,要求军队院校开展“四大”,破“四旧”。文化大革命之火正式在军队院校熊熊燃起。

广州军区的文化大革命轰轰烈烈，广东的学生自然更不消停。8 月 11 日中午，毛泽东在北京会见首都群众的喜讯传到广州，广州各单位纷纷组织游行活动。广州中医学院 301 名学生在游行时离开该校在校内游行的队伍，汇同其他一些院校队伍，游行到省委报喜和表决心。当晚中医学院的 301 名同学要求支援他们，由广东工学院发起，得到广州地区 6 所高校近万人的响应。事前未通知中医学院，就于

12 日凌晨 2 时集中到中医学院，开声援大会。一进院，他们就和中医学院不同意外出游行集会的多数同学发生争论。他们指中医学院多数同学是“保皇派”，喊出“打倒保皇派”口号，要解散中医学院的文化革命筹委会。

中医学院一部分学生指责这些人是“非法集会”，双方展开辩论，气氛颇为紧张。到早晨 5 时许，省委林李明、刘田夫、张云、王阑西匆匆赶到中医学院。

代省长林李明到校时很紧张，群众喊欢迎口号时未一齐喊，也没有举手，学生顿时出现不满的骚动。

又由于一时对情况不了解，林李明以询问的口吻问大会主持人开什么会，他想劝阻外校师生回去，于是广东工学院学生对全体同学广播说：“林李明态度很不好。”会场便哄了起来，立即有人喊“把林李明揪出来斗倒斗垮斗臭！”广东工学院一学生还写了一张很大的标语：“把林李明揪出来，斗倒斗垮斗臭！”挂在大楼上，甚至有人要林李明下命令解散中医学院文化革命筹委会。这时，中医学院多数同学也马上广播：“保卫林李明同志！”并自动召集了几十名纠察队员，站在主席台后面。接着他们把“把林李明揪出来”的标语撕下来，贴上“保卫林李明同志”的标语。会场一度混乱。

当时广东省书记处书记尹林平正在大学里看大字报，书记处候补书记张根生、李子元急急派人来叫他我回去，说林李明被包围在中医学院，现在那里很紧张，内外消息不通。尹林平不放心，亲自驱车到中医学院附近的现场控制点上，当他走到附近的汽车修配厂时，已经

看见公安厅副厅长白云带了一批公安人员在那里了。

省委非常紧张，大部分书记都连夜出动，并调派了大批公安人员在场戒备。

校内形势确实是一触即发。林李明等人再三要求大家保持冷静，双方摆出事实，把自己的道理讲清楚，然后学习《十六条》。大会随即转入辩论。辩论的主要问题是，一方认为，中医学院阻挠革命师生游行，文筹会不是民主产生的，以及错误地提出保卫校党委，保卫省委，和保卫党中央、毛主席连在一起，因而要求解散文筹会。另一方则认为，301 名同学，包括外校学生，别有用心地把矛头指向省委负责人，不经调查研究，就对中医学院运动横加干涉。

争了半天，最后林李明讲话，他表示："省委一定坚决支持革命师生的革命行动，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决贯彻十六条，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同时表示："省委工作人员一定向广大革命师生员工学习、学习、再学习。希望大家对尚未解决的问题，继续采取各种方式开展辩论。"并对自己初到时的不恰当的态度作了诚恳的自我批评，表示欢迎、接受大家提意见，贴大字报。

以后，广东的一些群众组织就已"301"命名。

8 月 16 日，赵紫阳从北京飞返广州，他风尘未洗，立即宣布"广东的运动不能说犯了方向性、路线性错误。"他传达了陶铸的指示："华东、中南地区没有犯方向路线错误"，"各省是否犯方向性路线性的错误，看是否实行反击，如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那就是方向路线的错误。反之，就不是。"赵紫阳接着说，"我们这里没有进行

反击，没有把革命学生打成反革命，所以不能说是犯方向路线性错误。”他还批评林李明不该在群众大会上承认犯了方向路线错误。

过后他还把林李明准备在华南工学院作检讨的提纲上有关犯方向性路线性错误一段删掉，并说：“今后不再这样说，越秀山说过一次算了。”

8 月 17 日晚上 7 时 30 分，广东省委常委在省委大楼 331 号会议室召开省委常委第 203 次会议。由赵紫阳主持。会议调整了省委文革小组成员，区梦觉任组长，张云、李子元、王阑西、李进阶任副组长，组员包括薄怀奇、马甫、王衍铎、白平、尤淇、李超、李雪光、谭桂明，另各地委各选一人参加。

在讨论完文革小组人选问题之后，赵紫阳提出另一个问题：“机关很快要起来了。机关压制民主的不少，有些已有严重问题，有些就是屁股摸不得。文革小组这一段主要抓学校，学校还未转上轨道，还要相当一段。”“当然，机关也要管，但这一段，主要是抓学校的。”他说：“厅、局部委贴省委的大字报，可贴在省委，机关是罢一批人的官，保一批人的官，升一批人的官。”

此时，广东省直机关的运动已风起云飞，处于暴风雨前夕。省委常委分工由尹林平、李坚真、刘田夫、寇庆延、赵卓云负责机关运动。农村社教运动和生产由张根生、罗天、杨应彬负责。城市企业“四清”和工业总的方面仍由刘田夫负责。孟宪德负责工业工作。赵紫阳把张根生作为二线人物，不同广州学生、工人接触，以便书记处都陷进去后，由张根生支撑整个局面。

撤出工作队，将在大专院校引起更加激烈的动荡，学生队伍将会出现更加严重的分裂。为了应付这种危机，省委在文革办公室下，再设立一个大学组，由赵紫阳、区梦觉亲自挂帅，成员包括刘田夫、张云、李子元等人，以及六名厅局级办公室宣传主任、16名处级组长或副组长。这个机构，人员配置非常强，但它的作用却很有限。赵紫阳无奈地说："如果省委被包围，我就跑，跑到农村去，跑不了，那就没办法，就抓去戴高帽子。"

8 月 18 日，广州市召开有 3 万人参加的市、区两级干部大会，广州市委代理第一书记焦林义宣读了市委书记处集体写的大字报《欢迎同志们贴我们的大字报》，并以高姿态宣布：所有领导机关的负责人，都是"炮打"的对象。省委文革小组决定，大、中学校的文化革命工作队，立即进行开门整风。

同一天上午，省委召开第 202 次（扩大）会议，由赵紫阳传达八届十一中全会精神。

第 123 回：有争执，桂林学生起斗殴

河南省，刘建勋炮打自己

再看与广东相邻的广西。8 月 5 日，广西师范学院工作队撤离时，师院的一些学生贴出“送瘟神”的对联：“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引起支持工作组学生的强烈不满，双方激烈争执和辩论，社会上前来参观这副对联的人也越来越多，直至发生学生之间斗殴。至 8 月 7 日，共打伤反对工作组学生 10 多人，这就是当时轰动一时的桂林“87”事件，也是广西最早的文革流血事件。广西医学院 30 多名学生率先自发组织队伍到桂林声援反工作组的学生。

8 月 10 日，广西师院学生就“87”等事件，派出代表赴北京向中央告状，要求改组桂林市委，要求广西区党委第一书记韦国清到桂林处理问题。

正在北京参加八届十一中全会的韦国清，散会后即于 8 月 13 日匆忙赶回桂林，立即在桂林市召集自治区党委书记处会议。广西自治区第二书记乔晓光、书记处书记伍晋南、贺希明、安平生、候补书记霍泛等都来到桂林，研究如何解决桂林问题。

8 月 17 日，王任重给广西师院师生员工发来一封电报,告知已收到他们的来信，并复信支持他们，表示他们的行动是革命行动。他在电报中说：“我和陶铸商量决定，授权予韦国清同志为首的区党委全权处理。韦国清是一位身经百战的战士，是中央委员，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兼自治区主席。我相信他能根据党中央的指示，正确领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关于撤销工作组的问题，确实是党中央和

毛主席决定的。希望革命的师生员工用十六条和毛主席著作来分清敌我，分清是非。希望革命师生员工团结起来，共同对敌，警惕敌人挑拨离间，谨防扒手，在广西区党委的正确领导下，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引向正确的轨道，为彻底打倒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而勇敢战斗。”

这天，广西第一批“首都红卫兵南下串连”的学生，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近代物理系的学生黄塞阳和人民大学学生古天阳的带领下到达桂林市。黄塞阳的父亲曾是桂林市书记处书记，1963 年调广西大学任党委副书记。黄塞阳到桂林广西师范学院和他原来的中学串联，很快组织起一支学生组织，并在破“四旧”的高潮中，捣毁了位于桂林东镇路阚维雍将军抗日殉国纪念碑。那天，他们按出身将学生分为好、坏队，然后浩浩荡荡地杀向镇东路，将纪念碑捣毁。

就在毛泽东在北京接见红卫兵的 8 月 18 日下午，广西自治区党委第二书记乔晓光在广西师院礼堂召开的全体师生员工动员大会上宣布：桂林市委书记黄云、副书记徐为楷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区党委决定并经中央批准，撤销黄云市委书记和徐为楷副书记兼“文革”组长的职务，撤销徐为楷驻广西师院工作队队长的职务，任命王同连为桂林市委副书记。

会后，师院外语系学生刘振林等师生，给徐为楷戴上高帽游街示众，遭到“赤卫队”围攻阻挠。接着，刘振林又带了一帮学生到市委抓黄云。黄云得知后，躲往梧州。这次给领导干部戴高帽游街在广西是第一例，引起社会极大反响，大街上到处出现围攻师院师生和“首

都红卫兵南下串连”学生的现象。当晚，正在桂林主持有桂林市委领导参加的自治区党委书记处开会的韦国清，认为学生这种过火行动是“右派”翻天，决定出动解放军桂林步校师生解决这一问题，并布置桂林全市加强警卫。这一举措适得其反，反而使双方的对立情绪更加激化。

而此时在中原郑州，学生们已经开始将批判的矛头指向了河南省委。8 月 1 日至 3 日，郑州大学中文系学生刘松盛拿着一份大字报底稿找他们班的团支部委员、代理书记、在校《文化革命报》做编辑工作的方复山商量。大字报从 20 个方面揭发批判中共河南省委及其驻郑州大学工作组所犯严重错误，其中写道：

“我们认为，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中共河南省委没有坚决执行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对运动领导不力，步子缓慢。……尤其是中共河南省委及其驻郑大工作组，在领导郑州大学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处理前郑大党委问题上，犯了极其严重的错误。中共河南省委在领导全省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存在着严重的问题。”

大字报最后写道：“我们怀着非常急切的心情，渴望我们最伟大、最敬爱、最英明的领袖毛主席在百忙中给予指教。我们认识对吗？这些问题如何对待？如何处理？我们下一步如何办呢？等等。切盼！切盼！”

方复山看罢，十分同意大字报的观点，他在文字上做些修改后张贴出去。这张大字报首次把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问题提到河南省委头上。

8月2日，还是郑州大学，外语系郑玉清、杨树生等9人已经贴出《河南省委也休想逃脱责任!》的大字报。同日，中文系党言川、王举章等9人也贴出了《彻底揭发批判省委和省委工作组执行的右倾路线》的大字报，对工作组进行全面的批判，并提出要追王培育镇压学生运动的“黑根子”。

与此同时，还有一部分学生则贴出了《河南省委驻郑大工作组正是体现了党的正确领导》《否定工作组，实质上是否定党的领导》等针锋相对的大字报。大字报中称党言川是“阴谋家、野心家”。

8月6日，郑州大学学生党言川首先前往北京，他要直接向毛泽东主席和中共中央汇报河南及郑州大学的文革情况。接着方复山、刘松盛两位同学也于8月8日动身赴京。他们3个人是河南省在文化大革命中，进京上访最早的3个大学生。

方复山、刘松盛到了北京以后，在国家地质部招待所见到了党言川。当时，全国进京的大学生只有几百人，全部安排在地质部招待所，公家管吃管住。

8月10日下午，党言川他们3人来到国务院接待站，见到了在此接待的国务院副秘书长许明，向她汇报了郑州大学和河南文化大革命的情况。

就在他们向许明汇报的时候，毛泽东来到接待站前的长安街上与祝贺《十六条》发表的北京群众见面。因为党言川他们是关着门汇报的，不知道外边的情况，事后只觉得是错失良机，后悔莫及。

8月12日，党言川他们3人在北京贴了一张大字报，标题是《致北

京革命学生的公开信——揭发河南省委某些负责人和省委驻郑州大学工作组主要负责人党若平在郑州大学文化大革命中所犯的右倾错误》。大字报中提到焦裕禄的战友张钦礼的妹妹、郑州大学数学系学生张凤芝在受到迫害时所写的《绝命书》：

“敬爱的父母，您的最小的女儿再也见不到您了。我的年迈的母亲，您怎么能想到春节的一面，便是母女的最后一别，我再也见不到您了。我的生身父母，你们不要为此过分伤心。但临死之前，我要向父母说明，您的孩子没有反党。我在您身边长大，我永远不会忘记父兄如何在白色恐怖下出生入死，不会忘记血泪斑斑的家史。不会忘记我六岁那年，二哥（指张钦礼)捉住我的手指教我会写‘毛主席万岁’五个大字，我永远热爱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我抱定了沿父兄的革命道路永远走下去的心愿。但是，现实对我的压力，使我失掉了生存下去的勇气……我不怕死后给我加上反党的帽子。我也知道，走这样的路太惨了。我的亲人，敬爱的父母和同胞哥姐，我是被逼死的……”

大字报轰动了北京城。

到了晚上，方复山听见外边乱糟糟的，就走了出去，看见人们都在往招待所的会议室涌去。方复山在走廊里，看见一大群学生拥着两个年纪大的人，顺便问：

“干什么的？”

一个人答道：“省委领导接见我们。”

“你们是哪个大学的？”

“西北大学！”边问边答，方复山也随着他们到了会议室。

经过主持会议者介绍才知道，那个40多岁的人是中共陕西省委第一书记霍士廉，那个50岁上下的人是中共青海省委第一书记杨植霖、《王若飞在狱中》的作者！霍士廉比较瘦，个子较高，有点文质彬彬；杨植霖的个头也不低，白胡茬子，比较土气平常。两位省委书记是来听取西北地区大学生们的意见的。大家提出许多问题，有些进行了答复，而有些问题却答复不了。

这时，西北地区的大学生们提出要见江青，霍士廉解释说："江青同志是中央重要领导人，我怎么答复能见不能见呢？"

有的同学提出打电话联系一下，于是，霍、杨两位省委第一书记就走到走廊尽头的桌边打电话，方复山也跟了过去。

霍士廉拨了几次电话，说联系不上，有的大学生说等一等再说。

这时，方复山挤到跟前请求霍士廉说："霍书记，我是河南的，陶铸同志原来是我们中南局第一书记，能不能联系一下，就说河南有人想见他。"

霍士廉说："陶铸同志现在也是中央重要领导人，他和江青同志一样，恐怕不容易见到。"

方复山说："见不到陶铸同志，能不能见一见我们河南省委书记？"

霍士廉答复说："这个可以，我可以转告刘建勋同志。你是哪个大学的？叫什么名字？给我写一下。"

方复山赶紧写了他们3个人的名字。

霍士廉接过方复山的条子后，在西北学生的催促下，又给江青拨

了电话，还是联系不上。借此机会，两位省委书记给大家讲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和伟大意义，鼓励大家要积极地投入到运动中去，并且表示省委支持他们起来闹革命。有些问题请示中央后，回到西安、西宁后再予答复。大学生们围着两委书记，七嘴八舌，说这道那，无拘无束，直到夜里 12 点才散。

8 月 13 日，党言川他们到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看大字报。中午回到地质部招待所吃饭时，广西桂林师范学院一位大学生问他们：

“你们是河南的吧？”

“是，什么事情呀？”

那位大学生说：“你们河南省委书记派人来找你们，没有见到你们，他就走了，下午可能还会来。”

果然不错，下午 16 时左右，真的有人来找他们。那人自报门庭说：“我叫黄松高，刘建勋书记派我来接你们的。”

党言川他们不约而同地说：“好呀！”

黄松高问：“你们是哪所大学的？”

“郑州大学的。”

黄松高说：“外边有车，咱们走吧！”

这时，一位中年妇女插了过来，他说：“我是新乡师范学院的教师，能不能一块去见一见刘书记？”

黄松高说：“可以，走吧！”小车开到北京前门饭店门口停下来。进到里边，碰见一个白发老头走了过来，黄松高低声说：“那就是西北局第一书记刘澜涛同志。”

到了刘建勋住的地方，这是个两间大的屋子，用屏风隔着。刚进门，一见到刘建勋，党言川就突然冒出一句质问：“刘建勋，你在郑州大学问题上有没有错误？”

来客的突然发问，令人防不胜防。面对如此尴尬的问题，刘建勋不愧为富有经验的共产党高级干部，只见他招招手说：

“同学们，不要急嘛！有什么话，先坐下来再说。”

可能就是这一次，党言川给刘建勋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待大家坐下以后，刘建勋问：“你们姓什么？叫什么名字呀？”

党言川他们一个个报了姓名，黄松高认真地记着。刘建勋说：“刚才小党提出，我在郑州大学有没有错误的问题。有！什么错误呢？右倾错误。原来，我也不知道怎么搞文化大革命，现在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开啦，《十六条》也发表了，我也明确了方向，有了依据，坚决按照党中央的部署办。回去以后，准备在郑州开十几万人大会，或者更多人也可以，号召广大群众炮打省委司令部，首先炮轰我这个司令官。你们看怎么样？”

“好！”大家异口同声地表示赞成。

刘建勋接着说：“关于郑州大学问题，抽时间我向郑大广大师生作检讨。”

刘建勋当时的身份是中共中央候补委员、中共河南省委第一书记、河南省军区第一政委。这时，刘松盛问：“刘政委，你号召炮轰省委司令部，省委内到底谁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

刘建勋笑了笑说：“小刘呀，你提这个问题叫我怎么回答呢？什

么事情都不能先入为主，我能随便说谁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吗？究竟谁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只有通过充分发动群众，根据揭发出来的问题，经过组织上核实，谁有重大问题，够上条件，谁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

对于刘建勋的答复，大家不约而同地点了点头。

方复山接着问：“刘书记，同学们在大字报中质问党若平是什么人，工作组在郑大到底干了些什么？他们的做法，你认为怎么样？”

刘建勋风趣地回答：”党若平是什么人？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嘛！他还能是什么人？驻你们郑州大学工作组是省委派去的，犯了方向性、路线性错误，你们不要纠缠党若平同志，我是省委第一书记，责任在我身上。当时，郑大出了问题，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按照上级的指示，就派工作组进去。现在不是已经撤离了吗？”

对于刘建勋的答复，大家觉得满意，气氛就活跃起来，双方说话也就比较随便。

晚上，党言川他们和刘建勋一起参加了在北京体育场召开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回到前门饭店，刘建勋问他们：

“八届十一中全会已经闭幕，我明天要回河南去，你们回不回？”

大家简单商量了一下，认为他们的省委书记态度很明确，没有必要再找其他领导人，回去就回去吧！刘建勋说：

“好！咱们一路，明天也准备你们的车票，到时候我派车到地质部招待所接你们。”

8 月 14 日，吃罢晚饭，刘建勋派小车来接党言川他们，在北京车站稍微休息一下，便登上了南下列车。刘建勋给党言川他们安排的是卧铺。火车到新乡时，天将黎明，师范学院那位老师下了车。黄松高也把党言川 3 人喊醒，领到刘建勋在火车上的包厢里。刘建勋问：

“你们看过梁斌同志写的长篇小说《红旗谱》吗？”

党言川直言快语地回答：“我们 3 个都是大学中文系的学生，哪会不看？”

刘建勋接着说;“我是河北沧州人，梁斌同志在《红旗谱》中写的保定二师闹学潮，我是二师的学生，也参加了学潮，就是今天的学生运动形式。那时我才 19 岁，什么也不懂，只知道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我们不甘心当亡国奴，打鬼子去！哪如你们现在的大学生，懂得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比我强得多呐！”

刘建勋又围绕“敢于革命，善于革命，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十六个字，一直和大家谈到郑州。他说：“要想学会游泳，首先敢于下水，不敢下水，就不可谈游泳。只有大胆地跳下水去，才能学会游泳。在游泳中掌握技巧，提高本领，成为游泳能手。这就是‘敢’字与‘善’字之间的辩证关系，首先是‘敢’字当头。做人要做有志气、有抱负、有理想的人，也就是毛主席教导我们的，做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只要认准是真理，就要坚持，哪怕抛头颅、洒热血，也在所不惜。许多革命先烈，为我们做出了光辉的榜样。但是有了错误，也不要羞羞答答，不要掩饰，不要弄虚作假，要敢于正视错误，改正错误，这才是一个有作为的人。”

8 月 15 日晨，党言川 3 人披着朝阳回到了郑州大学。

回到河南后，刘建勋在地市委书记会议上提出“炮打司令部”，并动员炮打“我这个司令官”。

第 124 回：李雪峰，北京工作交吴德　西安市，学生静坐建国路

8 月 15 日，毛泽东给刘少奇写信说："少奇同志：给续范亭信及我在信上建议改写的话，印象都不深了，如找到，请再给一阅，阅后送还，可否请酌。"

毛泽东给刘少奇的信中提到的这封信，是刘少奇在 1943 年 6 月 28 日就人性、是非、善恶等问题给晋西北行政公署主任兼晋绥军区副司令员续范亭写的一封信。毛泽东在当时读了这封信后，对其中的一些观点和提法批注了自己的意见，并于当年 12 月 17 日给刘少奇写信说："一气看完了你这一篇，前后看了三遍。并且率直批上了我的意见。""我也没有研究透彻，不能说我批的全都无错，还请你看后告我。"

当天，刘少奇接到毛泽东的信，即将他给续范亭的信及毛泽东的批注一起送毛泽东。

8 月 15 日这天，陈伯达、康生给毛泽东写报告说："我们请主席考虑，雪峰同志是否可以集中力量管华北局，不必再兼北京市书记，市委书记可由吴德同志接任。"

毛泽东于当晚 22 时批复："林、周、陶、刘、邓、雪峰同志阅，请林主持开会谈一下。雪峰市委暂时似可名义上不动，实际工作交与吴德持，需要华北局支持时去支持一下，似较好，请酌。"

从 7 月 15 日到 8 月 17 日，中共陕西省委召开了扩大的四届五次委员会，按照西北局会议的精神，继续揭批胡耀邦、赵守一、李启明。

8 月 3 日，西北局、中共陕西省委在西安西北体育场召开《大中

小学校“文化大革命”积极分子大会》，陕西省委书记王林在会上宣布：中共陕西省委第二书记、副省长赵守一是“陕西三反分子总头目，是黑线的总根子”。

“三反”是当时的通用名词，指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

这天,中共中央西北局和中共陕西省委宣布:“工作组不大适合大中小学校,决定撤销。以严克伦为首的交大工作组犯了方向性、路线性错误。”于是，从第二天开始,在打压“右派”学生的氛围下，本已沉寂下来西安古都，又有大批学生冲击本校党委,批判单位和省委领导的大字报也贴满各大专学校和市区主要街道、党政机关,全市到处发生批斗单位领导的情况。这种行为,也引起许多群众和干部的不满，各大学的保守派也相继组织起来,反对这些造反群众的行为。于是在8月中上旬，西安市一些大专院校内外和街头，不断发生不同观点的辩论、斗争，甚至是殴打。

8月13日，西安交大召开万人辩论大会，批判工作团，提出从“反对工作团入手，深挖陕西省委、西北局的黑根黑线”。批判的矛头指向了陕西省委和西北局。

这天下午，西安各界组织庆祝八届十一中全会闭幕大会，会后游行，西安交通大学的游行队伍近万人行进到钟楼时，已是夜晚，大街上围观的群众人山人海，有人喊：

“交大的学生你们为什么要反对省委，你们要造谁的反？”

四周顿时群情激奋，人们冲击交大游行队伍，要揪出反革命分子。

外校的学生手挽手组成人墙保护着交大的游行队伍，交大的游行队伍高唱“红军不怕远征难”，继续前行，回到学校时已经深夜。

8 月 14 日至 16 日，西安交大学生贴出“炮轰陕西省委，火烧西北局”，“造反有理”的大字报、大标语。一些大学生到省委门前贴揭发省委问题的大字报，接连 3 天，在陕西省委门前游行，呼喊“炮轰陕西省委，火烧西北局”等口号。许多工人、农民高呼“誓死保卫西北局、誓死保卫陕西省委”“坚信西北局、陕西省委的正确领导”等口号，阻止、围攻、驱散游行的学生。

8 月 16 日，中共陕西省委在西北体育场召开大会，正式宣布撤销工作团。这天，西北工业大学的宣传车在大街上播发揭发省委问题的稿件，同样遭到许多群众的围攻。车上的许多玻璃被砸碎。学生中开始用漫骂代替战斗，称霍士廉为“霍死脸”，称刘澜涛为“刘烂桃”。他们与一些工人、干部在大街上展开激烈的辩论，并不时发生冲突，有的学生遭到工人、农民和市民的殴打。

下午 14 时左右，西安交通大学、西安矿冶学院和其他院校的师生得知同学们在街上被殴打的消息后，冲出校门来到省委门前，要求省委解决问题。但是，省委一直没有人出来接待这些学生。学生们便在在省委门口席地而坐，静坐示威。西北工业大学和许多院校的师生及一些单位的群众也陆续前来支援，并参加静坐。同时，学生还派代表到北京找中央领导反映西安的严重事态。

很快，陕西省委所在地建国路就成了人山人海，以西安交大、西工大、西军电等院校的师生员工为主体的示威队伍，手中拿着各种标

语牌，上面书写着：

“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党中央!”

“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等标语，意气风发地唱着“团结就是力量”等歌曲，不断地呼喊着的口号，场面激奋人心。

一个学生在发表激昂的讲演，他宣读毛泽东的“我的一张大字报”的原文，向周围的学生和群众讲述这 50 多天来，工作组在西安交大等院校镇压革命学生、实行白色恐怖的事情。他说：“我们最听毛主席的话，凡是毛主席反对的，我们就坚决反对，就要跟他斗到底。”

那个学生继续说道：“交大的工作组是陕西省委和西北局派出的，他们执行了资产阶级的反动路线，建立了一个与毛主席对抗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今天，我们就要造它的反，革它的命……，请广大的革命群众支持我们，参加到示威的队伍中来……”

很多市民开始支持学生们的造反行动，为讲演的学生鼓掌并高呼着“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口号，还有一些市民加入了静坐示威的队伍。

在交大的静坐示威的队伍中，又多了一些中学生，特别是交大和陕工大的子弟，受到的影响比较大，纷纷参加到静坐的队伍中去。

随之而来的还有西安市、武功县、临潼县一些大中学校 5 万多学生参加到静坐示威的队伍中。静坐人数最多时竟达六、七万人之众，整条和平路都被坐满。

学生们在静坐现场召开“声讨省委黑帮大会”，向省委提出“八

点最最强烈的要求”，抗议 14 日至 16 日在省委门前围斗、殴打师生的“暴行”。

高音喇叭不断地播放着毛主席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让人们感受到好像就是毛泽东在指挥他们向资产阶级司令部发起进攻，那激昂的语言，那保卫毛主席的神圣使命，使得这些大、中学生就好像是真正地投入到战斗中一样兴奋。广播播放的一篇篇文章，好像是向“资产阶级司令部”发起进攻的檄文，伴随着一浪高过一浪的口号声，让建国路附近成了一片沸腾的红色海洋……

其实，仍有许多市民是反对学生们这样做的：朗朗乾坤，都是共产党的领导的天下，你们造谁的反？建国路附近有许多省级政府机关，很多干部不理解，他们不能同意“省委、西北局是资产阶级的”说法。

当那个同学还在讲演时，下面就有人反对说：“这是共产党的天下，你们造谁的反？！”

那位同学回答道：“我们要造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反。陕西省委、西北局执行了资产阶级的司令部的路线，派出了工作组镇压学生运动，我们就要造他们的反。”

反对的人是一个 30 多岁的人，干部打扮，看起来胆子也很正，他喊道：“你们的胆子这么大，这些话是谁说的？”

立即有人说道：“造反有理！这是毛主席说的。”还带头喊起了口号：“革命无罪，造反有理!”

反对的人说道：“你们这是反革命行为，要把你们抓起来的。”

在静坐示威的现场，当然是造反派的学生们多，不但人多势众，

还都被这造反的场面激发得热血沸腾，有了一次被打成“反革命”的经历，他们已经不害怕有人说这是“反革命”行为了。

面对那位持反对意见的干部模样的人，有的学生便耐不住性子了，只见一个学生指着那个反对者说道：“不跟他讲道理了，这是一个资产阶级保皇派！”

另一个学生说道：“剃头！给他剃个阴阳头！”于是，不知哪个人从附近的理发店拿来了一把理发推子，几个人扭住那个反对者，硬是将他油光锃亮的大背头从中间开出了一条白沟，在学生们一片哄笑声中，反对者十分窘迫地抱着头离开了现场，一边走还一边嘟囔：“土匪，一群土匪！”。

大会的广播中，还要求陕西省委和西北局承认学生的行动是“革命行动”。

到下午 18 时左右，西安交大的炊事员师傅们给静坐现场送来了大量的馒头、稀饭和咸菜。见到只要是交大的师生都去领饭吃，也不交饭票，附中的人就也跟着去领饭吃。

师傅们显然也从他们的脸上看出这些人不是交大的学生，一位师傅问道：“你们是哪里的学生啊？”

这些中学生理直气壮地回答道：“我们是附中的学生嘛。”

师傅赶紧说道：“是革命小将啊，快来，一人一份，不够了再来。我们支持革命小将的革命行动。”

说完，给他们每一个人的手中塞满了馒头，还一人给了一个碗，里面盛满了稀饭，放上了咸菜。

学生们感到十分的兴奋，在一种“革命”的氛围中，过上了“共产主义”的生活——“按需分配”了。不仅是交大，别的院校也都是这样，学校免费为参加静坐的师生员工们提供食物和水，以保障大家的身体健康。

到了晚上，看来静坐示威的队伍没有撤退的迹象，虽然人员稀疏了一些，肯定有人回去睡觉了，但是留下来的是绝大多数，而且热情十分高涨。

8月18日凌晨4时，刚从北京参加完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回来的西北局书记刘澜涛来到陕西省委门口静坐示威的西安市大、中学生中间，他向学生们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说：

“西安市大学中学诸位亲爱的同学们：我首先问所有参加这次伟大文化大革命的师生同志们好。让我们共同热烈地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所取得的一切胜利。”

他的开场白赢得了现场热烈的掌声。他又接着说：“我刚从北京参加了我们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回来，我们的党中央，我们最敬爱最伟大的领袖毛泽东同志很关心西北、陕西和西安市的文化革命运动。”这句话立即就被“毛主席万岁！”的欢呼声淹没。

刘澜涛在讲话中承认了西北局和陕西省委向大专院校以及中专学校派遣工作组是一个严重的错误，承认发生在西安交通大学的“六六”事件是一种革命行动，并说：“当我将要上北京的时候，我看了李世英同志的遗书。他是自杀了，以后抢救得很快，把他抢救过来了。他给党有遗书，他给他的父亲母亲有遗书。我看了那些东西，我的眼

睛看不清楚了。他是一个好同志，是一个革命的青年，只有 21 岁。虽然他受了打击，他不埋怨党，而且告诉他的家庭也不要埋怨党。我看了那个东西以后，就知道这里边有严重的错误，就逐渐纠正着，还有其他的错误。我们都如实地向中央作了报告。进行检讨，承认错误，承担责任，坚决改正错误。”

他说：“任何一个人，不管你的官多大，资格多老，只要你是反对毛主席的，反对社会主义的，反对文化大革命的，反对共产党的，统统都要打倒，统统要消灭掉。革命无罪，造反有理，这个话是完全正确的。”

刘澜涛的话再次被热烈的掌声和“毛主席万岁”的话呼声打断。

他又说：“现在，有些大专院校的革命师生，揭发批评中央西北局和陕西省委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我们对此表示热烈的欢迎。……至于有极少数人，说中央西北局和陕西省委‘完全烂掉了’，是‘黑帮’等等，广大的工农兵群众，广大的革命师生员工，是不同意的，在这种情况下，有的人提出了‘保卫西北局，保卫陕西省委’的口号，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这个口号是不对的。它不利于广大的工农兵群众，革命的知识分子和革命的干部，揭发和批评中央西北局和陕西省委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这种说法同我们的要求和愿望是不一致的。还有的人提出了‘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保卫西北局、保卫陕西省委的’的口号，必须指出，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这是绝对正确的。”

群众热烈鼓掌。

刘澜涛继续说："每个革命者，对那些反对党中央，反对毛主席的人，不管他们是什么人，我们一定要将他们统统打倒，彻底粉碎。但是，把保卫西北局、保卫陕西省委同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联系在一起，平列起来的提法，则是错误的。"

掌声再次响起。

刘澜涛："任何一个地方党组织，包括中央代表机关，如中央局，都不能同党中央相提并论。"

鼓掌声。

刘澜涛："最近由于'保卫西北局、保卫陕西省委'的口号，引起了许多争论，必须加以澄清。"

他最后说："同志们在这个地方据说已经有两天时间，你们比我们辛苦得多。现在是夜间4点多，没有太阳，比较凉快。我上面谈的这些意见，是对还是不对，或者那些对那些不对，希望听到你们的意见和批评。凡是不对的，我们就改。耽误了你们的休息和睡觉。完了。"

他的讲话赢得了长时间的热烈掌声，在"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的口号声中，学生们开始撤回学校。

而学生领导小组的成员，在撤回学校的过程中，受到一些群众的围堵。北京周恩来不断询问西安学生情况，当得知领导小组被围的消息，立即命令兰州军区派军队去解围，并将领导小组的成员用飞机送到北京。此时的北京，正发生这一起比西安更惊天动地的大事。

8月19日，李世英等人在北京受到周恩来、江青的接见。毛泽东看到西安学生绝食的材料，批示"李世英交大学生领袖" 毛泽东支

持学生造反，各级党委纷纷瘫痪，保守派很快土崩瓦解。

随后几天，西安交通大学热闹非凡，每天前来串联的队伍络绎不绝，川流不息。一过西安和平门，就能看到一队一队打着红卫兵或革命造反队旗帜、举着毛主席像或毛主席语录牌的人流涌向西交大。他们有的带着慰问信或贺喜大字报，敲锣打鼓去走访慰问。学校周围的篱笆上尽是大字报，看的人也很多。学校大门，更是拥挤不堪。在体育馆门前，参观的队伍排好长，里面展览有“八一四”“八一五”“八一六”流血惨案的照片和实物。

## 第 125 回：斗陆平，外地学生集北京
## 开大会，中央设立接待室

早在工作组时期，各地反工作组的学生就纷纷进京告状，到8月初，北京中南海接待站每天都有上百批的学生到这里反映他们那里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外地的。尤其是北京大学，来此参观的人平均每天都在5万以上。8月11日晚，北大一食堂，二食堂，三食堂、六食堂，员工食堂，全部住满了人。不算在同学宿舍过夜的，仅在北大筹委会登记的就有2000多人，而实际过夜的可能达到5000人。

《人民日报》头版头条报道了8月10日毛泽东来到中共中央信访站的消息后，大批红卫兵和群众涌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信访站庆祝和要求接见。8 月12 日，来北大参观的几乎达到10万人，大部分是天津、保定等外地大中学生及北京远郊中学生。这几天京津公路上，自行车，汽车来往不绝，天津大、中学校的师生大量的涌入北京，河北农大3000余人，一夜功夫就走了一半，全到北京大学来了。

8 月 13 日，天津大学少数学生为抗议学校的错误，徒步进京告状。毛泽东知道后，立即指示派车到杨村车站将他们接到北京。北京市称他们为“毛主席的客人”，予以热情接待。天津大学这些学生后来就以这一天作为他们组织的名称，成立了“八一三红卫兵”。当然，1958 年 8 月 13 日也是

毛泽东视察天津大学的日子，“八一三”也有纪念毛泽东到天津大学视察的含义。

8月13日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广播后，北大全校立即成了欢乐的海洋，北大师生和天津各院校的同学在校园里组织了联合大游行。由于日夜下雨，本来能露天过宿的同学现在都不行了，这天，北大所有的食堂和教室都住满了人；同学宿舍也住人，有一个女同学宿舍住了18 人。

8月14日，在北大住宿的天津同学在两万人左右。至下午18时止，来北大参观人数已至13 万，天津同学达1万人。听说还有几千名同学在京津公路上步行，预计第二天就会到达，中央已经派车去接。

鉴于此，北京市委决定，15、16日两天，北京大学停止接待。

8月15日，北京城已经云集了数十万名外地学生。北大、清华等大专院校乃至王府井、西单等繁华街道上，外地学生随处可见。

当晚 20 时,以聂元梓为首的北京大学“文革”筹委会在工人体育场召开 10 万人批斗陆平、彭佩云、张学书、谢道渊、王学珍等北京大学领导干部大会。北京、天津、保定各大中学校代表，中央各部机关，总参，总政，解放军院校代表及其他单位的工农兵代表 8 万多人列席了大会。大会还在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农业机械化

学院设了 4 个分会场。李雪峰，王任重参加了大会。大会一直开到次日凌晨 1 时 30 分才结束。大会一结束，北京市委就送走了参加大会的两万天津学生。

为了做好外地师生来京的接待工作，中央决定成立“中央和国务院联合接待室”，专门负责接待和协调红卫兵上访，处理文化大革命的有关事务，并选派一位各方面都无争议的军队干部来担任接待室主任。

8 月 16 日早晨,时任中央军委炮兵教导大队政委的宋杲，一位 1938 年参加革命的老军人接到电话：“已经派车前去接你。你马上直接到中南海国务院办公厅周荣鑫秘书长处，接受新任务。”

上午 10 时许，宋杲在滂沱大雨中赶到中南海西花厅。周荣鑫握着他的手，微笑着说：“任务很紧急，昨天晚上总理才定下来的。当前群众运动已经起来了，各地区上访的红卫兵和群众很多，特别是要求接见的人特别多。国务院办公厅信访办无法承担这么多任务。所以总理决定：马上从各单位抽调人，组成一个接待室，以适应当前形势发展的需要。接待室的正式名称为：中央和国务院联合接待室。总理点名由你担任接待室主任，立即上任工作。”

周荣鑫最后交代：接待室由周恩来总理直接领导，向他直接汇报工作，每天要有书面汇总报告，紧急情况可以使用红色电话，具体事宜可以直接找周荣鑫或者副秘书长许明。

联合接待室设在府右街北口，原国务院参事室办公楼内。楼前院里贴满了大字报和标语口号。这时，几十名工作人员，每天三班倒的接待各地上访的学生和群众组织代表。

与此同时，8 月 16 日上午 10 时，大雨中，中央文革小组在北京工人体育场举行“外地来京学生群众大会”。

此时的北京工人体育场红旗飘扬，人声鼎沸，造反歌此起彼伏，“毛主席万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口号声直冲云霄。北京新市委第一书记李雪峰和中央文革小组的康生、陈伯达、江青、姚文元出现在主席台上。

李雪峰首先说：“同志们，现在开会了，请中央文革小组第一副组长江青同志主持。”

李雪峰简短的开场白后，江青主持了这次大会。她说：

“革命的同志们好！我向你们致以崇高的无产阶级革命的敬礼！我受毛主席的委托，问你们好！”

这番话自然引来了山呼海啸般的掌声和口号声。

随后，她请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讲话。

陈伯达在大雨中作了题为《在大风大浪里成长》的讲话，他高度评价了外地来京师生。他在讲话中说：

“你们在毛主席的号召下，要同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作斗争，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你们来到伟大的首都北京，来到这个祖国的首都，来到祖国的革命中心，来到无产阶级革命的中心，我们衷心地欢迎你们。”

“像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经常告诉我们的，一切革命者，一切革命青年，都应该经风雨，见世面。革命者不可能在温室里成长，而是要在大风大浪里成长。我们要在革命的大熔炉里锻炼自己。你们这次到北京来，到无产阶级革命的首都来，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策源地来，经过很多辛苦，不怕大风大雨，你们的行动很对！你们的行动，你们的斗争，表现出你们有希望，你们能够真正做一个毛主席的好学生，能够做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你们这回到北京来，我想，将会在你们一生保存很深的印象，将会永远在你们心中激起革命的波浪，将会永远鼓励你们在大风大浪中前进，将会使我们祖国在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下，由你们——毛主席教育下的新的一代，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推向前进，把我们祖国进一步变成为世界先进的模范。”

他还指出“革命要依靠自己，自己教育自己，不能包办代替。”

整个体育场沸腾了，掌声冲天，欢声雷动，外地学生们激动得又蹦又跳，喊哑了嗓子，他们幼稚的心灵发出真诚的感谢与激动，因为他们终于从党中央听到了对自己行动的肯定。右派学生的帽子早已随着那浓重的闽南口音飞到九霄云外了。

李雪峰说：

“同志们，同学们：

我代表北京新市委欢迎你们！欢迎你们在北京各学校进行参观，进行访问。同时，他们也将和你们一起学习，交流经验。同学们来了以后，我们照顾得不够，我们的招待工作搞得不太好，请同志们原谅。……

我们这次来看同志们，如果你们需要什么，你们可以提意见。我们可以做组织工作，组织交通，组织车辆，按照你们的意愿送你们回去。如果同学们愿意在北京暂时停留一个时候，还要进行参观，访问，我们积极帮助。”

康生最后说：“我代表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全体成员向同志们问好！现在，我把文革小组的成员一个一个地向同志们介绍一下，赞成不赞成？”

众人答道：“赞成！”

康生又问：“可以不可以？”

台下齐答：“可以！”

于是，康生分别介绍了中央文革的各位成员：

“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陈伯达同志。

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第一副组长江青同志。

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副组长王任重同志。

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副组长张春桥同志。

常写文章的文化革命小组成员关锋同志。

你们在报纸上常见他的名字，常写文章的戚本禹同志。

常写反修文章，写九评参加者王力同志。

文化革命小组成员《光明日报》总编辑，《红旗》杂志副编辑穆欣同志。

写批判吴晗《海瑞罢官》的姚文元同志。”

然后说：“同志们，同学们，刚才我们文化革命小组组长陈伯达同志作了一个很好的讲话。同志们要很好地深思，要好好地学习。你们要走光明的道路，来到光明的首都，来到毛主席所在的北京，来交流经验，来互相传播革命道理。我们对你们这种不远千里来到首都的革命行动，表示热烈的欢迎！同学们，你们已经做了许多工作，你们这一次来也是一次极伟大的锻炼。同志们，同学们，你们能够在大风大浪中锻炼自己。陈伯达同志已经讲了，要我们好好学习十六条。这十六条决定是毛主席亲自主持写成的，这十六条是这次文化大革命的创造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创举。……谢谢同志们对我们的希望，我再一次向同志们致敬，感谢你们！”

随后，大会休息。休会后，人们在主席台上看到了一个熟悉的面孔——“周总理”。

“总理来了！总理来了！”消息立刻传遍各个看台，人头顿时攒动起来，目光也齐聚到主席台上。

周恩来稳步走到话筒前，可就在这时，不知哪个胆大的学生翻过看台的栏杆跳入场地，向主席台方向跑来。这个举动立刻引来数千人效仿，他们开始从四面八方向主席台冲

来。

负责保卫的海淀区红卫兵一看大事不好，立即进入场地，手臂挽着手臂，迅速在主席台前的跑道上筑起几道“人墙”。

“人墙”刚立稳，“人潮”就涌上来，并一点一点地推着“人墙”向主席台前挪动。

这时，周恩来的声音响起来了：“红卫兵小将们！大家不要挤，我们现在开会。下面，请林副主席讲话。”

接着，一个身穿灰色中山装、头戴灰色便帽的矮瘦男人走上讲台，他就是林彪。

此时，台下“人潮”和“人墙”之间的搏斗、抗争、拉锯愈演愈烈，外地的学生从四面八方拼命往主席台跟前挤，林彪讲了 13 次“同志们，静一静”，毫无作用。

突然更“可怕”的事发生了。十几名外地学生竟然跑道主席台的顶棚上，并趴在顶棚前沿，露出小半个身子向下探望。

周恩来一个劲儿地向他们摆手，示意他们马上离开，可这些人依然故我，一动不动。周恩来立即亲自指挥全场高唱《大海航行靠舵手》，但主席台前的秩序还是混乱。

周恩来冒雨走出主席台，让包围主席台的同学回去，他在大雨中淋了好一会儿，没有效果。

江青见状，只好说：“同学们，散会了，我们走了！”

林彪最终还是没有讲话。

主席台上的人都走了。主席台下的“人潮”这才终于停止了“咆哮”。当时，邓小平也在主席台上。刘少奇刚到会场，面对会场的混乱情况，他还没有下车就驱车回去了。

“潮水”退了，不大工夫，工体工作人员在主席台前的捡到的鞋子足足装了两大筐。

很多学生会后从工人体育场又来到中南海群众接待站。

大批来京上访的青年学生，最先都投宿于各大专院校的同学处。他们四处活动，多方联络，以求得到对他们行动的支持。而北大、清华是他们最集中的地方，铺天盖地的大字报让他们大开眼界；排山倒海的批斗会令他们意气风发。看看那些在台上低头弯腰，瑟瑟发抖的黑帮、当权派，有的学生难免要动恻隐之心，但是一想到就是这些可怜兮兮的人，曾经是那么专横、一意孤行地压制群众，又那么阴险地把天真的学生打成右派、反革命，用毕业分配威胁学生，就又觉得他们是罪有应得。

天津南开大学历史系学生黎钢后来说：“如果不是毛主席撤走工作组，那我们真是危险了。扣你一顶右派学生的帽子，发到边远山区，一辈子就完了。所以，我们当时是真心实意地拥护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对工作组恨到家了，如果不把他们批倒批臭，中国又将多出多少右派分子啊。”

文革中在一所军事院校读书的学生王佳说：“当时面临

着一夜之间变成反革命的下场，面临着受批斗受凌辱，面临着永生永世不能摘掉帽子并株连九族。而毛主席的一句话，‘凡是镇压学生运动的都没有好下场’，把很多人救了，而他老人家这句话是很得人心的，我们能不替他玩儿命吗？”

从大字报中开了眼，在批判会上开了心，又受到中央首长的接见，外地来京学生们纷纷从北大、清华所在的海淀区跑到中南海西安门国务院群众接待站。

他们说不清到底要解决什么问题，只是七嘴八舌地向接待人员诉说、反映本单位的领导如何压制“文化大革命”，其急切的心态、语调，仿佛接待人员能直接把他们的情况汇报给毛泽东，殊不知，不要说工作人员和他们一样，也是普通老百姓，根本无缘进入中南海；而且，很多工作人员是从没出过远门的北京人，对于来自五湖四海的同胞们的南腔北调理解能力甚差，压根就没听清学生们在说什么。

后来，学生们也意识到按常规办效率不佳，于是，他们把千言万语汇成一声声高喊：

“我们要见毛主席！”

“我们要见毛主席！”

从16日傍晚开始，直到17日傍晚，整整一天一夜，不时在群众接待站发出“我们要见毛主席”的呼喊，特别是晚19时，呼喊声尤为洪亮整齐，他们希望8月10日的神话能够再次出现。

神话没有再现，却传出了神话般的消息：“毛主席要接见红卫兵！”

8 月 16 日晚上，毛泽东就已同意在北京召开百万人规模的“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群众大会，参加大会的主要是来自北京和全国各地的青年学生。大会日期定在 8 月 18 日，毛泽东表示将出席这次大会，接见北京的红卫兵，并要求为他准备一套军装。

## 第 126 回：急筹备，准备接见红卫兵

## “新北大”，见清华三方代表

接见红卫兵的任务被火速安排下来，周恩来宣布，由“首都工作组”成立红卫兵接见指挥部。北京军区副司令郑维山兼管“首都工作组”办公室的领导工作，具体负责红卫兵接见的现场指挥责无旁贷的由他负责。

此时，原来的“首都工作组”办公室的几个工作人员已经无法应付北京急剧发展的革命形势，不得已又先后从总参作战部调来处长蔡洪江和 5 名参谋。同时又从其他单位临时借调了一些人来协助工作。“首都工作组”办公室迅速扩大到 20 多人。

受领任务后的郑维山，立即把首都工作组成员：总参作战部蔡洪江、北京军区副司令兼卫戍区司令傅崇碧和国务院秘书长、总理办公室主任周荣鑫等人召到解放饭店开会，筹划部署 8 月 18 日大会的准备工作，由蔡洪江、傅崇碧、周荣鑫等人分别负责作战部、安全保卫部、后勤保障部的工作。

紧接着，公安部部长谢富治等相关部门领导也集中到解放饭店开会，大会的安全问题，由公安部负责。

北京军区所属有关的部队开始迅速赶往北京各城区，对集结在各个地区的学生进行划片管理，各负其责。

为了保证大会的安全，周恩来亲自部署、组织，指示国务院秘书长周荣鑫，组织中学各校的红卫兵成立临时纠察队，参加 8 月 18 日的大会，和解放军战士一起维护大会的正常秩序。

8 月 17 日晨，参加纠察的中学生都穿着整齐、干净的旧军装，乘坐部队派来的大卡车，来到中山公园西门，由国务院联络员安排他们在“来今雨轩”休整、学习，并给每人发了一个印有“红卫兵”三个黑字的红袖标。

很多人是第一次戴上红卫兵的袖标，兴奋得不得了。7 月初，有些中学生把红领巾缠在胳膊上，以示红卫兵和普通学生的区别。后来演变成红袖标，和街道上值班、查卫生的老大爷、老大妈一样。在后来，有人开始用毛笔写上红卫兵三个字，这成了红卫兵标志性的象征，很快发展成正式的红卫兵袖标。中学生们不知道红卫兵今后会向什么方向发展，他们只知道保卫毛主席没有错，跟着毛主席走没有错。

周荣鑫秘书长接见了他们，并对他们说：“明天你们必须坚守岗位，一步也不能离开哨位，不要随意走动。你们就没有机会上天安门了，你们要甘当无名英雄。周总理已经答应，只要你们圆满完成任务，大会结束后，他要亲自接见你们。”

听说周恩来要亲自接见，大家都兴奋异常。当晚，学生们就在“来今雨轩”和衣而卧，度过了紧张、不安的一夜，他们以中学生特有的天真和浪漫迎来了 8 月 18 日这一天。

师大女附中“文革筹委会”主任刘进是 8 月 16 日接到的通知，说要在天安门广场召开“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大会”。她们决定以班为单位组织参加。当天即开始投入紧张的准备工作。按照市里的要求，主要是制作“红卫兵”袖章和标语牌。

“红卫兵”袖章就是红袖标。那时很少有人戴袖章，为了 8 月

18 日的集会，刘进带领同学们以各种方式赶制。8 月 17 日，筹委会组织了各年级的一批积极分子集中在学校大礼堂，把红色横幅、红绸布撕开，再裁成窄条。两位初中同学找来了毛体的“红卫兵”三个字，高二的一个同学用三合板刻了模子，刷上墨汁印制，但洇得很厉害，出了不少废品，所以那天印到很晚才做成 40 多条。大多数红布条来不及印字，就分发给各班了。

做木版模子的那个高二同学，她父亲当时已经被停职了。做了一夜袖章后，第二天她问初二学生小艾：“我能不能算红卫兵？”

小艾说：“你当然可以算了。”

于是她觉得自己也是红卫兵。她们的袖章因为是用墨汁印上去的，所以是黑字。

此时北京，打人风丝毫未见。8 月 17 日，就在师大女附中紧张的赶制红卫兵袖章，准备第二天天安门广场集会的同时，北京 101 中学的学生打死了该校美术老师陈葆昆。

同样是在这天，北京 2 中红卫兵响应《十六条》中提出的“破四旧、立四新”的号召，在市内张贴和散发传单《最后通牒——向旧世界宣战》。文中说道：

我们是旧世界的批判者。我们要批判、要砸烂一切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所有为资产阶级服务的理发馆、裁缝铺、照相馆、旧书摊……等等，统统都不例外。我们就是要造旧世界的反！

我们国家解放十七年了，但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仍然存在。被推翻的反动阶级不甘心他们的死亡，他

们总是要顽强地表现自己，和我们争夺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阵地，企图用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来腐蚀群众，征服人心，力求达到他们复辟的目的。毛主席说：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实践证明，毛主席的论断是英明、伟大、正确的。

资产阶级的老爷们懂得，要想复辟，必须在生活上打开缺口，使资本主义大泛滥。而理发馆、裁缝铺、照相馆、旧书摊……当中一些要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所谓的技术权威们，为了博得这些资产阶级老爷们的欢心，满足他们的奢望，就挖空心思，为他们服务，给他们大开方便之门。你们是金钱挂帅，金钱第一，你们对人民是有罪的！

首先，我们对你们——为资产阶级服务的理发馆、裁缝铺、照相馆、旧书摊……要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所谓的技术权威们提出最最强烈的抗议！

为了资本主义复辟，你们理出了大量的港式头。什么“飞机头”“无缝青年式”“螺旋宝塔式”“青年波浪式”等等稀奇古怪的发型，还喷上香水，抹上油，使那些流氓们摇头晃脑，得意忘形。

为了资本主义复辟，你们做出了大量的港式衣裙。什么“牛仔裤”“牛仔衫”以及各式各样花花绿绿令人作呕的港式衣裙，使那些流氓们飘飘然，神气十足。

为了资本主义复辟，你们照出了许多下流低级的照片，把那些资

产阶级少爷小姐电影明星们捧上了天，使他们神魂颠倒，眉飞色舞。你们照出来的相，可恶，可憎，可气！

为了资本主义复辟，你们贩卖了大量古今中外低级黄色冒险的小说，使那些狗崽子们从你们那里得到了满足。大批资产阶级的阴魂从你们那里飘了出来，毒害了许多青少年，滋育了他们犯罪的苗头。

还有那些商店，你们摆了那么多香水、雪花膏、口红、项链……等奢侈品，及港式衣裙、火箭鞋等等是给谁预备的？难道工农兵还抹香水，穿尖皮鞋吗？

你们从心灵深处不喜欢广大的工农兵那种淳朴憨厚自然的美。你们服务的对象是那些油头粉面、衣着华丽的老爷太太们，你们的灵魂深处是肮脏的，反动的。你们口头上也说为工农兵服务，你们是挂羊头卖狗肉。现在是你们彻底改造的时候了！

你们想过没有，如果再这样下去，那么不出几年，几十年，资本主义就会在中国复辟，整个中国就会改变颜色了。

现在，文化大革命的洪流正在冲击着资产阶级老爷们盘踞的各个阵地。资产阶级的温床，保不住了！解放十七年来，前北京市委对这些事情不闻不问，听而不闻，视而不见，对流氓作风、流氓行为放纵不管。他们走的是修正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路，我们和他们是两条路上的人。现在，我们站起来了，当家做主人了。有党中央和毛主席给我们撑腰，对于这样的事情，他们不管，我们要管，而且要管到底。我们要彻底铲除修正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温床和苗子，造这些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反。

……我们向理发、裁缝、照相等行业的革命职工倡议：

港式的发型不理！港式的衣裙不做！下流的像不照！黄色的书不卖！

我们要求在最短时间内改掉港式衣裙、剃去怪式发样、烧毁黄色书籍和下流照片。“牛仔裤”可以改为短裤，余下的部分，可做补丁。“火箭鞋”可以削平，改为凉鞋。高跟鞋改为平底鞋。坏书、坏照片作废品处理。

我们向全市红卫兵和一切革命的同志呼吁，这场斗争是关系到中国的前途和世界革命的大事。不要小看这些问题，资产阶级复辟的大门正是从这些地方打开的，苏联不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吗？所以我们一定要堵住一切钻向资本主义的孔道，砸碎一切培育修正主义的温床，决不留情！

我们也向全国无产阶级革命派呼吁：向残存的一切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开火，砸烂它，建立起无产阶级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

谁曾想到，这张小小的传单竟成了后来席卷中国大地的“破四旧”先声。

而周恩来在这天，继续关注着清华大学的文革情况。

清华大学自 8 月 4 日的辩论会后的，少数同学要求继续批判工作组，多数人则认为工作组的检讨可以通过，要求转入批判校领导。

一个深夜，周恩来又来到清华大学。他看了校园的大字报后，便在甲所召开座谈会。会议进行了一会，大家突然想到：“今天天气闷

热，总理来了这么长时间连口水 还没喝呢！”

他们赶紧找杯子，一看屋里的杯子积满了灰尘，一人找到随周恩来一起来的警卫人员， 问有没有带周恩来的水杯。警卫说：“总理外出从来不带水杯， 群众用什么，他就用什么。”

几个人连忙把杯子洗刷干净， 给周恩来倒了一杯白开水。周恩来就这样和大家边喝边谈，一批谈完了又是一批。有的同学担心累坏了总理，请警卫去劝他休息。警卫说：“总理今晚在人民大会堂刚接见完就来清华，已经一天一夜没休息了。但我们不能劝他休息，要是我们劝，他会批评的，你们去说说吧。”

一个同学走过去对周恩来说：“现在时间很晚了，总理您累了吧？该休息了！”

周恩来笑笑说：“不累不累，谈吧！”

大家再三劝周恩来休息都不成功，直到不约而同地都不讲话了，周恩来这才离开。这时，朝霞已升上了天空。

7 月底，清华大学工作组撤出前，工作组组长叶林提议，各系文革主任联席会议作为“清华大学校文革临时筹委会”，简称“临筹”，在工作组撤离清华大学后，负责清华大学的工作。8 月 7 日，清华大学文革临时筹委会按照王任重的指示，向全校发出建议：“按周总理的指示，全校学生团结一致对敌，即对准蒋南翔与校党委及黑帮。”此建议后来被清华称之为《八七建议》。

第二天，8 月 8 日，清华大学工程化学系学生、烈士子弟唐伟和汲鹏、陈育延、朱德明、吴楠及清华大学动农系“云水怒”战斗组的

主要成员周泉缨等人，在大礼堂开串联会，讨论清华工作组的性质，反对“临筹”的《八七建议》，发起成立“八八串联会”。他们的主张有两个：

（1）坚决与王光美为首的清华工作组镇压蒯大富为代表的大批清华学生的错误路线辩论到底。

（2）为被工作组镇压的蒯大富为代表的大批学生的革命造反精神彻底翻案。

他们酝酿着组建由清华本科生组成的红卫兵组织。

8 月 9 日，贺鹏飞、刘涛、刘菊芬等人也在大礼堂开串联会，成立清华大学“八九派”串联会，亦称“立即打黑帮串联会”，只批“黑帮”，回避讨论工作组问题。

8 月 10 日，王任重的秘书张生谈、傅明贤从湖北省委调到清华大学、以“新市委大学工委”的名义，任清华大学的联络员，驻进了清华。

随后几天，清华“八八”“八九”两派各行其是。“八八派”开会批斗了工作组的三位组长：经委副主任叶林、冶金副部长周赤萍中将和林业部副部长杨天放；大字报猛烈批判王光美。

而“八九派”“立即打黑帮串联会”则在 8 月 15 日，批斗了校党委第一副书记艾知生。

8 月 16 日晚，周恩来召集清华大学“临筹”、“八九串联会”和“八八串联会”的各方负责人座谈。“临筹”和“八九串联会”人多，各系都出一名代表，有十几个人。“八八串联会”人少，总部一

共只有几个人。他们一起乘坐一辆大轿车前往大会堂，结果在车里就吵了起来，一直从清华园吵到大会堂。即使是在在大会堂等待时他们也不罢休，直到 21 时周恩来进来。

周恩来进来后与大家一一握手，让每个人介绍自己和家长的职业。随后大家让“总理先指示”。周恩来说：“先请你们谈谈对清华运动的看法和建议。”

在周恩来雍容大度、温文尔雅的风度影响下，这些大学生一改刚才气势汹汹，互不相让的风格，都用最冠冕堂皇、最绅士文明的语言阐述自己的观点。但是不乏巧妙的打击对方抬高自己。

周恩来以高超的政治艺术和了稀泥，让双方都高兴地认为他支持了自己。周恩来最后批评他们不该吵架，他说：“我在走廊里就听见你们吵了，要求同存异，你们是组织的领导，要给下面的群众作团结的好榜样。”

座谈会结束时，已是 17 日凌晨。周恩来通知他们，8 月 18 日在天安门广场召开“庆祝文化大革命大会”。

代表们在大会堂吃完夜宵已是凌晨 4 时，周恩来又单独接见了“临筹”成员。回清华的路上，他们不再争吵了，可能是周恩来教育的成效，也可能是“饱了发困”，大家都昏昏欲睡。

8 月 17 日，周恩来再找清华大学刘涛等人谈话，批评了他们，让他们一方面要批判工作组，准备 8 月 22 日关于工作组的辩论大会，另一方面总结经验教训，自己要作检查。

8 月 17 日晚上，周恩来把宋杲叫去，询问了接待室的筹办情况

后，指出：“要向接待室全体同志讲清楚，这件事一定要严肃认真地办好，不能马虎。对待群众上访，应条条有交代，件件要落实。凡属于各省市职权范围的，要批转各省市办理；凡属于国务院各部委职权范围的，要责成他们认真办好。每天的情况要列表上报，以备查询。”

聂元梓参加八届十一中全会时，北大校刊的人对聂元梓说：“你见到毛主席的时候，请毛主席给咱们的校刊题个字。”于是，聂元梓请毛泽东题字，毛泽东很爽快地答应了。第一次题的字送来了，却多了两横，写成了“新非大”。聂元梓把题字送回。8月17日，毛泽东又派人送来第二个题字，还写了一封短信给聂元梓，大意是：聂元梓同志：上次送来校刊的题字写的不够好，现再送来一个，如不好，可再写。聂元梓将毛泽东的题词和附信向全校公布了。毛泽东的手迹很快就被中央档案馆给要去了。

图片引自“新北大公社火车头编辑部”出版的中央首长关于北大的讲话《毛主席的新北大》封内。题字的原件为中央档案馆收藏。

## 第 127 回：谈海军，地院“东方红”成立
## 聚广场，红卫兵人潮似海

8 月 17 日，林彪在人民大会堂召集叶剑英、肖华、杨成武等人谈话，此时，海军的马拉松党委扩大会还在继续。虽然林彪 8 月 13 日对李作鹏、王宏坤、张秀川 3 人做了评价，但是海军党委扩大会上对李、王、张 3 人的批判依然未停。林彪提出，海军会议可以结束了，对王宏坤、张秀川的批评已经到了“火候”，“适可而止”，“不要烧焦了，立即收兵停战，再开下去就会错上加错。应以大局为重，团结起来，做好海军的工作。”并说：“斗了李、王、张 40 多天，什么问题也没有搞出来。”

他肯定了肖劲光在历史上的“正确”与“有功”，但是说他“在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坚持四个第一，突出政治，是有错误的，是反对的。”“在反对罗瑞卿问题上，肖、苏是落后了。”

林彪对李、王、张也有批评，但充分肯定了：“李、王、张是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的，拥护主席的，是突出政治的，旗帜鲜明，海军工作转变做了许多工作，反对罗瑞卿有功劳。批判罗瑞卿时批评肖、苏的单纯军事观点，不坚持四个第一，不突出政治等等，是正确的。但错误是过了头，过了火。”

林彪指示：

第一，会议简报不准再出；

第二，会议文件不准再印发；

第三，工作组起了很坏的作用，立即撤回。

与会者一致表示拥护林彪的指示。

当天晚上，叶剑英在人民大会堂新疆厅召集肖劲光、苏振华和李作鹏 3 人开会，杨成武、肖华在座。

叶剑英对着肖劲光、苏振华、李作鹏宣布说："第一，海军党委扩大会议立即停会；第二，会议简报立即停发；第三，增补李作鹏为海军党委第三书记。"

李作鹏在青岛休息了 10 天左右，8 月 15 日前后，接到苏振华从北京亲自打来的长途电话，要他立即回北京，并派专机去接。

回到北京后，李作鹏才知道，首先是徐向前，之后是林彪，都不同意海军党委扩大会议转向批斗李、王、张。

自从北京地院以朱成昭为首的"爆破战斗队"贴出大标语，要求彻底批判工作队在地院的错误路线后，得到反对工作队的师生广泛回应和支持。他们积极串联，达成共识，于 8 月 8 日下午，在地院的"教工之家"召开各系各班造反派学生老师代表会议，经大家讨论，一致同意成立"东方红战斗大队"，朱成昭被推举为战斗队核心组的总勤务员。

"东方红战斗大队"成立后的一天，有同学领着一位戴眼镜的、25 岁左右、一身学生穿着的女青年来到教四楼二楼"东方红战斗大队"的办公室，对正在屋里的"东方红"核

心组的田春林说："她说要见'东方红'核心组成员。" 那人从文件袋中拿出一张32开的用粗黑铅笔书写的便笺，字是竖写的：

"兹派肖力同志为中央文革小组驻地质学院文化大革命观察员。"

落款是"陈伯达"。

田春林看了陈伯达亲笔签名的这个便笺，心中十分激动，欣喜若狂。肖力笑着对他说："想和核心组的所有成员见个面。"

田春林立即把其他屋里的"东方红"核心组成员都叫了来，有伏庆是、朱成昭、刘长风等。

肖力问了核心组成员的姓名、年龄、家庭出身和读几年级等基本情况，并作了详细记录，又问了工作队的情况，如队长姓名、什么时候进校、什么时候离校、"反干扰"抓了多少"游鱼"、"东方红战斗队"有多少人参加等等。

"东方红"还专门介绍了刘长风，说他是著名作家、长篇小说《创业史》的作者柳青的儿子。大约大家谈了一个多小时，她就告辞走了。

肖力去"东方红"的那天，还去了地院校文革。地院文革主任、地质系61级学生翁清豪接待了她，向她介绍了工作队、"620"、反干扰等地院文革中的大事。肖力只提问题，认真记录，从不表态。

以后她两三天就来地院一次，核心组成员都知道她是中央文革派下来的，但不知道她的真实身份。

一天，地院“工人赤卫队”的胡守安叫上地院“红卫兵”程关林，从木工厂后院挖出一包东西，是“反动学生朱成昭”及“反动学生蔡新平”的材料。

8 月 13 日，邹家尤代表工作队，向地院全体师生员工作了一个小时的检查,然后带着 200 多名工作队员撤离了地院。

工作队撤离后，留给地院的是保工作队的保守派与反工作队的造反派的对立与争辩。保守派在院文革委员会的组织领导下，毫不退让。争辩斗争之激烈是未曾亲历那段历史的人难以想象与理解的。此时，保守派实际掌握着学校的领导权，在人数上也占有多数。

8月17日，北京地院反对工作队的师生员工1000余人，在朱成昭“东方红战斗队”的基础上，成立了“东方红公社”成立。陈学明执笔起草了成立宣言。按照巴黎公社原则，选举产生了核心领导成员有：朱成昭、王大宾、周永璋、蔡新平、陈学明、蒋良朴、田春林等。

“东方红”一开始就宣布不搞“唯成分论”，许多对工作队有意见但出身不太好的学生纷纷参加，“东方红公社”很快成了地质学院的主要群众组织。

8 月 17 日这天，北京航空学院“红卫兵”罗迎难等人到北京新市委汇报，无意中听到毛泽东主席要在 8 月 18 日接

见红卫兵的消息。当时市委的人只提到中学红卫兵，没有提大学红卫兵，罗迎难马上提出“大学也有红卫兵组织，也应该受到毛主席的接见。”主持会议的人听取了罗迎难的意见，决定大学红卫兵每校可出 10 名代表，进入灰观礼台，参加毛泽东主席的接见大会。罗迎难带着这个特大喜讯回到学校，北航“红卫兵”立即选派了 10 名代表，8 月 18 日那一天进入灰观礼台。

此时，一些大学已经有了红卫兵组织，有的还处在“秘密”状态。如人民大学：8 月 8 日，约有十来个来自人民大学各系的学生在劳动人民文化宫中山纪念堂前的台阶上举行了一次秘密会议，这是在 1965 级党史班学生朱佳木的倡议下，由党史系的学生牵头召集的，成员有原北京军区政委朱良才上将的长子朱新加，刘志坚长女刘平凡、国家计委副主任顾明的女儿顾小鸥、总参动员部部长傅秋涛的女儿傅民族、内务部副部长程坦之女程辛联，以及李纪周、吕平、庞戍、侯成亚等人。

会议的发起人和主持者朱佳木说：“把大家召集来，是要商量组织一个我们自己的组织。现在，文化大革命已在全国开展起来，中国革命又到了一个重要关头。人大文化革命的形势已落后于北大、清华及一些中学，我们应当自己组织起来，自己闹革命，自己解放自己。要高举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在文化大革命中经风雨见世面，以实际行动

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捍卫无产阶级专政，保卫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红色江山永不变色。”

接着，他提出，以当年苏联的“青年近卫军”为榜样，叫“中国青年近卫军”。

这时，侯成亚说：“现在苏联已经变修，我们用它的名称，容易引起误解。现在中学的组织都叫‘红卫兵’，我们也叫红卫兵算了。”

有人反对：“中学红卫兵都是一些瞎胡闹的毛孩子，我们是大学生，不应和他们混同起来。”

但是，经过再三斟酌，大家还是采纳了侯成亚的意见，将组织名称定为“中国人民大学红卫兵”。随即，他们商议通过了人大红卫兵的章程和成立宣言，规定了组织纪律，选举了核心领导机构----勤务组，并设政委一人，大队长和副大队长各一人，下设政治宣传组、组织组、联络组和办公室，各组组长由勤务组成员兼任。“人大红卫兵”就这样在中山公园成立了。成立之初，其活动处于“地下”和保密的状态。因为当时北京的“红卫兵”还只是少数几个中学有，大学里是否可以成立“红卫兵”或类似的群众组织，谁也不知道，所以十分小心谨慎。而且，在此之前，学校已在工作组的主持下，成立了“中国人民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筹备委员会”，简称“校革筹”，或“筹委会”，负责具体领导人大的文化大革命。他们担心，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再另搞一个

组织，是否是非法的活动，会遭到打压和取缔。

其实，早在 6 月 18 日，矿院学生刘歌就在矿院发起成立了大学第一个红卫兵组织——“矿院红卫兵”。所以，“人大红卫兵”的秘密状态并没有持续多久，文化大革命的进程很快就使它浮出水面。8 月 11 日，“人大红卫兵”贴出了两张署名大字报，一篇叫《给筹委会的十点建议》；一篇叫做《造郭影秋修正主义错误之反有理》。

这两张大字报一贴出，全校一下又炸开锅。一部分人表示坚决支持，而另一部分人则表现出极大愤怒，说“人大红卫兵”是黑组织，是反革命，是要夺“筹委会”的权。一时间，校内掀起了一阵到处围攻甚至抓打已暴露身份的“人大红卫兵”的局面，弄得“人大红卫兵”只好东躲西藏，活动也只能秘密进行，甚至搞“单线联系”。

但是，出乎意料的是，陶铸突然通过北京新市委通知人大校文革筹委会，要于 8 月 17 日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人大红卫兵”代表。这一消息，对于处于困境中的“人大红卫兵”来说，不说是晴天霹雳，确也是喜出望外。校筹委会虽然心有不甘，但也不敢违命，派车将 10 多名“人大红卫兵”代表送到人民大会堂。

接见中，陶铸向“人大红卫兵”代表了解了人大文化革命的情况，并发表了一系列指示。其间，他问：“人家红卫兵都戴红袖章，你们怎么不戴呢？”

“人大红卫兵”回答说：“我们现在还被人家说成是黑组织，到处抓我们，不敢戴。”

陶铸听了，笑道：“哈哈，还有这种事？好了，从今天开始你们就不是黑组织了。回去买点红布，把红袖章戴上，戴上！”

受到陶铸的接见后的人大红卫兵，受宠若惊，回到学校，连夜贴出了《中国人民大学红卫兵严正声明》的大字报，指出：“郭影秋究竟是什么人，应在文化革命中经过群众的揭发、审查后才能做结论，广大师生揭发批判郭影秋的错误是革命行动，应当予以支持。”

贴完大字报，他们还没有回过神来，又接到人大“校革筹”的通知：“校革筹”接到北京市新市委的紧急通知，要人大“校革筹”和“人大红卫兵”各派 5 名代表第二天到天安门广场参加群众大会。“校革筹”连夜设法联系到了“人大红卫兵”，一起乘一辆卡车按时赶到了天安门广场。

8 月 17 日晚，北京广播学院接到中央办公厅的电话，安排 10 名红卫兵代表，8 月 18 日到天安门灰观礼台接受毛主席的检阅。第二天，广院王小戍、王小玲、朱武成、柯俊杰及北京市副市长万里的女儿万淑鹏等十人同其他大学红卫兵一样，登上灰观礼台。

而清华大学的学生，因为 17 日凌晨周恩来在座谈会上通知了他们，当晚，清华的几千学生便集合出发，于 18 日凌

晨来到天安门广场东边。

而大学中的第一个红卫兵组织——矿院“红卫兵”参加接见同样富于戏剧性。8 月 18 日早晨，矿院值班室接到中央办公厅的电话，说：“毛主席要在天安门广场接见红卫兵代表。”矿院接电话的人不知道矿院有红卫兵组织，办公室的其他人说，矿院确有红卫兵，他们召之即来，挥之即去，不知道在什么地方能找到他们。有人急中生智，干脆用院广播站的高音喇叭喊：“红卫兵到学院东门紧急集合。”这一招真灵，大喇叭一喊，朱迈、王小中、赵静愚、王阳春、刘延生、王洗尘等听到广播，迅速集合，由院方派车，把他们送到天安门广场。他们十几个人都上了天安门，还和毛泽东主席握了手、合影留念。事后说起此事，让未能登上天安门城楼的人羡慕不已。

1966 年 8 月 18 日，子夜刚过不久，北京城便苏醒过来。街上响起了学生们的笑声、歌声和呼喊声，北京大中专学校的学生们敲锣打鼓地从四面八方涌向天安门广场，一辆辆军车也把来自全国各地的学生代表们从各个招待所运到这里，来到这里的学生被有条不紊的安排在指定的区域。广场正中最前方是扛着《第一张革命大字报》模型的北京大学队伍，天安门城楼两旁的观礼台上站着数以万计带着“红卫兵”袖章的学生代表，他们大多来自清华、北大、北航、清华附中、25 中、八一中学等名头响亮的高、中等学府。

广场上的排列是精心安排的。金水桥两侧由 5000 名中学红卫兵组成的纠察队排成的人墙；在他们前面是北京卫戍区的解放军警戒线；警戒线之外，分别是北京东城、西城两区的红卫兵方队；再往后，才是那些千里迢迢赶到北京来接受毛泽东检阅的外省学生。

东方破晓，人群像蚂蚁一样聚集拢来，并向东西长安街两头溢出，把整个广场附近挤得水泄不通。期盼与等待的喧闹声如决堤而出的黄河之水，浩浩荡荡，汹涌奔腾。

清晨 4 时，空气中残留着仲夏夜的清凉，东方的天空开始泛白。此时的长安街沿途早已人潮如海、红旗如林。从四面八方来到首都北京的学生们，年轻的面孔上写着期待、兴奋、神圣和疯狂，因为他们在这一天，将要见到最最崇拜的伟大的导师、领袖、统帅、舵手毛泽东主席。他们临时按班、排、连、营、团的军队建制组织起来，其中的班长、排长、连长、营长、团长都是真正的部队官兵。这样，原本一盘散沙的学生便由军队组织和管理了起来。天安门广场上的 100 万红卫兵秩序井然。

由于距离毛泽东接见的时间还早，学生们席地而坐，每人手里都握着《毛主席语录》，很多人臂上戴着鲜艳夺目的红卫兵袖章。大片大片的红色燃烧着、照耀着、炽烤着他们，《大海航行靠舵手》、《东方红》、《敬爱的毛主席我们心中的红太阳》等歌声此起彼伏。

广场上，各种标语层出不穷，让人目不暇接：

“毛主席万岁！”

“誓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革命无罪，造反有理！”

“学习十六条，熟悉十六条，掌握十六条，运用十六条！”

“为实现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的伟大号召而努力奋斗！”

……

第 128 回：心难舍，金水桥回首频频

情激荡，天安门前波涛狂

学生们兴奋，毛泽东也夜不能寐。为了 8 月 18 日的接见，毛泽东一改他熬夜办公的习惯，在 8 月 17 日晚上早早就躺下了。但是，他怎么也睡不着，后来干脆起来，通宵办公。到了清晨 4 点多钟，他就提出要去天安门，并说要穿军装。

事情提的突然，工作人员毫无准备，急中生智，只好在中央警卫团的干部中寻找适合他穿的军装。一中队干部刘云堂是个身材魁梧的大个子，把他的军装拿给毛泽东试穿，正合适。

清晨 5 时，东方出现了瑰丽的朝霞，离大会开始还有两个半小时，迫不及待的毛泽东便早早来到了天安门。当他登上天安门城楼，看到广场上密密麻麻的红卫兵学生后，又径自从天安门上走了下来，不顾一切地推开了身边的警卫人员，走过金水桥，一直走进人群如海、红旗如林的群众队伍之中，同周围的许多人紧紧握手，并且向广场上的红卫兵学生招手致意。瞬时间，天安门前沸腾起来，人们不相信毛主席就在他们中间。学生们纷纷站了起来，向毛泽东身边涌来，整个广场，就如同钱塘江海宁潮，先是远处素练横江，而后来潮愈行愈快，接着是漫江翻腾，波涛万顷一般，整个天安门广场迅即沸腾起来，顷刻之间成为“毛主席万岁”的欢呼海洋。毛泽东亲切地向群众频频招手和握手，他向前走着，想走到广场中央。但人们纷纷站起后，一下子把他紧紧地围在人海中了。警卫劝他回去，他索性坐了下来。在他身后，跟着几辆汽车，公安部长谢富治站在车前大声喊着：“我是公

安部长，请同志们让主席走!”但无济于事，谢富治的喊声完全被海啸般的欢呼声淹没了。

中央警卫团机动部队和北京卫戍区机动部队赶来了，他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在人海中开辟出一条人墙通道，护卫着毛泽东安全地回到金水桥上。到了金水桥，毛泽东仍然意犹未尽的不时回身，手拿军帽不停地向激动万分的红卫兵们挥动着。

为做好毛泽东接见红卫兵的准备工作和部署安全警卫工作，首都工作组连续忙了几个昼夜。18 日凌晨 1 时，首都工作组的蔡洪江处长对几个参谋说：“休息一会，6 点钟到天安门指挥所。”为了早点到，不到 6 时他们就驱车到了天安门城楼。当他们急匆匆地正要步入天安门城楼正厅门口时，走在前面的王政成参谋一下停住，小声对后面人说:“主席在里面，别出声。”

他们偷偷往里一看，毛泽东穿着军装坐在正厅北面的沙发上。他们轻手轻脚地拐进西边隔壁间的指挥所。

在休息室，毛泽东看见负责现场安全警卫工作的北京军区副司令员郑维山，便问他：“杨勇、廖汉生来了吗？”

郑维山答道：“没有。”

毛泽东问：“为什么没有来？”

郑维山回答：“没有通知他们。”

毛泽东要郑维山立刻通知，要他们过来。

毛泽东还要到红卫兵中去，他想亲自和这些学生谈谈，听听他们的想法。周恩来建议，组织两侧观礼台的 1500 名红卫兵代表上天安

门城楼，请毛泽东接见。毛泽东同意后，立即交由傅崇碧组织实施。

于是，在观礼台的各学校红卫兵接到通知，选派代表上天安门。

7 时许，傅崇碧把 1500 名红卫兵代表带上了天安门城楼，并按照周恩来的指示，将他们分成两个方队，安排在城楼的东、西平台上，等候毛泽东接见。

周恩来帮大家排好队形，首先给这两个方队的红卫兵讲话，说："等会儿主席要来和大家见面，但有一条纪律，不要和主席握手，主席的手已经握肿了。主席 73 了，我也 68 了嘛，主席一夜没睡觉，我希望大家能够体谅，不要和主席握手。"他讲完纪律和接见时的注意事项，又轮流到东、西平台打着拍子指挥红卫兵唱《大海航行靠舵手》、《东方红》歌曲。

7 时许，毛泽东在天门城楼上的休息室接见了以聂元梓为首的北京大学 40 名师生代表，同他们一一握手。所有被接见的人都热血澎湃，只是激动无比地呼喊着：

"毛主席好！"

"毛主席万岁！"

接着，毛泽东又来到天安门东、西平台上，与那里的 1500 名红卫兵代表见面。学生们热血澎湃，幸福激动地高喊："毛主席好！""毛主席万岁！"

北京军区司令员杨勇、政委廖汉生，接到郑维山从天安门城楼打来的电话后，立即驱车赶到天安门。他俩走上天安门城楼，首先碰到了叶剑英。叶剑英告诉他俩："主席问到你们两个人，快去吧！"

他俩走进城楼中央的休息室，向毛泽东敬礼、报告，看见贺龙也在那里。

毛泽东问了一句：“你们两个吵架啦？”

杨勇、廖汉生互相看了看，不知如何回答才好。

毛泽东接着说：“你们两个闹过一次。你们不要闹了，一定要搞好团结，把军区工作搞好。”

在一旁的贺龙向毛泽东报告：“北京军区的工作主要是杨勇同志负责。杨勇是第二书记，廖汉生是第三书记。管事嘛，主要还是杨勇同志。”

毛泽东又问：“你们看过林彪同志没有？要尊重林彪同志，多请示，多汇报。与林彪同志约定一下，向他汇报。去的时候，要把郑维山同志带上。”

毛泽东提到的“吵架”的事情，大致是这样的：一次，军区党委召开全委会，听取来自各单位的委员对党委的意见。杨勇作为第二书记主持会议。他宣布开始以后，习惯性地拿出文件，一边看文件，一边听发言。萧应堂委员在发言中对军区党委的工作提出批评，讲得很尖锐，很严肃。杨勇开始没有注意，只顾埋头看手中的文件，中间仿佛听到了什么，连忙问：

“你讲的什么？”

廖汉生说：“刚才别人讲话，你不注意听，这时又问讲什么。”

于是，杨勇收起了文件，注意听着。以后，军区党委常委专门召开了一次交心通气会，杨勇结合廖汉生到军区工作几年来的情况，给

他指出一些毛病，廖汉生也对自己的老毛病做了自我批评，其他人也发表了各自的看法。同时，杨勇提出军区即将召开第三届党代表大会及选举新一届党委班子，届时要将他的第二书记与廖汉生的第三书记的位置调换一下。按照一般情况，政治委员大多担任党委书记，主持党委工作。对此，廖汉生坚决表示不同意，并在常委会上说明了自己的意见。

7 时 30 分，庄严的《东方红》乐曲从数十个高音喇叭里响起，陡地绷紧了百万红卫兵们的神经。最激动人心的时刻就要到了！广场上的百万红卫兵屏住呼吸，目光集中到一个方向，心中只有一个声音在回荡：毛主席就要来了，毛主席就要来了……

红卫兵中出现了骚动。人群沸腾起来了，有的尽力踮起脚尖，有的拼尽全力往前挤，一个女红卫兵用尖厉的嗓音喊了声“毛主席万岁！”顷刻间，天安门广场地动山摇，震天撼地的口号声此起彼伏，久久回荡。

毛泽东在一大堆人的簇拥下，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他不断挥动着手臂，向下面的百万师生和红卫兵致意。

登上天安门城楼的中央领导人，是按照八届十一中全会新选出的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名单次序排列的，这是新常委的首次亮相。毛泽东走在最前面，林彪紧随其后，再后面是周恩来、陶铸、陈伯达、邓小平、康生、刘少奇、朱德、李富春等人。毛泽东步伐慢而缓，林彪的步伐急而促，一不小心就会超越毛泽东，周恩来扯住了林彪军装的后摆，很用力，林彪几乎是一个踉跄，站住了。周恩来也停住了脚步。

周恩来不动，后面没有人敢超越他。待毛泽东又走出了一步，周恩来才松手，其后林彪一直自觉地保持着这一步之遥。等到毛泽东、林彪走出了七、八步，周恩来才带着大队人马缓缓跟上。

1966 年 8 月 18 日毛泽东林彪在天安门城楼上

大会由中央文革组长陈伯达主持，他宣布会议开始并致词。陈伯达在致辞中说："我们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导师，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今天在这里同大家见面。"

林彪首次在全国人民面前讲话，他说："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最高司令是我们的毛主席，毛主席是统帅。我们在伟大统帅的指挥下，好好地听我们统帅毛主席的话，文化大革命一定能顺利发展，一定能取得伟大胜利！"

"我们要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要打倒资产阶级反动权威，要打倒一切资产阶级保皇派，要反对形形色色的压制革命的行为，要打倒一切牛鬼蛇神！"

"我们要大破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要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我们要扫除一切害人虫，搬掉一切绊脚石！"

接着，周恩来也在大会上讲了话。他在讲话中说：

“一切革命者应当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做人民的勤务员，先当群众的学生，后当群众的先生。”“我希望北京市的革命同学和各地来的同学，要相互学习，相互支持，交流革命经验，加强革命的团结。”“无论是北京市的革命师生，还是各地的革命师生，主要的任务是把本单位的文化大革命搞好。”

北京大学聂元梓，北大附中“红旗战斗小组”的彭小蒙，哈军工代表、黑龙江省长李范五的女儿李黎力，长沙市一中学生谢若冰及南京等地的大中学生代表也在大会上讲了话。

湖南代表谢若冰发言时，激动得流出了眼泪，她哽咽着倾吐对毛泽东主席无比深厚的阶级感情，控诉湖南领导镇压学生运动的罪行。她讲完后，毛泽东跟她亲切握手，还应谢若冰的请求，在她的笔记本上签了名。

彭小蒙在讲话中说：“前面是刀山，是火海，我们跟着毛主席走定了！”

讲完话，毛泽东同她聊了起来，问她是哪里人？吃不吃辣椒？又问她：“陆平现在干什么？”

“他在北大扫地。”彭小蒙答。

“陆平只能扫地，就像我一样，我到了你们学校也只能扫扫地，别的干不来。我是你们的勤务员。张承先也是个坏人，把你们‘红旗’拆散了。你们要把‘红旗’拉起来。你们发展了多少人呢？”毛泽东接着问。

“有发展了。”彭小蒙说。

“这就对头了。”毛泽东表示满意。

“主席身体好不好？”彭小蒙问。

“我身体很好。我在长江里游泳，有个青年同志肝痛了，我就上来了，要不然可以游三、四个小时。”毛泽东答。

“毛主席，我们下一步怎么办？”彭小蒙接着问。

“你们一斗二批三改，按《十六条》办事。会不会游泳？”毛泽东说。

“才学会，游得不好，很乱。只会游十几米。”彭小蒙回答道。

“那不叫游泳，那叫闲庭信步。”这时毛泽东边做出闲庭信步的样子边说：“你要能这样，就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了。你们老怕别人批评。马克思主义就是压出来的。经风雨，发展兴旺起来。”

江青说：“不能让她老出风头，要让她谦虚。”

毛泽东说：“你怎么能这样说呢？要让人家干革命嘛！”

记者不失时机地拍下了毛泽东“闲庭信步 ”的照片。

游行开始了，游行队伍像奔腾不息的河流一样浩浩荡荡地通过天安门城楼。徐雅雅，北京市戏剧专科学校的红卫兵。这天，她组织北京市戏剧专科学校的红卫兵们唱着歌，打着竹板，列着方阵通过天安门广场。他们穿着略嫌肥大的旧军装，腰间扎着皮带，头上戴着军帽。行进的过程中，他们一边唱歌，一边用竹板打出“啪啪”响的节奏，特别神气威风，也特别引人注目。

毛泽东俯视着城下的游行队伍，兴奋地对站在旁边的林彪说：“这个运动规模很大，确实把群众发动起来了，对全国人民的思想革命化有很大的意义。”

周恩来对毛泽东说：“主席，一些北京的学生说，外地大中学校的同学纷纷来到首都，是不是会影响首都各学校的教育改革？人来多了，食宿、交通都有困难，9 月份以前学校复课恐怕不易实现。”

毛泽东回答说：“不要紧，群众目前只是刚刚发动起来，搞革命就是要搞串联，大革命就要串联，恩来，我们年轻的时候，不是就靠串联才搞到一起吗？北洋军阀虽然有枪有炮，可是全国的学生团结起来，他们就没有办法。”

周恩来应诺道：“那好，我去安排一下。”

刘少奇远远地站在毛泽东东边，不言不语。他看见伍修权，两人聊了一会儿，刘少奇说：“北大聂元梓的大字报我反复地看了几遍，实在看不出它的意义为什么比巴黎公社宣言还要大。”

毛泽东走到刘少奇身边，两人侃侃而谈。从远处看过去，他们就像朋友间的谈心，更像师生的交流。主要是毛泽东说，刘少奇听。说

的耐心而诚恳；听的虚心而谦卑。毛泽东说："中央犯了这么大的错误，总得有人出来承担责任。你回去要同光美同志和孩子们讲清楚，不要因此而背包袱。"

在离毛泽东不远处，康生看见一个红卫兵代表站在身后，便问他："你是哪个学校的呀？"

"我是南开大学的。"那位戴眼镜的大学生回答，又立即抓住机会问话，"康老，文化大革命下一步的伟大战略部署是什么呀？"

"要深入发展下去。"

"怎么深入呢？"

"查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历史。"康生说。

"到哪里去查呀？"那大学生又问。

"图书馆、档案馆。"

"人家不让我们查。"

"我给你们写个条子。"康生说道。

那大学生即刻掏出钢笔和笔记本，当场康生写道：

"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现有红卫兵小将前来查阅有关档案历史资料，望予支持。

康生　　八月十八日"

康生把本子和钢笔还给那大学生，接着说：

"天津的国民党监狱关押过不少共产党员。你们应注意叛徒，认真查一查，看看各单位、各部门有没有混进这类人。可组织有力队伍查阅敌伪报刊和各类档案。"

“好的，我们一定认真查。”那大学生点头应诺。

早在 8 月初，康生就要求“彭真专案组”对 1936 年北平草岚子监狱那批共产党员的出狱事件进行调查。“彭真专案组”很快成立了“1936 年专案”，简称“三六专案”。他们对那次出狱的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一批人的出狱手续进行调查，查阅了当时北平出版的各种报纸，审查了这批人的档案。

第 129 回："要武嘛"，毛泽东戴红袖章　欲革命，却如此屡屡犯错

8 时 05 分，毛泽东正在天安门休息厅与哈军工的女学生李晶谈话，清华附中的骆小海、韩军、宋柏林 3 人按捺不住好奇和激动的心情，乘警卫不注意，不顾一切地冲了进去，本来在外面的摄影和电影记者，一见他们进去，也跟着一拥而入，霎时强光齐明，镁光灯频闪。

他们 3 人来到毛泽东身边，激动得把什么都忘了，只是一个劲儿地说："毛主席万岁！""祝毛主席万寿无疆！"

毛泽东微笑地站了起来，和他们一一握手，并风趣地说："好，好，好！万寿也有疆嘛！"

当骆小海等人告诉毛泽东，他们是清华附中红卫兵时，毛泽东似乎是没有听清，问："哪一个？"他们 3 人齐声答："我们都是清华附中红卫兵。"

毛泽东也大声地向他们说："我坚决支持你们！"

骆小海问毛泽东："主席，听说您给我们写了封信，我们怎么还没收到呢？"

毛泽东答："那还是个草稿，还没有给你们。"

陈云在会议开始一个多小时后才到会。他走出电梯门口后，径直走向检阅台，却没有到他的位置上，只是在西检阅台上往天安门广场看了几眼，既未招手致意，也未和别人讲话，扭头就返回了休息间，正好邓子恢也在里面坐着休息。这时几位老帅向正在休息的毛泽东说："我们想和主席照张相。"

毛泽东当即答应："好啊。"

他站起身，一眼看见了邓子恢和陈云，便招呼道：“两位地方的同志也一块来吧。”

毛泽东面带笑脸，同朱德、林彪、叶剑英、贺龙、徐向前、陈云、邓子恢一起合影留念。

然后陈云就离开了天安门。

那一天，除了林彪之外，其他各位元帅，都没有穿军装。在天安门城楼上，临时得到通知说：“接见完红卫兵之后，毛主席要和元帅们照相。”元帅们的工作人员，都急忙返回住地取军装。贺龙一时找不到合适的衣服，帽子又太小，搞得很局促。那张照片，是毛泽东和元帅们在一起的最后一张历史照片。

当毛泽东看到海军的李作鹏、王宏坤、肖劲光、苏振华等人时，他主动过去和他们握手，并对李作鹏、王宏坤说：“肖劲光是老同志，苏振华是好同志，你们整肖劲光、苏振华干什么。”

随后，毛泽东同肖劲光在天安门上合了一张影。

游行开始后，1500 名在天安门城楼上的红卫兵就围个大圆圈，齐声朗读《毛主席语录》，高唱“大海航行靠舵手”和“造反歌”，急切地等待着中央首长接见。

9 时 40 分，毛泽东带着城楼上的人由东向西，又由西向东地在天安门城楼上走动，并不断地挥动军帽，向观礼台上致意。

游行快要结束时，在天安门东、西平台上的红卫兵代表又一遍遍地高喊“我们要见毛主席！”这时，广播里通知大学红卫兵代表，到天安门城楼前集合。北航“红卫兵”罗迎难就对身边值勤的解放军战士说，“广播里在叫我们呢”。解放军战士不信，去请示领导，得到确认后，由解放军的一名干部率队，红卫兵代表走下灰观礼台，经过金水桥，来到天安门城楼下，出乎意料的是，带队的竟让他们穿过城门洞，从天安门城楼东侧的台阶，登上了天安门城楼，等待他们昼思夜想的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的接见。

听说就要见到毛主席了，大家一路小跑登上了城楼。快要到台阶尽头的时候，远看有一个人拦在那里，近看原来是敬爱的周恩来总理。

周恩来问：“你们是哪个学校的？”

朱武成回答 ：“我们是广播学院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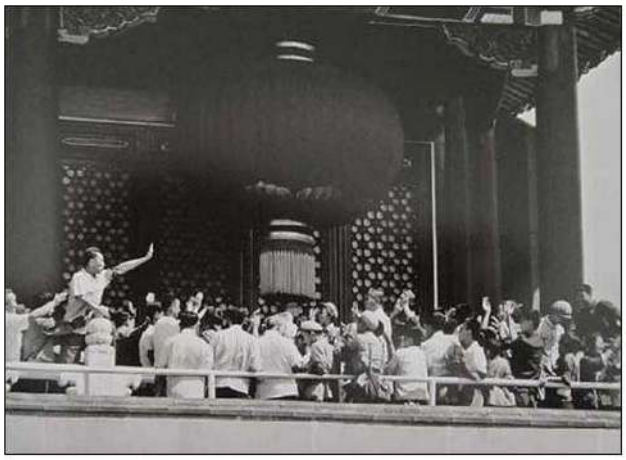
周恩来说，“请你们到护栏前排好队，毛主席马上过来接见你们。”

11 时许，当游行队伍全部从天安门城楼前面过去之后，周恩来陪同毛泽东再次来到东平台和西平台，并且一直走进这 1500 名红卫兵代表中间。这下子可热闹了，楼上楼下的欢腾融为一体，“毛主席万岁”的欢呼声、歌曲声响彻城楼和广场的上空。大家已顾不上秩序，

一边呼喊着“毛主席万岁”，一边蜂拥而上争抢着和毛泽东握手，急得周恩来不断大声呼喊，“请大家不要乱，不要挤着毛主席！”

复旦大学的孙月珠看着毛泽东径直向她走来，一步、二步……终于在她身边站定了！真是幸福从天降，红太阳升起在自己身旁！此时此刻，孙月珠浑身沉浸在幸福的海洋之中，激动的热泪滚滚流下。她跳跃，欢呼，拼命地鼓掌，紧紧地站在毛泽东身边，轻轻地抚摸着毛泽东的衣角。

毛泽东则慈祥地与每个人都握了手。最后在周恩来的指挥、安排下，分批和毛泽东一起照了相。



清华附中红卫兵成员（从左向右）梁苏军、卢家闽、李永平、李近溪、阎阳生、杨晓燕、季庆林、何小鲁、周春晓、卜伟华等受到接见

毛泽东左侧站立者即卜大华。照片中其他清华附中红卫兵成员还有（从左至右）：宋柏林、韩军、杨晓燕、何晓鲁、卜伟华、卢家闽、刘沛、季庆林、申克美、燕长江

毛泽东旁边两个小女孩，使劲拉着毛泽东，毛泽东问："你们是哪的？"她们说："我们是长沙一中的，是主席老乡。"然后叽叽咕咕的说话。毛泽东就低着头听她们说。

清华附中阎阳生和杨小燕在和毛泽东合影时，跑到正中央，两边分别是林彪和刘少奇。阎阳生当天的日记还记录了这样一幕："当他

们告诉刘少奇‘我们是清华附中的，红卫兵！’时，刘主席听不懂，连问了好几次。”

清华附中的熊刚拉着刘少奇说：“少奇同志，你也要注意身体健康，你的身体对我们很重要。”

1966年8月18日在天安门城楼上，照片中毛泽东左侧为清华附中红卫兵成员周春晓。

广院的红卫兵事后还从新华社记者那里得到了和毛泽东的合影。朱武成在毛泽东的右侧，紧挨着毛泽东。柯俊杰在林彪的左侧。王小玲在江青的右侧。万淑鹏就没有那么幸运了，她紧挨着刘少奇站着，正式发表的照片，把刘少奇和她都删掉了。

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分批会见红卫兵代表，而站在观礼台上的数万名红卫兵却没有这福分，他们仰望着城楼，一边挥动着《毛主席语录》，一边有节奏地高喊着：

“我们要见毛主席！”

“我们要见毛主席！”

毛泽东从城楼的东侧走到西侧，又由西向东，不断地挥动着手中的军帽，向观礼台上的红卫兵们致意，而观礼台上的数万名红卫兵们发狂地欢呼雀跃，“毛主席万岁”的欢呼声像经久不息的雷鸣回荡在长空中。这时的毛泽东充满着十足的自信，他自信眼前的一切，自信他对这些红卫兵和青年学生们拥有着巨大的权威和无限的号召力，自信他能够赢得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最后胜利。

1500 名红卫兵在得到毛泽东接见后，欲望更高了，大家都想面对面地看看毛泽东，甚至与毛泽东握握手。方队乱了阵脚，他们开始在东西平台和检阅台乱窜。当毛泽东从检阅台西头走到城楼西南角时，

被一群红卫兵拦住。他们拿着《毛主席语录》或小本本、钢笔，争着请毛泽东签名留念。毛泽东一个一个地接过他们的本子和笔，签上了“毛泽东”几个字，别的什么也未写。得到签名的红卫兵高兴得蹦起尺把高。

这时，师院附中一名初三学生推了站在他前面的师大女附中的宋彬彬一下，说：“你这袖章挺好的，为什么不去给毛主席献呢？”

师大女附中忙了一夜，只印了 40 幅袖章，宋彬彬原来本来戴的是没有字的红箍儿，临上天安门时，有个同学说她的袖章有字，比宋彬彬的好看，就和宋彬彬换了袖章。

当时，宋彬彬旁边站着公安部长谢富治，他和宋彬彬的父亲宋任穷在一起工作过，宋彬彬认识他，于是便问谢富治：“我能不能去给毛主席献袖章？”

这时，师大女附中的小艾也说她要去献红领巾，谢富治问：“她是谁？”

宋彬彬说了小艾父亲的名字，谢富治说：“那你们去吧。”

宋彬彬一摔羊角辫，兴奋地跑到毛泽东身边，用激动得发抖的手向毛泽东献上一只写有“红卫兵”三个字的红袖章，毛泽东左臂往上抬，让这名女学生把红卫兵的袖章往他胳膊上戴。毛泽东始终微笑地看着这一切，并同她握手，此时，毛泽东感觉到女红卫兵的手微微抖颤着，是太紧张、太兴奋了。

毛泽东笑着问她：“你叫什么名字？”

宋彬彬激动万分地回答：“叫宋彬彬。”

“是不是文质彬彬的彬？”

“是。”

毛泽东笑了笑，说：“要武嘛。”

“嗯。”宋彬彬又点点头，像蝴蝶一样飞走了。

“毛主席戴上红卫兵袖章了！”广场上的红卫兵们迅速传送着这一消息，相互热情拥抱，使劲地拍手庆贺，刚刚擦去的喜悦的眼泪，再一次情不自禁地流了出来。红卫兵们纵情高呼：“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卫兵，毛主席是红卫兵的红司令。”

1966年8月18日红卫兵代表为毛主席戴红领巾

此时的天安门广场已经成为疯狂的红色海洋，“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的欢呼声像春潮似地迸发出来，三山为之抖擞，五岳为之震撼，个人迷信也好、个人崇拜也罢，总之，狂热浪潮一浪盖过一浪。

当人大红卫兵走下天安门城楼，回首向上望去，看见刘少奇仍一个人站在天安门城楼的一角抽着雪茄。他们几个人大红卫兵不由自主地站成一排，向着城楼上的刘少奇举手宣誓：“刘主席，我们人大红卫兵向您保证：永远忠于党，忠于毛主席、誓死保卫党中央！誓死保卫毛主席！誓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过了一会，一个男红卫兵也过来给毛泽东戴印有“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字样的袖章。刚把袖章套过手腕时，毛泽东看了看袖章上的字，什么话也未说，就用右手往下扒拉袖章，表示他不接受“毛泽东主义”的袖章。

彭小蒙见到刘少奇，兴冲冲走过去，给刘少奇戴上红卫兵的袖章，并且汇报说：“刘主席，您知道吗？我们这些革命小将戴这些袖章，就是仿效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时的纠察队。”

因为刘少奇是当年大罢工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刘少奇点了点头，嘴角微动，权作回答。彭小蒙似乎感到刘少奇心情不好，于是又跑回毛泽东所在的城楼会客室，问：“毛主席呀，刘主席怎么好像不开心呢？”

“嗯，”毛泽东沉吟了片刻说：“他吗，他不支持你们。”

彭小蒙同毛泽东谈话出来，中宣部副部长熊复赶紧赶过来告诫她："你要作毛主席的好孩子、好学生，要遵守党的纪律，今天毛主席对你讲的话，都应该保密，不要到处乱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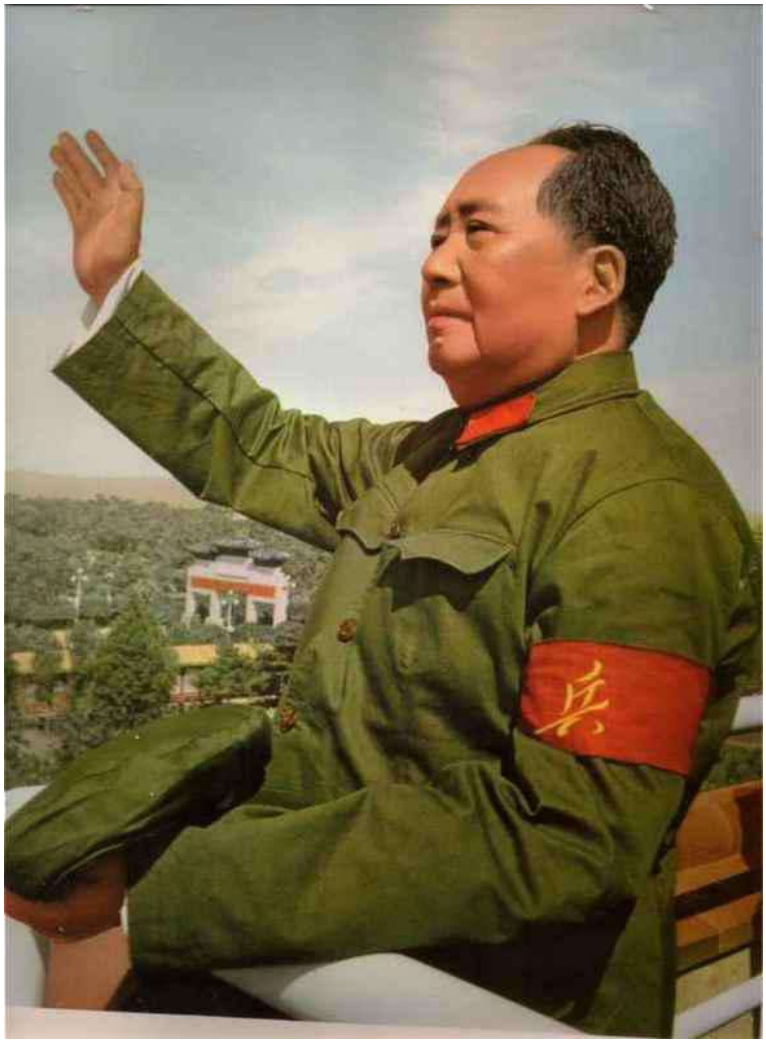
"是，我知道啦。"彭小蒙答道。

年轻的红卫兵认出毛泽东身边有位白发苍苍、高鼻子、蓝眼睛的外国老太太，"这不是斯特朗吗！"红卫兵一下子围上去，把"红卫兵"袖章也戴在了她的胳臂上。斯特朗幸福而庄重地说："你们是毛主席的接班人，要记住毛主席的话……"

斯特朗十分敬仰毛泽东，文革开始后，80 岁的她也热血沸腾，在《中国通讯》中以 8 页半的篇幅介绍"文化大革命"。

李富春的夫人、全国妇联主席蔡畅，在天安门城楼上，向毛泽东要求为《中国妇女》题字。8 月 20 日毛主席写了"中国妇女"四个书写体字。

1966 年 8 月 18 日毛泽东、林彪、周恩来、刘少奇等在天安门城楼上


兵

《人民画报》：参加大会的百万群众表示决心在伟大领袖毛主席领导下，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8 月 18 日这天，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整整呆了 6 个小时。由于握手太多，他的手早已肿了。

这一天，几乎所有登上天安门城楼的中央领导人全都穿上了绿军装，林彪的夫人叶群因为没能穿上绿军装，满腹怨气，她见到警卫处处长，对他说："你看，别的军委副主席今天都穿军装，就贺龙跟我过不去，昨天还特别通知了一回，他还是不送军装过来。"

穿军装，成了一种特殊的殊荣，也成了是否紧跟毛泽东的一块试金石。

8 月 18 日下午，师大女附中参加完毛泽东接见的学生们回到学校，已经听到宋彬彬为毛泽东戴袖章的同学们纷纷过来跟宋彬彬握手，还有人开玩笑说："彬彬，你以后就改名叫要武吧！"

宋彬彬赶紧说："那是毛主席说的，我不配。"

很快，《光明日报》一位男记者到学校来采访宋彬彬，询问毛泽东接见她的情况。

随后，师大女附中的梁二同也来找刘进和宋彬彬谈话，她说："你

们保工作组，是犯了错误的人，怎么能给毛主席戴袖章呢？这是对主席最大的侮辱！”

梁二同一边说一边哭了起来。

刘进和宋彬彬听了梁二同的话，似乎觉得她说的也有道理，自己好像又做错了，很是惭愧。刘进便说：“要不然把你们的袖章给我，去换一下。”

后来，刘进真的把反工作组一派的“红卫兵”袖章送到王任重那儿，希望他转交给毛泽东。

刘进反复检讨自己，为什么错误一犯再犯，越想越觉得不能这样下去了。第二天，8 月 19 日，她写了大字报，列举了自己的错误，宣布退出“筹委会”，宋彬彬也签字退出。

从 6 月 2 日写第一张大字报到宣布退出运动，前后 80 天的时间，却影响了刘进和宋彬彬她们一辈子。刘进家与学校仅一路之隔，文革开始后，就是那么近，她也从不回家，每晚就在教室前面的木讲台上，和衣倒头就睡，第二天爬起来又忙着干革命去了，天天这么过着。直到 8 月 19 日退出，最终自己也没搞清什么是革命、怎么才是革命。

次日，《解放军报》发表社论《我们永远忠于伟大的统帅毛主席》，突出强调毛泽东重新穿上军装这一深远的意义。全国各地主要报刊以大量篇幅报道了“八一八”毛泽东接见百万红卫兵一事。《人民日报》还发表了宋彬彬的文章《我给毛主席戴上了红袖章》。文中写道：

“这是我终生难忘的一天。我给毛主席戴上了红卫兵袖章，主席还给我取了个有伟大意义的名字。回到家中，我心中一直不能平静，

耳边总回响着毛主席的声音：‘要武嘛。’这句话深深地触动了我，使我看到了自己离毛主席的要求还差得很远……今天，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毛主席给我们指明了方向，我们起来造反了，我们要武了！”

文章的发表，宋彬彬并不知情，但却影响了她的一生。多少年后，宋彬彬在回顾这段历史时说了一句让人心酸的话：“青春是美好的，青春在历史的大树上结下的果子却是苦涩的。”

这次接见后的中央领导人名单见报是个难题，是按职务排列，还是按八届十一中全会确定的常委序列排列？刚开完八届十一中全会，按道理应该按最新明确的序列简报，但是十一中全会并没有撤销刘少奇等人党内副主席的职务，而排出的序列却是：书记处常务书记陶铸排在总书记邓小平前边，几个政治局常委排在了刘少奇、朱德、陈云三个副主席前面，如何处理？最后，还是周恩来找出了解决问题的办法，提议只保留林彪一人作为党的副主席，以突出他作为接班人的地位，而原有的副主席自他以下以后一律不再提及，改用政治局常委的名义见报。由于周恩来本人就是党的副主席，这样的提议由他带头提出，其他人自然也无异议。

## 第 130 回：关故宫，王震回家被揪斗

## 改名称，北京学生“破四旧”

8月18日，周恩来接见科学院的文革代表45人，就如何保护少数问题，作了重要的谈话。

周恩来问：“你们是怎么选举出来的？”

答：“是经过群众选举出来的，有的来不及选举，所以今天只派了临时代表来。我们是超过半数当选为代表的。”

周恩来说：“不超过半数不能当代表，那就不能保护少数。”

代表们问：“总理，那怎么办呢？”

周恩来笑着说：“你们今天来的是科学院的，是搞科学研究的，当然你们不是搞社会科学的，但你们也可以去研究研究呀！如何保护少数的问题？清华大学有个名叫蒯大富的，支持他的有20至30人，而反对他的有100多人，照你们说，那他就不能当代表了，但是还有20至30人支持他呢！假设他只有一个人，那当然不能当代表。你们看，少数人就应该保护。

代表里不应该有清一色。你们搞科学工作也是一分为二的。我们中央委员也不是清一色的，不是有彭德怀吗？国民党说：党外无党，党内无派。毛主席说：党外无党是帝王思想，党内无派是千奇百怪。而我们承认党外有党，党内有派。除了共产党不是还有民主党派吗？有的没党没派，我们还给他加了一个无党派人士，也算是一个党派。

有时，有的人大代表选掉了，但新的又会出现，不能保证清一色。但左、中派应该占绝大多数。不同的意见应该有他们的代表。当然，那些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人不能当选为代表。

自然科学家在政治上对他们的要求是低了一些，只要他们是爱国

的，是积极工作的，是不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是不里通外国的，允许他们有资产阶级的世界观，但可以逐步的改造。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和干部，其中就包括中间偏右。代表中要允许有不同意见的少数人当代表。即使少数人是错误的，你们可以批驳，通过批驳，通过斗争，来增强自己的才干，若你们批不倒，那说明你们自己还没有掌握真理，况且往往少数人掌握着真理。有不同意见也能促使我们改进工作，因此要充分保护少数，让少数人也有代表。”

这天，周恩来还接见北京31中“七一”赤卫队队员，对他们说：“你们能给中央提意见，很好。”

学生问：“为什么单有红卫兵上天安门？”

周恩来：“8月16日晚上在工人体育场开斗争会，外地来的人很多，大家都想见首长，16日晚回来就研究18日开百万人大会。把此结果汇报给主席。毛主席一定要求参加，并要求穿军装，后给主席赶制了一套军衣，18日有坏人上天安门也不用怕，咱干咱的。”

有学生问：“如果统一组织，中央能否做出具体的办法？”

周恩来说：“红卫兵、红旗、赤卫队等等是一定能统一起来的，以后会统一。这些组织与红军是有区别的，叫红军不妥当，红卫兵是外国的名字，赤卫队是本国的名字，我看赤卫队这个名字好，关于统一到一起叫什么名字好，要叫大家讨论。”

对学生们提出的出身问题，周恩来说：“看人要看两好：第一好，家庭出身好；第二好，目前表现好。如果表现不好，第一好也就谈不上了。第二好做不好的，也就等于忘了本。出身良好的不要放松思想改造，工人阶级还要进行改造。对于那些出身不好的来说，如果不加强改造，阶级烙印就会更深。现在有出身好的，也有出身不好的。对于出身坏的，

也不用怕，怕什么呐！革命要靠自己，出身好的也不见得没有坏影响，中国各个家庭也较复杂，各种影响很深，出身好的也不是绝对好，也要警惕，如彭德怀，他也是农民家庭出身，但后来，他成了军阀。

我们现在搞文化大革命，要建立新思想、新文化、新习惯，全靠毛泽东思想。这是个长期的革命工作。我们这一代做不完。如果你们做得好、能完成，做不好，还要你们下一代去完成！我的出身不好，我到清华去时，当我讲出身时，出身好的同学不愿让我讲，你要是讲完以后，出身不好的就要向你学习。如果他们愿意学我，很好！能超过我，那就更好，但不是都能超过我的。

我在党内填表时，填的封建家庭，我父亲本是小职员，本可填小职员的，但是考虑祖父、外祖父都是做官的，一个淮阴、一个淮中，他们对我的影响比较大，可以填一个封建家庭！我建议每一个人都写一个“自传”，要从祖父开始写，外祖父、姑姑、姨姨、父亲、母亲的情况，怎么样找出对自己有影响的东西来。写“自传”的方法是从苏联学来的，现在正在研究是否还要这样写，你们指的红五类，是工人子女，贫下中农子女，革命干部子女，革命军人子女，革命烈属子女。组织革命队伍要以红五类出身的为基本核心。”

8 月 18 日下午，时任农垦部部长的王震在家中被斗。

由于王震身体不好，曾做过两次大的手术。早在 1964 年 9 月，谭震林就对他说：“考虑你的身体状况，决定你离职休养两年，农垦部长和党组书记职由陈漫远代理。”

1966 年 3 月下旬，王震从休养地湖南回到北京。

文革开始后，6 月 17 日，谭震林到农垦部看大字报，随后，在全体干部会议上说：“看了你们的大字报，有三点不满意的地方。第一点不

满意，看不到我的大字报。下次如果还没有我的大字报，我就不来了。第二点不满意，是没有你们部长的大字报。部长一点问题没有吗？为什么不揭？你们那么怕，那么不勇敢还行？现在是革命时期，不是评功摆好。要‘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第三点不满意，有人贴了王震部长一张大字报，马上有许多人写大字报进行反击，把人家一下子就压下去了，压制民主。”

6 月 19 日，谭震林批准王震继续休养，并嘱陈漫远亲自去动员催促，王震又离开北京回湖南。

6 月 20 日，王震离开北京的第二天，农垦部召开党组扩大会议。农垦部副部长肖克在会上说：“王震不在家，并不影响对他的揭发。现在背靠背，将来面对面……现在部内可以放手批判王部长，可以出他的大字报，请大家放手批评。各局回去以后和大家讲一讲。必要时，还可以把王震叫回来。”

从 6 月 20 日到 8 月 1 日，即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前的 40 天里，农垦部接连召开了 18 次党组扩大会，集中揭发王震的“反党罪行”，贴了他的大字报。还将整理的王震材料上报中央。王震成为国务院在文革中第一个遭到揭批的部长。

7 月底，王震从湖南回北京参加八届十一中全会。对部里群众给他贴的大字报，王震于 8 月 13 日交给党组一封信，表示因身体不好，要求在家考虑问题。

8 月 18 日，王震也接到请柬，登上天安门城楼。在天安门城楼上，陈毅一见王震，就对他说：“有人说你多吃多占，你能占什么？有人说你没有跨进社会主义，我看你对社会主义无限忠诚！”

就在当天接见活动结束之后，农垦部 200 多人来到王震家，将一个

写着“黑帮头子王震”的牌子，突然挂到他的脖子上，随后高喊“打倒王震”、“砸烂王震独立王国”等口号。

王震怒火中烧，一下子就把牌子摔在地上，并高喊：“我是革命的！是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反对官僚资本主义的！”同时高喊：“打倒真黑帮！”“毛主席万岁！”

在场的人一下子惊呆了，有人吓得大喊：“王震打人了！王震打人了！”

得知王震在家被揪斗的消息后，周恩来立即指示李先念于当天下午到农垦部，听取农垦部党组的情况汇报。

会上有人问：“王震是不是黑帮？”

李先念回答说：“我怎么下这个结论？你又怎么下这个结论呢？”

在农垦部全体干部大会上，李先念说：“王震同志的材料我看了。我过去对王震同志比较熟悉，也比较了解。在一起行过军、打过仗，在一起工作过。中央其他同志对他也是了解的。”

第二天，李先念将《农垦部群众代表与王震谈话情况》报送李富春并周恩来，并称：“对王震同志的问题，搞得愈来愈不像话，这样下去不好。请富春和总理抽时间谈一次，把方针确定下来。”

8 月 18 日，叶剑英、肖华向海军党委扩大会议的全体代表传达了林彪 17 日对海军党委扩大会议的指示精神：批判肖劲光、苏振华够了，批判王宏坤、张秀川也够了，“收兵停战”。当时王宏坤、张秀川均已病倒住院，早已不参加会议，李作鹏参加审查海军党委扩大会议决议初稿。他对决议初稿提出八条反对意见，说这份决议的实质是：“盛锡福帽子店。帽子易戴不易摘，信不信由你们。”

听完李作鹏的发言，苏振华未发一言，起草小组也无人说话，决议

初稿的审查就这样结束了。

李作鹏心中不平，他要看他们如何处理他的反对意见。他想好了，如果不修改决议初稿，他就不参加通过决议的会议，或投反对票。

8月18日，地院“东方红”1000多人参加了天安门毛泽东检阅。王大宾带着陈保堂等几个男生来到金水桥警戒线，将“东方红公社”成立宣言交给了警卫战士，请他们转交城楼上的毛主席、党中央。

当晚，北航“红卫兵”二男二女专程到地院找到地院“红卫兵”程关林和祝天惠，问他们：

“今天毛主席接见红卫兵，你们为什么没去？”

程关林他们说：“没人通知我们。”

“太遗憾了，主席跟我们握了手，还照了相。”说完，向他们伸出手来：“握握我们今天跟毛主席握过的手吧！”

8 月 18 日当晚，在中央高级党校发生了第一次大规模暴力行动。这些职级很高的老“红卫兵”学习中学生红卫兵的方式，对校长林枫等游街、戴高帽子、敲铁簸箕自报罪行等。一时在党政机关中引起轰动。

当天晚上，北京还有许多红卫兵组织和学生开始对“牛鬼蛇神”和“黑帮”家进行了有组织的抄家行动。

这天晚上，还有一批革命激情高昂的红卫兵准备冲故宫，破“四旧”。周恩来得到报告后，当晚做出“关闭故宫”的决定，并通知卫戍区作好保卫工作。19 日上午，红卫兵再次来到故宫门前，叫喊着要冲故宫。故宫的工作人员因事前接到周恩来的指示，便对红卫兵说：“我们按总理的指示，关闭故宫，现在，故宫一律不对外开放。要完整地保护故宫文物。请你们回去。”红卫兵听到是周恩来的指示，不敢强行冲进故宫，陆续退回。

8 月 19 日，北京市第二中学红卫兵在市内主要街道上贴出大字报《向旧世界宣战》，就是他们两天前散发的传单。这个砸烂旧世界的宣言，无疑是向其他学校的红卫兵发出“战斗已经打响”的信号，还没过中午，北京各路红卫兵就像天兵天将一样出现在京城的各个照相馆、理发馆、裁缝铺、旧书摊，出现在京城的各个公共场所。他们首先掀起的是轰轰烈烈的“改名狂潮”。

坐落在北京王府井大街东侧的北京协和医院，是 1921 年美国洛氏基金会创办的私立北平协和医学院的教学医院，1957 年划归中国医学科学院领导，在医学界享有盛名。造反的学生在医院大门上贴了题为“革命造反精神万岁”的大字报，不仅引来病人观看，也招来了一大批过往的行人，连交通都堵塞了。在围观人群的喝彩声中，红卫兵取下了协和医院的院牌，在大门上方贴了一张大字横幅，上面用墨笔写着“反帝医院”。

中央美术学院附属中学的红卫兵首先造的是美术界的反。他们到专门展售中国字画的“荣宝斋”，将事先写好的《人民美术出版社第二门市部》的条幅盖住了书法家写的“荣宝斋”三个金光闪闪的大字。“为人民坚决创立新，为革命彻底砸烂旧”的对联贴在店铺的门框两边。荣宝斋的玻璃橱窗里挂上了中央美术学院附中红卫兵送来的大字报，大字报说：“荣宝斋是个黑画店，几十年来盘剥劳动人民的血汗，为资产阶级小姐、少爷、太太、老爷服务，为封建地主阔老阔少服务，为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服务，一句话，就是不为社会主义服务，不为工农兵服务。”“你们这里已经成了黑帮画家的交易所了。我们就是要把荣宝斋打个身败名裂！”

北京市公共汽车站的站牌全被红卫兵涂上了“打碎旧世界，建立新

世界，改掉旧站名，建立新站名”的标语。著名的长安街被改为“东方红大路”；东交民巷改为“反帝路”；西交民巷改为“反修路”；越南民主共和国驻华大使馆所在地“光华路”改为“援越路”，北京崇文织布厂改为“北京东方红兴无织布厂”；东安市场改为“东风市场”；同仁医院改为“工农兵医院”；清华附中也改为“红卫兵战校”；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则改为“毛泽东思想哲学社会科学部”

8 月 19 日晚上，北京 2 中、15 中、63 中红卫兵闯进坐落在前门大街享有盛名的全聚德烤鸭店。在他们的大声呵斥和鼓动下，挂在店门口已经 70 余年的“全聚德”的招牌被烤鸭店职工砸了个稀巴烂，换上了由红卫兵事先写好的“北京烤鸭店”的长条油漆大木牌。红卫兵们走遍“全聚德”的餐厅、厨房、宿舍，把原来挂在店铺里的山水字画全部撕毁，又推举出 25 中学、63 中学的 10 名红卫兵当烤鸭店的“治安员”、“服务员”、“毛泽东思想宣传员”，在店铺长驻。

留驻的红卫兵到新华书店订了 100 幅毛主席画像，烤鸭店职工买回后连夜在橱窗、餐厅、厨房、宿舍的墙壁上大量张贴。烤鸭店外宾餐厅的楼梯口原来挂着一幅画着北京烤鸭的大型壁画，红卫兵和店里的职工一块将壁画取下，换上了毛泽东语录：“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一切走狗！全世界人民要有勇气，敢于战斗，不怕困难，前赴后继，那么，全世界就一定是人民的。一切魔鬼通通都会被消灭。”

红卫兵还带领烤鸭店职工进行政治学习，让他们认识到：“全聚德”三个字是资本家剥削劳动人民的血汗铸成的，是剥削的象征。砸毁它的招牌，是彻底扫除剥削阶级遗留下来的旧思想、旧文化。

1966 年 8 月 24 日《人民日报》以《红卫兵在“全聚德”点起了革命烈火》为题，报道了此事。报道说：

“8 月 19 日晚，敢闯、敢干、敢革命、敢造反的红卫兵闯进了全聚德烤鸭店，点起了熊熊的革命烈火。”

“北京第十五中、六十三中的十名红卫兵在全聚德住下了。他们是烤鸭店的治安员、服务员，也是毛泽东思想的宣传员。”

“红卫兵和革命职工在商谈如何改进经营。红卫兵提出，北京烤鸭店首先要解决为谁服务的问题，就是面向工农兵的问题。”

“全聚德的阶级剥削史，是活生生的教材，教育了职工，也教育了红卫兵。革命的职工说：‘全聚德是劳动人民的血汗铸成的。烤鸭店要为工农兵服务。’

一张醒目的标语贴在北京烤鸭店的门前：‘欢迎工农兵进餐’。

北京烤鸭店的菜牌上，增加了五种菜，最贵的二角五，最便宜的八分。

许多工农兵群众被迎进了北京烤鸭店。”

第 131 回：中山堂，打人风愈演愈烈　潘复生，冰城支持造反派

8 月 19 日，周恩来让国务院秘书长周荣鑫和副秘书长许明召集紧急会议，布置各地来京串联师生的接待工作，任命北京新市委的副秘书长吕鸿为国务院接待总站兼“北京市外地革命师生大串联接待委员会”主任。吕鸿估计，大串联这一浪潮来势很猛，来京串联人次很难控制，将可能远远突破 500 万这个数字。周恩来指示：应充分估计，预做准备，周全部署，留有余地。

8 月 19 日，李富春办公室电话通知《中国青年报》，传达中央指示：该报从明天起停刊，不发消息，不登启事。

中央组织部和中央监委的干部，也在这天给部长安子文贴出大字报。

8月19日，遵照毛泽东的指示，廖汉生和杨勇、郑维山经过事先约定，于10时30分一同来到人民大会堂浙江厅见林彪。他们向林彪主动检讨了彼此之间的“吵架”问题，检讨了北京军区与各总部的关系问题。林彪批评他们不向他反映北京军区的情况。几天后，他们二人又向北京军区党委常委会全体委员原原本本地传达了毛泽东和林彪接见时的指示，与会者听后很震动。

8 月 19 日晚上，北京四中、六中、八中的红卫兵、文化革命委员会与北京新团市委及市教育局共同发起并组织了一个批斗“黑帮分子”的大会。大会在中山公园音乐堂召开。其声势之大、批斗人员之多、影响之广，在当时是少见的。

批斗会是八中文革委员会主任陈小鲁发起组织的。他觉得：“既

然以前工作组在的时候不批教育部门的领导，我们就挑头组织一次批判北京教育局的书记张文松和教育局局长李晨，还有学校党支部书记的批判会。”他的建议提出后，四中、六中都同意。会场定在中山公园里的音乐堂。然后陈小鲁到教育局，找那里的群众组织邀他们一起参加。

北京的四、六、八中和团市委之所以共同发起这样一次大会，是因为文革前这三所中学的“四清”运动。1965 年初，这三所中学的部分学生，以干部子弟为主，进行串联，组织罢课，当时被称之为“四·六·八学潮”。

这些学生直接给中共中央写信，尖锐地批评学校领导不讲阶级路线，地主资产阶级子女受老师赏识，而干部子女却受压迫。他们认为学校里有阶级斗争，有的老师出身不好，重点栽培出身不好的学生，而革命子弟被排斥，再就是鼓励走白专道路。他们由此认为，学校应该搞“四清”，搞阶级斗争。他们还举了学校里的一个干部子弟为例说：这位同学是老革命的后代，而学校排斥他，不发展他入团；甚至有的同学嘲笑他，常去摸他的头，这反映出阶级情绪，是对干部子弟的仇恨。后来，另一个班团支部书记召集开会，跨支部发展这位学生入了团。

学潮越闹越大，很多高干子弟都参与了。北京市的中学本来不搞“四清”，为控制局面，北京市委书记彭真让万里、张文松牵头，赶紧派工作组过去。到这些学校去搞“四清”运动。

工作组没有马上进校，他们按照“桃园经验”的做法，先是分别

找人谈话，秘密串联，就像进了敌占区似的。

进驻北京四中的工作组是由市教委牵头，市委教育部长张文松为主要负责人，工作组成员由市教育局、团市委的工作人员共同组成。经过半年多的时间，工作组对四中做出了“学校的领导班子是比较好的班子，四中没有四不清的问题”的结论。六中、八中的情况也基本如此。

后来万里在中南海对这几个中学的干部子弟学生训话。作为他们的父辈，他嘲讽、调侃，语气严厉，底气也足，训得这些学生没脾气，只能静悄悄听。他说：“你们老说红二分比白五分好，我看还是白五分好。”后来，闹学潮的领头学生都挨整了。邱会作的儿子邱承光，当时是主要的学生领袖之一，他很聪明，学习成绩出色。“四清”结束时，邱承光不断写检讨，总也过不了关。尽管高考的准备时间很短，但他依然考得很好。

学潮结束后，在中学生中开始发展党员，这些干部子弟学生中一些人，如孔丹、佘靖、马凯都是 1965 年入党的北京中学第一批学生党员。

孔丹，2000 年 7 月担任中信集团副董事长兼总经理。2002 年 11 月任中信集团董事长。

马凯，1965 年北京四中毕业后留校任教员，2012 年中共十八大任中央政治局委员,2013 年任国务院副总理。

我们还回到 1966 年。文革风暴到来后，由于这三所学校的“四清”运动是北京市委领导进行的，主要负责人张文松既是市委领导成

员之一，又与彭真夫人是同胞姐弟，他及参加过四、六、八中“四清”运动的干部自然也就成了破坏“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罪魁祸首。这就是“8.19”批斗大会的历史背景。

批斗大会由三所学校以及团市委、市教育局等有关单位分别指派人参加筹备。四中的代表是张小刚和刘东，八中的代表是陈毅之子陈晓鲁，六中文革委员会的负责人是董必武之子董良翮。筹备会确定了每校有一名代表发言，所有发起单位全体师生参加，除张文松外，凡是与三校“四清”有关的当权派和各校运动挖出的“牛鬼蛇神”一律陪斗。

8 月 19 日晚上，批斗大会如期举行。中央文革中学组派代表和新团市委的两位主要负责人王庆汉、于崇浩出席大会，在主席台就座。整个大厅座无虚席，三所学校和团市委、市教育局干部把音乐堂挤得满满当当，还有 26 中、师大女附中、101 中、师大二附中等校代表到场助威。大会未开始前，由三所中学的红卫兵把坐在囚车里的市教育部部长张文松、市教育局局长李晨、原团市委书记汪家璆、市教育局原局长孙国梁、副局长韩作黎、西城区委教育部负责人侯维成、杨荣梅、原八中校长温寒江、四中校长杨滨、六中校长朱吟宜等人押到会场，立刻有人把事先准备好的写有“黑帮分子×××”的大牌子挂在每个人的身上。大厅里，口号震天动地：“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坚决打倒黑帮头子张文松！”这些人被押上舞台，每人背后站着两名威风凛凛的红卫兵，“黑帮”们面对观众低头弯腰，做“喷气式”，几乎每个人都大汗淋漓。这还不算完，观众席里，忽然传出

整齐一致的呼喊："跪下！跪下！"站在被批斗者背后的红卫兵的脚使劲向前面的人膝弯处踢去，只听"扑通、扑通"的声音震得舞台都有些颤动，台上忽拉拉跪下了一大片人。那个场面真可称得上惊心动魄。

大会由四中张小刚主持，每个学校的代表先后发言。精心准备的发言在会场上引起极大的反响，发言者声泪俱下，听众群情激愤，不断有红卫兵跑上台，抡起腰间的军用皮带，向被批斗者没头没脸地抽去，台上无人敢于制止，台下则齐声叫好。此例一开，场面就再难以控制。陈小鲁见状，赶忙站起来说，"停下!把他们'打倒'在地!"但是场面已不是他所能控制。红卫兵的武斗举动逐步升级。有的红卫兵甚至手拿照相机，专拍被批斗者的各种狼狈姿态。他们示意台上的红卫兵把脚踩在被批斗者的身上，手持红卫兵的旗子，摆出一副胜利者的姿态，拍照留念。美其名曰"把一切牛鬼蛇神打入十八层地狱，再踏上千万只脚，叫他们永世不得翻身！"

曾在八中当过校长的温寒江，此时正在教育局工作，当时已是五、六十岁的老头了，也被八中高一年级的几个学生押着，从八中一路小跑到音乐堂，一路还用皮带打他。

市教育局局长李晨的脑袋被打得头破血流，押送他的红卫兵把他带到后台，用凉水冲洗一下，就又押回前台跪下。

四中校长杨滨事后告诉刘东，她心脏不好，虽然事先服了药，但还是被这场面吓得胆战心惊，加上年纪大了，到大会后半段，她已感到难以支持。押解她的红卫兵于心不忍，偷偷把挂在她胸前在大牌子

拿下来，放在她身体的前面，让她把牌子权当一个拐杖拄在地上，以减轻她的重负。

在中山公园音乐堂的舞台上，当着数千观众，毒打 20 多名教育工作者，鲜血流在音乐堂的舞台上，教育局长肋骨被打断。“8.19”批斗会的影响极其恶劣的，它给以后大大小小的批斗做了一次很坏的示范表演。后来的批斗会，“要文斗，不要武斗”的口号完全失去了约束力，批斗者可以任意打人，以各种非人道的方式摧残人的身体，甚至以此为乐。严肃的政治斗争在这里已经演变成变态的肉体折磨。

8 月 19 日晚，北京外语学院附属中学红卫兵，在学校里打死语文教师张辅仁和总务处职员张福臻。

8 月 20 日清晨，北京宣武区梁家园小学校长王庆萍被毒打和关押后坠楼身亡。

此时，哈尔滨 14 所高校仿效哈军工，造反派也相继成立了“造反团”，保守派则成立了“八八团”，有的还成立了第三派组织：“东方红团”。由于这几个团的起源地在哈军工，加之哈军工学生出身好；经过长时间部队生活的锻炼，组织性纪律性强；来自全国各地，消息灵通等因素，哈军工的“红色造反团”和“八八团”很快就成了全省两大派的核心和骨干。

经过串联，14 所哈尔滨高校造反团又联合组成了“哈尔滨大专院校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红色造反者总部”。由各校派出自己的成员，组成总部办公会议。开始是哈军工的一名高干子弟当头，后来陈伯达建议干部子弟不要担任群众组织的头头，改由工业大学陈造反任负责人。

陈造反是他在文革时改的名字，原名叫陈轮鲧。到 1967 年 1 月份，又换黑龙江大学的张连科负责。张连科是黑大哲学系 66 届学生、黑大“造反团”总团负责人，长于思考，善于辞令，很有组织能力。

8 月 16 日晚，黑龙江省委发出通知，要求各单位组织讨论“省委是不是革命的？”

哈军工“红色造反团”认为，省委是借这个题目煽动哈尔滨市工厂、学校、机关团体的群众围攻他们，是挑动群众斗群众的大阴谋。他们群情激奋，当晚就到省委贴大字报，强烈要求收回这个错误的通知。而哈军工“八八团”的 3 个头头则来到“红色造反团”总部要求会谈，说省委的这个通知是全省的一件大事，要求联合贯彻进行大辩论，被“红色造反团”拒绝。

第二天，“八八团”召开誓师大会，说是“揭发省委问题”，积极投入省委发起的大辩论。会后，20 多万工人和“八八团”人员上街游行，高喊“誓死保卫省委”“省委是革命的”等口号，向“红色造反团”施加压力。

当天，从北京参加八届十一中全会回到哈尔滨的省委书记潘复生接见“红色造反团”部分成员，称他们为革命左派，表示坚决支持他们。

8 月 18 日这天，哈军工“毛泽东主义红卫兵”成立。在成立大会上，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潘复生表态支持学生炮打省委这个司令部，并带上红卫兵袖章参加游行，成为全国第一位支持红卫兵造反的省委第一书记。恰巧毛泽东主席也是这天在天安门城楼上戴上了红卫兵袖

章。

当天下午，潘复生又在哈尔滨大专院校“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红色造反者”总部所在地，北方大厦门前广场，臂戴“红色造反团”的袖章，先后接见了哈尔滨市 14 个大专学校的“红色造反团”，并在大会上发表了几乎一样的讲话，他说：

“今天，伟大领袖毛主席在天安门广场接见百万红卫兵和革命群众，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盛大节日。在这里，我代表黑龙江省委，向革命的红卫兵致敬，向革命的红卫兵学习！我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压制了你们。我要向你们检讨，向你们赔礼道歉。”

“毛主席就是让我们站在革命左派一边，我们就是要站出来，支持你们!”

“你们的大方向是正确的，我坚决支持你们。”

潘复生还宣布省委“8.16”通知是错误的。会上“八八团”有人递了一个条子，问潘复生参加大会并戴上“红色造反团”的袖章是自愿还是被迫的？潘复生念完条子后说：“完全出于自愿，我还要努力做一个够格的红卫兵战士。”

潘复生的亮相，使“红色造反团”扬眉吐气、欢欣鼓舞，赢得了造反派对他的信任和支持。当然也就让“八八团”认为他是“挑动群众斗群众的罪魁祸首”，接连十几天，对潘复生进行围攻。

8 月 18 日这天，“哈尔滨市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八八战斗团”宣告成立。哈军工“八八团”自然是全市“八八团”的首领。

8 月 19 日，从北京来哈尔滨串联的红卫兵，与“哈军工红色造反团”在院长办公楼前，联合批斗刘居英和学院政治部主任、院文化革命办公室主任沙克，戴高帽，抹黑脸，拳打脚踢，无所不用其极。围观的群众中不少人流泪啜泣。各部、系和基层领导干部也纷纷遭到本单位造反派的斗争。

装甲兵司令许光达大将的儿子许延滨这次真的把刘居英打翻在地，踩在自己的脚下。然而，他自己也没有想到，他的家庭也将面临比刘居英更大的困境。

8 月 21 日，哈军工“红色造反团”贴出《踢开绊脚石，解散院党委》的大字报。

第 132 回：刘建勋，亮观点态度鲜明　曹荻秋，不主张建红卫兵

我们再看中原郑州。8 月 15 日下午，随刘建勋一起从北京回到郑州大学的党言川他们，串联了 38 名同学，在郑州大学南门外的机械厂开会。到会的人七嘴八舌，议论纷纷，但有一点是一致的，认为校文化革命委员会不能体现他们的意志，与群众的理想背道而驰，应该另立个组织，自己干自己的。大家说："我们是串联到一起的，就叫联络委员会吧！"大家决定晚上就召开个大会，让党言川他们把北京情况向大家介绍一下，在社会上广为宣传，名字定为"赴京同学汇报情况大会"，会场设在郑州大学操场，并以"郑州大学文化革命联络委员会"名义贴出告示。

他们没有料到，晚上前来参加大会的竟有几万人。郑州市其他大中学校的师生和各界群众也都前来参加大会。郑州大学一下子热闹、红火起来了。当时他们还不知道，中共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刘建勋、省委第二书记兼省长文敏生、省委书记处书记杨蔚屏、省委书记处候补书记纪登奎等领导也来到大会场旁听。

就在"郑州大学文化革命联络委员会"召开汇报大会的告示刚一贴出，郑州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就认为"郑州大学文化革命联络委员会"这一组织是非法的。汇报大会开始前，"校文革"主席彭学敏、副主席郑毅涛等人以郑州大学文化大革命负责人的身份，上台要主持会议，"郑州大学文化革命联络委员会"他们当然不同意，双方发生了争执，互相推推拉拉，最后把"校文革"的人轰下台。于是，"校文革"说"郑州大学文化革命联络委员会"打他们。会场距离物

理系教学楼比较近，该系几名教师以“革命教工”名义，广播声讨“党言川一伙打人”，还用扫帚写出一张白纸一个字的巨幅标语：“我们绝不承认非法的文化革命联络委员会！”

与此同时，“校文革”又在文科楼前聚众演讲，说“汇报大会没有校文革主持就是非法的，就是一个不光明正大的黑会。”并声讨党言川、方复山他们打人。于是，“打倒党言川！”、“打倒方复山！”的口号声此起彼伏。“校文革”一位委员在发言中说：“他们打的不是一个工人，打的是全校师生，打的是无产阶级专政，打的是中国共产党！”

汇报大会就在这种环境下开始了。大会由方复山主讲，向大家介绍在北京见到的情况，如红卫兵运动、文化大革命串联、北京高等院校的运动情况等等。党言川、刘松盛作了补充发言，谈了“炮打司令部”要敢字当头又要善于革命，要广泛发动群众，积极投入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去的问题。总之，他们 3 人把在首都北京的所见所闻，毫无保留地传达给大家。整个会场气氛热烈，群情激昂。

会后，“郑州大学文化革命联络委员会”很快就由 38 人发展到 100 多人。他们连夜在文科楼中文系阶梯教室召开全体会议，研究制定“郑州大学文化革命联络委员会”章程，组建领导班子。经过民主讨论，大家举手表决，方复山被选为一号服务员。那个时候，整个社会提倡为人民服务，于是这个领导班子称为“服务组”。服务组主要负责人还有党言川和青年教师唐伯绪，他后来改名唐一兵。服务组其他成员有历史系学生任延庆、中文系学生席占修、政治系学生殷树山、

外语系学生杜秀萍、数学系学生梁国喜、数学系学生李清云、政治系学生李玉芳、物理系学生张松黎、化学系学生孟福海、校办工厂工人袁宝珠，共 13 人。

由于“郑州大学文化革命联络委员会”是与“校文革”针锋相对的组织，他们组建后，经常受到群众的围攻和质问。8月15日晚上和16日上午，“校文革”主持召开“郑州大学革命师生辩论会”。会上称党言川的汇报会是“黑会”，“打了校文革的人”，于是一些群众高呼：

“控诉党言川一伙殴打校文革的法西斯暴行！”

“打倒党言川！”

“把党言川揪出来！”

接着，连续3天，党言川及“联委”学生受到围攻斗争。

有一次，方复山到学生第一食堂吃饭，被炊事员夺下饭碗，要与他进行辩论。方复山耐心地向工人师傅解释，说服了这些炊事员，后来他们也参加了“郑州大学文化革命联络委员会”。

8月17日，刘建勋、文敏生在郑州市大中学校师生员工大会上的讲话。

刘建勋说：

同学们，同志们:

我前天才从中央开会回来。为了迅速贯彻执行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的精神，省委立即召开了会议，研究了我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问题，决定召开今天这个大会，进一步动员郑州大、中学校的革命师生

员工，起来大闹文化革命。省、市党政领导机关也准备召开大会，进一步动员起来，大闹文化革命。

同学们，同志们:

十六条是在毛主席亲自领导主持下制定的，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纲领和最高指示，字字句句都要照办。

革命师生员工同志们，你们站在文化大革命的最前线，是学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主力军。毛主席支持你们，信任你们。省委遵照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完全支持你们，依靠你们，坚决和你们站在一起，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你们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解放思想，打破顾虑，敢干、敢闯、敢革命，冲破各种障碍，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只有广大群众真正起来，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大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才能挖掉修正主义根子，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走向共产主义。这两天我接见了许多同学，嗓子不好，不能向大家多讲。现在，请省委第二书记文敏生同志代表省委讲话。

文敏生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极其激烈、极其尖锐、极其复杂的阶级斗争，是一场史无前例的大革命。当前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任务，就是毛主席指示的：一斗、二批、三改。在学校，第一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第二是，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第三是，改革教育制度和教学方针、方法。"

"党的领导，就是放手地、充分地发动群众，诚心诚意地信任群众，坚定不移地依靠群众，满腔热情地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

“总结检查前一段运动的情况，对的就继续照办，错的就坚决改正，没有做的就切切实实地去做。谁要抵制、违犯十六条，不论他的职位多高，资格多老，就要揭发他，批判他，撤他的职，罢他的官。”

8月18日，也就是毛泽东主席第一次接见红卫兵那一天，省委第一书记刘建勋、省委书记处候补书记纪登奎、戴苏理3位领导，都带着自己的秘书，专程来到郑州大学了解情况，分别与两派代表开座谈会，听取汇报。方复山率领“郑大联委”服务组7名成员，向省委领导汇报了8月15日至17日郑州大学的情况，强烈谴责“校文革”转移斗争大方向，不批判有问题的当权派和反动学术权威，却专门斗学生。省委领导认真地听取了双方的汇报，没有表示任何态度，就离开郑大回省委了。

8月19日上午，刘建勋在纪登奎的陪同下，又来到郑州大学，让“校文化革命委员会”召集全校师生大会。会议议程简单明了。首先，纪登奎宣布大会开始，申明几项纪律，接着就请刘建勋讲话。刘建勋没说别的什么，直截了当地讲：现在宣读《我的一张大字报》：

郑州大学全体革命师生员工同志们:

昨天，我和纪登奎、戴苏理等同志校和郑大文化革命委员会的六位主席和同文化革命委员会意见有分歧的同学，谈了当前的运动情况，并看了一些大字报。现在谈一谈我对一些问题的看法:

一、党言川等三位同学到北京找中党中央、毛主席要求汇报郑大文化革命的情况，这不仅不是什么非法行为，而是一种革命行动。

二、他们从北京返校后，召开大会向同学们汇报北京文化革命运

动的情况和经验，这不仅不是什么“黑会”，而是光明正大的革命大会。

三、郑大有一部分同学，认为本校的文化革命委员会，不能代表他们的意见，因此，有的同学自动酝酿串连，建立了文化革命联络委员会，他们起来闹革命，我认为不能说成是非法的。

四、党言川等三位同学从北京回来后，和赞成他们意见的同学，自动到校内校外进行宣传，互相学习，交流革命经验，是一种革命行动。当然，各校革命师生员工的主要任务，是把本单位的文化大革命搞好。

五、我在北京同党言川等几位同学谈过话，完全支持他们的革命精神，并说我回去后，根据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要放手发动群众，大闹文化革命。要动员省直机关群众，对省委和各单位的负责干部，展开彻底地揭发批判。我说过“炮打司令部”这句话。就是要充分发扬民主，动员广大群众起来，把领导机关里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修正主义分子统统揪出来。

六、党言川同学就我知道的情况，他没有欺骗过我。他说我批准改选郑大文化革命委员会。当时我在场，党言川的话，同我说的虽略有出入，但不能说是欺骗。十五日大会上，我作了一点说明，文化革命委员会的选举和改选，完全由革命师生员工自己讨论决定，我没有批准之权。

七、运动初期，省委曾经坚决反对和制止了王培育挑动学生斗学生的严重错误。现在，我再次郑重提出，不许用任何借口，去挑动群

众斗群众，挑动学生斗学生，不准转移斗争目标。即使是真正的右派分子，也要放到运动的后期灼情处理。革命同学之间的争论，随意就给持不同意见的人戴上“反党反社会主义”等一类的帽子，我是不赞成的。

八、前一段，一部分同学贴大学报，批评省委工作组和省委的缺点、错误，这是完全应该的，我代表省委欢迎你们批评，支持你们批评。

九、我建议，在当前的争论告一段落后，仍然回到辩论工作组和省委对郑大文化革命的领导问题上来。以十六条为最高指示，分清是非，总结经验教训，检查缺点、错误，团结一致，奋勇前进。

十、昨天，有些同学们问我，“造反有理”这句话对不对？革命，就是造反。我们就是要造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反，造资产阶级反动“权威”的反，造修正主义的反，造一切反动派的反。我们要有这种革命的造反精神。

刘建勋支持少数派的大字报在河南引起了巨大反响，各地、市、县、社的领导干部纷纷挺身而出，支持群众运动。为此，1966年12月24日，毛主席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也就是一次汇报会上，公开表扬刘建勋和他发表的大字报：“全国省委书记只有刘建勋发表了一张大字报，支持少数派，这是好的。”

由于省委领导同志明确表示态度，郑大“联委”由100多人一下子发展到近千人。中文系李德庆、冯广珍、金玉田、余绍初4位老师冲破阻力，最先在大会上宣读声明，公开表态，完全脱离校文化革命

委员会，坚决和郑大联委的学生站在一起，战斗在一起，按照党中央的伟大战略部署，生死与共，积极搞好斗批改，誓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说罢河南，我们再看上海。

8 月 18 日毛泽东接见红卫兵的当天上午，上海市委书记处开会，讨论上海是否开会庆祝。曹荻秋开始竭力反对，后被迫同意开，但建议，大会不讲话，“队伍走过就算了”。大家都认为开大会哪有不讲话的，不同意曹荻秋的意见。最后还是陈丕显决定，曹荻秋和华东局书记魏文伯都要到会讲话。

第二天，8 月 19 日，上海组织庆祝游行。会上，复旦大学“红卫兵战斗小组”的代表报告 8 月 18 日在北京见到毛主席的情景，上海师范学院附中学生向大会提出在全市建立“红卫兵纵队”倡议。

对于中学生的这个倡议，曹荻秋小心地表示：“组织红卫兵的问题还要考虑，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没有讲”。并且，拒绝了学生们要在报上刊登建立上海红卫兵组织的倡议。

但是当天，上海市委办公厅副主任苏超还是打电话给上海市委组织部副部长、“上海市红卫兵联络站”主任张文豹说：“曹市长叫我告诉你，23 日召开上海市红卫兵成立大会，你们迅速去联络各红卫兵组织，协助做好会议组织工作。”

张文豹听说华东师范大学“心向党”红卫兵组织成立最早，人数最多，经华东师范大学党委推荐，拟定该组织的负责人女大学生李本荣代表红卫兵发言。张文豹也觉得她各方面条件都不错，请示市委获

得同意。

8 月 22 日，复旦大学“红卫兵大队部”成立。

第133回："三相信"，湖南省有人质疑　长沙市，八一九又起风波

此时，湖南形势也发展很快。8月14日，在长沙五一路边威严的中共长沙市委大门围墙上，贴出了两幅巨大的横幅标语，一幅是："坚决打倒三相信！"旁边写了注释："三相信（相信省委、相信市委、相信工作组）"，这是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6月6日在工作组集训班上最早提出的。还有一幅是"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

大标语的署名是"长沙市十二中学共青团员胡宜民、陈振国、范均兰、陈国斌、张春利"，这5人都是长沙市十二中高三学生。

"居然反对我们相信的共产党省、市委，还要造反？"这在长沙可真是骇人听闻！一下子市委大院门口就围满了人，先是观看，然后就是悄悄地议论，再后来又变成互相之间的辩论。

有人说："这是反动标语！"

"不相信省委市委，就是不相信党！"

还有些人则认为："这些学生兵写的，总会有什么理由吧！"

一批红卫兵则在人群中慷慨激昂地演说："只有党中央、毛主席才能代表党，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省委、市委就是不能相信！"

一个北京来的红卫兵操着一口很好听的普通话说："不管你是什么人，不管你是哪一级党委，我们只看你的言行是不是符合毛泽东思想，是不是符合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号召，就能决定是该相信你还是该打倒你！"

以前，一个党支部书记说的话都被认为是"党的指示"、都不容群众有任何疑义。现在，这些北京来的红卫兵突然提出"只有党中央

毛主席才能代表党”，“只有毛泽东思想才是判断是否革命的标准”，甚至连省、市委都不能相信，这对当时群众的影响可想而知。这几幅标语顿时轰动了整个长沙市乃至全省，搅得每一个市民都来议论甚至互相辩论，各级党组织的权威受到正面挑战。

支持学生的工人走上街头，表达自己的政治见解。一些产业工人在下班时间组成示威队伍，举着“打倒三相信”、“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的标语，游行到市委，引得路旁围观的市民欢呼雀跃。

在北京不断传来消息的刺激下，省会长沙的大中院校酝酿着更大的骚动与不安。8 月 17 日，“长沙市红色政权保卫军”，简称“长保军”宣告成立，这是长沙最早的全市性中学生红卫兵组织，其成员大多为中学生中的党员、团员、积极分子，以及其他出身较好的学生，以由省委、省军区负责人的中学生高干子弟为主，以誓死保卫省委、市委和红色江山，打击“黑五类”和“狗崽子”为宗旨，负责人是湖南省军区副司令员李洪茂的儿子、市五中学生李政；另一个负责人是市一中学生、省委代理第一书记王延春的女儿王虹霞。

“红色政权保卫军”仿效军队建制，设立了诸如司令部、政治部、组织部、保卫部、宣传部等机构。而且还将省政协委员们驱走，占据了省政协大院作其总部，总部大院配置了身着军装的值岗卫兵，当然也是红卫兵，并向可以进出总部的人敬军礼。整个儿就俨然是一个军区司令部，能让所有到这儿来的人都生出惊异与敬畏。

总部之下，便是各学校的“红色政权保卫军”的分部。

各学校一级“红色政权保卫军”组织定的名称也体现了军队味，

各学校叫“军分部”，不是称某某学校“红色政权保卫军”，而是称“红色政权保卫军”某某学校军分部。

他们有着很强的政治优越感，党委指向哪里，他们就冲向哪里。

8月18日，从长沙跑到北京告状的长沙市一中学生谢若冰登上了毛泽东检阅红卫兵的天安门城楼，她代表外地赴京学生发言并获得毛泽东的签名。消息传到长沙，本已躁动不安的湖南大、中学校也跟着风生水起，准备效仿北京红卫兵杀向社会的学生亢奋异常，急欲一试身手。

谢若冰时为长沙市一中高三学生，出生于干部家庭，运动之初她也是基本依靠对象。她与同学黄杏英等人因与进驻一中的省市委联合工作组在运动方向上产生分歧，连续贴出多张言辞激烈的小字报对工作组进行指责，被工作组打成了反党小集团。天天有人围攻她们，大字报更是铺天盖地，她们在学校真是没法呆下去了，于是决定进京告状。

8 月初，谢若冰和同伴黄杏英、李筑银等一行 8 人，步行出长沙到浏阳，再连夜经山间小路，步行至江西上栗县。在越过省界，确信后无追兵时，她们才大大地松了口气！

当她们辗转坐火车到达上海，还是被省委的人追上了，劝说她们回一中。其中几个人真的回去了。谢若冰、黄杏英、李筑银等人坚决不回去，她们从上海经天津到了北京，在北京也是东躲西藏，北京邮电学院和北京航空学院都去过。8月17日，有人通知她们说，“要毛主席家乡湖南的红卫兵上天安门城楼”，她们几个人就上了天安门城楼。

谢若冰因其出身于干部家庭，代表外省市师生讲话。当她讲完话后，取出随身带的一个小日记本，请毛泽东为她签下了“毛泽东”3个字！

谢若冰等人登上了天安门，正在北京开会的湖南代理第一书记王延春随即亲邀谢若冰几位“小将”游颐和园、吃西瓜，以示亲热，并授以吃瓜秘诀：要想甜、先吃咸——嘴里含块盐吃西瓜，吃得又多又甜。

8月19日，湖南大学土木系279名大学生游行庆祝毛泽东主席“八一八”接见红卫兵，沿途吸引了成千上万的市民围观。当他们来到位于五一路的长沙市委门前，将很多写有毛泽东语录和《十六条》中的章节，用大字报形式，贴在了市委大院内外的墙上，说是“宣传毛泽东思想”，吸引了许多市民围观。

这时有人发现长沙市委大楼墙上挂的毛泽东画像正中从上到下，有一条明显因画布拼接形成的痕印，认为这是对毛泽东主席的大不敬，当即就要进入大院，要求市委书记接见，对市委抗议，遭到阻拦。

市委书记孔安民兼长沙军分区政委，他仿效毛泽东八一八接见红卫兵时的样子，身着军装出面讲话，引起学生反感，舆论哗然。

市委领导人慌了手脚，说是“右派学生要翻天了”，“会发生匈牙利事件”，在向省委汇报后，动用公安人员暗中准备，长沙市委常委兼秘书长李惠民，从工厂和街道居委会调集众多的“工人赤卫队”来到市委大院内，意图保卫市委。并动员“红色政权保卫军”前来。

随着市委电话的紧急召唤，络绎不绝的工人、街道老太太和“红色政权保卫军”的中学生赶往市委。可想而知，当这些戴着“赤卫队”

袖标的工人、老头、老太太,和佩戴“红卫兵”袖章的大学生一接触，相互间的辩论，无疑使气氛急剧升温，争执中发生推拉拽扯，最终发生了工人殴打学生的事件，一批学生或轻或重挨了揍，并被轰出了市委大院。

怒不可遏的大学生冲上街头游行问罪，并声言要到省委要求省委出面解决。各中学“造反有理队”群起声援。

湖南省委同样紧急调集了“赤卫队”和“红保军”,在省委正门和西门各布置了三道人墙，想以老人对“娃娃”,用工人对学生。但大学生们并没有去省委。在长沙市街头，大学生红卫兵继续遭到“赤卫队”和“红色政权保卫军”的追赶和殴打。这就是轰动湖南全省的“长沙8.19事件”。

是日，湖南大学过湘江宣传的并非只有大闹市委的一支人马。下午 16 时许，市委大院鏖战方酣之时，湖大一辆应邀前往八中宣传造反遭围攻的宣传车，在八中同观点学生的护送下启程返回，行至不远处的湘春路小学门前，被闻讯赶来的工人“赤卫队”和“红色政权保卫军”拦住，双方展开辩论，各不相让，交通为之阻绝。此时，一位“红保军”成员高声通报了湖南大学学生冲击市委的消息，在场的“赤卫队”、“红保军”群情激愤，有人动手撕下宣传车上的横幅和扯下喇叭电线，造成宣传车哑声。但湖南大学的学生毫不退让，亦有市民为其端茶送水，表示支持。双方的对峙一直持续到次日凌晨 2 时，一位赤卫队员爬上路边一电线杆挂上大喇叭，从中传出了隐匿于现场某处的市委书记的声音：“我是孔安民……”

在孔安民的劝说下，“赤卫队”、“红保军”和围观市民方才散去，湖大宣传车得以脱身。

对于大学生红卫兵到市委去宣传毛泽东思想，请市委书记接见，很多人都似乎觉得没什么错误，因为中央各种传媒关于“红卫兵是革命先锋”的舆论，早已被人们接受了。而示威大学生们被满街追打，头破血流的境况，更引起长沙市民的同情，激发了市民对长沙市委领导人的义愤。全城炸开了锅，人人都在说这事。

为了防止事态扩大，长沙市的公安人员穿着便衣，密布在湖南大学和车站四周，不准学生离开学校。

湖南大学的学生决定上北京告状。经过似乎是很周密的策划，女学生摘掉校徽，挎着篮子，手牵小孩，化装成家庭妇女走出了校门。几个男学生大摇大摆在前面作掩护，以吸引便衣的注意。这些都是从当时风靡全国的小说《红岩》或《青春之歌》中学来的。

北上告状的学生成功地走到了橘子洲头，却在渡口被一个便衣拦住。当她否认自己是湖南大学学生时，便衣指着她的胸口说：“你将校徽摘了，可戴校徽的痕迹还在。”她看着胸口的两个针眼暗暗叫苦，只得低头不语。

出乎意料，这个放单的便衣居然站在学生一边。在他的提醒下，女学生摘下小孩身上的毛泽东像章别在胸口后又混到了火车站。

火车站戒备森严，在渡口漏网的学生都功败垂成，被赶下火车。情急之中，她们异想天开，直奔机场。在那个年代，老百姓坐飞机如同今天的太空行走一样不可思议。正因为如此，公安人员没有在机场

设防，被女学生钻了空子。她们乘飞机进了北京。

省委于8月19日当晚即决定在8月20日于河东的省体育场和河西的湖南大学同时设立会场，由“8.19事件”的当事双方各抒己见、展开辩论。

8月20日，在河西、河东召开的数万人参加的辩论会上，市委安排了3名颇有声望的劳动模范到会上控诉“右派学生”的反革命行为。其实，这几名劳动模范并没有看见大学生做了什么，因为他们当时都不在市委大院内。他们只不过是奉命在大会上，对大学生们的行动进行一番官样文章般的批判与指责而已。而湖南大学政治部主任王晓，身为领导干部参加辩论，居然采取与省委相反的立场、袒护学生，出乎许多人的意料。

“红色政权保卫军”主要负责人、省委代理书记王延春的女儿、一中学生王虹霞，高调维护省市委、指责湖南大学学生、攻击尚在北京，与8.19事件本无直接关系的谢若冰、黄杏英等人，情绪激动，发言至声嘶力竭，声音沙哑。

湖南大学的操场上，两派对立，群情激奋，气氛紧张，辩论激烈。因观点截然相反，参加河西大会的大部分高校学生退出了会场，然后跨过湘江，走上街头，开始了大规模的游行示威，喊出了“谁镇压学生运动绝没有好下场”、“打倒走资派”、“改组长沙市委”等口号。

辩论会以平局收场，省委的意图显然未能实现。会后的长沙乱成一锅粥，工厂、机关都如学校一般分成了两派。拥护省委者固然不乏其人，支持湖南大学、前往声援或学习取经者亦如过江之鲫。湖南大

学则好茶好饭招待，热情异常。

8月20日，长沙市委向全市各工厂、商店、学校、机关发布指示，指责发生在市委大院门口的事件是“右派学生企图向党进攻”的反革命事件，号召人们同右派学生作坚决的斗争。于是，原来支持学生的工人、干部，赶紧又闭上自己的嘴，刹时出现了声讨“右派学生”的一边倒气势。在街头，解释宣传市委大院事件的大学生遭到了不停地围攻，甚至遭到一些工人的殴打。

形势骤变之下，为传达中央八届十一中全会精神召开的湖南省委二届十三次全会于8月20日日草草收场，省委委员、地、市、县委书记们怀揣着迷惑与不安离开了长沙。

已感到闯下大祸的长沙市委更是不得片刻安宁，惊恐万状的孔安民只好在市委副书记兼长沙县委书记赵阳城的陪同下跑到春华山农村检查工作。支持造反的市水利机电局局长王俊杰闻讯后，带领一批造反派尾随而至，要请孔书记回长沙参加运动、接受教育。事后随同孔安民书记一起出逃的市委警卫处干部梁俊杰向王俊杰等讲述了事件经过，水利机电局的向治铨、省水电勘探设计院王建武、省文化干部学校邓守宇据此共同写出文笔生动传神的《奔命记》，令长沙市委颜面尽失。

8月21日，从北京回到长沙的谢若冰、黄杏英等人在省体育馆召开大会，向全市中学造反派介绍北京文革的大好形势，鼓动造反；各校“造反有理队”开始靠拢，并于8月29日成立以谢若冰、胡宜民、黄杏英为首的“毛泽东主义红卫兵长沙造反有理军”，后改称“毛泽

东思想红卫兵长沙造反有理军”。

第 134 回：八一九，全国都在开大会　荣毅仁，太平庄家中被斗

8 月 19 日这天，全国各省市模仿北京，都相继召开“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群众大会。全国各大城市先后成立了红卫兵。

是日，辽宁省暨沈阳市在中山广场召开有 30 万人参加的“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会”。东北局第一书记宋任穷、辽宁省委第二书记黄欧东分别在大会上讲了话。东北工学院的一些学生认为听不清，在会场打出“造反有理”的标语，会后东北局、辽宁省委决定，将大会组织者，沈阳市委书记宋光撤职。

8 月 19 日，天津市领导万晓塘、赵武成、谷云亭、张淮三一干人来到市一中，说是要参加一中的红卫兵大会，都带上了红卫兵的红袖章。有几个人马上去买胶卷，一时间好不热闹。

8月19日，湖北省委主要负责人也接见了武汉11所大中学校学生，表示坚决支持革命小将。武汉市委还组织50万人集会游行，庆祝毛泽东8月18日接见红卫兵。

早在 8 月 12 日，正在北京参加八届十一中全会的湖北省委代理第一书记、省长张体学就从北京电话指示湖北省委，要求在 15 日前按《十六条》精神成立文化革命委员会和文革领导小组，接替工作组对运动的领导。按此指示，8 月下旬，湖北各院校相继成立文化革命委员会，并陆续有组织地成立红卫兵。

8 月 12 日这天，武汉水利学院三年级同学韩同良、丁家显、韩玉琢，以三个贫农子弟名义写信给工作队长刘真，悲壮陈词，申明青年人搞文化革命的目的，批评工作队主持反击打击了热心参加文革学

生的积极性。

此后，武汉高校学生对成立文革委员会进行了认真的辩论和选举。青年人都醉心于中央《十六条》倡导的巴黎公社民主制度原则，少数受过压制的群众希冀通过理想化的民主辩论和选举，达到长期被压抑的自我的实现；学生干部和前段运动的“左派”骨干，则认为无产阶级民主从来就是讲民主集中制的，且仅有他们才能显示和实现这个真正革命的民主和集中；而所谓的“自我”，也无非是臭名昭著的资产阶级极端个人主义自我，对于资产阶级，本来就不应该给它什么自由和平等。不是说要撕掉“自由、平等、博爱”的遮羞布吗！

因此，巴黎公社的民主原则说起来简单，真正实施起来又谈何容易。

8月16日，从北京回到武汉的张体学一行立即来到武汉大学，并临时召开包括附近的武汉水利电力学院、武汉测绘学院等院校师生员工参加的3万人大会。性情豪放、快人快语的张省长对李达问题又讲了一番能烘托当时“革命”气氛的讲话：“李达，过去我们叫他李老，现在我们叫他老不死。他现在已经搞臭了，你们再用不着斗他了。你们一定要相信省委，把他交给我们处理。让他进博物馆，吃饭、睡觉、拉巴巴！你们也可以回家看妈妈。”

8月19日这天，武汉由党委组织的红卫兵正式成立并上街游行亮相。迄今为止，武汉的这些活动均为支持省委工作组运作的多数派参加；辩论中，学生群众中首次出现“派”的称谓，而他们是多数派。与其相反，在6、7月运动里受到疏远、排斥、打击的群众，开始被称

为“少数派”。少数，在当时的舆论和力量上处于绝对劣势，但他们激愤，一往无前，深信自己是忠实于毛主席和革命的，坚持“干革命”的自我实现。他们也相信刚刚公布的《十六条》中说要保护少数，“真理有时在少数人手里”就是有所指的，甚至认为真理开始就只能在少数人手里！

8 月 19 日这天，南粤广东省和广州市 50 万群众也在越秀山中心会场及各区分会场集会，欢呼毛泽东 18 日在北京天安门广场接见百万革命群众。中南局第三书记陈郁、赵紫阳、焦林义等人在越秀山中心会场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会后举行了盛大的游行。

但是，8 月 20 日，当赵紫阳、焦林义等人回到省委常委扩大会议的桌旁时，他们的情绪，远远不像在越秀山大会上那么振奋、激昂。赵紫阳建议，各地委来的人，都到大学去看一看，“学习，不回答问题，县委书记也可以去，说我是从外地来的向他们学习。去石牌那一片，哪个学校都可以。”他说：“现在学生看你怕不怕，越怕他劲越大。所以要彻底解放，最多搞得天翻地覆，下台。当然不能乱许愿，不能乱答应。有些不能马上答复，有些不好解释，要因势利导。”

石牌是广州东郊高校较集中的地方。令人闻风丧胆的 8 月红色恐怖，已经开始在各学校渐渐升温，不少人对学校和学生，都抱着极大的恐惧心理，进学校，就好像进鬼门关一样。

对于当时中央提出的“破四旧”一事，在8月19日的省委常委202次扩大会议上，赵紫阳提出：“陈家祠尽力说服学生不要砸掉，先锁起来不开放，展览会搬家。保护文物嘛。古物有价值的还是要保护。”

陈家祠堂坐落于广州市中山七路，又称“陈氏书院”，建于清光绪年间，是广东省著名的宗祠建筑，目的为本族各地读书人来广州参加科举考试时提供住处。光绪三十一年废科举后，书院改为陈氏实业学堂。民国期间，这里先后为文范学校、广东体育专科学校和聚贤中学。1950 年设立广州市行政干部学校。1957 年，经广州市人民委员会批准，列为广州市文物保护单位，并由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进行全面维修管理。

陈家祠堂在 1958 年修缮后，于 1959 年被辟为广东民间工艺博物馆，以搜集、保藏、研究和宣传展览广东地区历代各类民间工艺品为主。兼及全国各地民间工艺品。馆内辟有多个展厅，常年展出馆藏文物。展品有陶瓷、雕刻、刺绣等工艺精品。郭沫若曾在 1959 年参观后留有一首五言诗：“天工人可代，人工天不如。果然造世界，胜读十年书。”陈家祠的建筑装饰工艺早在 20 世纪 20 年代已为国内外建筑专家和学者所重视，德国和日本的建筑艺术专著中已有专题介绍。

我们再回到北京。8 月 20 日，越来越多的红卫兵开始在北京街头张贴大字报，举行集会，发表演说，散发传单，号召“破四旧”。上午 10 时，北京市女 2 中高二 3 班的红卫兵在通往苏联大使馆的“扬威路”的路牌上贴上了“反修路”三个字。她们在苏联大使馆对面的墙上贴出大字报：《反修路命名宣言》。她们在大字报上写道：“他妈的，扬谁的威风，我们红色中国就是反对帝国主义，反对修正主义，决不能叫修正主义耍威风。”

下午她们又把通往苏联商务参赞处的“北顺城街”改成“挖修根

街”。8 月 21 日，人大附中又贴出一张“反修路规定”：“自 1966 年 8 月 21 日起，在此路行驶的各种外国车辆一律慢速行驶。今后绝不允许修正主义国家的车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神圣的土地上横冲直撞，无法无天。”

北京的学生开始将中共中央提出的“破四旧、立四新”口号付之于行动。

8 月 20 日中午，北京女 2 中贴出“只许左派造反，不许右派翻天，非红五类不许出门”的通令。

这天，毛泽东在林彪转送的《解放军报》总编室编的《文化大革命情况简报》上反映的有关“破四旧”行动的第109号简报上批道：“已阅，是大好事，彻底暴露牛鬼蛇神。”“不奇怪，这样可以打出一条路来，对群众有利。”

时任纺织工业部副部长、原中国纺织业巨头、上海著名资本家荣毅仁的家，住在北太平庄，他的女儿在北师大女附中上学。8 月 20 曰，北师大女附中的红卫兵涌到荣毅仁家里开始抄家，都是些女孩子，当中也混进了一些社会上的来历不明的人。她们在荣毅仁家里批斗荣毅仁，并用他家里的摄像机把经过拍摄下来，要寄到他在海外的亲戚那里。荣毅仁考虑到寄出去的影响，所以给了这些红卫兵假地址。荣毅仁的夫人杨鉴清在批斗过程中被打伤。

恰好 8 月 20 日是机关发工资的日子，荣毅仁的司机郑耀辰送工资去时看到这些情景，赶紧回纺织部作了汇报。部党组书记钱之光立即说：“赶紧给周总理写个报告，用特急件送到总理办公室去。”

部文化大革命委员会给周恩来写了报告后，又向负责工交口运动的副总理李富春办公室打电话报告此事。李富春马上建议说："是不是你们想办法给送到医院去，在医院里保护起来。"

正好纺织部的张琴秋副部长是卫生部苏井观副部长的夫人，跟北京医院很熟悉，她给北京医院的院长打电话，谁知，院长无奈地对她说：

"大姐，不行哪，我们这里已经楼上楼下斗开了，都斗了好几批了。送到我们这个地方，不一样挨斗吗？"

没办法，纺织部又赶紧再给总理值班室打电话报告情况，也没有答复。凌晨 1 点多钟，国务院秘书长周荣鑫打电话找钱之光，说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要钱之光赶紧去一下。钱之光到了那里，周恩来问荣毅仁的事情是怎么回事？钱之光汇报了他家被炒、夫妇被打的情况。

周恩来说："这事情你怎么不报告？"

钱之光回答说："我们写了报告了呀。"

周恩来说："现在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写报告，要打电话嘛。现在我们只能管两个人了，一个是宋庆龄，一个是郭沫若。其他人你们自己想办法。荣毅仁你们一定要保护好，他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在国际国内都有影响，一定要保护好。"

凌晨 2 点多钟，钱之光赶回部里找文革委员会商量，研究落实周恩来的指示。他们把部机关的红卫兵头头找来，要部机关的红卫兵连夜开到荣毅仁家里去，当他们到达荣家的时候，看到那些学校的女红卫兵还东倒西歪地躺在客厅里。部机关红卫兵的头头找到她们的头头，

跟她讲：

“我是纺织工业部机关的红卫兵，荣毅仁是纺织工业部的副部长，是大资产阶级，要对他进行批斗，让他老实交代问题，请你们把他交给我们。”

开始这些女学生不同意，但毕竟她们年轻，很快就被说服了，说：“可以，但我们要提些条件。要他老实交代罪行，要他劳动，打扫卫生，只能喝自来水，吃窝窝头、咸菜，不许贪图享受。”

对这些要求，部机关的红卫兵都统统答应，于是那些女红卫兵们就撤走了。她们一走，荣毅仁就提出要把他的夫人杨鉴清赶紧送到医院治疗。可是送到哪个医院都不收怎么办？部机关的红卫兵头头很机灵，就把她送到积水潭医院，说这个人是重要的人证，需要她来录口供，不能让她死掉，你们一定要想办法给她治疗。医院一听是重要的人证，就赶紧给她医治。

第二天，跟荣毅仁住在一个院子里的胡子婴，历史上著名的“七君子”之一，时任商业部副部长，她的女儿就是医生。于是，纺织部机关红卫兵就通过她的女儿给杨鉴清开处方抓药。

8 月 20 日，农垦部文革委员会再一次组织人去王震家声讨，要求他检查。余怒未息的王震根本不买账，他大声说：“我是革命的！我不能作为黑帮头子、反党分子去作检查！”

8月20日，李富春给统战部长徐冰贴出一张大字报：

“徐冰同志：

十一中全会已经开了，中央关于《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

定》已经发表了。以十一中全会和毛主席的精神和十六条决定来检查统战部文化大革命，我觉得统战部领导是错误的。运动一开始不是放手发动群众，让群众炮打司令部，而是将首先贴大字报的同志打成‘四大家族’是何其毒也。请你马上宣布，打‘四大家族’是错误的。向他们赔礼道歉。向机关作自我批评，号召他们向部领导充分提意见，把文化革命的方向迅速转过来。过去你是不听我的话的，现在根据主席指示，十一中全会的精神，再一次劝告你，请部领导好好考虑迅速行动。”

## 第 135 回：八二〇，“红旗战斗队”成立

谈出身，谭力夫口若悬河

由于北航工作组撤离时没有正式给学校那些被打成“反革命”的学生和教师、工人平反，北航学校里保工作组的学生仍然继续将他们视为反革命，双方的对立情绪十分严重。反工作组和保工作组的人们互相指责、攻击，双方逐渐形成了两大派。

8 月 10 日，北航 400 多名反工作组的同学前去中央文革，要求北航工作组组长赵如璋回校检查。

8 月 11 日，院筹委会组织一些人，举着“热烈欢迎工作组回北航！”“工作组是革命的！”等标语牌迎接工作组。主张批判工作组的师生一看，针锋相对，也举出批评工作组的标语牌：

“强烈要求赵如璋深刻检查！”

“必须彻底批判工作组错误！”

“革命小将的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

“坚决按十六条办事！”

一场标语战开始了。但是，一天过去了，没有看见赵如璋回北航。直到很晚，才看见部分工作组成员来到北航，“北航红卫兵”马上挽臂保护。喧闹中，有人突然高呼：

“工作组万岁！”

“工作组万岁！”

立即就听到有人针锋相对的大声喊道：

“走！我们向中央反映去，看工作组这是回来做检查还是挑动群

众斗群众？”

8 月 14 日，赵如璋终于再次返回北航，在南操场召开大会。国防科委副主任钟赤兵、路扬、罗舜初和工作组组长赵如璋坐在主席台上。大会还没开始，一些举着标语牌和灯笼的师生已经站到主席台上。标语牌上口号对立，灯笼颜色依然是红绿两种。双方相持不下，约有 40 多分钟。最后，赵如璋作了 12 分钟的检查，他在检讨中承认组织批判《一条无头黑线》大字报是错误的，并说：“错误的责任全部由我们负责。我们衷心希望革命同志在大方向一致的前提下，互相谅解，加强团结，共同对敌。”“在这里我们向大会上点过名的石兴国同学以及所有由于怀疑工作组和国防科委而受到批评的同学和同志赔礼道歉。凡是我们在大辩论总结时，给个别同学戴上的帽子一律摘除。”

然后，院文革筹委会便组织开大会“斗黑帮”。有人将赵如璋检查大会上，不同观点人员的口角与磨擦，夸大为学生殴打工人。于是，一些北航的家属、儿童在校园内游行示威，抗议“反革命杀人犯殴打工人”的罪行。同时还向其他大专院校的工人、红卫兵求援、呼吁。于是地院、林学院、矿业学院一些工人，敲锣打鼓来到北航示威，表示支持北航工人。甚至远在几十里之外的首都钢铁公司工人也被请来了。北航“红卫兵”还分乘汽车到国务院告状，并准备以北航全体工人的名义发表《告全市工人书》，希望一举摧垮反对工作组的少数派。一时间闹得沸沸扬扬，满城风雨，再次激起少数派同学的不满。

迫于形势，赵如璋于 8 月 19 日第二次在北航全院师生员工大会上检讨。在这次检讨中，赵如璋重点回顾了组织开展大辩论时的想法

和当时对形势的认识，并就同学们对他在北航工作期间工作上和思想作风上的意见做了深刻的检查。

赵如璋检讨后，国防科委罗舜初也讲了话。他首先转达了聂荣臻对北航全院师生员工的问候，然后代表国防科委党委常委针对派工作组等问题做检讨。罗舜初说："工作组提出先辩论《一条无头黑线》的大字报，又点出它是一株大毒草，是经过国防科委党委常委同意的，这是我们的错误。其实这张大字报是不是大毒草，完全应该由广大革命群众自己去辨别，我们根本不应该事先划定框框，定下调子，批准这场辩论。由于这个错误，挫伤了一部分群众的积极性，给群众运动造成了不良后果。""由于工作组是国防科委派的，对《一条无头黑线》的辩论又是经过国防科委党委常委同意的，工作组所犯的错误主要由国防科委党委常委负责。""我们在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所犯的错误，是方向的错误，是路线的错误。""对国防科委党委常委、对工作组还有什么意见，欢迎提出；对国防科委是允许怀疑的，错误欢迎批评，我们对群众的批评是欢迎的！"会后，在全院绝大多数师生员工和新选出的筹委会同意的情况下，工作组第二次离开北航。

8 月 18 日，毛泽东接见红卫兵那天，北航三系（飞机系）2331 班学生田东看见北航"红卫兵"选派的 10 名代表集合上车时，也跑过去要求参加，遭到阻拦，被告知说：

"今天是组织北航的红卫兵去参加大会，你不是红卫兵，你不能参加。"

田东心里那个憋屈呀，当天就用一张大红纸写了一张大字报，内

容很简单，建议成立“北航红旗红卫兵”，并于当晚贴在东操场边。很快，就有大字报表示响应和支持。六系有同学也贴出大字报，倡议成立“红旗战斗队”。很多大字报下面还贴上了小红旗。8 月 19 日、20 日，大字报区已是满眼红旗招展。

其实在 8 月 18 日，北航学生屠海鹰、匡正芳、张依立也参加了毛泽东接见红卫兵的天安门大会，只是没有上观礼台，是在广场上集会游行。当游行队伍走过天安门城楼后，因为人潮汹涌，队伍散了。他们三个找个小饭馆，一边吃饭一边商量：

“毛主席支持红卫兵，北航高干子弟已经把红卫兵名称占啦，我们就叫‘红旗’吧。”

因为当天北大附中“红旗战斗小组”彭小蒙在天安门上讲话，他们都听到了。

出了小饭馆，他们找出几尺布票，屠海鹰出钱，买了几尺红布，由张依立回到学校后，连夜做了 7 个红袖章，用黄线绣上“红旗”两个字。屠海鹰、匡正芳第二天上午，即 8 月 19 日就戴上了北航“红旗”袖章。匡正芳班的党支部书记见了，还制止说：“匡正芳，你把袖章取下来，这是革命烈士鲜血换来的，你不能戴。”

匡正芳没有理睬他。

8 月 20 日，田东、崔光极、黄铭钧等商议筹建“红旗战斗队”，并给“红旗战斗队”第一面大旗写上“红旗”两字。当晚，学院在南操场放电影，北航“红旗”利用这次全校师生聚集的机会，纷纷佩戴着亲手绣制的袖章，打出队旗，来到操场。有人在看台上大声宣布：

“北航‘红旗战斗队’成立了!”于是各系的“红旗”队员就在看台下绕场游行，有的打着自己准备的旗帜，还有少数同学举着红灯，浩浩荡荡。结束时，有几个同学拉来几个院系当权派游斗。

看台上有人通知：请各系的“红旗”负责人到看台下跑道旁边碰头。当晚统计，全院参加“红旗”的人数达到 1070 人，是当时北航最大的群众组织。

8 月 21 日晚，北航“红旗战斗队”在学校东操场召开“发扬革命的大无畏精神，掀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新高潮”大会，实际也是庆祝北航“红旗”成立的大会。他们请来了 8 月 18 日在天安门上和毛主席握过手，并代表全国师生代表讲话的湖南长沙一中学生谢若冰。

8月20日这天，北京工业大学召开全校辩论会，能言善辩的谭力夫口若悬河，一气呵成了又一篇数十分钟、后来闻名全国的讲话，使他一下成为全北京市乃至全国的知名人物。这篇讲话在大力宣扬“血统论”的同时，尖锐指出“批斗各级干部是难以容忍的事情”。

谭力夫在讲话中说：

“到底有没有右派？工大这么个烂黑窝怎么会没有右派？我看今天来参加会的人当中就有右派。（热烈鼓掌）谁敢保证工大五千人里就没有右派？我们认为辩论会开不好，是有人捣乱。当然捣乱的人是少数。‘一个游鱼三个浪，三个游鱼九个浪。’没什么了不起的。”

谭力夫接着说：“少奇同志说：半年不上课，白吃饭，让我们干什么呀？”

台下群众齐声答道："干革命！"

谭力夫："是让我们干革命的，不是来扯皮的！""有人对黑帮不恨，……可是，对工作组，对一些老革命同志，却恨之入骨。对斗工作组比斗黑帮还带劲。知道哪一个干部犯了错误，就高兴得不得了，大有雀跃之势。看着共产党的干部犯错，你高兴什么？！他妈的！"

台下有人喊："骂得好！"接着是热烈的掌声。

他接着说："一讲阶级路线，他们也来讲几句。怎么配呀！"

台下一片掌声。

谭力夫："说起阶级路线，我们是'既得利益者。'同志们，举一个例子，很简单，翻身贫农的儿子和被斗地主的儿子，谈起土改来，怎么会是同一种心情？！"

又是一片热烈的掌声。

谭力夫："同志们，这就叫'阶级烙印'。看到杜万荣为首的工作组撑我们的腰，'土包子'上台掌了权，有的人在底下骂我们，我们是知道的。他们在底下的磨牙声音我们都听到了。……你就是说得天花乱坠，我也是喜欢杜万荣！老杜进校第一天，给我们做的第一个报告，给我们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老实告诉大家，那天很多同志哭了。像那些狗崽子们怎么能理解？那天，我们第一次在工大听到了我们在家里才能听到的话，第一次感到工大像个家的样子了。我们说一声：党的阳光，毛泽东思想的阳光，从此照进了工大！"

台下一片"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声和热烈的鼓掌。

谭力夫："那些被打翻在地的人，那些从此感到前途渺茫的人，那些从此感到自己的弟弟，妹妹，自己的家庭在政治上都没有了希望的人，怎么能和我们有同样的感觉，怎么能和我们有同样的语言？这就叫'阶级烙印'。（热烈鼓掌）有人说，学生不能老说什么'阶级烙印'。还有人说，我们都是知识分子，都是小资产阶级范畴，而且还引经据典地说什么这是毛主席的阶级分析。把主席在二十年代讲的，拿到六十年代来硬套，那怎么行？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就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大地主，大资本家专政下的知识分子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知识分子，怎么能还是一样？'你是贼，我也是贼。'这是什么逻辑？（笑声）解放前有这么多工农子弟上学吗？那时有什么革命干部子弟吗？（笑声）这种人对主席的书简直狗屁不通！（笑声）有人说，我们都是知识分子，对待我们都应该实行对知识分子的政策。都像对老教授那样？！（笑声）知识分子的队伍在不断变化，对待知识分子的政策也在不断发展。如果大家都一样，什么时候有我们无产阶级的知识分子队伍？要区别对待。家里人就是家里人，家外人就是家外人，不能混为一谈。"（掌声）

"跟你们吹个牛吧，关于阶级路线的问题，你们来 100 人，我一个也能对付！（掌声）老实告诉你，我们的根子硬，我们的根子在哪？"

台下："毛主席！"

谭力夫："你看，这还怕什么？"

台下大笑，热烈鼓掌。

谭力夫："老实说：我们在修正主义的学校，上了几年学，火气

已经小多了。比起我们的小将来，差多了，回家弟弟妹妹批评我们都有修味儿了。可是，听了我们的话，你们还嫌扎耳朵。我们的小将还没来呢？小将来了，就该把你们吓死了！”

又是一片大笑，热烈鼓掌。

谭力夫继续：“要革命的过来，不革命的滚蛋！”

台下掌声又起。

“有人说这不是毛泽东思想，不利于团结，这是断章取义。我们要革命，有人不让。他不革命也不许大家革命。比如开辩论会的问题，那我们只好让他滚蛋。”

掌声……

“有人反对阶级分析的观点和阶级斗争的观点。列宁教导我们，要从纷纭复杂的社会现象中理出个头绪来，只有运用阶级分析和阶级斗争的观点，没有这个观点，就是一个盲目的人，就是一条糊涂虫！”

“我们的历史从那里开始？就从现在！”

台下热烈鼓掌。

“若干年后，当你白发苍苍的时候，后辈们问你：‘震惊世界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怎么搞的？你当时如何参加的？’我们一红脸，对孩子们说：‘我虽然不是右派，也是中间偏右的。’”

“在阶级社会中，哪有什么平等、博爱？我们有多少哥哥姐姐小弟弟小妹妹刚一出世就惨遭敌人的杀害，叫做斩草除根！”

此时全场安静，静场……接着，口号声四起：“牢记血泪仇！”“不忘阶级苦！”

谭力夫继续："现在，我们对你们的老子专政，实行了仁至义尽的改造政策给他们重新做人的机会，他们的子弟也可以上学，表现好的还可以入团、入党，你们还要怎么样？你们搬出这套平等、博爱的垃圾来大讲，我看还是到厕所里去讲！"

又是一片热烈的掌声。

"一讲就是团结，怎么一种团结法呢？斗争中求团结。先把你们斗了，七斗八斗，斗得你们背叛了家庭，改造了思想，我们就团结了。（掌声）拿块糖，哄你来干革命？有人说要讲究策略。该孤立的先孤立，孤立完了，看有可能团结再团结，我看这就是最大的策略！"

"无产阶级，两个肩膀支着一个脑袋。没有坛坛罐罐，怕什么？无产阶级的战斗风格，就是刺刀见红。我们端着枪要对刺，心里急得像揣着一个兔子，你们围着树绕圈子，跑得像个兔子！谁是英雄？谁是狗熊？不是看得清清楚楚吗？（掌声）无产阶级天下坐定了！"

"工大不彻底改造不行！我们说这个学校太烂了，我们不要它！我们出去和工农兵结合去！你们敢吗？"

台下众人："他们不敢！"

"说到高考制度的改革，有人躲在被窝里哭，打碎了毕业分配的美梦，说：'贯彻阶级路线我的前途完了，我家庭的前途完了！'这十七年对你们也太宽宏大量了，你那个家还不完？早就他妈的该完了！（热烈鼓掌）……有人习惯于翻本本，找条条，都等中央指示，还要你'首创'什么？我看只有工农革干子弟有这个胆量，有这个本事，你们其他人谁敢？"

台下热烈鼓掌。

“看来还是‘老子英雄儿好汉’。”

台下众人跟着喊道：“老子反动儿混蛋，基本如此！”

又是一片热烈的掌声。

“说到这副对联，我又想起，有人老爱强调大多数，说我校百分之八十是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得听大多数的。毫无阶级分析，到劳改队里谁是大多数？我依靠谁？简直一窍不通。在工农当政的国家里，工农基本群众占百分之九十以上，但是他们的子女在大学里却只占百分之二十还不到，你怎么不说说这个大多数呀？！这是个阶级感情问题，是个阶级立场问题。”

“有人跟我讲什么黑格尔，费尔巴哈，我不懂那一套，我只知道毛泽东！”

热烈鼓掌。

谭力夫的这篇讲话中，有着“初生牛犊不怕虎”的锐气，也有着血性青年的激情。他在讲话中说：“我反正权力还在手，我就敢骂人。骂完了，我挺着肚子，像无产阶级的样子下台，不能像狗熊一样，不能给无产阶级丢脸”。

谭力夫善于言词，啃读过不少马列经典，对社会各学科的知识也掌握得比较全面。他引经据典，旁敲侧击，一幅正义在身真理在手的卫士形象。他的讲话让不少人认为有背景、有来头。有人猜测，谭力夫是高干子弟；有人议论，谭力夫是国务院新上任的年轻副总理；也有人传说，谭力夫的女朋友姓刘，是刘少奇的女儿，他的讲话稿是刘

少奇帮着拟的，等等。

其实，谭力夫是1961年病逝的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谭政文之子，1942年在延安窑洞里诞生。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时，24岁的谭力夫已是一名共产党员，他响应党中央的号召，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8月上旬，他发起成立北京工业大学的红卫兵组织，并被选为该组织的负责人之一。

但是，面对当时文化大革命深入发展的形势，他却有自己的看法。谭力夫认为，现在蜂拥而起的造反群众中，有不少是建国后17年受压的阶级敌人，他们要造反，就等于是要推翻共产党。因此，“鬼见愁”的对联一经贴出，立即引起了他的共鸣。

谭力夫的讲话一出笼，不但很快风靡北京，还同时被长途电话和航空信件传递到全国各地。这并不庄严的宣告，这并不雄伟的声音，通过各种现代化工具，迅速传遍白山黑水，黄河长江。从长白山到海南岛，从东海之滨到云贵高原，到处在流传谭力夫的讲话。各省市负责人都认为谭力夫的讲话好得很，应大力宣扬。仅福建省，即在不长的时间里复制了几十万份“谭力夫讲话”，甚至由新华书店发行到工厂和农村，有的单位还硬性规定每天必须学习讨论四个半小时“讲话”内容。但他们对同时期下发的中央《十六条》却提不起兴趣。

谭力夫在群众中获得巨大声望，光是福州师范学院附属中学就有5人更名为“力夫”。这还不算，在当时全国各大城市，先后刮起了一股“报出身”风。比方说你要上公共汽车，售票员就会让你报一下出身：红五类，您上座；黑五类，站着，有座也不许坐；进商店、医

院要报出身；出差、住旅社，对成分的要求更加严格。出身不好的人倒霉了，一次次被拦在路口盘查，被无数扇大门拒之于门外。聪明的人只好说说假话，编排个贫农、工人的成分，蒙混过关。没有熟人在场时，也戴上平时没资格戴的红袖章，以免遭人白眼，受人歧视。

整个红卫兵运动期间，在被红卫兵广为传抄的为数众多的讲话、记录稿的作者中，唯一不是政治领导人、没有特殊身份的人就是谭力夫！

## 第 136 回：辩论会，农民齐保郭影秋
## 西北生，纷纷向陶铸告状

8 月 20 日晚，人民大学在大操场召开第二次关于郭影秋问题辩论大会。操场四周停了 8 辆卡车，每辆车上装有一只大型照明灯，把整个会场照耀得如同白昼。大量新闻记者、电视台记者、摄影师来到会场。参加会议的除了北京的同学还有来自西安、兰州、四川等外地的同学。特别引人注目的是郭影秋四清蹲点的苏家坨农民 700 多人，他们高举语录牌、毛主席像及横幅标语，浩浩荡荡列队来到大操场。

晚 20 时，陶铸来到会场，同来的还有张经武，陶鲁笳等领导。一直等到 20 时 30 分，邓小平还没有来，大会开始了。

辩论会上，“左派论”“黑帮论”两派意见针锋相对。学校工人代表和苏家坨贫下中农代表以大量事实证明郭影秋是革命左派。引起反郭派大哗。反郭派发言时，保郭派不满。会场秩序不好。陶铸也很不满意，认为没有好的辩论气氛。

到了 8 月 21 日凌晨 1 时 40 分，参加人民大学辩论会的陶铸又来到人民大学一个大教室，接见在这里等候的西安交大、西安冶院、西北大学、兰州铁道学院、兰州铁一中、四川大学、重庆大学、东北工学院、吉林大学、山东大学等 200 余名同学。

陶铸征求学生们的意见：“同志们来得远，天津问题复杂，看来问题大的，还是西安、兰州和四川等地。今天我先听一个西北的，一个西南的，怎么样？”

同学们说：“好！”

西安交大的学生汇报说：“16 日下午两点左右，我校革命师生和其他兄弟学校的革命师生，一起在省委门口静坐示威，这是他们逼出来。

我认为这是革命行动，不知道中央首长怎样看？”

陶铸：“这当然不能说是反革命行动！”众人鼓掌。陶铸继续说：“省委问题没有检查好，你们去省委是对的。他们打伤了多少同学？”

西安交大：“不太清楚，听说打伤了 300 多。”

有人插话：“恐怕还不止这些。”

陶铸：“今天西北局来电话，承认打伤了人，我们正在调查。”

西安交大和西北大学的学生汇报他们静坐的原因，和西北局对他们的迫害。他们说：“杨植霖在西北大学诬蔑我们静坐是和日本人民对付佐藤政府一样。”

西安交大：“他们在西安车站楼上按了两个喇叭，骂我们是以交大为首的狗崽子。还有盯梢、跟踪。”

陶铸说：“过了潼关就听不到了吧！”大家都笑了。他接着问：“你们都有住的地方吗？”

西安交大：“还没有，我们刚来，还没有落脚呢！”

陶铸：“请人大同学安排一下好吗？”

人大同学：“完全可以。”

陶铸：“地方不欢迎你们，中央欢迎你们。”众人又鼓掌。陶铸问：“李世英同志来了没有？”

西安交大：“没有。”

陶铸：“李世英同志是一个好同志，不是革命的写不出那样的信件来，他的信我看过了。”

西安交大：“我们根本不相信省委了。我看省委应该改组。”

陶铸：“这由你们自己决定。”

长时间热烈鼓掌。

西安交大："有些人贴大字报，并高呼'誓死保卫西北局！誓死保卫省委!'"

陶铸说："我们现在只能誓死保卫党中央！誓死保卫毛主席!"

学生长时间热烈鼓掌。

陶铸接着说："谁如果不执行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当然应该打倒。打人就不对了，真是反革命还有法制嘛！自己不革命还不要别人革命，这不是如赫鲁晓夫一样了吗？怕革命的就是自己心中有鬼。党中央和毛主席很关心你们，正在想办法解决。同志们，相信你们是革命的，你们来，我们欢迎你们来，毛主席知道你们的情况。西北局打来电话，西安现在不准在街上搞辩论、贴标语、贴大字报，"

大家问："这样可以吗？"

陶铸说："这有什么不可以的呢？这算你们的创举嘛！这样可以向工农兵宣传毛泽东思想嘛！闹革命怎么能在屋子里闹呢？革命不能只限制在屋子里，辩论可以上街，大字报可以上街。外国人究竟是少数，北京不是照样也有外国人，大字报不是也照样贴在街上了吗？"

重庆大学的学生说："我们那里直到现在还在喊'誓死保卫校党委'。"

陶铸："这就是说重庆的文化大革命搞不起来了，你们还有什么问题？"

四川大学："四川抓右派最厉害，还有群众斗群众的现象。"

陶铸指着大家一个个笑着说："你是反革命？你是右派？"

同学都笑了。

陶铸说："你们上报点名了吗？没有公开宣布你们是右派吧？我看就算了吧！一股风吹掉。看来你们的问题就是他们想搞政治迫害，你们

学校搞起来了吗？”

重庆大学：“《十六条》下来后，大家起来了，但是压力还没有消除，据说中央有个什么规定，什么‘五不贴’？”

山东大学：“我们那里有个‘三不贴’。”

陶铸：“中央没有这个规定。你们都没有参加天安门的大会吧？为什么不早来几天呢？你们可以在这里过十月节吗？”

同学：“我们还要去干革命呢！”

陶铸：“我是来参加辩论会的，现在快 3 点了。”

这时外面又来了许多同学，陶铸说：“同学们来自全国各地，我代表党中央和毛主席欢迎你们。”

众人热烈鼓掌。陶铸：“你们来迟了，要不然就见到毛主席了，听到林彪同志和总理的讲话了。不过这也不要紧，好在有照片，天安门不是还在那儿吗！你们多住几天，原计划一周的改为两周，在北京看一看。北京也是走了弯路的，毛主席回来后，才扭转过来的，特别是十一中全会以后。《十六条》是毛主席亲自制定的，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纲领，运动搞得好不好，就靠《十六条》，就靠你们。《十六条》发布后，你们有什么变化吗？”

西安冶院：“变得更坏了，这就是铁证。”说着拿出撕得粉碎的衣服。

兰州铁院：“我们那边也没有变好，《十六条》发布以后，还发生流血事件。8 月 16 日还围攻我们，打伤了 60 多人。现在学校还被围，学生一出来就挨打。”

陶铸：“听说你们找省委书记处书记辩论，他们躲起来了，我看省委非垮不可，这个情况是严重的，我们已经打电话了，让他们立即停止打人，要不然发生什么问题，省委负完全责任。”

兰州同学："光让他们停止打人还不行！"

陶铸："是的。第一步首先让他们停止打人，别的问题以后再与省委算账。大字报可以贴在大街上，宣传毛泽东思想嘛！如果美国人要看，还可以贴到美国去嘛！（鼓掌）还可以贴到华盛顿去嘛！"（鼓掌）

天津同学："我们贴到省委，他们说不卫生。"

陶铸："不卫生？那要看什么卫生了！文化大革命就是要破四旧，立四新。封建主义的、资本主义的和修正主义的东西，好像很干净，实际上最不干净。（鼓掌）毛主席讲，全国各地都可以来北京看看，学习学习；北京的也可以去全国。58 年吃饭不要钱，现在坐火车不要钱。"

大家热烈鼓掌。

吉林大学的同学说："现在长春有一股风说，以吴德为首的吉林省委是正确的，企图转移视线。"

陶铸："这个问题你们可以去问吴德同志，好不好？"

学生答："好！"

陶铸说："现在正确的只有毛主席和毛主席领导的党中央。各级党组织有正确的，有错误的，为什么要用'正确'去压人家？你正确的，人家也搞不掉，你错误的，搞掉了不是更正确了？用'正确'作挡箭牌，实际上就不正确。只谈正确的，我看实际上就不正确，真正正确的就不怕揭嘛！"

这时，北京的红卫兵带着兰州一中的 5 名同学进入会场，陶铸和他们一一握手，他们哭着控诉了甘肃省委镇压群众的滔天罪行。

兰州铁一中的同学说："省委马继孔指使兰大同学围攻我们，我们从下午三四点钟一直跪到晚上十二点多，还让我们朝西跪着。他们打了我们 600 多人，下跪的就有 200 多人，当时就有 30 多人住了院，我们

跪在那里心里难过，我们要见毛主席呀！”

说到这里，许多同学哭了，陶铸也掉了泪。

兰州铁一中的同学说：“我们本来想让省委检查，但是省委书记马继孔说什么兰大同学打我们是革命行动，打得好，打得对，打得准，今后还要打。他们把毛主席像撕破，硬逼着我们拿着手榴弹和刀子对着毛主席像，让他们拍照。他们还喊‘李贵子万岁！’李贵子是一个混蛋！他是什么狗东西！我们要喊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这时会场连续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等口号。

陶铸对他们说：“你们是人民的好儿子，党的好儿女，不是反革命。”

他的表态得到长时间热烈鼓掌。

陶铸继续说：“你们不要难过，来到北京首先要把身体搞好，将来彻底斗倒黑帮。甘肃省委镇压革命群众的反革命事件，中央一定要严肃处理。文化大革命是一场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我看今天就是生动的一课。我们一定要按十六条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把一切牛鬼蛇神统统揪出来！不把黑帮揪出来。中国革命胜利了也会失败的，全国还要变颜色的。文化大革命搞好了。我们国家就不会改变颜色！”

西安的同学说：“西北局有黑根，我们要求改组西北局！”

陶铸说：“这由你们自己决定。”

大家鼓掌。

西安冶院的同学：“有人说，我们到北京来的都是反革命！”

陶铸：“毛主席住在北京，难道北京成了反革命的窝子了？这是反革命的语言，要坚决和他们作斗争。”

西安同学：“希望中央首长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到我们西安去看一

看吧！”

兰州同学：“到我们兰州去吧！”

天津同学：“到我们天津去吧！”

陶铸：“我们向党中央、毛主席报告。一定派人去各地看一看！”

大家再次热烈鼓掌。

北京十一中两个红卫兵送给陶铸一条上面别有团徽和毛主席像章的红领巾。并托陶铸同志将另一条带给毛泽东。

兰铁一中：“我们想见毛主席，这次大概见不到了，请你给毛主席带个好！”

陶铸：“好！我一定都带到！”

这时已是凌晨 3 时 10 分，陶铸结束对西北学生的接见，又回到了大辩论会场，这里的辩论还在进行，一直开到 21 日凌晨 4 点多。最后陶铸讲话。他说：“4 点钟了，贫下中农同志明天还要回去生产。”

台下农民答：“不回去！”

陶铸：“同志们不回去，欢迎，就在这里休息，要回去有汽车送，因为你们苏家坨离这儿有50华里。”

“就现有材料来看，郭影秋同志不是黑帮。但是，以前同志们认为郭影秋同志的问题是严重的，也不是没有根据的，因为曾有二月兵变问题。二月兵变这个事实是不存在的。但是我也讲，根据他在文化革命中的表现。郭影秋同志也不能说他是革命左派。为什么呢？郭影秋同志我们贫下中农很熟悉，相处一年多了，”

众人答：“9个月！”

陶铸：“我们对他更熟悉，从抗日胜利到现在20多年了，郭影秋同志的工作经历我们党是清楚的。在抗日战争中，在解放战争中的表现是

不错的。但解放以后，特别是文化大革命这一段是有问题的。市委为什么要撤郭影秋同志的职务？因为他犯了错误。原来他是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员，是代表华北局参加中央文革小组的。他是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在师大工作搞得不好，没有执行党中央的方针，没有执行毛主席制定的方针。在人民大学，最近一段在文化革命中的表现，不是我们所要求的那样的。有些同志讲，市委要郭影秋同志回来是因为人大工作很忙，要他回来领导人大。不是这么回事情，是因为他犯了错误，所以他不能作为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不能作为北京市委的文教书记来领导文化革命，因此撤销他市委的文教书记职务。那么，这样能说他是革命左派吗？所以就现有材料看，现在他不是黑帮，这是第一。第二，根据他在文化革命中的表现，他不能算革命左派。那么，既然不是黑帮，那就属于人民内部矛盾。不管二类也好，三类也好，都属于人民内部矛盾。虽然不是革命左派，但也不是黑帮。比上不足，总还不是黑帮，比下有余嘛！既然双方都承认这一点，都赞成这一点，郭影秋不是黑帮，拥护郭影秋的同志确实现在不好说他是革命左派，这个论点大家同意。只要是人民内部矛盾，可以先放下来，慢一点来解决嘛！这是个建议，不知能不能为全校革命师生接受？”

陶铸接着说：“绝不能因某张大字报讲的郭影秋是革命左派，我们就说他是保皇党，也不能说反对郭影秋的讲他是黑帮的就是反革命，这个不对。他认为是革命左派，可以嘛，他有他的看法嘛！另一方面，也有同志讲郭影秋是黑帮，也不要讲人家反对郭影秋，说郭影秋是黑帮，他就是反革命，这样人家就不能提意见了嘛！”

“最后，我讲一点红卫兵问题。人大红卫兵是合法的，整个北京市、全国现在都成立了红卫兵，成立红卫兵是党的一个政策。把红卫兵变成

我们青年的一个武装组织，不管在生产建设、阶级斗争，特别是美帝国主义打来时，变成坚强的红卫队。农村有基干民兵、民兵，工厂将来搞红卫兵或者民兵，全民皆兵，美帝国主义想欺负我们，侵略我们，就把它彻底消灭掉！”

“我不赞成在学校里成立贫下中农、干部子弟协会，因为大学贫下中农干部子弟是少的，学生三、四年就毕业。农村贫协是个权力组织。”

## 第 137 回：再升级，清华炮轰刘少奇

## 破四旧，红卫兵涌上街头

8 月 19 日，在刘涛成立的“清华大学自控系红卫兵”基础上，清华大学“八九派”成立了“清华大学红卫兵临时总部”。但是，这个被称为“八九红卫兵”的清华大学红卫兵组织只吸收革命干部与革命军人的子弟参加，普通的工农子弟都不能加入。

这天，清华大学“八八派”的唐伟、陈育延这对在清华园渐露头角的“金童玉女”以“向日葵”小组的名义贴出了《王光美——清华园第一号政治大扒手》的大字报。大字报写到：

有些人揪住叶林不放，连所谓“八八”串连会的某些参与者也把叶林认为是头头，可是叶林算老几？叶林的腰杆为什么这样硬，至今不检查？刘涛同志的态度为什么这样暧昧，至今不表态？问题在于他们有一个“雷打不动”的后台，这个后台就是清华园内第一号大扒手王光美。

王光美来我校干了什么勾当？“六一九”，她以钦差大臣的姿态出现在清华园，震动了整个清华。她在清华执政期间，清华园内死气沉沉，革命师生被打入四海之中，黑帮分子逍遥法外。叶林残酷地镇压了清华的革命群众运动，王光美就是他的后台老板。

她到清华园内的那天，正是“六一八”之后，她在工作组

会议上说了些什么黑话？

她到清华是镇压革命的。

她来后，“六二四”事件就发生了，大家不健忘的话，有名的“电话事件”她就是主谋。

反蒯期间她直接插手斗争蒯大富同志的准备工作，是她作了叶林的后台，血洗了清华的革命造反精神，造成了一个多月的白色恐怖，她才是清华实行资产阶级专政的大头。

七月，她预感到革命的大风暴即将来临，“规劝”叶林突然调转了矛头制造了“七一九”后“批判黑帮”的假象。

七月二十九日她在全校辩论台上出现，极不自然地发表了一篇语无伦次的、和稀泥的讲话，企图定下工作组问题辩论的调子，让叶林溜过去，不回答同学提出的“你为什么删掉毛主席关于怎样正确对待打人的四句话”的问题。会末，刘涛用念条的手段结束了这场会，将同学提出的问题无休止地拖延了下去，会后工作组的大字报急增。王光美到底扮演了一个什么角色？

王光美到清华来到底是干什么的？她是来夺权的，来和党中央毛主席争地位的，她就是想搞一个"王光美、叶林王国"，而临时筹委会却当了她的帮凶。

大家不是记得刘涛在“六二四”会上说什么“我妈妈说的……”你妈妈算老几？只要她反对毛主席，搞自己的一套，

阳奉阴违，搞神秘化，我们就要反对她，揪出她！

我们最最敬爱是毛主席，全中国人民的毛主席，全世界人民的毛主席，谁想夺毛主席的权，想和毛主席对抗，我们就和他拼命！

现在王光美看到叶林保不住，想甩掉他，自己不出头露面。我们决不让第一号大扒手王光美溜掉，不管她有多大的红伞，打着谁的旗号，我们也要抓住这个反毛泽东思想的大扒手，追她的根，挖她的底！刘涛一定要明确表示态度。如果你再继续搞鬼就让你滚下台，党的阳光和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誓死保卫党中央！

誓死保卫毛主席！

耸人听闻的题目取得了爆炸性的效果。文革初期曾左右清华运动方向的一批高干子弟，贺鹏飞、李黎风、乔宗淮、雷蓉、王晓平、袁塞风和王新民等 7 人，也在同一天，紧随唐伟和陈育延其后，联名贴出《三问王光美》。

8月20日上午，清华“红卫兵”召开批判工作组大会,走走形式。下午立即转入打黑帮，准备批斗蒋南翔。“红卫兵”总部委员阎淮和“临筹”负责人带队去高教部，凭介绍信领出蒋南翔。

王任重听说刘宁一的女儿刘菊芬要揪蒋南翔回清华批斗，特别着急，马上指示贺鹏飞去截，说“斗蒋南翔要主席同意。”

王任重的秘书吕乃强特地找刘菊芬谈了一次话。

再说清华“红卫兵”总部和“临筹”的人在高教部领到蒋南翔后返回学校，车队在路上被一辆小车拦下。小车上走下两人，说：“中央不让揪斗蒋南翔。”

“红卫兵”总部委员阎淮不客气地问道：“哪个中央，刘少奇的吗？”

前面英俊的大鼻子气势汹汹地喊:“周总理的中央不行吗!”

阎淮顿时软了。“临筹”的人还坚持要带蒋南翔回校批斗。后面那个文弱书生慢条斯理地说：“周总理来电话不让批斗，总理的话都不听，你们还听谁的？”

众人无言以对。阎淮动员大家交出蒋南翔，让那两个人送回高教部。他们回到学校，只好把原定当天的“斗蒋大会”改成“斗蒋誓师大会”。贺鹏飞宣布:“大家斗黑帮的心情已转告了王任重同志。王任重转达毛主席指示，毛主席要亲自指挥斗蒋南翔。”

后来才知道。那个英俊的大鼻子是自控系一年级学生宋克荒，东北局第一书记宋任穷之子。后面那个文弱书生是二年级的学生陈元，党中央副主席陈云之子。文革开始后，刘涛和贺鹏飞等隔三差五地联名写大字报，积极介入并影响运动，但是从未见陈元和宋克荒之名。校“临筹”和“红卫兵”里，也没有这二位的身影。

当天，清华大学1053战斗组贴出《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评刘少奇七月二十九日讲话》的大字报，其中写道：

7月29日，刘少奇在新市委召开的各大专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上发表了一篇讲话。看他那慷慨陈词，不可一世的劲头，真想不到他为什么会如此气急败坏！

这篇讲话是一篇极其恶毒地攻击毛主席，攻击毛泽东思想，抑制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黑话。他大肆放毒，用意极坏，看后真令人火冒三丈！不管你刘少奇是什么人，窃取多高地位，只要你敢反对我们最最敬爱、最最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我们就要和你拼命，把你拉下马，再踏上一只脚，叫你永世不得翻身！现在让我们剖析一下他的讲话究竟是什么货色！”

大字报以“一、狂妄至极，唯我独尊，恶毒地攻击毛主席；二、极力反对毛泽东思想；三、取消党的领导；四、划圈圈、定框框、保护黑帮过关”四个标题对刘少奇进行了点名批判。

大字报说：“临筹”是一个什么东西？完全是王光美的御用工具，完全是运动的绊脚石，说穿了就是帮凶。可是靠压有什么用呢？！清华园的形势发展不是回敬了你们响亮的一记耳光吗？！

前天，刘涛突然出大字报了，要造王光美的反，“大大方方”地端出许多“内幕”。老实说，这实际上全是旧闻了。你也有些太不高明，明明知道王光美还挑不起这个责任的重担，

却偏偏硬压上去，这哪里行呢？实际上叶林不过是一个赤膊上阵的打手，王光美也不过是委任坐镇的大使而已。步步为营的暴露是暴露，一下子暴露还是暴露，刘涛如果真想暴露内情的话，何不干脆一些呢？

大字报最后写道：同志们，毛主席他老人家教导我们："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这是多么亲切的重要指示啊！"

"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

让我们为扫除一切害人虫，为保卫我们最最敬爱的毛主席而拼死地战斗吧！

前几天还是"黑鬼"的"红专"学生叶志江也贴出《肃清原北方局中的黑线》的大字报。当他贴好第一张大字报时，有十几个人就站着不动了，当他从七、八尺高的梯子上下来时，围观的人就成几十位了……

这张大字报危言耸听地说："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发生过高岗、饶漱石反党集团事件，其成员大多来自原陕北红军。无独有偶的是，刘少奇反党集团的很多成员也都来自原北方局。"

是不是叶志江有什么内幕新闻？否则他怎么能写出这样爆料的大字报？

其实这张大字报是叶志江读了太多的革命回忆录，从中察觉了一点党内山头主义的蛛丝马迹后借题发挥而成的。这张将

矛头指向刘少奇等人的大字报贴出后不胫而走，引起了一点小小的轰动，曾让叶志江遭到北京中学红卫兵一个多月的追杀，不过最后还是安然无恙。

8 月 21 日，刘少奇的女儿刘涛贴出《誓死跟着毛主席干一辈子革命》的大字报，上演了大义灭亲的一幕。大字报说，要造王光美的反，彻底和王光美错误路线划清界限。

刘涛后来说："这张大字报是 8 月 18 日写的，写好后还想写一张刘少奇的大字报。觉得应当请示一下上级，就打电话给王任重。……后来把大字报改了改交给了王任重，他看了后又修改了。他还看了我写的给刘少奇的大字报，实际上，刘少奇那张大字报基本上是王任重授意的。王任重是这样安排我写大字报的：他们先贴《三问王光美》，然后再贴我那张大字报，他们再表示支持。"

刘涛的大字报贴出后，引起了钓鱼台 16 楼的中央文革的重视，当成爆炸性新闻。当晚，由关锋出面向办公室紧急布置马上组织人员去清华大学抄刘涛的这张大字报，顺带也抄了贴给其他中央领导人的大字报。

中央文革工作人员王广宇受命去马列主义研究院急调 20 多名工作人员，火速赶往清华园抄写大字报。这些抄写员分散在拥挤不堪的人群中抄大字报，大约抄了十几分钟。清华大学的广播喇叭宣布禁止外单位人员抄写大字报，并派了大批清华

附中红卫兵去现场当纠察队，看谁抄大字报就没收，要求外单位人员撤离清华园，同时封锁了校园。

原来，“818”后，清华出现大量批评中央领导人的大字报，主要是针对刘少奇的，少量也有其他人的，可以说除毛泽东外的中央领导几乎一网打尽无一幸免。校外群众大批涌进清华，把这些大字报传抄到全北京乃至全中国。所以，校“临筹”贺鹏飞他们组织了这次行动。

由王广宇带领的中央文革的抄大字报的人员此时也只好乖乖地收起纸笔，混在人群里，集中后退出了清华园。每人手中都是抄的残缺不全的大字报，没有找到刘涛的那张大字报。

钓鱼台 16 楼的陈伯达、江青等人还等着看刘涛的大字报，抄大字报的人却无功而返。16 楼距王任重住的 2 楼不足 300 米，对刘涛大字报出笼背景毫不知情的陈伯达、江青等，以为刘涛阶级觉悟升华而大义灭亲，并要树个典型。他们并不知道刘涛的大字报出笼竟是自己营垒的副组长亲手导演的。

经过这件事，中央文革小组决定立即派出自己的记者进驻高等学校。很快，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都派驻了中央文革的记者组，其他北京的高校也派了记者，随时掌握高等学校的文革动向。

8 月 21 日，星期日。北京最繁华的闹市区王府井和大栅栏人山人海，北京中学红卫兵和商业战线上的职工开始了联合扫

“四旧”行动。这是北京工人开始登上造反舞台的开始。

在“818”毛泽东首次接见红卫兵以前，北京许多厂矿企业及国家机关也都相继成立了各种各样的群众组织，但规模很小，一般都是偷偷摸摸地进行活动。活动的内容也不外乎是学《人民日报》社论，写大字报批判报纸上点名的黑帮、黑线，还处于“拿起笔做刀枪”的阶段。现在，工人开始和青年学生一道向旧世界开战了。

是日上午，王府井百货大楼前的停车场里挤满了百货大楼的造反职工和从各学校聚集而来的青年学生，他们站在一楼门楼上，把连夜赶出来的“北京市”三个大字固定在原来是“王府井”三个大字的位置上。从楼上悬挂出巨大标语：

“坚决支持革命学生的革命行动！”

“向革命小将致敬！”

北京市第 12 中学的红卫兵一清早就跑到大栅栏贴通告、通碟、标语、呼吁书。贴着贴着感到不过瘾了，不知谁说了一句：“咱们合在一块造反去！”大家纷纷说主意好，于是列队往回走。

在路过前门瑞蚨祥绸布庄时，有个红卫兵向店里瞥了一眼，便喊道：“快进去！快进去！”原来店里有一张国画。学生们冲进去以后，一下子就把画撕了下来。商店里的职工纷纷拍手叫好。有几个职工还主动对学生说：“同志们，跟我们去，里

边还有东西呢！”

在绸布庄职工的带领下，红卫兵从楼下翻到楼上，从前院搜到后院，将他们认为有毒的契约、唱片、皇历、美女商标、宫灯、画屏、花盘等连撕带砸，堆了一小屋。接着又涂掉了墙壁上的古画，并当即派人买了 15 张毛泽东画像四处张贴，同时把毛泽东的一幅巨幅画像嵌在镜框里，悬挂在商店正中。店名也被改为“立新”绸布店。

面对这热火朝天的造反运动，北京市的居民纷纷把四合院大门上的“福”字和一些表现吉祥如意人丁兴旺的对联刮掉、砍掉或用时兴的对联遮盖住。拥有私产房的市民纷纷跑到房管局申请上交房产，接连几天，为交房产的人在房管局里排起了长队。

一些人还提出改名换姓，把所谓带有“封、资、修”色彩的姓名改为“红岩”、“卫东”、“继红”、“永革”、“东风”等充满革命意义的字语。公安局户籍管理部门则以“报则速批”为原则，表示了对这种“革命行动”的支持。

8 月 21 日，根据红卫兵和群众建议，故宫博物馆宣布，“除《收租院》泥塑群像陈列继续开放外，其余各陈列馆全部暂停开放，进行彻底革命。”

中南海的警卫战士也提出要“破四旧”。他们说：“我们整天站岗，都守卫着那些封建帝王的东西。”汪东兴向周恩来请示，

周恩来说："那都是乾隆以前的东西，属于文物，不能把它搬走，要保护。"

第 138 回：令军警，绝不许镇压学生

禁旧习，发消息表示支持

8 月以来，西安地区以及汉中、宝鸡、礼泉等地都连续发生了反对学生将矛头指向各级领导的严重事件。8 月 20 日，陕西省铜川一中学生包围了市委，在场的公安派出所长杨万杰，擅自鸣枪阻止。这天，在西安市举行 50 万人的“文化大革命”誓师大会后，交大师生参加游行时再次发生学生被围打事件。

8月21日，中央下发中发［66］416号文件，这是转发总参谋部、总政治部《关于绝对不许动用部队武装镇压革命学生运动的规定》：

最近桂林、西安、兰州、包头等地相继发生学生上街游行、集会后，地方党政机关要求部队全副武装警戒会场、机关，据说桂林已调进一个营的武装部队，以应万一；还有的要求部队派人坐汽车向游行集会的学生或到工厂、学校去做宣传劝说工作等。结果搞得学生和部队之间的关系很紧张，有的学生群众来到部队进行辩论，贴大字报；有的院校师生接连给军委发来电报，说部队围攻革命师生，等等。这种情况，已经造成部队和革命学生的对立，应引起极端重视。为此，特作如下规定：

一、所有部队绝对不准动用武装镇压革命学生运动，更不得向学生开枪，就是向学生放空枪，也是严重的政治错误，将要受到严格的纪律处分。

二、如地方党政机关邀请部队参加庆祝集会时，经大军区党委批准，可派少量部队参加，但一律不准携带武器。

三、在任何情况下地方党政机关要求调动部队时，必须报经军委批准。

四、学生与学生或学生与群众发生冲突时军队不要介入，如发现确有证据的杀人、放火、放毒，破坏、盗窃国家机密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应由本地公安机关依法处理，如公安机关力量不足，请求支援时，军队可予以协助。

五、部队不得派军队进入工厂，学校去搞宣传劝说活动。

六、军队不得给地方学校、工厂、机关贴大字报，地方学校、工厂、机关给部队贴大字报时应表示热烈欢迎。

七、任何逃避斗争，跑到军队躲藏的人，军队要他们回去，不得隐藏他们。

以上规定，希各单位切实遵照执行。

这可能是中国有军队以来，第一份不允许军队参政的规定。

打人现象日益普遍，引起许多人的忧虑和不满。8 月 21 日，针对愈演愈烈的打人情况，中央政治局召开常委扩大会议，毛泽东说："提倡文斗，不要武斗，这是今天要谈的第一个问题。"

在听取了各方的汇报发言后，毛泽东在插话中问："北京就成了流氓世界了?不可能嘛！好人总是多数，坏人总是少数，怎么就成流氓世界？"

"总之，我们不干涉，乱他几个月。我们坚决相信多数人是好人，坏人只占百分之几。"

对西安等地学生提出要罢一些领导干部的官，毛泽东说："我们

不好答应，情况不清楚。”

西安交通大学和重庆大学进京同学在返校前请求再次见陶铸。8月21日下午16时30分，陶铸在中南海再次接见了他们中的部分同学。

学生提出陕西省委要改组问题。陶铸答：“陕西省委改组要报告党中央，由中央决定，这要报告党中央，报告毛主席，由毛主席决定，你们完全有权利提这个意见。”

学生问：“大字报贴到街上就算反革命吗？”

陶铸说：“不算，大字报可以贴在街上，也可以在街上辩论。你们可以上街游行、宣传、辩论，把大字报贴在街上是革命的，学生在街上游行示威是革命的，不是反革命的，是可以的，也可以贴标语在街上。《十六条》已经指出，要文斗不要武斗。工人、农民打学生不对，工人农民可以支援，不要打人。”

学生们担心：“我们回西安下火车要挨打的，怎么办？”

陶铸说：“你们越挨打就越是革命，我们过去搞革命是要杀头的。现在你们挨打算得了什么，现在挨打是为了革命的。他们打不要紧，他们是反革命的，他们一定会被你们打倒的。过去革命还是有生命危险，还要抛头颅洒鲜血，你们现在挨一下打没什么。”

早在6月，兰州市共青团市委中一部分人就组织了“七·一战斗队”，他们8月开始反对汪锋，这在全国省、市的青年团里是少见的。

甘肃省委为了平息8月1发生的冲击铁路局事件，汪锋呈报中央撤销裴孟飞和马继孔的职务。8月22日，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共甘肃省委撤销了省委常务书记裴孟飞、书记处书记马继孔的一切职务。

此后裴孟飞、马继孔被作为“黑帮”受批斗，戴高帽，挂大牌，搞“喷气式”等。

甘肃铁路职工和学生们仍然不肯罢休，加上北京红卫兵的串联鼓动，各大、中学校的学生们把矛头指向了省委第一书记汪锋。汪锋被红卫兵追得无处藏身，在兰州军区大院东头的六栋房躲了一段时间，但仍未逃厄运。

9 月 3 日，兰州群众组织及外地红卫兵在七里河体育场集会，揪斗了中共甘肃省委第一书记汪锋。

9 月 5 日，中共甘肃省委召开紧急会议，作出制止动乱扩大的五项规定：

（一）不要上街游行；

（二）不要到外单位贴大字报；

（三）不要出宣传车；

（四）要派代表提抗议；

（五）对持有不同意见的人，不论在什么地方都不能围斗，更要严禁打人。

9 月 12 日，兰州市中学红卫兵及外地赴兰红卫兵宣布成立“打倒汪锋委员会”。

8月21日晚23时，陶铸给中南局打电话说：“谈一个问题。中央最近开了一次会，有个极其重要的指示。从最近各地运动的情况来看，许多情况说明，还是怕字当头，不敢叫群众炮打司令部。有的地方学生起来锋芒对了党政机关，于是就煽动工农群众斗学生，打学生，最

厉害的有天津、哈尔滨、西安、兰州、桂林等地，西安最严重。主席对此很生气，很不满意。要把这个精神告各省（区）委。总之，不准用任何借口和方法对付学生，否则一定要犯大错误。弄得自己焦头烂额。下台也会下得很惨。学生是有觉悟的，为什么不相信学生群众？要大破大乱，才能大立。怕乱也还是要被群众革掉，必然要叫群众革掉。告诉各省（区），各地，要彻底放手。对学生绝不能用任何形式去压制，要坚决撑学生的腰。这次运动工农兵是主力军，学生是先锋。对军队，中央已发出通知，要坚决照办。……不要怕，乱的越厉害越好。

对赵卓云要放宽点。总之，不能提‘保卫中南局’，对我们有什么意见，谁都可以提。

我这个位子担当不了，但一摆上，人家就不敢提意见了。他反我就反嘛！”

薄一波 8 月 21 日给毛泽东写信说：“8 月 18 日天安门上主席跟我握手并亲切勉励要我好好革命时，我深受感动。”“最近主席如果有时间，希望找我谈一次。我想主要谈两个问题：（一）工交各部当前文化大革命的主要情况；同时检查我在运动中所犯的错误；及我的一个请求。（二）我对改革工业体制的一个设想。”

当天，毛泽东在薄一波的这封信上批道：

印发常委、文革小组及薄一波同志。

请一波同志将一个请求和一个设想，先用书面告我，然后谈话，可以缩短谈的时间。你是一个爱讲长话的人，我有点害怕听三四小时

那样的长话。

毛泽东

八月二十一日夜

8月22日，中央转发毛泽东批准的公安部给中央的报告：《严禁出动警察镇压革命学生运动》。文件批到："中央同意公安部的规定，希各级党委遵照执行。"

公安部的报告中说：

最近，兰州、哈尔滨、西安、重庆等地，学生包围了省、市委住地。同时发生了两起人民警察镇压革命学生运动的严重事件。八月五日，兰州大学学生与铁路职工、铁路中学学生发生冲突，兰州市公安局出动上百名警察，在兰大门前实行戒严。八月二十日，陕西省铜川一中学生包围了市委，在场的公安派出所长杨万杰，竟擅自鸣枪示威。

镇压革命学生运动是一种违法犯罪行为，绝对不能允许。公安部六月十日曾通知各地，要全体公安干部、人民警察满腔热情地支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支持革命师生闹革命，不准干涉学生的革命行动。但是少数地方没有认真执行。现再作如下规定：

一、不准以任何借口，出动警察干涉、镇压革命学生运动。

二、绝对不准向革命师生开枪，放空枪进行威吓也绝对不允许。

三、重申除了确有证据的杀人、放火、投毒、破坏、盗窃国家机密等现行反革命分子，应当依法处理外，运动中一律不逮捕人。

四、重申警察一律不得进入学校。

五、警察只在街道维持秩序。遇有打架、斗殴，可以劝解。如革

命学生打了警察，不准还手。

国家机器是什么？不就是军队、警察、法院吗？国家机器不用来保卫国家的各级当权者，这可能是自有国家以来闻所未闻过的事情。毛泽东青年时期就参加学生运动，当他听到有的地方动用军警来对付学生，他想到的是什么？是当年面对的北洋政权的木棒、铁骑和水龙头？是在强大的国家政权面前，一些学生的无奈与退缩？当然，像他这样的执拗青年也大有人在，否则，怎么会有现在的中国共产党呢？如今，他和当年的愤青们已执掌了政权，他是否会和历史上的所有执政者一样，为了保住已经掌握的政权，反过来镇压那些反对自己的学生呢？毛泽东似乎不允许这种情景再现。尽管此时许多使用军警的大员是他熟悉的老部下和战友，但他也决不能容忍这种现象出现，他要运用手中的权力，给这些学生以他们应有的自由和宪法赋予的权利。可能他认为，只有这样做，才是真正的捍卫他所为之奋斗的政权。

8 月 21 日，新华社播发 8 月 18 日毛泽东第一次检阅红卫兵消息时，把现场高唱的《革命造反歌》与《东方红》、《大海航行靠舵手》并列在一起。此后每当红卫兵走上街头，进行集会，集合，演讲，张贴传单、标语和大字报，抄家、开批斗会时，都要唱《革命造反歌》。这首歌，成了红卫兵的“国际歌”，成了红卫兵的文化标志。9 月 30 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国庆招待会上，由周恩来安排，该曲以 300 人合唱队庞大阵容，向中外来宾演出。不久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为该曲录音，并在节目中反复播出，其传播速度更快；甚至漂洋过海，传到了日本和亚非欧美国家。一时间，《革命造反歌》

成为红卫兵共同的战歌，是 1966 年中国流行最广的民众歌曲。甚至不无夸张地被称为“《国际歌》的儿子”。因为在当时，凭着这样的歌声，红卫兵在哪里都可以找到自己的战友。

几天工夫，北京市大街小巷，南城北城，工厂农村，面目全非。到处是花花绿绿的大字报、大标语、倡议书、通牒信，到处是红旗、红袖章、红喜报、红毛选，《革命造反歌》、《红卫兵战歌》、《毛主席语录歌》成天放个不停，大街上无论男人女人一律是军便服，解放鞋。虽然城里的建筑物以及城市格局并无大的变化，但北京市已“到处是革命的标语，到处是豪迈的歌声，到处是革命的行动，到处是一片热气腾腾。”

这表面上的“革命”气象，使急于建功立业的红卫兵有了一种不可名状的胜利感和满足感，他们要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打碎一个旧世界，同时建立起一个“红彤彤的新世界”。

8 月 22 日，北京市宣武区老君地小学发出《革命的倡议书》，提出：

“我们要砸烂一切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用无产阶级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来改变整个社会的精神面貌。”

《倡议书》要求凡是带有资产阶级、封建主义色彩的学校名称从 22 日上午 8 时开始，24 小时内全部改掉立即改掉。并向大家正式宣布把他们学校原名“北京市宣武区老君地小学”改为“北京市火炬区抗大第一小学”。

这天，北京市红卫区东方红理发基层商店（原西城区宣内理发基

层商店）发出《告全国理发行业革命职工书》，书中倡议：立即废除理发行业多少年来的旧服务项目、旧服务方式、旧规章制度。

取缔男式青年无缝式、青年有缝式、大背头留鬓角、吹波浪、吹卷曲、染发、高平方头、扒克头、青年胡、日本胡。

取缔女式有缝青年波浪式、无缝青年波浪式、长波浪、斜波浪、普通波浪、前额蟹爪式、前额葱须式、螺旋式和一切带有卷曲的波浪等等、电烫、冶烫、染发、正反荷叶头、资产阶级如意头、伤寒头、侨式头、梳吊辫等等怪发型。

倡议取消发腊、发浆、香水、止痒水、粘油、杏仁蜜等高级化妆品。

废除给顾客拉门、向顾客点头哈腰、提衣穿衣、理完发打闪镜、电话预约、门市登记、给熟人留号、找专人理发、顾客进门递面巾、给顾客摘镜子、女顾客冲头蒙脸等服务方式。

这天，二十六中红卫兵到《工人日报》社要求印一个宣言，内容有三项：

1．取消资本家的定息；

2．所有公私合营企业马上改为国有；

3．房产主的房屋，除本人住的外，其他一律归公。

这天，北京 200 多名回族学生到牛街清真寺造反。学生们向阿訇宣布 4 条命令：

一、交出全部古兰经；

二、不许进行迷信活动；

三、劳动改造；

四、不许穿长袍马褂。

后来更有“消灭伊斯兰教革命战斗队”提出“彻底消灭伊斯兰教”的口号，旋即被制止。

这天，北京第三女子中学红卫兵，连续三天毒打校长沙坪直至打死。北京第八中学红卫兵在连日折磨后导致学校负责人华锦死亡，中国人民大学红卫兵打死了教员杨俊。

8 月 22 日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国报道北京红卫兵“破四旧”的消息：《红卫兵猛烈冲击资产阶级的风俗习惯》。消息报道说：

“8 月 20 日以来，首都‘红卫兵’纷纷走上街头，到处张贴革命传单和大字报，到处集会演说，向一切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发动了猛烈攻击。一些带有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思想色彩的商店字号，在他们的宣传、帮助下，已经更换为具有革命意义的名称。他们向各学校革命师生倡议，迅速改掉一些毫无政治意义的学校名称。他们还向广大服务行业的革命职工倡议，决不再给某些顾客理怪发、做奇装异服、出售和出租黄色书刊。他们要把北京彻底改造成为一个非常无产阶级化、非常革命化的北京。‘红卫兵’的造反精神和革命行动，得到了广大革命师生、革命职工和街道居民的最热烈、最坚决的支持。”

报道中这样提到：“资产阶级的温床保不住了。‘飞机头’、‘螺旋宝塔式’等稀奇古怪的发型、‘牛仔裤’、‘牛仔衫’和各式各样的港式衣裙，以及黄色照片书刊，正在受到严重的谴责。”

第 139 回：同风雨，周恩来再访清华

发通牒，各党派停止办公

清华大学工作组组长叶林准备于8月22日晚在清华大学做检查。8月21日后半夜，清华大学的值班室后半夜突然响起电话铃声，值班人员拿起电话，话筒里竟然传出周恩来的声音：

“是清华大学吗？我是周恩来。你们明天晚上大会准备得怎么样了？”

值班人员一听是周恩来亲自打来的电话，都从床上跳起来，围到电话机旁。

清华大学汇报了会议的准备情况，接着，周恩来又对会议安排作了详尽的指示后，问道：“我讲的听清了吗?”

当值班人员按记录重述了一遍后，周恩来这才放心地说：“好!就这样吧!”

8月22日晚，大会召开前40多分钟，周恩来又打来电话询问：

“大会准备好了没有?”

负责会议筹备的人员答：“准备好了，就是下大雨，大会是否改期?”

周恩来问：“现在群众在哪里?”

“部分群众已经入场……”

“既然群众已经来了，那就风雨无阻，我马上来!”

当周恩来的车赶到会场时，大家发现，他身穿一件旧的灰色中山装，什么雨具也没来得及带。

周恩来在清华大学冒雨参加群众大会

叶林做完检查。在热烈的掌声中，周恩来发表讲话，他说：

“今天因为下雨，不可能把各方面意见都在这个会场上讲，所以很多同学要求减少发言。给我这个机会，我再一次向你们讲几句话。过去的，……”

这时，风向变了，雨随风势，刮向了主席台，淋到周恩来的身上，台下高呼：

“总理打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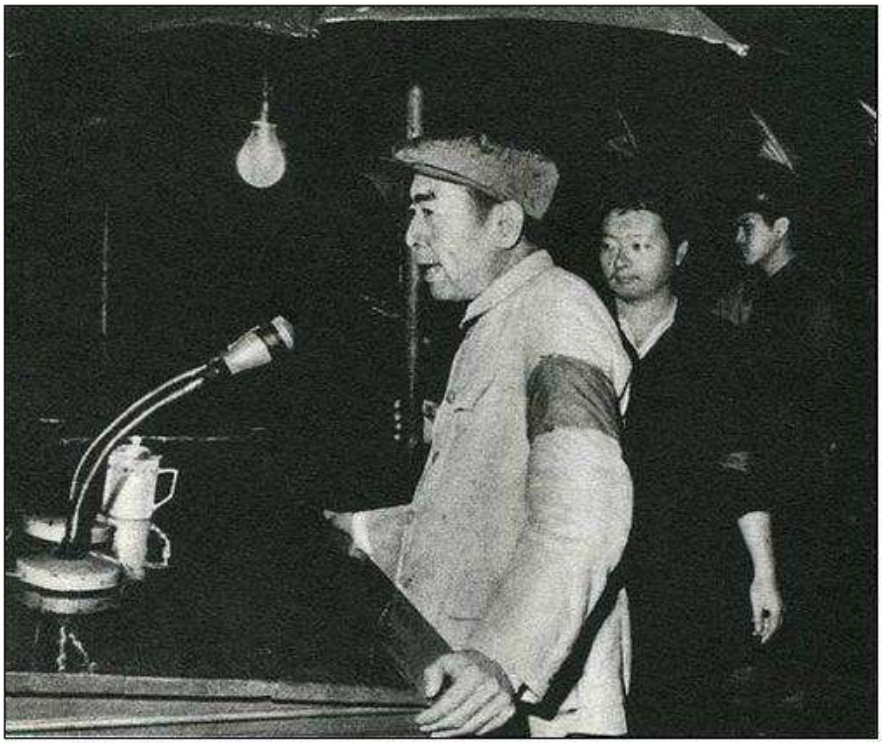
有学生上台给周恩来撑起雨伞。

周恩来推开打伞的同学，接着说：

“过去18天，我是很想早一点来，但是呢？工作不能够让我常常到你们这里来，这不是我不愿意来。……我是说真心话！你们想一想，我不到你们班上去，不到你们宿舍去，不到你们食堂去，有什么办法把你们现在那种不必要的隔阂，不必要的对立，不必要的误会解除呢？……我相信你们双方把不同的意见讲出来。可以找到一个团结的基础。8月8日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到今天公

布14天了，你们在学校有了团结的基础，为什么还有误会，还有隔阂呢？有许多事情我们也不清楚。对我来说，很不清楚，所以上次我在这里讲话以后，没有很好地解决你们的问题。你们贴我3张大字报。我说还很少。同学们，你们提的意见有许多是很好的。把我的讲话再谈一遍，一个人要不断地检查自己，改造自己。上次我就说过，要做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

长时间热烈鼓掌。



雨下大了，学生再次给周恩来打伞，他说“不用”。会场上响起了一阵阵有节奏的呼喊：

“总理、打伞！”

“总理、打伞！”

周恩来说：“你们不是给了我一个红卫兵袖章吗？你们正在经风雨受锻炼，让我跟你们一道经受锻炼吧！”会场上再次响起暴风雨般

的掌声。许多人脸上的雨水都混合了泪水。周恩来接着说：

“我要和你们一样在大风大浪中锻炼。所以我先要交代清楚，我知道，对清华知道的事情还是很少，因此，我今天只能讲几个比较重要的问题，供你们讨论的时候，交换意见的时候参考。”

针对清华最近出现大量批评中央领导大字报的情况，周恩来说：“中央的问题，在中央全会上已经基本解决了。贴大字报，必须是增强团结，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

周恩来最后说：“今天风大雨大，毛主席教导我们，要在大风大浪中锻炼嘛！但是今天时间太晚了，我们还要见面的，我结束讲话。我们大家都起来，请一位同学来指挥唱歌。”

大会主席：“请周总理指挥我们唱《大海航行靠舵手》。”

清华大学的辩论大会进行了 3 个小时，结束后，周恩来又特意从主席台前面走下来，踏着近半尺深的泥水和碎石，绕路与师生们握手。当同学们扶着周恩来上车时，发现他浑身衣服都湿了，很多人感动得热泪盈眶。

会后，8 月 22 日，“八八派”唐伟、汲鹏、陈育延也成立了红卫兵，名为“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后因传毛泽东不同意毛泽东主义一说，便改为“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总部成员有唐伟、陈育延、吴栋、陈楚三、刘万章、陈继芳等人。这天，唐伟等人以“向日葵”小组名义，贴出大字报：《刘少奇同志 7 月 29 日讲话是反毛泽东思想的大毒草》。

23 日，清华大学还有人贴出《周总理 8.22 讲话是个大阴谋》的

大字报。此时，校内批评中央领导的大字报和校外观看传抄者都急剧增加。清华“红卫兵总部”通过王任重，向中央紧急反映事态的严重。

8 月 23 日，中共中央工作会议结束，毛泽东在讲话中说：

“主要问题是各地所谓乱的问题，采取什么方针？我的意见是乱它几个月，坚决相信大多数是好的，坏的是少数。没有省委也不要紧，还有地委、县委呢！《人民日报》发表了一个社论，‘工农兵不要干涉学生的行动，提倡文斗不要武斗。’我看北京乱的不厉害，学生开了十万人大会，把凶手捉回来，惊惶失措。北京太文明了，发呼吁书。流氓也是少数，现在不要干涉。团中央改组，现在看不准，过四个月再说。急急忙忙做出了决定，吃了很多亏。急急忙忙派工作队，急急忙忙斗左派，急急忙忙开十万人大会，急急忙忙发呼吁书，急急忙忙宣布反对新市委就是反对党中央。为什么反不得?我出一张大字报炮打司令部。有些问题要快些决定，如工农兵不要干涉学生的文化大革命，他上街就上街，写大字报上街有什么要紧?外国人照相就照相，无非是照我们的落后面，让帝国主义讲我们的坏话，有什么要紧”。

在毛泽东主持的政治局会议上，中央文革小组的人要求刘少奇到清华大学检查。江青大声说道：“我认为刘少奇同志必须到清华、北大去检讨，必须到清华、北大听革命小将的控诉和批判！我强烈要求主席批准这个革命要求！”

坐在离刘少奇不远的陈毅站起身说：“你们让少奇同志到清华去检查，这种方式好不好？我看不好。要是下不了台怎么办？回不来怎么办？谁负责？后果你们想了没有？有错误可以批评，就在这里批

评，为什么非让他去清华作检查？”

刘少奇表示，他愿意去清华检讨，接受群众得批判，并请王任重帮他起草讲话稿。这时，陈毅又站起来，再次声明他不赞成这样做。

8 月 23 日，陶铸在中国医科大学讲话时提到了“怀疑一切”的问题。他说：

在文化大革命中怀疑一切是对的，但对毛主席不能怀疑。毛主席高度集中了人民的智慧，没有一个人比他更能发挥人民的精力。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不能怀疑。至于一个系统、一个支部、一个部的党委，是可以怀疑的。我们向共产主义前进，走社会主义道路不能怀疑，此外，一切都可以怀疑。领导好的怀疑一下就行了，领导不好的就怀疑下去，甚至把他打倒。有的领导你不信赖就可以去揭，每个人有权利怀疑观察你的领导。经过每人审查，领导好的，能领导好的，走社会主义的，就拥护，不要打倒。领导不能信赖的就可以怀疑。如果不对就放弃怀疑。

由于毛泽东在这天的讲话中提到了北京 8 月 13 日的十万人大会，提到了清华附中等学校红卫兵 8 月 6 日发的关于制止打人的《红卫兵紧急呼吁书》。江青回到钓鱼台后，立马催促陈伯达召开文革小组会，对王任重进行批评，要他对召开 10 万人大会斗流氓一事和印发《呼吁书》的事情负责。王任重说明了有关情况，并不认为自己有什么错误。会议连开了多次。

8 月 23 日，全国各大报、小报均在头版头条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浪潮席卷首都街道》的大字标题转载了新华社 8 月 22 日《红

卫兵猛烈冲击资产阶级的风俗习惯》的电讯。《人民日报》并于当天配发了两篇社论，题目分别为《好得很》和《工农兵要坚决支持革命学生》。

在《好得很》这篇社论中写道："北京解放已经十七年了，可是，在修正主义的前北京市委长期把持、压制下，许多地方的名称、商店的字号，服务行业的不少陈规陋习，仍然散发着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腐朽气息，毒化着人们的灵魂。""千千万万'红卫兵'举起了铁扫帚，在短短几天之内，就把这些代表着剥削阶级思想的许多名称和风俗习惯，来了个大扫除。这是破旧立新的革命行动。闪耀着无产阶级革命精神的新名称、新风俗、新习惯，为我们伟大的首都，为无产阶级革命的中心，增添了无限的光彩。"

《工农兵要坚决支持革命学生》社论中说：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洪流，正在冲击着种种阻力。毛泽东同志说，"钟不敲是不响的。桌子不搬是不走的"，"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那些顽固地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必然会采取种种办法，种种手段，抵抗十六条，压制群众运动，破坏文化大革命。他们除了继续挑动学生斗学生以外，还煽动少数工人农民斗学生，来转移斗争的目标。

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顽固派，荒谬地把自己本单位的领导，同党中央，同整个党等同起来。他们利用广大工农兵群众对党的热爱，利用一些群众不明真相，提出什么保卫本地区、本部门的党委的口号，如有革命学生批评他们，起来造他们的反，就被说成是什么"反党"，

“反党中央”，说成是什么“反革命”。有的地方，有少数工人农民和机关干部受了蒙蔽和欺骗，参加了对革命学生的斗争。

用这种口号煽动一些工人农民去斗争革命学生的做法，是极端反动的，是完全违背党的路线的。

任何一个地区，任何一个单位的党组织，都必须无条件地走群众路线，接受群众的监督和批评，决不允许以任何借口拒绝和压制群众的批评，更绝对不允许把批评自己的群众打成“反党”，“反党中央”的“反革命分子”。党中央就是党中央。一个地区，一个单位的党组织，就是一个地区，一个单位的党组织。任何一个地区，一个单位的党组织，如果违背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违背了毛泽东思想，为什么批评不得？为什么反对不得？为什么人家一批评，就叫做“反党”，“反党中央”，“反革命”？

……

广大革命学生起来闹革命，反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老爷们，是件大好事。他们贴大字报，是好事，大鸣、大放、大辩论，是好事。他们有上街游行示威的权利，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的权利。他们敢于用毛泽东思想批评本单位党委和上级党委的错误，正好可以端正那些党委的领导。至于那些死顽固，死不悔改的，垮了也没有什么了不起，也是好事。

革命的学生们组织“红卫兵”、“红旗战斗小组”等等革命组织，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合法的组织。他们的行动，是革命的行动，是合法的行动。谁要反对革命学生的革命行动，就直接违背了毛主席的教

导，违背了党中央的决定。

广大工农兵群众，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主力军，是革命学生的强大后盾。我们一定要坚定地站在革命学生一边，最热烈最坚决地支持革命学生的革命行动。

这篇社论还点名批评长沙发生的镇压学生的“819”事件。

社论于当日早上6时30分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与报纸摘要节目中播出后，长沙城一片沸腾，造反派认为自己的斗争取得了胜利，欢呼雀跃奔走相告；保守派则十分沮丧，不理解为什么“右派翻天”会得到中央的肯定。

民众中对省委和市委的不满情绪迅速升级并逐渐公开化，大字报贴上长沙市街头，“保皇派”和造反派的大辩论也公开上街。

很快，成千上万的大学生红卫兵涌上长沙市街头，高喊口号，拥护《人民日报》社论，庆祝自己的胜利。原来支持学生观点的工人、干部也自发扛着红旗，敲锣打鼓上街游行，并到湖南大学去慰问学生。长沙市委不敢再有镇压之举，听任人们重新涌到市委大院，高呼“改组长沙市市委！”的口号。原来反对学生的工人和基层干部，也成批转到同情学生的行列。长沙市的夜景，由此热闹非凡。

图为 1966 年 8 月 23 日当天下午，省会长沙举行了游行示威。

随即，造反风潮在湖南各大专院校风起云涌，红卫兵们积极帮助在文革初期，因对各级党委或工作组提意见而被打成“新右派”的学生、工人和干部，向中央反映情况，促使其得以平反。并帮助工人组建造反组织。

8 月 23 日这天，北京极其闷热。北京七十八中、五十八中等学校的红卫兵到中国佛学院造反。北京体育学院“八•一八”红卫兵组织和教职工家属 273 人，来到颐和园佛香阁，砸碎了释迦牟尼塑像，又把两座小佛像拖走。

海淀区朱房村的汉城遗址里珍藏的丰富遗迹资料，被挖得面目皆非。

丰台区大井村延寿寺中保存的明初遗物千手千眼菩萨铜像，被红卫兵拉倒，佛身断成 3 截，两只手全部断残，成了一堆废铜。

在拥有1300多年历史的戒台寺里，数千个大佛和周围的小佛像，全部被红卫兵砸光。

为人熟知的白塔寺、团城、圆明园遗址也遭到了不同程度的破坏。

当天，北京东方红一中，即北京二十五中部分同学还散发传单，《最强烈呼吁——坚决要求重新改选北京市、区人民代表》，原因是原代表中有地主、资本家等剥削阶级的人物。

8月23日，北京二十六中红卫兵印发了一份通告，题目是："通告全国：旧《国歌》必须立即废除"。"通告"说明废除"旧国歌"的理由有两点：第一，"我们的《国歌》（《义勇军进行曲》代国歌）没有一句提到中国共产党，没有一句提到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第二，"田汉这个反革命黑帮、这个混蛋在《国歌》里写到：'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田汉诬蔑中国人民的抗战是'被迫'，他这样写绝不是偶然的。我们要彻底打倒田汉！彻底粉碎旧的《国歌》！"

因为国歌的作词是田汉，从此，国歌的只"奏"不"唱"了十几年，直至文革结束。

"通告"中，不但要废除"旧国歌"，还"郑重建议"，要创作"新国歌"。新国歌的要求有五条：

1、全曲必须突出毛泽东思想，贯穿毛泽东思想，要充分表现我们对毛泽东思想的无限热爱、无限信仰、无限崇拜。

2、毛主席是我们最最敬爱的领袖，伟大的革命导师，是人类的希望，是我们心中永远不落的红太阳。

3、中国共产党是最伟大、最坚强、最光荣、最正确的党，是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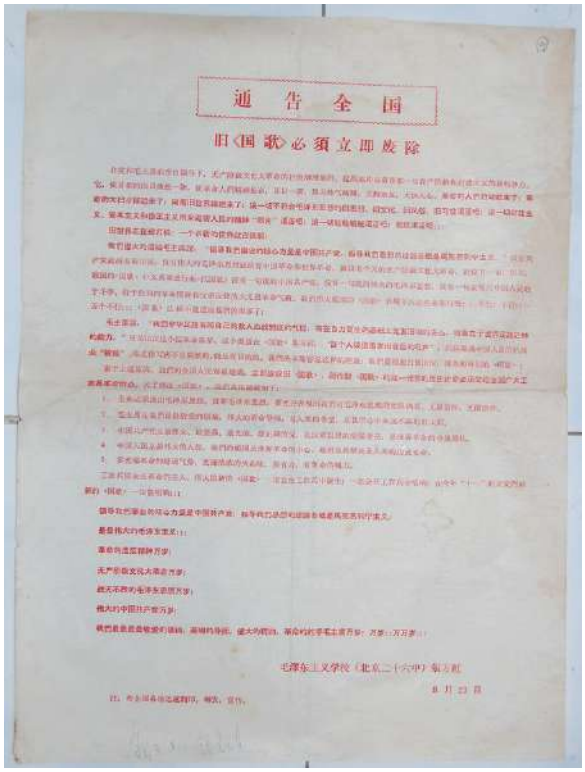
帝反修的坚强堡垒，是世界革命的中流砥柱。

4、中国人民是最伟大的人民，我们的祖国是世界革命的中心，她肩负着解决全人类的历史使命。

5、要充满革命的磅礴气势，充满浓浓的火药味，要有力，有革命的魄力。

“通告”最后说：“工农兵群众是革命的主人，伟大的新的《国歌》一定会在工农兵中产生；一定会在工农兵中唱响；在今年‘十一’的天安门前新的《国歌》一定能唱响！！！

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 是最伟大的毛泽东主义！！！”



通 告 全 国

旧《国歌》必须立即废除

毛泽东主义学校《北京二十六中》筹委会

8月23日

废除《国歌》的通告

8月23日，北京二十二中红卫兵和北新桥邮局联合发出通令，禁止旧官僚、反动军官、资本家订阅内部刊物。

这天，北京一中造反者发出《戒烟戒酒通告》，要求封闭烟酒店，停止生产、销售烟酒。

这天上午，北京二十五中红卫兵向各民主党派的民主人士下令：

一、定息、股票马上烧毁或交给国家，一切剥削来的东西全部上交国家；

二、薪金上交 40%（后增至 80%）；

三、上下班不许坐车，要参加打扫卫生等劳动。

当日晚到 24 日晨，北京八中红卫兵发出致各民主党派的《最后通牒》，限令各民主党派在 72 小时内自行解散并登报声明。他们还提议修改宪法，理由是，现行宪法没有突出阶级斗争。

民主党派接到《最后通牒》后非常紧张，不知怎么办好。事情很快反映到周恩来那里，时任政协主席的周恩来出了个主意："先发制人，争取主动，先'缴枪投降。'"

经中共中央统战部讨论，周恩来指示中国民主同盟等民主党派中央暂时停止办公，向红卫兵交出印章，由红卫兵在大门贴上封条，避免冲突。

农工民主党草拟了"关于停止组织活动的声明"，全国工商联关上了大门，并挂出牌子："停止活动，是否解散待上级指示。"

23 日下午和 24 日下午，北京机电学校和六十六中红卫兵分别在全国工商联召开斗争会，批斗了荣毅仁、荣松华、胡子昂、胡厥文、孙晓村、孙起孟等 13 人。

在王府井大街上，霓虹灯全部化为浓烟；东安市场的橱窗玻璃，

被砸得像雨点一样，撒落到马路上和电车上。

## 第 140 回：皇城根，文联斗牛鬼蛇神
## 难阻拦，女学生打人更狠

北京西长安街 7 号大院，北京文联和北京文化局机关所在地，本是个十分平静的大院。近日来，文联机关的出勤率，突然高于往常，那些常常在家中写作的人，再也坐不住了，纷纷按时上班，了解形势。

8月23日上午，北京文化局开会斗争文化局局长赵鼎新。会上，突然有人喊“牛鬼蛇神一律站起来！”

被点的人一个一个地都站起来了。点到戏曲编导委员会的萧军时，他没站起来。军代表问：“为什么不站起来？”

萧军说“我不是牛鬼蛇神，为什么站起来？我不是地富反坏右，站起来丧失原则。”当场就争吵起来。

中午回家吃饭时，萧军对孩子们说：“可能要出事，如果我晚上不回来吃饭，你们别等我。”说完，就去文化局上班了。

下午，文化局司机班、通讯班、炊事班的造反派让萧军去铲煤，劳动改造，萧军东北大汉，性格倔强，桀骜不驯。他认为自己不是牛鬼蛇神，当然不去。几个小伙子就过来要押他过去，萧军当过兵，武功好，几个人按不住他。于是，群众艺术馆就有的人给女八中打电话，叫红卫兵过来支援。

这天，全国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协副主席老舍也拄着拐杖来了。老舍，现、当代作家，出生于贫民家庭，正宗的无

产阶级出身。他不但跟文革的斗争对象——走资派沾不上什么边，甚至连黑五类都算不上。文革前他正在北京郊区体验生活，文革开始后他任文联的革委会主任，对文革是以一种积极心态参加的，其思想的进步程度绝不在郭沫若之下。

6 月 20 日，全国政协委员第六组学习会上，与会者有贝时璋、谭政、丁西林、茅盾、舒舍予（老舍）、张含英、汪菊潜、金城、陈垣、李仲揆（李四光）、吴有训、王芸生、竺可桢。会上舒舍予（老舍）“提议我们组（文艺科学组）高薪阶级自动提出减薪，”得到大家同意。

入夏以来，老舍身体不适，一天夜里突然大吐血，总量竟有半痰盂，他当即被送往北京医院，住院半月。出院时，医生嘱咐他在家多休养些日子，老舍却急着要上班参加文化大革命。他说：

“我刚刚出医院，身体不成了，老爱生病。有人捎话让我来参加运动，感受一下这次政治运动的气氛，所以我就来了。”

按往常习惯，老舍每到中午，便会安排回家，但今天去跟司机打招呼，司机却不见了。

此时，北京文化局的 7 号大院里已经有许多生人随意进出，老舍也有所察觉。大家安慰他说：“您先休息一下，千万别出去。”老舍点头答应。

下午 15 时 30 分，从北京女八中请来支援的 20 多名 16

岁左右女学生，身着绿军装，腰系宽皮带，臂带“红卫兵”袖章，乘坐两辆大卡车来到 7 号院。下车后，她们高唱着《造反有理》，一拥而进，闯入大院。只见她们挥动着皮带和拳头，高喊“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稚嫩的脸上，显现出的是腾腾杀气。一时间，大院乱作一团。

北京文联革委会副主任浩然在门口遇到了女作家草明，她非常害怕，一见浩然，就紧张地抓住他的手，连问“怎么办？”

浩然告诉她：“赶快躲起来。”

草明“嗖”地一下就不见踪影了。

这些女学生，先是冲进编辑部，把刊物和手稿撕烂，然后闯入文联会议室，嘴里骂着“养尊处优”、“精神贵族”、“裴多菲俱乐部”，用手里的剪刀把一张张皮沙发戳上窟窿。

随后，从文联和文化局两个门里，许多人被揪到了院子当中，其中有几个老人还被不分青红皂白地打倒在地。文联干部看得目瞪口呆，连革委会成员们也变得手足无措。他们本想保护被打的老人，但却不敢上前阻拦。因为他们不知道这是不是革命行动？该不该阻拦？会不会因为阻拦被指责为右倾，或者是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问题。

有人把萧军揪出来，脱去他的上衣，乱鞭抽打。萧军会武术，在旧社会号称“短刀一把，双拳分厢，左来左挡，右来右捅”，曾把国民党汉奸打得落花流水。现在浑身武艺却

无法施展，让这些头上扎两把小刷子的 16 岁的孩子打趴在地，几次站起来，几次又被打趴下。问他服不服？萧军说：“服打不服罪！”

此时，只有北京作协的作家管桦在混乱的人群中焦急地走来走去，大声喊着：“要文斗，不要武斗！”

《青春之歌》的作者杨沫挤在墙角的一棵小树旁，由于枝繁叶茂，小树起到了掩护作用。她紧紧握着同事的手，眼睛时而因震惊而大睁，时而忍不住痛苦地闭上，嘴里喃喃地说：“今天是我有生以来，感到最黑暗的日子，怎么能在光天化日下打自己的人呢？这叫革命？我的天哪？革谁的命呀？”杨沫因《青春之歌》，享誉全国，但此时尚未被红卫兵认出来。

杨沫忽然看到了老舍，心一下提到了嗓子眼儿：“乱成这个样子，他怎么出来了？”

老舍是在没人发现的情况下出来的，他一动不动地站着，大致是在想：“出了这么大的乱子，怎么一个警察也没有？”这时，他身体摇晃了一下，硬撑住了。

突然起了一阵混乱，红卫兵朝老舍涌来，像一个大浪头，把他卷了进去。据时任文联“文革筹”委员的曾德芳后来回忆，可能是因为老舍那天穿了一件中式袄的缘故，中学生认为那是“四旧”，于是把他也拉了过去。

红卫兵把老舍和其他 40 多位作家，弄成一个圈，在 40

度的地面高温下，让他们挂着黑牌，弯腰 90 度，20 几个女红卫兵站在圈外，手舞皮带，狠抽他们的脊背。

老舍的两腿颤抖着，几鞭下去，他的皮肉和头上迸出鲜血，眼镜被打飞了，但无论怎样，他始终不肯低下头。

这时，孔庙来了电话，说那里有一些文化局的物资，就是戏装。不知怎么叫中学生发现了，要烧。请示怎么办？看仓库的人叫余华。他的头已被人剃成阴阳头了。北京文化局请示宣传部，答复是象征性地烧一部分。文化局革委会筹委会的主任张彬、副主任葛献挺研究怎么办。有人提议让机关的当权派一起去受受教育。原来决定去四个人：局长赵鼎新、副局长张梦庚、办公室主任苏辛群、戏曲编导委员会的荀慧生。后来说不行，让当权派都去受教育。于是就开始找人，凡是带“长”的，有名气的，都去。

16 时 30 分，红卫兵把这群“牛鬼蛇神”撵上了卡车，押往国子监街中的北京孔庙，那里已把文化局收存的戏装、盔头、刀枪把子，当作“封、资、修”的东西，集中在一起，准备当众焚毁。老舍坐在车里最后一个位子上，他一直紧闭着双眼。

国子监里，红卫兵手持舞台木刀，勒令“牛鬼蛇神”把价值千金的行头，一趟趟搬到院中，堆成几堆，然后用火点着。女八中的红卫兵和已经先期到来的孔庙附近中学的红卫兵一起，把北京市文化局长赵鼎新、老舍、萧军、骆宾基、

端木蕻良、杨沫、著名昆剧演员白芸生及著名的京剧四大名旦之一荀慧生等30多人，弄成一个圈，挂上黑牌子，低头弯腰站在火堆周围。这些中学生用皮带抡着打他们，一边打还一边问："你负什么责？什么出身？挣多少钱？"

有人还指名道姓地喊着打：

"赵鼎新，黑帮头子，打！"

"荀慧生，四大混蛋（四大名旦），多打一下！"

"萧军，老顽固反党分子，多打几下！"

跪在火堆前的萧军，被身后的红卫兵用棍棒和铜头皮带毒打，心中真是愤怒至极。他想：凭自己的功夫，可以打倒十几个人。但是，他看到来自各学校的红卫兵围得里三层外三层，争相出手，打人打得发疯了一般，最后自己一定寡不敌众，会被打死，自己死了也就死了，可是其他被斗的人呢？他看到老舍就跪在旁边，脸色煞白，额头上正在流血。他想，如果他反抗，其他近 30 个"牛鬼蛇神"，说不定会跟他一道统统被打死在现场。他也想到他的家人也会被报复打死。他想了又想，最后调动了心中所有的力量，压下去反抗的冲动，无声地忍了下来。

红卫兵往他们头上倒上墨汁，用木刀在他们头上乱砍。突然，一个红卫兵喊了一声："这老东西的头破了，流血了，他妈的太嫩！"这个流血了的"老东西"就是老舍。鲜血从他的头顶上一串串沁出，顺着他的额角和脸颊，流进了衣领

遮掩下的脖子里……。

老舍没有揩去额角上的血迹……

有位老师一再劝阻，说这样会把人打死的。这些女红卫兵柳眉倒竖，杏眼圆睁，说："打死活该！"

只听人群中一个40多岁的妇女，尖着嗓子叫"我揭发，老舍在解放前把《骆驼祥子》的版权卖给了美国……"

老舍说："那是解放前，我靠稿费过日子。"

女红卫兵们听了大怒，说："在国外拿美金，不是里通外国，也是历史反革命。"

口号声起："老舍狡辩！"

"老舍反攻倒算！"

老舍的精神崩溃了，难道这就是他所崇仰的、追求的革命？这完全亵渎了他心中的共产党的政策，毛泽东主席的指示，亵渎了他心中那神圣的革命净地。国家的宪法，完全踏在脚下。比法西斯还法西斯。

孔庙大殿前净是柏树。后来消防队的也去了，怕把古树烧着了。

文化局革委会筹委会的主任张彬、副主任葛献挺他们怕出事，想办法让年纪大的都回去反省，年轻的留下帮红卫兵搬戏装，其实也没搬，借机都脱离开孔庙了。

萧军没让走，因为他太"顽固"了，接着打。

黄昏时分，老舍等人被拉回了文联大院。临走时，他和

萧军走了个对面。萧军见老舍脸色惨白，也是满身是血，头上还缠着“水袖儿”，天蓝色的衬衣弄得很脏。

回到文联后，红卫兵又围了上来，继续审问老舍。对红卫兵提出的问题，老舍冷静地作了回答。然而，这些回答似乎更加激怒了红卫兵，招致来的是更残酷的肉体折磨。

老舍明白了：他的任何回答都是无用的。除非他像狗一样趴在地上，任人拳打脚踢。可是老舍的骨气使他注定了不会这样。他不再低头，不再说话。

有人发现老舍胸前没挂牌子，很快就有牌子递到女红卫兵手中。女红卫兵往老舍头上套。那牌子吊着根细铁丝，又短，匆忙中，勒着耳朵了，勒不下去，但还是拼命勒。

因为疼痛，老舍双手拼命地往上托铁丝，托出头顶，犹有余力，不知是收不住，还是没有收，连手带牌子碰到了那个女红卫兵的脸。

竟敢打红卫兵，这还了得？于是，院子里一片哗然，红卫兵们沸腾了，只听见“打打打”的声音，花坛上女红卫兵噼啪打过去，男红卫兵跳上花坛噼啪乱打。老舍立刻成团堆在地上。

浩然见状，担心老舍被打出个好歹来，赶紧打电话叫来派出所的人，用车将老舍拉到派出所去。尔后，尾随而来的红卫兵还追随汽车赶到公安派出所，不顾所内人员阻拦将已奄奄一息的老舍轮番毒打到深夜……

当晚，北京文化局的朱行言带着几个人，来到萧军家，对萧军的家人说：

“萧军让你们交出凶器来。”

萧军的孩子回答说：“我们没看见我父亲有凶器。再说，你们也没有证明，也没有介绍信，我们知道你是哪的?假如真有凶器，也不能交给你，你要是坏人呢?”

朱行言他们一听，没话说了，就又讲：“那你们上文化局来一趟吧，你们父亲找你们呢!”

萧军的女儿萧耘就和他哥哥、姐姐三人一起来到文化局找他们的负责人。等了半天，一个叫牛文的出来对他们说“走吧，小礼堂里谈话”。文化局的朱行言、金和曾，还有张迎春等几个人，就在哪里和他们谈话，主要是讲萧军的罪证。

不到一小时，进来了一个人，跟牛文耳语了几句，然后牛文就站起来，脸一绷说：

“我们现在和你们谈话停止了，没话说了。”

萧耘正拿着本子一本正经的在那里记呢，还没听出个子午辰卯，突然说不谈了，忙说：“话还没谈完呢?”

牛文说：“有话外边说去！”就连推带搡地把他们从礼堂里推出来了，外面已经有一堆人。还有萧军儿子单位的群众组织，正好是对立面。

他们一上来就先把萧军的儿子五花大绑给捆住了，衣服也给扯了，光着膀子，罗列了一大堆“萧鸣的罪状”：什么

要破坏文化大革命，要刺杀江青，什么停电、停水等等。然后就是一通毒打！萧耘出于本能，一下就扑过去抱住哥哥的头，护着他。结果也被打得满身是血，衣服被血染红了一大片。打完了，把啸鸣往卡车上一扔就开走了。

萧耘那个气呀，心想：这些肯定是他们文化局策划的。从家里骗到单位，又骗到小礼堂，再骗到外面院子里，毒打完了，他们没事人一样，打完就走了，卡车一开，把人拉走了，到底去哪儿，也不知道。她就找到喊口号的负责人，说要见她父亲，那人说："不能见。"

萧耘问："为什么!你们让我来找我父亲谈话的!"

那人说："送公安局了!滚蛋!"

萧耘："你凭什么送公安局?他有什么罪证?"

"公安局让关押他的!滚!"

萧耘说："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牛文"。

萧耘赶快往外跑。因为她事先和姐姐已经商量好了，如果她和我哥哥进去后，过20分钟不出来，千万别进去找他们，赶快上国务院去告状！她不知道她姐姐还在不在外边？

萧耘的姐姐在外头等了半个多小时，没见他们出来，就着急了，也不管它们的约定了，就往里跑，正好两人长长的通道碰上了。她一看萧耘满身都是血，就说，咱俩别在这儿停留，赶快走！

萧耘她们跑到西安门，正好在文化局的后面，就是国务院接待站。在席棚里都是木板搭的炕，人山人海呀！告状上访的人非常多，可是打成浑身是血只有萧耘一人。大家都在排队上访告状，一看萧耘这样，就说："姑娘，你别排队了，赶快！"

萧耘她们直接进了接待站。接待员一看顿时就愣了，因为社论刚发：要文斗不要武斗。而且离他们眼皮底下这么近，隔一道墙就是文化局呀。

萧耘她们把整个过程都跟接待员说了，接待员马上打电话到文化局，这时已是半夜两、三点钟，筹委会副主任葛献挺在接电话，国务院接待站核实有没有一个叫萧军的人。

葛献挺说"群众运动，我们也没办法。"

国务院接待站当时正驻着"八一"学校的红卫兵，接待员叫郭昌垣，他让红卫兵纠察队赶快进驻文化局。"八一"红卫兵连夜就去了。到了文化局，打电话告诉郭昌垣："确实看见萧军了，在地上躺着呢，打得不行了。人活着呢，没死……"

郭昌垣让"八一"红卫兵把这些"黑帮"都集中到后院，把门封好，"你们负责把门，以后凡是再来人，不许随随便便提审黑帮。"看起来是圈起来了，实际上是将这些人保护起来了。

## 第 140 回：皇城根，文联斗牛鬼蛇神
## 难阻拦，女学生打人更狠

北京西长安街 7 号大院，北京文联和北京文化局机关所在地，本是个十分平静的大院。近日来，文联机关的出勤率，突然高于往常，那些常常在家中写作的人，再也坐不住了，纷纷按时上班，了解形势。

8月23日上午，北京文化局开会斗争文化局局长赵鼎新。会上，突然有人喊“牛鬼蛇神一律站起来！”

被点的人一个一个地都站起来了。点到戏曲编导委员会的萧军时，他没站起来。军代表问：“为什么不站起来？”

萧军说“我不是牛鬼蛇神，为什么站起来？我不是地富反坏右，站起来丧失原则。”当场就争吵起来。

中午回家吃饭时，萧军对孩子们说：“可能要出事，如果我晚上不回来吃饭，你们别等我。”说完，就去文化局上班了。

下午，文化局司机班、通讯班、炊事班的造反派让萧军去铲煤，劳动改造，萧军东北大汉，性格倔强，桀骜不驯。他认为自己不是牛鬼蛇神，当然不去。几个小伙子就过来要押他过去，萧军当过兵，武功好，几个人按不住他。于是，群众艺术馆就有的人给女八中打电话，叫红卫兵过来支援。

这天，全国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协副主席老舍也拄着拐杖来了。老舍，现、当代作家，出生于贫民家庭，正宗的无

产阶级出身。他不但跟文革的斗争对象——走资派沾不上什么边，甚至连黑五类都算不上。文革前他正在北京郊区体验生活，文革开始后他任文联的革委会主任，对文革是以一种积极心态参加的，其思想的进步程度绝不在郭沫若之下。

6 月 20 日，全国政协委员第六组学习会上，与会者有贝时璋、谭政、丁西林、茅盾、舒舍予（老舍）、张含英、汪菊潜、金城、陈垣、李仲揆（李四光）、吴有训、王芸生、竺可桢。会上舒舍予（老舍）“提议我们组（文艺科学组）高薪阶级自动提出减薪，”得到大家同意。

入夏以来，老舍身体不适，一天夜里突然大吐血，总量竟有半痰盂，他当即被送往北京医院，住院半月。出院时，医生嘱咐他在家多休养些日子，老舍却急着要上班参加文化大革命。他说：

“我刚刚出医院，身体不成了，老爱生病。有人捎话让我来参加运动，感受一下这次政治运动的气氛，所以我就来了。”

按往常习惯，老舍每到中午，便会安排回家，但今天去跟司机打招呼，司机却不见了。

此时，北京文化局的 7 号大院里已经有许多生人随意进出，老舍也有所察觉。大家安慰他说：“您先休息一下，千万别出去。”老舍点头答应。

下午 15 时 30 分，从北京女八中请来支援的 20 多名 16

岁左右女学生，身着绿军装，腰系宽皮带，臂带“红卫兵”袖章，乘坐两辆大卡车来到 7 号院。下车后，她们高唱着《造反有理》，一拥而进，闯入大院。只见她们挥动着皮带和拳头，高喊“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稚嫩的脸上，显现出的是腾腾杀气。一时间，大院乱作一团。

北京文联革委会副主任浩然在门口遇到了女作家草明，她非常害怕，一见浩然，就紧张地抓住他的手，连问“怎么办？”

浩然告诉她：“赶快躲起来。”

草明“嗖”地一下就不见踪影了。

这些女学生，先是冲进编辑部，把刊物和手稿撕烂，然后闯入文联会议室，嘴里骂着“养尊处优”、“精神贵族”、“裴多菲俱乐部”，用手里的剪刀把一张张皮沙发戳上窟窿。

随后，从文联和文化局两个门里，许多人被揪到了院子当中，其中有几个老人还被不分青红皂白地打倒在地。文联干部看得目瞪口呆，连革委会成员们也变得手足无措。他们本想保护被打的老人，但却不敢上前阻拦。因为他们不知道这是不是革命行动？该不该阻拦？会不会因为阻拦被指责为右倾，或者是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问题。

有人把萧军揪出来，脱去他的上衣，乱鞭抽打。萧军会武术，在旧社会号称“短刀一把，双拳分厢，左来左挡，右来右捅”，曾把国民党汉奸打得落花流水。现在浑身武艺却

无法施展，让这些头上扎两把小刷子的 16 岁的孩子打趴在地，几次站起来，几次又被打趴下。问他服不服？萧军说：“服打不服罪！”

此时，只有北京作协的作家管桦在混乱的人群中焦急地走来走去，大声喊着：“要文斗，不要武斗！”

《青春之歌》的作者杨沫挤在墙角的一棵小树旁，由于枝繁叶茂，小树起到了掩护作用。她紧紧握着同事的手，眼睛时而因震惊而大睁，时而忍不住痛苦地闭上，嘴里喃喃地说：“今天是我有生以来，感到最黑暗的日子，怎么能在光天化日下打自己的人呢？这叫革命？我的天哪？革谁的命呀？”杨沫因《青春之歌》，享誉全国，但此时尚未被红卫兵认出来。

杨沫忽然看到了老舍，心一下提到了嗓子眼儿：“乱成这个样子，他怎么出来了？”

老舍是在没人发现的情况下出来的，他一动不动地站着，大致是在想：“出了这么大的乱子，怎么一个警察也没有？”这时，他身体摇晃了一下，硬撑住了。

突然起了一阵混乱，红卫兵朝老舍涌来，像一个大浪头，把他卷了进去。据时任文联“文革筹”委员的曾德芳后来回忆，可能是因为老舍那天穿了一件中式袄的缘故，中学生认为那是“四旧”，于是把他也拉了过去。

红卫兵把老舍和其他 40 多位作家，弄成一个圈，在 40

度的地面高温下，让他们挂着黑牌，弯腰 90 度，20 几个女红卫兵站在圈外，手舞皮带，狠抽他们的脊背。

老舍的两腿颤抖着，几鞭下去，他的皮肉和头上迸出鲜血，眼镜被打飞了，但无论怎样，他始终不肯低下头。

这时，孔庙来了电话，说那里有一些文化局的物资，就是戏装。不知怎么叫中学生发现了，要烧。请示怎么办？看仓库的人叫余华。他的头已被人剃成阴阳头了。北京文化局请示宣传部，答复是象征性地烧一部分。文化局革委会筹委会的主任张彬、副主任葛献挺研究怎么办。有人提议让机关的当权派一起去受受教育。原来决定去四个人：局长赵鼎新、副局长张梦庚、办公室主任苏辛群、戏曲编导委员会的荀慧生。后来说不行，让当权派都去受教育。于是就开始找人，凡是带“长”的，有名气的，都去。

16 时 30 分，红卫兵把这群“牛鬼蛇神”撵上了卡车，押往国子监街中的北京孔庙，那里已把文化局收存的戏装、盔头、刀枪把子，当作“封、资、修”的东西，集中在一起，准备当众焚毁。老舍坐在车里最后一个位子上，他一直紧闭着双眼。

国子监里，红卫兵手持舞台木刀，勒令“牛鬼蛇神”把价值千金的行头，一趟趟搬到院中，堆成几堆，然后用火点着。女八中的红卫兵和已经先期到来的孔庙附近中学的红卫兵一起，把北京市文化局长赵鼎新、老舍、萧军、骆宾基、

端木蕻良、杨沫、著名昆剧演员白芸生及著名的京剧四大名旦之一荀慧生等30多人，弄成一个圈，挂上黑牌子，低头弯腰站在火堆周围。这些中学生用皮带抡着打他们，一边打还一边问："你负什么责？什么出身？挣多少钱？"

有人还指名道姓地喊着打：

"赵鼎新，黑帮头子，打！"

"荀慧生，四大混蛋（四大名旦），多打一下！"

"萧军，老顽固反党分子，多打几下！"

跪在火堆前的萧军，被身后的红卫兵用棍棒和铜头皮带毒打，心中真是愤怒至极。他想：凭自己的功夫，可以打倒十几个人。但是，他看到来自各学校的红卫兵围得里三层外三层，争相出手，打人打得发疯了一般，最后自己一定寡不敌众，会被打死，自己死了也就死了，可是其他被斗的人呢？他看到老舍就跪在旁边，脸色煞白，额头上正在流血。他想，如果他反抗，其他近 30 个"牛鬼蛇神"，说不定会跟他一道统统被打死在现场。他也想到他的家人也会被报复打死。他想了又想，最后调动了心中所有的力量，压下去反抗的冲动，无声地忍了下来。

红卫兵往他们头上倒上墨汁，用木刀在他们头上乱砍。突然，一个红卫兵喊了一声："这老东西的头破了，流血了，他妈的太嫩！"这个流血了的"老东西"就是老舍。鲜血从他的头顶上一串串沁出，顺着他的额角和脸颊，流进了衣领

遮掩下的脖子里……。

老舍没有揩去额角上的血迹……

有位老师一再劝阻，说这样会把人打死的。这些女红卫兵柳眉倒竖，杏眼圆睁，说："打死活该！"

只听人群中一个40多岁的妇女，尖着嗓子叫"我揭发，老舍在解放前把《骆驼祥子》的版权卖给了美国……"

老舍说："那是解放前，我靠稿费过日子。"

女红卫兵们听了大怒，说："在国外拿美金，不是里通外国，也是历史反革命。"

口号声起："老舍狡辩！"

"老舍反攻倒算！"

老舍的精神崩溃了，难道这就是他所崇仰的、追求的革命？这完全亵渎了他心中的共产党的政策，毛泽东主席的指示，亵渎了他心中那神圣的革命净地。国家的宪法，完全踏在脚下。比法西斯还法西斯。

孔庙大殿前净是柏树。后来消防队的也去了，怕把古树烧着了。

文化局革委会筹委会的主任张彬、副主任葛献挺他们怕出事，想办法让年纪大的都回去反省，年轻的留下帮红卫兵搬戏装，其实也没搬，借机都脱离开孔庙了。

萧军没让走，因为他太"顽固"了，接着打。

黄昏时分，老舍等人被拉回了文联大院。临走时，他和

萧军走了个对面。萧军见老舍脸色惨白，也是满身是血，头上还缠着“水袖儿”，天蓝色的衬衣弄得很脏。

回到文联后，红卫兵又围了上来，继续审问老舍。对红卫兵提出的问题，老舍冷静地作了回答。然而，这些回答似乎更加激怒了红卫兵，招致来的是更残酷的肉体折磨。

老舍明白了：他的任何回答都是无用的。除非他像狗一样趴在地上，任人拳打脚踢。可是老舍的骨气使他注定了不会这样。他不再低头，不再说话。

有人发现老舍胸前没挂牌子，很快就有牌子递到女红卫兵手中。女红卫兵往老舍头上套。那牌子吊着根细铁丝，又短，匆忙中，勒着耳朵了，勒不下去，但还是拼命勒。

因为疼痛，老舍双手拼命地往上托铁丝，托出头顶，犹有余力，不知是收不住，还是没有收，连手带牌子碰到了那个女红卫兵的脸。

竟敢打红卫兵，这还了得？于是，院子里一片哗然，红卫兵们沸腾了，只听见“打打打”的声音，花坛上女红卫兵噼啪打过去，男红卫兵跳上花坛噼啪乱打。老舍立刻成团堆在地上。

浩然见状，担心老舍被打出个好歹来，赶紧打电话叫来派出所的人，用车将老舍拉到派出所去。尔后，尾随而来的红卫兵还追随汽车赶到公安派出所，不顾所内人员阻拦将已奄奄一息的老舍轮番毒打到深夜……

当晚，北京文化局的朱行言带着几个人，来到萧军家，对萧军的家人说：

“萧军让你们交出凶器来。”

萧军的孩子回答说：“我们没看见我父亲有凶器。再说，你们也没有证明，也没有介绍信，我们知道你是哪的?假如真有凶器，也不能交给你，你要是坏人呢?”

朱行言他们一听，没话说了，就又讲：“那你们上文化局来一趟吧，你们父亲找你们呢!”

萧军的女儿萧耘就和他哥哥、姐姐三人一起来到文化局找他们的负责人。等了半天，一个叫牛文的出来对他们说“走吧，小礼堂里谈话”。文化局的朱行言、金和曾，还有张迎春等几个人，就在哪里和他们谈话，主要是讲萧军的罪证。

不到一小时，进来了一个人，跟牛文耳语了几句，然后牛文就站起来，脸一绷说：

“我们现在和你们谈话停止了，没话说了。”

萧耘正拿着本子一本正经的在那里记呢，还没听出个子午辰卯，突然说不谈了，忙说：“话还没谈完呢?”

牛文说：“有话外边说去！”就连推带搡地把他们从礼堂里推出来了，外面已经有一堆人。还有萧军儿子单位的群众组织，正好是对立面。

他们一上来就先把萧军的儿子五花大绑给捆住了，衣服也给扯了，光着膀子，罗列了一大堆“萧鸣的罪状”：什么

要破坏文化大革命，要刺杀江青，什么停电、停水等等。然后就是一通毒打！萧耘出于本能，一下就扑过去抱住哥哥的头，护着他。结果也被打得满身是血，衣服被血染红了一大片。打完了，把啸鸣往卡车上一扔就开走了。

萧耘那个气呀，心想：这些肯定是他们文化局策划的。从家里骗到单位，又骗到小礼堂，再骗到外面院子里，毒打完了，他们没事人一样，打完就走了，卡车一开，把人拉走了，到底去哪儿，也不知道。她就找到喊口号的负责人，说要见她父亲，那人说："不能见。"

萧耘问："为什么!你们让我来找我父亲谈话的!"

那人说："送公安局了!滚蛋!"

萧耘："你凭什么送公安局?他有什么罪证?"

"公安局让关押他的!滚!"

萧耘说："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牛文"。

萧耘赶快往外跑。因为她事先和姐姐已经商量好了，如果她和我哥哥进去后，过20分钟不出来，千万别进去找他们，赶快上国务院去告状！她不知道她姐姐还在不在外边？

萧耘的姐姐在外头等了半个多小时，没见他们出来，就着急了，也不管它们的约定了，就往里跑，正好两人长长的通道碰上了。她一看萧耘满身都是血，就说，咱俩别在这儿停留，赶快走！

萧耘她们跑到西安门，正好在文化局的后面，就是国务院接待站。在席棚里都是木板搭的炕，人山人海呀！告状上访的人非常多，可是打成浑身是血只有萧耘一人。大家都在排队上访告状，一看萧耘这样，就说："姑娘，你别排队了，赶快！"

萧耘她们直接进了接待站。接待员一看顿时就愣了，因为社论刚发：要文斗不要武斗。而且离他们眼皮底下这么近，隔一道墙就是文化局呀。

萧耘她们把整个过程都跟接待员说了，接待员马上打电话到文化局，这时已是半夜两、三点钟，筹委会副主任葛献挺在接电话，国务院接待站核实有没有一个叫萧军的人。

葛献挺说"群众运动，我们也没办法。"

国务院接待站当时正驻着"八一"学校的红卫兵，接待员叫郭昌垣，他让红卫兵纠察队赶快进驻文化局。"八一"红卫兵连夜就去了。到了文化局，打电话告诉郭昌垣："确实看见萧军了，在地上躺着呢，打得不行了。人活着呢，没死……"

郭昌垣让"八一"红卫兵把这些"黑帮"都集中到后院，把门封好，"你们负责把门，以后凡是再来人，不许随随便便提审黑帮。"看起来是圈起来了，实际上是将这些人保护起来了。

## 第 141 回：狂潮起，破四旧席卷全国

### 上海市，《新民晚报》先更名

北京红卫兵“破四旧”的消息很快就通过报刊、电台传向全国，立即在全国卷起“破四旧”的风暴。

8 月 20 日以后，哈尔滨“八八团”率先呼应北京红卫兵的破“四旧”行动，捣毁了哈尔滨的“极乐寺”和“喇嘛台”，开大会批斗静观和尚。这一行动当然也被“造反团”斥之为“转移斗争视线”。“造反团”说：“在我们猛搞猛攻省委时，你们去斗和尚、尼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执行者是来自省委走资派，而不是和尚、尼姑。”

“八八团”则批驳道：“《人民日报》热烈称赞‘破四旧，立四新’好得很，并且向全国报道了上海，天津、南京等地‘破四旧’的消息，难道这也是‘转移视线’么？有些人指责我们‘斗和尚’。这个极乐寺的方丈，是披着宗教外衣的日本特务，他极端仇视我党和人民政府，包庇窝藏恶霸地主，汉奸，特务。恶毒攻击三面红旗，咒骂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难道这样的‘和尚’不该斗吗!你们指责我们斗他，你们是站在什么立场上呢?”

23 日这天，武汉、长沙、济南、南昌、郑州、合肥、南京、南宁、福州、乌鲁木齐等城市的大、中学校的学生这天都走上街头，大破“四旧”。全国各地文教科技界的许多人士被殴打。

合肥红卫兵把佛像搬到马路是焚烧

8 月 22 日，在北京红卫兵“破四旧”运动的影响下，重庆由党政领导部署组建的学生组织“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教职工组织“赤卫军”等开始陆续上街“破四旧”，并在市委统一布置和公安机关配合下对一些“专政”对象进行查抄。大量采用抄家、封门、戴高帽、挂黑牌、游街、体罚、殴打、砸毁文物古迹等武斗手段。在抗战时期曾给予中共大力支持的“民主之家”特园的主人、著名民主人士鲜英，由于 1957 年被打成“右派”，这次被市委内定为重点抄家对象之首，由市公安局和重庆大学赤卫军组成抄家队进驻，在特园内挖地 1 尺进行全面查抄，特园内曾接待过毛泽东、周恩来、董必武、王若飞等中共领袖的大客厅中的珍贵历史文物《签名轴》，上面有到过特园的国、共两党领导人的纪念性签名从此失去下落。据不完全统计，主城区市中区由区委组织对统战人士、工商业者、“五类分子”及有海外关系者 6407 户进行了抄家，抄走各种财物估价 396 万元；江北区由区委

指名查抄 1445 户，抄收 944 户物资（折价 27 万余元）；北碚区由市委社教分团和区委组织对“五类分子”及其他“牛鬼蛇神”1240 户进行了抄家，抄走各种财物估价 43，956 万元。南岸区抄家千余户。沙坪坝区查抄住宅 1000 余家。据重庆市公安局史志办公室统计，全市共有 13160 户“牛鬼蛇神”被抄家。

8 月 23 日，重庆市委派至北碚区的社教分团文教工作队发出《关于缙云山风景区和北泉公园文物古迹清理情况的报告》，提出缙云山和北泉公园等寺庙的大小泥塑神像均应彻底捣毁。于是，红卫兵按此精神在全区砸毁神像 2000 多个。

8月18日，第一批到广州串连的外地红卫兵，是北师大学生，共13人。

8月20日，北京二十六中红卫兵5人来广州串连的，住在八一中学，帮助他们发起和筹备成立全市性的红卫兵总部，很快得到各中学的支持和响应。

刚从热火朝天的北京城出来的学生，对广州的平静感到不可思议，尽管这里有时也挺热闹，也有游行集会，也有大字报和传单，但对于见惯大场面的北京学生来说，简直不足挂齿。广州学生，还没有人敢直接向省委、市委挑战。权威还没有被推翻。他们决心在广州“点火”，打破这个沉静局面。

8月20日，广州开始向农村遣返“五类”人员，即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截止到9月30日，共遣返约12万人。

8月23日，广州《南方日报》报道广州市中学红卫兵连日来走上

街头，到处张贴传单和大字报，宣传“破四旧，立四新”。广州三大酒家之一的“陶陶居”的职工，把康有为手书的“陶陶居”三个招牌字铲掉，换上了自己书写的新招牌“东风楼”。广州市文化局宣布撤销对古海遗迹、南海神庙、九曜石、大司成牌坊、海瑞牌坊、南朝砖墓、绍武群臣冢、黄兴将军墓等文物保护单位；对名胜古迹、寺观庵堂“宣扬封建伦理道德”的文字、绘画，一律进行清除。

赵紫阳听说北京的红卫兵到广东串联，准备在省党校接见他们。《南方日报》记者左方听说红卫兵是天兵天将，也想看一看省委第一书记赵紫阳是怎么接见这些天兵天将，于是赶去采访。他到了省党校，看到一帮孩子们在打打闹闹，跟平日见到的普通中学生没有什么差别，后来赵紫阳带着省委常委一帮人来了。学生坐一边，赵紫阳及其他省委领导坐另一边。

赵紫阳习惯于主持会议、掌控全局，双方一落座，他首先表示：“我先来讲几句欢迎词……”

没想到北京来的学生真是些天不拍、地不怕的天兵天将，只见那位北京的红卫兵头头打断赵紫阳的话说：“没有轮到你讲。”

赵紫阳没有生气，很大度地说：“那你来讲。”

那位红卫兵头头说：“什么我讲？是毛主席讲，读《毛主席语录》。”

这时赵紫阳等一干省领导才发现，他们已经多么地落后于北京的形势，这些广东省的领导竟没有一个人带《毛主席语录》。

北京来的红卫兵高声质问道：“怎么你们广东省委通通都不学《毛主席语录》？”

还是赵紫阳脑子快，他没有慌，尽可能从容地解释说："不是不是，我们今天匆忙没有带。我们一起读好不好？"

于是，他带头，和广东省委诸领导一个一个跑到北京红卫兵学生身边，和他们一起朗读《毛主席语录》。

读完了坐下来，赵紫阳又要讲话了。那位红卫兵队长还是不让他讲，说："没有轮到你讲。"

赵紫阳依然微笑着说："那你们请讲。"

红卫兵队长宣布说："我们红卫兵开会前有一个规矩，先报家庭成分。"

这一报不要紧，这些省委领导不是地主就是富农家庭成分。红卫兵们大声喊道："什么，你们广东省委都是黑七类，赵紫阳你给我写一个省委常委名单，要将家庭成分写清楚交来给我们。"

赵紫阳："说名单我不能写，因为他们省级干部是中央组织部管的。"

尽管赵紫阳在这边耐着性子和北京的学生们谈笑风生，但是区梦觉等一干人早把嘴噘得长长的，气得要死。他们还没有遇到过如此藐视领导的学生。

8 月 22 日，沈阳"红卫兵"和"红后代"蜂拥上街"破四旧"，许多文物被砸。其中，慈恩寺的 30 多尊唐代石佛全部被捣毁。第二天，沈阳 31 中的学生给辽宁省委贴出通牒："你们各级高干宿舍太奢侈腐化，……更不合理的是，有的还雇用保姆、佣人。……我们通牒你们，限令你们一天答复，三天之内采取行动。"

在南昌市，黄庆仁药栈的职工在红卫兵的感召下，拿起铁锤砸掉了挂了 140 多年的招牌，换上了与对面的“兴无商店”相呼应的“灭资药店”新名；阳明路商店改成了“红卫商场”；东南商店改为了“东风商店”，南昌市郊的湖坊公社改成为“东方红公社”；南昌市书画之家改成了“南昌市工农兵画园”；新雅酒家被改为“人民餐厅”。

四川成都的陈麻婆豆腐饭店，改成“文胜饭店”，麻婆豆腐变成“麻辣豆腐”。

23 日，西安市的“红卫兵”走上街头，大破“四旧”，开始大量更换商店字号和街道名称：“藻露堂”国药店改名为“新风国药门市部”，“老孙家牛羊肉泡馍馆”改名为“东方红早餐馆”，“阿房宫电影院”改名为“东方红电影院”，“珍珠泉”浴池改名为“人民浴池”，“白云章”饺子馆改名为“东方饺子馆”，“福康西服店”改名为“西安服装店”，东大街改名为东风路，西大街改名为反帝路，南大街改名为反修路，北大街改名为延安路。

8 月 23 日，《甘肃日报》刊登新华社关于首都红卫兵“破四旧”的消息。甘肃各地亦开始了横扫“四旧”，许多文物古迹遭破坏，许多商店、街道、公社被改换名称，个别地方还出现“剪子队”，拦路剪去妇女的烫发和辫子。

8 月 23 日，驻在武汉的长江区航运局党委书记贺崇升、政治部主任李震宇发动了一个揪斗牛鬼蛇神运动，把长航系统内部揪出了 32 个人，带上高帽子挂上黑牌子游街，在沿江大道和中山大道游了

一圈，这是武汉市首次游斗牛鬼蛇神，对湖北的影响很大。

接着，以武汉市中学红卫兵为主体，仿效北京红卫兵的行动，上街破“四旧”。武汉市委为支持红卫兵，决定改换所谓具“四旧”色彩的街道、学校、工厂、商店的名称。此时，抄家、游斗浪潮迭起，延续周余。事后不完全的统计，在武汉共抄家 21000 户，抄出黄金 110 斤，白银 1800 斤，银圆 26.7 万块，现金与存款 440 万元。乱查抄、揪斗导致自杀案件 112 起，死亡 62 人，游斗折磨致死 32 人。那是恐怖的 10 天。

上海，8 月 21、22 两日，在外滩、南京路、各大学里，已经开始贴满从北京舶来的各种“造反有理”的大字报。

8 月 23 日上午，上海在人民广场召开了上海市“红卫兵”成立大会，有 3 万多人参加。市委副书记、市长曹荻秋，市委副书记梁国斌，上海警备区政委刘文学，副政委张宜爱、李彬山，空四军和东海舰队的代表，劳模杨富珍、杨怀远、蔡祖泉等参加了会议。曹荻秋代表市委讲话，表示支持上海市的红卫兵运动，刘文学代表警备区讲话，李本荣代表“红卫兵”发言。大会选出了上海警备区司令员廖政国之子廖年，华东局书记韩哲一之子李健，东海舰队司令员陶勇之子陶小勇等 4 人为“红卫兵”总部负责人。但这一切，丝毫也没有影响上海民间“破四旧”狂潮的到来。

8 月 23 日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报首都红卫兵上街破“四旧”的消息后，上海各学校的学生带着红卫兵袖章涌向街头，尤其涌往商业闹市区。他们组成上万支文化革命宣传小分队，抬着毛泽东巨幅画

像，举着“我们是旧世界的批判者”、“我们是新世界的创造者”等大型横幅，在街头演讲、撒传单、张贴大字报，还在大型剧场召集群众大会，进行宣讲。和北京一样，后来职工、干部也参加进来，他们的首要目标就是“四旧”店名、街名。

上海文革中第一个被改名的，不是商店，也不是马路，而是有着27年历史的《新民晚报》。早在6月下旬，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来报社宣布原党组靠边，另派工作组领导运动。6月24日，市委工作小组进驻《新民晚报》社，领导运动。8月12日，《新民晚报》社成立的文化革命小组和临时党支部，取代工作组，做出了把《新民晚报》更改为《上海晚报》的决定。

8月22日，北京“破四旧”已热火朝天。第二天，《人民日报》发了两篇社论：“工农兵要坚决支持革命学生”和“好得很！”，但上海老百姓还不知“破四旧”是啥格物事。《新民晚报》消息灵通，当天就将圆明园路50号报社门口的招牌砸烂烧毁，并决定《新民晚报》停刊。这天出版的《新民晚报》成了停刊号，中缝印有“第7256号”，“发报时间20时38分”。

《新民晚报》宣布改名为《上海晚报》。这家创刊于 1929 年的报纸，以贴近生活的报风深受上海市民喜爱，始终居上海地区市民自费订报之最。此次更名，恰好为上海改名狂潮做出了第一个榜样。

聚集人潮最多的地方，是上海商业最集中的南京路、淮海路、静安寺一带，8 月 23 日，这里锣鼓喧天，人山人海，红卫兵加上成千上万看热闹的路人，将马路围得水泄不通。上海商业界职工积极响应，表示要与红卫兵共同战斗，改革带有封、资、修腐朽气息的商店字号和服务业中残存的陈规陋习，绝不让这些腐朽的东西继续毒化人们的灵魂，一定要把上海改造成为“非常无产阶级化，革命化的城市”。

一时间，各商店橱窗贴满大字报，都是五花八门的改名意见：

国际饭店被倡议改为“亚非拉饭店”、“工农兵招待所”；

和平饭店被倡议改为“人民战争饭店”、“革命饭店”；

淮海路旧货商店被改名为“人民委托商店”。

外滩的外白渡桥已改成“反帝桥”；

黄浦公园改成“反帝公园”;

豫园改成“红园”;

上海大厦改成“反帝大厦”;

苏联领事馆刷上了“反修大楼”;

上海最大的百货公司——永安公司的橱窗上，贴着各种颜色的大字报，提出各式各样的更名意见。红卫兵和商业战线革命职工认为：“永安”是旧社会资本家大老板企图永远安安稳稳剥削劳动人民而定的名。有了资产阶级的“永安”，就没有我们无产阶级的铁打江山！我们决不允许“永安”这个臭招牌继续挂下去。至于“永安”到底改为“永红”、“永斗”还是改为“红卫”，红卫兵和革命职工争论不休。

老字号的王开照相馆、冠龙照相器材店、梅龙镇酒家、邵万生南货店……总之，南京路上名牌店老字号的牌匾统统被摘下砸坏，扔进火里，当街焚烧。全市“公私合营”的招牌全被取消，所有以资本家个人名字命名的商店字号，全都更名。

上海南京路附近的西藏路上，具有50年历史的上海最大的娱乐场所----“大世界”几米高的巨大牌子，在人们的欢呼声中，被职工和学生用绳子拉下。当职工们把最后一个“界”字拉下地的时候，在马路上、在附近大楼的窗口里、在路过的公共汽车中、千群众爆发出雷鸣般的欢呼声。

新的待命名字一大堆：“东方红文化宫”、“工农兵友谊剧场”、“革命俱乐部”、“人民游乐场”、“东风世界”，不一而足。

淮海路上，永隆食品商店改名“永红食品店”，哈尔滨食品厂改名“工农兵食品厂”，襄阳公园改名“向阳公园”。

“静安区”改为“延安区”、“红卫区”；徐汇区改为“群英区”、“前卫区”；长宁区改为“战斗区”、“长征区”、“遵义区”；“普陀区”改为“普红区”、“工人区”；卢湾区改为“红卫区”，等等。

南京路改为“反帝大街”、“五卅大街”；

淮海路改为“反修大街”；

嘉浜路改为“忆苦思甜路”；

复旦大学被建议改名为“东方红大学”，门口还贴上标语：“包头止步，奇装异服滚开”！

各大服装、皮鞋、理发店前，贴满大标语和“最后通牒”：“不准缝制奇装异服”、“不准出售尖头皮鞋”，“不准剪流氓阿飞头”；著名的蓝棠皮鞋店被上海交通大学学生斥为“尖头皮鞋司令部”，店里一双双待售皮鞋，被红卫兵们用剪刀剪碎。

上海理发店的职工，在红卫兵的协助下，提出了“革命性”的措施：彻底消灭一切“阿飞式”、“港式”发型，立即取消诸如剪指甲、美容、摩面等为资产阶级服务的项目。

上海各医院的口腔科提出取消洁齿业务。

全市的商品广告牌有的被涂损、有的被刷上“革命造反万岁”的大标语。

8 月 23 日，著名京剧艺术家周信芳的家被上海市第五十一中学

和市二女中的十几个红卫兵敲开，他们都是初中生，干部子女，而且大多是女孩子，但她们打人毫不手软。几个女红卫兵强行将周信芳 9 岁的孙女剪“阴阳头”，还当着孩子们的面，抡起带着铜扣的军用腰带，将周信芳的妻子和儿媳妇打得昏过去，将周信芳家的狗打死。9 岁的女孩子被吓得精神分裂，从此再也没能痊愈。

8 月 23 日晚，上海市公安局文保处的干部王维章，带人去抄了市委常委、市公安局长黄赤波的家。黄赤波是文革初期最早被上海市委抛出的局级干部之一。王维章以后成为公安局系统的造反派负责人。

《新民晚报》更名为《上海晚报》。当晚发行的《上海晚报》第一号，报头采用宋体字，套红。“发报时间 21 时 43 分”。报上记载了当天上海“破四旧”的情况。在报眼上刊有“本报启事”：“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高潮中，广大革命群众正在猛烈地冲击着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本报接受广大革命群众的热情建议，自今日起将《新民晚报》改名为《上海晚报》…”，该启事在 8 月 24 日出版的第二号四版中又刊登一次。

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

上海晚报

本报启事

# 上海晚报

1966年8月23日 星期二
夏历丙午年 七月大 初八 今日社售
第1号

上海市区今明天气预报
天气，多云。
风向，西北。
风力，4级左右，阵风6级。
温度，明早最低温度28到30度。
明晚最低温度27度。

## 本报启事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高潮中，广大革命群众正在猛烈地冲击着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决心用无产阶级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来改变整个社会的精神面貌。

本报接受广大革命群众的热情建议，自今日起将《新民晚报》改名为《上海晚报》。我们坚决在党的领导下，更高地举起毫无不敌的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为办好社会主义的《上海晚报》而奋斗！

第 142 回：青岛市，管风琴惨遭毁坏　闹绝食，地院一进地质部

山东各地在 8 月 20 日纷纷成立红卫兵，涌上街头“破四旧”。其中淄博地区的多个教堂被砸毁，神职人员被批斗。

8 月 23 日上午，青岛市大中学校红卫兵在永安剧场开会“破四旧”。有人建议砸教堂，一呼百应。海洋学院学生首先冲入中国唯一的祝圣教堂，青岛圣弥爱尔大教堂，在这座哥特和罗马式建筑风格的天主教堂内揪斗神职人员，焚烧宗教书籍。他们调来建筑工人，拆下教堂顶部两座十字架。修女们被一街之隔的第 7 中学的女红卫兵押到学校关在教室中。红卫兵在教堂内到处搜寻所谓潜伏特务人员藏匿的电台，砸破 2 楼的木板墙时，发现里面有许多细的金属管子，于是欢呼找到了电台。实际上，这是一部珍贵的大型管风琴，2400 多个声调，誉为亚洲第一，结果被从 2 楼推到 1 楼大堂遭毁。教堂内的壁画全部喷上墨水。去世多年被埋在教堂内原主教的尸体被挖出，当街焚烧。

青岛市委面对突如其来的破四旧砸教堂的行为，一是不知如何应对。直到 23 日下午，才想出以有组织的红卫兵出面到教堂维持秩序，这个任务交给了刚成立 39 中红卫兵营。39 中的红卫兵营长、一位初三学生接受了任务：“教堂中有许多封资修的罪证，为了更好地批判，必须保留这些罪证实物，不能砸毁烧毁。”

8 月 23 日晚上，这位红卫兵营长带领 39 中的 100 多名红卫兵进驻教堂。此时教堂已被砸被烧得千疮百孔，仍有一些学生还在烧砸。39 种的学生把这些人清除出去，关上大门。

破四旧的热潮中，济南市府前街众多的个体小商贩受到了冲击。最早的冲击是改名。济南市工读五中成立的红卫兵手持板刷和油漆桶，自北向南改名一路浩浩荡荡而来。那种自信、那种随意、那种挥斥方遒。仙峰理发店改为险峰，院西分社改为红卫分社，杨笼匠店改为东方红，知识文具店改为学习，等等。红油漆刷上去，你的名字就完成了革命的第一步。

沿途改去，改到天地坛街的棺材铺时，红卫兵犯难了，“X 记棺材铺”，太充满资本主义味了，绝对的封资修，不革命，天理难容。这时，济南一中的红卫兵的革命队伍也来到这里。两支革命队伍一商议，立即决定火烧棺材铺。

棺材铺的老板，见来了这么多红卫兵，早吓得说不出话来，被红卫兵按着脑袋押到一边。

小将们从棺材铺的后院搬出已制作好的、未完成的、正在制作的、黑色、白茬等大约十几副棺材，堆放在天地坛街的南口。

正是最热的天气。棺材铺老板的头上滚着豆大的汗珠，他看着红卫兵把自己的存货搬出来不知要干什么，猜想是不是要批判自己。当他看到学生们把一桶煤油泼在棺材上的时候，他明白了，这是要他的命啊！他挣扎着要冲上去，但立刻被紧紧拧住了胳膊，随即，一根皮带结结实实地抽在他的屁股上，他啊呀一声便不敢有任何表示。火柴点燃了，棺材烧着了，红的火，黑的烟，席卷着冲上天空。棺材铺老板被晒着，被烤着，被斗着，很快，他支撑不住，摇晃着，跌倒在他辛辛苦苦制作了几十年棺材旁边。

青烟缭绕，棺材成灰。过了一天，烧得木炭一般的棺材依然袅袅青烟。

第二年，棺材铺老板过世了。

泉城路新华书店和古旧书店，是当时济南市有名的书店，地址分别在现在的民天广场西临和对面，红卫兵从这家书店抄出了除《毛泽东选集》、马恩列斯全集以及毛主席画像以外的所有书籍（包括古旧书店的许多珍本）、画像、宣传画、电影剧照、连环画，总计约十几卡车，堆在马路上烧掉。浓烟冲上十几米的高空，卷起的纸屑落下来的时候，还是热的。一路、三路公交车也支持革命小将的革命行动，早早停止了运行。

晚上20时左右，围观的人越来越多，其时，火光照亮了半拉泉城路。

8月23日后的一天，泉城路百货大楼东侧的历下区文化馆西墙上，突然被山东师范学院艺术系的红卫兵改变成大批判栏，让老百姓目瞪口呆的是，他们竟然把刘少奇的大幅画像涂抹成漫画，通栏标题是：誓死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副标题是：揪出中国的赫鲁晓夫！当时，观看的人们窃窃私语，不敢相信刘主席会反对毛主席。

走到省府前街街口的时候，有两个愣头小子突然喊出："打倒刘主席！"另外一个连忙说："什么刘主席，是打倒刘少奇。打倒刘少奇！"人们面面相觑，看怪物一样。两个小子很自豪，得意洋洋地走了。

济南开始大规模抄家。截至 10 月底,共抄家两万多户，约占全市

总户数的七分之一，其中 7400 多户被强迫遣返农村。

8 月 21 日，北京地院“红卫兵”成立后，首先就是宣布扫四旧、抄家。

与保工作队的“红卫兵”不同，地院“东方红”此时最关心的还是顶在他们头上的“右派”帽子和工作队整他们的那些材料。

8 月 21 日，《红旗》杂志第 11 期社论《在毛泽东思想的道路上胜利前进》中说：“任何人，不管他的职务多高，资格多老，声望多大，只要他是不按照毛泽东思想办事，反对毛泽东思想，就要对他的错误主张进行坚决的抵制，就要对他进行坚决的斗争，一直到罢他的官，撤他的职。”

同期《红旗》杂志还重发了聂元梓等 7 人的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评论员文章新增了这样一段话：“对于无产阶级革命派来说，我们遵守的是中国共产党的纪律，我们无条件接受的是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对一切危害革命的错误领导，不应当无条件接受，而应当坚决抵制。”

“东方红”总部核心组在朱成昭的主持下接连开会，学习《十六条》和《红旗》杂志、《人民日报》社论，讨论分析地院的文革运动形势，商量如何与保工作队多数派辩论斗争，如何改变反工作队少数派受压制的状况。经过讨论，大家一致认为工作队犯了方向路线错误，他们批评工作队是完全正确的。因此，工作队必须承认错误，交出整理的那些反工作队学生的材料，即“黑材料”，并为被工作队批斗的那些反工作队的老师学生平反道歉，不能让工作队就这样不明不白地

走了。所以，要到地质部把邹家尤揪回来，让他把这些问题说清楚，并做出检查。

于是，“东方红”总部着手组织到地质部请愿上访，并为此成立了前线指挥部和后方留守指挥部。前线指挥部由朱成昭为总指挥，蒋良扑、杨雨中为副总指挥。留守部由王大宾总负责。他们在“东方红”进行了思想动员，决定于 23 日开赴地质部。

8 月 23 日清晨，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1000 多人，列队步行两个多小时，来到位于西四阜成门内大街的地质部，进入地质部大院。朱成昭等人即去找部领导，请求接见，要求工作队长邹家尤回地院向师生作检讨。

地质部党委不同意邹家尤回地院。理由是：邹家尤身体不好，万一他回地院后，局面无法控制，身体出现不测，不好交代。但是也没有人出来接待朱成昭他们。朱成昭等人在地质部大楼里找不到人，站在院子里的“东方红”千余人等了两个多小时没有结果，于是决定静坐请愿，千人队伍齐刷刷的在地质部大院里坐了下来，一直等到午饭时间。

派回地院食堂打饭的同学被学校食堂以“过了打饭时间”为由，拒绝为他们提供饭菜。打饭的同学空手而回。群情激奋的“东方红”学生宣布绝食请愿。手提式话筒里，不停传出：“头可断，血可流，革命理想不可丢！同志们，亮出我们的旗帜，党和人民考验我们的时候到了……”

刚成立不久的地院“红卫兵”在程关林带领下奉命赶到地质部。

程关林担任保卫地质部总指挥，边固任副总指挥。程关林见“东方红”绝食，让人从地质部食堂抬来两筐热气腾腾的白面馒头，几个人分头劝说“东方红”的同学吃饭。眼看他们有所收效，刚刚赶到的蔡新平急了，站到凳子上，张开双手大声喊道：

“大家不要上当！我们绝食的革命行动已经得到中央文革的重视和肯定！”他接着讲了中央文革支持他们的三条指示，又重新鼓起了“东方红”同学的士气，程关林顿觉：“这下完了。”

这时，突然来了一批北京中学红卫兵，指责地院“东方红”在国家机关大院里搞静坐示威是“反革命闹事”，是地地道道的反革命行为。他们高呼口号：“只许左派造反！不许右派翻天！”他们认为：“绝大多数工作队是好的和比较好的。”

面对突然出现的情况，“东方红”的领导处置冷静，没有与他们辩论争执，而是立即调整队伍，让男生坐在外边，将女生撤到中间，对中学红卫兵不予理睬。中学红卫兵无奈，只能站在静坐队伍的外边呼口号。

这天，肖力又到地院了解“东方红”的情况。“东方红”总部接受肖力的意见，前往北京市委进行谈判磋商。

8 月 24 日凌晨 4 时左右，地质部办公楼出来一位年轻干部，通知在院子里绝食静坐的地院“东方红”到办公大楼门口集合，有中央首长接见。

当队伍集合到大楼门口后，只见一位年纪大的干部站在大楼的门洞里，另一位中年干部介绍说：“请国务院工交政治部主任陶鲁笳同

志向同学们传达中央指示。”

陶鲁笳手里拿着一张纸，他向大家宣读说：

1、地质学院学生到地质部要求工作队领导回学校听取学生批评意见的行动是正确的，合理的。

2、现在决定，地质部领导于今天晚上去地质学院听取师生的批评意见。

3、师生如有不同意见，可以进行讨论。

地院“东方红”结束了他们在地质部的请愿，返回地院。路上，遇到地院文革委员会派来接他们的汽车，但是学生们拒绝上车，坚持步行回校。

这天，邹家尤回到地院后，直接来到支持工作组的学校“红卫兵”中听取意见。

这天晚上，在地院操场西头搭了个台子，大操场中间划了一条白线。“东方红”坐在了会场的一边，其对立面地院“红卫兵”和“斗批改兵团”则坐在了另一边。持观望态度的群众和外校前来观战的师生站在会场周围。

地院“东方红”为这次大会作了认真的准备，推举了上台发言的代表，讨论了每个人的发言内容。

会前，地院“红卫兵”的程关林与“东方红”的蔡新平就主席台名额、辩论次序等争得面红耳赤，

晚 20 时左右，地质部领导何长工、胥光义、地院工作队队长邹家尤和陶鲁笳一起在登上主席台。陶鲁笳热情地与“斗批改兵团”和

地院文革委员会的代表握手，还拍拍地院“红卫兵”程关林的肩膀。然后居中而坐。他右边是地院“斗批改兵团”的代表任士田、地院“红卫兵”的代表程关林、地院“工人赤卫队”的代表胡守安；左边是地院“东方红”的代表：朱成昭、蔡新平、贾振远。

看到何长工等人到场，“斗批改兵团”的群众立即鼓掌欢迎，而“东方红”这边则无动于衷，无一掌声。

陶鲁笳宣布大会开始，首先请地院文革委员会负责人主持大会。地院“东方红”当即有人冲上台去，夺过话筒说：“文革委员会不能代表地院全体革命师生，无权主持大会。”

而地院文革委员会的代表也毫不退让，也抢过话筒坚持由其主持。

双方多人冲上台声援，你推我搡，争抢话筒，互不相让。

开始陶鲁笳和何长工未置可否，没有表态。眼看双方就要打起来了，陶鲁笳不得不出面制止。经双方同意，陶鲁笳宣布会议由自己主持，大会发言采取一对一的形式。

首先发言的是“东方红”的贾振远老师，他指出工作队犯了方向、路线错误，邹家尤必须为受工作队打击的师生平反、道歉。

接着发言的是“斗批改兵团”的代表毛炎超同学，他认为大部分工作队是好的，对工作队不信任就是对党的不信任，反对工作队的领导就是反对党的领导。

接着，“工人赤卫队”代表胡守安工人发言时说了“工作队就是好”，“邹家尤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等不合时宜的言辞，遭到“东方红”师生及现场许多人的反对。

当轮到“东方红”代表蔡新平发言时，“斗批改兵团”有人冲上台，要抢夺话筒。“东方红”也有人冲上台，双方再次发生冲突。

蔡新平没有了话筒，但坚持发言。

这时，昨日在地质部围攻地院“东方红”的那批中学红卫兵也有人冲上了主席台，他们厉声质问蔡新平：

“你是什么出身？”

“革干!”蔡新平理直气壮地大声回答。

这几个中学红卫兵又转向台下大声问道：“你们地院‘东方红’里有多少‘黑五类’？”

没有人回答。

他们又大声说：“地院‘东方红’里的‘红五类’都给我站出来!”

没有一个人说话，更没有人站起来。

蔡新平继续他的高声雄辩，一个又一个的引用中央文革小组最近的讲话，但很快被“斗批改兵团”这边几千人的嘘声所淹没。

此时，朱成昭神情肃穆地站了起来，大声说道：“暮色苍茫看劲松，乱云飞渡仍从容。天生一个仙人洞……”

“东方红”几千人齐呼：“……无限风光在险峰！”

上万人的操场笼罩在一片哀兵动人的气氛中。

在此环境中，地院“红卫兵”的负责人程关林也颇有理亏心虚之感。

这时，一个秘书模样的人向陶鲁笳递了张纸条，他马上表态支持“东方红”。

原来，此时，中央文革的工作人员也来到了大会现场。而肖力在辩论会一开始就在会场后面。她时而走动，时而驻足，观察大会的情况。陪同肖力在会场后面的有田春林、伏庆是、刘长风等“东方红”的学生。

震惊北京的地院“8·24”大辩论以保工作队一方的大败而告终。当晚，地院不少人就宣布退出“红卫兵”或“斗批改兵团”。地院“红卫兵”基本上名存实亡了，坚持的只是勘探系“红卫兵”等各系保守派战斗小队及“工人赤卫队”。

会后，程关林和胡守安带“红卫兵”、“工人赤卫队”将邹家尤藏在地院西三楼。

“824”大辩论后，程关林的同班同学、“东方红”组织的李昌平在大操场碰到他，诚恳而又自豪地用浓重的河北普通话劝道：“关林，现在你还看不清形势吗？中央文革支持我们，肖力昨天还接见我们。中央文革、肖力代表谁你知道不？”

程关林当然知道，但心想：“周荣鑫、李人林、陶鲁笳、薄一波代表谁，你知道不？”话未出口，仅婉拒之。

23 日深夜，不知何人将毛泽东的《我的一张大字报》贴在北京大学大饭厅东墙上。观者如潮，串连的学生蜂拥而至。半个小时，这个消息传到上海等全国各地，惊动了中央文革小组。8 月 24 日凌晨一点多钟，陈伯达在两个秘书的陪同下来到北京大学看大字报。此时校园已经没什么人了，大字报区只有六、七个同学，他们见陈伯达来了，立即围了上去，大家席地而坐，聊了起来。陈伯达老成持重，有

些木讷，劝说同学不要贴刘少奇的大字报，给刘少奇提意见可以写小字报，大字报要贴到室内的“内部馆”。

有人又问：“可不可以贴郭沫若的？”

陈伯达也给了否定的回答，说对郭沫若要保护。

大家七嘴八舌，又提了很多问题。

陈伯达叫人覆盖了那张大字报，批评这种无组织、无纪律做法，重申：中央只授权新华社公布毛泽东的讲话、言论。任何人无权擅自公布。

此时，毛泽东的大字报已由北大传到了清华。清华又贴出许多批判刘少奇的大字报，如《炮轰刘少奇》，引起了极大的震动。另外还有许多攻击周恩来、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的大字报。

这时，针对刘少奇的大字报已经越来越多了。北大、人大、师大、地院、北航、钢院……几乎北京所有大学都出现了批判刘少奇的大字报。上海、天津、广州、武汉的高等学校里也出现了反对和批判刘少奇的大字报。只是，这些大字报都比较温和，在“刘少奇”后面都加了“同志”二字。这些大字报，除了批判刘少奇的，也有针对周恩来、陈伯达、江青，甚至还有毛泽东的。

## 第 143 回：八二四，清华“二校门”被毁

## 提疑问，北航轰中央文革

8月24日的早上，贺鹏飞拿着一份指责毛泽东的大字报底稿来到清华大学临时筹委会，非常气愤，和乔宗淮一块去王任重那里汇报、请示。

上午10时左右，清华大学自控系“敢死队”的王亚明带着林学院和师大女附中的红卫兵来到清华大学“临筹会”找到刘涛，对她说：“现在给中央领导的大字报贴得那么多，很多地富子女和黑五类本人也来看大字报，阶级斗争那么复杂，为什么不采取行动？你们如果不采取行动的话，我们就要采取行动了！”

刘涛说要请示上级。她马上给王任重那里打了电话，将情况作了汇报，并叫已在那里的乔宗淮、贺鹏飞回来商量怎么办？

乔宗淮、贺鹏飞回来后，和刘涛、刘菊芬、红卫兵总部、清华附中的一些人一起简单商议了一下，决定立即采取强制行动，处理“反中央领导的大字报”，而且对学校的水源、电源，广播台等要害部位都要实施“武装占领”。乔宗淮对这样做当即表示反对，不同意这么干。刘菊芬则坚决要干。在多数人的坚持下，他们还是决定：立即组织中学红卫兵采取行动。他们将这一决定通过常驻清华的王任重秘书作了汇报， 征得了王任重的同意。

中午，“临筹”广播，希望把大字报贴到内部馆。

中午 12 时，他们赶制了专用的红卫兵符号。刘菊芬等人则赶到清华附中红卫兵，要求附中红卫兵协助他们把这批“反动”大字报清

除掉。

下午 14 时，黑压压的自行车聚集在清华附中的大操场上。15 时，又有 10 个中学的红卫兵被清华的汽车拉到清华附中。与此同时，清华附中的大喇叭广播，让对立的“毛泽东主义红卫兵”退出附中，否则责任自负！

清华和附中及外校共 12 校红卫兵在清华附中召开誓师大会。一色的褪色军装，腰扎军用铜头皮带。贺鹏飞为他们作战前动员：“清华有一股妖风，把矛头指向党中央和毛主席。我们要保卫党中央、毛主席，只许左派造反、不许右派翻天！”

同时，他们还派人首先占领校广播台，高音喇叭反复播放《造反歌》：“拿起笔做刀枪，集中火力打黑帮，谁要敢说党不好，马上叫他见阎王！老子革命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要是革命的你就站过来，要是不革命你就滚他妈的蛋！”和“你们不是要‘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吗？那就给你们一身剐！”

下午 16 时，12 个学校的红卫兵 2000 余人，在贺鹏飞、刘涛、刘菊芬等“清华大学红卫兵”的带领下，跑步开进清华园，立刻包围了大字报区，先是宣读《最后通牒》，勒令作者一小时内撕去自己有关中央领导的大字报，移入内部馆。否则后果自负。

正在教室里写大字报的叶志江，听到杀气腾腾的广播声，顿觉来者不善，暗暗告诫自己：“今晚不要大意。这‘一身剐’和‘见阎王’都不是好玩的。”

他匆匆离开教室，骑车在校园里转了一下，看到已经进校的红卫

兵正在展开队形，进入指定的战斗位置。

贺鹏飞看到叶志江，他停下脚步，用手指着叶志江，对身旁的红卫兵说着什么。

叶志江想到他 8 月 20 日曾贴出的那张《肃清原北方局中的黑线》大字报，看贺鹏飞身边的人不多，估计此时他们还不敢把自己怎么样，便示威性地骑车在他们面前画了一个圈，然后扬长而去。

广播里广播《安民告示》，红卫兵开始驱赶看大字报的群众，声称“这些大字报不许看、不许抄”，并强行抢走群众手中的抄录本。有人抗议他们的行为，捍卫自己的权利，毫无疑问，遭到的是一阵拳打脚踢。好汉不吃眼前亏，看大字报的人群很快就被驱散。随后，这些红卫兵对大字报进行拍摄、抄录，记下了大字报的作者。然后便撕去那些揭露、批判刘少奇、邓小平、薄一波、王光美及其他中央领导人的全部大字报。盖之以“只许左派造反，不许右派翻天”，“狗崽子不许翻天”、“无产阶级专政万岁”之类的大标语。

接着，他们又在清华园中游行一圈以表示威。

17时30分左右，清华派出所负责人来到大礼堂前的“指挥部”，说：“家属院中旧社会的残渣余孽很多，应该顺势彻底清理。”

贺鹏飞和刘菊芬让红卫兵总部委员阎淮去了解详情。他来到照澜院派出所，才知道：清华园里大中学的师生2万人，家属3万人；其中戴“地富反坏”帽子的几百人，派出所可随时管教；1还有几百个“残渣余孽”，派出所平时不宜轻举妄动，请红卫兵重点清理。

阎淮回去汇报讨论后，决定晚饭后行动。

下午 18 时，清华大学红卫兵和 12 所学校的红卫兵来到始建于 1909 年的清华大学建校时期修筑的标志性建筑，刻有“水木清华”的汉白玉牌楼，被称作清华大学的二校门周围。

“二校门”是清华大学最早的校门。

清华园是以清朝的皇家园林为基址，原为康熙皇帝的行宫——熙春园的一部分，后被拨做游美肄业馆，即清华学堂。修建校舍时，“乃先支银七千一百七十二两，筑围墙六百五十二丈”。1911 年初，随着围墙的合拢，校门建成，其大拱门的两侧各嵌两根西式立柱，门楣上刻有清末大学士那桐题额的“清华园”三字，古典优雅的校门成为清华大学的标志。

“清华的校门是青砖砌的，涂着洁白的油质，一片缟素的颜色反映着两扇虽设而常开的黑栅栏门。”这是 1915 年就读于清华大学的梁实秋对清华二校门早年的风貌描述。

1933 年，清华大学扩建，修了西校门，原校门便成了“二校门”。

面对晚清要臣那桐的题字，红卫兵群情激奋。他们搭起梯子，找来大锤，爬上去砸掉那桐的题字。

红卫兵正在敲掉“清华园”三个字

还不过瘾，他们又找来汽车，将绳子拴在汽车上，众人齐力，将那么漂亮的牌楼轰然拉到，糅合了东方典雅和罗马古典的清华“二校门”，在众人的欢呼声中，顿时成为一片废墟。

拉倒牌楼后，红卫兵又用皮带驱赶着原校党委的领导刘冰、艾知生、何东昌等人及“大右派”钱伟长、黄万里等“牛鬼蛇神”和学校内的中上层领导干部、“黑帮”分子到现场汗流满面地搬卸二校门的石块，清理这片废墟。

因为他们是“黑帮”，所以他们有的满脸被泼上了墨汁；因为他们是反革命两面派，所以他们有的被剃成了阴阳头。一位蒙古王爷之后，人称“善格尔公主”，在清华园一带拥有不少房产，也被披头散发地拖来批斗。有位中学女红卫兵，一路用皮带抽打一名“反动大学生”，据说其父是上海的基督教牧师，当有人提出要“文斗不要武斗”时，她理直气壮地回答：“是毛主席叫我打的!”

清华大学校园内的甬道上，留下了一滩一滩的血迹。无线电系的教授和干部被打后，血流在地上，还有人在血迹旁画了一个大圈，写上“狗血”两个字。

晚上，这批红卫兵又抄了以批判刘少奇、邓小平为主要任务的“第一红岩”战斗组，并闯入宿舍捉拿“右派”，并勒令一些群众组织解散。

其中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的红卫兵，在清华大学造反后，又来到靠着清华大学的北京大学教工宿舍“燕东园”，抄了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翦伯赞的家，撕毁了他的藏画，查封了他的书籍。

晚20时，清华红卫兵在派出所设立“破四旧指挥部”，阎淮和派出所所长共同负责。各系红卫兵陆续到来，由民警和居委会的大妈指引，到“重点户”去抄家。强调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这次抄家，抄出子弹、刚开刃的刀、北洋军阀中将军服等物品，还有大量解放前出版的“反动书籍”和印有“国民党国旗”的各种证书，及一些金银首饰。 查抄的物品堆满了派出所的几间屋子。午夜前抄家结束。

当晚，清华附中副校长韩家鳌被清华附中的红卫兵拖到清华大学的科学馆。韩家鳌的家住在清华大学校园中荷花池附近，就是中学课本里朱自清的散文《荷塘月色》所写的地方。一公里长的路上，他的鞋子被拖掉了，红卫兵一路走，一路打他，一个红卫兵还把他的头按在地上，用脚踩上，说是要让他“永世不得翻身”，这是引用毛泽东的语录。

韩家鳌被抓走以后，他家的老人和孩子，不知道他被抓到哪里去了，又不见他回来，他们出门看到路上的两滩血，以为韩家鳌已经被打死，只有回家痛哭。

清华附中校长万邦儒也被抓来，红卫兵命令韩家鳌打万邦儒，说“你不打他，我就打你。”清华大学党办主任何介人和宣传部第一副部长林泰两个人也被学生逼着对打……

被揪到科学馆挨打的还有清华大学的负责人刘冰、艾知生等等。他们被逐个叫到一间小房间里挨打。清华大学团委书记张慕葶被架到审讯室，打得呻吟不止。

他们听到有人在喊：“贺鹏飞来视察了！”几个人走出审讯室到楼梯口迎接。被打的这些黑帮则被喝道：“快起来，跪好，低头，手背在身后，头距离地面 15 公分，不能超过 20 公分，也不许顶在地上。快！”

刚刚就绪，贺鹏飞就上来了，他脚踏大皮鞋，手提一条皮带。审讯室的学生向他汇报。贺鹏飞从校党委宣传部副部长罗征启面前走过时，看见他因为支撑不住，已经把头顶在地上，就用皮鞋踩他的头，

并且厉声说："不许顶在地上！"

罗征启被他这么一踩，头上已经结了疤的伤口又滴下许多血。

……

折磨了一夜后，到第二天中午，黑帮们被带回生物馆。从昨晚搬运二校门的垃圾到现在，他们连水都没喝一口，可以说是饥渴交迫。这时由几个学生押解几个黑帮分子到教工食堂取回窝头。黑帮分子们排成一排，一个学生在前面训话："你们要吃饭吗，那就听好，你必须说：'臭黑帮王八蛋兔崽子狗崽子某某某感谢毛主席给饭吃。'听清楚了吗？试一下。"

第一个是钱伟长教授，他说完了那段侮辱性的话语以后，那个学生又喊："你还得加一个'大右派'，重来！"于是钱伟长又来一遍，加了一顶帽子，领了一个窝头，站在原地等候。

"第二个！"

第二个是宣传部副部长罗征启，第三个刘小石，第四个是行政处长李思问……下午，又有学生到生物馆审问这些黑帮，又把他们打了一段……

清华附中的地理教师张葆林，看到同事们这样挨打挨斗甚至自杀，她不知道灾祸什么时候会临到自己头上，于是在自己家里跪在地上，叫她的儿子仿照红卫兵在"斗争会"上的样子打她，说要"练习承受红卫兵的殴打"。她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承受得了那样的拷打和折磨，竟然事先进行"彩排"。

事后，刘涛将清华"824"发生的事情向王任重做了电话汇报，

贺鹏飞也将在清华园拍摄的一些大字报底片交给了王任重。

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其他学校。

这天晚上，北京师范大学红卫兵覆盖了所有攻击刘少奇的大字报。

8 月 24 日这天，北京建工学院等单位的学生冲进建材部，部长赖际发被斗被打。

8 月 24 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欢呼〈新北大〉在斗争中诞生》的社论。说："不把旧北大的那些资产阶级反动势力打倒、打碎，新北大就不可能建立起来"。"要经过大斗争、大批判、大改革"，"把每个学校、每个单位都建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的战斗堡垒"。

清华附中过来一批红卫兵到北大"破四旧"，聂元梓听说后，担心他们会对北大的文物做出破坏性的行为，赶紧在广播中号召北大同学紧急奔赴学校西门，去保卫西门门口的两只石狮子和院里的一对华表。这对华表和天安门金水桥前的那对华表是北京仅存的四个华表。北大师生听到广播后，紧急出动，手拉手把华表围了起来，在那里整整坚守了一下午。由于聂元梓北大校文革的工作，北大的文物在"破四旧"时没有损坏。

但是，"黑帮"和"牛鬼蛇神"就不同了。他们被抄家，没收家产、文物、书籍等，仅北大校内被抄家的就有 536 户。还有人提议改名：临湖轩被改名为"解放院"；燕南园改名为"反修园"；南阁改名为"五二五楼，是为纪念聂元梓等人 5 月 25 日贴出的第一张大字报；俄语系也一度改名为"反修系"。

8 月 24 日这天，梁漱溟旧居小铜井 1 号家里受到了冲击。一群怒气冲冲高呼着“造反有理”口号的红卫兵一脚踹开梁漱溟的家门后，勒令他站到一边。接着，便开始了野蛮的抄家行动。梁漱溟的妻子欲上前劝阻，那些学生举起腰带便打。可怜老妇哪有招架之功，只好抱着头转过身来任他们打得脊背出血。经过一番砸、抄、烧、撕。接着，梁漱溟被拉出去参加斗争大会，跪在主席台上。当他批斗完押回家后，看到的是满目凄凉，杂乱破碎，木器多被砸碎，床也被捣了个稀巴烂。无奈之下，梁漱溟夫妇只得打地铺栖身。而他的先曾祖父、先祖、先父三代历尽战火动荡都没有损坏的两大皮箱画轴册全被焚毁。梁漱溟细细检点，自己的书籍、文稿、信件、笔砚、名章等，也全无踪影。随后，梁漱溟被勒令搬出旧居，同冯友兰一起住进了一间平房。

这天中午，一批外校“红卫兵”和中学“红卫兵”来到北航，封锁大字报区。学院的喇叭里大声广播着：

“一小撮牛鬼蛇神，把矛头指向党中央、毛主席。”

“只许左派造反，不许右派翻天！”

“先看守大字报，限令作者撕去大字报，否则后果自负！”

大概两个小时过后，校园里已是一片狼藉，撕碎的大字报随处可见，有的被粗红笔画得一塌糊涂。

就在当天下午 18 时左右，北航“红卫兵”、6 系（导弹系）学生、李井泉之子李明清贴出他和赖锐锐、王晓东、李洪瑞、刘福曾 5 人署名的大字报：《炮轰……》，全文如下：

首先我们承认落后了，我们是8月18日被我们敬爱的领袖毛主席接见过的红卫兵，我们没有能够勇敢地负起捍卫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红卫兵的光荣职责，头脑中旧的规章、框框、章法多，大无畏的革命造反精神不但不如红卫兵小将们，也不如我院的兄弟战斗队的革命同志们！我们再不能被什么框框、清规戒律约束了，我们要造反，要造反，要造资本主义的反，要造一切资产阶级和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反！

为了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捍卫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本着对革命负责的精神，我们就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某些领导单位存在的一系列做法和行为提出我们的异议。

为了能尽量了解清楚这些问题，我们要提出炮轰……

1.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党中央一直说，这一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的，而且是由伟大领袖亲自领导的等等。但是对于派工作组这个问题却有同志说，毛主席六月份不在北京，不知道这件事情，责任完全由在京的中央常委来负。我们不禁要问：毛主席是我们的伟大领袖，既然运动是他老人家亲自发动的，而且北大的第一张革命的大字报又是经过了长期的筹备，首先又经过他老人家亲自审阅过，对于派工作组的问题难道他老人家会不知道吗？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么我们不禁要问，当时在北京的党中央常委究竟听谁的？又是怎么研究决定的，刘主席、周总理、邓小平总书记等同志都做出了检查，可是把责任承担下来了后，工作组又该担负什么责任呢？没有明确的指示，所以造成了同学们对工作组的问

题意见分歧很大。我们认为这是某些同志应该负责任的。

2.党中央文革小组，对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抓的不力、不全。可以说有偏心，据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北京为重点，而北京又据说以北大、清华为重点。陶铸同志、江青同志、陈伯达同志负责联系北京大学的文化大革命运动，薄一波同志、王光美同志负责联系清华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后来，周总理也插入清华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他们经常到这两个学校做报告，了解一些情况，可以说对这些学校的情况是比较了解的，也可以说就是他们在领导这两学校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可是以张承先为首的北大工作组和叶林为首的清华工作组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都犯了相当严重的方向、路线的错误，难道这些负责同志不知道吗？知道又为什么不及时处理，予以纠正，对于文化大革命应负什么责任？薄一波同志还亲自参加了反蒯的大辩论。如果有人说蒯大富是真正的革命左派，那么薄一波同志又算什么派呢？从文化大革命开始至今中央及文革的一些领导同志经常去北大、清华、人大、师大讲话，而对航院、矿院、地院、钢院等学校一次未来，我们是多么盼望中央的一些负责同志给我们讲话，指导指导我们。在8月18日天安门城楼上我院红卫兵曾经口头上代表航院的全体革命师生员工请江青等同志来我院，江青同志也答应了，可是究竟来不来呢？还是一个疑问。我们要问，难道我们成千上万的学生就不是生力军了，就不值得一提吗？

党中央某些同志就是有“偏心”，大大的“偏心”，老迷信什么“北大”、“清华”、“资格老”，革命传统好，革命干劲大，这本身就是一

种修正主义的东西，如果不改变这种做法，我们就不同意！

革命无罪，造反有理！

革命造反精神万岁！

八月二十四日

大字报一出，立即轰动了北航全院，并且遭到“北航红旗战斗队”的坚决反对。北航“红卫兵”受到众多北航学生的围攻、冲击，危在旦夕。副总参谋长张宗逊的儿子张新陕和徐甘泉、刘克府等人商量，一面写大字报组织反击，一面向周围院校和中学的红卫兵求援。矿院刘歌闻讯后，亲率200多名矿院“红卫兵”列队开进北航，一面唱“鬼见愁”，一面高喊“坚决支持北航红卫兵”等口号，这才暂时稳定了北航“红卫兵”的局势。

据事后的材料揭发说，这张大字报是在贺龙家起草的，当时李明清就住在贺龙家里。

第 144 回：大祭日，龙华寺惨遭毁坏

做规定，上海市“不要抄家”

8 月 24 日，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农垦部的代表，说：“王震功大于过。王震从江西红军开始，到长征过草地，都是拥护毛主席的。从铁道兵到农垦部，也一直是跟着毛主席的。”“王震同志够不上黑帮。”“我讲的这些话是经中央政治局常委讨论，是毛主席决定的。”

从 24 日起，林彪因身体不适，不再参与主持政治局会议，改由周恩来主持中央碰头会。为加强和控制红卫兵的组织以及行动，周恩来指示筹建首都大中学校红卫兵联络总站。

8 月 24 日，北京十几所中学的红卫兵冲进在东单五条的玛利亚方济格修女会，在公安机关的支持下，把“披着宗教外衣从事间谍活动”的 8 名罗马修女驱逐出中国国境……

这天，北京师大女附中“毛泽东主义红卫兵”还给北京市的无业社会青年发出一份《最后通牒》：

社会青年们：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以雷霆万钧之势迅猛发展，现在我们红卫兵已经向四旧发起猛攻了，革命已经革到你们头上了。

过去，在旧市委的纵容下，你们这群白吃人民饭、游手好闲的寄生虫们，贪图安逸、享受，到处为非作歹，扰乱治安，干尽了坏事，为资本主义复辟大开方便之门，这是我们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绝不能容忍的，我们既然要造反，就由不得你们了，我们就是要把火药味搞得

浓浓的，爆破筒、手榴弹一齐向你们投过去，把你们的旧思想、旧习惯打个落花流水，打个稀巴烂，绝不留情。

老子革命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就是基本如此，你们的老子今天被人民专政了，跟他们一样作威作福当老爷是办不到了！要革命的站过来，不革命的滚蛋，反革命的就叫你彻底完蛋。

现在你们唯一的出路就是上山下乡，到广大的工农兵中去，彻底改造，彻底脱胎换骨，重新做人。否则，下一步棋怎么走，就由不得你们了。

最后，勒令你们在72小时之内到劳动局报到，上山下乡不得违令。

你们不革命，我们就坚决革你们的命！

把你们坚决、彻底、干净消灭掉！

不获全胜，绝不收兵！

当天，北京东城区东厂胡同，有6人被红卫兵打死。其中有家住东厂胡同2号的孙琢良和他的妻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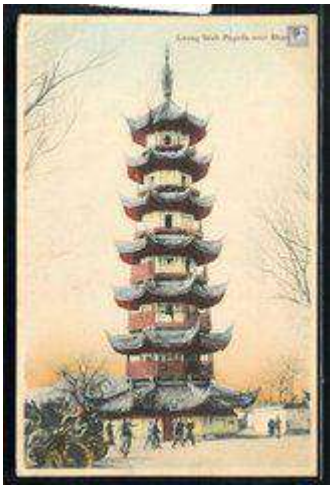
孙琢良是眼镜师，曾经开设一家眼镜商店。

另外还有东厂胡同6号的马大娘，她是帮人作家务挣钱的女工。这天，她看到同院左庆明的妻子，一个被邻里称为“左奶奶”的老人，被绑在葡萄架上毒打，就到胡同口报信，告诉左老先生不要回家。左庆明多年前曾经开有一家卖劈柴的铺子，他得信后逃开了。红卫兵发现马大娘的报信后，把马大娘拉来和左奶奶一起打，甚至提来一桶滚烫的开水，浇烫两位老人，当时左奶奶70来岁，马大娘50来岁。两

位老人凄厉的惨叫声传出院子。邻居们不忍听到，只好关紧窗户。左奶奶和马大娘在凌晨时分被打死，天亮的时候，火葬场的卡车来拉走了他们的尸体。

8 月 24 日这一天，好像是老上海的祭日！始建于三国时期的龙华古寺惨遭浩劫。

龙华塔和龙华寺是一个整体，后来在寺、塔之间造了条马路，就一分为二了。据记载："龙华寺是上海地区历史最久规模最大的古刹。相传三国时，东吴孙权于赤乌五年（公元 242 年）为孝敬其母而建造，并按佛经中弥勒菩萨于龙华树下成佛的记载而名。现存龙华塔为楼阁式七层八面砖木宝塔，高 40.4 米，塔体橙黄，刹杆高耸，其砖身和基础部分，系宋太平兴国二年（公元 977 年）建造时的原物。宝塔各层均飞檐曲栏，姿态雄伟美观，为上海地区至今保存最完美的古塔之一。"



8 月 23 日,社会上破“四旧”运动蔓延至龙华。24 日, 上海红卫兵和群众 1000 多人涌进龙华寺,将寺僧驱赶到一个屋里集中,随即动手毁坏文物、法器、古玩等。大小佛像如小山一样堆在弥勒殿前广场上,僧众被强迫站立在广场桌椅上示众。

学生们接着纵火焚烧了 700 余尊木雕佛像,其中 500 尊罗汉雕塑为沪上所仅有。寺内被誉为“龙华三宝”之一的范金千叶宝莲毗卢遮那佛像,是明万历年间(1573～1619 年)皇帝敕赐。原高 7 尺，莲花座下配有千佛，乃是无价之宝，在红卫兵的一阵棍棒下，成了碎片。而在弥勒殿里供奉的弥勒化身——布袋和尚，被砍下了头颅。

电视台记者闻讯赶到,现场拍摄了大型佛像被套上绳索猛力拉倒

的情景。上海卫生学校的 7 名学生看到龙华寺被砸、烧的惨象,就直言指出:“砸寺是破坏文物古迹,践踏文明的行为。”顿时遭到砸寺者的围攻,学生坚持说理,却被拖至寺里殴打、轰出镇外。

龙华寺内的砸、烧持续了 3 天,众多宗教和艺术珍品毁于一旦。

有一千多年历史的龙华古塔也险遭劫难。

8 月 25 日,一伙人臂带红袖章的红卫兵,聚集到龙华塔下,用粗长的绳索套住塔身,企图将塔拉倒,没有成功。接着他们又准备用汽油焚烧,遭到周围群众的强烈反对才作罢。

27 日午后,塔院门上出现一张署名某校红卫兵的小字报,上写道:“龙华塔也是‘四旧’,我们将采取革命行动,火烧龙华塔,勒令周围居民在近日内搬迁……”

消息迅速传开,引起巨大震动,镇党委、镇人民委员会召开紧急会议,商讨阻止毁塔并保护周围居民生命财产安全的工作。当即派人分头寻找张贴小字报的组织者,并向邻近工厂、学校等单位求援,一齐护塔。很快,一支由镇人民武装部组织的基干民兵队伍首先到达现场,各工厂职工也纷纷前来护塔。傍晚,邻近各大专院校组织的护塔队,

相继汇集龙华镇。其中,上海卫生学校出动百余名学生肩扛木枪护卫塔前。至晚上20时,塔前龙华路一带,护塔者、观望者云集万余人,通道为之阻塞。午夜,未见扬言烧塔者动静,就留下部分人通宵守护。

28日,有人献策:在塔身上凌空悬挂巨幅政治标语作为“护身符”,以遏制毁塔。当天,在塔的南、北、西三面就出现3幅政治标语,从塔顶直悬塔底,使七层古塔获得了有效的“护卫”，古塔方幸免于难。

9月14日,寺内珍藏的明神宗朱翊钧于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敕赐《藏经》718函5048卷,以及清同治年间自京师所领的“江浙所罕有的释教中《藏经》数十部”均被当作废纸,作价每公斤0.12元,售给废品回收站。共重1763公斤(含其他纸品),售价仅211.56元。

《藏经》化作废品去,寺内空剩藏经板。

驰誉海内外的沪城八景之一的“龙华晚钟”,是一口珍贵的铜钟，据说钟声悠扬，可传方圆十里。铜钟和寺内已被砸碎的范金千叶宝莲毗卢遮那佛像,均于9月30日被用气焊切割成铜块后,作价每公斤3元,售予废品回收站。被切割的铜钟重2574公斤,售得废铜价7722元,毗卢遮那铜佛碎块计重334.6公斤,得价1003.8元。600年金铭毁于一旦。

古钟已毁，只能在流行的“南屏晚钟”歌声中，领略一点“龙华晚钟”的风情。

24日这天，同样始建于汉朝的上海静安寺，好几批红卫兵冲进去，推翻供桌，打翻香炉，庙里十八罗汉塑像统统被戴上高帽子，静安古寺前的千年沸井被填没，珍贵的真言宗密坛被捣毁，仅剩下几间

寺屋的静安寺，从此名存实亡。

上海三大名刹中只有玉佛寺幸免于难，玉佛寺的两尊巨大的玉佛，一坐一卧，都是无价国宝。红卫兵学生要冲砸百年名刹玉佛寺，该寺所在的普陀区委领导得悉后，抢先派干部前往玉佛寺进行保护性“查封”，将该寺所藏的唐代以来的经书预先转移至仓库保存。又和寺院僧人及工作人员一起，将玉佛用红纸封住，再将毛泽东的相片贴满佛身。在学生到来后，进行说服工作。整座古寺和寺内佛像以及珍藏的经书大部分得以保存。

而位于玉佛寺边的佛教书局就没有如此幸运了，大量佛经、法物、佛像被红卫兵扔到大街上焚烧，致使江宁路的柏油路面被溶化，檀香木焚烧发出的香气，十里可闻。

曹家渡三官堂的菩萨被扔进苏州河。

佘山天主教大教堂的精美雕刻全被砸烂。

上海师院红卫兵冲进徐汇区天主教大堂，拉倒教堂上哥特式尖顶和顶上的十字架，焚烧宗教用品和书籍，并将神职人员罚跪在大堂中，后又戴上高帽，在徐家汇游街示众。

交通大学的学生冲进上海四川路国际礼拜堂，烧毁了 100 多部《圣经》、几十个耶稣像和一批神职人员用品。钟楼上的钟绳被砍断，圣母像圣徒像被砸坏，教堂彩色玻璃的窗户被打碎，一片狼藉。他们对教堂里的神父大喊：“打倒上帝！打倒洋奴！”

宗教人员遭受侮辱批斗乃至殴打。上海教区主教张家树、上海天主教爱国会副主任陆薇读等 73 位神职人员和上层教徒，被强迫跪在

徐家汇大教堂中，张家树等 8 人被戴上高帽子批斗；佘山大教堂的马神父被打死；杨浦傅家宅天主堂内修女被赶走。红卫兵还要“接管”庙堂或教堂。南市区的大同中学红卫兵接管清心堂基督教堂；卢湾区五爱中学红卫兵接管惠中堂基督教堂。杨浦傅家宅天主堂的修女被赶走。所有的教堂、十字架都被砸，祭坛被毁，圣经被烧。

濒临黄浦江的外滩，解放前是外国势力的活动中心。上海红卫兵无法推倒黄浦江外滩上的洋建筑群，便和大厦的职工一起，将建筑物上的大量雕像砸碎，将外滩市人委门前原汇丰银行留下的两座大铜狮子搬走；中苏友好大厦门前一对显示中苏友好的中苏人像，其中的苏联人像，脑袋被布包裹，身体贴上白纸，上书“反对现代修正主义”；嵌在墙壁上的各种标志和装饰被铲光。黄浦江畔上海海关大楼顶端报时钟，报时音乐被改为歌颂毛泽东的《东方红》旋律。

岳阳路上的普希金铜像，建于 1937 年，1944 年被日本侵略者拆除，1947 年又重建，此次“破四旧”浪潮中第二次被砸毁。

城隍庙豫园内上百年雕花门窗全被捣毁，豫园围墙上瓦片砌成的九条龙被限令一周内拆除。

红卫兵们贴出大字报勒令取消定息。一些私人开业的医生、护士、画家等被勒令停业。黄浦区有开业个体户撕去红卫兵大字报，被红卫兵扭送派出所。

红卫兵还贴出大字报“取消中秋节”，“人民警察改为红卫兵”。

西化生活方式被认为是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咖啡馆、西点馆门口被贴上“中国人不吃西餐”、“打倒外国货”等口号，因为吃西餐是

外来的“西方资产阶级的糜烂生活方式”；著名西餐馆老大昌的高档面包、泰山饮食店的“惯奶油”等都停售。店家收起威士忌、白兰地，并买来筷子代替刀叉。

中餐馆也逃不了被批判：沧浪亭的虾仁面被指“为资产阶级遗老遗少服务”而停售；一些餐馆取消营业员端菜上桌的服务，要顾客自己排队领取所点菜肴。百货行业经售的指甲油、玻璃丝袜、美容剂，与“资产阶级臭美”有关，也都不被允许出售。在一些收入较高的文化人或工商业者聚居的高档住宅区，公寓或弄堂口贴着大字报，限令雇主 24 小时辞退保姆。

供应高级商品的商店决定从 24 日开始，供应价廉物美的大众化商品，以更好地为工农兵群众服务。

银行门口被贴上“取消利息”、“没收千元以上存款”大字报，前往银行提款的客户统统被要求“报成分”，若是“资本家”或“小业主”，当场便被批斗。红卫兵认为“资本家拿定息和高薪是剥削”。

定息是固定息率的股息，是 1956 年“社会主义工商业改造”完成后，国家根据赎买政策给私营资本家和业主核定的私股股额，按期支付给原企业主的。南京路上“老介福”、“协大祥”、“丽华百货”的资方人员被同济大学、复旦附中红卫兵揪出批斗，前胸、后背贴上“剥削无耻”、“取消定息”的大字报，还被逼着当场签名同意“自愿放弃”定息。

私营企业被认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红卫兵说“公私岂能合营”？全市所有公私合营商店、企业，一夜之间全被摘下招牌。私人

业主被强迫歇业。北京西路上有家私人开业的私营妇科诊所，玻璃窗、红木桌椅、处方本，被砸得一片狼藉。画家哈定开设在余庆路上教授绘画的私营画室，玻璃窗、石膏像、画架，全被毁灭性砸烂。

从下午开始，全市出现红卫兵围哄“奇装异服”现象。红卫兵们围绕在交通路口和公共汽车站，凡有穿尖头皮鞋的就责令脱下，赤脚走路。穿着和发型显得“时髦”的就被剪去一刀。马路上那些穿尖头皮鞋，梳大包头、穿瘦腿裤的人个个成为革命对象，穿高跟鞋的被勒令当场扭掉后跟，穿火箭式尖头皮鞋的被当场破尖，穿牛仔裤的被当众从裤管口一直剪到大腿根……

黄昏路灯亮起时，造反的人群仍在街上狂欢，大家喊着各种口号：“不许走资本主义道路！”“公私合营滚蛋！一律国营！”“取消定息”“湖南农民运动万岁！”“红卫兵造反运动万岁！”

16 中学、打浦中学的红卫兵冲进一资本家家中，烧毁藏在家中的楠木棺材。

这股风很快刮到郊区，从 8 月 24 日到 29 日，不到几天，郊区的教堂、庙宇、道观、庵堂、公墓，稍有文化沉积的古物、古建筑，几乎全被砸光，社员家中的神仙祖宗牌位一扫而光。大部分农村人民公社改了名，换上时髦的东方红、红卫、红星之类新名字。

红卫兵还连夜把上海主要干线上的 100 多块巨型广告牌，全部用《毛主席语录》覆盖上。

学校中发生焚烧图书等情况。

从这天开始，上海红卫兵与北京来的红卫兵还掀起了抄家风。夜

色中，约有几十个当天被抄家的所谓“黑五类”，许多是小业主、资本家，还有教师，有老人，有妇女，揪斗后被赶到街头广场上，有的身上脸上流着血，躺着或坐在水泥板地上，低声呻吟着，大都衣衫不整。后来揪斗他们的人陆续散去，各自回去了，一些围观的人，在那里指指点点，大声议论说这个是地主婆，那个是老板娘，那个是胭脂店的老板，那个是小开，即有钱人家的儿子。这些人一定是太恐惧了，揪斗他们的人其实已离去，他们可以各自回家去了，但他们显然不敢，还不知所措地哆嗦在昏暗的街头广场上。他们的恐惧心态也影响了许多围观的群众。

8 月 24 日，上海市委书记处连夜开会，做出 10 条规定，第一个内容便是“不要抄家”，此外还有不要破坏公物，不要破坏文物，不要去搞外侨，不要在马路上强迫脱鞋子、脱裤子，不要随便拦汽车，允许市民乘坐三轮车，不要破坏建筑物，不要烧图书，不要烧档案，保护图书等等，电话通知各区、县、局党委宣传贯彻。

第 145 回：天津卫，欲铲尽殖民痕迹

飞峰麓，灵隐寺阵阵告急

在天津市，更改带有所谓“封、资、修”色彩地名的行动早在 6 月初就已露出端倪。6 月 6 日，已有部分学生去皇后理发店、周家食堂和森记稻香村贴大字报要求更改店名。7 月 7 日，天津市建设局在《关于更改我市部分街道里巷名称的意见〈草稿〉》中称：全市有 180 条街道、355 条里巷名称需要更改。计：“带有封建迷信色彩的街道 143 条，里巷 209 条，带有帝国主义殖民地色彩的街道 2 条，里巷 15 条，以资本家和反动人物命名的街道 4 条，里巷 41 条；带有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街道 11 条，里巷 31 条，其他需要更改的街道 20 条，里巷 59 条。天津市市长联合办公室决定将此文件下发群众讨论然后研究是否更改。

7 月 22 日，天津市同意将太平影院改成“火花影院”，东亚影院改成“东升影院”，奥斯科影院改成“向阳影院”，天宫影院改成“大众影院”，极乐影院改成“长虹影院”，天华影剧院改成“红光剧场”，兴北剧场改成“红桥剧场”，共和剧场改成“南市剧场”，聚华剧场改成“劳动剧场”。

8 月 20 日以后，天津市的商业中心区滨江道一带，整天锣鼓喧天，鞭炮齐鸣，许多商店在欢呼声中更换了老字号。

8 月 23 日，天津市各学校的红卫兵纷纷走上街头，散发和张贴传单、标语、大字报，沿街进行演说，更改道路和商店的名称。刹时间，横扫“四旧”遍及全市。

23 日，天津市最大的商场——劝业场的职工，抡起榔头，砸碎了嵌在墙上达 38 年之久的“劝业场”三个字，换上了“人民商场”的新名称。这时聚集在商场周围数以千计的人民群众，齐声高呼：“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中原公司专设接待站，征求群众对更改名称的意见，最后改名为“工农兵商场”。

具有 45 年历史的天津北洋纱厂 23 日晚集会，决定把在北洋军阀时代建立的北洋纱厂，改名为“四新纱厂”。他们还把工厂原来的“金三鼎”棉纱商标，改为“工农”牌商标。

天津人民歌舞剧院改成“东方红歌舞剧院”，宁园公园改名为“二七公园”。

一些中学纷纷更改名称，如井冈山中学、东方红军校、抗大天津附中、革命附中等。毛泽东曾到过的天津正阳春饭庄也以毛泽东 1958 年 8 月 13 日莅临饭庄的日子为名改“八一三食堂”。天津市所辖的和平区改为“战斗区”，河北区改为“卫东区”，河西区改为“红旗区”，南开区改为“东方红区”，红桥区改为“红卫区”。就连天津市也被学生改为卫东市……

几天之间，全市 4000 多个百货、副食品商店门市部，基本上都换了“富有革命意义”的新店名。

这天，天津市发出通知，暂停支付资本家的定息和千元以上存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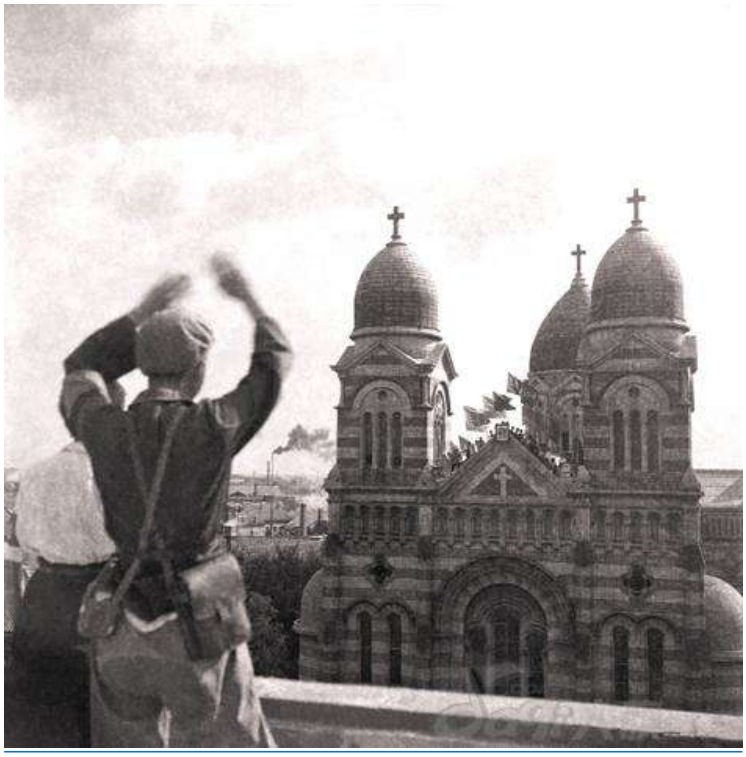
在红卫兵督促下，塘沽海关的职工把大沿帽、关徽、臂章、铜纽扣，统统视为帝国主义旧海关的标志，取下销毁。

天津红卫兵查封了开滦煤矿驻津机构——滦州矿务公司董事会。董事会 8 名高级职员均被抄家，除留下 3 名在本单位劳动，每月发给 15 至 30 元生活费外，其余人员均停发薪金或退休金。

8 月 23 日，天津二十一中的红卫兵在和平区大教堂门前贴出一张大字报，要和主教辩论有没有上帝。

大教堂位于墙子河边，和天津最大的商场劝业场遥遥相望。1969 年，墙子河改建地铁，上面建成了现在的南京路。据说大教堂是全国最大的天主教堂，因建在当年的法租界内，天津的老百姓都习惯地称之为法国大教堂。二十一中就位于教堂的对面，所以教堂的“破四旧”被他们捷足先登了。

红卫兵抄了大教堂，将抄出的东西堆在台阶前的空地上，像小山似的。教堂的两边刷上了几条醒目的大标语：炮轰黑教堂，棒打旧思想。横批：摧枯拉朽。教堂正门的上方挂了两幅毛泽东画像。许多带着红卫兵袖章的中学生在教堂顶层挥动着红旗，其中一面红旗上，印着三个金灿灿的毛体字：“红卫兵”。那情景就像在电影中看到的苏联红军攻克柏林一样。



红卫兵开始在教堂前焚烧圣物，烟雾腾腾，火焰冲天。其中有一尊圣像还没烧毁。一个红卫兵找来一把斧子，挥斧就劈。

接着在教堂前的街道上开批斗会，主席台是临时用乒乓球桌搭的，教堂的主教身披圣服弯腰站在上面。右前方摆了几张桌子，上面站着两位陪斗的副主教。主会场是前来声援的各校的红卫兵，四周站满了围观的群众，就连树上、电线杆上、墙头上、房顶上都爬满了人。

主教自己跪在台前，低头认罪，并承认："没有什么天堂、上帝，就是为了迷惑人民。"

8月24日，随着"破四旧"的活动，抄家之风在天津市开始兴起。从25日到9月12日形成高潮。抄家过程中，出现了批斗、打人、挂牌子和戴高帽子游街的动乱场面，有些地方还出现打死人的惨状。

8月25日，天津红卫兵纷纷贴出《通牒》、《命令》、《通知》，要求停止出售烟酒。和平区、南开区烟酒零售点全部停售，其他区也纷纷

停售烟酒。劝业场停销商品达582个品种，占全部经营品种的10%左右。

8月25日，新华社报道：天津革命小将和商业职工向剥削阶级“四旧”发动总攻，挥起革命铁扫帚 横扫一切旧习俗。

8 月 23 日，不甘示弱的杭州红卫兵，也雄赳赳，气昂昂，全副“武装”走上街头，向“封、资、修”的所有目标开战。杭州市以宋代封建文人苏东坡的名字命名的东坡剧院、东坡路、西湖苏堤，都换上了具有革命意义的名称。6 家以“张小泉”这个旧店主的名字作为招牌、并且一直沿用了 300 多年的剪刀店，都换上了“杭州剪刀店”新店名。

西泠桥旁的国家重点保护文物苏小小墓被扒平；乾隆皇帝御笔手书的“西湖十景”平湖秋月石碑被砸烂……

名胜古迹和受国家保护的历史文物中，第一个遭殃的是建于公元 1245 年，隐于茂林修竹之中的黄龙洞。那个象征 700 年前给久晴未雨干旱的杭州带来甘露的黄龙龙头塑像——“滴水龙头”，在红卫兵一阵猛烈的棍棒下分崩离析，葬入深潭之中。接着遭殃的是毫无设防的“净寺”……

杭州大学的个别红卫兵不甘落后，企图一鸣惊人，他们把矛头直指“岳王庙”。一张历数岳飞镇压农民起义等数条罪行的“声讨檄文”张贴在岳王庙的朱色围墙上，在一片呐喊声中红卫兵开始扫荡整个岳庙。出自历代名家之手的抱柱楹联和匾额纷纷被摘下砸烂或劈为薪柴。连“精忠报国”、“还我河山”等匾额和“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等楹联也未能幸免于难。红缨帅盔，紫袍金甲，足

履武靴,其神态英武逼人的岳飞坐像则用绳索套住拉翻在地。转眼间，岳王庙大殿里面一片狼藉，惨不忍睹。

由于这些红卫兵手头没有适当的工具，他们对岳王庙里的石碑、石人、石马等无法下手，最终让这些珍贵文物逃过一劫，后来被岳王庙内工作人员深埋地下才得以保存下来。

可能是因为时间过于仓促，岳飞和其子岳云的墓葬也未来得及破坏，红卫兵便匆匆离去。

岳王庙被砸，在当时的杭州城引起不小的震动。因为岳飞的功绩彪炳千古，他的英雄形象早已经根植于天下百姓的心中。但鉴于当时的政治环境，虽然许多人愤愤不平，但还拿不准是对是错，尚不敢多言。

在对待“名胜古迹是否属于四旧”这个问题上，浙江大学的学子们似乎比其他院校的学生们多几分冷静和思考。

8 月 23 日晚上，浙江大学机械系铸造专业六二年级一班住校的学生主动集聚在一起，认真地倾听几个杭州籍同学介绍红卫兵在杭州城内破四旧的情况。当听到黄龙洞被砸，净寺被砸，岳王庙被砸的消息后，会场先是一片沉寂。接着有人分析，破四旧下一个目标一定会是“灵隐寺”。会场内的气氛变得紧张起来。接下来大家就“灵隐寺究竟是不是四旧”进行了激烈的争论。最后一致认为：“尽管灵隐寺内有许多是属于‘四旧’的东西，但是就灵隐寺整体而言，它是劳动人民的智慧结晶，是人类文化艺术宝库中的瑰宝，我们没有理由，也无权轻率地将它毁坏。”最后有几位同学自告奋勇，决定明早先到远

离学校的灵隐寺看看再说。

第二天，8 月 24 日清早，杭州籍的周城镐和平阳籍的林成孚两位同学步行穿越玉泉旁的杭州植物园向灵隐寺出发，他们在灵隐路洪春桥站搭上开往灵隐寺的 7 路公共汽车直达灵隐寺。

清晨的灵隐寺没有一个游人，气势恢宏的殿宇正沉浸在一片淡淡的晨雾之中，泉水的淙淙声和鸟儿的啁啾声把环境衬托得更加幽静。灵隐寺对即将降临的大祸毫无警觉和防备，这里的黎明静悄悄。灵隐寺内的大部分和尚在文革一开始就已经被遣散，仅留下几个体弱的老僧守门，灵隐寺早就成了空寂的寺院。

天王殿是灵隐寺山门内第一重殿，此时正门紧闭，只有东西两边的侧门依旧洞开。周城镐、林成孚两位同学经侧门穿过天王殿，直奔大雄宝殿。巍巍的大雄宝殿，重建于清光绪末年，属单层三重檐式的建筑艺术风格，是中国寺院建筑中极有价值的历史遗产。只见大雄宝殿内没有香火，没有烛光，往日信众香客如云，烟火缭绕的景象荡然无存，大殿里面阴暗、冷清得近乎阴森。

坐在三层莲花花瓣之上的释迦牟尼佛姿势依旧，左手放在左腿上，作“禅定印”；右手微举，拇指与中指成环形，作“说法印”。

尽管佛陀周围的二十诸天、四大天王等众神和众菩萨从古至今一直摆着各种保护佛陀的架势，形似威武神勇，威风八面，可是此时在周城镐、林成孚两同学看来，他们那些举止不过是虚张声势的花架子罢了。

他们二人走出大雄宝殿重新进入天王殿，忽然感到天王殿内的气

氛与原先有些不同。放眼看去，猛然发现有三、四名中学生模样的年轻人在殿内转悠，其中一个人手执长棍东敲西击。一个远离他们站着的老僧，用疑惑和惊恐的目光盯着这几位不速之客的一举一动。周城镐、林成孚两同学从那几位中学生的举止判断，他们肯定不是来此游玩。突然，他们意识到这几个人很有可能是前来打探的红卫兵探哨。

就在周城镐、林成孚两同学走出天王殿时，远见从灵隐寺山门外壑雷亭方向走来一队中学生红卫兵，约 20 人。他们身穿军装，腰束皮带，个个显得器宇轩昂、神采飞扬。他们在天王殿前的台阶下列队停下。此时，人们终于看清了，队伍中有的人拿着棍棒，有的人拿着铁锨，还有的人拿着绳索。这些红卫兵来砸殿是毫无疑问的了。当时，这支小分队并没有动手，像是在等待后面大部队的到来。

力量上的悬殊是显而易见的，周城镐、林成孚二人心急如焚。就在这紧急关头，他们忽然看见从壑雷亭方向疾步跑来一队人马。定睛一看，居然是浙江大学的学生，其中大部分是周城镐、林成孚“铸造 62—1 班”的同学，这令他俩大喜过望。

跑步前进的后来者中有人高声喊道：“同学们，赶紧把通向大殿内的侧门关上！”立刻有七、八个同学直奔天王殿东、西两侧的入口处，拉上原先隐藏在墙后的两扇坚固的铁栅栏门。此时，不知从哪里冒出几个行动巍巍颤颤的老和尚，忙不迭地给同学们递上两把沉沉的大铁锁。就是那一声振聋发聩的叫喊，大殿才有了坚固的设防，暂时把破坏者们阻挡在大殿的外边。

意想不到的情景发生了。只见那几位老和尚双手合十，嘴里嘟嘟

哝哝地说道："阿弥陀佛，你们真是佛祖派来的天兵天将，唯你们才能够救大殿呀！"

列队在大殿台阶下的中学红卫兵们目击大学生们闪电般的动作，先是一愣。当他们意识到是怎么回事时，天王殿的所有入口都已经被挡死了，想闯入大殿已经不是那么轻而易举的事了。中学生的队伍开始骚动起来，他们准备向大殿发起冲击。此时，大学生们也不由自主地汇聚在一起，在天王殿"云林禅寺"大匾额下的台阶上列成一排，大家手牵着手，筑成一道"人墙"，阻挡中学生的冲击。

浙江大学学子们的举动令这批在社会上冲冲杀杀，从未受到过阻拦，一直所向披靡的中学小将们大吃一惊。他们没有想到，居然还有给革命小将的革命行动挡道的势力？当他们知道阻挡他们行动的对手是浙江大学的大学生时，红卫兵的阵脚有些慌乱了。因为，浙江大学师生的革命激情和气势那时可是闻名杭城，在学生界中享有很高的威信。加上大学生无论在个头和身体素质上都远远胜过这些中学生，中学生始终没有能够突破这道人体构筑的"护墙"。双方处于僵持不下的状态。

守护在天王殿外的浙江大学的学生们心中明白，要是中学生红卫兵的大队人马来了，这堵"人墙"将不堪一击。有人提议，应该尽快到学校搬救兵。派人回学校显然不行，因为路途太遥远。要是附近有电话该多好，大家都这么想。询问和尚，灵隐寺内怎么会有电话？

"我带你们去找电话！"从"人墙"旁边传来语气十分坚定的声音。大家扭头一看，说话者是一个工人装扮的中年人，约莫 30 来岁。

原来他一直站在旁边关注着双方发生的冲突。中年人带领 4、5 个浙大学生来到寺院西南角二楼的一间办公室内，这里有一架式样陈旧的摇柄电话机，这里就是灵隐寺的园林管理处，这位中年人是在此值班的园林工人。

面对电话机，领头的同学却有点不知所措。这个电话应该打给谁？校党委办公室和校长办公室早处于瘫痪状态，即便有人接听电话也无法对全体师生做出决定。他们商量了一下，决定还是试着给学校广播台打电话，求助广播台把发生在灵隐寺这边的紧急情况向全校广播，就说灵隐寺告急，希望广大革命师生紧急支援。

话分两头说。就在浙江大学的几个学生去打电话时，台阶下的中学生认为有机可乘，再一次发起冲击。眼看着双方就会发生严重的肢体冲突，不知是谁突然带领大家连声喊出：

“我们要辩论！”

“我们要辩论！”

口号声居然吓退了中学生的进攻，因为当时实行的就是大民主、大辩论，谁也不敢反对。

面对着对手突如其来的一招，“要辩论？辩什么呢？”中学红卫兵们不知所措。他们停止了冲击，双方又继续保持对峙状态。

第 146 回：传指示，北京电一锤定音　冒风险，王市长隐匿“第三”

再说浙江大学广播电台值班室接到护卫灵隐寺的校友们打来的电话后，二话没说立即通知一位男播音员播放这条消息。在“大海航行靠舵手”的开始曲过后，浙大广播电台轮番播出“灵隐寺告急”的通告。……人们聚集到高音喇叭的底下，收听广播音。此时此刻，已经有不少的同学开始朝着学校大门口方向奔跑了。一瞬间，这支队伍迅速膨胀，变得越来越庞大，它像汹涌的洪流急速地朝着目的地——灵隐寺奔腾而去。这是一支散乱的、衣冠不整的队伍。队伍中穿背心裤衩的有，趿拉着鞋子或拖鞋的有，甚至光着膀子，连衣服都来不及穿的也有……

盛夏的杭州天气热得像蒸笼，奔跑中的同学们挥汗如雨，可是谁也顾不了那么多，只顾拼命地朝前奔跑。当队伍抄近上了灵隐路，刚好与中学生红卫兵大部队相遇。只见红卫兵大部队沿着弯曲的道路迤逦而行，一眼望不到尾。但是队伍行进的速度比较缓慢，也没有先头部队那样的杀气腾腾。也许是他们从杭州城里出发，一路走来身体疲乏；另外他们几乎人人都扛着砸寺庙的工具——镢头、铁锨、棍棒和绳索

大学生的队伍不断地超越中学生红卫兵的队伍，抢在先头。带领中学生红卫兵大部队的首领们急了，他们不断鼓噪着，催促红卫兵们跑步前进。霎时间，灵隐路出现了相似万人马拉松比赛的场景，大家争先恐后，都想最早到达目的地。

守护在天王殿台阶上的浙江大学同学们终于盼到“救兵”的到

来。当看到支援的校友们像潮水般涌进灵隐寺的山门时，已经与红卫兵小将们对峙数小时的同学们按捺不住心头的喜悦，振臂齐声高呼革命口号，并向“救兵”热烈鼓掌，许多同学还眼含激动的泪水。只见新到的大学友们大汗淋漓，连气都没有喘定，就忙不迭地接替原来守卫的同学。里三层，外三层，把整个大殿包围的严严实实，此时的大殿已经成了再也攻打不破的铁桶江山。

不一会儿，中学生红卫兵的大部队也到达灵隐寺。浙江大学的师生们没有等他们站稳脚跟，便用小分队的形式穿插到红卫兵大部队中去，把本是整体的队伍分割得七零八落。十几个大学生包围 4、5 个中学生，主动与他们开展辩论。从天王殿前一直到春淙亭的道路上尽是东一堆，西一堆的辩论人群。这支本来要到灵隐寺破四旧的红卫兵大部队，就这样被浙江大学的师生们“化整为零”。而且所有的红卫兵还要应付辩论，其战斗力几乎被彻底瓦解，冲击灵隐寺的行动再也无法组织起来。但是形势严峻，双方的对立情绪十分激烈，冲突一触即发。

灵隐寺发生的学生严重对峙的消息传到了省、市政府，当天下午，省政府副秘书长兼交际处处长赵士炘和杭州市副市长顾春林来到灵隐寺处理此事。此时的灵隐寺前边的空地和道路上早已是人山人海了，保护灵隐寺和砸烂灵隐寺的两派学生群情激昂，双方唇枪舌战激烈地辩论着，间或还有骂架动粗的场面出现。

为了避免因秩序混乱发生严重的群众冲突，赵士炘、顾春林两人决定召集浙江大学学生代表和中学生红卫兵代表在天王殿对面的冷

泉亭协商解决双方争端，同时传达省市政府关于保存灵隐名胜古迹的几点意见。

由于双方观点针锋相对，分歧很大，加上双方又各执己见，无法达成妥协。而省、市政府关于保存灵隐寺的意见又遭到中学生红卫兵的坚决反对，协调会出现僵局。

赵士炘副市长再一次请示省委有关领导后，得到指示：由他于当晚就灵隐寺留和去的问题请示国务院总理值班室，请国务院作最后定夺。浙江省委还要求，在接到国务院答复之前，对立双方都必须保持克制，停止一切过激的行动。

省委的这个决定得到与会代表的一致同意，双方代表各自回去传达精神。现场乱糟糟的局面终于得到了控制，激烈而紧张的气氛暂时得到缓解。

天色渐渐黑了下来，由于中学生红卫兵毫无撤退的意思，浙江大学师生决定晚上继续坚守阵地。但是，在灵隐寺守卫了一天，在场的人都感到疲惫不堪。就在大家感到为难的时刻，灵隐寺周边的村庄自发组织一批青壮年贫下中农，加上灵隐寺园林管理处的部分职工，前来支援守护灵隐寺的大学生们。这支队伍不仅身体健壮，而且武器装备“精良”——锄头、铁锨、扁担、竹篙等应有尽有。他们熟悉当地地形，对灵隐寺山前山后的所有通道入口处都派人守候，防止有人夜晚偷袭。他们对守护大殿的浙大学生们说：“你们是对的，我们全力支持你们。”

到了深夜，飞来峰山下的暑气一扫而光，凉飕飕的山风吹得守夜

人抖抖索索。许多浙大学生还身穿背心，怎抵得住这股从山谷中吹来的冷风？园林工人折回原地，拿来帆布工作服分发给同学们挡寒。有了当地农民和园林工人们的支持，灵隐寺终于平安地度过了第一个夜晚。

从灵隐寺换岗下来的浙江大学学生胡庆国、徐景崧、王定吾等同学，回到学校后顾不上休息，连忙筹划向杭州市民散发保护灵隐寺的《告全市人民书》。

《告全市人民书》由胡庆国同学起草，通篇文稿文字激扬，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慷慨激昂，充分表达了莘莘学子们爱护祖国历史文物的拳拳之心。文稿一经大家通过，徐景崧同学就在寝室中把这份《告全市人民书》刻在蜡纸上。此时，王定吾同学已经弄来各种彩色的纸张和一部手推油印机。几乎全班所有的同学都来了，裁纸的裁纸，推油印机的推油印机。

到了 23 日下午 4、5 点钟，数千张《告全市人民书》印刷完毕。以陈瑞生、张同义为首的几位家住杭州城内的同学，自告奋勇承担了到杭州市内散发《告全市人民书》的任务。自文化革命开始，杭州出现的第一份《告全市人民书》就这样诞生了。

同学们兵分三路，一路沿着岳坟、平湖秋月、白堤、六公园、湖滨路、解放街、中山中路……散发张贴；另一路到杭州各大专院校张贴和散放；还有一路到几个中央在杭企业如：杭州钢铁厂、杭州制氧机厂、杭州重型机器厂、杭州棉纺厂等工厂去散发传单。

这份看似粗糙而简朴的油印《告全市人民书》，犹如一颗炸弹在

杭城“爆炸”了，在广大市民以及企事业单位中引起很大的震动。本来就对砸岳飞墓不满的市民，终于在大学生中找到了知音，于是，整个杭州的街头巷尾大字报铺天盖地，群众纷纷起来谴责部分红卫兵鲁莽、无知的行为，表示坚决支持浙江大学师生保护灵隐寺的行动。居民委员会中的居民们也行动起来，纷纷管教自己的子女，要他们立即收手，千万不要做出伤天害理的蠢事。

一时间，在保护灵隐寺这件大事上，整个杭州城里的舆论是一边倒的，完全倒向浙江大学师生一边。这样的局面显然给要砸灵隐寺的那些人很大的精神压力。

就在当天晚上和夜里，声援浙江大学保护灵隐寺的大字报贴满了灵隐寺的整个山墙。杭州钢铁厂工人们的声援行动显得更加惊心动魄，他们把一条写有“誓保灵隐”四个大字的条幅从天王殿东侧的大树上挂下，每个字长达 1.5 平米。这一巨大无比的条幅仿佛是从天上一泻而下的瀑布，把保卫灵隐寺的整个场面烘托得更加宏伟壮观。电业工人赶着在寺前的道路上和后山上拉起临时电线，装上照明电灯，道路和寺前的场地一片通明；不知道是哪个单位给守护大殿的学生送来馒头、烧饼、饼干等食品……

第二天一早，市里多个单位的群众，在红旗的招引下，步伐整齐进入灵隐寺声援浙大师生保护灵隐寺的行动。其中红旗上写着“浙鲁美红战队”字样的大学生队伍引人注目。原来所谓“浙鲁美”是“浙江鲁迅美术学院”的简称。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浙江美术学院的师生就把校名改称“浙江鲁迅美术学院”了。有了浙江美术学院革命师生

的加盟，使大学生辩方的论据更加充分有力。因为1953年国务院决定重修灵隐寺院时，那座重新塑造的，妙相庄严的释迦牟尼佛像就是浙江美术学院的师生共同精心设计和监督施工的。当时浙江美术学院的名称是：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浙美院的师生们为灵隐寺的重修曾立下汗马功劳，对灵隐寺的建筑和内部珍贵艺术品的修复和重建倾注了太多的心血和情感。而且他们对灵隐寺的艺术价值和历史价值比浙大师生懂得更多。

8月25日，在浙江大学铸造62—1班级几位同学倡议下，由浙江大学学生会牵头，通过各系学生会组织学生轮流到灵隐寺守护，使得灵隐寺的守护工作有条不紊地延续下去，也避免了部分同学因长期守护而精疲力竭。灵隐寺在众人的终日守护下，终于度过了两个平安夜。

可是，8月26日晚23时左右，摆放在机械系学生宿舍2001室门口的电话分机急促的铃声吵醒了睡在走廊上的同学们。第一个伸手接电话的恰巧又是周城镐同学。只听见电话总机那头一位女话务员紧张而急促地说，接到外线不明身份人的电话，有一批杭州第四中学的红卫兵正集结队伍向灵隐寺进发……周城镐同学睡意顿消，立即拨通学校广播台，把这个消息通知值班的广播人员。

顷刻，校园内的高音喇叭骤然响起。还是那首“大海航行靠舵手”的开始曲，像号角般吹响，随后便是一遍又一遍地广播“灵隐寺又告急”的消息。瞬间，只见全校各个学生宿舍寝室的电灯接二连三地亮起来，校园里的人声越来越嘈杂，大队人马又开始向校门口拥去。

可能是接受第一次保护灵隐寺的经验教训，学校和市政府提前作了准备，在校门口事先预备好了一些应急的交通工具——学校交通车、敞篷卡车，还有几部保护灵隐寺专用的公交车。司机们早已经进入驾驶室，汽车的发动机也已经发动起来了。率先到达学校大门口的同学们纷纷登上各种汽车。汽车发出一阵阵轰鸣声，然后风驰电掣般地向灵隐寺方向飞驰而去。大部分没有能够搭上汽车的同学依旧跑步前去，遍地是涌动的人群，人声鼎沸，打破了玉泉和植物园一带深夜的寂静。

先期到达的同学们迅速地在“天外天饭店”前的道路上构筑一道防线，后来者不断对这道防线加以充实。从“天外天饭店”到灵隐寺山门口的“咫尺西天”大照壁被学生们堵得严严实实，严阵以待破坏者的到来。

这一回来的是中学生红卫兵中的狂热分子，他们一边行进，一边高喊口号：“浙大保皇派！”、“浙大是保佛派！”、“浙大是‘四旧’的卫道士！”……然后他们开始冲击大学生组成的防线。面对大学生的人墙，中学红卫兵的进攻无效，他们前进不了半步。

令人奇怪的是，大家居然没有见到这批破坏者携带打砸工具。有细心人发现他们当中有人带有数只铁桶。于是，马上有人联想到，铁桶内可能装有燃油。因为事先曾听见中学生红卫兵中有人扬言，打砸不成灵隐寺，就火烧灵隐寺。

守护的浙江大学师生们被激怒了，一场争夺铁桶的严重冲突终于爆发。混战中，破坏者手中的几只铁桶全部被大学生们夺了下来，一打开桶盖，一股浓烈呛鼻的煤油味喷射而出。桶里装的果然是煤油。

中学生撤走之后，一部分浙大师生返回学校，但仍有许多师生继续留下，他们一直坚持到第二天天亮，才陆续返回学校。

随后的数天里，灵隐寺的场地上白天总是熙熙攘攘，两派观点的学生，甚至群众仍然在现场激烈地争论着。到了夜晚，人群渐渐散去，仍有部分人坚守在灵隐寺大殿的四周。

8 月 27 日，总理办公室主任童小鹏给浙江省委办公厅来电话，传达周恩来关于保护灵隐寺的指示。浙江省委秘书萧贻接电话后当场记录，马上向省委常委作了汇报。随后，童小鹏又书面回函证实，他是根据周恩来总理的指示在中央办公厅给浙江省委办公厅打的电话，要求省委领导对红卫兵做好说服工作。在接到周恩来的指示后，浙江省委当即组织省市机关干部前往灵隐寺传达周恩来总理指示。

当晚，在天王殿前冷泉亭附近的一块大岩石旁边临时搭建一个小台子，一盏高高悬挂在树上的汽灯把周边的场地照得透亮。在灵隐寺现场的群众早早地被吸引到这里，只见大岩石四周人头攒动，大家翘首以待省市领导传达周恩来总理的指示。

不一会儿，杭州市市长王子达，一个个子矮矮小小的小老头到达现场，他登上临时的小讲台，当众宣读来自北京的国务院总理值班室电话记录。现场的扩音设施不太好，王子达市长看着手上的稿子，尽量提高嗓门，用略微有些颤抖的声音念道：

“8 月 27 日北京国务院总理办公室来电，第一，希望革命的小将们要摆事实，讲道理，不要为灵隐寺的问题发生冲突；第二，灵隐寺是国家重点保护文物，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是劳动人民的智慧结

晶。在国际上，尤其在东南亚地区灵隐寺享有很高的声誉。希望能够保留下来……”

未等王子达市长传达完毕，全场早已经响起雷鸣般的掌声。“毛主席万岁！”、“毛主席革命路线胜利万岁！”、“坚决拥护国务院总理办公室的重要指示！”等口号响彻云霄。口号声淹没了王子达市长的声音，以至于他下面传达的另外几条指示的内容几乎没有人听清。因为大家认为，只要周恩来总理说灵隐寺要保护这一句话就够了，其他的话语都是多余的。

现场一片欢腾。守护灵隐寺的浙大师生和其他群众奔走相告，欣喜万分。而那些赶来砸寺庙的红卫兵们则像被秋霜打杀了的茄子，萎蔫了。

灵隐寺事件平静下来的一周后，当浙江大学机械系派出学生代表到杭州市政府约见王子达市长商量保护灵隐寺的续后工作时，大家才知道，王市长当时在灵隐寺宣读周恩来总理电话指示时，刚宣布完第二条，就被现场雷鸣般的掌声和喧腾的口号声打断了，纪录稿的最后一条指示没有向现场的群众传达。

这可是事关灵隐寺存亡命运的一条指示呀！也是可能会重新挑起两派群众争斗的一条指示。这条指示的大概意思如下：要爱护革命小将们的革命积极性，要是大家一致同意砸掉菩萨佛像，那就砸掉算了。

王市长把这一条指示隐瞒不宣布，在当时的政治形势下是要承担严重的政治风险的，难道这是他个人的胆识吗？不完全是。是群众，是广大杭州市民以及现场的成千上万的浙大师生和来这里声援的各

界革命群众给这位个子瘦小的市长壮了胆。有了那么多的群众支持，王市长才有那样的胆量。这就是人心向背的力量！

8 月 28 日，总理办公室的指示不胫而走，很快就传遍整个杭州城，社会上的舆论更加倒向保护灵隐寺的浙大师生一边，中学生红卫兵陷入完全孤立的境地。迫于来自各方的压力，中学生红卫兵决定全面撤退，全部一个不留地撤出灵隐寺场区。

当中学生红卫兵列队掉转方向开始撤退时，有足智多谋者突然振臂高呼："向中学生红卫兵学习！向中学生红卫兵致敬！热烈欢送红卫兵小将！"。现场的人开始一怔，后来大家似乎突然明白个中的玄机。于是跟着领呼者一起喊起口号，而且还伴以热烈的掌声。此时此刻的口号声和掌声是真诚的，没有丝毫讥讽或嘲弄的成分。不是吗，在当时的政治形势下，放下"武器"不砸灵隐寺，就是一种觉悟，理应受到大家的欢迎和尊敬。尽管中学生们在破四旧中表现出疯狂和无知，但是他们毕竟是无辜的，他们是被愚弄的受害者。

热烈的欢送场面显然感染了撤退中的红卫兵，他们的精神似乎也振奋了许多，沮丧的脸上终于露出略显尴尬的笑容，但是却是愉快的。中学生红卫兵大部队终于体面地退出灵隐寺现场。

随着大串连的开始，破四旧的风潮暂时偃旗息鼓，灵隐寺以及飞来峰造像等真正得到安定和平静。

趁此间隙，杭州市政府对外发布公告，宣布灵隐寺以及整个灵隐景区包括飞来峰造像等从即日起全部封闭，停止对外开放。杭州市园林管理局组织建筑施工队伍进入灵隐寺，夜以继日地施工，迅速地用

砖头、石灰把灵隐寺内的所有大殿严严实实地封闭起来，当时西泠印社岳飞等人手书真迹碑刻也都效仿这种方法才得以保护下来。当建筑工人封上最后一块砖头时，在场的众老和尚都深深地、如释重负地嘘了一口气。从此后，释迦牟尼佛陀和众神、众菩萨将不再受到尘界的惊吓和烦扰了，可以安静生息了。

第 147 回：法门寺，千年七音碑砸毁　火冲天，良卿护佛宝自焚

在“破四旧”的高潮中，内蒙古的广化寺、圆会寺、庆州白塔等多座古建筑被砸毁或遭严重破坏。

吉林延边的老龙沟、龙井、八道等多个教堂被毁。

著名的佛教古寺湖南南岳遭到严重的破坏。15 座寺庙中自唐以来铸塑的 479 尊佛像、395 尊菩萨、649 尊罗汉和珍藏了千年之久的 54 部藏经书、503 副贝叶像和大量佛事设施都被砸毁、被焚，仅从山上拉下来作为废旧物资处理的铜、铁碎片就达 60 余吨，这座千年古刹基本上成了一片废墟。

湖北黄梅县的五祖寺是佛教禅宗的发源地。在该县其他寺庙、道观全被砸烂之际，黄梅县历史博物馆和文物保管会为保护五祖寺，用盖有“黄梅县文物保管会”印章的封条将各殿封住：“正法眼藏”匾用写有“破除迷信”的纸盖住；梁柱上的“阿弥陀佛”覆盖上“革命到底”的标语。墙上的花窗、雕砖均糊上白纸，写上革命标语。在附近农村生产大队的协助下，庙里的住持法师将寺院几十箱重要文物用拖拉机运走，无法搬运的玻璃柜中的弘忍禅师（即五祖）的真身佛像则用画覆盖，两旁的玻璃则配以“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和“紧跟毛主席永远革命”。寺门紧闭，僧人们打扮成红卫兵模样，又在墙头打出工厂和学校红卫兵的旗帜，使前去“破四旧”的红卫兵，以为这里已破完“四旧”，方将这已有 1300 年历史的佛教禅宗的发源地完好地保护下来。

文革中，全国古刹老庙被砸、被毁的不计其数，能够部分保存下

来的算是侥幸。像灵隐寺那样毫发未损、完整地保护下来的恐怕是少而又少了。

相比于杭州的灵隐寺，西安的法门寺却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位于西安以西 100 多公里的陕西省扶风县的法门寺为关中塔庙之祖，也是唐代安放释迦牟尼佛指舍利的四大名寺之一，始建于公元 148 年。

话说 2500 年前，在拘尸那揭城郊娑罗树下，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悄然圆寂，遗体火化后共得八万四千颗真身舍利，装在一个金瓶中，存放于大般若堂中。

公元前 259 年，古印度孔雀王朝第三代国王阿育王统一了北印度诸国，宣布佛教为印度的国教，同时举行了佛教历史上第三次，也是最隆重的集结。最后，决定打开大般若堂，取出释迦牟尼的真身舍利，分成八万四千份，派出僧众和信徒持舍利与佛经到国内偏远地区和国外，布道施法，弘扬佛教。

公元前 250 年仲秋，西域沙门僧释利房等一行 18 人，手捧盛装 19 份释迦牟尼真身舍利的宝匣，披星戴月，跋山涉水向东土中国走来。

据历史记载，珍藏释迦牟尼佛骨舍利最多的南亚次大陆，由于后来伊斯兰教入侵，佛教受到了致命的打击。至十三世纪初，佛教渐渐消亡。有人推断释氏的灵骨已大部或全部散失了。

话说西域沙门僧释利房等一行 18 人，于秦始皇四年，公元前 243 年来到中国西部周原腹地。据说，在晚霞退去，夜幕覆盖大地时，伟

大的佛陀显身："暂不要将我残存肉身显示于世。等众生普度，万民归佛后，再显我灵骨吧……"最后，众人一致同意，先将佛骨舍利全部埋入一座高高的"圣冢"之下，然后再到咸阳面见秦王。谁料面见秦王嬴政之后，宰相吕不韦以"惑乱民心，毁我大秦"为由，将释利房等人打入地牢，所带经卷物器全部烧毁砸烂，弃之于野。幸而有一丈六金刚打破牢门，搭救了众僧，他们终于又鼓起了勇气，并决定：一行 18 人分四路，以秦都咸阳为中心，分别向南向北，向西向东，疏散民间，秘密与众说法布经，到每年的四月初八——佛诞日这天，在周原腹地美阳的"圣冢"前会面，交流各自的传法经过和布道经验。

由于缺少经书，只凭口传，佛法的普及面难以扩大，直到他们 18 人先后去世，佛法在中国都未形成气候。

公元 148 年，也就是历史上东汉桓帝建和二年，西域安息国的高僧安世高，又来到了中国。他在周原腹地的美阳城外时，夜晚三更时分，忽见破屋窗外一片霞光五彩缤纷，直冲斗牛，安世高激动万分，察看四面田野中间高高地隆起一堆黄土。这个隆起物到底始于何时，怎么会有佛门圣物的灵光，难道……。

安世高不再久留，他日夜兼程赶赴东都洛阳，面见汉桓帝刘志。桓帝听后自然异常高兴，立即令白马僧静安法师等人跟随安世高到关中挖掘荒冢。只半日工夫，便挖出八块带有梵文的青砖。青砖上的梵文为西域僧人释利房所书，文字中叙述了他们一行 18 人来中国的历程、以及释迦牟尼的真身显世和叮嘱。当然，最重要的记述，还是在青砖之下三尺的地方埋藏的 19 份佛指舍利。很快地，盛装 19 份释迦

牟尼佛骨舍利的宝盒被挖掘出来，安世高泣不成声，赶紧送到京都洛阳。汉桓帝一见惊喜万分，于是下诏在宫中建塔，以示供奉。

安世高为了使佛法迅速传播，进言桓帝："请陛下诏令，将宫中供奉的佛骨舍利分散于九州大地，建造精舍庙宇供养，佛陀的圣光将普照整个华夏，大汉帝国将会出现四海无波，八荒来服的鼎盛景况……"

桓帝拨出官银，命静安法师随安世高一道筹措分发佛骨舍利及在各地建造佛塔寺院事宜。二人领旨后，决定先在关中的周圆腹地的"圣冢"之上建造宝塔，并在四周修筑寺庙，在塔下挖掘地宫，以存放佛骨舍利。

很快的，周原腹地的荒冢上，架起了四层木塔。塔下的地宫中，存放着用紫檀香木做成的棺墎，内有金瓶供奉着释迦牟尼佛最大的舍利——指骨舍利，木塔上方写着"真身舍利宝塔"几个大字。宝塔建成以后，一座庞大威严的寺庙随之拔地而起。气势雄伟、巍峨壮观的玉石山门上，高悬苍劲的"阿育王寺"，四个金色大字。从此，继洛阳白马寺之后，中国又一伟大的佛教圣地、关中塔庙始祖——法门寺，诞生了。紧接着其他各地 18 座舍利宝塔，先后建成，18 份释迦牟尼佛舍利依次藏于塔中供奉。

当佛教在印度衰微时，中华民族拥戴它，使中国成为佛教的第二故乡。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法门寺一度成为全国，乃至全世界朝佛的总道场。

元魏(北魏)恭帝二年，公元 555 年，岐州拓跋育打开法门寺地宫，

供养佛骨、瞻仰佛骨。这是法门寺历史上第一次启奉佛骨的文字记载。隋文帝杨坚在结束南北朝分裂局面，统一天下的同时，也开始振兴佛教。继隋文帝之后，他的儿子隋炀帝杨广又大肆兴造佛寺。随之而来的是佛教在东土中国进入了一个大红大紫的黄金时代，法门寺也由此走向辉煌，进行每 30 年迎取一次佛骨的活动。

唐高宗显庆四年，公元 659 年，智综等僧众和部分官僚打开地宫，找到佛骨舍利。唐高宗即下令运到东都洛阳的皇宫中供奉起来。佛骨舍利在皇宫历经 3 年的奉迎礼拜，终于在唐高宗龙朔二年，公元 663 年送还法门寺。

继唐高宗之后，陆续又有武则天、肃宗、德宗、宪宗、懿宗到法门寺迎奉过佛骨，中宗、代宗、僖宗送归佛骨或下诏修寺，这些都记载于后来法门寺地宫出土的“志文”碑中。

唐僖宗把佛指舍利送还法门寺地宫，并布施大量宫廷器物供养。从此以后湮没千年，不显于世。到了明代，唐建木塔倒塌，重修砖塔，但地宫从未扰动过。

明代半壁残塔

法门寺

在历史的长河中，法门寺几经盛衰也步入了文化大革命。

这天，一群学生在扶风县城西郊那块宽敞的空地上集合完毕，随之满怀革命豪情壮志，浩浩荡荡地向法门寺涌去。他们认为，法门寺这座千年古刹，既是牛鬼蛇神的养生之地，又是埋藏蒋介石匪帮秘密电台的黑窝。这双重的罪恶赋予了他们加倍的责任和革命的神圣，使他们热血沸腾，信心倍增，一路杀进了法门寺。

法门寺 71 岁高龄的良卿法师出来迎接。

良卿和尚，俗名戚金锐，法名永贯，字良卿，河南省偃师县人，1895 年 4 月 13 日出生。幼年家贫，7 岁时，因连年灾荒奉母命于邻县宜阳铁佛寺出家。拜印川老和尚为师，为临济正宗派第十三代。1916 年投河南宜阳县灵山寺。1919 年受具足戒，圆戒后一直在灵山寺担任职事，循序升至监院。后来印川老和尚退居后，由良卿任灵山寺住持。

1931 年，上海留云寺方丈德浩老和尚，受请出任洛阳白马寺住持，良卿应德浩老和尚之邀，到白马寺担任西堂，后转后堂，继而升

任监院，到抗日胜利后回到灵山寺。后出门参访游化，1945 年到镇江金山寺挂褡。1947 年住浙江杭州太平桥姚祥寺，与明德法师在一起。1949 年又往定海南海普陀山住文昌阁。1950 年住宁波观宗寺。1951 年移居上海市金陵路 1 号福缘寺。

1952 年游化到陕西，住长安南五台、西安卧龙寺。1953 年，应扶风佛教徒代表王正平，李秉铎迎请，出任法门寺住持。

经过清末和民国时期战乱的法门寺，此时已是千疮百孔、荒草遍地。偌大的院内只残存两幢佛殿和一个即将倾塌的钟鼓楼，与真身宝塔形影相吊，而诵经礼佛的僧人则在枪炮的轰鸣和铁蹄的驱赶下四处溃逃，当时该寺僧侣只有澄观、慧明、常慧、心如等人。

良卿法师来到法门寺后，八方呼吁，四方求援，法门寺的境况日渐好转，佛殿、围墙及鼓楼得到了修整，绝迹的香火重新点燃……

正当良卿法师为自己十几年的心血换来的果实而感到欣慰的时候，大风暴来临了。

这时，一个头扎小辫的小姑娘走出人群来到良卿法师面前，高声背诵《毛主席语录》：“什么人站在革命人民方面，他就是革命派。什么人站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方面，他就是反革命派……”

还没等这个小辫子姑娘背诵完《毛主席语录》，早就按捺不住心中激情的学生们便开始了“不砸烂一个旧世界，就不能建立一个新世界”的行动。大雄宝殿内，那仅一只耳朵就可以承托 6 人的巨型泥塑卧佛被石头、棍棒、铁器击碎了，正佛殿的一切佛像和设施被捣烂了，

铜佛殿内的铜佛被捆上绳索拉倒了……

小将们将大殿内外的“牛鬼蛇神”顷刻荡平之后，心中的狂热依然没有减退。有人在寺院上殿檐口处发现了一块刻着字并有七个圆孔的石碑。石碑本身已摇摇欲坠，经此人用力一掀，摔落于地，铮铮作响。

此时的小将们并不知道，他们要破坏的正是一块中国历史上独一无二的记述古代音乐发展史并自身尚可发出七节音符的神奇绝妙的“七音碑”。

关于这块七音碑造就的年代无从查考，据后来的考古学家推断，至少不会晚于隋唐时代。当然，也有人推断诞生在北魏时期。传说是由中国古代音乐乐圣师旷得仙乐而制成，师旷去世后，七音碑在战乱中被遗弃荒野，法门寺建成后，一位有心的和尚找到此碑，并将它移至法门寺。

当然，现存的这块七音碑是不是和师旷同一个时代诞生，现在人们还无法确切地知道。人们知道的是，这块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本身能发出钟磬般的音节、上面镌刻着中国古典音乐发展历史和技巧的七音碑，就在这时，被这些小将砸烂了，然后又抛到一个石灰窑给彻底地火葬了。

以后，法门寺又多次被中学生光顾。

7 月 12 日，一群中学生又来到法门寺。他们要在真身宝塔之下，这佛祖的安息之地挖出秘藏的蒋帮电台。他们轮番挥舞着从附近农村拿来的铁锨、镢头，向地下劈去。一块块青砖被刨出，一堆堆黄土被

抛散。瞬间，宝塔内外已是坑洼遍布、面目全非。与此同时，有几人施展了“飞檐走壁”的绝技，以勇不可当的冒死精神爬上塔基，对每一处藏佛壁龛都仔细地察看，无数泥佛铜像纷纷坠地，跌入抛洒的泥土之中。

“阿弥陀佛，使不得，千万使不得，你们赶快住手……”

良卿法师一边阻止，一边向疯狂的人群中间挤去，竟跌跌撞撞地滚落到一个已挖有近半人深的坑中。

干劲正酣的小将们，见眼前的和尚竟敢阻止自己的“革命”行动，不禁勃然大怒，立即放下手中的工具，几个人上来，拽胳膊拉腿，将良卿法师连拖带拉扔到了宝塔后的空地上。

良卿法师眼见劝阻无效，便在庭院中堆积柴草，然后置身于柴草之上，大声说道：“你们要再挖下去，就先把我烧了吧。”

人们并不理会他的呼喊，继续疯狂的挖着。无奈之下，良卿和尚自己点燃柴草，端坐于柴堆之上，引火自焚。

一时间，熊熊大火冲天燃起，正在挖掘的中学生们哪里见过这一阵势，一个个目瞪口呆，在他们不算太长的“革命”征途上，从未遇到过以如此方式来抗争的非凡人物，这血与火凝固的瞬间，在每个人的心灵深处势同一枚重磅响雷轰然炸开。所有的人顿时懵了、傻了，积淀的狂热与喷涌的激情立即消失殆尽，他们在极度的惊恐与不安中扔下手中工具四散而去。而熊熊烈焰上的老和尚却已成为焦灰。良卿法师牺牲了自己的性命，保住了法门寺的地宫，保护了佛祖的灵骨。

但是良卿法师的自焚却不是发生在“破四旧”高潮的 1966 年 8、

9 月份，而是在此之前的 7 月 12 日，正是工作组行使职权之时，横扫牛鬼蛇神已经开始。此时，各级地方党委还都牢牢地掌握着运动的领导权。所以，这次搜查地下电台的行为应该不是群众自发的。

良卿法师焚身数日，弟子张政华居士(绍祥)不避危险收集遗骨送至贤山寺交静一装藏。静一装藏妥当，交白龙村吴七老居士转送至长安终南山上天池寺安葬。

## 第 148 回：拉萨城，大昭寺惨遭洗劫

## 滇池畔，春城炮轰省市委

8 月 23 日，西藏拉萨的八角街，也被改名为“立新大街”，而西藏叛乱时的重要据点药王山，则理所应当地更名为“胜利峰”，历代达赖喇嘛的居住地罗布村，改成为“人民公园”。8 月 24 日，西藏师范学校和拉萨中学的红卫兵开始走上街头，大破 “四旧”。

西藏师范学校成立于 1966 年 3 月，前身为创办于 1951 年的藏文干部培训班，大多数学生来自西藏各地的农村和牧区，处于扫盲阶段；也有一部分离开寺院的还俗僧人在此学习。

拉萨中学创办于 1956 年，一度由 14 世达赖喇嘛担任名誉校长，达赖喇嘛的经师赤江仁波切担任校长，是西藏历史上第一所中学，从当时拉萨仅有的 3 所小学吸收生源，由初中逐级升到高中，其师资力量很强，除了教授藏文的老师是藏人，基本上是在“旧西藏”接受过寺院或私塾教育的上层人士，其余主要科目的老师都是毕业于内地高等学府的汉人，有的还是内地大学的教师，或因出身不好或有政治问题而被“发配”进藏，但许多人是在共产党的宣传下，怀着理想主义的热情从中国各地奔向西藏的。像陶长松就是其中之一。他是江苏扬州人，1960 年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同年自愿申请进藏，被分在拉萨中学教授汉语文，在学生中颇有威望。

拉萨中学在 8 月 24 日前一天召开“破四旧”动员大会，语文老师陶长松语重心长地开导大家：“虽然我们的红卫兵小将都是翻身农奴的子弟，但我们并不是歧视家庭出身不好的同学。一个人的家庭出

身是无法选择的，但关键在于他（她）的立场和表现，这是可以选择的。明天的行动就是检验每个同学的机会，你是站在革命一边，还是站在反革命一边，就看明天的行动。”

8 月 24 日，天高云淡，阳光灿烂。一大早，新华社驻西藏分社的记者们敲锣打鼓地到拉萨中学送大字报，这在当时是最时尚的革命行动之一。以居委会为主的拉萨各单位的积极分子约上百人也赶来了。学校的高音喇叭里传来数学老师谢方艺的声音，他是学校团总支书记，也是拉萨中学红卫兵的发起人之一，后来是“造总”的头头之一。他要求全体红卫兵小将和革命师生到操场集合。

在宣誓要把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烧遍西藏各个角落的口号声响过之后，全校师生与各单位的积极分子排着整齐的队伍，唱着革命歌曲，向拉萨城东进发。一路皆是郁郁葱葱的树木，流沙河从色拉寺背后的高山上奔流下来，使得城北一大片尽是今已不复存在的湿地和阡陌。走在前面的都是当上了红卫兵的“小将”。他们戴着红袖章，扛着红缨枪，个个意气风发，斗志昂扬。走在后面的就不同了，有的肩上扛着学校发的棍子，有的什么也没有，两手空空，这都是出身不太好的学生，属于“革命师生”。

这是大昭寺的正面，手持红缨枪的同学们正在安放毛泽东的巨幅画像和五星红旗

他们来到大昭寺南边的讲经场，就开始演出，然后开大会。正在讲话的时候，突然乱了起来。大家抬头一看，大昭寺的楼上出现了许多人，有居委会的群众，还有各县来的积极分子。人们拿着十字镐、洋锨……居委会的几个年轻人，提着十字镐冲上来，开始砸讲经场墙上的壁画……说话间，楼上已经有人把大昭寺屋顶的象征金色的祥麟法轮挖下来了，正往下扔。大昭寺乱套了……这天，拉萨大昭寺这座

被 14 世达赖喇嘛誉为“全藏最崇高的寺庙”被砸。

大昭寺始建于公元 647 年，是藏王松赞干布为尼泊尔的尺尊公主而建。

传说释迦牟尼在菩提树下即将圆寂时，他的弟子们恳求佛祖留下真实的形象，以便世世代代指点迷津。佛祖点头同意了。弟子们于是塑造了佛祖 8 岁、12 岁和 30 岁不同时期的等身像。其中 8 岁、12 岁的等身像是请释迦牟尼的奶妈描述了佛祖年少时期的模样后塑造的。释迦牟尼亲自对三尊佛像做了加持后，便在菩提树下圆寂了。

后来，释迦牟尼的 8 岁等身像供奉在尼婆罗，即现在的尼泊尔王宫；30 岁等身像供奉在天竺，即当今的印度；12 岁等身像供奉在中国。

公元 7 世纪时，称雄雪域高原的吐蕃王松赞干布统一了雪域高原的各个部落，先后与尼泊尔和中国联姻，娶尼泊尔的尺尊公主为妻，而后又派人远赴长安迎娶唐太宗的宗室女文成公主。

尺尊公主的陪嫁礼品是佛祖的 8 岁等身像；文成公主带到吐蕃的是佛祖 12 岁等身像。

当文成公主一行刚进入拉萨河谷时，装载着佛像的木轮车陷在拉萨河谷的一片沙地中，任凭 4 个大力士怎样推，木轮车还是纹丝不动。文成公主说：“看来佛祖愿意被供奉在这里了。”于是，松赞干布听从了文成公主主张，专门修建了供奉佛祖的小昭寺，并将寺门面东，向着长安的方向。

松赞干布又想为尺尊公主建大昭寺，以供奉佛祖的 8 岁等身像。

文成公主用中原汉地的办法打卦占卜，对松赞干布说："雪域高原如同罗刹女魔的形状，而女魔的心脏正好处在拉萨谷地中间的湖泊。只有在此建寺，才能镇住女魔，让土蕃兴盛。"

松赞干布非常高兴地接受了这一建议，用井字形木架架在湖面上，填一层土又架上木架，如此反复，直至填平湖泊，修建了大昭寺。

松赞干布去世后，吐蕃发生了战乱，大昭寺被洗劫一空，各种文物、壁画遭到了颠覆性的毁灭，也包括释迦牟尼的 8 岁等身像。一些高僧和虔诚的贵族，唯恐小昭寺的佛祖像被毁，便偷偷将小昭寺 12 岁的等身像藏到了大昭寺的一个小殿内，又用土石将门封死。直到唐中宗将金城公主远嫁吐蕃，吐蕃才再次掀起了佛教文化热。金城公主查询到 12 岁等身像的下落后，起出佛像，供奉在了大昭寺。

就这样，迦牟尼亲自加持过的 3 尊佛像，8 岁佛像毁于战乱，30 岁佛像在天竺战乱中，被一些信徒暗地里送到大帆船上，准备飘洋过海送往他乡供奉，不料半途遭遇风暴，船被巨浪掀翻，佛像就此沉没于南太平洋。仅存于世的就是文成公主带进藏的这尊 12 岁等身像。

大昭寺后经历代修缮增建，形成庞大的建筑群。寺建筑面积达 25100 余平方米。有 20 多个殿堂。主殿高 4 层，镏金铜瓦顶，辉煌壮观，具有唐代建筑风格，也吸取了尼泊尔和印度建筑艺术特色。大昭寺又名"祖拉康"，藏语意思是经堂。"大昭"，藏语为"觉康"，意思是释迦牟尼，就是说有释迦牟尼像的佛堂。大殿正中供奉的就是文成公主从长安带来的释迦牟尼 12 岁时等身镀金铜像，它在佛教界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两侧配殿供奉松赞干布、文成公主、尼泊尔尺

尊公主等塑像。

大昭寺也是西藏重大佛事活动的中心。五世达赖喇嘛建立“甘丹颇章”政权后，“噶厦”政府的机构便设于寺内，主要集中在庭院上方的两层楼周围。许多重大的政治、宗教活动，如“金瓶掣签”等都在这里进行。

在拉萨有个说法，不去大昭寺就等于没来过西藏，意为大昭寺是这个雪域高原的核心和灵魂，因为这里供奉着世界上唯一的一尊经过佛祖亲自加持的佛像。

因此，在藏区的高山峡谷，还是在坦荡的大草原，或是西藏周边的青海四川云南甘肃，都可以看到那些虔诚的信徒，他们磕着长头，用身体丈量着大地，从四面八方缓缓叩来，他们的终极目标就是要用自己的手指亲自触摸大昭寺门前的青石地板，匍匐在佛祖面前。这一刻，是信徒们追求一生的幸福时刻，为这一刻灵魂的升华，任何千辛万苦都是值得的。

在拉萨，藏族人也将以大昭寺为主的八角街一带称为“拉萨”，藏文意思是佛地。

大昭寺释迦牟尼佛像

但是，在 1966 年 8 月 24 日以后的几天里，有 1300 多年历史的大昭寺被洗劫一空，大量经书和唐卡被付之一炬。文成公主入藏时带来的这尊释迦牟尼 12 岁等身像也被砍了一刀，佛像身上的珠宝装饰全部被剥去，但佛像幸免于难。其他所有的佛像，包括相传松赞干布，赤尊公主和文成公主入灭时幻化而入的十一面千手观音像，全被砸毁。

深知大昭寺在藏民心中地位的周恩来得知消息后，立即给自治区打电话，指示对大昭寺要保护。

我们再来说说云南。这里的文化大革命和全国其他地方一样，也是从文化宣传口开始的。1966 年 5 月，云南省委组织部部长、省委书记处书记孙雨亭召集省委组织部副部长兼共青团省委第一书记张曙光，收集整理了云南省委宣传部部长、云南省委书记处书记高治国的材料，送云南省委第一书记阎红彦。5 月下旬，省委制定了一个大逮捕、大收监、大劳教的计划。省公安厅专门设立了一个“保卫文化大革命办公室”专管这项工作。

此时，云南省委第一书记阎红彦也以为文化大革命就是抓牛鬼蛇神。6 月 10 日，他在地委书记会上作总结时说：“文化大革命的方针是集中力量打击牛鬼蛇神，打击反革命，打击资产阶级右派，打击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具体说，就是打击资产阶级权威专家，老古董，因为他们天天骂我们，什么是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不是指一般有缺点人，是包庇牛鬼蛇神的人，牛鬼蛇神就是三反分子”。

阎红彦在会上开始对教育部门和专业剧团进行大换班、大清洗，他说“教师队伍问题多，家庭杀、关、管的占 40%，问题严重的占 10-20%可以清洗，省委准备从高中毕业生、在乡知识青年、工矿中抽 5000 人顶替”。

根据这个指示，各地组织大批工作组，集中整训中、小学教师。大批教师被打成“反革命”。

6 月 26 日，阎红彦从西南局开会回来，带回文化大革命的步骤草案和孙雨亭制订的全省大逮捕、大清洗、大换班计划。阎红彦从西南局带回的一个绝密文件上说：“全国要抓 40 万右派”。

6 月 30 日，云南省委组织部制定了全省文教系统进行大规模清洗的庞大计划，并拟成两个文件，一是：“省委对各地区中、小学文化革命有关问题的通知”。一个是：“省委批转组织部关于抽调五千人加强教师队伍的报告”，批发全省各地执行。

7 月 2 日至 5 日，省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对云南省书记处书记、宣传部长高治国进行了批判，阎红彦在会上对高治国下了个结论是：牛鬼蛇神。

7 月 9 日，省委写报告上报中央，省委揪出高治国。

8 月 16 日，云南省代省长刘明辉宣布：“其他单位转入理问题，梳辫子”，“搞思想革命化”，布置在 10 月份即结束运动。

谁知，8 月 19 日，云南大学有两个同学贴出大字报提出：揪斗高治国是旧省委“舍车马，保将帅”的丑剧。孙雨亭立即组织上千人的大字报围攻，孙雨亭还亲自到云大讲：“曹、保(二同学的姓)大字

报，说它是反革命的大字报也不过分”。

8 月 23 日那天，阎红彦刚从北京开会回到昆明，正在主持全省地委书记会议，传达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精神，突然传来“炮轰省委”的口号声……只见昆明工学院的一个学生领头，一群来自不同大中学校的年轻学生，扛起“造反有理”、“革命无罪”的大旗，不顾一切地冲进省委大礼堂，点名要“阎红彦出来答复问题”。

原来，8 月 22 日深夜，昆明农林学院、工学院、师院、冶金工校的师生，在十一中全会和毛泽东接见红卫兵的鼓舞下，连夜串连，传送北京学生给农学院学生周鸿的一封“清华来信”，传送毛泽东“炮打司令部”的号召，传送北京及其它省无产阶级革命派冲出校园“炮轰省委，火烧市委”的情况，互相鼓舞，组织炮轰省、市委。

8 月 23 日上午 8 时，昆明农林学院、工学院，师院、中医学院、冶金工枝等院、校和部分中学生，先后有 9 批共 5000 千多人，冲进省委大礼堂集会。阎红彦决定立即宣布“会议暂停”，出来接见这些学生。

学生问：“为什么毛主席 18 号在首都接见百万群众的时候，没有云南的同学，也没有西南的？”

阎红彦答：“不要说你们不知道，就是我们，事先一点也不知道！”

学生问：“你为什么不给大家介绍北京的和河北的革命经验？”

阎红彦答：“我们去看了，北京学生的行动，并不都是对的。有好的经验，也有方向路线的错误。中央没指示，我们也不好介绍！”

学生问："炮轰省委，是不是革命行动？你们支持不支持？"

阎红彦答："我们对'文化大革命'没有经验。我们只有造国民党反的经验。在我们这个社会主义国家，在共产党领导下，'造反有理'，'横扫一切'，老实说，我是没有经验的。怎样造反，还是要靠我们独立思考来解决这个问题。""你们念的'最高指示'里不是有这么一条吗：'凡事要问一个为什么，看它是否符合实际，是否真有道理'！"

他又说："如果省委不执行毛泽东思想，当然应该轰！至于你轰得对不对，那还要看事实。""如果是轰牛鬼蛇神，一定要我承认是革命的那也是不必要的。""要说云南省委都是牛鬼蛇神，我现在还没有觉悟到那个水平。"

学生问："对于毛主席批发的清华附中学生那一封信，您怎么看？"

他毫不含糊地回答："这封信确实把形势轰起来了！但是，它的内容，我不一定完全赞成。"

本来，大多数青年学生只是听说其他省市都在炮轰省委，于是也"响应号召"而来，图新鲜，凑热闹，并没有什么明确的目的。提了几个问题，见难不倒阎红彦，也就都各自散去。

8 月 23 日下午和深夜，省委秘密派云南省副省长马文东等人组织大、中学校的部分学生到省委机关"保卫省委"。

同日，昆明工学院成立"金棍子"战斗小组。

当晚，阎红彦说："机关干部不要急于上街，不要急于搞反击，

让他们再暴露一下。”

代省长刘明辉在对机关干部谈话时说：“现在是大动荡、大分化、大站队的时候，不管你是什么人，你不站在这边，就站在那边，是每个人表明态度的时候了。”

省委立即下令停止省级机关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一致对付红卫兵”，深夜组织机关干部围攻写大字报炮轰省委的省委宣传部等部门的 45 名干部，将他们分别打成“反革命”和“叛徒”。阎红彦还亲自下令秘密拍摄了 5 张大字报的照片。调动一批部队及公安人员进驻省委。

深夜，刘明辉到省公安厅召开紧急会议，派出警车监视群众，省公安厅副厅长坐镇指挥。还公布收到北京来信的昆明农林学院一个学生的家庭情况。

8 月 24 日，针对“炮轰省委”的口号，昆明立即出现了“保卫省委”的行动。阎红彦也必须面对群众，回答问题：“保卫省委”是不是革命行动？你们支持不支持？“炮轰省委”是不是反动口号？你们为什么不反对？我们要和他们辩论、斗争，你们支持不支持？……

阎红彦站在群众的面前，坚定明快地说：“省委不怕炮轰”！接着又表示“也欢迎炮轰”。

“你们提出要保卫省委，我们很感谢。但是希望你们不要这么提。因为不符合‘中央精神’，不符合‘斗争大方向’！”

“希望你们不要去和人家辩论。那样会造成群众的对立，激化矛

盾，引起社会动乱；还要承担‘挑动群众斗群众’的罪名。”

“我们也得跟上‘中央的步伐’呵！”

8 月 24 日，省委召开地市委书记会议，会上放了“823”大会录音。晚上，马文东、王甸调来一批学生围攻那些“炮轰省、市委”的学生时，通知地市委书记参观，孙雨亭亲临现场指挥。阎红彦还亲自交代杨西文、史烽等人布置拍照，特别要选择“炮轰得厉害”“有刻骨仇恨的照下来”，“以后是有用处的”等等。又叫王甸布置人把贴在街上的大字报也拍摄成照片保存下来。

8 月 25 日，省委在云南艺术剧场召开各大中学校的筹委会负责人大会，地市委书记出席旁听。阎红彦在会上说：“炮轰省委可以，轰西南局不行，我不同意。”

云南省委书记处书记赵健民说：“以阎红彦同志为首的云南省委是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指示的，是正确的。”“阎红彦同志紧跟中央、跟毛主席是跟得紧的。”

此后，全省各地根据省委对付“823”的经验，纷纷把炮轰省委的学生打成反革命。

第 149 回：太平湖，一代文豪驾鹤去

讨说法，北航静坐国防部

8 月 24 日当晚，正在清华附中读书的大右派章乃器的儿子章立凡刚刚经历了清华园“824”风暴，回到宿舍，里面空无一人，新置的蚊帐已被撕碎，床上铺着一张墨迹未干的大字报，将“章立凡”三个字打上红叉，责令：“反动分子狗崽子，滚蛋！快滚蛋!”

章立凡钻出学校围栏，连淌两条小河，走上校园西侧的马路，刚好有一趟末班车经过，他迅速登车。此时天降小雨，坐在车上，他仔细品味着“惶惶然若丧家之犬”的滋味，不知进城之后，又有什么样的命运在等待着他。他不敢去灯草胡同的父亲家——章宅，便去了汪芝麻胡同他母亲的住处，刚下公共汽车，便见一群红卫兵蜂拥而上，查问乘客“是什么出身”。回到家中，母亲告诉他，本胡同的邻居张洁凤、傅毅茹、周康玉等几位小有资财的寡妇均已在抄家时被打死……

张洁凤，美洲著名侨领司徒美堂的夫人。

司徒美堂是二十世纪的全球华人社会和洪门袍泽中大名鼎鼎的人物，与陈嘉庚齐名，原籍广东开平，早年到美国当劳工谋生。他身强力壮，为人豪侠仗义，逐渐成为美洲洪门的“致公堂”的掌门人之一。孙中山在美国从事革命活动时，得到司徒先生从组织到资金的支持，孙先生还担任了“致公堂”的“红棍”。

身为革命大佬的司徒老人，因反对小辈蒋介石的独裁，受到毛泽东的礼遇，曾作为美洲华侨代表，参加新政协和开国大典，担任中央

人民政府委员等要职。1955 年老人逝世时，廖承志致悼词，周恩来、林伯渠扶灵，备极哀荣。

张洁凤也是广东人，但不是司徒老人的原配。据说她曾是一名贴身使女，后来收房成为夫人。老先生逝世时她还很年轻，年方 30 岁左右，享受着国家对知名人士遗孀的待遇，每月有 70 多元的生活补贴，与她家原先的警卫员同住在一个小宅院里。

一位年轻孀妇，自然有再嫁的权利。于是她不时参加一些舞会之类的交际活动，以选择未来的生活伴侣。经常与她结伴前往的，有一位林光明女士，又名林妹殊，即后来大名鼎鼎的气功师郭林，以及黄绍竑前妻黄瑞华。后来张女士终于觅得意中人，是一位在云南工作的工程师。

司徒老先生没留下多少遗产，张洁凤作为知名人士遗孀，如果再婚，就意味着必须放弃国家的生活补贴，于是她采取变通办法，到云南与工程师秘密结婚，生下一名女婴后，带回北京生活，对外说是抱养的。

“寡妇门前是非多”，内情逐渐透露出来，于是街坊四邻对她的“生活作风”开始有所议论。

抄家一开始，街道便招来红卫兵，诬称张洁凤是“坏分子”，剃阴阳头、抄家、批斗，厄运一下子降临到无助的女人头上。她被扯开双臂悬吊在房梁上，轮番用皮带抽打……最终撒手人寰，撇下年仅 6 岁的小女儿。

小女孩孤苦伶仃地靠邻居的一点施舍活着。终于有一天，那位头

发花白的工程师从云南赶来，牵着女孩的手，各人手里拎着一个小包袱，蹒跚着沿胡同向大街走去，离开这块伤心之地。

章立凡母亲提到的另一位傅毅茹老太太，家住独门四合院，和善慈祥，热心邻里公益，曾被推选为街道主任。老太太已故夫君是位旧时的小官僚，于是列入抄家名单，从褥垫下搜出短刀一把，顿时罪在不赦，惨死于红卫兵的皮带之下。

另一位周康玉女士也是独居小院，据说是天津名门周家的后裔，平日十分低调，但既属于“大资本家”眷属，自然在劫难逃，打成半死以后，挣扎着上了吊。

死者已矣，苟活者活罪难逃。大街小巷中，一下子平添了许多挂着黑牌扫街扫厕所的“牛鬼蛇神”，其中许多是白发苍苍的老头老太，最高龄者，是一位已超过 90 岁的老先生。

抄家过后，北京的大小拍卖行里，堆满各种抄来的高档硬木家具（文物除外），以极低廉的价格出售。曾见一对老态龙钟的夫妇，大约属于“小业主”阶层，推拉着老北京捡破烂用的四轮“地坦克”，上载一堆破旧的生活用品，步履蹒跚地到财政局请求上缴，说是红卫兵命令送来的，但财政局不收。

老夫妇问：“哪儿能收？”

答曰“自己问去。”

于是老夫妇又艰难地推着“地坦克”走了。

章立凡将从宿舍带回的大字报和破蚊帐给母亲看，她很是不解，以为同学间何至于有如此仇恨，要他明天回学校，好好向大家解释一

下。

第二天一早，章立凡回到校园遇见一位本班同学，是革干子弟，曾与他一道给校领导贴过大字报，算是有过“战斗友情”的。他摇晃着一条皮带，半开玩笑地对章立凡说：“你拿上这个，回去教训教训你爸。”

章立凡没有回宿舍，径直穿过操场，向教学楼走去。走到楼前时，见两位女红卫兵正在用皮带狠狠抽打门房周大爷。据说他曾是圆明园一带的地主，因家道败落，解放前就把地卖光了，后来便在学校当门房糊口。周大爷平日与世无争，好写几笔“精气神”之类的毛笔字，每逢冬至起九，便画上一幅“九九消寒图”挂在门房里，每日涂黑一个梅花瓣度日。他最大的乐趣无非是炖上一锅红烧肉，喝两口小酒。

章立凡在校园里，见到一位被指为“作风不正”的高年级女生，被剃成了“阴阳头”。走进教室，只见两位“出身不好”的女同学王淑瑛、孙淑绮也被“剃度”，坐在角落的“另席”上。

章立凡还不知道，8 月 24 日这天，一大批身穿绿军装、腰扎武装带的红卫兵冲进他父亲章乃器东城区灯草胡同一家四合院的家中，他们翻箱倒柜,把大量的书画、文稿、古董抄走、烧毁、打碎,基本上能破坏的都破坏了。事后,押着章乃器去“吉祥戏院”,那里正在进行着一场血淋淋的“斗争大会”。他们将章乃器推到台上时，“全武行”已使台上的许多人倒在血泊之中。

一群红卫兵对着章乃器大声训斥:“老右派,你的民愤极大,要老老实实交代你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滔天罪行。这才

是你的唯一出路。”小小年纪的红卫兵,每个人都自以为是地训斥了一通,之后扬长而去。留下了莫名惊诧的受训者,章乃器在无限委屈中自言:“我章乃器手上没有沾半滴人民的血,腰间没有留半文不义之财;社会上一切黑暗糜烂的勾当全没有我的份,可从辛亥革命以来所有的进步运动我几乎无不参与,这‘民愤’二字从哪里说起!……”

从 25 日以后的 7 天里，章宅门户洞开，每天总有几批人来任意拷打和凌虐他。有的用钢丝包橡皮的鞭子打，有的用点着了的火柴烧他的手，还有人用气枪射击他的头面。此外，如冷水浇头，水壶灌鼻孔，逼食肮脏的食物等等，有人更主张用辣椒水灌他的鼻腔，只因为在他家里找不到辣椒而作罢。后来，等到逼他迁出自宅之前，竟有人在用油彩涂抹他的面部之后，用氨水灌其鼻孔。

章乃器凭着顽强的意志和自幼学的气功还在硬挺着。他不断地告诫自己：“镇静、镇静，再一个镇静。”他坚信：“第一，我没有做过伤天害理的事情，我不应该死；第二，我的事实还没有澄清，我不能死。”

他后来回忆说:“我之所以能镇静,首先是因为我没有畏惧之心。死没有什么可怕,所求的只是死得其时或死得其所。我知道,只要来者是真正的群众,他们是不会杀害我的……”“其次,是因为我没有仇恨之意。我看到,人群之中即使有不纯的分子,但绝不是我的敌人,也绝不是阴谋陷害我的仇人。他们主要是一群天真的孩子,他们的缺点只是水平低和受蒙蔽而已。我应该心平气和的对待他们,以争取他们的理解和同情。”“又其次,是因为我还有顽强地活着的愿望。我认为,

我现在决不能死,我要等到党看清楚我是一个对党的革命事业无限忠诚的人,然后死而无憾。我深信,事实是掩盖不住的,事实总是越到后来越清楚。我活着,我的精神面貌就可以证明我对时代的乐观。这是有反动思想的人所万难做到的。”

因为镇静，应变的机智也就来了，在红卫兵打他的时候，他就问：“毛主席打不打人？”“解放军八项注意中的第五项是什么？”这样一来，打他人的心里有所顾忌，下手也轻一些。

8 月 25 日，章乃器写成一首诗，26 日请老伴来口述遗嘱。他在口述遗嘱中说道:“毛主席的统一战线政策是无敌于天下的,我愿竭诚拥护它,推行它,虽死无悔……党从遵义会议起到延安整风这一阶段的历史是无比光荣的,我愿发扬光大它,虽死无憾……毛主席说:用革命的两手反对反革命的两手。这句话是永远正确的,我们必须时时刻刻记着它,实行它……请红卫兵把我这些话转达毛主席、周总理,他们一定会相信我的话是真诚的。”

此后，章乃器运用多年练习的功夫，气沉丹田，全力抗击外在肉体上的折磨。更为积极的，他把自己的身体当作“科学实验室”，做绝食试验，从 24 日到 31 日，进行了 8 天绝食，其间拷打、凌辱不断。但因为他心中能够镇定，故而从容面对这一切非人的遭遇。

8 天后，有一个民警到吉祥戏院要人，说打死了章乃器不好向中央交代，章先生才被放了出来，送到医院时竟遭拒绝。章乃器头脑仍旧清醒，他挣扎着在医院的长凳上给周恩来写了几个字：

“总理，我被打，已经受伤，医院不给治，请你请示。”

信送出不久，章乃器就被推进了急救室。

8 月 24 日凌晨，被折磨了一天的老舍才被允许回家。离开派出所前，他被通知，早上必须拿着“现行反革命”的牌子到市文联报到。

老舍回到家院，爱怜地抚摸着小孙女的脸说：“爷爷要走了，要走了。”他离开了家……

第二天，老舍没有到市文联报到。25 日凌晨，有人在太平湖边发现老舍的尸体，他被打捞起来，放在湖边。一张破席，盖在他的尸体上。

太平湖公园的看门人说：8 月 24 日，这位老人在这里坐了一整天，从上午到晚上，整整一天，老人像一尊泥塑，几乎没挪窝，在岸边的地上丢满了烟头。死者的衣服、手杖、眼镜整齐地放在岸边。

人们在他的口袋里，发现了他的名片，上面写着：“舒舍予，老舍。”

消息迅速传遍京城，成百上千的人闻讯而来。他的好朋友巴金先生、冰心先生还有许多其他的人得知这一消息后，放声痛哭，国外的文学家率先写了悼念他的文章和小说，瑞典人在不知情的情况下甚至准备给他颁发诺贝尔文学奖，可是，这一切，他都不知道了，他走了。

67 岁的老舍成了文革中太平湖里的第一位殉难者，继他之后，这里成了文革冤魂的一大去处。连续好几天，每天都有人往湖里跳。

对老舍的死,江青问过戚本禹等人好几次,是谁把老舍弄死的？因为毛泽东很喜欢老舍，他在看老舍写的《龙须沟》的时候,演出刚结束，他就站了起来,远远的和老舍招手打招呼。江青也很喜欢老舍

的戏，大家都挺喜欢的人,而且还很进步，怎么就被人不明不白地打得投湖自尽了呢？

江青怀疑老舍的死是周扬余党指使人干的。戚本禹他们都不相信，认为周扬余党没有这样大的力量。江青说："你们不懂，他们这是要打着红卫兵的旗帜来反文革，别有用心。"她让戚本禹去查，戚本禹找到公安部长谢富治，查了半天，找不到证据，最后说是老舍的老婆胡洁青要和老舍划清界限。老舍外面挨斗，回家挨骂，找不到温暖，这才自杀了。

为了早一点到北京接受毛主席的接见，大连海运学院的 15 名学生，在上不了火车的情况下，决定徒步进京。8 月 25 日，他们打着"大连北京长征红卫兵"的旗子从大连出发，历经近一个多月的艰辛后，行程 2000 多里抵达北京。

8 月 25 日，中共中央转发总政治部关于正确处理地方学生要求斗争部队重点批判对象问题的意见。《意见》说："最近有些学生群众到部队来抓黑帮分子，戴高帽子、游街，进行斗争；有的地方要求部队交出重点批判对象；有的学生到军队干部宿舍进行搜查，"《意见》指出："学生和群众""要斗黑帮分子的革命热情，我们表示热烈欢迎。"但是，"军队中的黑帮分子，由军队负责处理。""在地方参加四清的军队干部，如确有严重错误缺点，应当在所在工作的单位进行批判令其检讨，回军队以后再酌情处理。""军队干部宿舍有武器、机密文件和常通军事机密电话，建议地方学生不要到军队干部宿舍进行搜查。"

8 月 25 日这天，全国各地发生了许多事件，统称为“825 事件”：

首先是北京航空学院。8 月 24 日上午，北航 3511 班“红旗战斗组”在 8 月 22 日周恩来在清华大学大会上讲话精神的鼓舞下，派出郑焕成、陆澄平、鲍风、董瑞玲四人，到国防科委去找北航工作组组长赵如璋，要求澄清问题。他们于下午 17 时多来到西城区西什库大街东侧的旃坛寺 1 号，国防科委机关大院南门接待室与赵如璋联系。在此期间，他们又遇到北航 23 大班两位同学。于是六人在那里一直联系到晚 20 时，终于在宿舍区传达室见到了赵如璋。

虽然对这几位北航学生的到来，赵如璋十分不满，但是听了北航同学当场念了周恩来 8 月 22 日在清华大学针对工作组问题的一段讲话后，还是同意 25 日上午 9 时，在国防科委接待站接见他们，但是希望有一名筹委会委员参加。

六位北航学生又当场给国防科委主任聂荣臻，副主任钟赤兵、罗舜初、路扬写了一封短信，报告北航“红旗”将和赵如璋开座谈会，期望首长能参加，并请吴凤翔、崔忠业两位部长也参加会议。

赵如璋答应递交。

当晚，郑焕成、陆澄平、鲍风、董瑞玲四人回到学校，对一些同学说了他们见到赵如璋的情况。8 月 25 日早上，他们四人就和一些同学赶往国防科委接待站。此事引起北航校园大字报区一些同学纷纷议论。很快，决定去国防科委接待站的人越聚越多，大家分批出发，上午约有一百多人来到国防科委接待站，其中就有北航“红旗”总勤务站的韩爱晶、何金国和屠海鹰。

但是，他们在国防科委接待站没有见到赵如璋，于是大家又赶到西什库大街茅屋胡同，这里是国防科委大门口。

9 时，国防科委裴济民出来对北航的学生说，因为临时开党委会，

赵如璋不能出来了。

北航的学生们表示，他们不走了，等赵如璋开完会再谈。

10 时 10 分，裴济民又出来转交赵如璋的一封信。内容是：

我正在开会，何时开完尚不知。几个副主任，钟副主任在京西开会，路副主任有病，罗副主任还在接见其他院校同学，估计结束不了。崔、吴两位部长，我也打了电话，他们今天已经把会议排满了。你们是否把意见先提出来，让我准备一下，想一想，然后再约时间。我昨天晚上开会到下午两点，也没有时间来得及考虑你们的意见。以上所述，如同意，请先回去吧！

原来，因为听说很多工作组在学校被打，戴高帽、游街……，国防科委担心赵如璋出去会有不测，所以，没有让他出来与学生们见面。

是走是留？国防科委大门口的北航学生议论纷纷，进退两难。大多数人坚持要等赵如璋出来。于是，他们从 11 时半等到下午 14 时，期间又打了几次电话，接电话的都说：赵如璋不在国防科委，也不在家。

这时，正巧西安军事电讯工程学院临时筹委会的同学在离国防科委大门口有几十米远的业余航校的小体育馆里，与国防科委联络组组长刘景禄辩论。于是北航的学生便来到小体育馆，边听他们辩论边等赵如璋，时不时还帮着西军电的同学跟刘景禄辩论两句。他们都没有吃午饭。上午 11 时，北航学生郑焕成曾去国防科委联系送饭，国防科委说人手不够。

下午 15 时，原北航工作组成员、国防科委刘秘书出来，向北航同学表达三点意见：

（1）你们先吃饭，然后返校；

（2）同学要求，筹委会同意，工作组可以返校，检查总结；

（3）有意见可以留下来反映解决。

北航的同学也向刘秘书也做了三点说明：

（1）对赵如璋言而无信、无视群众的做法表示抗议。

（2）把赵如璋请出来。

（3）下午4时前如再得不到任何答复，我们就进去找赵如璋，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完全由赵如璋负责。

16时15分，刘秘书没有出来。北航的学生又整队来到国防科委门口，与警卫室交涉，要求进去。负责警卫工作的军人对他们说：中央规定，未经允许，不能入内。于是北航学生就在国防科委的大门前席地而坐，高唱革命歌曲、念《毛主席语录》。

很快，16时20分，国防科委把午饭送到小体育馆。北航的学生让西军电临委会同学先去小体育馆吃饭。

16时55分，当北航学生准备去吃饭时，国防科委通知：赵如璋、吴凤翔、崔忠业快开完会了，赵如璋很快就要出来。

北航学生决定等赵如璋出来边吃边谈。国防科委的人要他们派几个代表。北航学生说："我们已经等了8个小时，赵如璋应该和我们一起谈。"

国防科委食堂的人和西军电临委会代表又劝北航学生吃饭，北航学生说："既然赵如璋快出来了，我们就等他一块吃饭。"

到17时30分，赵如璋还是没有出来，北航学生们也都没有吃饭。于是，国防科委的人把饭拉回去了。

国防科委的大门其实就是国防部的南门，在国防科委门口静坐就

如同在国防部门口静坐一般。这是共和国成立以来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事情。国防科委副主任罗舜初赶紧将情况向上级报告。

负责国防科委工作的聂荣臻接到报告后说:“国防部是什么地方，‘北航红旗’怎么可以这样胡来!要告诉国防科委领导人，学生要求赵如璋回学院去澄清问题，可以去，但学生不能在旃坛寺静坐，必须动员他们回学院去。”

旃坛寺即国防部所在地。

接到聂荣臻的指示后，国防科委党委常委立即派出院校局副处长裴济民等人组成接待组。

晚上 19 时，国防科委刘秘书出来说:“聂总责成科委常委解决这个问题。”北航学生再次重申要见赵如璋。此时，他们已经 11 个小时没吃饭了。

20 时，国防科委科委后勤部副部长王力华，说要见北航“红旗”的代表。北航“红旗”的韩爱晶、屠海鹰、何金国、张庆海、郑焕成等与他见面，再三要求见赵如璋。王力华答应转达。

这时，北航学院文革筹委会来人了，要求静坐的北航学生回学校。学生们拒绝。

林彪办公室主任叶群打电话向罗舜初了解情况。听了罗舜初的汇报，叶群说:“有情况要随时向林办报告”，放下了电话。

晚 22 时，北航学院文革筹委会中唯一的一位“红旗战斗队”的代表仇北秦同学，带着工人师傅，开着一辆卡车，把饭送到了国防科委门口的静坐现场。但是，没人顾上吃饭。

当晚，北航“赤卫队”正式成立。随即，北航“赤卫队”和北航的部分工人，坐车来到科委门口，要静坐的学生回校。

这时，北航“红旗”院勤务员石兴国、刘金荣、胡少南、杜小慧、戴维提又带着学校的一百多位“红旗”师生赶来声援。晚 23 时，西安军事电讯工程学院的同学也列队前来支持北航“红旗”的静坐学生。

下一步怎么办？是继续等待还是撤回？这么多人，吃饭、睡觉怎么解决？他们就这样在国防科委南门外迎来了 8 月 26 日。

## 第 150 回：旃坛寺，总参“八二五”事件

### 难预料，《陕西日报》出事端

就在北航学生国防部门前闹得不可开交之时，国防部院内又发生了震动军委的总参谋部“825 事件”。

总参谋部党委根据中央军委和总政的指示，于 8 月 22 日在京西宾馆礼堂，召开师以上干部会议，由代总长、党委书记杨成武作了机关用“四大”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动员报告。报告以后，下午通信兵部就有人到总参机关所在地旃坛寺贴大字报，说杨成武的讲话是压制革命运动。随后，总参的一些部、局，也贴出一批大字报，矛头大部分也是对着总参领导的。

8 月 25 日上午，毛泽东按照预定安排，要在钓鱼台 12 号楼接见坦桑尼亚军事代表团，陪同的有总理周恩来、代总长杨成武和副总参谋长彭绍辉，国防部外事局长潘振武为引见人。陪同和引见的人还没有到场，外事局参谋孙启祥就给毛泽东的秘书徐业夫打来电话，说他代表革命群众，要求毛泽东不要让潘振武参加接见。

那天，毛泽东比约定时间提前到了 12 号楼。杨成武一进门，徐业夫就将他接到外事局参谋打来电话的情况告诉了杨成武，并说：“我没有报告主席，请你决定。”

“等一会，待总理来了，我请示总理后再定。”杨成武说。

一会儿，周恩来到了，杨成武将上述情况向他作了报告。周恩来说：“引见一下，没有什么关系嘛，潘振武是做这个工作的嘛。”

“前两天我们作了动员，运动刚刚起来，为了照顾群众的情绪，

这次不要潘振武同志参加接见好。”杨成武向周恩来提出了建议。

周恩来听后想了想，说：“那好吧　就让他这次不参加。”并指示：“你去给潘振武同志解释一下。”

杨成武随即走过去对潘振武说：“外事局有人提意见，不让你参加接见，总理同意了。”

“好，那我就不参加。”潘振武听了爽快地回答说，随后自行离开了钓鱼台。

总参外事局的这部分人得知潘振武没有参加毛泽东的接见活动后，立即贴出标题为“特大喜讯”的大字报，并在大字报上点名批评了杨成武和负责外事局工作的副总长。

当天下午，总参党委召开会议，研究和具体部署机关文化大革命。杨成武在会上通报了25日毛泽东接见外宾时没有让国防部外事局长潘振武参加的情况。恰在这时，外事局的一些人得知总参党委在开会，随即集合队伍，打着鼓，敲着锣，拿着质问信、抗议书等，先在旃坛寺大院游行一周，然后冲到北楼6层总参党委会议室，质问杨成武，同时向总参党委提出抗议。

他们来势汹汹，不断高呼口号，说：“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支持了外事局革命群众要求，同意不让潘振武参加接见外宾活动，杨成武压制群众罪责难逃”等等。

当外事局冲击会场的人退出后，杨成武又向到会的总参党委委员和列席的部、局领导重复了一遍25日事情的经过。

当天晚上，外事局的大字报就贴出来了。

当外事局的大字报写好后，曾拿去找杨成武，请他签字，杨成武不签字，他们就找到副总参谋长王新亭，让王新亭签字，王新亭也不签字。外事局的群众见王新亭也不愿意签字，就找到作战部部长王尚荣，王尚荣当时正在值班，外事局的群众就让王尚荣在大字报上签字，王尚荣说要通过杨总长再说，可是群众不答应。于是，王尚荣就签了字。不仅他签字了，同时值班的另一位作战部副部长雷英夫也签了字。

接着，作战部连夜开会，贴出“支持外事局群众革命行动”的大字报。作战部部长王尚荣、副部长雷英夫等人在大字报上签了名。

作战部的大字报贴出后，总参各部、局马上响应，也纷纷贴出大字报，表示对外事局部分人的支持。在此前后，解放军测绘学院院长刘清明等人贴出批判杨成武的大字报；贺龙办公室工作人员贴出了题为“炮打总参办公室党委”的大字报。总参机关内陆续出现了一批揭发、批评杨成武的大字报，形势发展异常迅猛。

当晚，杨成武带着他的夫人和小女儿来到人民大会堂西大厅林彪的住处，要见林彪。林彪的警卫秘书李文普赶紧起身迎了出去。不管谁来见林彪，总得提前打个招呼。杨成武不约而来，肯定是因事情紧急。李文普让杨成武在西大厅稍候，他先去浙江厅报告林彪和正在这里的叶群。

杨成武是来汇报总参炮轰杨成武一事。他们走后，叶群来到秘书值班室，满脸狐疑地对几个秘书说：“总参作战部的正副部长带头贴大字报，炮打杨成武代总长，这件事真稀奇！杨代总长是主席和首长都信任的总参负责人，王尚荣、雷英夫能有多么大的胆子？！我看准

是有黑后台。你们看呢？”

秘书们谁也没敢搭腔。

叶群走后，“林办”秘书老赵对新来的秘书张云生说：“看来要抓黑后台了。对这种事，我们当秘书的千万不能多嘴。不管主任说什么，我们宁可装作听不懂，不能参加议论。”

按照军委和总政的指示，军队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是在各单位党委领导下进行的，总参的运动才开展两三天，就发生了冲击总参党委的事件，这是非同小可的事。军委通知，要各军兵种党委成员到国防部大楼看大字报，看了以后要写大字报表态，送给国防部。

在国防部大厅的一角，有两张不甚显目，但观点对立的大字报。一张是毛家湾林彪办公室写的批判王、雷观点的大字报，一张是东交民巷 8 号贺龙办公室写的支持王、雷观点的大字报。王尚荣是贺龙的老部下，这两张大字报，引起大家特别注意。

也是在 8 月 25 日这天，海军党委扩大会议结束,通过了《团结起来,以大局为重,焕发精神,努力工作》的决议。决议基本吸取了李作鹏的意见，把原来写的“地下活动”、“黄袍加身”,“要把肖、苏搞成罗瑞卿分子了”,“李、王、张的错误就是不按组织原则办事”等等说法都删掉了，但还是保留了“海军党委三届二次全会关于《海军党委常委内部争论问题的情况报告》是错误的，除存档外，一律销毁。《三年工作基本总结》有原则错误，一律收回存档。”

被说成是错误的《海军党委常委内部争论问题的情况报告》，是 1965 年 11 月底，根据林彪的指示，在海军党委三届二次会议期间，

由政治部主任张秀川组织，将海军党委三届二次全会上，海军领导对近几年落实“突出政治”中的两种思想分歧情况汇总的一个上报林彪的材料。

《三年工作基本总结》则是海军党委三届二次会议通过的决议。

长达两个多月的海军党委扩大会议终于不欢而散。此时海军机关的“文化大革命”之火已经热火朝天的烧起来了。从 8 月中下旬开始，军以上机关的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先后展开，文体单位揪斗领导已经开始，海军大院自然也是热闹非凡。刚开始，群众大字报所揭露的问题尚多属于工作中的一般性的缺点错误，司令部机关也给时任海军副参谋长、张学良的弟弟张学思贴了几张大字报，主要是说他“家里养只贵族猫”，“给猫喂鱼、看病”之类的琐事。

在海军党委扩大会议期间，已经不断有从下边部队、院校来的群众冲击党委扩大会议，要求揪斗各级党委的主要领导干部。召开海军党委扩大会议的海军第一招待所的墙上，贴满了对海军党委扩大会议不满的大字报，将会议称为“世外桃源”、“马拉松会议”。

就在海军党委扩大会议结束的当天，8 月 25 日，海军航空兵政治部副主任罗斌，以“井冈山红卫兵战士罗斌”的署名，贴出了一张很长、很具体、很有分量的，关于这次海军党委扩大会议情况的大字报。尽管他没有参加海军党委扩大会议，却把这次会议的基本情况全部公开出来了。

在林彪的指示传达后，特别是海军党委扩大会议形成决议后，这张大字报的内容就显得格外显眼，苏振华觉得不好，赶忙把它移到一

个大仓库的空房子里面，只让团以上干部看，其他人不准看。这样又引起营以下干部群众的不满。

海军罗斌的大字报，使很多人集中火力，炮轰李作鹏、王宏坤和张秀川。“万炮齐轰李、王、张”，“火烧油炸李、王、张”，“打倒李、王、张，再踏上千万只脚”，这样的大字报、大标语像雪片一样贴满海军大院，甚至一直贴到李作鹏、王宏坤家的墙上和写在他们的门口地上，不时还有高音喇叭对着办公楼和他们的宿舍高喊口号。

这些海军大院炮轰李、王、张的干部造反派们当然不知道，8 月 26 日，林彪在关于总参“825 事件”的材料上批示：总参“825 事件”与不久前煽动空军反吴法宪、海军反李作鹏、王宏坤等“同出一个根源”，并据此报告了毛泽东。

周恩来得知总参“825”炮轰杨成武的消息后，也立即给杨成武打来电话，询问情况，并要杨成武提高警觉，说：“人家都要夺你权了，你还不知道！”

8 月 26 日，周恩来给总参来信：

杨成武同志转告总参谋部各部、局党委：

昨(25)我陪同毛主席接见坦桑尼亚军事代表团时，杨成武同志向我反映，总参外事局同志提出不要潘振武同志参加接见。杨成武同志同意这一要求，并向我建议不让潘振武同志参加接见，我同意他的意见，并于事后报告了主席。可将这一情况转告有关同志。

周恩来

1966、8、26

就在周恩来发信之后的次日，毛泽东的秘书徐业夫也写来亲笔证明：

总参党委：

8 月 25 日毛主席接见坦桑尼亚军事代表团之前，总参外事局孙启祥同志打来电话说，不让潘振武同志参加，我当即报告了杨成武请他决定。这时总理已到，他即向总理反映了我接外事局电话的情况，并向总理建议不让潘振武同志参加，总理当时同意了杨成武同志的意见，并及时告诉了潘振武同志不要参加了。

此致

敬礼

徐业夫

8 月 27 日

总参作战部的人看到周恩来和徐业夫的文字证明后，立即翻了过来，说他们受骗了，说外事局有些人造谣，上了外事局那些人的当。他们群情激愤，集合队伍，摩拳擦掌，要去冲外事局，有的甚至几乎要动手打起来。杨成武赶紧出面制止。

8 月 25 日，西安也发现了一起严重的“反革命事件”：这天发行的《陕西日报》第三版以《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为题，刊登了纪念毛泽东《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发表 20 周年的有关文章。第四版刊登的是“毛主席检阅首都百万革命大军”的图片，两版都是“宣传毛泽东思想的版面”，按说应该够“革命”的了，谁料却祸从天降。当天下午，中山街《陕西日报》社门口

旁边的橱窗前，许多人拥挤在那里吵吵嚷嚷，只见报栏里挂着一份当天的《陕西日报》，透过灯光清楚地看到印有“毛主席”的一版后不偏不斜地印有“纸老虎”三个大字。许多人气愤地涌进报社要找总编和排版人辩论。门口警卫的解放军战士让众人在院子里等候，他们去叫，但迟迟叫不来总编和排版人，只有报社文化革命委员会主席出来面对群众。群众不答应，吵嚷着要他们的总编出来答话。

到了晚上，整个中山街已经是拥挤不堪，到处是红旗、校旗及毛泽东像、《毛主席语录》牌。辩论会已经开始，喇叭里正传出各单位代表的声讨发言。代表的发言个个义愤填膺，说报社“有意侮辱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是可忍孰不可忍……”

26 日清晨,西安交大、公路学院等院校 2 万多师生,聚集并包围了《陕西日报》社,痛斥这天报纸第三版标题《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中的“帝国主义”和“纸老虎”几个字正好对准了第四版毛泽东像的头部中央,“反动派”几个字正好对准了陈伯达的头和脖子,认为这是“以偷天换日的手法,对我们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进行的恶毒侮辱”,“是对我们无产阶级的猖狂进攻”,“是一个精心策划的反革命事件”,并将此事与西北局和陕西省委联系起来,向报社提出“六项要求”:

1、在报社门口召开声讨大会；

2、立即安装喇叭,布置会场；

3、刘澜涛(西北局第一书记)、霍士廉(陕西省委第一书记)参加大会,但不得发言；

4、由代总编辑李一松(陕西省军区副政委)交代问题,如交代不好,即封闭报社;

5、起草电报发往中央,不得延误;

6、两日内必须报道“西安交大等院校声讨省委黑帮大会”的消息。

学生们高呼“砸碎报社”、“封闭报社”“接管报社”等口号,冲进报社,占领报社编辑部办公楼,控制对外电话,限制报社人员出入,打烂贴报橱窗和楼门玻璃,闯入办公室,拿走和抄录文件及社论草稿、报刊杂志和钢笔、文具等,搜查两位副总编辑的办公室和宿舍,翻箱倒柜。

有些人还要强行摘掉李一松的帽徽和领章,让李一松戴高帽子游街,将他批斗长达7个多小时,陕西师大和北京工大赴陕战斗队有人还贴出“西安一毒草,长在中山街(即今东大街,陕西日报社时在该街),施肥自有省委人,根子实际在小寨”(指陕省军区)的街头诗和“立即改组陕西省委,立即改组陕西日报社”的大幅标语。其余如《陕西日报有鬼》、《陕西日报站在什么立场》、《赤膊上阵的陕西日报》、《戳穿陕西日报社的大阴谋》、《陕西日报是文化革命的绊脚石》等大字报更是满街都是,形成轰动一时的“825陕报事件”。

《陕西日报》不得不起而申辩,8月26日开始向全省以及全国160多个城市和广大农村大量印发题为《这是在干什么?》的传单,辩称“本月二十五日本报四版印有毛主席像和背面第三版印有‘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新闻标题,二者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

当天报纸、版样由四人分工,四版画刊是使用《人民日报》原版,三版新闻系新华社电稿,按版编排。审大样时是一版一版打出清样审查,第四版因用《人民日报》原版,不作审查。毛主席的像我们经常要刊登,关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语句,也要经常刊登,因而有时很难完全避免出现类似,别的报纸也有这种现象。再说,人们看报总是一个版一个版地看,不可能透过一版看二版”。同时表示“要继续努力,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把《陕西日报》办得更好。革命的同志们对我们提出意见,帮助我们发现问题,改进工作,我们衷心感谢”,并说围攻报社是“一小撮怀着不可告人的邪恶图谋”的坏人操纵的,要“革命的同学们、同志们”“千万擦亮眼睛,提高革命警惕性,谨防政治扒手,不要上当”。

《陕西日报》出版部也于8月27日贴出《什么人才干这种事——揭露坏人诬蔑党报》的大字报,说“少数别有用心的人,把根本不能联系也决不应该联系在一起的问题,死硬联系在一起,公然进行反动宣传。他们的目的不是昭然若揭了吗?他们的目的不是恶毒万分吗?报纸和其他书刊一样,我们平常阅读时,哪里会对着光看?只有那些别有用心的家伙,才采取这种办法进行煽动和欺骗,真是无耻之极。”

## 第 151 回：援交大，上海也出“八二五”反党委？青岛市亦发事端

8 月 31 日，《陕西日报》又以“陕西日报社全体革命职工”的名义,向全国发出《关于八月二十五日事件真相的公开信》,再次重申前面的辩词,同时进一步提出例证说：“我们翻阅了近一个时期全国的许多报纸,都有类似本报八月二十五日的版面的情况,说明出现这种情况是难免的,这怎么能说成是‘反革命’事件呢?”并且特别指出,“这次前来质问《陕西日报》的绝大多数群众,他们是出于对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热爱,是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阶级觉悟和政治警惕性大大提高的表现”,但“这次事件是有极少数人利用部分群众不明真相进行煽动,并向报社提出无理要求,故意破坏党报的威信,以达到他们不可告人的目的”。

一些对交大等校师生持反对观点的,如西安医学院、火炬小学等校的师生和庆安公司、肉联厂冷库的部分职工,同样于 8 月 26 日贴出大字报，称：

“我们最最强烈、最最坚决地谴责交大、冶院等校一小撮反革命分子借《陕西日报》在排版中三、四版的偶合大肆造谣生非,围攻我《陕西日报》社,破坏《陕西日报》社的正常工作,并严重影响了社会秩序,更使人不可容忍的是,向省委提出无理的‘六项要求’！我们呼吁广大工农兵群众和革命的师生员工团结起来,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以《十六

条》为准,戳穿这一小撮反革命分子的有目的、有组织、有计划、有步骤的妄想变天的大阴谋。”

同时也指出：“仅根据八月二十五日《陕西日报》上的一个问题,完全断定这是一个精心策划的反革命事件,并提出立即改组编辑部、停刊的要求,我们认为在事实真相没有彻底调查清楚之前,下这样的结论是不恰当的……《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等报刊,发现也存在类似严重问题,它究竟是什么性质,我们也不能过早下结论。”

西安医学院二院部分师生题为《是精心策划吗?》的大字报,还逐一列举了 7 月 1 日的《羊城晚报》,8 月 24 日的《健康报》,7 月 18 日、6 月 29 日、6 月 19 日、8 月 15 日的《人民日报》,6 月 19 日、7 月 1 日的《解放军报》,7 月 1 日的《文汇报》和 5 月 2 日的《羊城晚报》,说“以上报纸,也有‘黑帮首领’、‘反动派’字样，”“难道这都是反革命策划的吗?既然你们警惕性很高,交大同学在毛主席像背后写着‘造反有理’,你们是造谁的反?为什么不把他揪出来?”并进一步断言,“显然这是一小撮反革命分子借我们对毛主席无限热爱、无限信仰、无限崇拜的心情,而造谣生事,煽动群众闹事”。这些声音无疑给危境中的《陕西日报》送去了难得的同情和声援。

但是，面对造反师生的咄咄攻势，风雨飘摇中的西北局和陕西省委深感压力巨大。在造反师生的强烈要求下，他们

不得不组织由“革命学生、革命工人、革命干部”组成的陕西省委“《陕西日报》社印发传单问题检查团”，于 11 月 2 日进驻《陕西日报》社，对“825”传单一事进行检查。

这期间，还发生了河南、四川、北京等外地学生前往西安声援西安交大的事情。

8 月 24 日晚上，成都大学校园里一片沸腾，高音喇叭不断地传出十分紧急的“呼吁”和“倡议”，号召大家去西安声援西安交大的革命师生。“校文革”不同意大家去西安，学生们和他们辩论。“校文革”副主任赵东亚和市委办公室通电话。市委不同意大家去西安，但是大家都不答应，要求再向市委反映他们的要求。但是，一直得不到市委方面的许可。于是，有人带头高喊：“走啊，走！不要他们同意了，我们自己去！”一边喊一边朝外走。这样一来，其他的人也就跟着走。同学们背着行李，步行到了青羊宫，然后顺着一环路走到了成都火车北站。

校领导来了，要求大家不要去西安。但是没有人听他们的。

不久，又来了成都电讯工程学院的宣传队，他们安上高音喇叭，对着学生的队伍大声宣传，不厌其烦地反复讲一些不应该去西安的话。同学们听得不耐烦了，涌上去和他们辩论。闹腾了一阵子，宣传队只好走了。

到天亮的时候传来了消息：成都铁路局同意为学生安排

专列，大家立即欢呼起来。8 月 26 日下午 13 时多，他们到达了西安火车站。

整个西安，一条一条的街道全都穿上了一层大字报和大标语缝制的外衣。大字报和巨幅标语贴满了所有的墙壁，连房顶上、马路上也贴上了。而且，尽是诸如：

“向西北局、陕西省委黑帮猛烈开火！”

“坚决要求改组陕西省委！”

“愤怒声讨陕西省委黑帮镇压革命学生的滔天罪行！”

和“坚信以刘澜涛为首的西北局是革命的！”

“坚信以霍士廉为首的陕西省委是革命的！”

“坚决粉碎交大、冶院、西工大等院校一小撮右派分子对党的猖狂进攻！”

“坚决反对改组陕西省委！”

等等针锋相对的巨幅标语贴在一起。

此时的西安交大，无论什么地方都贴着大字报。到处是人山人海，来这里声援的，参观的，了解情况的人们络绎不绝，川流不息。与四川的同学同时到达的，还有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四川音乐学院的学生和西安的一个工厂的工人。这几支声援队伍汇聚在大操场上，先后发表自己的演说。交大的代表致欢迎辞。

8 月 28 日，四川的同学在西安城里去张贴大字报、大标语，表示他们对西安交大、冶院等校革命师生的支持。游行

队伍则从陕西工业大学出发，浩浩荡荡，进城游行。他们的队伍一路经过冶院、西北局、西工大、市中区、陕西省委。一路上口号声不断："坚决支持交大等院校革命师生的革命行动"、"向西北局、陕西省委中的黑帮猛烈开火"、"革命无罪，造反有理"。

游行队伍走了不远，就有一只只人数更多、总计大约有好几万人的游行队伍从他们的对面走来，他们举着大幅横标，敲锣打鼓，同时也高喊口号，队伍前面有装备着高音喇叭的广播车。口号是："坚信以刘澜涛为首的西北局是革命的"，"坚信以霍士廉为首的陕西省委是革命的"，"只许左派造反，不许右派翻天"、"打到右派学生"等等。

这些游行队伍，先后两次把四川大学生的宣传车包围起来。

8 月 29 日上午，在西安市体育场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外地来西安学生声援西安革命学生大会"，来自全国，主要是北京、成都和南京的 100 多所高校的近 2 万名学生参加。在会上发言的人一致表示坚决支持西安交大等院校的革命师生的革命行动。会议还通过了给党中央和毛主席的致敬电。会后，与会者又在市区主要街道举行游行。

为了保护游行队伍的安全，西工大、交大和陕西工大的同学们集合起来，在马路两边排成行，让外地的游行队伍从中间通过。

8 月 30 日，成都大学等院校赴西安支持交大的学生返回城都，受外地学生运动影响，他们回到成都后，第一次喊出了“炮轰西南局，火烧省市委”的口号。

我们再看上海，这里也在 8 月 25 日发生了上海“825 事件”。

8 月 24 日，复旦大学校内贴出了当时尚未公开发表的毛泽东《我的第一张大字报》，学生们读后如同注射了兴奋剂，许多学生热泪横流，纵声欢呼。

8 月 25 日，复旦大学赴京告状的孙月珠同学从北京返校。8 月 18 日那天，她和劳元一也登上了天安门城楼，并和毛泽东握了手。那天傍晚，他们打电报到复旦大学，整个复旦沸腾了，复旦大学的少数派纷纷到各大学去报喜，喜讯立即传遍全上海。

少数派把孙月珠、劳元一上天安门看作是他们的胜利，把毛泽东和孙月珠、劳元一握手看作是伟大领袖对他们的支持。当晚，复旦大学大礼堂里泪花盈盈，口号震天，震耳欲聋地回荡着杀气腾腾的战歌“……谁要不革命，就滚他妈的蛋！滚、滚、滚、滚他妈的蛋！” 把国骂谱成歌唱遍全国是历史的荒诞，但当时的学生们的确是感到难以名状的痛快。

复旦中文系四年级学生、“过河卒”小组负责人安文江是大会主席之一。深夜 23 时许，1400 多激情难抑的红卫兵

大学生应上海戏剧学院少数派的要求，高举精心裱装的《炮打司令部》，高唱《造反有理》冲向上海戏院。通宵的大辩论使几位誓死保卫司令部的藏族班学员昏厥过去，多数派则把更多未昏厥的藏胞抬上台去。这就是震惊上海的“825”事件。返校途中，学生辅导员蒋老师失口错呼了口号，更给“825”增添了恐怖色彩。

作为“825”上海首次大串联的领队，又是上海戏院大辩论主持人的安文江，他有些惶恐不安。第二天的《解放日报》以鲜明的标题报道上海戏剧学院多数派“坚决捍卫‘十六条’”的消息。虽然没点名，复旦大学和上海戏院的少数派学生实际上被指控为践踏“十六条”的暴徒。

8 月 26 日晚，复旦大学在大草坪召开 4 万人大会，约请了全市各高校代表，声讨“825”事件。曹荻秋市长出席并讲了话，他说这一事件“掺杂着两类矛盾”。“825”大串联和大辩论的组织者之一安文江在会上被多次点名。在这种声讨气氛中扬名，他很紧张，很惶恐。可是曹荻秋的讲话和毛泽东的大字报形成的强烈反差又坚定了安文江的信心。他坚信伟大领袖支持炮打司令部是不容怀疑的。“我怕个屁！”于是，他们在宿舍楼前贴出对联“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

少数派学生们认为：“既然毛主席站在我们一边，那么反对我们的群众无疑是保皇派，反对我们的领导必定是走资

派。”在当时，这似乎是一加一的算式。

复旦大学“孙悟空”小组的胡守钧等人和曹荻秋当场就有关问题进行争辩。

后来，在文化广场的一次演说中，安文江慷慨陈词：“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卫兵，我们是少数派！少数怕什么？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暂时、虚伪的多数我们不稀罕！有毛泽东思想指引，革命的少数发展为明天的多数是历史的必然！”他在演说的结尾，大声呐喊：“有毛主席撑腰，我们就是最强者！白色恐怖，我们不怕！反革命帽子，我们不怕！拎着脑袋干革命，砍头不过碗大的疤！”

8 月 25 日，美丽的海滨城市青岛也发生了对青岛乃至山东，甚至全国都有影响的著名的“825 事件”。

6 月 25 日，青岛医学院在市立医院实习的部分五年级学生在市立医院贴出“揭开七病房的内幕”，“严厉警告市立医院领导”等大字报。当晚，青岛医学院 9 名学生继续在市立医院召集青岛卫校部分学生在三、四、五、九病房开会，鼓动卫校同学“解除顾虑，去掉怕字，大胆地给党委提意见”。

他们开会时，在门外派人站岗放哨，引起了市立医院职工的怀疑。她们进入三、四病室，听到青岛医学院的学生正在讲：“……我们只相信党中央，只相信毛主席，别的党委都不要相信……”等等。

“这还了得，竟敢不相信党委？这不是要反党吗？”市立医院的职工当时就和青岛医学院大学生在病房内辩论起来。激烈的辩论声惊动了三病房值班护士，她进来阻止他们说：“你们这样大声说话，妨碍病员休息。”同时向医院党委打电话报告了此事。

市立医院主持工作的是党委副书记张秀文，她让值班护士通知学生们立即退出病房。随后又以医院党委的名义接连打来两次电话，学生们这才离开。

这就是后来所说的市立医院压制革命学生的“625”事件。

到了两个月后的 8 月 24 日，这天上午 11 时许，青岛医学院的 100 多名学生带着两份大字报：《为纪念“六.二五”革命风暴两个月》和《“六.二五”革命风暴的真相》到市立医院，从提旧事，矛头对准了院党委张秀文，说她对抗《十六条》，把革命学生打成反革命，因而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学生们围斗了卫校学生张淑梅，因为她是张秀文的妹妹，所以说她是“保皇派”。

医学院学生们的言行引起医院职工的不满，双方发生了冲突。当晚 19 时，青岛医学院的部分人又来到市立医院，要参加声讨“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张秀文”的大会。市立医院根本没有召开这样的会议，所以拒绝青岛医学院的学生进入医院。

青岛医学院的学生们在市立医院讨了没趣，不知所以。这时，有人提出到市委告状，正无所适从的学生们群起响应。约 20 时，600 多名青岛医学院学生来到栈桥青岛市委门前请愿静坐，指控青岛市立医院党委副书记张秀文镇压革命群众运动，强烈要求市委罢掉她的官。青岛市立医院是青岛医学院的实习医院，青岛医学院的学生曾经支持过这个医院附属的卫生学校学生的造反行动，他们自认为有干预这个单位运动的权力。

市委秘书长李克出来接待这些大学生，但学生对李克的答复不满意。看到站在大院里的学生们所表现出的愤怒和坚定，青岛市委第一书记张敬焘马上召开常委紧急会议讨论学生们的要求。

23 时，青岛市委做出决定：撤销医院负责人张秀文的职务。市委第一书记张敬焘亲自出来向学生们宣布："根据同学们现在揭发的问题，市委决定罢张秀文的官。"

一直等候在大院里的大学生们立刻欢呼雀跃起来，激动地宣称这是毛泽东思想的又一个伟大胜利。

他们立即返回市立医院，准备连夜斗争张秀文。但是，没有找到张秀文。学生们抓住了认为是"保皇派"的张淑梅、于希恩等 12 名医院的干部、职工，将其中 9 个他们认为最顽固的"保皇派"强行按头，让他们跪在地上或桌子上，有的脸上涂了墨，给他们戴了高帽子，有一人还顶了一个小

铁碗。对不服从的人，学生们拳打脚踢，有的衣服都被扯碎了。

第二天，8 月 25 日晨，青岛市立医院的群众把夜间被医学院学生打伤的 9 个人抬到市委门前，控诉青岛医学院学生的“法西斯暴行”。

25 日一早，青岛医学院学生又给市委送来了《坚决造市委的反》、《青岛市委有鬼》等大字报。

这天上午，青岛医学院的学生再次来到市立医院，占领了党委办公室，砸破玻璃，进入广播室，向全院广播张秀文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

下午，市委到医院传达对张秀文的处理意见，青岛医学院的部分同学闻讯赶到会场，将作为会场的医院食堂挤得满满的。他们在会场内外站岗放哨，强行占领讲台，主持会议。会上不仅斗争张秀文，还把多名医院的职工，作为“保皇派”揪到台上进行批斗。青岛医学院的同学领呼口号，当呼到“打倒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张秀文”时，医院的职工没有呼，青岛医学院学生当场殴打多名医院职工。市委李克前来劝解，被学生轰了出去。

学生们宣称当晚要召开万人大会，冲击市委。

青岛市委立即向山东省委作了汇报，省委书记处书记刘秉琳接的电话，请示谭启龙后，传达省委指示，要求学习宣传八届十一中全会 8 月 8 日通过的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文件

“十六条”。

青岛市委于当天晚上召开常委会议研究应对方案。会议认为：青岛出现的这些问题主要是《十六条》还没有掌握好，没有深入人心。因此决定当晚在全市掀起一个学习、宣传《十六条》的高潮。

## 第二部第一卷

## 各地文革章回索引

**北京：**

第 102 回；第 103 回；第 104 回；第 106 回；第 107 回；第 108 回；第 109 回；第 110 回；第 111 回；第 112 回；第 113 回；第 114 回；第 124 回；第 125 回；第 126 回；第 128 回；第 129 回；第 130 回；第 131 回；第 135 回；第 138 回；第 139 回；第 140 回；第 144 回；第 149 回；

**红卫兵：**

第 102 回；第 103 回；第 126 回；第 127 回；第 128 回；第 129 回；第 131 回；

**清华大学：**

第 102 回；第 103 回；第 104 回；第 105 回；第 126 回；第 137 回；第 139 回；第 143 回；

**“对联”：**

第 103 回；

**“二月兵变”：**

第 103 回；第 105 回；

**北京航空学院：**

第 103 回；第 127 回；第 135 回；第 143 回；第 149 回；

**人民大学：**

第 103 回；第 127 回；第 136 回；

**北京地质学院：**

第 104 回；第 127 回；第 142 回；

**大串联：**

第 104 回；第 119 回；第 124 回；第 125 回；第 131 回；

**北京大学：**

第 105 回；第 125 回；第 126 回；第 142 回；

**海军：**

第 113 回；第 127 回；第 130 回；第 150 回；

**刘少奇、61 人叛徒案：**

第 128 回；

**总参：**

第 150 回；

**“首都工作组”：**

第 126 回；

**破四旧：**

第 126 回；第 130 回；第 134 回；第 137 回；第 138 回；第 139 回；第 141 回；第 142 回；第 144 回；第 145 回；第 146 回；第 147 回；第 148 回；

**上海：**

第 116 回；第 117 回；第 118 回；第 119 回；第 132 回；第 144 回；第 151 回；

**天津：**

第 109 回；第 110 回；第 125 回；第 134 回；第 145 回；

**东北地区：**

**辽宁：**

第 134 回；

**黑龙江：**

第 114 回；第 115 回；第 131 回；

**西北地区：**

**陕西：**

第 119 回；第 124 回；第 138 回；第 150 回；第 151 回；

**甘肃：**

第 110 回；第 138 回；

**西南地区：**

**四川：**

第 120 回（重庆）；第 121 回（重庆）；第 122 回（重庆）；

**云南：**

第 148 回；

**西藏：**

第 148 回；

**中南地区：**

**河南：**

第 123 回；第 132 回；

**湖北：**

第 134 回；

**湖南：**

第 133 回；第 139 回；

**广东：**

第 111 回；第 122 回；第 134 回；第 141 回；

**广西：**

第 123 回；

**华东地区：**

**山东：**

第 151 回；

**江苏：**

第 106 回；

**浙江：**

第 145 回；第 146 回；

**福建：**

第 111 回；

# 文革史话

之

第二部

# 狂风骤雨

第二卷

# 目　录

第 152 回：断关系，副统帅发表声明
戈壁滩，林晓霖被遣新疆
第 153 回：广播响，哈军工一片哗然
黑龙江，众领导被斗台上
第 154 回：李文波，打人潮狂卷首都
西城区，纠察队宣告成立
第 155 回：谢富治，公安系统座谈会
逐黑帮，破四旧还在继续
第 156 回：文化宫，设红卫兵联络站
定《十条》，难遏止“清华模式”
第 157 回：黄花岗，自由神像被砸毁
石头城，中山铜像起风波
第 158 回：护古迹，龙门石窟辩论急
存与毁，千年名胜学生定
第 159 回：抢话筒，风波起开封师院
找地委，组织众人赴郑州
第 160 回：做得对！豫省委支持造反
听社论，长沙市地覆天翻
第 161 回：冲市委，天津在风雨飘摇
皖工大，炮轰省委李葆华
第 162 回：八二七，安徽造反派组合
几酝酿，红卫兵“一司”成立
第 163 回：再接见，周总理谆谆教诲
介绍信，学生免费乘火车
第 164 回：挺身出，杭州车站振臂呼
大串连，红卫兵四处点火
第 165 回：风云起，江渭清沉着应对
八二六，川大质疑廖志高
第 166 回：四不准，李井泉亲赴重庆
八二八，山城内再起风波
第 167 回：救命信，几经周转方才见
虽批示，润之未能救李达
第 168 回：疑省委，湖北大学成中心
“一小撮”，三镇组织搞反击
第 169 回：传经验，北京红卫兵抵沪
借东风，刘建勋欢迎炮轰
第 170 回：改路名，苏使馆前人潮涌
狂涛中，宋庆龄亦遭波及
第 171 回：要保护，周恩来开具名单
上海市，有组织三天抄家
第 172 回：讲政策，陈毅再谈“破四旧”
真敢想，竟要“造三个大反”

第 173 回：乱炮轰，人大政协不办公
逐修女，红卫兵战果辉煌
第 174 回：八三一，毛泽东再次接见
审《通知》，要保护重点部门
第 175 回：座谈会，组织红卫兵串联
开杀戒，大兴县血雨腥风
第 176 回：中学生，自己动手出报刊
揪厅长，厦八中执意北上
第 177 回：大混乱，万人会草草收场
烈日下，众学生静坐求见
第 178 回：见与否？省委意见难统一
终露面，广场上热浪一片
第 179 回：绣花针，一句话又遭炮轰
速解围，东海前线红卫兵
第 180 回：保省委，急动员工农上阵
大辩论，榕城内人潮汹涌
第 181 回：多与少，闽常委争论激烈
揭内情，《福州日报》再起事
第 182 回：担责任，张平化返回长沙
得电告，谭启龙亲赴青岛
第 183 回：谣言起，工人学生如水火
蓉城乱，学生静坐省委前
第 184 回：谣言传，“总理、江青到成都”
有组织，学子屡屡受围攻
第 185 回：难掌控，重庆人搭车进京
赴贵州，南下学生遭围攻
第 186 回：保市委，“我们工人要说话”
急调人，康平路如临大敌
第 187 回：下工厂，学生与工人结合
紧跟党，王洪文带头造反
第 188 回：起争议，工作组到十七棉
“老鼠队”，安徽打击“八二七”
第 189 回：组队伍，山城中学生造反
想不通，傅连璋多次求救
第 190 回：看新疆，九月三学生绝食
丁大胆，兵团抓阶级斗争
第 191 回：发通知，组织学生大串联
见贺龙，叫停少奇“生活会”
第 192 回：再结盟，北京二、三司成立
点烈火，农大学生到农办
第 193 回：海拉尔，国际列车闹反修
秋收到，革命还要促生产
第 194 回：电话急，周恩来亲自召回
爆黑马，毛泽东“青岛批示”

第 195 回：为平反，地院二进地质部
请小将，王任重煞费苦心
第 196 回：九头鸟，“我是地上湖北佬”
冷清清，红卫兵广东传“经”
第 197 回：黑龙江，大会批斗省领导
回母校，毛远新两派协调
第 198 回：提抗议，红卫兵西安绝食
周恩来，飞机接学生进京
第 199 回：九五夜，万炮齐轰闽省委
巧成拙，苏联播“洪乐急电”
第 200 回：湖南省，“炮轰省市司令部”
为信仰，投身中国大革命
第 201 回：外国人，积极组织红卫兵
办《快报》，成立“文革记者站”

第 152 回：断关系，副统帅发表声明　戈壁滩，林晓霖被遣新疆

8 月 25 日 20 时，青岛市召开工交、财贸等会议，要求各单位层层传达下去：让工人自发地去宣传《十六条》。于是，各单位的工人队伍开始上街。特别是到青岛医学院门前宣传《十六条》的队伍特别多。

工人们在马路上高呼“要文斗，不要武斗！”

青岛医学院学生则在校园内高呼“革命无罪，造反有理！”

学生和前来宣传《十六条》的群众在校门口展开了激烈的辩论。

晚上 21 时多，台东医院副院长在青岛医学院门前宣传《十六条》，在辩论时被医学院的学生抓入校内关了起来，双方矛盾激化。

与此同时，还有很多单位的工人按照领导的安排，聚集在青岛市委门前宣传《十六条》，防止冲击市委的事情发生。

从 8 月 26 日 0 时 30 分开始，青岛市约有 10 万人上街宣传《十六条》。一批批工人的队伍，还有中学红卫兵，簇拥着一辆辆宣传车，从市委门前出发，经过漫长的中山路，最后到达青岛医学院；然后再回到市委，周而复始。游行队伍每走到医学院周围，便锣鼓喧天，喇叭齐鸣，口号喊得震天响。各路队伍的口号统一为：

“要文斗、不要武斗！”

“打倒青岛医学院！”

“打倒右派学生！”

“保卫青岛市委！”

“学习《十六条》！”

“拥护《十六条》!”

“宣传《十六条》!”

“捍卫《十六条》!”

青岛医学院被围困，学生被围攻。

就在 8 月 25 日下午，青岛化工学院的同学也收到西北工业大学的来信，得知“西安交通大学事件”的消息，请求他们支援。于是，青岛化工学院派了师生代表到青岛市委，要求派代表团前去西安支援。

当晚午夜 24 时 30 分左右，化工学院的师生代表来到市委门前时，遇到一群自称是 “宣传大队”的人围上来给他们念《十六条》。化工学院的学生问他们是哪个单位的？他们也不正面回答，只说是“宣传大队”。化工学院的学生对他们说：“我们要开会，是不是等我们开完了会再听宣传”。

那群人仍然围住学生继续念《十六条》。原来这些奉命前来宣传《十六条》的工人，以为这些大学生就是来冲击市委的。

化工学院的师生代表对这群人半夜三更围着他们念《十六条》的行动莫名其妙，于是自己组织起来学习《十六条》，不听那些人念了。工人们不肯罢休，批评大学生冲击市委是错误行为。双方展开辩论，最后引发冲突。因为工人太多，好汉不吃眼前亏，化工学院的学生赶紧上了送他们前来市委的 4 辆汽车跑了。

前脚化工学院学生刚走，后脚海洋学院学生又来到市委。

海洋学院的师生是在 8 月 26 日凌晨 1 点多钟，收到化工学院文化革命筹委会印发的关于“西安交通大学事件”的通知后，一致要求

立即派代表团赴西安慰问和支持西安师生的革命行动。为此，他们排着队伍，敲锣打鼓来到市委门前。当两点半左右，他们的队伍到达市委门前时，早已有许多带“红卫兵”袖章的人迎上来，立即包围了海洋学院的队伍。海洋学院学生就“西安 815 事件”向市委提出了两点要求：

1、问市委以前是否知道这件事？

2、要求迅速派代表团去西安，表示支持和慰问。

市委一位负责人讲：没接到上级通知，不知道“西安 815 事件”；“派代表团由你们根据《十六条》自己决定”。

海洋学院的学生认为市委“态度很不明朗”，不肯离开，并且与在市委门前的职工群众辩论起来。到 26 日早晨上班的高峰时期，聚集在市委门口的市民和工人越来越多。

这时，市立医院 24 日晚被打的那 9 个人又被用救护车拉到市委门前。在场的工人群众看到躺在担架上的几个人，异常气愤，围住海洋学院的学生。有的群众呼喊“资产阶级造反无理！”“打倒右派学生！”等口号。

将近上午 9 点钟，青岛市委书记张敬焘出来讲话。他肯定学生们的革命大方向，要求大家认真学习《十六条》，欢迎贴大字报，并说：“西安事件我们不知道，同学们组织去，市委同意”。

海洋学院的学生这才主动退出了会场，回到学校。

至此，青岛医学院，海洋学院和化工学院这 3 所在青岛 8 月 25 日扬名的学校，被青岛人简称为“三大院校”。

被围困的青岛医学院的学生们并没有被降伏，他们坚信自己的主张是正确的，是符合中央精神的。8 月 26 日晚 19 时 30 分，一支队伍冲出校门口，企图到市委去提出抗议。但是一路受到工人的拦截和更激烈地围攻，到 27 日晨才得以返回学校。

事态的发展已远远超出青岛市委最初的想象。照此发展下去，孰对孰错，前景如何？实在难以预料。青岛市委束手无策了，频频向省委汇报和请示。

中共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谭启龙刚刚参加过八届十一中全会。这次全会印发了毛泽东给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热烈支持红卫兵的行动的信；毛泽东严厉指责共产党也镇压学生运动，实行资产阶级专政，还发表了针对中央一线领导人刘少奇的《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当他听了 8 月 25 日青岛市委的电话后，大声说："不要怕。要顶住。要准备戴高帽子，准备游街。"

8 月 26 日，青岛市委赶紧发出四条指示：

(一)工农兵要坚决支持学生的革命运动，绝不允许和学生发生冲突，绝不准斗争学生，不准到学校参加学生的辩论，在任何情况下，不准学生斗学生、工人斗工人。

(二)干部工人一律不参加学生的活动。

(三)所有机关干部组织起来，到医学院院外，对工人和街道居民进行说服马上离开，不要在医学院周围进行宣传。

(四)十六条，大型宣传一律停下来，主要搞小型的，不要到市委附近去宣传。

但是，已经为时晚矣。

“青岛笼罩着白色恐怖!”

“青岛在流血!”

一条条电讯传出青岛市，传向省城，传向北京。青岛三大院校的学生向全国发出最紧急呼吁：“中共青岛市委制造了大骗局，大阴谋，造成群众斗学生事件。”诉说他们“遭到了武装警察和工人、群众的围攻”，有“140 名师生被打伤”。

8 月 25 日这天，一条广播也震惊了位于冰城哈尔滨的哈军工，林彪宣布和他的女儿林晓霖脱离父女关系。

林晓霖在哈军工小树林辩论会的讲话很快就传到了北京。有一天，叶群从钓鱼台回到林办，对林办秘书赵根生说：“老赵，你看晓霖的事怎么办？”

老赵看着叶群，还没说话，叶群又接着说：“晓霖太不像话！她的‘八八战斗团’是保守派，在中央文革是挂了号的。她还到处演说，宣传保守观点。大家都知道她是首长的女儿，以为是首长在支持她。你们可以证明，我和首长才不支持她呢！”

叶群说到这里，显得很生气：“这都是首长自作自受。他把晓霖惯成这样，谁的话也不听，更不把我这个后妈放在眼里，但我就不相信拿她没办法！”

叶群将林晓霖的情况对林彪说了，林彪在秘书讲文件时，对秘书说：“你给我讲讲，晓霖都说了些什么？”

秘书将林晓霖讲话的梗概向林彪作了汇报。

“唔，”林彪苍白的脸上没有丝毫表情，沉默一会儿，他慢悠悠地说，“让国防科委派人去军工，不要晓霖乱说话。”

国防科委派人来到哈尔滨，住在省委招待所，就是哈尔滨人都知道的“107 号”。一连几天，国防科委的刘副局长请林晓霖来“107”谈话，中心内容是动员她退出“八八团”。

林晓霖不服气，举出两派间的许多事例和分歧点，说明自己没有错。

一天晚上，省委的小车悄悄驶进哈军工大院，一位省委机关的秘书找到林晓霖。

“潘书记今晚上要见见您。”秘书小声小气，客客气气。

林晓霖有点意外，心想：“我正想找潘复生书记反映意见呢。”她二话没说就钻进小车。

潘复生家的会客厅，宽大整洁，林晓霖刚刚坐到沙发上，潘复生就从房间里走出来。

“晓霖啊，”潘复生满脸堆笑，亲切地打招呼，坐在林晓霖的对面，一边让茶一边说，“今晚上把你请来，想和你好好谈谈心，啊，作为长辈嘛，我可能话讲得不那么客气喽。”

“阶级斗争是非常尖锐复杂的，”潘复生表情严肃，“陆平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中央都定性了嘛，这个，这个，正好他的弟弟刘居英又是你们的院长，你看，你怎么能保刘居英呢？”

林晓霖反驳道："陆平是陆平，哥哥是反革命，弟弟就一定是反革命？如果刘居英够反革命，怎么没有见到谁拿出材料来？潘书记有吗？给我看看。"

潘复生的脸上掠过一丝不快的阴影，他耐着性子继续说：

"晓霖呀，你想想，什么是中央的精神？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公报看过没有？你爸爸的讲话学过没有？你支持的那个'八八团''，是个保守派组织嘛，大方向错了嘛，特别是你的那个讲话，你知道流传得多远吗？全国各地！连贵州都发现了，中央文革非常生气啊。"

任潘复生苦口婆心地劝了半天，林晓霖仍然像块顽石，油盐不进。

潘复生终于摇着头说："很可惜呀，林晓霖同志，我要告诉你，这么下去你是要犯错误的！"

秘书走进来，潘复生挥挥手，冷冷地吩咐道："备车，送林晓霖同志回军工。"

8 月 18 日，毛泽东接见红卫兵后，哈军工两大派的红卫兵也都闹着去北京见毛主席，林晓霖也想和同学们一起进北京看看，她给毛家湾挂了个长途，让林办秘书转告林彪，她想到北京学习各高校的运动经验，受些教育。秘书答应向首长报告。

叶群走进林彪的房间，板着脸说："101，谁也管不住这个千金小姐了，得你自己来管管啦，昨天她来电话说要到北京串连，哼，想到北京来大闹呀！"

林彪口气明确地说："不许来！"他又在房间里低头踱步。

这一天，叶群向赵根生秘书口授了一个《林彪声明》。叶群说这是经过林彪本人点头的。《林彪声明》的大意是：晓霖一贯反对我(林彪)。她在外的一切言论和行动并不代表我，我概不负责。从现在起，我与她断绝父女关系。

同时，叶群亲自布置空军派出一架飞机，由国防科委的一位副主任带着印好的《林彪声明》，奔赴哈尔滨。由黑龙江省委印发，在哈军工及各大院校广泛散发。

8 月 21 日上午，林晓霖刚回宿舍，两个学院保卫部的干部就慌慌张张来找她，说省里来车接她去潘书记那儿，已经等了好一会儿了。

“你不是要到北京去串连吗？”见到林晓霖，潘复生依然很亲热，他很神秘地说，“我们今天早晨接到林办的电话，林副主席同意你到北京去，现在正好有一架民航飞机要去北京，我看你就坐这架飞机吧，我给你一个小时准备，但是，你跟谁都不能说。”

林晓霖喜出望外，连连点头，兴冲冲地往外走，潘复生在背后叮咛道：“要快啊，飞机上的人都等着你呢。”

省委的小车把林晓霖送回宿舍，她把毛巾、牙具和随身衣物塞进小挎包，又带上 10 元钱，看看床头还有一卷儿“八八团”的传单，也塞进挎包，收拾好了，看一眼手表，正好 12 点半。她给同学留了个便条就冲下楼，恰好碰上严延英，她打了声招呼：“潘书记送我去北京！”就一头钻进小车里。

小车飞也似的来到机场，在一架“伊尔-14”旁边停下，林晓霖匆匆上了飞机，只见空荡荡的机舱里只有两个军人坐在最后那排座位上小声聊天。林晓霖疑疑惑惑地问机务人员：“这飞机是去北京吗？”

机务人员答道：“是去北京。”边说话边把机舱门关紧。飞机迅速滑向跑道，加力，起飞。

“请问你们两位同志也是去北京吗？”林晓霖大声问同行的两位军人。

一位年长的军人扬扬手，大声应道：“我们也去北京。”

“去北京就行。”林晓霖小声嘀咕着，她找了个靠窗的座位坐下来，从挎包里拿出《毛主席语录》，随便翻看着，那卷传单滑出来，她灵机一动，抽出两张，送给那两位军人。

“你们知道军工的‘八八团’吗？请看看我们的传单。”

“啊，啊，好，好。”两位军人客气地接过传单，相视一笑，真的低头看起传单来了。

林晓霖有点儿晕机，她闭上眼睛，昏昏欲睡，不知不觉地过了两个小时，驾驶舱送出来一张纸条，上面写着：“由于北京天气不好，飞机临时降落呼和浩特机场，请原谅。”

傍晚，飞机在呼和浩特机场停稳，机务人员安排这仅有的三位乘客住进机场招待所，林晓霖觉得餐厅的伙食不错，饱饱地吃了一顿晚餐。

第二天早饭后，飞机腾空而起，直上蓝天。林晓霖心情开朗起来，她目不转睛地望着窗外的朵朵白云，心想，再过一个多小时，就能看

到北京城了。突然，她的耳畔响起低沉的声音：“林晓霖同志，我们要和你谈一下。”

林晓霖一惊，转过身来看着已经坐在自己旁边的两位军人：“你们怎么知道我叫……”

那个年长的军人大约 40 岁，中等身材，面色黝黑，他不理会林晓霖惊诧的目光，先自我介绍道：“我姓高，高少军。你就叫我高处长吧，这位是辛参谋，我们都是国防科委的。”

林晓霖警惕地看着他们，问道：“你们想干什么？”

高处长诡秘地一笑：“实话对你讲吧，我们奉命来向你宣布，你已经被提前毕业分配到基地了，我们是护送你到新疆的，现在飞机正在往新疆飞。”

林晓霖噌地站起来，怒不可遏地喊道：“你们这是欺骗！是绑架！不是说好去北京的吗？为什么要骗我？我是大学生，参加‘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给的权利！你们太卑鄙了！”林晓霖直气得脸色煞白，泪水夺眶而出。

飞机的真正目的地，是新疆的马兰基地。这是一个尖端武器试验基地，附近是几百里荒无人烟的戈壁滩。当晓霖发现自己受了骗，已经无济于事。

高处长不慍不火地等林晓霖的火气稍微小一点儿，才微笑道：“冷静一下，林晓霖同志，我们上飞机以前，我又和罗舜初副主任通过电话，罗副主任指示我们对你讲，你在哈军工的运动中陷得太深了，不

能自拔了，你成了运动大方向的障碍了，特别嘛，你那个讲话影响太大了，我们天天要受到各个方面的批评，所以嘛，让你提前毕业……”

“你们放我回军工！我还没有毕业呢！凭什么骗我去新疆！”

“要服从组织分配嘛，这对你也是一种保护……”

“什么保护！是迫害！”林晓霖声泪俱下，她无助地敲打着舷窗。飞机穿云破雾，一直向西方飞行。

“我宣布绝食！”林晓霖擦着泪水，哭喊道：“我抗议你们的非法绑架！”

高处长显然没有料到林晓霖的态度会如此强硬，他有点儿犯难，和颜悦色地放低声音说：“晓霖同志呀，你别这样，我们也是奉命行事，这一切都是林副主席的意思。”

林晓霖闻听此言，只觉得万箭穿心，悲愤欲绝。

机务人员送来点心和水，林晓霖看也不看，她不吃不喝，任泪水打湿衣襟。

第 153 回：广播响，哈军工一片哗然　黑龙江，众领导被斗台上

飞机中途加了一次油，下午飞抵马兰。飞机降落前，高处长又赔着笑脸过来问林晓霖：“你以前不是说要改个名字吗？到基地以后，你不能再叫林晓霖了，你看，你想改个什么名字？”

林晓霖背过脸，不理高处长。现在看来，把她骗上飞机这一场戏的确是毛家湾导演的。

“晓霖同志，帮帮忙，请配合一下我们的工作。”高处长几乎在央求，“你打算改个什么名字好啊？”

林晓霖心一横：我姓那个林字给我带来了什么！改名！她突然想起，今天早晨在呼和浩特机场上看到的草原黎明，满天彩云，霞光万道，真是美极了。

“好吧，”林晓霖对高处长说，“我改名了，就叫黎明了！”

“黎明？黎明……好名字，好名字！”高处长眉开眼笑。

飞机停稳之后，林晓霖摇摇晃晃下了梯子，在飞机旁边站着一群基地领导，为首的是基地副政委邓易非，原哈军工海军工程系政委。高处长不知道邓易非认识林晓霖，忙不迭地介绍说：“这就是黎明同志。”

邓易非打量着面容憔悴、泪痕犹在的林晓霖，心里什么都明白了，他只是微笑道：“我是邓易非，欢迎你到基地来工作。”

吉普车把林晓霖送到马兰招待所，为她开了一个单人房间，服务员马上送来了香气四溢的晚饭。林晓霖说：“端回去吧，我绝食了。”说完就无力地倒在了床上。

一会儿，邓易非和基地政治部主任、保卫处副处长等领导由高处长陪着，进房间看望林晓霖。

林晓霖脸朝着墙躺着，任这些领导讲什么，她一言不发。

高处长说了一句："邓政委啊，我们就算是正式把黎明同志交给基地了。"

一听这话，林晓霖愤怒地坐起来，指着高处长说："我抗议你们的欺骗行为，我要回军工，我还没有毕业哪！"

"消消气，你要想通啊，"高处长红着脸说，"要听组织的话嘛！"

邓易非只好出来打圆场，他对两位"解差"说："好吧，我们基地接受了黎明同志。"

高处长可算交了差，满脸堆笑："那我俩明天就回去了。"

第二天一早，林晓霖被远处的飞机引擎声惊醒，饥渴像无数蚂蟥爬上身来，一阵凶过一阵地袭击她，她闭上双眼，静静地躺着，她突然想到一个可怕的字眼：死。

走廊里静悄悄的，林晓霖轻轻挪步，溜出招待所，向远处赭黄色的戈壁滩走去，她跌跌撞撞地不知走出多远……

背后的呼喊声越来越近，林晓霖无力地摔倒在戈壁滩上，转眼间，几个军人和服务员就把她连拖带拉地逮回招待所，一个女孩子在门口坐着，外面又加了岗。

林晓霖铁了心，就这么不吃不喝地躺着，她渐渐感到周身冰凉，已经没有饥饿的感觉了。

一连两天，基地政治部主任带着几个干部不离林晓霖的床边，展开了“车轮战”，好话说尽之后，就只好来点儿硬的了：“你这是自绝于人民，死也白死！”“你这是反革命行为！”

绝食进入第四天，林晓霖的眼前出现各种幻影，那片片绿色是伊万诺沃的白桦林还是哈军工的白杨林？她模糊地感觉到，结束生命竟是一种崇高和悲壮的美丽。她终于由于虚脱而昏迷过去。

走廊里人声嘈杂，高处长第一个冲进屋里，他紧张得腮帮子乱颤，一边给林晓霖喂水，一边大声喊道：“同意你回哈尔滨啦！你可以回军工参加分配啦！”

林晓霖苏醒过来，好半天才听明白，她强睁开眼，声音微弱得难以听清：“你，你不是……在骗我吧。”

“是真的，我请示科委罗副主任了，批准你回学院……”

“你不是……回北京了……”

“我哪敢走呀，我就住在你的隔壁。你这个死心眼儿的丫头啊，长这么大容易吗？怎么能去寻死啊！”

高处长声泪俱下，他从心里同情林晓霖，可是军令在身，他又有什么办法？

两行清泪顺着林晓霖憔悴的脸上淌下来，她看见邓易非带着医生进来，“听话啊，晓霖……”邓易非难过地喃喃道，双手抖动着，把一杯温水捧给林晓霖……

8 月 25 日的中午，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的广播突然播出通知："全院同志们，不管是'造反团'的，还是'八八团'的，一律注意收听重要广播。"

两大派组织的大小头头们也同时吆喝着："快到食堂收听广播去！"无政府状态下的哈军工已经开不起全院大会，放广播倒是个好办法。

全院人员都静静地聚拢在有广播的地方。

林副主席 8 月 21 日下午在某地接见哈尔滨工程学院部分同学时对有关林晓霖问题的指示：

晓霖因长期不接受我们教育，屡教不改，处处与我们作对，而且还有后台指挥她，政治上非常落后，表现很不好，背着我们在外边做了一些坏事，因此，九年来我拒绝见她，九年来已与她断绝来往，只是在经济上供给她，并屡次交代学校严格教育她，等待她的转变，但她一直表现不好，她一贯反对我。因此，她在外边的一切表态都不能代表我的意见。她的所有错误言行和种种不良表现，都希望广大革命师生对她进行严肃的揭露、批评和教育，使她思想得到改造，痛改前非。请你们转告她，希望她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听毛主席的话，真正和革命师生站在一起，向牛鬼蛇神进行坚决斗争和揭露，真正参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

以上情况，请你们转告国防科委首长及潘复生同志并黑龙江省委，转告哈尔滨有关院校革命师生员工同志。

全院一片哗然，人们小声议论着：

“林副主席这个讲话，不等于在政治上判了自己女儿的死刑吗？”

“林晓霖哪儿去了呢？好几天没有看到她啊。”

“造反团”幸灾乐祸。“八八团”垂头丧气。总团紧急开会，声明林晓霖不是总团核心组成员，要求她退出“八八团”。潘复生指示把《林彪声明》铅印数万份，发向全省和全国。

住在马兰医院里的林晓霖，完全与世隔绝，对父亲大人的讲话浑然不知。出院的时候已是 10 月初，大漠的深秋使她感到难以忍受的冷寂和孤独。那天邓易非带着政治部和保卫处的干部们找林晓霖谈话。

“黎明同志，你要求返回军工参加毕业分配的事，我们又研究过了，恐怕你回不去了，你先看看这个。”邓易非递给林晓霖一张打印的《林彪声明》。

林晓霖只觉得天旋地转，一颗心被击得粉碎，眼泪扑簌簌地掉下来。

邓易非小声说：“这是北京电话里传达的，我们一句一句记下来再重新打印好的。这里还有一份传单。”

林晓霖接过来一看，是哈军工“八八团”的一份声明，上面说林晓霖从来就不是“八八团”总团核心组成员，现在已经不是“八八团”的红卫兵了……

政治处主任说：“你看，‘八八团’也把你开除了。”

满腔悲愤的林晓霖已听不清楚其他领导讲些什么了，她拿起笔来给林彪写信。

“我从小你就没管过我，你没有尽到做父亲的责任。我现在好不容易快大学毕业了，你派人把我绑架到基地，既然你不要你的女儿，我也不承认你这个狠心的父亲，我宣布和你完全断绝父女关系，我黎明再也不是你的女儿了……”

信写得很长，林晓霖痛快淋漓地谴责了林彪和叶群。

她把信封好，交给基地领导，要求他们寄给高处长，再由他转交给毛家湾。

基地早已奉命对林晓霖实施严格的邮检，她的这封与林彪断绝关系的长信怎么可能发出去呢？

出院后，林晓霖成了基地政治宣传处的一名干事，一言一行都受到监视。

再说哈尔滨，“军工红色造反团”锐气日盛，成为哈尔滨市造反派的盟主，它发布的“严正声明”之类的告示此时已比省、市委的指示还要权威得多，其鼎鼎大名更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从 8 月 22 日开始，至 24 日连续三天，哈尔滨哈军工、哈工大等 49 个单位的“造反团”发动了大规模联合行动，在哈工大主楼后院广场召开“哈尔滨市各界革命群众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点火大会”，先后共有 80 万人参加。在向全省发出的倡议书中号召全省军民“大挖省委内部的黑线，把省委内部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揪出来，斗倒斗臭!”

在 22 日的大会上，他们要求“罢李范五和王一伦的官”，并把坐在主席台上的李范五拉下台，逐出会场。次日，潘复生前来亮相，表示支持造反派的“革命行动”，于是大会掀起高潮，把第三天的大会

迁到八区广场开。造反派们宣布把八区广场改为“红卫兵广场”，浩浩荡荡的游行队伍走遍哈尔滨市大街小巷。

这是哈军工学生的游行队伍

8 月 24 日，哈军工“红色造反团”宣布接管院、部、系三级“文革办公室”，提出“一切权力归红色造反团”的口号，学院各级党组织至此完全瘫痪。

哈军工“八八团”不甘落后，于 8 月 25 日也组织了一场全市大会，批斗李范五、王一伦，并提出要把欧阳钦“揪回来”。

批斗省委的“走资派”

8 月 27 日，中共黑龙江省委机关和哈尔滨市几十万人在“红卫兵广场”，即哈尔滨八区体育场，召开“炮打司令部，揭发批判省委问题大会”。中共黑龙江省委第二书记兼省长李范五等省委领导干部被挂着“黑帮分子”的大牌子，在批斗台前一字排开。

广阔的体育场地里和四周一排排的水泥看台上，到处都是人山人海，红旗猎猎。此时，中共黑龙江省委书记兼哈尔滨市委第一书记的任仲夷，身穿一件白衬衫，褪了色的蓝制服上衣搭在左胳膊上，正和哈尔滨市委机关干部的队伍一起，坐在第一排水泥看台上，认真地听着台上的发言。

这时，台上一位发言人正在揭发批判发言时，突然提高嗓门，点到省委书记任仲夷的名字，接着有人高呼口号：“把黑帮分子任仲夷揪出来!”

任仲夷虽然已多次在省、市委机关和许多单位挨过各种形式的批判斗争，但是，还没有在这种几十万人的规模浩大的集会上当场被揪斗，公开示众。

这时，大会主持人接过麦克风，高声喊道：“根据广大革命群众的强烈要求，大会主席团决定：把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任仲夷揪出来!”

两名壮汉出现在任仲夷身后，将他的胳膊向后架起，押到台上。随即台上台下响起一片排山倒海般的“打倒黑帮分子任仲夷!”的口号声……

台上已为任仲夷准备了一把木制折叠椅，这种椅子让人站上去很难站稳，稍往前站就会一头栽倒，稍往后站则会使椅子折叠起来，连人带椅一起摔倒在地。只有小心翼翼才能找到平衡站稳，即使站累了也不敢动一动，稍微一动就会摔个人仰马翻。

事先制作的高帽子和黑牌子上写着“黑帮分子任仲夷”，红卫兵先给他挂上黑牌子，又拿来高帽子要给他戴上，这个纸糊的帽子足有三尺多长。由于是第一次在万人大会上当场揪斗任仲夷，造反派也不知道这位省委书记平常是戴多大号的帽子，高帽子的帽口做小了，戴不上去，只能使劲往他头上扣，结果硬是给撑破了，直往下掉，怎么也戴不住。这时，有一个红卫兵想出了一个鬼点子，在撑破了的高帽

子的后面拴一根绳子，逼着任仲夷把双手反背到背后，紧紧抓住绳子的另一头，使撑破的高帽子不至于掉下来。

接下来，一个红卫兵端过来一脸盆墨汁到任仲夷面前。先是逼他把手伸进墨汁盆里，蘸着墨汁往自己脸上涂抹。那个端墨汁盆的红卫兵又将脸盆高高举起，对着弯腰的任仲夷的脸使劲往上一抖，激起的墨汁弄得他满脸漆黑，眼睛和鼻孔里都灌进了臭烘烘的墨汁，顺着他的鼻尖、嘴巴往下流淌。后来干脆端起剩下的半盆墨汁，扯起任仲夷的衣领从后脖颈子灌进去，只见汩汩的墨汁顺着上身往下淌，穿过腰间又顺着双腿流淌到脚下，浸透了衣裤，白衬衣上墨迹斑斑，灰蓝色裤子从里往外渗透出一道道的墨痕……

8 月 29 日，哈军工“红色造反团”联合哈工大等高校，在“红卫兵广场”召开“火烧省委、炮打司令部”大会，70 万人参加，是哈尔滨市“文革”伊始的首创纪录，潘复生和东北局书记马明方出席大会。那个时候，能和造反派坐在一起的老干部可谓凤毛麟角。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主义万岁！
火烧省委炮打司令部斗争挚范五大会

第 154 回：李文波，打人潮狂卷首都　西城区，纠察队宣告成立

“破四旧”的风潮继续在全国狂卷。8 月 25 日，各地红卫兵陆续发出通知和命令，要求停销代表“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商品。天津劝业场停销 582 种商品，占全部经营品种的 10%。相声被当作低级趣味的娱乐，从此停止演出。

位于天津解放北路租界建筑群，素有“万国建筑博物馆”之称。许多建筑上的外饰物和建筑标志，被红卫兵砸毁。

在价值连城的龙门石窟，无数小佛头像被洛阳红卫兵敲掉。

在海南，海口红卫兵捣毁了滨涯村的海瑞石砌墓穴，其中的神道碑、石供器、石人、石狮、石羊、石马、功臣坊、亭园均被砸毁。

8 月 25 日早晨，民盟中央以办公厅的名义，在机关大门上贴出《中国民主同盟公告》:“本盟完全接受红卫兵的意见，自即日起停止办公，报请中共中央处理。”

当天下午，北京市的一些中学生在民盟中央机关召开批斗吴晗、章伯钧大会。

8 月 25 日，北京九中抗大红卫兵提出立即废除高薪制。

8 月 25 日，北京抗大一附中，即北京一中的“红缨枪革命造反队”，特地为北京国际乒乓邀请赛张贴了一张《十万火急通令》:

本届北京国际乒乓邀请赛马上就要开始，这次比赛是我国主办的，是一次和美帝苏修的混蛋“奥运会”相对抗的一次反帝反修的比赛。使这次邀请赛获得圆满成功，保证比赛的正常进行，是首都正在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革命群众的光荣责任。

一些被人民专了政的混蛋狗崽子们，不许你们参加革命观众的行列，不许你们看比赛，一些流氓狗崽子，二流子，无业或不务正业的混蛋，及崇洋的奴才，不许你们看比赛！

为了使比赛获得成功首先是获得政治上的成功，我们现在通令:

（1）无论个人或团体购票，必须凭本单位革委会介绍信。革委会开介绍信，要采取负责态度。

（2）退票或通过革委会退或退给原售票亭。(售票亭不得拒绝不收，应首先从政治上考虑）如有私自退票者，其票格撕勿论！由退票发生的恶果自己负责！

（3）看比赛者自觉遵守秩序，协助维持秩序，并应以共产主义的无产阶级的态度对待比赛。凡事从革命利益出发，以毛主席身边的人民的荣誉为主。我们的荣誉是祖国的荣誉，尊严是革命的尊严。

（4）一切资产阶级狗崽子，流氓狗崽子们！在场外捣乱，格揍勿论！进场内或奇装异服进场者，揪出来，格揍勿论！有言在先，临事无谓言之不预！

（5）以上规定，适用于一切国际国内的比赛和演出等场合。伟大的统帅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只许左派造反！不许右派翻天！

狂热的中学“红卫兵”砸烂了教室、学校，焚烧了教科书和学校中的一切中外文学书籍，将它们视为毒草。年轻的中学生还分不清革命和野蛮、残暴之间的区别，他们的行为一旦失去大人的监控，其兽性的一面就会展现出来。8 月初，北京六中学生朱支前对学校已定案的反革命分子，蜕化变质分子，未定案的黑帮宣布：“你们这些人由我管起来。”到了 8 月中旬，六中的红卫兵把学校后院东北角的音乐教室小院改成一座监狱。那里有一丈多高的墙，墙与音乐教室之间有夹道。夹道的东端是一个小厕所，他们厕所的上面修设了一个方形岗楼，岗楼上安装上一盏彻夜长明的大功率电灯。六中的红卫兵在他们的监狱门口挂了一个

“牛鬼蛇神劳改所”的牌子。

与北京六中“劳改所”同样著名的还有北京一中私设的“监狱”。这里的红卫兵成立了一个300多人组成的劳改队，用中美合作所、西藏农奴主以及古代书籍中记载的各种酷刑，来对付出身不好的人和同他们观点不一致的人。这些酷刑，仅仅听名字就会毛骨悚然：跪玻璃、油漆洗脸、上吊试验、叩响头、坐飞机、突刺——刺、火烧头发、刀刮屁股、开水洗澡、打活靶、扫膛腿……。

在北京学生下乡帮助农民秋收劳动期间，中学红卫兵还将非红五类家庭出身的人编成一组，由红卫兵组织中公认最厉害最凶狠的人带队。带队者每天甩着皮鞭吆喝，让那些学生干最脏最累的活，用最龌龊的语言辱骂他们。印第安奴隶主庄园中的悲惨情景，在六十年代的中国大地上到处上演。

8月25日这天，在北京崇文区发生了震惊全城的“李文波杀人案”。

李文波，民族资本家，居住在北京崇文区榄杆市一座自家的二层楼里。北京女十五中的红卫兵到他家造反，让他们夫妇下跪，向他们要“变天账”。李文波说没有，红卫兵就翻箱倒柜，穿着鞋在床上乱踩。没翻到“变天账”，红卫兵就用皮带抽打李文波夫妇，把他们夫妇关在楼上，一整天不许吃饭、喝水、上厕所。老太太憋不住了，硬要下楼，被几个女红卫兵推倒还踢了几脚。李文波一看急了，下楼理论，红卫兵用棍子揍他，打流血了。李文波急了，抄起把菜刀，向一个女红卫兵冲去，女红卫兵们吓得尖叫起来，夺门而逃。李文波也被自己的行为吓呆了，他没有多想，回到楼上，从二楼跳了下来。

从屋里惊逃到大街上的红卫兵这时也回过味来，“这是阶级报复呀！”她们义愤填膺，会同屋外的红卫兵和群众，对躺在地上奄奄一息的李文波一顿拳打脚踢……结局可想而知，只一会儿，李文波就一命呜呼了。

“红卫兵在破四旧”动中，被一个资本家的疯老太太用菜刀砍伤！”这一消息瞬间传遍北京。很快，又传成红卫兵被杀的消息……

李文波的老婆立即被警察抓到了派出所。红卫兵仍怒气不休，准备召开十万人声讨大会，将刘文秀当众打死。后因周恩来和中央文革的劝说，这个复仇计划才未付诸实施。但在9月12日，由北京法院将刘文秀判处了死刑，并于次日执行。同时，法院还判决已死的李文波死刑。

判决一个已经死了的人的死刑，这在法律上还是很特别的。

在8月25日这天，北师大附属二中红卫兵打死了他们学校的党支部书记姜培良、语文教员靳正宇、和一个学生家长樊希曼3个人。

支部书记姜培良有个儿子在初中读书，红卫兵把他叫到台上去，让他打父亲。他儿子拿起一根木棒打了下去。从此，姜培良的儿子一直精神不正常。

当天，在学校大礼堂的舞台上和姜培良等一起被斗的还有校长高云，以及被指控为“牛鬼蛇神”的教师们。打人的主要是初中学生。他们用有钉子的木棒，一打就把肉丝刮下来，鲜血淋漓。会中还有人大喊，“拿盐来，撒在他伤口上。”

校长高云也被认为已经死了，运到了火葬场。因为火化要排队。高云在火葬场的死人堆中间苏醒过来，爬起来回了家。

北京第33中的负责人杜光天，也是被毒打后送到火葬场。因火葬场的工人说她还有气儿，没有被送进焚尸炉，因此捡了一条命。

北师大二附中高三学生曹滨海的母亲樊希曼是中共铁道部党校的干部，文革开始后受到冲击，因此她曾经给儿子写过一封不满文革的信。这封信被红卫兵看到，认为是“反动信件”。于是，8月25日上午，学校高三（一）班红卫兵到曹滨海家抄家。曹滨海以前一直是“革干子弟”，突然成了“黑帮”被抄家，当然

无法接受，与抄家同学发生争执，盛怒下抄起菜刀砍伤了一个抄家者。这下子可闯了大祸，不仅曹滨海当场被公安局抓捕。红卫兵还将其母亲抓到学校，于当天下午，在校内一个砖砌的乒乓球台上被活活打死。

北京市女十五中学的一些老师和校长们，本来已经在学校遭到斗争和殴打。学校的红卫兵在李文波家遇到的冲突，成为她们对该校“阶级敌人”发动更残酷的暴力行动的理由。8 月 25 日当天夜里，红卫兵把已经被关押在校园中的第十五女子中学女校长梁光琪打死，时年 54 岁，已经担任这所女子中学的负责人三年多。她被打死之前，已经被剃了“阴阳头”，受到各种虐待和折磨。李文波事件成为红卫兵把她打死的一个借口。

“李文波事件”招致全北京红卫兵对“黑五类”的疯狂报复，一时间“牛鬼蛇神、狗崽子翻案”的喊声响彻京城。他们拿着皮带，到各单位把“黑五类”集中起来，狂暴地乱抽乱揍。

一天深夜，负责了解首都 58 所大专院校“文化大革命”的情况的《解放军报》记者刘景林突然接到一个电话，说在王府井大街内的帅府园中学，有十几名老师被关了起来，天亮前要被处死，叫他马上前去解救。

刘景林立即乘车赶到了学校。一下车，就看见两个红卫兵站在校门口，手持用圆钢打成的长把弯刀，不住地往水泥地上戳打，发出“当当”的响声，在这动乱的深夜，显得特别刺耳。

刘景林乘坐的是挂有“辰 3”牌子的轿车，当时只有中央领导人乘坐的车才能挂“辰 3”的牌子。那两个红卫兵一见这特有车牌的小轿车停在门前，立即停止了戳打，并陪刘景林进了学校。

一个戴着红袖章的女红卫兵头头问刘景林：“有什么事吗？”

刘景林问：“你们把老师都关押起来了？”

她说：“他们都是走资派、牛鬼蛇神！”

随后，她带刘景林来到一个教室内，只见十几名不同年龄的男女老师，已被折磨得狼狈不堪了。

刘景林当即对这个红卫兵头头说：“我奉周总理的指示，要求你们立即将这些老师放走。”

这个女红卫兵头头看了看刘景林，就对老师们说：“你们都回家吧！”

老师们一阵惊喜，急忙逃出学校。

刘景林再次对这头头说：“要从灵魂上闹革命，再不许伤害人!”

那个女学生点点头答应了。

又一天下午，传来周恩来的指示，叫刘景林随北京市委书记吴德和雍文涛，去处理王府井百货大楼对面的东安市场红卫兵杀人事件。吴德和雍文涛虽是中央任命不久的北京新领导，但因当时社会已处于极端的无政府状态，领导说话都不大管用，所以周恩来才叫负责红卫兵联络工作的《解放军报》记者参加处理。

东安市场二层楼上关押着红卫兵抓来的各校老师和各街道上的所谓“牛鬼蛇神”。这里比监狱还差，不给吃喝还随意打骂，不服的就处死。这一天又抓来几十名，很难说晚上会不会有人被红卫兵打死。吴德他们一行 3 人来到东安市场登上二楼，一看木板屋内已关了几十人，并正在打骂审讯。他们找到这里管事的红卫兵头头，一个戴红袖章的小男孩。吴德、雍文涛向他做了劝说。刘景林则直接说是传达周恩来总理的指示：“不准随便抓人、打死人！”并命令那个小男孩立刻把抓来的人放走。小男孩看了看他们，立即通知同学将那些关着的人放走。刘景林回来后迅速将此事写成材料，通过直达毛泽东的《快报》上报。

面对社会上出现的打人狂潮，北京八中革筹会负责人陈小鲁觉得，各学校的红卫兵各自为政，走上社会“破四旧”，打人成风，太乱了。根据《十六条》说的，“自己教育自己”，红卫兵自身的缺点、错误，也要有人来管。别人不管，也管不了，但自己应该管一管自己。于是，他就去找四中、六中的同学商量，提出成立“首都红卫兵西城纠察队”。每个学校红卫兵组织，抽出十几个优秀的人，做纠察队队员，管理好自己的学校，再组成一个联合的指挥部，来统一调度。为什么叫“西城纠察队”?因为四中、六中、八中都在西城区，海淀的、东城的，太大了，他们管不了。陈小鲁的这个意见和六中的董良翮、刘东他们一拍即合，于是，8 月 25 日，四中、六中、八中、师大女附中等西城区 31 所中学的红卫兵组织在师大女附中集会，“首都红卫兵纠察队西城分队”，简称“西纠”成立了。谁来当领导呢？他们搞了个编号，四中的孔丹是 1 号，总负责。于是后来人们都说“西纠”司令是孔丹，副司令是陈小鲁、董良翮，大家也都不否认。四中的秦晓是“西纠”宣传部长，王向荣是作战部长，赵胜利是后勤部长。

“西纠”在当天发布的公告中说：

“我们的职责和权力：

1．努力学习毛泽东思想，忠实执行毛泽东思想，热情宣传毛泽东思想，勇敢捍卫毛泽东思想。

2．坚决地协助红卫兵的革命造反行动。

3．坚决镇压地、富、反、坏、右和资产阶级孝子贤孙的反革命行动。

4．有权撤销一切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宣传品和禁令。

5．有权检查各学校，各机关，各工厂，各单位的红组织。

6．有权扣押假红卫兵和流氓。

7．在其他各区纠察队未成立之前，一些重要国家机关和主要街道，暂由西城分队代行保卫职权。

此令八月二十六日十时实行。

我们要求广大工农兵群众和各地区公安机关协助我们工作。”

“西纠”成立后，总部设在育翔小学，有两个纠察连。一个连全部队员是四中的，四中老高二的学生、孔丹的弟弟孔栋是四中连的连长，徐海东的儿子徐文连是指导员。另一个纠察连是师大女附中的，邓小平的女儿邓榕在女附中连。

后来，“西纠”总部设在了停止办公的“九三学社”，他们要求每个学校抽出红卫兵骨干组成一个排，下辖若干个班，任命有排长、班长。不久，海淀区、东城区红卫兵也相继成立了“东纠”、“海淀分队”等跨校际的红卫兵组织。

“西纠”成立的本意，是按照毛泽东关于群众自己教育自己的指示，用纠察队去纠正、控制某些红卫兵组织无法无天的混乱局面。所以，它一出现，就立刻在社会上得到拥护，群众也希望它具有某种权威性。8 月 25 日当天，西单商场找到“西纠”，告诉他们：

“西单商场卖《毛泽东选集》，革命小将说《毛泽东选集》不能卖，只能送。”

原来，北京一中的红卫兵发了一个“通令”，大意是：“毛主席著作和毛主席像是无价之宝，绝不可用金钱衡量，勒令各新华书店不得出售。”

新华书店说：“这是国家财产，怎么能送啊？”所以，请“西纠”予以解决。

于是，“西纠”在 8 月 26 日发出“第一号通令”：

“撤销红一中关于不许出售毛主席著作和毛主席像的通令。

从现在起各新华书店开始大量出售毛主席著作和毛主席像。

此通令立即生效。”

接着，西单商场的人又说：“你们能不能让我们继续卖‘米老鼠’奶糖呀？有红卫兵来商场说‘米老鼠’是四旧，不能卖，要封存起来。天这么热，糖都化了，国家财产受损失啊。”

陈小鲁说：“那你们换个包装呀？”

他们说：“奶糖都是一块块用糖纸包起来的，怎么能一块块地换呢？”

最后，陈小鲁说：“这样子吧，我给你们发个布告，宣布为了保护国家财产，你们可以把现有的存货卖掉。以后，你们就别再进货了。”

同日，“西纠”还发出了“第二号通令”：

“一切组织和个人都不得拦截首长汽车，不得搜查首长宿舍。违者，首都红卫兵纠察队立即扣押！明知故犯者，严加处分！

切切此布。”

第155回：谢富治，公安系统座谈会　逐黑帮，破四旧还在继续

8 月26 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清华大学自动控制系红卫兵的文章《清华园必须大乱》。

上午，在清华大学西操场召开北京“红五类”子弟大会：“声讨反革命分子杀害红卫兵的滔天罪行”，自然是为“825李文波事件”。会后，各校都开始行动。

这天，北京农业大学附中“红旗”红卫兵把131名“狗崽子”自己带的毛选和《毛主席语录》全部抢去，并对他们施以毒打。皮鞭抽，棍子打，皮鞋踩，剪阴阳头，侮辱女学生，他们一边打一边说：“叫你们这帮狗崽子尝尝无产阶级的火药味”，“毛主席跟我们说的‘要武嘛！’”

这就是北农大附中的“826事件”。

最恐怖的还是李文波居住的榄杆市地区，一批批红卫兵乘坐专门调派的公交车从各处赶到这里，对这一带的“牛鬼蛇神”大打出手。一连几天，大量的人被打死。

新凤霞后来回忆说：“8月26日到8月28日，是北京打全堂的时候。我听到一个红卫兵说：今天北京市全面开花打全堂，牛鬼蛇神一个也跑不了。”

8月26日，谢富治在北京市公安局讲：“刚从中央开会回来，讲几点：我们要保卫红卫兵，反革命杀了红卫兵坚决要镇压反革命……红卫兵打了坏人，不能说不对。打死了也就算了。”

在几个省市公安局负责人座谈会上，谢富治插话说：“打死人的

红卫兵是否蹲监？我看打死就打死了，我们根本管不着。”

一个省的公安局长问：“拘捕起来总可以的吧？”

谢富治答：“如果你把打人的人扣留起来，捕起来，你们就要犯错误。”

他又说：“过去规定的东西，不管是国家的，还是公安机关的，不要受约束。群众打死人，我不赞成，但群众对坏人恨之入骨，我们劝阻不住，就不要勉强。民警要站在红卫兵一边，跟他们取得联系，和他们建立感情，供给他们情况，把五类分子的情况介绍给他们。”

8 月 26 日，北京市人委宣布，取缔玛利亚方济格修女会，接管由此修女会经营的圣心学校。

8 月 26 日，北京 14 中“红卫军”《告全国同胞书》：

……我们向全国各大城市庄重宣告：

一、彻底铲除修正主义苗子

（1）理发馆、裁缝铺、服装厂的同志们，你们今后一律不许给那些资产阶级狗崽子、流氓、阿飞、小瘪三们理怪模样、妖里妖气的头发，什么无缝青年式、青年波浪式、螺旋宝塔式、鸭子屁股式……不许给资产阶级的孝子贤孙、外国洋人的干儿子干孙子们做牛仔裤、牛仔衫、牛仔裙、什么鸡腿裤、蹲下撕毁式……服装……

（2）商店、制鞋厂、委托商行的工人同志：……夜来香、香水、口红、这粉那粉、火箭鞋、牛仔鞋、高跟鞋、大盖鞋……你们必须停止出售类似商品，不许收售对社会主义有毒的商品。

资产阶级老儿们，顽固不化的狗崽子、孝子贤孙们，你们横行霸

道、不可一世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在我们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时代，在新中国，绝不允许你们梳大背头，穿着牛仔衫、鸡腿裤、火箭鞋到处放毒，绝不允许你们梳着鸭屁股头发，抹着夜来香，擦着香粉，穿着牛仔裙、港式衫、高跟鞋到处乱窜。只许你们老老实实，不许你们乱说乱动。你们必须在张贴此告示十天内，彻底改装。如若不然，广大的红卫兵将制裁你们！

二、彻底铲除一切剥削现象

（1）所有房主们，你们听着：解放前你们用剥削劳动人民的血汗钱，置办了房产，而今你们还收房租，继续剥削劳动人民。你们这些吮吸劳动人民血汗的臭虫，必须停止吸血，房产一律归公。住户们一律不向房主交租子！各地房管局的革命同志们，望你们办理好房产归公手续，马上把房产接收下来。

（2）中国人民银行各分行的革命同志，我们向你们发出通令：立即没收资产阶级的股息和取消存款给利息的做法。……今后那个剥削分子敢领定息，绝不许可！

（3）旧社会的文人秀才老朽们、演员作家们，你们终日坐在书阁暖室内，不但写黑书、演黑戏，还利用“特长”，向国家、向人民索取高薪，过你们奢侈的生活。劳动人民辛辛苦苦劳动一个月，工资几十元，你们坐在办公室、排练场一月，工资几百上千元，这二者有多大悬殊！这不合理的现象要彻底根除！你们必须主动向国家申请，请求降低工资。如若不然，我们将采取必要的行动！

三、杂　项

（1）医院的某些少爷、小姐们，……你们必须改掉旧习气，改掉旧制度，置身于工农兵之中，彻底为工农兵服务。

（2）各地的商店、街道的名称，凡是带有封建意识、资本主义企图的都应一律撤换，换上有社会主义色彩、共产主义理想的名称。

上述条令，自张贴日起，即时生效！若有违犯上述条令者，我们将采取必要的革命行动！

8月26日，北京东方红二中红卫兵《紧急呼吁》：

……目前，有不少散居在街道上的地、富、反、坏、右分子，劳改释放犯，劳动教养解除犯，少年管教释放犯，流氓盗窃分子，投机倒把分子，资本家，伪兵痞，伪警棍，机关、工厂、企业、学校等单位开除除名的这些混蛋们，长期以来厌恶劳动，贪图安逸，成群结队，打架斗殴。经常泡酒馆、茶馆，说坏话，做坏事腐蚀青年，或挑拨离间，造谣生事，或漫骂攻击政府，散布反动言论，严重地危害着首都治安。

……我们紧急呼吁:

中共北京新市委、市人委、劳动局、公安局、办事处、派出所和一切有关单位，立即采取措施:

家在农村的，限期还乡生产！

农村没家的，有关单位立即组织这群混蛋劳动，让他们赶快滚出首都去！

在这群混蛋没离开北京之前，不管是闲在家里的还是作临时工的，只许规规矩矩，不准乱说乱动，如果乱说乱动，立即予以制裁！

8 月 26 日，中直某机关红卫兵致爸爸妈妈们的一封公开信：

“爸爸妈妈们：

儿女们都起来闹革命了，都‘造反’了，都加入红卫兵了！大家都称你们为老革命。但是，我们要告诉你们一句：在老革命中，有的人是在混革命！你们想混到哪天才到头呢？无穷的忧虑，无数的框框，缠在你们的脑子里，套在你们的身上。当年血战沙场的英雄气概，横眉怒视阶级敌人的凛然大义，现在都到哪里去了呢？看见你们现在这个样子，孩儿们都感到很痛心。你们好好想想吧：你们的亲密战友有多少倒在雪山上，草地里，有多少英勇就义在敌人的刑场上，又有多少因积劳成疾而不幸与我们长辞。想起这些，你们中间曾经有多少人暗暗落泪。‘无数革命先烈为了人民的利益牺牲了他们的生命，使我们每个活着的人想起他们就心里难过，难道我们还有什么个人利益不能牺牲，还有什么错误不能抛弃吗？’难道你们不觉得可耻吗？难道你们不觉得危险吗？难道你们自己也不感到痛心吗？难道你们还想这样混下去吗？‘多少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到了你们起来造反的时候了！你们是我们的父母，但是，‘永远不要忘记，我们都是人民的儿子，都是劳动人民用血汗把我们养大的！千万不要忘记这点。千万要记得劳动人民是我们的父亲，是我们的母亲。’你们要是忘记了劳动人民，忘记了你们牺牲了的战友，忘记了革命，你们就可能变成修正主义分子了。我们就要造你们的反！谁说儿子不能造老子的反！你们‘修’了，我们就要造你们的反，造反有理，造反到底！

十几年来，你们当中有的人养尊处优，长期蹲在办公室里，你们的‘资本’早就花光了；你们的革命锐气早就磨钝了，你们和劳动人民相差何止十万八千里！走出办公室，到群众运动的大风大浪中来，换下你们的头脑，洗掉你们身上的污垢，灌进新鲜的血液，彻底改变你们这种精神状态。不然，在这场大革命中就要被淘汰了。

想当年，你们跟着毛主席转战南北，打出了人民的江山。看今朝，毛主席身穿绿军装，臂戴红袖章，又带着我们冲向文化大革命的战场。我们跟上了。你们呢？难道你们要掉队吗？亲爱的父母们，敬爱的老革命，你们千万要永葆革命的青春呵！老革命遇到新问题，有两条道路：一条是和人民群众在一道解决它，老革命就年轻了；一条是脱离人民群众，在新问题上跌跤子，这样老革命就真要老了，就要完蛋了。你们用你们的鲜血和汗水写出了鲜红的前半生，我们更衷心地希望在今天，还能紧紧地跟上毛主席，在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不失无产阶级的革命晚节。”

8月26日，书记处书记、全国总工会主席刘宁一给李富春写信，检查建国以来自己工作中的问题，信中说：

“关于全总的工作，我的初步回忆从思想上检查，17年来屡犯错误，其根本原因就是：毛泽东思想不挂帅。……无论怎样也跳不出修正主义的圈子。”

“据说全总党组有些人担心得很，怕群众照团中央的办法处理，我和马纯古同志说，应该站在群众一边，按照毛主席指示办事，号召全机关，全国各级工会组织，工人群众，炮打司令部。这一个领导机

关既不能批判自己，也不敢揭露坏蛋，早就应该被推翻，让群众彻底捣毁重建新的。”

“现在红卫兵青少年干得好。我看才是六级台风，我们应该看到十二级台风还在后面，谁也躲不了，越怕越被吹倒，全总党组应以勇敢的、欢欣鼓舞的心情和群众一起大斗、大批、大改。”

8月26日，《人民日报》转载刘少奇的女儿刘涛组织的清华大学自动控制系红卫兵的大字报：《清华园必须大“乱”》。

这天，《人民日报》用很大篇幅报道了红卫兵“破四旧”的情况。当天《人民日报》第一版的通栏标题是：

坚决用毛泽东思想改造整个社会的精神面貌

红卫兵革命造反精神振奋全国革命群众

各地革命小将向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发动总攻击　　广大工农群众最坚决支持红卫兵灭资兴无的革命行动

标题很长，达 90 余字，但其精髓却只在最后一句中的四个字：“灭资兴无”。

同一天，新华社再发通讯——

苏州采芝斋糖果店职工砸掉了挂了 90 多年的老招牌，换上了“红旗”商店的新招牌……

无锡市东林小学，原来是以明代东林党人聚集讲学的东林书院所在地而得名的，全校革命师生认为决不能再让这些反动文人玷污我们的社会主义学校立即把校名改为红卫兵小学。

南通大生一厂职工组织了一支突击队，攀上厂门口的钟楼，把近

代民主资产阶级的代表张謇题的“大生一厂”四个字全部凿掉，改名为南通市第一棉纺织厂。

南昌“黄庆仁药栈”砸掉了挂了140多年的“黄庆仁药栈”四个字，换上了和对面“兴无”商店相呼应的“灭资药店”新招牌。“阳明路商店”的革命职工，砸碎了为封建大官僚、大地主王阳明招魂立碑的店名，换上了 “红卫商场”的新招牌。

许昌市的革命群众把一户门上袁世凯的“清正廉明”匾打翻在地，人们都说反得好，砸得好。

重庆市南岸区一批高中学生8月26日到老君洞、真武山等道教、佛教名胜地“破四旧”，真武山住持和尚因被搜出练功刀剑而被认定有“变天复辟”阴谋而当作“反革命”扭送公安局。随后一些学生又到市内著名佛教名胜罗汉寺“破四旧”，五百阿罗汉塑像全被砸毁。

到8月底，湖南南岳15所寺庙中，唐代以来的1500多尊佛像、菩萨、罗汉、50多部经书等等大量文物古迹被毁，仅运下山的铜铁碎片即达60多吨。

北京34所中学准备把北京市改为“东方红市”，把天安门前的华表和石狮子搬走，为此成立了“东方红筹委会”。对此，周恩来8月26日批示：“可以倡议，但不能由他们决定命名。否则命名无效，岂不损失信誉？”

由于发生了“李文波事件”，周恩来的指示周荣鑫和北京市委在劳动人民文化宫设立了“北京市大、中学校红卫兵联络总站”，由解放军、机关干部和红卫兵三方面一起协调，处理“破四旧”中出现的

诸多问题，随时同红卫兵保持联系，及时解决他们的合理要求

8月26日晚22时，吴德在劳动人民文化宫召集北京红卫兵代表会，他说：

“今天和大家商量一个问题，首都有红卫兵、赤卫队和其他各种组织，为了使大家能够联络，我们有个提议，全市建立一个联络总站，各区成立一个联合分站，这是周总理的提议，地点大家讨论。

我们想，这是劳动人民文化宫，在这个地方作为办公地方行不行？当前文化革命是一件大事，红卫兵的成立也是一件大事。我相信大家一定会同意这个，同意成立联络组织的。首都红卫兵的联络站是在伟大的领袖、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亲自指挥下成立的，红卫兵联络站也联络其他革命组织，以首都联络站为中心，具体任务要大家来讨论，大家来创造，联络站过渡到总指挥部。

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革命的小将向旧世界进攻，用革命的精神向一切坏东西开战。使全市出现了大好形势，革命同志为你们热烈欢呼！你们做得对、干得好，革命造反精神万岁！

革命的红卫兵、红旗、赤卫队等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合法组织。人民解放军非常支持红卫兵，他们派来了干部，支持大家的行动，保卫大家安全，同时传播毛泽东思想，市委也派一些人员来，向同志们学习，为大家服务。市委派些人来，同志们欢迎不欢迎啊？”

大家说：“欢迎！”

当天，“北京大中学校红卫兵联络总站”在劳动人民文化宫成立，办公地点设在劳动人民文化宫最后面一座大殿，大殿里的厢房改造成

办公室兼休息室，除了一张桌子、两部电话，也没有更多摆设。政治处、政宣组、后勤组和办公室，都设在这座大殿里。北京市委书记雍文涛主持总站工作。

据当年曾调到红卫兵联络站工作的北京戏剧专科学校红卫兵徐雅雅回忆，联络站设在劳动人民文化宫，生活条件艰苦，每天吃咸菜，啃干烧饼，喝白开水，尽管如此，红卫兵心里却都非常愉快。联络站的工作由周恩来亲自过问，每天，要接待来自全国各地的一批批红卫兵，处理各种矛盾，解决各种疑难问题。

## 第156回：文化宫，设红卫兵联络站

### 定《十条》，难遏止“清华模式”

27日凌晨1点多钟，周恩来刚刚开完会，就赶到文化宫接见参加北京红卫兵代表会议的全体代表，并讲了话。他说：

“党中央非常关心你们，林彪同志关心你们，毛主席关心你们，你们到一起碰头很不容易，我们心里很不安。昨天，我们有的红卫兵被坏蛋刺伤了，我们心里很难过，想怎样帮助你们，所以想在劳动人民文化宫建立联络站。你们红卫兵有权使用这个宫。全市几十所大学，几百所中学，假如一天每个学校来两三个代表，一天就得接见几千个，一个大殿不够就两个，两个不够就三个。这是个联络站，不是领导机关。但要有个过渡组织，一下子要把几十个单位联合在一起不大可能，不要急。”“我们有责任帮助你们，不光成立总站，还在成立分站，给你们干革命的方便。给你们架专用的电话线，准备交通工具、吃住。我们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嘛！宪法规定有集会，结社的自由，我们绝不是限制你们。”

“我们怎样帮助你们呢？党中央、国务院可以在这里设办公室。反映你们的意见。有的学校建议取消定息，这个建议很好，但总得通过人民代表大会讨论呀！十五中要求警察换上解放军服装，这个事好办，我跟谢富治副总理商量，9月1日就改。但有些事情就得跟你们商量。有些红卫兵叫长安街为‘长征街’，有的红卫兵叫‘东方红街’，这就得商量。我们相信你们，尊重你们嘛，但是有些涉及到国家制度，就不能一下子改。你们要相信党中央、相信毛主席，有的事不能你们

一下通令就执行，那毛主席也得执行你们的命令了。”

“红卫兵，中学也好，大学也好，都是解放军的后备军嘛！你们提了很多建立，我都看了，一定把意见转达给党中央、毛主席。你们不是说服从解放军指挥的吗？就得听话哟！我搞政治工作，不是兵啦，但你们叫我当老红卫兵，我就有发言权了，还得听我的。我虽然退伍了，一旦打起仗来，我还要穿上军装，毛主席是最高统帅，他要我到哪里去，我就到哪里去。

总起来说，我跟你们谈三件事：

第一件事，支持你们，帮助你们。第二件事，保护你们，爱护你们。第三件事，遇事同你们商量，宣传解释。

我今天就提这点建议，你们商量讨论。你们的意见书、呼吁书、命令书……这么厚一打子（做手势），我们都分了类，送给中央文革小组、送给党中央、毛主席。你们的工作做得很好，发动小弟弟、小妹妹，自行车没有灯就通不过，人民警察十几年解决不了的问题，你们三天就解决了嘛！

今天只是开个头，今后见面机会还多呢！你们不是说要把八月十八日作为纪念日吗？对这件事，我举手双手赞成。

再说一遍，绝不是限制你们，是帮助你们。今天不多谈了。

北京、全国的红卫兵万岁！”

北京的打人风潮也让清华附中红卫兵的几个核心人物深感不安，他们向分管清华的中央文革副组长王任重提出，中央是否能有制止打人的措施？

王任重表示："中央说话不如红卫兵自己说，你们有什么想法就来钓鱼台写一写吧。"

此时北京市已成为中学红卫兵的天下，新市委的政令还不如中学红卫兵或西城中学红卫兵纠察队的通令灵光。中学红卫兵为所欲为，已经不把党中央放在眼里，颇有点像当年义和团进京。

清华附中红卫兵将起草制止打人措施的任务交给了骆小海和张晓宾。8 月 26 日，他们两人来到钓鱼台找到王任重，王任重对他们说：具体内容由红卫兵自己决定，但是希望提一下对新市委的态度，以及做事要先动口再动手。

骆小海和张晓宾回来后和几个头头连夜匆匆议定，一共写了 10 条，核心就是反对暴力，最后由骆小海执笔汇总，总标题《红卫兵战校红卫兵对目前形势的十点估计》，是卜大华定的，颇有点代替中央指点全局力挽狂澜的"狂妄"。除了王任重提示的外，主要内容有：呼吁红卫兵正视自己的错误；反对打人，打人"只能触及皮肉"，应该"讲道理"；纠正打倒一切的偏差；左派内部应该团结；团结非红五类，"不可笼统地叫做狗崽子"，他们也可以被吸收进红卫兵，恢复"重在表现"政策；反对胡乱串联；反对抄家、剪头发、禁卖点心等一类以"破四旧"为名目的破坏活动。

遗憾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就在他们起草《十点估计》的当天，8 月 26 日，清华附中也发生了打人风潮，并且有人自杀。

从 8 月 26 日开始，清华附中发生了后来被称为"清华附中模式"的校园暴力。宋柏林在当天的日记里这样记述："……回去后几乎各

班狗崽子都被打翻在地，用皮带，竹条猛抽。”

李文波被打死的第二天，8 月 26 日上午，清华附中红卫兵在教学楼前开大会，红卫兵负责人在会上激昂地说：“阶级敌人在向我们报复，我们坚决不能手软。”“阶级敌人用白色恐怖向我们进攻，我们要用红色恐怖来还击。”

当晚，清华附中红卫兵又在清华附中五楼大教室召开全校性的“斗争会”，由清华附中红卫兵的负责人卜大华主持。

举行“斗争会”的大教室有 150 多平方米，是清华附中最大的集会场所，有东西两个门。“斗争会”开始前，一般的教职员工，列队从东门进去，然后面朝西坐下。“黑帮”则排队从西门进会场，站成一排，等候“斗争”，有该校的校长万邦儒，副校长韩家鳌，共青团委书记顾涵芬，办公室副主任张秀珍，以及在 1957 年被划成“右派分子”的老师。而首当其冲的是清华附中的校长万邦儒，副校长韩家鳌。他们是清华附中的所谓“黑帮头子”。红卫兵命令他们二人在衣服的前襟上缝上一块黑布，黑布上写上白字：“黑帮大头”，“黑帮二头”。1966 年夏天他们就一直戴着这样的标记走来走去，时时遭到打骂和侮辱。他们被毒打过很多次。万邦儒作为头号“黑帮”校长，那晚被打得遍体鳞伤，肾脏受伤，便血，头上被打出了一个大裂口，长久不能愈合。以后他落下了肾病和胃病。

“斗争会”从晚上 19 时开始，叫喊加上殴打，一直进行到子夜 0 时左右才结束。在会上，所有的“黑帮”都遭到了残酷野蛮的殴打。红卫兵用铜头军用皮带、以塑料跳绳拧成麻花状的一种鞭子，猛抽“黑

帮分子”。当时正是炎夏，人们都只穿单薄的衣服。皮带和鞭子抽下去，落在人的身体上，一抽一个血印。被“斗争”的人先站着，后来被喝令跪下。跪得高了或是低了，都被红卫兵呵斥并因此遭重打。

除了拳脚交加和鞭子抽打，还有声嘶力竭的“揭发”和“控诉”，期间还穿插着高呼口号，诸如“坚决打倒黑帮”、“誓死保卫党中央，誓死保卫毛主席”、“把文化大革命坚决进行到底”，当时喊得最多最频繁的是“毛主席万岁！万岁!! 万万岁!!!”这一句。

预 651 班红卫兵把清华附中的女团委书记顾涵芬的头剃去了半边头发，然后就跪在那里挨批斗。有几个女同学拿着皮带抽她，把她左眼打坏了，几乎瞎掉，剩零点零几的视力，仅能感觉到一点光亮。因多次挨打受折磨，她的身体受了重创，后来两次怀孕都小产，到第三次才保住婴儿。

那晚被打得最厉害的是刘树华和邢家鲤。邢家鲤是清华大学教务处副处长，分管清华附中，和校长万邦儒，副校长韩家鳌顺排被红卫兵称作“黑帮总头”，他平日不在清华附中上班，这天被抓来，红卫兵打他打得特别凶狠。

刘树华则是那天晚上挨斗的“黑帮”新成员，他不是学校的领导人，也不是业务上突出的教师，1962 年大学毕业后分配到清华附中教物理，兼任班主任，年纪尚轻，也不可能在 1949 年以前有所谓“历史问题”，原不可能成为所谓“黑帮”或者“反动学术权威”8 月 26 日以前，他还没有被打进“黑帮”之内。刘树华从东门进了会场，想往一般教职员工的那边坐下，却被红卫兵呵斥住，并指着一群“黑帮”，

大声命令他："站那边儿去。"红卫兵说他是"流氓"。

刘树华那时刚结婚三个月，在这个婚姻之前，他追求过另外一个姑娘，那个姑娘不情愿，曾经到清华附中领导人那里抱怨刘树华纠缠她，学校领导人为此跟刘树华谈过话。这件事情过去后，刘树华另外找了对象并结婚。

6 月上旬文革伊始，"工作组"进驻清华附中领导运动，号召"大揭发"。学校里贴出了大批的大字报，刘树华谈恋爱那件事也被"揭发"出来。但直到这个时候，他还只是一个普通群众，不至于被批斗。

"斗争会"后，刘树华回到了他所住的叫做"明斋"的集体宿舍。当时刘树华的妻子住在山西省，而对他那样一个普通教师来说，要把妻子调到北京来，几乎是不可能的，他们只能两地分居。另外，刘树华在北京也不可能有自己的房间，他和别的男老师同住一个房间。他回到房间以后，理了一下床上的东西，就悄悄地离开了房间，再也没有回来。他的同屋张亦鸣老师那时候在房间里，但是没有发觉刘树华的异样。

第二天早上工人给锅炉通灰的时候，发现了刘树华的尸体。他是从清华大学西南门烧锅炉的高烟囱顶上跳了下来，是从烟囱里面跳下去的。烟囱的里侧空间窄小，刘树华的身体是直立落下去的，身体落地时的撞击力非常大。看到他尸体的人说，他的两根大腿骨，深深插进他的身体，尸体因此缩短了。尸体上满是血和黑色的烟灰粉末。

暴力扩大到学生。最严重的是高 631 班郑国行、郑光召、戴建中等 4 人。高二女生郭兰蕙服毒自杀。因贴大字报保过校领导的郑光召

被宣布为“反动学生”。郑光召身强力壮，是本校高年级学习、体育“尖子学生”，他被剥去上衣，光着膀子用皮带狠抽。他不服罪名，将一枚毛主席像章穿过皮肉，别在胸前，结果被打得肾脏出血。

8 月 26 日这天，北京被红卫兵打死的日死亡人数，从两位数跳到了三位数。

第二天，8 月 27 日，由清华附中署名的《红卫兵战报》，发表了《红卫兵战校红卫兵对目前形势的十点估计》，严厉谴责打人抄家以及对党政干部一律以黑帮论处的行为，要求红卫兵努力学习、忠实执行、热情宣传、勇敢捍卫《十六条》。《十点估计》印成大批传单，由张晓宾从他父亲的铁道部调来数十辆卡车分四路到北京市内进行大规模宣传。城里的主流红卫兵对《十点估计》表示不满，但在民间却引起巨大反响。传单被一再翻印，俨然如正式文告一夜贴满全城，继而传遍全国。他们收到了很多的感谢信，人们还敲锣打鼓上门致谢。也收到了许多控诉。

已发布了两份“通令”的“西纠”意犹未尽，在成立后的第三天，8 月 27 日，又发布“第三号通令”，进一步提出：

一、在文化革命的高潮中，为了满足广大工农兵群众和革命红卫兵的迫切需要，一定要大量出售毛主席著作，这是我们的武器、粮食、方向盘！一定要大量印制和出售各种毛主席画像和毛泽东纪念章，毛主席是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谁胆敢阻止工农兵群众和我们革命红卫兵学习毛主席著作，谁胆敢摘去我们心中的红太阳，我们就和他们拼命！把他们砸个稀巴烂！

二、没有中央的许可，没有新市委的决定，没有纠察队的命令，任何组织和个人都无权宣布戒严，都无权以任何借口拦截和检查来往车辆和行人，尤其不允许拦截和检查首长的汽车！绝对不允许以任何理由拦截军车！

三、绝不允许任何人擅自查抄国家机关、查抄国家负责干部的家！我们要保卫国家机密！保卫革命老首长的安全！

四、绝不允许任何人无理勒令革命老首长搬家，辞退保姆，交出电视、沙发、汽车等，我们要坚决粉碎敌人的阶级报复，坚决反对绝对平均主义！

五、为了给红卫兵在文化大革命中进行革命造反活动提供交通方便，我们认为，在路灯通明的马路上骑车，可以不必点灯。

六、各商店现存的实用商品，若其商标不是反动的，不是黄色的，就可以继续出售，任何人都不要进行阻止，不要让坏人乘机捣乱破坏国家财产。今后，生产部门要立即砸烂一切旧商标，创立革命的新商标。我们红卫兵决不许可任何旧商标的产品出厂！

七、严禁围追外宾、归国观光的华侨和港澳同胞，必须保证他们的安全和正当活动。

八、查抄地、富、反、坏、右、资黑六类的家，一定要通过本单位的红卫兵总部，一定要与当地派出所和各街道居民委员会取得联系，所缴获的一切财物都要归公！在查抄时，要提高警惕；要以文斗为主，后发制人，要严防坏人捣乱，钻空子。

“西纠”发出的《通令》像雪片般撒向北京城的每一个角落。

## 第157回：黄花岗，自由神像被砸毁　石头城，中山铜像起风波

8月27日，北京工业学院一中红卫兵有人发表了《告全市红卫兵紧急呼吁书：十万火急——彻底粉碎反革命的复辟阴谋》。《呼吁书》说：

“现在，阶级敌人动起来了，不仅向我们的阶级弟兄开刀，而且向我们敬爱的革命老前辈开刀了！！向我们敬爱的党中央和毛主席开刀了！！！红卫兵现在不挺身而出，还待何时？！”

“就在现在，有一批阴险毒辣的狗崽子，怀着对革命前辈和革命后代刻骨的阶级仇恨，乘革命之机，对我们进行疯狂阶级报复，妄想造成中国的匈牙利事件，妄想达到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反革命复辟阴谋。

他们闯进革命老干部家里，横行霸道，大打出手，揭下房瓦，扔出沙发，搬走橱柜，拆除电话，将文件乱翻一气，说这是‘特殊化’；将勤务人员赶出大门，扬言要老干部自己做饭，说这是‘劳动化’。

他们像一群疯狗，横在马路上，拦住革命老干部的小汽车，将他们赶下车，说这是‘脱离群众’，而他们自己却坐上汽车扬长而去。他们像一批杀红了眼的屠夫，冲进医院，‘勒令’取消高干生活待遇和看病优先权，让他们耗费宝贵的时间去排队挂号，企图让他们去等死！

他们这群洋奴，强行封闭高干病室，却改之为‘外宾病室’。

他们打着平等的招牌，干着强盗的勾当，假借工人的名字，叫喊什么‘房子应该平均分配’。

更恶毒的是，为实现他们篡党篡政篡军野心，他们到处散布流言蜚语，说什么：‘各级干部应民主产生’、‘文件不许分等级看’等等，等等。这完全是放屁！

更有极甚者，竟然狂妄叫嚣‘改组党中央’，竟然要给我们最最敬爱的领袖毛主席贴大字报。

诸如此类，不胜枚举。真他妈混蛋1混蛋！！混蛋！！！可恶！可憎！！可恨！！！该除！该斩！！该杀！！！

我们可亲可敬的革命老前辈和我们最最敬爱的领袖毛主席遭到污辱，我们的革命事业受到了损失！毛主席说：‘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我们就是这样做的，即以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反动派之道，还治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反动派之身。如此而已，岂有他哉！’

红卫兵遵照毛主席的教导，向全市狗崽子下最后通牒：只许左派造反，不许右派翻天！不许动我们的革命老干部一根毫毛，如果你们胆敢动一动，我们红卫兵饶不了你们！就和你们刺刀见红！要你们的狗命！”

“全市红卫兵战士们，擦亮眼睛，警惕起来！握紧拳头，行动起来！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肃清这一小撮形‘左’实右的地主、资产阶级小崽子们，让他们永世不得抬头，永世不得翻身！”

“成千成万的先烈，为着人民的利益，在我们的前头英勇地牺牲了，让我们高举起他们的旗帜，踏着他们的血迹前进吧！”

8 月 27 日，毛泽东在听取吴德关于北京“破四旧”情况的汇报

后说："北京几个朝代的遗老没人动过，这次破四旧动了，这样也好。"

这天，有关部门向周恩来汇报：红卫兵准备 29 日在苏联大使馆门前召开 20 万人的命名游行大会，把"扬威路"改名为"反修路"。

这天，北大附中学红卫兵，在校园里打死了两个在抄家中抓来的居民，一个是科学院气体厂的工人陈彦荣，37 岁，6 个孩子的父亲；另外一个，是一老年女人，姓名已无从查考。同日，北京第八女子中学和第三十一中学的红卫兵，在西交民巷打死了一个退休女会计孙启坤。北京宽街小学的校长郭文玉和教导主任吕贞先，也在这一天被打死；郭文玉的丈夫孟昭江同时被毒打，两天后死去。

这天，北京死亡人数又再次加倍。此后日死亡人数日日增加。

8月25日、26日，广州的红卫兵和部分群众捣毁了大佛寺等14个教堂和寺庙，烧毁了各种神品。全市的"封建迷信场所"统统销声匿迹，宗教活动全部停止，神职人员一时间，揪斗的揪斗，关押和关押，还俗的还俗，落了个二分尘土，一分流水的收场。

8 月 28 日，广州市近千名红卫兵和师生在黄花岗 72 烈士墓地汇集，他们在这里举行了"宣判散发着资本主义毒素的自由神大会"。会后，红卫兵登上墓顶，手持铁锤，将"自由神像"捣毁。

8 月 29 日，广东江门市人民银行的储蓄所贴出大字报《坚决响应革命倡议》，宣布从 29 日零时起不付利息，引发群众挤提现款，波及其他地区。

广州的路牌，也纷纷换上"延安路"、"红书路"、"朝阳路"、"曙光路"；　改称"北京路"的原永汉路上，触目皆是"东方红"、

“太阳升”、“新文化”一类商店招牌。美利权冰室的牌子被拆除，一乐也理发店改为“新风理发店”，并取消电发、落香水、发油、发蜡等项目，不理怪异发型；服装店不做奇装异服。名闻省港澳的酒家陶陶居改为东风楼，蛇王满改为卫红饭店，泮溪酒家改为友谊饭店，华侨大厦改为东风大厦，平安大戏院改为前进剧院，保滋堂、陈李济药厂改为广州中药一厂、二厂。中学也纷纷改名，广雅中学改为红旗中学，华师附中改为东方红中学。有人甚至标新立异地提议把白云山改为红云山。饭店不再有服务员，顾客统统要实行“自我服务”，自端饭菜。

红卫兵把养金鱼、雀鸟和猫狗宠物，统统斥之为“封、资、修”。他们闯入民居抄家，把名贵的酸枝木家具砸烂；把花鸟鱼虫的国画和线装书投入火中；把金银首饰当成资产阶级腐朽没落的证据，拿去公开展览。

文化大革命以前流行的歌曲，绝大部分被斥为资产阶级靡靡之音，唱片被红卫兵从商店货架和人们的家中取走，用锤子砸烂，用脚踏碎，扫入了垃圾堆。作曲家劫夫谱写的毛主席语录歌《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风行全国，成为群众集会、游行的必备节目。全国有十几个文艺团体和近百名作曲家，加入了为《毛主席语录》谱曲的行列。这在当时，是一种政治上的荣耀。

8 月 27 日，位于南京新街口广场中心的孙中山铜像被贴上了“破四旧”的勒令，大字报限令市委在“24 小时内拆除”，否则“后果自负”。

这尊孙中山内穿西式马甲，外披大礼服，颈系领带，作演讲姿势，神态坚定自信的铜像，久为南京人民所熟悉的铜像，是孙中山的日本友人梅屋庄吉赠送的。

梅屋庄吉，1868 年生于日本长崎，15 岁时瞒着父母偷跑到中国，在厦门、香港等地开设照相馆和电影院，以后回国从事电影摄制业，成为日本电影托拉斯的董事。

1895 年，梅屋经孙中山老师康德黎介绍结识孙中山。那时孙中山正准备进行反清起义，但缺乏经费与武器。听说这个情况，梅屋被孙中山忧国忧民的拳拳之心打动，他对孙中山表示："我将以最大努力来帮助你！"

1905 年，梅屋将自己的房子拿出用于筹备中国同盟会，同盟会机关报《民报》的创刊与初期运营经费也由梅屋提供。

1911 年，武昌起义爆发，梅屋不顾自己已经债台高筑，仍变卖家产筹得款项，用于武昌起义军的革命暴动。期间，梅屋还派摄影师拍摄辛亥革命波澜壮阔场面，留存下不少珍贵历史资料。

1914 年之后，孙中山在东京结集革命力量，组织中华革命党，发动讨伐袁世凯的"二次革命"和"三次革命"，这段时间里，孙中山就住在位于东京新宿区大久保百人町 351 号的梅屋家中。梅屋庄吉不仅为孙中山的安全操心，还帮助秘密筹集物款、运送军火，多方支持孙中山的革命活动。

当孙中山与宋庆龄相爱遭受家人压力和同志不解时，梅屋夫妇感动于孙宋爱情的真挚，坚决支持这桩婚姻。1915 年 10 月 24 日，那

场伟大的婚礼在梅屋庄吉的家中悄悄举行。同时，孙中山与梅屋庄吉拜为义兄弟，宋庆龄和梅屋夫人结为义姊妹。

后来，孙中山回国组织政府，但他与梅屋庄吉依旧信函不断。1925年，孙中山重病之际，梅屋庄吉闻讯派大女儿、大女婿赶到北平伺候汤药。孙中山弥留之际也不忘梅屋，对问前来探望的日本友人说："烟波亭(梅屋的号)近况如何，前在神户未曾晤对，甚感遗憾。"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去世，第二天梅屋就收到孙中山儿子孙科的唁电。听闻噩耗，梅屋悲痛万分。1929年6月1日凌晨，在南京湖南路当时的国民党中央党部公祭灵堂，在孙中山遗体即将奉安中山陵的时刻，我们在当时的纪录影片中依稀看到，年迈瘦弱的梅屋夫妇蹒跚着脚步，在他们好友的灵榇旁深深鞠躬并用绢子拭泪不已，他们在所有前来吊唁的外国使节和友人中表现得最为动情。

在国民政府设计建造中山陵的时候，梅屋庄吉不顾日本政府"禁止为孙文举丧"之禁令，不惜变卖家产，典当妻女首饰，为中山先生铸像。他委托东京最著名的"荻原金作工场"计划，聘请雕刻家牧田祥哉造型制作，一共铸像四尊。

1928年3月10日，第一尊铜像制成，铜像高2.9米，重一吨多。造像以孙中山向民众发表演讲姿势设计，栩栩如生，气势巍然。1929年3月4日，梅屋庄吉携妻女乘日本"鹿岛丸号"邮船将铜像运送至上海，再用专车护送南京，安放于南京黄埔路中央军校。这年10月14日上午9时，在中央军校隆重举行了铜像揭幕典礼，蒋介石、宋美龄、胡汉民和林森都出席了揭幕式。铜像揭幕后，蒋介石致辞，梅

屋庄吉先生致颂辞。他说："我庄吉跟随中山先生30余载，彼此已成生死之交。我为了纪念这位伟大知己，决定把这一尊铜像献给国民政府。"当天下午，中央军校开放，任人参观瞻仰铜像，据当时报载，涌入参观者不下万人。

第二尊铜像于1930年5月由日本邮船"大洋丸"运到上海后，转乘太吉汽船"凉州号"运往广州，安放在黄埔军校内。黄埔军校即 1924年5月，孙中山在中国共产党和苏联的帮助下，创办的陆军军官学校。军校旧址于抗日战争战时期被炸毁，1964年复原并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孙中山铜像依然伫立学校制高点。

第三尊铜像于1930年12月28日有日本邮船"白山丸"号先运至上海，1931年1月10日由中国军舰"靖安号"再转道广州，1933年以后安放在中山大学新校址内。

第四尊铜像赠送给了广东省中山县翠亨村孙中山的故居，但在1937年"七·七事变"后，铜像迁往澳门"国父纪念馆"，至今仍在那里接受人们的瞻仰。

安放在南京国民党中央军校的第一尊铜像，在民众的要求下，1942年11月，在孙中山诞辰76周年前夕，汪精卫政府为了笼络民心，将铜像移奉新街口正中心。同时，拆除了那里原有的宝塔，就广场空地建街心公园，四周添设新型灯柱及灯光设备，四角又建四座喷水池，栽植名贵花卉和常绿树木。11月12日铜像再次隆重揭幕。

从此，这尊铜像在新街口广场伫立了 24个春秋。

1966年11月12日是孙中山诞辰100周年纪念日。这年的3月

20 日，在“孙中山先生诞辰 100 周年纪念筹备委员会南京分会”首次会议上，讨论决定修缮中山陵、总统府内孙中山卧室和办公室，以及新街口孙中山铜像广场。

1966 年 8 月 27 日下午 17 时 30 分左右，南京市市政公司卡车司机、已有 24 年驾龄的张传顺开着全公司最好的卡车，崭新的苏制吉尔回到位于中央门外的公司，交了车，准备下班回家。这时，公司书记喊住他，说是下达一项紧急政治任务，立即开车去新街口广场运走孙中山铜像。张传顺二话没说，发动车就出发，18 时左右即来到新街口，只见广场上已是人山人海，路灯下，红卫兵们围绕铜像是砸是留，正在激烈的辩论。

一边说：“孙中山是革命的，铜像应该保。”

一边说：“孙中山不是革命派，是资产阶级的代表，铜像应该砸。”

两派学生都穿着黄军服，臂带“红卫兵”红袖章，有的拿着喇叭，或坐或立，吵得不可开交。张传顺到时，铜像旁边已有一辆起重吊车，做好了吊运铜像的准备。”

现场气氛极为紧张，有人当即打电话给南京市委书记。形势紧急，已下班回家的市委书记来不及换拖鞋就赶到新街口广场。

红卫兵各说各的理，市委书记也不敢决策。他当即表示：“事关重大，要请示中央。”

很快，国务院回电，明确对孙中山铜像要给予保护，并立即转移到安全地带。南京市委当即决定委托当时的中山陵园管理处和南京市政公司施工队，在保证铜像完好无损的前提下，一天内将铜像转移。

铜像最先准备安放在东郊梅花山下。为确保万无一失，张传顺接到命令，先开车跑一趟以熟悉线路。

到梅花山本来最近的一条路是向东，沿中山东路出中山门。为转移红卫兵视线，防止路遇不测，当晚 22 时多，张传顺带着装卸工开着空车，从新街口广场向南，绕行白下路，折到太平南路再向北，穿过珠江路，经北京东路驶往太平门，再沿古城墙经龙脖子路，拐进廖仲恺墓，这样绕了一圈后才开到梅花山下。

当时定下来铜像放在山坡上的一间办公平房内，但装卸工现场测量后发现，此处办公平房门太小，铜像根本运不进去，必须另换地方。随后张传顺接到命令，将车子从中山门开回新街口。

这时，铜像旁的起吊机已开始工作。这架长臂吊机是正宗美国货，负荷量极大。铜像基座的四周都已开挖出来，铜像用粗麻绳捆扎，但起吊机就是吊不起来。停机后，技术人员趴到地下吃惊地发现，原来基座用密密的粗钢筋焊在水泥浇筑的桩基上！于是又调来氧气切割机，割断底座下的一根根钢筋。然后再开动起吊机，将铜像吊上卡车。车厢里铺着厚厚的稻草袋，铜像平躺在草袋上。铜像基座上有铸有“日本大阪金工株式会社铸”的字样。是时，已是次日凌晨 2 时。现场四周站满公安人员维持秩序。

张传顺接到命令，天亮以前，无论如何必须将铜像卸到指定地点。

就在这时，又有人出来阻拦，要将铜像就地销毁。学生们还押来市委书记刘中，追问他准备把铜像运送哪里，是谁指使的。刘中说：“奉周总理指示，运到中山陵！”

坐满公安人员的吉普车在前面开道，卡车子从新街口南行内桥，往东经过白下路，再北折太平路出太平门，经紫金山南麓龙脖子路至中山陵。谁知先头部队“火力侦查”后发现，原拟存放铜像的音乐台已有学生据守，天也将大亮，情况突变，张传顺被告知：将铜像运往灵谷寺。从新街口沿中山东路直驱中山门，不到 20 分钟，载有伟人铜像的车子就开进了灵谷寺。在那里接应的陵园职工们迅速把铜像藏到寺后经堂里的一间小仓库内，作好伪装上好了锁。

第二天，警觉的陵园人发现有 300 多人围聚寺院，好像在寻找什么。为了确保铜像安全，这天晚上，大家又把铜像连夜装车，并将汽车和铜像一起开进车库，严把库门，铜像在车库里又度过一天。次日，大家终于选定了管理处的人事档案室。因为这间屋子里有一道隔墙，前面的大半间办公，后面的小半间是从另一个房间开门，隐蔽性极好。当晚，负责人在夜深人静时拆开隔墙，用滚木将铜像移入，再粉饰好，用沙发靠拢掩护。

就这样，孙中山铜像安全地保存了下来。

1968 年 6 月，在周恩来亲自指示下，这尊孙中山铜像被安装在中山陵前广场南端的八角形石台座上原孝经宝鼎处。在铜像前面挂着一块牌子，上面书写着《毛主席语录》：“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

第158回：护古迹，龙门石窟辩论急　存与毁，千年名胜学生定

8 月 26 日，河南洛阳白马寺村的大批村民，在村干部率领下，以“破四旧”的名义，来到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被誉为东方佛教“释源”、“祖庭”的中国历史上第一座佛教寺院——白马寺，在寺院内进行了大规模打砸佛像和焚烧经书的“革命行动”。

这天，位于郊区关林的洛阳市第八中学、位于龙门的洛阳市第十四中学的大批红卫兵，也以“破四旧”的名义，闯入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中国三大石窟艺术宝库之一的龙门石窟，准备采取“革命行动”。

这些十几岁的中学生，跑遍整个龙门石窟，辨认他们认为是反动封建遗毒的一尊尊佛像。他们用粉笔在许多佛像上写了“砸”字，还在当时保存经书的宾阳洞前库房的门口，写上了“烧”字，然后向龙门石窟保管所的工作人员强行要走了库房钥匙，返回学校去取砸、烧工具。

龙门石窟即将毁于一旦……

面对大群激动亢奋、热血沸腾的年轻人，面对这些响应党的号召、以最革命的名义来造反的中学生，白马寺和龙门石窟保管所的工作人员忧心如焚，却不能,也不敢进行制止，只好用电话向市文化局、向洛阳市委报告。

洛阳市委接到告急电话后，立即设法采取紧急措施。此时的洛阳市政府机关在暴风骤雨般的运动冲击下，已经陷于瘫痪状态，中共洛阳市委书记吕英急中生智，决定采取“以红制红”的方法，联系洛阳

市的最高学府，洛阳农机学院的红卫兵出面制止。

8 月 27 日上午 8 时许，洛阳农机学院接到中共洛阳市委办公室的电话，传达了市委书记吕英要求洛阳农机学院师生出面保卫龙门石窟和白马寺的紧急通知。学院以高年级学生为主的“文化革命委员会”此时负责学院的工作。他们接到中共洛阳市委的这个不寻常的电话通知后，校“文化革命委员会”主席和冠中与副主席李治林、秘书陈玺等人迅速交换了意见。他们没有片刻犹豫，立即承担起责任，打开学校广播系统，向全校师生员工紧急通报。

这时，洛阳农机学院的师生员工刚刚吃完早饭。听到这震撼人心的广播，所有的人都惊呆了。几个月来，他们也都响应号召，投入运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批斗了许多领导和老师。他们前两天也曾经到洛阳市老城“破四旧”，抄了一些“反动资本家”的家，砸毁了不少旧牌匾，和许多中学红卫兵一起，在街头焚毁了新华书店里的大批书籍和国营商店里成捆成箱的香烟，砸了一箱箱的白酒。老城街头，以及洛阳市许多商店的店门前，烟雾弥漫，酒味冲天。学生们都兴高采烈，以为扫荡了污泥浊水，从此将亲手开辟了一个新世界，许多人还没有从兴奋劲儿里缓过神来。但在这时，他们突然听到广播，得知著名的龙门和白马寺也面临被砸毁的威胁，即将毁于一旦，他们不禁纷纷骇然，昂奋狂热的革命劲头，立即在这震撼人心的广播声中，表现出保卫祖国历史文化遗产的高度自觉性，承担起历史所赋予他们的神圣使命。

洛阳农机学院的师生员工，团结一致，在以学生和冠中等为首的

“文化革命委员会”的组织下，立即动员起来。学院车队司机班班长葛培山师傅接到校“文化革命委员会”的通知，立即将司机班的司机师傅全部动员起来，打开车库大门，发动学院当时的全部交通工具，几辆大卡车和大轿车，从车库里开出。

以学生为主，有附属工厂工人和个别老师自发参加的数百人紧急集合，校园内人头攒动，一片大战将临的紧张气氛。有几位正在生病的学生，也跑下楼来，加入出发的行列。许多学生胳臂都戴上了印着“红卫兵”字样的红色袖标，表情紧张严肃。

上午 9 时整，洛阳农机学院的数百名师生员工，从学校所在的洛阳市涧西区西南角，乘坐多辆大卡车紧急出动。

这是一个阴霾满天、铅云密布的沉重的早晨。满载大学生的车队，狂飙般疾驶过著名的洛阳“拖拉机城”，驶过传单遍地、口号震天、人群沸腾的洛阳市区；驶上烟尘滚滚的洛龙公路，去执行一项注定要将他们的名字载入史册的重大历史行动。

他们分成两路，一路赶赴 30 公里外洛阳市南郊的龙门石窟，其中两辆车直接去关林洛阳市第八中学，另一路乘两辆大卡车，沿着中州路，穿过灰烬遍地、伤痕累累的洛阳老城，赶往 30 公里外洛阳市东郊的白马寺。

这时，还有许多没有挤上车的学生，飞跑到学校北面的景华路上，紧急拦截公共汽车。在许多乘客和司机的理解、支持下，满载学生们的多辆公共汽车，一路不停，风驰电掣，直接开往龙门石窟。

8 月 27 日上午 10 时许，洛阳农机学院的数辆大卡车，狂风骤雨

般穿过龙门街，浩浩荡荡，抵达龙门石窟的北口。上百名大学生纷纷跳下车来，潮水般涌入石窟。他们首先排成人墙，封锁了石窟南北两头的路口，严禁任何人进入。然后搜索整个龙门石窟，将仍然在石窟里活动的少数中学生清理出去。

在龙门石窟禹王台前的空地上，一度忧心如焚的龙门文物保管所党支部书记扈捷，激动万分。惊喜的双目里，闪烁着晶莹的泪光。他站在台阶上，向洛阳农机学院的大学生们介绍了情况。

听了龙门石窟保管所领导介绍的情况后，洛阳农机学院的师生们，立即又分出一部分人，赶往洛阳八中，与早上直接赶到八中的同学们一起，堵住八中的学校大门，禁止八中学生出校。然后派出代表，以洛阳农机学院“文化革命委员会”的和冠中同学为首，与八中学生代表谈判。其他大学生也分成多个小组，在校园里与八中红卫兵们展开了激烈的辩论。

洛阳市第八中学，创建于民国初年，是洛阳市历史最悠久的中学之一。它的校园旁边，就是著名的关林庙，里面埋葬着三国名将、史称“武圣”的关云长的首级。关公的墓冢上，芳草青青。古老的关林，巍巍庙宇，森森古柏，见证了 1966 年 8 月 27 日，发生在洛阳市第八中学里的这一场有关洛阳龙门石窟生死存亡的激烈辩论。这是一场奇特的辩论：一方是一群二十岁刚刚出头的大学生，另一方是一群十六、七岁的中学生，他们辩论的题目，与学校、与学习、与他们自身似乎毫无关联，但却与中国最重要的世界级文化遗产——龙门石窟，生死攸关。比他们年长的父辈们：老师、校长，甚至洛阳市的领导，此时

此刻，都无权决定如此著名的龙门石窟的命运，只能远远地站在一边，等待这些年轻的半大孩子们，来讨论如此重大的严肃的话题，来决定中国古老石窟艺术宝库的生死存亡。满天浓重的阴云，黑压压含雨欲落。古老的龙门，伊水无波，千佛止笑；郁郁葱葱的关林，似乎屏住了呼吸。历史的脚步，好像凝固在这一时刻了。

这是一场非常艰难的谈判。大学生们年龄、资格的优势起了重要作用。无法无天的中学红卫兵们，在年龄上、资格上，到底不是大学生们的对手，他们的意志和理念，终于被一个个态度坚定、来势汹汹的大学红卫兵说服了。

到下午 16 时，洛阳八中的红卫兵们终于回心转意，表示要服从尊敬的洛阳农机学院的大学生们的意见。谈判胜利结束。大学生们要回了藏经的宾阳洞库房的钥匙，他们一个个筋疲力尽，带着沙哑的喉咙，迈着疲惫的脚步，离开洛阳八中，回到了龙门石窟。在狭窄的龙门石窟保管所的办公用房，在潮湿的洞窟里，纷纷倒下休息。就在这些潮湿的洞窟里，他们横七竖八地躺着，终于可以喘一口气了。

8 月 27 日，山东冠县第 2 中学全体师生，砸开武训墓。等柳林农中和冠县卫生学校师生相继到达后，三个校师生联手捣毁墓穴。最后，他们挖出武训尸骨，抬尸游行，并在大柳林北门上场院举行公审大会，将骨殖砸烂后焚毁。

著名佛教圣地五台山，尽管位于山西省北部偏僻的崇山峻岭之中，但仍然有红卫兵进山“横扫”，南山寺门前汉白玉扶手上的雕饰狮子头全部被砸毁。

北京八中的学生发出致各民主党派的《最后通牒》后，就把这事忘了。还没到 72 个小时呢，民主党派机关的群众组织就来电话问："期限到了，你们怎么办?"

八中的陈小鲁就说："收大印。"

他们说："那好，我们来车接你们。"

8 月 27 日，在民盟中央举行了民主同盟、民主建国会、农工民主党、九三学社 4 个民主党派向八中红卫兵交印仪式，交出的各民主党派印章有 10 个之多。八中红卫兵代表说，这些印由他们暂时保管，以后交给中共中央。

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也于 8 月底由北京外国语学院附中红卫兵接管。

大概过了一两天，陈小鲁回家，从李富春家的门前经过。李富春正从家里走出来，把陈小鲁叫住，问他："解散民主党派，是不是你们八中干的?"

陈小鲁说："是。"

李富春说："这么大的事情，你们就擅自做主？我们党、我们中央，对民主党派有统战政策，你们知道不知道？"

他批了陈小鲁一顿。陈小鲁一时不知如何是好，就问："那怎么办?我们把大印都收回来了，再还给他们吗?"

李富春想了半天才说："你们以后做事，要多动动脑筋，不要轻举妄动!"

8 月 28 日，北京三中红卫兵贴出大字报，反对"十一"游行由

东向西行进。半工半读服务学校学生倡议，取消农村所有的自留地。

这天，北师大二附中的红卫兵，抄了地安门东大街 93 号朱广相医生的家，并当众殴打他。其邻居半导体研究所的工人李丛贞看不下去，上前劝说："朱大夫是好人，别打他了。"他因此被红卫兵绑在房前柱子上，当众打死。一个打他的红卫兵，为判断他是否真的死了，抡起一把刀从他的肩膀上劈下一块肉，见没有反应，才把李丛贞的尸体从柱子上卸了下来。

8月28日，家住北京市西城区大红罗厂南巷20号的李秀蓉老太太一家5人死于非命。事情的起因是：当地派出所民警接到个别人举报说，这一家人在转移财产，于是民警召来附近的三十八中红卫兵前去抄家。抄家过程中，李秀蓉全家人都遭到红卫兵的毒打，李秀蓉的外孙子黄瑞五、外孙女黄炜班，和在他们家工作了12年的男佣当天即不治身亡，两天后，李秀蓉的女儿陈玉润也死去。80岁高龄的李秀蓉老人亲眼见外孙子、外孙女、女儿被红卫兵活活打死，几天以后也受惊吓而死。

8 月 29 日，人大附属中高二的一些红卫兵，到北京大学承泽园，打死了他们的一个同班同学的爷爷孔海琨老人。

当时，红卫兵杀人的事时有发生。就在东安市场附近的一个小学，有个女孩要加入红小兵。红小兵组织的头头说她革命不坚决，她听后，找了一把尖刀，来到被关的老师屋内，上前就将一个老师捅死，回来说："我这么坚决，可以当红小兵了吧！"

8 月 29 日，一中"红外围战斗小组"贴出大字报，要求修改宪

法。

8 月 30 日，八十中红卫兵贴出大字报，要求废除芭蕾舞。

红卫兵不仅反对资本主义，也反对个体经济："大街小巷修鞋的，命令你们马上停止营业，由有关部门组织修鞋社，修鞋价钱必须减少。"

天津市人民委员会 9 月做出决定，支持红卫兵 8 月 23 日提出的要求，取缔个体商贩和修配服务行业的经营。其他大城市残存的个体经济也基本停业。

红卫兵还反对奖金制度，建议"各工厂企业一律废除资产阶级的奖金制度，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里，广大工农兵群众是用伟大的毛泽东思想而武装起来的，用不着物质刺激。"对物质刺激政策的批判在文革前就开始，文革期间大部分行业取消了奖金制度。

在经济收入方面，红卫兵反对资产阶级拿高薪和存款利息，他们要求"资产阶级"："从九月份起令你们把高薪降低于人民的水平，银行有存款的地、富、反、坏、右、资本家，不许取走一厘一毫，如违此令，自己负责，毫不客气。"　红卫兵"建议有关部门考虑，废除银行的利息制度，让人们本着节约爱国精神储蓄，支援社会主义建设。"　"各报纸今后一律不许给过多的稿费，堵住这个黑风口。""工厂里，一律不给地富反坏右分子退休金，取消一切待遇，要监督他们劳动。""建议国家考虑工人普遍长工资，资产阶级权威降工资。"

据不完全统计北京市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没收私房 52 万间，

其中私人自住房 82，230 间。上海市 12 个区在“文化大革命”中共没收 124 万平方米的私房。从 8 月 27 日到 9 月 9 日，到天津市房管部门主动申请交出私有住房者计 11，525 户，共交私房 49，776 间。

第159回：抢话筒，风波起开封师院　找地委，组织众人赴郑州

8月21日，河南开封师范学院中文系学生韩兆修贴出了《造韩倩芝的反》的大字报，矛头直指院党委书记韩倩之，说他充当开封师院的匡亚明，是镇压革命小将的刽子手。必须彻底揭发，坚决批判，彻底打倒！

和大字报一起贴出的还有他的《改名声明》，把原名“韩兆修”，改为“韩卫红”，以示捍卫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志向和决心。

8月24日下午，开封师范学院在大礼堂召开批判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大会。会前，韩卫红等人在中文系资料室开会，讨论如何争取大会上发言，批判学院党委推行的资产阶级教育路线，揭露韩倩之的资产阶级反动本质，控诉市委工作组操纵校文革对“65”革命小将的残酷迫害。

但是，怎样取得发言机会呢？左思右想，也想不出一个行得通的好办法。最后，韩卫红说：“毛主席教导我们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我们既想发言，想批判资产阶级，批判韩倩之，又想让他们许可，这是根本不可能的。我们要发言，要批判就只有一个办法，革命！造反！除了造他们的反，没有别的道路可走。”

于是他们认真、详细地讨论造反方案。第一方案是三个人上台要求发言，直接作揭批发言；第二方案是如果会议主持人不允许他们发言，就造反，把大会变成揭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大会，变成控诉韩

倩之反动罪行的大会。

他们要争取第一方案能够发言，但不抱幻想，按第二方案作好造反准备。具体方法是：

一、落实各系能联系和发动起来的同学人数。

二、要求和他们观点一致的同学要尽量地聚在一起，坐在前面。

三、中文、艺术、政教三个系的同学比较多，开会时要集中坐在舞台的两边的台阶附近。

四、靳景贤和王富德分别负责左右两个通向舞台的阶梯，保证畅通。

五、韩卫红和张洪、张继烈三个人上台要求发言，若被拒绝，就抢占麦克风开始揭发批判韩倩之。

六、如果发言遭到阻止，台下由艺术系王明贵负责贵带一铜锣，以锣响为号大家一齐上台保护发言，一定要把大会变成控诉韩倩之、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大会。

七、韩卫红作为总联络员，有什么情况及时联络处置，进行统一指挥。

八、强调严守机密，造反方案不得向外泄露。

24日下午14时30分，全院师生大会如期在大礼堂召开。大会由韩倩之主持，院学生会主席，院文革小组的侯志英作批判发言，他讲了约有10分钟，韩卫红和张继烈、张洪交换了一下眼色，就一起走上舞台要求发言，被韩倩之一口拒绝。韩卫红一看发言不成，就直接跑到舞台中央的讲台边上，按事先计划，韩卫红一把夺过麦克风，趴在麦

克风上面喊："同学们，我们要造韩倩之的反，要揭发控诉韩倩之迫害艺术系……"

这突如其来的行动把正在发言的侯志英吓呆了，他紧攥着麦克风不放手。韩卫红一句话没有喊完，侯志英就气急败坏地把麦克风从他嘴边拉开。韩卫红抓住不放，俩人一夺，话筒和底座就分了家，侯志英手里攥着话筒，韩卫红手里拿着底座。就在这争夺话筒的刹那间，台下艺术系的王明贵按约定，"呛"一声，把手中铜锣敲响了。在舞台前面的同学，从两个阶梯口一齐冲上了舞台，按分工，有的去看守扩音设备和电源，有的到讲台周围保护韩卫红和张洪、张继烈继续发言。

但他们没有预想到的是，支持校文革的学生也蜂拥而来保护侯志英和韩倩之，一个女生抱着侯志英的腰。紧接着一些职工上来就把韩卫红他们往舞台下边推，个别职工乘机出手就打。舞台上叫喊成一片，好几个同学的脸上都淌血了。韩倩之一看如此混乱，就对着麦克风大声喊："散会！散会！革命的同学们都回去吧！"随即电房里便拉了电闸，整个礼堂陷入一片灰暗，人们纷纷离开。转眼之间，大礼堂已是人走座空了。剩下的只有要批判韩倩之的几十个人，被孤零零地晾在舞台上。

大家既无奈又气愤，韩倩之解散了大会，还说革命的都走了，那这些没有走的岂不就成了不革命、反革命吗？这出乎预料的情况，使他们处于非常被动的境地中，既不能发言批判，又无法回到系里去。大家为难地哭起来。

面对这预料之外的局面，韩卫红是一点办法也没有了。无奈之中，他只好把大家召集到舞台中央的毛泽东画像前，先让大家排成四队，报数查人，共是56人。接着就领着大家一段又一段地朗读毛主席的语录，

“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

“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但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

“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这也和扫地一样，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

……

开封师院的韩卫红在带领大家朗读毛主席语录的同时，大脑飞快地转动着，他思考着如何把大家的情绪稳下来，鼓上去。扭转被动局面。紧急之中他流着热泪开始对大家讲话：

“同学们，战友们，今天我们造了韩倩之的反，我们的行动，彻底揭了开侯志英假批判，真保皇的丑恶嘴脸；同时也暴露了韩倩之捂盖子，保自己；试图阻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反动本质。我们还要对韩倩之的资产阶级路线进行彻底的揭发批判，还要控诉韩倩之镇压革命学生运动的滔天罪行，为六、五革命小将伸张正义。是韩倩之心中有鬼做贼心虚，解散了我们的批判大会，还挑动学生斗学生，煽动职工打学生试图把我们置于死地而后快。这是韩倩之犯下的新罪行！他搬起石头砸住了自己的脚！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

亡，这是一切反动派的逻辑。韩倩之也不会违背这个逻辑的。

我们今天的造反行动和韩倩之对我们的镇压，必将使全院师生员工进一步认识韩倩之的资产阶级本质，觉悟起来，和我们一起造他的反。反革命围攻出左派，韩倩之把人轰走了，我们并不孤立，真理和正义在我们一边，广大革命师生在心里是同情我们的，支持我们的！我们的心向毛泽东，连着天安门。我们站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千难万险不低头，海枯石烂不变心。斗争，失败，再斗争，再失败，直至胜利，这是一切革命者的逻辑，我们是跟着共产党，跟着毛主席干革命，我们一定会胜利！

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成千成万的先烈，为了人民的利益，在我们的前头英勇的牺牲了，让我们擦干身上的血迹，掩埋好伙伴的尸体，高举起他们的旗帜，英勇前进吧。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黑暗即将过去，光明就在前头！”

韩卫红慷慨激昂地竭尽全力地讲，喉咙都沙哑了。周围的同学深受感动，他们很快从被围攻和殴打的恐怖中解脱了出来。悲愤使大家鼓起了斗争的勇气。个个义愤填膺，人人斗志昂扬。又有不少同情他们的同学从外面走进礼堂，走上舞台和他们站到一起。

天就要黑了，大家已无法回系里吃饭，只好坐在毛泽东的巨幅画像下面，互相紧密地依偎着，情不自禁地唱起了思念毛泽东的歌：“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迷路时想您有方向，黑夜里想您心里明……”来抒发为难之时，对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深切思念。相互激

励着革命的斗志和情绪。年轻人是很容易冲动的，前来支持他们的同学越来越多，这些同学和他们坐在一起一个接一个地唱。

接着，韩卫红在舞台东头的播音室开了一个紧急会议，决定：

一、建立开封师范学院革命造反总勤务组，推选韩卫红为勤务组组长。

二、立即整顿队伍，准备上街游行，到开封市委请愿。

三、劝离个别不宜参与的同学（主要是出身不好，容易被对方抓辫子的）让他们在家坚守阵地，及时了解我们上街后学校内部的动向。

会后，他们在毛泽东的巨幅画像前，举起手中的《毛主席语录》，举行了宣誓仪式，然后抬起对其宣誓的毛泽东画像，从大礼堂出发了，到开封示威请愿。

一路上，他们高唱革命歌曲，高呼口号，群情激愤。不少同学见状也跟了上来。从礼堂走到学校大门口，队伍已经有100多人了。

队伍出东大门走过小桥。这时，一阵急促的脚步追上了他们，两个年长的老师把韩卫红拦住，激动地拉着他的手，声音颤抖着说："我们是中文系的两名教师，你们的革命造反行动，我们一直看在眼里，我们敬佩你们这些大无畏的革命小将。我们代表中文系的部分教师，对你们的革命行动表示坚决的支持！我们为有你们这样的学生感到骄傲和自豪。由于我们的身份是教师，现在还不能公开站出来和你们一起去游行，也不便告诉你我们的姓名。但是，我们相信，你们的大方向是正确的，胜利一定属于你们！我们在学校等着你们胜利的消息。我们和你们永远是一条战壕里的战友，我们和你们永远心连心。让我

们以不同的方式，为保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吧！”

开封市委书记徐学龙在一个会议室接待张继烈，李兵，白石头，汪俊峰和韩卫红5个代表，他以市委对开封师院无权管辖为由，让他们去找地委。

白石头毫不客气地质问徐学龙：“既然师范学院不归市委管辖，市委为什么向师院派工作组？工作组组长邵俅是不是你们市委的干部？邵俅在学院对抗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顽固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镇压学生运动你们管不管？这样的工作组该不该从开封师院撤出去！？”

徐学龙被只好支支吾吾地说：“你们提出的问题，市委真的不能表态，你们是省管学校，地委是省委的驻汴派出机构，有什么要求你们可以去找地委。”

汪俊峰向徐学龙当面表示了强烈的抗议：“我们警告你徐学龙，你必须对你今天的表现负责，你对我们采取的这种态度，肯定是要付出沉痛代价的。只有彻底悔悟，痛改前非才有光明前途。镇压学生运动的人，绝不会有好下场！”

学生们愤怒地离开会议室，随即把情况如实向大家作了传达。大家被市委的态度激怒了，高呼了一阵“打倒徐学龙！”等口号，使劲地跺着脚走出了市委。

他们又到开封专员公署的东门口。这时候他们队伍的人更多了。同时，校文革的人也尾追过来，要和他们辩论。韩卫红让他们的同学

坐在地上，并规定无论是什么人进行挑衅，不经批准都不准站起来。

地委很快答复要接见他们。先是开封地委副书记，开封专员公署专员杨体泽在大门里面的大厅里热情接待学生代表，他认真地听了韩卫红和白石头反映的情况后，让他们把同学们安置在地委礼堂休息，当听说学生们还没有吃晚饭，就赶紧安排后勤的人去给同学们弄饭吃。

过了一小会儿，杨体泽专员又领着地委书记张申、副专员袁煦、办公室主任刘绪宗等来到礼堂看望大家。张申书记当场发表了态度明确、热情洋溢的讲话，他说：

“我代表中共开封地委，代表开封专员公署对开封师范学院同学们的革命造反行动，表示坚决的支持！你们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以革命的大无畏精神，勇敢地造了资产阶级的反，以实际行动捍卫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你们不愧为毛主席的红小兵，是革命的小闯将，我们向你们学习，向你们致敬！你们受苦了。你们有什么要求就大胆地提出来，地委能办到的，一定给你们办。地委办不到的就尽快向省委反映。”

张申书记的讲话让这些学生受到很大的鼓舞，他们热泪盈眶，有一种找到了老家的感觉，不时地报以热烈的鼓掌。

韩卫红向张书记提出了五项要求：

第一、我们要当“红卫兵”，要成立自己的革命组织“开封师范学院革命造反队”，我们要有队旗和红卫兵袖章；

第二、要求撤出市委派驻师范学院的工作组；

第三、韩倩之顽固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疯狂镇压学生运动，

我们要求撤他的职，罢他的官；

第四、在师范学院召开大会给我们彻底平反；

第五要求省委领导接见我们，支持我们。

张申书记听了后说：”大家都很累了，先休息一会儿，我们马上和省委领导联系，反映你们的情况和要求。”

张申书记走了不大一会儿，地委办公室主任刘绪宗就来通知说省委要学生们派出160人到郑州去。然后叫他们把队伍带到自由路的邮电局作好去郑州的准备。

到郑州后，他们被安排住到中州宾馆对面的河南省人民政府招待所。院文革也派了160人追到郑州，住在河南饭店。

第160回：做得对！豫省委支持造反　听社论，长沙市地覆天翻

8月25日上午10点多钟，河南省委办公厅打电话说省委领导要听开封师院韩卫红他们汇报，一直等到下午16时，才派车来到招待所，把韩卫红和陈红兵、白石头、王富德、汪俊峰5个人作为代表拉到河南饭店中楼二楼会议室，听汇报的是省国防工办主任李庆伟和省纪检组组长丁石。汇报以白石头发言为主，其他人补充。最后，韩卫红向省委提出四个要求：

一、要求省委主要领导接见，表态支持我们的革命行动。

二、要求省委直接派人进驻开封师范学院，直接领导学校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为我们的革命造反行动彻底平反。

三院党委书记韩倩之和开封市委驻师院工作组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镇压革命学生运动，对抗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罪恶滔天，强烈要求省委撤消开封市委驻师院工作组，撤韩倩之的职，罢韩倩之的官，把韩倩之和市委工作组组长邵俅交给群众揭发批判。

四、我们要成立革命造反队，建立“红卫兵”组织，要求省委给我们做队旗和红卫兵袖章。并把画好的队旗和袖章图样交给李庆伟。

李庆伟听了他们的情况和要求后，首先对他们因造反而受到的围攻、压制表示同情，对挨打的同学表示慰问。又说省委领导委托他当学生与省委之间的联络员，有什么问题和要求可以直接找他反映，他保证及时把情况向省委主要领导同志汇报，如果反映的不及时，可以造他的反。今天就是受省委的委托来听同学们汇报的，至于省委领导

什么时候接见，他会随时和他们联系的。

8月26号上午9点，联络员李庆伟派人送来了按图样给学生们做的队旗和红卫兵袖章。队旗的上面一行是镰刀斧头组成的党徽，和校名“开封师范学院”，中间是“革命造反队”五个大字。袖章的中央是党徽，“红卫兵”三个字围绕在党徽周围。

8月27日上午8点多钟，李庆伟打来电话，省委领导纪登奎要接见学生的代表。

9点，纪登奎的秘书李天资带着一辆旅行轿车，把韩卫红和白石头、汪峻峰、陈红兵、王富德、张洪、李兵7个代表接到黄河路的省邮电会议室，纪登奎、张耀东、李庆伟和他们一一握手，然后坐下来细心地听了他们的汇报。最后纪登奎说：

“我听了你们的情况，很好。刘建勋书记，王维群副省长、戴苏理书记和省委的其他领导同志，都很忙，特委托我和耀东秘书长来和大家见见面。你们为了批判资产阶级，受到了围攻和殴打，你们受苦了，我们对你们在开封师范学院的革命造反行动表示坚决的支持！你们积极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积极参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冲破阻力，敢字当头，造了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反，不愧为毛主席的红卫兵，不愧为英勇的革命闯将。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我们向你们学习，向你们致敬。毛主席教导我们说：‘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年轻人，朝气蓬勃，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省委支持你们，……你们要求罢韩倩之的官，撤徐学龙的职，这就不是一句话就能够办得到的。处

理人的事要慎重，要由组织部门来决定。我可以告诉大家，省委对开封，特别是对开封师范学院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是非常关心的，为加强对运动的领导，省委决定派李庆伟同志当你们的联络员，有什么情况可以直接和庆伟同志联系。”

他打开《毛主席语录》，和学生们一起读了三条语录后又说：“你们要努力奋斗，你们的前面还会有很多的阻力和困难，但是你们只要牢记毛主席的教导，在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团结和依靠人民群众，注意政策和策略，坚持正义，坚持真理，坚持革命不动摇，就会夺取一个又一个的胜利。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正义的事业是不可阻挡的，胜利一定是属于我们。”说完，他站起来和大家握手，一点儿客套都没有就告别了。

傍晚，纪登奎的秘书李天资又来电话，通知明天在郑州大学操场要召开“郑大联委”成立大会，省委书记刘建勋有重要讲话。

8月28日早饭后，两辆大轿车把开封师院的韩卫红他们接到郑州大学操场参加“郑大联委”的成立大会。省委书记刘建勋在会上发表了支持讲话。散会时，纪登奎和李庆伟再次来到开封师院的车上，站在脚踏板上，扒着车门，大声地向学生们喊话：“开封师范学院革命造反队的战友们，革命小将们，你们好，省委支持你们的革命造反行动，你们要回到开封煽革命之风，点革命之火，要把开封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发动起来，进行到底！你们要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作毛主席的好战士。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持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革命，革命，再革命！

造反，造反，再造反！”他的喊话，激起了同学们狂热的欢呼。当天下午同学们就坐火车回到开封。

校文革160名尾追他们到开封的学生，在省城受到领导的批评，没出郑州就散掉了。他们当中先回开封的人，带回了省委支持造反的消息。

当韩卫红他们乘坐的火车下午17时多到开封，没有下车就看见了“欢迎同学归来”的横幅，还有校文革派来的接站车。他们没有上车，而是在站台上列好队，带着鲜红的红卫兵袖章，由体育系的李全中高举着“开封师范学院革命造反队”的大旗，艺术系的高撼和王明贵护卫在旗手的两边，在队伍的最前面，走出了火车站。

每个同学都是英姿飒爽，满面红光。他们沿土街一直向北走。傍晚的彩霞映红了古城开封，他们的歌声回荡在古城的上空：“日落西山红霞飞，战士打靶把营归。胸前红花映彩霞，胜利的歌声满天飞……”嘹亮的歌声引来很多的市民，到大街观看他们的归来。

8月31日上午，师院大礼堂召开了全院师生员工会上，李庆伟代表省委宣读了《中共河南省委关于撤销韩倩之中共开封师范学党委书记职务的决定》。中共开封市委书记徐学龙在会上发表了拥护省委决定，支持“革命造反队”的讲话，宣布撤出开封市委驻开封师范学院工作组，宣布韩倩之和工作组组长邵俅犯有严重错误，交给革命群众，接受批判斗争。可怜韩倩之、邵俅二人当场被揪上舞台，剪了头发，挂了黑牌，戴了高帽。汪峻峰，张继烈，刘彦杰先后在会上发言，对邵俅、韩倩之进行了控诉和批判。会后，韩倩之、邵俅二人又被牵着

游街示众。徐学龙在办公楼檣上贴出了“支持韩卫红等人革命造反行动”的《一张大字报》，宣布自己坚决站到革命造反派一边，愿意接受广大群众的揭发批判。

我们再看这时的长沙，人们正在为“长沙819事件”应该如何斗争“右派学生”而议论纷纷时，突然，8月23日早上6时30分，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与报纸摘要节目中播出当日《人民日报》社论：《工农兵要支持革命学生》。长沙被作为挑动工人斗学生的反面典型在社论中点名。

社论播出后，犹如春雷巨响，一下子扭转了长沙的风向，长沙城一片沸腾，人们欢呼雀跃奔走相告。成千成万的大学生红卫兵涌上了长沙市的街头，高喊口号，拥护《人民日报》社论，庆祝自己的胜利。原来就支持学生观点的工人、干部正愤懑不平，但又担心自己的言行被人检举，此时也高兴地自发扛着红旗，敲锣打鼓上街游行，并到湖南大学去慰问学生们。对此，市委不敢再有什么镇压之举了，听任人们又重新涌到市委大院，甚至听任人们高呼“改组长沙市市委！”“罢孔安民的官！”等口号。原来反对学生的工人与基层干部，看到党中央是支持学生的，也成批成批转到了同情学生的行列。长沙市的夜景，由此热闹非凡。

图为 1966 年 8 月 23 日下午，长沙举行的游行示威

随即，造反风潮在各大专院校风起云涌，红卫兵们积极帮助在“文革”初期省、市委和各单位领导“矛头向下”的打击下，因对党委或工作组有意见的学校、工厂、企业、机关单位中被打成“新右派”的学生、工人和干部，向中央反映情况，促使其得以平反。并帮助工人、农民群众组建造反组织。

保守派则十分沮丧，不理解为什么“右派翻天”会得到中央的肯定？

8月25日，陶铸在北京率原中南局领导张平化、王任重接见中南地区赴京学生。已调任中宣部副部长的原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对前来的同学们介绍说：“这是陶铸同志，他是中央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这是王任重同志，他是中南局第一书记。这是孙正同志，他是中南局的……”

他重申了向湖南同学讲过的三点：“一、长沙有人提出的‘三相

信’是错误的口号，利用这个口号镇压学生的革命行动，这是反动行为。二、长沙有人阻止同学上北京，各种刁难，设下障碍，怕人向党中央和毛主席告状，这是非常错误的。我曾经说过，怕人告状的人是心里有鬼的人。如果没有鬼怕什么？没有鬼，工作中有缺点和错误，告状也好嘛！怕人家告状是有见不得人的事。三、长沙有人挑动工人打学生，有的学生受到殴打。这种行为必须彻底追究，彻底查办。同学们要求中央调查，已向中央报告，一定调查清楚，中南局已经要求他们检查纠正。”

“我在这里再次向同学们检讨，我原来是湖南省委第一书记，离开两个多月，前一阶段湖南文革工作没做好，对干部没了解，我工作中的错误，也有它的历史根源。犯错误的人要负责，我工作没做好，留下影响，我也要负责。”

接着，中央文革副组长、中南局第一书记王任重讲话，他说：“外地有人说，中南文化革命冷冷清清，没有北京轰轰烈烈。是这样！希望大家学习北京的好经验，带回去……”“为什么不准人家怀疑省委？为什么不准人家怀疑市委？没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如果你是革命的，就要和广大革命师生站在一起干革命，如果你不革命，站在群众运动的对面，镇压群众运动，就应该打倒。下面陶铸同志还要讲讲。湖南问题，昨晚中南局讨论了。我给湖南省委第一书记王延春同志写了一封信，对指使殴打革命学生的负责人要严办！对站在楼上看同学被殴打的，一律撤职！……”他的话被热烈的掌声淹没。

陶铸在这次接见学生时的即兴讲话，显示了他们对形势和做法共

同的意见，特别显示了陶铸本人对文革的基本态度。他身居要职，想尽力跟上形势，因此，一些提法，也特别革命化和出格，甚至一些言辞比刚刚起来的武汉学生还要激烈、离谱：

运动中问题由谁负责？陶铸说："我的中南局第一书记刚刚'罢官'，交给他，文化革命不能由王任重同志负责，要由我负责。前不久，我们开了多次会议，要求他们按中央精神彻底把文化革命放手搞起来，但他们回去后还是不敢放手。长沙、桂林不但没有搞起来，而且发生压制群众的反革命行动。……群众要革命，你压制，就是反革命。我不是当过中南局第一书记吗？我有责任。……湖南省委，长沙市委态度很坏，现在有好转。王延春同志搞四清，农村阶级斗争是坚决的，但搞文化革命不那么坚决……我看文化大革命是触及每一个人的灵魂。农村四清搞别人能搞下去，现在搞自己就搞不下去了……"

对各级省委，陶铸明确表示，是可以反对的："真革命，假革命，半革命，三分之一革命，都要受一次检验。三反、五反、土改、四清，湖南是坚决的，这次文化革命不坚决，原因是没有勇气真正革自己的命。好多同志要求罢王延春的官，看一看好不好？我今天打电话，长沙市委书记撤职了，站在楼上看工人打学生，不下来制止，还笑，这些人统统撤职……省委可以反对，可以火烧，炮轰省委，可以炮轰中南局。包括我在内都可以反对，只有毛主席不许反对，我们的林彪同志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我们拥护他，不能反对。我们这些人可以反对，省委为什么不可以反对呢？湖南和湖北省委为什么不能反对呢？能！谁不革命，不但反对，而且要打倒。"

“文化革命像一江洪流，抗拒这个潮流要被冲洗掉。你要阻止这个潮流，你就要被彻底毁灭的。现在有的单位不懂得这个道理，怕！你怕有什么用呢？越怕越要革你的命！本来不知你有问题，一怕就知道你有问题了。你是革命的，怕什么呢？相反的，你是不革命，你是黑帮，怎么保也保不住。这些道理我过去讲了，他们懂得，就是不做，怎么办呢？”

群众齐答：“造反！”

陶铸：“就是靠你们起来，不革命的统统革掉。……”

对中南地区的文革运动，陶铸明确地说：“中南的文化革命运动我是不满意的。”

王任重插话：“我也不满意。”

陶铸继续说：“你们以可回去讲，说是陶铸说的。我原来是书记嘛！现在有好转，但不要估计过高了。……我们还是要靠你们去轰。对省委、市委、中南局开炮！比如王延春你们就开了炮嘛！你们回去说，你们不革命，我们就开炮了！就要罢官！”

众人喊：“罢王延春的官！”

陶铸：“打几炮看看动静嘛。还说这是我说的，现在给一个机会，如果不革命就罢官……运动还有很大阻力，《国际歌》说，把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什么叫落花流水？过去我还不懂，现在我开始懂得了。西单、东单、王府井的旧招牌被砸得粉碎，一块块掉下来了，不是落花流水嘛！灰色的、蓝色的，黑色的要砸烂，红色的当然要保下嘛！……这次革命要彻底打下消灭阶级的基础！”

众人热烈鼓掌。

对“什么是党的领导”这个问题，陶铸是这样回答的：“党委各级领导可不可以反对？反对是不是反党？是不是反对党中央？现在哪一级党委都可以反对，只要你不革命。毛主席领导的党中央和林彪同志不能反对。党的领导就是毛主席的领导，毛泽东思想的领导。一个地区的红卫兵，他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指示，就是党的领导，不是党员也是党的领导。党的领导不是党员垄断的，谁按毛泽东思想办事，谁就是党的领导。相反，你是党员，你不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你就不是党的领导，你是挂羊头卖狗肉。你们不要被他们吓倒，他们讲你们反党，你说我反什么党？我们拥护毛主席的领导，你们是什么党？不是毛主席的党我们就打倒！这是他们破坏文化大革命的武器，要剥夺这个武器。……筹委会不行就罢他的官！”

同学们答：“人太少罢不了！”

陶铸：“罢不了可以串联嘛！串联了一定的力量起来，就把他们轰倒。”

对红卫兵的组成原则，陶铸说：“什么人能参加红卫兵呢？就是红五类，应该很好地调查成分，我们要讲阶级观点、阶级路线，要有阶级分析。同学出身比较好的，所以阶级成分第一。我们要考虑阶级成分，但是我们反对唯成分论。第一要讲阶级成分，第二不是唯成分论，第三看政治表现。一贯很好就是出发点，我们也让他们进来。”

关于串联和交通问题，陶铸表示：“北京是首都嘛！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策源地，是毛主席住的地方，全国革命人民都有权到北京

来。”

同学们说：“没有路费。”

陶铸回答说：“你们有学校证明，可以免费。”

同学又说：“他们不开证明！”

陶铸：“你们搞个组织嘛！”

王任重：“上下结合嘛！”

陶铸：“不开证明，学生证也可以。”

同学说：“车站不可以。”

陶铸：“不可以，斗争嘛！”

王任重插话：“陶铸同志可以帮助你们到铁道部解决。”

陶铸：“对！我到铁道部去，你们坐车可以不要钱，免费。你们这次可以免费回去。”

在陶铸讲话时，有人递条子，要见毛主席。陶铸念了条子，台下的学生齐呼：“我们要见毛主席！”长达6分钟之久。

陶铸：“同学们的心情可以理解，我负责把同学的要求当面告诉毛主席。”

同学们高呼：“毛主席万岁！”不断鼓掌。

第161回：冲市委，天津在风雨飘摇　皖工大，炮轰省委李葆华

8月26日晚，长沙游行群众在湖南宾馆内缠住省委书记处候补书记、副省长章伯森，随即又冲入相邻的省委大院，省委多数负责人狼狈万端地逃离省委机关。后来毛泽东听说长沙市委和湖南省委跑路一事，很生气地说："原子弹还没有打下来，人就都跑了。"

第二天，2000多长沙学生到省委院内静坐，要求处理"819事件"。无奈之下，湖南省委做出决定：基本接受群众的要求，认定"819事件"是"镇压学生运动"，宣布撤销孔安民等人的职务，改组长沙市委，调常德地委书记孙云英任长沙市委书记。并批准《湖南日报》点名批判省文联副主席、湖大副校长魏东明。消息传出，造反派连日上街游行，庆祝欢呼。当天，8月27日，奉陶铸指示，中南局书记处书记金明，到长沙指导湖南省委的工作。

8 月 26 日，长沙市郊东屯渡公社新桥大队社员到市区示威游行，支持湖大学生造反行动

此时，湖南大学的红卫兵已经成了不少长沙市民心目中的英雄，整个大学的红卫兵也成了很多长沙市人崇敬的对象。各单位的游行队伍都游到湖南大学驻地，向湖南大学的红卫兵表示祝贺，锣鼓声，鞭炮声响个不绝。批判原市委的大字报也如春笋一般涌了出来，贴满了市委大院外围墙。其中最令人瞩目的是题为"奔命记"的大字报，揭露了"819"大学生红卫兵涌进市委后，害怕发生长沙市"匈牙利事件"的市委要人们，在那几天中，是如何仓皇出逃，离开市委大院躲到乡下去的事情。这份大字报很快被印成铅字传单，广为张贴，以此表示对原市委领导人的鄙视和批判。

此时，长沙更多的大、中学生，以及机关干部、工人、市民，提出了"一改三罢"的口号，即"改组省委，罢王延春、万达、章伯森的官"。坚持"三相信"口号的"长保军"不甘心这样退出政治舞台。两派都打着"誓死保卫党中央"、"誓死保卫毛主席"的旗号，对"国家大事"的观点如针尖对麦芒，没有妥协的余地，双方力量此消彼长，处于高度对立的局面。

全国各地的省市委都遇到了长沙的这种情况，只是表现形式和起因略有不同。我们再来看北京的南大门天津市的情况。

从8月开始，北京来津串联的红卫兵和天津红卫兵学生多次到天津市委前要求天津市委第一书记万晓塘或市委其他负责人接见，天津市委机关大楼天天面临群众的冲击。

8 月 19 日白天，万晓塘等市里领导参加了市一中的大会。当晚，万晓塘按照省委的通知指示工交政治部副主任说："省委通知要组织工人赤卫队，保卫宾馆。"并在接见当晚成立的 200 名赤卫队代表时说："你们主要任务是保卫机密，保卫要害部门。"李定说："阶级敌人要向我们总进攻，要砸市委。我们要组织赤卫队，保卫市委机关，保卫党的机密，袖章由市委统一发。大厂组织一个大队，小厂组织一个小队。要住厂随叫随到。"

聚集在天津市委门前的学生，只允许反对北京红卫兵的人发言，而不安排北京红卫兵讲话，更不让红卫兵进去。一些群众对此极为不满。21 日下午，有学生去北京，说是请文革小组人来，准备大辩论。他们认为天津市委根本不支持文化大革命，天津像个独立王国，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现在就得造反，给他来个大翻个。

8 月 24 日中午，十六中 3 人给天津市委写了一张大字报，炮轰天津市委。

8月24日，当京津红卫兵找万晓塘在市委相持不下时，突然开到两辆汽车载着环境卫生局的几十名工人，车头横标写着"扫鬼队"三字，下车大喊："市委机关赤卫队往后站，我们来保卫市委机关!"随后，把学生引到人民礼堂辩论。

当晚，绒毛加工厂赤卫队60人开进市委大楼，于前厅严阵以待，半夜方撤。

调动工人没能阻止学生的造反热情。8月25日，天津师院在市委门前静坐示威5小时。之后，万晓塘出来接见。后来河北省省长刘子厚也出来了。

8月26日下午17时多，北京红旗中学部分红卫兵和天津市劳动局第二半工半读技工学校，简称"劳二半"的部分学生共200多人，冲击市委大楼。当晚，劳二半"赤卫队"200多人结伙前往市委同北京红旗学生和劳二半"红卫兵"辩论，并组织了"辩论会前线指挥部"。辩论现场发生武斗。这就是后来所说的天津劳二半技校红卫兵围攻市委的"826事件"。

事情发生后，劳二半"红卫兵"和北京红卫兵乘坐大轿车连夜前往北京告状。

8月27日，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副组长张春桥，组员姚文元、王力接见天津"八二六"流血事件的受害者，和北京红卫兵、天津红卫兵100多人。张春桥说：

"同志们：经过战斗，受到了锻炼。当然也挨了打，流了血。但是，正如你们说的，干革命就不怕流血，不怕掉头。这个流血事件是残暴的。关于这个问题，你们整成材料，我们上报给中央。要解决问题，还要靠你们解决，这样的斗争，还要靠当地的群众。关于天津市委和其它省市的问题，中央已经研究了。罢官很容易，中央下个决定就罢了官，但是，你们就没有对立面了。不能算胜利。所以我们要靠群众的智慧和力量，靠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同学们的气愤我们很理解，但是不能那样做，因为我们以前这样做了，收获不太大……

他们打你们，你们就可以打他们，重要的是敢于斗争，敢于胜利！"

8月29日，天津市三轮运输二社召开职工代表会，筹备成立"文化革命委员会"。会议进行时，部分工人一哄而上，将支部书记陈良谋及社主任、人保股长、工会主席等47人抓捕关押，接管了该社文件、档案及印章，并对被关押人员酷刑拷问。支部书记陈良谋于9月1日被打死。此事激起公愤，市委先后组织2400多个单位、49万多人次到三轮二社追悼陈良谋，是为轰动天津市的"三轮二社事件"。

9月2日，京津红卫兵约200人要见万晓塘，万晓塘没有出来，红卫兵冲进市委大楼，市委书记处书记张淮三、副市长樊青典布置公安局派了200名干部领着工人从市委后门进去，希望在不发生冲突的情况下将学生挤出市委大院。市委第二书记赵武城闻讯后指示："公安局不能派人，顶多派几个干部在周围观察形势。"

随后几天，9月2、3、4、6日，在天津市委大楼前连续举行劳二半“826事件”辩论会，声讨劳二半“红卫兵”。但是能否保住天津市委呢？无人知晓。

再来看安徽。8 月 26 日下午 14 时左右，合肥工业大学学生宿舍 3 号楼门前贴出一张醒目的大字报，题目是：《炮轰安徽省委司令部——造李葆华的反》，第一个签名的是学校文革副主任、无线电工程系 67 届学生戴明扬。大字报提了十个似是而非的问题外，没有什么重要的内容。

无线电工程系原学生会主席梁守福看到大字报，内心一惊，反右派的情景突现眼前，戴明扬是他 11 年的同窗好友，他不愿意好朋友成为右派，急忙上楼找戴明扬，遇到无线电系技术专业的团支部书记刘廷智等几个在大字报上签名的人。梁守福忙问他们：“戴明扬到哪里去了？”

他们说：“到蚌埠了。”

原来合肥工业大学去北京串连的同学太多，他去蚌埠是为了疏导工大在那里的同学。

梁守福忙问：“什么时候回来？”

回答说：“不知道。”

梁守福心里很是着急，但又不想让他们看出来，装着很镇定的样子问他们大字报的事情：“你们打算下一步怎么走？”

回答是：“还没想”。

接着，团支部书记刘廷智又补了一句：“老戴不在，又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你是系学生会的老主席，是我们的老领导，你领着我们干吧。”

梁守福想了一下回答说：“炮轰省委的大字报贴在学校里不好，到时候省委会给你们扣上煽动学生闹事的帽子。大字报的内容除了问号又没有别的值钱的东西，内容与标题不符。我看了，都有一种虚张声势的感觉。既然已经弄出来了，又收不回去，还是作两手打算，一手是将同样内容的大字报再抄一份，我领着你们去省委送大字报，要求省委负责同志接见我们，向省委解释大字报。这样既表明我们对省委提意见的善意，又表明我们光明磊落，我们是将意见送到门口，不让省委找借口；另一手是准备省委不接见我们，被逼上梁山，所以同样内容的大字报还要再抄一份。这一份准备贴到合肥师范学院去，听说那里很热闹，学生思想也很活跃，我们把火烧大，这样防止省委利用专政工具对我们暗暗下手，事情闹大了，省委想抓我们也没那么容易。” 他还嘱咐他们，大字报署名“合肥工业大学无线电系六七级全体革命同学”。

这时 3 号楼二楼的走道里已经挤满了同学，经过短暂的准备，带着重抄的两份大字报，大约几十个同学，在梁守福的带领下向省委出发了。

他们沿着原徽州路快走到四牌楼的时候，遇到省建筑学校向省委报喜回来的学生。当时报喜都带有锣鼓，合肥工业大学的学生就向他们借了一套锣鼓，以此证明他们是敲锣打鼓给省委送意见的。梁守福当时的想法就是想把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不要把戴明扬当右派抓起来。于是他们就敲锣打鼓走到市收入局门前，发现那里有一个红卫兵接待站，备有简单的广播器材，那里本来就有些人，不知他们在辩论什么，工业大学的队伍停了下来。就在这时，一件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工业大学鲍家伦利用广播站将毛泽东《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全文广播了。梁守福一听，头嗡地一下就大了：“他从哪里搞的这张大字报？会不会是坏人的编造？”

连带头人梁守福都有这个想法，其他人就可想而知了，他们听到这个广播后，都聚到了接待站周围，人越来越多，有人开始围攻鲍家伦，质问广播稿的来源。

有个干部模样的人，一面质问，一面抢鲍家伦手中的稿子，指责他们说：

“毛主席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是 17 级以上的干部才能听传达的，是机密文件。你们在大街上广播，这不是泄密是什么！”

没想到，这位干部模样人的质问，歪打正着，反倒让现场的人隐约地感到，广播的毛泽东的大字报可能是真的。

就在这时，梁守福他们准备送给省委的那份大字报被 66 届的学生王云峰贴到百货大楼的玻璃窗上，这时已经是下午 17 时左右，四牌楼的人越来越多，工业大学的队伍完全被挤散了。

梁守福他们还得去省委送大字报，赶紧离开这里，到了省委对面的文革接待站，要求省委领导接见。

负责接待的工作人员很客气，要他们将大字报留下，由他们代转。学生们不同意，于是就坐在接待站的地上不走，一直等到晚上 20 时左右，接待站的工作人员都下班了，也不见任何负责人露面，学生们只好沿原路往回返。当他们再回到四牌楼的时候，那里已是水泄不通，人山人海。

梁守福见状，对同学们说：“事情闹大了，只有上梁山。把那一份大字报贴到合肥师范学院去，把火烧大，越大越好。”

这时他已感觉到，原来想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打算，只是一厢情愿的幻想。在他们面前只有两条路：不是右派，就是胜利者，只有斗争才能争取胜利。

“潘多拉”盒子里的“乱”字，终于从年轻人燥动的灵魂深处跑出来，卷入时代的乱流之中，在乱流之中搏击成了他们生命中的任务。

当晚，安徽省轻工业厅康厅长打电话给省委书记分管工业的书记李任之，李任之立即指示各单位要组织群众去省委参加“辩论”。

李葆华在紧急会议上给“炮轰”大字报定的调子：“是刘秀山一手策划的”。

刘秀山原来是安徽省文联的主席，1966 年 2 月 25 日被李葆华点名，说他是国民党特务、历史反革命。

合肥市委杨书记则布置说：“四牌楼出现的反革命大字报，各单位要组织写反驳大字报。”

梁守福他们回到学校，马上就召集到省委送大字报的数位同学，连夜准备“二轰”的材料。作为这些赤手空拳的学生到哪里搞到什么像样的材料，只好七嘴八舌，东拼西凑。当他们把“二轰”的大字报内容凑齐，天已经发亮。他们刚想躺到床上休息一下，就有几个 67 届的学生前来报告，安徽工学院有部分同学到四牌楼张贴声援工业大学的大字报，在那里被包围了，已经 10 来个小时没有吃饭，没有喝水，连厕所都不能去。而且在辩论中，有的同学已经被打，工学院广播站的刘霞同学来工大请求支援。

听到这个消息后，梁守福第一反应是：“他们是因为声援我们而被围的。”接下来的问题是：“如何声援？”只有一个办法，就是集合可以召集到的人群到省委请愿，要求省委派人到现场制止围攻，将被围的同学解救出来。接着，一个现实的问题又接踵而来：“如何将人召集起来？”他想到了校广播站，不把校广播站拿到手，将来也是寸步难行。

他马上从床上爬起来，找到同班同学、原来的广播站站长。但这位同学没有广播站的大门钥匙，钥匙被校党委宣传部李部长收走了。梁守福只好让这位同学引路去找李部长要广播站的钥匙。

李部长还未起床，听到外面有人敲门，起来开门，问梁守福他们这么早找她有什么事？

梁守福告诉她："我们想借广播站的钥匙用一下，广播一个通知。"并告诉她工学院、工大都有不少学生被围，工大应该声援他们。

李部长有些为难，梁守福说："李部长，我们不想为难你，很体谅你的处境，你只要带着钥匙跟我们走就行了，我们到了 7 号楼和 9 号楼之间的马路上你就明白了。"

李部长跟他们到了 7 号楼和 9 号楼之间，大约早晨 6 点钟左右，不少同学都已经起床了。梁守福站在路中间向李部长要钥匙，李部长坚持不给，她说身上没有钥匙。这时梁守福的声音突然大起来："你再不把钥匙交出来，我要找两个女同学到你身上搜，你可不要认为我们对你不尊重。"

这时围观的同学也多了起来，一齐高喊，叫李部长交钥匙。李部长这时表现出非常无奈的样子，用右手战战兢兢地从裤子口袋里将钥匙拿出来交给梁守福，并又嘱咐一句：

"用后一定要还给我。"

梁守福说："请李部长放心，完成任务一定归还"。

打开广播站的大门，广播里没有像平时那样先播音乐，而是由工学院的播音员刘霞同学播出"工学院革命师生向工业大学革命师生的一份求救信"，接着广播工业大学师生到省委请愿的集合地点。就这样，一支有学生、老师、干部 1000 余人组成的请愿队伍，在梁守福和钱三德老师、刘光裕同学的带领下，浩浩荡荡地向中共安徽省委的所在地进发了。这 1000 多人大部分是学校中的骨干力量，其中很多人都是中国共产党党员。

第 162 回：八二七，安徽造反派组合　几酝酿，红卫兵“一司”成立

合肥工业大学的请愿队伍步行到了安徽省委北大门，大门站岗的解放军不让他们进。这时梁守福脑子里突然闪出了“五四运动”时学生冲击北洋军阀的镜头。他把手一挥喊了声：

“冲进去！”

结果，请愿队伍像潮水一般，轻而易举地将省委大门撞开了。他们来到省委北楼门前的空地后，自动排好方队坐下。这时大概是上午 8 点多钟，省委的工作人员已经上班了。请愿学生坐下后，在梁守福的带领下，同声高喊：“我们要见李葆华！”

这样高喊了一阵子，许多人都未吃早饭，其实早已累了，他们停止了喊口号。无线电系二专业 66 届的学生、中共党员刘光裕拿了一份报纸给梁守福，上面有一篇《人民日报》的社论，意思是号召广大工、农、兵应支持青年学生。梁守福读了几句，实在是体力不支，两眼冒金星，眼前发黑。

刘光裕接着读下去，这时围观群众越来越多，听到社论精神，他们在外围拼命鼓掌，以表示对学生的支持。大概到了上午 10 时，在省委北楼大门的阳台上，突然冒出一个人头，他自我介绍说：“我叫王光宇，我受葆华书记的委托和同学们说几句话，省委同意你们的要求，被委派的黄岩省长，朱光副省长到四牌楼去了，你们也回去吧”。

这时同学们继续高喊：“我们要见李葆华！”

与此同时，梁守福也派人到四牌楼去看看被围的同学是否解脱了。此时，黄岩省长和朱光副省长已经到了四牌楼，他们用高音喇叭反复重复着喊道：“同学们赶快回去，不要影响交通！”朱光甚至喊出了：“提高警惕，谨防扒手”的口号。这样一来，学生不但没有解围，相反被围攻得更凶。

中午 11 时以后，安徽省委大院内形势突变，王光宇离开了阳台，却来了一批人高马大的体工队员，个个虎视眈眈。报社的摄影记者也来了，拿着照相机不停地拍照。这时学生们高呼：“毛主席万岁！”的口号，要摄影记者从阳台上滚下来。

矛盾在激化，请愿的队伍也在分化，工大不少老师和干部见此阵势，悄悄地离开了。但安徽工学院、安徽医学院、安徽农学院，还有不少中学、中专前来声援的学生不断增加，但队伍还是越来越小，最后剩下的只有 300 多人。

体工队的人看到请愿的人越来越少了，便从四周向请愿队伍围过来，摄影记者们也从阳台上走下来。他们开始冲击围坐在空地上的师生，后来师生们也起来围成一个圆圈，让年小、年老的和女同学站在中间，身强力壮的男同学手拉手围在外面。体工队的人很快冲散了他们的防线，拳头落在了他们身上。梁永福的右肋被狠狠地打了几下，他拼命地想挣脱，结果眼镜也掉了，身上的汗衫也撕破了，一只塑料凉鞋也在混乱中被踩掉。

队伍打散了，大约 12 时左右，梁守福和刘光裕在省委北门外集合被打散的队伍，唱着“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向太阳”回到工业大学。这次回到工大来的师生不只是工大的，而是合肥市大、中院校的。

工大总务处知道自己学校的学生在省委挨了打，特地为学生准备了一餐较好的饭菜。在开饭前，梁守福简短地说了几句话：

“今天是 8 月 27 日，这是个难忘的日子。”

他指了一下自己被撕烂的汗衫继续说：“也正是这一天，使我们不分学校、不分年龄，不分性别的革命师生走到一起来了。我们面前只有一条路，那就是战

斗，不战斗即死亡。我们要为真理而战斗。但是要战斗就需要团结，要团结就需要一个能统一大家的坚强组织。我建议今天晚上，各学校派出两名代表，到工大东大楼三楼圆柱厅开协商会议。”

他的话赢得了大家热烈的掌声表示同意。

梁守福接着又说：“我们上午没有完成解围的任务，看来走请愿的路是行不通的。现在被围困的同学不是在减少，而是越来越多，工大滞留在蚌埠的上百名同学已返回合肥，现在被围困在四牌楼。我建议，饭后大家不要离开，我们还要集合队伍，将被围困的同学救出来！”

周围的同学们再次以掌声表示同意。

下午 15 时许，队伍又集合好了。大家依然斗志昂扬，正准备出发时，电机系总支书记杨素清站在队伍前面。他是因为写《工大“四清”烈火是谁扑灭的？》而闻名全校。杨素清苦口婆心地劝学生们不能再去四牌楼，要保存实力，“如果你们再被围，工大连救你们的力量都没有了。”

梁守福回答说：“那不行，不能见死不救。我们几百人形成冲击波，硬冲也要把被围的同学救出来，最坏的情况是我们把他们置换出来”。

这时他灵机一动：“许多被围的同学几十个小时没吃饭了，我们何不抬着饭菜，以送饭的名义把他们解救出来。”就这样，大家抬着饭菜又出发了，杨素清怕学生们吃亏，也跟着去了。

当他们沿着宁国路向北经过粮食厅围墙时，围墙上沿，露出一排人头，他们高高地举起双手为学生们鼓掌。当他们顺芜湖路西行经过粮食厅大门时，竟有上百人站在门口为他们鼓掌，并放了一串鞭炮。

沿徽州路北上，一路上许多人鼓掌，呼口号，放鞭炮，表示同情和支持。

当他们来到四牌楼，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交通在逐步恢复，同学们不是被围攻，而是面对许多不了解情况的群众宣传党的政策，宣传毛泽东思想，看不到打人的现象。

从 8 月 26 日下午 17 时左右，到 27 日下午 16 时左右，在这 24 小时里，学生被打成轻伤的有 28 人，14 人被绑，8 人被游街，20 人被搜身，被辱骂的不计其数。

合肥工业大学梁守福通知参加“827”事件的各校同学于 8 月 27 日晚，在合肥工业大学东 3 楼圆柱厅开会，讨论成立统一革命组织的事情。

当晚到工大参加会议的除工大，工学院这两个参加“827”事件人数最多的学校外，还有安徽医学院、安徽农学院，及省银行学校、省建筑学校、省商业学校等十几所大中学校的代表，会议由梁守福临时主持。通过讨论，大家一致认为，这个组织的名称一定要冠以“827”，因为就是在这一天，大家共同走到一起与省委进行斗争。于是，合肥各校组织的名称都叫“827 革命造反队”。造反组织的学生干部产生方式，按照《十六条》说的，采取“巴黎公社”原则，通过自下而上的无记名投票产生。由于各校情况不同，强调各校独立自主，各自为战，体现《十六条》精神。与会者一致推举由合肥工业大学起草“827 革命造反队”《宣言》以及“组织原则”、“纪律”等文件。

也是在 8 月 27 日这一天，北京“大专院校红卫兵司令部”，即后来人们简称的“首都一司”宣告成立。

早在 8 月 24 日北航《炮轰……》大字报风波的前几天，北航、矿院和人大三校的“红卫兵”代表就在北航小白楼召开了组织“大专院校红卫兵司令部”的筹备会议，并由三校各推举 3 人担任筹备委员会的委员。会上，大家一致认为“毛

主席是全国红卫兵的总司令”。因此，红卫兵司令部只设总指挥一人。后来，人民大学的朱佳木提议说：“轻工学院的汪延群，我和她并不认识，但我认为汪延群是最合适的人选。她父亲汪东兴每天不离毛主席左右，是毛主席名副其实的大红卫兵。汪东兴的女儿当红卫兵的总指挥，顺理成章，众望所归。”朱佳木一席话，得到与会所有人的一致同意。会议决定由朱新民为代表，说服汪延群出任总指挥。

朱新民回到轻院，向汪延群转达了大家的意见。汪延群一听就坚决不干。汪延群知道父亲要求自己非常严格，她若担任总指挥有什么闪失，必然会给父亲带来大麻烦。朱新民再三劝说汪延群无效，就邀请汪延群周末到家中做客。

周末，在朱新民家中，朱新加、刘克府、朱新民三兄弟一齐上阵劝说。汪延群从未见过这阵势，终于被说服，接受了总指挥的提名。北京“大专院校红卫兵司令部”的组建工作进入实质性阶段。

8 月 24 日的北航风波，使北航、矿院和人大三校的红卫兵，在北航学院的相互支援中更坚定了联合起来、组织“大专院校红卫兵司令部”的想法。8 月 25 日，他们在北航又召开“大专院校红卫兵司令部”第三次筹备会。会上一致通过了总指挥和副总指挥人选，并约定 8 月 27 日召开成立大会。为此，“大专院校红卫兵司令部”筹委会还成立了五个临时部门，具体负责“大专院校红卫兵司令部”的筹建工作。当时估计，北京市一共有高校 53 所，在校师生共 30 多万人，“大专院校红卫兵司令部”要覆盖全部高校。

成立大会的各项准备工作进展顺利。汪延群把请柬送给了江青，她同意出席成立大会。周恩来、叶剑英、肖华、杨成武、杨勇、刘志坚、汪东兴等人也表态支持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成立司令部，表示将出席成立大会。大会的请柬，是在杨勇的支持下，在他家中写成后，通过部队机要通讯发出的。需要电话联系的，也是使用他家的保密电话。卫戍司令傅崇碧从一开始就支持红卫兵成立自己的司令部，他同意负责大会的保卫工作。

8 月 27 日，北京体育馆人声鼎沸，3000 多名北京大专院校的红卫兵前来参加“大专院校红卫兵司令部”的成立大会。眼看时间已到，中央首长一个未到，朱佳木心中非常着急，就提议汪延群给她父亲打一个电话问一下。汪东兴接到电话，立即提醒正在开会的江青：“红卫兵司令部成立大会的开会时间已到。”江青等人终止开会奔赴会场，并代表中央文革发表了讲话。她说：

红卫兵同学们，你们好！

我们今天几个人正在开会，听说你们成立司令部，哦！红卫兵司令部，我们就停止会议来庆祝你们！（热烈鼓掌）

我们一块来的都是军队的同志，还有公安部长谢富治同志，我是个人参加你们这个大会的，我没有来得及征求文革小组的意见，我相信我们这个小组是支持你们的。

红卫兵，顾名思义是兵，是青少年组织，对不对？

众人答：“对！”

江青继续说：

我们的人民解放军，是毛主席亲自领导的，战胜帝国主义、反动派、一切阶级敌人的军队。我们的人民解放军是有优良的革命传统的。我相信你们会继承这个传统的。

最近，你们干了许多好事。干得好！对不对？

众人答：“对！”

江青：

目前你们组织起来，联合起来，还要把中学的红卫兵也组织起来，联合起来，这样才能成为一个战斗的部队。

我们五个人，就是杨成武同志、刘志坚同志、谢富治同志、汪东兴同志，都是军队的。我们建议杨成武同志、刘志坚同志做你们的辅导员。我们几个人商量了一下，有些地方需要红卫兵协助人民解放军保卫的，不要被坏分子利用。中南海、人民大会堂、钓鱼台、宾馆、公安部、监狱，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国防部、人民解放军尖端科学、机要部门（包括文件、档案）邮电大楼、自来水公司、水力火力发电站、广播电台、外交部、外国使馆、领事馆（不要进里边去，外面是我们的事情），各种仓库、银行、交通要塞、机场、车站，还有通讯枢纽部门，如电话总机。现在不完全，你们再想一想，众人智慧大如天。作为一个建议，你们讨论讨论好不好？下面请杨成武同志给你们讲话。

杨成武讲话，很简短，但态度很明确：

今天我以极兴奋的心情，来参加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司令部成立大会。同时，今天江青同志让我做你们的辅导员，这是我最大的光荣。

同志们，我们和你们的年龄差不多时就参加了游击队。我们是解放军，我们是红卫兵，千条万条，最主要的一条是听毛主席的话，读毛主席的书，把毛主席的书带在身边，一时一刻不能离，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

红卫兵光荣万岁！

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中学生红卫兵代表、矿院附中学生苏振生发言，向大学红卫兵成立司令部表示热烈的祝贺。整个大会进行得非常热烈、顺利。

“大专院校红卫兵司令部”正式聘了三位辅导员：杨成武、刘志坚、周荣鑫。

大会结束后，筹委会的十几个人非常兴奋，都不愿意各自回家，而是不约而同地骑车来到天安门广场，畅谈红卫兵运动的未来。朱佳木指着天安门广场东侧的一座二层小楼，充满幻想地说：“这座小楼能给咱司令部当办公室该有多好。”

## 第 163 回：再接见，周总理谆谆教诲　介绍信，学生免费乘火车

周恩来白天参加北京各大专院校文革组织代表大会，未能出席“大专院校红卫兵司令部”的成立大会，但他指派了两个联络员去参加了这个大会。这两个联络员散会后，尾随着这十几个小“领袖”也到了天安门广场，这时他们突然露面，正式通知大家：“晚上 10 点，周总理要在劳动人民文化宫，接见红卫兵代表。”

听到这个消息，这十几个学生欣喜若狂。不在场的红卫兵也来不及通知了，他们迅疾左转，直奔劳动人民文化宫东配殿等候，有：汪延群、朱佳木、刘克府、刘歌、罗迎难、朱新民、刘息戈、李涛、雷在时、朱新加、林辉等，还有中学生朱小秋、苏振生、杨冀平、来新建等。他们一直等到晚上 11 点多钟，突然劳动人民文化宫正殿大放光明，周恩来到了，大家争先恐后拥了上去，抢着和他握手。周恩来一眼就认出了汪延群，高兴地说：“这不是汪东兴家里的老大嘛。”汪延群一一为周恩来介绍了在场的红卫兵小将，周恩来再次和大家握手，他高兴地说：“都不是外人嘛，都是我们的自家子弟。”

陪同周恩来一起来的还有杨成武、刘志坚、傅崇碧、周荣鑫、吴烈。北京新市委的书记吴德、雍文涛闻讯也赶了过来。

周恩来招呼大家在一张大会议桌前落座，直接明了地进入主题说：“首都大专院校成立红卫兵司令部是一件好事。我坚决支持。我向你们表示祝贺。我由于有事，没能出席你们的成立大会，但我派人参加了成立大会，我是支持你们的。你们都是革命的后代，要继承父辈的光荣传统，跟随毛主席闹革命。现在文化大革命发动起来了，革命小

将要守纪律，听指挥。你们不但要自己做到，还要教育家里的弟弟妹妹，做到服从命令、听指挥。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就要保证中南海、人大会堂不受冲击。另外军事机关、公安机关、钓鱼台、京西宾馆、新华社、广播电台、机要档案部门、北京火车站、首都机场，都要动员我们的红卫兵加以保护。要爱护国家财产，不能搞打、砸、抢，只有加强纪律性，革命才能取得胜利。中央准备发一个文件，强调革命秩序，加强安全保卫。你们红卫兵司令部也可以广为宣传，要做到家喻户晓。”

针对中学红卫兵提出的交通信号灯革命，红灯通行、绿灯停止，周恩来耐心地劝阻说：“红色虽然是革命的象征，应用于信号灯，主要利用红色光波长，传播距离远，有利于司机采取刹车措施。红灯作为停止信号，有利交通安全，是有科学依据的，不变为好。你们要向弟弟、妹妹们解释清楚。”

他接着说：“学校的红卫兵中有不同的观点、看法，是非常正常的事，这没有关系，通过交流、辩论，最后大家都归于毛泽东思想的大海。”

讲到这里，周恩来话题一转说：“你们有什么意见和要求，都可以向我提出来，让我来帮助你们解决。”

由于不知道讲什么好，大家你推我，我推你，谁都不出头讲话。这时，周恩来就点汪延群的名说：“你是总指挥，由你代表发言：”

于是汪延群提出，希望能帮助解决办公的地点，及电话通讯、交通工具和印刷宣传等。周恩来当场就拍板，拨劳动人民文化宫东配殿

作为“大专院校红卫兵司令部”的办公地点。由北京卫戍区调拨吉普车、摩托车等交通工具供“大专院校红卫兵司令部”使用，凡“大专院校红卫兵司令部”需要印刷的宣传品，由新华印刷厂承印。周恩来还说：“你们有什么其他要求，可以与周荣鑫秘书长联系解决。”

原定接见时间只有20分钟，实际上一直谈了一个多小时。

第二天，“大专院校红卫兵司令部”就开始在东配殿办公了。卫戍区调拨的7辆吉普车一字排开，停放在文化宫大院内待命，其它办公用具和交通工具也很快到位，“大专院校红卫兵司令部”以最快的速度展开了工作。在各部门正式机构尚未组成之前，又调整了领导班子，汪延群还是负责全面工作；办公室由刘克府负责，具体办理上承下达的行政事务；朱佳木负责宣传组，起草“大专院校红卫兵司令部”的各种宣传文件；刘歌、罗迎难负责联络组，联络各院校，发展新成员。

8月28日，北京矿业学院“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等没有参加“大专院校红卫兵司令部”的38个高校群众组织发表声明，认为“大专院校红卫兵司令部”的成立是非法的，是分裂主义的，他不能代表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当天，康生接见矿业学院“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他承认：成立大专院校红卫兵司令部，“我们中央、市委事前也不晓得。”

矿业学院“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提出三点意见：

一、不承认昨天下午成立的“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司令部”；

二、重新成立总部；

三、如不能解决，就向毛主席直接请示。

康生说："没有加入的，你们重新成立一个。"

于是，这些高校的红卫兵开始筹建新的红卫兵司令部。

从 8 月上旬开始，北京部分学生开始到外地串联。

8 月的一天，北京师范大学俄语系一个大三的温州同学董光,带着一种神秘的语调找到中文系的同乡叶正秋问:"想不想去杭州串联?可以搞到串联的火车票。"

"天下有这样的好事,为什么不去?"

于是，几个温州同学，董光、叶正秋、李国、李芳，还有物理系的李龙凑在一起，共有 5 人。

物理系大五学生李国说："为了接待串联的红卫兵和学生，已经成立了一些接待机构。北京站就有专门的窗口，拿介绍信即可领票。"

天文系大二学生李芳说："这些都由我来办,杭州方面,我的同学也安排好了。"

想到西湖的碧波,灵隐的香火,虎跑的泉水,断桥的余韵……大家都很高兴,你一言,我一语,都认为不要声张,怕知道的人多了,出去人多了,学校不干,再节外生枝,好事多磨……他们决定 8 月 18 日出发。

临出发时，董光有事不能去了。8 月 18 日 8 时，其他一行 4 人登上了北京开往南昌的特快列车,开始赴杭州进行革命大串联。

这天,正是毛泽东第一次接见红卫兵。当他们登上南下的列车时,天安门广场正在举行毛主席接见百万红卫兵活动。往日水泄不通的北京站空无人影,但是,能听见远处传来的一阵阵的口号声和欢呼

声……

这是一趟卧铺列车,因为毛泽东的接见,乘客很少。那节车厢只有这4位串联的学生。乘务员听说他们是去革命大串联的红卫兵,十分热情,马上叫来了列车长。车长亲自给他们送水倒茶,说:“需要什么,吱一声。”

他们各自挑了铺位,躺下休息。车窗外,一望无际的华北平原飞驰而过……

南下驰骋飞奔的火车上,他们似乎是第一批到外地“革命大串联”的北京红卫兵。

他们到了杭州，李芳的两个同学到车站迎接。他们都是杭州大学的学生,是李芳的高中同学,一个叫阿骐,另一个叫阿水。阿骐是杭大中文系二年级学生，阿水是杭大数学系二年级学生。

“你们来的太好了！可你们来的也太不是时候了。杭州全乱了,一塌糊涂,……啧啧,不得了,不得了!”阿骐说着,拉着他们的手,朝外面走去。

车站广场全是人。他们走出车站,一路上看见许许多多大学生扛着红旗,打着标语,在静坐示威。墙上,地上,都有大字报,大标语：

“浙江省委破坏学生运动没有好下场!”

“我们的目的一定要达到!”

“浙江学生心向红太阳,一定要去北京城!”

“革命大串联万岁!”……

他们在杭州大学门口下车,此时已经是下午快两点钟了，只见杭

大涌出浩浩荡荡的游行示威队伍。

他们向阿骐和阿水问起详情，原来毛泽东接见红卫兵的消息传到杭州，各大学都按捺不住了，同学们都纷纷要求上北京串联，要求去北京见毛主席。省委，市委一直没有表态. 部分学生就在省委，市委绝食静坐，这样事态越闹越大，越闹越凶。后来，学生干脆到杭州火车站卧轨示威……这在全国还是首例。

北京师范大学 4 名学生，刚到杭州就听到了这个消息，立刻一本正经地讨论起来。

是啊，他们是以天下为己任的中国青年，又打着“北京大学生革命串联队”的旗号来到杭州，这里既然有问题，那就义不容辞要过问。

怎么办？

李国认为：“大学生主要的任务是搞好本地的文化大革命，搞好斗、批、改，大家都去北京，斗、批、改怎么办?”

大家看着李国因激动而涨红的脸，觉得他的话很有道理，可是，反过来一想，人家会问，那你们为什么不在北京搞斗、批、改呢?

李芳坚定认为：“省市委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他们压制群众，破坏运动，必须造他们的反。不过学生卧轨拦阻火车，也有些过头。或许会有其他更好的办法。”

叶正秋提议：“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我们应该到现场看看。”

说干就干，他们顾不上吃晚饭，一起来到浙江省委。

这是一幢苏式风格的三层大厦，此时已无人守卫，随便进出。他

们进到大院,右侧是长长的大字报席棚,左边大厦前面有一条警戒线,院子里灯火通明。大学生席地而坐,有节奏地喊着口号。那些打着“誓死捍卫毛泽东思想”“省委是正确革命路线的代表”大标语的游行队伍,大部分是工厂、机关有组织的。游行队伍与学生们互相对喊口号,互相对骂,偶尔也会有一些肢体冲撞的动作。这些队伍进到省委院里转一圈就离开了,没有发生什么大的事情。

北师大的学生在省委旁边找到一家小邮局,李国草拟了一份给国务院周恩来总理的电报稿,报告杭州大学生在火车站卧轨拦车的情况。邮局职员表情很不自然,说要去总局才能发,关门走人了。

他们又回省委看了很长时间,心里有一点失望。夜深了,公交车早已停驶,只好从省委走回杭大。

第二天,他们一早又议论了一下,也想不出什么好的主意.决定看看再说。大学大字报是传递消息最迅速的地方。杭州大学校园里的大字报内容,大部分是批判省委宣传部,教育厅的,也有不少针对省委,市委的,要求到北京去革命串联,还有不少各地的消息。那时,消息传递主要靠长途电话和电报。为了保持消息的畅通,国务院后来还规定红卫兵寄发传单,打长途电话,打电报都免费,不花钱。

正当他们聚精会神看大字报时候,有人与他们打招呼:“二位,我们找个地方坐下说,好吗?”那人一脸诚恳的表情。

他们在一个小的阶梯教室里开始了谈话,那人先介绍了自己的身份。

原来,浙江省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发展没有北京那么快,,直到6月

中旬,还是一边上课,一边搞批判。6 月底,北京一些学校开始轰赶工作组了，浙江省委才刚刚向杭州各大学派出为数不多的工作组,没几天工作组撤销,改为联络员。此人就是联络员。这些联络员大部分是刚大学毕业或者大学毕业后两、三年的年轻人,容易与同学们友好相处。此时,大学党委一夜之间垮了,联络员就成了大学与上级交流的一个有效通道。

这位联络员态度温和,表情诚恳。他静静倾听这些骄气十足,出言不逊的北京学生表述自己的观点。他们认为:

“一、大学生要串联本是革命行动,但是卧轨拦阻,方式不妥,我们坚决反对；二、省委,市委,工作不力,怕群众,怕学生,延误时机,恐怕要错上加错,真要出事,就不得了！他们还表示,希望会有机会,能表达一下自己的观点。”

联络员听完他们的叙述,只说了一句话:“我想办法给你们反映一下。”说完就走了。

中午,杭州的气温高得不得了,这几位北京学生正在午睡,昏昏沉沉。突然,那位联络员敲门进屋,告诉他们：“上级可以考虑给你们印一份传单。”

听到这个消息,这几位在北京并不起眼的大学生，几乎同时从床铺上滚下来.齐声叫好。商量了一下,拟稿的任务由叶正秋包了,谁叫他是学中文的呢?

冒着酷热,挥汗如雨,在一本练习簿上正反写了两页,标题是《致杭州各大专院校革命同学一封公开信》。大家看后没异议,署名“北京

师范大学革命串联队”，接着是 4 人的名字。

傍晚，联络员过来把稿件取走了。大家松了一口气，总算有了一个“大鸣大放”表达自己观点的机会。这一晚，天气闷热异常，但是，他们都睡得很香……

早上，阿骐和阿水在外面像擂鼓似的把门敲得山响。他们满面春风进来，喊叫着说：“公开信发下来了，每班一份。”

大家一看，果然是用印红头文件的道林纸印刷的。这样的“传单”实在出乎这些北京学生的意料。

“了不得，了不得. 这一炮总算打响了。有意思，有意思……”阿骐高兴地说。

“我们系的同学都在打听北京师大革命串联队都是什么人呢？……还以为发的是省委的什么文件呢?’阿水也很兴奋说。

“一个班一份，杭州有多少所大专院校，加起来会有多少个班级呢?”李国是一个心细的人，他好像自言自语地说。

“浙江大学，杭州大学，浙江医科大学，浙江农业大学，浙江美院，还有什么邮电的，财会的，冶金的，水产的，丝绸的，……工学院，……等等，我也说不全。”阿骐掰着手指数着说。

这时从外面进来几个杭大的同学，他们很客气地说：“我们杭大的同学想请你们去见见面，好吗?”

大家的心情都不错，不假思索就答应了。

李国还问了一句：“去哪?”

“大食堂。”

这几个北京学生精神抖擞地跟着这几个人到了大食堂。这是一个空的食堂,没有桌椅板凳,面积大约一个多一点篮球场那么大。他们被领到靠柱子的地方站着。正当北京学生纳闷的时候,校园里的大喇叭响起来:

“杭大全体同学请注意,请大家马上到大食堂,和北京师大串联队的同学辩论会马上开始……”

## 第 164 回：挺身出，杭州车站振臂呼
## 大串联，红卫兵四处点火

连续广播了好几次。不一会,只见外面涌进了许许多多人。有人一路小跑,有人气喘吁吁,黑压压一片,把这几个北京学生围了个水泄不通。看着眼前一片陌生的面孔,个个怒目而视,人人义愤填膺……

“到北京大串联是革命的行动,你们凭什么反对和阻拦我们！”有人大声喊道。

叶正秋想:“这种场合必须主动出击。否则,几千人面前有口难辩,后果不堪设想。”

人越来越多了，已经没有思考的余地了，叶正秋向前走了一步,挥了一下手,大声说：“杭州大学革命战友同志们,我们北师大革命串联队,来到杭州,是向大家学习的。短短几天,受到了你们热情周到的接待,我们非常感谢！大串联是革命的行动.我们不仅坚决支持,而且我们北京的同学们也热情欢迎你们到首都来。据我所知,国务院、北京市都成立了革命师生接待站,坐车不要钱,住宿不要钱,吃饭不要钱,这是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英明决策,我们坚决拥护……但是,有一些同学太着急了,太过火了,他们到杭州车站卧轨拦车,我们觉得不妥。周总理说要抓革命,促生产，我们怎么能破坏生产呢?这样容易被坏人利用,造成新的群众斗群众。公开信只不过是表明我们的观点.我们丝毫没有指责和反对的意

思。我们同样也觉得省委市委,怕群众,怕学生,以至于挫伤了杭州各大院校革命师生的革命热情。我们认为可以派代表,也可以分期分批去北京,也可以去别的地方。革命大串联,全国各地都可以去么……”

本来,铁杆分子都还在车站,留在学校大部分都是随大流的。经叶正秋这么一说,觉得也有理。人们纷纷离去了。挑事的人也觉没趣,不再露面。

正说话,有人来对他们说:“上头有请,赶紧走。”话没说完,拉着他们就朝校门口走去……

杭州大学校门口,停着三辆崭新的上海牌小轿车。来人请他们上车，上车后才告诉:“省委江华书记要见你们。”

他们被领到省委大厦一楼的一间会议室，在长方形会议桌一侧坐下。抬头望去,看见江华书记就坐在对面,他们赶紧起身打招呼,问好，这才发现前前后后已坐满了不少领导。

江华先说:“欢迎北京革命小将到浙江,希望听听你们的看法、意见和建议。”

这几个北京学生心里都没准备,愣了一下,叶正秋不知来了何方勇气,接过话题,就滔滔不绝发言了。首先,说明他们 4 人从北京来到杭州,完全是个人的意愿,个人的行动。不受任何人的指派,也没有任何煽风点火的意图，只是学习。其次,说明他们对浙江和杭州的印象很好,杭州是当时全国唯一一个饭店吃饭不用粮票的地方。社会秩序好,文革运动

也轰轰烈烈。第三,但是,大学生卧轨拦车,他们认为是不对的,不符合“抓革命,促生产”的精神，坚决反对。

“你们都是革命的老前辈,你们过去什么时候怕过群众?我们觉得只要和同学们讲清楚,他们是会理解的。”叶正秋振振有词地说,特别提到,国务院、北京市都成立了革命师生接待机构，一场轰轰烈烈的红卫兵大串联运动会给各地造成新的巨大的冲击,希望浙江省市委经受考验。

“在八一建军节庆祝宴会上,”江华书记插话说:”周恩来总理敬酒时对我们各省的领导特别关照说,你们一定要过好文化大革命这一关。”

接着，江华又向这几个北京娃娃请教：“我们应该怎么办?”

北京娃娃说：“到火车站去,告诉学生,可以派代表,也可以分期分批去北京。”

江华表示同意,但是希望北京的小将能辛苦一趟，亲自到车站去和杭州的大学生讲。

已经兴奋的不知所以的北京学生毫不犹豫就答应了：“立即出发!”连江华请他们吃午饭的盛情都坚决谢绝：“革命就要只争朝夕，现在就走。”

随后,他们便被上海牌小轿车送到了杭州火车站旁边的铁路俱乐部。各大院校的铁杆卧轨派的学生都在这。李国自告奋勇第一个上台讲话,结果没讲几句就被轰下台。其他的

人也没机会上台。在台下,他们遇到高中的同学.他们大叫道:“原来是你?跑到杭州当保皇派来了?”北京的学生把他们的观点和省委谈话情况简单介绍了一下：“大串联是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号召,谁能阻挡得了！卧轨不是好办法,好方式,引起群众对立,容易出事。”聊了一会,大家还是有一些共同点，气氛也就缓和一些。北京学生离开了铁路俱乐部。省委正式通知分期分批派代表去北京，第一批去北京串联的学生挤满了车厢，不少人一直站到北京。当天下午，各校学生陆陆续续撤离了车站。

这是一个沸腾的八月，墙壁上到处贴着“造反宣言”“××红卫兵司令部通告”“一个革命的倡议”等五花八门的大字报。街头巷尾散发传单、发表演说的红卫兵中学生比比皆是。公共汽车里、马路边、甚至城郊的村头，小学生在那里朗诵着《毛主席语录》。头戴高帽游街的“牛鬼蛇神”随处可见……

北京火车站进口处，可以看见带白布袖标的人，上面写着“地主分子”、“右派分子”。一位中年人带着家属，抱着一个孩子低头从他身边走过，男人的白袖标上写着“地主分子”，可从他的年龄上看他最多是地主子女。这些人呆滞屈辱的目光，会让你联想起电影《辛德勒的名单》中那些戴着白布条的犹太人。但在当时，被革命激情燃烧的学生们无暇顾及这些，或者认为。这就是革命。

外地师生进京后，不断地接触北京市的红卫兵。他们对本地“资产阶级路线”压制“造反派”声泪俱下的控诉和求援，冲击着北京红卫兵“解放全人类”的满腔豪气，一种“捍卫毛泽东思想”的责任感搅得他们食不甘味，夜不能寐。在破 “四旧”的同时，北京各大中学校中最早的红卫兵一批批走出校门，走出北京，开始了“北上、南下、西进、东征”的“革命大串连”。他们的目的就是帮助各地红卫兵组织“破四旧”，把文化大革命的火点起来。同时也以支援战友为名，向全国各地渗透，来扩大各自组织的外围力量和知名度。从 7 月底开始，仅北京大学，一个月内就有 200 多万人次前去串联。毛泽东认为，新出现的这种方式有利于把“文化大革命”的风暴从北京迅速地推向全国。8 月 28 日上午，他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同《人民日报》代总编辑唐平铸、《解放军报》代总编辑胡痴谈《人民日报》改版等问题，陶铸、康生、张平化参加。陶铸、康生、张平化汇报了文化大革命的一些情况。

当陶铸向毛泽东汇报：届时外地学生来京已有 14 万时，毛泽东说，:“让他们统统来，分期分批嘛，带点秋天的衣服。现在学生对一斗二批三改不感兴趣，心思不在学校，要到社会上去横扫牛鬼蛇神。一斗二批三改是我讲的，现在群众不听了，他们已经超出了学校的范围，超出了本单位、本市、本地区。”

他说："现在学生心不在一斗二批三改，我们在领导上、在报纸宣传上硬要把学生拉到这个方面去，这是违反学生的潮流。"

谈到学生到各地大串连的问题时，毛泽东说："让他们去嘛，留些人轮流看家就行了。他们要开介绍信，就统统开，管他是左派、右派。文化革命委员会的人要去，也可以让他们去。有些坏人也会出去，坏人出去无非是放毒。在家里放毒，到外面去放毒，都是一样。""对外来的学生，要给他们搞伙食。有人说，没有房子住。哪里没有房子住？房子多得很，这是借口。现在学生对这种事情，最热心了。"

谈到有些红卫兵到"黑帮分子"家里抄家，把古书都烧了时，毛泽东说："我家里也有一部《二十四史》，帝王将相的书。不读《二十四史》，怎么知道帝王将相是坏的？"

谈到有些红卫兵到"黑帮分子"家里抄家，把古书都烧了时，毛泽东说："我家里也有一部《二十四史》，帝王将相的书。不读《二十四史》，怎么知道帝王将相是坏的？"

谈到许多地方的干部遭到红卫兵围攻时，毛泽东说："我们开了全会，还有很多人没有转过来，他们就是不执行。有些人当群众围攻他们时躲起来，这是临阵退却。"

他在这次谈话中把"文化大革命"原来设想的时间又延长了，说："文化革命的时间，看来到年底还不行，先搞到春节再说。大学生，理科还要学一点，文科就不要再学，文

化革命就是最好的学习。”

“猪圈岂生千里马，花盆难养万年松”，又是一个史无前例的红卫兵大串联开始了。

不用上课，不用读书，允许到全国任何地方去，坐火车、汽车、轮船一律免费，到处有政府指定设立的“红卫兵接待站”，吃饭不要钱，需要零花钱，凭一个学生证或红卫兵证件，即可随时向接待站借到。北京，曾是一个谈起来都会令人憧憬让人骄傲的地方，而现在，成千成万的红卫兵都轻而易举地去了……学生们体验到革命的幸福，想象出共产主义的美妙。

在郑州二七广场他们见到几个路标牌上“靠右行”的右字被涂改成左字。

外地红卫兵在武汉挂有“向红卫兵小将致敬”横幅的小店里吃完油炸馒头片和黑粥咸菜后，居然连欠条都不用打，店主还说“欢迎再来”。

8 月 26 日，关锋、戚本禹给江青的报告中说，北京市的红卫兵在 8 月 18 日百万人大会后有了很大发展，各大、中学普遍建立了组织。当前运动的主流是健康的，但也有一些缺点，产生了一些副作用。例如捉人、打人的现象很多，特别是捉了、打了一些好人和中间群众；抄家的范围宽了一些；对群众日常生活中的习惯干预得多了一点。北京新市委的一些领导人对红卫兵的活动采取消极观望态度，不敢积极出来

领导运动。特别值得注意的是：

（一）个别人利用某些学校的红卫兵对抗《十六条》，破坏文化大革命；

（二）有些院校红卫兵的领导权落到了保皇派手里，他们实行没有工作组的工作组路线，薄一波、陶鲁笳等就是工交口各院校保皇派的支持者。

报告提出了新北京市委应站到运动第一线去领导运动，、对工作组的路线应进行批判、陶鲁笳等人不宜继续领导北京市的学生运动、薄一波等人应当做出适当检讨等四点建议。

8 月 27 日，江青将这个报告转送毛泽东。毛泽东 8 月 28 日上午在报告上批到："此件印发政治局、书记处、中央文革小组、北京市委以及薄一波、陶鲁笳各同志。此事应当讨论一下。"

8 月 21 日，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曾给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并毛泽东、林彪、周恩来上报了一份报告，汇报国务院除外事、文教、科学三口外，其他五个口的机关两个多月来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情况，题为《关于机关文化大革命的一些问题》。报告中对这些单位如何贯彻《十六条》，搞好文化大革命问题提出了十条意见。这十条意见是由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薄一波、余秋里、姚依林等多人根据共同拟定的，主要精神是要加强对运动的领导，提出要保护国家机密；对

一部分干部“烧”到一定程度后要注意保护；既要放手让群众敢于革命，又要让群众学会善于革命、善于掌握党的政策等等。

8 月 23 日，周恩来审阅了李富春送来的这份报告，并批告陈伯达：“这件很好，我注了几条意见，如蒙同意，请送主席、林彪同志核阅，并请主席批示，可否印发政治局、书记处、文革小组各同志。”

8 月 28 日，毛泽东在周恩来报送的，李富春等人拟定的《关于机关文化大革命的一些问题》上批示：“印发政治局、书记处、文革小组各同志。此事应当讨论一下。”

自南京“63 事件”后，江苏省委向南京大学派出了工作队。随后，在南京大学，少数师生与省委工作队之间也不断产生摩擦。最早起来反对工作队的是外文系法文专业四年级，简称“法四”，和数学系五年级，简称“数五”的学生。他们对工作队感到不满，是因为溧阳分校的文科学生率先起来贴匡亚明的大字报后，得到中央和江苏省委的支持，在校本部的理科学生和外文系高年级学生也在自己的大字报中将斗争矛头对准南京大学党委的其他成员，然而省委工作队下车伊始，就公开宣布“南大党委没有问题”。在理科和外文系的部分学生看来，工作队的这个说法等于否定了他们的“革命行动”，于是便纷纷贴出大字报质问。

面对这种情况，工作队深入各院系做师生们的工作，说

那些给工作队贴大字报的人是“右派”分子，他们的目的在于反对党的领导，干扰运动的大方向，广大革命师生应该在工作队的领导下，组织起来与他们进行坚决的斗争。在工作队的宣传鼓动之下，多数师生对那些反对工作队的人群起而攻之，其中起骨干作用的是溧阳分校的文科师生和其它系科的党团员、群众积极分子。溧阳分校的师生之所以听从省委工作队的指挥，是因为他们在溧阳分校受到匡亚明打压期间，省委出面解放了他们，所以大家对省委抱有一种感激之情。其次，当时绝大多数师生总认为工作队是上级党组织派来的，是正确路线的代表。

一位当年溧阳分校的学生回忆说：“我们溧阳分校的学生一开始是很团结的，就是听从工作队的安排。……每次找我们开会，动员我们写大字报，他们都要向我们口授大字报的提纲，我们按照提纲将大字报写出来，再交给工作队审查修改，然后才抄写贴出去。目的就是整‘法四’、‘数五’的同学。工作队还指使我们把那些批评学校党委和工作队的大字报的标题和作者都记录下来。这就是抄人家的黑名单啦。”

然而不久以后，溧阳分校的师生就开始发生分裂。溧阳分校部分学生对工作队产生了怀疑，觉得自己被利用了，“法四”和“数五”的同学也和他们在溧阳分校的情况差不多，将心比心，换位思考，觉得跟着工作队整人家，要把人家打成“阶级敌人”，实在于心有愧。

就在工作队的威信日趋低落的重要关头，北京传来了毛泽东批评工作队的消息。此时一个重量级的造反人物：文凤来出现了。

文凤来是一位复员军人，当时是南大政治系的年轻助教，同时担任留学生部越南留学生班的政治辅导员。他来南大工作之前曾在省委办公厅交际处工作过一段时间，对省里高层的情况知道得多一点，于是就写大字报揭省委工作队的“黑幕”，其中还特别详细地描述了南京市委第一书记彭冲的个人生活如何腐化，指出他根本不配领导南京大学的文革运动。这个大字报犹如重磅炸弹，立即产生了巨大的反响。

## 第 165 回：风云起，江渭清沉着应对　八二六，川大质疑廖志高

江苏省委工作队为了将南京大学反对工作队的老师文凤来打成“右派”、“反革命”，就把他的档案材料拿出来交给那些拥护工作队的学生，让他们从里面寻找揭发批判文凤来的论据。文凤来一看风头不对，便偷偷溜出南大，跑到北京告状去了。8 月 18 日毛泽东第一次接见红卫兵的时候，文凤来被安排登上了天安门。第二天的《人民日报》以很大篇幅报道了毛泽东接见红卫兵的消息，其中一篇报道还特别提到“从秀丽的江南来到宏伟的北京的南京大学教师文凤来同志”。此举以戏剧性的方式凸现了造反派及其行为的合法性，立刻在南京大学产生了巨大的轰动效应。那些和文凤来一起反对工作队的人欢欣鼓舞，而那些拥护工作队的师生则手忙脚乱、不知所措。

省委工作队尽管感到前所未有的压力，却没有完全乱了方寸。其实早在 7 月底，前往北京参加八届十一中全会的江苏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就在全会预备会上获悉了中央关于撤工作队的意向，于是他几次打电话回江苏，与彭冲等人商讨应对之策。根据江渭清的指示，彭冲于 8 月 2 日在南京大学召集高等院校工作队长会议做出部署，一方面准备撤出工作队，另一方面准备在各校成立群众性的“文革筹备委员会”，打算在工作队撤离以后，省委可以通过联络组与各校“文革筹备委员会”保持接触，以这种方式继续控制各个高校的群众运动。后来经过几次开会磋商，省委最终决定于 8 月 27 日从各高校撤出工作队。

然而，工作队并没有能够按照省委的部署如期撤离。文凤来从北

京凯旋回来，迅速于 8 月 23 日拉起了南京大学第一个造反派群众组织：“南京大学红色造反队”。8 月 27 日，就在省委工作队计划撤离的当天，另一个造反派群众组织“南京大学八．二七革命串联会”成立，其领袖人物是数学系的年轻助教、“数五”班政治辅导员曾邦元和“数五”班的学生张建山、葛忠龙等人。这两个造反派组织一起动员了许多学生把守住学校的各个大门，阻止工作队员离开学校，要求工作队向南大师生作彻底检查，并且向受到打击迫害的学生道歉。工作队则以《十六条》中“对工作队要具体分析，有的是好的，有的是比较好的……”为依据，拒绝了他们的要求。

8 月 28 日，几个从北京来的大学生串连了南京大学两个造反派组织以及扬州、无锡来宁造反的学生，发动 200 多人围在省委门口，坚持要江渭清出来回答“如何领导文化大革命”的问题。至此，不但省委工作队全身而退已经没有可能，就连江苏省委也成为学生攻击的目标。

当时，江渭清正在主持一个会议，就让书记处书记张仲良带着省文革小组工作人员出来接待。学生们不干，一定要让江渭清出来，有的学生甚至翻墙进入省委大院。气氛十分紧张，很多人劝江渭清躲一躲，免得被学生揪住不放。

面对不期而至的学生们运动，江渭清并没有乱了阵脚。因为，在八届十一中全会期间，他曾当面向毛泽东提出：“现在学生已经把斗争目标从校党委、校长集中到了我们省委和各级党委，什么人都要揪出来打倒。我们这些当省委书记的都是‘走资派’。对于这个情况，

中央总要有个说法。”毛泽东回答说：“对你们要保护。”

其次，当江渭清私下里向周恩来请示工作方略的时候，周恩来对他说：“工作队撤走以后，一定会来个高潮。第一是不可怕，第二是要做好工作。要告诉青年学生，在革命中采取严肃谨慎的态度，学习党的方针政策，按照党的政策办事。……这样做不是清规戒律，不是束缚群众，阻碍革命。该讲的不讲，就会造成不必要的混乱。一定要在全体干部中讲清楚，要敢于发动群众，又要敢于领导；要支持群众，又要善于领导运动。这样做，对广大革命师生有利，对革命事业有利。”

江渭清决定出去和学生见面，免得事态越闹越大。他于是中断会议，将学生们请进省委小礼堂。

进了礼堂，北京航空学院的学生提出，这次会议由学生主持。

江渭清说：“行，会议主席请你当，相信你能当好。”

北航学生上了台，对江渭清说：“今天我们向你提出问题，你要老实回答。”

江渭清说：“这个办不到。因为你们提的问题，我不能即席回答。”

这时，一个北京人民大学的学生站起来说：“你们这个做法不对，这是斗‘黑帮’的做法，江渭清不是‘黑帮’，要允许他讲话。”

接着，江渭清对学生们讲了“四个欢迎”、“四个但是”。他说：“你们北京的学生南下串联，介绍经验，我们是欢迎的，但是，我们认为，搞好文化大革命，主要依靠本地区、本单位的力量；你们要了解南京各学校文化大革命的情况，我们是欢迎的，但是，只能平心静气，派代表来座谈，而不要采取哄闹的方法；你们提出问题，以平等

的态度民主讨论，我们是欢迎的。但是，不能要我们马上交代，甚至制定要什么人交代，因为有些问题我们也要了解情况，进行思考，才能解答；你们觉得南京大专院校的运动有缺点、错误，提出批评意见，我们是欢迎的，如果提的正确，我们改正。但是，在问题没有搞清楚之前，不要轻易下结论。”

这些学生与江渭清的当天对话于是就这样无功而返。

但是，北京南下学生也像孙悟空汗毛变出的无数小猴子一样，将炮轰各级党委的造反之火洒向了全国各地。

8 月，北京的学生也陆续南下进川串连，四川省内的造反组织也在此时相继出现，川蜀大地的局势开始动荡起来。

早在 7 月初，四川省文革小组长周颐也是沿用反右时的做法，要求各校工作组在师生中搞分类排队，排左、中、右派，要求每五天排一次队，并向大学组汇报一次。揭发校领导大字报多的学生，大都被排在右边。仅从成都地区大专院校统计，中层干部 450 人，截止到 8 月，就有 142 人被打成三、四类批斗对象，占 31.5％。其中川医中层干部被打成三、四类批斗对象的多达 43％，成都大学为 51.2％，四川音乐学院为 38％，四川师范竟高达 64.2％。

一些在 6 月初，受聂元梓大字报影响，率先给校党委贴大字报，而后受到打击的同学开始要讨个说法。在北京南下学生的影响下，借助省委派工作组的问题，成都各大专院校的学生，成群结队纷纷走上街头。广播车在街上巡游喧闹，大字报、大标语贴满了成都市的大街小巷。

清华附中“红卫兵”的大字报传单和毛泽东于1966年8月1日写给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信在成都各学校流传。成都大学政经系学生、也是该校第一张大字报作者之一的许登武也决定在本校建立一个类似清华附中红卫兵的组织。他不想重复清华附中已经使用的“红卫兵”，但又觉得这个名字很好，于是就叫“赤卫战士”。“赤”者“红”也，“战士”者“兵”也，“赤卫战士”实际上也就是“红卫兵”。他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同班同学吴成富，他很赞同。他们又约了班上的罗国富同学。就这样，成都大学第一个学生组织——“赤卫战士”成立了，成员就他们3人。

很快，学生们纷纷行动起来，着手建立自己的战斗组织。“东风战斗组”、“东方红战斗组”、“红色尖兵战斗组”等等开始在校园里活动。50多天冷冷清清的局面被冲破了，同学们写出许多大字报，对“校文革”提出批评。还有不少同学贴出大字报，“严正声明”不再接受“校文革”的领导。

8月20日，成都市人民南路广场举行的“成都地区革命群众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会”，30万人参加。李井泉、李大章、程子华、廖志高等西南局、四川省委和成都市委的领导人都参加了这次大会。省长李大章和省委书记廖志高在会上讲话。

8月21日，成都大学开始出现针对省市委负责人的大字报。

当天，成都市委第一书记廖井丹在成都市大专院校文革正副主任会议上说：“成大贴大字报，说西南局、省市委有黑帮，是神圣同盟，如果多数人拥护，这没有啥；担心的是多数人反对，这就要形成多数

压少数。如果对他有意见，就放在运动后期（去处理）”。

廖井丹所说的成都大学“贴大字报，说西南局、省市委有黑帮”一事，是指该校“赤卫战士”8 月 18 日送往各高校的《致成都市各大专院校革命师生的公开信》。这封信是许登武 8 月 17 日写的。省市公安部门立即指示成都大学保卫科对“赤卫战士”进行监视。

8 月 22 日晚饭前后，四川音乐学院一些人到成都大学学生食堂贴出了大约 200 多张大字报，对《致成都市各大专院校革命师生的公开信》进行批判，认为《公开信》是“大毒草”，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黑宣言”，说成都大学“赤卫战士”是“黑帮分子”、“牛鬼蛇神”、“政治扒手”等等。

这天，成都发生了“8·22 工学院事件”。因为 8 月 20 日在人民南路广场参加 30 万人大会的时候，工学院有几个同学用报纸垫坐，被成都四中的几个红卫兵发现报纸上印有毛主席像和毛主席语录。四中的红卫兵立即提出严厉批评。工学院的这些同学接受了批评。但是第二天，21 日，四中的人又在去工学院张贴大字报，还要强行广播他们写的稿件。22 日，成都四中的学生全部开到工学院，同时还有成都九中、十九中、十三中、水电学校、邮电学校等等十几个中等学校的一万多学生都去了。这些中学生，其中以西南局第一书记李井泉的儿子申在望最为积极，当天大闹工学院。后来人们称之为“8·22 工学院事件”。

四川省省长李大章在当天下午、成都市委第一书记廖井丹在当天晚上都去过工学院，廖井丹还发表了讲话，但是都没有对中学生大闹

工学院的事情提出批评。

第二天，8 月 23 日，工学院校园里挤满了各个学校的学生，一群一群地围在一起搞大辩论。当天还准备举行大型的辩论会。

从早上开始，就有许多工学院的同学去西南局反映昨天发生的情况，李井泉通知不要再开“辩论会”了。工学院的喇叭播出自称是九中、十七中学生的讲话，承认他们来工学院的行动是错误的，表示今后再也不会干这样的蠢事了。

这天，“破四旧”之风已经吹到了成都，满街都有人在宣传《十六条》，在教唱造反歌曲，到处贴着标语，许多商店、剧院、旅店的字号已经改了名字，来不及改的，也用纸把原来的名字遮住了。公共汽车上也有不少的青年人在宣传“破四旧、立四新”。由于当天《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工农兵要坚决支持革命学生》的社论，所以，一队又一队的工人打着“坚决支持革命学生”的巨幅横标在游行。

8 月 24 日，西南局党委书记李井泉和四川省文革小组长周颐来到成都工学院作了一系列指示。随后，李井泉又赶往重庆。8 月 25 日，成都工学院各系分别向师生员工传达李井泉指示。接着，工学院红卫兵纷纷起来对牛鬼蛇神采取暴力行动。一时间，满院到处可以看到一群一群的牛鬼蛇神，头戴高帽子，身挂黑牌子，四处游街示众。到 8 月底为止，全院 200 多群众被戴高帽子游街。8 月 25 日以后，四川各大专院校几乎同时对牛鬼蛇神进行斗争。但这些，并没有转移部分学生怀疑省、市委的矛头。8 月 25 日，成都电讯工程学院学生在市中心贴出“省市委在文化革命中干了些什么？”、“告全省革命同

志书”等大字报。

8月26日，四川省委文化革命领导小组在成都市东方红大礼堂，即锦江大礼堂召开四川大学师生员工大会，为此前工作组在四川大学的“错误行为”检讨。这个检讨会由省委第一书记廖志高亲自主持，首先是工作组组长黄流做检查，他承认自己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给自己戴了很多帽子，反复表示：“我错了，我辜负了省委的信任，辜负了李政委的信任，在川大，我犯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错误，我向大家沉痛检讨。”

黄流检讨后就组织轮番发言。第一个发言是反工作组的造反派发言，第二个拥护工作组的，第三个是反对工作组的，第四个是支持工作组的，正反方交叉发言。

最后，省委第一书记廖志高对工作组进行了批判。同时一再向同学们强调：“你们把矛头指向工作组，批判他的错误。”并表示：不要指向省委，不要指向李井泉，因为“我们是革命的。”

那天，主席台上做了许多军队干部，几乎占了主席台的一大半。这让反对工作组的学生们很不满意。因为川大的事情和军队没任何关系，这样做是什么意思？用军队来压制我们？

19 时左右，廖志高讲完话就宣布会议结束。可是，在场的学生不干了！8 月 24 日成立的“红卫兵川大支队”与北京南下的红卫兵一起冲上主席台要求发言，他们认为黄流的检查和廖志高的讲话是开脱罪责，掩盖错误，当场批判省委书记廖志高在会上的讲话是“大毒草”，给带上“黑帮头子”的帽子，并声称省文革领导小组召开的

会议是“一个大阴谋”，称其检查为“假检查”。大会主持强行把麦克风断电，不让学生发言。廖志高和工作组组长黄流也趁着混乱赶紧离开，军队干部也退出了会场，造反的红卫兵占领了主席台，他们坚持不走，不断有同学上台发言，没有要说的了就唱歌、呼口号。那天川大全校师生都去了，川大学生有 4000 多人。虽然老师、干部和一些保守派学生都走了，但还有 2000 人在会场上不走，一直到第二天上午，其他大专院校的学生造反派来声援他们，就这样坚持了 20 多个小时。

后来西南局的书记刘志爱来到现场讲话，劝说学生们解散。学生一致要求：“廖志高回到会场上来，接受我们的质询。”

下午 15 时左右，廖志高到了会场，最后却在全体学生一致同意的掌声中，将他押到北京，要“向中央告状”。

8 月 26 日这一天，成了四川大学造反派学生胜利的标志。9 月 13 日，以“红卫兵川大支队”为基础的“四川大学东方红八•二六战斗团”，简称“八•二六战斗团”成立。之说以有“东方红”，就是因为 8 月 26 日的造反行动发生在“东方红大礼堂”，而“八二六”就是纪念 8 月 26 日他们的造反成功。首任“八二六”的团长是谢昆仑，很快就改为游寿星为团长。数学系 64 级学生、中国共产党预备党员江海云是政委，她实际是“八二六战斗团”的一把手，人称“江政委”。因其个子矮小，身高仅 1.43 米，被对立派取了个数学味的外号“根号 2”。1966 年 7 月中下旬的一天，她在四川大学贴出了一张震撼人心的大字报，矛头直指四川省委派到四川大学的工作组，质问

工作组长黄流："你到底要干什么？""是何居心？""为什么你关着门给党员的讲话与五·一六通知背道而驰？""是相信你还是相信党中央、相信毛主席？"一时间，川大为之轰动。支持的大字报、讨伐的大字报铺天盖地而来。江海云也是8月26日那天冲大会主席团的干将之一。

第 166 回：四不准，李井泉亲赴重庆　八二八，山城内再起风波

8 月 22 日晚上，重庆市委向各单位秘密发出四条指示：

1、不准到市委门口参加（跟学生的）辩论;

2、不准到市委门口写反击（学生的）大字报，如果对市委有意见，也不要贴大字报，可以由工作队转;

3、不准职工去看大字报;

4、不准家属子女去看大字报。同时警告：若有违反者，党员开除党籍，团员开除团籍，干部受处分。

其本意是要保持局面的稳定，但适得其反，这四条指示反而诱使群众纷纷不顾禁令前去市委门外看大字报。

位于市委大门对面的重庆市第六中学，干部子弟众多，信息来源广，造反精神强，六中成为到市委门外看大字报的造反派群众串连活动的最佳落脚点。邻近六中的人民小学，设有“外地赴渝师生接待站”，十分方便来六中串连的群众与外地红卫兵联系。

到六中来串连的重庆工人群众，主要是一些在本单位遭到工作组批判打击的青年工人。如重庆木材公司政治部办公室宣教干事黄廉，因为在单位的一次学习会上提出：把斗争矛头指向“黑五类”不符合中央精神，斗争矛头应该指向搞特权和官僚主义的书记、局长才对。当场受到会议主持人对他组织的批判。

黄廉自恃出身好，解放军干部转业，又是共青团员，不服气。会后又不顾上级不让到市委去看大字报的通知精神，跑到市委去看大字报，半夜才回家。到家时间不长，就被公司来人带回公司，关押在公

司地下室里。

黄廉一气之下，索性写了一张揭发公司的大字报，题目是《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大字报中写到："你们读过关于国际共产主义总路线的建议吗？现在修正主义就在我们眼前，你们害怕群众起来揭你们的问题，你们怕群众起来造你们的反，你们想压制这场文化大革命！你们想错了，共产党员、共青团员，我们不是你们的奴隶，工人再不起来反对走资派，党会不会变色，国家将走向何方？我们工人阶级应该起来，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毛泽东思想，'头可断，血可流，毛泽东思想不可丢'，现在再不造反，更待何时？……"

公司工人越明祥等人将黄廉写的大字报拿给重庆大学学生和北京南下串联的学生看，问黄廉的大字报对不对？南下串联的学生认为黄廉的大字报符合《十六条》精神，就跑到木材公司来调查他被关一事，木材公司不让他们进去，南下学生就约了一些重庆的学生一起冲了进去，找到了黄廉，将他拥出了木材公司，直接来到市委，在重庆市解放碑前讲演。就这样，黄廉开始了他的造反生涯。

还有重庆市市中区建筑修缮联合社施工员朱登明，他是 8 月 15 日那天，重庆大学与重庆师范专科学校两派学生对立冲突的"815"事件发生时，正在现场率领施工队为重庆师专图书馆大楼进行大修，恰好看到了事情的全过程。因为他和施工队的工人对重庆大学的师生表示了同情和支持，在重庆大学学生遭到全城围攻时，他又代表所在建筑修缮社的 16 名老工人写了为学生辩诬的大字报：《为重大八一五疾呼不平》，结果被区委工作组定为重点清查打击对象。后来，他在

重庆大学的学生帮助下逃离单位，先到重庆大学，后到六中。

再有重庆市建工局402工区工人、共青团员朱镇坤，在单位上是共青团支部的组织委员，四清工作组的依靠对象，培养重点，正准备将他发展为中共党员。但是在四清工作组组织群众围攻外地来渝串连的学生时，他看到热情单纯的学生们遭到有组织的围攻，不让吃饭、喝水，甚至不让上厕所，有的女生被逼得小便失禁。他实在看不下去，就给工作组提了意见，被工作组认为“立场有问题”，一下子从依靠、培养对象变成了打击对象。出于义愤，他参加了造反，也来到了六中。

黄廉他们不愿被戴上“右派”、“反革命”的帽子，认为北京来的红卫兵是“从毛主席身边来的人”，于是把申冤、平反的希望寄托在这些学生身上。

北京学生们谈起的首都“文革”情况，使这些工人们瞠目结舌，眼界大开，他们认识到这次“文化大革命”绝不是又一场“反右派”运动，对此，他们无不欢欣鼓舞，勇气倍增。8月24日这天，重庆十几所大、中学校的学生到六中召开革命串连大会。经大会主席团多次“邀请”，市委派书记处候补书记丁长河在大会快结束时到会，但不表态。会后，全体与会者到市内游行并散发传单。

8月底，重庆的少数工厂已经出现造反派基层群众组织，如在南岸区的重庆群林服装厂青年工人们成立了“革命青年战斗队”。9月上、中旬，重庆市糖果糕点公司红卫食品厂部分工人组成了“红卫战斗队”，东风食品厂部分青年工人组成了“红卫兵东风战斗小组”……

此时，北京“一司”成员、北京国际关系学院学生孟宪臣在重庆

六中提议成立“重庆工人造反军”，支持重庆大学的学生，也支持各地来渝的造反派学生。在南下学生的帮助和主持下，在六中串连的造反工人先后开了三次会，选举木材公司黄廉牵头，筹建重庆市“工人造反军”。

他们成立了勤务组，选举黄廉当组长，在六中借了一间教室办公。对外发传单，也收集情况，与各厂建立联系。当时的六中，就像电影《列宁在十月》中，红军占领冬宫后的情况一样，人潮涌动。什么事情一个招呼，就有人积极去办。

8 月 24 日，李井泉匆匆赶往重庆，坐镇指导，并带来西南局宣传部部长、名列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刘文珍和四川省委工交政治部主任燕汉民协助重庆市委工作。刘文珍分工抓中学生红卫兵组织，燕汉民分工抓大学文革运动。

当天晚上，李井泉接见重庆大学文革筹委会全体委员。他说：“你们都是八一五派，你们去声援师专、建院的革命行动，就像苏联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列主义一样。”刘文珍、鲁大东陪同接见。

这天，重庆全市各大专院校按市委的布置统一成立了“赤卫军”。这个组织最初包括大专院校中的“红五类”学生及教职工，后来学生大多转到“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后为“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中，“赤卫军”就成为以大专院校“红五类”教职工为主体的群众组织。在“赤卫军”中最主要的、起领导、示范作用的是“重庆大学赤卫军”。“重庆大学赤卫军”成立次日，即召开了批斗校党委宣传部副部长邓时泽、

校团委书记刘稚民的大会，会后宣布将二人交学校机械厂群众“监督劳动”并责令检查。

在全市大专院校“赤卫军”成立的同日，8 月 24 日，重庆医学院一批“红五类”学生，主要是干部子女，在院领导支持下，串连成立了“毛泽东主义红卫兵”。以后，重庆市委通过市学联主席莫泽礼和市委文革办公室副主任李友同他们联系，并随时传达一些指示。莫泽礼还帮助串连了西南师范学院、西南农学院、重庆邮电学院等学校的学生加入“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并于 8 月 31 日组织 23 个学校的师生在重庆医学院会议室成立了重庆市“毛泽东主义红卫兵联络站”。

8 月 25 日，重庆市委召开各大专院校文革筹委会代表和学生代表“炮轰市委”会议，中共中央西南局宣传部长、西南局文革小组组长刘文珍代表西南局讲话，号召“集中火力，炮轰市委”。

第二天，8 月 26 日，重庆大学“八一五战斗团”冒雨举行成立大会。之所以用“八一五”命名，就是为了纪念 8 月 15 日他们声援重庆师范专科学校而引发的“815 事件”。

随后，短短数月内，重庆出现了大量以“八一五”命名的造反派组织。如“重庆市机械兵团八一五”、“财贸工厂八一五战斗团 ”、“红工八一五”、“红农八一五”等。

8 月 26 日这天，重庆及外地赴渝学生万余人又以这天《重庆日报》一通栏标题底纹下暗藏有“北京大红尸”字样的“反动标语”为由围攻、冲击报社，并将总编辑袁明阮揪出戴高帽子游街、批斗至次日。

重庆市南岸区一批高中学生8月26日到老君洞、真武山等道教、佛教名胜地“破四旧”，真武山住持和尚因被搜出练功刀剑而被认定有“变天复辟”阴谋而当作“反革命”扭送公安局。随后一些学生又到市内著名佛教名胜罗汉寺“破四旧”，五百阿罗汉塑像全被砸毁。

8月27日，中共重庆市委召开大专院校师生代表会议，号召革命左派“集中火力炮轰市委”。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李井泉讲话，宣布罢市委第一书记兼市长任白戈的官。市委书记处书记鲁大东代表市委作检讨。

任白戈被正式宣布罢官，成了大家可以合法批判的对象。但群众很难了解任白戈有些什么政治上或工作上的问题。这时，位于重庆市委大门对面的第六中学的学生，在北京南下红卫兵的鼓动下，率先翻墙闯入市委大院，到任白戈住宅造反，并将其作为任白戈“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罪证对外展出。

以往在市民心目中十分神秘的市长住宅变成了公开的“展览馆”，顿时轰动一时。去参观任白戈住宅的群众，看到他一家人能拥有楼上楼下那么多房间，房间中还有专门的“钢琴室”，这是当时许多“三代同堂”、“四代同堂”的平民百姓不敢想象的。群众由此而感到震惊、愤慨。他们将此看作是任白戈堕落为修正主义了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典型标志。除去房间多以外，还有就是房间里的灯多，当年城市居民通常一家只有一盏灯。再有就是住宅中有好几个厕所，而在当年，城市居民往往一个大杂院甚至一条街才有一个公共厕所……于是，在重庆的传单、大字报上，任白戈住宅就成了“六十年代的地

主庄园”。加之参观者出来一传，自然就引起观者如潮。

8 月 27 日下午，重庆市“毛泽东思想赤卫军”在市体育场举行誓师大会。“赤卫军”主要负责人有：

西南政法学院学生、市学联副主席王远举；

重庆建筑工程学院学生会主席，院文革副主任，市学联副主席李传芳；

重庆大学动力系六六级学生，校文工团合唱队队长李长春；

重庆大学机械系六六级调干生梁经权。

他们有的是中共党员，有的是中共预备党员。

8 月 28 日，重庆大学“815 战斗团”部分学生到江北区“宣传十六条”、贴“八一五好得很!”“炮轰重庆市委!”等大标语、大字报，被正在下横街小学参加集中学习的暑假江北区民办小学老师发现，他们认为重庆大学在大字报中提出的“集中火力炮轰市委”是攻击共产党的反动大字报，为表现他们“保卫党”的坚定立场，主动用“毛主席万岁”的大标语予以覆盖，由此与重庆大学的学生双方发生激烈辩论，唇枪舌战，直至肢体冲突。在江北区领导的指示下，老城区大批干部和群众赶来围攻重庆大学“八一五战斗团” 的学生。冲突中双方都有人因拳脚受到轻伤。

此事被拥护市、区领导的干部、群众夸张宣传为“828 惨案”。一时间，控诉“八一五”暴徒制造“828 惨案”的传单广为散发，声称重庆大学有个名叫“八一五”的组织去了一伙暴徒，在下横街聚众闹事，搞反对共产党的“匈牙利事件”，还围攻打骂跟他们作斗争的

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重庆大学“八一五”派的学生被描绘成“暴徒”、“反革命”。在当时的传单中有这样的记载:“教师们退到小学围墙内，校门被团团围住，重大八一五揪住下横街小学易书记批斗，她是驼背，八一五用门板给她正驼背；谢家沟小学老师张国才被打得脾破裂；三洞桥小学校长孙继珍扯落头发，打成脑震荡；江北红十字医院季开阳院长组织抢救治疗。” 全市因此展开了大规模的围攻、声讨、游街、批斗重庆大学“八一五”学生及其同情者的浪潮，强迫他们请罪等等等，群众对立情绪加剧，武斗现象多有发生。

据 1998 年江北区政协《江北区文史资料》第十二辑上发表了有关“828 事件”的回顾文章称：经调查，所谓“正驼背”、“脾破裂”等都是当时为了政治需要而虚假编造的。

重大“八一五”用“828，扯头发!” 否认“828 事件”是一起惨案，“扯头发”是重庆土话，意思是：没有的事。

## 第 167 回：救命信，几经周转方才见　虽批示，润之未能救李达

进入 7 月后，武汉地区接二连三召开批斗大会。而每次批斗大会，武汉大学校长、中共“一大”代表李达都是“主角”。批斗、声讨、示众、审讯、辱骂，使这位风烛残年的老人，遭受着肉体和精神的双重迫害。然而倔强的性格，使李达从不在批斗者面前低头，所以每一次批斗，都使他的身体受到很大的摧残。

尽管李达遭受种种非人的磨难，但当他听说自己组织编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大纲》资料被抢走，助手被赶跑、研究室撤销时，依然愤慨、倔强地呼吁说:“你们把我的资料抢走了，把我的助手赶跑了，我怎样完成毛主席交给我写书的任务呢？”

李达之妻石曼华扶着李达，想去要回手稿，却遭到一阵呵斥。回家的路上，李达老泪纵横，不能自已。

无情的批斗，肉体的折磨，李达的身体再也无法承受。他的饮食锐减，病情逐渐加重，身体一天天地消瘦下去。妻子石曼华看到他这个样子，内心十分难过，但李达仍然抱着乐观的态度，“黑暗总会过去，等运动结束了，我一定到北京去，向党中央、向润之告状。”

7 月中旬，为了加大对李达“罪行”的批判力度，武汉大学举办了“李达罪行展览”。这时李达胃病加重，伴有大量出血，每次发作，李达都非常痛苦，有时痛得大汗淋漓。尽管如此，对李达的批斗却没有半点减缓的迹象，批斗、游街、罚跪，可谓变本加厉，直到李达卧床不起。

7 月 16 日，73 岁的毛泽东畅游长江，消息顿时传遍武汉三镇。

李达从门外雀跃的小孩知道了这一消息，不由产生了一线希望。第二天，他试探地问他的秘书刘长森："听小孩讲，毛主席来武汉了。"

小刘因未得工作队指示，不便回答，只是冷冷地答说"不知道"。然后迅即向工作队汇报。工作队让刘秘书去试探李达是不是有想见毛泽东的念头。

18 日那天，李达家乡湖南零陵"贫下中农代表团"和哲学系部分师生又对他进行了面对面的斗争，李达情绪愈加激动。他甚至气愤地说："我是叛徒，是叛的陈独秀的党，不是毛泽东的党！"他也更加痛苦，到 19 日就很少说话。

得到工作队指示的刘秘书这时以关心的口气问李达："毛主席来武汉了，你是否想去找主席？"

而这时的李达反而冷静了，他说："毛主席在武汉，可我现在这个样子，不好去找，去，也可能不会接见我。问题这么多，毛主席怎么包得了！"刘秘书立即向工作队作了汇报。

到了这天下午，李达的血压升到了 236 / 114，尿糖仍是 4＋。在饭厅床上量血压时，刘秘书劝他坦白交代，低头认罪，李达愤愤地讲：

"我过不了这一关，快死了，斗死算了。我顾不得别人了。死了拉倒，后代也不管啦。"

量完血压，他悄悄地将刘秘书叫到屋内，然后极为生气地对刘秘书说："叫我回乡，带回去斗，我不去，要带就带死的回去，我就死在这里。"

讲完这些话，他喘了喘气又对刘秘书说："你帮我一次忙，不知

肯不肯，就帮这一次忙。”

刘秘书问：“什么事？”

李达说：“我血压这么高，随时都可能脑溢血，今天气喘病又发作，这是心力衰竭的征兆。我 76 岁了，死了算啦，你帮我一个忙，救一条命，毛主席在武汉，给我送封信到毛主席那里去。毛主席住在东湖宾馆，内有冷气设备，你去找。”

随即，李达强撑着用毛笔写了一封信。信封上写：“送呈毛主席武汉大学李达”。信纸上写：“主席：请救我一命！我写有坦白书，请向武大教育革命工作队取阅为感。此致最高的敬礼！李达七月十九日”。

对于这封至关重要的信件，李达要刘秘书马上送到。但是刘秘书因为还没有与工作队联系，不便答应，便推说：“今天已下午 5 点多了，明天一早送去。”

李达不依说：“今天就送去，你送去，要不找祝福庆、刘敬一送去。”

祝福庆、刘敬一均为李达警卫，运动中已被调开。

李达还对刘秘书特别交代：“你帮个忙，送这封信到毛主席那里，你不要与工作队他们商量。与他们一商量，信就送不到毛主席手里了，他们会留下。”

他似乎在提醒刘秘书：“这还是一场宗派斗争，刘真、侯福珍回来领导运动，他们来整我们几个人，非要把我们整死才甘心。”

刘秘书说：“省委不早作结论了，武大没宗派问题。”

李达仍然说："是宗派斗争，整我们几个人……"

17 时 30 分，刘秘书来到招待所向工作队庄果等 3 人汇报李达写信情况，并将李达写给毛泽东的信交出。庄果接过信后，即行拆阅，在取出信纸时，看到信封上写有"送呈毛主席武汉大学李达"字样，不禁后悔地说："呵，这是给主席的信啦，没有看见，糟糕！我犯了个错误。"

因为其时已有杨尚昆私拆和扣押毛泽东信件的错误通报。

工作队庄果 3 人商量后，决定把信留下。庄果对刘秘书说："你先到外面去玩玩，过一两个钟头再回去，对李达就说信已经送到毛主席那里了。"

遵照庄果的指示，刘秘书晚上 19 时 30 分回去见李达，说信已经送到。

李达问送信的经过，还问毛泽东是住在什么地方。但他又怀疑地问："信是否真送到了？"

刘秘书说："怎么没送到？毛主席住的地方还有绿色篱笆呢。"

李达似乎还不放心地问："有收条吗？"

刘秘书未想到此着，愣了一下，便支吾说："信交给了警卫，他说给主席的信是不给收条的，他保证送到就是了。"

李达由衷而充满期待地说："辛苦你了，交给警卫，信毛主席一定能见到。"

李达和庄果都不知道，毛泽东此时已离开武汉，正在返回北京的途中。

直到 7 月 29 日，工作队才将李达这封给毛泽东的“救命信”改换信封，以“中共中央毛主席收”由机要档交邮局寄。

毛泽东决定 7 月 18 日晨离汉回京。17 日晚上，王任重在东湖召开省委常委会，通过了《关于开除混入党内的地主分子李达党籍的决定》。

这个《决定》没有经过任何一级基层党组织的讨论，也没有听李达本人的申辩。《决定》明文肯定了李达“是个老叛徒”，但却既不给李达戴“三反分子”帽子，也不以“叛徒”罪名清洗出党，却只戴“地主分子”帽子开除党籍，并“开除公职，遣送原籍管制劳动改造”。

这个《决定》连同《关于开除李达党籍的请示报告》上报中组部，由该部八处于 7 月 27 日呈送已调北京担任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的陶铸批阅。陶铸在八届十一中全会前夕的 8 月 1 日批复：“同意你们给予李达开除党籍、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戴上地主分子帽子、进行监督改造的决定。”但是，李达本人对此却一无所知。

自 7 月中旬进入批斗高潮以来，李达胃溃疡复发，常感“头顶发麻”，心力已感衰竭。但他仍被强迫参加大小批斗会，最后实在无法支撑，只能要求在家听批斗实况广播。由于他已是被公开点名批斗的“敌人”，校卫生科也停止了对他的公费医疗，连糖尿病需经常服用的 D860 药也停止供应。李达的病情愈来愈重，到 8 月上旬，他已感到极度虚弱，多次请求自费住院检查、治疗，让他活到运动结束以后再死。

据当时武汉大学卫生科医生说，李达虽年老多病，但按他的体质和病情，如果保持正常条件，稍加医疗照顾，三、五年内是不容易死去的。但此时已既无正常条件，更无照顾医疗了！李达因是一级教授、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行政 6 级，在正常条件下，他不仅享受特殊医疗待遇，而且有防痨专家、武汉医学院李晖教授的亲自诊治，他的治疗和保健当然不成问题。但是，现在他遇到了极不正常的条件，他也就是脱毛凤凰不如鸡了，连自费治疗的请求都得不到准许，哪里还谈得上医疗照顾呢？

1966 年 7 月中旬，在钓鱼台 17 楼放映室，放映了一部电影制片厂拍的批斗李达的新闻纪录片，中央文革小组成员都观看了这个片子。纪录片拍摄了批斗李达大会实况，在一个大礼堂挂了一个横幅标语：《批判反动地主、反动学术权威李达大会》。大会主持人是武汉大学的领导之一，被批斗的李达对批斗会表现出蔑视、抗拒、不服，他双手拄着拐仗，背靠主席台，面向观众，时不时地反驳几句对他的批判。

8 月 10 日，毛泽东看到了一张条子：“李达（武汉大学）要求主席救他一命。”写这张条子的人当然就是收到武汉大学所寄的李达给毛泽东救命信的人，他注明“武汉大学”，是因为他知道除了“文”李达，还有“武”李达，即刘邓大军的参谋长、时任国家体委副主任的李达上将。毛泽东看到的只是这张条子，并不是李达的原信，自然不知李达的其他话语。但对于李达的求救，他岂有不允之理，当即便用他那特制的粗红铅笔作批：“陶铸阅后，转任重同志酌处。”同日，陶铸也在这张条子上作批：“即送任重同志”。

王任重后来说，毛泽东还曾当面指示他：不要把李达整死，要照顾一下。他也向毛泽东保证：“武大的革命师生决不会对李达采取过分的行动。”

但是，无论是毛泽东对李达“救命”信的批示和对王任重的当面指示以及王任重向毛泽东的保证，都没有传达，武汉大学的师生也无从知道。到 8 月中旬，省长张体学参加八届十一中全会回来后，对武汉大学校文革传达了毛泽东对李达问题的两点指示：“毛主席说李达是没有什么用了，我相信武大革命师生是不会对李达采取过火行动的。”

8 月 13 日黎明，李达在卧室突然摔倒，仰卧在地，脸色苍白，口吐鲜血，血直喷到了墙上。监视人员不仅不去请医生，反而斥责李达夫妇在耍花招。当日上午 9 时左右，卫生科医生来探视，诊断可能是胃出血，血压也陡降为 90 / 50，随时有发生休克的危险，建议立即送医院治疗。刘秘书去工作队请示，医生也去向工作队说明诊断情况，被告知“研究一下”，知道上午 11 时才由护士来打针止血，却并未给药。

8 月 16 日，张体学一行来到武汉大学，临时召开师生员工 3 万人大会，包括附近的武汉水利电力学院、武汉测绘学院等院校的师生。性情豪放、快人快语的张省长对李达问题又讲了一番能烘托当时“革命”气氛的话：“李达，过去我们叫他李老，现在我们叫他老不死。他现在已经搞臭了，你们再用不着斗他了。你们一定要相信省委，把他交给我们处理。让他进博物馆，吃饭、睡觉、拉巴巴！你们也可以

回家看妈妈。”

自 8 月 13 日胃出血倒床后，心力衰竭，李达很少说话。他的住院请求被拒绝后，自知不久人世。17 日，他终于嘱咐妻子：“我如死去，请转告托德麟同志，我唯一的恳求，就是希望他们一定要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大纲》下卷编出来，上卷改好，帮我完成毛主席交给我的任务。”

19 日晨，李达高烧 39·4℃，又从床上摔下，监视人员仍漠然置之。到 20 日才来一位护士打针。她发现李达小便带血，大小便都拉在床上。她要去向医生反映情况，也被制止。

李达自知年事已高，现在又病处垂危，但他仍在顽强地坚持生存，不想就这样戴着一大摞黑帽子死去。他尤其寄希望于和他有几十年友谊的毛泽东！他对夫人说：“等病好了，我们就离开武汉大学，我要到北京去见毛主席，向毛主席告状！”于是，他最后再一次向庄果请求允许送他去医院。他悲愤地说：“印度战俘有病，我们也给他治好病送回，现在你们把我当敌人，我就算是你们的一个俘虏吧，你们也应当让我治病呀。”然而，他的请求仍未被准许。

一直到 8 月 22 日早上，李达已奄奄一息，工作队才叫刘秘书等 2 人将他送往武汉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但不准夫人石曼华去护送和护理。李达有气无力、断断续续地对夫人说：“他们不让你今天去，你好好带媛媛，明天来看我。”于是，李达以“李三”的名字，即李达三家村的意思，住进普通病房。第二天，刘秘书来找石曼华，说他马上去医院，要她买些鸡蛋糕交他带去。石曼华要求一起去，仍然遭

到拒绝。她请求带一点牛奶去："他是靠牛奶吊命的。"但刘秘书还是不愿意。结果，石曼华只好买了四块鸡蛋糕和四个梨给他带去。医院每天早餐是稀饭馒头，中、晚餐则是干米饭，李达粒饭未尝，石曼华托刘秘书带去的鸡蛋糕和梨，也原样未动。只三天，8 月 24 日，李达便撒手人寰，含冤死去。

李达死后，25 日，遗体即被火化。当天晚上，武汉大学校文革召开全校师生员工"愤怒声讨地主分子李达"大会，宣布李达已死，宣读中央陶铸批复的那份《关于开除混入党内的地主分子李达党籍的决定》。

弱势的学生群众崇尚公正，天生地同情弱者，逆反心理特强。特别是武汉大学在运动初期受到压抑的教师和学生，当他们从大字报读到李达重病惨死的情景——鲜血喷吐墙上，反倒使他们非常同情这位官定的"黑帮分子"李达，甚至怀疑王任重是妒忌李达与毛泽东的私人关系，进而怀疑王任重在李达问题上是反毛泽东的。这些师生后来都成为武汉大学坚定的造反派。

第 168 回：疑省委，湖北大学成中心　“一小撮”，三镇组织搞反击

8 月下旬，北京部分南下的大学生也来到武汉，凭着年轻人的敏感，他们很快就发现了武汉的运动与北京的不同，立刻贴出大字报，指责湖北省委前一段运动犯了方向路线错误。

8 月 25 日，湖北省委常委召开会议，张体学对当时的形势做了概括发言：

“一、百分之九十的工作组脱离群众……找工作组开个会，先把工作组的头按到水里去，不按下去不能平民愤。二、有一条重要经验，准备犯大错误，作最坏的准备。不管怎样激烈的斗争，或风暴，只要我们的观点明确，完全可以把学生说服过来的。学生的革命要求，完全支持他，如北上南下的问题，那么讨论什么时候去，告诉文革小组办公室，给你交通工具，要经费我们给。我在华师讲，那么闹革命，把房子烧了它，我也赞成。有事我们就亲临前线，到现场去，哪里有事就到哪里去，越是矛盾尖锐的地方，领导先去解决，不能回避矛盾。我们省委犯错误，没有迅速采取湖北大学的办法，如果所以工作组采取这个办法，一检讨就主动了。……四要靠领导，领导哪一步棋走错了，就（要）打招牌的。工学院不这样搞，很可能到省委来，反对派一包围省委，湖大、武大要出来那就遭了，就变成湖南了。不要把工作组都搞臭了，搞臭了再回不去了，只有靠革命委员会领导。现在正是乱的时候，我们乱是向好的方向乱，不同于湖南。”

中国人民大学的赵桂林等北京南下串连的学生住进了湖北大学 31 号楼。这些北京南下学生带来了“最新的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指示

精神”，也带来了北京“革命造反派”的造反经验。他们公然指出湖北省委在文革中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公开聚众造湖北省委的反。

湖北大学经济系的贾培培等同学在南下学生的支持下，在 31 号楼成立了“湖北大学红八月战斗队”。曾经是计统系学生会干部、共产党员的龙铭鑫这时也站出来支持“红八月战斗队”。他们把斗争的矛头直指湖北省委。

一时间，湖北大学成了武汉市文化大革命运动的中心，到学校来看大字报的、贴大字报的人群，熙熙攘攘、络绎不绝。湖北大学的 31 号楼更是成了整个武汉地区造反派的联络中心。

以张体学为首的湖北省委当然不承认自己犯了错误，而是认为这一切都是一小撮南下右派学生在捣乱，在向党进攻。8 月 28 日、29 日，湖北省委常委连续举行扩大会议商量对策。张体学认为：“北京来的学生主要矛头对准省委，武汉地区大专学生矛头对准省委的约有百分之十至百分之十五。他们的逻辑：北京乱了，你湖北不乱？！百分之十至百分之十五中有坏人，多数是糊里糊涂，有左派、中间派，有极少数右派。……”

武汉市委书记宋侃夫汇报说：“市委的问题可能爆发在第一师范，他们在追查市委有没有黑帮，说我们封锁消息，压制批评。”

张体学指示他说：“你亲自到第一师范去作个报告，高姿态去，不高姿态去是不行的。接待工作，你不能出面搞，到学校去讲，尤其是马上要燃烧起来的学校，我们要亲自去做工作。不去做工作，争取不了领导权，他闹的再凶，把革命的旗帜一高举，左派起来就好办了。”

对南下学生提到刘少奇的问题，张体学说："他说刘犯了错误，我们说不晓得，省委没有给我们正式传达，你怎么晓得的？他说是陈伯达在学校讲的。他怎么说的？他说只对你们讲，不能向外讲，那你为什么向外讲？辩得他没有话讲了。"

在 8 月 29 日湖北省委常委会议上，最终做出了对付外地串联学生的决策，就是发《呼吁书》，组织反击。张体学说："我刚才给任重打了一个电话，把我们的决心讲了一下，要高姿态，不怕乱，准备乱两个月，刀山要上，火海要闯，七、八所大学没有问题。外来的学生发动武大、湖大攻垮省委，我们不会有湖南省委的结果。任重讲：'你们很主动，我知道。'我们应该相信大多数群众，相信湖北省委攻不垮的。关于搞《呼吁书》的问题，我也给任重讲了，他同意。搞《呼吁书》的办法：一是以革命委员会的名义出现，二是以学生的名义搞，三是以个人名义搞。全国的情况，我没有问，他说有一个信回来，也是这个意思。北京来的学生一、二、三，左、中、右都有。他说要把名字搞清楚，我们说搞不清楚。"

省委书记处书记兼省委秘书长许道琦说："将来查得清楚，跑不掉的。"

许道琦接着说："这回和过去反击不同，不能全面的反击，通过《呼吁书》、写信，把他们具体分析一下，使我们本市的学生发生左、中、右的分化，越分化明显越有利。"

张体学："不能用反击的名字。"

王树成："只能说是捍卫主席，捍卫党中央。实际上，他们看到

我们摊牌了，他要拼命地斗的。”

李衍授：“他唯一的办法是要我们犯错误，我们犯错误，他们就抓住了。”

王树成：“今天下午，体学讲的作为我们总的部署，不怕乱，顶多了不起把办公楼打了搬到武大去住。”

张体学：“我们不能搬到军队去住，哪个干部投降就开除党籍。”

王树成：“要完成这个部署有两种作法，一种是等着他来，最后上山，如果在这个期间，我们作说服工作，说服不了再从珞珈山赶下来就更失败了。这一条就算对，我们作了总结了。现在看，第二种情况还不可能有，但要准备有这样的情况。今天晚上，明天一天，把《呼吁书》的材料准备好，明天晚上把这一张牌摊出去，提一个新的口号，大张旗鼓地讲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不管你南下北上的，把他们的材料搞出来，这就可以立于不败之地。决心很重要，方法好办”。

常委会后，武汉市正式开始反击北京南下的造反学生，省领导策划的《呼吁书》以湖北大学学生名义发表，称来汉北京学生有一股“逆流”，同时提出“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次日，武汉市委也以群众名义发出“紧急呼吁信”，号召抵制北京来的“南下一小撮”。

省委毕竟不乏搞政治的老手，为与反击南下学生的决策配合，29日省委公开宣布省委宣传部长曾惇是“黑帮”，消息见报。接着又抛出抓政法工作的副省长陈一新，也作为“黑帮”。

接着，张体学来到湖北大学法律系“法六3班”开座谈会，干部子弟漆林在会上作了慷慨激昂的发言。就在这个会上，漆林被推举为

新成立的班文化革命小组组长。

第二天，9 月 1 日，《湖北日报》以套红大字标题刊登《文化大革命好——记张体学同志在湖北大学法律系与同学们的座谈》。紧接着湖北大学在武汉地区率先成立了《湖北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漆林被推举为校革委会主任，钱运录被推举为副主任。

庆祝成立大会时，省委、省政府的一大批领导前来校祝贺。

这天，湖北省委还在中南路工业建设展览馆召开多数派红卫兵会议，张体学公开表示：湖北省的运动是毛泽东主席亲自领导的，省委是个大红帮；指责南下学生中有右派，运动后要划为右派。这天，主席台上的张体学显得十分自信粗犷、潇洒简单：

“今天来的都是左派，你们不要做叛徒。做叛徒是没有好下场的！昨天你们开了个欢迎会，狗崽子们不识抬举。那个大个子付军胜是一个右派。他反对老子，老子干了几十年革命，还没有他们强？！”

台下群众活跃起来。

张体学接着说：“他们是没有好结果的。将来不把他划成右派，老子去告他的状！运动后划成右派，送到湖北劳改，我省长不当了，去当劳改队长！”

台下哄堂大笑……

张体学说：“这些狗崽子没有什么了不起，只要跟他斗，他就要失败。你们腰杆子要硬起来”。

次日，9 月 2 日，由人民大学赵桂林、付军胜等人发起，南下学生 40 多人在洪山的湖北省文革办公室门口召开揭发控诉湖北省委大

会。他们在省委门前静坐，高喊“打倒湖北省委”的口号，要求与张体学对话，停止对他们的迫害。

紧急之中，省委常委也同时召开扩大会议。会上，张体学说：

“有两个臭逻辑：北京乱了，湖北不乱？湖南乱了，湖北不乱？左派、中间派脑子很热，右派以极左的面孔出现，抓住了领导权。因此，（一）我们的战术要灵活，方法要具体……（二）北京来的学生提出的问题，凡是对革命有利的事，我们都要办，他们所放出来的不管是香花还是毒草，都给他们印。……（三）对内部学生的右派要采取高压政策，工学院的右派跑到武大放毒要抓住整他，不能内部右派嚣张，等到外来学生走了，再让他放出来。”

“湖北省委头可断，血可流，千万不能干王延春那样的事。哪个要干什么，是合理的就支持他，他打着红旗反红旗，你也要支持他，如果他一个劲地念语录，你也要跟着他念，你不念要犯错误的。但要注意一个问题，对他们态度要沉着，有一批人在糊里糊涂地闹，他们的精神可嘉，骂我们是黑帮，不要紧，不是黑帮骂不成黑帮”。

9 月 3 日，部分武汉学生也参加静坐。晚上，省委书记王树成发表广播讲话，揭露赵桂林等组织在省委闹事真相。部分保护省委的群众在现场与南下学生展开激烈辩论。一些人在省委门前扭着秧歌套用《人民公社好》的曲调演唱“湖北省委好”：“一唱呀湖北省委好，毛泽东思想红旗举得高……二唱呀……”

现场气氛十分紧张，由于张体学拒绝与学生会面，南下学生决定由静坐变为绝食。省委派人送来了面包和汽水，那些拥护省委的学生

又吃又喝，故意气那些绝食的学生。

武汉掀起抓“南下一小撮”的浪潮。为了驱走南下的学生，湖北大学校文革组织一部分人到 31 号楼去抢被子，但是适得其反，在校内和其他学校造反学生的支持下，接连不断的有人送来了棉被，南下学生的声望越来越大。

9 月 4 日，省委常委继续举行扩大会议。张体学做了概括性的安排：

“一、明天开欢迎外地革命师生、职工大会，可能会出现几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骂够、讲够、坐够，准备干 8 小时。头天讲不完第二天讲，讲它一个礼拜。第二种情况，把我们拉下来游街，要走一路走，我就朝湖大、武大和华师走。第三种情况无非打人，如果打伤了，我就到处演说，拍照，在《湖北日报》发表消息。准备一个礼拜，一个礼拜不行就两个礼拜，两个礼拜不行就搞半个月，最后留下几个人还不愿意走，红卫兵就和他辩论。

二、湖大、武大搞小型辩论，用大字报辩。其他学校不要到湖大武大去支援了。

三、不管十条罪状，多少条罪状，湖北省委不是黑帮。

四、我搞病了，树成同志代行职权。我和道琦、衍授、宁夫、阎钧去，辩一个礼拜，他就垮了，我们辩不垮的。”

水利学院有学生与教师数人，顶着讥讽，出面与南下学生辩论，声言就是要保卫共产党的张省长，要做党的好儿女，被该院造反学生嘲笑为张省长的“好儿女”“五朵金花”。颇有点“痞子气”的同学公

开指出“儿女”之一，是彭德怀集团成员周小舟的儿子——不幸的周宏，他在武汉三镇播放保卫省委的义正词严、风流倜傥的演讲，顿时遭到嬉笑怒骂，拥护者听说他是周小舟的儿子，顿感困惑而尽散。

由于省委领导拒不见面，南下学生赵桂林、付军胜等人决定结束绝食进京告湖北省委的状。武汉各学校则派代表一起前往。

第 169 回：传经验，北京红卫兵抵沪　借东风，刘建勋欢迎炮轰

8 月 20 日，“上海市红卫兵联络站”首次接待从北京来到上海的红卫兵，带队的是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的儿子谭怀远，福建省委第一书记叶飞的女儿叶子枫。他们此行的目的主要是向上海市委通报北京红卫兵运动的情况，并提出“要看望陈叔叔”，即陈丕显。“上海市红卫兵联络站”主任张文豹立即向上海市委办公厅副主任苏超作了汇报。经安排，21 日下午，张文豹带着谭怀远、叶子枫到华山路洋房见陈丕显。

谭怀远、叶子枫进屋后便自报家门，然后对陈丕显说“爸爸问你好!”

陈丕显也请他们代向其父问好。

接着，谭怀远向陈丕显介绍了北京的情况，并且建议上海也应及早成立红卫兵组织。陈丕显听了很高兴，表示赞同，当即对张文豹说：“这事你去负责办一下。

这批红卫兵到主要的几所大学串联了一两天就去杭州了。

接着，以“传播革命造反经验”为己任的北京红卫兵陆续南下上海，均入住“上海市红卫兵联络站”所在的上海市团校。他们还在市团校的大门上挂出了“北京东方红大学”的招牌，以示此处为北京等外地来沪学生的集聚地。

就在上海“823”破四旧狂潮的第二天，8 月 24 日，北京 80 多名红卫兵来到上海，其中 30 多人来到位于市团校的“上海市红卫兵联络站”。他们身穿旧军装，手持《毛主席语录》，要求提供宣传工

具和市委机关地址。一位梳着羊角辫、自称“鬼见愁”的胖墩墩的北航女学生，反复向上海联络站的工作人员宣讲“红色恐怖万岁”，“革命无罪，造反有理”，还说：“你们不支持我们，就要被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叫你们永世不得翻身。”联络站主任张文豹瞥见她的一个笔记本上写着一个名字：“刘春娥”。经报告、请示市委后，向他们提供了索要的做宣传用的一些物资材料。

当这些穿着没有领章的军装，佩戴鲜红的袖章，头顶军帽的北京红卫兵出现在酷暑的上海街头，顿时引起上海人的惊奇目光。他们注视着这些手中拿着红色《毛主席语录》的北京红卫兵，用尊敬的口气称之为“小将”。

这些声称“到上海来就是煽革命之风，点革命之火” 的北京“小将”们下车伊始，也用惊奇的目光，注视着上海。他们迅速发觉北京文革与上海文革在政治运动和社会生活诸方面都存有悬殊差异：上海的“文革”，是那样的“冷冷清清”！北京各单位早已赶走了工作组，而上海各单位还在工作组领导之下进行“文革”。领导各工作组的，则是中共上海市委。

8 月 26 日，北京 14 所大中学校的红卫兵 170 多人抵沪。他们是分散南下的，没有统一的组织机构和名称，如北京“红旗红卫兵战斗小组”就是由北京航空学院、北京工学院、北京 101 中等学校的学生组成。中共上海市委常委、副市长李干成到车站欢迎。北京红卫兵到达上海各校时，各校的师生员工敲锣打鼓，夹道欢迎。上海各报报道了北京红卫兵来沪交流文化大革命经验的消息。许多学校的师生与团

市委、市学联联系，要求介绍北京红卫兵去串联。

就在同一天，8 月 26 日，前期北京南下红卫兵开始冲击位于延安西路 33 号的上海市委机关大楼。

8 月 27 日，上海市委听镇江车站报告："北京市委派来红卫兵"，于是这天的《解放日报》发出"首都红卫兵来沪受到热烈欢迎"的报道。当天，上海许多学校贴出"欢迎首都来的真红卫兵，假红卫兵滚蛋!"的标语。据 8 月 27 日上海市委《外地学生来沪情况反映》的统计，在市学联已累计接待 901 名串联学生。

这天，借宿在市团校的北京中国科技大学红卫兵牵头，向分散在全市各校的北京红卫兵发出会议通知，并于 28 日上午 8 时 10 分在市团校大门口张贴出"北京大中学校南下革命串联联络站筹备会议，今日上午 9 时在上海市团校食堂举行"的通告。

会议于 9 时 20 分正式开始，北大、清华、北师大、北二外、人大附中，以及借宿在团校的北京中国科技大学、北京滑翔学校、北京抗大一中等 30 多人出席。据参加会议的代表后来说："会开得不成功"、"也没办法开"，有的甚至一头雾水，例如住在复旦大学的清华的代表秦建国抱怨："这会啥人召开也不知道"，"会客单也没人签名"。原来，当牵头的北京中国科技大学的红卫兵一提出"号召到团市委看大字报"、"吃饭坐车不该化钱"、"应给我们创造良好的条件"等建议时，立即就遭到北京滑翔学校、北京抗大一中中学红卫兵的猛烈反击，他们当场指责掌握会议的人"开这个会的目的不纯"、"参加会议的成员也不纯"、"不下去调查研究，就设立联络站没有

意思”。结果，会议没有展开讨论，更没有进入程序，在一片吵闹中，于 9 时 50 分不欢而散。

接着，北京滑翔学校、北京抗大一中的红卫兵冲到门口，将北京中国科技大学红卫兵张贴的通告和“北京东方红大学”的招牌全部撕下，并于 10 时 30 分、10 时 50 分贴出两份内容类似的大字报《要革命的留下，不革命的滚他妈的蛋－－我们的看法》。大字报对科大红卫兵“动不动就伸手要这要那的行为，感到无比的气愤!!! ”认为这“纯粹是占革命的便宜，投革命之机”。他们还对团校的工作人员说“我们要维护北京红卫兵的荣誉”。

8 月 28 日下午，应北航等北京红卫兵的要求，副市长李干成出面接见北京红卫兵。北京红卫兵态度偏激、蛮横，抽掉李干成的座椅，提出“市委怕群众造反”等问题，要求市长曹荻秋立即赶来参加会议。

这天，曹荻秋在工作队长会上说：“当前形势很好，但有一部分人到处串联，宣扬不要文斗，要武斗，要打倒一切，凡是共产党的一切组织都要打倒，这种人在大中学校活动特别多，……要打倒市委，炮轰市委，炮轰我们无产阶级司令部。”为了保卫上海市委，市委宣传部和文化局、出版局等机关、工厂在市委的安排下，成立了“机动红卫兵”。

8 月 29 日，清华大学《送瘟神》战斗队在上海外滩上海市委和上海市政府的大厦贴出一张标题为《给上海市委一记响亮的耳光》的大字报。同时还有一些北京红卫兵在静安公园演讲，号召市民起来造反。

上海市委异常紧张，在此之前，即便是上海的造反派，也没有如此明目张胆地轰击上海市委。他们通知上海国棉 17 厂的工作组组长施惠珍，紧急抽调 700 多名工人赶往上海大厦，与其他工厂的工人们一起组成纠察队，提防那些天不怕、地不怕的北京红卫兵。同时在上午 9 时许，上海市委办公厅副主任苏超通知上海红卫兵联络站主任张文豹他们赶快前去做劝说工作。

在延安西路 33 号市委机关门前，张文豹向红卫兵们自我介绍："我叫张文豹，是市红卫兵联络站的负责人。同学们，不要冲击市委机关，这样影响工作，希望大家离开。"

下午，他又到静安公园继续做这些北京红卫兵们的工作，还和他们展开辩论，说："解放以前，敌人对我们实行白色恐怖，我们革蒋介石反动派的命，造旧社会的反，那是有理的；现在新社会，不能革自己人的命，造人民政府的反，这是无理的，我认为：没有也不能实行什么红色恐怖。"

30 日，仍有许多北京学生聚集在上海市委大厦前。调集来的上海工人神情严肃、庄重，手挽手组成人墙围绕在 33 号周围保卫上海市委机关。

这天，张文豹向苏超报告："看样子顶不住了。"

苏超告诉他："已通知，所在机关决定 31 日放假；文件等全部转移，把门窗关好，做好受冲击的准备。"并让张文豹尽可能进行劝阻。

上海市委决定，8 月 30 日下午，在文化广场召开"欢迎北京来

沪串连红卫兵大会”，上海市委书记处的几个书记出席。

这天下午，约有 3000 名北京红卫兵参加大会，也有些上海学生混入。

这次欢迎会由上海市委书记处主持。市委书记处书记、上海市长曹荻秋代表市委首先发言，欢迎北京红卫兵到上海革命串联，并介绍了上海文化大革命的一些情况，解答了他们关心的问题。他表示：为听取对市委工作的揭发和批评、交换意见，请北京红卫兵推派代表，在大会后开座谈会。

曹荻秋讲话未完，就有一些红卫兵按照北京的习惯，给大会主席台递条子，坚决要求发言。书记处同意了让北京红卫兵发言。谁知他们上台后首先是一番义愤填膺的控诉，说他们在上海串联遇到了阻力，如：串连单位向他们要介绍信、乘车要他们买票、辩论遭到“围攻”、见市委领导比见毛主席还难等等。

这时有一名复旦大学的学生突然冲上主席台，说上海市委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可能红卫兵们尚未考虑到对上海市委“定性”，他的此举顿时引发了北京红卫兵的争议。有的要他“滚下来”，有的要他讲下去。一个北京女红卫兵冲上主席台，大呼：“由北京的中学红卫兵来维持秩序，上海同志下台去！”于是上百红卫兵，同会场工作人员，为主席台发生“攻防战”。结果，“毛主席派来的红卫兵”占了上风。而一贯讲究政策、又怕“投鼠忌器”的上海市委工作人员，在一片“滚滚滚！”的呼喊中，“滚”下了主席台。女红卫兵反客为主地宣布，由她任大会执行主席。随之，学生按照北京的做法，

依次查问了上海市委6位书记的姓名和家庭出身，指着曹荻秋的鼻子责问、训斥，说上海的运动冷冷清清，上海市委8月24日电话通知的“十条规定”是违背党中央、毛主席指示，上海市委犯了路线方向性的错误等等，将上海市委欢迎北京红卫兵的大会变成了北京红卫兵声讨上海市委的大会。曹荻秋感叹：“没有预料到，也无思想准备。”

直到晚上20时许，上海市委召开的欢迎北京红卫兵大会，在北京女红卫兵的主持下，宣布散会。

北京学生的做法和观点不能被多数上海工人和学生理解，上海市委向周恩来反映了这一情况。周恩来在电话中表示：上海市委不是黑帮，是革命的。上海市宋季文副市长很快把将周恩来的这段话传达给了北京的学生。交通大学还贴出《强烈抗议北京来沪同学胡作非为》、《8月30日文化广场大会真相》、《十滚令》等的大字报，认为会议是对“市委负责同志的极大侮辱”，这部分北京学生“没有组织观念”，并呼吁派人赴京向党中央报告事件真相。同时，也有的上海同学认为会议开得好，“我们也要像北京同学这样干才有劲”。

8月31日上午10时，北京红卫兵和部分上海红卫兵100多人，继续在延安西路33号市委机关门口要求市委单独接见，履行昨天大会上的承诺，同时要求上海市委给予他们印刷的方便。他们等到中午12时30分左右，部分红卫兵找来梯子等工具，从东侧爬墙通过楼梯进入了33号大楼内，从里面打开门锁。外面的工人人墙再也无法抵挡，大批北京红卫兵瞬间一拥而入，一张张脸上显出兴奋的表情……

有一位红卫兵爬上楼顶，想扯下国旗；见状，正在现场的张文豹

和许多工人、市民们高喊："不准降国旗!不准降国旗!"

吼声震慑了那位冲动的红卫兵小将，他住手了，五星红旗仍在飘扬。

北京红卫兵和上海一部分人冲进上海市委大厦后，与里面的市委工作人员发生冲突。上海市委说北京学生打了上海市委的工作人员，北京红卫兵说上海市委打了北京同学30多人。上海市委十分紧张，连夜紧急磋商，将康平路书记处附近的办公厅工作人员召集起来，组成了50人的"常备队"，并在通往书记处大楼的前门、边门装上警铃按钮，如果红卫兵一来，一揿警铃，"常备队"就可以马上出动。市委书记处书记王一平对"常备队"讲："你们要经得起考验。他们打人，你们也不要还手，甚至打死了，也是光荣的。"

冲进上海市委大厦的北京红卫兵到晚上18时左右才逐渐散去。但市民们依然三五成群，议论纷纷，忧虑、迷惘、不安。围绕北京红卫兵冲击市委机关的事件，上海学生和市民与北京红卫兵发生辩论。住在华东化工学院的北京机械学院97名学生已办票返京，被上海学生从汽车上拉下来，不让离校，要求辩论明白。

与其他省排斥北京南下学生的做法相反，河南刘建勋对北京学生持欢迎态度。8月29日，刘建勋接见北京高等院校赴河南串联的学生及开封师范学院同学时说：

"你们开封师范学院的情况，我知道，你们要借北京高等院校的东风。开封师范学院问题很大，同学们不能一下子冲破旧秩序，就来郑州搬兵求援。北京的同学来这里，我们表示欢迎。北京的文化革命

比我们早一个来月。河南在十一中全会前也犯了错误，派了工作组，相信工作组，相信工作组的结果吃了亏。《十六条》下达前我们的认识也是不够的，出现了这样那样的错误，正像毛主席说的，对这次运动的领导不得力、不理解，群众路线走的不够。《十六条》下达后，我们下决心把运动进行到底，凡是错误的，不符合《十六条》的，就坚决改正，按《十六条》办事。这次革命运动没有经历过，我们才摸着了一点经验。会见北京同学，我很高兴。你们到开封去点火，好得很，我代表省委表示感谢，开封师院的问题比较严重，冲破旧秩序需要自己努力，也需要北京同学的帮助，局面一定会改变，我十二万分地欢迎北京的学生去开封，把火点起来，点得旺旺的。”

北京一个学生说：“同学去到开封师院，被围攻了，把我们关到楼上。”

刘建勋：“这是个好事情，对左派围攻为什么不好，不围攻还暴露不出他们的面目。”

学生问：“省委什么时候提出炮打司令部？怎么引火烧身？采取什么措施？”

刘建勋答：“炮打司令部是8月25日提的，这个口号是从北京学来的，现在正在号召炮打我，好人不怕打，坏人打出来是好事，炮打司令部要发扬大民主、大揭发。群众自己组织文化革命委员会，领导统统不参加。许多学校，少数派看来是革命的，要把革命的多数团结起来。”

学生又问：“请省委谈谈对开封师院党委的看法？”

刘建勋说："我不认识韩倩之，这几年没有抓学校工作很抱歉，看来，韩倩之这个人应严加处置。你们到那提出办法算了，回去后组织人，提出罢官就罢官，阻挡文化革命的一律罢官，毫无姑息。开封师院的同学和北京的同学一起回校革命，串连是革命行动。我决心跟毛主席走，有错误你们可以提，你们帮助我们清理了许多司令部。现在革命派还是少数，还受压制，你们要争取多数，孤立少数，炮打司令部。"

刘建勋支持造反派的大字报也遭到郑州大学"校文革"的强烈不满。8月30日，郑州大学李月珍、彭学敏、郑毅涛等21人写出《炮轰刘建勋》的大字报，对刘建勋支持党言川提出疑问："你们口口声声要支持保护少数， 难道我校的绝大多数师生员工都成了'保皇派'了吗？如果你也同意肆意歪曲污蔑的做法，要给我们扣上这顶'保皇派'的帽子，我们决不答应!"

## 第 170 回：改路名，苏使馆前人潮涌
## 狂涛中，宋庆龄亦遭波及

8月31日晚，中共河南省委书记处候补书记纪登奎，在郑州大学接见了开封师范学院部分师生代表并举行了座谈。出席座谈的有开封师范学院“824”造反队、“红旗”战斗队、“红卫兵战斗师”的代表以及来河南进行革命串连的北京部分高等院校的学生共67人。纪登奎根据大家提出的文化大革命的方针政策问题和开封师范学院文化大革命的一些重大问题作了解答，进行了辩论，交换了意见，会议开得很热烈、很活跃。

在回答同学们提出的问题时，纪登奎说：“造反是对的，造韩倩之的反可以。造省委的反也可以。除了党中央毛主席以外都可以造，只要他有资产阶级思想，都可以揭他一下，只能是热烈地欢迎，不能有别的态度。反对革命造反，就是反对毛泽东思想。说革命造反无理，就是反毛泽东思想，就不行！”

说着，他拍案而起讲道：“占总机，把大门也没有什么了不起，何况没有呢？”

同学问：“如果在文化革命运动中间，党委领导干部和文化革命委员会领导，利用群众运动的某些缺点和错误，挑动学生斗学生，把革命的行动说成是反革命行动，对这样的干部应该怎么办？”

纪登奎反问道："你们说应该怎么办？"

大家齐喊："罢官！"

纪登奎说："同意！

同学问："欢迎多数派赴郑归来的会上，我们曾经两次递条子，给文化革命委员会主席侯志英，写上《十六条》条文，不许他挑动学生斗学生，他不理，这怎么办？"

大家齐喊："罢官！"

纪登奎纠正说："这怎么能罢官呢？他是学生，选掉！"

有人说："他是老师！"

纪登奎不解："怎么是老师？"

当他知道侯志英是教师支部书记后，说："应该以学生为主体，大家要罢免他，回去把他罢免了。"

侯志英态度明朗："我是文化革命委员会的主席。同学们敢于大胆给我提意见，我大力支持。"

纪登奎说："你是主席呀？对我的答复有什么意见吗？"

侯志英说："现在是炮打司令部，我们对斗争不理解。文斗，就是《人民日报》解释的大揭发、大批判；文斗不仅适用于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也适用于处理敌我矛盾。一开始揭发，有些人看着还不够牛鬼蛇神，因此双方都要斗，一方认为是内部矛盾，有一条揭发一条，斗一条；一方认为是敌我矛盾。有的戴高帽子，有的没戴高帽子。"

纪登奎："对一切牛鬼蛇神都可以斗，他不扣（帽子）

可以，愿意扣也可以，大胆放手吗，提高一点也可以，又不是最后定案。”

有人问：“韩倩之在开封师院当了七、八年党委书记，前几年犯了许多严重错误，尤其是在文化大革命以来，镇压革命学生运动，引起广大革命师生员工的无比愤慨，可是在昨天晚上斗争韩倩之时，一部分人喊‘打倒韩倩之！’另一部分人就不举手；有的在会上念主席语录：‘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另一部分人就强调‘文斗’。这两种态度你看怎么样？”

纪登奎答：“我赞成前一种态度。”

会议一直开到次日凌晨1时，很多人还要发言。纪登奎最后说：“不管哪一派，大多数都是革命的，大方向，大原则统一起来，一些枝节的问题不要争执。坚持真理，改正错误。当前是要集中目标炮打司令部里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今天很好，大家辩论的空气很浓，不扣帽子，不讽刺挖苦，很好。其实有些问题，你们自己是能搞清楚的。你们要我到开封，去了要好好听听，先当学生，后当先生。北京同学给我们很大帮助，他们都很有水平，大家回去要开门，一切革命同学都可到开封师院。我提倡你们到北京去，到北大、师大、清华去学习，好多问题，一讲你们就可以解决了。要分批去，一下子都走光了也不行呀！”

8月，郑州大学金维珠同学贴出了一份转抄河南省信阳地区光山县一位学生写的大字报——《千刀万剐吴芝圃》。大字报中说：屠杀河南人民的刽子手吴芝圃，制造了“信阳事件”及信阳事件中最严重的“光山事件”，“自1959年重阳节吃最后一口米饭至60年春，光山县四五十万人被打死饿死三分之一以上，在最严重的时候，走一段路就会遇见几具尸体，妻离子散、全家饿死者数不胜数，人民遭到了大劫杀，财产遭到最大限度的破坏，其惨状不堪耳闻目睹，痛苦不堪回忆，笔舌无法描述!要知道58、59年光山县的粮食获得了大丰收啊!可是59年连种子一粒不剩地征走，抖一抖稻草，筛下几粒粮食也得上交，哪里谈得上口粮!”这张大字报在郑州大学“联委”部分同学中引起了共鸣。

8 月 29 日，北京红卫兵要在苏联大使馆门前召开的道路更名命名游行大会。凌晨 2 时，周恩来召开紧急会议，研究此事。他做出指示：“改名可以，但不要把反修的大字报贴到苏联大使馆和大使馆墙上，不要去闯大使馆。”并要求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派一营部队，徒手到现场执勤，防止冲砸大使馆。

上午，北京苏联大使馆前的“扬威路”上锣鼓喧天，红旗招展，红卫兵组织了数万人在这里举行盛大的集会和示威游行，将“扬威路”正式命名为“反修路”，附近的北京第2女子中学，改名为“反修路中学”。

那天，马路两旁的墙壁上贴满了批判修正主义的大字报和祝贺《反修路》命名的贺信。当使馆内的中国工作人员抬着喜报和毛泽东主席的画像来到会场时，全场沸腾，爆发出一片“打倒现代修正主义”的口号声。

8时许，各国记者赶到，纷纷抢拍镜头。阿尔巴尼亚的代表接到通知后立即赶来。当他们来到会场时，现场情绪达到顶点，齐声欢呼“中阿战斗友谊万岁！”在热烈的掌声中阿尔巴尼亚的代表接受了红卫兵的袖章，并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说：“你们的革命不仅对中国，而且对世界马列主义者都有伟大意义。”

大会由北京女2中的15岁的红卫兵张小洪主持，将“扬威路”更名为“反修路”就是她的提议。最后，大会一致通过了致全国的通电，通电说：“苏联现代修正主义是不折不扣的大叛徒，是道道地地的败家子，是全世界无产者的死敌，我们一定要和它斗到底。”“让反修的旗帜在北京高高飘扬，伟大的旗手就是毛主席。”

8月29日，北京西城红卫兵纠察队发布第四号通令：

一、要深入调查研究

哪些人属于黑六类？哪些人不属于黑六类？一定要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可以搞“红卫兵”、“派出所”、“居民委员会”三结合，通过组织系统去调查。在未了解清情况之前，不要草率进行搜查，以免搞错或被坏人利用。……不

是黑六类的家一律不查！国家负责干部的家绝对不许查！

二、要通过组织

在查抄黑六类的家之前，一定要通过本单位的红卫兵总部，要持有证明信；一定要与当地的派出所取得联系；可以与各街道革命的居民委员会取得联系，取得他们的协助，还可以征求被查抄的人所在单位的意见。被某单位查过的家由此单位负责到底，其他单位要过问，必须与此单位联系。

三、要文斗。要提高警惕，后发制人

四、一切缴获要归公

我们查抄，政治是主要目的，经济是次要目的，查抄的物品主要是反动证据、枪支弹药、行凶利器、剥削来的金银、珠宝、巨款、赃物等。所查收的一切物品，都不要损坏，要全部归公，交给国家。红卫兵身上，绝不允许有任何黑六类的脏东西！各单位里，绝不允许有任何黑六类的脏东西！

五、区别对待，打击少数，孤立敌人

六、斗垮敌人，教育群众

七、给出路

确实查明，并斗争过的黑六类分子，尤其是逃亡地富分子。除现行反革命分子应当依法处置外，其余一律给政治上、生活上的出路，这个出路就是限期（于 9 月 10 日前）离开北京（如有特殊情况，经本人所在单位及查抄单位批准，可酌情延长），回原籍劳动，由革命群众监督改造，给他们重

新做人的机会。

8月29日，北京人大附中毛泽东主义红卫兵也发出了《八项禁令》：

1、革命干部、军人、工农兵家里一律不得搜查，不得勒令退房、换房。已搜查过者，如没收了文件物品必须立即退回。

2、军车、小队车一律不许截，更不许搜查。

3、对党、政、军机关任何人不准随意搜查。

4、革命干部、军人家里的保姆（非黑五类）勤务员不准勒令取消。

5、到地、富、反、坏、资产阶级家里搜查，要有本校红卫兵总部证明。没收物品一律打收条上交总部或派出所。如有趁机贪污盗窃自肥者，发现后严惩不饶。

6、黑五类子弟决不准冒充红卫兵招摇撞骗，如发现严加惩处。

7、外地来京者因不了解本地情况，一律不准到任何地方搜查。

8、上公共汽车、下饭馆、买东西必须按价买，任何人不得例外（有免费证者除外）服务人员如遇上述情况应切实负起责任。

注意事项:

1、如遇违犯上述禁令及发现各种不合理或反动传单，

真正的红卫兵有全权干涉。

2、执行此禁令时，如遇阻力当事者可立即向人大附中毛泽东主义红卫兵报告。(电话:28局2131转596或28局1671)

只准左派造反，不准右派翻天。如要翻天，立即镇压!

8月29日下午，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会议一开始，他就说："文化大革命，发展到社会上斗批改。要文斗，不要武斗。"

林彪一听毛泽东这样说，立刻紧接着说："全部形势很好，就是要去掉一个打人。不打人，就什么都好了。"

此时红卫兵正在到处揪斗原由各中央机关派去的工作组。被揪斗的工作组成员，通常都要戴高帽，挂牌子，遭到"喷气式"的残酷斗争。对揪斗的工作组的事情，毛泽东说："同意文化革命小组的意见，工作队员大多数是好的，只有极少数人不好。工作队长也不是个个都坏。派工作组的人要承担责任。国务院各口的负责人，要到群众中作检讨，到工作队员中去作检讨。这样，会解放大多数。"

在八月二十九日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毛泽东说：一条也不要，何必十条。

对学校中反工作组的造反派与支持工作组的"保皇派"的尖锐对立，毛泽东说："保皇派这个名称要取消。中央下的命令，人家怎么不保?不能怪工作组，现在又怪到工作组底下的学生去了。你们要去传，我也保过6天皇，保的只是

张承先，后来不保了。”

对其他单位是否成立红卫兵一事，毛泽东说：“机关红卫兵已经组织起来了，你把它解散也不行，不要禁止，也不要提倡。军队本身就是红卫兵，不必另搞。工厂、农村，让他搞。对学校红卫兵不同的组织派别，不要忙于合。”

对李富春 8 月 21 日关于国务院机关文化大革命问题十条意见的报告，毛泽东在这天举行的常委扩大会议上说：“一条也不要。何必十条?来一个放任自流。有《十六条》嘛，都不听。让它去搞。”

谈到一些干部受冲击问题时，毛泽东说：“全国的省委、大市委、中等市委，要垮一批。垮就垮，要准备个别中央局、一部分省委、一部分市委垮台。”

8 月 29 日，毛泽东找李雪峰谈话，说：“职务先不动，保留，但可以不管北京的事了，请吴德同志管。”

在“破四旧”的浪潮中，宋庆龄在北京的家也受到红卫兵的包围和冲击，一些红卫兵闯进她家，要剪去她的长裙，没收她的书籍。宋庆龄每天都收到不少红小兵的来信，“强烈要求宋奶奶不要再留那种资产阶级的发型与穿那些资产阶级的服饰了”。

每每看着这些笔画稚嫩的来信，宋庆龄只会苦笑着摇摇头，长长地叹着气说：“唉，孩子们不懂事呀，他们可别害了我们的孩子呀!”

上海红卫兵认为万国公墓埋着“反动人物”，墓碑充满“封、资、修”情调，8 月 29 日，长新中学红卫兵在万国公墓砸碎鲁迅朋友内山完造的墓碑。铁道学院红卫兵破坏了宋庆龄父母的墓穴，因为宋庆龄的父母是蒋介石的岳父母。

当天，北京的宋庆龄听到从上海传来上海万国公墓被上海红卫兵砸烂，其父母的坟墓被破坏的消息，悲愤异常。她以为是江青叫人去干的，骂江青下流，并连夜给周恩来写了一封信。翌日天一亮，就差工作人员隋学芳将信送到了中南海的西花厅。

周恩来阅信后立即给上海民政局打去加急电话，命令当时的上海市民政局领导务必在最短的时间里，做好宋副委员长祖墓的恢复与安置工作。

江青听说宋庆龄骂她，气得不得了，在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上，她让戚本禹叫红卫兵去“烧一烧”宋庆龄。周恩来当时在场，他没有说话。下来后，立即嘱咐傅崇碧派一个连，分为三班，日夜守卫、巡逻在宋庆龄家的内外。

过了两三天，宋庆龄住宅没有动静。周恩来开会时将戚本禹叫到旁边的小房间里，问他：“那事你布置了谁去啊,怎么布置的?”

戚本禹知道是说宋庆龄的事，回答道：“这事我哪能布置啊。江青那也是在气头上说的，事后她也没再和我说起。”

周恩来听了说：“哎哟,你可真是个好同志啊!”

因为毛泽东曾在一个中央文件的批示上说“戚本禹是好同志”。

上海根据周恩来的特别指示，重新修缮了宋氏墓地。但原先墓碑上的宋庆龄等兄弟姐妹的名字被删掉了，在重新竖立的墓碑上面只剩下了宋庆龄一个人的名字。

墓碑修复后的照片拿给宋庆龄看。宋庆龄看到她父母的墓碑立的比以前的还好，知道自己错怪了江青，表示向江青道歉。

此事反映到毛泽东那里，他对江青说：“你应该大度点，主动去看看她。”并派江青代表他去拜访宋庆龄。

江青遵照毛泽东的意见前去探望宋庆龄，向她解释这场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意义。宋庆龄静静地听着。17 年前，宋庆龄第一次见到江青，是在北京参加开国大典后回上海时，毛泽东让江青代表他到前门火车站为宋庆龄送行。两人在一起交谈了不到 20 分钟。江青当时给宋庆龄留下的是衣着朴素、善解人意的好印象。为此，宋庆龄后来不止一次在不同的场合对别人夸奖江青，说她“有礼貌，讨人喜欢”。宋庆龄第二次见到江青，是在 50 年代。那次，她在上海家中宴请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及其夫人。江青曾应邀出席作陪。那天，宋庆龄对江青的举止优雅、态度谦和、服饰得体再次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听完江青的介绍，宋庆龄微笑着说了一句：“但是总得

有所控制，伤害无辜是不对的。”

## 第 171 回：要保护，周恩来开具名单
## 上海市，有组织三天抄家

8 月 29 日晚，北京大学经济系的 30 多名红卫兵闯入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章士钊家中，进行查抄。在抄家过程中，他们偶然看到毛泽东与章士钊的书信往来，这才知道章士钊与毛泽东关系非浅，于是，赶紧撤了出来。

章士钊和马连良都有吸鸦片的嗜好，过去一直是靠“特供”维持。抄家时，章士钊的烟枪被抄走了。第二天，8 月 30 日，86 岁高龄的章士钊就 29 日自己被抄家一事致信毛泽东。信中说：“以钊荒耄不才，在公领导之余，受到本国青少年之督责搜检，此惟罪有应得，亦且情所甘愿。盖此中伏有大革命成功之美好前景，大多数人享受幸福，区区一小撮人沾着屈辱，又算得了什么也。”信中又要求“在可能范围内稍稍转圜一下，当有解铃之望”。毛泽东当天在信上批示：“送总理酌处。应当予以保护。”

周恩来接到毛泽东批示后，严厉批评了有关人员，责令当即送回抄走的全部书籍，并派人前往保护章士钊住宅。同时亲笔开列了《一份应予保护的干部名单》：

宋庆龄 郭沫若 章士钊 程潜 何香凝 傅作义 张治中 邵力子 蒋光鼐 蔡廷锴 沙千里 张奚若

（1）副委员长、人大常委、副主席

（2）部长、副部长

（3）政副

（4）国副

（5）各民主党派负责人

（6）两高

（李宗仁）

名单开出后，周恩来交代公安部有关负责人把这份名单转交给统战部，要统战部照名单划定范围，把党外人士的名单开列出来。

周恩来又召集陶铸、李富春、康生、陈毅、叶剑英、李先念、谭震林、谢富治、薄一波等十几名领导开会，研究红卫兵的政治教育问题。

章士钊的烟枪第二天就送回了，家也被保护起来。可马连良就没有这么幸运，抄家后不久就去世了，原因是吸食鸦片时间太长，断了嗜好就等于断了生路。不过，按照康有为的外孙女罗仪凤的说法，是因为马连良家的大门进门后右行，属“白虎门”，风水不好。

8月30日，周恩来接见中科院，国防科委等单位的群众代表26人。接见时周恩来问大家从什么地方来，科学院的代表回答说：“从革命村来。”

周恩来不知道革命村是哪里，就问：“革命村在哪？”

大家说：“就是中关村，现在改成革命村。”

周恩来：“噢。”他接着说：“中国没有毛主席，没有

今天。你们没有解放没有今天，你们也是没有毛主席就没有今天。红卫兵冲击封建遗留下来的残余……中关村还是先叫中关村。在苏联大使馆前面那条路正式改名为“反修路”，前几天举行了开典，这是一个15岁的小女孩张小洪提出的，她主持大会。他们真有办法。把越南代表请来，但是不好讲话，问问阿尔巴尼亚来了没有？当然来了，反修吆！阿尔巴尼亚好讲话。

真是后来者居上，望尘莫及，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总是这样。我15岁时还什么都不懂。我先跑到上海搞地下工作时，有时路是外国名字的还记得清，在北京呆了17年，现在出门就坐汽车，不自由，北京的好些路的名字都不知道。”

周恩来问在数学所工作的“825”大会执行主席：“华罗庚在你们所吗？”

答：“现在在东方红大学，副校长。”

周恩来：“没有抄他的家吧？”

答：“没有。”

周恩来：“斗没有？”

答：“斗了。”

周恩来：“有没有体罚？”

答：“没有让他坐下来。”

周恩来说：“大家把大学教授家给抄了，这样不好。不怕乱，突出政治要包含政策，乱要乱出道理，要乱出规律来，

要符合无产阶级政策，要有政策、策略。他们没收了许多东西，很多现钱，还有其他东西，放在屋子里没有管，也不给人家条子，后来联络员来了，红卫兵就叫联络员看管，说：‘我还有事。’这种做法已处在政策的边缘了。红卫兵勒令民主党派的负责人把工资的40％至60％上交，他们上交了，我们不要不行，红卫兵通不过，先替他们暂时保管起来。你们不要往外传。”

周恩来接着征求大家对下步运动的意见。与会人员没有领会周恩来的意见，争先发言，表明自己的观点，驳斥对方。双方争论激烈，都听不进对方意见，也不容对方把话说完。周恩来生气了，站起来说：“贴了一张大字报你就反对，人家有贴大字报的自由。要有一个辩论的气氛，不然还行啊！我去清华作了两次报告，也给我贴了许多大字报，要给人家贴大字报的自由，等你们做到这一点，咱们再谈。红卫兵两种、三种都可以，要重视成分，也要看表现。”

接着，周恩来又讲了党的历史，然后说：“我一天只能睡4、5个小时。”这时他打了一个呵欠，告诉前面一个人：“你要经常提醒我，一讲话就不累了，这是解放自己的办法。”

他又说：“对四类分子勒令回乡监督劳动改造，将矛盾下放是不行的。有人问，户口在这里，回去怎么办？要先和那里打个招呼，人家要不要？要注意工农联盟，不然回去也

是消耗国家财富。通牒是通牒，国外通牒也要等几天。假如你和他们讨论，你一定同意他们的做法。（大家笑）真正的高级干部还没有触动他，现在都是中级干部，好办，高级的你们要点，但是要讲道理，要批评……。今天是聊天，不是指示，最后如果变成你们的意见，你们自己去讨论。我作为毛主席的学生、战友，还要努力学习，当好学生，当好战友。”

周恩来还说：“家庭出身好是一好，表现好是两好。家庭出身不好，表现好，亦是一好。出身好表现不好，是忘本；家庭出身不好，表现不好，是两个不好。两个不好，应该回老家去了，或者叫复辟。主要看你的表现，晚节。瞿秋白出身大官僚资产阶级，晚年写了一篇《多余的话》，表现不好，晚年叛变了。我在政治局作了一个报告，还未发表，红卫兵知道了，就去八宝山公墓把碑给砸了。……在知识分子官僚家庭出身的瞿秋白，像李秀成一样，晚年变节了。我们应当向青年历史学家戚本禹同志学习，学习他对李秀成的分析。……瞿秋白被敌人抓住了，卑躬屈膝，最后还是被国民党杀掉了。”

8 月 29 日至 9 月 3 日，上海爆发了第一次大规模抄家，其中有组织的连续抄家达 3 天，领导者都是些中学红卫兵。抄家时，他们分管各区，下面如抄出重要物质，或与被抄家者发生冲突，随时与他们联系，因为上海警备区向他们提供了汽车，他们可以迅速前往处理。这次抄家是在上海市委默

许下进行的，抄家名单大多由公安局、派出所和街道党组织提供。每个参与抄家的学生都有一份材料，全是群众的检举揭发。被抄家人主要是被怀疑为国民党特务的，被认为是反革命的，被释放的旧军警和国民党将校以上的高层人员，还有解放后群众举报的私藏武器和电台的特务，等等。也有资本家，但大都是被认为和敌特势力有联系的资本家。所有这些材料，全是解放后到文革前夕群众的举报，由派出所整理的。每份名单下面都盖有派出所的印章。

徐汇区公安局一位副局长请中学生帮助破案，布置学生去抄嫌疑人的家，公安干警穿便衣夹在里面，关键时出面审问嫌疑人。

学生们抄到的东西也都交给公安局，并进行登记。

对此次抄家都作了规定，如必须留出与周边群众同等生活水平的家用物品，如热水瓶、被子、锅碗瓢盆等，以及现钞、存款、粮票等，都有很详细的数目规定；如果遇到反抗马上汇报，不许武斗，等等。

大抄家的第一天晚上，市公安局的一个副局长和红卫兵一起坐着吉普车巡逻，时刻准备赶往出事地点解决突发事件。

在这次抄家行动中，有关部门还让红卫兵出面干他们不便出面干的事。如监听部门过去在一些地段，长期发现可疑电波点，有的可疑点在多户居民混杂的房子里，证据不足不

能上门查抄。这次抄家，有关部门便要求红卫兵对这些可疑点的一幢或几幢房子进行抄家，甚至安排人亲自查抄。结果，确实抄出了十几部发报机，有个发报机是从棚户区里抄出的。也有原先测出可疑电波的地点，挖地三尺也没有抄出发报机。

上海虹口区北虹中学曾几次被要求“抽调一批可靠红卫兵”，以抄家为名，对公安局内部掌握的敌特嫌疑对象进行搜查……规定了纪律，如不准透露是公安局带领抄家的，只能叫公安局带队的人老师，不准对外人提起被抄的对象，查抄中不准打人、砸东西、所有查抄物品都要登记造册，由被抄人本人签字和居委干部签字才能带回来等等。而且，所有的抄家都是在夜间进行，公安局还为他们的行动配备了卡车。

再如上海市第 51 中学的红卫兵接待过几个自称是公安局的成年人，给了他们一份十几人的名单，都是住在徐汇区的，说这些人在中国人民银行租有保险箱，存放的可能是敌产，或是其他什么东西，甚至可能是武器，希望红卫兵小将去“破四旧”。但这些保险箱必须同时使用两把钥匙才能开锁，一把在银行手里，另一把在箱主手里，他们说：“我们不好出面开锁，你们红卫兵小将出面”。红卫兵根据提供的名单去到这些人家，要求交出钥匙，所有人都以种种原因推说钥匙不在或找不到。于是红卫兵将他们带往银行，要求银

行强行开锁，并由箱主支付 10 元开锁钱。结果，开出来的全部都是外币或黄金，没有武器电台之类。这些资产都当场在银行“就地上交”，物主不敢表示任何异议。

自从这次抄家之后，上海全市可疑电波全部消失，整个上海的上空安静了好多年。

高安路 19 号是不公开挂牌的中共中央华东局的宣传部。小院隔壁是情报研究所，也没挂牌。19 号对面的一幢小院，房主出国，房子长期空关着。根据公安机关提供的消息，学生们抄了那所房子，居然在屋子的阁楼上发现架着一门小钢炮，炮口就对着 19 号宣传部，下面箱子里还有两枚炮弹。

这次大抄家，全市共抄出 3 万多支轻重武器，从迫击炮到手枪，到好几箱黄油都没擦干净的步枪。

上海的官办红卫兵组织“上海红卫兵总部”成立后，曾打算将抄家花絮登在《红卫兵》报上，市里没同意，说许多事是保密的。“上海红卫兵总部”就在自己办公楼下办了个“红卫兵抄家成果展览会”，展出抄出的枪支弹药和电台，以及黄金等物。

上海 3 天全市性大抄家起了示范效应，紧接着全市抄家不断。8 月 30 日晚上，光是冶金系统各单位就出动近 6000 名职工红卫兵，对冶金局直属单位 900 多人进行抄家。工厂的职工红卫兵组织也对自己厂的“地、富、反、坏、右”和资本家实施抄家。上海国棉 17 厂，在 8 月 31 日至 9 月 1 日

两天内，全厂出动400多名由干部和工人组成的“红卫兵”，对34名“重点对象”进行抄家。

没有工作单位的自由职业者，也难逃抄家之劫，如著名翻译家傅雷及其夫人，就是被自己所住地区的房管所职工红卫兵抄家，接着又被上海音乐学院红卫兵抄家。

8月30日夜晚11点多钟，著名翻译家傅雷家大门外响起了急促的敲门声，中间还夹杂着粗野的踢门声。

来人是上海音乐学院的红卫兵。他们平时所学的那些典雅的音符，变成了急风暴雨般的打击乐。

傅雷爱花，夜间曾叫夫人朱梅馥打着手电筒，在小花园里进行嫁接试验。这一细节被具有高度警惕性的革命群众发现了，认为他们是在埋“变天账”，于是红卫兵挖地三尺，小花园里盛开的月季和玫瑰，全被连根拔掉。

傅雷家书成了重点搜查目标。红卫兵原以为信上写的会是“叛国勾当”，谁知他们父子在纸上互相倾诉爱国之情，发表对艺术的真知灼见。红卫兵传看起来，有的甚至读得入迷了，一时竟忘了这是在抄家。

抄家继续进行着，一会儿，地板被撬起来了。

忽然，从阁楼上传来消息：傅雷的“反党罪证”终于被查获了！

“反党罪证”是姑母寄存在傅家多年的、傅雷从未打开过的一只箱子。红卫兵敲掉箱子上的锁，在一面老得已经模

糊不清的镜子背面，发现嵌着蒋介石的画像；在一本旧画报上，翻到了一张宋美龄的照片。

“大右派傅雷窝藏反党罪证！”在震天的口号声中，傅雷夫妇被按倒在地，并被勒令跪着。

9 月 2 日上午，傅雷夫妇被拉到大门口，站在长板凳上，戴上高帽子示众。四周，是黑压压的沉默着的人群，再后面，是一排排大字报栏。

9 月 3 日凌晨，傅雷夫妇将那床浦东土布做成的被单撕开，打结，悬在铁窗横框上。他们在地上放上方凳，并铺上棉胎，以免方凳踢倒着地时发出太响的响声……。

就这样，傅雷夫妇上吊自尽于铁窗两侧。

抄家对象，开始是“牛鬼蛇神”中的一部分：即地、富、反、坏、右，再加上资本家，实际上还有小业主。以后很快波及党政领导、工商业者、上层民主人士、作家演员等著名文化人士、学校教师，等等。有的单位凡带“长”的全部都被抄家。市人民银行不论共产党执政前后，凡曾担任过银行正副经理、襄理者，都在被抄之列。商业一局更提出：“抄错是方法问题，不抄是立场问题。”静安区抄家 1.78 万余户，占全区总户数的 14%，其中被抄家最多的是威海、延中两个街道，各占总户数 17%多。海运局到 1966 年 10 月底，共抄 144 户，其中机关干部 18 人，船长 20 人，轮机长 7 人，大副 21 人，二副 7 人，大管轮 3 人，二管轮 3 人，三副和

三管轮以下工人 65 人。全市文化宣传系统 1.1 万名干部中，被抄者 2,421 人，占 22%。

上海是中国民族资本家最集中的地方，被抄家对象也最多，如刘念智、郭琳琪、荣毅仁之姐荣漱仁家均被抄。全市 6 万多工商业者统统被抄家，无一幸免。一些社会知名人士，更是红卫兵抄家集中目标，作家巴金，书法家和诗人沈尹默，以及演员赵丹、白杨、京剧演员童芷苓等等，上门抄家者络绎不绝，这帮去了那帮来，甚至时常发生两群抄家者在同一时间上门的情况。

抄家同样株连名人子孙后代。黎元洪儿子、段祺瑞侄子、袁世凯孙媳妇等悉数被抄。上门抄家的不仅是学校的红卫兵，还有单位的群众组织。抄家者挖墙洞、砸橱柜，上到房顶，下至地板，角角落落都抄彻底。更有“毁灭性抄家”，不仅拿走东西，还将未拿走的东西肆意破坏。有的家庭，被抄家后接着又被强占房子，“扫地出门”，失去栖身之地。

在抄家风扫荡下，许多人被迫自行破坏珍藏的文物书画等。如名画家吴昌硕后人，将许多字画撕毁，当废纸就卖掉一百多斤。著名画家林风眠，将自己留存作品浸入浴缸、倒进马桶。著名书法家沈尹默，将毕生积累的一大批明清大书法家真迹，以及自己的作品，撕成碎片在夜深人静时倒进苏州河。

从 1966 年 8 月 23 日到 9 月 25 日止，上海全市共抄家

15.77 万余户，占全市总户数 241 万户的 6.5%。其中市区 11.45 万余户，占市区 139 万户的 8.2%。抄家中，全市共抄出黄金 64.9 万余两，各种金银首饰 90.7 万余件，钻戒、钻石 4 万多只，珠宝、玉器、古玩 27 万余件，美钞 334 万余元，其他外币 330 余万元，银元 239 万余元，现金、存款、公债券 3.76 亿元。抄家收缴 597 架钢琴，后来都没归还原主，而由市革委会有关部门批准，转送给了中小学。抄家物资中，金银、存单、现金、外币及贵重物品，当时就交由银行收兑和保管；1970 年经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批准，各单位寄存在银行的金银，由银行按当时收兑牌价折价处理。

曹荻秋 9 月 4 日一个讲话说，“上海的红卫兵抄了 5000 家”。9 月 18 日曹荻秋在全市区县局以上干部大会上作关于上海文化大革命形势的报告，在汇报“文革战果”时，曹荻秋说上海搜出黄金 48 万两，“是北京的 10 倍”，“北京好像动得比上海厉害，但上海成绩比北京大”。10 月，曹荻秋去北京参加中央工作会议，将红卫兵抄家作为上海文革战果汇报。

## 第 172 回：讲政策，陈毅再谈“破四旧”

## 真敢想，竟要“造三个大反”

8 月，外交部党委召开全部大会批斗国际关系研究所所长孟用潜。大会由副部长乔冠华主持，副部长韩念龙、部长助理宦乡和已进驻研究所的工作组人员发言。会议作了周密准备，糊了十几顶高帽子。除孟用潜外，还将研究所其他领导人和业务骨干 10 多个人拉来陪斗。都戴着高帽子，手拄两根用白纸包的哭丧棒，在台前跪成一排。而孟用潜的高帽子里安装有图钉，用手一按就鲜血直流。他们在办公楼楼道里排着队被游斗，经过人群时，人们可以随便打他们和羞辱他们。孟用潜在游斗时走了一半就晕倒了。

接着，外交部也自发地组织了一阵红卫兵，进行抄家和“破四旧”。

8月30日，陈毅在外交部对红卫兵谈“破四旧”问题，他说：

“苏联大使馆的人员外出要带语录带毛选，由苏联开来的火车也要求人家带语录带毛选，去给每个人发语录，这样不好，不能强迫别人接受。外国人现在说我们搞个人迷信，毛泽东思想绝对化。我们要慢慢来，搞他个20年、30年就行了。毛泽东思想要传播全世界，但不要强迫人家接受，将来毛泽东思想一定要在全世界普遍起来。

中央肯定是要文斗，不准打人、骂人，不准挂牌子戴高

帽子，我们相信真理在我们这一边，我们有力量，为什么要压他们呢？用武斗压人家是软弱的表现，北京目前打人的风气很浓，不能提倡，反正这些人跑不了，跑到月球上也把他们从月球上揪回来。过去我们也搞过这种事，我也打过人，给地主土豪戴高帽子。毛主席说，这样不好，农民要这样，我们不能这样做。今天的天下是我们的天下，我们只要掌握了毛泽东思想，就能把他斗倒，用不着武斗。北京取得成绩很大，经验丰富，把经验传出去，不能把打人的经验也传出去，打人不能解决问题，只能使人更反感，这只能表明你没有力量，没有办法。”

“有些东西是封建的东西，如骂人狗崽子。戴高帽子没有什么了不起，你们可以给我戴高帽子，我成天戴着帽子，高帽子无非是高一些罢了。为了坚持真理，头可断，血可流，你们只想打胜仗，但也没想想打了败仗怎么办？有人说我是大鬼，但我还要到群众中去，任何时候都要讲政策，无非给我戴高帽子，把我劳改、打死。但是我还是要讲政策，毛主席就是敢讲，敢发表自己的看法，不怕打入冷宫，如有人说陈独秀路线是对的，毛主席就说是错的，有人说张国焘路线是正确的，毛主席就说是错的。

打人并不可怕，革命嘛，是暴动，看到打人，不要惊慌失措，见了不能马上镇压，挫伤群众积极性，例如列宁在十月革命时，当群众起来要把莫斯科城外的一个教堂烧掉，为

了不挫伤群众积极性，列宁还是批准了，我青年时期有过偏激，烧过两座城市，有的人连家都没来得及搬，这样做是错误的，为这个问题，毛主席还批评过我。北京今天有些地方打死人了，不要惊慌失措，没有什么可怕，但是对这些偏差要及时纠正，运动越搞得深入越要讲政策，不要怕群众，有人怕整到自己头上，写大字报、调子唱得特别高，这是一种不正确的心理，这是一种投机的表现。”

陈毅强调，“我们不能随便去抄人家的家，不能搞成台湾！”“抄家没收一定要经过手续，”“一定要与派出所取得联系，取得他们支持。”他说：“有的红卫兵去抄人家的家，有的红卫兵又去抄他们的家，他们就赶快回来保他的家。”

对遣返“黑五类”，陈毅说：“红卫兵要把他们送回去，这是好的，但是要和派出所联系，不要把人家置于死地，有的把黑五类往家送，送到半路就把人家打死了，有的抓住老往派出所送，派出所很快就满了，有人说我替黑五类辩护，我不是这个意思，弄不好，他们还要搞反革命暴动，因为他们没有出路了嘛！这是一场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不是那么简单。”

他特别提到：“无论如何不能排外，不能搞成我们是全世界第一，我们的外交政策还没有变，还有用，还是全世界联合起来，建立反帝统一战线。”“有的红卫兵说西哈努克

是国王，要求我们搞阶级路线，我们还是要跟西哈努克搞统一战线。有的人提出要砸烂洋货。提倡国货，这是对的。但是用洋货也没有罪。我这个表是瑞士的，红卫兵要砸也可以，我同意，但是你得给我一块表，要不然，我就没有表使了。有些人专门爱洋货，对这种人你整整他，我也不反对。现在我们的东西在国际市场上很多，这也是洋货。再过几十年中国一定在世界上取得发言权，人民币一定代替美元。”

说到中日联欢问题，陈毅说：“有人讲他们来的时候都是资产阶级少爷小姐，不要他们来，要贯彻阶级路线，这种想法太幼稚，可笑天真，叫他们来嘛，参观我们的建设，过去他们来看长城、故宫，今后要改变这种做法。”“有的红卫兵跟中央首先谈判，……最后谈判，还是把他们说服了。今年还要搞中日联欢，通过这件事说明群众是讲道理的，不要怕群众。”

“群众运动打死几个地主有什么了不起的，当然有的风一吹带来一些不好的东西，但运动是健康的，这场文化大革命震动了全国，震动了全世界，但也产生了一些偏差，要及时纠正，对于地主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已经被我们消灭了，但他们的问题可以用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解决。”

说到工作组的问题，陈毅讲：“毛主席说：工作队要保护，不能说工作队全是坏的，坏的是少数，大多数是好的，工作队检查一次两次就行了，通不过也不要再回去了。对工

作队要一分为二，不要揪着不放，外语学院大字报说工作队是老渔霸，革委会是刘新权的私生子，对这个大字报我看不下去，这种尖锐的语言对待敌人还差不多，但对大字报也不能一棍子打死，这样的大字报比外交部的框框少。

毛主席和周总理领导的运动，我怎么能一手遮天，罢官和停职反省不要搞得太多，有的说中层组织都烂了，中央还怎么存在呢？对我们党的一些问题不要悲观，揭发要揭政治问题，不要揭生活、男女关系问题，我过去也爱抠别人的脾气和态度，也因为这个犯过错误。”

8 月下旬，陈伯达患肺炎，发烧至 40 摄氏度，不得不住进北京 301 医院。8 月 30 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江青代理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职务的通知》，正式称江青为“第一副组长”。

8 月 30 日，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副主席兼秘书长叶剑英在军委办公厅三座门紧急召开军委会议，肖华、张爱萍、杨成武、王尚荣、雷英夫等都参加了。叶剑英主持会议，对发生在总参的“825 事件”，他指出作战部长、副部长的做法是错误的。叶剑英说：“杨成武有什么缺点，你们有什么意见可以提，但不允许这么搞。”肖华、张爱萍副总长也讲了话，作战部长、副部长在会上作了自我批评。杨成武也表了态，说：“此事已经解决，过去了，今后注意团结，好好工作。”

8月27日，陶铸给北大校文革聂元梓写信，针对学生们

提出的到外地串联要求，指示说：“派人出去，当然以搞好本单位的运动为前提，这样支援才有力量，才更能起示范作用。”他希望北大“积极搞好本身的革命，创造好的经验”，并说：“如有的同学要去外地点革命之火，自己走了这当然不好……”他一再鼓励北大校文革创造斗批改的“样板”，以作为全国文化大革命的“带头羊”。陶铸办公室还要求将此信“尽速印发，可在《新北大》上刊载，广为分发。”

王任重则指示北大校文革通过开展“大辩论”，减少学生出去串连，以此“考验左派”，并要求加强“组织纪律”。实在不行了，也要做一规定：串连人员不得超过15%至20%。

但是串联风潮一起，根本无法控制，人员纷纷外流，北大一下走了4000多人。王任重无法，说：“有些同学连《十六条》也不相信了。实在要走也没有关系，让他们去窜吧！东窜西窜，窜够了还会回来的。至多把运动推后两周。”并叫筹委会选举校文革，“选完立即转入斗争黑帮。”

8 月 30 日，北京大学文化革命代表大会召开。中央文化革命领导小组副组长王任重出席。聂元梓致开幕词。

在“破四旧”的高潮中，红卫兵和许多青年学生真正做到了“敢想、敢说、敢干、敢造反”，除了对毛泽东的崇拜外，什么都可以不管不顾，都可以大造其反。8月30日这天，北京大学“三角地”又贴出一张震动全校的大字报：《给党中央毛主席国务院的公开信：造三个大反》。大字报要造的

三个大反是：

第一、取缔党团组织形式，代之以革命委员会；

第二、党政合一而为革命委员会；

第三、砸烂从中央到地方的一切办公室。

在这份惊世骇俗的大字报中，他将文化大革命的目标建议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主要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横扫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剥削阶级的上层建筑。"上述造三个大反就是"横扫"上层建筑的一部分。显然，造三个大反中最重要的是"取缔党团组织形式"。取缔的理由是"由于党组织领导政府，对党的各级组织，党外群众又无选举权和各种特殊权利"，所以"他们不受群众监督"。

《公开信》列举了"现行党团组织形式的罪状"有八条：

"一、不利于搞群众运动；

二、实际上没有发动全民搞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

三、容易产生修正主义，便于反党黑帮分子搞阴谋；

四、疏远领导与群众的关系；

五、不利于把毛泽东思想作为一切工作的指导思想；

六、用入党的方式鉴别人、考验人是反毛泽东思想的，是不科学的（意识形态的东西，不能只考验一年半载，而要锻炼一辈子，采用入党的方式鉴别人，容易给投机分子钻空子的机会），总之，这种组织形式不利于人的思想革命化；

七、苏联的教训；

八、有些坏的党组织盗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名义把群众引入歧途。”

他们要造的第二个大反是：“全国的党政合而为革命委员会”。

他们要造的第三个大反是：“砸烂从中央到地方的一切办公室”至于为什么“砸烂”各级办公室，是因为它们脱离群众。《公开信》说：“办公事制度不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工作制度，因为它脱离群众、脱离实际、脱离生产劳动。”

大字报的作者是北京大学东语系缅甸语专业的两名学生：乔兼武原名乔俊礼、杜文革原名杜文中。

这张大字报的作者乔兼武已是第二次扬名燕园了。第一次是在几天前，他贴出大字报倡议成立“工人、贫下中农和革干革军子弟协会”，并在大字报上署名：“十三级干部子弟乔兼武”，这在北大几乎成为笑柄。尽管当时社会上血统论开始盛行，但自报家门“十三级干部子弟”还是让人感到滑稽。当年北大高干子弟多如牛毛，你区区十三级芝麻小官也来炫耀，岂不让人笑掉大牙。占大多数的平民子弟，能进北大也总有一定才智，对夸耀父亲官位的人当然也相当不屑。在乔兼武的这张大字报上，北大学生批满了各种尖刻的评语，极尽取笑和挖苦之能事。

乔兼武第二次在北大文革舞台亮相则让所有的人刮目相看，当即引起了震撼性的轰动。

乔兼武要造的第一个大反是“党团组织”。他认为这是官僚主义、修正主义、投机主义、反党黑帮及至资本主义复辟的温床和根源。

“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这是《毛主席语录》第一页第一段。在文革中被亿万人，从教授到掏粪工，在无数的场合，从家庭会议到百万人的群众大会，都会反复诵读的。就是这样一个被捧作神明的党，乔兼武居然要取缔？这二人的大字报一出来，当即反驳的大字报贴满了北大校园。当天晚上 22 时，北大文革筹委会就在北大五四操场召集北大全校召开了批判斗争大会，约有几千人参加，挑灯夜战，批判乔兼武的反动言行。

大会主持人一开始就要求乔兼武低头，并宣布他为阶级敌人。但仍有不少同学上台发表不同意见。一位东语系的同学上台为乔兼武辩护。他认为乔兼武的大字报是反动的，但乔兼武本人不一定反动。这位同学立刻遭到了围攻，许多人呵斥他，大会主持人还要撕他的红卫兵袖章。他当即表示抗议，退出了会场。许多人也起立表示抗议。在群众的不满情绪影响下，大会主持人对乔兼武的态度渐趋缓和，后来甚至拿了张椅子给乔兼武坐。因为是夏末秋初，又是室外深夜，主持人最后还拿了件衣服让乔兼武披上御寒。“造三个大反”

的大字报并未给他带来太多的麻烦，他仍有自由之身。

## 第173回：乱炮轰，人大政协不办公　逐修女，红卫兵战果辉煌

8月30日这天，全国政协机关根据周恩来指示，宣布自即日起停止活动。许多民主人士主动提出要放弃定息，取消高薪。一些著名民主人士退出了部分薪金，有些人还交出银行存款单。一些有专车的民主人士主动放弃专车，乘公共汽车上班。

对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红卫兵提出："这些'封、资、修'的代表人物，人还在，心不死，必须对他们实行最严厉的革命行动。"结果，除中国民主建国会外，其他所有民主党派在京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约有100余人先后被红卫兵斗争或抄家，占总数的36.5%。其中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有31人，中国民主同盟36人，中国民主促进会有8人，中国农工民主党有8人，九三学社有15人。全国政协有人向文史专员办公室的专员们宣布：溥仪等文史专员一律在机关打扫厕所，搞卫生，老病也不例外。梁漱溟、周作人等人被抄家并挨打，当院焚烧了一些祖传三代的字画书籍。

8月30日上午，"破四旧"开始的第五天，人大"二红"的红卫兵在全国政协副主席茅盾家中的服务员老白的带领下，冲进北京西四头条5号茅盾的家中，为首一人手执一把从张治中家中抄来的日本指挥刀，在茅盾家折腾了一个多小时。

茅盾女儿小曼后来回忆说："有件事，给我的印象特别深。我们家有一只铜质的台灯，灯架是一个裸体女神的塑像，她双手向左右伸出，手上各拿着一个小灯。这本是一件既有实用性又带工艺性的台灯，但抄家时被视为'四旧'。有一次，我回到家里，发现这只台灯上的

裸体女神，忽然穿上了一件连衣裙，感到很好笑。我问了妈妈，她说：‘这是四旧，不让用，丢了又可惜。我特地做了这件衣服给穿着，免得麻烦。’”

8 月 31 日，民国期间新桂系的三巨头之一的黄绍竑，在北京的小雅宝胡同的住宅被抄，本人也被打得奄奄一息。

本来在 1957 年整风大鸣大放时，黄绍竑就因为建议人大常委、政协常委专职专业，认为“兼职本身就是官僚主义”等问题，被民革于 1957 年 11 月 13、14 日连续召开大会批判。出席会议的有民革主席李济深，副主席蔡廷锴、张治中，中常委、中委、候补中委、各部门负责人，民革中央和民革北京市委的全体干部，以及基层组织的干部共 700 多人。先是黄绍竑自己做检查。然后，与会众人发言批判。

民革主席李济深说：“大量事实证明，黄绍竑是有纲领、有计划进行阴谋活动的右派头子。他的纲领，旨在推翻共产党的领导，推翻人民民主专政，破坏民族团结，推翻社会主义制度。黄绍竑为了实现他的反动纲领，勾结败类有计划地进行阴谋活动。他首先到处为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刑事犯罪分子撑腰，为抗拒改造的地主富农分子说话，并且煽动少数反动学生为他摇旗呐喊。黄绍竑又和广东右派分子罗翼群，在肃反问题和农民问题上向共产党和人民进攻，北呼南应。企图把人民的天下搞乱，使反革命分子复辟。摆在黄绍竑面前的只有两条路：彻底交代，接受改造，重新做人，这是一条光明的路；拒不交代，抗拒改造，这是一条死路，何去何从，由他自己选择。”

覃异之说：“在中共中央统战部和全国政协酝酿成立广西僮族自

治区的时候，黄绍竑表示坚决反对。最初黄绍竑企图一笔抹杀广西六百多万僮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的存在，当他这个阴谋被拆穿以后，又想了种种理由来阻挠自治区的成立。黄绍竑过去是骑在广西人民头上的桂系军阀，如果黄绍竑在民族问题上的阴谋得逞，我们的国家就会回到各民族互相仇视、互相残杀的老路上去。”

邵力子说：“黄绍竑有意借平乐事件夸大缺点，混淆听闻，离间人民和政府的关系。当政府毫不姑息给予犯了错误的人以严格的处分以后，黄绍竑还想利用这一事件大做文章。黄绍竑曾经说，行政处分不够，还要给法律处分，言外之意，就是要杀一批干部。黄绍竑在这个问题上完全是别有用心的。我们要质问黄绍竑，你过去长期骑在人民头上，罪恶严重，直接或间接屠杀人民和革命干部数以千计，至于因饿、因冻、因灾致死的，更不知凡几，这一笔账应该怎么算？你应当受什么处分？你曾经扪心自问过吗？”

卫立煌说：“黄绍竑借平乐事件，恶毒地诬蔑政府是‘宣扬成绩，掩盖错误’，是企图抹煞新中国在各方面的伟大成就，以达到动摇革命运动的成果，阴谋反动统治者复辟。”

张治中说：“今天，黄绍竑把过去的反动立场原封不动地搬到新社会来，他仇恨新社会的一切成就。黄绍竑必须改变反动的阶级立场，才能认清自己的罪行，彻底交代。要改变立场，首先就必须铲除反动的历史根源和思想根源，就是说要否定罪恶的过去，才能认识现在、肯定现在，才能由反动的立场转变到人民立场上来。我们都是从旧社会、从国民党反动统治政权来的人，想想看，国民党反动统治时期，

所作所为那一件不是腐败的、反动的、罪恶的、祸国殃民的，还有丝毫值得留恋的价值吗？譬如人民生活、民主、建设、外交没有为人民为国家做过一件好事。黄绍竑你在浙江、广西为人民为国家做了些什么好事呢？什么也没有做，相反的，罪恶重重，这样罪恶的过去，为什么不能否定了呢？”

焦实斋说：“黄绍竑企图从根本上否定人民民主法制。他认为我们的国家‘无法可依’。解放八年来到今年 9 月底为止，我们国家制定了各种法律 4072 件。这些法律在国家生活中起了巨大作用。而黄绍竑身为人大常委，参加了我们的立法工作，却有意诬蔑我们‘无法可依’。这显然可以看出，黄绍竑所需要的法是保护反革命分子的法，是反对社会主义的法。”

1958 年 2 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开幕前一天，即 1 月 31 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向大会提出了《关于罢免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民族委员会法案委员会和国防委员会中的右派分子黄绍竑等十人的职务的建议》。黄绍竑绝望之下两次服安眠药自杀未果。

谁知在文革开始后的 8 月 31 日，家又被抄，而且存款现金全被抄走。老公务员告诉他，家中连开伙的钱都没有了。黄绍竑让老公务员到政协请求预支一点薪水，此时的政协早已“歇业”，正积极投身于大革命热潮中的政协工作人员把前来预支薪水的老公务员训斥了一顿后令其离开，黄绍竑的薪水没有领到。

当天下午，黄绍竑来到西总布胡同 5 号看望李宗仁，面露惊慌之

色。在座的程思远对黄绍竑说："看来你有心事。"黄绍竑说："我不为自己打算，我担心的是德公。"

黄绍竑回家后，老公务员向他诉说预支薪水经过。黄绍竑听后没有再说什么，上楼用剃刀割颈身亡，终年 71 岁。

黄绍竑自杀后，同他住在一起的寡妹，人称"黄姑太"被康有为的次女、年近九旬的康同璧母女接到家中，解衣推食，直到政协在西黄城根给了"黄姑太"一间平房，才搬离康家。

北伐、抗战时的名将、全国政协常委黄琪翔也被抄家，夫人郭秀仪被打伤，手落下残疾。昔日"云南王"龙云在北京和昆明的家都被抄了，当时龙太太不在北京，她家的一位老公务员指着一些东西对红卫兵说是公家的，才算是给龙家保全了一部分财物。

中央文史馆副馆长、国画院院长叶恭绰曾是北洋旧交通系魁首，后又追随孙中山先生。此时已是半盲之八旬老人，老妻腿已残废，听到抄家的风声，老先生孤立无助，急中生智，将毛泽东当年给他的亲笔信装入镜框，高悬于客厅，红卫兵闯入后，见到"最高指示"，唯唯而退，两老算是幸免于难。

而康有为的次女、年近九旬康同璧先生则被红卫兵以墨涂面批斗，家也被抄，当时极为罕见的冰箱也被搬走。

大收藏家张伯驹、张效彬、关祖章等人的平生心血所聚，也都被整卡车地抄走。9 月 4 日，冯玉祥连襟、民革中央常委，北京市政协副主席余心清在他家的后院上吊自杀。

北京东四闹市区附近前厂胡同的一个院落里，住着四位前国民党

的高级将领，他们是：

唐生明，湖南东安人，唐生智的胞弟，黄埔四期出身，国民党中将，1956 年从香港起义归来。唐的夫人徐来是解放前的著名影星，有“标准美人”之称，曾主演过《渔家女》等影片。

郑庭笈，海南文昌人，郑介民的堂弟，黄埔五期出身，国民党中将军长。1959 年 12 月特赦后与家人团聚，举家搬进了古老的四合院。

宋希濂，湖南湘乡人，黄埔一期出身，原国民党中将副司令长官兼兵团司令。1959 年 12 月特赦后，经侯镜如夫妇介绍，与易吟先女士结婚，搬进该院中安度晚年。

杜聿明，陕西榆林人，黄埔一期出身，国民党中将副司令长官。1959 年 12 月特赦后，其夫人曹秀清从美国绕道瑞士返回北京，与杜聿明团聚，并决定在此长期定居。

在中国现代史的风风雨雨中，这四个人的身影颇为引人注目。他们经历了太多的沉与浮，现在的职务有的是全国政协委员，有的是全国政协文史专员，开会，学习，撰写史料，成了他们后半生的主要事情。四个人在同一个单位，同一个办公室上班，由政协按月发给工资。工作学习之余，他们在院子里栽栽花，种几株果树，体味着昔日军戎生涯中难以体味到的清静和幽雅，日子过得也还算有些韵味。

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再一次打破了他们的宁静。

从 5 月起，政治风声便越来越紧，他们心上那根无形的弦也就越绷越紧。各种小道消息使他们忐忑不安，他们唯一能做的事情是上班到机关埋头看报，下班后各自回家，关上门，决不多说一句话。

“破四旧”了，终于，有一天下班后，他们看见大院的门口贴着一张红卫兵的《通令》：

“国民党残渣余孽、牛鬼蛇神们：

你们听着——

1、勒令你们自动减低工资，过与劳动人民同等的生活。

2、勒令你们不许雇用保姆，禁止再过寄生虫生活。

3、勒令你们从明天起，分工负责清扫前厂胡同，不得有误。”

下面的落款是“某某中学红卫兵。1966 年 8 月 26 日。”

看过白纸黑字的《通令》后，杜聿明、宋希濂、郑庭笈共商对策，决定立即答复红卫兵。

于是，由宋希濂执笔，匆匆成文：

“诚恳接受红卫兵小将的监督和改造！

1、每月工资已从本月起由政协机关扣除，减低工资，与劳动人民过同等生活是应该的。

2、我们没有雇用保姆。今后也不会再雇。过寄生虫生活是可耻的。

3、从明天起，保证把分配给我们的胡同地段打扫得干干净净。另外还有什么活，只要我们能做的，还可以多干一些。”

下面的落款是“杜聿明、宋希濂、郑庭笈。”

唐生明单独另写一张，以示起义将领与特赦人员有所区别。

他们的条文贴出后的当天下午，8 月 27 日，一支 20 多人的红卫兵小分队开进了前厂胡同。红卫兵命令杜聿明、宋希濂、郑庭笈和唐

生明一字排开，在大院中央站着。一个高个头的红卫兵头头发令，让四个人自报家门。

杜聿明、宋希濂、郑庭笈都如实作答，再次恳请红卫兵小将监督改造。唐生明在自报家门时，多说了一句自己是起义人员，共产党、毛主席有政策。高个头红卫兵冷笑一声，走到唐生明跟前，用右手戳戳唐的肚皮："什么起义不起义，瞧你这大肚皮，吸了劳动人民多少血汗！都是一丘之貉，只许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

话毕，高个头红卫兵宣布道："你们都是血债累累的国民党战犯，对你们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是合情合理的。如果你们胆敢有任何捣乱行为，都将自取灭亡！"

在红卫兵训话期间，四位前国民党高级将领一个个提心吊胆，连大气都不敢出，低着头，静静地听着。红卫兵宣布完毕，院子里响起一阵口号声：

"无产阶级专政万岁！"

"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

虽然"就叫他灭亡"里的他指的是他们四人，可他们四人不能不跟着喊口号。红卫兵喊完口号，排着队，雄赳赳地走了。四个将军互相望一眼，默默无语地回到了各自的房间。

第二天清晨，杜聿明、宋希濂、郑庭笈和唐生明四人各执一把扫帚，分段打扫胡同。他们商定，如果白天发现胡同太脏，还可随时补扫。几天后的一个中午，清洁工人在运送垃圾时沿胡同撒了些脏土，他们更是相约着再次打扫。正扫着，一个上了年纪的居委会主任走过

来说："你们一天清扫一次就可以了，这胡同一天到晚不知多少人走过，还能保证一点不脏？你们也是上了年纪的人，我看一天就不必打扫几次了。"

这几句话，让他们感动得不知该说什么好。

话听在心里，胡同仍得天天打扫。红卫兵总部经常派人来查看，可能是对战犯们的表现还满意，也就没有再发布新的勒令。不久，大串连开始，红卫兵忙于到全国各地去串连，点燃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便再也没有光顾前厂胡同中的这个四合院了。

但是，他们四人仍然自觉地坚持打扫。

直到 1966 年国庆节，他们突然接到天安门观礼的请柬，并安排小汽车接送，这颇为让人感到意外。文化大革命前，每年国庆节也这样上观礼台，但今年形势不同，能上观礼台，意味着他们的前途还不至于会太危险。如同密集的乌云中透出一丝阳光，他们看到了一点希望。那几天，他们每家都杀鸡剁肉，聊天喝酒，个个喜笑颜开，以示庆贺。

这一年的国庆节在欢快中度过了。

10 月 2 日清晨，他们四个人依然扛着扫帚，到胡同中扫地。在门口，那位居委会主任把他们拦住了，她说："居委会已作了研究，认为一面到天安门观礼，一面又被勒令到胡同里扫地，是不合适的。我特地来通知你们，从今天起，再也用不着天天扫地了。"

四位将军颇为感动。他们仍然坚持扫最后一次地。

8 月 31 日这天，北京市公安人员和红卫兵押送玛利亚方济格修

女会 8 位罗马修女到机场，驱逐出境。

北京玛利亚方济格修女会被取缔，修女被批斗

到 8 月 31 日这一天为止，北京红卫兵“破四旧”获得辉煌战果：打死 1772 人，抄了 33695 家，将 85198 名有“问题”的人赶出北京；他们收缴黄金 103131 两，白银 345212 两，现金 55459919 元，文物玉器 13618 件；早在 1958 年的时候，北京进行在第 1 次文物普查中确定了 6843 处古迹，文革中共捣毁 4922 处，绝大多数毁于此时。

在此期间，西藏日喀则扎什伦布寺历世班禅的肉身，连同祀殿、佛像、佛塔、佛经全部被毁坏。

南昌市的万寿宫、万历牌坊、娄纪墓等一大批文物古迹被毁或遭严重破坏。

张家口四中初三的数十名学生，砸毁有数百年历史的云泉寺、老君殿、观音殿、罗王殿等古迹。

安徽滁县琅琊寺内佛像全部被砸烂，近百块题字匾额被烧毁，醉

翁亭内欧阳修、苏轼的《醉翁亭记》碑刻被凿坏。

浙江绍兴大禹庙的大禹塑像被毁坏。

8 月下旬，北京抗大分校（原 101 中学）“毛泽东主义红卫兵”，“井冈山之火战斗队”发出《勒令》：

一、黑五类分子，资本家老爷，太太资产阶级狗崽子严禁吸烟，喝酒，不许买烟买酒，如若出现烟酒者，抓住决不轻饶，如烟酒店对这批混蛋不加干涉，我们就造你们的反！

二、三十五岁以下的吸烟吃酒者，你们从此戒烟戒酒，和旧社会的旧习惯决裂，树社会主义的新风尚，否则就会成为修正主义分子！

三、未学会吸烟吃酒者，绝对不许沾烟酒边，哪个小崽子学，哪个流氓混蛋敢顽抗，我们抓住决不容许，严加处理。

我们的许多敬爱的老前辈，日夜为人民操劳，工作繁忙，他们吸烟完全合理，应该，任何人不许干涉，不许乘戒烟戒酒之时，污蔑革命的老前辈。

8 月下旬，抗大第一无线电工校（原北京无线电工业学校）发出《通告全市》，废除三轮客运自行车业务。

第174回：八三一，毛泽东再次接见　审《通知》，要保护重点部门

在各地进京红卫兵的强烈要求下，8 月 31 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第二次接见 50 万红卫兵。第一次接见时，在天安门广场的红卫兵反映“看不清毛主席”，要求改进接见方法。周恩来决定，这次请毛泽东先乘敞篷车接见在广场和长安大街上的红卫兵，尔后登上天安门城楼，检阅、接见通过天安门的红卫兵。

17 时 40 分，杨勇、廖汉生、傅崇碧、吴德、周荣鑫、于桑乘着汽车作为前导驶入天安门广场，紧随其后的第一辆敞篷汽车上是毛泽东、林彪、贺龙，由谢富治、杨成武陪同，紧跟着是周恩来、陶铸、聂荣臻、江青乘坐第二辆汽车，邓小平、康生、刘少奇、陈毅乘坐的第三辆汽车，朱德、李富春、陈云、董必武乘坐的第四辆汽车，叶剑英、肖华、王任重、刘志坚、张春桥乘坐的第五辆汽车鱼贯驶入天安门广场，来到了红卫兵和师生中间。这时，广场上激起无比欢腾的巨浪，人人纵情欢呼、跳跃，“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的欢呼声响彻整个广场上空。

1966 年 8 月 31 日毛泽东、林彪在天安门广场检阅红卫兵

毛泽东乘坐的汽车在广场上缓缓绕行，毛泽东不时向人群招手致意。原本席地而坐的红卫兵们见到毛泽东，一下子蹦了起来，手中挥

舞着《毛主席语录》，欢呼着“毛主席万岁！”

后面的红卫兵为了更真切地看到毛泽东，拼命地往起跳，往前拥挤。人们都想让车子走得慢一点儿，多看一眼毛主席。担任警卫的部队手挽着手，组成一道墙，竭力顶住人潮，维持汽车的通道。

这时，长春二中一位名叫王刚的学生也在广场的一个方块阵中。当伟大领袖的敞篷吉普车驶到离他那个方阵只有四、五米的距离时，他突然扑向前面的解放军警戒线。紧接着，后面几个红卫兵也跟了上来。秩序一下就乱了。

战士们拉了这个，跑了那个。王刚拼命挣脱了一个紧抱住他的战士，一个趔趄跌向毛泽东乘坐的车前。

车停了，王刚的双手正扶在那辆崭新的红旗轿车的右前灯上。他抬起头来，目不转睛地望着“心中的红太阳”，那一刻如同印在他脑海中的照片，至今难以忘怀。

王刚上小学时曾给毛泽东写过一封信，此时此刻，他真想向毛泽东汇报关于自己的一切，真想对他讲：“我小时候曾给您写过信呢！还邮了我的照片！党中央还回过信呢！这您一定知道……”

他渴望这幸福能够多延长一些时间，他期盼毛泽东他老人家能再看他一眼，他更奢望能面对面地聆听“最高指示”……

没容王刚多想，一只手拽住了他的后脖领子，死命地往后拉，他终于跌坐在警戒线的后面，头撞在一根灯柱上。

等他的满眼金花散尽，这才看清身边的一面红旗上写着：山东师范学院红卫兵。

这些今后要“为人师表”的大哥哥大姐姐们似乎比王刚更具有革命朝气和造反精神，尽管解放军战士拼命地拉扯，他们仍有不少拥在毛泽东座车的周围，有节奏地高喊着“毛主席万岁”……

上千名红卫兵冲破几道警卫线，涌到毛泽东乘坐的汽车跟前，像洪水一样将汽车团团围住。

车队只好停下，红卫兵小将们不顾一切地把手伸向毛泽东，喊着：“主席好，主席好！”

毛泽东也向这些极度亢奋的年轻人伸出热情的大手，一一握过去。

站在毛泽东左边的林彪对毛泽东说：“主席，请你坐下。”

毛泽东没动。

贺龙也说：“请主席坐下。”

他还是没动。

紧随其后的周恩来从车上跳下来，冲到毛泽东的车后，大声说：“红卫兵小将们，同学们，请散开，请注意主席的安全……”

一群带着“西纠”袖章的学生解下皮带，当着毛泽东的面抽打轰赶挤上来的学生。毛泽东看了很不高兴。

江青对着话筒说：“请同志们保护首长的安全……”

天安门城楼上也看见了这边的形势，很快，天安门城门里跑步出来一队解放军，奋力推开拥挤的人群，开辟出通道。接着又来了几辆北京吉普，把毛泽东等人接走了。

毛泽东的车队绕场一周以后，在《东方红》乐曲声中，登上天安门城楼。这次被邀登上天安门城楼的有300多个来自全国各地和北京的红卫兵。

此时，还有不少红卫兵和“西纠”的学生，在天安门底下嚷嚷着要“揪黑手”，说“卫戍区的有关人员失职，把毛主席困在金水桥上了”。现场很乱。陈小鲁正在天安门城楼上，他赶紧下去做工作，事态渐渐平息下来。

由于陈伯达生病，这次接见大会由代理“文革”组长江青主持。18时40分，她宣布大会开始。她首先代表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向大家问好。她说：“我们热烈地欢迎你们，向你们致革命的敬礼！”

林彪戴着“首都红卫兵西城区纠察队” 的黑字红卫兵袖章发表讲话，他强调说：“打击的重点，是钻进党内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一定要掌握这个斗争的大方向！”

周恩来作为“西城纠察队”顾问，在讲话中说：“要学习解放军的三八作风，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保护群众利益，保卫国家财产，造成社会主义新风气……在斗争中，要用文斗，不要武斗……现在，全国各地的同学到北京来交流经验，北京的同学也到全国各地去进行革命串联，我们认为，这是一种很好的事情，我们支持你们。中央决定，全国各地的大学生全部和中学生一部分代表，可以分期分批地到北京来。”

这次检阅红卫兵，通知戏剧专科学校徐雅雅去领喊口号。天安门广场，一个万众欢呼的红色海洋，红旗、红袖章、红语录本……在阳光下闪耀着、翻腾着。徐雅雅回忆说，当时令她最为激动的是，每当她喊口号的声音刚一落下，那片红色的海洋里就会随之响起山呼海啸般的回声。徐雅雅是女中音，声音不算很高，她喊“毛主席万岁”这句口号，很脆地把声音提到顶，尾音拖得长长的，然后慢慢往下滑：“毛——主席万万岁——！”那天，她的弟妹们正好也在广场上，听见了姐姐的声音，激动地涌出了泪花。

徐雅雅本人在回顾这段历史时说：“我们清醒，却又糊涂，我们造反，却又盲从。我们从来没有怀疑过毛泽东、毛泽东思想，只要是毛泽东说过的，指示过的，甚至暗示过的，我们都会为之肝脑涂地。从我们一出生，父母、学校、社会、党就是这样教导我们的。不，从我们的父母一代就接受过这样的教育，他们以遗传基因的方式，将这些教育注入我们的血肉与生命。生活不容许我们有一丝一毫的怀疑，

如果有一点这种念头，那也可怕得如同叛逆。当我们突然意识到我们错了时，我们的痛苦比别人深重一百倍。生活，永远，永远没错；真理，依然是真理！错就错在我们的生存时代，为我们的生存，安排好了错误。”

8 月 31 日毛泽东接见红卫兵时，周恩来亲自安排了检阅车辆，毛泽东与林彪、贺龙为第一车。在安排检阅的照片登报时，为了突出林彪，周恩来想出了林彪是“毛主席的亲密战友”一词，从此，“亲密战友”一词为报刊广播广为使用，在中国大地流传开来。

那天，北京红卫兵“一司”负责人汪延群和刘克府在天安门城楼上当面邀请贺龙元帅担任“一司”的司令，贺龙元帅愉快地接受了邀请，他高兴地说：“你们是毛主席的小红卫兵，我是毛主席的老红卫兵。”

“一司”还邀请陶铸同志担任“一司”的政委，陶铸也愉快地同意了。

中央让“一司”出个代表在大会上讲话。“一司”专门召开会议，一致推选刘克府代表“一司”在大会上发言，并为他起草了讲稿。距离大会开始还有两个小时，江青接到北航的匿名信，说刘克府反对江青。于是，江青要求将刘克府换下，由其他人代表“一司”发言。就这样，临时决定由林辉来代替刘克府发言。“一司”代表林辉，在大会上发言非常出色。“一司”名声大振，迅速传遍大江南北。“一司”进入了巅峰时期，人数达到 7 万多人。

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见到陈毅，挽着他的胳膊照了相,然后握着

陈毅的手说："陈老总,我保你!"

陈毅给毛泽东敬了军礼说："请主席放心,我能过关,我是共产党员,我靠我的工作,能取得群众的信任。"

原国民党高级将领，解放后在纺织工业部任部长的蒋光鼐，由于家住深宅大院，红卫兵认定里边有四旧的东西，在一天内几次去蒋家抄查。后来红卫兵干脆住在蒋家，监视这家人的"反动行为"。此事周恩来知道后，通知蒋光鼐务必在 8 月 31 日毛泽东第二次接见红卫兵时，上天安门城楼陪同接见。

在天安门城楼上，周恩来特意问蒋光鼐："红卫兵去过你家了？"

蒋光鼐忙回答："还文明，还文明。"

于是，那些住在蒋光鼐家的红卫兵赶紧撤离了蒋家。

叶剑英在天安门城楼上看见"西纠"的负责人孔丹，对他说："你们红卫兵不能这么打人，把刘诗昆的胳膊都打断了，人家是弹钢琴的嘛，你们怎么这么过分？"

刘诗昆是叶剑英的女婿。

孔丹跟叶剑英说："我们成立纠察队了，要制止乱打人的现象。"

叶剑英说："好啊，我支持你们。有什么事，你们找我。"

孔丹的母亲，时任总理办公室副主任、国务院副秘书长的许明将此事报告给了周恩来。周恩来说："这事不能找叶帅，应该是我做的事。"

于是，"西纠"的住房、电话、交通工具和印刷设施，甚至还包

括红卫兵冬夜值班所需要的军大衣等相关费用，都由国务院提供。具体由国务院秘书长周荣鑫承办。

入夜，天安门城楼和广场周围的建筑物上灯火辉煌。毛泽东在群众的欢呼声中走向天安门城楼东西两头，再一次向群众挥手致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声，震荡着首都的夜空。

这次接见历时约 6 小时。

8 月 30 日，陶铸向周恩来报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文化大革命中一些具体问题的通知稿》。这是陶铸根据周恩来的意见组织人起草的。

8 月 31 日，周恩来审阅了这份《通知稿》。

《通知稿》主要内容是：

一、在运动中，对于党和国家的要害、机密部门和单位，必须坚决进行保护。并列出要害、机密部门和单位有：军队、军事机关、公安机关、外事部门，中央和各省市、自治区广播电台、电视台、新华社、电讯部门和各级党政机关的电台、机要部门，中央和各地档案部门、航空场站、铁路枢纽、站段、港务局、码头、水电站、大电厂、变电站、尖端企业和尖端科研部门，科学研究机构和科学技术资料部门，中央和各地的银行、仓库、外贸机关，城市重要公用事业机关（自来水公司、公共汽车公司等），周恩来审阅时又增加了《人民日报》社、《解放军报》社、《红旗》杂志社。

二、对上述部门和单位，如发现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破坏，必须依法处理。

三、重要档案应加以封存。

四、此通知发至县团级，内部掌握，不对外公布。

周恩来在这份《通知稿》上批道："提议照发，请主席、林彪、康生、富春、江青核阅，退汪东兴办。"

## 第175回：座谈会，组织红卫兵串联　开杀戒，大兴县血雨腥风

8月31日，周恩来召集北京市红卫兵代表开座谈会。在会上，他说：

“今天开会的目的是进一步把红卫兵组织起来。将要派出一部分红卫兵到全国各地帮助搞文化大革命，交流经验；还要组织各地学生来京学习，交流经验。大学生全部、中学生的代表来京，首先是组织工作，第二是动员工作。红卫兵要大学解放军，因为红卫兵是解放军的后备军，毛主席是红卫兵的最高统帅，林彪同志是副统帅，党和国家也是这样。”

周恩来为红卫兵联络站明确了三大任务：“红卫兵是以红五类为主体的。联络总站已成立，它有三大任务：即：支援服务，爱护保护，宣传解释，是为你们服务的。现希望你们要把组织搞好，不致被少数坏分子钻进来，做坏事，做不好的事。”

对北京“一司”，周恩来说：“有些大专学校在学校之间联合成立了大专学校红卫兵总部，还有些没联合起来。你们还要成立一个首都红卫兵总部，有几十个学校。第一司令部成立时，我派人去参加了。这一次也要派人去参加，支持你们是一视同仁的，如出现第三个组织也给予支持。”

对出身不好的学生能否加入红卫兵，周恩来说：“即使出身不好，只要背叛原来阶级，表现又好，也可以参加红卫兵组织，因为出身自己是不能选择的，但要以红五类为主体。”

周恩来特别提到了政策问题，他说：

“有的红卫兵的行动对生产不利，与他们对立起来。老工人的思想落后，可以说服。我们既要革命，又要生产，你们要照顾到这一点，不能停止生产，服务行业也不能够停。否则吃什么？用什么？到工厂去可以找工厂革委会，不要到车间去，这样大多数人才能站在你们这边，各方面才能支持你们。要与公安部门配合好，团结好，因为公安机关是我们专政的工具。”

“关于地、富、反、坏、右，不是一般出身不好的黑五类都打击。我们说的是那些暗藏的在城里捣乱的。一般在城里已经落户的不需要马上赶走他们，如果逃亡地主有血债或有现行反革命活动的坏分子应当回去，要查有实据。”

“对资产阶级批判的是资产阶级的思想体系和违法行为。如他们守法就不要打倒、抄家，批判他们的威风，他们的威风要打倒。有的未做破坏活动，还有选举权，就不要打倒。取消定息是个好建议，但要经中央讨论，主席批准，人民代表大会讨论。你们可以号召他们不领定息，已领的退回去也不好，因为这是合法的。对知名人士贴大字报还是文明的，如民主人士年纪大了。你们一天去几次，他们就受不了。是否应该去，要商量一下。如果打，搜查，那就是法律制裁问题了，下边还要讲这个问题。

关于小商贩你们建议变国营的问题，几百万小商贩全部包下来，国家负担很大，发工资、劳保福利、公费医疗等，什么都享受，他们是高兴的。他们还贪污盗窃，我们采取给他们一定的利润，他们自己经营，让他们自销自售。公开的好办，暗藏的不好办，你们可能说我

们搞暗藏的，你们那么神通广大呀！你们那么消息灵通吗？

有些家庭出身很好，如一个红卫兵的父亲老干部，母亲出身是地主，外婆住在他家，是地主婆，你们去了就打，这就不好。这样你们在座的许多红卫兵，自己就要保自己了。但像罗瑞卿的岳母有血债，住在北京，被你们赶走了，这很好。你们的老祖母有的就是地主家庭，不是因为我是封建家庭出身就进行辩护，毫无此意。我的父亲是小职员，每月工资没超过30元，按党的政策我应是职员出身，我的祖父是县知事，我入党时就填了封建家庭出身，现在为什么要改？”

周恩来特别提到了宋庆龄等民主人士的问题：“对一些知名人士超过大字报的范围就要研究。你们从人家家里搜出花名册子，这些小册子无非是通讯地址，就按此追踪。这些人是在我们国家有地位的人。对待有地位的人是否都去搜查？如宋庆龄是孙中山的夫人，孙中山在历史上有功绩。毛主席在解放北京后写的头一篇文章《论人民民主专政》中写了孙中山的功绩，1924年和我们合作，他的功绩在纪念碑上也有。南京的同学一定要搞掉孙中山的铜像，这不好，地方不合适换个地方嘛！搞掉就是不听毛主席的话了。天安门对面在‘五一’、‘十一’放孙中山的像是主席决定的。他有对的有错误的，因为他是资产阶级革命家，他的夫人从合作以后，从来没有投降蒋介石。大革命失败后，她到外国，也营救过我们地下工作的同志，抗日战争时期和我们合作，解放战争初期也同情我们。她不是当权派，长期和我们革命合作，她对共产党的合作是始终如一，我们应当尊重她，到她家贴大字报不合适。有人说她生活资产阶级化，她本来就是资产阶级革命者

嘛！她兄弟三人，姐妹三人就出了一个革命的凤凰，不能因为妹妹是蒋介石的老婆就打倒她。她的房子是国家拨给她的，有些东西摆在那里也不能打碎，不能用还可以出口。你们说大会堂语录少，我们不是接受了吗？宋庆龄的地方不能去，有人说：我敢说、敢闯、就要去。我们无论如何要劝阻你们，因为她年纪大了，今年还要纪念孙中山诞生一百周年，她出来写文章对世界的影响很大，她还在政府工作。你们去搜查，最好请解放军、派出所三方面商量，不要单靠一方面，当然也尊重你们的决定，因为派出所的材料也不一定可靠，解放军是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比你们靠个人调查的要全面一些。要考虑哪家应去，哪家不应去。

打击流氓的面太宽，年青的娃娃，有些小流氓行为，有的只有点偷窃。如8月13日审判流氓的会就是错误的，是北京市委批准的。”

对打人的现象，他说：“过去我们俘虏敌人也没打过。领导同志说了要文斗不要武斗，你们说：‘打几个壮壮声势’，这反而失去了群众的信任，打失了手还能打死人。他如果搞反革命暴动，我们还可以用解放军、警察镇压他，在我们专政的情况下，何必用武斗？”

“确实要搜查的，要经过充分的调查研究，不然听到一个情况紧跟就去，不可靠。如西城区听说有地下军，去了几千人，但不知道在什么地方，大家的热情可嘉，如果消息不灵，大家搞的非常紧张，这样搞久了会使领导失去信用。所以搜查暗藏的，逃亡的地、富、反、坏、右和反动的资本家时，徒手的解放军、警察远远跟着帮助你们，这是从女15中的同学被那个反动资本家行凶砍伤后我想到的。是否要

没收他们的金钱、东西？要事先和派出所，卫戍区研究。你们把钱交到银行，把浮财交财政局。他们也没有写什么东西给你们，交给银行也没有收条，你们自己也没有登记，你们是要小心，搞久了就要损害国家财富，将来他不承认了，财政局有人贪污了怎么办？不能光凭热情，还要有组织。一般不没收财富、存款，只登记，以后再研究是否应该没收，这样就不至于弄错了。今后要建立秩序，不然有个别钻进来的坏分子，私自拿走了照相机、手表，即使查出来开除他，影响也不好。我们是解放军的后备力量，要有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交了东西要有登记、有收条。发现武器可以没收，但不要只听一个消息，‘谁有一把菜刀要报复’，就把他的菜刀也没收了，过几天还是要还给他去做菜。戴高帽子越加越重，有20斤重的铁帽子，这就变成体罚了，对同学要讲清道理。”

“最后，凡是国家要害部门，首脑机关，我们要保护，如党中央、大会堂、解放军、公安部门（坏的可以改组），专政工具不能瘫痪。交通警察维持秩序，我们要听他的，不要影响他们执行任务，这要保证正常安全。广播电台、新华社等宣传机构，不能随便乱搞，当然有领导人坏的，就撤换，因为不仅国内，国际影响也很大，与学校广播不同。还有机关重要档案，如机关瘫痪了，由上级机关取走，不能随便去弄乱了。”

“我今天讲的目的是要把红卫兵组织起来，把政策好好学习一下，出发到各地方去，8月份出去的没很好组织学习，因此与当地的工人、同学、地方党发生争执。他们主张打人，而且要用皮带打，也有带小

刀子出去的，就引起武斗，当地党委不好说话，多数派服了，少数派不服。这次大专学生到全国各地出去多少，真正组织起来就有纪律有组织性了，当然在斗争中锻炼，总部你们礼拜六成立，不在这两个组织的大专学校也可以派些人，中学的各校自己提出来也可以，没有到会的转告，临走时我们和你们见个面，不仅红卫兵，各种组织，不参加红卫兵的也可以出去，9月5日以前先要把外地来的30万人送回去，才能出发。”

从 8 月 27 日到 9 月初，北京郊县掀起打杀“黑五类”分子的狂潮，最严重的是昌平县和大兴县。

8 月 27 日，昌平县公安系统传达谢富治前一天在北京市公安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强调“民警要站在红卫兵一边”，要“把‘黑五类’分子的情况介绍给他们”。有的民警就向红卫兵组织介绍了当地“黑五类”分子的情况，同时也讲了谢富治“打死人我们根本管不着”的讲话精神。于是昌平县开始行动了，由最初的打杀“表现不好”的“黑五类”分子，发展到消灭一般的“黑五类”分子，直至乱杀家属。十几天时间，全县 24 个公社就有 14 个公社打死人，总共打死 327 人。骇人听闻的事情发生在中越公社和黑山寨公社。

8 月 27 日，中越公社派出所负责人召集公社副主任、武装部副部长、派出所民警和红卫兵负责人开会，布置“扫四旧”。会上宣读并印发了“西城纠察队”“以血偿血、以命抵命”的传单，决定全公社统一行动。当晚，燕丹砖厂声言有人搞反革命暴动，打死 4 人。派出所负责人赶赴现场表示支持，并说：“现在公安局打破旧框框，群

众说了算，群众要怎么办就怎么办。”

28 日、30 日，公社两次召开电话会议，逐村公布打死人的数字，宣称“‘破四旧’进展顺利，打死‘黑五类’大快人心”。

会上，回龙观因行动不力受到了批评。于是会后连夜打死 30 余人。到 9 月 6 日为止，全公社共打死 144 人。

闻听中越公社打杀“黑五类”，黑山寨公社公安员分别到黑山寨、辛庄两村和黑山寨中学游说，说“红卫兵打坏人没事”，“中越公社一个砖厂一夜就打死十几个人。”8 月 29 日晚，黑山寨大队在中学操场打死“四类”分子 2 人。有教师问：“这样做符合政策吗？”公安员答：“怎么不符合？对地富可以武斗，这就是当前的政策。”同一天，经公安员批准，辛庄大队打死 9 人。随后打杀之风蔓延到望宝川、南庄、北庄等大队。打杀中提出了“斩草除根，留女不留男”的口号，因此几个月大的男婴也被打死，妇女则被逼改嫁他乡。到 9 月 4 日止，全公社共打死 67 人，其中未成年的孩子 18 人。

大兴县的打杀“黑五类”也是从传达谢富治的讲话开始的。县公安局根据谢富治的讲话精神和市局“支持红卫兵，保卫红卫兵”的指示，在局务会议上决定，由治安科张副科长负责联系红卫兵。

8 月 26 日下午，张副科长在县公安局召开会议，参加者有河北农大园林化分校、黄村中学的红卫兵负责人和黄村镇镇长、黄村派出所民警等共 9 人。会上张副科长介绍了 27 家“四类”分子的情况，并分析了人都在家怎么办？家里没人怎么办？家里有人外边还有人怎么办？成立了指挥部，设在黄村派出所，划分了战斗组。具体分工

是：黄村中学包一、二、三街和高米店，林校包二、三、四街，定于27日下午15时统一行动。

红卫兵问："如果被抄户有东西弄不出来，打他行不行？"

张副科长说："在气愤之下，打两下也没什么。"

红卫兵又问："打死怎么办？"

答："打死就打死吧！"

8月27日下午，黄村开始"破四旧"，当天就打死2人。

同一天，黄村派出所指导员和公社武装部干部联合召开黄村公社各大队治保主任、民兵连长会议，指导员在会上说："'四类'分子不老实，打死就埋。要狠批、狠斗、狠打，打死也就打死了，先下手为强。"

29日，黄村公社"文革"小组组织四个大队的红卫兵去李庄子大队打杀"四类"分子，公社管委会主任则亲自去东磁各庄大队点火。

杀人风也蔓延到芦城和天堂河公社。仅天堂河公社新立村大队就打死了53人。

8月30日，天堂河公社马村大队治保主任又将全队"四类"分子及子女100多人集中关起来，设男老、男壮、妇女、儿童四个监狱。村大队书记李恩元率十几人在大队部审问，随提随审，随杀随埋，一条龙行事。夜里23时，县委书记王振元赶到马村，在一小队猪场劝阻杀人，李恩元等根本不听。王振元赶回县委，在请示了北京市委后，又带着十几名干部，于9月1日凌晨1时赶到马村。

谁知马村的民兵在村外布了三道防线，严禁外人进村。县委书记

王振元带着人向村里冲了 3 次，一直到晚上 21 时左右才冲到村口第三道防线前。县委书记王振元厉声喊：“你们不让我们进村，就先杀了我这个县委书记吧！”

民兵经过请示，这才允许他们排队进村。同行的中共大兴县委农工部干事张永和张连和后来回忆说：

“全村被白色恐怖笼罩着，鸡犬无声。刑场设在大街西头路北的一家院子里。……我们排队进院时，看见活人被捆绑跪着，死人横躺竖卧，鲜血染地，惨不忍睹。有两辆小推车往外运尸体，（据说把打死的人埋在村西永定河大堤）”“我看见一个十四、五岁的小男孩儿，长得非常漂亮，被反绑双手跪在 70 多岁的奶奶身边儿，……只见一个持铁棍的年轻男子来到小孩儿身边厉声问：‘快说，你们家的变天账藏在哪儿了？’小孩儿哆里哆嗦地说：‘不……知道！’‘我叫你不知道！’那人说着扬起铁棍向小孩儿砸去，正砸在背后的手上，只听‘扑’的一声，小孩儿左手的无名指和小拇指立刻断裂，鲜血如同水壶往外斟水一样，哗哗地往地上流……接着又逼他奶奶交代……两个民兵似的人物把一名中年妇女拉进刑场院内，一脚把她踢跪在地上，这时，来了一个手持剪子的年轻妇女，把这位中年妇女的头发剪掉，接着审，她不言语，被两皮带打躺在地……两个人抬起一个被打死的人装在小推车上，还没推出院门又活了，一挣扎掉在地上，一个人上去狠拍两铁锹，又装在车上运走了……他们要一位 30 多岁的小伙子交出‘准备反攻倒算’的枪支，因受刑不过说在家中东屋顶棚内。于是，派出两个人随他回家抄取。到家后一找，顶棚里没有，又指挖房

山、影壁、院墙，均未找到。小伙子又被打，他又说在自家坟地内。于是，又带他去坟地，当他们走到街上一个水井旁时，小伙子冷不防一窜跳入井内。他们说小伙子是自绝于人民，也不管他死活，用绳子拴牢大四齿续到井里往外捞……”

王振元劝李恩元停杀，李恩元把杀猪刀往桌子上一拍，道：“不叫杀了，他们反过来杀我们贫下中农怎么办？”

中央文革接到报告后，立即让戚本禹和王力去前处理。他们到了大兴的时候,打人、杀人的人听到风声都跑了，找不到人了。正好康生的孙女张力在那里当团委书记，她认识王力和戚本禹，向他们详细地说了乱杀人的过程。她说主要是市里一些红卫兵学生过来布置的，但有些来的人看上去年纪已经不小了,根本就不像是学生，而且还有警察带他们来。戚本禹马上给北京市委秘书长马力打电话,要他赶紧出面制止。

马力第二天就和北京卫戍区的刘绍文、张益三来到大兴，亲自来到马村，这才止住了马村的屠杀。结果是杀了 34 人，救出 108 人。

从 29 日到 31 日，大兴县共杀死 324 人。被杀者，最大 80 岁，最小的出生才 38 天。杀死“四类”分子 175 人，家属子女 137 人，其他 12 人。涉及 171 户，有 22 户被杀绝。由于 31 日杀人最多，故后人称之为大兴“八三一事件”。

9 月 1 日，北京市委秘书长马力向大兴县全县做了广播讲话，市、县又向杀人的社队派了工作组，大兴县的杀人事态才基本上得到控制。

9 月 2 日，中共北京市委为制止城乡出现的打死人现象，发出《紧

急通知》。《通知》提出："一、各级党委、人委党组，公安部门，均应根据十六条要文斗不要武斗的精神，表示明确态度，支持群众的革命热情，但要用最大努力耐心说服和坚决制止一切打死人的现象。二、过去有少数单位提供所谓流氓分子名单，鼓动群众去斗打，这是错误的，从现在起一律禁止提供名单，违者要受纪律处分。三、除现行犯外，五类分子的名单，有关部门也不要向群众提供。"

## 第176回：中学生，自己动手出报刊
## 揪厅长，厦八中执意北上

9月1日，周恩来命301医院准备接收章士钊、程潜、傅作义、蔡廷锴、李宗仁等知名人士入院，告以这些人年老多病，政府应负责保护。

这天，毛泽东在周恩来8月31日送审的《通知稿》上批道："退总理。此件不发。"

当天，毛泽东给章士钊复信说："行严先生：来信收到，甚为系念，已请总理予以布置，勿念为盼！顺致健康。"

这天中午，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听取周恩来汇报新疆、青岛两地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出现的一些情况。

8月31日晚，部队总政治部给毛泽东并中共中央的报告提出：

全军军以上机关原拟从九月份起，以两至三个月的时间开展文化大革命。鉴于不少省市的领导班子已经瘫痪，有些省市领导干部向部队告急，要求军区派人帮助，这时如部队各级同时进行大烧大整领导机关，一旦地方有事，则部队无人控制。为了使军队能够担负起保卫国防和保卫地方文化大革命的顺利进行，决定各大军区和驻大中城市的军、省军区、警备区等领导机关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暂缓进行，待地方文化大革命稍稳定以后，再继续进行。

9月1日下午，毛泽东在这份报告上批示："照办。"

这天，林彪亲自召集军委第 56 次常委会，贺龙等人均到会。林彪讲了对总参“825”事件看法后，提出要撤掉作战部部长王尚荣、副部长雷英夫的职务。他的意见得到了与会人员的认可，于是会上决定撤销王尚荣、雷英夫总参作战部正、副部长职务，交代问题。随后军委给各大军区和军兵种发电，宣布这一决定，作战部掀起了对王尚荣、雷英夫的揭发批判。总参各部局也到作战部参观大字报。总参机关的局势得到了控制。

在军委常委会议上，总政治部主任肖华汇报了驻京部队各大单位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情况。其中提到：部队中不准组织红卫兵，师以下部队及军以上机关的警卫、通信部队统统搞正面教育，不准地方到部队串联，也不准部队到地方串联，更不能让地方群众和红卫兵到部队营房搜查。如果发现有人企图煽动部队搞武斗，各级党委要采取措施，坚决制止，并立即上报。

肖华的意见，林彪、贺龙、聂荣臻、叶剑英、徐向前都表示同意。9 月 3 日，中央军委向全军批转了肖华讲话的要点，要求部队坚决遵照执行。

由于“首都工作组”办公室的正副组长皆被打倒，周恩来临时抽调总参作战部副部长王德出面领导，然后再调北京军区副司令员郑维山兼管“首都工作组”办公室的领导工作，使之能够继续运转。

毛泽东“818”首次接见红卫兵后，北京六中的几名同学孙长泰、孙克亮、于晋、张尚英、白志成、李秀生、杨世杰、刘振、陆炜等人为了扩大影响，谋划运筹出版自己的报纸。说干就干，于晋按照分工，先去了位于东直门内北小街里的《中国青年报》，联系报纸的印刷事宜。报社一听是红卫兵小将要印报纸，立即表示“坚决支持革命小将的革命行动”。刊印问题解决了，又熬了一两天，孙克亮将报纸的发刊词及主社论《论形势》也完成了。一读大家非常满意。这时，孙长泰、于晋、张尚英也写了文章，第一期的内容很快就排满了。当讨论这份报纸该叫什么名字时，大家异口同声地说：“就叫红卫兵报”。他们立即分头去找毛泽东的手迹，不久就拼出“红卫兵报”几个字，并立即将文稿送《中国青年报》社。

排完稿后，编辑找到这几位中学生问：“落款是什么？”

一下把几位中学生问住了。他们商量后说：“就叫‘红卫兵报编辑部’吧，地址就写我们六中的地址：北京六中，南长街大宴乐胡同十一号。”

排报的第二天恰好是 9 月 1 日，于是这份报纸的诞生日也就成了 1966 年 9 月 1 日。

报纸印出来了，他们拉回学校，下一步该怎么办？于晋说：“咱们上街卖去，北京晚报卖两分一份，咱们也卖两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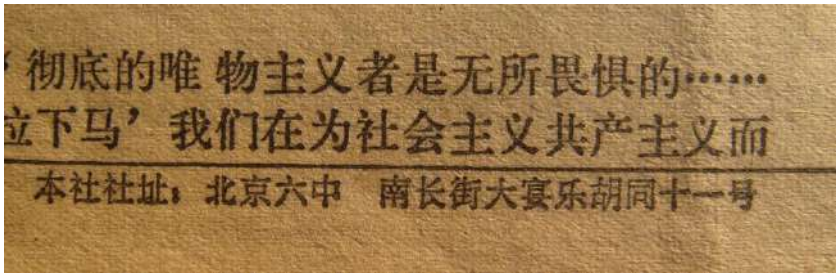
有人担心地问：“这行吗?”

于晋说：“怕什么。”

于是，大家全体上街去卖报，高声叫卖：“红卫兵报二分一份！”

在《红卫兵报》创刊号的社论《论形势》中，他们引用毛泽东的语句激昂地高呼：“中国将要升起在地平线上，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

由于第一期报纸语言激昂、文笔流畅，富于鼓动性，又由于《红卫兵报》是个新生事物，以前没有这样的报纸，而且报纸还上街去叫卖，这也是新中国成立后前所未有的事情，以前谁也没有见过，所以卖的非常快，不久报纸就销售一空。他们将卖报纸的钱交到设在劳动人民文化宫的“北京市大、中学校红卫兵联络总站”。


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
立下马’我们在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而
本社社址：北京六中　南长街大宴乐胡同十一号

红衛兵報　創刊号
1966年9月1日出版
北京六中红卫兵

学习毛主席语录

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几千年来总是说，压迫有理，剥削有理，造反无理，自从马克思主义出来，就把这个旧案翻过来了，这是一个大功劳，这个道理是无产阶级从斗争中得来的，而马克思作了结论，根据这个道理，于是就反抗，就斗争，就干社会主义。

发　刊　词

第一期《红卫兵报》卖出不久后的一天，六中来了几个中年人，说是要找《红卫兵报》的人员。当时六中大部分同学都到外地串连去了，学校只剩下《红卫兵报》的几个人和负责学校保卫工作的初中学生朱之前等几个人。朱之前便将来人领到《红卫兵报》社。这几个中年人进屋后一报姓名，这些学生才知道，他们原来是中央文革的姚文元、关锋、戚本禹及随员。

姚文元他们一进屋就说明来意，说是看到他们办的报纸的，就找到六中，并问：“《红卫兵报》是你们办的吗？”

学生们答道：“是的。”

他们又问："发刊词及社论《论形势》是哪位同学写的？"

于晋指着孙克亮说："是他。"

姚文元夸赞说："写得不错，就是毛泽东主义的提法不好，中央早就有提法，七大以后统一提毛泽东思想，而不提毛泽东主义。"

交谈中，学生们问："这期《红卫兵报》我们都上街去卖了，可以吗？"

姚文元他们回答说："可以卖嘛。"

接着，他们又说："我们准备将你们的主社论《论形势》在《红旗》杂志上发表，但是毛泽东主义要改为毛泽东思想，你们同意吗？"

学生们闻之大喜，受宠若惊，哪有不同意的道理，当时都愉快地同意了。《红卫兵报》创刊号上的主社论《论形势》，就这样刊登在 1966 年 9 月中国共产党的中央刊物——《红旗》杂志第十二期上，文章的题目作了修改，落款也将"红卫兵报编辑部"改为"北京六中红卫兵"，并配发了《红卫兵赞》的评论员文章。在文章结束的最后口号用语中第一次使用了"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的口号。

《红卫兵报》首期初战告捷，给这几位中学生以极大的鼓舞。正当他们以百倍的精力投入到第二期的出版工作时，突然接到"首都红卫兵纠察队西城分队"指挥部的电话，邀

请六中《红卫兵报》的同学去他们那里，说是有事相商。于是，孙克亮、孙长泰、于晋等人来到“西纠”总部，接待他们的是“西纠”的负责人孔丹、秦晓还有李三友。见面寒暄了一阵后，孔丹开门见山地说：

“你们出的《红卫兵报》影响很大，在社会上也引起了轰动。我们原也想出报纸，因为报纸的影响力、宣传力是其他舆论工具不能比拟的。但是你们走在了前面，以北京六中红卫兵的名义出版了报纸。我们想与你们合着出版这份报纸，不知你们意见如何？”

听完孔丹的提议，六中的几个学生有些突然，他们合计了一会后，由孙克亮代表他们发言，首先讲了他们办报的初衷及经过。而后又说，同意孔丹的提议，将六中《红卫兵报》改为首都红卫兵纠察队西城分队指挥部主办。同时提出，保留六中已有的办报机构。

孔丹他们同意了六中同学的意见。于是双方达成一致：第二期《红卫兵报》改由首都红卫兵纠察队西城分队指挥部主办。接下来双方研究了第二期的主要内容等事。

第二期《红卫兵报》刊登了“西纠”的第五号通令：《关于文斗问题的补充说明》，还有李三友写的“要用文斗不用武斗”的社论，以及六中《红卫兵报》改变主办单位的声明。

9 月 4 日，这期报纸出来后，反映依然强烈。尤其是“要用文斗不用武斗”的社论，起到了很好的指导作用。

为了扩大报纸规模，他们向西城区红卫兵提出要求，请求推荐几个办报的人员。不久，其他学校的几个女同学刘铭、冯娟、谷雪红等人来了。《红卫兵报》机构成立了。于晋为《红卫兵报》社社长；孙克亮为主编，孙长泰为副主编，张尚英、刘铭为编辑；白志成为财务组组长，组员有冯娟；李秀生为出版发行组组长，组员有杨世杰、刘振、陆炜等。以后张尚英与刘铭、白志成与冯娟还结为了夫妻。

但在筹划第三期《红卫兵报》的内容和以后办报的方针时，六中的学生与孔丹、秦晓和李三友他们发生了分歧。于是他们第二次见面。由于协商未允，双方只好握手道别，好说好散。第三期主办方又改由北京六中红卫兵主办。《红卫兵报》在出第三期时，接到北京图书馆的电话，提出将一、二期《红卫兵报》及以后每期的报纸送一份给他们收藏。六中学生照此办理了。

红衛兵報

首都红卫兵纠察队西城分队指挥部主办

第2期　1966年9月4日　星期日

社论

要用文斗　不用武斗

一九六六年九月四日　　红卫兵报

除了党的领导之外，六亿人口是一个决定的因素。人多议论多，热气高，干劲大。从来也没有看见人民群众象现在这样轻松愉快，奇志奇智，意气风发。过去的剥削阶级总企图压在劳动群众的汪洋大海中，他们不想变也得变。

毛泽东

首都紅卫兵糾察队西城分队指揮部

第　五　号　通　令

我们一定要按照毛主席的教导，发扬文革，不用武斗，不要动枪杆子。与资产阶级大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干脆斗争，宣、反、证、不分手，也是这样，或斗其思想反动，或斗其犯错误罪恶，只用文斗，进行充分揭露，深刻批判，才能彻底暴露他们的反革命面貌，把他们搞臭在地底下起来，斗臭，斗垮，斗倒。

——林　彪

为了贯彻毛泽东思想，为了执行党的政策，为了实现《十六条》办事，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深，搞透，搞彻底，在今后的文化革命运动中，严禁打人，严禁体罚和变相体罚，严禁侮辱人，严禁逼供信。

对于首犯不明，情况不明白的人，对于犯有错误，但革命或反革命分不清楚的人，对于犯有严重错误，但性质未定的人，对于已经定性的反革命分子，一律不准打。

我们坚定地和毛主席的忠实的红卫兵，站在坚决地执行党的政策方面，以《十六条》办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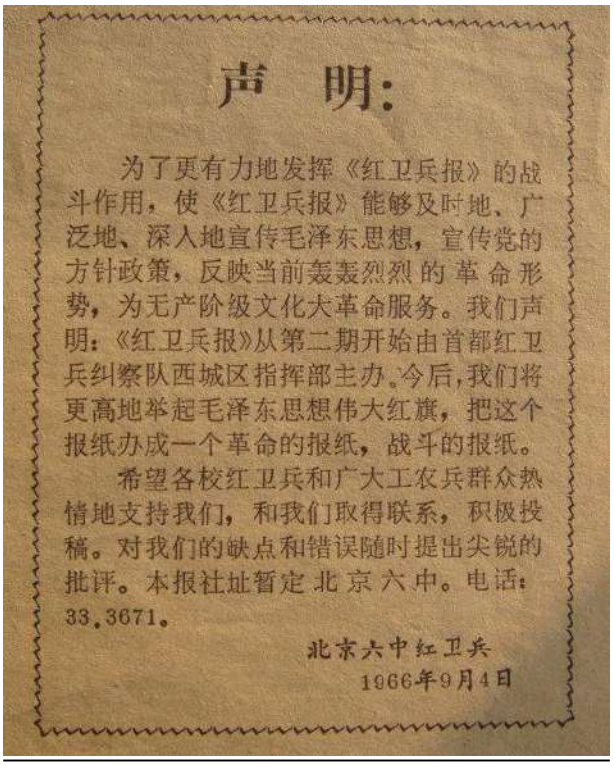
以林彪同志八月三十一日讲话为界，今后，对于红卫兵中违反最高指示，违反党的政策，随便打人者，一定要进行严肃的批评和教育。

对于阶级敌人反攻倒算，进行阶级报复，破坏执行党的政策，一定要严肃惩办，坚决镇压！

贯彻在我们手里，无产阶级专政在我们手里，由我们来斗，一定能够把敌人彻底斗垮，斗臭，斗倒，一定能够取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彻底胜利！

首都紅卫兵糾察队西城分队指揮部

一九六六年九月三日



声　明：

为了更有力地发挥《红卫兵报》的战斗作用，使《红卫兵报》能够及时地、广泛地、深入地宣传毛泽东思想，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反映当前轰轰烈烈的革命形势，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服务。我们声明：《红卫兵报》从第二期开始由首都红卫兵纠察队西城区指挥部主办。今后，我们将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把这个报纸办成一个革命的报纸，战斗的报纸。

希望各校红卫兵和广大工农兵群众热情地支持我们，和我们取得联系，积极投稿。对我们的缺点和错误随时提出尖锐的批评。本报社址暂定北京六中。电话：33.3671。

北京六中红卫兵

1966年9月4日

红衛兵報

红卫兵报编辑部

第3期　　一九六六年九月八日　　星期四

8 月 26 日晚上 20 时，福建省委在省人民体育场召开“炮轰宣传教育界万人大会”。省委主要成员都参加了会议。大会按照程序有条不紊地进行着，宣传部、教育厅的代表，福建省“东海前线红卫兵”的代表，以及各地区的代表一个接

一个地揭发、批判省宣传部部长许彧青和教育厅副厅长。当大会主持人宣布由厦门八中同学发言时，只见一个中等身材、身穿草绿色军装、剪短发的女孩子登上讲坛，她一开口，竟让与会者大吃一惊。她说：

“同志们，我是代表厦门八中全体革命师生在这个讲坛上讲话的，我怀着满腔的愤怒心情向你们揭露省委、厦门市委是如何阻挠我们来省城揪王于畊的革命行动。”

王于畊是福建省委第一书记叶飞的妻子，这位女孩子的开场白无疑像是一阵狂风吹过江面，在台下掀起了巨大的波澜。

但很快波澜就平静下来。大家都竖起了耳朵，想听她要说些什么。

厦门八中这位女学生侃侃叙述他们要求揪斗王于畊的原因及过程：

早在 6 月初，中央广播了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后不久，厦门八中师生就写出许多大字报，揭发王于畊在八中搞社教时，为八中的党支部书记兼校长、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李永裕翻案，搞“和平社教”等等，并强烈要求省委立即将王于畊调回八中交给学生批判斗争。

厦门八中师生的要求始终没有得到答复。于是，8 月 12 日，他们列队来到厦门市委，当面质问厦门市委第一书记袁改：

“袁书记，你对我们八中的革命行动是支持还是反对？”

“同学们的革命热情是很好的，是应该加以肯定的。”袁改回答道。

“我们要求直接打电话到省城，把我们的要求传达给省委。”八中又提出要求。

“现在打去没人接。”在场的厦门市文化革命办公室主任马上插嘴说道。

但是，市委里面也有人支持学生们的行动，当场指出他在说谎。结果，电话接通了，省委接电话的是省委秘书长、省文革办公室主任李敏唐。

厦八中的同学向李敏唐做了一番陈述之后说：“我们厦门八中全体革命师生希望你能够把省委对我们的要求的讨论结果尽快告诉我们!”

“嗯，好的，一有结果，我马上会告诉你们的。” 李敏唐在电话里答应道。

当晚，李敏唐即给厦八中打来电话，代表省委答复说：“一、支持你们的革命行动；二、省教育厅也在搞文化革命，王于畊在自我检查、自我革命，现在不便去厦门；三、你们可以继续揭发，然后将材料送市、省委。”

厦门八中学生对省委的这番答复自然是不满意的，他们当即表示：“我们厦门八中师生要求保留我们的意见，请省

委再作考虑。”

厦门八中学生连夜又将市委第一书记袁改叫到学校，再次向他提出把王于畊揪回厦门八中批斗的要求。他们仍然没有得到省、市委任何答复。

8 月 17 日下午，厦门八中学生二请袁改来校，对他说：“既然省、市委不支持我们的革命行动，不把王于畊送来，那么，我们就到省委去要人。”

袁改在学生们的强烈要求下，勉强说：“你们一定要去的话，去几个就行。”他想了想，又说：“你们现在只是筹委，无权决定去省城的问题。”

18 日，省委第二书记范式人委托秘书打电话给正在集中学习的原八中工作队队长说：“一、省委支持八中革命师生的革命行动；二、希望工作队去动员说服八中革命师生不要去省委，省委已经在研究教育厅王于畊的问题。”

19 日，厦门八中正式成立了校文革。校文革主任在全市万人大会上慷慨激昂地说：“我们厦门八中全体革命师生下定决心，排除万难，一定要把王于畊揪回学校批判斗争！”

她的发言获得了全场响雷般的疯狂掌声，又是支持，又是声援，整个厦门闹翻了天。就在这天中午，袁改又驱车来到八中，通知厦门八中校文革说：“省委欢迎你们去，什么时候去，什么派车。”

23 日，厦八中通知厦门市委，他们决定 24 日早上 7 时

半动身去省城，要求市委将车辆准备好。

当天夜，福建省委第二书记范式人、副省长许亚赶到厦门，立即找来原厦门八中工作队队长以及厦门八中校文革几个负责人谈话，一面表示支持他们的革命行动，另一方面，又劝说他们过几天再去省城，范式人说："由于车辆紧张，要乘汽车厦门没那么多车，需要从漳州调车，要乘火车还要向南昌铁路局打电话增挂车厢，建议你们是不是迟几天再去呀？"

许亚也道："或者你们不要去，过几天把王于畊送来。"

谈话结束后，范式人又打电话给原八中工作队队长说："王于畊这两天病得厉害，还吐血，希望你能够帮助说服学生不要去省城……"

然而，那些厦门八中学生们认为这又是在哄他们，固执地要按原计划行事。由于厦门八中学生同市委交涉车辆未果，就决定步行去省城，八中校文革把这一决定打电话告诉给省、市委，范式人也只好说："那你们要走就走吧。"

24 日凌晨 3 时，厦门八中 300 名师生代表打着一面厦门八中的红旗浩浩荡荡地出发了，范式人、许亚、 袁改等省、市委负责人站在街道旁默默地看着厦门八中的队伍走过。

范式人无奈地对袁改说："你们设法派几辆车子送他们上路吧。"

以后，范式人、许亚也驱车赶回福州。

早上 4 时半左右，八中赴榕学生队伍的后面赶来了两辆卡车，要同学们上车。同学们本来就对市委阻挠他们上省城非常气愤，而且，两部卡车怎么坐 300 人呢？所以拒绝上车。

他们又走了 3 公里左右，从市区又赶来 5 部公共汽车、1 部长途汽车和 1 部加油车。见此情景，同学们愤慨万分，纷纷质问说："你们说市区没车，要从漳州调车，为什么现在又有车？"

"厦门是个岛，同外地的公路就这么一条，我们沿途没有看到从漳州调回一辆车过来，而都是很快就从市区开出来，这不是说明市里有车故意不派么？"

司机告诉同学们说："22 日，市委是有打电话给交通局，要他们准备 10 部车，而 23 日又突然打电话说不要了。24 日四时又打电话说，要立即出车。"

同学们听罢，个个都像青蛙上蒸笼一样气鼓气胀，都表示道："除非市委说明情况，否则，我们决不能稀里糊涂地就上车。"

厦门八中师生继续步行了 50 余华里，车队也跟着队伍来到同安。沿途学校的师生都欢迎厦门八中师生，同时建议他们乘车，可以早日到达省城投入战斗。

同学们在厦门市交通局长说明情况后，于下午 17 时登车。次日，8 月 25 日下午 17 点，厦门八中师生到达福州。

厦门八中这位女学生介绍完这些情况，最后慷慨陈词

道：

“25 日晚，各地区宣传部、教育局以及各大专院校突然接到省委的加急电话，要他们马上选出代表，立即前往省城来参加‘炮轰宣传教育界万人大会’，不少地区的代表没有带任何揭发材料，匆匆地赶到省城，有的刚刚下车，有的还在途中，请问，这个万人大会开得如此仓促，难道真的是因为时机‘已经成熟了’？我们不禁还要发问，既然省、市委表示支持我们厦门八中的革命行动，为何长期以来对我们揪王于畊回校批判斗争要百般阻挠呢？为什么在坐车问题上态度变化无常，一会儿说有车，一会儿说没车呢？为什么早不早，晚不晚，偏偏要在我们到省城揪王于畊时，急急忙忙地召开这个万人大会呢？难道这些问题不值得发人深思么？……”

第 177 回：大混乱，万人会草草收场　烈日下，众学生静坐求见

厦门八中女学生的发言赢得了场上一阵热烈掌声。这时候，台上的领导聚在一起商量了一阵子，决定仍按原来的会议程序继续开下去。下一个发言人是市教育局的代表，他的发言依旧把矛头指向许彧青和笼统指向省教育厅。

就在他发言之际，场上又起了一阵骚动，只见从运动场外面进来了一支浩浩荡荡的队伍，队头的一面战旗在迎风飘扬着，上面写着“华侨大学革命造反兵团”的字样，这些男女大学生们迈着急急的杂乱的脚步沿着跑道开进田径场，他们风尘仆仆，斗志昂扬。会场上，有部分人为他们的到来，报以一阵掌声。

只见他们秩序井然地在田径场边上的空地上站住了脚。当那位市教育局代表的发言刚结束，主席台的出入口处就发生了纠纷，大会组织者和华侨大学的人正在争执，连扩音器里也传来了他们吵架的声音。台上乱了，自然台下也跟着乱哄哄起来，有的人翘首瞻望，有的人高声议论着。这时，副省长、书记处书记许亚也站起来，走过去进行调解。争吵声渐渐平息下来。只见一个身材魁梧的小伙子子大踏步地走上了讲坛，他头戴一顶军帽，身穿褪色的旧军装，把袖筒卷得高高的，左臂上戴着一面红袖章，他一手抓住麦克风话筒，铿铿锵锵地道：

“同志们、革命的战友们：我们是华侨大学‘革命造反兵团’的战士，刚刚我们一路风尘地下了火车，就直接赶到这个会场来。我们要求在今晚的大会上讲话，但是，那些大会的操纵者们却无理地阻挠我们发言，说什么今晚的大会没有安排我们发言，不能打乱会议的程

序云云。这是什么屁话，我们为什么不能发言？为什么要剥夺我们发言的权利？‘四大’自由是毛主席赋予我们的权利，是任何人也剥夺不了的！”

台下华侨大学“革命造反兵团”战士，以及厦门八中、厦门大学等学校的学生们起劲地为他的发言喝彩鼓掌。接着，他又操着一口华侨腔调的普通话继续说下去：

“我们学校是昨天夜里才接到省里的开会通知的，我们华侨大学‘革命造反兵团’全体战士一致认为，省委如此匆匆忙忙召开这个所谓炮轰宣传教育界万人大会，完全是一个大骗局、大阴谋，必须予以戳穿。众所周知，‘炮打司令部’是我们伟大领袖、伟大统帅毛主席向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发出的战斗号召，叶飞同志也去北京参加了八届十一中全会，自然他是知道毛主席写了《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可是，他回来之后究竟又干了什么呢？确实，他也在到处鼓动人们炮轰、炮打，又是这个校党委烂了，又是那个院党委烂了，然而，烂来烂去总烂不到他和他的老婆的头上去。今晚，他又在这个体育场召开全省性的所谓炮轰宣传教育界万人大会，也许，这个宣传部、教育厅是真该炮轰的，但是，我们又不能不问，难道说这个宣传部、教育厅就是我们省的‘司令部’么？难道说王道燃就是我省黑线的总根子么？难道说‘炮轰司令部’就是这样炮轰的么？我们认为，今晚的万人大会是省委想转移目标、扰乱视线的大阴谋，要坚决加以揭露，我们呼吁一切革命同志行动起来，把今晚的大会开成一个揭发、批判、炮轰省委的大会，现在是‘炮打司令部’、‘炮打省委’的时候了，我

们要坚决揪出省委里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掀起我省文化大革命的新高潮……”

这个华侨大学大学生的发言，博得了场上部分群众的狂热掌声，同时，会场上也起了一阵聒噪。大会组织者显然有些不知所措。

就在这个时候，台下又有一些穿军装、扎腰带的福州市一中学生冲上主席台，其中一位同学凑近话筒高声说道：

“革命的同志们、红卫兵战友们：我代表‘东海前线红卫兵总部’在这里讲几句话，刚才那个侨大的狗崽子放了一通狗屁，他散布的是地地道道的反革命右派言论。那个狗崽子声称今晚的万人大会是省委的‘大阴谋’，我看他是说错了一个字，居然把大阳谋说成‘大阴谋’。毛主席教导我们说；‘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这是两条根本的原理。如果怀疑这两条原理，那就什么事情也做不成了。’可是，那个侨大的狗崽子连这起码的知识也不懂得，将这会场上的成千上万的革命群众都视同阿斗，好像大家全上了省委的骗局圈套，唯独他这活宝是‘先知先觉’，真他妈的混蛋！这个狗崽子竟然怀疑起我们伟大的党，怀疑起省委来，甚至，还丧心病狂地叫嚣要‘炮打省委’，是可忍，孰不可忍？！我们的省委是无产阶级的战斗司令部，怎么可以随便炮打、炮轰呀？那些侨大的狗崽子们打着‘造反有理’的旗号，妄图造无产阶级的反，造无产阶级专政的反，我们就是一千个不答应，一万个不答应！我们只许左派造反，不许右派翻天……”

他的话音刚落，会场上“东海前线红卫兵”使劲地为他鼓掌喝彩，会场顿时大哗。

这时，另一个华侨大学的大学生又闯上讲坛，当他对着麦克风话筒刚说了一声“同志们”，话筒就被一中的同学一把夺走，对着话筒高声嚷嚷道：

“同志们，这里是无产阶级的讲坛，只许红五类子弟发言，不许黑七类狗崽子放毒，你要发言，得先报是什么成分，大家说对不对呀？”

“对，要先报成分再发言！”

“不许狗崽子在台上放狗屁！”

台下那些前线红卫兵们也发出了一片喊声。

台上那位同学手指着那华侨大学的大学生逼问说：“喂，你报，你是什么成分？”

“你干吗抢我的话筒，为什么要剥夺我的发言权利？”那位穿短衬衣的大学生争辩着，力图夺回麦克风话筒。

“不行，你要先报成分，才能发言。”一中的同学双手护着话筒，大声地说。

“要报成分，狗杂种的，你有种的就报成分！”

“不报成分不能发言，狗崽子，你有胆量，就报你的成分！”

台下的前线红卫兵又喊又叫。

那位华侨大学生迟疑了一小会儿，讷讷地说：“要报就报吧，我的家庭成分是华侨工商业者，我是革命的青年，是热爱社会主义祖国的……”

未等他说完，台上的几个前线红卫兵便用力地推搡着他，辱骂道：

“他妈的，乌鸦也想上金銮殿，狗崽子，还不赶快滚下台去！”

“一——二——三——，狗崽子，快滚下台！”

“不许狗崽子发言！打倒黑七类狗崽子！无产阶级专政万岁！”会场上爆发了一阵怒不可遏的吼声，伸出的一只只森林般的拳头简直可以把台上的那个大学生的脑袋瓜砸得脑浆迸地。而那位大学生则在竭力反抗着，如若母鸡抱窝一般赖在台上一步也不肯走掉，嘴里仍在争辩着：“谁是狗崽子哟？我要求发言，我抗议你们对我的人身侮辱！”

这时，好些华侨大学“革命造反兵团”的大学生和“东海前线红卫兵总部”一些人纷纷冲上台去，两派学生集聚在讲坛周围展开了一场话筒争夺战和唇枪舌剑的大辩论。骤然间，主席台成了黄河十八弯的大旋涡，体育场内也翻腾起汹涌波涛，到处都在歇斯底里般地狂喊乱叫，会场陷入混乱之中。

大会的组织者们已失去了对会议的控制，许亚让大会主持人通过后台的麦克风话筒赶紧宣布：“今晚大会就此结束。”接着将扩音器关了。

那些学生还在台上争吵不休，直至会场上的人都散得差不多了，双方才渐渐地休战。万人大会就这样地草草收场。但事情并没有结束。

8 月 28 日，福建省林学院、厦门大学、集美航海学校等学生 1000 多人乘 303 次列车到达福州。

8 月 29 日上午 8 时，这些学校的学生会同华侨大学、同安一中等在榕学生以及北京南下的大学生 1000 多人在省交际处礼堂集会，听取厦门八中代表的情况介绍。与会者听了厦八中的发言后，个个义

愤填膺，口号声风啸海咆，一只只拳头不断地举起。会议期间，学生们两次打电话给省委，要求叶飞书记前来接见并解答一些问题，但得到的都是叶飞正在开常委会，抽不出时间前来的答复。于是，到了中午 11 时许，这群闹海的哪吒们排着整齐的队伍，高唱着《大海航行靠舵手》、《造反有理》等歌曲，像一条奔腾不息的江水，浩浩荡荡地从省交际处向省委进发。这 1000 多名学生涌进福建省委大院，强烈要求省委书记叶飞接见。省委的工作人员告诉他们：叶飞书记正在开常委会，实在抽不出时间。于是，他们便在省委大院里席地而坐，念起《毛主席语录》。一时间，语录声，口号声，《造反有理》、《革命造反歌》的歌声，汇成一片怒涛，回荡在省委大院的上空。“乱石崩云，惊涛裂岸，卷起千堆雪”，一时多少情节……

此季正值盛夏酷暑，太阳如同一颗炽热的大火球悬挂在人们的头顶当中，万里长空没有半点云彩，那省委大院的水泥地被烤得滚烫滚烫的，酷热折磨着在场的每一个青年学生，他们费力地呼吸着，甚至会感觉到肺在发烫，嘴唇要像干旱的土地一样龟裂了纹。

但是，在无限崇拜毛泽东思想的狂热氛围中浸泡成长起来的这些青年们是什么困难也不放在眼里的。有几个女同学晕倒了，随即，她们又挣扎了起来，“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语录声阵阵不断。

省委机关的工作人员热情地送来了几桶开水。被烈日曝晒渴得要命的学生们蜂拥而上，像一群鸭子一样抢着喝水，顷刻功夫，几桶开水都被喝得光光的。

时间一分钟一分钟地过去了，可是，“思君不见下渝州”，始终也不见叶飞的人影。

学生在省委静坐的消息很快传遍了福州市，敢在共产党的省委示威静坐，这在建国后还是闻所未闻的事情，人们冒着炎炎赤日纷纷赶往省委大院观看。此时省委门口的大墙上，早已张贴着厦大、侨大、林学院的一些红卫兵战斗队写的《炮轰省委，炮打叶飞同志》、《质问叶飞同志几个问题》、《八·二七大会是省委的大阴谋》、《坚决支持厦八中革命小将揪王于畊的革命行动》等大字报，大院内更是热闹非凡，就像是集市，到处都是拥挤不堪的人群。人群中散发的热气互相串流、升腾。

但静坐现场秩序井然，学生们有序地坐在地上。人们都自觉地维护着学生们。

太阳仍张着血盆大口，把灼热、刺眼的阳光投射到地面上，燎烤着大地和坐在水泥地上的学生们。又有几个同学中暑了，被人搀扶到庇荫处休息。

叶飞听到学生们到省委大院要求他接见的消息后，没说什么，只交代省委值班的副省长刘永生先出去应对场面，而他照常睡他的午觉去了。

其实，叶飞这个午觉哪里睡得着呀？他躺在台湾草席上不停地翻着身，脑子里也像走马灯一样不停地转呀，转呀，直转得他头昏脑晕，还是一个劲儿地转着，转着。

叶飞已经几天吃不下饭，睡不好觉了。他知道，这些学生来省委

找他回答问题，无非是要把省教育厅厅长王于畊揪到厦门去。

王于畊就是他叶飞的妻子，这位当年保定女师的学生,在学校时就参加了学生运动。她 1937 年参加八路军,1939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到新四军,先后任战地服务团副队长、民运队长、区委书记、地委妇委副书记等职，是新四军有名的“才女”,既会做群众宣传工作,又写得一手好文章，当时多少人倾慕她。她怎么会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呢？叶飞不相信。但是，有些事情又是难以说得清，现在那些“黑帮”就都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吗？

唉，谁叫王于畊是他老婆呢？偏偏还当这个倒霉的省教育厅长。这场文化大革命首先要开刀的不正是宣传部、教育厅、文化局这些上层建筑领域吗？王于畊身为省教育厅长哪能不首当其冲呢？

叶飞心想，王于畊是在厦八中的社教已经开展一年多后才派去的，为什么要把一马桶的屎尿全倒到她的头上呢？这是不公正的。他怀疑厦八中的行动是工作组在后头当提线人，是有人在捣鬼，搞王于畊的真正目的是为了搞他，“项庄舞剑，意在沛公”。

对于厦门八中师生要揪王于畊的要求，王于畊早已知道。进入 8 月份，她就意识到自己的头顶上已布满乌云。她一面叫人打电话到华东局，向华东局求救，另一方面又匆忙召开教育厅党组会议，将厦门八中的情况立即反映给省委。当省委书记处书记、省文革第一副组长梁灵光听取了教育厅党组关于王于畊问题的汇报后，连忙和省委秘书长李敏唐挂了个长途电话到北京。

当时，叶飞正在北京开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他听罢梁灵光的电

话汇报后，心里矛盾重重。因为他刚刚在全会上受了毛泽东的批评，心有余悸，但偏偏王于畊又是他的夫人，使事情更复杂化了。他经过一番思虑后，表态说："同意王于畊去厦门是上策，也可由厦门八中派代表来省城，让常委们去决定吧。当然哟，如果王于畊要去也不能一个人去，应和厦门八中有关的人都一起去，把问题彻底搞透。"

梁灵光他们二人听罢叶飞的电话指示后，不敢擅自主张，便去请示省委第二书记范式人应该怎么办好。范式人猛抽着雪茄烟，思索了一阵子之后，面露难色地道："哎呀，这个板难拍呀……搞不好，他要怪人的，要骂娘的，实在难办啊，我看这事还是让他自己去决定吧。"

叶飞开完会从北京飞回来，还是那句话："这事让常委们去决定。"可是，谁的脑袋这么大呢？第一书记不做决定，何人又敢越俎代庖呢？只是小将们却不吃素，厦门八中师生们早就被省委和厦门市委反反复复的态度激怒了，17 日，他们决定赴省城来揪王于畊。

当天王于畊得悉这一消息，急得像热锅里的蚂蚁团团乱转，连午饭也顾不上吃，便急匆匆地跑到省委监委书记侯振亚的家里，哀求侯振亚说："老侯啊，不得了啦，厦门八中要来揪我了，现在是最紧急的关头，请你无论如何要帮帮我的忙呀！"

此时的王于畊已全然没有了当年新四军女战士的那股飒爽豪气，十几年养尊处优，颐指气使的首长夫人生活，以及建国后那些"右派"、"黑帮"的境遇使她无法承受可能要面对的前景。

侯振亚点点头说"好吧，我就去找范书记说说，看看应该怎么办。"

19 日上午，王于畊又亲自挂长途电话给华东局魏文伯说："魏老

呀，我是王于畊呀，厦门八中师生要来省城了，我准备给他们打死，在被打死前，我要求见您一面，向党做出最后的声明。”

魏文伯听罢她的话，不以为然地道：“你说什么呀？究竟谁要‘打死’你呢？你应该要相信群众、相信党呗，我看你还是要去厦门一趟，别害怕得魂不附体的，去经经风雨、见见世面，去见见群众、听听他们的意见吧！”

“这个——”她一时语塞，又恳求说，“总之，魏老，我请求先到华东局去一趟，让我能够见您一面，我有话要向党说。”

“我看没有这个必要，你有什么话现在就在话筒里说吧，我洗耳恭听……”

“不，有些话在电话里不好说，还是让我去上海当面对您说吧，魏老。”她又一次苦苦哀求说。

“你不要来上海，要去就去厦门，别见我的面，要见就见群众的面！”魏文伯也显得十分固执。

第 178 回：见与否？省委意见难统一　终露面，广场上热浪一片

挂断电话之后，王于畊沮丧极了，不过，她并未完全死心，仍一味按照自己的主意办事，她对人道："我就是要去华东局，只要我到了华东局，就拿我没办法了，难道还能把我赶回来？！"当天下午，她背着省委，私下买了一张福州到上海的软卧车票，准备悄悄地到上海去。

魏文伯放下王于畊的电话后，又挂了个电话给范式人，告诉他说："王于畊一定要去厦门，你要出面做工作。叫她不要到华东局来，必须端正自己的思想，到群众运动中去接受教育。"

俗话说，世上无不透风的墙。范式人恰巧也得悉王于畊瞒着省委要潜行上海一事，又接到魏文伯的电话，他即刻驱车到省交际处，把王于畊找到交际处的八角亭里谈话。他开门见山地问她说："听说你买了今天的车票，准备晚上到上海去，有这回事么？"

"嗯，"王于畊见此事已败露，干脆承认道，"我要到华东局去见魏老。"

"你要见魏老，可是魏老却不想见你的面，他今天特地打电话来要我告诉你，叫你一定要去厦门，不要到华东局来。" 范式人犀利的目光透过眼镜片直视着她，正色地说，"你身为省教育厅长兼党组书记，竟瞒着省委和组织，想偷偷跑到上海去，你还有没有一点党的组织性和纪律性呀？你心目中还有没有省委和党组织呀？"

"我坚决不去厦门，我去厦门会被他们打死的，我宁可死在省城，死在党组织的面前，也不死在厦门……" 王于畊高声嚷嚷着。

“你说什么呀？谁要打死你？难道厦门是台湾、是火烧岛？难道厦门就没有党组织吗？口口声声说‘死，死，死’，当真死到临头我看就不想死了。” 范式人也激动得涨红着脸道，“告诉你吧，你即便不去厦门，也不许去上海，我们省委不同意你去，华东局也不同意。”

“不，我的火车票都已经买好了，今晚我非去上海不可。”她也执拗得像一头牛。

“我代表省委正告你，如果你要去上海，就开除你的党籍。” 范式人严厉地警告她说。这场谈话陷入于僵局。

范式人深知王于畊的脾气，她仗着自己在省里的显赫地位，什么人也不放在眼里，早已习惯了我行我素。因此，范式人决定暂时把她留在省交际处里，不让她到外面去。

王于畊就像一头母狮被关进了铁笼子，暴跳如雷。

范式人派侯振亚、许亚二位书记再做王于畊的工作，他俩动员说服了她两夜，可是，王于畊死活也不肯到厦门去。出于无奈，范式人只得召开常委会，他提议说：“既然王于畊不去厦门，那么，厦门八中学生要来就让他们来吧，索性在省城解决问题，把那些原厦门八中工作队员也集中一起处理这个问题吧。”

那些省委常委们谁也拿她没办法，他们见范式人提议让厦门八中学生来省城，纵然这不是一个上策，也可算是一个中策，便纷纷表示赞同，这样，常委会便做出了这一决定。

王于畊对范式人把她关在交际处一事气愤难平，她怒不可遏地打电话到华东局，控告说范式人想整她，将她扣押起来等等。接着，她

又跑到福州军区司令员韩先楚处告范式人的状，要他出面讲话，阻止厦门八中师生来省城，但却遭到韩先楚的拒绝。

韩先楚获悉常委会迁就王于畊，做出了妥协的决定，他便把范式人找去谈话，说："你们这样处理是不对的，华东局魏文伯主张王于畊去厦门，我们军区党委也赞成这主张，你们应该两头做工作。一头用《十六条》，做好厦门八中的工作，要摆事实、讲道理，王于畊如有错误可以揭发批判，但要文斗，不要武斗；另一方面也要做好王于畊的工作，动员她大胆地去厦门，有错误就承认、做检查呗。"

范式人如同三明治中间的馅子两面受夹，他挨了韩先楚的批评，又听说王于畊到处擂鼓告他的状，憋了一肚子的火，他当即将王于畊叫去谈话。

"听说你到处告我的状，其实，我把你留在交际处里，完全是为了你好呀。" 范式人语重心长地对她说。

"哼，你为我好，就不应该让我去厦门，我到厦门会被他们打死的。"她怀有怨恨地乜斜他一眼。

"你老说死，死，死，谁要打死你呀？"

"我就是会被他们打死呗，呜呜呜——"她不禁地呜咽大哭起来。"你不了解情况，厦门八中的武斗很厉害，120 多个教师就被武斗了 70 多人，听说有个教师还被他们活活打死了，还有一个干事在电影院看戏，他们以找人为名，叫出来就被抓走了，甚至连市委文革办的一个工作人员到厦门八中也受到围攻……"

"这些情况我也听说了一些，不过，你也应该要相信群众、相信

党呗，要正确对待这场文化大革命。”范式人此际的语气和缓了许多。

“你不知道我这几天病得厉害，还吐过血咧，我去不了厦门，我这么虚弱的身体怎么经得起他们七斗八斗呀？我若去厦门，就会死的，真的，我会死的，呜呜呜——”她又失声断气地抽泣着，眼睛红肿、脸色苍白，嘴唇痛苦地颤动着。

范式人看见她这副可怜相，顿时起了恻隐之心，对于社会上的有关厦门八中的种种传闻。他是将信将疑的，毕竟他同红卫兵小将们也没有打过什么交道，担心王于畊若去厦门万一有个三长两短也不好交待。因此，他决定先亲赴厦门一趟，一则弄清厦门和八中的真实情况，二则想缓和一下厦门八中师生们的情绪，待做好他们的工作后，再让王于畊去厦门。于是，范式人偕许亚 23 日驱车赶到厦门。

8 月 25 日下午 15 时 30 分，叶飞在福州市作讲解《十六条》的报告时，第一次正式提出炮轰福建省宣传部和教育厅的口号，说现在时机“已经成熟了”。叶飞还在常委会上提出：“要高举革命红旗，把革命旗帜夺过来，争取主动。我主张立即召开万人大会，揭发批判全省宣传、教育界。”

福建省委连夜向各大专院校发出通知：26 日在福州市体育场召开省教育厅受黑线影响的揭发批判大会，要求各校派代表参加。结果，万人会在一片混乱中草草结束。

这几天，王于畊老是在叶飞的身边哭诉，说自己说什么也不到厦门去，“我去厦门说不定会被他们打死的，我害怕极了，呜呜呜——”

“哎呀，你别哭哭啼啼的，烦死了。”叶飞说着，又掏出香烟往

嘴里塞，并点燃了烟。他的内心陷入了重重的矛盾之中……

叶飞也担心王于畊若去厦门，万一有个三长两短，那该怎么办呢？现在是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非常时期，许多事情都是难以预料的，可是，她若不去厦门，那些学生和红卫兵们又不肯善罢甘休，他也不好说话呀！他感到左右为难、进退维谷，心好像揉作一团似地乱得很。身为堂堂的省委第一书记，却缺乏保护自己妻子的能力，面对着这场可怕的文化大革命的熊熊大火，他也感到茫然费解、束手无策。他大口地抽着烟，烟雾从他的口里不断吐出，腾腾烟雾飘忽在脑额的四周，他的脑海中也是一阵晦暗浑浊的迷雾在翻滚着，他的心绪乱极了，焦躁、烦恼扰乱了他的整个心境。

他曾经就此事向华东局请示过，岂料到华东局的领导同意王于畊去厦门，他的那些军区、省委的同仁们，也劝他不要管王于畊的事，把她的问题交给省委，相信省委会公正处理。

福州军区司令员韩先楚让福州军区副司令皮定钧来动员叶飞出去接见学生，说：接见群众，有好处，这样才符合毛主席的思想。皮定钧对叶飞说：“你要出去，你不出去怎么行呢？”

尽管叶飞口头上也同意不管这事，但心里总认为他是最了解自己的妻子的，觉得她十分冤枉，他不由想起关汉卿《窦娥冤》中的几句：“你道是暑气暄，不是那下雪天，岂不闻飞霜六月因邹衍”，“你道是天公不可期，人心不可怜，不知皇天也肯从人愿。做什么三年不见甘霖降，也只为东海曾经孝妇冤”。

再说 29 日这天，60 多岁的福建省副省长刘永生按照叶飞的指示

出来接见在省委大院里静坐学生。他从省委办公大楼的石阶上走下来，两鬓如霜，理着年轻人的寸头，脸上布满了密密麻麻的皱纹，就像核桃壳一样，一双不大的眼睛瞳孔连同玻璃体都是浊黄的，身躯消瘦硬朗，如若一根风干的老木头。

刘永生副省长的出现，使广场气氛顿时活跃起来。刚才还在穿梭般到处走动的群众一下子全涌向广场，围在厦大“红卫兵独立师”、侨大“革命造反兵团”那些学生们的四周，广场瞬间泛起桃花汛，正是：“因看平地波翻起，知是沧浪鼎沸时。”

刘永生站在石阶当中，残缺的牙齿发出漏风的沙哑的声音对场上的学生们讲话道：“革命的同志们、红卫兵小将们：你们好！我代表省委来看望大家，听说，今天你们来省委要求叶飞同志接见你们，这种革命热情是值得鼓励和提倡的。我们省委已经知道了这件事，不过，非常抱歉的是，今天叶飞书记不在家，他不能来接见同学们。你们有什么问题，不妨跟我说，我可以将你们的意见转达给叶飞书记……”

刘永生话音刚落，一位戴眼镜的手臂上套着“厦门大学红卫兵独立师”红袖章的小伙子一个箭步跃上了台阶，用洪亮的嗓门大声说：

“同志们：我们今天来省委是要求叶飞同志接见我们，并回答我们的问题的，我们的目的不达到，就坚决不回去，大家说对不对呀？”

“对！”下面的学生齐声应道。

接着，这位大学生又转过脸问刘永生说：“请问，刘永生同志，你代表得了省委第一书记叶飞吗？”

“我啊——”刘永生愣了一下。“我代表不了省委第一书记叶飞

同志，不过，我可以将你们的意见转达给他。”

就在这时，一个衬衣上别着“北京大学”校徽的南下学生也跨上了石阶，他绷着脸孔没好声地说：“哼，我们谢谢你的‘好意’，只是我们今天非要见到叶飞同志不可，请你告诉我们，叶飞同志究竟到哪里去了？”

“同学们，叶飞同志是省委第一书记，管的面很广，他到哪里去，我怎么知道呢？”他又是摇头，又是耸肩。

“得了，你甭跟我们来一套捉迷藏游戏了，我们都不是三岁小孩子，哄不了我们。”这个外貌看上去颇为精明能干的北大学生从鼻腔里发出一丝冷笑，又横下脸道，“老实告诉我们，叶飞究竟跑到哪里去了？”

刘永生听这话有些恼火起来，他掉头盯望了那个学生一眼，冷冰冰地回答：“我已经说了，他不在就不在，我也不晓得他究竟跑到哪里去，你们就是等到明天也还是这样。”

“你别一问摇头三不知，连叶飞书记去哪儿你也不晓得，那你这个堂堂的副省长是干什么的呀？”那个厦大“红卫兵独立师”的学生瞪起大眼斥问道。

尽管刘永生这位当年赫赫有名的老游击队员也身经百战，他当上副省长也见过大世面，但是，同这些顽猴般的学生们打交道还是大年初一吃饺子——头一回，况且，他又是一位老实忠厚人，文化水平也低，如何斗得过巧舌如簧的学生们呢？此际，他似乎没有经过大脑的思索，嘴巴里竟漏出了一句话：“吃饭的。”

有句英国谚语说，“话在嘴里是你自己的，话说出口是人家的。”这下可好了，只见一片哗然，又是起哄声，又是嘲笑声，真把刘永生羞得要往石阶缝隙里钻，他知道自己说错了嘴，连忙纠正说：“我刚才是说，工作、吃饭的。”

可是，下面的哄笑声依然不绝，那个北大学生奚落他道：“好一个副省长，连叶飞书记到哪儿也不知道，原来是一个吃饭的酒囊饭袋，哈哈哈。”

刘永生是一个憨厚人，他自知辩不过这群学生哥们，索性闭起嘴来不再吭声，任凭那些学生们怎么围攻他，“我自岿然不动”。

盛夏下午的太阳光仍是十分强烈，炎热的暑气像锅炉一样灼热烫人，简直划根火柴便可以燃着了似的。那些青年学生头顶炎炎赤日，又饿着肚皮，在省委广场静坐了数小时，中暑现象接二连三地发生。由于暴晒，有 60 多位学生晕倒。刘永生不得不和学生们一起在太阳下面晒着。

厦大学生代表在场的全体师生向刘永生副省长提出要求说：“我们要求省委派车将病倒的同学送往医院。”

而刘永生则漠然地乜斜了他一眼，道：“我不是早跟你们说了，叫你们别白等一场，叶飞书记不在家，你们又不听我的话，我有什么办法呀？”

刘永生不说也罢，一言既出，下面的学生就更火起来了，群起而攻之。厦大“红卫兵独立师”头头激动地对场上的群众高声道：“同志们、战友们：我们最最敬爱的领袖毛主席在百忙中，都能够接见首

都的百万革命群众，为什么叶飞同志就不能接见我们呀？我们今天无论如何也一定要见到叶飞同志，不然，我们就是要等到天明，坚持就是胜利！……同志们，大家都掏出《毛主席语录》来，念第156页第一段……”

“这个军队具有一往无前的精神，它要压倒一切敌人，而决不被敌人所屈服。不论在任何艰难困苦的场合，只要还有一个人，这个人就要继续战斗下去。”

“念第159页第二段……”

“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

……

在场的所有的人，纷纷掏出红色语录本，有的连语录本也无须从口袋里掏出，都能倒背如流、滚瓜烂熟地朗读起毛主席语录来，那语录声阵阵不息，如波翻浪涌、涛声震天的海洋。接着，北大学生又领着大伙儿唱起《下定决心》、《要提高我们的勇气》等语录歌，那歌声越唱越激昂，仿佛变成隆隆的雷鸣，震荡在省委大院的上空。

学生们念罢语录、唱罢语录歌，顿时精神倍增，一个个情绪都很激昂、愤慨。这会儿，那个厦大学生头头又伸长脖子，使枣儿大小的喉结整个儿凸出来，他声色俱厉地道：“我们再次向省委提出强烈要求，请省委立即派车把病倒的同学送到医院去，否则，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一概由省委负责！”

下面的群众也跟着嚷起来：

“刘永生，你口口声声说要支持革命群众运动，怎么连一辆车子

也不肯派呀？你真真是吃干饭的！”

“喂，刘永生，你是不是只想当一个口头革命派呀？”

俗话说众怒难犯，大约，刘永生也意识到这些红卫兵小将是得罪不起的，他终于答应了红卫兵们的要求，同意派车子送病倒的同学进医院，接着，他就借口去联系派车的事情溜之大吉，躲进省委大楼里不再露面。

原协和医院派出医疗队到现场，对生病的学生给予抢救治疗，这段插曲才算了结。

第 179 回：绣花针，一句话又遭炮轰　速解围，东海前线红卫兵

29 日下午 15 时许，叶飞带着沉甸甸的脑袋瓜来到了第二会议室参加省委常委会。省委常委们早已等在那里，其中多数也认为叶飞应当出去接见群众，可是，当叶飞一走进会议室，大家都没了话语，而叶飞的屁股在椅子上一坐下，就一动不动，埋下头一根接着一根吸烟。

那些常委们见此情景，既为难，又焦急，大家也只好跟着闷坐在那儿，彼此面面相觑，有的喝着茶，有的抽着烟，那天花板上的乳白色吊扇在转动着，将那腾腾而起的烟雾不断地吹散开……

省委第二书记范式人见这样坐下去也不是办法，他出来打电话到华东局，将这里的情况向华东局作了汇报。魏文伯在电话中对范式人说："你叫叶飞马上来接电话。"

范式人回到会议室，对叶飞说："魏老叫你听电话。"

叶飞这才站起来，到电话室接电话。在电话里，华东局书记处书记魏文伯训了叶飞一顿后说：

"你一定要出去接见学生，无论如何也要出去接见。"

"嗯——好吧，我去。"叶飞出于无可奈何，勉强答应了。

当他回到会议室时，又大发脾气说："去就去，我出去，要把事情全盘都端出来。本来我是叫王于畊去厦门的，厦八中的问题是许彧青、林一心的问题。"

而范式人也被他的话气恼了，冲着他道："你不去，我出去！"

叶飞不满地瞟了他一眼，恼火地说："我又没说我不出去接见！"

而后，他的目光扫视了在座的常委们一眼，心情沉重地道："现

在来不及向中央报告了，如果我回不来的话，由范式人代理第一书记。”他特别叮嘱身边的省委书记处书记梁灵光和省委秘书长李敏唐说，“你们都听见了吧！”

“听见了。”他们二人同时回答。

当省文革小组副组长、福州市委书记郑重听说学生们冲进到省委大院的消息后，连忙召开市常委紧急会议研究如何应变。会上决定，必要时派“东海前线红卫兵”到省委解围。此时，郑重见叶飞真的要出去接见学生们，立即从省委打电话到市委，调“东海前线红卫兵”前来保卫省委。

晚上，奔赴福建省委大院声援和看热闹的群众比白天多了好几倍，把省委大院的广场挤得水泄不通，人们像羊圈里的绵羊紧挨着，你挤我，我挤你，揉成了一个整块儿，散发出大量热量，每个人都成了大火炉，既烤人，也被人烤，豆大的汗珠从额门冒了出来。那些静坐的外地学生尽管已饿了好几个小时的肚皮，但他们益发精神抖擞、斗志昂扬，高唱着一些新近从北京传来的红卫兵战歌：

拿起笔作刀枪，

集中火力斗黑帮，

革命师生齐造反，

文化革命当闯将。

忠于革命忠于党，

刀山火海我敢闯，

革命后代举红旗，

主席思想放光芒。

歌唱毛主席歌唱党，

党是我的亲爹娘，

谁要敢说党不好，

马上叫他见阎王。

杀！杀！杀！嘿！

那阵阵杀气腾腾的歌声像插上了老鹰的翅膀在扑动着，回荡在省委大院的上空，广场上的气氛十分浓烈，似乎可嗅到了刺鼻、呛人的硝烟味。

这时候，两个电工模样的人从省委办公大楼上面牵线拉来了一个麦克风话筒和扩音器。有句古诗云："花如解语应多事，石不能言最可人。"看来，这麦克风话筒的设置也是一种征兆，表明叶飞书记可能要出场亮相了。

到了 19 时多，叶飞在许亚等人的陪同下，终于从省委办公大楼里走了出来，广场上的群众情绪顿时大为活跃，如同一阵熏风吹拂着稻浪，人们争相伸长脖子、踮起脚尖、拥来挤去地观看叶飞书记的仪容。

叶飞还是同 8 月 25 日晚上一样，穿着军装、戴着眼镜。

就在这同一时间，"东海前线红卫兵"总部的几百名红卫兵有组织地从省委的后门冲进了会场，把场上的学生团团围住，像箍桶一样

将所有的人都围困在当中。

会场大哗，气氛陡然变得十分紧张，空气中注满了火药味，两派学生咬牙切齿、怒目相视着，大有剑拔弩张、一触即发之势。

此时此刻，厦大“红卫兵独立师”的头头跑到麦克风话筒跟前，镇定自若地高声道：“同志们、红卫兵战友们：大家都安静下来，不要去理睬他们，我们开我们的会！……首先，让我们共同敬祝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寿无疆！”

“万寿无疆！万寿无疆！”场上所有人连同叶飞、“前线红卫兵”在内，都毕恭毕敬地同声齐喊起来。

“敬祝我们的林副统帅身体健康！”

“永远健康！永远健康！”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期，中国大地特有的宗教仪式完毕之后，厦大的那位同学又往下说：“今天，我们厦大红卫兵独立师、侨大革命造反兵团、林学院、二师范、厦八中、省化工学校等学校的革命师生以及一些南下的大专院校的红卫兵战友们来到省委，声援厦八中师生赴省揪回王于畊的革命行动，我们要求叶飞同志出来接见我们，并回答我们的一些问题。经过我们不屈不挠的斗争，战胜了十几个小时的饥饿、酷热、疲劳种种折磨，终于把省委第一书记叶飞同志给请了出来，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现在，先请叶飞同志给我们说几句话，大家鼓掌表示欢迎。”

说着，那位同学带头鼓起了掌，会场上响起了一阵掌声。掌声刚落，叶飞就对着麦克风话筒讲话了：

“同志们、同学们：首先，我向你们表示道歉，听说你们中午就来到了省委了，要求我接见大家。由于我们正在开常委会，抽不出身来，一直拖到这么晚才出来同你们见面，让同学们等了这样长的时间，非常对不起。

“在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下，广大革命群众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掀起了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同学们，你们不辞辛苦，从厦门、泉州、南平等地赶到省城来，积极参加我省的文化大革命，万炮齐轰宣传、教育界的黑线，我们省委表示欢迎和支持。

“听说，同学们今天来省委要我回答问题，你们有什么问题呀，嗯，不妨提出来，我能够解答的尽量解答，让我们在斗争中共同努力把毛主席著作学习好，进一步掀起我省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新高潮。”

叶飞简短地讲了几句话之后，他人就往后退了一点，掉头瞧了厦大那位同学一眼，双手交叉着贴在肚前，静立着等待下面的反应。

厦大那位同学又把嘴唇凑近话筒大声说：“同志们，我们现在请叶飞同志回答我们的一些问题，下边的人有什么问题要问，可以递纸条到上面来，我们要求叶飞同志给予回答。第一个问题是，今天我们来省委声援厦八中师生揪回王于畊的行动，请问叶飞同志，这个行动是否是革命行动？”

他提完问题便让到一边去，叶飞又迈步到话筒处，回答道：“这个行动当然是革命行动，现在，我们就是要组织全省大中专学生炮轰省教育厅呗。”

“第二个问题是，厦八中革命师生赴省揪王于畊的行动是否是革

命行动？”厦大的同学又继续提问。

叶飞一手按在麦克风话筒上，稍稍迟疑了一下道：“这个……我们省委是坚决支持厦八中革命师生的革命行动的，革命吧，就不能那样斯斯文文，规规矩矩，正如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所教导的那样，‘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绣花针，不能那样雅致……’”

可能是叶飞一时紧张、一时疏忽、一时忘却，竟把毛主席的原话“绘画绣花”说成了“绣花针”。言者无意，闻者有心。那些学生们一天到晚念着语录，背得比和尚念经还滚瓜烂熟，自然他们如若自动监视仪一般的灵敏。当叶飞刚说错了嘴，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场上的学生一下子全轰了起来，就像打开水库闸门急流奔腾一样，人们哄叫着，嘲笑着，聒噪的声浪吞没了叶飞的声音，只听见有几个学生撕破喉咙高喊着：

“叶飞篡改毛主席语录罪该万死！”

“谁反对毛主席就打倒谁！”

面对这突然爆发的火山，叶飞愣住了。想他的父亲年轻时就漂洋过海到南洋谋生，在他还只有 5 岁的时候，便被送回祖国念书。在大革命的年代里，他还是一个中学生就投身于滚滚的革命洪流中去。大革命失败后，刚满 18 岁的他就已是一个独当一面的党的工作者。

秋收起义的枪声响了，暴动、火把、梭镖、大刀、乌统，百千颗人头攒动着，“冲呀！杀呀！”的呐喊声惊天动地，他领导了多次暴动起义，点燃了福建省武装革命斗争的熊熊烈火。在中央红军被迫长征之后，他率部在敌后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抗日战争爆发后，

他在新四军军长陈毅部下任团长、旅长、师长，率部转战苏北、苏南、浙西，东进、东进、东进！电影《东进序曲》里晃动着他的身影，著名的黄桥决战有一份他用鲜血染成的英雄业绩，他至今仍清清楚楚地记得那场战斗是多么的激烈，炮弹爆炸冒起了一根根黑色烟柱子，把大地炸得到处都是坑坑洼洼，连续不断的密集的枪声噼噼啪啪地响着，无数的铁盔，吼声，刺刀见血，汇成了一曲悲壮的战争交响曲。他也不知道打退了敌人多少次的进攻，突然，一颗子弹打中了他的胸膛，他只觉得种满庄稼的大地在旋转着，一切都在旋转着，他倒了下去。当他醒来时，已是在救护所里。

他九死一生，时至今日，那颗子弹还留在他的肺部没取出来，算是一个永久的纪念吧。

在解放战争的隆隆炮火声中，他任纵队司令和兵团司令，挥师南下，把蒋介石赶出了中国大陆……

他为自己的革命一生感到自豪，这是光荣的不朽的足迹呀！但是，往事毕竟是不可再现了。而眼前发生的一切又是多么不可理解，这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烈火烧呀烧啊，竟然烧到自己妻子和他自己的头顶上，这是老革命遇到新问题吗？也许是，但这新问题确实太难理解了，已知的事物变成了不可知的黑洞，从前的真理变成了谬误，从前的谬误又变成了真理，他陷入于迷惘与困惑之中。

他不是不拥护这场文化大革命，难道毛主席亲自发动、领导的这场文化大革命，他还有不拥护之理？只是无论如何革命总不能竟革到自己的头上来呀？

在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他受到了毛泽东的批评，一方面他感到委屈，另一方面他也真诚地认为是自己错了，决心痛改前非，跟上运动形势。可是，想不到今天那些红卫兵小将们居然抓住“绣花针”这一小辫子，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竟喊出了“罪该万死”、“打倒”等口号，这叫他怎么不恼火？

豆大的汗珠从叶飞的额上冒了出来，他当了这么多年的省委第一书记，还是头一回如此狼狈不堪，委屈、憋气、无名的火，全一股脑儿地涌上心头，他恼羞成怒地嚷道：“哼，难道我是黑帮么？如果我是黑帮，一定自己把自己打倒，一定要发动大家把我打倒。可是现在党中央毛主席还没撤我的职，省党代会还没撤我的职，因此我要照常工作，对党中央、对毛主席负责，对人民负责。同学们呀，我们省委是不是共产党省委？省委的话要不要听？”

这时，那个北大学生手里拿着一叠纸条，他瞟了马为一眼，揶揄道；“哼，你不如问旧北京市委是不是共产党市委，难道你叶飞就是党的化身吗？什么‘绣花针’、绣花线的，这连小学生都会倒背如流的语录，可是，我们堂堂的省委第一书记居然说错了，真是一个遗憾的笑话，笑话的遗憾。我们奉劝叶飞同志今后要认真读毛主席的书，免得再出洋相。……这里，下面的人递上来许多纸条，要求叶飞同志回答，我先把这些条子念一念。……‘叶飞同志，是你派来这许多‘前线红卫兵’来护驾的吗？你想干什么呀？是不是想挑动群众斗群众？——华侨大学革命造反兵团一战士’。另一张纸条道，‘最近，毛主席号召我们要炮打司令部，请问叶飞同志，我们的省委可以不可以炮打，

你可以不可以炮打？——厦大红卫兵独立师一红卫兵战士’。还有一张纸条道……”

北大这位同学还没念完条子，只见福州一中的一队“东海前线红卫兵”冲到台阶上去，一把夺过了麦克风话筒……会场顿然像狂飙骤起，波翻浪涌，陷入混乱之中，噪声直上云霄。那些“东海前线”的红卫兵们为出其不意地夺下了话筒而欢呼雀跃，他们高喊着：

“只许无产阶级造反，不许资产阶级翻天！”

“誓死保卫无产阶级司令部！誓死保卫省委！”

而广场上那些厦大、侨大、厦八中的学生们被“东海前线红卫兵”的冲击行动激怒了，人们都把一肚子的火气发泄到了叶飞的头上，迸出了狮子般的吼声：

“舍得一身剐，敢把叶飞拉下马！”

“炮打省委！炮打叶飞！”

双方为抢夺话筒发生冲突，叶飞乘此机会，悄然无声地又退回省委办公大楼里去。这时，一个厦门大学“红色厦大红卫兵”的女同学对着麦克风话筒，激动地涨红着脸道：

“革命的同志们、红卫兵战友们：今天，在一小撮阶级敌人、反革命狗崽子的煽动下，一些不明真相的群众来到省委聚众闹事，破坏、扰乱省委机关的正常工作秩序。他们名义上是来要求叶飞书记接见，实际上是对省委进行示威，他们自己带了草帽却偏偏不戴，给开水也不喝，竟说有毒，给馒头也不吃，甚至，他们还冲进机要室，占领电话机，他们究竟要想干什么？难道这就是所谓的革命行动吗！不，这

一百个不是，一千个不是，一万个不是，他们是企图打乱省委的统一部署，破坏炮轰宣传、教育界万人大会的顺利召开，转移斗争大方向，借着‘炮打司令部’的名义，把矛头指向我们的省委，指向我们敬爱的叶飞书记，炮打无产阶级革命司令部，猖狂地进行阶级报复，我们决不能容许他们这样干，要彻底揭穿他们的阴谋诡计，只准无产阶级造反，不准资产阶级翻天……”

她的演说赢得了场上“东海前线红卫兵”的一片狂热的掌声，而静坐的那些外地学生则喝倒彩，乱起哄，几个侨大的侨生嚷起来：

“放你的狗屁去，我们就是要造省委的反，造叶飞的反！”

“阿保快滚蛋，阿保快滚蛋！我们要开我们的会！”

华侨大学是侨生成堆的地方，当时，侨生是可以同狗崽子划等号的，因此，那些“东海前线红卫兵”就拿他们开刀，只见那些中学生们高喊着“只许无产阶级造反，不许资产阶级翻天！”、“砸烂狗崽子的狗头！”等口号，冲进了侨大“革命造反兵团”的队伍中，霎时间，在混乱的咆哮中，跳起了混乱的拳头，辩论、谩骂、围攻、殴打，文斗加武斗，到处都是旋涡，狂涛沸腾，甚嚣尘上。谁也无法控制局面，那些前来增援的“东海前线红卫兵”越来越多了，形成了多数人对少数人的围攻。

## 第 180 回：保省委，急动员工农上阵　大辩论，榕城内人潮汹涌

叶飞退进大楼后，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他兴奋地对人道："我打了胜仗，我就是硬跟他们斗的。"

由于外面还在骚乱，他躲在楼里不再公开露面，但却不时地从办公楼二楼的窗口探头窥视下面的情况，他为还有这么多群众真心实意地拥护他感到宽心欣慰，不再像接见前那般忧心忡忡了，他特别欣赏那位"红色厦大红卫兵"女同学的演说，亲自在办公楼里召见了她，并对新华社分社一记者说："她讲得好，她是我省的董小海。"董小海是当时空军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深夜两点多，当叶飞离开办公楼时，再次同那位女同学亲切地握手告别。

省委办公厅副主任特地交代《福建日报》记者要替那位女同学拍张照片，写一篇报道，说："这个女同学是个闯将，没有讲稿讲得很好。叶飞同志交代明天要发一版，并登她的照片。"后来，因为省委第二书记范式人的反对才作罢，范式人不以为然地道："不要以为打胜仗了，这算得了什么胜仗呀！"

辩论无休止地进行下去，夜渐渐地深了，场上围观的群众也散去了不少。

就在这天夜里，福建省委大院的事情还没有完结，福州市委第二书记郑重即在市委 7 号楼召开各机关、工厂、公社和各区负责人参加的紧急会议，布置应对学生闹事的办法。会上决定：各工厂、公社迅速成立"赤卫队"，任务是"自卫"、"以红对红"，并且，还决定出动一万工人、二千农民和学生上街，进行宣传、辩论和斗争。

郑重还让福州市文教口武装部政委组织福州市二中的“东海前线红卫兵”连夜赶写《紧急呼吁书》。 《呼吁书》号召：“全市广大革命的工人阶级、贫下中农、革命师生及其他革命同志，立即行动起来，共同声讨八·二九反革命暴乱事件，誓死捍卫党中央，捍卫毛主席，捍卫无产阶级专政，捍卫十六条，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为了赶印《紧急呼吁书》，福建省文革办连夜多次打电话到福州市第一印刷厂，安排印刷事宜。他们还派员特地前往面洽，要求印刷厂以最快的速度，印出 30 万份《呼吁书》，发到全省各地。印刷经费由省委负担，并另拨 5 吨纸张供印刷用。

印刷机的圆筒飞快地旋转着，一张张雪片般的传单印刷出来了……第二天清晨，和报纸版幅同样大的铅印传单：市二中《紧急呼吁书》出现在福州市的街头巷尾。其他一些学校、工厂、省市级机关跟着大量翻印，许多内容相似的“紧急声援书”几乎同时出现在福州市各个角落。

但是，《八·二九行动好得很》的大字报、大标语也出现在福州市街头，一时间，枪对枪，矛对矛，针尖对麦芒，好不热闹。

30 日上午，郑重等人又在市人委的小礼堂召开会议，他说市二中《呼吁书》说的全部是事实，仅电台一事有些出入，接着，他又罗列了外地来省城串连的学生一系列罪状，慷慨激昂地道：“那些学生们打着‘造反’的旗号到省委闹事，要炮轰省委、炮轰市委，我们决不能让他们的罪恶阴谋得逞。我们市委号召广大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干部、革命学生立即行动起来，各工厂、各公社、各区都要组织工人

赤卫队、贫下中农赤卫队，学生要串连上街示威游行，我们也要上街游行，宣传十六条，同他们辩论、斗争，他们要闹多久，我们也要跟他们干多久，我们要以红对红，针锋相对地同他们斗争到底……”

于是，数以万计的工人、农民如潮水般地涌上街头，他们的手臂上都戴着崭新的统一规格的“工人赤卫队”或“贫下中农赤卫队”的红袖章，像百川归大海一样从四面八方都涌到了通往省委的路上，那打着大旗、喊声震天动地的工人、农民用头颅填满了街道，前望不到头，后看不见尾，整个福州市成了人的海洋。

这股汹涌澎湃的声援浪潮，前推后拥着，如蚯蚓一般缓缓地蠕动着，好不容易到了省委。省委大院又一次大涨潮，一眼望去，尽是黑压压的人头攒动，不过，昨日的那些外地学生几乎不见了踪影，取而代之的是穿工服的工人和穿褂子的农民。

下午出来接待这些工人、贫下中农“赤卫队”的还是那位年迈的副省长刘永生。如果说昨天他的胆子是吊到了电线杆上去，那么，今天他的胆子可是安安稳稳地嵌在自己的肚皮里，他不再是蹙起双眉，而是畅心地眉开眼笑了，眼睛眯成了一条细缝，脑袋摇摇晃晃着，皱纹似乎也少了几条，仿佛一昼夜他就年轻了几岁一般。他看到了工人的力量，农民的力量，感受到了一种推波助澜的巨大力量。他仍用那漏风的牙齿说道：

“我们省委感谢工人、贫下中农同志们对我们的支持，衷心地感谢你们，你们太好了！你们最听毛主席的话，最听党的话，最拥护毛泽东思想，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主力军。你们坚决执行《十六条》，

发扬敢想、敢说、敢干，敢冲、敢闯、敢革命的无产阶级革命精神，积极投入于文化大革命的滚滚洪流，使这场伟大的革命运动出现了新高潮。红卫兵和革命师生要以你们工农兵为榜样，虚心地学习你们的坚定的革命立场和革命精神，学习你们的优良作风和丰富的斗争经验……”

场上爆发出一阵掌声和口号声，巨大的声浪向着高高的天空呼啸而上：

“只准无产阶级造资产阶级的反，不准资产阶级造无产阶级的反！”

“要革命的团结起来，不革命的滚开，反革命的打倒！”

这时，一辆卡车载着几个大学生向一支声援的农民赤卫队的队伍及路人散发传单，那雪花似的传单在人们的头顶上纷飞，传单的题目是《事实胜于谎言》，侨大“革命造反兵团赴省战斗团”署名。

人们还没有读完传单，只见十几个五大三粗的青年农民冲上前去，将那辆汽车拦住了。随后，更多的赤卫队员蜂拥而上，把车子里三层、外三层地围了起来。

“下来，下来，你们统统下来！”农民们大声喝道。

“你们为什么要拦我们的车？”

“光天化日之下，明目张胆地拦截人家的车，简直就是强盗的行径，还宣传屁个《十六条》！”车上的大学生们愤怒地质问。

“啊——你们竟敢污蔑我们贫下中农是‘强盗’，还恶毒攻击我们宣传《十六条》，狗崽子，快给老子滚下来！”那些青年农民也怒不可遏地破口大骂。

“我们为什么要下车？你们凭什么权利叫我们下车？” 大学生一个个怒目圆睁。

那些青年农民们不管三七二十一，嘁哩喀喳就把后面的车厢栏给放下来，爬上车轰赶车上的大学生： “下车，下车，统统下车！”

大学生一个个赖在车上不肯下来，他们抗争着：

“不，我们不下车，这根本不叫做辩论，而是绑架、围攻！”

“你们要动武？……我就是站着不动，你别推搡我，撕破我的衣服要你赔！”

然而，到底是寡不敌众，几个大学生有的被拉下车，有的被推下车，一些男生力图反抗，重则挨拳打脚踢，轻则衬衣的纽扣被扯掉了，他们终于被全部从车上撵了下来。

这会儿，更多的赤卫队员把侨大学生密密匝匝地围困在当中，一个干部模样的人声色俱厉地盘问学生道：“你们是哪个学校的？是什么成分？”

“我们是华侨大学的学生。”

“你们是什么成分？每一个人都要报成分！”一个理寸头的青年农民气势汹汹地逼问。

大多数大学生都保持沉默着，只有一个戴白边胶框眼镜的小伙子顶撞说：“我们为什么要报成分？你们是什么成分呀？”

那个理寸头的青年农民用手拍拍胸膛，很得意地大声道："我是贫农，三代血统的贫农，堂堂正正的贫农，天然的革命依靠对象。"

"你们必须报成分，不报成分就是狗崽子！"

"谁说我们是狗崽子呀？天底下哪有如此之多的狗崽子、狗杂种呀？"

"你们就是狗崽子，华侨大学是狗窝，是狗崽子成堆的地方！"

"什么侨生，统统都是资产阶级公子小姐，是地地道道的资产阶级狗崽子！"

那些青年农民群起攻之。

"不许你们污蔑我们华侨，我们华侨大多数也是劳动人民出身的，是热爱我们社会主义祖国的，怎么是资产阶级狗崽子呢？"

"谁说我们侨生就是狗崽子？我也是无产阶级出身的，我父亲是橡胶园的工人，是无产阶级，怎么样，比你们更革命吧？"侨大学生们也奋起反击。

辩论无休止地进行下去，那些大学生被不计其数的赤卫队员们分割开来，一张嘴要同时对付好几张嘴，难以招架……

30 日中午，在省教育厅南下学生接待站的门口，有两位北京大学的学生在那里慷慨激昂地发表演说，指控福建省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搞得冷冷清清，像死海一样"，"糟透了，是全国最糟的省份之一"，鼓动要掀起一个"炮轰省委，炮打叶飞同志"的高潮。

中午 12 点多，刚刚游行了一上午归厂不久的福州市阀门厂“工人赤卫队”，又接到市委的紧急电话：“在省教育厅门口有南下学生在进行反动演讲，请你们务必立即前去占领阵地……”

于是，在厂长、工会主席等人的亲自带领下，市阀门厂工人赤卫队又敲锣打鼓地赶往省教育厅。

这时儿，北京大学中文系三年级学生林希正站在一条长板凳上，用着抑扬顿挫的声调在演讲：“这场由毛主席亲自发动、并在毛主席直接领导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是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各级领导、一切人都要在运动中经受考验，而后决定取舍，河北省委是这样，湖北省委是这样，其他各省委是这样，福建省委也当然是这样！

“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除了我们最敬爱的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外，其他的一切当权派，不管他是县级的，不管他是中央一级的，也不管他是省市一级的，都可以怀疑，都可以反对……”

这位大学生的滔滔不绝的演说尚未结束，市阀门厂“工人赤卫队”的队伍就赶到了现场，故意把锣鼓敲得震天响，这位大学生大声地斥问阀门厂工人：“你们这班人要干什么？又想来破坏‘四大’自由吗？是谁唆使你们来的呀？”

锣鼓声戛然停止，一个 30 岁左右的工人挤到前面，大声说道：“你别血口喷人，我们工人阶级是主人翁，是文化大革命的主力军，我们是上街来宣传《十六条》的，是要跟你们辩论的！”

“哼，你们要辩论？那就来辩吧，真理是越辩越明的！……请，就请你们上来先发言吧！”大学生装出豁达大度的模样，随即跳下长凳。

而那个工人也当仁不让地踏上长凳，激动地放开嗓门道：“同志们，革命的战友们：毛主席说，‘根本的革命力量是工农，革命的领导阶级是工人阶级。如果离开了这种根本的革命力量，离开了工人阶级的领导，要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是不可能的。’我们工农兵群众是这场文化大革命的主力军，如果离开了工农兵群众，要取得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但是，你们这些来历不明的外地学生却放着本单位的走资派不批不斗，竟像流窜犯一样流窜到我市来。你们不调查，不研究，下车伊始，就哇啦哇啦地放屁一通，造谣惑众，煽风点火，制造混乱，浑水摸鱼，企图把斗争矛头指向无产阶级战斗司令部——我们的省委，指向我们敬爱的叶飞书记，以达到其不可告人的目的。你们俨然以‘救世主’、‘钦差大臣’自居，想在我们工人阶级的头上挥舞指挥棒，呸！我们奉劝你们滚蛋，快滚蛋，滚你妈的蛋！……”

他的发言赢得了“赤卫队”的热烈掌声，当他讲完话后，另一位小个子的北京大学学生邱炳康想上去驳斥他的发言，可是，当地的赤卫队员蜂拥上来，将这几个外地学生团团围住，根本不让他们再发表什么演说。

“你们这是干什么？既然要辩论，为什么不让我讲话？难道只许你们工人赤卫队放火，就不许我们革命学生点灯吗？真是欺人太甚了！”大学生高声抗议。

“谁不让辩论？我们就是要跟你们辩论的，你们放的毒连空气也污染了，我们工人赤卫队要进行彻底的消毒！”

“你们在这里散布反动言论，阻塞交通，扰乱社会秩序，我们工人赤卫队有权予以干涉！”

“我们工人阶级是主力军，不需要什么‘救世主’、‘钦差大臣’，你们是不受欢迎的人，快滚回去！”

赤卫队员们七嘴八舌地嚷嚷着。

辩论变成了短兵相接的混战，十几个北京师范大学、北京钢铁学院的学生闻讯赶来支援他们的伙伴。

那些阀门厂赤卫队员们见南下学生们人数骤增，带队的厂长赶忙叫工会主席去打电话向总部告急，要求搬兵驰援……

道路被堵塞，汽车排成长蛇阵缓慢地开动着，不计其数的自行车夹在缝隙当中或尾随车后，有好些人甚至就牵着车停下来干脆不走，伸长颈脖在听辩论。

“赤卫队”的援兵陆续地赶到了，阀门厂赤卫队员们士气大振，一场更为激烈的辩论展开了，更多的路人停下来围观，大家越挤越紧，热得浑身直冒汗，令人感到一种窒息的闷热，但是，谁也都不愿意离开。

日薄崦嵫，暮色悄然无声地降落在繁华喧闹的市中心区。经过数小时的撕喉咙、扯嗓门的大喊大叫，辩论的双方都感到精疲力竭，一个共产主义学校“前线红卫兵”小头目模样的学生便建议辩论会暂时休会，晚上 20 时地点移到市少年宫门口继续举行。对于这一合情合理的建议，南下学生表示同意。

晚 20 时，福州市少年宫门口已是人山人海。“工人赤卫队”在市少年宫的门口摆了一张大办公桌，作为辩论讲桌之用，他们还牵来电线，安装了数盏几百支光的大灯泡，把会场照得如白昼一般通明。一眼望去，会场前面黑压压的一片尽是“工人赤卫队”、“贫下中农赤卫队”和“东海前线红卫兵”的人，他们有秩序地席地而坐。

市少年宫就在市委附近，这个辩论会也惊动和吸引了市府里的大小干部，他们纷纷跑来听取辩论，其中还有福州市委书记和市长，他俩各端了一张小凳子，坐在灯光照不到的阴暗角落里，尽量避免引起人注意。

南下学生也串联了一些同伴来，不过，他们加在一起还不到 50 人，力量的对比是悬殊的。

辩论的结果是没有悬念的，一边倒。几乎没有南下学生的发言机会。辩论会实际上变成了声讨会。

当晚，除了市少年宫门前的“辩论会”外，市里其他地方还发生了多起围攻少数派学生的事件。在东方红百货商店的门口，由“东海前线红卫兵总部”组织的另一场“辩论会”，也对 5 个外地来串联的学生展开围攻，一直斗争到次日凌晨 4 点多方告结束。

这天晚上，福州市委市委还到火车站阻止学生北上进京。

福州市开往上海的46次列车是晚上20时10分发车。发车前，近千名身穿军装、带红袖章的“东海前线红卫兵”包围了整个车站，他们列队把守在通往月台的大门口和所有车厢的门口，仔细地盘查要上车的旅客，这情景使人不由地联想起电影《列宁在一九一八》里的某些断面，列宁从芬兰秘密乘火车回到了彼得堡，在彼得堡车站上也是宪兵和密探密布如林，戒备森严……所不同的是一个查下车的，一个则查上车的，一个是白色恐怖，一个是红色恐怖。

那些“前线兵”们遇见学生模样的人便当场扣留下来，不让上车，他们大声说道：“我们是执行省委命令的，去北京的人在身份没有查清以前，一个也不能去！”

“我们按条件办好了手续，为什么也不让走？岂有此理！”那些要北上串连的学生们抗议道。

“妈的，不让走就是不让走，这是省委的命令，你们瞎嚷嚷什么呀！”前线兵们高声叱之。于是，双方便争执起来，站台上到处都是乱糟糟、闹哄哄的，陷入一片混乱不堪之中。

这天晚上要北上的学生几乎全部被拦截下来，去不成北京。46次列车也为此而晚点一个多小时才发车。

第 181 回：多与少，闽常委争论激烈　揭内情，《福州日报》再起事

8 月 30 日晚上，在福建省委第二会议室里召开省委常委会，讨论、研究近日的省市运动形势问题。天花板上的大吊扇以最高档的速度不断旋转着，驱除着人体散发出的热量和腾腾烟雾。在那长长的大会议桌上，铺着一块天蓝色的桌巾，有几份铅印的市二中《紧急呼吁书》以及一些声援《紧急呼吁书》的传单散乱地摊在桌上，上头用烟灰缸和建白瓷杯压着，被风吹得沙作响。

省委第二书记范式人瞥望了桌上的那些传单一眼，用力地把小雪茄烟蒂往烟灰缸里重重地掐灭，他的音量不大，但却铿锵有声地道："同志们，大家都看一看这些传单，尽说些什么呀？说昨天发生的事件是'反革命暴乱事件'，是'匈牙利事件'，究竟昨天出了什么事呢？无非是学生们来省委，要求叶飞同志出来接见他们，这有什么了不得呀？红卫兵小将又不是反革命暴徒，却视如洪水猛兽，我们毛主席的老兵居然如此害怕毛主席的红小兵，简直不可思议，本来，我们共产党和老百姓就是鱼水的关系，要是没有广大老百姓拥护我们，我们共产党怎能打下江山、并坐了江山呀？可是今天，革命学生要求接见，却'千呼万唤始出来，犹抱琵琶半遮面'，才捅出了这么个大乱子。现在，这印刷精美的呼吁书又说昨天的事情是'反革命暴乱事件'，不知是谁搞的鬼名堂，太不像话了！"

省委书记处书记、省长魏金水也用慢条斯理的腔调说："这些传单的观点显然是十分错误的，是歪曲事实真相的，所起的影响也是极端恶劣的。他们呼吁，究竟呼吁什么呀？我们可不要他们帮倒忙，我

提议咱们省委应该发表一个声明，肯定‘八·二九’是革命事件，而不是什么‘反革命暴乱事件’……”

叶飞不满地瞟了他们一眼，不以为然地说：“恐怕未必是‘无可非议’的吧，大可议一议，不错，我们是应该要支持革命小将的，但是，必须知道‘前线红卫兵’他们也是革命小将啊，而且他们是多数派，我们总不能因为要‘保护少数’，便去曲意逢迎少数派，却抛弃多数，这岂不成了抓了芝麻丢西瓜？”

“正是，叶飞书记所言极是，我们不能置多数人的利益而不顾，‘前线红卫兵’、‘工人赤卫队’、‘贫下中农赤卫队’这些革命群众组织人数最多，他们是真正的革命小将和文化大革命的主力军，是我们依靠的对象，我们的铜墙铁壁。他们的观点代表了全省大多数人民的看法，尽管《呼吁书》所说的情况与事实略有出入，但根本谈不上什么歪曲事实真相，《呼吁书》是反映了广大革命群众的强烈呼声和愤慨情绪，说明了人民和我们是心心相印的。对于多数派红卫兵小将们的革命热情，我们不能漠然无睹，更不能往他们的头上泼冷水。依我看，我们省委还是不要急于表态，暂时先不要发表什么声明，这样，弄不好反而被栽上挑动群众斗群众的罪名……”说话的是福州市委书记郑重，虽然他不是一个省委常委，但因为他是市里的事实上的第一把手，所以也列席了省委常委会。

范式人的那双眼睛透过镜片扫视了叶飞和郑重一眼，又道：“当然，对于多数派革命群众的革命热情是不应该泼冷水的，但是，真正的帮助是要引导他们往正确的道路上走，而不是放任自流，眼看着他

们犯错误。我们必须劝说他们，制止他们的胡作非为，倘若照这样子闹下去，只要三天，中央就会派人来改组省委，到那时候恐怕诸位便不那么轻松了。我很后悔昨天千不该、万不该，竟主张调遣‘前线红卫兵’来省委维持秩序，非常遗憾的是，这些人不但没有维持好秩序，相反的却扰乱了会场，捅出了这么个大乱子，对此，我愿意承认错误，并做深刻的检讨。叶飞同志，你也说说，昨晚你在接见时不是公开承认说学生们的行动是一种革命行动吗？那么，现在我们省委再次重申这一立场和观点为什么不可以呢？”

“啊——这个啊，”叶飞显得有些支吾。“昨天晚上我说过是革命行动，不过，对于‘革命行动’，各人还是有各人不同的解释，各人有各人不同的看法呗。我们应该要慎重一点，也必须要考虑到多数派，多数派还是支持我们省委的吧。”

“如果多数派的观点是错误的，难道你也要支持吗？在真理的问题上，少数人和多数人的概念是没有任何意义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党代会时只有 12 个代表，代表着全国 50 多个党员，可是，他们却代表着四万万五千万人民的根本利益。伽利略在宗教法庭上不也是只有一个人吗？而真理却掌握在他的手里，地球就是围绕着太阳在转吧。我们最好还是讨论究竟谁是谁非，不要在多数派、少数派的问题上纠缠不清。” 范式人辩驳说。

常委会上，出现了两种对立的观点，常委们在激烈地争论着，有些相持不下，如同冷、暖气团长期交绥而下起梅雨一般。这时，省委书记处候补书记、副省长许亚提出了折中方案说：“这样吧，既然有

人认为发表书面声明是不适宜的，那么，我看是不是改成用口头声明的形式，通过市广播电台的有线广播，由叶飞书记发表一个讲话，肯定学生们昨天的行动是革命行动，这样省委可以争取了主动，也消除了两派革命群众之间的不必要的敌对情绪，大家团结起来，共同对敌，把我省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推向前进。”

由于大多数常委与叶飞持不同的意见，少数服从多数，叶飞也只好同意用口头声明，承认“829”行动是革命行动。这一天的常委会一直开到次日凌晨 3 时多，才告休会。

8 月 31 日，省委召开南下串连学生约 1000 人的座谈会。叶飞、梁灵光在会上阐述省委对“829 事件”的态度，认为“829 事件”不是反革命事件。

然而，叶飞的思想实际上是不通的，他觉得这一次他的同事们居然群起攻之，“造”了他的反，完全出乎他的意料之外，他感到十分憋气、恼火、委屈，突然产生了一种众叛亲离的孤独感，他的心往下沉，仿佛跌进了一个深不见底的大峡谷。31 日晚，他打一个电话到上海，向华东局的魏文伯诉了一番苦，说：“8 月 30 日常委会的空气很不好，常委会分裂了。现在不能不让群众说话，而要让群众说话，就要召开中、小型街头辩论会……”

魏文伯听罢，表态道：“我们尊重你们省委的意见，可以召开中、小型辩论会吧。”

叶飞听了魏文伯的表态，兴高采烈地对来他家串门儿的郑重说：“华东局也同意我们召开中、小型辩论会的意见，我们要大干起来。

现在要组织工人才有办法，上海组织工人的经验很好，我们要学习，学校也要组织学生起来，这样才能对付捣乱的学生。我说过‘829 事件’是革命事件，但是，各人有各人的解释吧，为什么是革命的事件呢？把他们瓦解了，长了无产阶级志气，灭了资产阶级威风，这当然是一件大快人心的革命事件啊！”

9 月 1 日下午，在《福建日报》报社门口旁边的墙上一个高大的木架子上，贴出了一张顶天立地的大字报，是用报社才有的特大张新闻纸写的，题为《福州市委公然镇压学生革命行动，郑重出谋划策，坐镇指挥，赵宗信、王一平赤膊上阵》，署名是“《福建日报》社革命职工造反队”。

这张 998 字的大字报指控说：

“福州市委一些负责人公然煽动工人、农民和学校师生对革命学生进行围攻。继 8 月 29 日在省委机关里组织学生斗学生后，30 日又组织一些不明真相的工农群众，挑起一场更大规模的群众斗学生的严重事件。他们封锁道路、控制交通，千方百计地阻挠革命学生上北京见敬爱的领袖毛主席。30 日晚上，在市委 7 号楼会议室里，郑重得意忘形地对省计委两位负责人说：‘现在南北交通都控制起来了，有些学生要步行北上，也已组织队伍去拦阻了，他们就是插上翅膀，也飞不出我的掌心。’同日晚上，市委书记处书记赵宗信带了秘书、随员，乘黑色小轿车亲自到火车站现场指挥，市委书记处候补书记、副市长王一平也赤膊上阵，在树兜调度贫下中农赤卫队赶赴火车站阻挠革命学生北上。东南师院中文系和师院附中的 27 名同学，上北京意

志坚，决心步行去京，但当他们绕道避过重重阻挠，走到马店区茶园大队时，又被根据上级电话命令赶来的贫下中农赤卫队和前线红卫兵围住，并被非法扣押 18 小时。从上述事实，不难看出福州市委一些负责人是‘830 火车站事件’的策划者和主谋者。”

原来，《福建日报》社的一些干部、工人是受到毛泽东主席在 8 月 31 日接见 50 万红卫兵和革命师生的消息的鼓舞，他们根据目睹和群众来信揭露的事实，由 8 月 30 日火车站现场采访记者执笔，赶写出了这张大字报，分别贴在报社门口、省委门口、市委门口、火车站等处。

9 月 1 日晚上，又在省委第二会议室里召开了省委常委会。因为有了魏文伯的电话，这次会议的氛围与前天晚上截然不同，主要由叶飞一人在说话，他侃侃而谈：

“前天晚上常委会的气氛是不好的，一些同志表现得不够冷静，对当前阶级斗争的严重性估计不足，过于片面地强调要保护少数派，这是不妥的。昨晚上我和魏老通了电话，汇报了常委会的情况，华东局也同意我们的意见，可以组织街头中小型辩论会，让群众充分说话，自己教育自己。现在，我们省委面临着尖锐的阶级斗争，不应该搞合二而一，和稀泥是不行的。多数派是革命的左派，是支持我们省委的，我们不能束缚左派的手脚，不能丢掉多数派，否则我们就会垮台。对于那些少数派应该要区别对待，有些人确实就是右派呗，我们不能笼统地提什么保护少数。

“刚才，有人给我看了《福建日报》社几个人写的大字报的抄样，

这些人终于迫不及待地破门而出了，很好呗，到底是暴露了，同时，也说明了我们省委机关干部的阶级斗争观念太差了。《福建日报》社是一个马蜂窝，是文化大革命的重点，五届之一的新闻界，里面形形色色的人都有，问题十分复杂。这张大字报的出笼绝不是一个偶然的现象，是坏人在捣鬼，……”

范式人发言说：“如果华东局也同意举行街头辩论会，那么，不妨就组织辩论会吧，不过，应该要提倡一种民主的气氛，不能以势压人，而要以理服人，让群众发表各种不同观点、看法，在辩论中求得真理、提高觉悟，达到革命的团结。对于少数派，我认为还是应该要保护的，这是十六条明文说的么，‘即使是真正的右派分子，也要放到运动的后期酌情处理。’特别是那些厦八中的学生要保护……”

常委会后，省、市委作了分工，侨大、厦大、林学院方面由省委组织人和他们辩论，报社则由市委组织人和他们辩论。

9 月 1 日这天，那 27 名在 8 月 30 日、31 日被茶园大队“贫下中农赤卫队”扣押的师院中文系和附中的学生，回校后串联了一部分同学，约有近百人整队前往省委，强烈抗议茶园大队“贫下中农赤卫队”扣押学生的非法行为，并且，要求省委给他们开证明，准许他们上北京串联。省委秘书长接见了他们，他以大人物的豁达大度听取了学生们的慷慨陈词，表示要将这些情况向省委反映，并同意给他们开上北京串联的证明。

这些学生们如愿以偿，便排好队伍出了省委。谁料到，他们还没走多远，队伍就被急行军赶来的市阀门厂“工人赤卫队”、市三中等

学校的“前线红卫兵”的队伍拦截住了，这些赤卫队员、东海兵们要同他们进行“辩论”。于是，两边的队伍都散乱了，陷入于混乱的唇枪舌剑之中，狭窄的道路被无数旋涡般的人圈圈堵塞住了。

愈来愈多的“工人赤卫队”、“前线红卫兵”奉命驰援他们的伙伴，少数派学生在人数上处于绝对的劣势。见此情景，师院一位中文系学生当机立断，决定把队伍拉走。只见他高举双臂挥动着，对他的伙伴们高声喊道：“同学们，我们不要再同他们辩论下去了，大家都排好队伍，手挽起手来，昂首挺胸走我们的路！”

说着，他便带头跟旁边的两名同学手臂挽着手臂，少数派学生迅速地就近排成队伍，四个人一排，手和手、胳膊和胳膊都紧紧地互相拉着挽着，犹如铁链一般紧相连，成为一只造反的怪龙，这头怪兽伸出了一百个被同一观点联结在一个躯体上的头，一百双眼睛同时喷出了怒火，一百颗火热的心在熊熊燃烧着。而那些多数派们更加眼红了，他们一边大声地喊叫着，一边拼命地推搡少数派学生，企图冲散刚排好了的队伍。这当儿，不知是谁领头唱起了《团结就是力量》这首歌，这样，这歌声便豪迈地、大胆地、极其有力地、迅速地荡漾开来，所有的少数派学生都放声高唱着：

团结就是力量，

团结就是力量，

……

这首 1943 年就有的老歌，大家不知道唱过多少回了，然而今天，他们仿佛是第一次听见一般，心头被震撼了，热血在血管里沸腾起来，

因袭下来的各种感情重负都被烧得一干二净，任何畏惧的心理都被歌声所驱除，他们手挽手、肩并肩，昂首挺胸，满怀着战斗的豪情和希望，在这雄壮激昂的歌声中迈进着……

白居易的《琵琶行》中有一句著名的诗句："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而今时代变了，这诗句也被人改为："同是革命造反人，相逢何必曾相识"。沿途，同样观点的年轻人怀着、火热、赤诚的心，为了誓死保卫党中央、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共同集结在所谓革命造反的大旗下，纷纷自动加入他们的队伍，致使他们的人数由近百人骤增为数百人。

当他们的队伍走到附近的医学院处时，医学院少数派学生将他们迎进了一间宽敞的大教室里，队伍便解散开了。一下子，全场的人都情不自禁地欢呼雀跃起来，互相拥抱着，兴奋地高呼道："我们胜利了，乌啦！"

第182回：担责任，张平化返回长沙

得电告，谭启龙亲赴青岛

此时，革命的烈火也随着北京红卫兵的串联烧到了福建的近邻——浙江温州。9 月 2 日，北航 5 名温州籍学生组织的“北京革命造反队”回到温州串联。9 月 5 日，他们在温州地委大门上贴上一副对联：

高高在上做官当老爷有朝一日定被群众所厌弃

不当学生只想当先生不触灵魂岂非咄咄怪哉也

横批：何去何从

这副对联因为是贴在地委大门上，而且也是第一次在温州地委大门上被群众贴了对联，因此在温州全区轰动了，有人叫好，而干部中抵触情绪很大。

9 月 14 日上午，“北京革命造反队”发出传单，建议召开“坚决将温州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誓师大会”。传单中写道：“在这个会上，地委、市委负责同志要向全体革命同志，公开承认自己前阶段压制革命群众起来搞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严重错误；要承认在前段运动中，地、市委领导犯了方向性路线性的错误，并表示坚决改正和革命的决心。”

说罢福建、浙江温州，我们再来看湖南。8月30日上午10点钟，张平化从北京飞回长沙，解决已十分混乱的湖南问题。他先到省委，与省委常委见了面，作了短时间的批评与

自我批评。31日下午过河到湖南大学。在湖南大学办公楼前一下车，同学们就把他围起来了，和他握手。同学们让他讲话，张平化就站在二楼栏杆上发表了演说。他说：“我这次从北京回来，是得到毛主席的批准和指示之后回来的。”“有一次，毛主席找我们去谈工作，谈别的工作，利用这个机会，我直接向主席说了，我把湖南的情况向他报告了。”

群众热烈鼓掌。

张平化接着说：“我说这个情况是严重的，长沙市委，湖南省委这个严重错误，我也有责任，我过去的工作没有做好。因此，我请求主席允许我回湖南来工作一段，参加这个文化大革命。我向主席报告时，我就说了，我说我回去是两个任务：第一个任务，就是请罪，请罪！向大家检讨，承认错误，并且希望大家揭发批判，帮助我改正错误。”

又是一片鼓掌声。

张平化：“第二个任务，就是造反！”

掌声四起。

“就是要跟同学们，跟所有的师生员工们一起来造反。”

掌声再起。

“现在我想分别讲一讲，刚才谈到向主席报告，提出这两个任务，我说这样子回去工作一段是不是可以？主席说：‘同意，很好！很好！’就这样，我就回来了。”

当天晚上，由湖南大学发起河西7个大、专学校联合，

有3万人参加的一个大会上，张平化讲了话，并欣然佩上了湖南大学红卫兵赠送给他的“红卫兵”袖章。他的态度，不仅使听到或看到这个讲话内容的广大红卫兵学生与市民们感动万分，因为他们从来没有见过共产党的书记对下面群众表示出如此诚恳的态度，何况还是省委第一书记这么大的领导干部呢！同时人们也深深感到，这次文化大革命运动可真是了不得：连省委书记都说要“造反”了！

张平化后来在湖南省干部会议上的讲话时说：“红卫兵给我戴上了一个红卫兵袖章，正式当上了兵，我也是红卫兵一员，我感到很光荣，我感谢他们。湖大的革命师生及河西的革命师生也都表示，批准我和他们一起造反。单靠毛主席的批准还不够，还要看革命群众批准不批准。现在我住在湖大。”

张平化在湖南省干部会议上再次明确表示：“‘三相信’这个口号是错误的，是反动的。”

他说：“我们应该相信什么？应该相信毛泽东思想。省委也好，市委也好。凡是违背毛泽东思想的，就要反对你，打倒你。过去，我们各级党委包括工作组，认为谁要是反对各级党委，反对了工作组就是反党，甚至反对了党员就是反党，这是用党员的牌子来压人。”

对工厂、农村、街道要不要搞文化大革命的问题，张平化说：“过去，有个步骤，所谓分期分批。分期分批是农村

的老经验。当前这个形势还讲什么分期分批，群众不分，他要闹革命，你还不准，搞起来了犯什么法？原来我们所担心的，是人员的分配，怕一下子搞起来，领导来不及，怕妨碍生产，怕干部躺下，……我看这两个顾虑都没有必要。如果是积极领导，放手发动群众，相信群众，把群众觉悟提高，把运动搞起来，我看是不会妨碍生产，相反，会大大促进生产。”

“强调工厂不要搞，农村不要搞，结果他还是要搞。各级领导要管起来，特别要给农村干部讲清楚，有很多革命同学下乡遇到很多阻力，就是不欢迎，公开喊：不欢迎罗，不要来罗，用各种方法阻拦你，刁难你，甚至发动农民包围你，发动工人包围你，这样对运动不利，对生产同样不利。”

“我还要再三声明：我这次回来，完全是以个人身份，向主席报告，主席要我回来，不是派我回来，在湖大讲话时，记录记错了一个字，说是主席派来的，我改了。把我当成钦差大臣，冒称钦差大臣，这个事情万万干不得，我的讲话不能代表任何组织，我的身份完完全全是个人的，是普通的工作人员，普通一兵。今天的讲话，也完全是以一个普通干部，普通的共产党员的身份。个人的意见，有一分可取就取一分，有二分可取就取二分，如果不可取，就算没有讲，有错误，希望大家批评。”

9月1日，长沙市中学生上街游行，要求改组省委，罢王

延春等人的官。

中共中央做出决定；免去王延春的省委第一书记职务；中南局也做出决定：免去长沙市委几名领导干部的职务。

长沙市民们沉浸在节日般的欢乐，或新奇的气氛之中，而各级党的组织负责人对时局却陷入莫名其妙和手足无措之际。

再说中央得知“青岛 825 事件”后，周恩来于 8 月 26 日，即“青岛 825 事件”的第二天，就给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谭启龙打电话，指示他亲自到青岛处理此事。

谭启龙 8 月 27 日来到青岛，随同他一起来青岛的还有省委调查组，负责人是于明。他们匆忙到市委听取汇报。此时青岛的工人还在和学生对峙着，但市委已经溃不成军。省委调查组用了三、四天时间才把市委常委们找齐。于是，调查组在到达青岛的当天，8 月 27 日，即在三大院校召开了座谈会。

28 日开始，济南省城乃至北京等地支援的青岛的学生源源来到青岛，他们有声援的，有调查的，好不热闹，仅山东大学就来了 2000 多人。

28 日，谭启龙和调查组返回济南，省委听取了调查组长于明《关于青岛 8 月 25 日事件的调查报告》后，决定将《调查报告》上报中央，建议撤销张敬焘市委领导职务。

山东省委 8 月 29 日 12 时致电“青岛市委转青岛医院、

海洋学院、化工学院全体革命师生员工同志们：……在中央对此事批复作最后处理前，省委决定，责令张敬焘同志先行向青岛医学院、青岛海洋学院、青岛化工学院革命师生员工作诚恳及深刻的检查，听取大家的批评。特此通知。”

青岛医学院的学生知道了省委的电报，于当天下午在市委会议室批斗青岛市委第一书记张敬涛，同时通知张敬涛晚上参加三大院校召开的“革命造反誓师大会”。

当晚 20 时，三大院校的红卫兵押着张敬涛坐车从市委前往青岛第二体育场的会场时，被一群工人截住，工人不让张敬涛去参加会议。张敬涛对他们说：

“我如果不去，说明市委更有问题，回来也不好向党交待。”

约 22 时，大会在第二体育场召开，北京清华大学的学生杨绍珩及青岛医学院的管效珍、化工学院的杨云良、海洋学院的潘万洪 4 人主持会议。杨绍珩首先讲话。他是青岛人，从青岛考上清华的。他首先宣读了山东省委《关于责令张敬涛作检查》的电报。开始张敬焘坐在椅子上，在张敬涛作检查时，红卫兵们给他戴上写有“镇压革命运动的反革命分子”的高帽子，挂上写有“我是反革命分子张敬焘”的大牌子，跪在台上，进行体罚。

23 时多，附近工厂的于副厂长和该厂保卫科毕科长开完会回家，经过第二体育场，不知道里边开什么会，就进去了。

这个厂的一个工人也在会场，碰巧看到于副厂长和毕科长进来，马上向红卫兵说这两人是监督工人的，是保皇派。红卫兵一拥而上，于副厂长和毕科长还没明白怎么回事，稀里糊涂就被押到台前，跪在地上，剃成阴阳头，陪着张敬焘，批斗了 3 个小时。

会议一直开到 30 日凌晨 2 时多结束。

30 日上午 9 时许，青岛部分学生又在市委门前批斗市委书记张敬涛，让他跪在地上，一只手扶住头上的高帽，一只手拿着麦克风作检查，时间一长，张敬涛晕倒在地。随后住进人民医院 8 号病房。

青岛和外地大学生批斗张敬涛的事情很快汇报到济南。山东省委于 8 月 30 日 13 时 30 分致电“青岛市委并转革命师生员工同志们：为解决青岛八月二十五日事件，省委谭启龙同志已去青岛亲自处理此事，在谭启龙同志未到达青岛之前，请同志们、同学们保证张敬涛的人身安全，……”

谭启龙 30 日带领省委工作组到达青岛，当天在市委宣布经中央批准撤销青岛市委第一书记张敬焘的职务，口头任命市长李元荣代理市委第一书记。没有提张敬焘的省委常委一职，此职仍保留。撤职原本是个缓兵的临时措施，以缓解大学生的情绪。

李元荣长期在省商业系统和银行工作，原任省商业厅长，1965 年参加德州四清工作团。1966 年 4 月 19 日青岛市人大

六届一次全会上当选青岛市长时，他还在德州搞四清。青岛文革初期的“资反路线”他没有责任，在省城济南时与王效禹基本没有矛盾。

8 月 31 日，谭启龙在青岛市政协礼堂召开青岛市大专院校和外地来青岛的师生代表会议，学生要求张敬焘到场。谭启龙安排李元荣与两名红卫兵前往人民医院把张敬焘带来。

谭启龙在会上宣布：“中共中央批准撤销张敬焘中共青岛市委第一书记的职务，李元荣代理市委第一书记。” 学生们欢呼雀跃，谭启龙一时成了“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代表。

张敬焘是 1961 年 10 月由上海调到青岛任市委第一书记。上任期间正逢大饥荒的困难时期。当时青岛市下属的即墨县七级公社湍湾大队到 1960 年夏天不长的时间里出现大量非正常死亡，实际死亡 159 人。张敬焘到青岛，全力申请调拨解决粮食，缓解灾情。当年 11 月 4 日，青岛市委提出贯彻执行山东省委开展生产救灾运动紧急指示的意见，指出青岛市农村灾情严重：1、全市粮食总产量只有 55683 万斤，比 1949 年总产量减少 3.3 亿斤，扣去种子、饲料一斤不征，每个农业人口平均不足 190 斤，即墨不足 120 斤。2、病情严重，人口死亡、外流，大伤元气，劳动力比 1957 年减少 11.7 万多人，牲畜比 1957 年减少 55400 头。浮肿病人约 10 万人，即墨县的出生率呈负增长。市委要求各级党委认识灾情的严重性，找出原因，吸取教训，团结全党全民共同奋斗，渡过

灾荒。11 月 15 日市委针对市区发生浮肿病发出紧急通知，要求采取有效措施，短期内治愈现有病人。

由于张敬焘救灾得力，在青岛很得人心。此时他被撤职，自然引发青岛干部和职工老百姓的不满。31 日下午开始，陆续有上万人汇集到市委和人民会堂这两处的大门前，彻夜静坐抗议，同时向北京发出电报，强烈要求恢复张敬焘的职务。静坐大会还自主选出青岛化工厂车间团支部书记夏乃健、人交公司逄积厚、山东大学赴青支持青岛市委的几名学生为主持人。夏乃建身穿海魂衫，在群众大会上发表演讲。并成立了 11 人的大会“临时服务小组”。“临时服务小组”中，有 4 名济南到青岛串连的学生。这 4 名学生代表数十名济南学生，开始他们倾向青岛三大院校的大学生。经过走访调查，这些济南学生认为青岛三大院校的大学生首先多次殴打职工，先犯的错误，他们转向支持青岛职工了。大会决定向中央发出“要求党中央、毛主席马上派人到青岛调查‘825 事件’真相，做出正确决定”的急电。

青岛的形势再次紧张起来。全市有十几万人上街游行，在市委门前静坐，要求恢复张敬焘的职务，并连续三天包围三大院校，发生了更激烈的冲突，而且愈演愈烈。谭启龙担心，照此发展下去，有发生大规模流血事件的可能。他连夜向周恩来办公室报告说：照目前局势，以省委名义已很难开展工作。

周恩来 9 月 1 日凌晨 2 时，给青岛荣城路 4 号的谭启龙打电话，对大学生要求召开 10 万人批判大会表态：在双方存在纠纷的情况下，建议不召开那样大型的会议。要文斗，不要武斗。同时在电话中指示谭启龙要“穿上军装，以济南军区政委名义出面做好双方的工作”。谭启龙决定马上传达周恩来的指示，同时向 67 军借来军装穿上。

青岛市副市长郭士毅约 3 时在市人委的紧急会议上传达了周恩来讲话要点，布置当日下午召开全市学生职工协商会议。

为了张敬涛的安全，谭启龙立即找到驻青岛的北海舰队，希望张敬涛等人能到青岛的海军医院治疗。北海舰队第二政委卢仁灿从 1952 年起就是青岛市委常委，他立即电话请示海军第一政委苏振华，海军请示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兼全军文革小组组长、总政副主任刘志坚，得到同意。9 月 1 日清晨 4 时，张敬焘化名王海住进海军 401 医院高干病房二病区，当晚又转到空勤科。北海舰队副司令员邓龙翔、张元培等人商议后，同时还把市委市府领导徐雷建、周化南、陈友群、侯季伍等 8 人接到 401 医院治疗休养。

## 第 183 回：谣言起，工人学生如水火
## 蓉城乱，学生静坐省委前

9 月 1 日上午 8 时，谭启龙在有 10 万人收听的青岛市有线广播大会上，一方面承认青岛医学院等三大院校的革命师生的革命大方向是正确的，一方面又说："张敬焘不是反革命，基本上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

对青岛市委门前群众大会提出的要求，谭启龙回答说："我保证张敬焘的人身安全。张敬焘是革命的。""我支持你们。"

谭启龙传达中央指示："青岛市发生的问题，由全市工农兵学等各界群众代表会讨论决定"，"张敬涛的错误问题，由代表大会讨论决定"，"要文斗,不要武斗。"

中央指示传达后，市委门前的群众大会做出了撤销对张敬涛撤职的错误决定、恢复其职务、严惩右派学生等"六项决议"。开头两项是："1、撤销省委工作组对张敬涛同志所作的错误的决定处分；2、恢复张敬涛同志青岛市第一书记的职务，继续留在青岛工作。"

谭启龙的讲话和"六项决议"经群众流传，很快变为中央已恢复张敬涛职务的传言。而且《青岛日报》竟为这一假消息出了《号外》。一时间，青岛市到处传播着：

"张敬焘是我们的好书记。在革命年代不怕流血牺牲。"

“张书记来青岛，盖了许多新房子，和我们一起度过了灾荒……”

“那些右派学生把张书记拉去斗了。让他下跪，戴46斤重的大帽子，身上钉满了大头针……”

“学生撕了毛主席像，撕了《十六条》。”

“学生把一个女同志的衣裳扒光，只剩下一个裤头叫她游街。”

“学生烧死了两个小孩。”

“到市委门前静坐去。”

“先别干活了，游行去。”

青岛市台东区以“台东区区级机关全体革命同志”名义贴出大字报和散发传单《又一个更大的好消息》：“毛主席亲自来电：完全支持全市工农兵的正义要求，立即恢复张敬涛同志中共青岛市委第一书记的职务。”

谣言满天飞后，一场更大规模的工人运动爆发了。9月1日这一天，青岛市约有15万人上街游行。

从上午9时起，在各级单位领导的组织下,一批批游行队伍排着队伍,络绎不绝地到市委去送给张敬涛的慰问信,市委的工作人员在外面接待并拍手欢迎。

他们又拥到青岛医学院大门前，高举着“中央来电”和“向敬爱的张敬焘书记致敬！”的标语，呼喊着：

“拥护中央英明决定！”

“保卫青岛市委！”

“张敬焘无罪！”

“打倒青医！”

“严惩凶手！”

“交出右派学生！”

他们冲进学校，抓住了青岛医学院的学生，撕去了他们的红袖章，剥下了他们身上的旧军装。一位北京来串联的女学生因说了一句“中央来电怎么三份电文不一样？”就被拳打脚踢，脸上涂了墨水，拉着游街。有的教师上前劝阻，也被指称为“反革命”，涂了墨水，剃了半边头发，脖子上挂上牌子。

他们冲进医学院的办公大楼，撕坏了一些大字报、传单，砸毁了一些器具和办公用品。他们还摘走了学生为青岛医学院附属医院改名的“白求恩医院”的牌子，把青岛医学院贴在大街上的大字报和传单打上″×″，称是反革命传单。

青岛市北区的法院和检察院以“青岛市北区人民检察院、市北区人民法院全体革命干部”名义印发《紧急通令》、《紧急呼吁》等传单：“我们命令青岛三大院校及混在各地来青革命师生中的一小撮反革命分子在 24 小时内（9 月 1 日 12 时至 9 月 2 日 12 时）立即向本市政法机关投案自首！”“否则将受到最严厉的惩处！”

“煤建沧口经营处全体革命职工”发出《最后通牒令》：“把所有右派反革命学生，破坏文化大革命运动的罪魁祸首及摧残张敬涛同志的法西斯分子交出来！”

各单位张贴批判“右派”学生的大字报，同日，青岛市区及沧口、崂山出现数十万人大规模的游行示威。于是青岛在“825 事件”后，又发生了“91 事件”。

9 月 1 日当晚,青岛市委召开全市各界群众和高校师生有线广播大会,谭启龙就青岛的形势和张敬焘没有恢复第一书记职务等问题讲了话,实际上是辟谣。但是,部分人不满意,拒绝离开会场,又形成了 4 万多人参加的静坐大会。静坐大会连续向中共中央发出了 3 封十万火急的电报,要求中央撤销山东省委对张敬焘的处分决定。

9 月 1 日中午，周恩到中南海游泳池向毛泽东汇报新疆、青岛两地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情况。

9 月 2 日 中共青岛市委发出《告全市人民书》，宣布对张敬焘所犯错误的处理决定，欢迎广大工农兵、革命师生、革命干部对市委的问题继续进行揭发、批评。

同日上午，中央办公厅也给青岛复电：“中央领导同志非常关心青岛的问题，待研究后一定给你们作答复。” 此时,青岛静坐大会又做出了一个与前一个“六项决议”相类似的“六项决议”。直到青岛市委同意派群众代表去北京向中央反映群众的意见后，大家才散去。

青岛仍在混乱当中。全国各地到青岛的40多个大专院校的学生展开调查，形成两派意见。有支持市委，谴责三大院校学生首先打人的一派；也有支持三大院校，谴责市委挑动群众斗学生的一派。国棉一厂、国棉六厂、铁路医院等单位印发传单，揭发批判本单位支持三大院校学生的工人的问题，一时众说纷纭。

9月3日，陶铸给谭启龙打电话：犯方向路线错误还是内部问题，不是反革命。当天，谭启龙向中央呈送解决青岛问题的报告，提出了分两步走解决青岛问题,首先解决工人与学生之间的纠纷,然后解决市委领导班子的问题。

学生们把工人的行动归罪于青岛市委，矛头也指向了谭启龙。谭启龙感到自己的处境已有些不便，便要求中央派人来解决青岛问题。

9月4日 中共中央发来《关于青岛市委问题处理意见》的电报：

(一)中央委托山东省委谭启龙负责妥善解决青岛工人与学生之间的纠纷问题。

(二)对学生和工人发生的纠纷，要说服双方，无论如何不能发生冲突，要团结一致，共同对敌。

(三)工人与学生发生的问题，可采取互派代表，由省委领导协商解决。

按照中央的电报精神，谭启龙等人 4、5 两日连续开会、座谈。6 日，谭启龙发出《给青岛市广大工农兵、革命师生和革命干部的一封公开信》，信中说：

“青岛市委错误地估计了当时形势，采取了一些错误做法，把青岛市文化革命引错了方向……这一事件，从表面上看，是工人与学生之间的纠纷，它的实质上是工农兵群众、革命师生、革命干部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及其牛鬼蛇神之间的矛盾……他们利用青岛市委张敬焘犯错误的机会，利用群众对党的热爱，抓住群众运动中的缺点和错误，挑起革命群众内部纠纷，企图转移斗争目标，保护自己。”

谭启龙提出了分两步解决青岛问题的意见，并建议召开工农、师生、干部各方面的代表协商会议。

此时，四川学生炮轰省委的行动也愈加猛烈。北京南下学生带来的许多内部消息和“马路”消息，使成都的学生们精神振奋，劲头大增。8 月 28 日，成都电讯工程学院、工业学院、四川医学院、卫校及部分北京来的学生冒雨到省委贴大字报，并围住省委书记杜心源、廖井丹，向他们提出许多问题。

一些不同意将斗争矛头指向各级党组织的干部和群众和一些以干部子弟为主的学生，也成立了许多组织，他们在成都街头与南下学生展开了激烈的辩论。

8 月 31 日，成都大学赴西安支持西安交通大学的学生刚

刚返回成都，立即走上街头，走进工厂、商场、文化单位和党政机关，张贴大字报、大标语，发表演讲，宣传“向西南局和省市委中的黑线猛烈开火”、“革命无罪，造反有理”。他们在成都市区贴出了醒目的巨幅标语：

“万炮齐轰西南局，烈火猛烧省市委！”

很快，省、市委组织了数以万计的机关干部、中小学教师和工人，上街同成都大学的同学辩论。学生们被围困在人民南路广场、轻工业厅和红牌楼等处，不能回校，一直到次日凌晨两点多钟，

8 月 31 日下午，天气异常的闷热，成都大学高音喇叭高声地广播起来：“紧急通知，紧急通知，我校有不少的学生，被围困在市区街头……”

虽然学校行政机构基本瘫痪，学校里的学生也没有组织起来。但紧急通知似乎就是命令，没有人组织，没有人调度，也没有人指挥，成百上千的学生像洪流般，从不同的方向涌向市中心，去声援被围困的学生。

此时的人民南路广场早已是人山人海，水泄不通。落日的余晖，把天边抹成一片血红。声援的人群被对方有组织的人墙挡住，过不去。前往声援的大中学生越来越多，已经不分院校，班系、男、女、老师与学生，教授和职员，他们手挽手，肩并肩，企图从人群中挤出一条道路，把被围困的同学解救出来。而被围困的学生被解救出来后，立即又去参加

解救还在被围困的学生，又有被冲散的学生重新被围困。周而复始，混乱一片。其实当时，不论是被围困的，还是救援的，或是围攻别人的，都处于极度的亢奋之中，都认为自己正在从事着一项甚至可以彪炳青史，极其伟大的事业。为此，他们不惜牺牲自己的一切而决不放弃。

傍晚，闷热的天气终于酿成了一场大雨，漆黑一片，围困学生的人换班休息和进食，没有半点松动的迹象。声援的队伍像受伤的狮子，咆哮如雷疯狂的向人墙冲击。有人编了几句歌，一下子便唱开了："肩并着肩哟，手挽着手哟，顶狂风哟向前走哟……"歌声凄凉而悲壮，浑厚而低沉，被狂风暴雨裹着，在夜空滚动……解救活动延续到深夜，毫无效果，不知谁高喊一句:"找省委去!"于是300多名学生浩浩荡荡的奔赴四川省委，向四川省委提出5点要求，要求省委省政府领导接见，要求政府保证被困学生的安全，及开展按中央的指示的"四大"自由。并给中央发了电报。

四川省委向正在重庆的西南局第一书记李井泉请示汇报，李井泉要求机关干部"坚守岗位，沉着应战，不要打人，经受严格的政治考验"。

四川省委组织机关干部守住大门和楼梯口，紧急转移档案，同时囤积食品，并成立广播站进行宣传，还采取了转移重点人、监视"不可靠"的干部等措施。西南局干部还加派了一个加强班携带报话机进驻西南局办公大楼设立观察哨。

西南局、省市委领导人借口“气氛不好”，拒绝接见学生，并说：“现在问题看得很清楚了，不到一定温度牛鬼蛇神不会出来。”西南局的负责人认为“形势紧张”，在机关办公“不安全”，于是在西南局办公会议上提出并通过筹建“二线”，并把“二线”设在公安厅；另外还在省高级法院设了一个备用地点，准备必要时转移出去。“二线”专门收集学生运动的情报，后来以此为基础成立了西南局机关 9 人密探小组。

没有人出来接见成都大学请愿的学生，他们就在省委机关大院门前的马路上坐了下来，等待省委领导给予答复，成为后来轰动整个成都的“8·31 事件”，并由此开始了成都市“三天四夜静坐示威”。

第二天，9 月 1 日，被围困在人民南路广场、轻工厅、红牌楼等处的成都大学同学先后突出包围，大多数人来到省委。除了成都大学的学生外，还有成都第一师范学校、幼儿师范学校和其他一些学校的学生。

这一天，四川医学院、四川师范学院、成都工学院等等院校的许多学生，以及北京南下串联的许多学生也纷纷前来支援成都大学的学生。在省委门前参加静坐的师生达到 2000 多人。

下午，北京南下串联的 16 个院校的学生几百人来到四川省委报喜，欢呼 8 月 31 日毛泽东在天安门接见 50 万红卫

兵的喜讯，表示他们的革命决心。他们目睹了成都大学静坐的情况，立即表示坚决支持。他们提出，应该让成都大学的学生们进去。

成都大学静坐的同学进到了省委。省委书记处书记赵苍璧说自己是接待站“工作人员”，他简单地说了几句话，对同学们提出的问题却避而不答。他讲完后，一个来自北京的同学上去讲话，当他正领头高呼“毛泽东主义万岁”的口号时，省委工作站的人把电源线路弄断了，引起同学们的极大愤怒。同学们纷纷发言揭发省委的问题。

正在这时，成都九中的一队“红卫兵”“报喜”来了。他们一来就抢占了会场，把成都大学的队伍冲乱了。接着，前来“报喜”的中学生越来越多，成都大学的静坐无法再继续下去。于是，他们这只几千人的队伍又离开省委，上街游行，走到老南门大桥，然后往回返。为了防止街道上那些由省市委调动起来的人把他们的队伍冲散，同学们全都臂膀挽着臂膀，男生在外面一排，女生在里面，边走边高喊口号。最后，走到省委大门前，又坐了下来。

这时，省委大门前拥挤着很多人。当静坐的同学们们坐下来后，高音喇叭就响起来了，说他们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右派学生”、“政治扒手”、“黑五类狗崽子”等等。这些广播通过有线广播向全市播放。

静坐的同学们非常气愤，他们的代表去和省委接待站的

人交涉，要求允许他们也使用广播，发表自己的意见，向全市人民说明真像。

接待站的人开始不同意，后来在成都大学代表的一再坚持下终于允许了。但是，当静坐同学的代表、成都大学工业经济系的宋德富同学刚说了几句话，麦克风就被接待站的人拿走了。

晚上下起了大雨，静坐的学生全身都被淋湿透了。但是，没有人退缩，大家始终坚持着。

第 184 回：谣言传，“总理、江青到成都”

有组织，学子屡屡受围攻

第二天，9 月 2 日，根据省市委的布置，各单位组织起来到省委向静坐学生挑衅的人越来越多。这些人走了，另外的人又来。他们在静坐的队伍周围放肆地辱骂，不断地高喊口号“只许左派造反，不许右派翻天”、“严防政治扒手”。静坐得学生都忍受着，没有与他们发生冲突。

街上有人贴大字报，说：成都大学的右派学生围攻省委，表面上饿着肚子没有吃东西，但在实际上有人给他们发麻饼，他们轮流跑到厕所里面去偷偷地吃。

成都大学校内的斗争也很尖锐。“成大红卫兵”和教职工中许多反对静坐行动的人，攻击静坐的师生。甚至有教师说，在静坐的同学中有人公然喊“蒋介石万岁”的口号。引起了在校同学的极大愤怒，立即把说这话的李老师抓起来，戴上高帽子游行。

静坐临时主席团的同学带领队伍再次上街游行，并准备去火车北站上北京。游行队伍正在向火车站走的途中，突然传来一个消息：中央已经给同学们回电了：“周总理、陈伯达和江青同志要来成都！”大家很兴奋，立即调头往回走。回到省委，才知道，这是有人设置的大骗局！

晚上，又下起了大雨。同学们又冷又饿。可是，大家依然精神抖擞地坚持着。他们身上的衣服，已经在 31 日夜里

和 9 月 1 日夜里被雨淋湿过两次，白天穿干了两次。今天夜里，再一次被淋湿透了，浑身淌着雨水。大家又和前两天一样，唱起了革命歌曲。特别是《红军战士想念毛泽东》这支歌，反复地被大家唱起：

抬头望见北斗星，

心中想念毛泽东。

迷路时想您有方向，

黑夜里想您照路程

……

这时，有两个女生伴随着歌声在雨中跳起舞来。许多同学流下了眼泪，有的女同学更是泣不成声。

此时省委的高音喇叭中也传出了歌声，是毛泽东的诗："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巍然不动……"

9 月 1 日，在成都旅馆前，一些北京来的学生被当地群众围着站在墙上不让走，要与他们辩论，说是在"哪里放毒，就在哪里消毒"。围攻的人轮流发言，换班回去吃饭，而被围在墙头的学生没有饭吃，没有水喝。成都电讯工程学院的工人组织"硬骨头战斗团"和学院一些学生到现场散发成都电讯工程学院工人要广大群众支持学生革命行动的《紧急呼吁》，也被围在那里回不来了。

9 月 2 日上午，成都电讯工程学院广播通知，要全校革命师生到主楼广场集合。成都电讯工程学院两个最大的群众组

织“红旗”兵团和“东方红”兵团，大约 5000 人，都来了。他们要去救回被围的学生和工人。“红旗”兵团在前，“东方红”兵团在后，几千人的庞大队伍，浩浩荡荡向成都旅馆开去。领头的学生打着校旗和造反兵团团旗，宣传车是整个队伍的指挥部。每个学生都带着他们的“武器”——红宝书《毛主席语录》。

学生们一路上唱起了“拿起笔做刀枪，集中火力打黑帮”等歌曲和《毛主席语录》歌，情绪高昂，来到达成都旅馆附近，听说被围的学生和工人已被救出来了。但队伍前面有数百人拦路，无法前进。总指挥忙下令队伍调向，以后部作头、前部作尾，撤回学校。但回头的路上也有数百人拦路。他们只得在原地停下。最后干脆席地而坐，一遍又一遍地齐声朗读《毛主席语录》，穿插着唱革命歌曲。就这样一支庞大的学生队伍，被几百人围在了大街上，前进不了，也撤不回去。一直僵持到下午，同学们又累又饿，疲惫不堪。他们都认定，这是西南局、省市委组织人马来拦截他们的，大家唱起了“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歌声中充满了强烈的悲愤之情。

就在这时，队伍里像接力跑似地迅速传遍了一个令他们十分振奋的好消息：“中央知道了成都的情况，周总理和江青同志都要到成都来，要我们队伍去机场迎接。”因为事关

中央领导的安全，消息不能公开广播，只能在队伍里交头接耳地悄悄传递。

但是，不同时候、不同方向传到大家耳朵里的消息不一样。有的说“总理和江青已到了东方红宾馆”，有的说“总理和江青已经到了我们学院”。这支庞大的队伍也一会儿往前进，一会儿往后退，一会儿又停下来，就这样折腾了好久。旁边围观的群众发现他们在团团转，也好奇地向他们打听是怎么回事？多数同学为了保密，没有外传。但有极个别的人忍不住心里的高兴，向那些好奇者透露了一些“小道消息”。

天色已晚，总勤务组的头头们似乎警觉到了什么事，通知大家立即整队，向北开去。他们冲破了前面的拦阻，连走带跑，快速前进。队伍里没有一个人说话，只听到一片整齐的跑步声。队伍向北，向东，再向南，绕了好大一个圈，回到学校时，夜已深了。学院的羊书记仍在校门口等候他们回来。他这时已是“革命对象”了，但责任心使他仍然对学生们的安全非常关心。队伍一收拢，头头们没有作任何解释，就宣布解散，要大家回去休息。但大家对当天发生的一切感到如在迷雾之中，于是到处打听，总想知道个究竟。

有人说，下午时候，学校大门外来了两名“解放军”，是骑一辆带边斗的军用三轮摩托车来的。一名军人对门卫说：“军区要我们通知成电，总理和江青马上来成电。”说完驾

车就走了。校门值勤的人听了好高兴，就立即派人把消息传到了正在成都旅馆的学院学生队伍中。

后来，羊书记在学校听到了这个消息后很吃惊。他知道，中央领导外出的消息是不会乱传的，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事。他怕学生们听信谣言弄出乱子来，就赶紧派人传话，要他们不要上当，赶快回来。于是队伍赶紧撤回来了。

9 月 3 日凌晨 3 时左右，省委书记处书记杨万选终于出来接见在省委静坐的学生。他让大家进了省委礼堂，经过 3 个多小时的对话，始终没有达成结果。于是，大家又全部出来，继续站在雨中。

天亮以后，静坐临时主席团向大家宣布："从几天的情况来看，我们不能再对省委抱什么幻想了；同时考虑到大家已经三天三夜没有得到休息，过分疲倦。所以，决定撤回学校去，开展新的战斗。"

于是，静坐队伍回到了学校。至此，震惊成都的"静坐示威"也就结束了。

事后揭发出来的情况表明，这次"8·31 事件"中，那些走上街头和我们各个高校的学生"辩论"的机关干部、中小学教师、工人和其他行业的职工，完全是省市委组织起来的。四川师范学院物理系的李学民、刘明光等 9 个同学于 9 月 5 日下午 19 时在成都市第一中心小学，对参加过围攻学生的 3 位老师进行调查，然后写出了一份题为《谁在组织围

攻学生》的材料，其中的部分内容是：

8 月 31 日晚八点过，通知召开文革委员会，其他人待命。首先，工作组组长、文革委员会主任、东城区副区长曾广才说："我到人民南路去转了一圈，形势大好，在开辩论会，你们去不去？"并说，"目前阶级斗争很复杂，外面已经出现了喊'不但要打死老虎，而且要打活老虎，打省市委'；'革命无罪，造反有理'、'向省市委西南局里面的黑帮黑线开火'等反动口号……"

当时，我们东城区这个点（东城区小学教师共分五个点）学习共分五个战斗小组，我是其中一个组的组长。我们这个小组是由五个学校的小学教师组成的，配有一个工作组的同志高世德为领导。

同时，事先还策划成立了领导小组，战斗任务是用毛泽东思想去铲除毒草。

注意事项：①不带任何暴露身份的证件，就是饭票也不能带，只准带主席语录本和十六条，若语录本上有名字，就把名字叉了。②市委宣传部翻印的十六条不能带…… ③ 还叫我们在辩论中不暴露身份。如果别人要问，就反问别人，然后大家就起哄。这样就能达到不暴露身份的目的。在不得已的情况下，也只能说是成都市的革命群众。并且教师之间互相要说话，也只能扯辫子，拉衣服，拍肩头。尤其不能叫"曾区长"。还叫我们准备战斗通宵，揣好钱粮。然后决定

三个人打头炮，我就是其中的一个。任务是专门抓对方的观点，实际上就是抓漏眼，然后就大家群起而攻之。

曾区长在出发前两次动员说，“我们今天是用毛泽东思想铲除毒草”。并叫我们互相之间要装作不认识，只能称同志。一切行动听指挥。东城区一小大队辅导员、点文革副主任黎志群接着说：“若被他们抓住了，就要乘得起火，不要往上推。”另一工作组组员高世德也说：若我们的同志放了毒被围时，你们就要高声读廖志高同志在东方红礼堂（即锦江礼堂）的讲话稿，别人听了以后，问是哪里来的，你们就说那头有，你们去拿嘛！这样群众就会往那头跑去，就把别人引开了……假若我们的人说错了话也不要去管，只管去斗学生……

我们五个战斗组，每个组有 2-3 个联络员……总指挥部设在染坊街，总指挥是曾广才，副总指挥是杨林和（文革副主任、工作组副组长）若有情况，联络员就跑到指挥部去报告。

……

当天成大贴出大字报，说省委有组织，有计划地围攻学生，于是，工作组就组织我们“辟谣”（其实是造谣）。目的是要声明我们不是省委市委组织的，而是自发的。要求是：① “辟谣”的大字报不要我们写题目，由工作组统一编题目，免得题目重复被识破。② 写好之后，交工作组检查。

③ 落名只落“革命群众”，不落具体单位和真实姓名。④ 当天晚上写好大字报，深夜去贴在英雄口（即盐市口）。⑤ 印发传单，深夜上街从门缝里塞进去，合作商店，居民院坝要多丢点，目的是做到家喻户晓…

9 月 3 日下午和 4 日上午，从省委撤回成都大学的静坐学生在成都大学学生食堂举行大会，控诉西南局和省市委中的走资派挑动群众斗群众、破坏文化大革命。而保省委的“成都大学红卫兵”则向一些高校和中等学校的“红卫兵”发出呼吁，说参加大会的同学要斗争他们，要给他们戴高帽子，请求支援。

4 日下午，成都九中、十三中的“红卫兵”、四川医学院“红卫兵总部”、川大“红卫兵”等单位将近千人来到成都大学，在学生食堂召开大会，声讨参加“8·31”行动和在省委门前“静坐”的师生。

在接下来的 9 天时间里，省、市委组织全市力量对成都大学参与静坐的师生进行围攻。成都九中、十三中、成都交通学校、成都水电学校等单位，天天开着宣传车到成都大学来广播，对静坐行动进行批判和攻击。与成都大学一墙之隔的成都交通学校还在学校的楼顶上装上高音喇叭，对准成都大学校园，批判“成都大学的一小撮右派学生”。成都九中的“红卫兵”数百人甚至分别进入到学生宿舍进行挑衅。他们宣读他们撰写的《对目前成都地区文化革命运动中一些问

题的看法》，同成都大学的学生进行辩论。

在成都市，天天有许多单位的宣传车开动高音喇叭对“成都大学的一小撮右派学生和政治扒手”进行声讨。

用打字纸、白报纸、道林纸等高级纸张印制出数以十万计、百万计的传单和小册子，用宣传车、卡车、轿车、大客车、摩托车和自行车等等载着，大街小巷四处散发。这些宣传材料的内容，都是“揭露成都大学一小撮右派学生”的“暴行”和“反革命活动”的。

在全市的机关单位、企事业单位和街道居民委员会，人们被组织起来学习“揭露成都大学一小撮右派学生”的“暴行”和“反革命活动”的材料。凡是有人收到过成都大学学生发的传单的，都必须交出，而且必须进行“消毒学习”。曾经支持过静坐的人，则要进行检查，甚至被批判。全成都市掀起了一股声讨和批判“成都大学右派学生”的高潮。

但是，成都大学在省委静坐的那些学生并没有害怕，没有退缩。因为大家都认为，自己的行动符合党中央的《十六条》精神；而且，毛主席在 8 月 18 日和 8 月 31 日两次接见了红卫兵，给了他们巨大的鼓舞。他们有人把毛主席诗词中的两句话写成大幅标语，贴在在大校门两边的立柱上：“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巍然不动”。

9 月 5 日起，成都电讯工程学院、成都地质学院等大学的学生又开始连续 5 天在西南局内静坐，要求领导接见，回答

学生的提问。在这样纷乱的情况下，西南局领导当然不会出来。这样，学生们认为党政领导“心中有鬼”，“害怕群众”，在抵制和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9 月 7 日，李井泉从贵州电话指示四川，立即在全四川各大工矿企业，建立“工人纠察队”维护生产秩序。此后全省各大工矿企业，纷纷成立“工人纠察队”、“工人赤卫队”。

第 185 回：难掌控，重庆人搭车进京　赴贵州，南下学生遭围攻

此时的重庆市委也越来越难过。8 月 31 日，重庆市学联和市委文革办公室串连组织 23 个学校的人员在重庆医学院会议室成立了重庆市“毛泽东主义红卫兵联络站”。

按照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李井泉的指示，西南局宣传部长刘文珍在重庆蹲点，主要抓中学生红卫兵组织。他们想通过“加强领导”，把重庆的学生运动引上“健康发展”的轨道。8 月 31 日，在刘文珍大力促成下，重庆 50 多所中学的红卫兵在重庆七中召开代表大会，筹备成立中学生“红卫兵总部”。

9 月 1 日　重庆市中学生“红卫兵总指挥部”成立。刘文珍和市委领导到会祝贺。“中学生红卫兵总指挥部”在筹建期间就得到了官方的大力支持：安排他们在重庆市劳动人民文化宫办公，统一制作了旗帜、袖章，甚至还发了军装。

但是，在毛泽东的号召下，造反毕竟已逐渐成为大气候。市委的权威远不如北京南下串连学生的影响，重庆市中学生红卫兵已经不再顺从上级党委的控制，其总部成员和许多基层组织都倾向以重大“815”为代表的造反派。市委很快就发现了这一点，赶紧下令《重庆日报》撤销了已经排好版的有关中学生“红卫兵总指挥部”成立的报道。

9 月 1 日至 3 日，重庆南岸区数千群众在市 39 中学广场与主张“炮轰区委”的少数派师生、群众“辩论”。每天都有数千人停工、停产、停课到区委阻止“炮轰”派进入区委机关。

为平息“815 事件”对重庆局势的影响，9 月 2 日，李井泉和重庆市委开会商定：重庆师专党委书记要撤职，市委在这个问题上也有错误，要作检查。3 日在重庆师专召开全市 12 所大专院校代表会议，通知各学校派代表参加。重庆市委书记辛易之要到会检查“815”那天压制群众的错误。

9 月 3 日晚上，仍有一些干部、群众继续在重庆市中心解放碑召开“828 惨案受害者控诉大会”，斗争“815”派学生。而就在此时，重庆市委书记处书记辛易之正代表重庆市委在重庆师专大专院校代表会议上就“815 事件”作检查。重庆大学“815 战斗团”近千人来到重庆师专的会场造反，控诉正在南岸区及解放碑等地因“828 事件”还在发生的围斗“815”派学生事件，要求市委立即出面解围，并公开登报、广播，承认重大“815 战斗团”是革命组织。维持会场秩序的师生与“815”发生冲突。李井泉通过专线电话听取汇报后，一面通知派人到南岸区为“815”学生解围，一面要市委书记鲁大东“顶住”，不要答应“815”的其他要求。重大、师专等校“815”派师生因其他要求没有满足而宣布绝食斗争。

9 月 4 日　重庆市委文革办公室发出秘密通知，要求各单位制止打人、戴高帽、日夜不停扭住辩论等情况。

重大、师专等校“815”派师生千余人在绝食两天后得不到市委答复，于 9 月 5 日凌晨步行前往市郊茄子溪火车站阻拦列车，强行搭乘上京“告状”。当晚 19 时搭上增派列车赴京，在重庆市内引起极大震动。

重庆市群众艺术馆的文学编辑组干部邹雨林，美术组干部王以时，音乐组干部何明、谢思颖，因为遭到工作组的打击，组织了重庆市文艺界最早的造反派组织：“革命造反小组”。9 月 5 日后，他们得知重大、师专“815”师生上京告状的消息后，也自己购票乘火车上京告状，开了机关干部自行离开单位上京告状的先例。

9 月 5 日上午，重庆市西南师范学院大操场召开批斗副院长方敬和王逐萍大会，他俩都被定为反党反社会主义份子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两人分别站在主席台的两端，戴高帽子，弯着腰。陪斗的有各系的“牛鬼蛇神”109 人，其中就有中文系教授，国学大师吴宓，他被带上“反共老手吴宓”的木纸牌，驱往大操场，站在主席台前作为陪斗。

在大操场周围看到几篇有关吴宓的大字报。

一篇是《吴宓在课堂放毒》的大字报。写在课堂上一个学生提问，他对“况……乎？”这种古文结构的用法不够领悟，请老师能否举一结合现实的例子。当时正值三年自然灾害，每天粮食定量只有七两，平均每餐只有二两多。所以吴宓未加思索，随口举例说：“三两尚且不饱，况二两乎？”这句话被上纲上线为恶毒攻击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

还有大字报写吴宓说过“五四时期不知有毛泽东”，还说“宓恨吸烟人”。“毛主席吸烟，说明吴宓对毛主席有刻骨仇恨，从五四时期就反对毛主席，是个老反革命分子。”大字报还揭露，在批斗吴宓时，吴宓回答：“五四时，未知有毛泽东，确是事实。”并不承认反对毛主

席和共产党。因而大字报最后咒骂吴宓："顽抗不写《交代罪行材料》，自言未尝公开反党，尤为混账，小心汝之狗脑壳。"

批斗大会散会后，一个教师戴着高帽子游校园，路遇一担粪农民，他听说此人是反党反社会主义份子，农民二话没说，舀了一瓢稀粪淋了那位老师一身。

9 月 5 日这天，北京南下红卫兵为重庆大学学生 9 月 2 日在重庆市南岸区辩论中遭到群众围攻一事，在南岸区市 39 中学广场召开大会，批斗南岸区委领导，副市长段大明被通知到会陪斗。

李井泉在与重庆几个机关、工厂的领导干部谈话时，对他们提出的"机关、工厂要不要组织红卫兵？"的问题回答说："机关和工厂内不再组织红卫兵，因为已经有了文化革命组织，工会组织，还有民兵组织。如果工人要求组织，可以依照历史经验组织工人纠察队，担负保护厂房机器的任务。"

根据李井泉的这一指示，重庆市委工交政治部、国防政治部、机械政治部立即开会布置组织工人纠察队。9 月 5 日，按照工交政治部部署，"工人纠察队"首家试点单位在中梁山煤矿宣告成立。9 月 6 日，中梁山煤矿"工人纠察队"500 余人由书记、矿长带队，乘 11 辆卡车到市区游行示威。随即，全市性的"工人纠察队总部"成立，负责人是重庆大学汽车班班长、中共党员、转业军人楚光辉。市总工会还为"工人纠察队"统一编号缝制了袖章。

8 月 24 日，"首都红卫兵南下串联队"12 人首次到达贵阳，省市委先是让他们住进豪华的交际处——贵阳饭店。北京红卫兵很快就把

清华附中的大字报传到贵阳市各大中学校，使贵州的学生们眼界大开，重新燃起了他们对“66 事件”的质疑。与此同时，8 月 28 日，“北京南下串连二队” 16 人也抵达贵阳，一下火车，他们就开始贴大标语。有几个同学还把大标语贴到了火车站广场的公共汽车上。公共汽车的司乘员一看是北京来的“小将”，也都不干涉他们。于是那几个贴大标语的串联学生便搭车进城，把标语贴到了大街上。这下子，全城市民都知道北京学生来贵阳串联了！

“北京南下串连二队”一直忙活到下午 16 时多，来了几名贵阳医学院“工农红卫兵”的同学，非常热情地邀请“北京南下串连二队”到他们学校住下。当晚，北大学生张甦被邀请到男生宿舍向他们介绍了北京大学的运动情况，还有得北京串联学生被请到“红旗红卫兵”演讲。

第二天，“北京南下串连二队”又在贵阳医学院、贵阳师范学院和贵州工学院 3 所院校分别贴出张甦起草的大字报：《六问贵州省委》。这张大字报提出贵州省委前阶段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强烈要求省委必须为“66 事件”中被打成“反革命”的群众彻底平反，并向全省人民做出深刻检查。

当天下午，贵阳女中的学生到贵阳师院抄走了《六问贵州省委》，并将《六问贵州省委》贴到了贵阳大街。贵阳市轰动了！

后来，贵州省委给《六问贵州省委》加了批判的“按语”，下发给全省群众发动批判。

8 月 31 日晚，“首都红卫兵南下串联队”和位于贵州的中国科学

院地球化学研究所，简称“地化所”及贵州师范学院等200多人到《贵州日报》送大字报，质问《贵州日报》刊登毛泽东为《新北大》和《中国妇女》刊名题词为什么不套红，结果遭到数千人围攻、斗争，地化所有11人被打成“反革命”，支部书记被逼自杀。这一事件被称之为贵州的“8.31”事件。

“北京南下串连二队”的北大学生张甦，家住贵阳。他的生活费快没了，想回家要钱，不知是否安全，决定先到莲花坡他六舅家问问情况。9月4日晚19时许，他刚走到六舅家外面，就有几个人围过来，朝他上下打量。其中有位40多岁的人，戴着帽子，问张甦是什么人？

张甦说：“是北大学生。”

那人的口气变了，问：“你什么时候到贵阳的？是不是来串联的？”

张甦不敢再说真话，只好谎称：“我刚下火车，是回家探亲的，不是来串联的。”

那人又问：“你来找谁？”

张甦说是顺路看看六舅妈张培玉。那几个人告诫张甦不要来串联，就放他走了。

张甦一进六舅妈家，六舅妈张培玉就一脸慌张，问：“你来干什么？”并一把将他拖到里屋，关上门，小声说：“现在风声太紧！居委会都动起来了，晚上还查夜，提防北京学生来串连。”然后催他快走。

张甦打听家中情况。六舅妈张培玉说："你妈没事，天天照常上班。"

张甦跟外婆打了声招呼，就慌慌忙茫地走了。

张甦的外婆解放初期定为地主分子，此时跟着他六舅住。

张甦家住在贵阳市东山路 5 号，他穿出莲花坡，来到外环东路上，边走边张望，没发现什么异常，便放胆往前走。谁知刚到大路口，突然前后左右窜出几个黑影，一声厉喝："站住！"便将他围了起来，一道手电光照在脸上。

"是张甦！"居民小组长陈顺珍叫起来，"我们守你几天了！终于抓住了！"随即她快步上来，和另外一个男子，一人抓住张甦一只胳膊。居民委员雷莲珍说： "把他押到办事处去！"于是六、七个人，扭着张甦，将他押到街道办事处。

张甦被带到正中间办公室。中间靠里摆了张办公桌，后面椅子上坐了位 40 多岁的干部，他左右两边还站着几位。他问张甦姓名，学校，几时到贵阳的，这次来了多少大学生， 住在哪里，都干了些啥。审完后就走了。

张甦被押到另一间屋，先叫低头，接着又搬来一条高脚板凳，逼他站上去，低头弯腰。稍不如意，就打他。就这样，张甦被折磨了整整一晚上。

天亮后，张甦才被允许从高板凳上下来，押到外面。他要求喝水，吃点东西，都被严辞拒绝。过一会儿，陈顺珍拿了顶纸糊的高帽子进来，扣在张甦头上。接着来了两个男人扭着他的手，将他押上大街，

前后簇拥着一大群人。

他们走下省府路，来到中华中路。这时，大街上是一队队打着旗帜，呼喊着口号游行的人，热闹非常！张甦被押到中华中路市烟酒糖业公司门口，站在大街正中，周围是情绪激动的人群，高喊着："打倒反革命，保卫省市委！""谁反对省市委，谁就是反革命！"

突然间，人群分开来，一群人扭着张甦70岁的外婆进来了。只见她头上戴着纸糊的高帽子，上面写着"地主分子"；胸前挂着纸牌子，写着"南下串联队张甦的地主外婆"。陈顺珍也将一块写着"地主狗崽子张甦"的纸牌挂在张甦胸前。

昨晚在莲花坡询问张甦身份的那位男子此时也走到他跟前说："不老实，还说你刚下火车！"他振臂呼喊："打倒地主分子！""打倒地主狗崽子！"

周围的人也跟着喊起来。

有人又搬来高脚板凳，把张甦推上去。再推张甦外婆时，老人摇摇晃晃站不稳，就叫她在地上站着陪斗了。

大街上又涌过来一群人，是省京剧团的。一位中年女干部看见张甦，就高喊："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革命无罪，造反有理！"

此时的张甦那个激动，顿时热泪盈眶，感动异常，也高呼："毛主席革命路线万岁！""毛泽东思想的阳光一定会普照贵州高原！"

无疑，他又招来一阵拳头！

在张甦旁边，一大群人正在围斗省话剧团演员胡大舜。胡大舜昂头高呼："毛主席万岁！"四周的人死劲要摁他的头，他拼命挣扎！

这些人硬将他打倒在地！他还喊着：“要文斗， 不要武斗！”

大约中午 11 时过后，居委会的人斗累了，把张甦外婆押走了，张甦胸前的纸牌子，头上的高帽子也被取走了。张甦却被移交给一群厂矿企业的职工批斗。 他们还押来了几名本地中学生和一名北京来的大学生，要他们交待“罪行”。问到那位北京学生时，他说是刚下火车的。领头的说：“拿火车票来！”看完后，就去与另外两个人咬了一阵耳朵，对他说：“你赶快回北京！”就把他放了。

这时周围里三层，外三层，都在围斗“南下串联队”学生和本地造反派。“打倒反革命，保卫省市委！”的口号声此起彼伏。 贵阳市闹翻天了！

斗到下午 15 时左右，批斗的人才把他们几个押到市糖业烟酒公司里面，还让他们每人吃了碗盖菜饭。17 时多，他们被放走了。大街上人们也陆续撤走了。当张甦拖着极度疲惫的身子回到了贵医住地，一上床就倒头大睡。21 时被拍门声吵醒，门外传来街道居委会小祖长陈顺珍尖利的叫声：

“我们来找张甦！”

“把他交出来！”

“没有这个人。”北京的同学回答说，把她们支走了

9 月 5 日这天，首都南下串联队和贵州省商校、省艺校、贵阳女中等校学生约 3000 余人到贵州省委大楼前要求省委第一书记贾启允接见，回答文化大革命中有关问题。贾启允躲到省军区没有出来。这批学生便在省委大楼前召开揭发批判会、静坐示威。省文革领导小组

如临大敌，省公安厅出动100多名“机关红卫兵”保卫省委大楼。省文革小组则以上街宣传《十六条》的名义，调动干部、工人、居民12万人，对这些学生进行分割、围攻。群众高呼“打倒牛鬼蛇神”等口号，对学生们小圈套大圈，强迫他们检讨。

9月7日上午，“南下串联二队”的几位同学参加了在南明堂省委大楼三楼会议室举行的座谈会，主要是揭发追究省、市委领导人策划9月5日“九五事件”的责任，要求省委领导如实向中央报告并作检查。省委书记处书记张健民回答说：

“我刚从乡下回来，一点情况也不了解，怎么向中央汇报呀？”

代表们说：“那你就代我们向中央发电报。”

张健民答：“可以。”

于是，北京大学学生张甦自告奋勇起草电稿，当众宣读后，又按代表们的意见作了修改。

张健民接过电报稿看了下，立即交给身边工作人员，吩咐马上发出去。

过了一会，工作人员回来说：“电报已发出去了，是发给国务院办公室的。”

代表们问：“为什么不发给党中央？”

那位工作人员回答说：“我们的电报只能发给国务院办公室，这是规定。”

座谈会散了以后，省委一位干部和张甦交谈时说：“你们北京串联队很不纯洁。里面就混得有黑帮子女。”

张甦问："是谁？"

那位干部说"你们北大学生吕彤岩，就是黑帮子女。"还说：吕正操已经揪出来了，是黑帮分子。

张甦在省府路招待所碰到北大中文系同学张卫东，就问吕彤岩的情况。张卫东说："'九五事件'中，大批群众冲进贵阳招待所，围斗南下学生。吕彤岩和他们辩论，就被一伙人拉到大街上去了，和大家隔开了，一天一夜没回来。我们就怀疑是被绑架了。后来那伙人也知道了她是吕正操的女儿。不久，省委就来了部小车，把她接走了，住了一个晚上，9 月 6 日就回来了。"

张甦说："省委干部说她父亲是'黑帮'，已揪出来了。"

张卫东说："不可能呵。吕彤岩和我们住在一起，她没讲啊。"

于是她带张甦去见了吕彤岩。张甦把他听到的一五一十全给她讲了。吕彤岩没说什么，显得很沉着，也很和气。但是第二天就回北京了。

不久，随着大字报、小字报报道吕正操被罢官的消息，"揪出南下串联队的黑帮子女吕彤岩！"的大标语也刷到了贵阳招待所门前的围墙上！

9 月 8 日，北京学生的大字报"贵州省委、贵阳市委反革命的日子混不长了"贴到了贵阳大十字！

从 9 月 5 日至 8 日，贵阳市街头大街小巷、白天黑夜都在围斗炮轰省委的南下学生和中学生，到处都有穿着纸衣的"牛鬼蛇神"。这就是轰动一时的贵州"95 事件"。

9 月 7 日，李井泉来到贵阳，向贾启允、李再含等传达了陶铸对贵州省委的评估：“省委是‘四清’后的新省委，大方向是正确的。”他向贾启允布置：只要做到“五不动”，即军队不动，工人不动，农民不动，居民不动，干部不动，就会使“秀才造反，三年不成”。

## 第186回：保市委，“我们工人要说话”

## 急调人，康平路如临大敌

9月1日，又有北京学生到上海市委门口要求接见。到了9月2日晨，北京47中、100中、101中、120中、122中等学校的部分红卫兵再次来到上海市委门口，还是要求上海市委接见。他们在市委门前被层层“自愿来维持秩序”的人员拦着。

9月2日，下起了淅淅沥沥的小雨，在雨水淋湿的市委大楼对面的墙上，特意做的木架上，贴着一张刚刚写成的大字报，标题非常醒目：《我们老工人要讲话》。

年轻的红卫兵们并不知道这个标题的深刻含义。经历过1957年反右派斗争的人们却牢牢记得：开始反右派时，出现在《人民日报》上的醒目文章便是：《我们老工人要讲话》。

大字报的署名：“上海国棉17厂老工人”，下面有一长串著名劳动模范的姓名：刘喜荣、杨林大、王宝余、丁末郎等等，共有36人。大字报还预约要与不同意见者在静安公园“辩个明白”。后来，大字报又套红铅印成传单，广为散发。

大字报写道：“十七年来，市委和柯庆施同志对上海的三大革命斗争抓得很紧。从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中看，是坚决贯彻总路线的，制造出万吨水压机、双水内冷发电机、二十万倍电子显微镜等等。从阶级斗争看，铲除了资产阶级很多毒素，取消了交谊舞。三年自然灾害很快克服了。还有《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也是上海市委组织和讨论的。这些大量的事实证明，上海

市委不是修正主义的。北京市委烂掉，不等于上海市委也会烂掉。上海市委是正确的，革命的，对于这一点，中央也是肯定的。……”

大字报招来一群北京红卫兵与上海国棉 17 厂的老工人之间的一场舌战。

的确，上海人民十分热爱上海市委。老工人和劳模当场讲了许多肺腑之言，他们个个老泪纵横，说：“要不是他们听党的话，文斗不武斗，早把这些小家伙打了。”

9 月 3 日清晨 7 时，康平路上聚集着 300 多名北京清华大学、北京医学院、北京八中、八十七中、育英中学和上海复旦大学、第一医学院等学校红卫兵。天上飘下雨滴，北京红卫兵们全然不顾，放声高唱起当年的“流行歌曲”：

“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造反有理’！‘造反有理’！”

他们挥舞着《毛主席语录》，要求上海市委领导接见。

市委大楼前，外圈围着几层旁观者，一个女红卫兵站着领读《毛主席语录》，她读一句，众人重复读一句，起“扩音喇叭”作用。这腔调上海人从未见过。

这尚富诗意的气氛很快被打破了。远处走来一列不知为什么事“向市委报喜”队伍，开路的是一幅大号毛泽东油画像。目的很清楚：借“宝像”驱散市委大楼前的红卫兵。围观人群闪向两旁，心想：“这办法好，红卫兵也不敢挡毛主席的路。”

正当“宝像”将前进到红卫兵队伍时，红卫兵阵中跳出几个小将，举着纸印“宝像”迎上去，挡住去路，“毛主席万岁”口号声响在一片，报喜队伍停住了。上海人傻了眼。众小“宝像”档在大“宝像”前，僵持着。就像《封神榜》中神仙斗法：一宝降一宝。不多时，大“宝像”撑不住了，掉头离去。“宝像开道法”难破“宝像相对法”，这又使上海人大开眼界，常在以后“派斗”中运用。

上午 10 时，上海市委工作人员要求北京红卫兵各校派出一个代表，这些代表在市委工作人员沈宋平带领下，来到静安区文化馆上海市委临时接待站。这时，接待站里，除了沈宋平外，还没有一个市委的人。

沈宋平见状，就和红卫兵说去和市委联系，北京学生等了近两个小时，没有动静，就打电话催问。

终于等来了上海市委领导，但一见面，却让北京红卫兵们感到沮丧，出面接见的不是陈丕显，不是曹荻秋，而是中共上海市委常委、上海市总工会主席张琪和上海市外事办公室主任冯国柱。

红卫兵代表纷纷向他们提问题，这时一个红卫兵冲进来，把一张《解放日报》扔在桌子上，指出那张报纸上有一张毛泽东主席的像印得很难看，脸上还有字，红卫兵们顿时气愤万分，有的站了起来，有的跳到桌子上质问市委怎么搞的，有的红卫兵当时就气哭了。可是冯国柱却笑了，他可能还不知道北京的政治气氛

已经如此，似乎觉得这些红卫兵幼稚可笑，太小题大做了。红卫兵们愤怒无比，质问他："你为什么笑?看到有人诬蔑毛主席你还笑。你这位市委外事办公室主任是什么阶级感情?是站在什么立场上?"

红卫兵们认为问题很严重，立即提出三点要求："1、要曹荻秋同志接见已经在市委门口的首都红卫兵战士。2、要求直接和中央文革小组通电话(因为邮局挂不通)。3、给我们广播器材和印刷机器(或印刷的便利)，让他们宣传毛泽东主义，宣传革命造反精神，同时也辟一些谣言。"

对于红卫兵的三点要求，张琪、冯国柱不能答复，起身要走。北京学生拦在门口，他们二人只好说："我们不走"，"坐下来谈"。

但是，他们坐下来也无法回答红卫兵的要求，没有授权呀。红卫兵代表们见此状况，干脆扔下他们两人，出来会合北京红卫兵的大队人马，列队呼喊"誓死保卫党中央!誓死保卫毛主席!"的口号，重新回到上海市委门前。

"我们要见陈丕显！我们要见曹荻秋！"北京红卫兵们继续聚集在上海市委门前，不断地高呼着口号。

雨中，他们和上海工人纠察队员发生了激烈的争论：

"上海市委首长要管理一千万人口的上海市，为什么要接见你们这几十个人、几百个人？"

"我们要炮轰上海市委！"

"上海市委是正确的！我们要保卫上海市委！"

“上海市委跟北京市委一样，都是烂掉的！”

“上海市委跟北京市委不一样，上海市委是革命的！”

晚上 21 时多，上海市委门前的北京学生又从各学校中派了一名代表，去临时接待站找负责人。当他们来到静安区文化馆后，很快就被许多上海群众包围，这些群众高喊：

“政治扒手！”

“小流氓！”

“滚回北京去！”

接待站出来一个人，北京红卫兵代表再次向他提出了他们的要求，此人说他不能做主，要请接待站负责人来，过了半个多钟头，接待站的负责人来了，这时外面的群众也拥了进来，红卫兵要求这位负责人出面，让群众出去。那位负责人说：“他们要进来，我也没办法。”

红卫兵向这位接待站的负责人重复了一遍他们的要求。接待站的负责人说：“我只能向上反映，市委同志来不来，我不能保险。”说罢，便要离开。

学生问他：“你向上级反映需要多长时间？”

“半个小时吧。”

但两个小时过去了，既没再见到这个人，市委也没有派人来，群众却拥进屋里和红卫兵们辩论，学生们只好留下两人听电话，其他人又找大队伍去了。

9 月 4 日早晨 5 时 40 分，上海市委大楼的广播站又广播了

接待站的一个通知："同志们，同学们请大家静一静，我是市委接待站的同志。你们在这里待的时间比较长，大家辛苦了，请你们回去休息吧。市委负责同志包括曹荻秋同志这一昼夜已经分六批接见你们一百多个同学代表。你们还有什么意见、要求，可以再派代表谈。上海同志是欢迎北京同志来帮助闹革命的，现在你们辛苦了，上海同志热情地请你们回去休息，好不好?"

大楼前许多围观的群众和维持秩序的纠察队高呼"好!"把北京的红卫兵气得够呛。

上午 9 点钟左右，上海一些造反派给北京的红卫兵找来了两个喇叭，他们在市委门口的街道中央建立了自己的临时广播站，宣称"上海市委已经烂掉了"，要和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通话。北京师范大学的学生李颖在广播里说："同志们，我叫李颖，是北京师范大学的学生，我出身于革命干部家庭。我们家祖祖辈辈受压迫受剥削。我的父母很早就参加了革命，赴汤蹈火，流血奋战。我的好几个姑姑被万恶的阶级敌人杀害了，我对党和毛主席无比无比的爱!我今天来这儿就是来干革命的!……"

而就在 9 月 3 日深夜至 9 月 4 日凌晨，曹荻秋在延安西路 200 号市委办公大楼附近的静安区文化馆，与 6 名北京红卫兵代表见面。代表们提出三项要求：1、曹荻秋接见在市委门前的所有北京红卫兵；2、上海市委借给广播器材，提供印刷传单的条件；3、帮助接通给中央文革的电话。曹荻秋没答应前两条，解释说不开大会但开小会接见；广编印刷器材各单位都想要，给了

北京红卫兵也要给其他人；对最后一条，市委马上提供方便，让红卫兵用红色保密直线电话和中央文革通话。

曹荻秋不愿接见所有的北京红卫兵，引起北京红卫兵愤怒，他们一定要曹荻秋接见全体人员。上午，聚集在上海市委门前的北京红卫兵，多达 1000 余人，其中还有不少上海学生。他们成立了“临时指挥部”。

在雨中，临时指挥部的李颖再次昏倒。

上午 11 时 30 分左右，北京红卫兵向上海市委发出了最后通牒，强烈要求：“市委负责同志立即出来接见到场的全体红卫兵战士，必须在 30 分钟内给予答复。否则我们将采取必要行动了！一切严重后果由上海市委负全部责任。我们首都红卫兵说话是算数的。”

30 分钟过去了，通牒如石沉大海，上海市委没有任何答复。北京学生群情激愤，有 100 多名北京红卫兵在少数上海红卫兵和工人造反派的助威下，不顾大多数群众的劝阻，冲击大门，跟护卫人员拉拉扯扯。另一部分小将砸碎市委机关办公楼临街的玻璃窗，踏着人梯，沿着落水管攀爬冲进了延安西路 33 号市委办公大楼，并与维护大楼秩序的工人发生扭打。不一会，楼顶旗杆边就出现几个红卫兵，挥舞无旗杆的“红卫兵”大旗，引发一片欢呼声，同陈逸飞的名画《解放军攻占总统府》场景差不多。

冲突中有一些人受伤。

冲进楼内的北京学生发现市委大楼里所有的门都紧闭着，找

遍了整个大楼他们也没有找到广播室，而且，每道门都有成堆的“红卫兵”把守，成批地排着队的“工作人员”从市委后门进来，布满了整个操场。

中央接到北京红卫兵从上海打去的电话后，立即给曹荻秋接连打了两个电话，要他马上接见北京红卫兵。当晚 21 时 30 分，曹荻秋在市委办公楼门前再次接见北京学生，强调北京、上海学生要团结，欢迎大家揭发市委领导的问题。曹荻秋在对上海市委门前群众的讲话时说：

“昨天应北京同学的要求，我已经接见了北京 6 位代表，现在再跟大家见面了。北京同学来上海进行文化大革命，我们表示十分欢迎……这是对我们的极大支持，我们广大师生要和他们一道把文化革命进行到底。

文化革命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凡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不管他在哪一级党组织中，都要把他揪出来。上海市委在这次文化革命中要经受考验，上海市委是上海地方党的司令部，这司令部如果出了修正主义，对党的事业是个极大的危害，因此我们欢迎炮打司令部。所谓炮打司令部就是要用大字报这个锐利武器来揭市委的问题，市委如果是修正主义，完全可以造它的反。但是上海市委的问题，上海的工人阶级、革命师生、上海的群众最了解。”

现场学生长时间起哄。

曹荻秋接着说：“因此，上海工人、农民、革命师生你们大

胆地揭发上海市委的问题，北京的同学你们对上海市委有意见，我们也表示欢迎。北京来的同学来上海后曾经对文化革命产生若干问题，产生了不同意见，并产生了辩论，这个不同意见的辩论是不可避免的，自然的，譬如，关于文斗武斗的问题，我们是赞成文斗的……”

现场高喊：“要文斗！”

曹荻秋：“这是符合毛泽东思想的，符合十六条的。最近，林彪同志代表毛主席对这个问题有个专门讲话，同学们都看到了。

林彪同志在讲话中特别强调不能动手打人，说这只能触其皮肉，而不能触其灵魂，你把他人都搞得不能说话了，你们把人打死了怎能斗臭？”

众呼：“坚决支持！”

曹荻秋：“关于 8 月 31 日事件……8 月 31 日上午北京一部分人和上海一小部分人冲进上海市委，……竟打了上海市委的工作人员。”

众呼：“对！要文斗！”

曹荻秋：“关于这一件事情，市委认为，由于一部分同学的行动，市委是不赞成的，……但是有些人却到处发传单，说市委打了北京同学三十几个人，这全是胡说，单看今天的事情，有部分同学冲进了市委，至今还有部分同学在市委机关里……”

学生呼：“坚决反对市委放毒！”

也有人喊："不许捣乱！"

曹荻秋："我也不详细说这件事情了，反正大家看得很清楚。"

学生呼："一切后果由市委负责！"

曹荻秋："另外，北京同学提出两点要求，昨天也答复了，"

这时有人喊："罢曹的官！"

曹荻秋没有理会，继续说："一个要求给一个广播车，北京来的单位很多，每个单位都要，不能解决，北京同学组织起来了，我们也同意借广播车，第二跟北京通话可以打长途电话；二是打电报，三是可以通过市委转，保证一个字也不改。如果你们一定要跟中央通电话，那么，可以选两个可靠的人来。"

众人喊："要求曹荻秋公布中央来电！"

曹荻秋："我们希望加强团结，我们相信上海广大工农兵群众会满足你们的要求。我们工人是有组织有纪律的，我相信上海师生，广大工人阶级最会保证你们的安全。在同学争论中发生了争论，发生有北京同学打了我们，我们上海同志也不还手。"

学生呼："反对放毒！"

群众喊："坚决支持！"

曹荻秋："今天来了许多工人和革命同学，北京同学来上海搞革命串连，我们要给他们以方便，把上海文化革命搞好，大家一定要加强革命的团结。按十六条办事，按毛泽东思想办事，按党中央指示办事。不要动感情，你们要和北京通电话，请派两个代表出来。"

讲完话，曹荻秋转身进入市委内。

第 187 回：下工厂，学生与工人结合

紧跟党，王洪文带头造反

9 月 5 日凌晨 3 时 20 分，国务院秘书长周荣鑫从北京来电话传达周恩来三点指示：

一、同意给广播器材;

二、已告诉曹要他接见北京红卫兵;

三、周总理已给曹打电话，要求他将包围北京红卫兵的工人、学生全部撤走。

当天上午，上海市委劝说簇拥在市委大楼门口的上海市民退开，让红卫兵们进入大楼。下午近 18 时，进入市委大楼的红卫兵开会，要曹荻秋到场。曹荻秋到会并讲话，欢迎大家揭发市委问题，并呼吁团结。这时大批的上海工人、学生聚集在市委机关门口，要求听取会议实况，否则也要强行进入大楼，和北京红卫兵辩论。经学生同意，市委在门外安装了拉线广播，天上下起了秋雨，越下越大。1 万多人冒雨在马路上收听，黑压压一大片人群。

晚 20 时，会议结束，市委机关调派 20 辆大客车将北京红卫兵送往住地。

5 日、6 日这两天，上海街头只要听你说普通话，马上就有人围住你要辩论。

北京红卫兵在上海越闹越厉害。他们开始明白，外滩那幢挂着两块大牌子的大厦，只是上海市委和市政府一般工作人员的办

公楼。上海首脑们，是坐在康平路的办公楼里。那儿的门口，只是站着持枪的门卫，不见一块牌子。

上海市委估计:“北京的红卫兵冲了 33 号,又要冲书记处了”，9 月 5 日上午，市委召集了公安机关、警备区的人紧急计划，印制《作战地图》，中午 12 时 30 分，布置一部分“常备队”员分内圈、外圈两道防线，到通往书记处的各条马路口作暗哨，下午 14 时以后，又调了沪东、江南造船厂等一些厂的几百名工人，带了纠察队或红卫兵的袖章，在每个马路口安排 50 人，封锁交通要道，碰到集体来的红卫兵，就要他们出面对红卫兵说：“里面是保密单位，有特殊任务不能通行”。为了及时掌握红卫兵的动向，又在马路口安装专用电话，直通书记处。一有动静，可以立即向里面打电话报告。

后来，上海市委觉得这样做太明显了，一旦被北京的红卫兵发现，又会说他们调动工人镇压学生运动。于是，第二天，9 月 6 日，就改为利用各交通要道的交通岗警，在工作人员食堂装置了专用电话掌握动向。电话一开始装在厕所里，后来又改在了二楼，还把 2000 名工人集结在操场，一有情况，可以立即出来阻拦红卫兵。同时，还和附近各工厂打招呼，如果需要，一个电话，立即派出工人保卫市委。并且从虹桥靶场调来了 60 多个解放军，由连长带队，警备区派一名作战股长指挥；从市公安局调来了便衣，由市公安局副局长林德明带队。这些人都安排在书记处的院子里。

9 月 6 日，上海市委写了《热烈欢迎革命群众炮打司令部》的文章，要各基层组织代抄成大字报，在各工厂企业、学校、机关中张贴，表示要“引火烧身”。

9 月 2 日在上海市委门前贴出上海国棉 17 厂 36 位老工人署名的大字报：《我们老工人要讲话》，引起了北京红卫兵对上海国棉 17 厂的关注。于是，这些“小将”们响应毛泽东和中央文革的号召：知识分子要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于 9 月 2 日当天，北京女八中红卫兵就到工厂煽风点火，结果被工厂的工人赶了出来。

北京红卫兵又到上海国棉 17 厂串连，同样碰了钉子，工厂工作组要看介绍信，否则不接待。“小将”一听，觉得上海国棉 17 厂的领导太落伍了，还在用修正主义的“条条框框”阻碍革命，一定要造他们的反才行。但是，此时的上海不比北京，还没等他们造别人的反，就被工厂给轰出来了。很快，上海国棉 17 厂大门口，贴出了这样一副对联：

“大串连必需介绍信，斗批改全靠本单位”。横批是“请君留步”。

可是，没多久，旁边出现另一副对联：

“干革命何需介绍信，砸大门欢迎红卫兵”。横批是“造反请进”。

正像毛泽东说过的，哪里都不是铁板一块。上海国棉 17 厂既有拥护上海市委和上海市委派出的工作组的老工人，也有政治

上敏感，积极响应毛泽东号召的造反派。这个厂就出了一个后来闻名全国的人物——王洪文。

王洪文，东北吉林省人，抗美援朝时参军，在志愿军里入了党，提了干，转业后分到上海国棉 17 厂当工人，1960 年参加开发崇明岛的劳动，1964 年结束了在崇明岛上的 4 年劳动生活，回到国棉 17 厂。组织上安排王洪文到厂保卫科当保卫干事，兼任厂基干民兵连连长。当时，厂里没有保卫科长，只有一个代科长，一心想上进的王洪文很想当上保卫科长。但是，“四清”运动开始后，有人揭发他沾工厂的“光”，拿厂里的材料给自己家修房子，拿厂里的布做衬衣。因此厂领导没有急于提拔他当科长。

和全国许多人一样，6 月 1 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的聂元梓等人给北京大学党委贴的大字报也引起了王洪文的极大震撼。

这时，国棉 17 厂也有一些人贴出了一些大字报，但都是写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提一些不痛不痒的意见，对这些，没有人重视，大家都当笑话看，厂领导也不当一回事。但是，要真正给厂党委贴出一张有分量的大字报，从政治上提意见，又是有风险的，因为谁都知道刚刚过去不到 10 年的反右斗争。

那一段时间，王洪文反复研究报纸上的文章，翻来覆去的思考，一连几天，茶饭不香，好几个晚上没有睡好觉。他把《 人民日报》上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和《人民日报》的社论和文章又看了多遍，觉得自己对中央精神的理解没有错误：这次文化大革

命运动，就是揭发各级党委领导的问题，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终于下决心，响应党中央的号召，起来革命。

王洪文将他对中央精神的理解和保卫科干事孙一中、内勤董秋芳以及厂党委组织科档案管理员唐文兰等人进行了交流。这些人平时在工作中与王洪文接触多，加上王洪文爱和他们谈政治问题，有许多事情看法大体上相同。他们也看了聂元梓的大字报，觉得王洪文说得有道理，于是推王洪文出头，让王洪文起草大字报，“揭发”厂党委。

6 月 11 日下午，王洪文要唐文兰打开档案室的门，那是一个“闲人莫入”的地方，王洪文把房门关紧，躲在里面挥笔疾书，写出了《剥开党委画皮看真相》的大字报底稿。大字报写了三部分内容，第一部分是：厂党委不抓阶级斗争；第二部分是：厂党委执行修正主义路线；第三部分是：厂党委把群众意见当耳边风。

第二天清早，王洪文把大字报草稿给其他几个人看，大家看后都觉得行。于是王洪文拍板定稿。他让毛笔字写得好的董秋芳把大字报抄清，然后王洪文带头第一个把自己的名字写在最前边，接着，保卫科和组织科的 5 个人紧随其后，在大字报上签了名，共 6 人。

“6 个人不行——北京大学的大字报是 7 个人签名的！”王洪文颇为遗憾地说。就在这时，财务科的一个出纳员路过保卫科，王洪文一把拉住他：“你敢不敢签？”就这样，终于凑齐了 7 个人！

“光是大字报，还不够劲儿。”王洪文又想出了新主意，“再来几条大字标语，造造声势！”于是，由王洪文口授，保卫科的另一个科员执笔，写了三条通栏大字标语。

“坚决挖掉修正主义老根！”王洪文口授了第三条标语。可是，写标语的人却写成了“坚决挖掉修正主义根子”“不行，写‘坚决挖掉修正主义根子’不行，口气太轻了。”王洪文振振有词地说道，“你们注意了没有？前几天《人民日报》的社论说前北京市委的修正主义路线是‘盘根错节’，那就不是一般的根子，而是‘老根’，我们厂党委的问题跟前北京市委一样严重，所以应该写‘坚决挖掉修正主义老根’！”

经王洪文这么一解释，那 6 位“战友”恍然大悟。

“看不出，小王的肚子里学问不小哇！”

“小王是吃‘政治饭’的料子！”“战友”大家纷纷夸赞王洪文。

第二天，1966 年 6 月 12 日，他们在厂医务室旁边墙壁上，贴出了这张大字报，把厂领导的“问题”上升到了执行修正主义路线的高度，认定他们是“走资派”。这张把矛头直接指向党委的大字报，在上海也算是第一张。一时间，国棉 17 厂轰动了，人们纷纷前去看这张大字报和旁边的大标语，议论纷纷，有人赞成，有人反对。消息很快就传到了国棉 17 厂的上级管理公司——上海棉纺公司党委，大字报贴出不到一个小时，上海棉纺公司党委书记陈志达便于上午 10 时亲自赶到上海国棉 17 厂，来看这

张大字报。很快，他就召开厂党委紧急会议，作三点指示：保卫科大字报是大毒草；1957 年反右斗争的形势又来了；反到党委头上来了，不能稀里糊涂，这就是阶级斗争。厂党委找其他几个大字报签名者谈话，追查谁是起草者。

王洪文成了上海国棉 17 厂的风云人物。几十张、几百张大字报贴出来了。有人拥护他们的大字报，但更多的人是反对他们的大字报。就在王洪文等人贴出大字报的第二天，在这张大字报旁边，就贴出了反对的大字报，接着，有 90 张反对的大字报，过了几天，出现了上百张反对的大字报和大标语。在反对的大字报中，有许多大字报直接指向王洪文，认为他别有用心，甚至认为他是反革命分子。许多人对他侧目而视，还有人表示，要和他公开辩论。

王洪文思想上有了压力，他的脸色蜡黄。但是，却不表现出来，平时仍然挺拔着身板，一副精神抖擞的样子。可一到夜色降临，和他一起贴大字报的几个人就都聚集到王洪文在定海路的家中。

王洪文的这间小屋不大，来 6、7 个人，也就坐满了。来的人中，有人吸烟，有人喝水，都愁眉苦脸。王洪文见大家这个样子，就对他们鼓劲说：大不了当反革命。当反革命，我当，没有你们的事情。接着，王洪文把他这半年来所注意的中央形势向大家做了分析，还拿出他保留的报纸，一段一段给大家念。他的结论是：“我们贴大字报，正好和中央精神一致，没有错。我们的

行动是革命行动。”

受王洪文的鼓动，这些人又来了精神，但是仍然有人担心，这样和上级顶起来，会不会真的当反革命。因此，有人提出：是否向厂党委做一些妥协。这样一来，他们内部出现了分歧。王洪文决定，再进一步做一做工作，统一大家的思想。王洪文认为，从目前大家的情绪来看，已经到了必须做出决定的时候了。

就在这时，王洪文发现，他们的行动，受到了监视。每天都有几个人到他家附近转悠。王洪文也受到跟踪。白天，他上班时，后边有人盯着他。他还见到过区公安局一些人的背影。王洪文心慌了。他决定，不在自己家里密谋了，他告诉紧跟自己的几个人，到黄浦公园集合，有要事商议。

第二天一大早，王洪文就到了黄浦公园，此时，他已经自然地成为他们 7 个人中的头头了。王洪文做出了这样的“决策”：

一、到市委和纺织局党委去告厂党委的状；

二、再贴一张大字报，继续揭发厂党委，同时对反对者进行反击。

正巧那几天王洪文有点发烧，6 月 16 日，他把一张病假单塞到了保卫科代科长王有富手里。

第二天，休“病假”的王洪文跑到纺织局党委去反映国棉 17 厂党委的“问题”，王洪文找到纺织局党委书记陈志达，口若悬河地说了许多，讲了厂党委的一大堆问题。

陈志达听王洪文讲完后，耐心地向他做了一些解释工作，劝

他正确对待领导干部。王洪文见在纺织局党委这里话不投机，又跑到上海市委去告状，市委负责接待的人，只向王洪文讲了党的干部政策，对王洪文所反映的事情，只表示：还是请纺织局党委调查了解情况。几趟跑下来，王洪文话说得很多，腿跑得很累，但毫无结果。他心中的那个气恼，简直无法用语言形容。他意识到，告状之路，已经走不通了。

一不做二不休，王洪文决心再写一张大字报。他找来另外 6 个人一商议，把大字报的内容定下来后，由王洪文动笔起草大字报稿。第二天，也就是 1966 年 6 月 18 日，王洪文率领 6 个人，把这张题目为《再揭厂党委修正主义干部路线》的大字报贴到了厂医务室大墙边，内容集中在厂党委的所谓“修正主义干部路线问题’”上，认为厂党委不重视工人中成长起来的干部，而是重用修正主义“苗子”，走“专家治厂路线”，还点了国棉十七厂的一些干部的名字。

就在王洪文贴出第二张大字报的当天下午，在他们的大字报旁边就贴出了一张大字报，标题赫然写着：《向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王洪文猛烈开火》。这张大字报认为，王洪文领头贴的这两张大字报，内容是反对党委领导，反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大字报中揭发了王洪文过去存在的许多不良表现，认为他不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而是一个有个人野心，利用“文化大革命”之机，跳出来向党发动进攻的反革命分子。大字报号召全厂职工认清王洪文的真面目，和他划清界限。

王洪文决定再写大字报反击。当天晚上，王洪文吃过饭，就与共同反对厂党委的几个人商议，到厂里把大字报写出来。他们一同来到厂保卫科，王洪文和另外两个人进去写大字报，让同伙把他们反锁在保卫科里。

那天晚上 21 时，厂党委副书记张鹤鸣巡视厂区，走到厂办公楼，见办公楼里还有一间办公室亮着电灯，以为是什么人在加班工作，就走进办公楼查看，想表扬加班工作的人几句。近时却发现，亮着电灯的办公室是保卫科，外面有锁头锁着门。张鹤鸣敲敲门，里面没有动静，他觉得奇怪，保卫科是机要部门，敲门不开，显然不正常，他担心保卫科这样重要的地方出什么问题，就叫来几个人乒乒乓乓地敲门，依然无人答应。

21 时 45 分，终于把保卫科的一个工作人员找来。那门，便是他反锁的——原以为门外也用锁锁上，不会有人知道屋里有人。可是，从窗口射出的灯光，却“泄漏”了秘密。

来人把外面的锁打开，但里面还有一把锁锁着。张鹤鸣断定，这里面一定有人，他叫来更多的人，大家把门撞开，拥入办公室内，眼前的景象十分明白：王洪文正和另外两个人在写大字报。王洪文见张鹤鸣带人闯进来，却也没有躲避，他手里拿着笔，对张鹤鸣怒目而视，一句话也不说。张鹤鸣也很生气，他批评王洪文他们三个人说：

“你们把门反锁，万一有事，谁负责，你们知道不知道，保卫科是要害部门！万一失火怎么办？”

王洪文却反问道："你支持还是不支持文化大革命？"

张鹤鸣答道："当然支持。"

王洪文抓住这句话，反咬一口："我们参加'文化大革命'，正在给厂党委写大字报，可是，你身为厂党委副书记，却带人闯进来，对我们的革命行动进行干扰、压制，你这是压制民主，压制革命群众，压制'文化大革命'！"

王洪文敢于当众顶撞厂党委副书记，这在国棉 17 厂还是第一次，张鹤鸣当然不让步，二人就在保卫科争吵起来。跟张鹤鸣来的，大都是拥护厂党委的人，他们见王洪文这个样子，十分气愤，都上前指责王洪文。和王洪文一伙的人，也上前和指责王洪文的人吵架。二人对吵变成了群吵，把整个厂区都惊动了。两伙人一直吵到后半夜，互不相让。最后，都累了才散。在此之前，王洪文他们和厂党委还没有发生正面冲突，现在，正面冲突发生了，这是一个标志：王洪文已经与厂党委势不两立。

第二天，这个有 9000 人的大厂，几乎每个人都知道了这件事情。上午，在医务室墙边，又出现了不少批判王洪文的大字报，其中主要内容，是指出王洪文在厂保卫科搞反革命密谋活动的。王洪文也不示弱，立即写大字报反击。他们写的大字报，不涉及他人．只把攻击的矛头指向厂党委副书记张鹤鸣，一口咬定：张鹤鸣压制民主、压制群众，压制"文化大革命"，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王洪文的目标非常明确：打倒张鹤鸣。

## 第 188 回：起争议，工作组到十七棉

### “老鼠队”，安徽打击“八二七”

那时的上海国棉 17 厂党委没有正书记，因此副书记张鹤鸣便是厂里的第一把手。张鹤鸣出身好，为人谨慎，也很联系群众，在群众中有一定威信。在国棉 17 厂，一大批工人死保张鹤鸣。而王洪文他们一伙却非要打倒张鹤鸣不可。国棉 17 厂内形成了两派，一派是一大批保护张鹤鸣的人，另一派是以王洪文为首的要打倒张鹤鸣的人，两派人互相对立，除了大字报外，还经常伴随着当面的争吵，用当时的话说，就是“大辩论” ，整个工厂陷入了混乱之中，正常的生产秩序被打乱了。王洪文挑头造反，使他在一部分想要造反的人心目中，有了一定地位，他们把王洪文视为“造反”的“核心”，王洪文住的定海路小屋里，每天都有人来，不是讨论，就是出主意，再有就是“反映情况”的。原来冷落的王洪文家里，一时间热闹起来。

国棉 17 厂陷入混乱的情况，很快就被上海纺织局党委知道了。6 月 20 日，上海纺织局党委决定，派工作队进驻国棉 17 厂。王洪文知道消息后，立即找工作队谈话，向工作队反映厂党委执行“修正主义路线”和镇压“文化大革命”的问题，但工作队并不赞成王洪文的说法。谈话之后，王洪文找他的“战友”一起商议。他们决定：用大字报来迎接工作队。工作队进厂没有几天，王洪文等人贴出了一张题为《 再揭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张鹤鸣》 的大字报，主要内容集中在张鹤鸣“镇压群众”，压制“文化大革命”等问题。王洪文等人的大字报在厂内又一次引起轰动。有人找到工作组，要求工作队支持厂党委。

也有一些人找到工作队，要求撤销张鹤鸣的职务。

工作队决定 6 月 30 日开全厂职工代表大会，大家在会上把事情说清楚。

会议开始，工作队长说明了这次会议的目的。他的话音刚落，王洪文立即站起来发言。他口若悬河，滔滔不绝，讲话干脆，不拖泥带水，加上他口音纯正，有一定的感染力。就这样，王洪文把厂党委的“执行修正主义路线问题”和张鹤鸣“镇压群众”的问题集中起来，一讲就是半天，中间也不停顿。

下午开会，王洪文继续讲。他把问题集中了一下，转而向工作队提出质问，要求工作队回答，并且提出：工作队必须撤销张鹤鸣的职务。

工作队在全厂职工代表大会上批评张鹤鸣，肯定王洪文贴厂党委大字报的行为。随后，又连续召开各种会议，揭发批判张鹤鸣。

7 月 7 日，国棉 17 厂中，向厂党委造反的大字报突然增多，在不到半个月的时间里，竟有 7500 多张反对厂党委的大字报，形成了声势，震动了上海纺织界，也震动了全上海！

面对这样的形势，工作队退出了国棉 17 厂。

7 月 20 日，市委又派出 150 人左右的工作队进驻上海国棉 17 厂。工作队长是个女的，叫施惠珍，是上海市总工会副主席。另外几个副队长分别是黄浦区副区长张六吉、杨浦公安分局副局长赵戈，上海丝织一厂党委书记焦凤岭，以及上海市总工会教育部部长余文光。

鉴于国棉 17 厂的领导班子已经垮了，上海市委和纺织局组成了

一个新的国棉 17 厂领导班子，这个班子的成员也随市委工作队一起来到国棉 17 厂。他们在国棉 17 厂门口受到了工厂工人的欢迎。工厂大门两边贴出了红色标语：

“热烈欢迎市委工作队来我厂领导文化大革命！”

“热烈欢迎以施惠珍同志为首的市委工作队进驻我厂！”

工作队进厂的当天，就在厂礼堂召开全厂职工大会，队长施惠珍作报告，重点讲了工厂如何搞“文化大革命”的问题，她多次引用上海市委关于搞“文化大革命”的指示，中心观点是稳定、团结、党委加强领导、工人要在搞好生产的前提下搞“文化大革命”。据厂里后来整理的文革大事记说：这个报告不强调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而强调“搜索一切牛鬼蛇神”，要全厂职王“到深山密林中寻老虎”。这个报告对前一阶段王洪文等同志与旧党委斗争的革命行动只字不提，对张鹤鸣镇压革命群众的反革命罪行只是轻描淡写地提一句。

于是，在工作队进厂后的 10 天内，全厂又贴出 2800 多张大字报，揭发中层以上干部的大字报约占 14%，而针对群众中问题的占了 70%以上。到 1966 年 9 月底，全厂共排出四类对象 114 个，其中厂级干部 1 人，一般干部和工人群众 98 人，其中已整理书面的，也大多是工人群众。在 4 个月中，全厂 150 多个车间级以上干部进行批斗的 4 人。

对于王洪文所反对的副厂长张鹤鸣，施惠珍在报告中说是“压制大字报的严重事件”，但没有提及前一阶段王洪文他们对张鹤鸣的揭

发。据说是因为工作队派得非常匆忙，两个工作队之间没有交接，市委工作队进厂前不知道王洪文曾经贴过张鹤鸣的大字报，甚至不知道“王洪文”这个名字。进厂后，才逐渐了解国棉 17 厂的情况。

施惠珍到厂的第二天，就派出队员对王洪文进行详细调查了解，并且召开会议，专门讨论王洪文的问题。后来，工作队正式宣布王洪文列席党委会。

就在市委工作队进厂的第 10 天，厂医务室墙边突然出现了这样一张大字报：《市委工作队滚回去！》。

这张大字报列举了市委工作队和厂党委相同的说法和做法，结论是：市委工作队和原厂党委是一路货色。大字报最后要求市委工作队立即滚回去！

施惠珍看罢大字报，不由暗暗吃惊：工作队的内部会议及动态，大字报的作者竟一清二楚？她回去一查，原来是工作队进厂后，成立了“材料组”，负责收集全厂运动的材料。材料组组长是由工作队员担任，而组员则是从厂里的干部中抽调的。按常规，当然都是厂里组织科、保卫科人员，其中就有王洪文第一张大字报的参与者唐文兰等王洪文的密友。所以，工作队的一举一动，王洪文他们当然也都清清楚楚了。王洪文认为：施惠珍跟张鹤鸣一个鼻孔出气！于是他们写出了这张大字报，将炮口对向了工作队。

施惠珍毕竟老道，她不为所动，继续按部就班地进行着自己的计划。

8 月 18 日毛泽东接见红卫兵后，作为上棉 17 厂民兵连长的王洪

文马上与其他负责民兵工作的人商量，想将厂里的民兵也组织成红卫兵。工作队不希望王洪文掌握红卫兵，便想出了个办法：既然红卫兵是学校青少年的组织，那么工厂的红卫兵也应是青年工人的组织。他们将红卫兵年龄规定在 30 岁以下，这是基干民兵的年龄，上限是 30 岁。王洪文当时 32 岁，不能参加红卫兵。

8 月 19 日，上棉 17 厂按《十六条》要求，筹备成立厂文化革命委员会。造反派们提名王洪文为候选人，但王洪文所在的厂部科室两种观点争执激烈，一派支持王洪文，一派坚决反对王洪文，结果厂部科室的文革委员会始终没有成立。而要当选为厂文化革命委员会代表，必须是自己所在部门的文革委员会代表，王洪文因此没有当上厂文革委员会主任。王洪文和造反派们认为这是工作队干扰的结果，工作队则认为这是群众选举的结果。

就在这时，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一个叫余凤珍的老工人给王洪文贴了一张大字报，题目是《王洪文的十大罪状》。

余凤珍原是国棉 17 厂的工人，住在上海定海路 200 号，与王洪文是邻居，她还担任着定海街道第五居委会第二居民小组组长的职务。

余凤珍在这张大字报中写道：王洪文披着工人的外衣，在里弄里为非作歹，她亲眼看到，有一个劳改分子经常送螃蟹、烟、酒给王洪文，成了他的酒肉朋友；有一个现行反革命杀人犯，平时和王洪文称兄道弟，就在他作案被捕的前一天，还在王洪文家里吃喝到深夜；有一个贪污分子给王洪文一家大小做衣服，王洪文叫他“娘舅”，在这个贪污分子的问题暴露后，王洪文还利用职权加以包庇，使这个贪污

分子逃避了法律的制裁。余凤珍还在大字报中写了王洪文个人不检点的种种行为，指出：王洪文在崇明岛围垦期间，经常装病回家，逃避劳动。有一次有个同志托他带一只烧鸡到崇明岛，王洪文竟然把鸡肉吃掉，只把鸡爪子和鸡头带给人家。王洪文自己家里修房子，从厂里偷拿了许多材料，甚至连锁头也从厂里拿。王洪文还在邻居中挑拨离间，制造矛盾……

作为邻居，余凤珍与王洪文岳父岳母有矛盾，王洪文也和她吵过架。王洪文原来以为，余凤珍这个老太婆给他贴大字报，是因为此。可是冷静下来一想，觉得这件事还是与市委工作队有关。为什么在竞选关键时刻，余凤珍的大字报出来了？肯定是市委工作队搞的阴谋。于是，炮轰市委工作队的大字报铺天盖地而来。

9 月 1 日、2 日，北京红卫兵冲击上海市委，国棉 17 厂工作队也接到电话，让紧急抽调几百名工人赶往市委大楼，与其他工厂的工人们一起组成纠察队，保卫市委大楼。工作队找到担任民兵连长的王洪文，让他带领民兵去市委门前。当王洪文带着工人来到上海市委门口后，发现是围攻北京红卫兵，就叫他们厂的工人撤走了。但还是有老工人在现场与北京学生发生了辩论。

9 月 3 日，北京红卫兵们来到国棉 17 厂，就像一瓢冷水倒进热锅一样在厂里炸开了。有反对北京红卫兵到工厂来串联的，而王洪文为首的国棉 17 厂的造反派们，则支持北京红卫兵的行动。双方日夜展开辩论。

安徽合肥围攻炮打省委大学生的“827 事件”后，9 月 6 日，合

肥工业大学“八二七革命造反队”宣告成立，梁守福任造反队大队长，刘光裕、杜玉桥等人是副大队长。

“八二七革命造反队”成立的第二天，9 月 7 日，他们即以“纪念《十六条》发表一周月，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党中央”的理由，召开全市“大、中学校革命师生大会”，并要求省委派负责人参加，以表明他们对《十六条》的态度。

省委派张恺帆书记参加会议，他支持大会批判修正主义路线，捍卫《十六条》，但对“八二七”的性质闭口不谈。大会时间很短，但主席团突发奇想，想利用这个机会搞一次贯穿全市的大游行，借以发动群众。这个想法以广播形式征求参加大会师生的意见，与会者报以雷鸣般的掌声和欢呼声。上午 11 时左右，万人队伍的大游行开始了，他们从会场合肥师院出发，经望江路、合作化路，到五里墩向东顺长江路、巢湖路、和平路到安纺，直达合钢西门。一路上，所到之处都是万人瞩目，鞭炮、欢呼声四起。游行队伍越走越长，许多中学生，甚至高年级的小学生，也加入进来，还有若即若离跟着走的工人、服务人员和市民等等，他们都是带着水和食物走进队伍的，最后到底有多少人参加了这次大游行，无法统计。这就是著名的合肥“97”大游行，省委震撼了。

“老鼠过街，人人喊打”。在 1966 年 9 月以后很长一段日子里，合肥工大“827”的造反学生被称之为“老鼠队”。这是省委张恺帆书记在一次省委书记会议上说出来的。他当时写了一首打油诗，全文是：

“八•二七”，老鼠队

吃饱饭，没有事。

夜里出，白天睡。

出来就造反，见人就打倒。

全打到，不留谁。

你看有罪没有罪！

这首打油诗流入民间，大街小巷，几乎人人皆知。有甚者以“老鼠队”吓唬小孩，于是，“八二七”就和“老鼠队”划上了等号。

为了人打击合肥工大“827”，当时还制造了一些事件，如“稻香楼事件”。

还在 8 月 24 日后，合肥市的学生也开始“扫四旧”，安徽农学院离省委稻香楼宾馆比较近。有部分同学到稻香楼去“扫四旧”。在稻香楼有一间毛泽东曾住过的房间。在省委书记李任之的授意下，稻香楼领导指使人在毛泽东住过的卧室里布置被人破坏的假现场，并组织机关人员参观、拍照，说：“安徽农学院学生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大不敬，这是现行反革命行为。”其实，学生根本没有到毛泽东住过的卧室里去。而且当时也还没有“827”组织。后来稻香楼领导也觉得此事太离谱，怕露底，自己真成了现行反革命，又偷偷撤掉假现场，恢复卧室原样。这就是所谓的“稻香楼事件”。

除了通过编造事件说明“827”是“右派”学生，“现行反革命”外，还印刷了大量的传单。这些传单不仅通过各级党组织发行，而且以“合肥地区大中学校红卫兵总部”的名义向全国 50 多个大、中城市全文发了电报，甚至在新华书店零售。有的地方还像批“三家村”

一样批“827”，安徽省军区也学着地方，安排学习讨论。

省委还通过党的组织系统派出大量宣传车，安徽省军区也出动了宣传车。

对安徽省军区出动宣传车之事，“827”很有看法。因为中央军委早有通知，部队不准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如果介入的话，也应该按照 8 月 22 日的《人民日报》社论精神，“工、农、兵要坚决支持革命学生”。于是“827”将此情况反映给中央军委，引起重视，要南京军区立即调查此事。并于 10 月下旬派来三位《解放军报》记者，住在省军区招待所西小楼二楼。他们可以列席军区党委和省委的重要会议，还可以与中央直接联系。

9 月中旬，在合肥工大“827”最艰难日子里，由合肥工学院文革小组派校车将“827”头头梁守福于和劳动模范徐文成等十几个人送到浦口，他们在清华大学南下串联队负责人胡昭复的带领下，从这里前往到北京，一是去看看北京文化大革命是怎样开展的，同时向中央反映安徽的情况。因为他们身上带有反映省委的材料，怕从合肥上车遭到不测，所以绕道浦口。

到北京的第三天，他们就参加了毛泽东 9 月 15 日接见红卫兵的活动。随后向中央递交了反映安徽省委问题的材料。9 月下旬，梁守福收到在家主持“827”工作的刘光裕发来的电报，称合肥形势紧张，望梁守福速回稳定局势。接到电报后，梁守福放弃了 10 月 1 日上天安门参加毛泽东接见的机会，立即返校。

9 月 28 日，合肥工业大学“827”在东操场集合听梁守福报告北

京之行的情况。人到齐后，梁守福粗略估算一下，大约还有 300 余人。他去北京的时候是近 2000 人的大队伍，只有半个月，被省委分化瓦解得只剩下“一小撮”了。梁守福知道他们期盼什么？他们期盼精神的鼓舞。同学们更想知道今后应该怎么办？梁守福最后说：

“同学们，我们不能期望一个要置我们于死地的省委给我们平反，我们的出路只能是自己给自己平反。要实现这一点，我们必须打倒李葆华，即使李葆华胜利了，我们成了反革命，但我们相信历史会做出公正的裁判，历史一定会给我们平反！”

他的话音刚落，同学们整齐地站了起来高呼：“我们一定胜利！我们一定胜利！”

## 第 189 回：组队伍，山城中学生造反
## 想不通，傅连璋多次求救

9 月 8 日，重庆正式成立“毛泽东主义红卫兵总部”。总部办公地点被安排在红岭，即原鹅岭公园。重庆医学院“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的发起人刘桂兰担任总部政委。重庆大学学生、重庆市“赤卫军”负责人李长春经市学联和市委文革办公室推荐，担任“毛泽东主义红卫兵”总指挥。同时，由市委提议，经请示成都军区批准，54 军军长韦统泰、政治部主任梁大门奉命担任“毛泽东主义红卫兵”辅导员，并派来了 10 个名解放军做联络员。54 军军部，也是重庆警备司令部正位于“毛泽东主义红卫兵总部”驻地红岭公园马路对面。

9 月 9 日，《重庆日报》按照市委指示以套红通栏标题显著报道重庆市大中学校“毛泽东主义红卫兵总部”成立消息，发表其《向党中央和毛主席的致敬电》，并配发社论《向英雄的红卫兵致敬》，称“这是我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件大喜事”。随即，市委按照李井泉“要号召工人阶级动员自己的子女参加红卫兵”的指示，号召各单位发动“红五类家长”踊跃“送子参军”，即送子女参加“毛泽东主义红卫兵”。《重庆日报》还派出记者前往设于红岭公园的“毛泽东主义红卫兵”总部采访老工人“送子参军”消息。全市掀起劳动模范、老工人“送子参军”热潮。第二天，《重庆日报》头版报道老工人陈荣森、老贫农简阳卿等 36 人向全市

红五类家长发出倡议《立即掀起一个鼓励子女参加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的热潮》。并报道“毛泽东主义红卫兵”总部举行接受新战士入伍大会。

但是，事情的发展并不像李井泉想象的那样，官办红卫兵的成立并没有遏制住炮打重庆市委的浪潮蔓延。9月10日，重庆市第六中学师生在体育场召开各界群众声讨市委大会。

9月11日，李井泉进一步电话指示重庆市委：要拼命发展“毛泽东主义红卫兵”，要开誓师大会，授旗、登报。市学联主席莫泽礼和市委文革办公室主任李友当晚向“毛泽东主义红卫兵总部”传达了李井泉的电话指示。

到了9月13日，外地赴渝师生又在体育场召开了声讨重庆市委大会。

9月14日，按市委安排，重庆市“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召开誓师大会。54军“辅导员”韦统泰、染大门，西南局宣传部长刘文珍和重庆市委书记处书记鲁大东、辛易之、孙先余、廖苏华等出席。李长春代表“毛泽东主义红卫兵总部”讲话并发布《动员令》。鲁大东代表市委发表热情讲话。

由于重庆中学生“红卫兵总部”及基层组织中不少人对重大“815”表示同情和支持，重庆市委决定：趁重大“815”主力在北京告状未归之前，解决中学生红卫兵的问题。9月15日，重庆市委在潘家坪招待所开会时研究决定，让“毛泽东主义红卫兵总部”与中学生“红卫兵总部”合并。

9 月 16 日，市委向刘文珍报告了中学生红卫兵与重大“815”关系密切的情况，刘文珍决定断绝对中学生红卫兵的物质供应，撤出市委联络员。

9 月 20 日，按照市委的布置，中学生“红卫兵总部”的电话线被拆除，办公地点被强占。重庆市大中学校“毛泽东主义红卫兵总部”将中学生“红卫兵总部”强行合并，合并后的组织统称“重庆市大中学校毛泽东思想红卫兵”。9 月 21 日，《重庆日报》按照市委指示刊登“毛泽东主义红卫兵”与中学生红卫兵“合并”改称“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的消息，并宣布中学生红卫兵总指挥部撤销。

拒绝与“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合并的中学生红卫兵在第四十一中召开全体代表大会，来自 103 个学校的代表一致抗议市委授意下将中学生红卫兵强行合并的做法，选出了新的临时主席团。主要负责人是第四十一中学高六六级学生，共青团员刘先裕。至此，一个被市委“逼上梁山”的、与重大“815”并肩作战的中学生造反派组织正式出现，而且成为重庆第一个全市性的造反派群众组织。

9 月 24 日，重庆市中学生红卫兵 8000 多人在市人民大礼堂集会，抗议其被“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强行合并，要求市委领导到场解决问题，向市委提出八顶要求，未得答复。僵持至 27 日凌晨，数千中学生出发宣称“步行上京告状”。市委派出大批汽车、组织各校教师及家长到沿途学生逗留的

茄子溪、江津、永川火车站劝阻、拉回部分学生，但仍有 1500 余名学生在永川乘上火车，于 10 月 6 日到京。

此时，部队总后勤部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也轰轰烈烈的开展起来。自 6 月文革开始后，解放军总后勤部大院很快就贴出第一批大字报，其中最多的是批解放军首批授衔将军中唯一一位没有统兵打过仗的医疗将军、总后勤部卫生部副部长兼国务院卫生部副部长傅连璋，因为他写过两本书：《养生之道》和《在毛主席教导下》。大字报批他在书中宣扬活命哲学，吹捧自己。此时傅连璋正在住院，他爱人、军委卫生部处长陈真仁本来是在天津参加“四清”的，文革开始后总后通知她回北京。她回京后才两天，批判傅连璋的大字报就出来了。陈真仁去医院把情况告诉傅连璋，他十分生气，要出院，陈真仁劝住了。没想到，第二天大院里到处都是傅连璋的大字报了。

陈真仁气坏了，傅连璋在医院也呆不下去，坚持出院。

出院后，傅连璋先去看大字报，边看边连声斥责：“简直是胡扯，这像什么话！”

到了 8 月 26 日下午，国务院卫生部也贴出了傅连璋的大字报，说“傅连璋反对毛主席，反对林副主席”，“林副统帅病危时，不给药吃，陷害林副统帅”。

当晚，傅连璋爱人陈真仁的直接领导人正式找她谈话，要她和傅连璋划清界限，揭发他的问题。陈真仁十分气愤地

说："傅部长有什么问题？我和他划清什么界限？"

领导人只得说："傅连璋问题严重，你回家去看看就知道了。"

陈真仁回到家里时，一群人正在那里抄家。屋子里翻得乱七八糟。领头的人正逼着傅连璋交出文件。傅连璋指着文件柜说："就在这里边。钥匙在警卫员手中。你们找他要，可是他不在家。"

这些人走后。傅连璋想给毛泽东打电话，但是红机子已被拆掉，没有办法。又过几天，做饭的厨师也被撤走了。

卫生部在傅连璋家里抄家时，抄出一个箱子，里面有傅连璋为自己死后拟写的碑文，及他亲笔以自己十几岁儿子的名义写的一篇悼念自己的文章，这更加引起了干部群众的不满。以后几天，傅连璋在总后大院里被揪斗、戴上高帽子游街，还举办了"傅连璋罪行展览"。可怜 72 岁高龄的傅连璋连路都走不动了，但每次批斗，他都理直气壮地同那些批斗他的人"理论"，并一次次告诉他们："我有什么问题，你们去问毛主席，他最了解我。"

傅连璋是福建长汀的一名基督教徒，出身农民，他一出生就受了洗礼，在汀州福音医院的内科医师英国人希布莱尔的接济下读完中学，考取了亚盛顿医科学校，后来成了福音医院院长。1927 年，南昌起义部队与国民党军在瑞金、会昌等地激战，傅连璋在汀州救治了 300 多名起义军伤员。他曾

奇迹般地保存了陈赓将军的伤腿，治好了徐特立的伤，成为最早为红军服务的“红色医生”，红军于 1929 年到长汀后，毛泽东等人又与他结下深厚友谊。1933 年，他放弃每月 400 大洋的优厚待遇，连同自己的福音医院和家产，全部捐献给党，举家迁到红色之都瑞金。创立了苏区最大的医院中央红色医院，被誉为“苏区第一个模范”。

1934 年，毛泽东在于都患病，高烧多日不退，神志昏迷。消息传到瑞金，傅连璋日夜兼程赶到于都，确诊毛泽东患的是恶性疟疾。傅连璋精心治疗护理，几天几夜与警卫员守候在他身边，直到第八天高烧退下来，毛泽东才脱离险境。毛泽东很感动地说：“是傅医生救了我一条命。”他还说：“中国古代有个医生叫华佗。我们现在也有华佗。傅医生就是华佗。”

红军长征时，傅连璋随中央红军走完了长征全过程。到达延安后，他担任中央总卫生处长兼陕甘宁边区医院院长，并与前来中国支援中国抗日战争的国际主义战士白求恩成了好朋友。白求恩在延安只住了 3 个星期就去晋察冀边区，临行前得知傅连璋患有严重的痔疮，主动为他做了手术。白求恩的精神状态和事迹，直接促使傅连璋写下了入党申请书。1938 年 9 月 7 日，他被批准加入共产党，完成了一个基督徒到共产主义者的转变。毛泽东说，一个基督徒成为共产党员，很有教育意义。

解放后，傅连璋先后担任卫生部副部长、中华医学会会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卫生部第一副部长、中央保健委员会委员等职务，一直负责中央高级干部的医疗保健工作。傅连璋怎么也弄不明白他到底错在哪里。

8 月 28 日，傅连璋给毛泽东写信求救。信中说："我跟随你几十年，你是最了解我的。几十年我有什么错误，从来没有人跟我说过，现在突如其来地说我是三反分子、反革命，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实弄不清楚。就算我样样事都做错了，那么，1934 年你在于都病危时，我救了你的性命，总是对的吧。希望你现在能救我一命。"

这封信很快到了毛泽东手中。9 月 3 日，毛泽东作了批示："送陶铸同志酌处。此人非当权派，又无大罪，似应予以保护。"

陶铸接到信和批示后，于当天立即通知总政治部负责人，要他们按毛泽东的批示，对傅连璋予以保护。

但是，群众有他们的解释："'没有大罪'，总是还有罪吧。既然是'似应'，就不是肯定的，可以保护，也可以不保护。"

9 月 5 日，中华医学会的人揪斗傅连璋。72 岁的老人，脑袋被打得鲜血直流，肋骨打断好几根。总后勤部部长邱会作将傅连璋夫妇和他们的小儿子傅维璋送到北京香山新村疗养，暂时躲过群众的批斗。

11 月，总后成立“傅连璋专案组”，编写傅连璋的罪行材料，列出了六大问题，100 多条罪状。还拟了《关于批判傅连璋三反言行的报告》，送交中央军委。

傅连璋 12 月 12 日又一次给毛泽东写信，信中说：

“主席这次又救了我，我再一次深深地感谢您！自从对我进行斗争以来，所有的政治待遇都一律取消了，文件不能看，报告不能听，就连我在政协常委的待遇也取消了。应如何安排？请主席考虑!”

其实此时政协已停止办公，不仅是他，所有的政协委员的待遇都暂时停止了。

12 月 18 日，邱会作在总后送交的《关于批判傅连璋三反言行的报告》上批了意见：“军委办事组同意批斗傅连璋。主要抓三点：①三反言行；②黑线关系；③斗志衰退。”

9 月 2 日这天,刘宁一再次贴出大字报:《欢迎向我开炮!》

9 月 3 日，韦国清也在广西大学贴出《欢迎大家向我开炮(我的一张大字报)》的大字报。要求西大广大师生员工炮轰司令部，即自治区党委。

为了规范红卫兵的行为，9 月 2 日，周恩来起草了《有关红卫兵的几点意见》（未定稿），对红卫兵运动提出 10 条要求。主要内容是：红卫兵要大学解放军，“把红卫兵建设成为一支具有社会主义觉悟和严格组织性、纪律性的战斗队伍”。要“学习和掌握政策”，“分清敌我，团结大多数”。

“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在社会主义革命的现阶段中，仍然是需要的、正确的”，“对于在国家和统一战线中具有合法地位的民主人士和对于有贡献的科学家和科学技术人员，只要没有发现现行反革命活动，应当加以保护”。“要文斗、不要武斗，不要动手打人”。红卫兵搜捕人，必须与北京市委、卫戍区和公安部门商定。红卫兵串连“要保障党和国家的首脑部门、要害部门和宣传工具”，“使这些部门的工作不受影响，安全不遭危害”；“要保障交通运输机构照常运行，不受阻挠，要保障党和国家的对外关系和活动不受影响”，“革命串连不在这些机关内部进行”；“要保障厂矿的生产和基本建设不受影响，科研机关的科学实验和中间性生产不致停顿”等等。

第二天，9 月 3 日凌晨，周恩来对《意见》进行了最后修改，嘱秘书通知陶铸、康生、李富春、谢富治、陈毅、杨成武、吴德、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人上午开会讨论。会上，陶铸、陈毅等赞成《意见》，康生等人则持否定态度，结果《意见》没有送毛泽东。

9月3日，首都红卫兵纠察队西城分队指挥部第五号通令，提出：

以林彪同志八月三十一日讲话为界，今后，对于红卫兵中违反最高指示，违反党的政策，随便打人者，一定要进行严肃的批评和教育。对于阶级敌人反攻倒算，进行阶级报复，

乘机行凶者，一定要严加惩办，坚决镇压！

真理在我们手里，无产阶级专政在我们手里，我们用文斗，一定能够把敌人彻底斗臭、斗垮、斗倒，一定能够取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彻底胜利！

9月3日晚22时23分至9月4日晨2时，王力、关锋在中央文革小组接待站接见山东大学红卫兵代表34人。代表首先汇报了山东大学运动的基本情况，接着提出了一些问题。当学生问到当时最普遍的打人问题时，王力说："劝他们不要打。大多数人是好的，出于义愤，打就打了。出于泄私愤，打了人，红卫兵自己处理。北京××学校一个红卫兵打了人，被开除了。"

关锋也说："回去宣传林彪同志的讲话、《人民日报》社论，能不能说服大多数？打人在他们中间是少数，你们要估计到这一点，你们要相信绝大多数的人，听毛主席的话。林彪同志讲话作用很大，北京的变化很大。林彪同志说，一定要听毛主席的话，三段就是讲了三个'一定要'。打人的问题可以公开表示态度，就是黑帮分子也不打。他死了，我们就没有斗争对象了。"

王力进一步要求说："省委应该表示明确的态度，现在发生了这种情况，和各级党委以前没有明确表示态度有关系。"

当问到："文斗、武斗的界限是什么？"

关锋说：“动手是武斗，戴高帽子、游街全国各地都问这个问题，我们没有答复。”

王力再次强调：“打人不能发展下去，发展下去，方向就扭转了。”

关锋插话说：“打人还叫文化革命吗？”

有人插话：“那不成了武化革命了吗？”

王力：“林彪同志明确地指出这个问题。”

第 190 回：看新疆，九月三学生绝食

丁大胆，兵团抓阶级斗争

远在西疆边陲的新疆也开始了文化大革命。这里的文化大革命起源于批判自治区的“三条黑线”：资产阶级黑线；现代修正主义黑线；地方民族主义黑线。1966 年 6 月 15 日，自治区党委拿《新疆文学》开刀，将《远方星火》、《阿凡提的故事》等一批在《新疆文学》刊登过的作品作为“毒草”进行批判，自治区党委还把自治区文联党组书记刘宵芜定为“反党分子”，由此拉开了新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

8 月，北京大学研究生吴丹迪等人来乌鲁木齐串联，在人民广场引发大辩论。

8 月 31 日，乌鲁木齐市第一中学杨贵尧以“文尖兵”的笔名在人民广场贴出大字报：“首揭区党委”，将矛头指向新疆自治区党委，轰动乌鲁木齐。自治区、乌鲁木齐市党政领导紧急调来“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积极分子”与之辩论，杨贵尧的家长也被警告，要他们教育孩子，不然就停发工资。

9 月 1 日中午，周恩向毛泽东汇报了新疆、青岛两地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情况。

9 月 2 日，新疆自治区在人民广场召开大会，庆祝毛泽东接见红卫兵，时任区党委第一书记王恩茂在大会发表讲话，乌市学生和北京红卫兵认为，王恩茂的讲话和《新疆日报》刊登的有出入：原稿中未提“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

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北京红卫兵吴丹迪等人要求区党委交出原稿供他们批判，并贴出《炮轰司令部——区党委》的大字报。

清华大学的红卫兵 8 月份也来到新疆串连。他们发现，这里压制群众的情况非常严重。他们所到之处，都被人群包围，人们在喊：“王恩茂万岁！”的口号，他们觉得自己简直就是在一个独立王国的心脏里活动，由此认为：新疆党委没有执行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决定，新疆党委在所有学校都派了联络员，实际上起工作组的作用。他们决定要找王恩茂谈谈他们的看法。于是，20 多人挤进自治区党委接待室，要求见王恩茂。

“你们是什么人？”接待员问到。

“我们是北京的红卫兵！”

这个人进去了一下，然后出来，将这些学生领到另一间接待室，很快就有一些人出来和他们握手，其中就有王恩茂。

“我们的工作是按照中央的指示进行的。”王恩茂面带微笑对学生们说，“工作组已经撤了，当然还有许多问题。欢迎你们批评建议。”

学生们把他们知道的情况说了。同时不客气地批评王恩茂他们是说一套做一套。一开始王恩茂面带微笑，听着听着，脸色就变了。

接见很快结束，学生们一回到住处，就来了许多人和他们辩论，管他们叫“北京来的右派”，说他们在北京臭得混不下去了，才跑到新疆来捣乱。

北京的学生贴出两张大字报：《炮轰王恩茂》、《支持中学生的造反》。结果引来更多的普通群众找他们谈情况。同时，围攻也降临到他们头上来。他们刚一贴出大字报，就被人围住要求辩论，北京的学生走到哪里，一辆带大喇叭的广播车就追到那里，不停地攻击他们，甚至一直追到大学食堂。

到了 9 月 3 日这天，他们又去王恩茂的办公室，抗议新疆当局对他们的围攻，并宣读周恩来的讲话。这次，王恩茂没有见他们。

学生们开始在自治区党委大院里静坐，一起静坐的还有近 300 名新疆学生。下午，他们宣布绝食，要求王恩茂出来和他们辩论。

自治区大院的大喇叭对他们高声广播：“你们的行动是反革命的。你们和苏联在印度的代表一样坏。”

和他们一起静坐的新疆同学的家长和兄弟姐妹也通过大喇叭向他们喊话：

“XXX，我是你妈妈。你千万不要让北京来的反革命把你给骗了。如果你继续错误行动，我就要和你决裂。”

家长们在喇叭里这样喊着，但是，仍然有人加入绝食的行列。

9 月 4 日，北京、上海、兰州等地在乌鲁木齐串连的红卫兵开始冲击区党委办公大楼，说是要找王恩茂辩论。自治区党委办公大楼的干部高呼“誓死保卫区党委”的口号，禁止他们进入区党委办公大楼。事态越闹越大。

当天，周恩来召集中央碰头会，商拟给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并告西北局的两个特急电。

这天，周恩来向毛泽东报送 3 份文件，其中一份是第 183 回提到的中共中央《关于青岛市委问题处理意见》的电报。另两件就是给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并西北局的电报，这两份电报分别指出：

“中央根据民族政策，决定对赛福鼎采取保护方针。王恩茂同志正确执行了中央决定，并非包庇赛福鼎。此事可正式向群众宣布。并向北京学生们解释新疆是少数民族占多数地区，此地文化大革命运动必须是加强维汉民族的团结，防止苏修和少数民族主义者的挑拨利用。”

“为了保障边境安全，不使苏修有机可乘，中央决定伊犁、塔城、阿尔泰等边境地区的文化大革命，在学校、机关、企事业等单位可以运用‘四大’进行鸣放，揭露问题。解决问题由区党委负责通过自上而下调整领导，以满足群众要求，不要采取群众直接‘罢官’的办法。特别要劝阻外地学生，不要进入这些地区进行串连。已去的外地学生，应经过说服，动员他们离开。此事望你们严格掌握。”

赛福鼎，时任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书记、自治区人民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当天批示：“照发。”

这两份电报分别作为中共中央第461、462号文件当日下发，同时用明码电报发往乌鲁木齐。时任区党委书记处书记陆学斌在传达电报时，自己加上“王恩茂同志17年来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少数派学生识破后，更加把斗争的矛头指向王恩茂。

9月5日凌晨4时，王恩茂终于在众多警卫人员的陪同下出来和学生见面。他在学生前面的台子上坐下来后，对学生们说：“你们要见我，现在，我在这里了，你们好好看吧。”

然后又劝学生们说：“你们最好结束示威。你们的态度是错误的。”说完，就回去了。

王恩茂出来了，学生们认为取得了胜利。于是，绝食结束。但是，“93绝食事件”给新疆群众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

9月4日，中共中央下发《关于边境地区文化大革命有关问题的决定》：

中发［66］461号

兹将中央一九六六年九月四日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电转发你们。这个电报所决定的办法，同样适用于其他各省、自治区的边境地区，如东北三省靠苏联、朝鲜的黑河、富锦、虎林、鸡西、绥芬河、图们、延吉、辑安、临江、丹东等城

镇和边防要点；内蒙古靠苏联、蒙古的满洲里、海拉尔、二连等城镇和边防要点；广东的海南岛、深圳、拱北、沙头角等城镇和边防要点；广西的凭祥、东兴、宁明、龙州、水口、靖西等城镇和边防要点；云南的允景洪、潞西、腾冲、西盟、河口、金平、孟腊等城镇和边防要点；福建的厦门；西藏的阿里、错那、亚东、聂拉木、吉隆、普兰等城镇和边防要点。望各有关省、区严格掌握，并向革命工农群众、革命学生、革命知识分子和革命干部多做口头解释。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并告西北局：

为了保障边境安全，不使苏修有机可乘，中央决定伊犁、塔城、阿尔泰等边境地区的文化大革命，在学校、机关、企事业等单位可以运用“四大”进行鸣放，揭露问题。解决问题由区党委负责通过自上而下调整领导，以满足群众要求，不采取群众直接“罢官”的办法。特别要劝阻外地学生，不要进入这些地区进行串联。已去的外地学生，应经过说服，动员他们离开。此事望你们严格掌握。

中共中央

一九六六年九月四日

新疆还有一支隶属于新疆军区的准军事单位——新疆建设兵团。这个单位主要由新疆和平解放时原国民党陶峙岳部起义部队改编而来，辅之以支边人员。除原陶峙岳部起义人

员和大量的支边青年外，还有部分劳改自留人员，人员构成复杂，主要干部则由五十年代初入疆的解放军干部组成。

丁盛回到兵团总部后，立刻向兵团党委做了汇报。

文革初期，6 月 24 日，新疆建设兵团发生了一件号称是“小匈牙利事件”。这天，兵团第一副司令员丁盛到位于石河子大泉沟的兵团设计院视察，被几名设计院的干部拉到设计院礼堂，这里正在召开设计院群众自发组织的大会，声讨设计院的领导。将丁盛拉到大礼堂的人是被设计院党委打为右派的干部，他们在这里召集了不少支持他们的群众，借着群众的声势，逼迫丁盛表态支持他们，要求解除那些将他们打成右派的设计院领导的职务。

文革初起，丁盛还不知道这“群众运动”是怎么回事，迫于当时的情势，就按照这些群众的意见，宣布了由他们自己拟定的关于兵团设计院政治部主任、副院长、人事科长等 20 余名师团营级干部的停职的命令。当天，这些被宣布罢官的干部就被戴高帽子、挂黑牌子游斗。

丁盛回到兵团总部后，立刻向兵团党委作了汇报。兵团副政委贺振新对此事进行了严厉的批评。他说：“党管干部是共产党的规矩，怎么能按照群众的意见未经党委同意即由个人来决定呢？”此事处置显然有“越权”错误。经兵团党委同意，立即向设计院派出由武装排护卫起来的阵容庞大的工作团队，对“624 事件闹事的群众进行处理。

丁盛，绰号丁大胆，是原解放军四野的一员悍将。

在 1949 年 10 月国共两党在大陆的最后一战：衡宝战役中，时任 135 师师长的丁盛在急行军中未接到停止前进的命令，孤军深入白崇禧集团防御纵深，撼动了白崇禧的防御，全歼号称桂系“钢军”的第七军，一战成名，被刘伯承元帅誉为“腰斩七军”，丁盛及其所辖 135 师，由此闻名四野。135 师，这只落入虎口的羊被赞为冲如羊群的猛虎。时至今日，该部的全部战车上还是画着虎头的标志。

1962 年，中印战争爆发。时任 54 军军长的丁盛率 54 军参战，并亲自指挥 130 师，击败了印军主力第四军，使印军这只号称参加过二战击败“沙漠之狐”隆美尔军团的荣誉部队威风扫地。此战是中印战争中最关键的一战，也是最后一战，史称“瓦弄大捷”。此次战役，使印度军方的“恐中症”延续至今。直到现在，一些印度军校模拟假想敌的番号仍然是“54”。

1962 年 4 月，新疆发生“伊塔事件”，6 万余边民外逃苏联。碍于正规边防部队兵力严重不足而又为防止边民外逃继续蔓延，新疆建设兵团奉命当年 5 月紧急组编 6 个独立营共 21 个值班民兵连，沿中苏边境布防堵截并警卫地州党政机关。同时，抽调 36 个基干民兵连沿中苏边境建立边防哨卡、巡逻点、工作站，巡逻边境，劝阻边民外逃。北京方面并决定沿中苏边界建立一条国营农（牧、林）场带。

1964 年 7 月，丁盛离开 54 军，奉调新疆，任新疆军区副司令员。

1964 年 7 月 30 日，中共中央复电农垦部党组并西北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同意张仲瀚任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二政委；新疆军区副政治委员裴周玉兼任兵团第三政委；新疆军区副司令员丁盛兼任兵团第一副司令员；国民党起义将领、原兵团参谋长陶晋初任兵团第二副司令员，同时免去其兵团参谋长职务；新疆军区运输部部长陈实任兵团参谋长。

同年 8 月，军委决定新疆建设兵团两年内组建 300 个齐装满员的值班民兵连。同时，中央军委陆续抽调一批转业干部到兵团各师任职。

1965 年 12 月，根据王震建议，原 359 旅政治部主任、时任炮兵科学技术研究院政委的贺振新调任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副政委。

将裴周玉和丁盛调来，本意自然是用其所长：裴周玉原是 69 军政委。69 军是国民党董其武的起义部队，他在 69 军有对原董其武部的长期统战经验。而丁盛则有中印边境作战的丰富军事实践。

至此，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的领导班子为：司令员陶峙岳，政治委员王恩茂（兼），第二政治委员张仲瀚，第三政治委员裴周玉(1965 年 5 月到职),第一副司令员丁盛(1964 年 10 月到职)，第二副司令员陶晋初（原兵团参谋长），副

政治委员贺振新，参谋长陈实，政治部主任李荆山（1966 年 1 月到职）。

但是，兵团作风的散漫，让从野战部队来到这里的丁盛很看不惯：机关大院像个大杂院，鸡窝羊圈，堆放杂物，晾晒衣服，随处可见；上班漫不经心，迟到早退，几成习惯。上任前，中央领导在和他谈话时对他说："要狠抓兵团的阶级斗争。"因此，他曾试图改变此间种种与野战部队截然不同的现象，但很有点力不从心。他曾在大会上讲："兵团对国民党起义部队，只团结不教育，只使用不改造，致使其中的不少人员，特别是一些起义机关没有得到真正的改造，至今仍然坚持反动立场。"这让许多起义人员有想法，同时听起来也像是在指责兵团党委以前的工作，自然引起了许多人的不满，包括政委张仲翰和参谋长陈实等人及许多兵团的师、团干部。

由此可见，"文革"前夕，新疆建设兵团内部关系复杂，既有因部队转业干部歧视、压制、打击新疆"925"起义人员和支边人员而产生的矛盾，又有复转军人、支边人员与原起义人员和自流人员之间的矛盾，还有兵团领导层中解放军系统与起义干部的矛盾，更有奉命改造兵团的丁盛系的新干部与兵团老干部的矛盾。

丁盛不习惯建设兵团这种军不军民不民的体制，于 1965、66 年两次打报告要求调离，均无下文。

1966 年 5 月，兵团党委“文化大革命”领导小组成立，裴周玉任组长，李荆山任副组长，贺振新、丁盛、陈实、曾继富、王振东、侯全智、杨宗胜等 7 人为小组成员。

文革开始后，兵团机关大字报大都指向裴周玉、丁盛两位“新领导”，指称他们二人为“罗瑞卿分子”、“走资派”。少数人不同意将矛头指向“新领导”，而是揭批兵团“老领导”张仲瀚等人。

第 191 回：发通知，组织学生大串联　见贺龙，叫停少奇“生活会”

7 月 22 日至 30 日，新疆建设兵团党委在乌鲁木齐昆仑宾馆八楼召开学习毛泽东的“五七指示”座谈会。会议由张仲瀚主持，兵团各师领导干部及兵团部分劳动模范参加。座谈会上，张仲翰大讲贯彻毛主席“屯垦戍边”的伟大意义，强调兵团如何符合“五七指示”取得的巨大成绩，并对丁盛等人否定兵团成绩的言论展开批评，甚至说丁盛就是罗瑞卿安插在新疆的“罗瑞卿分子”。

参加座谈会的独立团团长许光途，因乱上计划外项目，在会上受到张仲翰等人的批评。他很生气，于是以独立团党委名义，写信给自治区党委和新疆军区党委，揭发八楼会议情况。

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新疆军区司令员王恩茂接到信后勃然大怒。8 月 21 日，自治区党委常委会议讨论兵团文化大革命问题时做出决定：“鉴于张仲瀚同志有病住院，兵团党委常务工作由裴周玉主持，重大问题同张仲瀚商量。”

会后，兵团党委文化革命领导小组作了调整：组长丁盛，副组长陈实、李荆山、杨宗胜，成员 13 人。

《十六条》下来后，丁盛为表示自己支持群众，重新演绎了 6 月 24 日发生在兵团设计院的“小匈牙利事件”，称自己当时是主动到群众中调查研究后，支持了“革命群众”，罢了那些“坏蛋”的官。因此受到主持日常工作的副政委贺振新的打击迫害。并否认武装排和工作团是他派去的，将“镇压革命群众”的责任全推给了贺振新，说是贺振新将“624 事件”定为敌视社会主义、意图复辟资本主义的“小

匈牙利事件”，而他本人则是“和你们一样也差点被他们打成反革命”。随着丁盛的演绎，这一设计院内小范围的对抗事件变成了兵团党委内斗的一部分。

贺振新是张仲瀚的老部下，曾任359旅政治部主任，第一野战军五师副政治委员，是随王震、张仲瀚等人一起入疆的旧部。1965年12月，根据王震建议，贺振新重返新疆出任兵团副政委，是兵团任职领导唯一既是359旅的战士，又是从22兵团调出，15年后又奉命重返兵团任职的领导。

8月26日，丁盛在新疆自治区三级干部会议兵团小组会上宣布：“揪出了以张仲瀚为主帅、贺振新为副帅的反党集团”，及“张仲瀚十大修正主义”，“张仲瀚三反罪行”。兵团老干部们不同意这样一个定性，为此和丁盛等人互相拍了桌子。三干会议争论不休，结果从8月一直开到12月。

9月3日，兵团文化大革命领导小组做出《关于整写重点人材料的通知》，对张仲瀚、贺振新等人进行揭发批判。

随即，以复员转业军人为主的兵团值班部队武装力量，开始在兵团自上而下改组各级领导班子。8月，武装部门接管政法部门的治安警卫，接管看守所和看守警卫。11月，接管政法部门的武器和自卫武器。当时的口号是：“复转军人掌大权，九、六、八靠边站，自流人员滚他妈的蛋！”

九，即“925”起义人员；

六，即56年支边人员；

八，即 58 年支边人员。

这一口号加剧了兵团内部的矛盾。一时间，新疆建设兵团基本在以复员转业军人为主的兵团值班部队的掌控之下。

9 月 5 日凌晨 1 时，陶铸报送毛泽东拟在 5 日《人民日报》发表的社论稿：《用文斗，不用武斗》。2 时，毛泽东审阅了这篇社论稿，批示：

“即送陶铸同志：此件看过，照发。”

当天，《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用文斗，不用武斗》。此后虽然还有打死人的事，但大规模的打杀风总算遏制住了。

自一些地方的学生开始到串联后，1966 年 8 月下旬，陶铸在向毛泽东汇报时说：“大串联这个形式很好，是群众自己教育自己的最好形式之一……”毛泽东立即表示支持。他对周恩来、陶铸、陈伯达和康生等人说：“可以让外地的学生和红卫兵分期分批地来北京进行大串联嘛。1958 年吃饭不要钱，现在学生坐火车不要钱，这可以使革命的青少年们在更广阔的天地里熟悉社会，熟悉群众，熟悉阶级斗争，推动文化大革命进入一个新的高潮！”

9 月 5 日这天，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发出《关于组织外地高校革命学生、中等学校革命学生代表和革命教职工代表来北京参观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通知》。《通知》说：“从 9 月 6 日起分期分批来北京参观、学习、相互支援，交流革命经验，以利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而且规定：

（一）每批来京参观的外地革命学生和革命教职工在北京逗留的

时间定为四天，主要活动是:

（1）参观和学习北京各学校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2）支持北京各学校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

（3）受中央负责同志接见。

（二）外地高等学校（包括全日制和半工（农）半读高等学校）革命学生，除了有病的、已经来过的或有其他原因不能来的以外，都可以组织来北京参观;

（三）来京参观一律免费乘坐火车，各地教育行政部门要同当地铁路管理部门密切联系，协商安排。在本地集中所需交通工具，由各地自行解决。来京参观的革命学生和革命教职工生活补助费和交通费由国家财政中开支。

（四）注意事项:

(1) 旅途中自带干粮，火车上只供应开水。到京后的伙食、住宿由北京市负责安排，但每人应按照自己的粮食定量交出粮票，在京时的饭费，由国家财政开支。

(2) 自带简单行李、衣物和碗筷。

(3) 为了预防火灾，保证旅途安全，不要在车厢内外贴大字报。

根据这一通知，全国各省市纷纷组织学生进京串连，贵阳、昆明等地区大专院校学生，几乎全部上京，中学生也陆续外出大串联。

国务院接待总站下设立了几十个分站，分管 4000 多个接待点（不含郊区），构成了完整的接待工作网络。市内交通、饮副食业、医疗卫生和代销社等部门全力以赴在总站统一领导下，协助各站、点实现

“五包”（吃、住、交通、医疗和思想政治工作）。北京还从全国 13 个省市调来公共汽车 1500 余辆和司机 6800 余名，补充北京市公共交通力量的不足。各省市还支援北京各种主副食品达一亿五千多万斤。军委、总政治部派出解放军官兵上万人，参加了红卫兵的接待工作，他们将来京的红卫兵按班、排、连、营编组，并和红卫兵同住同吃同军训。

大批青年学生从全国各地云集北京，虔诚地等待毛泽东的接见，然后，他们又把革命的“火种”带往神州大地的四面八方。在学生大串连如火如荼之时，各地受压的工人也开始到北京串连、告状。

此时，闹得不亦乐乎的空军党委会终于有了结果，根据林彪和叶剑英的指示，空军党委于 1966 年 8 月 20 日，以刘震为“彭黄反党集团成员”、“在空军搞罢官夺权”的名义打报告上报军委。

8 月 29 日，林彪把吴法宪找到人民大会堂浙江厅，听取关于空军党委第 11 次会议情况的汇报。

吴法宪说：“会议期间，成钧、傅传作、黄立清、廖冠贤等人曾到贺龙家去谈过，他们说，吴法宪、余立金不能主持和领导会议，问题很多，又不积极，对开会采取消极态度。贺龙同志回答他们，那你们自己组织起来开嘛，继续把会开好。”

林彪说：“这件事，你要他们写一个材料，然后送给我。”

8 月 31 日，吴法宪在人大会堂浙江厅转告成均、傅传作等人，让他们写出 6 月 19 日与贺龙谈话的材料。

9 月 2 日，林彪与海军副司令员李作鹏通电话时说：“不要只高

兴罗瑞卿倒了，要注意贺龙，这个人是罗瑞卿的后台。军委很快要开会解决他的问题，你就他插手海军的问题尽快写个材料交给我。”

李作鹏说：“好，我就办。”

9 月 3 日，叶剑英批准总政治部下发“三条指示”，即军队不准组织红卫兵，不准地方到军队串连，不准军队到地方串连。指示规定：军队院校只在军种兵种院校范围内不在军种兵种院校范围外和地方学校串连。

这天，吴法宪以他和余立金两个人的名义，将成钧等人写的材料，还有广州空军司令员吴富善 1966 年 8 月 20 日对贺龙的揭发材料送给了林彪。他们还附了一封短信：

“毛主席、林副主席：现送上成钧、黄立清、傅传作、廖冠贤四人所写的材料，请阅。现在看来，空军党委十一次全会之所以形成这样，是因为有两条线操纵着。一条是以林副主席为首的一条红线，贯穿着空军党委十一次全会的始终；另一条是以贺龙元帅为首的黑线，在控制着这次会议。”

林彪将此报告和所附材料报送毛泽东。

9 月 5 日上午，毛泽东要其秘书徐业夫打电话给贺龙，要贺龙到游泳池来。

贺龙听说毛泽东召见自己，对薛明说了句“毛大帅召我”，即匆匆出了门。

贺龙乘坐红旗轿车很快到了中南海游泳池。卫士将他引入毛泽东作为起居的休息室。

毛泽东握着贺龙的手,然后让他坐了下来，对他说："叫你来看封信。是吴法宪写的。"

贺龙从毛泽东手中接过信，戴上花镜开始看，大概是因为激动，手竟有些发抖。毛泽东说："不要急，慢慢看。"

贺龙很快看完了。没待他开口，毛泽东说："黄立清、傅传作去了你那里，回到空军就闹事。吴法宪有意见，就写了这些，林彪把信转给了我。"

贺龙气得有些脸色发白。他说："空军开会的招待所离我住的地方不远，黄立清他们休息时遛达到我这里，随便聊聊。也没说什么。"贺龙停了一下又说："从信中看，吴法宪对我意见不小，要不要找他谈谈。"

毛泽东把手一摆，说："不用谈了。对你我了解。"毛泽东又说："你还不知道，就这十几天内，我收到告你状的信十几封，炮弹都冲你来了。"

贺龙一惊。毛泽东又笑着说："你不要紧张。这么多年，我对你还不了解嘛。抗战初期，你在晋西北时，有人告你状的事还记得不？"

贺龙说："过去的事还提作甚？"

毛泽东说："当时我说了你三条，一是忠于党，二是忠于人民，对敌斗争狠，三是能联系群众。一句话，我做你的保皇党。"

贺龙听了，很受感动。

随后，毛泽东转换了话题，两人又谈了许多往事，毛泽东还同贺龙谈起唐朝贞观之治，谈起庄子，还谈到马克思从《〈黑格尔法哲学

批判〉导言》开始的唯物主义立场转变和人类解放思想的确立……谈话进行得轻松愉快，在不知不觉中已到正午。毛泽东挽留贺龙用餐，贺龙辞谢。

回到家中，贺龙心情依然很不平静。他对薛明说:“哼！告我的黑状，可就是没有告准。”

9 月 5 日，海军张秀川给毛泽东、林彪写信，状告贺龙，称:“我觉得他不够正派，对林副主席、对毛主席的领导抵制和有反对情绪……”

9 月 5 日，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召集林彪、周恩来、王任重等开会。毛泽东说:“关于少奇同志的生活会，不要再开下去了。越开调子越高，一定要说成反党反社会主义，再讲下去就是彭罗陆杨一帮了。我讲讲历史。1927 年大革命批判陈独秀是右倾机会主义，并没有说他反党，以后是他自己搞分裂，组织托陈取消派，才被开除出党的。八七会议之后，瞿秋白搞盲动主义，也只讲是路线错误，后来又有立三路线。六届四中全会，出来一个罗章龙另立中央，但有许多好同志如李求实、何梦雄都排斥在外是不对的。王明路线统治了四年，造成很大损失。我们从 1936 年至 1945 年一直采取团结、批评、团结，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李立三、王明，七大还是选举他们为中央委员。请大家想一想，我们是怎么对待张国焘的?张国焘另立中央，另立中央也算了，难道说其中没有好人?有好人，如徐向前、李先念，还有四方面军的一大批干部。张国焘不走，现在还是会坐在这里开会的。我们历来采取这种政策，看来是有效的。一、一个不杀。

二、团结犯错误的人，改正错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没有在生活会上讲话的不要讲了。世界就是这样的，永远没有清一色。批得厉害，是为了改。看他们改不改，我看不改的少。洪洞县百分之九十九是好人，百分之一至二的是坏人。我劝不要整民主党派的人。看看《水浒传》，如卢俊义就是个大地主，还有不少起义将官。王明路线使我们吃的亏最大，但我们却从三个师发展到一百万军队。只要路线正确，人少一点不怕。我们这些人是剩下来的一些‘残余分子’，做工作谨慎一点好。历史就是历史。希望犯错误的同志，谦虚一点，向人家学习一点，不要‘自以为是，好为人师’，这是最危险的。”

## 第 192 回：再结盟，北京二、三司成立

## 点烈火，农大学生到农办

因不服气“大专院校红卫兵司令部”的成立，在康生、周恩来及中央文革的同意下，北京 48 所院校未参加“大专院校红卫兵司令部”的 48 个学生组织，于 9 月 5 日也成立了“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总部”，共 11000 多人。后来，人们将“大专院校红卫兵司令部”简称为“一司”，即北京大专院校红卫兵第一司令部；将“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总部”简称为“二司”。中国人民大学学生、海军副司令员周希汉的儿子周太安任临时指挥。江青、谢富治、杨成武、刘志坚、汪东兴等出席了“二司”的成立大会。江青、刘志坚在大会上讲了话。“二司”的辅导员也是杨成武、刘志坚。“二司”成立后也进入文化宫的西配殿办公。

这时，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在本学校已基本从舆论上斗垮了以“斗批改”组织为主要势力的保守派，但“校文革”还没有垮，“东方红”在学校内还处在受压状态，因此他们很需要取得社会支持。他们开始也是想加入“一司”。朱成昭和蔡新平等核心组成员一连数天在各高校串连，后来发现这些组织不但观点保守，而且十分傲慢，于是，朱成昭决定重新串连一个纯粹的造反派联合组织。

这时，北京地院地质系 11631 班学生周永璋正在各大学奔波。蔡新平与周永璋都是地质系三年级同时被工作队打成

的反革命的重量级难友，于是向朱成昭建议由周永璋负责串连各大学反工作组的群众组织工作。朱成昭因当时校内形势也很紧张，没有精力做这件工作，而他实际上也并不是一个善交际联络的人，这一点他有自知之明，于是，就找了周永璋，希望他来做这项工作。周永璋很爽快，干劲十足，表示同意。

朱成昭说："我们的目标就是再建一个新的司令部，就叫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吧，只要反工作队的组织，都可以参加。"

周永璋说："得加上'革命造反'四个字，旗帜鲜明、以示于一、二司的区别。"

事情就这样定下来了。周永璋带着地院学生赵国柱、丘世涛、吉让寿开始奔波此事。他们首先和清华大学"清华大学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唐伟联合策划串连，接着又联络了北京政法学院、北京农业大学、北京财金学院、北京邮电学院、北京林学院等16所大专院校的反工作组的"东方红"组织。终于，9月6日，在"首都二司"成立的第二天，"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即"三司"成立了。这16个群众组织的主要负责人会议为"三司"的最高权力机构，他们代表了北京各院校的少数派3000多名学生，其负责人有：

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朱成昭；

北京农业大学“东方红公社”的负责人冯兴旺；

北京政法学院“政法公社”的负责人陈荣金；

北京邮电学院的孔祥山；

北京财金学院的敖本立；

北京农机学院的潘朝金；

北京林学院的王德祥；

清华大学“毛泽东思想红卫兵”负责人唐伟……

为了支持、维持“三司”的正常运行，各组织派出自己一名核心组成员到“三司”，组成“三司核心组”，作为“三司”的工作班子。当时，政法学院派驻“三司”的核心组成员叫张广海，林学院的代表叫朱一茹，清华大学唐伟派来的是他的弟弟唐成…… “地质东方红”当时忙于二进地质部，没有派核心组成员来“三司”，就让周永璋继续作为地院在“三司”的代表，同时也是因为“三司”是周永璋串连起来的。

9 月 6 日，“首都三司”在北京工人体育馆宣告成立。在成立大会上，地院“东方红”的王大宾宣读大会开幕词。

开幕词说：“参加我们这个革命造反司令部的各单位红卫兵组织力量还是较弱的，人数还是较少的。但是任何一个新生事物都有一个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的发展过程。我们深信，我们的大方向是对头的。只要我们能永远站在党的立场上，永远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我们就能克服重重困

难，就一定能完成党中央交给我们的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历史使命！”

刘志坚、周荣鑫、戚本禹出席了成立大会。刘志坚在“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成立大会上讲话，他说：

“江青同志身体有病，没有一起来，不能来参加今天的大会。我们也都在开会。谢富治同志本来想来，他正在主持会议，不能来。杨成武同志正在开会，也不能来。我代表江青同志、杨成武同志，谢富治同志和在座的几位同志向你们致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敬礼！”

“我现在代表总理、江青同志来参加大会，是总理命令我们来的。建议由公安部副部长杨奇同志当你们的顾问，好不好？（好！鼓掌）由杨成武、郑维山和我当你们的辅导员，好不好？（好！鼓掌）杨成武同志在开会，没有来。回忆起来，我参加革命的时候，年纪比你们还小，水平比你们还低，我们只知道要革命，要造帝国主义的反，要造封建主义的反，要造官僚资本主义的反，要跟毛主席走！（鼓掌）你们现在水平比我们高多了，因为毛主席在身边，指导你们，你们很幸福。（鼓掌）我们要把这一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我们要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学生！”（鼓掌）

蒯大富以“三司负责人”的身份，带领与会者宣读誓词。这誓词是地院学生聂树人执笔起草的。

蒯大富虽然于 7 月 29 日参加北京市文化大革命积极分子大会后，一夜成为社会闻名的大英雄，8 月 4 日，周恩来总理又亲自宣布为他平反，但由于清华工作组对他的批判，使蒯大富“反革命”名声在清华园一时难以消除，他在清华实际仍然很臭，所以他不愿意回清华，一直待在地质学院。

周恩来和中央文革多次要求朱成昭设法支持蒯大富，以“减轻中央压力”。也因为蒯大富本身在反工作组的过程中表现出“硬骨头”精神，使他在反工作组的学生中拥有很高的威信。因此，大家一致推举蒯大富以“三司”负责人的身份，带领与会者宣读誓词。

“三司”成立后，中央将三个红卫兵司令部的办公地点都放在了劳动人民文化宫的三座大殿里。

左起姚文元、蒯大富、王力

9 月 6 日这天，外地到北京串联的学生在人民大学筹备召开“来京串联革命师生誓师大会”。会后，大会主席团和一部分同学前往中央文革小组群众接待站反映同学们的要见毛泽东主席的请求，中央文革小组王力、戚本禹同志于 7 日凌晨两点接见了这些同学。首先由人民大学的同学介绍了 9 月 6 日在人大召开的“来京串联革命师生誓师大会”的筹备情况，并将参加大会的三、四万师生要见毛泽东主席的强烈愿望，委托王力、戚本禹同志转达给毛主席。

王力问：“现在北京有些学校要赶外地同学，这个大会是不是你们发起的？把人家赶走。”

大家笑了，一致说：“不是的，是外地同学发起的”

王力：“……哦，以为你们这个会是要赶人家走的，情况不清楚，我们不好派人去参加。”

同学们说：“这个会是外地住人大的同学发起的，得到 1000 多个单位拥护的，是我们离京前表决心、鼓干劲的誓师

大会。”

南昌学生王蓉说：“我们一定要见毛主席，今天我们开会，有人提出来要整队到中南海见毛主席。”

王力说：“这样到中南海见毛主席是见不到的。”

同学们反映说：“北京只让我们住 5 天。”

王力说：“5 天是谁规定的？我们不大清楚，回去问问。”

外地师生在北京只能待 4 天，这是昨天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下发的《关于组织外地高校革命学生、中等学校革命学生代表和革命教职工代表来北京参观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通知》中第一条的规定，看来王力也没有很好的学习。

同学又说：“我们要求 10 号以前，毛主席在天安门接见我们。”

也有人说：“8 号。”

王力说：“准备国庆以前还在天安门开一次会，8 号以前不能了。”

同学说：“我们有的明天要走，有的后天走。”

王力说：“你们多住几天，等天安门开了会再走。”

同学说：“周总理讲过，外地高等学校学生都分期分批来北京，现有些人把一些非红五类出身的子弟都说成是‘混蛋’，让他们滚蛋，这对不对？”

王力说：“这是不对的！是错误的！”

同学说：“有人把同学说成是‘保皇派’，这样对不对？”

王力说："你们可以跟大家说，毛主席说的，在同学中取消'保皇派'这个名词，同学们不同的观点，不同的意见可以保留，可以辩论，不要扣帽子。"

同学说："我们坐火车，就看到有人强行剪人家的辫子。"

戚本禹："这不对！"

周恩来听说外地来京的红卫兵学生一定要见毛主席的消息后，也立即赶来，并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说：

"同学们、同志们、红卫兵战士们：

我现在代表毛主席、党中央、国务院向你们问好。向你们致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战斗敬礼。你们是从四面八方来的，我们欢迎你们，我们支持你们到北京来进行革命串联，取革命的经，参观访问。你们昨天开大会，因为没得到消息，没传到我们那里，很对不住你们，让你们白等了 8 个小时，我觉得很抱歉。所以今天我们听到中央文革小组王力同志说了，告诉我们这件事，我们决定今天开会，一些同志来见你们。"

"现在你们到北京来，北京的同学也到全国各地进行革命串联，主要是交流革命经验，互相学习，……不管到那里去煽风点火，去煽社会主义之风，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之火，都是帮助别人，革命的主人是那个地方、那个单位的群众。"

"现在天气渐渐地冷了，同学们也没有地方住，你们想

一想每天来北京八、九万人，如果进来，不出去，又要增加一个北京城了，很快就增加出来了。没有地方住呀，当然，你们的精神很好，找不到地方就在车站的水泥地上睡，甚至在学校的广场上睡，你们艰苦朴素的精神使我们很受感动。但是使我们感到非常的不安，因为我们没有把你们招待好，没有很好的地方招待你们，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和你们的想法不那么一致，有点矛盾，你们想多留几天好，刚才那几位发言说：非见到毛主席不可，方才开会前，你们有个同学说中央同志能见到你们就回去，那就是说，不但我们之间想法上有点矛盾，你们自己说法也有矛盾，所以我们想办法建议你们……就希望你们满足我的一个小小的要求，首先，8 月 31 日以前来的同学可以回去，因为你们见到毛主席了。第二，9 月 7 日以前来的同学也陆续回去，才能让出地方，让给从明天起不断新来的同学、红卫兵。不然没办法招待你们。”

最后，周恩来指挥大家齐唱《大海航行靠舵手》。然后对大家说：“我还要参加别的会。很对不住，现在就告辞了。”

8月29日上午，谭震林在农林政治部接见农林政治部派往北京农业大学的工作组。工作组向谭震林汇报了北京农业大学的运动情况后，对让他们做检查颇有不满，对农林政治部主任秦化龙提了一些意见，谭震林劝慰他们说：

“错误是中央犯的，检讨你们去。具体地说就是少奇、小平同志，你们不要讲。他们没有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

毛主席说，叫他乱嘛！怕什么？叫他乱几个月，我对工作组开始没有怀疑，工作组一进校，为什么与广大群众顶牛？陈伯达同志三次提出不要派工作组，但他没有说是毛主席说的。出了问题不能让少奇同志检查，我们这些人去检查。”

“清华学生向工作组提意见，实际上是攻击王光美。攻击王光美实际上是攻击刘少奇。”

对工作组给秦化龙提的意见，谭震林主动承担责任说：“秦化龙有什么问题啊？他是听我的，我叫他干什么，他干什么，他是听我指挥的。原来工作组去学校的，去是专政的。不敢做的事，你们去做了，工作组必须做检查，这是毛主席说的。检查了没事做，人家写大字报，你们去帮助粘粘，打扫打扫厕所。吃了饭收拾收拾碗筷。北农大的工作组成绩是主要的，没有犯路线错误，还是发动了群众，如选革委会问题，北农大的革委会还是控制得不错。第二是红、黑线划分开，一共搞了9个党委委员的问题。第三搞了黑帮。如有缺点那是抓得不紧，从总的来看，那是妨碍了群众运动，是我们这些人，是中央。毛主席的一张大字报传到全国，北农大的学生还是守纪律的。”

对当时的运动情况，谭震林说：“运动的主流是好的，逆流是少的。我们分析当前阶级斗争是复杂尖锐的，形形色色都出来了，好嘛！让他暴露，让他放！不要管。机关找个办法，要成立红卫兵，……在运动中说错话，做错事，错了

就改嘛！林总说，朝令夕改，我们就表态，今天错了，明天就可能对，右派可能整左派。这是我个人意见，要按《十六条》办事，红卫兵坚持红五类，中农、小资产阶级暂时不要。”

中央农林政治部主持日常工作的是副主任秦化龙，湖南平江县人。1930年初参加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平江县委书记，中共湘鄂赣省委组织部部长，湘鄂赣军区后方留守部队政治部主任。坚持了湘鄂赣边区三年游击战争。

1938年，秦化龙赴苏联治病，后入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在苏联期间，认识了康生夫妇和林彪。1940年底在回国途中，在新疆同杨之华、马明方、方志纯、张子意等100多人被盛世才逮捕入狱，后经营救出狱。

1964年，秦化龙从上海警备区政委任上调进京主持农林口的政治工作。他在任上海警备区政委时抓了“南京路上好八连”这个全国闻名的典型。

当时，农林口的农业部、林业部、农垦部、水产部、八机部(农机部)、中央气象局等部门，都按毛泽东的指示建立了政治部，并从部队选调了一批将军担任政治部主任。1965年，农业部、农垦部、水产部的三个政治部与中央农林政治部合并，秦化龙任政治部副主任，主任是谭震林。“文革”开始后，按中共中央指示，国务院农办、农政机关立即成立农林口文革小组，秦化龙奉命任中央农林口文革小组组长，统一负责领导农林口的“文革”运动。

9 月 5 日这天，北京农业大学的学生来到北京西郊“万寿路 10 号院”国务院农林办公室造反，其实就是煽风点火，让那里的工人、干部起来揭发农业大学校长、国务院农林办公室副主任王观澜。

国务院农林办公室也称中共中央农村工作办公室，是以谭震霖为主任的国务院农林办公室和邓子恢为部长的中央农工部合并而成，只设部（室）处（组）两级，没有司局建制。因此，虽然这里的干部都资格不浅，干部行政级别都不低，就是组长也都在 10 级左右，但职务名称不大，不过就是个组长，所以文革一来，除了主任一级外，其他人都不算是当权派。

这时，农林政治部有位年轻干部积极响应上级号召,给主管农林口的副总理谭震林贴了一张大字报,说他贯彻毛主席“学习解放军、加强政治工作”的指示“不得力,不认真”,希望他“来群众中听取意见,加以改进,以便把今后的工作搞得好上加好”。

大字报只有 200 多字,内容十分简单,纯粹是响应号召、政治表态类型的大字报。但因为是中央农林部机关的第一张大字报,又是政治部干部写的,贴在办公大楼正中央,位置显著,所以引人瞩目。

9 月 7 日，谭震林来到农办机关大院视察，了解运动进展情况。他看过大字报后，认为这是“小干部的行动,大干

部的思想”。随后，召集机关干部到三楼会议室开会，作了炮打司令部的动员报告。他明确指出：“炮打司令部打什么?是无产阶级司令部发出的炮弹,打资产阶级司令部，不是资产阶级司令部发出的炮弹，打无产阶级司令部!农林口打什么?就是打邓子恢、廖鲁言。邓子恢是老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长期以来在农林口阴魂不散!”接着,他又说:“在座的就有资产阶级分子,他们企图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

第193回：海拉尔，国际列车闹反修　秋收到，革命还要促生产

这时，在东北边陲海拉尔，又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外交事件。在8月29日上午，苏联大使馆门前把扬威路改为反修路的行动中，可以看见一个16岁的高一女学生尚未成熟的身影，她叫汪彬，是个有男儿姓名的女孩子，军人家庭出身，自认为根红苗正，所以，冲上街头扫四旧，戴着红袖章斗牛鬼蛇神，毛主席在天安门接见红卫兵，她一样都没拉下。她们希望通过这次大革命，闹出一个最伟大的红彤彤的新世界来。

那时候，她们天天都在“策划”新举动，想干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在9月初的一个深夜，汪彬的同学邓媛萍急匆匆地找到她，说在黑龙江边境将有一个新的反修活动，比改“反修路”的影响还大。参加的人数不多，要保密。

汪彬当然不愿错过这个机会，她和邓媛萍第二天一大早就坐火车去哈尔滨，在那里已有一支由20名北京中学生组成“北京红卫兵北上小分队”，领头的是北京100中的学生李建军和54中的红涛。他们在8月11日从北京出发到东北串连，是北京最早出来串联的一批人。

汪彬和邓媛萍在哈尔滨与他们汇合后，几个领头的就去黑龙江省委联系。省委一听说北京来的红卫兵有“革命举动”，马上给他们创造一切条件。黑龙江省委和齐齐哈尔边防检查局给他们大开绿灯，在通行证上写明：“北京22名红卫兵从中苏中蒙边境一带视察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希沿途军警岗哨验证放行。”

好家伙，“视察”这词儿可只有国家领导人到地方上才能用，最

少也得全国人大代表才这么称呼呢！可见当时首都红卫兵规格多么高，毛泽东登上天安门时，很多老将军、部长都没资格上城楼，可红卫兵却能上，还能和毛主席说上几句话。

就这样，在一路绿灯的照耀下，这20几个红卫兵的照片也轻而易举地被齐齐哈尔边防局盖上可以通行的钢印。边防局还送给他们御寒的皮夹克、皮大衣，像整装待发的战士一样，乘火车开往海拉尔。到了海拉尔，他们又受到了当地领导高规格接待。

万事俱备，于是，9 月 3 日这天，这 20 几个红卫兵聚集在在海拉尔车站，站台上摆满了各种颜色的油漆、毛泽东画像、用汉英俄蒙四种文字印制的反对“苏修”的传单，以及九评苏共中央公开信的俄蒙文版小册子。

这天，当北京开往莫斯科的 1 次特快，披着呼伦贝尔大草原的夜色，徐徐开进了中国边陲小城——海拉尔，列车刚停稳，车门才打开，外国旅客还没有来得及下车呼吸一下大草原的新鲜空气，早已恭候在此的北京红卫兵便挤在车门前，或围拢在车厢附近，迫不及待地展开了他们的“反修”行动。

胖墩墩的林东红灵巧地窜进车厢，迅速地把毛泽东的画像贴在车厢里，这可能在列车史上还没有先例，漂亮的苏联女列车员先是吃了一惊，不知她要干什么，一时不知所措。过了几秒钟后，她反应过来，从嘴里吐出“胡尼”几个字，后来红卫兵们才知道，女列车员骂她们是“流氓”。只见那位漂亮的苏联女列车员，怒不可遏的将红卫兵刚刚贴上的毛泽东画像扯下来，撕个粉碎。

“你敢撕毛主席像？！”林东红大吼着。女列车员不懂得汉语，嘴里仍不断地用俄语骂着：“土匪！”

林东红不管三七二十一，只是大把大把地刷浆糊，一连又贴了几张毛泽东画像。气急败坏的女列车员挥手给了林东红一耳光。林东红跳了起来，扑到女列车员身上，和她扭打成一团。

李建军用克制的声音喊：“我们有真理，真理能战胜一切敌人。”林东红这才松了手。

北京帅府园中学的王保尔、陈其健和女四中的严静等人，沿着包厢外的走廊，向旅客们散发传单和小册子。有的人恭恭敬敬地拿在手里，装作认真阅读的样子，一看便知，他们是日本人。有的连看都不看，拿到后就像扔废纸似地扔到窗外面，一副不屑一顾的模样，估计他们是苏联人。

车下也是一片忙乱。小分队的头目、北京 100 中的李建军领着一帮人，用大排笔刷子和各色油漆，往车厢上刷着大标语。几个身材高大的红卫兵和几个前来阻拦的苏联列车员推推搡搡，吵吵闹闹。 还有一些人把车站变成了演讲中心，在三五成群的外国人的围拢下，慷慨陈词地发表着“反修”演说。

红涛俄语好，此时他正站在一节车厢门口，和一位苏联女列车员进行激烈辩论：

“你们要干什么？这是苏联列车，不是中国列车。滚开！”

“苏联列车？可它行驶在中国领土上。我们这是在进行反对苏联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你们要反对革命吗？”

他对女列车员说，苏共勃列日涅夫领导集团，是叛徒集团，背叛了十月革命，正在欺压苏联人民。你们是列宁的故乡，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要敢于起来造反，推翻修正主义的反动统治。

苏联女列车员则反唇相讥，说毛泽东是农民起义领袖，他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是反共反苏，是共产主义运动的空前耻辱。 她拿着一份《真理报》念道："中国领导人的反苏运动带有极大的挑衅性质，纯粹是流氓行为……"

红涛反驳说："《真理报》无真理！"

女客列车员毫不退让："中国的文化革命在消灭文化！"

外国记者像救火似地跑来跑去，镁光灯闪个没完，录音机不停地转动，还可以听到小打字机"啪啪"打字的声音。

红卫兵们又刷大字报又喊口号，火车比规定时间晚开了10分钟，海拉尔车站站长面露难色，因为误车是他失职，但他也不敢流露。

临开车前，红卫兵们突然发现有两位战友——彭少珠、商小果不见了，他们估计可能被苏联列车扣住了，急忙让站长发出紧急停车的信号，几个"反修勇士"飞快地跑到列车头前不远卧在铁轨上。

这时，火车已徐徐启动，但是，仍然不得不停下来。红卫兵们要求上车，但苏联列车员硬是不开门。还是工人阶级有力量，站长对几个工人说："不开门就用铁榔头砸！"几个工人果然抡起榔头砸了几下，列车门终于开了。

红卫兵们一拥而上，一个车厢、一个车厢地搜寻，终于找到了这两位同学，只见她们的手被反绑着，嘴里还塞上了毛巾。

红卫兵们当然怒不可遏。

“不能这么便宜了苏联，得给他们点颜色看看！”大家异口同声，同仇敌忾。

“拿油漆把车厢那一面全刷上标语，上车把没有散发完的传单、小册子全都散出去！”红涛说。

“别再用汉语写了，写了那边也看不懂，顶个屁用！红涛，你俄语好，你就带人去写吧！”纷乱中，不知是谁提出了这个建议。

红涛和一些小分队员拿起油漆筒和排笔刷子，绕到列车另一面，在车厢上写满了这样的标语：

“打倒苏联现代修正主义！”

“打倒勃列日涅夫、柯西金！”

又耽误了 5 个多小时，到了下半夜，列车总算又开动了。带着花花绿绿的标语，带着斑斑点点的传单，消失在大草原的茫茫黑夜中。再有一站，经过满洲里，它将离开中国国境，行驶在西伯利亚的旷野里。

这趟列车并没有直达莫斯科，刚进入苏联国境，就被苏边防军扣住。他们费了几天工夫才清除掉车上的标语和传单，有几个“失职”的列车工作人员还遭到逮捕。

小分队回来后，立即召开了全体队员会议，总结经验教训。有人批语红涛和李建军：“你们当头头的也太软弱了，苏修打人抓人，咱们刷几条标语就算完事了？你们还有点红卫兵的革命精神吗？”

大家一致决定，9 月 7 日再搞一次行动，然后赴满洲里，传播“文

化大革命”的火种。

9月6日，海拉尔市委给北京来的红卫兵小将领来了一位不速之客——中共华北局干部。他转来了一份党中央给这几位红卫兵小将的电报。电文是：“你们的反修精神很好，注意斗争策略。”小分队的同学们互相传看着电报。

来人问：“你们下一步有何打算？”

李建军讲了他们7日的计划。

来人说：“我代表华北局支持你们的反修行动，但这一次你们要事先请示中央。”

同学们闻言，议论纷纷：“反修还用得着请示中央啊？”

有人问：“又是‘很好’，又是‘注意策略’，是表扬还是批判？”

来人没有明确答复，只是坚持让他们在行动前请示中央。

同学们商量了一会儿，决定边准备，边请示。

7 日，在海拉尔市委的帮助下，一切准备工作就绪，但到下午还没有和中央联系上。晚上，同学们都去车站等候国际列车，留下红涛再做最后努力。

红涛在市委招待所给北京挂长途，要求直接找周恩来。电话员颇为傲慢地问：“你是什么人，有什么资格找周总理讲话？！”

一路很横冲直撞走过来的红涛没想到还有人敢这样和“毛主席的红卫兵”讲话，大发脾气，说：

“我是北京红卫兵，现在在海拉尔，有重要情况向周总理请示。

如果你不给我接通，过一会儿发生了国际事件，中央不知道，责任要由你完全承担！你敢负这个责吗？”

接线员被震住了，她赶紧找周恩来。

这时的周恩来，正在中国科学院万人辩论大会上讲话。

随着“炮打司令部”在全国的展开，从中央到农村生产队的各级领导，凡是带“长”字的、掌权的，统统都成为炮轰的对象。此时，工厂、农村也都强烈的要求开展文化大革命。北方的秋收临近，不少农村基层干部因为被批斗而不管工作。9 月，黑龙江双城县人委办公室张凤山给中央文革小组办公室打来电话反映：

“双城县 8 月 22 日开了点火大会，提出了炮打司令部，在会上县委书记和县长都被斗了。到 9 月 2 日为止，全县 21 个公社，已有 11 个公社和生产队炮打了司令部，公社和大、小队干部大多数被斗了。在这种情况下，有不少社队干部出走了，有的不知下落，生产无人负责了。

目前秋收生产临近，不少公社、生产队已陷于瘫痪，对秋收生产将会有很大影响。

县、社、生产队的文化大革命怎么开展？炮打司令部包不包括县、社、队？中央和国务院 7 月 2 日和 22 日通知和补充通知是否仍然有效？如果省、县安排农村结合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开展文化大革命，革命师生和群众不听，不相信怎么办？急切要求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给以明确答复。”

9 月 7 日，《人民日报》发表根据周恩来的意图、由陶铸主持起草的题为《抓革命，促生产》的社论，号召各生产单位和业务部门应适当分工，搞两个班子，一个班子抓革命，一个班子抓生产。

社论指出：“要以文化大革命为纲，一手抓革命，一手抓生产，保证革命和生产两不误。”

社论要求，“所有工矿企业、人民公社、基本建设单位和科学研

究单位的领导人员，都要紧紧抓住文化革命和发展生产这两个环子，很好地安排自己的工作。要适当地分工，搞两个适当的班子。一个班子主要抓文化革命，一个班子主要抓生产，抓生产的产量、品种和质量，特别是要狠抓质量。”

“工矿企业、基本建设单位、科学研究单位以及服务行业的文化革命运动，农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即‘四清’运动，都应当由那里的革命群众来进行。城乡‘四清’运动的原来部署，如果群众认为适当，又进行得很好，就可以不变动。学校的红卫兵和革命学生，不要到那些地方去干预他们那些部署，也不必去参加那里的辩论。工人、贫下中农是革命的主力军，他们完全能够把本身的革命运动搞好。而且那里的情况不同，生产任务很重，外边的人不明了情况，去干预，容易影响生产的正常进行。”

社论还要求：从“10 日起，派解放军不带武器，协助铁路维护联运列车、联运车厢和各停车站的秩序”。

9 月 7 日晚上，科学院在中关村大操场召开科学院职工两万多人参加的辩论大会。白天，电信局的工人就从海淀的 28 局，紧张地将电话线，穿树梢，跨马路，一直拉到大操场。这是中关村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群众集会，每个研究所都参加，号称中科院万人辩论会。辩论的主题是：张劲夫是不是黑帮，是不是走资派，该不该罢官，院党委该不该改组。

周恩来到中国科学院辩论会场，亲自宣讲《人民日报》《抓革命，促生产》的社论观点。

他说："首先我代表毛主席、党中央和国务院庆贺你们有决心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你们已经表示了这个愿望和决心，那么我们有责任支持你们这个愿望和决心。你们是科学院的同志们、职工们，你们很懂得我们是在进行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为纲的社会主义革命，同时就要推动其他两大革命运动。这就是《人民日报》今天社论所说的抓革命、促生产。"

当谈到张劲夫的问题时，周恩来说："在这几个问题上辩论清楚：该不该罢官？该不该改组院党委？张劲夫讲了三个问题，关于那个号外和其他一些措施，影响到科学院压制了群众。你们认为这些事如何？他表态如何？"他建议科学院下属50多个单位先讨论，然后再开大会。为此，他征求所有与会者的意见："我这个建议，你们可以同意，也可以考虑，提出别的办法，我并不要今天晚上就回答，请主席团决定。要合起来开，还是一个单位、一个单位开，可以在二、三天内做出解答。"

与会群众一致鼓掌表示通意。

这时，秘书过来告诉周恩来有电话，这个电话就是红涛从海拉尔打过来的。接线员一直将电话打到了中科院的辩论会场。

## 第194回：电话急，周恩来亲自召回　爆黑马，毛泽东“青岛批示”

周恩来拿起电话筒，里面传来这样的问话：“您是周总理吗？”

“是啊，我是周恩来，你是哪一位？”

“我是北京红卫兵红涛，我们小分队正在海拉尔串连。前几天我们拦截了苏联的国际列车，造了苏修的反……”

“中央派华北局的同志送给你们的电报，收到了吗？”

“收到了。”

“毛主席、党中央认为你们的反修精神很好，你们这一代大有希望，如果你们能够认真总结经验，不但敢于革命，而且善于革命，提高斗争水平，你们的反修斗争就会取得更大成就！”

“我们打算再搞一次拦截行动，小分队的同志们已经到车站去了，留下我向您请示。”

“我的意见，你们可以在车站上贴大字报，喊口号，不要到列车上去，那是他们的列车，你一闯，他们就说你侵犯他们的主权，这样就会发生国际纠纷，他们就会提抗议，还会发生上次他们绑架之类的事情。希望你能够马上把我的意见转达给小分队的同志们。”

周恩来放下电话，又回到辩论会场，接着说：

“我可以告诉你们打的电话是什么。我们的红卫兵，我们最可爱最英勇的红卫兵，他们想在各个战线上破旧立新，不仅在人民中，在国内破四旧、立四新，而且在国际领域上也要破四旧、立四新，所以前几天他们把苏联大使馆前那条‘扬威路’改成为‘反修路’，这件事做得好，我们支持他们。但当时他们就要闯进去，我们的反修文章

可以向全世界广播，但他的大使馆还要尊重。正如在莫斯科我们的大使馆他们也要尊重一样，你们把大字报贴到大使馆里墙壁上，文斗就变成了武斗了。示威是可以的，但不要越过界限，不要挑起武斗。后来，我们半夜与小将们交涉了很多次才成功，但我们又不放心，就派了警卫队徒手保护使馆，但是如果苏联人想挑衅，我们的武装部队，徒手警卫队，一定要勇敢地保护我们勇敢的下一代。我们下令：宁可付出任何代价也不能伤害了我们的下一代的一根毫毛！我们勇敢的下一代，我们可爱的小将们的确做得好，两天之内把示威运动，靠他们自己组织万人来庆贺。结果两天内来了很多学生，机关人员、贫下中农，通过主席台的就有40万人，井井有条喊着口号前进，没出任何事件。好！我们的红卫兵兴头大了。他们向全国出发了，不知那一班，大概是北京去的，到了海拉尔了，他们闯到了苏联的国际列车上去了，爬上去了。我刚才跟他们打电话，叫他们下来。他们听出我的口音来了，知道我是周某人。他问是不是毛主席说的话，我说当然是了。你们把大字报贴到国际列车上去了，必然吵架，是武斗势必要影响到国际关系，我们把红卫兵叫下来了。对于下一步怎么办再研究。你们可以在火车站上喊口号嘛！示威嘛！不要武斗。这样的事每天都要发生很多。”

这时，电话又来了。原来红涛放下周恩来的电话后，立刻给在车站的李建军打电话，向他传达了周恩来总理的意见。李建军和身边的几个人商量了一会儿，对红涛说：

“现在苏联的列车已经到达，我们正在车厢上刷标语，有人在车

上演讲和散发传单。我们的意见是，苏修上次绑架了我们的人，这次我们不能轻饶了他们，否则他们就会认为中国红卫兵软弱可欺。你问一下总理，他的话代不代表毛主席，如果代表，我们坚决执行，马上撤下来。再问一下，车站为什么来了这么多解放军？”

“来了解放军？”

“是的，刚才来了几卡车解放军，现在正在铁路沿线放警戒线。”

于是，红涛又给周恩来打来电话。周恩来对他说：

“中央今天上午讨论了你们的行动计划，我刚才的话当然是代表毛主席说的。你们能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指示，我们很高兴。部队是我派去的。你们上次不是受苏联欺负了吗？毛主席让派部队去保护你们。这次我们再也不能容忍发生苏修绑架这种事情了。你们最好 10 日前赶回北京，我要开会欢迎你们。”

周恩来接完电话回来又接着讲：“红卫兵孩子们真是可爱，打了电话，听说是毛主席的话就下来了。当然我也跟他们讲了一些道理，凡是不妨碍中苏人民友好，凡是批评他们领导人的大字报，可以贴在车站上嘛！不要上国际列车，他们不懂得车头是中国的，车厢怎么是苏联的，这个你们懂嘛！跟他说说就知道了，国际列车到中国境内要接中国火车头。今天中央国务院下了通知，内地的红卫兵，革命师生不要到边界城镇、国防要地去，像东北的海拉尔、新疆伊犁、塔城等。内地的红卫兵不要去串联。我们在北京不了解边防上的事。那里有本地的革命师生群众，革命靠自己嘛！”

“红卫兵有错误就改，真是好孩子，的确可爱，是我们的希望，

我们的前途在他们。我们放手让全国的大学生、中学生，放假半年闯革命。但说到你们，你们可不能放半年假噢！你们究竟不是科技大学。科学院和大学不一样，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不同，要搞三大革命嘛！我也不想把你们的争论拖得太长，就提了刚才的建议，也许比较合适。”

9 月 7 日,毛泽东对“青岛事件”做出批示。批示是写在青岛市副市长、中共青岛市委崂山县“四清”工作团副书记、副团长王效禹 9 月 4 日给中央文革小组的报告上。批示如下：

“林彪、恩来、陶铸、伯达、康生、富春、任重、江青各同志：此件请一看。青岛、长沙、西安等地的情况是一样的,都是组织工农反学生。这样下去,是不能解决问题的。似宜由中央发一指示,不准各地这样做,然后再写一篇社论,劝工农不要干预学生运动,北京就没有调动工农整学生,除人民大学曾调六百农民入城保郭影秋,其他都没有,以北京的经验告地方照办。谭启龙和这个副市长的意见,我看是正确的,请你们商议一下,酌定政策。”

王效禹原任山东省检察院副检察长，反右时，省检察院办公室主任刘佩侠等 4 人被打成右派，王效禹因为不同意而受牵连，成为右倾。1959 年 5 月降职到德州国棉一厂任副厂长，行政工资级别从 10 级降为 13 级。1965 年 1 月，王效禹甄别了右倾问题。同年 6 月 4 日到青岛。青岛市已于 6 月 1 日召开市人大五届五次会议，王效禹到青岛的第二天，6 月 5 日，在会上补选为副市长。 10 月 3 日，青岛市委组成崂山县四清工作团，他任副团长，常驻李村。

文革开始后，崂山县四清工作团于 7 月 8 日召集全县 3600 多名中小学教师，在县委驻地李村举办集训班，主要进行以文化大革命为中心的四清运动。

8 月 30 日上午，位于崂山县的青岛 41 中的教师李守丰到市区办事，看到大学生在市委接待站前批判青岛市委书记张敬焘，又听说 29 日夜已经召开了批斗大会。8 月 30 日晚上，工作队邓队长传达省委决定给予张敬焘撤职的处分，41 中教师张鸿瑞起草一份《呼吁书》，先后有李守丰、黄祖源、张鸿瑞、孙秀美等 10 名教师签名。《呼吁书》认为“集训班党委是想用种种借口把我们死死关在这个世外桃源里，也不难看出他们到底是革命派还是保皇派”。教师们提出“查清事实真相，彻底清算集训班党委的错误”。

31 日上午，李守丰、孙秀美等人赶往市区各大学串连取经，专门前往青岛医学院，在院子中大声宣布他们支持大学生的“革命行动”，受到青医师生们的热烈欢迎。大学生们准备第二天派人到崂山县。

留在崂山的张鸿瑞等人，也在 31 日上午敲锣打鼓到崂山县委送“呼吁书”， 崂山县四清工作团副团长王效禹出面接待。他在现场的讲话中表示支持教师们给四清工作团教师集训班党委写的大字报。

31 日下午，正在青岛的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谭启龙知道了 41 中教师在青岛医学院串联和到崂山县委送大字报的情况，以及王效禹支持 41 中教师送大字报的讲话。同时还听说王效禹 30 日曾在在崂山工作团串连，要给时任中共青岛市委副书记的四清工作团团长周化南写大

字报，但是没有获得响应的报告。

当天，谭启龙亲自布置北海舰队领导，通知舰队在崂山四清工作团的人员与王效禹谈话。

当时崂山县四清工作团副团长还有两位部队的正师职干部。一位是山东省军区政治部副主任赵修德，一位是北海舰队正师职原岸防政委独庆夫。独庆夫是作为第二批四清人员到崂山接替北舰正师职快艇1支队政委张慕水到崂山任副团长。张慕水此时已返回部队。

因为独庆夫到四清工作团时间短，北舰司令员刘昌毅、政委丁秋生在东海饭店召来已回部队的张慕水，要他重回崂山工作团。

张慕水8月31日下午匆忙赶到崂山县驻地李村，和周化南商议后，邀王效禹下象棋。

当晚22时左右，有电话找正在下棋的王效禹，通知他“教师集训班中41中的教师到市里串联的回来了，明天市里的革命师生到李村召开万人大会，揭发批判团党委执行的资反路线，支持集训班的革命教师的革命行动。还要将四不清分子剃鬼头，游街示众！”

王效禹放下电话即匆匆来到41中教师宿舍问：“你们是写《呼吁书》的中学吗？”

得到肯定答复后，王效禹说：“你们行动晚了，为什么现在还不行动？我不要党籍了，冒着危险来搞革命，你们快串连吧。”

41中的孙老师立即联络了10人到崂山党校卫生室开会，会议中又有1人加入，王效禹在会上说：

“我们要造反，化南（指周化南）已经跑了，他是保皇派，对红

卫兵不支持，市委有问题，省委也有修正主义。58 年斗了我七、八个月，现在小将们都起来造反了，保证中国 50 年不出修正主义。”

“三大院校革命师生的大方向是正确的。坚决支持三大院校的革命行动。”

“三十年党龄不要，副市长不要，百十斤不要，也要和革命师生站在一起。”　　等等。

午夜时分，周化南、张慕水派人找回王效禹，张慕水对王效禹的做法提出批评。王效禹不服，与张慕水发生争论，两人争得面红耳赤。

王效禹的话很快就通过青岛市委书记处书记、崂山县四清工作团团长周化南传到了正在北海舰队的谭启龙耳朵里。谭启龙只说了一句话：“跳出来了。好嘛！”

因为王效禹是青岛副市长和工作团副团长，第二天一早，参加会议的 11 个人分头传达会议精神以及王效禹的讲话，准备给四清工作团党委写大字报，王效禹同这些人一起吃了早饭。

这天上午，中央恢复张敬涛职务的传言也传到了崂山，这时，崂山工作团的人给王效禹贴出大字报，还准备了一块“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王效禹”的大牌子。王效禹听说后立刻紧张起来，马上承认又犯了错误，提出想找个静的地方休息一下。周化南向上汇报后，让市委组织部党员管理科科长、崂山县委副书记项锡洲等 4 人把王效禹看在崂山县人委后面一间房子里。

下午，崂山县集会，游行队伍扛着“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王效禹”的大牌子。参与写《呼吁书》并与王效禹开会的 41 中的多名教师被

揪了出来，接受批判。

9 月 2 日，参与王效禹 31 日晚崂山党校卫生室开会的 41 中 11 人被打成“反革命集团”。

当王效禹听说恢复张敬涛的职务是谣言后，即于 9 月 3 日晨 5 时 35 分，给“四清”工作团写了一封信，通过看管人员黄兆顺递了上去。信的内容是：

(一)质问：为什么对我采取这种措施?谁决定的?谁批准的?

(二)要求：和全县机关干部见面，和全县教职员工见面，和全县贫下中农社员见面，和家属见面。

谭启龙闻听此事，很为下面干部头脑如此之简单而懊恼。他指示赶紧释放王效禹，并派人向他赔礼道歉。

接着，王效禹给中共中央发去了一封电报，内容是：

“中央：崂山县 9 月 1 日发生了严重的镇压革命的反革命事件。王效禹发于禁闭室。”

9 月 4 日凌晨 2 时，王效禹又给中共中央文革小组拟了一份电报，全文如下：

北京

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

青岛市崂山县“四清”工作团党委，青岛事件以来犯有逃跑主义错误，稍微一紧张就藏起来，不敢和群众见面，不是号召工农兵坚决支持学生的革命行动，而是多方阻挠，在农村提出的口号是要热情欢迎、热情支持、婉言拒绝，并要工人、农民对学生进行教育，说吃着

农民的饭，穿着工人做的衣服，不能去胡闹。对学生不是叫他们到游泳中去学游泳，是说服他们不准进城，这是和中央对立的。我提出过不同意见，作过争论，没有解决。我在干部当中揭发这些错误，准备开始斗争，他们就把我关起来了，说我搞反革命暴动，组织大会斗争。我不管几万人大会斗，也要誓死批判这些错误。因此，如不及早制止，将有发生流血的可能。望速处理。青岛的问题，我认为学生批判张敬焘同志方向是对的，应该支持，打人是错误的，应正面教育。组织工人农民支援张敬焘同志，这是方向的错误，违背中央精神和“十六条”的，势必把事情推得更为复杂。

崂山县“四清”工作团副团长王效禹发于禁闭室

9 月 4 日 2 时

9 月 4 日是个星期天，白天，王效禹趁着看管人员不注意时通过邮局把电报发了出去。发出的时间是 4 日凌晨 2 时 35 分。

就这样，谭启龙 9 月 3 日的报告和王效禹的电报都到了毛泽东的案头。9 月 7 日毛泽东就“青岛 825 事件”和长沙、西安等地类似问题，在王效禹的电报上作了批示。

周恩来 9 月 8 日召集中央碰头会，讨论毛泽东 7 日对青岛等地工农与学生冲突事件的批示，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县以下农村文化大革命的规定》。《规定》指出：县以下各级的文化大革命仍按原“四清”的部署结合进行。北京和外地的学生、红卫兵不要到县以下各级机关和社会去串联，县以下各级干部和社员也不要外出串联。

当天，周恩来还审定了《中共中央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通知》。

中共中央《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通知》和《关于县以下农村文化大革命的规定》这两个文件要求：

一、工业、农业、交通、财贸等部门立即加强或组成各级指挥机构，确保生产建设、科研、设计、市场、收购等工作的正常进行；

二、各有关单位和行业的职工都应当坚守岗位，外出串连的应迅速返回原单位；

三、学生和红卫兵不要进入那些单位去串连，干预他们的部署，影响他们的生产和工作；

四、已经开展文化大革命的生产和科研单位，应在党委领导下，迅速组成抓革命和抓生产业务两个班子。职工参加文化大革命应放在业余时间搞，在这些单位不采取直接罢官的做法，未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单位可以推迟进行，等等。

同一天，周恩来将这两个文件及其附件送毛泽东，并附信说：

主席：

看了江苏文革小组9月8日来电和上饶红卫兵总部筹委会9月7日来电，我认为有关农村和工矿企业文化大革命问题，需要在政治局讨论一次，然后才好批发这两个方面的通知。现将有关文件送上，提议印发政治局、书记处、文革小组、北京市委各同志，妥否，请主席指示。

## 第195回：为平反，地院二进地质部　请小将，王任重煞费苦心

毛泽东“青岛批示”的第二天，9 月 8 日，康生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接见包括海洋学院在内的山东大专院校红卫兵学生代表，并发表长篇讲话。

康生一走进会场，就笑着对大家说：“来了好久了！”

康生接着说：“没有很快见大家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忙，不能很快地见你们，一天有 1000 多封信，老拆信就拆不完。另外到了的这些同志因为地方未定，想找也找不到。山东大学的同志曾和王力、关锋谈过一次，在座的同志是否见过了一些？”

众答：“没有！”

康生说：“情况是知道一些，青岛的问题、山东大学的问题、山东师范学院的问题，咱们商量一下子吧。大家最好到 6 点，最多 6 点 10 分、6 点半，我得接见，接见索马里代表团。一个单位讲一刻钟，主要是听听你们的意见，见见同志们。山东的学校我不大知道……听听同志们的意见吧！看哪个单位的先说吧！”

山东海洋学院的学生：“请康老转达我们山东海洋学院全体同志对最最敬爱的领袖毛主席问候。”

群众鼓掌，康生也一齐鼓掌。

康生：“咱们熟悉一下，你叫什么名字？几年级？”

海洋学院的同学回答：“五年级了。”

康生：“哦，快毕业了。”

海洋学院同学：“阶级斗争这门课我们还没有毕业。”

康生说："这我也没毕业。"

大家又笑了起来。

接着，山东师范学院的学生谈起他们学院的工作组还没有彻底检查就要撤走时，康生插话说："中央不是有一条，不检查彻底就不让走吗？"

师范学院的学生说："省委决定要他们走的，我们又把他们要回来了。"

各校汇报完了后，康生讲话。他说："我欢迎同志们到北京来交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经验，并通过你们向山东大学、山东海洋学院、山东师范学院、莱芜二中的全体同志们，向他们也向你们致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战斗敬礼。你们来到北京，这是毛主席住的地方，毛主席是我们伟大的导师、伟大的统帅、伟大的领袖、伟大的舵手。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亲自领导的。这个文化大革命深入到一个崭新的阶段，深入到人们灵魂的阶段。当然，交流经验是很必要的，我们来问问同志们到北京来学了什么经验，经验我有一点，可以介绍一下。"

接着，康生介绍了北京大学聂元梓大字报的公布过程，讲了工作组的错误性质。然后说："你们从青岛来的同志，特别要看到北京的经验，北京各校工作组镇压革命这件事你们都知道，北大、清华、师大，你们都见到了。山东海洋学院的同学问这是件什么事？这是阶级斗争，这是阶级社会中的反动思潮！有工作组发生这种事，没有工作组也发生这种事。这不是哪一个人的问题，而是一种思潮，是社会存

在的，看到兰州、哈尔滨、西安、青岛和其它地方的情况就可以了解。如果从阶级斗争，从文化大革命是深入灵魂的阶级斗争去理解，是可以理解的。……凡是蒙蔽工人、农民，利用他们去镇压学生，这是完全错误的，不但我们革命师生要学习工农，也欢迎他们支持文化大革命。

另外，他们也要学习。昨天《人民日报》有个社论《抓革命，促生产》，革命师生应相信工农，他们在工厂、农村会按照自己的特点去革命，不要包办代替，他们的生产一分钟也不能停。……当前中央决定要按照农村的生产计划，社教计划进行，不要干涉他们，还要帮助他们秋收。北京很快就要这样做，红卫兵参加劳动也好，向他们学习也好，抓革命促生产也好。”

“第三，你们要一道学习林彪同志 8 月 31 号大会上的讲话，文化大革命是触及灵魂的革命，要文斗不要武斗。文化革命不是武化革命，是脑子里的革命。我赞成北京的红卫兵去破四旧，但首先要清我们,包括我在内,脑子里的四旧，你们脑子里也有四旧吧！我看有，要不怎么要学习毛主席著作呢？清除头脑子里的四旧，你们给他戴上一个高帽子没有用。上海同济大学一个校长被戴上一个西瓜皮去劳动，天热，他戴上这个高帽子很舒服，叫他摘下去他还不干哩。有些地方传我一句话，说我赞成戴高帽子，挂黑牌，这是从高级党校传出来的，是个误会。8 月 20 日高级党校斗林枫，他们给他戴高帽子，身上贴了标语，给我汇报时，我觉得这个办法在思想上解决不了问题，又不能给群众泼冷水，就说群众出于义愤，给他戴了一个帽子，挂了一块

黑牌子游了一下街，也没有什么，还是要按十六条办事好。当然，游街、戴高帽子，只不过帽子高一点嘛！没有什么，但也不算文斗。党校只给传达了前一句，后一句漏掉了，他们从电话中传了出去，贴了大字报，就给传错了。戴高帽子不解决问题，林彪同志讲，这只能触及皮肉，不能触及灵魂，你们要学习林总这一指示。

时间已经非走不行了，我们以后到山东再见面。”

虽然北京地院“东方红”在“824辩论”中大胜，但是他们头上的“右派”帽子还是没有摘掉，“黑材料”问题也没有解决。而且，也找不到邹家尤。于是决定再去地质部，揪回邹家尤批判，为他们平反。

朱成昭问大家:“谁有办法找到地质部副部长们的住址和电话？”

核心组的梅建明于是想办法从家里偷出了父亲的电话本。

梅建明的父亲梅龚彬时任民革中央常委兼中央秘书长，全国政协常委。他1923年加入国民党，曾任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秘书长。1925年初，由恽代英介绍在上海加入中国共产党，任中共上海徐家汇支部第一任书记，也是中共情报史上的杰出人物，抗战“三杰”中的“隐杰”。“三杰”中的另两位是“怪杰”宣侠父、“英杰”陈希周。

9月5日下午13时，未达到目的的“东方红公社”1000多名学生在朱成昭带领下再进地质部。这次是何长工亲自出来接待，“东方红”总部的蒋良扑同学向他提出：“强烈要求地质部党委将邹家尤交给革命群众揭发、批判、斗争。”

此时，邹家尤还在地质学院，但“东方红”并不知道。

何长工说："不是我们不交邹家尤，是他现在不在部里，到什么地方开会去了，我也不知道。再说，陶鲁笳同志说了，你们双方辩论几次，然后邹家尤再回去做检查，这也是你们双方协议的。鲁笳同志是我们的上级。"

这时，地院一个同学立即站出来反驳说："我是20个代表之一，陶鲁笳根本没有这样讲：要双方辩论几次，看辩论情况再做检查。"

蒋良扑接着又提出三点要求：

1、把邹家尤交给我们，回去听取意见，我们保证他的安全。

2、要求部党委给我们革命串联的方便。

3、把高治平叫回学校，听取群众批评意见。

过了一会儿，何长工告诉学生，邹家尤已在地院。

"东方红公社"的学生们认为这是何长工、邹家尤对付他们的花招，是让邹家尤在地院接受"斗批改兵团"的保护。他们要求何长工把邹家尤从地院叫回来，交"东方红"揭发批判。

何长工推脱说："你们要求邹家尤去地院，他现在已经在地院了，我管不了了。"

"东方红"难解心头愤懑，在地质部墙上贴大字报，在地质部门前席地而坐，静坐示威，进而强行冲击地质部机关，还把地质部的牌子摘掉，挂上"东方红公社"的牌子。

何长工制止不住，气愤难平，对那些学生说："我死了，你们'东方红'要负责。"

当晚21时，孔丹带着"首都红卫兵西城区纠察队"来到地质部。

邓小平的女儿邓榕、徐向前的儿子徐晓岩、薄一波的儿子薄熙来等都参加了这次行动。

何长工见到“西纠”红卫兵，激动地说：“我们过去流血流汗打江山，现在他们还没有接班就来专我们的政了。”

“西纠”则说：“何长工是跟毛主席长征过来得老干部。”还说：“中央发给我们一个保护老干部的证件。”

何长工高兴异常，拉着“西纠”学生的手说：“没有你们，我一天也过不下去了。”

“西纠”提出“要保卫地质部革命干部”，并说地质学院“东方红”“抢走了国家机密”、“威胁首长安全”、“何长工休克了两次”等等。他们利用何长工提供的广播室，呼喊：“只许左派造反，不许右派翻天！”等口号，要求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立即撤离。

“东方红公社”当然不允。双方由辩论发展到武斗，并在楼梯上发生冲突。到了 9 月 6 日早上，“西纠”云集地质部，封锁了主楼南门，不让地院“东方红”的人进入。

“东方红公社”当然不同意。于是，“西纠”便将“东方红”的队伍包围在楼前院内，分兵把守，限制行动，连上厕所也不允许，必须立即离开。何长工等人出入地质部，“西纠”都派人随行保护。他们对“东方红”的大哥哥、大姐姐们说：“我们纠察队爷爷有权保卫国家机密，有权保卫老首长安全，你们这些混蛋，狗崽子为什么无视红卫兵，无视老首长？”

地院“东方红”奋起与“西纠”辩论，进而发展到武斗。

第二天，9 月 7 日，“西纠”抓走了 8 名地院“东方红”的学生，关押 20 小时之后，在周恩来国务院办公厅过问后才放出。这就是后来说的“97 事件”。

“97 事件”后，周恩来的信访秘书、国务院办公厅副秘书长、“西纠”负责人之一孔丹的母亲许明给“西纠”打来电话，要求他们撤离。

第三天，9 月 8 日，“西纠”全部撤走。

此后，“东方红公社”继续在地质部静坐示威。从 9 月 14 日起，地院对立派食堂工人拒绝给“东方红公社”的学生送饭，事件越闹越大，轰动了北京城。

肖力来到地质部，找到朱成昭、蒋良朴等人，把他们约到一个饭店，边吃饭边谈。在听取了朱成昭等人介绍情况后，肖力说：“你们在地质部这样僵持下去不是事，要考虑留有余地，适当时要先撤回学校继续坚持斗争。”

这时，朱成昭他们已经知道肖力就是毛泽东和江青的女儿。

后来，肖力到地院，王大宾陪同，在物探食堂外边，王大宾向她介绍了食堂的主管和大部分食堂师傅都是参加保工作队的“工人赤卫队”的，经常刁难“东方红”的学生，甚至有时不给饭吃。肖力听后说：“你们为什么不自己办一个食堂呢？”后来，周恩来又派周荣鑫到地院了解情况，促进两派联合。“东方红”也反映了吃饭问题。周荣鑫听后说：“这是一个大事，人总要吃饭的。”就给院党委书记王焕写了一张条子，让解决“东方红”的吃饭问题。不久，“东方红”办起了自己的食堂。

在中央干预下，也为了迎接国庆节和第二届中日青年大联欢，地院“东方红”于 9 月 19 日暂时撤离地质部，二次大闹地质部前后 15 天。

为稳定湖北，王任重将北京师大女附中的宋彬彬和刘进召到钓鱼台，对她们说：“湖北省委是革命的，现在有人反对省委，这件事可能是有什么背景的。”

王任重背了一段《毛主席语录》后问她们：“咱们怎么办？”

宋彬彬马上说：“那不行啊，不能让他们反对省委。”

王任重随即问道：“那你们能不能去一趟武汉？”

正在被自己为什么“屡犯错误”所困扰的刘进脱口说道：“不是让自己解放自己吗？怎么还让我们去呀？”

王任重就问宋彬彬：“彬彬，那你呢？”

王任重抗战时期就是宋彬彬父亲宋任穷的老部下，在大灾荒中他俩还同拉一个犁杖耕过地，宋任穷曾经说过，王任重是冀南军区四大才子之一。宋彬彬自然对这位长辈十分的信任，她毫不犹豫地说：“我可以去武汉。”

于是，宋彬彬带着几个同学一起来到武汉，被安排住在湖北省委第二招待所。宋彬彬她们借了几辆自行车，先到武汉大学、华中工学院等多所高校和武钢看大字报，开座谈会，讨论湖北省委到底该不该打倒？跑了几天，最后，大家讨论的结果是：湖北省委基本是好的，应该三七开。

这时，宋彬彬被省委叫去谈话，回来后心情激动，把原来的三七

开变成了二八开。她们决定写大字报，亮明自己的观点。

宋彬彬和张小康一人执笔一人口述，开始打草稿，内容多为分析和说理，写得像温吞水。她们写好后，将草稿先送给湖北省委看看。

9 月 6 日，一张题目为：《致北京、武汉革命同学的公开信》的传单随着《长江日报》发送到了每个《长江日报》订户的手中。传单全文不到 3000 字，反对炮打湖北省委，《公开信》中说：

“现在北京南下串连的同学中有一部分人要打倒湖北省委，说湖北省委是黑帮黑线，张体学同志是反革命分子、修正主义分子，这些反动的观点我们坚决反对！”

“我们严正警告那一小撮混进南下串连队伍中的混蛋、王八蛋们，你们恶毒地攻击我们伟大的党中央和毛主席，我们是饶不了你们的！你们把屁放了，想跑了，别他妈的妄想！你们在北京呆不下去了，就跑到武汉来捣乱，在武汉站不住脚，又想跑到北京去拉人来，这更是痴心妄想！”

《公开信》呼吁“革命的团结起来，不革命的滚开”。传单的署名是：宋要武、华小康、刘静梓、朱培、潘小红。

署名的后面 4 个人武汉人不知道是何方神圣，但“宋要武”这三个字在当时的中国可是家喻户晓。这一天，“宋要武”在武汉三镇再次出足了风头，街头巷尾人人都在谈论宋要武和她的文章，许多单位都在组织群众学习和讨论这篇公开信。

可是宋彬彬此时却气坏了。当她们看到传单时全都傻了。她们没想到原来的草稿变成铅字公开发表时，已经是面目全非了。而且，五

个人中不算宋彬彬，还有两人的名字也写错了：张小康在传单中变成了华小康，刘静子在传单上写成了刘静梓。

“怎么能不经我们允许就以我们的名义发表文章呢？”宋彬彬脸都气歪了，大家一致认为得写个声明，说清文章不是她们写的。

宋彬彬立即去湖北省委找张体学。

张体学和她谈了很长时间，声泪俱下地说：“我们跟着毛主席爬雪山过草地，抗战 8 年吃了多少苦，牺牲了多少同志，现在要打倒我们，我们怎么会是反党、反毛主席的人呢？”

宋彬彬非常同情张体学，她也不相信这些老干部会是反党反毛主席的走资派。但她总觉得由别人捉刀而以自己的名义发表文章是不诚实的，于是便说：

“我们可以声明支持省委，但要实事求是。那个公开信不是我们写的，你们以我们的名义发表，这样传出去不好。而且我也不叫‘宋要武’，文章中的一些提法大家也不太同意。”

张体学立即表示：“你们可以再写一份声明，然后交给省委印发。”

当晚宋彬彬就写好了声明。这时，湖北省委突然通知宋彬彬，说她父亲病重，火车票已经给她们 5 人买好了。宋彬彬一听，心里着急，就把写好的声明交给了湖北省委，然后她们 5 人乘坐湖北省委为她们买的火车票回到了北京。

宋彬彬回家一见到妈妈，就问：“我爸得了什么病？”

她妈妈奇怪地说：“你爸没病啊？”

宋彬彬这才明白，实际上是湖北省委想支走她们。她十分不满跟

妈妈讲了去武汉的经过，没想到她妈妈一点也不生气，反而对她说：

“以后不要再提这事了。他们那样做的确不对，但他们是在危难关头，已经被斗、被打、被逼无奈了，处于那种情况，他们这样做，无非是想利用你‘宋要武’的名声保自己，而你却那么较真儿，还要写什么声明，人家是拿你没办法了才想的招儿。”

第196回：九头鸟，“我是地上湖北佬”　冷清清，红卫兵广东传“经”

9 月初，王任重还召见了清华附中的骆小海和卜大华，对他们说：“你们可以到湖北去看看，那里去了不少外地学生，有左有右。你们都是文化革命的闯将，去看看有好处，给他们提提意见。”

王任重向他们介绍了湖北文化大革命的情况，还给他们看了武汉大学校长李达写给毛泽东的求救信。

骆小海和卜大华组织了几个人来到武汉，发现北京师大女附中的宋彬彬等人已在那里。卜大华他们也住在湖北省委第二招待所，湖北省教育厅厅长单一介接待了他们。单一介说：“任重同志经常提到你们，你们文化革命搞得好，下午就安排你们和湖北的左派朋友见一见。”

当天下午，卜大华他们见了王任重的儿子王三宝。

此时王三宝已是武汉中学生中的领袖人物，在武汉很有名。

第二天，他们到武汉大学看大字报，其中就有 9 月 6 日随《长江日报》发送的以宋彬彬她们名义发表的《公开信》。随后，他们又去了湖北大学、水利电力学院、测绘学院、华东农学院，参加了在那里举行的几个会，卜大华还在会上讲了话。

9月8日，陶铸接见了付军胜等9名南下武汉返回北京告状的大学生代表，听取他们的汇报和申诉，并做了三点指示，其中主要的一点就是湖北省委犯了方向路线错误。

当天，陶铸、王任重给湖北省电话中提出8条意见：

1、所谓炮打司令部，主要是打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2、要教育干部和广大人民群众，善于分析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采用不同的方法对待。

3、目前的文化大革命重点，仍是中等以上学校和大、中城市的党政机关。农村县以下要抓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抓革命、促生产，夺取丰收，暂时不进行文化革命。破四旧、立四新放在秋后冬季进行。

4、工厂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仍按原来的部署，结合四清运动进行。说服红卫兵和其他革命学生不到工厂串联。对工厂领导有意见可以派代表送大字报，各个工厂可以在门口建立接待站接待他们，教育革命的学生，不要到工厂去，以免妨碍生产。

5、工厂、农村所有犯错误的干部需要撤换的时候，一律要呈报上级党委批准，不要随便罢官，以使生产正常进行。

6、机关、工厂没有组织红卫兵的，不要去提倡。已经组织起来，也不要去解散。中等学校和高等学校，可以为市单位成立总的指挥部，设主任、副主任若干人，委员若干人，实行轮流值班制，以使领导人不脱离原单位群众。机关、工厂的红卫兵一律不参加这个指挥部。

7、红卫兵年龄限制在三十岁以下，参加红卫兵的条件：（1）出身成分好（劳动者家庭出身）；（2）政治思想好；（3）组织纪律好；（4）关于红卫兵的条件应当通过红卫兵代表会自行讨论通过。

8、国家党政机关，学生不要去串联，如送大字报，热情欢迎，如去串联开会，婉言拒绝。

申明：工人、农民、干部不参加学生组织的会议，这是一条纪律。

付军胜等人回到武汉后，大力宣传陶铸的三点指示，掀起了炮打

湖北省委的新高潮。可同时，湖北省委却又拿出了一个与造反派带回的陶铸指示相对立的三条陶铸指示，说湖北省委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于是，孰是孰非，孰真孰假，围绕陶铸的三点指示，江城两派争的是天翻地覆。

按照省委议定安排，9 月 12 日，由湖北省委支持和组织的武汉地区的“大专院校红卫兵司令部”在武昌阅马场体育场宣告成立，湖北大学的漆林任政委。张体学在漆林等人的陪同下，身着新军装乘军用吉普车在阅马场检阅红卫兵。“武汉大专院校红卫兵司令部”后称“武汉一司”。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也跟张体学一起参加了大会并讲话。

不过，张体学身穿军装检阅红卫兵，立即遭到非议，有人回学校就说：“张体学好威风啊，他想学毛主席啊……哼！”

是啊，一个地方首脑，想模仿毛泽东穿军装坐吉普车检阅红卫兵，以在政治上巩固自己，太出格了。一夜之间，“张体学罪该万死！”“打倒张体学！”的大字报刷遍了武汉三镇，弄得张体学灰溜溜的。

“大专院校红卫兵司令部”的袖章只有“红卫兵”三字，名称前没有冠以“毛泽东思想”等其它前缀，所以被人们戏称为“三字兵”。

9月15日，湖北省委在洪山宾馆和北京来串连的学生见面，首先是正在受到北京南下学生炮轰的湖北省省长张体学讲话。

张体学讲得很动情。他讲了自己他从小跟着母亲要饭，走遍了湖北所有的地方，家里穷得叮当响，实在没有活路的情况下参加了革命。在讲到他母亲去世的时候，他掉了眼泪。同时，他也讲了湖北省委的

情况，说“湖北省委解放以后始终是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工作的，毛主席每年都到湖北来，都要亲自做很多具体指示。”

他实在不理解，像他这样的人为什么还会被炮轰？张体学情绪非常激动。他说：“我代表湖北三千万人民，我控诉你们，你们不是在炮打我们，你们不是在给我们抹黑，你们是在往毛主席脸上抹黑！”

他说：“天上九头鸟，地上湖北佬；我就是湖北佬，我不是好惹的！”

参加这次会议的学生全国各地的都有，但以北京的为主。中国人民大学的赵桂林也坐在那里，抽着烟听着。当他在那里喷吐烟圈时，《湖北日报》的记者不失时机地为他抓拍了两张照片。

赵桂林一见，顿时就急了，他周围的几个人迅速站起来大声喊道：

“不许拍照！”

并冲出来抢记者的照相机。维持会场秩序的中学生不让他们抢。一些学生高喊着要揍赵桂林，要把他揪出去，双方扭打在一起。

坐在主席台上的清华附中学生卜大华和骆小海站了起来，他们自我介绍说：

“我们是清华附中的红卫兵。”

接着，骆小海说：“我们认为湖北省委是革命的省委，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省委，过去工作是有很大成绩的。我们相信张体学同志是要革命的。”

骆小海刚讲到这里，张体学立刻站起来，激动万分的用双手一边搂着骆小海，一边搂着卜大华说道：

“你们看，这才是真正的红卫兵！这才是毛主席支持的红卫兵！”

湖北省的记者在旁边不断地照相。

卜大华接着说：“即便革命的省委也应该欢迎群众炮轰司令部，革命的领导干部经过这样炮火的洗礼可以变得更加纯洁，革命的队伍变得更好，不革命的那部分就会被打掉。”

他们讲完以后，陆续有很多北京学生发言。多数是肯定湖北省委的。会议到中午结束，省委的人留清华附中的学生吃饭。当时，张体学情绪非常激动，吃不下饭。清华附中的学生来到他的屋里，张体学激动地对他们说：

“谢谢你们，谢谢你们！”

卜大华说：“我们想马上回北京，把这里的情况向王任重同志作个汇报。”

张体学立即答应说：“行！”并让秘书安排飞机。

秘书告知：“今天飞机已经没有了，得过两天才有。”

卜大华问：“火车有没有？”

一查，当天中午12点半就有一趟火车。卜大华他们说：“我们就不多说了，今天就回去。”

湖北省委立即派了一辆车，送卜大华和骆小海赶到武昌，结果火车已经开了。他们又从武昌再飞车赶到汉口，刚好赶上。省委派的人直接跟车站交代了一下，让他们上了火车。

当天到北京后，晚上就在钓鱼台和王任重见了面，向王任重汇报了湖北的情况。

卜大华说："湖北的情况，我们看了一下，觉得省委几个同志对运动都很不理解，很被动，对群众主要是太害怕。怕他们否定省委成绩，怕他们否定主席的指示。我觉得完全可以不必害怕，让他们说呗，你调查到什么东西，如果有错误，我们就改，如果不是的话再说。"他建议王任重做一下张体学的工作。

王任重说："你说的很对，那天开完会他们已经打电话来了，我们觉得张体学同志很不容易，刚才我们几个秘书同志都流眼泪了。我已经对张体学同志说了，你要挺住，要主动接受群众的批评。"

王任重对他们说："今天晚上你们不用回去了，就住在这里吧。"

第二天，卜大华他们就从钓鱼台直接返回了湖北。

此时武汉街头，连续出现数日大辩论："省委是否犯了错误？"湖北省委把清华附中写的《十点估计》印成大大的字，贴在省委门口。一边是《十六条》，一边是《十点估计》。

卜大华他们回到武汉后，林彪 9 月 15 日讲话中关于"炮打司令部"那段话也传到了武汉，南下武汉的人大附中一个女生甚至写了一篇大字报，题目是："与林彪同志商榷——关于炮打资产阶级司令部"，意思说林彪的提法不对，是压制群众，还让清华附中的学生也一起签字。清华附中的学生没有签，但卜大华等人觉得对形势的发展愈来愈看不清楚，湖北不可久留，他们将与王任重见面的情况与张体学做了沟通，然后发表了《清华附中红卫兵中南支队访汉声明》，讲了湖北省委的成绩，也批评湖北省委对运动的领导很不得力，希望他们能够更多地接受群众的批评。然后就南下广州串联去了。

9月19日，张体学在省委内部宣布：“我们赢了！”不过，这个回合吸引了众多工人和机关干部参与其中，在拥护省委的极高强声浪下，正暗暗滋生怀疑省委作为的潜流。

此时，北京和外省到广东串连的学生人数，先后已达12000多人，其中仅北京就来了7000多人。

广东省委在8月中旬成立接待组，每天都有大批学生涌到接待组，有的是了解运动情况，有的是要求解决生活问题，有的是要《毛主席语录》，有的是要国庆节观礼票，有些是了解外出串连的手续。最受关注的是北京101中的学生，从8月28日至9月5日，他们陆续来了5批共65人，分成13小队，分散到广州各中学和中等专业学校进行活动。

8月30日晚，北京101中的学生，对专诚前来取经的广州17中红卫兵介绍了3条经验：

一、毛主席已贴了大字报炮打司令部，你们就把党支部砸了，可以抓他们游街，游街不算武斗，北京就打死被游街的50人；

二、向小商小贩进攻，北京的小商小贩都给铲掉了，你们可以到处都砸，叫他们顾也顾不过来；把公私合营也给砸了；

三、剪辫子，北京的红卫兵上街带着剪子，看到留长辫子的就剪。

8月31日，两名来自北京清华大学的学生，在广州贴出一张与毛泽东那张大字报同名的大字报，《炮打司令部》，指责广东省委，害怕革命的群众运动，害怕革命的造反，致使广州的文化大革命，至今冷冷清清，许多单位的阶级斗争盖子，还没有揭开。直把广东省委，视作“资产阶级司令部”。

9月1日，《羊城晚报》宣布：“接受红卫兵和革命群众的意见，经上级批准”，将《羊城晚报》改名为《红卫报》

9月3日，“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在广州成立。

广州“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的建立，早在毛主席第一次接见首都红卫兵后就开始酝酿了。8月20日，北京26中来广州串连的5名红卫兵住在八一中学，帮助他们发起和筹备成立全市性的总部，很快得到各中学的支持和响应。总部初期设在八一中学，后来迁出。“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的成立，同样得到广州市委的支持。他们按市区划分为东、南、西、北四个分部，人数约3万人，10月以前的总指挥是杨秋元。“主义兵”刚成立时，家庭出身好坏，成为能否参加这个组织的重要条件，当时的头子都是高干子弟。在陈伯达提出高干子弟最好不要担任领导工作后，他们先后离开了总部。

9月3日上午9时许，广州地区4000多名红卫兵代表，在中山纪念堂召开第一次大会，中南局、广东省委、广州市委、广州部队和省军区的主要负责人，几乎全体到场，红卫兵为他们戴上了红袖章。大会通过了广州红卫兵宣言，红卫兵们庄严宣誓：“谁敢反对毛主席，谁敢反对毛泽东思想，谁敢反对党中央，谁敢反对无产阶级专政，我们就要革他的命，专他的政，夺他的权，造他的反，就要和他刺刀见红。”

海军战斗英雄麦贤得在会上发言。陈郁、赵紫阳、焦林义等省市领导，也分别致辞，赞扬和支持红卫兵的革命行动。

但这次大会还是受到了北京红卫兵的冲击。正当战斗英雄麦贤得在台上会见红卫兵前后，北京101中学8人，串联广州市21中部份红卫

兵20多人，直闯上讲台，声称：“我们要造大会的反。” 中南局农委主任李尔重劝他们到后台商量，他们说：“你不了解情况，没有发言权。”硬冲上台，秩序大乱。麦贤得离开后，他们又抢扩音器，强迫大会主持人请参加大会的中南局、省委、市委负责人先退场，红卫兵留下来和他们辩论，称“大会是失败的”，“是一次修正主义的大会”。

台下的红卫兵，有人在叫喊，有人在跺脚，噪声震天。

当天，《广州日报》发表社论《英雄的红卫兵万岁！》。

9月4日，北京科技大学“南下革命造反队”，散发一份油印传单，题为《揭穿一个大骗局》，称：广东省委利用红卫兵大会，“达到其不可告人的目的，想利用毛主席的莫大威望，利用红卫兵在这场文化革命中建立的伟大功勋，施放烟幕，迷惑群众，转移当前斗争的大方向，掩护省委过关”。他们质问，为什么中南局、广东省委、广州市委、广州军区的主要负责人都参加大会，且接受红卫兵的袖章呢？“广东省委想把自己与毛主席和林彪同志相提并论，以此说明自己是代表党中央，代表党的领导”。他们号召：“广州的红卫兵战友们，革命的同志们应该走出学校的大门、机关的大门，炮轰司令部，火烧广东省委，火烧广州市委，这是当前斗争的大方向。”

这天，北京101中学的10名南下学生，在破“四旧”总行动日，向省委递交了一份“最后通牒”，要求在省人民广播电台广播和在《南方日报》刊登。“最后通牒”称：

一、一切私营、公私合营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在明天（5日）

上午立即封门，否则后果自负；

二、广州市委立即把私营、公私合营国有化，同时要马上妥善安排市场，如果影响人民生活，要承担责任；

三、一切旧商标、旧商品、旧招牌立即毁掉，否则格砸勿论，拿你们问罪；

四、一切国营企业必须立即断绝与非国营企业的任何关系；

五、一切收旧货的国营企业，立即停止收购具有封、资、修色彩的东西，如旧书、首饰等，要一律没收，决不允许坏分子投机；

六、40岁以下的人，要戒烟、酒，商店出售烟酒要严格控制，烟酒工厂也要有计划地少量生产。

陶铸12月13日在北京的一次讲话中，特别提到101中学的学生在广州的活动。他说："北京101中的革命学生革命性不差，但打人也相当厉害，一去就找红线女，给她剃阴阳头，水门汀地上跪了两个钟头，抄了家，才子佳人剧本拿到造纸厂造纸，挂牌子，牛鬼蛇神红线女，扫了一个时期的马路，做了一点体力劳动，香港就说她自杀了。她说，她坚决革命。"

红线女是当时广州的著名粤剧演员。

第197回：黑龙江，大会批斗省领导　回母校，毛远新两派协调

9月3日至17日期间，陶铸一再以电话指示广东：要说服红卫兵不要随便抄家和没收财产；不要挖回墓和朱执信墓；把工厂、农村稳住，大、中城市放手革命，没有什么可怕；外地学生搞串连只到大、中城市，不要到县城，县城中学生也不要到工厂、农村串连；干部处理要慎重，领导不要随便罢官；上层民主人士还要照顾等等。

9月5日，中国人民大学、北京15中“南下革命造反大队”，在广州散发《向省委猛烈开火》的传单，宣布要“炮轰省委，把盘踞在省委的一切大毒蛇统统揪出来！坚决造他们的反，革他们的命，把他们斗倒、斗臭、斗烂！不反出一个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新省委，不反出一个毛泽东主义伟大红旗高高飘扬、处处飘扬的新广东、新广州，死不瞑目！”这份传单不仅散发到省委办公大楼，而且张贴于街道墙壁，还派人到茶楼饭馆宣读。

当天下午，由华南工学院一部分红卫兵发起和主持，1000多人在省委礼堂开揭发和批判广东省省长王阑西大会。这是高校红卫兵第一次到省委来“炮打司令部”。大会开到晚上22时许，近30名北方红卫兵突然从后台冲了上去，按着王阑西的头，要他跪下。这时台下的华南工学院红卫兵不断齐声高呼：“要文斗，不要武斗！”“非主席团成员请离开主席台！”扰攘了半天，那些北方红卫兵才悻悻退下。大会结束后，他们还不肯走，拦住华南工学院红卫兵辩论。北京大学哲学系一名学生喊着：“大会是失败的！让王阑西坐在椅子上，和人聊天，记笔记，不向人民低头认罪！”“广东的文化革命运动冷冷清清，

没有火药味！”

9月6日，广州市委批转市财委《关于迅速取缔小商小贩并安排其出路的请示报告》。全市共35664个小商小贩，根据不同情况，做出转街道服务站、新组织合作商店或插进合作商店、收回牌照和取缔等几种处理。

北方来的学生，把浓烈的火药味带到了广州：

北京大学附中7人，到广州市委要求把所有政协委员名单、大资本家名单交出来，说：“我们在北京每天都打死地、富、反、坏分子几十人，广州打死几个有啥问题？打死就算！”

北京国际关系学院3个红卫兵到市11中召开学生大会，说：“北京斗争时是将对象押上高台，要他们跪下，用皮带打，对顽固派就把他打死。搞完校内就搞校外，限令四类分子离开北京，不执行就打死他。北京每晚外出打流氓，一晚就打死10个、20个。我们南下时，在火车上就把四类分子打死了10多个，打死后由窗口丢出去就算了。要搞红色恐怖。”

9月7日，省委接待组一些关于广州市六中的情况反映，听起来令人毛骨悚然：

从8月下旬开始到昨天晚上止，全校70多位教师，被打的约有40多人，被打得严重的有20多人。个别的被打到吐血，有的还要被打者互相殴打，把地、富、反、坏、右分子和其成年家属排成队来打。昨晚有12位黑五类同学也被打了，两人被打伤，还不让护士包伤。有些同学躲在床底，也挨脚踢。打人都用军用皮带、胶轮带、竹子。

广州市六中，对入牛栏的人不分青红皂白，经常鞭打，一时叫他们笑，一时叫他们哭，或者叫他们在地上打滚，或者罚他们跪在地上。8月28日晚，以石榴岗海军高级首长之子吴XX为首的一小撮人，在晚上通知牛鬼蛇神集中到六中最偏僻之处，勒令他们弯腰，把附近电灯熄灭，用木枪、木棍等武器、工具，刺杀、毒打、鞭打牛鬼蛇神，不少人胸部、骨骼受伤。

小学的情形也不遑多让。荔湾区立新小学（即原洞神坊小学）的教师，不堪其扰，向省委诉苦："现在的学生根本不听老师的话，上课时，在桌上、凳上嬉笑吵闹，无法上课。老师随时都会被围困斗争或关起来，甚至被罚站晒太阳。学生叫家庭出身不好的老师是狗崽子，成分不好的是龟老师。有些学生还要到老师家贴大字报，有的红小兵向牛鬼蛇神要钱，将广播器搞坏，把图书拿走，甚至搞坏抽屉，拿走校章。把老师的会议室要去做红小兵总部，现在又要老师宿舍，学生还成立夜老虎队，晚上不睡觉，到外面跑，集体到学校睡觉。

外地学生成了广东省委最头痛的一群人。9月15日，省委发出《关于进一步做好接待外地红卫兵和革命师生的通知》，其实主要是针对从北京来的红卫兵而发的。通知写道："首都是革命的中心，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中心，首都和全国其他各省、市都有着开展文化大革命的许多宝贵经验。外地红卫兵和革命师生来到之后，党委文化革命办公室和各校文化革命委员会，要主动向他们介绍当地和本校运动的情况，听取他们对省委、市委和本单位工作上的批评和意见，虚心学习他们的好经验，并根据我们的实际情况，把他们的好经验应用到

我们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去。”通知流露出省委临深履薄的心态。

9 月 4 日，哈军工“红色造反团”发起，再次在哈尔滨红卫兵广场召开了有 10 万人参加的“‘炮打司令部’大会”，会上批斗了省委领导李范五、王一伦、陈雷等人。潘复生在台前亮相，支持红卫兵的行为。

那天，李范五等一大批“走资派”都站在木椅子上，弯腰低头“坐飞机”，突然窜出来一群北京来的中学“红卫兵”，她们拿出剪刀，抓住李范五和夫人黎霞就“剃鬼头”，只听“咔嚓咔嚓”，李范五夫妇痛苦不堪，任小将们革头发的命。哈尔滨人都看傻了，北京的“先进经验”呀，原来开大会前还有剪“阴阳头”这一道程序。

剃完鬼头，让李范五带着头发挨批。

大会的高潮发生在副省长陈雷的身上。不知什么时候，上来一位妇女发言者，她“揭发”副省长陈雷当年“枪毙过抗联战士”，这条未经核实的“罪行”顿时使会场大哗。这时候，哈军工“造反团”的一位烈士出身的学生，在群情激愤、有人高喊“揍他”时，打了陈雷一巴掌。此事当即被对立面“八八团”抓住不放，会后，哈军工“八八团”同全市“八八团”一起，向哈军工“红色造反团”兴师问罪，发起了猛攻。他们知道，哈军工“造反团”是全市造反派群龙之首，挫伤了哈军工“造反团”，就是打击了整个造反派的气焰。他们开动宣传车，散发传单，再一次到工人群众中做工作，声讨“红色造反团”的打人罪行。许多工人纷纷指责哈军工“造反团”违反《十六条》，一时间，造反派违反政策，违反《十六条》，乱揪乱斗，搞武斗，形成很大的一股社会舆论。

9 月 7 日，哈尔滨大工厂的数千工人把哈军工一道门围上了，要求找“红色造反团”的头头辩论，想问问：“揪斗、殴打老干部符不符合《十六条》？”这天，大批工人群众上街，围攻“红色造反”者。

省委门前，工人和干部举行示威，要求解散“红色造反团”。一时间，哈军工的气氛空前紧张。对此，全市大专院校“造反团”在大专总部召开各院校造反团负责人会议，认为：这件事情的表面是“八八团”，背后是省委有人支持、出主意，必须立即调查清楚，及时予以揭穿。最后会议做出两条决定：一是在 12 日，组织全市大专院校“造反团”搞一次大规模的游行示威；二是全面宣传《十六条》、贯彻《十六条》，在 12 日以后的几天里，召开揭批省委大会，揪出挑动群众斗群众的后台。

对于这一事件，省委内部斗争也很尖锐，有人说：“让工人整整学生也好嘛”，但潘复生又一次表态：“‘红色造反团’的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他们的缺点错误只是支流，绝不是主流！没有像他们这样一批敢于造反的革命小将，文化大革命就不可能搞下去”。

这时，哈军工“八八团”的曾敏杰接到毛远新的电话，他们都是院排球队的队员，关系挺熟。

“敏杰啊，你去做做司锡才的工作，”毛远新说：“支持一下‘造反团’，帮他们解解围。”

第二天，哈军工“八八团”大队伍上街游行，第一次表态支持哈军工“造反团”。这是毛远新刻意做两大派联合工作的一次尝试。

毛远新是毛泽东的侄子，他于 9 月初回到哈军工。1966 年初，毛远新提前毕业，分配到七机部的研究院。毛远新回到北京，毛泽东颇不以为然，他说：“你这个大学生呀，我还不承认呢，你没当过工人，没当过农民，也没当过兵，没有什么实际经验，怎么算个真正的

大学生？”

毛远新不服气：“我在军工当了这么多年的兵，怎么不是当兵呢？”

“我说的是连队，”毛泽东说，“连队当兵跟军队院校的学生兵怎么可以比？”

毛泽东又说：“七机部是个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你刚毕业就去那里，对你并不好。”

毛远新自小就非常听伯父的话，他马上打长途电话，请系里通过正常组织渠道联系一下，看看能否同意他下连队当兵。当然是一路绿灯，不久，毛远新接到去空军当兵的通知。

毛远新到空军司令部报到，吴法宪和余立金热情接待，连声说：“欢迎，欢迎！欢迎军工的高材生来到空司！”

胖司令吴法宪一定要请毛远新吃一顿饭，以表敬意。他说将会安排毛远新到空军的第二高炮指挥部，在成钧司令员手下当参谋。

毛远新轻松愉快地回到中南海，向伯伯报告，自己要到空军当参谋了。

毛泽东眉头紧蹙，摆手道：“不对。你不应该留在城里当官，我是要你下基层连队当兵！”

见侄子没吭声，好像有点保留意见，毛泽东又缓和地说：“你知道这句老话吗？参谋不带长，放屁也不响。当那个放屁都没声的参谋干么子？”

一句话把毛远新说乐了，他又到空司，要求吴法宪收回成命，改

派野战部队。

于是，空司把哈军工的几个高干子弟全都分到空军高炮某独立师，毛远新、粟戎生、廖晖分在该师三营。3 月初，他们调到云南，在大山里布防，准备迎击敌机。毛远新和粟戎生住在一个帐篷里，下大雨的时候，鞋子都会漂起来，最困难是大山上没水吃，下山挑水，走一趟就要 40 分钟。毛远新和战友们风餐露宿，忍受着蚊叮虫咬，很好地完成了战斗任务。

8 月中旬，空司来了电话，急调毛远新回北京。在深山里呆了半年的毛远新被北京天翻地覆的文化大革命吓了一跳，真有“山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的隔世之感。

8 月 18 日那天，毛远新跟着毛泽东登上天安门，看见了一大批哈军工的学弟师妹们。9 月初，毛泽东对侄子说：“你到学校去参加运动吧，了解运动的具体情况。是去 101 中？还是回军工？你自己定吧。”

毛远新说：“我还是回军工吧。”

两派中的干部子弟最先知道毛远新回来了，纷纷找他谈话，宣传自己那一派的政治观点和斗争业绩，攻击对立面的种种丑闻劣迹。

两边的意见毛远新都听，他不表态支持哪一方，只是原则上讲讲多作自我批评，加强各派团结的话，因而哈军工上下都认为“毛远新一碗水端得平”。

9 月 12 日，哈尔滨全市 14 所大专院校的“红色造反团”人员，按照计划，倾巢出动，从学府路到大直街东端，全程 30 华里。各个

院校的造反团成员，首尾相接，排着四路纵队，打着红旗和各种彩旗，浩浩荡荡，高呼“造反有理，革命无罪”、“造反有理，造反到底”、“省委有鬼”、“省委里有大鬼”、“把省委里的鬼揪出来”等口号，唱着《东方红》、《社会主义好》、《大海航行靠舵手》等歌曲。

除了哈军工的师生身着黄军装、蓝军装，斜背黄书包、蓝书包之外，其他各校每个人一色身着蓝布学生服，斜背黄书包，右手高举红塑料皮的《毛主席语录》本，一个个面部庄严而郑重。

这次游行示威，给社会造成了比较大的震动和影响。师生们在行进中，常常抑制不住兴奋之情，引以为荣。一次队伍小憩，师院中文系的一位男同学，绰号老虎的张春芳，弓着腰，压低嗓音，拿着一副爷腔说：“孩子们，”说着又故意咳嗽几声，假装吧着旱烟袋，啐了一口痰，继续说下去，“当年我们造反时，不怕压，不信邪，面对白色恐怖，我们就来个红色恐怖，组织大游行，你爷爷我……”，逗得大家捧腹大笑。

游行之后，各个院校“造反团”根据大专总部统一部署，向中央申报省委第二书记兼省长李范五接见“八八团”，挑动群众斗群众的问题。9 月 15 日，哈尔滨市“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总部”，即“红色造反团”在红卫兵广场主持召开了有 50 万人参加的“斗争黑帮分子李范五、王一伦、陈雷大会”，中共中央东北局第三书记马明芳和潘复生出席了大会。会议结束时，马明芳宣读了中共中央批准撤销李范五的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定和中共中央东北局批准停止省委书记王一伦、任仲夷、陈雷的党内外一切职务进行反省的决定。

## 第 198 回：提抗议，红卫兵西安绝食　周恩来，飞机接学生进京

这时，西北的西安再次出现问题。9 月 5 日，西安工业学院造反队跑到西安交通大学求援，声称他们受到本校保守派的围攻，不让他们吃饭。

原来，西安工业学院基本上是“誓死保卫陕西省委”“誓死保卫西北局”的铁板一块，没有人敢站出来揭发批判学校领导的问题。后来，外地串联的红卫兵到该校不断煽风点火，逐渐分化出 130 多名学生成立一个“无产阶级革命造反队”，并贴出揭发校领导和省委问题的大字报。这下触怒了学校领导，称他们是反革命组织，下令解散，并批判斗争这些学生，甚至一些态度坚决、不肯屈服的学生还遭到围攻和殴打，甚至有人说：校领导宣布，从 9 月 3 日晚起不给这些同学饭吃。一个学生受不了他们的残酷批斗偷偷逃出学校。

西安交大学生闻听此事义愤填膺，冲出校门来到和平路金家巷西北局门口示威抗议。

在西安串连的北京一些大学的红卫兵和西安地区其他高校的学生，也赶到西安工业学院声援。6000 多人在西安工业学院门外开会，声讨西安工业学院党委“破坏文化大革命的罪行”，并向院党委和中共陕西省委提出 6 条要求。

西安交通大学、西北工业大学、军事电信工程学院等院校数万师生员工再一次将陕西省委、西北局包围，省委一直没人出来接见并解决问题。

9 月 6 日早上，省委门口陆续前来声援的学生和群众越聚越多，

省委出来一个叫李康的干部答复学生和群众，让工业学院的130多名学生通过学习《十六条》解决问题。李康的答复让那些学生异常气愤，和他进行辩论。李康怎能辨过这些学生？只好打道回府，一走了之。此后，不管学生和群众怎么呼喊，省委内再也没有人出来答复。

学生们经过商议，向省委发出最后通牒，并警告省委领导，若不答复他们的6条要求将采取必要的革命行动，省委一直无人出来接待。于是，这些学生宣布从8点开始进行静坐绝食斗争，直到答复他们的要求解决问题为止。

气愤难平的学生开始在西北局机关和陕西省委大门外整齐列坐，绝食静坐。现场红旗招展，歌声起伏。年轻教师义无反顾，一些中年教师犹豫良久，经过反复利弊权衡，也加入了静坐绝食的行列。这个消息传开后，西安工业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冶金学院、陕西工业大学、西北农业大学、西北大学、西安军事电信工程学院等200多所大专院校立即响应，陆续赶来支援他们，并和他们一起参加静坐绝食斗争。一时间，省委门前的整条建国路坐满了人。

西安市民听说学生绝食，奔走相告，纷纷上街观看。和平路、大差市一带人山人海，热闹非凡。许多市民带着食物来到这里劝说学生用餐。还有许多人纷纷加入到绝食行列中来。

天气非常炎热，学生们坐在马路上确实不好受。但他们一想到西安工业学院130多个阶级弟兄已经3天没吃饭了，勇气就上来了。他们共同朗诵毛主席语录：“无数革命先烈为了人民的利益牺牲了他们的生命，使我们活着的人想起他们就心里难受，让我们踏着他们的血

迹前进吧！”“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等。同时，还高唱革命歌曲《大海航行靠舵手》、《毛主席永远和我们在一起》等，气氛活跃，慷慨激昂。

为了把他们静坐绝食的原因宣传出去，绝食行动的临时组织者要求使用省委的广播站，省委的人肯定不同意，并赶紧把大门关了起来。学生们不管三七二十一，冲进省委大院，夺取了广播站，用高音喇叭开始广播。

下午，省委书记处书记章泽被学生们拉了出来。他在马路上转了一圈，劝学生们不要绝食，相信省委会妥善处理此事。章泽回去后，省委又没有了音讯。学生们追问省委，省委说章泽对学生们的要求已经答复过了。

第二天，天气仍很炎热，热辣辣太阳让绝食的学生们个个饥渴难耐。后来，一些身体虚弱的同学开始晕倒，并且越来越多，几个担架不停地往外抬人，估计抬出有几百人。为保存体力，他们不再唱歌和谈话，默默地抱膝而坐打瞌睡。午后，附近街道上一些好心的老大娘，提着一桶桶的咸开水并带着碗来到绝食的学生们中间，让他们解渴，同学们无不感激涕零，连声道谢。

参加“绝食斗争”的人从 3 万余人发展到 5 万多人。西安交大与其他院校统一组织了“西安地区大专院校造反统一指挥部”，简称“统指”和“红卫兵造反司令部”。他们向中共中央发电报，同时向北京派出“九六绝食代表团”请求支持。

下午 18 时左右，天上下起了小雨，省委书记霍士廉来到了省委

门口，西安军事电信工程学院的红卫兵拉着他要和他辩论。最后，霍士廉基本答应了学生们的 6 条要求。学生们的绝食斗争胜利了，大家纷纷站起来欢呼：“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绝食的学生开始撤走，周围却有许多群众在道路两边围攻他们，向学生们挥舞着拳头高呼：“反对绝食！”“绝食有罪！饿死活该！”拳头几乎就能碰到学生到脸上，队伍被挤得稀稀拉拉的。同学们气得一边跑着紧跟队伍一边高呼“打倒资产阶级保皇派！”

绝食现场还有学生与这些群众进行激烈的辩论和争斗，局面十分混乱。

就在绝食的学生撤离的差不多的时候，又传来消息说，霍士廉否认他曾答应了学生的 6 条要求。还未撤离的学生非常气愤，冲进省委接待室继续绝食。由于多日未进饮食，加上激动，不时有学生晕倒在省委接待室，被省委机关的人抬走抢救。后来，只剩下 24 个学生了，他们意识到如果都被抬走，绝食也就结束了。他们提出，再有昏倒的学生坚决不让他们抬走了。他们表示：“我们这 24 位同学就是死也要一起死在这里，除非立即答应我们提出的 6 条要求。”

陕西省委门前建国路上静坐绝食的学生和群众

9 月 8 日上午，很多学校得知还有 24 名同学在省委坚持绝食的情况后，又有许多同学到省委支持那 24 名学生的绝食斗争。至 9 日，时令已是夏末，夜晚寒冷，白天中午炎热，太阳一晒，不断有学生晕倒。广播中不断传来“中心会场”有人晕倒的消息，情况变得十分紧急，真的死几个人，那就无法交代了。

周恩来闻讯，从北京亲自打来电话，要求与绝食学生直接通话。他在电话中说：“我一直在等待你们，我一再等待你们，你们要吃饭，你们不吃饭，我怎能睡觉呢？党中央怎么能看着你们不吃饭，有些问题要研究。”

“你们这个组织是合理的，陕西省委，西安市委保护你们安全和自由，大楼可以分一部分给你们办公，交通车受阻拦应给西安市讲，你们不要阻拦。”

“我整整一夜等待着你们，我一直坐在办公桌前，你们可以问刘澜涛同志，你们有什么要求，打电话，我可以命令，让所有军事电话

停止。”

“你们这是革命的行动，你们造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反，要吃饭，在毛泽东主义的新中国，怎么能够绝食呢？……我不是责怪你们，我是劝导你们。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有什么问题不能解决呢？如果倒下一个同学，影响多么不好。我给刘澜涛同志打电话，让工农群众不要围攻你们，要陕西省委、西安市委做大量的解说工作，你们有权提出罢郭××的官，但现在我情况不了解，我一个也不能回答。我要打电话给刘澜涛同志，要和党中央商量，你们要给我时间。”

“你们要吃饭，不吃饭不是等于向毛主席示威吗？毛主席是能够解决问题的。解决全国问题有先有后。有毛主席，毛主席看问题是从全局来看的。看一个人不但要看现在，而且从整个历史来看的。不要把问题看得太简单了。”

“要磨炼，要锻炼，遇到困难不吃饭，热情好，现在怎么能用这种方法呢？我们是毛主席领导下的国家，反动政府也不应该如此。我们干革命要把自己的命保住，除非是刀架在脖子上，像刘胡兰那样。在新中国怎么能不吃饭？毛主席才刚刚睡下，我不能再惊动他了。你们可以派少数代表来北京，我将……一天24小时都不够，现在全国每天都发生许多事要解决，全国还有生产、外交问题……很多，我们那些人怎么能支得开呢？”

当听说绝食现场有人晕倒，周恩来说：“赶快治病。你们不吃饭，我怎么能安心啊！我怎么能把电话挂断？你们少数人要到北京来，可派飞机把你们送来。立即停止辩论。”

周恩来迅速派飞机将西安“绝食代表”24 人全部接往北京,陕西省委、西北局也基本答应了学生们的要求，同时发出通知，反复在全市广播。省委的宣传车也用高音喇叭在市里反复广播刘澜涛、霍士廉的讲话,高喊“绝食是革命行动!”以平息群众之间的争论。这场“绝食”风波这才平息下去。

9 月 9 日,按照陕西省委答应学生的要求，西安交通大学等 10 多所院校的部分红卫兵组成“炮打司令部战斗队”,进入中共陕西省委机关常驻“办公”。

9 月 10 日，西北局决定部分改组中共陕西省委，改组后的中共陕西省委书记处成员有：第一书记霍士廉，第二书记李瑞山，书记处书记肖纯、胡炳云、章泽、舒同；候补书记肖潮、彭天琦。

当陕西绝食代表到达北京后，周恩来当天就接见了他们。他在接见时说：

“要不要采取绝食手段,采取在旧社会对敌斗争的手段,要不要,可以不可以提倡，是否可以用别的方式，也同样达到目的？那天我不能去，伯达同志有病，江青同志身体很弱，因此，派飞机接你们来商讨这个问题。同学们，当时出于革命热情或一时感情激动，是可以理解的。你们宣布绝食胜利，后来还召开了群众大会，这不责备你们，经过很大努力，劝你们吃东西、治病，听说支持绝食的同学对此还不满意。”

“你们要求报纸发表消息，国家内部的事情不登报，我们这样做正好为帝、修、反开了方便之门，敌人到处在收集我们的情报。北京

大字报在街上贴了很多，有的我们是不同意的，例如《彻底消灭伊斯兰教而斗争》的大字报，这怎么可能呢？这是不符合毛主席思想的。这是民族习惯。西北地区少数民族是信伊斯兰教的，在我国的西南边，巴基斯坦，阿富汗是信伊斯兰教的，东非、西非都有，全世界信伊斯兰教的有四亿多。伊斯兰教是意识形态问题，是民族习惯问题。今天他们还受帝国主义控制、压迫和收买，他们在亚非地区占相当的力量。这样提是不合适的。所以同学们的行动，不论是一个地区或全国的，都不能登报。”

“我们研究是否一定要用这个办法，才能达到目的？在承认毛主席党中央的领导、社会主义和《十六条》的前提下，宪法也保障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等自由嘛！目前的自由是最广泛的，从来也没有过的。刚才讲的这张大字报，前天才发现，就找有关的同学谈，他们认为是符合毛泽东思想的。但政策不是这样，这样言论都要登在报上，都承认是合法的？彭真反党但没有做最后结论，所以没有见报，采取改组北京市委的办法。何况刘澜涛的问题，现在还不清楚，还不能这样做，不论同意不同意你们，党报要对人民负责，对世界人民负责，这需要和同学们谈清楚的。”

“在我们国家，有最大的自由，可以贴大字报，出版，组织红卫兵、赤卫队也好，你们也可以示威、游行，也可以罢课。现在不等你们罢课，我们就放假，让你们闹革命。但是不提倡罢工，这样会影响生产，不提倡罢税，农业税也很低，不需要罢税。这样大的自由，只要承认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的前提下，只要要求合理，符合实际，总

会得到实现的。但要求不可能百分之百的正确，没有修改余地，没有商量地方。如果这样，我们就只有接受你们的命令了，你们下命令？为此向你们24个同学提出这个问题，不一定现在回答，回去可以冷静考虑。”

“毛主席领导的中国，有哪一个国家敢这样放手发动群众，闹这样的革命？列宁死得早，不可能碰到和提出这个问题。斯大林在世时，马列主义没有发展，反而停滞了，他死后苏联出现修正主义。只有毛主席才能这样大胆，放手发动群众，有这样大的民主和自由。”

“不能把路线错误都看成是反革命，它是人民内部矛盾。”

“是不是所有司令部都要炮打。怎么打，有缺点可以批评，有的可以放迫击炮，有的可以放空炮，试探着有没有问题，是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要调查研究。”

“北京同学到了上海，把上海市委打为黑帮，他们有点胆怯，问我怎么办？我说：‘上海市委是革命的’，但有错误可以检查。上海市委把我讲的话说成是革命的、正确的，第二句话我没讲，让同学抓住了，现在我说上海市委是革命的，但有可能有错误。不能认为所有各级领导都是黑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要是这样，毛主席领导的国家都是空的，现在又怎样领导文化大革命？由你们领导，你们还不行，还没有培养成熟。”

“抓革命，促生产，农业、工厂文化革命由他们自己搞，学生不要干涉，反过来工农也不要干涉学生革命运动。工农要搞生产。”

“西北局是否犯路线错误，我不能回答，但你们的行动是可以理

解的。”

9 月 17 日,去北京的 24 名“绝食代表”返回西安,成立“九六革命造反队”,并进入省委机关办公。

这天，霍士廉在西安市各界人民“炮打司令部”进军大会上作检讨，承认“在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陕西省委在指导上犯了严重错误。”“代表陕西省委向广大工农群众、革命师生和革命干部作检讨，向大家请罪。”

9 月，西安交大广播台成立“炮打司令部红色尖兵队”，主要调查陕西省委、西北局主要领导人的历史和现实问题。

第 199 回：九五夜，万炮齐轰闽省委　巧成拙，苏联播“洪乐急电”

北京南下红卫兵同样在福建再掀波澜。9 月 4 日，福州市里各处都贴出海报，由清华、新北大、人大、科大、北矿、北钢、北农机、哈工大、浙大、武大等南下学生串联组织，以及厦门大学“红卫兵独立师”、林学院“赴省战斗团”、二师院“红卫兵”、侨大“革命造反兵团”、师院“红九·二红卫兵团”、医学院“东方红公社”、福建大学“红卫兵战斗团”、厦八中“红卫兵”、《福建日报》社“革命职工造反队”等大小几十个少数派组织发起，定于 5 日晚上 19 时，在省人民体育场召开对省、市委揭发批判万人大会，“要求省委第一书记叶飞同志、市委第二书记郑重同志必须到会听取革命群众的揭发批判，并欢迎全市广大革命群众参加大会”。

4 日下午，省委召开常委会进行研究。会上，范式人等多数人都主张叶飞应该出席大会，而许亚几个常委的态度颇暧昧，他们闪烁其词，模棱两可。当时，正好省委书记处一位书记在北京开会，叶飞就挂长途电话给他，叫他去找周恩来请示：是否要参加这样的大会。

5 日，那位书记没找到周恩来，就找了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王任重。王任重的答复是：“还是要去。”这样，叶飞最后决定出席“95 大会”。

晚上 19 是 30 分左右，叶飞、范式人、许亚、郑重等省、市委领导登上主席台就坐，大会主持人宣布对省、市委揭发批判大会现在开始，全体起立，首先，敬祝“万寿无疆”和“永远健康”，高唱《大海航行靠舵手》的歌曲，接着，又齐声朗读数条最高指示后，大会主

持人说："现在，由厦八中的同学第一个揭发批判发言。"

谁知就在这时，台下一群"东海前线红卫兵"吵嚷着闯上主席台，声言："我们要第一个发言。"

那些大会组织者们匆匆碰了个头，同意先让他们发言。只见一个穿军装、腰扎皮带的"前线兵"踏上讲坛，在首先敬祝"万寿无疆"和"永远健康"之后，就用鼻音很重的普通话道："我以红卫兵和革命师生的名义在这个讲坛上说几句话，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说，'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没有这样一个核心，社会主义事业就不能胜利。'我们省的一切工作都是在中共中央批准成立的以叶飞同志为首的中共福建省委领导和主持下展开的，同样的，今晚这个全市的万人大会必须由、也只能由以郑重同志为首的中共福州市委来领导和主持，其他的任何组织都无权领导和主持。谁要是篡夺这个领导权，谁就是反党、反革命，就要全党共讨之，全国共诛之……"

台下"前线兵"报以一阵热烈的掌声，而少数派学生则给以喝倒彩和嘘叫，会场上出现一片混乱和骚动。

当这位"前线兵"走下讲坛后，一个清华大学红卫兵随即发言，他用冷峭刻薄的口吻道："刚才那位保皇派先生的发言是极端荒谬与可笑的，可爱的保皇派先生们，你们不是整天也高喊要听党的话、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么？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明文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集会结社的自由，你们是不是想要剥夺革命群众的这种自由呢？解放以来，已经十六、七年了，全省、市的万人大会也不知开过多少回，难道说所有这些大会都是由省、市

委领导和主持的吗？如果不都是，你们为什么不大喊大叫、起劲地加以反对呢？为什么我们革命群众才开了这么一个万人大会，你们就歇斯底里大发作起来呢？说穿了无非是因为这个揭发批判大会刺痛了你们的心肝宝贝，打中了你们后台老板的要害。

“在北京，这种群众自发组织召开的万人大会实在不算少，而中央首长也经常参加，并在会上讲话作指示。假若你们这些保皇派不相信的话，欢迎你们上北京见识、见识，别像井中蛙只看到巴掌一块大的天，山外有山，天外有天，这个世界大得很咧。如果说今天晚上这个大会是黑会的话，那么，北京许多由群众自发组织召开的有中央首长参加的万人大会恐怕也都是‘黑会’了，你们这些保皇派该怎么回答这个问题呢？

“我们不是不想请省、市委来领导和主持这个会，今天福建省委第一书记叶飞同志也参加了这个大会，然而，这个可亲可敬可爱的省、市委却有负众望，他们是根本不可能召开这样的会的。运动以来，特别是‘八二九’以来，广大革命群众揭发出来的大量事实说明省、市委根本不想搞运动。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厦门八中革命师生从六月份起就要求揪回王于畊，可是直至现在，这个完全合理正当的革命的要求还未得到满足。省委说要从 8 月 27 日起召开全省揭发批判教育厅、宣传部黑线大会，各地代表早已云集而来，住在招待所里头白占铺位，十几天都过去了，就八·二七那天晚上打几声闷雷，迄今连一滴雨水也不见掉下来。相反的，这些日子全省许多地方和福州市地区接连不断的发生许多围攻革命群众、斗争

革命学生的严重事件，革命群众受到了不堪容忍的政治迫害，有的革命同志被殴打致伤，有些革命学生要北上见毛主席，中途被阻，遭到无理扣押等等，等等。所有这一切都严重地阻碍了我省、市运动的顺利发展，说明了福建省委、福州市委本身已成了文化大革命的主要阻力，试问，这样的省市委怎么能够召开、并领导这个揭发批判大会呢？”

对于这位清华大学红卫兵富有煽动性的发言，场上那些同观点的学生、群众报以一阵疯狂的掌声。这时，台上一个学生带头喊起口号：

“打倒资产阶级保皇派！”

“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

“万炮齐轰福建省委、福州市委！”

那一阵阵杀气腾腾的口号声直冲九霄。由于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王任重开了口，叶飞不得不出席今晚的揭发批判大会，但是，他的心里头如同吊着水桶七上八下的，显得异常不踏实，不知道什么样的一种命运在前面等待着他……

自从“八二九”事件发生以来，叶飞初次尝到了少数派红卫兵小将们的厉害，明白他们可不是那么好惹的，简直比调皮捣蛋的孙悟空更令人感到头痛。当然，还不仅仅是头痛的问题，更主要的是他有些怕，因为这场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是在自己政权的基础上反对自己啊！他参加这次大会是做好了各种最坏的思想准备。乍看上去，叶飞泰然自若地坐在台上，手里不停地摇着扇子，然而，他的内心世界里却充满着北冰洋的风暴。他默默地倾听着各人的发言，

对于刚才那个“前线兵”的讲话，尽管他也知道其提法有些欠妥，但听起来却很入耳，就好像夏天吃冰淇淋一样，一股甜丝丝、冰滋滋的滋味一直从嘴巴、食管延伸到肚子里。接下来，那个盛气凌人的清华大学生的发言又是如此咄咄逼人，那一句句辛辣的话语有如锋利的锥子直扎他的心窝，把他“错听了野寺钟鸣误景阳”一般的幻觉陡然破灭了。说实在的，他对于这个巧舌如簧的南下学生有些畏怕，以前，他率领千军万马驰骋疆场，“抗日君迈进，饮马江南北。苏鲁驰劲旅，日伪告溃灭”，完全是一副大将军的威武气概，他不怕军阀，不怕土豪劣绅，不怕日本鬼子，不怕蒋介石，但是，今天居然有些怕起这些手拿红色语录本的红卫兵小将.....

也许，这是因为他当年是一个满腔热血、浑身是胆的革命者，而现在革命竟然革到自己的头上。革命者和被革命者，二者的含义是截然不同的，他不理解自己革命了大半辈子，为什么到头来反而变成革命的对象，也只有今天他才领略到挨人家“革命”的滋味是多么不好受啊。他想不通，有抵触情绪，但是，他又不敢抗拒毛主席的意志，谁敢说自己能比毛主席更高明呀？他只能违心地服从、服从、绝对服从……面对着眼前这一阵阵震耳欲聋的口号声，那一张张因为愤怒而变形的脸孔，他的心里惴惴不安，不胜惶恐，不知所措，听天由命，甚至还有一种要下地狱的恐惧感，……各种复杂的心理在他的心间织成了蜘蛛网。昔日他那种“自信挥戈能退日”的非凡气魄和骄矜自负骤然间消失了，他如同一只漏气的皮球神气不起来了。唉，毕竟时代不同了，一切都来个脚底朝天的大变化！

这时，大会组织者走到叶飞的跟前，问到："叶飞书记，你看呢，是由你们省委来主持今晚的万人大会，还是由我们红卫兵来主持呀？"

叶飞抬头双眼透过眼镜片望了他一眼，又扫视了台上其他人一番，沉吟了一下道："啊，这个——还是由你们来主持吧，我们今天是来倾听你们的意见和批评的。"

接着，厦门八中、厦大"红卫兵独立师"、侨大"革命造反兵团"、新北大、师院"红九·二红卫兵团"、《福建日报》社"革命职工造反队"相继在会上做了揭发批判发言，那一篇篇燃烧着怒火的檄文如同一发发炮弹直射向省、市委，那一阵阵天崩地裂的口号声像大海的波涛一浪盖过一浪。叶飞他们与其说坐在靠背椅上，不如说是坐在火山口上，他们感受到了火山熔岩的炽热，不知道什么时候这爆发了的火山所喷出的钢水般的熔岩将把自己毁灭，一种听天由命的念头油然而生。

当大会即将结束时，突然间，场上又发生了巨大的骚动，只见许多群众纷纷往前面拥去。只见一大群人抬着一副担架，从人海里挤上了主席台。

原来，下午 19 时多，一支贫下中农赤卫队来到《福建日报》社辩论，为首的是一个生产队长蔡福官。辩论中发生冲突，一个化工厂的工人彭增金腹部被打，当场就趴倒在地上。几个报社人员把受伤的彭增金搀扶到大楼里，让他躺在一张竹床上，还有一些报社人员同蔡福官展开唇枪舌剑的斗争，指控他为"打人凶手"。

蔡福官怒气冲冲地说："谁说我是'打人凶手'呀？你们不要血口喷人，捉贼凭赃、捉奸凭证，你们凭什么说我打人呀？谁看见我打人呀？"

有一个身穿蓝色工作服的30多岁的工人挤到人丛中间来，他炯炯目光直盯住蔡福官的脸，正色地说："哼，你别耍赖了，我也亲眼看见你动手打人，都打得刚才那个工人趴在地上直不起腰来。"

"你就是打人凶手，坚决惩罚打人凶手！"

"大家都看见你打人，你还不认账？你说，你叫什么名字？"

四周报社人员和群众群起而攻之。

蔡福官一下子成了众矢之的，心里有些发慌。不过，他还故作镇定地说："我没打人，我行不更名，坐不改姓，我名叫蔡福官。"

"既然你有胆量报名字，那就在纸上签名吧。"一个报社造反队员说着，就从口袋里掏出了纸和笔。

蔡福官稍稍迟疑了一会儿，发狠地道："签就签吧，反正我不怕，你们才是真正的打人凶手。"

接着，他就在那纸上签下了"蔡福官"三个字。

彭增金被送到医院检查治疗。经医生诊断是：1、左腰部软组织挫伤；2、胸部皮肤划伤；3、左下腹软组织挫伤。

报社农村版的一个女编辑打电话到体育场去，结果，体育场来了几个开大会的报社造反队员和厦大、林学院的学生，他们商量了一阵子，决定把彭增金抬到体育场大会上去，进行现场控诉。 就这样，他们用担架抬着彭增金，一窝蜂地簇拥着进入了体育场，顿时全场轰

动起来。

报社造反队员登上讲坛，对着麦克风话筒激动万分地道："我怀着满腔的无产阶级义愤，在这里控诉福州市委犯下的新的暴行！就在刚才的时候，在我们报社又发生了一起农民'赤卫队'殴打工人和革命群众的严重的政治事件，这位躺在担架上的一化工人彭增金同志就是被他们野蛮殴打成重伤的，这是一个活生生的血淋淋的铁证！在福州市委的暗地唆使和鼓动下，今天晚上又有一大批不明真相的'工人赤卫队'和'贫下中农赤卫队'前来围攻我们报社……"接着，他绘声绘色地叙述了刚刚报社发生的武斗事件的经过。

他的发言如一块巨石投在湖面上，激起了轩然大波，会场上的少数派学生和群众无不义愤填膺，愤怒的情绪就像憋不住的一阵咳嗽，从他们的肺腔里迸发出来，整个体育场如若是一座正在喷发的火山。台上领头喊口号的那个学生又奋臂疾呼口号，下面的人也跟着咆哮起来：

"万炮齐轰福建省委！万炮齐轰福州市委！"

"彻底改组福建省委！彻底改组福州市委！"

激愤填满了所有少数派学生和群众昂然凸起的胸膛，体育场上爆发出了一阵阵惊天动地的吼声，像山崩，像地震，一只只拳头不断地从人群中举起来，仿佛是狂风大作的森林。场上的那些今晚居于少数的"前线兵"们也惧于这些怒不可遏的群众，不敢轻举妄动。至于首当其冲的省委第一书记叶飞更是坐如针毡，身上的冷汗不时地冒了出来。以前他听惯了群众的欢呼声，而现在那些曾经拥护过他的人居然

纷纷造起他的反来，他们的面孔因为愤怒而变得那样可怕、狰狞，眼睛含着仇恨，声音含着杀气，他感到震惊、胆怯、伤心，天哪，这究竟是一场什么样的大革命呀？难道他真的成了一个“走资派”、一个十恶不赦的“罪人”么？为什么他革了一辈子的革命，到头来革命竟革到他自己的头上来呀？他想不通、不理解，一肚子的委屈如涌泉一般在心里翻腾着……

会后，学生们给中央发通电，“控诉省委、市委”压制他们的革命行动，要求“改组省委、市委，罢叶飞的官”。南下学生在省委门口贴上大标语：“福建省委是土匪部”，“叶飞是黑司令”。

9 月 8 日　全国劳动模范、福建省航管局外海航海大队大队长洪乐、福州市劳动模范杨秀玉等 9 人联名发出《给毛主席的急电》，又称“洪乐急电”，对福州“八二九事件”和“九五”大会中学生的行为表示气愤。急电称：“混在南下革命串联队里的‘一小撮’反动分子，同本省的一小撮反党黑帮相勾结，借‘炮轰司令部’为名，在我们福州招降纳叛，造谣惑众，煽风点火，从 8 月 26 日起，连续策划制造了六起严重的反革命事件。”

次日，认为“急电”是“好得很”’的一些群众组织、机关工作人员和学生当即上街游行，表示支持。认为“急电”是“糟得很”的另一些红卫兵及群众组织也上街刷标语、贴大字报、散发传单。

连日来，市“工人赤卫队”总部出动了几十万人马停工上街游行，他们抬着毛主席画像，扛着“最最最坚决支持《洪乐急电》!”、“《洪乐急电》好得很!”等巨幅标语牌，不断地高呼类似的口号，蔚为壮

观的游行队伍把市里的主要街道都挤得水泄不通，有如一个波澜壮阔、涛声震天的海洋。

同时，市木器厂、缝纫机厂、抗菌素厂、省红星机器厂等单位的部分工人和群众，以及省委宣传部红旗战斗小组、市财政局红旗战斗队、马店粮站部分职工也纷纷贴出大字报，用大量的事实揭露对少数派学生、《福建日报》社“革命职工造反队”的围攻绝不是出于群众的“自发”行为，而完全是市委一手策划组织的，所谓《急电》完全是歪曲事实真相的。甚至，最早被抛出来在《福建日报》上点名批判的省文化局局长、党组书记陈虹也声称自己是叶飞的替罪羊，是受叶飞迫害打击的，也要起来造叶飞的反。

越来越多的人对《急电》抱起怀疑的态度，少数派的队伍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了。“支持派”和“反对派”互相攻击甚至发生冲突，并持续好长一段时间。

这时，《洪乐急电》爆出了一个意想不到的问题，《急电》的文章被苏联新闻单位采用，并对华广播。于是《洪乐急电》的性质开始转变，出现了帮倒忙的问题，造反派穷追不舍要揪出《急电》的后台，矛头直指省委。

第 200 回：湖南省，“炮轰省市司令部”

为信仰，投身中国大革命

9月8日，湖南的张平化因为一个小小的疏忽，几乎又把自己放到了火山口上。

湖南大学“文革筹委会”联合湖南其他几所高等院校学生文革组织，共六个单位，准备在9月9日召开包括工人、农民、机关干部和学生参加的“全市革命大军炮轰省、市委司令部大会”，10万人参加。9月8日，他们到省委办公厅接待站提出申请。当晚，张平化从春华山农村回到长沙，办公厅立即向他请示。张平化不敢做主，马上给北京陶铸打电话，请示中央的意见？

陶铸说：“工人、农民、机关及居民有工作的人员发起开这样的大会是不适宜的，难免妨碍生产。在这时召集这些人开会是不符合中央指示的。中央社论指出：在精神战线、物质战线要双丰收，召集他们开会是不适宜的。至于学校开不开？什么时候开？由学校文革筹委会协商决定，中央就是这个精神。”

放下电话，张平化对办公室的人说：“通知湖大，要湖大同学商量一下，通知各个单位，不要开了。”然后就睡觉了。

第二天一早，张平化又按照计划到农村看旱情去了。湖南大学的学生听说张平化不同意他们召开10万人大会，不干了，立即选派代表来到省委质问为什么？并且怀疑这是个阴谋。

9月9日，大会在省体育场召开。因为省委和张平化不同意召开，到会人数不足两万人。发起单位都没有正式参会，只有湖南

大学驻城办事处组织了少数学生参加，还有部分工厂企业去了一些工人。

当天，张平化从农村回到长沙，听说此事，立即来到湖南大学“九·九”大会代表处，对代表们解释说：“我刚从乡下回来，在乡下跑了几天，到春华山我蹲点的地方看了一下。看了一下旱的情况怎么样。我刚才回来，各位同志在等陶铸同志的电话，一问这回事我就来说说这种情况。”

他叙述了昨晚给陶铸打电话请示的过程后说：“这还能造得谣吗？谁敢造这个谣？可以到北京去问嘛！当然也可理解省委犯了错误就不相信了。省委犯了错误只是在‘八·一九’这个事情上犯了错误，这是方向路线的错误。错误可以改嘛！省委已作了一次检讨，一次检讨不好可以检讨二次。大家要互相信任。现在中央是关心生产。中央提过要炮打司令部是可以的，但是要看是什么样的司令部？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湖南省委几年来取得的成绩是主要的。炮轰司令部主要是炮轰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司令部，揭省市委盖子没有问题，大家的眼睛是雪亮的，可以分清楚的嘛！群众分的清。”

接着，到会代表提出：“我们会议是否是革命的，省委看法如何？省委盖子揭开没有，今后准备怎么办？大会开成这样由谁负责？在不影响生产的前提下召开大会，省委支持不支持？张平化是什么态度？”

张平化回答说：“是不是阴谋？我肯定不是，是刚才讲的。

你们说‘你们是阴谋’，我向中央请示也是阴谋？中央答复工人等和有生产任务的居民开这样的会总是要影响生产的，学生可以，没有阴谋。

你们问：工人、农民可以搞吗？

总的来讲可以搞，充分发动妥善安排。‘妥善安排’这四个字要有具体办法。党内通知、招呼，没下文件。工厂与四清相结合。农村紧张，秋后再搞。破“四旧”立“四新”也在秋后搞。大家要搞分期分批不行，但具体安排还是要分期分批。群众都要自己搞，把运动、生产两不误。充分发动群众，由群众自己安排，如果不妥善安排，怎么能多快好省呢？特别是劳动组织，农村出工有的好，有的不好。为什么不赞成，就是考虑这些问题，怕影响时间太多，值得大家注意。我原来在湖大讲的，不符合中央精神、改正。

省委揭盖子，是否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我不能肯定，由你们决定。我在湖大检讨，有人说我是为自己的错误定调子，大家分析。这几年来主要是搞社会主义还是走资本主义，由大家分析。省委这些人到底是大家的敌人还是内部问题。搞当权派要看一贯，是什么样的当权派。对文化大革命运动犯错误的人要团结——批评——团结。抱治病救人的态度，是内部问题。原则是要分清敌我。大家是有分析水平的，究竟湖南省委是什么性质的。

今天的大会是个革命的行动，文化大革命怎么不是革命行动呢？我们从生产考虑，不是不让大家开会，来开会的有自由权，

不能让大家走，召集人应考虑什么人参加？什么时间开？牵涉多大，多广，会不会影响生产，丝毫不是限制群众，这个界限要分清楚。来1000人也可以开，召集人要考虑。刚才有个同志批评我，没有调查，但确实有人说是10万人，接待站的人可能有多有少。这是个大数字，大规模的会议，会不会影响生产，当时时间仓促……”

关于“张平化同志究竟是来干什么的？究竟造的什么反？”

张平化讲：“一请罪，二造反。看不到成绩，大家怀疑。我是真心来的。成绩不大，我已尽了最大的努力，接见的人很多，川流不息，在大会上接见了，还要个别接见，同志们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而且我和湖大商量派三个同志到株州和湘潭等三地去调查。同志们怀疑，我不怪大家。但我确实是真心来请罪造反的。‘八·一九’事件与我无直接关系，但有间接关系，我工作不好，有责任。省委支持了市委，没有站在学生这边，我批评了他们，同志们有权利罢他们的官，我向中央反应了同志们的要求，罢王延春、万达、章伯森的官。主要是闹革命，也不能不管生产，这几天都是谈运动，根本没有想到生产，但这几天跑到工厂、农村去，怎么能不考虑生产呢？难道跑了几天农村就说光搞生产是不恰当的。接见的群众太多，难得都满足。请大家设身处地为我想一想。群众要开会完全由自己决定。工人、农民来开这样的大会，我认为是不适宜的。在工厂内比较好，学校开会完全由自己决定，从来没有说不要开。游行什么时候都可以。把工人、农民都拉出

来耽误很多生产我不同意。”

这时有代表提问：“一、今天会议没开好，责任由谁负？二、今后工农兵及干部在不影响生产的前提下，开大会，省委是否支持？”

张平化说：“第一跟大家商量，不要先下结论，肯定不能怪群众，是省委还是筹备方面，大多分析，哪些对，哪些不对，总结经验主要责任就出来了。要经过调查研究分析。第二不妨碍生产，工人、农民、机关干部没有生产任务的居民和学生在一起开会，要做好准备，安排好，不妨碍生产，为什么不好呢？今后在那里开？怎么开？大家商量一下。一方面省委有责任通知有关单位党组织和文革组织，具体怎么办，由群众决定。中央有决定不通知是不行的，为什么要封锁？”

提问：“追究责任，责任谁负？”

张平化：“不讨论就先作结论（群众反对），这个问题是两个问题。肯定大会是革命行动。开成这样子责任谁负？开得好不好还没有研究。就要追究责任叫我怎么讲？不管那一方面，不同意见就可发表，把那一方面意见强加于人是不对的，要按你们的意思回答才算完，这样怎么行呢？你们讲你们的看法意见。现在我还没有发言权，会开好，怎么样我不知道。开的好，不好，好中有不足，要我表示的确是不行的，脑子里没有这个结论，请大家原谅。11日的大会，你们自己考虑，符合中央精神我一定赞成支持。”

9月11日，长沙市再次在省体育场召开“全市革命大军炮轰省、市委司令部大会” 780多个单位，5万多人参加大会。张平化、王延春及长沙市委书记孙云英出席大会。

会上，很多人递条子，要求张平化当场对 9 月 9 日和 9 月 11 日这两次大会表态，遭到张平化的拒绝。大会主席团因此与张平化发生争执，很多人涌上了大会主席台。在此情况下，大会组织者与张平化商议，张平化离开会场，约定晚上到湖南宾馆再继续会谈。

当晚，大会主席团成员应约到了湖南宾馆，得到通知，张平化因有事，会谈改在第二天上午。

9 月 11 日这天，中共中央将毛泽东 9 月 7 日对青岛王效禹电报的批语和王效禹的电报转发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等，并对不准调动工农干预学生运动作了 4 条具体决定。当天，《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工农群众和革命学生在毛泽东思想旗帜下团结起来》的社论。

12 日，张平化与“炮轰省、市委司令部大会”主席团成员及工作人员共 15 人如约见面。张平化表示：9 月 9 日和 9 月 11 日两次大会都“是革命的大会，是革命行动。”

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不仅让中国人热血沸腾，也让许多外国人心潮澎湃。9 月 7 日，中央文革办公室调查组抄录了阳早、史克、寒春、汤反帝 4 位美国专家 8 月 29 日给国务院外国专家局写的一张大字报:《为什么在世界革命心脏工作的外国人被推向修正

主义道路？？》

这张大字报说：

是哪个牛鬼蛇神指使给外国人这种待遇？在中国工作的外国人，不论他是哪个阶级，不论他对待革命是什么态度，都受到了这种“五无、二有”的待遇。　　五无:

一、没有体力劳动；二、没有思想改造；三、没有接触工农的机 会；四、不搞阶级斗争；五、不搞生产斗争。

二有:

一、有特高生活待遇；二、有各方面的特殊化。

制定这种待遇是什么思想支配的？这是赫鲁晓夫思想，是修正主 义思想，这是剥削阶级思想。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结果又是什么呢?

一、使要革命的外国人不能真正掌握毛泽东思想，只能在口头上说条条。

二、使革命的外国人革命意志衰退，滑到修正主义道路上去。

三、阻碍在中国的外国小孩成长为坚强的革命者。

四、把革命的外国人和他们的中国阶级兄弟隔离开，破坏他们的 阶级感情，破坏无产阶级国际主义。

我们认为这不是个别人的问题，而是关系到世界革命的原则的问 题。我们坚决反对这种待遇。

我们决心要成为真正坚强的革命者，成为坚定的反修战士。为了把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斗争进行到底，我们决心锻炼和考验我

们自己。 我们的后代必须成为坚强可靠的革命接班人，而绝不允许他们变成修正主义分子。因此我们要求:

一、以阶级兄弟看待我们，而不是以资产阶级专家看待我们。

二、允许并鼓励我们参加体力劳动。

三、帮助我们进行思想改造。

四、允许并鼓励我们密切地结合工农群众。

五、允许并鼓励我们参加三大革命运动。

六、我们的孩子和中国孩子受到同样的待遇和严格的要求。

七、生活待遇和同级的工作人员一样。

八、取消特殊化。

只有这样我们才有可能成为毛主席所要求的革命者。

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中国人民、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的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万岁！万万岁!!

阳早、史克、寒春、汤反帝（安汤珊）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九日于北京

阳早，英文名叫欧文·恩格斯特。1946 年 5 月，这位年仅 27 岁的美国年轻人，因为受斯诺《西行漫记》的影响，要亲眼见识创造了“小米加步枪”和“长征”神话的毛泽东。于是，他卖掉家里的奶牛，以联合国救济总署养牛专家身份前往上海。在

宋庆龄帮助下，秋天，来到了延安。这时，八路军恰好从山西军阀阎锡山手中缴获几十头良种荷兰奶牛，成立了光华农场。欧文·恩格斯特主动要求当起了“牛倌”。

身在中国，他想有个中国名字。有中国同事告诉他，上海《大公报》有一位笔名“羊枣”的进步记者，被国民党特务暗杀。他建议恩格斯特顶替这个名字，取名羊枣。1947 年，恩格斯特与斯特朗、马海德等外国友人一起，受到毛泽东接见，恩格斯特觉得“毛很有魅力”。

初到延安的羊枣，起先没打算呆很久。一场战争，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1947 年，胡宗南督师 20 万进攻陕北解放区，党中央决定暂时撤离延安。大撤退中，羊枣与他的中国同事们赶着奶牛两渡黄河，把奶牛保护下来。同年，毛泽东领导两万兵力大败 10 倍于他的胡宗南大军。羊枣总结：“毛以弱胜强，功在民心，得民心的毛定会得天下。”

两年后，1948 年，羊枣的未婚妻琼·亨顿也就是大字报上的寒春，一位芝加哥大学核子物理研究所的研究生，也来到中国。

琼·亨顿曾从事核物理研究并参与投放广岛、长崎原子弹的研制，她是由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恩里科·费米领导研究美国“曼哈坦工程”的原子弹研究计划中，数千名研制人员里的一位年仅 23 岁的女科学家。她与费米完成了一项关键性实验：测量出原子铀的临界质量。1945 年 7 月中旬，在洛斯阿罗莫斯以南一片沙漠，绰号为“大男孩”的人类第一颗原子弹试爆成功。三个星

期后，另两颗原子弹分别在日本长崎、广岛爆炸，15 万平民死于非命。

当黑色蘑菇云升空时，亨顿的同事慨然："这是日本人的骨头和肉！"亨顿深感震惊：我研究的科学究竟是为谁服务呢？我们不是专心致志于"纯"科学吗？我们怎么制造出这样的杀人魔王？她与许多科学家一起，跑到华盛顿向政府抗议，开始长达半年多的美国原子能非军事化运动。

1947 年，亨顿跟随导师费米到芝加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当得知奖学金由军方提供，她说："我不能一辈子搞杀人武器！"她哥哥韩丁 1945 年在重庆见过毛泽东，好朋友欧文·恩格斯特早已抵达延安，几经思考，她终于做出决定："我想亲眼看看'小米加步枪'的力量。"

亨顿拿着宋庆龄请她当中国福利基金会顾问的邀请信去找美国当局，他们连看也不看就放她来了。1948 年 2 月离开芝加哥前一夜，费米夫妇开了欢送会，赠送她一架照相机。亨顿坐轮船抵达上海，见到了宋庆龄，取中国名字韩群。北平解放后，她来到延安。

1949 年 3 月，韩群与羊枣在延安重逢。次月，陕甘宁边区政府在大礼堂为他们举行婚礼，一间喜气洋溢的窑洞当新房。中共元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亲临致贺，婚礼主持人康迪当场给新人题上一副喜联：上联是"阳早蝶恋花"，下联是"寒春鸟依人"。把新郎新娘的名字巧妙谐音为"阳早"、"寒春"，既贴切又

充满浪漫情调。当时，阳早的身份是联合国难民救济总署奶牛专家，他在瓦窑堡农具场做的风车、提水机等率先实现了农业机械化。夫妇俩非常适应并赞赏延安的民主气氛："白天干活，晚上用三大作风———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抓革命促生产。"他们在延安为"小米加步枪"的精神而感动，深信得到百姓拥护和支持的中国共产党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一定能实现"解放全人类"的伟大理想。每当人们问及他们为何不远万里来到中国时，他们会回答："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对我们的影响是巨大的，我们为信仰而来。"

阳早、寒春带着中国共产党交给的任务，带着83头荷兰奶牛落户陕北定远县三边牧场，帮助当地改良牛羊。该地是陕甘宁交界处，蒙汉混居。一次，一个汉族人把蒙族人的狗打伤了，共产党干部开了一星期的会批评汉人。阳早、寒春深信："这样的党将会把社会主义蓝图变为现实。"

1955年，阳早、寒春又带1000多头牛落户西安草滩农场。阳早对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响应："让贫奶的中国人都喝上新鲜牛奶、不坏一斤奶！"这一年，新中国第一代儿童喝上了他们生产的牛奶。此间，有关部门问寒春是否愿继续研制原子弹，寒春摇头："现在中国人缺的不是原子弹，是牛奶。"他们与工人、技术人员们摸爬滚打、同甘共苦。三年自然灾害，阳早一家有细粮，但他以"不搞特殊化"拒绝了，愿和周围人一样以红薯干、萝卜充饥。他坚信："能使穷人翻身的毛也能让人民过上好日子。眼

下的苦难是社会主义建设中不可避免的。”周恩来 5 次接见他们，次次道“辛苦”，阳早回应周恩来：“给社会主义干活，心甘情愿。做心甘情愿的事不谈辛苦。”阳早还幽默道：“不喝奶哪有劲干革命。”

10 年草滩农场，留给阳早、寒春一段愉快的记忆，“条件很艰苦，心情很愉快，大家一个心眼干社会主义，奔共产主义。”此间，他们研发的奶牛青饲料铡草机，半个世纪后仍是该农场主导产品。

1966 年 4 月，根据上级有关部门的安排，阳早、寒春从西安草滩农场一起调到北京。阳早在中国电影放映发行公司任英文译校，寒春在中国对外文化交流委员会图片特稿社任英文译校。

阳早在专家楼的阳台上俯瞰土地，心情郁闷：“我们现在过的是上层建筑的日子，养牛的人怎能住楼房？！”他们多次打报告要求重返农场。

## 第 201 回：外国人，积极组织红卫兵

## 办《快报》，成立“文革记者站”

当“文化大革命”如狂飙骤起般席卷中国大陆之后，一些在新华社、中央广播事业局、外文局、中央编译局和一些大专院校、科研、出版等部门工作的外国专家们，尤其是像阳早这样早已投身到中国革命洪流中的外国人，再也坐不住了。

寒春、阳早认为：从 1959 年开始，外国专家有了特殊化的待遇。生活上与中国人民拉大了距离，特别是在困难时期，有了一整套的特殊待遇。而最使他们难于容忍的则是政治待遇的变化，“政治待遇上的第一个变化就是不许我们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旅行变得越来越受限制”，同中国工人甚至干部的关系也疏远了。1966 年 5 月他们被调到北京后，情况更为严重，“剥夺了我们所有的政治生活”，“除了乘汽车外，我们不能到任何地方去”，他们主动要求降低工资以缩小与中国同事的差别，“费了老大的劲儿，我们的工资才降到仍然非常高的水平。”“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就让孩子们回家，不许他们参加文化大革命”，成天就只有关在住宿的饭店房间里，除了坐小汽车外，不许上街，不许去公园玩。他们 9 岁的女儿在这种环境里变得情绪反常，变得对什么外国东西都憎恨，还对他们大骂：“打倒你们这些美国特务！”……

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只好给外国专家局写了一封长信，谈到给外国专家的这种待遇是错误的和有害的。

7月17日晚上，外国专家局一位副局长来看他们。虽然他的态度很热情，可是对阳早、寒春提出的问题却无法给予满意的答复。……解释了半天，归根结底就是一个词儿“安全”。这两位外国专家感到这种“令人窒息的政治压迫”是不能容忍的，他们认为是有人“明目张胆地用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来全面攻击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是“尖锐的阶级斗争”。在7月4日颐和园的一次野餐中，阳早、寒春认识了刚来到中国不久的安汤珊，她一直都关注着中国的革命。8月18日毛泽东接见红卫兵后，安汤珊给寒春打来电话，约她一起出去看大字报。寒春很高兴的答应了。于是，二人骑着自行车来到王府井大街，并在那里产生了向红卫兵学习，写大字报亮明自己的政治观点的想法。她们的想法得到阳早的支持，随后又叫上了史克。四个人用了10天的时间完成了他们的大字报。

波兰犹太人、中国共产党党员爱泼斯坦是外国专家中第一个公开积极响应寒春、阳早大字报的，爱泼斯坦是很晚才听说有关“文化大革命”的消息。1966年夏天，他带着孩子们去北戴河休假。妻子邱茉莉回英国探亲了。她在给爱泼斯坦的一封信里问及“红卫兵”的事情了，她是从外国通讯社的电讯中看到这一消息的。

对于中国常常是突如其来的政治运动爱泼斯坦早已司空见惯，但没有料到这一次的来势如此凶猛。爱泼斯坦当时的主导思想是："当历史的火车头急转弯时"(用列宁的话说)，不要让自己从革命的列车上掉下来；也不要像毛泽东所用的中国式比喻中所说，像一个小脚老太太走路，远远落在英勇前锋的后面。"与革命同步"是他从少年时代以来所作的选择。

随后，许多外国专家纷纷贴出大字报。北京白求恩医院英国骨科专家洪若诗全家开了一个通宵的家庭会议，他们决定"坚决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起来造反，同中国同志一起造修正主义的反。"于是，他们写了一张全家署名的大字报……

在新华社工作的比利时专家邱亨利在1966年9月初写出大字报，要求"和中国同志一齐学习，并肩战斗。"

为支持中国革命而来到中国的外国专家们纷纷表示拥护"文化大革命"，法国专家戴妮丝说：毛泽东 "他有勇气抨击自己领导的政党，目的也许是通过'文化革命'为这个党洗涤灰尘，使党重新走上正确的道路。""我们有决心为革命的新发展而做出努力，甚至牺牲。"于是，这位在1936年就与中国旅法画家李风白结成夫妻，50年代初就随同丈夫来到中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法国共产党员，也为了支持中国的"文化大革命"而做出了两点"牺牲"：第一个牺牲是向

她所在的法共支部提出退党申请。她认为：身处异国，自己不能与所在的党共同战斗，但是，多年以来，她一直认为这个党过于听命于苏联，过多地指责中国……总之，太“修”了。她申请加入了一个年轻的法共（马列）。第二个牺牲相对来说容易些，和其他外国专家一样，她要求降低工资，以求接近中国同志，特别是那些即将去农村的同志。

9 月 8 日，毛泽东在 4 位美国专家的大字报上批道：

林彪、总理、陈毅、陶铸、伯达五同志:

我同意这张大字报，外国革命专家及其孩子，要同中国人完（全）一样，不许两样，请你们讨论一下，凡自愿的，一律同样做。如何请酌定。

“自愿”二字下，打了两点，表示重要。

9 月 10 日，外交部长陈毅把寒春、阳早和几个最早支持大字报的几个外国专家请去谈话。他说：“毛主席同意你们的大字报。”“但你们为什么到现在才写呢？长期以来，我们一直在等你们外国人发表意见。”他强调参加运动必须是完全自愿的，不要施加压力。

于是，在北京的外国专家也纷纷仿效中国同事们的做法，成立了外国人群众组织，有“毛泽东思想白求恩——延安造反团”、“国际燎原造反队”等。

“白求恩”象征献身于世界革命的精神；“延安”象征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道路。在北京的外国专家超过半数都参

加了这个造反团，分别隶属于所在工作单位的分支组织。同所有“红卫兵”一样，他们穿着蓝色或灰色的棉布制服，带上红袖章，到处开会。其他单位的造反派邀请他们去参加或讲话，他们几乎是每请必到，他们把所有中国人的“红卫兵”组织都看成是革命的。

在毛泽东为阳早等4位外国专家大字报做出批示4天之后，定居北京的81岁高龄的著名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接受了红卫兵赠送给她的袖章，成为一名“名誉红卫兵”。

9月8日，毛泽东在周恩来9月5日报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碰头会讨论提出的《关于党政干部任免审批手续的暂行规定》上批示：“印发政治局、书记处、文革小组、北京市委各同志。此事应在近日讨论一下。”这个规定指出：中央局书记和省部一级干部的任免，由中央常委会直接审定，或由常委碰头会提出，报毛泽东、林彪审批；党和政府系统的司局级干部，由常委碰头会提出，指定陶铸审批；大军区、军兵种和三总部的军政一、二把手的任免，都要呈报毛泽东和中央审批。

9月9日，毛泽东在陈毅本日报送的国务院外事办公室秘书处1966年9月8日编印的《文化大革命中涉外问题情况简报》第九号上，对署名“奥地利《红旗》的同志”的来信写下了如下批语：

退陈毅同志:

这个批评文件写得好，值得一切住外机关注意，来一个革命化，否则很危险。可以先从维也纳做起。请酌定。

毛泽东

九月九日

奥地利《红旗》组织写给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的那封信全文如下：

亲爱的同志们:

读到关于红卫兵支持你们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英雄行为的报道，我们非常赞赏。以你们伟大领袖毛泽东的智慧为基础的这一历史革命，对于我们这些致力消灭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和资产阶级社会的人来说是一个鼓舞。但是我们认为因此更有必要提醒你们注意，你们国内的革命斗争同你们在维也纳的商代表突出的资产阶级举止和资本主义的生活方式是极不相称的。从他们衣着看来，很难（即使说不可能的话）把他们同蒋介石走狗区别开来。精制的西绸衬衫和高价的西服同先进工人代表的身份很不相称的。这些代表们不仅占有一辆而且是两辆列尔来得——奔驰牌汽车（这种汽车可以说是资本主义剥削者的标志），难道真有必要吗？由于这一鲜明对比而引起维也纳人的窃窃私语和嘲讽，使我们听了很痛苦，这样的资产阶级，不仅损害了我们的共产主义事业，而且对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也起了不好的作用。

我们尊敬地并且迫切地要求，你们把这种事情向有关当局报告，并且立即采取措施，加以纠正，致以同志的致意。

奥地利《红旗》的同志

一九六六年八月三十日于维也纳

陈毅将这封信“送主席审查”。

与这期简报一同报送毛泽东的，还有共青团中央机关文革筹委会、临时书记处9月8日引发的《一坦桑尼亚群众来信对我外事活动中的资产阶级作风提出尖锐批评》的材料。

毛泽东“九九批示”在中国驻外使领馆导致了三件事：

1、驻外使领馆三分之一的人员回国参加外交部文革运动，分别加入了外交部的各种群众组织及其活动。如：耿飚、章文晋等驻外大使奉命回国接受造反派的批判。

2、大幅削减了驻外使领馆人员的生活待遇，以保持革命化。

3、驻外使领馆进行“破四旧”，撤下工艺品诗文画等，换上《毛主席语录》与毛泽东肖像。

红卫兵运动兴起之后，一些中学生就急欲将造反之火燃向全世界，“让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遍全球”，“解放世界上三分之二受苦人”。当时在北京就有学生打出了“国际红卫兵中国支队”的旗号；每天都有很多红卫兵跑到外交部催促

成立国际红卫兵，有的年轻人还激烈地提出若不尽快成立国际红卫兵就会给无产阶级世界革命造成损失，就是犯罪。一些外国留学生还向当时的中国外交部长陈毅提出，要回国去组织红卫兵，但受到陈毅的劝阻。

在中国红卫兵运动的影响下，在日本、墨西哥等国也出现了“红卫兵”，当然马上就遭到取缔。也有个别当时未遭取缔的，如意大利共产主义青年联盟（马克思列宁主义）办起了机关报《红卫兵》报，热情歌颂中国文化大革命；丹麦一位共产党员组织的红卫兵直到 1967 年 8 月还在发表讲话，宣称要在丹麦贴出更多的大字报……此外，一些国家的共产党内分裂出了“造反派”，以“××共产党（左派）”、“××共产党（马列）”之类名义另立山头，宣布与原“修正主义党”决裂。比如，从 1966 年 9 月起，日本共产党的一些基层组织受到中国文革的影响，在山口、佐贺、爱知、福冈、兵库等县建立了日共县委革命左派，向日共中央“造反”。日共中央认为这是中共插手了其内部事务，造成了日共分裂。

不过，尽管有这样一些风波，但红卫兵们想把文革造反之火燃遍全世界的天真意图仍然未能实现。真正像红卫兵那样起来向“走资派”造反的外国人，只是在中国大陆特别是在首都北京的一些外国专家。

1966 年 8 月，《解放军报》社驻各大军区记者忽然接到

报社命令："立即返回北京。"

他们到了北京，《解放军报》社代总编胡痴向他们传达了任务："根据毛主席的提议，由军报创办一份内部刊物，定名为《快报》，向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央文革小组反映'文化大革命'的动态，发行量虽然只有十几份，但必须认真地做好这一工作，这是一项特殊任务！"

《快报》由胡痴挂帅，记者处副处长宋琼主持日常工作，记者以中央文革联络员的身份，到各处收集情况并上报。

据戚本禹回忆，他 5 月 1 日一到钓鱼台，很快就成立了一个快报组，是由康生的妻子曹轶欧负责。当中央办公厅后楼研究室撤销时，原来在研究室的工作人员都调去学习了，戚本禹将其中的老干部靳耀南留了下来，放在快报组。

后来江青在戚本禹这里看见了靳耀南，就问戚本禹：

"这人是哪里来的？"

戚本禹回答说："是从后楼调来的。"

江青批评道："你会用人吗？后楼都是刘少奇的人，这样的人你能用吗？"

戚本禹解释说："这人挺好，经常给我出出主意。"

江青说："那就是他在领导你，不是你领导他了。"她让戚本禹赶紧把靳耀南调走，换个年轻一点的来。

戚本禹还想争辩，说："不都是自己的同志么？"

江青说："路线一样，才叫同志；路线不一样，叫同志也

不是同志。”

于是，靳耀南调走，戚本禹又从《光明日报》调来程理嘉。当然，这些都是后话了。

由于当时给这些《快报》记者明确规定的任务是：只做客观的报道，自己不表明态度。更不许参加当地的运动，亮出自己的身份和观点。因此，《快报》上的报道，在文革初期，大多是报导别人的看法，其中既有所谓造反派的观点，也有所谓保守派的观点，还有各级领导干部的反映等等，甚至还包括直接责备毛泽东的言论、传单等。

8 月下旬，新华社驻各军兵种、各大军区分社、支社、记者组的军事记者近 30 人，也突然接到紧急通知：“立即返回北京，速到新华总社集合,执行一项光荣而艰巨的政治任务。”

回到北京，新华总社副社长王敏昭向这些军事记者作了动员。他说：“大家是按照总政治部的命令选调来的,只有家庭出身、社会关系、工作表现和思想品德都没有问题的才能执行这项光荣而艰巨的政治任务”。

当天,王敏昭与新华总社军事部领导和大家照了合影。随后,将他们送到总参海运仓招待所集训。

集训是在“中央文革”领导下进行,由总政治部和新华社具体组织。总政文化部部长、“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总政文化部部长谢镗忠接见了大家。他说:“毛主席‘8·18’

接见红卫兵时,在天安门城楼上对林副主席和周总理说,各地文化大革命发动起来了,但地方党政机关和新闻单位有的自身难保,有的观点对立,有的无心工作,情况上不来,要派一些人下去,不要派大员,最好派记者,到各地调查了解文化大革命情况,及时向中央反映。于是中央决定组建‘中央文革记者站’,把大家请来,就是完成这项光荣而艰巨的政治任务。”

就这样,这些人成了“中央文革记者站”的第一批记者。

集训中,谢镗忠、王敏昭向大家介绍了“文化大革命”形势,组织大家学习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的《五一六通知》和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等文件。

王敏昭在最后以无可奈何的口气，向大家谈了一件事，他说：“北京一些红卫兵已勒令新华社回答问题，他们指责说新华社发的一幅毛主席照片上，有一把刀的影子，说这是‘政治问题’，准备冲击新华社办公地点。”王敏昭接着说：“这幅照片上根本看不出刀的影子。毛主席身边即使有一把刀,可以裁裁纸,削削水果,难道领袖身边就不能放把刀吗?给大家讲完话，我就要赶回去，研究安排解答红卫兵即将到来的提问。”

他的话让与会人员更加深切地感到中央直接派记者搞

“内参”是完全正确的。因为此时的新闻机构已不可能正常工作。

接下来，大家选举记者临时党支部，广州、南京、济南、福州军区及海、空军分支机构的负责人及带队人当选。

中央决定这些人一律持《解放军报》记者证,以《解放军报》记者的身份工作,所以,《解放军报》副总编辑胡痴被请到集训现场,向大家介绍了他们办文化大革命情况《快报》,及时向军委和中央反映情况的经验。

集训期间，给大家发了四卷合订本《毛泽东选集》，让他们随身携带，经常阅读，用毛泽东思想指导调研工作。

8 月底，短暂的海运仓集训结束，这些记者在国家机关管理局工作人员带领下，转住到北京钓鱼台宾馆斜对面的花园村 1 号院。这里是给国务院部级以上干部盖的宅院,都是二层小楼,共有 10 栋左右,尚无人入住。

工夫不大,王力前来给大家讲话,宣布“中央文革记者站”成立，对外称“《解放军报》记者站”， 隶属中央文革小组办公室领导,办公地点就在花园村 1 号，对外只称邮政代码“811 信箱”,日常生活，包括财务、交通、通信、饮食、服务等均由中央机关事务管理局负责。

王力讲了“文化大革命”的形势，说运动在许多地方已经发动起来，一些地方造反派受压，斗争复杂激烈，但总趋势是在发展前进。中央的方针是让它先乱一段时间，乱而

后治。

王力向大家布置了任务,他说:“《五一六通知》公布后,全国像哈尔滨、沈阳、齐齐哈尔、天津、兰州、宝鸡等许多地方的文化大革命都迅猛地开展起来,一些省、市党政机关已经陷于瘫痪状态。毛主席说,‘这个城市、那个城市都闹起来了,究竟是怎么回事,要派人去看看。中央不要去人,派一些记者去’。这样,就从新华社把你们这批军事记者调来了。你们的任务是向毛主席和党中央提供各地的真实情况。当地发生的重要事件,要随时向北京报告,一个地区或那里的某个单位发生了什么大事,要作系统翔实的综合调查报告。”

他特别强调说明:“你们任务是直接向毛主席和中常委负责,由我们中央文革小组领导。”

他还提出了要求:派往各地的记者,不受当地党政军机关领导影响,只向中央负责,独立进行采访,自主撰写稿件;不介入、不干预当地的“文化大革命”,不得向任何组织和个人随便表态;调查要深入,材料要核实,表达要简要、生动;拿不准的事,要及时请示报告,不要泄密等等。采写的稿件不受任何人审查,只传给记者站,打印报中央政治局常委。

那天到会的除王力外,还有当时解放军总政治部的谢镗忠、新华社副社长王敏昭、解放军报社副总编胡痴等人。

“中央文革记者站”由新华社资深军事记者徐学增负责，他在战争年代写过不少报道，为人忠厚老实，对组织一向忠诚。

记者站下设负责编审稿件的编辑组和接收稿件的通联组，并从中央办公厅机要印刷厂抽调人员、设备，组建了独立的保密印刷厂。印刷厂工作人员是由《解放军报》社和《中国青年报》社两个印刷厂临时选调来的。国家机关管理局派来了财会人员和交通、服务人员，负责后勤保障。中央办公厅机要人员负责稿件打印后的呈送工作。

派往各地的记者，持《解放军报》的介绍信和记者证，住各地军事机关，由当地最高军事机关提供交通、通信和办公、食宿等必要的工作条件。所有稿件不需任何人过目、审查，一般要用保密电话、少量适合的用机要传递、加密邮寄、中央值班飞机捎带等方式，直达北京“中央文革记者站”。稿件随到随编，由记者站编辑人员编审打印成《简报》和《各地动态》，再由机要通讯人员直送中央领导办公地点。

# 第二部第二卷

## 各地文革章回索引

**北京：**

第 155 回；第 158 回；第 164 回；第 170 回；第 171 回；第 172 回；第 174 回；第 175 回；第 176 回；第 189 回；第 191 回；第 192 回；第 193 回；第 194 回；第 200 回；第 201 回；

**破四旧：**

第 154 回；第 155 回；第 157 回；第 158 回；第 170 回；第 171 回；第 172 回；第 173 回；

**红卫兵：**

第 154 回；第 155 回；第 156 回；第 157 回；第 162 回；第 163 回；第 174 回；第 175 回；第 189 回；第 192 回；

**清华大学：**

第 155 回；

**大串联：**

第 163 回；第 164 回；第 191 回；第 193 回；第 194 回；

**北京大学：**

第 172 回；

**军队：**

第 172 回；第 176 回；

**首都工作组：**

第 176 回；

**总后：**

第 189 回；

**空军：**

第 191 回；

**贺龙：**

第 191 回；

**刘少奇：**

第 191 回；

**北京地质学院：**

第 195 回；

**中央文革记者站：**

第 201 回；

**上海：**

第 169 回；第 171 回；第 186 回；第 187 回；第 188 回；

**天津：**

第 161 回；

**东北地区：**

**黑龙江：**

第 152 回；第 153 回；第 193 回；第 194 回；第 197 回；

**西北地区：**

**陕西：**

第 198 回；

**新疆：**

第 176 回；第 183 回；第 190 回；第 191 回；

**西南地区：**

**四川：**

第 165 回；第 166 回（重庆）；第 183 回；第 184 回；

第 185 回（重庆）；第 189 回（重庆）；

**贵州：**

第 185 回；

**中南地区：**

**河南：**

第 158 回；第 159 回；第 160 回；第 169 回；第 170 回；

**湖北：**

第 167 回；第 168 回；第 195 回；第 196 回；

**湖南：**

第 160 回；第 161 回；第 182 回；第 200 回；

**广东：**

第 157 回；第 196 回；第 197 回；

**广西：**

第 189 回；

**华东地区：**

**山东：**

第 152 回；第 158 回；第 176 回(青岛)；第 182 回；

第 183 回；第 194 回；第 195 回；第 200 回；

**安徽：**

第 161 回；第 162 回；第 188 回；

**江苏：**

第 157 回；第 164 回；第 165 回；

**浙江：**

第 163 回；第 164 回；第 182 回（温州)；

**福建：**

第 176 回；第 177 回；第 178 回；第 179 回；第 180 回；

第 181 回；第 199 回；

# 文革史话

之

第二部

# 狂风骤雨

第三卷

# 目　录

第 202 回：再调人，各省都建记者组
大串联，下车伊始发评论
第 203 回：落荒逃，夜郎国小将被困
战抚顺，细研讨制定方略
第204回：　斗黑帮，开大会以造声势
做工作，将矛头指向市委
第205回：　砸佛像，古刹中夜半难寐
发奇想，逼和尚寡妇成亲
第 206 回：讲任务，再接见“南下兵团”
中南海，座谈反修小分队
第 207 回：见贺龙，叶群忙如临大敌
九一一，北大成立校文革
第 208 回：表忠心，写出四封揭发信
包吃住，众师生涌向北京
第 209 回：谈看法，古迹不要都毁掉
担责任，不能全怪工作组
第210回：　撑病体，三次接见红卫兵
“毛主席，各族人民想念您”
第 211 回：下贵州，李再含引起关注
宝塔山，朝圣学生千千万
第 212 回：井冈山，洪流滚滚奔“摇篮”
改历史，朱德扁担不见了
第 213 回：不落后，国际友人也串联
上海滩，打人风再起卢湾
第 214 回：沐恩堂，过往行人均遭殃
上音院，贺绿汀夫妇被打
第 215 回：激民愤，“南下兵团”撤回京
稳操控，江苏省把握局面
第 216 回：流言传，韦国清南宁被打
抓凶手，黄塞阳一夜成名
第 217 回：为绝食，陶铸电报发广西
众意见，王于畊终被停职
第 218 回：忙拦截，北上反修成绝唱
苦坚持，山城学生获召见
第 219 回：青岛难，《首都兵团》亮旗帜
万人会，万晓塘洗澡身亡
第 220 回：点火会，启发太原中学生
探真相，刘灏为袁振翻案
第 221 回：上北京，中南海前屡碰壁
破四旧，五台山僧尼遣散
第 222 回：谁曾想，检讨变成了申辩
辩论会，卫恒左右应对难

第 223 回：批王震，林彪谈学习毛著
反右倾，红楼召开座谈会
第 224 回：难忍耐，陶铸愤而顶江青
周恩来，接见黑龙江代表
第 225 回：九二三，清华“井冈山”成立
廿八天，“北航红旗”凯旋回
第 226 回：抢器材，地院发生大武斗
众领导，表态支持“东方红”
第 227 回：说海军，北京遣返黑五类
搞反击，湖南动员“抓黑鬼”
第 228 回：定政策，个体劳动要存在
王容芬，反文革上书中央
第 229 回：周恩来，接见“三司”负责人
讲权利，人民有六大自由
第 230 回：体育场，首都“三司”开大会
周恩来，代表中央致敬意
第 231 回：有敌情，安子文舞伴可疑
迎亲人，小将住进中南海
第 232 回：嘘寒暖，众领导走访关怀
庆“十一”，天安门百万聚会
第 233 回：巧应答，李宗仁比喻得当
再拥堵，林彪劝说亦无效
第 234 回：弄潮儿，李敦白参加造反
细斟酌，再解释“资反路线”
第 235 回：下文件，转军委《紧急指示》
誓师会，众群众涕泪满襟
第 236 回：看北大，有人要搬聂元梓
十月七，接见闽高校代表
第 237 回：索材料，地院三进地质部
夜半响，上海滩神秘抄家
第 238 回：说究竟，原来只为一封信
排阻力，中央召开工作会
第 239 回：急筹备，清华欲斗王光美
会沉闷，成都市“红成”成立
第 240 回：见北外，燕园继续大辩论
讲成绩，林彪发言做工作
第 241 回：找路扬，北京批判新市委
难阻止，藏族学生斗班禅
第 242 回：谈路线，陈伯达再作报告
没想到，又出现“口号事件”
第 243 回：长蛇阵，毛泽东五次接见
劝说忙，勿贴刘邓大标语
第 244 回：“造反军”，重庆工人再北上
“黑鬼”反，“湘江风雷”滚滚来

第 245 回：黔贵动，工人成立“红卫军”
赴新疆，王任重会上检查
第 246 回：周恩来，约刘、邓修改检查，
做工作，接见多数派学生
第 247 回：提希望，动员徒步搞串联
批刘邓，工作会上作检查
第 248 回：再叮嘱，万万不能认“反党”
拉条子，林彪又画龙点睛
第 249 回：要理解，毛泽东再做发言
张平化，中宣部礼堂被斗
第 250 回：中组部，群起要求批刘邓
罗广斌，《红岩》作者也造反
第 251 回：重庆市，红卫兵政委反水
闹农办，陈毅家宴请旧部
**各地文革章回索引**

## 第202回：再调人，各省都建记者组　大串联，下车伊始发评论

9 月初，中央文革记者站匆匆完成初建后，即派出记者组，分赴当时最乱的兰州、西安、沈阳、哈尔滨、青岛等地，每组三至四人。北京地区的文革调研工作由《解放军报》社负责，不归中央文革记者站管。

刚当选的中央文革记者站党支部成员，成了记者站的行政业务领导成员。根据分工，他们有的留京主持全面工作，有的带记者组去外地。

文革形势发展很快，为适应更大范围的调研任务，经周恩来同意，从 1966 年 9 月至 1967 年 2 月，又陆续从中央办公厅、新华社总社、《人民日报》社、马列主义研究院、解放军政治学院、空军、海军及沈阳、济南、北京、南京、成都、广州等各大军区，选调几批干部进中央文革记者站工作。当 1966 年 9 月，一些部队干部纷纷接到通知，借调他们到北京总政工作时，许多人深感受宠若惊。9 月 9 日，来自北京、济南、广州、沈阳各军区约 200 人汇集北京，集中到钓鱼台斜对面的花园村 1 号院中央文革记者站。后来，记者人数越来越多，又占了马神庙工会干校的房子。因为此时工会干校已停办，空房子很多。

人员到齐后，刘志坚、王力、张春桥、穆欣、谢镗忠前来看望他们，和大家一一握手。

刘志坚明确了调他们到总政的任务：“中央调部队同志参加文化大革命，到新成立的中央文革做记者工作。”

随后，王力讲了当前的形势，进一步说明了大家的任务：“调你们到中央文革工作，任务是到各地观察文化大革命情况，你们一定要紧跟毛主席,紧跟中央文革,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他规定了报导的纪律：只做客观报导，不直接表态，更不能公开身份，参加当地的文革运动。

领导讲话后，中央文革记者站负责人徐学增又做了具体的说明：“我们是中央文革记者，到各地是以《解放军报》记者的名义公开活动，主要任务是观察文化大革命，反映各地情况，向中央文革报告。站不站在造反派一边，是立场问题，是对毛主席的态度问题。”

接着，徐学增等人给大家分配了任务，他们在全国各省、市、自治区都成立了记者组。

随后，中央文革记者站为大家照相、办证，这些人就算是《解放军报》记者了。后来又增加了一批人,他们的身份是《红旗》杂志社的记者。

所有人员都住在记者站内，不准回家。

记者站扩充规模后，领导班子成员也做了相应增补。在北京的机构，增设了秘书组、联络组和北京组。秘书组负责全站行政事务；联络组负责联络在北京大学生中特邀的联络员；北京组负责北京地区的调研工作，将北京地区的文革调研任务担负起来。另外，还设专人负责收集全国重点大字报，编印《大字报选编》，后来称之为资料组。派往各地的记者到大专院校、机关厂矿、群众组织采访的同时，精心收集当地重要的、具有代表性的大字报、小字报和红卫兵小报，成捆

成捆地寄、送到北京。资料组按照事件、人物分类，并加以选择、编辑,然后送到新华印刷厂印成一事一本、一人一本厚厚的集子。在 4 个多月的时间里,共编印了 10 多个集子,印刷近千册。

中央文革记者站原来的编辑组、通联组和印刷厂此时也都增加了力量。

不久，随着工作人员的增加，又改选了党组织，支部改为分总支，下辖外地记者支部、包括站领导和站机关各业务组的机关支部和包括后勤人员的行政支部。分总支归中央直属机关党委领导。

建站初期的一段时间，由于多数记者对文革还不理解，跟不上中央文革办公室主任王力的要求。比如有的地方认为工厂的运动不同于学校；有的地方记者为当地领导干部说了好话……因此，王力对全体记者不断提出批评。

随着“大串联”的兴起，全国各地又统一开辟了“串联接待站”。红卫兵，包括一部分青年工人和“红外围”甚至“黑五类”学生都先后加入了“大串联”的行列。红卫兵最初是抱着把毛泽东思想传遍四方的冲动和决心进京、北上、南下、西征、东进的。哪里传出了“黑帮”压制革命红卫兵的消息，哪里就会出现前去串联、声援造反的红卫兵。

庄正，北京35中高三学生，其父为1938年入党的老干部，响当当的红五类，系“818”以前加入红卫兵组织的“老兵”。毕竟是高三的学生了，而且父亲是位早年参加革命的知识分子，瞻仰过卢浮宫的留法大学生。面对破四旧、抄家打人狂潮，他惶惑、反感，认为这是

干扰神圣的“文化大革命”。于是躲在家中埋头读书，读毛选，读马列，试图从伟人的经典著作中寻找答案，解答自己心中的疑惑。有时，他觉得豁然开朗，但隔窗远眺，一堆堆书籍烧成灰烬，一群群学生打斗侮辱曾教导过自己的教师，他重又迷惑不解。他是那时千千万万毛泽东的崇拜者之一，他最仰慕毛泽东的斗争哲学，认为是自强者挑战的哲学，而不是舞台上衙门里的差役，秉承大堂上老爷的旨意，挥动木板毒打不敢稍有反抗的犯人的卑劣行径。反校党支部、反工作组，何等的神圣、严肃，而打七老八十的老头老太太，就算他过去是地主、土匪，又能显出你哪点英雄气概来呢？

他想不明白，呆在家里无所适从。

一天，好友刘国华、赵小光来访。

刘国光说：“学校里住了许多四川来的学生，听他们讲，四川的保皇派特猖獗。省委、市委的黑帮挑动工人斗学生，红卫兵在水深火热之中，极需支援。”

快要熄灭的心火在庄正心头一下子又被点燃。

两点钟还在家中高谈阔论的庄正，4点钟时，已经坐在南下的火车上了。

幻想着“主沉浮”的中学生，没有想过四川的省长、市长们与庄正的父亲是同一种人。他们没有想过，他们抱着“不斩楼兰终不还”的决心，去与之拼命的却是自己的父辈。

他们到重庆的当天，去参观白公馆、渣滓洞，第二天上午又转大学、看大字报，下午就关在住处写起了大字报，发表他们对重庆文化

大革命的看法。

赵小光说："咱们这样下车伊始，哇里哇啦，不大好吧。"

庄正和刘国华想了想后，庄正说："咱们不能在一个地方呆得太久。"

刘国华说："毛主席不喜欢下车伊始乱指挥的钦差大臣，可他老人家喜欢只争朝夕呀。咱们不是钦差大臣的瞎指挥，是只争朝夕的革命宣言。"

于是，他们决定大字报的标题和缓一些免得授人以把柄、口实。

他们很快就抛出一篇《我们对重庆市目前形势的看法》：

……

我们是从祖国伟大的首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中心——北京，来到四川进行革命串联的红卫兵战士。在成渝串联几日，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们就自己所耳闻目睹的情况谈谈自己的看法。

一、关于"炮打西南局、火烧省、市委"的问题

"炮打西南局，火烧省、市委"是最革命的口号，是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有阶段性、指导意义的最强音。它是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火线上诞生的。并且经过无数次锤炼而被证明完完全全是正确的。

……

二、关于群众斗群众和大辩论的问题

在无产阶级斗争的大风大浪里，阶级斗争是复杂的，尖锐的。广大的革命群众由于思想觉悟和认识水平不一样，对许多问题的看法不一致，一点也不奇怪。但是我们有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有指导文

化大革命的战斗纲领：十六条，还有阶级斗争的实践，都会指导教育我们，统一我们的认识。革命的大辩论就是其中一件有力的武器。

对于那些混蛋们，最莫过于害怕的，就是把道理讲清。

必须指出的一点是：有些别有用心的人利用大辩论的机会，转移斗争目标，搞群众斗群众。这是我们绝对不允许的和坚决反对的！广大的红卫兵战士同志们，革命群众们！我们不要忘记在我们辩论的时候，真正的政治扒手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还在逍遥法外！资产阶级的老巢还没有彻底砸碎！

……

三、关于只打“死老虎”的问题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其气势之大是史无前例的，时间也不可能是短期的。客观事实证明，各式各样的牛鬼蛇神绝不可能会在同一条件下，同一时期内被揪出来。因此，我们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要使斗争向纵深发展就必须继续大造资产阶级的反。而决不能停留在仅仅批判斗争揪出的几个黑帮分子身上。

不获全胜，决不收兵！

……

四、关于从首都来成渝红卫兵战士的问题

前几天，有些身份不明的人盗用北京二十六中红卫兵的名义胡说什么由北京来川的红卫兵是在“北京混不下去了”，是“黑五类子弟”。这完全是造谣，完全是胡说八道！

那些极少数的混蛋们这样造北京红卫兵的谣，只能说明我们按毛

主席的指示办对了，我们是没有辜负最最敬爱的毛主席对我们的期望！

严正警告那些别有用心的人：党中央和毛主席支持我们红卫兵，广大的工农兵群众支持我们红卫兵！你们想破坏红卫兵的声誉，到头来，只会被历史的车轮碾得粉碎。

……

让我们永远跟着毛主席在大风大浪中奋勇前进吧！

最后，我们热诚地欢迎四川省革命同学去北京交流经验、参观、学习，进行革命的大串联！冲破一切阻力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革命无罪，造反有理！

北京井冈山战校红卫兵

1966年9月6日

三个人找来墨汁、毛笔、大字报纸，提笔刚要抄写，庄正忽然想起了什么，又把笔放下，说："咱们写了，贴出去，没等有多少人看见，保皇派一准用别的大字报给遮上。咱们有多少时间陪他们贴大字报？再说，咱们人单势孤，辩论时要打起来，也不是人家的对手呀。"

刘国华感叹说："还是文斗好"。

最后，三人决定印传单散发，好让更多的重庆战友、同志听听北京红卫兵的声音。

9月6日晚18时，三人找到一家很小的印刷厂，找到厂文革的头头，一个腿有毛病，走路一拐一拐的老头。老头挺热情，说非常欢迎北京

红卫兵来重庆指导文化革命。三人说明来意是印一份传单，表明他们对四川文化革命的看法。老头一口答应。庄正把大字报底稿递过去，老头看也不看一眼，就安排印刷了。

那年月，只要打起革命造反的大旗，想干什么你就干去，没钱也没事。他们印了1500份传单，只留下一封用印刷厂的纸写的他们自己签名的介绍信，就算完事。厂长还请他们吃了一顿宵夜。

三个人背着沉甸甸的传单，晨雾里，兴致勃勃地忙碌着：一人往墙上刷浆糊，一人分检传单，一人往墙上贴。

天慢慢亮了，行人渐多，有人围上来看他们贴的小字报，背后不时传来赞扬声：

“讲得好！就是要火烧大西南，活捉李井泉！”

“到底是北京的红卫兵，有水平！”

三个人心里非常得意，困倦，疲惫的身子好像感受到了春风轻柔的吹拂。

突然，刘国华觉得背后有人推自己，回头一看，十几个工人模样的人围成一个半圆，为首一人操着浓重的四川口音说：“你们是北京的红卫兵？”

“是的”刘国华回答，满以为后面是“向你们学习”之类的赞誉之词。

不料那人把脸一板，眼一瞪，怒气冲冲地说：“这里是四川重庆，你们晓得什么？你们来了不过几天功夫吧，能了解多少四川的事啊，就在这里伊里哇啦地胡说八道！”

庄正心中暗笑，满打满算，到重庆不到40小时，对方还多说了。他走到刘国华和那位老工人中间，尽量和气地说："工人师傅，欢迎您，欢迎您对我们的宣言表态。不过，我们都应该遵守'十六条'的要求，摆事实，讲道理，用文斗不用武斗，以理服人，不是用武力服人。您看我说的对吗？"

工人多的是力气，少的是文化，耍嘴皮子当然要略输文采，更何况面对的是有历史传统的京油子呢。十几个人气哼哼地走了，留下一句话："耍也耍了，吃也吃了，赶紧回家吧。"

庄正对刘国华说："忠言逆耳，赶紧撤。"

赵小光补充："是非之地不可久留。"

三个人直奔火车站，继续南下。

火车到贵州桐梓县，庄正突然想起，此地古称夜郎，李白当年曾流放于此地，于是建议下车。另外二人也因车厢内太拥挤，憋闷得气短心跳，便一同下了车。

三个人满怀思古之幽情，在头一次踏上的红土地上寻觅诗人的痕迹和夜郎人自大的遗风。然而，真是扫兴得很。小小县城里竟也分为两派，粗粗统计一下大字报的署名，不下百个战斗队。唯一引起三个人兴趣的，是县委大院门外张贴的一张大字报，落款是"人遗矢兵团"。

接待人员看过三人的介绍信，顿时显露出惶恐钦敬之色，连声说道："欢迎指导"。随后，由专人陪伴，三个人住进县招待所的高级套间。据旅馆服务员讲，那套房子只有省里领导下来检查工作时才启用。

三个人吃完晚饭，洗了离开北京后的第一个澡，舒舒服服地坐在久违了的沙发上，商量下一步的行动计划。

这时，门外传来一阵脚步声，随即进来十几个成年人。三个人忙起身让座。来人激动万分地说："终于盼来了毛主席身边的红卫兵，我们得救了，桐梓得救了！"

原来，他们是县机关的造反派，眼下是少数派，经常遭受围攻，处境十分艰难，听说北京来人，他们高兴得连夜召开会议，敬请北京红卫兵光临指导。

推辞不掉，庄正三个人只得随来人去参加大会。

会场上，群情激奋，三个人走上讲台时，掌声雷动、口号山响。三个人的情绪被煽起来，突然产生了某种异样的感觉。

庄正在北京时，只上台发过一次言，还是吵架、辩论，争论要不要工作组问题。这时的情景却不同了，几百人的目光都注视着，静静地期待着，庄正有点孤独感，有些紧张，但很快就消失了。刘国华、赵小光年龄比庄正小，推举庄正代表他们发言。庄正坐到主席台正中，用手扶扶麦克风，清清喉咙，开始教导那些陌生的、可以做庄正的父亲的成年人。他大言不惭地代表首都红卫兵向他们表示问候，并致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敬礼"。

台下一片欢呼，"毛主席万岁！"，"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口号声响成一片。庄正介绍了北京运动的情况，毛泽东"818"接见红卫兵的场面。最后，明确表态："坚决站在造反派一边，把桐梓县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揪出来，批倒批臭！不获全胜决不收

兵！”

庄正当时不但没见到过桐梓县的党政领导干部，不知道他们都犯下了哪些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滔天罪行，甚至还不知道他们是男是女，姓甚名谁，但是，这并不妨碍庄正对他们的批判。县长在当时的红卫兵眼里根本算不了什么，市长、省长、部长，甚至更大的官，还不是想骂就骂，用不着顾虑。

第203回：落荒逃，夜郎国小将被困　战抚顺，细研讨制定方略

庄正发言之后，接下来便是对当权派的‘血泪控诉’。大都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其中一位妇女揭发，三年困难时期，县长从下面一个公社拉了一小推车的胡豆，就是北京人说的蚕豆，有200来斤，只交了一块钱。当时那位妇女是县里的文书，随县长一块下乡，“狗县长”竟然一粒都没分给她！后来，这事不知怎么被上面知道了，让县长做公开检查。县长认定是她干的，于是借故把她撵出县委大院，发配到一个边远公社供销社看仓库去了。当讲到县长连一粒蚕豆都没给她时，那位妇女伸出一只手，用拇指抵在小手指的第一个关节处，摇晃着，咬牙切齿地说：“他明明知道我有两个娃儿，却连一颗豆都舍不得给我。真是毫无人性。连国民党都不如。”

庄正一边毫无兴趣地听，一边装模作样地记录，忽然有人递给庄正两页写满字的纸。一看，是庄正的发言稿。题目是《北京支持你们》，结尾是“毛主席的红卫兵永远和桐梓造反派心连心！”。

原来，他们要印发庄正的发言稿。没想到庄正居然也有了被人拉去当大旗的荣幸，他只觉头有点晕乎乎的，脚下轻飘飘的，胡乱改了改，加上两段最高指示，署上北京井冈山战校红卫兵算是签发了。

接过庄正的发言稿，那位年长庄正至少30岁的造反派战友虔诚地说了一句话：“威力无穷，精神原子弹！”说完，小心翼翼地双手捧着庄正那篇信口开河的发言，生怕它掉到地上立刻就爆炸似的走下台，付印去了。

三个人风光了半夜，第二天睡到中午 12 点。吃完午饭，闲着没

事到街上闲逛，发现大街小巷贴满了庄正的那篇发言，主要路口还抄成大字报张贴，还都冠以大字标题以吸引视听。有的是“重要新闻”，有的是“来自北京的声音”，甚至有一处赫然写道：“毛主席派来了红卫兵”。

三个人春风得意，又有点胆战心惊，正走着，斜刺里涌出一群人，为首一人操着东北口音问：“你们是北京来的红卫兵？”

听口气不像是昨天晚上那伙人，三人警觉起来。刘国华挺身上前，问：“你们是什么人？有什么事？”说完挑衅地双手叉在腰际。

来人忙堆出笑脸，说：“我们是‘遵义兵团’的，热烈欢迎首都红卫兵来我县指导文化大革命。”说完四下看看，都是他们的人，又说：“我们想汇报一下工作，请红卫兵首长指示。”

生平第一次当上首长的刘国华忍不住转怒为笑。头天晚上庄正出足了风头，心中老大不乐，今天终于扯平了，手也从腰眼上放下来，又伸出去，握住对方伸过来的手。

“我们‘遵义兵团’誓死保卫毛主席，与首都红卫兵心连心，并肩战斗。”

三个人听着“汇报”，不知不觉被这群人拥进县电影院，走上主席台。刘国华悄悄对庄正说：“皇帝轮流做，今天到我家。”

三个人大模大样坐到主席台上，刘国华更是满脸严肃，清嗓子、正衣襟，摆好架势准备讲演。不料一人端起麦克风自己先说起来。照例是首先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然后是敬祝林副主席身体健康，再下去便是祝中央文革的陈伯达、康生，一直祝到戚本禹、姚文元身体健

康，工作顺利。三个人心不在焉地听着。刘国华心中盘算着如何演讲，怎样才能盖过庄正。

发言的人敬祝完中央首长，开始第二个步骤：读毛主席语录。一般是“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或者是“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之类的主席诗词。然而，这一位没有引用这些，却抛出一句众人皆知，却很少引用的最高指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三个人同时一惊。

那人紧接着将话题转向庄正他们说：“请问三位钦差大臣，你们光临小小的桐梓县几日了？如果我们调查得不错的话，三位是昨天下午才到本县，到现在还不足24小时。可是三位的重要讲话已经出笼12个钟点，贴得满城都是了。据不完全统计，仅城关就张贴了125处，还不包括城外及散发到人们手中的。三位称得上是神通广大了。可是，且慢。毛主席教导我们，‘十六条’也反复强调，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钦差大臣先生，不要把群众当阿斗……”　　三个人遭到突然袭击，未免心慌。庄正在3个人中最年长，强作镇静，低声说：

“沉住气。光听不讲，拖延时间，会有人来援救我们的。”

三个人如坐针毡，眼睛不时扫过挤满人群的会场，看门口是不是有人冲进来。时间仿佛凝固了。剧场三面都有门，都关得死死的，而且挤满了人，要想冲进来不是件容易的事。幸好那位发言的人挺欣赏自己的口才，滔滔不绝，毫无让三个人表态的意思。虽然话语尖刻，

时有不敬之词，庄正听起来似乎也挺顺耳，心想：哥们，撒开了说，说他七七四十九天，咱们一块儿得道升天。

然而，正如俗话所说，千里搭长棚，没有不散的宴席。那位演说家的演说结束了，最后一句是："欢迎北京红卫兵的正确指导"。其中，正确两个字念得很重，并且拖长了音，以示强调它的深层含意。

麦克风送到刘国华面前。刘国华用手摆弄话筒，又抬头四下看看。下面黑压压一片，过道上人挤人，连只耗子也别想钻过去。三面墙也是人挨人。人们都静静地、目不转睛地注视着主席台上三位北京来的红卫兵。

刘国华头脑中一片空白，刚才想好的台词全都不翼而飞，即使还在，也派不上用场。

他下意识咳了一声，突然大声喝道："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

庄正、赵小光一听，惊讶得张大了嘴，身子凉了半截。刘国华自己也不知道怎么说出这么两句。事后分析，可能是想上天入地逃离现场，于是心里冒出了会七十二变的孙悟空。再加上那阵子红卫兵常用孙悟空自喻，怯懦与豪气相激，两句最高指示便条件反射般脱口而出。

一言既出，悔也无益。刘国华索性一拍桌子站立起来，大声背诵了另一段更具威力的最高指示："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

不知是最高指示真的威力无穷，还是首都红卫兵确实气势夺人，或者人们根本没理解两段最高指示的具体含意，想听下文。总之，台

上台下没有任何反应，仍然安静地听。

庄正心中暗暗赞赏刘国华的临危不惧，同时又欣喜他的机智，光背语录，不针对具体问题表态，真是高招，不由侧脸朝慷慨激昂的刘国华说："GO ON"意思是让他继续背最高指示。

刘国华在亢奋中没听清，以为庄正夸奖他是"好样的"，话题一转，转到桐梓上来："不错，我们到桐梓的时间不长，然而，正如毛主席他老人家所教导的，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如果像刚才那位同志所讲的，至少要调查研究一年半载，才能了解到真实情况，那么请问：全中国有多少个县，又有多少个比县大得多的市、省？如果依那位同志所设想的调查下去，请问，革命什么时候才能成功？今天恐怕咱们还在国民党蒋介石的统治之下，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痛苦挣扎吧？"

台下一片乱哄。听众被刘国华自以为得计的胡扯激怒了。有人大喊：不要钦差大臣！谁反对毛主席就打倒谁！

刘国华把麦克风往桌上重重一放，嘭的一声。台下反而静下来。他虽然心虚，嘴依然很硬："你们让不让我讲话？如果不让，我立刻就走！"

说完转身抬腿，真的要溜。庄正、赵小光不敢怠慢，忙起身相随。刚刚站起一半，又被人重重按下，刘国华也被两个壮汉拦住，坚决而和气地请他坐下，继续发言。

三个人被迫坐下。看着三面墙，半天才从密密麻麻的人群背后找到门。依然是大门紧闭，风雨不透。三个人暗骂造反派不仗义，这么

久了也不来援助。

刘国华只得对着话筒继续讲："革命的同志们、红卫兵战友们，我们一定要坚定不移地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造一切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反，这是当前这场触及灵魂的大革命的主要任务。千万不要被走资派蒙蔽，当保皇派！"

一石激起千层浪。台下人乱喊："你才受蒙蔽了呢！谁好谁孬，我们工人阶级心里最清楚！不要钦差大臣！打倒钦差大臣！"

刘国华也不示弱，靠着扩音器，与台下抗争："迷途知返，为时不晚。坚持到底，死路一条！危险啊……"

有人冲上主席台，夺过话筒。几十个、上百个男男女女冲上来，把刘国华、庄正、赵小光团团围住，形势危险万分。

已经有人用手推了刘国华一下。眼看首都红卫兵就要栽在小小桐梓县城。

突然人群外面有人大喊："不许动手！要文斗不要武斗！"

声音并不洪亮，传到一片纷乱的主席台上，甚至显得很微弱。然而，众人都顺从地停下来。

有人让开一条路，三个人看见来者，是一位中年汉子，满头大汗，衣衫不整。估计是这派群众的头头。

果然，有人大叫："静一静，肖书记来了，请肖书记讲话。"

这肖书记正是头天晚上那派人揭发批判的主要对象。

肖书记走上前去，说："对不起，我来迟了。欢迎首都红卫兵来我县串联，指导工作。"一面热情地伸出双手。

要打倒的对象成了救命的稻草，三个人不敢放过机会，虽然不情愿，却也不敢迟疑，乖乖伸出手，抓住那“稻草”。

肖书记道：“我工作中有许多缺点、错误，欢迎群众起来揭发批判，欢迎首都红卫兵下到基层了解情况。”他转向观众席，挥动双臂，大声说：“同志们，安静下来，一个一个地发言，不要吵。摆事实，讲道理，才能弄清问题，才好让北京来的红卫兵全面了解情况！”

接下去是踊跃的发言，一个接一个，慷慨激昂，群情亢奋。内容与昨晚大同小异：鸡毛蒜皮，人身攻击为主，上纲上线扣大帽子为辅，从开头到结尾尽是个人恩怨和捕风捉影的各种小道消息。

三个人见没了挨打的危险，安下心来听发言，同时考虑如何表态。忽然，肖书记站起身。赵小光看见，急忙跟着起身，抓住肖的肩头，说：“您去哪儿？”

一语泄漏了天机。肖书记嘴角掠过一丝难以觉察的微笑，说：“县里有个会，欢迎首都红卫兵参加，指导我们的工作。”

刘国华看到了对方内心的得意，真想痛斥他一番，然而没敢。

庄正装模作样地皱紧眉头，考虑了一下，说：“好，为了全面掌握情况，把问题了解清楚，就再参加一个会吧。”

三个人脱离险境，没去参加那个什么会，推说有事回到招待所。造反派的几个头头急得如同热锅上的蚂蚁，一见面就问：“你们到哪里去了，让我们好找。全城都找遍了。”

三个人拒绝了造反派的邀请，说是有重要事要办，打发了来人，关上门，在屋里商量下一步行动。

刘国华的意见，一定要把群众发动起来，把那个老奸巨猾的肖书记批倒批臭。赵小光则主张，三十六计走为上。庄正说：“咱们的任务是煽风点火。如今火已经点起来了，他是人是鬼，总要显露原形。而且，咱们也不能包办代替。我的意思：发表一个严正声明，继续南下去昆明。”

于是庄正执笔，连夜写了一份痛斥走资派挑动群众斗群众、破坏“文化大革命”的严正声明，题目是：“我们对桐梓县文化大革命形势的看法”。

第二天一大早，趁两派干了一夜革命，都在养精蓄锐的时候，悄悄贴出大字报，直奔火车站而去。

北京地质学院附中高三学生李钢和苏红、黄永革三个人，与庄正他们三人相反，不是南下，而是北上杀向抚顺。

为什么去抚顺，李钢只知道两件事。一、抚顺是中国的煤都；二、出了个名人雷锋。在火车上，他们三个人仔细看了当地造反派出的小报，又知道了那里保守势力猖獗，造反派正在受压，走资派“逍遥法外”，依然操纵着抚顺市的局面。

在拥挤的火车上，三个人分析了生平未曾踏上过一步的抚顺市的局势，讨论了具体对策，制定出行动方案。颇有未出茅庐，先定三分天下的气度。他们的第一步，亮出招牌，建立“首都红卫兵驻抚顺联络站”；第二步，发动群众，破四旧、横扫牛鬼蛇神，打死老虎、落水狗，扩大影响，壮大造反派的力量；第三步，矛头指向市委，向保守势力的后台总攻。

这第三步又要分三个阶段。一、收集材料，包括市里主要领导的历史、劣迹、关系网、乃至住所。二、张贴大字报，揭发批判。三、组织群众围攻，最好是游行和静坐示威双管齐下。如果发展顺利，这三大步走完，批斗大会就可以召开了，大权就夺过来了。

三人到达抚顺后，到市中心找了一家大旅馆，亮出首都红卫兵的介绍信。对方立刻诚惶诚恐地将三人迎入客房，房价多少之类的小事连提也没敢提。三人自然也不屑于问。

不出所料，招牌一亮，各派人马蜂拥而至，三个人应接不暇，还不时要劝解对立双方的争吵。

李钢三位比庄正三人老练得多，一连三天，不表态，只接待各方来客，口口声声是学习来了，是受首都红卫兵的委托来抚顺学习的，同时又暗示："中央文革很关心抚顺。临行前，江青同志接见了我们。"

遇到对立双方都在场时，也只是含糊抽象地说："有不同意见是正常的，应该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团结起来，共同对敌。"而那敌人是谁，则讳莫如深，绝不提及。

三天以后，他们开始了第二步：痛打落水狗。

大会定在雷锋纪念馆召开。李钢写了一份发言稿，从万恶的旧社会开始，直骂到右派分子、彭德怀反党集团、三家村、"彭、罗、陆、杨"。

会前，他们召集各派群众组织头头开会，强调要把大会开成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同仇敌忾的大会，令反动分子不寒而栗的大会。众头头领命而去。开会那天，各单位早早派人押送来本单位的

地富反坏右、各色牛鬼蛇神。先由保卫人员训话：你们必须老老实实，低头认罪，顽抗到底死路一条。三、四十个人密密麻麻跪了半屋子，一个个形如枯木，面若死灰，低着头一声不吭。

黄永革走到一个老头面前，只见他胸前挂的牌子上写的是“恶霸地主”，便踢了一脚，问：“你害死了多少人，雷锋的父母就是你逼死的吧？”

老头没回答问题，只低着头嘟哝：“我有罪，我罪该万死。”

一个馆内工作人员悄悄走上去拉了黄永革一把，黄永革随那人走去。走到无人处，那人说：“雷锋不是俺们东北人。他生在湖南长沙，在这儿当兵。雷锋是俺们抚顺的人大代表。”

黄永革好不扫兴，他觉得有点丢面子，便说：“地主不管是长沙的还是东北的，天下乌鸦一般黑，全他妈一路货色！”

## 第204回：斗黑帮，开大会以造声势　做工作，将矛头指向市委

李钢正忙着组织会场。人员基本到齐，各派都来了人，李钢心里很高兴。只是哪派都想先发言，一时争论不下，会议进程表无法确定。黄永革拉过李钢，说：

“雷锋不是东北人，是湖南长沙人，你赶紧对照解说词修改你的发言稿去吧，这里有我。”

李钢以手抚额，说：“大意失荆州。好险好险！”

在那年月，随便一个口误都可能招致杀身之祸。李钢家隔壁一个叫黄强的小孩，才上二年级。一天，一个叫毛三的孩子在他家墙上写了个“打倒强巴”，他就跑到毛三家墙上写了个“打倒毛三”。想不到祸从天降，被抓到厂桥派出所，不给吃不给喝，审了两天，问他到底要写什么反动标语，是谁指使他写这条反动标语的？孩子的父亲是资本家，吓得在家直哆嗦。后来，还是毛三的爸爸带着毛三去派出所做了证明，才没酿成大祸。

李钢去修改发言稿，这边黄永革协调群众组织的发言顺序。商量了好一阵子，也没得出个结果。有的说自己人多，有的说自己资格老，七嘴八舌争执不下。时间不等人。黄永革灵机一动：把决定权交给上帝。他建议：“咱们抓阄吧。”各派头领一致同意。

经过破四旧洗礼的红卫兵战士、造反派群众用最陈旧落后的办法，简洁明快地解决了问题。头头们纷纷回到自己的队伍中去。转瞬间，口号声如雷鸣般响起：

“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这是李钢为大会定的主题。口号

也是他选定的，以批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前被打倒的阶级、集团、人物为主。他深知，中国人最喜欢的就是痛打落水狗。

高音喇叭放出音乐，沉重、悲怨，歌词是凡开忆苦大会都可以听到的：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生产队里开大会，诉苦把冤伸……

李钢在学校是校广播站的播音员，今天正好派上了用场。他站在主席台中央，用标准的京腔大喝一声："把牛鬼蛇神统统押上来！"

早等得不耐烦的押送人员迅速行动。两个人押一名牛鬼蛇神，依照惯例，一人抓住挨斗者的一条手臂，反拧到他（她）背后，那人只能弯着腰走，押送人员一律是身着绿军装，腰扎武装带，左臂佩戴红袖章，昂首挺胸，大步流星。革命小将不忘祖训，男女有别，男的押男的，女的押女的，走到台上，依男左女右一字排开。

李钢首先发言，他用天下乌鸦一般黑的老话，把雷锋的血泪家仇巧妙地记到抚顺的地主、资本家账上，然后，又援引"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的最高指示，阐释了痛打落水狗的重要意义。

接下去便是大会发言。各派组织的发言代表，按老天爷安排的顺序依次登台亮相。一个个声色俱厉，慷慨激昂，仿佛真的与身后那些低头弯腰的牛鬼蛇神有不共戴天的深仇大恨。发言之后，为了表明自己无产阶级的坚定立场和无产阶级专政铁拳的厉害，都要转过身，赏那些牛鬼蛇神几个耳光或唾口吐沫。

那天押上台的人太多，分成两排，前面一排的牛鬼蛇神都跪在台上。发言者懒得弯腰，前排挨斗者尝到的就不是铁拳而是铁脚。

各派组织在共同敌人面前忘记了相互间的矛盾，同仇敌忾、痛快

淋漓。整个会场气氛热烈，杂而不乱。李钢心中很得意，达到了预期目的，首战告捷。招牌打出去，传播开，威名远扬。矿区、甚至农村的群众组织也纷纷上门，请示、汇报，并邀请他们去当地指导“文化大革命”。李钢三人设立的“首都红卫兵驻抚顺联络站”俨然一副中央文革驻抚顺办事处的架式。他们也摆出谦虚而专断、和蔼而不失威严的首长派头，频频下工厂，串机关，联系造反派，组织材料，实施第三步计划。

抚顺有一个“四野兵团”。李钢三人到抚顺之前，曾发生过一次煤矿子弟学校红卫兵冲击矿党委被工人纠察队拦截的事件。《人民日报》9月11日社论《工农群众和革命学生在毛泽东思想旗帜下团结起来》发表之后，工人纠察队的头头们一看大势不好，几人一合计，又不能像学生那样拔腿就走，只好自己保护自己，于是拉起了组织，名曰：“四野兵团”。他们既不是造反的“红色风暴”，也不是保矿党委的“延安三五九旅”，他们取名“四野”，一方面是因为当时林彪炙手可热；另一方面，他们似乎喜欢这个“四野”有四平八稳、广阔天地的意思，正是因为“四野兵团”四平八稳，队伍迅速扩大，成为矿区人数最多的群众组织。

李钢先来到煤矿子弟学校，说服红卫兵小弟弟们和工人阶级联合造反。这很容易，随即，中学生们簇拥着李钢拜访“四野兵团”的头头。工人以为学生是来打架，有的人已经抄起木棒、铁锹。只见李钢走在学生队伍的最前面，笑容可掬，步伐坚定，率领学生们高呼：“向工人同志学习！向工人同志致敬！”

无法拒之门外，工人们让学生进门。学生们多数与矿区有关系，或是亲朋好友在矿区工作，或父母就是矿上职工，自己就是矿上的子弟。没用多久，感情就联络上了，以前的误会也解释清楚了。

李钢以9月11日《人民日报》的社论为武器，充分发挥自己的口才，先把学生与工人冲突的罪责推到矿党委身上，这既是工人们所希望的，又是社论里明确指出的。李钢在“四野”头头们眼里一下子亲切起来，仿佛听到了大赦令，心中一块石头落地。

后面的谈话就更顺了。李钢分析说：“小小矿党委有那么大胆量与红卫兵运动顽抗吗？他们之所以敢跳出来，就是因为有后台，有恃无恐。”

李钢知道，工人们不敢反矿党委，是因为怕丢了饭碗，日后受打击报复。所以，李钢轻轻一句话，便不再攻击矿党委，而把矛头直指市委。攻击市里的领导，工人们听着不再紧张，毕竟离自己远了，县官不如现管。

“市委挑动工人斗学生、挑动工人斗工人，目的很明确，他们就是要把水搅混，让老百姓互相打，忘了他们真正的敌人。”

李钢见工人们还是顾虑重重，便又大讲一番北京的大好形势：“抚顺市走资派在北京的靠山——煤炭部部长张霖之早在1964年就被毛主席点名批判。上个月就不仅被揪出来打倒了，而且连灵魂带肉体都已经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走资派的总后台——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黑司令部已经面临灭顶之灾。抚顺不过是全国这盘棋中的一个小角落。全面的胜负已定，负隅顽抗的抚顺市走资派已经是秋后的蚂蚱，没几

天蹦头了。”

一席话，说得忠厚老实的工人无言以对。李钢又趁热打铁，逼上一步：“这些学生其实都是咱们工人阶级的后代，两者没有任何利害冲突。冲突明明是走资派挑起来的，这还仅仅是一方面。将来总要秋后算账的，学生是不会记恨工人的，不客气说，哪个学生在家没挨过爹妈几巴掌，谁会记恨自己爹妈呢？可就怕有一天，有人为了保自己，推脱罪责不算，还要给你上纲上线，到那时候，可真是跳到黄河里也洗不清啊。”

说到此，李钢故意打住，慢慢喝水。沉不住气的工人开口了：“照这么说，我们不成了替罪羊？”

李钢点头微笑，进一步渲染继续保走资派或隔墙观望的危险，同时指明造反、夺权的光明前景。

一直谈到太阳落山，李钢终于说动了几位“四野兵团”的头头。他们表示：不反对造反派的行动，但自己也不宜调头太突然。李钢完全理解对方的心理，又主动请缨，挥笔为他们写了一张表态的大字报，名为《我们不再受骗了》。

李钢解释说：“这是伟大的文化革命旗手鲁迅先生的名言。”

李钢写大字报一向不用草稿，一挥而就。仅此一举，已令满屋子人赞叹不已，李钢又边写边解释：“第一张表态大字报不宜太具体，好能让尽可能多的同志接受这一个转变，让对手弄不清咱们的路数。更重要的，今天我们表了态，明天我再让学生们写份声明，表示前嫌尽释，已经成为一个战壕里的战友。这样就堵死了走资派嫁祸于人的

路。”

初战告捷，李钢连夜赶回城里，召集学生领袖和造反派头头开会，不料造反派中力量最大的财贸尖兵的头头却反对联合。

这位“财贸尖兵”的司令以贴出第一张造反大字报为资本，率先拉起山头。从他起的名字看，他的组织开始人数一定很少，所以自称尖兵。应了那句俗话，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城里造反派势力越来越大，财贸尖兵也鸟枪换炮，成为数一数二的大山头。尖兵司令的话也就有了相当的分量。

李钢知道，“财贸尖兵”的司令反对矿区“四野兵团”参加造反派阵营，是怕“四野兵团”人多势大，压过他“财贸尖兵”。

对这位司令，李钢怒不得恼不得，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但这位司令充耳不闻，只一味强调：什么要革命队伍的纯洁性，什么不能走招降纳叛的土匪山大王的道路，不一而足，就是不肯与“四野兵团”联合。

李钢只好宣布散会，让各派头头回去与战友们协商一下，下次会再决定联合对敌之事。

送走各派头头，三个人又总结前一段工作；分析当前形势。苏红已将市委书记、市长等主要领导干部的住处查明，并将他们的历史，特别是在党内几次主要斗争时的表现也真的假的收集了一大堆，还有和女秘书不清不白、孝敬地主成分的爹娘等等个人生活中的问题。黄永革也已经把工厂、矿山的造反派鼓动起来了，可以说形势大好。目前主要的问题就是说服“财贸尖兵”。

“没有臭鸡蛋还不做鸡蛋糕了？”黄永革气愤地说。李钢说：“‘财贸尖兵’是资格最老的造反派；而且，他们虽然人不算最多，可是分布广，哪儿都有他们的人；另外，大规模运动开始以后，说不准需要什么，比如红布、纸笔、汽油，他们什么都有，省得再筹集经费了。”

三人商量到天亮。李钢吩咐黄永革、苏红到工厂、学校去，组织人写大字报，准备开始大批判，主攻方向是既定目标：抚顺市委。他自己一大早动身去财贸尖兵总部，游说尖兵司令。步行在大街上，他漫不经心地四下张望，心中盘算如何打动那老谋深算的家伙。突然，他看见抚顺市二商局的牌子，只觉眼前一亮，他立刻有了主意。

见到尖兵司令，李钢寒暄几句，立刻谈到正题：扩大造反派队伍，统一行动，炮轰市委。尖兵司令比昨天夜里退了一步，同意联合造反派，统一行动，但要李钢拿出具体方案来。

李钢谦虚几句，说些不了解情况，不敢乱发言的客套话，然后，便和盘托出路上刚拟出来的计划：“炮轰市委是咱们这次行动的首要目标，但不是最后目标也不是根本任务。我们要通过这次行动，达到无产阶级的团结，夺回被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把持多年的权力。为了更充分、全面地了解广大工人，还有农民的愿望，及时掌握下面情况，需要一个各地区都有自己成员的组织作为核心。”

李钢故意顿了一下，只见那尖兵司令点头微笑，看得出，他很满意李钢的分析。

李钢继续讲：“成立联合指挥部是当务之急。”

尖兵司令的眼神立刻收拢，直盯李钢，问：“怎么成立？”

李钢故意思考半晌，说：“有两种方案。”

“哪两种？”对方问。

“第一种，召集各派组织领袖，开个会民主选举，少数服从多数。可是这种办法有两个弊端。第一，可能一夜之间冒出千百个组织，结果没有联合，反而促成了分裂；第二，有的单位组织很多，有的单位在前一阶段已经实现了一定阶段的联合，组织就少了，其实战斗力更强。”

尖兵司令频频点头，问：“第二种方案呢？”

李钢不看对方，沉思似的继续自己的思路：“第二种，按单位派代表，以局级为单位，一个单位出两名造反派代表参加筹备组，这样筹备组里各方面的人都有，人员总数也不会因太多造成杂乱失去章法。”

听到这里，尖兵司令的脸一下子轻松了，笑了，大声表示同意：“好主意。我完全同意。”

李钢迟疑地说：“只是矿区难办一点。那里原来的造反派力量单薄，可是不能不算一家，‘四野兵团’呢，人多势大，一票不给又不合适，有点冷落人家……”

“好说，”尖兵司令一拍桌子，“给矿局四票，算两个局。”

李钢喜出望外地说：“真是好同志，顾全大局的好同志！我可以负责任地说，筹备组成员选举领导小组成员时，我推荐你！”

黄永革、苏红听说问题顺利解决了，高兴之余，问李钢要了什么

花招。李钢故弄玄虚一阵，讲出实话：“他想当抚顺市造反司令，唯恐人多势大的矿区工人群众组织加入造反派，破坏了他的司令梦。其实‘四野兵团’的头头没心思当司令，他们只是不愿意背镇压学生运动的黑锅，迫于形势同意进城表现一下。可是尖兵司令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实言相告，他必不相信。我正愁呢，忽然看见一块二商局的牌子，主意立刻有了。一商局、二商局，或许还有三商局，另外，偌大城市一定有服务局、仪表局、工商局和银行什么的，我估计，这些商业单位都有财贸尖兵。如果按单位出代表，财贸尖兵就占大便宜了，那位尖兵司令一准高兴，事实也正如我所料。”

苏红问：“别的组织同意吗？”

李钢说：“矿务局代表加倍，这还是尖兵司令的建议。两个大户通过了，其他单位问题就不大了。”

黄永革愤愤地说：“太便宜那混蛋了。”李钢笑说：“咱们又不在这儿扎下去，谁当司令和咱们有什么关系，打倒市委，咱们就得胜回朝，日后自会有耐不住性子的豹子头收拾他。”

当天下午各派组织代表集会，通过李钢的建议成立全市炮轰市委前线指挥部。尖兵司令当选前敌总指挥。黄永革、苏红带领中学红卫兵，帮助工厂、机关、商店的群众组织连夜上街张贴大字报。

第二天一大早，满街大字报枪口一致对准市委和市政府的主要领导。

没等对方明白过来，下午一点钟学生队伍率先来到市委门口，紧接着是财贸尖兵的大队人马，傍晚不见头尾的工人队伍浩浩荡荡开进

城区，把市委及市领导的住处团团围住。

保皇派失去了与要保的领导的联系，又见大势已去，作鸟兽散。

24小时之后，最前面的学生宣布绝食，48小时之后，示威游行停止，学生开始进食。原因是几位领导走出大门，接受群众的批判。

李钢坐在主席台正中，看看眼前几位低头弯腰坐“土飞机”的市长、书记，又四下张望，万头攒动，人海如潮，心中油然升起一种自豪感。他脑子里老是浮现出《红楼梦》中的两句诗：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

第205回：砸佛像，古刹中夜半难寐　发奇想，逼和尚寡妇成亲

福建省福州市东郊，闽江北岸，一带山峦绵延数十里，山巅有巨石如鼓，故名鼓山。山中有一座庙宇涌泉寺，为1000多年前的宋代时所建，宋真宗赐额“涌泉禅院”。寺院规模宏伟，建有天王殿、大雄宝殿、法堂、钟鼓楼、白云堂、明月楼、藏经殿、回龙图等；尤以藏经、藏版驰名海内外,是福州五大禅寺之一。

涌泉寺香火甚旺，最红火的时候，有僧人1000多名，一顿饭就用米1000余斤，除自己食用外，还要招待上香的善男信女们。寺院的素斋比饭馆的鱼肉味道高雅神圣多了。因此，经济效益颇佳。每月仅佛堂前香案上就能收五、六千元，大笔捐赠还不包括在内。

1966年，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某部进驻该寺，僧人们虽敢怒却不敢言，忍气吞声，旁若无人，念自己的经，吃自己的斋，祈祷佛吐，早日将大兵送走。

可僧人们的经咒没能驱走大兵，而迎来了红卫兵小将，更令人想不到被僧人视为眼中钉肉中刺的大兵却又成了他们的守护神，使寺庙在万古不复的劫难中，未彻底毁坏。

在串联高潮中，北京师大女附中学生刘建敏途中与同学走散，一个人误搭南下火车，从上海直奔福州，路上结识一群以天下为己任的红卫兵战士，刘建敏便入伙同行，开始她的福州之旅。

刘建敏等人自幼生长在北京，只游过北海、颐和园，第一次出远门，游览南方的名山大川，特别是深秋初冬时节，依然山清水秀。花木茂盛，风景绮丽，令他们赞叹不已。

一天，有北京串联来福州的学生20来个，结伴游鼓山。他们在参天古木中漫步，在清泉旁嬉戏，不知不觉来到涌泉寺。远远看到朱檐黄瓦，有人感叹：“真是古人说的，天下名山僧占多。”

一个十四、五岁的小红卫兵问：“听说和尚是洋货，和天主教传教士一样，都是洋人来毒害咱们中国的，是吗？”

“没错，哥儿们还真知道点儿学问。”另一位红卫兵回答。

“对，佛教比天主教还可恶，不许吃肉，不许娶媳妇，还他妈不分男女都得剃秃子，可恶之极。”

“要是咱们中国人都信了这玩意儿，还不亡国灭种？比鸦片烟还厉害，准是美帝苏修传过来的。”

“不能让和尚们占据咱们的锦绣江山。”

“和尚都是卖国贼，为什么他们不当老道？好歹老道也是咱们中国自己的土特产呀。”

“走，造反去！把和尚赶出去！”

深邃幽静、白云缭绕的山林里，传出北京的战歌。一行20余人很快来到寺前，排列整齐，齐声高喊：革命无罪，造反有理，混蛋和尚，快快滚出来接受批判。

红卫兵神威大显。大门吱地一声开了。门外红卫兵小将一愣。哪里有和尚，明明是自己最崇敬的亲人解放军战士。莫非这里是军事重地，抬头看匾，“涌泉寺”三个大字清清楚楚。要不，是他们先一步来造反？自己来迟了？

如果这些大兵一言不发，或干脆转身回去，后面的事就不会发生。

因为当时红卫兵天不怕地不怕，就是有点怕解放军。他们的红司令毛主席接见他们的时候，穿的就是绿军装。军人驻扎的地方红卫兵小将一般不敢问津，除非有能管住军人的“虎符”“密令”之类的东西在手。

偏偏这群大兵中有一位是刚从航校来的学生兵。1966年5月到部队，6月份“文化大革命”就轰轰烈烈搞起来。航校学生也冲破重重阻力，上北京见毛主席，南征北战、东挡西杀地进行全国大串联，好不痛快，好不热闹。偏偏爹妈性子急，早一年生下自己，要是晚一年不也赶上“文化大革命”了？更可笑的，给自己起名和平。既然你们爱和平，为什么还要闹革命还要送自己上部队？说是接过革命的枪。艾和平听说红卫兵小将宋彬彬听毛主席的话，改名宋要武的事迹以后，即刻打报告，要求改名，一下子拿出三个方案，请领导择优批准：艾党、艾革命、艾造反。

可连长不但没表扬他，反而讽刺他爱捣蛋。于是，艾和平在战士中真的有了新名字：捣蛋。艾和平处心积虑地设计了几次方案，想给连长使坏，但终因怕事情败露而未敢造次。今天看到一群比自己小不了三两岁的学生，特别高兴，随口说道：“欢迎。欢迎红卫兵来鼓山串联，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红卫兵小将反应机敏，立刻齐声高喊：“向解放军学习，向解放军致敬。”战士也只好回报：“向红卫兵学习，向红卫兵致敬。”

造反的序幕拉开。

当下山开会的连长、指导员返回涌泉寺时，寺碑已倒地破碎。已

有千年历史的牌匾成了劈柴。小将们正抡锹挥镐与佛像激战，口中振振有词："我看你佛法无边，我让你断子绝孙！"

两位驻军最高长官不仅知道历代革命造反的英雄豪杰多有拆庙宇砸佛堂的嗜好，而且了解山下"文化大革命"的大趋势，所以不敢逆潮流而动，还得表示支持红卫兵们的革命行动，命令炊事员为累得汗流浃背的红卫兵小将烧水做饭。

军队进驻涌泉寺之时，曾被告之，寺内珍藏有明代南北藏，清代龙藏等珍本，另外还有明清两代本山高僧元贤、道需等著述7500多册，明清经版万余卷，及苦行僧刺血书写的佛经675册。并特别叮嘱要保护好藏经之殿阁。两位领导一商量，决定暗调十几名战士进驻藏经殿，紧闭院门，说是军事重地。好在红卫兵小将非常敬畏"军事机密"，珍贵经卷得以保存。

当晚，吓得浑身哆嗦的僧人们被红卫兵饬令还俗，轰出寺院。红卫兵小将住进禅房。刘建敏和另外一个女学生住在长老房中。只见屋内清静典雅，香烟缭绕，四壁书架，上面都是线装书。取下一本，看不懂，再取下一本，仍是莫名其妙，闹不清应当归入封资修的哪一档。二人最后取得一致意见：有毒。

女孩子嫌老和尚脏，把床上被子扔到院里，从"最可爱的人"那里借来被褥，铺在床上。她们又惊讶那床的精美：床头雕着龙凤。禽兽，床脚刻有花草鱼虫，两边床帮刻的是浮云、远山，刀笔精致，玲珑剔透。床与书架均为紫红色，显得幽深肃穆。俩人并肩躺下，想到这屋子是个老和尚长年独卧的地方，怎么也睡不着，便天南地北的闲

扯起来。不知怎的，就说到命运，说到神仙佛爷，又一不留神，说到有没有鬼显灵的问题上。

两个女孩子嘴上都说不信同鬼的事，可是耳朵都悄悄聆听窗外的响动，心里怦怦直跳。

经过破四旧洗礼后的涌泉寺，门窗离框，牌匾脱钩，泥塑倒悬，难免因风而动，发出一些响动。两个女孩子不由自主地抱在一起。她们不说怕，却说“好冷”。

刘建敏同：“你白天砸佛像了吗？”

“没，没有。只给了小鬼一脚，现在脚还疼呢。”对方回答。

刘建敏说：“坏了。你要是打了观音、如来什么的，多狠都没事。人家是大慈大悲，大人不计小人过。那小鬼就不行了。小人小心眼儿，多看他一眼都记仇，没占着便宜就觉着吃亏的主，你踹他，他还不恨你一辈子。”

那女孩比刘建敏小，胆子也小，吓得偎在刘建敏怀里，说：“真的？那怎么办呢？”

“冻豆腐难办（拌），回家准备棺材去吧。”刘建敏说。其实，她心中也打鼓，不过强作镇定，讲笑话给自己定心丸吃罢了。她不敢闭眼，一闭眼，那慈眉善目、金碧辉煌的佛像就浮现眼前。一时佛像金漆剥落，裂纹片片飞迸，金像变成泥草木胎，双眼却金光四射，手指在戳自己，仿佛在说：“阿弥陀佛，罪过、罪过。”

突然，一声嚎叫，屋顶上扑通一阵乱响。吓得两个女孩同时惊叫起来。一会儿又恢复了寂静，只有山风不时把门窗吹动，发出吱吱的

声响。

小女孩实在忍不住了，说：“我，我有点害怕。”

“害怕？怕什么？”刘建敏给她打气，“听说过女共产党员江姐吗，被国民党反动派在手指上钉竹签都不哼一声，宁死不屈。咱们这算什么。江姐……”

突然，隔壁传来男同学的歌声。“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两人不由扑哧一声笑了。原来男子汉大丈夫也有心虚胆怯的时候。她们本来就没脱衣服，此刻再也躺不住，掀被下床，去敲男同学睡觉的房门。

于是，二十几位红卫兵小将，半夜三更又聚在一起，胆气倍增，谁也不言害怕，心中也真的不再害怕。他们又热血沸腾、慷慨激昂起来，商量下一步的革命行动。

第二天一大早，红卫兵小将分头行动。部分人马四下散开，到附近村庄招呼贫下中农来涌泉寺，少数人员把寺中桌椅板凳、书架床铺尽数搬到院中，开辟了“文化大革命”中的新战场：拍卖查抄物资。

一张八仙桌，5块钱拿走。对方说是贫农，两块钱也行。床板一毛钱一块。和尚打坐用的蒲团也是一毛。其中，卖价最高的是刘建敏躺过半夜的那张床。两个红卫兵小将累得直喘粗气才抬出来，决定要多卖几个钱，标价10元。没想到两个人争着要买。一个出到15，另一个拿出20。结果，出20元钱人的拿走了床。20年后，那位贫下中农用床换了一台大拖拉机，跑起运输，成了万元户。原来，那张床非同一

般不仅质地精良，为上等梨花木雕琢而成；更有一番荣耀经历，令富商豪客瞩目。据寺里僧人讲，此床原为林则徐林大人告病还乡时，福州知府所送，林大人就是在这张床上仙逝的。林的后人不忍再用，变卖有辱先人，弃之又可惜，便转赠涌泉寺，供寺中长老安歇。百年前购置此床也需百两白银，没想到落入红卫兵小将手中，20块钱就给打发了。

当天晚上。红卫兵小将决定走与贫下中农相结合的道路，住到老乡家中，与封建迷信的寺庙决裂。这下又忙坏了村里的父老乡亲。村文化革命领导小组成员腾出房子，派人打扫，同时又找人来烧火做饭，还得向北京来的红卫兵汇报本村的阶级斗争情况、文化革命进展情况。

晚饭后，北京来的红卫兵召开全村批判大会。照例是地富反坏牛鬼蛇神们跪了一地。拳打脚踢之时，一个老头的帽子被打落，竟是一个头顶有点秃的和尚。仔细辨认，是涌泉寺的老和尚。几个男学生又想起佛门不许结婚的事，忽生奇想，为什么不造一造佛门规矩的反，给老和尚找个老伴呢？

散会后，红卫兵们把老僧单独找来训话，问他是否愿意娶妻。老和尚一听，连忙低头说："阿弥陀佛，罪过、罪过。"

想到哪儿做到哪儿，不怕做不到就怕没想到。红卫兵小将说干就干，通过村基于民兵，抓来一个守寡的地主小老婆，先痛斥一番她守寡就是做地主阶级的殉葬品，就是妄想变天，然后给她指出重新做人的光明大道：与老和尚睡觉。老和尚虽然封建迷信，毕竟没有产业，寺庙是国家的，本人成分估计极有可能属于无产阶级，顶多是个自由

职业者，小资产阶级，属人民内部矛盾。嫁给和尚，不仅生活有靠，还能改变成份，摘掉地主婆的帽子。

那地主婆吓得只会磕头作揖，恳求饶命。但一切都已经定了。红卫兵一言九鼎，当地的青年后生也想看乐子。转眼间，和尚、寡妇被反锁到一间空房中。

忙了大半夜，红卫兵小将们心满意足地睡了。第二天，他们顾不上吃饭，来到关和尚、寡妇的屋子。开门一看，哭笑不得。只见和尚盘腿打坐，不知是睡是醒，寡妇跪在床上，面冲和尚，全身匍匐在床上。两人就这样过了一夜。

刘建敏信步上山，来到涌泉寺，见院内已打扫干净，破烂木块都已经堆到伙房，千年文物最后的用场是燃烧自己，为人类的生存施放热量。那位第一个向红卫兵表示欢迎的战士，正专心地制作镜框。刘建敏走过去，招呼道："做镜框呢？"

艾和平很乐意与女孩子聊天，寺里全是清一色的光棍，烦透了。他指着地上的木块说："净是好木料，看，那块是紫檀，那块是沉香，做镜框也算是废物利用。做别的做不成了。"刘建敏欣赏着艾和平的手艺："真漂亮，放张主席像挂在墙上，不怕落土。"

艾和平说，咱们想到一块去了。走，我带你去看看效果。

刘建敏随艾和平走进一间大殿，只见原先供奉佛龛的地方端端正正摆放着毛主席画像。画像放在艾和平刚刚用砸烂的旧文物拼制而成的镜框里。刘建敏恭恭敬敬朝毛主席像鞠了一个九十度的躬，随艾和平出来。

艾和平一定要送刘建敏一个镜框，盛情难却，刘建敏收下，道了谢，离开寺庙。

25年以后，刘建敏自己的孩子也已经十六、七岁，正是她当年大串联时的年纪。她几经沧桑，白发平添，生活中许多事情早已淡忘，许多东西早已丢弃，但是她一直保留着那个镜框，那个用有干年历史的破牌匾拼制成的镜框。如今的居室中，家用电器、铝合金镜架，已没有摆旧木质镜框的地方，而且那框刨得很粗糙，实在无法摆在明处。刘建敏把镜框放在柜子里，每到闲暇无聊或心情不快时，就取出来抚弄一番。女儿奇怪，问她是在干什么，甚至怀疑妈妈另有钟情。

刘建敏对女儿说："你还太小。等你长大了，我会慢慢地讲给你这镜框的故事。"

## 第 206 回：讲任务，再接见“南下兵团”

## 中南海，座谈反修小分队

我们再说说南下上海的北京红卫兵，他们在掀起冲击上海市委的活动遭到强烈抵制后，一面派人回京控告，同时感叹到：“在上海人民中遭到这样的孤立原来没想到。”

9 月 6 日，部分北京红卫兵在同济大学召开其他省市在沪学生交流会，了解各地省市委的情况，准备继续搞下去。

9 月 9 日，上海市委办公厅编辑的《文化大革命动态》第 622 号，其中一份《住在师大的外地学生的一些动态》反映：清华、北大等校的学生干部讨论“今后怎么办?”，多数人主张立即回北京，少数人主张继续干下去。

同材料还记录：北京红卫兵中有一部份上海籍考入北京的同学。这部分同学的家长怕他们冲击市委闯祸，要求他们回北京。

此时，北京又有一批红卫兵整装待发，准备南下，他们是北京大专院校“一司”组织的“南下兵团”。与此前赴沪串联学生不同之处是，这次的“南下兵团”是在周恩来亲自安排下实施的。国务院秘书长周荣鑫找到“一司”商量，能不能组织一部分红卫兵南下上海串联。于是“一司”闻讯而动，专门成立了“南下兵团”。他们首先由北大、人大、矿院等院校组织了一支“先遣队”，于 9 月 1 日出发前往上海，为“南下兵团”打前站，安排后续大队人马的接待、吃、住

等问题，同时了解上海地区的运动形势。周恩来特别指示，“先遣队”到上海后可先找东海舰队接待，弄清情况后再找上海市委。叶剑英的小女儿叶小英参加了“先遣队”。

“一司先遣队”9 月 3 日到达上海后，就住在上海警备区的招待所“延安饭店”。上海警备区司令饶正锡和东海舰队政委饶守坤接见了“先遣队”全体成员，并通过部队领导的安排，上海市领导曹荻秋等人也接见了北京“一司先遣队”，并做好了接待大批红卫兵南下的准备。

“一司南下兵团”很快在北京组建起来，分为 16 个纵队，总指挥是北京工业大学的学生章盾之。遵照周恩来的指示，“南下兵团”还带了 100 名北京中学生南下，作为“16 纵”，队长是 19 中的姚小康，政委是师大女附中的郑中伟。“南下兵团”专门组织了 3 天集训。

除了“南下兵团”，“一司”还组织了“新疆兵团”、“中南兵团”和“东北兵团”。

“新疆兵团”由汪延群亲自带队，朱新民任大队长，北航的萧远音任政委。“中南兵团”刘克府任大队长，农垦部副部长陈漫远的女儿陈南竹任政委。

9 月 9 日下午，周恩来在中南海西华厅接见“一司南下兵团”负责人，了解准备情况。

而就在此时，9 月 9 日下午，正为上海“831”、“94”事件而处于茫然之中的赴沪北京红卫兵也召开了各校负责

人会议。经会议讨论，宣布成立“北京红卫兵联络总站”，推选清华大学为首的3位负责人，并制定了“辟谣”、“到工农中去串联”等改变的“斗争方式和斗争策略”。这天，北京师大女附中、北京101中、北京政治学院附中、新北大、北京航空学院、新北大附中、中国科技大学、北京121中、北京师范大学部分来沪红卫兵、上海和平中学、上海复旦大学部分红卫兵散发传单《致上海全市革命同志——记上海市“九四”学生运动》。

第二天，9月10日，周恩来在北京工人体育馆参加了“一司”组织的“北上、南下、西进外出串联战斗军团誓师大会”，并发表了长篇讲话，向红卫兵提出了三项任务：

第一、红卫兵首先是一个战斗队，要在学校里、要到社会上进行斗、批、改，要破四旧、立四新。

第二、要作学习队，要学习毛泽东的著作。他说：“你们首先要学毛主席的书，搞好基本功，先进行调查研究。‘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没有调查研究也不可能把我们在北京的经验，北京所得出的一些办法马上下去，你们自己说的下车伊始就哇啦哇啦，这样你们就要犯我们从前犯过的毛病了。”

他说：“这一点非常重要，如果不重视这一点，你们首先就会跟着先去的北京红卫兵对立，那就很不有利了。你们不是说吗？他们会说你们是保皇派了，当然这个保皇派的名

称也不那么恰当的。因为保什么皇呢？是指保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皇，是不是啊？并不是所有领导都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台下响起了鼓掌声。周恩来继续说：“甚至在一些领导中有这样的当权派也不是所有人的问题，必须要进行具体的分析。否则毛泽东的中国，毛主席领导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不就是变成漆黑一团了吗？是不是？”

他还嘱咐说：“把北京你们听到的一些事情、做法，在你们调查研究了以后，首先跟北京去的同学交流经验。”“第二步要向当地的同学、红卫兵交流经验，因为他们是本地的红卫兵组织，你们要向他们进行调查研究、学习，因为他们是本地的么，本单位的么，他们是主人么，革命靠自己么，每一个单位革命内因为主么，外因为辅么。不管我们怎么煽风点火，煽社会主义之风，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之火，我们是外因么，是外来的因素么，你总不是内因么，内因靠他们自己。”

“如果他们正在生产，我们派人去了，他们派红卫兵接待你们在车间以外是应该的。如果你们想参观，就要得到他们那个地方的革命委员会的许可，不能说我们要看就闯进去，那不行。”

第三、还是一个宣传队。

针对上海的特点及上海外地红卫兵串联中反映出来的问题，周恩来说：“上海资产阶级的影响要比北京大。那个

地方你们并不太熟悉，上海的生产关系到我们全国的建设，关系到我们大小三线的建设，关系到我们国防工业的建设，关系我们的国际、世界民族革命的建设。有广大的进出口的业务，有广大的供应全国需要的东西，所以生产的任务很重，不仅如此，那个地方还有科学实验的任务，很多的尖端的科学在那个地方进行实验，进行中坚的生产……我们要使打击的敌人，集中在最主要的目标上。也就是《十六条》所说的，打击真正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打击的目标真正的是那些最反动的资产阶级右派，当然这里面包含最反动的买办分子、洋奴。但是这‘洋奴’两个字又是个新的问题，你们拿两个字去一套，凡是在上海滩上的，你们看不顺眼的，梳那种怪头的，穿你们看不惯的衣裳的都叫洋奴，那这个问题就严重了……上海那样的习惯久了，慢慢地改嘛……上海是大的进出口海港，码头，有很多外国人，里面有国际朋友、也有国际的工人阶级、像海员工人，但是有很大一批买卖的外国商人、很大一批游客、旅行的人，这里头一定有资产阶级的分子、反动分子、修正主义分子，但是你们用什么方法去分清呢？你去问他，你是不是红五类？（笑声）这行吗？这就不可能嘛。我们只能作文化大革命的宣传，影响他们……你们在座的不是有语言学校的同志吗？你们学英文的、法文的可以用一用嘛。当然啦你们说起外国话来不能够通过他们许可罗，因为你们宣传么。但是你向外国人宣传就

要适合于他们的语言，你们不能动口是‘混蛋’、闭口是‘狗崽子’。”台下大笑。

周恩来说：“现在你们自己也不常说了么。现在这类事情，北京的同学已经有很大的改进。如日本的商人找了个四中，四中也是一个战斗性很强的中学了，是不是？他们对日本商人、日本的反动政客进行的访问，准备好了答复的话，头头是道。所以使那些反动的日本人不得不说他们的青年在这一点上是很值得学习我们中国青年的。这样子做就是宣传。”

周恩来还对去新疆串联的“新疆兵团”嘱咐说：“到新疆那个地方。那个地方去的人并不是太多，大概没有超过 400 人。可这个地方很重要，是我们边疆，又是我们很大的一个省，又是多民族，少数民族占多数，情况十分复杂，而对外那个地方，既有中苏边疆又有跟印度接壤的一块地方。这样还有一部分跟巴基斯坦接壤，还有一部分跟阿富汗，还有跟蒙古人民共和国接壤。所以那个地方边境的情况也很复杂，就是说：有修正主义领导的国家，又有友好的国家，也有印度反动派领导的国家。因此中央有规定：边疆的省份，靠边境的市城、集镇和边防点你们不要去。要把去那个地方的红卫兵和外地去的同学，跟外地去的红卫兵和同学劝回来。

你们去新疆的几个学院，你们的任务很重，因为你们又要懂得边疆对外的政策，又要懂得民族的政策，又要做好在

那个地方的革命串联、交流经验、参观访问。你们只有 400 人，如果人力一分散，就没有几个人了，这个地区大得很。

你们到了新疆以后，不能把所有的清真寺都像北京一样办成学校，做公共的机关。那个地方宗教信仰和民族结合在一起，你要改变那个习惯需要时间，宣传是可以的。如果本地的民族同学他们不动手，你们不能给他动手。”

他又说：“你们到西北的人比较少，只有 80 人的队伍，我看这 80 人的队伍要集中。首先到西安，然后再到兰州，如果你们愿意分开就分成两个地方。你们最重要的任务是调查研究，为什么？因为人数不多把情况调查清楚了有很大的好处。这两个地方斗争是很激烈的，你们大概听到了。不仅在社会上，就是在同学当中，在红卫兵当中也有不同的见解。你们要很详细地做一番调查研究工作。到这个地方去的只有两个学校，地质学校和林业学院，林业学院的学生将来还要到那个地方学习、工作。”

最后，周恩来说：“所以你们五路：向上海、西北、西南、东北、中南，都是要把三大任务结合起来。一切都是从调查入手。”

“一司”的“南下兵团”在周恩来接见后，就直接奔向火车站，乘火车直赴上海。

周恩来当晚又在中南海政协礼堂主持了“首都大中学校红卫兵代表第二次座谈会”，回答了中学红卫兵在“破四旧”时提出的一些问题。他说：

“中学同学有闯劲，有朝气，这我同意。但也不能认为你们提出的东西百分之百都是正确的，不可改动的。8 月 23 日，我首先接触的是 15 中与警察同志争吵，提出限年底要改服装，我们感到期限是很宽裕的，但我们没等到年底就改了。可是改过后的实践证明，这种服装的颜色对进行指挥的效果，不如过去的好，在光线暗的地方很难看清他们是在指挥，不如过去白色衣服看得清楚了。司机就有些反映。我也很担心发生事故。15 中的同学又提议要改变红绿灯信号，要绿灯停，红灯放行。与各方面一协商，司机同志首先不同意。因为大夜间，有雾天只有红色看得远，改了容易出事故。红灯是从铁路上来的，看得清，红灯不仅是指路明灯，也是保证安全的红灯。好在 15 中的同学们还听话，我一讲他们就同意不改了。8 月 25 日 15 中 4 个同学和 4 个居民被反动资本家砍伤后，我马上见了你们，支持你们。27 日就成立了联络站，把中学都联合起来，便于斗争。8 月 31 日又开了第二次大会。9 月 1 日开了第一次座谈会，那次中学到的人最多，我讲了 3 个多小时，在座的有的可能也去过。今天又开第二次，也是中学到的人最多，你们批评我不重视中学红卫兵的意见，我不能完全接受（热烈的掌声）。8 月下旬，女 2 中发

起把扬威路改为反修路，搞了一周，最后集会发展到 70 多万人，召开命名大会，我们全力支持你们。我当时给卫戍司令部下的命令是：要严密警戒，如果苏修人员冲出来挑衅，要坚决压回去，不许他们伤我们同学一根毫毛。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应当保证同学们有这个集会的自由。”

学生们热烈鼓掌。

周恩来继续说：“可是，你们中学同志却也将了我两次军。8 月 13 日，有几个中学要组织 10 万人的大会，公开审判 5 个小流氓，在发出的呼吁书中，也把形势讲得过于严重。中央是不同意开这个会的，有的学校批驳了这个呼吁书，我们是同意的。同学们想想看，我们是祖国的首都，对外有极大的影响，为 5 个小流氓召开这样的大会，会有什么效果、影响？我们经过了艰苦的说服工作，才算同意不开。之后，反动资本家砍伤 15 中的学生，你们又要组织 10 万人的示威活动。这样一搞，反而倒使这个反动的资本家扬了名，扩大了敌人的影响，在国际上也会造成不好的影响，也是经过艰苦的说服工作，才算说服了他们同意不召开。同学们，中学同志闯劲的确大，我们承认，但有时也的确有考虑不周的地方。”

“现在我来回答大家提出来的一些问题。说老实话，我们近来把很大的精力都用在帮助、支持红卫兵的活动上了。大家提的多是具体问题，要一件一件回答太琐碎了。电影学

院的徐战士同学提出：目前红卫兵工作中有 10 个矛盾。我就借她这 10 个矛盾的题目来回答大家的问题吧！”

周恩来回答了学生中提出的问题，最后说：“我就打算讲这些了，有些问题下次再谈好不好！现在还有 4 批同学等着我今夜接见他们。你们还有什么问题准备一下，第三次座谈会咱们再谈好吗？”

会场上响起了长时间的热烈掌声。

赴海拉尔参加国际列车反修活动的小分队一行 20 多人于 9 月 9 日回到北京，当即被国务院派车将他们接到中南海。第二天，即 9 月 10 日晚，他们也参加了周恩来主持的“首都大中学校红卫兵代表第二次座谈会”。穿着草绿色军装的周恩来，特别指着他们向在场的上千名红卫兵说：

“我来介绍一下，他们是来自海拉尔的反修小英雄。他们同苏修进行了英勇的斗争，现在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回到北京来了。让我们热烈欢迎他们胜利归来！”

下面掌声雷动，持续了很长时间，小分队成员们十分激动、兴奋，个个都如英雄般的得意。

会后，周恩来在中南海政协礼堂会客室单独接见了赴海拉尔反修小分队的回京代表。他称赞小分队的革命精神，微笑着和他们一一握手，询问每个人的姓名。当和红涛握手时问：

“你叫什么名字？”

“红涛。”

“红涛？噢，我们在电话里早就认识了。你很厉害啊，用俄语和他们辩论了两个小时。你是哪个学校的？”

“54 中的。”

“听说你们是北京最早到外地串联的一支红卫兵，8 月 11 日出去的，对吧？”周恩来说。

大家都笑了。

周恩来和大家坐了下来。小分队汇报拦截国际列车的情况，提出了一些问题，他们问：“党内走资派应该只有极少数人，这次我们看到沿途很多地方的领导都成了‘走资派’，要是这样，我们党岂不是完全变质了吗？”

周恩来沉思了一会儿说：

“你们反映的情况很好，也很重要，有些情况中央还不知道。现在运动刚刚开始，各地的发展很不平衡，对有些问题，我们还要看一看，不急于下结论。你们可以把有些情况写成材料向中央汇报，交给余湛同志。”他指着坐在身边的余湛说：“这就是余湛同志，外交部苏联东欧司司长，就让他来担任我和你们的联络员吧，以后有什么事情，可直接找他，让他转告给我。”

大家鼓掌表示同意。

接见结束后，周恩来和小分队合影留念，还指示新华社记者说：“照片冲洗出来后，发给他们每人一张。”

9 月 10 日，毛泽东对陶铸报送的《中共中央关于 1966 年国庆节挂像、抬像办法和标语口号的通知》稿中的 100 条标语和口号作了大量删减，并批示：

“陶铸同志：标语、口号太多，是烦琐哲学，要大精简，各有十几条就够了，至多总共不要超过三十条。多了，谁也不记得，不看作一回事了。请再议削，印出交来。”

第 207 回：见贺龙，叶群忙如临大敌

九一一，北大成立校文革

9 月 6 日，林彪主持军委常委会。

这天，李作鹏给林彪写信，状告贺龙反对“四好连队”运动。反对“林副主席派李作鹏、张秀川到海军工作。”

9 月 7 日，军委副主席贺龙、聂荣臻、陈毅、叶剑英和军委各总部领导肖华、杨成武、张宗逊、彭绍辉、张爱萍、刘志坚、邱会作、张池明，还有北京军区的杨勇、廖汉生等接见了参加空军党委三届十一次全会的人员。接见后，叶剑英、杨成武作了讲话。9 月 8 日上午，吴法宪在空军党委三届十一次全会上作了总结发言。历时三个多月的空军党委第十一次全体会议终于结束了。此时，空军机关司令部、科研部、工程部的一些人，已经在会场上贴出了大字报，指责空军党委的这次会议是个马拉松式的会议，开了好几个月还开不完，应当赶紧结束，开始在空军开展文化大革命。

空军三届十一次全会结束后，叶剑英请南京空军司令聂凤智在京西宾馆吃饭，杨成武、吴法宪、余立金作陪。7 月初，江苏盐城的空四军 31 师和盐城基地给空军党委发来那份建议撤销刘亚楼的讣告和悼词，改组空军党委现有领导的电报一事，是由南京军区和南空组织实施调查的。南空又是由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王绍渊具体负责，最后得出“未遂兵变”的结论。于是，此事后来被人们称作“盐城兵变”。叶

剑英要求聂凤智回去后稳住部队。他沉吟片刻说，回南京后给空军党委发个电报，欢迎空四军政委江腾蛟到南空任政委。

1965年5月，南京军区空军政委余立金升任空军政委后，南京军区空军政委一职空缺。当时，接任此职位呼声甚高的任职人选中就有江腾蛟。由于南京军区空军司令员聂凤智等人反对，江腾蛟一直没能当上南空政委。

9月8日上午，林彪继续主持中央军委常委会，但未通知贺龙。参加这次会议的有叶剑英、陈毅、刘伯承、徐向前、聂荣臻和林彪6位元帅，肖华、杨成武、王新亭、刘志坚、邱会作列席。朱德、贺龙二人未参加。

林彪在会上说了未通知贺龙到会的原因："今天谈谈贺龙同志的问题。在主席那里谈过两次，主席已看了空军的材料，总参的材料。他的材料很多，只选看了一些综合性材料。主席的意思，要在高级干部中打个招呼，找各位元帅谈一谈。主席已找贺龙同志本人谈了，要他以后不要这样搞，人家不满意。贺龙同志说，有些是事实，有些不是事实。主席找我、剑英、陶铸同志谈，主席说贺同主席的关系不好。""我们元帅中间，除了彭德怀外，贺是最不好的一个。""过去早有苗头了，因为不那样紧急，所以拖着没有谈。我从没有同主席谈过。这次他搞到总参来了，利用外事局这样小的一件事，要把杨成武同志搞掉。要打掉杨成武，换上许光达。"

“在空军大闹要搞掉吴法宪，就是他煽动的。打掉吴法宪，替成钧开路。”“空军开会期间，贺那里是地下司令部。”

“海军他想扶苏振华，搞掉王宏坤、李作鹏、张秀川。”“材料很多了，总参、空军、海军、工程兵、政治学院、国防工办、公安部、卫生部，到处发现他伸手夺权。……他同彭真、罗瑞卿、杨尚昆关系很密切。”

“贺龙这个人，主要危险在毛主席百年以后，怕那时会放炮起哄，会闹乱子！”

“现在主席说要向高级干部打一个招呼。”

与会的叶剑英、陈毅、刘伯承、徐向前、聂荣臻纷纷表态拥护毛泽东的决策和林彪讲话。

林彪讲话中提到的许光达，时任装甲兵司令，10 员大将之一。1963 年夏，公安部给装甲兵政治部发出一份绝密通报，内容是许光达之子与苏联驻华大使馆人员有往来之事，时任装甲兵政治部主任的程世清按照组织程序将这份通报的内容报告给了中央军委负责人贺龙、罗瑞卿。不久，程世清调任济南军区 26 军政委，离开了装甲兵。1966 年 8 月，程世清前往青岛参加济南军区党委扩大会，会上传达了中央军委文件，号召给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提意见。济南军区首长指名让程世清提意见，程世清便与济南军区装甲兵政委罗通一道上书给总政治部主任肖华和代总参谋长杨成武，旧事重

提，揭发装甲兵司令员许光达与苏联人员交往密切及仿效苏联实行一长制一事，称许光达“与苏修有勾搭，有联系，有里通外国之嫌疑”，“时机一成熟他就会出来将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缔造的人民江山变成修正主义江山”。根据当时规定，凡写给军委首长的信，均应抄送林办。这样，林彪也就有了程世清和罗通联名信的抄件。

随后，军委办公厅通知在京的各总部、各军兵种的负责人到京西宾馆集合。大家到齐后，肖华和杨成武带着他们换乘两辆大轿车前往西山叶剑英家，说是看有关贺龙的材料，上车后还拉上窗帘。肖华、杨成武在车上对大家说：“临走前总理特别打电话交代，到叶帅家看材料重点是看通敌问题。”

到了叶剑英家的会客室，叶剑英说：“主席对贺龙很不放心，不少人揭发了他的问题。整理了一些材料，大家来看一看。总理刚才打电话来，特别强调要注意看投敌问题。”

会客室的桌子上放着十几份材料，大家都争着去拿材料。肖华忙说：“不要乱，不要多拿，每人只拿一份，然后交换看。”这些材料都是一些揭发贺龙的信，其中一件周恩来提供的一封信，是贺龙写给国民政府里任职旧交的。

到吃饭时间了，这次“看材料”也就结束了。返回车内闲谈中，有人说看到了很重要的敌我性质材料，但没有深谈。

在 9 月 8 日的中央碰头会议上，康生也提到贺龙“二月

兵变”的问题，据说还在北京郊区修了碉堡。康生重提贺龙在苏联时，苏联国防部长马林诺夫斯基向他提出推翻毛泽东领导一事，还说到贺龙给体委发枪、炮，炮安在什刹海，炮口对准中南海，并说到海军、空军都有他的国防俱乐部，还有无线电俱乐部等等。

会上讨论成立贺龙专案组，康生、陈伯达、江青、叶群等人均赞成，遂责成中央专案小组写出立案报告，上报林彪、毛泽东。

当天，叶群在人民大会堂浙江厅门口看见军委办公厅警务处处长宋治国，便问他：“你经常到老帅家里转时发现什么情况没有？比如贺龙。”

宋治国开始吓了一跳。后来，他明白了叶群的意思。

叶群走后，宋治国来到林彪的秘书值班室，对林彪的秘书张云生说：

“张秘书，给我找些纸，找支毛笔，砚台……”

“你要练毛笔字？”张云生奇怪的问他。

“不！叶主任交给我一个重要的任务。”宋治国表情严肃，还有些激动。

张云生本想问：“什么任务？”但一想到自己的工作性质，把话咽了下去，没有多问。

宋治国拿了纸和毛笔，又抬了一张小桌，放在了西大厅中间的一侧，伏案作起文章。林彪的几个秘书看了觉得好笑：

一个拿枪杆子的警卫处长，今天居然在那里一本正经的操着毛笔写起文章来了。

9 月 9 日晚上，毛泽东让秘书徐业夫给贺龙打电话说："经过和林彪还有几位老同志做工作，事情了结了，你可以登门拜访，征求一下有关同志的意见。"

9 月 10 日，贺龙准备拜望林彪。叶群闻言，如临大敌，他找到林彪的贴身警卫李文普处长问：

"老李！贺龙要来见首长你说怎么办？"

"他要来，就请来呗！我负责接待。"李文普觉得没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宋治国说，贺龙家里有支小手枪，他来见首长，会不会带枪来？"叶群认真的请教李文普。

"一个元帅有支小手枪不算奇怪。他带枪不带枪我可说不准。"李文普说。

"那他要带枪来呢？"叶群紧张地问。

"带枪来也不新鲜。"李文普还是满不在乎。"不过这样高的首长，一般自己很少带枪，随身警卫那么多，自己带枪有什么用！"

"我问你，如果他真的带枪来怎么办？他如果借着和首长谈话的机会，带枪来向首长开枪怎么办？"李文普越是轻松，叶群越是心急火燎。

"主任尽开玩笑！"李文普笑着说："那怎么可能呢？"

“你这个李文普，太天真！”叶群板起面孔严肃地说：“首长召开军委常委会，就贺龙问题打了招呼，能有不透风的墙吗？贺龙想见首长，准是为这事来的。他一定恨死首长了，见面后动了火，谁能保证他不先动手呢？不怕一万，就怕万一。万一首长的安全有了一差二错，怎么向主席交待？……”

叶群的一番话把李文普脸上的笑容驱散了。话说到这份儿上，他不敢再和叶群开玩笑了。

“主任放心，我们研究一下，保证不出问题。”李文普表态说。

“你们可以研究一下，但这件事，你们要听我的指挥。”叶群说。

“那好，听主任指挥。”

当天下午，贺龙来到人民大会堂，叶群已把李文普等几个警卫人员埋伏在浙江厅的幕帘后。

“你们几个躲在这里，手枪子弹要上膛。”她煞有介事的布置说：“你们谁也不准咳嗽，不能有一点动静。我负责观察，一发现反常，我就一挥手，你们就赶快冲出去！……”

贺龙走进浙江厅，林彪站起来迎向前去，与贺龙握手说：“来啦。”

“林总，你的身体还好？”贺龙问。

“就是那样子。” 林彪答，并用手指了指沙发。

内勤给客人送了一杯茶水，退了出来。

贺龙开门见山："主席要我跟你谈谈，听说你对我有意见。"

林彪把手一摆："没有，我对你没意见。"

贺龙说："我批评过吴法宪，也批评过李作鹏。像空军跑飞机到台湾的事，我就批评过吴法宪，把他批哭了。可都是当面的。他们背后嘀嘀咕咕地告我状，不光明正大。"

林彪说："他们比你小，有些事想得没你远。也可能反映的有不对之处，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林彪和贺龙在浙江厅里似乎谈的波澜不惊，而浙江厅浅绿色的帷幕后面，气氛却异常紧张。叶群把脸紧紧贴在帷幕上，顺着一丝夹缝向厅内张望。她左手拉着帷幕，右手贴在身后，随时准备挥动这只手发出"冲出去"的命令。

林彪沉默了一会儿后，又慢慢地说："你的问题可大可小，主要的是今后要注意一个问题，支持谁，反对谁。"

贺龙笑了，他站起来说："林总，我革命这么多年，支持谁，反对谁，你还不清楚？谁反对党中央、毛主席，我就反对谁；谁拥护党中央、毛主席，我就支持谁！"

林彪点点头，没有再说什么。

贺龙这么一起身，可把屏风后的叶群吓坏了，她以为贺龙要对林彪下手了。其实，贺龙这是准备走了。

从林彪那里出来后，贺龙又同毛泽东要他找的其他几个

人谈了话。但是，这些人对贺龙都很冷淡。

9 月 12 日，中央军委对空军副司令员刘震和参谋长张廷发两个人宣布了停职反省的决定。

对刘震进行停职处理，是因为空军的那场风波是他挑的头。但为什么还要对张廷发停职呢？

在空军 11 名常委中，刘震军衔最高，是上将。其余 10 名常委，除张廷发是少将外，都是中将。张廷发最年轻。刘亚楼在世时，一度曾经想把张停发培养成为接班人，因此使张廷发有些目空一切，对空军一些老人不够尊重，并且与司令部工作人员的关系也发生矛盾。叶剑英听到了下面的一些反映，要李文芳转告吴法宪说："张廷发可以停职，他太脱离群众了。停职不是撤职，教育一下，转变过来了，还可以复职嘛！"

于是，吴法宪和余立金给中央军委写了报告，请示对张廷发进行停职。

中央军委对张廷发停职的说法则是："罗瑞卿在空军的代理人"，"反毛主席、反毛泽东思想的罗瑞卿分子"。

9 月 12 日，毛泽东再次审阅陶铸重新报送的 30 条国庆节标语口号，批示：

"陶铸同志：省得多了，不知送中央文革小组讨论过没有？如未，请送他们议一下。"

我们再来看北京大学。8 月30 日晚上，北京大学师生

员工文化革命代表大会正式开幕，五四广场上灯光照得如同白昼，电影厂的六、七架探照灯来回扫视，主席台上闪光灯不断，五、六个记者拼命在那里抢镜头。王任重出席了大会。

9 月 9 日，北京大学设立了四个投票站，投票选举校文化革命委员会。全校应该参加选举的人数是 13,836 人，因有人外出串联，当天参加选举的人数为 9609 人。选出这是委员 42 人，候补委员 10 人。

9 月 11 日，北京大学文化革命代表大会又选举产生了北京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主任、副主任和常委，聂元梓当选为校文革主任。

9 月 20 日下午，澳大利亚共产党（马列）希尔主席及夫人到北大参观访问，中联部副部长赵毅敏陪同，受到全校师生的热烈欢迎。

第208回：表忠心，写出四封揭发信　包吃住，众师生涌向北京

军委办公厅警务处处长宋治国忙了两个大半天，于9月13日终于写好了一封揭发贺龙的信，并亲自送到叶群的办公室。信中写道：

敬爱的林副主席：

结合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大字报、十一中全会的精神的传达，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我觉得有些事，情况很不对头，为避免发生对保卫毛主席、林副主席、党中央不利的事，我再次向林副主席报告几点：一、我觉得贺龙与罗瑞卿、彭真、杨尚昆来往密切，经常密谈。听说，贺龙与薛明结婚，就是彭真介绍的。后来薛明又将跟她一起工作的一个人介绍给贺龙的外甥廖汉生。这个人是杨尚昆的亲戚。二、常去他家的人，神态也不正常，特别是罗瑞卿、彭真问题发生后，他们很紧张。在空军、海军、地方上到处拉人打桥牌，牌桌上无话不说，许多工作在牌桌上决定。罗瑞卿问题揭发后，他们一伙里的人还给贺龙送去一大筐桔子。三、体委荣高棠天天去贺家，万里也常去密谈、吃、喝、玩、乐、钓鱼。柯庆施在上海开刀后，被贺龙拉到西南养病，整天打牌、钓鱼。不久累死了。他们又多方安抚柯的家属，使她有话说不出来。这些情况，我很担忧，疑虑。为了保卫毛主席的绝对安全，特向您们报告我知道的一些情况。

宋治国

此后，他又先后写了三封揭发信，共四封揭发信。第二封信写于9月19日，信中写道：

……贺（龙）本人的房间里保管一支进口小手枪，夜间睡觉时常

压在自己的枕头底下，外出时带上，不知为了什么？他还让身边的警卫人员带上步枪和机枪，并让每天带在身上，这也不知为什么？他对警卫人员的教育不是政治挂帅，而是业务挂帅，如教育人家如何将枪法练好。并要求每个警卫人员要练得百发百中。贺龙经常到警卫分队去打扑克，乱扯乱谈，这是在拉拢部队，也不让调换。过去出去要"跟车"，现在对警卫处跟车不满，怀疑心很大。因为怕出事，我就赶写出来。我认为这是不正常现象。宋治国。

第三封信写于 9 月 21 日，信中写道：

贺（龙）家有枪：八音枪一支，子弹 20 发。白郎宁手枪一支，子弹 20 发。12 号猎枪一支，子弹 1037 发。16 号猎枪一支，子弹 1989 发。宋治国。

其第四封信写于 9 月 22 日，信中写道：

……罗瑞卿的家里，办公桌子下面，是贺龙全家的照片。罗瑞卿天天看，但没有毛主席的照片。听说怕人家发现，有客人去，他们还拿东西掩盖住。贺龙到现在还保留着他在旧军队时的照片。宋治国。

他将这些材料分装在两个敞口的信封里，直接交给了叶群。

过了几天，叶群将几份材料交给林办秘书张云生说：

“张秘书，这些材料你保存一下。这都是经过主席圈阅的文件，内容非常重要，都是珍品，可不能丢失了。”

张云生接过材料，大约有十多份。每份材料的开头都写着“毛主席、林副主席”，主席上面画了一个红圆圈，“林副主席”四个字也用红油笔圈上了，信封都一律别在材料后面，……叶群又说：

“这些材料你可以看看，因为对你们秘书是无需保密的。但绝对不准泄露出去。”

她坐下来继续说：“对一个人真无法看透，想不到贺龙竟把手伸得这么长……”

张云生随手翻了翻材料，忽然发现有几份材料是宋治国写的，不由得冒出一句：

“这里还有宋处长写的材料呢？”

“那是宋治国自发地写的。”叶群赶紧说，“他是做警卫工作的，经常到反帝路 17 号去。他是忠于主席和首长的，见到不正常的事，写信向首长和主席反映情况，这很自然。但他写这些材料完全出于自发，没有人向他布置……”

张云生偷偷瞥了一眼旁边的老赵秘书，老赵低着头看材料，一声不吭，他也赶紧低下头，继续翻看那些揭发贺龙的材料。

又过了几天，叶群把宋治国叫到秘书值班室，当着几个秘书的面问宋治国：

“你揭发贺龙的材料是真的吗？是，我们就送，不是，我们就不送。”

宋治国连连说：“是，是。”

“你不害怕打击报复吗？”叶群又问。

“为了保卫毛主席和林副主席，我什么都不怕。”宋治国挺了挺胸说。

“好，你可以回去了。”

叶群打发走了宋治国，立即让赵根生、李春生和张云生三个秘书就叶群和宋治国的谈话内容联名写个证明说："你们写个证明材料。证明宋处长送材料的经过。"

于是，3 位秘书推举张云生执笔，写了一份《关于宋治国写材料的情况证明》，叶群看后不满意，又口述了一段话加在上面，证明宋治国送来的材料是没在任何外来的压力下写成的，时为 1966 年 9 月 27 日。

张云生留了个心眼，偷偷在那份证明材料的底稿上加了张小条：

"此材料是根据主任口述写的，修改处也是主任让加的。"

9 月，正是以往学校开学的日子，而此时北京的学生们却响应中央的号召，纷纷离开学校外出串联，就说清华附中，红卫兵的革命委员会干脆把办公桌摆到操场，给除"黑帮"和"反动学生"之外的所有师生盖章发放串联介绍信。此时北京各学校基本成了空巢。

而这时的清华附中也已成为外地学生"朝圣"的接待站。在外省市，清华附中的红卫兵又几乎同时成了造反派的武器和当权派的稻草。在学校遭到红卫兵批斗的清华附中学生方位津后来回忆说：在湖北"把我当成北京红卫兵的代表，第一书记张体学还接见了我们，让我当了主播。那时全国对红卫兵的发源地清华附中都很神往，我也有一种自豪感。"

串联已经成了一个特别流行的词汇。在大学和中学红卫兵进行大串联时，小学生建立了"红小兵"，他们太小，没有能力到外地串联，只好手持红缨枪，在公路上四处设卡，拦住过往行人，要他们背一段

《毛主席语录》后才放行。

据说有一位农民曾被红小兵挡住背《语录》，农民想了好一阵，才背出一条："粮食紧张，人要活泼。"实际上，应该是"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红小兵们面面相觑，也不知道毛泽东是不是说过这句话，犹犹豫豫地只好放行了。

随着"大串联"浪潮的高涨，来京串联并要求毛泽东接见的红卫兵从四面八方涌进了首都。他们来势猛、人数多，再加上衣、食、住、行全部免费，使北京的接待工作到了难以应付的地步，周恩来将"首都工作组"的重心，转入到组织接见红卫兵上。依据需要，"首都工作组组"建了 8 个联合指挥所，简称"八大联指"，由各军兵种、驻京部队、军事院校等单位的领导任各"联指"的指挥员，并以这些单位的人员为主，吸收中直、国务院、北京市系统的有关人员参加，分片负责接待红卫兵和组织红卫兵参加毛泽东的接见。"首都工作组"办公室主任郑维山统管"八大联指"的工作。

进入 9 月份后，首都接待红卫兵的工作开始处于饱和状态，吃、住发生了困难，不少接待单位叫苦连天，有些接待指标分配不下去，有的单位拒绝接受。周恩来像战争动员那样不断地进行动员。在一次动员会议上，周恩来说："困难再大，也必须把毛主席请来的客人接待好。我在中南海接待 1 万名红卫兵，由在邢台抗震的 187 师派人来负责。"他这么一说，其他人也不敢再叫苦说难了，只好挖掘最大潜力做好接待任务。

大串联，给铁路运输带来了巨大的影响。9 月中旬，铁道部北京

铁路局发出了紧急通告，调整买票、上下车和火车到开时刻等有关事项，要求以“积极支持广大革命师生参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保证从全国到北京、从北京到全国各地进行革命串联活动往返乘坐火车的需要”。然而，有限的交通工具无法满足无限的人员流动的需求，中国出现了交通运输史上罕见的客运量最高峰。长途汽车、内河船只、海运轮船和火车的超载都达到了极限。火车车厢每节原定装载 100 多人，现在装载 200 至 300 人之多。两排座之间的 3 平方米空间，都要挤上很多人。茶几上、行李架上、座椅下面、椅背上、过道里都是人。有时车厢厕所内也同时挤进几个人。

9月13日，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吴德在工人体育馆安排接待外地进京串联师生的工作。他首先对外地来京师生表示热烈地欢迎，说：“这是我们北京的一项政治任务。”

接着，吴德说道：“从8月中旬到现在我们已经接待了100多万人，现在在北京的还有60万人，……市委原来也是对接待工作认识不足，认为来个10万、20万的，现在到了60万，遇到问题不少，对形势估计不足，最近也发生了一些事故，给外地师生带来了一些不便，也使做接待工作的同志遇到了不少困难，在这里，我代表市委、市人委向外地革命师生表示歉意。

据中央有关人员估计，国庆节前外地来京串联的革命师生人数可达到100万以上，可能达到150万人，这充分表示了一种大革命的形势，北京市区有150万人，加上近郊区共380万人，平时流动人口一、二十万，59年十年大庆时最多达20万人，今年达100万人，市区各家要合

上两、三人，并加上近郊，每个人就合上一个客人，接待工作很重，吃饭、看病、交通都会发生困难，我们一定要克服这个困难。”

对于如何做好接待工作，吴德提了几点意见：

1、全党动员全民动员，大家都来做好接待工作。

2、北京市内除工业、农业、财贸、生产必须用房不动外，各机关、各单位都要把办公用房，集体宿舍腾出一部分或大部分，作为接待用，已经占用的要继续用，同时天然空地及各校各地搭席棚，所有单位必须把困难留给自己，把方便让给别人。

第一，包住，……现在市委大楼腾出了一半作为外地同志住房，已经住了两、三千人，市委也在腾房，希望各单位、各机关都尽量腾出房子，并把住房可住的人数在两、三天内告诉市委。现在每天几万人住在广场街道，天气冷了容易生病，有时吃都没有，所以他们有些意见。

第二：包吃。住在哪个机关，哪个事业单位，就由哪个机关，哪个事业单位包吃。或者同附近饮食单位联系解决。例如：中学可以和副食单位联系。小学可以和居民联系。炊事员不够可以动员干部家属做饭。现在供应面、米、粮食不成问题，副食方面要做出努力。我们要拿出支援前线的精神，各单位都要抓紧，起码保证外地来京师生吃饱,吃热呼些,一天吃上它几餐,现在有的弄得一天一餐都吃不上。……

第三、包交通。有车辆单位，要把车调一些给外地革命师生使用，没有车辆的单位，可向交通部门联系。必要时所在单位要派人给领路。……现在外地已调来1500辆车。……

第四：包医疗。有医疗机构的要给外地来的客人看病，没有医疗设备的要照顾，帮助外地师生联系医疗。医疗部门要采取措施，如分片包干，巡回医疗……，总之要及时保证治疗。

第五：包宣传解释。宣传什么？宣传十六条，讲明十六条，宣传人民日报有关社论，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总之，对毛主席著作，对十六条，对有关社论要研究、解释、宣传。

这就是五包：包住、包吃、包交通、包医疗、包宣传解释。

3、加强领导。中央指定以国务院周荣鑫秘书长为首组成了一个领导小组。市委也组织了一个领导小组，在中央和市委的领导下进行工作。……在领导小组下面成立一个班子，以房管局为首的住房分配小班子，以交通为首的交通运输的小班子，以卫生局为主的医疗班子，以宣传部为主的宣传小班子……接待单位要确定一个负责人，五包要有具体工作实行负责。总之要认真抓革命促生产。既要把文化革命进行到底，以后又要促进工农业生产。还有接待工作要切实抓好。希各单位同志回去要很好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在现在秋收大忙已经到了，农村、工厂生产要搞好，又来了接待工作，力量要安排一下，认真做好外地革命师生接待工作。

9 月 13 日下午，谢富治接见北京政法学院红卫兵时说：

现在学校里很多隔阂，很主要的一条就是由于派工作组这个错误路线造成的。工作组的同志大多数是好同志，但总的方向错了，工作组肯定要犯错误，叫我去可能也要犯错误，各个工作组所犯错误的程度也不一样。至于保工作组的人，责任就小了。工作组是否有顽固分子呢？如果有，就坚决斗争。真理有时也在少数人手里，真理不一定什么时候都在多数人手里。列宁的布尔什维克党在十月革命前，多数只有一次，其他很多时候是少数。毛主席在"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时

候，他是少数，但是，真理在毛主席手里。现在有好多学校至少有两派，一派揪工作组，一派保工作组。大部分少数派是反工作组的，大部分多数派对工作组有不同的看法，少数派总的方向是对的。不只是政法学院，其他学院也是这样。保工作组没有多大责任，说保工作组就是保皇派这个说法不好。在对待工作组的问题上，真理在少数派手里，我是支持少数派的。我们支持少数派也是在这个大前提下。那么就不支持多数派吗？不是。多数派的革命行动我们也支持，我希望你们赞成少数派的大方向，至于个别人，个别事情，那就是另外一个问题。正因为他们的大方向是正确的，你们就应该向他们靠拢，支持他们，帮助他们，团结他们，绝不应跟他们对立。正因为你们是多数派，更不能用多数派压少数，那样矛盾不仅不能解决，反而会加深矛盾，千万不能多数压少数。

第209回：谈看法，古迹不要都毁掉　担责任，不能全怪工作组

9月13日这天，周恩来、陈毅又参加北京“二司”南下串连的红卫兵在先农坛体育场召开的大会。周恩来在会上再次重复了9月10日接见“一司”“北上”、“南下”、“西进”外出串连战斗军团时提出的“战斗队、学习队、宣传队”的三大任务。

陈毅在讲话中表示：“我完全同意、拥护周总理所谈的意见，我和大家一道坚决地执行。”

他说：“今年外宾人数超过过去任何一年。这次外宾、归侨那么多，为什么？当然是想看毛主席，游览中国的名胜古迹、参观，最主要的来看我们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体大学的红卫兵要联合革命师生，联合中学的红卫兵、群众和干部做一个群众的接待，给他们一个很好的印象，让他们了解新事物——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希望他们回去做义务宣传员。”

他特别强调说：“我们要照顾对方生活习惯、感情、以理服人。最近日本的自由民主党代表团到北京四中参观，到二中参观，到解放军某部队参观，我们接待了他们，他们非常称赞红卫兵的纪律性。他们热情地提出许多问题，红卫兵答得不错，真正掌握了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打锣打鼓地欢迎他们，打锣打鼓地欢送他们。他们非常感动，他们私下透露：我们这些人在红卫兵眼里都是牛鬼蛇神。来的人中有右派、反华分子。我们还是以礼相待，因为这是我们请来的。不请，他们不来，更多的人来有好处。我们要干中国革命，要干世界革命，把自己封闭起来，这不是胜利，而是失败。在接待中锻炼我们自己是

否真正掌握了毛泽东思想。完了。”

9月14日，陈毅在外文出版局革命委员会筹委会第一次全体职工大会上，做了一次挺有个性的讲话。他首先传达周恩来9月13日在先农坛体育场对“二司”南下串联学生的讲话，并强调说：“周恩来同志是我们党中央的领导人，国务院的总理，是毛主席、林彪同志的重要助手。他的讲话，非常重要，所以我自己来讲，来做一个传达。根据这个录音把它记下来，还没校正。同志们，要求一个条件，不能用大字报张贴在你们的机关呀、工厂呀。你们可以记，可以记要点，将来可以把它整理出来，得到总理同意之后，可以印发。你们主要领会它的精神实质，不在于词句，我把这个念完了以后，对外文局争论的问题，如有时间，我个人有个表态，不表态是不对的，哪怕是表态表错了，犯了一次错误，表态犯错误比不表态好。共产党员在任何时候应该要有自己的主张，不要怕字当头，错了，以后证明了就改正，就承认错误。我今天不是念完了周总理的报告就从后门溜走了，到任何时候我都要表示我自己的意见，请你们大家放心。”

接着他又马上声明：“我要求大家不要递纸条，因为纸条战术我们吃不消，我们在北京很多地方讲话，纸条一递就是几十张，几百张，没办法回答，要回答几十张怎么回答！递纸条不注意听讲话，他光搞纸条战术，不注意听，是不是请同志们谅解这一点。周总理的指示我想可以解决你们的问题，领会这个指示很重要。我这个指责不是批评你们两千人，没有这个意思。其它单位有些递纸条是不负责任的，就是骂人，递张纸条就是把你骂一顿，也没有署名，张、王、李、赵？

找不到他。他递张纸条骂你非常尖锐的语言，什么‘一切严重后果由你负责’，‘我给你个最后通牒’，‘你一定回答’，‘你就是当官做老爷’，‘你的官僚主义什么时候纠正’，‘你和黑帮的关系怎么样？’你怎么回答，要回答就得打架，要武斗就不文斗，这样的风气不好，不可提倡。共产党人在大革命中间，既要有革命的热情，同时头脑也要非常冷静。毛主席，我们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导师、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在任何时候都保持高度的革命热情，但在任何时候也都保持了冷静的头脑，我们学也学不到。我们……热情很高的时候，我们的头脑不冷静，有时头脑冷静下来，热情又减低了。毛主席经常讲冷热结合，现在我们有个普遍的毛病，热，热得太多啦。好，我现在书归正传，希望同志们不要搞纸条战术，头脑冷静下来，听一听中央负责同志恩来同志的讲话。”

陈毅开始传达周恩来的讲话：“‘今天本来准备同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总部，要出发到全国各地去串联的红卫兵战士们谈谈话……你们全体一万多人，除了已经离开的以外，此外还有外地区的同学（中山医学院）1000多人，也想来见见。这次谈话，仅仅是将我们的想法谈一谈，同意不同意由你们讨论决定。’周总理是作为一个建议，下面的意见就是个建议，同不同意由红卫兵同志来决定。今天我来念恩来同志的讲话，也是建议，也是同不同意由你们自己决定，请大家搞民主，不是命令，也不是什么中央的决定，也不是什么中央的指示，也不是什么周总理的指示，也是作为一个建议，可以同意，可以不同意。”

接下来，陈毅逐句的传达了周恩来的讲话。然后说：

“好，我现在自己宣布我是主席，休息10分钟，我再讲话发表我自己的建议。”

陈毅自己宣布休息一下，这样的幽默，当然获得大家的热烈鼓掌。

休息过后，陈毅接着讲：“同学们，同志们：我们念了周总理的建议，我回去找几个同志把文字校对一下，可以交给你们打印，每个人得到一份。”众人鼓掌。

陈毅接着说：“但是你们不要传给其它机关，得遵守这么个条件。最近，我们发现有那么一部分同志，把清华大学的大字报，北大的大字报，还有周总理的讲话，他们寄到国外去了，引起了国外使馆同志不安心。日本的记者跑到清华，把周总理的两次讲话，全部地、一字不漏地抄了去了，现在东京的报纸都登出来了，马上美国的《纽约时报》也登出来了。当然，我们天不怕地不怕，怕它登出来干什么，这是革命精神，同志们都有这个革命精神，不像我这个老头子那样子落后。这也属于国家最高机密问题，泄露了机密不好，泄露给帝国主义更不好。今天这个讲话，你们外文出版局同志知道就行，不要去传。其他单位，他传是他们的事，不是你们的事。这是个要求，如果你觉得不可以，可以讨论。刚才讲到国内外区别，文斗、武斗的问题，战斗队、宣传队、学习队，两类矛盾，可以作为我自己的思想认识来交换意见。我自己有看法，我们来交换意见，用不着用周总理的讲话来压人，是真理就大家来辩论。本来我好像念完了这个就应该溜了，本来人家这里是很忙的，现在已经五点半了，今天晚上七点半还有安排，

但还是想讲几句，不重复周总理的讲话。”

陈毅谈到了他对当前“破四旧”的看法：“要把北京的名胜古迹都要搞掉，我坚决不赞成！哪怕你红卫兵来围攻，我还是这样讲的。这对全世界是有吸引力的，毛主席也讲了嘛，古代的文化要批判地接受嘛！去其糟粕，保留它的精华。毛主席就不写白话诗词嘛！他就写古典诗词，写得很好。怎么样对中国革命有利，怎么样对世界革命有利，这是我们要考虑的一个最重要的问题，不是一个狭隘的民族主义。”

陈毅又说到上海的一封来信：“上海有一部分红卫兵给周总理写信，坚决反对演芭蕾舞剧《白毛女》。他说，你如果招待外宾再演《白毛女》，我就要来捣乱会场。最后下了通牒：‘一切严重后果就要由你负责！’”

台下响起笑声。陈毅接着说：“现在演员里有很多是非红五类分子、黑五类的子女。第二，看不惯他们的脚，把他的脚给他砍断。这都有点封建的思想，不仅不够社会主义水平，连资本主义水平也不够。《白毛女》是一个很好的符合毛泽东思想的现代戏。欧洲人哪，亚、非、拉很欣赏这个。我们把芭蕾舞加以革命的改造，这是个名牌，是个尖端，他们看不惯。他要把他的脚砍断，我就要把他这个脚给他保存起来，不让他砍。”众人笑。

陈毅说：“我说，红卫兵同志们，你们这个积极性我们是很佩服的，敢想、敢说、敢做，我们不能给你泼冷水，但是你们这样决定政策是有危险性的，演员是资产阶级出身、地主出身，现在才18、19

岁，解放时，他才一两岁，他有什么罪？为什么不让他当演员？还要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不能把他们排除在外，这个不好，所以，我讲的这段话可能是黑话，你们可以贴我的大字报，也许我这个人出身是地主出身，由地主破落变成为富农，最后富农保持不住了变为赤贫，这是小资产阶级，以后搞文学，我就是个文化人。有很多人不愿意讲，我还讲我是个文化人，其实我的文化也不高，是个文化不高的文化人。文化人的习气很深，多少年没有改造好的一个知识分子。

我现在还是要和上海外办商量，无论如何这次上海招待外宾，还是演这个《白毛女》，演这个芭蕾舞剧。打通这个思想，我们应该注意这一系列的问题，完全可以提出意见，不赞成，我反对，但无论如何不能下这个通牒，要经过大家商量。比如这个字画还要不要？古董玉器还要不要？古画要不要？这个外国货究竟怎么样？我今天就带这个瑞士表，就把它摔掉，买个上海表怎么样？都可以提出意见。但最后决定，恐怕是大家讨论，由中央决定。”

陈毅又说起了伊斯兰教的问题：“前天晚上我们去外交部值班，检查值班，看有没有人值班。我去了，马上值班的副班长就拿个传单：‘行动起来，消灭伊斯兰教’。就是要改变毛主席历来确定的信仰宗教自由的人，立即行动起来消灭这个。周总理把这个看了，便马上召集宗教事务局和统战部开会，说不能够这样做，想办法查出来，是哪个地方发的这个传单，可是这个传单已经传遍全国。就这样的问题，不能草率从事，有极大的危险，马上影响到我们和回教会员的关系。把这些回教会员一下子赶到美国去了，对我们有什么好处？回民和汉

人发生冲突，过去西北几十年搞一次汉回之间的残杀，杀起来没有地方跑，全城都是血迹，几十年搞一次。过去统治阶级故意挑拨汉人杀回民、回民杀汉人。马克思主义讲得很好，宗教这个问题要消灭，要经过长期的教育，让群众自己解决这个问题，不能由其他人下命令去禁止。这样的政策性的问题，抄家、没收、消灭宗教。你们这里有两部分红卫兵，广大的干部，还有革委会，外文局还有党委，是不是各种建议都可以提，各种大字报都可以写，有的采取行动要经过商量。并且希望你们和我打个招呼，我还是外办主任、外交部长，我是个副总理，在我没有罢官之前，希望对我应该有信任，我罢了官那当然没有问题了，新官上任你还是要信得过。

外交部的红卫兵是一个很好的红卫兵，做了很多好事，可是就是个抄家引起了几十个干部子弟之间的矛盾，干部子弟之间闹意见要打架，结果还是外交部红卫兵比较识大体，不抄了，问题就解决了。等我知道了，立即我就发言。我是个外交部长，没罢官以前，我要掌握这个领导权。我说头可断，血可流，我的领导权不能放弃。你们要和我打招呼，我一个月拿几百块钱什么事也不干，不是有愧于心吗？要是发生了事情，两部分打起来打伤了，将来毛主席、刘主席问我怎么办？你是干什么的？你当官做老爷，你是牺牲车马保存你这个老帅，（笑）我没法交待。我讲了很激动的话。希望有重大事情在行动之前，要和革委会商量，和党组，和我们商量。不急嘛！跑到月球上，我也可以把他揪回来，你怕什么？……”

对大家关心的7月份工作组“反逆流”问题，陈毅勇敢地承担责

任。他说："实际上反逆流的主要责任应该是我挑起来的，我这个外办主任、副总理、外交部长，我挑起来，反逆流是我派的工作组来干的，反逆流的责任应该由我挑起来。那时候还有个背景的环境，各个单位都出现这样子，出现很多反动标语，出现了反毛主席的话。那个时候要把陈毅这个大黑帮揪出来，这是很普遍的，有这样的活动的，工作组对这样的问题一点都不表示态度，这也就不可理解了。因此就开展斗争，找材料、搞斗争，开围攻会，斗争了一些好的同志。我今天正式向这些被斗的同志说道歉，向你们道歉！"

台下一片掌声。陈毅接着说："我承认这个错误。在中央全会上就作了自我批评，我说在这个问题上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打击了无产阶级的积极性，请求中央给我处分。你们也可以以这个问题建议中央罢我的官，我不见怪。这个大革命中犯了方向的错误，路线的错误，不要去怪他们。他们是第二位，第二才是工作组负责，工作组组长、副组长负责，然后才是局党组负责，我是负主要责任。张彦是我派的，张彦来你们这里，来一两次就没来了。他要都在你们这，不一定要挨整，也证明他不够好，要好不一定挨整。究竟是什么性质现在还没定，现在停职反省还没罢他的官，还要审查。我老实告诉你们，犯路线性、方向性错误我还不只这一次。我在1928年犯过一次，1929年犯过一次，我犯过两次大的路线、方向性错误，以后我就没犯。原则性的错误我犯过20多次，几乎每年犯一次。今天你们两个红卫兵把两个红卫兵的袖章给我戴上，感觉到你们接收我这个老红卫兵是对我十分重视，我很感谢！但我讲一句，你说我是个犯过错误而愿意改的

老红卫兵，这样接收我，我才满意。你不要以为我是不犯错误的。今天我讲句老实话，在座的同志，你们哪个敢讲你们没犯过错误，你们谁敢站起来说我就没犯过错误，你们哪个敢讲？没哪个敢讲。特别是你们年轻的同志们刚刚开始，乘长风破万里浪，你们刚刚跨出第一步。你们前途无量，你们要记着，在大革命中间不犯错误是不可能的。毛主席，我们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伟大导师，他就没犯过方向性错误，没犯过路线性错误。林彪同志可以这么讲，这是讲我们党里最高领导的情况，其他的同志恐怕很难讲，这是天才。19世纪有两个天才，马克思、恩格斯；20世纪又有两个天才，一个列宁、一个毛泽东。”

台下热烈鼓掌。

陈毅接着说：“我们中国有两个天才，一个毛主席，一个林彪同志，”

掌声又起，众高呼：“毛主席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万岁！万岁！万万岁！”

陈毅继续说：“政治上、组织上、战略上，总路线没犯过错误，没犯过方向性，路线性的错误。……东欧各国，包括古巴很多人谩骂毛主席，很多人点名反对毛主席，说很多诬蔑的话。毛主席根本没有回答，只搞了九评，一评、二评、三评……九评作了原则性回答。……这是最伟大的共产主义风格，不是斤斤较量，甚至不屑于和你较量，不和你辩论，这是伟大的领袖。”

## 第210回：撑病体，三次接见红卫兵

### “毛主席，各族人民想念您”

9月14日，毛泽东在周恩来9月8日关于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农村和工矿文革的请示信上批示：“可即发，不要讨论了。”而周恩来主持起草的“把所有干部都放到火里烧一烧”的文件被毛泽东压下未发。

当天，毛泽东还在李富春9月9日送审的《中共中央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通知》稿上批示：“可即发。”

《中共中央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通知》于当天发出，共六条。《通知》要求：

把《人民日报》九月七日社论《抓革命，促生产》写成大字报，在各机关、企业事业单位张贴，并组织全体职工认真学习讨论。各生产企业，基本建设单位，科学研究、设计单位和商业、服务行业的职工，都应当坚守岗位。学校的红卫兵和革命学生不要进入那些单位串连，以免影响生产、建设、科学研究、设计工作的进行。中央各部直属企业以及各地区的工矿企业、事业和商业、服务业、科研设计单位，凡已经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应当在党委统一领导下，迅速组成两个班子，一个抓革命，一个抓生产、抓业务。

这天，毛泽东第三次审阅经中央文革小组讨论过的国庆节标语口号通知稿后批示：

“林彪同志阅后退陶铸同志照办。凡事要思索，不宜仓

猝作出决定。凡大事要征求较多同志的意见。请陶、周、任重注意。标语、口号由一百条改为二十三条，较好，是一教训。”

这天，毛泽东还在刘少奇呈报他审阅的《在北京各工作组领导干部会议上的检讨提纲（草案）》上批示：“基本上写得很好，很严肃，特别后半段更好。建议以草案形式印发政治局、书记处、工作组（领导干部）、北京市委、中央文化小组各同志讨论一下，提出意见，可能有些收获，然后酌加修改，再作报告，可能稳妥一些，请酌定。”

刘少奇接毛泽东复函的当天，向已接替他主持中央工作的周恩来致信：“我的检讨提纲，毛主席已经看过，并批了一段话，退还给我。现送上，请你看看。我赞成毛主席的意见，以草案形式印发政治局、书记处、工作组领导干部、北京市委、中央文化革命领导小组各同志讨论一下，并请他们提出意见，退还给我，然后酌加修改，再作报告。关于印发事，请你批办，请各同志在几天之内提出意见告我，给我以帮助。主席的批语也印发。如何？请你酌情安排。”

9 月 14 日，中共中央连发［66］478 号《关于县以下农村文化大革命的规定及附件》和［66］479 号《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通知》两份文件，重申中央和国务院的《七二通知》和《七二二通知》仍然有效，以维护工交企业和基本建设的秩序。

《关于县以下农村文化大革命的规定及附件》是对黑龙江双城县人委办公室张凤山给中央文革小组办公室电话的回复，《规定》中要求：“县以下各级的文化大革命，仍按原‘四清’的部署结合进行，依靠本单位的革命群众和广大干部把革命搞好。北京和外地的学生、红卫兵，除省、地委另有布置外，均不到县以下各级机关和社、队去串连，不参加县以下各级的辩论，县以下各级干部和公社社员，也不要外出串连。”“秋收大忙时，应集中力量搞好秋收秋种和秋购，‘四清’运动可以暂时停下来。城市学校的革命师生和红卫兵，也应动员下乡，有组织地到农村参加劳动，帮助秋收。”

《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通知》中指出：“人民日报9月7日《抓革命，促生产》的社论，应当写成大字报，在各机关、企业、事业单位内外张贴，并组织全体职工认真学习讨论；工业（包括国防工业）、农业、交通、财贸部门，应当立即加强或组成各级指挥机构，保证生产、建设、科学研究、设计、市场、收购等工作的正常进行；各企业、基建单位、科研、商业的职工都应当坚守岗位。外出串连的职工和科研设计人员，应当迅速返回原工作岗位。学生不要进入工矿企业、科研单位串连。如对该单位有意见，可送大字报去。三线建设的重点项目、国防工业项目和新工矿区，无论已建成的或正在建设的，都是国家的机密，更应说服其他单位搞文化大

革命的人员，不能随便进入；各地区的工矿企业、事业和商业、服务业、科学研究设计等单位，凡已经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应当在党委统一领导下，迅速组成两个班子：一个班子抓革命，一个班子抓生产，抓业务。职工的文化革命，放在业余时间去搞。还未开展文化大革命、而生产任务又重的单位，文化革命可以推迟进行，但必须对文化大革命进行充分的正面教育，以利以后开展文化大革命；对领导干部须要撤换的应由上级党委主动加以调整，不采取群众直接罢官的做法。”

9月15日，毛泽东第四次审阅陶铸本日晨2时报送的国庆节标语口号通知修改稿后批示：“同意。”

15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向工农兵致敬 向工农兵学习》。社论指出：“生产是不能停下来的。工厂、农村的文化革命，应当按原来的‘四清’运动部署结合进行。农村在秋收大忙的时候，可以把运动暂时停一下。大、中学校的红卫兵和革命师生，不必要到工厂、农村去进行革命串连，干预那里的部署。工人、贫农下中农是完全能够把本单位的革命运动搞好的。同时要指出，工人，公社社员，机关企业干部不能像大、中学校的学生那样放假，也不要到外地去进行革命串连。广大工农群众，应当把从文化革命和‘四清’运动中激发出来的革命热情，用到生产劳动中去，促使各项工作做得更多，更快，更好，更省。”

这时，北京第三次接见红卫兵的各项工作早已准备就绪，计划安排 70 万红卫兵参加接见。恰在此时，发生了一个歹徒劫车撞死卫戍区清河哨卡哨兵并抢走手枪的事件，为保证毛泽东接见红卫兵大会的安全，周恩来决定破案后再接见。9 月 14 日，案件告破。毛泽东又在生病，他于 13 日晚给林彪、周恩来、陶铸写了一封信说："卧病三天，尚有微温，今天略好。可在明天(十四)或后天(十五)上午十时或下午五时在天安门开七十万人大会。我能起床，即去见见群众，不能起床，则请你主持，我不去了。"

15 日下午，病后初愈的毛泽东还是赶到天安门广场，由于推迟了几天，参加接见的红卫兵数量增加到了 100 万。

当天上午，来自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和首都的红卫兵和大中学校的师生，高举着毛泽东像、《毛主席语录》牌和无数面红旗，从四面八方涌向天安门广场和东西长安街广阔的大道上。

第三次接见仍然沿用第二次接见的方法，9 月 15 日下午 17 时 15 分，毛泽东、林彪，以及其他党和国家领导人周恩来、陶铸、陈伯达、邓小平、康生、刘少奇、朱德、李富春、陈云、董必武、陈毅、刘伯承、贺龙、李先念、谭震林、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李雪峰、谢富治等乘 5 辆敞篷吉普车从大会堂东门出发，先接见在广场和长安大街的红卫兵，然后，在《东方红》乐曲声中登上天安门城楼。这时，整个

广场沸腾起来了。百万双手一次又一次地高举起红色的《毛主席语录》，在灿烂的阳光照耀下，就像翻滚着红色浪涛的海洋。“毛主席万岁”、 “毛主席万万岁”的口号声经久不息。

在接受过毛泽东检阅过的千百万红卫兵中，有一位来自西藏的翻身农奴，这个 17 岁的红卫兵手捧一条雪白的哈达，口口声声说要亲手交给毛主席。那条雪白的哈达上，有他们全村 100 多人的深重嘱托和签名。

然而，当毛泽东所乘坐的汽车缓缓通过天安门广场时，这位双手将哈达高高举过头顶的西藏红卫兵才发现，毛泽东离他仍然十分遥远。他看见的毛泽东只是一点模糊的影子，距离那么远，中间还隔着那么多人，这个全村人选出的唯一代表，实在无法完成乡亲们交给他的深重嘱托，“哇”地一声，坐在地上大哭起来。

当时的报刊上登载的一篇采访报道中写道：“时间啊，请你收住脚步；汽车啊，请你开得慢些。翻身农奴的后代，西藏高原的红卫兵，要把人民救星毛主席多看一眼啊！在那‘百年魔怪舞翩跹’的黑暗日子里，他的阿爸被狠毒的领主用马活活拖死在戈壁滩上；他三岁那年，阿妈因为打碎了奴隶主的一个玻璃杯，就被打断了双手双脚，含恨离开了人间。从此，他小小年岁，就成了这座人间地狱中的奴隶。是人民救星毛主席指挥解放军进军西藏，使他和百万翻身农奴一

起，翻身见到了太阳！今天，见到了日夜想念的大救星，这个翻身农奴的后代怎么能够平静呢？”

这位红卫兵离开首都北京返回西藏之前，专门从住地跑到天安门的红墙下，捧起一把泥土包进布袋里，他激动万分地说：“我要把这包天安门下的红土带回西藏，撒在布达拉宫下。天安门和布达拉宫，是西藏人民最神圣和景仰的地方。”

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和学生代表 300 多人，被邀请登上了天安门城楼。他们激动地欢呼跳跃。

解放军高等院校的万名师生，也同红卫兵一起，接受毛泽东的检阅。

这次大会由康生主持。18 时，康生宣布大会开始。接着，林彪、周恩来发表了讲话。随后，首都的红卫兵代表和来自华北、西南、华东、东北、西北、中南地区的学生代表也在大会上讲了话。

红军长征经过的贵州山区来的红卫兵陈保红，代表西南区的革命学生在大会上发言。当她走到扩音器前，刚刚喊了一句：“最敬爱的领袖毛主席”，就激动得说不下去了。

这时，站在天安门上和广场上的红卫兵热烈高呼：“毛主席万岁！”

毛泽东走到她的身旁，轻轻拍拍她的肩膀，鼓励她说下去。

陈保红尽力克制着心里的激动说："我时时刻刻都在想念我们最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我经常做梦梦见我们最敬爱的领袖毛主席……最敬爱的领袖毛主席：我看见了您老人家，全身增添了无穷无尽的力量。"

"我要永远做毛主席的红色小兵，跟着毛主席在阶级斗争的大风大浪中奋勇前进！"

上海复旦大学名噪一时的红卫兵司令安文江后来回忆这次接见说："我在北京见了聂元梓、蒯大富、谭厚兰等，参加了关锋接见，又经人大附中、清华大学几名高干子弟疏通，登上城楼参加了'九一五'红卫兵检阅。当《东方红》乐曲骤然响起，毛主席身穿绿军装，臂佩红卫兵袖章在林彪、周恩来陪同下，向我们步步走近时，我的神经都在抖颤，每个细胞都在扩张，眼泪哗哗地滚下来。我身后的一个女红卫兵幸福得昏死了过去……接见完毕已是黄昏，我以百米冲刺的速度冲进电报大楼。楼厅里正播送'凡拍发毛主席接见内容的电报概不收费'的通知。太好啦！我一口气速写4份，每份电文都长达400字。我要让复旦、定海、妈妈和兄嫂及定山的贫下中农分享我的幸福！若干年后，在四川甘孜地区，我目睹一长串佛门弟子三步一拜，叩得满头鲜血的情状，我才理解这种'幸福感'所包容的愚昧。"

在接见红卫兵之前，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的休息室里认真审看了林彪和周恩来的讲话稿。

林彪在讲话，专门讲到了两种不同的“炮打司令部”，说炮打司令部就是炮打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一些“牛鬼蛇神”企图炮打无产阶级革命的司令部。这篇讲话稿在接见前由陶铸送毛泽东审定，毛泽东对这段话作了加写和改写，强调了不能容许“牛鬼蛇神”炮打无产阶级革命的司令部，“要粉碎这些牛鬼蛇神的阴谋诡计，识破他们，

不要让他们的阴谋得逞。”

在这次接见之前，陶铸曾将替周恩来起草好的讲话稿送周恩来审定，周恩来于 14 日将讲话稿送陶铸时提出：“我仍主只由林彪同志一人讲即可，已函请主席批示。”

陶铸在将讲话稿送毛泽东审定时写道：“我意明天还是林总与总理两个都讲较好。请主席批示。”

毛泽东即批示：“可以由两个人讲。”

周恩来在讲话中提出：“搞好工农业生产，关系很大。”“为了有利于工农业生产的正常进行，大中学校的红卫兵和革命学生，现在不要到工厂、企业单位和县以下的机关、农村人民公社去进行革命串连。那里的革命，要按照原来的‘四清’部署，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工厂、农村不能像学校那样放假，停止生产来闹革命。”

大会讲话结束后，毛泽东在欢呼声中，走向天安门城楼的东西两头，向大家招手致意。

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了来自全国各地的 300 多名红卫兵和学生代表，并同他们一起照了相。

此时，天已渐渐黑了下来。天安门城楼和广场四周灯火通明。原来在广场上的数十万学生，按照大会的统一指挥，秩序井然地向南移动，让原来聚集在东西长安街的几十万渴望见到毛泽东的学生进入广场。

到第三次接见时，周恩来对毛泽东说：“已经见了好几

百万了，火车、吃饭、住宿一切都免费，再来就困难了。”

毛泽东说：“现在才是开始，我要接见成千万。”

毛泽东和刘少奇在天安门上

1966 年 9 月 15 日毛泽东、林彪、周恩来、江青、康生在天安门城楼上

1966 年 9 月 15 日毛主席在天安门广场检阅红卫兵

晚上 18 时 30 分，毛泽东与林彪及其他领导人，再一次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毛泽东不断地挥手，又走向城楼东西两侧，再一次同广大群众见面。当毛泽东出现在天安门上，全场一片欢腾，“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声响彻云霄。

在天安门城楼上的红卫兵代表中有被称为“毛主席的好干部”的兰考县委书记焦裕禄的二女儿焦守云，当时她只有 13 岁。她跑到了毛泽东面前，旁边的人对毛泽东说：“她是焦裕禄同志的女儿。”

毛泽东笑着拉住她的手，与林彪一起同她合影。

焦守云激动地说：“见到了毛主席，是我最大的幸福。我一定要像爸爸那样，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永远听毛主席的

话，做毛主席的好学生。”

这次接见持续到晚21时才结束。

在接见时，周恩来特意安排了“西纠”红卫兵向毛泽东敬献纠察队袖章，毛泽东没有接受“西纠”红卫兵的袖章。

9月16日，康生给毛泽东写信说：“我长期怀疑少奇同志要安子文、薄一波等人自首出狱的决定。”“最近我找人翻阅了1936年8、9月的背景报纸，从他们登报的‘反共启示’来看，证明这一决定是完全错误的，是一个反共决定。”“有些人本来就已经或企图‘叛党保命’，少奇的决定，就使这些人的反共叛党合法化了。”“随信附上1936年有关报纸的影印件。”9月中旬，毛泽东批示：“已阅。”

9月16日，毛泽东第五次在陶铸当天再次送审的国庆节标语口号通知修改稿上批示：“同意。”这次送审稿中，加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加强工农联盟”两条口号，成为25条。

9月17日，中共中央将《关于1966年国庆节挂像、抬像办法和标语口号的通知》发到县团级。

17日，《人民日报》转载《红旗》杂志第十二期社论《掌握斗争的大方向》。社论指出：

集中力量打击一小撮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打击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是斗争的大方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目的，绝对不是斗争一切领导干部，也绝对不是斗争

群众。决不允许用任何借口，任何方式，打击革命积极分子，挑动群众斗群众。

第211回：下贵州，李再含引起关注　宝塔山，朝圣学生千千万

自从 9 月 5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发出《关于组织外地高等学校革命学生、中等学校革命学生来北京参观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通知》后，贵阳地区大专院校学生，几乎全部上京，中学生也陆续外出串联，贵阳市于是又平静了下来。北京南下串联核心组决定派一个赴京代表团返回北京，向党中央反映贵州文化大革命情况。代表团由李文带队，于 9 月 11 日中午时分乘火车离开贵阳。

那天火车上非常热闹，挤满了串联队的学生。北大有两个学生带了一名工人挤到代表团所在的卧铺车厢，介绍说："这是一个工人造反派，因为揭发省市委调动工人镇压南下串联队的罪行，遭到单位批斗，现在他逃出来，要到北京去告状，要求我们保护他。"

那人个子高高的，操湖南口音，自我介绍叫李铁乃。

李文同意了，叫他爬到上铺躲起来。

第二天，9 月 12 日，贵州省军区副政委李再含致信贵州省委第一书记贾启允：

启允同志:

这一段因为没有召开文化革命领导小组会议，作为小组成员，我应该把自己的意见告诉你，为了引起你的重视，我采用了书面提出的方式。

一、当前贵阳文化大革命出现的矛盾，究竟主要是敌我矛盾，还是人民内部矛盾。我认为主要的还是人民内部矛盾。出现某些敌我矛盾的现象，在广大群众来说，也是由于我们对某些重大问题处理不当

而转化的。

二、当前矛盾的焦点集中在省、市委，南下学生和本地部分群众对省委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领导意见。这个矛盾不解决，就有继续恶化的危险。解决这个矛盾的主导方面在省委。

三、省委的个别领导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确有某些错误，需要作认真地自我批评，否则将继续被动。

四、工人斗学生的情况已基本制止，但学生斗学生的现象，尤其是本地学生同南下学生的对立上并未解决。这种全面对立，不仅打击了中间派，也打击了左派。有必要采取有效措施，扭转这个情况。

五、建议在适当的时候，召开领导小组会议，或小组成员列席省委会议，对前一段贵阳文化革命作出基本估价，以便同群众见面时争取主动。

当否请指示

李再含

1966 年 9 月 12 日

9 月 14 日下午，贵州赴京代表团代表抵达北京。他们首先来到国务院文革接待站，要求周恩来总理接见。16 时左右，国务院办公室来了一名副主任、一名秘书专门接待。他们说："周总理很忙，抽不出身来，由我们两个先听取大家汇报，再向总理报告。"

当代表团的张甦汇报说："'95 事件'中贵州省市委组织、指挥十几万人围斗南下串联队"时，那位副主任表示怀疑说："十几万？不可能吧。你们说话要实事求是。"

张甦身边一位代表马上就冒火了，站起来，声严色厉反驳那位副主任。其他代表也对他一顿批评。那位副主任一时慌了神，赶快作检讨。

于是张甦现身说法，把他自己在“九五”事件中的亲身遭遇讲了一遍。他还问那位副主任：“9 月 7 日我们请贵州省委张健民同志帮我们发给国务院办公室的电报收到了没有？”

那位副主任回答说：“收到了，只是不太相信电报讲的情况。”

最后，那位副主任再次作自我批评，并保证把大家反映的情况向周恩来总理汇报。代表团汇报小组的成员就坐在接待站办公室里等着。到了半夜时分，那位副主任出来告诉他们说：“周总理很忙，今晚肯定接见不成了。什么时候接见，要等通知。”最后他问了问代表团留下来的人数，就进去了。又过了一阵子，副主任再次出来，对他们讲：“经过周总理批准，欢迎你们几位同学明天上天安门广场的观礼台，接受毛主席的检阅！”说着就把观礼券分发给他们，这些代表此时的心情非常激动！

9 月 15 日，贵州省军区副政委李再含再次致函贾启允：

启允同志:

你的讲话，作为表态，我表示拥护。现在需要进一步采取行动，把主动权争取回来。

九月五日晚至七日，贵阳确实出现了白色恐怖，大批斗争了南下革命学生和地化所的工作人员。在此期间有些工人、干部也被斗或被打成反革命。问题的性质是严重的。

为了及早解决南下革命学生、地化所、工农红卫兵等广大革命群众同省、市委的对立，我建议省委勇敢地同他们协商一个解决办法，召开一个适当的会议，我们同他们面对面地作认真的自我批评。正确地彻底地解决这个矛盾，看来是不可避免的了。解决的时间越快越好，否则我们将会更加被动。

供你参考

此致

敬礼

李再含

1966 年 9 月 15 日

9 月 17 日，中央文革记者站派往贵州的贵阳记者组乘飞机抵达贵阳，他们是由解放军政治学院的学员队队长、12 级干部张子良为组长，政治学院哲学教研室教员刘希政、政治学院宣传部干事张云勋 3 人组成，以《光明日报》记者的名义，来到贵州了解这里的文革情况。当时只有贵州省军区的主要负责人知道他们是中央文革派来的。

刚接受这个任务时，张子良 3 人都有些紧张和新奇，有一种当“红色特务”的感觉。

贵州省军区派车到机场将他们接到军区贵宾招待所，离军区大门不远。并给他们派了一辆专车和司机，随叫随到。

到贵阳的当天晚上，他们就到市中心广场喷水池去了解情况，因为那里正在召开造反派的集会，控诉“95 事件”。

17 日夜，3 位军人以记者身份第一次在贵阳参加如此乱哄哄的群

众集会，并且被请上主席台。他们开始有些惶惶然，觉得如此复杂的事件，仅凭他们 3 个人简单地了解，就能弄清楚吗？后来发现，这种担心完全是多余的。他们的工作其实不难，因为他们并不具体处理问题，拿出解决问题的意见。只要把各种代表人物的观点，客观地向上面反映就算完成任务了。根据这个精神，他们先后采访了各种有代表性的人物，如在省委中找了省长李立和省委书记贾启允等，在造反派中找了几所大专院校和中科院地球化学所的造反派头头等。通过采访很明显地看出两种不同的公开的观点，根本不必加以分析，不必表示赞成谁的观点，将原话加以概括向上报告就能说明问题了。例如，在群众组织游行示威时，两派的口号是明显对立的。一派喊："省委会有问题，大方向错误的。"另一派就喊："省委会问题，大方向正确的。"按照当时的标准，谁是保守派，谁是造反派是很清楚的。

有一次两派红卫兵代表在一起开会批判省委领导，两派都争着领念《毛主席语录》。一派只选如何全面看干部的《语录》，一派就专读造反有理，革命不是绣花，和反走资派的《语录》。从所选《语录》中就很明显地看出两派不同的观点。同时，两派红卫兵都争着要领念最后一则《语录》，让大家跟着念。似乎谁领念到最后谁就是胜利者。结果，两种《毛主席语录》打架，光念语录就念了一个多小时，使会议根本无法开下去，只好不欢而散。

这 3 位记者在最初一两周内，几乎每天都通过省军区用电话和电报的形式向中央文革记者站汇报，包括：1、贾启允回贵阳后的动态。2、贵州省三干会简况。3、省委副书记张健民认为省委对改正错误信

心不大。4、新华社记者戚休的发言。5、贵州工人中的造反组织。6、省长李立的看法。7、李再含给中央的信。

贵州省军区的司令员兼政委石新安是位老红军，他对文革中的一些做法看不惯。对他的谈话，记者们未加评论，只是按他的原话，客观地作了报导。在军区领导中，只有副政委李再含参军前读过中学，是文化较高的老干部。他身体干瘦，个子不高，像个文弱书生。李再含主动来找记者组，要求他们向中央转送他的信，并表明他是坚决支持造反派的。

李再含的这种态度在当时的部队领导中是较少见的。但是，却与中央的精神是一致的。当时，在干部队伍中，往往是文化程度较高者反而较早地接受了文革的思想。贵州记者组如获至宝，积极地将他的信和他的谈话记录，用电报发往中央文革。

9 月 20 日，9 月 24 日及 10 月李再含又连续给贾启允写了 4 封信，前后共致信 6 封。

再说贵州赴京代表团于 9 月 15 日接受毛主席检阅后，又在国务院接待站等了 3 天。最后，还是国务院办公室那位副主任来接待他们。那位副主任说："你们反映的情况，我们都如实向总理报告了，总理要我转告你们，你们一定要相信贵州的广大群众和广大干部，要相信他们，依靠他们，要让他们自己起来闹革命。"

代表团成员在京经过短暂休整，于 9 月 21 日离京，9 月 24 日抵达贵阳。 于 9 月 27 日晚上，在贵阳市邮电大楼前广场召开了声势浩大的汇报大会。

此时，红卫兵大串联的洪流，迅速在全中国形成了无数条布满红旗、红袖章的河流。北京、延安、井冈山、韶山、大寨、瑞金、遵义等革命圣地聚集了密密层层的身穿绿军装、头戴绿军帽的红卫兵。数以千万人计的红卫兵奔走在千山万水间，蔚为奇观。

66.12.7.

据不完全资料统计，1966 年 8 月到 12 月，滞留在北京的红卫兵最多时达到 250 万，大寨 20 余万，韶山 40 余万，井冈山茨坪仅三平方公里也聚集了 20 万，仅有 400 个铺位的井冈山大厦挤进了一万多人。

最幸运也最实惠的是到北京串联的红卫兵。毛泽东天安门城楼上的大检阅，激发了他们心中潜藏的冲天豪情，天安门成了千百万红卫兵们心中最为向往的革命圣地。

而且，北京是文化大革命的策源地，能一个子儿不花到那里串联，当然是件幸福的事。从内蒙古草原的牧羊少女，到西藏高原的翻身农奴；从天山脚下的维吾尔青年，到图们江畔的朝鲜族小将……红卫兵跨越万水千山，聚集到了祖国的心脏----首都北京。

对于南方的红卫兵来说，心中还有一个激动人心的秘密：到了北京，就能够看见雪啦！有的红卫兵则一心只想着尝一尝北京烤鸭。尽

管北京气候寒冷，天寒地冻，但是上头有明文规定，“在接待站每个红卫兵可凭串联证领借一件大衣”，如此照顾红卫兵，红卫兵的滚滚洪流更是从四面八方向北京涌来。

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外地革命师生串联临时乘车证
汽车、电车各路通用
（长途路线无效）
1966年　　月　　日前有效
票价¥1.00元　编号（No 520633　）

红卫兵乘车证

延安，中国共产党的圣地，位于黄河中游，依山傍水，四周沟壑纵横，黄土丘陵连绵起伏，如黄色的波浪。道道河谷蜿蜒在山城四周，像绿色的彩带环绕。城南有一座宝塔，九层八棱，矗立此巅。阳光斜照，静穆中，宝塔显得庄严雄浑，挺拔秀伟。

不少国际友人来中国，都会到延安参观访问。仅1966年的头5个月，就有五大洲50多个国家的700多名外国朋友去延安访问。在当年的留言簿上，记有这样的话语：“延安是中国人民的革命圣地，是世界人民的革命圣地。延安窑洞里的毛泽东思想光辉将普照全世界。”定居中国，在“文化大革命’中也曾风光一阵子的美国人李敦白说道：“毛泽东主席是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是美国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伟大领袖，也是世界革命人民的伟大领袖、导师和旗手。”

越南代表团成员参观了毛泽东到延安后居住的第一个窑洞，看到窑洞里只有一张桌子、一把罗圈椅、一张木板床和一个烤火盆，几乎

再没有什么陈设，激动得久久不愿离去，说："能在毛主席住过的窑洞里站一站也是最大的幸福。"

锡兰工会代表团成员在留言簿上写道："毛泽东是活着的列宁。"日本歌声代表团副秘书长齐藤良三说："我亲眼看见中国人民由于有了毛主席的领导，确确实实地把中国建设成了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我感到毛泽东思想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非洲朋友则表示："在我们国家里，反动政府发现谁有《毛泽东选集》，谁就要坐牢。可是我们还是要在中国买《毛泽东选集》，想办法带回去。"

大中学校的学生们从报纸上看到这类消息，心中自然无比激动。连外国人都赞不绝口，自己当然不能不加倍珍惜。大串联一兴起，千千万万的青年学生便涌向黄土高原，去瞻仰革命圣地延安。

来延安的红卫兵，第一件事是喝一口延河水。红卫兵们捧起浑黄的河水，喝进肚子里，一面或咽或吐残留在口中的泥沙，一面学着李玉和的腔调说："喝一口延河水，今后什么样的水都能对付。"京剧现代戏《红灯记》中的李玉和，他在赴日本鬼子鸠山的鸿门宴之前，喝了他母亲的一碗壮行酒，对妈说："有您这碗酒垫底，什么样的酒我都能对付！"意在表现革命者大无畏的精神。

可是，延河到秋天一发水，河水变浑，喝惯开水的学生们多少有点心里打鼓，一听有人说："喝了延河水，什么水都不怕"，竟理解为：如果这么脏的水喝下去都不拉肚子，那你就放开胆子喝生水吧，保准没事。

有个北京的中学生叫楚延生也是这群喝延河水中的一员，他喜欢

吹牛，自称是延安生的，言下之意，自己的父母是延安时期的老革命。了解底细的人知道，他的父母都是“臭老九”，一个是大夫，一个是教师，从来没去过延安。叫延生是因为过了预产期20多天，他才迟迟降生，为纪念此事，父母为他起名延生。

延生不爱与同班同学来往，结识了一伙新战友出来串联。延安是他们西北之行的第二站。第一站是古都西安。原本他想由陕西入川，去看武侯祠、杜甫草堂的。不留神吹牛走了嘴，说自己是喝延安水长大的红小鬼，说得同行的女学生一个个羡慕地往他身边凑，他无法一下刹车转向，只好顺水推舟说：“你们想去哪儿我不管，我是一定要去延安。那里不仅仅对全国人民具有革命的意义，还是生我育我的母亲。”

有十几个红卫兵战士，以女性居多，表示愿意去延安。延生便硬着头皮充当了一回小头头，率领一个红卫兵小分队北上革命圣地延安。

到了延安，喝过延河水，爬上宝塔山，延生庄严地让十几个同伴列队，向建于明代，经清代多次修缮，同时又象征无产阶级革命圣地的宝塔致以革命的敬礼。

“文化大革命”中，无数古代文物或砸或毁，至少也要封闭，不许它们继续散发毒气，唯有延安宝塔，独领风骚，不但未损毫发，而且香火更盛，从8月18日以后，连续半年的时间里，每天朝拜之人络绎不绝。人多的时候，土山之上站满人群，久而久之，绿色的草丛被踏秃，树上的叶子被揪光，黄土、绿叶被红卫兵虔诚地装进背包，留作永久的纪念。

延生等人先住在城里一所中学，后来，延生说自己是在延安的窑洞里出生的，一定要住到村里老乡家。最后终于住进杨家岭沟里的一座窑洞中。

在延安的活动，主要是参观毛泽东旧居和其他革命遗迹。延生比那些初中的女学生多念了几本书，便把书中的知识当作他父母的经历或回忆，讲述出来，令她们感叹不已，愈加钦佩他。

在凤凰山毛泽东旧居，延生告诉同伴，不朽著作《实践论》、《矛盾论》就是伟大领袖在这里写的。他还抢在女学生们步入旧居前，神秘地说："你们都知道白求恩大夫，也知道毛主席和白求恩只见过一面，可是，你们知道这一面是在哪儿见的吗？"

楚延生故意停下，让好奇心重的女孩猜一通，然后转身指着毛泽东旧居说："历史上伟大的瞬间就发生在这里。"

讲解员的介绍，文字说明，都与延生所说吻合。女孩子们说："延生，你知道得真多。"

延生说："我爸爸当年是白求恩大夫的助手。那次难忘的会见，就是由我爸爸翻译的。"

一个女孩奇怪地问："不是说毛主席外语特棒吗？不仅英语特棒，而且还精通德语、俄语，他老人家阅读马列著作，看的都是原文的，所以他老人家说，吃被人嚼过的馍没有味道。"

延生几乎被憋住没话可说了。他吹牛胡编的本事固然不小，胆子却不大，吓死他也不敢说伟大导师、世界人民心中的红太阳英语不过硬，还得用翻译和白求恩聊天。

他支吾几句，顾左右而言他。走到杨家岭革命旧址，众人虔敬地瞻仰中央大礼堂、中央办公厅的小楼，又爬上山，去瞻仰伟人居住过的地方。延生猛然想起了什么，叫住几个同伴，说歇歇脚再参观主席旧居。他几句话又扯回革命导师的外语问题上，说："毛主席的外语，特别是英语，把美国人都镇得一愣一愣的。可是，翻译还是需要的。你们想想，毛主席是党的领袖，是全国人民、世界人民心中的红太阳，地位摆在那儿呢，接见外国友人，没个翻译哪儿行啊。要的就是这个派！"

众人点头称是。

延生说："我再给你们说一段历史性的事件——一次伟大的会见。"楚延生抬手指指北面山上的窑洞，说："1946年8月，毛主席在那里接见了美国记者安娜·路易丝·斯特朗，那句光芒万丈的历史名言，'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就是在那次谈话时讲的。你们知道吗？当时的中国翻译把主席讲的'纸老虎'翻译成'稻草人'，毛主席一听，不对，翻译没充分理解自己的意思，只好打断翻译的翻译，自己讲起英语。他告诉美国记者，反动派不是稻草人，稻草人只能吓唬麻雀，而反动派的样子很凶恶，像老虎，所以能吓住一些人，但反动派外强中干，是纸做的老虎，你一打，它就倒。稻草人和纸老虎，差之毫厘，失之千里。美国人当时对毛主席佩服得五体投地。"

几个女孩对延生也几乎五体投地，问他是怎么知道的。他看着那一双双纯洁的眼睛，几乎忍不住要告诉她们，自己今天早上趁大伙还没起床的时候，已经先到这里来了一趟。然而他的善良天性没能战胜

虚荣心，还是装出很深沉的样子说：“我爸爸告诉我的。”

“那个翻译是你爸爸？”一个女孩问。

“不，不是。”延生还没忘记他已经把自己的老爹定位在白求恩助手的岗位上了。他陷入沉思中似的回忆说：“翻译是我妈妈……”

哇！一片惊叹。但分明有几个人的眼神中放射出不信、怀疑的目光。延生一向追求完美，见状立即续上话语：“是我妈妈的好朋友。我妈妈的外语就是那位翻译教的。”

第212回：井冈山，洪流滚滚奔“摇篮”　改历史，朱德扁担不见了

此时的井冈山也承受着巨大的接待任务。9月份，东北农学院、哈尔滨、江西九江、桂林、上海交大、北京农业大学、北京43中、人大附中、北大附中、湖南水利学院、北京红卫兵战校、北京地质学院等15个单位的红卫兵参观井冈山。10月份的记录上，有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领衔女主角聂元梓的姓名。粗略统计共40批，计5743人。到11月份，井冈山革命斗争博物馆由于人太多，每天闭馆的时间推迟到23点30分。从1966年9月到次年1月，仅仅5个月的时间里，不足5万人口的井冈山人民，接待串联的革命师生100余万人，耗资 250万元人民币。

报告文学作家胡平、张胜友在《历史深思录——井冈山红卫兵大串联二十周年祭》一文中，对井冈山红卫兵大串联的情况作了精彩详细的描述：

“一夜之间，井冈山的肩头，与北京、上海、广州等大都市一道，承受了当时中国最沉重的负荷；一夜之间，所有的机关、所有的商店、所有的家庭、所有的学校，有了压倒一切的任务。山上的中枢机构是红卫兵接待办公室，下设宣传组、秘书组、生活组、保卫组。仅生活组，就配备50余名干部。接待办公室下辖17个接待站，在茨坪就有7个。沟边、拿山、厦坪、石狮口、罗浮、桐木岭、朱沙冲、黄坳、大井等处也分别设有接待站。大部分接待站，由井冈山附近的吉安、泰和、荷花、宁冈、遂川、安福、永新、永丰等县负责，每一个接待站由一个县来一套人马，从管理干部，到工作人员、炊事人员，从搭棚

到购置锅盆碗盏，全包了。所需经费和粮食，则由接待办公室拨付。仅17个接待站的炊事员，加起来就有近千名。”

天南海北奔涌而来的红卫兵们走进苍茫的十万大山中，领略“苍山似海，残阳如血”的诗画意境，心中的豪情又增几分。他们顾不得放下行李、落实住处，也顾不得拂去满身灰尘、弄盆热水来揩把脸、泡泡脚，红卫兵们登上井冈山的第一件事，就是来到博物馆中厅的毛泽东雕像前，齐声高诵《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

“毛泽东同志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

巍巍五百里井冈作回音壁，那一字一句不像是从嗓子眼里流出来的，倒更像是从血管里涌出来的鲜红的波涛。

背诵过《语录》后，一个个红卫兵在自己长征队的旗帜上写下各人的名字，“在厅的两侧，摆满了献上的旗帜。谁都想让自己的队旗享有一个醒目的位置，占据更大的面积。为此，工作人员每天都要收走一批。到大串联结束时，博物馆收到的旗帜，叠在一起，下至地板，上至天花板，整整塞满了一个房间。”

在奔赴井冈山的千军万马之中，还有一队红卫兵怀着“扎根井冈山干革命，跟着毛主席献青春”的凌云壮志，告别了首都北京，告别了亲朋好友。

扎根井冈山的发起者是北京大学附中高三学生朱彤。

在学校里，人们背后称他为洪常青。这不仅因为他长得眉清目秀，

令人联想到电影《红色娘子军》中的男主角，更是由于他发起成立一个红卫兵组织“东方红”。这个红卫兵组织里，女性居多，只有他和一个初中学生是男性，于是得此雅号。他属于“造反倍觉毛主席亲”一类后起的红卫兵，其父是人民大学教师，据说曾经扬言要“杀三千共产党人”，革命干部的后代岂能放过如此罪大恶极的“狗患子”，文化大革命初期他惨遭毒打，险些丧命。

然而天无绝人之路，伟大的导师毛主席扭转乾坤，发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战略部署，一夜之间。“狗崽子”变成了“洪常青”。

身为“狗崽子”的朱彤，像当时千千万万的青年学生一样，无限敬仰毛主席，无限崇拜毛主席。他尤其崇拜毛泽东的叛逆精神，敬仰毛泽东的伟大品格。他下定决心，听毛主席的话，走毛主席指引的——也是毛泽东本人亲身实践过的路：到人民大众中去，到最艰苦的地方去。

他选择了井冈山。在伟人生活、战斗过的地方生活、战斗，将会是多么威武雄壮的情景！

一行人从吉安下车，开始步行。盘山道上，悬崖险峻，渊涧幽深，松杉竹幌盘根错节，繁茂峥嵘。山风吹过，枝摇叶瑟，苍劲沉郁。不时传来野鸡、杜鹃的呼鸣，闪过猴群往来丛木的骚动。行进在威严苍茫的罗霄山脉，从8岁起就背上沉重的人生十字架，尝遍人世苦辣冷暖的朱彤，心底油然升起一种自信。他挺直不堪重负过早弯曲的脊背，仿佛要抖掉背上的歧视与屈辱。他打起精神，带领和他一样报着大丈夫一去兮不复还的慷慨情怀的战友们，唱起“红军不怕远征难”。

一个同属“狗崽子”的井冈山朝圣者曾这样描述他当时的心情：“我们此行将不是以后辈人的身份，去瞻仰井冈山，而是以先行者的脚步，去跟随正烧红中国第一架大山的毛委员。肝脑涂地吧，热血冲天吧，我们将以此证明自己的体内没有黑心，没有反骨，有的只是一腔搏动着的忠诚！”

朱彤来井冈山扎根干革命，井冈山有哪一个领导能表态呢？朱彤等人在井冈山上呆下去。他相信，只要心诚，石头也能开花。

像所有来井冈山的红卫兵一样，朱彤一行人顾不上找住处、休息吃饭，先列队于博物馆中厅的毛泽东塑像前，敬祝万寿无疆，献上无限忠于他老人家的青春的心，然后在自己的红旗上，郑重地在留上姓名，将红旗放到毛泽东塑像前。

井冈山的革命博物馆里红旗堆积如山，毛泽东的旧居里，红旗遮住墙壁。毛泽东旧居后有两棵树，旧居被烧时，一并被烧，后又复芽，生机勃勃，当地人称之为“常青树”。红卫兵将自己的红臂章挂到树梢上，微风吹动，飘飘摇摇，有如一团烈火在燃烧。

朱彤等人由于做了长期打算，准备充足，境况稍好，白天精力充沛，饱览了井冈山雄伟景象。

他们登上黄洋界哨口，举目四望，只见苍山似海，群峰如浪，数百里的白云翻滚。引导学生的工作人员介绍：1928年8月底，著名的黄洋界保卫战就发生在这里。当时守山的红军部队不到一个营，依靠毛泽东思想的无比威力，借助黄洋界地势险要，打垮敌人4个团的进攻。毛泽东为此写下“黄洋界上炮声隆，报道敌军宵遁”的诗句。

黄洋界西侧，路旁有一棵木荷树，高十余文，几个人才能合抱过来。枝叶繁茂，像把大伞。当年毛泽东、朱德率红军战士挑粮上山时，常在此休息。红卫兵小将们听到此，仰面观看，只见树杈上早已经挂满鲜红的臂章，便有人用木棍竹竿把自己的红卫兵臂章挂上去，为那团红色的烈焰增添一份热量。

在大自然的宏伟神奇里，听着革命先辈惊天地泣鬼神的英雄事迹，谁能不感奋、不激动？

不知是谁喊了一声，紧接着，在这海拔1400米高的天空，滚荡起了一片又一片、一阵又一阵的呼喊：

“毛主席万岁！”

“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没有谁在安排，每天却绝对是同一个程序。接下来，从五湖四海走到一起来的红卫兵小将们不约而同，齐声高唱毛主席诗词《西江月·井冈山》：

山下旌旗在望，

山头鼓角相闻。

……

黄洋界上炮声隆，

报道敌军宵遁。

大山之中，歌声、呼喊声激荡，惊醒沉寂了几十年的山峦，以为战事又起，发出低沉的回音。

他们从黄洋界下山，来到井冈山五井之一的小井。这里地势险峻，

飞瀑直下龙潭。向导向红卫兵介绍：此处曾建红军医院。1929年1月，毛泽东、朱德、陈毅率红军主力出征，敌人乘机进犯。小井医院中100多名伤病员来不及转移，被敌人赶到附近一块稻田里。在敌人的严刑拷打面前，红军战士英勇不屈，没有暴露任何情况，全部被敌人杀害。

红卫兵小将怀着沉痛的心情在烈士墓前默哀。

在一座古庙旁，井冈山的向导向学生们介绍不远处的一个石洞——游击洞，洞口荆棘丛生，十分隐蔽，洞内很深，干燥坚固；可容四五百人。1929年1月，红军主力出征，敌人进犯时，留守红军就隐蔽在山洞里，和敌人进行艰苦卓绝的游击战。

朱彤听着介绍讲解，看着一处处革命遗迹，一时忘却了背上的十字架和心中的屈辱与创伤。他沐浴革命的气息，升腾起干一番事业的豪情，更坚定了在井冈山扎根的决心。

井冈山上，造反的第一颗火种，是由东北农学院的红卫兵点燃的。这块革命的圣地，也无可避免地经受了“文化大革命”战火的洗礼。

1966年9月的一天，首批上山的东北林学院红卫兵喊出了“炮打井冈山管理局党委”的口号。井冈山人虽然也读书看报、听广播，但毕竟生活在大山里，未能及时跟上已经搬到北京城的毛泽东。他们靠共产党、毛泽东的早期历史而名扬天下，炮轰党委不就是反对共产党吗？更何况，一群嘴上无毛、乳臭未干的娃娃，念了几天书，刚刚晓得了地球是圆的，人是猴变过来的，有什么资格在革命圣地张牙舞爪指手画脚？

当地群众与上山来的红卫兵情绪上产生对立，进而变为行动。井

冈山大厦前，十几个红卫兵和数十倍于此数的当地干部、群众，展开了一场激烈的大辩论。

红卫兵一方的观点是："炮打司令部！炮打井冈山管理局党委！"

与之对抗的观点是："井冈山人不是阿斗，井冈山的文化大革命不需要外界插手！"

针锋相对，火药味甚浓。一边是外来红卫兵，是毛泽东呼唤出来造反的"孙猴子"，自认为有毛泽东撑腰，不可一世；另一边是革命圣地井冈山的儿女，是从里红到外的无产阶级，以毛委员的老战友自居，有恃无恐。后者更有天时地利人和作为依托。双方都能从《毛主席语录》中找到杀伤力极强的武器。

"吃共产党的饭，穿共产党的衣，进共产党的学堂，现在倒跑到井冈山上来造共产党的反了！"显然，井冈山儿女们的生活节奏慢了半拍，他们似乎还不知道北京的造反形势发展到了什么样的程度

辩论的双方，在辩论尚未开始前便已经分出胜负，靠的是实力，而不是说理，这在中国已有几千年传统。没有多少文化的老百姓生来就明白此中奥秘，而青年学生们却没有从书本中学到这条道理。辩论的气氛越来越紧张，愤怒的井冈山儿女情急之下，有人动手打人了。红卫兵揪出几个打手，周围更多的人群一拥而上，说是劝架，推推搡搡中不断有人向外地红卫兵暗送拳头。红卫兵跌跌撞撞后退。一场关于如何革命的争论演变成了街头地痞似的打斗。结果是在一片"要文斗，不要武斗"的呼喊中，红卫兵小将鼻青脸肿，跌跌撞撞，被撵下山。接待站拒绝再留宿，当晚，这一行红卫兵只得怏怏下山。

井冈山造反的第一粒火种熄灭了。熄灭得窝囊，让人总觉得不甘心。

11月，东北农学院的红卫兵再度上山。这回情况不一样了。连毛泽东都在“炮打司令部”，井冈山党委岂有不许造反的道理？

在罗浮，红卫兵首次揪斗了山上的一批领导干部。

在茨坪，红卫兵直奔公安局：“你们打电话去学院调查我们的成分、表现，现在必须把黑材料交出来！”红卫兵听毛泽东的话起来造反，公安局却在背后整“黑材料”，企图“秋后算账”，红卫兵们的气愤可想而知。他们抡起斧头，把文件柜、办公桌乱砸一气，木屑纷飞，纸张遍地。堂堂的无产阶级专政机关，在造反的红卫兵面前，第一次丧失了威风。

曾经以众志成城、岿然不动自豪的井冈山人无法再保持静默了。井冈山人建立了自己的红卫兵组织。组织的名称也带有井冈山革命历史印记。一方叫“红四军团第三十一团”，因为历史上这个番号所属部队是毛泽东秋收起义后带上井冈山的，是资格最老的“红卫兵”，今天的井冈山红卫兵自然也是毛泽东的嫡系部队。对立面打出“三猛战斗队”的旗号。“三猛”得名于副统帅林彪当年提出的战术：猛打、猛冲、猛追。

井冈山的主要领导——井冈山管理局党委书记农林、局长孙景玉、党委副书记段奇逸等人被揪出来，批斗。

在井冈山博物馆里，红卫兵在第一展厅的“八一起义”部分，涂写了“朱德是个大军阀”、“贺龙是土匪”、“陈毅是老机（机会主义）、

老右”等字句；在第三展厅的一幅朱德毛泽东会师、成立红四军的巨型油画上，朱德的腿上被打了叉叉；在第四展厅红五军坚持井冈山斗争部分，张贴了“这是为大阴谋家、野心家彭德怀歌功颂德！”的标语；在几排起装饰作用的松柏木雕图案上，红卫兵发现12根叶针组成一圈，无疑象征着国民党的党徽，当即撬下，作为一起严重的“反革命事件”，追查谁是设计者及其家庭成分、社会背景；朱德题书的“井冈山革命斗争博物馆”横匾被倒了过来，并书上“批判馆”三个大字取而代之……。

由于毛泽东、朱德奉命率主力部队西征，彭德怀带领少数部队守山时，大股敌人进犯，彭德怀寡不敌众，率部突围，留下100多名伤病员未能转移，遭敌人杀害。于是彭德怀在井冈山又多了一条罪名：“屠杀革命烈士的刽子手、国民党反动派的帮凶”。

红卫兵小将们都从语文课本里读到过“朱德的扁担”，课文讲述了朱德的一件平凡往事：在井冈山时期，朱德常常和战士们一起挑粮上山。战士们非常爱护自己的军长，不让他挑粮，偷走他的扁担。朱德就在新扁担上写下“朱德记”三个字。红卫兵小将们上山后，已见不到朱德的扁担，取而代之的是五幅油画：画面上，前文提到的那棵黄洋界路边大树下，毛委员身旁的林彪手中赫然拿着一根扁担。似乎扁担成了军权的象征。

1967 年 1 月，红卫兵正式封闭了井冈山博物馆。

第213回：不落后，国际友人也串联　上海滩，打人风再起卢湾

大概是1966年11月的最后几天，井冈山下了第一场大雪。雪花纷纷扬扬，四处飘舞，漫山遍野银装素裹，白雪皑皑，颇有诗情画意。尤其是那些广东、福建的红卫兵，生平很少见到过雪景，更不用说大山区中的雪景了，他们高兴得手舞足蹈，久久看着那一派冰清玉洁的风光，流连忘返，在山顶又蹦又跳，高声朗读毛主席的诗词："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念到"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时，不由山呼万岁。一个个热血沸腾，都自认为自己就是能胜过只识弯弓射大雕的成吉思汗的当代风流人物。

然而，寒风凛凛，冰雪无情，欢乐很快被寒冷冲淡了。

气温迅速下降，树枝变成了一串冰条。屋檐下，长短不一的凌冰悬挂下来，像是冬天寒冷的音符。红卫兵小将们终于在战天斗地的战役中败下阵来。他们躲进了接待站的竹棚子里，围拢在一堆堆嘶嘶叫唤的炭火前，暖和一下哆嗦个不停的身体。

但是他们心中的热量似乎并没有降温。白天，他们步行几十里，上百里山路，瞻仰革命先辈战斗过的地方；晚上，挤在一起，五六个人合盖一条棉被入眠。有消息说，毛泽东要来井冈山接见红卫兵！而且这消息被红卫兵战报的各种传单和号外渲染得有声有色。时间：12月9日；地点：茨坪；陪同参加接见的人员有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江青、陈伯达……

这消息不胫而走，像电波迅速传遍大江南北，黄河上下。

从混沌到有序，千军万马日夜兼程，红旗指向中国第一块革命根

据地。从南昌到吉安，再到井冈山，350公里的公路上，车水马龙，一队队的红卫兵高举红旗，背着背包、水壶，手捧毛主席语录。用自己稚嫩的双脚，踏着革命前辈走过的道路，去接受心中的红太阳的检阅。

井冈山各个接待站都在辟谣:“毛主席不会来!”“毛主席不会来!”“我们没有得到这方面的任何通知!”

各个接待站都在疏导，乃至采取强制性措施，规定每个红卫兵在茨坪只能呆两天，如果到时不走，就收回借的被子。

但是不起作用。先上山的红卫兵滞留下来，始终不愿离开这里；外省知道这个消息的红卫兵已经到达南昌，不会不来井冈山；由南昌出发的红卫兵，到了吉安、拿山，更是不能不上井冈山。

红卫兵固执地坚信，他们在运动初期在同工作组的斗争中遭受了那么深的压抑，在步行串联途中经受了那么多的磨炼，毛泽东不会不来接见他们！还有，毛泽东多次表示要“重上井冈山”，如果今天在井冈山接见红卫兵，不是具有某种特殊的意义吗！

不能说红卫兵想得没道理。毛泽东是一个具有诗人气质的政治领袖，诗的艺术是象征的艺术。他能在武汉率领千万游泳健儿劈波斩浪，能在天安门广场大检阅动员全国红卫兵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奋勇冲击，又为什么不能来井冈山接见红卫兵，再来一次新的“农村包围城市”的壮烈活剧呢？

茨坪人满为患。不足 5000 人的县城，接纳了近 20 万红卫兵小将。

毛泽东没有来。疾病却悄悄侵蚀入红卫兵单薄的躯体。粮食也即

将告罄，大雪封住山路，汽车不能进山。病毒乘虚而入，先是有学生感冒，后来发生了急性脑膜炎死人事件。

20岁的广州暨南大学学生林金凤永远留在了井冈山。

终于有一天，一个消息从管理局大楼传出："毛主席今天要来慰问我们红卫兵！就在当年的红四军军部。"这话不知从谁的口中传出，经过千百万红卫兵的耳朵和嘴，传得越来越像真话。

好像为了证实消息的可靠性似的，在一块水田上，解放军手拉手，围起一个巨大的圆圈。

下山的红卫兵听到消息，立即掉头，往山上爬。原来没到山顶的红卫兵，更是焦急迫切地上山。

接待站的工作人员口焦舌燥、声嘶力竭地解释："那是送治脑膜炎药品的飞机要来。"

然而，没有人肯听信这正式报道。多年来，人们养成了偏爱小道消息、马路新闻的习惯。红卫兵小将还太幼稚，不知道谣传具备的真实性是情感的真实性，并不一定具有客观真实性。他们把自己强烈的愿望当成了现实。

水田上，解放军战士围成的圈子外，红卫兵小将越聚越多。除了卧床不起的重病号，所有呆在茨坪的红卫兵都聚到解放军战士身后。他们眼望蓝天，如饥似渴地期待着奇迹的发生；他们竖起双耳，倾听那即将来临的飞机发动机的第一声轰鸣。

从正午到天黑，天空中没有半点动静，连一只飞鸟也没出现。天色渐晚，寒气袭人。红卫兵们衣着单薄，瑟瑟发抖，却没有人离去，

唯恐错过那千载难逢的幸福时刻。

整整一夜。在寒风刺骨的旷野，红卫兵小将怀着激动的心情，用身体的热量与无情的大自然搏斗。他们互相拥挤、跺脚、唱歌，终于，有人支持不住，坐到地上，头枕着膝盖，睡着了。

第二天一早，谣传多日的消息幻化出了一幕幕激动人心的场景。那片凝固了的、巨大的天空，终于隐隐有了什么：由弱而强了，是发动机的轰鸣声；由远而近了，是一架涂有八一红星军徽的直升飞机。

顷刻间，“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的欢呼声如同巨大的海啸，奔腾而至；人群如同即将喷发的火山，上下起落，左右错位；那解放军手拉手围成的圈子，则像一只四面受挤压的气球，随时都有可能破碎……

直升飞机并没有立即着陆。它在低空作了多次的盘旋，那道道灼热的气流，纷纷扫落树枝上的冰壳、冰凌，强大得像奥林匹斯山的宙斯，在俯视人世间的芸芸众生。它几次像是要着陆了，又猛地升上去，似乎又有蜻蜓般的小心翼翼，生怕让什么东西给吃了，或缠了去……

身子向后顶去，脚板向前跳去，解放军战士的手拉得更紧了，彼此的五指，宛如一道铁钩……

直升飞机终于着陆了。螺旋桨仍在隆隆地转动，舱门刚刚打开，隐约看到里面一个穿军装的高大身影……

直升飞机运来的是几箱治疗脑膜炎的贵重药品，进口的阿拉明、新福林，还有血管紧张素等抢救休克的针剂。

红卫兵散去后，在这半边水田里，拾到了两大筐鞋子、袜子……

直升飞机只能暂时停在了茨坪，螺旋桨劈坏了，在等着从南昌的向塘机场运送新的螺旋桨来换……

惊愕、愤怒的红卫兵们向空军造反了，他们誓死要揪出杀害红卫兵小将的刽子手和幕后策划者……

悲愤、迷惘，失望的红卫兵大队人马，开始步行下山。红卫兵大潮掠过的井冈山，一片狼藉，水田被踩踏成烂泥塘，竹棚茅舍东倒西歪，到处扔着破鞋、烂衫，红卫兵长征队的战旗、臂章随处可见。山上粮食紧张时，空军曾空投了大量馒头、油条、压缩饼干，如今堆在那里任它发霉……

在那特殊年代，一些洋人也在中国大地上免费大串联！

湖南省韶山被称为“红太阳升起的地方”。蜂拥而至的红卫兵队伍中，出现许多白肤黑肤、白发黄发、蓝眼睛、褐眼睛的外国人。中国红卫兵涕泪横流大呼“万岁”声中，这些洋人也大受感染、热血沸腾。尤其一些来自亚非拉发展中国家的青年人，激动万分地叽哩咕噜高呼：“中国，毛泽东！中国，毛泽东！我们要拿起枪杆子，走中国武装革命的路！”甚至有些人还想成为他们国家的毛泽东，要马上赶回国去点燃“星星之火”……据粗略统计：1966 年 10 月间，仅去韶山的外国人就达 3000 人。还常有非洲等地留学生，在毛泽东故居学习《毛主席语录》…….

在延安，有些日本人对接待人说：“我们强烈要求在毛主席住过的窑洞睡一下，亲身体验毛主席当年革命经历！”但那窑洞最多挤十多人，日本人急了，叽哩咕噜地说：“我们从北京到长沙、韶山，又

到井冈山、延安，就是按中国革命的进程串联的！若不认真体会圣地的窑洞，怎能算取革命真经呢?”有人想了很久肃然说：“每批人在窑洞睡两个小时，一天可以睡几批人！”于是皆大欢喜。

当时北京的大学、重点中学，都有外国留学生。在北大附中读书的村山喜二，父亲是日本大学教师、中国问题专家，他没料到儿子在中国成了具有红卫兵思想的日本少年。当时口号是“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学生都要到农村劳动。但郊外有市公安局的牌子：“外国人不得逾越！”村山喜二不能下乡，难过万分，他给毛泽东写信：“要求能和中国学生有同样待遇、同样革命！”

文革开始后，村山喜二如猛虎出笼，和中国的红卫兵一起造反。大串联开始，他联络了几个日本小孩子，也打起红彤彤的战旗去“长征”。在延安窑洞，他就是排队在窑洞睡了两小时的洋人之一。但他还觉得不过瘾，又花两天时间排队，再度体验毛主席住窑洞的峥嵘岁月。从长沙徒步行到韶山，他庄严肃穆地都对另几个日本小朋友说：“如果毛主席当年不走出韶山去革命，中国还像今天的日本人一样，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他们又风尘仆仆到广州去瞻仰“农民运动讲习所”，却听说接待单位不让外国人“大串联”。眼看饿肚子还要露宿街头，几个日本孩子灵机一动，决定用同班同学于晓园、张东明、贾宝全等人的名字，冒充中国红卫兵，果然被热情安排食宿。村山喜二说：“多亏我们会讲北京话！”……有趣的是：20 年后，村山代表一个日本商社来华，宾馆见他北京话溜熟，以为是冒牌日本人，再三盘问。这个当年走南闯北的外国红卫兵，只好用流利日语说话。宾馆于

是彬彬有礼了，这让他感叹不已……

有一天，一个哥伦比亚的革命者站在井冈山五大哨口之一的桐木岭哨口，大作深呼吸。陪同的中国人以为他身体欠安，忙问吃不吃药？他豪迈地说："这是毛泽东同志用革命暴风雨洗涤过的空气！"时值盛夏炎阳似火，他不肯戴草帽，又豪气冲天说："我需要毛泽东思想的太阳！"

来自非洲刚果的一位外国人，白天跑了 100 多里瞻仰多处革命遗迹，非常疲劳，可是晚上睡前比中国红卫兵还来劲，他翻开《毛主席语录》，读到深夜两点多……大串联中，来自世界五大洲的许多外国人，同中国人一样沉醉在文化大革命的激情中。一个日本人提出批评性建议说："现在仅仅说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典范，这是不够的。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最高峰，是最高最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指导世界革命的普遍真理！"

我们再回到上海。9 月 11 日，"一司南下兵团"，包括中学生"16 纵"在内的 2100 多人乘专列到达上海，上海市委派出摩托车车队开道迎接，一路风风光光地进入位于市中心，紧靠人民广场的市体育馆，住在看台下的空房子里。上海天气很热，房子里没有被褥，就铺些稻草睡觉。

上海市委要求区、县、局各级党委为北京"一司南下兵团"红卫兵活动提供方便。当天，"南下兵团"即散发《宣言》说：我们"是带着党中央、毛主席的无限期望，首都革命人民的战斗友谊"来的，第一，我们是战斗队，是旧世界天生的造反者，要造一切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封建主义的反。第二，我们是学习队，要向上

海的工农兵、红卫兵，向赴沪的其他红卫兵学习，永远做群众最恭谨的小学生。第三，我们是宣传队，要让毛泽东思想和党的方针政策家喻户晓，深入人心。

按照事先的安排，第二天，“南下兵团”分别到上海第二棉纺织厂，与杨富珍、王林鹤、程德旺等40多名劳模座谈；在市学联，与上海学生代表举行了座谈。座谈会上，北京红卫兵提出上海如何造反，上海红卫兵如何组织，如何抄家，被抄对象是否反抗、报复？抄家物资如何处理？如何贯彻阶级路线等问题。上海的工人和学生依照统一的口径作了介绍。会上，北京红卫兵还对打人作了解释，强调北京的“阶级报复”很厉害，确实打死过一些“坏人”等。

这天，就在“南下兵团”与上海劳模、学联代表举行座谈会时，以前零星来到上海串联的北京语言学院、外国语学院南下红卫兵正在上海的大街上奔走呼号，散发铅印版传单《最最紧急的革命倡议》。

《倡议》指出“现在，上海存在一种不能容忍的现象”，即一些“黑帮分子”仍然“养尊处优，逍遥法外”。所以向上海市全体红卫兵、广大工农兵群众倡议：凡“牛鬼蛇神”一律减薪；银行存款、电视机、照相机、沙发等一律没收上缴；保姆一律解雇；高级公寓、别墅一律搬出；白天一律进劳改队，晚上一律写交代；一律挂“牛鬼蛇神”牌，不准自行摘下等，以至要将上海的一切牛鬼蛇神“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使它们永世不得翻身”

与此同时，“南下兵团”各路纵队也主动与各区联系，广泛查摸“敌情”，反复询问有关人员“抄了多少户?斗了多少人?斗服了没有?有没有漏掉的?”，甚至提出查看档案和大字报底稿，交出此前搜查

的清单等。当晚，“南下兵团”即以徐汇区为重点，分别在卢湾、虹口、静安、黄浦、闸北等区实施抄家。

到达上海的北京“一司南下兵团”红卫兵起初还注意调查研究，组织得比较严密，如徐汇区的行动组成了对家属的训话组、对本人的讯问组、对搜查的东西进行登记的登记组及搜查组、记录组等。当发现原单位搜查不彻底，被查抄人家中生活用品仍很多，便一边宣称“若在北京则基本扫光”，在北京抄家“不是推门进去，而是把门打坏了进去，不老实就揍”；一边向街道干部提议：“黑六类不能住一幢房子，把他们扫地出门好不好?”。

但是，北京红卫兵的这种克制只保持了一天。很快，他们组织的大规模抄家和打人现象就出现了。

9 月 14 日晚，在上海卢湾区，130 多名北京“南下兵团”红卫兵分头搜查了 3 户人家，其中就有上海大资本家虞洽卿的儿子、儿媳，他们夫妇被剪了头发。抄家时，红卫兵问虞洽卿的孙女：“你站稳立场吗?”

答：“站稳的。”

红卫兵就叫她用皮带抽打她的父亲，她不肯，结果，也被剃了发。

另一户是个 80 多岁的瘫痪老头，被称为“洋奴”。北京红卫兵将他儿子、媳妇、女儿都绑在浴室里，儿子被鞭打。抄家后，将东西装了 3 卡车运到体育馆。

在徐汇区，30 多个北京“南下兵团”红卫兵在永福路一个姓陈的原三青团分队长家搜查。他们将搜查对象的兄妹及其父的大小老婆等

5 人全部剃了光头，并用皮带、长柄伞、火钳、拐杖等抽打这 5 个人。

陈某争辩说："《十六条》讲要文斗，不要武斗。"

红卫兵呵斥说："没有打死就是文斗！"

结果，把陈头部、胸部、背部打得皮肉裂开，处于昏迷状态，最后送往区中心医院。

当时，周围群众和街道干部要进去，北京红卫兵在门口把守着，不准街道干部和群众入内，邻居们只好在屋外喊："要文斗，不要武斗！"

据统计，至 9 月 15 日以前，仅两天时间，北京红卫兵"南下兵团"就在上海 10 个区搜查了 90 户左右的人家，其中徐汇区搜查了 58 户，并在徐汇区、静安区举办了"资本家剥削罪证展览会"。其间共发生武斗 48 起，98 个对象中 82 人被殴打，其余的是被剃阴阳头、罚跪、涂漆。

9 月 14 日，北师大附中、北地院附中的一群红卫兵，进入上海同济大学广播台"和平楼"，声称"'和平'两字没有战斗气味"，便砸掉外墙上的"和平"两字，贴上"要武"的标语，并搜查了广播台的所有唱片。后来，这批北京红卫兵又爬上该校西南一楼楼顶，扬言"要把屋面上的和平鸽统统砸掉"。当他们用大锤砍掉一只和平鸽时，遭遇了同济师生的抵制，他们在楼顶上叫嚷"革命的上来，不革命的滚蛋"。

这天，"南下兵团"第九纵队 20 余人，路经黄浦区西藏中路沐恩堂时，与看守教堂的上海贵州中学的红卫兵接洽，宣传"对牛鬼蛇神

就是要打”，“打死人国务院不管”等。接着，便进入教堂，对居住在教堂里的牧师和市“三自爱国会”秘书长家的保姆进行罚跪、殴打。该保姆是地主婆，后被剃发后于 15 日晚自杀。这就是当时著名的“沐恩堂事件”。

16 日晚，这批北京红卫兵又从马路上抓来 9 个“游民”，打了一夜，剃了头发，并把长裤剪短。

第 214 回：沐恩堂，过往行人均遭殃　上音院，贺绿汀夫妇被打

9 月 15 日，北京“南下兵团”第五纵队进入龙华医院妇科主任、民盟成员、市政协委员、66 岁的陈某家搜查，中医学院文革组织闻讯赶到，说明陈家已抄过五六次，除一间存封古董文物的房间外，其余可再抄，为此双方发生争执。17 日，北京红卫兵破门搜查，第二天又借陕西路小学开斗争会，将陈的老婆、子女、孙子一家均揪去，全家不分老小一概罚站、抄身、鞭打，还要吃柏油泥丸，其中陈多次被缚住手脚，口中塞布，推到在地用皮带、棍子抽打。经医院检查，陈腰以下及臀部皮肤呈青紫色，有肿痛，肩部、两肋、脸部、颈部也有伤痕。

9 月 15 日深夜，上海侨务处红卫兵在一干部家中张贴大字报，路经此处的“南下兵团”第十六纵队红卫兵便进去搜查，不仅用皮带抽打，还把“一架照相机、四块银元、一套军服和一本日记簿往口袋里装，准备拿走”。侨务处红卫兵见状，向北京红卫兵宣讲政策，“双方争论不休，扭到了卢湾区公安分局”。侨务处红卫兵打电话给位于市体育宫内的“首都红卫兵南下兵团”总部，总部来了 6 个纠察，说“打坏人活该”，带着搜查物扬长而去。

9 月 15 日下午 13 时，“南下兵团”第十六纵队的北京外语学校学生 11 人，带着照相机和手提扩音器来到上海外语学校，即上海外院附中，与该校高干、革干子弟组成的红卫兵一起高呼“红色恐怖万岁”等口号，宣称“北京运动轰轰烈烈，资产阶级狗崽子已威风扫地”。16 时左右，这批红卫兵砸碎窗子，破门进入校长室，撬开抽屉，拿

走公章，将屋内的电话机拆到学校的红卫兵营部。接着，这批红卫兵又勒令总务主任交出钥匙，打开保险箱，拿走了支票本，后经劝说还回，但公章拒不交还，还说："这是夺权。"

在整个事件过程中，教师中的红卫兵不敢出来讲话，学校的党支部书记吓得躲在办公室的橱子后面。当晚，该校红卫兵开始分头外出抄家。与此同时，北京红卫兵和该校红卫兵骨干召开会议，商议第二天"如何使资产阶级威风扫地"的行动计划，直至深夜。

16 日清晨，上海外院附中"红卫兵营"在校园里贴出"实行红色恐怖"的勒令布告。6 时左右，教师们陆续到校，即被"红卫兵营"拦住，逼令填写成份。随后，"红卫兵营"发出广播，让教师集中起来，按成份列队，强迫将所有成份不好者剪发。当即有 5 名女教师被剪成"阴阳头"和"花头"，男教师都剃成光头。接着将这些教师揪至校门口罚跪、脸上涂墨，衣服上画上乌龟，写上"混蛋"、"王八蛋"、"狗崽子"、"资产阶级分子"、"大右派"等字样，胸前挂'牛鬼蛇神'牌子，并强令他们相互骂打，谁不打不骂或打轻了，就用脚踢，用木棍戳、推。当时有拉拖车的工人路过该校门口，停车劝告被北京红卫兵赶走。

9 时许，又一批约 20 多人的北京红卫兵增援到校。学校一名女教师将家中黄金转移到学校，被红卫兵搜出，令她趴在长凳子底下，两手举起，北京一名女红卫兵在她背上踩了一脚，头碰在水泥地上，随即地上出现一摊鲜血，几个红卫兵又逼着她把地上的血吃掉。另一女教师因不肯剪发，结果被数十名红卫兵推到在地，用脚踏在其身上，

硬是把她的头发剪掉了。

中午 11 时左右，红卫兵强迫所有被批斗者光着脚，对那些可能有“生活作风”、“男女问题”的人，还让他们在嘴里叼着一只鞋子、一只袜子进行劳动，有的是将破鞋子挂在他们的脖子上，个别还挂着大砖块。学校的教职员工对这种做法大多表示不满，却都很怕，有的躲在教室里，有的躲在家里。同学们也多不敢声张。非红五类子弟说：“我们讲了话，也要被剃头的。”有同学几次找支部出来讲话，但没有一个敢出来，所有的党员都躲了起来。学校支书吓得躲在办公室里，整天在叫：“怎么办？要求市委想办法”。市教卫部有关人员曾三次建议上外党委出面，党委成员一再回避。后来，党委负责人于中午去了一次，因准备不足，被这些初二年级同学连问几个问题就讲不下去了，其他党委成员也都两手一摊，表示无法可想。

下午 15 时 30 分，红卫兵集中被批斗者训话，读《毛主席语录》，然后为被批斗者拍照，有集体照、个别照，也有将问题严重的一男二女合起来拍。最后，又逼迫所有被批斗者在楼梯上跑上跑下。

晚18时，被批斗者中有9人押送派出所，其余放回家。过往的工人见一些教师赤脚走在马路上，都认为这种做法“是违背党的政策的”，而这批“南下兵团”的红卫兵们则兴致勃勃得说：“上海比北京搞得痛快，越搞越有劲了”。

20 日，上外附中部分教师在四川北路等处贴出《直至今天还会发生这样的事》的大字报，反映北京“南下兵团”在他们学校打人的事情。上午，10 多名北京红卫兵赶到上外附中辩论，强调“大方向

没有错”。下午，附中召开初一年级家长座谈会，一些北京红卫兵与上外附中红卫兵闻讯后，包围了会场，责令支书交出讲话稿，要到会家长一一留下地址。上外附中事件在上海产生较大的震动和影响。

9 月 15 日至 18 日，住上海蓬莱中学的北京遵义中学十几个红卫兵到沪后 3 天打了 12 个人，都是用鞭子打、脚踏、皮带抽，有的“连大便也打出来”。20 日下午，他们又抽打一个“用手指放在嘴里吹”的小学生，说他是“流氓”，被路过的工人、居民、学生围住辩论，最后只得承认错误，撤回蓬莱中学。

9 月 16 日下午，北京第二十五中 10 个红卫兵拿着《重炮猛轰上海市委》等 5 种传单，坚持要《解放日报》社“大量印刷”。报社总编办负责人说明情况，要求大家“体谅报社的困难”。北京红卫兵立即把门关起来，有的解下皮带，一边抽打桌子，一边大骂“不印就是反革命，就是保皇派”，还恫吓说“不解决就弄到楼下去游街”。北京红卫兵把电话挂起来，责令接待人员“只准讲北方话，不许讲上海话”，前后闹了三个多小时。同日，北航附中红卫兵因《解放日报》少印了两份传单，先后三次冲进办公大楼。有的北京红卫兵手执皮带，将接待人员推来推去；有的手拿传单打接待人员的头；有的要把大字报贴在接待人员的脸上；有的骂接待人员“混蛋”、“狗崽子”、“反革命”。

9 月 16 日晚，居住在黄浦区市六女中的北京水利学校红卫兵率天津一中、沈阳十中等串联学生，及上海市六女中“海燕战斗队”100 余人，以一教师“撕掉贴在办公桌上的大字报”为由，将一些教师揪

到操场上用棍棒殴打。结果，一教师被打休克；一教师被打伤后，还剪了头发，涂了浆糊，挂了黑牌子。17 日上午，市六女中有同事准备送伤者去医院治疗，北京红卫兵将该教师关进小屋，用扫帚扫脸，并不给吃饭。当晚，区委干部赶到市六女中，被拦在门外，北京红卫兵说："相信同学会自己解决------我们搞好后会向党中央、毛主席汇报的"。

9 月 16 日至 17 日，北京航空学校和北京第十五中 20 多个红卫兵闯进斜士路第一小学，三次殴打该校干部、教师 9 人，有的被打成脑震荡、出血、不能动弹，送医院医治。打人时，北京红卫兵派人把守大门，不准外人入内，附近工人议论纷纷，非常气愤。

9 月 17 日，北京五十七中、七中的 12 位红卫兵，在长宁区民办群联中学批斗 31 名出身有问题的教师,约占全校 73 名教师的半数，其中 11 人长时间高举双手低头跪在地上，有 2 个教师还戴上装着砖头的高帽子，一位将近临产的女教师也是如此。每个受罚教师的脖子上都套着一根铅丝，由人牵着，并规定铅丝离地的距离，不符合标准就往下拉。同时，有 3 个教师被剃阴阳头，1 个女教师被剃成光头；3 个男教师被涂了花脸；15 个教师受到皮鞭抽打。下午 15 时以后，北京红卫兵拽着一位被剃了光头、赤脚的女教师游街，一直游到该女教师的家中。整个过程中，区委联络员一再进行劝说，北京红卫兵非但不听，还宣称"对出身不好的兔崽子就是要揍"。

9 月 17 日下午，因《解放日报》社宣布停止承印各种传单，以北大学生为首的一群北京红卫兵冲击《解放日报》大楼，高喊"不印

传单，是压制革命”。正在楼上休息的夜班工人围在楼梯口观看。一北京红卫兵拍照后扬言这是报社“发动群众斗学生的场面”。后来，有北京红卫兵发现《解放日报》社附近一小印刷厂正在印制葡萄酒商标，如获至宝，冲进去强令七部机器全部中断生产，取出这些供出口的装潢用纸，到《解放日报》楼上大喊：“《解放日报》印‘四旧’，却不印传单！”直至报社人员陪同他们去该印刷厂调查，才弄清真相。

9 月 17 日下午 16 时，“南下兵团”和北京 101 中红卫兵在天马电影制片厂广场台上揪斗了厂领导丁一，陪斗的有谢晋、徐昌霖、汤晓丹、顾而已、黄宗英、蒋天流等 13 人。北京红卫兵给丁一挂上“黑帮大红伞”的牌子，责令陪斗者“一个个交代罪行”。

9 月 17 日晚，“南下兵团”第七纵队及上海五十一中红卫兵 100 多人，将一“资产阶级分子”带到新康花园，并把新康花园 100 多户的居民全部叫喊出来。强迫里弄干部指认哪些是知识分子？哪些是资产阶级？并“命令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以及子女，即使是小孩都要把头低下，不低者就用木棍打”。斗争时，红卫兵将该里弄的前后门全部封锁，不准外人入内。

与此同时，“南下兵团”还广泛介绍北京对黑六类的武斗，认为上海太强调文斗。第十纵队在黄浦区的各个活动点上制造舆论，大肆宣扬“文斗是没斗”、“敌我矛盾就是用武斗”、“打死人没关系，花八元钱(指火葬费)。”以北大学生为主的第七纵队在静安区活动时也宣传，北京已杀许多人，“就是要红色恐怖!”，“要乱，要大乱特乱，越乱越好，乱出一个铁打的江山，一个崭新的世界”。据 9 月 15 日至

17 日的三天统计，北京红卫兵打人 30 起，被打达百人以上，其中斜士路第一小学支部书记被打成重伤。仅仅数天之间，北京红卫兵的武斗涉及面已经从“四类分子”、“资本家”，扩展到被认为有“问题”的“社会青年”、“游民”等。

9 月 18 日上午，北京红卫兵“南下兵团”16 纵队 100 余人开进沐恩堂。他们首先打电话给黄浦区委，说扫 “四旧”需要工具。接着，便在堂内挖掘地道、敲墙壁，撬开原上海工学院、华东化工学院、复旦大学红卫兵查封的档案室，将市三自爱国会副主席谢某某、秘书长孙某某等 6 个牧师和 4 个传道的头发全部剃光，把白漆涂在这些人的头上、脸上，在他们背部写上“汉奸”、“洋奴”字样，然后关到房内用鞭子抽打。在抽打时还问牧师“疼不疼？”牧师答“疼”，他们就打得更狠，说：“你还敢不敢讲疼？”牧师改口说：“不疼”，他们打得更凶，说：“不疼再打重些。”

他们还叫牧师、传道们互相抽打，谁不打就打谁。有的被打得不能走，只好爬行；有的背部、屁股打得发青，出现血斑。同时，这批北京红卫兵还剪去一家属的半边头发，并搜去手表、金戒指等物品。

19 日晚，和平电影院散场，北京红卫兵以“男女一起走，疑为行为不端”，从观众中捉进 20 多人。一男子因赶着回家“走得很快，被疑为盯梢”，也被捉来。经询问，除感觉不对头，当场打出教堂 6、7 人外，其余均被剪裤管、剪头发和抽打，有 4、5 人交代态度不好，被关在四楼房间里。午夜，北京四十一中和上海浦江中学红卫兵联合行动，在苏州河边捉了 7 个“阿飞”，经剪发处理后送至沐恩堂抽打。

20 日，16 纵队红卫兵还开着一辆卡车从马路上捉来一批“阿飞”。其中花鸟商店的一女艺徒因谈恋爱被剪开裤管，撕破上衣，剃掉头发，该艺徒哭着说：“我天天要上班，剃掉头发怎么见人”。北京红卫兵回答：“剃掉头发更好看！”

此时的沐恩堂已远近闻名。

当时，北京红卫兵不许任何人进入沐恩堂，从大门口到他们住的四楼前后设了三道岗哨，有两名工人想进去看看，结果被当作坏人打了一顿。湖南大学一红卫兵听见教堂内传来打人的呼叫声，就冲进去宣传《十六条》，北京红卫兵要打他，他指着胸前的校徽说：“我是湖南大学的红卫兵，红五类子弟，你们打吧”。结果，这个湖南籍大学生被扣留了两天。

据统计，“南下兵团”16 纵队共在沐恩堂打了 60 多人。为此，群众议论纷纷。住在沐恩堂附近的大庄里治保主任向街道“四清”工作队反映：“我每晚都听到打人的叫唤声、呼救命声。我们要到市委去请愿，到首都红卫兵总部去请愿，这批北京的红卫兵为啥这样打人？”

附近的居民群众则不断自发地到沐恩堂门口，与 16 纵队的红卫兵辩论。24 日晚，有 200 多群众围在沐恩堂门口，与 16 纵队的红卫兵辩论至清晨，有的人还到公安局，到首都红卫兵“南下兵团”总部告他们不遵守纪律。25 日下午，在巨大的社会舆论的压力下，16 纵队撤出了沐恩堂。

9 月 13 日，首都红卫兵“南下兵团”第七纵队中央音乐学院附中

学生 12 名红卫兵，乘三轮卡、摩托车，带着电影摄影机来到上海音乐学院附中。他们在车上高唱“鬼见愁”歌，在大门口、各大楼和行道上写下“老子革命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对联。接着，他们与校内的红卫兵造反派串联，来到接待组，责问该院红五类子弟所占比例？教师队伍家庭出身情况如何？

这批北京红卫兵还将上海音乐学院院长，著名歌曲《天涯歌女》、《四季歌》、《游击队之歌》的作者贺绿汀揪来批斗，叫他下跪，脱鞋脱衣，往他脸上吐唾沫。为了避免武斗，上海音乐学院红卫兵把贺绿汀押走了。晚上，这批北京红卫兵提出要住在上海音乐学院，当时，市接待站已安排他们住在化工学院，但他们表示在上音附中“住定了，不走了”。

15 日中午，这批北京红卫兵要求学校广播站广播文章：“无产阶级阶级路线万岁”，遭到拒绝，双方展开激烈辩论。晚 18 时多，20 多名身穿军装、佩戴袖章的北京红卫兵一边唱着“鬼见愁”、“革命造反歌”；一边骂“狗崽子”、“混蛋”排队进入学校。这批赶来增援的红卫兵对参加辩论的上音附中的学生又推、又拉、又打。19 时多，他们又将上音附小校长、贺绿汀之妻姜瑞芝揪来，一阵抓头发，踢打，打得她嘴边出血。接着，他们涌进支部办公室索要广播站钥匙，有的站在台上，有的站在椅子上，并责问支书等人的成份。突然，一北京红卫兵吹起哨子，叫喊“大家去砸广播站的门”，接着占领了广播站。

16 日，“南下兵团”第七纵队 120 人强行住进上海音乐学院南楼。

他们宣称“上音红五类子弟只占30%，是黑帮统治”。第二天晚20时，第七纵队红卫兵用拖车把贺绿汀夫妇从家中拖至附中。此时，贺绿汀的头被布缠绕起来，姜瑞芝已被打得披头散发。斗争中，贺绿汀夫妇被剪了头发，并在脸上涂了墨汁，还被打耳光、下跪、爬地、塞嘴。

二级教授李翠贞因平时注意仪容和服饰，就被视为“资产阶级分子”，在批斗她时，把她的皮鞋、口红、胭脂拿到大庭广众之下“展览”，她还被勒令拿着扫帚边敲打边喊叫：“我是一个妖婆。”李翠贞不堪摧残，当晚自杀。

19日晚19时，上海音乐学院附中红卫兵再次冲进贺绿汀家，抽打贺绿汀夫妇后，又将贺绿汀夫妇拖到附中楼上，与北京“南下兵团”第七纵队红卫兵一起对贺绿汀夫妇拳打脚踢，用皮带抽打，贺绿汀被打在地上翻滚。他们还叫姜瑞芝跪下，在她的背上放一把椅子，然后就轮流坐上椅子用皮带抽打。姜瑞芝的哭声惊动了附近的居民，多次打电话给音乐学院，上音师生也再三要求他们停手，他们置之不理，反而越打越凶，贺绿汀夫妇一直被打到半夜23时，家也被抄得家徒四壁，全家衣物都被作为“战利品”拉走。1966年冬天，贺绿汀全家过冬竟没有一条棉被。

20日晚，“南下兵团”16纵队的中学生70多人再次开进上音附中，贴“鬼见愁”对联，唱“造反歌”，并高喊“红五类站过来，黑七类滚出去，其他人报成份”，这便在校园里引起“要不要报成份”的辩论。不久，又一卡车首都红卫兵增援到校，冲进广播站大喊“狗

崽子们出来辩论。因无人应承，又冲进支部办公室，将支书等 3 人拖到楼下，在拖拉的过程中，与上音附中不同意见的学生扭成一团，一直闹到次日凌晨 2 时。

21 日晚 19 时，“南下兵团”第七纵队红卫兵撕毁上音校园里经修改的“老子革命儿接班，老子反动儿造反”的对联，遭到上音少数民族班学员和新疆等外地来沪串联学生出面制止，发生争吵，有 3 人被打，当场有 4 个学生因气愤而昏倒过去。事情发生后，上音代表提出交出打人凶手、并将打人者开除出红卫兵、派人到医院慰问伤者、昏倒者等要求。第七纵队不承认打人，并排起队伍让上音学生辨认，当时没有认出。后经协商进入大礼堂举行辩论，会议由各方领队主持，双方列队进场，并把非红五类子弟赶出会场，有些非红五类子弟躲在后排旁听。辩论中，北京红卫兵坚决否认曾经打人，上海及少数民族同学则纷纷上台揭发，并坚持要打人的红卫兵站出来。双方言词激烈，气氛紧张，致使又有 4 个少数民族同学昏倒。此时，一新疆同学认出一北京女红卫兵曾打骂人，该女红卫兵上台后一面勉强表示道歉，一面哭着大声宣讲，表示革命的决心。上音红卫兵则坚持要所有打过人的红卫兵站出来承认错误，双方形成了僵持局面。这时有个北京男红卫兵站起来发言，他大声说：“即使我们由于情况不明，打骂了阶级兄弟，那也是红五类内部的事情，今天有人借这个大会挑动群众斗群众，是个大阴谋，是有人搞阶级报复。一定要揪出政治扒手！”这个发言震惊了全场，更主导了会议的走向。接着，北京红卫兵打电话向第五、第八纵队求援，并派人到市委接待站，要求市委派出负责人。

清晨5时多，上音红卫兵宣布单方面退出会场，第七纵队仍纠缠不放，声称要揪出“政治扒手”。“南下兵团”宣布组织纠察队着手对此事件进行调查。

## 第 215 回：激民愤，“南下兵团”撤回京
## 稳操控，江苏省把握局面

9 月 18 日，北京红卫兵在上海某中学召开红卫兵大会，宣传“自来红站起来”和“老子反动儿混蛋”的观点，并对“黑六类”子弟提出警告。接着，他们斗争了高三（2）班的 10 个黑六类子弟，要他们一个个交代父亲是否反动？自己是否混蛋？直至都承认才罢休。

9 月 20 日，“南下兵团”的红卫兵在国际饭店门口贴上“鬼见愁：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对联，散布《红色恐怖万岁》的传单，并用大喇叭命令外宾下车走路。

这天，“南下兵团”总部考虑到上海市民的反应，在市体育宫内贴出了《整顿军纪》的布告。

但是，在 9 月 21 日上午 8 时至夜 11 时多，上海图书馆工作人员仍然听见隔壁中苏友谊馆传来叫喊救命的声音。他们从楼上窗口望去，看见有 3 个男的，1 个女的在中苏友谊馆内被打。当晚，上图工作人员找到中苏友谊馆、上海体育宫的负责人才知道，那是“南下兵团”十六纵队在打人。被打的人有“被抄家态度不好者”、“流氓阿飞”、“无执照小商贩”、“说北京红卫兵坏话”等原因。

22 日下午，上海图书馆的群众请来华东师大的 3 名红卫兵代表与首都红卫兵“南下兵团”指挥部总部联系。但 23 日晚上，十六纵队红卫兵拉上窗帘继续在房间里审讯打人。

当晚 24 时，华东师大来了七、八十个红卫兵，不仅派出代表与“南下兵团”指挥部交涉，还强行察看了十六纵队的打人场所，看到在押的 6 人已被打得躺在地下。师大红卫兵提出“辩论、不再打人、释放关押者”等要求。“南下兵团”只承认“打人不对”，“说服不再打人”，拒绝辩论。

9 月 22 日，北京红卫兵听说松江佘山教堂下有地洞，有藏匿枪枝的嫌疑。100 多名红卫兵便赶往佘山教堂，一边挖地，一边斗争神父马风祥，结果东西没挖出，神父马风祥却被殴打致死。

9 月 25 日晚 20 时，住在上海交大的北京红卫兵查抄徐汇区永福路某号原国民党驻法使馆参赞、外交部秘书、时任市人委参事、年已 72 岁的肖某家，责令其交出手枪，因为在他儿子单位抄家时抄出了子弹。肖交代“手枪留在法国”。北京红卫兵“将他脱光衣服，只剩一条短裤，用皮带抽打得很厉害”。凌晨 3 时，肖死亡。

北京红卫兵的行为引起了上海市民的强烈反感，冲突屡屡发生。鉴于上海的紧张形势，周恩来亲自召集“一司”汪延群等人到西华厅开会，商量办法，决定派建工学院贾健、外贸学院李蜀龙为“一司”代表，坐专机飞上海了解情况，直接向周恩来汇报。

贾健、李蜀龙两人到达上海后，发现“南下兵团”的红卫兵已被上海工人围困在几所学校里出不来了。他们迅速将实情报告 “一司”，“一司”连夜报告了周恩来。

周恩来决定，铁道部发专列，将“南下兵团”全部撤回。

与此同时，9 月 24 日，中央得知北京红卫兵“南下兵团”决定于 9 月 25 日在上海召开群众大会，届时将组织近百名上海著名资本家游街的消息后，周恩来立即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碰头会，商定给华东局、上海市委并北京市“红卫兵南下兵团”、北京市各大中学校在沪的红卫兵组织的电报，要求：

必须严格执行“十六条”中要文斗、不要武斗的决定，二十五日在上海强制资本家上街游行示众和准备召开的群众大会，应该停止。北京红卫兵南下兵团和北京其他大中学校的红卫兵迅速结束在上海的工作，回北京参加国庆节，进行组织和维护秩序的工作。

电报稿当天即报毛泽东审阅同意，当天发出。

9 月 26 日，周恩来在西华厅再次接见“一司”代表。当天，“南下兵团”开始撤回北京。

9 月 27 日下午 16 时，“南下兵团”第七纵队回京前，突然在上音校园里贴出许多对联，其中两条：

上海音乐学院的王八蛋暴跳如雷，反抗党的阶级路线，狂犬吠日没有用。

上海音乐学院的狗崽子温文尔雅，污蔑首都的红卫兵，笑里藏刀真可恶。

横批：雪压冬云何足惧

上海音乐学院的红五类虽然不多，对混蛋们仍应狂镇狠压。

上海音乐学院的革命者尽管糊涂，与王八蛋仍有本质不同。

横批：无限风光在险峰

上海音乐学院师生立即做出反击，在校园里打起“对联大战”。也选取两条：

指手划脚，包办代替，犹如第二工作组。

打人骂人，蛮不讲理，严重违反十六条。

横批：好好检查

主席书，十六条，总理话——违反几条？

战斗队，学习队，宣传队——执行多少？

横批：一清二楚自己知道。

傍晚，上海徐汇区五十四中、市二女中、黎明中学及上音附中的一些学生闻讯后汇聚上音校园，对北京红卫兵表示声援，双方对峙的形势更趋紧张。为此，上海音乐学院党委做出紧急部署，要求大家不再参与辩论，让北京同学回去。晚 19 时多，首都红卫兵“南下兵团”第七纵队集体离开，历时两周的“上音事件”终于结束。

9 月中旬，“一司”还向武汉派出“中南兵团”，共 380 人，大家习惯称它“中南大队”。湖北省委将北京“中南兵团”安排住在各大学里。“中南兵团”经过一段时间了解，一致认为湖北省委是好的，于是在武汉体育场召开了群众大会，宣传自己的观点。会后，张体学紧握“中南兵团”负责人刘克府、陈南竹的手说：“你们是周总理派来的红卫兵，你们才是真正的红卫兵。”

9 月末，“中南大队”开始遭到武汉造反派的攻击，说“中南大队”是保皇派、灭火队，“中南大队”很难在武汉地区继续呆下去，因此决定南下井冈山、株洲，进而抵达广州。一路跟随大队南下的一位《解放军报》社记者，名叫邢增干，他是周恩来派来的联络员。他们到广州后，听说北京大专院校形势动荡，大家无心恋战，一致决定“中南大队”停止活动，各学校分别带领自己的队伍返回北京。

由于中央已经发布了《关于绝对不许动用部队武装镇压革命学生运动的规定》和《关于严禁出动警察镇压革命学生运动的规定》，江苏省委不能像处理“《新华日报》事件”那样动用专政力量来对待群众运动，于是便开始扶植大中学校中那些拥护省委的群众势力，与造反派组织形成对抗。在省委工作队的策划下，以南京大学溧阳分校学生胡才基、朱英才等人为首的南京大学保守派组织“红旗战斗队”于 8 月 30 日成立，省委立即对这个组织予以承认。紧接着在 9 月 6

日，全市性的保守派学生组织“南京红卫兵总部”在上海路8号神学院大院里成立。该“总部”中学部的头头是省委副秘书长韩培信的儿子韩建中，大学部的头头是军事学院负责人张震的儿子张毅。南京大学的“红旗战斗队”也以“团体成员”的身份加入了“南京红卫兵总部”。由于这派红卫兵的袖标是红底黑字，所以被对立面称作“黑字兵”。

“南京红卫兵总部”成立时，江渭清、彭冲、南京军区的林维先、省委办公厅副秘书长周泽等人亲临会场，江渭清亲自为“黑字兵”授旗。江渭清、彭冲等人还戴上学生们送给他们的袖章，成为“黑字兵”的名誉成员。

由于“黑字兵”与省市委、南京军区和省公安厅之间保持着紧密的联系，并从各方获得大量资助，因而显得财大气粗、兵强马壮，在江苏省委与造反派红卫兵的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造反派也不善罢甘休。为了挑起事端，他们声称在长江路省人民大会堂内发现了蒋介石的巨幅画像，当时称作“人民大会堂事件”，并指责雨花台烈士陵园的管理存在严重问题，致使一些烈士的遗骸被暴露在露天里，当时称作“雨花台事件”。9月9日，南京大学文凤来和中国人民大学学生谢伯良、何毅敏等人再次率领大批南京大学“八．二七”、“红色造反队”和无锡轻工业学院的师生，以上述两个事件

为由，聚集在省委大门口示威，要求省委领导出面对此做出解释，接受群众的批判，被称为“九·九事件”。

省委对他们的要求不予理会，一方面派人把住省委大门，一方面在大院里面架设了高音喇叭，与示威学生形成对峙。中午的时候，一些参加示威的学生翻过围墙进入省委大院，占领了省委设立的广播站，并在省委大院内静坐示威。

省委紧急打电话给“黑字兵总部”，让他们派人来保护省委。“总部”迅速调集大批“黑字兵”赶到省委，并在北京西路邮局楼上设立了“前线指挥部”。省委大院内的道路两旁可以看到很多身穿运动衣的体院学生守卫在路边，还有一队一队黑字红卫兵在巡逻。省委办公大楼门口坐着近200位同学，省委内部气氛非常紧张，每个办公楼门口都有好几个人在看守，省委门口更是戒备森严，门外黑字红卫兵负责第一线守卫，省委接待站负责第二线守卫，门内长凳上又坐着省委的预备队。许家屯亲临指挥。省委门口的主席台均已为总站派来的黑字红卫兵占领。黑字红卫兵可以自由出入省委，而黄字红卫兵不准入内，已经进入省委的也不准随便出来，谁要出门，就要检查学生证，记下他的姓名、学校和校徽号码。

第二天，许家屯和静坐的学生代表谈判。他和黑字红卫兵一起，不承认黄字红卫兵冲进省委院子是革命行动。他说：“无论如何不能承认爬墙头进来是革命行动。”

谈判长达 6 个小时，最终破裂。

经过 3 天的对峙，包围江苏省委大院的造反派学生被迫主动撤离，“九．九事件”再次以造反派的失败而告终。江苏省委决定乘胜追击。彭冲在一次省委会议上说：“南大形势很好，左派已占统治地位，要抓住这个有利时机坚决搞臭文凤来。”随后，彭冲指使省监委副书记何永皓、办公厅副秘书长周泽带了几个人到南京大学做秘密调查。9 月中旬，彭冲又指使省监委派人去辽宁海城县文凤来的老家，秘密调查文凤来的出身成分和社会关系。其次，省委书记处书记、省文革小组副组长张仲良根据省委的部署，召集南京市内 4 区区委书记开会，指示他们以“宣传”为名暗中策动，让“左派”群众出面，组成众多“辩论战斗小组”，围攻造反派。并指示他们要抓住突出事件、突出人物，要注意相互协作，不要孤军奋斗……

每当辩论结束，总会有一个年龄大一点的陌生人主动走过来和保省委的学生打招呼，和他们一起分析辩论中的得失，对他们说：我刚才听了你们的辩论，你什么地方讲的很好，什么地方讲的不太好，你应当怎么讲……

当学生问他是哪个系的？他说：“是省委的。”还把工作证掏出来给学生看。很多学生这才意识到，那个时候在校园里面举行辩论的地方，总有一些陌生面孔的人在那个地方

听辩论，有的还做记录，有的还在拍照片，原来都是一些省级机关的干部和便衣民警啊！

9 月中旬，许家屯在专员、县长会议上和南京市委负责干部会议上表示了对文化大革命的不理解，他说："就是党内大民主，也没有这样程度!他要你答复，你感到没法答，不答了，他就问你这是什么感情!你扇扇子，他就提抗议，你笑一笑，他也向你提抗议。"

造反派又酝酿于 9 月 17 日在五台山召开 5 万人的批判江苏省委大会。为了抵制这次大会，省委副秘书长韩培信于 16 日晚召集直属部、厅、局长会议，传达省委会的决定。韩培信在会上说："省委对这个会议的方针是：把它拖垮！不能拖垮的话，要尽量缩小它的影响。估计最多让它开成两万人的大会。"

他还要求说：省市委领导和机关干部不准参加这次大会，"凡参加大会的，党员以党纪处分，干部以国法制裁。"

紧接着，省委又于深夜通过联络站找"黑字兵总部"负责人到西康路 33 号开会，要他们动员所属组织成员不要参加这个大会。

9 月 17 日，造反派策动的五台山批判省委大会如期举行。然而也就在这一天，南京大学"红旗战斗队"利用校内造反派主力赴五台山开会之机，在学校大操场举行了"欢送工作

队离校大会”，敲锣打鼓将工作队送出南大。其它学校的工作队也相继撤离。

据造反派主办的报纸透露，从 8 月下旬到 9 月底，江苏省委一直有效地操控事态的发展。每次造反派试图举行大规模的“控诉会”，结果都因保守派群众的介入而成为“辩论会”。省委公布的“大辩论”战绩是“九比零”。江苏省委显然对事态的发展相当满意。

造反派学生无奈，于 9 月底派出大批人员到北京告状，向中央控诉江苏省委压制群众运动的种种罪行。

1966 年 8 月，南京外语学校的“黑字兵”官沪宁等人上街刷标语，无意中用标语将工人王金的小破门封闭贴上。王金为进家门，不小心将标语弄破。南京外语学校的红卫兵官沪宁等人，将王金从公共汽车上抓到外语学校一楼楼梯下三角形空间里殴打，要王金承认是破坏文化大革命。王金不肯，结果被活活打死。事件发生后，引起群众的愤怒。外校学生说：从公安局查到，王金是国民党中尉，打死活该。王金的同事们却说他是地地道道的“工人阶级”。很多工人为王金之死包围了外国语学校，一时间闹得沸沸扬扬，全南京的人都知道了这件事情。群众起来纷纷揭发批判省、市委。

9 月 28 日，许家屯召集市级机关和工矿企业领导干部开会，竭力平息“王金事件”。他说：“像官沪宁他们打人这件事当然是错误的，不对的，但只是大运动中的暂时的问题，

局部的问题，个别的问题。” “这些小鬼，从他们主观上来讲，并不是像有些人讲的那样要把好人打死，他把王金当成了坏人，结果犯了严重的错误。”“我看了官沪宁的检查，16 岁的小鬼检讨写得不错。你不要看他犯了错误，打死了人，用主席语录用得比较恰当，最后还引了主席的诗，我这么大岁数的人也写不出来。”

又说：“在这么大的运动里，群众发动起来以后，在没有经验的情况下，犯这样那样的错误是不可避免的，这同平常时候打死人的事情是不同的。”“这不是敌我矛盾，是像打仗一样发生了误伤。我们打仗也是这样，挂花、牺牲的是不是都是敌人打的呢?不是的。也有自己人的枪走火，误伤的。”“你怎么能把走火误伤的人当敌我矛盾对待呢?你能都抵命吗?这是不可能的。”

他说“应该敢于严肃指出这个问题是错误的，又要敢于指出这件事情同平常打死人不同。” “今天已经犯了错误，我们如果用错误的态度和方法来处理这个问题，把他们抓起来抵命，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后果会怎么样?这就打击了青年一代。我们要从整个运动，从全局，从国家的长远利益和世界革命利益出发来处理这个问题。”

中共南京市委和公安局逮捕了南京外语学校红卫兵头头官沪宁和季超，同时由公安局把外语学院的学生护送出校，到农村住了几天后，送他们去大串联了。

## 第216回：流言传，韦国清南宁被打
## 抓凶手，黄塞阳一夜成名

我们再看广西。此时桂林已经分成两大派：主张“誓死保卫市委”的为一方，主要有“工人赤卫队”、“红旗红卫兵”，是少数派；广西师范学院“红卫兵”和“工人红卫兵”、“机关职干造反队”为另一方，他们在桂林是多数派。所以，广西师范学院“红卫兵”在桂林也被称为桂林“老多”。

9月6日，桂林市26个大中学校“红卫兵”代表和“首都红卫兵南下串联队”30人向市委和自治区党委书记贺希明提出召开全市群众大会及三点要求：

1、大会由“红卫兵”维持秩序；

2、市委在会上公开引火烧身；

3、黄云、徐为楷作检查。

他们的要求未获同意。于是，从7日上午11时起，这些学生宣布将在市委院内静坐绝食，抗议市委破坏文化大革命。学生们还提议组织代表团到南宁市广西自治区党委请愿，于是选出25名代表赴南宁，要求广西自治区党委进一步处理桂林“八七事件”。

9月8日上午，广西师院学生2000多人来到桂林市委门前静坐绝食，许多北京南下红卫兵也前往参加。每当桂林市委门前的静坐学生看到新的同学加入，就一起高喊：

“向革命战友学习！”

“向革命战友致敬!”

前来参加静坐绝食的北京学生也热血沸腾，他们把随身携带的饼干、干粮甩到场外，把自己携带的水壶拧开盖子，壶口朝下，将里面的水咕嘟咕嘟倒个干净，然后挤进会场席地而坐。全场立即会响起一阵热烈的掌声表示欢迎，每个参加静坐的同学都也会被自己的行为感动的热泪盈眶。

与此同时，9 月 8 日上午，北京南下广西的红卫兵原副领队黄塞阳也乘火车离桂赴邕探望父母，正巧与桂林“老多”去南宁的请愿代表乘一趟车。他们在车上彼此打了打招呼，不像前些日子那么热烈了。因为黄塞阳不主张静坐绝食这种斗争方式，所以，北京“南下串联队”改选，由更加激进的清华大学学生邱振冶和北师大学生李翠英当了头头，人民大学学生古天阳和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黄塞阳一起下台。

8 日下午 17 时左右，黄塞阳回到位于新民路教育厅宿舍的家中。

而此时，桂林“老多”赴南宁的请愿代表也来到了自治区党委大门前，要见韦国清，被南宁市的“赤卫队”阻拦，双方展开辩论。消息传开，广西医学院、广西大学、南宁市二中等 19 所大中学校学生 2000 多人前来支援桂林“老多”代表，并宣布在自治区党委大门前就地静坐和绝食。“赤卫队”和南宁“盾牌”红卫兵对静坐的学生进行围攻，双方发生激烈辩论，情绪几近失控。

说是辩论实际上什么也听不清，只有双方齐念《毛主席语录》时才能听清:

“小小寰球，有几个苍蝇碰壁，嗡嗡叫，几声凄厉，几声抽泣。”这是“盾牌”和“赤卫队”在骂静坐的学生。

“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梅花欢喜漫天雪，冻死苍蝇未足奇。”这是静坐的学生在还击。

“盾牌”红卫兵中有一个很漂亮的女大学生，个子高高的，梳两个齐肩发辫。她跑到静坐队伍里，耐心地劝大家结束静坐绝食。回答她的却是一片震天动地的歌声：“要是革命的你就站过来，要是不革命就滚你妈的蛋”，那个女大学生站在静坐学生中间，气的不知所措，一会也边挥拳边大声喊道：

“滚蛋！滚蛋！”

一位静坐学生气愤地说：“羊群里跑进来一只骆驼，充什么大个！”

看看周围席地而坐的一大片战友，再看看这位站在人海中比他们高一半的女大学生，有人不禁笑出声来：“人家居高临下，可不就是羊群里跑进来一只骆驼。”

南宁街头一下热闹起来，到处都在为此事进行辩论，结果是前来参加静坐的学生不断增加。

吃饭的时候，黄塞阳和父母自然议论起发生在区党委大

门前的静坐绝食。黄塞阳的母亲说韦国清是个好人，她担心学生娃娃们的健康，又担心矛盾激化会被坏人利用，叮嘱黄塞阳运用他在桂林红卫兵中的影响去做工作，尽量避免事态恶化。

黄塞阳答应了母亲，他知道当年在抗大一分校时，韦国清是他母亲的领导，他母亲和韦国清前妻梁政还是好朋友，而且韦国清现在的夫人许其倩也在广西教育厅工作，与黄塞阳的母亲关系很好。而黄塞阳的父亲 1963 年调广西大学任党委副书记时，韦国清正兼着广西大学的校长。

但黄塞阳并不知道，就在这天，自治区党委宣传部部长谢王岗、副部长贺亦然亲自指示区宣传部干部起草并铅印《绝食不符合十六条精神》《黄塞阳是怎样一个人》等传单。当黄塞阳人刚到南宁，这份铅印传单已撒遍全广西。在此之前，南宁市委书记肖寒层对市团委书记崔伟航说："南下串联队在桂林搞得很乱，里面有坏人，他们已被桂林的群众搞臭了，最近有一批南下串联队要到南宁来捣乱，其中黄塞阳很坏，要是他出面，就组织群众揭他的老底，也要把他搞臭。"

吃完晚饭，黄塞阳来到区党委大门前的静坐绝食现场，看见这里秩序还好，围观的人很多，静坐绝食的许多人是南宁的，并不认识他。黄塞阳的女校友，中国科技大学化学系王美蓉也挤在围观人群之中，她家在南宁，也是高干子弟，

应该是第二批南下的。她和黄塞阳简单地交换了一些看法，黄塞阳便默默地走进了区党委大院。

静坐现场到处传着各种“北京来电”。桂林“老多”知道黄塞阳来到绝食现场，当晚，广西师院中文系青年教师甘恒彩拿着一张纸找黄塞阳征求意见，说北京来电，陶铸讲静坐绝食是伟大革命创举，问他是否发下去？

黄塞阳建议暂时不要发，核实无误后再说，以免被动。

这晚，黄塞阳没有回家，找到一块干净的水泥袋铺在区党委大院马路一边，躺在上面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

9 月 9 日早上，黄塞阳看静坐现场没有发生大的冲突，便走出大院就近买些东西吃，顺便观察静坐者和围观群众的情绪和态度。

大约 10 点多钟，有人找到黄塞阳，说是韦国清要接见北京红卫兵和静坐绝食代表，并带着他到大院马路左侧一个办公楼，上到二楼会议室，韦国清已坐在大会议桌前面，两侧都是红卫兵学生，其中有广西师院中文系学生李日明。

黄塞阳走到韦国清跟前礼貌地对他说：“我是黄塞阳，我母亲李力问你好。”

这是黄塞阳第一次见韦国清，韦国清点了点头，黄塞阳便找了个空位坐下。

会议刚开始，有人急急忙忙跑进来报告说：“有学生晕倒了！”会议室骚动起来，在代表们的要求下，韦国清和区

人民政府副主席覃应机来到马路斜对面的一个办公楼，抢救室就临时设在这里一楼的圆形办公室里。

原来，天气炎热，又渴又累，参加静坐绝食斗争的学生中，不断有人饿昏，被抬到这里休息。

身着军装，手持腰带的黄塞阳第一个走进抢救室，他向大家介绍说："韦国清书记来看望大家了。"

此时，北京女四中学生卫东正处在半昏迷状态。原来，北京南下串联学生参加9月8日上午在桂林市委门前静坐绝食的红卫兵，也选出北京外语学院德语系的齐卫东、北京师院附中的铁军、建军等5人、北京女四中的卫东等人和郑州航校的学生作为他们的代表赴南宁向广西自治区党委请愿。

抢救现场的气氛很紧张。韦国清走过去，关心的伸出手，想摸一摸这位女学生的头，却被这位女学生用手挡开。天太热，韦国清拿着草帽扇凉，另一个女四中的女学生一把将韦国清的草帽夺过来扔在地上。韦国清没有生气，笑着拾起草帽继续扇着。那个女学生见状又夺过草帽扣在痰盂上，并大声斥责说：

"革命小将都饿成这样了，你还笑，你他妈的还有良心吗？"

围在韦国清周围的工作人员见状，立即簇拥着韦国清慌忙离开了办公室，瞬间就不见了踪影。

韦国清走了，问题怎么解决,晕倒的学生怎么办？在场

的学生心急火燎，赶快分头去找韦国清，其他人留在现场等待。

等呀等呀，楼上楼下都找遍了，谁也没有见到韦国清。

这时，自治区党委一个负责人来到静坐绝食现场，向学生们建议说："你们先休息休息，身体恢复了再和我们对话，解决问题。"

天气确实太热了，参加静坐的北京学生接受了区党委的这一建议，离开了区党委的大门，被安置在广西医学院附属医院休息治疗，等待对话。

下午，区党委两个工作人员给广西医学院附属医院休息的北京学生抬来一大筐水果，有香蕉、梨子等。这些学生的"头头"严肃的对这两位工作人员说："桂林市委的问题不解决，我们不会吃饭的，请你们马上抬走"。

那两个工作人员没有理会，学生"头头"斩钉截铁地说："如果你们不抬走，那就让它在这里自己变成一堆残渣烂核吧。"

那两个工作人员笑了笑，把水果放下就走了。

对于饿了两天的绝食学生来说，这一筐水果的诱惑无疑是巨大的，大家都围着那筐水果认真的给水果"相面"，一饱眼福。很快，这筐水果还是被大家分吃了。吃完的果皮果核都扔回了筐里，刹时间就盖住了筐子底，不一会装了小半筐。绝食学生的"头头"看呆了，无可奈何的苦笑着说："真

变成一堆残渣烂核了”。

北京学生左等右等，区党委那边一点动静也没有，倒是关于他们的谣言越来越多。先是说静坐学生受了黄塞阳的欺骗，黄塞阳是个大骗子等等；接着是静坐绝食的学生打了韦国清的传言从自治区党委大院不胫而走，一说韦国清被打了，再传韦国清被打伤了，三传被打躺倒住院了，最后传成韦国清被打得遍体鳞伤了。很快，全南宁市贴满声讨静坐学生殴打韦国清的大字报，说他被打伤住院，要揪出凶手。

天渐渐黑下来了，几个“盾牌”红卫兵来找黄塞阳辩论，将他带到一块空地上，很快黄塞阳就被众多的“盾牌”红卫兵团团围在中间，就势开起了他的斗争会。“盾牌”兵个个横眉怒目，挥动拳头，羞辱责骂不容分辩。黄塞阳几次想说话都被狂怒的呼喊声压下。无奈之下，他只有沉默，心想：“你们也算红卫兵？哼！”

时间一小时一小时地过去，黄塞阳饥饿口渴疲惫不堪，站立久了几乎晕倒。突然，一个阿姨冲进包围圈，拉起他就往外走，“盾牌”兵惊得目瞪口呆，不敢阻拦。原来这个阿姨是区党委办公厅负责人孙立海的爱人。孙立海六十年代早期和黄塞阳父亲同是桂林地委书记处书记，他们都住在区党委大院。“盾牌”兵几乎都是革干子弟，大都认识这位阿姨。就这样，黄塞阳在孙立海夫人的保护下出了区党委大院，回到家。

这天晚上，愤怒的“盾牌兵”、“赤卫队”封锁了南宁水陆空交通。黄塞阳家的大楼也被“盾牌兵”从一楼一直堵到家门口，准备将他抓起来。

而此时，黄塞阳还在家中酣然大睡，全然不知。他父母可紧张死了。黄塞阳父亲当机立断，写了一封信托人面呈韦国清，大意是请务必保护黄塞阳的人身安全。

经广西自治区党委研究，认为黄塞阳目前不能抓，抓了事态会进一步扩大，区党委、南宁市委都不好下台。

深夜，南宁市市委书记肖寒派市团委书记崔伟航去说服“盾牌”红卫兵，肖寒对崔伟航说：“你去告诉他们不要忙于抓人，抓一个人有什么用，如果要抓，在北京也可以抓，告诉他们，黄塞阳是跑不了的，顾全大局要紧。”

“盾牌”红卫兵这才暂时罢手。

9 月 10 凌晨 2 时，广西南宁、桂林、玉林等地许多单位都接到了紧急电话通知，说韦国清被黄塞阳等南下串联队红卫兵殴打重伤住院，现在凶手正准备逃跑，要大家立即写大字报捉拿凶手，同时宣布四点注意事项：

一、大字报一定要在天亮前贴出去，集体去以免遇到红卫兵出事；

二、签字一律用革命群众，不写单位；

三、贴报地点在某某路；

四、此事一律不得泄密，谁说谁负责。

天亮了，南宁满城张贴《黄赛阳是怎样一个人》的铅印传单，将黄塞阳写成了“黄赛阳”，而声讨“黄赛阳”的标语更是从百货大楼等高楼的顶层一直悬挂至地面，一时间广西掀起了声讨“黄赛阳”的浪潮，大街小巷、城市乡村到处都贴满了“打到黄赛阳”、“油炸黄赛阳”、“绞死黄赛阳”的大标语。“黄赛阳”一夜间成了广西的大名人。

广西各地也相互呼应，《桂林日报》社根据南宁 10 日凌晨 0 时 15 分来电，以全体职工的名义印刷了 10 万份“号外”，而当时《桂林日报》发行量也仅 2 万份左右。与此同时，广西各地纷纷集会，声讨“黄赛阳”殴打韦国清的滔天罪行，各地来信来电，有的地方还集会声讨静坐学生打伤韦国清事件。声讨“黄赛阳”，慰问韦国清的慰问信、慰问电从广西四面八方雪片似地飞往南宁，有的甚至报告党中央和毛泽东。

第 217 回：为绝食，陶铸电报发广西　众意见，王于畊终被停职

9 月 10 日清晨，以保护为名，广西自治区教育厅“赤卫队”把黄塞阳带到了邕江边一所房子，吃住都安排得很周到，只是叫他写材料。教育厅一个姓马的阿姨经常来看黄塞阳，叫他放心，安心写自己的材料。这位阿姨是教育厅老领导吴师光的爱人，她还常去安慰黄塞阳母亲。

10 日上午，广西大学“红卫兵”于成武打电话到区党委办公厅询问韦国清被打一事，区党委办公厅黄英梅回答说：“没有人打韦国清，也没有谁盗窃区党委文件，不过会上态度很不好，很不礼貌。有人骂人，有人把韦国清戴的草帽摘下来。”

这天，区党委接待站负责人彭钊剑也对来访的北京红卫兵说：“这个问题大家很关心，有的不了解事实真相，传说很多。情况是这样的：昨天上午韦国清同志去看晕倒的同学，同学代表陪同前往。同学代表不让随从韦国清同志去的赤卫队员进去。进去后，韦国清同志拿草帽扇凉，当时有人很气，把帽子打掉了，并有推拉的现象（没有打），对健康没有影响。这些事情都只是个别人干的。”彭钊剑还在记录稿上签了名。

9 月 10 日，应南宁市委的请求，韦国清在南宁桂剧院和群众见面。会议是秘密召开的，只有观点符合自治区党委南宁市委的组织才能参加，肖寒亲自布置崔伟航组织几十个“盾牌兵”到桂剧院交由石力指挥做好保卫工作。肖寒陪同韦国清接见了几位“盾牌兵”的负责人，然后由自治区党委授意“盾牌”司令部写一份“澄清真相”传单

拿到柳州桂林散发，并派 4 人带着传单上北京向中央反映情况。肖寒亲自与上北京的“盾牌兵”谈话，为他们开介绍信，嘱咐他们：“见不到江青、总理，至少也要见到陶铸。”

自治区党委还发了一个特急电报给中央，电报是区党委候补书记霍泛根据韦国清、乔晓光的授意起草并经韦国清签发的。电文如下：

上报中央中南局并陶、王：

平息事件的做法

一、用别的学校的红卫兵和他们展开了辩论，揭露绝食是不对的，他们理屈词穷，多数动摇起来了，逐渐退场；

二、揭发了煽动此次绝食的主要人物之一黄塞阳的许多罪恶，许多恶毒和极端反动的言论和阴谋活动，揭露了他偷爬楼梯想窃取党的机密文件，被赤卫队和红卫兵拉下来；

三、揭露了煽动绝食的一些负责人，特别是黄塞阳用法西斯控制手段，强迫别人绝食，但他们每天都背地下饭馆吃饼干，听到揭发后，其他绝食者极为愤慨，纷纷表示上了当；

四、揭露和公布了这些学生借以闹事的所谓“八七”事件的真相，使许多被骗者清醒过来；

五、对绝食者进行了耐心的争取和教育工作，送水送饭送草帽，给治病，使他们深受感动。

9 月 11 日，陶铸给广西自治区党委的电报：

广西自治区党委并告南宁、桂林地区革命师生同志们！

现在向大家申明一下，我对绝食问题的看法：我在接见来京学生

时，没有谈到绝食问题。说我讲过“静坐、绝食不仅是革命行动，而且是伟大的创举，”这纯属谣传。绝食我是不赞成的，为什么要绝食、把身体弄坏呢？应当爱护身体，吃饱饭，按十六条更好地进行斗争。

（加急分送两份：桂林地委、桂林市委。）

陶铸

一九六六年九月十一日

这份电报，在广西大量印发。

由于外面风声越来越紧，被安置在广西医学院附属医院的北京绝食学生都非常紧张，觉得继续呆在这里早晚会被那些五大三粗的工人“赤卫队”揪出去围攻。于是他们的“头头”当机立断，决定撤退。有人提出：“南宁那些支持我们的人正在与强大的对立面斗争，我们在南宁是他们的精神力量，现在跑了是不是有点不仗义。”

他们的“头头”不以为然，说：“十月革命后列宁和德国签订布列斯特和约的例子说明，革命有时需要妥协……”并一再解释说：“这不是逃跑，是撤退。”大家心服口服的接受了这一“撤退”理由，趁着半夜月黑风高，寂静无人时，悄悄撤离了住处，神不知鬼不觉的离开了“赤卫队”重兵压境的医院，来到了火车站附近后，“头头”又指挥大家排成两列纵队，亮出红卫兵南下串联队的大旗，唱着“巍巍井冈山，养育着钢一连，毛代表就在我们的身边，朱军长走在队伍的前边，走在前边！镰刀割断旧世界，斧头开辟新江山，为了红色的政权，同白匪军决一死战”的歌曲，向车站走去。

火车站人大多，他们对车站的负责人说：“我们是北京来的，负

有调查研究的任务，现在要回去复命”等等，希望能提供方便。车站的负责人看到他们整齐的着装，轩昂的气势，就很爽快的让他们进站上车，顺利的回到了桂林。

这时，桂林的绝食已经结束了，他们又到北京红卫兵接待站反映问题，无人理会，最后也不了了之。

当他们回到北京后，有人向父母讲述起他们在桂林、南宁的这段“英勇斗争”经历，这人的父亲问他：

“你们绝食的原因是什么呢？”

这位学生想了半天，楞是没想起当时是为什么，隐隐约约记得是抗议桂林市委的什么人或者是什么事吧。父母笑道：“跑那么远饿了3天，不知道是因为什么？真胡闹。”

几天以后，自治区党委决定让黄塞阳离开南宁回北京，教育厅工作队又做了黄塞阳母亲的工作。14日，黄塞阳获得自由，告别父母后踏上北上的火车。当他回到桂林时，却受到英雄般的欢迎，再度成为新闻人物。

而此时的福建，依然是问题重重。

9月12日，南下串联的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科技大学、南京农学院的红卫兵冲进福建省委机关，勒令叶飞和省委文革领导小组第一副组长梁灵光回答问题。

9月14日下午，叶飞召集一些少数派学生组织代表和部分南下学生会举行座谈会，听取他们的意见和看法。晚上，他又召开了常委会紧急会议，心情沉重地说：“最近，福州市出现了一系列有计划、

有组织地挑动群众斗群众、工农斗学生的严重现象，对此我们省委感到十分不安，我们省委在这个问题上显得很不得力，未能加以及时制止，我作为省委第一书记，对此要负主要的责任……”

常委会上，决定由叶飞向全省人民发表广播讲话，阐述省委对当前运动的一些观点，希望能够消除两派群众之间的严重对立情绪。

第二天，叶飞代表中共福建省委发表有线广播讲话，向群众宣讲“文化大革命”形势，表明省委态度，要求把斗争锋芒指向省委，一共演说了 15 分钟。

在谈到 8 月 29 日福建省委大院的静坐事件时，他说：“省委不仅昨天已经肯定 8 月 29 日行动是革命行动，而且在 29 日就肯定了。”

接着他谈了对“前线红卫兵”的看法：“前线红卫兵是好的，是红色尖兵，但是，他们是有些缺点的，我准备向他们建议，做一些解释工作。

对“万人大会”，他说：“在昨天的座谈会上，北京学生提出要求召开万人辩论大会，我们同意召开，待省文革小组和学生协商以后再确定。”

关于他爱人王于畊的问题，叶飞说：“我支持八中要求，但是，现在已经组织全省大中学校代表总攻教育厅和宣传部，攻了以后，如果八中认为还没有全解决问题，要王于畊再到八中也可以。在这里我要表示一下态度：大家知道王于畊是我的老婆，我绝不包庇她。如果她是黑帮，首先，我应该把她打倒。这不是老婆问题，是革命和反革命的问题。我不包庇，也不可能包庇，省委也不可能包庇王于畊，这

是党中央不允许的。如果我是黑帮，我首先要把自己打倒，也号召革命师生把我打倒。”

当晚，福建省委书记处继续开会研究如何贯彻中央 9 月 7 日毛泽东关于青岛事件的信件批示和《关于县以下农村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两个文件。鉴于批判宣传、教育界大会即将要结束了，对于许彧青、王于畊二人是否要做结论处理，在会前，福建省委第二书记范式人同省长魏金水打了招呼，认为应该停他们两人的职。

叶飞原以为王于畊的问题已经开大会揭发批判了，结论要等以后再做。然而，出乎他的意料，这天晚上的会上，范式人竟提出要许彧青、王于畊二人停职反省，那些书记们也一呼而应，同意这一处理决定。这可把叶飞气坏了，他气呼呼地道：“这怎成？揭发批判大会才刚刚开，她的材料尚未调查核实，你们就迫不及待地给她处理处分，我坚决反对这样做，请书记处考虑，如果这样搞，岂不是罢官成风？这是违背中央精神的！”

“谁说处理了王于畊就是罢官成风呀？况且我们还没摘她的乌纱帽，只叫她停职反省咧。”范式人当即反驳说，“万人大会开了这么些天，广大群众揭发了大量的材料难道还不能说明王于畊问题的性质是严重的么？老实说，叫她停职反省是够通情达理的了。”

叶飞不满地瞪了他一眼，紧绷着脸说道：“反正，我坚持我的意见，我认为要先作调查，核实材料，最后再做结论，我要求把我的意见上报中央，两种意见都上报。”

而魏金水也发火说：“好，不管你报不报，我们就这样定了。”

15 日晚的书记处会议未能达成一致的意见，遂决定 18 日晚改为召开常委会，让所有常委们都来解决这个问题。

本来书记处的会议内容应该是十分保密的，连那些省委常委们也不太清楚 15 日晚上的会议究竟争吵了些什么，可是，次日就有教育厅的 3 个人跑到华东局告状去，控告有人要停王于畊的职，谁也不知这风声是如何传出去的。

18 日晚，省委第二会议室的气氛令人沉闷，主持会议的叶飞一直阴沉着脸抽闷烟，既不谈书记处会议的争论，也不谈万人大会揭王于畊的主要问题，光叫大伙儿讨论。可是，怎么讨论呢？两个第一、第二书记反了目，而且，常委们也不了解 15 日晚书记处会议的真实情况，大家都不知该说什么是好，常委们各自喝茶、抽烟，谁也不急于表态。后来，还是梁灵光开口将 15 日晚争论的情况说了一下，但诸位常委依旧是闷嘴葫芦，没有一个发言。会议开到 23 时尚无任何结果，只得休会。

19 日晚又继续开常委会，这天晚上的会议气氛与昨晚截然不同。开会时，先把争论意见和大会材料印发给大家，接着由叶飞首先讲了将近一个小时，内容大意是：（1）请常委会通过一个拟好的大会结束讲稿提纲，他说："通过这个文件，以后出什么问题，由省委来顶住。"（2）给王于畊定调子，说"王于畊是犯有严重错误的，但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她不是四类，最多是三类。"（3）反对对王于畊采取组织措施，说"如果停职，将影响到全省停职成风，罢官成风。"

在叶飞讲话后，常委们相继发言，魏金水最先发言说："刚才叶飞同志说王于畊是几类，不是几类的，但是，这几天的会议并未讨论王于畊问题的性质，现在还不是定性质、定调子的时候，而是应该要大张旗鼓地揭发批判许彧青和王于畊的严重错误，从已经揭发出来的大量材料看来，他们的问题的确是很严重的，所以，15 日晚上书记处会议大多数同志认为要叫他们停职反省，这种处理意见是正确的。如果说停了他们二个人的职就叫做'停职成风'、'罢官成风'的话，那么，请问以前停了那么多人的职又叫什么呢？你叶飞为什么都不说是'成风'呀？"

省委监委书记、常委侯振亚也掐灭了烟蒂，不急不忙地发言道："昨晚上散会时，我曾对梁灵光说，我同意书记处大多数人的意见，在今晚的常委会上我还要重申我的态度，我同意 15 日晚书记处会议大多数同志的意见，许彧青、王于畊必须停职反省，不这样处理，不足以平革命群众之愤、红卫兵小将之愤、广大党员之愤，连我们也想不通……"

除了叶飞之外，所有常委都发言表态同意书记处的意见，甚至连郑重也支持对王于畊停职反省的处理意见，叶飞发现自己已陷入众叛亲离的极端孤立的境地。不过，也有一人是例外的，他是副省长何老，一个老红军出身的工农干部，没什么文化，只是他不是常委，有发言权，却没有表决权。他表示不同意对王于畊停职反省，只是摆不出反对的理由，他是凭着内心的感情反对这样做。

马拉松式的会议一直开到次日凌晨2时，由于全体常委都同意对

许彧青、王于畊停职反省，并决定由韩先楚组织一个专案组来专门审查他们的问题。叶飞出于无奈，最后才勉勉强强地说："好吧，我放弃个人的意见，停职就停职算了，但是下不为例，不要罢官成风。"

谁料到福建省委常委会关于许彧青、王于畊停职反省的决定才刚刚做出几个小时，20日清晨8时，又有两个自称是市一中红卫兵的人打电话给华东局，抗议常委的决定。后来查明，这二人不是别人，一个是叶飞的女儿马薇薇，化名丹心，她是市一中校文革副主任、"前线兵"的一个头目，另一个是烈士的儿子袁向阳，他也是市一中的学生。

当范式人获悉这消息时，气坏了，中午11点了，还临时召集书记处会议。他盛怒未平地道："我们常委会的决定是凌晨两点才做出的，可是有人清晨8点就打电话到华东局去抗议常委的决定，是谁的消息这么灵通呀？难道他们的耳朵不是装了天线么？究竟是谁把消息泄露出去的？究竟是谁布置他们这样干的？这是严重违反党的纪律行为的，是可忍，孰不可忍！"

魏金水也一脸郁怒，生气异常地说："这完全是胡作非为！常委会的决定怎么能泄漏出去呢？

而且是这么快就漏出去了，太不像话了！请问这样搞，常委会还有什么密可保呀？我们查过邮电大楼，打电话到华东局的是两个自称是市一中红卫兵的人，其中有一个化名叫丹心，丹心是什么人，什么人把消息透漏给丹心的，这要好好查一查。"

书记处会上的人有意无意地纷纷把眼珠子盯到叶飞的身上，那来

自四面八方的锥子似的目光盯得他真不好受，叶飞显得有些心神慌乱，他掏出手绢揩了揩额上的汗珠，连连摇头道："不是我透漏出去的，我也不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

范式人斜目瞥了他一眼，鬓角里的青筋嘭嘭地跳着，怒气冲冲地道："反正是我们常委会上出了鬼，我不讲了，开除我党籍我也不讲了。"

"我也不讲了。"魏金水也恼怒地说。

梁灵光见双方闹得很僵，他想缓和一下这紧张的空气，况且，上午叶飞曾找他私下谈话，动员他不要同意对王于畊停职，因此，他便乘此机会提出了一个折中方案说："嗯——我看是不是这样，把对王、许的'停职反省'改为'停止工作，进行检查'，好不好呀？"

可是，他到底是孤掌难鸣，常委会好不容易才做出了这个决定，谁还想再去推翻呀？何况，那些人都正处在火头上，他们扬言"不讲了"，就真的埋下脑袋一声不吭，谁还会再去理睬什么"动议"呢？

时间如天马行空一般飞快地过去了，会议主持人范式人看了看手表，摆摆手道："嗨，算了，已经一点了，下午两点半还要开大会咧，休会！大家都回去吃午饭，等下所有在福州的常委统统都要去参加今天的万人大会，不得无故缺席。"

由于昨夜常委会开会的情况被人泄露出去，叶飞自然成了头号被怀疑的对象，书记处会上的几个书记都大动肝火起来，弄得他有口难辩，尴尬万分，他憋了一肚子的火气，只要划一根火柴便可以像天然

气一样燃烧起来。回到自己的家里，叶飞一见王于畊劈头就问："喂，我问你，昨晚上我跟你说的常委会上的事，你有没有跟别人说？"

"我……我没有，我跟什么人……也没说呀。"王于畊支支吾吾地否认说，但她的眼睛却不敢正视叶飞。

"哼，你没有？那消息是怎么走漏出去的？为什么今天大清早居然有人打电话到华东局去抗议省委的决定呀？"叶飞脸上露出一副不相信的表情，他那一双如X光般犀利的目光直盯住她，仿佛可以看透她的五脏六腑。

"我不知道，这我怎么知道呢？"王于畊依旧矢口否认。

"你别装糊涂了，我看你是最大的嫌疑犯，我问你，你有没有对薇薇他们说昨晚上常委会开会的事情呀？"他的目光依然逼视着她。

而王于畊没有应话，她将头扭到别处去。

"怎么，你哑巴了？……你说话呀，我的夫人，你到底有没有对薇薇说？"他发急起来。

"我说了又怎么？是我叫孩子们打电话到华东局抗议的，我又不是什么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你们凭什么要罢我的官，撤我的职呀？"王于畊索性吃了扁担——横了肠子，石头对石头硬顶撞。

"嗨，果真是你闯的祸，我特地交代过你千万不要对任何人说，结果你还是跟人说了，真气人，谁叫你要孩子们打电话到华东局去呀？胡闹，你们女人就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事情全被你搞糟了！"叶飞大发雷霆，怒不可遏地训斥起她来。

然而，叶飞毕竟是个大忙人，也没有时间容得他发火，下午两点

半就要开万人大会了，他吃完饭便又要去开会，而王于畊也得到会话听取批判，双方都没有功夫争吵，况且夫妻之间拌嘴又算得了什么？吵了又会好的，共同的命运之索已经将他俩紧紧地捆绑在一起，在这风雨如晦的日子里，他俩同乘一条岌岌可危的小舟，在苦难的茫茫大海上漂浮着、挣扎着。

20日的万人大会上，叶飞亲自派人用汽车接来北京西城红卫兵“自来红战斗组”，让待为上宾的这些北京红卫兵在大会上发言，“自来红战斗组”的讲话基本上就是谭力夫讲话的翻版。同时，会上有人还散发反对省委停王于畊职的传单和“前线兵”总部翻印的“谭力夫讲话”的传单。

省委第二书记范式人在万人大会上作了讲话，他代表省委郑重宣布对许彧青和王于畊停职反省的决定，还决定由韩先楚组织一个专案组来专门审查他们的问题。至此，由厦八中师生首先发起的闹哄哄一阵的“揪王行动”就这样暂告一个段落。

## 第218回：忙拦截，北上反修成绝唱
## 苦坚持，山城学生获召见

9 月 15 日，毛泽东在天安门第三次检阅红卫兵。根据周恩来指示，北上海拉尔拦截国际列车的红涛和李建军上了天安门城楼，其他队员在西二观礼台上。毛泽东在城楼上接见了李建军和红涛。周恩来介绍说："他们就是来自海拉尔的反修小英雄们的代表。"毛泽东微笑着和他们握手。

小分队的声誉达到了顶峰。许多红卫兵都跑到他们的驻地——南河沿 111 号来打听拦截国际列车的情况。周恩来和他们合影的照片、海拉尔市委送给他们每人一双崭新长筒马靴，以及他们手里那张进出边境地区证明，都让他们羡慕不已。

苏联对这次事件有何反应？有一天红涛到外交部，碰到苏欧司的老刘，他拍着红涛的肩膀说：

"你们这些不知道天高地厚的小家伙啊，给我们带来的麻烦大了！事情没过几天，苏联大使就来提抗议。我们绞尽脑汁，答复说，这次事件是民间所为，而不是我国政府所为，为此我国政府不能接受贵国政府的抗议。苏联大使气得不得了，'啪'地一下把抗议照会摔在桌子上就走了。你不是想了解苏联的反应吗，来看看这份《真理报》吧！"

红涛拿起报纸一看，苏联塔斯社在醒目的标题下报道了他们拦截国际列车的消息，骂他们是"暴徒"、"流氓"、

是“一批反苏小丑”等等，还附了一张他和苏联女列车员辩论的大照片。

红卫兵们得意了，他们又策划第二次拦截，很多同学也想争当英雄，但红涛他们把人数限制在 30 多人。

9 月 21 日晚，红涛带领一路小分队出发前往去满洲里，火车刚到天津站，就听到站台上的大喇叭在急促的广播，让红涛去接紧急电话。

原来是周恩来让天津市委派车把他们接回北京，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他们，但这次和以往不同，他没有谈笑风生，而是挺严肃的批评他们，为什么没有打招呼就擅自北上？

再度拦截国际列车的行动终于搁浅，第一次行动成了“绝唱”。

话说重庆大学“815”在9月4日绝食10小时后，因得不到重庆市委答复，于9月5日凌晨步行前往茄子溪火车站阻拦列车，强行搭车上京告状。千名学生在吴庆举、黄顺义等人带领来到北京，住在北京展览馆及几所中学里。吴庆举每天带领一帮人去府右街中央文革接待站等待接见。此时他们是如此的孤立无援，戚戚惨惨切切，在中南海门口守得确实太漫长也太可怜了，以至9月9日，连吴庆举自己也痛感顶不住了，遂从府右街捎回一封信，倾吐满腔苦水，甚至对此次北上行动表示了许多绝望。

这封信连夜向寒卧北京展览馆地铺上的同学宣读，当即便有人失声痛哭。那一晚，九月秋凉，辗转无法入睡，几个同学起而谈议，直到东方既白。

这时，煤炭工业部驻重庆办事处党支部张副书记给他们送来了一封盖着煤炭部驻渝办事处党支部公章的介绍信，对重庆大学“815”表示支持。这让“815”总团勤务员黄顺义等人深受感动，黄顺义让吹起紧急集合号。

忽然响起的军号将住在北京展览馆的师生全都紧急集合起来，只见一脸干瘦的黄顺义跳上石凳，声色俱厉地向众人宣布：“昨天晚上，吴庆举的信把形势估计错了！现在，我们重新估计！”

他带领大家朗读了《毛主席语录》：“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我们的同志在困难的时候，要看到成绩，要看到光明，要提高我们的勇气。”然后宣读了煤炭部驻渝办事处张副书记带来的信，并讲了张副书记带来的重庆那边的最新情况。他说：“9月6日，重大冶金系、无线电系的同学在重庆解放碑贴出大标语：‘头可断，血可流，毛泽东思想绝不丢！可挨打，可挨斗，誓死不低革命头！’反响很大，更多的财贸、工人、师生支持‘815’。”

黄顺义激情充沛，慷慨陈词。每当演说到高潮，他总喜欢把话停下来，嘴唇咬得紧紧的，全身凝然不动……他的坚定把大家重新鼓动起来。

他们参加了毛泽东9月15日第三次检阅红卫兵的集会、游行。在游行过程中，新华社一位记者采访了黄顺义，问他此事有何感想？黄顺义说："我感到很幸福，很激动。""我们一定要响应毛主席的号召，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我们的誓言是：头可断，血可流，毛泽东思想绝不丢！可挨打，可挨斗，誓死不低革命头！"

新华社的稿件在中央广播电台和《人民日报》上作了报道："来自山城重庆的广大红卫兵师生员工，立下誓言：头可断，血可流，毛泽东思想绝不丢！誓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引起了更大的反响。

吴庆举继续在府右街中央接待站前苦守多日，一直顽强坚持到9月25日。这天晚上20时30分，陈伯达、王力终于在政协礼堂接见了重庆大学"815战斗团"及其他师生，陈伯达说：

"我代表中央文革小组向同学们问好！你们来到这里很希望我们来谈谈话，我们事多人少，常常辜负了你们的期望，很抱歉。"

"我们对于那些不遵守中央指示的领导是很不满意的。我们对文化革命运动中受到委屈、受到打击围攻的同学表示慰问，表示同情。我们刚才收到一封信，对这封信提出的问题，我完全赞成。"

接着，王力开始念信，这是南京的工人写来的信，他们

在信中提出了几点要求：

“1、立即恢复工人自己选举的文革小组的活动。”

陈伯达插话：“如果学校有这种情况，也可以改为对学校的情况。”

王力补充说：“不管学校、单位、文革小组、文革委员会，凡是不是按《十六条》由群众选举出来的即无效；凡是指定的背后有人操纵的、委派的，一律不算数，一律重选。”

他接着念：

“2、立即撤走别的单位调来的别的组织，别的用来镇压这里群众运动的立即撤走。

3、立即停止逮捕群众和组织群众斗群众。

4、我们的文化革命必须由自己的单位来解决。

5、立即发放工人的工资，不能停发不同意见的和反对自己意见的人的工资。

6、停止出动武装和公安人员对我们的镇压。”

陈伯达接着说：“南京水电队的工人提的几条意见是很合理的，很正确的，与《十六条》对得上的。南京水电队的同志恳求党中央解决问题，毛主席、党中央制定的《十六条》，就是这样制定的。我们很高兴，希望南京很快地解决这个问题，以便同志们早日回南京一手抓革命，一手抓生产。”

“刚才有人递条子，对于那封信（南京水电队的）有不同意见，这完全可以说的，我们文革小组的意见不一定是完

全正确的，可以批评，可以怀疑。因为我们讲的是个原则，中央指示的是文斗，不要武斗。在群众中造成宗派，不能讨论，不能辩论；造成武斗，就会被牛鬼蛇神利用，被坏人利用，就会被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利用。总之，会被坏人利用，值得大家警惕。刚才的这封信作为一般的原则来说的，各个单位的具体情况怎么样，根据大家的讨论，根据群众的意见解决。”

他又说：“这次文化大革命有两条路线，……这一个多月来，斗争的形势更尖锐更复杂了，就是说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资产阶级反动的修正主义路线的斗争更尖锐复杂了。有些人不愿意执行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不愿意执行毛主席的指示和党的路线，虽然形式上撤走工作组，可是他可以用别的形式代替工作组，虽然工作组撤走了，他就事先指定，背后操纵，成立文革筹委会等组织。你们红卫兵中也有真的红卫兵，有修正主义红卫兵，要提防。”

在这里，陈伯达无意中提出了“修正主义红卫兵”，日后产生了极大的争议。此时的他还毫无察觉，继续说道：

“一个小建议，跟你们商量一下。在座的有无高干子弟？我有一个个人意见：高干子弟在文化革命中占有领导岗位的应让出来，让普通的工农兵子弟来领导文化革命。”

接见结束后，重庆大学“815”进京告状的学生返回重庆。当他们到达重庆时，已是子夜。数千人在山城绕行高呼：

“我们见了毛主席！”把睡意朦胧的重庆市民搞得云里雾里，不知所以。

9 月 23 日晚，北京航空学院学生朱进选等 3 人从贵阳乘火车来到重庆。他们先到了重庆大学，9 月 25 日，又进城来到重庆六中。当他们从重庆大学出来时，在沙坪坝街上碰到一个赞同“815”观点的青年工人正被人围攻，朱进选他们以首都红卫兵的身份去帮那个青年工人解了围。这个青年工人叫黄全达，是长江航道段 661 指挥部的临时工，于是他就跟着朱进选一起来到六中。

朱进选到六中后，为前来串联的造反派工人设计油印了登记表格，包括每人的家庭出身、政治面貌、文化程度等。他看到各单位工人群众组织名目纷繁，有的叫“造反军”，有的叫“造反团”，有的叫“战斗团”，就提议把名称统一起来，并且给他们起了一个略显冗长的名字：“重庆无产阶级革命工人造反军”。他还亲自设计和刻印了第一批“工人造反军”的纸质胸章，在上面刻绘了象征共产党领导的党徽，镰刀斧头，和四射的光芒，交给六中学生用红纸印好，贴在纸板上，做成一个个小纸牌子，他亲手写上编号“革字×××号”；另外还做了十来个“纠察”胸章，在背后加盖了“干革命靠毛泽东思想”的印章，找了些踏实肯干的工人担任纠察，主要做维持秩序、防止发生破坏的保安工作。

9 月 28 日，重庆大学“815”提出“十一”要以独立的

支队举行国庆游行，并为此成立“重庆市国庆游行筹备委员会”。重庆市委没有答应他们的要求。“815”提出强烈抗议，并向全市发出呼吁。北京来渝学生答应帮助“815”解决这个问题。

9 月 29 日，以重庆大学“815”为首的重庆市大中学校“红卫兵司令部”在市体育场宣告成立。他们以重庆市少年宫为办公地点。司令是重庆大学“815”负责人周家喻。

9 月 30 日，朱进选认为：“815”学生决定次日要独立举行国庆游行，“工人造反军”也应该借此机会把自己的旗号公开打出去。于是，他用红纸写了一幅竖条的“重庆无产阶级革命工人造反军”标语，贴到重庆六中校门边。同时，他又起草了一份宣告“工人造反军”成立的《告全市人民书》，让六中学生帮忙油印出来。

当晚，由孟宪臣等北京学生组织重庆造反工人，在重庆市人民大礼堂召开了“重庆无产阶级革命工人造反军”成立大会。说是大会，其实规模并不大，到会的工人也不多，更多的是前来助威的学生。但总算是宣告“工人造反军”正式成立了。

就在这时，重庆市委通知各单位的“毛泽东思想红卫兵”、“赤卫军”、“工人纠察队”等组织于当晚 11 时 45 分，抢先占据游行必经的主干道，藉此阻止 10 月 1 日重庆大学“815”的游行。“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即原来的“毛泽东主

义红卫兵”。

10 月 1 日上午，重庆市照例举行一年一度的国庆游行。但这次游行与往年不同的是，再没有往年那样提前彩排、展示各行业建设成就的盛装游行队伍，而只有绿军装、红袖章、由市委组织的“毛泽东思想红卫兵”、“赤卫军”、“工人纠察队”和毛泽东画像、《毛主席语录》牌和红旗。市委领导的主要想法就是怎样防止混乱进一步发展。

当几万名“815”派的学生来到游行会场时，重庆市委已宣布“大会游行结束”，并撤离。“815”派自行组织了游行，一直走到朝天门。

以“815”为主的“红卫兵司令部”成立后，周家喻和“红卫兵司令部”的中学生副司令小何就带着两个红卫兵开着吉普车来到驻在红岭山腰边的 54 军军部，被大门口站岗的警卫战士拦下，问他们：

“你们干啥？”

“找你们军长。”周家喻毫不犹豫地回答说。

警卫战士很惊讶的质问说：“军长能让你们随便找吗？”

周家喻说：“我们是全市‘红卫兵司令部’的，有要事找他。”

警卫只好让他们在接待室等着。

不到 10 分钟，54 军韦统泰军长就亲自来到接待室。互相介绍后，韦军长诙谐的说：“你是红卫兵司令，我是警备

区司令。好，我们就司令对司令，都是平等的。有什么事，我们就谈谈吧。”

韦统泰脚蹬一双普通布鞋，其着装之朴素让周家喻心中暗暗钦佩。但他仍然没忘此行目的，不客气的质问道：“你为什么要当‘思想兵’的辅导员？”

韦军长回答说：“我是重庆市委常委，是常委会决定要我当的，我们要听党的话。”

“你们应该听毛主席的话。”周家喻反驳说：“毛主席支持我们起来搞革命，‘思想兵’却是市委组织起来压制我们的。你跟我们到‘红卫兵司令部’去一趟，我们把问题辩论清楚。”

韦统泰也毫不含糊的回答说：“好啊，只要讲道理我就喜欢。”

这时，周家喻 4 人上来就要把韦统泰抬出去，警卫见状立即上来阻拦，加上韦统泰个子大，周家喻 4 人也抬不动。韦统泰就势站了起来，对周家喻他们说：“好，我到你们司令部去，正好去看看你们。”他让警卫不要阻挡，坐上周家喻他们的吉普车来到了位于重庆市少年宫三楼的重庆市大中学校“红卫兵司令部”。周家喻向大家介绍说：“这是我们请来的客人韦军长。”大家热烈鼓掌表示欢迎。随后韦统泰被请到一间屋子里和大家交谈，然后他又和这些学生一个人一个人的单独谈，从他们的家庭出身、个人经历，到为何造

反，问得很详细。他发现这些学生基本都是苦出身，对共产党、毛泽东有很深的感情。他索性就在少年宫住下来了，每天和这些学生一起去食堂吃饭，晚上就和周家喻和小何一起睡在地板上。当时重庆的天气依然很热，学生们就在地上铺些报纸睡在上面。

部队来人接韦统泰回去，他说："我向党委请一个星期的假，就在这里做些调查研究。"来人说部队还有工作，担心在这里不安全。韦统泰说："我在这里很安全。难道没有我就不能工作了吗？我在这里很安全。"就这样，重庆驻军54军军长韦统泰在"815""红卫兵司令部"住了一个星期。

周家喻向韦军长谈了重庆市委书记任白戈生活的奢华："他住的那个小院过去是蒋介石住的，法国式的马桶。他们这么讲究个人享受，太脱离群众。毛主席号召大家起来造他们的反，难道不应该吗？"

第219回：青岛难，《首都兵团》亮旗帜　万人会，万晓塘洗澡身亡

此时的青岛，已经得到毛泽东9月13日赞许的副市长王效禹，就青岛问题写给山东省委第一世纪谭启龙一封信：

启龙同志：您好！

……

解决青岛问题，我有几点建议，请您斟酌。

1、三大院校革命师生的革命行动，无论如何，大方向是正确的，这一点绝对不能动摇，不能含糊，必须坚定不移地给予支持。在这个前提下，纠正其缺点，并不困难。

2、一切阻碍这个运动、破坏这个运动、诬蔑这个运动的言论和行动，都是违背“十六条”的。必须加以反对，加以教育纠正。

3、对待革命师生队伍不纯的问题，要用毛主席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当中所论述的观点、立场去解决。相信绝大多数在毛泽东思想哺育下成长起来的青少年是最听毛主席的话的。张敬焘同志犯错误的根本思想就在这里弄错，对革命师生采取了对立态度，用了压制的手段，因而就犯了方向性错误、路线性错误……

4、要说服群众，首先要说服领导……

现在和两军对峙一样，机关干部为一方，革命师生为一方，这是极不正常的局面。为了打破这种僵持状态，要用革命精神拿出勇气，放下架子，到学生中间去。学生是吃不了人的，不用怕，我反而觉得他们非常非常听毛主席的话，也非常尊重老干部。在他们中间住一段时间，自己也觉得年轻了很多……”

信中特别指出：“‘九一’事件是个反动事件。”

谭启龙并没有把王效禹放在眼里，他仍坚持自己拟定分两步解决青岛问题的方案：第一步解决工人和学生之间的纠纷，第二步，解决青岛市委问题。

9 月 20 日上午 9 时，谭启龙千辛万苦召集的“青岛市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师生和革命干部代表协商会议”召开，1174 名代表参加。会议由谭启龙、苏毅然、栗再温、段毅等人主持。

谭启龙拟定了一份作为会议决议的《给毛主席和中共中央的致敬电》。电文中说：

“青岛市工人和学生之间的纠纷，在谭启龙同志亲自领导和帮助下，经过双方的共同努力，已经得到了解决。”

“纠纷是由于青岛市委张敬焘同志害怕群众，采取了错误做法，压制学生运动，犯了方向性、路线性错误；由于一小撮走资派和其他牛鬼蛇神的挑动所引起的。”

“青岛的广大红卫兵、三大院校和其他院校革命师生坚决地、勇敢地向那些公开的、隐蔽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举行了进攻，起了革命急先锋的作用，他们的革命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

协商会议自始至终充满纠纷，会场秩序混乱。通过决议时，虽然工人代表最终委曲求全，接受了决议的措辞。但青岛医学院等三大院校学生代表，对协议中引起青岛事件原因的“二元论”提法表示不满，而且他们不承认纠纷已经解决。因为他们根本就不同意谭启龙“两步走”的方案。他们认为只有先解决青岛市委的问题，才能解决现在的

纠纷问题。

会议连续协商 18 个小时，谭启龙的忍耐终于到了极限。他大声说："主张分裂的人，可以出去!"

三大院校的 136 名代表毫不犹豫地走出了会场。

21 日凌晨 3 时，会议以 938 票通过了《青岛市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学生、革命干部代表协商会议向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报告》，但是 136 人的拂袖而去大大减轻了它的份量。军队代表 100 人未参加表决。随后这份决议就成了一张废纸。青岛市大规模的群众冲突再起，而且愈演愈烈……

青岛以"三院两校"的青医"东方红"、海院"主义兵"、化院"东方红"、冶校"造反军"、航校"思想兵"为主，于 9 月 21 日发起成立矛头对准各级党委的全市性造反组织"青岛市大中学校红卫兵联络总部"，简称"大中学校总部"，主要领导有化工学院杨云良，冶金学校孟庆祝等人，总部设在反修路 74 号，即现在的中山路。

9 月 25 日,青岛市首批 2700 多名红卫兵乘专列赴北京,一是参加国庆 18 周年活动,二是参观、学习首都"文革"运动。青岛市委决定，"825 事件"中表现突出的青岛医学院大学生张汉祥赴京参加国庆观礼。

王效禹给康生、王力、关锋写了一封信，请赴北京参加国庆活动的青岛医学院红卫兵负责人张汉祥到北京后面交王力和关锋。

张汉祥拿着信，心存疑惑地问王效禹："王力、关锋是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他们能接信吗？"

王效禹回答："没问题，见到信，他们肯定接见你。在渤海区时，我同王力、关锋的关系很好。渤海区当时斗争很激烈，我们观点相同，是一派的。"

张汉祥到了北京，人生地不熟，直到国庆观礼结束，也不清楚中央文革小组的地址，无法找到王力关锋。无奈，他于 10 月 2 日早晨把王效禹的信贴上挂号邮票，寄往中央文革小组，信封上写明"王力关锋收"。没想到第二天，10 月 3 日，就有人通知他不准外出。

下午，王力、关锋亲自乘车到山东赴京观礼代表团驻地找到张汉祥等人，与他们交谈了 4 个小时，询问有关情况。王力、关锋两人谈到王效禹时表示："我们 18 年不见了，你们回去以后，一定代我们向王效禹同志问好。"

随后，康生还和王力、关锋接见了张汉祥等人。

此时，北京二中、五中、二十五中等学校的造反派红卫兵，于 9 月 16 日成立了中学"毛泽东思想红卫兵首都兵团"，简称"首都兵团"。发起人是北京二十五中的高三学生李冬民。

李冬民天资聪颖，成绩优异。他在北京二十五中念高中一年级时，提前参加大学入学考试并取得很好的成绩。据李冬民当时的班主任李鸿达老师讲，他那年的俄语高考分数是 98.5 分，其他各科成绩也都优秀，尽管几所大学要人，后来都被校领导挡回去了，李冬民也由此认为，中国当时的教育制度对学生天性的压抑太大，太误人，非改革不可。文革开始后，尤其是聂元梓的第一张大字报出来以后，他和全国的老百姓一样，沸腾了，觉得解放了。

6 月 7 日，北京二十五中的学生夺了学校领导的权，开始宣传他们对教育改革的看法，李冬民干脆就不回家了，晚上就在课桌上睡。6 月 8 日，工作组进驻二十五中，两天后学校的情况就不一样了，工作组要求每天上课 8 小时，同学们的热情一下子就下去了。这时候工作组支持一些干部子弟当权。谁家官大，谁家的孩子就当权。

李冬民写了一份《教育革命呼吁书》，为了将文章油印出来，他们找工作组借学校的油印机，可是工作组不同意。晚上在同学家里，李冬民随手翻了一本人们平时都不看的书——《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正好翻到第三章第 87 条，“公民有出版的自由，并且国家应给予支持，并给予物质上的便利”。第二天，他们就拿着《宪法》和工作组再去要油印机。最后李冬民对工作组说：“你们不同意我也要印，你们必须支持我们的！”

工作组很生气，也没有办法，吓唬他说“那你们就印去吧！但是责任你们自己负。”

“当然是我们自己负责。”李冬民回答。

6 月 16 日，工作组突然发难，说李冬民他们是“反革命”。6 月 17 日，工作组召开全校辩论会，斗争了 4 个学生，其中一个是团总支书记，两个是班的团支部书记，还有一个是班主席，就是李冬民。从早晨起来就开会，工作组坐镇，中午也不让他们吃午饭，一直斗到太阳下山。晚上吃完晚饭，又继续开会，一直到第二天早晨快上课时才结束，连续批斗了 20 个小时。

工作组撤离后，李冬民咸鱼翻身，于是他联系了几个学校受工作组压迫的学生，于 9 月 16 日成立了“毛泽东思想红卫兵首都兵团”。

北京的南大门天津也很热闹。9 月 18 日上午，天津市一中、十八中、女六中、劳动局二技校等 16 所中学红卫兵和学生上万人，在民园体育场召开了首次揭批天津市委大会，一中学生王小勇主持会议，天津市委第一书记万晓塘、第二书记赵武成都参加了大会并分别讲了话。

为防意外，会前，天津市委书记处书记张淮三电话布置自行车厂党委书记亲率数百名工人参加大会，其他工厂也安排了工人前来参加。市委事先还准备了传单，准备要是会议乱了，就撒传单。

上午，赵武成在会上作检查。下午万晓塘检讨时，会场只有几百人参加。万晓塘在会上说：“我们一再号召炮打司令部，我们已经揭露了像胡昭衡、白桦、王金鼎这样一些混进党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钻进党内的这样一些资产阶级代表人物……”

万晓塘后来说：“这次大会开得不错，应当相信群众。原来我们想得很坏，心想一定很激烈。但会上很好，又给水、又给座。”

谁知，第二天晚上，万晓塘在睦南道市委招待所洗澡时突然死亡。

9月21日，经陶铸批准，新华社播发了天津市委第一书记万晓塘死亡公告。

9月22日，天津市委在第一工人文化宫为万晓塘举行隆重追悼大会。河北省省长刘子厚主祭，天津市委第二书记赵武成致悼词。50万人参加追悼万晓塘的活动。

以“人民体育场红卫兵、全体革命群众”的名义写的《沉痛哀悼万晓塘同志——从九·一八大会看万晚塘同志的革命精神》传单，攻击9月18日在民园体育场召开的揭批天津市委大会是“反革命大会”，认为是与会的学生、群众“害死了万书记”。于是，9月18日的民园体育场大会就成为天津当时的“九一八事件”。

从 9 月 21 日到 25 日，5 天里，天津市委前门庭若市，人群汇集于此，一声令下，队伍集合，口哨声起，这些队伍迈着愤怒铿锵有力的步伐，高唱革命歌曲，车水马龙，浩浩荡荡开往位于天津南郊的劳二半技校。就在劳二半门前，弹指间，大会临时主席即刻选出，扩音器、辩论台，场地准备完毕，所到单位达 62 个之多。他们贴大字报、发传单，声讨劳二半“八·一八红卫兵”，高喊：

“为万晓塘同志报仇！”

“血债要用血来还！”

“砸烂八．一八总部！”

“取缔八·一八！”

“捉拿甄常华、徐国恩！”

还说“见着甄常华、孙大圣叫他们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

天津劳二半技校门前，连续 5 天都是空前规模的围攻、声讨学生。

而天津市委大楼内外，许多揭发市委问题的大字报被撕掉或盖上，到处贴的是：

“万晓塘是坚定的革命左派！”

“替万晓塘同志复仇！”

“严罚杀人不见血的凶手！”

“以血抵血，以命抵命！”

这样的誓词、标语、大字报。连公安局人员也写大字报要“法办”劳二半“八．一八红卫兵”。

与此同时，许多单位的炮轰市委的红卫兵和群众被围攻，有的甚至被抓起来禁闭。

面对这样的局面，一中“八一红卫兵”负责人王小勇干脆联合这些受围攻的学生组织成立了“九一八造反团”，就以“九一八”命名。

9月26日晚上，张淮三在天津四清工作团长会议上说：“形势越来越好。最紧张的一段是8月下旬和9月上旬，经过八•二六事件的辩论，真相澄清了。9月18日，几十个学校又召开大会，揭发市委，晓塘同志亲自同学生见了面，讲了话，诚恳态度，欢迎批评，这样就争取了大多数，使会场形势有了很大变化。上午三千多人，下午只有六、七百人，发表意见也比较缓和了，极少数对市委有对立情绪的人，感到失望，觉得没劲。通过那天大会，形势逐渐变化。从9月20日到22日，广大群众吊唁晓塘同志，市委没有组织，但声势很大，实质是群众的正直行动，对坏人示威，对左派支持，市委被动局面好转。但要看到运动的阻力，还很大，斗争还会有反复，敌人决不会甘心失败，他们还会用各种手段破坏文化大革命。”

## 第 220 回：点火会，启发太原中学生　探真相，刘灏为袁振翻案

我们再看山西。华北局会议一结束，山西省委第一书记卫恒和省委其他负责人就急忙返回太原召开小会和大会，传达贯彻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华北局工作会议精神，部署山西的文革运动，力图紧跟毛泽东搞好这场运动。

7 月 3 日，山西省委宣传部副部长解玉田在向相关部门领导传达卫恒指示时，要求在大中学校和机关的老师、学生、干部中划分左、中、右、反四类人，并提出“抓紧时间完成”。一时间，许多师生被划成“右派”或“反革命”。

7 月 9 日，山西省委派出由省委书记处书记贾俊为组长的工作组，进驻太原市委，动员市级机关干部开始揭批袁振。市委书记袁振仍主持工作。

7 月 18 日，山西省委和太原市委同时召开了两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动员大会”。

山西省委召开的会议在省城迎泽湖畔的湖滨会堂，省委第一书记卫恒在大会上做了题为《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积极参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长篇报告。

他在报告中说：“现在我们所进行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所要打击的目标，就是一小撮钻进党内的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大大小小的当权派；同时，还要注意把那些有个人野心的阴谋家挖出来。”显然，这是有所指的，因为在华北局工作会议上，太原市委第一书记袁振，已经被定成了个人野心家和阴谋家。

太原市委召开大会的地点是新建路市委礼堂。市委第一书记袁振在大会上正式向全社会公开了华北局会议的内幕，对自己的问题做了如此检查：

“太原市还有些重大问题没有揭出来，我的问题就没有揭出来嘛！我是犯了严重错误的，我的问题是在华北局会议上揭出来的。”

他还说：“我犯了严重错误，犯了罪，搞了宗派活动，利用《傅山画集》等问题反对省委。”并沉痛地说：“我把自己推向了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方面，是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

袁振的报告与卫恒的报告形成极大的反差，在干部和群众中引起了种种猜测。自湖滨会堂大会之后，山西部分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按照省委的安排和卫恒报告的精神，开展本单位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在此期间，省委以“压制民主”、“破坏文化大革命”、“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个人主义野心家、阴谋家”为由，处理了一批领导干部。

7 月 25 日，山西省委决定在《山西日报》上，公开点名批判分管文教的副省长王中青,给他戴上“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漏网大右派”、“地主资产阶级的走狗”等帽子。从这天起至 12 月 16 日，山西省委共做出 45 项决定，撤职、停职反省的领导干部达 49 人。

7 月 31 日，山西省委在太原的常委在省委礼堂接见了山西大学、太原工学院等 11 个院校的师生代表。

山西省委领导急于要站在运动前列领导好运动，当山西大学化学系的 5 名学生率先贴出大字报，将斗争矛头直接指向了山西大学校党

委及主要负责人刘梅后，省委第一书记卫恒为了体现省委支持学生运动的政治态度，指示《山西日报》社领导，在 8 月 5 日的报纸上，全文刊发了这张大字报，还配发了《这是为什么？》的社论，点了在山西大学主持工作的党委副书记、副校长刘梅，以及教务长宋华青的名，指责他们推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在同一天的《山西日报》上，还报道了太原六中师生揪出以党总支书记李雪明为首的反革命集团的消息。山西省委还做出了在《山西日报》公开批判著名作家赵树理的决定。在省委的领导和促进下，省城太原无论是党政机关，还是大学、中学，各种各样的大字报，正铺天盖地而来。

此时，太原五中、太原六中、太原工业学院和山西大学等校的部分学生组织起“星火战斗队”、“炮轰组”到中共太原市委造反，张贴出一批关于“傅山画集问题”、“批判工作组”的大字报和“炮轰贾俊”、“赶走工作组”的大幅标语。8 月 8 日，太原部分学校的学生到太原市委大院贴大字报，驱赶省委派驻市委的工作组。市委大院骚乱，无法正常工作。

8 月 12 日，山西省委发出通知，允许高校师生在校际间互相参观大字报，互相访问，召开座谈会。

8 月 1 日，并非八届中央委员会委员的卫恒，以中共山西省委第一书记的身份列席了这次全会。8 月 12 日，参加完八届十一中全会及其随后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卫恒赶回太原传达会议精神。

8 月 13 日，太原重机学院的群众组织“革命造反小组”到省委提出给文革中被“划为右派的师生平反、罢相关院校领导官”等八项要求，遭省委第二书记、省长王谦拒绝。王谦指示省委组织部办公室主任窦凯组织机关干部围攻推搡学生，并将他们扣押至晚上才放回，成为了轰动一时的太原“八一三事件”。

8 月 18 日，在毛泽东北京接见红卫兵大会的鼓舞下，山西轻工业师范学院部分师生也组织成立了“八一八革命造反大队”，并于当天到省委门前静坐，要求罢免院长杨国帧的职务。

8 月 20 日，太原 10 万人在五一广场集会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共山西省委、省人民委员会、山西省军区、驻晋部队的领导人卫恒、省长王谦、省委书记处书记王大任、省委书记处书记、副省长郑林、省委书记处书记、副省长武光汤、省委书记处书记赵雨亭、贾俊、省委常委、副省长焦国鼐、刘开基、省委常委、山西省军区第二政治委员张日清、陆军第 21 军军长胡炜等出席了大会。卫恒在大会发表讲话，要求“革命群众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发扬敢闯敢干敢革命敢造反的革命精神”，进一步亮明了省委的政治态度，决心紧跟毛泽东的战略部署，按照《十六条》搞好山西的文化大革命。

在大会上，中学生吹起冲锋号，并高举书写着毛体“红卫兵”三个大字的大旗，把红卫兵袖章给省委书记卫恒、王谦戴上。全场欢声雷动，口号声不断，气氛热烈。

虽然省、市各级领导积极号召大家参加到文化大革命中，大、中学生们也积极响应中央号召投身到了文革潮流中。但是文革究竟怎么

搞？是不是只是“破四旧”？大家都很茫然。很多人想革命、想造反而又一时不知靶子何在？

于是，利用北京红卫兵赴各地串联的机会，由山西省委出面组织，请北京的红卫兵来晋阳大地“煽风点火”。

3 位到太原串联的北京红卫兵战士，穿着父辈们曾经穿过的绿军装，戴着毛泽东主席也曾戴过的红袖章，手握《毛主席语录》，虽显得幼稚却威风凛凛。他们被山西省委书记处书记王大任请上了湖滨会堂的主席台，用年轻人高昂嘹亮且不容置疑的北京腔，向台下那一片期望燃烧的太原大、中学生们传经送宝。他们说：

“……毛主席他老人家为了反修防修，为了让我们的红色江山千秋万代永不变色，已经好多天没有睡好觉了。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地方有没有呢？我们学校有没有呢？有！只有把这些大大小小形形色色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反革命修正主义统统揪出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才能取得最后的胜利！北京有人搞资本主义，企图扭转运动的大方向。你们的学校有没有呢？你们山西，你们太原有没有呢？……”

这种会议，在那时被称为“点火”。会后，刚成立的太原红卫兵马上开始“破四旧”。

太原的“点火”会极大的启发了太原五中高三年级的学生刘灏，他在学校成立了一个“七一战斗小组”，小组的成员多是平时的好学生，其造反精神自然远远落在五中其他众多的学生组织后面，在“横扫牛鬼蛇神”的战斗中，他们实在没有什么战绩，因此也被校园内其

他一些学生组织斥之为保皇派。这时，想革命、想造反而又一时不知靶子何在的刘灏突然悟到，这次文化大革命的主要矛头并不是一般的牛鬼蛇神，而是那些当权派！北京学生的传经会刚完，还没有走出大会堂，刘灏就急于找到他的对立面辩论起来了："你们不是说我们'七一战斗小组'不敢革命，不敢造反吗？你们不是说我们是保皇派组织吗？听听人家北京红卫兵的说法！学校党总支不敢引火烧身，而是放火烧人，你们不炮轰总党支，只会斗老师，你们才是保皇派呢！《十六条》里讲的明明白白，这次运动的对象是当权派……"

刘灏要证明他带领的"七一战斗小组"不是什么保皇派。一张署名为"七一战斗小组"，标题为《质问校党总支要把运动引向何方》的大字报，在太原五中第一次将斗争矛头对准了党总支。大字报指出："支持学生揪斗老师的学校党总支是走资派，所以他们才要转移运动的大方向。"

这张大字报使"七一战斗小组"在五中出名，更多的学生聚到了刘灏的身边，甚至连那些遭受揪斗之苦的老师们，也站出来表示支持刘灏的革命行动。刘灏终于成了太原五中一派群众组织的核心人物，追随者也愈众。刘灏以他有限的历史知识，开始指导自己的革命行动了："当年的毛委员不是依靠井冈山的革命力量，最终打出了一个红彤彤的新中国吗？要想跟着当今的红太阳、红卫兵们的红司令再打出一个红彤彤的新世界，还得走井冈山的道路。"于是，刘灏将他的"七一战斗小组"正式更名为"井冈山造反兵团"。

"井冈山造反兵团"成立了，可偏偏有人却要退出"井冈山"，

这无疑叫刘司令大为吃惊。他不是怕自个儿的兵团里缺少了一个可耻的逃兵，是不相信这位要好的同学竟会失去革命和造反的勇气。他要责问伙伴，要弄清楚事情的原委：

“为啥？”

“我怕玷污了咱‘井冈山’的纯洁性。”

“你是红五类，怕啥？”

“我现在成狗崽子了。”

“为啥？”

“因为我爸爸是袁振。”

刘灏不由得一惊，眼前这位要好的同学竟会是袁振的儿子？

袁振是太原市委第一书记，这刘灏知道。袁振成了反对省委的伸手派、野心家，成了太原市委反党集团的头子，刘灏从街上的大字报上也知道了。但市委第一书记离他目前革命造反的靶子还远的很，他想的是校党总支的问题，还没有想到要去过问市委的问题。

面对袁振的儿子，刘灏明白这个红五类确实变成狗崽子了。在同班同学中，他和这位伙伴以往就相处的很好，相信这位伙伴不会说谎话。刘灏一时无语，面对自己最要好的一个同学，一个和自己一道发誓，要跟上毛主席投身于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好朋友，他的爸爸怎么会一下子就变成反革命了呢？头脑中的阶级斗争观念，使刘灏在一刹那间，先决定了要与这个“狗崽子”划清界线，但心底那种做朋友就要讲义气的传统思维，又让他由不得生出了必须帮助这个好朋友的念头。他和这位要退出“井冈山”的同学没有再说什么，既没

有批准，也没有劝阻，而是暗暗决定，要亲自去找袁振看个明白也问个明白。如果袁振确实是青面獠牙的黑帮，那就让这位同学和他老子划清界线，再退出“井冈山”不迟。如果是别人冤枉了袁振，那就让这位同学继续留在“井冈山兵团”，谁冤枉了他爸爸，就找谁算账！

拿定主意的刘灏，只是向这位还将痛苦挂在脸上的好伙伴撂下一句话：“你等着，等我弄清楚问题后，咱们再说。”

8 月初的一天傍晚，刘灏只身一人走进了太原市委大院。虽然已过了机关下班的时间，但市委大院里却依旧热闹非常。数不清的大字报，贴满了市委大院里所有的墙壁。放眼望去，那些大字报的标题几乎全是批判袁振的。还有许多人围成堆在争吵、辩论，有的穿衣打扮像是机关的干部，有的像是工人，都在说袁振如何、如何，口气分明不同，观点也分明不同。对于这一切，年仅 18 岁的刘灏，一时很难听出个究竟，穷尽他的思维能力和判断水平，也不知大字报上的内容谁对谁错，争辩的双方谁是谁非。此时的他，只相信自己，甚至脑海中泛起一丝想法，那想法竟然和看电影时判断银幕上的好人和坏人有关。他想：“只要一见到袁振，他是好人还是坏人，就不信我看不出来！”

他按照袁振儿子告诉他的方位，首先找到了排房小院，然后再沿着门牌号码来到袁振的家门口。开始敲门时，他心里惴惴的，毕竟是在敲市委第一书记的大门，这可不是造反时去敲五中党总支的办公室。走向社会，毕竟还是初出茅庐。

门开了。是一位个头不高，瘦弱的老头儿开的门。那老头儿看上

去面目慈祥且态度谦恭，眼神中，也露出一丝害怕和不安。

刘灏对那老头说："我来找袁振。"

"我就是。"

惊诧的刘灏没敢眨眼，不愿相信这个长相一般的小老头子，会与省委书记处书记、太原市委第一书记这样大的官职有直接的联系。可眼下谁又愿冒名顶替一个反革命黑帮呢？

"我是五中'井冈山兵团'的司令刘灏。"中学生自报家门后，即开门见山责问这位老头："我要调查一下你是不是黑帮？"

"我怎么会是黑帮呢？是人家逼我承认的。"老头摇头叹息，又显出一脸热情说："快请进，你想听，我就好好给你们革命小将说一说我的情况。"

刘颢就这样被请进了市委第一书记家的客厅内。

此时的袁振正需要有人听他倾诉，此时终于有一个愿意听他详细诉说的人了，于是开始向刘颢讲起前门会议的经过：

"……他们说我是野心家、伸手派，想当山西省委第一书记；我是听毛主席的话，揭发彭真、陆定一他们在山西的问题呀；我不是伸手派，野心家，顶多是没有尊重卫恒，他们就说我不尊重卫恒同志，就是伸手派野心家，我是听毛主席的话要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的，他们是有问题才怕文化大革命的，办什么傅山展览，就是个明证嘛……"

"谁叫傅山？"刘灏听不明白。

袁振只好又介绍几句傅山是一个明末清初的历史人物，又说宣传傅山与宣传海瑞一样，活人反党，总是利用死人来做文章。更重要的，

是袁振说起了邓拓在支持搞《傅山展览》和《傅山画集》问题上，与山西省委有重要关系。邓拓是“三家村反党集团”的头号黑帮，是反党分子，这刘灏太清楚了。运动刚开始时，大家就批判邓拓的“三家村反党集团”。刘灏开始渐渐相信袁振说的那些个“问题”。

一个年方 18 岁的准知识分子，从一位党内高干口中，听到了从未听说过的省委内部斗争，听到了袁振过去如何跟随毛主席干革命，前门会议上如何揭发省委的问题，又如何受到打击迫害的详细自述，袁振逐渐的获得了这位中学生的同情，刘灏觉得：袁振确实被冤枉了，是卫恒一伙在迫害袁振。

“毛主席、党中央叫把斗争大方向对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袁振刚对准卫恒这个山西最大的当权派就受到迫害，这还行？有必要澄清是非。”刘灏要为自己的那位同学和朋友讨回清白，更要为山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斗争大方向不被人扭转，不让人破坏而发起战斗！

“你写一份申述材料，我们五中‘井冈山兵团’给你翻案。”

袁振高兴的只是点头。此时，靠谁能比靠红卫兵小将更有效呢？毛主席都靠红卫兵小将开展文化大革命呀！在袁振看来，今儿晚上，真是天上给他掉馅饼儿了！

刘灏又说：“在中央你认识谁？我们给你往上送。”

已被冷落多日的客厅里，好像突然就充满了春光。袁振激动的连声说：“多啦，多啦。我认识邓小平，薄一波，还有华北局的书记李雪峰，我认识的多啦，多啦……”

他一口气举出了一长串在中央地位显赫的大人物名字，小闯将也对给小老头翻案充满了必胜的信心。他想，只要把袁振的案翻过来，五中“井冈山兵团”在太原和山西的文化大革命中，就立下了大功！这位 18 岁的中学生拍着胸膛大声叫了一声“袁书记！”再次表示了要为市委书记翻案的决心。

在市委书记的再次感激和鼓励下，刘灏信誓旦旦地与袁振确定了来取材料的具体时间。

## 第 221 回：上北京，中南海前屡碰壁　破四旧，五台山僧尼遣散

刘灏拿到袁振写好的申述材料后，挤上了开往北京的列车，他希望这次进京能赶上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接见，并且“最好能在见到毛主席时，亲手将这些材料送到毛主席手上。”但是，毛主席接见红卫兵时，自己肯定上不了天安门城楼，那又怎样将材料是送到毛主席手上呢？他又想象着那一个个熟悉而又陌生的名字，那一张张曾在报纸和新闻纪录片中见到过的熟悉而又陌生的面孔：邓小平、薄一波、李雪峰……想象着见到这些人时，如何能把袁振的冤枉说得更清楚一些，他们如果能把袁振的申述材料再送给毛主席，袁振的冤案岂不是一下子就翻了吗？对，只要他们收下材料，就跟他们提出给毛主席转送这些材料的请求……

他到了北京，下了火车，直接来到了中南海。看着中南海大门两边笔直挺立着的解放军卫兵，刘灏的心中没有一点儿顾虑。太原市委的大门不是直进直出吗？那个年头，学生们臂上的红袖章，就是横行天下的特种通行证。然而，中南海不是太原市委大院，“红袖章”唬不住“红领章”。以绝对标准的立正姿势分立大门两边的解放军卫士走了过来，伸出手臂将刘灏挡住：

“干什么？”

面对这声喝斥，刘灏一愣，一时没有了“横扫一切”的胆量和豪气。可是他并不怕，竟不顾一切振臂高呼起来：

“革命无罪，造反有理！”

偏偏站在这里的“红领章”不吃这一套，管你是喊“无罪”还是

“有理”，请你到一边喊去，要想进去，不行！

刘灏没辙了，只好滔滔不绝的对执行警卫任务的解放军说：“我要找邓小平总书记，我要给袁振翻案……”

刘灏最终也没有进入中南海，他只好沿着中南海的红墙四处徘徊。企图找到一处缺口，或者一处矮墙，他把党中央的所在地想象成普通的民间大院了，自然无机可乘。原先以为给党中央送份材料容易的很，没料到连党中央的门都进不去。突然间，他看见一辆黑色的红旗小轿车从长安街上急驶而来，在拐向中南海的大门时减慢了速度。喜出望外的太原红小将灵机一动，急步向前，弯下腰身，想躲在小轿车旁边蒙混进去。中南海的卫兵一把将他揪住：

“好啊，又是你！”

“我要向党中央反映问题，我是太原五中‘井冈山造反兵团’的司令……”

卫兵把他带进传达室，里面的解放军问道：“你不是要反映问题吗？有材料没有？”

刘灏从怀中掏出材料，那位解放军收下材料，给刘灏写了一张盖着公章的收条。收条上，把接到的材料题目名称，共有几页，写的明明白白。

刘灏清楚，再待下去也没有用了。他只好满怀希望地望着这位解放军，大声说：“谢谢您啦，您可一定把材料给转上去呀！给哪位中央首长转，材料上全写着名字呐！”

从北京败北回到太原的刘灏，带给袁振的是一个连他自己也极不满意的结果。但袁振却一句也没有埋怨为他主动效力的这位中学生。

刘灏的太原五中“井冈山造反兵团”在太原街头贴出一张山西省委迫害袁振的大字报，这使刘颢在太原开始有了小小的名气，但也有种种小道消息，说这个太原五中的中学生是袁振的女婿，是个一心要保老丈人的小保皇派。那一天，在市委机关大院，刘灏因为带人贴袁振如何受省委迫害内容的大字报受到围攻。有人硬要说他是袁振的女婿，这让刘灏真是百嘴难辨。正在寡不敌众之际，突然挤进一位大学生，胸前戴着“太原工学院”的校徽。那位大学生拉上刘灏来了个“三十六计走为上”，溜出了人群。

他们互相通报了姓名，原来是太原工学院“瑞金革命造反兵团战斗队”队长宋捷。他问刘灏：

“你同意炮打省委？”

刘灏头一昂：“我为袁振翻案，就要找卫恒算账。”

“你有卫恒的材料？”

“我有袁振的材料，里面就有卫恒的问题。”

“这样吧，我们替你为袁振翻案，你与我们一道炮打省委，怎么样？”

“好，咱们就一起干。”

一起干的第一步，就是宋捷同意与刘灏一道再上北京，替袁振送申辩材料。

二上京城，刘灏身边有了一位大学生战友。中南海是绝不去了，去了也进不去。好在袁振又提供了几位在京党政军首长的地址，袁振说那些赫赫有名的大人物都是他的战友，只要见到他们，托他们往上递材料，材料即使到不了毛主席手里，也准能到了林彪和陶铸这些大人物手里。出师依旧不利，大人物们的住地倒是不难找，但往往是只能见到他们的秘书，秘书们也总是异口同声，说首长们很忙，这些日子根本不回家。虽说秘书们都收下材料了，但这回收下的材料和上回中南海传达室收下的材料一样，天晓得是不是又要石沉大海呀？待材料一一送完，两人一路闲走，竟来到了农垦部的门前。哇，里面正在开批斗王震的大会呢！满院子的大字报，不但要打倒王震，还要火烧、油煎！王震是什么人？那可是南泥湾 359 旅的旅长，共和国的功臣和一代英豪！是什么人这么大胆，怎么可以随随便便地批斗起大英雄王震呢？几乎没有商量，从太原来京的这两个红卫兵就结伴冲进了会场。刘灏给袁振翻案没有结果，同行的大学生炮打省委也没有结果，一肚子怨气正无处发泄呢，两人又喊口号又跺脚，把批斗王震的会场搅了个乱七八糟。

二上京城为袁振送材料，还是没有结果。两位小将躺在京城的红卫兵接待站里，一位是想急着回去与袁振商量如何翻案，一位是想急着回去与其他战友们商量如何炮打省委。

8 月 23 日，山西忻州地委召开地直机关“向文化大革命进军大会”，会场上没有悬挂国旗，会议也没有安排向毛主席致敬的仪式，忻县师范的部分学生就此当场向地委提出“强烈抗议”。同时，这些起来革

命造反的学生们，还在会场内外贴出了批判地委的大字报。忻县卫校的部分学生，不同意忻县师范这些学生的做法和观点，双方当场展开大辩论，会议是无法继续开下去了，两家观点不同的学生们，又各自请求声援，叫来了支持自己观点的外单位人员和其他学校的师生，文斗和武斗相互交错，主持会议的忻州地委领导们，再也无法控制会场了。此事发生的第三天，忻县师范和忻州农机学校的 300 余名学生来到太原，直接到省委请愿，要求省委罢忻州地委书记徐志远的官。省委书记处书记赵雨亭不分昼夜与请愿学生谈话，做他们的思想工作，但请愿的学生围着省委的大门，不依不饶地坚持自己的造反要求。省委门前的围观者和声援者，也将省委前的一条街堵了个水泄不通。无奈之下，省委第一书记卫恒只好出面接见了这批学生，并向请愿学生建议，由忻县师范和忻州农机学校选出代表，与省委派出的干部一道，组成一个调查组，对没有落实的问题进行调查，再做出结论。但是请愿的学生们却不同意，而是要求省委必须立即罢掉忻州地委书记徐志远的官，同时在《山西日报》和山西人民广播电台对其进行点名大批判。卫恒亲自出面与这些学生们谈判，他不放弃原则，自然也就没有结果。学生们愤怒了，第二天就由太原涌上火车，赴北京请愿和上访去了。

8 月 23 日这天，太原机械学院的红卫兵发出了《致全省红卫兵、广大工农兵、革命知识分子、革命干部的公开信》，倡议在省城和全省迅速掀起一个大破四旧的造反高潮。在这所学校红卫兵的倡议下，省城一些红卫兵首先到位于解放路的太原市天主教堂造反。他们捣毁

了教堂上的十字架和教堂内的宗教用品，对神职人员和修女挂牌批斗，极尽人身侮辱。第二天的《山西日报》上，全文刊发了这份公开信，更加促进了全省红卫兵横扫年鬼蛇神的“红色风暴”。太原柳巷、钟楼街、桥头街一带，是这座古城最有名的商业街区，也是那个年代省城最繁华的闹市区。太原各个大中学校的红卫兵们，陆续在这里掀起了大破四旧的革命造反行动。像“双合成”、“六味斋”、“清和元”、“开明照相馆”、“认一力”、“老香村”等众多的晋商老店，牌匾统统被砸。店家被迫将店名改成了诸如“东方红某某店”、“工农兵某某店”、“红星某某店”等。

山西大学的学生到山西五台县佛教胜地五台山去扫四旧，砸庙宇，将和尚、尼姑斗争了一通。他们走后，当地政府下令，将 289 名僧、尼、喇嘛逐出山门，强制遣送回了原籍。蒙古族老尼姑白银珍当时已 96 岁，被赶出五台山后，无处落脚，不得不回到内蒙古草原，与几个亲人相依为命。她大难不死，过了 20 年，竟成了内蒙古自治区第一号老寿星。

在这种“红色风暴”中，一代晋剧大师丁果仙的家，竟被来自不同学校的红卫兵们先后抄家达 11 次。

太原机械学院地处太原北郊地面的烈石寒泉处，附近有窦大夫祠，祠侧有中国同盟会老会员、中国国民党老党员、阎锡山的老师赵戴文先生的墓地。机械学院发出倡议书的那些红卫兵学生们，把他们的革命造反组织，比作当年林彪所统帅的“四野”大军。当年，“四野”由东北入关，在解放战争中屡建功勋。可这“太机四野”的学生们，

却去窦大夫祠造反、破四旧，先砸了那位春秋战国时代曾为民造福而被后人祭祀，由唐代工匠塑造的窦大夫塑像，顺便把赵戴文先生的墓碑也一举砸碎，以示其革命决心。据离休的干部徐忠诚回忆，他当时在太原市商业局办公室任干事，局机关共有干部 100 余人，被挂上牛鬼蛇神牌子驱逐出太原的有 10 多名。其中有个干部并无什么可揪的辫子，因名字叫效石，被红卫兵说成是要效忠蒋介石，并以此罪名，将其驱逐出太原。

按照北京“红五类”为红卫兵核心组织原则性，太原市也有了红卫兵纠察队。“红卫兵北城区纠察队”、“红卫兵南城区纠察队”，两组织主要成分是以城区军干子弟为主。“太原市红卫兵总部”，主要成分是以省市各级地方干部子弟为主。形成太原市三股“红卫兵”纠察势力。“红卫兵北城区纠察队”叫“北纠”，“红卫兵南城区纠察队”叫“南纠”。在破四旧中立新功的十中红卫兵，在 9 月初发出了砸天主教堂的倡议，全校师生基本都参加了这个行动。

天主教堂距学校不远，也在解放路的中段，标准的西欧建筑，两个报时的尖顶钟楼中央，悬挂着象征基督蒙难的十字架。

那天，解放路上人山人海，天主教堂里里外外围得水泄不通。教堂外被砸得七零八落面目全非，教堂内被砸得乱七八糟一片狼藉，神父、修女战战兢兢被集中一处听候处理。一名勇敢的学生不顾风雨交加、冒着生命危险，爬上几十米高的尖顶，取下了铁制的十字架……从此，十中红卫兵在社会上威震四方，太原市红卫兵总部也因此在天主教堂安营扎寨发号施令。因而被称为“天纠”。

形势的变化再次出乎山西省委领导人的意料和安排之外。9 月 5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组织外地高等学校革命学生代表、中等学校革命学生代表和革命教职工代表来北京参观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通知》，山西的大批学生蜂拥北上，直奔北京。北京的学生则乘机到了各地，仅太原一地，就有北京等外地学生 10 万人之多。太原市的全部招待所、旅店、澡堂、影剧院成为外地来并学生的食宿之处。山西省委成立红卫兵接待站，专司接待省外来太原串联红卫兵衣食住行之责。来太原的外地学生有部分人是文革刚开始的“保皇派”，有的则是根据所在院校红卫兵安排来山西造反的。形形色色、五花八门，不一而足。他们一踏上山西这块黄土地，就参加到“革命造反行列”，不久便组成“首都赴晋革命造反大队”、“北航播火兵团”、“北农机《全无敌》纵队”等造反组织，和山西当地的造反派结合在一起，炮轰山西省委及其领导人。

学生们起来造省委的反，有中央文件的精神支持，卫恒已经难以招架了。更让卫恒无法招架的是，9 月 9 日袁振在太原市委大院里，公开贴出了大字报《我的声明》。他声明说“我没有反党，没有组织反党集团，华北局会议把我打成向党伸手的野心家，是在斗争中我被迫承认的，是冤枉人的。”同时，向社会公布了他在华北局会议上揭发省委的那些个“政治问题”。

袁振是省委常委。省委的内部斗争，现在被公开了，可以想象，卫恒已经料到了日后山西的文化大革命局面将更难控制。这位饱经革命年代战火锻炼的老共产党员，一定明白紧跟在袁振发出的“信号弹”

后面的，必将是一个更大的行动。已经公开承认了自己是野心家和伸手派的袁振，又公开贴出翻案的大字报，这无疑预示着什么！他想到了明天，也就是定于在 9 月 10 日太原市委将要召开的机关干部大会。原定在这个大会上，省委派驻太原市委的工作组，将要让在华北局会议上犯了错误的袁振做检查。袁振的大字报肯定是一个信号，明天的大会上会不会出现意外呢？

第 222 回：谁曾想，检讨变成了申辩　辩论会，卫恒左右应对难

意外果然让山西省委第一书记卫恒和其他的省委的领导们始料不及。9 月 10 日的会议刚刚开始，一队太原中学小将，排着整齐的队伍，在一面“太原五中井冈山造反兵团”的大旗指引，来到了新建路太原市委的大礼堂。礼堂把门的当然不让这些突然出现的中学生们进去：会议是市委召开的，参加会议的是市委的党员干部们，台上还坐着省委派到市委的工作组领导，你们一群中学生，来这儿干啥？

带队的刘灏，此时胸有成竹。因为他与袁振已经做了周密的部署。与同来的战友们，也做了详细的安排。队伍排得依旧整齐，只有刘灏带着几个骨干上前交涉：“我们是来参加批判黑帮袁振的。我们要参加太原市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把门的不敢做主，连忙进去通报。坐在主席台正中的首长，是接替袁振正在主持太原市委工作的省委派驻太原市委工作组组长贾俊，他旁边是市委的书记处书记赵力之和其他的市委领导。贾俊和赵力之闻讯来到礼堂门口，面对这一队突兀而至的中学生们，两人说话的口气不能强硬，但态度却是有原则的，两张嘴轮番劝解：“袁振的问题是党内的问题，今天是市委机关的党员干部会议，我看你们学生们就不要参加了吧。”

刘灏可不管这一套，态度也十分强硬：“参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你不让我们参加，是不是违背了毛主席的指示？”

不待对方回答，刘灏和身边的骨干们就大声背诵起老人家的语录：“毛主席教导我们说：革命无罪，造反有理。”

接着是帮腔：“我们来革黑帮的命，造黑帮的反，你们为什么不让我们进去？”

接着学生们又背诵老人家的语录：“毛主席教导我们说：凡是镇压学生运动的人都没有好下场。”

继续帮腔：“你们不让我们进去参加文化大革命，就是想镇压学生运动！”

接着又是：“毛主席还教导我们说……”

学生们搬出了一条又一条最高指示为自个撑腰，贾俊和赵力之两位领导不得不让步了。再这么纠缠下去，里面的大会还开不开呀？他们看的清清楚楚，这队学生打的是太原五中“井冈山”的造反大旗，戴的红袖章上，齐刷刷印着太原五中“井冈山造反兵团”。保袁振的，不就是这些学生们吗？这个组织的司令，不就是一个叫刘灏的学生娃吗？这个学生娃不就是个死保袁振的“保皇派”吗？不让他们进去不行，让他们进去会不会出乱子呢？他俩瞅瞅面前的学生们，想继续做点儿思想教育工作，先问清谁是刘灏，一看应声者原来是那么一张娃娃脸，两位领导又轮番说了好一通大道理：“好，好，你就是刘灏呀？你们要参加文化大革命，就要听毛主席的话，牢牢把握斗争的大方向呀，今天的大会是让袁振检查呢，这可是个斗争的大方向……”

“我们今天来就是来听袁振检查的！”刘灏狡黠地笑了，他笑自个的聪明也笑对方的糊涂。只要能进了会场，可就由不得你们了。

山西省的两位党内高层领导，终于对年少的中学生让了步。有毛主席当红司令，造反的学生们可是眼下的天之骄子，谁能惹得起？再看刘灏带来的学生队伍，排着队走进大礼堂，还挺有秩序地坐在了过道上。

大会终于开始了。贾俊和赵力之重新上了主席台，前市委第一书记袁振，被主持会议的贾俊叫出，从后台走到了麦克风前，他要向市委机关的全体党员干部做检查了。

袁振从口袋里掏出早已写好的底稿，开始了“检查”：“我的申辩书。”

声音高亢而嘹亮，充满了激烈与愤慨。袁振大声念着稿子，下面的内容，竟是为自己的一条条申辩，并开始揭发省委的问题。会场的气氛顿时凝固了，大礼堂内显出铅一般的沉重。主席台上的领导们互相低语，想让人先把袁振押下去，但刘灏和他安排好的学生骨干们，早一个个飞快地跳上了主席台，台上台下，刹那间乱成一团。有人高喊：“打倒袁振，揪出别有用心的坏人！”更有学生们高喊：“袁振无罪，申辩有理！”参加大会的市委党员干部们，在袁振问题上看法原本就不一致，此时大礼堂里成了辩论的战场，学生们更是一个个握拳相向，背诵出的一条条《毛主席语录》如投枪和匕首，互相争吵和推打使与会者乱成了一团，那乱劲真能把大礼堂掀翻。

很快，五中的造反学生们就掌握了会场的局面。刘灏成了主持人。他先让主席台上的领导们一个个报出身，这是那时候官办红卫兵们最厉害的一个招数。

中学生小将声声逼问，主席台上的领导们只好说实话。报贫下中农出身的可以权且放过，报中农出身的可不能轻易放过去了，毛主席早就说了，中农是团结的对象，你一个团结的对象，怎么可以坐在主席台上呢？最倒霉的是说自个是地主出身的一位领导了，按学生们那时的思维，他一定是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当下就被学生们从座位上揪出来，撵下了主席台。刘灏开始主持大会，让袁振继续他的申辩。学生们高昂的口号声，加上与会者中保袁振的干部们，也跟着呼口号。这次会前会后所发生的一系列变化和内容，就从市委大礼堂迅速传遍了太原。

9 月 11 日，刘灏张贴出题为《痛打卫恒黑帮》的大字报，这是山西第一张指控卫恒这位省委第一书记为“黑帮”，指控山西省为“黑线”的大字报。作者在大字报中还称赞袁振“站到革命派一边”，称“同卫恒坚决斗争，大方向始终正确”。

贴完大字报，刘灏还决心要进省委找卫恒辩论。省委办公厅传达室已经加强了干部值班，刘灏要进省委办公厅，值班的干部不让进。于是就争执辩论。学生要搞文化大革命，这可是毛主席支持的，刘灏要找省委第一书记是理直气壮。值班干部又拿出会客登记簿，说是有规定，找人必须填写。刘灏不填，双方又是一阵争执。在规定面前，刘灏眼看没理了，一把拿过登记簿来，举笔就在上面写下了一行字：“老子刘灏要找卫恒！”值班干部瞠目结舌，无奈之下，只好放这位中学生进去。事后社会上传说，刘灏在省委除了贴出《痛打卫恒黑帮》的大字报，还贴出一条大标语：刘灏老子要找卫恒小子。

刘灏在省委大院里转来串去，就是找不到省委第一书记。坚守岗位的省委办公厅的干部们，自然不会告诉这个来贴大字报的中学生省委第一书记的行踪。

此时的卫恒正忙得焦头烂额，他即便知道了这天有个叫刘灏的中学生来省委，贴出了一张《痛打卫恒黑帮》的大字报，怕是也顾不上去理会这事，更想不到要去接见这个中学生了。因为，从北京天天有来太原串联的学生，太原的大学生和中学生们，也正在组织起来开始了大串联。有往出走的，也有往里涌的。从各地来太原串联的大中学生们，最多时，一天就有 7000 多人。对待革命学生的态度问题，在当时可是一个对待“文化大革命”的态度问题。卫恒得亲自开省委常委会，研究成立红卫兵接待站的大事。更有北京来的红卫兵来头大，动不动就要亲自找卫恒解决问题。别的省委领导接见不行，非得卫恒接见才行。

9 月 16 日，以山西大学外语系大一学生方培泉等一些学生为主，联络了太原工学院和其他大中学校的一些学生，成立了“炮打黑省委临时指挥部”。那位太原工学院的大学生宋捷，由于曾经与刘灏做伴赴京为袁振送申诉材料，在他进入“炮打黑省委临时指挥部”后，刘灏所率领的太原五中“井冈山造反兵团”，自然也就成了这个指挥部的成员。19 日，“炮打黑省委临时指挥部”的部分成员占据山西省第一招待所，把卫恒拉到这里辩论袁振问题。

其时，“炮打黑省委临时指挥部”内也有分歧，其原因还是袁振问题。刘灏认为，袁振是革命的领导干部，是受省委迫害的，因此要

支持袁振，炮轰省委。但另一些学生头目们却不这样认为，他们觉得：袁振是红是黑，还需要澄清，袁振本人就是省委的一个重要成员，省委抛出袁振是在舍车保帅，要炮轰省委，自然也要包括一道炮轰袁振。“炮打黑省委临时指挥部”的几方头目，有的提出了“澄清袁振，炮轰卫恒”的战斗口号，有的提出了“支持袁振，炮轰卫恒”的战斗口号。于是，刘灏要跳出“炮轰省委指挥部”，成立山西“革命造反兵团”。而另一些与刘灏在袁振问题上有分歧的大学生头目，如“太工红旗”，也筹划着要成立山西“红色造反联络站”。好在炮轰省委的斗争大方向还一致。就这样，卫恒在第一招待所与大学生们辩论了一通，其实是被大学生们揪斗了一番。随后，他刚刚回到省委机关，就见到刘灏派人贴出的大字报，白纸黑字，又是要与他这位省委第一书记进行“革命谈判”。这次是刘灏与省城其他学校一些造反组织头目们的一次联合突击。他们 20 来人，既有“炮轰省委指挥部”的骨干，也有刘灏计划组建“山西革命造反兵团”联络下的新战友。他们闯进省委办公厅，坐在省委会议室里，只有一个要求：“我们炮轰省委指挥部要成立‘山西革命造反兵团’和‘山西红色造反联络站’，省委第一书记必须明确表态，承认‘兵团’和‘红联站’是合法的革命造反组织。”

他们特别申明：“别的领导都不见，就见省委第一书记。”

当晚，在省委机关的会议室，刘灏终于见到了卫恒，卫恒也终于认识了这位太原五中的革命小将。

出生入死几十年，对毛泽东的指示不理解也得执行的省委第一书记卫恒，绝不愿意站在群众运动的对立面，绝不愿意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绊脚石。革命小将找上门来了，他已无法躲避。小将们要成立两个组织，要让他承认它们都是合法的革命造反组织，他能不承认吗？人家这回来可不是揪斗，口口声声是来“谈判”的，他能不出席吗？他来了，走进了原本是省委书记处书记们和常委们开会的地方。扫一眼那20来个怒目圆睁的大学生和中学生们，省委第一书记慢慢地坐下了。他想尽量以平和的态度，像毛泽东教导的那样，到革命群众中去，与革命群众一道搞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刘灏就坐在了卫恒的对面。卫恒与面前这个戴着近视眼镜的中学生对视了。他要缓和一下气氛。省委第一书记先向坐在对面的这位中学生点点头，一副长者风度，用和蔼和可亲的语气问道：“你叫什么名字呀？”

“刘灏。”回答自信而又冷漠。

“哦，你就叫刘灏。”省委第一书记大约怎么也不愿相信，这么一个毛头娃娃，就是兴风作浪，大闹省城的那个“兵团”司令。原本是一句吃惊的自语，当即遭到了刘灏的怒斥：

“是刘灏又怎么了？”

卫恒只能好言相劝，阐述自己的认识：“你的大字报我看了，你那一大堆帽子实在没有啥根据嘛……”

刘灏可不听这一套，劈头打断省委第一书记的话：“没根据？你敢说搞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没有根据？”

接着，这些自称代表着全省大中专院校革命学生的学生头头们，开始用最高指示逼得省委第一书记上气不接下气，再难以解释了。

“毛主席教导我们说，什么人站在革命人民方面，他就是革命派。你说，你是不是站在革命人民方面？是不是革命派？”

“毛主席教导我们说，不管反动派怎样企图阻止历史车轮的前进，革命或迟或早总会发生。你说，你不想承认我们是革命造反组织，是不是想阻止历史车轮的前进？”

……

省委第一书记不得不表态说：“你们要成立的‘山西革命造反兵团’和‘山西红色造反联络站’，都是革命的造反组织。”同时答应给这两个造反组织一笔经费，还同意让他们分别进驻省委第一和第二招待所闹革命。

山西的“革命造反兵团”与“红联站”与省委第一书记的“革命谈判”大获全胜。

接着，刘灏又派出尖刀班，就袁振问题与省委辩论。尖刀班的小将们没找到卫恒，却找到了省委书记处书记郑林。小将们拼刺刀要一刀见血，口口声声说傅山是封、资、修。郑林的回击也理直气壮：“傅山是个古人，算个秀才，群众中流传他会画、会写、会看病，有民族气节。我们在抗日战争时期也强调民族气节……”

尖刀班回来向刘灏报告，刘灏认为，只有抢到有关傅山的“黑材料”，才能向中央文革小组说明袁振不但无罪，而且揭发山西省委有功。可是抢太原五中党支部的“黑材料”好办，要想抢出山西省委的

这些“黑材料”，仅凭自己手下的这些中学生行吗？这时，他想到“井冈山革命造反兵团”的队伍中还有一支“工人阶级”的队伍——“兵团冶金第一团”，头头是杨成效，辽宁省鞍山市人，十三冶的一个二级半电焊工，1964 年十三冶公司由东北迁至太原，他也来到太原。

说起杨成效的造反经历很有戏剧性。刘灏大闹新建路市委礼堂后的一天，25 岁的杨成效骑着自行车在大街上闲逛，恰巧看见刘灏带着几个“井冈山兵团”的学生在五一广场刷大标语。大标语的内容当然是为袁振翻案，还有炮轰省委和揪出卫恒黑帮。早想革命造反而不知从何下手的杨成效，站在革命小将的身后，看着大字标语上的“袁振”二字，突然用浑厚的东北腔，透着一种直率和豪气说道：

“袁振是我们的好经理！”

刘灏猛一回头，看到了这位身材不小，头戴鸭舌帽的东北汉子。

“你是什么人？”兵团的刘司令发问了。

“我是工人阶级！”对方的回答口气也大得很。

“你认识袁振？”刘灏又问。

“袁振在鞍钢当过经理，我就是从鞍钢出来的。袁振是我们的好经理！我们工人阶级坚决支持你们的革命行动！毛主席说，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你们为袁振翻案，我们工人阶级坚决做你们的坚强后盾。”

当其他小将告诉杨成效，与他说话的“眼镜”，就是大名鼎鼎的五中“井冈山革命造反兵团”的刘灏司令时，杨成效的口气更激动了：“卫恒迫害我们的好经理，我们工人阶级支持你们炮轰卫恒！”

杨成效拍着胸膛向刘灏表态，这让刘灏好不感动。有工人阶级站出来支持“井冈山革命造反兵团”炮轰省委，这正是他眼下求之不得的大好事。

“你有多少人马？”刘灏问。

对方依旧拍拍胸膛：“就我一个！”不过，二级半电焊工当即向刘司令表态，说回到单位马上就招兵买马，拥戴刘司令，誓死革命造反。

数日后，杨成效果然不悔前诺，找刘灏报喜来了：“刘司令，我已经拉起队伍来了，你瞧，就叫‘兵团冶金第一团’。”

抬抬胳膊，果然戴着印有“兵团冶金第一团”的红袖章。

“有多少人？”

“暂时十来个，全是清一色的工人阶级。”

“什么是清一色？”

“就是他妈的一个共产党员也不要！”

杨成效觉得这位学生娃的问话实在多余。革命、造反，不就是要向走资派开火吗？走资派都是共产党的头头，造他们的反，能要共产党员吗？

可刘灏却为杨成效的这句话，心里由不得一颤。保袁振，为袁振翻案，那是刘灏心中认定袁振是好党员好干部，是受了卫恒的迫害。打卫恒，那是刘灏心中认定卫恒是毛主席亲自制定的《十六条》中说的走资派，是钻进共产党里面的黑帮分子。在年轻的中学生心中，共产党和共产党员，是人世间最崇高最神圣的字眼和人物，革命和造反，

怎么就“一个共产党员也不要”呢？他再次打量一下杨成效，这样的工人阶级，靠得住吗？

然而，对于一位极欲果腹的行路者，能拣到几颗麦粒，远比拣到一颗珍珠要实际得多。身处那个时代，立志革命造反，急于扩大兵团力量的刘灏，18 岁的大脑里想的最多的，自然是可食的麦粒而不是不能充饥的珍珠了。

刘灏便拉住了杨成效的手，大声表了态：“兵团接收你啦！”

有工人阶级组成的“兵团冶金第一团”，还愁“黑材料”抢不到手？

9 月下旬的一个晚上，刘灏率五中“井冈山革命造反兵团”的将士们来到太原市文化局办公楼，他们齐声高呼口号：

“把‘黑省委’大搞封、资、修的‘黑材料’交出来！”

值班的干部们吓得双腿直抖，还没有弄清这些造反的学生们喊的“黑材料”是指什么，早有一群工人冲进了楼内，领头的，正是“冶金第一团”的二级半电焊工杨成效团长。他们可懒得呼什么口号，跟上革命小将刘司令是来革命造反的，光喊口号有什么用？在冶金建筑工地上练就了的那些手和脚，此时无须借助任何工具，飞起脚来，关闭的门自能踢开。舞动双手，办公桌和文件柜上的锁头不愁扭开，中学生们紧随在工人阶级身后，不管是档案还是文件，只要是白纸黑字，统统抢走再说。

有杨成效的“冶金第一团”打先锋，“井冈山革命造反兵团”在文化局大楼首战大捷；接着，他们又立即挥师太原图片社；再接着，

驱车直奔太原文管会。一夜连战三处，黎明前，“兵团”将士班师回到五中。

杨成效带着“冶金第一团”初试锋芒，使“井冈山革命造反兵团”在山西省城顷刻间威名大振。

按袁振的吩咐，在所有的黑材料中，凡是有关傅山的东西，统统挑出来送中央文革小组，结果依旧是石沉大海。

刘灏在太原越闹越欢，卫恒很想了解一下这个中学生的父母是什么人，希望通过其父母劝说他们的孩子。

情况很快报上来了，刘灏的父亲是太原解放军某部医院的院长。于是，省委第一书记立即派人去请这所部队医院的院长过来“看病”。

院长奉命赶来为驻地的省委第一书记“看病”，言谈中，让卫恒好生失望。原来这位院长，根本不是刘灏的父亲。刘灏的父亲是前任院长，一年前已经调往河北保定某军队医院就任了。省委第一书记只好长叹一口气，对面前的现任院长语重心长地说：“你们和这个孩子的父亲熟，能不能替孩子的父亲找这孩子做做工作？叫他甭再闹了，……”

第 223 回：批王震，林彪谈学习毛著　反右倾，红楼召开座谈会

自周恩来 8 月 24 日接见了农垦部代表，谈了王震的问题后，8 月 27 日，李先念按照李富春的批示，将农垦部文革委员会抓王震到农垦部斗争情况的材料送给谭震林。批语说："遵照富春同志批示，送陈漫远和党委同志阅好。"8 月 30 日，李先念又将农垦部群众针对王震的 4 张大字报批送薄一波。批语说："群众意见，当时是不应当满足的。昨天总理告。王震应当限期把检查写出，并请你看一下，提点意见。"

王震按照周恩来的布置写了检讨。9 月 7 日，李先念致信李富春："王震同志的检讨，已看过。电话中与震林同志商量，先讲了再让群众提意见，横直群众总是不满意的。讲了之后，宣布：停职反省，闭门思过。这样，王震同志即可以休息，并根据群众意见，再写一次检讨即可，如何，请决定。"

于是，农垦部准备于 9 月 19 日召开王震检讨会，周恩来指示："会场不许挂横标；王震作检查时，群众不喊口号，不插话；王震可按讲稿念。"

带着周恩来的指示，李先念于 9 月 18 日晚召集农垦部有关人员开会，告诫他们"应按毛主席的最高指示办事，不要把检讨会开成批判会。"

第二天，李先念、谭震林等人来到王震检讨会的会场——政协礼堂，会场上还是挂了"揭发批判王震反党言行大会"的横标。

王震念完检查后，在随后的代表发言中，没有一人称王震为"同

志”。

会后，王震找到贺龙。贺龙对他说：“你应该讲一讲你的历史，让他们好好听一听！”

9 月 18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关于串联问题的通知，提出“目前全国铁路客货运输十分紧张，为了不影响工农业生产，”要求“各地革命师生在国庆前暂不要到其他省市去进行革命串联，以免全国铁路运输无法安排。”

中央决定10月份再放手让学生串联一个月，要铁路部门按进出北京各150万至170万的学生人数安排运力。谷牧向周恩来反映铁路部门的困难。周恩来告：“可以搞三个方案，把方法和困难都写出来。由我报常委讨论决定。”并说：“我更担心的是铁路停断和阻塞。铁路是国民经济的大动脉，一旦停断，整个国民经济就瘫痪了。”

9 月 18 日，林彪接见高等军事学院、政治学院和总政治部宣传部负责人。接见谈话时，林彪说：

“对毛泽东思想抱什么态度，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们就是要抓对毛主席的态度、对毛泽东思想的态度问题。特别是政治学院更应该这样。其他院校和一切教育机关也都要这样。

毛泽东思想是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统一行动纲领。全世界谁也不能代替毛泽东思想。什么李达、康斯坦丁诺夫，尤金，都不行。这些人的书怎么能同毛主席的书相比？现在全中国、全世界没有那一个人的著作能统一人们的思想。马克思、列宁的书太多，读不完，他们离我们又太远。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典著作中，我们要百分之九十九

地学习毛主席著作，这是革命的教科书。要彻底把毛泽东思想贯彻于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用毛泽东思想来统一我们的思想。现在全国都在学习人民解放军，都在学习毛主席著作，形势和从前不一样，局面也不同了。我们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学不好不行。许多事情都要军队参加，如四清、文化大革命、生产、群众工作，还有许多干部不断转业到地方工作。因此，军队应该真正成为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要真正把毛泽东思想掌握起来。毛泽东思想是革命的科学，是经过长期革命斗争考验的无产阶级的最高真理，是最现实的马克思列宁主义。”

“现在全国都在搞文化大革命。中央开了八届十一中全会，更高地举起了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提出了全党全国学习毛主席著作的问题。全党全国学习毛主席著作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部队、院校学习毛主席著作，要有新的考虑，必须适应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新形势。要尽最大的努力，把毛泽东思想真正学到手，真正掌握起来。

你们学校明年招生，离现在还有三个月。今年一定要把文化大革命搞好。通过文化大革命，把组织机构搞得精干一些。宁肯人少一些，也不要坏家伙。把组织整顿好，把教学队伍整顿好，这个问题很重要。不把组织整顿好，思想不一致，甚至有坏人插在里边，怎么能搞好？一定要提高对毛泽东思想的认识，要严厉批评那种对毛泽东思想估计不足的倾向。

有些人迷信洋教条，总觉得苏联比我们的好，近的不香远的香，说什么山沟里没有马克思列宁主义。其实他们那一套那里比得上我们

毛主席的思想？毛主席比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高得多。现在世界上没有那一个人比得上毛主席的水平。有些人说《资本论》是理论的基本阵地，其实《资本论》只解决资本主义社会的规律问题。我们国家，资本主义已经打倒了，现在是解决社会主义社会的规律问题。反对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建设社会主义，就是要靠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是最高水平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要把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举得高高的。要用毛泽东思想统一全党全国的思想，进一步促进人的思想革命化，挖掉资本主义的根子，防止修正主义。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很重视学习毛主席著作，现在全党全国学习毛主席著作已进入了新阶段，出现了新局面，新形势。

我们要打破洋人比中国人高明的民族自卑感。有这种民族自卑感，就会丧失革命斗志。有人说外国月亮比中国的好，我们不如洋人。其实，中国人到了外国，人家也是把我们看作洋人。有些中国人在外国比洋人还洋，学问都很高。洋教条的观点，土教条的观点，都是反毛泽东思想的。洋人、古人那里有毛主席高？那里有这样成熟的思想？毛主席这样的天才，全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现一个。毛主席是世界最大的天才。”

“我们军队打仗，历来靠人的政治觉悟，靠勇敢。这就要靠政治教育，要用毛泽东思想来教育部队。部队战斗力的高低，取决于政治工作、政治教育抓得紧不紧。部队的纪律好坏，作风好坏，能不能出干部，能不能多出好人好事，千条万条，用毛泽东思想教育人是第一条。人的觉悟提高了，勇敢也有了，积极性也有了，创造性也有了，

组织纪律性也有了，吃苦的革命精神也有了。全军工作情况虽然很复杂，有各种不同的情况，但在这一点上，又复杂又不复杂，又有差别，又没有差别，总的就是都用毛泽东思想统一起来。

明年怎么搞，总政宣传部要研究，各院校要研究。全党全国学习毛主席著作出现了新的形势，我们军队要把学习毛主席著作提高到新的阶段，搞出新的局面，要适应文化大革命这个新的形势。学习内容、学习方法、学习时间，你们去研究。

干部要学习毛主席著作。有些同志在部队里尽搞那些事务性的东西，一天忙到黑，那有那么多时间读书？他们到学校来，就是要让他们坐下来读书。如果不读毛主席的书，就要脱离理论，就要脱离方向。具体怎样搞法，你们自己去研究。可以办几个月的训练班，十个月、八个月也可以。”

“我过去曾经说过，对毛主席著作的学习，部队干什么学什么；学校与部队不同，学习时间长一点，内容可以多一点。要通读与选读相结合，通读与专题相结合。可以有三种办法：一种是按专题学，一种是完全按顺序学，一种是通读与专题相结合。时间长的采取通读与专题相结合，时间短的不通读，或者搞半通读，选读一些同当前形势和部队实际需要结合得紧的毛主席著作。究竟用那一种方法，要根据学习时间来决定，反正不要走过场。一期两个月、四个月的不搞通读，七个月、八个月的可以搞通读。时间长的可以搞通读，但重点要放在专题上。要有重点，不要搞平均主义。读书和做事，都不搞平均主义。平均主义不合辩证法。一定要讲究效果，不要搞形式主义。要把这几

年的经验总结一下，怎样才学得好，才能真正理解，熟练运用毛主席的思想，看那种形式、方法效果好，就采取那种形式、方法。现在，对毛主席思想不是学不学的问题，而是真正学到没学到、会用不会用的问题。”

“要列出几个专题来作为重点。有些文章如作战命令，浏览一下就行了，重点文章就要多读。毛主席的哲学著作要学几十遍才能学懂。

部队里就是结合实际学，今天学这篇，明天学那篇，时间久了，就差不多通读了。有的要反复读，读好多遍，有的读几遍。还是干什么就学什么，有目的地学，和自己的工作结合起来学。用得上的学了就容易懂，容易记。例如，搞财贸工作的，学习毛主席关于财经问题的著作，就学得懂，记得住，用得上。不结合实际学，就学不懂，记不住，用不上。理论联系实际是根本原则。总之，是结合实际选读，同时又有通读。连队更要结合实际选读，要带着问题学，活学活用。个别人愿意通读也可以，但不要作死规定。

老三篇虽然是战士必读的。但是干部也要读。老三篇最容易懂，但最不容易做到。要把老三篇作为座右铭来学。那一级干部都要学，包括我们这些人。从中央副主席到每个支部的每个党员，都要学。学了就要用，搞思想革命化。思想方法和政策的学习也很重要。

《解放军报》要很好掌握，要很好突出毛泽东思想，联系部队实际，指导好部队学习毛主席著作。要反复教育，反复宣传。看起来部队是不变的，实际上干部、战士都在变。天天都在变。要反复宣传，结合新的形势，用新的语言反复宣传，就不觉得枯燥了。马克思列宁

主义的根本原理，反来复去就是无产阶级立场，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但一结合实际，就一点也不感得重复了。这样宣传，形式上不重复，内容上是重复，只有多次重复才能加深认识。

今天我提出的问题，你们回去研究。全国出现文化大革命的新形势，全党全国学习毛主席著作进入一个新阶段。为了适应这个新形势，新阶段，部队特别要学好。部队一定要贯彻毛泽东思想，抵制修正主义思想和一切剥削阶级思想，加强革命化，提高人的觉悟，提高政策水平，提高思想方法。

总政宣传部编的要战士熟读熟记的《毛主席语录一百条》，可以搞，这也是有重点的选读，不过更突出重点，更精炼了。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不上课的政治课，是不经考试的考试。群众运动就是政治，就是最好的政治课。这话是毛主席说的。我也说过类似的话。

今天就谈到这里，一两个月以后，还可以再来谈一次。”

林彪的这次讲话就是后来被称之为《林彪同志关于把学习毛主席著作提高到一个新阶段的指示》。其中关于“老三篇”的那段讲话很快被谱成了歌曲到处传唱，家喻户晓。

此时，北京高校反工作组的造反派虽然联合成立了“三司”，但他们大多数在自己的学校仍处于少数受压的境地。于是，北京地质学院、北京政法学院、北京工业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农业大学、北京林学院、北京邮电学院、中央戏剧学院等十几个高校造反派组织

串联后，联名以各校红卫兵组织名义给中央写信，请求支持。他们将信送到《红旗》杂志社，请他们转递。

中央文革小组收到信后，进行了研究，并向毛泽东做了汇报。据《王力反思录》记载和后来戚本禹对韩爱晶所讲，中央文革小组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召开了大专院校少数派红卫兵座谈会。

当时住在中央音乐学院王义新那里的蒯大富，听中央文革办公室一个工作人员告诉他，中央文革小组要开座谈会，回来后对王义新说："中央文革有个座谈会，你去吗？"

王义新毫不犹豫的说："去。"

9 月 17 日，由张春桥主持，王任重、刘志坚、王力、关锋、戚本禹、谢镗忠和毛泽东的女儿李讷参加，在北京沙滩《红旗》杂志社附近的原北京大学校址——红楼，这个当年"五、四"运动的策源地，连续三天召集北京大专院校的少数派组织负责人座谈，后来被称之为"少数派座谈会"或"红楼座谈会"。开会的房间在一层的一间教室里。进会场没人管，很随意，每天都坐满了人，有 30 人左右，北京高校每天都有人前来参会。

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参加座谈会的朱成昭，每天都是和中央戏剧学院的造反派头头、叶剑英的女儿叶向真一起来参加会议。

叶向真，25 岁，在中央戏剧学院读书，还担任过中央戏剧学院的学生会主席。此时，她已是有一个儿子的母亲了。孩子的父亲就是当时闻名中外的钢琴神童刘诗昆。

文革开始后，刘诗昆因给工作组写大字报被学院革委会抓进"黑

帮劳改队”，在中央音乐学院早期红卫兵揪斗院长马思聪、党委书记赵沨等领导干部时，刘诗昆也被抓去陪斗并被打致左臂骨裂。工作组撤离后，刘诗昆奋起造反，此时已是音乐学院造反派领袖。

难抵造反激情，叶向真在中央戏剧学院也率先造反，并组建了“毛泽东主义红卫兵”。而在派出工作组期间，向中央戏剧学院派出工作组的单位恰恰是叶剑英任院长的军事科学院。该工作组进院后，支持叶向真的造反行动。

工作组撤离后，叶向真起而反对工作组，并于 8 月底 9 月初，到北京地质学院串联，认识了地院学生领袖、“东方红公社”的一把手朱成昭。

叶向真还把电影学院、音乐学院的造反派联合起来，参与了“三司”的组建，并任“三司”文艺部的负责人。

9 月 6 日，在首都“三司”成立大会上，朱成昭向王大宾介绍了叶向真。后来，他对王大宾他们说，他和叶向真是在中央文革的一次接见中，江青向他介绍的叶向真。她对朱成昭说：“这就是叶帅的女儿叶向真同志。”

在“红楼座谈会”上，张春桥针对社会上流传的林彪 9 月 15 日讲话中提到的“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那句话，特别解释说：“林副主席 9 月 15 日讲的，有人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不是指同志们。”

北京地质学院的朱成昭第一天就做了言辞激烈的发言，提出：现在是没有工作组的工作组路线，少数派还在受压制，有一条“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并批评了地质部副部长何长工。

中央财政金融学院“八八队”的敖本立，在会上发言批判主管财经的副总理李先念、财政部副部长吴波等执行了错误路线，打压造反派。敖本立指出：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发展，已经提出了是否把反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在全国广大革命人民中公开进行的问题。

北京政法学院代表在发言中批评了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杨秀峰、副院长吴德峰。

北京农业大学代表在发言中批评了农林办副主任兼农业大学校长王观澜。

北京林学院以及北京邮电学院的代表等也都做了发言。

代表们反映，保工作组的多数派借林彪副主席 9 月 15 日讲话中提到的“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那句话，攻击受压制的少数派。张春桥在会上特别解释说:“林副主席 9 月 15 日讲的有人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不是指同志们。”

朱成昭、蒯大富、谭厚兰等人还在会上提出，有人借口周总理讲的“抓革命、促生产”压制群众，等等。说有人在“搞调和”，“把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保了一下”；他们“怀疑现在是否还有一个暗中与党中央、毛主席对抗的司令部”，还说周恩来是“和稀泥”、“折衷主义”。

在第一天的会上，北京工业大学的代表提供了许多谭力夫宣传血统论和为工作组辩护的讲话材料，批判谭力夫保工作组打压造反派的言行。谭力夫讲话被广泛传播的影响，及其对刘邓错误路线的保护作用，成为此次座谈会热议的一个重要话题。

这几天，北航“红旗”的负责人韩爱晶忙于国防部门外的静坐活动，没有参加 17 日的“红楼座谈会”。当天下午，北航在北师大参加批判“谭力夫讲话”大会筹备小组工作的田东，领着北京工业大学的伍家穗来找韩爱晶，对他说：

“红楼有一个座谈会，有中央文革的同志来听意见，今天已经开过一次，明天继续开。你是不是明天去这个会，反映我们的情况。”

田东是在批判“谭力夫讲话”大会筹备小组听到中央文革召集北京高校少数派红卫兵座谈会的消息，于是跟筹备小组部分成员一块参加了 9 月 17 日第一天的座谈会。

韩爱晶听田东一说，非常高兴，觉得到处找中央领导，总是见不到，这次可是机会难得，立即回答说：“明天我一定去参加座谈会。”

北京沙滩红楼

第二天下午，韩爱晶和田东、伍家穗又来到业余航校，叫上朱芝慧同学带上笔做记录，就一起赶往沙滩红楼。

走进那间作为会场的教室，韩爱晶看到，教室的讲台上摆了几张不宽的长桌，连接成主席台。面对主席台，摆着好几排木质的长靠背椅，是与会者的座位。他和田东、朱芝慧在靠后的一排坐下。也没什么开会的气氛，也没人介绍什么，像是基层工厂或街道开会的那种土里土气的气氛，很安静。主席台上的人衣着很朴素，好像还有两个穿着军装，也不像他心中原来想象的中央文革小组的人，好像是工厂或街道的干部。

韩爱晶看见地质学院的朱成昭坐在前面，既不是坐在第一排面对着主席台，也不是坐在主席台上对着下面，而是斜坐在一个单人木椅上，半对着主席台，半对着大家，在关锋左边，与关锋互相递着香烟，看上去彼此很熟悉。

张春桥主持座谈会。有人在台下举手表示要反映情况，台上同意，就在自己的座位上站起来，像上课的学生回答问题一样，面对讲台上中央文革的人讲话。有时，台上也问某某大学某人来了没有，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发言不热烈，言词也不激烈，可能昨天讲得差不多了。

北师大的谭厚兰站起来发言，这是韩爱晶第一次见到她。

清华大学蒯大富讲话时，浓浓的苏北口音，让韩爱晶一下就听出他是自己的老乡。韩爱晶也是第一次见到蒯大富。

蒯大富说完坐下，别人接着发言。这时，台上李讷走过来把蒯大富叫到教室后面的空地上，在离最后一排椅子约有两米的地方，轻声

和蒯大富说话，问了问他的情况。此时，韩爱晶好羡慕蒯大富呀。

散会后，韩爱晶过去与蒯大富相见，问他是哪里人，蒯大富说是滨海，韩爱晶说自己是涟水人。

蒯大富向韩爱晶介绍自己身边的一位女学生，说是清华附中的刘刚。

韩爱晶问刘刚家庭出身，她说资本家。韩爱晶心想，外面的造反派很杂。

后来，刘刚告诉韩爱晶，那天是骗他的，哪有见面就问出身的？实际上她出生在干部家庭，她父亲解放前也在北平草岚子监狱坐过牢，和安子文、薄一波他们一样。

## 第 224 回：难忍耐，陶铸愤而顶江青
## 周恩来，接见黑龙江代表

9 月 19 日，周恩来将刘少奇的检讨和毛泽东的批语印发有关人员征求意见。

这天，周恩来接见科学院文革代表和院党委、政治部、组织部及监委共71人。接见时，581工厂工人代表交给周恩来很多传单，他坐下仔细地看了看后询问了印刷传单的事情，然后说："各种不同的意见都应该印刷。根据宪法规定，公民就有出版的自由。科学院不管哪一种观点，除了那些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分子以外，都有出版的自由。"

"我们还有结社，刚才你们不是说有战斗组吗，这就是结社啊！还有集会的自由，还有游行的自由，这都是宪法规定的。还有请愿的自由，不是有很多人到北京来告状吗？57年也有很多人到北京来告状，但下面就有人怕了。还有罢工，因为某些领导人有错误，工人不做工了；还有罢税，因为有的农业税不合理，农民不交税了。不合理的就得改嘛！还有罢课，学生给他们放半年假，给他们闹革命。这是我们无产阶级专政，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世界上最大的自由，最大的民主。只有在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才能做到。我所说的前提是不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人，若不是公民，那就没有这种民主，自由的权利了。"

"《十六条》的第十二条规定，对于科学家、技术人员

和一般工作人员，只要他们是爱国的，是积极工作的，是不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是不里通外国的，在这次运动中都应该继续采用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因此，都应该给他们自由，给他们民主。自由、民主是有阶级性的，科学院的革命同志，就应该给他们民主、自由、不管是多数，少数都应该给他们出版自由的方便。没有给不同观点的同志印刷，这是院党委的责任。没有给同志们的这种自由，政治部更有责任。”

对于什么是体罚？周恩来说：“我们刚才听到一个消息现在告诉你们，哈尔滨厅局长以上的干部几乎一半被群众斗了。什么叫体罚，动手就算体罚，戴高帽子算不算体罚？他自己戴上去的不算体罚，你们给他戴上去的就算体罚；他不低头，你给他按下去，就算体罚，因为你动手了。厅、局长以上的干部被群众戴了高帽子，脸上也抹了黑，但还不是反党分子。游街以后，他们说：‘我还有党和人民交给我的工作、任务，今天党还没有免了我的职，我还要工作，还要干革命’，接着摘了帽子，洗了脸就干起工作了。这才有共产党员的生气，才是一个共产党员对党对人民事业的高度负责的精神，一个共产党人应该经受得住这种考验。斗争以后群众很受感动，我们每个共产党员都应该像他们那样。”

提到8月25日科学院部分群众召开的万人大会，张劲夫没有参加的问题时，周恩来对张劲夫说：“你为什么不去呢？

怕什么呢？总比哈尔滨好吧。自己灰溜溜的，人家一看也有问题。”

接着他问：“杜润生斗了没有？”

张劲夫：“没有，怕群众有意见。”

周恩来：“怕什么呢？杜润生现在怎么样？”

张劲夫：“自7月12日起，杜就停职检查了。”

周恩来：“杜润生担任什么工作？”

张劲夫：“停职以前担任秘书长、党委委员。”

周恩来：“谁给他提的那么高？是中宣部？还是组织部？”

张劲夫：“不是中宣部。是58年，通过组织部我们给他提的。”

周恩来：“你们为什么不追一追呢？中宣部已经烂了，组织部的安子文也被揪出来了，为什么不好好的追一追呢？怕群众有意见，你们院党委可以扩大一些，先叫杜作检查，看你们是否能与他划清界线，也可以请文革代表参加。院党委对‘应地所’是处理不当的，张劲夫在9月5日已经向他们赔礼道歉了。对杜润生、卫一清的认识，能不能与他们划清界线，这也算是对你们院党委的考验。”

有人问：“总理，我所红卫兵提出来，要扣科学家的工资，你看如何掌握政策？”

周恩来笑着说：“现在工资一律不改，改革工资以后再

说。科学院的红卫兵是国家干部，我们又不是学校里学生的红卫兵，应该注意党的政策，国务院里有民主人士，有的他们家虽然被红卫兵搜了，但因为他们是部长级的，因此我们给他们部长级的工资，没有给他们扣，因为工资还没有改嘛？不合理的，我们以后改。现在还是不变，革命的同志应该注意革命的秩序。”

有人问：“总理，过去困难时期，科学家和干部补助的，现在群众有意见，红卫兵也下了命令，要求扣回来，这政策如何掌握？”

周恩来：“该补助的就补助，不该补助的就不该补助。该补助多少？不该补助多少？均经群众讨论决定。”

随着社会上红卫兵组织的蓬勃发展，8 月，学部的吴传启、林聿时指定年轻的造反派、哲学所的邹永图出来联络学部其他所的组织，酝酿成立一个学部的红卫兵组织，得到了各所的赞同。8 月 27 日，学部的第一个红卫兵组织“学部红卫兵联队”成立了，队长是近代史所曹震中、副队长是文学所的杜书瀛、指导员邹永图，副指导员是历史所的孟祥才。

但是，与之相对立的群众也很快拉起了一个“学部红卫兵总队”的组织，斗争矛头主要指向吴传启。负责人称之为总队长和教导员，这显然是要在名目上压对方一头。

“学部红卫兵总队”有一个专门小组，专门查阅吴传启的历史材料和发表的文章，以各种形式揭发和宣扬他的“罪

行”，力图将他打为“三反分子”。他们揭发出来吴传启最要害的一个“罪行”是，他在一次会上攻击大跃进：“裤子赔光了，还谈什么政治！”

而哲学所的“学部红卫兵联队”则针对“总队”提出的指控一一进行反驳。后来双方达成协议，召开一次大辩论会，看谁正确。辩论会从 9 月 12 日开到 9 月 17 日，一对一发言，双方都使出浑身解数，声嘶力竭，唇枪舌剑。结果自然是谁也不服输。“总队”于是将吴传启的“罪行”材料抄成大字报，印成小字报，贴满北京城。重复最多的还是那句“裤子赔光了，还谈什么政治！”一时间吴传启被搞得灰头土脸。

就在学部辩论会进行的同时，吴传启、林聿时通过关锋，希望陶铸出面保一下吴传启。陶铸让秘书查阅了吴传启的档案，里面有吴传启在解放前曾任国民党蓝衣社特务机关报“大刚报”的主编，是国民党党员的记载。陶铸将这份材料在文革小组内进行了传阅。

一天，中央文革小组开会，陶铸一进屋，江青就问陶铸：“你为什么迟迟不去宣布支持革命左派？”

陶铸说：“有的革命左派确是有问题的，吴传启的材料你也看过了，他有些历史问题还不清楚。”

“只要是写第一张大字报的，就必须承认他是革命左派，就必须支持他们。至于什么历史问题，那有什么了不起！”

江青振振有辞，又紧接着跟了一句说："你不也是国民党吗？"

陶铸一下火了，他高声说道："你知道我是什么时候的国民党员？我是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国民党员，是在国民党军队集体参加国民党的，那时毛主席也是国民党，周总理也是国民党，还是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国民党第一军的党代表。他们都是我的顶头上司，我只是国民党的一个小兵。而吴传启是什么性质的国民党员？他的国民党能够与我们的国民党员混为一谈吗？"

陶铸是火爆脾气，年轻就是这样，在家里跟爱人曾志也是大声嚷嚷，过去跟江青也是有啥说啥。此时，只见江青也不由分说地大声喊道："不管怎么说，你非去支持吴传启不可！"

陶铸霍地站了起来，直视着江青声色俱厉地说道："你干涉的太多了！管得太宽了！你什么事情都要干涉！"

江青登时呆在那里，很快，眼泪默默的流了下来，她哽咽着从嘴里挤出了两句话："你欺负我！镇压我！"接着就是号啕大哭。

人们纷纷过来劝慰江青，同时批评陶铸不该耍态度。陶铸这时也冷静了下来，走过去向江青道歉。

事后，关锋将此事告诉了叶群，叶群马上报告林彪，并说："这件事太大了，这个陶铸，他怎么能说到毛主席，怎能跟江青吵？"

9 月 20 日上午，熊复受陶铸委托，会见学部两个红卫兵组织的代表 24 人和学部负责人潘梓年，并向他们讲了话。根据代表的要求，熊复首先传达了陶铸的指示：

"一、有的同学要求把张际春同志交给哲学社会科学部批判、斗争。关于这个问题，我在不久以前受陶铸同志委托，宣布中央关于张际春停职反省的通知时已经说过，欢迎学部的同志们对张际春的错误进行揭发、批判和斗争。（据我所知，学部的红卫兵联队已经开过这样的大会）根据中央通知，张际春自今年五月以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及会后，政治上表现都是不好的。他在学部工作期间所犯的错误有待同志们进一步揭发、批判和斗争，只要你们准备好了，要开大会随时可以把他交给你们。我们对学部的同志这样讲，对文教及其他部门的同志们也是这样讲。

二、据我们了解，你们有两个红卫兵组织，相互之间是有不同意见的，你们双方最近都召开了辩论会，据你们通知是讨论吴传启问题，中宣部派了杜大公和其他一些同志去听你们辩论。他们的任务，是把听到的情况向领导汇报。他们的确这样做了。我们也已经把他们听到的情况，随时报告中宣部的领导陶铸同志。如果杜大公同志他们在学部讲了什么

话，那只能代表他们个人。你们有充分的权利把你们辩论的情况和意见书面提交我们或者口头告诉我们，我个人可以负责向中宣部的领导陶铸同志汇报。

三、希望你们双方面在辩论吴传启同志问题的时候，都不要把问题扯到关锋同志身上去。关锋同志是坚定的革命左派，中央是信任的，中宣部是支持的。至于吴传启同志，我们也知道他在 57 年反右斗争以来，特别是在批判杨献珍、冯友兰和吴晗等人的斗争中，表现是不错的。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他也是参加写第一张大字报，揭学部阶级斗争的盖子的。当然，你们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就吴传启同志的问题进行辩论是可以的，是符合《十六条》精神的。我们愿意听取你们双方面的意见，随时向中宣部的领导陶铸同志汇报。

四、听说这两天你们一部分同志正在开斗争会，斗争学部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杨述。《十六条》规定，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林彪同志最近两次讲话也指出，集中力量打击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大方向。我们赞成全学部的革命同志们都按《十六条》，按林彪同志的指示，也就是按毛泽东思想办事，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同志们，我受陶铸同志的委托同大家见面所要讲的，就是这四点。”

陶铸的这四点指示，吴传启、林聿时立即印成传单广为散发。此后，“总队”每况愈下，其中的不少群众纷纷“反戈一击”，站到了“联队”方面。

9 月 21 日，为了解决黑龙江省的问题，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专门接见哈军工“造反团”、“八八团”和“东方红”三派组织的代表，潘复生等省委领导和毛远新也在座。

周恩来和每一位哈军工学员握手后，在笔记本上记下他们的名字，然后请三派的领袖们先讲讲自己的意见。听完他们的发言，周恩来首先表示：“今天我不谈哪个做得多一点，哪个做得少一点，哪个错误多一点，哪个少一点，只要投入到文化大革命的烈火中来都有成绩。”

对炮轰省委，周恩来说：“你们炮轰了省委领导，省委有错误，但对省委还要一分为二，不仅对省委是这样，对市委、地委、县委，每个机关都要一分为二，连我们一个人也是一分为二的，何况一个组织！对省委问题你们炮轰了，斗了一些，还有些好的同志嘛！如果仅仅有潘复生同志一个人，不用你们轰，省委就垮了，还是要一分为二。”“欧阳钦错误有多少，可以揭发，因为他有病，不能回去，对一个人要看整个历史，欧阳钦在黑龙江只是一段嘛！就是周扬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刚开过刀，也没让中宣部要回去斗。”“中央批准抓一个人，停职反省一个人，批判斗争一个人，得经过研究许多材料，而且要经中央常委批准，有的还需主席批

准。”

他要求三派组织：“你们要相互尊重，相互支持，只有相互尊重才能相互学习，首先都要作自我批评，这样才能逐步达到团结。”

他最后说：“黑龙江的问题，中央责成东北局的潘复生同志全权妥善处理。”

他指着周涛说：“你们造反早，也不能说自己一切都对嘛，现在对干部动辄就是‘黑帮’、‘黑线’，这不是毛泽东思想，不是马列主义的科学语言。”

周恩来又指指司锡才问：“你们‘八八团’是不是不让潘复生同志睡觉呀？如果那样就不对喽。”

他最后说：“我派飞机送你们回哈尔滨，你们各派的头头们要带队下乡参加秋收啊。”

周恩来讲完话，“八八团”的代表司爱云提出一个问题：“林副主席关于林晓霖的讲话不应该在哈军工公开广播，不仅对‘八八团’造成压力，对林晓霖本人也是一种伤害。”

周恩来笑了，他说：“你们还年轻，没结婚，没有孩子，等以后你们要是有了孩子，就知道做父母的心情了。”

周恩来的接见结束了，大家站起来鼓掌，向他表示感谢。周恩来正要离开，“八八团”的代表刘豹走上前来，指指周恩来胸前那枚小小的毛主席像章说：“周伯伯，能不能把您的毛主席像章送给我？”

周恩来又笑了，他把胸前戴的毛泽东像章摘下来给了刘豹。那时候毛泽东像章刚刚出现，是十分珍贵的纪念品，刘豹得到周恩来戴过的毛泽东像章，让哈军工同学们好生羡慕。

哈军工的三派代表乘上周恩来派的飞机飞回哈尔滨。同乘这架飞机的还有潘复生、马明芳和毛远新。

在飞机上，毛远新坐到司锡才的身边，劝道："你过去和潘书记聊聊嘛。"

司锡才直晃脑袋："不，我才不想理他呢，这人净说瞎话，我们什么时候不让他睡觉了？"司锡才又说起造反派打陈雷的事，毛远新说："你们要理解群众运动嘛，不免过火，'八八团'要有点高姿态，现在两派互有对错，对的坚持，错的就改嘛。"

第 225 回：九二三，清华“井冈山”成立

廿八天，“北航红旗”凯旋回

9 月 16 日，清华“临筹”主持召开校文革代表会议第二次会议，通过决议，成立由各系选举出代表组成的“清华大学校文革临时主席团”，简称“临主”。而此时的蒯大富呢？虽然周恩来在 8 月 4 日晚清华大学的辩论会上亲自为他平了反，但是由于他在清华已经被工作组批得太臭了，就在周恩来宣布平反的会场上，还有人说蒯大富就是反革命，不应当平反。后来，很多人仍然这样认为：蒯大富即使不是反革命，也不是什么好东西。当然，学校里也有不少反工作组的同学，不同意工作组压制不同意见的做法。可是蒯大富平反后，即便是这些反对工作组的同学也不太愿意跟他接近。因此，平反后的一段时间，蒯大富主要和外校的学生来往，经常待在地院。

周恩来和中央文革多次要求地院“东方红”的朱成昭设法支持蒯大富。

“红楼座谈会”后，李讷到地院找到蒯大富，对他说：“你的阵地在清华，你得回请华组织你的队伍，地质‘东方红’要支持他一下。”

9 月 20 日，朱成昭、韩爱晶都鼓励蒯大富自己成立一个组织，蒯大富说：“我在清华被整得太臭了，学校里没人敢跟我跑。”

朱成昭和韩爱晶纷纷说道：“我们支持你。”

蒯大富听了很感动。于是地院“东方红”派出队伍，一夜就将支持蒯大富的大字报覆盖整个清华园，同时将蒯大富送回了清华大学。

蒯大富回到清华，与同学鲍长康等人商量成立自己的组织，大家

都表示赞成。起什么名字呢？有人说："'星火燎原'，一步步走向胜利。"

清华附中的刘刚说："叫'井冈山'，更响亮。"

大家都说好。

刘刚怎么跑到清华大学蒯大富这里来了？

原来，清华大学 6 月 24 日关于工作组的辩论会结束后，刘刚给蒯大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8 月 10 日，蒯大富被周恩来宣布平反后不久，就一个人跑到清华附中去找刘刚。谁知，一进附中，看到学校到处都是批判刘刚的大字报。蒯大富哪里知道，刘刚在他被工作组"围剿"的时候，曾勇敢的站出来贴大字报支持他，因此在学校受到批判。

蒯大富来到刘刚所在的高 656 班，有人冲里面喊："刘刚，蒯大富来找你！"顿时，吸引了一帮人堵在门口好奇地看。

刘刚出来了。蒯大富觉得自己就像是劳改犯释放回来了，他带着刘刚来到与清华附中一路之隔的圆明园，断壁残垣星星点点地散落在无边的稻田和落叶当中，他们在这里谈了一个多小时。在那个激进的年代，一个 16 岁的女孩子在众目睽睽下，跟着一个备受争议的男子走入圆明园杨树林的一刻，无疑就是一种离经叛道的私奔。

在夕阳的残园中，可以让人感受到一种近乎苍凉的使命感。中央首长亲自为蒯大富平反，更让有些憔悴和惶恐刘刚坚信蒯大富是对的。从此，蒯大富走到哪里，刘刚就跟到哪里，他们几乎是天天都在一起。

9 月 23 日，张春桥在中南海西门接见了蒯大富，对蒯大富单独成立自己一派红卫兵的想法，给予了鼓励。

从中南海回到清华大学，蒯大富和鲍长康、彭伟民立即贴出《清华大学井冈山红卫兵筹备建立委员会第一号决议——关于组织原则》，明确提出："井冈山红卫兵是以红五类为主体的革命的组织。第一，有成份论；第二，不唯成份论；第三，重在政治表现。"在同意"井冈山"观点的前提下，"非红五类子弟可加入井冈山战斗团。"

9 月 24 日，清华"井冈山"成立大会在清华大学的礼堂召开，成员只有十几个人。但是，地院"东方红"来了几百人，北航"红旗"也拉来几百人，将清华"井冈山"的成立大会搞得轰轰烈烈。自此，清华大学便有了三大红卫兵组织：

一、由高干子弟贺鹏飞、刘涛等为核心的"清华大学红卫兵临时总部"；

二、以烈士子弟唐伟、陈育延为首的"毛泽东思想红卫兵"；

三、由被工作组打成右派或反革命的学生为核心、以蒯大富为首的"清华大学井冈山红卫兵"。

"清华井冈山"一成立就参加了"首都三司"，朱成昭请蒯大富担任"二把手"。从此，有人开始戏称蒯大富为"蒯司令"。加上后来毛泽东也戏称蒯大富为"司令"，"蒯司令"从此名扬四海 。

以高干子女为主导的"清华大学红卫兵"，从 8 月 24 日以后，就一直处于被动状态。9 月 29 日，贺鹏飞和刘涛不得不宣布自我罢官，"清华大学红卫兵"也因此自动解散，其中一部分成员转而成立"造反兵团"，支持蒯大富。

几乎同一个时期，"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的唐伟、陈育延，因不

满“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总部的“右倾”，从中拉出一支队伍，另组“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八八总部”。从此，“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分裂为“八八总部”和“临时总部”。结果，蒯大富的清华“井冈山”红卫兵反而后来居上，不断壮大，很快发展到了数千人。此时，清华园中名目繁多的其他红卫兵，也都打着批判刘少奇路线的旗子如雨后春笋般地冒了出来。

再说“北航红旗”到国防部南门静坐，至此已有 20 余天。国防科委担心学生会揪斗工作组长赵如璋，始终不让他出来见学生。

8 月 26 日凌晨凌晨 2 时 30 分，国防科委副主任罗舜初来到静坐现场，受到静坐学生热烈欢迎。因为凌晨刚刚下过雨，地上很湿，北航学生从传达室要了把椅子，请罗舜初坐下，他不肯坐。

同学们七嘴八舌的要求赵如璋出来澄清问题，罗舜初只是表示：“你们有什么要求，我可以给你们转达。工作组可以通过筹委会回院作检查。”

学生们坚持要见赵如璋，罗舜初显得很无奈，只是反复劝说学生们回去。过了一个多钟头。学生们觉得这次来不是找罗舜初的，就让他回去了。

静坐现场的北航“红旗”院勤务员进行了商议，决定先从科委门前撤离。4 时 30 分，他们列队撤到三座门中央军委接待站。

但是在中央军委接待站待到清晨 6 时后，大家又觉得这里离国防科委太远，于是又返回到国防科委旁边的业余航校小体育馆。在仇北秦等人的努力下，学校送来早饭。在韩爱晶、屠海鹰、戴维提等几位

院勤务员说服下，绝大部分同学吃了早饭。

下午 15 时，业余体校小体育馆有课，于是，北航学生又整队离开，回到科委门口空地上，有的学习《毛主席语录》，有的把“请赵如璋同志出来和我们澄清问题！”标语贴在地上。同时还将传单散发给前来上班的科委干部，包括坐小汽车前上班的领导。胡同里的居民很热情地，有人给北航学生送来茶水。

北航静坐学生学习《毛主席语录》

后来，国防科委警卫室的人对静坐的北航学生说：“中央首长有指示，不要在军委门口贴大字报，影响不好。”

于是，北航“红旗”又将贴在科委门口地上的大标语全部撕下。警卫室的人表扬他们说：“你们是毛主席的好学生。”

晚上 20 时，中央军委派人给静坐学生送来晚饭。

8 月 27 日上午 9 时，国防科委通知北航静坐学生可以派代表进去谈。静坐学生选出韩爱晶、屠海鹰、何金国、戴维提、张庆海、郑

焕成、刘金荣七个代表，还组织一个保卫人员小组同行。他们在一个会议室见到罗舜初副主任、庞展局长和其他几个干部，但是没有工作组组长赵如璋。

学生坚持要见赵如璋，罗舜初未置可否，会谈陷入僵局。

中午，工作人员送来午饭。罗舜初、庞展和学生代表一起吃饭，聊起了家常。当他们听到这几个学生代表都是干部子弟和烈士子弟时，脸上露出了笑容。韩爱晶干脆说：

“请领导放心，不仅我们谈判代表是红五类，我们来科委的这些红旗战士几乎都是红五类，学校里还有一千多红旗战士基本也都是红五类，我们对共产党，对革命前辈是非常有感情的。别以为我们是右派造反，我们是响应毛主席、党中央号召，反修防修，为了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才参加文化大革命的。”

8 月 28 日晚上，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派了十几个代表到小体育馆对北航“红旗”表示声援。

深夜，静坐的北航学生三五成群，走出胡同，十几分钟就来到北海公园和中南海相隔的桥上。在这里，可以清晰地看到中南海的灯光，看到中南海的房屋和树。大家纷纷说到：“毛主席就在中南海，毛主席离我们很近很近！”

有的人说：“我们在北京，在首都，在毛主席跟前，我们怎么会这样无奈无助呢？”

还有的人说：“我坚信！有毛主席，我们一定能得到公正的对待。”

在后来的二十几天里，他们经常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到这里来漫

步，望着中南海的灯光，盼望胜利。

8 月 30 日下午，北京“西纠”突然到小体育馆发《通牒》，限令北航“红旗”在 8 月 31 日 9 时以前撤离。

8 月 31 日下午，毛主席第二次接见红卫兵。“西纠”又派人来，要北航“红旗”撤离。

北航“红旗”告诉他们：“我们和国防科委领导的对话一直在进行，军委了解情况，没有说要接管我们。”

闻听此言，“西纠”的人四周看了一下，就走了。

当天，北航“工人赤卫队”、“毛泽东主义赤卫队”和“红卫兵”联合公布向国防科委提出的五点建议，主要是赵如璋返校，一定要经过筹委会；“工人赤卫队”、“毛泽东主义赤卫队”、“红卫兵”不同意赵如璋回去；“红旗战斗队”和科委首长会谈，要有两名以上的筹委会委员参加，“工人赤卫队”、“毛泽东主义赤卫队”、“红卫兵”也要派代表参加会谈。

9 月 5 日下午，在北京“二司”成立大会上，有位北航“红旗”的学生向参加大会的江青反映了他们的要求。江青当即表示，她回去转告周恩来总理亲自解决北航的问题。

9 月 6 日下午，国防科委副主任钟赤兵接见北航院文革筹委会常委。他用那只独臂一拍桌子站起来，涨红了脸，大发雷霆的说：“根据现有的材料，赵如璋同志不是黑帮，是个好同志，谁敢动一根毫毛，我们决不答应！”他要北航筹委会负责保护赵如璋安全，最后宣布：对北航“红旗”暂不接见。“你们还管他们？让他们去闹！你们抓紧搞斗批改，抓住运动的大方向。”

钟赤兵的态度让北航“红旗”感到了巨大的压力。有人建议暂时撤回学校。但绝大多数人表示：不能暂时撤回学校，要坚持斗争到底。

他们已经没有退路，校园内，有的小孩看见戴“红旗”袖章的，跟在后面骂“‘红旗’臭！‘红旗’臭！”

还有人说北航“红旗”是“反动学生，聚众闹事”。“‘红旗’给赵如璋剃了光头，戴了高帽子。”“‘红旗’目标是炮轰国防科委，就是要炸国防科委的大楼！”

“北航红旗”在国防部门口的静坐，轰动了北京市乃至全国。

时任林彪的秘书张云生后来回忆说：

罗舜初来电话，要找叶群。我去报叶群，叶问：“谁？”我说：“罗舜初。”叶群摇摇头：“不接。”我刚要走，叶群交代：“你就说我不在。他有什么事，可以对你们秘书讲。”

罗舜初没办法，只好对我说：“那就请你转报叶主任，我希望得到林总的指示，我自己确实不知怎么办才好了。”他接着报告说：“几天来，国防科委门前一直坐着一群学生。他们说是‘北航红旗’的，一定要我们把赵如璋交给他们批斗。赵是我们科委的一个局长，曾经担任北航的工作队队长。我们考虑，赵的健康状况不好，如果交给学生批斗，后果是不堪设想的。我们耐心的向学生做工作，对他们说明情况，但他们根本不听，坚持要揪人，不达目的不罢休。一开始，人数不算多，而且只是静坐示威；现在参与静坐的人越来越多，从静坐发展到了绝食。有些娃娃已经绝食几天了。我们派人给他们送饭吃，他们坚决不吃。这样下去，我担心会出问题。如真的出现生命危险，我们也担当不起。究竟怎么办好，希望给我们指示。”

我把罗舜初的电话内容详细记录后，报告叶群。叶群说：“我管

不了，你去报首长。”

这时，林彪正在浙江厅踱步，见我进来，就停下来问：“有事吗？”

我说：“罗舜初同志电话报告个重要情况。”

林彪似乎有些兴趣，走近几步问：“什么重要情况？”

我把罗舜初电话内容复述一遍，林彪没等我听完，就转过身，又去踱步。

“罗舜初同志希望得到首长的指示。”我说。

林彪头也没回，继续踱着步，说了4个字：“不用答复。”

事过两天，罗舜初又来电话报告，说绝食的学生有增无减，有的学生身体瘦弱，开始有些支持不住了。罗舜初不放心地问：“我前天报的情况，你向首长报告了吗？”

我说：“报告了。”

“有什么指示吗？”

“没有。”

“请你务必把我今天报的情况再报一下，好吗？”

“好。”

我直接去报林彪，林彪还是没有指示。以后，罗舜初又接连来了几次电话，一次比一次急迫：已有几个绝食的学生晕过去了，正在抢救。

我又向叶群报告。

叶群嘟囔说：“罗舜初不该老是把球往这里踢，绝食的学生一旦出了事，还想把责任往我们身上推呀？别想好事。”

但是这次她把电话记录拿过去了："我去找老夫子！"

"老夫子"就是陈伯达。

中央文革小组也将这一情况报告给毛泽东，毛泽东支持北航"红旗战斗队"。总政副主任、中央文革副组长刘志坚告诉罗舜初："毛主席也听说了国防部门口发生的事情。毛主席说：搭起席棚，给他饭吃，给水喝，另开辟一个战场，让他闹几个月。"

当然，从第一天开始，国防科委就为同学们准备了饭。至于要不要搭起席棚？罗舜初觉得在国防部门口影响不好，没有搭。

9 月 8 日，周恩来将中央文革小组报给毛泽东的一期简报批转聂荣臻、罗舜初和赵如璋阅，这期简报中有关于北航"红旗"在国防部南门静坐的报道。周恩来指示国防科委可以让赵如璋去澄清问题，甚至可以单独澄清问题，首先要说服多数，不要压制少数，澄清问题后双方要开会求得统一。

当天下午，罗舜初召集北航文革筹委会、北航"工人赤卫队"、"赤卫队"、"红卫兵"代表商讨落实周恩来的指示。北航"工人赤卫队"、"赤卫队"、"红卫兵"坚持不同意赵如璋单独接见"红旗"，与国防科委在会上发生激烈辩论，一直到晚上。

22 时以后，国防科委三次派人到业余航校来和"红旗"谈判，说可以让赵如璋见面澄清问题。但是，要他们同意北航"工人赤卫队"、"赤卫队"、"红卫兵"提出的"五项条件"，被"红旗"断然拒绝。

9 月 9 日下午，国防科委通知北航"红旗"晚上与赵如璋见面澄清问题。但是，北航"红旗"的代表与罗舜初一起在三座门中央军委

接待站从晚上 19 时 30 分等到第二天凌晨 2 时多，没有见到赵如璋。原来，赵如璋半路被北航“红卫兵”截走了。第二天清晨，他们又把赵如璋送回国防科委上班。

9 月 12 日，罗舜初和赵如璋终于与“红旗战斗队”代表见面。但是，谈了整整一个晚上，在“红卫兵”和“赤卫队”的人是否也参加澄清问题一事上翻来覆去，最终还是毫无结果。次日凌晨 2 时多，罗舜初和赵如璋与北航“红旗”会谈后，又接见了北航“红卫兵”和“赤卫队”的人。

北航“红旗”对国防科委领导非常失望，他们在北京各处张贴大字报，散发传单，陈述他们的想法。

9 月 13 日、14 日，国务院秘书长周荣鑫秘书长约见北航“红旗”，商量赵如璋和大家见面澄清问题的事情，并表示：“周总理很关心这件事情。”

9 月 15 日下午，毛泽东第三次接见红卫兵，周恩来在天安门城楼上催促罗舜初尽快解决北航“红旗”与赵如璋见面问题。

9 月 19 日，韩爱晶在“红楼座谈会”的发言给中央文革小组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座谈会结束后，刘志坚、张春桥等人当天就分别向林彪和陈伯达作了汇报。

这天，中央文革小组张春桥给聂荣臻的秘书打电话说：“北航有些学生对工作组有很多意见，已经拖了很长时间未能解决。伯达同志最近提议，这样拖下去不好，可以让工作组去听取意见，让少数派学生把意见说完，工作组要认真做自我批评。”

听了秘书的报告，聂荣臻指示罗舜初把情况详细准备一下，去向张春桥汇报，研究一下究竟如何办好？随后，他又给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打电话进行解释，并希望中央文革小组出面，劝学生们回校。

9 月 21 日，王力给聂荣臻的秘书打电话，转达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的意见："对北航问题，不管群众多少，找来了，领导上都要接见；对群众不要顶牛，顶牛最后总是没有好下场的。陈伯达同志下午约聂荣臻商谈北航问题。"

下午 15 时，聂荣臻约罗舜初一起到钓鱼台陈伯达处开会。

见面后，陈伯达坚持赵如璋要与"红旗战斗队"见面。对国防科委的担忧，陈伯达说："如果学生伤害赵如璋，我来偿命，我可以立下军令状。"说罢，他真的拿起笔写了张军令状。

罗舜初向陈伯达详细汇报了赵如璋 8 月 14 日、19 日两次检讨的情况，以及罗舜初 19 日在北航全院师生员工大会上代表国防科委党委常委做的检讨，介绍了 8 月 25 日以来北航两派学生的意见分歧以及国防科委在这些天所做的工作，并特别说明：早在 9 月 12 日，他就按照周恩来的指示，和赵如璋一起与"红旗"代表见面商讨如何单独澄清的问题。

听罢罗舜初的情况汇报，陈伯达将写好的那张军令状纸条撕了，继续和聂荣臻、罗舜初商讨解决问题的办法。陈伯达最后决定：赵如璋和"红旗战斗队"代表到全军文革接待站单独澄清问题，并由他去劝说"红旗战斗队"离开国防部南门。

当晚，北航韩爱晶在业余体校的小体育馆的门口听到门口值班室

有人说话，出于警觉，他走近传达室，看到有两个人面熟。再一看，竟然是他前两天在红楼刚认识的中央文革小组王力和关锋。他惊呆了，简直不敢相信，赶忙走过去拉住王力的手问：

“王力同志，你们怎么来了？”

王力看到韩爱晶，笑着转过脸，对一个岁数大的人说：

“这就是韩爱晶。”然后他又对韩爱晶说：“伯达同志来看望你们了。”

韩爱晶更不敢相信，站在他面前的这位穿普通制服的胖胖的干部就是中央政治局常委、文化革命小组组长陈伯达。他赶紧握着陈伯达的手，然后领他们走进小体育馆。

韩爱晶大声的对体育馆里的同学们宣布说：

“请大家静一静。红旗战士们，中央文革小组的组长陈伯达同志，还有文革小组的王力同志和关锋同志以及《红旗》杂志社的林杰同志看望大家来了！”

体育馆里的北航学生没有想到韩爱晶领进来的这几个陌生人竟是中央文革的领导，全场顿时响起热烈的掌声。

陈伯达和王力他们看看这个场面，互相低声地说着什么，好奇地四处观察。

陈伯达问大家：“你们要找工作组组长赵如璋澄清问题，你们主要有什么问题？说给我听听。”

北航“红旗”院勤务员何金国声音说：“工作组组长赵如璋把石兴国的大字报打成毒草，对持不同意见的学生打击压制，整黑材料，

把几百名学生定成了四类，还有几百名定成三类。他不但不很好的做检查，还坚持说是反干扰。他约我们见面来澄清问题，可是我们已经等了 28 天 28 夜了，他还没有和我们见面！”

还有的学生说：“我们又没有说要打倒他，只是要见面澄清问题。他们不相信群众，害怕群众，证明他们心里有鬼！”

陈伯达笑了。

有的同学讲：“我们要向中央反映情况，要求中央首长支持我们！”

陈伯达说：“我们来了，不就是一种表示吗？”

王力说：“伯达同志来看望大家，就是表示。”

陈伯达说：“我是代表中央文革小组来看看你们。……你们是少数，少数是优秀的，真理有时往往在少数人手里。我们来就表示一种态度，你们懂吗？”

左起：陈伯达、王力、关锋，右侧站着韩爱晶，后面吹哨子的屠

9 月 22 日，在全军文革接待站，罗舜初和赵如璋再次单独与北航“红旗”澄清问题。

而在全军文革接待站大门外，闻风而来的北航“红卫兵”和“赤卫队”也要求参加澄清会议。国防科委赶紧派出工作人员劝说他们回去，并恳切地要求北航筹委会不要让其他战斗队的同学到会，北航“红卫兵”和“赤卫队”对国防科委突然改变做法很有意见，大有被出卖了的感觉。

在全军文革接待站里，“红旗战斗队”和国防科委分歧不断，仅会议应由谁主持，双方就争论了两个多小时，直到接到全军文革的指示，由“红旗战斗队”主持会议，这一争论才告结束。

北航“红旗战斗队”拿出他们事先准备好的一张“赵如璋的书面保证”，要赵如璋签字。看到“保证书”上有“随叫随到”的字样，赵如璋说：“我是军人，不经批准，怎么能保证随叫随到呢?”

为此，双方又纠缠了整整一个晚上。

据林彪秘书张云生回忆，就在 9 月 22 日这天晚上，叶群从钓鱼台回到毛家湾，一进门，就从皮包里拿出一张纸放到桌子上说：

“你们看看，这是老夫子的指示。”

秘书们过来一看，纸上写着：“以普通劳动者的态度，同北航学生们聚谈或同住几天，科委的干部（包括罗舜初、赵如璋）如果被学生杀死或杀伤，陈伯达情愿抵偿。”

落款是陈伯达的亲笔签名。纸条的下角还有一行字：“关锋记录

9 月 22 日晚 10 点”。

叶群得意地说：“我去找老夫子，他开始还不愿管。我说不管不行。你要不管，学生饿死了，你负责！老夫子架不住我将军，这才写了几个字。这上边，是老夫子的亲笔字。下边几个字是关锋替老夫子写的。”

叶群收起那张纸，找林彪去了。

林彪同意赵如璋与学生见面，并说：“赵如璋不出去，派一排人把他押出去!”

此时，赵如璋正在三座门和“北航红旗”的同学纠缠。

第二天，9 月 23 日，赵如璋依然拒绝在保证书上签字，一直到这天的下午 13 时，刘志坚得知情况后，通知国防科委：“赵如璋可以签字。”9 月 23 日下午 17 时，赵如璋终于在保证书上签了字。前后持续了 42 个小时的谈判终于结束，“北航红旗”最终胜利了。

当晚，赵如璋来到业余航校小体育館，与北航“红旗”见面，与学生们一起学习，一起念《毛主席语录》，唱《国际歌》，看大家写大字报，写大标语。有的同学对他说：“你现在来到我们中间了，我们也没有人动你一个指头啊！你好好学习学习毛主席的指示。”

从此，北航“红旗战斗队”一举成名，当时，《解放军报》社一位记者宋立彤曾到业余体校，他写诗赞曰：

北航旗如血，

风雨满京城。

二十八昼夜，

牛鬼吓断魂。

## 第 226 回：抢器材，地院发生大武斗　众领导，表态支持“东方红”

9 月 23 日，北京地质学院发生了争占学院广播台事件。

在此之前，国务院秘书长周荣鑫曾多次到地质学院做工作，要求地质学院保工作队的“斗批改兵团”和院文化革命委员会，交出工作队搞的“黑材料”当众销毁，并退还本人写的检查，与反工作队的“东方红”联合团结，搞好斗批改。对地院的广播台，他也与两派达成协议，由“东方红”和“斗批改兵团”轮流使用。但他走后才几天，9月23日，“东方红”要召开批判工作队的大会，需要使用广播台，“斗批改兵团”却违反协议，拒绝“东方红”进入和使用院广播台。“东方红”头头朱成昭当机立断，决定夺取广播台。他们当即发表声明，不承认院文革委员会对学校文革运动的领导权，宣布其未按巴黎公社原则民主选举产生，而是由工作队一手操控建立的，因而是违反《十六条》，是不合法的，应于解散。接着，他们查封了院文革委员会的办公室，并组织队伍前去接管学校广播台。

“东方红”的行动遭到了院文革的强力阻挠，学院的工人“赤卫队”和“斗批改兵团”红卫兵迅速赶来与接管广播台的“东方红”红卫兵进行争夺，双方发生了你推我拉的严重肢体冲突和抓伤、撕破衣服的现象，当场有170多人被打伤，“东方红”二号头头王大宾还亲自爬到电线杆上摘掉广播的大喇叭。就这样，局面僵持近10个小时。

这是北京高校中两派群众首次发生武斗，此时负责北京市委工作的吴德十万火急报告周恩来。周恩来将北京市委书记吴德、丁国钰和北京军区副司令员、“首都工作组”办公室主任郑维山叫来询问情况，

并让他们3人去做地院两派的工作，要文斗不要武斗。他还指示郑维山从北京军区派一支徒手部队去地院把纠缠在一起的双方分开，避免武斗激化，并让地质部副部长、原地院工作队队长邹家尤和他们一起去，由邹家尤做“斗批改兵团”和院文化革命委员会的工作，吴德他们做“东方红”这一派的工作。

吴德他们到地质学院后找两派的头头来谈。但两派的头头都没有来，只让他们的副手过来。吴德他们让两派罢兵，但双方各执己见，根本不听吴德他们的。

晚上，有人给吴德送来一张条子，说中央文革派关锋、戚本禹作为中央文革的观察员前来协调解决问题。

此时，关锋、戚本禹已经在地院与“红卫兵”和“斗批改兵团”的人谈判。

关锋劝说“斗批改兵团”：“希望你们参加今天的会，批判斗争邹家尤。邹家尤是不是方向路线的错误呢？要好好想一想。如果邹家尤是革命的话，就该这样做，谁有意见他就去听。还会打死他吗？不会的，我们应和同学睡在一起，吃在一起，有什么就说什么嘛。”

戚本禹：“错了就改嘛。”

关锋：“对！邹家尤一定要来的，不来是不对的。允许对邹家尤有各种不同的看法，允许说邹家尤是好的，也允许说邹家尤是坏的，你们若是认为不需要批判或者现在不用批判了，就不批判算了。但你们不能妨碍他们批判。邹家尤不到地质部去听取意见，这是不对的，是错误的。一个共产党员为什么要怕学生呢？听听有什么要紧，听听

不就没有这些事了吗？一斗、二批、三改，不批判右倾机会主义，就不能完成一斗、二批、三改。当然，这里的情况我知道的也不多，但这点是肯定的，邹家尤应该和他们见面，至少他没有把他们的话听完。就算是错误的话，也要听完嘛。”

戚本禹对地院“红卫兵”说：“你们看，是否把扩音器安一下？你们负责安好，用完你们收回去。”

“红卫兵”代表说：“我们让他们打个借条吧！他们自己安，他们自己也是这么说的。”

戚本禹：“大家都在这儿，你们安，你们收，还要什么借条？”

“红卫兵”代表：“我们让他们打个借条吧！”

戚本禹：“你们有困难，我们不勉强，就算了。”

关锋：“没有扩音器也一样开嘛。我们过去打游击也没有扩音器嘛。”

戚本禹问：“你们的‘红卫兵’是否也参加批判邹家尤？”

“红卫兵”代表：“我们可能参加，因为今天早上9点钟直到现在还都在紧张地斗争。已经很迟了……。”

戚本禹：“你们要是怕累就不参加好了。人家也是战斗了一整天，人家不累吗？干革命就不能怕累嘛！我们相信你们大多数还是好的。你们看是否去广播一下，让大家都来参加，实在不愿意来就算了，你们现在去把喇叭装一下，大家的财产要大家用嘛。”

关锋：“大家的财产是为大家服务嘛！”

戚本禹：“对，为人民服务嘛！”

“红卫兵”：“我们要说清楚，他们已经抢了很多广播器材……”

戚本禹：“大家的东西嘛，怎么能算抢呢？他们又不是外来的强盗，怎么叫抢呢？大家的东西嘛。广播器材是你的吗？”

“红卫兵”：“当然不是我的。”

与关锋、戚本禹同来的一人说：“你们去安一安吧，这个会是中央文革主持的，是他们叫你们安的。”

“红卫兵”：“我们安、我们拆，我们保管，是不是这样？大家都在这里，‘东方红’的领导人也在这里，大家都听了，我们安、我们拆，我们保管。”

戚本禹：“你们管，新的文革成立以后，归新的文革。但是今后器材要为两方面服务，既广播你们的，也广播‘东方红’的，不就没事了吧？”

关锋：“邹家尤不到地质部去和同学见面是不对的，他们到地质部去是正确的，他要是见了他们，就不用等十几天了。”

戚本禹问：“你们的文革委员会为什么不来见我们？我们是中央文革小组的，你们是不是不欢迎我们中央文革小组的同志？你们要是实在不愿意和我们见面也就算了。”

“红卫兵”：“我们不是院文革的，我转达一下吧！”

关锋：“我们是陈伯达同志派来的，你们的院文革为什么不来见我们？我是给院文革写的条子，为什么他们不来见我们？陈伯达同志的批示你们广播了吗？”

“红卫兵”：“我们没有见到这个批示，若是有，我们一定广播。”

戚本禹："刚才不是有很多同学抄了吗？让抄了的拿出来让他们抄一下。"

"东方红"的同学递出批示的抄本，"红卫兵"代表抄了一份。批示全文是：

兹派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关锋、戚本禹同志到地质学院做观察员。

陈伯达

九月二十三日

戚本禹对"红卫兵"代表说："你们两个，一个负责安喇叭，一个和院文革转达一下，我们请求见他们。"

"红卫兵"代表出去后，过了一会儿，一位北航"红旗"的同学进来找关锋，关锋问他们："你们学院原工作队长赵如璋接见你们没有？"并说："赵如璋同志如果不接见你们是不对的。"

北航"红旗"的同学汇报了赵如璋不同意在"保证书"上签字的情况。另一位北航同学对关锋说："我和北航'红旗'的意见不同。"这时，一位北航"红旗"的同学呵斥道："资产阶级的狗崽子滚蛋！"

关锋马上批评说："不要这样，让他把话说完，出身不好也可以把话说完嘛！"

紧接着，关锋问那位和北航"红旗"意见不同的同学："赵如璋为什么不签名呢？为什么十几天不见面呢？"

那位北航同学说："我认为对待一个军人，这样不对。"

关锋："我认为是对的，要坚持大方向嘛，你们回去想一想。"

那位北航同学说："反正我们有点想不通。"

戚本禹："你们想不通是可以理解的，不过要带着这个问题去学习毛主席著作。我们讲的这些话主席早就讲过，主席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里讲得很清楚，这是对待群众的态度吗？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是不怕群众的。"

关锋："别说 100 个，就是 10 个群众让他去，他也应该去。他是工作队长，整了同学嘛。"

这时，地院两派都接受了关锋、戚本禹的意见，达成协议，双方各自的队伍都撤出了广播台。

问题解决了，戚本禹派人给吴德送来纸条，叫吴德他们过去谈。

吴德对送条子的人说："不知道戚本禹在哪里？"

送条子的人便领着吴德找到了戚本禹。戚本禹听了吴德介绍的情况后说："你们要支持'东方红'，他们是左派，中央文革小组支持他们。"他征求吴德的意见："是否可以这样，'东方红'今晚有个大会，你代表市委主持'东方红'今晚的大会，把那个姓邹的地质部副部长交给他们批斗一下就回去，他们只批斗半个小时。"

吴德看问题解决了，就叫丁国钰先回去，郑维山也借口走了。吴德留下参加"东方红"的大会。

关锋让吴德先说几句，主持会议，然后批斗一下邹家尤，最后由关锋宣布中央文革小组的意见。

但是"东方红"的头头朱成昭不同意由吴德主持会议，戚本禹将他拉到一边，做了做工作。最后，戚本禹对吴德说："还是由你来主

持。”

24日凌晨，关锋、戚本禹、吴德召开地院全院师生大会。关锋身穿军装在台上讲话，对地院“东方红”表示了坚决的支持。

他说：“今天让同志们等了好多时间，对不起你们，向你们道歉。”

“在大革命时期不应该讲长话，应该讲短话。我和戚本禹同志拟了几条意见，对最近‘东方红公社’的同志的行动表示我们的态度。下面我就照本宣读。

第一条：我们支持你们的要求，邹家尤应当到少数派学生那里去检查，不管有多少学生，都应该随叫随到，这是中央撤销工作组时早已说清楚了的。

第二条：我们支持你们的要求，事情发展到今天的地步，何长工应负责任，也应该去检讨。

第三条：多数派同学，既然你们对工作组没有意见，或者已经没有意见了，你们应当欢迎和支援少数派同学要求邹家尤检查的行动，你们不应当阻挠他们的行动，如果你们采取阻挠的行动，是不对的，是不符合中央指示的精神的。

第四条：我们同意你们的意见，少数派同学到地质部机关去要求邹家尤检查的行动是不能说是错误的，是对的！”

他表示：“这四条意见可以赞成，也可以反对，可以写小字报，也可以写大字报，我们都欢迎。”并且说：“你们既有不同的意见，坐下来好好讨论，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把工作组路线错误，方向错误彻底搞清楚，在《十六条》基础上，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

团结起来！”

台下“东方红”狂热鼓掌。

接着，邹家尤做检查，表示愿意听取师生们的揭发，随叫随到。

吴德也发表了支持“东方红”的讲话，他说：

“我代表我们市委完全拥护关锋、戚本禹同志的意见。

‘东方红’同志们的要求是对的，我们支持你们的行动。你们学院里边还有不同意见，希望你们通过讨论逐渐取得一致。对于特别是‘东方红’的同志，对于‘红卫兵’、‘赤卫队’的同志，我们不要给他们戴上保皇派的帽子，我相信他们大多数同志是革命的。有些问题的看法不一定对或者是不对的，这也是认识上的问题。所以特别要求我们‘东方红’的同志主动地团结他们，团结大多数。因为彼此都是为一个目标而奋斗的，应该很好地商量，摆事实、讲道理，要文斗，不要武斗，在《十六条》的基础上，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很好地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我们两方面很好地团结起来，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其次，谈一谈我们市委在前一阶段文化大革命里边是犯了方向和路线的错误的，所以，这种路线错误的责任主要应该由市委来负，当然工作组他们也有他们的责任。他们应该进行检讨，一次检讨不好就再次检讨，检讨到真正把路线问题弄清楚为止。

邹家尤同志今天只是表示一个态度，以后还应该继续开会，进行系统地检讨。以后同学们要他什么时候来检讨，他就应该什么时候来检讨；要他在什么范围内检讨，他就应该在什么范围内检讨。

最后提个建议，今天关锋、戚本禹同志的意见，希望‘红卫兵’同志也要很好地进行一次讨论，也希望‘东方红’的同志很好地讨论一下。

刚才关锋同志讲文化大革命期间要讲短话，开短会，现在时间不早了，现在就按关锋同志的意见，今天开个短会，会就开到这里。”

参加这次大会的还有北航、成都地院来此串联的师生。

会后，邹家尤被送回地质部。

会后，地院“斗批改兵团”瓦解，成员纷纷加入“东方红”。

次日，北航“红旗”、北外“红旗大队”、清华“井冈山”等学校也纷纷效法地院“东方红”，夺取了学校广播站。

## 第 227 回：说海军，北京遣返黑五类
## 搞反击，湖南动员“抓黑鬼”

我们再看此时部队的情况。海军党委扩大会议结束后，各级领导急匆匆地各返其位，去迎接这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而迅猛发展的形势，也打乱了海军原先预定的部署，各级领导都陷入了极端被动的地步，无法控制局面。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几乎都是群众自发搞起来的，仅海军大院就给海军党委 10 个常委贴了 2000 多张大字报，其中有一半是批评政治部主任张秀川的。这个情况反映到林彪那里，于是，9 月 22 日、23 日，林彪两次到海军机关看大字报，了解海军开展“四大”的情况，并视察了海军司令部、海军政治部等单位。

在视察海军政治部时，林彪说：“全军只有‘一个半’好政治部，除空军政治部算‘半个’，海军政治部则算‘一个’。”

在海军党委常委会议上，林彪说：“希望你们原班人马都在海军工作，我们没有把你们哪一个人调出海军，你们要把谁排挤出去，我们也不赞成。”

他还说：“全国都在学习解放军，我们一定要做模范，做好样子。要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用毛泽东思想武装全体指战员的头脑，使我军彻底革命化，使我军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事业中发挥更大的作

用。”

林彪又针对海军工作说：“是非既然已经搞清楚，应该团结起来，全力以赴，做好工作。”

9 月 24 日，海军党委做出《关于贯彻执行林副主席对海军党委指示的决议》。

林彪肯定了海军政治部的工作，从此，攻击张秀川的大字报几乎就没有了。

为了建设一个红彤彤的新世界，北京的中学红卫兵又于 8 月下旬发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遣返运动”，就是将“黑五类”，即“地、富、反、坏”以及历史上有重大问题的人驱赶出北京市。这原来是“首都工作组”为了加强首都安全准备实施的一项计划，此时由中学红卫兵出面执行。

张欣的父亲是北京新华印刷厂的工程师，由于参加过张学良领导的东北军，任少校教官，遭到红卫兵的批斗。他在工厂被关了近一个月。9 月的一天，父亲突然在 3 个年轻红卫兵的押送下，回到家里。红卫兵向张欣全家宣布：“3 天之内，全家滚出北京！”

“3 天？”全家人都呆住了。张欣的哥哥问：“怎么，我们子弟也走吗？”

“对！”红卫兵厉声对她哥哥喝道：“全家都滚蛋！一个不剩！”

张欣的哥哥不服，去北京市委群众接待站上访。市委接

待站聚集着一大批遣返对象的子女，他们中有些人还佩戴着红卫兵的袖章。这些子女异口同声说他们已同反动家庭划清了界限，正在积极投身“文化大革命”。若将他们一起遣返，这不是把他们往反动阵营里推吗？接待站的人一听有道理，立即向市委做了汇报。第二天接待站就告诉他们：“政治表现好并且经济上能够独立的‘黑五类’子女可以留京。”

张欣由于年龄小，当时只有 12 岁，经济上不能独立，只好随父亲一块离开了京城。但是，这些年轻的红卫兵并不知道应该将这些“黑五类”送往何方，他们只是见别的单位在遣送“黑五类”，生怕自己落后于形势，便匆匆地订下了驱赶“黑五类”的时间表。不过红卫兵有一点是明确的，那就是要把他们送到乡下去，所以红卫兵命令他们少带东西，只带几个铺盖卷、几双碗筷就行了。

张欣父母按照红卫兵的要求，处理了所有的东西，每人做了一身黑棉衣。

9 月 17 日，一辆吉普车开到了张欣家门口。在一阵“四类分子滚蛋了！”的喊声中，他们一家在红卫兵的监督下，战战兢兢地爬上了吉普车。

吉普车开到了北京火车站，他们一看，吓了一跳：满广场都是穿着旧军服、腰扎武装带、手里拿着皮带、木棍的红卫兵。广场中间有一条窄窄的通道，穿着黑棉袄、黑棉裤的“黑五类”扶老携幼在这条通道里慢慢蠕动着。红卫兵们不

时抡起皮带、拳头朝“黑五类”砸去，“黑五类”躲得了这边，躲不了那边，一副悲惨相。

看到这情景，张欣父母想往后退，但押送的红卫兵不答应。说早晚得过这一关，而且火车很快就要进站了。没办法，他们只好硬着头皮往前走。还好，连走 30 多米都没挨着皮带，红卫兵站在两旁只是讥笑他们 3 个人穿的又肥又大的黑棉衣。由于时间紧，母亲只用大针缝缝就给她们爷俩穿上了，所以棉衣很不合体。她父亲的棉衣一边长一边短，袖子还掉了下来；张欣的棉衣又肥又大，引得红卫兵们一阵大笑。

快到进站口时，情况有点不妙。他们前边的一对老夫妻被红卫兵截住了。红卫兵开始搜他们的身，当搜到那老妇人时，老妇人有些慌乱。红卫兵立刻警觉起来，挨个口袋翻查老妇人的衣服。突然，一个女学生翻出了一叠钞票。她立刻变了脸，吼道：“谁让你藏现金的？没看见我们的布告吗？‘黑五类’不能带任何贵重物品上车。你为什么违反规定？”

这时那“黑五类”老头扭过脸说：“这都是我们这几个月的工资，到乡下要花钱的。”

“好啊，你敢顶撞我们？！”那女学生立刻朝老头举起了皮带，只听“啪”的一声响，金属皮带环打在老头眼眶上，顿见鲜血。老妇人想去扶老伴，但被几个红卫兵死死拉住。“打！”只听一声喊叫，十几个红卫兵一齐朝老头扑来，老

头很快就倒下了。

那老太婆已经吓傻了，呆呆地不知该怎么办。一个女学生大喝一声："滚！"这老太婆才一拐一拐地朝前挪动。但没走几步，不知哪个学生喊了一声："这是地主婆！"于是老妇人遭到了四面八方唾沫的袭击。

厄运终于也落到张欣一家头上。她父亲由于走的快了一些，学生们立即截住了他，一阵拳打脚踢。只是由于父亲嘴里不停地喊："我有罪！我有罪！"红卫兵才放过了他。接着是她母亲，由于红卫兵从她身上搜出了 100 元钱，几个女红卫兵扯着她的头发，要不是广场上突然响起了红卫兵指挥部的紧急广播，后果不堪设想。

戚本禹后来回忆说："在一次毛主席参加的中央会议上，叶剑英还向主席汇报了把一批人驱赶出北京的事。当时主席对这种做法是有疑问的，主席认为只要这些人没有现行的破坏活动，那就应该就地发动群众对他们进行监督，而不是把他们简单地赶走。主席说，你把他们都赶到农村去，那叫农村怎么办啊？"

周恩来为此告诫中学红卫兵，不要"把污水泼到乡下去"，"'黑五类'分子应该也能够就地得到改造。"9 月 25 日晚 22 时，周恩来在中南海国务院接见北京"三司"主要负责人和外地来京的代表时，有人递条子，建议中央把"黑五类"子女全部赶出北京，周恩来念完条子后说："有人提

出要轰黑五类子女走，这当然不能同意。”

很快，9 月下旬，北京和其它城市的“遣返”运动基本停止。短短十几天时间，仅北京就有近 9 万人被轰回原籍。

中央政策既然明了，这些被红卫兵驱逐的牛鬼蛇神，后来大多数又返回了城市。

面对群众对各级党委的冲击，能够像黑龙江潘复生和河南刘建勋那样正确理解《十六条》的太少了，很多省委不知如何是好。从“江西省委给中央并主席的报告”中，就可以看出他们当时的心态：

“现在广大工农兵革命干部中已有较强烈的反映，他们说：‘难道中央和　　毛主席光要知识分子了？’目前所造成的一些现象，促成了他们的这种看法。

……目前的作法，都是把广大工农兵丢在一边，只相信学生，所有学生都是　革命的，各级党委书记都成了革命对象，并且还得支持他们，稍一怠慢就是反革命或保皇派，就要一律打倒。这样一来，工农兵为主体这句话就成了空话……上述的一些作法，翻遍主席的所有著作也找不到，我们深感到，假如这样继续下去，不仅会影响运动正常进展，也大大影响了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威信。现在广大工农兵和革命干部看到一些学生不讲道理，敌视、围攻我们的情景，流下了眼泪，怀疑党是否有这样的政策。”

在中宣部担任了两个多月常务副部长，刚从毛泽东身边回到湖南的张平化，其实也不清楚这场文化大革命究竟应该如何进行，特别是不知道应该打倒什么人又应该依靠什么人。但是，湖南的老人都知道，张平化有一看家本领叫“不带头”，即每临大事均先打探左邻右舍的态度，特别是注意王任重的动向，故湖南省委私下里被戏称湖南省委为湖北省委的“分省委”。

9 月初，张平化又派省委书记处书记华国锋进京找陶铸、王任重汇报工作。华国锋返湘后误传中央有组织反击的意向。张平化闻之来了精神，他沿袭过去，特别是反右和“四清”的经验，决定对“向党进攻的阶级敌人进行反击”。

9 月 15 日，湖南省委发出通知，要求各级领导“必须以党和人民的事业为重，要坚守岗位，坚持党的正确领导；要挺起腰杆，挑起担子，把各项工作做好。”

湘潭市委副书记、湘潭电机厂党委书记程贞茂闻风而动，抓出支持造反的“大黑鬼”、厂党委宣传部长兰云飞。数日之内，电机厂的做法就上升为“经验”。9 月 20 日，省直机关举行干部大会，由程贞茂介绍湘潭电机厂的情况；张平化、王延春做总结发言，认为长沙“819 事件”是“坏事变成好事”，“牛鬼蛇神暴露出来了”，明确提出要反击。

林彪在第三次接见红卫兵的讲话中有这样一句话：“很明显，一小撮反动资产阶级分子，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

坏、右五类分子和我们不同，他们企图炮打我们无产阶级革命的司令部，我们能容许他们这样干吗？”这篇讲话，是经毛泽东审阅过的。然而，这句话使各地党委和保党委的势力跟着北京的老红卫兵们喊出了“只许左派造反，不许右派翻天”的口号。

9 月 24 日，湖南省委在省委小礼堂接见湖南高校部分师生代表，张平化向大家介绍了参加接见的省委领导王延春、龙书金、章伯森、苏纲等人，以及各市委、地委负责人和长沙新市委书记孙云英等人。会上，张平化就当前运动形势及今后任务发表讲话，他根据自己所理解的林彪讲话精神，认为形势已经发生变化，应该是进行反击的时候了，各级党组织要反击趁文化革命之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反革命，坏分子。会后，湖南省委将张平化的这次讲话录音，作为报告发给全省各单位播放，指导全省的抓“新右派”、“黑鬼”的运动，这就是后来著名的“抓黑鬼”动员报告。

张平化说：“前段是引蛇出洞，现在蛇已出洞，是打蛇的时候了！”“当前要集中力量打击一小撮资产阶级右派分子。”

省委第二书记王延春就如何抓“右派”作了仔细的部署：

一、放手发动群众，集中力量，打击“右派”分子；

二、开展大辩论，从政治思想上把敌人压倒；

三、分清主次，分清前台后台，先抓主要的，先抓后台的；

四、这个运动搞三个月；

五、大中学校主要是把矛头对准本单位。

还说："有多少右派，就抓多少，不受框框限制。"

在此前后，王延春曾说过："原来说，对文化大革命运动不理解，现在理解了，就是要抓呀！文化大革命，原来是这样搞的。"

号令一出，烽烟四起。各级党委闻风而动，他们隐忍多时，终于庆幸自己没有被前段"造反"的热潮弄昏头，一句"引蛇出洞"使他们似乎一下子明白了前段为什么会出现那局面。其实，早在接到湖南省委指示之前，各级党委依据以往的阶级斗争经验判断：现在的斗争形势同 1957 年相比，如出一辙；现在的斗争策略同反右时相比，大同小异。"阳谋"也好、"阴谋"也好、"引蛇出洞"也好，没说的，按省委的指示办！事实上，许多人一直就在等着这一天。因此，省委抓"黑鬼"的动员令一经下达，各地雷厉风行。早已对"敌情"了如指掌的各级党委，轻车熟路，胸有成竹地执行省委指示，在本单位大抓起"右派"来，三湘四水间，迅速掀起一股抓"黑鬼"、抓"右派"的高潮。

因《十六条》明文保护学生，所以"抓黑鬼"运动主要是在工人，干部及非学生市民中进行。

“黑鬼”一抓一个准。很多在文革中有所参与的五类分子都受到打击，有的被单位关押，有的被关进看守所。前一段支持造反派学生的活跃工人都被打成“黑鬼”，被单位关押、批斗。张平化“924 报告”尚余音绕梁，各地便纷纷告捷。省会长沙更是战果辉煌，与《奔命记》有关诸人无一漏网：王俊杰、梁俊杰、向治铨失去自由，邓守宇、王建武分别于 9 月 26 日和 27 日自杀。后来成为“湘江风雷”头头的李敬林、罗新发，“东方红”总部头头的熊正吾，日后湖南“工联”负责人之一的张学晃、吴国香以及平反后退出运动的曙光电子管厂厂医王振华等均为名噪一时、身陷人民战争汪洋大海的大“黑鬼”。

每一个单位都有人表示过对湖南大学红卫兵的支持或同情，因而每一个单位都有“右派”可抓。加上前段批“三家村”时所“抓”定的“小邓拓”“小三家村”一类的名单中的部分人，“右派”数目迅速膨胀。成千上万的“右派”、“黑鬼”被各自所在的单位揪出来了，或被批判，或责令写检讨，以决定如何最后处置，或被企业机关等单位非法禁闭“停职反省”，甚至有的很快被投入监狱。

比较难办的是令省委颇为头痛的谢若冰，因为是学生，停课闹革命搞造反乃天经地义，“924 报告”对其鞭长莫及。但谢若冰出身干部家庭，父亲谢介眉为省政协副秘书长、母亲谢巧瑜为省妇联副主席，均符合充任《十六条》中所说“这

次运动的重点”的条件。在当时环境下，欲搞臭谢若冰，进而打击湖南“造反有理军”、平息造反风潮，对其父母下手是最便捷的办法，因此祸水被有意识地引进了谢家。二谢解放前长期在白区从事地下工作，历史问题还用找吗？而解放后湖南党内占主导地位的南下干部与地下党关系一直不融洽，二人的现实问题也不难找。于是大把辫子被“革命群众”揪住，而且“问题”迅速升级、升温，档案材料也不胫而走，流入社会。加之“红色政权保卫军”的火上加油、多次揪斗，两位冷衙门的副厅级闲官，遂成了尽人皆知的大“黑帮”。当时正值宣扬“血统论”的谭力夫讲话走红全国之时，背负“黑帮子女”的帽子和“保爹、保妈”、“拒绝与反动家庭划清界限”罪名的谢若冰，在“造反有理军”内外均面临巨大压力，遂退出“造反有理军”。

其实，谢若冰并不常在“造反有理军”，作为社会知名人士，她在学生中大受欢迎!各校红卫兵、学生都请她们去串连、传经。9月24日前后，谢若冰正在中南矿冶学院，她是被该院的学生造反派詹先礼等人请来的,并提供食宿，安排她们住在较偏僻的学生九舍。张平化“924抓黑鬼”讲话后,谢若冰面对各方面的压力越来越大，詹先礼等人有些害怕了,找人劝谢若冰她们离开矿冶学院。谢若冰一行8人离开矿冶学院回到河东。

然而，面对雪片般飞来的抓“黑鬼”捷报，张平化怎么也高兴不起来。他不无惶惑，作为在“50多天”里走马上任的中宣部常务副部长，他知道刘邓的工作组在那50天里都干了些什么；作为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参加者，他清楚工作组的所作所为与《炮打司令部》的关系。眼见因造反而被抓的“黑鬼”与日俱增，他不会想不到“某些领导同志……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思虑再三，他决定刹车。

9月28日，张平化又抛出一个报告，声称“924”后心中颇感不安，吞吞吐吐、遮遮掩掩地要求停抓“黑鬼”。然而，秋后算账正在兴头上的各级官僚启肯就此罢休？“928报告”成了一纸空文，无人理会。

在那充满肃杀气氛的日子里，大学的红卫兵虽然没被划入斗争批判的“右派”行列，但造反派学生没有忘记他们的支持者。这些在文革爆发前才从社教前线回来的大学生，对共产党的“扎根串联”、“访贫问苦”老传统十分在行，许多大学生冒着极大的风险，深入工厂、机关、街道和农村调查研究，耳闻目睹了新一轮“红色恐怖”的威势和残酷。他们很快就把“黑鬼”们的血泪控诉和自己的所见所闻诉诸文字，写成调查报告，张贴大字报，印发传单，贴遍长沙的大

街小巷。并开动宣称广播车，发动游行大示威。湖南省委陷入十分被动的局面。

与此同时，学生们组织工人上京告状，向中央反映湖南抓“黑鬼”的情况，甚至弄到了“924”报告的录音，送往中央文革小组。一些工厂、机关被划入“右派”黑名单的工人、干部，在大学生的帮助下，也冒着被抓捕的危险，一批批溜进北京，将一叠叠申诉材料送到了中央文革接待站，等待着中央的表态。

等待的过程是漫长的，痛苦的……

## 第228回：定政策，个体劳动要存在
## 王容芬，反文革上书中央

在破“四旧”中，红卫兵提出的取消资本家定息和居民存款利息、把集体所有制转为全民所有制，否定个体劳动者的合法存在等等建议，周恩来指示李先念研究一个意见。李先念先后几次召集谷牧等有关负责人员开会讨论，于9月15日提出了9条解决办法，以国务院财贸办和国家经委《关于财政贸易和手工业方面若干政策的报告》形式，呈送周恩来。

第二天，9月16日，周恩来批示：“即送中央文革小组，约先念同志一议，然后再提请中央政治局讨论。”

9月20日，周恩来给江青的信中说：“文化革命中有关经济政策方面，农业和工业方面、科研两个通知发出后，对生产很有利。财贸和手工业一个通知修改稿，已送文革小组几天，务请陈伯达同志抓一下，以便议后再提请中央政治局讨论。”

这个报告经过几次讨论，中共中央于9月24日作为试行草案以中发［66］508号文件转发全国。文件明确指出：关于取消定息要“由国务院提请全国人大或人大常委会讨论后实行”；“继续执行存款自愿，取款自由的原则，利息照付”；公债“应按原定办法还本付息”；“出口商品，包括工艺美术品，在商标、图案、造型等方面，一般的目前暂不变动”；“集体所有制的手工业合作组织，目前一般不要改

变”；“独立劳动者及家庭服务人员应允许继续存在”。

9 月 24 日，北京外国语学院东欧语系德语专业四年级一班的 19 岁的学生王容芬上书毛泽东：

尊敬的毛泽东主席:

请您以一个共产党员的名义想一想：您在干什么？

请您以党的名义想一想：眼前发生的一切意味着什么？

请您以中国人民的名义想一想：您将把中国引向何处去？

文化大革命不是一场群众运动，是一个人在用枪杆子运动群众。

我郑重声明：从即日起退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致

礼!

北京外国语学院东欧语系

德语专业四年级一班学生

王容芬

1966 年 9 月 24 日

王容芬是一个才女，在她 10 岁的时候，就以语文、算

术两门课 200 分的成绩考进了北京 101 中学。

她参加了毛泽东 8 月 18 日在天安门广场首次接见红卫兵。但是，和其他与会者的感觉截然不同，这次大会不仅没有让这个才女感到亢奋，反而几乎断送了她的性命。

王容芬是学德文的，她曾听过希特勒的讲话录音。在“818”那天的天安门广场上，她听了林彪的讲话，不知是因为口音的关系还是什么，她总觉得林彪的讲话和当年的希特勒简直没什么区别。从天安门广场回来，王容芬觉得心沉得很……“这个国家完了！这世界太脏，不能再活下去。”“不忍了，豁出去了，把想说的话说出来！”那几天，她脑子里什么都装不进，就这么几句话绕来绕去，终于在一个多月后，鬼使神差的开始动手给中共中央、共青团中央、团校，还有毛泽东本人写这封信。

信写好后，王容芬十分郑重地走到天安门广场，她认为非常神圣的地方，向烈士纪念碑行注目礼，然后走进棋盘街邮局，买了邮票，贴上，发出……

接着，她又来到王府井药店，买了 4 瓶敌敌畏，把一封同样内容用德文写的信带在身上，出发向东，到了苏联大使馆附近，看好距离，就开始一瓶一瓶喝的敌敌畏。她当时的想法是：“他们会第一个发现尸体，然后，我以死来反抗‘文化大革命’的事会传遍全世界。”她看见了苏联大使馆窗口有人，好像还听见里边的说笑，接着就什么都不知道了。当

她醒来的时候，已经躺在公安医院里了。

王容芬刚醒过来就有人过来审讯。王容芬把输液的管子拔掉，把瓶子摔在地下，她已报着必死的决心。

在公安医院躺了 3 天，王容芬被带到了北京功德林监狱，收进一号监房，直至文革结束，去了德国。

9月25日，叶剑英、戚本禹、谢镗忠接见在北京的13个艺术学校、团体的50多名少数派代表。

叶剑英在讲话中对派工作组一事做了检讨，他说：“我们的工作做得不好，军队派到各艺术院校去的一些工作组在运动中犯了方向错误、路线错误。据我了解，错误最严重的是中央音乐学院，其次是电影学院、戏剧学院。他们不去斗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是去‘肃清外围’，组织学生斗学生；不是文斗而是武斗，就是打。这种行为，不仅违反了红军的光荣传统，而且也丧失了解放军的荣誉。我狠狠地批评了他们。现在他们正在集中检查，以后再回到各院校向你们检讨，承认错误。

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树立了不朽的功勋。例如，北京市有一万多黑户，深宅大院，解放十六年，谁都没有进去过，一些坏人就是在里头搞鬼，公安局，司法人员没有足够的证据也不能抓。有个圣修小学，是外国鬼子在我们中国搞了多少年的，谁也不敢动它。红卫兵小将管你什么法律不法律，一扫而光。多少年的老大难问题，红卫兵解决了。有

些极反动的家伙，十多年来天天骂我们的党和毛主席，左邻右舍都知道，恨死他们了。但谁都不敢动他，这一回小将们就把他揍死了。可能违反一点政策，可是更大的利益是扫除了坏人，扫除了我们社会上的垃圾。

在前一段也出了一点毛病，如打人、打死人。有些青年，特别是一些中学生，对于经济很有兴趣，这是极端危险的事情啊！在抄家时，有的把金条装起来了，半导体收音机在他屁股后头挂起来了。那次在天安门开大会时，就拾到一些金条。你不服我，我也不服你，形成一个长期对峙的局面，搞成两个国家一样，那就不对了。”

叶剑英在接见时还说：“最近时期，我们党内还有一个很值得庆贺的大喜事，就是毛主席选定了他自己的第一个接班人。主席选了几十年了，究竟谁来接班？选来选去，验来验去，经过近四十年革命斗争的考验，证明了林彪同志具有丰富的革命斗争经验，是伟大的政治家和战略家，还有高度的领导艺术，是毛主席最好的接班人。主席选定林彪同志这样一个最亲密的战友为接班人，肯定地说，不但我们文化革命运动取得彻底胜利，而且对整个中国，整个世界的革命取得胜利也完全是乐观的。林彪同志的身体比我们中的任何人都好。我们确信，林彪同志跟着毛主席领导个二、三十年是毫无问题的。有了主席，有了林彪同志这样英明伟大的领袖，有了他们两个人，刚刚好，马克思、恩格斯也是两个人，毛

主席、林彪同志也是两个人，我们的革命就无往而不胜，就可以信心百倍地完成我们伟大的革命事业。”

接着，各单位汇报他们那里的情况。当谈到叶剑英的女婿刘诗昆因为贴了工作组大字报，而被院革委会强行抓进“黑帮劳改营”的情况时，戚本禹问刘诗昆：“你进去了没有？”

刘诗昆：“进去了，但是作了声明，讲清楚了革委会是权力机构，可以作决定，但是我抗议这个错误的、非法的决定。”

戚本禹：“革委会的错误决定你可以不听，可以抵制，不执行。”

刘诗昆：“当时他们是强行把我抓进去的。那时候，少数派的人很少。以后，他们派纠察队看管我们。”

9月25日晚22时，周恩来在中南海国务院接见了首都大专学校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即“三司”主要负责人和外地来京的代表，包括哈军工的代表。陪同接见的有杨成武、刘志坚和周荣鑫等。周恩来首先询问了代表们的姓名、籍贯和学校，然后与“三司”的学生进行了彻夜长谈。

开始有人提及仪仗队的问题。周恩来说：“仪仗队这个名字不好，是封建的，是否可以改为前卫队？这是我的倡议。”

代表说：“有人要改名字。”

周恩来："现在大家说要改名字，我看不一定要改名字吧！我开始参加革命时，有些无政府主义者主张要改名，说叫无名，其实还是有名，有些人不是后来改了名嘛，姓陈吗？现在国务院参事室，请红卫兵不要去冲他。当时有人要我改名，我说不改了，国民党通缉我，我都没有改嘛！

有的工友说我 9 月 15 日讲话是大毒草，这是不对的。这个讲话是经过中央研究过的，毛主席和林彪同志都看过的。当然这样讲也不奇怪，有说是见怪不怪。"

周恩来问："第三司令部是不是完全是少数派？"

代表说："大多数是少数派，有个别是多数派。"

周恩来："你们只要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少数也会发展成多数的。当然有错误就要修正。外语学院工作组问题的辩论会结束了吗？"

代表："没有。"

有人插话："他们一点也不承认错误。"

周恩来："不对吧！检查几次。"

有人说："检查了两次。"

周恩来："不对吧！我叫我的秘书去，就参加过两次会。"

代表："开了五次会。"

周恩来："对吧！五次会。人总是有一怕，外交部作政治工作的刘鑫泉就怕你们少数派，你们不放他嘛！你们是少数派，但有人怕你们，说明你们有力量嘛！工作组 50 多天

的错误有多大！错误有大有小，但不要怕。地质学院邹家尤在吗？”

有人说：“溜啦。”

周恩来：“跟你们见面是支持嘛！你们斗争得很厉害。多数派不是包围了吴德同志9个小时吗？现在解围了没有？打电话，没有出来，找我讲话。”

有人说：“吴德同志到文化宫去了。”

周恩来：“他管全市国庆节的筹备活动，他是副主任，主任是叶剑英同志。你们包围他9个小时，他怎么能办事呢？”

代表：“邹家尤被人保护起来了，我们是在野派。”

周恩来：“在野派更好嘛！发言权更多些嘛！你们对立得更厉害了，是否把房子来个一分为二，划一个非军事区，来一个没有武装的保护，然后再谈判，这在外交上采用过的。”

代表：“‘工人赤卫队’中有坏人，他们动不动就打人。”

周恩来：“我看先分开，后评理，请郑维山同志去分开。”

有人说：“我们没有人做饭。”

周恩来：“炊事员也可以一分为二嘛！不管你们怎么分，都要汇合到毛泽东思想的汪洋大海之中。你们都是革命同学，在一起就要和平共处。当然这不是不争论，而是不要动武。”

代表："我们的组织很纯，他们的不纯。"

周恩来："都很纯？也不一定吧！你们有多少人数？"

代表："有的说我们有 3000 多，有的说我们有 2900 多人。"

周恩来："我提议物质上同等待遇，一视同仁。这一点北大较好，但完全合起来，当然也有困难。政治上不管，行政上同等待遇，请其它部门管也可以。

你们在毛主席领导的中国，实行四大民主、六大自由（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迁徙），你们比宪法还超过很多呀！不过在辩论当中，你说他是黑帮，他说你是黑帮，还有人说要先骂后辩，这不好。我向你们说话是坦率陈词的，别的哪个国家有这么多的自由？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的哪个国家都没有这样的自由！什么都可以贴嘛！有人提出炮打周恩来，可以嘛！这是经过主席批准允许的。当然，你们打我，我是不会承认的。还有人在王府井贴传单，要彻底消灭伊斯兰教，发了 10 万份，这能行吗？像巴基斯坦、阿联等国家都信伊斯兰教，全世界有 4 亿人口，能消灭吗？这怎么能行呢？答案是：不可能。"说着，周恩来笑了起来。

他接着说："出版，什么都可以出版嘛！有哪个国家有这么自由呢？集会，要开多大就开多大嘛！当然，我们对有些大会要过问嘛！如北京公审小流氓10万人大会就不对。还

有师大附中对一个同学杀伤另一个同学要开10万人大会，再有一次要公开审判资本家李文波的老婆大会，我把中学的同学找来说，最好把下的通知收回来，议一议，我正在说服他们，他们说还没有通知，真的把我们弄了个紧张局面。他们知道我要和他们商量，他们没有下通知。还有反修路，要弄几十万人去游行，我们劝说了，后来还是游行了。我们叫部队徒手去保护了。我对他们说：要是苏修向我们挑衅，绝不能让它损害红卫兵的一根毫毛。像这样的大会是影响到全世界的，我们不得不过问。”

上海抄了十万户资本家，北京去的同学打电报来要拉一万人（资本家）游行，这样范围太大了，我发了一个电报去制止了。你们知道天安门开大会是要报导的吗？开大会全世界都要报导的。所以，你们要搞那么多人游行，我们就要和你们商量了。

关于结社有三条，要接受党的领导，按照毛主席指引的方向，例如四个不忘（不忘阶级斗争，不忘无产阶级专政，不忘突出政治，不忘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四句话（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学生）。总之，是领导、方向、纲领。结社这三条是不可缺少的。大家都是革命的，不能说别人是不革命的。是不是革命的，要在实际行动中去看，去考验。清华附中红卫兵成立最早，五月份他们就进行了酝酿。七月份，毛主席就

抓住了这棵幼苗。中学的同学感到这点非常自豪。有人提出组织有些不纯，开始很纯，而后来不太纯，将来就会看出来了，处理可以放到以后再说。搞革命组织就是结社自由嘛！游行，反美游行就可以。这是天经地义的，像反修路那样的游行，我们就要保护。凡是游行，我们就要过问，就要商量。毛主席领导的国家怎么能不过问呢？”

第 229 回：周恩来，接见“三司”负责人　讲权利，人民有六大自由

接见时，谈到了“李文波事件”，周恩来说：“我们的国家很巩固，像李文波那样的资本家行凶，楼下只有1个女学生，楼上有3个女学生，结果砍伤了4个。这样的事要开大会，全世界是有影响的。像李文波行凶砍人。我们是疏忽的，要是有几个人或4个男同学，那他就不敢了。当然，还有事情发生之后，公安局派出所不知道。8月25日出了事，就不能不过问。26日，我就叫成立联络总站，我规定了三项任务，大家知道嘛！我们对各个革命组织，在物质上是一视同仁，同等待遇。”

“资本家是不能拉出来游街的，还有他们的头面人物，你们也不要去抄，你一抄，世界上一报导，说我们的政策变了，要消灭人身了。我们国家的政权是巩固的。阶级是要消灭的，但人身是不能采取消灭政策的。毛主席的三大法宝，并没有取消统一战线政策嘛！”

“在学校搞四大，搞到社会上，我们是支持的，六大自由也给了你们。现在没有罢课，罢工和请愿的。要搞，我们也是允许的。当然，我们不要罢课，而是放假搞革命，只有毛主席领导的国家才能这样搞，此外哪一个国家能这样做？事情还有另一方面，就是能不能集中呢？”

有人说：“我们学校还没有享受到这些自由！”

周恩来：“正因为如此，我今天晚上才来为你们服务！毛主席就是有意放的，提倡大民主，只有高度的民主，才有高度的集中。集中什么？就是四个不忘。所谓无产阶级专政，就是专剥削阶级的政。林彪同志说过，取得政权以后就要保护，由谁来保护，主要的工具就是

解放军和它的后备军——红卫兵。”

关于文斗和武斗的问题，周恩来说：“有的同学说：‘只有武斗，才能文斗。’北京有的同学到上海去说人家是‘温斗’，这是讽刺，抄了十万资本家还算少吗？林彪同志说：‘要用文斗、不要武斗。’还说：‘武斗只能触及皮肉，文斗才能触及灵魂。’讲这些话也就行了嘛！但问题还没有解决，现在不是还有吗？

专政要靠解放军、民兵，他们很忙。红卫兵先搞政治斗争，不要掌握武器。在工厂、机关、团体，还有商店，不搞红卫兵。已经搞了的可以暂时保留一个时期，前途是取消。这一点，毛主席、林彪同志和中央常委已经决定了的。所以保卫专政的工具只有靠解放军和它的后备军——民兵。

解放军艺术学院组织了红卫兵，被军委下令取消了，这是对的。在上海，有些红卫兵冲入军医大学，要人家组织红卫兵，人家欢迎他们开大会，但不同意组织红卫兵，这是对的。人家是军队嘛！机关、法院、监狱，这些专政工具是不能下放的。如果有些人有错误，你们可以批判斗争。第二点是逮捕，还是让公安部门去办。东风市场设了点，有 4 间房子关了 8 个人，我想去，不方便，周荣鑫同志去过，雍文涛同志也去过，设点押人不能搞。关于这一点权力是不能下放的。”

有人问：“蒋南翔可不可以斗？”

周恩来：“蒋南翔可以斗。第三点是专政的宣传机关，如新华社、广播电台、报纸都是代表党的，是毛主席的声音。当然报纸上有时有个别错误，可以改嘛！有的不好，可以改组，如《北京日报》。《人民

日报》是代表党中央的，学校的斗、批、改不能登报，不能公开，有些公开了的可以，不能公开的不可以。如林彪同志和我的讲话，有些不能公开。世界人民是看中国的《黑龙江日报》登了斗省委的消息，这是不对的。前北京市委改组了，我们还没有点名字啊！彭真是个两面派，他讲了很多打着‘红旗’反红旗的话，不然中央怎么会信任他呢？所以报上公布一个东西，中央是很慎重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中也没登嘛！这里不仅是国内的阶级斗争，而且还有国际阶级斗争，所以党中央公布一个东西是经过慎重考虑的。

第四点是关于电视台，也要保护，学生斗争不能拍电视，哈尔滨搞啦，我们说服了。对同学的行动不能压制，但也要有集中，不要宁‘左’勿右。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潘复生同志，中央是信任的，他去不久嘛！几派同学都去和他谈，谁谈了以后都说潘伯伯你累了，你休息吧！就这样一个接一个，十几个晚上睡不成觉。后来我们就叫解放军看管起来了。武装、法庭和宣传机构需要集中。”

有人问：“自己可以印报吗？”

周恩来：“自己印报可以嘛！”

有人问：“我们可以不可以照相？”

周恩来：“你们照相要费多少胶卷？照片可以由新华社供给嘛！一视同仁。一定要使民主和集中统一起来，这是毛主席说的，要接受毛主席的领导，毛主席是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

有代表问：“有人提出党内犯了路线错误，是革命还是不革命？还是反革命？”

周恩来也反问到："党内犯了路线错误是革命，不革命，还是反革命？"

有同学答："还是革命的。"

周恩来："有一个同学说：犯了路线错误还是革命的，这是对的。上次哈尔滨的同学说是反革命，我们讨论了这个问题，他要我来答复。大家知道我们党的历史，陈独秀是犯了右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的，当时他是总书记，是革命的。以后他叛变了，投靠了帝国主义，成了反革命是另一回事了。我们对一些人的问题不是作唯心的解释，要看行动。当时毛泽东同志是正确路线的代表，陈独秀是错误路线的代表，不要说陈独秀没有一点作用，毛主席说在党史上不能不写陈独秀，因为他是党的领导人，他是个存在。1938年出版的联共（布）党史，不能不写社会民主党嘛！张承先犯了路线错误，不能说他是反革命。因为，我们对他的问题还没有做出结论。要好好地学习毛主席著作，你们是大学生，我和你们讲话就讲得深些。蒋南翔，我们现在还没有作结论，八届十一中全会他还参加了嘛！当然，并不因此就不去揭他，不能说不革命就是反革命。我就犯过错误，但不能说我是不革命或反革命。你就是10万同学和我争论，我也不能同意。"

接着他谈到了自己："我在党内 45 年，我受过毛主席教育，帮助我，信任我，给我工作做。我还和民主人士谈过多次，我犯路线错误时，国民党还通缉我嘛？还有康老，我和主席说过，应该把党的历史全面地告诉青年，要讲革命史，也要讲错误，不能只讲好的，不讲坏的，主席同意。例如南昌起义，现在还把它定为革命节来庆祝嘛！我

和朱德同志、林彪同志、陈毅同志，我是主要负责人，没有到农村中去，我犯了错误。”在这里，周恩来没有提南昌起义的总指挥贺龙。

他接着说：“当然，这并不是路线错误，因为当时我们夺取了武装。我犯路线错误是六大四中全会，王明亲自主持的。关于这个问题，请同学们不要贴大字报，我不是怕，革命者是无所畏惧的，说我不革命，我现在还做总理。1931 年至 1935 年四年期间，当然我不是主要领导，但是领导，就在犯路线错误时，蒋介石还通缉我呢！哈尔滨工程学院的同学们，你们的父亲有没有告诉你们，周伯伯犯了错误吗？”

有人回答：“没有。”

周恩来：“你们不会说周伯伯是不革命的吧！我说应该向你们讲一讲党史，让你们知道。苏联在斯大林后期。犯了错误，搞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最近澳大利亚的希尔同志说：毛主席在建党学说方面有很大发展，例如‘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就是最大的发展。林彪同志说：‘中国这样的大国要团结更多的人，要团结大多数。’毛主席一再说：‘要允许大家革命嘛！口头革命家是不行的。要看行动。’哈尔滨的同学你们是好心，你们都是革命的，不是只想革命，而是有行动。上面这一段是党史问题。我告诉你们就是谈谈心，我不赞成不讲党史。

关于出身成份问题，一看出身成份，二不唯成份论，三要看表现。出身不好表现好，背叛了原来的家庭，就解决了这个问题。研究出身问题，要研究家史。我家在绍兴，生在淮阴，两地都承认我的父亲是职员，每月薪金不超过卅元，可是我的祖父、祖伯父和外祖父都当过知县，都是当官的。过去当官的，只有大贪污、小贪污，没有什么清

官。我父亲一个月卅元，还穿件皮袍子，他怎么买得起？戚本禹同志劝我改，我革命了四十五年了，改它做什么？我是封建主义家庭出身，如果形式主义就是职员。这次文化大革命是触及人们灵魂的。从这场斗争中就可以看出来，旧社会的四旧，旧家庭的旧思想，旧习惯影响很深，主要是影响思想。旧社会影响是很深的，一个人要过五关，政治关、思想关、家庭关、生活关、社会关，主要是思想关。因此旧社会出身的人，更要注意学习毛主席思想，要学到老，改造到老。出身好是一好，还要表现好，两好才能保证。有人说，我是天然的造反者，这不符合逻辑。有些就不能造反，乱造反就不好，这不是宿命论吗？这不行。还要好好学习毛主席著作，要认真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按文化大革命的十六条办事。出身不好更要注意改造。我离家 56 年，从来没有回过家，主席问我为什么不回家？我说这样一个剥削阶级家庭出身，回去就会提出这样那样的问题，支持一下他们就会到处吹嘘，就会给地方工作造成很大困难。我不就有一个房子问题和一个坟的问题吗？我的房子已经交给政府了，可我的婶母说什么要把我生的地方留一间作纪念。可是我婶母是我出生后才来的，她怎么知道我生在哪儿呢？我和江渭清同志打了好几年官司才同意取消了。这不是很好吗？这不减少麻烦嘛！一堆坟，我这没儿没女的人，只好找两个侄子来解决这个问题，一个侄儿还不通。还有一解放军侄子帮助我解决了这个问题，看来还是要靠解放军，是他说服了地方，说服了婶母。别看我是总理，解决这个问题好不容易。当然，那时没有红卫兵，如果找红卫兵就好解决了。你们把封建的东

西打掉了好多。政府就不好办。我为取消一个牌坊还得罪了一个民主人士，他反得可坚决，就是不同意。你们就来得彻底。我们这个院子里的大狮子，不也是被红卫兵搬走了吗？关于政策，一定要讲清楚。”

“现在你们是少数，将来你们会是多数。要你来我往，不要长期对立，革命总是汇入毛泽东思想的汪洋大海的。工作组的影响后果总要一个阶段才能消除。但是工作组检讨再深，也不能解决你们本身的分歧问题，因为工作组不能说你们哪个是革命的，我也不能说。哈尔滨的同学斗省委就有三派，一派要斗这个，一派要斗那几个委员，我在接见他们三派时说：你们都是革命的。也要共同革命。抓革命，促生产，有的人说提得太早了，我说不早，不能丰产不丰收。伊春的木材不就减了产吗！那儿是出木材的。东北还有尖端项目，不抓怎么能行？经过讨论以后，他们同意不争论了，都下乡帮助搞秋收了，很好！关的人也交省委了。所以在运动中要有两个不怕：一要挺身而出，敢于和师生见面，第二遇到违反政策的，我们要敢说，不符合政策的怎么不能说呢？要敢于解释党的政策。

运动是主席领导的，我们没有讲清主席的政策。《十六条》，林彪同志和我的三次讲话，篇篇都是经过主席审查的。还有《人民日报》一篇社论。怎么能说早了呢？8 月 8 日我到清华讲的革命造反精神是肯定了的，也是代表主席讲的。只讲了文化革命委员会将是长期的，当时没讲红卫兵，因为还没有看出红卫兵的先锋作用。‘八·八’还没有讲，有的同学说我讲了，说在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公报中，文化革命委员会等革命组织的‘等’字就是讲了。要找错误缺点还是可以讲

的，没有想到的事情还是很多的。”

说到抓革命，促生产，周恩来说：“我们的工作不能没分工。大、中学校，大中城市搞文化大革命。工农兵，学生要互相信任，互相支持。工人不能不搞生产，不能放假搞运动。他们和学校不同，这一点不能不尊重他们。农村只能和四清结合。农村三秋到了，只能抓三秋，不抓秋收怎么行呢？当然，他们文化革命和四清结合时间就要长些。你们学生将来可以有组织地去农村破四旧，但要宣传。当然，工厂也不要去干涉学校。”

说到正在开展的大串联，周恩来说：“北京到外地，外地到北京的串联，北京可以到外地，外地也可以到北京来，外地到外地就不要搞了。这一点中学生的意见大，我也不能回答。主要是运输问题，不是接待问题。现在运输大大超过了，每天有 40 辆客运列车，而货运量减少了百分之十。这些不要出大字报。再增加运输量就要影响国家的经济建设。因此，外地去外地的串联就不能不停止了。当然，还有少数同学还把自由扩大些，这也是有的。”

有代表问：“工作组怎么办？”

周恩来：“工作组承认路线错误、方向错误就行了，不能说是右派，反革命。另外，他们也不能说你们是反革命。我告诉他们要把左、中、右的名单和调查的材料全部烧掉，一律作废。不要在这方面多纠缠，要快刀斩乱麻，要把学生和工作组解放出来，不然怎么搞斗批改？革委会统一不起来，以后再统一。你们再选举也不行吗？巴黎公社选举也不行吗？我要接见你们大家和你们 5000 人讨论嘛。当然，开大

会就得要有准备。这话我们说得深一些。我并不是不会讲分寸的，我做外交工作还是可以的。不能说没有走火，但走火不大。在国际上抓住我的时候还是很少的。所以我建议你们要准备一下。你们的核心小组可以扩大些，有些问题可以归纳一下，以后再来讨论，明天开个会都来工人体育场。”

“工作组造成的后果，不能说是永恒的。有人提出工作组成员能不能回去检讨？我现在不能答复。红卫兵要尊重工农兵。红卫兵要在30岁以下，不能和民兵混在一起。党政机关，工厂，文化团体、商店不组织红卫兵，只搞民兵，也不搞串联。红卫兵要搞文化大革命。纠察队要地方保护那是不对的。他们的长处是根本的。要避开群众斗群众，也是不容易的。青岛市副市长不同意群众斗群众，谭启龙同志去那儿住了一个多月才解决了。这个问题，看来要经过一个时候的。”

“党团生活是否恢复，中央正在研究。”

“炮打司令部，有人就不管你是资产阶级还是无产阶级的司令部，先打一下再说。我看不尽然，打仗总是要选准目标嘛！”

“有人提出要轰黑五类子女走，这当然不能同意。”

有人建议：“现在已经两点多了，请总理休息。”

大家热烈鼓掌。

## 第 230 回：体育场，首都“三司”开大会

### 周恩来，代表中央致敬意

周恩来接见“三司”负责人的第二天，9 月 26 日，首都“三司”在工人体育场召开彻底批判工作组方向、路线错误大会，周恩来又到场并讲话。这是他第一次参加北京“三司”的大会，所以他一上来就说：

“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造反总司令部成立整整 20 天了，我因为忙，没有很早的来跟你们会见，很晚才来见你们，这是一件很抱歉的事，但是，总是来见你们了，今天能来见你们，这是我高兴的事。我现在首先代表毛主席、代表党中央、代表林彪同志、林彪副主席、代表国务院以及我个人向你们问好。”

口号声、鼓掌声响起。

周恩来继续：“同时向你们首都革命造反总部以及各大专院校的红卫兵致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战斗敬礼！”

又是口号和鼓掌。

周恩来说：“我曾经参加过其它两个红卫兵的司令部所属各大专院校的红卫兵召开的大会，和他们讲过话，一次在这里，一次在先农坛体育场，今天第三次与首都大专院校的红卫兵见面，今天我讲话难免与上两次有些重复。重复的地方我讲的简单一些就算了。

我想以这样的题目，首都各大专院校红卫兵出现的多数

和少数的形势。少数，在学校里是少数，但也有的是多数，总起来说你们现在处于少数地位。正是这样，更有必要讲一讲。你们虽然处于少数地位，但是，你们敢于坚持你们认为对的方向，这一点值得称赞的。”

“首都各大专院校的当权派一般都被批判了。不管是属于哪一类，一般都被批判了。特别是首都各大专院校普遍都派了工作组，工作组一般都处于原来当权派的位置，所以多数也被批判。这样造成了你们与他们的对立形势，就对他们不满，对他们是否包办代替，压制学生表示怀疑，而你们正是那时涌现出来的，因此在这个工作组的问题上你们有优先发言权。

我虽到的学校不多，拿清华来说，是这么个形势。因为少数批判了工作组，和他们对立，因此，工作组就是挑起另一部分学生斗争这部分学生。这个错误属于工作组的。因此是犯了方向、路线错误。7 月 29 日 我已经说过了，我在清华的两次讲话也讲过了，为什么工作组造成这个错误的事情，少数处于被压制的地位，自己的意见不能申张，相反的另一方面，得到工作组的支持那一方面，给了打击甚至采取一些不正当的方法，斗啊，围攻啊，甚至于打人啊，监视啊，这些行为，为什么造成这样，当然这是工作组领导的错误，刚才说了是属于路线性的、方向性的方针的错误。但这个错误为什么这么普遍，拿北京的大专院校和中等学校来说，几乎

很难找到不属于这类型的，也许这里头程度上有深浅，错误的严重有深浅，有多一些，有少一些，有做得恶劣一些，但是，这类错误带着普遍性，不仅北京，甚至于在全国，这种错误也几乎是很少有例外。为什么这样？那来源就不是仅仅的一个学校，或那个学校工作组的错误了，那就是派工作组……要负这个责任。在北京来说，各单位的工作组，都是市委派的了，而市委所以派出这样大的工作组，是由当时在中央工作的同志批准了，同意了，甚至主张。有时还坚持的，所以这个错误，主要的责任应由上边来负，工作组负一般的责任，工作组长负更多的责任，而主要的责任应由上级，首先是中央在当时做工作的一些同志来负。所以提到路线错误、方针错误，应该这样来追。

提到主要的责任归之于谁，那么这个问题解决了没有呢？解决了，党的十一中全会解决了这个问题。党的十一中全会是毛主席亲自领导的。”

会场上响起长时间热烈掌声。

周恩来：“所以，党的十一中全会产生了从党内的在 5 月通过的一个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内部通知，发展到一个公开的在 8 月 8 日宣布的《十六条》的规定。这就是我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战斗纲领。”

又是长时间热烈掌声。

周恩来：“同时，又在十一中全会最后闭幕那天通过了

十一中全会的公报，就是 8 月 12 号、13 号广播，14 号见报的。它总结了过去的 4 年，从党的十中全会整整 4 年功夫里，毛主席是从继续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在北平还没解放以前，那个时候，在西柏坡所通过的文件，指出全国胜利以后的阶级矛盾，主要的就是无产阶级跟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跟资本主义的斗争了。由于那个时候的预见，一直发展到 1962 年党的八届十中全会，毛主席进一步阐明了在社会主义的社会内部存在着矛盾、阶级和阶级斗争，发展了阶级斗争的学说和理论，使我们认识了咱们整个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我们都要拿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这两个阶级斗争为纲，拿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这两条道路斗争为纲，来进行我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所以这 4 年从十中全会的公报以来，毛主席在公报上讲得很清楚，亲自制定的许多方面的政策，确定了我们许多斗争的方针，一直连贯到挖修正主义的根子，培养我们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一直到这一次亲自领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 4 年的丰富的斗争史是史无前例的，没有一个在当今社会主义国家敢于这么做的。”

长时间鼓掌。

周恩来：“所以，林彪同志说得很对，毛主席是列宁以后的二十世纪最伟大天才。”

又是长时间热烈鼓掌。

周恩来:“十一中全会解决了当时50多天领导上的错误。这一点我在许多的场合都讲过，我在清华第二次群众大会上我已经讲过。那么，既然党中央、毛主席亲自地解决了这个问题，指出了这一段时期50多天的方针和路线的错误。为什么现在还有学校的工作组还没有把问题解决，例如，你们这个总部所属的20多个学校，据我所知道的，至少还有一半还存在着这些问题。从这个问题上来看，就是说，这里头有的是工作组本身或者主要负责人没有认识了这个情况，没有作深刻的检讨，向给在工作组领导的时候，所压制的、所打击的、所排斥的少数派同学承认错误，赔礼道歉，宣布被错打了的那些什么反革命啦，什么非法的啦，什么右倾的啦那些帽子，应该统统的取消，这是一方面的原因。还有另一方面，据我知道也有一些部门，就是对工作组所派出的部门，没有依照党中央十一中全会的精神，负责解决这个对于少数派的这种错误政策，错误的路线，错误的方向的问题，比如，举例来说，地质部就是一个例子。”

热烈鼓掌。

周恩来：“由于这两方面的原因，所以直到现在北京还有一些学校存在这个问题，而你们却大概比较集中的代表了这一方面所受到的压抑的情绪，所以，你们造反有理嘛，”

又是长时间热烈鼓掌。

周恩来：“因此，我现在不可能一个一个来回答你们每

个学校所遇到的问题，但是，我可以站在中央工作的同志的地位来说这样的话：就是凡是你们一直到现在，在过去工作组的时候，加在你们头上的那些错误的帽子、错误的名称、错误的行动、乃至于一些恐怖等等，我来代表中央说一句，这些错误的东西，统统应该一扫而光。”

长时间热烈鼓掌。

周恩来：“就是说，凡是错误的行动、错误的称呼，统统应该取消。

在这方面，既然已经取消了，就是错斗了的，错打了的，错写了的，把你们譬如说搞成分成类，那些错误的档案，凡是对你们压抑了的，冤屈了的，这类东西，凡是由你们提出，如果工作组或者在学校，或者在部里头，这样的材料你们告诉我们，我们负责把它集中起来，凡是那些错误的文件，错误的档案、错误的分类，经过我们的检查以后，属于工作组搞的，或者学校里搞的，这些东西经过我们检查以后，负责告诉你们，那些东西一律无效，然后再把它烧掉。”

会场上再次响起热烈掌声。

周恩来：“至于你们当时被错打了的，被压抑的被迫的写出来的那些检讨，哪个时候的笔记被搜查了去的，经过我们调查了以后，亲自清查出来，统统还给你们。”

周恩来再次被热烈掌声打断。

他继续：“当然做这样的工作需要时间，需要你们首先

自己先提出意见，然后经过你们总部的核心小组，工作人员，再加上各校的红卫兵的代表，来开扩大会议，来分类，把那些问题提出来，列成单子，通过你们、我们派到你们这里来的联络同志，让郑维山交给你们，经过了这样的手续以后，我们再去一个一个学校调查，我们保证，这件事情说了就算数，就要做。当然啦，这个是第一步，一定还相应还有许多问题，昨天晚上我跟你们的代表谈了差不多半夜，谈了 4 个多钟头。我今天也不可能一件一件都举出来，这个等到你们总部开了扩大会议，列出分类的表来给我以后，我们来处理。一句话，就是我们看，从党和国家领导地位看，你们这些不管是那个学校的红卫兵组织，都是革命的组织。说你们不是革命组织或者甚至于诬蔑你们说是反革命组织，这样的说法是没有根据的，站不住的。”

“既然你们是革命组织，那么那一些反对你们的组织，那么就是不是另一种性质的组织呢？那我不能这样说。你们也不可以这样说的，”

台下齐答：“不是！”

周恩来：“对，你们跟我是一样的意见，不能这样说。现在你们在学校中，只有多数、少数的差别，没有其它的差别。”

众人鼓掌。

周恩来：“那么我们拿什么事情来做标准呢？如果没有

标准，就随便对你们也说是革命的，对他们也说革命的，那么你们要问：你这个是不是和稀泥呀！”

众人大笑。

周恩来：“我不承认，我没有和稀泥。我是站在毛主席的思想、党中央的方针上、立场上讲话的。”

然后，周恩来提出了革命组织的三个标准：“它有一个大前提，大前提有三个：第一所有的革命组织，青少年的革命组织，都承认毛主席和共产党的领导。第二点，你们都是承认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按照毛主席指示的方向奋勇前进。你们照林彪同志说的，听毛主席的话，读毛主席的书，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都愿意做一个毛主席的好学生，好战士。第三，党的十一中全会，8 月 8 日《十六条》决定发表后，这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纲领，你们是承认的。这个战斗的纲领，也就是你们红卫兵的战斗纲领。所以这三个大前提，领导、方向、纲领，我跟许多大中学校的红卫兵组织谈过。没有哪个提出说不同意这个意见的。既然大前提都相同了，所以不能在中间选一个说：你是革命的，他不是革命的，不能这样说，因为大家都承认这个。大家有共同的领导、共同的方向、共同的纲领，问题是在于行动，在于实际的战斗，那么，这要在长期的斗争中来考验、来证明。”“这些青少年的革命组织是革命的不分多数与少数。”“那么志同道合的，意见一致的就结合在一起，这是一种很自然的现象，很

合理的现象，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正是因为你们有这种朝气勃勃，首创的精神，所以文化革命运动当中，你们创造的很多革命的组织，首先就是红卫兵这个组织。”

“《十六条》的规定上，在当时，注意的是各学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革命师生代表大会、文化革命委员会，文化革命小组。但这种组织形式，我们甚至于没想，要统一到全市，乃至于更进一步的联合。这样的一个方向一个前途是会出现的。可是在现阶段，现在这个放假闹革命的时期出现的比这个超过了，就是红卫兵的组织。因为红卫兵的组织更适合你们初期闹革命的状态。就是刚才说的一个学校，可以这一部分组织，那一部分组织，志同道合的组织在一起。这样子便于你们战斗，便于你们学习，便于你们活动，你们自己证明嘛！所以《十六条》上写的革命的组织那里有个‘等’字，你们红卫兵就在那个‘等’字里。”

众人鼓掌大笑。

周恩来：“你们不要笑，我这是老实话。我说呀，许多革命运动，我们还是落后于群众。因为红卫兵我们是向你们学习的嘛，你们创造出来的，是全中国大中学校的同学们创造出来的，然后我们再把它称赞起来。林彪同志 8 月 31 日的讲话称赞了你们，提到这个问题。《红旗》杂志写了红卫兵称赞你们。这都是在‘红旗’成立之后罗！还不是你们先首创，然后我们。”

周恩来一直是站在那里讲，大家强烈要求他坐下。周恩来说："我坐下就说不了这么清楚了！"

他说："我们的许多干部，许多学校的工作人员，他常常不是按照这样一个前进的革命的眼光来看问题，常常用一种旧框框，老办法的态度对待这种新生事物，新鲜的事物，那么怎么办呢？昨天跟同学们商量，你们这部分同学的代表赞成我这样一个倡议，就是你们现在所受的不平等的待遇，或者受的压抑，除去政治上要宣判你们被冤屈的、被歧视的那一种称呼等等，刚才我已宣布了一律取消以外，还应该对于物质上的待遇也要得到的自由和便利。"

现场气氛热烈，掌声、口号声响成一片。

周恩来继续："办法就是要使学校的行政摆脱过去的学校的旧的行政当局的控制，如果那个学校的行政受了部的影响，那也摆脱那个影响，同时也摆脱，也不需要那个学校的现在的文化革命委员会或筹委会，或临时委员会的管理。因为现在学校里的据我所知道的，绝大多数革命委员会，临时委员会等等，总是还没有能够包括全体的革命师生的代表，总是偏在一方面，或者比较偏在一方。当然罗，这个里头必须声明了，也还有一些学校是比较好的罗，受欢迎的罗。但是，这个不多。既然如此，所以，可以把学校行政机构超脱出来，另外派人，北京市派人来管理，而与过去校的当局、工作组，跟上面的部的关系，没有关系。超脱一点点去掌握

这个行政机构。”

“大家说的吃饭的事情，首先是住房子的事情，吃饭的事情，办公的地方，交通通讯的便利，广播的便利，广播是学校的广播啰，还有交通的便利还有其他等等。就说呢，这一切的待遇同是革命的组织统统得到公平的待遇，合理的待遇。”

接着，周恩来又谈了红卫兵是战斗队、学习队、宣传队的问题。

对于红卫兵的组织，他说：“是要以红五类的出身的子弟核心，为主体，这一点是对的，打下个基础，但是，不能说仅仅限于红五类出身的子弟，它总要吸收一些它周围的红外围嘛，比如说，有许多中农家庭出身的子弟，职员家庭出身的子弟，在斗争中又很革命，为什么不可以把它首先组织到外围，然后吸收它成为红卫兵呢？这是许可的。”

他建议说：“你们也可以创造性的试验试验，搞些外围的组织，使它在学校或社会上有个服务的机会、学习的机会，不然就会变成过去的情况，参加红卫兵的很忙、很紧，另外不少的人站在那里没事作，忙的忙，闲的闲这就不好，这个问题还有待于解决。”

接着，周恩来又不厌其烦的反复强调要注意区别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及文斗武斗的问题。

9 月 26 日当天，周恩来主持中央碰头会，讨论中共中央

华东局就解决学生和红卫兵到医院串连，医院出现混乱的问题给中央的请示报告。会议决定电告华东局并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卫生部：中央同意红卫兵不到医院串连，医院内应按 9 月 25 日中央批转总参谋部、总政治部的报告办。已成立红卫兵组织的，要做到自动取消。

第二天，周恩来嘱秘书致信“三司”，告：

昨日会上所讲“你们认为对的，认为是真理，可以坚持一个时候”一句讲得不完全，特作如下更正和补充：“如果在辩论和实践中，经过你们自己或别人证明确实是错误了或部分错了，你们就应该承认错误加以改正；如果证明确实是对的或者部分对的，你们就应该把对的言行坚持下去。这就是毛主席经常教导我们的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道理。”

## 第231回：有敌情，安子文舞伴可疑　迎亲人，小将住进中南海

9 月 27 日，周恩来接到中共北京市委办公厅报告：北京 34 所中学和外地的学生成立了一个“东方红筹委会”，拟将北京市改为“东方红市”，还决定将天安门前的华表和两个石狮子搬走，立毛泽东铜像和英雄人物像。

周恩来就此事批告中共北京市委和周荣鑫：“通过联络站，告以这是国家大事。国际观瞻所系，他们可以关心，可以倡议，但不能由他们决定、命名。否则，命名无效，岂不损失信誉。”

此时，康生听到聂元梓汇报，中央组织部部长安子文身边可能有特务。

文革前，中组部部长安子文和海军司令员肖劲光经常到聂元梓的爱人、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常委吴溉之家里打麻将。安子文来时，身边总有一个女的，叫邓觉先，打扮得很漂亮，抹着红嘴唇，穿的也很时髦。她还经常将她的妹妹也带到吴溉之家。

邓觉先的丈夫叫张振汉，原西北军中将师长，1935 年 6 月在湘鄂围剿红军时被贺龙部俘获。当时贺龙缴获了国民党 3 门炮，但不会用。听说张振汉是保定军校炮科出身，就让张振汉教红军开炮。后来，张振汉随红军经历了两万五千里长征，他是唯一参加长征的国民党将军。到延安后，张振汉在红军大学担任军事战术教员，中共把他妻子邓觉先也接到了延安。

抗战爆发后，毛泽东亲自找张振汉谈话，让他回国统区，张振汉这才离开了延安，到达西安。1943 年，张振汉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

中将高参；1946 年底任江苏省连云港市市长，1947 年 4 月辞职；1948 年 10 月从上海迁居长沙；1948 年 12 月任驻台湾省特派员；1949 年 3 月加入民革，后以台湾省特派员身份返回湖南，秘密从事湖南和平解放工作，参加了湖南起义。1949 年长沙解放后，历任长沙市人民政府委员、副市长，湖南省政协常委，民革中央委员，全国政协委员。

邓觉先跟聂元梓讲，她现在住的院子就在中组部斜对面，既宽敞又漂亮，是安子文给她安排的。从前的房子，则是另一位中央领导人给她找的。这位中央领导 62 年下去了，他下去以前，常常找她去跳舞，他是个舞迷，跳到深夜都不回家，从来也不带他的夫人出面。邓觉先说："那时跳舞跳得很厉害，找我的人比现在更多。我住的那条胡同，来我家的小车都得排长队。"她搬家的原因之一，就是她家里客人来往多，原先那个院子所在的胡同小，有时候她家的客人来多了，车子都搁不下，一直要停到大街上，还要民警来安排指挥。

邓觉先与安子文来往甚密，中组部有事找安子文找不到，到邓觉先那里肯定就在。

这些事情让聂元梓产生了怀疑，她觉得：安子文是中央的组织部长，有什么事情应该是交给中组部的人去做，为什么一而再、再而三地让邓觉先去做？张振汉是党外人士，邓家姐妹也不是党员，这么重要的党的干部工作，怎么可以让这些人来插手？她的丈夫本来是中共的一个统战对象，国家对他们一家人都有照顾，邓觉先在测绘局工作，管管资料，上下班都很自由，生活条件很优越，她有什么必要这么繁

忙地在党政要员的圈子里活动，与这么多党的高级干部周旋？

聂元梓与吴溉之谈了自己的感觉，并对他说："你和安子文这么熟，他和邓觉先这种关系太不正常，你为什么不提醒他？"

吴溉之说："都是好朋友，这些事情，开始是不好意思说，等到后来，木已成舟，就是说也没有用了。"

5 月，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揭发批判彭真，通过《516 通知》，这件事，在正式向下面传达以前，聂元梓除了在曹轶欧那里有所耳闻外，从邓觉先那里也早已听说了。邓觉先甚至还能说出这次会议上的许多具体情况，谁谁怎么发言等等。她说，安子文是中央组织部长，对于彭真等人的揭发材料，都是安子文直接掌握的。聂元梓感到，党的这样核心机密都让邓觉先这样的身份不明的人得到了，这怎么得了？

有一天，聂元梓来到在中科院工作的杨惠文的家里，她们当年都是太行山的老战友，一起工作了很长时间，是难分彼此的朋友，杨惠文还是北京大学社教工作队的成员。聂元梓和她讲起了自己对邓觉先的怀疑。正好杨惠文的丈夫、中国科学院石油研究所的所长白介夫也在家，他走进她们谈话的房间，一听聂元梓讲这些事情，他就不走了，坐下来听聂元梓的讲述。

听完聂元梓说了事情的头头尾尾，杨惠文和白介夫夫妻俩一致认为，邓觉先姐妹俩，准有问题，肯定是特务，要赶快向公安部长谢富治汇报，揭发她们。

杨惠文夫妇的意见让聂元梓犹豫不决，她想：如果邓觉先是一个

坏人的话，安子文就是受她欺骗，从本质上讲，一个参加革命多年的老党员，又处在相当高的地位，他是决不会跟着她跑，决不会参加她的那一伙特务活动的。再一个，聂元梓要是揭发了安子文，和吴溉之的关系是否会破裂？离婚不离婚？对于已经是离过一次婚的她来说，不到万般无奈，是决不愿意再离一次婚的。

很快，白介夫向中科院的保卫科长讲了这件事，让保卫科长去给公安部长谢富治汇报。

此时，聂元梓的另外一个老战友，在外交部工作的郝德青刚从国外回来。他到清华大学看读书的女儿，顺便绕道到北京大学来看聂元梓。聂元梓又把安子文的事情说给他听，想听一听他的意见。郝德青一听就说，邓家姐妹准有问题，张振汉是党外的知名人士，如果从个人的角度讲，他的工作和生活都被照顾得很好，完全没有必要通过让自己的老婆做这种事来谋取什么利益，没有必要用美人计拉拢安子文。

聂元梓告诉郝德青说，“白介夫和杨惠文让我对谢富治讲。”

郝德青连说，“不行不行，不能对谢富治讲，你应该直接找康生。”他说，“你应该跟白介夫和杨惠文讲，不要去找谢富治，因为事情是涉及到安子文的，谢富治未必能有这么大的权限干预此事。他们两个人都是中央级的部长，一个是中共中央的组织部长，一个是国家的公安部长，谢富治怎么好过问这样的事？这种事情，只有康生才能管得了。毕竟康生是主管党内的保卫工作嘛。”

聂元梓犯愁的说：“康生不好找。”

郝德青说，“曹轶欧现在不是就在你们学校嘛，你给她讲一下，

转告康生就可以了。”

于是，聂元梓找了曹轶欧，对她说，有一件事情要向康生汇报。曹轶欧问，是什么事？聂元梓简单地说了一下情况。曹轶欧让聂元梓给康生写个字条说，有关于安子文和邓觉先的重要情况，需要向康生汇报。然后由曹轶欧转交康生。

9 月的一天，康生约聂元梓去面谈。聂元梓下班以后，坐着曹轶欧的车子，和她一起来到钓鱼台见康生，和康生谈到半夜。

对聂元梓汇报的情况，康生非常重视，他嘱咐聂元梓，“有什么重要情况，可以随时向我汇报，找曹轶欧就行。”

“你要继续保持跟吴溉之的关系，不要闹崩，要注意他们有什么活动，你还照常到安子文那里去，该吃饭就吃饭，该打牌就打牌，留心他们的动静，发现可疑情况就直接报告我。你写个条子给曹轶欧就行。”

他还特别交代聂元梓让她就安子文和邓觉先的问题，写一份正式的书面报告。

9 月 27 日，北京地院“东方红”的王大宾接到参加国庆日庆典活动的大红请柬。请柬上直接写着邀请王大宾的名字。

王大宾拿到请柬，觉得不妥：“地院‘东方红’的第一把手是朱成昭呀，请柬应该发给他才对。”

他马上找到朱成昭，对他说：“你是‘东方红’的一把手，这个请柬应该给你，应该你去参加。”

朱成昭说：“这是国庆日庆祝活动筹备组他们商定的名单，既然

邀请你，你就代表我们‘东方红’去参加吧。写的是你的名字，还是你去的好。这样的活动，我今后有的是机会。”

当晚，王大宾按请柬的要求报到，被安排入住中南海。他这时才知道，同时报到的还有师大的谭厚兰、北大的聂元梓、北航的韩爱晶。地院“东方红”的对立面组织“斗批改兵团”红卫兵头头中的一个女同学也同样受到邀请。北航韩爱晶的请柬是北航“红旗”所在的首都“二司”给的。

9月30日上午10时，赴北京参加国庆节纪念活动的开封师范学院学生韩卫红，在他们的驻地北京医科大学接到通知，到办公室去接受一项特殊的任务。他来到办公室，一个干部模样的人，了解了韩卫红的年龄、家庭出身等基本情况后，和蔼地对他说：“根据上级的通知，你要去执行一个特殊的任务，你愿意去吗？”

韩卫红说：“只要我能办到的，我会努力做好。”

“那好，现在要你到一个地方去。到哪里，干什么，先不要问，到时候会告诉你的。”

韩卫红回答说：“革命的需要，就是我的选择，什么任务我都会努力完成。”

那人听了笑了笑说：“你现在就回去准备一下，什么也不需要，带上洗脸刷牙东西就可以了。”

然后又特别严肃地交待道：“记住，今天这事儿先不要告诉别人。这是党对你的考验和信任！”

韩卫红说：“记住了。”

韩卫红回到住室，把牙缸、牙刷、牙膏、肥皂和毛巾装进挎包就走。同班同学刘纪纲、靳景贤、郑国友、邢永义看到他慌忙的样子，纷纷围上来问：

“有什么事啦？”

“叫你干啥去？”

韩卫红答了一句“现在我还不清楚。”就匆匆走了。

到了办公室，刚才那个人又问他，有没有同学问你干什么？韩卫红如实说了。那人又看了他带的东西，确认没有不放心的地方，才带他走出了办公室。

医科大学的门口，有一辆黑色的小轿车在那里等着。他们上车后车就开了。韩卫红一声不响，看着车窗外的街景，也不知要到哪里去。

汽车在一个大院里停下来，那人让韩卫红下车后到一队人的后面去排队，并告诉他不要离开，一会儿就会有人来领他们。

韩卫红从墙上的标牌上知道这里是先农坛体育场，四角高高的铁架上装着数不过来的探照灯。

近12时，来了3个工作人员，一个推着食品车，一个拿着本子核对姓名，给在场的每人发两个馒头和两个咸鸭蛋，并客气地说：“人多，先吃点儿馒头吧，那边有开水。下午就会有人来接你们。”

大家都平静地接受着这一切。也有人从工作人员那严肃认真的劲儿上揣测，肯定是要他们去参加一个非常重大的活动。

下午15时，一下子来了20辆清一色的大轿车。身着统一服装的工作人员，指挥大家依次上车。车里边干净极了，座椅上蒙着整洁的白

衬套。工作人员非常和气地告诉大家：

“按照上级的安排，现在要带大家到一个地方去。请大家按要求自觉地把自己的物品清理一下，除了洗漱用品和钢笔、日记本以外，其他物品，特别是小刀和钥匙之类的东西，是不允许带在身上的。请您交给工作人员为您保管。”

她敏锐的目光逐一看过每一个人，确认没有异常后才坐下来。

汽车平稳地从先农坛开出来了。一路上，工作人员和大家一起唱歌：《大海航行靠舵手》、《社员都是向阳花》、《谁不说俺家乡好》，一首接着一首。汽车自东向西驶过天安门、新华门，沿着深红色的围墙向北进入了中央机关的办公区……

歌声也停了，大轿车静静地穿过红墙之间的松树林，向东转，驶进路北的一个院子里停下来。大家下了车，依次在摆好的小马扎上面向东坐下来。

这是一个平平常常的院落，坐北向南，除了红围墙上面砌着绿色的琉璃瓦外，和普通的院落没什么不同。院子里靠大门东边有一个木板搭成的半米来高的台子，五、六米宽。台子的两边有两根木桩，拉起一条红色的横幅，上面写着“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七周年”。

和韩卫红一起来的足有千把人，年龄相差不多，大家都手拿《毛主席语录》，身穿绿军装、佩戴红袖章，背着绿挎包。

一辆黑色的轿车从大门开进来，停在台子前。车门开了，国务院办公室主任周荣鑫下了车，拉开后门，周恩来总理从车里走了出来。

大家十分惊喜，使劲地鼓掌，一声连一声地高喊“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

周恩来微笑着，向同学们招了招手，也鼓着掌，走到台子中央。

同学们都很激动。周恩来也很激动，他和大家一起长时间的一阵又一阵的鼓掌，持续了很久很久，周恩来和在场每个人的眼里都噙着泪花。最后，还是周恩来把两只手举起来向大家示意，掌声才停下来。

周恩来走到离前沿一米来远的地方，尽量提高声音，很有节奏地说：

“同学们，红卫兵小将们，你们好！你们是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请来的客人。我代表，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热烈地，欢迎你们的到来。你们，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伟大号召，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向反动的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向资产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观念，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发动了英勇的进攻，你们战斗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第一线，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为反修防修，为防止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复辟，立下了很大的功绩，你们不愧为，英勇的革命小将，不愧为忠于毛主席的红卫兵。我们向你们学习，向你们致敬！”

这激动人心的讲话，被又一次的鼓掌和欢呼所打断。大家一起使劲鼓掌，高呼：“向周总理学习，向周总理致敬！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周恩来又一次和大家一起鼓掌，一起高呼“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他接着说到：“伟大领袖毛主席说，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中国的前途寄托在你们身上。你们青年人，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你们一定要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不要辜负毛主席、党中央对你们的期望。肩负起反修防修和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伟大使命。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你们是任重而道远。”

讲话再次被掌声打断。

周恩来接着说：“明天，是我们伟大的祖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七周年，毛主席亲自邀请你们红卫兵代表，来北京参加庆祝活动，你们要和毛主席一起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三军仪仗队，检阅百万群众游行队伍，这是你们的最大荣幸，最大光荣。”

掌声再次响起。

第232回：嘘寒暖，众领导走访关怀　庆“十一”，天安门百万聚会

周恩来继续说：“这一次邀请参加国庆观礼的代表总共有3000人。工人、农民代表1000名，解放军代表、民主党派和国际友人1000名，红卫兵代表1000名。工农兵是我们的主人，他们战斗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各条战线，在不同的岗位上创造出了优异的成绩，为人民立了功，为祖国争了光，他们都是应当受到尊敬的英雄模范人物。民主党派和国际友人是我们请来的贵宾，他们都理所当然的住在宾馆。你们红卫兵小将，是革命的接班人，毛主席把你们看成是自己的娃娃，是自己家里的人，当作客人就外待了，所以毛主席特意安排要把你们请进中南海，住到家里边，住在毛主席的身边。这是毛主席、党中央对红卫兵小将的极大信任，极大关怀，极大爱护。”

热烈鼓掌。

周恩来：“这是你们的光荣和幸福，也是你们一生中最大的骄傲和自豪！”

“毛主席万岁！万万岁！”的欢呼声又起，周恩来再一次和大家一起热烈地长时间地鼓掌。

他让大家安静下来，语重心长地说：“中南海，是全中国、乃至全世界革命人民都向往的地方，是党中央、国务院办公的地方，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中央首长工作和休息的地方，毛主席他老人家，就在这里日理万机地处理国内外大事。就好像一个人要有一个头，一个大脑，人的每一个动作都要靠大脑来指挥。中南海就是我们国家的首脑机关。我们的国家是一个拥有960万平方公里辽阔疆土的，拥有10亿

人口的社会主义大国，作为首脑机关，每时每刻，都要和祖国各地保持紧密的联系，并根据实际情况发出指令，来指挥我们国家的革命和建设。所以，这里需要保持一个非常安静的环境。既然毛主席请你们来到这里，并叫你们住在他的身边，说明毛主席和红卫兵心连心。你们从全国各地来到北京，来到中南海，又住在毛主席的身边，你们的心情一定是非常激动，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我要求你们，一定要克制住自己的感情，不要惊动毛主席他老人家的工作和休息，不要影响中央首长和中央机关的正常工作。从现在起，再激动也不准鼓掌，也不准喊口号。在院子里可以走走看看，但不要乱跑。不经允许，不要到办公区域去，办公区的路边上，都有‘非工作人员，请勿入内’的标牌，你们要自觉遵守，不要进去。这一点，请我们的红卫兵小将，务必做到。”

他又说：“中南海不是宾馆，你们住的地方都是我们中央机关的工作人员给你们腾出来的房子，条件比宾馆差得多，所以你们不能和工农兵代表们住的宾馆比。是毛主席把你们当作自己家里人，才请到中南海和他住在一起的，虽然条件差一点，但待遇要高的多。除了你们红卫兵小将，谁也得不到这样的待遇。这是任何人都无法和你们相比的，这是最难得的荣幸呀！”

又一次热烈的长时间的鼓掌和欢呼。最后，周恩来终于说到：“这里是北院，再允许你们这么使劲地鼓一次掌，喊一次口号，过过瘾。但到此为止！从现在起，希望大家克制自己，控制自己，不要再鼓掌，不要再喊口号了。好不好？”

说完，他向大家招了招手转身就要走了。同学们不由自主地又开始鼓掌，周恩来转过身来，招手制止说："刚才不是说好的不再鼓掌了吗？"大家只好停下来，目送他静静地上车，周恩来也静静地向同学们招了招手，汽车开走了。

大家都极力控制着自己激动的心情，谁也不说一句话，静静地走成一队，按要求，用左手出示自己的"观礼证"，经门岗一一检查后，从北门安静地走进了神秘的中南海。

他们走到一个冬青围着的园子，北面是青砖砌的老式楼房，工作人员领他们进去，韩卫红和另外15个人就住到二楼一个两间相通的房间里，看样子是办公室腾出来的。并不太白的石灰墙上，还留有放桌子的痕迹，深红油漆的木门窗，黄铜的拉手、风钩和插销，深红油漆的木地板。房间朴素而简洁。靠后墙，在地板上铺成通铺，平平地蒙着衬单儿。被子像部队一样叠得整齐划一。原本军绿的被面和衬单，颜色已经褪净了，白白的打着补丁，干净极了，一切都好像一尘不染！韩卫红依照次序对准了一个铺位，便坐下来休息。他心底怎么也没有想到，我们的中央机关，竟是这样的平凡，竟是这样的保持着战争年代那叫人敬佩的艰苦朴素的革命传统！

下午18时，晚饭送来了。两个馒头，一碗大米粥，菜是白菜煮豆腐每6个人一小盆。正吃饭时，邓颖超、周荣鑫、汪东兴一块儿走了过来。汪东兴招呼大家：

"大家注意啦，邓大姐和周主任抽空来看大家了。"

因为不叫鼓掌，不叫喊口号，所以同学们只好放下手中的饭碗，

站起来向首长致意。

邓大姐马上摆摆手说："不要站起来，你们继续吃饭吧。"

大家又蹲下来。只见她走到饭车旁边，拿起勺子舀起大米粥看了看，又到菜桶旁边儿，舀起一勺菜看了看，然后向大家说：

"你们吃着怎么样？菜煮的咸不咸？我们这里的大师傅，可没有做过这么多人的饭，猛一下做这么多，不免就拿不住口味，大家将就着吃吧，他们会想办法，把饭菜做得好一些，努力给你们改善生活。"

她歇了口气接着说："中央机关的同志们，听说毛主席要请客，要把你们这些革命的红卫兵小将请到家里来过节，大家都很高兴，很欢迎。我是机关党支部的支部书记，毛主席把接待的任务交给了我们，是对我们的信任，我们感到很光荣。这里的条件差，没有能力接待这么多的人。为了完成这个光荣任务，我开了个支部党员会，动员我们的党员干部，把自己的住室和办公室挤一挤，腾出一些房子来让你们住，把自己的被褥拿出来给你们盖，集体大铺，睡地板，好在天气还不太冷。但北京这里和南方可不同，秋天的北京，夜里还是很凉的，你们一定要盖好，不要着凉感冒了。真感冒了就说话，我们这里有医务所，可以给你们看。你们很荣幸，你们能跟毛主席住在一起，住的非常近，非常近，我们都很羡慕你们。明天，你们还要登上天安门城楼，和毛主席一起参加国庆大典，一起检阅游行大军，你们是千百万红卫兵中最幸运的人，最幸福的人，真叫人羡慕。这是人生最难得、最幸福的机会，是终生难逢，终生难忘。什么时候想起来都会感到无比的自豪和骄傲。毛主席日理万机，主席的工作和休息，主席的健康

是大事中的大事，所以你们要保持安静，千万不要打扰他老人家。要十分珍惜伟大领袖毛主席对你们的信任和希望，要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战略部署，关心国家大事，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你们在这里有什么要求，随时都可以提出来，我们和我们支部的党员，随时都会尽量满足你们，帮助你们。中南海是24小时办公，没有假日，没有星期天。有什么事情，写个条子在北京的任何一个信箱投进去，我们当天就可以收到。请你们相信，我们的工作是很有效率的。当然，你们也知道，党中央、国务院管着全国的大事，小事还是别打扰，好吧？今天就说到这吧，晚上叫机关的电影员给你们演电影。一有时间，我会再来看你们这些娃娃。你们吃饭吧。”

说完她就走了。

北京地院驻首都“三司”的代表聂树人也收到了参加“十一”国庆活动的“入席证”，是“三司”总指挥周永璋发给他的。

聂树人入席证的正面

聂树人入席证的背面

入席证上面的姓名一栏原是空的，“聂树人”三字是他自己填写的。盖的章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七周年筹备委员会”。入席证上面写的：“1966 年 9 月 30 日，乘（凭）此出席证进中南海，十月一日登上天安门城楼，见到了伟大领袖毛主席”这三行字是聂树人后来自己写上的。

9 月 30 日下午，聂树人住进中南海。他心情激动，因为，这里是中国最高领袖居住、生活和工作的地方。但是，从房子的外表看，中南海的建筑与外面没有太大的不同，大都是平房，而且破。特别是房子的陈旧，给聂树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晚饭后稍事休息，同学们带上马扎，排着队，顺着来时的路出中南海北门，到路北对门的院子去看电影。还是下午那个木台子，银幕就拉在台子前面两根挂横幅的木桩上。放映的是故事片《年轻的一代》，加映新闻纪录片《欢呼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放映中间，灯光突然亮了，看见江青、康生、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汪东兴等

出现在银幕下面。灯光下看见江青穿着风衣，风衣的帽子盖在头上，脸色看上去很白，也有些浮肿似的，带着黑色镜框的眼镜，匀称的身材，两手安详地扣在胸前。稍微静了一下，她向大家招了招手便开始讲话：

“同－志－们——，红卫兵－小－将－们——，你们好——，你们辛苦了—。伟大领袖－毛－主－席—有外事活动，没有时间，就交待我来看望－大家—。我代表毛主席，向－你们－问－好—。和我一起来的还有中央文革的同志们，你们红卫兵是文化革命的闯将，我们向你们学习，向你们致敬。”

江青的嗓音很高，很细，颤抖着，拖着长腔，有些上气不接下气，身体状况明显不好。

下午有了不叫鼓掌，不叫喊口号的规定，大家就静静地听着她讲话。心里很是感动。仿佛到了毛泽东的家里，沐浴着他老人家的关怀和温暖。江青看到红卫兵好像有些激动，她接着说：

“明天，伟大领袖毛主席，就要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你们。希望你们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资产阶级反对革命路线的斗争中，经风雨，见世面，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努力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要斗私批修，为人民的利益坚持好的，为人民的利益改正错的，把自己锻炼成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不要辜负党中央，毛主席对你们的希望。我们的同志在困难的时候，要看到成绩，看到光明，要提高我们的勇气，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胜利属于伟大、光

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属于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属于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她停了停，歇了口气又说：“伟大领袖毛主席把你们请到家里来，不要拘束，要吃好睡好，明天好上天安门见毛主席。我就不耽误你们看电影啦。明天天安门上见。”说完，她向大家摆摆手，戴上风帽就走了。

第二天，同学们5点钟起床，5点半开饭。周恩来和邓颖超又来了，也没有人陪同，就像在家里一样。周恩来问大家睡的怎么样？有没有人受凉？受凉了就到卫生所去看医生。接着说：“今天是国庆节，要上天安门，伟大领袖毛主席要接见你们，要和你们一起检阅三军仪仗队，一起检阅百万群众的游行大军。天安门上的贵宾很多，不能专门来照顾你们这些娃娃，中午给你们准备有干粮，饿了就在天安门上吃一点，你们要自己照顾好自己。毛主席教导说：‘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你们要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一切行动听指挥。特别要说的是，今天在天安门上，你们将受到毛主席的接见，这是你们一生中最大的幸福，一定会非常激动。这是可以理解的。为了让你们都能在最近的地方最清楚地看到伟大领袖毛主席。我要求你们一定要服从统一的安排。不要乱跑。我们热爱毛主席，我们就要自觉的维护毛主席的健康。你们要知道，毛主席已经是70多岁高龄的人啦，他老人家今天还要接见外宾和朋友，还要接见各条战线上，为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做出了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一定是很累的。我们要倍加注意他老人家的健康，所以我要你们也向我保证，为了主席的健康，要控制

自己的感情，不论是谁，只有在毛主席主动和你握手的时候，才能上前握手，毛主席没有主动和你握手，你不要去握主席的手，这是一条纪律，一定要遵守。再激动也不行！你们这些娃娃，抱住手又不是规规矩矩的握，而是又喊又跳，又摇又晃，主席这么大的年纪，哪经得起你们这么摇呀？我还要特别提醒你们，一定要控制自己的情绪，千万不要到了毛主席身边了，你一激动错过了机会，没有看清毛主席，那你就后悔莫及了。要想再拐回来看第二次是绝对不允许的。要想再次见到毛主席，就要等到你在今后的岗位上，为祖国，为人民，为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事业做出了突出的重大贡献，再来北京受毛主席接见的时候啦。好吧，就这样，你们抓紧吃饭，咱们天安门上见。”

说完，周恩来和邓颖超就走了。

在北京的外地学生是 9 月 30 日晚上 20 时接到集合令，拿上统一发的面包香肠和水果，排上长长的队伍等到次日凌晨四、五点钟。然后一个挨着一个，密密麻麻地缓慢的向前涌动，不知道要涌向哪里，只知道紧跟着前面的，并且不跟也不行，因为有后面的在推动。大家困得死去活来，边走边睡。直到前面的停下了，后面的撞到前面的身上才惊醒一下，随即进入稳当的站立睡眠。

早晨 5 时，他们终于来到了东长安街，就地坐下。

10 月 1 日这天，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了百万人参加的隆重集会和游行，有 150 万名首都民众和外地来京的红卫兵参加，也称“毛主席第四次接见 150 万红卫兵”。外地赴京告状的群众代表都被安排参加了国庆观礼。

## 第 233 回：巧应答，李宗仁比喻得当
## 再拥堵，林彪劝说亦无效

10 月 1 日一早，中央领导都来到中南海勤政殿集中，然后一起出发，开车去天安门。

9 时 55 分，《东方红》乐曲响彻整个广场上空，毛泽东、林彪及中央其他领导人、民主人士登上了天安门城楼。广场上爆发出“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的欢呼声，如山呼海啸，响彻云天。

上午 10 时，吴德宣布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七周年大会开始，军乐队奏国歌，礼炮响起十七响，接着是林彪、周恩来讲话。随后在军乐队的进行曲中，盛大的检阅仪式开始了，八一军旗迎风招展，陆海空三军，分别组成钢铁般的方阵，步伐矫健，齐整威严。接着彩车，后边是游行大军。

林彪站在毛泽东的右边讲话，而毛泽东的左边站着刘少奇、宋庆龄、董必武。这天是国庆节，作为国家主席的刘少奇自然是要站在醒目的地方，而宋庆龄、董必武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

外地学生在解放军战士组织下，横排 29 人，一齐向前推进，并且接到命令，走过天安门时不许停留。

激动人心的时间到了，当他们步入广场，艳阳已射上天安门城楼。因为距离太远，他们辨不清哪个是最伟大的领袖，只能兴奋地雀跃，不停的挥舞着手中的《毛主席语录》，不断地呼喊“毛主席万岁”。广播里反复播放着《最伟大的领袖是毛泽东》。

激动令人无法自持，秩序也不像解放军战士叮嘱的那样井然有序了，人们身不由己地停下来想多看几眼城楼上的伟人，后面的便不能前进，这时听得广播里响起林副统帅颤抖的声音：“同学们，大家不要停留，要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继续前进！”有的女学生流下喜极而泣的泪水，有的挤掉了书包，踩掉了鞋子，抛丢了帽子。游行直到中午 12 点多才宣告结束。当人流散去，广场上的遗留物扫起一堆又一堆。

天安门城楼上的毛泽东，看见观礼台的墙上贴着一幅大标语：“打倒消防队长李天佑！”他一回头，正好看见副总参谋长李天佑就在旁边，便诙谐地对李天佑说：

“天佑，天佑，‘天保佑’！”

这幅大标语是总参三部下属张家口技术工程学院的部队学员贴的。1965 年军队院校整风时，李天佑曾带工作组去过这个学院。后来，三部副部长姜钟又带着工作组进驻学院。1966 年 8 月，军队院校的工作组也随着工作组撤走的浪潮撤出了学院，曾受到工作组打压的一些学生开始进京“上访”，冲击总参三部机关，称李天佑是“学院黑帮的总后台”，要求他出面“回答问题”。

李天佑先后 5 次接见学生代表，回答了他们提出的问题。几天后，他又亲自带领检查组前往学院，进一步了解运动的发展情况。他是工作狂，一进门，就在学院办公楼门口接见师生员工。当他在讲话中说到：“学院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一定要在党委领导下进行，不能搞打、砸、抢……”时，话音未落，有人当场喊起来了：“你不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李天佑也毫不客气，立刻反驳：“我怎么不执行?在战争年代，我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所以才打胜仗；今天我一来就传达毛主席的指示，连大门都还没进，怎么是不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呢！”

没有人说话了。

李天佑在学院睡上一觉。谁知，第二天一早，学院的大操场上就出现了“舍得一身剐，敢把天佑拉下马”和“打倒消防队长李天佑”的大幅标语，一幅李天佑拿着水龙头灭火的漫画贴在办公楼外最显眼的地方。李天佑看后，无奈的笑笑说：“消防队长好呵，保护人民生命和国家财产安全，有什么不好！”

此言一出，立刻又招来铺天盖地的大字报。不久北京好些地方都出现了批判“消防队长”李天佑的大字报。“打倒消防队长李天佑”的大幅标语，就这样贴到了天安门城楼下。

在天安门城楼上，毛泽东看见了李宗仁，便兴致勃勃地向李宗仁走过来，边走边向李宗仁伸出手去，李宗仁赶忙伸出双手，去握住毛泽东伸过来的右手，两人一边握手一边摇晃。

当时在场的解放军画报摄影记者孟昭瑞迅速抓拍下了这一场面。

毛泽东带着浓重的湖南口音对李宗仁说："请多保重身体，共产党不会忘记你的。"说着，请李宗仁到休息室去吃茶。

进到休息室，毛泽东请李宗仁坐在沙发上位，李宗仁赶忙说："主席在这里，我怎么好坐在上位呢！"

毛泽东说："你比我年岁大，是老大哥，应该坐在这里。"

坐下后，毛泽东点起香烟，和李宗仁谈起了眼前的这场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他说："群众是发动起来了，群众一起来，那就不能完全依靠个人的想法去做了。"

"火头是我烧起来的，点火容易灭火难呀。看来这火还要烧一个时期。你对这场运动怎样看？有什么意见？"

李宗仁很谦逊地说："毛主席高瞻远瞩，英明伟大，古今中外任何国家领袖，没有一个人能有这么大的魄力来发动

这场革命。目前虽然稍乱一点，但是为子孙后世着想是要付出一些代价的。”

李宗仁又把北伐时期，在武汉和苏联顾问鲍罗廷的一段谈话讲了一遍：当时革命军打到了长江中下游，攻克了重镇武汉和南京，由于革命队伍内部发生了严重分裂，李宗仁由南京到武汉进行调处。在他会见鲍罗廷的时候，除了对革命形势做了分析外，鲍罗廷说革命就是和妇女分娩一样，为了生儿育女，就难免这一时之苦，受了这个痛苦就换来了将来有子女的幸福。李宗仁对鲍罗廷说：“痛苦对产妇来说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作为一个助产生就要尽可能减少她的痛苦。”李宗仁用这段回忆来比喻文化大革命，他的意思是说当前的乱是为了未来的治，作为领导人要尽可能缩小这乱的范围和程度。

毛泽东认为李宗仁的话很对，并且表示他也正在做这个制乱的工作。并说明当前的问题很多，要一件一件地去解决。譬如红卫兵小将们给各民主党派下“哀的美敦书”，勒令限期取消组织，这是不可以的；听说他们砸烂政协，反对统一战线，这更是不对的。接着，毛泽东把统一战线在民主革命中的作用、贡献和社会主义时期统一战线的必要性做了说明。最后，毛泽东明确地说：“民主党派不能取消，这要对红卫兵说清楚，有些人可能听不进去，但这要好好地做工作，说服教育他们。李先生，你的看法怎么样？”

李宗仁急忙连声说："毛主席英明高见，我从前根本不晓得这些道理，今天算是顿开茅塞。"

毛泽东和李宗仁走出休息室，回到原来的位置上，继续检阅游行队伍。检阅刚一结束，就有几位新闻记者围住了李宗仁，询问毛泽东和他谈话的内容。李宗仁说："只谈家常生活，没有别的内容。"

这天上午，3000 多名工农兵代表、少数民族代表和红卫兵代表，分批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庆祝大会。中午 12 时，毛泽东接见大庆油田 3211 钻井队的伤员代表。

毛泽东还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了全国英模代表和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代表：北京大学聂元梓、北京师范大学谭厚兰、北京航空学院韩爱晶、北京地质学院王大宾。

蒯大富那天没有上天安门，而是在天安门城楼前的观礼台。9 月 30 日，贺鹏飞广播要蒯大富到静斋。蒯大富去后，贺鹏飞对他说："国庆有上观礼台的请柬，是贵宾台。给我们清华有几张，几个组织平分，给你们'井冈山'两张。"于是，才成立一个星期的清华"井冈山"蒯大富和彭伟民一起去了天安门观礼台。

1966 年 10 月 1 日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与群众在一起

大会结束时，毛泽东走下天安门城楼，穿过金水桥，走进群众队伍中，向大家祝贺国庆节日。整个活动持续六个多小时。这是毛泽东第四次接见北京和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和革命师生。

1966 年 10 月 1 日毛泽东在群众中，左面是总政治部主任肖华

1966 年 10 月 1 日毛泽东在群众中

1966 年 10 月 1 日毛泽东和周恩来等走下天安门城楼来到群众中

1966 年 10 月 1 日毛泽东、周恩来在观看节日焰火

1966 年 10 月 1 日刘少奇和江青在天安门城楼上

10 月 1 日晚上 19 点多钟，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在大会堂西门外登车出发。当车队到达南长安街南口时，又被红卫兵拦住了，他们一窝蜂似地涌上来，争着要看毛泽东。毛泽东的车无法前行，只能停下，后面的车队也都停下了。顷

刻间，他们就被包围在人海之中，任凭周恩来和中央警卫局的人怎么疏导也不管用。

林彪下车高喊:“我是国防部长，让我们的车到天安门参加晚会。”可是穿着军装、戴着红卫兵袖章的“副统帅”竟然指挥不动眼前的这些“红小兵”。洪水般的人潮涌过来了，毛泽东被挤伤的情况随时都可能发生。在这危急的关头，中央警卫团的领导带领警卫团的部队赶到了，北京卫戍区的机动部队也赶到了。两支部队硬是开辟出一条人墙通道，才使毛泽东等中央领导的车队安全地驶进天安门。

为了保证毛泽东从中南海到大会堂、到天安门的路线畅通、行驶安全，周恩来指示首都工作组着力加强这两条路线的警卫部署。郑维山、傅崇碧商量后，经报请周恩来同意，把这一任务交给了警卫三师，即原 70 师。警卫三师在大会堂西侧、南长安街、北长安街部署了一个加强团的兵力，以部分兵力执勤，主力作为预备队，以应付突发事件。为便于指挥，在南长安街南口开设了师指挥所，师长邱巍高坐镇指挥，保证毛泽东行车的畅通和安全。

10 月 1 日晚上，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观看烟火时同澳大利亚共产党（马列）主席希尔交谈。谈到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动机及其现状时，毛泽东说：“你应该到大学去看看。大学里有左派，有右派，有中间派。左派、右派都是少数，最多的是中间派。很多旧社会的知识分子，我们包下来了。他

们看不起工农群众，看不起工农出身的人。我们还得用他们，不用他们，我们的报纸就出不了，广播也播不出去。文学界、艺术界，也是他们的人多，全部改变要用很长的时间。”他指着广场上的学生说：“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就是怕这些学生，我们有些干部也是怕他们。”“你不要以为我们的环境那么好。我们有些干部不想革命了，中央委员也有，政治局委员也有，省委书记、地委书记、县委书记都有。他们就是怕。他们要调动军队来对付这些学生。解放军他们是调动不了的，他们就调动工人、农民来跟学生作对。”

当天晚上，毛泽东和朱德、周恩来等中央首长，从天安门城楼上走下来，走过了金水桥，来到了欢呼的群众中间，周围的人群沸腾了，大家争相拥挤跳跃，就要挤到毛泽东的身边来了。这可慌坏了周恩来和警卫战士们，他们站起来和战士们一起，与挤到前面的群众，手拉着手，臂挽着臂，结成一层层弧圈形的人墙，向外扛着，使群众和毛泽东之间保持一个尽可能的距离，人们就这样拥挤着，晃动着。

周恩来看着这个局面，生怕有什么闪失，就尽力地高喊：

“革命的同志们——，为了让大家都能看到毛主席，为了毛主席的健康和安全，请大家自觉的维持好秩序，一定要听毛主席的话，‘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请前面的同志们坐下来！请大家坐下来！”

于是，人们开始安静下来，由里向外一排一排地坐下来。

毛泽东和周恩来也席地而坐，与广场上的群众一起观看焰火晚会。一直到21点多钟，周恩来说天气太凉，劝毛泽东回去休息，毛泽东说："好。"

周恩来搀扶着毛泽东站起来，其他中央首长也站起来，警卫战士在前面分开一条通道，让毛泽东和首长们走回金水桥。

10月1日，有6位外国专家被邀请登上了天安门城楼，其中就有外国专家组织"白求恩——延安造反团"的头头、美国人李敦白。

李敦白出生于美国北卡罗莱纳州的查尔斯顿市的一个名门望族，富家子弟，英文姓名是Sidney Rittenberg，中译为悉尼·里滕伯格。他从小就"离经叛道"，17岁时开始参加工会和学生运动，支持黑人解放斗争，19岁成为一名美国共产党员。

1942年，当时还叫里滕伯格的李敦白应征入伍。根据当时美国的有关规定，他入伍以后不得不脱离了党籍。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陆军当局调他去学习日文，这让他十分恐慌。他想，日本肯定会战败，美军可能长期驻扎在那里。而中国是美国的盟国，胜利以后，自己就可以很快回国建设自己的国家。于是，他坚决要求去学习中文，并得到同意。1943年，他被调到斯坦福大学陆军语言学校学习中文。但他做梦也没想到，这"一念之差"竟改变了他一生的命运，而且在

中国一待就是35年。 1945年9月16日，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一个月，李敦白和他的战友们乘坐一架美军运输机，从印度东北部的阿萨姆邦起飞，飞越了长约800公里的“驼峰航线”，来到了中国的西南重镇——云南省昆明市。他被分配到昆明美军军法处赔偿损失部担任中文专员，专门负责调查美军在当地的违法行为以及当地的中国人向美国军方索赔的案件。在这里，开明书店的老板给他取了一个地道的中文名字——李敦白，这个名字就是在唐代大诗人李白的名字中间加了个“敦”字，代表正直，而且与“Rittenberg”谐音。

李敦白经办的第一个案件是一个12岁女孩的死亡案。这个案件的受害者名叫李木仙，是黄包车夫李瑞山的女儿，肇事者是一名美国空军上士。案件的原委是这样的：据后来这位美国空军上士在供词中说，他在肇事的前夜借了一辆军用卡车，开到城里去“寻花问柳”，错过了回营地的时间，于是索性灌了两杯烈酒壮胆开车回营地。在经过李木仙家所在的巷子里，李木仙正在踢毽子。这个美军空军上士见状，就想吓唬这个女孩来找点刺激。于是，他把车故意擦着小女孩的身边开过去，没想到把她撞死了，接着迅速逃离了现场。案子发生后，李木仙的母亲受不了这个刺激，精神崩溃，过了不久就去世了。李瑞山通过甲长、保长将索赔的要求送到了美国军部。经过多方交涉，最后赔偿费是26美元，但由

于甲长、保长等中间人的盘剥，到李瑞山手上的只有 8 美元。一条人命只值 8 美元！这对于崇尚人权高于一切的美国人来说，简直是不可思议的。这个案件对李敦白触动很大，用他自己的话说，在一定程度上正因为此事他才留在了中国。

李敦白的工作，使他有很多机会接触到中国社会不同阶层的人民，渐渐看出国民党当局的腐败和黑暗的统治，更对传说中廉洁并且充满理想的中国共产党产生了强烈的好奇心。为了进一步了解中国的社会状况和学好中文，李敦白经常找街头的报童购买中国报纸杂志。这位没有了党籍的美国共产党员，很喜欢阅读中国共产党主办的《新华日报》和《群众》杂志。日子一长，那位报童和他熟悉了，有一次，报童悄悄地问他："你这么喜欢看共产党的报纸杂志，那你想不想与那些编这些报纸杂志的人见见面呢？"李敦白喜出望外，就随报童去见了当地的两位中共地下党员。几次见面后，地下党员了解了他的经历，就慢慢向他讲解共产党的方针、政策和八路军、新四军英勇抗战的事迹。

此后，李敦白常常利用美军的身份，替地下党朋友购买一些紧俏的商品，甚至用美军的吉普车，把上了国民党反动派"黑名单"的地下党员转移到城外，帮助他们脱离险境。

1945 年 11 月，在昆明的美军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准备复员回国了。可此时的李敦白由于与地下党员的频繁接触而一改初衷，他想留在中国，并渴望能到延安去看一看。为

了避免退伍回国，他想方设法调赴上海的美军陆军总部工作。经昆明地下党员的介绍，他和上海的地下党接上了头，并认识了宋庆龄。不久，通过宋庆龄的介绍，李敦白成为了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驻华办事处的救济观察员，任务是把救济粮食送往受灾地区，包括解放区。他非常高兴，从此脱离了美国军队。

1946 年是中国风云变幻的年代，内战随时都有可能一触即发。是年春，李敦白奉命押运救济粮食到湖北省境内的中原解放区。这个任务让李敦白喜不自禁，因为他正一直想找机会亲眼一睹解放区的景象。但是，救济善后总署的官员在行前对他说的一番话却在他的心里蒙上了一层阴影。那位官员对他说："你去了以后，要注意收集共产党的情报。"

## 第 234 回：弄潮儿，李敦白参加造反

## 细斟酌，再解释“资反路线”

李敦白到达中原解放区的首府——宣化店后，在这个被国民党军封锁的贫穷的地方看到了和国民党统治区截然不同的情形，这里没有死尸，没有娼妓，甚至没有乞丐。在共产党的组织下，当地农民通过公开讨论决定救济粮食的分配。在这里，李敦白还结识了李先念、王震、王树声等共产党的高级将领。工作之余，李敦白经常到王树声的驻地找他聊天，时间一长，竟被王树声的那种身陷敌军重围而不惊、对中国革命必胜的乐观情绪所感染。若干年后，有人问及李敦白为什么在中国内战爆发后没有回美国，反而投身于共产党的革命事业时，他说：“当年在宣化店，认识了一个叫王树声的将军，是他对中国革命必胜的信心使我决定留在中国。”5 月 8 日，李敦白的工作刚刚结束，他得知了中共代表周恩来和国民党代表王天鸣、美方代表白鲁德组成的军事停战三人小组即将要到宣化店进行“和平调处”的消息。

说来也巧，国、共、美三方代表到达不久，李敦白就在厕所里碰到了白鲁德，白鲁德毫不隐讳地警告他不要在此久留：“我可以告诉你会发生什么事，这里的人将会被消灭掉。我刚从东北回来，那里的共军是政府军的十倍，政府军不可能获胜。但是政府军在这里却占上风，所以我们决定让他们歼灭此地的共军。”

白鲁德的话让李敦白很是诧异，同时也让他看清了美国政策的本质。用他后来在回忆录里的话说，“就在宣化店的茅厕里，我来到了人生中最大的转折点。”李敦白打定主意，决定把这个情报透露给李先念。

当天晚上，国、共、美三方代表举行第一次会议。在这里，李敦白第一次见到了仰慕已久的周恩来，并被周恩来的精彩演讲所折服。散会后在回住地的路上，巧遇周恩来和李先念。李先念把李敦白介绍给周恩来：“这是我们的美国朋友，李敦白。”

周恩来握着李敦白的手说：“我在会场上看到你，你给我的掌声比给其他人的都热烈得多。这样做不够明智。他们会注意到你的反应，等你回到国统区后工作便没那么容易了。你应该更加谨慎才是。”

李敦白惊诧于周恩来的洞察力，不禁问周恩来，大厅里那样昏暗，他怎么会看到了他，为什么又要对一个落单的美国人如此注意呢？周恩来回答说：“照顾国际友人是我们的工作，我现在很忙，以后有机会到南京去见面吧。”

在送别周恩来后，李敦白把白鲁德的话转告给李先念。李先念向他表示感谢。虽然李先念率领的部队已经做好了应战的准备，但李敦白的情报让他们更坚定了这一点。

回到上海不久，李敦白辞去了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的工作，并决定立即回国，不再替美国政府干那些支持蒋介石打

内战的勾当。他去向宋庆龄辞行，宋庆龄劝他先别急着走，并建议他“至少向周恩来道了别再走。”于是，李敦白从上海来到了南京的梅园新村拜访了周恩来，并表达了回国的想法。周恩来听后，向他分析了中国的形势和解放战争的发展前途，然后对他说：“回国前你应该到延安去一趟，你应该拜会毛主席，和他谈一谈。你其实应该去看看那些比较老的解放区，在那里已有相当规模的建设。宣化店的情形只是一时的。这样你回到美国后便有更多的东西可以讲，更多的内容可以写。”

在周恩来介绍下，李敦白经北平辗转来到共产党在华北控制的最大城市——张家口。在这里，李敦白看到了当地与宣化店不同的新气象：这是一个有一定规模的城市，有烟厂、大学、医院，等等。他拜会了时任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的聂荣臻。聂荣臻告诉他，等共产党掌权以后，还是要跟美国来往的。因此，他们正在成立一个英语电台，以便直接向美国人民介绍中国共产党的主张。从此，李敦白就在新华晋察冀总分社开始从事英语广播的翻译、修改和播音工作。不久之后的 1946 年 9 月，在国民党军傅作义部大规模进攻晋察冀，进逼张家口之前，聂荣臻派人护送他前往延安。经过一个半月的长途行军，他终于到达了向往已久的革命圣地——延安，并在这里担任了新华总社的英语专家，负责翻译和修改稿件。李敦白认为自己在为这个古老的国家的巨变

留下记录，因此他安下心来，打消了回美国的想法。

还在张家口时，李敦白就已经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到了延安后他再次提出了这样的要求，并且请在中原解放区就相识的李先念、王震作为自己的入党介绍人。经过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这中央书记处五大书记的直接批准，李敦白成为当时惟一的外籍中国共产党党员。 此后不久，美国左派作家、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第二次到延安采访，新华总社的负责人廖承志委派李敦白担任翻译。

李敦白的工作得到了中共中央领导人的肯定。1946 年底，毛泽东在同几个西方记者谈话中说："现在有两种美国人，马德海、李敦白、史沫特莱都是好的美国人，在延安有个斯特朗也是好人，这样的人我们都欢迎。"

1949 年，李敦白卷入了当时苏联的"斯特朗国际间谍案"：1948 年底，在莫斯科帮助编辑英文报纸《莫斯科新闻》的美国左派作家安娜.路易斯.斯特朗从美国赶回苏联，准备再去即将解放的北平。在途经东欧的时候，她兴奋地发表了一篇文章，说中国革命是自主的胜利，并不是搬用苏联模式。不想这惹来了祸端。她刚刚抵达莫斯科，就被苏联的"克格勃"逮捕并且被驱逐出境。苏联方面认为她涉嫌"间谍和损害了苏联利益"，此外也认定了她布置了一个遍布世界的"情报案"，李敦白也受她的领导，负责收集中国的情报，并通知中共方面，把李敦白抓起来。

1949 年 1 月 21 日，李敦白收到了一份紧急调令。他的直接上级廖承志把他叫到家里，说中央准备派他“到北平执行特殊任务”。他当时想，解放军已经包围了北平，可能是去当翻译，或执行有关中美建立外交关系的任务。可是，他被带到另外一个村子，有人指控他“接受美帝国主义的指示，破坏中国的革命”。他惊讶地说不出话来。仔细回想了到中国以后的全部经历，包括和斯特朗的关系，再三申辩：“我和美帝国主义没有任何关系，我不是间谍。我那么热爱中国人民，为共产主义理想而奋斗，你们为什么把我当成敌人呢？我所说的一切，你们都不信。你们要我承认的，我又没有干过，那怎么办呢？这一定是个可怕的错误。”但是，他的辩解没有起到任何作用，他被关押在北平郊区的一个窗户被封死、前后只能走四步的小屋里。突如其来的牢狱之灾超出了李敦白的承受能力，经常性的审讯使他的精神几乎崩溃。

1950 年春的一天，监狱长找到李敦白，告诉他：“我们现在基本上了解你了，但是，我们还是得了结你的案子，还需要不少工作。在这段时间里，你还是不能出去工作或学习。否则，如果你放弃与中国的所有关系，你将获准回到美国。”对此，李敦白后来回忆说：“我根本没有考虑他的话，回去我能做什么？美国那时到处都在迫害支持中国的人，回去了我只能做反华派。”于是，李敦白决定继续留在狱中改造自

己的思想，并给自己定下两条原则：一是不论受多大委屈都不能不爱中国，二是不论受多少苦都不能被整垮。

1953 年初，斯大林逝世，之后大量斯大林时代的冤假错案获得了平反，“斯特朗国际间谍案”也在其中。1955 年 4 月 4 日，李敦白终于结束了长达 6 年的牢狱生涯。那天，组织上派人向他宣布：“我们花了许多时间精力调查你的案子。我们发现你是一个好人。你一直被冤枉坐牢，受了很多苦，我代表中国人民政府和公安部门，为这项错误向你道歉。”

事隔多年，1964 年 1 月，毛泽东在北京宴请包括斯特朗和李敦白在内的外国朋友时承认了当年的错误并当面道了歉。毛泽东对斯特朗说：“当你在延安的时候，国民党开始轰炸了。我们担心你的安全，就让你走了。如果你那时留在延安，就不会当作间谍在莫斯科被捕了。”

毛泽东又朝李敦白说：“你被牵连到她的案子，我们犯了一个很坏的错误，你是一个好同志。”

出狱后的李敦白很快恢复了党籍，他来到缺少外国专家的广播事业局工作。6 年的监狱生活，并没有使李敦白对中国共产党丧失信心，仍然一如既往地献身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事业，并要求加入中国国籍。但周恩来认为，他保留美国国籍更有利于中美的友好交往，于是，他听从了劝告，保留了美国专家的身份，成为当时广播事业局英语组唯一的外国

专家。

1966 年 10 月 1 日这天，李敦白得到了一次特殊的荣誉，他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等 6 位外国朋友被邀请登上了天安门城楼。而在以前，北京的外国专家都是在天安门城楼下面的观礼台上观礼。

登上天安门城楼，这让李敦白受宠若惊。11 时左右，他走到休息室，看到邓小平一个人坐在桌前，手里拿着一瓶橘子汽水。李敦白也拿了一瓶橘子汽水走向那张桌子自我介绍说："邓同志，我是李敦白。"他边说边向邓小平伸出手，他以为邓小平不认识他。

"噢，是，是，是。"邓小平露出谦虚的微笑，"是，我认识你。"邓小平站起身和他握手，然后他们便坐下来。李敦白想着跟邓小平说些什么，但他看的出来，邓小平此时并不想说话。

11 时过后，毛泽东也缓步走向后面的一排红丝绒沙发椅坐下来，点燃一根小雪茄。接近 12 时，许多人纷纷过来找毛泽东在《毛主席语录》上签名。李敦白也立刻跟上去，挤到毛泽东跟前，"主席，"他按一般的习惯称呼他主席。

"Rittenberg"，毛泽东一音节一音节地念出李敦白的英文名字，然后得意地大笑起来："我学英语学了好长一段时间，但好像就是学不好。"

"不过，您念我名字还是很准，"李敦白说，"您能不

能给我的红宝书签个名？”

毛泽东从李敦白手里拿过《毛主席语录》，再接过他手里的笔，然后问：“你要我在书上写什么？”

李敦白的大脑此时一片空白，唯一能想得到的就是:“您的名字就好。”于是，竖写的“毛泽东”3 个字漂亮地落在扉页的边缘，一笔呵成。

后来，李敦白回忆这件事时还懊悔不已：“我应该要他写下对群众的新指示，或是他的著名诗句，或是对我个人的赠言，要不就是给美国人民的一句话，还是给谁的一句话，但当时根本想不起来。”

6 位登上天安门城楼的外国专家被邀请分别同毛泽东合影。

李敦白回到机关以后，人们都拥了过来，说：“老李，你和毛主席握手了呢，你洗手了没有？”他说：“没有洗。”于是，大家抢着和他我握手，办公室外面还有 40 多人排队等着和他握手。

第二天，《人民日报》和所有的报纸都在第一版上刊登了毛泽东和李敦白的合影。于是，李敦白的大名不胫而走，传遍了全中国。

林彪“十一”的讲话稿，是由陈伯达和张春桥一起起草的。其中有一句说：“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资产阶级反对革命路线的斗

争还在继续。”

“资产阶级反对革命路线”，显然就是“刘少奇路线”的代名词。自从毛泽东写了《炮打司令部》，江青便作了“注释”。她说：“北京有两个司令部，一个是代表无产阶级的司令部，一个是代表资产阶级的司令部”。

关锋又对江青的话，作了“发挥”：“无产阶级的司令部就是毛主席的司令部。资产阶级的司令部是某几个中央领导同志的司令部。”

姚文元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写了一张题为《永远跟着毛主席前进》的大字报，提到了路线问题：

“炮打司令部，指的是什么呢？就是用马列主义的炮打，毛泽东思想的炮打，打掉司令部里的一切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反动路线。”

随着反工作组的斗争逐步深入，一次又一次提到了“两个司令部”的斗争，于是，“两条路线斗争”也由“秀才”们提出来了。“两条路线”中的一条，早已见诸于报刊，即“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那么，与之对立的叫什么路线呢？按照“对偶”的原则，王力提出了“资产阶级反革命路线”，陈伯达把这个“新名词”写入了讲话稿。

在中央开会讨论的时候，陶铸觉得“资产阶级反革命路线”用词太凶，容易把执行“资产阶级反革命路线”的人等同于“反革命”，扩大打击面。

毛泽东说："反对革命不等于就是反革命。"

周恩来赞同道："主席说得对，要把反对革命和反革命加以区别。"

陶铸建议加一个"对"字，变成"资产阶级反对革命路线"。所以10月1日林彪的讲话中用了"资产阶级反对革命的路线"。

但是，当天对外发稿时发现，"反对革命"和"反革命"这两个词，用外文翻译出来并没有区别的。江青让中央文革小组立即开会讨论研究一下。

八届十一中全会后期，关锋在小组讨论时曾提出过"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讲法，在当时就引起人们很大的关注。不过在后来发表的公报上没有采用关锋的提法。当10月1日晚上讨论时，陈伯达说："还是关锋的提法好，'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家都表示赞成。江青当即让关锋就此提法给毛泽东写信报告。毛泽东同意"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提法，并把关锋的信批给其他中央领导。

当晚，当毛泽东和中央领导在人民大会堂北京厅集合，准备乘敞篷车去看焰火时，张春桥向毛泽东说起"资产阶级反对革命路线"一事，毛泽东答道："以后就提'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在谈论运动的发展情况时,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大都认为中央和地方上许多领导人对这场文化大革命实际上还是"很

不理解,很不得力”。毛泽东也认为运动的阻力不小,应当彻底批判刘少奇的“错误路线”。他表示,文革一定要搞下去,甚至说:“文化大革命是要搞到底,要枪毙,我和你们一起枪毙。”

第二天,10 月 2 日,《人民日报》提前转载将于 10 月 10 日出版的《红旗》杂志第 13 期社论《在毛泽东思想的大路上前进》,把林彪在“十一”大会上讲话中提到的“同资产阶级反对革命路线的斗争”改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社论说:

“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是两条路线斗争的产物,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战胜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产物。”

社论号召:“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彻底批判。”“要不要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能不能贯彻执行文化革命的十六条,能不能正确进行广泛的斗批改的关键。在这里,不能采取折中主义。”

讨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词和 13 期《红旗》杂志社论时,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碰头会的周恩来因事没有参加。张春桥在北京厅向毛泽东提到这一问题时,周恩来恰巧也没有在。他第二天看到社论后,就问执笔此社论的关锋和王力,为什么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词?关锋向他解释了半小时,说民主革命时期同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对于路线的提法

应当不同。周恩来还是不理解，他对王力说：“党内路线问题只有‘左’、右倾机会主义的提法，怎么用了‘资产阶级’，还‘反动’呢？”

王力说：“这是在‘十一’晚上，毛主席的意见。”

周恩来说：“好吧，我去问问主席！”

据王力回忆，周恩来专门向毛泽东请教过，他问：“主席，党内历来提路线问题都是提左倾、右倾，没有反动路线这个提法，这样提合适吗？”

毛泽东回答说：“原来用 Counter－revolutionaryLine，反革命路线，后来改成 Anti－revolutionaryLine，反对革命路线，最后觉得还是用 ReactionaryLine 反动路线好。”

周恩来听后说：“我懂了。”周恩来以后就照着毛泽东的口径讲了。

第 235 回：下文件，转军委《紧急指示》

誓师会，众群众涕泪满襟

国庆节的晚上，在天安门城楼上观看焰火时，陶铸的女儿陶斯亮看见了毛泽东的女儿李讷，李讷热情的拉着陶斯亮的手说：“走，去看看爸爸去！”

她们一起来到天安门城楼上的休息室，只见毛泽东一个人正在里头抽烟。陶斯亮紧张得透不过气来，站在那儿讷讷地说：

“毛伯伯，您还认识我么？”

毛泽东微笑着，用浓重的湖南口音说：“亮亮么，陶巨的女儿。”

他将陶铸的“铸”念成“巨”

陶铸进来了，他对毛泽东说：“亮亮是逃跑出来的。”

毛泽东问陶斯亮怎么一回事？陶斯亮慌乱地、前言不搭后语地将学校不让他们串联，他们又怎样“冲破阻力”到北京的事情说了一遍。

原来，陶斯亮此时所在的上海第二军医大学，简称二医大，干部子弟多，得风气之先。自从军队院校开展“四大”后，和地方院校一样，二医大也为“校党委是不是执行资反路线”形成两个阵营。

8 月底，二医大学员中的少数派部分骨干汪志杰、钱信莎等人在海医系操场碰头，讨论学校的文革形势，对于运动

以来校党委的许多做法表示了强烈的非常不满，认为必须尽早向上级汇报，由总后党委来解决和纠正学校领导的问题。

钱信莎主动提出去北京，并于 8 月 29 日带了两位同学启程北上。就在她们走后的第二天，整个学校就沸腾了，大字报指名道姓地将钱信莎三人称为“逃兵”，声言要抓“逃兵”。

面对如此局面，少数派骨干数次碰头，认为学校运动的形势已经变得更加糟糕。由于无法与钱信莎联系，到了 9 月中旬，他们觉得不能再等了，要更多的人去北京向上级汇报，形成声势。于是，汪志杰和另外 11 名同学同时离开学校，于 9 月 15 日到达北京。第二天一早，学校就掀起了第二波抓‘逃兵’的热潮。

而陶斯亮则是在 9 月 13 日晚，与二医大另外 5 名女生一起，在哈军工“红色造反团”赴沪串联的学员鼓动下，离沪乘火车赴京的。到北京后，在中南海见到了李讷，她们早就认识，李讷拉着陶斯亮就往她住的小屋去。虽然毛泽东就住在中南海游泳池，但不愿意女儿沾他的光，而江青从上海回来后，忙于文革的工作，住到钓鱼台了。于是，李讷只能一个人住了。陶斯亮这是第一次上李讷的小窝拜访，她的住所与毛泽东的宅院一墙相隔，只是一间小屋子。她在中南海大食堂搭伙，有时赶不上开饭就啃烧饼下挂面吃。李讷生活得如此清苦，使陶斯亮感到意外，也有点同情。“当毛主席

的女儿太苦了！”她徒生感慨。分别时，李讷送了一只长毛绒玩具小狗给她，还是外国货，在那时是很稀罕的，陶斯亮自然是珍爱有加。

这就是陶铸说陶斯亮是“逃出来的”的原因。

左起：李讷、林豆豆、聂力、陶斯亮 1961 年摄于深圳罗湖桥头

毛泽东听了陶斯亮的叙述后，对自己的女儿说：

“李讷，你就没有亮亮的造反精神。”

此时，陶铸有事出去了，偌大的休息室里，只有毛泽东、李讷和陶斯亮三个人。毛泽东谈笑风生，对陶斯亮说：

“陶斯亮，陶元亮，你就是如此这般的陶渊明。”

元亮是陶渊明的字，毛泽东在和陶斯亮开玩笑。

中共中央、国务院 9 月 5 日关于串联的《通知》下发后，军队院校也有师生要求进京串联。林彪要军委副主席兼秘书长叶剑英召开军委扩大会议，同各总部，各军、兵种的负责人一起讨论一下，看看究竟怎么办。在会上，大家提出，军

队的院校师生进北京来见毛泽东是完全可以的，但是接见以后，必须立即返回原单位，不能同地方的学生搞串连，不能干预地方的“文化大革命”。于是，总参、总政于 9 月 12 日发出的《关于组织军队院校革命教职员工来京参观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通知》，对军队院校师生进京接受毛泽东的接见作了三条规定：第一、军队院校的师生可以分期分批地来北京，接受毛泽东的检阅，但是接见以后，必须马上返回原单位。第二、来北京以后，一定要模范地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一切行动听指挥，要有组织地来，并且一定要有领导带队。第三、来京以后，由军队负责接待，不准到外面去串连。

接到允许军队院校学院进京串连的通知后，二医大的大部队来到北京，于是总后领导要求先期到京的钱信莎等人归队，他们不从，总后部长邱会作决定：强行归队，如不执行，以军纪论处。

9 月 25 日，邱会作与总后副部长饶正锡在总后办公区指挥了二医大对钱信莎等人的围攻，将他们从总后大院抓了出去，在二医大进京的大部队内部看管起来。

9 月 27 日，由二医大学校领导主持，二医大学员在其临时住处后勤学院召开“民主辩论大会”。大会进行过程中发生混乱，二医大少数派趁乱抢走钱信莎等人。抢人时钱信莎的衣服被撕破，皮肤被抓伤。被撕坏的衣服，还有一封血书，

被送到全军文革办公室，又由当时的全军文革小组组长刘志坚送到了钓鱼台。

不过后来二医大“红纵”的报纸《红色造反报》1967 年 2 月 4 日的一篇报道：《叶群同志会见“红纵”等革命造反派代表》，引用叶群的话说：“有件衣服（指钱信莎受围攻时被撕坏的衣服）撕掉了扣子，还有一封血书。林豆豆拿着衣服给他爸爸看，几位副主席都在场，我在旁边看着哭了。林副主席看了很生气，由他建议起草了《紧急指示》。”

而据林办秘书张云生回忆称：“此时，又有上海二医大‘红纵’的一个红卫兵代表，拿着‘血衣’，来见林彪、叶群，要求给予支持。林彪脑子一热，又要采取行动了。1966 年的国庆节一过，林彪告诉赵根生，立即把全军文革的负责人找来。他指着二医大送来的血衣对大家说：‘如果我们不支持学生造反，就要犯大错误。’接着他指示，要对军队院校被打成‘反革命’的学生一律实行平反，要销毁一切有关他们的‘黑材料’，要允许他们搞‘四大’，要支持他们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要准许他们去全国各地‘大串联’。林彪指令全军文革据此拟一份军委命令，准备以布告形式张贴出去。”

全军文革小组根据林彪指示，很快就草拟了《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林彪看后将文件草稿送中央文革小组审改。

陈伯达、江青、康生、张春桥对文件草稿进行了逐字逐句地修改，在其中“以前军委总政对院校文化大革命的个别规定，……已不适合当前的情况，应当宣布取消”一段中，增加了“关于军队院校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在撤出工作组后由院校党委领导的规定”一句，将这句话改为：“以前军委总政对院校文化大革命的个别规定，如关于军队院校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在撤出工作组后由院校党委领导的规定；……已不适合当前的情况，应当宣布取消。”

刘志坚阅后立即将此事向军委秘书长、具体分工负责军队院校工作的军委副主席叶剑英作了汇报。在中央文革小组讨论这个文件时，刘志坚对取消军队院校党委领导运动一条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觉得：“文件中首次取消党委领导，这在我军是史无前例的。”经过争论，这一条还是通过了。

中央军委常委会上，经中央文革修改后的《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文稿，除作了几点补充限制规定，如：不要干涉、介入地方的文化大革命；有一些学校，如护士学校等，主要进行正面教育；院校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时间，大体上可搞到明年 1 月份；军级和省军区机关的运动，暂不进行运动等等外，基本上都通过了。林彪亲自拿着经军委常委会通过的文稿当面请示毛泽东，得到毛泽东的同意。

10 月 4 日下午，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召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听了林彪、周恩来、陶铸汇报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情况后，毛泽东认为，文化大革命经过 8 月到 10 月的发展，已取得经验，形势是好的。为了进一步排除所谓来自党内各级干部的阻力，提议将各省、市、自治区党委负责人、中央各部委党组织负责人召集起来，举行一次中央工作会议，以便集中解决各级干部的“中间”问题。

10月5日，中共中央以中发［66］515号文件批转军委、总政《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称：“这个文件很重要，对于全国县以上大中学校都适用，同样应当立即向全体学生和教职员工原原本本的宣读，坚决贯彻执行。”

《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中写道：“根据林彪同志的建议，军队院校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必须把那些束缚群众运动的条条框框取消。”

同时指出：“要注意保护少数，凡运动初期被院校党委和工作组打成‘反革命’、‘反党分子’、‘右派分子’和‘假左派、真右派’等的同志，应宣布一律无效，予以平反，当众恢复名誉。个人被迫写出的检讨材料，应全部交还本人处理，党委或工作组以及别人整理的整他们的材料，应同群众商量处理办法，经过群众和被整的人的同意，也可以当众销毁。

以前军委、总政对院校文化大革命的个别规定，如关于军队院校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在撤出工作组后由院校党委领导的规定；关于指挥学校的学员队开展文化大革命的作法与连队相同的规定；关于只在军种兵种院校范围内不在军种兵种院校范围外和地方学校串连的规定等，已不适合当前的情况，应当宣布取消。”

《紧急指示》要求军队院校完全按照《十六条》的规定办，开展“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在这方面，军队院校要做出好的榜样。

10月5日这天，总政召开全军院校文化大革命动员大会，传达军委《紧急指示》，陈毅在会上做了形势报告，叶剑英在会上作了讲话，他说：

“我们真正认识到毛泽东思想是世界人民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我们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作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阶段，毛主席能否领导我们取得世界革命的基本胜利呢？我说：一定可以！我这样说是有根据的，根据就是主席很健康，主席的健康就是革命的胜利，主席的年纪最少要超过齐白石。我们主席今年73岁，还能横渡长江，一个多钟头30多华里，到98岁还有25年。在毛主席的领导下，25年，在今天强大的社会主义中国和世界的形势下，一定能解放全世界。”

“中央最近决定，让林彪同志作为我们的副统帅，这是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最可庆幸的大事。还应该指出的是毛主席从 1928 年起经过 38 年的观察，林彪同志从 1927 年参加南昌起义，1928 年上井冈山，以后一直在毛主席身边，向毛主席学习军事指挥，理论等方面是最好的。在党的领导干部中，特别在军队领导干部中，最全面掌握毛泽东思想，而且年纪最轻，身体也最健康，今年才 59 岁，是领导中最年轻的。而且身体经医生多年检查，从头脑到内脏没有什么毛病。林彪同志只有局部神经受伤，不会影响思考和健康。因此，他是最优秀、最健康、最年轻，是最有能力领导我们的。我们不仅要宣传毛泽东思想，而且要向全国、全世界宣传毛主席和林彪同志的健康，这是极大的政治意义。”

“现在又有文革小组，党的领导是不是要保证呢？我们考虑，干脆重新组织文革小组，党的干部也参加选，好的就选上，群众认为不好的干部就让他选不上。运动有多长时间，文革就领导多长，小组随运动多长就多长。（军委研究）运动结束时再选党的领导，再重新产生革命的领导，就好比我们党的代表大会期间的代表大会主席团，到开代表大会时，上届中央委员会就把权交给大会主席团了。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通过运动产生更加坚强更加有力的领导。”

杨成武在会上讲话："我完全拥护毛主席、林副主席、中央军委、总政关于军队院校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这个指示是非常英明正确，又非常及时的。"

肖华在会上讲话："部队院校也有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牛鬼蛇神，要统统把他们揪出来，把修正主义的根子给挖掉，把教学工作中的旧框框、旧条条，统统踢掉，让学生的精神面貌，通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焕然一新！不获全胜，决不收兵！我们部队院校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应该搞得更好！

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是我们一切行动的最高指示，是全党全军全国的统一行动纲领，毛泽东思想是我们最强大的思想武器，是全世界革命人民的命根子。毛主席是当代的马克思、活的列宁，是当代最伟大的天才！"

10 月 5 日当晚，在北京后勤学院的上海二医大学员少数派召开了各年级相同观点骨干会议，对于军委《紧急指示》，大家感到非常激动和兴奋，决定也成立一个群众组织，取名为"第二军医大学红色造反纵队"，这就是后来著名的"红纵"。

10月6日，北京"三司"联合北航"红旗"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全国在京革命师生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誓师大会"。由于这个大会的主题是批判工作组，从而引

起全国进京告状的群众及北京各学校受工作组迫害的少数派强烈共鸣，十多万全国各地在京师生参加了这次大会。

大会筹备时给中央领导人：周恩来、陈伯达、陶铸、江青、康生等人发出了邀请。10 月5 日下午，中央文革办公室的张根成急急来到“三司”，说大会送给中央首长的请柬不够，还要再送三个人。于是，很快就又补了三个人的请柬。

10月6日这天，除了毛泽东和林彪外，周恩来以下所有中央首长都出席了“三司”召开的这次大会。

大会开始，北航“红旗”代表井岗山第一个发言，他说：

“一切受到打击和压制的革命群众，必须统统解放！一切准备运动后期‘酢情处理’用的政治迫害材料，必须交出来，当众销毁！”

“天是塌不下来的，历史的长河决不会倒流，无论有多少妖风迷雾，有多少恶浪激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毕竟是大势所趋，不可阻挡，天大的阻力也会被强大的群众运动冲垮。毛泽东思想的革命路线必将取得最后的胜利！

我们是伟大的导师、伟大的统帅、伟大的领袖、伟大的舵手毛主席最最忠实的红旗红卫兵！我们庄严地向党、向毛主席宣誓：活着，为党的事业而战斗；死，为党的事业而献身。为了捍卫伟大的毛泽东思想，为了捍卫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革命路线，为了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我们

愿献出自己的一腔热血和年青的生命，千重困难，万道险阻，动摇不了红旗战士钢铁般的意志！”

他那超宏亮的声音和充满革命豪情的发言，激起全场热烈掌声。

王大宾和陈育延分别代表“地质东方红”和“清华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在大会上发言。广西桂林师范学院等全国各地十多个单位代表也在会上发言。

最后，大会主持请中央领导讲话，陈伯达首先请文化革命小组第一副组长江青讲话。

江青说：“同志们，同学们，你们好！我受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委托，问你们好。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全体同志问你们好，向你们致崇高的无产阶级革命敬礼。我们支持你们这种大无畏的无产阶级革命的英雄行为，我们学习你们这种不怕困难、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我们坚决和你们站在一起，捍卫和执行党中央十一中全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一个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者，一定要掌握原则、掌握政策，懂得策略。我希望同志们在大风大浪的锻炼中，掌握稳政策，学会善于运用斗争的策略，最重要的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原则基础上，在斗争的考验过程中，发展壮大左派队伍，团结大多数愿意革命的人，孤立打击那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党中央在10月5日批转了军委关于院校无产阶级

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现在请张春桥同志向同志们宣读，好不好？”

会场上齐声响应：“好！”

随后，张春桥宣读了军委和总政给中央报告和中央批转军委和总政《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

听了《紧急指示》，当时在场许多被打成“反党分子”、“右派”的学生、工人，看到平反有望，激动得热泪盈眶，“毛主席万岁”的欢呼声惊天动地。

周恩来在雷鸣般的掌声中讲话，他说：“今天这个会开得很好！如今，在这个地方，把中央的声音宣布了。过去各级领导和工作组对一些革命同学加以压制、围攻、斗争的，甚至搜查、压迫，这类的严重事情，宣告一律平反！”他说：“我没有更多的话要说了，我完全同意刚才江青同志讲的那段话。”

接着，他回答了群众提出的几个问题：

“有些半工半读学校，我知道还有一些工厂，对不同意见的人扣工资，这样的事情是错的，我们可以下命令叫他们工资照发。不仅工厂是如此，就是半工半读学校，放半年假闹革命期间，半工半读学校的待遇还应该照样给，不许打折扣。”

“刚才在这个地方讲了话的，南京大学‘八二七’串联会的代表说：我们有1300名师生，提出要求，由于地方上给他们很大的压制，关于这个问题，我们一定通知那个地方的工作组的上级负责人，一定叫他们回到那个学校里去。

另外，我们早就宣布过，任何学校的工作组，本身犯的错误，在学校犯的错误，应该随叫随到。如果他们的上级应该负的责任，那么上级就应该到学校检讨。”

许多外地在京上访的工人参加了大会的组织工作。湖南赴京告状的“黑鬼”代表在会上将湖南赴京代表叶卫东、张家政、易剑辉 3 人起草的《致党中央、毛主席的公开信》递给中央领导。信中提出了六项紧急建议和要求。其中提到：“请党中央和您亲自审查省委 9 月 24 日、28 日的两个录音报告。”

四川大学“826 战斗团”团长游寿星递了一张条子上去，说学校筹委会卡他们，不让他们继续留在北京，他们要求到各高等院校去学习革命经验。周恩来在会上念了这张条子，并指示：“让国务院秘书周荣鑫解决四川大学学生的住宿和生活问题。”四川大学留在北京参加这次大会的几十名学生兴奋地一下子都站了起来，高呼口号，尽情欢呼。

会上，张春桥看见蒯大富，对他招手说：“蒯大富，过来过来。”他把蒯大富拉到主席台另一边，介绍给江青说：“江青同志，这就是蒯大富。”

江青说："你就是蒯大富啊？"

蒯大富文革后回忆说：我"这是第一次见江青"。

会议最后一个议程是宣读誓词，通过《大会通电》：《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这份《通电》是北师大蒲寿章写的。

《通电》誓词本来在北航韩爱晶手上，他觉得井岗山已经代表北航"红旗"第一个发言了，很成功啦，自己再领誓，北航占得太多了。正好清华蒯大富坐在他旁边，他认为让蒯大富上去意义更大。于是就把稿子递给蒯大富说："誓词你来念吧!"

蒯大富接过稿子就上去了。

在大会进行中，有人把北航戴维堤受迫害时写的血书交给了周恩来，他看后交给了江青等人传阅，然后问戴维堤本人来了没有，要见他。

戴维堤穿着洗得发白、双肘上补着大补丁的蓝上衣，在全场 10 万多人注目下从广场下面走上了主席台，来到周恩来面前。他眼含热泪，紧紧握着周恩来的双手，激动得说不出话来。

周恩来也很激动，他对戴维堤说："你们是优秀的，不应当压制你们，应当为你们平反。我已经让国防科委的同志为你们平反。"说完，将戴维堤介绍给了江青。

江青握着戴维堤的手说：“毛主席听说你们被逼得写了血书，很生气。你们不要怕，中央支持你们。”

戴维堤激动地说：“请问候毛主席好，祝他身体健康。”随后，他又和主席台前排的陶铸、陈伯达、康生、谢富治、王力、关锋、戚本禹、张春桥、姚文元、肖华、杨成武等人一一握了手。

会上，关锋对北航“红旗”的韩爱晶说：“韩爱晶，毛主席最近说：‘告诉小将们，现在到了他们有可能犯错误的时候了。’”

## 第 236 回：看北大，有人要搬聂元梓　十月七，接见闽高校代表

北京大学校文革成立后，有些大字报讨论北大下一步文革运动如何搞。在众多大字报中，北大哲学系教师郭罗基的大字报提出了一个口号，叫“上揪下扫”，“上揪”，揪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根源，“下扫”，扫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影响。

10 月 6 日，北大物理系二年级的路远、周闯贴出《搬开聂元梓，北大才能乱》的大字报，如同在一湖平静水中扔进了一块大石头，整个未名湖为之动荡起来。

大字报说：“由于过去的原因，聂元梓是个当然左派。但是事务是发展变化的。试看聂元梓同志上台以后，长达两个多月，干出了几件好事来？”

大字报具体讲述了 7 个问题：

由于聂元梓主张在斗陆平时，要注意文斗，不戴高帽子等。大字报认为：

“（一）筹委会斗陆平，完全是为了给北大贴金（实则抹黑）。当时就是特别注意文斗为全国立个样子来。结果文斗变成温斗，后果不佳，只好又要选举。”

“（二）选举选举，选不出好班子来。此处浪费青春，外地正好革命，走了！那么多人发了紧急呼吁，要聂元梓等注意。可是他们却

置之不理，不抓事务苗头，忙于事务。三千人跑了，陶铸的信才来。聂元梓同志何其迂也！

（三）红五类早在‘八一八’以前就提出组织起来。在红五类子弟的大会上，聂元梓同志的讲话支支吾吾，避开组织问题，一再强调绝大多数同学，真是胆小鬼！看今日之北大，团结好了吗？

（四）聂元梓等同志上台之后，各种宣传机器把哲学系左派突出。特别是在展览会里，一没有突出毛泽东思想，二没有突出革命群众，那么到底突出了谁？北大校刊上聂元梓等七人的“只有无私才能无畏”一文，我们认为没有突出党中央、毛主席的正确领导。难道五二五大字报不是由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五一六指示的指导才写出来的吗？同志，当心名利思想的侵蚀！”

聂元梓在 1966 年 8 月 5 日关于工作组问题的广播讲话中说：“工作组是人民内部矛盾”，路远、周闯的这张大字报明确指出：

“（五）张承先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这是中央文革小组的结论。但群众只要这个结论就行了吗？同学中有部分人要坚持辩论，聂元梓同志你为什么不让展开辩论以肃清工作组影响？当初批判工作组，你认为是人民内部矛盾，后来怎么想通的？你是否知道群众想通了没有？”

“（六）自吹自擂选举校文革是什么巴黎公社全面选举。真的如此吗？学生占多数吗？改换候选人还没充分介绍、有的候选人本班都不知道，如此等等能算充分酝酿吗？人走了三千余，还说是全面选举，岂不给巴黎公社全面选举制抹黑吗？

（七）中央首长说：北大不一定去参加劳动。《红旗》发表社论，各校辩论两条路线轰轰烈烈，可是北大学生下乡，仍是冷冷清清，这是为什么？在每一个关头，必然有两派意见，聂元梓却总是压制一派反对的意见，起了捂盖子的作用。有聂元梓在上面压，北大的矛盾就露不出来。还有一部分人，谁给聂元梓贴大字报，就有人打着保护左派，爱护左派的旗帜压人，竟有故意贴住人家给聂元梓贴的大字报。我们认为两条路线的斗争形势是新北大能否诞生的关键。不能用庸人的观点，形而上学的观点看待这个问题。

聂元梓对那些压制民主的现象不加以制止。她还文过饰非，不承认错误。所谓支持抗大战斗队下工厂农村，纯系谎话。筹委会工作报告，大部分同志都不同意，还提了尖锐意见，可是却不了了之。我们劝聂元梓同志这次自动退位，当一名普通的积极分子。对革命，对本人无不好处加倍！！！”

这张大字报打响了随后发生的北京大学两条路线斗争辩论的头一炮，揭开了关于聂元梓和校文革执行什么路线大辩论的序幕。

紧接着，经济系左派杨勋当天也贴出大字报：《北大文化革命又处在关键时刻——兼评聂元梓同志八月五日的广播讲话》。

这张大字报的主要论点是“全校运动几乎处于停滞状态”，校筹委、校文革“执行了一条右倾保守的改良主义的错误路线”，在清除张承先反动路线在北大运动影响“这个关键问题上”“是采取了走过场的做法”。

大字报说：“8 月 5 日，聂元梓同志代表筹委会作了《对当前工作的几条建议》的广播讲话”，“是具有方向性错误的”，“它的基础是右倾保守的，改良主义的，折中主义的，调和主义的”，聂元梓“把这种个别现象当成了当时的主要危险”。“聂元梓同志 8 月 5 日的广播讲话给当时蓬蓬勃勃的群众运动泼了一瓢冷水，”“聂元梓同志的 8 月 5 日的讲话以后，由毛主席和中央文革小组重新发动起来的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又逐渐冷却了下去。”

“当时主要危险是许多人害怕清理，抵制清理，从而有可能使清理张承先工作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走过场。”

杨勋表示，她与聂元梓有过斗争，被“排挤”出校文革，受到“将近二个月有组织、有计划、有领导的围攻。”

她在大字报中说：“两个多月过去了。斗争陆平、彭珮云的大会开了若干次，校文革也选出来了，展览会也办起来了，论战的大字报

和辩论会也没有了，从表面上看似乎北大的运动一切都令人满意了，北大好像真的成了向其他单位传授先进经验的‘橱窗’了。但是，北大的运动究竟搞得怎么样呢？群众真正发动起来了吗？校文革选举真的符合十六条中提出的巴黎公社原则吗？运动真正触及了人们的灵魂了吗？活学活用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形成了吗？”

大字报最后说：“为了彻底清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对北大运动的影响，排除阻力，改变北大运动的落后局面，胜利地完成斗、批、改的任务，目前有必要就北大文化革命运动的根本路线问题展开一场大辩论。

我们希望校文革和聂元梓同志立即行动起来积极组织这场大辩论。”

随后出现许多响应路远、周闯和杨勋的大字报。同时也出现了许多支持聂元梓的大字报。

第二天，10月7日，北大校文革做出《立即行动起来，积极参加大辩论》的决定。

这天下午，在“五四”操场召开全校革命师生大会。聂元梓作动员报告，号召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投身大辩论，表示欢迎对校文革、对她本人、对各级文革来一个“大检查、大批判、大总结”。会

上传达了批转军委总政的“紧急指示”。聂元梓代表校文革对平反表了态。

10 月8 日，《新北大》十四期发表社论：“欢呼这场大辩论”。提出就校文革执行了什么样的路线“是非”开展路线大辩论。同期还登载了两种不同观点的大字报，其中第三版转载了杨勋的大字报《北大文化革命又处在关键时刻——兼评聂元梓同志八月五日的广播讲话》。

10月7日上午10时15分至13时55分，陈伯达、关锋、姚文元、戚本禹、穆欣、叶群在中南海接待站接见福建医学院“东方红战斗团”、厦门大学“红卫兵独立团”等8个福建院校及清华、北大、北师大等校的代表共70余人。接见时张春桥、关锋讲话，陈伯达和叶群还分别用闽南话和福建话和福建同学交谈。

张春桥说：“同志们提了很多问题，我想讲这样一个问题，明天是8号，《十六条》公布已两个月了，这两个月可以看出什么问题？林彪同志在国庆时说的两条路线斗争还在继续，在某些方面来说比《十六条》公布以前更尖锐更复杂。为什么呢？因为《十六条》公布以前，有些地方群众没有发动起来，《十六条》公布后，广大群众发动起来，有些原来的矛盾表面化了更尖锐了。《十六条》公布后，反对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人，有的精神准备不够，至今的确还不理解，有

的是坏人。《十六条》指出，有四种人而不是一种人。有些工人、农民很容易被挑动起来，他们保卫省、市委是出于对党、对毛主席的热爱，如果我是工人、军队，我也会去。有一条，军队不能动，这是中央的命令，要能动军队，那早就开枪了。全国还没有发生动军队。”

有同学插话：“有的公安部门已经动了。”

关锋说：“个别地方有动。”

张春桥：“正因为个别地方有，所以中央立刻下命令，这样才能保证，斗争虽然很尖锐，但是没有发生更严重事件，这说明了阶级斗争复杂、尖锐的。”

“同志们受到压力，受到迫害，是有困难的，这也证明这场革命是非常必要的，现在党中央毛主席领导下，还会发生这样的现象。如果政权掌握在别人手中，那你们向谁控诉呢？你们将会怎样呢？你们还会到这里来控诉？”

有个同学插话：“会被杀头。”

张春桥接着说：“看了条子，有几种感觉，同志们受压迫很重，较苦闷，问我们怎么办？我们俩（指关锋）刚才讨论一下，至于该怎么办，我们还得问你们该怎么办？”

同学们坚定地回答：“斗争到底！”

张春桥："不是中央没说过话，《十六条》不是写得清清楚楚吗！他们也都知道这是毛主席亲自支持制定的，而且有的人也参加了会议……"

同学插话："叶飞也参加了。"

关锋："不执行的还是不执行！"

张春桥："问题复杂就在这里，一开头中央就估计到，在八届十一中全会结束时，毛主席公开指出有两种情况：有的执行，有的不执行。全国都是这样。现在出现的情况，别的地方也有，有的地方比你们严重，有的地方比你们差一点。这是有普遍性。中央说一句话，各人都可以利用。《十六条》各人有各人的解释。林彪同志说：不要炮轰无产阶级司令部。你们说对不对？"

答："对！"

张春桥："林彪同志说的完全对！革命的同志应当清醒。但有的人抓住这句话，说我是无产阶级司令部，不能打我，林彪同志讲的话并不包括革命同志批评省市委。"

会场响起热烈的掌声。

张春桥继续："应该说：违抗《十六条》，攻击《十六条》的人，就是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这个司令部，就是以毛主席为首的司令部，"

再次响起长时期热烈掌声，并高呼口号：“毛主席万岁！”

张春桥：“你们回去要紧紧抓住毛主席亲自制定的《十六条》指示，别人不执行，我们执行，我们不折不扣地执行。讲道理就是讲《十六条》的道理，林彪同志的讲话，是根据形势的发展，精神还是根据《十六条》。”

“他们的压迫无非是政治上的压迫和经济上的压迫，中央发出的通知首都三个司令部物质待遇应当平等，中央文革小组讲了，周总理也讲了，但没用。不要以为中央讲了都会执行。到前天，第三司令部发通知，还是用手写的，请我们去开会，后来我们查问，为什么中央规定首都三个司令部待遇应当平等，你们不执行？后来就送来了铅印的通知，我把铅印的丢掉，手写的留下，可贵！”

会场热烈鼓掌。

张春桥：“我说这话无非是说革命还是要靠自己。把革命同志团结起来，形成坚强核心。”

“左派不可能很多，中间派跟谁跑就力量大。我们就要动脑筋和这些人打交道。如何去做工作，我们不要对过去围攻我们的同学闷一肚子气，大家都是同学么！”

关锋：“都是同学，都是阶级弟兄么，他们是一时受蒙蔽。”

张春桥："你们写条子上来，说要急着回去，回去前去北京几个学校去看，他们斗争比较尖锐，如北京航空学院、北京地质学院、北京师范大学、清华大学，有的被孤立时只剩下10个人。"

关锋："有的被关起来。"

张春桥："昨天去念通电的蒯大富那是翻身了，他以前就被打成反革命，你们去问问他们，他们的经验比我们多，当然我们也有受压迫，今天我们不在这里诉苦了。"

"现在开始变化了。昨天的大会就是标志，主席台上的人好多就是戴过反革命帽子的，我念决定时，台下很多人都哭了。你们以后就不要怕，中央有指示，现在不是同志了吗？中央的批示你们听到了吧？"

众："听到了！"

关锋："如果他们再戴你们的帽子，你们就叫他们把指示拿出来，读给大家听。"

## 第 237 回：索材料，地院三进地质部
## 夜半响，上海滩神秘抄家

10 月 7 日，周恩来就召开中央工作会议事致信毛泽东：“是否主席还在考虑目前开全国工作会议的利弊。如果主席认为时机尚早，今天还来得及以电话告大区、省市书记暂缓来京。如主席认为无需改动，即照通知进行。”

毛泽东当天批示：“照样开会，唯会期三天不够，需要七天。”

周恩来即主持中央碰头会，商量中央工作会议的准备工作。

这天晚上，远在上海的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接到叶群从北京打来一个电话，找陈丕显的爱人谢志成。谢志成不在家，陈丕显与叶群在电话里寒暄了一番。叶群问陈丕显身体怎样，谢志成和孩子可好等等，接着说：“中央要开工作会议，中央和林总、江青对你很关心，希望你能参加。八月中央全会你没来，林总怕你落后于形势，特地要我给你挂个电话，把他对你的关心之意转达给你。虽然你身体不好，但我想你还是尽量来，哪怕坐一两个小时听听也好。让小谢陪你一起来，我派飞机去接你。来的时候把老虎一起带来。”

“老虎”是林彪的儿子林立果的小名，细高个儿，长着白净的面孔，单眼皮，嘴角常挂着笑意。1966 年，他是北京大学物理系的一名学生，年仅 21 岁。北大停课后，他在家

里呆了几个月。大串联一开始，叶群向林彪建议，想让孩子们自己去“闯闯”，“锻炼锻炼”。林彪想了想说：“放到空军，我放心。”于是，林立果也戴上“红卫兵”袖章，到南方串联去了。

他到了上海，住在空四军政委江腾蛟那里，江腾蛟指定保卫干事和管理员分别负责安全和生活。江腾蛟还带着他参加各种会议，与各级领导见面。

此时的陈丕显，刚做完鼻癌手术不久，按医院安排，正准备到浙江去疗养一段时间。叶群的电话，让他颇费踌躇和疑惑：陈丕显与林彪、叶群很少联系，除他们来上海休养时去看看他们之外，平时几乎没有什么来往。今天叶群怎么突然亲自给他打来电话?更奇怪的是，中央工作会议为什么要由叶群通知呢?而且为什么电话又是找谢志成?

第二天，陈丕显和谢志成以及医院派出的医生、护士等一行登上叶群派来的飞机飞到了北京，同机的当然还有林彪的儿子林立果。

陈丕显和谢志成到北京后，刚刚住进京西宾馆，叶群就带着哈密瓜来看他们。

10月7日，农垦部部长王震贴出了《我的第一张大字报》。他自7月底回到北京以后，连续受到群众冲击，气愤不过，于是这次也贴大字报予以回击。随后，从10月9日起，王震又陆续贴出5张大字报，把肖克历史上的一些问题揭发出

来，从二、四方面军会师到1958年反教条主义等等，一时广为传抄，令肖克非常尴尬。

据说这事反映到毛泽东那里。毛泽东听了以后，说了两句话。第一句是："王胡子赤膊上阵了。"第二句是："你们不要斗王震了，你斗他，他真会打人的。"

10月7日深夜24时，与北航"红旗"观点接近的北航"东方红"突然全体集合，在院内集中贴出很多大标语：

"坚决要求罢罗舜初的官！"

"罗舜初顽固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彻底检查！"

之后，他们几百人的队伍开出航院，前往三座门全军文革接待站。甚至把"撤赵如璋的职!罢赵如璋的官!""不获全胜，决不收兵！"等大标语贴到北京市内一些非常显眼的地方。

10月8日,中央文革小组和中央军委在林彪主持下，在人大会堂东大厅开会研究国防科委问题。会上争论激烈，张春桥等认为罗舜初是对抗毛泽东的指示,与会的几位军委副主席不同意这样的说法。陈毅说，国防科委为了避免两派群众发生冲突，采取的措施是对的。罗舜初前后6次到学生中去，和学生一起席地而坐,商讨解决办法,怎么能说他拒不接见学生呢?

主持会议的林彪在会上也说："这个人过去很好嘛，现在搞得没有办法了。"

张春桥坚持认为罗舜初是对抗毛泽东的指示,因此必须罢官。

林彪说："先停职吧，这样主动一些。"

周恩来随即补充说明："不是罢官,只是停职反省,不是反党,也不是反革命,只是觉悟不高。"

10 月 8 日晚 20 时 30 分，在三座门全军文革接待站,刘志坚代表中央军委宣布了罗舜初停职反省的决定。北航"东方红"凯旋而归，全校轰动。与北航一路之隔的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派代表列队开进北航表示祝贺。

10 月 8 日，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第三次开进地质部，即后来说的"三进地质部"。这次他们带着乐队，开着宣传车，以毛泽东像为先导，浩浩荡荡来到地质部，在地质部大院召开了"庆祝十六条发布两个月，揭发批判何长工、邹家尤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并向何长工提出 7 项"严正要求"。深夜，又将何长工带回地质学院。他们此次找何长工，主要是为解决工作组在地院期间整理了一些群众的材料。这些材料一旦放进了这些师生的档案，这些师生将一辈子都会有问题，很难翻身。人们将这些材料称之为"黑材料"。

10月9日凌晨2时，李富春接见了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5位同学。他说：

"1、你们可以在地质部设立联络站。地质部拨房子给你们。地质部办公，你们办公，地质部的牌子你们的牌子互

不干扰。你们不要把地质部的牌子摘掉，地质部也不应把你们的牌子摘掉。

2、今晚你（指周荣鑫秘书长）同他们一起去，把工作队整理革命师生员工，包括干部的材料和已销毁的清单交出来，给‘东方红’总部，邹家尤可以留在你们那个地方，摆事实，讲道理进行辩论。

3、‘东方红’不是反革命的，要平反。叫何长工宣布，向全国宣布。

4、卓雄可以调回来。（卓雄是地质部副部长，因犯错误调到下面工厂，调回是因为‘东方红’同学了解情况需要）

5、下次开斗争会时，何长工、胥光义、赵承来、旷伏兆、卡固都要参加斗争会。”

9日上午，周荣鑫来到北京地质学院参加“东方红”主持召开的师生员工大会，传达了李富春凌晨两点作的5点指示，并根据中央军委的《紧急指示》，要求将在文革运动中师生员工被围攻的材料交出来，由学院各派出4人组成一个专案小组点清，暂时封存起来。

10 月 9 日这天午夜，在远离北京的上海，淮海中路武康大楼 3 楼 3 室，著名电影导演郑君里家，响起了急骤的敲门声。保姆把门打开，一群带着红卫兵袖章的人拥了进来，进屋之后，就将门关上。

被惊醒的郑君里和夫人黄晨赶紧出来，随即就被冲进来的人看管起来。这些人拉上窗帘，开始抄家。

郑君里家已被抄过，也算有经验了，并不很紧张，只是感觉这次与以往的几次抄家不同。

以前抄家来的都是一群十几岁的学生，指挥的也是年轻的学生。而这次抄家的“红卫兵”，年龄都在 25 至 30 岁之间。还有个年纪稍大的男人，戴着口罩，坐在沙发上，用眼神指挥着，看得出，他是头头。

以前抄家，又喊又叫，到处乱翻，屋里折腾得乌烟瘴气。这次抄家，来人语言不多，动作熟练，他们打开郑家所有的箱、柜、抽屉，只抄信件、笔记、日记、画报类，不抄财物。他们把每一本书卷曲，用大拇指指甲按着书页，迅速地逐页翻卷过去，查一下书中是否夹着纸头；每一本线装的书，都用事先准备好的竹片挑开，查看折页之中是否夹着什么。看得出，这是一批训练有素的人物，他们带来好几个米色拉链包，凡是写有文字的纸头，尤其是信件，全被装进包里。就连黄晨的工作笔记，儿子的成绩报告单之类，也都囊括一空。直到清晨 6 时，头头说声“走”，这群人呼啦一下子就撤了。

郑君里和黄晨赶紧来到阳台，朝下俯瞰：只见那些人三三两两分头而去，很快消失在人群之中。

再听电梯司机描述：这些人进入武康大楼后，首先在大楼内加强警戒，控制电话，软禁电梯司机，锁住大门，然后才去敲郑君里的家。

郑君里觉得这群人来得蹊跷，去得突兀，虽说已是黑帮，但毕竟还是有单位、有组织的知名人士，他当即打电话给单位——上海红旗电影制片厂，即原海燕电影制片汇报此事。

上海红旗电影制片厂“红旗电影造反兵团”的头头异常震惊：赵丹刚刚来过电话，说昨夜一伙来历不明的“红卫兵”闯入上海湖南路8号三楼他的家中，一直抄至清早才走。也是不抄财物，唯抄信件、笔记、日记、画报之类。紧接着，顾而已和陈鲤庭两家，也打电话向“东方红电影制片厂”，即原天马电影制片厂告急。顾而已和陈鲤庭都是“电影老人”。顾而已导演过《小二黑结婚》、《燎原》、《槐荫记》等电影，还主演过许多影片；陈鲤庭导演了《丽人行》、《结婚进行曲》等影片，写了电影剧本《龟迅传》等。搜查顾而已家的“红卫兵”，个个戴着大口罩和军帽，为首的也是30多岁，黑皮肤方脸。“红卫兵”在窗和门的地方派人守卫，拉紧窗帘，叫出卧室内的顾而已夫妇，开始搜查卧室、亭子间和会客室。

在上海的张春桥妻子李文静，很快接到来自电影界的报告。随即她又获知，著名京剧演员童芷苓昨夜也遭突然抄家。

同时行动，同样手法，抄了郑君里、赵丹、顾而已、陈鲤庭、童芷苓 5 家，显然有来头。

这“不知名的红卫兵”究竟来自何方？受谁指使？李文静赶紧写了一封信给张春桥、姚文元。

张春桥、姚文元未回信，但让警卫员带口信说：“你们不要管了。”

直到 10 年后，在审理“四人帮”案件中，这次发生在上海的神秘抄家的缘由才浮出水面。

原来，1966 年 10 月初，已是南京军区空军政委兼空四军政委的江腾蛟，接到空军司令吴法宪的长途电话，说有“重要任务”，让他立即秘密来京。

江腾蛟立即飞到北京，刚在招待所住下，吴法宪就来接他。夜色苍茫。江腾蛟随吴法宪一起坐车直奔钓鱼台 16 号楼。他们一进楼，就看见叶群已坐在那里等着呢。

没有寒暄，叶群开门见山：“江政委，请你来京，为的是要在上海执行一项绝密任务。”

江腾蛟说：“我一定尽力去办!”

叶群压低声音说道：“是这样的：这项任务是江青同志前几天交办的。考虑到部队执行任务的保密性好，所以尽管这项任务跟空军业务无关，我还是考虑让你执行。任务并不太复杂。江青同志说，她 1958 年有一封信落到郑君里、顾而已他们手上，需要把这封信收回来，但是不知道在谁手里，

你可以组织一些人，以红卫兵名义去搜查郑君里、顾而已、陈鲤庭、赵丹、童芷苓 5 个人的家，凡是书信、信件、日记、笔记这些东西统统拿来。这个事情要绝对保密，不要惊动别人……”

为了绝对保密，叶群给这 5 家取了代号“老大”——郑君里；“老二”——赵丹；“老三”——陈鲤庭；“老四”——童芷苓；“老五”——顾而已。

叶群叮嘱江腾蛟道：“把信件、日记本、笔记本、画报，凡是文字材料，统统抄回来。然后，你亲自送到北京，交给我。直来直去，不要让任何人插手。”

江腾蛟不敢怠慢，翌日，就飞回上海。

10 月 2 日，江腾蛟把空四军政治部文化处处长张彪叫到他的办公室，对他说：

“吴法宪司令打电话来，有一个重大的政治任务，现在先请你把几个人的地址帮助查找一下，他说了周信芳、童芷苓、赵丹、郑君里、陈鲤庭、顾而已、于伶。”

江腾蛟又增添了于伶、周信芳两家，以遮掩真正的目标。

张彪战争年代受过伤，脚有点瘸，行动却军人作风，雷厉风行。他只用了半天时间，就把这 7 家周围地形、出入路线调查的一清二楚。当他赶回上海巨鹿路空军招待所 869 号江腾蛟住的房间时，看见空四军的组织处长袭著显、秘书处长刘世英、保卫处副处长陶崇义、军务处副处长蒋国璋及郭

永成、杨启良都在屋里，江腾蛟正向他们交待任务。张彪向江腾蛟汇报了侦察情况，建议减去于伶、周信芳两家，原因是周信芳因主演京剧《海瑞上疏》，被当作“南方的吴晗”，不知抄了多少次家，他家现在有京剧院红卫兵驻守，空军前往查抄会引起冲突；于伶久病在家，又住在巨鹿路招待所斜对面，一抄就会暴露。

江腾蛟觉得张彪言之有理，也就放弃了于、周两家。

江腾蛟向他们交代了来自北京的绝密任务，但说“首长指示”，并未讲明“首长”是谁，也不点明真正要查抄的东西是什么。

他接着规定了代号。江腾蛟说：“一、二号最为重要，一号郑君里，由秘书处长刘世英和军务处副处长蒋国璋两人带队，由刘世英负责。二号赵丹，由袭著显负责。三号陈鲤庭，由张彪负责。四号童芷苓，由陶崇义负责。五号顾而已，由杨启良负责……”

江腾蛟说，这次以“上海市红卫兵总指挥部”的名义去抄家，“一、这次去抄家是革命行动，要注意政策，只要书信、日记本、笔记本、照片等物品，其他钱财、金银、存款等一概不准动；二、拿走的东西都以红卫兵名义打收条；三、带队的负责人可以暗藏手枪，但绝对不准动用、开枪；四、临时行动，将军用卡车上牌照用纸糊上；五、对警卫排战士

和干部子女说是空军有一份设计蓝图或绝密文件丢失在这些人家里，不抄回来就泄露了国家重大机密。”

江腾蛟安排袭著显组织空四军机关部队的干部子弟组成抄家队伍。江腾蛟的女儿，也参加一号的行动。如果人不够的话，就从军警卫排人员里面抽一部分人，把领章、帽徽拿下来。于是，袭著显从警卫排里挑了 20 多名战士。

经过几天的准备，10 月 8 日，江腾蛟说：“就在今天晚上行动，出发地点在郊区的新华一屯，较为隐蔽，出发前跟大家讲一讲，你们也要戴口罩，以免被人察觉……”

夜幕降临。40 多名部队的孩子和警卫排的战士，穿着各色便衣，集中在上海东北角、离虹口不远的新华一村。这个新村。一排排米黄色的楼房，位于僻静之处，在上海并不显眼。张彪在新华一村空军图书馆里向他们下达“战斗任务”：

“我们空军有一份绝密文件遗失了。据侦察，落到了郑君里、赵丹、陈鲤庭、童芷苓、顾而已这五个黑帮分子手中。为了不打草惊蛇，领导上决定让你们化装成红卫兵，对他们进行彻底抄家。凡属文字材料、照片，都要没收。不论在任何情况下，绝不可暴露军人身份。这是无产阶级司令部下达的紧急任务，一定要圆满完成……”

“抄家的时候用代号，抄来的材料用代号作标志。”

“此次行动以‘上海红卫兵总指挥部’的名义，若有人询问，就以‘上海红卫兵总指挥部’回答；行动时间定在零时至 4 时之间。”

如同作战一样，10 月 9 日凌晨零时，5 路兵马按命令同时行动，5 部卡车从新华一村一所大院急促地驶出，奔向各自的目标。

上海市委办公厅 10 月 20 日第 99 期《文化大革命动态》对这次抄家作了这样的报道：

“10 月 9 日凌晨，顾而已、赵丹、郑君里、童芷苓、陈鲤庭等人，几乎都在同一时间被一些不知名的红卫兵抄了家，这些人在抄家时的特点是，只搜文件文物，不抄其他，行动秘密……”

## 第 238 回：说究竟，原来只为一封信
## 排阻力，中央召开工作会

江腾蛟将上海的抄家情况向吴法宪作了报告，吴法宪要他第二天就把东西送到北京来……”

抄家的“战利品”分两次送往北京。先是江腾蛟带着张彪亲自飞往北京，然后刘世英、袭著显又飞了过去。“上面”交待的任务只是抄一封信，而他们带去的“战利品”却是鼓鼓囊囊的四麻袋，另加一小包。

江腾蛟和张彪一下飞机，便由空军党办二科科长卫球迎接，送往“反帝路”即东交民巷 44 号空军招待所，住进 9 楼 6 号门，江腾蛟住楼上，其他人住楼下。

10 月 12 日晚 21 时许，北京空军招待所忽地接到一个奇怪的命令：关闭所有的路灯。

路灯灭了。在一片黧黑之中，几辆轿车悄然而入，停在 9 楼 6 号门前，从车里下来几个人，是叶群和林办的秘书赵根生。早已等候在此的吴法宪和江腾蛟迎了上去，将他们接到楼上江腾蛟的房间。

江腾蛟向叶群汇报了抄家的过程，并将他认为比较重要的几个小本亲自交给叶群。叶群没有说什么，只是让把另外几麻袋东西也带走。于是，刘世英等人帮助赵根生扎好麻袋口，拿到楼下，装进叶群他们小车的后备箱。

回到毛家湾，叶群让把材料送到她卧室，倒在地毯上，由秘书们分类。

过了 3 天，叶群又对赵根生交代说：“江青同志指示，要将这些材料放到最保险的地方去……我已同吴法宪讲好了，放到空军指挥所去，你和张云生一块去，放到空军指挥所去……”

过了将近两个月，1967 年 1 月初，叶群从钓鱼台打电话告诉赵根生：“空军要把那包材料退回，你收下。”

赵根生来到空军指挥所，空军党办科长卫球把材料交给赵根生。赵根生一看原封未动，就拿回去放在办公室的桌子上，很快叶群就回来了，一同来的还有江青、谢富治。

叶群把他们领到客厅，到办公室找赵根生要走材料，并让赵根生快点到后院小伙房捅开火炉子，说是要销毁那包材料。

赵根生到后院刚把火炉子捅开，叶群领着江青和谢富治就来了。谢富治亲自拆封，和叶群他俩一份一份地将材料填入火炉，中间还让赵根生拿铁棍扎了几下，江青只是在离火炉十来步远来回踱步。材料烧完以后，他们回到前院客厅，过了一会儿，江青和谢富治就走了。”

那么，叶群说江青要在郑君里那里找的究竟是封什么信呢？

还在 1966 年 6 月的一天，上海海燕电影厂曾通知郑君里到康平路去一下。

郑君里来到康平路市委办公室，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张春桥和上海市副市长梁国斌接待了他。张春桥对他说了一通端正态度、积极投入“文革”、跟三十年代“文艺黑线”划清界限之类话后，把话题一转，说道：

“我知道，你跟江青同志早就认识，有过交往。江青同志现在的地位跟过去不同了。她过去有一些信件之类的东西还在你家里。存藏在你家不很妥当，还是交给她处理吧！”

郑君里一口答应。他回到家里，立即和夫人黄晨一起在家中翻找，将找出的信件、照片等材料包成一包，密封后，托厂里转交给张春桥。

上海市副市长梁国斌后来回忆说：“1966 年 6 月张春桥找郑君里谈话，曾对我说，江青现在是主席的夫人了，她有照片、信件在郑君里家，我要找郑君里谈一次，为慎重起见，你也参加一下。我答应了。……”

“事隔约一个星期左右，张春桥对我说，郑君里那里的信件、照片等交出来了，转交给江青，她当场烧了。”

不料，过了些日子，张春桥再次找郑君里谈话。这一回，张春桥单刀直入道：“江青同志有一封信在你手中，你为什么不交出来！”

郑君里这才明白张春桥找他谈话是为了要江青的一封信。而且，这次谈话肯定是奉江青之命来找他的。因为，除了江青本人，别人是不会知道那封信的。显然，江青已经看过郑君里上一次交给张春桥的材料。

“那封信，早就不在了。”郑君里答道。

“你再好好回忆一下，把信找出来。”张春桥说。

郑君里回到家里，忧心忡忡，他早就销毁了那封信，眼下交不出来，怎么办呢？

黄晨和他翻箱倒柜，郑君里向来很重视保存创作资料，便于写作，他保存了许多三十年代电影书报、剪报。凡是其中涉及蓝苹的，都一一交出。黄晨还找出了一张四人合影的照片——唐纳、蓝苹、郑君里，她。她记得，那是在 1936 年，他们在霞飞路(淮海中路)万籁鸣兄弟所开的“万氏照相馆”里拍的。

郑君里见到这张照片，立即放入上交材料中。黄晨虑事比丈夫仔细，只见她拿起剪刀，剪去了唐纳。郑君里会意，赞许地点了点头。

蓝苹是江青在 30 年代在上海当演员时的名字。唐纳是江青在上海时，她的前夫。

郑君里给江青写了一封信，说明信件“没有保存，只是理出几张三十年代的老照片，请你处理吧”。他在信中还写

道："运动之后，我们搬到农村去落户，搞搞文化馆的工作……"

江青在毛家湾，曾和叶群谈到了郑君里，说有一封信在郑君里那里。江青走后，叶群即通过吴法宪，电召江腾蛟火速来京。于是有了10月9日发生在上海的那次神秘抄家。

10月8日，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各路大员陆续聚集到了京西宾馆，一个个表情严肃，连说话的声音、语调都和平时不同，显得格外谨慎。会议还未开始，整个京西宾馆便笼罩着在紧张而神秘的气氛中。

中央工作会议，山东省本来只有谭启龙、白如冰、苏毅然3人出席。中央却通知王效禹也要参加。当康生告知谭启龙，让王效禹来京参加会议时，谭启龙当即表示了异议。随后，他向华东局魏文伯做了汇报，同时给山东省委打电话，要省委迅速整理王效禹的材料送京。

周恩来从康生那里知道了谭启龙的态度，再次来找谭启龙，要王效禹赴京参会，谭启龙不太情愿的说："这个人恐怕有些问题。"

周恩来说："只要不是反革命，就叫他参加。"

此时，山东省委已经通知青岛市委上报王效禹的材料。青岛市委秘书长李克立即组织人连夜加班突击，将王效禹的材料报到省里。9日，山东省委整理了《关于王效禹同志的材料》，于10日送达北京。

而王效禹早已接到王力的电话通知，于 9 日到达北京。不过，中央工作会议已经开始了。

除山东的王效禹外，经李井泉推荐，陶铸点名，贵州省军区副政委李再含也出席了中央工作会议。从 9 月 12 日起至 10 月，李再含连续 6 次致信贵州省委第一书记贾启允，谈及自己对贵州文化大革命的看法，认为不能将矛头指向群众，指出贵州省省委在文化大革命中确实犯了方向和路线错误。这些信引起了毛泽东和中央文革的重视。

从 10 月 9 日起，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中央党政军各部门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的负责人参加。会议印发了林彪 8 月 13 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国家计委党组《今年一至九月份经济情况》等文件。还印发了十几个参考材料，如关于红卫兵的《把旧世界打得落花流水》、《关于国务院文教各部门红卫兵查抄五类分子家庭的情况简报》、《小学也必须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李雪峰同志代表中共北京市委作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所犯方向路线错误检查提纲》等等。

这次会议的一个显著特点是不再按大区编组，而是把各地打乱重编。组长也不再由各大区领导担任，而是由军队的老帅、老将和中央文革小组的主要成员担任。会议地点亦由北京饭店改为军队的京西宾馆。中央还组织了一批军队干部担任会议的工作人员。

京西宾馆西门警戒线是细细的一条白杠，却像南天门，隔开了两重天。各省来京告状的群众把大字标语刷满宾馆对面的墙壁、马路、房顶，却不能越京西宾馆西门那道细细地白线一步。整个白天，到宾馆四周示威的队伍接踵而至。上海的走了，福建的来了，安徽的走了，江苏的来了，都是为了解决文革中的问题。

10月9日下午，中央工作会议召开全体会议，林彪主持并讲话，他说：

“现在我们需要总结一下这一个时期的经验，研究怎么样继续努力地贯彻十一中全会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决定。4号下午，总理、陶铸同志还有军队的同志在主席那里汇报文化大革命形势的时候，主席就提出来召集各地的同志开这个会。主席本来要亲自到会，恰恰这两天受凉。这个会议的时间准备只开7天，从今天起就开小组会，大约开两、三天，然后再由中央文革小组的同志作综合性发言再讨论两天，最后一天请主席作指示。”

周恩来就中央工作会议的开法建议：“（一）发言请谈观点、摆问题。（二）每区发言两种方法，每大区先有一个同志发言，其他同志以后讲，或者两种不同的看法、不同的意见一起讲。（三）可以口头讲，也可以书面谈，充分发扬民主，尽可能都能发言。不同看法，开门见山，都可以讲。”

接着开小组会。第二组组长叶剑英在第二小组发言时说："主席说，这次运动暂定搞到明年1月，还有4个月。十一中全会后搞了两个月，要很好地总结经验。为什么发动文化大革命？第一是为了反修防修；第二是为了战备。现在的战备任务很重，时间很紧。可能在1968年前后发生战争。主席说，三线不建起来，觉也睡不着。文化大革命就是最好的战备动员，这一点日本人、美国人都看出来了。打仗就得靠青年，把他们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什么都不怕。"

第二组的副组长是杨成武、张春桥。

与会者大都对文化大革命很不理解，天津市委第二书记赵武成发言中继续批评同来参加会议的天津市市长胡昭衡，说学生们围攻市委，致使第一书记万晓塘心肌梗死。

江苏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发言说："现在群众分成两派，都是革命群众，都应该支持，不能支持一派镇压一派。"

张春桥听后马上说："群众的一派造反，代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另一派保守，代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你两派都支持就是混淆路线是非，和稀泥。"

福建省到北京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叶飞、韩先楚、范式人、魏金水、郑重等人，起初只知道来北京开会，却不晓得会议的内容是什么，那个郑重跑到别省熟人房间里头发牢骚说："真不知道把我叫到北京开什么会，那些北京南下的红

卫兵都是造谣、撒谎，照他们那样闹下去，不知要到哪个世纪才转入斗、批、改。”

9 日下午，身为组长的陈毅来到福建组，他要大家发言，但叶飞缄口不语，谁也不肯开头炮，大家就在沉闷的气氛中耗着。

晚上，魏金水私下对范式人说：“看形势，现在不揭开盖子是不行的。”

范式人沉思了一阵子，道：“还是看 3 天再说吧。”

福州军区司令员韩先楚因为有事情耽搁了，他 9 日才飞抵北京，连动员大会也没有听，就直接参加小组会。

这天晚上散会后，江青请陈丕显和谢志成到她中南海的住处吃了顿便饭。身穿军装，戴着帽徽领章的江青一见谢志成就说：“小谢呀，你头发留那么长干什么？还不赶快剪掉!”

吃饭时，陈丕显谈到这次来到北京的初步观感，江青说：“这些小将们真厉害呀！那儿都敢闯。我出去都把文件藏在车座底下，怕被他们抄走。这次让你来北京，就是怕你跟不上形势，落后于形势。”

讲到上海的情况时，江青说：“对上海方面两个人不满意，一个是魏文伯，一个是曹荻秋。他们在这场运动中很不得力，在群众中没有威信。”她又举了一些例子。

这天，毛泽东抱病与各大区领导谈话。他说：“大家在工作上犯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错误，主要责任是制定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执行的人有各种情况，要区别对待。”

## 第239回：急筹备，清华欲斗王光美　会沉闷，成都市“红成”成立

10月9日这天，清华大学的“清华井冈山红卫兵总部”、“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临时总部”、“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八八总部”等8个组织联合开会筹备揪斗王光美。他们组织了几百人到北京市委静坐示威，向中央要求，让王光美到清华大学做检查。周恩来、张春桥接见了清华大学这8个群众组织的代表。周恩来首先问了各个组织的情况，然后对王光美回清华大学做检查一事问他们：“你们几个组织同意？”

同学们答：“7个，今天又来1个，8个。学校一共有十几个组织。”

周恩来：“你们说9日开会，没说8点。昨天才知道今晚8点开会。你们4日交的信，5日收到，9日就检查，太快。彼此要有个信任嘛！王光美就在中南海，我们对她负责，正准备检查。王光美检查，也要有个准备；同时，党中央也要讨论……。张春桥他是副组长，他也不能多讲。我把我能说的话说了，不能多说了。我说过中央全会解决了。组织上、思想上完全通要有个过程。”

张春桥：“你们这个要求是合理的，她应该检查。”

同学：“不能压制我们的革命精神。”

张春桥：“什么时候也不能压制，周总理昨天没有时间。”

周恩来：“还有个时间讨论，中央常委讨论，主席很忙，还要找时间。她最近去不去检查？检讨得怎样？她不是普通工作人员，中央都必须讨论。你们大学生，明白嘛！”说着周恩来出去接电话。

同学问：“领导谈话可以印吗？”

张春桥："有个青年，他的传单说我主张武斗，我怎么能主张武斗呢？我不更正。因为这个印传单的打了人，一更正，这个人受压不小。最近这个青年来信说：'我做了一件很不好的事，我印了传单未得到您的同意。'这样我就算了。"

周恩来接完电话回来对学生们说："我们讨论一下，王光美不去检查，不能当场检查，一去检查肯定下不了台，势必闹起来。一闹就牵涉到党中央、毛主席领导的党中央。你们总是党中央、毛主席领导的。三大前提：党中央领导，听毛主席的话，《十六条》。不能拿这个问题为难党中央，不能说毛主席也做不了主。毛主席亲自领导的这场大革命，放手发动你们，动员你们来做。大民主，四大武器，六大自由，还有放假闹革命……我这里说的话，22号讲了，十一中全会解决了。党中央只能给这个范围。我们碰到澳大利亚共产党也只能讲到这个程度。王光美她若是一般工作人员，单一个人好办，随叫随到。她一检查，一追一问，问题就大了，势必牵涉到另外的问题……传到世界上是不是有好处？你们考虑。有一张大字报说中央怎样，你们看了。现在全国广大人民都仰望北京，敌人也在仰望北京。《参考消息》有吧？"

同学答："有。"

周恩来："有外国记者评论大字报有多少中央委员点了名，希望你们自觉。革命派的人听党的话，你们要努力实现革命目标。我们在开会，今天下午中央决定了，你们也有想法，我把中央情况讲清，王

光美写了书面检查，明天转给你们，你们可以表态，提出意见，满意不满意？”

同学问：“我们可以和王光美谈话吗？”

周恩来：“这必然要和上面有牵连。你们把问题摆在她面前，会牵连到别的。”

学生们还在提要求……

周恩来：“错误路线就是这些。毛主席健在，你们还不相信他领导的中央和林彪同志能解决这个问题吗？中央全会12日结束，后又开工作会议，16、7日他们才回去，各省委还未传达到，你们红卫兵就围上去了。他们有的现在还未开省委委员会。要有个过程。这两个月很忙，你们闹革命，我们一方面领导你们，一方面向你们学习。我们先学习，后提意见。你们也这样。司令部常常碰不到头，几件事情一直到今天才商量到底。大字报那些问题，她不能全部回答，我们也不能全回答。22日我说全会基本解决了，毛主席说：也只能这样说。你们大学生知道的。现在炮打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毛主席健在，全会又解决了。现在中央若是修正主义起作用，那你们起来造反，现在不是。大字报贴伯达同志在北大的讲的话，那是主席叫去讲的。关于主席的文章，未公布的，我们不能纠正，纠正等于肯定了。明天换个书面形式检查，不通过再检查。”

张春桥：“你们的要求是合理的，问题是检查范畴问题，换个方式，人不去，给书面材料。大家满意不满意？可以座谈讨论，把意见给她，再检查。”

周恩来：“把她不能回答的问题就避开，不然要我们陪着，那更麻烦。背靠背可以避开一些问题。”

同学问：“内外有别是指什么？”

周恩来答：“内外有别是指国内外。”

同学：“有的同学给破了。”

周恩来：“发展不更坏吗？那样的传单发出去，影响很不好。党未号召全党共讨之，全国共诛之，那就是全会解决问题了。”

周恩来：“十一中全会后，各地为什么还很抵触，这是有个过程。你们现在大分化、大改组，浪潮一个一个的，经过十三期社论和10月6日大会，又大分化、大改组。毛主席总是告诉我们不要急，不是不革命。那样的传单无论如何是不妥当的，国家不能给印。你们的大字报，已把这个问题给贴出来了，再把它传出去，现在你们正在为正确路线而斗争，再搞会走远的。”说着周恩来又出去接电话。回来后，同学说：“完全相信党中央解决了这个问题。从我们学校看十三期社论，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要批判解决，清华必须联系到王光美。”

周恩来：“那些事，你们可以拿出来批判。下面要解决还要经过长期斗争。大字报的问题，传单的问题，要牵涉到别的，而别的中央解决了。根据《红旗》社论，你们完全可以深入批判……我们准备把蒋南翔材料全部交给你们。”

张春桥：“我们的目的不是解决一个人，我们的目的是放在观点上。同样，对王光美也是一样，她能代表路线的要批判她的观点、思

想、行动、作风，这样就能肃清影响，不妨碍批判。既然形成了个路线，全国各种表现形式差不多。”

周恩来：“中国共产党过去犯过错误，但不能说是不革命的。……文革小组不赞成王光美去检查，中央其他人也是，主席不同意王光美去清华检查，不然下不了台。我解释，不要面对面检查，可以背靠背。……”

第二天，王光美将一份书面检讨送到清华大学。

其实，早在 8 月 22 日清华大学的大会上，贺鹏飞就首先向周恩来要求，让王光美回清华大学做检查。

10 月 10 日，《人民日报》以林彪《对中国人民解放军学习毛主席著作的重要指示》为题，转发了林彪 9 月 18 日接见高等军事学院、政治学院和总政治部宣传部负责人时的谈话这次讲话的部分内容，对其中的个别字句进行了增删，如：林彪在讲话时说的“毛泽东思想是革命的科学，是经过长期革命斗争考验的无产阶级的最高真理，……”这次转发时删除了“最高”二字，成为“毛泽东思想是革命的科学，是经过长期革命斗争考验的无产阶级的真理，……”

10 月 10 日上午，中央工作会议。陈毅又来到福建组，动员说：“福建省的同志谈谈吧，大家畅所欲言，有什么看法都可以谈。”

韩先楚首先发言，他讲了许多福州地区组织和挑动群众斗群众的事情。接着，魏金水也跟着发言，结果，面对面地同叶飞干了起来。

晚上，范式人带着阴郁和忧虑的表情，坐在自己房间的桌前，对同房间的魏金水说："糟糕了，现在弄得全国都知道了，韩先楚同志揭发的材料是不是可靠？"

魏金水则不以为然地道："韩先楚同志揭发那个材料是有根据的，什么全国都知道了，在中央面前应该如实反映，我们又不是封建家庭，有什么家丑不可外扬。"

话不投机，范式人不再吭声了。

韩先楚来找范式人，对他说："你和叶飞是老战友，你的话，他或许还能够听得进去，你应该要尽量做他思想工作，劝劝他，一定要端正路线、提高认识……"

范式人听罢，沉吟了一下道："我尽量说服他，不过，叶飞这个人的脾气你是知道的，他可不是那么好说服的呀！"

接着，陈毅也找范式人个别谈话，性情直爽的陈老总干脆说："叶飞要是一个屡教不改的人，他这个省委第一书记就不要想当了。"

范式人抬头望了陈老总一眼，摇摇头道："不要谈这个是人还是鬼，回去烧，烧成人就是人，烧成鬼就是鬼，结论不要下得太早了。"

叶飞的肚里确实憋了满满的火气和怨气，当运动刚刚开始时，他还是能够跟得上形势的。可是，这场文化大革命的烈火很快就烧到他老婆的头上，并且，大火又蔓延到他的身上，他就想不通了，他的老婆王于畊怎么会是反党分子呢？他怎么会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罪魁祸首"呢？难道这场文化大革命就是要叫他自己把自己打倒？难道

自己革命了大半辈子，到头来却变成了革命的对象吗？他不理解，怎么能理解呢？

范式人两次找他谈话，都未谈成，这时候的叶飞，根本就听不进任何人的话。当范式人第二次找他时，他不耐烦地摆摆手道："嗨，你不要谈了，我的脑袋简直要像地雷一样快炸开了！"

范式人掏出烟盒，递给叶飞一支小雪茄，自己的嘴里也塞了一支，又用打火机点燃了二人的小雪笳，他吸了几口烟，才慢吞吞地开口说："话总是要谈的，我看你就是面子搁不下，不愿意承认自己犯了路线错误。"

"还谈什么，反正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我已经失去信心，你们回去搞好了。"叶飞大口地抽着烟，他的心境恶劣到了极点，面色苍白，眼光充满着绝望和沮丧。

10 月 10 日，山东谭启龙在小组发言中提出：

"一、外地学生到我省串连，和省内学生互相串连。这种无领导的革命串连活动也带来新的问题，一是运输压力大，二是许多领导干部被缠住，不能很好地领导文化大革命和生产。对此，我们在 9 月 26 日'抓革命、促生产'的情况报告，曾提出过'今后除了北京到各地、各地到北京有计划地组织串联外，停止地区与地区、和省内的互相串联'。请中央考虑。

二、当前各大专院校革命组织很多，相互间有时争论很激烈，党团组织几乎都垮了，革命委员会至今建立不起来。如何实现对他们的领导，需要研究解决。

三、大量大字报上街，许多工农群众、机关干部有不同意见，也要贴大字报，参加辩论。现在我们说服他们不要这样做。但是工人农民说，工农兵是文化革命的主力军，为什么不让他们说话？这个问题很难掌握，一不小心就会发生冲突。”

10 月 10 日晚，北京外语学院“红旗大队”、“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北京公社红卫兵”、“东方红红卫兵”、“二七红卫兵”等 5 个红卫兵组织的 100 多名红卫兵蜂拥前往外交部政治部，索取工作队在外院期间整理的师生们的材料。几乎与此同时，北京石油学院“大庆公社”夺取了校广播站，北京政法学院“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冲击最高人民法院。北京的造反声浪再度高涨，少数派学生与派出工作组的各级领导的斗争更加激烈。

10 月 11 日，毛泽东针对中央工作会议的情况说：“头一阶段的发言，不那么正常；但运动来得猛，只有 5 个月，难怪同志们不那么通，有抵触，是可以理解的。先乱它几个月，大字报要上街，工农兵不要干涉学生。”

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对形势的看法，两头小，中间大，敢字当头的只有河南，怕字当头的是多数。”

这天，贺龙在第四小组会上做了检讨。他说：“北京体育学院的文革运动，体委派工作组，不是相信群众，依靠群众，而是包办代替，结果，把那里轰轰烈烈的文革运动搞得冷冷清清。……体委本身的文革也搞得不深不透。体委一些领导，怕字不少，框框很多，对这场文

革的领导，还处于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的情况，……我是有责任的。根本问题是对主席思想学得不好，跟得不紧。”

周恩来在第五小组讨论时插话说：“要争取主动，有些省市委的同志如果不争取主动，还要继续被动下去。还有各部委的同志，要自己解放自己。”

9 月 22 日下午，北京钢铁学院举行了“西南地区赴京部分革命师生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誓师大会”。参加这次大会的有四川、云南、贵州的 98 个单位，以及全国各地的 104 个单位，约 2 万人。来自成都、重庆、贵阳、南充、昆明等地的学生和工人在大会上发言。清华大学、南京大学、陕西师范大学等学校的代表在会上发言表示坚决支持。在这次会议上，成都大学工业经济系的潘生同学和成都地质学院的伍玉生等人商议，把成都地区各高校的造反派学生组织起来，成立一个统一的“红卫兵”组织。

10 月 11 日，回到四川成都的成都大学的潘生、杨富银等同学和四川地质学院的伍玉生等同学发起，成都各高校造反派的红卫兵组织“红卫兵成都部队”宣告成立，总部设在成都市中心的中西顺城街的一座原来属于天主教堂的两层楼房里，旁边就是市体育场。当天下午，在市体育场举行了隆重的“红卫兵成都部队成立大会”，全市 11 所高校的造反派红卫兵组织都参加了这个组织，成为它下属的“支队”。“红卫兵成都部队”总部的领导机构叫做“勤务组”。“勤务组”的成员由各个支队派一名代表组成。“红卫兵成都部队”总部第一届“勤

务组”的 3 人核心小组主要负责人有地质学院的学生伍玉生、成都大学的学生张定中并且兼任总部政治部主任，及电讯工程学院的张炳新。

10 月 15 日，成都市的保守派组织“成都市大专院校红卫兵指挥部”和“成都市大专院校工人赤卫队总部”在市体育场举行了一个“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誓师大会”。大会进行过程中，来自北京的学生领头高呼“炮轰西南局，火烧省市委”口号时，台下无人响应。接着，北京的学生在会上念一份揭露西南局省、市委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传单，台下更加骚动，有的队伍开始退出会场。随即，退出会场对队伍越来越多，大会一哄而散。

10 月 16 日下午，成立于 10 月 11 日的“红卫兵成都部队”，简称“红成”也在市体育场举行“万炮齐轰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誓师大会”。这是“红卫兵成都部队”成立后组织的第一次大型活动。西南局和省市委都派负责人参加了这次大会，他们是：西南局书记处书记、文革领导小组组长刘植岩，省委书记处书记张力行，市委书记处书记廖家岷。他们坐在主席台上，听着发言的学生批判他们，还不得不跟着大家一起鼓掌、喊口号。刘植岩作为西南局、省市委的代表在大会上讲话。他在发言中说：“‘炮轰西南局，火烧省市委’这个口号，肯定是革命的口号，决不能说它是不革命的，更不能说它是反革命的。”与会者听到这个表态，都高兴地鼓起掌来。

第 240 回：见北外，燕园继续大辩论　讲成绩，林彪发言做工作

根据10月7日北大校文革《立即行动起来，积极参加大辩论》的决定，10月10日晚上，北大“五四”操场继续召开辩论会，对北大校文革成立后执行的路线展开辩论。会上，大多数人认为“关键不在于搬了聂元梓，要害问题是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开火。”有人指出：“遵义会议是解决领导问题，而最后解决问题是四二年整风才决定。”亦有人说：“要夺权，不合适的人都要罢掉”。

聂元梓在会上讲话说：“如果这条路线反映在我身上就批判我，文革执行了就批判文革，表现在哪，那个单位严重，就应斗争更厉害……当权派有决定作用，现在我是当权派，”“当然我是右倾，可以批判”。她希望大家大力宣传这场辩论的意义，号召大家积极投入到校文革组织的这场大辩论中。

10月11日，北大校、系文革领导开会，纷纷表示要和群众一起投身到对前段工作的“大检查、大批判、大总结”中，甘当群众小学生。

当天下午，在“五四”操场举行全校革命师生员工“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开火”的誓师大会。孔繁代表校文革发了言。

通过几天的大辩论，北大支持路远、周闯和杨勋观点的人渐渐增多。有人认为校文革是“右倾”，“严重右倾”；有人认为是“压制群众”，“挑动群众斗群众”；亦有认为聂元梓是“名利主义的典型”，

“没阶级感情”，“没和地主家庭划清界限”的……而“清华井冈山北大支队”更是认为聂元梓为首的校文革执行了“挑动群众斗群众”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清华井冈山北大支队”是10月9日在清华蒯大富和地质学院朱成昭的支持下刚刚成立的，作为清华“井冈山”在北大的一个分支。

北大的“北京公社”则认为“大辩论处在危急中”。

从10月7日开始，北大、清华、北师大率先开始批判李雪峰为首的北京新市委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11日，周恩来派国务院副秘书长许明和公安部副部长杨奇清去看批判王光美、李雪峰的大字报。

当天上午，外交部副部长罗贵波和周恩来的秘书钱嘉东接见10日晚涌进外交部政治部索取“黑材料”的北外学生，听了他们反映的情况后，向周恩来作了汇报。当晚22时，罗贵波在外交部政治部会议室向学生们传达周恩来的口头指示：

“今天下午把这里情况向周总理和陈副总理作了汇报和请示。周总理作如下口头指示，陈副总理同意这一指示，现向同学们传达：

一、宣布刘新权同志停职反省，因为他说在同学中没有进行排队，实际上是进行了排队，他说材料烧了，实际上是没有完全烧毁，他不但欺骗同学们，也欺骗了外交部党委、陈毅副总理和周总理。

二、政治部其它文件柜，如果同学们需要检查的，所以在外交部、总理秘书钱嘉东同志和1—3位同学共同参加下，打开检查，凡属于与刘新权工作队有关的材料都可以拿出来。但是希望同学们不应当利用这些材料去斗学生，与工作队无关的材料不能拿走。政治部的档案不准动。

三、已经拿出来的材料由检查组（外交部、总理秘书和同学代表组成）负责清查，将工作队员个人笔记本和专案材料封起来，这些材料由钱嘉东同志保存，如果同学想把这些材料拿回去保存也可以，但未经同意，不得启封，听候周总理和陈副总理的指示，其他材料都可以拿走。

四、至于刘新权同志说已经烧毁了，周总理和陈副总理派人彻底查清楚。

五、同学们可以先回学校，如果同学们还让工作队同志及昨晚有关同志去检查澄清，随传随到。

以上是传达周总理和陈副总理的指示。在这里说明一个问题，对于与昨晚有关的张增旺等同志，外交部党委将召集他们开会，让他们继续检查，同学们要他们什么时候去澄清随时可以去，这一点，我也报告了总理。”

10月12日，戚本禹、关锋接见保工作组的北航“工人赤卫队”和地院“红卫兵”的代表。针对同学们对第13期《红旗》杂志社论提出的问题，关锋说：

“《十六条》公布以后，许多地方，两条路线的斗争还在继续，林彪同志上次的讲话也谈到这一点。《红旗》社论的发表是了解了全国各地的情况，特别是根据林彪同志的讲话精神。十六条通过时，毛主席说，是否大家都会执行，那不一定。有的会执行，有的不一定。后来斗争果然在继续进行着，有不少地方有些单位很激烈。”

“通过这几个月的斗争，你们对复杂性有了了解，像这样复杂的斗争，你们预料到没有？没有！我预料到没有？没有！抽象地说是复杂、尖锐。我从来没有经历过，现在认识得也很不够，请同学们相信这一点。我们不是根据这个学校几个人的反映写出这篇社论的。社论的发表，这是大事，社论讲得对不对？哪些地方对，哪些地方不对？可受时间考验。同学们可以批评。据我们看来，两条路线斗争确是复杂尖锐，在场同学不妨和外地同学座谈一下。外出串联的同学，他们受了很大的锻炼和教训，也帮助我们了解了很多情况。”

“我们要解放一部分同学，又要不怪另一部分同学，一时被打成‘反革命’的，也要解放另一部分同学，另一部分同学也不要怪他们。他们出于对党，对毛主席的热爱，是工作组造成的。有些地方发生了

工农斗学生，工农斗学生能怪工农吗？不能。他们了解情况吗？不了解。”

“有一个同学问：是不是群众斗群众？是谁挑动的？是不是有人怀疑我们挑动？”

众人答：“有。”

关锋：“好，可以继续辩论继续调查，对北航、地质学院的具体问题，我不多说了。当时地质学院发生冲突，我是临时派去的，第二天开了个会，大会是吴德同志主持的，有东方红的红卫兵，工人参加了，我和戚本禹参加了，邹家尤也参加了。

我在会上发言，对两部分都没有批评，我批评了邹家尤，现在仍然要批评他。东方红同学找他，他应该接见，结果是十几天都没有接见，跑到地质学院，说部里的同志们打电话通知西城区纠察队，说人家偷机密文件，把人家请来了，结果打起来了。到底谁搞起来的呢？是他邹家尤请来的。这样愈搞愈被动，早解决就没事了。我们是不是群众斗群众，可以调查。”

接着，戚本禹说：“为什么要搞文化大革命？为什么毛主席亲自接见小将？还不止三次，国庆还要接见，毛主席对青年寄有无限希望，文化大革命是要解决不出修正主义的问题。毛主席说，你们要关心国

家大事，就是要关心国家命运。我们有没有修正主义的危险？毛主席说，如果不注意，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

“自57年以来，我们国家在惊涛骇浪中渡过的。不是说你们是修正主义的，但是有没有方向不对，认识不清的呢？有。你们坦白地说，我也坦白地说。你们看《毛泽东选集》，毛主席批评一些东西，就是因为有错误的东西。45年有人要交出武器；合作化时有人要解放合作社。这不是一般问题。你们谁提出问题也不成为路线，不是路线错误。那是有地位的人，很多事情不能讲，高岗、饶漱石早公开了。这几年，62年‘三自一包’，困难时期斗争非常激烈，那时要是我们伟大的舵手不在，稍微离开，那么我们的国家就要危险。那时主张‘三自一包’的不是底下的同志，不是基层干部。一条线贯下来，62、63、64、65，直到66年，有些是党内的问题，不能公开讲。”

“姚文元的文章出来后，《北京日报》根本不登。”

关锋：“当时同学们可能不注意，上海登姚文元的文章，为什么北京不登？为什么《北京日报》和《解放军报》按语距离那么大？”

戚本禹：“这是生死斗争啊！很激烈。大大小小的‘三家村’揭出来后，斗争还在继续。聂元梓的大字报，毛主席支持，把火点起来了，形势很好。《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全国特别是北京轰轰烈烈的向资产阶级反动人物开火。但突然6月18日以后冷下来了。派

工作组干革命吗？不是，因为工作组本身就是镇压运动的，给我们的印象很深。当时中央办公厅一个镇压学生运动的通知，我看到了。经过几天斗争，一个礼拜，各校抓‘右派’，抓‘反革命’和抓‘游鱼’，打击首先向党委发难者，对革命群众进行政治迫害，很多学校死了很多人。他们利用同学对党和对毛主席的热爱，欺骗群众。被打成‘反革命’的与没有被打成‘反革命’的感情是不一样的。”

“谭力夫讲话是一篇代表性的作品，我们到今天为止，没有说谭力夫是‘反革命’。为什么？因为他是一个同学，他的讲话代表一种思潮。这样，性质就不同。严重的是群众斗群众，他们利用工农，说这些人是‘反党’，来镇压学生。西北地区是很厉害的，一个很负责的人组织打学生。工人打了后，很后悔，痛哭流涕，觉得自己犯了罪。工人是没有罪的，有罪的人是欺骗工人的人。多数里情况和工人不同，像北航两派，我有没有倾向性呢？有！倾向‘红旗’、‘东方红’，因为他们方向较正确，他们对错误路线比较清楚，但不是说他们每个人，每个行动我都支持。因为他们不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就不愿斗批改。”

10月12日这天，周恩来就清华大学红卫兵以发“请帖”的名义要王光美去清华参考批判会事批示：

中央文革小组办公室转陈伯达、康生、江青等：

我准备派人去录音，带回给王光美同志，而不要她去参加会议。

10月12日

10月12日，林彪在中央工作会议小组会上发言说："目前运动的问题，是对文化大革命的认识问题，主要解决两条路线的认识问题，这个运动进行好不好，是要看贯彻毛主席对文化革命正确路线如何，各部门各地都要想一想。"

他说："现在的根本问题是怕字多，敢字少，要拿事实来教育大家，从解放以来，公安工作最好一次走群众路线的是肃反工作，要以理服人，又要以事实服人。现在有多少'怕'，通通列出来，搞一个分析，得出结论，'怕'得到什么坏处，'敢'得到什么好处，充其量会怎样，都要讲得清清楚楚。"

周恩来插话说："乱要乱出一个道理来。"

当谈到这次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意义时，林彪说："成绩可以算出好些来：

（1）学毛著已成高潮，

（2）揪出一些反党分子，

（3）搞出一批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也搞出一批犯方向路线错误的人，

（4）严格地打击了四类分子，

（5）冲击了当官作老爷的威风，

（6）已开始体现到大民主的味道，

（7）在党内，社会上是一次大清理，

（8）是一次很好的战备演习，

（9）会促进人的思想革命化，同时也一定会促进生产、促进工作，

（10）培养了一大批革命接班人，这些小将是敢闯、敢干，在斗争中成长起来。

但是，现在有些人就看不到上述主流，只看到那些个别不好的现象到处乱传，甚至扩大化，这是贬低文化大革命，而实际上不拥护，有的还对抗，其原因就是革命革到自己头上来了，不愿意革自己的命，所以唱反调。现在要扩大宣传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意义。

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的，为了文化革命运动，为了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干部思想落后于形势，落后于群众是不好的，所以要从思想上搞通，下大力进行政治思想工作。”

当天，周恩来在中央工作会议小组会上听了国家科委副书记韩光的检查和时任国家科委政策研究室主任张本宣读《科委机关少数派同志联合揭发韩光同志的错误》第一部分以后，插话说：

“8月13日，我接手过问科委、科学院的运动。为什么科委的运动进展缓慢？一是因为我忙，二是韩光阳奉阴违。过去他总是推到聂荣臻身上，实际上韩光对聂荣臻同志也是阳奉阴违的。6、7月份李富春、陈伯达、康生、聂荣臻同志都批评他，他总是找借口，为自己辩护。

8月13日，我与聂荣臻同志商量好，科委的文化大革命由我来管，韩光对我也是阳奉阴违，除了张本同志刚才讲的那事之外，还有几件事证明韩光是有组织搞的。我本想把群众引导到毛泽东思想基础上来进行大鸣大放大辩论，辩明是非，结果倒发现韩光方面有组织地搞示威，当我的面闹事，对付张本同志。在计量院的大会上，举起预先准备好大字牌子，不让张本上台。我预先打过招呼，韩光、张本同志不上主席台，只要计量院革委会协商的主席台。开始有支持张本同志，递条子要张本上台，大会主席没有念条子，最后靠近韩光党委那方面的主席，递了一个可疑的条子，交给大会执行主席念，要张本上台。接着下面就举起了不要张本上台的大牌子，轰闹。我和我同去的人看得很清楚，是有组织的。

还有一件事，双方准备在辩论会上的发言稿，请把清样送给我，我说过清样印出来后允许修改。韩光那一方面负责人个人发言稿是19日送来的。这时已经学了10月5日军委总政的指示了，伯达、江青同

志讲过话了，这些难道他们都不知道？代表你韩光方面的三个发言，太不像样子，完全不对头，完全不对头！韩光完全是有组织的阳奉阴违。我同意刚才韩光交给我的计量院的要求，今晚将全部人事档案封存起来。”

第241回：找路扬，北京批判新市委　难阻止，藏族学生斗班禅

10 月 13 日，在北京展览馆召开了北京市第一次“彻底批判以李雪峰为代表的北京市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会后散发了《告北京市群众书》。第二天，北京及外地师生 5 万多人在北师大集会，批判北京新市委。李雪峰在会上代表新市委作了检查。吴德等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参加了这次大会。吴德在会上讲话表态说：

“今天师大和其他学校学生召开大会，对北京市委犯的错误路线进行揭发和批判，这是很好的革命行动。我们市委书记处的大部分同志都来了，我们的来，第一是支持你们的革命行动，一是听取同学们的批评，向同学们作检查，我们北京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毛主席亲自领导下制定的十六条指引下，极大地调动了广大群众的革命积极性，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引向一个新的高潮，整个革命形势好得很，越来越好。”

“至于同志们提出的具体问题，我们没有办法答复，我们只能带回去研究。我们要强调，主要是靠自己解决，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大串连，互相交流经验，但主要解决问题，还是要靠自己，自己思考、解决。

对于出身问题我们要用马列主义的科学语言，毛泽东思想的语言，如：工人阶级，贫下中农，革命干部等，不要用那些不确切的名字，

这并不是就不管出身了，究竟什么是革命干部？什么是工人？我们还得研究，如解放十七年了，难道只能是解放前三年当工人的才算工人？我们要用马列主义的科学语言来划分阶级。

我们希望同志们很快地回去参加斗争，参加革命串连，不要老呆在北京。”

北京市委机关这天也召开大会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华北局工作组池必卿在会上作检查。

10 月 13 日，哈军工“八八红旗战斗团”到北京要求国防部办公厅副主任、国防科委副秘书长路扬交出工作组整的“黑名单”和工作笔记。因为 1965 年全军院校整风，哈军工被评为全军院校倒数第二，国防科委派路杨为组长,带着工作组进驻哈军工。周恩来批示：（一）“八八”战斗团有什么意见可以提出来或派代表来谈，全军文革小组和国防科委派人参加。（二）笔记属国家机密，不能给，交军委封存。（三）干部可以去参加批判会，但要给他们休息机会，不能让干部长时间留在那里不回来，他们还要工作。

这天，周恩来在中央工作会议第五小组会议上插话说：“要敢于革命，敢于革自己的命，把我们自己放在内。革自己的命，不是革自己的整个政治生命，而是革自己思想上资产阶级世界观的命。这次文化大革命，我们都是没有充分思想准备的，也没有经验。但毛主席对

运动的前景是看得清楚的，我们看不清不要紧，要紧跟主席，不要掉队。”

当天，周恩来和陶铸联名致信毛泽东，报告中央工作会议进展情况，建议毛泽东14日或15日约常委谈一次，听取汇报。

10 月 13 日，毛泽东就外地来京串联师生的问题作了批示：“下次接见。采取阅兵的办法，不管多少人，解放军要统统包下来。由军队负责将外地来京的师生，按解放军的编制，编组成班、排、连、营、团、师，编好后进行训练。学习政治，学习解放军、学习林彪和周恩来的讲话，学习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学习解放军的三八作风，学习编队队形，学习队列基本动作，学习步法，每个人都要学会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歌子，使外地师生有秩序地接受检阅。经过训练，把解放军的光荣传统、三八作风、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带到全国各地去。”

第二天下午，周恩来让值班秘书通知“首都工作组”有关人员和郑维山、傅崇碧以及公安部、北京市的主要领导人，晚上到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开会，研究落实毛泽东 10 月 13 日批示，布置准备毛泽东第五次接见红卫兵的工作。

当晚，“首都工作组”办公室部队指挥组组长蔡洪江带着参谋张辉灿、王日升来到福建厅，过了几分钟，郑维山、傅崇碧、吴德和公安部的一位副部长也先后到达。此时，周恩来正在毛泽东处。毛泽东

根据周恩来、陶铸13日联名致信的建议，召集中央政治局常委、各大区负责人和中央工作会议各组组长开会，听取各组汇报和研究中央工作会议情况。

散会后，已是子夜，周恩来和杨成武、周荣鑫、谢富治一起走进福建厅。他刚一坐下来，就开门见山地说："再过两三天就要第五次接见红卫兵了。我想和大家商量一下，如何改变接见方式的问题。"

他端起茶杯喝了一口茶，继续说道："毛主席日理万机，本来就够累了，又在43天内连续四次接见红卫兵，一站就是几个小时，主席实在太累了。我不忍心再让主席这样受累，想用夹道欢迎的方法接见红卫兵，让毛主席乘敞篷汽车从中间通过，既不累又节省时间。现在我们就来研究一下，看这种方法行不行？"

参加会议的人一致表示这个方案很好，最大的优点是可以节省时间，顶多一个小时就够了，安全问题也可以解决，至于选择哪条路线比较好，大家的意见不一致，有的说在东西长安街向西延伸至五棵松，有的说在二环路上绕一圈，也有的说在新修的三环路上比较好，路面平整，两边高大建筑物不多，安全警卫问题比较好解决。

周恩来认真地听完大家的意见，然后问道："北三环路通到哪里了？"

蔡洪江回答："通到友谊宾馆了。"

周恩来又问："带地图了没有'？"

参谋张辉灿麻利地从挎包里取出地图，展开在周恩来面前的地毯上。这是丝绸印制的万分之一比例的北京市地图。周恩来俯身看着地图，很快将目光投向天安门广场，尔后沿着长安街、建国门内外大街、东三环、北三环路一段一段地观察，分析两边的建筑物分布情况，最后，他手指着地图说："就沿这条路线两边摆满红卫兵。今天上午你们到沿线看一下，按照实地情况计算一下能摆多少红卫兵。"

接着，周恩来又说："实行这个方案的最大问题是如何保证主席的安全。所以，要由北京市和公安部协助首都工作组、北京卫戍区，制定一个万无一失的接见方案和警卫方案，明晚 11 时拿到这里再研究确定。"

开完会已是 15 日凌晨了。当天上午，郑维山、傅崇碧和公安部有关领导带着"首都工作组"办公室有关人员、沿东长安大街、建国门大街、东三环、北三环路进行现场勘察，并在现场确定了队形排列和重点警卫方案。

15 日这天，国务院再次发出《关于各地革命师生暂缓来京进行革命串联的通知》，说："外地来京革命师生现已超过百万，接待能力已达顶点，食宿、交通、卫生医疗等等都已发生极大困难。加之近来气温急剧下降，很多人不带被盖棉衣，极易生病。切盼各地革命师

生暂缓来京，待现有的外地革命师生离京后，再按中共中央、国务院九月五日的通知有计划地来京进行革命串联。”

按照周恩来的要求，首都工作组蔡洪江等人于 15 日晚 22 时 45 分到达福建厅。过了几分钟，郑维山、傅崇碧、吴德和公安部的一位副部长也先后到达。他们在福建厅一直等到深夜 24 时，周恩来仍然未到。

过了一会儿，一位秘书进来告诉大家：“周总理正在和江青同志一起接见北京红卫兵‘三司’的代表，还要等一会才能结束。”

这位秘书说，从下午 16 时起：“周总理就一直在大会堂工作。开头是接见中央民族学院干训班的藏族学生，劝说他们不要强行要求把班禅送回到西藏去，让他继续留在北京。但这些学生很难说服。接见北京红卫兵‘三司’的代表也遇到了麻烦，所以拖到现在还没有结束。”

66 年 9 月中旬，民族学院的学生，乘黑夜翻墙进入班禅的住所，控制住担任警卫任务的解放军战士后，把班禅绑走，一时不知去向。周恩来得知情况，焦急万分。后来听说是民族学院的藏族学生将班禅绑走的，准备在民族学院开他的批判会。周恩来深知班禅的脾气，万一和民族学院农奴出身的藏族学生顶起牛来，很可能被活活打死，后

果不堪设想。他立即在西华厅召开紧急会议，叫来“一司”负责人汪延群等人。

周恩来详细布置说：“你们赶快发动红卫兵，查找班禅的下落，马上报告我。如果他们要批斗班禅，你们多派一些红卫兵参加批斗会。他们喊打倒班禅，你们也跟着喊，但不许他们搞武斗，批斗完了，要把人带回来，我要活的班禅。班禅有错误，但不是反革命，你们要和群众讲清楚。”

周恩来还派总理办公室主任童小鹏、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刘述周和“一司”红卫兵一起行动。

民族学院批斗班禅的会场十分混乱，批着批着，就有人动手打班禅。“一司”红卫兵见状不妙，和化装成红卫兵的解放军战士一起冲入会场，将班禅抢出，藏在北京卫戍区。

15日下午16时，周恩来接见中央民族学院干训班索朗顿珠等11名西藏学生，对他们说：

“西藏地区经历了三次大解放：第一次是1951年人民解放军进驻西藏，西藏回到了祖国大家庭；第二次是1959年的农奴解放，平叛之后，进行了经济制度的改革，取消了农奴制度；第三次是文化大革命，喇嘛获得了解放。全西藏有十几万喇嘛，百分之九十已还俗，要组织

这些解放出来的小喇嘛参加生产。对贫农出身的小喇嘛，要进行培养。没有还俗的，也要使他们参加对喇嘛寺的管理。

班禅的错误很严重，但还要看一下。1959年达赖叛国，西藏在平叛后进行了经济改革，班禅当了西藏自治区的代理主任。但是作为农奴主的代表，班禅起了野心。1960年和61年，他阻止喇嘛还俗，还到内地四出活动。当时，主管统战工作的李维汉、习仲勋右倾，对他无原则迁就，班禅终于在1962年野心大暴发，写了一个《七万言书》，暴露了他的反动本质。

1964年，西藏人民对班禅进行了斗争，1965年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对他进行了揭露和批判。因为他中毒深，交待不好，撤销了他的西藏自治区代理主任和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职权，保留一个政协常委的职务，这主要是为了给他保留一个自新的机会。”

“最近你们对他进行了三次斗争，很好，我们想还是让他留在北京改造，再看他一下。

阿沛和班禅有所不同，阿沛.阿旺晋美也是一个过渡人物，他在西藏的作用还未完全失掉。他与班禅有所不同，班禅反对政教分立，阿沛赞成我们主张的政教分立。政教分立这和阿沛等人的利益也是一致的，因为他在宗教上是没有地位的。现在他当自治区主席，也是对他的一个考验。至于他过去的问题。以及他和国外的关系问题，他能

否彻底交待，这是对他的考验，我们要给他时间来交待。这次国庆让他上天安门，主要考虑是代表一方面。同时，我们安排了一个藏族同学讲了话。现在农奴主还存在，我们就要利用他，可以对那一部分人起作用，否则，他们感到没有出路就会捣乱，对国家建设不利。当然我们也不怕，这是分化他们，表示党和政府对他们仁至义尽，这也是对跑到国外的人的一种分化。从长远来看，我们的目标应该从劳动人民中去培养干部，但这需要时间。阿沛的前途有两种可能，一种是真心诚意地跟毛主席走，就有出路；一种是走班禅的老路，就会自绝于人民。我们总是要做到仁至义尽，主要看他自己。

西藏的宗教是一个长期的问题，但政教一定要分开，喇嘛制度一定要打碎，因为喇嘛制度严重妨碍了民族发展。为什么解放前西藏、内蒙的人口逐渐减少？就是喇嘛宗教制度的影响。这次文化大革命是思想大革命，就是要把喇嘛制度彻底打碎，解放小喇嘛。但是，破除迷信则是长期的，迷信思想在没有新思想代替之前，是一下子消灭不了的，这是长期改造的事。现在，西藏正在破四旧，打庙宇，破喇嘛制度，这都很好，但庙宇是否可以不打烂，作为学校，仓库利用起来。佛像，群众要毁可以毁一些，但也要考虑保留几所大庙，否则，老年人会对我们不满意。

培养干部，使用干部都要贯彻阶级路线，但对一些农奴主的子弟，要利用他们的经验，让他们做工作。当然不是依靠他们，依靠的是劳动人民，你们那里中下级政府机关里，就可以多收一些解放了的农奴，逐步培养他们。你们要把农奴主的子弟赶回西藏去改造，并且叫他们黑五类。‘黑五类’这个名词，中央没有批准，因为这样就等于不让他们改造了，这是宿命论，是新迷信。我们既要破除旧迷信，也要破除新迷信。北京工业大学有个谭力夫，他的讲话是极‘左’的，把‘红五类’的条件规定的比党员条件还严，实际上是脱离了广大群众，是形‘左’右。但也要注意依靠谁，团结谁的问题，至于这些人（农奴主子弟）是回去改造好，还是分散改造好的问题。我个人认为还是分散改造，可能更有利些。

对统战工作也要本着这个精神去做，既要培养劳动人民，贯彻阶级路线，又要对农奴主子弟团结、教育、改造，使用他们。”

接见完西藏的代表，周恩来和江青等人又接着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北京“三司”代表。

在会上，有人提出“上海市有人以总理说‘上海市委是正确的’讲话为盾牌，压制革命”。

周恩来回答说：“我给上海市委负责人打电话，说过他们不是黑帮，是要革命的。革命反革命是敌我矛盾，正确不正确是人民内部矛

盾，这是两个问题，两种不同性质的矛盾，一定要区分开来，不要混淆不清，我已讲过多次了。”

接见一直持续到16日凌晨1时，周恩来才拖着疲倦的身躯来到福建厅，看得出来他已经很累了，但一进门仍然抱歉地说：“让大家久等了。”

“首都工作组”郑维山、傅崇碧等人向周恩来汇报了毛泽东这次接见红卫兵的方案和警卫方案。周恩来认真审查后，当即决定，按方案立即进行准备，计划于18日12时左右实施接见。

按照周恩来审定的方案，首都工作组、公安部、北京卫戍区、北京市公安局和各“联指”，立即投入了紧张的组织准备工作。

为保障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在50里长的接见路线上的安全，北京卫戍区采用了军、警、民三结合的警卫布势：武装哨与便衣哨结合，地面警卫与控制制高点的立体警卫结合，对沿路两边的建筑物、住户、临街危险窗口、制高点等进行了全方位的警卫、监控。卫戍区4个师中的机动兵力全用上还不够，又从驻京军兵种中借用了部分力量。

10月16日，北京航空学院贴出了一张题为“法西斯党的危险就在眼前”的大字报。大字报以毛泽东1963年5月9日在《浙江省七个关于干部参加劳动的好材料》的批语中一段话开头：“不然的话，让地、富、反、坏、牛鬼蛇神一齐跑了出来，而我们的干部则不闻不

问，有许多人甚至敌我不分，互相勾结，被敌人腐蚀侵袭，分化瓦解，拉出去，打进来，许多工人、农民和知识份子也被敌人软硬兼施，照此办理，那就不要很多时间，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列举了文革后，绝大多数的党、团组织站在群众的对立面，“充当了反对革命的角色”，最终瘫痪的事实，指出：“如果不是毛主席发动了这场文化大革命，法西斯党的危险不就近在眼前了吗！”

大字报建议：

坚决解散那些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证明是资产阶级保皇党、修正主义党、法西斯党的黑组织，以后在这些地方、学校或单位重新建党。

在高等院校内，到运动后期重新登记党员，由革命群众讨论决定原有党员的党员资格。

以后每隔三至四年进行一次党员登记，经过群众讨论，把那些革命意志衰退、入党后不积极工作空顶一个“党员”的名、落后于群众、落后于形势、骄傲自大、止步不前，并且经过教育仍然改进不大的人“请”出党的队伍，以保证党的无产阶级的革命性。这些人什么时候具备了无产阶级的革命性，够了党员条件，还可以随时重新入党。

以革命的红卫兵组织代替共青团组织，取消共青团。

大字报是以1966年10月15日结束，以“红旗战斗队湘江纵队卫泽东、保泽东、崇泽东、跟泽东、学泽东、爱泽东、颂泽东”落款。而这七位保卫、崇拜、紧跟、热爱、学习、歌颂毛泽东的七位同学分别是侯玉山、袁慕嶽、周一志、张树勇、沈念安、朋吉福、杜小慧。

## 第242回：谈路线，陈伯达再作报告　没想到，又出现“口号事件”

10 月 16 日，在中央工作会议的全体会议上，陈伯达作了题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两条路线》的讲话，共四个部分：

（一）形势大好；

（二）两条路线斗争的继续；

（三）去掉几“怕”，放手发动群众；

（四）坚持毛主席提出的阶级路线，团结大多数。

讲话稿是经过毛泽东亲自审阅了的。10 月 15 日晚，毛泽东对陈伯达送审的讲话草稿前三部分做了修改。

陈伯达的讲话草稿第三页说：“九月二十五日，我同文革一些同志接待一批各地来的学生，曾经有个建议：如果高干子弟在各学校、各单位的文化革命中占有领导岗位的话，最好让普通工农兵和普通干部（江青同志提议加普通干部，比较完全）的子弟来担任。”毛泽东将括号内的“江青同志”改为“有同志”。

讲话草稿第七页说：高干子弟“有许多是好的、比较好的，可以成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也有一些是不大好的，或者很不好，甚至要走修正主义的道路，蜕化变质为修正主义的代表”。毛泽东删去了其中的“蜕化变质为修正主义的代表”。

此外，毛泽东还在其他几处作了个别文字的修改，然后批道：

即送陈伯达同志：

看过，可用。未完部分请送来一阅。看过的这几部分，有几处有少数文字方面的修改，是否妥当，请酌。建议：

你讲过之后，印发给到会各同志，讨论几天，提出修改意见。

毛泽东

十月十五日下午八时半

午夜，陈伯达又将讲话稿第四部分送来，毛泽东将第二页中："各地流行着一种所谓'自来红'的谬论。宣传这种谬论的人，他们利用小孩子们天真提出的'老子英雄儿好汉'，来蛊惑一批学生。实际上，这是剥削阶级的反动的血统论。"的"小孩子们"改为"一部分年轻人"。并批道：

退陈伯达同志：

可用。只在第二页改了几个字。建议全文立即付印，以便一面讲，一面发给听众。

毛泽东

十月十五日夜

按照毛泽东的指示，陈伯达的这个讲话稿作为中央工作会议文件之一连夜付印，第二天发到每个与会者手里。

这篇讲话，高度评价、热烈歌颂了文化大革命和红卫兵运动，其中这样写道说："伟大的红卫兵运动震动了整个社会，而且震动了全世界。红卫兵运动的战果辉煌。可以无愧地说，整个文化革命运动，比巴黎公社，比十月革命，比中国历来几次大革命的群众运动，都来得更深刻，更汹涌澎湃。这是国际上最高阶段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

其次，点名批评了刘少奇和邓小平。

陈伯达解释毛泽东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是“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群众要怎么办就怎么办”；而刘少奇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则反对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把国民党的‘训政’搬来了。”

他说：“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决定的十六条，纠正了前一个阶段的错误路线，即资产阶级的路线。但是，错误的路线，还可以用另外一些形式出现。无产阶级的革命路线与资产阶级的反对革命路线的斗争，还是很尖锐，很复杂的。”“斗争一直围绕在群众的问题上。”“我们有些同志，是少数同志，以老革命自居，在解放后做官当老爷，甚至把自己的革命历史忘记得一干二净。毛主席多年来批评的‘官、暮、骄、娇’，他们全有，可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却不让群众去触动。”“有些地方，有些同志，在十一中全会之后，还用各种形式，在许多问题上，继续犯路线错误。”

陈伯达作了这样的归纳：“党内路线的斗争是社会阶级斗争的反映。刘、邓的错误路线有它的社会基础，这个社会基础主要是资产阶级。错误路线在党内。有一定市场，因为党内有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还有相当一批世界观没有改造或没有改造好的糊涂人。”

在这一阶段的中央工作会议的小组会上，康生历数了以万晓塘为首的天津市委如何与红卫兵顶牛的情况。当讲到万晓塘死后，市委组织群众上街游行时，他指着天津市委第二书记赵武成说：“你们这是拿死人压活人，公开反对毛主席！”

这时的赵武成面色苍白，汗珠连连滚落。他在中央工作会议初期指责胡昭衡的发言成了这一阶段的批判重点，只能是一再检讨。作为天津市委的上级领导，河北省委书记刘子厚也跟着检讨错误。

另外，西北局第一书记刘澜涛、西南局第一书记李井泉、东北局第二书记欧阳钦、中南局第三书记兼广西区党委第一书记韦国清都在会上受到了重点批判。福建省委第一书记叶飞当然更是难过。

10 月 16 日晚上，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福建省领导集中在范式人的房间里头，由叶飞主持小组会，他绷着脸说："大家讨论吧，党中央叫我们讨论就讨论，对这个文件有什么意见都可以提。"

以前开会，叶飞总是最先发言，而这次会议却一反常态，只管催促别人发言，自己则当"录音机"，光录不放。显然，他对这次会议、对陈伯达的报告是有抵触情绪的，他曾经私下发牢骚道："陈伯达这个人，就是只听一面情况。"又说，"中央文革一些人不了解下面情况，不深入下面来看看群众是什么群众，不知道群众的情绪怎样，好像我们这些人最不听话。"

当会议进行到讨论福建省是不是犯了"反动路线错误"的时候，韩先楚、魏金水等人认为是犯了"反动路线错误"，叶飞则多方强调是属于认识问题，是不理解，范式人也认为是认识问题。

后来许多省都上线了，范式人仍然显得犹豫不决，他打长途电话回去征求梁灵光、许亚、李敏唐等人的意见，可是，在家里的几个常委意见都十分暧昧。压力越来越大了。韩先楚要魏金水去问范式人，为什么不揭发叶飞的问题，并要他检查自己执行"反动路线"的错误。

魏金水就去问范式人说："你为什么到现在还不揭呀？真的要和叶飞穿一条裤子吗？"

"不敢，不敢，回去烧，回去烧。"范式人依旧是一副犹犹豫豫的样子。

10月17日，周恩来将13日对哈军工"八八团"要求国防部办公厅副主任、国防科委副秘书长路扬交出工作组整的"黑名单"和工作笔记一事所做的"三条指示"批告总政副主任、全军文革组组长刘志坚：这三条指示适用于国防科委所属十一所院校。

10月17日，王力接见上海大专院校及文艺单位驻京代表时，重点讲了两条路线的斗争。他说："现在这两条路线的斗争，就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还在继续。过去批过前一阶段的错误路线，还有些地方、单位采取新的形式，新的手段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目前斗争很复杂，我们中央文革小组陈伯达同志上次在这里讲过，我们坚决支持你们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坚决支持你们。无论是挑动学生斗学生，还是挑动工农斗学生，或是挑动群众斗群众，都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又不愿意公开的向群众检查，又不接受批评，还不参加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开火，就是执行着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在谈到许多地方利用林彪9月15日的讲话将矛头再次指向群众时，王力说："现在有人利用林彪同志9月15日在天安门上的讲话和《红旗》十二期社论，又来整革命少数派，我们坚决不答应！林彪同志的讲话和《红旗》十二期社论不是针对群众的。社会上有反对毛主席，

有反对林彪同志的，我们要提高警惕。但不能用这个借口来镇压学生。”

对一些工厂的工人提出是否可以参加文化大革命的问题，王力说：“工厂工人可不可以外出调查材料，和学校联系？是否可以到外面去？抓革命、促生产，但是这一条决不是说工厂就不能和别人相比，决不是说工人连调查都不可以的，决不是说连文化大革命都不搞，利用抓革命、促生产这个口号变成不革命，这是不对的，是有错误的。何况工人同志还首先保证了生产。”

这天，王力、关锋、戚本禹还接见了全国少数派学生代表。这些学生到北京后，给江青、中央文革小组写信要求接见，反映他们在各地受打击的问题，汇报各地文化大革命的情况。接见时，重庆、甘肃、江西、湖北、云南、新疆、安徽、上海、辽宁、福建、湖南、贵州等12省市20个代表先后发言。对他们提出的问题，王力说：

“你们向我们反映了很多重要情况，提出了很多重要问题，我们负责，把同学们在会上提出的情况和问题以及上交的材料，我们带回去报告江青同志，报告文化革命小组的领导同志，报告我们小组的全体同志。我们认真地研究同志们的情况、问题、要求和意见。”

他明确表态说：“只要是镇压革命学生的，只要是镇压革命群众的，只要是挑动群众斗群众的，挑动学生斗学生的，那些都是错误的路线，都是执行的错误路线。特别是犯了路线的错误，过去犯了镇压学生的路线错误、镇压群众的错误路线的人，又不向革命群众公开检

对自己的错误，不承认错误、不进行自我批评，不得已才出来参加这一个批判错误路线的斗争，那就表明，他就不可能执行正确的路线。”

下面的代表们热烈鼓掌。王力接着说：“对于那些在错误路线下，被打成‘反革命’，被打成‘右派分子’，被打成‘反党分子’，被打成‘假左派，真右派’的这样一些群众，这样一些学生，这样一些工人，这样一些机关干部，不坚决地给他们平反，不公开地给他们恢复名誉，这就表明他们还在继续执行错误路线。必须坚决和他们斗争。”

王力的讲话再次被热烈掌声和口号声打断……

王力接着说：“过去执行错误路线，现在他们是不是回到正确路线上来了，它的标志就是这个——是不是公开承认错误，是不是替被打击的，被打成为‘反革命’的这些群众、这些学生平反。这就算标志。有的地方工作组撤了，后一种形式叫什么联络员、观察员、巡视员，这三员也是在背后操纵，而且也还是在学生的头上，还是继续的压迫学生、镇压学生的革命运动，这样一种形式换汤不换药，还是错误路线。”

对一些同学和工人提出的，10月5日中央《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是不是适合于机关、企业、工厂及县以下的单位、学校，王力说：

“我们研究过这个问题，党中央也研究过这个问题，认为：凡是有这样一种情况的单位，不管是工厂，不管是工矿企业，不管是机关，不管是县以下的学校和其它单位，凡是有这样的情况的一律适用！”

“同志们也要注意，同学们也要注意，就是也不要把过去所谓保院党委的、保工作组的，保这个筹委会的，也不要把他们，把同学当中这样一些同学把他们说成保皇派。我们建议，我们主张在学生当中不要戴保皇派这一类的帽子，对于过去受蒙蔽的同学，执行错误路线的同学，我们对他们还是要团结的，对他们啊，对错误路线必须进行原则的批评和斗争，对这些同学一定要满腔热情地帮助他们、教育他们、团结他们。”

对工厂、农村是否也可以搞文化大革命的问题，王力说：“中央通知过，是发过这样的通知，工厂啊，农村啊，它的文化大革命要注意到生产、工人、农民不能离开自己的生产岗位到处跑，这是不可能的，因为有生产任务。但是呢，这一条决不是说工厂、工人的情况不能同别人交流，决不是说同别的单位交流经验都不可以，交换交换都不可以，这个，没有这样子的规定。这个通知特别提出了这样一条，我们保证生产任务，保证工厂正常的生产秩序的。在这样一个情况下，我们做一些文化大革命的工作，这个为什么不可以呢？利用这个——抓革命、促生产这样一个口号变成不许革命，这个不对的，抓革命吗？也没说不革命嘛！”

10 月 17 日这天，首都“二司”与“一司”的部分学生集聚中南海门口，上万红卫兵手举《毛主席语录》高喊：“周总理，周总理，我们要见毛主席！”

17 日晚 23 时，郑维山、傅崇碧、蔡洪江等人在福建厅再次向周恩来汇报了接见方案、警卫方案准备工作的落实情况。周恩来完全赞同，又一再强调在实施中要“万无一失”。

会后，周恩来不顾深夜疲劳，又召集叶剑英、杨成武、汪东兴、吴德、周荣鑫同志，最后又叫上谢富治、戚本禹，一起到现场察看准备情况。

在 9 月 15 日、10 月 1 号毛泽东那两次接见红卫兵时，天安门城楼前维持秩序的标兵都是由北京“三司”和部队联合派出的。10 月 17 日半夜，“首都工作组”又赶紧通知“三司”，告诉他们，标兵不用去了。

“三司”的人突然接到这个通知，不明就里，大为疑惑。地院“东方红”的一把手朱成昭一听就说：

“哎呀，是不是要出事啊？”

原来，9 月 16 日，中宣部下发了这次接见红卫兵的口号。但是 17 日又发了一个，内容有变化，删除了 16 日下发的口号中的几条口号，学生们看了不满意。当天，北京农业机械化学院“东方红公社”就发出传单：《揭穿一个大阴谋》。传单说：“第二次印发的口号把第一次印发的几个口号删掉了，就是 2、3、4、6、8、11，同志们：这是一个大阴谋。”

而此时，半夜又来了这个通知。于是有人就怀疑其中是否有阴谋了，甚至认为是否有人要搞政变，还可能是“有人要向毛主席下手了”。

10 月 18 日上午，北航“红旗”正在学校的东操场组织活动。突然听到校外马路上广播车的口号声：

“誓死保卫毛主席！”

“谁反对毛主席就砸烂谁的狗头！”

有人过来向北航“红旗”的负责人韩爱晶报告说：“北京地质学院朱成昭带着几个学校的学生开过来了。”

没一会儿，北京农机、政法、石油、矿院、北医、邮电、北机、水电等高校几千人的学生队伍就进了北航南校门。地院的朱成昭来到北航韩爱晶跟前，情绪非常激动的说：

“中央出大事了，毛主席今天有危险，今天万万不能让毛主席出来见红卫兵。如果出了事情，就是中国革命的重大损失。”

韩爱晶问：“到底是怎么回事？”

朱成昭拿出两张纸对韩爱晶说：“你看，昨天的口号单上有‘以毛主席为代表的……’，今天早上发下来的新口号单把‘以毛主席为代表的’八个字删掉了。

朱成昭特别强调说：“有人删掉了‘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这不是中央里面有人要搞反革命政变吗？毛主席有危险。我们提出的口号是‘谁反对毛主席就打倒谁！’”

韩爱晶听了也觉得问题严重。广播车发出的愤怒口号声和浩浩荡荡的示威队伍及本校学生们脸上的战斗神情，都让他觉得：“毛主席的安全最重要。万一有人搞鬼怎么办？”他立即和北航的田东及屠海

鹰等商量后，北航“红旗”约 1000 人随即也加入了游行的队伍，一起向天安门进发，浩浩荡荡，口号震天！

队伍行进到北太平庄时，看见市民组织的纠察队为保障当天接见红卫兵的顺利进行，已在路上排成横排执行戒严任务。

但是面对情绪激昂的学生队伍，听到广播车的高音喇叭不停喊出的“誓死保卫毛主席！”“谁反对毛主席就打倒谁！”的口号，负责封路的纠察队市民也搞不清楚怎么回事，稀里糊涂的就让这些热血沸腾的学生冲散了。

这时，正在劳动人民文化宫“三司”办公室的清华蒯大富，看到北京卫戍区司令傅崇碧急急忙忙来找他，对他说：

“蒯大富，快快，总理找你。”

这时，哈尔滨工业大学学生又在天安门前观礼台上贴出了“打倒刘少奇”的大标语。周恩来得知后，立刻派国务院秘书长周荣鑫、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童小鹏前往天安门东侧的劳动人民文化宫，向红卫兵做劝说工作，要求他们撤下这些标语口号。

当周荣鑫他们开车来到劳动人民文化宫时，文化宫前已挤满了人，一片嘈杂。他们的车子无法开过，只好停下，当即被拥挤的人流包围。他们好不容易进到文化宫找到哈尔滨工业大学学生，经过反复做工作，虽然还有人反对，但多数人赞成，把“打倒刘少奇”的大标语从观礼台上撕下来了。

第 243 回：长蛇阵，毛泽东五次接见　劝说忙，勿贴刘邓大标语

18 日上午，离毛泽东接见红卫兵不到 1 个小时了，周恩来又从人民大会堂来到了“首都工作组”设在天安门城楼的指挥所。他问郑维山、蔡洪江：“你们想过没有，若是红卫兵没有思想准备，主席的车通过时，他们没看清主席，要求再次参加接见怎么办?要立即写个广播通知，交给宣传车，在主席车出发进入通道前 5 分钟开始广播，过早了容易泄密。”

接着，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地讨论《通知》的内容，最后，郑维山总结大家的意见，当场口授“通知”内容，蔡洪江作了补充，稍加整理后念给周恩来听。周恩来听后说：“就这样，马上交给宣传车，并告诉广播员，一定要在毛主席的车出发前 5 分钟开始在沿线广播。”

再说蒯大富跟着傅崇碧来到天安门城楼，只见周恩来和陶铸都在城楼中厅，周恩来一见蒯大富就说：

“蒯大富，你无论如何想办法把韩爱晶和朱成昭挡在西单那边。”

陶铸非常激动的说：“你们是红卫兵，我们也是红卫兵啊，我们也保卫毛主席啊，我们从井冈山的时候就是毛主席的卫兵了，我们怎么可能那个，没有你们说的那种情况，他们可能是多疑的，多心了。毛主席接见，一百万多红卫兵等着呢，你们如果这样，那将造成多大的影响，无论如何都要想办法劝阻他们，不让他们往里面来。”

周恩来还说：“今天你可能见不到主席了，没关系，下次什么时候有机会我一定把你介绍给毛主席。”

蒯大富从天安门上下来，和傅崇碧一起，从皇城根脚下乘车驶往西单。

再说朱成昭和韩爱晶带领的示威的队伍冲过一道又一道戒严防线，一路向西单开了过来。

西单这里，已经是由部队执行戒严任务了，但也禁不住学生这近万人的队伍。朱成昭他们很快就上了长安街。

蒯大富和傅崇碧在西四附近堵着了韩爱晶和朱成昭的队伍。蒯大富迎过去，对朱成昭和韩爱晶讲：

“总理让我来通知你们，无论如何队伍不能再往前走了，有什么事情等毛主席接见完红卫兵再解决。”

只见朱成昭把手一划，说：“别吵，马上要出事了，毛主席有危险，根本就不能出来接见。我们要把这事情公布于世，毛主席处在危险中。我们保卫毛主席！奋勇前进！”

只见学生们情绪激昂，脸都变了，高喊着：

“保卫毛主席！”

“毛主席危险了！”

在蒯大富旁边的傅崇碧根本就说不上话，只能在蒯大富旁边跟着。近万人的队伍几乎没有停留，很快就来到天安门前金水桥下。

这时，傅崇碧从天安门上下来，走到队伍跟前，很认真地对朱成昭和韩爱晶说：

“周总理请你们上去。”

朱成昭和韩爱晶跟着傅崇碧上了天安门，见到周恩来。周恩来对他们二人说：

“你们在这边等一等，马上和你们谈。”随后就走了。

12 时 45 分，宣传车从人民大会堂东门出发，开始沿途广播接见《通知》：

同学们，红卫兵战士们！

你们日夜盼望的时刻就要到来了，伟大领袖毛主席就要来接见你们了！

为了使这次接见顺利进行，确保安全，接见总指挥部特作如下通知：

（一）各联指立即按划定区段整理好队形，等候接见。

（二）所有参加接见的革命师生，立即各就各位，不要离队，不要走动。

（三）所有参加接见的人员，必须遵守纪律，听从指挥。

（四）为了不妨碍视线，所有旗帜、横幅、标语牌等影响视线的物体，一律收起放下。

12 时 50 分，《东方红》乐曲响彻天安门广场上空，毛泽东第五次接见红卫兵开始了。

1966 年 10 月 18 日林彪在接见全国各地来京“革命师生”大会上讲话

毛泽东、林彪、周恩来各乘一辆敞篷吉普车，中央其他领导人陶铸、陈伯达、邓小平、康生、刘少奇、朱德、李富春、陈云、董必武、陈毅、贺龙、李先念、谭震林、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李雪峰、

谢富治、刘宁一、萧华、杨成武、江青、王任重、刘志坚、张春桥等分乘6辆敞篷吉普车，从大会堂东门出发，在12辆敞篷开道车和警卫车的引导护卫下，首先接见广场的红卫兵，尔后沿着东长安街、建国门内外大街、东三环路、北三环路缓缓地驶进。红卫兵都按广播《通知》的要求，在原地、原位有准备地、秩序井然地接受了毛泽东的检阅、接见。只用了1个小时，就接见了巨龙似的、排了50里长的150万红卫兵。

但接见结束后出现了意外险情。当毛泽东的坐车由西进到大钟寺东侧时，与外地刚刚来到北京的红卫兵相遇。这些红卫兵看到毛主席后，蜂拥而上，拦住了他的汽车，整个车队被三、四百名红卫兵围住了。

紧急时刻，所有的警卫人员，在卫戍区警卫处长毕庶畅的指挥下进行疏导，但效果不大。

此时，一个男红卫兵跳上杨成武、傅崇碧、蔡洪江乘坐的敞篷吉普车上，这辆车在毛泽东乘坐的敞篷吉普车的左后侧，这个红卫兵想

通过此车再跳上毛泽东主席的车，并说：“我是毛主席家乡的人，我要上车看毛主席。”

蔡洪江精明果断，手疾眼快，一下子把他拽住了。他极力挣脱，把蔡洪江的衣袖都给拽破了。蔡洪江则死死地拽住他不放，并把他推下车去。

这时，人群围住了毛泽东的车，而且包围圈越压越小。就在此时，卫戍区部署在北太平庄以西的 4 个机动连，天兵天将似地出现在现场，在周恩来、蔡洪江、毕庶畅的指挥下，迅速开辟出一条人墙通道，才使毛泽东等中央领导的汽车安全脱离困境，他们换乘各自的专车后迅速开走。

再说天安门城楼下，北航、地院等院校为“口号”示威的学生还像潮水一样堵在金水桥上，高喊着：

“坚决把篡改口号的人揪出来！”

“谁反对毛主席就打倒谁！”

“誓死保卫毛主席！”

周荣鑫、傅崇碧和童小鹏又赶到这边。看到群情沸腾，口号四起的场面，他们只好把朱成昭、韩爱晶等几个主要负责人叫到一块，分别和他们商量，希望劝说学生们回去，派几个代表去见周恩来。

韩爱晶觉得那么多学生都来了，只派几个代表去，有些对不住大家，就说：

“不能只见我们几个代表，要想办法让大家都见见周总理。”

周荣鑫又去请示，回来后答复说："总理说可以。你们让队伍等着，我们调车。"

一会儿，公交车一辆接一辆开到金水桥旁劳动人民文化宫门前空地上。在场的学生几十人上一部车，几十人上一部车，一辆接着一辆开往东郊北京体育馆。

而这次在观礼台上参加接见的学生很多人因为离的太远，没有看清毛泽东，于是不走，在那里喊："我们要见一次毛主席！"其他人也跟着一起喊。就这样，四面八方都是各种口音、各种腔调："我——们——要——见——毛——主——席！"喊得越来越整齐，从中午一直喊到下午。最后毛泽东也没回来，而是开来了 100 来辆公共汽车，周荣鑫在天安门城楼喊："请同学们上车去工人体育馆。"

最后进入北京体育馆的大约有 7000 多人。。蒯大富也来了，是周恩来通知他过来的。他和朱成昭、韩爱晶、及政法、石油、矿院、农机、北医、邮电、北机、水电等院校的一些负责人组成主席团，坐在主席台上。

大约晚上 20 时，周恩来来了。他和主席台上的学生组织负责人一一握手，还不停地解释说：

"你们要相信我周恩来嘛，你们要相信中央能够把这个事情查清楚嘛，我们一定会把这个问题搞清，一定会负责任的。"

朱成昭反复提出要见江青。还有的代表提出，这件事要有处理结果。台下的几千人喊的口号就更不同了，从天安门观礼台来的人高喊着："我们要见毛主席！"

经过半个小时商量，做通了大家的工作。

这时，台下的学生涌向主席台，担任警卫工作的战士们要学生退后，和主席台保持一定距离，可学生们都想离总理近些，尽量往前挤。朱成昭向周恩来报告后，对台下大声说：

“请解放军相信红卫兵，请解放军后撤，由我们红卫兵负责总理安全，大家说好不好？”

台下齐声高呼：“好！”

周恩来亲自过来让战士们后撤。

18日晚20时30分，周恩来作了讲话。他说：

“我首先向你们致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敬礼！”台下响起热烈地掌声。

周恩来接着说：“首先让我向今天参加这个大会的各校革命左派同志们表示，我非常感谢你们这样高的革命警惕性，提醒了我们！”

群众热烈鼓掌，高呼“誓死保卫毛主席！”“谁反对毛主席就打倒谁！”

周恩来接着解释道：“今天一些学校的革命左派代表到中宣部去谈，发现两个口号单子的问题。今天早晨我才知道有两个口号单子，这是我的官僚主义，我没看过。他们给我打了电话，我说我要见到正式的东西。你们发现两者有很大的政治差别，你们提出后一个口号单子有严重的政治错误，你们发现这样的问题是完全正确的，是对的！希望在中宣部谈话的同学给我们时间，我们一定审查这件事。当时已经深夜天快亮了，我们正在组织今天的接见工作，当时并没有看到这两个口号单子，为了使毛主席顺利接见150万外地的革命师生，当时我责成中宣部审查这个口号单子，今天早晨5点，我才发现有两个口

号单，并且确有问题，因此才研究确定这个白底红字的口号单。这个口号单是拿到党中央政治局通过的，是在毛主席跟前决定的。”

又是长时间热烈鼓掌和“毛主席万岁！万万岁！”的口号声。

周恩来说：“‘谁反对毛主席就打倒谁！’这个口号就是你们提出来的。同志们，我们彻底的革命派在真理面前是无所畏惧的！这22条口号是胜利的口号，革命的口号！你们可以公布，其中每一条都可以到任何地方贴。

关于那两个口号单子，我应你们的要求，正责成中宣部进行调查，我负责调查清楚，查清后我还要向中央常委和毛主席汇报，并答复你们。”

周恩来深情地说道：“20 年前，啊！21 年前毛主席到重庆谈判，我是陪他去的，解放战争在陕北打游击，也跟他在一块儿。我有过错误，主席纠正我，挽救我，我从来不掩饰错误，但是我知道错误，我就坚决地改，所以我以这种心情来爱护毛主席，至少不落后于你们，大家是可以理解的。”

他的话再次被热烈的掌声打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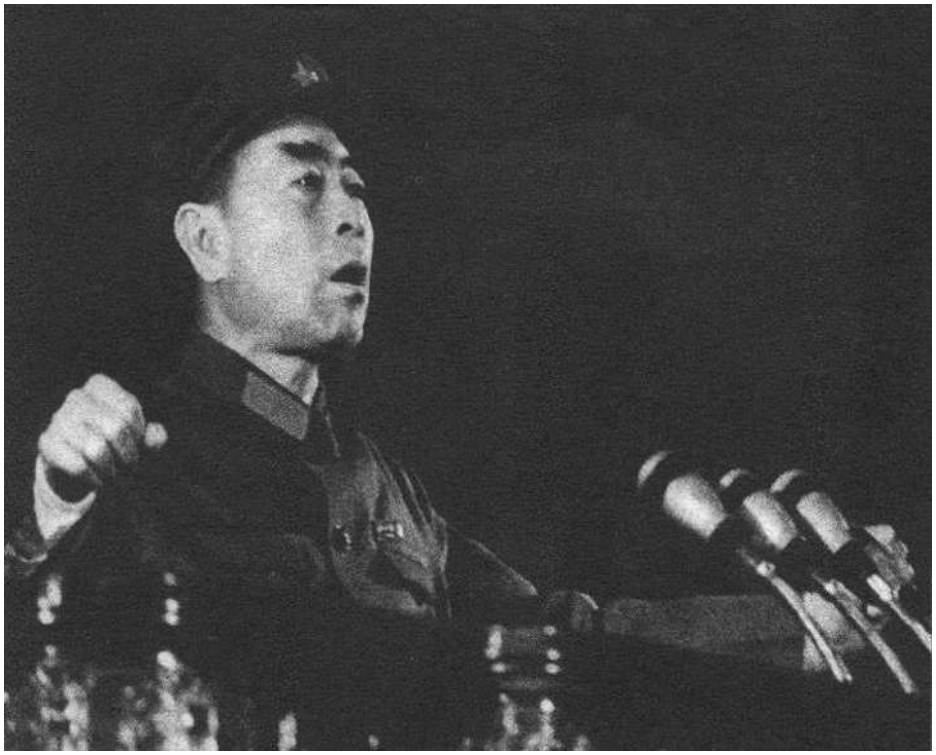
周恩来说：“这次花了一个半小时，但还有缺点，在最后 500 米处挤伤了几个同学，我心中一直不安，因为在这里解决你们的问题，还没有去看他们。我们不能满足这样的情况，要继续前进。当时两万多人，一围上不好办，只好到这里来。今天你们等久了，我 5 点半到天安门，看着你们上车我才离开。”

“关于同学们还要求见到中央文革陈伯达、江青、康生等同志的问题，你们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当然他们也想见到你们。但是，陈伯达同志是毛主席、林彪同志领导下的我们党的最好的理论家。林彪同志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提出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陈伯达同志最善于发挥、善于阐明毛泽东思想，使我们得到了很大的好处，他脑子用得很多，需要好好地休息。我今天和他同车，是我亲自送他到休息地点的。康生同志快出国了，要代表我党出席阿尔巴尼亚的党代表大会，目前他正在忙着做准备工作。江青同志，有的同学 15 日座谈见到她，你们看到她身体比较差，这两年来她搞文化大革命是很辛苦的，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应该让她休息。所以，我今天没有去惊动他们 3 位。”

众人高呼：“祝江青同志身体健康！”

周恩来：“我一定向他们转达你们的意见。”

最后，全体起立，周恩来亲自指挥大家高唱《大海航行靠舵手》。



周恩来指挥高唱“大海航行靠舵手”

接见结束后，北航田东回到学校，又动员了很多“红旗”组织的学生连夜进城，满大街刷大字报、写口号。还在天安门广场上正对着天安门的旗杆前面，树起几个 2.5 米至 3 米高的木架，贴上大字，一个架子上一字：“誓死保卫毛主席”。后来，学校工人又做了十个钢铁支架，每个支架有好几米高，每个支架上面用钢板条做一个大字，组成“谁反对毛主席就打倒谁”口号，替换原来的木头架和标语。

还有部分群众在接见结束后又到《红旗》杂志社去揪“口号”的具体负责人熊复。陈伯达赶到《红旗》杂志社做解释。据说，熊复心脏病发作，送到医院去了。

当天下午，清华大学也出现了“打倒修正主义头子刘少奇”的大标语。

毛泽东接见红卫兵后，在北京参加完接见的哈军工“红色造反团”总团的头头们正在紧张地开会，他们刚刚接到周恩来秘书的通知：“今晚总理要接见哈军工‘红色造反团’的代表。”规定去 7 个人，约好由国务院派车到他们的驻地灵镜胡同联络站接人。

一番讨论后，总团推出 7 名代表。

这 7 名代表来到中南海，周恩来先问每人的个人情况，轮到徐卫河，刚报了名字，周恩来目光炯炯地盯了一眼，突然问：“你是徐深吉的儿子吧？”

哈军工电子工程系的徐卫河是北京军区空军司令员徐深吉中将的儿子，一直是“造反团”总团参谋班子的成员。

周恩来仔细了解哈军工和哈尔滨市的运动情况后，对徐卫河说：“你们这些高干子弟千万不要介入派别斗争。积极关心‘文革’，参加运动是应该的，但是不要当头头，不要参加领导班子，让工农子弟去负责。你们可以到外地走一走，看一看，看看全国‘文革’的大好形势嘛。”

徐卫河当即向周恩来表态：“请总理放心，我们一定从总团核心组退出去。”

已经快到午夜了，周恩来要留大家吃夜宵，同学们怕影响总理的工作，坚决不肯。

第二天上午，徐卫河回到灵镜胡同，把周恩来的意见向哈军工“红色造反团”总团头头们做了汇报，周涛、贺铮等几位高干子弟都表示立即退出总团，到南方串联去，徐卫河又组织了“造反团”中的几个活跃分子，到广州串联去了。

10月19日，周恩来就北京外贸学院“毛泽东主义红卫兵”要李先念去参加20日下午召开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并要求提

供3辆宣传车在街上播送李先念讲话录音事批示："参加大会可以，提供3辆广播车在大街上播送李的录音不可以。"

这天，周恩来约陶铸、童小鹏、周荣鑫谈话，安排劝阻哈尔滨工业大学师生去天安门张贴批刘少奇的大字报。第二天，周恩来在国务院会议室接见哈尔滨工业大学造反派代表，劝说他们：

"我劝你们不要到天安门去贴少奇同志的大字报了，学校也最好避开这个问题。即使少奇同志有错误，我现在也无权回答你们。你们把少奇同志的大字报贴到天安门，你们要考虑考虑。少奇同志是政治局常委，是国家元首，他不是普通党员，也不是普通领导，就是要撤换，就是要撤换也不需要去发动群众。主席的思想一直是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思想教育方针。我今天讲这么多，就是劝你们，不要到天安门去贴少奇同志的大字报。清华的同学要把王光美同志叫回去检查，主席还不赞成。主要是考虑群众大会一开，就不好收场。你们做事，要慎重些。凡是中央未提倡的，十六条里又没有的，你们就要多考虑后果。你们不能使中央处于被动地位。"

有代表提出："刘少奇在八大修改党章的报告中没有提毛泽东思想。"

周恩来："八大修改党章的报告没提毛泽东思想，是主席的提议，是针对当时的国际局势。主席说，不一定每一次开代表大会都提。你们青年人热情很高，但你们把问题想得太严重，你们不了解实际过程。"

当问及毛泽东在党内是否是“少数”和“炮打司令部”问题时，周恩来答道：“毛主席的地位在遵义会议时就确立了。现在毛主席的威信是蒸蒸日上，谁也不敢公开出来反对。”

当天，周恩来得知北京地质学院和北京航空学院学生准备21日或22日在天安门广场召开50万至100万人的针对刘少奇、邓小平的“誓死保卫毛主席”大会，立即让周荣鑫和中央文革办公室派人分头去做劝说工作，说服他们不要开。

## 第 244 回：“造反军”，重庆工人再北上

### “黑鬼”反，“湘江风雷”滚滚来

此时，各地在 10 月 5 日中央军委《紧急指示》的鼓舞下，掀起了一阵高于一阵的要求平反的浪潮。

10 月 11 日晚上，聚集在重庆市六中的上百名工人，在学生的鼓动下，来到重庆市委大饭厅，要求市委领导接见。长江航道段 661 指挥部的临时工黄全达等工人在北京学生的指导下，向重庆市委提出的四条要求：

1、承认“工人造反军”是革命的群众组织；

2、给“工人造反军”安排办公地点；

3、给“工人造反军”拨发活动经费；

4、因受到工作组迫害而逃离单位、被扣发工资的工人，应该补发工资。

因为中央 9 月 25 日中发［66］509 号文件规定：农村，工矿企业、事业单位，党政机关，群众团体不成立红卫兵等组织，重庆市委对他们的要求一时不敢轻易表态。

12 日早上，急不可待的北航学生朱进选以“无产阶级革命工人造反军总部”的名义，给党中央、毛主席发去了一份电报，内称：

“向党中央、毛主席告急：重庆市无产阶级革命工人造反军，现已成立，在市委请愿，声讨市委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滔天罪行，达八小时之久了。市委领导人怕字当头，不接见我们，我们坚决要求改组重庆市委。”

“誓死保卫党中央！誓死保卫毛主席！不达目的死不瞑目！市委不承认我们是革命的组织，合法的组织，我们坚决不离开市委！速回电指示。”

这天，部分重庆进京告状的工人以重庆“赴京工人战斗组返渝联络站”和“二七战斗团筹备处”名义发出了《重庆工人二七战斗团组织章程（草案）》，开始在工人中公开发展队伍。

13 日凌晨 3 时 10 分，重庆市委副书记辛易之出来接见聚集在市委大饭厅的工人们，讲了些安抚、劝导性的话。但工人们对这些空话并不买账，执意要求答复四条要求。双方形成僵持局面。一直到晚上，聚集在市委大饭厅的工人眼看他们的要求难以得到市委同意，孟宪臣、朱进选等北京红卫兵商量决定：让工人撤出市委，步行到北京告状。朱进选起草了《无产阶级革命工人造反军北上宣言》，由六中学生印成传单。

《宣言》说：“无产阶级革命工人造反军鉴于重庆的严重情况，为了捍卫十六条，誓死保卫党中央，誓死保卫毛主席，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解放工人被害、被扣、被软禁、失去人身自由的一切革命同志，揪出、斗倒、斗臭、斗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我们于十一号晚召开紧急会议，控诉市委严重违背和极端仇视、歪曲、破坏、对抗十六条的严重罪行，会后去市委解决问题，但市委用尽破坏之能事，市委一手控制的市文革——市委镇压、破坏重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头号打手，六十年代的绞杀革命的白公馆，进行百般刁难，于十二号晚三点半一位书记出来‘接见’，此位书记完全

暴露了市委的丑恶嘴脸。……我们要亲自去见我们最敬爱的领袖毛主席，亲自向毛主席汇报重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情况，我们最相信党中央，最相信毛主席，我们只能相信党中央，只能相信毛主席，毛主席是我们工人阶级的救星，是我们心里最红最红的红太阳。”

第二天，10 月 14 日，在重庆市委大饭厅静坐请愿的工人造反派全部撤回六中，愿意参加北上进京告状者即回家准备钱和粮票，年纪较大、有家庭拖累的老工人就劝说不要参加这次北上告状了。但是许多老工人都坚决要去北京“见毛主席”。

孟宪臣、朱进选等北京学生召集各区工人造反派中的骨干人员开会，研究了北上计划，并把参加北上告状的工人按地区编成了 6 个连，指定了负责的连长、指导员。另外还有一个负责安全保卫工作的纠察班，班长邓胜利是东方红模具厂工人，退伍军人。

北上告状团领队先是杨国成，后又改为重庆市工业设备安装公司工人、复员军人叶祖禄。

这批工人造反派中，青年工人多，流动性大的建筑行业工人多，中小企业工人多。大多是出身贫苦，接受毛泽东时代革命化教育成长起来的一代新人，而且有不少中共党员和共青团员，还有不少复员转业军人。他们为什么要起来造反呢？

北上告状团领队杨国成，“文革”前刚从部队复员，其中共党员预备期应到 1966 年 10 月结束。他本来在单位上参加搞“四清”，因读报读到“工农兵是文化革命主力军”时发了句牢骚，说“大字报都不准我们看，还算什么主力军”，结果被工作组当作批判对象，被迫

起来造反。

一连连长朱登明，1966 年 8 月 15 日重庆大学与重庆师范专科学校两派学生对立冲突的“八一五”事件发生时，他正在现场率领施工队为重庆师专图书馆大楼进行大修。因他和工人们对重庆大学造反派师生表示了同情和支持，在事后重大“815”学生被打成“反革命”遭到全城围攻时，他又代表所在建筑修缮社的 16 个老工人写了为学生辩诬的大字报《为重大八一五疾呼不平》，结果被区委工作组定为重点清查、打击对象，他在重大学生帮助下逃离单位，先到重大，后到六中，参加了“工人造反军”的筹建。

三连连长甘廷荣，在一次党员会上，总支书记宣布市委规定的“四条”后，他起来发言，说这“四条”是错的，不准职工去看大字报是违反《十六条》精神的，这就使他一下成了党总支心目中的有问题人员。随后他又违反“四条规定”，跑去市委看了大字报，还到重庆大学找学生串连，回来后又参与组织了厂里的第一个群众组织“青年革命战斗队”，单位全体青年都参加了这个组织，共青团支部书记任队长。9 月 21 日，市委财贸政治部搞了一次统一行动，把全市财贸系统各单位有“造反”言行的人员全部关起来。甘廷荣自然也在其列，一直被关到国庆节后。他后来是借上厕所的机会逃走，由第十一中学和交通学院学生帮助逃到了六中。

四连骨干朱镇坤，重庆市建工局 402 工区工人，共青团员，21 岁，在单位上是共青团支部组织委员，四清工作组的依靠对象，培养重点，正准备将他发展为中共党员。但是在四清工作组组织群众围攻

外地来渝串连的学生时，他看到热情单纯的学生们遭到有组织的围攻，不让吃饭、喝水，甚至不让上厕所，有的女生被逼得小便失禁。他实在看不下去，就给工作组提了意见，被工作组认为“立场有问题”，一下子就从依靠、培养对象变成了打击对象。出于义愤，他参加了造反。

五连连长林嘉禾，在厂里率先成立了“闯将战斗队”，被工作组打成“反革命”，批判后单独关押，他进行了绝食抗议。工作组被迫将他放出后，他于 10 月 12 日跑到六中，参加了北上告状。

可以看出，当时这些工人造反派，大多是被基层党委或工作组按照“反右派”运动的老一套思路打击迫害而“逼上梁山”起来造反的。

这批人当中，还有一个颇为奇特的人物，即一连指导员黄万奇，他是个转业军人，中共支部书记。后来一连连长朱登明和一些工人曾好奇地问过他：“你又没有受过迫害，为什么要参加造反？”

他很老实地回答说，他本来是被党组织派来打入造反派的。因为他是九龙坡区杨家坪那边的人，市中区这边的人不认识他，所以派他来与市中区的工人造反派接近，还为他编造了“对转业后的安排不满意，受到压制”的“造反”理由。但他到六中接触到这些造反派工人后，发现他们都是些热爱毛主席的热血青年，都是好人，没有谁是图谋不轨的“反革命”，于是就跟他们一起真正参加造反了。

10 月 15 日清晨，重庆工人造反军北上告状团 800 多人，从重庆六中整队出发。步行经沙坪坝翻越歌乐山北上。

朱进选在北上告状团出发前作了简短讲话后，回到在六中的住房

里去取东西，出来时告状团队伍已经走远，他乘车追赶又走错了路线，未能追上。他的同学许叔兴和北京国际关系学院的孟宪臣等学生，还有一些重庆学生则跟随北上告状团队伍走了。朱进选独自返回后，到市委向文革办公室人员提出：工人北上告状团已经步行出发了，市委如果不管，路上出了事市委要负责。

焦头烂额的重庆市委对此不敢不重视，当即派了市委办公厅、工交政治部、基建政治部和文革办公室的干部，还带上了医护人员，前去追赶告状团。当晚，市委人员赶在“工人造反军”北上告状团之前到达璧山县，联系好县城里最大的餐厅为告状团准备了晚饭，并约见告状团代表和随行的首都红卫兵孟宪臣等，劝说他们返回重庆，有问题由市委负责解决。但告状团不同意，市委人员便按照市委此前商定的意见，提出告状团不再步行，而由市委联系重庆驻军派出军车，将告状团全部送到永川转乘火车北上。

告状团工人们对是为让他们乘车北上的建议最初意见不一，有人担心这是市委的阴谋，上了车会被强行拉回重庆关起来。

有人说：“如果那样就全体跳车，出现伤亡由市委负责。”

有人不愿坐市委派的车，坚决要步行去北京，以表明自己“革命造反”的决心……

经过劝说，加上随行的学生们做工作，告状团队伍还是全部上了市委派来的军车，当夜到永川，次日转乘火车去了北京。

在永川，北上工人中有人说筹备组的人有右倾思想，特别提到叶祖禄右倾思想严重，说不定是市委派来的。于是，他们在永川召开“遵

义会议”，重新选举了勤务员，选 402 工区的工人杨国成、重庆锅炉厂工人张厚贵、四建公司的工人朱正昆为负责人。

在永川上火车后，为了在政治上不被抓住“辫子”，告状团按照“家庭出身红五类”的要求，将家庭出身小商贩的原领队杨国成又换成了家庭出身雇农的叶祖禄。

未能走成的北航学生朱进选，在重庆六中又接待了陆续前来串连的工人群众。他将他们组织起来，按各地区编为“工人造反军”的各分团，让留守的重庆建设机床厂工人蒋国志负责联络。随后，以蒋国志为首组建起了“工人造反军司令部”，主要负责人有蒋国志和重庆天原化工厂教育办公室干部、转业军人、28 岁的李方成及重庆电表厂工人赵蔚武等人。因为中央支持造反派的态度日益明确，他们这支“工人造反军司令部”成立后，很快就得到重庆市委的承认，迅速发展壮大，成为“工人造反军”中最大的一个山头。

此后，“工人造反军司令部”中以人民交通公司职工为主的二分团，脱离司令部单独活动，并成为“工人造反军”中坚决与重大“815”站在一起的一个独立山头，主要负责人是人民交通公司汽车修理总厂工人、23 岁的杨大渝。

10 月 17 日晚，朱进选乘火车赴京前，又到重庆上清寺电信局以个人名义给“党中央毛主席”拍发了一份电报，内称：

“重庆白色恐怖千余工人代表 15 号晨步行去京控诉饥寒交迫望速派车”。

电报中说的“千余工人”略有夸张。据甘廷荣回忆，他们到北京

后，他代表北上告状团去北京新市委领了 800 个毛主席像章和 800 个免费乘车证。因此他记得“800”这个数字。估计北上告状团有六、七百人。

这时，湖南张平化的担忧很快变成了现实，进京告状的湖南“黑鬼”在北京受到了热情的接待，他们参加了天安门广场的“十一”国庆观礼，参加了 10 月 6 日“首都三司”在工人体育场召开“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誓师大会”。 在会上，他们听了周恩来、江青的讲话，听了张春桥代表中央文革宣读的 10 月 5 日中央批转的军委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不少人激动得热泪盈眶。就在这个会上，他们将湖南“924 报告”后被打成“黑鬼”的长沙市一中老师叶卫东、银星电影院美工张家政、航运局李敬林的爱人易剑辉起草的《致党中央、毛主席的公开信》递给中央领导，控诉以张平化为首的湖南省委迫害群众的情况，并提出六项紧急建议和要求。信中说：“请党中央和您亲自审查省委 9 月 24 日、28 日的两个录音报告。……请党中央和您派中央首长到湖南了解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对湖南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做出指示。……请求党中央和你同意，我们回去成立一个长沙市工人文革串联总部，……”

10 月 8 日，张家政、叶卫东去“首都三司”，见到了“首都三司”组织部的沈爱莲等人。沈爱莲他们听了张家政、叶卫东讲诉湖南文化大革命的情况，表示坚决支持湖南赴京告状工人的革命行动。

10月10日后，湖南赴京告状的代表又在北京工人文化宫、天安门前、前门、铁道学院等处张贴由叶卫东、张家政、易剑辉等人起草的

《致党中央毛主席的公开信》、《看谭立夫的“干爸爸——张平化9、24”黑报告》等大字报及“张平化是破坏湖南文化大革命的罪魁祸首”、“张平化是镇压革命群众的刽子手”、“张平化9、24黑报告是反毛泽东思想的大毒草、必须彻底批判”、“舍得一身剐，敢把张平化拉下马!”“罢张平化的官、撤张平化的职，打倒张平化”等大标语，还撒发了传单，轰动北京。

来京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张平化情知不妙，于10月12日，以个人名义发表《郑重声明》，承认抓“黑鬼”是执行“资反路线”。宣布9月24日所作的报告内容作废，并决定停止抓“右派”的斗争，要求给被斗的人恢复名誉，销毁一切这次整人的材料。这份声明不仅作为文件传达到湖南全省各级党组织和政府、企业单位，而且还被红卫兵当作他的检讨印成传单，在长沙市全城广为张贴。

这个突然而至的好消息在长沙市再次引起了震动。但已不像《人民日报》“823社论”发表后那样，令人欢欣鼓舞。除了红卫兵学生在街头刷了无数大字报和标语，以示庆贺中央“紧急指示”的到来和声讨张平化的9月报告外，再没有如潮般的游行队伍，没有红旗，没有锣鼓。实际上，企业机关的工人、干部，对省委9月24日的报告仍心有余悸，“引蛇出洞”这句名言阴魂远未消散，因而，人们除了庆幸之外，不敢有什么动作。

而企业、机关的党组织负责人，对于销毁前段整理的整人专案材料和宣布给被斗被批的人平反这些工作，一般都很勉强，有的干脆就不予销毁材料，甚至不予宣布给人平反，仅仅只是停止了整人的斗争

而已。因为，在这些党组织负责人心目中，实际也仍认为目前恐怕又还是“引蛇出洞”，前段斗争大概又是时间搞早了一点而已，斗争的性质并没有改变。

正在北京的“黑鬼”叶卫东、张家政则贴出《作废是可以的，滑掉是不行的》的大字报，表示此事不会就此罢休。

在“首都三司”的帮助下，叶卫东、张家政等又串联了湖南770厂、裕湘纱厂、汽车电器厂、长沙港运局等单位以及株州、衡泉、柳州、湘潭等地的赴京告状“黑鬼”，商议联合行动。10月14日，在“首都三司”组织部负责人沈爱莲、李党育数日的宣传、鼓动、策划下，湖南赴京告状的众“黑鬼”在北京开始筹备成立自己的组织，市曲艺团罗勇为这个新组织起了一个十分响亮的名字“毛泽东主义红卫兵湖南湘江风雷挺进纵队”。他们很满意这个既有地方色彩，又有战斗风格的名字：首先，湘江是毛泽东青年时代游泳的地方，“湘江”二字象征着毛主席的故乡；“风雷”二字为毛泽东诗词所常用，这里意味着即将掀起一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文化大革命的新高潮；而“挺进纵队”则象征这个组织应该是一支保卫毛主席，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刀山敢上、火海敢闯，勇往直前，无所畏惧的铜铁般的队伍。

当时选出的核心小组成员有：“司令”为汽车电器厂工人彭少云，负责全盘；张家政抓后勤、联络；叶卫东负责宣传；罗勇负责接待；张智忠抓组织建设；聘请刘荣华、赵连城当参谋，参加核心小组会议，负责政治思想工作。

“湘江风雷”成立的当天，王任重即派秘书与赵连城联系，并把张平化 10 月 12 日给王任重的信交给赵连城。赵连城、彭少云、张智忠等对陶铸、王任重非常信赖，积极地通过王任重的秘书与王任重联系，向王任重递交汇报材料，请求陶铸接见。

10月15日，“长沙市高等院校红卫兵司令部”也在长沙成立，简称“高司”。成立大会上，省委书记处书记的华国锋到会祝贺，并高呼“向英雄的红卫兵战士致敬！”

“高司”的主要负责人是中南矿冶学院特冶系金属物理专业661班学生詹先礼，中共党员。其他负责人有余定成、黄绍贤、王吉贤、王占中、龙会光，都是大学生中的造反派红卫兵。整个“高司”组织，由长沙市高校的造反派红卫兵所组成。

“高司”的大学生很快就把“黑鬼”们的血泪控诉形诸文字并贴遍长沙的大街小巷，使湖南省委陷入十分被动的局面。

10 月 16 日，湖南“湘江风雷”在北京贴出《向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张平化猛烈开火——致全国革命同志书》大字报。由于在北京对文革的动态了解迅速，大字报不仅批判张平化为首的湖南省委，还联系了刘少奇，文中说：“他们要党员、团员学习《党章》、《团章》《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加强党纪，党性的锻炼，束缚党团员的手脚，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彻底进行。”

10月19日，张平化又散发《中共湖南省委关于加强革命团结和更好地支持革命调查的建议》传单，呼吁加强团结、集中力量，要继续揭发批判省委在文革中所犯路线错误；要求机关干部、工农群众加强

和学生的团结，支持他们的革命行动，不要去参加学生中不同意见的争辩，今后“不再提保卫省市委的任何口号，也不要写为省委辩解的大字报和传单；各校师生代表可以有组织、有计划地到各地各单位进行革命调查，所去地区和单位应予以配合支持。”

第245回：黔贵动，工人成立“红卫军”　赴新疆，王任重会上检查

虽然贵阳地区大中学生在 9 月至 12 月大都到外地大串联去了，但是贵阳地区的工人运动在北京南下串联学生的帮助下，依然蓬勃发展起来。贵州的“95 事件”诱发贵州一些工人开始起来支持造反派学生，并自发组织起来参加文化大革命。

9 月 14 日，贵州工人第一个炮轰派组织“贵阳复员转业退伍军人战斗团”成立。后来按照中央指示，更名为“贵阳战斗团”。

接着出现了“毛泽东思想工人赤卫队”，后来号称有 13 万之众，“赤卫队”头头黄世明是贵阳市建筑公司泥水工。

9 月 28 日又成立了“红卫兵纠察大队”，因其红卫兵袖套上有编号，被称为“号码兵”。李再含是“号码兵”的政治辅导员。

9 月 15 日，毛泽东在北京第三次接见红卫兵，贵州学生参加了接见。怀着受到伟大领袖毛主席接见后的幸福心情，他们返回校贵州学校后，纷纷以这一天命名，成立红卫兵组织。如贵州工学院“九一五红卫兵团”、贵州大学“九一五革命造反团”、贵州农学院“九一五兵团”等。贵阳师范学院的红卫兵组织则定名为“六六战斗团”，这是纪念贵阳的“66 事件”。

10 月 9 日，在首都南下串联队的帮助下，贵阳地区大中专学生成立了“炮轰西南局”的炮轰派组织“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司令部”。

南下串联队在贵阳带头“炮轰西南局、火烧省市委”，煽动作用很大。他们支持和鼓励各工人炮轰派组织联合起来，成立了“工人控诉省市委罪行大会主席团”。

和其他省市一样，到了 10 月中旬，贵阳已形成了拥护和反对省委的两派。每天大街上都会传来一阵阵口号声：

“省委会——没问题！大方向——正确的！”

街道上，一支手拿小三角旗的红卫兵队伍，随着队伍行进的节奏，不停地呼喊着这一口号，声音整齐、宏亮，扣响着临街的每个窗户，引出不少男女老少出门翘首张望。

这支红卫兵队伍，刚走过不到 10 余分钟，又有一支更为庞大的红卫兵队伍走过来。为首的打着红旗，每人手里拿着红色语录本，也精神抖擞地有节奏地振臂高呼：

“省委会——有问题！大方向——错误的！”

口号声一浪高过一浪，也引来临街不少男女老少翘首张望。

走上街头可以看到，高大的建筑物上，也书写着针尖对麦芒的口号。当时的贵阳，两派就以这两句口号作为各自的行动纲领。

10 月初，贵州“毛泽东思想工人红卫军”、“毛泽东思想红色工人战斗团”先后成立。

“毛泽东思想工人红卫军”，简称“红卫军”，主要由贵阳地区汽车运输行业和街道手工业工人为主组成，头头名叫李铁乃，原是汽车运输公司的修理工，曾在部队当过兵，因为生活作风上出了点问题，被退伍到地方。在运输公司里，由于偷摸等问题，又曾被判过劳教。就是这样一个人，造反劲头特别足，要造当权派的反，要清算 10 多年来“受压”的老账。他串连起几个工人造反组织，强令“走资派”批准活动经费，在贵阳市的中心地区——邮电大楼前搭起一个高台，

组织起一个大会领导小组，在这里召开了全市批判省委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大会。

大会都是在每天晚上进行，主持会议的人主要就是他李铁乃。发言采取自由式，不论那个造反组织或造反派个人，都可向大会领导小组，实际上就是李铁乃报名，然后，安排次序，轮流发言。听众，除由“红卫军”组织作为基本队伍外，其余准备在大会发言批判的组织，也可自行将造反大军带进会场。谁料想，这么一个异常松散式的大会，发言的人还十分踊跃，居然将全市造反组织的注意力吸引了过来。每天，挑灯夜战，群情振奋，大会一连召开四、五天，要求报名发言的组织和个人，还连续不断。

李铁乃参军前，只读过小学，看书读报一窍不通。其实，他根本还没有弄懂什么叫“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什么叫“走资本主义道路”。所以，前来报名在大会上发言的，他只要一看是造当权派的反，要求申冤平反的，就一律开放绿灯。由此，在这个名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大会上，各种人都有。有的将本单位的“走资派”押到现场，戴高帽子，坐喷气式，高呼口号，高唱《语录歌》，轰轰烈烈地批斗一番。有的造反派组织，将对立面保守组织的头头揪到现场，涂抹成花脸，连工作组的成员，也在大会上狠狠“刹刹威风”。当然，还有一些党政机关单位的造反组织，认认真真地在这里召开批判大会，历数省委在运动初期划框框、定调调，压制群众造反的错误。他们并不特别看重李铁乃，只觉得这个场所设立得很适中、很及时，对掀起贵阳地区文化大革命高潮很起作用，自己也应该在这里充分展示一下

积极性。

这个大会一再延长，一连召开 10 多天，也记不清有多少人在大会上发言，但李铁乃却因此出名，“红卫军”也趁机扩大了自己的势力，不少工厂的造反组织加入“红卫军”，自愿成为它的下属组织。连一些军工厂的造反组织也对这个“红卫军”刮目相看。李铁乃将勤务组成员扩大再扩大，到邮电大楼前批判省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大会结束时，“红卫军”组织已号称有 80 万大军了，一时成为贵州省最大的工人造反组织。当时，贵阳地区的大专院校，尚未成立全省性的红卫兵总部，“红卫军”就成为当时屈指可数的造反大军了。

这个大会的影响很快波及全省。有的地区的造反组织居然不远千里，赶到省里来参加大会，声泪俱下地在大会发言，从而也把省会贵阳的这种造反气势，很快带了回去。不到一个月，贵州几乎所有地区都召开了类似贵阳的这种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大会。

李铁乃一待批判省委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大会结束，便将省工会一幢上下四层的大楼占为己有，设立“红卫军”的总部。为了显示气派，将特制的长方形队旗，高插在总部的屋顶，门口悬挂出“红卫军工人造反兵团总部”的招牌。他还特地请人写出歌词，谱出曲子，取名为“红卫军军歌”，铅印成张，每个队员人手一份，组织歌手广为教唱。“红卫军”的一些下属组织，也引以为荣，高举着“红卫军”队旗，雄赳赳、气昂昂地唱着“红卫军军歌”，列队行进在贵阳街头。

“红卫军”的基层组织遍布贵阳地区的大小厂矿以及部分专、州、

县。省文革领导小组成员李再含对待“红卫军”的态度，也是积极支持的。他引用当年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的比喻说：“当年对湖南的农民革命运动，有两种截然相反的看法，一是‘好得很’，一是‘糟得很’。我看，现在对李铁乃，也有两种看法，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绘画绣花，有一些过火的行动，就不能不看大方向，全盘加以否定。”

9、10 月间，西南局阎秀锋在贵阳时听说李铁乃“有问题”，便叫省公安厅作调查。李再含在省军区一次会议上看到省公安厅对李铁乃搞的调查材料后，当场替李铁乃辩护，质问：“是谁叫你们搞的？这是整造反派的黑材料。”并将材料转到李铁乃手中，李铁乃扬言要揪斗公安厅的当权派。

李铁乃在贵州发起了一个又一个“造反”行动。他造起反来，根本不注意什么政策和策略，不时使人感到意外。他将主管全省工交、财贸工作的副省长陈朴如，主管全省公安、政法工作的副省长吴实等人，以揪斗“走资派”为名，一一扣押在总部，其目的是使“红卫军”组织和他本人批钱批物方便，能及时勒令“走资派”批条子、下指示，为群众“平反”冤假错案。

有一天，中央文革的记者特地在“红卫军”总部，采访了被李铁乃扣押的副省长陈朴如、吴实等人。他们都被关押在三楼的一间房子里，头挨头地沿墙挤住着五、六个人。记者的进入，顿时使他们的情绪活跃起来。他们诉说着李铁乃名为揪斗，实为关押的做法是错误的。副省长吴实还告诉记者，李铁乃过去曾被判过劳教，现在他居

然提出要查抄他留在公安局的档案，说那是迫害他的“黑材料”，并还要公安局马上释放曾与他有过勾搭的同伙。他们越说越气愤，怒形于色，无比愤慨，有的竟说：“李铁乃哪是像革命造反，完全是在想搞复辟、翻案。”

李铁乃为了控制总部大权，将勤务组成员一减再减，一切权利都集中在他一人手中，任何事情都要请示他才能办理，任何经费没有他的批条不能领出半分。他将自己信任的同伙，安排在总部各个组当头头，全部向他一人负责。自己则深藏在总部三楼一间小屋里，平时很少与外人接触，以防发生意外。他还特制了出入总部的“通行证”，发放时，逐一进行登记。对出入他的办公室，他又另外特制了一种“出入证”，编成号码，发放时由他自己负责控制。所以，要想进入“红卫军”总部，晋见李铁乃，没有他的同意，或手持两个“通行证”，是根本无法办到的。除此而外，他还生怕有人不满暗算他，物色了两名身强力壮的同伙作为他的保镖，每人都配带有手枪，昼夜不离左右。他自己还随身携带一个小包，据说里面装有两支手枪、“红卫军”公章和现金。他蓄着短平头，留着小胡须，敞开衣领，端坐在办公桌后的藤椅上，左右各站立着一个身材彪悍的保镖，俨然像是电影上看到的那种封建把头、帮会头目的派头。

李铁乃的做派引起了“红卫军”内部部分人的不满。对于这个造反头目，群众有不同的看法，造反派内部也有分歧意见，省委领导之间的认识也不一致。只有当时省文革领导小组成员、省军区副政委李再含，旗帜鲜明地表示：“李铁乃造反精神好，行动坚决，我们

要看他的大方向，不能抓住枝节上的错误全盘否定，他主持召开批判省里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大会，对推动全省开展文化大革命是有一定影响的，我们应该支持和保护。”

10 月 15 日，为了对付炮轰省委的“炮轰派”，按贾启允指示，成立了“工人纠察队联络站”，由省总工会主要负责人具体负责上下联络。

10 月24 日晚上，贵阳盲童学校的盲童左右相连，前后搀扶也上街游行。举着红旗和毛主席像，拿着盲文的毛主席著作，高呼“火烧省市委，炮轰西南局”，两旁路人看了莫不为之感动。工人，家属，妇女，那些“炮轰派”，那些“狂民徒”，背着孩子，抱着孩子，狂呼“省市委有问题，大方向错误的”。

我们再来看中南重镇武汉。10 月 6 日，留在北京的武汉造反派红卫兵，参加“全国在京革命师生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强烈开火誓师大会”后，旋即回到武汉，逐渐掀起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高潮，矛头直指时任中央文革副组长、中南局第一书记王任重和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省长张体学。湖北少数派要求落实中央军委 10 月 5 日《紧急指示》，给被打成“右派、反革命”的群众平反，批判各级党组织所犯压制群众的错误。

而维护传统秩序的多数派，坚持认为前段省委掌握的运动大方向没有错，遂被造反派指责为“资产阶级保皇派”。

由于彼此认识截然相反，非此即彼，在中国当时的政治大环境下，这不仅仅是谁对谁错、谁是谁非的问题，而是关系到每个人的政治前

途的大问题。如果对了，你可能从此要风得风，要雨有雨，起码在人前事后，挺胸仰头，人五人六。如果错了，以后不仅会事事低人一头，政治上永无出头之日也很难说，还有可能变成人民的敌人，那就成了这个社会的“贱民”。这种相互利益的冲突，已使群众分裂无可避免。

10 月 15 日，武汉地区“大专院校红卫兵”，简称“一司”，召开批判“资反路线”誓师大会，这是多数派。第二天，10 月 16 日，武汉地区“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也联合召开批判“资反路线”誓师大会，这是大、中学生中的少数派组织。两个会比着开，“批判资反路线”已成为武汉全体学生的革命口号。自此，武汉市委将常委活动迁移出解放路市委大院，先后转到胜利饭店、江汉饭店办公。

10 月 18 日，王任重在中央文革小组就武汉文化革命问题写出检查，公开承认湖北省委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并表示，《十六条》公布前的错误责任由他承担。

这时，新疆的形势也日益吃紧。国庆节刚过，周恩来就在大会堂接见“一司”新疆兵团的汪延群等人，对他们前往新疆进行详细的交代。他说：“新疆地处边陲，和苏联有很长的边界线，内地有很多劳改犯在新疆劳改，一旦发生动乱，局面不可收拾。现在新疆区党委受冲击很厉害，王恩茂同志处境困难。你们派人去新疆保一下，要从大局出发，稳定新疆的工农业生产。”

遵照周恩来的指示，汪延群亲自带队，迅速调集人马组织成“新疆兵团”远赴新疆。他们到达乌鲁木齐后，就分散到新疆大学、八一农学院等校，支持保党委的一派。

对他们的到来，新疆军区首长非常欢迎。军区副政委郭鹏亲自请小将吃羊肉，安排他们住在军区。可惜好景不长，“新疆兵团”内部发生分歧，北大一部分红卫兵转而支持打倒王恩茂的一派，自家人打起架来。汪延群一看形势不妙，就和北京联系。北京答复说，尽量说服意见不同的红卫兵，实在无法说服，就瓦解他们。汪延群只好私下鼓动不同意见的红卫兵，回自己家乡串联，或者到好玩的地方去串联。这一招还真有效，反党委的红卫兵一哄而散，而以朱新民为首的保党委一派的红卫兵，一直在新疆坚持。

在中央工作会议期间，10 月 19 日，乌鲁木齐地区及生产建设兵团几千名职工、干部、学生包围了乌鲁木齐昆仑饭店，要求批判“资反路线”，批斗正在宾馆开会的自治区及兵团的领导人，并于 20 日宣布绝食。23 日，中共中央要求绝食者立即复食，选派代表和自治区领导人一起去北京解决问题，这一事件才告平息。

10 月 21 日，谢富治在公安部接见了新疆大学“九三”事件赴京汇报代表团，对他们表示支持。

第246回：周恩来，约刘、邓修改检查，做工作，接见多数派学生

再回到北京，中央工作会议还在继续。10月20日，周恩来从毛泽东处出来后，约刘少奇、邓小平谈话。

21日，周恩来约李雪峰、刘澜涛、宋任穷、李井泉、魏文伯、王任重、韦国清等各大区负责及陶铸、陈伯达、李富春、陈毅、叶剑英、谭震林、肖华、江青等开会，谈刘少奇、邓小平的检讨方式问题。

10 月 22 日，毛泽东在邓小平的检查上批示："小平同志：可以照此去讲。但在第九页第一行'补过自新'之后，是否加几句积极振奋的话，例如说，在自己的积极努力和同志们积极帮助之下，我相信错误会得到改正的。请同志们给我以时间，我会站起来的。干了半辈子革命，跌了跤子，难道就一蹶不振了吗？又，题目'初步'二字可以去掉。"

这天，周恩来和陶铸、李富春约邓小平谈话。

与此同时，周恩来还帮助刘少奇修改"检讨提纲"。他在"提纲"的十几处地方，写了 1000 多字的批注，订正了若干史实，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有些地方还加重了批判的分量和语气。

22 日当天，周恩来把修改后的"提纲"退还给刘少奇，并且写了一封信："少奇同志：粗粗地看了一遍，注了几点意见，并没经过深思熟虑，因而不能说是成熟意见，送上只供参考。"还注明："方才将我注的意见，同陶铸、富春两同志谈了，他们表示同意我的意见。"

一天下午，周恩来把他的保健医生张佐良叫进办公室说："你去

看看少奇同志，他现在怎么样了？”

张佐良到了刘少奇在中南海的住所“福禄居”，院子里悄然无声，看不见什么人，一片萧瑟冷清的景象。哨兵问张佐良是哪个单位的，找谁？张佐良向哨兵说明自己是西花厅的工作人员，哨兵便放张佐良进了院子。

张佐良没有看见王光美，找到了一位穿便衣的工作人员，告诉他，自己是“总理办公室的，要见见少奇同志”。那位工作人员引张佐良来到刘少奇办公室门口，门敞开着。

张佐良穿着军装，进门向刘少奇行了个军礼，向他报告道：“我叫张佐良，是周总理的保健医师。总理要我来看望少奇同志，向少奇同志问好。”

“谢谢总理的关心，总理怎么样？他好吗？”刘少奇说。

“总理还好，就是工作太忙，休息太少。”

刘少奇问张佐良是什么地方人，家里有几个人之类问题。张佐良见他没有什么重要的话题，便告辞。

“请少奇同志保重，我回去了。”

“请你代我向总理问好，请他保重。”刘少奇仍坐在沙发上平静地说。

张佐良站起身来向他行了个军礼，便返回西花厅向周恩来复命。

进入10月份，周恩来、中央文革多次接见北京“三司”少数派代表，引起了多数派学生的疑惑和不满。越来越多的多数派学生聚集在大会堂西门，强烈要求周恩来和中央文革接见。

10月22日，周恩来在国务院小礼堂接见北京18所大专院校多数派代表和全国25省市红卫兵代表，近100人。他说："同学们：很对不住你们，你们在西门外等了很多天，因为有些问题我们自己还没有讨论。10月6日第三司令部开誓师大会，我们去了讲了话。9日第二司令部开会，正好赶上我们也开会未能参加。我们商量，派周荣鑫、谢镗忠、高扬文三同志出席你们的会议，会后放录音。虽然我没有出席你们的会议，但是，我们的录音同样放给你们听。你们还不满足，你们的代表在西门外又陆续地来了，我们不能不接见你们。15日江青同志和我又在人大会堂东门，接见了第三司令部，也有第一、二司令部和外地代表，那是6号答应的，15号接见，主要是听他们的意见，外地同学提出26个问题。不过对他们的问题，现在还没讨论，忙于开会，抽不出功夫，对他们的问题也没有回答。你们提出的问题，我们记下，我能答复和能表态的，我讲几句。最后关于大方向的问题我讲几句。"

北航"红卫兵"发言，当他们讲到北航"红旗"抄了他们的总部、搜材料、抢广播电台时，周恩来问："你们过去广播台是大家一起使用吗？"

答："公用，叫联合广播台。"

周恩来又问："我问你们一下，你们保赵如璋，不让到'红旗'那边去检查，有没有这回事？"

答："有这回事，我们错了。当时没有认识到是错误的。"

周恩来说："你们这样说，对！你们犯了一点错误，刚才你们讲对了，是认识不清。请你们自己去搞革命，你们自己去认识，认真想

办法和‘红旗’搞好关系，这样对立下去是不好的。”

北航“红卫兵”又问：“在同学中流传着江青同志说，毛主席在中央是‘少数’。最近有些谣言，说什么‘法西斯党的危险就在眼前’、‘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中央两条路线的斗争非常激烈，毛主席占少数’等等。是不是真的？”

周恩来问：“写大字报没有？”

答：“没有。”

周恩来：“有传单没有？”

答：“没有。”

很多人说：“‘三司’传的很多。”

周恩来说：“这些问题我问过第三司令部，他们说没有，也问过哈尔滨‘红色造反团’，他们说不对。我没听到，没有大字报，没有传单，我就不信，信就没完了。从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同志的领导地位，我们党一直是毛主席在领导，怎么能说处于少数呢？不可能嘛！我不相信。接见‘三司’时我和江青同志在一起，没有这个事情。我坚决反对你们相信这些谣言。”

北航同学又说：“第一司令部开除‘保’字号和‘修’字号的红卫兵，要重新登记。”

周恩来说：“哪会重新登记，不允许登记的整个组织就打成修正主义的？！哪有这样一回事？”

有人问：“陈伯达同志讲话中提到的‘修正主义红卫兵’怎么解释？”

周恩来说："陈伯达同志说他没有说过这句话。陈伯达同志讲话，同学们都印发，他没有看过，怎么能算数？我的讲话，出的大字报也很多嘛，说我和稀泥，我的讲话印得多了，我没有审查，印发了我不负责。刚才讲第一司令部的问题，他们没来人，我得去问一问。被开除的不等于是修正主义，整个组织不会是铁板一块，就是领导有错误思想，不能把整个组织和领导混为一谈。"

接着，周恩来念了《十六条》第七条最后一段"为了防止转移斗争的主要目标，不许用任何借口去挑动群众斗争群众，挑动学生斗学生，即使是真正的右派分子，也要放到运动的后期酌情处理。"然后说："是右派分子也要在斗争中证明，也要放在运动后期处理。现在是运动初期，顶多算是中期，学生放假要放到春节，还有4个月，6、7、8、9月份全算上，这是中期，还没有到后期。我是用《十六条》和同学们谈。我很赞成北航开门整风，自己整风这是好的，应该允许'红旗'旁听。"

北航"红卫兵"说："我们欢迎他们发言，帮助我们整风。"

周恩来："'红旗'长期受压制，现在看来运动中应该算是左派了。'红卫兵'整风，'红旗'应该去听一听，但不要说话，旁听，听清楚了之后适当发言。当然对你们也是有帮助的。"

他接着说："'红旗'过去受压制，人家要赵如璋去检讨，赵如璋就是不去检讨。你们是受蒙蔽了。国防科委有一个副主任罗舜初，已停职反省了，他去过北航6次，有人说8次，据说开会时坐在地下，这样的接近群众，可是，他就是不让赵如璋去检查。中央的同志说了，

他就是不干，我看他就不是一个好同志。赵如璋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对不住学生，一定要检查，烧掉整理的材料，可是罗舜初就是不让他去，就是要保护赵如璋，和稀泥！我说你要让赵如璋去检讨，赵如璋首先要说服红卫兵，不要压制，要说服多数，然后再去少数中检讨，然后双方开会求得统一。主席在8月打了招呼，要刘志坚同志传达，一定要让赵如璋检查；陈伯达同志立了军令状，以生命担保赵如璋出去没问题，他就是不放心；最后没办法，中央才决定停职反省。为什么不罢官呢？在运动中，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罢官，一般的都停职反省。看一看，经过考虑，看他在停职反省以后态度如何，看改正得如何，在群众运动中表现如何。当然，敌我性质的，有阴谋活动的要罢官。比如彭真、罗瑞卿……。如果没有阴谋活动，就不是敌我矛盾；只是在运动中压制群众的，一般只停职反省，暂不罢官，中央决定停职反省就是一个很大的处分。听说你们有部分同学去国防科委，要求罢官，这就不好了，这就过激了。中央已经决定，你们就应该相信。‘你左，我比你还左’，这样人家就不服了。你们开门整风的办法是个好态度，你们青年人要有这个勇气，敢于面对现实，正视错误，我们老年人得向你们学习，知道错就改嘛！”

这时，地质学院“红卫兵”反映他们受到压制，周恩来听了以后说：“你们过去压那一方压得那么久，你们应该经得住一点压力，千锤百炼嘛！一千次、一百次，你们压一次就受不了？你们开门整风是好的，想想你们是怎么整他们的呢？例如邹家尤搞了某些‘东方红’的个人的材料，说人家是反革命，这些材料一律作废。8月4日我在清

华就讲了，8月22日我又讲了，9月份在三个司令部全都讲了，特别是第三司令部直到中央正式文件下来（中央军委紧急指示），而工作组一直不退还，还保存、保密。对上边也是这样，派余秋里去问邹家尤，还不说，最后‘东方红’把5位副部长都拖去，找到了几个箱子，都是‘东方红’的档案。你们保护他干什么？很被动，你们上当了。”

为了澄清《紧急指示》发布后在“黑材料”问题上的概念理解和政策实施中的混乱，周恩来说：

“我们一直宣布黑材料大概有这样的东西：

第一、 工作组对上级的报告，这些报告把学生分成两派，从一去就这样做，揭工作组的是反革命派了。

第二、 排队，排队也不恰当嘛，排左中右。

第三、 检讨材料让被压制的一方检讨。

第四、 对支持工作组的就叫他们供应材料。

第五、 出简报，这种简报有很大的倾向性，把反工作组的都说成是反革命，把拥护工作组的都说成是好的。

第六、 工作组组员记的日记，记哪些同志说什么话……

第七、 工作组会议记录。据我调查，大体有这样七类。”

周恩来说：“我在清华做了这些工作，让叶林检讨退还。我最近没有见到叶林。”

有人说：“叶林已经作了处理。”

周恩来：“那叶林的觉悟就提高了点了。关于这7种材料，工作组或多或少都有，无怪乎受压制的少数，你们不给，他就去抢了！我亲

手就碰到这样的情况，你们就相信刘新权就那么老实？”

外院的一位同学为刘新权解释了一句，周恩来说：“你还替他辩护，我做总理的不如你知道？我亲手处理的嘛！他还瞒着我呢？态度不老实，他说烧了，结果又搜出一麻袋。所以说这个问题早一点处理是好的，找人封起来，不然同学意见更深。这方面的材料写得那么多，对立起来了。现在离开了，社会上还要见面嘛！同学们不记这些，这是工作组的错误。所有的工作组都要自觉地解决这些问题，省得被动。叶林这样做了，觉悟就多了点。过去解放少数，现在解放你们！你们上当受骗，给你们改错的机会，改正错误轻装上阵，就愉快了嘛！允许人家革命。”

地质学院同学又讲了本院“东方红”的一些问题及有人提到一切权力归“东方红”口号和地质学院“七个等于”的大字报。

周恩来说：“我看到了。要严于责己，宽以待人。先检查自己，开门整风。你刚才说从4号就开始检讨了，如果是真的，这是好的。‘东方红’有些群众是正确的就支持，联合行动。对方不信任你们，不联合行动，你们要主动。不要过多地指责对方。”

当地质学院又讲了“东方红”拿大帽子扣人时，周恩来说：“你们过去说他们还不多？千锤百炼嘛！”

当地质学院同学讲到一个战斗队被迫在马路上办公时，周恩来说：“这也是锻炼嘛！你们在西门外等了几天几夜，你们有坚持性，你们在学校马路上办公，也是考验嘛！”

接着，周恩来又分别回答了北医、机械学院、矿业学院、农大等

院校红卫兵提出的问题。然后，解答了16所院校10月9日大会主席团联合提出的7个问题，其中关于10月9日大会的问题，周恩来说："我们确实在开会，派了周秘书长、谢镗忠、高扬文三同志去参加。15日答应接见第三司令部后见你们。如果等到把问题讨论完，就等到下月了。你们要见我，责任在我身上，我和文革小组的意见是一致的，怎么能说不一致呢？大方向是一致的，当然不能每句话都一样。不然一个人的讲话放放录音就完了。在无产阶级思想范畴里，允许个人的独立思考，要不然就不用见你们了。"

当问到政法学院的问题时，周恩来说："杨秀峰是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人民法院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机关。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工具一是武装，人民解放军；二是法律机关、公安、检察、法院；三是宣传机器，报纸、电台、电视台。这三点我们要紧紧掌握，不能什么人都可以去搞。到政法部门可以去串联，但跟其它部门应该有所不同。四大民主、六大自由，只有在毛泽东时代，才有这么大的民主，这才是真正的民主，你们大了才会感到这是最大的幸福。

最大的民主还要有最高限度的集中，最高限度下的民主，最大限度民主基础上的集中，这就是民主集中制。法院、公安、监狱不要随便进去，串联可以，但不要超过一定限度。"

"杨秀峰有错误，你们可以批判，但不要戴高帽子，不要游街，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去游街，那还像什么话？……只要你们大方向对，过去你们搞错了，改正就行了。"

有人向周恩来发问："你有没有犯过错误？"

周恩来回答："我一生犯过许多错误，关键时刻都是毛主席挽救了我。"

接见结束后，有些学生纷纷登台，堵住了路。这时，正在讲台一侧操作录音机的一个年轻人用自己的后背挡开正在登台的学生，一边喊道：

"让一让，让总理先走！"

周恩来身边的工作人员见状，问他："你是哪里的？"

那位年轻人答道："我是上海来的。"

周恩来听到了，立刻回头问："哦，你是上海来的？"

那人回答说："我是上海戏剧学院级学生赵全国。"

原来此人就是上海戏剧学院 6 月 22 日第一个给院党委贴出大字报并受到围攻的表演系一年级学生赵全国，属蛇，江苏人，从部队转业后到戏剧学院上学，属于调干生。此时，正在北京串联的他是在台上帮助电影学院一名同学操作录音机。

## 第247回：提希望，动员徒步搞串联

## 批刘邓，工作会上作检查

10 月 22 日，周恩来又接见全国半工半读学校部分师生代表，回答他们提出的问题。他首先肯定“以学为主的半工半读、半农半读是毛主席的教育思想。不仅见诸于《毛主席语录》中，并且早在毛主席青年的时候，他就曾经赞助过勤工俭学。”

周恩来回顾了中国自“五四”运动以来的勤工俭学和半工半读的历史，指出了半工半读学校中学习与劳动之间的矛盾，生产部门已经将学校学生的劳动列入了生产计划，因此，半工半读学校在文化大革命中，“放假闹革命，就等于把计划冲垮了？”

“我们从以学为主这个角度考虑，只能放假。以工为主，当然就不能放假。主席这段话就清楚了嘛！你既然叫学校，不管你是半工半读、半农半读、全日制、半日制，你总是以学为主，这点要肯定，因为你要经过学习，发展德、智、体三育，要训练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的劳动者，你是在学习过程中，是以学为主，又搞工业劳动、搞农业劳动，又要兼学其它，学军事，还要搞文化大革命，这样你们今天还是学生嘛！他又不能说你们这个半工半读学校的不是学生，是徒工，他又不敢叫这个名字，是不是呀？如果他招的是学徒工，你们就没话讲了，你们是去学徒吗？那就是在这

个工厂范围啦！叫半工半读学校，那就得放假闹革命。”

众人鼓掌。

周恩来对国家经济委员会第一副主任兼工业交通政治部主任陶鲁笳说：“陶鲁笳，我破坏你的计划啦！”

众人再次鼓掌。

周恩来：“但是我也另外给一条出路，他说有一些人愿意劳动，工厂又需要劳动，如果确实双方愿意，那就把这部分改为学徒工，以工为主，兼学习好不好？”

众答：“好！”

周恩来：“由他们自愿去解决嘛！他可以叫做学徒工，凡是学校，不管半工半读、半农半读、半日制也好，统统以学为主，凡以学为主的学校，都要放假闹革命。”

“你们半工半读学习中的补贴应该照发，你们不劳动，工资是不是全部发？半工半读实际上是学徒工的状态，不是半工半读，如果你们是以学为主的半工半读学校，第一，劳动不会那么长时间，第二，工资不会那么多了。半工半读顶多是补贴，不应该全劳动。八小时劳动还学什么？也许三小时，四小时。那么工资不会那么多了。以前欠的工资应该照发，工厂的，可由我们经济委员会通知他。”

“以学为主就是放假闹革命，以工为主的就要转为学徒工。第一选择以学为主，就要放假闹革命；第二如果愿意多拿工资养家就选择学徒工，就要转为以工为主，同样还是闹

革命，但是劳动为主，这是工业罗。

农业方面，我刚才已经说了，如果有生产基地，不靠你们学生解决生活问题，可以给你们继续放假半年闹革命，回去将来再好好劳动。”

10 月 22 日晚饭后，《解放军报》的一辆小车开到北航，找到北航“红旗”的韩爱晶，对他说：“你把‘红旗’的几个主要头头找来，首长想见见你们。”

于是，北航“红旗”的韩爱晶、井岗山和屠海鹰，三人坐上《解放军报》的车，来到人民大会堂一间不大的会议室，见到陈伯达、康生、江青、王力，还有李讷等人。大家围坐在桌上旁边，康生和江青说：“找你们来，想听听你们的情况，有什么想法。”

事情突然，韩爱晶他们又是第一次被中央领导召见，一时想不出有什么重要的事情需要对中央首长说，一时间非常拘谨，只是汇报了他们最近阅读毛泽东的《学习和时局》，反复学习《放下包袱，开动机器》一节，表示“一定要记住毛主席的最新指示，现在到了我们小将可能犯错误的时候了。我们一定要团结大多数。”“要紧跟毛主席，关心国家大事，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

江青说：“毛主席告诫我：‘要夹着尾巴做人。’我把这句话送给你们共勉。我们一定戒骄戒躁，谦虚谨慎。”

见面时间不长，谈话也没有展开。

为了早一点进京串连，接受毛泽东主席的接见，大连海运学院的 15 名红卫兵，在上不了火车的情况下，决定徒步进京。8 月 25 日，他们打着“大连北京长征红卫兵”的旗子从大连出发，历经近一个多月的艰辛后，行程 2000 多里，终于抵达北京。10 月 22 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红卫兵不怕远征难》的社论，高度赞扬大连海运学院徒步串联的方法，社论说：“大串联，是群众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伟大创造。”“不坐火车汽车，徒步行军进行大串联，这又是一个很有意义的创举。”社论希望“各地的革命师生，在自愿和可能的条件下，也这样做。”

在中央的鼓动下，全国各地都出现了积极响应步行串连的红卫兵。一支支命名为“长征队”的红卫兵串连队伍开始在中国大地上移动。有的红卫兵长征队索性按照当年红军长征二万五千里的路线再走一遍，以示继承光荣革命传统的气魄和决心。这篇社论，在北京也引起了一番争论。第二天，23 日晨，北京市 20 多个院校的红卫兵和师生来到《人民日报》社，对《人民日报》10 月 22 日号召徒步串联的社论《红卫兵不怕远征难》提出批评。

10 月 23 日，在中央工作会议的全体会上，刘少奇和邓小平分别宣读了经由毛泽东修改的检查。刘少奇在 10 月 23 日的检讨稿中说：“在工作组派出之后的五十多天中，我是一直支持工作组的，这样就增加了工作组犯错误的可能性、

严重性。有少数工作组实在不能维持下去了，把工作组撤离之后，接着又派了新的工作组去。工作组的负责人大多数不理解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又没有好好向群众学习，一开始就要业已发动起来的广大群众按照我们和工作组主观设想的计划和步骤行动。这样，就违背了革命的群众运动发展的规律，就发生了许多严重事件，就在事实上站到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去了，实行了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革命运动打了下去，颠倒了是非，混淆了黑白，长了资产阶级的威风，灭了无产阶级的志气。”

邓小平在检讨中说：“林彪同志是我们学习的典范，正是他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正是他把毛泽东思想举得最高，学得最好，用得最活，正是他善于吃透两头，对重大问题及时向毛主席请示汇报，既最了解主席的思想和意图，也最了解群众和下面的情况，所以他的思想水平和领导水平很高，成为毛主席最亲密的战友，他领导的人民解放军成为全国学习的榜样。对于我这样犯错误的人应该老老实实的向林彪同志学习。学习他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学习他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这是我改正错误，力求作一点对党对人民有益的工作的唯一可靠的途径。”

23日晨，一些北京市院校师生来到《人民日报》社，对《人民日报》10月22日社论《红卫兵不怕远征难》表示不满，一直到24日凌晨3时还没走。他们通过《人民日报》总编辑

唐平铸，向周恩来反映了他们的意见："《人民日报》10月22日的社论发表后，各院校将有大批革命师生外出串联，有可能导致使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批判遭到夭折。"

周恩来听取了详尽的汇报后，做出口头指示："情况已经了解了。现在在北京的外地学生还很多，每天只能走十几万，根据这两天的情形，北京的学生每天走了四至五万。中央已经研究这个问题，准备发一个通知。大致上有这么两点。

（一）北京的学生不要忙于出去。要让外地学生先走，北京的学生可以留在原校搞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

（二）长征是一件很艰苦的事情。要下决心，要有很多的准备。不要说走就走，不是说到那里就到那里，这里得有计划。比如：我们要到大寨，可是那里只能容纳几十个人，去多了是安置不下的。"

10月24日，周恩来发出《关于学生徒步来京的电话紧急指示》：

1、《人民日报》发表的徒步来京的消息和社论是根据中央的指示，不是《人民日报》自己决定搞的。

2、同学们有不同看法可以听听大家的意见，这两天可以暂时不报导这方面的问题，过几天中央了解情况再说。

3、徒步串联这是一个很不容易的事情，不会一下子都走光。

4、同学们提出来，人走了怎么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我们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对多数同学来说，主要是进行教育，要彻底肃清错误路线的影响。

5、你们过去反对工作组，批判错误路线是正确的。有些人出去了，他们可以得到锻炼，你们仍然坚持正确路线，思想就容易统一起来。

在 10 月 24 日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谢富治作了长篇发言，将刘、邓的问题分为历史和现实的两个方面进行了批判。邓小平是谢富治重点批判的靶子，他说:“邓小平到北京工作后，发展得很坏。他的错误很多。最根本的一条是不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他不接近主席，对主席没有感情、抵触，以至反对毛泽东思想。什么‘形式主义’、‘庸俗化’等等反对学习主席著作的谰言，不少是从他那里来的。”

谢富治还建议将被批者的错误在更大范围内、起码在县团级范围内公布和批判。

当谢富治揭发邓小平“在淮海战役中动摇，企图后撤，犯有逃跑主义的罪行”时，在淮海战役中担任中野三纵队司令员的云南省委第一书记阎红彦站起来反驳说：“我怎么就不知道这件事。整个淮海战役期间，中野总部一直是随我们三纵行动的，邓小平一直是和我们在一起的。”

他又指着坐在身旁、时任云南省委常委、昆明市委第一书记的赵增益：“你是当时三纵的作战部长，你说说，你知道不知道！？”

赵增益回答："不知道"。

作为老下级，傅崇碧曾问过谢富治说："过去小平同志是你的直接领导，对你那样好，你对邓应该是了解的。邓是上过毛选的。你批的这些问题我怎么从来没有听说过呀？"

谢富治说："你没听说过的多着哩。"

24日晚，毛泽东听取中央工作会议情况的汇报会。各小组召集人汇报了对刘少奇、邓小平检讨的讨论情况后，毛泽东说："这次会议是我提议要召集的。时间这么短，是否讲得通？可能比上次好。我没有料到聂元梓一张大字报，一个红卫兵，一个全国大串连，搞成这么大的事。"

"有什么可怕呢？你们看了李雪峰的简报没有？他的两个孩子跑出去，回来教育李雪峰说：'我们这里的老首长，为什么那么怕红卫兵呢？我们又没打你们。'你们就是不检讨。伍修权有四个孩子，分为四派。有很多同学到他家里去，有时几个人或十几个人。接触多了，就没有什么可怕的了，觉得他们很可爱。自己要教育人，教育者应先受教育。你们不通，不敢见红卫兵，不和学生说真话，做官当老爷。先不敢见面，后不敢说话。革了几十年的命，越来越蠢了。少奇给江渭清的信批评了江渭清，说他蠢，他自己就聪明了吗？"

毛泽东问刘澜涛："你回去打算怎么办？"

刘澜涛答："回去看看再说。"

毛泽东说："你说话总是那么吞吞吐吐的。"

毛泽东问周恩来会议情况，周恩来说："会议开得差不多了，明天再开半天，具体问题回去按大原则解决。"

当宋任穷谈到他们向群众检查自己犯严重错误仍不能得到通过时，毛泽东说："反党反社会主义决不能承认，承认了还能工作吗?"

他又向西南局第一书记李井泉说："你们回去要振作精神，好好搞一下，万万不能承认反党反社会主义。把中央局、省、市委都打倒，让他们学生来接班，行吗?不知工农业，只读一点书，行吗?"

毛泽东问李井泉："廖志高怎么样？"

李井泉答："开始不太通，会后一段较好。"

毛泽东说："什么一贯正确！你自己就溜了，吓得魂不附体，跑到军区去住。回去要振作精神，好好搞一搞。"

他又讲到刘少奇、邓小平的问题，说："把刘、邓的大字报贴到街上不好，要允许人家犯错误，要准人家革命，不要不准人家革命，叫学生们把鲁迅的《阿Q正传》看一看，其中'不准革命'一章。"

"这次会议开得比较好一些。上次会是灌而不进，没有经验。这次会议又有了两个月的经验，一共不到五个月的经验。民主革命搞了二十八年，犯了多少错误！死了多少人！社会主义革命搞了十七年，文化革命只搞了五个月，至少得五年才能得出经验。一张大字报，一个红卫兵，一个大串联，

谁也没料到，连我也没料到，弄得各省市呜呼哀哉。”

毛泽东问李先念：“你们今天会开得怎样？”

李先念答：“财经学院说，他们明天要开声讨会。我要检查，他们不让我说话。”

毛泽东说：“你明天还去检查，不然人家说你溜了。”

李先念说：“明天我要出国。”

毛泽东说：“你要告诉他们一下。过去是‘三娘教子’，现在是‘子教三娘’。我看你精神有点不足。

他们不听你们检讨，你们就偏检讨。他们声讨，你们就承认错误。乱子是中央闹起来的，责任在中央。地方也有责任。我的责任是分一、二线。为什么分一、二线呢？一是身体不好，二是鉴于苏联的教训。马林科夫不成熟，斯大林死前没有当权，每次会议都敬酒，吹吹捧捧。我想在我没死之前，树立他们的威信，现在走到反面。”

陶铸说：“大权旁落。”

毛泽东说：“这是我有意大权旁落。现在到处闹独立王国，许多事情不与我商量，如土地会议，天津讲话，山西合作社，否定调查研究，大捧王光美。本来应经中央讨论作一个决定就好了。邓小平从来不找我，从1959年到现在，什么事情都不找我。62年，忽然四个副总理、李富春、谭震林、李先念、薄一波到南京来找我，后又到天津，我马上答应，四个又回去了，可邓小平就不来。武昌会议我不满，高指标弄得我毫

无办法。到北京开会，你们开了六天，我要开一天还不行。完不成任务不要紧，不要如丧考妣。遵义会议以后，中央比较集中。38年六中全会以后，项英、彭德怀（新四军皖南事变、彭德怀的百团大战）搞独立王国，那些事情都不打招呼。七大后中央没有几个人。胡宗南进攻延安，中央分两路，我同周恩来，任弼时在陕北，刘少奇、朱德在华北，还比较集中。进城以后就分散了，各搞一套。特别分一线、二线，就更分散了。1953年财经会议以后，就打过招呼，要大家互相通气，向中央通气，向地方通气。刘、邓两人是搞公开的，不搞秘密的，与彭真不同。过去陈独秀、张国焘、王明、罗章龙、李立三都是搞公开的，这不要紧。高岗、饶漱石、彭德怀都是搞两面手法。彭德怀与他们勾结上了，我不知道。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是搞秘密的，搞秘密的没有好下场。犯路线错误的要改。陈、王、李没改。”

周恩来插话：“李立三思想上没有改。”

## 第 248 回：再叮嘱，万万不能认“反党”
## 拉条子，林彪又画龙点睛

毛泽东接着说：“犯了路线错误要改。不管什么山头，不管哪个省市、什么老部下，都要管紧、管严。只要改过来，意见一致、团结，就好。对刘、邓要准许革命，准许改。说我和稀泥，我就是和稀泥。你们有错误要改，改了就行，回去放手工作。七大时，陈其涵说不能把犯王明路线的选为中央委员。王明和其他几个人都选上中央委员了。现在只走了一个王明，其他人还在嘛！洛甫不好，王稼祥我有好感，东崮一战他是赞成的。宁都会议洛甫要开除我，周、朱他们不同意，遵义会议他起了好作用，那个时候没有他们不行，洛甫是顽固的，少奇同志是反对他们的，聂荣臻也是反对他们的。对刘少奇不能一笔抹煞。你们有错就改嘛！改了就行，回去振作精神，大胆放手工作。学生有些出身不太好的，难道我们出身都好吗？不要招降纳叛，我的右派朋友很多，周谷城、张治中。一个人不去接近几个右派，那怎么行呢？哪有那么干净？接近他们就是调查研究嘛，了解他们的动态。那天在天安门上我特意把李宗仁拉在一起，这个人不安置比安置好，无职无权好。民主党派要不要？一个党行不行？学校党组织不能恢复太早。1949年以后发展的党员很多，翦伯赞、吴晗、李达都是党员，都那么好吗？民主党派都那么坏？我看民主党派比彭罗陆杨就好。民主党派还要，政协也还要，

同红卫兵讲清楚，中国的民主革命是孙中山搞起来的。那时没有共产党，是孙中山领导搞起来的，反康、反梁、反帝制。今年是孙中山诞生100周年，怎样纪念呢？和红卫兵商量一下，还要开纪念会。”

康生说：“八大政治报告是阶级斗争熄灭论。”

毛泽东说：“报告我们看了，这是大会通过的，不能单叫他们两个负责。

工厂、农村还是分期分批。回去打通省、市同志们的思想，把会议开好。上海找个安静的地方开会。学生闹就让他们闹去。我们开了十七天会，有好处，像林彪同志讲的，要向他们做好思想工作。

斯大林在1936年讲阶级斗争熄灭论了，1939年又搞肃反，还不是阶级斗争？你们回去要振作精神搞好工作，谁会打倒你们！

邓小平耳朵聋，一开会就在我很远的地方坐着。1959年以来，6年不向我汇报工作，书记处的工作他就抓彭真。你们不说他有能力吗？”

聂荣臻说：“这个人很懒。”

毛泽东接着讲：“对形势的看法，两头小，中间大。‘敢’字当头的，只有河南，‘怕’字的多数。真正‘反’字的还是少数。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有薄一波、何长工、汪锋，还有一个李范五。

真正四类干部（右派）也就是百分之一、二、三。”

周恩来说：“现在已经大大超过了。”

毛泽东：“多了不怕，将来平反嘛！有的不能在本地工作，可以调到别的地方工作。

河南一个书记搞生产，其余五个书记搞接待。全国只有刘建勋写了一张大字报，支持少数派，这是好的。

聂元梓现在怎么样？”

康生说：“还是要保。”

李先念说：“所有写第一张大字报的人都要保护。”

毛泽东：“对！”

谈到大串联问题时，周恩来说：“需要有准备地进行。”

毛泽东：“要什么准备，走到那里没饭吃？

对形势有不同的看法，天津万晓塘死了以后，开了50万人的追悼会，他们也认为这是大好形势，实际上是向党示威，这是用死人压活人。

李富春休息一年，计委谁主持工作，我都不知道。富春是守纪律的，有些事是对书记处讲了，书记处没有向我讲，邓小平对我是敬而远之。”

最后，毛泽东再次强调：“你们回去开会，把省、市、地委的思想搞通，时间不能太短。过去许多市没来人，这次都来了不少。像林彪同志讲的，向他们做政治工作，打通思想。你们回去要振作精神，好好工作。谁会打倒你们呀！万

万不能承认反党反社会主义。你们都成了黑帮，不就轮到我头上来了，我不就是同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一块工作吗？有些人将来还有甄别、平反，有些打错了的，可以调到其他地方工作嘛！”

10月24日夜，毛泽东对陈伯达讲话的最后修改稿批复：

即送陈伯达同志。

改稿看过，很好。抓革命，促生产这两句，是否在什么地方加进去，请考虑。印成小本，大量发行，每个支部，每个红卫兵小队，至少有二本。

毛泽东

十月廿四日廿三时

10 月 25 日，陈伯达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做这次会议的主题发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两条路线——对两个月运动的总结》。

根据毛泽东的批示，陈伯达在这天的讲话稿第三部分的末尾加了一段话：“我们各地区各部门的同志，广大工农群众，广大青少年，都必须掌握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注意‘决定’中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指示，而在工作中尽自己的最大革命义务。”

25日早晨，毛家湾，林彪在自己面前摆了一叠白纸，他苦思冥想了一阵后，在一张白纸上写了几个其他人弄不懂含

意的大字，然后将这张白纸推在地毯上，然后再接着想，想好后又在另一张白纸上写下几个大字，同样地把它推在地上。地毯上到处都是林彪散扔的白纸。最后，林彪让内勤把地毯上的白纸收拾起来，并由他自己进行了一番排列组合。这就是他的讲话的“条子”。当天,林彪也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作了讲话。他说：

“这个会开了17天了，开得很好。这个会从头到尾都是毛主席亲自领导的。这个会实际上是十一中全会的继续，是进一步搞清楚两条路线的问题。

几个月来文化大革命中的情况是两头的劲很大，中间的就有一点劲头不足，中间甚至还有一点顶牛，局势一度有些紧张。毛主席看到这个形势以后，提议把大家找来谈谈。原来是准备搞3天，以后搞7天，现在搞两个多星期。越开，情况也就越清楚，思想也就越清楚，就更能够掌握毛主席的路线，把这条路线坚持下去。所以，这是很必要的一个会。

两头的劲头大，一头是毛主席的领导，一头是群众。”

说到“群众”，林彪说：“广大群众轰轰烈烈，……收获很大，尤其是政治上的收获。党内揪出了一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社会上搞臭了很多资产阶级的反动‘权威’，还挖出了很多潜藏的反革命分子、坏分子，破获了很多反革命案件，搞出了很多武器，电台、黄金，等等。但是，最主要的是在思想上，确实是触及了人们的灵魂。”“这个

运动在世界上树立了史无前例的榜样。对于反对修正主义，中国这种做法很有示范的作用。”

说到“毛泽东的领导”，林彪说：“只有毛主席这样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才敢于发动这样轰轰烈烈的，震动全国和全世界的革命群众运动。在毛主席领导下的一些同志也很得力，一直是拥护毛主席的路线，执行这个路线的。”

说到“中间”，林彪说：“刚才说了中间有一些顶牛，这就是 5 月 16 日中央《通知》上说的，‘绝大多数党委对于这场伟大斗争的领导还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一直到这次会议以前，我看还是这样的情况。”“有一些是主观上的抵抗性，但是大多数不是，大多数是认识问题，不够理解的问题。最近这两天，大家才明确，各地的这种情况是有两个方面原因的。一方面固然是本地的原因，思想上的原因；更重要的是，中央有几个领导同志，就是刘少奇、邓小平，他们搞了另外一条路线，同毛主席的路线相反。”

在这里，林彪首先讲了文化大革命的情况。

第二，林彪讲了文化革命的必要性问题。他的主要观点是：

一、社会意识形态这个上层建筑，一定要随着社会的经济基础的变化而变化。“我们为什么要搞这个文化革命呢？

要搞这个社会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革命呢？决定的因素，就是因为我们社会的经济基础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经济基础既然发生了变化，我们的社会意识形态这个上层建筑，一定要跟着变化，一定要赶上去。如果我们不赶上去的话，就妨碍社会主义所有制的巩固，就会使我们进步缓慢，就会使新的社会生产力不能得到发展，就会使革命既得的成果不能巩固，就会走到资本主义复辟……”“所以，搞不搞文化大革命，是一个关系无产阶级政权能不能巩固、革命成果能不能发展的重大政治问题，是一个关系革命成败的重大政治问题。”

二、要重视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苏联搞了近 50 年，今天修正主义上台统治。我们如果不始终一贯地来抓文化革命，也会产生这个结果。”“现在我们……在思想上还没有完全取得统治地位”，“我们有权力、有必要来建立我们无产阶级在思想上的统治。”“我们斗争的方式有的时候是采取报刊批判的方式，……可是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时候，就要有像 5 个月以来的这种轰轰烈烈的，全社会都动起来的大扫荡，大破除。……这种运动的作用决不是那种报刊上的批判可以代替的，这有它的特大的作用，有它的特大的威力。这次运动是一个伟大的创举。”

三、破“私”立“公”。“旧文化、旧思想的本质是什么呢？……概括来说，旧在一个字上，旧在‘私’字上。那

个新东西，新思想，又新在哪一点上？概括来说，新在一个‘公’字上。”“我们就是需要培养为公的人。”

四、用“革命化”来领导“机械化”。“建设我们的国家有两条路线，一条就是像苏联那样片面地只注意搞物质，搞机器，搞机械化，还搞什么物质刺激。另一条就是毛主席领导我们走的这条路线。”“毛主席领导我们创造了一个新型的国家，这个国家除搞机械化以外，更重要的是搞革命化，用革命化来领导机械化。”

林彪说：“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我们社会生产，并没有如某些同志所担心的，要受破坏。恰恰相反，生产还是增加。按理，文化革命是应该促进生产的，而且在事实上已经得到证明。”

第三，怎么搞文化革命，林彪的回答是：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发动群众”。他说：“革命的群众运动，它天然是合理的。尽管群众中有个别的部分、个别的人，有‘左’有右的偏差，但是群众运动的主流总是适合社会的发展的，总是合理的。因此，我们应该相信群众，依靠群众的创造性。这次运动开始的时候，我们就没有规定多少章程。”“一个是群众路线，一个是反群众路线。这就是我们党内两条路线的尖锐的对立。”“好多人的确是怕出乱子。其实，这个乱子是乱敌人，而不是乱我们。”“你们现在如果怕出这点小乱子，将来要出大乱子，牛鬼蛇神将来要造无产阶级的反，

造我们的反。这次我要谢富治同志搞了一个说明红卫兵战果的材料（就是这次会议上印发的参考材料之四《把旧世界打得落花流水》），我还派人去参观过。事实上人家就是准备造我们的反。”

最后，林彪讲了对前一段犯“路线错误”者的看法和对领导干部状况的估计：“总的估计是，大部分同志是不自觉的，并不是有意抵抗毛主席的路线。大多数是一个认识的问题，而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问题。这个我们都知道。现在的中央书记、省委书记、市委书记，是老好人的多。个别的坏的也有，多数是好的。你们当然也有你们的责任。……总的方面还是属于认识问题的多。只有少数一小撮，那是抵抗毛主席的正确路线的。”

林彪的讲话虽然没有稿子，但却是经过认真准备的。10月中旬的一个下午，叶群从外边回来，急匆匆地召集秘书们开会。她说：“主席决定最近召开中央工作会议，各大区和各省、市委的第一书记参加。主席让首长在会上讲话，另叫陈伯达代表中心文革在会上作两个月运动的总结。首长要讲话，讲什么？负责讲文件的赵秘书和张秘书要帮助拉个条子。你们要抓紧，不要误了事。”

会后，新来的秘书张云生问“林办”的老秘书赵根深：“主任讲‘拉条子’，拉什么条子？”

“拉条子就是写扼要的讲话提纲。”赵秘书解释说，“由于提纲用的语言非常概括，是一条一条式的，所以首长和主任都说‘拉条子’。”赵秘书继续说，“首长讲话不愿用稿子，向来喜欢自己顺口讲。听说1962年七千人大会时，军委办公厅费了好大的劲给他预备了一份讲话稿，他根本不用。他后来在大会上的讲话，就是自己预备的条子，一发挥就是一大篇。‘5·18’讲话时我遇上了。主任叫我们几个秘书帮助拉条子，结果是白费劲。只有主任帮助收集的那些古今中外政变资料，倒还用上了。”

张云生说：“我们这次帮助拉条子，不又是白费劲吗？”

赵秘书说：“白费劲也得干！都是主任在张罗。她说，不管用不用，反正得预备。就是用不上，对首长讲话有点启发也是好的。”

于是，他们两人经过研究，以为林彪讲话的内容离不开正在进行的文化大革命。但从林彪所处的角度，对文化大革命应该讲些什么，实在心中没底，只好东抄西引，由张云生执笔，写了足有四、五千字。

一天，郭秘书从林彪那里回来，通知张云生和赵根深：“首长听说你们拉成了条子，叫你们去谈谈。”于是，两位秘书带着“条子”来到了林彪的会客厅。

“把条子念给我听听。”林彪坐在会客厅的沙发上说。两位秘书坐在林彪对面的沙发上，由张云生开始念那已经拉好的“条子”。

“都是些空话！”张云生只念了一部分，就被林彪挡住了。

“这是在做官样文章，不是拉条子。你们写的那些，可以去掉百分之九十九，留下百分之一就够了。不要写那些连成片的话，不要抄报纸上的那些官样词句。真正有用的话，有几句就够了。”

林彪这一盆凉水，浇得两位秘书透心凉。回到秘书办公室，仍然不知所措。倒是叶群进来给他们鼓了鼓气：

“不要怕失败。他预备他的，你们预备你们的。要看看主席的批示，看看中央的文件，别怕重复，只要不捅娄子就行。”

于是，两位秘书又振作精神，重新给林彪“拉条子”，直到林彪即将出场讲话的那天早晨，叶群才叫两位秘书把新拉的“条子”给林彪送去。林彪看后的反应如何，秘书们就不便去问了。

张云生后来看到了林彪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记录稿，他们预备的“条子”林彪根本没有用，只有一句像是他们“条子”上的话，那就是林彪开头讲的：“这次会议，是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的继续。”

## 第249回：要理解，毛泽东再做发言

### 张平化，中宣部礼堂被斗

25日这天，毛泽东也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了话，他说：

我讲几句，讲两件事。

十七年来，有些事情，我看是做得不好，比如文化意识方面的事情。

想要使国家安全，鉴于斯大林一死，马林科夫挡不住，发生了问题，出了修正主义，就搞了一个一线、二线、现在看起来，不那么好。我处在第二线，别的同志处在第一线，结果很分散。一进城就不那么集中了。搞了一线、二线，出了相当多的独立王国。所以，十一中全会对一线、二线的问题，就做了改变。这是一件事。

十一中全会以前，我处在第二线，不主持日常工作，有许多事情让别人去做，想让他们在群众中树立威信，以便我见马克思的时候，国家不那么震动。以前的意思是那样。大家也赞成这个意见。但处在第一线的同志处理得不那么好。现在，这个一线、二线的制度已经改变了。但红卫兵还不知道已经改变了。

我也有责任。为什么说我也有责任呢？第一是我提议搞书记处，政治局常委里头有一线、二线。再么就是过于信任别人。

引起警觉，还是“二十三条”那个时候。

从许多问题看来，这个北京就没有办法实行解决，中央的第一线中存在的问题就是这样。所以，我就发出警告说，北京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这是去年九、十月间说的。我感觉到，在北京我的意见不能实行，推行不了。为什么批判吴晗不在北京发起呢？北京没有人干这件事，就在上海发起。姚文元同志的文章，就是在上海发表的。

北京的问题，到现在可以说基本上解决了。

我要说的再一件事，就是这次文化大革命运动。

我闯了一个祸，就是批发了一张大字报；再就是，给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写了一封信；再，我自己写了一张大字报。

给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的信，并没有送出，但是他们已经知道了，传出去了。

文化革命运动时间还很短。六月、七月、八月、九月，现在十月，五个月不到。所以，同志们不那么理解。

时间很短，来势很猛。我也没有料到，一张大字报（北大的大字报）一广播，就全国轰动了。给红卫兵这封信，我还没有发出，全国就搞起红卫兵来了。各种各派的红卫兵都有，北京就有三四个司令部。红卫兵一冲，把你们冲得不亦乐乎。

我这个人闯了这么个大祸，所以你们有怨言，也是难怪的。上次开会我是没有信心的，我说，会议的决定，有些人

不一定执行。果然好多同志还不理解。经过两个月以后，碰了钉子，有了一些经验，这次会议就比较好了。

这次会议有两个阶段，头一个阶段的发言不那么正常，后一个阶段就比较顺了。你们自己的思想有了变化。

总而言之，这个运动才五个月。可能要搞两个五个月，或者还要多一点时间。那个时候还会有新的经验，还要总结。

我们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搞了二十八年才胜利，开始谁也不知道怎么革法，包括我自己在内。从一九二一年起到一九四九年，二一、三一、四一到一九四九年，二十八年。我们自己也是逐步地在实践中间总结经验，找出道路来的。民主革命搞了二十八年，社会主义革命也搞了十七年了。这个文化革命只有五个月，所以，不能要求同志们现在就那么理解了。

自从去年十一月批判吴晗开始，许多同志也没有看文章，也不大去管。京戏改革，批判《武训传》，批判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批判胡适，等等，更不用讲了。

过去，没有全盘抓起来。我说这个责任在我。谁让你没有系统地抓起来呀？个别的抓了，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不行，问题不能解决。

这一次文化大革命运动的以前几个月，去年十一月、十二月，今年一月、二月、三月、四月、五月，虽然有那么多文章，中间，五月十六，又发了一个“通知”，可是，并没

有引起多大的注意。我看，还是大字报、红卫兵一冲，你们不注意也不行。拿同志们的话来讲，叫“革命革到自己头上来了”。那么，赶快总结经验吧。

为什么两个月以后，现在又来开这次工作会议呢？就是要总结一下经验，做政治思想工作。林彪同志讲，要做政治思想工作。很对。你们回去有大量的政治思想工作要做。中央局、省一级、地一级、县一级，至少这四级要开一个十几天的会，真正把问题讲清楚。也不要企图所有的干部统统弄得清楚，不可能，总有一些人不那么清楚，思想不通。

好几个同志对我讲，“原则上我是赞成的，到了具体问题上又糊涂了”。这种话我就不那么相信。原则上你又理解，具体问题又不得解决，是什么道理？现在我看，恐怕也有一点道理。不然为什么老这么讲？原则上是赞成的，碰到具体问题又处理不好，恐怕还是政治思想工作没有做好。比如上次开会回去以后，就没有开好会，有些地方就根本没有开，有些地方开了，也不是那么充分，被红卫兵一冲就乱了。假如有十个书记，就要有七个或者八个去接见红卫兵。接见慢了要冲进来。学生们生了气，自己还不知道，又没有准备回答什么问题，以为表面上一应付，表示欢迎，就解决问题了。人家有一肚子气，几个问题一问，不能回答，就处于被动。这个被动也可以改变的，可以改变为主动的。

毛泽东说：我对这次会议以后的情况，信心增加了。我就不讲上次会议讲过的话了，说这一次会等于不开，回去还是老章程，维持现状，跟红卫兵对立，跟一派红卫兵对立，利用另一派红卫兵保驾。这种状况，我看会改变，情况开始好转了。当然，不能过高要求。中央局、省、地、县这几级，还不讲县以下广大的干部，全部都那么快地就通了，不一定。总有一些人想不通，有一小部分，还是会要对立的。但是，我们相信大多数会讲得通的。

我讲这么两件事。一件事是历史，讲一线、二线的问题，别人有责任，我也有责任。第二件事，是文化大革命的问题。

文化大革命这个火是我放起来的。时间很仓促，只几个月。跟二十八年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十七年的社会主义革命比较起来，这个文化革命只不到半年。不那么通，有抵触，这是可以理解的，是自然的。很多同志，过去尽搞经济工作，工业、农业、交通运输，或者做一些别的政治工作、行政工作，就没有设想到搞这场文化大革命，你们外交部也一样，军委也一样，你们没有想到的事情来了。现在学生不是冲得厉害吗，没有设想到的事情来了。来了就来了。这一冲，我看有好处。过去多少年我们没有想的事情，这一冲就要想一下了。无非是犯了一些错误，那有什么了不起的呀？路线错误，改了就是了。谁人要打倒你们呀？我是不要打倒你们的，我看红卫兵也不一定要打倒你们。有两个红卫兵对李雪峰

讲：他们到全国跑了一趟，他们没有料到有些老前辈这么害怕红卫兵。他们说，红卫兵有什么可怕的？还有伍修权，他家里有四个红卫兵，就是他的儿女，分成四派，还有他们的同学，有很多人到他家来，大概有十几个二十个吧！他接触了那么一点人。另外也有接触几十个人的，也有接触一二百人的。我看小接触很有益处。大的接触，一百五十万人，我们一个钟头就搞完了。这也是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各有各的作用。

这一次会议的简报，差不多我全都看了。你们过不了关，我也着急呀。时间太短，可以原谅，不是存心要犯路线错误，有的人讲，是糊里糊涂犯的。也不能完全怪刘少奇同志、邓小平同志。他们两个同志犯错误也有原因。

过去中央第一线没有领导好。时间太短，对新问题没有精神准备，政治思想工作没有做好。所以，这一次又做了十七天。我看，以后会好一些。

毛泽东24日、25日的两次讲话后，福建叶飞和范式人看到各省、市也犯了“路线错误”，受到很大的震动，也承认自己是犯了“路线错误”

听说张平化到北京参加中央工作会议，湖南到北京告状的“黑鬼”组织“湘江风雷”与哲学社会科学部“红卫兵联队”、民族研究所文革配合，于10月23日到中宣部大院揪张平化，“首都三司”听说后立即支持，也派人前来参加。

下午 14 时，“湘江风雷”的先遣部队进驻中宣部大院，贴出“罢张平化的官，撤张平化的职！”“打倒张平化！”的大标语，向中宣部文革提出强烈要求。晚上，“湘江风雷”大队人马开进中宣部大院，派出代表与中宣部文革协商要求批斗张平化。当晚，他们组成了批判斗争张平化大会的筹备小组，湖南“湘江风雷”负责材料整理和大会组，“首都三司”的代表负责联络，学部“红卫兵联队”和民研所文革负责宣传。

经多次催促，中宣部一直说没有与陶铸联系上，“三司”的学生和湖南“湘江风雷”、学部“红卫兵联队”、民族研究所文革就一起在中宣部大院里唱歌，念《毛主席语录》，此起彼伏，折腾了一个通宵。到 10 月 24 日早上，当人们跨进中宣部大门后，都大吃一惊：“怎么中宣部成这样了？！”到处都是“湘江风雷”的大标语、大字报。

陶铸终于同意张平化到会检讨。24 日晚上 20 时至 24 时 30 分，在中宣部小礼堂联合召开“彻底批判揭发张平化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西安军事电讯工程学院的红卫兵代表闻讯也赶到大会现场表示支持。会前，“湘江风雷”负责人赵连城、彭少云、张智忠根据陶铸的意见，希望将这次大会搞成接见的形式，而张家政、叶卫东为首的“湘江风雷”及学部“红卫兵联队”则坚持要开斗争大会，说：“搞接见形式，我们不但不参加，还要造反！”

会上，长沙纺织厂王天保、郴州的蒋学流等被打成“黑鬼””、“右派”、“反革命”的“湘江风雷”成员以自己亲身的经历，愤怒声讨了张平化镇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滔天罪行”。大会上群情激愤，“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捍卫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彻底清除张平化九二四反动报告的流毒！”“彻底清算张平化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滔天罪行！”“打倒张平化！”等口号震天动地，首次登台接受批判的张平化昔日威风扫地，十分狼狈。他承认：“我是站在资产阶级反动立场上，贯彻执行了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在会议进行中，一批“誓死保卫湖南省委”、“誓死保卫张平化”的长沙“红色政权保卫军”企图冲进会场，破坏大会，但势单力孤，未能得逞。

大会期间，中央文革小组工作人员阎长贵听了“首都三司”代表的汇报，表示支持，并立即向中央文革汇报了会议情况。

已是半夜 24 时 30 分了，大会执行主席赵连城说：“时间不早了！”“以后还要开一个 10 万人的斗争大会”，于是宣布休会。

台下群众轰了起来，坚决不同意休会。长沙航运局的李慈顺立即站起来冲向主席台前，非常气愤地高呼：“我们今

天还接到长沙来的长途电话，罗新发今天还在挨斗挨打！今天的会非要开下去不可！”

有的人高喊：“张平化不老实，斗他几天几夜！”

赵连城、彭少云、张智忠还是宣布休会。这时，叶卫东站起来，要赵连城公 布张平化 10 月 12 日给王任重的信，赵连城拒绝，说：“未经王任重同志同意，我不能公开。”

“湘江风雷”与“首都三司”、学部“红卫兵联队”、民研所文革商议，准备在 10 月 27 日召开 10 万人大会斗争张平化，蒯大富答应当大会执行主席，场地联系在工人体育场。

凌晨，赵连城传达陶铸 1 时 15 分来电，内容是：“1、陶铸同志同意接见一部分湖南来京代表，但今天不行；2、大会不要再开了，张平化同志在北京还要有很多事要做，平化同志的错误检查一次当然不深刻，回去还要检查；3、希望张平化同志能够改正错误。”

“湘江风雷”要求中宣部文革证实此电话是真是假，中宣部文革曾科扬书面 证实是真的，不等曾科扬将此电话稿读完，叶卫东跳上桌子说：“同志们！10 万人大会肯定要开！陶铸也不能代表中央！”

衡阳锁厂郑开成也说：“陶铸这几点指示就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要把它公布出去，进行批判。”

在场的陈勇、王有山、刘荣华立即表示赞同。

赵连城、彭少云、张智忠连忙说："陶铸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你们不能炮打中央，炮打中央文革！"

10月27日的10万人大会最终没有开成。

10 月 25 日这天，叶卫东、刘荣华、李福钧和学部金吾伦共同起草了《最新消息：张平化被批判了——<彻底批判揭发张平化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简况》的报道，以"大会秘书组"的名义，用电话传回湖南，"湘江风雷"顿时在长沙引起震动。"长保军"紧急"辟谣"。与此同时，"湘江风雷"和其他群众组织推选了近 20 名代表去见陶铸，要求罢张平化的官。

第 250 回：中组部，群起要求批刘邓　罗广斌，《红岩》作者也造反

10 月 25 日，知道十一中全会内情的中央组织部 300 多名群众，要求前往中南海向毛泽东和党中央送交决心书，表示坚决揭发、斗争刘少奇和邓小平。陶铸闻讯急忙坐车赶到组织部，劝阻他们说："刘少奇、邓小平还是人民内部矛盾，党中央反对对他们采取过火行动"等等。

这天，北京师范学院、政法学院、林学院、农机学院等院校的部分"三司"红卫兵，就《红卫兵不怕远征难》这篇社论，又到《人民日报》社。下午，陶铸在国务院接见了这些代表，反复说明徒步串联的伟大意义。

蒯大富表示："搞文化大革命不能只靠学生，我认为同学到工农中去宣传是很好的。"

师院一位女同学："这样搞空城计了，给那些不承认错误，要避难的同学，提供了理论基础，这样两天就走光了。"

陶铸："物质不灭定律，反正总共1400万人，不在这儿就在那儿，都在中国，不会在外国。事实上不会走光的。"

师院女学生反驳说："物质不灭定律是一个物理定律，但对人类阶级斗争不适合吧？为什么社论一发表，首先要走的是多数派？"

陶铸问："你们学校走了多少？"

师大女学生："已经发了总动员，制定了长征跋涉计划，这样全北京都走光了。"

陶铸："如果是步行走光了，我们负责把同学给你们找回来。大串联是我们坚定不移的方针，以后还要扩大，没有这样的大串联，全国的群众发动不起来。"

有同学问："这篇社论与《红旗》社论关系是一致的吗？"

陶铸答："是一致的，都是搞阶级斗争，批判反动路线，没有社论时，多数派要去，你们能不能制止住？"

同学答："能制止住。"

陶铸说："据我知道，人民大学就制止不住的。这么大的事情（大串联）我们还要去宣传呢！今后还有许多这样的文章要发表，靠内因是重要的，但外力是很重要的，有些地方没有外力帮助就不行。"

唐平铸："我刚才听陶铸同志的讲话和同学们的发言，大串联是中央和毛主席的号召，据我们知道的，毛主席对这个非常赞扬的。我认为住在北京的学生不能出去了，必须很快地卡死，应该很快地采取措施，北京的同学不能坐火车出去，步行出去也要很好的组织。"

陶铸："现在4点半了……"

一个同学："陶铸同志的讲话，我们觉得不适当。我们要求中央文革的江青、关锋同志接见我们，这是强烈的要求，交一张批判社论的大字报。"

陶铸："同学们，现在社论谈话，你们有你们的意见，你们认为这是阴谋，这不是阴谋，是党中央批准的，毛主席批准的。还有重庆报导可以压几天，如果对批判反动路线的影响很大，就可以迟几天发表，可以通知本市学生缓出。大串联绝不是什么阴谋，只要把这火烧

得更大。今后我们可以在社论中加上你们的意见，社论不能推翻，不能改变，这是中央的决定、方针。”

同学：“我们要求中央文革的陈伯达、江青、戚本禹等同志接见，不接见我们就在这里等。”

陶铸：“我们负责把你们的意见转达给他们，不过我希望同学们还是回去，你们是第三司令部的，我们同你们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很清楚的么，我们是坚决支持你们的。今天谈到这里，我们还要赶去开会。”

晚上，在这些学生的强烈要求下，陈伯达、戚本禹、关锋在《人民日报》社接见了这数百名红卫兵代表并讲了话。陈伯达说：

“最近一个多月我没到《人民日报》来，今天下午我才看了《红卫兵不怕远征难》这篇社论。写得还可以，看得下去。但有缺点。是一篇看得下去的社论，只是写得不周到，不完全。同学们可以提出质问，质问是有道理的。发这篇社论不是《人民日报》编辑部的意思，是中央的意思。表达的好不好是另一回事。”

他明确表示：“中央赞成步行串联。这不是简单的方式方法问题。”

他说：“走路，就是叫你们学习毛主席的榜样，熟悉我们的社会，熟悉千百万群众，熟悉我们的伟大祖国的各个方面。这样，你们就有丰富的材料，可以结合毛泽东思想写文章了。对不对？”

众答：“对！”

陈伯达接着说：“谭力夫走在你们前面了。他是坐火车走的。坐火车不算高明，步行才算高明。”

有人问："走多久？"

陈伯达："你们愿意走多久？可以走三个月，可以走半年，也可以走一年。"

有人问："有没有假红卫兵，修正主义红卫兵？"

陈伯达："前些时，我接见外地来的一批学生，说有执行毛主席路线的红卫兵，有执行修正主义路线的红卫兵。不是说有的红卫兵组织就是修正主义的。这个问题，有人要把我揪出来斗，这没有什么。有些红卫兵，如谭力夫、方立功，他也叫红卫兵，这还不是假的？这是个别的，少数的，一小撮，他们是在败坏红卫兵的名誉。他（方立功）没收了什么人的财产，当成自己的，有两辆汽车，开车司机归他管，有两个男秘书，两个女秘书，录音机、照相机、摩托车。这种人也叫红卫兵？我原来是说一些红卫兵是执行修正主义路线的，被修正主义路线蒙蔽的。我从来没有说过什么'修正主义红卫兵'。对于一般红卫兵的组织，不要分真假红卫兵。我补充，纠正我原来的说法。可以吗？"

大家答："可以！"

有人说："不赞成陈伯达的意见！对一切事物都要一分为二，对红卫兵也要一分为二。"

陈伯达说："我们要把受蒙蔽，影响的红卫兵争取过来，不要歧视他们。"

有人提出："'怀疑一切'的口号对不对？"

陈伯达："我的意见，有问题，可以怀疑，可以批判。如果：'怀疑一切'，是指对一切事物都要思考、考虑、思索、加以分析，那是对的。把怀疑一切变成否定一切，就不对了。这样说是不是好一些？毛主席在《学习和时局》中说：要善于使用思想器官，善于思索。经过思索，有的肯定，有的否定。没材料，思索也是空的。没有油，灯就不亮。你们可能是几百盏灯，社会主义的灯，无产阶级的灯。没有油，灯光就没有了，灯就不亮。所以，你们要接触社会，接触群众。这样，像毛主席告诉我们的，就能得到大量的材料，就有思索问题的原始源泉。不然，你们就不会运用毛泽东思想。"

陈伯达说："谭力夫讲话我看了，这是一篇大毒草。你们要学会批判这种文章。要批判得好，就要接受经验，脑子里要有油水，芝麻油也好，花生油也好……你们如果不能把谭力夫批判倒，你们还搞什么革命？"

同学递上条子问："您谈的精神我们支持，但是我们学院去了 1300 人，只剩下十几个人了，怎么办？"

陈伯达："我劝你们也去，回来了再搞批判，步行去，步行回来。"

"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扫四旧，是个长期的事情，去半年回来还不晚……可以去半个月，也可以去半年、一年。批判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这是一个长期的任务。一是到群众中去，了解有什么要批的，这样，文化大革命就多种多样了。破四旧，都破些什么呢？那么大的天地，你们还不知道怎么破呢？知道了，了解了，才能破。你们步行就是准备大斗、大批、大改，有力量的斗，有力量

的批，有力量的改。”

有同学称陈伯达为首长时，陈伯达说：“我不是首长，我是老百姓，我们都是同志。”

众人鼓掌。

有人提出：“《人民日报》10月22日的社论，是同《红旗》十三期社论抵触的。”

陈伯达说：“22日社论有缺点，没有提到两条路线斗争。我是《红旗》杂志总编辑，十三期那篇社论的题目是我定的。我并不是要用这篇社论取消那篇社论。不是要让北京的牛鬼蛇神舒舒服服的，不斗。不是让全城全校都走。社论里没有这个意思。”

“欢迎大家提意见。我代表《人民日报》接受大家的批评。”

“有人说发表这社论‘有阴谋’，我认为是没有阴谋的。”

有人宣读大字报，仍然说这篇社论是“大阴谋”。

陈伯达：“社论有疏忽之处。我代表《人民日报》接受大家的批评。大家对《人民日报》提意见，是好的。这给《人民日报》编辑部一个警告：要有高度警惕性。党的机关报，稍有疏忽都是不好的。大家批评是有道理的。可以要求再写一篇补充这一篇。不能因为这一篇文章就判成死罪，那样就不能再写文章了。

我没想到对这件事情会发生这么大的抵触。这证明你们政治敏感比我高。

《人民日报》社论，只是建议，谁不同意，可以不照做。”

“今天的事，不能怪同学们，要怪《人民日报》本身有缺点。看他们什么时候补过吧！”

有人喊：“明天就要！”

陈伯达：“来不及。有些问题，要容许人家有考虑的余地。‘最后通牒’这种方式不一定很适当。红卫兵提了很多好建议，有的已经接受，还有许多我们正在研究。”

关锋和戚本禹进来，替换陈伯达和唐平铸。陈伯达说：“就谈到这里吧，把他们两个也解放了吧！”大部分同学同意，鼓掌欢送。

他们刚走出会议室门，师院一同学又用扩音器喊：“要求关锋、戚本禹两同志回来听我们汇报情况！”有一些人鼓掌。关锋、戚本禹就又转回来。师院那个同学讲完以后，有些不同意见的同学发表了意见。又有几个同学谈了一些情况，说陈伯达讲的话前后不一致，又提出疑问，再次要求中央明确表示意见：提倡步行串联，是不是中央意见，这样文化大革命究竟如何进行？

戚本禹说：“关于出去串联问题，你们可以讨论一下，自己应考虑留多少，走多少，我看问题不是那么严重。这篇社论有缺点，没有提到两条路线的斗争，可以再写篇社论。”

10 月 26 日，湖南“湘江风雷”撤出中宣部大院。但是，10 月 24 日斗争张平化的大会使“湘江风雷”名声远扬，但同时也引起了内部的分裂。有人对彭少云等人那天晚上的表现不满，斥其“右倾”。10 月 26 日晚上，“湘江风雷”在北京水电部招待所召开民主生活会，由张家政、叶冬初主持，进行了 4 个小时。会上，大家尖锐批评彭少

云、赵连城、张智忠的右倾情绪。彭少云一气之下，扔下“湘江风雷”袖章冲出房间，联合几个人贴出大字报，声明退出“湘江风雷”。于是，“湘江风雷”改由一中教师叶卫东、银星电影院画工张家政等出任主要负责人。

10月26日，周恩来在中央工作会议华东组说：“文化大革命是史无前例的，是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过去从未有过的。我们每一个人不仅缺乏实践经验，也缺乏历史经验。”

“我个人在这五个月中，前五十天虽两次外出，但在京时也没有做好助手的作用，对工作组提过改良主义的办法，没有及时向伯达同志请教和深入到群众中学习。这是我的主要错误。在十一中全会后，我努力紧跟主席和林彪同志，向文革小组密切联系，有时仍有掉队之虞。”

“路线斗争是文革小组与少数派谈话后提出来的，我未预见。”

这期间，著名小说《红岩》的作者罗广斌、杨益言也在重庆文联宣布造反。

《红岩》作者之一的罗广斌，1948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国民党军第十六兵团司令官罗广文的胞弟，著名物理学家杨振宁的学生。

1948 年 4 月，当时的重庆市委书记刘国定被捕叛变，供出罗广斌的共产党员身份。国民党西南长官公署二处处长徐远举得知罗广斌是国民党第七编司令罗广文之弟，特将罗广文约到重庆城内老街慈居西南长官公署二处处长办公室，将罗广斌参加革命的详情告知罗广文，

并向其保证不伤害罗广斌的性命。罗广文则明确表态，同意徐远举派人逮捕罗广斌，帮助家人管教他。

就这样，罗广斌于 1948 年 9 月 10 日被捕，于 9 月下旬押解重庆渣滓洞和白公馆看守所。

当时白公馆党组织秘密制定了“狱中策反越狱计划”，通过陈然和罗广斌的努力，将看守杨钦典策反成功。1949 年 11 月 27 日下午 16 时，“白公馆”开始了大屠杀，到次日凌晨 3 时，共 9 批 29 人被杀。此时，还有 19 名“犯人”关押在牢中。然而渣滓洞尚有 100 多人未处决，于是杀手全部赶往渣滓洞。白公馆的“犯人”由看守长杨进兴全权处理。

面对解放军的隆隆炮声，杨进兴心里发慌，他命令杨钦典一人留下看守，自己带领亲信逃离了白公馆。通过做工作，杨钦典把牢房钥匙交给了罗广斌，19 名难友被编成 5 个越狱互助小组，在黎明前的黑幕中冲出了白公馆。尽管被敌特武装发现，但是他们冒着密集的机枪扫射，冲向后坡的山林中，安全脱险。罗广斌在那场屠杀中幸免于难。

建国后，罗广斌历任青年团重庆市委统战部部长、重庆市民主青年联盟副主席，后在重庆市文联专门从事创作。

因长篇小说《红岩》在全国的巨大影响，罗广斌作为作者之一，又是重庆歌乐山“渣滓洞”和“白公馆”大屠杀的幸存者，自然成为青年们崇拜的英雄，但是那时他的日子并不好过。小说《红岩》虽然使他的名气如日中天，但政治生活却遭到诸多限制。原因是 1959 年

4 月，在押特务张界供称罗广斌被捕后，曾交代了组织关系。市委指示市公安局成立专案组，对罗广斌的细节问题进行再审查，这次审查没有结果。

1963 年，共青团中央提议推选罗广斌为全国青联访日代表，被“历史问题有个别疑点”而否决。1964 年共青团召开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又拟安排罗广斌为团中央委员候选人，亦遭同样原因否决。

1964年，小说《红岩》被译成日文后，在日本青年读者中产生了强烈的影响。日本民间组织邀请罗广斌访日。共青团中央征求重庆市委意见，于是这个被挂了5年的问题又被提出来，着手审查。其结论是：罗广斌系刘国定出卖，经罗广文同意而被捕；承认了党员身份未叛党；脱险出狱是因为人情关系。市委组织部的最后意见是：还有一些细节问题需进一步调查，在细节未澄清以前，不宜出国访问。

罗广斌被下放到远离城市的长寿湖渔场做场长。长寿湖渔场的雾霭是沉重而寂寥的，罗广斌就在那儿消磨着才华横溢的日子。

1966 年 5 月，文革开始后，重庆马识途、沙汀、李亚群等文艺宣传部门的重要领导人，被定性为重庆“三家村”黑线头目，痛加批判，罗广斌自然也被说成“一根线拴住的蚂蚱”。

1966 年 6 月 22 日，进驻重庆市文联的工作组收缴了罗广斌等人的创作笔记，准备批判……罗广斌惶恐不安。

1966 年 8 月 3 日，根据市委指示，市公安局连续提出三份《对罗广斌被捕的几个问题开展调查的报告》（之一、之二、之三），其要点是：一、罗广斌与马识途关系密切，被捕情节可疑。二、罗广斌

严重丧失立场，承认党员身份，在敌特面前低三下四，大屠杀时，向刽子手求饶。三、敌特明确宣布释放罗广斌，并非其“越狱脱险”。四、包庇刽子手，把叛徒塞入烈士行列，自我吹嘘，伪装成“英雄人物”。调查结论：罗广斌被捕、狱中表现、出狱及解放后的一系列活动，都存在着严重问题。决定对已调查清楚的问题转给文化革命领导小组，在运动中发动群众对其进行揭发批判。

受批判的罗广斌忍无可忍了。1966 年 8 月底，市文联职工郭青等发起成立造反派组织“红卫兵战斗小组”，罗广斌立刻表示坚决支持并说：“怕什么，最多是坐监牢，掉脑袋，全家打成反革命！”

9 月，《红岩》作者罗广斌、杨益言与刘德彬组织重庆市文联的司机、炊事员、勤杂工等组成“红卫兵战斗组”。

10 月 6 日，罗广斌、杨益言给市委书记处写报告，称重庆市文联“问题不少，性质严重。所办《奔腾》双周刊，据前三十期的粗略统计，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草约占 40%，这不是小问题，有关领导干部是有严重责任的”，并称自己因积极与文联领导王觉等人斗争，长期受到压制，提出：“到底是机关领导？是工作组？还是工作组之上的领导同志对我们采取了错误的对待？总之，领导上怀疑我们，工人同志相信我们，群众靠拢我们，这是一个什么问题？我们到底算反革命的右派？还是算革命的左派？”

10 月 23 日，罗广斌、杨益言写出大字报《致重庆市文联机关全体革命同志的信》，公开造反立场。

10 月 25 日，重庆市文联由罗广斌、杨益言主持进行“巴黎公社”式民主选举，提出候选人 11 人，被剥夺选举权 8 人，他们是：“黑帮”邓均吾、王觉；“黑帮爪牙”中层干部向晓、马融、张继楼，《重庆日报》揭发出来的副刊“黑编辑”杨世元；“摘帽右派”李南力、温田丰。民主选出炊事员郭清、临时勤杂工尤淑芳、罗广斌、杨益言、刘德彬 5 人为文革筹备小组成员，组长郭清，实际由罗广斌、杨益言掌控，从而完成了重庆市文联的造反派夺权。次日起文联文革小组正式行使领导文联机关文革运动等权力。

11 月 8 日晚上，罗广斌、杨益言将原驻文联工作组组长牛文拉到市中心解放碑“辩论”。罗广斌慷慨激昂，痛斥市委工作组执行的“反动路线”！他自认“态度鲜明，斗争坚决”，因为坐过牢不被上级信任，只是 15 级干部，“许多会议不能参加，许多报告不能听，许多文件不能看”……面对许多揭发他的大字报，他宣称：“我不是叛徒，我的作品没有问题……”

罗广斌成了重庆家喻户晓的“造反派”。

第 251 回：重庆市，红卫兵政委反水　闹农办，陈毅家宴请旧部

在此期间，重庆的保守派的队伍也在发生变化。10 月 9 日，重庆“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总部”召开会议，宣布撤出解放军辅导员，会上，“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总部”副政委兼纠察总队政委及组织部长孟军发言，指出市委犯了路线错误，也批评了解放军辅导员对“红卫兵总部”有包办代替的问题等。

10 月 23 日，“毛泽东思想赤卫军、红卫兵驻京联络站”打电话回重庆，反映“思想兵”总部政委刘桂兰、副政委孟军在北京与“北航红旗”和重大“815”打得火热，听说要组织“红色造反团”造总部的反。“思想兵”总部立即召开各级干部会做稳定军心工作。传说，重庆团市委书记崔成礼听说刘桂兰、孟军造反十分生气，骂她们是：“10 个男人都日不烂这两个女人，我要号召全市的共青团员不娶她们”。

刘桂兰和孟军都是重庆医学院学生，孟军还是时任四川省副省长孟东波的女儿。

10 月 29 日，重庆市“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总部”政委刘桂兰、副政委孟军从北京串连回到重庆后，即前往 54 军军部找解放军辅导员谈她们准备向市委造反的想法。

10月30日，重庆“红卫兵造反司令部”、“首都红卫兵第三革命造反司令部”等8个群众组织，在重庆市大田湾体育场召开“彻底批判重庆市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群众大会”，13万人参加。清早，各校师生从四面八方唱着歌，呼着口号向体育场集中，市内交通阻塞。

大会在上午11时正式开始，直到晚上18时结束，市委书记辛易之、廖苏华等前往接受批斗。

会后举行了盛大的示威游行。大、中、小学生高呼“坚决要求改组重庆市委”，“八一五好得很”等口号，群情激昂。路旁挤满了围看的群众，一些老年人露出茫然莫解的神色，显然他们对反对中共市委的行为不能理解。

10月30日这天，重庆后字242部队6人贴出了揭发重庆警备司令部的大字报：《警备司令部是镇压群众运动的帮凶》、《警备司令部的政委好凶啊！》一时间影响很大。

在中央工作会议期间，陈毅让妻子张茜告诉陈丕显的妻子谢志成，让她转告华东局几个省市的第一书记叶飞、魏文伯、谭启龙、江渭清及陈丕显和谢志成等人晚上到他家里吃饭。浙江的江华和江西的杨尚奎请假没有参加中央工作会议。

当时的江苏省委书记江渭清后来回顾这段历史时感慨地说：“八月份召开八届十一中全会时，会场里的气氛还比较融洽，毛主席坐在台上讲话，台下坐着的同志也时常插话，场内有时还漾起一阵笑声。

“到十月工作会议，这种气氛已经荡然无存了！会上刘少奇、邓小平同志，已被文革小组定为资反路线的炮制者，当作黑司令部的总头目批判了。以此划线，人人检讨，根本不容辩解！心情压抑的程度更是难以名状！

“正在这里，接到陈总秘书的通知：陈总今晚请华东几位第一书记吃晚饭。我竟像孩子盼过年似地盼起天黑来了,看得出，一同去的

陈丕显夫妇、叶飞、李葆华、魏文伯、谭启龙等同志，都有同样迫切的心情。吃饭是小事，能到老首长面前谈谈心，出出气才是真的。整个会议期间，虽说与陈老总天天都见面，碍着人多眼杂，只有碰面点点头的机会呀！”

天近傍晚，两辆拉严窗帘的“大红旗”神神秘秘地离开了京西宾馆。

车上这几个人，多是第一书记，因此，陈毅嘱咐司机路上格外小心，一定要注意安全。

他们从京西宾馆到中南海，本来可以走笔直的长安街，要不了20分钟即可到达。可是司机却避开宽敞的大道和熙熙攘攘的人流，在狭窄的僻静的小胡同里东拐西弯，时而停车躲让自行车，时而缓慢艰难地转急弯，足足绕了半个钟头，汽车方才切入府右街，呼啸驶入中南海西门。

这时，司机如释重负，长长地舒了口气。

陈毅站在院门口，微笑着与每一位客人握手。张茜拉着谢志诚的手，一边往里让，一边歉意地说：“真是的，老总请你们来，也没提前打招呼，匆忙中，只备了几样家常菜，请大家多原谅哟！”

大家忙说：“吃是次要的，说说心里话才是要紧的。”

这几位华东来的书记，几乎每次到北京开会，总要“敲”陈毅一次“竹杠”，当然主要目的是看望一下老首长。这次，碍于形势错综复杂，不便聚会，陈毅一直未发邀请，无奈几位书记心里有事，几次提出要求，陈毅才在会议快结束时临时决定。

陈毅家的厨师施师傅当天中午才知道请客的事，但因都是熟客，口味喜好他有数，只半天工夫，就像变魔术一样，煎、炒、烹、炸、摆上一桌菜。桌子正中放着两瓶茅台，一瓶长白山红葡萄酒。

陈毅拿起茅台酒瓶，给每一位伸过酒杯的老部下斟上一杯，最后把自己面前的小酒杯倒满，举起，向众位说："今天我们喝茅台，都敞开酒量喝个痛快！"能喝的开怀畅饮，不行的也品尝几口。我也不敬酒，剩下来的，请大师傅喝光。干！"

没有吃菜，也没碰杯，有的一饮而尽；有的抿了一口。

陈毅猛一仰头,滴酒不剩。他把空杯子搁在桌上时又补了一句：

"我酒量有限，不再敬酒，你们能喝的尽量喝！"

大家边说边干杯。

性格豪爽的陈毅，一开口就埋怨说：

"现在有些大字报怎么好这么搞呢?连朱老总都骂上了，说朱总司令是大军阀!从红军的一套到解放军的一套，还是朱老总南昌起义时传下来的呢，说朱老总是大军阀，说得通吗?"

"陈老总！"江渭清憋不住了，"我从运动开始到今天，始终没想通过，我对这场运动确实有抵触！"

"我记得62年北戴河会议上你向主席提过：再不能搞这样大的运动了（指大跃进），我们受不起折腾了！

"当时毛主席说，你的意见对，今后要慎重。现在怎么又…… 唉！搞大运动，一窝蜂，根本不能实事求是嘛！都是先有框框，先有结论：'走资派'！扣上顶高帽子再找材料。

“不算战争年代，我在江苏工作 17 年了。17 年间，我就撤过一个县委书记，因为他死官僚主义，省里拨给他的粮食他不要，全县饿死 4 万人。现在可好！从省到地市委，到县委，‘洪洞县里没有一个好人’了，我保不了他们，连我自己也保不住了！这样搞法，怎么行嘛！叫我怎么理解，怎么得力嘛！”

说到最后几个字时，江渭清眼圈潮润，声音也有些嘶哑了。为了镇定情绪，他往嘴里塞了支烟，发颤的手，划一根火柴，断了；再划一根，又断了；划到第三根，才把烟点燃。

张茜给身边的谢志诚夹了块白斩鸡，又夹了块，似乎想往陈丕显碟里送，略一思索，放在陈毅碗里。转而夹起一块酱鸭送到陈丕显面前，关切地问：“陈书记的身体怎么样？”

“是呀，”陈毅接过话题，对陈丕显说：“阿丕，你怎么搞的，怎么得了这个病?”

陈丕显 1966 年初鼻腔突然出血，检查后确诊是鼻咽癌，如今已渐好转。他把得病的经过和治疗情况大概讲了一遍。

陈毅说：“你的命很大啊，得了这个病还那么健康!”

陈丕显说：“多亏发现早，治疗及时得法。发现我得了这个病之后，总理派了北京肿瘤医院的吴桓兴院长长住上海，亲自为我诊断治疗，镭放射科又专门开‘小灶’为我治疗。像吴院长这样的专家，真正是病人的福星!可是前两天我去看他，他因为是华侨，被红卫兵抄了家，连病人都不准他看了。”

陈丕显感慨万端。

“阿丕！”陈毅以责备的口吻说，“既然有病，你就好好养你的病嘛，来开什么会呀?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嘛!”

陈丕显把叶群打电话，江青请他吃饭的情况讲给陈毅听，然后说：“回去以后，病恐怕也养不成了。”

“管它呢!明天的事明天再说。今天我们喝酒!”

陈毅又开始和大家碰杯，并不断劝酒说：“喝，大家喝呀!说不定是最后一次啦!”

大概是“最后”这两个字犯了忌，张茜猛一怔，随即拉拉陈毅的袖子，埋怨说：“你不要瞎说嘛！”

“你懂什么！”陈毅突然像狂暴的雄狮，冲着张茜怒吼了一句。

大家又一次受到震动，当着客人的面，陈毅从来没有对妻子这样横蛮。如果性情倔强的女主人离席而去，整个酒席将会不欢而散。根据以往经验，这完全可能。

也怪，张茜意外的平静，她只不太明显地叹了口气，转而笑着招呼大家：“别停筷子，多吃菜呀！空腹喝酒会伤身体的！”

说着，拿着酒瓶为每一位客人斟酒，然后又给身边的丈夫加了半杯，温存地说：“老总，你只能再喝半杯，这是医生定的量，对吧！”

“嗯。”陈毅顺从地点点头。

反常，一切都反常，反常得令人眼眶发热，鼻子发酸。

张茜个性强，她“管教”陈毅时的厉害劲儿，在座的有几位是亲眼目睹过的。当时曾觉得她太不给面子，可是今天突然觉得那才是张茜，而眼前这位逆来顺受的女人则显得陌生。

大家都知道，有一次开完会，已近中午，周恩来掏钱，留陈毅、贺龙在北京饭店吃狗肉，又派人打电话，把张茜、薛明也请来做客。周恩来还特地买来一瓶茅台酒。酒过数巡，脸色红润、汗珠满面的陈毅，突然以极度夸张的语调大叫：

“哎哟！”然后转脸对身边的张茜说：

“哎、哎、哎，今天是总理请我们吃酒，总理给我敬酒，我怎么能不喝呢？你不要老在下面踩我的脚嘛！”

几句话，惹得满座哗然，包括羞红脸的张茜，也无可奈何地笑了！

后来，每逢周恩来向身边同志讲到这段故事，总忍不住放声大笑。

见大家也无心吃饭，陈毅索性端起酒杯说：“各位不要垂头丧气。我知道现在大家很困难。困难谁没见过?长征不困难?三年游击战争不困难?建国初期要米没米，要煤没煤，头上飞机炸，下面不法投机商起哄捣乱不困难吗?困难!没有困难，还要我们共产党员干什么?!我还是那句老话：无论多困难，都要坚持原则，坚持斗争”

这些道理并不深奥，在座的诸位也都会说。但是，……大家屏住气，认真聆听老首长的临别赠言。

他凝视着手中的酒杯，斟酌着字句说：

“德国出了马克思、恩格斯，又出了伯恩斯坦。伯恩斯坦对马克思佩服得五体投地，结果呢?马克思一去世，伯恩斯坦就当叛徒，反对马克思主义!俄国出了列宁、斯大林，又出了赫鲁晓夫，对斯大林比亲生父亲还亲。怎么样呢?斯大林一死，他就焚尸扬灰，背叛了列宁主义!中国现在又有人把毛主席捧得这么高!毛主席的威望国内外

都知道，不需要这样捧嘛!我看哪，历史惊人地相似，他不当叛徒我不姓陈！”

说最后一句话时，大家像陡闻一声炸雷，受到强烈的震动。

“我这个人从来就相信，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时候一到，一切都报!”

陈毅拉开椅子，站起身，高高举起酒杯。大家也都起立，把手中的酒杯举起。

陈毅说：“让我们干了最后一杯！我保不住你们了，你们各自回去过关吧。如果过得了关，我们再见；如若过不了关，这是最后一次!”

大家挨个与陈毅碰过杯，一仰头，吞下了这杯烈酒。

10 月 26 日，北京农业大学的冯兴旺带着“东方红”的学生再次来到万寿路 10 号院农村工作办公室抢“黑材料”。这里和他们 9 月 5 日来煽风点火时一样，仍然冷冷清清。农大一名学生因此写了一首“农办造反随草”的打油诗记录了他们当时的心境：

农办、农办，可真难办！

工作人员很懂“礼节”，甚至不敢接我们的传单！

有时被迫塞到手，他还偷偷扔一边。

农办，农办，可真难办！

没有一张大字报，没有几块语录板；

工作人员更干净，语录也不在身边！

农办，农办，可真难办！

不让我们上楼贴大字报，说什么要先商量商量看，

什么“要保持环境卫生”，什么“贴到墙上不好看”。

“这楼你们不能上，因为我们还没上班”。

“现在重点工作是接待，大字报已有月余没见面”。

“我们不同于学校，我们特殊----因为我们是机关”。

“我们要内外有别，大字报你们不能看”。

“我们也开了揭发、批判会。但没解决问题----这我不管”。

农办，农办，必须大乱！

横扫奴隶主义，树立革命造反。

革命群众齐动手，“不周山下红旗乱！”

当农大的学生要砸档案室时，机关的叔叔阿姨们，手挽手地组成人墙，任凭学生们打骂，就是不退一步。下午，学生们还是动手砸了几个办公室，抢出了一些“黑材料”。当天，他们还抄了他们的校长、农办副主任王观澜的家。晚上，学生们和农林政治部、农办的干部辩论到很晚。大院的喇叭彻夜广播，宣传《十六条》。第二天，大院的家属也来参战。后来，农工部大院的子弟们也赶来助阵，大学生不愿跟中、小学生纠缠，终于决定撤回学校。这天下午，他们从农办步行返校。天冷，风大，他们列队走在运河边上，打着红旗，虽然是从农工部大院被轰出来的，但每个人的自我感觉还相当不错，因为他们觉得自己刚刚进行完一项伟大的革命事业。

## 第二部第三卷

## 各地文革章回索引

**北京：**

第 202 回；第 223 回；第 224 回；第 228 回；第 229 回；第 230 回；第 231 回；第 232 回；第 233 回；第 234 回；第 235 回；第 236 回；第 237 回；第 238 回；第 239 回；第 240 回；第 241 回；第 242 回；第 243 回；第 246 回；第 247 回；第 248 回；第 249 回；第 250 回；

**中央文革记者站：**

第 202 回；

**大串联：**

第 202 回；第 203 回；第 204 回；第 205 回；第 206 回；第 208 回；第 211 回；第 212 回；第 213 回；第 218 回；第 219 回；第 223 回；第 247 回；

**贺龙：**

第 207 回；第 208 回；

**空军：**

第 207 回；

**北京大学：**

第 207 回；第 240 回；

**陈毅：**

第 209 回；第 251 回；

**红卫兵：**

第 210 回；第 241 回；第 242 回；第 243 回；

**刘少奇、61 人叛徒案：**

第 210 回；

**清华大学：**

第 225 回；第 239 回；第 240 回；

**北京航空学院：**

第 225 回；

**北京地质学院：**

第 226 回；第 237 回；

**海军：**

第 227 回；

**首都工作组：**

第 241 回；第 242 回；第 243 回；

**农口：**

第 251 回；

**上海：**

第 206 回；第 213 回；第 214 回；第 215 回；第 237 回；第 238 回；

**天津：**

第 219 回；第 238 回；第 242 回；

**华北地区：**

**山西：**

第 220 回；第 221 回；第 222 回；

**东北地区：**

**辽宁：**

203 回；204 回；

**黑龙江：**

第 224 回；第 241 回；第 242 回；第 243 回；

**西北地区：**

**新疆：**

245 回；

**西南地区：**

**四川：**

第 202 回；第 218 回（重庆）；第 239 回；第 244 回（重庆）；

第 250 回（重庆）；第 251 回（重庆）；

**贵州：**

第 202 回；第 203 回；第 211 回；第 245 回；

**广西：**

第 216 回；第 217 回；

**西藏：**

第 241 回；

**中南地区：**

**湖北：**

245 回；

**湖南：**

第 227 回；244 回；249 回；250 回；

**华东地区：**

**山东：**

第 219 回；第 238 回；第 239 回；

**江苏：**

第 215 回；第 238 回；

**福建：**

第 205 回；第 217 回；第 236 回；第 238 回；第 239 回；第 242 回；

**江西：**

第 227 回；

# 文革史话

之

第二部

# 狂风骤雨

第四卷

# 目　录

第 252 回：为材料，中戏大闹军科院

西南局，中央工作会结束

第 253 回：劝丕显，各地进京告状多

众领导，见新赣浙闽代表

第 254 回：批社论，《人民日报》遭质疑

揭问题，群起炮轰陶鲁笳

第 255 回：步履艰，叶飞返闽过关难

闹革命，红卫兵抗美援越

第 256 回：为材料，带旅大领导进京

回长沙，张平化再次被斗

第 257 回：太复杂，刘宁一哪敢再言

急“逃难”，天津市秘密办公

第 258 回：同对待，见天工两派代表

要材料，沈阳农学院武斗

第 259 回：不支持，成立全国红卫兵

再接见，新疆赴京代表团

第 260 回：为材料，学生冲广播大楼

毛泽东，六次接见红卫兵

第 261 回：“新运会”，运动员出国风波

齐动员，要打掉骄娇二气
第 262 回：渐失控，武汉市群雄纷起
抢材料，七机部两派冲突
第 263 回：“敢”字差，云南阎红彦检查
谭启龙，与学生进京告状
第 264 回：赴晋祠，学生来到“三干会”
换地点，黔常委无奈休会
第 265 回：举战旗，青城上下燃烽火
谁传达？天津市又生争议
第 266 回：报告会，质疑万晓唐之死
林彪惊，国防部真的被冲
第 267 回：大道理，中央文革临现场
“黑材料”，中南海西门关闭
第 268 回：矛盾现，聂元梓批邓小平
再赴沪，“三司”设立联络站
第 269 回：座谈会，串联工人闹革命
定“三不”，曹荻秋态度坚决
第 270 回：上海市，“工总司”宣告成立
奔市委，工人要见曹荻秋
第 271 回：去北京，造反英雄困荒野
京沪断，“安亭事件”惊世界
第 272 回：情相似，武汉市“工总”成立

天渐冷，毛泽东七次接见
第 273 回：开西门，中南海再受冲击
飞上海，张春桥临危受命
第 274 回：不进城，雨夜飞车奔安亭
见工人，演讲诚恳收成效
第 275 回：接急电，王洪文驰往昆山
践诺言，张春桥同意要求
第 276 回：怒冲冠，三巨头反应激烈
约“炮司”，前往苏州做工作
第 277 回：再汇报，陶铸态度有变化
新问题，陈伯达也在研究
第 278 回：搞活动，隆重纪念孙中山
竟为何？《新北大》校刊被砸
第 279 回：汇京城，部队机关闹翻天
开大会，陈毅讲路线斗争
第 280 回：守纪律，叶公痛斥“小老鼠”
外交部，陈毅又作隆隆声
第 281 回：先实践，主席支持张春桥
有危险，安排聂元梓避难
第 282 回：赴苏州，张、曹、韩再签“五条”
推心腹，春桥谈思想转变
第 283 回：南京行，周宝林不负使命

唐平铸，答江阴代表疑问

第 284 回：见工人，企业文革怎么搞？

文化部，错把陶铸当望东

第 285 回：大新闻，伊林·涤西批林彪

印传单，北京城引发震动

第 286 回：串联停，恩来见天津代表

过新疆，陶铸再与鲁座谈

第 287 回：回济南，山东继续“三干会”

缠卫恒，撤出晋祠返城中

第 288 回：提要求，安徽省委要检讨

刘宁一、谢富治表态支持

第 289 回：大混战，稻香楼流血三天

步步退，江渭清仍掌局面

第 290 回：识时务，赵紫阳主动检查

为“材料”，广州市沸反盈天

第 291 回：出不去，五羊城人满难当

下通知，大军区开始“四大”

第 292 回：蓉城会，李井泉下落不明

查旧报，惊发现“反共启事”

第 293 回：叛徒网，居然全都是“高干”

报总理，其实并不是新闻

第 294 回：查叛徒，小将们誓不罢休
吉林省，三干会书记被揪
第 295 回：报社封，辽宁省委陷瘫痪
丝绸厂，杭州工人进北京
第 296 回：《十二条》，再征求工人意见
周恩来，见冰城“八八”代表
第 297 回：部队乱，吴法宪无处安身
陶铸忙，做沈阳两派工作
第 298 回：北机床，向工人了解情况
斗卫恒，学生封《湖北日报》
第 299 回：没想到，王任重问题严重
说话间，江青忍不住哭泣
第 300 回：谈“草案”，工交会抵触颇大
施残暴，六中内私设刑堂
第 301 回：义愤涌，伯达亲临“劳改所”
转《通告》，见“三司”北航代表

**各地文革章回索引**

第 252 回：为材料，中戏大闹军科院　西南局，中央工作会结束

工作组期间，中央戏剧学院的工作队是军事科学院派去的。10 月 25 日，中央戏剧学院“毛泽东主义红卫兵”派代表前往军事科学院，找军事科学院派往中央戏剧学院的原工作队分团负责人胡秉权、高体干等人索要他们在中戏期间整理的中戏师生的“黑材料”。对于这些材料，胡秉权他们不敢交给学生，经过长达 9 小时的争执，胡秉权等人答应将这些材料加封，并保证：“一定不让任何人动此材料。”

10 月 27 日，中戏多数派组织“红色造反团”也来到军事科学院查询这批材料，胡秉权同样也让他们在这批材料上加上了封条。中戏“毛泽东主义红卫兵”于当天下午 17 时闻讯后，立即派出 4 名代表前去另行查封，并向胡秉权提出强烈抗议。

胡秉权他们将“毛泽东主义红卫兵”这 4 名代表请进接待室，“毛泽东主义红卫兵”代表郑国喜问胡秉权：“周总理 22 日的讲话你们看过没有？”

胡秉权答：“看过了。”

郑国喜接着问：“总理的讲话算数不算数？”

胡秉权说：“当然算数。”

郑国喜又问：“你们打算执行不执行？”

胡秉权说：“我们讨论研究了一天，应该执行。”

这时，中戏学生杨守林已将材料查封完毕，听了胡秉权这句话；就说：“这材料先放在我这里，……”

未等杨守林把话说完，原工作队人员林中和立即扑到杨守林怀中，抢夺他手中的材料。此刻，在场的几位军事科学院的干部也参与进来。争夺中，杨守林被摔倒在地，材料也被军事科学院的人抢走。这时，原工作队分团负责人胡秉权站起来大声斥责军事科学院的这几位干部：“你们这是干什么？！”

林中和将材料放在墙角，其他 4 人马上围在林中和的附近保护。中戏学生郑国喜对此提出强烈抗议，并说：“你们今天这种行动，使我们对你们不能信任，材料在此存放我们不放心。我们今天要将材料带回去，等中央下达指示后开封。”

胡秉权不同意中戏的学生将材料带走，双方展开激烈的争论，军事科学院的干部打电话将军事科学院负责人王树声副院长、杨副院长、向仲华副政委请到现场，阻止学生拿走材料。

此时，中戏又来了 4 名代表，王树声副院长对他们说：“我们是军人，我们要听总政的命令，你们这份材料不能拿走！保存在院党委由我负责。”

中戏学生郑国喜说："现在所交涉的问题，是我院革命师生员工和我院原工作队之间的矛盾。此材料是中央戏剧学院的，按军委指示军队无权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请你不要干涉，免得给自己找被动！"

王树声没再说话，和其他军事科学院的领导走出了房门。

中戏"毛泽东主义红卫兵"代表又要上去拿材料，军事科学院的林中和与其他 4 位军事科学院的干部马上阻拦，双方又撕扭成一团。原工作队分团领导、军事科学院的干部高体干见状，大声说到："你们这是革命行动吗？你们欺人太甚。"

到了晚上 22 时左右，在屋内和楼道里站了数十名军事学院的干部、战士，中戏"毛泽东主义红卫兵"代表人少势单，始终没有拿到那些材料，于是他们派人回中央戏剧学院向"毛泽东主义红卫兵"汇报。中戏"毛泽东主义红卫兵"闻讯后，愤慨万分，立即聚集了 50 余人，乘车前往军事学院。

军事科学院的领导听说后，立即将一个排战士，共 36 人派往接待室，在放置材料的墙角处，组成三道人墙予以保护。王树声等院领导也再次来到接待室，对学生代表大声说道："材料就是不能给，我看你们怎么下台？！"

说罢和几位院领导人走了出去。

22 时 40 分左右，乘车来到军事科学院的中戏 50 多人进入接待室，又与军事科学院的人激烈的争吵起来。

学生问："你知道你保护的是什么材料？"

原工作队员林中和说："有黑的有白的。"

学生又问："是谁叫你保护黑材料的？"

林中和说："也可以说是毛主席叫我保护的。"

……

双方僵持到 24 时 25 分，中央戏剧学院各红卫兵组织负责人向军事科学院提出最后通牒："如果 28 日 1 时还不将材料交出，就采取必要的行动。"

临近 28 日 1 时，保护材料的战士增至 72 人。通牒时间已到，中戏的学生将出门的路让开，并鼓掌，念《毛主席语录》请战士们出去。战士们没有命令当然不会离开。于是，学生们将站成三排人墙保护材料的解放军战士一个一个地往外拉，战士们奋力地挣脱，其中有的战士因过度疲劳而昏了过去。

与此同时，在门口也发生了撕扭，楼道中的该院干部拼命住屋里挤，门口一个中戏女同学被挤倒在地，犯了癔症昏迷不醒。

撕扭持续一小时之久。

至 6 时左右，中戏派代表去军委文革反映情况，军委文革打电话请示后，对中戏“毛泽东主义红卫兵”代表表示：

（1）支持你们的革命要求;

（2）科学院派军队不对;

（3）希望不要把事态扩大。

随后，他们派《解放军报》社记者到现场了解情况。

军事科学院和中戏学生又相持到 28 日上午 11 时 05 分，中戏学生又发出最后通牒：“限 20 分钟内将材料交出，否则我们将采取必要的行动！一切后果将由军事科学院及原工作队分团领导全部承担。”

军事科学院狄副政委答应将采取措施，给予答复。

又过了 20 分钟，军事科学院还是没有答复，于是，中戏学生在“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口号声中，再次冲向接待室内的战士……

这次战士们没有太多阻拦，学生们终于将材料抢走，大队撤出军科，留下代表继续与原工作队分团领导谈判，提出三个条件：

（1）必须把其他院校的材料交出来;

（2）抢走的黑材料只是一小部分，必须将我院的全部材料交出来;

（3）强烈抗议军事科学院某些领导，调派军队镇压革命学生，挑动战士斗学生；科学院党委必须向广大战士检查；向中戏学生做深刻检查。

军科院发生的这起“1027 事件”影响波及整个北京市。事件发生后，在北京以及全国都在盛传：北京“三司”打死了 4 名解放军，打伤 20 多名解放军……

10 月 27 日，地院“东方红”四进地质部“扩大战果”。他们也因为四进地质部，在全国影响甚大，而成为当时红卫兵运动中的一面旗帜。

10 月 27 日这天，还发生了北师大“井冈山”到“大庆展览会”造反事件。他们造反的理由是指责展览会“抬高刘少奇，贬低毛主席，刘少奇的照片比毛主席的照片还大。解说词中，突出刘少奇的所谓两种教育制度，更为严重的是，在八届十一中全会后仍继续放毒”。北师大“井冈山”的行动受到一些群众的抵制和反对。10 月 29 日，陈伯达亲自写信给北师大“井冈山”：“同学们发现石油部展览会布置有政治问题是对的，我赞成你们的意见。”当天，戚本禹在接见北师大代表时说：“大家造石油部展览会的反，造得很好！”

10 月 27 日，成都市空字 028 部队的“红总”贴出大字报，揭发成都军区政委郭林祥、司令员黄新庭在 9 月 11 日成都各大专院校的

学生在人民南路市中心广场举行进京汇报誓师大会时，让成都军区下乡劳动的部队在市里绕了一圈才走。大字报说这是向红卫兵示威。

原来，成都市各高校学生 9 月 10 日听到了党中央决定分批组织全国大学生赴京参观学习的消息，万分高兴，准备在第二天，9 月 11 日，在市中心人民南路广场举行庆祝大会，以表达喜悦心情。

但是，在 10 日夜里和 11 日清晨，却有不少单位得到上级的“紧急通知”，并且有成都四中的保守派“红卫兵”发出了“十二万分紧急呼吁”，说 11 日有成都大学、成都电讯工程学院、成都地质学院等院校的右派学生要在人民南路广场制造“匈牙利事件”，要求广大群众不要参加，而是要进行反对。

果然，在 11 日上午，交通学校和位于送仙桥的水电学校组织了许多人，并且开着宣传车把成都大学的大校门堵住，不让该校的学生队伍进城去参加大会。成都大学的“工人赤卫队”更是把大校门锁住了。学校“818 红卫兵”要求“工人赤卫队”把校门打开，未果。于是，他们动手砸锁，打开了校门，抬着毛主席画像向外冲。经过两个多小时的斗争，终于进城参加了庆祝大会。

9 月 11 日，成都各大专院校的学生万余人在人民南路市中心广场举行进京汇报誓师大会，这是成都各大学学生组织联合统一行动的开始。

这天，成都军区下乡劳动，但是部队在市里绕了一圈后才走。而且这天上午，成都大学四周来了许多的军人在前校门和后校门的地里劳动。这就是 10 月 27 日成都空字 028 部队的“红总”贴大字报揭发的情况。

10 月 28 日下午，“红卫兵成都部队”等群众组织在成都市体育场举行“誓死保卫毛主席，最热烈庆祝我国导弹核武器发射成功大会”。会上，从北京来成都的几个学生介绍了 10 月 18 日北京发生的“口号事件”，学生们知道了在北京存在着两个司令部，群情激奋，一致高呼口号“誓死保卫毛主席”。发言者都表示了要站在毛主席为首的司令部一边，坚决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决心。

会上，清华大学“井冈山公社”的一个红卫兵要求发言。他的发言就是欢呼空字 028 部队“红总”冯德华等 13 人 27 日在人民南路贴出的那张揭发西南局和四川省委、成都市委在 9 月 9 日和 9 月 11 日，两次调动军队向革命学生示威的大字报。

清华大学这个学生的发言立即引起了参加大会的全体学生的气愤。接着，清华大学的这个同学代表大家，向参加大会的西南局代表宋世勇提出了四个问题：调动军队的目的是什么？谁是主谋？等等，要求回答。宋世勇自然不能满足大家的要求，因为他说无权代表西南

局表态。于是，大会主席提出："既然西南局派来的代表回答不了我们的问题，那么我们就直接到西南局，去找西南局的领导回答。"

于是，队伍浩浩荡荡地来到了位于新华路的西南局机关。但是，机关里找不到一个领导人，还是只有宋世勇在和大家周旋，磨了很久。在这种情况下，学生们意见也不一致，没有了主意。但是，大家都表示要坚持斗争到底。

第二天，进驻西南局各个学校的几千人已经分开在西南局机关的各个房间里住了下来。成都电讯工程学院和成都地质学院的同学整整齐齐地留在那里。

10 月 28 日，北京，中央工作会议的最后一天。晚上，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对会议如何传达作了具体部署，他说："今天向主席、林总都报告请示了。这次会议，主席说不那么统一，有抵制。后一段已经趋向一致。目前的形势还是在运动的初期阶段。主席说文化大革命运动可能继续 5 年，意思就是到 1970 年。主席提议各省市同志回去要开三级干部会议，大区就不必开了。刘少奇、邓小平同志的检讨发到县、团级。做梦也没有梦到这样一个大局面，……总是难以设想下这样大的决心。"

林彪插话："不敢想。"

周恩来："感到我们跟主席总是跟不上。"

他说："我们在文化大革命中是不是设想一个时间表。这是陶铸同志提议的。可以作一个设想，今天在主席那里谈了，原来常委也谈过，跟中央文革小组也说了。省、市、自治区一级能不能在春节前使机关的运动告一段落。设想中央各部（包括各口子，如农林口、工交口）主要的也在春节以前告一段落。当然这是主观愿望。富春设想部一级还有司局长一级争取 1 月半就结束。"

"主席提倡各省回去召开三级干部会议，赞成公开开会，不开秘密会。你们下车以后，可能被捉去，所以要发一个通知，对红卫兵讲清楚，让你们好好传达，集中力量开好会。"

周恩来又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对运动中若干具体问题作了原则性的答复，概括起来就是：

1、关于大串联影响火车运行计划的问题，提议全部徒步，搞军事化的全程徒步。

2、要求红卫兵组织只限于学校，其他工矿企业、机关团体不搞红卫兵。

3、对于群众中分派问题，周恩来强调在青年中，不能一次、一事就定左、中、右，不要叫"保皇派"，不要过早地给青年盖棺定论。

4、对于红卫兵搞大民主的行为，他要求还要有集中，即不准动解放军，不能代替法院、监狱、公安等专政机关，不能干扰新华社、电台广播、电视台、报社等宣传机关。

5、红卫兵不能对干部搞“罢官”，不能扣人，抄家，不要打人、体罚等等。

周恩来说，根据形势的发展，文化大革命要延长到春节前结束。他最后要求各级干部一定要站稳立场，不要什么都怕，要向群众多宣传这些政策。

中央工作会议结束时，周恩来语重心长地对福建省委第一书记叶飞说：“你还不是朽木不可雕，把朽的挖掉，还可以雕。你回去后要下个死决心，坚决改，这是中央对你的最后的一次批评。”

叶飞也心情沉重地道：“我辜负了党中央和毛主席对我的信任，我感到很痛心，回去后我一定要向群众公开认错，改正错误，搞好平反，引火烧身。”

会议结束，当华东局的专机从北京起飞，依次降落在济南、合肥、南京机场时，叶飞一反往日握手话别的习惯，像一位真正的华侨一样，以紧紧的拥抱为每个人送行，并且在每个人耳边只留下三个字：

“永别了！”

## 第 253 回：劝丕显，各地进京告状多　众领导，见新赣浙闽代表

在中央工作会议期间，陈丕显、曹荻秋的发言稿想叫姚文元帮助改一改，还想让张春桥给提提意见。但是姚文元没有说话。因为中央是要看各地领导自己的意见，他们不好表态。最后曹荻秋找了戚本禹。戚本禹可能超脱一些，或者是性格使然，他帮他们修改了发言稿。

张春桥到陈丕显住处来过一次，他说："上海的群众对魏文伯、曹荻秋意见很大。从这次会议期间看来，魏文伯、曹荻秋又没有做什么像样的检讨。看来他们两人是不能再领导运动了。"张春桥让陈丕显回上海之后，站出来主持工作。陈丕显没有表态。

中央工作会议结束后，江青再一次请陈丕显和谢志成吃饭，是在钓鱼台，饭菜很丰盛，是正儿八经地请客。江青对陈丕显和谢志成嘘寒问暖，夹菜添饭，亲热一番后，马上道出了本意："曹荻秋对文化大革命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看来是搞不下去了。我们希望你站出来。"

陈丕显说："我一直在休息，好久没有工作了。大半年了，身体也不好，许多情况不了解，一下子接不上去，恐怕不能胜任。"

"不了解情况可以调查研究嘛。你应该主动接触少数造反派，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里。我和春桥、文元三个人支持你，给你当顾问。" 江青继续劝道。

“不敢当！不敢当！”陈丕显连忙说，“你们三个都是中央文革的领导，你们当顾问，我可担当不起。我的身体情况不行，还是做做调查研究，给曹荻秋他们当当参谋。”

江青脸上顿时显出不快，气氛显得沉闷起来。

吃完饭，谢志成在洗手间对江青说：“江青同志，丕显确实身体很不好……”

“那是因为他柴米酱醋管得太多了！”江青狠狠地说了这么一句，连声调都变了。

为了再进一步了解情况，陈丕显又去钓鱼台看望陈伯达。因为陈伯达是中央文革小组组长，而且和陈丕显是老乡，彼此比较熟悉。

陈丕显一到陈伯达那里就指着房间里的摆设开玩笑说：

“伯达同志，外面都在破‘四旧’，你这个房子里摆的东西不尽是些‘四旧’吗？”

“我这是借住的地方。这些东西是原来摆着接待客人的。”陈伯达连忙解释说。

陈丕显向陈伯达讲了江青要他到第一线以及她与张春桥、姚文元要给他当顾问的情况，陈伯达急切地问道：“你怎么个态度?”

陈丕显说：“我自生病以后一直在治疗，身体很虚弱，所以我还是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搞搞调查研究，还上不了第一线。”

陈伯达没有再说什么。

在中央工作会议开会期间，各地的造反浪潮在10月5日中央军委《紧急指示》的推动下有增无减。各地在前段时期被打成“右派”、“反革命”、“黑鬼”的师生、群众，要求落实《紧急指示》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进京告状的人数还在不断增加，已不仅是学生、老师，还有很多工人、群众，甚至县城也有人进京告状。10月28日夜至10月29日凌晨，中央工作会议刚结束，周恩来就到政协礼堂接见江西和新疆大学“九三”事件赴京汇报代表团全体代表。他先对新疆的同学说：“等不及了，先解决江西的。”然后对江西的同学说：

“你们的问题，自己回去解决。只要你们做得对，就一定会解决。因为你们的矛头已指向江西省委。江西省委是要很好地进行检查，当面对你们回答。”

他接着说：“你们的事情出在 9 月 3 日，比较迟，南下的同学去了，起了一个推动作用。当然主要靠自己，自己解放自己。江西省、市委确实没有精神准备……”

周恩来提到的9月3日的事情，是那天江西省内最大的军用航空工业企业、原代号为“320”厂的洪都机械厂一个车间的检验工万里浪和张羽、邱成芳、余志园等人带头到江西省委造反的事情。

万里浪“文革 ”前是江西省内颇有名气的工人诗人，曾和郭沫若唱和过诗，《人民文学》上常能见到他的名字。江西人民出版社1960年初出版过万里浪诗集《欢歌集》。

此时的万里浪早已是名人了，也被选为官方文革主任，但还是让一些泥腿子工人推出来带头造反，因为这是毛泽东发出的号召，太崇拜了！

9月7日，串联到南昌的“首都红卫兵12大队”和江西医学院红卫兵首先在南昌贴出“炮打司令部、火烧省市委”的标语，江西省委调动工人保卫省委。一时间，八一大道上人声鼎沸，在“火烧”、“炮轰”、“砸烂” 、“打倒”的震天口号声中，数不清的群众组织应运而生，其中“江医红卫兵”、“江大井冈山”、“五中一小撮”、“南柴铁扫帚”……都在省内影响较大，名噪一时。

接着，社会上又相继成立了许多全市乃至全省性的群众组织，其中举足轻重的有设在人民广场旁的“江西省大中学校红卫兵司令部”，简称“大中红司”；设在青少年宫的“南昌市中等学校红卫兵司令部”，简称“南红司”。

而江西拖拉机制造厂的全国劳动模范赵志坚和江西纺织厂的江西省妇联执行委员经自麟(女)出头组织“工人赤卫队”，退伍转业军人组织“八一战斗兵团”，是保卫省、市委。

周恩来继续对江西代表说："炮打是正确的，而扣帽子是错误的，但是要辩论。放两门空炮也不要紧，老革命可以冲冲他们的暮气，但一冲他们就怕，就乱了阵脚。有些南下归来的红卫兵说：以前那些老革命，不怕枪林弹雨，却怕学生，真是不可理解。因此你们江西同学回去，第一建议你们要调查研究，可以进行调查，如果错了就承认。老革命、共产党员要忠诚老实，实事求是。青年人可以加点语言上的夸张是允许的。但你们要好好进行调查研究，核实材料。"

提到正在进行的大串联，周恩来说："串联会不会妨碍两条路线的斗争？不会。但如果还坐火车，这样会停止生产。比如，你们江西出粮食，也要车运。"

说到每天到达北京的外地学生，他感慨地说："一天要来 18 万，10 天一个国家就搬到北京来了。中央美术学院，长征式出去串联很好，火车到一定的时候要停止。"

他又说到江西发生的群众与省委的大辩论一事："他们错了就要作检查。如果你们是真正革命，那么还要到社会上去，如到上饶。景德镇市委压制、打击学生，你们就去帮助，推动一下，就好像北京南下串联同学一样。你们会碰到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军队。性质不同，你们要参加他们的斗争，要和他们联系。你们都是放假革命。至于工厂、城镇居民各种企业单位，他们要抓革命、促生产，我们闹

革命不能不搞科学试验。核试验，现在是导弹加弹头，两弹结合，有火箭。抓革命，促生产。因此他们不能停止生产，要一边革命，一边生产。他们串联的性质、范围、内容和学生不同，与学校不一样，我们还要研究一套办法，以后去搞。当然有的同学已去搞了，我们不去干涉，有分工，不可能全国都去搞串联。我们设想，放假至少放到明年暑假，把全国办成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你们要宣传毛泽东思想，宣传得还不够，还要宣传，把毛泽东思想扎下根子。‘老三篇’、毛主席的哲学思想、两论、《十六条》都要学习。解放军又在选编主席著作，打基本功。所以理论要和实践结合，徒步串联，能接触社会，主席的基本功就是社会调查研究、阶级分析。所以搞大串联不会妨碍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你们是革命左派，不受压制怎么能成为革命左派呢？不然就是中间派或保守派了。你们要经得住锻炼，革命要千锤百炼，你们才锤了几下子。当然要允许老革命犯错误，就向你们学习，在这一点上，你们眼界要放宽些，要继续闹革命，不断前进。”

“青年人的思想经常不定，有时与行动不一致，思想起伏变化很大。比如红卫兵，北航要求工作组回来批判的是坚定的左派，支持工作组的是保守派，还不能说是右派，否则，必然又是学生斗学生，‘保’字号应不说，说保皇派就闹得更凶。哈尔滨的‘八八团’犯了保守思

想，保工作组和省委，保错了。现在闹得更凶，搞国防科委，这就是过‘左’，再过‘左’，就是形‘左’实右。现在不能把同学们的思想统得过死。所以说保守派更容易接受些。多数派同意我的意见，他们开门整风，北医有的红卫兵原来不承认错误，现在承认了，开门整风主动了，红卫兵开始是少数派，变成多数派，在同学中是个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的大好形势。”

周恩来继续说：“你们实行大民主是对的，是主席提倡的。但要有集中，专政的一面。”“你们所得到的民主是世界上空前未有的，做梦都没想到过，只有毛主席做到。也许你们青年人敏感，想到了。做梦想到了，但是这是现实，幻想变成现实。你们有四大自由，你们贴大字报的范围，连我也贴了几张，有错误就可以贴。‘炮打司令部’不是大鸣吗？不管是不是修正主义，先打几炮，‘飞鸣镝’。大放，放手发动群众，六大权利，出版、集会（万人大会）、结社（红卫兵）、游行示威、言论，宪法的六大权利，外加两条吃饭、坐车不要钱。不仅如此，还放假闹革命。我们那时改良主义被关，你们还放假闹革命，坐火车不要钱，吃饭不要钱，这个不是在毛泽东思想、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哪里有如此幸福！”

“在这个最大限度民主的基础上，要有集中和专政。三个界限，专政的工具武装部队要保护，送大字报要贴在里面，不要贴在大街上，

影响不好。专政依靠武装，没有武装就没有一切。总参不革命，不是搞了罗瑞卿？不需要你们搞。解放军要保护你们，女十五中的红卫兵，8 月 25 日被资本家老婆砍了几刀，解放军就赶来保护你们。我们提出解放军不准动气，不吵嘴，被打不还手，打伤不开枪。专政的第二个工具是法院、监狱。送大字报可以，但不能闯。第三、宣传工具应掌握在党的机关里。因为这是党和毛主席的喉舌，你们的意见，可以在你们的广播上搞。这三条是不能侵犯的。”

“要档案材料，可以谈判商量，有个通知嘛，问题有一个界限，超过这个，是形‘左’实右。你们犯了错误，我不责备你们。我告诉你们，景德镇可以串联，而且还可以大串联。”

“工人和学生相结合，本来学生闹革命，不要到工农中去，但是如果是志同道合，也不是绝对的。”

10月29日，张春桥接见“浙江金华北上控告团”。他说：

“全国从那时到8月，几乎所有的省市委都被包围了，这证明群众起来了。结果会遇到阻力很大。你们金华问题，在全国也是很突出的，是一个很严重镇压学生的事件，完全违反《十六条》。我看了李学智的检查，检查太轻了，说什么犯了方向性、路线性的错误，这个‘性’字要去掉，就是路线错误、方向错误，就是完全贯彻资产阶级

反动路线！同学们要我们表示态度，我们认为，同学们的行动是革命的行动，我们中央文革小组完全支持你们！”

会场上长时间地热烈鼓掌。

张春桥继续说：“革命的同学要求见地委书记，一个地委书记，竟然摆那么大的架子！李学智怕的要死，共产党员怕群众的那个样子，那称什么共产党员？共产党员本来应该到群众中去，群众找上门来了，他还不出来，这算什么共产党员？你们在地委门口等了二十几个小时，这完全应该！但是我有一点不大赞成，就是不吃饭。他们吃饱饭、睡好觉，你们也吃好饭、睡好觉再来包围。今天你不来，我们明天再来，再跟你斗！不吃饭，身体要垮的，我们以后不干那傻事！你们出来，就没有道理。你不出来算了，为什么用那么多方法去挑动工人、农民、利用工人、农民对党对毛主席的深厚阶级感情，去包围学生，那还得了！这个不能怪工人、农民，这个责任应该归地委。特别是中央发表了指示，《人民日报》发表了社论，不准挑动群众斗学生，三令五申，他们仍然这样挑动工人、农民和学生的关系，这更加错误了，这是绝对不允许的！这是完全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相反的。”

他的话激起在场人员的热烈掌声。张春桥继续说：“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就是信任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相信群众能自己解放自己，依靠广大群众的力量来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

派，打倒一切牛鬼蛇神。他们是反革命的路线，是压制群众的路线，是反对群众的路线，所以就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对这条路线，你们要炮轰，要批判，我们完全支持！这一条路线不彻底肃清，不彻底批判，那革命就要受挫折。你们同学要坚决执照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办事，坚决反对资产阶级路线，才能取得胜利！”

接见在热烈地掌声中结束。

这天，陈伯达、王力同福建惠安一中25名学生座谈，对他们的造反行动表示坚决的支持。

有同学们问：“许多传说县以下中学文化大革命不搞了，要复课，我们正搞得轰轰烈烈，不搞了，那……”

王力：“已经轰轰烈烈就搞嘛，怎么不搞？”

同学：“9月14日中央规定，不是说县以下机关不搞串联吗？”

王力：“那是指农忙会影响生产，你们不影响生产，怎么不搞？”

学生们热烈鼓掌。

同学们接着反映说：“我县各中学都不让互相串联，校门关的很紧。”

王力：“不串联就不对，为什么县里不能互相串联？你们各中学相离多远？”

同学：“不远，走一上午就可以走到。”

王力：“这样不影响生产，也不影响交通，为什么不能呢？”

同学：“中央有没有复课的规定？”

王力：“没有嘛！”他回头问同来的人员，都说没有听说。

王力：“中央没有这个指示，复课也不能像过去那样。”

同学：“谭力夫讲话省委大力支持，还有新华书店翻印。”

王力拍着陈伯达的背说：“你们的贵福建。”

陈伯达笑了。

同学问：“同学能否串联？”

王力与陈伯达商量说：“这个问题要给他们答复，这是全国性的问题。”

陈伯达提笔写道：“各学校可以互相串联”，送给学生说：“我写的字不好。”

第254回：批社论，《人民日报》遭质疑　揭问题，群起炮轰陶鲁笳

10月29日，关锋在《人民日报》编辑部接见学生代表，听取又一批学生们对《人民日报》10月22日社论的批判。他说：

“现在宣传工具，例如《红旗》、《人民日报》都掌握在我们手中。”

“5月31日进来以后，从社论看，大方向是正确的。我举一个例子，清华的工作队，公然把《革命的大字报是暴露一切牛鬼蛇神的照妖镜》当作毒草来批判。”

唐平铸：“还有几篇。”

关锋：“同志们！那时你们受压制呀！我们呢？”

一同学说：“那时你们不是进了中央文革了？”

关锋：“进中央文革又怎么样？比如师大，林杰是师大的毕业生，师大少数派去找林杰支持他们，工作组孙友渔就说林杰是北京市右派学生的牵线人，林杰的背后是关锋，关锋的背后是陈伯达、康生。”

他又问：“你们北京师范学校形势怎么样？”

同学回答：“再过三天就剩下传达室的人了，火车票放在传达室，谁爱走就走。中央军委《紧急指示》要不要贯彻？”

关锋：“当然要贯彻！”

同学：“人都没有了。”

关锋：“你们考虑是有道理的，我看不要紧，谭力夫带着一批人走了，他想，你们批判你的，我带一部分人走，将来好卷土重来。可是现在一分为二了，众叛亲离了，回来了一部分人揭他。他们出去把

眼界开阔一下有好处，在家里怄气，不认这个账，出去看一看，叫人围攻，听人诉说，那里没他的账，就容易接受，出去是有好处的，有时不要光从一个学院来看，要从全国来看。全国每个地方都有每个地方的特点，有些地方斗争很艰苦，”

唐平铸：“有的地方还得去冲一冲才行。”

同学问：“就全国来讲，当前文化革命的中心工作是什么？”

关锋：“是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进行斗批改。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广泛的斗批改不能对立起来。欢迎犯错误同志改正错误。”

有同学讲了到工厂调查，和工人开座谈会的情况。

关锋：“那很好啊！”

北航同学讲了他们到工厂被扣的事，关锋：“那是好事嘛！叫他们扣起来是好事嘛！”他接着说：“所以工厂到底怎么搞法，这个问题可以研究，山西有个解悦，我鼓吹过她那篇文章，听了她的意见。她厂的红卫兵分两派，以党委书记为首的4000多人，她那一派1000多人，对立得很厉害，这个问题可以研究，不要进车间，不要妨碍生产。”

有同学批判《人民日报》9月7日社论《抓革命，促生产》中一段不让串联的话。

关锋：“当时连续发表了几篇社论，据我了解，当时是那样考虑的，不少地方挑动工农斗学生，鉴于目前形势，写了这个社论。现在考虑和工农结合的问题，采用什么形式，你们也想想，我们也想想。”

唐平铸："文章发表是以社论形式，但实际上是中央政策规定，一个问题是生产，是很重要的问题，工厂的工人也是要起来革命的，许多地方内部搞得很复杂，生产幅度下降很大，最重要的是稳住，当时不光是学生不去，工人也不要到学生中去。一些省、市委煽动的口号就是'保卫省委就是保卫党中央'来挑动工农斗争学生，发表社论要制止这种现象。"

关锋说："《十六条》里还有抓革命、促生产，贯彻这一条，贯彻主席的路线，还要积累实践经验，大家可以考虑。"

同学们说，现在实际上是只生产不革命。

关锋："是啊！要他抓革命，他不抓，可以找工人开座谈会，抓革命，促生产是中央的精神。

工厂有个问题，现在开始搞的有多少，没有搞的有多少，分期分批怎样掌握，是要调查研究。一下铺开到全国，也是有问题的，问题是搞过的暂时停了，被戴上'反革命'帽子怎么办？你们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反映，作个调查研究。"

同学们对《人民日报》社论又提了很多意见，还提了很多问题，关锋说："改标语口号与总理无关，有些问题我可以讲，有些问题我不能讲，我和戚本禹是普通工作人员，有些不是我们能解答的。大家关心国家大事的精神很好。很愿意听你们的意见，是否每个意见都同意，互相可以保留意见，我们就是要创造这种社会风气，我正在考虑无产阶级专政和大民主的问题，大民主是很大的好事，想有机会和大家座谈座谈。大民主才能保证无产阶级专政不演变成资产阶级专政，

这是很重要的问题，要考虑斗争是复杂的，如《党的阳光照亮了文化大革命的道路》，这不是出自哪一个人的手的问题，和《北京日报》、《中国青年报》的社论不一样。你们都是二十来岁的，将来会明白这个问题，我只能讲到这里为止。”

关锋最后提到山西说：“有没有到山西的？山西很值得一去。情况知道不太多，我看去一点人好，去太原。当然话说出来会得罪一些人，(太原)来得人也不多，来的信也不多。”

这次接见后，清华大学的任传忠、邢晓光、赵卫东、北京铁道学院的朱永根、北京工业大学的赵景春、北京航空学院的刘福生以及北农机的杨根等人先后来到太原，他们组成“首都赴晋革命造反大队”。

10月21日，北京化工学院、邮电学院、地质学院、林业学院等校造反派300多人，到国家经委造反，并在经委机关内设立“工交系统院校驻经委联络站”。10月29日，国家经委的一些人贴出题为《薄一波究竟是什么人？陶鲁笳为什么要包庇他？》的大字报。当晚20时30分，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戚本禹和石油部部长、国家计委副主任余秋里和陶鲁笳一起，按照陈伯达的指示，在工交政治部大楼会议室接见北京师范大学“毛泽东主义红卫兵井冈山战斗团”部分代表和邮电学院红卫兵，就“井冈山战斗团红工兵”揭露在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展出的大庆展览中他们发现的问题和工交政治部主任陶鲁笳的态度发表了讲话。

余秋里首先说：“我是奉陈伯达同志的指示，陪戚本禹同志来的。”

戚本禹说：“我是陪你来的。”

余秋里接着说："他是文革小组同志，他是在百忙中抽时间来的，首先听听大家的意见，然后请戚本禹同志讲话，我也讲讲话。"

接着，由刘宝华等10余位同学揭发陶鲁笳在大庆展览馆的问题和挑动工人斗学生等问题……

戚本禹说："是否就讲到这里，看来大家几天几夜不睡，很疲劳了，你们给伯达同志的信，中央文革的同志都看了，我们很关心这件事，你们送来的材料，我们也都看过了，记者每天都在报导。我来之前，陈伯达同志作了指示，我先念一下，然后请余秋里同志讲话。"

接着，戚本禹念了陈伯达的信：

同学们:

同学们发现石油展览馆的布置有政治问题是对的，我赞成你们的意见。我本来打算同余秋里同志来会见你们，因为我有事情不能来，特请戚本禹，余秋里两同志来给同学们说明展览馆布置的责任问题。据我了解责任不在石油部，而在工交口陶鲁笳同志，要陶鲁笳检讨。

谨此问好。

陈伯达

二十九日晚"

然后，余秋里发表讲话说："我热烈拥护戚本禹同志代表陈伯达同志给我们的指示，伯达同志这封信，把我们的根本问题解决了。同志们对大庆展览的造反，我完全支持。它有错误就要在群众面前揭发，这对我们是有很大的教育意义的。"

余秋里对大庆展览馆的问题作了检讨，并表示：“同学们到展览馆去闹革命，受了委屈、侮辱、谩骂、摄影，我一定去查，查清后，一定向同学们道歉，赔礼。”

接着，戚本禹说：“同志们做得很对，同学们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很好，坚决反对反毛主席的人，宁可不吃饭、不睡觉、坚持斗争，这一点余秋里讲了，他很佩服，我也很佩服。我们有这样的战士，就会使我们国家不变颜色，就能保证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世世代代传下去。”

群众喊口号并要求：“陶鲁笳要向毛主席请罪！”

戚本禹：“对！就是要向毛主席请罪！”

众人问陶鲁笳：“你向毛主席请罪？”

陶鲁笳连连点头说：“请罪，请罪。”

戚本禹说：“陶鲁笳同志不仅仅是这件事，这是整个执行资产阶级反对路线的一个表现。他的错误远远不只这一点。不仅在大庆展览馆挑动工人斗学生，两面三刀，他是两面派！在邮电学院也是这样，是两面派，挑动学生斗学生。”

群众喊：“要罢陶鲁笳的官！撤陶鲁笳的职！”

戚本禹：“毛主席从来允许犯错误的人改正错误，我们也允许陶鲁笳改正错误，但陶鲁笳完全不是这样，他不是改正错误，是在挑动群众斗群众和毫不对自己错误进行检查。他需要的是权术，所以很多同学受他蒙蔽了。认为他是好人，甚至有人还说他是文革小组的成员，我听了后真可笑。邮电学院是他策划的，但后来又……”

群众说："还带了红袖章呢！"

戚本禹："完全是两面派，两面三刀，邮电学院群众斗群众，责任既不在多数派，也不在少数派，而是在陶鲁笳。邮电学院、地质学院、钢铁学院、北师大同学都应叫陶鲁笳回去好好检查，"

众人鼓掌。

戚本禹："执行伯达同志的指示。"

再次鼓掌。

戚本禹："不好好检查就不让他过关。"

掌声又起。

戚本禹："刚才有一个同学递条子说，11月2日准备开会批判薄一波的错误。"

众说："我们还准备批判陶鲁笳！"

戚本禹："对！我看加上他。以上是我个人的意见，有错误请同志们提出批评，我说得不对的陶鲁笳也可以批评，但请考虑我的意见。……"

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曾说：薄一波、何长工、汪峰、李范五四个人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外，其他人都不要承认是反党反社会主义。林彪在大会上也特别点名批评了何长工，说他是在向党进攻。

会议结束后，李富春在人民大会堂向各部、委传达会议精神时，也说到："毛主席在中央工作会议小组长汇报会上讲：薄一波、何长工、汪峰、李范五在文化大革命中所犯错误的性质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

会后，何长工给毛泽东写了一封170多字的信，请朱德转交给毛泽东。信中写到：

“受到主席的批评，我既惭愧又遗憾。我从一九一九年在北京长辛店留法勤工俭学预备班和你相识，到秋收起义跟随主席同上井冈山，在主席长期教育、培养下成长起来。万万想不到主席培养了我几十年，居然培养出一名反党分子。不仅我个人感到遗憾，我想主席也会深深感到遗憾。请主席不要误听旁人的谗言，将昨日的功臣变成今日的罪魁，将昨日的同志变成今日的敌人……”

大串联给铁路运输带来巨大的压力，已经影响到工农业生产。尤其是冬季将至，生产、生活用煤激增，加上北京外来学生出京的巨大压力，10月2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了《关于北京大中学校革命师生暂缓外出串连的紧急通知》。

10月30日，中共中央在答复安徽省委的请示中做出关于工人不要离厂外出串联的指示：

中发［66］532号

安徽省委并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

十月十六日电悉。

关于工人离厂外出串联的问题，请按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第十四条和中央九月十四日《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通知》的精神，对工人群众进行正面教育，要他们听党中央的话，听毛主席的话，坚守生产岗位，不要到厂外去串联，抓革命、促生产，保证革命、生产双胜利。

中 央

一九六六年十月三十日

（发至县团级）

10 月 31 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又发出《关于维护铁路运输秩序的紧急通知》。

第 255 回：步履艰，叶飞返闽过关难　闹革命，红卫兵抗美援越

中央工作会议一开完，福建省的马为、方俞平一行人即飞回福州市，准备召开三级干部会议。这时候，福州市又发生了一起封闭省委大楼的事件：

10 月 31 日晚，厦八中、省航校等少数派学生在市一中新四楼前集会，要求市一中“八一八战斗团”的“前线兵”立即交出他们抢走的有关王于畊的材料，以及被他们绑架走的原厦八中工作队队长，否则，就采取革命行动，冲击大楼。当时，在现场的“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总部负责人反对这种做法，他主张通过谈判来解决问题。可是，在场的多是些中学生，他们纷纷表示反对。而且，他们也不隶属于“思想兵”总部。于是，在“革命是暴动”、“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呼啸声中，这些中学生冲进了新四楼，抄了“八一八战斗团”的队部。

这时，许多少数派学生也闻讯陆续赶来声援，有人提议趁热打铁，索性再去抄“前线兵”的总部，大家当即集合就要出发。“思想兵”总部负责人认为抄“前线兵”总部是不妥的，决定先把队伍拉到省委去示威再说。大家表示同意，他们就这样去了省委。

谁料，到了省委，厦大“红卫兵独立师”、侨大“革命造反兵团”、厦八中、省航校“红卫兵独立团”的一些人突然心血来潮，竟然宣布要暂时封闭省委大楼，而“思想兵”总部的人坚决不同意这种做法，他们的头头站在大楼前的石阶上公开宣布“思想兵”总部退出会场。这是少数派组织之间的一次重大分歧。

当晚 20 时多，厦门大学、华侨大学、福建林学院、厦门八中及

南下学生约 200 人冲进叶飞住地，要揪王于畊回厦门。

第二天，11 月 1 日，省委办公楼被占领了，学生们发表了封闭公告，福建省委领导已无法正常办公。

这天凌晨，大批的“前线兵”和“工人赤卫队”如开了闸门的蓄水一般涌进了省委，把里面的少数派学生团团围住，两派群众又发生了严重的冲突。

恰巧 11 月 1 日这天，叶飞等人坐火车返回到福建，得知福州市区如此紧张的形势，他们被通知先在福州郊县闽侯白沙下车。

火车临时停车后，叶飞等人被接上了五凤山，那里有几座房子，原来是作为省委备战时的指挥所，现在正好派上了用场。

11 月 4 日上午，叶飞、许亚、王禹等人到福建省人委办公楼继续和福州大学、福建师范学院、华侨大学、福建林学院及一些南下师生座谈。叶飞等人刚进入会场，学生们便大声念《毛主席语录》，唱《造反歌》，读《红旗》杂志社论。接着，宣读了五项“严正要求”和三项“严正声明”，要叶飞表态。主持人带头高呼“打倒叶飞”，并要求叶飞晚上作初步检讨，对一些学生进行当众平反。

叶飞说公开检查要有准备的时间，学生们便拍起桌子，要求叶飞跟他们一起去省委。

叶飞只好和这些学生一起来到省委办公大楼。经过谈判，叶飞被迫同意下午召开省委常委会，晚上到体育场作初步检讨，这才被准许离开。这时，已是下午 13 时多了。

当晚，在福建省体育场召开的万人大会上，叶飞作检讨，但没有

被接受。造反学生说叶飞的检讨是个“不像样的检讨”，很不深刻，内容空洞，没接触实际。他们说：“像这样的检讨，再作几十次，也过不了关！”“还要检讨，要随叫随到！”

11月19日，叶飞代表福建省委在全省三级干部会上发书面检讨。

此后，叶飞在省委三级干部会议上以及其他场合代表省委多次作检讨，但都没有过关。

1966 年 10 月底，北京已是秋末冬初，普通百姓家开始安装煤炉，储备冬煤，准备过冬了。

可北京玉渊潭国宾馆西侧的八一湖里，却有十来个与众不同的游泳者。他们不像其他人那样，只穿游泳裤下水，而是穿着衣服。背着重物游泳，像是解放军战士的军事训练。

他们是北京市第一〇〇中学高中学生赵建军、武热河，北京市第五十六中学高二学生孙智忠，北京航空学院附中瞿绍东和王莒生、李小倩等人。这几个人是9月份在北京全国政协礼堂召开的一次全市红卫兵大会上，刚刚相识的志同道合者。

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年轻人相处的方式、热门的话题。60年代中期的他们，聚在一起交谈的话题都是革命、造反、串联、红色司令部的新精神以及在何地发生了重大事件等等。

在那次红卫兵大会上，他们听到一位老将军气宇轩昂地说：“红卫兵小将们，我以一个老战士的资格向你们保证，老一代用28年的时间打出了一个红彤彤的新中国，今后在伟大领袖毛主席领导下，我们还要用一个28年解放全人类！打出一个红彤彤的新世界！”

这话猛然撞击着这几个人的心。散会了，赵建军、武热河、孙智忠、王莒生、李小倩结伴而归。一个共同的理想把他们系在了一起：光用笔墨批不倒旧世界，应该拿起真枪真炮，进行武器的批判——“埋葬帝修反”。红卫兵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先锋，短短五个多月的时间，“文化大革命”的烈火已成燎原之势。工农群众已经起来了，充当革命先锋的红卫兵应当开辟新战场。心中装着全世界的红卫兵小将把目光投向国门之外，几个人不约而同想到越南——越南南方的抗美斗争。

当时，占世界五分之一的中国人民是越南人民的坚强后盾。越南共产党主席胡志明称越中友谊是“同志加兄弟”。中国人民无私的援助源源不断地通过火车送往越南。越南人民抗美斗争的事迹也不断传到中国来。中国人从越南出版的《南方来信》中知道：美帝国主义残酷而又虚弱，被越南人民打得焦头烂额，溃不成军。这一切令红卫兵小将跃跃欲试：“到越南去，到南方去，到热带丛林中去打游击、埋竹签，亲手消灭几个美国鬼子。”

赵建军等人敢想敢做，立即着手准备。他们根据自己设想的需要，购置了指南针、地图、匕首和必要的食物。他们听说，美国少爷兵人人怀揣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散发的传单，一见到越共就投降，便学了几句：“放下武器，缴枪不杀”，“同志，你好”等简单的越南话。他们在空旷的麦田、河边，高声用越语喊着：“举起手来，缴枪不杀！”

听着自己威严的语气，他们仿佛看到，高鼻梁、蓝眼睛、黄头发的美国大兵瑟瑟发抖，跪在面前。就像地富反坏、揪出来的走资派那

样，在红卫兵面前没有半点反抗能力。

10月30日，赵建军、武热河、孙智忠、瞿少东、王莒生、李小倩及赵建军的亲弟弟赵奠军、李南下、赵和平、杨锐等10名红卫兵瞒着父母，登上了北京至南宁的5次特快列车。

赵建军是北京装甲兵司令赵杰的儿子，他在日记中写道："再见了，年迈的父母，等到越南统一之日，再回来见你们。"

车身摇晃、车厢板咯吱作响，车厢里充满汗臭脚臭、几个月不洗一回的黄军装上的汗渍味。谁都无心去欣赏窗外的风景，因为这10个人正要去完成一件"伟大的壮举"。

经过30多个小时的颠簸，火车吐着白烟在广西自治区首府南宁停下来。11月3日，10个人匆匆转乘去凭祥的普通快车。当天下午14时，他们在离终点站还有3里地的车站下了车。

这里可能是天高路远，还没有红色革命带来的痕迹，没有《语录》牌，没有高音喇叭，没有戴着高帽的游街。头顶斗笠、穿着黑短衫的农妇在地摊上叫卖着咸肉、蔬菜，壮实的坦胸裸背庄稼人守着一捆捆等候买主的竹竿，像松树皮那么又干又皱的老爹们在灼热的秋阳下晒着烟叶。鸡鹅鸭鱼，瓜果椰子，真叫人目不暇接。

通过一条又窄又长、两旁长满低矮树林的小道，一行人陆续来到了一小山丘上。武热河不等人们坐定，忙催赵建军："你快点把咱俩商量的方案说说吧。"

"战友们，再前面就是边境线。"赵建军打开一张军用地图指点着，"我们要分成三个小组，从几处过境。也许几天之后，我们就能

在越南见面，也许……”

接着，10人分成了3个小组：

第一组：武热河、瞿绍东、王莒生；

第二组：赵建军、孙智忠、李小倩；

第三组：杨湘燕、李南下、赵和平、赵奠军。

10个人分手了，带着北京的风尘、南疆的雾气，带着父母的照片和对家人的思念，带着未褪尽的少年的稚嫩和不成熟的热情，也带着对领袖的狂热信仰和对革命路线的忠诚，分手了、离别了。

当赵建军、孙智忠等人的脚步声刚在国境线上响起，一棵巨大的法国梧桐后面就闪出了乌黑的枪筒。“站住！干什么的？”两名巡逻兵把他们拦住。

“我们，我们是北京来的红卫兵。”赵建军急中生智，连忙亮出了红袖章。

“我们是到边境来慰问解放军的。”孙智忠的谎话也是说来就来。

两名战士笑了。孙智忠把几枚精致的毛主席像章递过去。

“我们不晓得是红卫兵，闹误会罗。”一个战士操着四川口音说：“北京来的客人，当然不敢怠慢哟。”言毕，就把他们让进了哨卡小棚子。

几乎就在同时，武热河、瞿绍东、王莒生也被截留在友谊关。

杨湘燕、李南下一行4人组成的第三支小分队运气最好。他们步行数公里，不想竟让越南人民军抓了“俘虏”。看着这一个个全身军人装扮却又没有帽徽领章的越境者，他们判定是一群解放军的逃兵跑

错了方向。于是，二话没说就把他们押到了同登公安局。然后又与中国方面联系，送到中国边防站，打了防疫针，最后发了回国签证。这一路人马虽然初战告捷，但也是“全军覆没”了。

当晚，凭祥市委的紧急会议一直开到深夜。议题是怎么处置这些“毛主席的小客人”。

第二天，凭祥市委按上级决定，把赵建军、武热河、孙智忠、瞿绍东、李小倩、王莒生6人“解往”南宁。准备从那儿直接送回北京。

可以想象这几个人在去火车站的路上，心里那股窝囊劲儿了。不行，得跑，他们故意放慢了速度，他们在寻机发起第二次行动。

机会来了：街角拐弯是一处厕所。阳光烘烤下，臭气熏天，隔着多远就听见绿盈盈的苍蝇在四周飞鸣。走在前面的两个姑娘像躲避瘟疫似的绕开了，押送人员也跟着走到街的对面。当时正值中午，土路上人来人往，尘土飞扬，汽车一过，一片灰尘。赵建军连忙向武热河、孙智忠、霍绍东3人一使眼色，立即消失在人群、尘土里。为了造成假象，还把军用挎包放在厕所外，示意他们只是小小“方便一下”。

赵建军等人凭着一股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的倔强，返回边境，越过国界，进入异国他乡。他们以为，在越南，可以凭一句“胡志明主席万岁”，找到同志、朋友，像在中国似的“毛主席万岁”，就是全国人民的共同语言。

他们在越南的山林里，偶尔碰到人，他们喊“胡志明万岁”，对方只表现出惊恐、迷茫，似乎不知所云。倒是中国的人民币他们还认识，换了些吃的东西。

后来他们才了解到，胡志明在越南更广为人知的名字是“阮爱国”，而且越南没经过中国的土改运动、“文化大革命”运动，山里人的阶级觉悟有限，对国家大事也不怎么关心，甚至有的人还以为南方人民正在与之浴血奋战的仍然是骑在他们脖子上多年的法国殖民主义者。

赵建军等人感慨之余，更急于找到自己人。他们日夜兼程，终于找到公路，拦住一辆卡车，高喊：“巴亭，巴亭。”

巴亭是河内的一个大广场。越南人熟悉巴亭广场，就像中国人熟悉天安门广场一样。卡车司机示意让4人上车。在车厢里颠簸了一天一夜后，4个人终于到达越南的首都河内。

这里的山形地貌、房屋样式，除了留下不多的法国洋楼和日本的小窗户厚墙壁的建筑外，与我国的广西边区并无二致。梧桐树叶和别致的椰林装扮起来的大街小巷，看上去真有点像南宁。只是灯火管制，夜的沉寂和隐隐嗅到的硝烟味，给人一种陌生的战争感觉。他们还看到了灯光下的巴亭广场和路旁树下的高射炮。他们感受到了战争的气氛，精神为之一振。

在北京时，他们瞒着亲人离家出走，到了河内，他们又自然而然地去寻找亲人——中国驻越南大使馆。

可河内街上行人稀少，4个人用学过的几句话四处问路，大多是面有难色、摆摆手。武热河又急了：“建军，别他妈瞎打听了，就凭咱这几句话，恐怕连个厕所都找不到。”这句气话倒真提醒赵建军，他连忙掏出个本，撕下张纸，按照不准确的印象画了面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的旗帜。

恰在这时，一个戴太阳帽的公务员走过来，建军连忙把纸片递过去，那人胸有成竹地点点头，示意他们跟他走。谁想到，稍稍放宽的心，几分钟后又收紧了。当赵建军他们按照向导的指引，来到一幢米黄色的两层楼前时，立刻愣住了。楼上飘的竟是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国旗。

“错啦错啦！我们是中国人，中国……”

“中国，同志中国？”

“没错儿，是中国。”四个小伙子的声音一下提高了八度。

公务员歉意地笑了，又带着他们向远处一座高大的建筑物走去。那里，飘扬着五星红旗。

赵建军、武热河4人见到了中国驻越南大使馆的朱奇文大使，讲述了几天的经历，坚定地表示：“我们一定要去南越，不管路多远，困难多大，我们都能坚持下去。”

外交无小事，何况是未经许可，偷越国境。大使无权自作主张，即刻向北京汇报，并于第二天向越南方面表示歉意，几位中学生这才感到，事情不像他们设想的那么简单，有麻烦了。

11 月 4 日，大使馆很快就接到了周恩来亲笔签署的电文：

朱大使并告四位革命小将:

他们未经中越双方批准，私自越境，使我们感到为难。但他们在援越部队锻炼一个时期，在部队轮换时回国。如胡主席接见革命小将，应由大使陪同。请将 4 人姓名、年龄、出身、家庭及住址等情况一并报来。此事下不为例。

这种事，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了外交上的被动。但由于当时的政治环境和气候，这 4 名红卫兵的行动也被视作“革命”。此后，周恩来曾与陶铸等人谈过这方面的问题。

陶铸找到周恩来那儿，皱着眉说：“听说文化大革命已经开始涉及国外，特别是东南亚。”

周恩来意味深长地说：“宣传毛泽东思想，不能强加于人。所以我们做什么事情，一定要有全局观念。事情复杂，我们的头脑就不能简单。”

11月9日，赵建军、孙智忠被分到中国援越部队31支队316大队2分队，武热河、瞿少东被分到302大队2分队。

在1967年1月19日的战斗中，赵建军所在的一班击落一架F—105后，被敌子母弹命中，赵建军壮烈牺牲……他是越南战争中牺牲的唯一一名红卫兵。赵建军所在的支队给他追记二等功一次，并按他的愿追认其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不久国内报纸登出了“向毛主席的好红卫兵——赵建军学习”的报道，报道只字未提援越抗美一事。但很快被消息灵通人士知道，在红卫兵中传扬，于是大批各地的红卫兵都想到越南战场去……遵照“下不为例”的意见，边关已经严查阻止，侥幸越境找到援越部队的，部队也不敢收留了。

## 第256回：为材料，带旅大领导进京
## 回长沙，张平化再次被斗

10月30日，哈尔滨市大专院校造反派在八区体育广场搞了一场联合批斗大专院校走资派的大会，哈尔滨师范学院院长兼党委书记杜若牧参加了这次大会。他停职反省之后，就感到威信扫地，抬不起头来。从八区挨了批斗回到学院后，又被学院“八八团”批判了一通。回到家，他洗了脸上、身上的墨水之后，对妻子说：“看来毛主席对我们这些老同志不信任了，要换年轻人了。”说完便走进卧室躺了下来。第二天一早，杜若牧妻子发现他吊在厕所的水箱下，抬下来时，已经气绝身亡。

再说东北辽宁旅大市委书记崔荣汉、旅大市市长许西二人，为了“黑材料”的事，被大连的学生带到北京告状。在等了近20天后，10月30日上午10时30分左右，陶铸接见了21名大连工学院红卫兵代表。

同学说：“我们认为和胡明是敌我矛盾。崔荣汉愿意和我们一块来，许西是揪来的，胡明没抓着。”

胡明为什么没有抓到？因为他是旅大市代理第一书记、旅大市政协主席，当时正在北京参加中共中央工作会议。

陶铸问：“你们把许西和崔荣汉都带来了？”

同学：“崔荣汉是我们带来的，许西是‘海运’带来的。”

学生说的“海运”是大连海运学院。这时，旅大市委书记崔荣汉进来了。陶铸问：

“你是崔荣汉同志吧，来过北京吧。你们现在住在一块吗？”

崔荣汉答：“住在旅馆。”

陶铸：“同学照顾你了。”

同学：“让他住医院他不去。”

陶铸：“住旅馆，同学是优待你了。”

同学读市委整学生的材料。

陶铸问：“你们都要些什么材料？”

同学：“胡明的报告、简报、通报，文化大革命的布置，整理学生、群众的材料。”

陶铸问崔荣汉：“同学讲的是不是都有根据？”

崔荣汉回答说：“我们没有抓右派。”

学生们反驳崔荣汉的说法。陶铸又问崔荣汉：“关于工学院的材料你们是否都交了？”

崔荣汉：“差不多了，按中央指示精神，就是整同学的材料。”

同学们不同意，说：“不对，没交，简报就没交。”

崔荣汉解释说：“他们说的简报还没来，就来北京了。”

陶铸批评说：“中央指示早就发下去了，为什么不早点主动交，你们市委思想解决问题没有？”

崔荣汉回答：“我们答应全部交出来。”

同学把简报交给陶铸看。

陶铸对崔荣汉说：“你们要负责！”

崔荣汉答：“我们要负责。”

陶铸对学生们说：“好，我们研究一下，12点我还有会，两点我还要接见湖南的，已经排好队了。”

“下面定个原则，两个问题嘛！一个材料问题，一个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问题，还有罢胡明的官……把崔荣汉拉到这来，就说明市委已经解决不了啦。现在你们两方面口径还不一样，所以解决还不是那么容易的。崔荣汉同志，现在你还不敢斩钉截铁地说。刚才崔荣汉说差不多了，差不多？我看就差很多，你不敢斩钉截铁地说没有了，或者全部交出来了，差不多就是差很多，也许我的话是武断的。……我看材料只能按中央指示办事。这个指示不仅适用于军事院校，也适用于全部大专院校，市委应当坚决执行。崔荣汉同志没有保存的必要了！错了就改嘛！把材料坚决清理，坚决交出，把这些材料全部交出来吧！留着也没什么价值了！提几个意见，你们考虑考虑：

1、检讨的交给本人，由本人来处理，可以留作纪念。因为检讨都是逼着写的，都是逼、供、信嘛！可以烧毁，可以留作纪念。

2、大会上的报告，开会的记录，大会小会，报告的纪录都应交给你们，你们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要抛出来，这样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才有根据。工作队员讲话，大会发言，应交给同学。有根据不是放空炮，你们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要有炮弹，要材料是小事，重要的是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不是个人问题，大家共同研究，奇文共欣赏嘛！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大家：“懂了。”

陶铸表扬学生说：“你们理解得快，你们都是大学生，我是小学生，”

学生们哄堂大笑，说：“陶铸同志太谦虚了……”

陶铸继续说：“关于大连工学院的报告要分析批判。其它材料特别是排队名单、小报告、工作队让同学打的小报告，要交给同学当众销毁。最近中央发个通知，这样双方都可解除负担。我们就怕学生斗学生，不留下。……你们大连有两派，工作组整理材料那儿来？还不是这听一点那听一点，依靠一部分人，你一句我一句的检查，还能没有一句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话？青年人讲话还有不犯错误的？哪有百分之百都是马列主义的？所以我今天讲话也不见得都对。”

这时旅大市市长许西进来了。陶铸问他：“你是哪的人？”

许西答：“江苏的。”

崔荣汉问："现在红卫兵组织是两派，在烧材料时怎么处理？ "

陶铸说："两个红卫兵组织都派人参加，上级党委也可派人参加，市委不行省委派，省委不行局里派，但中央不能派。我们要负责到底。整你们的交给你们，报告、排队的黑名单都交给你们，清一下子就销毁。……但是我要提一句：关于党的机密，干部问题，档案不能交。除此要搞彻底，毫不保留，向省委的报告可以先不交，因为市委开会，还有其它单位的问题。向省委的报告不要交，因为最反映整个旅大市问题。"

有人问："工厂的干部、教职员被打错了，怎么办？"
"教职员一样参加学生运动怎么办？"

陶铸："参加学生运动的教职员也一样嘛！为什么参加学生运动的教职员不给呢？要一视同仁嘛！你们解放了，他们不解放就没有理啦！"

他对崔荣汉和许西说："你们很不觉悟，很不得力，很不理解这次运动的伟大意义，阻止运动是要倒霉的。……十一中全会后全国改的都不好，你们是很差中的一个。所以，说你们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是一点也不冤枉的。群众要革命，你们不让革命，压制他们还包庇黑帮，这不是方向、路线的错误？性质是执行的性质，否则就更严重了。和宋任穷讲好了，叫胡明回去检查。"

同学问："文化大革命大致要搞多长时间？"

陶铸答："时间很难说，革命第一，反正明年春节以前你们不能念书，总的原则是搞彻底，革命第一，是最好的读书。你们是搞工的，自然科学，脑子红了，专才容易。导弹在世界第三。把法国、英国甩在后边了。觉悟高的人是最敢想、敢干的，什么都可以搞出来。必须把运动搞彻底，不然很快会变颜色的。"

学生问："什么样的干部算当权派？"

陶铸答："大学系以上的，系主任。我要求一条，我的讲话以后不要印成传单。"

此时，湖南长沙最早起来造反的谢若冰，因父母问题已退出长沙中学生"造反有理军"，黯然回到了长沙河东。但是，她没有消沉，在来长沙串联的北京三中"刺刀见红战斗队"朱大年、印东兵的协助下，于10月28日，又和黄杏英等一批不怕戴为"黑帮"翻案帽子的志同道合者，成立了"湖南井冈山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井冈山红卫兵"，主要成员都是中学生。中共湖南省委红卫兵接待站批给他们600元经费。他们买了印传单用的纸，蜡纸，钢板，铁笔，油印机后，还买了一架德国造的折叠式旧照相机和几辆旧自行车。由于来不及印制袖标,他们开始只是在红布袖标上盖个章,就上街散发《成立宣言》了，因而也被人说是"假红卫兵，连个袖标都没有!"

张平化在北京被揪斗的消息传到长沙，造反派士气大振。10月30日，长沙的“东方红总部”在东风广场召开大会批判控诉张平化的罪行。

当天下午 14 时至 15 时 20 分，陶铸在人民大会堂小会议室与湖南赴京工人师生干部代表座谈，“湘江风雷”选出的代表：叶卫东、张家政、李铁凡、赵南西、郑开成、蒋学流、赵连城、彭少云、张智忠、李福钧、刘荣华与北京“三司”代表周冬生共 18 人参加了这次座谈。

陶铸一进会议室，就满面笑容地和大家一一握手，快人快语的他还未坐下就和大家交谈起来：“你们为什么找宣传部？张平化当过宣传部副部长，现在不是了，以后不要再找宣传部了。你们的问题在湖南，我也是湖南的，我们是老乡嘛，说话好懂。当然不讲乡土观念罗！张平化不是做了检查了吗？”

代表说：“不深刻。”

陶铸：“一次当然不会深刻？今后还要做检查嘛！你们是几个单位的？”

他一个个问，当问到一个郴州同学时说：“郴州的问题与张平化有什么关系？”

那个同学答道：“张平化9月24日报告影响很广。”

陶铸又问其他代表的情况，问完后说：“你们代表的单位还不少呀！湖南的同学都回去了吗？”

代表们答："没有。"

陶铸又问："见到毛主席了吗？"

大家答："见到了，还离得很近。"

陶铸说："都可以回去了嘛。见到了毛主席，这是最大幸福，一切问题都解决了嘛！

按规定张平化同志在北京是不能与你们见面的。因为他是在中央开工作会议，他不是宣传部部长了，但是我请示了中央，还是让他去作检讨了。王延春以前搞得很坏，是毛主席让张平化回去的。他回去也搞得不好。我请示了中央，建议他回去，他今天回去了。湖南的问题应回湖南去解决，湖南有3800万人民，问题要回湖南解决，湖南的革命回湖南去革。你们在北京基本要求已经达到了，张平化那天作了检查，当然不深刻，态度是好的，犯了错误还给他一个机会改正，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要'团结——批评——团结'。这都是毛主席说的嘛，对不对？"

陶铸对两个湘潭代表志说："你们是湘潭的更应听毛主席话，到现在为止，他还不属敌我矛盾，还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是不是？"

答："暂时这样看。"

陶铸："当然嘛，要观察他，他继续坚持，就是敌我矛盾。他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原先湖南省委就犯了错误，他回去之后，开始做了点好事，但后来受不好的干部包围影

响。当然这些不好，有的是思想保守。作了9月24日的报告，起了很坏的影响。当时我就打电话批评了他。后来他写了大字报作了检查，但不深刻。他是犯了方向性、路线性的错误，以后还要检查。”

有人说：“他对群众运动就是恼火。”

陶铸：“以前上井冈山不恼火，在社会主义这一关，他没有过好。我们大家都要过这一关，因为要触及灵魂，只要有私心杂念搞社会主义就会垮台，什么天王老爷都要垮台，不管老干部，每一个人都是这样。我们要听毛主席的话，不怕苦、不怕死，不图名、不图利，一心为革命，一切为人民，就能过好社会主义这一关。”

“革自己的命张平化就怕了，领导干部就是要过这一关。主席现在就号召大家把自己的灵魂搞干净，特别是老干部。张平化过去搞别人还可以，这次不行了。你怕，不行，你越怕越革你的命，怕，就要把你打倒。我找张平化谈了话，态度还好，但要看行动。”

“彻底帮助他革命，实在不行，用湖南话说：‘稀牛屎糊不上壁’就打倒。”

有人说：“我们已经喊了打倒。”

陶铸：“喊‘打倒’行，但不马上打倒。”

北京“三司”一名湖南籍同学说：“湖南的情况是严重的。”

陶铸说："湖南的情况在中南来说是严重的，在全国来说不算最严重，你们要帮助湖南的同志，老乡嘛。"

代表向陶铸汇报湖南传达"中央八条"的问题，陶铸说："中央文件未形成，你们说的'中央八条'的问题，就是现在的农村'五条'，工厂'六条'的前身，在这两个文件发出前王任重同志通了个电话，告诉他通通气，他迫不及待地散发，全省往下讲，想要解决县的问题，搞成了'八条'，这是错误的，太急了，影响不好，中央没有正式文件，你就搞个'八条'，后来中央文件不是'八条'而是'六条'、'五条'，你就被动了。"

北京"三司"的一个同学说："现在学生问题不太成问题，工农问题大，抓生产不要革命，停革命，把工人打成'反革命'，这个情况很严重。东北有一个厂有1000多人打成了'反革命'。"

陶铸："工厂革命靠工人，农村革命靠贫下中农，学生革命要搞好本校还要在社会上造成一股大的推动力，学生不到车间去影响生产，可到办公室座谈，可送大字报，可到生活区宣传调查。老乡们，你们到工农中去宣传我完全赞成，但不能指导运动，去随便罢官，你们支持工农，工农支持你们。相互支持嘛！县中学可以组织起来帮助农村，光靠大学生不行，全国大学生只有100来万。"

有人问："湖南只4个城市搞文化大革命，但全省都搞反右派斗争。"

又有人问："长沙市内5个区，区以下机关、企业单位，搞不搞文化革命？"

陶铸回答说："要搞，长沙市是大城市，是运动的重点，其他地委机关所在地包括湘潭、株洲、衡阳、郴州、邵阳、岳阳、益阳、常德津市等中等城市都要搞，第一批搞，但领导不得力不行。"

"分期分批搞，现在连省委还没有过关，如何领导？大连两个学校，一个抓市长，一个抓市委书记，抓到北京来了，我和总理跟他们谈了两个钟头，他俩才回去了。没有领导不行，要撑腰的领导，不要泼冷水的领导。先把省委、省级机关、地委级机关搞好，再搞县级。这次开了中央工作会议，都会搞起来了。你们回去看看，你们出来多么久了？'洞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回去你们再看看。"

有人反映："很多地方不贯彻军委指示和江青同志、周总理10月6日的讲话，把群众、学生打成了反革命。"

陶铸："把群众打成'反革命'统统不算，他不贯彻军委指示，你们就搞他……"

有人反映："有的地方动用了军队、公安部队。"

陶铸："军队不能动，湖南只有长沙，郴州保护电台用了军队，那是中央同意了的。对群众不能动军队，不能动公安部队。"

有人说："公安部队抓了人，还发生了开枪事件。"

陶铸："真的？要调查。"

有人说："军队参谋向民兵作动员，要抓'右派'。"

陶铸："那是不对的，应作废。各地方黑暗的东西很多，你们回去要斗争，要彻底揭露，不要怕，第三司令部蒯大富不是被打成了右派，现在不是成了负责人了吗？你们就要接受这种锻炼，你们要'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你们的条件很好嘛，你们享受了宪法的全部权利，言论、集会、出版、结社、游行、示威都有自由，坐车吃饭不要钱，打电话打电报不要钱嘛。什么组织都可以建立，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不是成立了三个司令部？讲来讲去，还是回去干革命。搞久了，不回去，你是革命的也会脱离群众。不要住在北京太久了，不然'保'字号的就要挑动了。"

有人说："有人说我们没有做事，不能发工资，说我们上北京是非法的。"

陶铸："回去一律发工资，工人同志来北京是革命的，到北京是毛主席号召的，怎么是非法的呢？不过要派代表来。当然工人要积极参加生产，工人不生产，你讲得天花乱坠也不行。我打电话去，工资照发，开除不算，告诉大家都

回去，一个也不留。因文化大革命被捕的要放，……只要不是现行反革命就要放。

工人百分之九十五以上是好的，文化革命主要是搞当权派的问题，学校至少是系主任以上的才算当权派，还有党员伙夫班长也算当权派吗？

四清没有文化革命这样彻底。我这个人不算很保守的，但现在看起来还是保守了。文化革命这样大的民主，这样大的声势，这样大的规模，这样大的威力。我没有想到，也想不到，没有这么大的想象力，但也还是有些想象力，只有主席是最高的马列主义的领导，才这样放手，才能领导这样大的运动，才可以领导得好。北京在11月5日以前大概有800万人次来北京，招待都不容易，相当于保加利亚一个国家搬家，全国几千万人在大串联，在搞大民主，在炮轰，扫到每个角落，省委书记动不动就揪出来，当然我不提倡，中央很多负责同志都上了墙，过去谁想到？宣传部的大字报就公开嘛！

我想，搞10年的宣传毛泽东思想，也没有红卫兵这几个月搞得好。我也有一本《毛主席语录》，”

他拿出来给大家看，“开会都要念，不念不行，念多了就熟了。《毛主席语录》到处都是，家喻户晓，毛泽东思想一旦被群众所掌握，就可以变为巨大的物质力量。10年前，我们还只会制手榴弹，10年后就能制造导弹、原子弹，这在世界上是没有过的事，是奇迹。外国的工程师一下班就抱小

孩，我们的工程师不干好那件事，就连吃饭、睡觉都不顾了。毛主席思想被全国人民掌握那就不得了，人民大会堂10个月建成，要我画都画不成。

这个运动规模之大是空前的，古今中外前所未有，现在是开始正向全国大规模的开展，方兴未艾，强大的洪流什么地方都要触及，要堵死，有灭顶之灾，你们碰钉子不要怕。”

代表问：“要搞多久？”

陶铸答：“反正要彻底搞好，不搞好不上课，下定决心搞彻底，毛主席是下了决心的，非彻底搞好不可。”

有人问：“半工半读学校如何搞？”

陶铸说：“半工半读干革命，半天搞革命，半天搞生产，也可以轮班，一班串联一班生产，再轮换。”

此时已是次日凌晨3时20分，陶铸还有一个会，要走了，赵连城对陶铸说：“我们准备一起杀回湖南，希望给我们安排一个车厢。”陶铸连忙吩咐中宣部文革曾科扬说：“你们给办办。”

这时，张家政拿着一个“湘江风雷”的袖章，对陶铸说：“陶铸同志，我们在北京成立了一个组织，叫‘湘江风雷挺进纵队’，主要是受迫害的工人和干部，请你当顾问。”

陶铸慌忙推辞说：“我不当顾问，我是中央文革小组顾问，当了几个顾问，我就当你们一个普通队员吧！”

大家热烈鼓掌。最后全体代表请陶铸转达湖南人民的祝愿：“祝毛主席万寿无疆！”

陶铸：“我一定转达你们的心意，转达湖南人民的心意。”

陶铸走到门口，又转过身来说：“张平化再不改，再对你们进行迫害，你们再来。”

第 257 回：太复杂，刘宁一哪敢再言　急“逃难”，天津市秘密办公

10 月 31 日，中宣部为赴京告状的湖南代表们准备了专列送他们返湘。北京“三司”原打算派 100 人同“湘江风雷”一道杀回湖南，因时间仓促没有走成。

“湘江风雷”在火车上又发展了不少成员，由68人发展118人，并在火车上编成了13个支队。彭少云等几个人申请归队。

11 月 2 日，叶东出、张家政、舒无等人率“湘江风雷”到达长沙，张平化闻讯连忙让秘书毛况生打电话通知湖南省文革办负责人：“湘江风雷回来了，平化同志明天接见，你们要准备会议室，要专车专人到二招待所去接，他们的负责人叫叶冬初……，你们要热情一些，要跟省委招待所传达室的同志讲好，他们出入不要阻挡。”

“湘江风雷”一下火车，就直奔省委大楼，在省委礼堂召开大会，由叶卫冬主持，提出了要求：

1. 湖南省委必须马上派出专人负责调查 10 月 30 日长沙至韶山红卫兵参观毛主席故乡的翻车事件，并全力以赴支持革命大串连。

2. 张平化要随叫随到，若借故不到，查出后，一切后果由张平化个人负责。

3. 回来的湘江风雷战士，是湖南文化大革命的火种，现在必须全部集中住在一起战斗，省委应提供方便。

4. 省委应在经济上一视同仁，供给文化革命的宣传器材和经费开支。

显然，风头正劲的“湘江风雷”是得理不饶人，而在中宣部大院就吃过苦头的张平化也知道自己处于何种境地之中，只得积极回应：

1、 只要预先约好时间，无特殊事情，一定随叫随到。

2、其他具体事项责成官健平（省委统战部长）、韩江正（省委副秘书长）负责解决。

当晚，“湘江风雷”成员集中住宿在省人委第二招待所，并将其在北京斗争张平化的实况录音通过地处市中心的湖南大学驻城办事处的湖大“河东战斗队”公开播放。是时，听者如堵，“湘江风雷好得很！”的欢呼声震天动地。而保湖南省委的“红色政权保卫军”、“赤卫队”则气急败坏，尽管不情愿服输，反对说：“还说是什么接见，明明是斗争，还把我们平化书记当敌人斗争，‘湘江风雷’坏透了！”但形势已日趋明朗，极大的社会影响已经造成，各路“黑鬼”望风归附“湘江风雷”，使其短时间内便成为拥兵百万之众，雄踞四水三湘的湖南头号造反组织。谢若冰于10月28日刚刚成立的湖南“井冈山红卫兵”也是狂飙突进，与“湘江风雷”互相呼应，推动了湖南文化大革命的发展。

11月4日，张平化与“湘江风雷”头头在省委招待所第九会议室会谈。

我们再回到北京。10月31日，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开火联络委员”和“红卫兵联队”，委托高宣扬、贡发信等几十人到全国总工会向原工作组副组长时代和工作队员罗毅、吴映平、王长庚、文哲、申谊等人索要工作组在学部工作期间搜集的“黑材料”和工作日记。晚上，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总工会主席刘宁一和中联部副部长兼国务院外事办公室副主任赵毅敏开会回来后遇见了他们，立即接见了高宣扬等5位代表。

刘宁一说：“关于工作组的情况，因为不是我们派的，我们不清楚，是宣传部派去的，我们不管这个事。刚才听说你们来了，来不及回来，上午到飞机场去了，下午参加了纪念鲁迅的大会，才回来。

吴传启同志是革命派。你们和吴传启同志是一起的。你们是革命的左派，我们很高兴和你们见面。你们要把这类材料收回，这个要求是合理的，因为中央和军委有指示。但是对工作组的情况我们不清楚。我们有个原则，有个规矩，不管什么检查材料，凡是材料，笔记该退回的退回，该当众烧掉的当众烧掉。”

随后，刘宁一又接见学部前来的全体人员，并发表了同样的讲话。此时已是11月1日凌晨了。

第二天，11月2日，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红卫兵联队”的对立派组织“誓死保卫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联络委员会”和“红卫兵总队”72位代表也来到全国总工会，要见刘宁一。刘宁一接见了他们，他说：

“同志们，你们很辛苦了！你们来了一会儿了？你们晚饭还没有吃吧？都是哲学社会科学部的吗？你们到我们这里来，非常欢迎。等了这么久，我在开会，很抱歉。不晓得大家很早就来了我因为开会，听说大家有些问题，是不是？大家见见面，谈谈也好。

你们哲学社会科学部的情况，我一点也不知道，我也不管。昨天有那么几十个人来，我今天才知道你们那里不是一码事。你们有几派？你们分两派吗？你们叫什么名称？“

答：“红卫兵总队。”

刘宁一似乎对学部的运动情况并不十分清楚，还不知道这次来的“总队”与他31日接见的“联队”并不是一回事。他问：“你们‘总队’和‘联队’不是一个编制吗？你们都是研究什么的？不是在一块儿的吗？昨天我发表了一点意见，我的态度是首先听取意见，向你们学习。首先是学习，根据毛主席的思想，首先做学生，我愿意听取大家的意见。昨天因为时间很短，也没有谈什么，他们说是来要材料的。我这个人有点官僚主义。你们是哲学社会科学部的，要什么材料呢？

后来我才知道，我们这里有几个人在中宣部参加了工作队，他们说是运动中的材料。后来我说，部里一礼拜前，我们就告诉了参加工作队的人，按军委文件办事，清理一下，应退还本人的退还本人，应销毁的销毁。他们昨天来了很久，大概是上午来的，我到飞机场去了，下午一点钟开大会去了。我回来，一进门就看见哲学社会科学部的人来要材料，就这么一回事，中心是要材料的事。我说大家既然来了，要材料，究竟他们手中有什么材料，我不清楚，应该交给有关的机关。我说：‘你们先回去，等清理好，有什么材料，片纸只字都不能遗漏。’今天他们又打电话来问材料清理好没有。今天你们来了，我以为又是他们来要材料了，其它的还有什么问题，我就不知道了。”

学部的人告状说：“‘联队’已经把你的讲话大量散发出去了，这个讲话你看过没有？”

刘宁一说：“我不知道。”

有人给刘宁一念了“联队”印发的传单全文。

刘宁一说：“这个材料我没有看过。我不知道他们印这个东西，他们也没有征求过我的意见，我也没有这个经验。因为他们是来要材料的。他们讲，我听。你们讲，我也听，我学习。关于哲学社会科学部的问题怎么办？我不能参加意见，应该根据主席的思想，相信群众，依靠群众，群众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他们昨天来，不是听我作结论

的。你们这些人，我一个也不认识，你们谈情况我就听。昨天他们来，我也不认识，他们说，我也听。大家都按《十六条》办事，我们都拥护毛主席，反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拥护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都按《十六条》办事嘛！他们印这份材料，没有告诉我，什么时候印的，我不知道。”

有人插话：“我听‘联队’有同志说：‘中央书记处书记说话了。’‘要按刘宁一同志指示办事。’”

刘宁一答道：“书记处并没有委托我，我不能代表书记处。他们来是要材料的，我在门口遇到了他们，我表示愿意听取他们的意见，就是大家谈材料，就这么回事。昨天他们讲，我们听，今天你们讲，其实我们肯定地说，你们的事，你们自己去讨论，根据《十六条》讨论。我相信不管几派，只要根据《十六条》，认真学习主席指示，问题都能弄清楚，一定能团结，统一。标准只有一个，就是毛泽东思想。”

刘宁一再三解释对学部的情况的他不了解，并劝慰这派代表说：“材料问题你们不要急，按中央决定办事，我们集中以后，听候中央处理。工作组不归我们管，我们不能销毁，也不能保存，不能交给你们，也不能交给他们。

今天以前，我还不知道你们两派斗争那么尖锐，不听你们今天的汇报，还不知道事情会这么复杂。你们今天这样一说，使我增加了知

识。只要我们坚决站在《十六条》，站在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边，什么问题都可以解决。这些情况我都不知道。”

这时有人插话：“‘红卫兵联队’方面，有人说林杰的话一句顶一万句。应该说，毛主席的话一句顶一万句。”

太复杂了，刘宁一不敢再缠，赶紧说：“今天就谈到这里，再见！”

此时，天津市委的处境已十分不妙。10 月 25 日，在天津的河北大学附中、天津市一中、女六中、劳二半、十八中的学生到天津市委找书记处书记张淮三。张淮三没有出来，他们就冲进市委，直到 12 时 15 分才离开市委。到了 10 月 29 日，天津市委门前已是人潮汹涌。一中的学生听《解放军报》社记者说：“现在先不要出去搞串联。要猛攻市委，现在市委很被动……”

这时的天津市委书记处、常委会已无法在市委机关开会和办公，于是陆续转移到市政府交际处所属常德道 2 号招待所、睦南道招待所、云南路招待所、河东招待所以及天津铁路分局所属台儿庄路招待所秘密办公，在警备区礼堂、中苏友协、北宁公园等多处地方也开过会，其中以云南路招待所待的时间最长。

云南路招待所即现在位于天津市大理道和平宾馆的润园，大门在云南路。在天津河北宾馆建成前，这里是最高级的招待所，毛泽东和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都曾在这里下榻过。

云南路的秘密办公地，本来是很隐蔽的地方。因为这条街很僻静，独门独院，平时大门紧闭，门前也没有招牌，很少有人出入。这时书记们的小轿车都换成了军用吉普，只有在出门时才打开大门，汽车开出后又迅速闭门。除了市委有关常委、秘书长等少数人来这里请示、汇报、商量工作以外，机关一般人都不知道这个地方。除了市委书记的秘书以外，市委办公厅只有两名工作人员昼夜在这里值班。

就是这样秘密的地点，也发生了一次“逃难”。10 月的一个晚上，天津市委第二书记赵武成因病住院，原河北省委书记处书记、天津市划归河北省以后调天津任职的谷云亭主持工作。当时，他和张淮三及市委常委李守真正在这里开会，22 时过后，谷云亭的秘书忽然接到紧急电话，说有人发现了这个秘密点，正要来这里揪人。谷云亭他们只好决定马上转移，3 人匆匆各自乘车，分头而去。

张淮三在路上才决定去位于河东区十一经路的河东招待所，即原苏联领事馆。当驱车开进这座静谧的深宅大院时，只听得“哑、哑”大叫，一群乌鸦蓦地飞起。“是凶，还是吉？”走哪说哪吧！

云南路招待所暴露了，于是天津市委领导办公地点又秘密转移到了河东招待所。这里还保留着前苏联人的特点，卧室高大，大床铺，大澡盆，大马桶，大拖鞋。

第258回：同对待，见天工两派代表　要材料，沈阳农学院武斗

10月31日晚21时30分，周恩来在国务院会议厅接见天津工学院“红卫兵”和“红战友”组织的代表赵建敏、胡忠信、齐熙国等20人。参加接见的还有：河北省委书记处书记阎达开，中共中央候补委员、河北省书记处书记李颉伯，中共中央华北局文革小组芦志彬，中共河北省委文革小组茹洪声。

当代表们走进会议厅时，周恩来迎到门口，和代表们一一握手，让他们坐下。他询问了每个代表的名字和家庭情况，然后说：“你们谁是总部的？”

学生们回答：“我们没有总部的。”

周恩来说：“不！我是说你们天津工学院的。”

赵建敏答：“前三个。”

他是说被接见代表名单中的前三名。

周恩来又逐个点名，并问：“谁是总指挥呀？”

赵建敏迟疑了一下，李颉伯对他说：“你们现在可以公开了。”

周恩来说：“你们对我可不能保密呀！”

于是，赵建敏答道：“我和马桐臣。马桐臣没来。”

周恩来问大家：“你们是全权代表吗？”

赵建敏答：“是。”

周恩来说：“好！一言为定，说好了我们就好谈了。”

这时，天津“大专院校造反总部”又来了6个同学，周恩来又一一问了他们姓名。然后说：“我今天头一次接见天津的同学，我首先

推荐毛主席的基本功，从调查入手。刚才谈了第一件事。第二就是民主。现在你们说，得到的民主多不多？算过没有？有多少？”

接着，周恩来讲了当时时兴的四大自由，即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和宪法赋予的出版、集会、结社、言论、游行、罢工这六大权利，这六大权利直到这时，中国的学生才得以充分地享有，而工人们也在要求享有。当时的工人、农民都积极地要求参加文化大革命，就是希望同学生一样，也享受这六大权利。当然，他们还没有意识到，其实这六大权利宪法早就明确赋予他们了。但是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这六大权利谁能真正享受到呢？曾经，一顶“右派”的大帽子，就能让你永世不得翻身。现在不同了，我有“四大”，你领导说我是“右派”、“反革命”，我还贴大字报说你领导是“走资派”、是“反革命”呢。你领导不是有上级领导支持吗？我连你的上级领导一起打到，管你是市委书记还是省委书记，甚至大区书记都不在话下。陆平怎么样？聂元梓一张大字报不就打到了吗？

周恩来接着解释宪法赋予的六大权利，他说：“游行，你们都游到北京了，还有点示威性质的，阎达开是站在前面吗？”

阎达开答：“是。”

周恩来继续：“你们要走路来，天津到北京是小长征，4天就到了，应该让你们长征，如果你们走来，我就摆队伍到大门口欢迎，还把你们都请进来。秘书追着我告诉我这个消息，可得到了这个好消息，我正开会，我告诉了毛主席，毛主席很高兴。让达开带着游行很好嘛，晚上李颉伯告诉我，才知道你们上汽车了，我怪省委太体贴你们了。”

李颉伯马上检讨说："我应该检查，我没领会总理的意图。"

阎达开也主动承担责任说："我当时也没坚持。"

周恩来对学生代表说："阎达开有胆病，现在又有些痛，他不叫我说，我得给你们说，他是好同志。

今天只给你们谈一件事，就是给阎达开同志自由，今天既然到我这里来，首先要给他自由，信任中央嘛！专政只能对敌人，你们不用陪他了，你们同意的话，就撤走阎达开身边的同学。你们同意吗？"

众人纷纷表示："同意。"

周恩来很高兴，他说："达开同志今天不让我提，颉伯同志还说没把握，你看怎么样，一讲大家同意了，同志们很懂得道理嘛！达开是个好同志，他很尊重你们，他有错误，他会检查的，这样你们就主动了，要不，保守派又要说你们限制他的自由了。今天我想谈的主要就是这些，前面说的是为烘托，是画龙，这一点是点睛。前边我说的也不是废话吧？对你们有帮助吗？"

众人回答："帮助很大！"

接见结束时，胡忠信代表天津工学院"红卫兵"、"红战友"赠给周恩来一个"八·二五"帽徽和一个"八·二五"红卫兵袖章。当周恩来接过"八·二五"帽徽时问："八·二五"是什么日子？

胡忠信说："这是我们翻身的日子。"

周恩来："噢！这是你们解放的日子。"

接着，周恩来、阎达开、李颉伯和代表们一起合影留念。

第二天晚上21时10分，周恩来又接见了天津工学院与"八二五红

卫兵”对立的“毛泽东思想红卫兵”15名代表和“共产主义红卫兵”5名代表。座谈中在座的依然有阎达开和李颉伯。

座谈开始，周恩来依然是逐个点名。他首先点到：“赵红旗！”

赵红旗站起来回答：“到。”

周恩来说：“‘红旗’这个名字很好！你是后来改的吧？”

赵红旗说：“不是，从小就叫红旗。”

周恩来又问：“你多大了？”

赵红旗答：“22岁。”

周恩来：“噢！这也可能。”

他又接着点到王淑兰，并看着名单问：“你是北县的？噢！是农村的，你们那地震怎样！”然后详细的询问了家在邢台的王淑兰地震区的情况，问她回家了没有？家里现在生活怎么样？

王淑兰说：“我回家一次，你放心吧！现在没事了，家里都挺好的，照顾的非常好！社员干劲都很大！”

代表插话：“我们搞四清都在地震区，那里建设得很快。”

周恩来问：“噢！你们在哪个地区？”

代表答：“我们在隆尧地区。”

周恩来：“我去隆尧时你们在那儿吗？”

代表说：“在！当时您在隆尧县委大楼下指挥战斗，我们有许多同学都看到了您了。”

周恩来继续点名单，互相交谈着。念完名单后，学生们开始汇报天津工学院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同时提出工学院副院长兼党委副书记

袁血卒和陈云的关系问题。代表说："据天工'红卫兵'某些人说，天工'红卫兵'曾三次会见了陈云同志，交换了袁血卒的问题。"

周恩来颇有些惊讶："噢，这倒是个新闻！怪事！陈云近年一直休假，更没有参加文化大革命，怎么能接见'红卫兵'呢？"

一个工作人员插话："大约一个多月以前接见过一次，在大会堂。"

学生代表说："一个天工'红卫兵'战友8月25日从北京回校后说：'我这个地主狗崽子也到中南海兜了一圈！'"

周恩来纠正说："这是吹牛！中南海大得很，在外边转也是转一圈。袁血卒是什么人？"

代表回答："袁血卒是我们学院的党委副书记兼副院长，是广大革命师生揪出来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黑帮分子，经省委批示了。"

周恩来问阎达开和李颉伯："是吗？"

阎达开点头："批示了！省委同意批斗。"

周恩来马上派人用电话去调查关于袁血卒和陈云的事情。

代表继续汇报说："袁血卒的大女儿在天津市女一中上学，据说她近来请假回家整理他爸爸的材料，就等陈云或总理的一句话了，只要有陈云同志或总理一句话她爸爸问题就可以解决了。"

周恩来说："这是吹嘘！我根本连知道也不知道，连认识都不认识，怎么把我当成他的后台？"

这时，调查情况送来了，周恩来念调查报告："天工'红卫兵'代表共6个人，通过文革小组介绍，合乎手续，9月2日陈云接见过他

们一次，他们要调查袁血卒的历史问题，陈云介绍他们去中央组织部，并告诉他们袁血卒过去的历史问题已经作了结论，不然就不会派到天津去工作。他们向陈云也汇报了学校文化大革命的情况，陈云给江青同志写了一封信，并将他们的材料转给文革小组，以后又来了，没接见他们。另外，中央办公厅副主任接见过他们，但从没给他们写过信。”

周恩来说：“我对北京院校讲的话，我现在还认为原则是对的，‘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也好，‘八一八红卫兵’也好，其他各种名字的‘红卫兵’也好，都是在党中央毛主席领导下，都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都是以《十六条》为纲领，那个‘红卫兵’也承认这几点，大方向能说不对？你们的领导是毛主席，方向是毛主席指示的方向，纲领是毛主席亲手制定的纲领《十六条》，大方向当然是对的。你们应该统一但又不能统一，这是个思想态度问题。左、中、右反映一定的阶级社会存在，先进开始总是少数，争取多数就要排除右倾错误思想，成为多数以后，又出现新的错误思想，不断排除，不断进步。阶级消灭了，思想也有左、中、右，思想没有变化了，人还有什么意思？有了保守的，就得排除吗？在斗争实践，锻炼自己嘛！”

代表说：“可是说我们大方向是错的，因为我们和省委进行了辩论，我们的大方向就错误。”

周恩来问：“你们知道我给他们讲什么了吗？”

周恩来这里说的“他们”是指昨天才接见的“天工红卫兵”，是正在接见的“天工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的对立面。

代表们："我们不知道。"

周恩来："我和他们讲了些大道理，都是主席的大道理，最后我向他们提出一个要求，要求恢复阎达开的自由，他们很快答应了，不要那么紧张，你们的心情我是理解的，怕别人抢走了，"他指了指阎达开，又继续说："听说你们今天也抢了，是吗？"

阎达开解释说："没有抢，是我们去看他们的。"

周恩来："听说你们还要扣留他们？"

阎达开："没有扣留，你打电话要我们一起接见，我们马上就来了。"

代表们谈到10月27日发生的搜身、封门的事情。

周恩来："搜身！我反对这个行为，封门搜身是错误的，广播器材共同使用，只能平等相处解决问题。"

此时已是11月2日日凌晨1时多，毛泽东处来电话，说有事找周恩来研究，这才结束了他同红卫兵的谈话。周恩来带上了"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和"共产主义红卫兵"的袖章。代表们还请周恩来将另两幅红袖章转送给毛泽东和林彪。周恩来带好袖章后说："好，我跟你们合影。"

绝对的一视同仁。

10 月 25 日，沈阳农学院"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红色造反团"向院文革索取"黑材料"时，发生冲突，有 23 位"毛泽东思想红卫兵"被从一、二楼窗口扔出去，有的摔成重伤。"毛泽东思想红卫兵"3 位负责人，也是沈阳农学院第一个给院党委贴大字报的 3 位教师，被

绑架押往北京告状，控告沈阳农学院“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红色造反团”在学院搞打、砸、抢，请中央评判、主持公道。“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沈阳总部各大专院校代表300多人闻讯后也赶往北京，寻找沈阳农学院“毛泽东思想红卫兵”这3位被绑架的负责人，并向中央告状。

11月1日晚，东北工学院“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姜健生与总政文化部长、中央文革小组的谢镗忠和谢镗忠的夫人、统战部宗教事务局秘书长金平谈话，汇报沈阳市文化大革命情况，介绍了辽宁省官办红卫兵的问题和沈阳农学院“毛泽东思想红卫兵”3个负责人被绑架、殴打、失踪之事。他们认为辽宁省委和沈阳市委问题严重。

谢镗忠说：“你们认为省，市委有问题，认准了，就造反嘛！”

姜健生：“我们总部的人认识比较统一，但是有的人有些思想顾虑，怕万一造错了不好办，《十六条》说：‘即使是真正的右派分子，也要放到运动的后期酌情处理。’怕搞错了被划成右派。”

谢镗忠：“错误是难免的，无意犯些错误可以原谅，你没那个右派思想，怕什么？打成反革命也不怕。你们应当相信群众，相信党，事情总是会搞清楚的，真的假不了，假的也真不了，没有那个右派脑瓜是定不了右派的。即使受几次打击也是好事嘛！左派只有这样才锻炼得出来，你看准了可以干，犯了错误没关系，作点自我批评，多碰几次钉子，一次不能成为左派，左派不多受几次压是不能成功的，看来你们的造反精神很不够。”

姜健生：“的确是不够，比北京差远了！”

谢镗忠：“哈军工‘红色造反团’的人到我们这里来了几次，我

大力支持他们造反，结果，造出了个地下司令部。你们与他们有联系没有？”

姜健生：“有联系，哈军工‘红色造反团’在我们‘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沈阳总部有办事处。”

谢镗忠：“你们可以请他们介绍经验嘛！听听人家是怎么造反的，他们发动了群众，顺藤摸瓜，就把省委盖子揭开了。”

姜健生：“我们的思想也不是没顾虑的，怕万一造错了人不好，特别是老干部年纪大，身体不好，涂了墨，游了街，戴了高帽子，造错了不好下台，将来道歉都来不及。”

金平：“这对老干部是个考验，老干部也应经得起这个考验。周总理说：‘戴几次高帽子也没关系嘛！’”

姜健生：“中央文革支持第三司令部，有些地方有人认为是否过了火，老叫人家回来检查。老干部事情多，特别是运动中事更多。没多大影响的问题，光是点工作组的问题，就算了吧！检查了一两次就算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该怎么批判就怎么批判，不能让人家老回来。”

金平：“毛主席是当代最伟大的天才，林彪也是天才，主席有些想法也不是一般人马上都容易理解的，没理解也要紧跟着做。现在搞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反动路线批判不彻底，文化大革命就不能胜利进行，阻力就会很大。”

姜健生：“造反什么样子才算造得好，而不是形‘左’实右？”

谢镗忠：“造反嘛！就要有些造反精神，毛泽东思想就是革命的，

造反的。省市委的问题你们看准了，确实有把握就大张旗鼓地干。北航红旗很好，我很欣赏，他们要北航工作组赵如璋、罗舜初回来检查。到国防科委干了28昼夜，到最后赵如璋才回来作检查。28天，28夜，他们天天在那里闹，天天派人送饭，造反精神好得很！”

姜健生：“就是因为这件事就干了28天吗？”

谢镗忠：“北航工作组的确犯了错误，北航红旗一定要他们回来作检查，有理就坚持到底嘛！他们干得好！这才叫造反嘛！”

姜健生：“北航红旗那种做法有不少人反对，社会主义国家这样闹，不成样子，过火了，不知中央文革小组怎样看？”

谢镗忠：“造反嘛！不能那样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北京的红卫兵舍得一身剐，敢把××拉下马，炮打××；到省委，省委书记根本不看在眼里，××都敢造他的反嘛！”

姜健生：“我们还想找中央首长谈谈，省委问题能不能给提提线索，指导指导。”

谢镗忠：“不行！我们都忙得很。省市委问题主要靠发动广大群众去揭发，特别是省委内部，内因是主要的，红卫兵要起煽风点火的作用。要根据现在发现的，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中的问题去追根，步步逼紧，非追到底不可，就能暴露矛盾。要集中优势兵力，突破一点，扩大战果，顺藤摸瓜，要抓主要矛盾，主要矛盾抓住了，解决了，问题就迎刃而解。省委盖子揭开了，就什么都好办了，不能分散兵力，要分主次。你们要有真凭实据，看准了就大胆地干。这次中央召开会议，东北局的人回去了，他们把中央精神带回去，上下一起动手，就

好办了。”

姜健生：“那可不一定，中央要他这样，他不这样，我们也不知道。”

谢镗忠：“你们可以全国大串联嘛！各省比一比，问题就会发现。”

姜健生：“省委鬼花招很多，不容易搞他们，揭出一些问题，他们就给罢官，罢了不少。罢完了，有的群众也就认为大功告成，没有继续深挖，深揭了。”

谢镗忠：“罢了官更好，你们让他们回来作检查嘛！”

姜健生：“他们根本不来。”

谢镗忠：“不来，不来就到省委去闹。”

谈话结束后，姜健生整理了谈话记录，并说明：“根据当晚我和谢镗忠以及金平（统战部宗教事务局秘书长）谈话之后，马上回忆整理写成这份材料，未经谢镗忠、金平审阅，如有出入，概由本人负责。东北工学院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战士姜健生”

## 第259回：不支持，成立全国红卫兵　再接见，新疆赴京代表团

11月1日这天，张春桥、戚本禹还接见“中华人民共和国革命造反红卫兵总部”、“国际红卫兵中国支队”和北京大专院校红卫兵第一、二、三司令部代表，对他们提出的建立全国性的红卫兵组织和国际红卫兵组织一事，张春桥说：

“红卫兵成立全国性组织，一定要通过中央讨论。你们有这种积极性很好，我们不反对，请同志们考虑一下条件如何，是不是没有这种组织不行，是不是第一位的问题。”

“全国性的红卫兵组织的成立，我们要考虑，我看条件不够成熟。”

“国际红卫兵中国支队实际上还是中国的，别的国家也不可能马上成立红卫兵组织，日本出现一股，很快就被扑灭了。墨西哥也出现一股，很快就被抓进监狱。说明中国红卫兵在世界上影响很大，但在全世界还要有一个过程。”

戚本禹说：“大方向是对的，潮流所趋，红卫兵是否代替共青团还得考虑。红卫兵全国组织是一种趋势，将来总会建立的，这是大事情，非常严肃的事情，全国红卫兵的大事，对整个世界震动很大。因此这么大的组织不能仓促成立，要做很多工作。

国际红卫兵中国支队，主席不能做你们的统帅，这不是小孩闹着玩

的事情，牵涉到国际关系……你们国际红卫兵中国支队发了大字报，外国人都很感兴趣。我们俩人建议你们不要用这个旗号打出去，打出去反而对人家国家的红卫兵斗争不利。日本出现了，被抓了，就搞秘密组织，抓是抓不尽的，革命的大火是扑不灭的。你们搞国际红卫兵中国支队有联系可以抓，这样好心变成坏事，对外国革命并不有利。”

“你们要更好地做些踏实工作，你们会讲话，会分析，都是风流人物……到各地联络，调查研究，哪些是左派，保守派是哪些，哪些人拥护毛主席。你们要做踏实工作，不要打旗号，目标小有好处，懂吗？将来是要建立这个组织的，前途是光明的。”

第五次接见红卫兵后，周恩来和首都工作组又在考虑安排毛泽东的第六次接见。按说，第五次接见的方式最省时间，最能减少毛泽东的劳累，但周恩来考虑到毛泽东的安全，不敢在 50 里长的路线上重复使用上次的方式，于是他决定，以红卫兵乘车通过天安门的方式进行第六次接见。

外地来到北京的红卫兵太多了，已有 200 万之众，如果用汽车搭载他们通过天安门，至少需要 6000 辆卡车。当时驻京部队的卡车没有这么多，要在 3 天内调集 6000 辆卡车难度极大。首都工作组报请周恩来同意，连夜从沈阳、北京、济南等军区和军兵种中抽调卡车，火速云集

北京，由北京卫戍区统一指挥编队。

当时北京能通卡车的大街不多，二环路、三环路尚未连通。6000辆卡车的编队，登车点的确定和各路卡车纵队通过出发点、天安门的时间，以及疏散出口的规定等等，都必须做出科学的计算、准确的规定、密切的协同，进出路线都不能交叉运行。首都工作组把制定这一规划的任务交给了卫戍区参谋长刘光谱。他对摩托化部队的集结、开进、疏散有经验。他和科长胡自成、参谋刘广文、朱海英等，通宵达旦地制定出一份蛛网式地图注记式的行车计划。

周恩来在福建厅听取了刘光谱、邱巍高的汇报后，又亲自审查了这个计划，并指示，按这个计划组织一次演习。

11 月 1 日，首都工作组在天安门城楼组织 6000 辆卡车进行了一次模拟演习。他们没有告诉周恩来，因为他太忙了，一天只能休息四、五个小时，所以不想再惊动他。

可是周恩来还是独自在大会堂的二楼观看了演习的全过程，没有让首都工作组知道。演习结束后，周恩来召集首都工作组、卫戍区领导在福建厅开会，研究解决演习中发现的问题，重新规定了 6 路车队的车速、车距和间距。

为了组织好11月3日毛泽东接见红卫兵，11月2日，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秘书厅给全国各地来京的红卫兵一封信：

全国各地来京的红卫兵战士和革命师生们:

十一月一日，我们曾经写给了你们一封信，告诉你们一个最好的消息：我们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毛主席要接见来京的革命师生了。因为来京的革命师生已超过一百五十万人，为了把接见大会组织好，中央曾经决定分期分批组织接见。现在考虑到，分期分批接见，时间会延长，而且这几天来的人大大增加，已经接近二百万人。为了使广大革命师生更快地看到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同时也为了中央负责同志的健康，中央决定改变分期分批接见的办法，准备这二百万人一次接见。

我们希望每个革命师生和红卫兵战士除了遵守十一月一日信中所提出的要求以外，还请注意以下几项:

1.学习解放军，听从指挥。为了帮助大家，我们派了解放军同志和党政机关干部陪同你们，希望你们很好地同他们合作，接受他们的帮助和指导。

2.通过天安门接受毛主席、林彪同志和中央负责同志的检阅时，要雄赳赳，气昂昂，整队前进，不要停留，不要拥挤，以免影响后面的同学通过。

3.行进队伍要整齐，行动要健壮，行进中要保持规定的排面和速度。齐声呼口号，高唱革命歌曲。

4.通过天安门后，不要自由离队，应按指定路线回到原来的住地。

5.提高革命警惕性，严防阶级敌人破坏。不管遇到什么情况，都要保持镇静。

6.不准携带易燃易爆物品、武器、弹药，以保证安全。

……

接受了检阅的同学们，应当很快地返回本地区去，把毛主席给我们的鼓舞和教导，把在北京学习到的革命经验，带回到本地区、本单位去。坚决地保卫和贯彻执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彻底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路线，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秘书厅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日

当天，周恩来召集北京各红卫兵负责人开会，对他们说：

“今天是个紧急会，所以我就开门见山了。明天要接见外地200万革命师生，我们现在分别开会，从昨天晚上到现在都在研究关于明天毛

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接见外地革命师生的事。我们信任你们，所以跟你们谈谈这些问题。有人听说毛主席要接见，就到天安门广场上来等。因为这次人太多了，所以现在只能用大喇叭广播，让他们回到各单位去。

这次接见任务很重，北京市从来没有组织过200多万的大队伍来游行，每年十一、五一最多才150万游行，这次200多万，你们想想看，你们要帮助党中央，军委和市委搞好这项工作，胜利完成这项重大的任务。

这次接见是在搞两条路线斗争深入的时候；在我国发射导弹，敌人慌乱的时候；今年又是农业大丰收，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胜利的时候；全国人民欢欣鼓舞的时候，我们伟大的领袖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来检阅，我们应该是雄赳赳气昂昂地走过天安门。我们这次比十一任务还重，但一定得比十一还要好。这次可能时间拖得很长，如果不很好地组织起来，那时间就更长了。虽然说在上几次接见的时候，主席出来站一会儿再回去休息一会，但那也够累了，主席疲劳了，那也不好呀！

对外地的革命师生，不但安排住的地方，吃的地方，而且还要招待得好。我们对你们有几项要求：

1、不参加检阅，不到天安门去。你们要向雷锋，王杰学习，专门

利人毫不利己。市区联络总站，分站联合组织，通过你们的组织来做好这项工作。你们谁没有见过毛主席，以后给你们补，我不是把你们的名字都记下来了吗？

2、能回学校的就回学校做宣传工作，帮助解放军和其他组织做宣传，要遵守秩序，搞好队伍，通过天安门时要迅速。宣传毛泽东思想，今天下午你们回去好好地讲讲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同志接见的伟大意义。

3、就是他们走后，还要帮助他们把屋子打扫干净（指外地师生去游行时），我们要以身作则，用我们的实际行动来感动他们，你们要学习解放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4、回来之后（指游行回来），劝他们回去，好好地搞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两条路线的斗争，搞本单位的运动。劝他们回去。每天北京要来24万人，来的时候就连厕所都装7个人，火车头上都有人，但是回去的时候呢？每天只走两万多人，车上很松，有的还在车上躺着睡觉，你们算算这个简单的账，这样下去，北京几天就不行了。所以你们一定要好好给他们讲讲，接见之后，要按照发票的时间走，回去搞斗批改，搞运动。

5、要为下一步做好准备工作，使每个学校容量扩大。但不准住大

会堂，你们要保护大会堂，因为每天要有好多人来开会。我们把问题说穿，即使我说错了，给我贴大字报，我可以改嘛！我们中南海都住上外地师生了，住了有3000人。你们回去要跟大家商量，不要拥挤，并劝同学和不参加组织的人不要拥挤。碰上问题了，要多给人家解释。向解放军学习，团结，紧张，严肃，活泼。

6、帮助宣传，一定要做好宣传工作。”

11 月 2 日，周恩来在中南海再次接见了新疆大学“九三”事件赴京汇报代表团全体代表。他表扬新疆大学的学生说：“你们的精神很好！”

周恩来看了新疆保守派同学的传单《红卫兵要做无产阶级保皇派》后说：“胡扯！怎么这样提。”

他又看了“首都一司新疆兵团”400人的传单《我们要念念不忘阶级斗争》后说：“我拿了传单就觉得不对头了，给王恩茂念了，他也觉得这是错误的。”

周恩来批评“首都一司新疆兵团”说：“希望落空了，他们犯了错误。”

代表们反映工人被打成“反革命”怎么办？

周恩来说：“既然你们恢复名誉，当然他们也要这样做。本地的学生，外地的学生和工人一起平反，不更好吗？”

他嘱咐新疆大学的学生要注意民族政策，帮助自治区开好三干会。接见后，周恩来戴着学生们献给他的毛主席像章和《新疆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纠察队》袖章同大家照了相。并亲自批准，赠送一万枚毛主席像章，交给代表团带给新疆人民。

11 月 2 日，中组部内突然贴出了许多批判刘少奇、邓小平的大字报。陶铸来到中央组织部讲话，并再次重申："不能把刘少奇同志叫做敌人，不能喊打倒。""我不赞成写打倒刘少奇的大字报。他是国家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犯了路线错误，是团结——批评——团结的问题，是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组织部组织人去中南海喊打倒刘少奇，贴他的大字报，这种做法我不赞成"。

## 第 260 回：为材料，学生冲广播大楼　毛泽东，六次接见红卫兵

11月2日，广播学院的学生再一次到广播局大楼要求工作组处理“黑材料”，被警卫战士拦在广播局院外一天。后来，部分学生冲进大楼，查找黑材料。广播局赶紧向周恩来汇报。周恩来指示：广播局副局长、局党委政治部主任、广播学院工作组组长李哲夫立即出来接见学生，按军委紧急指示精神处理“黑材料”，劝说学生离开。

这时，学生们已经强行打开了广播局政治部的一个柜子，周恩来闻言，马上在电话里说：“请广播学院的小将来听电话，我有话对他们说。”

广播局的人通知学生代表去接周恩来的电话。学生代表拿起电话，听筒里果然传出周恩来的声音：“是广院的小将吗？”

学生代表激动地说：“是我们，总理。”

周恩来：“我支持你们的革命行动。但是，广播大楼还要向全国、全世界人民宣传毛泽东思想。为了不影响他们的工作，同学们先撤出来，你们找5个代表，我派一个外事秘书和你们一块搜查，你们看好不好？”

学生答应说：“好！”

接着，学生问：“丁莱夫是您亲自派到广播局的吗？”

周恩来：“不是，不是。我一个人怎么能决定派谁呢？”

同学问：“是谁派的？是罗瑞卿派丁莱夫到广播局的吗？”

周恩来："这个我不太清楚，是中央决定派人，具体是总政治部干部部派来的，派谁由他们管。"

同学问："您是什么时候认识丁莱夫的？"

周恩来："他到广播局后，我才认识他的。"

这时，张春桥、姚文元已赶到广播局，是晚上23时。学生们纷纷向张春桥、姚文元讲述索要材料的经过。随后张春桥问国家广播事业局副局长李哲夫：

"你听到军委指示后怎么办的？你们什么时候传达的军委指示？"

李哲夫："正式见文件是5号。是十月十几号传达的，具体哪一天，我记不清了。是丁莱夫同志传达的。"

张春桥："什么时候传达的，你记不清了，你们记性怎么那么坏？"

姚文元："你们有些事情我们却记得很清楚。"

李哲夫向张春桥、姚文元汇报事件的经过，这时，姚文元先出去与聚集在院子里的学生们见面。

姚文元在广播学院的学生和广播局"战斗团"组织的陪同下，从广播大楼里出来，陪同他一起出来的广播学院学生对等候在院子里的同学们喊：

"同学们！姚文元同志来跟大家见面了！"

院子里顿时响起同学们和广播局“战斗团”组织群众的热烈掌声和欢呼声。

姚文元说：“同学们！我们是来支持你们革命的！”

大家纷纷涌上来跟姚文元握手，争相述说广播学院的情况。

姚文元：“广播学院的情况我们有所了解……”

“我们几次来向他们要‘黑材料’，他们不给！”同学们述说广播局丁莱夫派工作组整学生材料的情况。

姚文元：“广播学院不仅是‘黑材料’问题，还有别的问题。”

同学说：“姚文元同志，您不知道学院现在的情况……”

姚文元：“广播学院不是贴了我们的大字报吗？我们怎么不知道呢？不是有人还要造江青同志的反吗？”

同学：“姚文元同志，希望你们到我们学院来了解情况。”

姚文元：“我们是要去的，不过现在没有时间。同学们！跟大家商量一下：你们留下几个代表，我们一起来处理今天这个事，今天时间已经很晚了，我看其余的同学都回去，大家同意不同意？”

同学们说：“好！同意！”

姚文元指着警卫战士对学生们说：“你们不要责怪他们，他们是执行任务。”

他又对警卫战士说："你们要理解他们的心情，要理解他们的行动。"

这时，还有很多拦在广播局院子外面的学生爬在门上喊："姚文元同志！我们要进来！你要他们让我们进来！"

姚文元与警卫人员商量，这时，中央广播事业局副局长王寿仁走过来了，姚文元跟他商量："是不是让他们进来？"

王寿仁对警卫人员说："那就让他们进来吧。"

大门打开。门外的同学们兴冲冲跑进大门，与大楼内的同学汇合，而后就纷纷上了汽车。广播局"战斗团"的一位女队员对姚文元说："希望中央文革也关心广播局的运动情况。"

姚文元："好，好，这些事我们以后再谈。你们也要支持他们的行动嘛。"

汽车开动了，广播学院的师生唱着革命歌曲，乘车离开广播局大楼返校，姚文元鼓掌挥手送走他们。

会议室，张春桥、姚文元和学生代表及王寿仁、李哲夫等广播局的人继续会谈。

张春桥问："你们的材料烧过没有？"

李哲夫说："没有。"

学生们不同意李哲夫的说法，他们说："有，你们的组员有烧的。"

李哲夫继续汇报他们传达军委《紧急指示》的过程。

张春桥："传达晚了，你说是丁莱夫，那就由丁莱夫负责。你们订立执行方案没有？"

李哲夫："没有。"

张春桥："你们到学院传达过军委指示没有？"

李哲夫："没有。从我们撤离后，就没管过。"

张春桥："军委指示来后，未去传达。你们研究过怎么办？按你理解怎么执行？研究过方案没有？传达后，你们应该研究工作组应该怎么执行。这个指示和你没有关系吗？"

姚文元："在9、10月份你们办些什么？和学院有联系吗？"

李哲夫："没有。"

张春桥："怎么执行，党委讨论过没有？有无执行方案？"

李哲夫："不知道。"

张春桥："你是党委委员吗？"

李哲夫："我是。我参加的会，没有讨论过。我经常出去。"

张春桥又问王寿仁情况，王寿仁说："我们党委会学习过一次。"

张春桥："制定过执行的具体办法没有？"

王寿仁："4个人参加了，领会文件不透。我去问一下，对这件事

情不清楚。”说完出去了。

这时，在阻拦广播学院学生冲进办公室时，在屋里的一名被广播学院学生打了的广播局政治部的女干部递条子给姚文元，上面写着：

“我是受迫害者，我是被打的，希望首长不要听一面之词，全面了解情况。”

她见张春桥和姚文元没有理会她，就出去了。过一会儿，她又进来说：“我想跟首长谈一谈。”

姚文元说：“时间不早了，我们是专来解决材料问题的，明天还有事情，你写成书面材料好不好？”

她坐了下来。这时，支持广院学生的“战斗团”也有两人递上一张条子，上面写道：

“张春桥、姚文元同志：广播局问题很严重，针插不进，水泼不进，希望中央领导同志调查。”

姚文元便和写条子其中一名女干部谈了起来，并接过他们送上的两份文件说：“我们拿走，回去看一看。”

张春桥接着问李哲夫：“领会不透，你们向中央请示了没有？跟群众商量了没有？问问同学怎么办。”

李哲夫没有说话。

张春桥接着对李哲夫说："根据你们说的，你们第一不上报中央请示，第二不同群众商量。如感到没办法，一请示上级，二与群众商量，两头都不问，那算什么？"

李哲夫急忙解释说："我们向市委请示过。"

张春桥："你们什么时候才请示？他们找上门来才请示。这个指示是比较原则，很多地方纷纷打来电报，说：'难以贯彻'。你们领会不透，也不上报中央。当时学生普遍感到有压力，反映这一条。我们写指示时，想得比较简单，认为同学自己写的检查交给本人，其余的全部当众烧毁。我们自己没当过工作组，没干过工作组的事，所以我们不知道整理过多少种材料，没想到这么复杂。后来我们发现有同学互相写的，比如我写了你的，你写了他的。如果不知道还好，知道后宽宏大量的还好。但是年轻人嘛，知道后就说：'你整我的材料，你是什么？'这样知道后，会引起群众斗群众，写材料的人大都属于对党对社会主义的爱护。这样解放了一批人，又有一批人背上了包袱。自己写的检讨退回本人。还有些材料，如工作组长讲话，也交给大家。其余材料先封存，以后烧掉好，免得引起新的纠纷。以后再也别搞这些，同学间有意见，可以正常进行批评。"

同学代表问："有人整理的材料还没交出来，怎么办？"

张春桥："没交出来的，先不要搜，免得同学不好团结，等他们觉悟了，他们会交给你们，或者自己销毁。"

同学说："有人还整理材料，并且扬言'后会有期'。"

张春桥："这是工作组的遗毒，不要把矛头指向那一派。你们一直叫少数派就不光荣了，当你们孤立时我们支持你们的，当形势变化了，你们应从少数派变为多数派。对那些同学要做工作。对工作组存在分歧不是一天，青年学生处在变动时期，如跟着跑就坏了。你们更容易受外界影响，还需要与工农兵结合。我们比你们年岁大一点，也是这样，有个时候，全国各地来电报都是说：'红卫兵尽干坏事、打人、闹事。'我们听了，也要考虑两天，要是不坚定，有一点动摇，就会犯错误。"

姚文元："同学们和我们座谈，讲有人要秋后算账，这样有人担心被打成反革命，到现在也不敢说一句话。"

张春桥："这是一个祸根，军委指示就是为了消除祸根，使大家能解放出来，共同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开始我们想得简单了，后来就决定发一个补充的，但认为用中央的名义，就不能匆匆忙忙地发，发了个补充，再来个补充，所以一直没有发。关于工作组作的公开报告，有利于批判反动路线，拿出来批，其余的封存起来，烧掉，免得以后再斗起来，这是初步想法。"

姚文元问："你们有个姓陈的跳楼是怎么回事？他们斗了这个人？"

李哲夫："我不知道。"

姚文元："你们干的什么事，我们都知道。"

同学代表说："有人让中央文革小组到我院作检查。"

张春桥、姚文元笑了。姚文元说："我们是准备要去的，贴了我们的大字报，我们已经看到了。广播学院的情况我们有所了解，广播学院不仅是'黑材料'问题，还有别的问题。贴了我们大字报，我们怎么能不知道？不是有人还造江青同志的反吗？我们是要去的，不过现在没有时间。"

同学反映："《红旗》十三期社论发表后，出现了第三种意见，一手打倒'临革会'，一手打倒'代表大会'。"

张春桥、姚文元又笑了。张春桥说："其实还是两派。"

张春桥又把话题转到"黑材料"问题上来，他批评李哲夫没有立即落实中央军委的《紧急指示》精神，李哲夫说："我们整了6个人的材料，已经给他们了。"

同学代表不满意，说："别人的也整了，有人看见有的组员已经销毁了。6个人的材料，你们交出来还后悔吗？"

李哲夫："我们再让组员找一找。交出来。

张春桥问李哲夫：“学院你们管不管？”

李哲夫答：“不管。”

张春桥说：“各个学校分别各部管，不行的话找哪个副总理管，现在总理很忙，我们担心他身体支持不了。你们再问一问中央。你们应该勇敢担起来。错就检讨，改正可以成好干部，这样不改就成问题，改不改头一条就看平反。《红旗》14期社论讲得很清楚，区别改正错误或坚持错误的标志，是对群众态度，是否公开向群众承认执行了错误路线，是否给被打成‘反革命’，‘反党分子’，‘右派分子’，‘假左派，真右派’的革命群众认真平反，公开给他们恢复名誉，并且支持革命群众的革命行动。如果你是真正的共产党员，就勇于改正，同学们会欢迎你们改正错误。广播局党委也应当督促他们把材料搞好。”

王寿仁连忙点头说：“是，是，是。”

张春桥：“同学们一块学习，过去说了那些错话，交给同学批判。你们（指李哲夫）帮查一查档案。不能把材料往档案里塞，凡是从文化革命开始，从6月2日算起吧，塞进档案的都不好，一是个人写的，或别人写的，一块取出。”

李哲夫向张春桥汇报他们执行的具体做法。

张春桥：“别这样详细的说了吧，我们很忙，封材料的事，你们双

方解决吧！我们就不参加了。”

王寿仁忙说：“还有什么指示？你就下吧！我们坚决执行。”

张春桥：“我们不是来下指示的，我们是来督促你们执行中央指示的。”

同学代表：“广播局对我们少数派不平等。”

张春桥：“在组织上，经济上应该平等。”

李哲夫：“是，是。”

张春桥：“至于在政治上嘛，倾向于谁，我就不好说了，你们自己决定。我们彼此之间是很了解的。”

接着，张春桥把同学叫到一块说：“我们一点也不责备你们，我们怕你们上当，怕你们吃亏，我们听到后，立即就来了。”

姚文元：“有人故意把材料从保险柜中拿出来，然后引同学翻，这样诬蔑同学抢档案，我们怕你们被动。”

学生们边和张春桥、姚文元说着，边往外走。走到门口，刚才那位递条子的女干部和另一位干部，要求张春桥、姚文元一定要到政治部干部处办公室现场看看。

张春桥：“不去了，时间很晚了。”

那位女干部坚持要他们去……

姚文元：“好吧，我们不去看，你们下不了台。”

张春桥生气地说：“去，去。”

张春桥、姚文元转身往政治部走，这时王寿仁连忙挡住去路说：“不要去了，不要去了，首长没时间。”

张春桥、姚文元和大家一块走下楼。

11 月 3 日上午 10 时 10 分，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登上天安门城楼，第六次接见红卫兵。

1966 年 11 月 3 日毛主席、林彪、周总理、陶铸、陈伯达接见红卫兵

林彪讲话后，10 时 20 分，搭载红卫兵的 6 路卡车队开始缓缓地通过天安门。事与愿违，这种接见方式很不理想。搭载红卫兵的 6 路卡车队，未能像演习那样顺利地通过天安门。因为当卡车进到金水桥时，车上的红卫兵都争着要看清毛泽东，车厢南面的人拼命地往车厢北边挤，

任凭广播员怎么劝说，他们都不听。这样，卡车载重失去平衡，时有翻车的危险，司机只好再放慢速度，不能按计划行进，致使整个接见时间延长，直到下午 15 时才结束。

毛主席在天安门上接见日本毛泽东思想研究会负责人西泽隆二

接见时，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曾慢慢转过身，与刘少奇交谈。他问刘少奇：王光美和孩子们的情况，刘少奇做了回答，并向毛泽东表示："现在文化大革命起来了，我也要到群众中去锻炼锻炼。"

毛泽东说："你年纪大了，就不要下去了。"

他们谈了很长时间。

在休息室，刘少奇碰见邓小平，问道："小平同志，你怎么样？"

邓小平到爽快："横直没事。"

刘少奇也说："没事，学习。"

第261回：“新运会”，运动员出国风波　齐动员，要打掉骄娇二气

这时，参加第一届亚洲新兴力量运动会的运动员即将出国。体育学院和体委的少数派认为国家体委负责人荣高棠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不同意他带队出国。

11月2日下午，国家乒乓球队、游泳队、羽毛球队、体操队召开“出国誓师大会”，邀请贺龙、荣高棠出席大会。

第二天，11月3日，体委多数派的出国运动员又到国务院请愿，要求荣高棠和他们一起出国。

11月4日，参加第一届亚洲新运会的运动员上车出发时，一些多数派的出国运动员坚持说：“不让荣高棠出国，我们就不上车。”并再次到国务院请愿，要求荣高棠出国。

当晚，周恩来、陶铸、贺龙、陈毅一起接见参加第一届亚洲新兴力量运动会全体人员。

陶铸主持了大会，他说：“今天是给你们送行的。请总理作指示。”

周恩来点了梁丽珍、倪志钦、庄则栋、陈满林、郑凤荣等几个优秀运动员的名字后说：“徐寅生，你到过我们国务院吗？贺总昨天那么紧张，你们还去了！

我们第一是送行，壮哉此行，为国争光，为毛主席，为社会主义争光。我们是新时代的国家，毛主席时代的祖国。这是光荣的任务，应该送你们。有4位政治局委员送你们，还说不重视？

第一是欢送，因为你们出去，要好好完成这个光荣任务，用徐寅生写的那篇文章对照，好好地活学活用。贺龙，江青同志推荐，毛主

席亲自批示，我也读了，不是很光荣嘛！你们过去做出了出色成绩，很光荣，今天有责任把这个成绩再不断提高。要联系到比赛，联系主席的增强人民体质，联系到主席的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指示，要站得高，看得远。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心胸更应宽大，要胸怀祖国，放眼世界，学王杰，有一颗火热的心，贡献出全身的精力。我感到你们这次责任大，任务重，你们应比我们站得更高，看得更远。完全没有想到，你们昨天提这么个要求。我们首先对你们希望很高，一时没想通，落后了，是暂时的，这可以改。首先要完成党和国家的任务，不要有私心杂念，有个小小的个人得失，就应排除。所以今天临别赠言，是不仅像过去所说的要胜不骄，败不馁；还要胸怀祖国，放眼世界，献出火热的心；要浑身是胆，发扬“五敢”的精神，才能战胜。我们是社会主义祖国，是毛泽东思想指引的祖国，正在搞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我们没有想过不让你们去，我们中央一致通过，没有不同意见，一直信任你们，相信你们会完成任务。你们曾经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响应了林总的号召，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在用字上狠下功夫，立竿见影。为什么我们这样信任你们，你们却这样有一点自暴自弃？希望这是一时错误。如昨天毛主席接见大中学校百万红卫兵，越南同志还去看乒乓球表演，这不仅是尊重你们，也是尊重祖国的体育界。这次是面临着国际斗争任务，这个任务应该是讨论的主题。前天陈总接见，我想来，忙，没来了。今天逼我来了，不让来也得来。你们不能像红卫兵那样不见就大闹。

没想到在国内多数、少数，激进、保守发生分歧，你们想出气。

不对，为什么这样？庄则栋、李富荣、郑凤荣、徐寅生，你们为什么要出这个气？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考验每个人。在座的能说我们没犯过一个错误？我们几个也都是这样。这样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文化大革命，哪个没有错误？为什么要出气？搞得不清不白。把贺总也请来了，把贺总给拉下水了，对不起老同志。最近有人到贺总家请愿，不走，跟老总磨，争面子，这样做不对。昨天在天安门接见红卫兵，早晨7点到晚上7点，一天12小时，从天安门回来听到这个情况，心里非常不愉快，我马上找黄中，李梦华来我这里。老实说，我对你们有看法。”

周恩来接着说：“誓师大会时还让贺总去。听说荣高棠不出国，你们就不去，我一听就以为荣高棠搞的鬼。我对熟悉的同志要求的严，我了解荣高棠，他有许多短处，突出政治不够，原则性不高，政治性不强，还有些迎合。我怀疑誓师大会是他搞的，要批评。这种作风怎能允许？原来考虑荣出国，现在看来不能出去。政治局常委讨论时，我要提这个问题，我不能答应你们的要求，相反要责备你们。至于学校揪工作组，互相争论，对荣高棠有意见，……但国家体育队不能像学校一样，把观点带到体委来。你们不能有私心杂念，不能这样想。徐寅生不是有文章吗？为了国家，为了人民，就豁出来了，一想到个人，精神紧张，手就软了，要向欧阳海、蔡永祥、刘英俊学习，不能与那一派纠缠在一起。这一派不让荣出国，我就支持荣出国，你们立场站错了，就是有私心杂念，这就是个人出气。

过去出国，就没有搞过誓师大会，这次搞了，搞到体育馆来，又

请了各派，还有外地革命师生。应学习红卫兵敢想、敢说、敢干的精神。不能这样搞，搞得这么乱！一个统一的国家体育队，这样不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而是相反。昨天我就与黄中、李梦华谈了一个多钟头，为什么这样关心？原来我想的与这差一大截，没想到你们思想这样落后，我大吃一惊。

在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立场没站好，这与领导有关，你们身上没有官气、暮气，有骄、娇二气。我深深想了一下，就是第一届新运会得胜了，几次乒乓球得胜了，骄气增长了，娇嫩气也有了。这次文化大革命红卫兵对你们有意见，一部分意见是对的。过去体委，北京市，上面对你们有些放纵，教导不严。我还请你们吃过饭，陈总也请过，我也有责任，今天要挖根子，我们进行自我批评，否则怎么能有说服力呢？对你们是负责的，支持你们，同情你们。你们还年轻，毛泽东思想还没生根。徐寅生有一篇文章之后，就没有错误了吗？有没有？你们这些符合不符合毛泽东思想？”

徐寅生说：“不符合。”

有人插话说：“徐寅生不出国。”

周恩来：“不出国，想通了写篇文章，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还要写一篇短的东西送行，鼓励鼓励他们，《人民日报》，哪个报社都可以登。这是给徐寅生出两个难题，看你们毛泽东思想举得高不高，学得勤不勤，用得活不活，下的工夫狠不狠。不然为什么大是大非面前分不清？过去我娇惯了你们，放纵了你们，我有份，老总有份，当然直接责任是荣高棠，他是常务书记。梦华对我说，誓师大会与荣高

棠无关，因为荣高棠同志是早晨刚刚出来。即便荣不知道有这么多人，也是荣放纵的。你们知道他会支持，你们才敢这样做，甚至把老帅也拉出来了，把外地革命师生也弄来。还要请我去，我没功夫。开誓师大会弄四、五千人为什么？这就是对付另一部分不赞成荣出国的同志，向他们示威。对象搞错了，应向美帝、苏修、东南亚和印尼反动派示威，怎么能向红卫兵、同学示威呢？你们不应这样。同学们讲的还是有道理的。

我告诉黄中、李梦华，不管是荣高棠知道不知道，他都要负责任。你们谁也不能驳倒我，你们有意见回去可以贴大字报，留一张大字报也行，我等你们一分钟，当然这是‘将军’。我很难过，我不是不器重你们，为什么不能辨别大方向，责任是在领导，首先直接在荣高棠，不应该养成你们的娇气，应该立即改。

文化革命才是开始阶段，时间长，你们回国后，要学会在斗争中学会斗争，在游泳中学会游泳。怎么把出国问题与荣高棠问题搞在一起？出去不出去，运动员都是为国家，不是为他。这样做造成一种风气，带有私心，个人主义感情。我们要有无产阶级感情，为绝大多数着想。去比赛应去掉这些想法，到广州你们再谈一谈。

总之，不多占时间了，你们要休息。今天点了几位运动员的名字，因为熟悉一些，不光是他们的责任。今天看了你们几个队的信，这封信是你们共同拟的吧！说明你们认识有改变，我很高兴。昨天这个请愿，我完全不同意。誓师大会，请愿不好，改了就好，‘君子之过，如日月之蚀’，只要改了，就是好的。林总说：年轻人可以改。你们

也意料到这样责备你们吧！一时错误，你们中没有人超过三十岁吧！还是红卫兵的年岁。林总还说：我们不要犯错误，要保持晚节。活到老，学到老。对你们是允许犯错误的，这是教训。体育队是为增强体质，备战备荒为人民，不是为个人荣誉，不是为锦标；是为集体，为阶级荣誉，要一切为人民为国家，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要学习‘老三篇’，专门利人，毫不利己，这样思想就会前进了。徐寅生不出去可以写一点东西，出去的也要突出无产阶级政治。毛泽东思想挂帅，要注意劳逸结合。错了只要改就可以，责任由体委领导负，我们负，减轻你们负担。你们要真正全心全意为人民。一心一意去争取胜利，在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指引下争取胜利，做好团结，友好工作，做好斗争，争取胜利。

荣高棠不出去，你们就不去，不对。他们可以提出荣高棠不去，你们也可以提荣高棠可以去，但不上车不对。誓师大会，请愿，红卫兵对你们有意见，是有道理的，要挖错误根子。不是偶然的，是必然的，不在这事上就在别的事是表现出来。把公与私混在一起了，我们坚决反对。”

陶铸接着说：“到北京不久，管体育未管起来，昨天才开始管。总理的话，语重心长，同志们昨天晚上已传达了。出点错，犯点错就改。林总说‘朝令夕改’嘛！我们今天加速送行，原来迟了。你们开誓师大会，请愿，不算了，今天再送行。把个人的问题抛开，为党、为人民着想，什么都想得通；否则什么也想不通。背着包袱搞运动不行。总理听了很难过，因为是想不到的，意料之外的。问题解决了。

总理给你们送行。好好把思想总结一下，不要背包袱，要兴高采烈。你们有包袱没有？同志们还是有觉悟的，出这么个问题，讲完就完了。走时要想想总理为什么这么讲。”

陶铸又举了钱学森和红线女的例子说：“一不为名，二不为利，三不怕苦，四不怕死，一心一意为人民。讲两个故事。导弹实验有个科学家叫钱学森，夫妇两人都是科学家，在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把保姆给赶走了，他老婆上街买菜，生活大大降低，未影响情绪，保证了导弹实验。另一个是红线女，在文化革命中把头发剪掉了，挂牌子，坐卡车游街，扫街。她革命是买来的，给她高薪，洋房，汽车，现在降到每月400元，还是很高的。现在看来有希望，香港来了一些人访问她，毫不埋怨，情绪很高。”

他说：“出国的体育队，不应有多数和少数的概念，回来再说。出去不要为文化大革命抹黑，昨天黑一点，手巾一擦就没有了。出国不出国完全是国家的权利，你们向国家负责行不行？黑龙江省委书记揪住不放，我说不放也可以，你把军事生产都管起来！但又说管不了，就把省委书记放出来。荣高棠不让他出国，因为体委有路线错误不检讨，你们可以提意见，出不出国由中央和毛主席决定。原来想把两条路线搞搞，承认错误，当时可以考虑。问题是这么样就走了，你去就胜利，不去就不胜利，那还叫什么体育队，谁领导都可以，只要不是右派，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贯彻毛泽东思想就可以。原来打算叫去，想开幕式，闭幕式去一下，很快就回来，现在更不能去了。我们和他做工作，他不觉悟，而且搞得这样复杂，一点觉悟也没有，走了

怎么行？

你们代表国家，不是代表个人，荣高棠你们熟悉点，私人感情好点，但不能从感情考虑，今天决定不是少数派的意见。特别是在中央工作会议以后，继续犯路线错误，自己不好好改。今天一五一十讲清楚，没有保留。”

随后，贺龙讲话。他说：“首先，工作我未做好，昨天想了一个晚上，你们一个同志拍了桌子，火气不小，把我吓住了，把矛盾上交了。高棠有高棠的责任，我有我的责任，总理、陶铸同志的指示要想想，要从根子上挖。是两条路线的问题，一条是毛主席教导的，听党的话；一条是资产阶级的，不从这个根子上挖不行。谁反对毛泽东思想，谁反对毛主席，我就反对谁，是这样一个问题。前天开誓师大会，接了请帖很犹豫，未问清楚，本来出国有几百人，讲讲话，一去看到一礼堂人，知道糟了，要我讲话，我就不讲话了。不该开的会，错误的会。”

陶铸插话：“放荣高棠同志回去开三级干部会，结果开了誓师会。”

贺龙：“我不叫荣高棠讲话，他讲了话，而且慷慨激昂！”

陶铸：“他不应该去。”

贺龙：“要争国家输赢，阶级兄弟有话好讲。坚决执行总理的指示，到金边还要讨论，要转得过来，要转九十度。”

陶铸：“飞机上就要转过来，不然怎么打好球？”

贺龙：“不转过来，球打不好。你们昨天是‘私’字，不是‘公’字。前天这样做对荣高棠没有好处，加重了他的错误，他认为有人拥

护他。不转不行，一个是资产阶级，一个是无产阶级。一定要转，一定要讨论。黄中、李梦华、赵正洪要负责。赵正洪你可不要阳奉阴违呀！干部首先要通，跟毛主席走还是跟哪个走？有‘私’，和荣高棠有私情，打扑克，打台球，打麻将……，不是为毛主席，为共产党。总理管这么多事，把矛盾上交，我也很痛心，就是罢工嘛！不转不行，今后我参加你们的会议。”

陈毅也讲了话，鼓励运动员“全心全意地争取金边比赛的胜利，为民族，为国家，为党，为毛主席争光！”

陶铸：“《体育报》不是封闭，需要整顿，是总理批准的，是暂时停刊。报办得不好，检查一下宣传毛泽东思想好不好？高举毛泽东思想够不够？没有革命的思想就不能办好报纸。不光《体育报》，《北京日报》，《中国青年报》，《健康报》也都停刊了嘛！”

## 第 262 回：渐失控，武汉市群雄纷起
## 抢材料，七机部两派冲突

由于王任重患有肝病，中央工作会议前每日发低烧，陶铸见状十分着急，给毛泽东写了报告，建议王任重辞去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职务，仍回中南局工作，首先是让他治病。毛泽东在报告上批示：“王任重同志是文革小组副组长，要离开文革小组，请政治局和文革小组开个联席会，对任重提提意见。”

中央工作会议结束后，王任重即往海南岛养病，远离了北京的喧嚣。

进入 10 月以后，武汉的文革运动基本跟上了北京的脚步，湖北省委对本地区的文革进程也渐渐失控，各种群众组织蜂拥而起。

10 月的武汉水利电力学院，对造反派学生来说，犹如节日的狂欢。他们自己装的广播，天天播放出慷慨激昂，时时又带着冷嘲热讽的批判文章。走进学生们称之为“革命造反楼”的 6 号教学楼，就像走进了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巴黎市政府，也像十月革命时俄国彼得堡的斯摩尔尼宫，里面人来人往，表情严峻而神圣，来去都急急匆匆，似乎他们每个人身上都担负着国家和世界的前途与命运。6 号楼的大阶梯教室，就像当年法国各派争吵的“国民议会”，天天都有许多人在那里争辩着新的话题，阐述各自对毛泽东的论述、中央文革

的精神、北京报刊的社论、文革形势的理解，就连院党委一手培养出来的骨干，院团委的主要干部，和一批学生的政工干部、政治辅导员，也加入了造反派的行列，并成了一批核心人物。这些学生多么希望通过这次大革命，能够在中国诞生出一个比历次资产阶级大革命和俄国十月革命后出现的政权更加民主和革命的政权！他们坚信，在他们无限崇拜的伟大领袖毛泽东的领导下，他们正向着这个目标迅跑，他们为自己能够成长在这样一个伟大的时代而感到幸运和自豪。

10 月 26 日，武汉地区几个大学的“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成立了“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武汉地区革命造反司令部”，以后被简称为武汉“二司”，以区别于 9 月 12 日由湖北省委支持和组织的“一司”，即“大专院校红卫兵司令部”。“一司”成立那天，按照省委议定的安排，主持湖北省委工作的省长张体学参加成立大会，并穿着新军装乘敞篷吉普车，学习毛泽东的样子，检阅了红卫兵学生。此事后来遭到“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和许多中学红卫兵造反派的指责，说张体学这样做是有野心，想模仿领袖、超越领袖，他因此受到了批判。

“二司”成立之日，湖北省委也派人参加会议表示祝贺。

“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是武汉学校中较早起来反对党委的少数派学生组织，最早出现在华中工学院和湖北大学，其

中以华中工学院人数最多。原来学生们是准备推选华中工学院的同学聂年生担任“二司”司令。

聂年生率华中工学院无线电系的部分学生参加了 9 月 2 日至 4 日北京南下红卫兵组织的在省委门口的静坐和绝食行动，并随他们进京告状，于 8 日受到陶铸的接见。

从北京回来后，聂年生在华中工学院串联和组织成立了“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新华工革命造反司令部”，并推荐原学生会主席团成员郭保安任司令。不久，他又组织了赴省委战斗兵团：“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新华工总部驻省委战斗兵团”，率先杀向社会，在武汉市形成极大的影响。“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新华工总部驻省委战斗兵团”后改为“新华工红色造反团”，简称“红反团”，人数不多，仅 192 人。

“二司”就是聂年生首倡和筹建的，其他几个学校的同学分别担任副司令，实行常委学校制。但由于湖北大学那天来开会的人数不多，只给了一个常委学校的位置；华中工学院则因为由谁出任“二司”司令一职，意见分歧没有到会，于是，这个武汉地区“毛泽东思想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司令一职就由武汉测绘学院的杨书贵同学暂时代理，因为杨书贵是中共党员，在那个注重阶级、出身的年代，党员的牌子是很响亮的。“二司”司令的位子仍对聂年生虚席以待，等华中工学院内部意见统一后再来出任。

杨书贵就是杨道远，他于 1966 年 8 月 31 日参加了毛泽东在北京对红卫兵的接见。这次接见和北京文化大革命的激昂情绪极大地感染和激发了杨书贵的革命斗志，他决心要紧跟毛泽东主席革命到底。回到武汉，他就仿照北京的模式，在武汉测绘学院组织了“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和 1789 年的法国巴黎大革命一样，那时风行改名，“书贵”者，有“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之意，显然不革命，他响应毛泽东勉励年轻人的号召：中国和世界革命“任重而道远”，遂改名“道远”。

武汉“二司”成立后，杨道远为解决“二司”办《革命造反报》需要的经费、交通和印刷问题，找到张体学省长，张省长二话没说，当场交给杨道远一个存款折子，对他说：

“这是无限存款取款折，每一次最多只能取到 300 元钱，但是随时取都行，每天不论你取多少次，只要每次取款不超过三百元就行。”

当时一名工人的月工资也不过 30 元左右，300 元钱在那时可是一个大数，可以办很多事情，“二司”的学生们十分满意。

第二件事是交通，张体学二话没说，立即通知省政府车队指定一辆英式吉普车作为“二司”办报的交通工具。这也是件了不得的事情，那时候，很多县长还没有一辆吉普车呢。

关于印刷问题，张体学说：

“我已经交代下去了，你们的报纸就在湖北省印刷厂印，一切费用由省政府结算，不用你们费心，你们只负责办好报纸，宣传毛泽东思想。” 杨道远自然十分满意。

正事办完后，张体学非常亲切地拍着杨道远的肩膀说：

“你们是革命小将，世界是你们的，我们这些人不行了，跟不上形势了。国家的前途就在于你们这一代了。”

杨道远的名字和原湖北省委书记王任重的名字正好可以组合成“任重道远”的成语。从此后，武汉的局势就不是“任重”，而是“道远”了。

文化大革命这场规模空前的社会运动，彻底搅动了中国社会，历史延留下来的根根绊绊、矛盾纠葛，都乘机沉渣泛起，各个不同境况的人群，都希望在文化大革命的旗帜下，在革命的站队和语汇里，重新找到自己的位置。造反派就是在批判“资反路线”的旗帜下集结起来的力量，就是对当权派用抓反革命、抓右派或者纠缠历史问题为手段，而行排斥异己之行为的不满。

11 月 2 日，湖北省传达中央工作会议文件精神的三级干部会议在洪山礼堂召开，一批“二司”红卫兵试图冲进会场，宣传关于批判“资反路线”的精神和要求旁听传达，被工作人员和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劝阻，陈再道进而向红卫兵表示：如果省委还执行错误路线，他将和红卫兵一起造反“砸掉这个门”。

多数派的舆论则立即抨击“二司”这次冲击会议的粗暴行为。

11 月 4 日，武汉各大学的“东方红”序列“红卫兵”，成立了“武汉地区红卫兵第三司令部”。其成员很多是被学生称之为“苦口婆心、‘高瞻远瞩’、婆婆妈妈”的那些怕学生犯政治错误的老师组成。他们和“一司”不同，是群众自发成立的，不是官办的。但又处事稳妥，不像“二司”学生那样激烈。他们提出：同意“二司”的观点，不同意过激的作法，“凡事应该等待中央表态后再行动”，是比较典型的中国知识分子缩影，因此被戏称为“改良派”、“康派”、“康老三”，即康有为。他们在学校和社会上也展开了批判“资反路线”的活动，矛头也是指向原省委书记、现任中央小组副组长、中南局第一书记王任重和正在湖北省委主持工作的张体学。

由于北京邮电学院“东方红公社”提出要罢陶鲁笳官，11 月 5 日，戚本禹接见了他们的代表。他在接见时说：

“关于罢陶鲁笳官的问题，北邮转抄师大‘井冈山战斗团’的记录不确切。其它的记录是这样的：群众喊‘要求罢陶鲁笳的官’，我说：‘重要的不是罢官，重要的是要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邮电学院斗了很多革命同志。这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造成的恶果，这是与工交系统陶鲁笳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

线分不开的。不仅邮电学院这样，陶鲁笳所领导的地质学院等院校也都是这样。革命同学反对这条路线，是做得对的，在反对这个错误路线过程中，提出对以谭力夫为代表的思潮进行批判是必要的，对执行这条错误路线的批判并不是群众斗群众。”

“受错误路线蒙蔽的同学，只要认识了自己的错误，站到正确的立场上来，我们就要很好的团结他们，不要叫他们修正主义红卫兵，因为这对团结多数很不利。”

11 月 5 日下午，陶铸在国务院接见了北京医学院“八一八”红卫兵、“工农兵”红卫兵、“长征”红卫兵和医大“红旗”公社的 6 位代表。午夜以后，陶铸的秘书到国务院的西门外向北医和医大等学校在这里等候的同学传达了陶铸在接见代表时的讲话要点：

（一）今晚我刚从外边回来，听到你们要求接见，现在 6 位代表接见了。昨天找了孙正（国务院文教政治部副主任），张孟旭（文教办公室主任）听他们汇报了情况，委托他们向同学们谈话。今早以为大家走了，晚上回来才知道没走，大家等了两天两夜。

陶铸的秘书解释道：“陶铸很关心大家的健康，并且这里还有很多女同学，现在他让大家回去。”

（二）要求见面的问题准备在 12 日以前，卫生部门召开了一个会议，钱信忠、张凯同志准备作检查，陶铸同志到场，

你们大家都参加，今天到这里的同志全体参加，不多一个，不少一个。

（三）关于罢官的问题，同志们完全有权利提，我完全有责任听，并向中央反映，最后由中央决定。中央9月27日已经决定撤钱信忠卫生部党委书记的职务。现在由孙正同志担任新的党委书记。党委改组的问题同志们完全可以提，卫生部党委要不要改组，如何改组，中央要进一步考虑。今后整个卫生部文化革命的领导，主要由孙正同志负责。凡是同学们所有的革命行动，孙正要坚决支持，孙正如果不革命，大家可以造他的反。

（四）关于向卫生部要材料的问题。

（1）陶铸认为根据中央军委指示，同学们向卫生部要材料是革命的行动。

（2）11月3日发生的争执（指北医，医大同学向卫生部要黑材料，从而和卫生部部分群众发生的一场武斗）主要责任在卫生部，不在同学们。

（3）方向问题，比如打开窗子，柜子等，这是卫生部逼出来的。但这样的方法以后不要用，不要宣传。

（4）已经拿到的一些材料，按中央有关规定处理，有的退给本人，有的作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材料，有的销毁。还没有拿出来的要交出来，中央有详细的补充规定，传达下来以后，按新的规定办。

（5）要求总理接见的问题，全国只有一个总理，总理已经60多岁了，我们应该爱护总理，大家不要见总理了。

11月5日晚上，七机部三院因抢“黑材料”发生纠纷。第二天，李富春接见七机部“916”联络站前来告状的代表。他说：

“七机部在文化革命中犯了方向性、路线性的错误至今还没有很好的纠正，……”

“凡是过去被压制的打成‘反革命’、‘反党分子’、‘右派分子’、‘假左派，真右派’在文化革命中戴了帽子，一律恢复名誉，部院党委应采取坚决措施，凡是不管什么方式戴的帽子，一定在部院、部所厂各级大会上公布进行平反，……凡在文化大革命中所有的材料、大字报，排队名单……一律封整齐，由部党委负责，院党委采取措施，所室封起来，听取中央指示处理。希望昨天晚上发生的事情（指抢三院的一些材料问题）不要再发生了。”

“一周后，我希望每个观点的一、二、三、八院的群众，平等待遇，各派15名代表来这里辩论两天。”

“在这一周内，部院要好好学习文件，积极采取措施，认真平反，把材料封起来，不准再烧。”“但不准扣帽子，不能喊空口号。”

李富春问七机部部长王秉璋：“这样行不行”，

王秉璋回答：“好！好！好！”

“916”代表问：“昨天发生的事情，是不是革命的行动？你结论一下。”

李富春说：“我不作结论。”

“916”又有人说：“王部长也可以结论。”

李富春说：“我支持不支持，看了后再结论，但不能说群众的这个行动，是反革命的行动。”

王秉璋跟着说：“是不能这样说。”

“916”一人指着王秉璋说：“你刚才干吗不吭气？”

李富春对七机部三院5名复员转业军人说：“你们5位同志回去要注意，不能说他们是反革命行动，因为这个行动有几百人参加了。”

第二天，11月7日，七机部“916”代表的对立面——“915”又找来了。李富春还要接见，再作解释。没办法，一碗水要端平。李富春说：

“1、抢材料，抢文化革命的材料，砸保密柜，档案室，中央是不提倡，不赞成的，这种行为我认为是过火的。昨天他们来了问我支持不支持，我说看了材料再说。对这个问题我在这里表示个态度，抢是过火的行为，中央不赞成，不提倡。同时也要看到整个北京市的这个行为，特别在院校带有普遍性，空军学院、地质、外语、体院、机械学院都发生过这种情况。我同意你们的说法，院校和你们院部情况不一样，七机部这种行为更严重，对你们七机部来说，这种行为更不

能支持，更不能提倡。

2、我们也不同意说成这是反革命的行为，因为牵涉许多人，除了被少数个别坏分子利用的，其余一般地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不能把三院701所这样一些人的行动定为反革命。……

3、七机部党委、政治部、中央办公厅三方面组成一个调查组，我们去两人，七机部党委，政治部也各去两个人到现场去找各方面的人谈话，审查被抢的材料，然后再下结论。

4、你们可以有权利继续对这件事进行批判，你们认为这个行为不对可以写大字报辩论，运用‘四大’进行批判。……”

“要学会相互商量，学会摆事实讲道理，学会相互辩论。你们是骨干分子，你们也要向916介绍情况，最后会消除群众对立的。916抢了六厂一处915的串联站是错误的，这是群众组织斗群众组织，你们可以批判。不管多数少数，除极少数外，其它都是要革命的。我们把文化大革命延长到明年2月份，还有4个月。……这次七机部发生的事件在各机械部中是个教训，其它机械部不要去参观了。其它院校的教训也很深刻，外交部副部长刘新权同志为这事被撤职了。邮电学院把材料放到武器库，以为这样就保险了，结果人家就是从这里把材料找出来了，邮电部长停职反省，搞得各部很被动。我不允许七机部再出现这类事，但必须搞两条路线斗争。有

错误的认错，跟不上毛泽东思想的，继续紧跟。”

## 第263回：“敢”字差，云南阎红彦检查
## 谭启龙，与学生进京告状

谭立夫的大字报传到了云南。9月30日，云南省省长周兴在书记处会议上盛赞这张大字报写得好，说：“谭立夫很有才干，通过运动才能出这种人才。”

云南省委第一书记阎红彦也说：“北京谭立夫讲话出名了，我们这里还没有这样的水平。”

10月12日，谭立夫、刘京等9人串联来到昆明，周兴派专人把谭立夫他们安排在二十二中。

谭立夫将他写的《告全校革命师生》交给周兴，由《云南日报》印刷。后来，谭立夫被南下学生发现，要抓他，周兴又派专车将谭立夫、刘京他们专程送往四川泸州转赴成都。

10月24日晚饭后，北京体院负责接待工作的师生告诉正在这里串联的云南大学学生：

“前些天你们提出见中央首长的要求，我们已为你们反映了。现在，我们用汽车把你们送到煤炭工业部的礼堂，到那里等候首长的接见。”

听到这个消息，云南大学的学生全都高兴极了！这是他们首次受到中央首长接见，有些回来晚了的同学，顾不上吃晚饭，就和大家一起上了大轿车。

汽车在一个院子停下。云南大学几百人井然有序地下车，鱼贯而入礼堂依次坐下后，这不大的礼堂最前边几排依然空着。他们小声地猜测会见到哪位首长？有的说可能是江青，也有的说大概会是陈伯达，有的说大约是……礼堂里到处是嘁嘁喳喳的议论声。带队的同学一看这样下去不太好，乱轰轰的样子让中央首长看了像个啥呀，于是组织大家念《毛泽东语录》，唱革命歌曲。霎时间，礼堂里满是歌声。正在大家唱得兴高采烈的时候，首长出现在主席台上了。

大家自觉地全体起立，礼堂里爆发出长时间的热烈掌声和高呼拥护文革的口号声。

经介绍，大家才知道，矮胖点的那位是姚文元，高个子的是戚本禹。他俩是受中共中央文革的委托来看望云南学生的。

主席台上除姚文元、戚本禹二人外，还空有很多座位。姚文元、戚本禹热情地招呼大家说："主席台上还有这么多座位，请大家快来把主席台上的位子坐满；后边的人往前排移，这样大家距离近一点好不好？"

大家报以热烈掌声，但是谁也没有往前排的空位移，更没有人敢上主席台去坐。

姚文元、戚本禹见招呼许久都没人往台上坐，又鼓励大家道："有造反精神的同学就请坐上来吧！有造反精神的同学就往前坐吧！"

依然没有人上前去坐，姚文元不由感慨到：“名不虚传，云南的学生的确太老实了，要是其它省的学生，我们随便招呼一声，马上就会把主席台给挤得满满的了，哪里用我们再二再三地都请不动呀！”

姚文元和戚本禹相视一笑之后，戚本禹对他们说：“有同学给江青同志写信，江青同志批给我和姚文元同志来和大家见面。”他征求学生们的意见说：“听说你们有些意见要反映，一种是开大会，有什么意见到台上来讲；一种是派代表开小型座谈会，你们看怎么样？”

众人说：“第一种办法好！”

于是就开大会，但是却出现了冷场，北京等地的造反气氛还没有影响到昆明，没有人上台发言。

戚本禹说：“我看你们的造反精神还不够，云南的大学生都很有礼貌，你们在北京见到北京的同学多了，他们的造反精神很好，别的地方都是一拥而上。”

姚文元也动员说；“我们来听意见，有什么意见来讲么！你们不是要敢想敢干吗？要敢于发表自己的意见，在台下也可以讲么！”

又过了一会儿，云南大学杨树同学上台。戚本禹说：“好，你是敢字当头。”

杨树上台谈了些自己的意见，接着，又有同学发言。最后，戚本禹对两条路线斗争的问题、要求工作组回校检查等问题做了解答。

有纸条传递上去反映大家想念毛主席、盼望能见到毛主席时，姚文元、戚本禹保证一定会把大家的心愿及时转告毛主席和党中央，大家报以热烈掌声。

也有纸条问："这次云大来的学生都是保了省、市委的，今后怎么办？"

戚本禹挥起拳头高声回答："受蒙蔽无罪，反戈一击有功！"

台下响起经久不息的热烈掌声！因为这正是大家到北京以后苦思冥想的问题啊！

10 月 27 日，昆明市邮电局第一个造反组织"工人战斗总队"成立。

10月下旬，昆明市公安局刘殷农作为机关干部，第一个杀出来在街头贴出大字报，揭发省、市委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11月3日，昆明"八二三井冈山战斗团"、云南大学"炮兵团"等组织成立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联合指挥部，并在检阅台召开第一次批判大会。阎红彦在大会上作第一次检查。准备参加云南省三级干部会的地、市、县委书记全都出席了这次大会。

11月5日，云南省委召开三级干部会议。

11月7日，“新云南革命造反司令部”、云南大学“炮兵团”等组织进驻云南省委，串连省委机关干部起来造反。第二天，昆明机床厂工人徒步从北郊走到昆明参加检阅台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省委、省人委机关也出现批判工作组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大字报，滇池畔开始反声连天。

再回到齐鲁大地——山东。1966 年 8 月初，山东大学 12 名遭工作组批判的学生，冲破学校的阻拦，乘火车直奔北京，参加了毛泽东“八一八”接见。8 月 28 日，他们在天安门广场宣誓跟着伟大领袖革命造反，成立了一个红卫兵组织，起名“鲁迅大学毛泽东主义红卫兵”，这就是后来驰名山东的“山大主义兵”。之所以称“鲁迅大学”，是因为破四旧时，山东大学改名“鲁迅大学”。早在 6 月 2 日，这几位学生便贴出了炮打校党委书记成方吾的大字报，称他是山东大学一切牛鬼蛇神的总靠山；7 月底，又开始攻击山东省委派到山东大学的工作团。当这 12 名“山大主义兵”从北京杀回济南校园时，批判“两个月来的刘邓资反路线”已经开始，“千村霹雳开新宇，万里东风扫残云”，呼啦啦山东大学绝大部分学生，都参加了“山大主义兵”。数千名“山大主义兵”走上社会、走入民间，深入工矿企业学校，组织串联、宣传

鼓动、煽风点火，点燃了整个山东文化大革命造反的熊熊烈火。

“主义兵”主要负责人邵长文等人，在校内还成立“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工人支队”，负责人是学校职工、汽车驾驶员董金福。

早在“青岛事件”发生前，山东大学就有人参与了青岛三大院校反对张敬涛的“八二五事件”，支持王效禹炮打青岛市委。“青岛 825 事件”发生后，山东大学近 2000 人奔赴青岛。

山东大学的保守派组织“东方红”红卫兵张岱基、李长杰、韩明轩等 9 人组成“山东大学物理系赴青战斗小组”，最先赶赴青岛，经过调查，写出支持青岛市委和职工的材料《青岛“八二五”事件调查报告》，9 月 2 日油印散发。随后，谭启龙和青岛市委决定大量印发这份“调查报告”，新“报告”9 月 17 日修改补充加入 11 日、16 日的一些材料。青岛印刷厂印制完毕，又接到通知继续加印，仅加印数近 3 万份。在青岛、济南、北京等地散发。

这份“调查报告”的内容，苏联在 1966 年 10 月 22 日出版的《真理报》予以引用，题目是《青岛事件》。苏联报纸的报道极大帮助了青岛、山东的造反派，他们抓住“苏修恶毒攻击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有力罪证，批判省市委和保皇派。

后来加入“山大主义兵”的王世歧、牛奔东等许多人是在“825 事件”发生后的第三天，8 月 27 日来到青岛的，他们坚决支持青岛三大院校造反红卫兵和王效禹，后来还在在青岛设立了“山大主义兵驻青联络站”。王世歧、牛奔东等人在青岛与王效禹同甘苦共患难，受其重用，立下汗马功劳。特别是山大中文系的王世歧，笔头子过硬，为造反派写了很多文章。

“山大主义兵”除了奔赴青岛的一路外，还有一路下到济南各大工矿企业组织串联，如柴油机厂、铁路机车车辆厂、机床一厂、机床二厂、济南锅炉厂、山东内燃机厂、山东重型机械厂、山东化工厂、黄河汽车总厂等，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鼓动工人造反。

当时山东有影响的大学除了山东大学外，还有山东师范学院。1966 年 8 月初工作组撤离后，对党委和工作组有意见的学生开始串连，于 8 月 11 日成立组织，名称多次变化，因为其中有“串连”俩字，后来被简称为“山师串连兵”，领头的是政治系学生王竹泉，1960 年参军，同年入党，1963 年复员后考入山东师范学院。

面对省、市委和保皇红卫兵，“山大主义兵”和“山师串连兵”团结一致，联合济南的其他大专院校红卫兵，于 9 月成立了“红卫兵济南指挥部”，简称“红济指”。10 月 3 日，“红济指”发起，在济南体育场召开“向资产阶级反动

路线猛烈开火誓师大会”。参加大会的有省城和全省部分地市大中学校红卫兵及在济南串连的北京、上海、黑龙江、内蒙、广西、四川、甘肃等16个省市和全省各地共300多个红卫兵组织代表，共12000余人。“山师串连兵”王竹泉主持大会，“山大主义兵”代表第一个发言。第二位登台的是一位北京13中“飒爽英姿”的女红卫兵，她在发言中狠批北京谭力夫的讲话和没有工作组的工作组路线。大会激烈指控以谭启龙为首的山东省委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表示誓死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大会通过了《给毛主席的致敬电》，并发出了《告全省革命红卫兵和革命师生书》,鼓动全省学生和教师大造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反、大造各级党委的反。

10月7日，山东大学“主义兵”的第三路兵马“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红色敢死队”在邵长文带领下进入省委机关大院，占据办公室，长驻下来。他们建立了联络站和广播站，宣称要与以谭启龙为首的山东省委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血战到底。

10月14日晚，山东大学“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红色敢死队”以查封省委整群众的“黑材料”为由，封了山东省委两个办公大楼的门。

10月17日，由山东大学“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发起，在省委机关大院召开了“声讨省委贯彻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

线的一小撮人罪行大会”，有省城济南市和外地赴济串联的红卫兵参加。大会发言以激烈的言词指控山东省委及各地党委“血腥镇压革命师生的滔天罪行”。

10 月 23 日，“红卫兵济南指挥部”继续在体育场召开万人“誓死保卫毛主席宣誓大会”，青岛大中学校总部及昌潍、泰安红卫兵造反组织派出代表赴济到会发言。大会进一步攻击以谭启龙为首的山东省委。此时的谭启龙正坐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参加中央工作会议。

在青岛，副市长王效禹是第一个把矛头对准省委的市级领导，他认为“省委也有修正主义”。保守派的红卫兵组织开始将攻击重点指向王效禹。10 月 27 日，位于沂水路 8 号王效禹的家第一次被抄。10 月 28 日，王效禹发表致青岛市委的“公开信”，并把此信寄往中央文革小组。

谭启龙开完中央工作会议于 10 月底回到济南，按照中央工作会议的要求，着手布置山东省“三级干部会议”，传达中央工作会议精神。

11 月 1 日开始，山东“主义兵”、“红济指”在济南珍珠泉礼堂召开批判省委资反路线大会，要求谭启龙等人到会回答问题。

11 月 2 日，谭启龙、白如冰来到会场，学生们提了很多问题，要求谭启龙第二天答复。

11 月 3 日上午，山东省“三级干部会议”如期在济南南郊宾馆召开，谭启龙在大会上讲话。由山东省委书记处书记、副省长苏毅然，前去珍珠泉礼堂答复学生们昨天提出的问题。

“红济指”的小将们在珍珠泉礼堂迟迟不见谭启龙到来，盛怒之下发出了最后通牒：“谭启龙必须于 3 日下午 2 时亲自到珍珠泉回答问题。”

11 月 3 日下午 14 时一过，“红济指”的小将们徒步启程前往南郊宾馆找谭启龙理论。谭启龙闻讯，只好抛开“三干会”，乘车前往珍珠泉。汽车一开出宾馆，就看见红卫兵小将们的先头人马已经到达宾馆门口，但是谭启龙没有下车，还是乘车与他们擦肩而过，直奔珍珠泉而去。

“红济指”的学生来到南郊宾馆大门前，便要进去面见谭启龙。宾馆大门的警卫战士加以阻拦，冲突之中，大门的玻璃破了，划破了一个学生的头。鲜血激怒了红卫兵小将。他们决定把批判揭发省委大会转移到南郊宾馆大门前召开。晚上，1000 多名红卫兵在这里集会，指令谭启龙到会。

谭启龙又回到南郊宾馆，他索性率领省委书记处的全体书记、以及与会的全省三级干部 237 人参加了这个红卫兵大会，阵容蔚然可观。

此举更加激怒了小将，大会发言中充满了挑衅性的言词。会后，他们揪住谭启龙，斥责他对抗革命群众。

谭启龙大动肝火，毫不示弱。双方相持不下。小将们要与谭启龙到中央解决问题。盛怒之下的谭启龙完全忘记了自己省委第一书记的身份，忘记了正在召开的“三级干部会议”，一口答应了这些讨厌的小将们的要求，在一群娃娃兵的簇拥下，于 4 日晨 7 时，乘上火车，奔赴北京。

由于未获中央批准，他们中途在德州滞留了两天，第三天才获准进京。到北京后，中央接待站安排谭启龙和红卫兵住在国家经委礼堂，由红卫兵看管。由于没有床铺，大家只能睡在地板上。国家建委主任谷牧得知后，派人给谭启龙送来了两捆稻草和一床棉被。

6 日当晚，陶铸和谭震林按照周恩来的指示，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济南红卫兵代表和谭启龙。最后商定，开一个“批判反动路线大会”，为此选了几个人为大会服务团。陶铸、谭震林指示只能文斗，不准武斗。并明确指出：“谭启龙同志我们了解，没有什么大问题，是个好同志”。

8 日晚，陶铸，谭震林找谭启龙单独谈话。

第 264 回：赴晋祠，学生来到“三干会” 换地点，黔常委无奈休会

10 月 24 日，山西省委也在太原湖滨会堂召开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省委书记处常务书记王大任代表省委作动员报告。其实，已经无须动员。《紧急指示》一经宣布，不胫而走，山西同全国一样，早已掀起要求平反、追查运动初期“整群众的材料”的风潮。那些被打成“反革命”、“右派分子”、“反党分子”、“伸手派”、“野心家”的人们感到解放了，纷纷起来清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罪行。10 月 26 日，太原工学院“红旗战斗队”串联了山西省委党校、山西医学院、太原十中等校学生 200 多人，到省委就执行军委 10 月 5 日《紧急指示》问题进行交涉，要求省委迅速落实。山西省委书记处书记王大任出来接见他们，但对学生们提出的要求迟迟不肯表态、签字。 愤怒的学生代表表示，不答应他们的要求，他们就不走。王大任无奈，提出先让学生们吃饭，而后派代表谈判。

学生们担心一吃饭队伍就散了，所以表示：“ 我们不怕冷，不怕饿，不吃省委的饭。省委不答应我们的合理要求，不迅速采取措施执行《紧急指示》，我们就坚决不走！”

谈判开始后，太原工学院“红旗战斗队”队长李青山代表工学院部分受害学生首先就他们提出的 5 个条件与王大任，副省长武光汤等人展开了逐字逐句的激烈争论。例如，对黑材料的“黑”字，王大任他们要求改成“迫害革命同志的材料”，学生们坚持不改，相持不下。 最后在“黑材料”3 字后面加了一个注解：“即迫害革命同志的材料”。又如第五条：“省委必须彻底交待……的罪行”，王大任坚

持要用“方向性错误，路线性错误”来代替,学生们经过再三斟酌,认为“方向性错误，路线性错误”更具体一些，同意了省里的意见。

屋里，省委领导和学生代表老少双方是字斟句酌，字句必夺。屋外,学生们在寒风刺骨的天地里，群情激昂，排着整齐的队伍,喊着“革命无罪，造反有理”，“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毛主席万岁”等口号，高唱《大海航行靠舵手》、《下定决心》等歌曲，声援屋里谈判的学生代表。 晚上 22 时了,学生们在寒夜里已经站了 7 个小时。屋里谈判的王大任劝学生们先吃饭再谈判，并且把热腾腾的大饼送到他们面前。但是学生代表坚持抓紧时间,先签订五条协议。最后，双方终于就五条协议达成基本一致。王大任又提出将前言中“经过一下午一晚上的艰苦斗争”一句删去，并在后面中加上“省委坚决支持学生的这些正当要求”，学生们坚决拒绝。他们说：“我们的同学已在外冻了十几个小时，省委还迟迟不答应我们的合理要求，这难道是‘坚决支持’吗？我们现在都还饿着肚子,还冻在外面，这难道不是‘艰苦斗争’吗？现在已经深夜 11 点了，我们都还不能回去，这是谁的责任?”

王大任无语。学生们坚决要求在协议上盖中共山西省委公章或由王大任和武光汤亲笔签字。外面的学生气极了，高喊:“如不签字，就叫王大任出来见群众!”

在学生们的强大压力下,经过长达 12 个小时的艰难谈判，王大任他们最终在“协议”上盖了中共山西省委的章。“协议”的主要条款是：立即给受害群众平反；不准转移整群众的黑材料；追究打击迫害

群众的干部的责任。省委还将此“协议”印刷 3 万份，发至全省各地。

五条协议达成后，学生们立即和省委就履行第一条协议，由省委负责人带领，封了所有与“黑材料”相关的文件柜，并声明，如有遗漏，由省委负责。

深夜 24 时，学生们唱着《大海航行靠舵手》凯旋而归。

10 月 26 日，以太原市中学生为主的跨校造反派组织“山西革命造反兵团”成立了，简称“兵团”，主要成员有：太原五中“井冈山”、由大庆 32111 英雄钻井队取名的六中“32111”、根据林彪任第一任师长的八路军 115 师命名的七中“115 师”及山西大学叶积凯、王清英、焦根林、太机张文林、太工宋捷等。“兵团”司令为五中“井冈山”的刘灏，司令部就设在省委第一招待所。他们的政治口号是：“打倒卫恒，支持袁振！”

11 月 1 日，“山西红色造反联络站”也正式宣布成立，简称“红联站”，地点在大南门工人俱乐部旁的省委第二招待所，主要成员有：：“太工红旗”、 “太工永红”、 山西省党校“东方红”、太原机械学院“红旗”，简称“太机红旗”、山西医学院“红革联”、太原冶金学校“东方红”，简称“冶校东方红”、太原十中“七一”、山西会计学校“井冈山”，简称“会校井冈山”等，稍后又有山西农学院“火炬战斗队”，简称“山农火炬”等大批组织加入。各主要战斗队至少派一位负责人作为该队联络员参加联络站工作。

“红联站”的核心是“太工红旗”，他们的口号是：“打倒卫恒，澄清袁振！”他们设想，这个组织，不对各下属战斗队发号施令，而

是遇到重大问题，召集各下属组织负责人开会讨论，协商决定。 所以叫“联络站”。

“兵团”与“红联站”都有了总部，山西另一个群众组织“革命山西工人联合会”不干了。这个组织的总指挥叫张志安，是山西机床厂的一位年轻工人。文革前曾全国几家刊物和省报上发表了一些不错的诗歌，在省城文坛上被誉为青年工人诗人。他发起成立了这个组织，并被推上了总指挥的位置。诗人去找省委，要求领导接见和支持他们组织起来，参加文化大革命。省委文革领导小组的组长卜虹云接见了这位血气方刚的工人诗人。张志安以工人阶级代表的身份，阐述了支持省委领导文化大革命的观点，卜虹云也代表省委，坚决支持革命工人们的这种革命行动，支持他们联合起来保卫省委，搞好山西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所以，“山西革命工人联合会”在社会上一亮相，提出的口号便是“支持省委领导好山西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个组织也因此就被炮轰省委的各个造反组织斥之为“黑省委的保皇狗”。

张志安一看，那些反省委的组织省委都承认了，给钱给地盘了，我“革命山西工人联合会”坚决保卫省委，怎么能没有钱也没有一块地盘呢？他也带上人去找省委，公开向省委“造反”了。卫恒对这个公开保省委的工人组织自然另眼相看。一句话，照样给钱给地盘。于是，“山西革命工人联合会”的总部，就在省城迎泽大街工人文化宫内安下了营盘。

山西还有两个保省委的学生组织：“太原红卫兵纠察队”和“山

西红卫兵团”。这两个组织都成立于 1966 年的 8、9 月份，前者是一个中学生组织，由太原市委中反对袁振，支持省委的一些领导干部和各个中学的党支部支持的。后者则是太原工学院的一个大学生组织，其中不但有大学生，还有不少教师参加，而且大部分都是党员教师，这个组织是在太原工学院的党委支持下成立的，其口号与“太原红卫兵纠察队”一样，坚决在省委的领导下，搞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两个组织成立不久，就与山西大学的历史系学生刘普德发生了联系。

刘普德早在 1964 年就是名噪三晋的优秀大学生了。他是山西省委树立的学习毛主席著作标兵，担任着山西省学生联合会的主席。1965 年元月，全国第十八届学生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在这次大会上确立的 5 名学生标兵中，刘普德名列第一。1966 年初，日本青年代表团要来中国访问，山西是访问地之一。山西省委决定，由省外事办公室和团省委牵头，成立一个叫做“中日青年联合委员会”的临时机构，由相关的 8 个厅局派出人员组成。这个临时机构设立党委，书记由山西省委副书记、副省长郑林担任，而这个临时机构的主任和党委副书记两职则是由尚未毕业的刘普德出任。

毛泽东第一次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红卫兵，身边有北京红卫兵的代表。第二次有内蒙古自治区红卫兵的代表。第三次，华北局决定让刘普德站到毛泽东身边。后来，省委将专门为日本青年访华而设立的临时机构，改成了省城外宾接待委员会，刘普德仍然担任主任和党委副书记。为了在接待外宾时也显示出“文化大革命”的内容，刘普德将支持市委和省委的“太原红卫兵纠察队”，和“山西红卫兵团”这

两个组织的头头，全吸收为省城外宾接待委员会委员。由此，他自然也就被这两个“保皇组织”尊奉为实际领袖了。

11 月 2 日至 19 日，山西省委按照中央工作会议的布置，召开省、地、县三级干部会议。会场分别设在太原市郊外的晋祠宾馆，和市内的迎泽宾馆两地。地委书记和县委书记们在晋祠宾馆开会，由省委第一书记卫恒亲自主持；行署专员和县长以及各大厂矿的党委书记和厂长们，在迎泽宾馆开会，由省长王谦主持。会议内容一是传达中央工作会议精神，二是安排下一步领导好文化大革命和抓好生产。

山西三干会召开的第二天，11 月 3 日下午，“太工红旗”负责人李青山等人得知了消息，他们认为这是向全省广大干部宣传文化大革命，宣传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好机会，他们 7 名同学立即开着宣传车赶到晋祠宾馆三干会会场。这让山西省委十分紧张，先后派出省委秘书长史纪言，省委书记处书记，副省长郑林出面询问学生们有什么要求。学生向史纪言提出 3 条要求：

1、贴大字报、标语；

2、散发 10 月 26 日与省委签订的五项协议传单；

3、利用散会后开饭时间进行广播，宣传毛泽东思想，控诉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罪恶。 广播内容有：

(1)、“红旗”十三期社论；

(2)、“红旗”十四期社论；

(3)、卫恒等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八大罪状；

(4)、10 月 26 日太原工学院等 7 校部分革命学生同省委签署的

五项协议。

史纪言不同意学生将宣传车开进晋祠，再三劝说学生："十三、十四期社论我们正在学习呀；八大罪状，五项协议都发了传单吗，不必要再广播啦，要集中精力开好会呀！"等等。

学生们坚持要广播，史纪言说："我们省委的意见是你们不能广播，要广播你们自己广播。"

于是，执着的学生们利用会议开饭时间进入大会饭厅，当众讲演，并在晋祠大门外用广播车广播。

"红联站"闻知"太工红旗"在晋祠宣传的消息，也马上联络太原冶校，太原十中，太原工学院，山西医学院，十三中等下属组织派人分 4 批前来增援。大家强烈要求卫恒出来回答问题。"太工红旗"调来了录音机在辩论现场录音。同学们高唱革命歌曲，高声朗读《毛主席语录》，斗志昂扬，表现了"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造反精神，对三干会震动很大。

当晚 23 时 30 分左右，卫恒终于出来了，随即被学生们纠缠到次日凌晨 4 点多钟，卫恒被迫答应立即组织人员处理"黑材料"，考虑交出 7 月 18 日的报告录音，保证不销毁和篡改 7 月 18 日的报告录音。

于是，"太工红旗"于 11 月 4 日晨 5 时 凯旋而回。随后，"太工红旗"写了一份广播稿，标题是"摸一摸山西省委的老虎屁股"。他们用广播车广播了这篇稿子和他们与卫恒和史纪言的辩论现场录音。此事后来被称作"造三干会反的事件"。

11 月 4 日，贵州省委也按照中央的要求，召开有省、地、县三级

领导班子干部参加的贯彻中央工作会议精神的三干会。上午 9 点左右，在省委办公楼常委会议室，省委常委会开会，首先由省委第一书记贾启允传达中央工作会议精神。谁料，会议进行到 10 点左右，突然，一支从北京来贵阳串联的红卫兵队伍，开着装有宣传工具的卡车,冲进了省委机关大院。不一会，楼梯“噔噔噔”的脆响，10 余名戴着红卫兵袖章的学生不容通报，直闯会议室。室内的气氛顿时紧张起来，省委第一书记贾启允也按捺不住地站起身来，对冲进会议室的红卫兵问道：

“我们正在召开省委常委会，你们冲进来干什么？”

为首的头头，操着一口京腔，大大咧咧地回答：“我们是从北京串联到贵阳来的红卫兵小将。为了使我们能及时了解贵州地区的文化大革命情况，我们要求派代表列席省常委会。”

贾启允显然是被这一要求闹懵了，似乎不相信的连续发问：“怎么，你们要求参加省常委会？！你们要求参加省常委会？！这是党的会议，怎么能允许红卫兵派代表参加？”他环顾一下在座的省委常委，他们每人的脸上都是一副为难的神色。

红卫兵头头见此要求可能不易办到，便改为建议说：“如果不同意我们派代表参加，我们要求在会议室按上广播，直接将会议进行情况向外公开播出，我们就在会场外面监听！”

贾启允显然对这种做法也无法接受，摊开双手说：“这是省委的常委会，是党内的会议，总还应该内外有别，怎么能现场公开广播？”

“这种做法，在北京许多单位早就这样了，你贵州还有什么特殊

的！”

“北京中央工作会议精神，我们都了解，你贵州还有什么保密的！”

闯进会议室的红卫兵代表，就像教训一群没有见过世面的乡巴佬一样，与贾启允争辩着。

这时，为首的头头，放大嗓门吼道：“大家不要再说了，今天这个反我们是造定了，如不答应我们的要求，我们就要采取强行的措施，派出代表进驻省委会！”

“我们要求参加三干会！我们要求参加三干会！”停在省委大院造反派的卡车上的大喇叭，不断地冲着省委常委会议室高喊。

会议是难以进行了。列席参加会议的贵州省军区副政委、省文革领导小组副组长李再含站了起来，他走到红卫兵头头面前，语气谦和地说：“红卫兵小将的要求我们可以理解，但党的会议在党章上也有明确的规定，是绝对不能随意破坏的。我看是否这样，对省三干会的情况，我们保证做到经常向串联到贵阳来的红卫兵小将通报情况，及时听取大家的意见。”

红卫兵头头望了一眼面前这位身着军装的领导干部，似乎很给面子，没有再坚持什么，对同来的红卫兵说：“好，我们今天也不一定非要强行参加会议了，不过，对我们的要求，请贵州省委认真考虑考虑！”

从此以后，贵州省三干会的代表住地，不时受到红卫兵的冲击，省常委或会议领导小组的会议，只得不时变换地点，有时在省政府的

会议室，有时在外宾宾馆，甚至多次驱车到17公里外的花溪宾馆召开。每次开会的地点又都是临到会前约半小时才发出通知至与会人员。直到12月7日，会议无法继续开下去了，三干会只好休会。最后一次的全体大会，为了避开红卫兵的冲击，也是在离城区10余公里、一所新建工厂尚未竣工的礼堂里召开。这次会议，时间长达一个多月。从时间之长，更换地点之多，可以说是“史无前例”。

第 265 回：举战旗，青城上下燃烽火　谁传达？天津市又生争议

8 月 16 日，中共中央批准撤销乌兰夫内蒙古党委第一书记、华北局第二书记的职务，任命解学恭为内蒙古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李树德、康修民为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处书记。从此，乌兰夫被监护在北京，不再返回内蒙古。但是，华北局向中央上报的《关于乌兰夫错误问题的报告》仍未批复，乌兰夫名义上还担任着内蒙古自治区主席和内蒙古军区司令员兼政委，及内蒙古大学校长等职。

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在等待，解学恭也未到任。但此时的呼和浩特，已在文化大革命的浪潮中群雄逐鹿，战旗叠起。

9 月 5 日，呼和浩特市成立“红卫兵临时总部”，即呼市“第一司令部”。

接着，以高干子弟为核心的呼市“大中（专）学校红卫兵司令部”，即“第二司令部”也相继成立，司令为自治区党委书记处书记王逸伦之子王建华，副司令为自治区党委书记处书记王铎之子王纪言。

金秋 10 月，中央召开工作会议期间，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又一次急催中央，说是发现呼和浩特有人替乌兰夫“翻案”，希望赶紧批复报告。于是，周恩来从陶铸手中拿过了报告，交还给华北局和内蒙古自治区党

委，对他们说：“你们三个月前写的报告，现在有没有过时？”让他们再次修改。

10 月 26 日，华北局书记处书记、新任内蒙古党委第一书记解学恭与内蒙古大学和内蒙古师范学院红卫兵谈到乌兰夫问题，宣布了中央撤销乌兰夫华北局第二书记、内蒙古党委第一书记的职务的决定。对红卫兵提出的乌兰夫上天安门的疑问，解学恭是这样解释的：

“ 让乌兰夫上天安门，中央是如何考虑的，我不知道。但我相信毛主席的决定是英明的，是正确的。林彪同志是毛泽东思想红旗举得最高的。他说：听毛主席的话，你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毛主席高瞻远瞩，考虑问题不仅从全国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且从全世界的利益出发，我们无限信仰毛主席，无限崇拜毛主席，我们相信毛主席、党中央的安排是正确的，让乌兰夫上天安门是经过慎重考虑的问题，我们要相信毛主席。但是，让乌兰夫上天安门这并不影响和妨碍大家继续揭发他、批判他以及他的同伙。”

10 月 29 日，“呼和浩特大中专红卫兵革命造反第三司令部”成立，简称“呼三司”。它包括 6 个大专院校 16 个中专中的 65 个群众组织。其主体是由受压的青年学生组成的造反派，人数不多，但能量很强。从其诞生之日起就坚决地把矛头指向上级党委，指向“资反路线”和工作

组。“呼三司”迅速发展成为内蒙古政治舞台上一支能量很大的激进派组织。与之对立的“呼一司”、“呼二司”很快便消失在保守派的队伍中。

“呼三司”成立的当天，在呼和浩特工矿企业中，还有一支工人造反派的组织，“河西八一八”也宣告成立了。1966 年 6 月 14 日，呼和浩特河西化工机械公司王志有、郝玉东、何根泽 3 人，给本单位领导贴出了第一张大字报，被公司领导认为是阶级敌人的捣乱，大批群众成了整肃对象。7 月 6 日，工作组进驻该公司后，按照反右时的模式，惩处贴大字报的人，隔离反省、强迫交待、变相劳改……

八届十一中全会后，这些人咸鱼翻身，扬眉吐气。10 月 29 日，他们宣布“踢开筹委会，自己闹革命”，成立了“八一八革命造反团”，简称“河西八一八”，其成员以科技人员和技术工人为主。

这时，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和内蒙古军区内部也分成了两派。自治区党委中，一派是以高锦明、权星垣等“反乌英雄”为首，大多是从六十年代初就抵制乌兰夫，“前门饭店会议”上又大揭大批乌兰夫的。另外是以内蒙党委书记处书记王铎和王逸伦为群龙之首的一大批对运动不甚理解的中、高级干部。这些人与激进派相比显得保守，其实也左得很：他们并不反对“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文化大革命，并不反对把乌兰夫打成民族分裂主义、“三反分子”。他们反对的是犯上作乱，是破坏现存

秩序，是动摇官僚体制。总之，他们要保卫新中国成立后 17 年已经形成的社会规范和价值标准，显然这是与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目的南辕北辙。

王逸伦是乌兰夫的老搭档，三十年代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回国后从事地下工作；1946 年进入内蒙古的领导班子，时任内蒙党委书记处书记，自治区副主席。

王铎与乌兰夫是延安时代的老战友，四十年代初，乌兰夫在延安民族学院任教育处长时，他是副处长。建区后，他担任内蒙党委书记处书记，负责组织工作，区内许多干部都是他一手提拔上来的。

这两个人之所以没被打成乌兰夫黑线上的人物，一是他们都是汉族。二是王逸伦一直养病，未参加“前门饭店会议”。王铎虽然参加了会议，又有与乌兰夫“相对而泣”的“严重错误”，但他做了深刻检查，得到了中央的谅解。第三，他们都不是乌兰夫“新班子”中的人，而是老资格的领导干部，在内蒙树大根深，德高望重。

11 月 2 日凌晨 4 时，中央专线电话从北京打到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办公厅：华北局的报告批复了。这时，内蒙古党委下属机关已经瘫痪，连文件都发不下去了。党委办公厅只好派出几个通讯员，顶风骑上自行车沿街散发。

这份经中央批复的报告给乌兰夫定了五条错误：

一、反对毛泽东思想，另打旗帜，自立体系。

二、反对阶级斗争，反对社会主义革命。

三、对修正主义卑躬屈膝。

四、以一九三五年《宣言》为纲领，进行民族分裂活动，搞独立王国。

五、安插亲信，篡夺领导权。

11 月 2 日当天，中共中央又批准撤销乌兰夫内蒙古大学校长的职务，至此，乌兰夫的职务就只剩下了一个内蒙古自治区主席了。

内蒙古军区此时也分成了两派。在“前门会议”期间，当时内蒙古军区的最高领导人乌兰夫、吴涛都在北京开会，所以日常工作由军区副司令员黄厚、副政委刘昌、参谋长王良太、政治部副主任张德贵等人负责。

吴涛是沈阳人，蒙古族，“918 事变”以前就在北平求学，参加了一二九学生运动。建国后，他先后担任军委直属政治部和总参谋部直属政治部主任，1959 年调任内蒙古军区副政委。对于掌管军区日常工作的黄厚、王良太、刘昌、张德贵等人来说，在军区高层领导之中，吴涛是乌兰夫之外最具备被打倒资格的人。因此，文革开始后，军区参谋长王良

太在 1966 年 7 月中旬召开的军区二级部长会议上说："吴涛是个典型的ＸＸＸ式的人物，高高在上，养尊处优，脱离实际。"

ＸＸＸ即指乌兰夫，因为当时中央不准在报上公开点乌兰夫的名，因此内蒙大小报纸皆以ＸＸＸ指代。

王良太讲话后，在 1966 年 7、8 月期间，内蒙古军区大院出现了揭发吴涛的大字报，这一事态引起了中央的重视。为了防止吴涛被打成乌兰夫黑帮，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华北局、自治区党委多次指示内蒙军区："吴涛是个好同志，不要把吴涛打成黑帮，他不是乌兰夫的人，他在华北局揭发乌兰夫是积极的。"

为此，叶剑英还特别打电话给内蒙古军区副司令员刘华香，对他说："吴涛同志在战争年代,在总参直属政治部工作期间，表现是好的。来内蒙后，与乌兰夫是工作上的关系，你们不能打倒他。刘华香同志，你听清楚没有？"

8 月 3 日，在内蒙古军区二级部长会议上，肖应棠副司令员"传达了林副主席、叶副主席和肖华主任的指示，不能把吴涛同志打成黑帮。他不是ＸＸＸ的人，在华北局会议上揭发ＸＸＸ是积极的。"

就在 8 月 3 日当天，内蒙军区司令部和政治部的部分干部冲击了军区党委召开的军区机关支部书记和二级部长会议，要求揭批某些支书、

部长的问题。这件事当即被打成“83 事件”，军区领导派人整这些人的黑材料，准备秋后算账。

虽然有中央军委、总政、华北局、叶剑英等人对吴涛问题的明确指示，但是在怀疑一切的社会风气下，这些指示几乎就成了耳旁风。第二天，8 月 4 日，内蒙古军区副政委刘昌在政治部二级部长和支部书记会议上依然宣布：“对吴涛的问题，今天常委已决定了，首先是常委面对面地对他揭发，发动大家背对背地揭发，然后叫他检查。有的问题他不承认，可以核实。比如他和北大陆平的联系问题，他不承认，那就派人去调查。”

8 月 5 日上午，在政治部积极分子会议上，刘昌继续动员说：“对吴涛要继续揭发，摆事实讲道理，揭出一切牛鬼蛇神。”

8 月 12 日，参谋长王良太在军区大礼堂接待室召开各部骨干会议，亲自布置了对吴涛的揭发，并对吴涛的问题划了六条线。他最后说：“你们千万不要以为华北局、军委、总政保护吴涛过关，是要交给群众处理的，不要产生错觉。”

不久，吴涛即被抄家、揪斗、关押。

到了 10 月，内蒙古军区文工团、卫校、报社等单位成立了造反派组织，军区文工团的“红色造反团”首当其冲，与之对立的保守派组织是

“军区联合行动委员会”。这些造反派势单力薄，仅占军区总人数的 3%，但是他们仍然无所畏惧地举起了反对军区掌权派的大旗。

此时，天津市委领导在传达中央工作会议的问题上又出现了分歧。11 月 4 日至 22 日，天津市委召开各区局领导干部 280 人出席的工作会议，传达中央工作会议精神和毛泽东、林彪的指示，陈伯达、周恩来的讲话，和刘少奇、邓小平的检讨；听取与会人员的意见；市委作检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但是会议首先遇到一个难题是，由谁来传达中央工作会议精神？天津市是市委第二书记赵武成和市委书记处书记胡昭衡二人出席中央工作会议。胡昭衡在华北局工作会议上受到批判以后，本来已被停职检查。但在中央工作会议开会时，天津市委接到总理办公室童小鹏的电话通知，点名让正在接受批判的胡昭衡参加中央工作会议。

胡昭衡到京后，《光明日报》社总编穆欣立即前去看望，并向他转达了陈伯达对他的问候，说天津市工业部副部长李树夫已给陈伯达写信，反映胡昭衡的情况。陈伯达收到信后，向该打招呼的人都打了招呼。

在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周恩来也找胡昭衡谈话，询问胡昭衡被揭发批判的情况，并要来胡昭衡的《老生常谈》看。事后，他告诉胡昭衡说，这本书没有什么大问题，要胡昭衡回津后坚持工作。中央领导在中央工

作会议上对天津市委“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提出了批评，河北省委刘子厚作了检讨。赵武成回津后，患病住院，不能出席市委工作会议。那么由谁来传达中央工作会议精神呢？赵武成坚持由当时主持工作的市委书记处书记谷云亭传达，胡昭衡则坚持谷云亭不能传达，应由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他来传达。

接着，会议又遇到第二个难题：市委的检查在会上通不过，过不了关。此时的天津市委在造反组织的冲击下四处躲藏，早已转入地下。11月9日，由参加天津各区局领导干部工作会议的一个组发起，串联各组，上书中央：

周总理:

我们向您呼吁，请中央速派人来，主持天津的三级干部会议和领导天津的文化大革命。天津市委已经无能为力。

天津市委在文化大革命中所犯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错误是非常严重的。这些错误多是发生在十一中全会以后，在中央的严肃批评下，市委至今还未深刻检查，正确认识。

市委的领导班子实际上处于瘫痪状态。万晓塘同志病故，赵武成同志住院，张淮三同志去京开会。书记处其他同志都有不同程度的错误，只剩下谷云亭同志一人，会内会外难以支持，与当前形势很不适应。

这次三级干部会议十分重要，关系到文化大革命成败的关键。遵照毛主席的指示，这次会议必须开好。但事实却与主席指示相反，从 4 日开会以来，松松垮垮，领导很不得力。特此紧急呼吁，恳请迅速答复！

天津市三级干部会议全体同志

这封信上说的“天津市三级干部会议”就是正在召开的天津市委工作会议，可能人们习惯 8 月在河北宾馆参加的三级干部会议的名称了，也都这样称呼这次会议。

这封信上送后，华北局书记处常务书记解学恭来到天津。

早在 10 月 1 日国庆节天安门城楼上，毛泽东见到解学恭，就告诉他，中央已决定调他到天津工作，让他去找周恩来。

解学恭见到周恩来，周恩来口授任命书，由解学恭作了记录，周恩来当场审阅后签了字，然后对解学恭说：“陈伯达对天津了解多，你去找他谈谈。”

解学恭与陈伯达见面后，秘密来到天津，分别找胡昭衡、谷云亭谈话。

第266回：报告会，质疑万晓唐之死　林彪惊，国防部真的被冲

这两天，天津市委门前依然是热闹非凡。11 月 7 日晚，劳二半“八一八红卫兵”在市委门前召开揭发市委大会。9 日，一中学生去市委贴大字报，提出“万晓塘是天津资反路线的罪魁祸首”。10 日上午 9 时，一中学生又到河北宾馆贴大字报。他们知道三级干部会议就在会议楼上召开，所以一直冲上二楼，服务人员开始不让他们在二楼贴大字报，学生们与服务员辩论。服务员哪辩得过学生？无可奈何。

一中学生王端阳问：“三级会议是不是在这里开？”

服务员说：“反正不在这一层开！”

王端阳一听，马上又跑上三楼。

市委组织部苏明赶紧出来与一中的学生们见面。之后，市委秘书长路达、和平区委书记马秀中也都来了。对于学生们提出的关于胡昭衡参加会议的问题，路达向学生们说明：

1、胡昭衡去北京开会是中央直接叫去的，因此这次开会叫他参加。

2、赵武成病了，胡昭衡又去中央参加了会议，因此叫胡昭衡传达中央的会议精神。

3、胡昭衡的反党反社会主义性质天津市委给定了，但中央未批准，因此还发给他文件，叫他开会。

4、白桦参加会，是由华北局决定，胡昭衡也一样。白桦性质华北局未定，市委给定了。

白桦，时任天津市委宣传部部长。

学生们又给路达提出许多问题，他都记下，并答应第二天下午15时给学生们打电话通知。学生们于是散去，此时已是中午12时多了。

学生们下楼来到116室，恰巧白桦在此，被同学们叫住，问起宾馆会议的事，白桦不敢讲，说必须市委同意才敢说。他说自己是无意识、不自觉地执行了周扬反动路线，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性质的……

这时已是下午13时多，房门突然推开，出乎所有学生的意料，只见胡昭衡满面笑容推门进来，学生们当然不会放过这一机会，立即向他问到：

“市委给你定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性质，你知道不知道？”

胡昭衡说：“不知道。”

学生们又问他为什么这样高兴？

胡昭衡说：“去北京开会当然高兴了。”

他接着说：“我出身富农，知识分子出身了。37年参加革命，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改造好，有个人主义，但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老生常谈》不是毒草。”“有的文章有错误观点，《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也是如此。”

《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是刘少奇的著作，文革前几乎人人都要学习。在此，胡昭衡竟然说这本当时每个共产党员的必修书有错误？这也是一种很新的提法了。但此时刘少奇犯错误的事已经不是秘密了

胡昭衡颇为自豪地说：“总理在开会期间单独和我谈话，当然和我握手了。这次开会中央通知我去的，我预先没有想到。29日晚回

来，就又参加工作了。上面说我是内部问题，我自己认为我是革命的。”

学生问：“上面是谁？是不是周总理？”

胡昭衡答：“上面是负责人，是谁不能说。关于大会情况有组织原则，不能讲。”

胡昭衡在回答学生问题时，一直都是笑容满面。当一中学生王端阳问他为什么一直在笑？胡昭衡说：“不笑还哭呀？我说相信中央能调查清楚。我心中很有底，有把握。”

学生们说：“市委在这里可能又要阴谋，说谁是反革命谁就是反革命。九一八大会上万晓塘说胡、白是党内走资派，给自己记上一大功，转移视线。这件事很复杂，不能算完!!!”

胡昭衡答应学生们，明天下午 15 时还在 116 室等他们。

当晚，一中学生又跑到市委贴关于胡昭衡问题的大字报。

11月11日下午15时，一中学生如约来到河北宾馆，却没有见到胡昭衡。他们又跑到市人委、市委去找，均未见到。听市委、市人委的人说：胡昭衡被人揪到北京去了。学生们认为，胡昭衡参加北京会议是中央决定，他们将胡昭衡揪到北京，实际上是破坏“三级会议”。

其实，胡昭衡并没有去北京，还在天津，只是行动不那么自由了。那天晚上，市委机关一群众组织把他从河北宾馆市委工作会议上揪走进行批判，责令他不许随便行动，不准参加会议，要随叫随到。胡昭衡为此写信向中央、华北局反映。

11 月 13 日，学生们在河北宾馆贴出标语：“胡昭衡参加会议，这是中央决定!”

学生们向市委要车，准备去北京向中央反映情况。这时，他们听说胡昭衡就在天津的家中。

14 日晚 19 时 15 分，学生们来到胡昭衡家了解情况，这才知道，原来是市委文革委员会不让他参加三级干部会议。

学生们表示，他们同意胡昭衡去参加会议，决心把天津市这块又沉又大的铁盖子打开。

华北局书记苏谦义得知天津市又不让胡昭衡参加会议的消息后说："这件事的责任完全在市委。"

华北局第一书记李雪峰也于 15 日指示："让胡昭衡工作，由他传达中央工作会议的精神。"并批评不让胡昭衡传达会议精神是"宗派情绪"。

16 日一大早，胡昭衡又出现在河北宾馆三干会上，许多人都到宾馆来找他。

第二天晚上，南开大学"卫东"组织在市体育馆召开"万晓塘之死调查报告会议"，对万晓堂之死提出质疑。

11 月 19 日晚，一中"九一八"在市委贴出批判华北局的大字报："华北局是'刘邓司令部'的忠实打手，是天津市委的后台老板！"

22 日，天津市委工作会议草草结束。

在此期间，10 月 21 日上午，哈军工的"八八红旗战斗团"300 多名学生又来到国防科委揪路杨。11 时，在没有等到答复的情况下，其中 100 多人强行冲进国防部大院，接着又冲过由警卫部队和机关干部组成的人墙，冲进国防科委大楼，一直冲到大楼顶层，到处搜查，

口口声声说，要派到该院的工作组交出整学生的“黑名单”。

当晚，聂荣臻同叶剑英一起，请中央文革、全军文革的人到京西宾馆开会，研究解决办法。聂荣臻在会上说：“连国防部都冲进去了，此例一开，将来还有什么地方学生不敢冲，后果严重啊，必须尽快要学生退出，现在只有你们说话才灵。”

叶剑英也竭力主张要强令学生退出。

中央文革表示：“我们去做工作。”随即由张春桥等 4 人去向学生宣布：“遵照毛主席要保障党中央、国防部等要害部门所在地安全的指示，学生不能进入国防部大院，必须立即退出。”

22 日凌晨 1 时，学生全部退出国防部大院。

此时，叶剑英正在北京西山召开全军各大单位领导人汇报会。会上，各军兵种、各总部领导人纷纷反映现在没法工作，没有时间看电报，连吃饭、睡觉的时间都没有保证。刘志坚根据叶剑英的指示，于 11 月 6 日主持起草了《关于各总部、国防科委、军种兵种机关必须经常保持战备状态的通知》，要求必须保证军委各总部、国防科委、各军种兵种的主要领导对部队实施经常的指挥，不能中断。提出未经军委许可，他们不能离开指挥岗位。对于机关的办公室、通信设施、保密设备要妥为保护，以免影响对部队的指挥和日常工作的进行。

这个通知，林彪批给中央文革小组，陈伯达认为是“借战备压革命”，扣压未发。刘志坚根据叶剑英的指示，曾组织全军文革小组前后起草过 5 份电报，都被陈伯达扣压了。在一次中央文革小组会上，陈伯达还当面指责说：“你刘志坚思想不对头，发的几个电报，都是

压制造反的。我都给扣留了。”

11月8日凌晨2时，门卫森严的国防部又突然遭到几百名带着领章、帽徽的军人冲击……

国防部乃军机要地，何况国防部部长是“副统帅”林彪，这些军人难道吃了豹子胆了？

前来冲击的军人，其实也是学生，主要是张家口解放军技术工程学院的学生。他们说，国防部李天佑副总参谋长在他们学校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学生们前来国防部兴师问罪，要求批判李天佑。

1966年国庆节时，“打倒消防队长李天佑”的大幅标语贴到了天安门城楼下，被天安门城楼上的毛泽东看见了，他曾诙谐地对李天佑说：“天佑，天佑，‘天保佑’！”

国庆节后，军委和总政治部发布《紧急指示》，张家口技术工程学院涌现出“革命造反团”、“红色造反联络总站”、“革命联络总站”三大群众组织，并且开始进京串联。其中，“革命造反团”的成员专门整理了一份“造李天佑的反”的材料，称“李天佑是镇压我院运动的罪魁祸首”，并且将攻击李天佑的大字报贴到了国防部大院里。

10月26日上午，“革命造反团”的15名学生又闯到总参“文革”办公室，要求和李天佑辩论“在学院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问题。他们要求3天内，李天佑必须带着总参三部彭清云副政委和姜钟副部长去学院作检查。李天佑当晚20时接见“革命造反团”代表，做了长达万言的讲话，一一回答了他们提出的各种问题，直到深夜才离去。

谁知他走后，这些学生左思右想，突然又“不满意”他的答复，冲到国防部南门警卫室，大喊着：“要再同李天佑辩论！”

结果，李天佑又不得不连续两次接见他们，反复进行解释，可是学生们就是不走，一定要“辩”出个所以然，也就是要李天佑承认自己是错的。

李天佑一直坚持自己执行的就是毛主席的指示，没有错误，岂肯认错？

这时，社会上又开始抢“黑材料”。此风一起，“革命造反团”只留下“精干小分队”继续占据国防部南门警卫室，“大部队”则赶紧返回学院，索要“黑材料”。因为那些可能会放进他们档案里的材料才是真正关系到每个学生政治生命的头等大事。

学院的学生为“黑材料”与院方再次发生纠纷。10 月 31 日，学生们强行砸开学院保密室的门，院方调来学院的警卫战士守卫，与学生发生冲突，导致双方人员受伤，酿成所谓的“1031 事件”。

战事一出，“革命造反团”又跑到北京告状，声称学院派兵“打学生”，要求总参党委和“文革”办公室惩办策划者，追查后台，交出“黑材料”，进行验伤；并且还提出要 4 名“受伤”学生上天安门观礼台参加 11 月 3 日毛主席的接见，如不答应，就“抬着受伤的同志到天安门示威”。

“中央文革”得知此事后，立刻要求总参查处学院领导一方。李天佑则坚持说：“毛主席教导我们要实事求是。这件事情只有实地调查清楚后，才能再作处理。”

总政治部同意了李天佑的意见，并组织调查组，学院两方派代表参加，实地调查。调查的结果，“革命造反团”承认是他们砸保密室的门在先。

就在总部调查组正在张家口调查的时候，“中央文革”已在北京宣布：学院负责保卫、保密室工作的 3 人停职反省；同意“革命造反团”代表上观礼台参加毛主席接见，并对“受伤”的学生赠送镀金毛主席像章。“中央文革”还拟定了一个情况通报，准备发至全国。李天佑等总参领导闻讯，据理相争，坚决反对这份《通报》下发，“中央文革”得到总部调查组的调查结果，也同意总参的意见，《通报》一事于是作罢。

张家口技术工程学院的进京告状的“革命造反团”又串联了几个全国有名的造反组织，准备在 11 月 9 日上午，联合召开“控诉、批判、誓师大会”。他们以《一场骇人听闻的反革命血腥镇压》为题，把“1031 事件”铅印几千份传单，在全国各地散发张贴。甚至，正在广州举行的贸易交易会也贴上了。

在他们印刷完几千份传单后，囊中羞涩了，11 月 7 日下午，“革命造反团”又向总参“文革”办公室提出 3 项要求：

一、提供经费；

二、提供会场、通信联络保障；

三、“代印”传单 1 万份。

并要求李天佑于当晚 18 时前答复。

与此同时，1000 多人聚集在国防部南门口进行示威，并在国防

部大门外架起高音喇叭，对着里面不断地高喊口号，发出“通牒”，要求李天佑和王新亭副总长出来见面。

晚 22 时，总参党委经过开会研究后，通知张家口“革命造反团”：不同意他们开大会。

于是，这些穿着军装的学生们开始强行冲击国防部大门，警卫部队紧急动员。当时有两个营担负国防部大楼的警戒，里面、外面都有战士手挽手组成的十几道人墙，拦阻学生。

11月8日凌晨2时左右，为了越过警卫战士手挽手组成的十几道人墙，学生们找来木板架到战士们头上作跳板，从警卫战士的头上爬了过去，最后像当年赤卫队打土豪那样，用木板撞开警卫室的门窗，然后，500余人冲进国防部，在大院里静坐，并拦截汽车。

国防部立即把紧急情况报告全军文革组长、总政治部副主任刘志坚。刘志坚不敢怠慢，马上打电话向林彪报告。接电话的是林彪秘书张云生：

“请向林副主席报告一个重要情况：今晨 3 点左右，一些军事院校的学生不听劝阻，打伤了门卫战士，冲到国防部大院里去了。这些学生，大部分是张家口外语学院的，也有一部分是其他院校的，共约几百人。他们昨天就在国防部西门外，要揪出李天佑副总长，理由是李天佑不久前去张家口检查工作是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全军文革派人给他们做工作，说明对李副总长有意见可以提，但不能冲国防部，他们不听。警卫部队在西门口组成人墙，但这些学生很不像话，不但打警卫战士，还在一位现场维持秩序的副团长身上抹浆糊，贴大

字报。现场的战士都做到了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就是不准他们冲进去。学生们后来弄了块长条板子压在战士的人墙上，从他们头上跳了进去。就这样，许多学生冲进了国防部大院。现在，警卫战士正在动员这些学生出大院，但还有不少学生仍在院子里不走。这些情况，请你在林副主席起床后及时向他报告。”

“我一定及时报告。”张云生说。

“现在，叶帅正在西山和我们一起研究这个问题。”刘志坚继续说：“我们认为，这个问题是严重的，必须进行严肃、果断的处理，否则对统率机关的安全和战备工作就会造成难以设想的后果，对全军各部队的影响也是很坏的。因此我们建议采取以下一些措施：命令所有还在国防部大院的学生立即退出大院，否则以违反军令论处；要抓一两个带头闹事的坏头头；冲进大院的学生要写出书面检查，保证以后不再重犯；……林副主席有什么指示，请及时告诉我。”

刘志坚的电话讲了半个多小时，张云生刚放下话筒，肖华的电话又打进来，也是报告这件事，主张严肃处理。

这时，林彪正在休息。向林彪报告事情有几条禁忌：在他临休息前，不能向他报告任何事情，否则会影响他睡觉；他在睡觉的时候，无论什么事情，都不要叫醒他；他才起床后，由于精神尚未完全恢复，也不能听讲任何东西；他在用饭时乃至饭后半小时内，不但不能听讲文件，就是与人谈话，都会“出汗”。这些不成文的“规矩”，在林办已延续多年：谁违反了它，谁就要对林彪的健康负责。由于这一切，张云生在清晨接到刘志坚和肖华主任的电话报告后，直拖到上午 9 点

钟以后才得机会向林彪报告。

“啊？冲进国防部了？” 林彪听后，显得有些惊讶：他用手指了下对面的沙发，示意张云生坐下说。

## 第267回：大道理，中央文革临现场　“黑材料”，中南海西门关闭

林彪听文件，从来都是让秘书坐在对面，为的是怕给他带来“风”。

张云生在林彪对面的沙发坐下，这时，林彪的儿子林立果正坐在他旁边。

张云生向林彪汇报国防部受冲击的情况，这时，叶群也进来了。张云生又汇报了叶剑英和刘志坚他们研究的几条措施，说他们“希望得到林副主席的指示。”

“我没什么，就让他们去处理吧。”林彪说。

“那怎么行，”叶群急了，“他们要抓人，你也默认吗？他们向你做了报告，你不明确表态，别人就会说他们的胡来都是经你同意的，中央文革就会认为你是他们的后台。别的事不表态可以，这个事不表态可不行！”

“那就给刘志坚回个电话吧，”林彪对张云生说：“你告诉刘志坚，他早晨报的情况我知道了，要对学生做好政治思想工作，动员他们退出国防部大院，但不要抓人。”

“也不要叫学生们写检讨了。要保护学生们的积极性，不要和他们对立。”林立果在旁插话说。

叶群夸奖说：“老虎不愧是红卫兵，对红卫兵造反很有感情。”林立果听后笑眯眯的，歪着脑袋，斜着眼瞅了瞅叶群。这是他的习惯动作。当他特别开心或遇到不顺意的对话者，总是歪着脑袋用斜眼望望对方，只是表情不同。

林彪也高兴起来，说：“对！把老虎说的也加进电话记录里。以

我的口气传给刘志坚！”

于是，张云生回到办公室，立即将林彪的指示电话告知刘志坚，刘志坚听后说：“好吧，我们继续做工作。”

全军文革小组的李曼村、谢镗忠、辛国治再次出面劝说学生们退出国防部。冲进国防部大院的学生退出了大院，但仍坐在西门外。周围站着许多看热闹的群众，将国防部西门堵得水泄不通。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一个学生头头带领大家不断地念着《毛主席语录》。

“把李天佑交出来！”

“打倒李天佑！”

“造反有理！”

“谁对抗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就砸烂谁的狗头！”

还有一个学生带领静坐的学生在那里不停的呼喊着口号。

“同学们！同学们！” 一位40多岁戴眼镜的军人走到学生前面，他是全军文革成员、总政文化部长谢镗忠。他对学生们说：“同学们！请大家安静，我相信大家都是听毛主席的话的。我希望……”

“你代表谁？”一个女学生站起来尖声质问道。

“我是全军文革的，并不代表谁。我想对大家……”

“打倒刘少奇！”

“打倒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

一连串的口号声，把谢镗忠刚出口的话音立刻压了下去。谢镗忠见状，只好站在那里耐心的等待着。

“我们喊毛主席万岁，你为什么不举手？”另一个学生站起来，点着谢镗忠的鼻子厉声质问，“你对毛主席是什么感情？”

谢镗忠一时无言以对，十分狼狈，只好退了下去。学生们却不依不饶，“打倒谢镗忠！”“谁反对毛主席就打倒谁！”的口号声此起彼伏。

又一名全军文革成员、总政宣传部长李曼村站出来想讲几句，学生们可能已经认识他了，没容他开口，就把他轰下去了。

总政青年部长辛国治见状站了出来，他穿着一件校官呢大衣，看上去挺斯文的，也有风度，学生们没有立刻把他轰下去。但他只讲了几句，学生们又不满意了，用一连串的口号声把他压了下去。

双方就这样僵持在那里。在一阵短暂的寂静之后，开来一辆黑色小轿车，从车上下来两个人。人群让开一条路，他们走进来，大家很快认出他们是中央文革的张春桥和戚本禹。

“向中央文革学习！”

“向中央文革致敬！”

“谁反对中央文革就打倒谁！”

……

学生们的口号声又起。

张春桥、戚本禹向学生们招招手，没有讲话，径直走进国防部大院门卫值班室，李曼村、谢镗忠、辛国治跟了进去。学生们继续在外

面念《语录》、喊口号。带头喊口号的那几个学生的嗓子已经喊得嘶哑了。

不一会儿，张春桥等人走了出来，人群顿时寂静下来。只听张春桥大声说道：

“同志们！同学们！我是伯达同志派来的……”

“哗……”场上顿时掌声雷动。

“伯达同志和中央文革是支持你们的。伯达同志给同志们写了几个字，我来念念好吗？”张春桥继续说道。他讲话慢条斯理，富于感情，几句话就把学生们的心抓住了。他“好吗？”的话音刚落，学生们就齐声高喊：

“好！”

张春桥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片，宣读陈伯达亲笔写的书面讲话：

“小道理服从大道理，大道理管小道理。这是毛主席经常说的。今天的事不管你们有这样或那样千条万条的道理，但比起冲进我们无产阶级的神圣的国防部这件大事来，你们的多种道理都站不住脚了。你们忘记了大道理，把这样的小道理摆在大道理之上，怎么能够说是正确的呢？

希望你们立即离开国防部，有什么事可以一个一个谈清楚，有什么委曲可以一个一个解决。在文化大革命中，同学们要用大道理来自己教育自己，自己提高自己，方法是摆事实讲道理，骂人不好，打人更不好，请同学们好好想一想，不要在那里顶了，你们年轻，不要以为自己都对，谁也说不得，我说的这些都是好意，都是从大道理出发

的。希望你们不要轻听轻信，偏听偏信，在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道理上前进。再说一句，希望你们立即离开国防部，今天的错误是可以改正的，改正以后还可以做一个毛主席的好学生。

因为身体不好，托张春桥、谢镗忠和戚本禹三位同志来接见你们，说这番话，请你们考虑。

陈伯达

十一月八日”

学生们原来以为陈伯达会像支持北航“红旗”、地院“东方红”那样支持他们，没想到泼了一盆冷水。他们大感意外，一时没人鼓掌，也没人表示异议。

张春桥抓住机会，紧接着大声问道：“同学们，伯达同志的话，你们拥护不拥护？”

“拥护！”大部分学生响应。

“好。既然大家拥护伯达同志的意见，就请大家回去吧！”张春桥紧接着说道。

闹了一天的学生们，这时陆续散去。国防部西门又恢复了往日的平静。此时已是晚上18时多了。

原来，在向林彪汇报的同时，全军文革也向中央文革作了汇报。正在人民大会堂的周恩来密切注视着事态的发展，在谢镗忠他们几番劝说无效的情况下，他和中央文革陈伯达等人紧急磋商后，由陈伯达写了条子，派张春桥、戚本禹去宣读。如果此策不行的话，他就准备亲自出场了。

此时，周恩来等人正在人民大会堂与北京的红卫兵代表谈话。因为这段时间，各地各部门为“黑材料”的问题纷纷要求中央领导接见，弄的各级领导应接不暇。11 月初，北京又出现了许多批判陶铸的大字报和大标语。而且，就在张家口技术工程学院的进京告状的“革命造反团”冲击国防部的当天，大批群众为“黑材料”的问题，聚集在中南海西门外，要求周恩来接见。为防止意外，中南海已将两个西大门关闭，只开了一个小门进出。为此，11 月 8 日当晚，周恩来、江青、谢富治、戚本禹、张春桥、王力、周荣鑫等人在人民大会堂，与北京“一司”、“二司”、“三司”红卫兵代表各 8 人，及指定北航“红卫兵”和北航“红旗”及其他单位各 1 名代表共 30 多人座谈有关“黑材料”的问题。

周恩来对红卫兵代表说：“因为连着开会，季节不好，连着疲劳。今天叫你们三个司令部的来，想座谈一个紧急的问题。10 月 5 日中央军委的紧急指示信……中央批转了，到现在一个多月了，但平反和档案材料问题没解决……今天和你们直接谈谈，使之解决的彻底、干净、利落，以便于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坚决地斗争……不然纠缠在这个问题上不利。北京如此，全国也是如此。想征求你们意见，你们可能感到很突然。事先通知了没有？”

众答：“没有。”

周恩来让大家举手发言。

蒯大富首先说：“叶林到我们那儿去了，说要交材料，但什么也不交，他拿了两份清单，一份清单我们照了相，另一份是交给文革的

材料清单，他不交，不让照相。他们说防止群众斗群众。”

周恩来说：“你们两边都挺‘文明’。他不交，你们不叫走；那一边呢，他就不交，也不走了。他有的材料是回忆的，你们串联的回来了，一问，不对，说有的烧掉了……因此他说宁肯不听中央的报告，也不回来。”

周恩来什么都清楚。

蒯大富问：“同学们等不得了，那要抢怎么办？”

江青笑了。

周恩来说：“那不好。”

有人谈到陶鲁笳的问题，江青小声说：“陶鲁笳胡说八道。”

林学院、国际关系学院、人大、航院有的代表谈了他们的意见，还有一些学校谈了一些具体问题。

北医“红旗”的代表说：“搞材料没意思，材料公布，不要销毁。应该乱，三个司令部要乱，红卫兵要乱，要大胆地闯，不怕乱。有的问题自己解决，不要把矛盾上交。”

周恩来问他们：“那你们为什么还有人在中南海西门等我？”

北医“红旗”：“现在有人在国务院西门，是说服他们回去，只有一个代表。”

周恩来说：“你回去说服说服，你们给陶铸同志贴大标语，共 7 个标语，贴到陶铸头上合适不合适？请你说服说服。他要把第四号人物也揪出来，是什么意思？我不能见他，我不能同意这个口号。这个口号不只是我不同意，毛主席也不同意。”

北医“红旗”的代表说：“他说党委不是黑帮。”这是指陶铸刚到北京时的一个讲话，后来他在一次接见群众代表时专门为此事做了检讨。于是，有人说：“那个已经检查了。”

北医“红旗”又说陶铸在另一次讲话中的问题，周恩来说：“那个已经声明了，”有人接过周恩来的话说：“8 月 23 日在医大他也检查了。”

周恩来接着说：“定调是定早了，他承认这个错误。把第四号人物陶铸揪出来，我怎么能见？中央政治局名单，没有正式公布，但是只要有点政治常识，在报上总可以看得出来嘛！我那个门（指国务院大门）走不进去了，怎么做工作呢？大民主应该有个限度，在最大民主的基础上应该有集中，必要的集中还是要的，《十六条》公报是毛主席审定的，新的政治局常委是十一中全会选出来的……说错了几句话是不可避免的。如果陶铸他坚持这几句话，你们还可以让他检查，他承认了嘛！”

“你们贴标语说陶铸是‘扶摇直上’，却又说毛主席要提拔新生力量，把这样的老同志没看成是主席的学生、战友。”

“现在，要见我的人这么多……我不只有国内的事情，还有国外的事情，不能点名要见周某人，我就见，我没有这个义务哇！我插入这一段，把时间占了，我借这个机会向你们呼吁。”

接着，很多代表讲了对“黑材料”的移交处理意见，有的主张抓“黑材料”问题，有的主张不要在这件事过多地耗费精力，有的主张把“黑材料”销毁或部分领导过目，或全部公布等处理意见，五花八

门，各有说法，分歧很大。

周恩来听后说道："这个问题全国到处都提出来了，中央文革小组正在研究，你们现在分歧不小，研究后再报中央。我想就两个问题跟你们商量，中央要委托文革小组研究提出个方案来，这牵涉到许多问题。

一个问题是，中央的大门不能开了，你们三个司令部的不要闯进去，不管哪个司令部哪一派的都不要闯进去。光拥护毛主席亲手制定的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拥护党中央，但是毛主席睡觉也睡不好。我号召你们不要往里闯，先开一个门，然后再开一个门。

另一个问题，有的如为了'黑材料'问题，档案问题，把部长找去要见。我们排上队要有个商量。

我今天说了，你们同意，我回去就开。毛主席的中央，哪有开小门的？"

"你们是住在北京的，接待外地来京的同学很紧张。在家的由你们传达，还有外地的同学，外地的同学总好劝嘛！主要是北京的作个榜样嘛！

这是一件事，向你们呼吁。你们哪个反对？"

没人反对。

周恩来又问："应该不应该开？"

众答："应该！"

周恩来继续说："主席这两天要分批接见外地师生，要见就得分批接见了，因为各种组织形式都试过了，总有缺点。这次想时间短一

点，拿车运。对外地的同学，要说服他们，第一批不成，以后还可以见。本地的同学辛苦了……你们做工作，明天请周荣鑫同志给中学同学做工作。这次排上队的见了就回去……告诉他们排得上的上车，别的第二批，第三批……都排得上。

真正拥护毛主席的，要使毛主席、中央不受干扰。问题是非要当天见不可，非要见某人不可，我们十几人，有一个人见就可以嘛！我和谢副总理谁见还不一样嘛！这不能一见就叫陈伯达、江青。陈伯达是杰出的理论家，要思考，要写文章……”

由于参加北京“二司”的学生组织中，只有北航“红旗”、轻工“红鹰”等极少数是学校的少数派，其他都是校内多数派和支持工作组的组织，所以“二司”被“三司”讥为“保皇司令部”。11 月 7 日，北航“红旗”和轻工“红鹰”等联合发动了“宫廷政变”，造了“二司”的反，夺了“二司”的权，成立了“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总部革命造反联络站”，又称“首都二司造反联络站”。“三司”马上表示坚决主持这一“革命行动”。而“首都二司”总部人员当然倍觉委屈，前往中央文革告状，告北航“红旗”到“二司”总部抢东西，搞打、砸、抢，希望中央文革能为他们主持公道。此时，“二司”的代表向周恩来和中央文革提及此事，江青说：“你们群众组织自己的问题，我们不能包办代替，应由你们自己解决。你们那个问题，我们听，委托戚本禹同志出来。”

第268回：矛盾现，聂元梓批邓小平

再赴沪，“三司”设立联络站

北京大学的大辩论在继续，北大校文革内部的矛盾也开始显现。10 月20日、21日两天，北京大学校文革召开常委扩大会议，提出“常委首先要整风”。会上，孔繁等多个常委提出要外出串联。

10月24日在校文革常委会上，聂元梓提议：因五个常委外出串联，经部分常委研究，提名陈影、姜同光、侯汉清、孙蓬一、王海忱等参加常委会会议，加强常委集体领导。会议同意了聂元梓的意见。聂元梓还决定由孙蓬一负责全校的运动、组织和作战。

第 268 回：10 月 25 日下午，北大“北京公社”、“东方红公社”等组织发起召开“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诞生五周月大会”。北京各高校和外地进京串联师生数万人参加了大会。第一张大字报作者之一的宋一秀在大会上发了言。大会宣读了《给毛主席的致敬电》，聂元梓应邀讲了话。

这天，由北大“红旗兵团”主办的《红旗兵团》小报创刊，发表了中文系“起宏图”、“顶风船”两个组织的大字报《欢呼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在北大的胜利》，回顾了北大几个月斗争的历史，提出“五·二五大字报是两条路线斗争的产物”。

但是，这天也有不同的声音。成立于 10 月 15 日的“新

北大红色造反联军”，简称“红联军”下属的“向日葵”小组，以“也来纪念‘五·二五’五周月”为副标题，贴出了题为《聂元梓在两条路线大辩论中究竟干了些什么？》的大字报，说聂元梓提出的“上揪下扫”是错误的，聂元梓同意北大师生外出串联，结果使校内师生“走得空空的”，这是“值得深思的”，等等。

这天，还有北大哲学系四年级的“风雷激”小组发表的《再论要彻底革命，不要改良派》，与哲三“岿然不动”组织辩论，具体地谈聂元梓是如何由于“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本质缺乏认识，逐步脱离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走上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路线的。”

10 月 28 日，北大校文革发出“加强对黑帮管理”的通知，决定将各系被监管人员集中到昌平北太平庄村监督劳动，成立“劳改大队”。

10 月 29 日下午，“新北大捍卫毛泽东路线联络站”所属单位发起召开了纪念毛主席支持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五周月、批判以李雪峰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原工作组副组长武振声、张德华被揪来批斗。市委的吴德、刘建勋和聂元梓等出席大会，李雪峰到会作了检查，承认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基于《新北大》负责人杨克明及编辑部人员外出串联，10月31日，北大校文革决定改组以杨克明为主编的《新北大》

编辑部，改由刘国政、陈影负责《新北大》编辑部。北大“红旗兵团”等组织发表《联合声明》称：“《新北大》临时编辑部，是在原编辑部主要负责人和大部分工作人员外出串联而被迫停刊的情况下，由校文革常委会任命刘国政同志为临时主编，一部分革命师生参加工作，自觉地组织起来的。”

11 月 1 日下午，北京大学同时召开了两个大会。一个是“新北大捍卫毛泽东路线联络站”等所属组织在东操场集会，继续 10 月 29 日的“纪念毛主席支持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五周月、批判北京市以李雪峰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纪念聂元梓大字报广播之日五周月。

另一个大会是“红联军”、“毛泽东主义红卫兵”、“新北大红卫兵革命造反委员会”和“新北大井冈山红卫兵”等 6 个组织在五四操场召开的，也是“纪念‘六·一’五周月”大会，但在会上批判聂元梓、校文革执行了一条隐蔽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发表倡议书，号召“批判北京市以李雪峰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批判北大以聂元梓为代表的革委会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经济系左派杨勋坐在主席台中央。

“新北大井冈山红卫兵”就是 10 月 9 日在清华蒯大富和地质学院朱成昭的支持下成立的“清华井冈山北大支队”，作为清华“井冈山”在北京大学的一个分支，后称“新北大井冈山红卫兵”，简称“井冈山”。11 月，“清华井冈山北

大支队”加入“三司”。

同一天，同在北京大学，却出现了两个会场，两场大会。并且，“五四”会场的主席团在会议期间，还派了两人到东操场会场，要聂元梓过去参加他们“五四”会场的大会。聂元梓表示，是否过去要经过东操场大会的主席团。于是，在东操场会场上出现了争执和混乱现象。

聂元梓在东操场的大会上发表讲话。她说：“我们要坚决响应林彪同志号召，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决按照十六条和林彪同志在庆祝我国国庆十七周年大会上的讲话的精神，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开火，彻底批判以李雪峰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影响。在当前如果不是把斗争的矛头指向这个目标，都是不正确的，而且会影响文化大革命的胜利进行。

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这也和扫地一样，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

我郑重宣布：北京大学校文化革命委员会是在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斗争中诞生的，它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战胜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产物。北京大学校文革执行的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我们在工作中也有缺点和错误，但这些缺点和错误，即便有些缺点和错误是严重的，也是在革命前进道路上所产生的，是在执行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过程中的缺点和错误，是在与资产阶级反动路

线斗争中的缺点和错误。毛主席教导我们：‘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我们如果有缺点，就不怕别人批评指出。’因此，我们衷心欢迎同志们对我们工作中的缺点错误进行严格的批评，哪怕是尖锐的、激烈的。今天，当我们在这里开会的时候，有的同志也在召开‘纪念《六·一》五周月大会’，‘批判北京市以李雪峰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但是他们的大会主要是‘批判北大以聂元梓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我们给他们的大会提供了必要的条件，但不能去参加他们的会，因为我们是执行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我们在工作中有缺点和错误，欢迎同志们提出严格的批评，但我们决不能作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代表人物’登上被批判的讲台。”

11 月 2 日，“红联军”等将两位中学生的来信抄成大字报贴出，题为《北大聂元梓为首校文革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铁证》，说聂元梓在 11 月 1 日大会上“挑动群众斗群众”，是反动路线的大暴露。北大“井冈山”、“红联军”等组织说聂元梓在 11 月 1 日大会上念的那段《毛主席语录》：“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这也和扫地一样，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是指他们的，是把他们说成“反动组织”，因此提出抗议。

北京大学“红旗兵团”当即发表《在中学生公开信的背后是什么》给予驳斥。

接着，聂元梓在临湖轩召开校文革委员会，听她 11 月 1 日在大会讲话的录音。听过以后，在场的人开始议论，都说没有问题。散会后，聂元梓把录音带拿走，自己找人修改了录音带，删去那段《毛主席语录》：“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这也和扫地一样，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

后来，聂元梓在11月1日大会上的讲话录音带被“井冈山”组织从历史系的李炳煌那里借走。一天晚上21时左右，李炳煌约物理系的胡宗式陪他找“井冈山”的头头、地球物理系学生魏秀芬要录音带。因为魏秀芬是校田径队跳跃组成员，胡宗式是组长，彼此很熟悉。他们来到魏秀芬住的35斋，敲开她宿舍门。魏秀芬出来后把门带上，当她听了李炳煌讲明来意后，大声说：“这么晚了。你们两个大男人，来女生宿舍干什么！”说完，转身开门回房，不再理他们。

11 月 5 日，《新北大》二十期出版，报导了 11 月 1 日两个大会情况，并刊登了聂元梓讲话，但删除了那段《毛主席语录》。

这期《新北大》还发表了夏天兵《论机会主义的真面目——兼评杨勋十月六日的大字报》一文。

11 月 6 日，“新北大捍卫毛泽东思想联络站”对 11 月 1 日东操场大会录音带问题发表声明，提出“井冈山”等组织久借录音带不还，多次交涉无效，种种建议遭到拒绝，令

人怀疑它失去了原始意义，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由“井冈山”他们负责。

11 月 7 日，北大“红联军”小报《浪滔天》发表文章：《可耻的行径，卑劣的勾当》，说校刊二十期刊登聂元梓的讲话是被篡改的。因为 11 月 5 日《新北大》二十期刊登的聂元梓讲话没有了“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这也和扫地一样，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这条《毛主席语录》。

11月8日，聂元梓等11人贴出《邓小平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大字报。大字报说：“我国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刘少奇，二号人物就是邓小平。”

北大经济系的郭朝田认为聂元梓的这份大字报是错误的。他找了很多人谈过自己的看法，他说：“聂元梓第一张大字报使她名扬天下，第二张大字报将使她遗臭万年。”他还特地找了北大组织部长、时任校文革委员的张侠讨论他的看法。张侠是中共的老党员，原八路军抗大一分校女生队政治指导员，山东莒县区委书记。她的前夫是安征夫烈士。1945 年安征夫烈士牺牲后，其女寄养在山东莒县老百姓家，至今未找到，不满周岁的儿子随母挺进东北，又一直打到海南岛。她先后任东北局组织干部、蔡畅秘书、四野 43 军教育主任、组织科长。1949 年张侠曾代表八路军参加亚澳国际妇女代表大会，转业后先后任中山大学人事主任、北京大学组织部长。

张侠也认为聂元梓给邓小平贴大字报的做法违背中央精神和组织原则，是错误的。讨论后，张侠立即写出大字报。严厉批评聂元梓。

北大《动态报》负责人胡宗式在这张大字报贴出后也去问过聂元梓："为什么不贴刘少奇的大字报，而贴邓小平的大字报？"

聂元梓说："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批判刘少奇、邓小平。刘少奇态度较好，邓小平的态度不好。我们写大字报轰一下他。"

11 月 8 日这天，北大"井冈山红卫兵"建立广播站。

我们暂且放下北京大学，再来看看此时的上海。北京的"一司"南下兵团撤离上海后，10 月 29 日，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即"三司"南下兵团先遣队领队、北京地质学院学生姜涛，持北京"三司"总部介绍信，正式向上海市委提出设立驻沪联络站，并附一份"物质要求"清单：

一、将延安西路 28 号市委对面的办公大楼作为联络站。

二、配给一辆装有 3 个高音喇叭的宣传车。

三、配给 20 辆自行车、一辆摩托车。

四、配给 1 架打字机、3 架手摇油印机、5 块誊写钢板、10 支铁笔。

五、刻有“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驻沪联络站”字样的公章。

六、拨给5000元活动经费。

经研究，市委表态：除自行车减为10辆，办公地址、活动经费待进一步商讨外，其余均予满足。

接着，“首都三司驻沪联络站”落户愚园路311号。这里原本是上海一个资本家的房子。在扫“四旧”的时候，红卫兵一纸“勒令”，便把资本家赶走了。北京红卫兵还以革命的名义，将资本家的照相机、自行车抄家充公，用以革命。并将一幢上海第一师范学校准备办展览会的资本家房子作为北京红卫兵到上海后的宿舍。同时，“三司”向外宣称：目前“三司”在沪红卫兵已达300余人，总司令部还将派出有大批人马到上海，等等。愚园路311号里设有北京红卫兵接待站，每天都接待很多红卫兵。

从11月1日起，“首都三司”南下红卫兵就开始与工厂的工人造反派串联，专找造反派，特别是找那些因反工作组，反上海市委而挨整的人。4日，“首都三司”南下红卫兵又与11月3日才成立的“上海市红卫兵炮打司令部联合兵团”，简称“炮司”的红卫兵一起下厂串连。

上海“炮司”，说起来是一个“联合兵团”，其实只有二十几人，是一个由上海复旦大学“东方红公社”、上海交通大学“反到底兵团”、上海第二医学院“东方红公社”、

上海纺织工学院“东方红公社”、上海师范学院“孙行者战斗队”和上海市市东中学“红色恐怖战斗队”6所学校的群众组织联合在一起的一个全市性学生组织，其中唯一的中学生组织，上海市市东中学“红色恐怖战斗队”的头头红鸥，原名侯美度，也是“炮司”的发起人之一，她于1966年10月在北京串联时，认识了上海戏剧学院的学生赵全国。

那是在一次中央文革接见外地学生的千人大会，红鸥见会上没有上海代表发言，便冲上台要求“代表上海红卫兵”发言。发言后，她就被一群上海红卫兵哄上来争着握手，其中就有赵全国。他对红鸥说：“你讲得对，上海是一潭死水，需要大乱特乱！你参加我们司令部吧，我正在筹备‘上三司’！”

10月下旬，回到上海的红鸥去上海戏剧学院看望赵全国，他谈了自己的伟大计划：要拉一支“首都三司”式的队伍，队伍的名字也与“首都三司”一模一样，只需要把“首都”换成“上海”就可以了。

他说：“上海没有市一级的造反派组织，原来的两个红卫兵组织，‘一司’‘红卫兵总部’是保皇派。‘二司’‘红革会’是温和派。只有我组织的‘三司’是响当当的造反派!”

他接着对红鸥说：“你来当我的宣传组组长好吗？”

红鸥听了很不舒服，她不喜欢这种不平等的关系，她认为，红卫兵组织应该采用《十六条》指出的巴黎公社式的选

举，哪有自封司令的？于是对赵全国说：“我现在还没有考虑好要不要参加？”

很快，上海华东纺织工学院“东方红公社”的林翌，看到马路上贴的市东中学“红色恐怖战斗队”的传单《红色恐怖万岁》，慕名来到市东中学找红鸥，他说：“我们串联了全市最激进的学生，要组织上海红卫兵‘第四司令部’，你们是最有造反精神的学生，说什么也不能漏掉你们！”

他说：“我们把毛主席的‘炮打司令部’作为我们组织的名称，我们就是要炮打司令部，炮打上海市委！”“他说我们将根据巴黎公社的原则组织我们的队伍！”

林翌的最后一句话让红鸥很爱听，她和“红色恐怖战斗队”的几个人一商量，就一致同意参加“炮司”。

11 月 2 日，来自上海四所大学和一所中学的二十几名学生在上海人民公园绿草芬芳的草坪上围成圆圈坐了下来，他们是在召开“炮司”成立的筹备会。开会前，自然是要先念一段《毛主席语录》。这次他们读的是毛泽东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直读的大家热血沸腾。

复旦大学“东方红”公社周谷声说：“上海局面一直打不开，就是上海市委实行资产阶级专政。这种现象，在学校里不太明显，在工厂里很明显，从九四事件起，我们复旦和华纺、二医的红卫兵，开始与工厂的工人串联。所以比较了解工厂的情况，工人受压比学生厉害。如果我们学生能把工

人发动起来，组织起来，上海的局面就能打开。毛主席在《青年运动的方向》里指出学生要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我认为我们红卫兵也应该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

他的话得到与会人员的赞同，还把学生与工人相结合称为工学运动。

会上有人提议把“炮司”司令部设在巨鹿路 691 号，说那里住着位私业医生，一家四口人住着二十几间房，还雇了许多佣人，光男佣人就有 3 名，女佣人更多。破四旧时，他的诊所被红卫兵封了。像这样的吸血鬼，应该把他赶走。

他的提议没有人反对，就这样通过了。

第二天，11 月 3 日，“炮司”一行人又来到上海交通大学“反修楼”与上海交大的“反到底兵团”的许云飞见面。

许云飞原是上海“一司”红卫兵，他不愿参加“一司”的抄家行动，被“一司”开除，于是就自己组织了“反到底兵团”。

许云飞说：“红卫兵战友们，我们选定了工学运动，这条路选得好，选的对！这是一条历史必由之路，一条胜利之路！47 年前，1921 年 5 月 4 日北京发生了五四运动，学生首先上街游行，揭开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6 月 4 日，工人运动也迅速展开。历史证明了这一条真理：即学生是先锋队，工人是主力军。我们的红司令毛主席也是这样教导我们的，他老人家说，中国的知识青年们和学生青年们，一定

要到工农群众中去，把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的工农大众，动员起来，组织起来。没有工农这个主力军，单靠知识青年和学生青年这支军队，要达到反帝反封建的胜利，是做不到的。战友们，同学们，让我们走向工厂，走向农村，去和工农结合吧，去和工人农民并肩战斗吧，上海市委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丧钟就要敲响了！”

于是，就在这一天，他们在上海交大“反修楼”宣布成立“上海市红卫兵炮打司令部联合兵团”，简称“炮司”。

接着，“炮司”二十几人又来到巨鹿路 691 号，敲开了这里的黑漆铁门。

这是个深宅大院，四周有五米高的围墙，院内有二幢楼房，前面一幢是私宅，后面一幢是诊所，二幢楼房中间是一个占地 300 平方米的大花园，园内繁花绿树，假山流水，甚为幽雅，一条弯弯曲曲的游廊把前后二幢楼房连接起来，这是沪上祖传名医妇产科医生陈大年的私宅。陈大年当时已 60 多岁，一生悬壶济世，力起沉疴，誉满杏林。

“炮司”向陈大年宣读了《勒令书》，说：“陈大年是一个靠剥削起家的老吸血鬼，我上海市炮打司令部联合兵团代表人民宣布，从即日起巨鹿路 691 号收归国有。现勒令陈大年立即滚出 691 号，如敢违抗，我红卫兵将对其采取革命行动。”

“炮司”在附件弄堂找了两间房，让陈大年一家搬到那

里。有人借来一辆黄鱼车，把他家的大柜、床、家具都搬到黄鱼车上，拉了过去。接着又把他家剩下的柜子、箱子等贴上了封条。

从此，巨鹿路 691 号就成了“炮司”的司令部。

26 年后，1992 年，参加这次行动的红鸥怀着负疚的心情，再一次叩响了巨鹿路 691 号的门，正巧碰见了陈大年医生的大儿子，她说是找陈医生道歉，自己就是当年把他赶出家门的红卫兵之一。陈大年医生的儿子带着难言的悲痛说：“父亲已去世靠（沪语：近）十年了，过去的事情都过去了，希望你们今后多做对祖国对人民有益的事”。

## 第269回：座谈会，串联工人闹革命

## 定“三不”，曹荻秋态度坚决

再说上海那些在文革初期因为给领导提意见而被挨整的工人，对北京来的红卫兵也比较信任，愿意找北京的红卫兵交流经验，述说他们挨整的经历。他们提出要到北京去上访，正在上海串联的北京中央美术学院学生包炮对他们说：“你们不要去北京上访了，我们就地闹革命。”因为几天前，10 月 30 日，中央转发了给安徽省委的回复，要求工人不要离厂外出串联。

包炮，原名包常甲，“包炮”这个名字是取毛泽东“炮打司令部”之意。当他在上海接待了第一个工人来访者，上海铁路装卸机械修理厂的工人，听说他们因为支持北京红卫兵而被上海南洋模范中学红卫兵毒打，以后又被送回所在工厂后继续挨打时，他震惊了。他要帮助上海工人成立群众组织，与压制他们的领导斗争。

包炮向“三司”南下兵团先遣队领队姜涛提出，应该开一个筹备会议，把上海的工人组织起来。11 月 5 日，他根据来访登记簿上的记录，让“首都三司驻沪联络站”的红卫兵给曾来此串联过的工人打电话，邀请他们第二天下午来“联络站”参加座谈会，交流工厂文化大革命情况。

这天下午，在上海串联的北航红卫兵吕英豪等几个学生到上棉 31 厂串联，找到该厂的造反派工人谈炳奎，谈炳奎

将他们领到该厂第一个工人群众组织的头头黄金海那里，黄金海接待了他们。

黄金海 15 岁学徒，1955 年“三反五反”时，他揭发老板偷税漏税，致使老板的生意关门，自己也因此失业。但他仍积极参加社会活动，“五反”运动结束，政府在仁德纱厂开会，给各厂老板发定案书，让黄金海在台上颁发手工业行业的定案书。几十年后，黄金海回忆当时的情景时说：“我心里很激动，有种强烈的翻身感，觉得扬眉吐气。”

黄金海参加了失业工人学习班，速成到初中毕业，然后进申新五厂。该厂后来与另外几个厂合并为国棉 31 厂。

进厂后，黄金海写了入团申请书。每个厂休日，他都义务加班。尽管那时正式工人加班拿双薪，但是学徒加班没有加班工资，可参加可不参加，但身为学徒工的他基本上每次都积极参加。

1957 年，他车出加工难度很大的特种螺丝，被评为七级车床技工。车床工最高技术八级，他觉得自己升级太快，主动要求减为六级半。三年经济困难时期，他又主动要求减去半级工资，他说：“我应该为国家分挑困难”。

黄金海是厂里跃分子，业余时间抄写黑板报，领做广播体操，参加歌咏队，舞蹈队，篮球队。他还坚持每周三天读夜校，一下班就匆匆啃着馒头去上学。读完了夜校，又上夜中专，学习机械专业，直读到毕业。还打算再读夜大学。

黄金海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讲义气。许多工人有困难，他主动帮助解决。自己能力不够，不能解决的，也要去安慰一下。工人中间难免有些小矛盾，他也出面调解。对于和他交往较多的人，他也以诚相待。这样。一来二去，他在工人中就有了威信。

但是，他身上也有许多毛病，比如散漫、有时说话粗鲁等等，这些普通工人身上的通病，他都具备，因此他的入团申请迟迟不被批准。黄金海觉得是受自己的父亲牵连。黄金海生父解放前长期吸毒，积习不改，入不敷出，直至解放后贪污公款，事发后被判刑五年。其实黄金海和生父在一起生活仅仅三年不到，就被他父亲送人了。但黄金海因此有些消沉，他后来回忆说："我的政治包袱越背越重，业余沉溺在钓鱼打牌之中，一度留起了小胡子，还买了领带和方头皮鞋，去寄卖商店买了格子呢的西装。""我比较注意外形，头发每星期一定理一次，不喜欢显得邋邋遢遢。"黄金海还喜欢跳舞，溜冰，"不过我有底线，跳舞溜冰，我都在厂里，从来不去跳舞厅和溜冰场。那时那种地方都是些当时被看作不太好的人去的"。

其实，他的表现还是不错的，就连他文革中他的对立面，同厂的保守派组织负责人李剑钰文革后说起他，也认为他"文革前表现不错，没什么大缺点，就是穿着打扮在当时比较醒目而已。"

黄金海喜欢看书。1964年号召学习毛主席著作，他自费买来《毛泽东选集》，读了很多遍。文革开始后，他能一段一段地准确背诵《毛主席语录》，就是与他在那个时候的积累有关。

黄金海是工会小组长，还搞技术革新，发明车床“双头刀架”，提高了产品质量和生产效率。他带的甲班车床组，月月超额生产量都在20%以上，1965年被评为厂里的“五好小组”，他也被评为“上海市五好工人”。

1966年3月，他被吸收入党，支部大会通过，党委还没批下，文革就开始了，这次入党也就不作数了。

文革开始后，在党委的号召下，黄金海也积极写出了批判“三家村”的大字报。6月，厂党委又要求联系本单位实际写大字报。黄金海是“五好职工”，当然要带头响应，于是挖空心思写了张给车间党总支提意见的大字报，因为他对厂里的事情不了解。大字报的内容是批评车间党总支一些干部们在政治学习时间聊天讲“大道”，即“侃大山”，因此要求这些干部“下来”与工人一起学习。为什么说“下来”？因为干部的办公室在车间二楼。

6月25日，大字报贴出的当天晚上，黄金海正上中班，见组里工人们的车床一个一个关了。他是组长，但却没人向他请假或打招呼，他心里奇怪，也不好问。原来是车间党总支通知大家开会，但却没有通知黄金海。

晚上 22 时，中班下班，黄金海去食堂吃半夜饭，赫然见一路都是针对他的大字报："把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黄金海揪出来示众!"到食堂门口，又是一张大字报："'下来'就是要党下台!"他这才明白，原来是那张"下来"的大字报惹的祸。吃饭时，大家谁也不敢和他坐在一桌了。第二天，上百张大字报贴出，说黄金海是"反党分子"、"个人野心家"。黄金海父亲的吸毒历史也被挖出，作为黄金海本人出身不好因而"一贯反动"的有力证据。甚至还有大字报揭发说，黄金海从小就跟随父亲出入鸦片馆。黄金海的妻子见到这样声势浩大的围攻，吓得在家里掉泪。黄金海很生气，认为这是党委抛出本应保密的职工个人档案。因为他在写自己简历时，曾经老老实实地提到，小时候父亲曾经带他去过一次鸦片馆。他的本意是为了说明，这次经历使他看到吸毒的丑陋而更加痛恨吸毒。这个"向党交心"的自白，现在被作为罪状抛出。这样的围攻惹火了黄金海，他白天坚持生产，晚上便带着面包去上海市委告状，但毫无下文。黄金海觉得那个冤呀！

8 月初，黄金海与他所在车间持相同观点的工人，组织了"毛泽东思想红旗战斗队"。因为是党总支的批判对象，领不到写大字报的免费笔墨纸张，他们就自己掏钱买。厂里有人指点他们：不要老是纠缠在"下来"的问题上，应该把目标对着厂党委和工作队。此时社会上红卫兵运动已经兴起，

黄金海觉得有道理。8 月 30 日，“毛泽东思想红旗战斗队”贴出了针对驻厂工作队的大字报。

看到毛泽东《我的一张大字报》后，黄金海激动得掉泪，觉得“毛主席好像就是针对我们厂的情况说的”。10 月底，黄金海听说国棉 17 厂的王洪文去北京告状回来了，他也想赴京告状，便去国棉 17 厂串联。王洪文接待了他们，对他们说，北京现在很乱，不要去。他们去北京时，中央接待站的人对他们说，厂里压制工人的问题，中央会逐步解决的。黄金海听从了王洪文的劝告，王洪文的热情和稳重举止给黄金海留下很深印象。

此时，北航学生吕英豪对黄金海说：“明天下午在愚园路首都红卫兵三司驻沪联络站开个会，主要是串联一些工厂企业，交流一下上海工矿企业的文化大革命情况，请你们去参加。”

黄金海答应了。事后他想到上棉 17 厂的王洪文，便给王洪文打去电话，叫他明天一起去愚园路“首都红卫兵三司驻沪联络站”听听，王洪文答应了。

一个月前，10 月 7 日，王洪文看了《红旗》杂志第 13 期的社论：《在毛泽东思想的大路上前进》，注意到里面提出了“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彻底批判”的口号，便与唐文兰等 6 个厂部科室人员贴出大字报:《就目前形势谈看法》，公开打出了反对工作队的旗帜。

工作队通过厂文革委员会组织了四次全厂大辩论，辩论的中心是国棉 17 厂的文革对象和方向，实际是对着王洪文他们的。10 月 10 日的辩论中，王洪文被围住，正在此时，国棉 17 厂职校学生廖祖康带来一帮学生红卫兵为王洪文解了围。晚上，反工作队的工人们在王洪文家聚会，王洪文提出："我们现在只有一条路：到北京去向党中央告状。"当即决定派人赴京。第二天，又在唐文兰家里开会，成立了"誓死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战斗队",成员有 30 多人，王洪文被推为负责人。

10 月 12 日下午，王洪文等 15 人赴京告状。在此期间，国棉 17 厂一些造反派又拉起一支新的战斗队"永远忠于毛泽东思想战斗队"，王洪文组织的"誓死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战斗队"许多队员也加入了"永忠"。另外，保卫科干事马骥等人也成立了"捍卫毛泽东思想工人赤卫队"，有 5000 多人参加，得到工作队支持。

10 月 25 日，王洪文一行回到上海。第二天，在王洪文提议下，"永忠队"和"誓死队"合并，仍叫"永忠"，王洪文仍被推为负责人。他提出"永忠"的首要任务，就是赶走工作队。当天深夜，"永忠"全体出动，在工厂大门口和工作队办公室门前贴出针对工作组的对联：

"焦凤岭哼哼哈哈捧上压下，施惠珍嘻嘻笑笑奸刁储腹。什么东西"；

“热泪盼来绊脚石，纸船明烛送瘟神。滚滚滚”；

“落水狗祸国殃民，施惠珍罪该万死。一对宝货”。

这天夜里，“永忠”还查封了工作队办公室工作队员的抽屉。

此时，全国驱赶工作队已成大势所趋，主管全市工作队的市委社会主义教育办公室，只得让驻国棉 17 厂的工作队检查错误。

11 月 1 日，“永忠”贴出《工作队十大罪状》大字报，刷出大标语“工作队靠边站!”。

11 月 4 日，“永忠”占领厂广播台……

11 月 5 日晚，“炮司”和包炮串联了上海部分工人造反派，在“首都三司”驻沪联络站召开预备会，商量第二天“上海工人串连交流经验会”出席者名单，然后分别通知。

11 月 6 日晚 19 时 30 分，包炮在愚园路“首都红卫兵三司驻沪联络站”主持召开了“上海工学串连交流经验会”。参加这次座谈的有上海各企业在文革中起来造反而受到打压的代表：

上海玻璃机械厂工人潘国平、王口元、沈建柱；

五一电机厂的丁德法；

沪光灯具厂的黄文海；

保暖瓶二厂的范佐栋；

741 服装厂的徐美英；

上钢三厂的戴祖祥、穆南生；

合成纤维研究所的叶昌明；

良工阀门厂的陈阿大、童海龙；

上海铁路装卸机械厂的谢鹏飞、周国定、蒋周法；

上棉 31 厂的黄金海、仇歧贵、方松林；

上棉 17 厂王洪文、廖祖康、唐文兰、房佩仙；

822 厂的岑麒麟；

人民电机厂的张伯达等。

上海“炮司”等学生红卫兵组织也参加了这次串连会。“炮司”周谷声指着一个刚进门剃板刷头的青年工人对红鸥说：“红鸥，他叫蒋周法，是江湾装卸机械厂的工人，受的迫害最厉害。九四时，他支持我们学生冲上海市委，被他们厂里打成反革命，工作组挑动不明真相的群众和学生几次毒打他，打得他遍体鳞伤，两天两夜不能动一动，毛主席说白色恐怖，他们厂里就是白色恐怖。”

红鸥和周谷声一起迎上前，握住他的手。周谷声问蒋周法：“血衣带来了吗？”

“带来了。”蒋周法把手里的白色包袱放在桌上摊开，里面是两件血迹斑斑的白衬衣，他又把一根铁棍放在桌上，怒目切齿地说：

“你们看，他们用这么粗的铁棍打我，我的命差点　送在他们手里！我有什么罪？支持北京红卫兵有什么罪？响应

毛主席号召写大字报有什么罪？”

会议开始后，包炮首先对大家说：“我们受中央文革小组的委托来了解上海工矿企业文革的发展，请大家汇报自己单位的情况，提出建议和要求。”

戴祖祥首先控诉自己被厂工作队打成反革命并被关在防空洞的遭遇。接着，岑麒麟、潘国平、叶昌明、徐美英、谢鹏飞等人也争先恐后地讲述厂党委、工作组对他们的迫害，讲他们单位是怎样镇压文化大革命，把他们打成“反革命”的。

说的和听的都哭了，会议在一片嘤嘤啜泣声中进行。

上棉 17 厂的王洪文讲了他在厂里贴了第一张揭发厂党委的大字报后的受压的情况，和 17 棉文革工作队队长施惠珍进厂后对他们的迫害。

黄金海说他仅贴了一张大字报，就因为其中要求党总支从楼上的办公室下来，到下面的车间同工人们一起学习毛主席著作，就被说成“要党下台”，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

叶昌明则讲了上海市委在他们合成纤维研究所炮制假标兵“红雷青年小组”的经过情况。他的发言对大家的震动很大，因为其他人说的都是工厂范围里的事情，涉及到公司或者局一级已经不得了了，但叶昌明揭露的却是上海市委的问题。

周谷声噙着满眶热泪，激动地说："工人同志们，你们用血和泪控诉了上海黑市委的累累罪行，对我们教育很大，我们决心向你们学习，和你们一起把上海市委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彻底批臭批倒，把上海市委、华东局的问题彻底弄清，不达目的，死不瞑目。"

陈阿大忘情地把手一举："向红卫兵小将学习。"

随后包炮讲了全国和上海的文化大革命形势，他说："问题不在各基层，根子在上海市委。'资反路线'是上面下来的。"

包炮分析了上海市委曹荻秋的几次讲话，认为是修正主义的，是和文化大革命唱反调。他提出："上海工人阶级应该组织起来，否则上海的文化大革命会打下去的。"他说："江苏、湖北的工人组织得比较早。现在上海每天都有不少工人来找我们，反映受迫害情况，要求支持，希望在座的能考虑成立一个工人造反派组织。我们已就此事与一些到这里来要求首都红卫兵支持的工人们商讨过，他们也有此要求。"

大家一听，都赞同包炮的看法，纷纷谈起《十六条》中讲到工农兵是文化大革命的主力军，主力军为什么不动呢？应该组织起来。这时，上海玻璃机械厂"造反有理战斗队"的年轻头头潘国平说："我们造反派工人光是串联和交流经验是远远不够的，我们应当成立上海工人造反派的全市性组织。正如马克思所说，无产者只有联合起来，才会更加有力

量”

他的提议立即得到与会者的一致响应，822 工厂的岑麒麟和上钢三厂的戴祖祥说他们已经找了一些人做了准备，说着，戴祖祥拿出一枚他自己用石膏刻的“上海工人赤卫队”的公章。

戴祖祥曾是何香凝的学生，专画狮子，有一定的艺术功底，在上海第三钢铁厂做美工。

这时坐在黄金海旁边的王洪文当即表示反对，他说：“原来讲好今天仅仅是交流情况，怎么连印章都搞好了？这不是‘真主意假商量’吗？”

黄金海也有同感，与会的许多单位代表也觉得奇怪，他们当场将岑麒麟和戴祖祥当成“政治扒手”批了一通。包炮他们赶紧解释说，岑麒麟和戴祖祥他们前一天来过“三司”联络站，和他们已经议论过工人要组织起来的事情，他们这样做也是好意。

但是，包炮说，“赤卫队”这个名字不好，现在都是造反派组织，建议成立“工人造反队”。

黄金海提出：“这个名称应该能让人接受，能团结人，叫造反队不合适。现在共产党领导，难道你要造共产党的反？老工人一听就会感觉刺耳，这怎么能团结大多数呢？”

王洪文等人都支持黄金海的看法。因为在此之前，上海的各工厂企业都没有叫造反字眼的，就是“红旗战斗队”、

“永红战斗队”、“永远忠于毛泽东思想战斗队”等，基本出发点都是文化大革命是在共产党、毛主席领导下，为了防修反修、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大民主运动。仅提“造反”，就会有造共产党反的嫌疑，故大家一时都不能接受。

但北京红卫兵坚持这个名称，并大声朗读“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

于是一些人也接受了。

黄金海又提出：“既然叫造反队，就应该含义明确一些，加上革命两字。”这点大家比较同意。另外，也学红卫兵组织叫“司令部”。黄金海又提出在“司令部”前再加一个“总”字，说北京红卫兵分裂成几个司令部，上海工人造反派不要再分裂，大家同意。就这样，“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诞生了，后来简称“工总司”。

这时，已经是晚上22时，包炮估计有些人家里有事，便建议各厂选出代表留下，吃过晚饭后继续讨论筹建组织事宜。17个单位留下了各自的代表，他们是：

国棉十七厂保卫科干事王洪文；

上海玻璃机械厂工人潘国平；

上海合成纤维研究所工人叶昌明；

良工阀门厂工人陈阿大；

国棉三十一厂工人黄金海；

上海保温瓶二厂工人范佐栋；

沪光灯具厂工人黄金海；

上钢三厂工会美术人员戴祖样；

822厂技术员岑麒麟；

五一电机厂工人丁德发；

人民电机厂工人张伯生；

色织拈线厂工人陈金星；

有色金属压延厂工人孔繁胤；

江南金属制品厂司机王汉青；

上海铁路装卸机械修理厂工人谢鹏飞认为自己“出身成份不好”，推荐同厂另一位工人蒋周发留下来；

147服装社的女工徐美英惦着家中四个孩子，回家去了，留下同厂工人史梅龙；

还有一个无线电仪器厂的造反派代表。

留下的代表吃完饭继续开会，首先商量推选成立大会的主席团筹备组负责人。

包炮毕竟是从北京来的红卫兵，对《十六条》和巴黎公社原则比较清楚，他说：“你们可以每个人先讲一下自己的出身、成份、简单经历和为什么要造反，然后大家民主选举一个召开成立大会的主席团；在开过成立大会以后，由参加‘工总司’的各工厂的代表再正式选举‘工总司’勤务组。选举要采取巴黎公社式的原则民主选举，随时撤换。”

大家都同意这个办法，开始作自我介绍，结果，与会的

只有两个共产党员，王洪文和岑麒麟。因为岑麒麟自报在四清运动中延缓登记，王洪文就是这些人中唯一的党员。

18 岁参军，22 岁复员到玻璃机械厂工作刚满两年的潘国平年仅 24 岁，因为是他提议成立上海工人造反派的全市性组织，并得到与会者的一致拥护，而且能说会道，一副风流倜傥的勃勃英姿也博得众人的齐声喝彩，当场就有几个从北京来的红卫兵建议，要他担任“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的临时召集人，说他造反精神足。

黄金海感到潘国平“海”派气息重，于是提出请王洪文担任，因为他是共产党员，复员军人，又是保卫干部。他的提议几乎没什么争议，因为与会者虽然互不相识，但对共产党的干部还是一致相信的。大家公推王洪文负责。王洪文说：“负责可以，但主持大会不行，因为口才差些，讲话不行。”于是大家又推选潘国平主持大会。接着又选国棉三十一厂黄金海、上钢三厂戴祖祥、良工阀门陈阿大与王洪文、潘国平一起作为大会主席团筹备组候选人。

红卫兵提出，上海市委正在召开全市三级干部会议，“工总司”成立大会一定要抢在三级干部会议结束之前召开。于是决定将成立大会时间定在11月9日，“让市委措手不及”。

关于大会的地点。红卫兵提议，放在人民广场，但是，上海宝山县大场中学代课老师项德宝向包炮提出，上海工人造反派只有2万多人，成立大会还是放在文化广场召开，效

果会更好。大家都同意。上海“红卫兵造反委员会”方劲戎当场就说：“文化广场会场我们包了。”表示由他们去联系文化广场。

对于大会的准备，工人没有搞过，很有些茫然。好在北京的红卫兵有经验，他们提出，要先成立一个大会秘书处，处理会场上的提案、发言等接洽事宜，还要准备相关的文件。于是由沪光灯具厂的黄文海等人组成了会议秘书处，决定会上由合成纤维研究所的叶昌明揭发“红雷小组”是“假标兵”一事；上海铁路装卸机械厂的谢鹏飞、上钢三厂的戴祖祥揭发他们厂领导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请曹荻秋到会表态，要他支持“工总司”组织及听听大家对“资反路线”的揭发；会场由上海中学“红卫兵造反委员会”负责；关于整理发言稿、借会场、布置会场、出海报等等筹备工作，就由各红卫兵组织包了，“工总司”成立“宣言”由参会的人民电器厂张伯生在交通大学“反到底”红卫兵协助起草。最后，王洪文提出：筹备处还没有地方。上海“炮司”的林翌说，可以先放到他们那里，地点在巨鹿路 691 号。

王洪文说：“大家这几天可以经常到巨鹿路去通通情况，各自回单位后，要抓紧组织人参加我们 9 号的成立大会。”

散会后，有人提出：“开会需要用的红布和做袖章用的红布还没有呢，买布的钱和布票哪里来……”

北京红卫兵笑道：“你们怎么这样婆婆妈妈的。革命嘛，

可以先到商店里借，打借条，等革命胜利后就还。”

陈阿大说：“向布店借，不肯借也要硬借。等组织成立后，写个证明，叫他们去向曹老头结账！”

戴祖样的弟弟戴祖大建议去八仙桥的协大祥绸布商店，他在服装店工作，对这一带比较熟悉。

江南金属制品厂的王汉清是司机，他正好开着一辆卡车来开会。于是，在几个红卫兵学生的带领下，上棉 17 厂的王洪文、上棉 31 厂的黄金海、保暖瓶 2 厂的范佐栋、五一电机厂的丁德法、戴祖大等人就乘坐王汉清的卡车驶往附近的八仙桥协大祥。途中汽油没了，他们将车开到延安路附近一个加油站，加完汽油，众人登上卡车刚欲离开，被油站工作人员拦住。当时加油都要汽油票，工作人员向他们索要，他们递上一张纸条：“上海市委加油 100 公升”，说：“向曹荻秋去要！”

而潘国平则赶往上海交通大学找“反到底兵团”的严步东，因为市委书记马天水在他们手里。他想通过严步东找到马天水，要市委派人来参加“工总司”的成立大会，承认“工总司”。

马天水无法答复，只能说：“这个么，还要研究、研究……”

愚园路“首都红卫兵三司驻沪联络站”这边，工人们走光后，上海交大许云飞把“炮司”的人留下来，谈了他的顾

虑。他提出，要审查“工总司”的这几个发起人。许云飞是红五类出身，他害怕让坏人混进“工总司”。

包炮表示支持，说：“许云飞说得对，为了保持工人阶级队伍的纯洁性，有必要对核心成员进行审查，在 9 号开大会前告诉大家。一旦发现劣迹，立即开除。你们‘炮司’出人，我们出介绍信。”

再说去找红布的王洪文他们来到位于西藏南路 25 号的协大祥绸布商店时，已是子夜时分，这里门户紧闭，店堂里一片漆黑。大家问王洪文怎么办，王洪文说：“这么大的店，一定有后门，到弄堂去找！”他带着人找到后门敲门。值班的店员开门后有些紧张，不知发生什么事。范佐栋向他解释说，上海工人要组织起来，缺点红布做袖章，想借一些，同时范佐栋拿出工作证给他看。

值班的店员看见他们一些人还都身着工作服，不再紧张，领他们上了三楼卧室，叫醒店党支部书记。王洪文说他们因革命造反急需红布二百尺，支部书记要他出示证件。王洪文拿出“首都三司联络站”的介绍信，支部书记说红卫兵介绍信不能作凭证，他要王洪文出示工作证，王洪文没带。范佐栋和另两个人出示了自己的工作证。支部书记见了工作证后，告诉他们，店里没有红布，不信可到商场去找。支部书记带他们去二楼货栈查看。果然只找到一百尺红府绸。王洪文说：“府绸也要，我们借了！”值班人员拉着他们让付钱，

范佐栋当场写了借条，承诺“工总司”成立后和他们结账。

出了门，大家议论说这点红布可能不够。戴祖大说附近有家棉布批发站，肯定有红布。他们又直奔金陵东路和四川南路交叉口的一个棉布批发仓库。正巧仓库一个值班的开门出来上厕所，他们就跟着上去了。值班的那人看见后面跟进来一群人，吓了一跳，问他们是干什么的。范佐栋向他作了解释后，那人释然，领他们进去。里面有两三人值班，知情后一致表示支持，并帮助他们从上面搬下四捆红布，大家表示感谢，双方热情告别。

后来，“工总司”成立后，上海市委给了经费，“工总司”派丁德发去协大祥结了账。以后，张春桥跟毛泽东说起王洪文他们这次抢红布的事情，毛泽东笑着说：“他们也是没有办法，是官逼民反么。”

## 第270回：上海市，“工总司”宣告成立
## 奔市委，工人要见曹荻秋

7 日凌晨，王洪文等十几个工人，扛着一匹匹红布，挟着寒风，敲开了“炮司”巨鹿路 691 号的大门。

“炮司”把他们让在沙发上休息，也许是太累了，这些工人一会儿就打起呼噜，进入梦乡。许云飞拿起男宿舍仅有的几条棉被，轻手轻脚盖在工人们的身上。

“谁?”一个工人朦胧中睁开眼，一看是红卫兵为他盖棉被，顿时激动得握住许云飞的手，连声说：“谢谢，谢谢。”

天刚破晓。“炮司”的几个“政审”小组就悄悄地从巨鹿路出发了。

许云飞和一个男生到上钢三厂调查戴祖祥，他们找了许多人谈话，有厂领导，也有和戴祖祥一个班组的工人。有人反映戴祖祥有偷窃行为。许云飞毫不留情地决定把戴祖祥开除出核心组。

江必雄调查陈阿大。

调查王洪文的是红鸥和周谷声。他们进厂后，没有立即找工作队，先浏览一下大字报，看看有没有写王洪文个人品质的大字报，没有发现。于是红鸥提出找工作队，他们是王洪文的对立面，如果王洪文有什么问题，他们不会不说。周谷声点头称是。

工作队队长施惠珍接待了他们。

“王洪文同志出身苦，当过兵。复员到我厂后工作表现一般。”施惠珍简略地介绍了王洪文的情况后，话锋一转，滔滔不绝地谈起了王洪文在文革中的表现，从他第一个写厂党委大字报说起，一直说到他组织赶工作组。因为是她亲身经历，说得比较细。

“施惠珍同志，王洪文有没有判过刑，蹲过监狱？”红鸥问。

“没有。”施惠珍答。

红鸥和周谷声同时松了一口气，站起来向施惠珍告别。

接着他们又急急地赶到国棉三十一厂，不巧碰上了厂休，厂内空无一人。他们非常沮丧，但又不甘心白来。周谷声说：“你去问问看门的工人吧，问总比不问好。”我也想不出比这更好的办法。

红鸥拖着如同灌了铅的双腿，来到门卫那里问道：

“工人同志，我们向侬打听一个人，你们厂里有没有一个叫做黄金海的人？”

“有，你们明天来。”

“明天我们没有空，侬能不能告诉我们，这个人有没有判过刑、关过牢？”

“没有。”老工人干脆利落地说。

一块石头落地。

上午，147 服装社的女工徐美英带着一台缝纫机，自费叫了辆三轮车拉到巨鹿路 691 号，她是用平时积攒的加班时间在这天做了调休。这时，王洪文等人和包炮、“炮司”、交大“反到底”驻“炮司”联络员杨小兵，真名杨安礼在里间开会，徐美英就在外间用昨晚抢来的红布为“工总司”做袖章和大旗。袖章上的字是戴祖祥用毛笔写的仿毛体“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造反队”，写在一块硬板纸上，由国棉三十一厂的陈竹伯和上海轻工业学校的红卫兵将字刻成镂空，再用黄色油漆刷到红布上。戴祖祥还用一个石膏像的底座，以一根缝衣针为工具，刻了个工总司字样的图章，盖在徐美英做好的袖章上。但只盖了十几个袖章，石膏图章就裂成几块。大家生怕没盖图章的袖章“不合法”，所以开大会那天实际没发下去。大旗上的字需用黄布剪了贴上去。徐美英去附近一家布店想用工作证“借”，却正是昨天被抢红布的那家店。店员不肯，说“你们的人昨天半夜已经来抢过了。”当时购买纺织品需用布票或纺织品专用券，徐只好用自己的专用券购买。因带的专用券不够，没买足尺寸。所以大旗上的一行小字“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最后那个“部”字的耳朵偏旁，布不够了，只好用黄漆写了补上。大旗中间是“造反队”三个大字，也是戴祖祥仿毛泽东字体设计的。

里间的人正在讨论大会主席团人选。有人提出，主席团没有女同志，于是将外边的徐美英叫进去，要她自报出身。

徐美英说自己是生产组长、女工委员，又讲了自己造反的原因。大家就说通过了。就这样，选出了王洪文、潘国平、范佐栋、叶昌明、陈阿大、戴祖祥、蒋周法和徐美英组成的大会主席团。王洪文为大会主席团主席，潘国平是大会执行主席。

叶昌明与蒋周法在“炮司”的三楼起草大会发言稿。“工总司”的成立宣言则由人民电机厂工人张伯生在厕所起草出来的。“炮司”给了张伯生一些资料，他嫌房间里太吵，就躲进厕所去写。当时他对自己被厂里围攻的遭遇很气愤，所以带着一股激情，把“炮司”给他的几份传单东抄西摘，东拼西凑，组织成一篇宣言。其中一句“砍掉脑袋不过碗口大的疤”，就是从一篇红卫的兵宣言中摘录下来的。

第一稿写出后，张伯生拿给大家看，然后按修改意见修改，前后修改了三次被通过，形成了“工总司”的第一个文件。

这个宣言和当时社会上各种宣言，声明一样，充满了流行的革命语言。其中一句话比较突出：“我们要夺权”。这在造反派的宣言中虽然不是第一个，但也是比较早提出的。“夺权”两字早在两年前中共中央关于四清的文件《二十三条》中就第一次提出。文革开始后报刊社论以及《十六条》中也有提及。张伯生等显然也是为了引起轰动效应而照抄此话，他们当时肯定没有理解和想到其真正含义，更没有想到一个

多月后源于上海席卷全国的夺权风暴。

《宣言》定稿后，交给叶昌明去市接待站交涉印刷。叶昌明和几位红卫兵来到延安西路200号上海市红卫兵接待站，向他们提出要求印刷几万份，9日上午要。接待站的人起初不答应，最后表示只能印2000份。但是，当叶昌明他们去印刷厂交印时，印刷厂表示，时间太紧，9日成立大会前肯定交不出。于是，“工总司”决定出海报扩大影响。

11 月 7 日晚上，蒋周法，谢鹏飞与黄金海等带领几十人，乘着一辆卡车去江湾，到蒋周法和谢鹏飞工作的上海铁路装卸机械修理厂抢“黑材料”，为“工总司”成立大会发言作准备。他们来到工厂办公室，先将电话机的听筒拆下，然后要值班者交出“黑材料”，遭拒绝。于是他们便自己动手翻找，最后看到一个铁箱里面有厂里的四清材料，未及细看，就在箱子上贴上封条，装上卡车。接着，“炮司”的红卫兵又去与工厂交涉，说他们关人打人是私设公堂，是非法的。工厂只好将仍被关押着的邝三腾等工人释放。

11月7日晚，“工总司”核心组成员和“炮司”红卫兵在巨鹿路691号召开联席会议，许云飞简略地介绍了他们“政审”的情况，讲了戴祖祥和岑麒麟“政审”没有通过。岑麒麟是保密厂的技术员，地址保密，无从调查，所以只好“忍痛割爱”。“工总司”核心组表示完全同意。会议决定：“工总司”“炮司”不分家，“工总司”成员是“炮司”红卫兵，

“炮司”红卫兵是“工总司”造反队员，大家共同筹备11月9日“工总司”的成立大会，并对大会会务作了分工。

11月8日，上海的大街小巷，都贴着“工总司”的海报，上面写着：

我们上海工人革命造反队定于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九日（星期三）中午十二点整在文化广场举行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成立大会。会上将彻底批判和控诉上海市委压制革命运动、迫害革命群众的罪行，粉碎上海市委推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我们希望全市各工矿企业的革命造反派和革命群众支持我们，支援我们，积极参加大会，并热烈欢迎一切革命群众参加大会。

我们通令上海市委以及各工矿企业的领导，不得用任何借口阻止、刁难革命造反派来参加这次大会，不准戴帽子、扣工资，不准挑动群众斗群众。违令者就造你们的反！

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

筹备组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七日

一辆首都红卫兵的宣传车开过来，车里的高音喇叭高唱着：“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造反有理！根据这个道理,于是就反抗,就斗争------”的语录歌。唱罢语录歌，喇叭里开始广播一个重要通知：

“明天中午12点整，在文化广场召开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成立大会，热烈欢迎响应毛主席号召、要革命造反的工人和广大群众前去参加。”

11 月 8 日上午，潘国平又去交通大学找到交大“反到底”的红卫兵申志明，与申志明一起去市委康平路办公处，要求主持上海市委工作的上海市市长曹荻秋接见。曹荻秋不敢怠慢，指示海市委办公厅副主任刘冠英前去接待。

刘冠英来到康平路，接待这些来访者。潘国平提出三项要求：

（一）上海市委必须承认“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

（二）曹荻秋必须参加 9 日的大会，接受批判；

（三）提供宣传、交通工具。

潘国平限令上海市委当天下午 14 时之前答复。

这些代表走后，市委办公厅秘书长李家齐随即用电话将这一情况报告曹荻秋的秘书。同时，刘冠英迅速把潘国平提出的这“三项严正要求”用急件转送住在衡山宾馆的曹荻秋。曹荻秋立刻召开相关的市委领导开会，研究如何对“工总司”的成立和这“三项要求”表态。

根据中共中央 1966 年 9 月 14 日“抓革命促生产”的通知精神，按说工矿企业不应该成立全市性的群众组织，但是在这个连党的副主席林彪都称之为“朝令夕改”，瞬息万变

的大革命年代，谁又有绝对的把握呢？于是曹荻秋给当时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中央常务书记陶铸打电话请示，陶铸在电话中很明确地表示，必须严格按照中央文件办。

有了中共中央 1966 年 9 月 14 日“抓革命促生产”的通知精神和陶铸的电话答复，曹荻秋认为成竹在胸，他在会上提出，上海市委，对“工总司”的要求采取“三不方针”，即：“不参加，不承认，不支持”。

曹荻秋的看法得到了与会者支持，形成了上海市委的统一认识。

随后，曹荻秋又将上海市委的决定打电话转告了正在北京的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张春桥，他也没有反对，因为上海市委的决定符合中央 9 月 25 日“关于农村，工矿企业、事业单位，党政机关，群众团体不成立红卫兵等组织的批示”精神。

下午，上海市委将曹荻秋的“三不方针”通知办公厅副主任刘冠英。为了不激化矛盾，要刘冠英以个人名义，根据中共中央抓革命促生产的精神，答复“工总司”和学生代表。但是，由于电话号码搞错了，刘冠英一直未能与“工总司”联系上。

市委还立即通知基层党组织，要求他们说服职工“不要离开生产岗位去参加大会”。曹荻秋又特地布置上海市总工会主任张祺做好接待的准备。张祺后来回忆：“曹荻秋说，

工人有工会组织，为什么还要成立什么造反组织？这里有问题。并关照我对受到蒙蔽的工人群众一定要做好工作。”

晚上，曹荻秋和魏文伯来到西郊宾馆看望正在这里疗养的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谈了市委对“工总司”成立一事讨论的情况，陈丕显也表示同意。，还定下原则：“不赞成，也不反对，个人意见也不能发表。”

曹荻秋后来对这个三不方针解释说：“建立了工总司这样的组织后，工厂的矛盾不是缩小，而是会把一个厂内部的矛盾扩大为外部矛盾，矛盾就难以解决，局势就难以控制，生产就没有保证。”他还对秘书说：“工总司的负责人，有些是社会渣滓，要注意。造反派中确有一些不纯的人混在里面。今天这些人上台，明天那些人上台。一个组织成份不纯，影响生产，最后是站不住的。我就不参加大会，我参加就是犯错误了。”

曹荻秋的这段话，其实也反映了当时全国几乎所有的部、委、局、省、市、地、县领导对造反派的看法。

11月9日中午12时，“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的成立以及“彻底批判中共上海市委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在上海陕西南路文化广场召开。

说起上海文化广场，那也曾是上海的标志性建筑。其前身是 1928 年法商开办的逸园跑狗场，并附设旅馆、舞厅等，号称“远东第一大赌场”。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进入租界，

逸园改作军营和仓库。上海解放后，大型集会、文艺演出多在此举行。1949 年 6 月，上海解放后老解放区的南下干部和上海地下共产党员两千余人就是在这里举行了第一次集会。以后，这两千余人，都是上海各部门的领导干部。

1951 年，逸园所有土地及建筑划归市文化局，正式定名为上海市文化广场。改建工程自 1952 年动工至 1954 年底竣工。改建成能容纳 15000 人的大会场。新建舞台宽 21 米，外台宽达 28 米、深 19.8 米、总高 12 米。后台有可供 200 多名演员同时化妆的大小化妆室 14 间，台前建有乐池，可供 60～120 人的乐队演奏，是当时全国最大的舞台。

其实，文化广场很简陋，除了舞台，就是一个大平顶，平顶同舞台和后排的梯式水泥看台相联，中间有许多钢架立柱支撑，两面无墙，中间布满木条长椅，冬天西北风直窜，夏天平顶下暑气逼人，倒是扩音喇叭很多，能保持全场听清台上的演讲。

此时，各路造反组织陆续进入会场，很多人是看到《海报》前来的。

江南金属制品厂工人戴立清 11 月 9 日从北京告状回来，一下火车，就在车站出口的广场边上，看到一块单独立着的牌子，上面贴着有两张《解放日报》那么大的红底黑字海报，正是“工总司”的成立海报。戴立清让和他一起回来的同厂工人帮忙把行李带回去，自己直接就去了文化广场。

戴立清厂里来了许多人，都是参加“工总司”筹备会议的王汉清用卡车拉来的。

上棉 30 厂王秀珍也是看到《海报》后去参加大会的。

王秀珍，出生于辽宁省一个城市贫民家庭，六个姐妹中大姐饿死，二妹也早死，她是老三，很小就背着妹妹拣煤渣。1950 年她进了辽阳纺织厂。因为工作积极肯干，进厂两年加入青年团，1953 年加入共产党。不久她被评为车间的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接着，又被评为厂里、市里、省里、乃至东北地区的先进生产者和劳动模范，当选为沈阳市和辽阳省（当时的建制，今辽宁省的一部分）人民代表。1956 年她作为调干生保送进上海纺织工业学校学习，毕业后分配进上海纺织设计院。1961 年因设计院精简，王秀珍要求下厂，来到上海国棉 30 厂，担任技术员兼织布车间工长以及厂长室技术秘书。

国棉 30 厂前身是仁德纱厂，公私合营后，原来的资本家仍参与生产管理，担任厂里几个主要部门的负责人都。厂党委对他们很尊重，开口称“先生”，闭口喊“厂长”。对此，王秀珍很看不惯，她向厂党委提出了尖锐的批评。

文革开始后，1966 年 6 月 11 日，国棉 30 厂第一张针对厂党委的大字报：《厂党委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冷冷清清!》就是王秀珍带着另外 10 人写的。8 月，厂里成立文化革命委员会，王秀珍当选为厂文化革命委员会（筹）主任。不久，

工作队进厂，由于王秀珍不赞成工作队只批资本家不批党委等做法，与工作队产生矛盾。

10 月 28 日下午，王秀珍到上海市委接待站反映驻厂工作队情况，在这里遇到纺织中专的老同学、当时在国棉 17 厂劳动工资科工作的王春晓。王春晓也是国棉 17 厂和王洪文一起造反的七个党员之一，她向王秀珍介绍了在场的王洪文。

王洪文三天前刚从北京上访回来，王秀珍邀请他到自己厂里去介绍形势。王洪文第二天下午便去了国棉 30 厂。接着王秀珍又组织厂里的工人去王洪文所在的国棉 17 厂串联学习。11 月 4 日，王秀珍又在厂门口贴出大字报《一对宝货——工作队和厂党委》，再一次轰动全厂。当天，王秀珍他们还将工作组长和厂党委负责人游街，从工厂内的厂区一直游到工厂外的马路上。

11 月 9 日，王秀珍组织了同厂的几十个工人，亲自带队，用大卡车载着大家开到会场。

参加大会的工人大都是从厂里直接来会场，穿着各种不同的蓝色或白色的工作服或背带工作裤，许多人工作帽还戴在头上，脸上的机油都没有擦去。

由于大家彼此不熟，他们的对立面，各单位“保”字派的工人也大批涌入。各色袖章、分属于不同“司令部”的红卫兵们，也活跃于会场上下。

开会前，负责主席团成员政审的“炮司”江必雄宣布，陈阿大的政治审查没有通过，他父亲在“破四旧”时有为资本家窝藏黄金之事，不能上主席台。

陈阿大是上海良工阀门厂的工人，他当过 3 年兵，却没有在部队入党。复员后分在上海良工阀门厂的工人，曾任车间里的保卫干事兼民兵排长。因根红苗正，出身好，又当过兵，曾受到组织上的重视，“四清”时，作为工人代表参加了厂里的“四清”工作。但他文化程度毕竟不高，更核心的工作他做不来。文革开始后，他率先在厂里贴出一张厂领导有“路线问题”的大字报，在厂内引起轰动， 加上陈阿大在辩论中是个大嗓门，经常从一个工人的角度，用工人的语言批驳保皇派，使他的演讲很有煽动性，一些造反的人愿意跟着他跑。于是，在陈阿大的身边就聚集了一些造反工人，他也很快成为这些人的核心。后来，由他倡议，这些人共同成立了良工阀门厂“革命造反兵团”，陈阿大出任“司令”，成为良工阀门厂响当当的造反派头目。

8 月 23 日，上海“破四旧”时，有一个资本家害怕红卫兵抄家，将两斤七两黄金藏到陈阿大的父亲陈七二家里。虽然这个资本家躲过了黄金被没收之事，但不久就东窗事发，陈阿大的父亲被红卫兵以窝藏资本家黄金之罪名楸斗游街，黄金没收交上海长白新村派出所处理。后来这个派出所所长看陈七二也是个老实巴交的老工人，并没有其他问题，就将

他放了。“炮司”去调查陈阿大的政治情况时，街道将此事抖落出来，说他父亲“替资本家窝藏黄金”。

陈阿大说自己父亲冤枉，大吵大闹，但坐主席台的资格还是被取消。

胸前挂着“主席团”红布条的王洪文，穿着肩上有一根小带子的部队干部服坐在主席台上。他们一直等到下午14时多，市长曹荻秋也没有来。

不能再等了，14 时 45 分，潘国平作为大会的执行主席，不得不跑到话筒前，宣布大会开始。他首先介绍在台上就坐的大会主席团五名成员：王洪文、潘国平、叶昌明、蒋周法、徐美英。但还没说几句，刚介绍到自己时，一个女青年突然从下面爬上了主席台，指着主持大会的潘国平大声说：“他不是上海工人，是北京红卫兵”，是“骗子”等等。这位女青年是“斯美玻璃纤维厂”的普通女工，叫熊友红，在市委大楼前听辩论时，看见潘国平与一些北京红卫兵在一起，就以为他也是北京红卫兵了。当大会的纠察人员上前阻止她时，下面又冲上来更多的人大喊大叫，会场秩序顿时混乱。

这一突然袭击，出乎潘国平的意料。他竭力为自己辩护，说自己确实是上海工人。许多人要求他证明自己的身份。潘国平出示了自己的工作证和工会会员证；但接着他所在工厂的一个工人上台，揭发说潘国平在厂里表现一贯吊儿郎当，出身黑五类，根本不能代表工人，会场又是一阵骚乱。潘国

平工厂另一个工人又跳上台，证明他出身不是黑五类。

这时，许多人纷纷跳上台抢话筒。潘国平拿着话筒被人推搡着也无法讲话，后来连话筒也被人抢走了。

坐在主席台上的人都不曾经历过这个场面，一时间手足无措。

这时又冲上来一个高个子的男青年，在人群中抢过话筒大声叫喊着，终于把其他人的声音都压了下去。这个人是后台维持秩序的上海基础公司的电焊工人张宝林。上棉 31 厂黄金海则指挥一些工人手挽手筑成围墙，将王洪文等人保护在主席台中间。潘国平被人挤到台边。

张宝林指挥主席台上的纠察，将所有自己跳上台的人都赶下台，然后向那位女青年，熊友红，问明了问题后，大家都力证潘国平确实是工人，不是红卫兵。

有人去找来了一块大黑板，将大会主席团成员的名字、工作单位，是否党团员以及家庭出身等情况，抄写在上面，放在主席台前，让大家都能看到。

潘国平宣布大会继续进行。张宝林就将话筒交给王洪文。王洪文接过话筒，没说上几句，又有人冲破纠察线，跳上主席台，一把揪住王洪文。是国棉十七厂的工人，他们揭发王洪文是“政治扒手”。还是张宝林，用带领高呼口号的办法，勉强稳住了秩序

上海铁路装卸机械厂的蒋周法宣读了“工总司”成立宣

言，叶昌明代表合成纤维研究所“红旗战斗小组”发言，批判上海市委宣传红雷青年小组是“大阴谋”。接着蒋周法发言，发言稿是谢鹏飞起草的，内容是控诉他们被殴打和关押经历。蒋周法没有说几句就哭了，哽咽得说不出话。台下听众不知发生了什么事，又开始喧哗。于是谢鹏飞上台接过话筒，继续控诉。他出示了血衣、用来殴打他们的铁刨花、医院开具的验伤单，以及工厂派人抄他们家时给的收据，会场的气氛达到高潮，“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口号声响彻会场。

台下有人呼喊：“把曹荻秋揪出来！勒令曹荻秋到会接受批判！”

王洪文与主席团其他人商议后就要后台工作人员去打电话到市委催促他们：“群众强烈要求曹荻秋到会接受批判。”

将近20时，就在一片群情激愤之时，忽有消息传到主席台上，讲市委派人来了。王洪文等人来到后台，只见上海交通大学“反到底”的严步东和另外两名学生带着一位干部正在那里。严步东对王洪文说：“这是张文豹，市委红卫兵联络站主任。”

张文豹是11月5日接到上海市委副书记马天水的秘书打来的电话，说交大“反到底”红卫兵组织要查抄烧毁档案，校党委希望他去做劝阻工作。交大派车将张文豹接到学校，

学生们让他在学校里住了下来，和学生们吃住在一起。张文豹了解到学生们不信任校党委，怀疑档案里记载了一些不利于他们的东西，因此想全部烧毁。张文豹正在做学生的劝说工作，已有成效。

11 月 9 日 19 时，交大“反到底”组织的头头严步东等人突然把张文豹拽到一辆吉普车上，对他说：“一起到文化广场开会去。”

张文豹问：“开什么会？”

严步东说：“不要问了，去了就知道。”

张文豹就这样和严步东他们一行四人来到文化广场后台，严步东说：“我把你介绍给王洪文”，接着向王洪文介绍了张文豹。

王洪文对张文豹说：“我叫王洪文。我们在这里召开‘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成立大会，希望你代表市委讲几句话，支持我们起来造反。”

在场的众人中，张文豹见到一个他认识的人——潘国平。潘国平一见张文豹便说：“我见过你，你就讲几句，代表市委支持我们。”

张文豹没有任何思想准备，但已感到事关重大，他怎敢表态？张文豹努力让自己镇静片刻后，对王洪文、潘国平等人说：“你们工人师傅要起来参加文化大革命，是允许的，但是，要按《十六条》办事，抓革命、促生产，不能停产闹

革命。第二，我是市委机关的一名普通工作人员，我无权代表市委。”

王洪文等人说：“不行，其他人没找到，就找到了你，你是联络站主任，你可以代表市委。”

潘国平不由分说，一边把张文豹往主席台推一边帮腔说：“你可以代表， 你可以代表。”

张文豹解释说：“我是和学生打交道的，你们工人师傅要起来造反，这不是我的工作范围……”

众人说：“不行，既然来了，就到前面去和大家见个面……”

张文豹一看无奈，干脆摆脱推搡，自己走到主席台前，看到昏暗的灯光下坐满了人……

王洪文在话筒前向大家介绍说：“张文豹是上海红卫兵联络站主任，欢迎他代表上海市委支持我们起来造反，欢迎张文豹讲话。”

台下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和口号声。

等口号声停了以后，张文豹向台下的人们说：“工人师傅们，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号召的、中央领导的革命运动，你们起来参加是可以的。我是市红卫兵联络站主任，但只是市委机关的一个普通的工作人员，无权代表市委，发言没有准备……”

台下群众听说他不能代表市委，顿时轰了起来，要他滚

下来。

张文豹僵在台上，进退两难。王洪文见状便朝台下的人群喊到：“师傅们，他既然不支持我们造反，就把他轰走好了。我们另想办法。”

旁边的潘国平等人也狠狠的斥责张文豹，叫严步东把他带走。

晚上21时多，眼看着会场里只剩下四、五千人了。这些人基本上都是各工厂造反的工人，一个厂就来几个人。想到市委既不参加又没有一个态度，他们心里感到不踏实，担心回去要遭到更大的迫害。主席台上，有几个红卫兵提出不能散，到市委去要曹荻秋接见，主席团的人也都同意。

潘国平再次到前台讲话：“同志们、战友们，我们到延安西路的市委办公室去找曹荻秋，一定要他承认我们的‘工总司’。”

沪光灯具厂的黄文海把“工总司”的大旗一扬，带头冲出会场，向上海市委的办公大楼进发。许多人一时之间不知道如何是好，但是大多数人还是不假思索的跟着大旗走。于是在上海的马路上，就形成了一支长达数公里的队伍，不停地呼喊着口号。在路上，不断有人开小差，也不断有人加入进来。

## 第271回：去北京，造反英雄困荒野

### 京沪断，“安亭事件”惊世界

天上下起了冷雨……前往上海市委的“工总司”队伍举着红旗冒雨前行，他们已经没有了口号声，只是在沉默中前进。上海市委写作班的徐景贤正好从延安西路 33 号市委机关下班，虽然此时他在思想上是倾向市委的，但看到这样一支队伍，也从内心感到震慑。

半个多小时后，游行队伍聚集在延安西路 33 号上海市委机关大楼前。红卫兵们立即在大楼对面的平台上拉起电线，身为电工的戴立清爬上去装上扩音喇叭。他们提出市委在 22 时 30 分前接见等 4 项要求，高呼“革命无罪，造反有理”，“毛主席万岁！”等口号，在雨中等到 22 时 40 分，市委还是没有人来。

王洪文，潘国平和包炮等进入市委大楼找人，楼里一片昏暗，不见一人。

终于，有一个市委工作人员出来了，他让大家去上海展览馆的“咖啡厅”。

“咖啡厅”就是上海展览馆的友谊电影院。那是一座俄式建筑，是苏联援建的，原名中苏友好大厦。随着中苏交恶，改名上海展览馆。不过，那象征着中苏友谊的友谊电影院，仍叫原名。那里，离市委不远，大家以为曹荻秋会在那里接见，于是又冒雨涌向那里。

这时队伍已经不成形，主席团的人互相找不到。到了咖啡厅，只有 1000 来个座位的友谊电影院，顿时显得十分拥挤，大部分人只能等在外边。为了鼓舞士气，“首都三司”的红卫兵指挥大家唱起了《毛主席语录》歌：《下定决心，不怕牺牲》和《工人阶级硬骨头》。

上海交通大学“反到底兵团”、“革命造反兵团”赶来声援。红卫兵们不断地演讲，填补着等待的时间。

一小时又一小时过去了，仍不见曹荻秋。直到凌晨2时，上海市委常委、总工会主席张祺才来到友谊电影院，劝说工人们回家休息，不要影响第二天的生产。可是工人们七嘴八舌地问他：

“你承认不承认我们‘工总司’是革命的群众组织？”

张祺回答说：“这个组织是《十六条》上所没有的！所以我不能承认。只要是《十六条》上规定有的，我一定承认。”

张祺的话刚刚说完，立即遭到大家的围攻。他见劝告无效，只得离开了。

很明显，即使等到天亮，曹荻秋也不会接见他们了。

这时忽然传来曹荻秋的“三不”指示，这更激怒了又饥又冷，大部分只穿着工作服，连午饭、晚饭都没吃的工人。只见一位红卫兵学生拿着半导体喇叭，高呼“我们要去北京去！我们要见毛主席！”而另一个喇叭也在反复广播：“特大喜讯！特大喜讯！周总理来电话说，曹荻秋不接见你们上

海工人造反派，我接见！”大家一下子响应起来。人群中有人高喊“打着红旗上北京！”

王洪文对着话筒说：“这么多人去北京不现实的。”

台下立刻有人骂他：

“老保！”

“右倾！”

“滚下去！”

上海铁路局装卸机械厂的谢鹏飞拿过话筒说：“北京是肯定要去的，我坚决跟大家到北京去，但我们这么多人都去不现实，我们是不是要派代表去啊，大家再考虑考虑行不行？”

“不行！我们也要去！滚下去！”

台下又是一片喊声。许多人已经涌出了大门。

谢鹏飞跟王洪文等人说：“那我们就去吧，我们是总部的人，会议是我们搞起来的，他们去了我们也得去。我跟你们不一样，我是反革命帽子戴在头上的，如果没有个说法回厂里还会被迫害。”

于是，王洪文等人也跟着大家向上海火车站走去。

后来，1967年3月，已经是“战到底”负责人的上海自行车三厂工人孙福样告诉戴祖祥，那个“总理接见”的“特大喜讯”是他自己编造出来的，他说：“不这样说，当时的气氛调动不起来。”

此时已是黎明时分，一夜未眠的“工总司”队员们举着红旗，唱着《下定决心》和《工人阶级硬骨头》等歌曲，行进在上海湿淋淋的柏油马路上。没有任何人组织，也没有人带队。人们是自发地、一窝蜂似地拥向上海北火车站。

走在最前面的是潘国平。上棉30厂的王秀珍也走在队伍的前列，尽管家里还有两个孩子，她托付给邻居，带着厂里几十人，参加了“工总司”成立大会。眼下，走在“北上告状”队伍中连她在内，上棉30厂只剩10人。

王洪文的800来名“永忠队”队员出席大会，此刻也只有396人。

10日清晨，首先是举着“工总司”大旗的戴祖祥，带着满载造反队员的四辆卡车开进上海火车站，也称北站，接着是潘国平率领队伍冲了进来。检票员看到这无法阻挡的汹涌人流，只好退到一旁，眼睁睁地看着他们冲进月台。

正在这个时候，工人们看见一列到北京的红卫兵列车停靠在月台旁边，潘国平向车上的红卫兵打了一个招呼，然后挥手说了声：“大家一起上！”，便有1000多名工人冲上列车，把刚才还在车上热烈欢迎上海工人的红卫兵，挤得大喊“救命！”

这是626次师生赴北京的专车，经过交涉，铁路局答应工人乘这次专车去北京。

潘国平忙着指挥大家登车，却把自己留在车外，看看上

面实在挤不进人了，他只好在月台上等待后面的队伍到来。

当王洪文、张宝林率领队伍来到北站时，已经挤不上那辆红卫兵列车了，只看见潘国平还在月台上。

王洪文、潘国平和包炮又找到北站的一个负责干部，要车站增发去北京的列车，限 4 点半前答复。上海铁路局马上请示中共上海市委，上海市委立即向国务院汇报。

这时，有人发现有一列开往郑州的 756 次列车。反正都是北上，潘国平和王洪文、谢鹏飞便率领其他 2000 多名造反队员登上该车，把这辆列车也挤得满满的。后面的人愈来愈多，当他们来到北站时，又没有车了，便嚷着找铁路局的头头，要求为他们增派北上列车，因为他们要到北京告状，这是革命行动，不支持革命行动的就是反革命！

在国务院值班的是国务院秘书长周荣鑫，他接到上海的报告后在电话中指示：尽量劝说工人，实在劝说不了，不要影响正常发车。

上海市副市长李干成将周荣鑫的电话指示转告了上海铁路分局。上海铁路局局长邵光华和副局长李明哲、赵国栋，上海铁路分局局长纪玉文、党委书记王华生以及路局和分局公安局的领导庞振泉、原修文等，先后到达上海站，劝说工人们回去“抓革命促生产”，没有效果。邵光华请示铁道部运输局王效斌，王效斌让他们执行上海市委的决定。于是，清晨5时许，火车站忽然传出一片欢呼声。去北京的红卫兵

626次列车发出“呜”的一声长啸，车轮开始转动，在列车内外一片热烈的欢呼声中，终于驶出了上海火车站，在中午时分抵达江苏省首府南京。

眼见战友们的车辆已经远去，坐在756次列车上的人们更是焦急万分，当他们听说该车要到晚上23时才能发车，责骂声就像决了堤的洪水，纷纷要求造反司令潘国平和王洪文想办法解决。两位司令带着十几个身强力壮的造反队员，找到胸前挂着“郑61”号码牌的姓王的列车长，要求提前开车。他们说，他们是要到北京告状，这是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头等大事，比火烧眉毛更加紧急，要求列车长提前发车。

被围困的列车长只好派人报告调度室，调度室上报上海铁路局，铁路局请示上海市委，得到最后通知：“756列车改作69次特别快车，当天上午7时正准时发车。”

消息传出，车厢里欢腾起来。那些后到的队员，本在等待第三趟列车，这时也纷纷拥上这趟列车……

69次特快终于也在一片欢呼声中驶离上海北站。

列车有节奏地摇晃着，一夜未睡的造反队员们，即便是站在过道上的，也合上了双眼。

车过南翔，放慢了速度，以每小时20公里的速度前行，比慢车还慢。

车厢里出现了骚动。一问列车长才知道，接上海站调度通知：这趟列车到江桥后，又从69次特别快车改为602次慢

车！

所有打瞌睡的人，都醒了。

此时列车尚在上海所属的嘉定县境内行驶，还没有开出上海，它慢吞吞地从南翔开到黄渡，前面是嘉定县内的一个小站——安亭。

8时17分，这趟慢车终于抵达安亭车站，随即倒开，驶入了一条卸煤的岔道，停下，摘下车厢，火车头单独驶往常州戚墅堰。

火车站站长过来，扳好扳道后，当即锁上。

这里距离安亭还有3公里，周围是一片荒野，没有一间房子，旁边堆满了大量的木材和无数的煤，失去动力的602次列车就这样被锁在了这里，车上的这些工人全部被截留在安亭火车站！

潘国平一见情况异常，急忙下车打听，包炮等人找到安亭火车站站长的小屋，想打电话给上海市或北京，但无法打通。他们要求站长放行，站长说，没有上海铁路局调度室的命令，他不能随便放行。

后来，潘国平又挂电话责问上海火车站：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上海火车站调度室里的人，在电话里好像有点幸灾乐祸的回答说：“你们留在上海北站的第三批造反队员，本来已经抢占了一列北上的列车，原定在上午10时10分开车。可是我们车站方面接到上海市委的命令，这趟车不开了。把

你们送到安亭，也是市委的安排，我们铁路局只是奉命行事。希望你们有事去找上海市委，不要怪到我们铁路局的头上。”

工人们这才感到自己受骗了，上了上海市委的当。

原来，在衡山宾馆的曹荻秋也一夜未合眼，一直守在电话机旁。“工总司”成立之时，在文化广场的一举一动，此后，去市委大楼请愿，去友谊电影院要求接见，直至冲进北站，强占列车，他都随时知道动态。他不时与中共中央华东局、与中共上海市委的负责人保持联系，商议对策。同时还不断把上海“工总司”的动向，向中央文革小组报告。

当这些工人们涌到上海火车站的时候，华东局和上海市委的领导就研究好了对策。他们不希望把工人截在市区的火车站，而希望能在离上海不远的一个地方解决问题。这地方最初定在更远的昆山，已通知铁路局。但是在列车开出后，陶铸来电话，明确告知：“中央不同意上海工人北上，如有意见，可请他们派10至20名代表进京。”

周恩来得到铁道部关于上海铁路局的汇报，立即开会研究。陶铸主张坚决制止工人的这种做法。李富春等人提出还是让中央文革小组出面解决这一难题。就在602次刚过南翔，上海铁路局局长邵光华接到铁道部运输局王效斌打来的紧急电话，问火车开了没有？并说刚才向周恩来总理汇报了此事，周恩来不同意这么多工人进京。王效斌要求马上想办法将列车停在上海附近的车站，就地解决问题。还说马上会有

相关的电报发来。

邵光华放下电话，立即执行王效斌的停车指示。此时，602次已过黄渡，下一站是安亭，于是急令602次停在安亭。经铁路局领导研究，由铁路分局局长纪玉文通知调度所，上午8时17分，602次列车终于停在了安亭车站的专用线上，并被锁进了安亭站的岔道。

随后，又从南京火车站传来消息说：那趟红卫兵列车在中午驶入南京车站之后也停滞不前了。至此为止，潘国平和王洪文要到北京告状的计划几乎全部告吹，从上海出发的造反工人队伍，已经被分割成三截：第一截流落在南京；第二截停留在安亭；第三截仍在上海原地没动。

我们先说截留在上海火车站的工人，他们在“工总司”成立大会主席团成员徐美英带领下，原准备乘下列火车进京，但车站又通知说不派车了，还告诉他们，前面那列车也停在安亭车站不再开了。

我们再看被截留在安亭的这几千人，他们是9日中午离开家的，当时太阳是火辣辣的，所以穿的衣服都不多。可此时已是深秋时节，早上和晚上的气温，还是比较寒冷的。到了10日上午9点多，首先是肚子发出抗议，再加上早晚的寒冷，大家早已是饥寒交迫了。于是，于是找头头，大声责问为什么会弄成这个样子？

包炮听见大家在煤堆那边辩论，就跑过去了，一不小心

摔倒了，膝盖摔破了，鲜血直流，人们赶紧把他搀去治疗。

这时候，只见潘国平勇敢地站了出来，他先叫大家安静，然后带领大家朗诵《毛主席语录》：

“我们的同志在困难的时候要看到成绩，要看到光明，要提高自己的勇气。”

“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说来真的是有点神奇，就像天方夜谭里的神话故事一样，刚才还在吵闹不休的人们，读了《毛主席语录》后，不少人就安静下来。也许他们都在用毛泽东的话来对照自己的行动，责怪自己在困难的时候，怎么就看不到光明的前景？责怪自己为什么一看到困难就失去了勇气？那个时候，毛泽东的话可是包医百病的“灵丹妙药”。要知道，中国共产党正是靠着这些“灵丹妙药”走完了两万五千里长征，坚持了八年抗战，又用短短的三年打败了蒋介石的800万军队，建立了新中国。此时，潘国平就用这副妙“药”，暂时治好了许多人的急躁和饥饿的综合并发症。当他看到大伙的气有点平了，就进一步号召造反工人要不怕牺牲，一定要誓死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坚决与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上海市委斗争到底。

经过潘国平的鼓动，群众的情绪又激昂起来。

这时，大家看见一列货车驶过，便拦下了这列货车，要求司机将他们的列车拉出岔道。司机拒绝，被工人们围住不

放。司机见状，表示同意，让工人们离开铁路，他才能将火车开进岔道。谁知工人离开铁轨后，他却越开越远，一去不回了。

这时，又一列火车从上海方向呼啸而来，上海铁路装卸机械厂周国定带着一批人站在铁轨两侧，有的挥舞帽子，有的脱下上衣挥舞着，有人还打着一面大红旗将铁路旁的信号灯给遮住了。司机不见信号灯，又见铁路上站了许多人人，不知出了什么事，来了个急刹车。这列火车停在了从黄渡到安亭的铁路线上，没有进站。火车停住后，很多人跑上铁轨。

停下来的是648次客车。列车长下车后，看见铁轨上的大批人群，吓出一身冷汗，心想，要不是及时刹车，后果真是不堪设想！

说时迟，那时快，“工总司”的造反队员看见列车停下，立刻嚷着要挤上车去。

听说这些人要上车，列车长马上拦住车门，果断地拒绝他们说：“车上有电话，你们可以派代表来打电话，没有上海铁路局的命令，我这个车长决不能让你们上车的！”

电话打了一个多小时，上海铁路局当然不同意，而且反复传达上海市委的意见，要求他们返回上海。这时，几辆小轿车急急驶来。是上海市委派来的轻工业局局长、机电局局长。接着，上海市公安局和铁路公安局也派人来了。

铁路上的人越聚越多。

此时，包炮、王洪文、潘国平等人正聚在一起商议下一步该如何行动，听说造反队员们拦下了 648 次列车，王洪文毕竟是干部，觉得此事不妥，劝说工人们将 648 次列车放行。但他没有潘国平那样的口才，工人们没理睬他。

那时，沪宁线上虽然大部分路段都已铺了双轨，而从黄渡到安亭这一段恰恰是单轨。648 次客车就停在了从黄渡到安亭的铁路线上，等于卡断了沪宁线。

北京，陈伯达找来副组长张春桥，商量。随后，由张春桥拟就了一份电报草稿，经陈伯达过目后，以陈伯达、张春桥的名义，于 11 月 10 日上午致电中共中央华东局书记处书记韩哲一：

“据铁道部报告，上海有几千名工人要乘火车来北京，现在安亭停车。中央文革小组研究了这个情况，请你立即往见工人同志，同他们好好商量，希望他们回沪，坚守生产岗位，有问题可以就地解决。有重要问题不能解决的，可以派代表去北京。”

这份电报，也急速传到安亭，王洪文拿着电报问包炮，包炮说：“现在不能回去。”王洪文没有反对。

上海市委直接给停在安亭的 602 次列车挂了电话，劝告“工总司”的造反队员，不要北上，应立即回沪“抓革命、促生产”，有关问题在上海解决。如果“工总司”同意，602 次列车可以由安亭开回上海工人们当然不同意。648 次客车

在安亭停了两个多小时，直到列車长答应可以让几个上海工人随 648 次去北京告状，而且安亭车站铁路人员也答应可以让滞留在安亭的 602 次开车，继续北上，工人们这才同意将 648 次放行。上海铁路装卸机械厂当即选了几名造反队员，从 648 次列車的窗口上爬了进去。

648 次火车头连连鸣笛。造反队员们退下了铁道，648 次的车轮终于又开始转动，驶离了安亭。

但是，648 次开走了，602 次却依然未动，工人发现又上当了，怒气冲天。12 时 02 分，14 次特快列车经过安亭，再次被上海铁路装卸机械厂周国定带着几十名愤怒的工人造反队员拦住。

从上海站始发的客车中，14 次特快向来最受重视，因为它是上海与北京之间的特别快车。不仅是头头脑脑们要坐这趟车，外宾们也常坐这趟车。停下来的 14 次特快列车上许多外宾拉开了车窗，不解地望着车外成群成群戴着红袖章的工人。

列车长气喘吁吁地跑到拦车者们面前，当他听说工人要求上车，或把 602 次挂在 14 次后头，坚决回绝了：

“从未有过这样的先例！不行，绝对不行！你们赶快放行，否则你们要承担一切严重后果！你们要明白，这是 14 次特别快车！”列车长格外强调了最后一句话。

“我们就是要拦你 14 次特别快车！”工人们说。

列车长只好请示铁路局，铁路局回答也是：“不能开这个先例。”

上海铁路装卸机械厂“造反队”头头谢鹏飞感到事情可能影响比较大，马上跑到602次列车的车厢里找王洪文报告。王洪文也很着急，当即带着上海国棉17厂的廖祖康和谢鹏飞一起沿着铁道线向14次特快那边走去。14次特快前边的人已越来越多，王洪文走到人群当中，请大家离开铁道，让火车开走。大家围着王洪文高喊：

“我们要到北京去告状！”

14次特快列车僵卧在铁道上，无法动弹。沪宁铁路再次全线停车，上海站36趟客货列车不能出发，开往上海的近百趟客、货列车被迫停在沿线各站，整个中国的铁道运行图被彻底打乱，震惊中外的“安亭事件”爆发。

铁道部中心调度室里报警声不断的鸣叫，报警红灯不停地闪耀，从各地打来的告急电话铃响声不绝。安亭事件不仅惊动国务院，惊动了中央文革，也惊动了整个世界，当时的外电是这样报道的：

“1966年11月10日到北京中央文革小组去告上海市委的状的几千名‘工总司’成员，在安亭受阻后卧轨拦截开往北京的14次特快列车，造成京沪铁道线中断……”

安亭告急！上海告急！

李富春再次给钓鱼台中央文革小组打去电话说，上海出

了这么大的事，“你们去处理吧。”戚本禹已经将汇集到的上海情况向陈伯达作了汇报。

安亭，大批的电报纷至沓来。这些电报，大都是京沪线各车站发来的，有的是受堵的旅客发来的。每一份电报，都发出强烈的抗议声：

“目前沪宁全线停车，是上海一小撮别有用心的政治扒手一手制造的。他们任意离开工作岗位，违反《十六条》所规定的‘抓革命，促生产’的精神，在安亭闹事，破坏国家经济命脉，中断交通。这是一个重大的反革命政治事件，我们提出最强烈的抗议！”

“中断交通是造谁的反？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严惩一小撮破坏交通的暴徒！”

“揪出上海‘工总司’的坏头头，对他们实行无产阶级专政！”

14 次列车上的旅客，斥骂拦车的“工总司”工人是暴徒，是反革命。

14 次列车软卧车厢里的外宾，也提出了抗议。车上有个苏联代表团急着要赶回北京上飞机，代表团共 15 人，其中两名妇女。他们的抗议的措辞更为强硬。

就在安亭事件爆发的当天，11 月 10 日清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放了《人民日报》当天的社论：《再论抓革命促生产》。上海市委通知上海火车站和安亭火车站马上广播这篇

社论，并让嘉定邮电局通过安亭支局将几千份当天的《人民日报》送到安亭火车站，让火车站帮着发放到造反工人手里。

与此同时，上海市委调集了许多老工人、劳动模范、干部和“四清”工作队员乘汽车赶到安亭车站，劝说“工总司”的造反队员返回上海。

原上棉 17 厂的党委书记谢明方首先来到安亭，在装卸站食堂里动员工人回去，没有效果。后来，他又到列车上去宣传、动员，结果被围在车厢里出不来了。

11 月 10 日上午，上海合成纤维研究所工人叶昌明在“工总司”总部听到了“工总司”乘火车去北京告状的消息，马上骑自行车赶到火车站，在车站月台上看到了徐美英，还有一大批群众围在在她周围。徐美英向叶昌明介绍了他们到市委大楼以后的情况，说她准备带着余下的这些工人步行到安亭车站，与前列车的队伍会合。她让叶昌明告诉“工总司”总部的其他人设法前来支援。

准备赶回总部的叶昌明出站后却发现自行车不见了，只得坐公交车赶回巨鹿路“工总司”总部，正好遇见“炮司”的红鸥等三位女红卫兵。他讲了情况后，红鸥她们带他在静安寺附近找到一辆红卫兵的宣传车，大家一起乘车赶往安亭车站。

留在上海的“工总司”人员也纷纷赶往安亭。黄金海是自己掏钱叫了辆出租车，和另外两个工人赶去安亭。

叶昌明和红鸥她们到了安亭，只见一列客车停在一片煤场的中间，两边都有煤堆，大批人群散落在列车周围。叶昌明想找王洪文和潘国平，但是找不到，问人，大家也不知道。但是当他们知道叶昌明也是大会主席团成员后，就都围上来焦急地问他该怎么办。于是叶昌明与一起来的红卫兵们把宣传车上的广播设备拿下来，在煤场的一部大吊车上架好喇叭后，他就代表“工总司”总部向大家讲话表态，让大家一定要坚持下去，总部支持大家的北上控诉行动，要坚决斗争，等等。

叶昌明在大吊车边竟意外地遇到了他所在单位的领导，合纤所机动车间党支部书记吴宝兴等人。吴宝兴告诉他，市委已通知所有单位，凡有职工外出的，都要派干部到安亭车站来找到人做工作，把外出人员带回去。

叶昌明问吴宝兴有否见到合纤所来参加大会的“红旗战斗队”苏惠康等人。吴宝兴讲没找到他们，但听说有一批人是乘另一列车先开走的，这列车现在停在南京，估计苏惠康他们是在那列车上的。

叶昌明对吴宝兴等人讲：“我是不会回去的，你们也别找了，还是回所去吧。”

吴宝兴告诉叶昌明，市委已通知有关部门组织力量送食品和饮水到安亭车站来了。

下午14时左右，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上海市副市长梁

国斌，上海市委办公厅秘书长李庸夫和上海市委组织部副部长、上海红卫兵联络站主任张文豹来到安亭车站。只见到处是人，或坐或站。车站的工作人员把他们引到值班室，找来一个约30岁、穿工作服、听说是一纺织厂的机修工。梁国斌和李庸夫劝他们回去，谈了不足半小时，劝说无效，他们又开车回上海了。回去的路上，3个人都沉默不语。

另外，北京“三司驻沪联络站”、上海“红革会”等许多学生组织和其他群众造反组织不断的在市内示威，他们募集捐款、食品和饮料水送到安亭，坚决支援北上造反工人的革命行动。

华东局书记处书记的韩哲一，收到了陈伯达指名道姓直接发给他的电报后，当天，陶铸也给华东局和上海市委打来电话，重申：中央不同意上海工人成立造反司令部，不同意进京，有意见可以派代表，让工人尽快返回上海“抓革命，促生产”。

## 第 272 回：情相似，武汉市“工总”成立
## 天渐冷，毛泽东七次接见

接到陈伯达的电报和陶铸的电话后，10 日傍晚，韩哲一和上海市委常委兼副市长李干成、华东局宣传部副部长杨恺等人，用卡车拉上棉大衣、棉被和一万五千只面包来到安亭，在上海无线电专用机械厂的厂房内落下脚来，将此作为与“工总司”交涉的临时谈判点。然而，乱哄哄的现场，到处都是露宿野外的工人，他们不知道该找谁谈？经过一番交涉，终于，一个 20 多岁的年轻人出现在上海无线电专用机械厂二楼的办公室，他就是上海玻璃机械厂的潘国平。参加与韩哲一他们谈判的“工总司”代表一共 6 人。

韩哲一向他们传达了陈伯达电报和陶铸电话的精神，要求他们贯彻中央指示，返回上海抓革命促生产。潘国平根本不卖账，僵持到深夜，双方反复拉锯，没有取得任何进展，再磨下去已毫无意义。韩哲一表示，若要满足“工总司”的要求，必须请示中央，“我们无权超越权限作任何肯定的答复。此地限于条件，无法同中央取得联系，我们必须返回上海后再行联系。”

潘国平等人起先认为，谈判没有结果不能放韩哲一走，但现场确实不可能解决与中央通话的问题，无奈之下，只好让步，同意韩哲一先回上海。

为了表明自己的态度，“首都三司”的红卫兵包炮等人

起草了《安亭告急——告全国同胞书》，声明“工总司”是被上海市委逼得上京告状的，一切责任都应由上海市委承担……王洪文看之后，叮嘱道：“赶快用电话把稿子发到上海，请你们‘首都红三司’驻沪联络站连夜印发！”

11 月 10 日，就在上海成立“工总司”的第二天，武汉工人造反派也在武汉市洪山礼堂成立了全市性的群众组织“毛泽东思想战斗队武汉地区工人总部”，简称“工总”。

与上海造反工人的情况大致相同，武汉“工总”的工人大部分也是因为在运动初期给领导提意见，或反对领导将斗争的矛头指向群众而受到各级领导的压制被迫起来造反。而工人组织“工总”的成立，也是在湖北大学造反派和北京南下造反大队学生串联下逐渐形成雏形的。

但是，与上海的曹荻秋不同的是，湖北省委书记张体学和湖北省委书记处书记赵修亲自来到武汉洪山礼堂参加武汉“工总”的成立大会。

赵修此时已改名为“赵立公”。

张体学在大会的口号声中致词，首先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大会表示祝贺，并要求广大革命职工把湖北省的文化大革命胜利开展起来。随后，他将“工总”的大旗亲手授予“工总”的代表——武汉重型机床厂的鄂世纯。鄂世纯从张体学手中接过“工总”的旗帜，在主席台上挥舞，引起大会持续的欢呼声和掌声……

应邀出席大会的红卫兵组织相继在大会上发言，对“工总”的成立表示祝贺。

突然，张体学提出身体不适要求提前退席，留下赵修继续开会。大会主席团商议后表示同意，大家鼓掌欢送张体学，武汉市房地局工人汪光甫、武汉重型机床厂工人江新祥和武汉锅炉厂的王光照一起将张体学送到省委大门处，坐上吉普车。王光照在护送张体学上车时，看到他脸色通红，喘着粗气，是在发烧。张体学是带病前来参加大会的。

但是，湖北也遇到了和上海同样的问题：根据当时中央的文件要求，工人不能成立全市性的跨行业组织，因此，张体学走后，赵修在讲话中要求“工总”改名为“联络站”，不同意叫“总部”。会场顿时炸了锅，于是也发生了和上海一样的情况，这些工人决定拦火车上北京请愿、告状。

各单位的领导、甚至是车间主任都接到指示，劝说自己的工人不要北上。于是这些人纷纷来到火车站，劝说本单位的工人回厂：

“不要相信学生的宣传，天气蛮冷了，不要到北边去了，去了身体会受不了。”

北上的工人不回去，他们表示：“湖北不支持我们，我们就要去见毛主席。毛主席支持我们。”

好在武汉北上告状的工人不多，只有 300 多人，他们就坐在火车的椅子背、行李架上去了北京。到北京后，国务院

热情接待了他们，将他们安置在国务院白石桥接待站。

与上海相比，张体学和赵修能够参加“工总”的成立大会，其水平已经是非同小可了。但是，中央既然有文件，张体学也不能违反，他还要看看中央的态度。不仅是他，上至中央文革，下到各省市地方，都被部分起来造反的工人要求成立自己的组织、批判资反路线的强烈需求所困扰。上海和其他地方造反工人的崛起，给中央文革出了难题，周恩来、陶铸，包括陈伯达，都希望运动按照原来制定的文件和精神办，不要延及工业交通战线。这种意见在执行过程中受到激进的造反工人强烈抵制。此时的北京，也在为厂矿企业文化大革命的问题不停的探讨、研究、解释。

11 月 10 日，周恩来就当天即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社论《再论抓革命促生产》召集讨论，强调生产建设不能中断。

这天，王力、穆欣接见山东部分来京群众，谈到了厂矿企业文化大革命的问题。他首先回答了代表们关于山东的问题。他说：

“山东省过去是犯了严重的方向、路线错误的。这些犯错误的同志，毛主席和党中央对他们讲，希望他们不要像开完十一中全会那样，回去没有什么大变化。我们应有一点信心，有了两个月斗争的经验，他们也有一点经验，是不是认识上有提高。现在看来，可能有一些同志认识上会有提高。

但有些同志反映：把谭启龙带到北京来了，就同志们反映：他回去之后进步很小。

群众说：“他没进步。”

王力说：“继续对革命学生采取这样对立的态度是不对的。这样辜负了毛主席，林彪同志的苦心教导，一定要坚持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谁违背毛主席的正确路线，就一定要同他进行坚决斗争。一定要坚持正确路线，”

下面热烈鼓掌。

王力继续说：“一定要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各种表现形式斗到底，斗深，把这条路批深，批透。这个原则是一定不能妥协的，这个旗帜必须鲜明，这个原则不能含糊！同时要根据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给予时间进行观察。同学们要保证三级干部会议开好，给他们条件，因为这个会要传达毛主席，林彪同志，党中央其他领导人的讲话精神，进行讨论。”

“最近北京大学贴出林彪同志《论左派》这篇文章，一个字也不是林彪同志写的，这是彻头彻尾地捏造，这是假的。看来是有人为了达到政治目的而搞的。这些东西不能算数，要上当的。至于有人故意利用这些讲话，大量印发，达到其特定的个人目的，是要和他斗争的。例如青岛大量印发总理讲话，所谓青岛问题解决了，这是不对的。例如，林江同志的讲话，有许多错误，有人大量印发来达到他的政治目的。

林江同志，他正在检查。要他去青岛，是不必要的，他是一个一般的干部，他的检讨可以交给你们。你们要批判那个利用这个讲话的人，要同他们斗争。”

随后，王力谈到了工厂文化大革命的问题，他说：“关于工厂文化大革命如何搞，这个问题今天不能回答。我希望刚才谈情况的那个同志，把意见写个材料给我。现在党中央正在研究这个问题，农村也是一样。希望同志们有这方面调查材料的向你们省提，也向外面提。革命学生应该和工农结合，这是方向，是毛主席的原则，任何大的运动革命学生不和工农结合，都不会结出丰硕的果实。工人农民在文化革命中的积极性要支持，不能压制，打击，更不能镇压。这些都是错误的。但是，工厂农村同学校不一样，学校停课一学期，再停一个学期，这是毛主席的决定。但工厂不能停生产，一天也不能停。农业生产也不能停。是不是有两条可以肯定：第一条，不能离开生产岗位，全国人民要吃饭穿衣，国民经济要发展，这是全国人民的利益。第二条，生产指挥系统不能中断。具体的工厂文化革命任何搞法，欢迎工人同志们提出意见，同学们可以提意见，我相信这个问题，党中央很快会有指示。农村农闲时应怎么办？工厂农村问题很紧迫，希望同志们，同学们提出自己的意见。总的口号是‘抓革命、促生产’，这是毛主席提出的。”

当天夜里，“首都职工革命造反总部”要求王力接见，

回答当天《人民日报》社论《再论抓革命促生产》和北京工厂如何开展文化大革命的问题，王力回电话说：

“关于你们的情况我已了解一些了，我也很想见你们大家，但今天夜里确实不行了，我们要开一个紧急会议，所以不能来见大家了。”

“关于工厂文化大革命怎么搞，现在我们头脑中空空的，要了解工厂的情况。现在工厂又提出了许多问题，工厂的问题到了必须解决的地步，我们抓晚了应该检讨，没及时抓，现在再不抓就要犯错误了。现在要同你们谈，要深入细致地谈。”

“现在我还和吴德同志打电话，不准拿最近《人民日报》的社论整你们。还有关锋、戚本禹同志还想和大家谈谈，向大家学习，听取情况和意见。”

王力与吴德通完电话后，又给“首都职工革命造反总部”回了第二个电话：

“和市委联系了，要市委答应凡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成反革命的一律平反。要保证大家的安全，回去不受打击、报复，不得用那篇《再论抓革命促生产》的社论来压大家。这篇社论是针对一般情况讲的不要离开工作岗位。这几天你们在这儿进行斗争，不能用社论来压你们，希望市委出面帮助大家解决一些具体问题。

关于全市性的工人组织，中央现在还没有研究，咱们保

卫自己作一些联合，这也是许可的。咱们应该充分相信自己，成立什么组织也不一定要中央去承认这个组织。现在你们提出要成立全市性工人组织，这一下子出了题目，中央也要好好想一想。”

“现在，大势所趋，把工厂的文化大革命提到一个重要的议事日程上来了。”

进入 11 月份，北京的天气逐步变冷。周恩来考虑到，立冬后再接见红卫兵，保障孩子们的衣食住行将遇到极大的困难。他力图说服毛泽东尽早结束接见红卫兵的活动。经请示毛泽东同意，11 月 6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联署发出了一个紧急《通知》，规定红卫兵和师生“暂停来京和到各地串连”。可是，这个最高权威的“红头文件”，这时对红卫兵已没有约束力了，他们来京的势头不但未减，反而更猛了。

为了早接见、早让他们回去，周恩来在第六次接见后的第七天，又安排了第七次接见 200 万红卫兵。

11 月 10 日，就在上海爆发“安亭事件”，武汉“工总”成立的当天，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第七次接见红卫兵。这时的毛泽东也很疲劳了，接见从上午 10 时开始，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在天安门城楼接见第一批 150 万红卫兵。红卫兵以游行的方式接受毛主席的检阅、接见。计划是：5 万人一个方块，横 100 人，纵 500 人，东西红墙距离 300 公尺，在天安门正中停 3 分钟，每个方块走 20 分钟，两个半小时可走

完。广场上坐 20 万人，观礼台 2 万人。上观礼台的每 50 人选一个，三个照顾条件是：少数民族、边疆地区、年龄小的。

接见前，有红卫兵提出：游行队伍不要向西，要向东迎着红太阳升起的地方行进。这显然是不行的，但谁也不敢回答不要迎着红太阳升起的地方行进。问题汇报到周恩来那里，周恩来说："告诉红卫兵小将们，我们要高举反对帝、修、反的大旗，向着西方进军！"周恩来的话传达到红卫兵中，红卫兵小将又是一片欢呼。

这次接见，进行得非常迟缓。20 分钟一个方队的速度根本做不到。红卫兵为了多看一会毛主席，走到金水桥时，或是放慢脚步，或是打漩涡来回走。有的甚至停下不走，而后面的又急着向前拥，队伍顿时大乱，拥挤不堪。

北京卫戍区司令傅崇碧跑来说："下面的群众不肯往前走了，他们一定要见到毛主席才走，现在队伍中间空出了一大截。"

毛泽东说："那就出去吧。"

毛泽东在城楼上已经站了很长的时间，腿都肿了。大家也感觉到很累了，都劝毛泽东再休息一会儿。

毛泽东对大家说，他年轻时见过孙中山，孙中山很谦虚，对他很器重。他说，他一辈子做事情要对得起孙中山。

毛泽东还说："将来的希望不是你们这些人，而在今天我接见的那些人里面，这些人里面哪怕出几个人来，我们的事业就有人继承了。"

他说："我见了孙中山，我就一辈子都不会忘记。他们见了我，他们也不会忘记我，他们会去研究我。"

毛泽东说得很诚恳，在场的人听了都大为感动。

为引导红卫兵西进，毛泽东不断地沿着检阅台往西走，手挥军帽，示意不要在天安门前停留。周恩来不断地叫人打电话告诉70师师长邱巍高组织部队疏导。这种渐进式的接见，直到下午16时才结束，毛泽东在天安城楼上站了整整6个小时。接见时，毛泽东对一些负责人说："你们要政治挂帅，到群众里面去，和群众在一起，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得更好。"

天将黑时接到通知，今天结束，明天继续进行。听到这个消息，许多孩子都哭了。他们怕明天见不到毛主席了。甚至有 4000 人提出抗议：一抗议前面的学生不走，二抗议组织者，折腾了一天还未见到毛主席，说北京干部是大饭桶。

10日晚上，周恩来、陶铸前往毛泽东处汇报工作，毛泽

东问起关中南海西门一事，批评了这种做法，说：“为什么要怕群众呢？”

11 日，毛泽东接着又进行了第二批接见。这次把 50 万红卫兵摆在天安门广场东、西长安街上，留出通道，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乘 9 辆敞篷吉普车进行了接见。

## 第273回：开西门，中南海再受冲击

## 飞上海，张春桥临危受命

11月11日这天，按照毛泽东的意见，中南海西门重新打开。结果在下午就发生了外地进京告状的群众冲进中南海西门、北门的事情。当天晚上，陶铸、李富春、陈毅、谭震林、谢富治5位副总理和中央书记处书记刘宁一，及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总理办公室主任童小鹏在中南海怀仁堂后小礼堂，接见这些告状的职工代表，共30个单位，90多人。

汪东兴首先说："今天毛主席接见了串联革命师生，今晚在中南海解决代表们的一些问题，我们专门请你们代表来，说明中央关心这件事。"然后他一一介绍了参加接见的中央负责人。

国务院秘书长周荣鑫接着说："文化革命深入发展，有很多问题向中央反映这是可以理解的，主要是采取什么样的办法？现在怎么办？原来有一个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秘书厅文化革命联合接待室，工作人员不多，外地来访的同志很多，这样就不能适合形势需要。"

"你们要见中央负责同志，要马上见，要立刻答复，引起了很多的争论。外地来京师生要成立联络站，要宣传工具，接待站解决不了，影响了工作。你们到中南海西门，不答复不走，要冲进中南海，前些天门都关上了。请同志们想一想，毛主席所在的地方，门都关着，这说明了做接待工作的同志

接待工作做得不够，希望大家想个办法。”

冲进中南海的职工代表王富春检讨说：“我们千不该、万不该到中南海来胡闹，向解放军脸上抹灰，给李富春同志找麻烦。这是毛主席著作学得不好，忘记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我请求处分。”

陶铸说：“同志们用什么态度来对待中南海的问题，昨天晚上我和周总理到毛主席那里去，毛主席批评我们，为什么把西门关起来？怕群众吗？我们工作做得很不够，下午把大门开了。党中央和毛主席所在地，为什么关门？下午发生了问题。王富春检查很好，不要给他处分。来反映问题都可以，来许多人向里面冲就不好。北门，西门都冲进去了，这不好。”

他说：“应该信赖接待室，他们不能解决的，反映给我们，我们不能解决的，再反映给毛主席，林彪同志，周总理。你们不是接班人吗？看你们将来到中南海办公，也只能采取这个办法。来了马上就解决，这是永远不可能的。你们要求马上罢省委书记的官，这怎么能马上答复，我们也不能解决，只能由毛主席解决。”

陈毅插话：“毛主席还是召开政治局会议，由中央政治局解决。”

陶铸接着说：“如果真正是修正主义了，应该打倒，都是修正主义吗？有人说我是修正主义总根子，可我说不是。

要信任以毛主席为首的司令部，司令部不能只有一个司令员……什么国家有那么多民主？我们国家有最大民主，集会、结社、出版、示威、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大串联，这是其它国家所没有的。”

“具体问题最后是回本地区去解决。我们分工了，山东、辽宁、江苏是我负责，安徽谢富治、刘宁一负责。你们现在来很多派，一派来要罢官，另一派来要复官，有的罢了三次复了官两次。”

随后，陈毅沉重又风趣地规劝道：“夜深了，工作很忙，我再补充两点：……我以一个犯错误多的同志的名义讲话。是不是你们的行动合乎要求？行动是不是能达到革命的目的？过去我常以为自己的行动是革命的，猛打猛冲，结果失败，作检讨，不止一次犯过错误……1925 年，我冲过中南海西门，我是 4 个代表中的一个，有大刀我们也冲进去了。我从来没想到，我在这里当外交部长、副总理，没想到有人冲我，”

陶铸插话：“你们那时冲对了。”

陈毅说：“你们满怀希望到中南海来，是无可非议的，我们应该支持你们。你们也要考虑一下，为革命目的到中南海来要有个界限，不能要冲就冲，坐着不走，想见什么人就见什么人，不见什么人就不走。列宁同志和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真理强调过分会变成错误了”。

之后，谭震林、谢富治、刘宁一也都讲了话。

11月11日这天，张春桥、戚本禹也与北航“红旗”5名代表谈话，解答学生到工厂串联的问题。

“红旗”代表问：“我们到工厂去了几趟，看到真正工人的造反精神比我们好，现在文化大革命向纵深发展，我们迈开脚步到工厂去和工人相结合，了解社会。我们到工厂去写大字报，宣传毛泽东思想，宣传党的方针政策，与工人谈心，替工人抄大字报，和工人一块劳动，搬到工厂去住。”

戚本禹答：“到工厂与工人一起住，不要打破他们的生产秩序。当然有的生产秩序也是要打破的，靠群众去创，去打破，这样就可以了。”

张春桥答：“搞工厂是方向问题，我们打算下一步应该这样走。至于怎么样搞，你们去闯，去摸索经验。”

学生问：“有人反对我们进工厂，例如：北京玉器厂、光华木材厂，红旗战斗团也对我们提抗议。”

张春桥：“这是一件新鲜事物嘛！当然有人反对，反对你们进工厂的指导思想是怕你们打破了他们的生产秩序。如果你们注意了，把革命和生产的关系处理好了，他们就不反了。首先你们应该和工人接触，现在不要到车间去，因为他们内部不统一，也谈不了多少话。我以前有几次到工厂去，也是这样，要等工人下了班再和他们谈话，否则你们到这派师傅那里去劳动，另一派可能全部停工，那就不好了。”

再说上海安亭。11日凌晨，韩哲一一行风尘仆仆的从安亭回到了上海，立即拨通陈伯达的电话，汇报了安亭之行的情况，表示根本无法做通工人们的工作，华东局也无法承担京沪线瘫痪的重大责任。搁下听筒，韩哲一再给陶铸拨电话，然而连续拨了两个多小时也没拨通。天亮以后才知道，这天毛泽东再次接见红卫兵，中央领导天不亮就都去了天安门城楼。于是，电话由中南海转到天安门，这才找到陶铸。陶铸说，中央一是以陈伯达的名义拟好一份电报，直发安亭，劝工人造反派立即返回上海抓革命促生产。二是派张春桥亲赴上海，处理安亭事件。

此时上海，到处都张贴着署名“二·七战斗队”的传单：《十万火急的紧急呼吁!!》反对上海“工总司”的工人在安亭拦截火车致使京沪线中断的行为。

传单引起强烈反响。人们从署名猜测，传单一定是铁路职工撰写。于是，支持者纷纷到上海铁路分局的接待站打听“二·七战斗队”情况，也有要求将自己的战斗队挂在“二·七战斗队”名下的。

传单确实是上海铁路职工写的。因为，铁路系统有规定：正线中断一小时就算大事故。安亭火车被拦截，致使沪宁线中断。最先知道此事的上海铁路分局调度所工作人员，自然是非常惊讶和愤怒。10 日下午，他们在一起议论，想发传单向社会呼吁。正在议论时，上海铁路分局副局长李殿元走进

调度所，大家对他说：

“我们要写传单！”

李殿元来调度所之前，刚参加了上海市副市长李干成在北站红卫兵运输指挥部召集的会议。会议正是讨论安亭事件的，会上分局党委书记王华生提出，要向全市发呼吁书。所以，李殿元听到调度所职工要写传单，立即表示支持。于是调度所值班主任汪培元起草了一份传单。写毕交李殿元过目，李殿元建议由分局的局长办公室秘书陈阿春修改。

陈阿春在 10 日曾和李殿元去过安亭，试图说服那些工人返沪，没有结果。陈阿春对安亭发生的拦车事件强烈不满，这时让他修改传单，他觉得义不容辞。但他又觉得由局长办公室出面到社会上散发传单不妥当，他想到了北站红卫兵运输指挥部。这个指挥部下面设组织，宣传等若干组，其中宣传组专门负责对外宣传。陈阿春想，何不让宣传组去印发传单？于是他打电话给担任宣传组长的邬科长，邬科长一口答应。陈阿春即将传单原稿包封，请通讯员送到在上海站的邬科长手里。邬科长当即向正在上海站的分局党委书记王华生汇报。此时副市长李干成还在，李干成说：

“群众要发，就让他们发吧！”

10 日晚 19 时过后，陈阿春接到上海铁路分局政治部副主任田丹的电话，要他留下来修改传单。接着，分局副局长李殿元、分局政治部副主任田丹和分局政治部办公室主任张傲

佐，一同来到局长办公室，共同修改传单，陈阿春执笔。传单的题目定为《十万火急的紧急呼吁!!》时间是10日晚上21时30分。

传单以什么名义散发？曾考虑过用“三个革命群众”,“部分革命群众”等。最后李殿元说，铁路工人有“二七”大罢工的革命传统，建议署名“二·七战斗队”。既能体现作者是铁路工人，而且以当时流行的战斗队名义，还可以为今后的发展留下余地。底稿连夜被送往路局印刷厂。第一批印六千份，11月11日凌晨天没亮全部印出。上海铁路分局调度所副主任王玉玺等人，马上分东西南北四路火速张贴。11日天亮后，上海满城都张贴了这张传单。

11日上午，韩哲一接到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打来的电话，表示可以让上海革命造反派的工人到北京向毛主席汇报情况。10时左右，韩哲一和上海市副市长李干成等人再次来到安亭车站，韩哲一站在塔吊上向工人们讲话，答应工人们可以派少数代表去北京，韩哲一还说：“如果车挤的话，我们还要安排车皮，让工人平安到达北京，我回去后马上要秘书解决。”在场的工人当即选出北上代表。一些代表要求韩哲一在他们的《毛主席语录》上签名，韩哲一写上“敬祝北上成功”，并签了名。

11日中午，刚刚参加完接见红卫兵活动的陈伯达，赶紧发急电至安亭：

工人同志们:

10日夜我们听说你们有几千人要求来北京。在安亭同铁路局争执不下，我们打了电报给华东局韩哲一同志，请他劝你们回上海，就地解决问题，以免影响本单位生产任务和京沪铁路运输。刚听到消息，有部分同志已经回去，这样做是很好的，很对，很对。据说有些工人同志，还是在车站不愿回去。我们认为工人闹文化革命是很需要的。但是必须牢牢记住毛主席、党中央再三强调的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指示，坚持生产岗位，把生产搞好，完成国家计划。

毛主席经常告诉我们，大道理管小道理，小道理服从大道理。搞好生产这是大道理。我们的国家是社会主义的国家，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伟大国家，全世界的一切人们都在注视着我们的活动，注视着我们经济发展的动态。工人同志是为我们祖国争光的先锋队，时时刻刻都不能忘记搞好生产这个大道理，如果你们不是在业余时间搞文化革命，而是中断生产、停止生产，那么你们的文化大革命也一定不会搞好。并且在停止生产的情况下，即使有多少道理，有这样那样的道理，有千条万条的道理也站不住脚了，因为你们忘记了最重要的大道理。

工人同志们，我们的行动时时刻刻都要注意对社会、对国际的影响，时时刻刻要顾全大局，时时刻刻都要顾全整个工人阶级的大局。我们绝对不能因为一部分利益，因为有些

人意气用事，而损害全国全局的利益，损害我们国家的威望，即使是小小的损害，也是不好的。

事实上你们的这次行动，不单影响本单位的生产，而且大大影响全国的交通，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事件，希望你们现在立即改正，立即回到上海去，有问题就地解决，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张春桥同志立即会见你们，你们有意见可以同他当面商量。

这是我们再三再三考虑才发出的电报。我热烈希望你们接受我们的意见，向你们致以最高的无产阶级敬礼!

陈伯达

陈伯达起草完电报就拉着戚本禹和他一起签字。

戚本禹说："你是组长，你签字就行了，干吗要我也签呢，我算啥？"

陈伯达说："不行，有人说你是支持上海市委的，所以你也得签字，免得人家再说你什么。"

陈伯达硬是替戚本禹把名字也写在了电报上面。戚本禹坚持不能与组长共签，最后，电报还是以陈伯达一个人的名义发出。

陈伯达之所以说戚本禹支持上海市委，是因为 1966 年 4 月初，戚本禹到上海组织工农兵学哲学的文章的时候，曹荻秋专门宴请过他，10 月中央工作会议时，曹荻秋还请戚本禹帮他修改过检讨。

陈伯达的电报中午 12 时到达上海市委，然后由两个穿着棉大衣的市委工作人员送到安亭。这时已是下午 18 时左右，天色已黑，徐美英打着手电，潘国平垫着墙壁签收了电报。

徐美英是 11 日凌晨 3 时左右来到安亭的。10 日下午 17 时，她带领留在上海火车站的几百名工人，顺着北站旱桥下的铁轨徒步北上，经过 10 小时步行赶到了安亭。

潘国平拿着电报找到王洪文，王洪文不相信，说：

“不可能！这份电报是假的!”

潘国平问王洪文：“怎么办？”

王洪文也拿不出主意。

潘国平急得哭了，王洪文此时也急得眼泪快掉下来了，恨不得给陈伯达写一张大字报。他和潘国平一起去找包炮。

包炮此时躺在车站后面一间小屋里。他摔跤后，被工人用拖拉机送到安亭一家医院，伤口缝了十针，刚回车站。

包炮认为这份电报口气像陈伯达写的，不会假。王洪文问他怎么办，包炮说：

“电报上没有承认我们是革命行动，我们不能回去!”

陈伯达的电报通过安亭火车站的广播站向外广播，播着播着，广播突然不响了，原来电线被造反派剪断了。站长马上赶到附近的上海探矿机械厂，请他们继续广播，那边的广播机功率大，声音响。而且广播线在工厂院内。

陈伯达的电报，像炸弹一样在安亭爆炸，“工总司”军心动摇。“刚听到消息，有部分同志已经回去，这样做是很好的，很对，很对。……”电报里的这些话，打动了许多造反队员的心。尤其是那些原先就主张回上海的队员，更是嚷嚷着要求回上海。

上海市委动员各工厂，派出一大批空的大卡车，来到安亭。宣传车不断地念着陈伯达的电报，不断喊着口号：

“欢迎工人同志回上海！”

“抓革命，促生产！”

“要回上海的，赶快上车！赶快上车！”

“工总司”的队伍开始瓦解。好多造反队员爬上了大卡车。有的还站在车上大喊：“上来呀！上来呀！回上海去！回上海去！”

“呸！叛徒！逃兵！可耻！”也有一批“坚定分子”，唾骂着那些回上海的队员。

“谁是叛徒？谁是逃兵？”车上的队员，与车下的“坚定分子”们争吵起来，人心更乱了。

11 日这天，上海市十余万造反派在人民广场召开“向上海市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大会”，从 13 时到 19 时多，曹荻秋到会回答问题，形如审讯，甚至要他靠边站。由于有些发言的讲法过于激烈，也引起了不少人的反感和不满。

上海铁路分局调度所的职工听到陈伯达的电报后，非常

高兴，认为中央文革小组也不支持“工总司”的行为，决定再写一张传单。因为他们觉得第一张传单对“工总司”影响铁路交通的后果，写得太笼统。于是由调度所资料员唐兆元起草了第二份传单。这张传单的全部数据，都来自调度所当时的生产记录，即列车运行图。调度所副主任王玉玺将第二份传单的底稿交陈阿春修改，题目定为《非常大的安亭事件》，这是套用陈伯达电报中的一句话：“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事件”。署名仍是“二·七战斗队”，连夜张贴全市，引起更大的反响，被一再翻印。南京路、淮海路、外滩等繁华地段纷纷出现“坚决支持二·七战斗队”的大标语、大字报，要求共同行动的人和组织，更是不计其数。上海铁路分局副局长李殿元建议他们干脆成立“二·七战斗队”。就这样，“二·七战斗队”以调度所职工为基础正式成立，推举调度所副主任王玉玺为队长，陈阿春为顾问。

11日晚上22时左右，就在陶铸等5位副总理正在接见闯中南海的群众代表的时候，在暮色茫茫中，在凛冽的寒风呼啸声中，一架军用飞机悄然降落在上海北郊的大场军用机场。张春桥走下飞机，韩哲一、李干成、杨恺已在飞机舷梯旁等候。

因为当时事态急迫，陈伯达要王力给空军司令员吴法宪打电话，派军用飞机送张春桥去上海。

张春桥深知此行的困难：“工总司”必须从安亭撤回上

海，这是中央的意见，陈伯达的电报是遵照这一意见发出的，他急急赶往上海，也是为了执行这一意见。可是，还不能打击“工总司”，因为“工总司”的大方向是符合毛泽东文化大革命战略意图的，对此，陈丕显、曹荻秋他们看不清楚，可是张春桥、陈伯达心里是明镜一样。正如张春桥后来所说：“处理安亭事件，要么为毛主席立一大功，要么犯一大错误。”就在白天，他还和戚本禹一起接见了北航“红旗”的代表，解释工厂文化大革命的问题，此时，他已坐着空军特地为他准备的专机，飞到了上海。上飞机前，张春桥先与首都“三司”的蒯大富取得联系，通过“三司”驻沪联络站，获知“工总司”的一些情况。

当李干成握着张春桥的手时，他笑着说：“春桥同志，什么风把你吹来了？”

张春桥淡然一笑说：“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东风！”

李干成接着说：“上车吧，先到衡山宾馆，市委的同志都在那等着向你汇报……”

张春桥没有立即上车，而是说：“我先给伯达同志打个电话。”

张春桥向陈伯达通报了他已到达上海，并请示下一步去哪里？

陈伯达指示他：“要立即赶到现场，尽快和工人们见面，动员他们回上海！”

张春桥出来对韩哲一、李干成、杨恺说：“我不去衡山宾馆了，咱们在这里碰碰情况吧。”

## 第274回：不进城，雨夜飞车奔安亭
## 见工人，演讲诚恳收成效

在机场，韩哲一和张春桥谈了一个多小时，主要是通报安亭的情况。张春桥同意华东局和上海市委的意见，即：不承认“工总司”，也不支持他们的行动，必须说服工人造反派返回上海抓革命，抓生产。寒暄之后，张春桥请韩哲一回去休息，他由杨恺陪同直接前往安亭。

张春桥提出要找几个熟悉情况的红卫兵一起去安亭。打电话后，两个北京红卫兵赶来。就这样，张春桥在杨恺和北京红卫兵陪同下，直奔安亭。

夜雨敲打着车窗玻璃，雨刷来回摆动着。司机拧亮大灯，汽车在雨帘中飞奔。驶过真如、南翔、黄渡，直入安亭。

正在安亭的上海市委干部找到了潘国平和包炮，谈判还是在上海无线电专用机械厂举行。包炮穿着棉大衣，拄着个棍子走了进来。

谈判的一方，是足智多谋、久经沙场的“中央大员”张春桥一人。

谈判的另一方，是以王洪文和能言善辩却乳臭未干的潘国平等 9 人。

张春桥首先说话。他说：“你们这样离开生产岗位，拦截火车，是犯罪，是道道地地的反革命事件；如果按中央以

前的规定，光凭你们破坏交通命脉，就够杀头了。现在你们给我回上海，叫工人统统回上海，今天商量的是回去不回去的问题，有什么事，到上海再说。”

王洪文被训得低下头，没有反驳。潘国平当场哭了，王洪文也掉下眼泪。

可是学生红卫兵不卖账。包炮说：

“春桥同志，你是坚定的左派，在北京，你是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的，坚决支持我们首都红卫兵，你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怎么到了上海就完全变样了？就来压制上海的工人运动了？”

包炮还说，这些工人不是自己来安亭的，是上海市委把他们乘的火车停在安亭的，他们拦车是被逼出来的。

张春桥并不为包炮的话所动，依然坚持要王洪文和潘国平答应将工人们带回上海。

“伯达同志的电报，你们都看了。电报虽然是伯达同志以个人名义打来的，但是代表着‘中央文革’的声音，代表着党中央的声音，代表着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声音。”张春桥说，“我对你们的要求，那就是按照伯达同志的电报指示精神，立即带领造反队员。从安亭、从南京，撤回上海，有问题到上海去解决……”

“到上海能解决问题吗？”此时，潘国平毫不畏忌地反驳张春桥，“我们正是因为在上海不能解决问题，这才北上

告状，这才被半途甩在安亭、南京。如果在上海能够解决问题，我们就不会在安亭拦截火车了！”

“如果你们要北上告状，只能派少数代表。大队人马必须回上海‘抓革命，促生产’。”张春桥继续说道，“你们是‘工总司’的负责人，你们应该负起这个责任。”

“正因为我们是‘工总司’的负责人，所以我们必须对‘工总司’全体造反队员负责！”潘国平毫不妥协地说道，“到北京告状，不是我们几个临时负责人的意愿，是全体造反队员的强烈愿望，派少数代表去北京，没有声势，恐怕是告不倒曹狄秋的！”

潘国平情绪激动，几次讲得控制不住，哭了起来，边哭边讲：“中央得到的关于安亭停车的报告，是被华东局和上海市委歪曲了的片面情况。我们受上海市委资反路线迫害，要到北京去向毛主席和党中央报告真实情况，华东局和上海市委先同意我们乘车去，但车到安亭就不开了，骗了我们。陈伯达的电报也是一味指责我们，抽象地讲什么大道理，小道理，被上海市委利用，大量印刷，到处广播，对我们压力很大。”

张春桥表示：“中央得到的铁路不通的情况，首先是铁路系统报告的，不是上海市委。我今天一下飞机就到安亭来了，也没有和上海市委联系过，所以没有什么偏听偏信。”他坚持要求工人们先回上海，什么事都到上海再谈。

潘国平说："张春桥同志，我们尽量说服下面的造反队员们回上海，不过，有几个问题，一定要请您先表一个态，否则的话，我们实在很难说服工人群众。首先，我们坚决要造上海市委反的'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是不是一个合法的革命群众组织？其次，我们要求到北京控告上海市委的行动，是不是革命的行动？第三，酿成安亭事件的责任应该由谁来负责？是'工总司'呢？还是上海市委？第四，能不能答应我们工人群众的革命要求，曹荻秋是否要向全市人民做公开的检查？第五，能不能给我们'工总司'提供工作方便？如果这五个问题能够得到圆满的解决，我们就马上动员工人群众回去。"

张春桥注视着潘国平说："我认为，你们'工总司'是符合宪法的革命群众组织，北上告状也是革命的行动，但以后碰到此类问题，应派少数代表，现在你们一定要回去，这是中央首长的命令！"

潘国平等人几次走出会场商量对策。

王洪文表示可以回去劝说自己厂的工人回沪。

正在此时，有人进来报告，说煤场那边一部分工人已经等得不耐烦了，正集合队伍准备步行去北京。张春桥听到这个情况，立即结束谈判，让人去将他们追回来，并说：

"既然你们说不通，那我就直接去和大家说！"

潘国平马上找了辆大卡车，装上高音喇叭。

12 日早上，天上密密麻麻的下着蒙蒙细雨，在安亭火车站的堆料场上，2000 多名经历了两天三夜没有休息的造反队员，有的站在木堆上，有的坐在 602 次列车车顶上，也有的竟爬到吊车的吊臂上，焦灼不安地等待着他们的头头和张春桥的到来。

红色的造反大旗，蓝色的工作服，绿色的没有领章的军装，组成了现场这支造反大军的基本颜色。

准备步行北上的，是谢鹏飞等一行人。8 时不到，他们刚走出堆料场，就看见一辆解放牌大卡车，两边装着两个喇叭，迎面开来，在他们前面停下。张春桥、王洪文、潘国平等都在卡车上。潘国平在喇叭中喊道：

“请大家回去，中央首长张春桥要和大家讲话。”

于是众人跟在卡车后面，回到堆料场。

堆料场内的人群骚动起来，发出一阵阵口号声：

“我们要听毛主席的声音！”

“我们要听中央文革的声音！”

“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大卡车一身泥浆，在堆料场停下。人们朝大卡车聚拢。

卡车上站着一群人，那个披军大衣、戴眼镜的，便是张春桥。王洪文、潘国平、包炮等人站在他的周围。王洪文给张春桥打着黑布伞。这时，张春桥看到现场的工人们都在雨中淋着，他推开了王洪文手中的伞。王洪文遂即收起手中的

伞。

“同志们，战友们，毛主席派来的亲人、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张春桥同志来了！”潘国平用他洪亮的嗓子、清晰的吐字，一下子在堆料场上激起一阵欢呼声。

“造反派的工人同志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工人阶级是我们国家的领导阶级，我们已经过去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需要工人阶级的领导。现在搞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也一定要有工人阶级的领导。有了工人阶级的领导，毛主席亲自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定会取得

伟大的胜利。现在，上海的工人同志们已经起来造反了，这是上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大好的一个重要标志！”张春桥的这几句开场白，总算还有点颜面，赢得了稀稀落落的几起掌声。

他接着说：“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说：‘整个革命历史表明，没有工人阶级的领导，革命就要失败，有了工人阶级的领导，革命就胜利了。’”

全场立刻欢呼。

他继续说，“文化大革命的成败，取决于工人阶级。现在，同志们起来造反了，工人阶级起来造反了，这是上海文化大革命形势大好的重要标志！”

张春桥的这几句话，赢得了一片掌声。

“但是，文化大革命是一件新事物，应该怎么样来搞，还缺少经验。最近几个月以来，我们中央文革小组，只领导了学校的文化大革命，取得了一些经验，但至今还没有工厂闹文化革命的经验。工厂的文化大革命怎么搞，我们没有经验。党中央和毛主席非常关心大家，他老人家也在成天地想着大厂怎么搞？中厂怎么搞？小厂怎么搞？三班制怎么搞？”

张春桥的话再次被热烈的“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声所打断。

接着，张春桥讲了近一个小时，最后又回到要大家回上

海的主题上。

他的话音刚落，拄着拐杖的包炮第一个发言。他重复了在上海无线电专用机械厂与张春桥谈判时说的那些话。接着，“炮司”江必雄跳上车头，指责张春桥不支持工人。谢鹏飞紧接着江必雄发言，他站在汽车的保险杠上，与张春桥面对面，他说：

“大家不要忘了，张春桥本来也是上海的书记，是当权派。”

谢鹏飞将自己和厂里的那些工人因贴大字报被厂党支部殴打关押之事，向张春桥控诉了一遍。

秩序越来越乱，大家抢话筒，争着发言。

潘国平大声的维持着秩序，让大家递条子，一个一个发言，不要乱七八糟抢着说话。

接着，有人控诉，有人起哄，有人爬上卡车与张春桥辩论.....卡车车头的外壳也被被踏出瘪凹。

王洪文看到情况有点不妙，赶快站出来大声地道：“‘工总司’的战友们，同志们！张春桥同志是伟大领袖毛主席身边过来的亲人。他对我们的关心，就是毛主席对我们的关心。他对我们的支持，就是毛主席对我的支持。他在昨天晚上已经明确表示承认我们‘工总司’……”

有人见王洪文变了态度，爬上卡车抢过话筒大骂：“王洪文滚他妈的蛋!”

潘国平想动员大家回上海，也被起哄叫他“靠边站”。

有人问陈伯达的电报是不是真的，张春桥从衣袋里拿出陈伯达的电报念了一遍，又高举起扬了扬，然后说：“这就是陈伯达同志的电报稿，陈伯达同志代表中央文革小组，他的声音就是中央文革的声音，就是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声音。”

全场顿时鸦雀无声。

张春桥说：“工人同志们，我原来对一些情况不很了解，听了大家的控诉很有触动。你们的行动是上海市委逼出来的，看来，上海市委执行了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你们的行动是革命的行动。”

张春桥的讲话，又一次博得了人们的掌声，听声音，这次的掌声显然比第一次热烈的多。会场上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骚动，有人领头唱起了经过他们改编的《毛主席派人来》的歌：

毛主席呀派人来，

雪山点头笑颜罗，

彩云把路开，

一条金色的飘带，

把北京和上海（拉萨）连起来

……

歌声反映了工人们的心声，张春桥进一步顺势说道：“现在我张春桥请大家先回去，还有什么问题，不管是什么问题，

都可以在上海大家坐下来一起再商量。”

已经是下午了，张春桥已经13个小时没有吃饭，在场的所有人也没有吃中午饭。张春桥让王洪文宣布最后决定。王洪文拿起话筒说：

“同志们：我们在9日召开大会的目的已经完全达到，今天应当听中央文革代表张春桥同志的话，马上返回上海！留在上海的造反派战友也等着我们，他们要和我们一起，彻底清算上海市委和曹狄秋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罪行！要誓死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志们，让我们赶快杀回去！支援留在上海的造反派战友，一起去造上海市委的反！”

张春桥也提高了声调，再一次表态：“这一次，我到上海来，中央文革小组告诉我，要我很好地向你们学习。我向大家保证，一定要把这件事情处理好。如果不处理好，我决不回北京！”

在一片欢呼声中，张春桥结束了讲话。

张春桥走了。王洪文和潘国平跳下了卡车，动员着造反队员返回上海。

“王洪文右倾！王洪文出卖了‘工总司’！”王洪文受到了一群人的围攻。

滞留在安亭的“工总司”分化了，分成了两部分：11 月 12 日的中午时分，国棉 17 厂派出的车子已到安亭。此时，

王洪文带头乘上车，带着厂里400多名工人首先离开了安亭。随火车回上海。下午4点，张春桥离开安亭。接着，一部分愿意回上海的人，跟着潘国平登上返回上海的火车，或者市委派来接他们的十几辆公交大客车。11月12日下午18时，最后一批滞留在安亭的造反派被大客车拉回上海。

另一部分人仍坚持北上，“不到北京不回头”的，由上海铁路局装卸机械厂锻工谢鹏飞领头，率队步行，沿着铁路前进，朝着苏州方向走去……

张春桥于下午16时左右返回上海后，马上给北京挂了长途电话，分别向陈伯达、江青汇报了对“安亭事件”的处理情况。

## 第275回：接急电，王洪文驰往昆山

## 践诺言，张春桥同意要求

安亭的“工总司”队员回到了上海。只见上海街头，到处都贴着针锋相对的大字标语：

“安亭事件是反革命事件！”

“安亭事件好得很！”

“工总司是暴徒！”

“工总司岿然不动！”

上海市委收到陈伯达的电报后，立即大量翻印。市委写作班也连夜把电报抄成多份大字报，张贴到静安公园的大字报专栏广为宣传。

《解放军报》记者、中央文革小组驻沪联络员甄文君于11月12 日下午17时10分致周恩来的电话报告：

张春桥同志和上海要求赴京工人谈话情况

张春桥同志昨晚9点多抵沪，即赴安亭车站，跟9个工人代表谈判，谈判中间有波折。9人中有3个同志同意说服工人回上海，6个不同意。一直谈到天亮，未达成协议，他们坚持要步行去京。

今早7时，春桥同志又到现场找工人谈话。工人对伯达同志的信（按即电报） 有意见，说只讲生产，不讲革命，他们不同意。有些人谈起来情绪激昂，进行控诉 。

现在看，有少教人是坚决主张到北京的，他们起领导作

用。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驻上海联络站支持他们。

第二种是多数人。他们提了 5 个条件，如答应他们，他们就回上海：1、承认工人造反司令部，发给袖章；2、承认他们的行动是革命行动；3、此次事件的责任在市 委；4、曹荻秋要做检讨，承认错误；5、后天要开控诉大会。

第三种人，也是少数，主张应听中央的话，回上海去。但他们不占领导地位。 据有些工人私下谈，他们有顾虑：这次到安亭的有七、八十个单位，除一个单位来的人很多，有 300 多人外，都是零星的来一些人，其中有些还是受过批评的，担心回去后被围攻、挨整。

挤在安亭的工人，生活问题市委已注意，不会出问题。

铁路交通，昨天已恢复，工人的那一列车，停在叉道上。

张春桥同志还在安亭。

上海市委了解到安亭车站的情况后，12 日下午即向各单位发出了《沪委［66］第 113 号》文件。文件中说："市委要求你们，在他们回厂的时候：一、对他们听党的话，回厂同广大职工一起闹革命、搞生产的行动表示欢迎。二、对他们的行动不要指责，不要跟他们辩论，不要扣帽子。三、他们这次离厂期间的工资，可以照发。下不为例。"

下午 16 时多，王洪文接到刚刚回到上海的张春桥打来的电话，让他立即赶到昆山，把继续北上的造反队员拦在昆山，劝回上海。

王洪文坐上张春桥为他准备的一辆银灰色的轿车，直奔江苏昆山。由于连日来的劳累，一上车，他就闭上双眼，在疲惫不堪中睡着了。

昆山，位于安亭和苏州之间。当王洪文率领1000多人回上海的时候，谢鹏飞率1000来人步行离开安亭，傍晚抵达昆山，在昆山中学“安营扎寨”。

当轿车驶过安亭，驶过天福庵，王洪文才被人叫醒。车窗外，已是一片漆黑，只有远处的灯射出一缕缕昏黄的光。

“车子不要进昆山中学，靠在远处，我下车走过去。”王洪文这位“司令”初次坐轿车，生怕队员们说他“变修”，便如此这般吩咐司机。他下车后，独自朝昆山中学走去。刚刚走进校门，便给“尖刀班”撞见了。

这“尖刀班”，是由十几个20来岁身强力壮的青年组成的。他们差不多都认得“司令”。

“你来干什么？”青年们一拥而上，用冷冰冰的口气盘问“司令”。

“我来找谢鹏飞，找周宝林，找总部的人。”王洪文答道。

“找他们干什么？”

“春桥同志要我来找他们。”

“尖刀班”的青年们用充满敌意的目光注视着王洪文。有人骂王洪文右倾，有人骂他叛徒。他们像押犯人似的，把

王洪文押去见头头。

来到昆山的这1000多人来自各家工厂，每家工厂的造反派头头，都算是这支队伍的头头。谢鹏飞名义上是总头头，大约只是因为他参加过“工总司”的筹备会议，在成立大会上作过“控诉”，算是“总部”的人。

另一个“总部”的人叫周宝林，21岁。连他自己也说不清楚，他怎么会卷入安亭事件，会成为“总部”的人？他1964年从海军航空学院毕业，分配到上海市仪表局，在一家无线电厂劳动。“工总司”成立那天，他看热闹，在会场里坐了一会儿，晚上便回家了。第二天，安亭事件爆发了，上海市委派了一些人坐着轿车前往安亭，以了解现场的动态。市委办公厅的一个同志与小周相熟，遇见了他，便把他也拉上轿车。于是，他就到了安亭。先是在旁边看看，后来，他被那里的大辩论吸引了。年轻好动的他，听着，听着，按捺不住，居然也加入了辩论。他才讲了几句，立即有人厉声喝问：“你是什么成份？”原来，他还不懂“辩论规则”，开口之前要先报成份——因为“什么阶级说什么话”！他只得如实报告：“周宝林，共青团员，复员军人，大学毕业生！”他的话，马上引起王洪文的注意。王“司令”手下，正缺“成份好”而又肚子里有墨水的人，便把他吸收到总部工作，负责联络、负责宣传……就这样，阴差阳错，他竟成了“总部”的人。

王洪文向昆山这支队伍的头头们传达了张春桥的意见之后，说道：“希望大家听从总部的决定，听从春桥同志的意见，明天回上海去。”

“你算总部？你代表总部？”马上有人指着王洪文的鼻子质问。

“你是叛徒！右倾！”

“张春桥算老几？他能代表‘中央文革’？”

“张春桥也是上海市委的，跟曹荻秋是一伙的！”

王洪文想不到，他远道赶来，竟成了批斗对象。

唯一表示赞同王洪文的是周宝林。

“把王洪文关起来！”

“把周宝林也关起来！”

有人这么一说，“尖刀班”便一拥而上。把王洪文与周宝林关进昆山中学的一间教室。

刚刚还是坐轿车，转眼之间进“班房”。没有床，没有被，把课桌一并，披上棉大衣，王洪文和周宝林躺了下来，却怎么也无法入眠。

过了子夜，昆山中学的灯一盏盏熄灭了，从一个个教室里传出一阵鼾声。

大抵是一连几夜未得安眠，就连看守“牢房”的“尖刀班”的小青年，由站着到蹲着，到坐着，终于也发出了鼾声。

王洪文和周宝林蹑手蹑脚地走出了“牢房”。关押了4

个多小时，王洪文算是“自由”了。

走了一里多地，才在路边看见那辆银灰色的轿车。

王洪文坐进轿车，不住地向送他出来的周宝林挥手。

银灰色轿车迅速地消溶在黑色的夜幕中。

11 月 13 日清晨，天刚蒙蒙亮，上海市委写作班党支部书记徐景贤家里的电话铃响起，是中国科技大学来沪的红卫兵许小昆打来的，他在电话里急切地说道：“我刚从安亭回来。你知道吗，几千个工人成立了‘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要求市委接见并承认这个组织，市委不予理睬，他们就乘火车北上告状，被困在安亭车站。中央文革派张春桥同志赶到现场处理。昨天工人们已经接受张春桥同志的意见返回上海，张春桥对他们有过承诺，他们不放心，这批人现在等在文化广场，一夜没睡觉，要求张春桥见他们，但没有办法和张春桥联络。请你无论如何一定要找到他，转告他安亭回来的工人们正在文化广场等他。”

文化广场的领头人是上棉31厂的黄金海。本来，9日晚上队伍到达“咖啡厅”后，他胃疼得厉害，回厂医务室打针治疗去了，没有和当晚的队伍一起涌向火车站。11日，他去巨鹿路“工总司”总部，说要去安亭，守在总部的范佐栋让他带去两捆刚印出来的“工总司”成立宣言。于是黄金海自己掏钱叫了辆出租车，和另外两个工人，于下午14时赶到了安亭车站，并于12日下午，随王洪文他们回到上海。但他没

有回上棉31厂，而是带着一部分人又来到了“工总司”成立的文化广场，因为他在安亭时曾对张春桥说过：

“回去可以，但我们不能回厂，否则会被厂里打成反革命。我们集中在文化广场，等你为我们解决问题后再回厂。”

张春桥答应了。

所以黄金海带着队伍从安亭回到上海后，全部拉到文化广场，表示：“问题根本没解决，我们不能走！”

徐景贤放下许小昆的电话，立刻赶往武康路二号市委写作班，因为在那里市委给他装了一个红色保密电话，可以直通市委各个领导人。徐景贤拨通了张春桥家里的保密电话，是张春桥的妻子文静接的。她说张春桥半夜才回家，还在休息。

徐景贤告诉文静，情况紧急，从安亭回来的工人们聚集在文化广场，等候张春桥接见。

张春桥接过了电话。他听了徐景贤在电话里的汇报后说，他正在发烧，在安亭和工人谈判时淋了雨，感冒了。但是，工人们既然等在文化广场，他还是准备去和他们见面。他要徐景贤先找到他们的头头，联络会面之事。

放下电话，徐景贤即赶往文化广场，那里的工人告诉他，他们的负责人叫潘国平，现在去了巨鹿路“工总司”总部。

徐景贤又赶到巨鹿路“工总司”总部，只见里面人来人往，乱哄哄的，谁也不知道潘国平在哪里。徐景贤亮出市委

文革小组成员的身份，才有负责警卫的人告诉他，潘国平在三楼睡觉。

徐景贤摸到三楼的一个小房间，叫醒了睡眼惺忪的潘国平。

听说是市委文革小组的人来了，潘国平一咕噜光着着脚从床上爬起来，穿上鞋接待了徐景贤。

此时已经是中午，他们约定下午在文化广场与张春桥见面。

这消息飞快地从“工总司”传出来，造反队员们互相通知：“下午，张春桥在文化广场接见我们！”

消息也传到上海市委，传到曹荻秋耳中。中午，上海市委召开书记处紧急会议。

中午开会，这在上海市委是几乎未曾有过的事情。会议由曹荻秋主持。

会议一开始便出现了冷场，大家坐在那里都不发言。

曹荻秋让张春桥先讲讲。张春桥说：“这次来是想听听上海各方面的意见。”

会议再次出现冷场，曹荻秋只好首先发言。他说：

“‘工总司’是一个全市跨行业的群众组织，根据中央的指示，我们市委经过集体讨论，做出的不参加、不承认、不支持的态度是正确的。事实上已经证明，他们在安亭铁路上拦截火车，阻断交通，难道这是革命的行动吗？他们在安

亭闹事，造成沪宁线中断30个小时，这是很严重的破坏事件。这个责任应当由谁来负？难道是要我们上海市委来负吗？明明白白，清清楚楚，责任只能由‘工总司’来负！……”

曹荻秋接着又举出了一些厂矿因为这次事件所造成的经济影响，列举了因此而带来的一些社会治安问题，希望市委能拿出一个正确处理的意见，以稳定上海的局势。

曹荻秋说完，大家开始发言，一些人支持曹荻秋的意见，说不能承认“工总司”，并对“工总司”可能提出的各种要求进行了设想和研究。

张春桥在会上没有发言，只是一支接一支地抽烟。作为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的张春桥，他受曹荻秋的领导。可是，作为“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的他，在领导文革运动的问题上，则又在曹荻秋之上……曹荻秋在会上征求他的意见，张春桥没有表示。

会议开始一会儿后，曹荻秋叫来他的秘书糜欣祥，让他挂电话给陶铸，说有问题要请示。

会议快要结束的时候，电话挂通了，曹荻秋来到104室，向陶铸汇报了上海市委书记处对安亭事件和“工总司”的意见，陶铸表示同意，并一再强调不能搞跨行业的群众组织，不能阻碍铁路交通。曹荻秋一边听着，一边在本子上作记录，最后，他让糜欣祥叫张春桥过来听电话。

张春桥从曹荻秋手里接过话筒，一边听着电话，一边点

着头 “嗯，嗯，嗯。知道了。好的，好的。……”

等张春桥听完电话，曹荻秋说了句：“照陶铸同志的意见办吧！”会议就结束了。

张春桥走出会议室，坐上轿车后，对司机道：“快！去文化广场！”

这天，天气很冷，文化广场来来往往人群不断，都是戴着工作帽，穿着蓝色工作服或蓝色棉工作大衣的工人们。黄金海从一早起就布置纠察，守住文化广场的所有八个大门，只留 8 号门进出。他还派人去找王洪文和潘国平。

“工总司”的造反队员早已在陕西南路文化广场那扇形大厅里等候，一遍又一遍地念着“最高指示”。张春桥的迟迟未到，让这些队员们的心越来越着急。

一次次打电话给张春桥，均告知他在市委开会，会议重要，不能接电话。

14 时 30 分左右，张春桥带着秘书何秀文赶到文化广场 8 号门，徐景贤已在那儿等候。此时，早已在文化广场会议大厅里等候的造反队员们沸腾起来，“向中央文革学习！”“向中央文革致敬！”的口号声此起彼伏。今天来的人特别多，除了从安亭回来的，原来没有去安亭的也来了。他们不断地高呼：“向中央文革致敬！向张春桥同志致敬！”

黄金海安排张春桥，徐景贤和何秀文 3 人先到后台第一间的小休息室休息一下。很快，下午 15 时左右，潘国平和十

几个红卫兵陆续来到。“炮司”周谷声、丘励欧也赶来参加了谈判。

但也不像谈判的样子，红卫兵一上来就抢过工人的话头，要上海市委保证工人们回到工厂去不会挨整，不被扣工资。上海交通大学“反到底”的申明全指责张春桥没有站到造反派工人的立场上。他们认为陈伯达的电报是错误的，张春桥不该去安亭把工人们动员回上海，应该支持他们上北京告上海市委的状等等。

红卫兵说了许久后，张春桥讲话。他说：原来在北京听到上海市委汇报安亭的情况，是不全面的，中央文革几个人商量了一下，由陈伯达执笔写了一份电报；他自己赶到安亭以后，听了工人们的发言，觉得上海市委是有责任的。至于有人现在对电报里的一些措词有意见，那是因为起草时听了上海市委的片面汇报。他是同情工人并站在工人一边的。张春桥按照周恩来在接见红卫兵代表时对陈伯达的赞扬，称陈伯达是“马列主义理论家”，是很有水平的“党内秀才”，相信如果陈伯达了解了情况也会同意张春桥的看法的，等等。

一个北京电影学院的红卫兵，拿着一只照相机，向张春桥提出：“陈伯达的电报是不是真的？会不会是上海市委伪造的？”

张春桥从他穿的军装胸袋里，掏出几张折叠起来的纸张

后展开，向在场的人展示说："你们看，伯达同志起草电报的手稿都交给我带来了！你们应该听从中央文革的意见。"

大家看到陈伯达用铅笔字在几张白纸上写下的电报全文，北京电影学院的那个红卫兵如获至宝，赶紧把电报稿拿过去平铺在桌子上一张一张地摄影。谁知他拍完照片，竟把原稿收到自己的口袋里不肯交还了。张春桥向他索要，他也不肯拿出来。

张春桥有些着急了，徐景贤赶紧和那个红卫兵交涉，告诉他："中央文件的底稿都是要存档的，不能由个人保存。"

就这样磨了很久，北京电影学院那个红卫兵才把电报稿掏出来交给徐景贤。徐景贤赶紧递给张春桥，张春桥又把它小心翼翼地放进胸口的口袋里。

张春桥讲话时，越来越多的人涌进谈判的休息室，屋里拥挤不堪。潘国平提议换个大点的房间，黄金海于是将大家领到后台西面一间大点的化妆室，自己仍然守在外面。

众人都去了大房间，张春桥没走，依然留在休息室，只是不时的到另一间房间打电话，每次回来，都很焦躁，应该是电话没打通。后来，他干脆不打电话了。一个人在空荡荡的屋子里来回走着，从这个墙角踱到另一个墙角，从另一个墙角踱到这个墙角，来来回回地走着对角线。终于，他像下了决心似的走出房间，来到西边的那间大化妆室。

西面的房间里有一张长桌子，三十多人围着桌子，张春

桥在桌子尽头坐下，徐景贤坐在他身后。

潘国平事先已经和北京以及上海的几个大学红卫兵商量过，他提出："这次安亭事件是由上海市委压制工人造反造成的，一切后果应该由上海市委负责。现在工人们都听中央文革的话，返回了上海，张春桥同志在安亭说有什么要求回上海以后再讨论。现在陈伯达同志在电报里说我们工人'忘记了最最重要的大道理'，'损害全国全局的利益'，这样上海市委就可以根据电报来整我们这些回厂工人。"

张春桥说："伯达同志在北京，不可能了解现场的具体情况，所以中央文革派我来直接处理。现在上海市委决定向各基层单位发文件，对回厂工人表示'欢迎'，'不要指责，不要扣帽子'。"

但潘国平坚持说这样的文件是非不分，一定要承认"工总司"是革命组织，他们到安亭去的行动是"革命行动"。

张春桥说，成立全市性的跨行业工人组织将对全国造成影响，劝潘国平他们遵守中央的规定。

但参加谈判的工人和红卫兵们坚持自己的意见，谈判僵持了一个多小时没有结果。

潘国平说："我们相信中央文革，相信陈伯达和张春桥同志，但是不相信上海市委，我们回厂后肯定有些人要被打成反革命，有些人要受到围攻，被扣发工资。"他提出希望签署一份书面的东西，张春桥当即表示同意。

潘国平见张春桥如此爽快，有点意外。他连忙和红卫兵们商议，将事先由上海师院学生、“炮司”江必雄起草的要求，作了些许修改，然后重抄了一遍，递给潘国平，潘国平看后交给了张春桥。

这是张从笔记本上撕下来的纸片，上面依次写着：

一、承认“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是革命的合法的组织。

二、承认“11．9大会”以及被迫上北京是革命行动。

三、这次所造成的后果全部由华东局、上海市委负完全责任。

四、曹获秋必须向群众作公开检查。

五、对“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今后工作提供各方面的方便。

张春桥仔细看了一遍，纸条上的字迹有些幼稚，其中把曹获秋写成“曹获秋”，但张春桥没说什么，只是拿着这张纸犹豫、踌躇了一会儿，然后拿起笔在第二条后边用括号加了一句“（以后碰到类似的情况应派少数代表）”，并在下边用钢笔签下：

“张春桥1966．11．13．于上海”。

张春桥说：“那就叫市委印成文件下发吧！

随后，潘国平也代表“工总司”在上面签了字。

这是现场北京电影学院的红卫兵摄下的张春桥签字的镜头。

中坐签字者为张春桥，后中站立者为徐景贤。

在文化广场还有市委办公厅派来的一个秘密联络员，当他在谈判现场看到张春桥在“五项要求”上签了字，赶快打电话向康平路市委书记处作了汇报。

第276回：怒冲冠，三巨头反应激烈　约“炮司”，前往苏州做工作

谈判会场里的工人代表和红卫兵们，看到张春桥终于在“五项要求”上签字了，兴高采烈，纷纷拿出自己身上的《毛主席语录》，也让张春桥签名留念。

潘国平更是兴奋万状，他问张春桥：“你是不是要见见群众？”

张春桥说：“好。”

于是，在潘国平等人簇拥下，张春桥在一片欢呼声中走上文化广场主席台。

潘国平将张春桥签字同意的《五条》当众宣读了一遍，广场上欢声雷动。

接着，张春桥对着话筒开门见山地说：

“同志们，大家在这里等了很久。刚才在这里跟你们总部的同志商量了几个问题。现在说明一下：

头一个问题，就是‘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是不是一个革命的合法的组织？

我认为‘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是一个合法的革命的组织。

第二个问题，11 月 9 日的大会后，有人要到北京去控告上海市委，这是什么性质？

我说，这是一个革命的行动，在这个问题上我要讲一点意见，以后再在这种问题上碰到这个问题无论是工人和农民要派代表上北京，因为集体去会影响生产。

第三个问题，现在这个事情造成的后果，你们代表提出，这责任

应由上海市委和华东局负责。

我也同意这个意见，我声明市委昨天已发出通知，你们回去后不应受到打击和责难，工资照发，如果刁难你们，就是错误的。你们可以知道市委有这个通知。但是，我不能保证，你们回去不被围攻，我觉得凡是搞革命的人就不怕，采取这个态度问题就好解决了。

第四，要求曹荻秋同志公开向群众做检查。

这个要求我同意。

有的同志关心我的安全问题。其实，我到这里来，对你们是没有怀疑的。我不是把你们当成坏人。如果你们都是坏人，我就不会一个人到安亭去了。曹荻秋同志的安全问题，倒是要注意的。我希望你们有事讲理。曹荻秋同志一次检查不行，还可以来第二次。

第五，给‘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提供方便。

这一条我同意，我想提一点意见，就是咱们工人要发扬艰苦朴素的优良传统，不要像那些组织，汽车、录音机、照相机我们尽可能少用一些，继续发扬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

大会后，我还要找工人同志了解上海工人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在文化大革命中工厂遇到什么问题，你们如何解决革命和生产的关系，曹荻秋同志检查时间和下次会议的准备。我希望上海文化大革命搞好，成为全国的模范，上海有200万工人，是有光荣传统的，一向最热爱毛主席，听毛主席的话，读毛主席的书，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上海的文化大革命，一定能走到全国的前面，如同在工业上一样。”

张春桥的讲话，获得暴风雨般的掌声，造反队员们高呼：“毛主

席万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足足响了十几分钟。

大会结束以后，张春桥回到后台，但他很快又被人群包围起来，各个组织纷纷要他签字，刻制图章问题，解决经费问题，买摩托车问题，发红袖章问题等等，围得他没法脱身。张春桥又为“造反队员”题了字：

“11月9日上海市工人敢于革命造反北上是革命的行动。”

“上海工人革命总司令部好得很。”

人们把门都堵住了。这时，市委警卫处的警卫员看到会议室有个窗口，赶快搬几张桌子到窗前，扶着张春桥上桌子，从会议室窗口爬了出去，外面有警卫员接应，把他和徐景贤塞进轿车，一口气开回康平路市委。

回到康平路，张春桥径直回了大院里他的家。徐景贤则来到康平路小礼堂汇报，只见市委常委们都分散坐在沙发里，他们已经听取了派往文化广场的办公厅联络员回来的汇报，知道张春桥签字同意“五项要求”了，曹荻秋气鼓鼓的样子，嘴里在不断地埋怨；王少庸猛地吸着烟，瞪着眼睛不做声；杨西光被复旦大学的学生揪斗过了，精神萎靡地蜷缩在沙发里。

公务员老李悄悄问徐景贤：“吃过饭没有？”

徐景贤这才想起还没有吃午饭。老李给他下了一碗卷子面。

张春桥回家后，立即与陈伯达通了电话，汇报了他在上海及在“工总司”的“五项要求”上签字的情况。他说：“工总司五条要求（承认组织合法、承认上京告状是革命行动、告状后果由上海市委负责、

曹荻秋公开检查、对工总司提供各方面条件）我不能不签字，也来不及请示华东局、上海市委和文革小组，不然车就不能通，他们不肯回上海。”

与此同时，“工总司”印发的传单《特级报导》也开始飘落在上海的马路上，可能是因为太急，所以把标题中的“特急”误写成“特级”了。随后，上海的大街小巷马上又贴满浆糊未干的新传单，标题为《张春桥签名同意五项要求》。

当天晚上，中共华东局书记魏文伯和上海市长曹荻秋来到西郊宾馆，找到正在这里养病的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

“出了什么事？”陈丕显问。

曹荻秋从随身的公文包里拿出一张传单来放在桌子上，然后生气地说道：“你看看，这上面都说的些什么，张春桥背着我们市委单方面与‘工总司’谈判，并且签字同意了他们的五点要求，这哪里是来上海解决问题的，这不是有意把我们市委往火坑里推吗？”

陈丕显看后感到不可理解：市委的常委会张春桥是参加了的，对于市委的决定他当时也没有提出不同意见，怎么能这样背着市委去单独同意那五点意见呢？这不是违背了组织原则吗？

魏文伯生气地说：“张春桥算什么，谁给他这么大的权力，谁让他任意在上面签字？”

曹荻秋更加气愤，说：“我就怕他这么阳奉阴违，因此特意让他听了陶铸同志的电话，他的这些做法，不是与陶铸同志的意见背道而驰吗？不是有违中央的指示精神吗？

“这是张春桥闯的祸，将来由张春桥自己来收拾吧！我们上海市委坚决不卖他的账！”曹荻秋怒形于色。

三个老人越说越生气，陈丕显提起电话筒，命令接线员说：“接北京中央文革！”

电话占线，此时陈伯达正和张春桥通话。一分钟后，电话接通了。大抵因为陈伯达的闽南方言一般人听不懂，所以他开会讲话、对外表态或接听电话，经常让王力“做翻译”。这次接通陈伯达的电话后，又是王力的声音先冒了出来。陈丕显生气就跟他讲：“我也是福建人，我听得懂老夫子的电话，用不着你来当翻译。”

听到陈伯达的声音后，陈丕显劈头便问：“张春桥在‘五项要求’上签字，你知道了吗？”

“知道了，知道了。”陈伯达连声回答道。

接着，陈丕显向陈伯达开起了连珠炮：“原先中央说过不承认建立全市性工人群众组织，为什么张春桥擅自承认了？中央文革究竟给了张春桥多大的权力？卧轨拦车，明明是破坏交通，为什么张春桥说这是‘革命行动’？安亭事件的严重后果，明明应当由‘工总司’负责，为什么张春桥反而说由华东局、上海市委负责？魏文伯、曹荻秋都在我这儿，他们都不同意张春桥的意见。今天中午，上海市委书记处还开过会，张春桥也参加的，为什么在会上不说，会后却去与‘工总司’单独谈判？他凭什么敢违背组织决定？”

面对老乡连珠炮般的质问，陈伯达被问得一时语塞，好半天才吱吱呜呜的说：

“要让春桥大胆处理这个问题，要相信张春桥，给他这个权”，“对张春桥，是想让他锻炼锻炼的。事情发生在上海，你们负一点责任吧……”

陈丕显不依不饶：“张春桥作为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有没有权力不同华东局、上海市委商量，背着华东局、上海市委，就同造反派签字？张春桥眼里还有没有国家法令？有没有党中央的指示政策？他是不是可以不顾国家法令、不顾党中央的政策，擅自达成违背法令、违背政策的协议？”“为什么张春桥签字以前，不与华东局、市委商量一下？为什么一切后果要华东局、市委负责？”

陈伯达劝慰陈丕显：“阿丕，我的老乡，不要生那么大的气，好好商量。已经签了字，怎么办呢？我们好好商量下一步怎么办。”接着，他像做大报告似的，从宪法规定工人有结社自由讲起，一直讲到要正确对待群众运动……

陈丕显见话不投机，还没有等陈把话讲完，就重重地把听筒往桌上一甩，一屁股坐倒在沙发上，再也发不出声音了。

曹荻秋说：“我给陶铸同志挂电话！”

陶铸在电话中倒是非常明确地告诉曹荻秋：“张春桥签署‘五项要求’，是错误的！张春桥是一个没有群众运动经验的人！”

陶铸的态度，又给了魏文伯、陈丕显、曹荻秋以鼓舞。

其实，事前张春桥曾给戚本禹打电话征求意见。戚本禹说：

“咱们也没有什么别的武器，不就是一分为二，辩证法么？上海市委支持批《海瑞罢官》，那是正确的，我们不否认它；但是它执行

资反路线，镇压群众，那是错误的，就得检查。”

戚本禹又对张春桥说：“这事你不要去和陈伯达多说，跟他说半天也说不清楚的。你应该直接找江青去说。”

于是张春桥就给江青打了电话,江青在电话里对他说:“只要怎么做有利于工人造反派,有利于他们的成长,你就怎么办,不要有顾虑。”

当天晚上，陈伯达又给张春桥打来电话说，中央文革小组讨论了张春桥的汇报，他和江青都认为张春桥对“工总司”这个组织及对他们的行动做出的判断是完全正确的,张春桥这样做也是正确的。同时，陈伯达表示他原先写的电报“太匆促了”……

在当晚的文革小组会上，江青听了陈伯达转述陈丕显的电话后，十分恼火地说：“没想到陈丕显给伯达同志打电话，态度那么坏，一句一个为什么。”

话分两头，再说 13 日一早，昆山中学“工总司”北上队员发现王洪文跑了，顿时议论纷纷，

“头头不行。我们要求改选头头！”造反队员们吃过早饭后，集中在昆山中学礼堂，发出了强烈的呼声。

于是，改选开始了。

“报成份！报成份！”台下有人喊道。

于是，候选人一个个开始“报成份”。

那个被关了一夜的周宝林，到底是“总部”的人，此时也被人推到台上“报成份”。他只得又一次自报家门；“周宝林，共青团员，复员军人，大学毕业生。”

完全出乎意外，周宝林竟被推选为头头，因为他的成份比别的候选人要好得多，受到多数造反队员的拥戴。

“我还只是一个共青团员，怎么能够领导这支队伍？”周宝林站在台上大声呼吁，“是共产党员的，站出来！”

台下上千人，无人吱声。

“是共产党员的，站出来！”另一个被推选为头头的上钢五厂工人孙玉喜，也大声在台上喊道。孙玉喜也不是中共党员。

“我是共产党员！”一个四十来岁的工人，突然在台下大声答道。

“上来，上来，共产党员快上来！”台上、台下发出一片嚷嚷声。

那个中等身材、壮实的男人，穿着一身蓝色工作服，走上台去。在众目睽睽之下，他不慌不忙。大声地“自报家门”：“我，耿金章，共产党员，上海井冈山造纸厂副工长，复员军人。”

说罢，他又补充了几句：“井冈山造纸厂，也就是原先的中泥造纸厂。我的家庭出身，是贫农。我 5 岁死了爹，8 岁死了娘。我从小给地主家割草、放猪。我 1949 年入党，在部队里当过班长、分队长、副排长……”

在他报完成份之后，全场轰动。像他这样“红透了”的成份，又是苦出身，又是参过军，又是党员，又是副工长，在造反队员中如同凤毛麟角。

“我们选耿金章为头头！”台下有人喊道。

马上响起一片掌声。

就这样，耿金章当场就被选为头头。

耿金章是年 41 岁，贫农出身，曾是国民党军队中的一名士兵。1948 年 9 月的济南战役中，耿金章被俘。因为是苦出身，马上又穿上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装，投入了战斗，成了中国人民解放军 35 军 313 团 4 连战士。因作战勇敢，耿金章被提升为副班长、班长。1949 年，他在镰刀铁锤红旗面前宣誓，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提了干。1957 年 9 月，耿金章复员时，已经是一个副连长了，被分配到上海中泥造纸厂，当一名打浆工。不久，他成为这家工厂的民兵连连长。1964 年 2 月，他被提升为副工长，已经是车间干部了。不过，两年多国民党军队生活，也给他留下烙印：粗鲁，野蛮。1959 年，厂里有人在黑板报上批评耿金章。耿金章发火了，扇了那人一记耳光。1964 年，他与邻居，一位同厂职工发生口角，一气之下，他抡起了板凳……为此，受到了厂里党组织的批评。

“文革”一开始，他写了对厂领导 10 条意见的大字报，贴在厂里的大礼堂。公司党委副书记赶来看了大字报，认为他的大字报是针对厂里党组织的，有“反党”情绪。于是，耿金章成了厂里的造反派。

他没有参加“首都三司驻沪联络站”召开的交流会，只是听到消息才参加文化广场的“工总司”成立大会。

“同志们，我们的总部是一个右倾的总部！”耿金章在一分钟之前，还不过是一名普通队员。此刻，他站在台上，以头头身份，发表“就职演说”，“我认为，回上海去就是右倾！我们要继续北上，到北京去告状。千万不要上上海市委的当——回上海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同志们信任我，选我为头头。我认为，我们现在就应该离开昆山，向

苏州前进！向南京前进！向北京前进！红军不怕远征难！”

顿时，台下响起热烈的欢呼声：“红军不怕远征难！”

造反大旗迎风猎猎。队伍出发了。走在队伍最前面的，是周宝林、耿金章和孙玉喜。

当天下午，就在张春桥在上海文化广场签署“五项要求”的时候，周宝林和耿金章率1000多造反队员已步行抵达苏州。

苏州还没有像上海那样混乱，依然保持着往昔的平静，当1000多上海工人造反队员涌入这座古城，顿时使古城也受到了“文革”浪潮的猛烈冲击。造反队员暂时在几家澡堂歇脚。他们的到来，惊动了苏州市委。苏州市委立即通知苏州铁路中学让出校舍，给上海工人造反队员安营扎寨。

当晚，王洪文接到张春桥打来的电话：“明天去苏州！”

“去苏州？”王洪文一听，有点紧张，他想到昨夜被关在昆山中学的滋味。

“我和你一起去苏州！”听到耳机里传出张春桥的这句话，王洪文才松了一口气。

11月14日上午，上海巨鹿路“炮司”总部，电话铃响了，正在“工总司”“炮司”联合办公室的红鸥拿起电话，只听电话里传来一个慢条斯理的声音：

“我是张春桥，我找‘炮司’的红卫兵。”

“我就是，噢，张春桥同志，您好，您有什么事？说吧。”中学生红鸥回答说。

“能说一说苏州的情况吗？”张春桥用商量的口吻问道。

“刚才接到苏州一个造反队员的电话，名字他没有说，我也没有问他，他说，他们要学习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不到北京不回头，还说为了顺利到达北京，准备成立临时党支部，他们不知道可以不可以成立，所以打电话到总部请示。”红鸥将她了解到的情况告诉张春桥。

“不行，不能成立临时党支部，这是违反组织原则的。”张春桥的声音听上去很焦急。

“还有南京方面——”红鸥还要说下去，被张春桥的插话打断了。

“这样吧，请你们红卫兵到我办公室来，我们好好商量一下怎么办。”张春桥的声音很诚恳。

“行！”红鸥一口答应。她放下电话，立即去找复旦大学“东方红公社”的周谷声，周谷声不在。她又找上海交通大学“反到底兵团”许云飞，许云飞也不在。正好看见复旦学大学“东方红公社”的汪在银刚从外面进来，她不由分说，一把拖住他说：“走，快和我去办一件急事。”

20 分钟后，吉普车将他们俩送到了张春桥的办公室。张春桥一见他们进来，立刻迎上去和他们握手，并问他们的名字。

“我叫红鸥，红颜色的红，海鸥的鸥。他叫汪在银，汪洋大海的汪，现在的在，金银的银，他的名字是四旧。”红鸥抢着回答。

张春桥微微一笑，说：“请坐，红鸥同志，汪在银同志。”

坐下后，汪在银即拿出《毛主席语录》，严肃地说：“请翻到毛主席语录第一页，第一段，念——”

红鸥和张春桥都从口袋里拿出《毛主席语录》，跟着念起来。

汪在银领着读了几段《毛主席语录》后，用湖北口音很重的普通话说："张春桥同志，请你先谈谈你的想法。"

张春桥依然保持和蔼可亲的神态，从奉中央文革之命亲自到上海，一直谈到与"工总司"在文化广场签署了"五项要求"，他说：

"我到上海以后，在同志们的协助下，做了些工作，有一部分工人同志听党中央、毛主席的话回上海了，还有一部分工人同志继续北上，严重干扰了毛主席的战略步骤。我到上海是来解决安亭事件的，现在没有解决好，我饭吃不香，觉睡不好。"

红鸥这才发现，张春桥眼圈发黑，神色疲惫，嘴唇和手指被香烟染得很黄。她同情地说，"张春桥同志，您应该走群众路线，发动大家做。"

"有伟大领袖毛主席支持，有你们红卫兵小将支持，安亭事件一定能解决好，你们说是不是？"张春桥说。

汪在银说："张春桥同志，你要我们做什么，尽管直说，我们保证能做好。"

红鸥几乎是和汪在银一起说的："我们帮您处理安亭事件，让毛主席放心，让党中央放心！"

张春桥接着说："小将同志,我和你们商量一件事，我想请你们到苏州，把北上的造反队员全部劝回上海，然后到南京，把那里北上的造反队员也全部劝回上海。任务很艰巨，你们考虑一下，愿不愿意去？"

“我愿意，你呢？”红鸥大叫起来，她太高兴了。她问汪在银，但不等他回答就又建议说：“我们应该组织一支红卫兵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开到苏州，开到南京，向工人们宣传毛泽东思想，保准能把工人全部劝回上海。”

还没等红鸥说完，汪在银已经站起来，粗声大气地说，“兵贵神速，我们现在就走。我去把他们统统抓回来。谁敢反对毛主席，我们就打倒谁!”

张春桥笑着说：“小将同志，不要急呀，我给你们派两辆吉普车，再给你们开两封介绍信，我在文化广场的讲话录音，你们也带上，你们吃饭问题，住宿问题请当地政府解决，你们看看，还需要什么？”

红鸥想了想说：“留下您的电话号码，我们随时要跟您联系。”

“你们再想想还要什么？我现在就给苏州市委、江苏省委写信，写上红鸥、汪在银两位小将的名字，请苏州市委、江苏省委协助你们，一会你们带上这封介绍信。”张春桥边写信边说。

临别时，张春桥微笑着和“炮司”的两位小将握手道别说：“红鸥呀，这事全权委托给你们红卫兵小将了，我嘛，就不准备去了，在上海还有许多工作要处理。有什么情况打电话给我，我在上海等你们的好消息。”

## 第277回：再汇报，陶铸态度有变化　新问题，陈伯达也在研究

红鸥、汪在银带着张春桥的亲笔信及录音带，回到巨鹿路“炮司”司令部，可是找不到人。“炮司”的人本来就不多，又来自各个院校，都喜欢自说自话，东窜西窜，坚守总部没有几个人。此时总部只有交通大学孙赤峰一个人，到哪儿去凑一支兵强马壮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

孙赤峰二话没说，回交通大学去搬兵，汪在银也赶紧打电话找人，红鸥则站在门口，见来人就拦。

不一会，孙赤峰带了八、九个交大“反到底”的人来了，再加上红鸥和汪在银在“炮司”拢的人，共有十五、六个。两小时后，他们就乘着吉普车直奔苏州。

此时，苏州的“工总司”队员已被苏州市委安置在苏州铁路中学。中午，“炮司”一行人迈着解放军的步伐，排着队，呼着口号走进铁路中学。

许多工人认识红鸥，她往安亭送过面包，并说“陈伯达的电报是大毒草！”当时就受到很多工人的拥护，对她喊：“说得对，小左派！”此时，工人们都涌上来和他们打招呼。红鸥说：

“请大家到教室里坐，我们红卫兵要来宣传毛泽东思想了。”

工人们分坐几个教室，“炮司”红卫兵也分成几个小组，轮流到几个教室进行宣传。

红鸥和汪在银刚走进一个教室，工人们就轰起来，非要拉红鸥唱歌。于是红鸥唱了一段《造反歌》：

忠于毛主席忠于党，刀山火海也敢闯，谁要敢说党不好，马上叫他见阎王。

刚唱完，工人们就鼓起掌来，还叫“再来一个”。红鸥赶紧掏出《毛主席语录》说：“请同志们翻到第一页，第一段。”

他们读了一段又一段，然后红鸥开始讲话：

“工人同志们，造反派战友们，我代表‘上海市炮打司令部联合兵团’向你们表示热烈的祝贺！祝贺你们取得了胜利，张春桥同志同意了‘上海市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的五项革命要求。现在我来读一下……”

这时，汪在银在教室里来回分发《张春桥签名同意五项要求》的传单。

红鸥说：“工人同志们，我们到北京告状是为了争取合法的权利，现在我们的目的达到了，我们下一步的革命行动就是杀回上海，完成毛主席交给我们的任务，把上海的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她讲完后，却没有人鼓掌，更没有人叫好，工人们都沉默不语。

又有几个红卫兵发言劝工人们回上海，张春桥的录音讲话也放过了，工人们依然沉默，不鼓掌，不表态。

汪在银见状上来讲话，他翻开硬纸板讲义夹，念道：

“上海市炮打司令部联合兵团严正声明：

1、自张春桥代表中央文革签名同意五项要求之日起，谁还要继续北上，谁就是反革命！

2、张春桥同志代表中央文革，代表毛主席处理安亭事件，谁还

要继续北上，就是反对毛主席，谁反对毛主席，我们就砸烂谁的狗头！”

红鸥很吃惊，汪在银这份声明，她一点都不晓得。不过“炮司”的人都是自说自话，红鸥也是如此，只要能解决问题就行，她也习惯了。

汪在银的声明念完后，教室里再也不安静了，工人们交头接耳。

耿金章站起来说：“红卫兵小将，刚才你们读的五条，那是张春桥为王洪文他们签的字，不是为我们签的字，我们要张春桥亲自为我们签字，签完字，我们就回上海，大家同意不同意？”

工人们齐声应道：“同意”。

红鸥一听，心想，这还不容易，当即表态说：“好，我去把张春桥叫来，为你们签字。”

于是她和几个红卫兵匆匆赶到苏州市委，要通了上海的电话，告诉张春桥，工人已答应回上海，只是要他到苏州来为他们签字。

张春桥一口答应。

11 月 14 日下午 13 时 30 分，曹荻秋在康平路市委 2 楼会议室主持召开上海市委常委扩大会议，讨论张春桥签字同意“工总司 5 条要求”的问题。毫无疑问，张春桥的做法遭到市委书记处书记、常委们的一致反对。

市委常委扩大会结束后，曹荻秋再次给陶铸打电话，汇报了有关情况。下午 17 时 30 分钟，陶铸回了一封电报，电报中说：

“工厂文化革命的情况，还没有完全掌握，要进一步研究。工人不搞全市性的组织，联络性质的组织可以，但不能建立机关；搞文化

革命不能影响生产。生产时间以外，可以交流经验。春桥已同意，那要做工作，改变性质，要春桥多做那一方面的工作，市委做另一方面的工作。”

曹荻秋立即从电报的字里行间感觉到，陶铸的态度发生了变化……

当天，上海市委根据陶铸的电报批示，给各单位下达了一个口头通知：

“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是他们搞起来的。昨天下午，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张春桥按照结社自由的原则，就同意了。

关于组织问题，中央精神是，工人不建立全市性的造反司令部这一类性质的组织。区以下，在不影响生产、不影响工作的前提下，在业余时间，可以建立交流经验的联络性组织，但不设机构。

已经建立了造反司令部这一类性质的组织，要按照中央这一精神，加以改变。

关于这个问题，中央将有通知下达。

其实，就在张春桥飞往上海的当天，11月11日，陈伯达已经在北京草就了《关于工厂文化大革命的十二条指示（草案）》。正当张春桥在安亭火车站的货场上，冒雨面对2000多名上海工人演讲时，11月12日，陈伯达、姚文元、戚本禹、王力、余秋里、唐平铸、高扬文、刘建勋、谢镗忠、谷牧等人也在北京和“首都职工红色革命造反总联络站”等单位50余名工人代表座谈，讨论工厂文化大革命的问题。

王力开宗明义的说明了这次座谈会的目的：“同志们，今天来开

个座谈会，主要靠你们来谈谈工厂的文化大革命怎么搞，我们是来当小学生的，我们小组人力很少，对工厂的情况了解很少，我们是勤务员，没当好！大家问工厂的文化大革命怎么搞，我们在整个文化大革命中，对工矿企业的工作做得很少。工厂究竟怎样搞法，存在什么问题，过去我们搞得很少，有意见也没有很好研究，今天的会是个开端。大家提些问题，我们带回去。”

北京光华木材厂，机床厂，起重机厂，内燃机厂等代表相继发言。

有人反映：“成立全市工人造反司令部，有人说我们是非法的。”

陈伯达回答：“不要成立什么司令部，成立个什么红卫兵代表大会呀，什么联合会呀！司令部本身就有司令，总指挥……司令部本身就有点衙门性质。红卫兵搞个什么游行，开个什么大会，可以临时选出个总指挥。”

有人说：“市委对工人运动很冷淡，怎么办？”

陈伯达：“那个不对。”

有人提出：“学生到工厂很困难。”

陈伯达：“进去做工人的学生。我是你们的学生，小小的学生，我们是劳动人民的儿子，我们向你们学习。今天的讲话，是和你们商量的。我们要执行毛主席的指示，抓革命促生产，要把生产搞得更好，要超过世界上所有的先进的国家，不许把生产停下来。”

有人问：“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成‘反革命’、‘牛鬼蛇神’，开除的怎么办？”

陈伯达：“开除的，中央有指示，都算无效，过去凡是打成‘反

革命’的一律无效。黑材料一律烧掉。”

有人问：“有的不给，放在档案室里，是否可以砸？”

陈伯达：“不给吗？要革命，要斗争，最好不要砸。中央新的指示即将发下来，希望你们按中央指示办事。”

第二天，11 月 13 日中午，陈伯达把文革小组起草的关于工交系统如何进行“文化大革命”的文稿《关于工厂文化大革命的十二条指示（草案）》给了谷牧，要国务院工交口在一周内提出意见。

此前，周恩来在征得毛泽东同意后，曾找余秋里和谷牧谈话，让余秋里抓紧准备召开全国计划会议，力求把1967年的计划安排得早些、好些；让谷牧组织几个人，研究一下工交系统如何“抓革命、促生产”的问题。谷牧与余秋里是文革开始后，周恩来报请中央出头主抓工交生产的负责人，一人分管10个部。所以陈伯达将《关于工厂文化大革命的十二条指示（草案）》交给了谷牧。

11 月 12 日，北京“二司”总部的人又来到钓鱼台，找中央文革评说 11 月 7 日北航“红旗”、轻工“红鹰”等组织搞“宫廷政变”，在“二司”总部夺权的事。中央文革小组工作人员阎长贵听取了他们的汇报。正好戚本禹开会回来，他也参加了会见。在“二司”夺权的第二天晚上，11 月 8 日，中央领导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北京一、二、三司等红卫兵代表谈“黑材料”事时，江青曾提到让戚本禹过问此事。

戚本禹先听了一下情况，然后问“二司”总部的人：“你们以后准备怎么办？”

“二司”的人回答说：“准备开联席会议。”

戚本禹问："你们能召集起来吗？北航的能来吗？他们要改改吗，行的话就改，不行的话怎么办呢？他们有多少人？几个单位？他们一开始就不同意你们的观点，他们是比较反对工作组的。我特别要质问你们一句，上次开会时，我说过两条路线的斗争问题，有两个司令部，一个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你们还是执迷不悟，我希望你们能站在主席一边，当然不是说你们现在不站在主席这一边。例如谭力夫就是跟主席相对抗的。你们长期以来就是保呀，保呀，保得厉害！你们听得懂吧？你们那时对江青同志很不礼貌，怒气冲冲。我要你们做工作，有人说不干了。我说还是要干下去，通过你们把红卫兵战士带到毛主席一边。不然的话，我为什么要支持你们成立组织？花这么多钱？主要是让你们做工作，把红卫兵战士带到毛主席一边。关于'11.7'事件，事先我一点不知道，是革命行动我都支持。他们对你们的突然袭击，你们自己检查一下，这是矛盾尖锐化的表现。我事先没有支持他们。他们说我叫他们去的，可能认为我会支持他们的行动的。我对第三司令部也是支持的，我对双方都不责备。"

对北航"红旗"在"二司"夺权一事，戚本禹说："现在不是抢东西的问题，而是关系到3万红卫兵何去何从的问题。这次宫廷政变，搞得很周密，我倒很欣赏，如果将来出现修正主义，就这样造反。你们要敢说一句话：'好得很！大方向是对的！但不一定每一件事都对。'

你们说‘我们不彻底，你来！’‘你们北航红旗正确，听你们的！’走到毛主席一边嘛！”

有人提到化工学院建议解散北京的三个司令部。

戚本禹说：“这是革命组织的事，我不想插手。”

他特别表扬了“三司”：“第三司令部办了些好事，第一司令部也办了些好事，第二司令部也不能说一件事也没有做。如果多数人说不要了，你们也解散。如果让北航来领导，我看他们还是较好，坚持正确路线。你们自己处理。”

本来就是被别人用武力赶跑的“二司”总部人员，本想在中央文革这里得到哪怕是少许一些的支持，没想到却遭到了一顿批评，其内心的窝囊及对戚本禹的怨恨可想而知。11 月下旬，原属“二司”的北京矿业学院“首都红卫兵总部”联合十几个院校的多数派，成立“批判戚本禹联络站”，表示要彻底批判戚本禹 11 月 12 日的讲话。其下属“红色游击队”更在市内贴出“我们坚决要求和陈伯达辩论”，“戚本禹 11 月 12 日的讲话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等大标语。

11 月 12 日这天，北京“三司”还在北京工人体育馆组织全国各地进京告状的工人，举行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誓师大会”，武汉“工总”进京告状的工人也参加了大会，而且负责整个会务工作。

会后，武汉“工总”首次打出“毛泽东思想战斗队武汉地区工人总部”的旗帜，步行来到中南海西门，在墙上贴了两张大字报，质问陈伯达有没有说过“大道理服从小道理”？如果有，他们就要求与陈

伯达辩论：到底革命是“大道理”还是生产是“大道理”？他们认为陈伯达把“大”“小”颠倒了，不符合毛泽东思想。为了避免给人以口实，出发前，他们把身上所有的金属制品哪怕是指甲剪刀也都集中交给其他人带回去。他们排队走到中南海西门，派代表与一个警卫的解放军干部交涉，要见陈伯达.其他人都安静地坐在警戒线外。到晚上，北京红卫兵“三司”派来许多人，送来了白菜汤，馒头、窝头还有棉衣，并动员武汉来京的工人先回去，相信中央会解决武汉的问题。武汉“工总”相信首都“三司”，也相信中央已经知道了他们的请求，同意先回去。深夜24时，大客车将他们送回招待所。

11月12日，王力、戚本禹接见10月6日到京的重庆市“中学生红卫兵北上告状团”控告重庆市委强行兼并他们一事。

王力说：“中央文革小组支持一切革命同学的革命行动。戚本禹和我负责把同学们提出的各种情况，各种问题，各种要求向我们小组其他同志汇报，向中央汇报。同学们提出这次北上告状是不是革命行动？我们认为是革命行动！”

众人鼓掌。

王力继续：“同学们还提出，你们在重庆市‘炮轰重庆市委’，有人说是反革命行动。是反革命行动吗？”

众说：“不是！”

王力：“我们也认为不是。”

热烈鼓掌。

王力："从今天会上，我们听到的情况和我们在其它地方听到的一系列情况，从这些情况看来，重庆市委的问题是严重的。这样一些严重问题，需要进一步调查核实，严肃处理。对于重庆市委镇压群众运动，对这样的市委为什么不炮轰呢！应该炮轰！说炮轰重庆市委是反革命行为，是完全错误的，是完全违背《十六条》的。

有同学提出要求改组重庆市委，罢市委书记的官。刚才我和戚本禹同志商量了，我们的意见是暂时不要改组，暂时不要罢官，不知你们同意不同意？为什么呢？要靠你们斗嘛，我看你们斗得还不够，现在就罢官，就改组，那太舒服了，我看这样不好。改组的人对你们支持不支持？这样改组对你们斗争有利没利呀？……不要光靠上边的一个命令，这样不能解决问题。重庆的问题应该靠重庆的群众来解决，我们应该相信自己的力量，相信自己能够解决自己的问题。"

"在重庆有向同学们的家长施加压力的，对支持同学们的家长进行政治迫害，甚至迫使家长和你们脱离关系。重庆市委这样做法是极其错误的。同学们，不要怪你们的家长，造成这样现象的原因是错误路线的影响，斗争的矛头应指向错误路线。对于这些支持革命学生的家长进行迫害，扣工资，也是极不对的，……党中央坚决反对用各种形式挑动群众斗群众，挑动学生斗学生，家长斗学生。"

“在这里我向同学念一篇也是刚发生的事情。陈伯达同志向中央负责同志讲了一些问题，介绍了四川一个例子。陈伯达同志说：我们有少数同志，以功臣自居，解放后长期当官做老爷，养成一种官气。毛主席多年批评的官、暮、骄、娇四气他们都有，可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却不让群众去触动他们。现在介绍个例子向大家读一读。有一位四川南充的学生家长对街道干部说：‘如果这 2000 多学生是搞反革命的，那么地委也有问题。为什么反革命这么多，他们在党的培养教育下这么多年，都成了右派，地委能没有问题吗？’这位普通妇女说的话是何等的正确，何等中肯，何等尖锐。有一位退休的工人说：‘革命的地委还要动员我们去保，又不是国民党的地委，革命的地委还怕群众吗？又不是旧政府。国民党八百万军队都没有保得住。’陈伯达同志说：这位普通工人把问题分析得多么清楚，这位工人同志很会领会毛泽东思想，比我们干部不知高明多少倍。”

“现在斗争形势很好！对拥护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同志，是大好形势，同学们应该利用这个大好形势赶快回到重庆去斗争，好不好？”

众答：“好！”

戚本禹说："王力同志讲的很多了，他的讲话也代表我，我没有多少讲的了。我要说一点，我们支持同学们的造反。你们造得很好，但造得还不够，还要大造反。"

"我们希望你们回去，回到山城去继续斗争。关于重庆市委，不是一个任白戈的问题。"

"在重庆有张大字报，说我到四川以后，看到四川情况，回来要把北京学生全部调到四川去，把四川问题闹翻，把西南局砸烂。有人问我去过四川没有？我不准备在这儿辟谣，因为这样会给革命同学增加困难。我是在《人民日报》社说过，大家可以到四川去看一看。但这张大字报把情况说得严重了一点，我也不准备辟谣，只反映了你们一些同学的幻想，希望上面派人去四川。四川问题还应靠你们自己去解决。你们应该回去，说服动员家长同情支持你们，不要光靠学生孤军作战，应争取支持你们的家长参加斗争，与你们一起造反。……市委可以动员工农斗你们，难道你们不能争取工农一起向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作斗争吗？

有人提问党的领导问题，我们认为党的领导是毛泽东思想的领导，而不是具体的哪个人，哪一个党组织。如果你这个党组织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就体现了党的领导；如果不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而是执行资产阶级的反动路线，就不能体现党的领导。像重庆市委就没

有体现党的领导。你们应该用毛泽东思想去分析，对的要执行，不对的就批判。我们讲话不能代表中央文革小组的意见，有错误你们可以批判。祝你们最后胜利！”

第 278 回：搞活动，隆重纪念孙中山　竟为何？《新北大》校刊被砸

11 月 12 日下午，北京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万人盛大集会，隆重纪念孙中山诞生 100 周年。虽然早在一年前，1965 年 11 月 1 日，中共中央就组建了以国家主席刘少奇为首的“孙中山先生诞辰一百周年纪念筹备委员会”，制订了一系列的隆重纪念活动。可是，经过红卫兵席卷全国的“破四旧”，对孙中山的百年诞辰究竟还要不要纪念？海内外华人都拭目以待。可能是为了纠正红卫兵在“破四旧”期间对孙中山及辛亥革命的一些错误做法和认识，中共中央对这次纪念活动显得尤为重视。还在“十一”国庆前夕，毛泽东就特别强调，一定要在天安门广场中央挂孙中山画像。每年国庆节，孙中山的画像都要挂在天安门广场中央，这本来是历年的惯例，属于例行的事情，无需毛泽东过问的。而这一年，毛泽东特别强调了出来。

1966 年 11 月 11 日，《孙中山选集》、《宋庆龄选集》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广州的孙中山故居纪念馆加建了辅助纪念馆。

11 月 12 日这天下午，北京纪念孙中山诞生 100 周年的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周恩来、宋庆龄、董必武、陶铸、陈伯达、邓小平、刘少奇、朱德、李富春、陈毅、贺龙、谭震林、叶剑英、李雪峰、谢富治、刘宁一、萧华、杨成武、郭沫若、何香凝、杨明轩、程潜、张治中、阿沛·阿旺晋美、周建人、徐冰、高崇民、蔡廷锴、邓子恢、李四光、谢觉哉、沈雁冰、许德珩、李德全、杨秀峰、张鼎丞、邓颖超、廖承志、穆欣、解学恭、许广平、李宗仁、熊克武、邵力子、章

士钊等出席了纪念大会。

纪念大会会场上高悬巨幅标语，上面写着："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纪念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主席台中央悬挂着孙中山的画像。画像两旁插着十面红旗，以及金色字标："1866——1966"。

北京纪念孙中山诞辰 100 周年大会会场

大会开始前，周恩来、宋庆龄、董必武、陶铸、陈毅和何香凝，接见了参加大会的部分外国朋友、港澳人士和华侨代表。参加大会的工人、农民、解放军指战员、红卫兵和机关干部，在会场上高声朗读毛泽东在 1956 年写的《纪念孙中山先生》一文中的一段话："事物总是发展的。1911 年的革命，即辛亥革命，到今年，不过 45 年，中国的面目完全变了。再过 45 年，就是 2001 年，也就是进到二十一世纪的时候，中国的面目更要大变。中国将变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国。中国应当这样。因为中国是一个具有 960 万平方公里土地和六万万人口的国家，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

下午 15 时 30 分，国家副主席董必武宣布纪念大会开始。国歌奏

毕，董必武首先致开幕词。他扼要地介绍了孙中山先生在中国人民反对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斗争中立下的不朽功勋，说："我们永远不会忘记孙中山先生对中国革命事业所做出的伟大贡献。孙中山先生是永远值得我们纪念的。"

周恩来接着在大会上讲话。他在讲话开始时，首先引述了毛泽东在《纪念孙中山先生》一文中对孙中山一生所作的崇高评价，他说："毛主席说：'纪念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

纪念他在中国民主革命准备时期，以鲜明的中国革命民主派立场，同中国改良派作了尖锐的斗争。他在这一场斗争中是中国革命民主派的旗帜。

纪念他在辛亥革命时期，领导人民推翻帝制、建立共和国的丰功伟绩。

纪念他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把旧三民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义的丰功伟绩。

他在政治思想方面留给我们许多有益的东西。

现代中国人，除了一小撮反动分子以外，都是孙先生革命事业的继承者。'

并说：'孙中山先生的一生表明：一个真正的爱国者，一个真正的革命民主派，必须坚决地、毫不妥协地反对帝国主义。'"

他最后说："中国人民在毛主席领导下所进行的伟大斗争，所取得的伟大胜利，都远远超过了孙中山先生的理想。毛泽东主席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

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毛泽东思想是我们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我们今天纪念孙中山先生，就要永远跟着我们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毛主席，永远同革命人民在一起，努力学习新事物，不断改造自己，在社会主义革命的烈火中永远前进！”

国家副主席宋庆龄在大会上发表了题为《孙中山——坚定不移、百折不挠的革命家》的长篇讲话。她的讲话，详尽地介绍了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的生平和革命活动。她说：“孙中山一生致力于推动革命。这一点今天仍然值得我们学习。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人民没有获得解放，我们必须坚持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斗争，坚持为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而进行的革命斗争，使我国在各方面实现现代化，并努力攀登科学高峰。”

宋庆龄最后说：“孙中山在遗嘱中要求所有革命者继续斗争，直到胜利。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实现了这一遗志，并远远超过了它。如果孙中山还健在，他会为中国共产党团结全国人民和全国各民族、领导人民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巨大成就并在当前世界上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真理的坚决立场而感到骄傲。”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何香凝在大会上的讲话。她说：“孙中山先生一生最大的特点是他的不断进步，坚持革命，越到晚年越坚决。孙先生的晚节是万人共仰的。”“尽管我 90 岁了，我仍然有决心在文化大革命中努力跟上时代的要求，在这次大革命中继续保持革命晚节。我号召所有追随过孙中山先生的战友们，不要自馁，不要倚老卖老，不要一屁股坐在老资格的包袱上而寸步不前。我们要决心跟毛

主席跟到底，继续改造自己，继续努力前进。我认为，只有这样，才是我们对孙中山先生和无数革命先烈、革命前辈的最好的纪念。”

日中友好协会理事长宫崎世民应邀在大会上讲话。宫崎世民先生的父亲和伯父是孙中山先生的生前友好，情谊深厚。他说：“伟大的中国人民在毛泽东主席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粉碎了所有封建势力和帝国主义势力的枷锁，解放了自己，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十七年来，中国人民不仅完成了孙文先生未能完成的民主革命，而且正在继续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正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基础上，在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的光辉照耀下，进行着社会主义建设。”他说：“现在中国正在进行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为了进一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并已取得了巨大成就，这将给予世界革命力量以新的信心和鼓舞。”

在北京的许多外国朋友和各国驻中国的使节参加了大会。来北京参加纪念活动的华侨代表和港澳人士利怡怡、陈凌、郑铁如、费彝民、何贤等人和孙中山生前的副官和卫士马坤、马湘，也参加了纪念大会。

13 日、14 日两天，广州、上海、南京和武汉，分别举行 2000 人到 4000 人的集会，纪念孙中山先生诞生 100 周年。一年前计划的纪念孙中山诞辰 100 周年的纪念活动，全都按计划予以实施。尽管活动组织的十分隆重，但这一涛声，毕竟还是淹没在了文化大革命的惊涛骇浪之中。

在参加 11 月 12 日孙中山诞辰 100 周年的纪念大会时，刘少奇和一些朋友交谈中开玩笑地说：“将来我当个孙中山总可以了吧？”有

人把这话报告了毛泽东，毛泽东说：“我们这些人哪个能比上孙中山先生呢？他的功劳要比现在一些共产党人大得多。他是一个千秋永在的伟大人物。有些人呢，连根草都不如。”

11 月，刘少奇曾说：“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我不参加中央对文化大革命的领导了，对文化大革命的事情我决不过问了，怎么还会出现那么多问题呀？”

王光美也说：“毛主席对少奇同志的检查还是很满意的，是经过了主席批准和审查的，少奇一天到晚辛辛苦苦，一心一意地想把工作干好，却犯了错误。毛主席那时经常不管事情，中央的大事都需要少奇来决定。”

王光美还对一些工作人员说：“就算我们过去有错误，现在也轮不到这样来对待我们呀。这样对待我们，还不是新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吗？”

11月15日，以全国劳动模范时传祥为领导人，由北京市工交系统100多个单位的人员组成的“捍卫毛泽东思想红色职工团”宣告成立，号称有30万人，该组织公开表明“反对批判刘少奇”。

也是在张春桥在安亭火车站的货场上，冒雨面对 2000 多名上海工人演讲、陈伯达率一干人员与北京工人座谈工厂文化大革命如何开展的同时，11 月 12 日上午，毛泽东的女儿、穿一身军装的李讷，骑着一辆旧自行车来到北京大学 6 院 2 楼校文革组织组。她是来找聂元梓的，聂元梓不在，到市里去了。屋里只有哲学系的李清昆、孙蓬一、夏剑豸、陈葆华、付治文，还有两个学生。

李讷一进门就和孙蓬一握手，说："孙大炮，怎么听不到你放炮了？"

孙蓬一曾在中央文革小组工作过，所以和李讷很熟。

李讷问了北大运动的情况。孙蓬一作了汇报，说学校很乱。

李讷说："你们不要老是盯住北大，要放眼全国。我们了解，现在上海的造反派正受压，主席想让北大造反派去支援上海的造反派。我这次来就是谈这件事。"

李讷问聂元梓在哪里？大家告诉她去市里了。李讷说："我要等她回来"。

他们就在那里边说边等，一直说到午饭时间，学生从学生食堂打来了米饭和饼，李讷和大家就在组织组的屋里吃了中午饭。

下午，聂元梓回来了。李讷提出要同聂元梓单独谈，她们便进到里间办公室。李讷对聂元梓说：

"主席批评了我。主席问我最近到北大来了没有？我说去了。主席就问我见到聂元梓了没有？我说没有。主席批评我说，你去北大为什么不去看看她呢？所以，今天主席特意让我来看看你，问问你最近在干些什么？想些什么？"

聂元梓请李讷代她向毛主席表示感谢，接着汇报了学校运动的情况，请示应该如何处理当前运动中存在的问题，如：对还在集中管理劳动的校、系一批干部、教员、教授和陆平等人怎么办？

陆平是工作组关起来的，当时是保护性关押，因为有很多学生要批斗他，怕出问题。工作组撤走以后，看管陆平的学生让校文革接收

陆平，聂元梓没有接收，她不知道把陆平接收过来以后怎么处理他？当时工作组关陆平时，她就有不同意见，认为应该把陆平交给群众斗争。现在直接下令把陆平等人放出来，似乎也不合时宜，这时运动搞得轰轰烈烈，人们恨不得越激烈越好，越激烈就越是能表现出投身于文化大革命的积极性主动性，普遍是越来越左，聂元梓不敢顶着大趋势把陆平等人放出来。正好李讷代表毛泽东来了解情况，她就势将这事提了出来，如果毛泽东对这件事有个明确态度，她就有行动的依据了。

还有，对下一步运动应该做些什么？聂元梓也不清楚。她说："我现在是在抓陕西汉中的北大分校建设，别的工作我就不知道该做什么了。"

她还对李讷说，全校学生和有些教员、干部都出去串联了，学校事情不多，她也想去外地看看。李讷说："我回去向主席汇报一下。"

这时，楼下出现吵闹声，有人进来报告说，北大"井冈山"等组织砸抄了刚成立不久的《新北大》校刊，因为上边刊登了聂元梓的一篇纪念"七人大字报"五周月的讲话。李讷和聂元梓一起来到窗前看了情况。李讷很气愤，她对聂元梓说："你太软弱了。这是反革命行动。"

李讷提出要到现场看看，她们来到《新北大》临时编辑部五院，只见 18 号、19 号房间被砸烂，玻璃窗被砸碎，21 号房间电话线被砸断。19 号房间库存的几万份《新北大》第二十期被撕毁，扔得满地

皆是，甚至扔到厕所里去。18 号房间校文革组织组密封的档案柜被砸开，档案被扔在地上。

原来，对 10 月底改组后的《新北大》临时编辑部，“井冈山”、“红联军”等 5 个组织在 11 月 12 日这天发表了《告北大和全国革命同志书——砸烂〈新北大〉临时编辑部》，提出了三大罪状：

1、“完全违背毛泽东思想”，“压制我们革命造反派的意见”，“成了校文革贯彻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御用工具”；

2、二十期刊登聂元梓讲话是经过“精心删改的伪造品”，去掉了聂元梓“挑动群众斗群众”，“把群众打成反革命的恶毒词句”，是聂元梓执行反动路线的“遮羞布”；

3、“坚持种种罪恶行为”，“死不悔改”。

他们印成传单，大量散发。

当天下午 17 时许，“新北大井冈山红卫兵”、“新北大红卫兵革命造反委员会”、“毛泽东主义红卫兵”、“新北大红色造反联军”、“北京大学红卫兵革命造反战斗队”等 5 个单位的约 20 人，闯进五院《新北大》临时编辑部，捣毁了编辑部，抢走文件、校刊编辑部印章、编辑部钥匙……同时贴出《告北大和全国革命同志书——砸烂<新北大>编辑部》的大字报，说：“《新北大》登出的聂元梓纪念‘六一’五周月讲话是‘伪造品’，删掉了聂元梓挑动群众斗群众、把群众打成反革命的言辞，充当了聂元梓执行资反路线（即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下同）的遮羞布。”

他们这次行动，前后只有十多分钟，恰巧让李讷碰上。

晚上，被毁坏的《新北大》临时编辑部现场来了不少本校和外地师生参观，对此，有支持和反对的两种意见。

第二天下午快下班的时候，李讷再次来到北大找聂元梓，对她说："快下班了，我陪你回家去谈谈，也看看你的家。"

"好啊，咱们走。"聂元梓说着，就领着李讷边走边谈，来到北大三公寓聂元梓的家中。

李讷对聂元梓说："你昨天谈学校的情况和问题，我都向主席汇报了。主席说，学校的事情不多，聂元梓想出去走一走，好嘛，可以出去。上海和外地的运动比北京开始得晚，现在一些地方群众运动发动得不够好，领导不够得力。主席同意你去上海串联，还希望你多走几个地方。"

李讷还说："你出去串联不能同一般学生、教员一样，到处跑跑看看，你要宣传主席的思想和路线。你可以带几个人同去"

聂元梓问："主席对学校运动和我请示的那些问题有什么指示？"

李讷说："没有。主席就是说，让你串联去。现在主要是发动群众，全国的运动搞不起来，光你北大搞也不行。"

李讷又说："主席还叫我问问你，关于你和王任重的关系问题，要不要他为你说几句话，保你一下？"

聂元梓说："我同王任重的关系没有什么问题，他对我的指示都是关于北大运动和成立校文革的问题，没有什么错误。谢谢主席！现在不需要主席为我说什么，等将来我若有重大错误的时候，再请主席保我吧。"

当晚，聂元梓将李讷和她谈话的精神告诉了孙蓬一等人。14 日上午，他们又召开了校文革常委会，传达了李讷转告的毛泽东指示精神，讨论怎样执行，谁去上海串联，谁留校主持工作？最后确定，孙蓬一同聂元梓一起去上海，学校的工作由姜同光主持。

## 第279回：汇京城，部队机关闹翻天
## 开大会，陈毅讲路线斗争

自从10月5日中央军委的《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发出之后，全国125所军事院校的学员，加上文工团、体工队等开展文化大革命单位的人员，达数十万之众，乘着大串联之风，如潮水般地涌向社会，涌进了北京城。到11月，全军院校来京串联的学员已逾10万人，驻京各军事院校、机关，甚至部分连队都住满穿着军装、戴领章帽徽的“红卫兵”。他们在北京到处串联，不分日夜地轮番地要求领导接见，要求解答问题。如不接见就静坐、写血书、绝食……有的甚至把装有文件的铁柜抬来，称文件柜里藏有镇压学生的“黑材料”，非要全军文革小组接见不可。

当时，大家都以揪“走资派”为荣，谁揪出的“走资派”越大，谁的功劳也就越大，名声也越大。瞬息间，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领导机关和各军区机关不断被冲击，北京的国防部、总参、总政、总后，还有空军、海军、工程兵、铁道兵、炮兵、装甲兵、通讯兵和北京军区，几乎所有的军事机关都被他们冲遍了。许多领导干部被揪斗，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的领导被军队院校的造反派追的是东躲西藏，海军的苏振华、李作鹏、王宏坤、张秀川，空军的吴法宪、余立金、刘震、成钧，总后的邱会作、李聚奎、饶正锡，二炮的吴克华、李天焕、宋烈，装甲兵的许光达、黄志勇，炮兵的陈仁

麒，铁道兵的崔田民等都首当其冲。一些领导，如装甲兵司令许光达、铁道兵政委崔田民还被揪到景山前街旃坛寺国防部大门前批斗。

还有空军司令吴法宪，《紧急指示》下发后，空军除飞行院校外，数以万计的空军院校学员和空军工厂的群众进京串联，仅进驻空军大院的军队院校学员，就大约有 3000 多人，还有住在空军其它机关的更多学员。

这些“革命小将”进京后，多方查抄“黑材料”，竟弄清了吴法宪批给空军各院校的文件、电报，以及传达的电话记录。于是，猛烈炮轰吴法宪前期派工作组“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错误” 的大火烧到了吴法宪的头上。空军机关的部分干部职工和文工团团员纷纷成立“战斗队”，不少人还在空军司令部机关门前静坐，要求吴法宪出来接见并回答问题。

空军院校和工厂的群众为了揪出吴法宪这个“空军最大的走资派”，在他家门口前面的马路上，写了好几米见方一个字的大标语，“打倒吴法宪！”

除了揪吴法宪以外，空军政委余立金和副司令员成钧等人也同样被揪。闹得最凶的，是西安空军通讯学校、空军技术学院，以及太原空军机务学校的学员，还有空军下属一些工厂的工人。他们和学员们会合在一起，天天要领导接见，要领导交代问题，要领导参加批斗大会。

面对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余立金和空军副司令、七机部部长王秉璋终于病倒住院了，吴法宪还在那里勉强支撑。

而总后勤部从10月9日开始，部长邱会作每天晚上19时左右到次日早晨6时，就一直在二医大“红纵”和总后造反派车轮战式的连续批判之中，主要是批判他“顽固推行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如“对院校搞摸底排队”、“没有将海医研究所的领导关系立即转到二医大，是分裂造反派力量的阴谋”、“要求承认‘红纵’是革命左派”等等。11月5日，二医大“红纵”以总后党委拒绝交出院校文革中的有关材料为由，封闭了总后司令部保密室，并称此“完全是革命的行动”。

在此期间，还发生驻浙江某部的一个连队，竟全副武装，不经请示，胁迫一名部队领导带他们来到南京军区，非要抓走军区的一名科长不可。正在军区值班的南京军区张才千副司令员连夜打电话到林彪住地毛家湾，说有急事要请示林彪和叶群。

林彪和叶群都已经休息。“林办”的值班秘书张云生对张才千说：“首长和主任正在休息。您有什么事，可以对值班秘书说，我作好记录，等首长和主任起床后立即报告。”

“那就等不急了。算了！”张才千极不高兴地放下了电话。

过了几分钟，张副司令又来电话：“张秘书，我把情况对你讲讲，你看不找林副主席能行吗？”

张才千将事情的原委讲了，然后生气地说："我们是部队，这样干怎么行呢？都这样不就乱了吗？你说这事急不急？"

张云生说："确实急。请您先放下电话，稍等一会儿，好吗？"

对方放下电话后，张云生仍然感到左右为难：叫醒林彪和叶群吧，叶群早有规定：他们休息时，除了毛泽东和江青的电话，谁的电话也不接。压到明天再说吧，南京急得火烧眉毛，张副司令正在电话旁等指示……张云生急中生智："找总理！"于是，他马上拿起电话问总机："请你问问总理休息了没有？"

"总理还在工作。"总机告诉张云生。

"那好，请接总理！"张云生兴奋地说。

"我是周恩来，你是哪里？"电话里传来周恩来熟悉而亲切的声音。

"我是林彪同志的秘书张云生。"

"噢，张秘书，有什么事吗？"

张云生把张才千副司令的电话内容重复了一遍，同时也把林彪已经休息的事告诉了周恩来。周恩来理果断地表态："好，这件事由我来处理。"

"谢谢总理！"张云生放下电话，心中悬着的一块石头也落了地。

大约过了 20 多分钟，张云生电话询问南京方面，张才千高兴地说：“总理来过电话，问题已经解决了。谢谢你！”

第二天，张云生把此事的处理经过报告了叶群，叶群说：“你没有叫醒我，这就对了。”

张云生又报告了林彪，林彪笑笑，没有说话。

这段时间，部队各单位求救电函纷至沓来，全军文革组长刘志坚以及全军文革的全体成员，全力以赴忙于处理各种问题，日夜应接不暇，忙得不可开交。

10 月 30 日，总政治部主任肖华给林彪打报告，提出：

一、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军队干部回去后要认真传达、学习这次会议的精神。

二、各大军区机关文化大革命于十一月份展开，到明年春节前后告一段落。

三、军的机关暂按师以下部队的做法，进行正面教育。

四、省军区可以两个月左右的时间进行文化大革命。

五、军队院校正在进行文化大革命运动，必须派得力干部加强领导。

六、军以下部队目前仍然要保持秩序稳定，加强正面教育。

林彪报送毛泽东，毛泽东阅后批示：“同意。退林彪。”

11 月 3 日毛泽东接见红卫兵时，肖华在天安门城楼上见到徐向前元帅，对他说：“最近，我们准备召开一次军队院

校来京学员的大会，请总理、陶铸和几位老帅接见、讲话。”

徐向前说：“你们起个稿子，请叶帅代表军委讲讲就行啦！要强调一下军队担负着战备任务，军队要稳定，不能乱。”

肖华说：“可以，不过还是请老帅们都讲一讲，这样更好些。”

徐向前点点头，表示同意。

没过几天，肖华带着讲话稿来到徐向前家，徐向前看后作了些小修改，增加了战备的内容。

11 月 13 日，经林彪同意，报毛泽东批准，“军队院校革命师生大会”终于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会前，叶剑英给林办打了电话，讲了准备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军队院校的万人大会，师生希望林彪接见，还要求几位老帅讲话。叶剑英对秘书说：

“考虑到林总的健康，我想我们几个出场就够了。请你报告一下林总，看他有什么指示？”

秘书报告了林彪，林彪点头笑了笑说：“我不参加。”

秘书给叶剑英回了电话。叶剑英问：“林总没指示吗？”

“没有。”秘书答。

13 日下午 15 时许，分散居住在北京各地的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海军、空军、炮兵、第二炮兵、装甲兵、工程兵、铁道兵、通信兵、防化学兵等军种、兵种和北京军区的 10 万余人，在细雨如丝中乘车来到体育场内，以

军种、兵种按方块落座，密密麻麻的一片人海。体育场上，铺满了约 30 条大幅标语：

“我们要见毛主席！”

“誓死保卫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谁反对毛主席就打倒谁！”

“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

“凡是镇压学生运动的没有好下场！”

“彻底批判总参文革小组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向总后邱会作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

“向海军党委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

“海军党委心中有鬼！”

“向空军党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

“最强烈抗议工程兵派反动分子当标兵，保卫毛主席！”

“全军红色造反者联合起来，向军内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

……

在会议没有正式开始前，大家捧着《毛主席语录》时而念着，时而唱歌，时而呼口号。

15 时 45 分，周恩来、陶铸、陈毅、贺龙、徐向前、叶剑英、肖华、杨成武、刘志坚及各军种、兵种、各总部的首长和北京军区的负责人进入会场。周恩来、陶铸率先走在前

面，中央军委副主席贺龙元帅、陈毅元帅、徐向前元帅、叶剑英元帅紧随其后，其他军队领导人肖劲光、许光达大将，杨成武、刘志坚、邱会作、李聚奎、苏振华、吴法宪、余立金、黄志勇、陈士榘上将、谭甫仁、吴克华、陈仁麒、李寿轩、崔田民、张乃更、李真少、江文、陈鹤桥、杨勇、廖汉生等人在后面鱼贯而行，绕场一周和大家见面，他们每个人的手里都拿着一本《毛主席语录》，一面走着，一面挥动着手里的《毛主席语录》向与会者致意。顿时，全场爆发出了暴风骤雨般的掌声和口号声，此起彼伏，人们笑着、叫着。

总政治部主任肖华宣布开会后，乐队奏起了《大海航行靠舵手》的乐曲，全场同声高唱。然后，念《毛主席语录》四段：第一页第一段、第三页第三段、第七页第二段，以及毛泽东在中南海外与群众见面时所说的："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周恩来说还要出席一个重要会议，便和陶铸退出会场。主持会议的肖华首先致开幕词："同志们、同学们：首先让我代表军委、总政、代表各总部、各军种、兵种的同志，热烈地欢迎大家，林副主席今天有点感冒，今天让我向大家转达他对你们的问候。"他接着说：

"这次同志们千里迢迢来到北京，受到毛主席的接见，这是同志们最大的幸福，最大的光荣。今天周总理、陶铸同志、陈毅副主席、贺龙副主席、徐向前副主席、叶剑英副主

席、杨成武代总参谋长和各总部、军种、兵种的负责同志来接见同志们，军委的几位副主席还要和大家讲话，这是对同志们莫大的关怀和鼓舞。我们要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坚决执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将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推向新的阶段，掀起新的高潮！现在请陈毅副主席向同志们讲话。”

11 月，北京的天气已经十分寒冷，四位老帅都穿着厚厚的棉衣。陈毅因为已多年不在军队工作，没戴帽徽领章，天太冷，他把棉帽的耳朵都放了下来。

陈毅在会上讲话

陈毅事先并没准备讲话稿，按照历来的习惯，空着手往台前一坐，把话筒朝自己跟前拖了拖，便开了腔：

“亲爱的同志们：

今天，我们军事院校的革命师生在这里集会，周总理和

中央其他领导同志接见你们，借此机会讲几句话，提供军事院校全体同志参考。”

陈毅接着又讲：“我每天接待许多外宾，他们都称赞我们的解放军。解放军是很伟大的，有陆海空几百万，还可以组织起一亿多民兵，还有几千万红卫兵，是解放军的后备队。我强调一下，其它单位可以乱，但是人民解放军不行；其它单位没有秩序没关系，解放军不能乱。我们人民解放军一定要有秩序，一定要有准备，随时准备打仗，一声令下，就上前线！我们要随时准备与美帝国主义实行武斗。……我今天讲的不知对不对，不对，请大家批评。”

“我们完全欢迎你们搞路线斗争，而且十分必要。……毛主席是最会搞路线斗争的，他是我们的先生。林副主席学习毛泽东思想学得最好，他也是最会作路线斗争，也是我们的模范。在文化大革命中，你们要搞路线斗争，要向毛主席，林副主席学习。

亲爱的同志们，我讲这话不是没有意思的，不是空口说白话。我在这中间犯过大错误，栽过大跟斗。我参加过很多支持正确路线的斗争，也参加过支持错误路线的斗争。我讲这话，你们不要说陈老总又在体育场吓唬人，你们青年人天不怕地不怕，还怕我吓唬你们吗？搞路线斗争，可能立大功劳，也可能犯大错误。毛主席搞路线斗争几十年，立下了伟大的功勋。林副主席紧跟毛主席参加路线斗争，做得很正确，

也为我们党立下了伟大的功劳。可是我几十年也跟着毛主席，有时还不错，跟对了，有时就搞错了，损害了党的利益，直至今天思想上还有负担，一讲到这里就十分沉痛。这种心情不是‘后悔’二字所能表达出来的。为什么当年要犯那样的错误呢？为什么会迷失方向，乱斗一气？我今天向亲爱的同学们讲两句心里话，两条路线的斗争，一两句话是讲不清楚的，你们在毛主席和林副主席领导下搞路线斗争，可能做得好，在文化大革命中立下功劳。是不是可以考虑一下，你们百分之九十九是做得对的，但是你们会不会有这么百分之一是搞错了呢？我当年犯错误，就是不懂得“百分之一”的道理，认为做得都对，结果犯了大错误。如果虚心一点，倾听别人的意见，就不会犯大错误了。”

在这之前，1966 年 8 月下旬，北京城里有关陈毅的流言蜚语猛然增多。什么“陈毅历史上一贯反对毛主席”，“陈毅反对文化大革命，死保工作组，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唱对台戏”。8 月 31 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接见红卫兵时，他挽着陈毅的胳膊照了相，然后握着陈毅的手说：“陈老总，我保你！”陈毅给毛泽东敬了军礼，真诚坦荡地说：“请主席放心，我能过关，我是共产党员，我靠我的工作，能取得群众的信任。”

在“十一”后的一次接见红卫兵时，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休息室问起陈毅近况，陈毅回答后乘势说道：“主席，我

还有个想法。”

毛泽东很感兴趣，问：“什么想法？”

“主席，现在年轻娃娃没有参加过路线斗争，也不懂得什么是路线斗争，我想，应该给他们讲讲历史，用我自己的经验教训，教会娃娃们搞路线斗争，你看行不行？”

毛泽东一听要讲这个，当然高兴了，欣然应允道：“好嘛！”

陈毅后面的话证实了这一点。他接着说：“前几天我在天安门上和毛主席谈过这个问题，我不是用毛主席这个大招牌来压你们，我对毛主席说：‘现在搞文化大革命，青年学生搞路线斗争是非常好的事。但是会不会搞还是一个问题，是不是要教他们搞？’……有人说，噢！你陈老总今天在体育场又是泼冷水！泼冷水不好，但是头脑太热了，用冷水毛巾擦一擦也是有好处的。……在青年人面前，我别的没有什么好讲的，但是我犯错误比你们多，这一点我有资格讲话，你们没有犯错误，听听我的话有好处。”

第 280 回：守纪律，叶公痛斥“小老鼠”　外交部，陈毅又作隆隆声

陈毅话锋一转，严厉地说：“有些人把小单位的事情，扩大到比全局还重要，有的学生冲进中南海，把大铁门都冲坏了；有的人冲国防部，我坚决不同意！”

陈毅的话激起会场上的热烈掌声，人群中高呼：“誓死保卫毛主席！”

陈毅接着说：“我不怪年青同志们，怪我们事先没给大家讲清楚，讲了以后，希望再不要发生，要顾大局。你那个小单位的问题再重要，难道能会比中南海更重要吗？能比国防部还更重要吗？既是解放军院校的，还去打解放军，打解放军的干部，这是没有听说过的事。我 1927 年当解放军，至今差不多 39 年，还没见过解放军打解放军！”

陈毅的话再次被掌声淹没。

陈毅最后说：“搞斗争，我不赞成‘逐步升级’的做法。什么搞一般校长、党委不过瘾，搞处长不过瘾，对搞部长还不过瘾，意思是还要搞我们这些？搞总理吗？不是不可以搞，我是欢迎大家给我提意见的，搞路线斗争要实事求是。我过去搞过过火斗争，就犯了简单化、扩大化的错误。我们不能用工作组的办法来对付工作组，要帮助工作组改正错误，要用毛泽东思想的斗争方法去帮助工作组改正错误。用错误的办法去纠正错误，就必然适得其反，错上加错，这是关键。今天我没有资格

批评任何同志，但是我有 40 多年犯过错误的资格来讲话……”

陈毅是演讲高手。无论是在战争年代还是在外交部时期，每遇他讲话，下面的干部总是聚精会神，鸦雀无声，随着他讲话的手势，或大笑或惊愕，一坐四、五个小时无人退场。今天因为还有别的元帅要发言，陈毅只好在讲到兴头时收住了话题，在掌声中走下讲台。那些坐在主席台上的解放军各总部、军兵种的干部都觉得，陈毅元帅说出了他们的心里话，讲得太好了！但也有少数学员在陈毅讲话后当场表示反对，由于大多数人不支持，这才把他们压了下去。

第二个讲话的是贺龙。他只是照稿子念。这不是贺龙的一贯作风。贺龙虽说读书不多，但从农民成长为元帅，除了才智非同一般，口才也是相当出众，可以说是滔滔不绝，风趣幽默，引人入胜。但是这次，他没有多讲。除了表示拥护“文化大革命”以外，就是讲大串联的具体问题，他说：“我想讲一讲在革命大串联中，军队院校学生要做好样子的问题。毛主席是提倡革命大串联的，在革命串联中，可以更深刻地了解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向工农学习，向首都院校学习，使自己得到锻炼提高，以搞好本单位的斗批改，这是一种更大更好的政治野营，是一种很好的自我教育方法。……为了搞好革命串联，我向大家推荐空军第十七航校关于革命大串联的‘十点倡议’。”他念完“十点倡议”后，高呼

了几句当时人人都呼的革命口号后，就离开了讲台。

贺龙是 4 位元帅中讲得最短的一位。他讲完后，肖华请徐向前讲话。

徐向前说："我们领导机关，各军种、兵种对祖国安全，对文化大革命负有重大的责任，一方面，他们要敢字当头放手发动群众，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好；一方面还要保持警惕，保证战斗指挥，一刻不断，如果敌人突然袭击那是不得了的。……

同学们，你们向很多干部提意见，向领导机关反映情况，要他们解决问题，这一切革命行动，我们是完全支持的。同时，我们也希望同学们从全国最高利益出发，考虑到他们有重要任务，谅解他们，能使他们有从事指挥部队及日常工作时间和精力，不要从白天搞到黑夜，又从黑夜搞到白天，缠住他们，这怎么得了！你们人多，他们人少，这批完了，又来一批，要注意这样做是对领导干部有害的，对国家是不利的。他们又都是五、六十岁的人，有的还有病。我这样说不是妨碍你们的革命行动，能照顾一下，就照顾一下。"

"我们希望同志们不要做有损于解放军荣誉的行为，我们没有很好引导，我们没有做好工作，应该向你们检查，我们的正确意见，希望你们考虑！"

在掌声中，徐向前向全场行了个军礼，他因为患偏头痛，提前离席

了。

最后，叶剑英讲话，他说："刚才陈毅副主席，贺龙副主席，徐向前副主席给你们讲了话，这些话都是很对的，对运动，对我们每个人都是有教益的，因此我完全拥护上面的讲话。"

"我们一定要把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在运动初期的少数派，做了最坚决的反抗，我们支持你们这种革命精神，我们完全赞扬你们的硬骨头精神。你们顶得住冲击。但是要注意，任何真理是有限度的，跨过了一步就是谬论。同志们的反抗精神，不达到目的决不罢休的革命硬骨头精神，我们不但同情，而且支持。在《紧急指示》发出以后，有些领导人已经承认错误，甚至挨打挨斗。……应指出，二医大的那些同志就做得过分了，搞过了头就错了。"

"我们是闭一个眼睛，睁一个眼睛的。闭一个眼睛，尽量地放；但我们还是睁着一个眼睛，这只眼睛是雪亮的，我们看到运动的大方向，知道运动是向什么方向发展的，你们点名是不应该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只是一小撮，只占百分之一，二，三，以前有的人镇压学生运动是不对的，挑动群众斗群众是错误的。但是现在转过来不允许人家改正错误也是不对的。毛主席说：要允许人家犯错误，也要允许人家改正错误，允许人家革命。《阿Q正传》里有一个人就是只许自己革命，不

许别人革命，哪有不准人家革命的呢？”

“现在，各军区的负责同志都到北京来开会。在师以下的单位要狠抓主席思想教育，团，营，连，排要很抓社会主义教育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正面教育，也要很抓战备。”

“你们出来是学习革命的，不是玩的，有少数人出来就不大听话了，有的人到上海住高级旅馆，有的住资本家家里。有我们解放军坐火车，位子没满就关门，红卫兵叫开门，他们也不开，结果红卫兵打碎窗子混进来。红卫兵说：‘这种解放军，我们不能学。’不如红卫兵，连中学生都不如。希望这些同志自己批评自己，改正过来，真正成为红卫兵的榜样。

有个别的人没有阶级感情，我对这件事很愤慨。毛主席说‘通过批评达到团结’，‘要允许人家犯错误，也允许人家改正错误，允许人家革命。’有的首长有病，人家都犯了心脏病，还是硬拉着走。这种人没有阶级感情，这是对待敌人的态度，我希望同志们不要被敌人利用。

还有一个问题，有些人要求到总部看大字报。我们几个商量了一下，认为这些大字报涉及到国家的机密，你们要有意见，可以送大字报，但不要干涉机关文化大革命，要相信他们那儿有他们的领导，他们那儿有群众，他们能把自己的运动搞好。

运动是有方向的，不是乱斗的。最近有人围攻《解放军报》社，要砸《解放军报》。《解放军报》是军委，总政的机关报，是代表军队说话的，是林副主席亲自抓的，是毛主席肯定了的，受到毛主席赞扬的。去年毛主席说：《解放军报》比《人民日报》办得好。《解放军报>》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是起了作用的。有意见可以提。你们要关心它，拥护它，支持它，换句话说，就是不要捣毁它。报社是机密机关，是保护单位之一，是要保卫的。林副主席说，要把《解放军报》办得好上加好。”

“今天我提到只是个别人，我这里有他的名字，就不在这里点他的名了。他们听了我的话，可能是要反感的，甚至是要报复的。但我相信，在这儿的几万师生是可以理解的。

同志们，请大家静一下，我要宣布一个重要消息：”

这时，全场鸦雀无声，大家都竖起了耳朵等待着，而叶剑英更是激动万分，他努力在抑制住自己的情绪，这种沉默、挣扎和自制大约持续了几秒钟，他又抬起脸环视了全场一眼，高声说，“兽医大学，这个学校是医马的，不是治人的，兽医大学红色造反团战士李基才，递了一个条子给肖华主任，问我们：‘第一，今天这个大会经过林副主席批准了没有？’他怀疑这个大会是我们偷偷开的，同志们相信不相信？”

场上的大多数人不约而同地喊道："不信！"

叶剑英激动异常地说道："李基才同志，你听到了没有？让我代表军委及总政全体同志向除去李基才以外的全体同志感谢同学们信任我们！今天周总理和陶铸同志都来了嘛！他们都是常委吧！本来林副主席也要来，有点感冒，没让他来。有人怀疑这个会不是林副主席批准的，可以允许有人怀疑。李基才他是红色造反团的一个战士，写了两条质问，还要求广播。他的第二条是：'第二，四位副主席的讲话是否经林副主席看过了？'林副主席不但知道，而且看过，并且我们还集体讨论过。"

场内高呼："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党中央！"

叶剑英接着说："让我代表军委及总部的全体同志再次感谢同志们的信任。李基才要求大会广播他的条子，尊重他的'命令'。他想在这里得到大家的同情，但是没有达到目的。他说他是兽医红色造反团的战士，他不是战士！"

许多人喊到："把他揪出来！"

叶剑英继续说："我是按照他的'命令'办了，按照他的意志办了，从口号，掌声来看，同情他的很少。李基才，你听到了吗？

毛主席说，这次文化大革命是'子教三娘'，学生教老师，儿子教老子，教爷爷，青年教老年，这是对的。但还有一条呢！是青年教育青

年，多数教育少数。希望大家都来帮助李基才同志，要允许人家犯错误，允许人家大胆怀疑，允许人家改正错误，允许人家革命。

同志们，我向你们学习，共同学习两段语录，呼几个口号，作为我们大会的结束。”接着，大家跟着叶剑英读《毛主席语录》，第十六页第一段、第十七页第一段、第二段，在念到“这种批判应当是充分说理的，有分析的，有说服力的”时，叶剑英说：

“要找出问题的原因，应摆出事实来”，当念到“而不应是粗暴的，官僚主义的或形而上学的”时，叶剑英又作解释说：

“不是武斗，解放军打解放军从来没有，红卫兵要笑我们，我们现在很严肃地指出这一点。同志们，自己打自己帮助了谁？”

场上的人齐答：“敌人！”

“对！帮助了敌人！”叶帅慷慨激昂地道，“这条语录大家拥护不拥护？”

“拥护！”全场的人齐声回答。

“对！我们坚决拥护！”

“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万岁！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中国共产党万岁！

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此时会场群情激动，全场高呼：

“要走出去！”

“要起模范作用！”

“要做好样子！”

绝大多数与会者都对叶剑英的讲话报以热烈掌声，但也有约一、两千人，不满几位老帅的讲话，在会场上闹起来了，肖华和刘志坚看到这种情况，等叶剑英的讲话一结束，立即宣布散会。随即，护送老帅们离开了会场。

这次大会在全国范围内，尤其在北京引起巨大反响，有赞同的，也有反对的。有人认为陈毅、叶剑英的讲话违背了“《十六条》和《紧急指示》”，是“镇压群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猖狂反攻”。有几个院校成立“批资筹备处”，准备批斗几个元帅。“陈毅、叶剑英讲话必须批判”的大标语出现在街头。

当秘书将四位元帅的讲话要点讲给林彪听时，林彪问：“都是照稿子讲的吗？”

“除了贺老总是念稿子外，其余几位老帅都是即席讲话。”

“他们讲的内容有什么特点？”林彪问。

“共同点是歌颂毛主席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都强调院校的学生要听毛主席的话，掌握斗争大方向，团结大多数，要遵守纪律。”

“不同点呢？”林彪又问。

“讲话的风格不一样。贺龙、徐向前讲话比较平稳。特别是贺龙的讲话，是照稿子念的，显得很慎重。”

林彪哼了一声说：“他已经谨慎了。”

“陈毅和叶剑英讲话很活泼，也很直率。叶帅讲话时，有人递条子，问他们开这个会林副主席知道吗？叶帅让那个人站出来，说可以和他辩论。大家都笑了，没有人站出来。叶帅说，他不敢站出来，怕阳光，只是个小老鼠。”

林彪听到这里，哈哈笑了，还重复了一句：“小老鼠！”

第二天，11 月 14 日，外交部红卫兵大会在外交部小礼堂召开，陈毅又作隆隆声：“自 5 月 25 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以来，我讲了很多话，现在我还要坚持讲下去。我已经作好准备，落个被罢官、撤职、坐班房，这都不要紧哟。但是我不愿做和事老，不表态，躲在角落里。我要发挥共产党员的作用，可能是好的作用，也可能是坏的作用，但是我还是要

讲，而且讲就必长，一讲起来就有批评。讲话以后总有很多大字报，有同意的，有不同意的。有时你还没有讲完，大字报就已送上来了。有人劝我陈老总少讲一点话，他们都是好心哟。我压了又压，可还是压不住，有啥子办法？文化大革命以来，我一张大字报也没写，是个落后分子，你们写了几百张，是‘先进分子’哟！现在外交部里大字报的名堂可多哟，什么‘罪魁祸首’呀，什么‘刽子手’呀，什么‘滔天罪行’，……哈哈，就由你一张大字报定了吗？这不是解决问题，是纸老虎，是在追求惊心动魄！”

陈毅嬉笑怒骂，台下有人报以阵阵笑声和掌声，有人匆忙记录要作“罪证”材料。陈毅全然不顾，继续加大“火力”：“有人在大字报中说我陈老总的讲话不符合《人民日报》社论，他说他的，但我不改变我的看法。我这个当外交部长的经常在估计形势，我是靠这个吃饭的，但这场文化大革命，我是完全没有估计到，是很不自觉、很不理解的。”

他还说：“现在还揪住工作组不放，揪住哪一个领导人说错一句话不放，这对文化大革命很不利。”

第 281 回：先实践，主席支持张春桥　有危险，安排聂元梓避难

11 月 14 日上午，周恩来召开工交系统各口碰头会，谷牧就陈伯达起草的《关于工厂文化大革命的十二条指示》一事向周恩来汇报，并说，“原来就想把上海、天津、北京、沈阳、武汉、广州的同志和各大区管工业的同志找来，商量一下工交系统的文革问题，现在陈伯达他们既已搞出了一个文件，能否开一个工交座谈会商量一下。”周恩来表示同意，会期定在 16 日到 20 日。11 月 15 日，余秋里正式写了一个报告给分管计划工作的李富春副总理，要求在全国计划会议开始时，“先用 5 天时间座谈工交企业文化大革命运动和当前生产中迫切要求解决的问题”。当天，李富春指示：“拟予同意。送主席、林总、总理、陶铸、任重同志。”李富春还指示：“文化大革命和生产分别座谈，由谷牧、秋里分别负责。”

就在上海市委 11 月 14 日下午召开常委扩大会讨论张春桥签字同意“工总司 5 条要求”的时候，北京，14 日下午 15 时左右，毛泽东也在游泳池召开中国共产党政治局常委扩大议会。除刘少奇、邓小平、朱德、陈云外，其他政治局常委和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的人员都参加了扩大会。毛泽东在听取了相关汇报后说：“宪法允许公民有结社的自由吗。我认为，上海问题上，张春桥是对的，可以先斩后奏，总是先有事实，后有

概念。先有工人组织这个事实，再有工人组织这个概念。”他拿出宪法念了一段关于公民权利、集会结社自由的条文……接着讲了认识论：

“先有事实，然后有概念。没有事实，怎么能形成概念？没有实际，哪能有理论？有时理论与实际是并行的。有时理论先行，但是实际总归是第一位的。工人不先把革命闹起来，哪儿来的几条规定？总是先有事实后有政策的，张春桥是对的，根据事实改变了过去的政策。过去的政策脱离了群众。”

毛泽东坚决支持了张春桥，没有人提出不同意见，都是检讨，陶铸也作了检讨。政治局常委会同意了陈伯达和中央文革小组对“安亭事件”的处理意见，同时也为“安亭事件”最终画上了句号。

会后，王力给张春桥打电话，告诉他会议的结果。

而这次会议应该就是当天下午 17 时 30 分钟，陶铸给上海市委回复的电报让曹荻秋感觉变化的原因。

这天，毛泽东收到唐平铸的信，反映陶铸同意新华社报道将陈毅的头像换成邓小平的头像一事：国庆节时，新华社要发一组国庆检阅的新闻照片。按规定照例要有一张毛泽东和刘少奇两位主席在一起的一张，新华社依然循章办事。审稿时，陶铸发现没有邓小平的镜头，当即指示一定要有邓小平的照片，并询问新华社负责人熊复有什么办法可以补

救？熊复说可以做技术性处理。后来他们将一帧照片上的陈毅的头像隐去，换成了邓小平。这就是后来说的“换头术”。

由于天气越来越冷，而涌入北京等待毛泽东接见的各地红卫兵却越来越多，北京的接待压力不堪重负。11 月 14 日晚，周恩来紧急召集北京大专院校 60 个单位负责人开会，就外地来京串联的学生接待问题与他们商议：

“今天晚上开个紧急的会，邀请各校革委会和三个司令部的负责人来开个紧急的会……请了大专院校60个单位，……

天气一天一天冷了，外地同学一天来了好多，我们怎么能使他们串联好，学习好，生活好，怎么使大家有组织的看到毛主席，接见后顺利离开北京。主席接见采取了好多方式，各种方式都实验了，共接见了八次，有七次都没有很好地完成。到后来都没有人很好地领导组织队伍了。由于各单位带队人数不多，到天安门就无法带动了。11月3日上午10点到下午6点接见不到100万人，未见到毛主席的还有130万人， 11至13日3天，外地又到了60万，平均每天20万，到20号共7天，如果主席不接见，可达140万，怎么组织接见，是个大难题。外地师生到北京串联，主要是见毛主席，另外还要看大字报，参观学习，如果不帮助他们组织的话，那么他们的时间就浪费了。

现在你们高校的接待任务也很重，达20万人，但整个比，还很小，只占百分之二十，其它单位、机关、各区居民、中小学负担也很重，看来你们的负担还得增加。

有个设想先透露给你们，大中学校闹革命，搞串联，这个假得延长到明年暑假以后，这里还有10个多月的时间。我们的想法：冬天到来了，严冬季节坐火车、轮船、汽车串联停止一个时候，停止一个时候到北京串联，到外地串联。这样有好处，集中力量可以搞学校斗、批、改。也可以搞社会的斗、批、改，这样可以提到日程上去解决。到不到工厂去串联，中央正在研究，这不属今天讲的。严冬停一时期免费串联，这样便于在冬季增加一个运输计划。为第三个五年计划增加生产做些物质准备，便于物资运输，特别是煤、原油、还有日用生活品，明年春天，更加加大运量，同时冬季铁路也可以进行维修。

如果截止到20号为止，到北京进行串联的人次已达到900万人次，全国大中学校，包括农业中学、半工半读的，共有学生总数1400多万，这900人次除了重复来京的以外，再打个折扣，还超过了半数。自八一八到现在才3个月，已达到900万人次，还有500万人次。过严冬，明年还有5个月串联时间，同样可以在以后更有组织地、有计划地进行。”

周恩来介绍了整个北京接待任务的形势后，说出了召集这次会议的

目的："我们希望大专院校居住增加一倍，从20万增加到40万，清华最高数目达二万七，拿别的学校一比，还可以增加。……我希望在北京的同学不要外出串联了，出去了还得回来，你们留在学校要多多帮忙，与解放军搞好协作，哪个学校缺炊事员的可以从军队和地方调，有的学校把炊事员都带出去串联了，做饭有困难，要马上解决。"

周恩来说："我向你们呼吁：不管你们是哪一派，左、中、右、保守的也好。在接待任务这一点上都要一致嘛！希望你们采取统一的行动，贯彻最高指示，听毛主席的话。

11日下午主席接见后，有200万人现在要离开北京，火车很挤，管它挤不挤，挤得上就走，最高纪录一天走18万人。"

"一司"有人提出："要求北京市内要进行徒步串联，外地的可以徒步回去。"

周恩来说："这种精神是好的，我们也设想，北京市郊的学生，外县的动员他们徒步回去，河北省各区让他们有相当大的数目坐汽车回去，也可以徒步嘛！"

有人问："现在北京的还要徒步怎么办？"

周恩来："我们正在商量办法，当然小股的几个人先尝试一下，我们也不要阻止他们徒步，人多的，目的地远的，要有组织和充分的准备，

我个人的经验还是先试验一下，不然半途而废不好，你们到井冈山去，这个地方很好，是革命的圣地，但都去也成问题，在那里要办个很大的粮店，一下子去几十万人，接待有困难，我不同意都往一方去，有人要走长征的路，这个路有的还不通，也没有公路，还要过草地，上雪山，得有相当的计划和准备。”

有人提到了工厂文革的问题：“目前有些工厂压制很厉害，派别斗争很激烈，学生能不能到工厂去？”

周恩来说：“这个问题正在研究，中央文革准备召集那些被压制的以及来告状的工人开个座谈会，分批和他们解决，澄清各种问题，具体的情况不一样，叫我一人也不好解答。”

最后大家又提到关于接待卫生，粮食节约等许多问题，周恩来一一做了解答。

11 月 14 日，北京大学支持聂元梓校文革的“东风兵团”成立。

这天上午，王力、关锋找聂元梓、孙蓬一、李清昆到全国政协礼堂谈话，要把张恩慈从中央文革办事组清除出去，让聂元梓他们出面揭发张恩慈，具体的揭发材料则由王力他们提供。聂元梓说:“毛主席要我到上海去串联，我们马上就要出发，揭发张恩慈的这个材料我写不了了。”

晚饭后，王力把中央文革小组办公室工作人员王广宇叫到钓鱼台十六楼他的办公室，关锋也在。王力对王广宇说："交给你一个重要任务，马上去办。据我们掌握的可靠情报，聂元梓目前处境很危险，有人要暗害她，为了保护左派力量，也是为了聂元梓的人身安全，中央文革小组决定对聂元梓采取保护措施，让她离开北大，暂时到中央文革躲一段时间。花园村一号不是筹办得差不多了吗？让她暂时住在那里。"

王力又说："你去找聂元梓单独谈，这是中央文革小组对她人身安全的关心，今天晚上就接来，如果她有什么重要文件和材料怕丢失的，也可以随身带来。北大校文革的工作，需要交代的以后再说，先离开北大，到了花园村后再给校文革的同志打个电话，就说出几天差就行了。"

王力特别叮嘱王广宇："这件事要绝对保密，不能走漏风声，对谁都不能说。"

王广宇即刻打电话到北京大学找聂元梓，但是没有找到。事情紧急，王力叫他马上去北大找。王广宇随即要了辆车直奔北大，经过一番周折，最后总算在北大校文革的帮助下，找到了聂元梓。在校文革的一间办公室，王广宇单独向聂元梓传达了中央文革小组的决定和王力的谈话内容。聂元梓听后感到很突然，但并不惊慌，她感谢中央文革小组对她的关心和爱护，表示接受中央文革的安排，但提出要先回她在北大的家里取些

日用生活品和文件材料。王广宇和她一同乘车来到聂元梓的家。聂元梓让王广宇在外间小客厅兼饭厅等她，她去里间收拾东西。

王广宇在外间等了约半个小时，这时，从外边进来一个十三、四岁的男孩，聂元梓出来告诉他，这是她的孩子，然后对王广宇说："我今天晚上不走了，一是要找的材料，一时还找不到；二是要把孩子安顿一下。"

按照王力的要求，聂元梓当晚必须离开家。王广宇表示对她晚上住在家里的安全担心，万一出了事，他无法交代。

聂元梓说，她晚上不住在家里，一会儿就和孩子一起去她姐姐家。

无奈，王广宇只好和她商量明天早上 8 点，去聂元梓的姐姐家接她。聂元梓不同意。最后商定，还是到聂元梓北大的家里接她。

王广宇回钓鱼台复命。王力知道没把聂元梓接来，也无可奈何。

第二天早上 7 时，王广宇接到聂元梓打来的电话，告诉他不要去她家了。聂元梓已进城，在中宣部图书馆楼前等王广宇。

当王广宇到了中宣部图书馆楼前，看见聂元梓正和阮铭说话。阮铭是中宣部调查研究室主任，当时已是中宣部最早造反的造反派头头了。

原来，这天聂元梓先到了阮铭家，对阮铭讲了毛泽东让她去上海串联的指示，动员阮铭和她一起到上海去。阮铭说他马上去不了，随后再

去上海吧。

王广宇将聂元梓直接送到花园村一号中央文革记者站，请记者站管理员把她安排在一栋复式小楼住下，并向聂元梓解释，因为记者站刚刚建立，调来的人还没到齐，食堂也刚刚开伙，生活设施，吃住条件都不太方便，只好请她委屈一下。他还嘱咐管理员对聂元梓的生活加以关照。这一层楼空空荡荡。楼上，每一个房间都摆着几张床铺，还没有人住。

按中央文革小组的要求，王广宇再次嘱咐聂元梓："暂时不要和外界联系，不要往外打电话，千万不要让外人知道你住在这里，有什么问题找我联系。"

聂元梓提出，她随身带来一个小布包，里边有重要东西，放在身边不放心，她问王广宇能不能暂时存在中央文革办公室。王广宇问她里边有什么东西？她说有陆平、常溪萍和王任重的材料和几个笔记本。王广宇表示可以暂存在中央文革办公室。于是，王广宇把聂元梓带到钓鱼台，向管机要文件和中央文革印章的矫玉山说明情况。当着矫玉山的面，他让聂元梓把小布包捆好，矫玉山把盖有中央文革办公室印章的封条，贴在小布包上，由矫玉山负责存放在办公室专用的保险柜里。王广宇告诉聂元梓，小布包只能由她亲自启封，需要时由她自己来取。办好存放小布包的事后，司机将聂元梓送回了花园村。

聂元梓住到花园村的第二天，“文革记者站”负责人徐学增给王广宇打来电话说：“聂元梓到食堂去吃饭，被许多记者认出来了，他们都问是怎么回事？”

王广宇告诉徐学增：“马上给家里的记者打招呼，聂元梓住在这里是保密的，千万不要传出去。聂元梓如果觉得去食堂吃饭不方便，可以让管理员派炊事员把饭菜送到她宿舍吃。”

如此，王广宇还是有点不放心，又去花园村探望聂元梓，了解她住在这里在生活上有什么不便？

聂元梓对生活方面倒没提什么要求，只是流露出她一个人住在一栋小楼里感到冷冷清清的，问这样的情况还要持续多长时间？

对她的疑虑，王广宇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只好安慰她安心休息几天，并答应向上级反映她的心情。

王广宇回到钓鱼台，把聂元梓住花园村感到寂寞、焦急的心情向王力作了汇报。王力没有正面回答，只是说：“聂元梓不是说她掌握王任重的材料吗？叫她利用这个时间写揭发王任重的材料，不是就有事干了吗？”

王广宇把王力让聂元梓写揭发王任重的材料转告给聂元梓。

这时，北京大学“新北大红色造反联军”，即“红联军”于 11 月 15 日贴出大字报：《我们为什么要砸烂〈新北大〉临时编辑部》，说明他们砸《新北大》临时编辑部的原因：“在 10 月中旬，《新北大》临时编辑部这个‘鬼胎’突然降生了。这是怎么一回事呢？原《新北大》编辑部，曾经刊登过与校文革观点不同的红卫兵的声明，发表过支持和鼓励革命师生对校文革执行什么路线进行大辩论的社论，刊登过几篇认为校文革是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大字报，还登载过不允许突出某个人而只能突出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的评论……。所有这一切，惹恼了以聂元梓为首的校文革，大骂原《新北大》编辑部走的是‘资产阶级的办报方向’，并扬言，把原校刊主编‘揪出来’。鉴于这种情况，原校刊主编一气之下，外出串联去了，剩下的编辑人员继续办报。但校文革常委借口大部分同学外出串联，编辑人员少、主编又不在，下令停刊，于是剩下的编辑人员基本上也走光了，这时校文革常委见时机已到，又佯称‘校刊是毛主席题的字’，不能停刊。于是他们灵机一动，任命校文革常委刘国政为主编，主编确定之后，又经过校文革的招兵买马和精心策划，炮制出的‘临时编辑部’便粉墨登场了。”

这天，北大支持聂元梓的“红旗兵团”也贴出大字报《井冈山、红联军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中干了些什么？》指责“井冈山”和“红

联军”不批判李雪峰为代表的反动路线，而千方百计想把聂元梓为首的校文革打成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行为。

## 第 282 回：赴苏州，张、曹、韩再签“五条”
## 推心腹，春桥谈思想转变

11 月 14 日夜，苏州市委忽然派人到铁路中学给正在这里的上海“工总司”传话：“请派一名党员负责人到苏州市委招待所，春桥同志接见！”

虽说周宝林是“第一把手”，因为不是党员，不能去。全权代表自然是“第二把手”耿金章。

头头们经过紧急磋商，由周宝林执笔，依据“工总司”在上海已由张春桥签订的“五项要求”作了一点修改，写在印着“苏州铁中”字样的绿色横格纸上，交给耿金章带去。

耿金章坐上苏州市委派来的轿车，直奔苏州市委招待所。

小会议室，张春桥一身戎装，已经和王洪文、红鸥、汪在银一起坐在那里，等候耿金章的到来。

眼下，耿金章已把自己手下的 1000 多造反队员，称为“工总司苏州大队”。张春桥与这位陌生的新首领握了握手。然后，很随便的询问了耿金章的个人情况后说：“你们要听毛主席的话，就地闹革命——回上海去。你是党员，要起带头作用。……”

耿金章掏出了周宝林写好的“五项要求”递给张春桥。

张春桥一看，那“五项要求”已经签过，如今不过重签一下罢了。他飞快地拿出钢笔，签下了“张春桥，1966．11．14．于苏州”。

耿金章收好了那张纸头，又说：“春桥同志，光是你签字还不行，还要请魏文伯和曹荻秋签字！”

张春桥感到意外，问道：“为什么？”

“因为其中有一条，‘这次所造成的后果全部由华东局、上海市委负完全责任’，必须有华东局和上海市委领导签字才有效。还有‘曹荻秋必须向群众作公开检查’这一条，也必须经曹荻秋签字才有效。要不，你替他签了，你是要回北京的，你一走，他赖账，不承认，又把我们打成反革命，那怎么办？”耿金章说得头头是道。

王洪文在一侧听了，不由得一惊。

张春桥不由得从头到脚把耿金章打量了一番，很快一口答应说：“我向华东局、上海市委转达你们的要求！”

耿金章走后，“炮司”汪在银气得大骂耿金章是大骗子，老骗子，他挽袖捋臂，说：“通知公安局，把这个破坏文化大革命的现行反革命抓起来。”

这当然不行，红鸥立刻往巨鹿路“炮司”总部打电话，打了几次，终于通了，是交通大学的许云飞接的电话，已经急得像热锅上蚂蚁一样的红鸥，立即把全部情况都告诉了他，要他赶快想办法，把魏文伯、曹荻秋“揪”到苏州检讨。

许云飞放下电话，就把复旦大学的卫东等七、八个红卫兵从被窝里拉起来，说有紧急任务。

大家的精神立刻亢奋起来，连夜赶到到康平路市委大院

门口。站岗的解放军不让进。许云飞的牛劲上来了，第一个从围墙上爬进去，其他几个红卫兵也跟着翻墙进去。

进了大院，一看都是房子，黑夜里连门牌也看不清，不知道曹荻秋住在哪幢楼？于是他们把小洋房的门都敲一遍，心想总有一幢是曹荻秋住的。他们敲了半天，一扇门也不开。复旦大学的卫东发现有一幢小洋房的窗开着，就与交通大学的许云飞商量："我们爬进去吧。"

"爬。"许云飞又是第一个爬进去。

他们还没站定就听见黑暗中有人问干什么的？接着灯"啪"地亮了，许云飞发现自己站在一间厨房里，厨房门口有两个穿蓝布中山装的男人。

"我们要找曹荻秋，几千个工人在外面挨冻受饿，急盼曹荻秋到苏州与他们见面，曹荻秋不去，他们就不会回上海。"许云飞说。

"这里没有曹荻秋，你们快出去。"

许云飞怒发冲冠，说："我们不出去，我们就要在这里静坐，等曹荻秋。他不出来，我们绝食抗议！"

那两个男人没说话，退了出去，一个守在门口，一个找市委汇报。

许云飞为了弄清房子的主人，闯进一间房间，房间里铺着红地毯，陈设很气派，许云飞打开一个抽屉，发现里面有给魏文伯的公函，他断定这间房间主人是魏文伯，就给魏文

伯留了一张条子，勒令魏文伯三天内接见他，否则采取革命行动。

写完条子，他们几个人就坐在地毯上，开始了静坐示威，没坐多久，上下眼皮开始打架，不多会几个人东倒西歪躺在地毯上睡着了。

11 月 15 日，许云飞等人开始绝食，因为他们无法出去弄早饭，出康平路的门，白天要进来更困难。

许云飞等人的绝食未到中午就结束了。昨天晚上的那两个男人来通知许云飞他们，曹荻秋在会议室等他们呢。

许云飞一行人先到《支部生活》编辑部饱餐一顿，然后来到会议室。

会议室除了曹荻秋外，还有《解放军报》记者、《支部生活》编辑部的记者等十几人。

许云飞首先开炮："上海出现震惊中外的安亭事件，是上海市委害怕群众、欺骗群众造成的，我们都希望北上的工人回上海抓革命促生产，但要做到这一点，只有请曹荻秋自己出面，以求得群众谅解。"

曹荻秋同意到苏州去与工人见面。

原来，就在这天，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兼市委秘书长王一平接到中央文革小组王力给上海市委打来的电话。王力明确告知王一平；"'中央文革'全权委托张春桥处理安亭事件。'中央文革'同意张春桥签字的那'五项要求'！"

王一平放下电话，怒气冲冲地说：“王力支持张春桥，支持那‘五项要求’，是放屁。要‘中央文革’的老爷自己下来处理问题吧！”然后，赶紧把北京的动态告诉曹荻秋。

就在这一天，“工总司苏州大队”急电上海市委：“强烈要求把曹荻秋揪到苏州来！”

此时，张春桥已多次和魏文伯通话，要求韩哲一去苏州。

魏文伯与韩哲一协商后，同意韩哲一前往。

张春桥又要求曹荻秋也同去，曹荻秋与陈丕显商量，陈丕显也同意曹荻秋一同前往。

就这样，曹荻秋、韩哲一与“炮司”的许云飞等人于15日上午坐上轿车，直奔苏州。他们抵达苏州后，联络员汇报说，这批工人准备提出又一个五项要求。曹荻秋与张春桥在苏州南园宾馆会客室讨论如何应对，两人激烈争论了整整两个小时。曹荻秋不同意签字，他说：

“我是准备他们把我押到北京去的。”

曹荻秋认为来苏州就是动员工人回上海，不是在又一个要求上签字，况且上海市委没有授权于自己。

张春桥说，既然来苏州，就是来谈判，来谈判就是要签字。张春桥问曹荻秋：

“那你对第一个五条是什么态度？”

曹荻秋说：“我组织服从，思想不通。”

会客室里顿时寂静无声，气氛紧张。

张春桥说："你不签，我签"，"我代表中央文革小组签字！"

韩哲一打圆场："还是问问家里的意见。"

他和曹荻秋分别打电话给陈丕显和魏文伯。不久，魏文伯回电转达上海市委意见：

"既然张春桥代表中央文革签字，我们就不必再坚持不同意见了。"

耿金章与周宝林到苏州市委招待所。参加与他们谈判的，除了张春桥、曹荻秋和韩哲一，还有"炮司"和交大"反到底"的红卫兵，以及苏州市委的人。耿金章与周宝林他们果然拿出了一份重新写过的"五项要求"，这"五项要求"除包含了与潘国平文化广场所提的类似内容外，还要求"绝对保证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的每个人员的政治、人身安全、经济保障"，要上海市委用"宣传机器对前阶段谣言进行辟谣"……

这时参加谈判的人员中，有人要耿金章靠边站，并提出更苛刻的要求。张春桥说：

"你们究竟谁是代表谁是头？一会儿一个人出面提出一些条件，一会儿又一个人出面提出又一些条件，这样说话不算数，没法谈！"

张春桥表示拒绝再谈判下去。

僵持一段时间后，还是耿金章作为谈判代表，依然是耿

金章提出的五条，张春桥听后说：

“这个问题不大，我在上海已经签订了个五条，无非是只五条吧。”他当即签字。曹荻秋和韩哲一也签字。

就这样，在《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赴京控告队的五项要求》的下边，签着“张春桥 1966．11．15．于苏州”。在张春桥的签字旁边，签着曹荻秋、韩哲一的名字。

紧接着，他们 3 人又开始签另一种字。工人们拿出笔记本和《毛主席语录》，请这 3 位领导签名。交大的许云飞也拿出笔记本，请曹荻秋签字，3 位领导一一满足了大家的要求。

11 月 15 日下午，张春桥被迫与前来找他的同济大学“东方红兵团”见了面。他说：

“非常感谢同志们对我的信任，到处找我。但希望这种方式今后不要推广。我高兴又不高兴，高兴的是与你们见面，不高兴的是这样做影响我的工作。我回来是因为上海部分工人到北京请愿步行到安亭，影响了交通生产。为此我匆匆忙忙赶回，但是具体情况还不太了解，问题亦没解决完。这次回来匆忙之际本想把这个问题解决后，再与同学见面谈谈，你们既已找到我也就很高兴与你们见面。我总想回来的，对上海的文化革命我们关心。从同学来信和与到北京串联的同学谈话中知道一些情况，但不详细。”

“谈陈琳瑚（原工作组长）的问题。刚才同学与我谈了

一下情况，当时讨论的焦点是陈琳瑚去检查。这个原则无问题，中央早已作了决定，不管是多数还是少数，无论什么人叫，什么派要他检讨，即使很少的人叫他都要去。”

“第一个提出工作组问题，又考虑按照毛主席指示办事的是陈伯达同志，而他又是北京派出的第一个工作组，但它执行的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这是大家公认的马列主义的工作组。因此不能那样谈，要具体分析。上海派的少，是受了毛主席路线的影响。但不一定看多少，天津不是亦没有派工作组吗？那里镇压学生运动的情况也够呛！不能看形式，要看他执行的什么路线。不相信群众，不派工作组还是有犯错误的，这和执行路线的人有关。”

“今天还有同志等着我，我看是不是谈这些，以后有问题再说。

同志们，你们知道我平时对这些问题的态度，但我对‘红旗’一点也不了解，我必须听听他们的意见，一点也不听他们的意见这怎么行呢？我不搞折衷主义，我是倾向于你们这一边的。”

接着，张春桥在苏州铁路中学接见了“工总司苏州大队”的全体队员，将自己对安亭事件的的思想转变过程说给上海造反工人听：

“同志们，我们又见面了，这次见面，你们的心情和我的心情都有了变化，当然我这方面的变化不小，我下面再讲。

我接受任务，由韩哲一同志讲到他是在怎样一个匆忙之下，讲了放行的话。这的确是谷牧同志做出的决定。后来中央知道这个决定，认为是不对的，怎能做出这样的决定呢？因为，那几天，同志们都知道毛主席连续检阅接见，头一天60万，第二天170万，中央的同志就是为这200万革命师生的接见日日夜夜忙着，别的事情一点也没干，总理忙得几天都没有睡，所以，有的事情处理比较仓促，这个地方和那个地方，这个部门和那个部门，这个人和那个人都没有接头，仓促之间出了这样的错误，在那样的情况下决定派我来的，给我的任务也是非常仓促，拿我个人来说，我也没有来得及打个电话问问上海到底是怎么回事。伯达同志在那里写信，写了一夜，信确实是他自己写的，我看了一眼，我就去打电话，问飞机怎么样，因为飞机要临时调，班机没有。这样忙着出发，非常仓促，到了上海机场，也没有来得及，就急急忙忙向安亭去了。”

“同志们，这几天，在上海也好，昨天晚上也好，对我提出的批评，说我在安亭讲话不妥当，这个批评我是接受的，因为，我的精神准备没有这样的复杂，我是个共产党员，给了我任务马上要出发，可是，出发不是那么从容，不是那么从容地调查过，当时，同志们要知道为什么陈伯达写了那么一封信，讲了那么一番道理，现在说这封信是大毒草，是修正主义的，这些话我统统在电话中告诉了伯达同志，那时陈

伯达同志匆匆忙忙写这封信是在什么客观环境下呢？我不是讲客观原因，而是要说明一下。”

张春桥接着说“同志们提出对伯达同志的批评，我刚才讲我已经告诉他了，在电话里交换了意见，他表示心里不安。他要我有机会的话告诉同志们，这封信写得太仓促了，伯达同志是一个很好的革命同志，是一个很虚心的同志。他说：‘怎么办呢？想什么办法来弥补呢？’我讲：现在已经造成了这样结果，请你先想一想，既然那天很仓促，不要再弄一个仓促的事情了，伯达同志又说：‘是不是写第三封信。’我说：你如果要写的话我赞成，再写一封信表示一下自己的观点，可以考虑一下，不要马上写，你想一下这个问题，索性把工厂文化革命问题能不能说得完全一些。因为他现在正忙于调查工厂文化大革命情况，中央呢，也正在考虑这个问题，对伯达同志的批评已转告了，今天我又听到了一些意见，我还要继续转告，我相信同志们会相信他，他一定能够采取必要措施把那封信所造成的不好影响能够纠正，我从安亭回去后，那一天没有来得及，因为回上海深夜了，也没法去找他。第二天回到上海的同志在文化广场等我，我本来上午想和上海市委同志了解情况。结果没有来得及赶到文化广场，到了文化广场和那里的同志交换了意见，继续了解情况。到最后在那里达成了五点协议，同志们可以了解，从在安亭一定要我表态，我一直没有表示，这是不是革命行动？是不是

革命群众组织？到文化广场我明确地表示我的意见，这对我应该是一个进步吧。对这个问题认识比在安亭大进了一步。我也看到问题关键在什么地方，本质在什么地方，这次我可以下判断了。这样就是说用了24小时，我这个决心下得还很不慢吧。而且我组织手续并不完备，没有和华东局同志商量，也没有和市委同志商量，更没有和中央文革小组打电话，因为来不及，就下了决心。然后从文化广场回到我住处，才给陈伯达同志打电话，把同志们刚才对我，对陈伯达同志的批评告诉了他，他听了这样的话心里很不安，并且也把五条协议以及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报告给了他。”

“这样中央文革小组就讨论我在文化广场所讲的五条，到了晚上文革小组给我打电话来，认为我在文化广场对这个问题的判断，对这个问题的处理是完全正确的，是应该这样做的，对你们的组织，你们的行动做出了判断完全正确的，陈伯达同志、江青同志都参加了会议，他们认为我这样做是正确的，这样，我在这个过程里，包括中央文革小组的同志和陈伯达同志在最后就这个问题认识是有个过程的。那末，现在应该以最后为标准，最后那就是判断你们的行动是革命行动，你们的组织是革命的组织，对这样一个组织，应该加以支持，那我们前一阶段时期的错误现在就改过来了。我们共产党人在处理问题的过程中，不可能随时都判断那么准确，处理那么正确，问题就是在于在最后做出比较正确，比

较科学的判断，所以有些刚才对我说，怀疑陈伯达同志，我就想作些说明。我刚才说，我从出发到今天，经过一个长时期，我们彼此更了解了，我们处理的过程中，工人同志的讲话，发言给了我很深的教育，同志们讲了很多我不知道的事情，表达了上海工人阶级那种热烈的热爱毛主席，热爱党中央，对革命事业那种无限忠诚，你们这样深厚的感情教育了我，感染了我，我想这一段时间内，时间虽然不长。但对你们每个人来说，也许能成为终身难忘的事情，对我来说，也会成为我永远忘记不了的事情，因为我们是在一个这样的环境里认识的，不是在一个平平静静的环境里认识的。”

“我现在的心情，和刚来的时候不同了，我现在主要是想什么呢？现在主要是想大家很快回到上海后，赶快召开座谈会，来谈一谈你们厂里的阶级斗争情况，你们感觉到文化革命要解决什么问题？你们觉得怎么解决？这一方面请同志们想一想，就是你们厂里的阶级斗争是些什么问题，是怎么样的问题，怎样的情况？工厂与学校不同，与农村不同，这些问题应该怎么解决，你们有些什么想法，我现在想知道这方面的意见，能够及快地把你们这一方面的呼声、愿望、要求，尽力报告中央文革小组，报告中央，因为中央正在讨论这个问题。”

“这一段时间内，虽然时间不长，……对我来说，也会成为永远忘记不了的事情。”

“同志们，你们提出的五条刚才我同韩哲一、曹荻秋交换了意见，我们完全同意，而且我还希望同志们除了这几点以外还可以提，因为，你们还要干革命，就这么五条我觉得太少了，咱们这里有五百几十个人，我在这里也是一条，我希望你们每人给我提出一条，就是对文化大革命有什么要求，那我就可以收到五百几十条，那我的收获就太大了。如果每人写上十条，文化革命要注意什么，有些什么问题，应该怎样解决，这样就可得到许多条，有的我可以在上海解决，有的可以当作研究的资料，留作中央考虑问题的材料，你们共同要求的东西可以把它集中起来，并且希望你们把与你们不同的意见也写给我，那就更好了，可能车间里，工段里，生产小组里对文化革命有各种不同意见，都告诉我，那就更好。那我就不但满足了你们的要求，而且我又得到了几千条意见，那我非常感谢同志们了。我再说一遍，非常感谢同志们这几天对我的教育，对我的帮助，还希望同志们今后对我继续进行帮助，如果有错误，你们随时可以向我提出来，不管我在上海期间，还是在北京期间，或者到其他地方去，只要我是中国共产党员，我随时准备听同志们的批评，接受同志们的意见。我讲就讲到这一些。同志们你们都很辛苦了，要把身体搞好，因为我们搞革命搞生产都需要把身体搞好。同志们，我就讲这些，没有了。”

## 第 283 回：南京行，周宝林不负使命
## 唐平铸，答江阴代表疑问

11 月 16 日一早，几辆大轿车开进苏州铁路中学接工人回上海。工人要求风风光光回上海，他们提出要乘大轿车，“炮司”的红鸥与苏州市委商量，苏州市委同意派大轿车。

红鸥和“炮司”的余小兵人等站在大轿车门口，招呼工人上车。奇怪！工人一个也不上车，只是远远看着，红鸥心想：“坏事了，耿金章又和我们斗法了。”

果然，耿金章说：“工人们一致要求每人发两套大饼油条，没有不上车，不回上海。”

红鸥透了口气，原来只要求大饼油条呀，一套只需 7 分钱。她不假思索地回答：“行！一人两套大饼油条，不够还可以添。”接着就与苏州市委联系，请他们速送大饼油条到铁路中学。

苏州市委一口答应。

吃着大饼油条的工人全部上了大轿车。轿车向上海方向驶去。

送走“工总司苏州大队”，“炮司”一行人又坐上吉普车，按照张春桥的要求奔向南京。

张春桥处理完苏州徒步北上的上海工人，也在考虑那部分坐火车北上滞留在南京的上海工人了。这部分工人当天中午就在南京被截留。下车以后，他们首先想到的是寻找他们

的头头，可是在这辆火车上，竟没有一个“工总司”核心组的人，大家一下子慌了神，在群龙无首的情况下，许多人又成了无头苍蝇，到处乱碰乱撞起来。

当时最需要解决的是肚子的问题，他们从9日中午出来，已经足足过了24小时。他们看到同车的红卫兵学生有接待站接待，可是却找不到一个接待造反工人的接待站。由于多数人只穿着单薄的工作服，身无分文，再加上两天来的露宿受冻，一千多人不同程度地病了，有一天竟有二十几个工人晕倒。

正在大家一筹莫展的时候，突然有一个身材不高、面孔黑瘦的年轻人跳上一块路边的大石头，高声地叫道：

“同志们，上海来的造反派战友们，我们要告上海市委的状，却上了上海市委的当。现在他们把我们丢在南京，在南京现场又找不到带我们出来的‘工总司’的领导人。我们现在怎么办？只有我们自己组织起来，向南京市政府要吃的，吃饱了还要他们派车，我们还要北上，我们一定要到北京去，向毛主席去告状。我的名字叫戴祖样，是上钢三厂保卫科干部，同志们如果相信我，现在就跟我到江苏省委去！”

“好！我们到江苏省委去！造江苏省委的反！”

戴祖祥，本是“工总司”发起人之一，因“炮司”政审时，有人反映他有偷窃行为，因此未进主席团，只是在“工总司”成立大会上负责接待工作，不为人知。没想到，此时，

这位在造反队伍中名不见经传的人物，在南京路边大石头上振臂一呼，竟然一呼百应。这是在群龙无首的时候，自己跳出来的一个龙头！

戴祖祥也要求："共产党员、复员军人站出来！"于是他们选举了负责人，戴祖样是负责人之一，几个共产党员还成立了临时党支部。

在戴祖样的带领下，流落在南京的上海工人，向江苏省委进发。

江苏省委急忙调南京红卫兵守卫大门。上海的工人冲破防线，占领了江苏省委。经过与江苏省委谈判，江苏省委请示了华东局后，开始安排他们吃住。第一顿饭他们吃得要多狼狈有多狼狈，半斤装的钵头饭，有的一口气吃了两、三碗，还要吃。他们实在饿坏了。

戴祖样他们又提出派车让他们继续北上的要求，自然没有答应。南京市委为上海工人安排了食宿，给他们送去两千斤饼干，劝他们回沪。一部分人回去了，还有一部分人坚持北上。他们第二天早上乘船摆渡到长江对岸，又步行到浦口，被困于此，有11人病倒送往医院。戴祖样又带领造反队员向江苏省委借棉衣，每个人都借到一件黄色的军大衣。

11 月 12 日凌晨，南京市委安排滞留在浦口的上海工人住进南京农机分院。他们等了三天，始终没能乘上火车。11 月 15 日凌晨，大家眼看等车无望，决定步行北上，当天步行至

江苏省的六合县，晚上住在六合中学。

第二天，一行人举着徐美英缝制的工总司第一面大旗继续步行北上。戴祖祥在大旗上加了一行字："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第一路军"，用黑色毛笔写在一方白布条上，缝在旗子上，并派了6个人轮流举大旗。

队伍从六合出发半小时后，一辆吉普车追上了他们，穿着棉军大衣的潘国平跳下车，一起的还有戴祖祥工作的上钢三厂的车间党支部书记，以及红卫兵。潘国平等人是受张春桥和上海市委之托来劝说他们回上海的。队伍于是回到六合中学，开了个会，由临时党支部的书记主持会议。潘国平告诉大家，张春桥已经签字同意工总司要求，大家的目的达到，应该返沪。戴祖祥见潘国平穿着簇新的军大衣，说他被当权派收买了，于是将潘国平关在六合中学的厕所里。戴祖祥说："要有党中央和毛主席的电报才回去！"

潘国平翻墙逃出。

还有许多问题急待处理的张春桥不能亲自去南京了，虽然有"炮司"的人已前往南京，但他仍不放心。这时，他想到苏州认识的周宝林，于是派车前往上海愚园路218号的红都剧场，把"苏州大队"的周宝林接到兴国路招待所，要他前往南京，召回"工总司"滞留在南京的一批造反队员。

张春桥给江苏省委书记许家屯写了一封亲笔信，让周宝林带上。等周宝林出发后，他又给许家屯打了一个电话，请

许家屯在南京打点一切。

周宝林从张春桥那里出来，就给王洪文打了电话：“春桥同志要我去解决南京问题，你跟我一起去吧！”

王洪文在电话说：“行啊！”

可是，当周宝林的“专车”驶抵巨鹿路“工总司”的“司令部”，却找不到王洪文。

“刚才他还在这里嘛！我的电话是打到这里的。”周宝林问那里的人。

“不知道。我们不知道王洪文到哪里去了！”“司令部”的工作人员摇头道。

20岁刚出头的周宝林，生平还是第一次受到中央首长的接见，也是第一次坐着由首长派出的专车，去执行由首长交给的任务。重任在身，周宝林不敢久等，驱车直奔南京。他在安亭受了寒，正发高烧，便带弟弟同去南京。他们一到南京，马上受到了江苏省委领导许家屯的接见……

再说“炮司”的人到了南京六合县后，先个别与工人们谈心，然后再开大会。

他们向戴祖祥介绍了上海、苏州的情况，告诉他：“我们是来接工人回上海的。”

戴祖祥对他们异常亲热，说：“我们天天盼，日日盼，终于把你们盼来了。”

“炮司”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在南京北上工人大会上宣读

了“双五条”，即“上海五条”和“苏州五条”，工人们长时间鼓掌欢呼：

“毛主席万岁！”

“杀回上海去，就地闹革命！”

戴祖祥说：“工人同志们，造反派战友们，我们已经完成了历史使命，我们是作为文化大革命的闯将，文化大革命的火种回上海的，是极其光荣的。今天‘炮司’和交大‘反到底’的红卫兵小将带着中央文革的声音，代表上海的亲人来接我们回上海，我们全体北上工人向他们表示最衷心的感谢。”

“哗，”又是长时间的热烈鼓掌。

而周宝林是奉中央文革的代表张春桥之命，专门到南京来迎接战友，更使这些造反英雄的脸上有了光彩，哪有不回之理。于是，11 月 18 日，滞留在南京六合县的“工总司”造反队员，在他们的新司令戴祖祥的率领下，队伍离开六合回到南京，准备返回上海。

至此，安亭事件终于暂告一段落。

11月15日，《人民日报》负责人唐平铸接见江阴五一棉纺织厂等单位进京告状的工人代表，同时回答工人们对11月10日《人民日报》发表的《再论抓革命促生产》社论提出的质疑。

他说：“我讲一讲个人看法，看你们有什么意见，咱们

互相研究。我从小参加军队工作，对军队熟悉一点，对工农业方面经验很少。来《人民日报》工作时间很短，《人民日报》对学生文化革命谈得很多，对工农业方面我们经验和知识很少，向同志们学习，听取同志们的意见和批评，督促《人民日报》搞得更好。最近我们找工人谈话，找北京工厂工人开座谈会，首先我把同志们提出来的问题谈谈，大家商量，也不一定我们之间的意见完全统一了，因为你们了解的实际情况较多。”

关于《再论抓革命促生产》社论的问题，唐平铸说：“写这篇《再论抓革命促生产》社论酝酿已经很久，中央负责同志给我们指示，当时我们作了调查，作了了解。关于工厂，农村的文化大革命怎么搞？这是非常重要的问题，这个问题中央一直在研究。工厂单位怎么领导，怎么发动，采取什么组织形式，中央也正在研究。前一时期文化大革命重点在大专学校，党政机关和文化部门。中央有意识首先从学校发动。在工厂、农村有的地方开展了，有的地方还没怎么开展。但全国革命形势很好，已经从城市，从学校发展到各工厂、各部门。因而中央文革要很好地来领导这个运动，中央文革已经派人去工厂调查研究。怎样才能更好地把工厂的文化革命搞起来。目前工厂单位搞得最好的是黑龙江富拉尔基机械厂。这个厂的文化革命搞得很好，生产也有很大上升。富拉尔基另外有个工厂，成天讲搞好生产，不搞文化革命，千方百计

地压制文化革命，这个厂的生产反而不如机械厂好。文化革命与生产不像有些人所讲的文化革命会影响生产，而与十六条所讲的一样，文化革命是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强大的推动力。”

对于工人们提出的能否在工厂成立群众组织的问题，唐平铸说：“同志们革命热情很高，要求组织起来。北京已经组织了职工造反司令部，上海也成立了很多的工人组织。地方上党委工厂党委不承认，但也组织起来了。昨天我们开会陈伯达同志提出个意见，因为宪法上有规定，除了党团组织外，我们还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示威游行等权利。根据工人自己的要求，成立了战斗小组等等，我们应当支持，不应该泼冷水。但组织名称不叫司令部、总部，因为一有司令部就要有司令官，会产生官僚主义，最好组织名称用‘工人联合会’、‘工人总会’等名称。学生光在北京就成立了三个司令部，三个司令部经常打架。前几天第三司令部的官章大印被人家搞掉了。学生好的经验我们要吸取，不大好的地方要加以改革。北京有个中学、六十六中，红卫兵总司令搞了两个男秘书两个女秘书，来去都是小包车。这些都是无产阶级文化革命要反对的，我们工人不能这样做。……北京市有的成立全国性组织，成立了人家不承认，是空的，没有用。江阴或无锡都可以成立联合组织，以后可以慢慢地发展为江苏省的联合组织。”

有人问："这与中央指示工厂不成立红卫兵组织有矛盾吗？"

唐平铸回答说："红卫兵原来控制在大中学校党政机关的，我们单位也有红卫兵组织。据我了解，中央在这个问题上不会有什么限制了。今后工厂成立什么组织都不会受到约束，因为现在的文化革命不是把它压下去，而是要积极诱导，加强领导，引导到毛主席指出的正确路线上来，不至于像学生那样走很多弯路。""今冬明春我们在迎接工人文化革命运动的高潮。学生怎么与工人结合起来，原来说学生不能去串联。毛主席教导我们，学生要与工人、农民结合起来，划了这道线就有问题了。我报这篇社论也谈了，允许学生到工厂去，但是学生被赶出来，情况复杂得很。学校和工厂的文化革命政策完全是一致的，没有什么区别，因为任务都是一斗、二批、三改，是一样的，放手发动群众也是一样的，总的说来没有区别，都按十六条精神办事，是完全一致的。"

唐平铸说："工厂、农村与学校有不同的方面，虽然是次要方面，但也有它的特点，就是毛主席讲的：'抓革命、促生产。'不能停止生产，因为学校没有生产任务，放一年半年假没问题，工厂农村不能停止生产。"

"毛主席几次会议上都谈了对生产问题不能忽视，工农业生产是一个整体，是有机联系的，如果望亭电一停了，那无锡、苏州、上海等地的工业就都要停顿瘫痪，像这样的事

同志们很清楚。生产也是要很好强调的一个问题，现在问题是在怎样把生产搞下去。”

“有些单位生产搞得不好，是不是和一些当权派所说的一样因为工人捣蛋。不是的，而是他们压制革命，扣工资，把工人打成反革命甚至开除，连户口都不给，把工人赶下农村。这样怎么搞得好生产呢？责任应该由这些当权派负。他们是压制革命搞生产，因而搞不好生产。陈伯达说了，正确处理革命与生产的关系是很重要的。文化革命不一定在生产时间搞，八小时工作后，四小时可以搞文化大革命，还要注意休息。工厂与学校的情况不一样，工厂领导生产不能中断，……生产是有机联系的，没有领导是不行的，一定要坚持领导，好比海上航行一定要有船长。”

对 11 月 10 日《人民日报》社论的《再论抓革命促生产》，唐平铸再次解释说：“中央没有意思通过《人民日报》把群众运动压下去，如果有人利用社论打击我们工人同志，这是党纪国法都不允许的，要受严重处分，绝对不许可这样做。同志们来北京了，是不是违背中央指示了呢？是不是错误呢？我们工人同志完全是革命行动，中央研究后坚决回答，我们工人的行动是革命行动，是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抗议。你们不是来串联的，你们完全是被逼迫来北京告状的。江阴县委、无锡市委不给你们解决问题，你们只好来北京，你们不是串联。你们先来了北京，

那时我们这个精神还没有下去，你们事先也不知道。当然回去后一方面搞好文化革命，一方面搞好生产，把江阴县、无锡市面貌改变过来，一定在文化革命中做个榜样，做模范，不要让他们找借口。”

“这篇社论中央讨论过，请过有关中央同志修改。是不是毛主席看过了，我不很清楚，但不是每篇文章都要经过主席看了才发表。毛主席事情忙，要照顾他的身体健康，我们要相信中央的同志，社论中有些不恰当的地方不能怪中央，责任应该本报负，是本报的疏忽。比如：‘任何影响生产的行为，都会带来严重的后果’，也提得不好，说得过分。社论的其它地方也有些是框框，话说得太强调，太过分了。”

“《红旗》和《人民日报》。都是党中央领导的，互相之间不会有矛盾。都是陈伯达同志负责的，这些东西都要他来决定的，精神是一致的，一篇社论解决一个问题。”

工人问：“档案可以不可以借阅公布？”

唐平铸答：“档案是保密的，人保干部应负责任，不可以借阅，更不可以公布。举个例子：一个工人有些历史问题，贴了领导的大字报，但他们早不公布晚不公布，写了领导人的大字报以后公布了，这就是挑剔，就是打击报复行为，压制别人写大字报，挑起群众斗群众。”

## 第 284 回：见工人，企业文革怎么搞？　文化部，错把陶铸当望东

各地进京告状的工人愈来愈多。15日这天，王力、戚本禹在北京接见全国各地来京工人代表。王力说：

“关于工厂的文化革命怎样搞？谁最有发言权？是同志们！

“现在我们看到全国各地工人动起来了，这是很好的现象，很好的事情。我们感到工厂要搞文化大革命是大势所趋，任何人都不能阻挡的。究竟怎样搞，还要听取意见，继续听取意见，向你们学习，争取迅速反映给党中央，迅速做出适合工厂文化大革命的搞法意见。我们不能再像学校那样，再犯包办代替，工作组那样下框框定调子的错误。

“有的同志提出：八小时生产绝对保证，文化革命用业余时间，大约三到四个小时，不占生产时间，同时又不影响休息。这个意见请同志们考虑。”

他特别强调说：工厂“不许斗工人，不许斗一般干部……”

一位工人说：“他们目前就是这样！”

王力：“这样做不对！是完全错误的！”

另一个工人说：“他们借‘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斗工人！”

王力：“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是对的，但是不能对工人。”

一位工人建议：“听首长作指示，先不要乱插话！”

王力：“第一，我和戚本禹都是老百姓，不要用首长这个词来对待文革小组的同志，这里没有首长，这是第一点。第二，没有指示，而是同你们商量，问题的解决还要靠你们，我们的意见反映了你们的

要求。

“‘10月5日中央军委紧急指示’是否适于工厂、机关？关于这个问题，中央还要发指示，紧急指示是适合工厂、机关的。在运动中不许挑动学生斗学生，要注意保护少数，凡运动初期被院校党委和工作组打成‘反革命’、‘反动分子’、‘右派分子’和‘假左派，真右派’的同志，应宣布一律无效，予以平反，当众恢复名誉。个人被迫写出的检讨材料，应全部交还本人处理。党委或工作组以及个别人整理的整他们的材料，应同群众商量处理办法，经过群众和被整人的同意，也可以当众销毁。要充分信任群众，不要怕群众，要敢字当头。除将群众在运动中检讨的材料交还本人外，另外将一切材料要全部的，不许隐瞒，不许转移，不许私自销毁，要当众销毁。”

有人讲：“他们不给。”

王力：“不给就斗争嘛！中央要有指示的。”“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规定，工人有建立各种组织的权利，怕什么？有什么害怕的。……我们为了革命是可以搞厂与厂的联合组织，用联络会，代表会这样联合起来、组织起来。这是斗争的需要，这是合法的嘛！在群众组织内部之间，按民主组织方式斗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及肃清它的影响。在内部有不同的意见，有争执，通过民主协商的方式解决，不应这样打架而停工。”

工人齐声喊：“对！”

王力接着说：“串联的问题：在本市范围内，厂与厂之间的串联是正常的，是完全必要的。交流经验，互相支援。关于出去的问题，

一般是不出去的。必要的原则没有什么规定，相信你们可以自己解决本地的问题，本地解决不了的再问上级。到北京来，在必要的时候是可以来的，大家是否可以同意这样的原则？”

大家高喊：“同意！”

“关于学生到工厂去的问题：认为学生与工人、农民结合是正确的方向，应该欢迎学生到工人中去交流经验，好不好？你们赞成吗？”

众人齐答：“赞成！”

“关于《人民日报》的问题：《人民日报》是党中央机关报，6月份已经造反变成革命的了。从总的原则来讲，应该支持、相信。第一是它的威信问题，第二是国际、国内的影响。另外，不对的，有缺点，有批评，有言论的自由。比如《再论抓革命促生产》，同志们提了很多意见是正确的，这是我个人的意见，也代表戚本禹同志的意见。《人民日报》许多问题不对是可以改正的，应当成人民内部矛盾。同时要积极要求改进，应支持工人，并改进工作中的缺点。编辑部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正确路线，要听取群众意见才能办好。”

“关于农村，县以下中、小学搞文化革命的问题：还应请在座的同志们提意见，这个问题已到非解决不可的地步了。”

场上掌声雷动。

王力接着：“今天没研究，不能回答。”

有人问：“来北京是不是革命行动？”

王力说：“你们不是已经来了吗？实际上已经承认了嘛！你们来北京反映情况，检举压制文化大革命的罪行，这是革命的。但是，不

要大批地离开工作岗位，影响生产。应该有计划地派代表。具体情况要反映，解决要靠自己。上海的工人要赶快回去，联合起来造反。

我要解答的原则就是这些，下面是不是再由戚本禹同志讲几句。”

戚本禹说：“我看具体问题你们还是依靠自己来解决。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有些工厂的领导，非常怕文化大革命，怕的不得了，像怕老虎一样的怕，”

王力插话：“怕字当头。”

“就是想把它压下去，他们最大的一个理论就是生产，拿生产的大帽子压工人群众。实际上关心生产的是谁？是工人群众。……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们破坏生产。太原市纺织厂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那个党委书记，为了保护自己，挑动工人罢工，挑动保他的那一派工人罢工，他关心什么生产？第二个问题就是王力同志刚才讲的大方向。”“我们的革命不是斗工人，也不是斗一般干部，而是斗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斗那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我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收到了很多信，有的提个意见，就给人家开除嘛！有的就给搞成牛鬼蛇神强制回乡嘛！那当然，强制回乡的有很多是牛鬼蛇神，这是我们大家都很清楚的，但是很多借这个东西来整工人。

还有北京一个工厂的同志给我写信，就是因为他那个工厂的书记对工人提出不正当要求，那个工人拒绝了——是个女工，马上就开除。那个恶劣程度，我看不比黄世仁好一点，更坏。这样的人不反怎么行啊！不反的话，我们国家还会不变颜色吗？这样的人不反的话，我们

的工厂就要变颜色，我们的国家就要变颜色，所以我们要大造其反！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文化革命以来，在有些工厂是相当严重的，学校里学生还比工厂好一点，在工厂里我看到一些情况要比学校严重得多。”

有个工人说：“我们领导讲这次运动群众不是不斗，群众也要斗。”

戚本禹：“革命的运动从来就不是斗群众的。”

工人讲：“他就公开这么讲。”

戚本禹：“这些问题怎么办呢？我建议你们不要把希望寄托在我们身上，我们没有很多时间一个一个地处理问题。我告诉你们两个方法：一个方法依靠毛泽东思想，错误的东西，你们能用毛泽东思想来批判，最高指示嘛！你给他念语录，语录本拿出来给他念，毛选拿出来给他念，你执行不执行最高指示？这是一个方法。第二个方法要依靠群众来解决问题。”

工人说：“把我们都解雇了，县官不如现管。”

戚本禹：“是呀，这些问题怎么办呢？依靠青天大老爷行不行呢！没有青天大老爷，青天大老爷就是你们自己，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群众就是青天大老爷。你们依靠我们会得到失望。因为我们每天都有很多事情，不可能一项一项都处理，要依靠群众，依靠毛泽东思想。我给你举个例子，太原市我昨天也看了些工厂的问题，那问题拿哪儿也不好解决，他们自己组织起来就能解决。上海工人要成立团体，不让你们成立，有的几千人，有的上万人，轰起来了，闹起来了，解决了。

用四大武器发动群众，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依靠这些

武器来发动群众、团结群众。如果你们不能团结群众，你们是个搞折衷主义的，宗派主义的小集团，变成孤家寡人，那么谁也不可能帮你们的忙。”

杭州一个工厂的工人提出要工作队撤退，罢官。

戚本禹说：“我教你们个办法，像你们这个工厂里有3000多工人，你们分几班？”

答：“我们有4000多人，分三班。”

“三班制？你把3000多人分成三班包围省委。”

惊讶地问：“可以吗？”

戚本禹：“可以包围的！”

众欢呼：“好！”热烈鼓掌。

戚本禹：“他不答应你们的要求，你就不走”

众呼口号：“革命无罪，造反有理！”

有人问刻公章问题，戚本禹说：“工人能制造机器，难道一个公章问题还要问我吗？”

有人提出：“还有学生的问题没解决。”

戚本禹问：“什么问题？”

这时有人站起来回答说：“毛主席在1927年以前就下了指示了，只要我们按毛主席的指示去做就没有问题。”

大家齐声说：“对！”热烈鼓掌。

戚本禹说：“看，他答复的比我还好！”

11 月 15 日上午，文化部正在后勤学院礼堂召开 17 级以上党员干部会议，突然，北京电影学院“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中央戏剧学院“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中央音乐学院“毛泽东思想战斗团”，及北京、上海几个艺术院校和艺术团体的群众组织来到大礼堂，要造文化部长肖望东的反，让他做检查。守卫在大门和礼堂门口的警卫战士和部分党员干部不让这些学生进去。学生们举着红旗高喊：

“造反！造反！造反有理！”

“冲进去！冲进去！”

就这样一直冲进了礼堂。

礼堂的主席台上，陶铸正在讲话，最先冲进去的同学并不认识陶铸，看他站在主席台上，认为必是部长肖望东无疑，就抢了话筒，抢了陶铸的眼镜和讲稿。陶铸询问了学生们的来意后，立即接见了这些学生，答复了他们提出的要肖望东作检查等要求，并热情赞扬、高度评价了学生们的革命造反精神。

学生们走了，陶铸回到主席台上说：“会开得很好嘛！他们来造反，增加了革命的气氛。”

全场热烈鼓掌。

陶铸又接着说："他们的行动好得很，大无畏的精神，要'敢'字当头。青少年就是敢想，敢冲。刚才来的那些青年，就是敢！多威风啊！打着红旗，一进来就喊：'造反！造反！造反！'"

与会者热烈鼓掌。

陶铸继续说："把你的官架子都抛到九霄云外去了！刚才他们雄赳赳、气昂昂，勇敢得很，一上台就抢话筒要说话，为了革命，一无所惧，有大无畏的精神！就靠这些人接班，接班人就从这些人里产生，这些人是国家的栋梁！

青年人敢于革命。苏联为什么修，就是没有吸取这个教训。毛主席就是吸取了这个教训开展了文化大革命。

他们的行动好得很嘛！如果以后有个赫鲁晓夫站在台上讲话，他们就敢把他揪下台来，拉走嘛！

我们有许多人是'老哥尔洛夫'，就是不爱学习，做官当老爷的，得给一点压力！

要相信同学们，他们是讲道理的，一次讲不清楚，多讲几次嘛！总是可以讲清的，刚才不就讲清楚了吗。

今天文化部的同志，在这儿开会保密，没讲清楚，他们来这里要文化部作彻底的检查，这是应该的，正当的要求。你不改正错误，那造反是应该的嘛！

我们很多同志的革命自觉性不够，就是不革自己的命，因此必须给点压力。当然还要靠自觉性，但是没有压力，轻飘飘的不行，我是赞成给点压力的。可是，不要把他压扁了，压扁了就不好了。群众的压力，只有把你压到毛主席的正确路线上来。到今天为止，两条路线的斗争还是人民内部矛盾。这点，林彪同志已经讲的很清楚了。尽管如此，要解决，拖下去不是办法。今天他们来造反要肖望东作检查，”他回头问还在台上的群众：“是这个目的吧？”

群众回答：“是！”

陶铸说：“这个目的是正当的，也是应该的。今天他们不知道我在这里作报告，我来北京不久，又没到他们学校，他们不认识我，以为是肖望东在此……

他们是很讲道理的，现在知道了就会回去。我和他们谈了，他们同意腾出一层楼来给部长们办公。

部长们要和群众保持密切联系，坚决支持他们，彻底检查、批判，改正自己的错误。但有一条，还是要讲文斗，不要武斗，武斗是不可以的。‘随叫随到’是法律名词，不要多用。但现在是革命非常时期，用也可以。部长们要挺身而出，你们不要回避，不要躲躲闪闪，要站出来，要坚定地站在革命人民一边，站在他们一边。不要害怕，不要怕群众，你改正错误，就支持你。

有人说我讲‘绝食是伟大的创举’，我是同情绝食的，但我不赞成这个办法，不要太辛苦，吃饱了再闹革命，要长期革命。”

他指着肖望东对群众说：“我让他们从明天起早上八点钟去上班，去解决问题，晚上 12 点回去休息。一天不行，第二天再接着嘛！休息还是要休息。”

他又指着群众说：“他们要革命，领导上总也不解决问题，他们没有别的办法，所以才采用绝食，我是同情的。有人说绝食是反革命，不能这样说，是革命的，不是反革命的，过去我也绝过食嘛！绝食 3 天，滋味不好受，也是不得已的，现在就要吃得饱饱的干革命，斗到底。

当时全国一开始没有，西安的就在大街上贴大字报、标语，在大街上进行大辩论，这还是文斗，还是摆事实，讲道理的。他们说这是革命的，是新的伟大的创举，我说绝食也是个创举吧！结果后来传成这一切全是伟大的创举了……

但是，还是要文斗，要摆事实，讲道理，要学会怎么进行两条路线的斗争。搞两条路线的斗争，毛主席说过：我们的政策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要采取一看、二帮，这是早就提出来的，这样才能使事业兴旺。一定要欢迎他们微小的进步。”

## 第 285 回：大新闻，伊林·涤西批林彪

## 印传单，北京城引发震动

11 月 15 日，清华园又传出惊人的消息，早上 7 时左右，有人以“伊林·涤西”的署名在清华大学贴了一张大字报，题目是：《致林彪同志的一封公开信》。大字报原文是：

敬爱的林彪同志：

近日看到你九月十八日在军事院校的讲话记录,直爽地说,有几个关键地方的提法是非常错误的。

您说：“对毛泽东思想抱什么态度是个很重要的问题，我们就是要抓住对毛主席的态度，对毛泽东思想的态度问题。”“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书太多，读不完，他们离我们又太远。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典著作中，我们要99%的学习毛泽东著作。”“毛主席比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高得多（重点是我加的），现在世界上没有哪个比得上毛主席的水平，有人说《资本论》是理论的基础阵地，其实《资本论》只能解决资本主义社会的规律问题。我们国家资本主义已经打倒了，现在是社会主义规律问题。”“毛主席这样的天才，全世界几百年，全中国几千年才出现一个。”

敬爱的林彪同志，“毛主席比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高得多”的提法是不正确的。最近翻阅斯大林论《论反对派》的一些论文，见到论列宁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功绩的一段：

“同志们，必须承认正是列宁而不是别的什么人发现了社会主义可能在一个国家胜利的真理,不能抹杀理应属于列宁的功绩。不要惧怕真理，要有勇气说出真理，要有勇气公开地说，在马克思主义者中间，列宁是用新的方式提出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内胜利的问题并肯定地解决了这个问题的第一个人。

我这些话绝不是想说明作为思想家的列宁比马克思、恩格斯高出一等。（重点是我加的）我这些话只是想说明两个事情。

第一，无论恩格斯或马克思是多么有天才的思想家，绝不能要求他们在垄断前资本主义时期，预见到五十年以后，即在发达的垄断资本主义时期的无产阶级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革命中一切可能性。

第二，列宁作为恩格斯或马克思的天才学生，能够看得出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新条件下的无产阶级革命中的一些新的可能性，因而发现了社会主义可能在一个国家内胜利的真理，这是没有什么奇怪的。”

斯大林的态度是对的，林彪同志的态度是错误的。“毛主席比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高得多”的提法是错误的，理论上是错误的，实践中是有害的，它会给各国修正主义造成攻击中国共产党的口实，毛主席也绝不会答应！

正如您说的：“对毛泽东思想抱什么态度是一个重大的问题，我们就是要抓住对毛主席的态度，对毛泽东思想的态度问

题。”斯大林正是在怎样对待列宁和列宁主义的问题上和托洛斯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分开的。如今在对待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的问题上，已经开始并将继续进行大分化。在大分化中，那种对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估计不足的倾向固然是非常错误的（是站不住脚的，主要应批评的），但那种估计超出历史发展的倾向同样站不住脚，也容易一头栽入反毛泽东思想的邪路。林彪同志，用斯大林同志当时对待列宁和列宁主义的态度来对待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才是唯一正确的，其他态度统统是错误的。

其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书太多，读不完，他们离我们又太远，在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经典著作中，我们要99％的学习毛主席著作，但您是在军事学院讲的。无论这个99％是指学习时间，精力之比还是指学习毛泽东思想和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之比都不适用。

第一，书太多，读不完。他们离我们又太远。显然不能成为99％的理由。

第二，专门的理论是需要的，而中国的现状是特别需要的。毛主席早在二十四年前就深刻地批评到：“但是要照中国革命的丰富内容来说，理论战线就非常之不相称。二者比较起来理论方面就显得非常之落后。一般地说来，我们的理论还不能和革命的实践相平行，更不去说理论应该跑到实践前面去；我们

还没有把丰富的实践提高到应有的理论高度。我们还没有对革命实践的一切问题，或重大问题加以考察，使之上升到理论的程度。你们看，中国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我们究竟有多少人创造了可以称为理论的理论，算得上科学态度的周密的而不是粗枝大叶的理论呢？特别是在经济理论方面，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从鸦片战争到现在，已经有一百多年了，但是还没有产生一本合乎中国经济发展的实际的，真正科学的理论书。像在中国经济方面，能不能说理论水平已经提高了呢？能不能说我党已经有了像样的理论家呢？实在不能说。”

二十四年前毛主席这个批评，在二十四年后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更加暴露出来了，在我们不但要解决国内问题，更要解决国际问题的时候特别地表现出来了。文化大革命以来，书店的书柜中看不到什么系统的周密的（哪怕是较系统较周密的）关于中国和世界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的“可以称为理论的理论”著作！过去书架上倒是摆过一些厚本、专著，但文化大革命表明，他们的作者不是披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毛泽东思想的外衣反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混蛋，就是钻进书堆里出不来的书呆子或空谈家。

在您的作用下，解放军成为学习毛泽东思想的榜样，全国学习解放军,全国掀起了一个学习毛主席著作空前广泛的运动，就是说一个工农兵广大群众直接掌握理论的伟大时代出现了！

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说："给目前范围有限度的提高以基础，也是给将来范围以广阔的提高工作准备条件"，已有过之而无不及，提高的问题自然而然的突出出来了！大批真正的理论家，现在和不久将来的革命运动很需要。

第三，既然我们现在很需要在经济、政治、军事文化方面有大批的理论人才，那么这些理论家，不管其专长是什么都起码得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具备一个较全面的系统的了解，而毛主席的著作只是其中一部分，因而这个99%比例是不正确的，对大专院校不适当。

第四，毛主席著作虽然只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著作的一部分，但毛泽东思想是当代最现实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最高最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现在我们无疑是在毛泽东思想大道上前进，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战斗。我们不是否认这一点，而是肯定这一点，正是这一点要对毛泽东思想有个彻底的了解，清楚毛泽东思想如何前进，因而就必须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发展有个相当的认识，从这里您的"99%"也是不适合您所讲话的对象的。一般说，用主要的精神，大部分的时间学习毛主席著作是正确的。

其次，有人说《资本论》是理论的基础阵地，其实《资本论》只能解释资本主义的规律问题，我国资本主义已经打倒了，现在是社会主义规律问题。这一点加上上面的，给人以马克思

著作似乎已经过时之感。我还没有读过《资本论》，但知道马克思主要著作就是《资本论》，《资本论》中基本理论已经不再是理论的基本，岂不是说马克思主义中的基本理论已经过时了，这不是从“左”的方面，同样走到新老修正主义者的沼泽中去吗？您的意思似乎是从马克思列宁主义到毛泽东思想经过了一个从牛顿到爱因斯坦的飞跃，根本的质的飞跃！但这显然是错误的。

敬爱的林彪同志，请你解释这些。

顺便向您提出一个批评，在天安门上，您已经发表了对当前文化大革命具有决定性指导意义的六次讲话，可是这次运动最主要最精华的部分——学生运动,却没有看见您来亲自参加，如同周恩来、陶铸、陈伯达一样来参加我们的辩论会，亲自看大字报，接见学生，给我们讲话。我很怀疑你讲话绝对正确。就拿九月十五日讲话来说，这个讲话过早过分地强调了“一小撮资产阶级分子，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严重性，其实各省市“炮打司令部”“火烧省市委”的大多数是学生，即使省市中，大多数也不一定“炮打司令部”，指的就是黑司令部，而是放几炮轰轰看，或击中其中个别人，或否决“司令部”某些强大的保守措施，可您没有讲炮打司令部这方面的意义。您强调“我们国家的领导权，是掌握在无产阶级手里。”强调专政的正确方面——不需要改

进的方面，却没有敏锐地觉察到文化大革命以来未突出来的问题，即“改善无产阶级专政，革新社会主义制度。”党和国家组织形式需极大的改变。十七年来，建立的人民民主专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陈旧,极需创造出一个适合中国历史特点的,世界上从来没有的国家机器。这些没有强大的摧毁，没有强大炮轰的震撼，没有高温度的熔炼，实现得了吗？

恩格斯名言“公社已不是原来意义的国家了”，看来您理解得不是很深的，毛主席多次提到公社，您也未必惊醒，眼睛犹很朦胧，看不到官吏机器正在彻底完蛋，代表“中国”的东方公社的光芒已经露射东方地平线了，因而讲话不但没有注意引导这方面，反而给全国运动一个阻碍，造成一个反复（虽然不大），把大批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的张平化9·24讲话就是乘机抛出来的。

敬爱的林彪同志，毛主席唯一最亲密的战友和学生，对于您的六次讲话，很希望您能像毛主席那样“理论应跑到实践前面去”。但说老实话，失我所望，您的六次讲话跑到实践后面去了。比如吧，第六次讲话虽然指出了“步行串联的好处，可以广泛地去接触群众，接触社会的各个方面，更深的了解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但这文中没有突出毛主席学生时代就利用寒暑假进行“社会调查”，毛泽东式的“社会调查”。而这一点，您讲话之前，清华大学里的大字报已经渴望了好几天

了。

希望您特别深入运动，不然久而久之，也会有“靠边站的危险”，历史的辩证法是无情的。

敬爱的林彪同志，我们的副统帅，毛主席唯一最亲密的战友和毛主席的接班人（许多中央首长这样讲，人民也这样讲）。为什么要给您寄这封信呢？我认为，应坦白地向您公开我的目的，您作为毛主席的接班人，希望您具有毛主席那样高的理论，那样高的实践，像毛主席那样正确、完整，因为中国党的领导所领导的不是中国一国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事业，而是整个共产主义运动，在这条道路上，斗争异常尖锐，有差之毫厘，谬之千里的危险存在。这条道路毛主席是走上来了，如果毛主席的接班人不能像毛主席那样成为无产阶级革命导师，中国党还会面临法西斯党的危险，再说一遍，无情的辩证法将会请您“靠边站”。

为什么要公开呢？就是要促进人民进一步取得您所提出的批评，监督党和国家各级领导和各级领导人的“大自由”。

有错误就要批评，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地方就要指出，难道您是不可提批评意见吗？（有些首长讲话似乎对您提批评是不可以的）我看您是不会同意这样做的。

赤胆忠心之言，见之请您斟酌。歪理之处，给以批评指正。

敬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敬礼！

北农大附中学生伊林•涤西

刘握中　张立才

于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五日

炮轰林彪的大字报贴在清华大学,但它的作者却不是清华大学的学生，而是北京农业大学附中的学生刘握中和张立才。而这个“伊林·涤西”又是谁呢？就是刘握中和张立才。“涤西”是张立才在学校写大字报一直用的名字，取“荡涤西方一切污泥浊水”的意思，据说，毛泽东曾用“涤西”作过笔名。而“伊林”，则是列宁曾用过的笔名。

这张大字报的起因，还要追溯到半个多月前，1966 年 10 月的一天，作为北农大附中“八一八红卫兵”头头的刘握中在清华大学的图书馆里碰见一个人。俩人并不认识，却在一起聊了 3 个小时，很谈得来。他们谈到了林彪，那人说：“林副主席接班可不行,林副主席不可能像恩格斯那样。他有法西斯倾向。”

刘握中一听很惊讶，林彪可是刚刚确定的接班人，而且一直是高举毛泽东思想大旗的，怎么会有法西斯倾向呢？刘握中从来没有想过这样的问题。但是当时红卫兵在破四旧时打人很厉害，他和大多数人一样，对此很反感，觉得林彪在接见红卫兵时的讲话中对这些行为是有鼓励的，所以对那人说的“林彪有法西斯倾向”很容易的接受了。另外，当时“怀疑一切”的

思潮盛行，刘握中为此还写了一篇文章，就是“论怀疑一切”，大概有一万多字，寄给武汉的《长江日报》。

当时，宿舍里的同学都到外地串联去了，只剩下刘握中和张立才俩人，毛泽东鼓励大家要关心国家大事，他们就一晚上、一晚上地聊天，用他们的热情和年轻的知识指点江山，探讨着国家大事。

聊天中，刘握中提到了林彪在9月18日接见高等军事学院、政治学院和总政宣传部负责人时的讲话。这个讲话，张立才在武汉串联时也从大字报上看到过，当时就感到很不舒服，觉得完全是个人吹捧。他们俩对这个“讲话”的认知很快就说到一起了。

这时，刘握中提出：“咱们能不能就这个问题写一张大字报啊？”

张立才不以为然：“写大字报有什么意思，给上面写信意义也不大。”

其实，刘握中在跟张立才聊这事之前，就已经写了《给林彪同志的一封公开信》。据他后来回忆说，他起草这封《公开信》是受北京师范大学的李文博和北京大学乔兼武的影响。乔兼武1966年8月26日写了“造三个大反——用毛泽东思想改造旧世界，创建新世界”的大字报，李文博1966年10月17日写了“公社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国家了”的大字报。刘握中为此

找过李文博，跟他们聊过。

此时，刘握中把这个《公开信》的初稿拿出来给张立才看，并对他说："干与不干，都由你决策。"

张立才看了稿子以后说："咱们先不说干还是不干，斟酌一下再说。先把其中一些激烈的文字去掉，换上温和的语言。"

《公开信》的草稿中原来有一段是专门批评林彪讲话中"毛主席这样的天才，全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现一个" 这一句话的。这段文字张立才一看脑袋就大了，说："这条不能批呀。虽然文章我还没细看，但这条一定得拿下来。"于是他将这段批评文字彻底删掉了。

修改完后，张立才决定："干。"他说："要干就公开干，不能寄信，寄信是扯淡。公开就得按大民主的方式写大字报。"

张立才的毛笔字比较好，于是他抄写大字报。抄完后，他在落款处写上他在学校写大字报一直用的名字，也是农大附中的同学都知道的笔名："涤西"。然后对刘握中说："你快点起个名字。"

刘握中在那翻《列宁选集》，翻着翻着，翻到一篇文章，看底下中文译名是伊林。他说："那我就用伊林吧。"

伊林·涤西《致林彪同志的一封公开信》抄好后，首先贴在农大附中。一贴出，农大附中就开锅了，顿时热闹非凡。前来看大字报的川流不息，络绎不绝。北京各大专院校的、政府

机关各大部委的、各大军区的人，都来农大附中串联，校园里一时间人山人海。同学都说："这回咱们学校可出名了。"

前来农大附中串联的学生中有一位清华大学的学生，名叫万润南，他对伊林、涤西说："观点可以讨论，而且你们提的也有积极意义，但是应该采取寄信的方式，不应该公开。你这一公开不就伤害林副统帅了吗"

还有一个 50 多岁的人，骑着一辆永久牌自行车，专门来找伊林、涤西要《公开信》的传单，还问他们为什么要公开化？问他们都看过些什么书？

农大附中高一有一个学生叫瓦罗佳，他爸爸是老布尔什维克，娶了个苏联媳妇，生下了瓦罗佳，所以他是半个苏联人。瓦罗佳就把这个传单递给了苏联大使馆。这让伊林、涤西有点害怕。

瓦罗佳的传单弄得全世界都知道了。本来只是林彪在一个军事学院的讲话，没太多的人知道。这一下子世界各国的共产党都非常恼火，一连串地群起攻击中共。因为林彪的这个讲话说毛泽东比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还高。

11 月 15 日早晨 6 时多，他们又跑到清华大学小礼堂旁边的科技馆，那里是贴大字报最密集的地方。7 时，他们将这份《公开信》贴在那里。但在当天下午。就让蒯大富的"井冈山兵团"给撕了。

11 月 16 日，伊林、涤西在北京大学最热闹的三角地又贴了一份，当即北京大学“横扫千军”、“红梅”两个战斗队同时贴出大字报反击。不过，曾于 1966 年 8 月 30 日在校内贴出《造三个大反》大字报的乔兼武则明确表示支持伊林、涤西的《公开信》。

伊林、涤西索性组织人将《公开信》印成传单，并在传单的结尾特别说明：

此公开信11月15日清晨7点左右用大字报形式公布于清华大学，当日下午被部分同学撕毁，并被骂成“毒草”“反革命”的大字报，还扬言“要批倒、批臭”等等，既然这张大字报已经被你们说成是“毒草”“反革命”的大字报，你们就应该发动广大群众批判之，批倒批臭之，既要让群众都看到原文，又要看到批判文章，然而，你们为什么竟然据其防止流毒更广，而把大字报撕毁了呢？你们到底相信不相信群众呢？显而易见，你们这种包办代替的方法是愚蠢的，是软弱的表现。

在这里，我们奉告你们，你们要真防止流毒更广，真心批判的话，希望你们亲手再把原大字报贴出来，让大家来批判鉴别！

同志们！既然有人不让此公开信公开，那就将转为另一种方式，印为传单。

伊林.

涤西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八日

读者注意：如果有的同志批评我们，指责我们的“靠边站”对个人过分的话，我们是乐于接受这种批评的。

伊林.涤西

一张蜡纸一般只能印800份到1000份。为了印得更多些，张立才亲自推油滚子，不让别人动。他推得非常仔细、小心，生怕这蜡纸破了，最后印了1200份16开纸，共四页的传单。传单的落款只有“伊林、涤西”。

18日，传单印好后，同学们拿着折叠好的传单轰地跑出去，分别到各大专院校、各军队和机关大院的门口，一路走一路贴，满北京散发，立即在社会上引起震动。

## 第 286 回：串联停，恩来见天津代表
## 过新疆，陶铸再与鲁座谈

11 月 15 日 22 时 50 分，周恩来接见天津大学红卫兵代表 6 人、南开大学“八一八”红卫兵 2 人、东风大学，即天津师范学院红卫兵总部代表 2 人、天津高等院校红卫兵总部代表 4 人。在座的还有河北省委书记处书记阎达开、李颉伯，省市联络站站长杜长天，华北局卢志彬，省委文革办公室副主任儒洪升。当周恩来走进会场，代表们热烈高呼：“毛主席万岁！”然后争相问：“周总理好！”

周恩来微笑着和大家握手，问代表都是哪个学校的。各校代表向周恩来献袖章，周恩来戴上了东风大学红卫兵联合总部的“毛泽东主义红卫兵”袖章后，开玩笑地说：

“他们也让我参加红卫兵，你们也让我参加红卫兵！”

代表们说：“两个都参加！”

周恩来笑着说：“那人家该说我是折衷主义了！”

代表们都笑了。他们一直谈到近 24 时，周恩来还有会，正准备走，有人把天津工学院红卫兵印发的“号外”递给周恩来说：“他们说，总理说他们是左派。”

周恩来不满意地说：“发‘号外’，捧自己，是违反毛泽东思想的。对于你们学校的问题我们一定想办法解决。你们寄份综合材料，一、两千字，给我，明天上午 12 点交给我能行吗？”

学生答："行！"

周恩来说："你们真的受压制，可以写材料交给我看一看。最近一天先别走，可以派中央同志和记者去了解你们的情况。"

周恩来看了下表，已是 0 时 35 分了，他急忙说："好，我得去开会了，解决那 30 万人的事情去了。"说着走了。

接着阎达开，李颉伯等人又和代表谈了谈。李颉伯说："你们和另一方要坐下来，达成协议。我们的总方向是一致的，是热爱党和毛主席的，要按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如果像打人，武斗，砸东西，这让我们说是革命的还是不革命的，我们的态度是这样，革命热情是可以理解的，这种做法我们不同意。有的人贪小便宜，总要吃大亏的，老实人办老实事，说老实话，也就是革命人办革命事。"

阎达开说："你们给总理写报告时，也要检查自己的错误。"

周恩来急急忙忙地走了，他要去解决更火烧眉毛的事情，就是专门为接待外地进京串联师生的事情召开会议。他在会上说："今天召集中央党政军民各机关负责同志，北京市党政军民各机关、厂矿、企业事业、派出所、街道办事处负责同志，解放军各军种、兵种的负责同志，各大专院校的负责同志，大概一万多人来开个会，是个紧急会议。有一件事要

大家分担责任，就是招待外地革命师生和红卫兵战士。国庆节前作过一次动员，效果很好。现在作今年最后一次动员。

“现在留在北京还没有走的共 225 万人，其中没有接见的大概还有 140 万人。但实际上不只此数。因为有一些人住在认识的人家里，没有统计起来。这几天，从各地来京的革命师生和红卫兵比例数更大，每天超过 20 万人，有到 25 万的，有更多的，曾经一天到 29 万多人。原接待工作应付不了，容纳不下。昨天晚上，在永定门车站到先农坛、到天坛到处都是外地师生。用突击力量，大部分人才解决了。但这是临时性的突击，不解决问题。

首先得解决这样几个问题，中央最近要发一个通知，准备把大中学校，包括军事院校，学生放假闹革命的时间延续到明年暑假，……第二个规定。准备把各地免费乘车的时间，截止到 11 月 20 日，还有 5 天就截止。”

“为了做好这一次最后一批来京革命师生和红卫兵的接待工作和组织工作，需要我们作最大的努力。即使数目截止了，不再增加了，不再来京了，但等待接见还得有一段时间。这次接待要超过 200 万人，接近 300 万。”

“根据现在的情况，原接待单位所接收的人数不够。还要增加 110 万接待数目。这需要在我们国家机关，解放军，大专院校，北京市厂矿企业、事业单位，街道等一起来分配这个数目。按我们昨天晚上紧急会议商量的数目，大概这样

规定：北京市增加 50 万人，由北京市各机关、厂矿、企业事业单位、城市居民通过派出所、街道居民委员会来安排。因此厂矿企业事业在不影响生产的情况下，他那地方的宿舍、礼堂、俱乐部、一切公共地方，都要接待革命青年同学和红卫兵。中央国家机关、党政军机关增加 30 万人。大专院校，北京有 60 多个大专院校，绝大部分学生都到外地串连了，接待力量不够，我们动员外县一万人，解放军组织炊事队，共 30 个炊事队，这样大专院校增加接待 20 万人。解放军各兵种、军种、三个总部，其它附属机关、军事院校，增加接待 10 万人。

机关中急要工作还继续做，特别是指导生产业务，办理紧急行政、外交等工作还继续进行。但有一部分经常业务、不是紧急的业务，这种办公室，可腾出一部分让同学们住。

为着起带头作用，国务院，就是你们知道的中南海的中海，我同李先念副总理所住的地方，我们也开放，接待一万人。今天上午 8 点至 9 点已到永定门车站、先农坛去领学生，等会我们回去就能看到。既然中南海那样小的地方，国庆节接待 3000 人，现在增加二倍，一万人，并且首先先做给你们看，等于增加 7000 人，那个地方能接待一万人，全北京市增加 110 万就可以做到了。……根据主席指示，我们从解放军抽出一部分同志，把外地师生组织起来，成营、成连、成团地组织起来。……每 100 人派 3 个解放军干部，100 万

就要 3 万。所以解放军抽调可以担负 200 至 300 万人的军事干部，今天集中，明天就进点马上动，用突击精神来实现，分到各机关、企业去。”

“还有一个问题，医疗能力现在有限。从现在起所有的医疗机关，不论是地方的、中央直属的、解放军的、军事单位的，包括医科学校的高年级同学、护士学校高年级学生，一切医疗能力都要统统动员起来，暂缓出去串联，希望明年再出去串连。……因为现在 300 万，或者超过 300 万的师生许多是南方来的，衣服单薄。目前天气冷，很容易感冒。已经病了的不少。……所以医务人员、医务学校的高年级学生应有这样勇气承担这责任。”

“第二件事就是，供应机关要做好工作。粮食蔬菜要充分供应，不要使街道感到缺乏。其它一些被子等等十分不够我们还要借。这次不仅是考勤，而且是文化革命中的一次很好的考验。尽管在文化革命中一些同志有错误，把这项工作做好，就可以将功补过。不要带着包袱做工作，要愉快地接受这任务，允许别人改正错误嘛。所以这个精神，不仅在今天来传达，也希望你们传达给各学校，共同做好这项工作。完了。”

就在这天，11 月 16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革命师生进行革命串连问题的通知》，终于暂停了免费乘车、船进京串连。通知说：

“决定在今年十一月二十一日起到明年春暖季节，全国各地大专院校、军事院校和中等学校的革命师生和红卫兵战士一律暂停乘火车、轮船，汽车，来北京和到各地进行革命串连。目前正在水陆交通沿线等候车、船外出串连的各地革命师生，可劝说他们返回原地。”

“决定从十一月二十一日起，全国水陆交通，只负责免费输送各地到北京或外地进行革命串连的革命师生返回原地，和北京去全国各地的革命师生返回北京。他们要凭免费票上车，上船，直回原地，不要在途中停留。”

“对于已在进行徒步串连的少数革命师生（几个人到几十个人），中央和各地党政机关应主动地给以必要的便利。超过百人以上的徒步串连，必须同有关党政机关事先接洽，有计划地进行，以免沿途发生食宿和其他方面的困难。有关徒步串连的注意事项，将另行通知。”

至此，中国历史上首次非直接以生存为目的的大迁徙终于开始慢慢的进入了尾声。

11 月 15 日，康生率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参加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第五次代表大会和劳动党建党 25 周年庆祝活动后回北京途经乌鲁木齐，于当晚乌鲁木齐时间 11 时 50 分在宾馆接见了新疆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 200 余名学生。数名维、哈、汉红卫兵给康生戴上了他们的红卫兵袖章，被接见的有新疆

大学“星火燎原战斗团”、“革命造反团”、“东方红战斗团”和外校、外地部分学生。接见时在座的还有伍修权等人。

康生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介绍了在阿尔巴尼亚访问的情况，讲了对文化大革命的认识，然后说：“通过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这种民主超过了巴黎公社的那种民主。”

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赴疆串连的一同学问：“中央是否有这样的指示，把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和牛鬼蛇神都赶出城市？”

康生回答：“没有这样的指示”。

这位同学拿出乌鲁木齐红卫兵总部1966年11月3日颁布的（66）纠字第四号通令交给康生看。这位同学说：“这个通令发出后乌鲁木齐公安机关配合行动，乌鲁木齐不但是把五类分子、牛鬼蛇神的往外赶，还有的不是五类分子、牛鬼蛇神也往外赶。我们地院‘东方红’、北航‘红旗’的同志与自治区党委联系多次却没有解决。我们认为这样做是不合适的，我们找王恩茂同志多次，11月13日找王恩茂等了8个小时都没有解决，我们觉得这是形‘左’实右的，特别在现在自治区有些单位才刚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些在前一时期被打成‘反革命’、‘右派分子’、‘反党分子’的还没有平反。发出这一通令是不是符合中央指示的，我们向您请示。”

康生答："我知道中央没有这个规定，这是情况不了解。运动中把群众打成'反革命'、'右派分子'、'反党分子'、'真右派，假左派'的人不能划成牛鬼蛇神，这些还是革命的。别那样讲，不对。我们自己（指红卫兵组织）不能这样讲，即使这里有牛鬼蛇神，这时也不好处理。"

又有人说："王恩茂同志说：'你替我设身处地地想一想，我当第一书记也是不容易的，不然你们当书记试试看。'请康老反映给毛主席，好好批评批评他。"

康生说："好。这样说共产党也不好当。全人类的命运交给了我们，不仅不好当，有时命也要牺牲。革命怎么那么容易！"

这次交谈至16日晨乌鲁木齐时间2时30分。各单位的人闻讯陆续赶来，想问题，反映情况人很多，飞机要起飞了，接见只好结束。

济南红卫兵代表参加了毛泽东第七次接见红卫兵的活动，10日开会，商议召开批判谭启龙大会的事情。

一些学生认为陶铸、谭震林6日晚接见表态了，王力9日讲话也说了，这次进京的目的达到了，可以回济南解决问题了，因此对开会已不感兴趣。

但是另一部分学生认为，根据王力9日的讲话精神，还是要批判谭启龙的错误。

最后决定，11日在小范围开会，听谭启龙检查。

此时，火气已消的谭启龙，在 11 日的会上，向进京的济南学生作了检查，承认山东省在文化大革命中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犯了方向错误”。一些学生改变了对谭启龙的看法，会后有的红卫兵见了谭启龙也称起“同志”来了。

但是，也有的学生认为谭启龙是假检查，在会上向他提出了很多问题，与谭启龙发生争论。

第二天，学生们开会决定，13 日在国家计委礼堂召开“批判反动路线大会”后，15 日返回济南。

谁知，11 月 13 日的大会上又出了问题。

会上，造反派提出“济南红卫兵师”的问题，谭启龙回答：“不能说‘红卫兵师’是保皇的，反革命的。”

济南学生为此与谭启龙展开辩论，会场气氛紧张。

与谭启龙一起进京的山东省委秘书长于明，赶紧给谭震林打电话汇报，得到指示：以中央办公厅名义，通知谭启龙到中央议事。

于明将谭震林的指示直接告诉了“山东赴京红卫兵服务团”主要负责人赵柏林。可是，正与谭启龙辩论的学生中，有几位就是不让谭启龙离开，要他继续回答问题。

拖延了一段时间后，谭启龙才得以离开会场。但是，会场上造反派气犹未消，当场决定，第二天，即 14 日下午，在北京中山公园召开大会，批斗谭启龙。

后来，他们觉得中山公园太小，又提出要在天安门广场

召开 10 万人大会，游街批斗谭启龙。他们向中央提出 3 点要求：

（1）在天安门广场召开 10 万人大会批判谭启龙;

（2）在京游行（即游街）;

（3）拨给经费和两辆宣传车。

对此，周恩来作了明确答复：

（1）10 万人大会不能开;

（2）游行不能搞;

（3）委托陶铸、谭震林同志出面处理。

济南学生得到通知，说北京不能随便召开大会，另外外地来京串联的学生太多，他们的问题应该回济南继续解决。于是，学生中原来不准备开会的意见占了上风，济南学生准备 11 月 17 日离开北京返回济南。

应学生们的要求，11 月 16 日，陶铸、谭震林再次接见了他们。

陶铸说："明天就要走了，今天给你们送行。你们提提看，还有什么问题。"

赵伯林同学："主要听首长指示。"

陶铸："没有指示，要指示，谭启龙同志指示，他是老山东了。"

接着，陶铸提到这天凌晨周恩来召集北京各机关、企事业单位的紧急会议说："今天开了一万多人的会，大家要搞

好接待，总理亲自讲了话，现在还住 200 多万人，有近 50 万人的住处未解决。近 300 万人等于北京一个人接待一个人，机关、老百姓都住了，只剩下毛主席的住处无人去住了。”

谭震林说：“保卫毛主席这是大道理，小道理要服从大道理，不能坐在国务院门口闹，到这里闹，就是小道理。”

陶铸说：“我们只解决了一个问题，解决问题由谭启龙同志解决，提高觉悟与你们站在一起，坚决革命，你的觉悟是高的，再提高一步嘛！”

谭震林说：“你们回去也要由大道理管小道理，这就要总结经验，省委三级干部会开得不错，正在总结经验。你们也要好好总结经验。学十六条，学毛主席著作，看运动发展到什么程度了，该提出什么问题了。两条路线的斗争，你们看到主席在天安门与少奇同志谈话，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是少奇同志，主席还与他那样客气。那么对谭启龙同志你们应该采取什么态度？主席讲相信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那就得总结经验。1930 年在江西苏区，肃反打 A、B 团。破坏活动是个别的，大部分是内部问题。肃反运动把很多人抓起来了，主席就及时开会，不许逼供信。逼是用各种刑法逼出口供，供了就信，那不是把问题搞乱了！

中央批转军委总政的紧急指示，40 天总结了经验，又写了补充指示。主席是善于抓关键的。你们不是要接班吗？你们是毛泽东时代的青年，要学会及时总结经验是很重要的。

各地区、各单位、各班的情况不同，各方面提出问题的角度也不同，要善于总结经验，不然容易出偏差。文化革命是新东西，除主席及林彪同志、陶铸同志、伯达同志他们明确。我们有的经验是过去整风反右的经验。你们山东的经验是很多的，如朱瑞问题、何明问题……”

“总结经验要与省委充分合作，把文化大革命搞好。省委的同志年龄都大了，敏感性不及你们，你们要推动他们前进，他们有经验，”

谭启龙说：“有框框了。”

谭震林：“就是框框不适应形势。你们帮助，怎么帮法？即主席的公式：‘团结——批评——团结’，在延安整风就提出来了，这是党内 21 年历史的经验总结。主要是总结反对宗派，即王明当时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

他又说：“如何推动山东文化大革命运动？启龙同志支持你们，与你们站在一起。你们要推动省委，如何推动法？你们要总结，不然要犯错误。省委犯了错误，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打击了一些人，现在纠正了，如搞不好，又可能打击另一些人。”

陶铸说：“谭副总理讲得很好。我的话不好懂。”

“我相信山东这次一定可以改得很好，错误大一点，批评严格一点，可以改得好一点。这几天我接触江苏、辽宁及你们三批，接触的同学都很讲道理。我们现在比较超脱，问

题好讲，你们基本上是谈了一次就谈通了，基本问题是好好总结经验，基本问题是领导上信任群众不够，深入群众不够。谭启龙同志，你过去到过学校多少次？你到山东十三、四年来深入学校，批评你，十三、四个小时算什么！我是不赞成搞十三、四个钟头的，我们长期不深入学生，这个批评是好的。

这次来北京是谁的责任？还是谭启龙的责任。你当时好好检讨就解决了。你说：要去，全体书记都去。大家批评，不要发火嘛！过去我们做官当老爷嘛！过去我们做官当老爷做惯了，我们是有贴大字报的必要。主席、林彪同志、总理不能贴大字报。

这次来京，是谭启龙和省委负责，不是你们负责。你犯了错误，人家批评，你还发脾气，不对嘛！”

陶铸接着说：“一、回去怎么办？把山东文化大革命搞好，帮助省委改正错误，回去先开好三级干部会。二、两条路线的斗争要抓。三、黑材料问题。你们有问题没有？四、平反问题。执行错误路线各地都存在，打击了一部分好同志，搞错了的要彻底清查历史的问题，是历史问题，有人历史上参加过三青团……。这次因为贴了大字报，你把人家打成反革命的一定要平反。六大自由嘛！人家批评领导，就叫攻击领导？即使批评错了，也不是作结论嘛！只要不是杀人，放火……，对运动中批评、贴大字报的要保护，要坚决彻底。”

青岛渔业公司的韩同文同学说："青岛工人就打了好几千？哪有那么多反革命！要坚决平反。"

陶铸接着说："五、斗争的问题。这是一场尖锐、复杂的斗争，是两个阶级你死我活的斗争。资本主义思想不消灭，它就要复辟，要消灭资产阶级，它就反抗。斗争是复杂的，如：刘志坚家两个孩子，一个拥护郭影秋，一个反对郭影秋，要坚决斗争。六、农村、工厂四清派工作组，这不叫路线错误。《二十三条》是肯定了工作组的。农村分散，组织松散，必须有工作组撑贫下中农的腰；工厂也需要工作组撑工人的腰，那是帮助群众起来揭盖子。学生不同，有文化，能学主席著作，能看报纸，这次派工作组是群众起来了。派工作组是镇压运动，和四清不一样。"

对工厂的运动怎么搞？陶铸说："工人要支持革命，工厂即使搞了四清，也还要搞文化大革命。未搞四清的结合搞，工厂今后可能不要派工作组。学生可以到工厂参加劳动，到俱乐部、到食堂，放假时到工人家里去串联，但是要依靠工人自己革命，要相信工人老大哥。但工厂不能离开生产搞革命，只能业余时间搞革命，不能中断领导。生产计划性很强，要有领导，大家都按规程操作，遵守劳动纪律。"

有人问："能不能到医院串联？"

陶铸答："医院可以到办公室座谈，到宿舍，但不能干涉医生的医疗，送大字报可以，串联到宿舍交朋友可以。工

人利用礼拜天，晚上也可以去串联。但不能停止生产来串联。你拿工资不能生产不行，只能利用业余时间。

工厂怎么搞法，中央正在研究，它与学校不一样，不能离开生产岗位，不能占用生产时间。

农村也可以采取工厂的办法，可以去串联，但不能去多了。”

谭启龙表态说：“完全同意陶铸、谭震林同志作的指示，我们一定向三干会传达，认真对待这些指示，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同时，一定向全省人民、学生作彻底检查，一次不行，再次、三次。”

陶铸：“搞七次也可以嘛，七擒孟获嘛！有三擒三纵就行了。诸葛亮还把敌我矛盾当内部矛盾处理呢！谭启龙同志到山东 13 年，主持省委工作 5 年来，还是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山东的工作这几年搞得比较好嘛，只是 50 多天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次态度不好。山东省委是认识问题。执行问题，是人民内部矛盾问题。”

## 第287回：回济南，山东继续“三干会”

## 缠卫恒，撤出晋祠返城中

11 月 17 日谭启龙回到济南，继续主持“三级干部会议”。18 日，他在济南军区五所召开的省委常委扩大会上，向常委们介绍了富有传奇色彩的北京之行，不无高兴地传达了陶铸关于山东省委是“内部问题”的讲话，表态支持造反派，但是据说他在会上也落泪了，哭了。他还指示把陶铸讲话的记录稿大量印刷，发往全省，向主要造反组织派联络员，省委书记处书记、副省长苏毅然去山大“主义兵”，省委秘书长于明去“红济指”，省委办公厅副主任许剑波去“山红联”。同时决定，给在文革中受到迫害的泰安国恕连、济宁张俭等人平反。

在谭启龙被押赴北京期间，山东省的三级干部们继续进行座谈讨论。他们在称赞过“文化大革命形势大好、取得了极其伟大的成绩”之后，便开始谈各自的想不通，始而试探，继而议论纷纷，终于慷慨激昂起来：

“戴高帽子，挂黑牌子，游街，打人骂人，剃阴阳头，半夜跳墙抄干部宿舍，还要说他们是革命闯将。就是想不通。难道这算干革命？干革命就是要这样的闯将？”

“什么敢死队、尖刀班、造反队，一听就感到不舒服。”

“我县保证不会发生群众斗群众，我给他们磕头作揖也不能让他们斗学生。”

“运动初期派工作组认为是对头的，后来就批是方向路线错误；总理讲话文化革命的主要任务是搞好本单位斗批改，后来又提出革命大串联，学生冲了机关；林彪同志讲了要炮打什么样的司令部，又觉得运动的高潮差不多了，乱到头了，应该转向正规了，但想不到 10 月 1 号又提出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我们工作组并没有挑动学生斗学生，而学生就是揪住不放。难道工作组办的事都是错误的吗？到现在我们就是不承认是犯了方向路线错误。”

“这次运动，中央没有具体指示，只能靠报纸社论和中央领导人接见红卫兵的讲话办事。有些问题请示中央文革，又不回答，真是不好掌握。”

“错误路线执行者，这个官比提出错误路线的官难做得多。两个发明者的检讨，还没有我们执行者挖得深。”

“比较难的是又要让他们冲，又要领导他们；不是我去领导，是最高指示去领导……”

11 月 23 日，山东省“三级干部会”向与会者下发了谭启龙的一份检查稿。检查稿中说：“在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以我为首的山东省委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我是第一书记，又是省委文化革命现任组长，这个错误的责任应该由我来负。”

检查稿最后说："我们诚恳地欢迎广大革命师生、革命群众、革命干部、首先是到会的同志们'炮轰省委'、'火烧谭启龙'，揭发批判我们的错误。"

谭启龙看了前段会议的简报，看到他的同事和部下们流露的思想，他深有同感。但是作为第一书记，作为一个地方的当家人，他还是以自己的内心感受诚恳地说服大家：

"毛主席狠心发动这场大革命，七次接见学生，让这么多人到北京、到全国去跑，中南海也去了，所有游览的地方统统开放接待学生，总要有个道理。主席为什么这样干？是不是主席要把我们统统打倒？把生产搞乱？主席有个远大目标……思想上的革命究竟怎样完成、怎样过渡到共产主义？采取什么方法消灭人的私有观念？这是个大事。他不惜一切代价，火车停下来，学校停一年，中央机关全部干这个事。为什么？大家集中从头至尾，把这个问题想一想，这里边有个大道理。我们要相信主席这个的道理是正确的。"

山东"三级干部会议"全体与会人员于 11 月 25 日参加了山东大学"红色敢死队"召开的"控诉山东省委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26 日参加了由山大"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组织的"红卫兵山东革命造反联络总站"，简称"红联站"召开的批判省委大会，27 日参加了"红卫兵济南指挥部"召开的批判省委的大会。还于 11 月 27 日、28 日参观了分别

由“红卫兵济南指挥部”和“济南红卫兵师”举办的文化革命“造反”展览会。

11 月 29 日，山东三干会会议结束，干部们匆匆回到了自己的岗位。

说罢山东再讲山西：11 月 8 日晚，“山西省革命造反兵团”刘灏在没有和“红联站”通气的情况下，带人来到了晋祠宾馆，一下子就把正在准备开会的卫恒堵在了屋子里，“山西省革命造反兵团”与“首都赴晋革命造反大队”和当天刚成立的“山西革命工人造反兵团”共数百人将卫恒“请”到“兵团”的驻地——山西省第一招待所。省委第一书记明白，刘灏口口声声那个“请”字，其实和“揪”字的含义相同。而这驻地，还是卫恒亲自批准给“山西省革命造反兵团”使用的。与卫恒一起来的，还有省委书记处另一位书记王大任。

到了那里，刘灏代表“兵团”，向卫恒提出了八项要求：

一、交出卫恒历年来的讲话稿;

二、交出整群众的所谓黑材料;

三、造反组织召开的批判大会，卫恒必须随叫随到;

四、宣布贾俊代理太原市委第一书记是不合法的;

五、撤销省委派驻各单位的工作组、联络员和没有卫恒的“卫恒”(意指卫恒的代理人);

六、为被整的群众彻底平反;

七、广播车应由造反派调用;

八、各造反兵团在省委设立联络站。

并要求卫恒在上面签字。

卫恒给出六点答复：

一、对八项要求，我无权答复，省委也不能答复;

二、迅速地积极地为被整的群众平反;

三、袁振问题是党内问题，材料不能给;

四、11 日以前撤出派驻太原市委的全体工作人员，贾俊除外;

五、要求撤销贾俊职务由省委研究，10 日前再给答复;

六、录音机去购买，时间不能马上定。

辩论中，卫恒承认，山西省委执行了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主要表现在：

1、运动之初，下令维持现状，不准革命学生起来干革命；

2、派工作组，联络组镇压学生运动，至今尚有一小部分未撤；

3、对学生进行排队，把革命学生打成右派，反革命；

4、提出伸手派,野心家转移斗争目标，打击革命群众；

他也承认,李雪峰 6 月份提出的“八条”他都执行了。但是，对小将们提出的八项要求，他坚持不松口。

白天过去了，夜晚来临了，一方坚持八条要求步步紧逼，一方坚守六条原则毫不松口。这种名为“谈判”实为揪斗的

对峙，就这样僵持着。

一天一夜了，“兵团”的小将们可以轮番上阵，他们要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热血涌动，加上年轻体壮，一个个是越战越勇。可年龄已 50 出头的卫恒，喝不上一口水，闭不得一下眼，头脑渐渐地昏昏然，体力越来越不支了。早有准备的刘灏和他的战友们一改战法，使出了第二招，他们和“北航播火”、“北农机全无敌”要求：“毛主席早有最高指示，大鸣大放大辩论。你不是死活不同意我们的八项要求吗？那好，咱们就到太原市最热闹的五一广场大辩论去，让参加三干会的干部们和全太原市的工人群众，都停工停产来听听，看究竟是你卫恒有理？还是我们革命造反派有理？”

还不等卫恒听明白，一份早已拟好的《海报》，就递到了卫恒的面前。

“我看这海报就不要贴了，停工停产更不行呀……”省委第一书记几乎变成商量的口气了。

“怎么？你还想以生产压革命？不敢去五一广场，你是不是怕群众？你不敢公开辩论袁振问题，是不是还想迫害袁振……”

省委第一书记无言以对。

刘灏将那张海报放在了卫恒的面前。其他小将们继续在口口声声地讨伐卫恒，让他快快签字。

9 日凌晨 4 时左右，卫恒终于掏出他那支签发过山西省

委许多重要文件的钢笔，面对这张“兵团”的《海报》，在刘灏指定地方签上了自己的名字。这是省委第一书记的退缩，也是卫恒在特定形势下无奈的一种选择。有最高指示让他们这些人“到群众中去”，有中央工作会议的最新精神，让他们这些人检查自己。或许，还有渐渐不支的体力状态，和头脑昏昏然中，想急于要结束这种“谈判”的心态……

刘灏一把抢过这张有卫恒签字同意的《海报》草稿，一边安排人把卫恒送回省委，一边按捺不住心头胜利的喜悦，夺门而出，安排另外的手下立即印制《海报》，当天务必贴满太原市。

黎明前，卫恒终于被刘灏派出的几个学生送回省委机关，当他向一直等他的其他省委领导通报了自己签字的情况后，由王谦省长带头，其他领导当即对他们的第一书记提出批评，认为他这样做，容易引起大会辩论时群众斗群众，还会削弱党在群众中的威信，使省委对运动的领导走向被动。

第一书记接受了他们的批评，当即以个人名义写出了《关于十一月九日〈海报〉声明》，称：“以个人名义同学生签订《海报》是错误的，希望机关干部、职工、市民不要同学生辩论，不要干预学生运动，不要与学生发生冲突”。说他同意和学生辩论袁振问题是“党内问题还是党外问题”是犯了错误，是转移了斗争大方向。同时又说，学生的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并大声“疾呼”：“全市革命同志向我开

火。”并于 10 日将他的这份个人声明公布于社会。而此时，“兵团”印制好的那张有卫恒的签字《海报》早已贴满省城太原的大街小巷了。

省委第一书记要退，一心要将卫恒揪到五一广场的刘灏岂能让“兵团”在社会上言而无信？“兵团”于当天也贴出了声明，向社会宣布与卫恒的辩论会将如期举行。声明中宣称：“袁振问题是山西文化大革命的关键，不懂袁振问题就是不懂山西文化大革命的问题。”

10 日下午 14 时不到，“兵团”与“首都赴晋造反大队”联手，又召集了一些省城的其他群众造反组织，在五一广场举行了集会，同时派人赶到省委，勒令卫恒必须如约到会参加辩论。

造反派们要与省委第一书记卫恒在五一广场公开辩论，这在山西还是首次！这天下午，太原五一广场上，骤然聚集的人群越来越多，人山人海，应该不少于 30 万人。18 岁的刘灏司令第一次站在广场的主席台上，身旁是自己的战友们，台下是自己的将士们，望着兵团的大旗在风中高高飘扬，看着广场上黑压压的一片人群，他的自我感觉进入了从未有过的状态，他沉浸在一种革命的激情和幸福感之中。

然而，此时的刘灏万万没有想到，那些坚持要保卫省委的群众组织，也悄然无声地聚集在广场了。特别是“革命工人联合会”，他们的会长张志安可不是等闲之辈。你刘司令

不是要与省委第一书记辩论吗？由张会长组织的“革命工人联合会”大批人马，也从四面八方到会了。虽然没有人扛出他们的大旗，但人员早已分批混在了广场的人群中，而且更多的人，是混在了主席台四周靠前的人群中。

下午 14 时 40 分，一辆黑色的小轿车，悄然停在了广场西侧的人民银行大楼下。卫恒来了。没有人注意到他。已经变成人山人海的广场，小车无法进去，卫恒只有慢慢地穿过人群，迈着沉重的步伐向主席台走去。他的心情一定太复杂也太矛盾了。他明白，不来，会授学生们以把柄。更重要的，是毛主席在北京一次又一次地接见红卫兵小将，身为省委的第一书记，怎么能怕红卫兵和革命学生，不敢到他们中间来呢？而来了，一定会使拥护省委的群众与学生们产生冲突。何况，他心中明白，刘灏要与他辩论袁振问题，出头的是一个中学生娃娃，背后的支持者，却是他认定在华北局前门饭店会议上犯了严重错误的袁振。在这一点上，他不能示弱。

那真是一段虽短，但对此时的卫恒却显得格外漫长的距离。他终于走上了以往十一国庆节和五一劳动节时，他站在上面向集会的群众讲话的主席台，来到了刘灏的身边。

“规定两点开会，你怎么现在才到？”刘司令对卫恒一声喝斥，仿佛将军在喝斥一位士兵。

麦克风里当即传出卫恒的回答，声音通过大喇叭，传遍了五一广场：“我是走过来的，所以误了点时间。”

直到此时，台下的群众才知道那位站到刘司令身边的老人，就是堂堂的省委第一书记卫恒。应该说，卫恒的回答并没有错误。“走过来”，自然是从人民银行大楼那边走过来的。可广场上的群众，却可以理解成卫恒是从省委“走过来”的。本来就对闹哄哄的学生运动不理解，只是怕当反革命不敢说罢了。此时对卫恒这句话的理解，便让台下的许多群众对卫恒有了同情心。黑压压的广场上，出现了一片嘈杂声。台上早有准备的小将们开始高呼口号：

“炮轰黑省委！”

“打倒山西的土皇帝卫恒！”

口号刚刚呼完，刘灏正要准备发言时，早有一位年轻的工人跳上了主席台，一把夺过麦克风，开始发言。

这真是半路上杀出个“程咬金”，刘灏和他的诸位战友们还没有弄清楚来者何人，却听到那人一阵滔滔雄辩，却不是在批“黑省委”和省委第一书记卫恒，而是把矛头对准了“兵团”和“兵团”的刘司令。

台上还没来得及乱，广场上的人群先乱了。支持“兵团”和反对“兵团”的群众开始辩论，后来对骂，接着动了手。更有“工人联合会”的会员们，将早就备好的砖头往主席台上的“兵团”小将们身上抛去。18 岁的刘司令，完全失去了控制局面的能力。他只能与他的那些战友们一道，押住卫恒，让他承认自己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是在挑动群众斗群

众。

卫恒坚决既不低头也不认罪。他从反扭他手臂的学生们中挣扎出来，高举起双臂向台下舞动着，对着麦克风大喊："同志们，向我开炮，把矛头对准我！"

这颇有电影《英雄儿女》中拿着爆破筒冲向美军的英雄王成的风范，这宏亮而又颤抖的喊声，在五一广场上空回荡着，更加激起了群众对"兵团"的义愤，广场上的混乱加剧，主席台四周也更乱了。"工人联合会"的工人弟兄们，在他们的头头张志安的带领下，先将为数不多的学生们分隔开，又蜂拥而上，从主席台上将省委第一书记"劫持"而去。

卫恒被救，而刘灏和他的"兵团"战士们，直到华灯初放时，依然被观点不同的工人和学生们围困在广场辩论，不能离开。

毕竟人少，炮轰省委的学生们嘶哑的声音，辩驳不过众人之口，一个个趁乱开溜了。在原本计划大获全胜的这场战斗中，"兵团"的小将们失却了英雄本色，铩羽而归。

卫恒刚刚脱离五一广场"兵团"的重围，谁知又在晋祠遇到新的难题。

当"兵团"将卫恒和王大任揪到第一招待所辩论时，"太工红旗"的头头李青山一直都在现场。他没有说话，但心里已有了计划："太工红旗"要再造省委三级干部会的反。于是，在 11 月 9 日上午 8 时，"红色造反联络站"、"山西革

命造反兵团”、“首都赴晋革命造反大队”500多名学生齐集省第二招待所“红联站”本部。各方面负责人碰头研究，组成了“造反指挥7人核心小组”，随后分乘7辆卡车,分两批出发,直奔晋祠。此前,“太工红旗”的宣传车，已在“太工红旗”的于永革，李宪林率领下，先期到达晋祠。

学生们认为，以卫恒为首的山西省委召开的三干会不符合中央精神,名义上召开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三干会,实际上却仍然拒不撤除工作组，拒不交出卫恒7月18日在万人大会上的报告，拒不执行中央批转的军委总政的《紧急指示》。学生在省委带领下封的7个柜子有5个是空的。因此，必须造反！他们要求在三干会上：

1、卫恒等人必须彻底交待自己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破坏文化大革命的严重罪行，立即严惩迫害革命学生的凶手;

2、卫恒必须撤走以贾俊为首的驻太原市委工作组;

3、省委必须立即惩处拒不执行中央批转的军委总政的“紧急指示”，多次欺骗革命学生的首要分子王大任、李明温。罢李明温的官,令王大任当众作检查;

4、省委必须令卫恒立即交出7月18日的报告录音;

5、必须立即澄清袁振问题;

6、必须有革命学生参加。

学生们到达晋祠宾馆后，卫恒不在，他正忙着发表关于

下午袁振问题辩论会的声明。王大任出来接见学生。此时，三干会已经开不下去了，参加三干会的干部都到现场听学生们和王大任的辩论。

中午 13 时，学生们宣布造反开始。他们派纠察队,到招待所开会的各房间贴大字报,分头参加三干会的代表们座谈。参加三干会的干部也是各级领导，他们许多人的看法是和省委一致的。很快，许多小组学生和干部也展开了辩论。

座谈约一小时后，学生们又集合起来，开揭发批判会。由“兵团”、“红联站”及“北航红旗”的代表发言。最后,他们认为：“三干会分摊开是一个大阴谋,必须立即合起来,会址由晋祠搬回城里。”

对学生们的这一要求，王大任称作不了主，正好卫恒回到了晋祠，学生们立即将他围了起来。

在一片吵嚷声中，卫恒终于听明白了学生们的要求。筹备一次会议哪有这么简单，怎么可能说搬就搬呢？对学生们振振有词的“革命”要求，他一点办法也没有，只能耐心的解释说：“这怎么行呢？没有准备好呀，吃的、住的都不现成呀，都需要筹备呀……”等等。

学生们自有办法，他们说：“住的地方由我们解决。没有汽车，就先用我们带来的车。革命，就要只争朝夕。”

卫恒还能说什么？反正开三干会也是为了搞好文化大革命，学生们说怎么办就怎么办吧。

下午18时30分,参加三干会的干部，分乘多辆卡车，在学生们的一片掌声中被带进城。到了11月14日，山西“红联站”的大学生又强行解散了省委三干会的秘书处，然后由他们组建起了自己的秘书处，要让省委靠边站，由他们来领导正在进行的省委三干会。然而，令他们没想到的是，他们的这个秘书处却指挥不动与会者，与会者一个个全不见了。原来，省委不得不将正在进行的三干会转入地下，在省人委礼堂和省邮电局电话会议室，由卫恒和其他领导分别做了会议总结和下一步工作的安排。

山西“兵团”与“红联站”的造反行动，促使山西从官场到民间，当即形成了两派观点：山西省委是红是黑？对省委的盖子是揭是捂？是革是保？不同的认识，成了社会上各派群众组织斗争的焦点。

那位曾拍着胸膛要支持刘灏的工人阶级杨成效，此时已不甘心做“兵团冶金第一团”小小的团长了。这个杨团长另立山头，成立了“十三冶革命造反决死纵队”，自封司令，再不接受刘司令的管辖。他以新的身份来见刘司令，成了堂堂的司令对司令的对话：“我决死纵队照样支持你们兵团炮轰‘黑省委’，为我们的好经理袁振翻案!”

11 月 12 日，由“山西革命造反兵团”发起，在北京体育馆召开“彻底批判山西省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誓师大会”，号召山西赴京串联的红卫兵回山西和卫恒斗争。同一天，

“红联站”和“山西革命造反兵团”在北京强行占据山西驻京办事处，并设立由他们组织的“山西造反派驻京联络站”。

第二天，11 月 13 日，在太原的“山西革命造反兵团”抢占贾俊在太原市委的办公室。

## 第288回：提要求，安徽省委要检讨　刘宁一、谢富治表态支持

我们再看此时的安徽：10 月 18 日，合肥地区大中学校“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成立，简称“827”。随后，各专区、市、县也都成立了造反派的各种联合组织。

中央工作会议结束后，“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根据传出来的中央会议精神，坚决要求省委向全省人民公开作检讨，检讨省委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犯了方向路线错误。

11 月 5 日，负责与合肥“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联系的安徽省总工会主席陈庆泉到司令部找到“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头头梁守福说：“下午三点张凯帆同志在稻香楼东四楼一楼和你见面，具体商讨省委检查问题。”

梁守福和胡玉才、吴祚云 3 人按时赶到，陈庆泉也赶到了。大概快到 16 时，原安徽省副省长、时任安徽省政协副主席的张凯帆到了。梁守福等人质问张凯帆为什么迟到，开始就不讲信用？并说：“今天不谈了，跟一个不讲信用的人谈也白谈。”

说完站起来就要离开，陈庆泉赶紧拉住梁永福，又是道歉，又是赔不是，学生们这才又坐下来。

梁守福一开始就向张凯帆提一个问题：“今天你是代表省委，还是代表你个人？”

张凯帆答：“当然代表省委。”

“省委信任你吗？” 梁守福又问了他一句。

张凯帆回答说：“省委派我来，当然信任我。”

“你同我们商定的问题能算数吗？”学生问。

“没有把握的问题我会向省委汇报。”张恺帆答。

学生们提出：李葆华在检查中必须承认：省委犯了方向性错误，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制造的“827”事件是反革命事件；镇压“827”革命造反队是反革命行为；解散省委策划的保守组织等内容。

在会议规模和形式上，他们要求：应在省体育场召开 20 万人大会公开检查，同时要向全省直播；会议由“827”主持；安全由省委负责等。

张凯帆说：“你们提的这些条件，有的我现在就可以答应你们，比方省委犯了方向性错误，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些大的原则问题，我们省委必须要承认。至于反革命事件这类的东西，你们也考虑换换提法，如果你们一定坚持，我要向省委常委汇报。在体育场召开 20 万大会，我可以明确地回答你们做不到。不是怕开 20 万人大会，而是省体育场容纳不下，大家不能站着开会，坐下来最多容纳 10 万人，这个我们早测算过。加上体育场两边的进出走道，最多再加 2 万人，共 12 万人。至于会由谁来主持，我看我们再商量。”

第一次的谈判就这样结束了。

又过了两天，陈庆泉又来通知梁守福他们：老时间，老地点，张凯帆再和你们商量省委检查的问题。

这次大家都如期赴会。一见面后，梁永福就问：“你说过的话有多少能兑现？”

张凯帆说：“所以今天请你们来再商量。”

梁守福又说："李葆华的检查要先经'827'审查。"

张凯帆说:"这有困难,省委常委还未定稿，怎么给你们?你们看了不同意，省委怎么办?改来改去,改到什么时候？"

他又说:"我答应你们，省委承认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但省委认为承认犯了路线错误就包括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不需要再单独提出来。"

这天,"827"同张恺帆很快达成协议:在省体育场召开15万人大会，李葆华代表省委公开向全省人民检讨文革初期所犯路线错误，会议还是由省委主持。商定后，梁守福又问张恺帆一句:"这次我们做了这么多的让步，你说的话应该算数了吧?"

张凯帆很干脆地讲:"一定算数，一定算数"。

11月9日，中共安徽省委召开三级干部会议，传达中央10月工作会议精神。李葆华代表省委作了《在文化大革命中所犯路线错误的初步检查》。当晚，部分群众冲进三级干部会议住地稻香楼，围攻、批斗李葆华等省委主要领导，冲散了三级干部会。

陈庆泉给梁守福他们打电话说:"省委不开大会作检查了,以书面检查代替。"

梁守福带着受骗的气愤，在电话里警告陈庆泉说："省委不要错过这次改过的机会，错过了，你们以后会后悔的，再想得到这样宽松的检查条件就不可能了。你把我的话转告给张恺帆，让省委等着吧!"

这顿火发的果然有效。不多会儿，陈庆泉通知梁守福："张恺帆同志想很快再同你们谈谈。"

梁永福说："还有什么好谈的？说话不算数，谈了也没用。"

经过陈庆泉的劝说，最终，梁永福还是同张恺帆见了面，最后双方商定，于 11 月 11 日上午，在省体育场召开 15 万人大会。由李葆华代表中共安徽省委向安徽全体人民作检讨。

梁永福不放心，又问了一句："这一回该算数了吧？"

张恺帆说："没有问题。"

梁永福说："那我就通知大家如期赶到会场。"

张恺帆说："你通知吧。"

没想到，到了 10 日晚，梁永福突然接到省委通知："11 日上午天气不好，大会改到下午。"

到了 11 日上午 10 点多钟，又通知他们："下午的会取消，什么时候开，另行通知。"

这时，梁守福明确地告诉省委："这次改不了啦，许多远路学校的学生已经走到半路了，下午不要说是下雨，就是下刀子也得开。别的群众组织能不能去，我管不了，但'827'的学生肯定会到，我们不怕雨淋。"

就这样，"827"万余师生在下午 13 时左右都赶到了省体育场。

这时，天已下起了小雨，同学们冒着小雨整齐地坐在地上，等省委开会。到了下午 15 时，主席台上仍然空无一人，同学们愤怒了。开着宣传车到长江路游行。这时雨也大了，游行队伍到省委北门口停下来，高呼："李葆华滚出来！""捉拿李葆华！"等口号。结果仍不见李葆华的踪影。于是游行队伍又来到稻香楼宾馆。

由于稻香楼地方小，“827”临时疏散一部分师生返校，留下远路的同学，坐在各楼层的大厅、走廊和小礼堂里。服务员接到通知，将卧室房门全部打开让学生们进去休息，但是没有一个人走进房门。他们怕是陷阱，再搞出第二个“稻香楼事件”。大家就穿着湿透的衣服，互相依偎着取暖，连到处走动的人都没有。

同学们一直等到 12 日清晨 5 点钟左右，李葆华终于在梁永福和李文安等几个学生头头的簇拥下，走上了小礼堂的舞台，台下群情激奋。

他们走到麦克风前，梁永福首先质问说：“李葆华你为什么这个时候才来？省委说话不算数？”

李葆华说：“我对不起同学们，我来迟了。我现在来，就是向同学们赔礼道歉，赔罪的。”

下面的同学喊：“我们不想听你赔罪，回答我们，你为什么骗我们？”

李葆华说：“省委不是有意骗你们，主要是怕人多开大会，情绪难控制，怕在会场出现大的冲突。”

同学们与李葆华你来我往在小礼堂里折腾了半个小时。由于大家都是是一夜无眠，梁永福和台上几个学生头头商量了一下，除留下数人与李葆华继续交涉外，大部分同学回校休息。

大家走后，梁永福又提议是不是让李葆华也先回去，大家等省委通知再谈。

他的提议遭到在场多数人的反对，李文安认为：“将李葆华放走

了，以后我们到哪里再能找到他？”他提议：“我带工学院的几个同学留下与李葆华继续谈判，你们先回去。”

梁永福对他说：“现在稻香楼里的学生不全是‘827’的，还有蚌埠商学院、芜湖电校等外地的学生，要注意李葆华的安全。”

李文安很有把握地说：“梁司令你放心，我带安工十几个同学在这里，哪个也不敢碰他一根毫毛”。

就这样，李葆华在稻香楼被学生扣留下来，与他一起来的安徽省委常务书记、副省长李任之也被扣下。

就在11月12日这天，已在北京等候了一个多月的安徽合肥工大、安徽工学院、安徽医学院、安徽农学院的“827”革命造反队和安徽医学院“红旗战斗队”的代表受到谢富治、刘宁一的接见。

谢富治首先表示：“我个人还有刘宁一同志两个人，对你们表示热烈欢迎！向来北京的革命学生，干部，工人，教职员工问好！并通过你们来京的革命同志向安徽革命人民问好。你们来京时间很长了，听说有40多天了，国务院的同志没有抽出时间来见大家，这也是我们工作的缺点。从这一点来说，我们工作有缺点，也是我们最大的抱歉。”

刘宁一在接见时针对工厂文革问题回答说：“工人要提倡在工厂自己闹革命，以前没说，来了也不是犯法，像安庆那个工人是被逼得没法生存，就来京告状嘛，这不是一回事！”

11 月 14 日，谢富治、刘宁一再次接见安徽“827”代表。刘宁一先到。他说：“我先来了，谢副总理还在开会，没有来，还有什么意见？”

同学们说："前天，首长接见了我们4个多小时，今天又接见我们，我们十分高兴。首长教导我们坚决地站在毛主席一边。不论在什么时候，什么单位，在什么范围，都要同那些反对群众，压制群众，甚至迫害群众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作坚决的斗争。首长还教导我们，要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锻炼自己。我们坚决将首长的指示带回去，传达给大家，照着做。但是，首长给我们的回答有两个问题还不够明确，一个是我们斗争的大方向是否正确；一个是我们的组织是革命的还是不革命的？请首长予以明确的指示。"

又一个同学说："安徽的问题比较复杂，他们硬要把我们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刘秀山联系在一起。"

刘宁一："你们和刘秀山没有关系。"他重复说了三次，"刘秀山和你们不是一回事嘛！我们认为你们是革命的，你们的大方向是正确的，我们不仅这样答复了，我们还讨论过了，还要把我们的意见通知安徽省委，通知蚌埠市委，通知安庆地委，"

刘宁一的每一句话都被热烈地掌声淹没。他接着说："这不是很明确嘛！这个意见不是我个人的，是我们研究的。我们告诉你们，反正我们的研究是一致的。为了郑重起见，我们又一道来了，谢副总理还有事，晚来一会。你们贴大字报，就遭到围攻，今后还要贴。"

同学说："我们认为安徽省委的问题是很严重的，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以后，李葆华还没有改正错误，原来答应开15万人大会作检讨，以后又不答应，后来又同意，最后还没有开。"

刘宁一："可能是这个原因，这次中央工作会议要求各级干部开

会，好好消化消化，有错误就应认真作检查，这次会议的精神体现在两个社论上，一个是《红旗》十四期社论，一个是《解放军报》社论《再论提倡一个公字》。认真讨论中央文件，好好体会，认真执行毛泽东的思想，认真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批判怕字当头，批判错误路线，批判压制革命，反对革命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暂时让他们开会。”

谢富治来了，大家起来热烈鼓掌，一一握手。刘宁一对谢富治说：“他们就是问两个问题：一个是他们的大方向是否正确，一个是问他们的组织是不是革命的。我说我们认为你们的大方向当然是正确的，你们的组织当然是革命的。”

谢富治：“那好得很，他代表我们两个人的意见，实际上他代表许多人，我们跟中央同志，陶铸同志，总理都讨论过了。我们还要打电话告诉你们省委。你们赶快回去，坚决站在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一边，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我们坚决支持你们。”

刘宁一对谢富治说：“李葆华还未开大会检查，可能在开三干会，学习。”

谢富治说：“前次我们有些情况还不够清楚，还不大敢讲呢。……现在我们已经研究过了。坚决支持你们！”

谢富治、刘宁一还说：“合肥‘八二七’革命造反队，名字太小，应该改成‘安徽省八二七革命造反兵团’。”

刘宁一当场为他们题写“八二七革命造反兵团”，以示支持和鼓励。

谢富治可能已经知道李葆华在稻香楼被扣的事情，他说："听说合肥很热闹，你们赶快回去，积极参加战斗，掌握政策，掌握政策就是胜利。"

同学问："合肥工人成立了'革命造反司令部'，是否合法？"

刘宁一："这个问题中央正在研究，组织起来了也是合法的。"

同学们说："首长很忙，就说到这儿！"

安徽省委书记任质斌将李葆华、李任之被学生扣押的情况向华东局魏文伯做了汇报，他说："李葆华神志不清，血压升高，再搞下去就有生命危险。"

华东局立即向中央写了报告。11 月 14 日，周恩来在中共中央华东局关于中共安徽省委两位书记被连续批斗的情况反映上批示："请陶铸同志以电话找安徽省委一谈。如情况属实，请找'八二七造反团'负责人以电话交涉，无论如何要放出李葆华、李任之两同志，让他们回家休息"。

陶铸根据周恩来的批示给安徽省委打来电话说："李葆华同志从现在情况看是人民内部矛盾，可以批判；李葆华在神志不清的情况下答应的问题不算数；扣留李葆华同志是错误的，应立即放掉他，让他回省委工作。"

梁守福看到陶铸电话指示的传单后，赶紧跑到稻香楼了解情况。他先见到李文安带着两个同学站在楼道里，便问李文安："你们站在这里干什么？"

李文安回答说："保护李葆华。"

梁守福问李葆华的情况怎样？李文安说：“李葆华很好，吃得饱，睡得香，比他在省委好。我们站岗，谁敢碰他？”

梁守福问：“李葆华现在哪里？”

李文安说：“他在会议室接待蚌埠商学院的代表，正在谈问题。你要不要看看？”

梁守福看到李葆华正在会议室里低头记东西，状况确实很好，也就放心了。接着，他和李文安说起陶铸电话的事情。

李文安说：“我知道，他们造谣”。

梁守福说：“能不能尽快将李葆华放掉，否则矛盾会激化。”

李文安说：“矛盾激化了才好，解决问题就快了。现在不是我们说了算，外地串联队扣住不放”。

梁守福说：“那不行，做工作一定要放人。”

李文安答应。

第 289 回：大混战，稻香楼流血三天　步步退，江渭清仍掌局面

11 月 15 日的中午，安徽省工会主席陈庆泉又到合肥工业大学“八二七红卫兵造反司令部”找梁守福谈放李葆华的问题。梁守福说：“我到稻香楼去过了，李葆华的情况不像造谣传单说的那样，他很好。李文安答应做外地串联队工作，很快就放”。

这时，在稻香楼宾馆外面已经围聚了许多人，要求放了李葆华。下午 16 时左右，李葆华出现在东头三楼的阳台上，拥在楼前的一些稻香楼服务员，对着李葆华反复大喊：“下来！下来！”

李葆华没有下来，他用双手指着胸脯对大家说：“同志们，我在这里身体很好，很安全，请大家放心。我们省委在很多重大问题上犯了错误，大家有权力批评；你们大家也有权力批评。我没有站在桌子上，我在台子前讲话，桌子上还有开水。同志们回去，我很快就回省委去。”

讲完后，李葆华就进去了。

当天下午 17 时左右，一辆绿色高蓬吉普车来到稻香楼东门停下来。司机和守门人耳语了几句，车子就进去了，停在距边门不远的岔道口上。又过了大约 10 分钟左右，东边门外传来轰轰的人声和口号声，由远而近，他们是纺织厂的工人队伍。接着，“合肥地区大中学校红卫兵总部”的人也来了。李葆华再次出现在东头的阳台上。楼下的同学和工人造反组织人不多，有一位同学搬来一个椅子让李葆华坐下。李葆华对楼下群众挥了挥手说：“同志们：我身体很好，没有昏倒，没有武斗”。

楼下的人依然高喊：“下来！下来！”

李葆华指着自己的喉咙，拍拍身边省总工会主席陈庆泉的肩。陈庆泉抬高嗓门喊：“葆华同志委托我代表他讲话，他叫大家回去，回去！他很快就回省委！”

讲话再次被楼下人群的喊声打断：“不要你讲！不要你讲！我们要李葆华下来，一起回去。”

李葆华又叫身边的另一个胖一点的干部讲。这个干部说：“葆华同志马上就回省委去。”

下面的人群坚持要和李葆华一起走，李葆华又进去了。

接着有人从窗户爬到讲台上，搬起椅子砸向里面的学生，接着里面又传出“打人了！打人了！”的呼喊声，冲进去的工人在三楼高喊：“同志们，冲啊！”“‘827’把李葆华书记架走了，冲啊！”

就这样，在一片混乱中，一群人前拥后挤地将李葆华架走，让他坐进一辆轿车，直接送往安徽省军区。

在架走李葆华的同时，工人还与赶来的合肥师范学院“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发生了扭打冲突。此时，要求省委罢免合肥师范学院党委书记李瑞的合肥师范学院的“毛泽东主义红卫兵”正在省委礼堂召开声讨会。他们是经省委书记李任之同意，进驻安徽省委机关礼堂的。与工人一起来的“合肥地区大中学校红卫兵总部”部分同学高呼着“打倒‘八二七’！”“抗议‘八二七’！”口号冲进会场，还有少量工人也冲了进去，并在省委贴出“‘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必须在三日内滚出省委”的大标语。

在这次冲突中，有十几位同学负伤，包括“红卫兵造反司令部”的副总指挥吴祚云。“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的主要头头张来信脖子上挂着一条纱布吊着手，头上还缠满了纱布。

学生们依然坚持在省委礼堂。第二天下午，工人们又来到省委小礼堂，要学生在 24 小时之内必须离开省委，否则，他们要采取革命的行动。

下午 17 时左右，省委大院又冲进一群工人，头戴安全帽，有的腰里还扎着大皮带，高呼“‘八二七’滚出省委！……”

大约晚上 21 时，有位工人找到合肥工业大学“827”头头梁守福，对他说：“你们的政委胡玉才被人指认出来，在省委北门外被几个头戴柳条帽的省建二处工人打伤，看样子伤势不轻，被几个‘824’学生扶走了。”

梁守福一听，立即骑自行车赶到省委。此时的省委大院已是人山人海，挤得水泄不通。大门根本无法进去,那位报信的工人把梁守福领到大门西边 20 米处,帮他翻过铁栏杆爬了进去。

进了院子也无法进入省委小礼堂，这里的人更多，推拥不动。梁守福只好再回到围栏边。这时院子里是一片辱骂声，混合着同学们高喊的“毛主席万岁”声。

头戴柳条帽的工人，不停地将同学向外拖，被拖的同学还不停地呼喊着“毛主席万岁！”

到了晚上22时左右，省委书记王光宇在省委文革接待站的楼上用喇叭不停的喊道："工人同志和学生不要发生冲突，请你们回去，明天还要上班，有什么事，省委负责处理。"

没有任何效果。工人是有组织、有准备来的。他们见到学生模样就挥拳踢脚向外拖。梁守福见状，赶快又从铁栏杆上翻回来。这时，站在长江路上的大批市民也在高喊：

"要文斗，不要武斗！"

"不许打人！"

甚至能听到喊口号的人群中有哭泣声。

梁守福找到自行车回到自己的"司令部"，立刻打电话找陈庆泉，告诉他："我要见张恺帆！"

陈庆泉说："张恺帆在交通厅小礼堂接见蚌埠商学院的学生代表，会还没有结束，他们都在，你赶快去吧。"

梁守福放下电话，正准备走，副总指挥段玉昌提出一定要跟他一起去。他们俩骑一辆车，沿着环城路到了交通厅礼堂，只见张恺帆和任质斌正在台上，与台下的商学院同学讨论什么问题，双方僵持着。梁守福顾不得许多，大步流星地冲上舞台，劈头就说：

"张恺帆！省委要打死人了，你还在这儿开会！"

这时任质斌也把头扭过来，并且很吃惊。

张恺帆说："梁守福同志，有话慢慢说，不要着急，省委发生了什么事？"

梁守福说："你是真不知道，还是假不知道？"

张恺帆说："我是真不知道。"

梁守福把自己在省委大院看到的情况，简略地说了一下。

这时张恺帆很生气地说了一句："太不像话，简直是土匪。"

梁守福紧接着要求他把这里的会停一下，一同到省委去制止打人事件去。张恺帆说："我去讲话，他们会听吗？像你说的那么乱，工人又不认识我。"

梁守福说："你不去也行，你写几句话，签上你的名，我找人去广播。"

张恺帆马上写了几句话，对其中一句："殴打革命学生是错误行为"。梁守福说这样写太轻，没有用。要求把这句改成"殴打革命学生是反革命行为"。

张恺帆说："这样写太重，你们怎么说都行，我不能这样说。"

"那就把这句改成反动行为吧。"梁守福说。

张恺帆想了一下，同意这样写，并加了个"紧急呼吁"的题目。全文是："'八二七'造反队是革命的组织，谁殴打革命的学生，谁就是反动行为。凡围攻革命的学生者，应立即退出省委，否则追查责任，严惩凶手，望照此办理。"

张恺帆签上名后，梁守福问任质斌签不签？任质斌说："有恺帆同志签名就够了，我就不签了"。

梁守福紧接着说："你不签也行，被打伤的同学必须由你护送到北京治疗。不要在合肥治疗期间，再出现新的流血事件。我这是为伤员考虑，也是为你们省委考虑"。

张恺帆马上表态："这样做也好。"

任质斌最后也表示同意。

这时，天已快亮了。

就在梁守福和张恺帆交涉期间，凌晨 1 点多种，又来了一批安徽纺织一厂和针织厂的男女工人往省委大院冲。

17 日上午，梁守福约中央文革记者站派到合肥的《解放军报》记者刘慎思反映情况。刘慎思对他说："从 15 日下午到 16 日夜间，我都在现场。这是记者的职责。我穿的是军装，要穿便衣说不定也要挨打"。

他又说："医院我去过了，伤员大概有 50 多人。我还要去省委"。

临走时，他又叮嘱了梁守福一句："作为朋友，我劝你注意安全，省委的同学最好撤出来"。

这时，省委北大门和西门都被工人封住了。学生们也不敢往外撤了。

张恺帆 17 日凌晨写的"紧急呼吁"，在 17 日上午 10 时左右，由"827"代为广播，并抄成大字报贴到了省委大门旁边。

到了 11 时左右，又有一批工人分成两队，分别从正面和后门冲进礼堂。随后就往外拖学生。这时，与"827"观点相同的"工人革命造反司令部"的工人赶来了。他们的到来才暂时给同学们解了围。

到了下午 15 时左右，省建二处的工人又来了，比第一次更凶。他们从窗户进去，直接冲向二楼，抓走很多学生。副省长张祚荫在楼上对他们说："同志们，回去吧！不要打，天大的事有省委负责。"

17 时左右，有人到“红卫兵造反司令部”报告说：“今晚 9 点钟以后，不仅会来更多的工人，而且可能有农民进入省委。他们准备来一到两万人，一定要把省委的大学生全部清走。你们动员同学们退出来。不然，太吃亏了。”

梁守福也顾不了那么多，赶紧写了一张条子：

吴祚云、张来信并边爱娜：

据可靠消息，今晚还会有更多人前往省委殴打你们。我们的任务已经完成，省委垮台已成定局，希望你们见字后，在九点钟前撤出省委，勿误！

梁守福 即日

他将条子递给那位报信的工人，并叮嘱一句：“千万送到。万一送不到，也要把条子毁掉”。

“你放心，送不到我把它吃掉，也不能落到他们手里。”

这位出生入死不报姓名的工人，是合肥铁路机务段的孟庆元。他后来成为“合肥工人革命造反联合会”的主要头头之一。

18 时左右，从长江路自东向西来了一队工人，约有几百人。队伍到了省委北门一分为二，一部分从北门冲进去，一部分跑步从妇联西边的路上直奔省委西门。

他们一进省委大院就高喊：“同学们不要怕！我们是革命造反工人，‘工联会’的。我们是接你们出去的。”

他们很快从省委大门到办公楼大门冲出一条道来。“工联会”的工人站在通道两边和前来冲击的保守组织工人扭打，不让他们靠近学生。

保守组织的工人打学生行，见到“工联会”的工人，就不敢往前冲了，有的开始退却。紧接着从西门冲进省委的一队工人也赶到了省委北门，几百名同学架着伤员就这样撤离了省委。他们一面往外跑还一面高喊：

“向工人阶级学习！向工人阶级致敬！”

“革命无罪！”

“造反有理！”

“毛主席万岁！”

就在他们高呼口号的时候，许多同学们脸上还流着血。女同学中有的头发被扯散，披头散发，惨不忍睹。

站在街两旁的群众高呼：“向八二七学习！向八二七致敬！”有的地方又响起了鞭炮声。

这就是后来称之为稻香楼抢人的“三天流血”事件。“三天流血”事件共有 300 余人受伤，重伤 51 人，“827”学生胡玉才被打折 3 根肋骨。后由负轻伤的副总指挥吴祚云带领伤员到北京治疗，省委也派了公安厅一位姓孙的副厅长和几位处长一路护送。到北京后，由周恩来亲自过问。伤员安排在“协和医院”治疗，随后任质斌代表省委也前去慰问。

李葆华11月15日从稻香楼被接走后，先住进安徽省军区，后被省军区司令员严光接到他家里住。又觉不妥，有违中央军委命令，遂转入肥东。在肥东县录制了讲话，直到流血结束了，才放他的录音。录音的全文如下：

“同学们:工人同志们：我是李葆华，我现在代表省委跟大家讲几句话。刚接到中央陶铸同志指示，工人与学生无论如何不要发生冲突。希望双方都要按照陶铸的指示办事，立即停止冲突。双方都要退出省委大楼。我们的意见是最好院子里的先退，然后楼里再退，都退回本单位，以后再由省委召集双方代表协商解决这次纠纷。”

安徽的东邻江苏省，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始终掌控着全省运动的局面，南京造反派被迫于9月底派出大批人员到北京告状，向中央控诉江苏省委压制群众运动的种种“罪行”。他们参加了10月6日北京“三司”组织的“全国在京革命师生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誓师大会”，南京大学“827串联会”的代表丁日泗同学还在会上发了言，控诉江苏省委对他们的压制。周恩来在讲话中特别提到“刚才在这儿讲话的南京大学‘827革命串联会’有1300多名革命师生提出要求，地方上对他们很大压制，丁日泗同学讲得很清楚了，我们一定通知那个大学，那个工作组，那个工作组的上一级，工作组应该回到学校去！另外，我们早就宣布过，任何工作组在学校犯的错误，那些同学要他们回去，应该随叫随到，如果上一级应该负责任的，上一级要到学校去检讨。”

周恩来10月6日在“全国在京革命师生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

烈开火誓师大会”上的讲话传到南京后，造反派立即向省委提出要工作队回学校做检查的要求。省委没有立即就此做出答复。造反派方面迫不及待，于 10 月 13 日把省文革副组长张仲良“请”到南京大学进行批斗。

10 月 14 日，江渭清接见了《解放军报》记者邢文举，阐述了华东局和江苏省委的看法，其中特别强调了以下几点：

第一，江苏省委是好的，各级领导干部中的大多数是拥护党、拥护毛主席，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因此对领导干部要有分析，不能一概打倒。

第二，对于红卫兵运动，各级领导应该既不迁就，又积极疏导。青年学生凭着一股狂热，破坏封建迷信之类是应该的，但他们的行动带有很大的盲目性和破坏性。因此要善于总结经验，“破”得对的要巩固下来，一部分“破”得对，一部分“破”错的，要坚持对的一面，改正不对的一面。

第三，在运动中广大干部、群众要提高政治觉悟，防止坏人破坏，特别提醒大家要警惕少数以极“左”面目出现，进行招摇撞骗的“政治扒手”。

10 月 29 日，南京一部分师生又到省委索要工作队整他们的“黑材料”。在协商未果的情况下，他们将省委和各部、委、办、局的档案室和一部分办公室封起来。省委方面则派人在现场拍摄了大量照片，准备秋后算账。

江渭清在北京参加中央工作会议期间，私下里找到王任重摸中央

的底。王任重告诉他："'资反路线'有的省有，有的省没有。"江渭清听了很高兴，但还不放心，又去找了陶铸，结果得到相同的回答。

回到江苏以后，江渭清一方面加大了批判"死老虎"的力度，在《新华日报》上组织文章批判包括匡亚明、孙叔平、陶白、吴天石、刘子见、钱静人等人在内的120位"走资派"和"反动学术权威"，与《人民日报》上对"彭罗陆杨"、邓拓、吴晗、周扬等人的批判文章遥相呼应，另一方面则以要召集省委常委会和全省三级干部会议，传达中央工作会议精神为由，极力拖延与造反派的正面交锋。因而在10月和11月这两个月中，江苏的斗争处于一种胶着状态，江苏省委依然牢牢地控制着整个大局。

但是，在中央的压力下，11月初，工作队开始分几批回南京大学"检查错误"和"接受教育"，南京市委第一书记彭冲也被南京大学造反派揪到南京大学监禁和批斗。与此同时，南京大学造反派宣布占领校部机关。

11月12日上午，江苏省委书记处书记李士英对省委副秘书长周泽说："老周，我看你们右倾，人家北京小飞马把第三司令部砸掉了，蒯大富跑掉了，也不是算了。""你们为什么不把中学生组织起来？什么'八二七'、'红色造反队'，把他们一抄，把他们东西搬走，什么司令部不司令部，抄了拉倒！"

此后不久，南京果然出现了一个名叫"警备纠察队"的群众组织，不断与造反派组织产生摩擦。同时，江苏省委兵分三路，一路是书记处书记李士英，以"养病"的名义前往上海，负责与华东局和上海市

委保持密切接触；另一路是省体委主任王范则以“请示工作”的名义前往北京，与陶铸建立直线联系；第三路是书记处书记陈扬前往无锡、苏州，负责上海与苏南各市间的联络。

第 290 回：识时务，赵紫阳主动检查　为“材料”，广州市沸反盈天

11月12日，陶铸、汪东兴、江苏省委书记处书记张仲良等人与解放军华东工程学院赴京战斗团160余人在北京谈有关“黑材料”的问题。

陶铸说：“你们不远千里而来，要解决问题，中央要我和汪东兴同志来和大家谈一谈，汪东兴同志说同志们很讲道理，看起来，省委开会回去，思想问题没有解决。张仲良很聪明，到北京来，一方面风格高，另一方面北京比南京舒服，在小房间里，学生不来找你，悠哉悠哉，又休息了一个礼拜。你们不把材料拿出来，我们有什么办法，只好这样。”

陶铸对张仲良说：“你们省里回去可以解决了吧！”

张仲良：“……还要靠中央解决。”

陶铸：“你们把材料拿出来吗。中央准备发一个补充通知。主席，林彪同志，周总理和我都是同意的，他们大多数同意。”

“材料是工作组造成的恶果，……因为材料的问题，斗争比较激烈，比较紧张，有打架现象，打伤了人。辽宁农学院就打伤了人。”

汪东兴：“打伤了3个人。”

陶铸：“党委怕你们抓他们的东西，再开中央全会，他思想不解决，也解决不了问题。在这里打通了思想，回去又不通了；当面通了，要材料又不通了。现在，第一步把文化大革命的材料要处理好，烧掉；第二步，再彻底清理所有档案。不是什么档案都不要，不要偷偷摸摸搞材料。这是特务作风。是苏联的作法。……从5月16日起到现在的

材料通通拿出来，看看封面题目，付之一炬，统统烧掉。”

陶铸很激动地说：“党委留一手怎么办？谁留一手不拿出来，以后查出来就开除党籍。关于这一点，主席，林彪同志，总理和我都是同意的，当然有少数不赞成。不下这个决心是不行的。”

陶铸又说：“……毛主席说：就是要搞民主。这次好多省委书记的官气打掉了不少，炮轰司令部，当然不是一轰就是坏的，轰掉点缺点错误也不错嘛！过去脱离群众，官气十足。

我当了14年省委书记，以前省委书记可神气了，在全国我不算最神气，但也够神气了。这次官气打掉百分之七十，再定些条条，党内民主以后就有希望了。四川省委书记鲁大东被重大整了28小时，叫坐下就坐下，叫站起来就站起来，如果过去一年去重大一个小时，就不会像现在这样了。当然时间长了点，不过，没有关系，矫枉必须过正嘛！广东省委书记赵紫阳，人很聪明，开会叫站起来就站起来，老实得很。特殊化，官僚作风有希望整好，运动要搞深搞透。”

“对人民内部矛盾要学会处理，学会党内斗争方法，不能像教条主义那样，你整我，我整你，残酷斗争，无情打击。”

“有些学校两派斗争的很厉害，责任在党委。如山东搞了个红卫兵师是省委御用的，要汽车有汽车，要喇叭有喇叭。山大说它是修正主义的红卫兵师，我说,整个师是修正主义的，这不能说，但是可以说个别领导成员有修正主义思想。”

张仲良表态：“陶铸同志的讲话对我启发很大，教育很大，确实关系到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问题，关系到用毛泽东思想统一七

亿人民思想的问题，关系重大。回去后商量，坚决按陶铸同志讲的办。

对我的批评，不但接受，而且坚决要改。省委犯了方向路线错误之所以没有公开检查，是因为在开三干会，检查总结以后，要向同学们公开讲的。希望同学们狠狠揭发。”

陶铸：“文化大革命总的趋势好得很，越搞越有味道，越搞越有成效。今年天那么旱，粮食、棉花增产。工业形势也很好，钢也增产，都是优质钢材。虽然也有些问题。两条路线的斗争经验，我党是全世界最丰富的，如和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王明、博古、张国焘等的路线斗争，开始都是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陈独秀、张国焘自己跑到敌人方面去了。真理在我们手里，只要是人民内部矛盾就要惩前毖后，允许犯错误，允许改正错误；一看二帮，思想从严，组织从宽；团结——批评——团结等等，都是行之有效的。这样就把事业办得兴旺，国家就能胜利，就团结。这是毛主席一贯的方针，只有毛主席才能这样。我也用不着隐瞒，少奇、邓小平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时间很短，天安门上主席与少奇、邓小平同志谈了很久，你们看到没有？”

众人答：“看到了。”

陶铸接着说：“我们彼此心照不宣。”

同学说：“我们院党委不承认有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也不承认院内有两条路线的斗争。”

陶铸答：“你们院党委就那么高明？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你们看到了吧？其实是心照不宣的。

我们这些同志就是怕，限制群众，甚至压制群众，一般是执行性

的，是很不理解；也有例外，加了新的东西。如黑龙江的李范五、甘肃的汪锋，恶劣，搞宗派，两面手法，要罢官。

江苏过去工作不错，是不是背了包袱了？过去是过去，这次文化大革命是文化大革命，有错误要讲出来。我看你们要帮助院党委，还要帮助省委。”

当学生问实习工厂工人是否可以参加学生的辩论，红卫兵能否参加三级干部会时，陶铸说：

“中央确定工厂搞文化大革命，但要用业余时间，不要参加学生之间的辩论，你们回去说服他们。

三干会中央决定了，红卫兵不要参加。有几个原因，现在好多干部思想还想不通，你们在他们就有顾虑不讲了；你们不在，他们可以放心揭发上级的问题。

容易闹冲突，他们心里想不通还委屈，你们再说他们检查不深刻，就冲突出来了。派工作组不好，你们反对，你们也要相信干部大部分是要革命的，要相信他们，不然什么事情你们都要参加，你们不是成了工作组了吗？他们开完会，可以向你们公开检讨。”

南粤广东，9 月 3 日由广州市委组织的“毛泽东主义红卫兵”成立，人数约 3 万人，得到中南局和广东省、广州市委的支持，当时的头头都是高干子弟，家庭出身好坏，成为能否参加这个组织的重要条件。“主义兵”在破四旧时起了主要的作用，在陈伯达提出高干子弟最好不要担任领导工作后，高干子弟先后离开了总部。

10 月 28 日，“广州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成立，

简称“红一司”。广东工学院学生易作才、中南林学院学生黄朗秋、中山医学院学生洪祥发等 7 人为常委。

易作才是中共党员，贫农家庭出身，曾经是学校的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

11 月 1 日，另外由 14 个大专院校学生组织、8 个工人组织、1 个农民组织、26 个中专学生组织、10 个中学生组织组成的“广州大专院校誓死保卫毛主席红卫兵总司令部”，简称“广州三司”成立。主要负责人是广东工学院学生曾涛、华工学生陈新伟、吴开东、华农学生李汉导等人。观点与“红一司”大致接近。

在此之前成立的还有“广州大专院校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总部”，简称“广州二司”，大部分是工农干部子弟和党团员，扫四旧时，是名震一时的急先锋，但当运动转入“批判院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后，这个组织的领导层，显得软弱无力，被广州一司等组织划入“保”字号之列，还被抄了两次家，从此一蹶不振，到1967年初，已处于分化解体状态，1月20日总部宣告停止办公。

11月4日下午，广州“红一司”在东较场首次召开揭发批判赵紫阳大会。在会上，赵紫阳主动要求检查，他代表省委检讨说，省委在运动中，“怕字当头，不相信群众，不敢放手发动群众，怕冲破旧秩序，定了许多框框，在运动中采取了许多消极限制的措施，严重束缚了群众的革命积极。”

他还说，省委没有把学生打成“右派”和“反革命”，没有挑动学生斗学生，没有挑动革命群众斗学生。

红卫兵认为赵紫阳这是在假检查，于是上台造反，不让他再检查下去，学生们纷纷上台揭发、批判赵紫阳。

广州的文革比北京至少要慢半个月的时间。到了 11 月初，抢“黑材料”才像一股平地而起旋风，在广州各院校猛烈地刮了起来。学生们已经掌握了陶铸给中南局和广东省委的许多电话指示，中南林学院红卫兵在 10 月就成立了“陶铸问题研究小组”。11 月，他们就“黑材料”问题，和省委负责人展开长达 3 天 3 夜的辩论，要求赵紫阳、林李明立即交出“黑材料”。

11 月 6 日凌晨 3 时，赵紫阳电话请示陶铸：“材料问题，很尖锐。什么叫打成反革命？排个队也叫打成反革命？现在两派都往省委冲，说我们抗拒中央军委指示。”

陶铸答复说：“电文内容，鉴于目前两派争执不下，处理材料有困难，材料暂时由你们保管，中央将有一个关于材料的补充规定，四、五天之后就发下来，你们再按这个补充规定处理。”

代省长林李明把陶铸的电话内容转告学生，并提出省委的三条意见：

一、省委已经交出或正在交出“黑材料”。

二、“黑材料”暂时由省委保管，省委保证不会出现转移、遗失、烧毁的现象。

三、待中央补充指示下达以后处理“黑材料”。

他介绍了赵紫阳与陶铸的通话情况，并说：“看来，陶铸同志是同意中共广东省委的意见的。”

学生们对林李明说："广东省委不交出'黑材料'，根子在陶铸，我们上北京找陶铸辩论。"

11 月 7 日，中南林学院和中山大学部分学生北上"揪陶"。 就在这天，上海时代中学的学生陆荣根已经将炮轰陶铸的大字报贴在了北京清华大学。

到了 9 日凌晨 2 时许，中山大学突然广播，号召党员起来到党委，保卫国家机密。原来，此时学校的党委大楼已被学生们团团围了个水泄不通，门窗都被挤破了，他们也是来索要"黑材料"的，外面高音喇叭在高声广播。

这天，学生们还冲击省委专案组、秘书组、地区组，抢走了一部分材料。组织部档案被封。

11 月 13 日，到达北京的北上"揪陶"告状的中南林学院、中山大学"北上造反队"，在中南海西门贴出了炮轰陶铸的大字报《强烈要求陶铸和我们辩论黑材料问题》。大字报指陶铸"是站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立场上包庇广东省委，抗拒中央军委紧急指示"。

11 月 15 日，中南林学院"革命造反总部"又在中南海西门、前门大街、国务院接待站、中宣部贴出了炮轰陶铸的第二张大字报《陶铸与广州大专院校学生保守派的一次秘密会见》，声称"中共广东省委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们认为陶铸是他们从事这个反革命活动的幕后指挥人。"

而这天上午，陶铸正在后勤学院礼堂参加文化部召开的 17 级以上党员干部会议，正在台上讲话时，被红卫兵错当成文化部部长肖望

东受到冲击。

11 月 20 日，从广州赴京的 7 名学生在中南海西门前贴出炮轰陶铸的第三张大字报《从中南地区文化大革命运动情况看陶铸的表现》，内容有三条：

一、陶铸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他保“黑材料”，保林李明、王阑西、王任重等人；

二、陶铸是一个资产阶级两面派人物。

三、陶铸问题不是什么老革命碰到新问题，而是干反革命罪行。

同一天，在前门、国务院接待站、中南海西门，还贴出了巨型标语：

“陶铸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陶铸是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王任重、张平化、林李明的后台老板！”

“陶铸是广东省委的大红伞！”

同一天，上海时代中学的学生陆荣根也在中宣部贴出《重炮口对准陶铸猛轰》的长篇大字报，用了 60 多张大字报纸。这张大字报集中批判了陶铸在《太阳的光辉》一文中写到的“又有谁说过太阳毫无缺点呢？”要知道从 1949 年后，人民就把毛泽东比做红太阳，陶铸竟然说太阳有缺点，这还了得？

大字报还批判陶铸在《革命的坚定性》一文中写的：“我们作为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一定要像岩石一般坚定，当狂风暴雨之夜，风想把它们彻底掀翻，雨想把它们打进沙滩，浪涛想把它们掷入大海，

但是它们屹然不动。当风雨过后，当浪涛退后，它们仍旧矗立在大海边，指向青天，面对大海。”

大字报说：“面对大海，就是面向台湾；指向青天，就是指向国民党的青天白日，就是向往蒋介石。”

中宣部的人出来同对陆荣根进行辩论。这张大字报出现两小时后，中宣部的墙上就贴出了许多反对陆荣根的大字报。

红卫兵在中宣部和前门大街开办了几个炮轰陶铸的宣传窗，吸引了无数学生、市民围观和传抄。

11 月 21 日，陶铸在中宣部传达中央工作会议精神时，再次说：“刘邓路线的问题主要是一个认识问题，是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我们应该坚决反对给他贴大字报，要防止一小撮坏人利用这些来做文章。”

第 291 回：出不去，五羊城人满难当　下通知，大军区开始“四大”

此时，广州市还面临着外地红卫兵来穗串联的接待问题。大批滞留在广州的外省串联学生，已成为一个严峻的问题，而且愈来愈严重，像一个随时可能爆炸的火药库。

由于毛泽东11月3日第6次接见红卫兵，为减缓北京的压力，根据国务院指示，广州开往北京的火车，停开5天，造成省内的学生出不去，外省的学生也走不了。仅11月2日这天，到省委上访的525批群众，人数2214人，几乎都是因为当前交通紧张，要求解决车票和生活困难的。

一伙急疯了的哈尔滨学生，闯到省委接待组，跳脚大叫：“我们来广州已经一个多月了，还不能回去！”

他们威胁说：“11月10日或11日一定要回去，如果10日下午6时前不解决回程车票，就采取行动，强行上车，到时就不管什么影响不影响，什么纪律不纪律了。”

11月9日，广东省委发出通知：“目前，外省和本省各地来广州进行革命大串连的革命师生已达30万人，由于铁路运载能力的限制，入多出少，停留在广州的人数会越来越多。吃、住、行都发生了很大的困难，急需加强对接待工作的领导，把做好接待革命学生的工作作为当前最重要的任务。为此，省委决定，除了抽调赵卓云、欧初、郑少康、何文等同志全力以赴抓好接待革命学生的工作以外，省人委办公厅的文化大革命要暂时停止一段时间，除挑选若干人留下来管日常的行政秘书工作外，其余的力量都应集中来搞好接待工作（当然两方

面的工作有时还要结合起来搞）。”

然而，仅仅几天之后，11月14日，省委办公厅估计，“现在广州市外来进行革命串连的同学已经达四十万人，其中外省市来的约占二十万人……本省各市、县来广州进行革命串连的同学也达二十万人。目前正在路上和即将步行来广州的还约有二、三十万人。”这是令人悚然的数字。省委办公厅频频告急：

“广州现已来的40万革命同学，本地、外来各约一半，每天增加三万至五万人，走只一万。人数急速增加，很快就可达六、七十万，准备达到一百万。广州市等于成年人增加一倍。交通是最大的困难，火车每天只能走五、六千人，最多一万人。”“交通带来一系列困难，人越积越多，走不了，没钱，没粮，没衣穿；有的住二十多天一个多月，非常着急。天天冲火车站，使旅客无法乘车。吃、住、市内交通都有很多困难。疾病——急性脑膜炎、副霍乱流行，11月13日已经昏倒七、八人。外地蚌埠死十二人，北京也挤伤几十人……”

文革办公室、接待委员会的工作，极感困难，每天来访两、三千人，大楼随时挤着几百人、上千人，并且住着一、二百人。“困难！困难！困难！”到处都听见人们在喊着这个词。省委办公厅提出了4点建议：

一、做好宣传工作，说明情况，使大家明白交通的困难，同时说明生活安排，使之耐心等待。按秩序持票乘车，要不断召开代表会，出通报。

二、做好生活安排，吃饭，住宿（衣被），学习（组织老红军介

绍，一起学老三篇，回忆对比），医疗，交通，安排参观，看看电影。吃饭用具、粮食、菜蔬、喝开水，都立即采取措施。每个人都当服务员、炊事员（调5％工人）。

三、交通问题，铁路尽量多安排车辆，分票办法要急需改进，市内公共汽车，汽车、船支（只）输送到汕头、湛江。

四、提倡徒步行军，各县都已建立三四百个服务站，要加强领导，政治挂帅，两条腿走路，靠腿走是主要的。

由于交通紧张，许多南下串连学生和本省北上串连学生积压在广州的时间太长，有的竟达20天，所带钱粮已尽，御寒衣服又缺乏，他们心情焦急，无心在广州串连和参观了。因此每天前来接待站要求解决车票的人数激增，有的到接待站来大吵大闹，说为什么广东省委不让他们出去或回去？有的哭着求情，要求写证明优先领车票。有的扬言要向广东省委提出强烈抗议。

他们对分配车票的办法，非常不满。有些单位住了几百人，一天才分配到几张车票，像华南农学院住了2000多外地学生，但每天只有50多张车票，即使只出不进，也要40多天才能全部走光；暨南大学全校学生只有2500人，但学校却开出3700多张外出串连证明；有些学生十几个人集体来，现在却要分散走。他们质问为什么每天能把上万名学生运进广州，却只能运少量人出去？他们因为广州积压学生太多，希望省委向中央建议，广州暂停开放几天，以便把积压的学生运走。

根据接待组的记录，11月12日，在339批来访者，有208批是要求解决车票的。13日有360批共1533名来访者，其中外省来的有219批共

733人，也几乎全是要求解决车票的。一名南下学生写信给赵紫阳说，他们于10月28日到达广州，至今未得到火车票，不能外出串连，他说，要组织暴动，与省委和接待站拼。

悲剧终于发生了。11月14日晚24时，开往北京的火车进站还未停定，站台上的学生便蜂拥而上，争先恐后，互相推挤，结果武汉市四十五中4名学生被挤下路基，摔到车底去了。其中一人重伤，左腿上骨粉碎，生命垂危。其他3人也不同程度地受伤。

11月15日，海南劳动大学的一名学生，被火车压伤，不得不锯掉右腿。

11月16日，当火车进入广州站时，一万多学生疯狂扑上去爬车，结果又有一名女学生被推至路轨被火车辗死。到晚上再有3人受伤。

11月21日，广东省委、省人委通知：凡参加徒步串连的师生，“在省内串连每人发给学习、宣传费1元；到外省长江以南邻省串连的每人发2元；到长江以北各省串连的每人发3元。”“医药费。在省内串连的每人每月发5角；到外省串连的每人每月发1元；大专院校革命师生可按公费医疗标准发给。”

经过极其艰苦的努力，至12月中旬，滞留在广州的外地学生，总算大部份送走了。12月23日的《南方日报》报导，在过去几个月的大串连高潮中，广州市共接待了160万从各地来广州串连的师生和红卫兵。至12月1日止，广州市接待红卫兵开支1080万元，仍感不足，又向省人委要求借款1000万元。

当大串连告一段落时，整个广州地区的形势，确实完全不同了。

省委已经成为斗争的焦点。赵紫阳在12月对省委成员们说："怕也怕不过去，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怕也不行，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就用不着怕。极而言之，无非是罢官。"他们对前景已经不抱任何乐观了，雷霆即将降临他们头上。

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叶剑英和肖华将兰州军区政委冼恒汉和新疆的王恩茂、新疆军区副政委左齐召到西山，向他们打招呼说：贺龙有问题，是大土匪、大军阀，国民党曾派人到他那里策反等等。他们叫冼恒汉回去以后向兰州军区司令员张达志传达，叫王恩茂、左齐回去向新疆军区副司令员郭鹏传达，要他们搞好思想转弯。

冼恒汉听后吃了一惊，当即说："他是土匪军阀是过去的事嘛，红军二、六军团会合时都知道，他不是把策反的人都枪毙了，现在怎么又成问题了？前一段他不是陪同毛主席检阅红卫兵嘛，到底咋回事嘛？"

叶剑英和肖华没有理睬他，只是叫他们转好思想弯子。

中央召开工作会议后，中央军委又把军队干部留下开会。总政主任肖华在会上指示，要在全军的机关、院校、文艺、体育单位开展"四大"，大闹3个月，把军队的问题好好揭一揭。

冼恒汉回甘肃后向司令员张达志了传达了叶剑英和肖华关于贺龙问题的指示。当时，西北的部队基本还是贺龙当年的老底子，军队的领导干部几乎都是贺龙的老部下，对于贺龙的问题，冼恒汉和张达志都没有再往下传达。

11 月 14 日，兰州军区召开军区常委扩大会议，传达了军委会议

的精神,在军区机关作了开展“四大”的动员。兰州军区机关“四大”正式开始。

会后，军区政治部张副主任带头贴出大字报，说军区司令员张达志是“三反分子”；政委冼恒汉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张达志和兰州军区副司令员李书茂是“反党联盟”；张达志、冼恒汉和兰州军区副政委高维嵩是“执行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大字报出来后，得到了机关一部分人的拥护。

在军区召开常委会时，一部分群众和张副主任一起冲进会议室，要求改组军区文革的领导，坚决反对由“三反分子”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们把持运动的领导权。于是，军区决定由政治部张副主任接替政治部副主任李虎担任兰州军区文革办公室主任，兰州军区副政委王庆生接替副政委高维嵩担任了文革领导小组组长。

接着， 11 月 25 日、26 日，兰州军区召开军区常委扩大会议，讨论“运动”如何深入开展的问题。

会议一开始，群众就闯进了会议室。会议室地方小装不下多少人，大部分群众就挤在会议室外面，由于听不清，有人就拉起了喇叭，外面的人就在喇叭底下听，群众称之为“喇叭会”。

会议名义上由冼恒汉主持，实际上是王、张掌控。整个会议开成了由他们发问，张达志、冼恒汉被迫交代问题的斗争会。就连散会出场都按他们划分的左、中、右的顺序作了安排。第一个出场的是王副政委，接着是张副主任、杨嘉瑞、康健民、徐国珍、李书茂、高维嵩，最后是冼恒汉和张达志。

散会后，王、张便多次在常委会上根据“革命群众”的意见，要求将张达志和冼恒汉的印章收交文办管理，并公开宣布要监听张达志和冼恒汉的电话，又宣布凡是要调动一个班的兵力，都要经过常委一致同意、一致签名才能生效。同时，还对张达志和冼恒汉搞单线警卫。并要冼恒汉交待同贺龙的关系；批判冼恒汉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军区造反派开始给他们挂黑牌子、戴高帽子，敲锣游军区大院，压冼恒汉下跪低头认罪，搞喷气式，站在桌子上弯腰，脖子上还挂上一个扩大器等等。

由于没日没夜地挨批斗，吃不成饭也睡不成觉，冼恒汉有一次竟一头栽下台子。

除了兰州军区，各大军区也纷纷开始了文化大革命。

中央工作会议后，军委、总政批准南京军区政治部所属宣传部、文化部、《人民前线》报社，前线话剧团、歌舞团、歌剧团，军乐队、体工队，简称“三团两队” 及部队医院、军事院校等单位先行开展“四大”。南京军区司令部、政治部、后勤部暂不开展“四大”的部门也有组织有领导地专辟一室，允许写小字报，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

那几个先行开展“四大”的单位，都给本单位的领导贴了大字报，提了意见。其他单位看了十分羡慕。军区政治部、包括整个南京军区机关，何时能开展文化大革命呢？广大干部、群众满腔热情、翘首期盼这一天的到来。

11 月 12 日，南京军区在军人俱乐部露天电影院召开“文化大革命动员大会”。这次大会，改变了以往“政治运动由政委做报告”的

惯例，而是由军区司令员许世友亲自出面做动员报告。

许世友讲话一向是单刀直入，开门见山，不照本宣科，不照别人写的稿子念。一次，他到浙江金华视察工作。李德生军长召开干部大会，请许司令作指示。许世友一上来，劈头盖脑地讲了这么几句："有的人工作不安心，闹情绪，我看这些狗娘养的，不识相，原来还不是挑大粪的，有什么好闹的？再闹叫他滚蛋，还是回去挑大粪。"大概不到 5 分钟就完了，既无"前言"，也无"后语"；既没有官腔，也没有客套话。

还有一次，1964 年初，罗瑞卿在南京召开推广"郭兴福教学法"的现场会。现场会的最后一天，许世友应罗瑞卿的要求，临场即席讲话。他说："我们南京军区的同志们千万不能翘尾巴！不要以为在我们这里开现场会，好像我们的工作就怎么好啦！如果不注意，我们的'好八连'就不好了，'霓虹灯下的哨兵'就不红了，'郭兴福'就不兴了。" 针对性强，很有哲理，通俗易懂，言简意明。

可是，这次动员报告完全打破常规。他在报告中，大段大段地宣读毛主席的"讲话"、"语录"、"指示"一字不漏地传达党中央的有关决议、方针、政策。他从头到尾，不离开讲稿，一字不多、一字不少的照着念。给他精心准备的讲稿，字写得又大又粗，每一页纸上写不了多少话。许世友一边讲，一边不停地翻着讲稿。他对这种方式很不习惯，很不自然，如果是其他场合，他早不耐烦了，会把讲话稿甩到一边，发挥他的"个人特长"。可这一次，他始终耐着性子，一字一句，一板一眼的地念下去。最后，他还特别强调，全军区的广大指战

员，要照毛主席的指示去做："关心国家大事，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他要求大家多写大字报，给军区领导提意见，帮助军区领导搞好文化大革命。并规定每天每人要写若干张大字报，说："这是对毛主席的态度问题。"

本来，大家对参加文化大革命早已跃跃欲试，只是由于部队的纪律和军人的自觉，未敢擅动。这次听了许世友的动员，还有具体、明确的指标，谁不踊跃？第二天，司、政、后机关的大字报就贴出来了，其中以政治部最多，司令部只有个别二级部写了，后勤部也有点动。

第一批大字报主要是指责军区党委对文化大革命"不理解，不认真，不得力"，"立场不坚定，态度不端正，旗帜不鲜明"。还有批评许司令好骂人、好打猎、好喝酒等生活琐事的。许司令看了，表态说："骂人可以改，也一直在改。喝酒是爱好，又不误事，有什么关系？不能改。打猎是借以熟悉地形，又是运动，也不能改。"对这一类意见他不太在乎。

第292回：蓉城会，李井泉下落不明　查旧报，惊发现“反共启事”

9 月底，四川省文革大学组负责人张广钦等人按照西南局 9 月 16 日、23 日两次会议的部署，到北京以解决四川赴京学生的生活福利问题为由，在那里大量搜集串连师生赴京告状的情况，每天用电报发回成都，在成都整理后，印成简报，直接送交李井泉、廖志高。同一时期，李井泉指示大学组下设的联络、情报、宣传、研究等组，逐日将学生召开的各种集会、游行示威，贴的大字报、传单，学生的动向等，写成简报或报告。到 10 月中央工作会议前夕，四川省文革小组长周颐命令大学组、办公厅等赶制大批材料，包括：各大专院校红卫兵排队材料、文革筹委主要成员的分类排队材料，外地来川师生"放毒"的材料，报告某事件的事实真相材料，师生下厂下乡串连影响生产的材料等等，准备李井泉他们到北京开会时视情况向中央汇报。当然，这些材料最后在中央工作会议上都没敢拿出来，但此时，却成为西南局和四川省委镇压群众的证据材料。

10 月 28 日，四川造反派学生进驻中共中央西南局和四川省委。31 日，中央工作会议结束后回到成都的李井泉，携西南局、四川省委、成都市委等众多领导人，响应中央工作会议的精神，贴出《我们的大字报》，表示“我们欢迎革命师生、革命群众、革命干部对我们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而犯的方向、路线错误继续揭发、批判”。

如何传达中央工作会议精神和召开三级干部会议？李井泉真是动了脑筋。11 月 2 日，他和四川省委书记廖志高一起召集成都市各红卫兵和其他群众组织负责人座谈，传达中央工作会议精神和中央关

于召开三级干部会议的通知，希望大家积极支持四川省三级干部会议的召开。

“红成”的代表立即表示：坚决支持省委召开三级干部会议，但要求“会议不能走过场，李井泉和廖志高在三级干部会议前必须向成都市人民做出公开检查，并要参加三级干部会议的全体干部和成都市17级以上干部到会，听取广大工农群众和革命师生的揭发、批判。”

学生参加党的会议是否合适？李井泉、廖志高都没有把握，表示要请示中央后才能做出决定。

但是第二天，11月3日，成都部分学生和北京到成都串连的学生数百人就自行来到四川省三干会人员的驻地——成都东方红宾馆，即原锦江宾馆，提出要有红卫兵和工农兵代表参加省委三干会，并由他们组织主席团等要求，并让省委领导出面解答有关成都地区文化大革命中若干问题。

西南局和四川省委领导李大章、程子华、阎秀峰、杨万选等人赶紧出来与学生协商，却遭到学生们的批判斗争。

4日上午，李井泉和四川省委第一书记廖志高也遭到学生的批斗。他们二人被迫向学生作检查。

这天，四川省委三级干部会议召开。

11月9日，“红成”再次找到西南局和四川省委询问，得知中央已同意李井泉、廖志高向成都市人民公开检查，于是和西南局和四川省委商定，共同于11月13日上午9时，在人民南路广场召开“万炮齐轰西南局、省市委推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让李井泉、廖

志高在会上向群众作公开检查。

陶铸十分重视这次大会，几次同李井泉通电话，询问他的身体状况能否在这样的大会上检查，希望他能通过这次检查取得群众谅解，重新以革命干部的姿态站出来领导运动。

成都的人民南路广场也称天府广场，其前身是老皇城坝，已有2700多年的历史。早在春秋时期开明王朝建城以来，这里就是西蜀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从那时起，这座金碧辉煌的城中城，时而崔巍宫阙龙凤旌旗，赵女吴姬笙歌彻夜；时而漫天战火杀声四起，城摧墙毁虎狼栖身……至秦国巧辩之士张仪在此再筑“大城”后，又几经兴衰盛败。到朱元璋建立明朝，儿子朱椿到成都当蜀王。荒凉几百年的皇城，再现巍峨雄姿。1644年，张献忠在老皇城建立大西国，吃败仗后又一把大火将登基宝殿烧得精光。大弓长矛的清朝骠骑杀进四川，巡抚张德地惨淡经营，在原蜀王府遗址上重修庭院，因气派太大，清代驻成都高官，怕有“僭越”之嫌，谁也不敢在此设衙门，改为“贡院”，俗称“皇城”，悬挂“为国求贤”横匾，还有乾隆龙飞凤舞“旁求俊乂”的草书匾额。风云变色，1911年辛亥革命，皇城被尹昌衡作为四川军政府所在地，在这里把清朝四川总督赵尔丰砍头斩首、鲜血四溅。此后，老皇城成了堆放煤渣垃圾的“煤山”。新中国成立后，1953年，成都市政府建起宽阔的人民南路广场，成为成都标志性建设，同老皇城古迹相互辉映。皇城残留的城楼有枣红色的城墙， 还有三个拱形城门洞，如同北京的天安门城楼，被用作大型集会的主席台。皇城里的楼阁上，是西南局、四川省委开会的会议室，

里面有一个广播台，在人民南路广场开几十万人的大会，都用到这个广播台。

为了保证 11 月 13 日大会正常进行，西南局、四川省委与“红成”商定，后勤工作由西南局和四川省委、成都市委负责，会场秩序由“红成”派出纠察维持。

按照省委的统一布置，各单位通知组织群众到会，公安部门也布置了一些人员担任警戒工作。在通知开会时，有人把“听李井泉作检查”说成“听李政委作报告”。又有人传出，群众组织要“非法绑架李政委”、“把李政委围攻病了”等等。

这些消息引起红卫兵中一些人的猜疑，以“红卫兵成都部队四川大学支队”，即四川大学“826 战斗团”和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赴蓉人员为首的一些红卫兵，认为“红成”总部头头“右”了，“修”了，会前与李井泉达成的关于大会的协定是“拿原则做交易”，为什么连“打倒李井泉，改组西南局”的口号都不敢提？他们认为，这次大会成了李井泉假检查以蒙混过关的阴谋。于是，他们与“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等组织商定，要造这次大会的反。

还在 10 月 25 日前后，在四川串联的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学生就相继在成都大学、四川大学、成都工学院、四川师范学院、成都体育学院、成都地质学院、成都电讯工程学院等院校造反派学生中宣传，认为“红成”右倾，提出要在成都建立“第三司令部”。

10 月底，四川大学在运动初期最早站出来批判川大校党委，造省、市委工作组反的化学系“赤卫”、“风雷”、“十人”和外语系的“红心”

战斗组几十个人，宣布退出四川大学“东方红826战斗团”,成立了“井冈山野战军川大纵队”，简称“井野”。他们取名“野战军”，就是要冲出学校，杀向社会，进行天翻地覆的野战。

11月10日、11日两天，“井野”主持召开了参加“第三司令部”筹建的各大学造反派组织秘密串联会，准备对11月13日在人民南路广场召开的大会采取“造反”的行动：一是要求改组主席团，由他们主持大会；另外一个就是把李井泉抢走，使大会开不成。他们起草了《造反声明》。

11月13日上午，由“红卫兵成都部队”、“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重大815战斗团”等7个群众组织主持，在人民南路广场如期召开号称有25万人参加的“揭发批判西南局、省市委贯彻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这是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西南地区最高规格、最大规模的批判大会。站在城楼上，只见台下是几十万参加集会的群众，红旗招展，“炮轰西南局，火烧省市委”的口号声和革命歌声此起彼伏。台上是主持大会的“红成”头头和准备做检查的西南地区党政大员：中共西南局书记李井泉，四川省委书记廖志高，四川省长李大章和成都市委书记廖井丹等人。

上午11时，会议按计划开始。大会勤务组长讲完话，四川省委书记廖志高代表省委作检查。突然，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的宣传车广播大喊一声：

“造大会主席团的反！”

随即，主席台上，川大“东方红826战斗团”的负责人和“井野”

负责人在台上说："这次大会，主席台布置得如此庄严隆重，彩旗飘扬，台下乐队庞大，这哪里像是检查揭发的大会，倒像一个庆祝大会。因而是右倾机会主义。必须造反！"

接着，北京地院"东方红"的宣传车又大声喊道："把李井泉拉下来……"

城楼下摇旗呐喊，鼓噪起来，指控主持批斗大会的造反派头头是"明批暗保"。会场顿时乱了。

此时，北京的同学又提出要改组主席团。主席团成员一时间束手无策，表示同意，在原来的主席团的基础上增加了一名北京学生，会场这才又逐渐安静了一些，主席团开始安排李井泉作检讨。

李井泉检讨，他的周围挤满了人，突然一位外地学生抢过李井泉的话筒，会场又是一片混乱。大会主席团赶紧维持会场秩序。

面对如此混乱局面，保护会场的纠察队员无所适从，垂头丧气地放弃了警卫，会场外冲击会场的群众乘机涌进会场，城楼下，左、中、右群众顿时混作一团。

台上，李井泉表情冷漠，似乎对眼前的一切毫不关心。

李大章嘴角挂着一丝嘲笑，大概在等待好戏开场。

廖志高脸色惨白，拿着讲稿的手抖得像筛糠一样。

只有职务最低，但身材魁梧的成都市委书记廖井丹大步走到城楼边高声劝说冲击会场的群众退出会场。

主持大会的造反派头头被眼前的混乱搞得六神无主，慌忙鸣金收兵。就在这个时候，李井泉被一些人带下了主席台，廖井丹依旧在城

楼的一角作着无用的努力。

来此串连的清华大学学生叶志江此时正在城楼上，他靠近廖井丹，悄悄地告诉他："其他人都已经走了，你还不快走？"

几个军人和一辆轿车出现在城楼的台阶旁时，叶志江推着廖井丹往楼下走。廖井丹一边说着"我不能离开"，一边挪动脚步走下台阶。

轿车旁挤满了人，车门已无法打开，叶志江让廖井丹爬上车顶。在一片"廖井丹滚下来！"和"廖书记快上车！"的口号声中，成都市的堂堂父母官无奈地端坐车顶，像一叶孤舟，在波涛汹涌的人海中缓慢前行。

李井泉被带走时，人们只以为是会场纠察人员为了保证他的安全而将他带离了会场。事后不久，却传出一个令人意外的消息，说是那天护送李井泉的并不是红卫兵，而是由公安部门组织的便衣人员冒充红卫兵，趁会场大乱之机将李井泉转移走了！

李井泉哪去了？无人知晓。

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李井泉不见了！三级干部会议被迫停开。

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李井泉不见了！周恩来万分着急，派人多方查找。

原来，李井泉被护送离开大会会场后，先后转移到成都市郊几个单位招待所后，接着又被铁道兵副司令员、西南铁路建设副总指挥郭维城转移到驻扎在偏远地区的铁道兵部队：灌县、彭县、西昌、渡口。

后来，总理办公室打电话给郭维城，证实了李井泉的去向。

随后，李井泉又来到云南省的元谋、昆明等地。在此期间，李井

泉一直与西南局和四川省委保持电话联系。

11 月 17 日，四川大学、成都工学院、北京地质学院、北京农业大学等院校的学生以及来自南充、重庆等地的学生在四川大学开会，研究当天晚上去抢占人民南路广场上的成都市有线广播台。会议对准备发表的“声明”进行讨论，并对当晚行动的人力布置做了安排。会议在讨论成立“第三司令部”的问题时，来自北京的学生主张立即把旗帜打出去，但是一些组织反对，最后，大家同意先建立一个“解放大西南五湖四海联合兵团”，接受省内外各单位一切观点一致的组织和个人参加，但是要把“红成”排除在外。

当天晚上，他们果然采取行动，把成都市有线广播台抢占了，改名为“解放大西南广播台”。

这时，北方天津南开大学又传出惊人消息，他们发现了一个庞大的叛徒集团，其成员都是在职的高级干部。

文革开始后，原南开大学党委书记、时任河北省政协副主席高仰云正在南开大学的家中休养，他的妻子李琛还在南开大学工作。校园里打“黑帮”，很快烧到了李琛，她被打成“历史反革命分子”。昔日的高书记自然不干了，他逢人便讲：“李琛不是反革命，这是政治陷害！”“搞李琛是给我高仰云脸上摸黑”。

高仰云认定搞李琛是时任南开大学党委书记臧伯平的主意，因而与臧伯平之间的矛盾日趋激化。当时的《新南开》报记者描述说：“一时间，冷落的高家大院成了闹市。休养在家的高仰云成了南开园里的忙人，接待来访、座谈、游说、讲演、‘扎根串联’”，而且“随着

高臧之间的斗争的激化，群众斗群众的现象越来越严重，武斗逐步升级，流血事件接踵出现”。

南开大学红卫兵当时的思想也很困惑：“高、臧之间的斗争究竟是什么斗争？”“臧伯平是不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高仰云又是何许人？”

在高、藏斗争中，有人反映，高仰云也有历史问题。南开大学的红卫兵在 8 月 18 日天安门城楼上拿到康生的手令，立即跑到北京国家图书馆去翻报纸，翻着翻着，一张 1936 年 10 月 14 日的《华北日报》直叫他们欣喜若狂，只见第 2 版一则《反共启事》赫然入目：

高仰云反共启事

仰云前因思想简单观察力薄弱交游不慎言行不检致被拘禁于北平军人反省分院反省，自新当兹国难时期凡属中国青年均须确定方针为祖国利益而奋斗。余等幸蒙政府宽大为怀不咎既往准予反省自新，现已诚心悔悟愿在政府领导之下坚决反共作一忠实国民，以后决不参加共党组织及其他任何反动行为并望有为青年俟后莫再受其煽惑。特此登报声明

高仰云

这高仰云是他们的前任党委书记。平时张口闭口都是革命词藻的高书记，竟然会躲在历史的深处反共。古人云：知人知面不知心，高书记的“反共启事”震得南开小将目瞪口呆，欣喜之中一股革命的义愤油然而生，他们直觉得自己的革命热血一个劲地往上涌。他们立即返回到学校去揪高仰云，要他交代被捕叛变问题。又拿出康生开的

“特许证”，冲进河北省委查阅高仰云的人事档案。

当他们听说和高仰云一起坐牢的还有薄一波、安子文、杨献珍等人，一队南开“八一八”红卫兵又立即杀回北京，杀向薄一波、安子文和杨献珍。

第 293 回：叛徒网，居然全都是“高干”　报总理，其实并不是新闻

薄一波是国务院副总理，安子文是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他们当时虽然已经如临深渊，岌岌可危了，但毕竟还没有正式被打倒，学生们想找他们也很不容易。于是，将首战矛头指向早在 1964 年被毛泽东点名批判下台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原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现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任副所长的杨献珍。他们听说高仰云与杨献珍交往极深，高仰云在牢里生病时，杨献珍曾喂过他饭。

毕竟是直接与中央的大人物交锋，在“首战杨献珍”前夕，南开大学“八一八红卫兵”集体宣誓：“杨献珍，你就是‘铁’老虎，我们也要敲掉你两根牙！”

他们来到哲学所，按照计划，小将们一上来就将杨献珍围在屋子中央，像审犯人一般进行突击审问：

“杨献珍！你和高仰云是什么时候认识的？你们之间是什么关系？”

杨献珍已经历过无数次批斗会了，他见这群天津学生来者不善，便一口咬定：和高仰云只是一般认识，没有什么联系。

再往下，无论这些学生怎么问，杨献珍或者说声“老糊涂了，什么也记不清了”，或者就索性不开口。

南开大学红卫兵情急之下只好背《毛主席语录》，并放出狠话：“杨献珍！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这就是你们的逻辑！既然你不交待，那也好，限你 5 分钟考虑，5 分钟后我们再来。”

5 分钟后，南大学生很快又杀气腾腾地回来了。此时，年届古稀

的杨献珍已是满头大汗，嘴唇哆嗦，再也无力抵挡小将的“革命攻势”，不得不承认他在1936年和高仰云一起蹲过敌人的监狱，还在狱中给高仰云喂过饭。

南开大学红卫兵一阵狂喜，急不可耐地追问他们在狱中的情况。杨献珍说：

“我据实交待吧……”就把他们在狱中如何立场坚定如何英勇斗争直至出狱的故事说了一遍。南大学生突然大喝一声：

“杨献珍，收起你的鬼把戏吧！国民党对共产党的政策，是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走一个，他们竟能对你这位立场坚定英勇斗争的共产党员大发善心？老实交待你们是怎么出狱的吧！”

杨献珍心里十分明白，这段出狱历史容易让人误会，也特别容易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至于眼前的这些革命小将，就更难以理解那段历史了。不到最后一刻，他是不想“交待”的。现在，这“最后一刻”到了，杨献珍不得不“交待”了他和高仰云是如何奉了上级的指示，通过发表“反共启事”出狱，并且不得不“供认”，同时发表“反共启事”的还有薄一波、安子文、刘澜涛等共61人。

从杨献珍身上打开了缺口，南开大学“八一八”红卫兵立即又杀向北京图书馆，一头扎进故纸堆中，继续翻检《华北日报》。

要翻出那些“反共启事”，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小将们每天只吃一顿饭，喝几口冷水，啃几口冷馒头，奋战了三天三夜，终于从《华北日报》上找到了一个接着一个的“反共启事”，有的是一人单干，有时是多人合伙，从1936年8月31日至1937年3月14日，总共9

批，不多不少，61 人。

可是，“反共启事”上大多是化名，比如，薄一波当时化名“张家璞”，刘澜涛的化名是“刘华甫”，杨献珍化名“杨仲仁”，安子文化名“徐子文”。反复翻阅“反共启事”，小将们仍旧一头雾水，这里面没有薄一波、安子文他们呀？

死材料不会说话，还得抓活的。南开大学的这些学生又从故纸堆中出来，先后 6 次提审杨献珍，根据他供出的线索，乘胜追击，“直捣”农业部长廖鲁言，“怒斥”统战部长徐冰，“激战”农业科学院副院长朱则民。到了 1966 年 10 月，小将们基本摸清了一些人名，也大致摸清了这个庞大的“叛徒集团”“叛党投敌”的几个关键环节：

“这伙叛徒自首出狱是刘少奇指示的。刘少奇指示‘狱中党员可以履行自首手续’。刘少奇是叛徒之首。刘少奇的‘指示’是由徐冰（现统战部长）传给孔祥祯（现第一轻工业部长）孔又传给狱中薄一波的。”

这些人现在都身居要职：

薄一波，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国家经委主任；

安子文，中央委员、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全国政协常委；

刘澜涛，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西北局第一书记；

胡锡奎，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处书记；

李楚离，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

刘锡五，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副书记；

廖鲁言，农业部部长兼党组书记；

周仲英，国家经委副主任；

徐子荣，公安部副部长兼党组书记；

赵林，吉林省委代理第一书记；

王德，中共中央中南局书记处书记；

王其梅，西藏工委书记；

侯振亚，福建省委书记；

还有杨献珍等等，全是老资格，大家伙。

而且，这可是刘少奇刘主席批准的，刘少奇还站在天安门城楼上。怎么办？学生们十分犹豫，他们经过一个星期的辩论后统一了认识：这个叛徒集团是关系到党和国家命运的头等大事，饭可以不吃，命可以不要，一定要斗争到底。

尽管杨献珍再三对他们说，他们当时是假自首，是根据党组织的决定那么做的，中共中央早已作过结论，红卫兵却不理会那一套。坏蛋抓得越多越光荣，他们根本不相信毛泽东会同意共产党员向敌人假投降，所以薄一波等人一定是叛徒无疑。

11 月 1 日，初冬北京的深夜，高教部的一间木工房里灯火通明，热气腾腾。天津南开大学“八一八”红卫兵正怀着万分激动的心情奋笔疾书，起草给党中央和中央文革的请示报告。小将们写道：“现以查明，他们是一伙叛徒”，“刘少奇是叛徒之首”。在“请示报告”中，小将们向中央请示：

1、刘少奇向毛主席、林副主席交待过这个问题没有？

2、这个问题党内有过结论没有？如果有，是谁做的？我们认为必须重新评价这个问题。

3、不管如何，我们认为他们都是叛徒，必须彻底揭发、坚决打倒！至于什么时候往外打，请中央指示。”

《请示报告》最后写道：“此事关系重大，刻不容缓，望速回示。”还附上了高仰云的“反共启事”。

几天后，小将们又给他们的校友周恩来写了一封信。信中说：“根据占有材料看来，这伙叛徒多属‘高干’，职位很高，权力很大，根子很硬，涉及面很广，危害甚大。因此，我们建议党中央立刻成立专案组搞这个问题，我们协助党中央坚决把这伙叛徒铲除净尽！”

11 月 9 日，他们又提出了“四项战略部署”，向中央文革和中央请示批准：

第一、南开大学的红卫兵“与首都三司的‘政法公社’、‘财院八八战斗队’联合起来，建立抓叛徒的专门班子”；

第二、“继续扫清北京毛主席身边的大叛徒，同时去全国各地，和革命造反派一起，深挖刘少奇大叛徒集团”；

第三，随时“提审刘少奇、邓小平、薄一波、安子文”；

第四，“把确实已查实的叛徒名单打出去，点全国之火，围剿刘少奇大叛徒集团”。

11 月 9 日当天，他们就在南开园里贴出了《看！高仰云反共反人民反革命的叛徒嘴脸》的大字报，并开始揪斗高仰云夫妇。

高仰云经不住小将们的揪斗，跳河自杀。

11 月 12 日，小将们又发表了一份号召揪斗叛徒集团的《告全国人民书》，组织了“抓叛徒战斗队”，进驻北京、石家庄、太原、西安、南京、苏州、广州、郑州、长春、乌鲁木齐等地。这些战斗队用他们自己的话说，就像“弹出膛”、“刀出鞘”般地“杀向了全国各地”。各地也跟着纷纷成立起“抓叛徒”的战斗队伍，把人事档案机密统统翻腾出来。据 1967 年 10 月他们自己的统计：“踏遍全国二十几个省份，走访了北京、天津、上海……数百个大中城市，历时一年左右时间，先后出动一万五千多人次，行程二百万公里”。

在“抓叛徒”调查活动中，出现过许多感人的事迹。有一个叫陈通的学生，共产党员，是专管到图书馆查阅资料的。一次他三天三夜没有出图书馆，直到劳累得了重病送到医院抢救。还有一位赵福林同学，在他参加调查活动不久，他的父亲就接到匿名信，说他是三反分子，已经被开除团籍，他父亲很生气地写信要他立即回家。当时，赵福林正在南京搞调查，接信后向同学借钱做了一面红旗到雨花台献给烈士，墓前写了一首诗：“半夜雨花台，壮志满胸怀。先烈为党死，血浇百花开。继承先烈志，自有后来人。誓斩判贼手，为党除奸害。”回来含泪给父亲写了一封信，认为自己的事业是正义的，也可能叛徒集团挖不出来，您的儿子会被打成“反革命”，为了不连累父母，情愿和父母断绝关系，不把叛徒集团挖出来，誓不回家。直到一年后他当上中央文革的特派员后才回家看望了父母。

这些红卫兵绝未料到，他们出动几千人次、奔波 100 多万公里而终于调查清楚的“叛徒集团”，对周恩来根本不是新闻：

那是 1935 年 11 月后，刘少奇作为中共中央代表在天津主持北方局的工作，任北方局秘书长兼刘少奇秘书的林枫协助他工作。当时面临的局势是日本侵占华北、全国抗日救亡运动非常高涨，北方局却极其缺乏干部。他想起北方局组织部长柯庆施曾提到关押在北平军人反省分院有一批党员，据说只要履行国民党规定的手续就可以出狱。

当时，“北平军人反省院”因地处北平草岚子胡同，通常称草岚子监狱。于是，刘少奇出面给主持中央工作的张闻天写了一封信，说：北方白区工作干部极缺，抗日形势迅速开展，急需解决干部问题。现在北平监狱中有一批干部，过去表现好，据监狱内部传出消息，管理监狱的人自知日子不长，准备逃走，也想及早处理这批犯人，所以只要履行一个简单手续犯人即可出狱。如不早办此事，日本人占领平津后，就不能办了。刘少奇要求张闻天赶快答复并要交通员等着把复信带回去。信中还附带着狱中共产党员提出的有 3 个条件的请求书，也要张闻天签字。那 3 个条件是：1、自首出狱的责任要由中央负责；2、自首出狱后不受歧视；3、自首出狱后要按正式党员立即分配工作。

由于事情紧急，张闻天立即与有关人员商量后签了字，予以批准。

1936 年 6 月，刘少奇即以中央名义先后向“北平军人反省院”及其他“反省院”中被监禁的共产党员，下达了“可以履行反共自首手续”的指示。这个指示通过林枫和北平中国大学教授、中共地下党员徐冰，同孔祥祯取得联系。

孔祥祯 1931 年被捕，入草岚子监狱，曾任监狱中的秘密党支部书记，1932 年因病保外就医，出狱后以家庭教师身份作掩护，继续

从事党的秘密工作。

孔祥祯将北方局的指示写成信件，由魏梦玲负责设法给当时监狱党支部负责人之一的殷鉴送去。信的大致意思是：北方局指示你们可以履行“出狱手续”，争取早日出来。

当时正担任狱中党支部书记的薄一波和支部委员刘澜涛、殷鉴收到北方局要他们履行出狱手续的密信后，疑虑重重。他们担心这是敌人设下的又一个圈套，于是同少数骨干商议，决定不予执行，也不在党员中传达讨论。

北方局送信到狱中已 3 个月，仍不见回音。刘少奇决定，通过孔祥祯给狱中党支部写第二封信。信中说：

党组织营救你们出狱，这是中央的决定。上次去信后不见你们的行动，现再做如下指示：根据新的政治形势和任务的需要，考虑到你们是经过长期斗争考验的，党认为，为了争取你们尽快出来为党工作，你们不但可以，而且必须履行敌人出狱手续。这样做是符合党的最大利益的。党认为你们过去坚持不在敌人“反共启事”上按手印，做得完全正确。但是，你们那时的斗争，还是在小圈子、小范围内的斗争，现在要求你们出来在广阔范围内作斗争。现在形势变了，国民党“安内攘外”，登“反共启事”司空见惯。正因为你们是经过长期斗争考验的，所以你们更有条件，这是特定条件下所作的决定，不是常例。党现在向你们做出保证，在政治上和组织上中央完全负责，政治上不以叛徒论，组织上不歧视，你们要相信中央。如果你们接此信后，仍然拒不执行，就要犯更大更严重的错误。

这时，狱中党支部已经改选，支部书记是赵搏，支委是杨献珍、张友清。他们同骨干分子讨论后，考虑到党的纪律，准备将中央指示付诸讨论，征求狱中全体党员意见。

为了证实这两封信是否真是中央的指示，支部又通过另外的通讯办法得到了北方局的第三封信。信上再次说明，这些指示是北方局向中央建议，经中央批准的，随信还附有北方局向中央建议的主要内容抄件。

支部终于判定：确系中央指示。他们做出了“准备执行”的建议，交全体党员讨论。讨论结果，大多数人同意服从组织决定。经杨献珍三易其稿，征得国民党当局同意，他们在《反共启事》上签了字。

1936 年 8 月 30 日的《华北日报》上全文发表了这份题为《徐子文反共启事》的文件。

“子文前因，思想简单，观察力薄弱，交游不慎，言行不检，致被拘禁于北平军人反省分院反省自新。

“当兹困难时期，凡属中国青年均须确定方针为祖国利益而奋斗，余等幸蒙政府宽大为怀，不咎既往，准予反省自新，现已诚心悔悟愿在政府领导之下坚决反共，做一忠实国民。以后决不参加共党组织及其它任何反动行为并望有为青年俟后莫再受其煽惑。特此登报声明。

徐子文（安子文） 刘华甫（刘澜涛）

杨仲仁（杨献珍） 周斌（周仲英）

董旭天（董天知） 夏维勋（鲜维勋）

冯俊斋（马辉之） 张永噗（薄一波）

徐立荣（徐子荣）

中华民国二十五年八月三十日”

1936 年 9 月上旬的一天，薄一波等 9 人第一批出狱了。

## 第 294 回：查叛徒，小将们誓不罢休

## 吉林省，三干会书记被揪

北平，太庙茶馆。熙来攘往的人流络绎不绝，小商小贩的叫卖声喊成一片。薄一波同孔祥祯并肩走向茶馆，他是来和北方局党组织接关系的。到了茶馆门口，孔祥祯留在门外了望，薄一波一个人走了进去。迎接他的正是徐冰。两人紧紧握手，徐冰问了薄一波的住址，向他交代了接头的暗语，然后匆匆离开。

按照地址，柯庆施找到了薄一波，说："让你们出来是刘少奇、北方局向中央建议，经中央批准的。你们出来时还拿架子，三请诸葛亮才出来呀！"言毕，哈哈大笑。

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几十名共产党员，分作 9 批履行了监狱规定的手续出狱，陆续出狱。出狱后他们被中共党组织分配到山西、河北、天津等地，重新投身到革命的洪流中，开始新的工作。

1940 年至 1941 年间，刘少奇曾主持起草过一个带有征求意见性质的文件，对自首出狱的党员分析了几种情况：

一、被捕后经不起敌人拷打引诱自首者，不予恢复党籍；

二、经得起敌人拷打和引诱而后期组织需要自首，又没有出卖组织者，可以恢复党籍。

这个文件由于许多人的反对，没有被通过。

1944 年，党的七大召开。从草岚子监狱出狱的党员中，

作为七大正式代表的有 12 人，候补代表 2 人。

薄一波也是七大代表，他到延安第二天，即向毛泽东汇报了在北平五年半的狱中斗争，受到毛泽东的称赞。之后，书记处书记任弼时又找薄一波谈话，说："你们出狱，中央完全知道。"

薄一波提出，应把他们 1936 年出狱的问题向七大做出报告，把过程讲清，作结论。在七大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审查讨论时，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任弼时正式说明了这件事。委员会对薄一波等人的出狱问题，做出明确结论，认为适合代表资格，并提交七大代表一致通过。

当时，康生也是这个委员会的成员，他对薄一波说：北方局的一大功劳就是营救草岚子监狱的一批干部出狱。

北京解放之后，刘澜涛又向刘少奇提议："对 1936 年写自首书的问题还是请中央做个结论，恐怕以后时间长了不好说。"

刘少奇当时回答："不要作结论了，党了解这个事。经那个手续出来的，你写个名单放在中央，以后这些人出什么事叫他们到中央来查。凡用这种办法出狱的都不是叛徒。"于是，刘澜涛便详细地写了一个名单，交给了刘少奇。

1962 年，刘少奇指示安子文把登记上来的名单交给邓小平，说："凡在卷者，不管谁查问，均一言以蔽之：有了组织结论。谁追查就说中央知道，这是组织秘密，不能告诉你。

填表时就填组织营救就行了。”

所以，当 1966 年 11 月 9 日前后，周恩来收到南开大学“八一八”红卫兵给他的信后，并没有很以为然，因为他知道这件事的经过。

随后，南开大学“八一八”的一支战斗队杀向了西北局所在地西安，他们的目标是一头白发的“白匪”刘澜涛。当西安的大学红卫兵得知，在《华北日报》刊登“反共启事”的“刘华甫”就是刘澜涛后，整个古城立刻炸了锅，到处在抓刘澜涛。可是，20 多天过去了，仍旧没有抓到。一不做二不休，小将们将西北局办公楼团团围住，开始了静坐示威。

终于，在一个大雪纷飞的晚上，一位眼尖的学生认出了刘澜涛乘坐的小轿车。小车在前面跑，小将在后面追，最后，“奇迹出现了！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八一八小将，就凭着一双脚，追上了刘澜涛的小轿车，在深山中逮住了刘澜涛”。

天津南开大学还有一支与南开“八一八”对立的南开“卫东”红卫兵，在抓叛徒的问题上也不甘示弱。11 月 23 日，他们联合西安“炮打司令部战斗队”红卫兵，准备在西安召开大会，批斗中共西北局第一书记刘澜涛和书记胡锡奎。西北局连夜向中央请示，总理办公室回答说：“总理正在起草回电，待送主席看后即发你们。”

11 月 24 日凌晨，周恩来在中共西北局报来的关于西安“炮

打司令部战斗队”要求追查刘澜涛出狱问题的请示上作了批复，然后将批复送给毛泽东审批并附信一封：

“送上西北局来电和刘澜涛来信……经与陶铸、康生两同志商量，因这一自首案牵连人甚多，而当时确为少奇同志代表中央所决定，七大、八大又均已审查过，故中央必须承认知道此事。否则，震动太大。现拟电如另纸。如妥，请批发。”

周恩来代拟的中央给西北局复电：

西北局：

二十三日电悉。请向南开大学卫东红卫兵和西安炮打司令部战斗队同学说明，他们揭发的刘澜涛同志出狱的问题，中央是知道的。如果他们有新的材料，可派代表送来中央查处，不要在大会上公布和追查。

中 央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周恩来还在信封上特别写明：“请徐业夫同志面陈主席阅批，特急件！”

毛泽东用铅笔在“主席”两个字上画了个圆圈，然后拖出一杠，再写下两个黑粗的大字：“照办。”当天，周恩来代拟的中央给西北局复电发出。

周恩来刚给西北局回完电，又接到东北局第一书记宋任

穷关于吉林省委代理第一书记赵林被揪斗的紧急电话请示。因长春的大学生从天津南开大学红卫兵处得知，“61 人叛徒集团”里的“罗林祥”就是吉林省委代理第一书记赵林的化名，便在 25 日贴出“赵林是大叛徒!”的大标语。

周恩来在电话上明确回答后，又立即以中央的署名，于 11 月 26 日给东北局发电报说：

东北局并吉林省委：

请向南开大学八一八红卫兵和其他革命同学说明，他们揭发的赵林同志出狱的问题，中央是知道的，如果他们有新的材料，可派代表送来中央查处，不要在大会上公布和追查。

11月30日，中共中央给吉林师大红卫兵组织的电报：

来电均悉。关于赵林同志出狱的问题，中央于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六日电复东北局并吉林省委，请他们向南开大学八·一八红卫兵和其他革命同学说明：“他们揭发赵林同志出狱的问题，中央是知道的。如果他们有新的材料，可派代表送来中央查处，不要在大会上公布和追查。”

希望你们按照中央上述电示执行。如果你们还发现新的材料和线索可以继续查清，并将新的材料派代表送来中央查处。希望你们不要在群众大会上公布和追查，也不要散发传单，涂写标语。

30 日，周恩来再次发电给东北局及吉林省委，让他们转交致吉林毛泽东主义教育大学，即吉林师范大学的“红色造

反团”和“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王秋红的复电，重申 26 日的电报内容，并指出：“希望你们不要在群众大会上公布和追查，也不要发传单、涂写标语。”他还打电话到沈阳，指示中共中央东北局第一书记宋任穷，“不能让小将们在这个问题上胡乱发难。”并要宋任穷依照他的话回答红卫兵：“赵林的出狱问题中央是知道的。”

南开大学的又一支战斗队，在白山黑水间跟踪追击。他们到东北大庆油田搞调查，路过林海雪原，火车因雪停开，他们在雪地里走了 9 天 9 夜，有的脚冻烂了还坚持走，行程几百里，才到了目的地。

他们早就查出 61 人“叛徒集团”中的“罗林祥”和“汪德光”“盘踞”在东北局。“罗霖祥”如今叫“赵林”，任东北局委员、吉林省委代理第一书记；“汪德光”真名叫“王鹤峰”，任中央监委候补委员、中央监委驻东北局监察组组长。

揪斗赵林，因为周恩来的干预而出师不利，于是，战斗队就集中火力搞王鹤峰。不料王鹤峰听到了风声，走为上策，躲到了大连。战斗队日夜兼程赶往大连，将王鹤峰当场“抓获”。面对小将的审问，王鹤峰拒不承认自己就是“汪德光”。小将呢，他们这一次居然不急，玩起了“欲擒故纵”的好戏。王鹤峰却有些急了，连夜从大连给东北局组织部发电报，请求有关人员帮助转告各地的草岚子难友，如果红卫

兵向他们打听他在狱中的名字，“务请绝对不要告诉”。小将果然神通广大，电报落入了他们手中。

王鹤峰发了电报，仍不放心，急忙赶回东北局，从家中翻出在草岚子与薄一波、安子文等的合影照片，乘飞机到了北京。小将们仍旧不动声色，坐了火车，尾随而至。在北京，王鹤峰的警惕性提高了，发现小将在跟踪自己。他一面让随从与小将周旋，一面搬了住处。自以为很安全了，王鹤峰就满北京城找难友，“大搞攻守同盟”。他当然不能想到，“小将们暗暗跟着王鹤峰，找到了一个又一个叛徒的家”。小将简直比昔日搞过地下工作的王鹤峰还厉害，所以，事后他们在自己的小报上大肆嘲笑王：“大叛徒王鹤峰为小将领了路，做了向导，他还自鸣得意。”

此时，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徐冰虽然已被打倒，但他是当年亲自办理薄一波等人出狱手续的人。他见 30 年前作了决定的事情又翻了出来，便于 12 月 7 日将当年中共中央如何作决定的经过写下，分送周恩来、康生和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富春。

康生对薄一波等出狱的情况是很清楚的。当年与薄一波同在“北平军人反省院”，即“草岚子监狱”的共产党员刘格平，因坚持不肯填写“自首书”，直到 1944 年才被释放。1947 年，康生率领中央土改工作团到了山东渤海区搞土改。1948 年春节，土改工作团全体成员回到渤海区党委所在地

——惠民地区信阳县何家湾过春节。当时正在那里的刘格平请康生吃饭，工作团全体成员也都参加。

饭后，康生与土改工作团团员张琴秋、毛岸英、于光远、曾彦修等人到村外散步。康生从刘格平也在当年的北平军人反省院里坐过班房谈起，说到了薄一波等人的出狱之事。康生说："那时如果再不加紧营救，蒋介石就可能把这批同志转往南京；如果日寇很快侵占了平津，或者华北国民党政权汉奸化，这些同志就只有全部被杀。考虑结果，中央决定，让他们办理了出狱手续。当时很多同志都照办了，唯有不属于薄一波他们这个党支部的刘格平没有办，直到日本鬼子投降才出来，多坐了八年牢。"

1944 年康生在延安中央党校作报告，讲到"列宁认为党的策略要机动灵活"时，曾以此事为例，说明"我党中央采取了机动灵活的策略，要薄一波等同志接受敌人办理手续的条件……"

1945 年中共召开"七大"，康生作为"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成员，亦未就薄一波等刊登启事出狱一事质疑他们的代表资格，更没阻挠其当选为中央委员。

当时只有高岗在"七大"酝酿中央委员名单时，曾以"自首变节"为由，反对薄一波等人进中央委员会，因得不到多数人的支持而作罢。1954 年高岗也曾就刘少奇当年支持薄一波等人刊登《反共启事》出狱，而且刘少奇本人也曾被捕过，

也有叛变嫌疑一事提出过质疑。

但是，文革开始后，康生对此事似乎有了新的想法。1966年8月，康生让彭真专案审查小组办公室对此事进行调查。8月18日在天安门城楼上，又鼓励南开大学的红卫兵查阅当权派的档案。9月，中央专案审查委员会办公室工作人员肖孟给康生写报告，将此事说成是叛变。9月16日，康生给毛泽东写信说："我长期怀疑少奇同志要安子文、薄一波等人自守出狱的决定。有些人本来就已经或企图叛党保命，少奇的决定，就使这些人的反共叛党合法化了。""最近我找人翻阅了1936年8、9月的北京报纸，从他们所登报的'反共启事'来看，证明这一决定是完全错误的，是一个反共的决定。"随信还给毛泽东附上1936年有关的报纸复印件。

吉林省委代理第一书记赵林为"自首出狱"一事搞得是焦头烂额，文革之火也早已烧向省委。还在 9 月 1 日，吉林师大的群众组织"临时总部"就贴出《炮打东北局，炮打省、市委》大字报。4 日，吉林大学、吉林师大等红卫兵又组织召开揭批中共长春市委第一书记宋洁涵大会。

9 月 10 日，吉林省委文教书记、东北局派到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郑季翘给中央文革小组写信，告知："吉林省各级领导处于瘫痪或半瘫痪状态，党和政府下达的指示很难贯彻实现，今年吉林省年景很好，但可能发生丰产不丰收，征购不上来的危险；工业生产，7 月份全省下降 4.5%，长春下降

10.4%。”

9 月 11 日，吉林师范大学“造反大军”、吉林大学“中南海”等 40 多个群众组织在地质宫广场联合召开“炮打司令部点火进军大会”，呼吁向省、市委开火。

从 10 月开始，吉林省长春市也开始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10 月 28 日，长春市各大专院校召开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会后，吉林师大“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强行进驻吉林省委大院，对立一派也随后赶到。双方在省委机关发生了争斗。

29 日，红卫兵与省委书记处书记阮泊生进行辩论，要求省委进行检查。

10 月 30 日，长春地质学院 200 多名红卫兵又冲进省委机关大楼，抄砸了省委“文革”办公室，抢走部分材料，强行带走办公室工作人员，省委陷入一片混乱。吉林省委书记处及常委办公室被迫于当天离开省委机关大楼，转移到省人委办公楼档案室办公，后又不断遭受冲击，先后辗转迁到团省委、省宾馆、康平街 2 号、省委党校幼儿园等处，直至翌年 1 月 25 日完全停止工作，先后转移了 7 次之多。

11 月 5 日，中共吉林省委召开三级干部工作会议，传达中共中央工作会议精神。15 日，与会人员参加了省委机关文革小组召开的揭批省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会上，

省委作了《关于在文化大革命所犯方向、路线错误的检查》，承认贯彻执行了所谓资产阶级的路线。16 日晚上，吉林师大“造反大军”联合“二总部”所属一些院校师生 500 人，冲进省委办公楼内地下室档案库，砸开档案柜，将库存绝密材料和文化革命材料拿走五、六麻袋。11 月 17 日，吉林省委代理第一书记赵林在三干会上讲话时被吉林师范大学“毛泽东主义红卫兵”揪走。

当天，吉林师大“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再次砸开市委档案柜，强行拿走档案材料 278 份，造成震动全省的“1117”事件。

11 月 18 日，吉林师大“毛泽东主义红卫兵”挟持吉林省委代理第一书记赵林去北京汇报“1117”事件，途经沈阳时，被东北局第一书记宋任穷将赵林留下。

11 月 24 日，吉林省委在长春市体育馆召开群众大会。原定由阮泊生代表省委作《中共吉林省委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所犯方向、路线错误的检查》，因阮泊生在入场时被吉林工业大学的学生揪走，不得不由省委书记处书记兰干亭代表阮泊生作检查。

第 295 回：报社封，辽宁省委陷瘫痪　丝绸厂，杭州工人进北京

与吉林相邻的辽宁省，在提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口号后，沈阳、丹东、旅大、抚顺、锦州、鞍山、朝阳、阜新等地的“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总部”在沈阳市人民体育场召开了“揭发辽宁省和沈阳市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辽宁省委第一书记黄火青、第二书记黄欧东、书记处书记李荒、沈阳市委书记处书记宋光、吴铁鸣以及一些大专院校主要负责人都被拉到会场批斗。

11 月 3 日至 9 日，辽宁省委召开三级干部会议，传达中央工作会议精神。会议期间，主持会议的省委书记处书记白潜遭红卫兵围攻。此时，省委领导机构已名存实亡，省委书记处书记、候补书记除有病住院的外，大都被抓、被扣，省委处于瘫痪状态。

11 月 4 日，红卫兵查封了《辽宁日报》社。

11 日，砸了省委档案室。

16 日，陶铸在北京接见挟持辽宁省委主管工业的书记处书记胡亦民进京告状的辽宁大学“八三一”红卫兵代表。

同学说：“我们这次同胡亦民等人来主要是解决‘黑材料’问题……”

他们向陶铸汇报了在辽宁省委索取“黑材料”的经过，当讲到看守档案的部队增派战士并上起刺刀大练刺杀时，陶铸说：“军队不应该上刺刀，不应该上刺刀嘛。解决问题主要靠你们自己，你们可以同胡亦民商量吗？你们的白潜来时，我批评了他，他怕字当头，”

陶铸对胡亦民说：“你们省委书记犯了方向和路线错误，你承认

不承认？”

胡亦民点头。

陶铸接着说：“辽宁省委是‘怕’字当头，是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我们批评过他们，提醒过他们，我昨天和胡亦民谈了，白潜来开会我们批评了他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胡亦民同意吧！在黑龙江问题上，东北局是支持潘复生的，潘复生是少数派嘛！东北局也是支持‘红色造反团’的。正因为这样，‘八八’团不是要造东北局的反嘛？辽宁、吉林没有很好地发动群众来，宋任穷没很好地帮助他们执行中央方针，所以说他们是三分之一正确，客观不？辽宁的问题我大体上是晓得的，但没有你们具体。大连的胡明说形势很好。我说，好什么？你压得很厉害，群众一旦起来你就吃不消的。”

胡明是大连市委第一书记。

同学纷纷反映说：“上次胡明挨了您的批评，但回去之后，仍然不交‘黑材料’。”“白潜11月6日检讨很不深刻。”

陶铸：“不深刻，要他深刻，一次不行两次，总是批判你，炮轰你，不清是不行的。这不是一下子能解决的，要有个过程，现在很多地方党委不主动，同学把书记带走了，学生也没办法，这不能怪同学，轰不动就抓嘛！不解决这个问题还会发生。叫省委一下子交出来不可能，他们觉悟还没那么高。最近总理、江青同志和北京的红卫兵商量，多数赞成，少数不赞成，中央有个新决定补充军委的指示，现在透露给你们，很快就会下来的。中央决定从5月16日以后文化大革命的材料要全部拿出来，都烧掉，以后如查出一份来，就开除党籍。……辽

宁省委主要是执行反动的资产阶级路线，这个路线是中央发布的，在一段时间，50天，省委能不执行？如果你们接班了，你们当了省委书记，能不执行？全国二十几个省没有例外的，他们也不能不执行，党章是那么规定的，这是党的纪律。当然有的地方毛泽东思想多一些，搞得好一些。有的人搞十几年革命了，怕把官搞掉了，执行得很厉害。辽宁是好的、坏的，还是一般的我不能说，由你们来定。”

当同学们谈到辽宁省委在中央工作会议之后还不执行中央军委指示，同学们砸了档案室时，陶铸说：“砸就砸了，总的你们是革命的，以后不要采取这个办法，我不批评，也不赞成，这是逼出来的办法。我听说你们把白潜游了街，把他放在装满‘黑材料’的袋子中间，反穿皮袄戴着高帽子，用汽车拉着在沈阳游了一圈。我看搞一下也好，是不是以后不搞了？”

同学说：“放了，再找也找不着，问题攒了一大堆，好容易找着了，解决吧！不解决，就不放你，放回去就找不到了。”

陶铸问：“胡亦民，你们怕不怕？”

同学说：“他们怕得要死。”

陶铸依然对胡亦民说：“胡亦民啊！你们不要怕嘛，越怕越有鬼。”

同学：“省委怕字当头，黄欧东、王良病了，白潜还不接见群众。”

陶铸：“你们说怎么办？你们管行不行？黑龙江的杨易辰扣了十几天放出来，这个人慢慢好起来了。真正搞通了，还是革命的，还是要相信人家。现在辽宁省委不能改组，我向你们交个底，不能罢，你们要帮助他们革命。一个学校一开会就是7、8个钟头，别的学校还要

开，这是不行的，一次不超过4、5个钟头，你们搞车轮战，这办法我们是搞过的，犯了错误。你们要把他关上10天、20天，整天批，那工作谁做。”

同学们继续谈沈阳的问题。他们说：“我们砸的实际是‘黑材料’库，里面有10987发子弹，两瓶烈性毒药，还有刀、剑，根本没有什么档案，什么国家机密。”

同学：“辽宁省委有鬼，根子在东北局。”

陶铸对胡亦民说：“你把这个意见转达给宋任穷同志。”

同学们提出要求中央改组沈阳市委。

陶铸：“向省委东北局反映。我们意见不采取这个办法，可以先揭，我不赞成先罢官。官肯定要罢，要批的。有些人慢慢好起来，还是要让人家革命的，要不怎么叫惩前毖后。罢官还是在运动后期好。毛主席讲，只要有微小的进步也要采取欢迎的态度。罢官不急。我们支持你们揭，你们批，对一些人现在还看不清，多看一看可能更准确些。有的干部罢了三次，复了两次，那就是因为没看清除。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现在刚开始。罢官不急好不好？”

同学：“省委用解放军保护档案馆，实际上讲的全是‘黑材料’。”

陶铸：“保护档案馆是中央的决定，上刺刀不好，”他转向胡亦民说：“你回去让他们作检讨。”

胡亦民：“当时就检讨了。”

陶铸：“不行，还要检讨。”

胡亦民：“我们回去发动全部机关把所有的材料都拿出来，一定

要解决‘怕’字，有什么事大家商量。我在北京还有事，不能和同学一块回去。”

陶铸：“你不回去接不上头，你要有始有终，重开张嘛！你们要主动，同学的帮助要欢迎。你们的干劲，热情我支持。你们要按十六条办事，把林彪同志、周恩来同志的讲话好好研究一下。我的讲话只是个人意见，也不是完全叫你们执行，你们认为合理的就办吧！我讲的话有针对性，不要外传。

最后我提出三点要求：

1、把材料烧掉。

2、把白潜放出来。有问题可以揭发，可以批判。

3、在省委住的同学可以撤回去，和省委保持联系。支持省委的多数派，可以派代表和他们座谈。”

陶铸站起来对胡亦民说：“同学对你们不信任，你们要争取新的信任。”

对同学说：“你们要放眼世界，有爽朗的胸怀，在全国把修正主义搞掉，革命越彻底越好。要团结多数。”

11 月 13 日，浙江省委在省委常务书记、副省长李丰平的主持下召开了全省三级干部会议。

从 11 月初开始，杭州丝绸厂上千人就来到省府大楼前静坐请愿，要求罢免该厂“四清”工作队队长徐钊的职务，浙江省委予以拒绝。于是工厂 2000 余名工人冲上火车，赴京告状，控告省委以生产压革命，压制工人运动。11 月 17 日，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姚文元在

北京接见了他们。

王力在回答工人们提出的问题时说：

“大家要求中央文革小组对你们这次行动做出估价、表示支持。同志们，3800 人的行动能说是反革命吗？一万个不行！大家会上反映的都是革命的情况、革命的要求，对所受的压迫进行控诉，我们认为这些都是革命的。有人对同志们的这种革命行动，说成是匈亚利事件，是完全错误的。我们保证同志们回去不受任何迫害，同志们在政治上、经济上都不应受到任何损失。我们负责通知浙江省委，不得打击报复，所有的谣言都要省委负责辟谣。

你们工厂在错误路线支配下，斗群众，把工人、一般干部打成反革命的，把革命群众打成牛鬼蛇神的，应根据 10 月 5 日中央批转军委紧急指示，一律平反，宣布无效，当众恢复名誉。工作队强迫你们个人写的检讨，应退还本人处理；工作队整理的各式各样整工人的材料应全部集中，当众烧掉。”

“你们文革委员名单中只有一个生产工人。我们建议你们要以生产工人为主体，重新建立工人自己的文革委员会来领导文化革命。”

“生产问题，如果原来领导生产的机构还可以领导就领导，如果不能领导就以老工人为主，你们自己组成生产领导班子。革命和生产都应由我们工人自己来讨论安排。革命、生产都要靠工人阶级。”

“同志们对《人民日报》,《再论抓革命促生产》这篇社论有意见，我个人认为你们的批评是正确的。这篇文章是有缺点，唐平铸同志对我说准备再写一篇，支持你们搞革命。有人拿这篇东西来压你们，你

们不要怕。这篇东西中有正确的东西，你们要拿起来当武器。”

“根据宪法规定工人阶级有权成立自己的团体。也可组织联合组织，最好叫联合会、协会等适合工人自己的组织形式，一般的最好不脱产。你们不要搞官僚主义机构。过去搞的那些官僚主义机构，今天要作为革命对象。”

“同志们还要求刘钊检讨，是合理的要求，刘钊应去检讨。我们支持你们的要求。”

刘钊时任浙江省副省长。

王力接着说：“同志们这样多的人到北京来，这件事对生产是不利的，这个责任应由省委、市委负，不能责备群众。”

“同志们能否认为主要问题解决了，可以回去了？我们相信同志们一定能把革命、生产都搞好，做出个样子来给他们看看，要在生产上也做出个样子来。”

“我们提议，同志们早些回去，你们商量一下，回去更好抓革命促生产。”

姚文元也讲了话，他说：“徐钊这个人坏透了，她所执行的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现在全国都在开展两条路线的斗争。你们这个厂反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是全国斗争的一部分。你们去街上看大字报，工业部门就有人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嘛！”

“工厂的文化大革命一定要搞下去，还要把各种修正主义的东西搞掉，改变不合理的制度，真正把工厂办成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

“是否可以考虑，大家回去自己对革命，生产做出妥善安排，做出个榜样来，把革命搞彻底，又把生产搞好。我们等候你们的好消息。

“大家回去后有问题写信到中央文革小组来，我们一定负责处理。”

就在王力、姚文元接见杭州丝绸厂进京告状工人的当天，杭州市部分大专院校红卫兵冲进省委机关，省委书记处办公室部分文件、材料被抢。此后，省级机关各党组织普遍受到冲击而呈瘫痪半瘫痪状态。

浙江省三干会也被冲击。11月20日，浙江省委被迫暂时结束三干会。

由于10月5日《紧急指示》下发后，各地为“黑材料”出现了很多问题，到北京上访人员不断，各地领导也纷纷来电请示。11月17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处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档案材料问题的补充规定》，再次重申：

“十月五日中央批转的军委、总政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对于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正确路线推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起了重大作用。

根据最近各地的情况，中央认为，对于文化革命中各学校、各单位编写的整群众的档案材料，都应该宣布无效，全部清出，一律当众焚毁。”

“必须将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以后的各种整学生、整群众的材料，包括整理过的或者没有整理的材料，除在这一文件宣布以前，确实已经焚毁的外，全部集中，不许隐瞒，不许转移，不许复制，不许

私自处理。否则，就将加深错误，并将受到党的严厉处分。”

并特别指出：“以上规定，完全适用于工矿企业、事业单位、党政机关、群众团体等组织，也完全适用于进行文化大革命的军事机关和院校。所有这些单位，对于在文化革命运动中，因为给领导上或工作组提意见而被打成‘反革命’、‘反党分子’、‘右派分子’和‘假左派、真右派’等的革命群众，都应宣布一律无效，予以平反，当众恢复名誉，并按以上规定处理材料问题。”

## 第296回：《十二条》，再征求工人意见

### 周恩来，见冰城“八八”代表

11月17日，陈伯达、王力、关锋、戚本禹、曹轶欧、唐平铸和刚调到北京任北京市委书记的刘建勋与北京工矿企业职工代表60余人在政协礼堂小会议室座谈，讨论陈伯达为中央文革小组起草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十二条指示（草案）》，征求工人们的意见。北航“红旗”部分学生参加了这次座谈。

王力说：“这次座谈，就是让大家谈谈工厂文化大革命应该怎么搞？以后还要和外地的工人谈，征求他们的意见。11月12日和工人们座谈时时，陈伯达讲了很多意见，供同志们参考。现在将陈伯达的这些指示，定了个初稿，先征求工人们的意见，先当你们的学生，看行不行？”

然后他逐条宣读、解释了《十二条》。当宣读到第八条：“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工人有建立各种组织的权利，必须使革命群众懂得，都要按照党中央的政策办事。革命群众的内部都要充分发扬民主，不同意见要经过讨论，严防宗派主义和工团主义，不要纠纷、打架，不要停工，……”时，陈伯达插话：“不要与工人打架可以吧？”

大家说：“可以！”

陈伯达：“不要武斗。”

接着有人问："什么叫工团？"

王力说："工团，小集团。第九个，工人的联合组织最好采取联合会、联合协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等等，适合于工人组织形式，一切组织形式都应当保持工人阶级的勤劳品质，不要脱离群众……。"

有人说："工会也是工人组织，但有些工会作用不大。"

陈伯达问："你们的工会能不能代表工人？"

有人答："不能"。

王力又接着念："工人组织中的成员一般都不要脱离生产。"

陈伯达说："个别的也可以嘛！"

这时一个工人站起来，诉说自己被打的情况。

陈伯达说："私设刑堂、拷打，都是不合法的，挑动工人斗工人的开除党籍，按照国家法律做极为严肃的处理。"

工人代表问："党委会已经瘫痪的那些干部，应当自觉到车间劳动。他们不去怎么办？"

王力："我们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大民主的方法，使他们自觉地参加劳动。"

北航同学问："是否要和每个工人组织联系？"

王力："不！不！不！跟一个组织。这个意思就是联系一下。"

同学们又问："他们可以说你们支持一派，反对一派，挑起群众……"

戚本禹说："你们就说哪一派革命就支持哪一派。工人生产时不要去车间，保密车间都不要去。"

一个工人问："我们自来水公司算不算保密单位？"

群众大笑。

那人接着说："他们不让学生和别的单位串联，说我们是水源单位，也是保密单位。"

哄堂大笑。

陈伯达说："这个文件你们讨论通过后，再加《十六条》，《军委紧急指示》、《中央批示》就作为工矿企业文化大革命的指导文件。"

有人问戚本禹："我们那有人强调要给群众认真平反，干部打错了要平反吗？"

戚本禹说："当然要平反，干部也要平。"

问："那些工人的材料如何处理？……"

陈伯达说："从5月16日运动以来，所有整群众的材料，一律无效，现在中央有指示。"

工人问："犯了严重错误的工作组成员在群众要求下，是否要回去检查？"

曹轶欧说："应当检查嘛！"

王力在会上说："工人阶级是文化大革命的领导力量和积极的因素。他们对这个文化大革命负有特大责任。工矿企业的工人群众起来进行文化大革命，是大势所趋，好得很！是不能阻挡的。"

据北航"红旗"一把手韩爱晶回忆，当天下午，他接到王力电话，通知去开座谈会。韩爱晶叫上井岗山赶到会场时，看见王力、刘建勋等人正在座谈。会场约有二十人左右，是谈工厂企业的文革运动如何开展。韩爱晶和井岗山没有到下面就座，就站在王力旁边。这时，话题转到中学红卫兵关人、打人的事情。朝阳钟表修配厂"红卫队"代表、女工李连喜，哭着诉说中学生无故说她是坏人，如何抽打她。她说着走到前边，弯下身，掀起后背上衣，露出一道道伤痕。

大家纷纷围拢过来，见此情景，气愤异常。王力拍着桌子怒吼道："不像话，简直是暴徒！违法的就应该抓起来！"

台上的领导都对私设刑堂、打人行为非常气愤，认为这都是违法行为，应该按照国家法律严肃处理，王力当场拿出纸、笔，就站在那里写道：

"任何厂矿、学校、机关和其他单位，都不许私设拘留所、私设刑堂、私自抓人拷打，这些都是违反国家的法律和党的纪律。如果有人在幕前或幕后指挥这样做，必须受到严厉处分。"

他将写好的纸交给刘建勋说："以北京市委名义发，全市张贴！"

第二天，11 月 18 日，北京市委将 11 月 17 日王力临时写就的那几句话以北京市委的《重要通告》下发：

"任何厂矿、学校、机关或其他单位，都不允许私设拘留所，私设公堂，私自抓人拷打。这样做是违犯国家法律和党的纪律。如果有人在幕前幕后指挥这样做，必须受到国法和党纪的严厉处分。从今天起，如有再犯以上罪行的，要立即处理。"

11 月 17 日下午 15 时 50 分，周恩来穿一套退了色的蓝制服在中南海小会议厅接见哈军工"八八红旗战斗团"。"八八团"的头头们喜出望外，因为 10 月中旬，周恩来曾接见了哈军工"造反团"的代表，对此，"八八团"一直心存芥蒂。

周恩来走进会议厅，和早已等在这里的"八八团"代表们握手，微笑着问道："都是工程学院的？有哈工大的没有？"

代表答："没有。"

周恩来："我又得多一次，又得被动，几个月一直被动。"

大家坐好之后，周恩来说："我在这里给你们谈话也是随便谈，我把你们都看成革命青年，我是你们当中的一个，把我的话都传达就不好了，如果和你们打官腔，半个小时就解决问题了。"

周恩来环顾所有代表后说："上次接见时的代表一个也没有来，你们总是换人，我说过的话还得重说。"

接着大家和周恩来一起念起《毛主席语录》第一页第一段，第二页第二段，第三页第二段和造反有理一段。

周恩来说："反抗，反抗，反什么抗？反抗，反抗反动的，剥削的东西，斗争，斗争错误的东西。"

"八八团"代表汇报说，"造反团"以高干子弟为领导核心，"八八团"以工农子弟为领导核心……

周恩来道："你们的高干子弟也不少嘛，上次三方代表座谈，我记得5代表中有4，刘豹，就是刘伯坚的儿子。那次15个代表，印象是这样，他们有4个干部子弟，你们也是4个，'东方红'一个也没有。李范五的女儿不是也在你们团吗？还有林晓霖不也是你们的吗？"

代表："他们不是我们的领导，那次座谈会仓促，通知我们晚了一天，有好几个是北京联络站的。"

周恩来："李范五的女儿不是在你们团吗？现在来了没有？"

代表："没有。"

周恩来："还有林晓霖不也是你们团的吗？是你们的负责人。"

代表："她不是我们的负责人。"

周恩来："那是现在呀！现在改选了。"

代表："以前也不是，既不是总团的，也不是分团的，是一个普通成员。说他是我们团长，那是'造反团'宣传的，而且我们团没有团长，只有勤务组。"

代表："他们靠小道消息干革命，反过来说我们保皇。"

周恩来："你们开始初期，对院党委批评得少一点。"

代表："你有什么根据？"

周恩来："我首先说，你们三个团都是革命的，你们大方向是一致的，但是里面有激进的，中间的，保守的，他们是激进的，你们是保守的，我那个时候，就这样讲的，当时开会时，你们就没有起来辩论嘛！他们把李范五揪出来了，又揪出陈雷，王一伦，又揪出了杨易辰。"

代表："我们搞省委是最早的，第一次开了斗争会……"

周恩来："我当时批评他们做得过了，你们三方都在一起，没有人起来反对，现在人都不在，你们又提出问题，我拒绝回答。回去以后，他们反映你们对批评他们的宣传的多，对他们压力大。我先肯定他们成绩，又说他们过了一点，他们自己觉得很好，对他们是一个教育。"

代表："我们总团在传达时把批评他们的都删掉了，批评他们的还是从'东方红'那里传来的，我们的人还在造总团的反，说总团为什么不相信群众，不全部传达。"

周恩来："这次你们'八八'来北京，到三座门，搞科委，抓路阳，搞得也有点过火了。"

代表："我们主要指联络组，联络组不按总理指示办事。"

周恩来："听说你们要占领三座门？"

代表们忙说："没有，我们是去要黑名单。"

周恩来："那不是已经给你们了吗？不是承认了吗？"

代表："他们划分左、中、右……"

周恩来问："左是指那方面人？"

代表："造反团的。"

问："右是指谁？"

答："'八八'的，他们划的'右'晚上就被斗了。"

周恩来问："谁斗的？"

答："划为左派的人。"

问："对这个他们承认不承认？是怎么答复的？"

代表："他们不承认是黑名单，只给了我们发现了的那个单，是柳明记的，还有别的材料没给。"

周恩来："你们说除了这个单子之外还有别的，这个问题我要给你们解决，一会儿我给你们念一个文件，等'东方红'来了一起念，我不讲重复的话。"

"我要责成他们检查，把所有哈尔滨工程学院文化大革命的材料都交出来，统统集中，不能公开的三方派代表，一烧了之。我们研究过多次了，打了好几个月的被动仗，使你们牵扯到这些琐碎的问题中去了，对你们思想提高不大。"

"我的嗓子坏了很久了，我担心我说不出声，不能为人民服务。"

一同学说："总理你嗓子不好，你光看，听我们汇报吧！"

周恩来："5月份我陪谢胡去哈尔滨时，见到刘居英，就警告他了，陆平已经是黑帮了，你要看看沾了多少，能不能划清界限。我当时怀疑，后来查出来他沾了许多，刘居英搞了许多专家路线。你们当时是否尖锐揭发了，我不清楚。你们说根子是国防科委，这就值得研究了。国防科委，国家科委在聂副主席的领导下，要一分为二，成绩要不是主要的，原子弹、导弹上了天，不是靠毛泽东思想吗？大道理管小道理，我就讲这一件。当然，不光是国防科委一家，还有其他很多单位，是全国工人，专家，领导三结合，还有国防工办协作，还有领导和中央的关心，毛主席的威望。如果60年专家撤走后，不靠自己自力更生怎么取得62年以后的好转？不错，61年后有个波折，把专家

和知识分子重视过多了些。专家也出了点力量，出了点力量就骄傲起来，这是他们的本性，他们自以为是，瞧不起新生力量，这是他们的本性，当然贡献力量是好事，专家撤退我们自力更生后，64年10月至66年10月，四次试验，每一次都提高一步，不像苏修那样搞浪费试验。我们不是骄傲，这四次弹无虚发，能说科委没有一份吗？当然，你们有意见提出来，不能说是错了。当然，怀疑一切是不科学的，不是毛泽东思想的，实事求是的。可以怀疑，不了解的可保留，这是合乎科学的。”

代表：“总理这次也是先接见了他们，我们一直没接见。”

周恩来：“我没单独接见‘造反团’？”

代表说：“总理在10月16日单独接见了我院‘造反团’，他们还录了音。”

周恩来回忆不起来，后来国务院工作人员查记录报告说：“是单独接见过哈军工‘造反团’14人，主要谈省委问题及谈了对‘八八’的一些看法。”

周恩来说：“我接见哈工大，是因为刘少奇的问题，我请示了主席，我印象是很深了，他们在主席接见后，把大字报弄到街里去，请示了主席，与他们谈判。”

接着代表汇报关于林晓霖问题已转为国家大事。

周恩来："林副主席讲话我看过了，我证实是真的。林晓霖不是你们团长，怎么不声明？"

代表："声明了。"

周恩来："这个问题你们不要去研究了，最伟大的人对自己子女也处理不好，封建社会里有句话：清官难断家务事，你们有了孩子就知道了。他们把它到处张贴是不对的。没有什么了不起，你们娃娃们不懂这些事情。这是林副主席和'造反团'随便的谈话，家务事也讲了，我在这里给你们谈话也是随便谈，我把你们都看成革命青年，我是你们当中的一个，把我的话都传达就不好了，如果和你们打官腔，半个小时就解决问题了。林晓霖离开你们三个月了，没有在一起。青年的团体都在变化，你们在进步。事情都是发展的，过去他们贴刘少奇的标语，我说了他们，现在你们去看，府右街现在不是又贴出了这个那个的，事情在变化嘛！对院党委问题，你们写个材料给我，什么时候开始的。问题的关键，你们的斗争情况，也附带上他们（造反团）那些地方和你们合作，写一份综合材料，两、三千字，多了看不过来。"

在接见过程中，周恩来吃了一次药，18 时 50 分，秘书提醒他："时间到了，7 点钟接见外宾。"

周恩来站起来说："我的嗓子坏了很久了，我担心说不出声来，不能为人民服务。""我们最高限度一天只能工作18个小时吧？要不

然就不可能有思考的余地。”他和哈军工的学生们一一握手，这才在热烈的掌声中走出会议室。

这时，“八八团”五分团的潘龙泉跑上前，和周恩来交换了纪念章。

第 297 回：部队乱，吴法宪无处安身　陶铸忙，做沈阳两派工作

11 月 17 日，中央文革小组讨论陈伯达起草的《关于工厂文化大革命的十二条指示（草案）》。会上，刘志坚觉得工矿企业的事情和军队关系不大，就对关锋、王力说："工厂的事情我就管不着了，军队的事情我要集中地管好。"

没想到这随口说出的几句话让江青听到了，她生气地对刘志坚说："最好你什么也不要管，你那个臭水平，你能管好什么事情？现在军事院校的造反派给我来信告你的状，说你把一些老帅抬出来压制群众运动，你要想一想，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刘志坚见状，没再吱声。会后，他给叶剑英打电话，报告了中央文革小组会议上的情况，同时汇报了江青对他的指责。叶剑英对他进行了劝慰，并说，此事他会报告林彪的。

当天，叶剑英向林彪报告了江青对刘志坚的批评，林彪说："不要让军队乱起来，只要军队不乱，一切都好办。你还是再抽一个时间讲讲话，给军事院校的学生组织树立一些好的榜样。"

17 日当晚，邱会作在后勤学院礼堂经过连续 10 多个小时的大会批判时，晕倒在会场上，总后文革办公室人员赶紧将他送到 301 医院抢救，"红纵"派人跟到医院。林彪闻讯后，叫叶剑英将邱会作送到西山军委战时指挥所休养。他还特别批示："没有我和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的命令，邱会作不许下西山"。当时被接上西山躲避造反派批斗的还有海军副政委杜义德、国防工委兼国家经委副主任赵尔陆、空军副司令员兼七机部部长王秉璋、罗荣桓的遗孀林月琴等人。

此时的空军司令吴法宪也如同惊弓之鸟。他听说地方造反派也到空军机关、院校串联，又急又怕，赶紧指示空军司令部办公室主任王飞和周宇驰、于新野等人搜集材料，整理成“情况反映”上报，自己也亲自频频向毛家湾告急。

听说空军第一高级专科学校的一名教员指挥了军事院校学员冲国防部的行动，在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周宇驰等人建议下，吴法宪下令把他抓起来。接着，几个院校造反组织的头头也被带到空军第二高级专科学校，准备审查处理。这时，“林办”突然来电话，命令他们立即释放那些群众组织头头，还让食堂立即准备一桌饭菜，对几个被抓的人表示歉意。

一夜间，“吴法宪继续执行资反路线压制革命，抓革命群众”的说法在北京城传了个遍，对吴法宪的攻击更为猛烈，说“吴法宪不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火烧、炮轰吴法宪”，有人还闯到空军指挥所去揪他。

不得已，吴法宪向代总长杨成武作了汇报。此时的杨成武，自己也面临着造反派的冲击，为避开学员们的揪斗，他已经离开了总参谋部的所在地和自己的家，住在总参管理局的第五招待所里。听了吴法宪的汇报后，杨成武要他直接请示叶剑英，是否也像杨成武一样，住到第五招待所去。于是，吴法宪又把自己的情况报告了叶剑英，叶剑英要吴法宪先上叶剑英的家里去住几天，并把这一情况报告了周恩来，周恩来对此表示同意，并说：“暂时不要叫吴法宪回去了。”

可是老住在叶剑英家里也不行啊！吴法宪在叶剑英家里只住了3

天就出来了。哪知道，他刚刚回到空军大院就接到通知，要他去“营建大队礼堂”。

这个“营建大队礼堂”是当年建设空军大院时施工部队留下的一个简易饭堂。那时党中央、国务院三令五申，不准建楼、堂、馆、所。因此，整个空军大院只有一个礼堂，就是这个用简易饭堂修改成的“营建大队礼堂”。

吴法宪周围的工作人员都劝他不能去，说造反派用痰盂做成了高帽子，准备了墨汁涂脸，还准备了剃刀和剪子准备剃阴阳头。

吴法宪把这些情况报告了叶剑英。叶剑英也叫他不要参加大会，并立即离开大院，以免被造反派揪住不放。于是，吴法宪带了一个秘书、一个警卫员，时而在空军指挥所，时而在西郊机场，时而在北京军区空军司令部，每天以电话和空军指挥所及各军区的空军指挥所联系，不断要求空军各领导机关和各飞行部队注意防空警戒，注意不要跑飞机、摔飞机。他就这样整天东躲西藏，时间一长，拖得精疲力竭，不得不再次请示叶剑英。

叶剑英听了吴法宪的汇报，对他说：“你住到京西宾馆吧，我要军委办公厅给你一间房子，就在那里住些日子。京西宾馆现在由卫戍区警卫，学生是不敢冲的。”

不久，军委办公厅按照叶剑英的指示，给了吴法宪一间房子，他就在京西宾馆住了下来，晚上出去工作，白天回宾馆睡觉，就这样一住就是两个月。

因为 10 月 25 日，沈阳“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红色造反团”向沈阳

农学院院文革索取“黑材料”时，与对立面沈阳农学院“红卫兵”发生冲突，多人被从一、二楼窗口扔出来摔伤，住进医院。还有 3 位带头造反的共产党员教师，其中有一位是该学院第一个给院党委贴大字报的老师，被绑架押送北京，他们是沈阳农学院“毛泽东思想红卫兵”负责人。

“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沈阳总部”各大专院校代表 300 多人，到北京寻找被绑架的沈阳农学院“毛泽东思想红卫兵”3 个负责人，并到中央告状。11 月 12 日，国务院秘书长周荣鑫接见了他们，听了 6 个小时的汇报。17 日晚上 23 点多钟，陶铸和周荣鑫一起再次接见沈阳“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全体赴京代表，解决他们的问题。

陶铸说：“时间不早了，已经 11 点多了，约好 11 点半还有一场接见，现在看来 11 点不行了，到 12 点吧！今天还得干两场。情况已经讲了，过去的，大体知道一些，不用补充也可以了，但是不如你们清楚，周荣鑫向我汇报了。”

因为陶铸是湖南人，他担心自己的方言同学们不懂，便问学生们：“我说的话你们能听懂吗？共产党公开提的第一任辽宁省委书记就是我，45 年解放，我就任省委书记，以后在辽东，辽西省委书记，我和东北还是很有感情的。47 年跟林彪同志进关没回去，17 年了，很想去看看。”

他说：“中国搞不好，世界革命就要倒退 200 年，共产主义最后还是要实现的，马列主义一定能胜利，这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世界革命人民都眼望着北京，中国要是变了，世界人民就会失望了。

不管你赞成不赞成，最后都会建设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只要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其他各国都会很快跟着走的。解放战争时，十分之一的人口解放了，其他人口就很快解放了。”

他对学生们说：“你们方向对！”

学生们热烈鼓掌。

陶铸说：“真理在你们手里，为什么他们由多数变少数？你们由少数变多数？因为你们方向对！你们是正确的，过去省委，东北局未支持你们是错误的。当然这不是一个省的问题，全国大同小异。”“执行了错误路线，全国都有，你们那地方怎么没有？只是有的轻有的重，有改得快，有改得慢。那时全党服从中央、下级服从上级、个人服从组织嘛！你们东北局，省委就是怕字当头！多数派是保守派，他们很支持，……现在要总结经验，改正错误。同学们要有信心，全国大势所趋，没有中间道路，要么革命，要么不革命，怕革命是不行的。”

辽宁省委书记处书记俞屏说：“我们接见多数派指出他们不对。为什么要打架？我劝同学不要搞了，要平反，这些东西影响我们的精力。我建议批臭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可能比现在好。你们大方向是正确的，让他们承认错误。”

陶铸继续说：“农学院发生的问题，不只是农学院的问题，是普遍的，大连也是跟我谈的责任在东北局、省委。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宋任穷同志的发言还是诚恳的。潘复生同志指出东北局三分之一是正确的，三分之二是不正确的。东北局支持了保守方面，没有分析情况，应该支持谁，不应该支持谁，没有批评省委怕字当头，压制群众，东

北局在沈阳支持了潘复生，支持了哈尔滨造反团是正确的，在辽宁没有支持造反派，东北局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辽宁学生斗学生非常严重，是不是，徐少甫？”

辽宁省委书记处书记徐少甫答：“是。”

陶铸：“压力大，将来你倒霉，你怎么能压迫革命同学？辽宁省压制群众，怕群众怕得厉害，这是我个人的看法，不是鉴定，我无权给东北局鉴定，我提给东北局，辽宁省委作参考。我看我讲的话是比较客观的，讲就是主观宣传了，我建议辽宁省委，东北局彻底解决问题，挖一挖，这问题是严重的。在东北局、辽宁省有些路线还有发展。以后你们不要把书记带到北京来，不要把你们名誉搞坏了，井水不犯河水嘛。”

“中央一小撮人违背了毛主席的路线，东北局，省委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是可以理解的。这是头脑中的和客观的不谋而合。要力争不犯方向路线错误，犯了要快改。”

谈到“黑材料”，陶铸说：“5 月 16 日至现在，所有文化大革命中的黑材料都烧掉。凡是文化大革命中的黑材料就烧，烧，烧。”

众人鼓掌。

陶铸继续：“都烧了，你们就放心了。大家都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是人民内部矛盾。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各中央局多数执行了。改正不迅速，要彻底批判，用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解决。多数还是人民内部矛盾，要批判斗争，还是文斗，不搞武斗，不变相体罚，不囚禁起来。批判从 8 点到 12 点，吃好饭再来嘛！不

开疲劳会。我看你们回去要斗一下，斗一下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没什么，对不对？”

俞屏，徐少甫赶忙说：“对，对，对。”

陶铸：“随叫随到，前面可以加个请字嘛。”

“最后，对待农学院的 3 位同志，东北局、辽宁省委要负责，多数派是错的。要给他们平反，东北局是能解决的，把问题搞成这个样子，还带到北京来了，使同志们受损害，要道歉，开大会。”

接见完这批沈阳的学生代表，已是 11 月 18 日凌晨 1 点多钟，陶铸不能稍歇，接着又马上接见与刚刚接见的沈阳农学院“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相对立的，押送那 3 名教师到北京告状的沈阳农学院“红卫兵”，动员他们放了抓到北京的那 3 位教师，即沈阳农学院“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的负责人。

陶铸首先表示歉意说：“到齐了吧！本来讲 11 点半开会，现在 1 点多了，让你们等了很久，首先向同学们道歉。刚才我和农学院‘毛泽东思想红卫兵’谈了。你们这次看到毛主席了吗？”

同学答：“看到了。”

陶铸：“见到了就值得了。1945 年解放后，我曾任辽宁省第一任书记，还当了沈阳地委书记 3 个月，1949 年进关以后，17 年未去东北了，东北变化很大。今天讲两个问题，一是总结经验，二是两条路线的斗争问题。”

他讲了半天文化大革命的意义，讲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最后终于谈到主题。他说：“把精力消耗在材料问题上不好，要集中精

力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犯路线错误，一般说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只许文斗，不许武斗，不搞变相体罚，开会请他们到。大都是五、六十岁的人啦！思想从严，组织处理从宽。批判反动路线是全党的事情。”

陶铸动员农学院“红卫兵”放了抓来的3个教师，他说：“你们把那3个人放回去好。杨老师是贫农出身，受党培养8年，过去他确实说了些错话，他自己要检查，这种事东北局有责任，今后要负责解决，你们高高兴兴地回去。今天就讲到这里。”

同学代表不答应散会。陶铸说：“你们明天若不走，可派30至40个代表，再向我汇报两小时，我讲一小时。或者你们回去讲。”

有的同学说：“回去还是学生斗学生，他们根本不让写大字报。”

陶铸：“东北局帮助你们解决，若是不行，再来。”

当晚，陶铸如约和周荣鑫继续接见沈阳农学院“红卫兵”代表。

学生问：“对我们的斗争大方向怎样看法？”

陶铸说：“两方面都是革命的，但他们激进些。如医生治病一样，都是为了把病治好，但有各种学派。”

学生说：“我们从‘825’后开始分歧。主要在对待院党委的态度上不同，我们主张先大鸣大放揭问题，即先定性后罢官。而他们主张先罢官后定性，到底谁按《十六条》办事？不同意罢是否就是保皇？”

陶铸回答说：“罢也可以，不罢也可以，对这个做法的争论，无所谓保皇不保皇。既然罢了就罢了嘛，为什么要复官呢？这样就会影响群众的积极性。把群众发动起来这是最重要的问题。罢官是东北局决定的，后来复了，就压制了那一派，这是省委的责任。在运动中，

群众起来是很不容易的，现在革命就是革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命，如果是四类干部，不仅是个罢官的问题，而是要开除党籍的问题。二、三类干部都是可能罢官的，罢官不一定就是定性。定性要最后由上级决定。”

周荣鑫也说：“北京各大学党委，其实都有罢了官的，少数派不信任这个党委，完全有权提出要求罢官。”

陶铸：“在八月份那种低潮期，罢了可能对发动群众有利，罢了官并不是作结论。”

学生说：“我们当时主张深挖深揭的做法是维护《十六条》的。”

陶铸：“《十六条》最基本的一点是把群众发动起来，敢字当头。只要总的方向对头，出一点小偏差，没有什么问题。你们不如他们胆子大，顾虑多一些；他们没有你们照顾政策，但冲劲大，有利于运动。既然罢了，就不要再辩，到运动后期处理，这个责任主要在省委。如清华大学的情况，蒋南翔的问题揭出后，要发动群众，关键在工作组的问题。当时蒯大富要揭工作组的问题，被打成‘反革命’。他这派只剩下十几个人，连薄一波都说他样子像反革命，简直主观透了，说人家名字叫大富就是反革命，这算什么道理？”

学生问：“我们按照抓革命促生产的精神，去参加劳动，而他们把和他们观点一致的农场工人拉去搞静坐。谁是坚持大方向呢？”

工人代表也说：“农院附属农场是搞四清的，他们不按四清搞，把工人拉去静坐示威，生产停下来了。还宣传打倒场的领导可以坐小汽车、住洋房等等。”

陶铸说："抓革命促生产的问题，在写《十六条》时，我们没有经验，只能原则上定，搞四清运动，方向是正确的，因为中央10条和后来的23条，都是毛主席制定的。现在看来，用文化大革命的形式搞，可能比四清搞得彻底。中央正在考虑这个问题。学生可以到工厂、农村去，工作时间可参加劳动，业余时间搞革命是可以的。学生支持工农闹革命，方向是正确的，但停止生产和那样宣传，如坐小汽车、住洋房等，方法是不对的。"

工人说："我们也有被打成反革命的。"

陶铸明确："不管哪一方被打成反革命，都平反。工人开除的要给工人照发工资。"

学生质疑："你在对他们的讲话中说过我们是保守派！"接着念讲话记录。

陶铸分辨说："我没有讲你们是保皇派和保守派，只讲是保守一些。我的讲话记录待我审查后，给你们写信，我亲自签名分发给你们。"

"至于双方打了架，不要再说抓凶手了。什么凶手呀，都是革命同志。但是那三个人被抓是个错误，侵犯人权，是政治迫害。主要责任要由东北局负，回去开个大会，俞屏要讲话，宣布双方被打成反革命的名单，进行平反。平反时，这三个人要突出地讲，先讲这三个人，再讲所有的人。""每个人要责己严对人宽，要有无产阶级政治家的风度，才能达到团结。"

陶铸建议：“你们‘红卫兵’起个名，不要用农学院的名义，因农学院是双方的。院文革是否可以停止活动，以后再新成立。现在北京很多学校都没有文革。从分到合，先消一下气。”

同学：“我们不同意取消文革。”

陶铸：“这是我的建议，你们可以考虑。”

学生：“请陶铸同志为我们‘红卫兵’起个名字。”

陶铸：“叫‘辽沈战役红卫兵’吧。”

学生们说：“同意。”热烈鼓掌。

第298回：北机床，向工人了解情况　斗卫恒，学生封《湖北日报》

11 月 16 日 北京机械学院“东方红”50 多名学生到北京第一机床厂串连，遭到拒绝。学生们便翻墙而入，强行进厂，与工厂“捍卫团”组织发生冲突，双方辩论十几个小时，一些学生被打。18 日下午，陈伯达、王力到北京第一机床厂半工半读学校与各派代表座谈，了解情况。

对工厂中发生的打人现象，陈伯达说：“要按《十六条》办事，要用文斗，不要武斗。要听毛主席的话，只用文斗不武斗。过去打过人的，今后不准再打人了。过去打过人的同志要向被打的人赔个不是。”

有人问：“学生要进工厂怎么办？”

陈伯达答：“以后学生来，你们要欢迎他们，无论那一派都要鼓掌欢迎。我建议你们要搞好文化大革命，一定要把时间安排好，八小时的工作制一定要保证。产量要高，质量要高，任务要完成。剩下的时间可搞三小时到四小时的文化大革命，时间太长你们太累，你们中断生产得不到社会上的同情。”

问：“有人不上班对不对？工资发不发？”

答：“工人不干活就不对。过去没干活去搞文化大革命，工资还是发，因为以前没有规定。”

问："现在少数派办公室有十几个人整天不干活对不对？"

陈伯达答："工人不要脱产，除病号外，统统回生产岗位。办公室封了可以打开嘛。"

问："他们学生要进厂闹事，影响生产怎么办？"

陈伯达答："你们和学生交流经验，学生可以派代表谈判，你们和学生开座谈会。学生进工厂学习、劳动有好处，有问题可以商量，他们有错误你们可以纠正。不要把他们当成洪水猛兽怕他们进来。"

18 日这天，"北航红旗"又有约 500 人到北京第一机床厂串联，结果被轰赶出来。当天晚上，北京第一机床厂派出几十辆汽车到天安门广场游行，高喊"北航红旗滚出去！"等口号。

11 月 17 日，山西"革命造反兵团" 和山西大学"88 红旗战斗队"、 十三冶的"决死纵队"，联合"北农机全无敌"、"北航播火兵团"在太原五一广场召开了"批斗反革命修正主义黑帮分子卫恒"大会。这一回卫恒不是走来的，而是被"兵团"小将们直接从省委机关揪来的，一直揪到了五一广场的主席台上。陪同他的还有省长王谦和省委书记处书记王大任。这三位被简称为"卫、王、王"，是当时山西省委的主要领导人，此时成了"黑省委"走资派的主要代表，他们胸前挂着写有走资派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字样的牌子，名字上打着红叉。这是山西省委书记卫恒和省委的其他领导在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第一次被公开揪到五一广场接受批斗。

当省公安厅的领导得知“兵团”要在五一广场揪斗卫恒等省委领导时，曾经做出派警察保护省委领导的决定。但卫恒却以省委第一书记的身份，立即严肃告知省公安厅领导：“不要派人，已派出的一律撤回。”又严格指示，公安人员一律不准介入这种活动。

11月18日晚，已经两天没有睡觉的关锋、戚本禹与已经等候很久的山西省“革命造反兵团”、山西省电业管理局“革命造反队”、山西大学“八一四毛泽东思想先锋大队”代表座谈。

山西大学的学生首先向关锋、戚本禹说明了来意，一是反映山西省委在文化革命运动中贯彻了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二是要求中央文革领导解答前段运动中的有关问题。

当学生们谈山西省委压制群众运动时，关锋问：“你们知道不知道袁振的问题？解悦的问题？袁振我不认识，解悦我见过，这在你们省里是很大的问题。省市委机关群众运动起来了没有？”

工人代表说：“没有，尤其是中上层干部不敢说话。”

关锋提到的解悦，原是一个普通的农村姑娘，1958年大跃进时，进入太原纺织厂当上了纺织工人。头一天上班，她按规定看100个纱绽，第二天就要求看200个，过了几天，她主动要求看400个。随着技术的不断提高，到1964年，她创下了一人看1800锭的亚洲纪录，这是当时两个以上挡车工的工作量，而她并未因此多拿一分钱的奖金。

1965 年，作为全国劳模之一，解悦受到了毛泽东的亲自接见并合影留念。刘少奇、邓小平、薄一波等领导都称赞她，当时身为《红旗》杂志总编和《哲学研究》杂志主编的关锋亲自上门采访她，并发

表了署名“关锋”的文章赞扬解悦的奉献精神。

解悦勤奋好学，对共产党、对社会主义、特别是对毛泽东，都有着无比深厚的感情。出名以后，约她写文章的也就纷至沓来，她也曾写过不少文章，其中有一篇叫做《接头的规律，纺纱的哲学》，登在1965年第六期《哲学研究》杂志上，同期发表的一组工农兵学哲学的文章中，还有一篇文章是后来江泽民执政时的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当年号称“青年鲁班”的全国劳模李瑞环。

文革开始后，解悦也在报刊上发表了一系列批判“三家村”的文章，可是，随着文革的深入，她本人也在厂里遭到炮轰和火烧，说她是走资派的“黑劳模”，还挨了打。此事反应到了关锋这里。

接着，有人提到山西作家赵树理，说他既是反动学术权威，又是当权派。戚本禹听了笑了，说：“不是学术权威，写小说的怎么成了学术权威？赵应该是反动艺术家。”

关锋：“是个反动艺术家，总之可以批判就是了。”

工人代表说：“我们认为山西省委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中央是有根子的。”

关锋点点头说：“你们看根子在哪里？可以谈谈。说错了不要紧，我们不抓你们的辫子。”

工人提了5个人的名字。

“兵团”代表汇报了他们对袁振的看法，当谈到在华北局会议上把袁振打成“伸手派”时，戚本禹说：“‘伸手派’就是你们山西的特点。”

“兵团”学生说：“山西省委说袁振的问题是党内问题。”

学生继续问：“袁振的问题究竟是党内问题，还是党外问题？我们可不可以伸手？卫恒等人以‘袁振是党内问题’为借口，不让我们插手，我们应当怎么办？”

关锋说：“你们不会辩论嘛！”

戚本禹：“你们不是插手了吗？插手你们可没有问过我们吧！现在怎么又来问我们呢？”

关锋：“袁振不是作了检查，承认了嘛！后来又发表了个声明？”

戚本禹：“你们除了在袁振问题上造反外，还造什么反？做了几件大事？你们有什么刊物没有？”

学生们做了汇报，当他们问到：“华北局会议，我们可以不可以了解？是不是保密问题？”

戚本禹答：“这个问题问华北局，不要把矛盾上交。”

关锋：“去华北局问他：袁振你们现在怎么看？袁振是不是野心家、伸手派？是好人还是坏人？袁振是我们市委第一书记，我们要关心国家大事嘛！”

山西的工人问：“工厂企业中如何处理抓革命、促生产这个问题，是不是在不影响生产的情况下，可以去搞些串联？机关中能否成立其他的革命组织？”

关锋答：“红卫队可以搞，工人最好用‘联合会’、‘代表会’，形式就多了。成立革命组织，中央是允许的。”

戚本禹：“你们说是否可以发展？你们说呢？可以嘛！别的组织

可以在嘛！红卫兵是30岁以下的人，是青少年组织。老头、老太婆还像什么话？工厂干部有工作任务，我们不主张大批出来，怕影响生产，业余时间在本市串联为什么不可以呢？”

“你们出来了，这是可以的，但是不提倡，你们出来怎么能不影响生产呢？每天8小时工作嘛！文艺团体可以另外考虑，他们不搞什么生产，而是搞文艺，特别是过去的文艺团体，尽搞牛鬼蛇神、帝王将相，所有他们走了也不影响生产。当然可以出来啦。”

工人问：“中央对山西文革运动看法如何？”

戚本禹：“中央文革还未专门讨论山西问题，不好回答。由山西群众自己讨论。”

学生问：“三级干部会的召开是否是中央指示，山西省委检查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其他人可否参加？”

戚本禹答：“是中央指示召开的，犯错误就得检查嘛！群众不一定派代表参加。”

关锋：“陕西交大李世英是个‘大反革命分子’，这个人很有本事，他们不要求参加三干会，要保护会议开好，他们印发了好多传单，还搞了一个展览会，把参加三干会的人请了去参观，使参加三干会的同志了解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搞得很好。他们没有参加三干会，但起了很大作用，实际上是参加了三级干部会。”

他又谈到太纺解悦的问题：“群众之间互相贴大字报，这没有什么。如有领导、有组织，拉一派、搞一派，那就叫群众斗群众。太纺的杨丕夫我认识，解悦我也认识。我和杨丕夫谈了两个晚上，批评了

他。前几天，接见了太纺的几个人，我谈了3点：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是运动的大方向。杨丕夫挑动工人斗工人，群众斗群众是完全错误的。杨丕夫犯了方向性，路线性错误。二、解悦是活学活用毛著的标兵。她的工作搞得很好，她挨了打，我们表示慰问。三、有人说：林彪同志、江青同志说过反解悦是对的，这是错误的，没有这回事。”

“山西太纺停工，这是很大的损失。袁振的问题是个人问题，但我们了解得不多，不能得结论。如果袁振真的是个野心家、伸手派、反党分子，应登报公布，让大家讨论，使大家受到教育；如果不是，也绝不能马马虎虎，合稀泥，掩盖过去。到底是不是，你们解决。”

一位工人代表说：“聂元梓等新写的大字报，在大街上广播，说刘少奇是中国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邓小平是第二号，我认为这种做法不合适。”

戚本禹：“你有你的看法，聂元梓有她的看法，不同意见可以保留嘛！”

11 月 16 日，武汉“二司”、“三司”和“哈军工”、“西军电”、“北航红旗”等部分外地红卫兵研究决定查封省党报《湖北日报》。他们先在洪山开大会，会后游行来到《湖北日报》所在地——红旗大楼。这是一幢 8 层楼的玻璃钢窗现代主义建筑风格的大厦，建于 1949 年，当时是永利银行大楼，也称裕华大楼，离长江江堤不远，位于江汉路与洞庭街的交口处，右面与江汉关钟楼遥遥相望，正面为纺织工业局，1966 年改称“红旗大楼”，是当时武汉的一个标志性建筑。

学生们在红旗大楼前集会，几个同学站在大门口的台阶上，宣读他们的《联合声明》，指责《湖北日报》总编辑刘江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名目张胆地反对毛泽东思想，公然篡改毛主席语录和林彪同志的指示……挑动工人、群众斗学生，挑动学生斗学生……吹捧张体学，为湖北省委唱高调，把张体学凌驾于毛主席之上，把湖北省委当独立王国，充当了湖北省委镇压革命、镇压群众运动的凶恶打手，现已堕落为湖北省委少数人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喉舌”。他们要求彻底改组编辑部，撤社长雷行的职，罢总编刘江锋的官，勒令该报停印。

红旗大楼内顿时乱了起来，有人觉得学生们说得对；有人觉得不妥：党报怎么能学生说停就停呢？

学生们冲进红旗大楼。顷刻间，楼内到处是造反派学生，报社工作人员实际上已不能再继续工作。由于文革开始后，中央三令五申，任何地区、单位不能动用军队、警察镇压学生运动。因此，对学生的行为谁也不敢表示反对，报社领导也只能听之任之，束手无策，当然还要向上级报告，等候上级的处置意见。

这起群众造反封报事件，在中南地区尚属首例。中南局以[中南发（66）字]特急电湖北省委，表示：“‘北航红旗’、‘哈（尔滨）军工红色造反团’、‘西（安）军电临委会’和武汉‘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对《湖北日报》前个时期在报道上的错误，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这种对党的事业高度负责的革命造反精神，是很可贵的。湖北省委和湖北日报编委应该热忱欢迎和支持同学们的革命行动……”，电报要求让

学生将改组日报编委的意见向省委提出，有不同意见，可以进行研究，但要保证照常出报。

湖北省常委当天召开紧急会议讨论此事，常委、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在会上说："先要拉他们谈。他们要改组《湖北日报》，也可以研究，把材料搞了再研究，把他们拖住不要占《湖北日报》……闹得不能出报，这个风不好，其他问题可以谈判嘛！"

其实，文革开始时陈再道因生病正在北戴河疗养。8 月间，看到全国各地文化大革命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了，不甘寂寞的陈再道坐不住了，主动给主持军委工作的副主席林彪写报告，说自己身体已经好了，可以回去参加运动了。林彪很快批准了他的请求。路过北京时，他顺便去看望了老领导徐向前。

再说此时的武汉，群众中有要求封报的，肯定就有反对封报的。第二天，11 月 17 日凌晨，以"武汉地区大专院校红卫兵总指挥部"大旗为前导，武汉"一司"的学生和各工厂的"赤卫队"及湖北大学、武汉医学院的复员退伍军人组织----"红卫军"、"女红军"等工人为主力的庞大队伍分乘大批卡车来到红旗大楼。他们的口号是："保卫党报！"他们指责查封《湖北日报》的行为是向湖北人民封锁党中央、毛主席的声音，是破坏文化大革命！"一司"红卫兵和工人包围了红旗大楼，对"二司"、"三司"展开围攻。双方从争辩、推搡、冲撞开始，相持约两个小时后，终于出现了流血事件。"赤卫队"和"红卫军"爬上窗台，破窗而入。坚守在楼内的学生哪里是工人的对手，"二司"和"三司"的学生被一个一个地从楼内拖出来，推下大门前的台

阶。

学生们打架不行，动嘴还是强项。当天，查封《湖北日报》的学生临时指挥部与《武汉晚报》编辑部联合发表声明称：他们只造《湖北日报》的反；对《人民日报》、《解放军报》要扩大发行量，并发到每一个省报订户手中；支持《武汉晚报》照常出版；《武汉晚报》保证不将新华社电讯稿转交《湖北日报》。晚报造反组织公告表示支持造《湖北日报》某些人的反，申明两报联合印刷厂的“机器被砸碎”纯属造谣。

第 299 回：没想到，王任重问题严重　说话间，江青忍不住哭泣

由于党报与民众政治生活的紧密联系，《湖北日报》事件顿时成为武汉市舆论的中心话题。汉口、武昌街头随处可见辩论的人群，市民、工人和机关干部全都在那里议论纷纷，人人发表自己的看法，赞成、反对，众说纷纭。一些旁观者还以大字报形式表述自己的看法。整个武汉沉浸在一片罕见的大民主的气氛之中。其中有一张当时传遍武汉三镇的大字报:《两个工人的对话》,记录了那时的两种不同意见：

工人甲：省报错了几个字和文章，可批判，不应该封，不要一棍子打死，要相信群众，应该请示毛主席党中央决定停刊。张体学的检查虽不深刻，只要改正错误，还是三类、二类，甚至一类干部，造反派应该在炮轰同时找他解决问题。

工人乙:暂时停刊不是一棍子打死,要求改组编辑部不过是手段,目的是把报办好，办成真正的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喉舌。

一篇出自汉阳钢厂工人的文章：《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我们工人支持你》说：

批判资反路线、走资派是主要矛盾，封不封报社的争论是内部问题、是非问题，相对双方可以求得协商，意见不一，可各自保留，再不要引起冲突伤亡。

可见,人们对于能够自由发表自己意见的环境还是欢迎的,但是,对可能出现的武斗现象，由衷地感到恐惧和反对。当然，直接参与事件的学生，情绪就要比旁观的工人激烈得多了。

出乎保守派所有群众的意料,湖北省委对造反派查封《湖北日报》

的要求很快就做出让步。11 月 18 日凌晨 4 时，省委负责人张体学、赵修、秘书长张华到红旗大楼与学生谈判。可是，楼内学生组织众多，山头林立，没有一个核心。大家七嘴八舌，争先恐后，张体学他们也不知该听谁的，与谁谈判。最后，还是华中工学院学生聂年生、赵延昌站了出来，将学生们的意见集中起来，对张体学等人说：

“省委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应该向全省人民做出交待。群众批判省委是为了帮助省委扭转前一段时间的错误方向，也是为了更好的将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并不是针对某个人的个别行为，作为领导干部不应该有抵触。”

张体学表示：“揭发批判报社的错误、造报社的反、占报社大楼、封报社、停止发行是革命的行动。我不是虚伪，流血事件我们没有制止，这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影响，由省委负责。”并说：“你们在毛泽东时代比我强，我对大串联不理解，对红卫兵冲进省委，革我的命不理解。文化大革命好，打掉了我的官架子。”

张体学肯定了学生们的行为，承担了封报引起的武斗责任，聂年生也在他的脑海里留下了印象。

恰在此时，在熙熙攘攘的红旗大楼门前，武汉实验中学造反派学生将王任重的儿子、该校初三学生王三宝收藏的其父笔记和诗张贴在大楼外，顿时引起全市的轰动。特别是王任重 1959 年 6 月 28 日陪同毛泽东到韶山时，记于留言簿的那首诗：

韶山风光依旧，

人世几经沧桑。

壮志已成大业，

何须衣锦还乡。

立即受到造反派的激烈批判，说王任重“到韶山”一诗是讥讽和反对毛泽东的。

本来王任重诗的前三句都是赞扬毛泽东革命事业有成，但第四句的作者潇洒反问，在那个无限上纲的年代，一下子成了批判王任重的钢鞭材料。其实反问句在诗中是常用的一种写法，如“峥嵘岁月何须风流”等等，大学生不能说完全不懂这种写法，但此时正是寻找王任重小辫子的时候，这样的材料自然不会轻易放过。而且，“衣锦还乡”典出自《史记》：鸿门宴后，项羽想到他老家在江东看看，下人劝他不要去，认为天下未定，但项羽说，我建立如此辉煌的事业，如不衣锦还乡，谁认识我项羽呢？张良听到这句话后讽刺说：“楚人沐猴而冠”。而武汉大学经济系三年级学生杨家志，在 1966 年 6 月 8 日写给王任重的信中，就公开批评过的王任重 1959 年以后写的《读史札记》中，将《史记》中的“楚人沐猴而冠”的原话译为“原来这个楚国人是个穿花衣服的猴子呀”。于是，“穿花衣服猴子”就成了王任重对“沐猴而冠”的古典今译，“穿花衣服”，也就是王任重对“衣锦还乡”的注解。这么一绕，王任重“到韶山”的这首诗不就成了骂毛泽东的反诗了吗？

11 月 18 日，就在张体学到《湖北日报》社与学生谈判的当天，中央文革小组的关锋、戚本禹接见武汉地区 16 所大专院校的武汉“二司”赴京代表团，第一次将中央文革小组与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王任

重的分歧公开披露出来。

关锋说："接到湖北同学给伯达同志的信，提到王任重的问题，要求王任重回去检讨，我和戚本禹同志受伯达、江青同志和文革小组的委托，来看望你们，简单的说明一点情况。

王任重来北京好几个月了，在这几个月间，在北京的工作也好，给湖北省委的指示也好，没有在文革小组讨论过，没有向文革小组汇报过。他的作法和中央文革小组没有关系，这是第一条。

第二，是王任重已经回去半个月了，不在北京。关于王任重的问题可以找陶铸，他是管中南局的，对王任重比较了解。

第三，对王任重有什么意见可以批评。"

戚本禹："等了半天，就是这么三句话，够用了吧？清楚了吗？"

众答："清楚了。"

其实，何止是"够用"呀，学生们简直是非常意外，原来王任重的问题比他们原来揭发的还要大！接着会议转为自由谈话方式。同学汇报武汉情况，他们谈了自己的体会：

"我们现在逐步认识到王任重是湖北省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总指挥，总后台。"戚本禹和关锋相视一笑，连连点头说："啊！你们现在才意识到"。

接着，学生们汇报了《湖北日报》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些事情，说明他们为什么要封《湖北日报》，关锋回答说："这些材料我们都有了。"

戚本禹说："你们用《人民日报》对照《湖北日报》去批判，用

中央首长的讲话对照他们的讲话去分析批判是对的。”中央文革对造反派封报的行为表示了支持。

同学们又提到湖北武汉地区还有工人、群众围攻、斗争学生的现象，提到以前省委、市委曾经出动囚车逮捕、毒打学生，镇压学生运动，其中，绝大多数是中学生。张体学自己检查时都承认逮捕了100多名学生，有的至今还未放出。

戚本禹问：“到底抓了多少人？”他非常气愤地对关锋说：“这在全国少见，湖北确实特殊。”他接着问：“最近湖北省委还有什么新东西？”

同学们答：“他们又组织工人‘赤卫队’，复员军人‘红卫军’，用来对付革命学生，现在有的工人公开打人了，发生了流血事件。”

戚本禹问：“有没有支持你们的工人？”

同学讲：“有！前几天来了‘毛泽东思想工人战斗团’，有200多人，控告省委。”

戚本禹说：“哦，工人也起来了。工人中也有‘少数派’，他们被打成‘反革命’，受压制受迫害比你们还厉害，你们不和工农结合将一事无成。”

“最好的办法是职工起来自己造反，你们要和职工结合，他们行动起来力量比你们更大。”

关锋说：“这次运动是学生开头，但不是主力军。”

戚本禹说：“你们是不是主力军？你们要在斗争中认识到这一点，不和工农群众相结合将一事无成！”

同学问："串连怎么办？我们想到农村、工厂去宣传我们的观点，和工农群众结合。"

戚本禹答："你们自己考虑，多少人去农村，多少人去工厂，多少人留在学校搞……"

关锋插话："我们不了解情况，需要你们自己去处理"。

11 月 19 日下午 15 时 50 分到 18 时 10 分，在政协礼堂三楼，陈伯达、江青、王力、关锋、戚本禹接见为 18 日被北京第一机床厂轰赶出来一事而前来告状的"北航红旗"学生。

学生说："我们去第一机床厂，不让进，说我们不符合中央精神。"

陈伯达："你们爬墙进去的吗？"

学生没有正面回答，继续控诉说："昨晚第一机床厂派了 27 辆汽车游行，还通过天安门广场，叫'北航红旗'滚出去，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另一同学说："他们叫'北航红旗'从工厂滚出去。他们到劳动人民文化宫，第三司令部还接见他们。"

学生们问："目前可不可以到车间跟班劳动？"

陈伯达："我给你们谈一点小意见。用造谣、混水摸鱼的手段，想取得群众信任，没有一个不失败的。我们希望同学们，做记录或不做记录，每句话都要落实，每一个字都要落实。"

“你们年纪很轻，政治上敏感，有勇气，敢于斗争，接受毛泽东思想比较容易。这是你们的好处。这是你们的优点。但是，你们有缺点没有？今天我找你们来，就是讲你们的缺点。”

“中国有一句古话：‘行百里，半九十’”。100 里路，走了 90 里路，算走了一半吧！最后 10 里路，最难走了。走了 90 里路，觉得了不起了，可是偏偏这 10 里路不容易走，可能要发生错误。要跌倒的，不是前面的 90 里路，而是后面的 10 里路。对不对？”

“这些话，也是对我自己说的。中央、毛主席委托我们做文化革命工作。有时做的对，有时做的不对。我经常对文革小组的同志们说，要提高警惕，不要冲昏头脑。”

“昨天晚上这个事情，给你们很大的警告。昨晚我到机床一厂，谈了 4 个钟头。你们不要吵架，不要只许这方面说，不许那方面说，这就辩不起来。我想找同学们谈话，听说第一机床厂与你们有关系，有工人对你们说了不少意见。我就想，学生的确需要向工农学习，同工农打成一片。我们学生到工厂去，首先抱着做小学生的态度，不是带着一个当先生的态度，我来教训你们，你们应当怎么做，变成瞎指挥。与大家商量，两三个人谈都可以。不要采取工人或老工人不喜欢的手段。当然，他们的话也有打折扣的。那几位同学到第一机床厂去，你们爬过墙没有？”

同学答："没有！开证明信去的。"

陈伯达："我说，你们北航要特别谨慎。"

这时，江青进来了。她说："不要录音。我们与你们谈谈心，伯达同志与你们谈谈心。"

接着，陈伯达和同学们讲了怎样与工人、农民谈话，介绍了自己的经验。最后，他说："爬墙不是你们。你们要说服机械学院的同学。这个错误，首先是工厂的领导，他们为什么不开门呢？我们去，"

这时，江青插话说："有些工人受了蒙蔽。你们要原谅他们。"

陈伯达继续说："如果他们有这些行为，你们不要有对抗情绪。他们是受了蒙蔽，有人在幕后操纵，有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在幕后操纵。你们不能怪工人，昨天我在第一机床厂替学生说话。今天我替工人说话。可能你们要批评我折衷主义。江青同志，你讲一讲。"

江青说："同学们！同志们！我首先要你们原谅我，有客观的原因，有主观的原因。今天关起门来谈心，不许记录，我们谈心。……你们看过西游记没有？我这个人像孙悟空，'身在水帘洞，心追取经僧'。我心里总是想着你们，当我知道北航同学在受折磨，我非常难过，我确实哭了。如果我不是主席的老婆，我就要和你们一块儿去。"

说到这里，江青忍不住哭泣起来。同学们见状赶紧高呼口号："毛主席万岁！"

江青继续说道："我们小组大部分同志很是激愤。但我们受中央常委委托，我们不能去。你们不是唐僧，你们是革命先锋。中央批转军委的紧急指示以后，你们又出现了新苗头，分不清敌、我、友。这是战略问题。……7 号晚上，最热闹了。同学们发了一个电报，反对我们总理。我不知道总理说了些什么话，我知道总理受中央、主席的委托。这样一来就要大乱。最近又有叫依林的，贴副帅的大字报。林彪同志，恩来同志，我认识 30 多年了。贴出来后，又撕了。不经辩论，这不妥当。随便贴副帅的大字报，从政治上考虑不妥。既然已经贴了，不要采取撕的办法，可以用大字报辩论嘛！撕了，他倒神气了。散发了很多传单。……第三司令部不是已分裂，第二司令部不是被抄家了吗？有人问我怎么办。我们不能包办代替。分裂没有什么原则性问题，要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

她接着问到："蒯大富到哪儿去了，来了没有？哦，脱离群众了，住在司令部当起总指挥来了。脱离阵地很不好，阵地应该在学校，你们自己的阵地还不巩固，这很危险。请转告他，不到群众中去就不行。我批评他，是爱护他。核心力量要组织好，团结同盟军，并且善于利用对方的矛盾，孤立最少数的敌人。你们还辩不过谭立夫，辩不过依林？看你们谁辩过他？"

同学们纷纷高喊："一定驳过他！"

江青继续问：“你们有没有这个气度？”

众人齐声答到：“有！”

江青：“还想讲一个问题。对过去曾经整过你们的少数同学，只要他们检查得好，承认错误，又有揭发，可以让他们归队。对高干子女，要一分为二，有一小部分走错了路，不怪他们。要怪他们的中年人、老年人、幕后人。”

## 第300回：谈“草案”，工交会抵触颇大
## 施残暴，六中内私设刑堂

根据11月14日工交系统碰头会上谷牧的建议和11月15日余秋里给分管计划工作的李富春副总理的报告，有冶金、化工、水电、铁道、机械5个部和北京、天津、上海、沈阳、哈尔滨、武汉、广州7个大城市及各大区主管工业的负责人参加的工业交通座谈会，于11月16日在北京京西宾馆召开，主要是讨论中央文革小组提交的《关于工厂文化大革命的十二条指示(草案)》。会议由陶铸主持。

由于在《十二条》中写有“允许工厂成立群众组织”、“允许学生到工厂串连”等条款，与会者对《十二条》提出了许多意见，要求保持中央此前的一贯要求，即工交企业不能“停产闹革命”，运动只能在业余时间进行，学生不能到工厂串连等等。参加会议的大多数人抵触情绪很大。

参加座谈会的中央文革小组记者在11月19日至26日期间所写快报中反映了当时会议的一些情况：

一、与会者认为，工厂搞大民主、大串连势必影响生产。国家计委负责人李人俊说：文化大革命如果全面铺开，时间集中，问题集中，生产肯定要受到影响，影响的程度很难预料。他说，目前生产已有停顿趋势，科研、尖端项目、协作项目已基本上停止，基本建设也开始受到影响。其他代表就此问题作补充插话，认为当前生产主要靠吃老本，库存材料

已经很少，问题越来越多，马钢、武钢都有停产危险。因此，会议认为，开展文化大革命，只能分期分批地进行。

二、一致提出对工交系统要区别对待。西南地区的同志说，工交战线还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形势还是大好的。要求《十二条》对这一点要做出明确的估计。谷牧提出对工交系统的干部状况也要估计一下，这样写文件时才好提出问题。

三、与会者强调要坚持党委统一领导，一致认为建国十几年来工交系统的各级党委还是好的。东北地区的同志说，工厂里无论如何要由党委领导，下边再分两摊，不然非受影响不可。大家指出，《十二条》只提了统一领导，连党的领导都没有提，许多人对此很不理解。

四、工人搞文化大革命不要建立联合组织。各大区负责人表示，这是他们最关心的一个问题，担心各种组织中会出现两派对立的现象。东北地区的同志说，如果各种组织都建立起来，麻烦就更多了，不是打架就是停产。还有的说，现在工厂里组织已经不少了，有工会、职工会、民兵，还有党、团，还建立那么多群众组织干啥？他们要求对于建立全市性工人联合造反组织问题不要松口。哈尔滨和上海的同志都主张取消已经建立起来的全市性的工人组织。

五、与会者不同意把学校搞文化大革命的一套搬进工厂。他们担心学生进工厂串连会搞包办代替，搞乱工厂。有的部

长非常义愤地说：“现在的问题是学生到工厂去是向工人学习，还是领导工人搞革命？这是问题的实质，问题的核心。”他们要求在文件上写上“不能让学生和工人结合起来造反”。

六、关于革命和生产的关系问题是各大区和各部门领导人极为关注的问题。他们气愤地说，如果允许生产受影响，哪怕是允许有个马鞍形，就可以放手去闹革命。水电部长刘澜波说：如果既要抓革命，又要促生产，那么，我们的方针就得好好研究了。现在弄得人心情不舒畅，人家积极搞生产，说人家是保皇。

11 月 19 日，周恩来亲临工交座谈会。面对众人的情绪，他告诫大家：现在的形势是“方兴未艾，欲罢不能，大势所趋，势不可挡”。在这样的形势下，我们要学会“因势利导”。“我不入苦海，谁入苦海？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大家要抱定这种精神，挺身而出，为了保卫党和国家的利益，个人被冲垮了也要毫无抱怨。

他同时指出：工交战线进行文化大革命，必须充分考虑企业的特点，在党委领导下分期分批进行，工人要坚持八小时工作制，不能擅自脱离工作岗位，不能搞跨地区串连。

11 月 19 日，周恩来还在部长会上就档案问题再次强调说：

“划分一个界限：处理在这次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工作组的档案。文化革命以前的档案，即使有问题，与工作组无关，

留待以后处理。文化大革命中确实有反动档案（不属于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案的），要组成专案进行处理。

（一）处理档案的方针：

（1）凡错斗的错镇压的，都应该平反。这些人的检查材料都应退回本人，帽子一律摘掉。

（2）凡可以作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材料，凡不是影响群众斗群众，不影响大局的都可以退回群众。比如工作组对学生的讲演稿、报告稿、大字报等。

（3）凡是能够引起群众互相斗争的材料一律不交。但应当众销毁，比如左中右排队，排错的，别人反映的材料，这是对军委文件精神的一个补充和修改。

（二）各级党委应按此指示精神主动处理，承认错误。

如果处于被动的，可按此精神和群众谈判，如果谈不通，可以交上级党委帮助处理，如果仍然不行，就将此材料暂时加封起来，谁也不准动。现在各大学的主动权已经不多了。中学还可能有些主动权。运动一开始就排队。这是很错误的。也反映了我们组织工作中的问题。各省委、各个党委，各区党委都要过问这一问题，帮助处理这些问题，不能放任自流。只有把它解放出来，你们才有可能脱开手搞文化大革命，才能说服他们不去占领你们的办公楼，才能将被动变主动。”

根据周恩来的讲话精神，结合与会者的意见，在陶铸主持下，主持会议的谷牧和余秋里组织人对陈伯达的《十二条》

作了修改，草拟出了《工交企业进行文化大革命的若干规定》，共 15 条，简称《十五条》。

《十五条》明确写上“十七年来，工交战线基本上是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除此之外，还对陈伯达的《十二条》原稿作了一些增删合并，最重要的是增加了三条内容：

（1）工业化大生产具有连续性和社会协作性，不能停产闹革命，只能有步骤地分期分批地搞；

（2）工人参加“文革”活动，只能在业余时间内进行，八小时工作制不能侵犯；

（3）学生不能到工厂去串连。

其中第 15 条就是一句话:“此件精神也适用于财贸系统。”这是按照当时主管财贸口工作的姚依林的意见加上的，姚依林一再说:“你的列车上一定要多挂一个车皮，把财贸捎上。”

11 月 19 日，全国总工会主席刘宁一接见无锡工人代表，解答他们提出的问题。他说：

“你们不管受到了什么委屈，来北京告状，向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革命司令部讲讲怎么不能呢！这是革命的行动。谁要说你们到北京来告状就是‘裴多菲俱乐部’，这是不对的。”

“你们是在运动初期贴了大字报。毛主席给了我们六大自由、四大民主，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以后加大串联。革命的大字报以后还要贴。你们回去敢不敢贴？”

众答：“敢。”

刘宁一继续说：“因为这样被打成‘反革命’的，回去立即平反。来北京告状是允许的，不仅不开除，工资还要发。因为你们是被迫来北京告状的。”

“你们在文化大革命中产生的各种组织，算不算合法？宪法上规定有结社自由。革命中成立的组织，当然是合法的。组织有各种各样：有厂的，有厂里几个组织联合的，有厂和学校联合的，有地区性联合的造反司令部。联合的可以叫代表会，或者联合会。怎样对工作合适，需要研究。”

有人说：“我们每天接待两、三千工人，怎么行？”

刘宁一说：“你们想想办法，要一个脱产人员没有，把工作做了。”

“我是做总工会工作的，我想今后工厂里的群众组织都不设脱产干部。不能依靠人海战术，要靠大家自己闹革命。”

有人说：“有跑到部队去的。”

刘宁一：“还有跑到高粱地去的，真是怕得出奇。我们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有了错误就要改，和大家一起闹革命有什么怕呢！”

当有人问到怎样“抓革命、促生产”时，刘宁一说：“我理解大家提这问题不是反对抓革命促生产，而是有人利用这口号不让大家革命。有人想利用《人民日报》社论，变成以生产压革命是不对的。《人民日报》准备再写一篇文章，我

们不要放弃这个口号，放弃了也会犯错误。应该抓起革命这个纲，促生产。”

关于工厂的文革委员会，刘宁一说：“厂长、书记都不能当文革委员，选了可以取消，因为不能自己监督自己。”

有人问：“文革委员会和本单位党委是什么关系？”

刘宁一答：“党委很受大家欢迎的可以，已经瘫痪了的要采取措施。文革委员会是否在党委领导下？如果党委很好，文革委员会自己会和它商量的，但文革是群众组织，党委不能直接下命令。如果瘫痪了，就不会理会。工厂的生产不能断，工厂的生产领导班子要健全，我们要注意这个问题。”

11月19日晚，陈伯达、关锋、王力、戚本禹等人来到北京六中。当时，学校部分教师正和解放军开会，商量接待外地来京师生的工作。只听到“当”的一声门响，一个穿军大衣的人开门进来，随后又走进几个人。大家一看，原来是陈伯达、关锋、王力、成本禹等人。

陈伯达态度很严厉地问：“你们在干什么？！”当老师们回答“正在商议接待外地红卫兵”后，陈伯达亲切地笑了，说：“好吧！我去看看外地革命师生。”

原来，中央文革接到举报，六中的“西纠”红卫兵在学校搞了个“劳改所”，随意打骂、关押他人，甚至还打死了人。陈伯达把这些老师误认为是六中“西纠”红卫兵了。

老师们带着陈伯达等人看望了外地来京串联的师生后，陈伯达他们就直奔六中的“劳改所”而去。

六中距离天安门广场只有几百米远，和中南海也不过一街之隔，它的地理位置就使其影响非同小可，当时有不少外校红卫兵前往六中参观学习。

8 月中旬，六中的红卫兵把学校后院东北角的音乐教室小院改成一座监狱，并在门口挂了一个“牛鬼蛇神劳改所”的牌子后，在这里装有多只电铃。日夜有人值班，守备森严。夜间，只要一有情况，便警铃四起，强光环射，一片恐怖。

“监狱”正面的门窗被封死，出入只能从侧面通过厕所的两道门，然后跃窗进出。夹道的西端筑一墙，以防别人看见。原来还想顺后墙挖一个地下刑讯室，因土质过松，没能挖成。他们还准备修电网、房上道，也没来得及。

“劳改所”东边隔壁是“看守所”，这里也是刑讯室。

“劳改所”内经常放着木枪、木棍、指挥刀、短刀、皮鞭、弹簧鞭等刑具。墙上，有几个刺目的红漆大字“红色恐怖万岁！”，字下滴着血滴，他们让被打者把血抹到“红色恐怖万岁！”几个字下。

这是当时监狱墙上“红色恐怖万岁”六个字

这座监狱存在了100多天。在这里被扣押过的人员，有教师、学生，所谓流氓，甚至有一个从外边弄来的8岁小孩。他们不分男女老幼统统关押在一起，由开始的拳打脚踢发展到后来的种种法西斯暴行，由原来的能回家发展到失去人身自由，直至完全失去生命保证。其中有9 名六中的老师从头到尾被关在这里。有一位老师被打坏了骨头。有一位老师被学生拉来当作练拳的活靶子打，以至引起胃出血。一位教导处副主任被关押了3个多月，放出去1个月后就死了。六中的一个老校工徐沛田、学校附近的一个房产主何汉成以及一个学生王光华被打死在这个监狱中。

罚跪、罚站、左右开弓的耳光、乱棍齐下、乱打乱抽、弹簧鞭打，在这里都是司空见惯的家常便饭。另外，像跪煤碴、油漆涂脸、上吊试验、磕响头、坐土飞机、火烧头发、刀剁屁股、开水洗澡、用人打靶等等更是惨无人道。

北京六中校文革和红卫兵在号召大串联时贴出一张告

示：未经他们许可，任何人，尤其是出身不好的“狗崽子”不得私自外出。该校王光华、程家宝、王福生、万明等5个同学没听着一套，偷偷跑出去串联了。

他们在从上海到广州的途中，发现火车上有北京的几个红卫兵成立了一个临时纠察队，逐个车厢盘问出身，将出身不好的学生统统赶下车。

他们返回北京时，因为知道北京站都是西城纠察队的，怕挨打，就从丰台站下车，徒步走回城里。

9月24日半夜24时，3名“西纠”队员来到王福生家里叫他去学校。他们把王福生带到学校，关进“牛鬼蛇神劳改所”。

9月26日晚上20时30分，西纠的两个队员又来到万明家，把他也押到学校，推进“劳改所”。两分钟后保卫组组长来了，对万明说：“喝，你他妈小子来了。”说罢就用皮带套着脖子拖到一间的小屋。只听一声“跪下！”两边的人就开始打。用皮带抽，木枪刺，直打得万明皮开肉锭，鲜血直流。

第二天，天刚亮，就有一名西纠队员来了，说：“我改行了，我不打排球了，练踢球了。”然后一脚一个跟头踢了万明半天……。

3 个外出串联的学生被抓到学校的监狱里，被迫给红卫兵磕头。每人都被打掉一颗牙齿。他们流在地上的血，被蘸了涂描墙上的“红色恐怖万岁”六个大字。

9月27日傍晚，王光华回到北京。立即被抓进监狱。一进

门，十几个红卫兵成员就围上去一起用棍棒皮带打他。开始还能听到王光华直喊“要文斗，不要武斗！”以后就没声了。约莫5分钟左右，他们把程家宝、王福生、万明几个人叫了进去，只见王光华仰面朝天躺在地下，有人正往他身上泼水，地上已全都是水。王光华被凉水激醒，头刚一抬，刘兆平笑着说：“凉水真灵，泼上就醒了”。他们又把王光华打昏在地。然后让程家宝他们将把王光华拖到屋外一根大树底下，红卫兵叫劳改所里关着的学校领导伍继广、汪一净出来给王光华做人工呼吸，同时还在旁边抽打着伍继广、汪一净，并让他们俩比赛，看谁做的快。

王光华回过气来以后，红卫兵又打汪一净，将他的手臂骨头打坏。

半夜，王光华呼吸急促，生命垂危。但是，第二天上午，他再次被毒打。下午，王光华死了。

红卫兵没有通知王光华的母亲，直接叫来了火葬场的运尸车。被关在监狱里的 4 个老师把王光华的尸体抬到学校的前院。

王光华被打死的时候，身上有 7 元钱，书包里还有一些别的东西，都被几个红卫兵分了。然后，六中红卫兵到王光华的家中，没有告诉家人王光华已经死了，而是骑走了王光华的自行车。多日之后，六中红卫兵向王光华的母亲索取 28 块钱，告诉她这是王光华的火葬费。

第 301 回：义愤涌，伯达亲临“劳改所”

转《通告》，见“三司”北航代表

10月4日，西城纠察队六中红卫兵又打死该校退休老工人徐沛田。

徐沛田，时已86岁。他父亲曾是洋车厂厂主，而徐沛田本人1937年前就开始在戏院当茶房，1937年至1940年又到北师大当工友。1940年到1956年在北京六中当工友。1956年退休后， 因只身一人，一直就在六中生活。解放后，这位老人工作一直勤勤恳恳，认真负责，没出过差错。他退休后还根据自己的体力做些勤务工作。几次有病住院，共产党治好了他的病，因此他非常感激毛泽东主席，常说：“要在旧社会我早就死了，我感谢毛主席！我感谢共产党！”

9月3日，六中红卫兵把他赶出校门。他无家可归，在街头流浪两天，后由派出所送回学校。

回校后被锁在屋内，学校红卫兵一些人对老人进行了种种非人的迫害：让他口叼着破鞋在操场上爬行，一直爬到厕所，又将他推入小便池，在他身上尿尿。

10月3日，学校红卫兵头头、“西纠”成员王冒明又把老头叫到淋浴室，用开水浇头。怕他出声用绳子勒脖子，又用冷水反复浇了多次。把徐的头皮都烫掉了。徐受不住哀叫道，“饶了我吧，小祖宗……让我死了吧！”

第二天，4 日，老工友徐沛田就被活活吊死了！六中的红卫兵说，老头是“畏罪自杀”了。他们还把老人的尸体放在后院，暴尸 3 天。

11月7日，六中俄语青年教师王明湖在学校值夜班，一起值班的

胡老师对他说："王冒明找了你一天，晚上还找你，什么事不知道，不过你得作些准备"。

王明湖的父亲曾当过伪县长。一会儿，一个学生推开值班室的门喊道："王明湖，有人找你，跟我来！"

王明湖问："是不是王冒明找我？"

那个学生说："你跟我走吧！"

走进王冒明屋，只见房间里的留声机放着音乐，满地都是唱片。王明湖听见背后有人大喊一声："王明湖！"他一回头，迎面被一张唱片猛砸在头部，接着王冒明等人一跃而起，拳头巴掌齐上，打得王明湖满脸是血。王冒明将王明湖的棉衣，背心扒下来，堵住他的鼻血。接着又把王明湖的手表揪下，冷笑着说："私人财产，可要保护。"还有一个同学将王明湖的毛主席纪念章拽了下来，戴在自己胸前说："嗨！我又得到了一个"。

这些学生，把王明湖打倒在墙角，用脚猛踢，并抓住他的头发往墙上拼命地乱撞，……

过后，他们让王明湖面向墙站着，一个人飞起一脚踢在他的背上，王明湖全身扑倒在墙上。接着，几个人轮番照此踢他，王明湖五脏剧痛，已被打得浑身酸软。这些学生仍强迫王明湖到屋子中间立正站好，一人便从后猛来一个"扫堂腿"，把王明湖绊倒在地。随后又强迫他站起来，其他人接着拿他来练扫堂腿。王明湖的小腿被踢肿，站立不住，翻倒在地，昏迷不醒。

接着，他又被揪住四肢抡起向下抛。这样抛了几次，王明湖的内

脏像炸裂一般，又昏了过去。又有人飞起一脚，正中王明湖的阴部，顿时肿了。他们又在王明湖的肚子上、胸上踏来踏去。食物立即从王明湖的口中喷出，大便也踩了出来。

对于“西纠”的这些胡作非为，中央文革收到了群众的反映，有的来信还是用血写的。周恩来、江青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责成戚本禹去调查，他带着解放军战士到“西纠”活动猖獗的地方，像王府井东安市场，此时已改名叫东风市场，并被许多人称为“十里刑场”。

戚本禹他们到了东风市场后，立即责令这里的中学生把被关押的人都放了，并且收缴了他们使用的凶器，装了几箩筐直接带到了中央文革的会议室给大家看。

江青看到后说：“他们这是想给我们中央文革身上抹黑，栽赃。”

陈伯达说：“高尔基,鲁迅都说过，革命总是要伴随着血腥味的。”他说戚本禹有点小资产阶级的味道。于是11月19日晚，戚本禹就带着陈伯达他们亲自来到了六中看守所。

陈伯达把关押在“劳改所”里面的人都带了出来。这时，“劳改所”门前已经聚集了一些老师、工友和外地学生。陈伯达他们出来后主动和这些师生打招呼，问他们都是什么地方的人。

当陈伯达走到“劳改所”前面的一棵大树下，看见树上正好贴着11月18日北京市委发出的《重要通告》：

任何厂矿、学校、机关或其他单位，都不许私设拘留所、私设公堂、私自抓人拷打。

这样做是违犯国家的法律和党的纪律。

如果有人在幕前或者幕后指挥这样做，必须受到国法和党纪的严厉处分。

从今天起，如有再犯以上罪行的，要立即处理。

中国共产党北京市委员会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八日

陈伯达指着《通告》问大家："你们都拥护吗？"

大家说："当然拥护啰。"

陈伯达又指着"劳改所"问大家："你们同意他们那样搞吗？"

大家答："不同意。"

陈伯达又问："为什么不管？"

老师们说：压力大，不敢讲话。

陈伯达又对着《重要通告》，手指着"劳改所"说："这简直是对市委《通告》的一个讽刺！"

老师们请陈伯达到接待站给大家讲几句话，陈伯达欣然同意。但走到《红卫兵报》编辑部门口时，六中"红卫兵"请陈伯达进去。于是大家都进去了，站了一屋子。这时，"西纠"红卫兵的人也来了。老师们很害怕，发言不很踊跃。他们汇报了学校的情况。当谈到王光华、徐沛田时，陈伯达问了原因，当谈到王光华被活活打死时，戚本禹一下子从座位上站起来，拉开军大衣的扣子，使劲脱了下来。显得非常生气。问到老工人徐沛田惨遭勒死时，陈伯达气愤地说："父亲

是洋车主，不能算他的账！”

讲到了“劳改所”，陈伯达十分愤慨地说：“这是非常残酷的！不管对什么人，这样搞都不行！要摆事实讲道理，这样文化大革命才能搞下去。吵架也可以，但不要动手、武斗。家庭也可以吵架嘛。可不是这样搞法，这是与文化大革命的方针背道而驰的！”

陈伯达又拿起桌上的一分《红卫兵报》，报上正好有一条《毛主席语录》：“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分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还有一篇不要武斗的文章。陈伯达说：“这报上登得很好，我那儿还有几张报呢！”

王力说：“他们并不准备实行之。”

陈伯达接着说：“他们不是不实行，他们是反其道而行之！”

陈伯达又问报社为什么不管那些事情，他说：“你们的报要停止了，你们的行动对你们的报是一个讽刺。这样的报可以不办！”

后来，陈伯达又责问同去的北京市公安局局长，问他为什么不制止？又对大家说：“讲干革命，要有这点胆量。现在北京公安局不支持制止武斗，不按毛泽东思想办事。我们靠毛泽东思想吃饭，我们什么也没有，没有匕首、短刀、短枪，但是我们相信群众，我们什么也不怕！”

临走时，陈伯达又说：“红卫兵负责人，请他来。你们可以批评他们，但不要再关他们。红卫兵负责人回来了，不要用这个方法（指武斗）整他们，要团结他们，批评才能团结。”

最后，学校的全体教职员工一直把陈伯达等人送出校门。

11 月 20 日，经毛泽东同意，中共中央向全国各地转发了中共北京市委的《重要通告》：

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

北京市委十一月十八日的重要通告，很好。现在转发全国，请各省、市、自治区用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名义大量印发，在学校、厂矿、机关或其他单位内张贴。各地如有同样的情况，照这个通告办理。

11月21日傍晚19时多，陈伯达、吴德等人再一次来到六中 “劳改所”。他们在“劳改所”里查看了半个小时左右。然后又十分气愤地来到木工车间，看“西纠”打制匕首的砂轮机，“劳改所”看守们也跟了进去。陈伯达向学校工友要匕首，工友说：“我没有，看守们有”。看守们一听，赶快溜出去了。

陈伯达、王力等人就在木工室开会，研究如何处理“劳改所”的问题。这时，看守们气势汹汹地喊着说：“他们（指工友）在首长面前造谣！”并有动武之势。陈伯达见状气愤地制止说：“不许动工人！过去你们打人，应向被打的道歉……今后绝不许再犯！”

陈伯达他们走时，吩咐公安人员在“劳改所”里拍了照，带走了两大捆匕首以及其他凶器，拆掉了岗楼。六中“劳改所”就这样跨台了！

11 月 8 日深夜，号称中央文革小组的“铁拳头”的北京“三司”遭到北京外语学校、101 中、人大附中等校 100 多名“老红卫兵”的冲砸。在以后的半个多月内，又连续遭到三次冲砸。11 月中下旬，

“三司”在重庆、长沙等地的联络站及工作人员也多次遭到围攻和砸抄。

11 月 15 日，北京女八中的“《忍无可忍》战斗小组”还给清华大学“井冈山”贴了这样一张大字报：

可“尊敬”的蒯“司令”：

自总理给您平反以后，您“青云直上”沾沾自喜、不可一世、真可谓“老子天下第三”也！

殴打解放军、冲击天安门……诸如此事举不胜举、您——“司令”脸上好不光彩！

即日登门“拜访”，奉送“清凉剂”一付、望“司令”接受。

最后预祝第三司令部“岿然不动”！！！

北京女八中《忍无可忍》战斗小组

于 1966 年 11 月 15 日

11 月 20 日，关锋接见“三司”代表，鼓励他们说：

“第三司令部名字改不改不要紧，要顶住，不要垮！想一想，如果我们文革小组垮了，你们将会怎么样？在座的有多少打成‘反革命’？运动还会有反复，假如敌人得手，你们还会被打成反革命，我们也会，而且还会被杀头！

左派队伍中的小问题不要争，小道理服从大道理，要容忍、忍耐、宽恕。井冈山内部的问题要解决，蒯大富要批评，团结——批评——团结。第三司令部 150 多个单位，复杂不要紧，发展总是好的嘛！不发展还行？抗日时比这乱多了，我到一个土匪连当指导员，18 岁，

是个学生，他们看不起，后来我就剃头换装。原来抗日时期队伍很小，不是后来发展到几万人吗？成份复杂不要紧，改造嘛！文化大革命，不仅革命，是革命力量，而且也当革命对象遇事先批评自己，再批评别人。

善于和不同观点的人接触，和不同观点的人说话，不同意见要商量，文化大革命还早着呢！左派千万不要因为一些问题闹意见，左派顶打、顶揍，如梁山泊排座次就是用大石，无产阶级不要那一套，不要出头露面，艰苦的担子自己挑，第三司令部排场不要讲，不要退出，要内部整顿，搬出文化宫。有人说，不纯，从 18 人发展到 100 多个单位，队伍不纯是可能的，如抗日救国时打了几个胜仗就几万人了，队伍要浩浩荡荡，资产阶级攻三司，实则攻我们，退出对革命不利。

反蒯有两种，蒯不是一个人，是一个代名词。清华很复杂，一个人错，缺点要改，内部要整风，左派不善于利用敌人矛盾，而自己却被敌人利用。我们是革命的主力，也是革命的部分名字不要改，退出是错误的，不对的要改。

当司令你搞不好，我当也当不好，慢慢学嘛！”

11 月 21 日，关锋、王力接见“北航红旗”召集的“反修大会”工作人员,看来他们对“北航红旗”的这个会不是很支持。

王力问：“你们除准备开这个大会以外，还准备开什么？”

北航“红旗”代表：“我们要开批判第二司令部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大会和进行内部整风。”

“三司”代表说：“最近，连续发生砸我们司令部的严重事件。据不可靠的消息，西城区纠察队和第二司令部纠察队（部分）要联合搞垮第三司令部。这是阶级斗争的反映，要来一次反扑。我们要追查根源，准备开一次大会。”

关锋开导说：“要注意这样一个问题，要相信大多数同志是好的。西城区纠察队我们也去了一下，他们有他们的观点和看法，我们讲了我们的观点和看法，他们不一定同意。他们也听到一些谣言，听说第三司令部要砸他们，搞得很紧张。他们砸了你们，你们不要砸他们，你们要做艰苦耐心的思想工作，要相信他们大多数是会服从毛主席正确路线的。”

王力接着说：“要相信大多数，他们暂时受了蒙骗，要做艰苦的思想工作。”

“一司” 石油学院的代表反映：“《论造反者》是我们学校‘保’字号写的，是大毒草，但谣传是姚文元同志写的。”

关锋：“你们可以去宣传，《论造反者》不是姚文元写的，与姚文元同志毫无关系。姚文元同志根本不知道。我看过那份东西，是不正确的。”

“三司”代表问：“我们那一份从长沙来的急电，你们收到没有？”

王力说：“收到了。”

“三司”：“长沙来了几个同志，他们想马上亲自向中央反映湖南重要情况。”

王力问：“你们觉得张平化怎么样？”

“三司”代表说：“我们觉得很坏！”

人民大学的代表：“张平化 9 月 24 日的讲话，影响面很广很坏。”

王力：“这个报告已经影响到全国，张平化他自己也承认这个报告很坏。”

“三司”代表：“我们觉得这个报告比谭力夫讲话还臭。”

王力：“11 月份开的大会较多，11 月 6 号开了一个大会后全国各地也开了不少大会。从 10 月份到现在已有一个多月了，现在这样一个新的斗争任务摆在我们面前，究竟怎么办好？现在你们还准备开两个大会？”

关锋：“你们要跟反对你们的人接触接触，我相信反对你们的人中间大多数还是好的。”

王力：“你们的核心要搞一搞批评与自我批评。没有批评与自我批评，就不能形成坚强的领导核心。像打仗一样，打一仗后，就要休整一下，提高斗争水平和策略。10 月份以后形势有了大的变化，左派队伍扩大了、翻身了，保守的一派分化了，有进步了。这些问题都需要我们去做工作。有些同学在家是保守的，出去串联以后，受到围攻的尝到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味道的回来有所改变了。我们要欢迎他们，不要给这些同志扣帽子。要做艰苦细致的工作，要团结他们、扩大队伍，把队伍搞得浩浩荡荡。因此，你们要坐下来，总结工作。”

关锋：“西城区纠察队，你们可以好好地跟他们谈谈。”

王力："当然，原则是不能让步的。现在北京有一股打人的风，这不利于文化大革命的深入，要制止这股风。最近北京市委有个重要通告。"

关锋："这个通告是很正确的。"

王力："这个通告是中央文革提议的，北京市委通过了，准备发转到全国去，行凶打人，砸，这样不行。现在天气冷了，许多同学要回来怎么办？要有一个打算。"

北航"红旗"："我们要开展小整风。"

王力："他们要回来了，可能对你们的做法有些意见，要辩论，你们要做好工作，争取主动，要有一个精干的队伍，没有巩固的核心，要带好这么大的队伍是不可能的。他们回来了，这个局面就不一样，究竟怎么办？北航小整风很好。革命形势在发展，工厂、农村都起来了，这是谁也阻挡不了的，知识分子要和工农群众相结合，学校不能在空中来改革。我们要取得工农的信任，是要有一个过程的，和工农群众相结合也要有一个过程。这也是自我改造的过程。"

关锋："到工厂不要做包打天下的英雄好汉。"

王力："总之，你们几个司令部都面临着许多具体，共同的问题，要考虑考虑，不要把主要精力放在开大会上。"

## 第二部第四卷

## 各地文革章回索引

**北京：**

第 252 回；第 253 回；第 254 回；第 255 回；第 257 回；第 259 回；

第 260 回；第 261 回；第 262 回；第 266 回；第 267 回；第 272 回；

第 273 回；第 277 回；

第 278 回；第 282 回；第 296 回；第 301 回；

**北京大学：**

第 268 回；第 278 回；第 281 回；

**工交座谈会：**

第 277 回；第 281 回；第 284 回；第 296 回；第 298 回；第 300 回；

**贺龙：**

第 291 回；

**陈毅：**

第 279 回；第 280 回；

**军队：**

第 279 回；第 280 回；第 291 回；第 297 回；

**大串联：**

第 281 回；第 286 回；

**陶铸：**

第 284 回；第 290 回；

**十一月黑风：**

第 285 回；

**六十一人叛徒案：**

第 292 回；第 293 回；第 294 回；

**北京航空学院：**

第 298 回；第 299 回；第 301 回；

**“西纠”：**

第 300 回；第 301 回；

**上海：**

第 253 回；第 268 回；第 269 回；第 270 回；第 271 回；第 272 回；第 273 回；第 274 回；第 275 回；第 276 回；第 277 回；第 281 回；第 282 回；第 283 回；

**天津：**

第 257 回；第 258 回；第 265 回；第 266 回；第 286 回；第 292 回；第 293 回；

**华北地区：**

**内蒙：**

第 265 回；

**山西：**

第 254 回；第 264 回；第 287 回；第 298 回；

**东北地区：**

**辽宁：**

第 256 回；第 258 回；第 295 回；第 297 回；

**吉林：**

第 294 回；

**黑龙江：**

第 256 回；第 266 回；第 296 回；

**西北地区：**

**甘肃：**

第 291 回；

**新疆：**

第 259 回；第 286 回；

**西南地区：**

**四川：**

第 252 回；第 277 回（重庆）；第 292 回；

**贵州：**

第 264 回；

**云南：**

第 263 回；

**中南地区：**

**湖北：**

第 262 回；第 272 回；第 277 回；第 298 回；第 299 回；

**湖南：**

第 256 回；第 257 回；

**广东：**

第 290 回；第 291 回；

**华东地区：**

**山东：**

第 263 回；第 272 回；第 286 回；第 287 回；

**安徽：**

第 288 回；第 289 回；

**江苏：**

第 283 回；第 289 回；第 290 回；第 291 回；第 300 回；

**浙江：**

第 253 回；第 295 回；

**江西：**

第 253 回；

**福建：**

第 252 回；第 253 回；第 255 回；

# 文革史话

之

第二部

# 狂风骤雨

第五卷

# 目　录

第 302 回：议《十条》，部长们哄堂而起
调大炮，聂元梓抵达上海
第 303 回：各树旗，“工总司”山头林立
“赤卫队”，纷纷质疑张春桥
第 304 回：湘江闹，晋常委欲罢卫恒
心满意，山城工人回四川
第 305 回：抢校印，重庆大学竞夺权
罗广斌，乘车绕场遭非议
第 306 回：文化宫，福州赤卫队遭劫
冲会场，榕城再酿流血事
第 307 回：勉其难，毛泽东最后接见
红卫兵，召开记者招待会
第 308 回：再接见，四川和全国代表
轰文革，十一月风起京城
第 309 回：与“三司”，共商谈文革大计
告学生，下工厂勿忘生产
第 310 回：难理解，中学生筹建“联动”
是“忽略”？江青没有提陶铸
第 311 回：装甲兵，许光达急火攻心
又集会，两老帅再次发言

第 312 回：提要求，党报代发学生报
遭拒绝，《解放日报》被停发
第 313 回：封党报？数万人围攻报社
急火冲，韩哲一晕倒现场
第 314 回：实无奈，上海市委终低头
“工总司”，周宝林调往总部
第 315 回：砸孔庙，谭厚兰一马当先
派专家，与考古同步进行
第 316 回：占省委，挟持廖志高北上
急劝阻，只能派代表进京
第 317 回：再接见，蜀滇及全国代表
反文革？林学院自发辩论
第 318 回：点名否？毛泽东又缓一步
周恩来，批评成都告状团
第 319 回：叶剑英，接见学员李基才
武汉市，“职工联合会”成立
第 320 回：皖瘫痪，厅、处级干部造反
粤动荡，围攻中大图书馆
第 321 回：议《十条》，政治局常委讨论
见外院，忽闻彭真被劫走
第 322 回：谈工交，林彪主持讨论会
反文革，一二四“三司”回击

第 323 回：一二五，“联动”成立撒《宣言》
江苏乱，江渭清晕倒台上
第 324 回：周恩来，即召见四川代表
工交会，陶铸带头做检讨
第 325 回：点刘邓，从解放初期谈起
“全红总”，临时工组织成立
第 326 回：冲“三司”，廖承志又惹祸端
查材料，贵州“二李”生嫌隙
第 327 回：心交瘁，叶飞抱病参加会
易帜难，大田湾孕育危情
第 328 回：一二四，大血战再起山城
气难平，挥笔炮打戚本禹
第 329 回：控诉会，体育场白花如山
周恩来，批评西城纠察队
第 330 回：座谈会，传达工交会精神
批文革，一时间风声阵阵
第 331 回：众领导，与“首都兵团”座谈
斗彭真，接见中科院代表
第 332 回：见北航，劝学生防止分裂
陶铸说，不许反中央文革
第 333 回：见外院，批评成都的代表
劫书记，津浦线再次停车

第 334 回：突然间，江青点周、雍二人

偷摩托，“联动”一冲公安部

第 335 回：开大会，撤销“西城纠察队”

教育部，陶铸谈五点意见

第 336 回：情况变，伊林、涤西均被捕

设专案，江青见广院同学

第 337 回：中南海，春桥召见蒯大富

许明死，恩来见江西代表

第 338 回：抓永嘉，姚文元来电解围

到复旦，“罗思鼎”“逼上梁山”

第 339 回：何去从？徐景贤尚在犹豫

写作班，众秀才一致造反

第 340 回：后院火，上海市“心脏爆炸”

影响大，“机联站”宣布成立

第 341 回：荣复转，不准单独建组织

轰陶铸，出版社贴大字报

第 342 回：群起涌，北京大学反“黑风”

抓杨勋，聂元梓夜半抄家

第 343 回：保“西纠”，“联动”再冲公安部

新疆乱，广州《红卫报》被封

第 344 回：见西纠，李先念再遭炮轰

赤卫队，上海百万人聚会

第 345 回：张春桥，北京见上海代表
又反悔，“赤卫队”炮轰市委
第 346 回：彭德怀，成都说动大学生
王大宾，接指令紧急赴蓉
第 347 回：王大来，回京汇报说情况
捉“海瑞”，“北航红旗”下蓉城
第 348 回：周恩来，再下达电话指示
“天”“地”争，彭德怀专列离蓉
第 349 回：伤未愈，罗瑞卿首次被斗
封湘报，惊现“密令 007”
第 350 回：洪飙起，“湘江风雷”轰陶铸
发“九轰”，《四川日报》也被封
第 351 回：抓“联动”，王任重回到武汉
大游行，清华打倒刘少奇
第 352 回：体委乱，贺龙能否保过关
又北上，津浦线再次中断

## 第 302 回：议《十条》，部长们哄堂而起

## 调大炮，聂元梓抵达上海

11 月 21 日上午，余秋里、谷牧修订的《工交企业进行文化大革命的若干规定》，即《十五条》报中央文革。下午 17 时，陈伯达打电话要谷牧和余秋里立即去他那里。

余秋里有事迟到，谷牧先到了。陈伯达一见他，就拿出一本线装书，指着其中的一段话，怒气冲冲地要谷牧读一读。

谷牧接过来一看，是司马迁的《报任少卿书》，要他读的那段文字是："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因主上所戏弄，倡优所畜，流俗之所轻也。"意思是，写文章的，搞历史的，研究天文的，是类似算命打卦一类的下九流人物，本来就是被主子和上方所戏弄、被娼妓戏子所豢养、被社会习惯势力所轻视的。

谷牧不知自己什么地方把陈伯达得罪了，在未明白是怎么一回事时，还是沉默为好，他没有说话。

陈伯达见谷牧不做声，就问："这篇文章你过去读过没有？"

谷牧说："读过。"

陈伯达接着就大发牢骚说："反正我们写文章的，无权无势，小小老百姓，谁也瞧不起。过去邓小平瞧不起，现在你们也瞧不起，你们有本事啊！把我们的稿子改得体无完肤了，有本事你们自己写一个嘛！"

谷牧这才明白，陈伯达之所以发火，是因为他们改了陈伯达的《十二条》。他赶紧解释说："情况没有这样严重，我们不过是结合工交系统实际，加了那么几条，使文件更完善一些。"

陈伯达仍忿忿不平，这时余秋里也来了，他和谷牧二人看再解释也没有用，就退出来了。

他们回到中南海，径直去西花厅找周恩来。此时周恩来正在听宋任穷汇报东北局的工作，他们就插进来谈了刚才在钓鱼台的情况，又谈了为什么要做那些修改的理由。周恩来说："没有这么严重吧。明天中午，我和陶铸同志再听一次你们汇报。"

11 月 22 日中午，谷牧参加了周恩来、陶铸、李富春主持召开的碰头会，并在会上又将昨天下午到陈伯达那里的情况汇报了一遍。

当天，周恩来、陶铸、李富春到毛泽东那里汇报工交座谈会的情况。毛泽东对陶铸说："总要支持工人建立联合组织，这不是大家都同意了吗？""《十五条》不行，可以另写，讨论出来看看，然后再拿到底下去。"

当晚 22 时，李富春给谷牧打来电话说："你汇报的情况，我和总理已经报告了主席，主席指示：

（1）工矿企业还是要分期分批进行文革；

（2）八小时生产不能侵犯，工人只能在业余时间闹革命；

（3）文件提出后，让谷牧带个班子到上海、天津、沈阳听取各派工人的意见，继续进行修改，争取 12 月份发出；

（4）原稿上把当权派划宽了，同意你们提出的把‘忘本、自私、压制群众’等几类人去掉的意见。”

11 月 23 日上午，谷牧即把修改后的稿子印好后上报。当天，谷牧向参加工交座谈会的与会者传达了李富春向他讲的毛泽东的指示。

毛泽东表态了，陈伯达又将《十五条》修改为《中共中央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十条规定（草案）》，提交工业交通座谈会讨论。

24 日，周恩来到工交座谈会讨论会场听取意见。在周恩来面前，刘澜波、吕正操、吕东这些部长们哄堂而起，说到最后都站了起来。大家的话题已不仅仅是工交座谈会所讨论的文件，而是讲到国家动荡不安的形势，讲到他们的担忧。当然，他们说的是“广大干部群众”的担忧。

周恩来开导说：“文件要修改，改后送中央，林总要听一听。”

“大势所趋，因势利导，方兴未艾，欲罢不能。不能阻挠，要采取大禹治水的办法，不能采取鲧的办法，要疏导。”

“企业存在不少落后的东西，旧框框，洋框框，都不适应生产发展的要求，都不适应文化大革命的形势。”

“分期分批可能不能解决问题，工交欲罢不能。有各种原因，首先要看到内因，没有内因，外因搞不起来，不能光看外因。工交内部有很多问题，光看外因，不看内因，容易产生抵触情绪，埋怨情绪，消极情绪，要犯错误。”

“老工人、青年工人，这些工人起来闹革命，青年工人敢说敢闯和青年学生一样，还有些积极分子对领导不满，老工人生活好了，儿女上学了，翻身了，很爱护厂子，容易带来保守性，当然也不能一般这样说，他们也有的对领导不满意，不愿意看到厂子搞坏，要闹革命。”

“分期分批文件是写上了，大势所趋，欲罢不能，挡不住，不如疏导的方法。因势利导的方法是写上了，能否做到还要看实际情况，做的时候不能硬卡。当然有些单位确实不能搞的，放后再搞，如电站、自来水、电业、重点国防、运行中的车船，写上做两手准备，能说服的说服，不能光靠这几句话。”

“当前工交企业运动，现在才是开始，未动的也很快起来。也不要幻想学生回到学校搞斗批改，就不出来了。不要存在这种侥幸心理，不要怕打乱旧秩序。不破不立，在主席领导下大方向不会错的。浪潮来了，要站在浪潮的头里，因势利导，顺势搞下去，就能领导。背着浪头会被浪潮冲掉。”

“作为领导干部，就要在怕革命、怕群众、怕生产搞坏这方面来认真考虑问题，检查认识自己。”“我们当年跟敌

人打仗，大家深入虎穴，不怕牺牲；今天更应该有‘我不入虎穴，谁入虎穴’的革命精神，敢于赴汤蹈火，敢于站到潮流里面去。只有这样，才不致被潮流所淹没，才能处于主动的地位。”

“现在所以来势这样猛，是过去工作中的问题长期积累所造成的后果。……过去的领导方法、思想方法、干部路线、执行政策、工作作风都有很多问题。这些问题比五十天路线错误影响还深……各部门都要准备受冲击。”

“运动中可能有些毛病，干部子弟学父母一些坏东西，做的可能不恰当，但这些青年比我们当年闹革命还好。他们学习毛主席著作才半年，不能要求那么高，运动还要继续发展，有些情况可能比现在还要严重。”

“要有思想准备，要受得住，过去所造成的恶果要接受惩罚，受到教育。”“准备吃苦，掉磅。这个惩罚是我们过去造成的，我们不来承受谁承受？我们不来入地狱谁来入地狱？我们不来入虎穴谁来入虎穴？没有一种精神准备不行。这个仗一定要打，做好思想准备，领导好了，也不至于那么严重。”

在陈伯达忙于起草工矿企业文革文件的同时，江青也没有放松对上海文革运动的关注。11 月 16 日，江青召集陈伯达、姚文元、王力到她的住处商议聂元梓到上海的事，她说：“叫聂元梓到上海去一趟……再从北京选一些左派去，支持

上海造反派，造成造反派的声势，冲破上海市委资反路线统治”。

当晚，江青找聂元梓，对她说了去上海的事情，并且提到王任重的问题。江青说：“王任重是国民党派来的”，“你不要追随他”。又说：“你到上海去串联，我们中央文革是支持的”，“上海问题是严重的，文化大革命前，陈（丕显）、曹（荻秋）执行的是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文化大革命开始又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镇压群众，不执行毛主席的指示，对毛主席指示一贯采取抵制态度”。还说：“张春桥和陈、曹是有斗争的”，“上海市委和北京市委都是一窝黑帮”，“他们互相是有联系的，和邓小平也是有联系的……”

一天晚上，王力、关锋又把王广宇叫到王力办公室，王力说：“聂元梓要去上海串联，听说她要把北大校文革的骨干一起带走，北大校文革有组织能力的孙蓬一也要带走，这样不好。聂元梓串联去了，北大的运动还要继续搞，领导成员中的骨干一起都走了，北大的运动恐怕难以控制，影响校内运动。为了北大文化革命运动的全局，告诉聂元梓去上海尽量少带骨干，特别是孙蓬一不要带走，把他留在家里搞运动。要尽量说服聂元梓照顾大局。”

王力又说，“我们的这个意见是从北大文化革命运动正常进行考虑的。先不要告诉她这是谁的意见，实在说服不了她，就说这个意见是江青同志提出来的。”

王广宇立即来到花园村聂元梓住处。一进门，看见李讷正在和聂元梓谈话。他们寒暄几句后，王广宇就把王力说的意见向聂元梓传达了。

聂元梓听了后说："北大运动的事我已经安排好了，带走孙蓬一对家里的运动没什么影响，其实，孙蓬一的组织领导能力和独立工作能力还不如其他人，他要作为助手还可以发挥点作用。北大校文革的其他人都可以留下，唯独不能把孙蓬一留下，我们都说好了，他也愿意和我一起去上海。"

王广宇看聂元梓把话说得这样肯定，没有商量的余地，只好打出最后一张王牌，告诉聂元梓说："这个意见是江青同志提出来的。"

聂元梓听后，似乎也不以为然，可能是碍于李讷在场，她没有说话，也不表态。

王广宇见状，就准备回钓鱼台交差。他问李讷要不要一起回去？李讷说，"我没什么事，顺便来看看聂老师，我来的时候没要车，是坐通讯员送信摩托车来的，咱们一起回去吧！"

在车上，王广宇对李讷说："聂元梓这个人真固执，听不进别人的意见。"

李讷道："孙蓬一精明强干，是她的心腹，得力助手，她离不开他。"

回到钓鱼台后，王广宇即把情况向王力做了汇报，王力

听罢也没办法。

聂元梓去上海前，到钓鱼台找王广宇取材料，同时向王广宇提出去上海串联的几个问题：

一、她们去上海可不可以说是受中央文革的派遣？

二、到上海住在什么地方合适？

三、到上海后调查了解到的情况怎么同中央文革联系？

王广宇报告了王力。经中央文革小组研究，作了答复：

一、聂元梓等去上海不要说是受中央文革的派遣，用北大群众组织的名义去串联，帮助上海造反派造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反；

二、到上海住在中央文革的上海记者站，那里安全些，也便于联系；

三、聂元梓在上海的活动情况可以通过上海记者站同中央文革记者联系。有关去上海后食宿等问题由中央文革记者负责人徐学增负责安排。张春桥现在正在上海，如果遇到了什么问题和困难，必要时，可以去找张春桥。

王广宇把中央文革对聂元梓请示的几个问题的答复向聂元梓作了传达，聂元梓提出，下午她要回一趟北大。

次日晚上，聂元梓正收拾东西准备回学校去，听见敲门声，开门一看是王力。他俩寒暄后，王力再次嘱咐聂元梓说："你们到上海，不要打中央文革的旗号，你到上海串联，主要是你们自己行动，有急事可以打电话给中央文革，有事情

可以找上海记者站的记者，姓甄，甄文君。因为你们是群众出去串连。就是找甄文君，也要注意方式。”

而此时的上海，工人以对安亭事件的态度，分成了两大派。上海 20 多家工厂的代表，在安亭事件后，即组成了“安亭事件联合调查组”，赴安亭现场进行调查。这个调查组的主要成员有陈阿大所在的良工阀门厂的金瑞章、潘国平所在的上海玻璃机械厂的潘月法、黄金海所在的国棉 31 厂的李剑钰等，他们与上海铁路分局“二．七战斗队”联合行动，写出传单《拆穿西洋镜》。

11 月 18 日，上海 50 多个单位的 400 多位工人代表聚集在上海展览馆咖啡厅，要求张春桥接见。张春桥同这批工人从早晨 9 时一直谈到下午 17 时。工人们质问张春桥为什么要签订“双五条”，抗议他向“工总司”让步“出卖原则”。

张春桥寸步不让，说自己签字符合宪法。“‘工总司’只要不是反革命就是合法的”，“不按毛泽东思想办事，并不等于违法”。

工人指责“工总司”的成立不符合中央文件精神，张春桥说：“你们也可以组织起来嘛！”

于是会后，这些工人酝酿也成立全市性组织。

第二天，11 月 19 日，700 名反对“双五条”的工人代表聚集在上海市少年宫，要求市委领导接见。待曹荻秋赶到少年宫，已是 20 日凌晨 2 时左右。聚集在少年宫的工人，提

问矛头直指张春桥和“工总司”。

曹荻秋回答：“我只支持造资产阶级的反，不支持造无产阶级的反，如果有人利用组织反对无产阶级，他们迟早会暴露出来，落在人民手掌之中。”

曹荻秋还说：“你们都是党员，团员，老工人，在社会主义建设中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党还是要依靠你们的！”

工人代表提出要向中央发一份反对“双五条”的《抗议书》，曹荻秋马上答应：“我一定负责转交中央。”

曹荻秋回去后，当即将《抗议书》交给市委副秘书长，说：“工人要求市委代他们用电报发中央，市委加点说明。”

11 月 19 日，北京，聂元梓带上哲学系中年教师孙蓬一、陈葆华、付治文 4 人乘上 13 次北京至上海特快，于 11 月 20 日抵达上海北站。

火车票是中央文革办事组买的，坐的是软卧包厢。后来，中央文革办事组找北大报销火车票，说聂元梓“他们的人事关系不在中央文革，报不了”。只能由北大报销。但是按规定，13 级以上的干部才能坐软卧，这样只有聂元梓一人可以报软卧车票，其他三人只能报硬卧。这里的差价，聂元梓自己掏腰包补上了。

聂元梓他们到达上海北站后，即打电话到中央文革驻上海记者站找甄文君，甄文君乘车来接聂元梓和孙蓬一，在汽

车上，聂元梓迫不及待地就问：“张春桥在不在上海？他要是在上海的话，我想见见他。”

“春桥现在不在上海。”甄文君回答。

“有机会我想见见他。”聂元梓说。

“好的。”甄文君点头答应，又道，“你们先在衡山宾馆住下，好吗？”

“不，我们没那么娇贵，我们到学生中去，这样可以多了解情况，便于发动学生，你就让我们住到华师大去吧。”聂元梓说。

“那也好。”甄文君略略想一想，就叫车驶入华东师范大学后门，直奔第三宿舍。那儿原本是留学生宿舍，运动开始后，留学生纷纷回国，那里成了一幢空楼，聂元梓和孙蓬一便下榻于此。随即，聂元梓和孙蓬一宣布成立“新北大毛泽东思想捍卫团”。

事先，江青在长途电话里已经告诉张春桥：“我给你调来一门大炮，专轰上海市委！”江青所说的“大炮”，便是聂元梓。

20 日当天，张春桥就在“中央文革”驻沪记者站的小楼里会见了聂元梓。他对聂元梓说：上海的运动发展不平衡，工人起来了，学校红卫兵则落在后面。

张春桥非常称赞上海的工人造反派，他向聂元梓介绍了刚刚处理的“安亭事件”，说：“上海工人很听党的话，觉悟

高，顾全大局，都接受了劝告，从安亭返回上海了。”

张春桥还说：“你们应该向上海的工人学习，要到工厂去看看。还有，上海的运动和北京不一样，上海街头的群众辩论很好，很有特点，你们也可以去听一听。”等等。

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红色造反团驻沪联络站”离巨鹿路 691 号的“炮司”总部只有十几步远。这天，“红色造反团”的红卫兵来“炮司”找红鸥说：“聂元梓要见你。”

红鸥高兴得不知所措，因为她就要见到全国仰慕的大左派了。

到了“红色造反团驻沪联络站”，哈军工红卫兵向聂元梓介绍说：“聂元梓，这是‘炮司’的小司令。”

“哦，坐吧。”聂元梓的声调里透着傲慢，一下就让红鸥的心凉了半截，伸出去的手又缩回来了。

聂元梓身穿崭新的绿军装，外披一件绿呢军大衣，鼻梁上架着一副黑框眼镜，打扮与江青毫无区别。她问炮司多少人，都有哪些学校，红鸥一一作了回答。

问完，聂元梓摇摇头说：“你们上海的学生运动远远落后于工人运动，你们红卫兵要打冲锋，不要跟在别人的后面跑。”

红鸥说：“我们搞的是工学运动。”

聂元梓不以为然地说：“不管什么运动，你们要站在前台，要亮牌子，你们应该先打常溪萍，再打曹荻秋”。

红鸥觉得聂元梓好像是“首长”下命令，有些反感，就告辞走了。

第二天，聂元梓与上海“工总司”的王洪文、潘国平见了面。

听说要和聂元梓见面，王洪文也非常兴奋，这可是文革开始后，王洪文衷心崇拜的一个女人。他从写第一张大字报起，就模仿着她；到北京串连，也特地赶到北京大学，期望能见聂元梓一面。遗憾的是，没有见到。没想到，聂元梓会亲自到上海来。

一见面，王洪文就说：“久仰大名！久仰大名！”这并非客套话，因为他确实对她“久仰”。

“王司令，认识你很高兴。”

与王洪文不同，寒暄过后，聂元梓便开始放炮了：“你们‘工总司’怎么只知道轰曹老头儿，不轰常溪萍？”

“噢？”王洪文不解。

“你们上海的‘文革’，有一个很大的缺点。”聂元梓直言不讳。

“什么缺点？”王洪文连忙问道。

“你们工人造反派对学生运动重视不够！”聂元梓指点道，“你们应当联合上海的红卫兵，结成‘统一战线’，共同作战。这样，你们才会更有力量！”

“行。”王洪文点头同意。“我们明天就和红卫兵联合

召开大会，请你点火！”

聂元梓爽快地答应下来。

没有等到第二天，当天，在上海文化广场召开的“批判上海市委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上，聂元梓就以“新北大捍卫毛泽东思想战斗团”的名义在大会上登台发言。她说：“这一次我们来上海的目的，是要揪出出卖北大社教运动的大叛徒、刽子手常溪萍，代表新北大全体革命师生来和他算账。常溪萍的问题上下都有根子，上面的根子是邓小平、彭真，下面的根子是以陈丕显、曹荻秋为首的上海市委。”

## 第 303 回：各树旗，“工总司”山头林立
## “赤卫队”，纷纷质疑张春桥

上海的“安亭事件”以造反派的胜利而暂告结束。但是，造反派刚刚胜利，内部的纷争也开始了。

一夜之间跃为头头的耿金章，把赴苏州的 1000 多名造反队员带回上海后并没有解散，而是聚集在上海愚园路 218 号的“百乐门”，当时已更名为红都剧场，要大家留下通讯地址和联络方式，说是方便以后联系。随后，他们在红都剧院门口贴出一大张纸，上面写着“工总司第一联络站，欢迎大家前来挂钩”。须知，这支从苏州返回上海的“工总司苏州大队”大都是各工厂的造反队骨干。他们一回厂，便招兵买马，扩大势力。那 1000 多造反队员，在短短几天内，便发展为几万之众。

再说由周宝林从南京接回来的戴祖祥的人马回到上海后，也没有到巨鹿路去与潘国平和王洪文等人会合，而是到红都剧场与耿金章相见。耿金章与戴祖祥紧紧握手之后，再来一个热烈拥抱，两人亲密的样子，真是使人看了动容。一阵亲密之后，两个人立即筹划成立“联合兵团”。经初步研究，打算叫做“苏州南京联合兵团”。

但是，建立“联合兵团”的谈判并没有结果。于是，戴祖祥宣布成立“北上返沪第一兵团”，耿金章也成立了“第二兵团”。另外还有随耿金章到了苏州的孙福祥 40 多人，没

有跟着张春桥回上海，而是矢志北上，在苏州混上了火车，到了北京。他们认为自己的革命造反性格最强，也最具有战斗到底的决心，回到上海后招兵买马，扩大组织，也成立了一个兵团，叫“战到底兵团”。

这三个兵团，都挂着“工总司”的招牌，却完全不听“工总司”总部王洪文的指挥。

而此时“工总司”总部内部也发生了矛盾，一度使王洪文逃到耿金章那里。耿金章让王洪文在“二兵团”住了几天，直到危机过去，才派人派车把王洪文送回“工总司”。

11 月 21 日，张春桥、曹荻秋、韩哲一等在上海红都剧场接见从南京回到上海的“工总司北上返沪第一兵团”全体人员。他们是在当天凌晨 4 时 30 分抵达上海的。

在长时期热烈鼓掌、口号声中，工人代表给张春桥戴上他们的袖章。

接着，张春桥讲话。他刚说：“同志们……”台下就喊道：“曹荻秋靠边！”

张春桥代表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向大家表示亲切慰问。在一片掌声和口号声中，张春桥介绍了当前全国交通的严峻状况，再次向大家说明了陈伯达在安亭事件中发那份电报的初衷，讲述了他处理安亭事件的全过程及他目前的状况：

“我还开过一天的会，和什么人开会呢？就是强烈的反对我答应你们五条这一批工人开会，他们说我犯了错误，说

我违反了毛泽东思想，一定要叫我去。几十个厂子，上千个人，现在还陆陆续续不断地有很多工人到这儿来见我，要求我谈话，前天我谈了一天。我和这一些工人同志接触中间，我也就深深地感觉到，就是毛主席经常讲的，我们要相信群众，要相信群众的大多数是好的，那么那些人，他们反对你们的行动，举了种种的理由，反对我答应五条，仔细听下来，同志们会知道，他们完全出于对党中央对毛主席的无限热爱，他们并不反对党中央，并不反对毛主席，他们也并不拥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他们也拥护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但是，他们对这些问题，一时就搞不通。

从早晨9点谈起，一直到下午5点，结果是什么呢？就是大多数同志说是被我说服了，说可以同意我的观点。但同意也有各种各样的同意方法，同意也不完全是一个样子。还有一部分同志表示继续表示怀疑，同意一部分，但还有作问题怀疑。还有一部分同志，一直到散会的时候，还有说，我坚决反对。我也注意了这些同志，这些同志都是一些好同志并不是坏人。所以，同志们，我把这些情况跟你们介绍一下，就是我还继续做他们的工作，我也有责任向他们做工作，正如我有责任向你们做工作一样，我也希望同志们，你们能在这一方面支持我，就是你们回到厂里边，对于工人同志要采取毛主席的方针，团结——批评——团结。”

“同志们很辛苦，我想我今天不准备多讲了，……这儿

还有些条子，都是给我们提的。关于工厂文化大革命的具体问题，这些问题中央正在那里研究，在起草文件，准备对这些问题做出解答，我今天在这里不想讲了。……而且因为这几天，几乎到了上海以后，就是不断的谈话，谈话，谈话，你们听，我的嗓子已经哑了，一直很痛，所以我想今天就不讲了，我们还有机会再见面，祝同志们身体好！”

11 月 22 日，以王洪文为首的上海“工总司”和“红卫兵上海市大专院校革命委员会”，简称“红革会”及“炮司”等上海群众组织在静安区体育馆召开联合大会，欢迎聂元梓到上海。当聂元梓出现在主席台时，体育馆里响起狂热的掌声，在人们的眼里，聂元梓仿佛就是“中央首长”一般。

聂元梓走到话筒前，对上海的运动作了一番指点：“上海的运动，从安亭事件开始，有了起色。原先太‘温’了。不过，就现在的情况来说，也还是不能令人满意的。第一，工人运动必须紧紧地和学生运动相结合；第二，必须集中力量打倒上海市委，首先是打倒常溪萍！”

“如果我们要罢陈丕显、曹荻秋的官，中央同意吗？”会场上有人问。

聂元梓说：“现在的罢官，不是由中央来罢免，而是先由群众提出来。中央要罢谁的官，有这个意思，但不能讲出来。群众提出来了，中央就按照群众的要求，罢他的官。你们要罢陈丕显、曹荻秋的官，那就集中力量炮轰上海市委，

打倒上海市委。中央会支持你们的！”

这次会议之后，聂元梓在上海博得一个“保姆”的称谓。因为她讲话的口气、神态，确实像一个保姆在那里数落、开导不懂事的孩子。

也有些中学生见到聂元梓后感到失望。因为他们原以为聂元梓也是像那些北京南下的红卫兵一样是青年学生，没想到见面后才发现已是半老徐娘。于是一些中学生在会后抱怨说：“什么革命小将哟，都是老太婆了。”

当天，也是在 11 月 22 日，“上海市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上三司”，也在文化广场召开有一万五千人参加的“向以曹获秋为首的上海市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大会。这个大会本来是“上三司”的成立大会，其发起人是上海戏剧学院学生赵全国。他从北京串联回来后，立即和几个同学走向社会，成立了这个组织。赵全国他们将成立大会的事情向聂元梓作了汇报，聂元梓指点说：成立大会应该是“誓师会”、“出师会”，所以他们又将这次成立大会临时改成“批斗常溪萍、炮轰上海市委”大会。曹获秋和杨西光、杨永直、常溪萍等上海市委领导到会并接受批判。聂元梓也出席大会并接受了“三司”为她献的毛主席纪念章和袖章。

聂元梓在发言中喊出了“打倒上海市委，打倒曹获秋”的口号引起坐在主席台上的“炮司”许云飞的不满，他认为

上海市委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认识问题，官做大了，有官气，群众冲一冲冲掉了就行了。光凭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还不够打倒。于是，许云飞对“三司”的赵全国说：

“不是讲好会议上不喊打倒曹荻秋口号吗？”

赵全国答应把许云飞的意见带给聂元梓。

大会开始进行的很顺利。后来，曹荻秋提出下午 5 点要接见几内亚外宾，希望让他回去。大会主席不让，先是说曹荻秋撒谎，说：“他根本没有什么接见外宾”，后又说：“曹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他能代表上海一千三百万人民吗?”这样就引起一些与会者的不满，大家纷纷递条子，并喊着：“让曹走!”可是大会主席却认为喊叫的人是“捣乱”，要“镇压”。这下更激起了反感。来开会的大都是造反派，喊叫声更加强烈，最后，大会主席说：“不革命的滚蛋”，于是许多人都愤怒地离开了会场。

会前，赵全国想在《解放日报》上登一则“上三司”成立的简讯，被报社拒绝。他知道“炮司”的许云飞和张春桥关系密切，每天都要打电话与张春桥的秘书何秀文联系，交换对上海运动的看法，于是就来找许云飞。许云飞愿意帮忙，他告诉张春桥：“如果《解放日报》不给‘上三司’登消息，‘上三司’可能要闹事。请你给《解放日报》做做工作。”

张春桥说：“好，联系，联系。”

不久，张春桥打电话给许云飞说：“《解放日报》是党报，

不可随便刊登群众组织的消息，是否另外弄一张号外，这样行吗？”

许云飞转告给赵全国，赵全国很高兴。

会后，“上三司”要求出版大会特刊，曹获秋同意。11月24日，由“上三司”主办的《革命造反报》特刊出版，对开四版，与《解放日报》等正式报纸同样大版面，报头套红，配毛泽东、林彪大照片，十分醒目，。这是上海第一张红卫兵小报中的“大报”。特刊报道了“一万五千小将向上海市委开火”集会的实况，突出聂元梓参加大会及她的讲话，刊登了大会的开幕词、大会通电，社论，大会来信等内容。在这份《革命造反报》特刊中，有多个上海和外地著名红卫兵组织代表发言、来电表示支持。

《革命造反报》特刊，夹在25日的《解放日报》发到了每个《解放日报》的读者手里。

《革命造反报》 特刊 1966年11月24日出版 主办组织：

上海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 对开四版

11月22日这天，张春桥在上海接见上海和外地造反派代表。当有人问：“上海市委是否完全贯彻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张春桥答：“这样的问题我怎么能谈呢！我是来甘当小学生的，要先听你们的。”

有人问：曹荻秋某月某日报告中讲，上海前阶段运动是江青同志抓的。

张春桥回答说：“去年到今年，江青同志在上海呆了6个月，搞部队的文艺工作，但中央没有这一说法：她指导上海的运动。我想江青同志也不会这样说的。《海瑞罢官》批判，江青同志花了很大力量。”

他最后说：“同志们的问题我都是临时答的，对的算你们的，错的算我的。”

11 月 20 日至 22 日，上海“红革会”和“二医大红纵”在上海最大的室内剧场，由“天蟾舞台”改名的“劳动剧场”联合举办了“革命造反有理歌舞演出大会”，共演了 3 场，观众上万。演员全是大学的造反派红卫兵，观众都是红卫兵，或即将造反的工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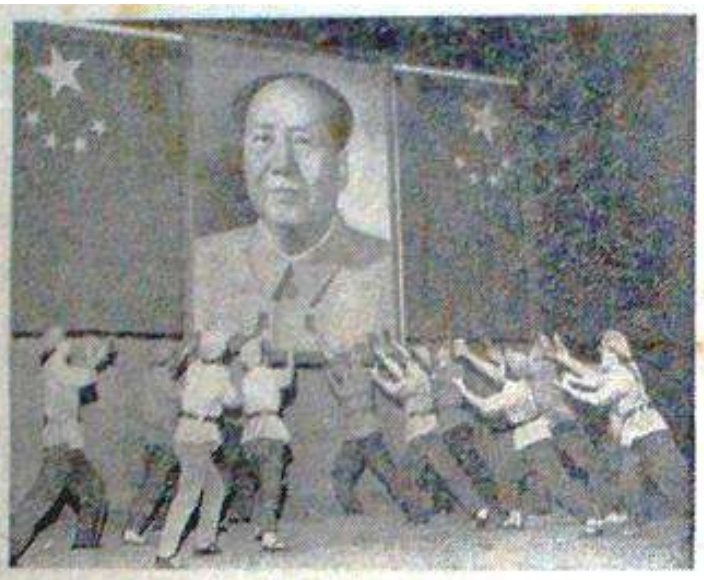
11 月 24 日的第 8 期《红卫战报》，几乎成了这次演出的专刊。该报中详细地记录了演出盛况，还有整版的演出照片。这次演出是成功的，使“红革会”士气大振。

红卫战报

革命造反有理歌舞演出大会胜利举行

内容提要：革命造反有理歌舞演出大会胜利举行 把资产阶级霸占的舞台统统夺过来

☆ 最最敬爱的领袖毛主席，在那战斗的日子里，我们哪天哪夜不把您思量："道路时想您有方向，黑夜里想您明路程，困难时想您有力量，胜利时想您心里明。"这是表演唱《红卫兵战士想念毛主席》中的动人场面。



☆ 敬爱的毛主席，是您老人家又一次解救了我们，是您给了我们数沖数闯的勇气和力量！这是表演唱《我们心中想念毛主席》中的一个镜头。

↑ 表演唱《不忘阶级苦》唱出我们革命造反者的心声：我们是红色的后代，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小兵。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我们永远跟着毛主席，世世代代不忘本。

↑ 在我们斗争最困难的时候，当我们一打开毛主席语录，我们的心中立即升起一轮最红最红的太阳。最最敬爱的毛主席啊，由您老人家给我们撑腰，我们刀山敢上，大海敢下，我们向您保证，永远跟着您造反到底！这是第二军医大学红色造反纵队宣传队演出的联唱《红色造反者想念毛主席》中的一个镜头。

第二军医大学“红色造反纵队”宣传队演出的民乐合奏《杀，杀，杀!》

11 月 24 日上午，“红革会”开会，传达和张春桥、聂元梓等讨论后的决定，由“猛轰曹荻秋”改为“炮打（揪出）曹荻秋”。聂元梓认为曹荻秋是上海资反路线的罪魁祸首，上海造反派同意了她的分析。

11 月 23 日，上海玻璃机械厂、上海良工阀门厂、国棉 31 一厂等 23 个工厂的反对“工总司”的工人代表又在杨浦区平凉路 526 号中共杨浦区委会议室开会。筹备建立他们自己的组织。良工阀门厂的金瑞章说，他们厂已经成立了“工人赤卫队”，这个名称符合共产党的历史传统。大家都同意他的提议。为了与“工总司”的“司令部”区别，他们决定不称“司令部”，而称“总部”，定名为“上海工人赤卫队总部”。会上决定起草成立宣言和控告张春桥的电报。

11 月 24 日，中共上海市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安亭事件。会上，曹荻秋说：

“我思想是不通的。承认这个组织我是可以的，但为什么要把‘由华东局，上海市委负完全责任’也写上去？对一部分不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要对工人说清楚，你们不能支持这批人。如果你们要这么做，对你们政治上不利。”

曹荻秋所说的“这个组织”就是指上海“工总司”。

市委书记王一平说：“那次签字(第一个五条)是使得我们一点没有准备，没有充分认识可能会带来什么问题。要变被动为主动，在这个问题上主动了，在大量问题上又被动了。那天春桥同志一回来，我就感到突然。”

上海市委委员，、市委工业政治部副主任杨慧洁说：“多数派实际上是听我们话的，他们对荻秋同志的答复不满意，要找春桥同志，说张春桥怕死，出卖了工人阶级利益。工作队的话，多数派是听的，问题是工作队思想还没有扭过来。”

市委工业生产委员会主任周璧说，下面的群众“纷纷责问市委：张春桥、韩哲一、曹荻秋为什么要签字？这样做是否符合中央指示精神？是否符合主席思想？是否符合十六条？问题提得很尖锐”，说群众“还要求召开万人大会，声讨市委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就是指两个五条的签字)，还要采取革命行动，捣毁造反司令部”，“要找张春桥辩论”。

市委组织部部长杨士法说：“工厂企业有它的特点，正在搞四清，职工队伍比较复杂，有地、富、反、坏，肯定会有

人翻案的。学生根本不了解情况，如果没有阶级观点，就上当了。”

副市长宋季文说：“我们现在要做最艰苦的准备，乱无非大乱，中乱、小乱，小乱就像眼前这样，影响百分之十，中乱影响就大些，大乱就影响生活，成为瘫痪状态。究竟怕不怕？不怕就不怕，让它乱。”

副市长张承宗说：“搞一条，五条，实际上影响了生产。是不是可以这样搞下去，方针究竟怎么样？思想上当然要准备大乱的。”

面对众常委的指责，张春桥说：“不能说造反派工人对党没有感情”，“不能因为一个组织中有几个坏人，就说它不是革命组织。中国共产党中间也会有坏人，中央常委中不是还有牛鬼蛇神？”“承认这个组织，不仅是宪法上已有规定的问题，还有个对群众组织采取什么态度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你去解散他，岂不是成了陈独秀？”

张春桥事后对人说：“当时市委书记处没有一个人支持我，我那时在市委是孤立的。”

第 304 回：湘江闹，晋常委欲罢卫恒　心满意，山城工人回四川

此时，湖南向各单位领导用强硬手段索取“黑材料”的事也时有发生。为查“黑材料”，各单位领导的办公室和办公桌、档案柜经常被封。对这种行为很不理解的各单位领导，纷纷向上级党委报告，祈望上级党委给予指示。但他们的上级除了向再上级的党委请示外，也和他们一样，不知该怎么办？

11 月 9 日，“湘江风雷”、“长沙井冈山”、“首都三司红色造反纵队”等组织冲进长沙市委大楼搜查“黑材料”，此举震惊长沙市。

11 月 10 日，湖南省委领导王延春、华国锋住进部队的 163 医院。同时，湖南省军区领导也捎信给张平化：“平化同志到军区招待所去住，司令员、政委都很关心他的健康，很想和他谈谈。”此后张平化等人就经常到军区招待所，并在军区招待所开了几次省委常委会。湖南省军区给各地、市委书记架接通省委书记处的“军用电话线”。张平化在省委常委会上布置，将机要文件赶紧送省军区保管。

11 月 12 日，湖南省委安排将三级干部会议的文件和笔记本，全部送到省军区保管。

11月13日，由“湘江风雷”、“首都三司驻长联络站”为主发起，以湖南剧院为中心会场分设四处分会场，召开“彻底批判、控诉以张平化为首的湖南省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到会群众愈万。“湘江风雷”代表李仲昆在大会上以自己的亲身经历愤怒控诉了张平化。当因写作张贴《奔命记》而受害自杀的王建武的母亲流着泪控诉了张平化“9．24”报告逼死她儿子的罪行时，全场怒不可遏，要张平化低

头认罪，有人把一本《毛主席语录》压在张平化的后脖颈上，使其不能抬头。这引起了参会“高司”成员的不满，其100多人的队伍高呼着“要文斗、不要武斗”的口号退出会场。

11月14日，又有数千长沙市民冲入湖南省委机关查“黑材料”，办公楼被封10余日。不过，省委还是按照中央的精神发出通知，允许群众组织搜查文革材料。但是省委自此也难以正常办公，逐渐失去对局势的控制。

11 月 15 日凌晨 3 时 05 分，“湘江风雷”、“首都三司”、“长沙井冈山”等组织联合给张平化发出《通令》说；“……今特令张平化迅速做到以下几点：

1．所有黑材料全部交出。凡被转移、藏匿的一切黑材料必须报告下落，并迅速交出。

2．以张平化为首的省委所作整理群众材料的黑指示，马上交出，张平化所作历次黑报告也一律交出，由革命群众审阅、批判。

3．凡销毁的黑材料必须立即开列清单，指使和执行销毁材料的人员必须如实交出。

4．如实交待公开抗拒军委、总政紧急指示的罪行，张平化必须公开检讨。

5．凡经查封或漏封的办公室、办公桌、柜子等(包括档案室、机要室、保险柜)，一律不准私自开封和动用，需用者必须经革命组织同意，各革命组织何时需进入搜查，有关人员必须立即携带钥匙陪同搜查，不得违抗。

6．自即日起一律不准各级组织偷偷销毁纸张等物，违者一律以销毁黑材料、违抗军委、总政紧急指示论处。

7．以上各条适用于各级党委与工作组等组织，必须认真执行。有违者一律以公开违抗军委、总政紧急指示论处，有偷偷销毁、转抄、藏匿黑材料者，均以现行反革命论。

8．已执行销毁或藏匿黑材料，凡不从实交待，以及有材料不交者，一经查出，全部报呈罢官。

此令!”

这天，“湘江风雷”总司令部派彭克刚等 3 人带着搜出的“黑材料”赴京上报中央，并决定在北京建立驻京联络站。

11 月 18 日，“湘江风雷”与“东方红总部”等组织在劳动广场召开 10 万人的群众大会，斗争张平化，当众公布和烧毁从省委搜出的“黑材料”，如“谢若冰等九人反党集团”的材料等。

11 月 19 日，建湘瓷厂造反派为“黑材料”事冲击厂党委。20 日凌晨， “长保军”“赤卫队”为保卫厂党委，与造反派冲突。51 人被打伤送进医院。“湘江风雷”等造反派组织去了上千人声援建湘瓷厂造反派。这就是当时的“11．19”流血事件。

第二天，20 日，“湘江风雷”发起游行示威，抗议张平化为首的湖南省委挑动群众斗群众，制造流血事件，坐山观虎斗。

第三天，11 月 21 日，“湘江风雷”、“东方红总部”等组织又召开“‘11．19’大惨案控诉大会”。会上，在建湘瓷厂串联的北京女 10 中红卫兵，在长沙实习的新西兰朋友也在大会上发言。

再看山西。11 月 20 日，“山西革命造反兵团”、“山西革命工人造反兵团”、“首都赴晋革命造反大队”等组织的几十人，再次找到卫恒进行辩论，长达 17 个小时。强烈要求卫恒在他们提出的“八项要求”上签字。在群众压力下，卫恒最终签了字。当天,“红联站”在五一广场召开了“控诉以卫恒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滔天罪行”大会。会上，王玉花在发言中诉说了她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迫害的情况后,几乎所有听到的人都流下了眼泪。

开会中间,卫恒被拉到会场。

大会向山西省委提出 7 项要求,限省委第二天 10 时前答复。这 7 项要求是：

1、立即撤走以贾俊为首的太原市委工作组;

2、立即解放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迫害的革命同志，立即惩办迫害革命同志的凶手;

3、立即处理拒不执行中央军委“紧急指示”，欺骗革命学生的王大任，李明温。罢李明温的官，令王大任当众作检查;

4、立即令卫恒交出 7 月 18 日黑报告录音;

5、立即交出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指示、通知、黑材料;

6、将我们所提供的大会的材料发表于报;

7、以上各项，如不答复，以有意对抗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论处。

在快要散会的时候,卫恒突然抢话筒,要讲话,引起会场一阵乱。大会主席团没有让卫恒说话,引起到会群众不满。他们说：“今天你们

应该大胆让卫恒说话，这一次他迷惑不了我们。我们甚至从来没有听过卫恒讲话，我们到底要看看，他要说些什么话。”“有这么多同志支持你们，你们怕什么？我们本来想帮你们让他答应这些条件,……”

到了晚上,五一广场仍然聚集着大批群众辩论。不过这次辩论与11月10日那次辩论不同,不是群众对学生，而是群众自己辩论。

11月21日晚上，当刘灏和其他与“兵团”共同战斗的造反组织领导，带人去省委要求落实与卫恒的“八项协议”，即他们提出的“八项要求”时，王谦省长出面接见了刘灏等人，并且代表省委表态说：“卫恒同志和你们达成的协议，未经省委集体讨论，其中有的是原则错误，有的应报请中央批准。”他向刘灏等人提出，让大家给省委一点时间，省委好集体讨论他们曾向卫恒书记提出的那八项要求。

22日这天，山西省委召开紧急常委会，但不是讨论刘灏等人向卫恒提出的那八项要求，而是讨论了王谦、王大任、郑林、武光汤、赵雨亭、贾俊、焦国鼐、史纪言等8人当天联名给周恩来、陶铸、陈伯达、李雪峰的报告。这个8人报告的内容，主要是向中央和华北局报告了卫恒在“八项协议”上签字的问题，说这是一个“违犯党的原则和中央规定的严重政治错误”，并建议撤换卫恒省委第一书记的职务。

省委第一书记卫恒对这份报告内容，也表示了同意。在省长王谦的带头下，参加会议的14名常委一致通过，将这份8人报告作为省委的正式报告，立即上报中央。这次常委会对省委第一书记卫恒作了

严肃批评。会议决定：

一、由卫恒写一个深刻的检讨，公开印发，省委将转发各级党委引为教训;

二、今后不准用个人名义答复与中央指示相违背的或未经省委集体讨论的重大问题。

卫恒同意上述决定，接受了大家的批评。

22 日中午,“太工红旗”又到省委追问 20 日大会上的 7 项要求的落实情况,卫恒逐一拒绝。一直僵持到晚饭后。学生们宣布要暂时接管省委大院的有线广播台,并立即印出传单 3 万份；责成卫恒负责向中央文革挂长途电话，学生们要汇报情况。

听说学生要接管省委大院的有线广播，卫恒十分生气，不准他们这样做，并警告说：“革命的学生决不会采取这种行动”。

学生们认为，卫恒的意思是，他们不是革命的学生。于是，当即下令：强行接管。广播室的门锁着，找不到负责人，学生破锁而入。

这一下，又引起省委工作人员的指责，说学生们是“造省委机关群众的反”。 但是，围观的群众纷纷上阵,支持学生的行动。

第二天早晨，省委的秘书们和一些工作人员约 60 人左右，趁“太工红旗”当时在省委的人数不多，又夺回了学生们控制的省委大院广播室。“太工红旗”的头头李青山闻讯立即赶回省委大院,派人到卫恒卧室把他拉出来, 当场指出这是他们精心策划的大阴谋,并提出三项要求:

1、对于今日下午在省委发生的省委机关部分群众围攻学生的事

件，卫恒必须负完全责任;

2、卫恒必须提供方便，使学生可以立即向中央文革小组汇报情况;

3、必须把广播室重新交到学生手里。

卫恒不等学生把话说完,就要走。学生们哪能答应，将他扣下，一直折腾到次日凌晨两点,最后卫恒太疲劳了，实在无法跟学生们耗下去了，终于同意：

1、广播室由学生掌握;

2、立即由省委派人陪同，打电报向中央文革汇报;

3、对于今日的围攻事件，卫恒承担责任。

在省委派人陪同下，学生到最近的邮局给中央文革拍了一份长达4000字的电报，反映他们在太原造反的情况。

这天，11月23日，卫恒发出海报告知全市：他将于24日在五一广场向广大学生作检查，“请太原市各大专学生以及中等学校革命师生参加”,“热烈欢迎外地来山西串联的革命师生参加” 。

11月24日，中共山西省委在省城五一广场召开了群众大会，卫恒代表省委，在会上检讨省委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错误。卫恒的态度是诚恳的，中共山西省委的态度也是诚恳的。他们承认在毛主席亲自发动的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开始，省委背离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但是，在袁振问题上，省委不认错，也不表示要给袁振平反。在刘灏为司令的“兵团”战士们看来，这样的检查岂能通过!“兵团”的大批人马来造反了，与“兵

团”一个观点的造反组织高举各色战旗，也进入五一广场，对这个大会造反了。多辆广播车也开进了五一广场，广播里传来一声一声向省委造反的口号。那些受命来开会、坐场的各单位群众被搅乱了。卫恒在广场主席台上无法再检查下去，只得与主席台上的其他省委领导商定，临时宣布散会。

11 月 26 日，中共山西省委在省委礼堂继续召开群众大会，仍由卫恒代表省委，向全省人民检查省委在“文化大革命”中，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错误。中共山西省委还形成了（66）221 号和（66）223 号文件，对省委的错误作了认识，对第一书记卫恒进行了批评，指出卫恒“犯了严重的组织错误”和“严重的政治错误”。

11 月 27 日，“兵团”、“决死纵队”、山西大学“八八红旗”在太原五一广场召开批斗卫恒、王谦、王大任大会。由于这次有“决死纵队”这支工人劲旅的参加，11 月 10 日那次卫恒被“劫走”的一幕没再重演。

“太工红旗”进驻省委，占领俱乐部，接管广播室的行为,立即引起连锁反应。“山西革命造反兵团”也强占了卫恒的办公室,社会上其他学校,其他单位的一些组织也纷纷进驻省委。一时间，山西省委大院车水马龙，人流滚滚。尤其是来找“太工红旗”的人，更是络绎不绝。其中，有两个穿军便装，自称是《红旗》杂志社记者的人，几乎每天都来向他们了解情况。他们大部分只是听，或者发问，对事物并不表态。12 月底的一天,他们又来到太工“红旗”省委支队的驻地，对李青山说，他们要走了，对他们之间的合作很满意。他们告诉李青

山：山西省委卫、王、王（卫恒、王谦、王大任）是一批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希望他们继续努力，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10 月中旬，重庆“工人造反军北上告状团”到京后，分别被安排在煤炭部招待所和化工部招待所。朱登明领导的一连后来驻到了北京航空学院，“北航红旗”还给他们发了红卫兵袖章。

重庆市委考虑到天气转寒，北上工人都穿得很单薄，担心他们受冻生病成为自己新的“罪状”，通知凡有人员北上的部门和单位各自派人给工人们送去寒衣。

重庆的黄廉在此之前已经与几个南下学生在 8 月份先行来到北京，住在天坛物资部接待站。黄廉到北京后的第二天，清华附中的林怀就带他去见了蒯大富。那天，正好清华大学和人民大学一起在北京体育馆主持大会批判余秋里、林枫，有人把蒯大富叫下来与黄廉认识。简单交谈后，蒯大富请黄廉上台去坐，问了一些重庆的情况。蒯大富告诉黄廉，有几个四川的干部说是受迫害，已经在北京，问黄廉知道不知道。这些人是原宜宾地区的干部刘结挺、张西挺夫妇。蒯大富让黄廉想办法找一找他们。

后来，周恩来的联络员也来找黄廉了解重庆的情况。

8 月 30 日，黄廉接到通知，转到北京市劳动人民文化宫，和几个四川和广西来的人住在一个临时搭建的帐篷里。那里住的都是当时各地比较有影响的人，如湖南“湘江风雷”的叶卫东，西安交大的李世英等。

晚上，王力、关锋、戚本禹和林杰来看他们，王力说：“我没有

资格代表毛主席，我们代表中央文革来看你们，毛主席更想念你们，明天要见你们。”

戚本禹说：你们被打成“假左派、真右派”，遭到关押，你们受苦了，下面的干部对文革还很不理解，你们起来是帮助他们理解，是帮了文革的忙。

在中央文革的安排下，黄廉和其他省市进京告状的学生、工人参加了 8 月 31 日毛泽东第二次接见红卫兵的活动。

在北京呆了近两个月，黄廉准备返回重庆了。这时，突然文革接待站的赵文成来找他说：“重庆‘工人造反军’的工人到北京了，住在煤炭部第二招待所，你们反映的问题中央已经同意给你们解决了，不可能再遭镇压和打击，你去做做工作，让大家回去就地闹革命。”

接待站用汽车把黄廉送到煤炭部二招，那里有重庆“工人造反军”250 多人。黄廉向他们转达了文革接待站的意见。千辛万苦来到北京告状的“工人造反军”当然不服，他们说：“你的问题解决了，我们还没有解决呢。”

中央文革接待站的干部对他们说：“你们反映的问题和黄廉同志反映的问题是一样的，中央很重视，一定会解决的。还有什么问题，可以问黄廉同志。中央工作会议刚刚结束，有新的精神。你们赶紧回去，参加本地的文化大革命。”

重庆“工人造反军北上告状团”人员被安排参加了 11 月 3 日举行的毛泽东第六次“接见红卫兵”的集会和游行，这让他们备受鼓舞，第二天就赶着要返回重庆。中央文革接待站说，车厢已经帮助他们包

好了，票也已经买了，什么时候走，车厢就什么时候挂上去。人们心里充满着胜利的喜悦，赶着买黄布做军装，还到北京市委领了 800 枚毛主席像章，还有许多文件和传单。

11 月 10 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再论抓革命促生产》，引起许多工人造反派不满，认为其中一些提法是“以生产压革命”。甘廷荣和朱镇坤代表重庆“工人造反军北上告状团”和其他一些地区来京告状的工人造反派代表一起走访了《人民日报》社。那天，《人民日报》负责人唐平铸接见了他们，听取意见。甘廷荣和朱正昆都发了言。

在返回重庆的途中，“工人造反军北上告状团”在成都下了火车，坐在车站，给省委打电话要他们帮助找住的地方。接电话的是工交政治部主任张敏，他们怕重庆这些人分散下去会给成都造成影响，迅速调来 5 台公交车，把他们拉到财贸干校住下。还来了两个干部，要求他们不要上街，还十分关心的询问他们准备什么时候离开？有什么要求？

此时，四川省委正在召开“三干会”，重庆“造反军”提出要列席省委扩大会议，看省委到底是怎么贯彻落实毛主席的战略部署的，还要给成都的造反派战友汇报中央文革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讲话。令他们没有想到的是，李大章欣然同意了，他说：“既然是中央的声音，工人有意见，我们应该直接听你们讲，专门听你们的观点。”

第二天，11 月 25 日下午，四川省委就把重庆“造反军”的人拉到锦江宾馆礼堂，群众坐在三楼靠栏杆的地方，头头就坐在楼下第一排。李大章对黄廉他们说：“我们老了，愿意来听听工人的意见，我

们还讲不到王力那个好，听听中央的声音，讲完了之后你们回去再去跟鲁大东讲。”

这天的会，成都的“826”、“红成”和“兵团”的人都来了，楼上楼下按票对号入座，全部坐得满满的。

第 305 回：抢校印，重庆大学竞夺权　罗广斌，乘车绕场遭非议

李大章为什么这么痛快的答应了黄廉他们的要求？原来，成都 11 月 13 日召开的“1113 大会”也邀请了重庆大学“815 战斗团”参加，重大“815”总团由总团勤务员周家喻亲自带队，由机械系和采矿系的部分人员组成总共有 600 多人的庞大队伍，到成都参加大会。其中包括有名的重大“815”铜管乐队及体育队的一些人，阵营很是可观。

“1113 大会”被成都“826”冲击后，重大“815”周家喻听信了总团先期派到成都的观察员的介绍，发表了一份《支持造反的声明》，对成都“826”表示支持。

重大“815”来成都还另有目的，就是想要在省会扎下根子。那时重庆毕竟只是一个省辖市，不是一个省的政治中心，省会文革的意义，那是不言而喻的。于是他们成立了“重庆大学 815 战斗团赴蓉挺进纵队”，队部就设在四川大学校长办公室。

为了在成都地区名正言顺地开展活动，并争得一定的领导权和话语权，“重庆大学 815 战斗团赴蓉挺进纵队”经过与成都及外地的一些造反派协商，提议成立一个西南的造反派总指挥部之类的组织，定名为“西南无产阶级红色革命造反联络总站”，简称“红造联”。11 月 20 日，“红造联”正式成立，大家公推“重庆大学 815 战斗团赴蓉挺进纵队”负责召集，并负责主持日常工作。“红造联”就设在玉沙路西南局的办公楼内。

“红造联”成立后，决定利用四川省委正在召开“三干会”的机

会，组织大西南和四川的群众控诉李井泉、廖志高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镇压群众运动，阻碍文革运动向前发展的罪行，作为“红造联”的第一场大型活动。

11 月 23 日，重大“815 挺进纵队”以“红造联”的名义，找到省文革副组长、水电厅的张广钦厅长和省三干会秘书组，提出强硬要求：“三干会不能按李井泉、廖志高的意图，四平八稳地开。我们代表造反派，坚决要求在会上插入揭露和控诉部分地方党委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镇压群众运动的内容。”

开始张广钦他们当然是不同意了。重大“815”就扬言，如果不按他们的意见办，就组织造反派强行冲击三干会，叫省里开不成会。

张广钦无可奈何，经请示省委领导，终于同意给“红造联”24、25 日两天时间。重大“815”的学生想：“两天就两天，开起来再说，到时才不管你的呢！”最后与张广钦达成妥协，他们上午的报告会、讨论会“红造联”不介入，不干涉。下午由“红造联”主持揭露和控诉会，省委负责安排协助。他们商定妥后已是 24 日凌晨 4 时，第一次插入揭露批判的时间就在当天下午 14 时。首场会议安排在时称东方红礼堂的锦江大礼堂左侧会议厅内举行，到会的人不过数百，由贵州工人控诉在文革初受到的迫害。由于时间太仓促，经验也不足，开张不太成功。不过在会上各组织散发了大量传单，与会干部们都抢着要。

按约定，25 日下午“红造联”还可以参加一次“三干会”。恰在这时，重庆“工人造反军北上告状团”到达成都，他们也提出参加“三

干会”的要求，于是李大章就势答应了他们的要求。

在 25 日下午的会上，黄廉让朱正昆念王力的讲话。谁知，朱正昆上台后，讲起自己在北京怎么见到了毛主席，接着又控诉了重庆当权派是怎么迫害他，还说：“王力那个讲话你们下去自己看就行，要《四川日报》印刷厂帮助印 5 万份发给大家。”

李大章忙说：“给他们印，给他们印。”

遂后，重庆工人“北上告状团”和重庆“815”的其他人也分别进行了控诉，他们又把杨超押上来交代问题，结果汇报会变成了批斗会。因为李井泉和四川省委确实在重庆搞了不少的鬼名堂，可以揭批的内容多，也很生动具体，这天的揭批会气氛非常热烈，效果很好。一些参加“三干会”的干部纷纷说：“以前我们真的不知道，做官当老爷惯了，恐怕我们成都也好不到哪里去。”

会议结束后，李大章就问“造反军”什么时候回重庆，是坐火车还是汽车？在礼堂后头休息室里，有人向李大章要经费，有的要他给重庆下指示。

李大章说，传单印刷好办，他可以解决装车运回重庆去，至于说给重庆下指示，省里面还是廖志高负责工作。

廖志高过来给他们写了两封信，一封是写给重庆市委鲁大东的，还有一封是给重庆军分区的，要他们帮助解决遗留问题。写完之后，问大家满意不满意？

对“工人造反军”的工作，廖志高表示支持，同意 20 至 30 个人脱产，其他人回单位，原来扣的工资要补发，挨批判的群众要道歉。

省轻工厅还给他们20辆自行车，以示支持。成都“兵团”列队欢送他们，“红成”对他们也很友好。

重庆“工人造反军北上告状团”当天晚上回到重庆，市委没有人出来接待，但在车站迎接他们的群众很多，他们半夜就在大街上扭起秧歌。第二天满街都是胜利归来的大字报和中央文革的讲话。

重庆“工人造反军北上告状团”去北京后，未走成的北航学生朱进选，在重庆六中又接待了陆续前来串连的工人群众。他将他们组织起来，按各地区编为“工人造反军”的不同分团，让留守的重庆建设机床厂工人蒋国志负责联络。随后，以蒋国志为首组建了“工人造反军司令部”。因为中央支持造反派的态度日益明确，“工人造反军司令部”成立后，得到了重庆市委的承认，从而迅速发展壮大，成为“工人造反军”中最大的一个山头。

回到重庆的“重庆工人造反军北上告状团”因不愿接受蒋国志为首的“工人造反军司令部”领导，另外成立了“工人造反军总部”，主要负责人叶祖禄、朱镇坤、杨国成、黄廉、林嘉禾等。

因为回到重庆的那天半夜，几百人一时没有地方落脚，有人说回六中，有人说干脆全部住总工会。于是就来到了总工会。“工人造反军总部”成立后，他们在总工会要了两间办公室，接待每天前来访问、串联、交流的人。由于来访的人太多，总工会食堂说无法承受，“造反军总部”就出一个通知，说往来串联人员不能在总工会食堂进餐，那个时候的革命权威完全依赖群众的自觉，不仅重庆市前来交流的工人不再去食堂打饭了，就是外地来重庆串联的红卫兵学生也不去食堂

打饭了，本来按规定食堂是给他们准备饭菜的。

再说重大“815”勤务员周家喻带着重大600多人杀向成都的时候，11月19日，他们的母校重庆大学发生了一次夺权事件。这天上午10时，重庆大学一群“815”学生来到掌管学校公章的曹万华处盖章，曹万华是学校“赤卫军”的，他见“815”来了这么多人，有些疑虑。可见来人都很客气，又是打招呼，又是递烟，也就没多说。公章盖好后，他正要放回抽屉，“815”学生突然冷不防一把抢过校印。

曹万华身材魁梧，力大无比，“815”学生抢了他校印，职责所在，他不顾一切，猛扑过去，企图夺回，一些“815”男生把他挡住，然后把抢到手的校印不停得往后传，最后曹万华也不知印在谁手上。受了这帮学生的如此戏弄，曹万华气得躺在地下像小孩一样打滚大叫：“815反革命暴乱了！815暴徒，救命呀！”

“815”头头来到校办，看曹万华在地上打滚，大声说：“老实点，不要装腔作势！我们‘815’是全市最大的革命造反派组织，是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革命发展到今天，学校还是保皇派掌权，对革命造反派实行资产阶级专政，我们采取革命行动，接管校部。”并宣布：“从今以后，一切权力归‘815’！我们可以在这里给你挂一个发工资的地方。如不愿意，你可以走，撒泼是不行的。”

闻讯赶来一批“赤卫军”立即把校办公室围住，“815”来了更多的人又形成一个包围圈，“赤卫军”打架显然不是“815”的对手，与其说是辩论不如说是吵架。“815”很快便占领了校长室、电话总机房、广播站，印刷厂等地，又有一部分人冲击“赤卫军”总部饶家院。重

庆大学校园内原有几家地主庄园，饶家院是一个坐东朝西的地主庄园四合院，北临团结广场，东北面紧靠校长办公室，背靠沿江马路，前临湖塘。“815”翻过院墙，爬上房顶，把“赤卫军”房顶上、黄桷树上的高音喇叭抢了。当“赤卫军”大队人马闻讯赶回饶家院总部，“815”的人早已逃走了，只看见他们在“赤卫军”饶家院大门上贴的一副对联：“惟有保皇怕造反，更无扒手不投机”，和一张“敦促赤卫军投降书”。这就是重庆大学“1119 夺权事件”。

第二天，11 月 20 日，重庆的官办红卫兵组织“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总部”的政委刘桂兰，代表她和副政委孟军在造反派集会上作题为《告全市人民书——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的长篇发言，详细揭露了“思想兵”如何在市委操纵下成立及打击造反派的内幕。

11 月 23 日，重庆大学、西南师范学院、西南政法学院、西南农学院、重庆建筑工程学院、重庆师范专科学校等校的“毛泽东思想红卫兵”、“赤卫军造反者”数千人在西南政法学院举行大会，批判“毛泽东思想红卫兵”、“赤卫军总部”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揭露省、市委操纵利用“毛泽东思想红卫兵”、“赤卫军”作为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工具的罪行。成立了造原总部反的“总联络站”。

11 月 25 日，“毛泽东思想红卫兵”、“赤卫军”内的造反派在解放碑召开大会，揭露其总部所犯方向路线错误，批判省、市委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由于《红岩》这部小说和由小说改编的电影《烈火中永生》在年轻人心目中的影响，位于重庆歌乐山的“渣滓洞”和“白公馆”一直

成为了中国青年一代向往的革命纪念地。也是红卫兵大串联的主要去向之一，许多红卫兵来渝串联，参观白公馆、渣滓洞时，《红岩》小说的作者罗广斌为他们作报告，还录了音，每天上午9时和下午15时播放。

11月27日是解放前夕国民党制造著名的“渣滓洞”大屠杀的死难纪念日。“1127”，成了凭吊革命先烈的神圣忌日。而罗广斌，作为小说作者，作为大屠杀的幸存者，自然也随之成为了全国青年顶礼膜拜的英雄。因此，在1966年的11月27日这一天，重庆大田湾体育场，全国赴渝师生及重庆造反派在这里召开纪念“11•27”殉难烈士大会，罗广斌作报告，引起了全场青年汹涌澎湃的欢呼。于是诸如：“向革命老前辈罗广斌同志学习！致敬！”“强烈要求市委给罗广斌等同志平反！”的巨幅标语贴满了重庆。文联大门上还贴出一副赞颂罗广斌的对联：

想当年无辜系狱犹青松临风立

到而今横遭诬陷似红梅傲霜开

大会宣读了罗广斌、杨益言等人起草，文联文革小组刻印的决议：倡议改重庆市为红岩市，改《重庆日报》为《红岩日报》，改“11•27”烈士为“红岩烈士”等。

罗广斌乘坐敞棚吉普车绕场一周招手致意，接受崇拜者们疯狂的敬意。那情景，很容易让人想起毛泽东接见红卫兵的场面，当然很快就招来了非议，说罗广斌实在是过分，甚至有人提出：是可忍，孰不可忍？一些人不满了，攻击他“以烈士战友自居，把自己巧扮成‘越

狱’的英雄，到处做报告，编造事实，哗众取宠，渲染自己……”

这次会后，重庆市有了“罗书记、杨市长”的流言。

第 306 回：文化宫，福州赤卫队遭劫　冲会场，榕城再酿流血事

11 月 23 日凌晨 1 时 50 分，福建省省会福州市，似乎整个城市都睡着了。在这个幽静的月夜，月亮从天上向下窥视，环境优美的工人文化宫里一个人也没有，万籁俱寂，一切景物都默默处于半明半暗之中。

这时，一支行色匆匆的队伍迈着急促的步子闯入了这个寂静的世界，他们迅速地扑到了挂着“工人赤卫队”总部牌子的剧场大楼前。那楼的玻璃大门没有上锁，只是门内的通道上搭了两个床铺，有两个赤卫队员在值班。

嘈杂的脚步声惊醒了守夜的那两个赤卫队员，他们从蚊帐里探出头来查看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不由地被眼前的景象惊住了，二人一骨碌地从床上爬起来，慌忙问：“你们是什么人？要来干什么？”

“我们是革命造反派，是来抄‘黑材料’的！你们快把钥匙交出来，把整南下学生的‘黑材料’交出来！”来人压低嗓门说道。

“不，我们没有‘黑材料’，你们必须立即从我们工人赤卫队总部撤出去，否则，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一概由你们负责！”值班的赤卫队员也壮着胆子警告说。

“少啰嗦，快把办公室的钥匙交出来！把‘黑材料’赶快交出来！否则，我们就要采取革命行动了！”来人气势汹汹地说道。

“我们没有‘黑材料’，钥匙也不能交给你们！”赤卫队员断然拒绝。

来人知道跟这两人磨嘴皮是白费劲，他们便把二人看管起来，封

锁了出口，然后按照事先的部署，分兵几路，有的去对付在总部里的那些赤卫队员，有的去拆电话线，有的则去搜寻“黑材料”。

他们没有钥匙，便强行砸开了门窗，拥进了办公室，又撬开了一些办公桌的抽屉，看到了大量的材料和文件，还有满满一防空洞的传单，以及成捆的《谭立夫讲话》。在一间办公室里，他们还发现了 10 支小口径步枪。

这些人行动迅速，仅用 35 分钟就撤出了全部人马，而睡在总部里头的人居然都不知道外面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同样的事情当晚还发生在福州市总工会，这里被人用铁锤砸开办公室、机要室、仓库和干部宿舍的门，抢走了档案。

原来，这些人是由哈尔滨工业大学“东风造反团”、福建省华侨大学“造反兵团”、厦门大学“独立兵团”、福建林学院等院校的300多名红卫兵组成的队伍，他们听说“工人赤卫队”总部有南下学生的“黑材料”，于是经过一番密谋策划后，组织偷袭，以搜查“黑材料”为名，同时冲进“工人赤卫队”总部所在地福州市总工会和工人文化宫，抢夺“黑材料”。

天亮后，福州市“工人赤卫队”做出了强烈的反应。他们提抗议，发声明，拍照片，同时进行现场展览，许多工厂的领导都组织工人前去参观。工人文化宫里人声鼎沸，人流汹涌，到处是演讲的漩涡急流，赤卫队员们一个个竖起了愤怒的眉毛和胡子，眼睛里喷着怒火，谁要是说一声“11.23”不是反革命行动，立刻遭到群起而攻之。有 8 名

清华、科大、厦大的学生被怒气冲冲的赤卫队员们团团围住，一名学生企图偷拍下被围攻的场面，结果照相机被抢走，胶片曝光。

下午，许多工厂提前下班举行示威游行，那擎着大旗、喊声雷涌的赤卫队员的队伍行进复行进，有1000余名赤卫队员列队来到正在召开福建省三级干部会议的人民大厦，强烈要求省委对“11.23”事件表示态度，叶飞出来对他们作了安抚工作。

23日当晚，多数派在工人文化宫召开声援大会。又有1万多名工人到人民大厦请愿，要求叶飞、范式人、伍洪祥等人及省委三级干部会议代表到现场参观。叶飞带领参加省委三级干部会议的代表驱车来到工人文化宫现场。他一边看那遍地狼藉的现场，一边听取了赤卫队员讲述事件发生的经过。

“同志们：我首先问大家好！”听完汇报的叶飞对大家说。

会场上响起了一阵热烈的掌声。

“我们到这里看到昨天发生的事情。昨天发生的事情我们也有错误，我们也要负责任。因为我们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错误，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个错误造成的恶果到现在还没有清除。今天我到这里，看到工人赤卫队、工会、工人的革命组织这样被捣毁，这是很不幸的事情。

这个事情，我们先向大家表示这个态度，是我们过去犯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错误，一直没有挽救过来。捣毁工人的革命组织，工会和工人赤卫队总部，这是不对的。把文件抢走，把枪支抢走，这是不对的，应当还给你们。在文化大革命中都应该按照《十六条》办事。……

“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要批判我们，批判我们省市委。首先是我，我要负主要责任。不能去批判群众，把斗争的矛头指向群众这是不对的。”

下面的赤卫队员们纷纷鼓起了掌。

“……我们今天看到这种情况很难过。我们的账是我们的，我们不会推给群众。今天发生这样的事情是我们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造成的影响，这是我们造成的恶果，这就是我们的责任。在这里，我们向大家请罪。”

24 日晚，“工人赤卫队”与福州市“东海前线红卫兵”在省人民体育场联合召开号称有 10 万人参加的揭发批判省、市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对省、市委和叶飞大加讨伐、鞭挞和炮轰。叶飞、范式人、魏金水、伍洪祥、梁灵光等参加大会听取批判发言。

为了防范少数派学生来捣乱会场，“工人赤卫队”组织了 3000 多名纠察队维持秩序。

18 时 30 分左右，住在中医学院南下学生串联接待站里的 50 多名南下学生带着他们抢来的“黑材料”，排成三列纵队也前来参加大会，准备要同“工人赤卫队”辩论。当他们来到主席台前面的空地上准备坐下，只听见主席台上一声口令：“同志们，大家向前五步走！”

一、二、三、四、五，那场上的“工人赤卫队”队伍如惊涛拍岸一般向前五步，把南下学生的队伍一下就挤到了场边，三行的队伍被挤成一团，无法坐下。

这时，主席台上又是一声口令：“大家都坐下！”

场上的“工人赤卫队”都坐下了，而最前面的南下学生因为没有地方坐了，尴尬的在那里站立着，后面的赤卫队员即发出了一片喊声：“坐下！坐下！”

南下学生随即派出一名代表同纠察队进行交涉，要求主席团下来一个人，准备当面对他提出两点要求：（1）给他们安排坐的地方，让队伍坐下开会；（2）要求发言。但是，那些纠察队员拒绝去叫主席团的人下来，并且，堵起了一道道人墙，不让这位代表上主席台去。

双方争执了十几分钟，南下学生造反派脾气上来，呼喊着“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口号，便向主席台硬冲上去，结果是被人多势众、五大三粗的工人纠察队员抬起扔了回来，混乱中，这些学生自然挨了不少拳头，清华大学《井冈山红卫兵》的袖章也被扯下来了，鞋子也丢了。

南下学生自然不会就此罢休，他们欲再次发起冲击，纠察队这才同意南下学生派两名代表上台交涉。学生代表一上台就向在台上就坐的叶飞提出强烈抗议，并且要求发言，没有获准。

这时，二化“工人赤卫队”代表正在发言中，他慷慨激昂地说道：“昨天，在工人文化宫发生了一起骇人听闻的‘11.23’事件，这是地地道道的反革命行动，是省市委继续顽固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挑动群众斗群众的一个新罪证……”

那个清华大学的学生代表再也忍不住了，他像一个狂人一样跳到了讲桌上，手里举着《毛主席语录》高声嚷嚷：“我们要求发言！我们要求发言！”

“滚下来，快滚下来！”台下的“赤卫队”发出了咆哮。

纠察队员强行把这两个学生代表拉入后台，并用4个女纠察队员把他俩围住。

此时，厦大“红卫兵独立师”、侨大“革命造反兵团”、林学院“赴省战斗团”等少数派学生组织也呼喊着：“革命无罪，造反有理！”、“向工农兵学习，向工农兵致敬！”等口号，陆续进场了。场内同观点的南下学生也跟着喊起来，一呼一应，会场上顿时陷于一片混乱之中。

台上的南下学生代表这时向大会主席提出最后通牒，他威胁说：“我们向你们提出最后一次最后通牒，在 9 时前必须安排我们的发言，否则我们就采取革命行动！”

大会主席同意让他发言 20 分钟。

这位学生代表上台没讲几句话，下面的赤卫队员们就起哄起来：“学生放屁，快滚下台！”

场上的喊声、嘘声此起彼伏，像海浪的巨响盖过了台上的发言声，学生代表的发言多次被打断。

当 20 分钟一到，纠察队员就上台对他说：“时间已到，下去吧！”

“不，我的话还没说完，让我说完！”

“学生快滚蛋！学生快滚蛋！”台下的赤卫队员又怒吼起来。

纠察队员把他拖到后台去，另一个北京大学的学生要冲上去继续发言，也被拖走了。

会场上顿时大乱，人海里波翻浪涌，见此情景，原来坐在主席台

上听取批判的叶飞急忙出来讲话说："同志们，请静一静，同志们，你们工人阶级是最听党的话，立场最分明，现在是考验你们的时候了！你们好话要听，坏话也要听，正确的话、错误的话都要听。"

此时，叶飞的讲话无济于事，谁也不卖他的账，台上台下依旧乱成一团。少数派学生集结队伍，举着大旗，高喊着"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不顾一切地向主席台冲去。

由于主席台两侧的梯子被纠察队占领了上不去，被挤到台侧的一些学生想从两人多高的主席台栏杆攀爬上去，台上的纠察队和主席团成员就往下推学生，继之用拖鞋、凉鞋、木头朝学生摔去，有的甚至用板凳、木棍、竹棍打学生，阻止他们攀爬。

叶飞一行人由于无法制止住这场混乱的局面，劝说无效，只好宣布散会，先期从后台走了。

冲！冲！冲！"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少数派学生怀着纯真而又狂热的革命信念，下定不冲上台誓不罢休的决心，终于冲上了主席台……

大会被冲散了，双方受伤 100 多人，有 20 多人被送进医院。同时好几辆装有大喇叭的宣传广播车被砸坏，许多红卫兵及群众组织的旗帜被撕毁，旗杆被折断，整个会场一片狼藉，时称"11·24 流血惨案"。

当晚，少数派学生又把队伍拉到省委开控诉大会，在会上通过了给毛主席的急电，要求党中央改组福建省委，罢叶飞的官，会后举行

了示威游行。

“11·24流血惨案”同样引起工人“赤卫队”的更大不满，他们准备发动更大规模的罢工。

为了防止事态的进一步扩大，叶飞提出三条建议，要求省委常委和省委三级干部会议代表到工厂去做工人的工作，少部分人去做少数派的工作。既肯定学生们大方向是正确的，也指出他们使用的方法欠妥。工人阶级也是革命的，不应把矛头对准工人，而应该对准省委，因为责任在省委，不在工人。

省委常委和省委三级干部会议代表共70多个厅局级以上干部，到各个工厂去做工人的工作，说服他们要以大局为重，要文斗，不要武斗，不要再引起新的冲突。这些工作虽然收到一定成效，没有再发生更大冲突，但双方都还是不满意。学生们坚持成立“1123革命造反指挥部”。

“1123事件”并没有引起民众对红卫兵造反派的太大反感，而“11·24流血惨案”却让工人“赤卫队”威信扫地。次日，在工人文化宫，即“赤卫队”总部的大门上，钉满了许多工人“赤卫队”的红袖章，大批群众纷纷退出了“赤卫队”，拥有10余万之众的工人“赤卫队”昼夜间开始土崩瓦解。

11月25日，“11.23革命造反指挥部”冒雨举行了7000多人的示威大游行。“打倒叶飞，改组福建省委!”、“打倒郑重，改组福州市委!”的口号声响成一片。

27日，“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福建省总部”和“11.23革命行动指

挥部”用担架抬着在“11·24流血惨案”中负伤的红卫兵，举着被撕碎的战旗和那天被毁坏的毛主席画像，举行近两万人参加的示威游行。

同一天,中共福建省委发出《致全省工农群众、革命师生、革命干部、红卫兵的一封公开信》，恳切希望对省委所犯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错误进一步进行揭批，清除错误路线的影响。

到了29日，5万群众在省体育场集会纪念“八·二九”三周月，又一次把满腔的怒火统统发泄到了叶飞的头上。

这一天，叶飞在三级干部会上，做了《中共福建省委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所犯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错误的检查》。在这一检查中，对于“11.23”、“11.24”事件避而不谈。毕竟这是难以表态的事情，弄不好又要被栽上“挑动群众斗群众”的罪名……

此时的叶飞,早已经没有了控制运动的能力。他现在所能做的除了不停的检讨，不断地承担责任，和没完没了的检查外，再无适当的工作了。

第 307 回：勉其难，毛泽东最后接见　红卫兵，召开记者招待会

我们再回到北京。11 月 20 日，首都红卫兵一、三司令部、大连海运学院“长征红卫兵”和蚌埠铁路中学“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联合在北京工人体育馆召开“全国在京革命师生步行串连四个单位誓师大会”。周恩来参加大会并说：“我支持你们开这个大会”。会议通过了《全国在京革命师生步行串连四个单位倡议书》，向在外串连红卫兵发出了号召，步行串连回本单位参加文化大革命运动。

尽管中共中央结束串连的《通知》贴满了全国大、中、小城市的车站、码头，催促在外串连的红卫兵尽快返回原单位；但还没有过足免费旅游瘾的红卫兵一时无法转回头去，他们想方设法，用互换车票的办法继续按照原计划游动。

随后，全国各地的接待站逐渐撤销，从而限制了串连的学生们，散布全国的学生开始陆续回原学校。到年底，由于进入冬季，除部分继续完成其宏大步行串连计划的学生组织外，大部分学生都返回了原学校。但在北京、韶山、井冈山、瑞金、遵义、泸定桥、延安等“革命圣地”依然人满为患。为此，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通知：长途步行串连，在全国都停止。各地也开始坚决拒绝接待参加串连的红卫兵。

进入 11 月下旬，北京上次接见过的红卫兵还未走完，新来京的红卫兵又达到 250 万，当时在京的红卫兵将近 400 万。

北京的天气已经很冷了，这 400 万红卫兵或是离家过早，或是从南方来，绝大多数都穿着单衣，没有御寒的衣物。这时，周恩来遇到的最大困难、最大压力是给这些衣食住行全免费的“客人”解决御寒

被服，可是北京市的库存物资全部拿出来了也无济于事。

经报请毛泽东同意后，周恩来像进行战争动员那样在工商系统和北京市进行了全面动员，号召工商部门、工厂、商店、仓库，把棉被、棉衣、毯子、绒衣、球衣等御寒物品全部拿出来。几经动员，同舟共济，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解决了这个大难题。

这时，毛泽东已经很累了，不太情愿接见红卫兵了。“小雪”节气已过，周恩来怕发生冻伤事故，设想在 25 日、26 日两天中全部接见完在京的 250 万红卫兵。当他把这个设想报告毛泽东时，毛泽东说：“不是停止串连，要回原地闹革命嘛？”

周恩来说：“已经来了，天又渐冷，北京市压力很大，要尽快想办法见，让他们快回去。你不见，他们不走啊。”

毛泽东说：“这些红卫兵娃娃来了，天又冷，了不得，这是逼上梁山呀！”

他同意周恩来的建议，把这次接见作为最后一次接见，这就是毛泽东第八次接见红卫兵。

因为人数太多，为减轻毛泽东的劳累，周恩来决定把 250 万红卫兵分两批进行接见。11 月 25 日接见 150 万，26 日接见 100 万。

两批接见均把红卫兵摆在天安门广场、东西长安街、西郊机场，毛泽东和中央其他领导人乘 9 辆敞篷吉普车进行接见。

由于北京卫戍区人力不够，临时调驻守天津的 66 军 74 师、196 师前去协助维持秩序。74 师家属院的几个孩子罗朝利、陈建朝、段晓芹、段维明、罗用斌、汪小宁、汪小东等也随着一起来到北京，住

在北京团中央的地下室里，地上铺着稻草。这里已住了许多外地红卫兵，孩子们太兴奋了，一晚也没睡，第二天早上 4 时就起来了，每人发了两馒头，然后随着队伍步行来到天安门广场。他们被安排在最西边的观礼台。当毛泽东主席出现在天安门城楼时，距离太远看不清，陈建朝和段维明两人就顺着天安门城楼往中间跑。因为那里执勤的战士都是 74 师的，认识这些孩子，也没管他们。当他们跑到第二个观礼台时，正好毛泽东、林彪、周恩来等人走到天安门的西边，他们看得真真切切，两人不停地跳跃着，用那还带着童音的嘶哑嗓子，不停地，拼命、兴奋地高喊“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陈建朝后来回忆说：“伟人仿佛听到了我们那独特的嗓音，向下望着我们，微笑着挥挥手。与伟人对目那一霎那，深深的定格在我的脑海里，以至永远，永远……此情此景终生难忘。”

1966 年 11 月 25 日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

1966 年 11 月 25 日在天安门广场接见红卫兵

25 日接见完天安门广场、东西长安大街的红卫兵后，周恩来请毛泽东和中央其他领导人到大会堂休息一会，尔后一起出发去西郊机场。

不多一会，毛泽东催着要出发，周恩来担心西郊机场未准备好，去早了怕毛泽东在野外受冻的时间长，打电话询问又怕不准确，便叫蔡洪江坐周恩来的“吉斯”专车亲自去看一下。一路绿灯放行，蔡洪江很快疾驶到机场，仅用了不到 10 分钟，就用周恩来专车上的无线电话向周恩来报告:“一切准备就绪，可以出发了。”

周恩来这才放心地让车队出发，到机场后，一点时间也未耽搁，进行得非常顺利。

26 日下午，在西郊机场进行了最后一次接见。接见后发生了两个意外的事故：一是又冷又饿的红卫兵，还未等毛泽东换车，就散了，结果把机场大门堵得水泄不通，毛泽东的车无法回中南海，只好返回走人行道，从机场东北侧的一个小门改去玉泉山。蔡洪江等人步行协助毛泽东的警卫人员把他护送到了玉泉山。二是散场时红卫兵拥挤不堪，将机场外的一座罗锅桥压断，踩死了几个人，伤了十几个人。

由于这次在车上站的时间太长了，有的领导下车后，已不会走路了。

1966 年 11 月 26 日周恩来和江青、康生检阅红卫兵

11 月 22 日，应驻京外国记者的要求，北京女二中、男二中和红卫兵战校，即清华附中的红卫兵近 20 人，同路透社、法新社、德新社、加拿大《环球邮报》、日本共同社和《赤旗报》驻京记者进行了座谈。红卫兵首先主动介绍了中国文化大革命和红卫兵的情况和成就，接着记者提出了不少问题。

法新社记者范桑首先问："你们为什么要把扬威路改名为反修路？"

一名红卫兵答道："毛主席说：我们现在思想战线上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开展对修正主义的批判。苏联修正主义领导集团让资产阶级思想在苏联泛滥，实质已经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工贼叛徒，他们自己不革命，还不让人家革命。我们恨透了，改路名表达了我们反对修正主义的决心。"

另一名红卫兵说："苏联现代修正主义配合美帝镇压世界上的革命运动，维护资本主义统治，维护美帝国主义利益，是美帝国主义的帮凶走狗，在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土上，怎么能够扬修正主义的

威风呢？”

有一名红卫兵申明：“我们反对的不是苏联人民，而是苏联修正主义领导集团。中苏人民一直是友好的。我们完全相信苏联人民总有一天会起来造修正主义领导集团的反。”

第一个回答问题的红卫兵接着说道：“大会是我们自己组织的。示威进行了两天一夜，8 月 29 日和 30 日，参加人数共 101 万人。当时有的外国记者不相信，问是不是真由我们组织的，我们说，当然是我们。干革命根本不分大小，只要掌握了毛泽东思想，我们就能创造奇迹。”

路透社记者白尔杰对坐在他身边的一个小姑娘问道：“那天大会好像是你主持的，对吗？你多大了？读几年级？”

那位女红卫兵答道：“是的。15 岁。初中二年级。”

德新社记者巴格曼问：“美国作家斯特朗和红卫兵座谈过，她在《中国通讯》中说：‘红卫兵也是军事力量。’你们有什么看法？”

红卫兵答道：“红卫兵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后备力量。现在我们也搞军事训练，随时准备和越南人民一起，消灭美帝国主义。”

法新社记者范桑问：“具备什么样的条件才能加入红卫兵？”

红卫兵答：“工农、革命干部、革命烈士、革命军人的子女是主体，同时吸收其他家庭出身，在政治上表现好的子女参加，最主要是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好。”

路透社记者白尔杰：“你们红卫兵怎样同党中央联系？”

一名红卫兵答：“我们人手一套《毛选》，一本《毛主席语录》，

一份《十六条》，还有林彪同志讲话，周恩来同志讲话，《红旗》、《人民日报》的社论，这些都是毛主席的声音、党中央的声音。”

另一名红卫兵说：“每天我们拿起毛主席的著作，就像听到毛主席的讲话。”

共同社记者福原：“你们红卫兵的领导是怎样产生的？”

红卫兵：“按巴黎公社的全面选举，通过大家充分酝酿讨论选举产生的。他们学习毛主席著作学得更好，能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路透社记者白杰尔：“你们说用巴黎公社式的全面选举，请你们解释一下好吗？”

红卫兵调侃道：“ 还是让法新社的记者先生说说吧！”

法新社记者范桑：“我们不知道你们从巴黎公社究竟学了些什么？”

红卫兵答：“我们像巴黎公社那样实行全面选举，自下而上进行充分酝酿讨论。对于选出的代表随时可以批评，随时可以撤换。”

加拿大《环球邮报》记者翁西亚：“你们这个学校有多少学生？多少红卫兵？”

红卫兵答：“1000 多学生，300 多红卫兵。我们这里红卫兵组织也正在发展。”

翁西亚继续问：“你们红卫兵搞了多少活动？那另外 700 多不是红卫兵的同学在干些什么事呢？”

红卫兵答：“红卫兵从来不脱离群众。毛主席说：‘这个运动规模很大，确实把群众发动起来了。’我们这里也是全体都发动起来了。

红卫兵是文化革命的急先锋。其他同学干的事情和红卫兵一样，不过红卫兵最积极、最肯干。”

另一名红卫兵说：“帝国主义、修正主义诬蔑我们红卫兵是流氓、凶手，毁灭文化。敌人这样骂我们，是好事而不是坏事。他们骂得越起劲越说明我们搞对了，我们红卫兵干得好，很有成绩。”

路透社记者白尔杰：“你们对国际红卫兵有什么看法？”

红卫兵答：“我们完全相信，总有一天红卫兵会出现在华盛顿、纽约、莫斯科、东京，人民一旦觉悟起来，就会自己动手组织起来。”

“革命不分中外，只分革命、不革命、反革命，只分拥护毛泽东思想还是反对毛泽东思想。”

德新社记者巴格曼：“你们相信苏联人民会组织起红卫兵反对他们的领导吗？”

红卫兵：“完全相信。苏联人民会起来反对他们的修正主义领导，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共产主义大旗必将插遍全世界。”

法新社记者范桑问：“现在北京有多少种红卫兵报？”

红卫兵答：“红卫兵宣传毛泽东思想，多多益善，宣传毛泽东思想不嫌多。”

加拿大《环球邮报》记者翁西亚：“大中学校什么时候开学？”

红卫兵：“要等文化大革命搞完。其实我们并没有停课，现在是在补阶级斗争的课，上的是没有课堂的课。”

“这是我们的主课，是在教室里学不到的。应该说社会是我们的课堂，工农兵是我们的教师，毛主席著作是我们的课本。”

“只有在毛主席的领导下，才能敢于让我们学生上这样的课，使我们学到这样的东西。”

德新社记者巴格曼：“你们现在学习政治问题、阶级斗争，什么时候开始学习这样的数学等技术课程？”

红卫兵七嘴八舌的答道：“学习技术课程，首先要解决为谁服务的问题，这个问题解决了，学习起来才有用。毛主席说：世界上有两种技术，一门是阶级斗争，一门是技术斗争。我们现在补阶级斗争课。”

“我们生产原子弹的时间比美国、苏联都短，这说明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人，就能创造奇迹。”

“美国、苏联生产原子弹为谁服务？美国生产第一颗原子弹就扔在日本国土上，日本的记者先生们，一定是有感触的。我们中国生产核武器，就是要打破美国、苏联的核垄断、核讹诈。我们政府一再声明，我们绝不首先使用核武器。”

“毛主席说：‘武器是战争的重要因素，但不是决定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越南是个小国，但是打败了美国，因为美国进行的是侵略战争。美帝国主义在亚洲横行霸道，很不得人心，美帝国主义每侵略一个地方，就给自己脖子上套上了一根绞索，最后必然彻底灭亡。”

法新社记者范桑：“你们说 5 月底开始批判吴晗、廖沫沙和邓拓，实际上他们在《北京日报》写的文章已经很久了，为什么 5 月才开始批判，才看出他们是坏人？”

红卫兵：“其实他们的文章早就有人开始批判了，但《北京日报》

对于读者来信、批判文章一律扣压，不予发表，他们压制革命群众的批判。5 月份只是到了高潮。”

德新社记者巴格曼：“你们学校文化大革命，已经清除了一批反党分子，现在还有没有？”

红卫兵：“反党分子不但过去有，现在有，将来还会有。毛主席说得很清楚：‘党内不同思想的对立和斗争是经常发生的，这是社会的阶级斗争和新旧事物的矛盾在党内的反映。’”

法新社记者范桑：“在宣布北京市委改组的时候，你们感不感到惊奇？”

红卫兵：“我们感到高兴，并不惊奇。改组北京市委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

法新社记者范桑：“为什么这么长时间，你们才看出北京市委是修正主义的？”

红卫兵：“阶级斗争是复杂的，阶级敌人是狡猾的。十几年来，我们对前北京市委许多资产阶级修正主义做法，不断进行抵制、批判和反对，但群众认识有过程，我们掌握了毛泽东思想，就看透了他们的真面目。”

加拿大《环球邮报》记者翁西亚：“你们怎么知道文化大革命搞完呢？”

红卫兵：“文化大革命一直搞到共产主义建成，这次只能说是搞一头，搞一个阶段。”

德新社记者巴格曼：“解放军是文化大革命的榜样是吗？”

红卫兵："解放军是我们全国人民学习的榜样，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学得最好，为人民服务最完全、最彻底。"

巴格曼："请介绍一下你们学校的文化革命委员会好吗？"

很多人指着一位小姑娘，即主持"反修路"命名大会的主席说："她就是我们的文革主任。"

巴格曼问："你们的主任挨过大字报批判过吗？"

那位小姑娘答道："我们工作有缺点、有错误，群众就要批评。"

翁西亚："红卫兵有没有写大字报批评中国领导人？都写了哪些人？"

红卫兵："你自己去看就知道了。"

路透社记者白尔杰："有大字报要刘少奇、邓小平、李雪峰进行检查，你们有什么看法？"

红卫兵答："毛主席教导我们：'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我们如果有缺点，就不怕别人批评指出。不管是什么人，谁向我们指出都行，只要你说得对，我们就改正。你说的办法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照你的办。'我们彻底实行大民主，对谁提意见都可以提。你们资本主义国家，敢于让人民写大字报批评政府和国家领导人吗？佐藤政府敢于向人民检查自己的错误吗？"

佐藤是当时的日本首相。

法新社记者范桑："我相信你们的话，那些都是不可能的。"

红卫兵："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对政府是不满的，但他们一起来批评政府，反对政府，政府就会动员军队、宪兵警察，进行镇压。而

我们国家领导人是欢迎群众批评提意见的。对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必须彻底打碎。我们是根本不同的社会制度，我们的干部是人民勤务员，你们的政府官员、领导人是压迫剥削人的统治者，这里有本质区别。”

法新社记者范桑：“你们现在对齐白石和他的画是怎么看待的？”

红卫兵：“我们用毛泽东思想来鉴别他的画，如符合毛泽东思想的，我们就肯定，不符合就批评。”

范桑：“你们是不是也读些毛主席著作以外的书，非政治性的书来放松放松、消遣消遣？”

红卫兵：“毛主席说：‘在现在世界上，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为艺术的艺术，超阶级的艺术，和政治并行或互相独立的艺术实际上是不存在的。’我们不知道什么是非政治性的书，世界上根本不存在什么非政治性的书。”

范桑问：“鲁迅的书你们读过吗？”

红卫兵：“鲁迅是文化革命的先驱。我们不仅读他的书，而且学习他打‘落水狗’的革命精神。”

范桑：“其他作品，如赵树理的作品你们也读吗？”

红卫兵：“我们最爱读革命的书，比如《欧阳海之歌》等等，对于一切艺术作品，我们都用毛泽东思想来衡量。”

德新社记者巴格曼：“让我们从文艺转过来谈谈体育运动吧！毛主席提倡群众游泳运动，你们会游泳吗？”

学生们齐声回答：“我们都会。”

一名红卫兵说："我们都会游泳。这样不管美帝国主义从天上来，还是从海上来，我们都叫他有来无回。"

另一个红卫兵接着说："我们等美帝国主义等了好几年了，我们的前辈头发都等白了，他们早来早消灭，我们欢迎他们明天就来。我们一定让他们淹没在人民战争的海洋中！"

德新社记者巴格曼："如果苏联修正主义比美国来得早呢？"

红卫兵："我们相信，苏联人民决不会允许苏修领导集团进攻中国。"

"这不决定于我们，就我们来说，我们连一天也不愿意打，但是如果美帝苏修来了，我们一定奉陪到底，我们用正义战争消灭非正义战争。"

德新社记者巴格曼："你们志愿去越南吗？"

红卫兵答道："当然！只要越南人民提出要求，我们全部志愿去。我们要正告美帝国主义，它欠下的血债一定要用血来还，现在苏联修正主义领导同美帝国主义互相勾结，美帝国主义是纸老虎，苏联修正主义也是纸老虎，两个加在一起还是纸老虎。苏联修正主义帮不了美帝国主义的忙，美帝国主义也救不了苏联修正主义领导集团的命，他们已经为自己准备了掘墓人，终有一天他们会从地球上彻底被消灭掉。"

巴格曼："今天花了不少时间，谢谢。祝你们工作成功。"

红卫兵："我们最后再说几句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史无前例的大革命。苏联现代修正主义和帝国主

义对我们的文化大革命颠倒黑白，造谣诬蔑，怕得要死。文化大革命敲响了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的丧钟，文化大革命就是要消灭修正主义的社会基础，资本主义的温床。美帝国主义把和平演变的期望寄托在我们第三代、第四代身上，红卫兵的出现和发展彻底粉碎了他们的梦想。红卫兵干的就是对！世界革命人民都称赞红卫兵好得很！我们要警告那一小撮人，他们这样反对文化大革命，反对红卫兵，绝没有好下场！希望能客观报道今天的座谈。”

11 月 22 日，北京“西纠”给周荣鑫写了一封信，信中说：

周荣鑫同志:

汽车我们半轮也不追,中央文革要我们解散,必须把原因讲清楚,否则一切后果由中央文革负责!!!望周同志把这些话转达给陈伯达同志，并告诉他，我们全体西城纠察队员找他。

兰小兵 路小峰 王向荣

## 第 308 回：再接见，四川和全国代表

## 轰文革，十一月风起京城

刚刚组织完毛泽东接见红卫兵的活动，11月26日下午18时，周恩来又和成都地质学院、重庆师专、西南民族学院、唐山铁道学院、红岩二中、自贡培红中学、自贡釜溪中学组成的“西南赴京联合告状团”40名代表座谈。当周恩来与代表一一握手点名认识时，发现个头矮小的自贡市培红中学学生王典兴只有13岁。他惊讶地说：“呵！就是这个小同学！”

另一同学插话说：“才13岁就被打成历史反革命了。”

王典兴：“我与父母都断绝了关系。”

周恩来：“你父母是干什么的？家中兄弟多吗？”

王典兴：“我父亲是工人，共产党员。我是老大，如果我父母不和我断绝关系的话，要被扣工资，开除党籍！”

周恩来：“不要怕，我保你！”

同学们高呼：“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周恩来又问唐山铁道学院的同学，唐山铁道学院是什么时候迁到四川峨眉的？

唐山铁道学院的同学回答说：“是今年5月。学院分成两派，一半要回唐山，一半坚持留在四川。”

周恩来：“我看在哪儿都一样，西南不是三线建设吗？你们不是有人参加了三线建设，那儿搞的热火朝天！我说在四川是闹革命，在唐山也是闹革命！”

周恩来又问成都地质学院和西南民族学院在北京有多少人，是否和“四川告状团”在一起？

同学答：“不是，是‘二七战斗团’的。前次我们开告状会时，他们还冒我们的名。”

周恩来：“今天主席接见，‘四川告状团’在天安门不走，怎么说也解决不了。我们把他们集中在旗杆附近，他们还把我们三个执勤人员的袖章，一顶军帽……都抢去了。”

周荣鑫：“这些人还骂我们的执勤人员是宪兵队。”

周恩来：“我准备叫你们去劝一下，结果又不是你们一起的。昨天，他们在王府井100多人睡在马路上不走，同学们又是劝又是拉，最后才睡在马路侧边。”

周荣鑫：“他们闹了三次了。”

同学说：“我们要坚决摧毁这些保皇组织！”

周恩来又问起：“刘结挺他们在哪里？”

同学答：“现在在北京航空学院……”

周恩来把刘结挺、张西挺等人的名字，职业，现在住在哪里，都一一记下来后问：“他们来多久了？”

同学：“他们8月份就来了，已3个多月了，不敢回去，李井泉要抓他们。”

代表们向周恩来递交告状材料，以及刘结挺等人揭发李井泉等人的材料。

刘结挺，1955 年 5 月起任宜宾地委书记兼宜宾军分区党

委书记、政委；1960 年 7 月至 1963 年 3 月任宜泸合并后的宜宾地委第二书记。他妻子张西挺 1954 年 5 月任县级宜宾市委第二副书记，1956 年 1 月任宜宾市委第二书记，同年 8 月起至 1963 年 3 月，任宜宾市委第一书记。1963 年 3 月，他们夫妻二人被李井泉以严重违法乱纪、合谋打击陷害干部群众之名，同时被撤销职务，1965 年 2 月经中共中央批准二人被开除党籍。

文革开始后，他们夫妇二人来到北京，状告李井泉，揭发西南局的问题，但始终不得要领。当重庆的黄廉 8 月份到北京告状时，见到清华大学的蒯大富，蒯大富还向他打听刘结挺夫妇的情况。9 月上旬，重庆大学“815”到北京告状，一位家住宜宾的重庆大学学生曾带着刘结挺夫妇一行 3 人到北京展览馆找过他们，是“815”负责人之一的黄顺义接待的。当黄顺义看完他们的材料，知道他们此次前来的目的是希望通过重庆大学“815”替他们向中央转送申诉材料时，想到此时自己尚且状告无门，只能无奈的对他们说：“我们现在也申诉无门，帮不了你们。”刘结挺 3 人只能败兴而回。以后他们又去北京展览馆找过“815”几回，均无结果。

北航“红旗”在国防科委大门口坚持了 28 个日夜，于 9 月 21 日撤离后，在军委门前的体育馆留下了“北航红旗红一连”的十几个人，作为联络组织，负责接待外地到北京的上访群众。10 月 11 日，刘结挺、张西挺找到“北航红旗红

一连”的同学，与他们谈了西南局李井泉的问题，引起了“北航红旗”的重视，让他们住在了北航。并将刘结挺、张西挺他们揭发李井泉的材料很快交给了中央文革。

10 月 17 日，王力接见刘结挺、张西挺。

10 月 20 日，王力和关锋又接见了与刘结挺、张西挺一同进京告状的原宜宾地委副书记王茂聚和原宜宾地委组织部长郭林川。王力首先询问他们“是哪儿的”，然后又问他们是不是“机关干部”？

王力对刘结挺夫妇和王茂聚、郭林川反映的情况很重视，认为他们是受了李井泉的迫害。他给江青写了报告，建议党中央成立一个调查组调查此事。所以周恩来在这次接见四川代表时特别问了刘结挺的情况。

接着，成都地质学院的同学向周恩来汇报成都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的“八一五战斗队”于11月2日，将学院武装部保管的枪支全都拿走的情况。

周恩来问：“枪没有保管起来吗？”

同学说：“没有，是他们的人在掌管，李井泉曾调动军队来向我们示威，在成都、重庆、贵阳都调用了军队。李井泉坏透了，我们要坚决打倒他。”

周恩来：“那还了得！你们不要看得那样严重，现在调不动了。”

同学：“调得动的，他们到处造谣我们要制造匈牙利事

件……028部队的几个战士还给林副主席写了血书。”

周恩来问成都地质学院的同学：“你们怎么进驻到西南局去了呢？”

同学说：“我们去造反，他们就乘机搞我们。”

周恩来问：“地质学院有一个赵铮，8月份停职反省。任白戈现在在哪里？”

同学答：“被‘815’抓来斗争，住在重大，在重大扫地，劳动改造。”

周恩来将秘书叫来说：“今晚就收回成都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八一五战斗队’库存的武器，今晚一点钟回复。”

周恩来开始询问重庆的情况，问他们：“你们的要求是什么？”

同学说：“我们要求改组重庆市委，交出‘黑材料’，要求罢李井泉的官。”

周恩来：“明天我要讲些原则问题，你们都去参加，以后就可以回去了，回去斗争吧！一个单位最后剩下3名代表就行了。地质学院人多，可以多留下几个。”

座谈一直到21时45分结束。此时，由成都地区学院红卫兵给周恩来戴上“红卫兵成都部队”的袖章，并请周恩来代献袖章给毛泽东和林彪。最后，周恩来指挥大家唱《大海航行靠舵手》。

全国进京告状的代表太多，北京压力很大。11月27日，

周恩来等22位中央领导接见全国各地进京的群众组织代表。他说：

“你们是等了很久的，希望党中央、国务院、文革小组领导同志来接见，我们不太可能一个个接见，采取集体的办法，今天能来的，都来了，我现在介绍一下：陶铸、叶剑英、康生、陈毅、李先念、谭震林、谢富治、张春桥、王力、刘宁一、曹轶欧、谢镗忠、戚本禹、穆欣、姚文元、唐平铸、汪东兴、周荣鑫、童小鹏等同志。都是你们点名要找的，还有几位同志，像陈伯达同志很想来，但这几天接见，很累，不能来，让我向你们道歉。江青同志也一样，几天接见，很累，不能来，让我向你们道歉。还有一位文革副组长刘志坚，向你们请假，凡是能来的，都动员来了。”

现场长时间热烈鼓掌。

对代表们上访提出的一些具体问题，周恩来说：“一般的说：通过依靠你们自己在斗争的实践当中，就地与当地的党政机关协商解决，不可能一件一件地都由中央代替地方同你们直接解决。我想请你们设想一下，就拿这个学校方面来说，全国的学校，大学几百所，中学就更多，几千所，都要派代表到中央来解决，设想一下，那我们在座的同志只能天天作接待，天天接见，天天协商，也不可能排得下来。所以一般的各个学校出的事情，依靠自己的力量，像十六条那样说了，毛主席这样说，依靠自己教育自己、依靠自己解放自

己。”

周恩来特别谈到北京市委11月18日的《重要通告》，他说：“最近，中央批转了一个《重要通告》，就是要保护人民的自由。有的说《重要通告》是个‘大毒草’，这是误会。北京市委的通告，是中央文革小组提议，经过毛主席和中央批准，发给了各地。……比如过去派出的工作组执行错误路线时，曾经把革命师生、革命左派拘留起来，是错误的，批判过的，我们不要去说他了。据我们了解，现在有些地方有些掌权的还这样做，所以我们要禁止，也有的地方由于受了工作组做法的影响，受到打击的，一时激愤也想照样做一下，这就代替了专政权力。……这是过去的学校、机关的党政负责人做得不对引起的错误后果。”

然后，周恩来谈了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和两条路线斗争的问题，接着，又讲了平反和档案材料的问题。他说：“凡是这些错打的，一律无效，宣布一律平反，恢复这些革命的积极分子左派的名誉！”

现场掌声、口号声一片。

他接着说：“关于档案材料就是更复杂了。首先要原工作组或者原校党委负起责来，把他所搞的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一段时期中，从5月16号以后有关的材料集中起来。上报的材料，由上级的党委集中，他自己的材料以及工作组员的日记等等，也都应当把它负责集中起来，交给学校的革

委会或者筹委会。分散的要把它集中起来。所谓集中，就是要封存，并不是拿去公布，更不是拿去参观，而是把它安放封存起来，等待学校的各派学生，首先是左派学生，多数回来了，能够选出代表，上级党委要参加，来参加监督，来当面焚毁，就是说，把过去这段时期的档案，一烧了之！”“这件事情，请示中央、主席、林彪副主席还有中央常委，还有文革小组，我们再三考虑，最后大家共同认识，就是一烧了之为最好。”又是一片掌声、口号声。

在谈到北京来请愿的问题时，周恩来说：“今天大家都见了，绝大多数同学都可以回去。如果原则解决了，全体都回去。”“这一点是我们对你们的一个诚恳的要求。”

最后周恩来又谈了中央正在研究厂矿、农村、县以下的中学、小学、半工半读的学校如何进行文化大革命的问题。

谈到成立国际红卫兵组织的问题时，周恩来说：“全国性还不成熟了，国际性呢就更不成熟啦。我举个例子来说，坦桑尼亚在民族主义国家中比较坚持反帝，它有一批海员的人到中国来参观，我们北京的红卫兵送给他们的红卫兵袖章，他们带回去了，经过埃塞俄比亚飞机场，那个海关要检查他的东西，他就说我们是红卫兵不许检查。当然人家不听他的罗，报上就登出来了，说中国的红卫兵已经传到非洲了，那么这几位朋友回到坦桑尼亚，他们要想做工作不容易，那个地方要破旧立新啊，问题那的确就是多啦，因为那个地方

还是在民族主义阶段，连土地改革还未进行，这个距离就很大咯。这是一个，对我们是欢迎的，但他们那个地方是不能实现的，还没到实现的条件。还有第二种的，有的拉丁美洲的国家，有一个地方成立了红卫兵，写了一封信给我们北京红卫兵，说要成立国际组织。但是它啊，那个地方的红卫兵的组织情况有点复杂，因为它反对的对象不是修字号共产党，而是反对马列主义的共产党，这个问题就复杂了，所以我们就不能够答复了。至于帝国主义国家，修正主义领导的国家，那它不要我们这个红卫兵，而它更不会让你们去了。所以说现在成立红卫兵的国际组织条件不成熟。而且我们一个国家的红卫兵不能称是国际性组织嘛，也总得大家共同发起嘛，所以这件事情肯定条件还不成熟。因此我们说，你们的志向很大，将来总有一天会建立国际红卫兵的。”

再说北农大附中伊林·涤西给林彪的《公开信》贴出后，很快在北京又掀起了一股炮打中央文革小组和林彪的政治旋风。还有很多学校的红卫兵和学生组织联合起来，到处贴大字报、散发传单，为刘少奇和邓小平鸣冤叫屈，反对江青、陈伯达和林彪，有的大字报公开把矛头对准了毛泽东。

一天，北京航空学院曾经因反对工作组而闻名的曹伟康来到农大附中找到“伊林·涤西”中的张立才，表示支持他的观点。11 月 20 日，北航“红旗”的白晓宏也来找他们。此时的曹伟康和白晓宏等几个人，在北航成立了一个“国际

红卫军”的组织，其宗旨和口号是：“把无产阶级革命和红卫兵运动推向全世界，为解放全人类而斗争”。他们认为，文革以来林彪的表现和言论十分出格和反常，令人怀疑。林彪对毛主席的评价不是实事求是地赞扬，而是别有用心地吹捧，令人肉麻。许多话是明显错误的，违背了事实和辩证法……

白晓宏和曹伟康悄悄地向许多人特别是北航“红旗”的头头们散布他们的观点。他们还认为，北航“红旗”已经成了“保皇派”，成了中央文革怀里的“阿斗”，不再继续革命了；真正的革命造反派应当继续造反，造林彪的反，把中国真正的赫鲁晓夫、反革命两面派林彪揪出来示众。那样，北航“红旗”才是真正的革命造反派，才会受到全中国、全世界的赞扬和佩服……

这时，刘握中对张立才说：“立才，咱们碰到大个的了，有一群人在反林彪呢……”

张立才说：“我们跟人家不一样，咱就是给林彪提个意见，咱咋能反林彪呢？反林彪可不是咱们的观点。”他马上否定了说他们是反林彪的说法。

但此时在北京，反文革小组之风已起。11月25日，北航“红卫兵”的“八一纵队”贴出《一问中央文革》、《二问中央文革小组》的大字报。在《一问中央文革小组》的大字报中写道：

“许多中央首长，像林副主席、周总理、叶剑英副主席、陈毅副主席等在接见革命师生时，总是讲主席英明、伟大、正确，讲主席怎样教导，讲自己跟不上主席思想，每次开会都不忘学习主席语录，而中央文革小组一些同志也经常接见革命师生，也经常讲话，但他们中的一些讲话很少引用主席语录，很少说主席的英明领导，很少提伟大的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而经常听到是：我说如何如何，我如何如何支持你们；不然的话，我就怎样怎样；我要你们做什么什么……为什么处处突出这个‘我’字呢？”

“中央文革小组的某些同志不深入群众进行耐心细致的调查研究，认真听取各方面意见，而是偏听偏信呢？就拿我们北航来说，为什么中央文革小组有些同志就只听‘红旗’战斗队一方面的意见，根本不听红卫兵一方的意见呢？”

“10月中旬，我院红卫兵、赤卫队及林学院等其他一些院校的红卫兵要求中央文革小组接见，反映情况，等了11天11夜，中央文革小组也不接见，最后还是总理出来接见的。”

“11月8日有一些军事院校的学生及北航红旗部分战士冲入国防部一事引起了军委的重视，于是在11月13日下午中央军委召开在京军事院校革命师生大会，当时周总理，陶铸同志，军委四位副主席及许多军队首长都出席了大会，然而中央文革小组却为什么没有一个人参加？还有些人冲进国务院，中南海，直接威胁到主席安全，中央文革小组的同

志为什么对此事不表示态度？而是由陶铸、李富春、陈毅、谭震林、谢富治等副总理出面表态？”

在《二问中央文革小组》大字报中，他们写道：

“10月6日第三司令部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誓师大会》，中央文革小组全体同志都参加了大会。10月8日第二司令部和第一司令部的部分院校在北京也召开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誓师大会，中央文革小组却没有一个同志参加。同样都是红卫兵，为什么中央文革小组对第三司令部特别重视呢？而对第一司令部和第二司令部如此冷淡呢？”

“10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社论《红卫兵不怕远征难》后，有一些人不相信毛主席会支持长征，甚至于认为鼓励长征是阴谋。于是就到陶铸那里去询问，陶铸同志告诉他们主席是很支持长征，周总理也认为这篇社论讲的不错，他们仍不相信，却指名要求戚本禹同志接见。为什么这些人不相信陶铸同志而相信戚本禹同志？”

由于 11 月 18 日，浙江温州部分群众怀疑温州市公安局藏有“黑材料”，围攻占领了温州市公安局。温州地、市委领导赶去劝阻，结果也都被围在温州市公安局内好几天。温州代理地委书记王芳的秘书黄荣波想办法出来后，向浙江省委和中央办公厅报告了这一情况。

11 月 25 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为此事签发了中共

中央、国务院［1966]569 号文件。文件指出：“公安机关是专政机关，是无产阶级国家的专政工具，任何时候，都要保证它能正常地履行职责。温州市少数群众占领公安局，对维护治安、进行对敌斗争和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都极为不利。希望你们立即退出，使公安机关能协同人民解放军执行维护治安和对敌斗争的职责。公安机关有任何缺点错误，都应在公安机关以外的地方进行批判，协商解决。”“其他地方如发生类似问题，请照此办理。”

文件要求浙江省委派负责人前往温州，向进入公安局的群众和全市人民宣读中央指示，并负责处理那里的问题。

11 月 26 日，浙江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沈策来到温州，在公安局门口向群众宣读了中央[1966]569 号文件。有的群众质疑文件的真实性，押着沈策赴京核实。29 日，中央办公厅又下发[1966]577 号文件，指出“中发[1966]569 号文件是经过毛主席批准的，必须坚决执行”。随后，围困温州市公安局的群众才陆续散去。但是温州市公安局长杨绍庚被揪到市人民广场开大会批斗，并挨了打，他是温州中层以上干部中第一个被打得伤痕累累的人。

第309回：与“三司”，共商谈文革大计　告学生，下工厂勿忘生产

11月下旬，北京矿业学院“首都红卫兵总部”联合十几个院校的多数派，成立“批判戚本禹联络站”，表示要对戚本禹11月12日接见“二司”告状代表时的讲话进行彻底批判。矿院“首都红卫兵红色游击队”在市内贴出“我们坚决要求和陈伯达辩论”的大标语。

11月27日，北京林业学院“红卫兵战斗兵团”的李洪山贴出“剖析戚本禹同志的讲话----评戚本禹同志11月12日的讲话”的大字报，表示“戚本禹的反是造定了。”

从27日至30日，北京“三司”召开全体工作人员和所属组织代表会议，讨论当前的形势和任务。27日晚，陈伯达、关锋等人在北京钢铁学院接见了与会的全体人员及北航“红旗”的代表。

陈伯达说：“现在想跟大家交换交换意见，有些问题想向大家请教。大家安静下来就好谈一些。你们是不是有这个感觉，现在文化大革命有些新的情况？”

众答：“对！”

陈伯达：“主要是什么问题啊？主要是什么情况啊？”

大家纷纷说：“打人！”

陈伯达：“在哪里打人呀？”

答：“好些地方都有，学校、工厂……。”

有同学说：“湖南在工厂打伤100多人。”

陈伯达：“为什么打你们啊？为什么工厂里要打人啊？”

答：“就是因为要‘黑材料’不给。”

陈伯达："要'黑材料'不给就打人吗？是不是你们要得很急呀！我告诉你们吧，我们也是很急的。"

大家热烈鼓掌。

陈伯达："我们向中央反映情况，中央自己也掌握了情况，所以关于这个问题中央几次发下了指示，发下了文件，你们知道中央批转军委的一个文件吗？"

众答："知道。"

陈伯达："你们知道中央又搞了一个补充规定吗？"

众答："知道。"

有同学说："湖南还不知道。"

陈伯达："湖南还不知道？你们报告的这个情况很好。中央批转军委指示，中共中央补充规定上面写着，要在群众当中宣读的，如果没宣读，应要求那里的党委宣读。宣读以后怎么办呀？他们不交怎么办？"

很多人喊："打！"

陈伯达："我这人生平没打过架，让反革命打过那是有的，但从来没和好人打过架，不打架还是可以革命的呀！拿起武器和敌人作战那是另外一回事，那是必要的。这不是我个人想，《十六条》规定不要打架的，打来打去最重要的最大量的还是打了自己人，还是好人挨打，不管他有什么错误，打了他不一定认识错误，反而坚持错误。我们是希望改正错误好，还是希望犯错误的人坚持好？"

众："改正错误好！"

陈伯达："你们现在有一个很好的志愿，很多同学有很大的志愿，到工厂去革命去，我赞成大家的志愿。可是我对这个问题有一些看法，所以需要和大家商量，是商量不是命令。我不是首长，大家都叫我首长，我不是首长，我是普通老百姓，……这样就可以提出一个问题，你们到工厂去，如果去，一定要抱着做勤务员的态度，当人民的儿子，这样工作起来就不困难了，如果做一个指挥官去那就要碰钉子。……学生到工厂去，一部分工人和学生有矛盾，我看这个责任首先主要在学生，不晓得你们觉得我说得对不对？"

众人鼓掌。

陈伯达："所谓责任在学生，因为学生年轻，还没有经验，不会和工人结合，你们学生革命热情，革命精神好，但是没有适当的方法，你们的目的是达不到的，你们的任务，你们的革命任务是完不成的。"

学生们纷纷往台上挤，陈伯达："同志们！请你们不要挤，这样挤，这样推很不好，东面、西面坐下来好不好？我们是商量问题呀，不是看戏呀！我们也不会演呀！你们这样子，我们很不安心，我们给你们惹了祸了……后面坐不下，可以到台上来。"

主持大会的学生："同志们不要到台上来，注意首长安全。"

陈伯达："刚才他说的话是错误的，没有什么首长、安全问题，我们都是老百姓，可以上来，都是一个群众嘛！我也是一个老百姓嘛！可以考虑考虑嘛！挤得不可开交！"

台下有人喊："台下听不见，没喇叭。"

陈伯达："这倒是个理由，台下听不见，没喇叭。"

人们开始递条子，一张条子问：“有一部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挑动一部分工人斗学生怎么办？”

陈伯达：“有这样的事，是在考验你们会不会做工作，如果你们会做工作，要向工人做工作，工人了解你们不歧视你们，那么这种事情就会避免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要挑也挑不起来，他就孤立了。假定工人一下子听不进你们的话，因为有坏人给他们灌输了一些坏东西进去了，你们的话他听不进去，你们怎么办？我说这时候你们就要耐心，不要心急。给大家坦白地说，我这个人非常心急，但在群众面前我就经常警告自己，不要心急，群众听不进去，群众与你意见相反，我们就要想一想嘛！我们的意见究竟还有哪些地方有缺点，如果我们的话是对的，群众听不懂学生腔，也感到你们是学生腔，所以你就要学会跟工人和群众说话。所以，要学会跟工人和群众说话，一个是态度问题，还有一个语言问题，群众的语言对我们年轻人是缺少的。

现在有一个根本的问题，学生和工人的关系问题，这个认识如果不正确解决，就会给人家挑拨，就会被坏人利用。学生和工人打起来很不好，如果工人和你们打起来，怎么办啊？我看是走为上策！可以跟他们说，我们来是好意，可能我们的工作方法不那么适当，以后再说吧！真理是不能用打架来解决的。越打矛盾越厉害，对不对？净我说，没有你们说话的余地，你们不同意也可以表示表示。”

众：“同意！”

陈伯达：“你们年轻，容易打架，我年纪大了，比较不好打了，

不适合你们的口胃吧！”

群众：“适合！”

陈伯达：“工厂发生几件事情，都说是这些学校的学生搞的，搞来搞去就搞到我们中央文革小组来了，因为这些少数派是我们保护过的。保护过他们以后，他们到各地就没有注意工作方法，就不好了。当然，发生了问题，我们也受连带，负了责任，请同学们注意，请和我们接触过的同学注意，你们做的事情是和我们联系在一起的，虽然现在你们的许多事情，我们并不知道，我们没有指挥过，可是有人就说我们是幕后指挥者。实际上我们并没有幕后指挥，我们跟大家说的话，都是在大会上说的，都是在幕前说的没有在幕后说。我们不搞任何阴谋诡计，我们讲原则，讲党的路线，讲毛主席的路线，我们不搞权术，”

关锋：“不搞两面派。”

陈伯达：“现在有的人误会，说是我们操纵的，实际上我们并不知道。这些事我们一点也不知道，如果有百分之九十九不知道，还有一分知道，我们也是错的，我们确实百分之百不知道，所以我们特别希望同志们谨慎，和群众搞好关系。你们到工厂去，和工人一起劳动、学习、革命，我们都赞成，但是当群众还没有觉悟的时候，拒绝你们，你们也不要勉强，你们看我这是不是右倾机会主义，大毒草吧？听说上海工人贴我大字报，说我的电报是大毒草，我根本不辩护，可能明天大街上贴了很多大字报，说陈伯达是大毒草，是替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辩护，如果你认为是大毒草，是替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辩护，那完全可以贴大字报。现在我嗓子哑了，请关锋同志讲几句。”

关锋说：“刚才伯达同志讲的精神就是让大家注意工作方法，学会做群众工作，特别是要记住毛主席的话，任务是过河，方法是桥和船，桥和船的问题不解决，任务就不能完成。”

陈伯达接着说：“现在我在上海也有点名气了，贴了我的大字报，说我给上海工人的电报是大毒草。电报主要是说，让工人回到生产岗位上去，不要中断生产，不要中断交通，不要中断铁路交通，有问题就地解决，必要时可以派几个代表到北京来，不要来那么多。中断交通，中断生产，这样子就没有理由了，社会上就不同情我们了。因此说是大毒草。中断生产运输，必然扰乱了国家经济建设，国家经济计划，我们是必须保证完成和超额完成的，我们的革命就是促进生产，而不能中断生产，更不能停止生产，现在是社会主义经济，像一个大机器一样，各部分联系着的，一个地方停止工作，整个机器都停了。这个问题要注意，不能意气用事，你们说对不对？”

众答：“对！”

陈伯达又问：“是不是停止生产闹革命好？我们说工厂革命有根本两条是：一条是八小时工作制一定要保持，搞三个钟头或四个钟头的文化革命，总之是在业余时间，八小时以外的时间，业余时间由群众自己支配，这是第一条，这是保证生产，同时要保证质量，要保证质量，听懂吗？”

众：“懂！”

陈伯达：“不能降低质量，你们进工厂要注意这样一条，保证质

量、产量，在八小时工作时间之内，不要去扰乱他们，这是要很好注意的；还有一条是，组织一个领导的班子，由那些有经验的、政治好的老工人和优秀的技术人员组织起来抓好生产，这样我们就能搞好文化大革命，离开生产就不能搞好文化大革命，你们赞成不赞成啊？”

众：“赞成！”

陈伯达：“没有饭吃能搞好文化大革命吗？你们这些人来北京吃饭不要钱，还不是因为这几年生产搞得很好嘛！不然怎么有可能啊！不然在北京就会要饿肚子的，那还行啊？”

关锋说：“马克思说：‘任何一个民族如果停止劳动，不用说一年，就是几个星期也要饿死，这是每一个小孩都知道的。’”

陈伯达接着说：“马克思的话主要是讲的农业生产了，工业生产也不能停止几个星期呵！全国的工业生产停止几个星期，那还了得啊！像我们社会主义国家，是工人阶级领导的，工农做主人的国家，工业生产停止几个星期就乱了。交通运输也不能停止，现在有些人在火车站上，让火车不能开，好些车停在那里，这样做是不利的，这样坏人可以利用来攻击文化革命，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反对文化革命更有理由了，帝国主义也会称快，所以不能这样做。”

“学校是可以放假闹革命，因为不直接搞生产，但工厂、农村就不行了。”

关锋：“学校可以停止半年、一年闹革命，在阶级斗争的大课堂里上课，工厂、农村不行啊！……主要想跟你们说两个问题，一个是学生和工人接触中的工作方法问题；一个就是抓革命促生产的问题。

主要的意见讲完了，有反对的意见可以递条子来，不一定站起来说话，站起来说话怕人家有反对的啊！可以递条子嘛！”

陈伯达：“现在街上有许多文章，包括我在内的文章和讲话，有些是假造的。姚文元的《论造反者》是假造的，林彪同志《论左派》也是假的！林彪同志没有这样一个讲话。还有我和‘誓死卫东’战斗队的讲话完全是假的，名都没听说过。请大家帮我辟谣，我没有这个讲话。听说很多学校翻印了，上了当了。还有文化革命小组的同志也被造谣，有这样那样的讲话，有这样那样的文章。跟你们说，正式发表的讲话和文章都是经过中央批准的。”

关锋：“有一个条子上说，我到工厂去听人说，不应当规定那么死，几个小时工作，三、四小时搞文化革命。他们的意见是，在完成生产指标的情况下搞文革，这个意见不知对不对？”

陈伯达说：“我的意见还是一定要八小时工作制，没有八小时工作制，完成生产计划没有保证，如果能够完成了，还可以超额完成嘛！还可以质量更高嘛！这样不是文革更有劲了吗！精神更愉快了吗！不更多快好省了吗！革命就能搞得更好一些吗！反对文化革命的人就没借口了嘛！他就没有理由了嘛！这样看来我们意见比较一致吧！”

“三司”在这次会议提出：“两条路线的斗争更激烈、更复杂、更尖锐、更明朗，党内走资派垂死之际，要疯狂的挣扎和反扑，他们孤注一掷，在残酷镇压革命群众的同时，把莫须有的罪名加在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中央文革小组头上，企图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

## 第310回：难理解，中学生筹建“联动”

### 是“忽略”？江青没有提陶铸

毛泽东11月26日最后一次接见红卫兵的第二天，11月27日，关锋给江青写信说：“陶铸同志到中央工作以来，就积极支持刘邓路线，并参与了刘邓路线的制定。陶铸同志的说法，是直接同主席的《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唱对台戏。”信中列举了陶铸的7个问题，建议中央密切注视，加以考察。江青将信转给了毛泽东。

也是在毛泽东11月26日最后一次接见红卫兵的第二天，11月27日下午，在北大附中教室二楼的会议室里，聚集了北大附中、石油附中、清华附中、矿院附中、地质附中、北航附中、人大附中、钢院附中、农大附中、北医附中、101中、女六中、八一学校、育英学校、十一学校、丰台三中、北京工业大学附中等18所中学红卫兵的20多个负责人。

早在10月初，北大附中的红卫兵就联络了一些学校，想成立一个中学红卫兵的联合组织，北大附中学生、北大附中“红旗战斗小组”负责人之一的宫小吉负责起草这个组织的宣言。

宣言起草完毕后，他们召开了这次会议。北大附中高三学生牛皖平主持了这次会议。

“外地全乱了！”刚刚回到北京的牛皖平说道。这位天真的学生预备党员，在“破四旧”后，开始了大串联。他本想到外地去开开眼界，甚至和校文革商议，把北大附中搬到东北或者内蒙去，搞半农半读、半牧半读。但是，残酷的现实很快就让这位天真的理想主义者困

惑起来。在他所到之地，西安、武汉、广州看到却是党的各级领导遭到“炮轰”的现象不断升级，省委、市委的各级领导班子基本瘫痪，党委负责人纷纷落马。难道这些领导都是黑线人物？不是说文革只搞6个月，斗批改只有3个阶段吗？路线斗争的残酷性使北京中学的这些老红卫兵们感到迷茫，牛皖平带着满腹疑团，回到了北京，又亲眼看见自己的父母被“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造反带来的灾难已经降落到了自己的头上，原先“红色贵族”的地位正在动摇，甚至还有可能坠入社会的最底层，成为新的“狗崽子”!

听完牛皖平的发言，清华附中的卜大华随声附和。此时的卜大华也已经开始从狂热走向了迷惑。他们以为文化大革命是夺回被资产阶级篡夺的权力，但他在京广线和沿海串连时，却看到另外一番景象。自从受到毛泽东的特别关爱，清华附中红卫兵到任何地方，其待遇都有如“首长视察”，总是被请上主席台就座。但所有的地方，却没了党组织、没了省委和市委、而且没有一位共产党的领导不是正在受到“火烧”和“炮轰”，就连北京的朱德也被人贴出了大字报，说是“黑司令”、“军阀”、“老机会主义者”。这位红卫兵发起人之一的卜大华不禁问自己：“一个领导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的党难道只是由少数几个好人组成的吗？”他后来回忆这段时间自己的心情时说：“大串连的那些日子，我的心情一直郁郁不乐，在外地时甚至没有戴过红卫兵袖章，我们实在耻于同那些对不论什么人都不分青红皂白高喊打倒的人为伍。”

卜大华把8月初天桥剧场开会时江青的讲话告诉大家。于是，大

家七嘴八舌地说开了。

“中央文革就是中央文革，它既不是毛主席，也不是党中央，对它有意见为什么提不得？”

“可现在谁提意见，谁就是反革命，这岂不是国民党的作风？”

“为什么不许我们对当前运动提出自己的意见？我们中学红卫兵应该联合起来，和蒯、聂之流干到底！”

“应该团结起来成立一个组织，像‘西纠’那样。”不知谁提出了这样的建议。这个建议立即得到会议室里几十个人的一致响应。

“那么，这个组织应该叫什么名字呢？”

“我看，就叫‘红卫兵第四司令部’！蒯大富是‘三司’，咱们是‘四司’！”

“要不就叫‘造反兵团’？”

“司令部多如牛毛，‘造反兵团’也太俗气，不如叫‘联合行动委员会’吧！”

最后，大多数人都赞成叫“联合行动委员会”，有人还建议在前面加上“首都中学红卫兵”几个字当定语。会议持续了两个多小时，“联动”诞生了。

怎样将这个红卫兵联合组织向社会正式亮相呢？卜大华建议，召开一次“破私立公大会”，检讨老红卫兵在文革初期过分鼓吹“鬼见愁”对联，强调阶级路线、阶级队伍，造成了学生中间的分裂。

会议决定，“联动”的组织机构采用集体协商的办法，由各校派出一名联络员主持常务工作，总部设在北大附中，总联络员由北京工

业大学附中红卫兵于增寿担任，组织工作由北京石油学院附中负责，“联动”的宣言仍由北大附中宫小吉起草。

就在关锋给江青写信揭发陶铸的第二天，11 月 28 日，北京召开了首都文艺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会，明确将北京京剧一团等四个文艺团体列入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序列。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刘志坚、谢镗忠、吴德等人参加了大会。两万多人把人民大会堂的那个会议厅挤得水泄不通，内中有不少人是从外地赶来的。

陈伯达致开幕词，他说：“历史上的文化革命，常常是从文艺方面开头的。我们现在进行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也正是这样。十四世纪到十六世纪的欧洲文艺复兴运动，即处在革命时期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发动的文化革命，由意大利一位伟大诗人坦丁，用他的文艺作品来表白历史的新开端。在我国以 1919 年‘五四’运动为历史标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大革命，也由一位伟大的文化闯将——鲁迅，用他的文艺作品来表白历史的新开端。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南。毛泽东同志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艺理论，用无产阶级宇宙观，系统地、彻底地解决了我们文艺战线上的问题，同时系统地、彻底地给我们开辟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条崭新的道路。”

接着他高度称赞了江青的贡献：“我在这里想说，坚持这种文艺革命的方针，而同反动派、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的同志中，江青同志是有特殊的贡献的……”

陈伯达讲完以后，江青讲话。她一开始就介绍了她对发动文化大

革命的认识过程："几年前，由于生病，医生建议我过文化生活，恢复听觉、视觉的功能，这样，我比较系统地接触了一部分文学艺术。首先我感觉到，为什么在社会主义中国的舞台上，又有鬼戏呢？然后，我感到很惊异，京剧反映现实是不太敏感的，但是，出现了《海瑞罢官》《李慧娘》……等这样严重的反动政治倾向的戏，还有美其名曰'挖掘传统'，搞了很多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东西。在整个文艺界，大谈大演'名'、'洋'、'古'，充满了厚古薄今，崇洋非中，厚死薄生的一片恶浊的空气。我开始感觉到，我们的文学艺术不能适应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那它就必然要破坏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

"试问：旧的文学艺术不能适应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古典的艺术形式不能完全适应社会主义的思想内容，那要不要革命？要不要改革？我相信，大多数同志们和朋友们，会认为需要革命的，需要改革的，只是这是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又是一件非常细致、相当困难的工作。"

"在今年 5 月以后，进入了全国性的几乎涉及整个意识形态领域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派工作队这个问题，我个人也有一个认识的过程。6 月 1 日，聂元梓等同志的大字报发表以后，我用一个多月的时间，观察形势，分析形势，我感觉出现了不正常的现象。这一个月，我开始大量注意学校。例如，南京大学匡亚明制造的反革命事件，西安交通大学的六、六事件，北京大学的六、一八事件。我很惊异，为什么一些出身成分很好的青年，从他们自己写的材料看，他们是要革命的，可是他们竟被打成所谓的反革命，逼的他们自杀，神经

失常，等等。毛主席是 7 月 18 日回到北京的，我是 7 月 20 日回到北京的。原来应该休息几天，可是听了陈伯达、康生同志，以及在北京的中央文革小组的同志们的意见，我就报告了毛主席，我感到需要立刻跟伯达同志、康生同志去看大字报，倾听革命师生的意见。”

“这时，我才充分地认识到，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派工作队这个形式是错误的！他们不是把斗争锋芒对准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以及反动的学术权威，而是对准革命的学生。”

“问题不在工作队的形式，而在它的方针、政策。有些单位并没有派工作队，依靠原来的领导人进行工作，也同样犯了错误。也有一部分工作队采取了正确的方针，政策，并没有犯错误的。”

“8 月 18 日，毛主席接见了百万革命小将，主席是那样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是那样相信群众，是那样爱护群众，我觉得自己学习的还不够。这以后，红卫兵小将们走向社会，大破四旧，我们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同志拍手称快。但是过了些天，又遇到了新的问题，于是我们赶快找材料，调查研究，这才又追上不断发展的革命形势。我们就叫做紧跟一头，那是毛泽东思想；紧追另一头，那是革命小将的勇敢精神，革命造反派精神。跟和追，不是经常能够完全合拍的，是时而追上，时而落后于形势。因此我有什么缺点和错误，希望同志们，朋友们，红卫兵小将们批评我，写信也可以，写大字报也可以。凡是我错的，我都改。凡是我对的，那我当然坚持。”

她在讲话中说：“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周恩来同志、陈伯达同志、康生同志，以及其他许多同志，都肯定了我们的成绩，

给过我们巨大的支持和鼓舞！”

这时，江青好像“忽略”了名列陈伯达之前的陶铸，这些讲话发表在第二天的《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上。在那个敏感的年代，这一“忽略”自然引起人们极大地关注。

江青讲完话后，周恩来接着讲话，他说：“首先，我对江青同志的讲话表示完全同意和支持，并热烈祝贺北京京剧一团等四个文艺团体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建制。我希望，今后，还会有新的文艺单位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序列。”

“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创造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大民主的新经验。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大串联，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这是毛主席的群众路线在社会主义革命中的新发展。”“我们的目的，就是像毛主席指出的那样，要形成一种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

“我在这里要介绍一下在座的陈伯达同志、康生同志、江青同志，都是坚决拥护和执行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

“上面说的文艺革命的成绩都是同江青同志的指导分不开的，都是同文艺界的革命左派的支持和合作分不开的。这是同三十年代到六十年代贯串在文艺界的一条修正主义黑线进行坚决斗争的结果。江青同志亲自参加了斗争实践和艺术实践。虽然艰苦的斗争损害了江青同志的身体健康，但是精神的安慰和鼓舞，一定能够补偿这些损失。”

“我们的文艺团体，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重点单位之一。过

去长期在彭真、陆定一、周扬、林默涵、夏衍、田汉、阳翰笙等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统治下，文艺界成为他们抗拒毛主席文艺思想和革命路线，散布修正主义毒素，制造资本主义复辟舆论的一个重要地盘。我们一定要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坚决把一小撮盘踞在文艺界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统统揭露出来，把他们斗倒、斗臭、斗垮。”

“正如江青同志所说，文艺团体中犯错误的人员，要区别对待。要分清是人民内部矛盾还是敌我矛盾。少数混入文艺队伍的坏人，是要从文艺队伍中清洗出去的。对于大量的犯错误的人，要分别错误的不同性质，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只要他们真正地认识错误，真正地改正错误，就应当欢迎他们，帮助他们，允许他们革命。”

接着，周恩来又谈了关于“黑材料”的处理等当时群众关心的问题。

周恩来讲完话，谢镗忠正式宣布：“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决定，将北京市京剧一团（包括北京戏剧专科学校参加国庆演出的红卫兵演出队）、中国京剧院（包括中国戏曲学校参加国庆演出的红卫兵演出队）、中央乐团、中央歌剧舞剧院的芭蕾舞剧团及其乐队，划归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制，列入部队序列，成为我军进行政治工作和文艺工作的组成部分。”

他同时宣布：“我还向大家宣布一个大喜事：中央军委决定江青同志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文化工作顾问。这是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

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副主席对我军文化工作的极大关怀。江青同志对毛泽东思想学习得很好，领会得很深，运用得很活、很坚决。由她担任我军文化工作顾问，是加强部队文化工作革命化、战斗化的最重要的部署。”

戚本禹根据江青的指示，还安排叶剑英的女儿叶向真在会上做了发言。

## 第311回：装甲兵，许光达急火攻心　又集会，两老帅再次发言

根据林彪 11 月 17 日的电话指示，11 月 21 日，叶剑英再次就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和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的问题对军事院校的部分组织发表讲话，他说："拥护伟大的毛主席必须以林副主席为榜样。林副主席是毛主席最好的学生。他对毛泽东思想钻得最深，学得最活，用得最狠，贯彻执行的最好最彻底。他是几十年革命的实践，就是拥护毛主席的几十年，林副主席用毛主席的人民战争的理论武装了我军才能成为世界的榜样。林总提出了那么多的问题，仍非常虚心，说自己不够。林副主席就是我们老干部学习的榜样，要突出政治，突出毛泽东思想，活学活用，突出群众路线，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提高群众的觉悟，发挥群众的革命积极性。违背了这一点就违背了毛泽东思想。毛主席的接班人就是林彪同志。林副主席对毛主席思想体会最深。林总说'我只有拼命地学习毛泽东思想，听毛主席的话，相信毛主席的天才，相信毛主席的英明，相信毛主席的智慧'林总这样以身作则，是我们全党全军每一个同志的榜样，只有向林副主席那样学习毛泽东思想，才能真正拥护毛主席。林总是贯彻了'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的，林总学得狠，我们要大吃一惊的，觉得我们落后了，再不学习就要被抛弃了。"

会后，叶剑英把林彪 11 月 17 日的电话指示告诉了刘志坚。刘志坚建议："根据林总的意见，我看你和陈毅副主席再次召开一个会议，给他们纠纠偏，再把周总理和陶铸同志请来，让他们也和大家见见面。用这个来体现军委的决心和方向。"

叶剑英报告了周恩来后，周恩来先是婉言拒绝，但是在叶剑英和陈毅再三要求下，周恩来终于答应了。

11 月 28 日，工程兵学院的学员派出代表来到装甲兵机关，找到司令员许光达，提出要和装甲兵的造反派一起，在装甲兵大院开批判大会，批斗刚从工程兵调来的装甲兵政委黄志勇，说黄政委在工程兵学院工作期间，生活作风不检点，有不少三反言行，过去没有人敢惹，现在机会来了，是该清算他的问题了。他们还要在批判大会上给黄志勇戴高帽子、挂牌子。

许光达说："会可以开，有意见可以提嘛，注意大的问题，至于生活作风，我们党委会可以开会处理。"但他不同意给黄志勇戴高帽子、挂牌子。

经过协商，许光达和工程兵学院的学员达成协议：当晚在装甲兵礼堂开大会，由工程兵学院的代表发言，许光达和装甲兵领导都到会参加。

晚上，批判大会开始后，工程兵学院的学员代表刚发完言，突然从主席台的两侧走出几名学员，拿出纸糊的高帽子要给受批判的黄政委戴上。许光达见情况有变，当即起身制止。这些学员用力推开许光达，并高声斥责。

许光达又气又恼，大声说到："你们不守信用，你们还是军人呢，这么无组织无纪律！要戴高帽子，那就先给我戴上好了！"边说边上前去抢高帽子。激动的情绪，无法抑制的愤怒，使他的心脏病突然发作，倒在了主席台上。

全场哗然。台上的人忙着抢救许光达，台下的人闹闹嚷嚷。许光达被送到了解放军总医院，经过医务人员的紧张抢救，他慢慢恢复了知觉。

但是学员们并没有就此罢手，他们要在许光达病房的门上贴一副对联：

小将造反有理

老将理应支持

横批是：

造反有理

此举被医院护士拒绝。于是，学员们来到许光达的家，将对联贴在了他家的大门上。

11 月 29 日下午，按照总政副主任、军委文革小组组长刘志坚的安排，周恩来在叶剑英、陈毅的陪同下再次来到工人体育场接见军事院校学员。

这天,正赶上寒流来袭,天气很冷。而大会会场的气氛比上次大会更为紧张。一些对上次大会叶剑英、陈毅讲话有意见的学员，决定利用这次大会进行“反击”。他们在会场贴满了大标语，指责陈毅、叶剑英 11 月 13 日的讲话有“严重错误”，必须“彻底批判”。

周恩来同上次一样，绕场一周，接见完军事院校的学员后，就告辞了。叶剑英、陈毅、肖华和刘志坚登上主席台，宣布开会。会议仍然由肖华主持，仍然是陈毅率先讲话，他说：

“我 11 月 13 日的讲话，有些同志反映很坏，说我泼了一盆冷水，

要揪出来批判。”“有些人不讲心里的，光听好听的话，什么最光荣的，最正确的，最伟大，光荣又光荣，伟大又伟大，这不行，这是不老实的态度，我们应该说老实话，……我那天讲话也是有意识地得罪一些人。光讲伟大伟大，很好很好，对大家没有帮助，说明陈老总这个人不老实，看着同志们犯错误不帮助，这没好处。”

陈毅接着说：“林副主席几年来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军事院校是有一定基础的，地方院校差一些。地方解决地方的问题，不能把他们的一套搬到军事院校来，也不能把军事院校的一套搬到地方上去，可以交流经验，但是不能抄袭。把大专院校的做法搬到工厂是危险的。学校可以放假闹革命，工厂怎么能放假呢？一放假国民经济就瘫痪了，那怎么行呢？军事工厂能这样闹革命吗？有些军事院校要到工厂、农村去串联，他们不懂得厉害。他们要去农村串联，如果农村停止生产，一年歉收，整个国民生活就成问题了。工厂、农村也搞文化大革命，他们有他们的搞法，地方院校有地方院校的搞法，军事院校有军事院校的搞法。这个问题讲多了容易引起误会：陈老总又是那一套，又是定调子、划框框，束手束脚，东也不能动，西也不能动。误会是可以的，但我还是这样讲，我还是要解释，我讲的是有道理的。要承认有大框框，毛主席的伟大思想，你要承认这个大框框的，离开这个大框框搞无政府主义，那还行啊！还有一个大框框，不能离开地球，人造卫星上天了，还要回来的，不回来上哪去啊！我们要相信伟大的毛泽东思想，遵照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办事和框框是两回事。

别的我不敢讲，我没调查。我管外交部，大家出了十几万张大字报，很有意思。‘滔天罪行’呀，‘刽子手’呀，‘罪魁祸首’呀，‘没有好下场’呀，‘挑动群众斗群众’呀，‘一切严重后果你要负责’呀，‘限四十八小时答复’呀，看起来很厉害，其实并没有打中要害。”

“现在这个斗争，有人担心，我也担心，我也不是怕，反正天塌不下来，我们有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的领导。我担心的是，现在不去斗争黑帮，不去斗真正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是揪住一些同志来斗，每个部斗部长,每个单位斗单位首长，讲错一句话，做错一件事，都要斗。黑帮分子很舒服，没人去斗他，真正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坐山观虎斗。我很担心这样子文化革命就搞不好，就不能搞到底。”

“一讲黑帮，都是黑帮；一讲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都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一讲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都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打击面太大太宽。当年，我就犯了这个错误。同志们，所有军事院校的负责人都是黑帮，所有的都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所有的都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都要负同等责任，请同志们想一想，你把毛主席放在什么地方？把林副主席放在什么地方？把共产党放在什么地方？这就等于否认了毛主席是我们伟大的领袖，否认了林副主席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否认了中国共产党是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否认了伟大的人民解放军。

我去过一些学校，见过一些人，谈过一些话，你们那个搞法我不赞成，就是简单化了，扩大化了，没有打中要害，没有打到真正敌人，那种搞法本身很危险。我说，你这么搞法，我交班也不交给你。这么

年轻，大学还没有毕业，就这么凶，就这么搞法，你要掌了权，还不害死人呀！这样讲，听起来不舒服，我这个人讲话有点刺耳，有人不爱听，那怎么办呢？我讲的是真话，是老实话。是不是你这个陈老总讲话是个大阴谋，不让我们讲话，封我们的嘴？你们不要这样误会，你们的嘴我封不住，你们要写大字报，我制不住但是讲这样一个问题有好处。”

“我讲这话可能有错，可能有片面性，欢迎大家批评。可能批判我，我要出席批判会，可以，只要我有时间。但是，是你把我批倒，还是我把你批倒，还很难说。

有的人提出，既然形势这么好，搞文化大革命有没有必要？搞得影响生产，那么没秩序，学生不好管了，许多人伤了感情，多数派和少数派吵架，相见仇视。对文化大革命采取否定的观点是不对的，要严厉批评。在这种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各种大字报贴出来了，各种言论出来了，各种思潮出来了，确实有些方面有些不好，但是也说明 1965 年 5 月以前和今年 5 月以前的那种平静局面是不可靠的。现在问题真正暴露出来了，灵魂深处的东西暴露出来了。通过这个‘乱’，达到真正的治。我们就更加巩固，更加强大了。过去不牢靠，今天经过斗争，就真正牢靠了。只有毛主席才能下这个决心，敢于放假闹革命，敢于成立红卫兵，敢于接见一千一百多万红卫兵和革命师生，敢于让革命群众在中南海附近贴大字报，敢于让各种思潮上街，中南海北门、西门、王府井、天安门贴的大字报最多。只有毛主席才有这样伟大的气量，敢于搞这个文化大革命。”

陈毅一讲起来，又一发而不可收拾。最后，他看到肖华不住地给他使眼色，这才摆摆手说："今天的讲话，希望大家参考，可以斗批改。我这个人经常犯错误经常纠正。错了的，希望大家勇敢地批评。"他就此结束了自己的讲话，

徐向前因几天睡眠不好,身体不舒服,没准备讲话,只是硬挺着到会,坐下不一会儿偏头痛发作,没等会开完就提前退场了。

接着，刘志坚讲话，他说："叶剑英、徐向前同志身体不好，所以我在这里按他们拟的稿子讲。

我代表军委向大家问好，致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战斗敬礼！

这次第三次接见外地来京师生，陈毅同志作了重要指示，上次讲话，多数同志拥护。今天到会的主要是各军区同志，怀着对毛主席的热爱，来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中心北京，来到毛主席的身边。

……

最近中央国务院已经发出通知，从 11 月 21 日到明年春暖，各大专院校、中学红卫兵一律停止乘车来北京串联。因此希望我们军队院校的革命师生抓紧这段时间进行本单位的斗批改。"

在刘志坚讲话时,肖华和叶剑英耳语了几句。当刘志坚讲完时，肖华宣布"请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同志讲话"。

叶剑英站了起来，没有马上讲话，就那样看着会场，足足有 5 分钟，然后，他才开口说：

"我本来不准备讲话的,肖华同志叫我讲一讲。大家冷得要死,我也很冷,下边递了很多条子,我简单地说一说。话头一次讲了，今天

没有多少东西，也要找点东西讲讲，也没有什么讲的。刚才有位成都军区战斗歌舞团的，通过很大的奋斗才交出这封信，把心里的话都讲出来了。你们的信我看了，成都军区的领导人围攻你们，压制你们，你们十六个人来京告状，你们这种造反精神我们坚决支持你们。”

全场热烈鼓掌。

接着，叶剑英指着场地上的标语说：“同学们，我们又收到场地上的条子，见到场面上的标语，中心是要见毛主席，其中一两张条子是关于陈毅副主席和我的问题。”

他接着念条子道，“‘陈毅、叶剑英副主席讲话是严重违背毛泽东思想，违背十六条。——七医大红色造反团’、‘要批判军队院校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首先批判陈毅、叶剑英讲话’、‘陈毅、叶剑英副主席的讲话是我军院校文化大革命的新阻力’，四医大红色造反纵队。另外，四医大、七医大提出了双十条，这二十条都是为李基才提出的问题，中间还有一条是说；‘军委统帅是毛主席，副统帅是林副主席，你说代表军委全体，你有什么权利代表毛主席，代表林副主席处理这件事？！兽医大造反团’还有一张条子：‘敬爱的叶剑英副主席……’又敬又爱，谢谢你们了，要求我接见红色造反团，可以。我也很想见你们，只要有时间。希望为李基才恢复名誉，但是没提出恢复名誉的方法，是登《人民日报》呢？还是登《解放军报》呢？主要就这三条。这些问题要我认真答复，我把这些问题提出来，让大家思考。”

叶剑英说："同志们，你们提的这些问题，要认真地答复，需要很长的时间，让我们认真地思虑吧！

'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我们如果有缺点，就不怕别人批评指出。不管是什么人，谁向我们指出都行。只要你说得对，我们就改正。你说的办法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照你的办。'这是谁说的？"

众答："这是毛主席的教导！"

叶剑英接着问："'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这是谁说的？"

众答："也是毛主席的教导！"

叶剑英说："同志们，我们军队院校和地方有些不同，现在你们已经是炮兵、工兵、装甲兵、步兵，将来都是军队干部。你们要好好地学习，不好的我们就要洗刷！""我们不允许军队院校学生在我军院校文化大革命中违反毛泽东思想，违反了军队的革命传统，违反了几十年为全国人民的优良表率。放任你们，我们这些人就失职了。不忠于党、不忠于人民、不忠于毛主席。"

"我把我自己的意见讲一讲,也许明天又来大字报了,来大字报也不怕,我还要讲一讲。""我们军事院校的同志们绝大部分是革命的，战斗的，可是，的的确确也有小部分人败坏了我军的光荣传统。学雷锋，少数人坐火车关上窗户，不让红卫兵进车厢。红卫兵把车窗打烂了，进来说：'你们这样的解放军我们不学！'这不是批评你们几个人的问题，这是关系到整个解放军的名誉，被他们这一小撮老鼠

败坏了！还有的人跑到上海，要住大房子，吃好的，要小汽车，完完全全忘记了红军艰苦朴素的好传统。还有的到北京来，讲轻一点是一小撮不明事理的同学向国防部，向毛主席居住的地方猛冲猛打，天天说热爱毛主席，军委主席是毛主席，副主席是林副主席，国防部长是林副主席。象你们这些人如果我们不把你们当成一个反面教员来教育广大同志，我们就不算一个共产党员，就不是一个解放军的干部。同志们，你们这一小撮人不要以为这是斗争群众，这不是引起群众斗群众，你们这一小撮人再不改，就会成为废品，就是不能用的，是要处理的，是要被清洗的。我们做工作的就是要把你们的错误指出来。再也没有比冲最高统帅部、冲进国防部大冲大打，冲中南海更大的错误的了！严格讲起来，这就是反革命！同学们说是不是？”

在场的几万人同时高呼口号：“誓死保卫毛主席！”

叶剑英又说：“我讲这些话的声音又大了，大家又要说我在发脾气。有人这样干，我怎么能不大声讲呢！陕西有个 50 多岁的复员军人，他既不是学生，又不是教员，可是他在幕后操纵指挥，我们一定要把这一小撮别有用心的人揪出来。在这一小撮人当中，有的父亲是黑帮，已经自杀了，有的人全家都在台湾。像这种情况，我们怎么能不管呢？如果不管，就不是共产党员，就不是党的干部。”

“同志们，我解释一下，我声音大，喉咙大，道理就在这里，我同一小撮同学前世无冤，后世无仇，不认得你们张三、李四，就是看你们的行动讲的，如果不改要洗刷。……”

最后，他说：“时间不多，本来不准备讲话，肖华同志叫我再讲话，我讲的是不好的话，你要我向李基才道歉，听说有人讲他好，有人讲他不好，我也不知道你这个人好，你这个人坏，你要我广播，我为什么不好广播，这是小事情，广播并不是打成反革命。这个会也不是偷偷开的。这么多同学，你问，我解答嘛！条子只有一张，现在看代表一大撮，那时我不知道，只有李基才一个人。事实还在这里。什么孤立了？当然只有你一个提出的，不要小资产阶级爱面子，讲了你也不舒服。

“希望同学们能很快回去，陆陆续续回去，主要任务是搞自己本单位的斗批改。不要横冲直撞到总部，愿同学们回去努力把斗批改任务完成。要把学校办好，提高政治觉悟。成为具有毛泽东思想的干部，为部队服务。”

陈毅、叶剑英的讲话再次遭到一些人的反对。会后，他们到处告状，矛头直指叶剑英和陈毅。“打倒陈毅”、“打倒叶剑英”的大字报贴遍了东、西长安街。

钓鱼台,江青也指责刘志坚说：“军队这些接见,是镇压群众!”关锋点名批评陈、叶的讲话是错误的,要到群众中去检讨,接受群众教育。北京街头小报登了这样一条消息：“王力说：‘这次不打倒四个老帅,就准备上断头台。’”造反派学生准备在工人体育场再开一个10万人大会,批斗叶剑英和陈毅。

刘志坚把那些指责叶剑英和陈毅的信件转给叶剑英，并建议说：“你是否抽点时间见一见兽医大红色造反团的代表，平息一下这件事

情，否则他们还要继续闹。已经闹到江青和陈伯达那里了，江青质问我：‘是谁把这些老帅们推到第一线去了？这不是典型的要让老帅们去扑灭运动的烈火吗？军委文革小组到底安得是什么心？’所以，我看你还是去接见他们一下子吧！”

叶剑英想了想，回答说：“那就见一见吧，时间就定在 12 月 2 日吧。”

## 第 312 回：提要求，党报代发学生报
## 遭拒绝，《解放日报》被停发

我们再看上海。

11 月 24 日，就在上海市委常委扩大会讨论安亭事件的当天，上海“工人赤卫队”总部在延安西路的市少年宫与上海市委联系，要求参加处理安亭事件的市委领导张春桥、曹荻秋以及韩哲一接见。张春桥因为要回北京，不能参加。曹荻秋于 11 月 25 日上午，叫上市委组织部长杨士法，前往位于武宁路的上海沪西工人文化宫，如约会见“工人赤卫队”筹委会代表。

会上，大家向曹荻秋提了 30 多个问题，都是针对张春桥签字的“双五条”，指责张春桥对安亭事件的处理是错误的，要求市委收回批发“双五条”的市委 116 号文件。曹荻秋对成立上海“工人赤卫队总部”表示支持，他说：

“上海‘工人赤卫队总部’成立，我看，你们要成立这个组织，我们也是支持的，你们要成立，我们不反对。”

曹荻秋还建议，在“总部”后加上一个“筹”字，“因为搞筹备委员会比较主动，如果中央一些决定下来，就是说不建立这些组织，那我还是个筹委会，可以马上主动退却。”大家都赞同。

曹荻秋说：“你们建立了这样的组织，要什么袖章啊，只要你们成立了这样的组织，我们承认，支持了你们，当然

可以发袖章!”“到那个时候，你们建立时，市委一定派负责同志参加你们的会。所以你们建立这个组织我们完全表示支持的态度。”

杨士法对安亭事件直言不讳地表示了反对态度，还说“两个五条是有问题的，由于我的职务关系，不能再讲下去了，我只能讲到这里为止。”最后，杨士法对大家说：“你们应该这样!”他边说边举起了握紧拳头的双手，“这样，才会有力量，一定要组织起来啊!”

杨士法又建议：“你们是工人阶级，办公地点还是放在市总工会好。让总工会给你们找房子。这个问题，由市总工会张祺同志负责。”

这时，“红革会”打听到曹荻秋在沪西工人文化宫，便赶来要将他“借去”参加“红革会”与“首都三司驻沪联络站”下午在上海文化广场联合召开的“彻底埋葬以曹荻秋为代表的上海市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临走前，曹荻秋对“赤卫队”筹委会的代表说：“你们有事可找杨士法联系。”

会后，上海“工人赤卫队总部(筹)”负责人在市委机关工作人员陪同下，到愚园路邮电支局，以上海“工人赤卫队总部(筹)”的名义，向中央文革小组陈伯达和江青发了一份加急电报，要求上海市委立即宣布张春桥与“工总司”签订的“双五条”无效，要求开动除广播台，报刊以外的一切宣传工具，肃清上海市委刚签发的关于“双五条”的 116 号文

件后果，要求责令张春桥、韩哲一、曹荻秋立即向上海群众作公开检查。

11 月 25 日，“新北大驻沪联络站”代表李醒尘按照聂元梓指示来到《解放日报》，和这里的造反派串联。报社的关震民等造反派向李醒尘提供了“安亭事件”发生后，《解放日报》采访部主任徐学明等人写的题为《不能拿原则作交易》的大字报。这张大字报不指名批评张春桥等人。李醒尘认为这就是“炮打中央文革”，他要关震民等人再查查《解放日报》有否发表过贯彻“二月提纲”的宣传报道材料。

这天下午，上海文化广场人山人海，上海“红革会”与“首都三司驻沪联络站”联合召开“彻底埋葬以曹荻秋为代表的上海市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大会不但请了聂元梓，还请了刚到上海的清华大学“井冈山”红卫兵司令蒯大富。他们俩人都在会上发了言。

聂元梓说：“上海乱了几次，但是还没有真正乱起来。这一次我到上海来，就是要上海大乱。乱，就是革命。乱而后治。不乱，就无法革命。现在，上海正在乱起来。这乱，乱得好。要继续乱下去，大乱特乱。要乱掉上海市委的阵脚，要乱出个红彤彤的新上海！”

聂元梓在说了这番话后，指着会场上的曹荻秋说：“上海市委是什么东西？上海市委跟以彭真为首的北京市委是一路货，都是反革命的！上海市委执行了一条不折不扣的资

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彻底打倒上海市委，打倒曹荻秋……”

会后，“红革会”的红卫兵将曹荻秋揪到会议室，向他提出三项要求：

（1）第九期《红卫战报》要办成特大号；

（2）第九期《红卫战报》扩大发行量，要印80万份；

（3）第九期《红卫战报》要同中共上海市委机关报《解放日报》一起发行到订户手中。

《红卫战报》是“红革会”于10月17日创刊主办的，上海最早的铅印四开四版造反派红卫兵小报，由上海市委指示交《文汇报》代印。

由于曹荻秋的“一时疏忽”，同意将“上三司”主办的、11月24日出版的、由《解放日报》代印的《革命造反报》特刊，于11月25日夹在《解放日报》一起发行。这件事已经引起读者和各方面的指责，此时的曹荻秋，说什么也不敢再开这个口子，他没有答应“红革会”提出的将《红卫战报》与《解放日报》一起发行的要求。

就在上海“红革会”与“首都三司驻沪联络站”联合召开“彻底埋葬以曹荻秋为代表的上海市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的同时，也是11月25日下午，一支近2000人的游行队伍走出上海国棉17厂的大门，浩浩荡荡上街，从杨树浦朝着市区进发。他们肩扛着巨大的大字横幅：

“火烧张春桥！”

“取消双五条！”

“双五条”就是指张春桥在上海和苏州两次签署的“五条”。

那面“捍卫毛泽东思想赤卫队”的红色大旗在游行队伍前面开路，一路呼喊着：

“张春桥滚出来！”

“火烧张春桥！”

“抗议张春桥出卖上海工人阶级利益！”

“双五条是大毒草！”

“抗议张春桥在上海执行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等口号，惊动了沿途的成千上万的市民。

国棉 17 厂“捍卫毛泽东思想工人赤卫队”的头头叫马骥，与王洪文同在保卫科工作，比王洪文大两岁。王洪文任二纺车间治安保卫主任时，已经是厂保卫科干部的马骥负责联系二纺车间的保卫工作，和王洪文很熟。后来王洪文调到保卫科，两人关系就更密切了。

王洪文写第一张大字报时，马骥正好出差去青岛，没有参加签名。但是他同意王洪文大字报上的意见。所以他出差回来后，自己一个人又写了一张大字报，质问党委副书记张鹤鸣几个为什么。随后，他也和王洪文一起写过大字报，还和王洪文连夜去上海市纺织工业局，告厂党委副书记张鹤鸣的状。

工作队进厂后，马骥与王洪文有了分歧。王洪文对工作队有意见，马骥认为应该支持工作队。几乎是与国棉 17 厂“永忠队”成立的同时，10 月 24 日，马骥也成立了“捍卫毛泽东思想工人赤卫队”，简称“捍卫队”。“永忠队”抢工作队的材料，“捍卫队”就掩护工作队。为此，王洪文写了马骥很多大字报，批判他是保皇派。马骥也写王洪文大字报，其中最有影响的是《我们厂里的造反派》，这张大字报写道：

我们厂里有一些造反的勇士们。他们打着“造反有理”的旗号，实际上常常干出无理的事情。

他们口头上忠于毛泽东思想，而行动上就是违反《十六条》，违反毛泽东思想。

他们口头上要打倒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实际上千方百计，取消党的领导。

他们对待不同观点的同志，动辄勒令，通令，杀气腾腾，对广大革命群众实行训政，把群众当阿斗，说老工人是“老糊涂”，“保皇派”，“狗崽子”，把自己当诸葛亮。

他们对揭发他们错误缺点的同志，进行逼供信，说这是革命行动。

他们霸占广播站，只许他们讲话，不许别人发言，把广播站变成他们的一言堂，这也算革命行动。

他们存心拆工作队台脚，今天勒令这个回去，明天勒令那个回去，不同意时，竟然以罢工相威胁。

安亭事件发生后，马骥不解：“怎么拦截火车破坏生产倒成了革命行动？我们反对”，“我们不能不采取行动了！”于是，11 月 25 日下午，在国棉 17 厂俱乐部召开了“捍卫毛泽东思想工人赤卫队”成立大会。大会结束后，马骥提出举行示威游行。此时是下午 14 时，正好是早班工人下班时间，许多下了班的工人加入游行队伍。数千名工人排成浩浩荡荡的队伍，从国棉 17 厂门口举着标语喊着口号出发了，最后来到外滩的市人委办公大楼门前，要求曹荻秋接见。

曹荻秋没有出来。接待他们的市委干部要游行者到友谊电影院去。

国棉 17 厂“捍卫队”游行的消息很快传到“赤卫队（筹）”总部，总部委员潘月法赶到友谊电影院，代表“赤卫队（筹）”总部向国棉 17 厂“捍卫队”表示支持。

马骥带领国棉 17 厂“赤卫队”在友谊电影院等了整整 3 天。上海市委候补书记王少庸来到电影院，同意他们派 15 名代表去北京。11 月 28 日，由潘月法带领，马骥和 40 名工人组成的赴京控告团出发。上海市委提供了赴京的火车票。临行前，上海市总工会主任张祺叮嘱他们，到北京后可以通过上海驻京办事处的工作人员，找到正在北京参加全国工交企业座谈会的上海市委书记马天水。

但是，正在北京开会的马天水没有与他们见面。这些工人们上告无门，只得找到全国总工会，要求全总将他们的控

告转交党中央和国务院，怏怏而归。

同样是在上海“红革会”与“首都三司驻沪联络站”联合召开“彻底埋葬以曹荻秋为代表的上海市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的同时，11 月 25 日下午，徐家汇的徐汇剧场，上海“捍卫毛泽东思想工人纠察队”成立大会也在召开。这个组织得名于 1927 年共产党领导的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时的“工人纠察队”，由市内 82 家工厂的群众组织串联而成，参加成立大会的工人代表近千人。上海市委仍派组织部长杨士法出席大会。

杨士法坐在主席台上听着大会发言，觉得这个组织的宗旨和他上午参加的上海“工人赤卫队总部(筹)”很像，就对坐在身边的人说：

“上海已经有个工人群众组织，与张春桥开展过大辩论，组织过几千人抗议张春桥的游行，还给党中央发电报控告张春桥。”

大家听了很兴奋，马上打听详细情况。杨士法说：“他们的观点跟你们差不多，成员以党团员，老工人，劳动模范为主，你们可与他们联系。”

与会者马上讨论，决定派出 10 名代表，第二天就与“工人赤卫队总部(筹)”联系。

11 月 26 日，刚刚成立一天的上海“捍卫毛泽东思想工人纠察队”10 位代表赶到上海市总工会，找到刚搬到这里办

公的上海“工人赤卫队总部(筹)”。双方交谈后，意见一致，当场决定合并。上海铁路分局“二·七战斗队”也加入。于是就在总工会大楼成立了“捍卫毛泽东思想工人赤卫队上海总部”筹委会，简称“赤卫队(筹)”。在联合会议上，三个组织各报出身和职务，商定科长以上职务不能担任总部领导。于是确定了赤卫队总部 16 名委员。推选负责人时，大家认为上海铁路分局“二·七战斗队”成立早，影响大，拟邀请陈阿春当负责人。陈阿春说自己是分局长办公室的秘书，如果当头头，会被抓把柄，他推荐了上海铁路分局调度所副主任王玉玺。王玉玺就这样被推为“赤卫队总部”负责人。

在上海市总工会工作人员徐力的提议下，“赤卫队总部”还聘请了 7 名上海著名劳动模范和先进人物当顾问。他们是：沪光科学仪器厂工人工程师王林鹤、三轮车工人程德旺、复旦大学电光源实验室工人工程师蔡祖泉、闸北区果品公司经理劳动模范周信礼、参加过北伐战争期间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的老工人孙长胜、上海耐酸搪瓷厂技术员劳动模范孟德和、著名共产党烈士李白的夫人裘慧英。列入名单没有请到的有国棉一厂纺织工人杨富珍，她正在日本访问；还有海运客轮服务员杨怀远，他所在的轮船出海了。

上海“赤卫队(筹)”刚成立，全市各工厂就闻风而动，滚雪球般迅速建立了各厂的“赤卫队”，短短几天，便达到

20 多万人，以工人中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先进生产者为骨干力量，一树起旗子就得到大多数干部支持。不少工厂的工会将办公室腾出作为赤卫队的办公室；有的干部在幕后出谋划策，有的干部在台前调度指挥，他们都难以抑制自己的感情倾向。“赤卫队”一时在各个工厂占据了绝对优势。

再说曹荻秋不同意“红革会”提出的将《红卫战报》与《解放日报》一起发行的要求，“红革会”小将岂肯就此罢休？11月27日，他们来到《解放日报》社，要求将即将于11月28日出版的第九期《红卫战报》与《解放日报》一起发行。报社值班人员对学生们说：“报纸发行归发行处管，你们找错地方了。”

报刊发行处在邮电大楼。于是，学生们又来到邮电大楼报刊发行处。报刊发行处的负责人面对这群充满“造反精神”的年轻人，赶忙推托说：“这事我做不了主，要向上海市委和《解放日报》请示后才能定下来。”

于是，11月28日，“红革会”的学生们冲向市委。因为第九期《红卫战报》在这天要出版特刊。经过斗争，他们也首次争取到对开四版、套红印刷，也有毛泽东、林彪大幅照片，有聂元梓照片，而且还增加了蒯大富照片及横跨整个版面的会场照片，印数65万份。在头版，他们以醒目的大字标题刊登了一篇《解放日报是上海市委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忠实工具》的文章。这份报纸还登了两篇大字报，一是《如

此党报》，一是《解放日报的资反路线必须彻底批判》，内容讲过去《解放日报》发表过《海瑞上疏》等文章，把矛头对准毛主席，以及《解放日报》在“文革”中保市委、整群众等等。

这两张大字报是《解放日报》的一位姓关的体育记者写的。当时，此人已50多岁，原在山东济南一家国民党小报做编辑，官至少校。解放济南时，他曾写过一篇社论《保卫济南》，解放后被遣返到上海。后来考入《解放日报》。他背着历史的包袱，平时从不抛头露面，处事小心谨慎。文革开始后，《文汇报》造反派头头也是体育记者，两人很熟，一拍即合，关记者先在报社贴出这两张大字报，成了《解放日报》第一个起来造反的人。

虽然“红革会”学生冲向了市委，但是，上海市委依然没有同意“红革会”提出的将《红卫战报》与《解放日报》同时发行的要求。

第二天，11月29日清晨，上海“红革会”的学生们再次前往《解放日报》社，要求将已经印好的第九期《红卫战报》与《解放日报》一起发行，他们提出的理由是：《解放日报》放毒到哪里，第九期《红卫战报》就消毒到那里，“红革会”要达到的目的是“彻底肃清《解放日报》在群众中所施放的流毒！”并明确提到：“有此前例”，即“上三司”主办的、11月24日出版的、由《解放日报》代印的《革命造反报》特

刊，于11月25日夹在《解放日报》一起发行一事。

《解放日报》社无法，只好向上海市委请示。上海市委再次拒绝了“红革会”的这一要求，理由是：《解放日报》是党报，是市委机关报，而《红卫战报》只是学生群众组织的报纸，两者岂能相提并论？因此绝对不能让《红卫战报》与《解放日报》一起发行！市委承认：《革命造反报》与《解放日报》一起发行是“市委没有认真听取邮电局职工和《解放日报》广大读者的意见，贸然同意”的，“这种不合理的做法，受到各方面的强烈反对”，“市委主要领导人当场做了检讨”，“邮电部门还就这件事做了检查”。所以，不能再同意《红卫战报》与《解放日报》一起发行了。

当日黄昏，“红革会”的学生又来到《解放日报》，向报社党委提出了 3 项要求：

一、《红卫战报》第九期夹在 11 月 30 日的《解放日报》里一起发行；

二、《解放日报》必须马上全文转载《红卫战报》上的《＜解放日报＞是上海市委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忠实工具》一文；

三、把上海市委有关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问题，以及上海市委对报社的指示告诉“红革会”。

此时，报社党委书记马达不在，只有一个前不久刚提拔为副总编辑的党委委员王树人值班。王树人为人温和，言语

不多，他和报社接待室的负责人张伏年一起在汉口路 309 号报社大楼底层接待室接待了这几位学生。王树人告诉他们：马达书记联系不上，关于红卫兵提出的发行《红卫战报》一事，解放后早在 50 年代中央就决定“邮发合一”，报刊的发行工作由邮局管，《解放日报》只管编报，没有发行权。他说：“你们要批判《解放日报》的‘资反路线’，我们欢迎；《红卫战报》要与《解放日报》同时发行，我们也没有意见，怎么发行都可以，但发行归邮局管，关于发行问题，你们要去找邮局商量。”

王树人又把邮局发行处蒋处长请过来与学生们一起商谈。

## 第 313 回：封党报？数万人围攻报社

## 急火冲，韩哲一晕倒现场

11月29日晚22时，还有300多名“红革会”学生在邮电大楼报刊发行处，同样是在进行着一场软顶硬磨的较量：

“你们为什么不把《红卫战报》和《解放日报》同时发行？”

“没有这样的先例。”

“文化大革命本身就是史无前例的！”

“《解放日报》是党报。”

“《解放日报》是毒草丛生、群魔乱舞的黑报！大毒草《南包公海瑞》、《魏征与李世民》就是《解放日报》登的！《解放日报》还是上海市委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工具！”

“对不起，关于《解放日报》的问题，请你们向《解放日报》提出。这儿是报刊发行处，只管发行。”

……

这场辩论陷入了循环不已的圆圈！

报刊发行处的负责人似乎精通“太极拳”。尽管红卫兵们怒发冲冠，可是他们始终笑脸相迎，与之进行“循环辩论”，简直哭笑不得。

他们居然还找出了一大堆有趣的理由：

“哦，《红卫战报》和《解放日报》一起发行，邮递员的邮包装不下！”

“对啦，两种报纸一起发行，自行车的轮胎也吃不消！”

邮局发行处蒋处长来到《解放日报》社后，听到学生提出的要在《解放日报》中夹送《红卫战报》，他没有再说同时发行不可以，而是强调一个“夹”字，说如果要将《红卫战报》和《解放日报》“夹”在一起发行，几十万份报纸，要一份份打开来，再一份份把另一张报纸“夹”进去，需要有很多人力和时间，而这时已是深夜，人也找不到，要“夹”在一起发行，确实难以办到。

“红革会”的代表依然坚持他们的要求，谈判就这样推磨式的进行着，一直持续到半夜子时，仍然没有进展和结果。“红革会”代表中有两个红卫兵不断走到别的办公室，用电话将谈判情况不间断的向“红革会”总部汇报。

零点敲过，“红革会”代表的态度突然强硬起来，嗓门也大起来。他们说：“你们报社党委必须尽快答应红卫兵的合理要求，否则，我们的忍耐已经到限度了，我们将要采取革命行动与措施，使你们 30 日的《解放日报》也不能发行。”

王树人说：“夹在一起发，邮局确有困难，你们说如果不‘夹’在一起发，《解放日报》也不能发行，这就不对了。这不是像姓张和姓李的吵架，却关了我姓王的门吗？”

话虽这么说，但在那个时代，只要不是反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这群红卫兵学生什么事情做不出来？王树人等人听了“红革会”代表的最后一句话，还是感到了压力。上海

《解放日报》自 1949 年 5 月创刊以来，没有一天停止出版或发行过。如果有一天人为地中止出版或发行，就肯定是一个严重的政治事件。这样的事件一旦发生，责任由谁来负呢?他们一面继续与红卫兵谈判代表周旋，一边派人溜到有直线和红机(保密机)的房间，与马达联系。

马达感到了事态的严重，他立即跑到华东局，找到正在值班的上海市委书记王一平商量：是否向中央文革反映一下。

王一平立即给中央文革顾问陶铸打电话汇报，陶铸在电话中说：

“告诉红卫兵，冲击无产阶级专政工具的报纸是不对的，要说服他们立即撤离报社，有问题可以协商。”

同时，陶铸作了四条指示：

一、群众组织的报纸和党报是两种不同性质的报纸．不能夹在一起发行；

二、如果红卫兵冲击，要说明，这是个原则问题，要顶住，要坚持原则；

三、可以分开发行；

四、造反派的文章，要按中央《十六条》的规定，不能在报上乱点名。

30 日凌晨，马达急匆匆赶回报社，想把陶铸的指示告诉大家。可是，还未等他开口传达，就听到报社的造反派已在

传达南京传来的电话，说江苏的《新华日报》社被红卫兵封了，毛主席说：“新华日报被封门了，有什么了不起。”还传达江青的话：“报纸搞资反路线，就是要冲，要封！”

凌晨 1 时 30 分，一队臂戴“红革会红卫兵”袖章的学生约 50 余人，由市“红革会”常委、上海师范学院中文系学生李功佐带队，排着整齐行列，由汉口路 274 号报社大门进入报社，然后，立即在报社的门上以“红革会”的名义贴出一张大标语：“勒令《解放日报》停止发行！”同时把印报车间大门、沿马路的发报间门洞、供卡车进出的弄堂的大门，统统都封锁起来。

清晨 4 时许，报社大门东发报间有一辆绿色邮车，在等待后知道无法装成捆报纸了，无奈地开走了。5 分钟后，又开来另一辆邮车，同样被红卫兵告知：“今天有特殊情况，不能发报。”也开走了。

上午 9 时，报社日班职工 600 多人上班到齐，纷纷相告昨夜今晨报社内发生的事变。有的惊讶，有的漠然，有的气愤，有的深思，有更多的人拿起电话，把消息传给社外的亲朋好友，或有关方面。报社内的“红革会”也不断同总部、外界联系，《解放日报》被封的消息很快就传遍了全上海的党政机关、新闻单位和各群众组织。

“竟敢封《解放日报》？”一般群众很反感。

报社周围马路上围观的人越聚越多，将《解放日报》社

周围的汉口路、河南中路和山东中路拥挤得水泄不通。经过这地段的公共汽车被完全阻断，就连普通过路的群众也无法通行。

报社门外不时有游行队伍经过，他们举着横幅，拿着小纸旗，都写着“我们要看解放日报!”

报社铁栏杆大门紧闭，门内外的人隔栏辩论，不时有东西飞进飞出。报社大楼阳台上也装了多个高音喇叭，大声播放着革命歌曲和口号。还有红卫兵在阳台上撒下《红卫战报》。报纸飞到哪里，哪里就有一片伸出的手，抓到报，撕碎，扔向空中，引发一阵叫好声。

“工总司”宣传部的人来了。因为 11 月 26 日“赤卫队(筹)”成立后，队伍迅速扩大，仅仅是做袖章的红布，便用去了 1000 匹。由于他们拥有上海市委提供的印刷厂，很快，上海街头，“赤卫队”的铅印传单满天飞：

《安亭事件真相!》

《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的一张王牌》

《一个造反队员的控诉》

……

为了对付“赤卫队”铺天盖地的像雪片一样飞舞的传单，上海“工总司”不甘落后，决定筹办《工人造反报》，但没有印刷条件。11月30日这天，他们来到解放日报社，是让解放日报社的印刷厂排印《工人造反报》，正好碰上“红革会”

学生在这里停发《解放日报》，“工总司”马上表示坚决支持。学生们得到“工总司”工人的支持，情绪更加高昂。

30 日上午，解放日报社的造反派组织“革命造反联合司令部”中心组召集会议，认为：红卫兵批判上海市委、解放日报社党委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方向是正确的；要求将《红卫战报》第九期与《解放日报》一起发行是合情合理的；工人“赤卫队”包围报社、围攻红卫兵是错误的，是市委挑动群众斗群众；《解放日报》社“革命造反联合司令部”坚决支持红卫兵的革命行动。他们做出了支持红卫兵的决议，将这一决议以《四点声明》的形式，在报社内用大字报公布，又排成铅字、手工印成小传单数百份，在报社内外群众中散发，立即受到“红革会”的热烈欢迎。《四点声明》是：

一、欢迎《红卫战报》揭发《解放日报》的资反路线；

二、要求把《红卫战报》夹在《解放日报》中间发行。

三、对红卫兵小将要看《解放日报》社内部大字报的精神表示敬意；

四、建议《解放日报》党委主动与红卫兵小将协商，使红卫兵更多地了解《解放日报》的文化大革命。

《解放日报》社内的“红革会”红卫兵总共只有不到 200 人，“工总司”进来的工人也不到 20 人。报社外面的人随时可能冲进来，而报社内的“保皇派”也是坚决反对红卫兵进入报社的，他们不断给“红革会”红卫兵出难题，设障碍，

甚至利用报社内工人对付这些红卫兵，特别是想开门迎接外面的人进来。以编辑部干部为主体成立的“红色造反兵团”，和以工厂部为主体的工人成立的“工人赤卫队”，这两个组织以“报社革命职工”的名义发出一个“最最紧急呼吁”，要求：

一、非解放日报社职工立即撤出报社；

二、《红卫战报》发行办法再继续协商；

三、在没有达成一致协议前，《解放日报》可以迟几天发行。

红卫兵没有理睬。

到了30日下午，“红革会”在《解放日报》大楼里正式宣告成立“火线指挥部”。这个“火线指挥部”宣称：

“我们革命的红卫兵不忍看到华东地区的党报如此堕落下去，我们有责任为恢复《解放日报》的革命青春而造反，有责任为使《解放日报》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而斗争。现在主要矛盾已经变化，不仅仅是发行《红卫战报》的问题了。我们现在就是要占领《解放日报》社，彻底批判《解放日报》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直到它回到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为止。”

为了防止对立派的人进入《解放日报》大楼，“红革会”当天晚上印制了《解放日报》社的通行证，在白纸上红字油印刻制：“通行证 市红革火线指挥部”，排成圆型，然后用一

个圆的杯子盖，沾上红油墨印上圆戳，权当圆形印戳，就制成了通行证，发给“红革会”和“工总司”的人。

12 月 1 日上午，《解放日报》社党委发表声明说：“《红卫战报》不是《解放日报》副刊，绝不能与《解放日报》同时发行。”

上海市红卫兵联络站副主任、团市委副书记郑均培等人带着上海市委的意见来到《解放日报》社同“红革会”谈判，由于这些的意见回避了“红革会”的根本要求，未达成协议。

外面的一部分群众，要攻进汉口路 274 号和 286 号的两座《解放日报》社的连体大楼，而大楼里的“火线指挥部”则指挥红卫兵守住大楼。

报社内部当时被称为“保皇派”的骨干人物，多次乘报社内红卫兵不备，向外面的人打手势示意，甚至喊话，要他们攻进报社来。文艺部王编辑，对报社外面围攻的人群喊：“同志们，我是《解放日报》社的，我欢迎你们上来!”红卫兵认为他挑动外面群众进来“群众斗群众”，斗了他半天加一个晚上。还有一个史编辑，拿着手提喇叭在党委办公室窗口向外面的人群喊话，红卫兵说他煽动群众冲击大楼，在夜里开会批斗他。

12 月 1 日下午 13 时，汉口路 286 号报社侧门曾一度被冲破，涌进数十人，朝楼梯上冲。报社里的“红革会”学生好不容易才把冲进来的人推赶出去，将这扇门重新封堵起

来，

“火线指挥部”总结了两天的教训，决定加固门防“工事”。他们把防汛用的器材翻出来，用很厚的木板、顶梁柱，还有沙袋，加固门防。他们还准备用消防龙头去冲进入者。

2 日，有人用卡车上的跳板冲击报社大楼的 274 号门，“红革会”的学生用竹竿从二楼窗口敲打汽车和车上的人，迫使他们中止了攻门行动。

到了下午，几万人高喊着“我们要看《解放日报》！”的口号，拥堵在《解放日报》周围的所有马路，并向《解放日报》发起猛烈冲击。在大街上，一见到佩戴“红革会”袖章的人就与他评理。《红卫战报》一贴出去，就被人撕掉。

上海市民的舆论已达到沸点。上海的第一号报纸——市委机关报，居然几天见不着面了，这是 17 年来闻所未闻的特大新闻!党报怎么样了?上海市党委怎么样了?

“红革会”也曾做出让步：提出不一定像《革命造反报》那样夹在《解放日报》中发，可以作为两份报纸一起发给订户。遭到拒绝。“火线指挥部”认为，报社党委已无权代表任何人谈判了，必须由《解放日报》的主管机关——中共中央华东局和中共上海市委派来代表到报社谈判。

下午，“红革会”的李功佐打电话给“工总司”的潘国平，要求“工人老大哥支持我们的革命行动”。王洪文马上召集“工总司”头头在复兴中路总部开会，大家一致同意支

持“红革会”的革命行动。于是，王洪文让潘国平代表“工总司”去解放日报社。

报社大门已被封锁，潘国平他们只能从汉口路 286 号报社后门上的一个小窗翻爬进去。

“红革会”向潘国平介绍了情况。潘国平说：“不让人家看报总不得人心。”他建议“红革会”撤出报社，撤出去后再与市委谈判。

李功佐感到进退两难，说不能出去，“出去会被外面包围的人给打死的。”最后，他们决定将市委书记找到报社来谈判。

潘国平和李功佐等人设法出了报社，听说市委书记处书记王一平正在长宁区少年宫接见“红革会”的学生。他们赶到长宁区少年宫，找到王一平。

王一平同意和他们一起去报社解决这件事情。结果，他和副市长宋季文也是从报社边门小窗爬进了报社大楼。

此时，潘国平发烧，他准备回家休息。不想刚出报社，就被外面围观的人群认出，围攻了一晚上。

正在报社的北京师范大学教师李卫民，趁夜深，包围报社人群最少的时候偷偷跑出报社，赶到“工总司”总部找到王洪文，再一次要求工人增援。

王洪文让陈阿大、戴立清等人，调集“工总司”各区联络站的造反队员前往《解放日报》。同时，他让国棉 17 厂造

反队派出 300 人去报社，把守住第一道大门。各区联络站的 700 多人先在人民广场集合。然后，一部分人进入报社，一部分人则在报社外举行示威游行，内外呼应，以壮声势。后来，又从静安区调了近 3000 人前往助阵。耿金章的二兵团，也调来几千个造反队员。

到了 12 月 3 日凌晨 3 时，“工总司”黄浦区联络站将被报社外围观群众围攻的潘国平救出。

同时，占领报社的各派组织经商议，决定由“工总司”与“红革会”共同组成火线指挥部，人员有：“工总司”王洪文、耿金章、戴立清，“红革会”李功佐、马立新、劳元一，“炮司”周谷声等。王洪文和劳元一为总指挥。

劳元一和马立新找了张春桥的秘书何秀文，要何秀文打电话给张春桥，希望中央文革表态，但没回音。于是，他们决定派出一个由 4 人组成的赴京控告小组，由马立新带领，随带 1000 份《红卫战报》，向中央文革小组告状。

凌晨 4 时多，“工总司”和“红革会”联合发表了《五点声明》：

1、坚决要求第 9 期《红卫战报》特刊夹在《解放日报》中，同时送到每个订户手中。

2、勒令《解放日报》立即交出文化大革命以来拍摄的反对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黑照片、黑指示、黑材料。（包括反毛泽东思想的社论、报道等底稿）。

3、市委和《解放日报》党委的主要负责人必须就有关问题向上海市革命群众作公开检讨。

4、市委和《解放日报》党委一天不答应我们的革命要求，我们就一天不撤出《解放日报》我们造反的决心是下定了，钢铸铁浇，天崩不动，地裂不摇。在我们的要求未获得圆满解决之前，由于市委压制革命群众的要求，致使《解放日报》出版受到了影响。在《解放日报》受到影响期间，必须把《人民日报》准时发到每个《解放日报》订户手中。

5、市委必须对《解放日报》事件及其产生的一切严重后果负完全责任。本决议自12月3日起生效，限市委和《解放日报》党委在12月4日前作答复。

几个晚上都未曾合眼的曹荻秋十分疲惫。中央已经请示过了，陶铸的态度十分明确，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还不能有效地控制局势，将这次事件平息下去，责任就完全在市委头上了。想到这里，他感到不安，感到从未有过的压力。他几次想到现场去，都被办公室的工作人员给拦住了。

曹荻秋只好给华东局韩哲一打电话，韩哲一决定亲自到现场去，以防事态进一步恶化。接着，曹荻秋又给报社方面打电话，让他们准备一些面包之类吃的东西给报社里的红卫兵。

因为这时，除了“工总司”的人前来报社增援外，还有“首都三司”、清华“井冈山”、“红三司”、同济“东方

红”、交大“反到底”等京沪红卫兵造反组织的几百人，冲破“赤卫队”的封锁线，进入报社。报社内的红卫兵和工人造反队员总数激增至1000余人，超过了《解放日报》社全体职工的数量。报社大楼内的办公室已变成熙熙攘攘的闹市，报社食堂的伙食供应也增加了一倍多。而大楼又被“赤卫队”数万人团团围住,蔬菜运不进，只能以咸鱼顶替，报社食堂叫急。

更严重的是厕所不够用。不少人不会使用大楼里的抽水马桶，用后不冲水和乱扔杂物，再加上“赤卫队”停水，几天下来，厕所早已污物四溢，有些人干脆就在大楼角落里随便大小便，致使楼内臭气熏天。

上海市委即要缓和报社门内外两派群众的对立，防止斗殴，又要组织人天天给大楼内送面包，清理厕所。他们最担心的是出现大规模武斗事件，怕事态进一步扩大。到时候，一顶“挑动群众斗群众”的大帽子扣下来，那就无论如何要被打倒了。就这样，造反派在大楼里一面吃着“走资派”送来的面包加白开水，一面继续坚持跟上海的“走资派”对着干。

报社大楼外的马路上，围观群众已达日均三、四万人。

12月3日早晨，“工总司”和“红革会”又找到市委宣传部副部长蒋文焕，将他带到报社。随后，又将正在家里养病的副市长李干成带到报社。

李干成患心脏病和高血压，到了报社还要吃药，只好让他回去，但是要换曹荻秋过来。

曹荻秋也在生病，不知藏在哪家医院，找了半天也没有找到。但是在华东医院找到正在发烧的中共华东局书记韩哲一，将他揪到解放日报社。

韩哲一来到报社，对“火线指挥部”的条件既不敢否定，也不敢答应，只是劝他们先撤离《解放日报》再继续谈。“红革会”学生岂肯如此就范，再次重复他们的三条要求。没有办法，韩哲一只得向他们宣读陶铸给上海市委的四点指示。本想以此说服这些人撤退，没想到学生们却说这个指示是假的，是上海市委编出来的，不是陶铸的话。他们拥进报社总机室，逼着话务员给北京打电话，要直接与陶铸通话，让他撤回这四点指示。

“解放日报事件”发生后，许多组织和市民不断打电话到“赤卫队(筹)”总部，询问他们对解放日报事件的态度，“赤卫队”各区联络站也纷纷要求总部拿出明确决策。全市保守派都关注着“赤卫队(筹)”总部的态度，希望他们出面遏制造反派。许多基层的赤卫队组织和赤卫队员，更是早已主动投入事件。去解放日报社门前示威的人群，大多数是赤卫队员，还有“上海市红卫兵总部”总部所属的学生。

由于“赤卫队(筹)”总部正忙于筹备“赤卫队”成立大会，最初对解放日报事件没有全力关注。12 月 3 日下午，他们与

“上海市红卫兵总部”总部等8个组织一起散发传单：《正告上海市委：必须坚持原则》，提出：

“上海市委必须坚持原则，维护党和人民的利益，决不允许重演11月25日的错误做法”，要求上海市委不能向“红革会”让步。

所谓“11月25日的错误做法”，即指对“红三司”报纸的夹送。传单还要求“红革会”公开承认错误，主动撤出解放日报社。

一、《解放日报》是华东局和上海市委的机关报，强占《解放日报》办公大楼，干扰报纸正常发行是错误的。

二、绝不允许《红卫战报》夹在《解放日报》中间发行。要求“红革会”和“工总司”自动撤出《解放日报》。

《正告》最后说：“以上两点，上海市委必须认真考虑，严肃对待，否则一切后果，全由上海市委负责。”

12月3日这天，从汉口路外滩到西藏路人民广场，几十万群众喊着：“我们要看《解放日报》。”

上海彻底乱了。两个月前的安亭事件，市区只在文化广场开了一次大会，其他的诸如卧铁轨、拦火车等事都发生在远离市区的安亭，对市区的影响还比较小。可这次“解放日报事件”，就发生在上海最热闹的中心地段，就发生在外滩的上海市人民委员会和福州路上海市公安局的鼻子底下。那些公安局里的警察，不但不去阻止事端的发生，相反有许多

人还参与其中，他们有的帮学生反对“赤卫队”，有的帮“赤卫队”反对“红革会”，上海真的是大乱了！

12 月 4 日聂元梓特地去解放日报社旁的山东路体育场，对在那里的“红革会”和“工总司”的造反派说：“《解放日报》事件发生后，许多组织打电报给中央文革，要中央文革表态。中央文革没有表态，这种不反对的态度就是支持我们!”“不要从《解放日报》轻易撤出来，要坚持到市委垮台为止。”

12 月 4 日，报社的许多工作人员自己出电报费，联名致电中央文革，报告报社的状况，希望中央出面制止事态。

这天，“赤卫队(筹)”总部在闸北区番瓜弄办公处开会研究对策，决定采取行动。

就在“赤卫队(筹)”总部开会的同时，上海市委书记处也在开会，研究对“解放日报事件”的处理意见，决定向“工总司”与“红革会”妥协。为了慎重起见，曹荻秋打电话给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张文豹，要他了解保守派组织的态度。于是市委办公厅苏超打电话给市总工会，要张祺出面了解“赤卫队”的态度。

## 第 314 回：实无奈，上海市委终低头

## “工总司”，周宝林调往总部

赤卫队总部(筹)的会议刚结束，上海市总工会联络员徐力赶来，说市总工会主任张祺要找总部负责人去谈话。王玉玺、金瑞章、尹平三人随即与徐力赶到市工人文化宫见到张祺。张祺询问了“赤卫队”总部对正在发生的解放日报事件的态度，没有表示什么意见。几个头头判断，市委希望“赤卫队”有所行动。当天，“赤卫队”总部商定了一个“先礼后兵”、“先舆论后行动”方案，决定先由陈阿春起草一份《郑重声明》，表明“赤卫队”总部立场，如无反应，再采取行动。

《郑重声明》表示了四点意见：

一、《解放日报》是华东局、上海市委的党报。“红革会”因为《红卫战报》不能夹在《解放日报》内发行而封闭《解放日报》社的做法是错误的；

二、支持上海人民要看《解放日报》的要求；

三、撤出后，《红卫战报》的递送，由华东局、上海市委、“红革会”、“工总司”、“赤卫队总部”会同一起协商解决；

四、“红革会”如无视我们的声明，我们将采取必要的行动。

在此之前，许多工厂的基层“赤卫队”已经开始行动。

一连几日，上海街头上百万人示威，反反复复呼喊的就是两句口号：

“我们要看《解放日报》！”

“《解放日报》是党报！”

震耳欲聋。

不论游行队伍从东面来，从南面来，从西面来，从北面来，都要朝汉口路进发，都要在《解放日报》大楼附近走一圈。一边走，一边呼喊口号。在那些日日夜夜，汉口路一带一直可以听见撼天动地的口号声。

“赤卫队”的工人们通宵达旦地示威游行，怒不可遏地叫喊着口号，呼喊声汇成了一股嘈杂的旋风，吵得弄堂里的居民无法睡觉和休息。谁也不知道究竟有多少“赤卫队”。只见他们面孔涨得通红，眼睛冒着怒火，咬牙切齿，激动地不断挥舞手臂，有的还手持木棍、铁棒向报社大楼里面冲。有人甚至使用了十二磅重的大榔头和百余斤重的三角铁，以及大石块、玻璃片等等，一起向守卫在门口的“工总司”工人和“红革会”学生打来。

里边的人则用竹竿、木棒、自来水管往外打。

每天都有群众受伤，每天都有数次抢救伤员的救护车，焦急地打着铃，在拥挤的人海中缓慢地爬行。送往附近同仁，同济两所医院的受伤者达71人。

“赤卫队”还开来了工程急修车，使用了云梯和铁叉攻

楼。还有人竟然学习诸葛亮，把汽油倒在报社的门板上，准备火攻，要把学生烧死在里面。

《解放日报》社坐落在人口密集的居民区里，周围都是砖木结构的民居。“赤卫队”要纵火，这可吓坏了附近的居民，他们也赶紧联合起来，坚决反对“赤卫队”用火攻。

报社附近的居民，原来都认为“红革会”学生无理取闹、不讲道理，硬要夹送《红卫战报》，这可是古今中外的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奇闻，亏他们也想得出来？如果他们认为《解放日报》放毒有错误，可以写文章批判，但批判的文章你要自己去发行的哟，为什么一定要夹在被批判的报纸里一起发行呢？因此居民们都认为“红革会”不讲道理！可是后来“赤卫队”如此进攻，居民们反倒同情起“红革会”来了：他们毕竟还是不懂事的学生，你们“赤卫队”都是大人哟，怎么能这样对待小孩子呢？

到后来，“赤卫队”愈是进攻，居民们就愈是为里面的学生担心。特别是“赤卫队”还想要用火攻，这不但是要烧孩子，不是还要烧我们居民嘛？为了防止“赤卫队”放火，里弄里的许多老妈妈也出动了，她们也组织起来，与赤卫队员讲道理，阻止他们进攻。最后，“赤卫队”总算没有放火。但是，切断了附近的水源和电源，使《解放日报》社附近的几条马路到了晚上是一片黑暗。

“赤卫队”又失算了，“红革会”学生利用一片黑暗，

悄悄地爬到报社的屋顶上面，在黑暗中扔下瓦片。他们居高临下，占据了非常有利的地形，许多赤卫队员被打得头破血流，从此，“赤卫队”不敢再走到近前来进攻了，只是围住大楼呼喊口号，楼内的学生也获得暂时的安全。

4 日下午，冲突达到高峰。解放日报社前的几条马路上挤满人。报社外，“赤卫队”等组织安装了 6 个高音大喇叭，后来又运来十几个崭新的喇叭，连包装纸都没拆，就装在了报社大楼四周。近 20 个高音喇叭对着报社呼喊着口号，震耳欲聋。而“红革会”只有 3 个小喇叭，声音全被对方的宣传盖住。李功佐打电话给自己学校的“红革会”，让他们将学校的两套广播器材和大喇叭拆下运到南京路。外语学院也运来喇叭。“红革会”在距离解放日报社不远的南京路上，每两个电线杆上装一个喇叭，从外滩附近的和平饭店，直排到西藏路附近的华侨饭店。功率最大的 500 瓦喇叭装在南京西路西藏路口的中百一店楼上，从早上一直播到晚上。

4 日下午，报社门外的赤卫队员用汽车跳板猛力冲撞报社大门。守卫大门的造反队员把一张乒乓桌竖立起来，堵住门口，但是桌面被跳板一端的铁钩撞了个大洞。造反队员将市委宣传部副部长蒋文焕拉到门口，让他去堵那个破洞。蒋文焕急的休克过去，报社职工赶紧把他送往医院。

此时，上海几乎所有的马路上，都有游行的队伍，他们有的高喊：“我们要看《解放日报》！”

有的却喊："《解放日报》是大毒草！我们要看《人民日报》！"

对立的两支队伍如果狭路相逢，开始时彼此都想以自己的声浪压倒对方，谁都不肯让步，结果双方都喊破了喉咙，于是就大打出手。这种大大小小的遭遇战，每天不知要发生多少次？这是上海滩自文革以来的第一次大规模的武斗流血事件。

"火线指挥部"发出《紧急通告》："头可断，血可流，《解放日报》决不可发！""我们一定要坚守解放日报社，决不后撤半步"！"我们的口号是：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用鲜血和生命去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誓死保卫党中央！誓死保卫毛主席！"

报社大楼里，韩哲一和"红革会"的马拉松谈判持续了一天一夜，讨价还价，来回请示、磋商。谈崩了，就休会，过会儿再继续谈。累了，经常就靠在墙上睡着了。韩哲一终于撑不住，他想先离开现场。"红革会"的学生岂能让他轻易离去，对他说："要与群众同甘共苦。"并声称："市委一天不答应，我们就一天不撤离。"

12 月 4 日，韩哲一高烧 39 度，报社职工赶紧用担架将他抬往医院抢救。

李干城与蒋文焕又继续和学生们拉"锯"，当时的谈判都做了录音。

12月4日，“红革会”和“工总司”在友谊电影院召开批判《解放日报》党委书记兼总编辑马达的大会。会后，他们把王一平、王少庸和马达带走，步行到真如火车站，准备赴京，声称要把“《解放日报》事件”的大火烧到北京去。王少庸一听，登时就说身体不行了，中途被送往医院。

王一平急坏了，中央三令五申，不能让铁路堵塞。他见红卫兵已经在火车站做好了拦车的准备，如果再发生一次“安亭事件”，怎么向中央交待呀？他赶紧和马达商量，是否同意红卫兵提出的让《红卫战报》与《解放日报》一并发行等项条件，先让他们返回上海。

12月5日晚，中央文革小组电话指示上海市委说：

总的方面要支持，解放日报附带发行红卫战报无非是揭露市委的错误，应该欢迎。……

地方报纸停那么几天，没有什么了不起。

周恩来也委托陶铸电告上海市委：“红卫兵提出把他们的报纸同解放日报一起发行，可以一起发行嘛。”

当晚，上海市委研究了中央文革小组的指示，认为应当执行中央文革小组的指示，停止执行陶铸以前的指示，否则后果不堪设想。他们当即派出市委书记处书记王一平、市委常委宋季文，赶到《解放日报》社，同这里的“火线指挥部”进行谈判。

这是一次真正的谈判。“红革会”以《三项决议》的形

式表述了自己的要求。“工总司”则以《四项要求》的形式表示了自己的条件。王一平、宋季文联名在这两个文件上签字，并写上“同意”。

“红革会”的《三项决定》主要内容是：

(1)《红卫战报》第九期与《解放日报》同时发行；

(2)解放日报社党委交出整群众的黑材料，允许红革会查板报社有关文章，底稿等；

(3)解放日报社党委就执行资反路线作出检查交代。

“工总司”《四项要求》的主要内容是：

(1)支持红革会的要求；

(2)市委要采取有效措施，使其他组织不要干涉革命造反派组织的行动；

(3)解放日报事件产生的后果由市委负责，并作出公开检查；

(4)保证工人革命造反队员回厂后不受刁难，否则引起的后果由上海市委负责。

12月6日，“赤卫队(筹)”总部与“上红”总部、“上红大专”总部等8个组织联合发表《严正声明》，谴责市委的签字是“完全放弃了原则，严重损害了党和人民的利益”，表示“最强烈的抗议和最坚决的抵制”。

12 月 6 日，上海“赤卫队”总部召开正式成立大会。会后，十几万赤卫队员排着队，高喊“我们要看解放日报”的

口号，前往解放日报社门前示威。

尽管上海市委在 12 月 5 日签字同意了“红革会”的《三项决议》和“工总司”的《四项要求》，但报业系统的许多职工并不卖账。12 月 6 日出版的《红卫战报》第 10 期在印刷过程中就出现了麻烦。该期的“告读者”中这样写道：

“《红卫战报》本来是上海市委指定《文汇报》社代为印刷的。一部分受蒙蔽的印刷工人，无理停止了本期《红卫战报》的印刷，说什么：《解放日报》被你们停止发行了，你们的《红卫战报》也不能出版。”

后来《红卫战报》虽然“在革命造反派的印刷工人”帮助下，照样出版了，但是报业系统的抵制还是存在的。

12 月 7 日，《解放日报》恢复发行。停发了 8 天的《解放日报》陆续送到读者手中。《红卫战报》第九期也随《解放日报》送到了每位读者手中。

12 月 8 日，上海市委发出《紧急通知》，要对“红革会”的《三项决议》和“工总司”的《四项要求》进行广泛宣传和坚决贯彻。于是，9 日清晨，进驻《解放日报》社内的各群众组织，包括“红革会”、“工总司”，以及“首都三司”、清华“井冈山”、“红三司”、同济“东方红”等撤离《解放日报》社，持续 9 天的“《解放日报》事件”结束。

就在这天，《解放日报》社的一些职工和干部还发了一张四开单面、题目为“解放日报事件真相”传单，这张传单

印了“几十万份”，“不仅张贴在上海全市的大街小巷上，而且寄往全国各地”。在传单的末尾，还要求“请转抄，请广播，请张贴，请翻印”。该传单的内容有五个方面：

一、事件的由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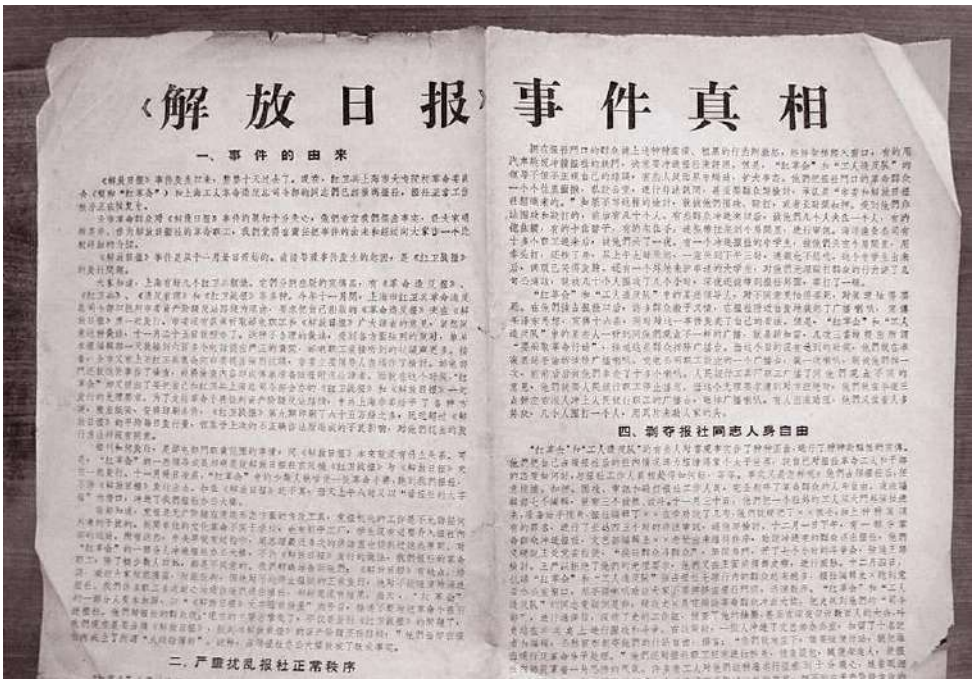
二、严重扰乱报社正常秩序；

三、非法审讯殴打革命群众；

四、剥夺报社同志人身自由；

五、对华东局和市委负责同志进行人身摧残。

该传单把“《解放日报》事件真相”介绍得很详细，把“红革会”在“解放日报事件”中的所作所为，讲得一塌糊涂。



《解放日报》事件真相

一、事件的由来

二、严重扰乱报社正常秩序

四、剥夺报社同志人身自由

12 月 10 日，上海市委再次下发中共上海市委文件沪委（66）第 12 号《通知》：

现将曹荻秋同志十二月十日签复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

司令部的四条印发，请按照执行。

中共上海市委员会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日

一、市委公开承认“解放日报事件”是上海市委的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严重事件，造成群众之间的对立和分化。市委支持革命造反派批判市委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认为任何人保市委都是错误的，围攻造反队更是错误。

二、市委认为参加“解放日报事件”的造反派工人的行动是无产阶级革命的行动。各单位对造反派人员占用的生产时间以公假论。

三、曹荻秋要亲自向伤员及其家属公开道歉，伤员的一切医疗费用均由市委负责。

四、市委支持“红革会”的革命同学下厂同工人结合，参加工厂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曹荻秋

（签字）

经过王一平和宋季文签字同意的“红革会”的《三项决议》和“工总司”的《四项要求》随同上海市委的这一红头文件一起下发，层层传达。整个上海滩，几乎是家喻户晓，人人明白。

当“工总司”和“红革会”的头头们拿到这份中共上海市委红头文件时，都高兴得跳了起来。

翌日，12 月 11 日下午，上海人民广场，红旗飞舞，人声鼎沸。60 万人在那里召开“迎头痛击市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大会”。

忽然，广场上发出了雷鸣般的惊呼：原来，曹荻秋又一次被拉上台来。可怜的老头，十分踉跄地走到主席台前，他的胸前挂着一块牌子，上面写着五个黑色的大字：“打倒曹狄秋”，在曹狄秋三个字的上面，还打着一个鲜红色的大叉。一位共产党的大员，坐镇一方的封疆大臣，堂堂的上海市委书记兼市长，中央还没有点名打倒，竟也会落得如此下场！难怪与会者猛然看见后，顿时发出一片惊呼。

曹荻秋当场在“工总司”关于要求出版《工人造反报》并由《解放日报》社的印刷厂代印的条子上签字。从此，“工总司”有了强大的舆论工具，《工人造反报》就是它的“机关报”，发行量据说超过百万。

《解放日报》事件后，偌大一个上海，无论是大街或者小巷、无论工厂农村或者机关学校，凡是有人群的地方，到处都是议论纷纷，参加辩论的人数之多和范围之广，争论之剧烈和时间之持久，几乎是空前的。以前如孙中山到上海张园发表演说，北伐时的三次武装起义，甚至是解放军进城，都没有如此众多的人员参加。从此以后，上海市真的是大乱了，北京和上海的红卫兵搅了大半年没有把上海搅乱，可是有了工人的参加，有了工人阶级和学生运动的结合，只有几

天，上海就马上大乱。共产党的上海市委和华东局再也无法控制上海的局面。

“赤卫队”无法想象他们死保的上海市委竟会如此窝囊。他们不明白，就在赤卫队员们努力奋战，将“红革会”和“工总司”困在大楼里面，差不多已经到了胜券在握的时候，上海市委为什么却突然举起白旗投降！这简直是有点像当年的中法战争，冯子才将军率领的中国军队已经在前方打了胜仗，而满清政府却还要割地赔款！

但是，到了这时，赤卫队员们还是不肯向造反派屈服，他们不相信自己力保的上海市委，会去执行一条资产阶级的反动路线。他们继续处处与造反派为难，不断地挑起事端。尽管上海市委领导已经签字同意在《解放日报》中夹送《红卫战报》，但许多具体送报的邮递员是赤卫队员，他们按照总部的命令，拒绝夹送，弄得“红革会”和“工总司”也没有办法。

而此时，上海“工总司”的王洪文也要解决一下自己内部的问题了。“工总司”的“一兵团”、“二兵团”势力急剧膨胀，特别是“二兵团”，已经超过了王洪文的“总部”。王洪文斥责有人搞“分裂主义”，但无济于事。于是，他通知召开“总部”会议。

戴祖祥带着“北上返沪第一兵团”的常委们来了，耿金章带着“第二兵团”的头头们也来了，孙福样的“战到底兵

团”的核心人员都来了。王洪文面带微笑，带着一大批“工总司”总部的核心及其他要员，跟这些老战友们紧紧握手。

会议在造反派的一片胜利喜悦声中开始，按照当时开会的惯例，总是要先念一段《毛主席语录》。

王洪文领读的那一段语录，是从《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的序言》里挑选出来的，是这些造反派头头脑脑们平日很少念过，十分生疏的一段。那些兵团头头们念起来当然是零零落落，有的人根本跟不上来。但王洪文是有准备的，他非常熟练的一字一句的念道：

“就胡风分子的许多个别的人来说，我们所以受他们欺骗，则是因为我们的党组织，国家机关，人民团体，文化教育机关或企业机关，当着接收他们的时候，缺乏严格的审查。也因为我们过去是处在革命的大风暴时期，我们是胜利者，各种人都向我们靠拢，未免泥沙俱下，鱼龙混杂，我们还没有来得及作一番彻底的清理。”

冷不丁的，突然念起了这么生僻的一段“最高指示”，几个兵团的头头们不知所以，会场的气氛有些紧张。

王洪文收起了笑脸，板起面孔，开始发言：“同志们，我刚才念的这段《毛主席语录》，就是我们今天会议的主题。毛主席所说的‘泥沙俱下，鱼龙混杂’的现象，不光是在过去的革命的大风暴时期有过，在如今的文化大革命中也同样存在。我们的‘工总司’，就有‘泥沙俱下，鱼龙混杂’的

严重问题。”

王洪文说毕，用眼光环扫了一下四周，继续说道：“戴祖祥，就是混进我们革命队伍里来的败类！”

戴祖祥一怔。

显然，王洪文已经整理了戴祖祥的材料，他一边说，一边拿出一叠纸头，一张接一张念着，从历史的到现行的都有。戴祖祥在四清运动中受到批判，这是历史。说到现行的，就是戴祖祥在南京冒充上钢三厂保卫科干部，王洪文说戴祖祥“是一个政治扒手”。这一次突然袭击，使毫无准备的戴祖祥一时间无法招架。他不明白，自己在南京眼见大家群龙无首时，挺身而出，带领群众渡过了难关怎么就错了？为了取得群众信任，他佯称自己是保卫科干部，这不过是权宜之计，现在怎么成了罪状？但戴祖祥更想不明白的是，自己在南京的讲话，王洪文怎么知道的这样清楚？

是国棉 30 厂的王秀珍回来后向王洪文汇报的。王秀珍参加了“首都红三司”驻沪联络站召开的“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经验交流大会”，也参加了 11 月 9 日文化广场的“工总司”成立大会，会后在北站登上了那辆红卫兵列车到了南京。

当队伍在南京群龙无首时，她很想站出来领导队伍。可是想到自己只是一个女流之辈，那些桀骜不驯的男人能听她的指挥吗？就在她犹豫的时候，戴祖祥站了出来。

也是戴祖祥的粗心大意，吹牛不打草稿。王秀珍听他介绍

自己是保卫科干部，却没有说自己是一个共产党员时，心里就有了怀疑。像上钢三厂这样的大厂，绝对不可能叫一个非党群众担任保卫科干部的。回到上海后，她没有参加“一兵团”，而是仍旧是回到“工总司”，并且立刻把自己的怀疑报告了王洪文。出于保卫干部的工作本能，王洪文马上派人到上钢三厂调查，于是将戴祖祥查了个底掉。

戴祖祥就这样被打闷了，从此一蹶不振。

王洪文又将目光转向“二兵团”。

“周宝林也不是好东西！”王洪文居然点周宝林的名，这使周宝林大吃一惊。

周宝林会有什么问题呢？“工总司”总部有人宣读了《周宝林五大罪状》。这小伙子做梦也想不到，“总部”的人指责他在南京游山玩水，指责他的女朋友有非常复杂的海外关系，还说他不服从总部的命令，要想脱离“工总司”搞独立，等等。

周宝林一点也不示弱，据理一条一条的加以反驳，最后说：“这是王洪文在昆山受到围攻，今天要拿我出气来打击报复！”

耿金章火了，他拍案而起，指着王洪文责问他：“你在安亭为什么躲到厕所里去了？”

孙福样也跳起来，大骂王洪文是缩头乌龟！“今天胜利了，乌龟倒是神气起来了，还想独吞胜利果实！没门儿！我

们广大造反队员坚决不答应！”

孙福样还说，王洪文没有资格担任“工总司”的造反司令，叫他赶快从司令宝座上滚下来，“我们要潘司令，不要王洪文！”

这时，包炮赶紧站了起来，大声喊道：

“同志们，请你们静一静，现在请我们的潘司令讲几句话。”

此时的潘国平正在考虑如何发言。面对眼前的这个局面，双方各不相让，他被包炮逼了出来，只好清了清嗓子如此说道：

“好吧，同志们请安静！让我们先来朗诵一段《毛主席语录》。”

“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国内各民族的团结，这是我们的事业必定要胜利的基本保证。”

读完语录，潘国平接下来继续说道：

“同志们，现在我们工人革命造反派最大的敌人，是上海市委和曹狄秋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现在反动路线的流毒还毫发未动，而我们革命的无产阶级内部却争吵得不可开交；我们现在这样争吵不休，对得起广大的工人群众吗？对得起春桥同志对我们的支持吗？对得起毛主席吗？毛主席教导我们要团结，我们却争吵不休！像一个革命的造反派吗？所以我希望大家不要争吵！安静下来好好的想一想，我

们前面还有多少事要做？还有多少困难？怎样做才能克服这些困难……”

包炮看到对立的双方都安静下来，也站起来说：“潘国平同志说得对，我们革命造反派现在一定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集中全力重炮轰击上海市委！”

王洪文也紧接着说道：“好吧，现在看在小包、老耿和小潘的份上，总部就决定不处分周宝林，为了表示我本人的诚意，我想把周宝林同志调到总部工作！我一定与小周很好地合作。希望小周也不计前嫌，在总部与我一起工作。”

周宝林调到“工总司”总部，派到“宣传组”工作。

## 第 315 回：“砸”孔庙，谭厚兰女将当先派专家，与考古同步进行

孔子的故乡曲阜，建有规模宏大的孔庙、孔林、孔府，号称“三孔”，位于曲阜城的中央，是在孔子故居的基础上逐步发展起来的一组具有东方建筑色彩和格调、气势宏伟、富丽堂皇的庞大古代建筑群，也是历代统治者祭孔的地方。

孔子去世的第二年，鲁国国君鲁哀公将孔子旧居三间改建为庙“岁时奉祀”。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历代君王盛行“尊孔”，他们厚待亡灵，对其嫡裔也是眷顾备至。孔府、孔庙经上千年的修缮，成了文化遗产，加上 3000 亩古木参天的孔林，形成了令海内外华人仰慕的“三孔”。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三孔”被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8 月下旬，曲阜县委书记李秀曾接到消息，说泰安水校和曲阜师范学院的红卫兵要来砸“三孔”。县委立即分头向县直各机关单位及学校布置防范措施，但后来未见动静。以后，曲阜当地的学生给中央文革写信反映当地文革运动的情况时，也提出批孔、清理孔庙、挖孔子坟的建议。

北京师范大学的谭厚兰听说此事后，反应很积极。陈伯达表示支持谭厚兰她们的革命精神。

于是，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讨论了此事。

关锋是批判孔子的专家，他对批判孔子提出了很多建

议，但对清理孔庙，挖孔子坟持谨慎态度。他说：“孔庙、孔子坟是几千年封建统治阶级压迫人民的象征，乘文革的东风，清理一下也好。但要有专家参加，不可乱挖、乱毁。”

康生在会上分析说，孔子坟里可能是没有什么东西了，他是穷教授，没有钱财，顶多有几捆竹简。

陈伯达说，有竹简挖出来也好，可以弥补学术研究。他估计尸体早腐烂了，孔子的后人又不能像秦始皇那样保存墓葬。所以挖不挖只是个形式问题。

戚本禹提议：“不妨由国家派出考古人员和他们一起去，这样既可以满足群众挖坟的愿望，又可以进行考古发掘。”

最后，周恩来综合各方面看法表示：与考古所相结合，作科学的清理。

得到中央同意后，由陈伯达、关锋和戚本禹向《红旗》杂志的林杰作了传达。让林杰去北师大作动员报告。

戚本禹对林杰讲：““孔子讲，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孔子是歧视妇女的鼻祖。谭厚兰是女同志，讨孔让她去更合适，更有意义。”

10 月，林杰向北京师范大学的谭厚兰说了去山东曲阜“造孔家店的反”的事。因为孔子是“万世师表”，这个任务理应由未来的教师们承担。直到 11 月 7 日，谭厚兰方才腾出手来，率众在天安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集会，誓师捣毁“孔

家店”。会上，谭厚兰号召同学们发扬“五四精神”，砸烂孔家店。会后，她亲率200多人登上了南下山东曲阜的列车。

联络员立即将此事报告中央文革。这天，正好是康生在钓鱼台16楼值班室，他闻之大惊，拍桌说到：“孔庙不能砸！”但此时，谭厚兰他们已经在前往曲阜的火车上，重温“五四”先辈们打倒“孔家店”的光辉历史和太平天国运动中，所到之处必砸文庙、捣“圣像”的壮烈行动，决心继承先烈遗志，走先烈们开拓出来的革命大道，完成先烈们的未竟事业，让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烈火，乘着大串连的东风，烧向曲阜，烧向孔子几千年不散的阴魂。

11月9日，谭厚兰他们到达曲阜，住进曲阜师范学院，并立即与曲阜师范学院的“毛泽东思想红卫兵”联合成立了“彻底捣毁孔家店革命造反联络站”。第二天上午，他们一起浩浩荡荡直奔曲阜县委。

曲阜县委书记李秀闻讯，立即和县长高克明、县委副书记张玉美带领200余名机关干部,人手一册《毛主席语录》，在县委门口列队迎接。

县长高克明首先代表曲阜县委向北京来的红卫兵表示欢迎。

谭厚兰宣读了《火烧“孔家店”——讨孔檄文》，红卫兵激昂铿锵地唱起了《毛主席语录》歌：“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造反有理！”

接着，曲阜县的机关干部齐声背诵起“老三篇”中的《为人民服务》：“我们的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革命的队伍……”

当曲阜县机关干部一气呵成背诵完整篇《为人民服务》文章后,出现了一个静寂的瞬间。接着，红卫兵又背了一段《毛主席语录》：“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它就不倒……”“凡是错误的思想,凡是毒草,凡是牛鬼蛇神,都应该进行批判,决不能让它们自由泛滥。”

接下来,曲阜的机关干部又齐声背诵了《纪念白求恩》和《愚公移山》。随后，红卫兵高呼口号，散发《讨孔檄文》。

之后,谭厚兰提出要到“三孔”去看一看。在县委办公室干部的引导下，他们在孔府翻出了国民党的青天白日旗,伪满洲国国旗,还有一把宝剑和一把东洋刀，这是孔子第 77 代嫡长孙、袭封 32 代衍圣公孔德成结婚时，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和同为孔子后裔、时任行政院副院长及财政部长孔祥熙送的贺礼。红卫兵还陆续翻出了袁世凯的照片、国民党“剿共”的“清乡册”,孔府与日本侵略军、汉奸汪精卫来往的照片、函件等物品。

11 月 10 日晚，谭厚兰彻夜未眠，她与众学生开会商议。第二天，一行人马在一番指点江山、激扬文字之后，以“带头砸开孔府的重重大门”为口号，冲进孔庙，驻扎在那里。

红卫兵抄出国民党党旗后，曲阜县县委、县人委的领导已经十分紧张。接着,一个更加惊人的消息在曲阜迅速流传——“红卫兵要烧孔府孔庙啦！”县委领导被这个消息吓得坐立不安,决定立即向中央汇报。

中央文革接到山东省委的电话请示后，即由戚本禹根据周恩来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的指示精神，代表中央文革电话回复山东省委，要求他们告诉红卫兵：“孔庙里的牌区，明代以前的都不能砸、不能损坏，要保护好。清代的可以砸，但康熙、乾隆的不能砸。孔庙可以改造，像收租院那样改造。孔坟可以挖掉，但要有懂文物的考古人员在场参与，对墓中文物要保护。”

11 日晚 23 时，陈伯达也将上述精神直接告诉了曲阜的谭厚兰。

12 日凌晨 2 时，曲阜县委接到省委转达的中央文革指示：“孔庙、孔府、孔林不要烧掉，留作封建制度、孔家地主的博物馆，像收租院那样。孔坟可以挖掉。”

12 日下午，谭厚兰主持召开曲阜各红卫兵组织代表会议，宣告“全国红卫兵彻底捣毁孔家店,树立毛泽东思想绝对权威革命造反联络站”成立，从而结束了曲阜的红卫兵组织各自为政的混乱局面，将各个红卫兵组织全部召集在“讨孔联络站”的大旗之下。

11 月 14 日，谭厚兰决定次日召开誓师大会，砸烂国务

院命名“三孔”为国家一级文物保护单位的石碑。当晚，正在省城济南三级干部会的曲阜县委书记李秀得知了这一消息，立即向省委作了汇报。省委研究决定，通知曲阜的县长高克明、县委副书记张玉美要尽量做红卫兵的工作，国务院的石碑不能砸，孔子像不能拉倒。

11 月 15 日早晨 7 时，高克明、张玉美怀着一丝侥幸心理，到驻扎在曲阜师范学院的“讨孔联络站”指挥部去找谭厚兰，希望谭厚兰能改变主意。谭厚兰当然不会同意

高克明、张玉美只好作罢。

当天上午 9 时，各路红卫兵在孔府门前集合，他们在这里召开“彻底捣毁孔家店”万人大会。砸碑的小分队手持铁锤等候在国务院竖的石碑前，石碑已被套上了粗大的绳索。围观的人群里三层外三层,把街道挤得水泄不通。

11 时，红卫兵举行的砸碑誓师大会开始。会上，红卫兵宣读了《火烧孔家店——讨孔檄文》、《给国务院的抗议信》、《告山东革命同胞书》、《告全国人民书》，北京师范大学、曲阜师范学院、曲阜一中的红卫兵代表先后发言。

北师大红卫兵代表张道英带领全体红卫兵宣读《砸碑誓词》后宣布： “砸碑开始！”

早已准备好的红卫兵砸碑小分队用绳子将国务院 1961 年立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石碑拉倒。手持铁锤红卫兵马上跳上去叮叮当当地砸起来。一会儿工夫，花岗岩的

石碑就变成了一地碎片。

接着，红卫兵兵分两路，一路冲进孔庙，把孔子像及大成殿内所有塑像的头都砸了下来，一时间，昔日庄严神圣、金碧辉煌的大成殿尘土飞扬。有人从殿内塑像的腹部掏出线装本的《周易》、《尚书》、《礼记》、《论语》、《春秋》。孔子和以颜渊、子思、曾参、孟轲四人配祀庙、及 12 贤哲塑像腹中的 17 套珍版书、17 套银五脏和 17 个铜护心镜，也从此没了踪迹。除孔子像外，其他塑像全被拉倒。孔子像未被拉倒是因为红卫兵还要拉出去游行、火烧。

还有一路红卫兵去了周公庙和孔林,拉倒了周公像,将孔林门上的“至圣林”牌匾砸碎。

11 月 25 日，根据讨孔指挥部的部署，红卫兵到孔庙大成殿搬孔子像，拆卸牌匾。他们原想把孔子像整个弄下来，抬出去装在汽车上，没想到弄碎了，后来游街的时候,就把孔子像的脑袋安在了其他塑像的身子上。

11 月 29 日上午, 考古队到后，“讨孔联络站”在曲阜师范学院组织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讨孔大会。当时的《讨孔战报》第五期描写了这样的情景：“革命是人民群众的盛大节日。人们怀着节日前激动的心情等待大会的召开,很多贫下中农清早两点多钟就起身了,附近地区的红卫兵 27 日晚上出发,步行五六十里,清晨两点多钟就赶到会场……清晨 6 点钟,大批红卫兵小将和贫下中农排着整齐的队伍,高举着革命造

反的红旗,拿着红彤彤的《毛主席语录》,高唱着革命歌曲,像一股股红色的铁流,从四面八方,汇集曲阜师范学院,整个曲阜师范学院成了红色的海洋……”

会上,谭厚兰作了总结性发言,讨孔指挥部副总指挥董连猛宣读了通电全国的《彻底打倒“孔家店”、捍卫毛泽东思想十点建议》。北师大红卫兵代表还朗读了《给毛主席的致敬电》：

“敬爱的毛主席：我们造反了！我们造反了！孔老二的泥胎被我们拉了出来，‘万世师表’的大匾被我们摘了下来。……孔老二的坟墓被我们铲平了，封建帝王歌功颂德的庙碑被我们砸碎了，孔庙中的泥胎偶像被我们捣毁了……”

宣读完毕,锣鼓齐鸣,口号震天。最后,董连猛宣布,向孔林进军,刨平孔坟!

“讨孔联络站”为这次扒坟定下的对象是“上三代下三代”。所谓“上三代”，是指孔子及他的儿子和孙子，“下三代”，是孔林里埋的最后一位衍圣公孔令贻及其父亲孔祥珂和祖父。孔子墓是孔林的中心所在,东为儿子孔鲤墓,南为其孙孔伋墓,这种墓葬布局意为“携子抱孙”。

专治经学的周予同教授也千里迢迢来到山东曲阜，他和高赞非等参加过 1962 年“孔子讨论会”的学者及当地干部都参加了孔子塑像游街。

接着，红卫兵扫荡了孔子及其后裔的坟地----孔林。

孔子、孔鲤、孔伋三个巨大的土冢上站满了红卫兵和农民,镢铣并用,尘土飞扬,每一个人都充满了狂热和期待。围观的人越聚越多,坟越挖越深,人们只能看见扔上来的黄土,别的什么也看不见。从地面向下又挖了三米多深,除了黄土还是黄土。人们渐渐失去了耐心和兴趣。然而,他们仍不甘心,不相信孔子墓中什么都没有,于是打了眼,埋设了炸药和雷管。一声巨响,掀起的黄土铺天盖地,人们冲上去一看,一座空坟！孔鲤和孔伋的墓也都空空如也。

与挖令人失望的孔子墓比起来,挖孔令贻及其父亲、祖父的墓就显得惊心动魄了。当红卫兵挖开孔令贻及其父亲孔祥珂墓的封土层,露出墓室石墩时，因为当时天色已晚,红卫兵决定第二天再开棺。

11 月 30 日,待开的棺木吸引了更多人涌向孔林。石墩打开,露出了里边的红色棺木,棺木打开,弄出尸体,两座墓中共扒出五具尸体,分别是孔祥珂及夫人、孔令贻及妻妾。尸体腐烂的臭味使人们恶心、呕吐。红卫兵将五具尸体就地放了五六天后,弄到孔林东南角一个土堆里烧掉。

红卫兵从这几具棺材中清理出的元宝、翡翠、手镯等随葬品装了满满一箱子。凡是为专家确定为文物，并需要保护的，都印刷了“保护”字样的帖子贴上以便识别，重点的都用红油漆写上，特别重要的，比如汉晋代的，都派了专人守护。

12月7日,谭厚兰认为打倒孔家店已经基本达到了目的,便率领她的队伍离开曲阜返回北京。据谭厚兰汇报，根据陈伯达传达的周恩来指示精神，他们对孔庙的碑匾、文物要保护的都写上了红字保护，并留有照片。

孔庙大成殿内的明彩塑孔子像，被挖了眼，扒了心，全身贴满了大标语。

## 第 316 回：占省委，挟持廖志高北上

## 急劝阻，只能派代表进京

此时的成都市已经越来越混乱，一再遭冲击的西南局和四川省委、成都市委几近瘫痪，领导干部被围攻批斗甚至被扣留不放，四川省委向中央报告："省委机关被学生进驻，其中办公厅已被全部占用"，"11 月 26 日，廖志高、李大章、廖井丹等省市委负责人被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学生抓走，至今未放回。"

当时，廖志高被北京学生控制在陕西街省高教局机关，他们正准备和"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一起，将廖志高带到北京告状。

11 月 27 日凌晨，廖志高被"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带到了成都火车北站，随行的工作人员除了廖志高的秘书曾庆祥和警卫员刘寿祥外，还有四川省委办公厅秘书处副处长裘尧鉴。

天还没亮，一些厂矿单位和街道的队伍，打着"兵团××分团"的旗帜，敲着锣鼓，从城里不断赶到火车站，对"兵团"总部北上告状表示支持。车站内外人头攒动，一列从成都开往北京的火车被工人们抢占，车上挤满了人。廖志高被带进其中的一节硬卧车厢，车站站长已经被抓了过来。工人们逼廖志高给站长下命令，让他立即发车去北京。

廖志高说："火车站是铁道部负责，不归咱们四川省管

呀。我们地方党委无权给铁路系统的工作下命令，就是下了他们也不听呀。”

站长也马上说：“是呀，是呀，要铁道部的指示才能发车呀，否则要出事的，会撞车的。”

临近中午，站长办公室有人出来告诉大家：铁道部请示了中央文革小组，说只要有车票就可以去京。不久，站上的喇叭又突然反复广播：“周总理指示，有问题就地解决，不要来京，更不能阻拦和抢占火车”。

听说周恩来有指示，“兵团”下属有的单位开始偃旗息鼓准备撤离，有的群众则进行阻止，人群中出现争吵甚至相互漫骂和抓扯的混乱情况。究竟是北上进京告状，还是在成都就地解决问题？各个分团甚至“兵团”总部领导之间出现严重分歧。有的主张先撤回去再说；有的则认为中央文革小组支持进京，坚决反对撤离。经过讨论，“兵团”总部逐渐统一了认识，认为这是成都铁路局和车站搞的鬼，蓄意制造矛盾和混乱。

午后不久，“红卫兵成都部队川医支队”一队人来到车厢里围着廖志高宣读他们的声明说，他们坚决支持“兵团”上京告状，之所以阻拦抢占火车完全是不得已，是针对省、市委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所采取的必要的革命行动，由此带来的后果应由四川省委和成都市委负责。他们还要廖志高在他们拟好的这份《声明》上签字，否则他们将采取更大的

“革命行动”：卧轨阻拦成都所有发往各地的火车。廖志高一听吓坏了，只好在《声明》上签字。

“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经过激烈的争吵辩论，直到傍晚才最后决定，仍然进京，不让乘火车就带着廖志高徒步北上，还要带上成都市委分管工业的副书记冯焕武一道前往，但是一时找不到冯焕武在哪里。

当晚，“兵团”总部主要负责人、第五冶金建筑公司驾驶员李长友来到廖志高的车厢，宣布他们徒步赴京告状的决定，并指派“兵团”总部成员、成都无缝钢管厂工人林云钦带领成都电线厂的徐尚林、西南电力修造厂的侯在均两名青年工人，把廖志高带到车站附近的四川省手工业管理厅机关会议室暂住一宿，准备次日动身上路。

第二天早上，当廖志高他们准备从四川省手工业管理厅出发时，两位机关食堂炊事员吵着要见廖志高。他们是老工人，林云钦等人不便阻拦。见面后，两位老炊事员对廖志高问寒问暖，临别时还将一大堆煮熟的鸡蛋硬往廖志高的秘书曾庆祥和警卫员小刘的口袋里塞，边哭泣边嘱咐：“一定要注意廖书记的健康和安全”，情绪非常激动，小刘要付钱他们坚决拒收，小刘也被感动得流下了泪，在一旁看管廖志高的徐尚林等两位小青年工人也不好说什么。“文化大革命”以后，1982 年廖志高来川治病休养，才得知当年这两位“炊事员”实际上是手工业管理厅的老红军干部，其中一位叫杨

宗清的还到金牛宾馆来看望廖志高，他回忆说：“当时到处都乱轰轰的，很多事情我们都看不惯、想不通，那天听说要拉你上北京，我们既焦急担心，又爱莫能助，只好冒充炊事员来看看你，否则人家不会让我们进去，回想起来真是啼笑皆非。”

随后，在林云钦等人的监控下，廖志高他们分乘“兵团”弄来的两辆小车随进京告状的队伍出发，沿途看到零零落落的步行队伍中还有一些老年人和个别儿童。

11 月 28 日早上 7 时，周恩来通宵办公后正准备休息，听到了廖志高随进京告状的队伍一起北上的消息，当即交代办公室主任童小鹏设法尽快找到廖志高，要和他通话。

上午 10 时左右，成都北上告状的队伍进入新都县境，早已在公路旁等候的新都县委副书记罗世发拦住廖志高他们说：“周总理要找廖书记通电话，请立即去县委同北京联系。”

到了县委，罗世发安排林云钦等人在会议室等候，然后带廖志高和秘书曾庆祥到他的办公室，很快同北京周恩来通上了话。

此时周恩来早已在北京的办公室等候了，他首先问廖志高：“你身体怎么样？能吃得消吗？”

廖志高回答：“10 月中央工作会议回来后，受到的冲击越来越大，劳累一些，但身体还可以，请总理放心。”

周恩来又问："他们来京到底要告什么状？"

廖志高说："我也不清楚，从这一两天的接触看，大多是涉及一些厂矿单位领导人压制群众、转移'黑材料'和工作、生活作风方面的一些具体问题。"

周恩来说："这些问题只有在本地本单位才能解决嘛！能不能劝阻他们就地解决，不要来京？"

廖志高说："下面劝阻已经起不了多大作用。前一两个月，我们按照中央、国务院的要求，对发生的几起集体进京上访的人进行劝阻，多数人还听招呼，仍有少数不听劝阻的到了北京，连我们省委组织部长安法孝最近也被控制到北京去了。因此，目前要劝阻确实难度极大。"

周恩来沉默了一阵又问："你身边还带有什么人？"

廖志高回答："除秘书、警卫员外，还有办公厅一位副处长。"

最后，周恩来嘱咐："你要注意保重身体。目前情况复杂，还要注意安全。"

秘书曾庆祥当场记下了廖志高的谈话。通完电话后，廖志高马上给他复述了周恩来的讲话内容，然后十分感慨地说："总理还是像过去那样，考虑问题非常细致，关心干部也十分周到。"

中午，廖志高他们在新都县委吃午饭时，廖志高向林云钦提出：徒步去北京，路远而且越往北天气越冷，希望"兵

团”说服老弱和儿童回去。林云钦对廖志高和周恩来通话时县委把他撇在一边，早已十分不满，就气冲冲地说：“没法动员，全都得去！大不了死他几十百把人！你们怕出事就派车送嘛！”

饭后，廖志高向秘书曾庆祥交代：“为了防止可能出现的问题，请省委考虑派几辆大客车，配上医护人员，沿途把老弱病幼尽量劝阻回去。”

曾庆祥把廖志高的意见以及同周恩来通话的情况，电话告诉了省委办公厅值班的领导。

28 日下午，廖志高随北上告状人员抵达广汉，后面随行的“兵团”步行队伍也陆续到达。省委办公厅增派了省委门诊部医生任长方和保卫科长廖肖一赶来随同廖志高他们一起进京。当晚，县委收到经周恩来亲自审改，以国务院名义发给“兵团”的电报，主要内容是：

“欢迎你们派代表（小厂一人，大厂二至三人，总数请不要超过三百人）来北京商谈。……请你们认真考虑：成千的工人同志来北京请愿，既不便于接待和会谈，也会影响你们工厂的生产。如果另一方面工人同志也照样来京，那将更影响生产。……来京人数确定后望告，以便通知铁道部配车，车费由所属厂矿解决。廖志高同志也同你们的代表一道来京。”

廖志高立即让县委连夜大量翻印，同时找来“兵团”主

要负责人李长友，希望他们按电报要求尽快商派代表，待电报印好后立即组织力量散发下去做好群众工作。李长友表示同意，电报也于当晚深夜印好并散发出去了。

29 日早饭后，北京工业大学来川串连的两名学生郝小林（女）、冯培新急急忙忙跑到广汉县委向廖志高反映："我们为了实现同工农结合和向工人阶级学习的愿望，这次一直跟'兵团'从成都出发，昨天深夜又自告奋勇到工人群众中去散发和宣讲总理的电报，却受到一些人的阻挠和围攻。他们说电报是西南局和省市委伪造的，是廖志高搞的鬼，并且鼓励群众继续北上。目前，'兵团'领导人之间争吵不休，群众也出现了分裂……"

话未讲完，又有自称是某街道分团的几十个人，冲进县委气势汹汹地找到廖志高，说电报开头对"兵团"的称呼是"成都工人造反团"，少了"兵"字特别是没有"革命"两个字，显然是别有用心和伪造的。经廖志高耐心说服解释，他们始终不相信，提出要立即同总理办公室通电话核实。

电话接通后，童小鹏证实确给"兵团"发过这样的电报，这些人还不甘心，又进一步向要童小鹏电报全文，经逐字核对无误后，仍然在电话上纠缠和质问童小鹏，为什么要取消"革命"二字，并气势汹汹的在电话上说："到北京后要找你们算账！"

在场的北工大学生郝小林，出生于外交部干部家庭，对

周恩来十分崇敬，目睹这一情况，愤慨地说：“真没想到工人阶级队伍这样复杂，竟然对总理的指示抱这种态度。”说到伤心之处，不禁失声痛哭起来。

当天深夜，李长友又带着郝小林、冯培新急急忙忙来到县委找廖志高商量，说现在情况越来越复杂，局面已难以控制。“兵团”决定林云钦带上廖志高尽快离开队伍，先设法乘火车去京，当面要求总理允许已经上路的工人全部去京，他们留在后面继续做工作。同时提出要郝小林和冯培新连夜赶回成都转乘飞机回京向周恩来详细汇报。

廖志高听后表示：在目前情况下，只好这样办。并要秘书立即电话通知省委办公厅接待两个学生并为他们购买机票，同时将廖志高他们准备乘火车进京一事向周恩来汇报，并尽快做出安排。

11 月 30 日凌晨，林云钦和廖志高他们提前从广汉乘车赶到绵阳，中午接到省委办公厅电话：“已安排，请于今晚 12 点前赶到江油车站，乘由成都开往北京的特快，到时由列车长接待。”

当晚，绵阳地委派车将廖志高和随行 5 名工作人员，加上林云钦等 3 人，一行共 9 人送到江油，12 月 1 日凌晨 1 时登上火车，12 月 2 日深夜抵京。

就在廖志高等人奔波于赴京旅途之时，11月30日，周恩来在中南海小礼堂东厅接见成都地质学院代表3人。座谈开

始后，周恩来看到廖志高打给国务院的电报，知道有50多名成都工人已到了西安，没有转上车。周恩来对成都地质学院的代表说：“以国务院的名义给工人发了一份电报，开始他们还不相信，后来把电报贴出来了，大多数要求回去，少数不想回去，正在辩论。”

为了弄清情况，周恩来询问成都地质学院代表关于“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的情况。

周恩来说：“国务院发了一个通知给工人，大意是：支持工人的革命行动，有问题欢迎派少数代表到北京来解决。请他们考虑，上千人到北京来影响生产，又不好谈，家中也还有工作要做，建议：大厂派2到3名代表，小厂派1名代表。”

成都地质学院代表把李大章为其继母立碑的照片交给周恩来，周恩来接过照片看了看，把照片丢在桌子说：“我家里的那个坟是由我侄子经手处理的，我还特意让他们埋深些，上面的土地留给农民耕种。”

周恩来听了代表们反映的各校组织原来掌握的武器弹药问题后说：“关于军区收枪的问题，开始他们还不敢动手，怕打起来了，后来我说：‘不管怎么样，还是应该去，无论如何也要封存起来。’最后军区还是执行了。现在又不搞民兵训练，集中力量搞文化大革命嘛！”

在如何对待李井泉、廖志高等人的问题上，周恩来：“要他们检查、批判，这是对的，但是不能搞轮番轰炸，李井泉

不是说已经生病了吗？这样搞久了反而对文化大革命不利，对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不利。把这些批判对象拿来连着搞3天3夜，就搞垮了，这有什么好处呢？”

最后周恩来对代表说：“你们已经给我了一份材料，我还在看，看完以后，关于西南局，四川的情况，我要详细给你们讲的。好！明天谈吧，我还有别的事情。”

## 第 317 回：再接见，蜀滇及全国代表
## 反文革？林学院自发辩论

11 月 30 日，周恩来与陶铸、李富春、陈毅、李先念、谭震林、叶剑英、谢富治继续接见全国进京工人群众代表，中央书记处书记、全总主任刘宁一主持大会。

由于中央关于工矿企业运动如何深入搞，已经统一了意见，文件正草拟之中，所以周恩来在短短的开场白里讲到：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初期，我们把重点放在大中城市的文化教育单位和党政领导机关，这在《十六条》上规定了。对厂矿企业事业单位、县以下单位和农村人民公社，我们作了抓革命促生产的规定。但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向前发展的，是向广度、深度发展的，这不可避免地影响到厂矿企业、事业单位，首先是影响大城市，接着是中等城市的厂矿企业、事业单位，所以，同样这些单位也发生了一些问题。有些问题有共同性，有些问题有特殊性。现在中央正在研究这些问题，准备写一个关于厂矿企业、事业单位进行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来解决这些单位如何进行文化大革命的问题。决定正在起草当中。如果起草成功，还要把草案发到大中城市的厂矿企业中给广大职工讨论，征求意见。所以，今天晚上的会见，不能把未正式讨论的决定向大家讲，个别问题要谈，但不能在这样的场合谈。……希望大家回到本地开展文化大革命。”

周恩来讲完话，请陈毅讲话，他又赶去参加另一个会议。陈老总又潇洒一番，大谈一番老百姓很难听到的国际形势后，陈毅说："千言万语说不尽，一句话就是一方面要抓革命，一方面要抓生产，不要妨碍生产。中国的伟大的工人阶级的代表，我们不能像学校一样，不能停止生产闹革命。要抓紧生产，搞文化革命利用业余时间来进行。这是我们国家的根本。你们当中有些人受到了压抑、打击，为此来北京申诉、告状，来造反。这有道理，应该。但有一条，要不妨碍生产。生产是大道理，对大道理有了妨碍，小道理要服从大道理。""要抓革命促生产，生产上不去，我外交部长脸上无光"。

全总书记刘宁一最后说："中央领导同志在百忙中跟同志们见面，我们表示感谢！周总理、陈毅副总理的讲话，希望大家认真讨论。我相信同志们会认真执行的。同志们递条子提出来的问题，我们转给有关方面认真处理。"

这批全国进京告状的工人代表满意地散会，打道回府了。武汉"工总"进京告状的代表也返回了武汉。这时，湖北省委、武汉市委已经同意了武汉"工总"的要求，并指定省政协办公楼——"红楼"作为武汉"工总"的办公地点，仅武汉市政府每个月就给"工总"1500 元的活动经费，所需物资、汽车由省、市委协调解决。

这天，周恩来对以西安交大为首的红卫兵要求派学生代

表列席中共陕西省委三级干部会议一事作出批示："主席确实说过，红卫兵和革命学生不要参加党的三级干部会。"

11 月 30 日夜，周恩来又在中南海小会议厅接见成都、昆明等 17 个单位代表。他进到会议厅后，刚坐下来，看到会的人名单中有宜宾的刘结挺等 4 人。他按照名单一一点名和他们认识，接着又详细地看了成都地院 11 月 30 日打来的长途电话记录，随后问到："'工人造反兵团'北上了 1000 多人？"

代表回答："已经到北京了 64 人，还有 1000 多人在步行，他们要见毛主席，要把成都地区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向中央反映。"

昆明代表反映了他们的情况，说李井泉到昆明后，保守势力大为活跃，在学生中大挖红烙印、黄烙印、黑烙印（指阶级烙印）……周恩来听后说："什么！这些怪名字，真是谭立夫思想!"

接着，周恩来又让贵州代表谈贵州的情况。还问及贵阳保守派有多少人，有没有组织工人、农民斗学生？

代表回答："从 6 月就开始了。逼死了学生一名，还有两名坐牢的，《十六条》公布以后，还逼疯了一个人。"

周恩来关心地问："坐牢的出来没有？一直持续到什么时候？"

代表回答："一直到现在。11 月 2 日又打死了一人。"

周恩来问："是中央会议以后！是谁打的？省委没有处分吗？"

代表回答："17 日又打伤了 22 人，都是小学生。"

周恩来气愤地说："这还是第一次听到！"

周恩来又说："各地红卫兵要求参加省的三级干部会议，以致使得省、市、县好多地方的会议都没有开好。我们说过：让他们自己去开。开了，好改正，好做工作。有些地方的左派还问是否毛主席说的，我给他们说：毛主席说过。这个会议是党的会议，好多红卫兵还不是党员。要参加会议，这不是主要的，主要的是让他们关上门，冷静地考虑一下问题。红卫兵一进去，批评他们，吵起来，对立起来，他们就不能冷静地考虑问题。我的意思是让他们开好这个会，在群众中检讨好，做好工作。文化大革命都无经验，全国都是这样，一下子大民主，他们搞不惯，有些人有抵触，但不是全部，我们争取他们转过来。"

接着，周恩来又听了重庆、南充的代表反映情况。他详细地询问了各地保守势力和左派的人数，过去的情况，现在的情况。当听到有的学生、工人被斗、被关、被打时，周恩来都表现出极大的关怀与同情。

当听到代表反映南充礼堂把李井泉的像和毛泽东的像并挂时，周恩来惊奇地问："是真的？"

代表说："是真的，取下来前还照的有相。火花公社就

是李井泉蹲点的地方，针插不进！”

周恩来又说：“怎么这么大影响！你们要做工作哟！不会是铁板一块，要想办法做工作，要说服，要宣传，要跟他们在一起，不要说他们都是保皇派。要同情他们，说服他们，想办法分化他们！”同时还鼓励大家：“你们和他们辩嘛！他们有什么理论水平？我看还没有你们强，不革命才会出现匈牙利事件。”

接着，周恩来又详细地倾听了自贡小代表、13 岁的“历史反革命”王典新叙述他所遭受的迫害。王典新的父亲因为他被吊打 8 次，不给饭吃，还被捆起来，边打、边游行。最后，由于王典新死也不改变自己的观点而被家中断绝了关系。他是冒着危险在南下同学协助下逃到北京的。

周恩来在听王典新小同学的控诉时，也忍不住流出了泪水，但立刻又抑制住了，随即问：“市委书记是谁？”他鼓励和安慰王典新同学说：“你父母是不得已的，你到了北京，回去以后，你父母是会欢迎你的。”又说：“他们说你是暴徒，当小暴徒也很好吗！你了不起！年纪这么轻，回去好好奋斗吧！”

最后，周恩来又想起了宜宾的刘结挺他们 4 人，这时已是深夜 24 时 40 分了，周恩来只好和刘结挺他们另约时间单独谈。临走时，周恩来再一次和自贡王典新小代表握手，并亲切地对他说：“努力奋斗，再加一把劲！”

11 月，北京铁道学院附中《红后代》“铁血纵队”贴出《中学生问中央文革——就中学两条路线问题》的大字报。大字报中说：

“中央文革小组深入群众不够，自展览馆会议以后（10 月 28 日），中央文革小组对中学运动是不够深入群众的。……中央文革小组的一些同志经常在上边发议论，对一方是表示坚决的支持，看作是坚定的革命左派，而对另一方表示不满意，以至形成比过去更加规模的一派压另一派的情况，更有些人把中央文革小组某些同志的讲话，捧作圣书经典，大力翻印和学习，这些人一遇到什么事情，便说中央文革小组同志是怎么说的。自 7 月 28 日后中学生对毛主席著作没有更好地学习和掌握。有些同志根本就不学。十六条也没有深入学，运用的也不好。

十六条说得很明白，要让群众在这个大革命运动中，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决不能采取任何包办代替的办法，实际上，中央文革小组的一些同志的讲话，已经束缚了一部分人的思想，阻碍了群众的首创精神。”

“大部分是出身工、农，革干、革军、革烈的在校的学生，难道他们都是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吗？难道这些最先起来造反、同阶级敌人有着刻骨仇恨的小将们，会在革委会里制造所谓斗批改吗？大多数的干部子弟是要革命的，他们同党同毛主席有着深厚的阶级感情。在旧社会里我们的父母

受尽了鞭打和饥饿，万恶的地主和资本家吮吸着他们的血汗。他们起来反抗了！他们跟着毛主席造旧世界的反了！他们在炮火纷飞的战场上出入枪林弹雨，用对人民的忠诚和鲜血打天下！我们一想起这些，一股子承父志的烈火燃满了胸膛，一想起这些，我们就无限感激毛主席，无限热爱毛泽东思想！难道他们的孩子会忘掉这一切吗？会背叛党的事业吗？”

11 月 30 日，北京林业学院李洪山又在“红卫战斗兵团”负责人赵全来的协助下，在天安门观礼台前贴出“踢开中央文革小组自己起来闹革命”的巨幅标语。

第二天，12 月 1 日上午 9 时，在北京串联的福建师范学院、浙江绍兴一中、黑龙江双城县杏山中学、 黑龙江省佳木斯手工（业）中等学校的学生和林院林业系“捍批队”的师生、林院部份工人与北京林学院红卫兵李洪山进行了一次辩论会。

学生们问李洪山为什么提出“踢开中央文革小组，自己闹革命”这一口号？

李洪山说他的理由有三：

一、根据十六条中的第九条，中央文革小组只能是起桥梁作用的。不管是哪一级的文革小组都是经过群众全面选举的，像巴黎公社那样。十六条中，并没有讲中央文革小组可

以不经过群众选举。中央文革小组没经选举产生，不符合十六条精神。因此，必须踢开。要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

二、文革小组成员坐在上面，做官当老爷，不深入下面，不调查，都是蹲在北京，不到外地。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就是钦差大臣满天飞，夸夸其谈，乱发议论。副统帅林彪同志讲，要好好听听最高统帅的话。中国只有毛主席才能领导。任何事物都要怀疑，怀疑一切。周总理、江青、陈伯达等的讲话都要用最高指示去分析。什么东西都要怀疑。现在北大聂元梓搞得四分五裂，有新北大红卫兵、北大红卫兵、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井冈山战斗队等等。这就是中央文革小组造成的，是谁我就不说了。总之，扼杀了群众的首创精神和智谋。

三、中央文革制造分裂。10 月 6 日三司会议上，江青说："要坚持原则，讲究策略，要用阶级观点分析多数派、少数派。"这是分裂的开始。陈伯达讲话要冲垮修正主义红卫兵，传单满天飞。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全国哪有那么多的修正主义红卫兵？"现在是大民主，所以我才写这幅革命的标语。有什么不合法的？！法律上也没有规定，我们有自由言论的权力。要在前三年，我写了就不在这里呆了。我写的都是革命的大字报、革命的标语。即使是右派，也要放在运动后期酌情处理呢。"

他还说："谭力夫的讲话，陈伯达讲是一株大毒草。我说是革命的演说，基本精神符合毛泽东思想。""批判谭力夫讲

话，是群众斗群众。发动了95％以上的学生来批一个普通学生，这是把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引向群众斗群众。即使是右派现在也不能批判，要放到后期去处理。”

12月1日，上海陆荣根再次贴出炮轰陶铸的一万多字的大字报，题目是《再向陶铸开炮》，遭到了一些人的殴打。他患病后回到上海家里，于1967年2月12日在上海病故。

12月1日晚21时24分到2日零时55分，周恩来在中南海国务院会议厅接见大连铁道学院“红色造反团”21人。

当天，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第三次发出通知：一律暂停乘火车、轮船、汽车来北京和到各地进行串连。

时届严冬，已有10万人挤到大寨，又有10万人挤到井冈山，还不知有多少万人挤在韶山。天冷，粮缺，路塞，一些地方向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告急。军队动员了一部分部队连夜赶做大饼，并派直升飞机到大寨、井冈山空投大饼、衣服、毯子。在空投现场，成千上万的红卫兵噙着热泪，连声高呼“毛主席万岁！”

12月2日，北京林业学院“红卫战斗兵团”及“一二九”、“永向党”等组织贴出《看中央文革小组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执行了一条什么路线？》、《踢开中央文革小组，紧跟毛主席闹革命》两张大字报。提出中央文革小组执行了一条“左”倾路线，大字报说：“像这样的中央文革小组，不踢开哪行呢？不解散哪行呢？目前它是毛主席脚下的一个绊

脚石，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绊脚石。我们必须把它搬开，自己起来闹革命，紧紧跟着伟大的统帅毛主席和副统帅林彪副主席在大风大浪中勇猛前进。”

他们在大字报中说：“敬爱的统帅毛主席，副统帅林副主席，敬请您对此调查，尽快地拨正航向吧！”

他们还在天安门两侧观礼台上刷出大标语：“中央文革小组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李洪山也跑到《解放军报》社接待站公开亮出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中央文革小组多数成员都犯了挑动群众斗群众和包办代替的方向性错误。李洪山说，他们已联合了 50 多所学校，要求解散中央文革小组。

这天，北航“八一纵队”又贴出了《三问中央文革》大字报。北京航空学院红卫兵“八一野战兵团”也贴出《也问中央文革小组》的大字报，大字报说：

“中央文革小组是为人民服务的，因此，他就应该受到人民群众的监督和帮助，为什么他们就不能受批评呢？”

“全国各地有抄总部，抄群众的家，抢档案，打人的现象发生，以至发展到冲军委、冲中南海（因为原来封机关，封报社并没有受到文革小组的批评，实际上等于纵容）这些都有中央文革的责任。更有甚者，戚本禹竟蛮横指责一部分红卫兵为什么不去投拜第三司令部足下，谁是左派就凭你戚本禹一张嘴就定了吗？告诉你，你所宠爱的某些左派，我们

不‘感冒’，许多群众也不‘感冒’。尽管他们总是以极左的面目出现，总是以左派自居，你又总是替他们涂脂抹粉，但是大家却总看他们不像。要相信群众，是左派他们自己会去争取群众，群众是讲理的，也会主动团结在他们周围，不用你们去劝说，不需要你们给几个钱，不是左派的，你再怎么做工作也无济于事。”

这天傍晚，北农大附中的伊林、涤西正在宿舍看书，两位穿着没有帽徽领章军装的女学生，推门进来，自我介绍说：“我们两个是北航的大学生，一个叫向阳，一个叫红匕首，我们赞同你们《公开信》的基本观点。”听到有支持者，伊林、涤西高兴起来，和她们你一句我一句就聊了起来，谈的十分高兴。时间已过 20 时，两位姐姐站起来要走。突然，其中一人绷起了脸，对着伊林、涤西严肃地说：“你们要知道，你们实际上是站到了刘少奇、邓小平资产阶级司令部一边！”

伊林、涤西当时就吓了一大跳，那可不是闹着玩的！原以为她们此时会亮出反对者的真面目，没想到她们接着又说：“刘少奇、邓小平有什么不好，他们有什么错，他们没有什么错。”

俩人不告诉伊林、涤西真实姓名，却重复说了她们住的宿舍：“北京航空学院女生宿舍 24 号楼西边上二楼右边第二间”，让他们有事就去找她们。

两位姐姐的话“铛”地把伊林、涤西敲醒了，张立才心一下子就凉了。他们感到惶恐，开始思考：“这大字报是不是右了？”伊林、涤西此时才开始意识到，他们那封《致林彪同志的一封公开信》，在效果上，实际上是站到了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边，站到了刘少奇、邓小平右的一边。

## 第 318 回：点名否？毛泽东又缓一步

## 周恩来，批评成都告状团

12 月 1 日，周恩来向毛泽东报送《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革命师生进行革命串连问题的补充通知》稿。这个补充通知对 11 月 16 日中央发出的关于串联的《通知》又作了四条补充规定，要求 11 月 16 日以前到北京的外地师生和红卫兵，和正在全国各地串连的师生和红卫兵，必须在 12 月 20 日以前返回原地，从 21 日起吃饭、乘车不再实行免费。

12 月 2 日，毛泽东审阅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革命师生进行革命串连问题的补充通知》稿，删去稿中“毛主席”之前的定语“我们的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批示：“退总理照办。”。这份补充通知于当天发出。

12 月 2 日，北京“三司”向所属组织发出倡议，号召造反派立即有计划、有组织地到工厂、农村进行革命串连。

这天，周恩来审阅新华社报道 11 月 28 日“文艺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会”的新闻送审稿时，在其中点名称彭真、刘仁、郑天翔、万里、邓拓、陈克寒、李琪、赵鼎新和陆定一、周扬、林默涵、夏衍、齐燕铭、田汉、阳翰笙等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三处文字旁画了双线。随即，他将阅后的送审稿报毛泽东审批，并附信说明：

主席：

这一报道，已经中央文革小组通过，并经林彪同志审定，

现送主席审批。在第7、9、13页中，有3处指名批判了一些人，是否合适，请主席批示。

周恩来

十二月二日

第二天，毛泽东在审阅时，把这三处点名批判的人名勾去，并批示：

“退总理，已作修改，请再酌。”

周恩来阅后批告陈伯达、康生、江青：“速阅转唐平铸同志办，即照毛主席批改件发表。”

12月2日，周恩来召集陶铸、李富春、余秋里、谷牧和中央文革小组有关人员开会，讨论陈伯达修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十二条指示（草案）》而写成的《抓革命、促生产的八条意见》。经讨论补充为十条。

会后，周恩来致信毛泽东，报告会议情况，建议毛泽东“在三、四两日内安排谈一次工矿企业如何进行文化大革命的问题”。

北京第六中学红卫兵继“劳改所”之后，又成立了一个“砍变节”战斗组，声称：“要除掉叛变者”。12月2日黄昏，六中“红卫兵”骨干鲍陕安，对正要揭发“西纠”的学生耿小西公开行刺，耿小西身中8刀。其中一刀刺伤肺叶。鲍陕安随后被公安部逮捕。

这天，周恩来接见北京外国语学院 12 个群众组织代表，他不同意他们到外交部“摸黑线”，并说：毛主席不赞成用“保皇派”的名称，因为伤人太多。“黑帮”、“黑线”也是如此。

12 月 2 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发出由周恩来草拟的给四川绵阳转有关负责人的电报：“对从绵阳分路来京的 1000 余工人，可派人至广元做工作，务劝他们乘火车回成都，只派代表北上。”

听说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已经有几十人到了北京，成都在京的学生也有少数人主张暂时全部留下，周恩来不同意。12月2日晚，他再次接见成都地质学院代表，耐心地劝说：

“你们看，就一个四川，我已经和你们座谈了几次了，我不断地找你们，打电话回去，支持你们。我看西南的问题复杂得很！看起来简单，我们为什么费这么大劲呢！撤李井泉的职，那还不简单，打一个电话就解决了，一分钟就解决了。但解决西南的问题就不是我一个人的问题，这是全党、全体人民的利益！如果我个人对你们的问题随便答复，什么都同意，我这个总理就当不成了，都要起来撤我的职啦！要懂得革命不只是为了今天，而且要为明天！如果什么都做出结论，你们还搞什么革命！”

“还是让大家回去闹革命，如果一切问题都让中央做出

决定，那还要你们回去闹什么革命呢？不仅四川，还有贵州、云南，学生阻力很大，任务很重。主要是三个学校：成都地质学院、民族学院、成都大学。西南的问题还要向中央请示，运动的深度、广度发展还靠大家揭发！”

“工人来了，我们还要听一听工人的意见，廖志高来了以后，也要听听他的，可能一个礼拜以后才能解决一些具体问题，也许10天还不成，……你们留少数代表作联系。”“你们要尽快回去，争取多数，这不仅是一个学校的问题，是关系西南的问题。地质学院的保字派不是还占着主楼吗？你们要回去斗争！回去争取多数，把住阵地，和西南局、省市委斗争。……”

谈话一直到次日凌晨2时50分才结束。

接见结束的当天，12月3日，代表们回去后立即向四川告状团传达了周恩来的意见，大家同意留下代表，其余全部于第二天乘火车返回成都。

这时，廖志高他们已于 12 月 2 日深夜抵京，中央办公厅安排他们 9 人全部住中直招待所。刚进招待所他们就接到通知：“总理准备立即接见。”

廖志高他们稍事休息后立即赶到中南海国务院会议室，此时已是 12 月 3 日凌晨。周恩来接见成都地质学院代表尚未回来，趁等待的时间，廖志高到总理办公室看望童小鹏。抗战时期，童小鹏在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廖志高在地下党川

东特委，都分别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工作了较长一段时期，见面后很自然地谈起周恩来的近况。

童小鹏说："文革以来，总理简直忙得不可开交，国际国内、大事小事都得管，头绪多，矛盾大，经常通宵达旦工作，很难安安稳稳地睡上两三个小时。他要办公室几个秘书轮流值班休息，自己却一直顶着干，经常搞得精疲力竭，看到他这样毫不考虑自己地拼老命，大家既着急又担心，真令人心痛。28 日那天早晨，他通宵办公后正准备休息，得到你被抓上路的消息，就一直坐在办公室等着同你通电话，根本没有休息。即使让他去睡他也睡不着，真拿他没办法！"

廖志高听后心情十分沉痛地说："我们工作没有做好，这次又给他添了不少麻烦，实在感到内疚！"

当廖志高回到会议室时，先期回京已向周恩来汇报过"兵团"情况的北京学生郝小林和冯培新也来了。

大约凌晨 3 时过后，周恩来进来了，他刚一坐下就首先表明：

"从 11 月 27 日知道你们在成都火车站的情况后，就一直关心和跟着你们，到广汉时发去的电报上称呼'造反团'，没有'革命'两个字，这只是个简称，没有轻视你们或其它的意思。"

接着，他对在成都火车站发生的拦车、抢车行为提出批评："你们 11 月 27 日要求来北京时，就有 79 名工人强行

上车来北京，他们到北京来，我们是要招待的，但是我们不能承认他们的这个行动是革命的。这次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领导和发动的，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进行的，这同我们过去革剥削阶级的命是两回事。你们有权利批评西南局和四川省委，但不能拦车、抢车，把交通运输搞断。你们的革命行动我们支持，但不是每一项具体行动，特别是错误行动也都要支持。拦车抢车、影响交通不仅不是革命行动，而且是错误行动。你们的组织名称是‘工人造反兵团’，这样乱干，还像个工人阶级的组织吗？像个‘兵团’这样的军事组织嘛？造反，也要看造什么反，造谁的反嘛！”

周恩来转向廖志高说：“听说你们已经签字承认他们抢车是革命行动，这是错误的。这不对嘛！你承认我们不能承认。”

他又对林云钦他们说：“你们批评省委的错误，是对的，但不应该抢车，你们抢车是错误的。你们斗争的大方向是正确的，但不一定每项行动我们都支持。四川省委承认你们抢车是革命行动，这是不对的。”

林云钦在汇报中说，目前已经上路的人动员不回去，代表也难推选，他代表“兵团”要求总理允许他们全部来京。周恩来坚持表示不能同意。

林云钦反映：厂领导还在转移“黑材料”……

周恩来：“对类似问题，可以派人和工人共同检查。材

料如果真正交完了就算了嘛。如果现在还在转移‘黑材料’，就要罪上加罪。”

他又耐心说道：“你们来京要求解决问题，我们三家在一起，三头对面，大家都要讲真话。我事先没有跟廖志高谈过，大家都要诚恳坦白。现在正在绵阳、广元的工人，可以派100名代表到北京来，最多不超过300名。我们抽时间跟你们谈，但具体问题还是回四川解决。”

“工人到北京问题，中央的态度很坚决，就是不能同意全部都来，只能派代表，这一点我们决不松口。步行来京我们也不赞成，你们不怕苦的精神无可非议，但这会花很长时间，必然影响生产，这样的行动我们决不支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仅不应当影响、破坏生产，还应当促进和发展生产嘛！你们是工人阶级，应该懂得这个道理！”

“最近中央刚刚把红卫兵串连暂时停下来，准备加强交通运输，抓紧在冬季抢运生产上急需的原、燃材料和物资，这是当前十分急迫的大事，你们也替中央想想，能不能答应你们的要求？中央的意见很坚决，就是不赞成你们全体来北京，只能派代表来，你们已经是最高指标的代表团了。”

周恩来苦口婆心一再说服，但林云钦仍然固执坚持他的要求，而且态度急躁，语气也较生硬。这时周恩来生气了，他说：

“那好！林云钦同志，我们两个人换个位置，你来当总

理。如果全国都像你们那样，把交通搞断，影响了生产，你怎么办！？你们一两千人的队伍都要步行来京，走三千多华里，而且越往后天气越冷，遇到这种情况，你说说该怎么办！？”

一阵沉默之后，他又批评廖志高：“听说你同意派汽车运工人？”

廖志高点头说：“是。”

周恩来提高语气说道：“我在这里公开宣布：这是错误的！”

他又对廖志高说：“你们是瘫痪下来了，你们都想把矛盾上交给中央。你们来了，我们当然要帮助你们解决问题，但是对于你们的这种做法，我们感到很恼火。”

这时，林云钦不再吭声了。后来在第二次接见会上，林云钦主动向周恩来承认错误，诚恳地作了检讨，周恩来说：“有错误，认识了就好！”

回到招待所，秘书带着埋怨情绪对廖志高说：“下面干部的处境那样困难，签字、表态、派车都是迫不得已的事，今天还遭总理批评，特别是当着‘兵团’那些人的面来批评，我硬是想不通！”

这时，廖志高给他讲述了一段自己亲身经历的往事：“延安整风抢救运动中，一些在四川地下党工作过的同志被错误审查，为了弄清和解决这些同志的问题，1943 年春，中

央把我从重庆调回延安。先让我在中央党校学习，接受组织对我个人的审查，由于有的同志不了解地下工作，给我提出：‘重庆是国民党最高领导机关所在地，特务横行，你在那里呆了六、七年之久，又是地下党的头头，为什么没有被捕过？’等无法回答和解释不清的问题，而且一直纠缠不让我过关。我想不通，去总理那里倾诉自己的委屈情绪和困难处境。不久，总理来到审查小组，首先向大家介绍白区地下工作的特殊性、危险性和所处的复杂环境，然后当着大家的面批评我的委屈情绪和态度，要我正确对待组织的审查，对大家提出的问题，要采取欢迎和实事求是的态度。不是事实的可以申辩，但不能同大家顶撞争吵；当然也不能什么都包揽下来，更不能投人所好，随便乱说，这不仅给自己同时也会给组织上带来更多的麻烦。总理对我的批评，实际上也是讲给大家听的，这以后就再没有人纠缠，我也很快顺利地过了关。”他接着又说：“总理今天对我的批评本来就是正确的，我丝毫没有感到委屈，特别是当着大家的面来批评，实际上也是讲给大家听的，是对我今后工作的支持，是对我们的困境解围。”

事实证明，以后“兵团”的人来逼廖志高签字表态的情况，确实大为减少。

12月4日凌晨1时，周恩来接见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代表和刚抵京的成都磷肥厂和人造纤维厂的5位代表。接见

时在座的有国务院秘书厅毛绳墨，中共中央办公厅庚午。周恩来首先问了磷肥厂及纤维厂的生产情况及工厂人数、产量和投产时间。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给周恩来看“兵团”来的电报。

谈到磷肥和人造纤维两个厂已分4批共计114人抵京时，周恩来对这两个厂在座的5位代表严厉地说：“光你们两个厂就来了100多人，有的还是拿着学生串连免费票，冒充学生抢上火车来的。你们都是工人阶级，我倒要请教请教，如果全国都这样搞，行不行？！这种搞法我不能同意，不是代表的人到了北京我也不接见。你们5位代表要给其余109人讲清楚，不能再乱来！”

接着又对廖志高说：“听说学生免费票是你们的省长同意给的，省长不执行国务院的指示，慷国家之慨，这哪能行呢？”

周恩来问林云钦：“你们的人还在来嘛，还步行吗？你们指战员要学会三八作风，《三八作风歌》你们会唱吗？唱了就要会用，怎么工作不起作用呢？！”

林云钦：“我们大家一路上一直在做思想工作，但是阻挡不了，群众仍然步行来北京。”

周恩来问成都磷肥厂代表：“你们也是强行来的？”

成都磷肥厂代表答：“这不怪我们群众，应该由‘兵团’负责人负责。我们是招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

周恩来：“你挺会说的！”

周恩来接着问：“12号的大会你们‘兵团’有多少人参加？”

林云钦答：“1000多人。”

周恩来：“杨仲述带走多少人？”

林云钦答：“1000多人。”

成都磷肥厂代表说：“27号早晨，成都火车站的广播站为了不让我们的同志到北京来，广播说：周总理打来电报，说不要大家去。重大‘815’的同学去问，他们只拿出一些传单来，后面有几个钢笔字，所以大家不相信这份电报。”

周恩来：“27号发出的电报你们不知道，这不怪你们。你们第二批是怎么上车的？”

一个姓刘的代表答：“我们上了68次快车，车站广播说：若有一个‘兵团’的人上车，就不开车。挑动学生斗争工人，他们派纠察队赶我们下车。我们‘兵团’同志向红卫兵解释清楚后，得到了红卫兵的支持，结果学生和我们一起派代表找到鲁站长，站长说有一个‘兵团’的人上车就不开，要买车票才开车。我们共同到省委和高教局找李大章，李不在，并听说，廖志高在新都也听说可以派代表到北京来。我回车站后，林××他们13个人已经走了，后来我们乘上到哈尔滨的火车，取下了袖套来的。”

周恩来笑着说：“你们是伪装红卫兵来的？第三批怎么

来的？”

刘答：“带了五角钱买了一张车票来的。”

周恩来：“第四批怎么来的呢？”

刘答：“李大章签了字买票来的。”

周恩来：“连省长也不执行中央指示，告状是许可的，派代表嘛！能在当地解决就在当地解决。全国各地都有人来。学生支持你们的革命行动，打电话来。只要有一处来，别处都来了。

你们‘兵团’在途中的很多，广元、西安，紫铜都有，有两批到了广元，也有到西安的，如果他们再来，我就派你们几位回去做工作……在紫铜的，我已委派当地县委书记在做工作。在紫铜的也可以推派代表到北京，其他的回家。他们都是好意，你们领导还不能命令他们，我们一边称赞一边说服他们嘛！”

接着，他对成都磷肥厂、成都纤维厂的代表说：“我不同意你们两个厂的做法，罢官要考虑嘛！组织是合法的，‘黑材料’要集中，保证你们活动自由，要罢厂党委和局党委某些人的官，要跟省党委商量，层层负责嘛！你们到齐了就有几十个厂罗！注意有冒充你们‘兵团’的，成立了联络站，要好好整顿一下。帮助是要帮助的，可不要打架。你们白天可以出外联系。我昨天接见了你们，今天又接见了你们，明天还要接见你们。你们回去后，一定要给全纵队指战员说我

是要接见他们的，只不过方式不同罢了。

我要抓住你们几个人不放，要把运动搞好，首先组织好，把你们两个厂的基础打好，把人员集中起来嘛！你们两个厂的5个代表，1个小学生、两个初中生、两个高中毕业生，很有组织能力，打不散。你们用4种办法来京，冲散了，有集中，你们两个厂很有战斗力，有斗争经验。不过我首先声明，我不同意你们这样搞，你们派代表我还是接见的，将来你们全体我也是要接见的。”

在此期间，11 月 28 日，四川成都“成都产业工人战斗军”，简称“产业军”成立，原来的“工人纠察队”、“工人赤卫队”，几乎全部转为“产业军”。

“产业军”是于 11 月 25 日召开的第一次碰头会。而后于 11 月 27 日晚上，在红照壁礼堂正式召开筹备会，有成都地区 17 个单位 40 多代表参加，最后选出 21 人组成筹备组织，定名为“成都产业工人战斗军”。

第二天凌晨，11 月 28 日，“产业军”分别向毛泽东和党中央发出两封“致敬电”，并于当晚，砸抄了“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总部。12 月 1 日，他们在红照壁礼堂正式挂牌，并向全市散发成立《宣言》。

第319回：叶剑英，接见学员李基才　武汉市，“职工联合会”成立

12 月 2 日下午 16 时 30 分，叶剑英在刘志坚等人陪同下，在京西宾馆接见了李基才和兽医大“红色造反团”的代表董会瑜、孙丕真 3 人，在座的还有全军文革办公室副主任彭飞等人。

叶剑英和他们一见面，刘志坚就说：“兽医大已经围攻了李基才，被批斗过了。”

叶剑英笑呵呵地说：“我就怕多数派围攻你，结果还是围攻了你一下子吧？这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要经受锻炼嘛！”

听取了李基才等人的汇报后，叶剑英说：“我想讲一讲你们兽医大的情况，你们兽医大学也是国民党那个老摊摊，你们回去应该好好地斗一斗、造一造反了。二医大也是国民党的老摊摊，也应该好好造一造、斗一斗，把那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老权威斗倒、斗臭。过去全军多个院校搞了一年多整风，结果搞的不好。我们一定要应用文化大革命的精神，特别是发扬你们少数派的造反精神，好好把兽医大学，把全军院校好好造一造，造成一个亦工亦农、亦文亦武的合乎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这要花很大的劲儿。怎样搞好呢？要集中全校的革命力量。现在一个学校分好几派，听说北大有 87 个组织，这样就集中不了力量，连文革委员会也成立不起来。你们有几个组织？”

答：“60 多个组织。”

叶剑英说：“这还了得。多数派中有左派，少数派绝大多数是左派。现在你们要壮大左派，争取中间派，尽量团结大多数，孤立极端

反动的右派。”

叶剑英接着说：“李基才呀，上两次军委开大会，也不是因为你递那个条子想打击你。我们支持你们，就是你们左派敢于斗争，不善于斗争。两次讲话就是要用很大的劲儿扭转，我们准备还要召开代表座谈会，开个会，昨天我们还开了一个会，专门研究如何支持左派。有些地方出现了半夜抓人，车轮战术，把斗争对象搞得精疲力竭，还有的私设公堂，严刑拷打，戴高帽子游街、罚跪、低头、披麻戴孝、劳改、画花脸、抄家，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就冲中南海，冲国防部。这样脱离群众，群众反对，这样发展不了队伍，左派队伍不能壮大，人家同情你敢干，但不敢加入。你们兽医大学‘红色造反团’做得还好。因为刚成立嘛！哪个教员反动，可以批判，要抓罪证，但不能去砸他们的坛坛罐罐，你们把箱子砸了，还得给他们做一个。发下来的薪金买来的生活用品都不要抄。

北京有 8 个艺术院校，少数造反派被压得很厉害，我和戚本禹同志一起去大力支持他们。那时我有个讲话。”

代表说：“我们都看过。”

叶剑英继续说：“你们把老首长整垮了，把你们都提成司令、部长？部长、司令将来都是你们的，我们要交班，但现在时间还不到。”

大家笑了。

叶剑英接着说：“13 日、29 日的讲话，我是从全军的利益出发，从最高峰出发讲的。主要是根据林副主席讲的做好样子的指示来讲的。国防部、中南海，红卫兵都没有冲过，我们自己冲自己的司令部，解

放军打解放军，那还行吗？解放军打解放军世界上也没有过，这个东西若不批评，将来对继承人有很大影响。我们两次讲都是抓住这两件事，中南海是毛主席住的地方，国防部是林副主席办公的地方。抢车票、占车厢，连红卫兵都不如，红卫兵说你们这个解放军不能学。

我不是不讲多数派不敢斗争，讲了他们会说，我们怎么不敢斗争？对多数派我们另外讲。多数派好像很注意策略，实际上是不敢。将来你们兽医大、二医大要有个冲劲，要带多数派，所以如果你们永远是少数，是斗不胜的。想法通过壮大你们左派队伍，把中间派争取过来，甚至把对立面消除，这样才能团结起力量，把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斗垮、斗倒、斗臭，才能集中力量搞斗批改。

这两天座谈一下，两万人不要开大会，开个代表会，代表多一些没关系，看 20 个怎么样？主要讲一讲回去怎么搞的问题，你们看怎么样？”

代表回答：“我们很需要首长给我们作指示。”

叶剑英：“以前开了两次会，我们两次都扭了，都是 13 日会后有些不好的影响。”

彭飞插话：“主要是有人歪曲了首长的意思。”

叶剑英点点头说：“接待站的人说 29 号的会议不要开了，我说还要开。要消除不良影响。我们还要开会来纠偏，使你们懂得策略。这个会就是要很好地支持左派和少数派造反，当然也不要小野心家。什么是小野心家呢？就是学校里你串联三、四十个人，我串联二、三十个人成立什么组织，当个小领袖，像北大 87 个组织那样。左派敢于

斗争，但是不善于斗争，我们以后就是要很好地支持左派，还要相信多数派中是有左派的，大多数是革命的，叫他们和你们很好地合作。”

“今天接见你们，和你们交交心，我们交交底，主要是把 13 日的讲话说一说，不要检讨。为什么 13 日四位副主席都来了，就是要用大力量来扭，不这样不行。还有一点要注意，我在 13 日讲‘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话不一定这样讲，但实际上应有这样一个警惕。文化大革命确实有坏人捣鬼，教员中也有，学生中也有，有些人的老子被打成黑帮、右派，有的自杀了，他们就打入左派，把左派打得乱七八糟，故意搞得越‘左’越好，利用青年的热情左搞右搞，使真正的反动派坐山观虎斗，使他们舒服了，这就不行。当然斗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也要实事求是。”

代表们说：“我们打算来 7 名代表，不至于这样突然。”

叶剑英说：“这方面得向你们作检讨，有时就对你们发火。”

这时外面来电话，叶剑英接完电话后说：“中央要开会，今天就谈到这里。你们回去好好干，把兽医大学那个旧摊摊彻底打乱，把兽医大学变成毛泽东思想的大学。你们要总结串联的经验，整理汇报材料，你们回去就要变成领导力量了。我明年秋天到你们那里去，看一看你们学校的新面貌。”

代表们回答：“我们一定不辜负首长的希望，要把兽医大学变成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

最后，叶剑英和李基才互相赠送了《毛主席语录》，叶剑英分别给 3 个学生的语录本题字留念。给李基才题的字是“李基才同志留念”，

给董会瑜、孙丕真的题字是："关心国家大事，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12 月 8 日,叶剑英出席军委召开的 13 所军队院校师生代表座谈会。有人劝他不要去，弄不好现场就会批斗他。叶剑英还是去了，在会上，他针对有人攻击他和陈毅在"十万人大会"上的讲话,据理说道："有人不是要搞大民主吗？他们有讲话的自由,我也有讲话的自由!"

因为有林彪的指示撑腰，他理直气壮地说："军委、总政没有反动路线问题,军队自上而下不存在一条黑线,不但没有反动路线,而且始终是同错误路线作斗争的。"

12 月 10 日，叶剑英在军委、总政、全军文革小组主持召开的军事院校代表座谈会上直言不讳的说道："冲进国防部严格的说是政治上的大错误，严格地说那就是反革命。"

"11 月 29 日本来是来送行的，我本来不想讲，起了个稿，叫刘志坚念，后来肖华主任要我讲，才讲了几句。我三令五申，小声讲不行，就大声讲；肤浅批评不行，就严厉批评，错了我负责，有人说我的讲话是棵大毒草,他们说是黑话就是黑话吗？他们说是毒草就是毒草吗？他们有他们的言论自由嘛!"

《湖北日报》11 月 16 日被学生封了，18 日张体学与他们谈判，支持学生们的行动。11 月 20 日，湖北省委发出《省委关于湖北日报在文化大革命的宣传中所犯严重错误的检讨》，承认指使报社拍摄学生造反活动照片、错误理解报道林彪"9.15 讲话"精神是压制和打

击革命群众，承认“错误地突出报道省委负责同志活动，错误地突出报道省委的作用问题”，以及报道和提出“教育革命口号”和“报道不实问题”。11 月 24 日，根据湖北省委指示，《湖北日报》编辑部发出《关于我们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所犯方向路线错误的初步检查》，承认宣传报道中的一些错误。

湖北省委和《湖北日报》编辑部终于做了检讨，但并没有因此而得到学生们的谅解，而且还遭到学生的进一步指责和批判。支持湖北省委、武汉市委的工人、干部及各单位的四清工作队队员和积极分子，也十分气愤局势的这种发展，他们抱怨和抗议省委对造反派的一味“无原则的让步和投降”，以致对省委的妥协退让行为产生怀疑。他们历来都是紧跟各级党组织的，认为各级组织就是代表中国共产党。虽然文革开始后，他们也在领导的授意或安排下，纷纷成立了类似“赤卫队”的群众组织，但总是受到造反派的指责和捣乱。尤其是“工总”成立后，造反派有了全市性的组织，行动起来声势和规模都很大，因此，这些群众也想成立一个类似的组织，可以与“工总”抗衡，在更大的范围表达他们的意见。

11 月 25 日，武汉重型机床厂的原“四清”工作队队员崔景德、杨庭峰等三人来到市委工交办，申请成立一个全市联合的工人组织。工交政治部刘振邦主任接待了他们，非常支持他们的想法，同意他们尽快成立。

12月2日，经过武汉市委的酝酿，市委组织部长辛甫直接牵线安排，武汉重型机床厂的“四清”工作队员和积极分子正式向全市倡议：

成立 “武汉地区革命职工联合总会”，简称“职工联合会”。这个倡议得到了武汉市各级领导和干部、各单位积极分子们的支持。

12月11日，“武汉地区革命职工联合总会”在武汉市体育馆正式开会成立了。市长刘惠农到会讲话并授旗。会上推选了杨庭峰、崔景德、张立华、何其华、冯正湖、冯根根、周德明、张用久、汪大榜9人为常委，办公地点设在汉口万松园路的武汉市总工会里，一号头头叫崔景德，是武汉重型机床厂技校的电工，曾任“四清”工作队队员。市里还拨了棉被、自行车、办公桌等物资。市委秘书长黎智说：

“工人总部每月要的经费是三千元，你们只要一千元，不够用，就批准你们每月两千元作为活动经费。”

从此，武汉有了与造反势力相对抗的、强大的工人和基层干部的组织——“职工联合会”。“职工联合会”的最初成员主要是全市的“四清”工作队队员。在辛甫等人的指点下，“革命职工联合会”又推出武汉重型机床厂老劳模马学礼为名义上的领袖，果然号召力极强，力量迅速壮大，很快发展成为40万人的组织。他们抵制造反派批判省委的行径，强烈反对封闭《湖北日报》，针锋相对提出：《湖北日报》立即复刊；解散“工人总部”；坚决反对学生到工厂串连。

12月2日，陶铸接见武汉“二司”赴京代表团，根据中央意见和他自己认识，讲了5条意见：

其一，中南地区文革运动搞得不好，整个地区都执行了资反路线；王任重同志对湖北的问题要负责，从中南来讲，王任重同志接任中南局第一书记不久，整个中南的问题，我仍要负责任，虽然我已离开了。

其二，支持革命师生和群众彻底揭发批判湖北省委所犯的严重错误；全省打了那么多“右派”、“反革命”，排斥和打击南下串连的革命同学；抓南下“一小撮”；派人冒充“解放军记者”；唱《湖北省委就是好》的歌子，张体学乘敞篷汽车检阅红卫兵，等等。这些都是很不正常的做法，是很错误的。……

其三，少数派要争取、团结大多数。

其四，湖北省委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而且是比较严重的，责任主要由王任重同志来负。待王任重身体好一些，一定回湖北向革命师生作检讨。

其五，关于“湖北日报”问题的意见，陶铸承认学生的揭发批判是正当的，停刊十几天没有什么关系，但是，长期不出报也不太好……要看是谁的责任最大，就让他一人停职反省，向革命师生作检讨；被打伤的同志要赶快治疗，责任不在工人、学生，而在湖北省委，省委要检讨，向被打伤的同志赔礼道歉。告诉大家，不要上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人的当。

讲话要点由陶铸办公室整理、陶铸本人审阅同意，于12月6日印发。

12月15日，湖北省委正式决定停止出版《湖北日报》，这一行动被群众和干部普遍认为是向造反派投降。

12 月 2 日，武汉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简称“长办”的 1000 多名干部，因为对湖北省委的一封“11、16 来信”有看法，跑到省委洪山宾馆造反。省委秘书长李衍授接见他们时，不由自主地说：

“还是头一回看见干部起来造反。”

“长办”1000 多名干部与省直工委进行了长达 9 天 9 夜的谈判，省委书记王树成代表湖北省委出面与他们周旋。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湖北省委串联了“长办”的另一派群众演了一出双簧，由他们把王树成抓走。于是在谈判桌上，造反的群众没有了谈判对手，一时不知如何是好。后来，他们决定上北京去。为了筹路费，就在谈判现场借钱。大家一角钱一角钱地凑，最后凑了 1000 多块钱，12 月 12 日由赵早安领着几个人上北京去反映情况。

他们到北京后，找到水利部部长钱正英 ，由钱正英帮助把材料转送周恩来。12 月 19 日，钱正英转达周恩来指示：“湖北省委信件是错误的，‘长办’同志应该造他们的反。”

当赵早安等人回到武汉，重新找到王树成，说了周恩来的意见。王树成感到很吃惊和难以置信，说：“你们先等着，”就进到屋里。过了一会儿，他出来宣布说：“明天我去‘长办’。”

12 月 21 日，王树成代表张体学和湖北省委，向‘长办’的干部承认错误、赔礼道歉，同时宣布收回“11、16 来信”，“长办”主任林一山停职反省。

“长办”的这些干部就此成立了造反组织“长办联司”。

第 320 回：皖瘫痪，厅、处级干部造反　粤动荡，围攻中大图书馆

11 月 20 日下午，谢富治、刘宁一在北京听了安徽“稻香春三天流血事件”的汇报后，指出：“他们（指安徽省委）如果有计划、有组织的这样干，不是一般的错误，是严重的错误，是错上加错！退一万步，也是省委错误路线的结果”。并严厉地指出：“这是罪恶！”

安徽“稻香春三天流血事件”也引起周恩来的关注，对送到北京治疗的安徽伤员，他指示“要送进最好的医院治疗”。于是这些伤员全都送到了北京协和医院。

11 月 22 日，以安徽省政协副主席李云鹤为首的 17 名省、厅、处级干部联合发表《紧急呼吁》，明确指出：“以李葆华、李任之、杨效椿等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彻底暴露了他们反对党中央、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革命的狰狞面目”。并提醒机关干部，“再不起来同革命小将、工人同志们一道坚持斗争，就无法向毛主席交待、向党中央交待、向安徽 3000 万人民交待，也无法对待自己的革命责任心了。”

12月2日，谢富治、刘宁一等人再次接见因安徽“稻香楼”事件到北京告状的安徽群众代表。

谢富治说：“今天我和刘宁一同志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向来自安徽的全体工人、学生和全体文艺界的革命同志表示热烈欢迎。”大家热烈鼓掌。

对安徽的造反派，谢富治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并说：“有些同志受到了打击，我们对这些同志表示慰问。特别是来了一批，到北京51

人，相当多的人出了院，今天大概也来了，对这些同志表示关心，对这些同志恢复了健康，我们表示很高兴。从这件事看来，安徽的事，在省委领导中，特别是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引起群众斗群众，造成了极大的恶果。尤其是时间延续的特别长，从‘827’到现在，一直连续不断，特别是26、27（指8月）群众斗群众，后来24、25、26（指11月）又有一些工厂群众斗群众，这是我们党中央、毛主席所反对的，不允许的。”

他动员安徽代表回去：“今天我们见见面，希望你们回去，我们支持你们到家里闹革命。”

为了将一碗水端平，谢富治说：“我今天要和同志们、同学们商量另一件事。安徽的多数派，有比较中间的、保守的，但他们中的群众是要革命的，他们来了好久，我们接见你们好多次，你们是知道的，就是不接见他们。”

代表们热烈鼓掌。但谢富治话锋一转说：“我们还要准备接见他们，你们看好不好？”

代表们又是热烈鼓掌，齐声答到：“好！”

谢富治说：“多方做工作嘛！”

“我今天要求同学们、同志们做一件事。因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引起了一大批工人要徒步到北京，有的已到蚌埠，和他们商量可以派代表。今天，我同你们商量，你们‘827’给我们帮忙，和他们谈谈，还有你们工人也和他们谈谈。说北京很冷，还有180多万红卫兵，穿的衣服又很薄，来了又冻病了。”

刘宁一说："有一个时期，我们对各地方工人自发组织的问题，一开始讨论未定局，陶铸去了一个电话，只是建议，是有这个问题。到后来，根据宪法，六大自由，四大民主，所以一切革命的群众自发组织都是合法的，这不是个人所能决定的，而是经过讨论的。

有个同志讲，现在厂里的工人因为支持革命学生被扣工资，一回厂就遭毒打，不能上班，这次步行来京，要求总理解决。这个问题周总理已经讲过了，也发了文件，凡是给领导提意见，写大字报而受打击、扣工资、开除，一律不允许。中央有文件发出去的。"

12 月 8 日，安徽省委组织部组织处副处长张永哲，给省委组织部和省直机关文化革命办公室干部写了一封公开信，希望省直机关干部"勇敢站出来投入战斗"，"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省直机关干部在安徽省政协副主席李云鹤为首的 17 名省、厅、处级干部的《紧急呼吁》和省委组织部组织处副处长张永哲《公开信》的影响下，纷纷起来造反。省交通厅、省劳动局、《安徽日报》社、省广播电台、省文联等几乎都先后成立革命造反组织，而且以极为迅速的态势发展着。这时中共安徽省委的权力体系断裂了，省委的权力意志再也难以通过原来的权力体系运转了。

此时南粤广东自 11 月初抢"黑材料"旋风刮起后，愈演愈烈。到 11 月 23 日，大批红卫兵从下午 15 时起，开始包围和冲击广东省委大院，围困赵紫阳长达 15 个小时，勒令他交出"黑材料"，直至次日清晨 6 时。

赵紫阳在打给陶铸的电话中焦急地说："现在广州情况越来越紧

张，问题的焦点还是材料问题，很难处理。现在少数派（全市约 1000 多人），激烈得很。” “因为材料问题，省委同少数派的关系闹得很僵，本来从北京开会回来后是准备同少数派在一边的，但现在无法做到，反而越来越糟……平反问题，也与材料问题有互相联系，纠缠不清，在这种情况下，多数派与少数派的关系自然紧张，我们每天的时间，自己无法支配，掌握不了自己的命运。”

中山大学的群众组织在政法干校召开批判赵紫阳大会。当时中山大学已形成两派组织。一派叫“红卫兵兵团”，一派叫“红卫兵总部”。后来“红卫兵总部”又分成两派，一派以武传斌为首，更加激进。这批人从总部拉了出来，另组了“中山大学八三一红卫兵”。当时只有 30 多人，但声势造得很大。而“红卫兵总部”则联合了一些教工组织，如“红教联”之类，于 11 月 24 日，成立了中山大学“红旗公社”，简称“中大红旗”。

11 月 25 日，成立于 10 月 28 日的广州“红一司”在自办的小报《广州红卫兵》上，发出了“炮打广东省委，火烧赵紫阳”的动员令。接着在 27 日，本地和外地的红卫兵，继续冲击省委，赵紫阳无可奈何地说：“现在目标集中在我身上。”

到了 11 月 28 日早上。一批情绪激动的群众闯进了省委，在办公大楼的出入口席地而坐，静坐示威。接着，广东省委被省直“联络总部”一些人和华南工学院“红旗造反兵团”、中大“八三一”、珠影“东方红”、北航驻穗联络站、地质“东方红”、哈军工、中南林学院等 8 个组织抢走文件、刊物 378 份，其中机要局文件 142 份，中南通讯

25 份，省委文件 87 份，省委办公厅文件 31 份，四清办公室文件 93 份，笔记本 23 本，包括有组织部记载干部调动方案的笔记本。

面对抢“黑材料”的风潮，各单位人事、组织干部都慌了手脚，他们急忙将人事档案上交省委组织部，请求保管或处理。而此时的省委各部也早已被有组织的群众冲击抢砸过许多次了，自己已经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了，又怎能保得住这堆上交的“黑材料”？后来不知谁又想出了一条“交由可靠的革命群众组织代为保管”的妙计，于是把这一大批的“黑材料”秘密地转移到中山大学的图书馆内，交由当时的“中山大学革命委员会”代为保管。

中山大学图书馆是个偏僻而冷门的大楼，文革开始以后便封闭不用了，平常亦不会被人注意到，而且这座图书馆当时是控制在“中大革委会”的手里。把“黑材料”密存与此，应该是再合适不过了。然而，没有不透风的墙，事情还是被“中大红旗”的人知道了，真正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既然“黑材料”送上门来，焉有不抢之理？于是 11 月 28 日这天，成立不足一星期的“中大红旗”组织了中山大学自 11 月 9 日包围校党委，索要“黑材料”之后的第二次哄抢“黑材料”的行动，该校“八三一红卫兵”一马当先。但“中大革委会”也早有戒备，召来上千人守卫图书馆，加之这座建筑物只有一道楼梯上楼，因此“中大红旗”久攻不下，还被打伤了人。于是他们打电话向珠影“东方红”求援。

珠影“东方红”的主要负责人曹征接到电话后，当即动员全体成员前去支援助抢，同时还打电话联络其他学校的学生，一下子组织了

上万的人，从四面八方赶到中山大学的校园，情况骤然变得异常紧张。

“中大革委会”亦打电话向“主义兵”的“总派”求援，同时又打电话报告广州军区，请求派解放军过来保护……

于是，在中大图书馆周围便展开了万余人之众的攻防战，武斗十分激烈。两派之间还有上千的解放军夹在当中，这些军人手扣手地筑成了一道人墙，制止两派武斗，保护图书馆内的“黑材料”。这样双方对持了差不多一天的时间。最后“旗派”的人拼命地冲破了解放军的人墙，终于夺取了楼梯登上书库，他们砸烂了门窗和箱柜，搜到了“黑材料”。

但是，此刻楼下仍然被上万的人重重围困着，“旗派”和“总部”的人互相包围成了几个圈，继续在搏斗，包围圈当中还夹杂着解放军声嘶力竭地大声朗诵着《毛主席语录》，进行劝架，致使楼内已抢到“黑材料”的“旗派”人员无法将材料运出去。这时，珠影“东方红”的曹征急中生智，把“旗派”的女学生和珠影“东方红”的女成员组织了一个救护组，说是要上楼去救护受伤的战友，拖着解放军作掩护，与她们一同上楼，就这样冲开“中大革委会”的防线。但这些女士们进入书库后，就拼命将“黑材料”往自己的衬衫内、裤兜里塞，塞满了就猛冲下楼突围而出，被拖上楼的解放军虽然眼巴巴看着她们这些动作，但碍于她们是妇女，一时不知所措，亦无法动手制止。这时“东方红”已经备好了几辆汽车在校门外接应，等她们连人带“黑材料”上了车后就立即开走了。

事后一位“东方红”的女成员说：“这回抢到可以装满几麻包的

黑材料，但还不及存放在书库里的十分之一哩！”

她还说：“我个人就抢到了一大捆，当晚先由各人带回家里去，以后才交回给自己的所属组织。我看过自己抢到的那一份，原来是一间中学教职员和一处邮电所职工的人事档案，这些档案当中还夹杂着他们党支部在运动中斗批教职员工的材料哩，几乎每个人的档案都附有所谓言行记录，政治怀疑要点，别人对他的检举报告，后期处理参考意见等等。真是可怕，也真令人愤恨……”

11 月 30 日，中山大学发生了第二次大规模哄抢校党委机要室的事件。因为大批“黑材料”存放在机要室里，学生要求按军委 10 月 5 日的紧急通知处理，但校党委方面无人理会，于是发生了哄抢，许多桌椅柜子都被砸烂。一位学生在大字报中说：“你整了我的材料，不但不交出来，还要我同你在一起平起平坐一共协商保管，你没有资格，你的责任就是交，没有资格保管。”

从 11 月至翌年 1 月，目标不仅仅在赵紫阳身上了，追查“黑材料”的浪潮，发展成普遍冲击机关，抢档案、抢材料。全省各厅、局、部、委，无不卷入了漩涡之中。12 月 3 日，赵紫阳以电话向陶铸报告：“最近学生到省委抢材料很厉害……在学校，少数派与职工多数派关系也很紧张。现在广州各大专学校的少数派联合行动，很容易冲突起来。”

第 321 回：议《十条》，政治局常委讨论　见外院，忽闻彭真被劫走

12 月 3 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讨论《工矿十条》，林彪在会上说："会议暴露了一些思想问题，比原来是一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要坚决贯彻陈伯达同志的十条。主要是大破两种观点：一种观点是问题不少，问题也有，基本上执行了毛主席路线，和文教系统不同，第二种观点工人阶级是好的，同知识分子不一样。不打破这种两种观点就不能在工交战线上开展文化大革命，就没有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就是应付，就是被迫革命，不是欢迎革命。要打破框框，工交系统也有东西可革，有薄一波的东西，也有刘邓的影响，这些都是代表旧的东西，代表剥削阶级的东西。"

"抓革命促生产怎么摆法？要以革命推动生产。"

"讲重要性是革命第一，在时间上还是生产第一。"

当天，李富春、陶铸在工交座谈会上讲话，动员各部部长和各地方的领导丢掉幻想，积极投入到文化大革命之中。

李富春说："工业《十条》定下来了，大家有意见还可以提，明天中央还要开会讨论。《十条》是根据毛主席路线提出来的，向工人、向厂矿提出的文化大革命的意见，文化大革命的大民主是毛主席新的群众路线的体现，我们的屁股是坐在书记、部长的位子上，还是坐在群众方面，这是当前一个很重大的问题。敢不敢领导，敢不敢深入到

群众中去，信任不信任群众，敢不敢、怕不怕、信不信，讲来讲去还是这个问题。”

“目前大民主是空前的，我们的思想跟不上，学生一起来必然影响工人，大势所趋，谁也挡不了。有了《十条》好办事，业余时间闹革命，八小时工作制，可以串联，但不是强行干涉，要文斗不要武斗，有了这几条就不怕了。”

“我们现在哪一个人在群众起来后得到群众拥护了，成为群众的领袖？没有。我们现在欠债很多，时间很长，有十几年啦，就处在这个十字路口，抓革命促生产，思想革命化了，生产就上去了，短期影响一点生产是不可免的。”

陶铸说：“大家到这里来，担心生产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同志们的想法是好的。从地方上来的同志有缺点，有问题，狭窄，政治挂帅差，不像中央文革小组那样，看问题看得远，看得准，跟毛主席思想跟得紧。毛主席要搞社会主义，消灭阶级，搞共产主义。这个问题解决了，其它问题也就解决了。”

“目前的根本问题还是怕字当头。不要怕挨斗，不要怕受委屈。工厂确实有许多压制群众的东西。冲一下，生产就会大大发展，我们要坚信毛主席，跟毛主席走。”

“本质的东西是群众要革命，要跟毛主席。十几年来，我们一方面有进步，一方面有当官作老爷、怕群众、脱离群众很厉害，中央给我们那么大权力，得不到群众信任。”

“现在牢骚那么多，实际上就是抵制毛主席的路线。现在工人刚刚起来，是放的问题，不是堵的问题。十条从目前看已经够了，不能再多了。无非是搬到工厂去，革命的就支持，比较差一点的就团结争取、提高他们。过去我们搞秘密工作有什么条件？现有一点地位，完全可以做好工作，现在不解决这个问题是不行的，罢官。改变被动状态要靠我们到群众中去，把文化大革命搞好，把百分之九十五的群众团结起来。”

12 月 3 日晚 19 时，国务院会议厅，周恩来接见北京外语学院少数派代表。正式谈话前，到会学生代表纷纷对外交部派驻外院工作组负责人、外交部副部长刘新权表示不满。

周恩来对一学生说：“你今年才 20 多岁嘛，活到我这么大还有 40 年。你晓得将来会碰到什么样的牛鬼蛇神吗？怎么把刘新权说得那么可怕？”

那位学生说：“刘新权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

周恩来摇摇头说：“还不能作这样的结论。”

学生说：“我们就作了。”

周恩来：“我还没有同意。”

学生不服地说："那我们各自保留看法吧！"

接见开始后，学生们汇报了他们在该院搞了一个两条路线斗争展览会，准备到到外地巡展。

周恩来说："要提高一步，改进一下，可以出去。出去就要打响这一炮！"并提出自己要亲自去看看这个展览会，"然后再出去。"

他还问："你们学校党委检查了没有？"

同学答："没有。"

周恩来："我看你们就是对上面有兴趣，你们学校党委反而没事干了。"

同学说："工作组利用过去的思想汇报或党团组织生活会上的汇报，拿来整人。

周恩来："这是不健康的党风，这是王明搞的那一套，从苏联学来的。以后安子文也是这样，这是很不健康的党风，主席很反对。"

同学："有人不但汇报自己，还汇报别人。"

周恩来："这是全国很大的问题，一定要纠正。"

周恩来问："你们这些人代表多少组织？"

同学答："七、八个。"

周恩来："观点是否一致？"

同学："一致。"

周恩来："怎么这么多，观点一致要少而精嘛！"

说到"纠察队"时，周恩来："大学要什么纠察队，大家都是红卫兵嘛！纠察队好像是管红卫兵的，我建议取消。"

这天晚上，正在人民大会堂开会的周恩来和中央文革小组得到一个惊人的报告，说是当晚，一群来路不明的红卫兵，乘坐两辆汽车来到了位于台基厂 7 号的彭真家大门前，把一封信交给了门卫。他们趁门卫进屋看信之机，突然强行冲进大门，把刚刚睡下的彭真从被窝里抢走，并摆脱了随后追来的警卫人员，把彭真劫走了。

当晚被同时绑架的还有刘仁、万里、郑天翔、林默涵、夏衍、田汉、许立群等人。周恩来他们听后都大吃一惊，立即让吴德、汪东兴、傅崇碧、周荣鑫他们把彭真找回来。

吴德茫无头绪，不知到哪里去找？

傅崇碧对周恩来说："这件事是不是让戚本禹问一下？"

周恩来马上打电话问戚本禹："谁把彭真、罗瑞卿、陆定一给抓走了？"

周恩来说话的口气很严厉，戚本禹忙说："总理，我不知道这事，我哪有那么大的胆子啊？"

刚说完，他突然想起几天前一次开大会时，叶向真向他汇报他们批斗杨尚昆的老婆、艺术学院院长李伯钊的情况，说把李伯钊的家抄了，把她的西装也拿出来烧了。她说她们还想斗争彭、陆、罗、杨，希望得到戚本禹的支持。戚本禹当时对她说："这可不是小事情,你得请示总理。"

叶向真说："总理那么忙,我那里找得到他呀。"

戚本禹说："那你向你爸爸他们请示了没有？他们都是老革命了,你要多和他们商量,不能自己乱搞啊。"

叶向真没再说什么，就走了。

于是，戚本禹将叶向真要组织人批判“彭、罗、陆、杨”的事告诉了周恩来。周恩来听完，没再多问。

原来，在 11 月 28 日北京召开的“首都文艺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会”上，周恩来讲话时说到：“过去长期在彭真、陆定一、周扬、林默涵、夏衍、田汉、阳翰笙等反革命修正主义的统治下，文艺界成为他们抗拒毛主席文艺思想和革命路线，散布修正主义毒素，制造资本主义复辟舆论的一个重要地盘。我们一定要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坚决把一小撮盘踞在文艺界的反党反社会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统统揭露出来，把他们斗倒、斗臭、斗垮。”

次日，即 11 月 29 日，一些参加了大会的红卫兵到叶剑英的女儿叶楚梅家里开会，研究斗争陆定一的事情，参加开会的有叶楚梅的妹妹叶向真，她曾经在昨天的大会上发言；还有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 61 级学生、老红军彭加伦之子彭宁；叶向真的丈夫、中央音乐学院刘诗昆。后来，地院“东方红”头头朱成昭也来到叶楚梅家参加讨论。

中戏、北影、音乐学院和中央乐团原归文化部管辖，这几个单位红卫兵此前活动的重点在文化部。既然江青在 11 月 28 日的讲话指出了“旧北京市委、旧中宣部和旧文化部相互勾结”，为什么不把批斗“黑帮”与破“三旧”结合起来呢？为什么不找更“大个的”呢？当有人从游斗陆定一的汽车问题跳到批斗彭真问题时，与会者都热情响应，朱成昭也拍板同意。

彭真当时在家中隔离反省，警卫严密，怎样把彭真弄出来呢？红

卫兵们进行了严密的策划。12 月 1 日他们确定，行动由中央戏剧学院、北京电影学院、中央音乐学院和中央乐团 4 个单位参加。当天叶向真、刘诗昆分别在戏剧学院和音乐学院做了传达。第二天早晨，叶向真又找到电影学院的彭宁。当天晚上，有人去摸彭真的住址，研究具体抓法。12 月 3 日晚，他们做了最后的安排。叶向真主持会议，她讲了为何要抓彭真，并说已经和戚本禹讲过，戚本禹说："你们看着办。"

彭宁赞成叶向真的发言，并宣布了抓人名单，其中包括彭真、林默涵等人。接着，大家研究了"黑帮"抓来后住什么地方，中央乐团"井冈山"的陈力提出住中央乐团。最后，大家还商定了游斗路线，决定各单位在农业展览馆集合，随后沿东西长安街过天安门游街。朱明宣布，4 个单位的头头担任尖刀班、警戒等任务；刘诗昆、彭宁负责相关宣传；行动总指挥是郑国喜、叶向真、孙增华。

当晚，就发生了彭真劫持事件，整个过程历时 5 到 7 分钟。后来，他们将此次行动称之为"7 分钟闪电"。

彭真被抓走后，先被关在中央乐团的音乐大厅，随后又被转移到了西山山沟里。

知道彭真等人的下落后，周恩来和中央文革的陈伯达、江青他们的心终于放下。周恩来让吴德他们负责将彭真等人要回来。

吴德为难地说："我去可能要不回来，最好是由傅崇碧、卫戍区出面交涉，把彭真放在卫戍区监护，他们什么时候要批斗，卫戍区什么时候就送去。"

周恩来指示北京卫戍区和公安部立即把他们找回来，指出："不能开这个先例，不能随便抓人。"

但是，这帮红卫兵小将根本就不理傅崇碧和谢富治的茬。此时已是 12 月 4 日凌晨了，周恩来他们连夜接见中央戏剧学院、北京电影学院、中央音乐学院、中央乐团 4 个单位的代表。

周恩来是看着叶向真长大的，她一进来，周恩来就笑着问他们："你们怎么回事啊，把他们藏在哪里了？"

叶向真他们开始不说，只说把他们藏在安全的地方了。

12 月 4 日这天，周恩来三次接见中央戏剧学院、北京电影学院、中央音乐学院、中央乐团 4 单位"三司"所属红卫兵组织代表。第一次和第二次接见都在凌晨，第三次是在下午 16 时至 17 时，周恩来说："你们走后我们召开了中央会议，我们完全支持你们的革命行动。首先鼓励你们。我们很理解你们的这种义愤心情，现在确实像上午同志们分析的，存在反扑，要给予反击，反扑不止一次，要有多次。反扑，机关里有，学校里就更多了。有斗争的反复可以锻炼我们。尤其在北京，林彪同志负责这个地方，他们就更不甘心了。"

"我们每个行动都要估计，要再三估计，考虑到后果。但是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你们的行动是革命的，也是很成功的。第一，仅 5 分钟就解决问题了，干得漂亮！你们把警备卫戍司令部都给瞒过了。"

随后，周恩来又说："你们的行动是好的，但也不可能没有缺点，你们如何配合中央，请大家考虑。"

周恩来问叶向真下一步有什么打算？

叶向真说中央戏剧学院、北京电影学院、中央音乐学院、中央乐团 4 个单位准备在农展馆集合，然后沿东西长安街带“黑帮”游街示众。

周恩来听了后说：“你们的宣传想得很理想，做出来很不好办。长安街的人那么多，你们怎么走得动？很不好办，如果出点事情，很麻烦。所以要我来说服你们……这样搞不安全，斗争的效果也不太理想……方才开会时，我们都不同意你们这种做法，游街示众，我们感觉没把握……开大会这个办法好，可以出出你们的气，当然不仅是你们的气罗，而是公气。”

叶向真他们问：“那怎么办？”

周恩来笑着说：“我来帮你们批斗彭真好不好？”

叶向真说：“彭真是我们抓到的，应该由我们组织批斗。”

周恩来说：“我们保证，帮你们开群众大会。你们看不住，如果有坏人捣乱，你们不能保证他们的安全。你们不是还少一个杨尚昆么，彭、陆、罗、杨应当一起批判吗。你们知道杨尚昆在哪吗？我知道。我把杨尚昆带来，咱们一起批判好吗？”

叶向真他们忙问：“真的？”

周恩来说：“你们把人都交给我，开会的时候我保证把 4 个人都送过来。”

于是，叶向真他们说出了彭真一干人所藏地点，北京卫戍区奉命前往西山将彭真等人接回。接受任务的战士每人要求都带一条背包带，傅崇碧说：“做什么用，你们去想”。

彭真在西山早已筋疲力尽，一天多没吃饭，连口水也没喝，身上也未带任何随身之物，就连解手用的大便纸，也不得不用土坷垃代替。

这天，戚本禹在周恩来处见到叶剑英，笑着对他说："叶帅呀，你女儿真行啊，竟然把彭真他们都抓起来了。"

他是故意当着周恩来的面说这句话的，意思是告诉周恩来，抓"彭、罗、陆"这事与中央文革小组的人员无关。

叶剑英多聪明啊！他马上答道："哎呀，我女儿一个小孩能有多大本事，她都是在江青和你们的指导下，才能做出这么点事情。"

第 322 回：谈工交，林彪主持讨论会　反文革，一二四“三司”回击

12 月 4 日下午，一向不过问生产的林彪按照毛泽东的指示，亲自主持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听取谷牧关于工交企业座谈会的汇报，讨论通过《工业十条》。

会前，谷牧准备了关于工交座谈会的《汇报提纲》。他在汇报中谈到了座谈会上大家提到的工矿企业的三个特点，他说：“大家认为在具体做法上，必须从工交企业的实际出发，充分考虑工矿企业的三个特点：1、工交系统基本上执行党的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2、工交系统的干部和职工队伍基本上是好队伍；3、工业生产的连续性决定了生产不能中断。工厂和学校不同，不能停产闹革命。这几点同学校、文教系统、同高级领导机关、各部委、各省委的情况不一样。是不是考虑我们文化大革命的做法应当有不同。”“从这些特点出发，《十条》照顾了这些特点，如坚持八小时工作制；文化革命的活动只能利用业余的时间进行；遵守劳动纪律，完成生产定额，保证产品质量；健全领导生产的班子；工人群众不能到外地串连等。因此，拥护《十条》。”

谷牧还提到：大家还担心工厂中的派别斗争，会在生产上产生严重的后果。他说，大家担心的就是厂矿里面的派别组织，现在相当多的厂都有两派以上的组织，比如，“北京绝大多数厂矿、哈尔滨80%的厂矿、上海1200多个厂矿、天津300多个厂矿”。他举了当时南京的720厂，因两派斗争，停产半个月；哈尔滨电机厂今年约有20多万瓦的发电机完不成等例子。还说当时：“有相当多的基层企业组织瘫痪

情况严重，各级领导讲话不灵，中央精神贯彻不下去。中央关于在党委的领导下成立两个班子的指示，从中央工交各部到省市委，迄今大部分都不落实。”他建议：“工矿企业党的领导不能中断，抓生产的班子要尽快落实，抓生产的领导主要精力应放在生产上。”

他同时指出：“还有一些问题，请求中央另外采取措施：1、从全国来看，工交企业的文化大革命，还是有分期分批的必要。2、对工矿企业的规章制度的破与立，要接受历史的教训，把革命干劲和科学态度结合起来。3、群众起来闹革命，有相当一部分人是想把集体所有制改为全民所有制，临时工、合同工想改为正式工，前几年精简下去的人要求回厂。等等，这涉及体制，事关全局，请中央统一考虑。”

谷牧最后强调说：“如果上述工矿企业3个特点站得住脚的话，有这么个考虑，对于运动中犯错误的干部，恐怕不能全部采取停职。”

谷牧发言后，陈伯达讲话。他说：“讲一点个人意见，大家讨论商量。抓革命促生产的《十条》，不只是中央文革小组提出来的，而且已同各派工人商量过，并陆续有些补充，先搞了《八条》，后来根据各派的意见，补充成《十条》。”“这《十条》各派都赞成，不能说是折衷主义，实际是按主席思想搞的。”

对工矿企业中的各派群众组织，陈伯达认为：“工厂出现这些派别问题，关键不在群众，而在于工厂的领导。当群众向工厂领导提了些意见，工厂的领导干部就组织一部分人保自己，你来一个，我来一个更大的，这样就出现了各派的组织。比如北京机床一厂，组织‘捍卫毛泽东思想的捍卫团’，厂的领导把老工人、党团员组织起来，不

是捍卫毛泽东思想而是捍卫他们自己。”因此他认为：“所有的问题，症结在领导，而不在群众。领导不和群众一条心，不去说服群众，而匆匆忙忙地组织保护自己，所以沟就越来越深。我不懂工厂的情况，但工厂和学校基本是一样的问题。工厂存在的问题主要是领导和群众的关系问题。群众一提意见就怕整到自己头上，所以群众意见一出来，就赶快组织一批人保卫自己，使问题复杂化了。”他举了一些在工厂座谈中工人提到的一些例子。

陈伯达说：“《十六条》对工厂完全适用。”

对工厂中的党团组织，陈伯达说：“关于党团组织活动问题，现在在工厂里提不得，任何党团组织要在文化大革命中接受考验，接受群众的考验。匆匆忙忙，恢复党团组织活动是没有什么好处的。”

他进一步解释说：“这《十条》是广泛听取多数派、少数派的意见，还有文革小组的意见，然后东凑西凑，凑起来的。现在，工厂文化革命，用压的办法、堵的办法，产生的后果必然会出乱子。”

接着，康生发言说：“对工人阶级文化大革命，我没有调查研究，过去没有接触过，今天算第一次。对工人阶级文化大革命怎么认识，对工厂文化大革命怎么认识，我也不大很了解。近来，同波兰的左派的一个同志，谈了三次，10 个钟头，从同他谈话来看，受教育不少，谈到从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怎样变为资本主义国家。这个波兰的同志，过去是中央委员，搞过工业，谈得很详细。社会主义工业向着资本主义方向发展的情况，他们形式是‘公’，实际上是‘私’，形式上是‘新’，实际上是‘旧’，形式上是社会主义，实际上是资本主义。

过去对这些问题不大理解。”

林彪插话：“形式未变，内容变了，实际上是资本主义。”

徐向前插话：“挂社会主义招牌，实际是资本主义。”

康生接着说：“我们过去对苏联，从斯大林到赫鲁晓夫领导变，我们比较清楚，文化上也比较清楚，比如叶甫图申科到美国，到处受到欢迎；农业上，他们有自留地……等，我们也还知道一些。对工业就不大清楚是怎样变的了。”

林彪说：“把个社会主义国家怎么变成资本主义国家？农业、工业、文学、艺术、党各项政策怎么变的，要找人研究一下，怎么复辟的，我们还对这些到底怎样变的，不甚了解，怎能塞这个漏洞，要研究。昨天同周总理谈话，还谈到这个问题，资产阶级革命是经过多少次反复的，法国革命从 1789 年，路易十四上台，后来就上了断头台，拿破仑上台又恢复了帝制。三次革命，五次反动复辟。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也经过很多次反复，克伦威尔后来也上了断头台，坟墓都被挖出来了，尸体被烧，活像赫鲁晓夫对斯大林一样。可见资产阶级革命也是经过了多少次反复。中国革命，从戊戌政变、辛亥革命、袁世凯做皇帝恢复帝制，北洋军阀到蒋介石，也是几次反复。”

周恩来说：“剥削阶级代替剥削阶级，还经过这样多次反复呢！”

林彪说：“社会主义革命，的的确确、实实在在存在着反复问题，几千年人类有文化以来的历史，就是个剥削史。特别是社会主义国家如何变为资本主义的，如何复辟的，现在我们只有笼统的概念。没有具体事实，没有说服力，请康生同志组织研究一下这个问题。”

康生接着说："从波兰情况看资本主义复辟，在工厂方面，关系很大，因为它是经济基础。"

林彪："工厂比学校厉害，好也厉害，坏也厉害。"

康生："波兰的情况是有三种经济，一是私人可以开工厂，私人可以开饭馆、旅馆、舞场，法律规定雇佣工人不许超过 3 个，但是学徒不算数。"

周恩来："我们半工半读学校，剥削也很厉害，他们每月只有 20 元，八小时工作制，没有什么学习。"

康生："二是他们农业劳动合作社，形式是社会主义，实际上是资本主义，农村的富农经济更突出，一个人可以有 50 公顷土地。"

李先念说："这就是富农经济。"

康生："有的土地并不多，在郊区经营蔬菜、水果，可以变为百万富翁；三是国营经济，形式上是社会主义，实际是资本主义，他们除贪污盗窃以外，同国外有勾结，形式上是社会主义国家，实际上是资本主义国家，或叫新的资本主义国家。我感到我们的工厂，是否那样干净，我没有研究。要挖掉修正主义、资本主义根子，怎样搞文化大革命，林总讲的'我们的经济基础是新的，上层建筑是旧的，不行。'这是对的。什么是新的？我看了《哥达纲领批判》和《国家与革命》，所谓新，就是生产资料私有制变为公有制。"

林彪说："所有制由私变公，其它一切都跟着变了。"

康生："我们工厂里，旧的经济规律没有变的是什么？在交换问题上，商品等价交换规律没有变，工资仍是按劳付酬，资产阶级法权

残余仍然存在。毛主席五八年就说过，要讨论这个问题。但是，没有很好的研究过这个问题。列宁说：‘小生产者可以随时产生资本主义。’我们工厂资产阶级法权残余还存在，仍可产生资本主义。工厂搞不好，也会出修正主义的。上层建筑不好影响基础，基础不好影响上层建筑。工厂文化大革命，就这个意义讲，比学校重要。它是经济基础，工厂也有上层建筑。”

林彪：“不论工厂、农村，都有上层建筑问题。”

康生：“因此我们工厂文化大革命，对防资、防修很重要， 不是可有可无的，不是比文化教育界的文化大革命次要一些，更重要在于工交系统怎么认识工交文化大革命，需要很好研究这个问题。现在领导机关，对于工业、农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防修、反修问题上认识不够，很不理解，总觉得没有什么问题。谷牧汇报的第一条、第二条理由站不住，对主席思想很不理解，须要认识。要调查研究什么叫修正主义根子，要深入调查研究，工厂的问题不一定比学校少。”

林彪：“问题是不摸底，一摸不是问题少，而是一堆。”

江青：“工厂里有成本、利润问题，从修正主义那里抄来很多东西，我们的脱产人员太多，生产工人一表现好了，就马上提拔上来，脱离生产。××是劳模，让他脱产了，坐上了汽车，提高了待遇，这个问题很大，他怎么革命呢？”

林彪：“吃了饭不革命，就镇压人家革命。”

康生：“我们有些工厂，恐怕是列宁所说的，没有资本家的资产阶级工厂，工交口的同志要很好地对待这个问题，教育干部，认识这

些问题。”

林彪：“前车之鉴，引为教训，不要重蹈覆辙。”

康生：“工厂权力比学校干部权力大的多。”

林彪：“有身家性命、生杀予夺之权。”

康生：“苏联专抓经济工作，政治不挂帅，检查起来，我们工厂政治不挂帅，毛泽东思想不挂帅，恐怕比学校还厉害。抓革命促生产的十条，我参加共同讨论的，完全赞成。但是，第一条是否再加这几个句子：‘工厂文化大革命，对防止修正主义、资本主义复辟，发展生产力，有更大的作用。’抓革命，促生产，这不是二元论，而是主席说的，抓好革命才能促生产。北京第二机床厂一个车间的材料不错，由于抓革命，促了生产，精神变物质。不好的地方是领导搞的不好。”

江青：“凡是革命的地方，生产总是搞得好。”

康生：“我补充一句。波兰同志说，修正主义的力量，一是党的上层领导，一是基层企业领导。”

12 月 5 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继续讨论“工交座谈会”的汇报，江青首先发言，她批评工交系统的一些领导“搞修正主义那一套玩艺儿!”她和陈伯达还向主持会议的林彪汇报了部队文化大革命的情况。江青说：“现在不仅是工矿企业有人在有计划地抵制和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开展，就是在军队里也有人在拼命地执行和贯彻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而且更甚。”

张春桥对谷牧说：“你的发言，代表了一小撮走资派的情绪。”

康生强调说：工厂“文化大革命”比学校更重要。如果工交财贸

系统的“文化大革命”不好好地闹一闹，变修了，文教系统搞得再好也没有用，国家非出修正主义不可。

此时，北京反对中央文革小组的“十一月黑风”风头犹劲。12月4日，首倡将苏联大使馆前的街道改名为“反修路”的北京女二中，贴出署名为“八一纵队”的大字报：《三问中央文革问得好 —— 支持北航红卫兵八一纵队对中央文革提出的三问》。

同日，清华大学红卫兵“红雷战斗队”贴出《中央文革小组的路线性错误必须批判》的大字报。而且，在清华园和北京城内出现了大标语“誓死揪出毛主席身边的真正的资产阶级阴谋分子”。

12月4日当天，北京“三司”发动所属红卫兵组织，在凛冽寒风中，出动宣传车，集合游行队伍，从四面八方汇集到天安门广场，大举讨伐“十一月黑风”，举行了“12·4大反击”大会。天安门广场四周贴满了“誓死保卫毛主席！”“坚决拥护中央文革小组的正确领导！”“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打垮阶级敌人的新反扑！”等巨幅标语。会后，“三司”开动宣传车在全市宣传，高音喇叭不断高呼着“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林副主席！”、“誓死保卫中央文革小组！”等口号。当天出版的“三司”《首都红卫兵报》发表“打垮新的反扑”一文。

第二天，12月5日，北京林业学院、清华大学、人民大学等23个学校的红卫兵有45人集会，联合反对中央文革小组。林学院的李洪山在会上宣读了反对中央文革小组的文章：“一篇很好的反面教材，扼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棵大毒草-----评陈伯达同志的两个月

来运动的总结”。文章从四个方面批判陈伯达：

一、错误的估计了形势；

二、把矛头指向群众，转移目标，具有方向路线错误；

三、以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为名，行大骂群众运动之实；

四、给运动划框框、定调子。

清华大学学生易振亚在会上发言说：“说党的领导就是毛主席的领导是错误的。林彪也可以怀疑，林彪的经验没有刘少奇丰富，刘少奇都会犯错误，林彪就肯定不犯错误吗？文化大革命以来是一片黑暗，尽管江青的讲话见报了，我们还是要批判。”

针对这股反对中央文革的风潮，江青在中央文革小组的会议上指出：“这是一股反革命复辟逆流，是从刘少奇那个阴沟里刮出来的，我们一定要提高警惕，发动群众，把敌人的反革命气焰压下去！”

## 第 323 回：一二五，“联动”成立撒《宣言》

### 江苏乱，江渭清晕倒台上

北京的“联动”经过几天的筹备后，于 12 月 5 日正式宣告成立。“联动”所办的刊物：《准备!》，在鲜红的封皮上写着血淋淋的“准备”二字，准备什么？封面下方是一片空白，只有“准备”二字后边拖着个巨大的惊叹号，像虎视眈眈的炸弹悬在半空中，随时“准备”落下来爆炸。

当天夜里，“联动”成员冒着刺骨寒风倾巢出动，四处张贴标语和《“联动”宣言》。北京街头出现了这样一些标语：“热烈欢呼联合行动委员会成立！”“坚决拥护中央军委四位副主席的讲话！”“坚决反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的表现形式！”北京工业大学附中邹建平等人竟爬上了几十米高的西直门城楼，用几十张大字报纸刷成了一条巨幅标语：“中央文革把我们逼上梁山，我们不得不反！”此时《“联动”宣言》已经撒遍了北京城，全文如下：

首都中学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今日宣告成立。

本委员会誓死忠于党、忠于毛主席，为了粉碎一切违反毛泽东思想的行为，时刻准备施行必要的行动。

继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之后，出现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形式乃是对当前运动的最大威胁，它威胁着革命群众血汗换来的胜利果实，它将使群众重新回到被专政、被压迫的地位，它将夺取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的权利。它将使千百万人头落地，它将使历史车轮倒转。

它，威胁着我们！

只有一条道路：拉起队伍来，干！自己的事情自己去做，革命的果实需要自己去保卫，自己革命的权利必须掌握在自己手里，保卫十六条，保卫我们的总司令部党中央，保卫我们的伟大统帅毛主席！

我们宣誓：誓死捍卫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彻底批判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坚决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保卫无产阶级铁打的江山永不变色！

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

无产阶级专政万岁！

誓死保卫党中央！

誓死保卫毛主席！

誓死保卫毛泽东思想！

在此期间，江苏的江渭清也控制不住局面了。11月中旬，南京大学工作队员第三次回南京大学做检查的时候，曾经担任南京大学省委工作队副队长的南京军区干部梁辑卿、杜方平、吴大胜3人审时度势，主动站出来揭发彭冲和江苏省委如何动用省公安厅整学生“黑材料”的情况。南京大学造反派如获至宝，于11月19日在五台山召开了5万人参加的群众大会，批判江苏省委的“资反路线”。江渭清被迫出席五台山大会，并代表省委作了检查。但是当梁、杜、吴上台揭发省委勾结公安厅整造反派学生“黑材料”的时候，江渭清一口咬定没有这回事。与此同时，南京大学“红旗战斗队”集中火力批判梁辑卿、杜方平、吴大胜3人在南京大学工作期间的“资反路线错误”，希望能藉

此转移会议的斗争方向。

可能是梁、杜、吴的“临阵倒戈”，或由于为会场上的气氛激烈，江渭清突然急火攻心，当场昏倒在台上，被紧急送往南京军区医院治疗。他随即向中央打报告请求离职休养3个月，由陈光代理江苏省委第一书记。

中央没有批准江渭清的离职请求。

就在江渭清晕倒五台山会场的当天，11 月 19 日，南京市的部分工人群众也以“造反”的名义，成立了 “南京工矿企业赤卫队”。“赤卫队”成员中党团员、老工人、老模范占了相当大的比例，一些工矿企业的基层领导也参加进去，短期内就发展到近 30 万人。省委为“赤卫队”提供了大量经费和物资援助。该组织与省委组织的红卫兵“黑字兵”互相支持。从 11 月下旬至 12 月中旬，当造反派群众组织将斗争矛头指向省、市委主要领导人时，“赤卫队”和“黑字兵”就将斗争矛头指向已被定性的“黑帮”分子：原南京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匡亚明、原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陶白、省社科所负责人孙叔平等人。当造反派群众组织围困省、市委的时候，“赤卫队”和“黑字兵”则动员群众去保卫省、市委。

11月22日，江苏省委书记处书记许家屯被造反派带到北京。

12月5日晚21时，陶铸、汪东兴在政协礼堂接见江苏省赴京代表团28位全体代表及随代表团赴京的江苏省委书记处书记许家屯、省文革副组长罗文治。代表团向陶铸赠送红卫兵袖章并托陶铸把一只红卫兵袖章献给毛泽东主席，并祝毛主席万寿无疆！

陶铸问了代表们的姓名和单位，和代表作了短时间交谈后，面向许家屯问道：“你是和他们一起来的吗？住在一起吗？”

许家屯：“一块来的，住在一起，住在国家计委第二招待所。”

陶铸又面向大家说：“招待不周吧？”

众人答道：“很好！”

陶铸随即切入正题：“先听听你们的，今天可以大概规定个时间，现在是9点10分，我们还是来个总路线，多快好省，我们初步想搞到12点，行吗？”

同学：“我们只要能解决问题，短一点也可以。”

陶铸：“你们还想短呀！好，还是先听听你们的吧！”

同学们简单地汇报了江苏省文化大革命的情况。“揪江渭清战斗队”代表还汇报了他们进行了3天3夜的绝食斗争，他们质问徐家屯：“我们要问问许家屯，这是不是江苏省委逼出来的？！”

许家屯说：“现在陶铸、汪东兴同志代表中央在这儿解决问题，我欢迎大家批评揭发。”

学生气愤地说：“我们早就揭发了，在五台山当着你的面就揭发了，你是怎么对待的？”

陶铸出来说话：“江苏省委不准你们闹革命，同志们愤怒的感情完全正当的，你们对省委的态度是完全应该的，我们是很支持的……”

学生们热烈鼓掌、高呼“毛主席万岁！”

陶铸接着说：“今天我们主要是听听同志们的意见，江苏省委有那些问题，建议你们控诉，看中央能给你们解决多少，要把江苏省委

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打倒，把毛主席的大旗高高举起，同志们，好不好？”

众答：“好！”

同学说：“在三天三夜的绝食斗争中，好多人生病了，有一位同学得了盲肠炎，今天晚上刚从医院遛回来，现在还没有好……”

陶铸当即问：“是谁？”并站起来和那位同学亲切握手。汪东兴也赶紧问同学中有多少人生病？亲自点了生病人数。

陶铸说：“同学们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斗争很坚决，你们绝食斗争我是很同情的。你们为什么要这样干呢？没有办法了么？但是，这不是最好的办法，总理不是讲么，要吃饱饭干革命，把身体搞的好好的，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是长期的，没有好的身体是不行的，把身体搞垮了我很同情。”

陶铸对那位得了盲肠炎的同学说：“你是不是今晚就到医院去，好好休养休养。毛主席把大民主交给人民，有结社、游行、示威、集会、言论、出版六大自由，现在还有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还有大串联么！靠这些完全能把反动路线打垮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不简单，它是要抵抗的，毛主席讲到大风大浪中去锻炼，这就是大风大浪，革命那么容易就不叫革命了，过去革命要流血，我在南京坐监狱5年，也绝食过，关在小房子里，看普通书也不准，绝食了4天，到第三天就大量喝水，头上出汗，这方面我还有些经验。你们有没有喝水？”

绝食的同学：“我们也喝了水。”

陶铸："今天不同了，你们年纪轻轻，不要把身体搞垮，你们要学斗争的方法，要有好身体。"

在继续汇报的过程中，一个同学要求许家屯翻开他笔记本倒数第二页，许家屯不肯，双方发生争夺。那位同学说："这个本子上有我的名字，他们在搞黑名单。"

原来许家屯将参加接见的28名代表的名字记在了笔记本上。陶铸把许家屯的本子拿过来，看了一下，极其严肃地问许家屯："是不是抄的28人的名字？"

许家屯尴尬地向陶铸说："不是的，只有几个人。这是为了和他们交朋友。"

同学："那上面有我，还有其他几个人的名字。你抄名字是不是想整我们？我们死都不怕，还怕你们开黑名单吗？"

许家屯解释说："我们过去犯了错误，在党的教育下，我们要求改正。"

陶铸解围："他爱和你们交朋友，你讲是黑名单，看么！要是黑名单，以后打击报复，就罪上加罪，这个名单我们看到了，由我和汪东兴作证，你们不要害怕！交朋友是可以的，是交朋友很好么！我们大家看，如果是站在资产阶级反动立场上，我也不愿与他坐在一起。"

同学们热烈鼓掌："他回到毛主席这边来，我们是愿意和他们交朋友的。"

一个同学问到文化大革命中材料问题，陶铸说："材料要坚决烧掉它，留了也没有用。《补充规定》下来之前的烧掉就算了，真正烧

掉也好么？《补充规定》以后就不能烧了，如果藏起来就不对了，要当面点清，呈封后再烧。”

同学们又反映文化大革命以来，省委不在办公大楼办公，省委负责人找不到，似乎转入地下了。

陶铸：“他们转入地下，你们要想办法叫他们到地面上来么！”

同学：“有人放空气说，十一中全会以后江渭清升为中央委员、华东局第一书记、南京军区第一政委。还说江渭清是江青同志的哥哥呢？这些事情是否确实？”

陶铸问了一下汪东兴，然后说：“还是候补委员，没有提升么！没有提升为华东局第一书记，这是造谣，你们以后不要轻信这些谣言，你们可以批驳么！江青和江渭清，一个是山东，一个是湖南，怎么会说得起来呀？”

接着陶铸读了同学们向中央提出的八点要求，核心内容是要江苏省委向造反派承认错误，停止对造反派的镇压活动，揭开省委内部阶级斗争的盖子。然后陶铸说：“现在请许家屯同志答复，我们来帮助解决问题，江苏问题还是要江苏省委解决，如确实不能解决，我们再来帮助，错误已经犯了要改么！毛主席说：要允许人家犯错误，也要允许人家改正错误，不改就不行，如果确实改正错误，那我们欢迎，革命人越多越好，如果今天反对革命不革命，就坚决抛开。”

他转向许家屯说：“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一个省委书记，不要那么顾虑，你不要怕，不要因为江渭清不在这里不敢做主，你不能解决的，我们代你做主，不能代表省委的，就代表个人，八个问题不要含

糊，要深入细致，你以一个共产党员、一个省委书记，认为应该怎样答复，就怎样答复。”

许家屯：“我首先感谢这次来北京的各位同学，在这次从南京到北京来的过程中对我个人很大的教育，使我进一步认识到江苏省委及我个人在这次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犯错误的严重性，对这次问题的处理中，我们有缺点有错误，特别是28人身体上精神上受到的伤害，我表示歉意，道歉，其次我感谢党中央、毛主席、陶铸、汪东兴同志百忙中处理这个问题，由于我们又没有能正确地执行主席的革命路线，以至在处理许多问题上犯错误，处于被动，不能很好解决，带到北京给中央添了麻烦，心里很不安。对陶铸、汪东兴同志表示感谢。对同志们在南京揭发的问题及今天揭发批判的几个问题，在19日江渭清同志的书面检查中已讲到了，有的问题没有提到，要求同志们继续揭发，凡是我们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我们一定检查，一定下决心来改正，在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由于对主席的思想教导很不理解，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有一份检查，由于匆忙没有带来。”

同学们说：“我们替你带来了，已经上交中央了。”

许家屯：“这个检查在南京同志们认为很不深刻，同志们很不满意，我们继续检查，中央工作会议以后，我们省委对中央工作会议一再学习，通过三级干部会议，联系我省作了检查，感到错误是严重的，感谢毛主席，林副主席对我们的教导，我们愿意检查承认改正错误，由于我们执行了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对江苏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带来了很大损失……”他声音不高，字斟句酌，慢慢说道。

同学们："要触及灵魂，直接就我们的八项要求回答。"

陶铸："就照这八个问题谈吧！"

同学们一起念《毛主席语录》："什么人站在革命人民方面，他就是革命派，什么人站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方面，他就是反革命派。"然后质问许家屯："许家屯！你要做什么派？"

许家屯："同学们允许我把话讲完，对八个要求我表示这样的态度。"

接着他边读要求边解释，对这八个要求均表示同意。

陶铸又就同学们提出的几个问题作了回答。

最后大家要陶铸做指示。陶铸说："指示是没有了，你们革命革得很好嘛！坚决按《十六条》办事的么！按照毛主席的最高指示，按照林彪同志、周恩来同志、陈伯达同志、江青同志的指示，还有《红旗》《人民日报》社论去作了，很好！你们还要去好好学习，我们今天主要是解决问题，你们大概不能十分同意，要有七分就行吧！"

接见结束后，许家屯一回到北京饭店就哀叹地说："多么被动"，"事先怎么一点不知道"，"这下子是决堤了。"又说："《八项协议》有什么办法呢?陶铸当场要表态，我只好采取高姿态，真要命啊!"当时，许家屯特别对《八项协议》中要公开江渭清养病的地址，表现很紧张，怕回去不好向江渭清交代。他说："江渭清病中允许人去看，万一发生问题怎么办?"因此，他决定写个信给陶铸，"立此存照。"

许家屯写给陶铸的信是这样的："关于同学们要告诉他们江渭清同志生病住院的地址问题，由于你接见前我没有来得及向你汇报，有

些情况会上又未能说清楚。根据渭清同志的病情，如果同学们知道他的住址，万一控制不住，病情可能恶化，发生危险。此外，还有一些问题，恳请你百忙中抽空听我当面汇报一下。盼示！许家屯。”

第324回：周恩来，即召见四川代表　工交会，陶铸带头做检讨

12 月 4 日以后，四川又有几批工人陆续抵京，周恩来于 6 日凌晨 1 时，又一次接见廖志高和新到的工人代表。

周恩来说："工人阶级组织中也有不受纪律约束的，可能还有个别搞破坏的人，对这样的人不能放纵，一放纵就会乱来。你们要各自管好自己的队伍，特别是来京以后，要加强管理教育和纪律约束。如果有闹事的，是哪个厂的就由哪个厂的代表负责。"

接着，他要代表们谈谈这次来京要求解决什么问题。归纳起来，大都是反映本厂本单位领导压制群众，以党、团籍威胁造反派，隐藏、转移整群众的"黑材料"，以及要求罢某些领导人的官等具体问题。

汇报中，一位代表反映："来京途中接到成都的电话，西南局、省市委有人谋杀了一位解放军干部，是用绳子勒死的，要求总理严惩凶手。"

周恩来当场交代廖志高尽快查明情况向他汇报。

还有一位代表反映："最近发现在红照壁省政协大礼堂院内的'产业军'总部挖有一条大地道，里面存有大量枪支弹药和棉被等物资，还有一些尸体，说明'产业军'开始对革命派动手了，要求总理过问此事。"

周恩来听后说："如果真有武器当然不好，但你们要冷静，不要轻信谣言。"

同时交代廖志高回去后同"兵团"、"产业军"双方代表共同到现场查清此事后向他汇报。

周恩来听完代表们的汇报后说："要解决你们提出的问题并不难嘛，但只有回去在本地本单位才能解决。"

"不准以党、团籍威胁群众，不准压制和打击报复，我们发的电报中已明确讲了嘛！"

"隐藏、转移整群众的材料，如果知道具体地点就派人同主管领导去查；如果没有就给他们讲清楚，今后一旦查出要加倍处罚。"

"这些都是容易解决但又必须回本单位才能解决的问题，罢某些领导的官就不是那样简单，首先要调查清楚问题并且研究如何处理，还有个组织审批程序，总要有一个过程这个问题也必须回本地本单位才能解决，哪能今天只听了你们汇报就解决了呢？"

最后，他对廖志高说："趁'兵团'的人还没到齐之前，你抽些时间先找来了的工厂谈谈，同他们认真接触，搞搞工人运动嘛！"

会后，廖志高先后找了"兵团"联合指挥部、"兵团青白区支队"所属几个工厂的人座谈，按照周恩来的指示精神做了一些工作，没有再发生围攻和强迫廖志高签字的情况。

回到招待所，廖志高的秘书立即给省委办公厅打电话查询代表反映的"谋杀解放军干部"的事情，接电话的值班人员当即回答：

"此事已完全弄清，死者是成都军区所属崇庆步校的一位领导干部，该校学生起来造反，揭露了他工作、生活作风方面的一些问题，受到批判和冲击想不通自缢而死。外界有的造反组织闻讯后去殡仪馆抢走尸体，硬说颈上的自缢痕迹是被人谋害勒死的证据，曾来省委哄

闹过，后来又在市体育场开了追悼大会，控诉西南局、省市委迫害谋杀军队干部的‘滔天罪行’，完全是无中生有和夸大渲染的事。”

第二天，廖志高的秘书向周恩来的秘书周家鼎电话报告了此事，请他转报周恩来。

周家鼎说：“我也通过军队系统查了，确系自杀身亡，已经报告了总理，请转告志高同志，此事就此了结，不用再管了。”

12 月 20 日，廖志高回到四川后，由省委副书记杨万选主持，“兵团”、“产业军”各派 3 名代表，同时找来提供政协大院内挖有地道、藏有枪枝弹药这一消息来源的 420 厂工人赵勤纲，一起到红照壁大院认真查看，结果除了原有的一个旧防空洞内堆有一些杂物外，根本没有什么地道，更谈不上枪支弹药和尸体了。廖志高秘书当场草拟了调查报告，结论是：“未发现地道和任何武器，也未发现有地道痕迹及其他可疑之处”，经共同确认并签名后，由杨万选带回省委向周恩来作了报告。

12 月 6 日，周恩来将谷牧的《工矿企业文化大革命座谈会的汇报提纲》送给毛泽东批阅时，附信说明：

“这是谷牧同志在 12 月 4 日的政治局会议上的书面报告。它集中地代表了这次座谈会的共同认识，受到常委几位同志特别是文革小组同志的严厉批评，最后，林彪同志作了结论，认为座谈会是失败的，但在政治局会议上暴露出来受到批判又是好事。关于这次会议的情况，除每日托汪东兴同志面报外，待主席确定时间，林彪、伯达和常委少

数同志当面来报，有关其他重大问题，如各省各部重要情况和涉外事件亦当面报。”

当天，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听取“工交座谈会”的汇报。毛泽东要求在会上批评陶铸，要陶铸检讨。他说：“要不然这个会就成了对谷牧的了，这不能反映问题的实质。”

常委们在酝酿时要其他一些人发言。于是，12 月 6 日下午的会议，王力系统的批判了谷牧的《汇报提纲》，点名批评陶铸。他说：

“工厂的文化大革命经过了两起两落。第三次起来后，有些人又在那里拼命地把它压下去。6月，文化大革命起来了，被刘、邓的错误路线镇压了。中央十一中全会以后，特别是红卫兵运动起来后，工人又起来了。9 月上旬，就压，用‘抓革命、促生产’这么一个口号，又变成了不准革命，压革命。

到10月1日，林总讲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红旗》第13期社论，10月5日军委紧急指示，在这样一个号召之下，工人运动就又起来了，规模更大。这本来是很好的，形势好得很。但是，在这样的形势下，我们中央有的同志就是主张要压，产生了《再论抓革命、促生产》的社论。差不多所有压制革命的人都欢迎这篇社论。为什么在这么一个时候发表这样一篇社论？而且主要的方面不是鼓励革命，不是支持工人的革命要求，而相反，主要为的就是讲生产。骂得很厉害，批评得很凶。这些词句都是陶铸同志坚持的。这篇社论发表的第二天，北京市就发生了许多工厂的造反派工人被赶出工厂，许多工厂就是拿着这个社论来抓人。社论的精神就是堵、压。这个问题一直到上海安亭事

件，就是上海工人要成立造反组织，市委不答应。这个事件是一个信号。这个事件以后，我们明确感到工人起来了。

红旗第九期有篇社论叫《信任群众依靠群众》，其中一段话是陶铸坚持加进去的，就是：绝大多数共产党员、党组织是好的。陶铸同志很坚持要党委统一领导工厂的文化大革命，我问陶铸同志和在座的同志，北京哪一个厂能够统一领导？统一领导就是镇压革命。

关于工人串联问题，也是一个原则的争论。在学生运动期间，那条错误路线就是不准校与校之间来往。现在又拿这一套来对付工人，工厂与工厂之间不能来往。我们是个什么样的国家？我们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工人为什么不能来往？

毛主席说，学生必须与工农结合。学生不同工农结合，他就漂浮了嘛！因此，学生往工厂里跑，这是一件好事，我们应该欢迎，应该鼓励。但是，现在有些人一看到学生，就不得了，就是‘洪水猛兽’。过去说红卫兵组织是非法的，现在工人组织变成非法的，不予承认。我昨天就提出来了，中央过去说工厂、农村一般不成立红卫兵其他革命组织，这样的指示还适不适用？中央还批了一个什么地方的材料，说厂外不能串连，这本身就是不对的，原来就不应该这样说。还有什么工业六条、农村五条（按指中共中央、国务院在9月14日发出的《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通知》和《关于县以下农村文化大革命的规定》），还适用不适用？农村五条是农忙的时候，现在也不是农忙了。所以就不能说这方面的指示和其他规定还都适用。如果都不适用，有好多地方压制工人运动的人就很希望有这些规定，那么，就走到压制群众运

动、压制革命的道路上去了。工交座谈会的这个《汇报提纲》，集中反映了一套错误的东西，就是不要搞文化大革命。”

接着，周恩来讲话，他说：“这次20多天的会，我要负责，就是光见过参加会议的同志两次，一次是全体，一次少数人谈了一下，没有更多的抓。

十一中全会和中央工作会议后的几个月时间，领导干部绝大多数没有想通，想通了的是极个别人。这种情绪一直影响到这次工作座谈会。会上，我所接触到的那些部长、省委来的人，没有几个通的，大多数还不理解。他们有一个最大担心，就是怕运动影响国民经济建设，反过来再影响运动的发展。总的来说，多数同志对文化大革命不理解，因此，发生抵触情绪、埋怨情绪，这和那种硬是欺骗中央的人性质不同。

抓革命、促生产，是《十六条》上提出来的。当然，这里头有个主从，狠抓革命，才能大促生产。

犯了错误不要紧，改了就是嘛！要负起责任来，不要诚惶诚恐。当年打仗的时候都可以入火海，都可以坐牢、下地狱，现在还有什么舍不得的？要下决心到实践中去，继续摸索经验。”

林彪说：“这次工交会开得不好，是错误的，思想很不对头，需要来个180度的大转变。不能把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单是落在生产上，如果我们完全从生产的收获多少来论文化大革命的成败，那就大错特错。

我们应该不是被动地而是主动地让这场革命进入到工业、农业，

进入到社会。因此，不应该是‘势不可挡’，不是挡不挡的问题，而是迎接的问题；不是刹车的问题，而是要扩大的问题。要让这场革命席卷每一个领域。”

接着，陈伯达发言说：“我要澄清几点意见。第一，我们重新制定的工矿企业的十条是作为安民告示出现的，工厂中许多问题没有涉及到，但是十条是包含了一个完整性。谷牧同志的《汇报提纲》，实际上是割裂了它的完整性，《汇报提纲》说赞成十条，实际上是反对十条的。所有各条都是同工交企业相适应的，但是如果把革命打掉了，十条就打掉了。第二，谈一谈工作方法问题。说工作方法问题，不是说文革小组的工作方法就很好，可以说文革小组的工作方法不好，我的工作方法特别不好，不会做工作，不会商量问题。但《汇报提纲》是不好的，事前也不同我商量，特别是没有请示过毛主席和林彪同志，我是计委的成员，大小计委都有我的名，但是没有和我商量。那天看了提纲，的确是个突然袭击，这个方法不好……”

周恩来插话说：“这个提纲是我要他们写的，不能在汇报时光凭口讲，要有一个提纲。他们是开夜工搞的，可是来不及征求意见了。这个责任我来负。”

陶铸在会上作了检讨，他说：“工业农业文化大革命问题，我要负主要责任。坚持老框框。《工业六条》、《农村五条》还是结合四清来搞，怕乱了生产，写了‘抓革命、促生产’两篇社论。

我主张不搞全市性的工人组织，不造成工人离厂串连，同意《汇报提纲》的某些观点。

这一切都由于思想上没有解决问题。八届十一全会以后，各省问题没有完全解决中央工作会议也没有完全解决各省的抵触情绪还很大，思想还不通，在许多方面还有怀疑情绪。

在这种情况下，中央拿我这样一个例子来批判，来教育各地，我看很好。”

第 325 回：点刘邓，从解放初期谈起　“全红总”，临时工组织成立

陶铸检讨后，周恩来说：“前几天，也就是11月24日下午，我讲了一下。十月中央工作会议时我说方兴未艾，毛主席说：不能刹车，一个多月后运动必有发展。果然，现在势不可挡。我们要因势利导，要导要疏，不要堵，不要挡。实际上文化大革命已经从学校发展到社会，破四旧，立四新；从大中院校发展到小学校，从小学校发展到工厂，学生到工厂同情被压抑的群众，也很快就发展到农村，中间还有一个商业。现在形势已经看得出来了，工厂、学校、农村、商业、服务行业、机关、甚至影响到军队。机关会从主要的机关，由上而下发展到各种专业机关。正如林总说的，运动正在向着广度和深度发展，势不可挡，你怎么能挡得住呢？伯达说这是革命洪流，是不能堵，只能疏的……”

林彪插话说：“革命洪流的‘洪’字，应该改为红色的红。”

周恩来点点头说：“对！比如说对红卫兵，我们就认识不够，只准学校搞，不准别的搞。你不让他叫红卫兵，他就叫造反队。这不还是搞起来了吗？你不同意，你堵，他用别的名字又出来了。只要你不想镇压，就与反动路线有区别，你正在改正错误路线，反对反动路线嘛。你还压吗？你还要压吗？划清正确路线和错误路线的区别，区别就在于压不压的问题。毛主席说：‘先有事实，后有概念’。想通了这一点，就可以改正了。工人们要求组织，先存在了，你不能不承认嘛！”

“你们觉得工矿企业以为毛主席的指示都执行了，计划完成不错

了，建设也搞得不错，有成绩了，大三线和生产都搞得不坏。不要满足这些，要有更高的要求。从挖修正主义的根子看，就有很多的障碍，是存在错误路线的，必须从根本上来解决。障碍是很多的，要从历史上来说才能说清楚，刘邓路线不仅五十天的问题，少奇作为主席的接班人已经二十年了，的确不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影响是很深的。他不像林彪同志在军队独树一帜宣传主席思想，毛泽东思想红旗举得高，但还遇到了罗的干扰。由于少奇不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就影响到全党全国。小平主持书记处十年，没有尽到应有的责任，也不宣传主席思想。中央宣传部也不宣传主席思想，宣传修正主义思想。组织部的安子文在搞黑线，是彭真的黑线，过去的联络部搞三和一少，后来经纠正，调查部搞神秘的东西，统战部不执行主席的路线。中央办公厅杨尚昆也是搞黑线。工、青、妇也有不少问题（刘宁一、蔡大姐除外）工会问题很多，青年团垮了。党校、党报、新华社、广播电台，都有严重的问题，还有农村工作部早就垮了。二十年、十年影响之深，还有黑线参插在中间，不能不对党的实际工作发生影响，不能不会影响党的生活，不能不影响到干部的思想，不能不影响到基层，这是个严重的问题。所以错误路线不只是五十天，是十年、二十年，不能不影响到我们的党。薄一波和彭真结合在一起，是两面派。”

林彪插话说：“我还被他骗了，我以为政府中他还搞得不错，以为是革命的，是宣传毛泽东思想，在工交战线搞革命化，实际上他是破坏革命化的，这个人还没有充分揭露。我从东北回来，在火车上，他动员我拥护刘少奇，给我的印象，他是搞宗派，搞山头的，是个坏

家伙。”

周恩来：“薄一波说他同彭真不接触，但据我了解，实际上他们的来住是很密切的。”

康生：“这个人阎锡山很信任他，这不是偶然的。”

徐向前：“在晋东南薄一波简直是一霸，对下面干部很凶，当作奴才。”

周恩来接着说：“薄一波影响到工交战线。陈云的错误在财贸系统有影响的，邓子恢的错误，过去有过批判。罗瑞卿在公安部中搞特务作风，影响也很深。……十月中央工作会议回去，三级干部会议绝大部分没有开好，只个别开的比较好，有的没有开成，稀稀拉拉，为什么？就是认识不一致，没有认识到要过社会主义关，没有决心脱裤子，引火烧身，检查自己，有的还拿多数压少数，还组织工人保自己。发生了问题，又把矛盾上交中央。发生问题后，群众一迫，不负责任的什么都签字，这是完全不负责任的。对这么大的革命认识不深，有些城市还发生流血事件，这些都不是偶然的”。

“这次座谈会，有些同志是抱着一种抵触情绪的，以后讨论伯达同志的十二条，批判得体无完肤，一无是处，22 日向毛主席汇报，24 日我自己来听听大家的意见，有意识的让大家放一下，我知道他们有情绪，思想不通，我对刘澜涛说，你当年是怎样闹革命的？各地同志说的意见不多，中央部门的同志说了很多意见，说到什么问题时，几个部长一哄而起，站起来围着我，说明大家的抵触情绪不小。如果我们不搞文化革命，怎么样呢？就不能不出修正主义。大家的情绪那

么不好，最多是脱裤子，罢了官，有什么了不起。我当时说，当年打仗，入了虎穴，坐牢，入地狱，死都不怕，现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搞文化革命有什么可怕？最多是掉点磅，生点病，罢官嘛！”

“谷牧的汇报提纲是错误的，拿出来好，把大家的思想都摆出来了，反映了干部的思想状况，反映了现实情况，我们的干部对文化大革命还是很不理解。搞了十条后，找你们谈，大家同意了，但是思想没有通，还有些意见。林总问我有没有一个通的，我说我接触到的没有，多数不通，不是孤立的，是有思想根源的。”

“这次开会，我自己没有很好抓，思想上反映很坏，天天反映这个被抓去了，那个被抓去了，大家都有股怨气，这股情绪是不利于搞文化革命的，不如让他们到工厂去看一下，从工人中体验一下生活，不然回去后思想还不通”。

“文化大革命，从5月到现在已经7个月了，要求大家做彻底的革命派。我帮助林总担负这个责任，每天都诚惶诚恐的心情。一个要摸出一些经验，一个要有革命的火热的心。有些事向主席、林总学习，有时请教伯达同志。”

接着，周恩来谈了一些具体的问题。

随后，谷牧和余秋里分别作了检讨。谷牧说：“虽然一时不通，也要相信主席的真理正确。”

余秋里说：“我们总不如主席那么站得高，看得远嘛！”

林彪最后对会议作了总结。他说：“这次会议扭转了陶铸等人指导工交会议上的错误，使会议要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基础上重新进

行。”

他在总结中点名批判了“刘、邓、彭、薄所代表的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他说：“刘、邓的错误不是50天的问题，他们的错误是10年20年的问题。”

他说：“在解放刚开始时，少奇一次到天津讲话，讲的很多，有几句最尖子的话，他说中国不是资本主义多了，而是资本主义少了，中国工人不是反对剥削，而是欢迎剥削。这句话的意思是说：解放以后中国还要发展一个资本主义，不是过渡到社会主义。又如解放初期，邓子恢提出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怎么办？当时刘少奇回答说：我们党员有的走富农路线怎么办？并没有坏处。又如54年中央组织部邓子恢提出过中国共产党是什么性质的党？是无产阶级半无产阶级的党，并提出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就是说不要社会主义过渡，就是发展资本主义。这些话是经过少奇同意的。这个思想主要是少奇的思想。再如土改以后，邓子恢提出过农村实行四大民主自由（土地买卖自由、雇工自由、放债自由、贸易自由），这就是土改以后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纲领，这四大自由实际是少奇的思想，是少奇通过邓子恢讲出来的，根子在刘少奇。杨献珍办学校，他有一套修正主义的思想，实际上也是少奇的思想，少奇是亲自领导党校的。56年少奇在党校讲过，我们的党校学习毛主席著作很多啦，学马、恩、列、斯的经典著作少了。反对学习毛主席著作。……”林彪从解放初期一直讲到文化的革命。

他又说：“实质不是谷牧的问题，而是陶铸的问题，是书记处负责人坚持一些错误观点，现在本人也作了检讨。他说工交座谈会开得

不好，是错误的，同毛主席思想对立的，坚持旧的一套。”

随着大串联的洪流，一群来自全国各地上访的临时合同工来到北京，被“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接待站”分配住到西直门内大街西章胡同内的原冶金部第二招待所，当时临时改名为“中共中央国务院文化革命联合接待站招待所”。其中来自湖南长沙的杨政、安徽蚌埠的裴燕柱、江苏无锡的吴永湖、广西桂林的周泉及贵州的周牧同住在一寝室。

这些人都是临时工，大部分是因为参加文化大革命被原单位解雇了。说起各自的遭遇，同病相怜：同为工人阶级中的一员，正式工人虽然在政治上受迫害，但至少工资照发，有一碗饭吃。而临时合同工，一旦在政治上出了问题，马上被一脚踢出单位大门，连饭也吃不上了。他们认为，临时合同工制度不合理，他们要上访，要反映。

贵州的周牧是贵阳洛湾小学的合同工、18 岁的他是国民党将领之后，中学毕业后成为一名代课的老师，但属于临时工系列。临时工的生涯使他认为中国的临时工制度不合理，于是在 1965 年 12 月写成了《论临时合同工制度》一文。此时，他将这篇文章拿出来给大家传阅。同为临时工，自然是心有灵犀，大家都感到这篇文章说出了他们的心里话。来自长沙的杨政提议：把这篇文章印成传单，散发到社会上去，希望广大临时合同工团结起来，争取自己的政治权益和经济利益。

于是，这份油印的传单，在 1966 年 10 月 6 日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的“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誓师大会”上公开散发出去，在临时合同工中引起很大反响。从那天下午开始，许多外地来京的临时

合同工和北京本地的临时合同工按传单上的地址找上门来，周牧和湖南的临时工杨政等人日夜忙于接待这些来访者。

中央工作会议后，杨政和周牧商量，决定成立一个争取临时合同工权益的组织，当时商议的名字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红色劳动者造反总团”，口气颇大。参加发起的人除了周牧、杨政外，还有北京的李云臣、江苏无锡的吴永湖、安徽蚌埠的裴燕柱、慕纪群、慕纪雄、广西桂林的周泉等人。

周牧建议大家都回家乡去，建立各地的基层组织，北京留下杨政和北京本地的李云臣保持联络，等到 1967 年 1 月 1 日再回北京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成立全国总部。大家都同意这个意见。

11 月 5 日，留在北京的杨政给贵州周牧发去电报说，现在各地进京的临时合同工很多，建立全国总部的时机已经成熟，要他立即动身北上，参加 11 月 8 日的全国总部成立大会。

11 月 8 日，他们的组织在北京冶金部第二招待所正式宣告成立，把原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红色劳动者造反总团”简化为“全国红色劳动者造反总团”，简称“全红总”。

成立当天，“全红总”就在罗运泉、廖阁夫带领下，由首批成员 50 多人到全国总工会会议厅静坐，要求全国总工会承认“全国红色劳动者造反总团”。

北京每天接待全国上访人数极多，全国总工会书记处书记王志杰等人开始并没有把“全红总”这 50 多人放在眼里，无暇理睬。过了 10 天，到了 11 月 18 日，静坐人数由 50 多人增加到 300 来人，王志

杰等人不理睬不行了，连忙向全国总工会总书记马纯古、全国总工会主席刘宁一报告。马纯古又向当时中共中央负责工交口的副总理李富春作了报告。李富春表态：不要把事态扩大，要王志杰等在口头上表示支持“全红总”造“临时合同工制度”的反。当天，王志杰代表全国总工会在口头上承认了“全红总”是合法的造反组织。

12 月 1 日，“全红总”组织各地临时工、合同工 300 多人又到全国总工会静坐，要求全国总工会不仅是口头承认“全红总”，还要给“全红总”刻制公章，拨给活动经费。

12 月 4 日，全国总工会党组负责人马纯古向李富春并中共中央上送了《关于如何解决临时工、合同工问题的请示报告》。

12 月 5 日，“全红总”北京分团正式宣告成立，并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了近 3 万人参加的游行示威。紧接着，“全红总”的湖南分团、黑龙江分团、吉林分团、广西分团、广东分团、江苏分团、上海分团、河北分团、内蒙古分团、安徽分团、江西分团相继在各地成立。

12 月 6 日，在中央工交会议上，对全工总提交的《关于如何解决临时工、合同工问题的请示报告》，谷牧在汇报中提出，对临时工的一些要求不能同意，否则将会给当时的国家财政和劳资制度带来巨大的冲击。李富春将“全红总”的情况向周恩来作了汇报，周恩来表示应给予正确的疏导。

12 月 6 日下午，北京“三司”又在北京工人体育场举行“全国革命造反者联合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总攻击大会”。全国各地云聚北京的造反派踊跃参加。北京“三司”、 “全国红卫兵革命造反联络站”、

北航“红旗”、安徽“八二七革命造反团赴京告状团”等组织在会上发言。大会通过了《给毛主席的一封信》和《致全国革命造反者书》。

陶铸收到江苏省委书记处书记许家屯的信后，于12月26日子夜24时30分，派车将许家屯接去，对他说：“我们相信江苏省委，相信江渭清同志是拥护主席的。”“你这次到北京来，坏事变好事，和学生打成一片，逐步取得他们的信任，争取把局面转过来。”他还说：“我在讨论工业十条的会议上作了检讨。农业五条，工业六条，两论抓革命促生产，都是我提议的，现在看，堵的方面太多，放的精神不够。向你们交交心。”当许家屯讲到由于工作没有做好，给中央带来很多麻烦时，陶铸说：“你们省委在第一线，不是你们，中南海怎么保得住呢?”

## 第 326 回：冲“三司”，廖承志又惹祸端

## 查材料，贵州“二李”生嫌隙

12 月 6 日，也就是北京“联动”宣告成立的第二天，北大附中的牛皖平就带领十几个“联动”学生来到北京“三司”大门口，点名要和他们辩论揪斗老干部的问题，当即被几十名大学生围在中间一段狠批。眼看寡不敌众，牛皖平等人只好夺路而逃。

习惯了凯旋而归的北京中学生老红卫兵，岂能容忍这般近似耻辱的失败？第二天，12 月 7 日，“联动”再次派出北京石油学院附中、北京农业大学附中 20 余名红卫兵来到“三司”所在地。谁知道，对方竟用电话迅速调集了上千名大学生，将“联动”成员团团围住，双方展开了激烈的辩论。

周恩来得知牛皖平等人被围困的消息，立即派国务院秘书长周荣鑫前往调解。“三司”的上千名红卫兵怎能让周荣鑫轻松地将这些人带走？周荣鑫只得耐心劝说，直到第二天凌晨 1 时多，大学生才勉强同意放人，并要求得到明确承诺：“联动”不得再来冲击“三司”总部。

于 11 月 26 日成立的“上海捍卫毛泽东思想工人赤卫队总部”筹委会，于 12 月 6 日正式召开有 30 万人参加的成立大会。会后，他们即给中央文革小组发电报，说张春桥和“工总司”签的“双五条”是大毒草，要求张春桥回上海检讨。中央文革小组没有答复。

当晚 22 时 30 分至次日凌晨 1 时 15 分，张春桥、姚文元在北京政协礼堂接见上海“工总司”赴京代表团 20 人。

代表们说：“我们这次到北京来有四点任务：（1）反映上海的情况；（2）谈谈对中央《十二条》的看法；（3）把在北京的同志带回上海；（4）听听中央对上海运动，尤其是工人运动的新指示。另外介绍一下‘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的组织情况及上海的新形势。学生运动与工人运动相结合，到工厂去了。”

“关于生产情况，我厂提前一天完成全月计划，其它厂也是这样，新新机器厂超额完成任务。”

他们把新新机器厂的喜报交给张春桥。

姚文元说：“你们把宣传资料给我们一些，我们帮你们宣传。你们也印，来辟谣，做些宣传工作，搞些快报。”

张春桥问：“上海国棉 17 厂情况如何？他们打了几个电报叫我回去检查。”

代表谈了国棉 17 厂封材料、烧材料问题，接着说：“上海国棉 17 厂里成立了‘赤卫队’，游行时大叫要‘造张春桥的反’，‘抗议张春桥在上海执行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上海国棉 17 厂派了 17 个赤卫队代表到了北京，还讲总理已经接见了他们。”

张春桥说：“这个我知道。总理单独接见他们是不可能的，那是前两天的接见大会，不是单独接见。游行我不知道。

他们连打了三次电报叫我回去检查，否则一切后果由我负责。”

代表说：“你走后，上海成立了‘赤卫队’。”

张春桥：“我是（11 月）25 日中午走的。”

代表：“他们 25 日下午就筹备起来。还提出了这样的三个观点：1、要罢张春桥的官；2、收回‘双五条’；宣布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是反革命组织；3、炮轰上海市委。”

张春桥问：“‘赤卫队’有多少人？”

代表答：“大约有 40 万人。他们有 40 多人到北京，住在左家庄。”

张春桥问：“他们来了，怎么没有找我？”

代表说：“他们是来找总理告你的！”

姚文元：“来告，我们也不怕！”

代表：“当前运动可能有大反复，中央文革处境也很为难。”

张春桥笑了：“不要估计得太高，你们不要替我们担心。”

姚文元：“不要把问题看得太严重。”

代表：“有人说，要挖掉毛主席身边的定时炸弹！”

张春桥；“有林彪同志，还不能保卫毛主席？！”

代表又谈到企业文革《十二条》问题，张春桥说："我们找了首都工人来座谈，八小时生产要保证，每周一次生产讨论要保证，其它由工人自己安排。"

"《十二条》要大修改，根本不是正式文件，我们想写的简单一些，越写具体越难，越没有办法写，争论越多，……最近我们的精力都放在这上面了。"

代表提出："对于中央《十二条》，工人说没有《十六条》那么亲切。"

张春桥："你们对《十二条》不满意，反对的人可多了，他们革命讲多了，生产讲得太少，我们要在各方面都听。"

姚文元："你们是从革命方面考虑的。"

张春桥："有人说这也革命，那也革命，那太多了。这两种思潮随时反映在党内的……这个问题要从实践中解决，关于两篇《抓革命、促生产》社论，从群众中解决，我们想写的简单些。有些地方的提法要修改。要根据运动的特点，准备再详细地写篇社论。当前，学生运动与工人运动相结合非常重要，也是很必要的。"

"农民运动还没有起来，不过开始冒头了。他们的问题要复杂，阶级关系复杂。对农村连这样的《十二条》也拿不出来，他们不是八小时问题，而是季节问题，这真是吃饭的问题，季节一过，一年就完了。"

“有两种情况。有的是好人，有的不是这样。一种是坏人要破坏，但有些老工人是由于旧的习惯势力。这种势力相当大，对于这种人更难办，这种人打不得骂不得，要做政治思想工作。目前有个倾向，就是劳模被拉过去了，他们不但在厂里有影响，在社会上影响也很大，我们要做政治思想工作。”

姚文元：“包括‘赤卫队’40 万人。”

张春桥：“中央不会把文化大革命停下来的，主席也是这样，决心下定了，全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要进行到底，当然还有分期分批的问题。一个城市不能分期分批，像上海形势很好，可以全面铺开。有的就不行，像中小城市、三线问题。”

“情况很复杂，有人利用文化大革命搞复辟活动，也有些人抓着生产来进攻，当然我们也不怕罗。同志们对于抓革命、促生产理解很好。在这样大的革命运动中会出现各种问题，这是难免的，要以革命来推动生产。今天的争论是围绕着革命的问题，是要不要革命，敢不敢革命的问题。无论如何要下定决心把革命搞好，革命搞不好，生产怎么能搞好呢？中国不是要变颜色了吗？现在我和你们有共同利益了，我没有想到会有这么多人打电报要我回去。这点我不怪你们，几时我回上海开一个十万人的大辩论会。但做法上要有

策略，要争取多数，把中间状态的人不要当作坏人，‘赤卫队’中间的大多数都是热爱党、热爱毛主席的。”

“近来我收到控诉我的意见，对你们的情况听得比较少，我希望能听到你们的情况。另外希望你们把厂里造反队中生产好、革命好的典型总结一下，要确实的消息，寄给我一些，我要给中央看，也可以在北京宣传。对于打人的事，你们要观察一下，到底是谁在挑动打人。”

代表：“这很明显，头子是张琪，是总工会主席。”

12 月 7 日，北京地质学院“穷棒子造反兵团”发表“第一号公告”，说中央文革小组是形“左”实右。

这天，国务院外事办副主任廖承志在民族文化宫主持的“第二届中日青年友好联欢”筹备会。会上，中学老红卫兵又与“三司”发生了冲突。冲突的焦点是联欢会的主持权。“三司”红卫兵代表提出，联欢会应由他们来主持，而中学红卫兵代表、“西纠”的马晓军等人坚决反对，双方为此争执激烈，“三司”一名姓沈的女代表被打，现场大乱，交通一度堵塞。作为筹备会的召集人，廖承志倾向中学生一边，“三司”愤而抗议，然后退场。

时间已是深夜，喧嚣过后的民族文化宫恢复了以往的宁静。廖承志将中学生引进他自己的房间，准备作促膝长谈。

这些中学生，其父母都有着辉煌的历史，他们自己在文革初期曾秘密组建起红卫兵，得到毛泽东的支持，也有着辉

煌的过去。没想到全国人民都起来造反了，他们却感到了失落，四处受挫，内心觉得非常的委屈和辛酸。此时，他们围着廖公，心中的不平和愤懑算是找到了一个发泄的地方。

廖承志听着听着，一声长叹，说道："总理是理解你们的。"

房间里顿时安静下来。几个年轻人眼里，有泪光闪动。

廖承志深思一会，继续说："你们要懂得，作为一个革命者，在革命高潮时应该跟着党，在受到冤枉委屈时，也要跟着党干革命。我从小参加革命，可是到了革命队伍又遭到不信任，长征时我是戴着手铐走过来的。后来是总理救了我。希望你们要以革命利益为重，经得起斗争考验。现在我白天挨斗，晚上还会见外宾……"

说到这儿，廖承志脸上苦笑一下，停住了。

停住，是因为有人敲门。

门打开了，两名身着便衣的《解放军报》记者走进来，亮了亮记者证，坐下，要求旁听。

屋里的中学生感到突然，当即就有几位站起来，坚决要求那两名记者退出会场。

廖承志摊开双手，耸耸肩说："既然孩子们不欢迎你们，你们就请出去吧。"

"我们是搞内参的。"其中一名记者说。

"内参，我们自己会写。"廖承志说。

“你？”说话的那个记者怀疑地打量着廖公。是的，自中央文革记者站组建以来，这些记者不论到哪里，都受到非同一般的接待。他们可以列席省、市常委会，参加任何群众组织的会议，就连总参代总长杨成武、各大军区司令员都对他们客气有加，今晚在廖承志这里，却被请出门？他有些难以置信。

“年轻人，我当新华社社长的时候，这个世上还没有你哪！”廖承志说着轻轻笑了。在场的中学生们则毫无顾忌的放声大笑。

两位记者十分尴尬的退了出去，廖承志也因此惹下了祸端。当天晚上的后半夜，廖承志刚刚上床，就被一阵急骤的电话铃声惊起。

电话是江青打来的：“你连毛主席司令部的人都敢撵，你还是不是共产党员？！”

廖承志刚想申辩几句，对方“喀”地一下将电话放下了。

12 月 7 日晚 20 时 05 分至 23 时 05 分，周恩来在中南海小礼堂接见中国科学院京外 49 个单位来京代表。中南区武汉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的许友梅代表全体与会单位汇报了科学院系统京外各大区运动的大致情况。

当周恩来看了西北冰川冻土沙漠研究所周志和的信后问：“周志和同志来了吗？”

周志和答：“来了。”

周恩来："你的信我看了，你何必用血指呢？不用血指我们也会重视的，我看了很难过。"

当许友梅汇报到武汉办事处文革和分院领导人追到火车站逼迫赴京代表退票时，周恩来问："他们来了没有？"

答："来了一部分，8 个单位，20 多个人。"

周恩来继续问："今天到会没有？"

答："来了。"

周恩来："湖北现在行动起来了，你们赶快回去闹。"

他又问："杨献珍在武汉你们知道吗？……杨献珍现在倒舒服。有人说他是死老虎，其实现在还没有'死'。他在党校工作了十多年，影响很大。"

当许友梅汇报到兰州有的单位借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之名，重新在群众中抓李贵子式的政治扒手时，周恩来问："兰州的情况怎么样？李贵子的问题到底弄清楚了没有？"

众答："弄清了，他是个政治扒手。"

周恩来问："省委利用他，现在受他影响的同志觉悟了没有？"

众答："群众已经觉悟了领导还没有觉悟，领导都是保皇的。"

周恩来很奇怪，问："汪锋已经倒了，还有什么皇？"

代表答："省委秘书长在万人大会上公开讲，我就是李贵子的后台！"

周恩来："哦！这个人倒有意思，还有这样的人！如果李贵子回去怎么样？"

代表说："应该枪毙，很多大字报都说要枪毙他！"

当汇报到武汉主要是学生运动，机关差得远时，周恩来说："'长办'不是搞得很凶？大家也是机关！"

代表："他们对于干部有很多规定，不准把大字报贴在外面，不准同学生一起搞。"

周恩来："你们把它冲破就是了。"

代表："湖北的王任重威信很高，大家都很相信他。"

周恩来："那也不一定。'长办'的林一山牛皮还不是很大的？说他可以直接同主席谈话，还不是给揪出来了。"

11 月底，由贵州"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司令部"发起，贵州"炮轰派"成立了"贵阳市统一行动指挥部"，"红卫军"、"地化所"等所有"炮轰派"组织都参加了。这是贵州造反派最初的大联合形式。

12 月 3 日，西南局同意增补贵州省省长李立和贵州省军区李再含为省文革小组副组长。

这天深夜，贵阳市发生一起交通事故，在贵州省工会"红卫军"总部大门口的宽阔街头上，两名"红卫军"被汽车压死。这两人都是拥护李铁乃的"钢杆"。肇事者是谁呢？事后无法彻底弄清。有人说，是李铁乃派遣他们深夜外出行动，在漆黑一片中调动汽车，不慎被自己的人误伤了，也有

人说，这是他们“红卫军”内部狗咬狗，有人故意陷害这两“钢杆”压死的。不管怎样，李铁乃却抓住这件事大做文章，说是保守派组织趁黑夜有意制造惨案，开车压死了造反派“红卫军”成员，事后，开车溜之大吉。他坚称，这两人是“工人纠察队”开车压死的。他要求举行厚葬，并索要钱物。

李再含代表省领导与李铁乃谈判，提出在事件的原因未弄清之前，不要举行隆重的礼仪安葬死者，对李铁乃索要钱物的要求也表示不能同意。李铁乃坚决不答应，声色俱厉的说道：

“‘红卫军’战士的血不是白流的，血债一定要用血来还！省里不答应我们举行葬礼，我们自己也要办！”

李再含公开表态罢了市公安局长的官，并带头签字同意在全市停产 3 天，游行追悼，还以省文革小组名义发出全市停产通知。次日，“贵阳市统一行动指挥部”举行追悼会，李再含与贾启允联名送花圈，并致悼词，还追认这两名死者为“烈士”。追悼会那天,动用了 60 多辆卡车,将两名死者的棺材并列摆放在排头的卡车上,四周摆满了花圈,卡车从头到尾都装饰了白布和白花.随行的每辆卡车,都在当头缀有一朵大白花.车厢周围都贴有用白纸写的“血债要用血来还!”“誓死为红卫军战士报仇!”等标语。在通往火葬场的路途上，哀乐高奏，炮竹声、口号声不时响彻云霄。

事后，“红卫军”要求解散“工人纠察队”，把躲在省

军区地下室的省委第一书记贾启允揪出并扣押起来，一时间轰动省城。李再含和李铁乃被贵阳人并称“二李”。

12 月 5 日，“红卫军”以查抄“黑材料”的名义，从《贵州日报》社抄出很多材料运回总部。李铁乃声称掌握了李再含的“钢鞭材料”，说“李再含比贾启允更坏”。“二李”之间的关系起了变化，李再含对李铁乃的态度变为“一看、二帮、三警惕”。

12 月 10 日天上午，贵阳群众揪斗省委第一书记贾启允，让他站在卡车上，身穿一件黑纸扎成的清朝官服，腰系一条纸做的玉带，头上戴一顶黑纸做的乌纱帽，帽子的两翼伸出有一尺多长，随着车子的抖动上下左右晃动。尾随围观的人太多，随着一阵马达的轰鸣声，汽车猛一启动，他的身子又不由自主地向前一闪，头上的乌纱帽，差一点晃落下来。汽车向前开动了，高音喇叭里传出震耳欲聋的吼声：“打倒李井泉在贵州的代理人贾启允！”“愤怒声讨贾启允在贵州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的罪行！”

12月10日，李再含在给林彪转毛泽东、党中央的一份电报中说：“省委已完全瘫痪”，“全盘机器已完全失灵”，“有影响三线建设的危险”等。

贾启允被揪斗后,陶铸来电:“同意撤销贾启允贵州省文革小组负责人的职务,由李立同志主持,李再含同志协助。陶办。”

“工人纠察队”因面临解散危机，遂挟持省长李立上北京告状，但被“炮轰派”截堵抢回。12 月 17 日，陶铸来电：“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每一个公民都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工人纠察队是群众组织。既然是群众组织起来的，就不要撤销。陶办。”

第 327 回：心交瘁，叶飞抱病参加会　易帜难，大田湾孕育危情

福建的叶飞，此时的日子愈加艰难。12月2日，福建“11.23革命造反指挥部”在人民大厦召开“11.24”流血惨案控诉大会，叶飞因为开三级干部会，未出席大会。少数派不罢休，四出找人，于是叶飞派人与大会指挥部协商，答应12月3日下午和“11.23革命造反指挥部”座谈。

12 月 3 日，叶飞和省长魏金水等人参加了“11.23 革命造反指挥部”的座谈会，在会上，叶飞代表省委宣读了《对当前发生的一些事件的态度》，承认 23 日、24 日连续发生的事件，是由于省委过去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影响还没有完全肃清，群众之间的对立情绪还没有完全消除造成的，省委是有责任的。

不用说，那些学生们对叶飞的这个表态是极端不满意的，他们勒令当场召开省委常委会，解决他们所提出的印刷传单的纸张问题和医治伤员、保证少数派的人身安全、赔偿他们一切损失等要求，根本不听叶飞的解释。

当晚，学生们又召开“叶飞一手制造的‘11.24’流血惨案控诉大会”，在人民大厦的广场上再次密密麻麻地坐满了人。

这些日子，叶飞被搅得精疲力竭，心力交瘁，3 日下午他已是抱病来和学生们开座谈会的，晚饭后，更感到头痛欲裂，躺在床上不停的呻吟着。他的妻子王于畊见此情景，关切地问他道：“你怎么啦？什么地方不舒服？”

“我的头痛得厉害，唉哟哟。”叶飞一边闭着双目说，一边用手不断地揉着两额的太阳穴。

“我打电话去叫医生来。”王于畊说着，就去挂电话。

不一会儿，叶飞的保健医生急匆匆地赶来了。他给叶飞打了针，服了药，叶飞这才感觉好一些了。

小憩片刻，叶飞挣扎着要爬起来，保健医生急忙制止他道：“叶书记，你别爬起来，应该好好躺着休息。”

王于畊也劝说：“是呀，你就躺着休息，今晚的会就别去参加了。”

“不，今晚的会非去不可。”叶飞连连摆手。

就这样，叶飞在两个工作人员的搀扶下来到人民大厦广场。可是，由于他的姗姗来迟，一直坐在水泥地上等他的学生们早就不耐烦了，叶飞一到，迎接他的就是一阵怒气冲冲的咆哮：

“打倒叶飞，改组福建省委！”

“打倒郑重，改组福州市委！”

叶飞在一张椅子上坐了下来，这时候，他的保健医生又给他送来一包葡萄糖。但是，这有什么用呢？他的头还是痛不欲生，没有人理解他疾病的痛苦和内心的苦衷，下面的学生们向他投来的全都是毫无隐蔽地一道道凶狠的目光，他们愤怒地捏紧了拳头，怒不可遏地喊着“打倒”的口号，似乎他和他们之间有着不共戴天的仇恨。他，叶飞，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为了共和国的诞生，曾出生入死，血染沙场，而今却一下子变成了一个“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天哪！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这一切是多么不可思议、不可理解呀！这叫他怎么不感到伤心、痛楚、悲哀呀？为此他伤透了脑筋，他的头痛得愈来愈厉害了，但是，还要坚持……

12 月 4 日、5 日，“11.23 革命造反指挥部”和叶飞、郑重他们多次开小会，展开激烈的辩论，老将到底辩不过巧舌如簧的小将们，省委常委于 7 日被迫再次对“11.23”、“11.24”事件表示态度。

这一次的表态同样写成书面，由叶飞向“11.23”指挥部宣读：“11 月 23 日，部分革命学生抢走了市总工会所存的材料，这种行动在群众中引起了一些不同的看法。我们认为革命学生所以采取这种行动，主要是为了促使我们省委尽快地向广大工农群众、革命师生、革命干部做出全面的检查（在此之前省委只作了初步的表态），并遵照中央的指示，坚定而迅速地做好平反工作，他们的矛头主要针对着我们省委，他们的大方向是正确的。11 月 24 日，工人赤卫队在体育场召开揭发批判省、市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错误的大会上，发生了群众同群众的冲突的时候，我们省、市委出席会议的同志，离开了会场，而没有大力地去进行工作，这错误的。”

与此同时，郑重也代表福州市委，宣读了《关于 11 月 23、24 日问题的意见》一文：“市委认为‘11.23’行动指挥部组织的革命同学为了坚决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革命热情是好的，大方向是正确的，他们在 11 月 23 日、24 日所采取的行动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我们认为还是不要采取这种方法为好。”

对于省、市委的表态，学生们还是不满意的，他们想从叶飞的嘴里撬出“11.23”行动是“革命行动”这几个字，可是却始终也撬不出，叶飞固执地缄口不语，在一再逼问之下，直到最后才说出“这个问题事关重大”一句话来。尽管叶飞和许多老干部一样对这场文化大革命感到迷惑不解，狂风暴雨的运动使毫无思想准备的他晕头转向，对于那些造反的红卫兵小将们有些畏惧，确切地说，是相当害怕，但是，在关键的原则的问题上，他还是坚持了他的立场，不肯向红卫兵让步妥协。

从 11 月 23 日到 12 月 7 日，这是福州市发生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的半个月，文化大革命波涛翻腾、风雷激荡，如果说《解放日报》事件是上海运动的一个重要转折点的话，那么，“11.23”、“11.24”事件也是福州市运动的一个重要转折点，省、市委像一艘罗盘失灵的大船随波逐流，随时可能被有如起伏的高山般的巨浪所吞没、粉碎，拥有十几万之众的煊赫一时的“工人赤卫队”和“前线红卫兵”开始大崩溃，就像被山洪冲刷的泥石流，而少数派学生再也不是“一小撮”了，他们正在成为福建省运动的主宰，力量的天平向另一端倾斜。

无休止地检讨、做工作，叶飞的高血压、心脏病等老毛病加重，早晨的脉搏达 100 多次，头昏，不得不住进了福州军区总医院。福建省委到此时也基本瘫痪。

叶飞的家被抄了，有人提出要将叶飞的宿舍进行公开展览。福建省委不同意，红卫兵坚持要搞。省委只得向中央请示，中共中央办公厅于 12 月 1 日发来“不同意在叶飞生活方面搞实物展览”的电报，

不同意在叶飞住处举办“反修展览馆”。

12 月 8 日，厦大“红卫兵独立团”等学生组织不顾中央办公厅“不同意在叶飞生活方面搞实物展览”的电报答复，硬是将叶飞住地搞成了“反修展览馆”，将一些生活用品作为“封资修”的东西进行展览。叶飞在福建的威风扫地。以学生为代表的红卫兵造反组织不仅在舆论上取得了主动权，而且在行动上也取得了主动权。

12 月 14 日，尽管医生认为叶飞的病情不宜参加各种活动，但他还是拖着病体，出席造反派的会议。

为了在当晚的会议上向学生们解答“1123”、“1124”的问题，叶飞又认真地看了陶铸、汪东兴接见江苏造反派赴京代表及江苏省委主要领导的谈话记录。他认为：少数派革命最坚决最勇敢，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但是，他们在掌握政策方面、斗争策略方面、工作方法方面不太注意。群众对他们这些毛病很不同情，所以需要对群众进行大量的、艰苦的教育说服工作。但是对多数派也不能一概否定，应当争取和团结他们。否则只会使双方的对立越来越尖锐，发展下去将引起更大冲突和流血事件，省委就要负严重的责任。

叶飞也清楚，做这项工作最大的困难在于：省委尚处于被动的地位，说话没有人听，少数派不听省委的，多数派也不信任省委。尽管如此，他仍然坚持要对双方做艰苦的劝说工作。叶飞表示，学生们的行动虽是出于革命的目的，但方法是欠妥当的。自己只能承认 11 月 23 日讲话有错误，但不能肯定学生们的行动毫无不当之处，这一点要坚持，尽管他们会不满意，甚至会施加种种压力。

当晚，叶飞在“11.23革命造反指挥部”代表联席会上作了检讨，承认自己的讲话有错误，学生的行动本质是好的。但学生们说叶飞的检讨一点都没触及灵魂，勒令叶飞等人每天早、中、晚要分别学习一篇社论，还要写心得；并要求第二天中午每人要交一篇学习心得给“11.23革命造反指挥部”，且必须亲自动手写，不能打字，也不能由秘书代写。最后，学生们还给了一通警告：“叶飞，你不要讲什么‘老老实实检查’之类的话，你的病是有的，要用毛泽东思想来治你的病。你的心脏跳120次还不够，要跳240次，要触及灵魂。你不老老实实交代，要准备斗争，不触及灵魂会完蛋，非垮台不可。”

对于福建省委的领导问题，叶飞提议分为一线、二线，常委分工有前有后，组织个三人小组，由他和范式人，再加一人组成，放在后边一点；再组织一个三五人的管生产班子，专管农业、工业、财贸以及接待工作等，公开讲清楚，不能冲击他们。对于群众提出的问题，应当处理而又能处理的，坚决处理，及时解决。不该处理，不能解决的，不乱答应，要敢于坚持原则。遗憾的是，在当时的形势下，叶飞的这些建议，已经没有实施的可能，也难以做到。叶飞本人已经处于自身难保的境地。

我们再看重庆。11月28日，重庆“工人纠察队”决定更名为重庆“工人战斗军”。这天，重庆全城同时飞传一张《海报》称：“重庆工人战斗军”司令部定于12月4日在重庆体育场召开“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深入揭发批判西南局、省市委所执行的资产阶级反

动路线誓师大会”。

当时，重庆官办的 4 个群众组织中，学生组织有 3 个：“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小学“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也有人称之为“毛泽东思想红小兵”；还有学校的“赤卫军”。“赤卫军”是“思想兵”的外围组织，成员均为出身、成份较差者。工人组织只有“工人纠察队”。海报中所称“重庆工人战斗军”，其实就是“工人纠察队”名称改换而已。

消息既出，重庆造反派和“首都三司驻渝联络站”等外地赴渝红卫兵便认定大会是“阴谋”，是“假批判、真包庇”，决定坚决对其造反。

重庆市委得知“124”大会可能导致群众之间的冲突，十分着急，在 11 月 29 日上午召开的重庆各大学负责人会议上，市委书记处书记辛易之对“工人纠察队”将要召开的这个会议表示了忧虑。下午，市委主要领导听取汇报时，辛易之和四川省委工交政治部主任燕汉民对主持重庆市委工作的书记鲁大东讲了 12 月 4 日“工人战斗军”要在大田湾体育场开大会的事情。

12 月 1 日，重庆市委在小温泉召开干部会，说明市委已经犯了路线错误，如果再滑下去，就有变成“四类”干部，即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危险。对 12 月 4 日“工人战斗军”召开的大会，一定要说服他们不开，如果他们一定要开，就通知各单位的“工人纠察队”不去参加。

12 月 2 日上午，重庆市委书记处书记鲁大东、辛易之专程到重

钢招待所会见“工人战斗军”负责人楚光辉等 3 人，提出：目前少数派与多数派有对立情绪，如开大会，少数派来冲会场，则很可能发生冲突，所以 12 月 4 日的大会最好不要召开。如果一定要开,也建议不要开大会,改为开小会。

然而,原本就是组织起来保卫各级党委的“工人纠察队”,这次却不听党组织的招呼了。他们召开这次大会的目的,本来就是要挽回政治声誉,甩掉“资产阶级保皇派”的帽子,若按市委的意见不开这个会了,岂不正好授人以柄,招致造反派的耻笑？因此,他们表示大会非开不可,但保证绝对不发生冲突。

鉴于对“工人纠察队”负责人劝说无效,重庆市委不得不在当天下午电话通知各部委、各区委,要他们通知下属单位的“工人纠察队”不参加“124”大会。自然,这些通知也同市委领导对“工人纠察队”负责人的劝告一样,不起作用。众多的“工人纠察队”队员早已憋了一肚子气,坚决要通过这次大会来向公众表明,只要毛主席、党中央发出号召,他们也是会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造反的。

12 月 2 日，重庆市委在派人劝重庆“工人纠察队”、“重庆大学赤卫军”12 月 4 日不要开会的同时，也作重庆大学“815”的工作，劝他们不要去造 12 月 4 日大会的反。正在重庆协助市委工作的西南局宣传部部长刘文珍和四川省委工交政治部主任燕汉民，都到重庆大学去向“815 总团”负责人进行劝说，对此，重大“815”当然也是不可能答应的。

12月3日上午，以重庆大学“815战斗团”为首的重庆“红卫兵革

命造反司令部”召开联席会议，制定对“124大会”的造反方案，决定：如到主席台发言造反不成，则将队伍拉到市中心解放碑另开召开“真批判”大会,与“工纠”的“假批判”形成对比，以争取广大中间群众。该计划立即遭到“工人造反军”反对，被黄廉等人斥为太“温良恭俭让”，太“右”。

同日下午和晚上，“重庆工人二七战斗团”、“工人造反军”和“首都红三司驻渝联络总站”等组织的负责人又制定了另外两套方案，除安排冲主席台、控制两侧看台、卡住大门外的具体人员外，还特别安排在主席台后边马路停放3辆救护车以运送伤员。其中有人称：“要以血唤起山城人民的觉悟，就是要准备死人，准备血战一场。”

当晚，位于重庆市体育场旁边的重庆市文联院内灯火通明，几所中学的造反派学生在文联院内实行“戒严”，将气氛搞得十分紧张。文联造反派中已传遍了“明天大田湾开会要发生流血冲突”的说法……

第 328 回：一二四，大血战再起山城　气难平，挥笔炮打戚本禹

12 月 4 日是一个星期日，再过三天就是农历节气“大雪”。山城重庆上空彤云密布，气象肃杀。清晨的寒雾尚未散去，人们便已从四面八方涌向了市体育场。一面面旗帜在寒风中猎猎飘动，一行行队伍唱着《毛主席语录》歌，呼着口号，敲锣打鼓走进会场，宣传车上的高音喇叭播放着《声明》、《宣言》……

建于1956年2月的重庆市大田湾体育场有8个入口，除去当中的足球场和环场跑道外，仅四周看台即可容纳4万多人，加上中央的运动场，这里可容下10多万人，是建筑在起伏山丘上的重庆城里唯一便于举行大型群众集会的场所。

随着各群众组织队伍的到来，体育场内已是人山人海，场外的道路和空地上也是人满为患。到会者除了来自各地区各单位的“工人战斗军”，即“工人纠察队”外，还有他们请来的同样是由“官方”组建的“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小学“毛泽东思想红卫兵”、“赤卫军”及刚刚成立的“文艺革命军”。他们都已听说了造反派要来冲会场的传言，早已是义愤填膺，严阵以待，不到9时，重庆七区三县的学生、老师、大人、孩子都进入会场指定位置。为防止造反派的破坏，“工人战斗军”司令部还组织了数千人的大会纠察队伍，层层设防，摆好了“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的架势。一部分工人身穿整齐的新工作服，头戴钢盔，手持棍棒和扁担，严阵以待。

大会尚未开始，摩擦便已发生。一会儿是“首都三司”的红卫兵发现“工人纠察队”写的标语“谁反对工人纠察队就砸烂谁的狗头”，

认为是反动标语——因为当时的口号是“谁反对毛主席就砸烂谁的狗头”，“工纠”竟把自己与伟大领袖相提并论，是可忍孰不可忍！一会儿，又有几个“首都三司”红卫兵刷写挑衅性的标语“工人纠察队必定垮台！”“工人纠察队总部必定完蛋！”引起工人纠察队员的义愤，双方发生了争执和抓扯……

按照当时惯例，任何群众组织集会都要“欢迎各革命群众组织和革命群众参加”，“工人战斗军司令部”的海报上当然也写了这样的套话，而且在会前重大“815 战斗团”还煞有介事地派代表到“工人战斗军”司令部去联系有关参加大会、“支持革命工人运动”事宜。“工人战斗军”负责人自然也客气地表示了欢迎。因此，尽管大会组织者十分不情愿，也不得不让造反派的一些组织挤进了会场。

在双方都剑拔弩张、摩拳擦掌的气氛里，上午 9 时，大会开始，主持人宣布“重庆工人战斗军” 成立。

发言尚未进行，急不可待的造反派就借口“主席团成员未介绍家庭出身”开始造反了。本来当时，无论大会发言还是街头辩论，首先要自报家庭出身，这是文革初期“血统论”流行时的一条不成文规矩。但从“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以来，“血统论”已经受到批判。可是为达目的，不择手段，造反派只要有一个借口就行了。

率先上主席台的重大“815”周家喻和黄顺义强烈要求发言，遭到拒绝，并被早有准备的纠察人员推下台去。黄顺义被打掉了眼镜，周家喻被卡伤了脖子。

一个冲上了台的北京红卫兵曾一度抢过了广播话筒高呼“815 好

得很！”也被抓走……

与此呼应，台下被激怒了的“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小学“毛泽东思想红卫兵”、“赤卫军”及刚刚成立的“文艺革命军”和“工人战斗军”的群众则跟随高音喇叭的口号高呼：

“815 坏得很！”

“815 滚出去！”

人多势众，呐喊声如山呼海啸一般。

先期进入会场的“815”学生人数虽少，但却是最具有造反精神的青年学生和青年工人，他们摇旗呐喊，高喊“保皇有罪，造反有理！”的口号，以同样的愤怒拼命向主席台发起冲击，为首的就是重庆大学采矿系学生郑全体。

这时，“工人造反军”、“北京南下支队”和大专院校“815”也赶到了体育场，他们高呼：“受蒙蔽无罪，反戈一击有功！”“保皇派，就是右派！”等口号冲进会场。维持会场秩序的“工人纠察队”阻止他们进入，双方在体育场大门口扭成一团。

被阻隔在会场外的造反派大队人马，如狂潮急浪一般向早已水泄不通的体育场发起拼死冲击，他们占领体育场大门边一座中西合璧风格的建筑作为指挥部，一场混战就这样开始了。

台上台下数万群众，由相互喊叫、谩骂、吐口水，很快就升级为推搡、扭扯、厮打。拳头不够，旗杆、标语牌、脱出的鞋子、地上的砖头，统统成了武器，满场混战，满场喧嚣，满场哭喊，满场血腥。双方还出动了大批摄影师，站在汽车、宣传车顶上和主席台、看台的

高处，抢拍各自所需的镜头。

“赤卫军”和重大“815”之间主要还是互相推、挤，最多用拳头，但黄廉的“工人造反军”的工人就不一样了，拿着扁担和棒棒冲过来大打出手，直捣主席台。他们在体育场外真的停了 3 部救护车。

会场上的高音喇叭不停地带领“工人纠察队”一派群众高呼“815 坏得很！815 滚出去！”那些坐在看台上的小学生们，胳膊上戴着“红小兵”的袖章，也在老师带领下紧张地挤在一起，涨红的小脸蛋拼命用稚气的声音加入这狂热的呐喊。造反派的几辆宣传车也往会场里挤，从会场一些侧门外还传来锣鼓声，甚至是冲锋号声……

这时，正在台上准备接受批斗的“走资派”见此情景，走过去拿起话筒劝起架来：“大家不要打，我们随时随地接受革命群众的批判斗争。要文斗，不要武斗。”

没有人顾得上搭理他们。

很快，不断有伤员从体育场内匆匆抬出，打得不可开交的两派群众，不管是哪派的，只要见是伤员抬出，都纷纷让路。赤手空拳武斗，打得很悲壮，抬出来的则个个满脸鲜血，双目紧闭。

为了尽量制止冲突，重庆市委事前已派了市文革办公室干部到会场了解情况，打听了体育场各侧门出口是否畅通。为了及时掌握情况，市委文革办公室还架设了专线电话，后来这些都被造反派认定是“预谋”。冲突发生后，鲁大东立即派市文革办公室负责人赶到现场做劝解工作，并要求把所有的门都打开，迅速疏散群众。随后市委书记处书记辛易之也征得鲁大东的同意到现场帮助做疏散工作。

会开不下去了，“赤卫军”和“工人纠察队”眼见不是“工人造反军”的对手，主席台已被“815”占领，高音喇叭气急败坏地通知：“工人战斗军的同志快快撤出会场！快快撤出会场！”

“工人战斗军”和连夜赶来助战的“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小学“毛泽东思想红卫兵”、“赤卫军”、“文艺革命军”的三区八县的学生、老师、大人、娃娃，一边骂着“815，暴徒!”“8 点 1 刻，暴徒!”一边像潮水般从体育场的各个出口涌出，从各条通道漫过。由于重庆市委的干预，这场持续两小时左右的大规模流血冲突终于平息下来。体育场内和场外的道路上、路边空地上，到处是折断的旗杆，撕碎的旗帜、标语，丢弃的鞋子、帽子，一片狼藉。

而造反派已经占领了会场，黄廉让“工人造反军”将挂在体育馆旗杆上的“工人纠察队”的军旗扯下，旗杆是铁杆的，有 20 公尺高，黄廉叫造反军把铁杆挖出来，派 40 个“造反军”作为战利品抬到他们的总部。

这时重庆的大街上，人们抬着伤员在游行，人们举着血衣在游行。

宣传车的广播员跳上车顶，把缴来的凶器、袖章高高挑起，大声宣讲着。

工人用白纸缠额，像电影上的日本示威者，白纸上写着：“以血还血！”手里还拿着大纸板，上面写着：“这才是真正的铁证如山！”“罪责难逃！”

他们在街上冲过去，冲过来，把“工人纠察队”的标语统统撕个精光!

很多纠察队员把袖章摘下来，扔到宣传车上，一个北京女学生把这些袖章穿成一串，挂起来，向群众高呼：“工人纠察队中要革命的同志，好样的，就站过来！”

目睹当时的血腥场面，路人在传：“工纠打死了人，是‘二轻兵团’的。”

当“815”的学生怒气冲冲地从城里步行十多公里返回沙坪坝，一路上听到街传路议，死人已由几人迅速增至几十人！

回到学校的“815”学生怒不可遏，又在沙区窄窄的街道写满了标语，都是“以血还血，以命抵命”之类的诅咒。

同样，12 月 4 日下午，从体育场被迫撤出的“赤卫军”也是余怒难消，在沙坪坝大街上写了一下午“打倒李井泉”的标语。

当天晚上，重庆大学周孜仁等 20 多个学生，又冲到学校松林坡上，一口气把有数倍于他们的“工人纠察队”总部砸了。砸得轻而易举。既然死了人，性质就不一样了，“工人纠察队”自觉输理，怕“815”杀人报复，所以，任由他们砸东西、抱东西，“工人纠察队”都乖乖让一边，惟恐把他们激怒，只在嘴里不听地骂：“815，暴徒！”“8 点 1 刻，暴徒！”只是动口不动手，眼睁睁看着“815”扬长而去。

12 月 4 日晚上，重庆大学饶家院到图书馆之间黄桷树下大字报栏内贴出了一张题目为《12.4 的罪魁，戚本禹也算一个！》大字报，署名是“1018 红兵”。

大字报写道：“毛主席教导我们，文化大革命要文斗，不要武斗，而身为中央文革成员的戚本禹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绘画绣花，

这么大个运动不打破点坛坛罐罐行吗？’‘不打不相识嘛’。这是鼓吹武斗，破坏文化大革命，12.4 武斗与戚本禹的煽动有关，罪该万死！”

大字报刚贴好，几个北京红卫兵就围上来盘查。很快，这些北京的小将就在大字报上密麻麻批上：“中央文革是毛主席的最高参谋部，炮打其成员就是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是反革命……”等评语。

重庆大学“815”也立即介入，在 12 月 18 日出版的《815 战报》第二期上写到：“最近在重庆大学，一个署名‘1018 红卫兵’的混蛋也抛出了一张诽谤中央文革的大毒草：《一二四的罪魁，戚本禹也算一个》”。

12 月 26 日出版的第三期第三版中又专门对此事作了报道：

“又讯：重庆大学抛出天字第一号大毒草《一二四罪魁戚本禹也算一个》的大混蛋，现已用大字报做了一个文过饰非的所谓‘初步检讨’。现已查获该大字报的作者‘1018 红兵’原乃冶金系赤卫军干将黄昌国是也。”

黄昌国，重庆大学“赤卫军”的骨干，在重庆大学附属小学当辅导员期间，组建了重庆市小学“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并领着那些小学生参加了 12 月 4 日大田湾体育场的大会，那天从体育场回到重庆大学后，实在是气愤不过，连夜写了《12.4 的罪魁，戚本禹也算一个！》大字报。因为他曾在 10 月 18 日参加过北京毛泽东接见红卫兵，所以落款写的是“1018 红兵”。

黄昌国为什么要炮打戚本禹？原来，首都“二司”是支持重大“赤卫军”的，其中北京“二司”一名北京大学哲学系的研究生串联到重庆，就在“赤卫军”总部当高参。这位高参曾经给了黄昌国一叠中央文革小组成员鼓吹武斗的言论集，并以毛泽东的话对他说：“表现在下面，根子在上面。”

黄昌国听了这位首都“二司”高参的话，心想：“中央文革小组几个人有什么了不起？向他们开炮！”他不想笼统提中央文革，就开始在中央文革成员中选择目标，发现戚本禹的言论中煽动武斗最露骨而激烈，就先瞄准了戚本禹。

第 329 回：控诉会，体育场白花如山　周恩来，批评西城纠察队

《红岩》作者罗广斌、杨益言对重庆“12.4武斗事件”非常痛心和愤怒。他们在大田湾大混战的第二天，12月5日上午，领导重庆市文联文革小组召开“124烈士”追悼会。会上，有人介绍了到医院看望造反派伤员的情况，有人介绍了“124”会场及“工纠打死造反派”的情况。

下午，重庆“815”、“工人造反军”及外地赴渝学生就在“124”事发地——大田湾体育场召开“124惨案控诉大会”。

这个会原打算叫追悼会，但因一时没找到尸体，只好改叫控诉会。

会上，重庆大学“815”用旗杆举着长长的挽联进入会场，受到群众热烈鼓掌。挽联上写道：

是七尺男儿生能舍己

作千秋雄鬼死不还家

碧血溅山城，喜红岩史诗又添新页

风暴扫迷雾，看文化革命谁敢阻挡

在大田湾，一朵朵白花、一个个花环、一幅幅挽联，很快堆成了一座小山。

重大“815”负责人周家喻发言说：“西南局、省市委中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阴谋策划其御用工具——重庆工人纠察队、毛泽东思想红卫兵、赤卫军赤膊上阵，拳打足踢，挥戈扬矛，大打出手。他们用钢钎、木棍、铁锤、铁矛、旗杆、主席语录牌……等等，打死

打伤‘815’派200余人，造成世所罕见的流血惨案。”

小说《红岩》作者罗广斌在会上发言说：“昨天，就在这里牺牲的革命先烈，是为了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彻底胜利，而被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重庆市委所屠杀的。”

“一个星期以前，我们在这儿追悼牺牲在中美合作所里的革命先烈，一个星期以后的今天，我们又在这儿追悼牺牲在重庆体育场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英雄。”

他呼吁：“所有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紧急行动起来，和革命群众一起，站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革命路线一边，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保卫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

他振臂高呼：“打倒黑市委！解放山城重庆！”并以“文联全体革命同志”名义，写出大字报《愤怒控诉制造12.4大血案的重庆市委会》。还在当天给党中央、毛主席拍发电报说：“我们怀着悲愤的心情向您报告……当场打死多人、打伤一百余人。”混乱年代，难免词语夸张，此事后来又被一些人借机攻击罗广斌等人是“伪造事实欺骗毛主席、党中央！”

一些“目击者”在会上发言中对“工纠打死造反派”作了“控诉”。

会后，到处风传：“黑市委”要“毁尸灭迹”，“红卫兵造反司令部”、“二七战斗团”等组织立即强行接管了火葬场，查封了那里的14具正待火化的尸体，等候检查。同时分兵把口检查过往车辆，看是否有人偷偷转移尸体。

山城内流言四起，北京也打电话来问：“到底死了人没有？”全

市老百姓都很关心。但是，谁也说不清楚。

此时的重庆市委更是惊恐万状，他们害怕再出大事更不好向中央交代，赶紧指示要稳定形势。从此，重庆市的“保守派”停止了公开活动。可怜重庆市文化系统中，主要由重庆市京剧团、川剧团、越剧团、话剧团、杂技团等文艺演出团体组成的与“工人纠察队”观点相同的组织“毛泽东思想文艺革命军”，于1966年12月3日刚刚成立，次日才参加了“工人纠察队”召开的“124大会”，结果就遭到了如此毁灭性的打击，还没来得及开展活动就从此销声匿迹了。但也正是因为参加了“124”事件，才使这支仅存在一天的“毛泽东思想文艺革命军”与重庆市的“毛泽东思想红卫兵”、“赤卫军”、“工人纠察队”齐名并列，被重庆造反派称之为“保皇四军”。

造反派组织了庞大的“一二四”调查团，负责人是重庆大学“815”的熊代富和清华大学学生、“首都一司驻渝联络站”的钟东，原名钟正国。调查团从数十人发展到近 300 人，不但有核心组、调查组，还有情报组、联络通讯组、组织组、宣传组、秘书组、后勤组、接待组、保卫组等，熊代富任团长。他们大部分是充满革命激情的年轻人，相信“工纠打死造反派”的传言，一心要查个水落石出。他们到全市各重要工厂、医院、机关、学校，有的甚至打入“工人纠察队”内部，进行了调查，也只是基本摸清了造反派的受伤人数，掌握了全部住院人员名单，收集了大量的冲突现场的照片。但是找不到一具“烈士”尸体。

12 月 6 日，一些造反派组织从重庆市火葬场抢出 4 具“可疑尸

体”，晚上从第一工人医院停尸房抢出当天死于心脏病的“815”学生李天敏的尸体。很快，就有人将这些尸体作为“124”事件尸体运往体育场陈列展出。“工人造反军”更是抬着抢来的5具尸体游行，说是被“重庆工人战斗军”和“赤卫军”打死的。

12月7日下午，所谓“124惨案”尸体在体育场预展。一些外地红卫兵担任纠察。主持广播。原定的“可疑尸体”展览很快就被宣传为“烈士遗体”展览，前往悼念者达数万人之多，花圈祭品无数。消息传到城中心解放碑附近的财贸工人“921战斗团总部”，正在这里串连的重庆市歌舞团一位演员义愤填膺，一气呵成写出了追悼“124烈士”的歌曲《亲爱的战友你在哪里》，歌中深情地唱道：

手捧着《毛主席语录》想起了你，

亲爱的战友你在哪里？

那天我们一起去开会，

会场上我们却失去了你，

我们的好兄弟！

你上台揭露了重庆市委，

你发言戳穿了阴谋诡计，

你勇敢战斗，你英勇无比，

谁知那一双黑手把你青春夺去！

歌词共四段，曲调凄婉悠扬，催人泪下，大受欢迎。一时间，重庆大街小巷、码头车站，到处张挂歌单，好事者高踞桌凳义务教唱，学唱者唱会一批又来一批，情切切而意深深，其势大有一夜楚歌，吹

散十万雄兵之气概。

万分悲壮！全市围绕“12.4”展开了舆论战，都说挨打死人，到底谁打谁？“造反军”的抬尸体游行，舆论倒向“815”一边，谴责“工人纠察队”的暴行。

12月8日下午，由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鬼见愁”的红卫兵率领，造反派把在体育场展出过的5具尸体抬着示威游行，随后冲进重庆市委大院，强行将尸体抬到市委办公厅楼上机要室停放，逼迫市委交出“黑材料”。

“一二四”调查团经过3天的调查，在“一二四”惨案过程中没有发现死人的情况，遂将调查情况向北京学生、各造反派负责人作了通报。但是罗广斌和一些北京学生坚持说有死人。北京的一些学生甚至提出“革命的谣言万岁！”的口号，还说“只要能够摧毁‘工纠’，摧毁保守组织，什么手段都可以用。”他们的态度与重庆大学“815”产生了矛盾。

12月9日，重庆大学《815战报》创刊，主要刊登了“124惨案控诉大会”的有关发言和控诉文章。

这天，由北京“一司”、“三司”、“北航红旗”、哈军工“红色造反团”等红卫兵和重庆造反派联合组成的“124惨案赴京控告团” 启程北上，进京告状。罗广斌一人掏腰包为“控告团”十几个成员购买了全部车票，并随团北上。

在当时“怀疑一切”甚嚣尘上之时，“尸展”中的尸体自然也引起许多人的怀疑。从医院抢出的那具重大学生李天敏的尸体首先被家

属领走，有人劝其家属承认李天敏是“烈士”，但遭到拒绝。

造反派中的一些红卫兵出面劝说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鬼见愁”，将停放在市委办公厅楼上机要室的尸体抬走，加上对尸体身份的质疑已经引起造反派的内部矛盾，后来将尸体抬走。

一批支持“工人纠察队”的首都红卫兵，对从火葬场抢出的 4 具尸体作了追踪调查，于 12 月 10 日至 15 日陆续用传单、大字报将调查结果公布出来，令造反派十分难堪：那 4 具尸体分别是，12 月 4 日下午在河运学校附近遇车祸死亡的近郊农村妇女；12 月 4 日早病故的重庆针织厂女工；12 月 3 日夜因心脏病去世的临江门石粉厂工人，据称是曾被劳改的“戴帽反革命”；12 月 3 日因急性白血病去世的四川省第二监狱劳改犯人……

后来查实，“124 事件”确实打伤不少人，事发当天，被送往医院的伤者，鼻青脸肿者有之，腿瘸臂折者有之，更有甚者，不能动弹、躺在床上输液的，也不乏其人。但是，说死了多少、多少人，却纯属子虚乌有。

保守派完全被造反派气势汹汹的反击吓破了胆，一直躲在屋里不敢露面，几乎半个月后，才又开始出来。害怕挨揍，都是一群一群地集体活动。他们走到街上，先选好一块地方，然后便手拉手围成弧形实施保卫，集体颂读《毛主席语录》以为掩护，接着小心翼翼，开始张贴反击造反派的大字报，其景凄惶寒惨，让人望而生怜。即使这样，得理不让人的造反派也决不给他们半点好脸色。一天，重大的“思想兵”正在张贴大字报，一位怒气冲冲地老头不问青红皂白，粗暴推开

正念语录的人墙，三把两把便将还没贴完的大字报撕个精光，而“思想兵”却毫无反抗之意，仅面面相觑，然后好像什么事都没发生一样，又排成两行纵队，高唱“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继续前进，寻找下一个张贴点。

保守派曾试图以“尸体”问题打开缺口，作最后一逞。他们在惊魂甫定后贴出的第一批大字报，主题就一个：你们“亲爱的战友在哪里？在火葬场！”然而毕竟大势已去，这种反击已经完全徒劳。此后，整个重庆形势一边倒，全市到处声讨、抄砸“保皇四军”，揪斗、殴打、关押、刑讯其人员。造反派声势浩大，如日中天。

我们再回到北京。廖承志在处理中日青年友好大联欢的事情上出了问题，周恩来又要亲自出面，于 12 月 9 日就中日青年友好大联欢的有关问题与北京大、中学的红卫兵代表座谈。他说：

“今天临时召开这个会，在座位问题上发生了争执，现在移上台，一视同仁，过去我和红卫兵谈话总是在台下。”

他讲了红卫兵参加的三次国际活动：

“第一个国庆活动，在首都是好的。……收获是很大的，国际评价是好的。

第二个活动是广州对外商品交易会，外国人大多是商人。在贸易战线上，我们红卫兵也起了相当的作用，给出口商品提出了很多意见。……在交易会前，我们工作人员对红卫兵去参观交易会还怕出问

题，结果不是我们所想象的。这两次大活动，证明了我们红卫兵阵容的强大。

第三个活动就是这次中日青年友好大联欢。以前日本反动派阻挠破坏，日本青年不能来。但日本左派青年向往中国青年，带有狂热，向往中国，要了解新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上千人想到中国来，受到中国青年的热烈欢迎。”

他接着说：“党中央有了国庆活动、广州对外贸易交流会的经验，又有了筹备中日青年联欢的经验，原以为问题不大了，对于这个问题没有注意，结果出了问题。”

“这次发生的问题，首先是领导关心不够，中央抓得不紧，主要是廖承志和他的帮手抓得不好。大，中学校参加有各种组织，左派的，中间的，保守的，要求不经过协商，像巴黎公社选举。无记名票选，好像很民主，但不能代表大多数的意见，协商就能代表较大多数的意见。……这两次廖承志要负主要责任，但不能因领导的问题而打人，造成 7 日的行动。打人是错误的，只能文斗，不能武斗！打人是原则问题，是错误的。‘西城区纠察队’以前有些成绩，但骄傲起来，犯了错误。我不是下结论。看了你们的第一号至十三号通令，我倒要研究一下。如第一号就有问题，对老干部要保护，你们要用毛泽东思想要求老干部，包括我在内，要让老干部继续革命，要求前辈好好革命，

不要你们保护，你们保护他躺在太师椅上，结果不是帮助，而是让他停止革命。你们保老干部太多。地质部你们去保护，你们上当了，是工作组邹家尤找去的。地质‘东方红’的同学对小弟弟，小妹妹要原谅他们，他们受了骗，何长工之流倚老卖老，把你们出卖了。当时我非常不满，同学斗同学，他在那里笑呵呵，他那革命的灵魂已不存在，像这样的人保护他干什么！不要去保护他，当时我知道后很不满，这个风气没有纠正过来。你们的通令我初翻了一下，有些话是错误的。你们（西城区纠察队）要好好整风，不要盛气凌人。

陈伯达同志是毛主席、林副主席的得力助手，他两次到你们那儿去，引起你们的误会。他抱着好意要帮助你们，他是我们杰出的理论家，毛泽东思想阐述得那样好！他跟毛主席那样紧，是中央文革小组组长，我们要尊重他，跟他学习。你们管辖下的六中，那样打人，完全违反《十六条》，你们自己整顿嘛！大前天在民族饭店的行动，连工作组劝都劝不住，爬窗口进去打人。第三司令部沈××被打，她今天来了没有？”

众答：“来了！”

周恩来：“她来了可以作证。7 日许多人围住，交通都阻塞了，这是廖承志犯的严重错误。他不是严肃地指出，诚恳耐心地教育，而是

另一种态度，放纵。对《解放军报》记者不尊重，引起大家大笑，侮辱在毛主席、林副主席亲自领导下的解放军。”

“对中央文革小组的同志，对陈伯达同志、江青同志、张春桥同志、关峰、王力、戚本禹、姚文元同志不尊重，甚至贴了海报、标语反对，那就不应该了！中央文革是党中央、毛主席、林副主席指定的，是经过半年多考验过来的，是有很大成绩的。中央文革是在党中央、毛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领导下的，是毛主席、林副主席信任的。我提醒你们，我讲的话不是百分之百的正确，有一半对就了不起，但我没有坏主意，我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讲话的。这次接待日本朋友，我们要联合起来搞的。我们要抛弃私心杂念，即使有错误意见，可以保留。我们要求在毛泽东思想旗帜下联合起来，要求对中日联欢有共同的行动，对以后北京大专院校的团结方向打个好的基础。”

“现在宣布：12 月 20 日以后，解放军休整一下，调一、二十万帮助中学参加训练，大学后一步。”

“还有一个问题。纠察队的名字，开始还有好意，1924 至 1927 年大革命时期，工人纠察队防止工贼、资本家的狗腿子，破坏罢工，手挽手地保护罢工机构。可现在纠察变成了红卫兵的上级。招待日本朋友一定要以红卫兵组织出现，纠察队的名字改不改由你们。伯达同志讲，不用纠察队这个名字，我同意伯达同志的意见，但我不干涉。”

周荣鑫："海淀区红卫兵纠察队递条子说，打人是枝节问题。"

周恩来生气地说："我不同意。"随手从衣袋里掏出一个红本子，读了林彪8月31日的讲话"……武斗只能触及皮肉，文斗才能触及灵魂。"然后说："斗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还是如此，何况我们红卫兵自己！所以打人不是枝节问题，是原则问题！这个问题存在北京城里！"

接着，廖承志讲话，作了检讨。这时，很多群众递了许多条子让周恩来解答。

同学问："第一司令部属于哪一派？"

周恩来："第一司令部开始成立时偏左，后又改组。现在是保守还是奋斗，由群众来定，最好不由我来封的好。"

"'西城区纠察队'要求跟我谈话，我愿意单独跟你们谈。说老实话，咱们要以诚相见。我赞成陈伯达同志说的，高干子弟最好不当领导。但有的高干子女与父母脱离关系，我们也不赞成。这样办不好，不提倡。"

此后，有人建议"西纠红卫兵"停止办公，偃旗息鼓，趁早全身而退，等待机会东山再起。但是大多数"西纠红卫兵"不同意。这些以革干、革军子弟为主体的红卫兵，从生下来那一天起就是社会的宠儿，他们还不习惯挫折，更不熟悉失败，他们孱弱的承受能力，导致他们在绊了一跤后变得绝望，甚至变得有些疯狂。他们扛着大旗，集

合人马，成群结队骑着自行车在大街上游行，高喊口号：“西纠不倒！”

## 第 330 回：座谈会，传达工交会精神
## 批文革，一时间风声阵阵

就在周恩来召集关于中日青年友好大联欢一事与北京大、中学红卫兵代表座谈会，批评北京“西纠”的当天，12 月 9 日，北航“红卫兵纵队”又贴出一张针对中央文革小组的大字报：《批评和监督中央文革的典型意义》。文章说：

“到了中央文革这一级，如果认为它的工作中有缺点和错误，它的某些成员的讲话不符合毛泽东思想，还能不能批评，还敢不敢造反。对于文化大革命中某些问题不理解，能不能向中央文革提出问题？”

“无产阶级司令部，它的缺点和错误就批评不得吗？坚定的左派就没有缺点、错误吗？他们的缺点、错误就批评不得吗？他们过去是坚定的左派革命，就永远是坚定的革命左派吗？否也，这乃是形而上学的观点。”

不仅是在北航，北师大中文系的张传亭也在 12 月 9 日这天，以向东彪的笔名，与同班同学敦进田以林锋的笔名在大字报栏里贴出一份油印小字报：《也致林彪同志一封公开信》。小字报的前半部分以较大的篇幅宣传林彪的功绩，后半部分以较小篇幅说明：即便伊林、涤西的观点有错，也不应该把这两位农大附中的学生打成反革命。

其实此时伊林、涤西这两位中学生还是自由的，但是他们的大字报肯定已经将他们放到了众人瞩目的位子上了，而

他们大字报的观点肯定也会受到大多数人的批判，上纲上线在那个年代是司空见惯的。

同一天，清华大学颜晓东也贴出《给毛主席的一封公开信》，指出:“10 月 3 日之后，北京的运动犯了方向、路线性错误”。

这天，清华大学“捍卫《十六条》战士”还贴出《中央文革小组向何处去》的大字报，质问中央文革小组：

“你们在北大蹲点至现在，尤其是《红旗》十三期社论发表至现在，全国文化大革命在你们领导下搞得怎样？你们是按照《十六条》这个最高指示办事的吗？你们贯彻了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吗？”

“运动初期，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结果造成了白色恐怖，请问你们，现在是否还存在这种局面？现在无产阶级的大民主到底实行得怎样？到底是不是已经真的大民主了？”

“你们对原来的多数派、少数派是采取了同一种态度呢？还是采取了不同的有偏见的态度？”

“三司部下的人为什么对周总理不是那么信任，把调和折衷的大帽子往总理头上戴，而对中央文革的人倒是如此的五体投地呢？是总理党内外的职位，还是掌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那一样不如你们这些人呢？”

“你们眼里的原来的多数派到底是不是革命的人民？还是修正主义的红卫兵呢？ 第一、二司令部召开的 10 月 9 日

的大会，为什么你们一个也没有去？而 10 月 6 日的会议你们全部都到呢？”

同日，清华“捍卫团”在红星电影院集会，会上有人呼喊“刘少奇万岁”的口号。

北大附中彭小蒙说：“毛主席树北大附中《红旗》为一面红旗，不能倒。”还说：“我不参加‘联动’，并不是我不反中央文革，因为‘联动’反的不是点儿，只知道乱冲，把老子逼急了，老子比‘联动’还反动。”

12月9日下午，毛泽东在游泳池主持中央政治局碰头会，研究工交座谈会精神如何传达。中央文革小组提出要把谷牧他们起草的《十五条》下发全国公开批判。

谷牧表态说：“如决定把《十五条》发下去公开批判，我没意见，但希望不要把与《十五条》无关的一些事扯上。”

坐在谷牧身旁的聂荣臻，望了望谷牧，慢悠悠地说：“我以为不宜传达，不宜公开批判。谷牧的错误，仅是一次没有形成后果的错误，不过是改了改稿子嘛！外面并不知道。如公开批判，观点就会流传，就会干扰当前斗争的大方向，后果值得考虑！”

聂荣臻说完，叶剑英等人立即表示赞同。

周恩来说：“批判《十五条》的事不再扩大范围了，由今天出席会议的各大区同志回去后，在常委范围内讲一讲。”

12月9日，中共中央下发《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十条

规定（草案）》。

当晚，中央办公厅机关事务管理局的李伟信来中直招待所，找到四川省委书记廖志高，当着“兵团”林云钦等人的面说：“中央领导同志找廖志高现在去开会。”

李伟信将廖志高以及他的秘书和警卫员送到北京饭店安排住下后说：“总理要我们找个好点的地方让志高同志好好休息一下，我们考虑这里既安静又安全，生活也可以改善。”

12 月 10 日，周恩来召集参加工交座谈会和被各地群众揪到北京的各省、市、自治区 20 多位负责人在人民大会堂会议厅开座谈会。

会上，周恩来说：“要准备迎接汹涌的浪潮。大势所趋，万马奔腾来了，你根本挡不住，要因势利导。否则，就会被冲垮。”

又说：“要组织生产班子，把懂生产的人、生产积极分子、老工人都吸收过来，把生产搞好。谈到如何对待红卫兵的冲击时指出：要摆脱被动，争取主动。如果省、市委领导还继续这样被动下去，就不利。对待红卫兵有三条：一是欢迎他们批判，抱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态度。二是站在他们当中一道来研究问题，弄清他们的要求是什么，合理的接受过来，三是要坚持原则，要讲政策，不能什么都签字。如卧轨抢车，就不能同意。”

省委书记们反映说：农村层层揪“走资派”，一直揪到生产队长，冬季生产和春耕准备工作无人管。

周恩来严肃地说：“基层干部就是要抓好农业生产，不搞好农业生产，工人农民吃什么？穿什么？我们的国家怎么办？要制止他们到农村串连。搞乱了农村，农业这个基础就要动摇，国民经济就要遭到破坏。”

他对派往各部门的联络员说：“告诉红卫兵，乱揪各省同志到北京，是不对的。各省的领导同志三天内回省，不许阻拦。”

10 日下午，中央办公厅机关事务管理局的李伟信来通知廖志高立刻去周恩来那里。周恩来询问廖志高近来工作和身体状况，他们谈到“文化大革命”发展成现在的情况，周恩来说他也没有想到，但是现在不能停下来，就像火车进行当中急刹车就会出轨，只能慢慢地收，估计明年内可以告一段落。他要廖志高面对现实，正确对待，坚持下去。

周恩来还要廖志高转告向中央请假外出治病的李井泉抓紧写出检查，否则越拖越被动；如果有病就“以口代笔”，自己口述由秘书整理。

廖志高的秘书当即电话告省委办公厅值班人员，要他们设法尽快找到李井泉。此时，李井泉正在云南昆明，周恩来的秘书周家鼎已将上述内容直接告诉了李井泉他们。

“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北上进京告状的代表基本都

到了北京，集中住在由全国总工会负责的白石桥接待站。周恩来于 12 月 11 日凌晨接见廖志高和后到的这些代表。他一开始就说：

“从你们要求来京的第一天起，就给你们和各级有关部门打过 6 次电话，发过 4 次电报，说明中央处理这件事的原则和态度是明确的，同时也是做给志高同志看的。”

在听取汇报过程中，针对有些人的偏激言论，周恩来说：“你们提出要‘解放大西南’，这个口号是错误的！大西南是中国共产党 1949 年早就解放了的嘛！现在还提这样的口号，针对谁呢！？”

参加完接见，廖志高又从北京饭店回到中直招待所。

这天，陶铸给上海市委打电话说：“以前对你们帮助不够，我自己也有错误，替你们出了些坏点子，对不住。今后，不要靠中央保，现在靠谁保都保不住。”

曹荻秋听到这个电话，非常难受，对人说：“心都凉了”。

进入 11 月，北京大学数力系学生杨作森、生物系卞宗美、刘秉慈、王山米等人组织了“虎山行战斗团”，取意“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他们不仅严厉抨击北大校文革聂元梓，还把矛头指向了中央文革，贴出了“炮打中央文革”、“火烧中央文革”、“中央文革必须开门整风”的巨幅标语，支持北京林学院学生李洪山给中央文革所贴的大字报，还对北京农业大学附中学生伊林·涤西给林彪贴的大字报表示

“坚决支持”。卞宗美说：“如果都像伊林·涤西那样敢于批评的人，中国就会永远不出修正主义。”杨作森则对文化大革命提出了这样的看法：“我担心这是斯大林后期的重演。”他们甚至说：“聂元梓的后台是江青，所以搬开聂元梓必须炮打中央文革。”“只有炮打中央文革，北大运动才有出路。”

12 月 10 日，“虎山行战斗团”贴出大字报：《毛主席的大民主万岁!》大字报提出：“炮轰中央文革小组是运动发展到今天的必然，是运动发展的关键的关键”，并质问道：“为什么中央文革小组就批评不得，老虎屁股摸不得？一摸就‘砸狗头’？！！”

大字报还说：“令人遗憾的是，以反对聂元梓为首的校文革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而挨骂最多的井冈山红卫兵及所属战斗团也极尽挑动群众斗群众之能事，变本加厉地执行从三司批发来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我们就要炮轰中央文革小组！”

“愿中央文革小组开门整风，深入群众，听取批评意见，愿全国人民对几个月的运动来个大检查、大总结、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把运动推向更高阶段！”

12月10日，北师大中文系学生彭加瑾贴出了《我们也贴中央文革小组一张大字报》。

12 月 11 日晨，北师大又出现了物理系的刘中柱和杨以

鸿给林彪写的大字报，标题是：《林彪副统帅也是可以批评的——给林副主席的一封公开信》。

大字报一开始就肯定说："批评不是攻击，更不是反对，农大附中伊林，涤西两同志《致林彪同志公开信》应该肯定是一个革命行动，这个行动是具有深远意义的。"

大字报认为："给党的领导人提意见，是值得肯定的革命行动，而给威信蒸蒸日上的林副统帅提意见，尤其是值得肯定的革命行动。

有无认真的批评和自我批评是区别共产党和其它党派的一个显著标志。认真的批评，就不管错误缺点的大小。"

大字报批评到："有人说：'林彪同志批评不得，'我们认为不对，我们只有一个标准，就是毛泽东思想。谁违反毛泽东思想，就批评谁。我们只有一个目的，就是保证祖国江山万代赤红。有的同志说：'不能给林彪同志贴大字报'，我们认为可以贴，贴大字报不过是批评的一种方式，我们看，对林彪同志的大字报，就是可以贴。"

大字报以湖南为例写到："九月十五日，林彪同志发表讲话，随着很多地方的当权派，就利用这篇讲话，宣传自己是无产阶级当权派，起劲地抓起一小撮右派来，给许多革命群众以很大的压力，很多地方的学生，工人炮击省市委的运动一度处于低落，最典型的是湖南，张平化照林彪同志的讲话做了一个报告，湖南就狠抓了几天'右派'，至今还有一些

人，仍利用林彪同志这篇讲话，来攻击造反派，我们看林彪同志的这篇讲话，客观效果是不好的。”

大字报最后说：“肝胆之言，是否像反革命，请大家斟酌考虑。”

物理系的学生李文博立即在此大字报上用钢笔签上了表示支持的评语。

12 月 11 日，清华大学“雪莲小组”印出传单《用毛泽东思想指导一切》，点名批评陈伯达、江青。

12 月 12 日，北京林学院李洪山贴出大字报《江青同志的讲话把运动引向何处——评江青同志 11 月 28 日在首都文艺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会的讲话》。

北京钢铁学院、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北京航空学院、北京矿业学院等院校的各种红卫兵组织分别贴出了《甩开中央文革自己闹革命》、《给中央文革小组的一封信》、《踢开中央文革，紧跟毛主席闹革命》、《看中央文革小组在文化大革命中执行了一条什么路线？》、《中央文革小组的错误路线必须批判》、《陈伯达必须给打成修正主义红卫兵的各种红卫兵组织平反》、《坚决罢掉关锋、戚本禹的官》、《誓死揪出毛主席身边的真正的资产阶级阴谋分子》、《给毛主席的一封公开信》等大字报，大标语，天安门两侧观礼台上，还出现了《中央文革小组执行的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大标语。

清华附中也公开贴出《向中央文革质疑》和《向江青同

志质疑》的大字报："毛主席批语江青同志有小资产阶级情绪，我们还再要加上一句：心胸狭隘，听不得不同意见"。

12月12日，北师大中文系学生王永敬贴出《把无产阶级的大民主推向新阶段》大字报。

12月13日，北师大物理系李文博的同班同学刘琢、李鸿杰、金宝英联合贴出了《中央文革要把运动引向何方》的大字报。

12 月 15 日，北师大数学系二年级学生李世取以"黑牛"的笔名贴出大字报，题目是："必须彻底实现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大民主"，其中说到："既然我们实现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大民主，那么，在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的前提下，对国家领导人的善意意见和提醒都是合法的，都是值得肯定的，因而不能打击迫害给林副统帅提意见的人，依据大字报内容，给中央文革提意见和建议的人更是完全出自对国家前途和命运的关心，对他们更不能打击迫害。"

接着，"黑牛"又将他曾给康生写的信转抄成两张大字报公开张贴，题目是《致"中央文革领导小组"的公开信——几点意见和建议》，署名也是"黑牛"。

李世取，"红五类"家庭出身，父亲是工人。10 月底，他和班上十几名同学组织"长征队"，途经平型关、大寨，准备前往延安。11 月中旬，当他们抵达太原小住时，听到中央要求学生们返校"复课闹革命"的紧急通知，李世取与另

一同学便迫不及待地脱离大队，乘拥挤不堪的火车连夜返回了北京，其他同学则继续按原定计划步行抵达延安。

李世取回到学校后，回顾了“文革”开展近半年来的历程及“长征”途中的所见所闻，感到“文革”存在许多问题，如“打击面”过大，各地“乱批乱斗”现象严重，“要文斗，不要武斗”的规定不能落实，被批判者的人身安全得不到保障等等。特别是当他亲眼看到狼牙山五壮士英勇就义河北易县和山西沿途，包括平型关地区老百姓的生活仍很困苦，教育非常落后。于是，在回到北京后的十几天里，经过反复考虑，给时任中央文革小组顾问的“康老”写了一封信，通过邮局寄出。信的主要内容是反映了步行串联中沿途的观感，表述了自己的忧虑，就自己个人关于如何“更健康”地开展“文革”提出了“几点建议”，核心内容是希望中央文革小组积极引导群众“历史地、全面地评价干部”，要“加强领导”，要“加强政策引导和落实”，“对乱斗人、乱打人的”现象一定要制止，对工农业生产一定不能放松，学校学生长期听课带来的损失也许是无法弥补的，也应重视。

“黑牛”的大字报张贴出来后，有若干人在大字报的空白处写下了支持的意见。

## 第 331 回：众领导，与“首都兵团”座谈　斗彭真，接见中科院代表

北京二十五中学的李冬民 9 月 16 日组织成立了北京中学“毛泽东思想红卫兵首都兵团”后，就到东北串联去了，直到 11 月才回到北京。这期间，他们学校一个叫秦希昌的同学，不辞辛苦地一个学校、一个学校的跑，以“毛泽东思想红卫兵首都兵团”的名义刻了公章，成立了北京 18 区县的联络站。此时，“毛泽东思想红卫兵首都兵团”已经是全北京市最大的中学生红卫兵组织。这是一个“平民化”的学生组织，骨干大部分是受工作组迫害的学生。

12 月 11 日，中央文革召集“首都兵团”李冬民等 19 名中学生代表在人民大会堂开座谈会，了解中学文化大革命的情况。这群中学生谁都没见过中央领导，乱哄哄的在人民大会堂等了大约一个多小时，闲的没事的李冬民四处溜达。这时，他在走廊里看见来了一群人，其中有周恩来、康生。这群人除了周恩来穿一身灰衣服，康生穿一身藏青色的中山装外，其他人都是一身军装，他们是陈伯达、江青、刘志坚、张春桥、姚文元、谢镗忠、李曼村、穆欣等中央文革的一干人马。李冬民一看这阵势，除了毛泽东和林彪，中央其他领导人几乎都来了，赶紧跑进厅里叫大家都坐下。中央文革的人和周恩来都是第一次见到“首都兵团”这群孩子，也很好奇。江青看了看李冬民，好像很熟悉似的问他：“哎，你是谁家的孩子？”

这时，李冬民也赶紧坐下，然后回答江青说：“首长，您以前没见过我。”

江青很好奇，便问他：“那为什么？”

李冬民回答很简单："因为我没见过您啊。"

旁边的康生和戚本禹一听，都笑了，江青也给逗笑了。这时李冬民又加了一句："因为您是首长，是文化革命的旗手，我们大家都想见到您。您呢，见过的人比较多，不一定记得住。但我们见没见过您，我们印象会很深刻的。"

座谈就是在这样融洽的气氛中开始了，大家谈得比较轻松。

中央文革了解北京 18 个区县的中学情况，几个中学生和大人谈事情，也没有发言次序，看到什么，想到什么，就说什么，主要反映的是工作组打击学生的问题，血统论和搞红色恐怖的问题。那几个大人一个个都聚精会神的认真听，这让这群中学生们感觉颇爽。

这时，"首都兵团"正筹备于 12 月 16 日在工人体育馆召开一个批判老红卫兵用血统论制造红色恐怖的大会，控诉中学里打人、伤人的罪行。李冬民趁这次机会，正式邀请周恩来和中央文革参加他们的大会，周恩来、江青当场就答应了。

李冬民与江青

叶向真他们劫走彭真等人后，周恩来答应帮助他们召开批判"彭、罗、陆、杨"的大会。于是，叶向真他们交出了彭真等人。可是，"彭、

罗、陆、杨”是中央级的黑帮，当时还没有向社会上公开。谁主持召开批判“彭、罗、陆、杨”的大会，无疑会成为全国一面造反的旗帜。在当时的形势下，如果由叶向真他们单独召开批斗彭真的大会，势必会引起各派学生组织之间的纠纷，周恩来让吴德去和叶向真他们商量，由各个造反组织联合起来召开批斗“彭、罗、陆、杨”等人的大会。

吴德来到戏剧学院找到叶向真，提出是否可以和北航“红旗”、地质学院“东方红”、北师大“井冈山”等组织联合起来召开大会，避免发生冲突。戏剧学院的人不同意联合批斗。无奈，吴德又和丁国钰去找地质学院的朱成昭，请他出来做叶向真的工作。

见到朱成昭，吴德向他谈了联合召开大会斗争彭真的方案。朱成昭同意联合开会，但他提出条件，这个大会要由他们来主持。吴德让他问一下北航的韩爱晶同意不同意。朱成昭当场打了电话把韩爱晶请了过来。

韩爱晶来后，吴德又对他们说：“周总理的意见是各派联合起来开大会，至于你们谁主持，你们自己商量，也可以轮流主持。”

朱成昭、韩爱晶都表示同意按周恩来的意见办，于是，吴德回过头来又找戏剧学院的叶向真。经过反复商量，终于决定联合开大会，先由地质学院“东方红”主持，然后是戏剧学院的“毛泽东主义红卫兵”主持。

这时，学生们忽然又提出，由北京市委吴德出面联系批斗彭真，是不是北京市委的阴谋？目的是为了转移批判北京市委“资反路线”

的视线，是北京市委在捣鬼。吴德赶紧分辩说："这不是由我决定的，这是由中央文革小组决定的，不信可以给中央文革小组打电话。"

吴德给中央文革小组打电话说："他们说我们在搞阴谋，转移视线，我们说服不了他们。"

中央文革小组决定派人到会，表示支持召开联合批斗大会，并说这不是市委的阴谋，是中央文革小组的决定。

这天，一辆小汽车开进北航。从车上下来一位女子身材修长，头发和衣服都很洋气，举手投足与北航校风迥异。她说要找韩爱晶。

见到韩爱晶，那位女子大方热情的自我介绍说："我叫叶向真，是中央戏剧学院的。"

叶向真请韩爱晶上车跟她去开会。在车上，叶向真对韩爱晶说：

"我们把彭真等黑帮分子抓来了，准备在北京召开万人批判大会。领导同志要我找你们北航'红旗'，和我们一起筹备大会。"

他们到中央音乐学院，那里已经有十几个人了，正在七嘴八舌的议论成立批斗彭、罗、陆、杨大会筹备处的事情。韩爱晶听了一会儿才明白，他们都是"三司"文艺部的，他同意派人参加大会筹备组。

回到北航，韩爱晶让侯玉山和方臣两个人去人民大会堂参加一个会。他们二人到了那里才知道，是批斗彭、罗、陆、杨大会的筹备会。中央文革只有戚本禹一个人坐在那里，拿着笔征求大家的意见。

大会筹备组负责人是北京地质学院的。只见叶向真和朱成昭时而在后面窃窃私语，时而大声喧哗，不仅影响大家的讨论，而且也不尊重会议主持者。在讨论大会上各校及组织的座位分区的时候，两人更

是一唱一和，并不把戚本禹放在眼里，有时高声说“不行！”不容戚本禹不听。北航的方臣实在看不过去，就要站起来理论，被侯玉山按住了。他认为此会并不重要，只是事务性安排。叶向真争的是文艺口两派谁靠主席台，北航没必要与其争论。他和方臣没听几句争论，就提前回校了。

12 月 12 日中午，由北航“红旗”、地质“东方红”等高校造反派串连各院校和北京市直属单位共 12 万人参加，在北京工人体育场举行了“誓死保卫毛主席，斗争彭、罗、陆、杨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誓师大会”，现场批斗了彭真、刘仁、郑天翔、万里、吴晗等原北京市领导。

当时的传单是这样描述这次大会的：

1966 年 12 月 12 日，以北航红旗、地院东方红、中央戏剧学院毛泽东主义战斗团、中央音乐学院毛泽东主义战斗团、中央乐团井冈山、北京电影学院毛泽东共产主义公社等六个革命造反组织，共同发起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誓死保卫毛主席，斗争彭、陆、罗、杨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誓师大会”。大会由北航红旗等组成的主席团主持。

参加大会的领导人有：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关锋、戚本禹、穆欣、姚文元，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国务院秘书长周荣鑫，北京市市委第二书记吴德，北京市委书记刘建勋等人。12 时 30 分，大会在《大海航行靠舵手》的歌声中开始。彭真、刘仁、郑天翔、万里、张洁清（彭真的妻子）被拉到台上接受批判。

在会上发言的有北航红旗代表、北京电影学院等组织代表，北京

市委代表、首都革命职工红色造反总部联络站代表、中央戏剧学院代表、北京平谷县马房公社农民代表、在京串联的辽宁戏剧学院代表。

吴德在会上讲话，最后大会通过给全国人民通电，在高昂的口号和洪亮的歌声中结束。

这是全国首次公开揪斗中央一级的“黑帮”，果然轰动一时。

1966 年 12 月 13 日“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第一司令部宣传部”出版的《红卫兵》报报道：

《本报十二日讯》全国亿万工农兵群众，和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小将十万多人,今天中午在首都工人体育场举行《誓死保卫毛主席，斗争彭，罗，陆，杨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誓师大会》

中共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吴德同志出席了大会并讲了话。国务院周荣鑫秘书长，中央文革小组王力，戚本禹，关锋，姚文元等同志也出席了大会。

12 点半大会开始，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彭真等被揪出来示众，此刻，全场上下，铁臂如林，怒声雷动，彭真等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在众目睽睽之下，在“老鼠过街，人人喊打’声中，恐慌万状，狼狈不堪。

在斗争大会上，北航“红旗”，北京电影学院毛泽东主义公社，首都职工红色造反联络总站以及来自平谷县的贫下中农代表在大会上发了言。

北海红旗代表在发言中说：经过几个月的艰苦奋斗，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压制和迫害的革命群众，冲垮了重重阻力，终于把反革命修

正主义分子挖出来斗了；真是大快人心，这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他接着说：“揪出彭真来斗，是对当前的反革命逆流的迎头痛击！现在，这一小撮别有用心的家伙操纵一部分受蒙蔽的群众，炮轰无产阶级革命司令部。正告那一撮人，再顽抗下去，你们的下场决不会比彭真黑帮好！”

北京电影学院毛泽东主义公社代表在发言中说：“这次斗争彭，罗，陆，杨等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就是斗争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是斗争社会上的一切牛鬼蛇神“。首都职工红色造反派联络总站代表在发言中说："前北京市委，以彭真为首的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将他们的亲信，爪牙安插在许多党政领导机关，企图搞资本主义复辟，企图进一步篡党，篡军，篡政，妄图实现全国性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复辟，妄想使我国无产阶级铁打的江山变颜色，这是白日做梦，永远不会得逞！”

其他单位的代表也在会上发了言，他们表示，誓死保卫毛主席！坚决把彭真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斗倒，斗垮，斗臭！坚决打退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猖狂反扑！

在全场暴风雨般的掌声中，吴德同志讲了话：他坚决支持这个革命的大会，并高度赞扬红卫兵小将向彭真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猛烈开火的革命行动。

下午四点大会在高呼口号：“砸烂彭真的狗头”“谁反对毛主席就打倒谁”的愤怒声中结束。

本报记者兰朝练

12 月 12 日晚，周恩来分别接见了中国科学院两派群众组织的代表。在与科学院 9 个造反组织 20 名代表见面时，他在热烈的掌声中进入会场，和每个代表一一握手，然后开始点名。他在点名时说："常见，有些名字记不清了，记性不行了。"然后问："邱海平没来吗？"

答："没有，他是领导小组成员，等第三批接见。"

周恩来说："今天想跟你们谈谈领导问题，抓革命，促生产的问题，最近中央发了一个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十条规定》，你们看到了没有？"

众答："没有看到。"

周恩来问："噢，怎么没看到？"然后转向陪同接见的国家科委副主任刘西尧，问道："没有通过你这个口发下去？"

刘西尧答："没有，是从院党委那个口发下去的。"

周恩来说："先拿几份来，后几批来了，赶快先发给他们。" 接着对刘西尧说："你把它念了。"

刘西尧宣读了《十条规定》。

周恩来说："这个规定科研单位也是适用的，经过十一中全会以后，经过四个月的摸索做了初步总结，得出这《十条规定》，当然大的原则《十六条》都有了，但这个《十条》在抓革命促生产的问题上，更进一步了，比《十六条》更具体化了。"

他说："群众运动的发展，常常比我们原来设想的规模更大，这是我们领导同志和一般干部还不懂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比我们看得更远。""碰到新鲜事物，是进步的就支持。林彪同志跟主席跟得紧，我

们也要紧跟，一点明就跟。聂元梓的大字报一贴，谁知道有这样的形势，今年春天我做梦也没有梦见，你们梦见那是你们的预见。”

大家都笑了。

周恩来:“潮水总是要涨的,每年涨潮,你们这里有没有浙江人？”

他看了看名单后问代表毛照本：“你看过钱塘江的涨潮吗？”

毛照本答：“我曾路过那个地方，但没有看到涨潮。”

周恩来：“例如涨潮，你也知道，但来势多猛，涨多高并不知道，只有你到现场看一看才晓得。”“潮水来了，总是有弄潮的，被吞没的，观潮的三种。”“柔石写《二月》的时候，鲁迅是观潮的，那时是 1928 年到 1929 年，我们是弄潮的。鲁迅说你已等潮，还要观潮，只有面对着潮才能跟着潮走，如果怕就被潮卷去，观潮就得到岸上去，到山上去，鲁迅在《早春二月》的序中写到，那时他还是一个观潮派，说我是等潮的，《早春二月》的主人公，在海边趟来趟去，最后被潮水吞掉了，这些是一些作家们，后来柔石牺牲了，过了快 40 年演这个电影是堕落了。一个革命者，有革命壮志就可以跟上形势。”

周恩来指着《十条规定》说：“不会每一个规定都准确，经过了四个月，好一些，也不能再具体，太具体反而束缚了。大家可以比较，是进步了。”

周恩来逐条解释《十条》，他说：

第一条是“很抓革命来促生产”。

“第二条是进行两条路线的斗争。群众成立了组织，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

“第三、四、五、六条是说革命和生产的关系，八小时工作，业余闹革命。”

“第六条：讲的是搞一个业务班子，生产班子的问题，这是我今天要谈的。”

“你们科学院党委瘫痪了，长期不行，科学院不能老这样，陈伯达同志在八月份也讲过这个问题，我想在科学院搞个实验，把各方面统一起来，至今这个实验失败了，要谁来统一领导呢？中央不能派，这等于工作组，张劲夫拉下来了，裴丽生也不行，你们同意，我们也不同意，我作了各种试图都不行。因此，我想搞一个独立的直属国务院的抓革命促生产的领导班子，这个生产班子是独立的，不受文革领导，属国务院，以后派一个副总理管也行。这样的班子要健全，改选产生，由工作人员选，条件是以革命为主导方面。

第七条是矛盾如何解决。应该自己解决，不要跨级。一闹就到我这里，我不能一请就到，这样耽误了你们。现在还是要层层负责。有些地方的党委，说话不灵了，让他们在大风大浪中锻炼，在游泳中学会游泳，在斗争中学会斗争，在大革命中摸规律。毛主席有两条原则，我先给你们讲一讲，第一，主席是不大赞成动不动就停职检查，应放在后期处理。就那么点材料，似乎是死老虎，不能一棍子打死，一个停职就休息了，没有机会锻炼学习了，群众也不好监督，这样反而不好，他们不能在风浪中继续锻炼。如原甘肃省委书记停职后很轻松，而新任省委书记工作也难开展。”

周恩来问：“今天在北京工人体育场斗争反党头子彭真，你们有

人去了吗？”

毛照本答：“我去了。”

周恩来：“七个人发言是不是？”

毛照本答：“是!”

周恩来：“今天的讲话还不错，今天的会开得还好，今天你们批判的只能到这个程度，他的罪恶还多得很，他的许多主要材料在党中央那里，……说清闲，他们最清闲了，要说彭真这半年休息得最好了，当然他们精神不清闲，这种人没有办法，不可救药，政治生命完蛋了，物质生命还存在，只好靠边站了，你又不能把他杀了，有些人还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叫他们在游泳中学会游泳。在游泳中有几种情况，第一种人是善于游泳的，就像毛主席 73 岁在长江游泳还泰然自若；第二种人有勇气有干劲，在游泳中喝了几口水就会了；第三种人是怕喝了几口水就退回来了，结果掉队了；第四种人游了几下被水淹死了。斗争也是这样，不要怕喝水，时间长了就学会了。主席一般不太同意停职反省。叫他们在游泳中学会游泳，在斗争中学会斗争，有的留在这里也可以做反面教员，停了职反而不好处理了。这是主席第一条原则；另一条，不停职，也不保，靠自己，过去我们运动里边有保的情况。主要是民主人士，不是我们党的领导干部，有的民主人士快死了，保他们一下子，如章士钊就是最典型，他过去干了许多坏事，但近来 30 年，不反共、拥护党，但他满脑子还是资产阶级思想，现在 80 多岁了，还写了几十万字柳文，他是研究古典文学的，对柳有独立见解，但作为一门学问还可以参考，他写了还有点贡献，本来想出版了，文

化革命一来，自己提出来不要出版了，出版了还得受批判，看来他还有点自知之名。红卫兵要抄他的家，我们就保护了，红卫兵找他谈判，叫他在门上贴两副对子：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后来他写了，他不反党，不反毛主席，这条他还能做到的，你们找他去谈判，他 80 多岁了，骨瘦如柴，不保他就受不了了。”

“我不赞成绝食，有的学生搞绝食斗争，只好劝说，对他们提出的要求，合理的就答应，少合理的就劝，还是要吃好饭，睡好觉。有矛盾要自己解决，斗争矛头要向上不向下，矛盾不上交。在科学院，革委会不好成立，大体上两派还存在，经过思潮起伏，要在大原则上团结多数人，这还需要一个过程。革委会可以做一些联合的事情，如对外，这有好处。有矛盾自己解决，不好解决时，双方谈判，非万不得已矛盾不上交。工厂更是如此。”

“第八条是不要互斗。第八、九、十条都是这样。第八条是领导和群众的关系，领导压制了的，办错了的要平反，不要压。矛头反过来对领导，在科学院，矛头对院党委，第一名是张劲夫，但也不限在张劲夫上，整个院党委都要批，他们要彻底检讨。今天中层干部来了没有？”

答：“来了。”

周恩来：“中层干部造反团要自觉。你们参加过一部分领导工作，有的是所党委书记、所党委委员，是所的当权派。全院对准院党委，院党委的问题解决了就到所，所以下就是处，处长在一个处又是当权派。中层干部、基层干部，如科长在一个科里还是领导，也要检查。

矛头要对院，也要把自己检查出来，一方面揭发院里，一方面自己解脱，要是都推给院里，以后到自己头上反而苦了。不如既揭院党委，又联系到自己，这样更深刻。”

“第九，第十条属于群众之间。要文斗，不武斗。要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等大民主解决。”

“这个文件供讨论和试行，在试行过程中，可提具体措施，提上来明年修改。这个规定是 9 日公布的，我想用科学院作试点，今天首先召集造反派、左派的同志，以后还有别的同志，然后提方案报中央。”

周恩来接着又说了三件事：第一件事是成立业务班子；第二件事是院党委已不能行使党委职权的问题；第三件事是现在的革委会是带有临时性的过渡。“临时革委会推动和领导文化大革命，领导权放在各所、各基层。全院选举前，一定要先在所内健全起来。现在革委会是联络组织。”“革委会搞革命，监督业务代表。院文革和业务班子是平行的，业务代表靠各所监督，领导还是一元化，文革要监督业务班子，但业务班子不能监督文革。”

他最后说：“这段话谈长了，以下不能这样。这是头一次谈想法，谈得多一点，你们看行不行？”

接下来是各代表发言。

代表张涛问：“业务班子与党委是什么关系？”

周恩来答：“党委什么也不管，先让他们检讨，你们大家批判，经过运动谁过了关就留谁。”

代表韩洪侠：“现在张劲夫更坏了，背后尽捣乱，阳奉阴违更厉

害了。”

周恩来：“那好么！让他去造谣，越造谣越好，叫他去造谣么，叫他去暴露么，这样材料越来越多了，现在他蒙蔽了许多人，你们要做这部分人工作，争取多数是个很重要的工作。我等他一百天了，他越这样我对他就了解更多了，你们不要为我担心，这个问题决定了，我就揭发他。”

代表邹协成：“张劲夫问题很严重，他主要是玩弄权术的两面派，三反分子也够了。”

周恩来：“噢！有材料么？你有材料交给我，我上次要的那材料（指张劲文揭发张劲夫反毛泽东思想言行的材料）现在还没有给我，我希望得到张劲夫系统的修正主义言论，要搞得精炼些，不要搞烦琐哲学。”

邹协成：“现在不罢张劲夫的官，阻力很大，可能还有大的反复。”

周恩来：“我早就跟你们讲了，这里边他们的人还混在里面也很多，不容易暴露出来，这样脓包没有放出来。今后还会有反复，你们通过斗争，比罢张劲夫的官好得多，如过小河沟你们一下子就过去了，现在是渤海湾。现在蒯大富要比聂元梓巩固得多，当然我不是说聂元梓不好，聂元梓一声炮响震动了世界，我是说聂元梓比蒯大富经受的锻炼少，我从七月份回国后经手了两个人的问题，一个是蒯大富，一个是王锡鹏，我不随便捧他们，靠你们左派奋斗。”

群众代表又就科学院保守派组织“串联队”的一些问题与周恩来进行了讨论。

“红色造反司令部”的代表说：“‘串’字号开会，我们去捣乱，他们打小孩，那个小孩喊‘打倒保皇派!’”

周恩来：“我早就告诉你们，不要喊保皇派，他们是群众嘛！‘保皇’是侮辱人。”

最后，有人问：“是否复员军人不能成立红卫军？”

周恩来明确答复说：“不可以成立独立性的组织，可以成立联络组织，全国不要搞独立性组织，你们是科学院的红卫军，不是全国性的，当然可以。”

随后，周恩来又接见了科学院保守派的群众组织代表。

第 332 回：见北航，劝学生防止分裂　陶铸说，不许反中央文革

12 月 13 日凌晨 2 时 05 分，周恩来在接见完科学院的两派群众组织代表后，又在中南海会议室接见了科学院文革委员会的代表和科学院的院党委委员。本来院党委委员和院文革代表是准备分开来接见的，实在是没有时间了，只好在一起接见了。

周恩来说："本来想分开讨论，不可能了，时间太晚了，我想把我的意见讲一讲，有几个建议请你们讨论。《十条》看到了吧？"

众人答："看到了。"

周恩来："院部收到了吧？还没讨论吧？"

答："没有。"

周恩来说："首先讲一下十条的情况。"

就在周恩来介绍中央《十条》时，秘书进来向他请示吴玉章治丧问题，下边有人问是谁？周恩来说："吴玉章同志病故，90 岁高寿了。"

他又对秘书说："家属要发表，要说服嘛！治丧也要改革，治丧委员会去掉了，灵堂不设了，化灰后开个追悼会。这也是改良主义的。希望你们管事后，要把灰扬到水上、土上，这才是彻底革命。恩格斯也讲过这个办法。彻底革命不是一步登天，是要经过步骤的，你们在座的有激进派、造反派，也要等待。在你们眼里看，我总有点改良味了，我坦白地说，从我思想上也还是认为这是改良的，事物发展是有曲折的，大方向是向革命走，但还得有个过程。

人的正确思想要通过实践产生，不可能凭空想到。这场文化大革命，今年春天我做梦也没想到，要有做梦想到的我佩服你。……红卫兵来的规模事先不能预想，3 个月达 1100 万人，连日本也不得不承认，你们 3 个月就分期分批地把东京搬到北京来了。最后一次 200 多万，把天津也搬来了。只有从实践中才能产生智慧。”

“八届十一中全会后，总想有个步骤，先这个后那个，红卫兵不进厂，农村最后等等。4 个月证明，这股伟大的革命洪流冲击了各个方面，从学校有了红卫兵，归功于清华附中了，毛主席抓住这个新的苗头，就发展起来了，很快推广到全国。”

“现在的《十条》原则，在工矿企业、研究设计单位都适用。它比《十六条》详细，打开了一些限制。错误路线是压制群众，打击群众，围攻革命派，实行白色恐怖，是极端错误的。要深刻批判，它是有思想的、历史的、社会的根源的。十一中全会后，有分期分批的设想，过去运动也这么搞过，但现在是要动员几亿人民进行思想意识领域里的大革命，不是过去的规律所适用的了。要放手发动群众，必须通过实践。现在工厂的几条，还要搞农村的几条，以及小学的，这都是原则性的，不能太具体，要不断地充实补充。这一规定同样适用于科学院，因为它是一个研究、生产、教育的组织。”

接着，周恩来结合科学院的实际逐条解释了《十条》的内容，然后说："希望你们把意见带回去，希望你们50多人把十条讨论一下。还是希望你们把革委会搞成协商的。每个所，在文革领导下讨论一下。若文革瘫痪了，可几派协商临时成立一个协商的领导组织，领导讨论和学习。明天你们革委会讨论提些意见。"

他接着说："院党委肯定是瘫痪了。现在通过抓革命促生产，进一步考验所以下的各级。

原打算搞统一领导，研究了多次，不行。不如让它瘫痪着，既不领导运动也不领导生产，这是党章上没有的。学校中也是这样，这也是一个创造，是毛主席一整套建党思想，将来要写成东西，兄弟党同志在问了，一直到革命接班人问题。列宁是在革命前建党有一系列的创造，不同于马克思、恩格斯。斯大林就少一些，而后期停滞了。党委瘫痪了还一样抓革命促生产，这也是一个创举。"

接着，周恩来回答大家提出的问题。当有人问到65年毕业生能否串联的问题时，周恩来说：

"65年毕业生口径不一，中央有些人不清楚，如有了岗位就不能随便行动。如分配工作就应该是工作人员了。如在四清工作队，现在多数要解散回来了。什么叫转正？"

有人答："转正前46元，转正后56元。"

周恩来："那转正不能作为依据，他们有工资嘛。又增加 20 多万出去串联，国家也担负不了。"

有人说："陶铸同志同意了。"

周恩来："陶铸同志说错了。两天之内我们就印发一个通知，应该承认这个错误。我认为是没有分配工作的。你们提到了级，我们的级要垮了，斗批改以后要垮。我们考虑斗批改以后，要改供给制了，不过是逐步的。要把资产阶级法权、三大差别逐步缩小。即是资产阶级法权中的东西，要丢掉了。你拿了工资，就占了资产阶级法权的一部分，哪能那么随便。过去是我们不了解情况了。"

有人问到平反中的问题，周恩来说："只要是被宣布了的，要平反。平反是领导平反，不是个人平反，是要领导出来承担责任，承认错误。换句话说，科学院的罪魁祸首是张劲夫！张劲夫来了没有？你站起来回答我的问题！"

张劲夫站起来，周恩来转向他说："你是不是罪魁祸首？你承认不承认？你勇敢地说！"

张劲夫答："是。"

周恩来："你要不要负责任？"

张劲夫答："我要负责任。"

周恩来："不要再说你理解不够了！还不是根据你的报告？！从现在起你要再搞阴谋，再搞，你就要犯罪了！我要警告你和你的整个集团。张劲夫同志啊！我今天还称你同志，我忍耐 4 个月了，整整 4 个月了。从 8 月 13 到今天我才说，我就是要等待大家觉悟，在大风大浪中学会斗争。我就是不把结论过早地加给你们。不要以为你搞的那些活动我都不晓得！你要走张彦的路，你自己去走！"

沉默了一会儿，周恩来接着说："平反的事情，责任在上边，根子在刘、邓，但底下是科学院张劲夫，院党委、所党委也要负一部分责任，主要责任在张劲夫。不要互相道歉，那还成什么！这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这是烦琐哲学。所党委书记应把一切责任负起来！"

有些单位问到临时工、合同工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辞退等问题，周恩来说："你们本单位自己先研究。有些问题很具体，你要让我回答，等于让我犯错误了！"

秦力生问到临时工、合同工提到的几点要求如何处理？周恩来说："这不是一个科学院的问题，这是全国的问题，你们用得是否恰当，你们自己检查。他们可派代表与总工会去谈。""原则要坚持。你们总想向上交，你们就是想抓根稻草，让上头给你们解决。你们自己造成没有威信了，就是你们自己造成的嘛！"

接着周恩来又回答了关于停职检查和党委有瘫痪的问题。接见结束时已是凌晨 4 时 40 分。

这时，“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赴京告状的工人已全部到达北京，周恩来于 12 月 13 日上午来到白石桥接待站“兵团”工人驻地，但他始终坚持只接见按照国务院电报要求选出的代表。

当天，陈伯达、江青接见北航“红旗”的代表，王力、关锋、戚本禹参加。

江青首先说：“同学们，同志们！我首先要你们原谅我，有客观的原因，主观的原因。今天关起门来谈心，不讨论，我们谈心。刚才吃饭时我想了很久，对左派同学要进行一点帮助。我这是点建议。事实上，你们的革命行动、冲劲、干劲、革命的组织，都是在我们知道以前，你们就搞了。但是我们发现你们革命组织受迫害，受压抑，我们就坚决支持你们，学习你们造反精神。我这个人要做一些自我批评。世界上没有圣人，我也常说错话，做错事。思想上也不是那么很快地跟上主席。就是对你们的革命行动我也在紧跟、紧追。我们之间没有联系，你们可以作证。我们支持你们，学习你们，就有人对我们有意见，我们不怕。问题是我们整个小组，对你们负有政治责任。而你们同样，也要对我们负有政治责任。我感觉最大问题，我看了一些材料，7 号那天，我接见一些同学后，我病了，这几天好一些。我知道有这样的机会还是想来与同学们商量。”

江青的这几句话，三次被学生们的掌声打断。

她说："你们主流是好的、勇于革命，敢闯、敢干、不怕天，不怕地是好的，但不太讲究策略，我们忧虑，这一点讲的对不对？"

同学们说："对！"

江青接着说："你们自己分不清敌、我、友，从党内到同学，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主席不是讲过吗，'以无产阶级为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这样才能打败敌人。你们越以为少，越以为少数派是革命的。我觉得大多数同学是好的，不能用'保皇派''罢官'等名词，你们不是扫'四旧'吗？对他们要做艰苦细致的工作。我有狭隘的经验，做工人农民的工作好作，做知识分子工作我害怕。能不能提出这么一个问题：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原则基础上求同存异，同是原则，异是枝节。第二司令部不是分裂、不是被抄家了吗？有人说我们怎么办？我们不能包办代替。分裂，没有什么原则性问题，要进行批评自我批评。我们看到不仅我们共产党员民主集中制做得不好，我看到青年也不能冷静坐下来。做些自我批评。我过分性急认真。你们有没有这个？"

众人答："有。"

江青："主席常常告诫我们，要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你们有没有？不能认为我们自己都是一贯正确的吧？各人有各人的性格，共性要在个性之上，没有集中就不能革命，个人利益不能强加于集体之上。但不一定不能改正错误，也可以教育。刚才伯达同志讲，你们才走了 5 步、10 步就四分五裂。我们希望好好读一读毛主席著作，读语录不能解决。"

陈伯达："要掌握毛泽东思想，不折不扣地执行毛泽东思想，要艰苦学习，江青同志讲的战略策略非常重要。"

江青："我解放后除了病只能做幕僚，第一我是共产党员，我是毛主席身边的一员干部，要活学活用主席著作，我年轻时读列宁的《国家与革命》读了六次没有懂多少，可是我懂得一个问题，资产阶级专政机关是压迫人民的，眼看国民党压我们，我们连爱国的自由都没有。如果不是今年 5 月把党内问题基本解决了，你们能有这样的民主吗？"

众答："不能！"

江青："不要到法院去抢保险柜，实际文件早已搬走了。要逼着他们交出来，不能上他们的当。公安部不要冲了，你们是不是说，今天江青来划框框定调子。有些问题已经解决了，不然不能这样。不能怕出乱子，越乱越好，有革命的大乱，才有革命的大治。治与乱是革命的统一。有人怕乱，没有乱就没有治，要知道敌人只是一小撮，不要看着好像那里都有。

我相信你们会成为国家红色接班人，对过去曾经整过你们的一些同学，只要他们检查的好，承认错误，又有揭发，可以让他们归队。对高干子女要一分为二，有一小部分人走错了路，不怪他们，要怪他们的中年人，老年人和幕后人，你们要主动找他们谈，他们有人找你们谈，你们不感兴趣，对吗？谭力夫做了一点检讨，你们不要采取他们采取过的办法，对谭力夫，也不要打他，批透他，批倒他。批不倒

这算什么本事？对承认错误的要欢迎他们归队，要把是非弄清，觉得他们检查比较深刻就要团结他们。”

江青：“没有出去串连过的，建议出去看看，见见世面，增加你们的胜利信心。主席建议设兵站，50 里设一兵站，不一定要走雪山草地，那里没有阶级斗争，你们要到有阶级斗争的地方去。安源煤矿是主席首先去的，一步一步走去的，碰一个就讲一个。走路，不要坐火车、轮船，运输有困难。现在我们是无产阶级的天下了，锻炼一下不要紧，我们过去能走，我想你们也能走。不要把打击目标扩大。”

接见结束后，学生们鼓掌高呼：“毛主席万岁！”工作人员宣布让首长先走。江青又回到扩音器前说：“同学们，我不是首长，我是江青同志。”同学们又热烈鼓掌。

12 月 13 日这天，陶铸在总后勤部礼堂对卫生系统讲话时说：“最近，你们看到北京，在全国出现了一小撮反对中央文革的叫嚣和行动。这种叫嚣和行动是反革命的！不管主观上如何，可能是有意识的，可能是受蒙蔽的，（客观上）是反革命的，反动的！最近还看到有人还反对中央文革小组，要踢开文革小组。中央文革小组是最坚决地执行了以毛主席为代表的革命路线，是最正确地执行了以毛主席为代表的革命路线！还有，特别是出现了反对毛主席的亲密战友的标语，有的地方甚至开会煽动。我们说：反对林副统帅，反对周恩来同志，陈伯达同志，康生同志的言论和标语是绝对不能容许的！ ”

第333回：见外院，批评成都的代表　劫书记，津浦线再次停车

12 月 13 日晚 20 时 30 分，周恩来在国务院小礼堂接见北京外语学院“红旗造反团”代表，听取关于 12 月 5 日北外学生到石家庄国棉一厂串连时被打一事的汇报，同时被接见的还有北京“三司”的负责人和北京外国语学院其他群众组织代表，接见历时五个半小时。

周恩来首先肯定了学生们的造反精神，他说：“你们到一厂去贴大字报时，中央关于工厂的《十条》还没下来，你们走在前面，闯对了。现在《十条》公布了，肯定了你们的革命行动。”“干革命就是要闯，敢于打破框框。”

当听说有学生被打伤的情况后，周恩来记下了受伤学生的名字，对代表们说：“你们回去了解一下，如果需要，可以把他们接到北京来治疗。”

周恩来询问了石家庄左派队伍的发展情况，嘱咐学生：“你们要虚心向工人学习，适当参加劳动，宣传毛泽东思想，一起搞革命。要扎下根，不要蜻蜓点水，可以到工农中住 10 天、半个月，甚至半年。”

外院的同学汇报他们举办的两条路线斗争展览会的情况，其中有批判陈毅的内容，周恩来说：“你们也说了，这个展览搁浅了。我倒不想搁浅，我想提高。光搞外交部我当然不同意，问题是如何让它起作用，现在大字报越来越多……你们经过考验，是左派，但不能满足，要提高水平，成为坚定的左派。现在街上到处是大字报、大标语。大字报太多了，也不能起到应有的作用。好比说：‘谁反对毛主席就打

倒谁’这样的标语就很响亮。但太多了，就很困难，就没人看了。那么说，我这话变成‘黑话’了？问题看怎么贴法。展览会这是个形式，用好了又是一个新事物，别人就要学习。所以不经过我这一关，我不能让你们就这样拿出去。”

“赫鲁晓夫下台，我们反对他是一个因素，但他自己也把他丑化了。他那一套思想，加上他的流氓行为，非下台不可。在反修中我们一直没有用漫画，大概有八个国家画了漫画，我们研究了几次，还是没用。”

外院的同学说，陈毅的讲话有问题。周恩来说：“你们要看什么情况下讲的。比如，我今天讲是对你们，如果你们拿去转抄，我不负责。我是对你们具体情况讲的。只是关于党内作风，这是一种恶劣作风，这一点是对全国的。”

学生说：“他说反毛主席不算反党，他就反过两次，毛主席上台后还团结他……”

周恩来说：“说反对毛主席还不算反革命，如果是指党内路线斗争，也可以这样讲，他没有把当时情况讲清楚。他是把这个问题孤立起来谈了。走火就在这个地方。”

学生：“11 月 13 日他向军事院校学生讲话，好多学校转播，同学中对立情绪马上增加，停止了几个月的大辩论又开始了。”

周恩来：“有这么大作用？”

学生：“‘多数派’同学揭发，陈毅骗了他们，见他们时支持‘多数派’，见‘少数派’时又另说一套……”

周恩来澄清说："陈老总没有单独见过'多数派'。"

外院同学说陈毅一直"和稀泥。"

周恩来解释说："其实他也是好意，想让你们团结起来。他说话好走火，我还不了解他，跟他一起工作了十几年。他是个老同志，确实为党做了不少工作。"

学生："他说工作组检查两三次就行了，还说毛主席说的……"

周恩来点头肯定道："有这样的事，是讲李雪峰同志。李雪峰检查相当好，主席讲，检查两三次就可以了。"

学生："陈毅在外交部红卫兵解散大会上还讲'多数派'守纪律。"

周恩来："你们对陈毅同志说过的话，就要求那么严？这样听起来，你们是对他有偏见，专抓'小辫子'。"

学生："……反正陈毅同志的许多讲话没起好作用。他还说刘新权是我陈毅派出的，我担一半责任。"

周恩来点头说："是负责任的话。刘新权是外交部派出的，陈毅同志是外交部长，他当然要负一部分责任。这很好。"

学生："他还说，将来你们对就立一功，不对就向我道歉。"

周恩来肯定地道："我听陈毅同志这样说过。"

学生："他要我们别总揪住工作组不放，说明他对文化大革命不理解。"

周恩来："这样说他可能承认。我们也说过不理解嘛！"

学生："他总强调个人经验。"

周恩来："可能地点、时间不合适，没讲清楚。当然，这也是这个同志的优点，没有隐瞒观点，脱口而出。他以为用现身说法可以帮助你们，而你们需要的又不是那样的话……"

外院的学生继续坚持："我们认为，现在外事口的关键不在别的，而在于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例如，工作组问题还远远没有解决，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还有，陈毅到现在还没有作检查，仍然坚持他以前的观点。他给军事院校学生的两次讲话，保守派很欢迎。总之，外事口文化大革命的阻力来自陈毅。因此，必须彻底批判陈毅！否则，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就打不垮！"

周恩来说："我今天没有时间专讲陈毅问题，但我要告诉大家，陈毅同志是政治局委员、副总理、外交部长，你们把陈毅'黑话'搞出去，将来势必要做结论，这样党就不能同意。尤其在党内说话走火的事也是常有的。如果都拿来批判，就不行了。你们要考虑国际国内影响。至于陈毅同志问题的认识，你们不能强加于我。我和他相处几十年，一起管外交，经常一起向主席报告工作，我晓得这个同志，他不会说假话。你们搞一个新的，搞好了我一定去看。但陈毅同志的事例外。"

周恩来又做了耐心的解释工作，他说："陈毅同志确实做了不少工作。现在国际事务我只花很少一点时间来管。陈毅同志的好处就在于我们批评他，他从来没有抵触情绪。这个同志我了解他。这个人看

起来年岁不少了，但还是感情容易流露，这一点我也经常提醒他。外事工作他都要请示我，我也要请示主席，主席说了算。所以外交上的大方向还是对的。上次他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发言是受大家欢迎的，林副主席也很称赞。陈毅同志很坦率，有什么讲什么。”

针对北京外国语学院的“武工队”冲进外交部政治部，抄走 8 麻袋“黑材料”一事，周恩来说：“你们以后闯外交部一定要人少，这是国家保护机关，把事情搞大了，势必要我出面，我出面就得劝你们回去，国际关系你们无论如何要注意。大民主在无产阶级专政下才有的，没有毛主席能有大民主？我就没有作过这个梦，你们也许想得更伟大些。所以大民主这个形式要真正应用，当然我不是让他们不犯错误，但尽可能少犯些。”他要求外院的学生立即撤出外交部，否则，就要派卫戍部队去把他们拉出来。

外院的学生依然揪着陈毅的事情不依不饶，和周恩来你来我往，一直争论到12月14日凌晨2时，周恩来说：“今天我不准备同你们谈这件事，要谈以后谈。你们不能压我。你们送我一大叠东西，我还没有看。总得让我把材料弄清楚吧……”

这时，外院一位学生打断周恩来的话说：“总理，你要理解我们的心情！”

周恩来不高兴了，他说：“你讲，我一直在听，耐心地听嘛！但你不能总要我马上回答你的问题。……你们的心情我可以理解。但你

们把一切问题归结于一个人，这不是辩证地看问题。运动发展是波浪式的,不能老是‘如火如荼’。天天出大事才痛快。我过去对你们说过，这样大的局面，我做梦也没敢想过；也许你们想到了，算你们有伟大的预见！事物发展常常超过我们的预计，包括各个行动，不犯错误是不可能的。问题是犯了错误，认识到了,就要马上承认、改正。我这是对你们讲的老实话。所以，在我理解你们情绪的同时，我们的情绪，也请你们理解。总之，我今天没想回答陈毅同志的问题，还发了这么大脾气，对不住了！”

说罢，周恩来站起来离开了会场。

就在周恩来在国务院礼堂接见北京外语学院“红旗造反团”代表的 13 日当晚，吃完安眠药已经躺下休息的江青，又被请到中南海西门接见等候在这里的《红旗》杂志社的群众。她说：

“同志们、革命小将们：

你们好！我已经睡觉了，吃了安眠药，听说你们来了，还是来看看你们。你们的造反精神好得很，你们是我们的革命战友，你们是我们的革命小将，我们和你们心连心，要坚决打倒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反动的那么一小撮人。无产阶级专政万岁！没有无产阶级就没有大民主！你们都是毛主席的好学生，我和革命小将一道干革命，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斗到底！对不对？”

群众答：“对！”

江青："我们和你们在一起，不要怕！我已经吃过安眠药了，今天同志们、革命小将们来，我还是来看一看。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我们不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我们不分离，我们在一块儿。你们说是不是这样？"

群众答："是!"

江青："'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我背不好，背不全。但是我们一定要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毛主席非常爱护你们，关心你们，这一点我想革命小将是会懂得的，我们心连心。我吃过安眠药了！我说得不一定对，我来看看同志们。"

大家请江青回去休息。

江青、陶铸 12 月 13 日的讲话并没有遏制住北京反对中央文革小组的风潮。12 月 14 日，清华大学红卫兵"红旗手战斗队"也给中央文革小组贴出大字报，题目是:《中央文革小组的错误就是必须批判》。

12 月 14 日，陈伯达、康生、江青、戚本禹、阎长贵等人继续与"一司"、"二司"、"三司"、北航"红旗"、矿院"东方红"等红卫兵组织的代表座谈，康生在会上说："对反革命分子实行最严厉的镇压，这是最大的民主。"他说："大民主是广大人民的民主，对反革命分子要实行专政，一言堂。只有革命人民的言论自由，没有无产阶级专政就没有大民主，大民主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

有人反映给林彪贴大字报的事情，康生问：“攻击林总是否叫群众？凡是反对林总和毛主席的就是反革命。他们不是群众，是群众的敌人，是他们与群众做斗争。对中央文革态度的辩论是要不要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

矿院“东方红”的代表反映：“多数派说，你们少数派不怕当反革命，我们也不怕当反革命。”

江青说：“别忘了咱们是无产阶级专政。有人把反对林总的标语、传单隔墙投到林总家里去，你们也可以给他们贴，你们认为他们谁是后台，可以给他贴。”

当“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赴京告状的工人按照国务院电报要求选出代表后，周恩来于12月14日接见了“成都工人造反兵团”的代表。他批评他们说：

“你们2000多人要离开生产岗位到北京来，我给你们打电报说不要来，你们反对我下的命令，叫我到绵阳去，叫我为你们2000多人服务。如果只为局部服务，那倒很轻松。但我不能借口为局部服务，不为7亿多人服务。7亿多人是不会答应的。因此，我就未执行你们的命令，因为你们的命令不合理。你们硬要来，我坚持一条，一定要派代表来，……”

周恩来说："在处理每一件事情的时候，都要从7亿人民着想，这样就想得通了，只从个人着想就想不通。"

周恩来对李大章签字同意给四川进京告状的工人买20张火车票一事提出批评，然后说："对你们的愿望，表示支持，来了就热情招待。但是，我要坚持原则，这一次作个典型给你们看一看，算个细账。现在有的同志有两怕，即文化革命开始的时候怕群众，就压制群众；回来群众起来了，群众给予压力了，又是怕群众，随便答应签字，不坚持原则了，这就是两怕；有的人满足了少数派的要求，多数派不同意，怕多数派揪你，就成了三怕。因此，原则必须坚持。"

"杨仲述提的问题，我在电报上都解决了，他要我承认你们的组织，一句话就能解决嘛！既然是革命组织，都要承认，这是宪法给你们的权利。如果市委不承认，打一个电报就解决了。"

工人问："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对西南局作结论没有？"

周恩来答："没有作结论。中央要他们在大风大浪中锻炼自己、改造自己，彻底改正错误。我们这次搞大民主，就是要在广泛的民主的基础上，更好的集中，帮助他们在大民主运动中改造自己，改正错误，挽救一批人。当然也有极少的一批不能挽救。"

接见完这批"成都工人造反兵团"北上告状的代表，周恩来又紧接着于12月15日凌晨在中南海小礼堂接见了第一批到北京的"成都工

人造反兵团”代表和成都电讯工程学院“红旗”部分代表。他说：“刚才我已经接见了你们的代表，给他们讲了话，天亮后代表们会向你们传达的。”

“你们可能看到了我的电报，不扣工资，不调工作，不准歧视。也许有的人是自己买票来的。从28日起到今天已有半个月了，就是因为原则问题不能让步。”

“你们起来斗争，你们受到压制，领导检查又差，要就地斗争。派代表到北京来，不要都来，问题又是一个人的问题，这是原则问题，决不能拿原则来做交易。只要你们一来，开了个先例，以后就变成两个，就会变成两万，就会变成两百万、两千万，生产还怎么搞呢？”

“你们来北京是艰苦奋斗的。第一，欢迎你们；第二，批评你们一点，主要是为了吸取教训。”

“祝你们回去努力工作，身体健康。”

代表们纷纷说：“总理您太辛苦了！”劝周恩来休息。周恩来用四川话说：“啥子辛苦哦！”

与全国各省市自治区一样，浙江省委也于 11 月 13 日，在浙江省委常务书记、副省长李丰平的主持下召开了全省三级干部会议，传达贯彻中央工作会议精神。但这次会议很快也被造反派认为是反对“文化大革命”的会议而受到冲击，被迫于 11 月 20 日暂时结束。

浙江省委的三级会议是否如造反派所说是反对文化大革命的

呢？12 月 11 日至 14 日，李丰平等省委领导又悄悄地将会议人员拉到安吉南湖劳改农场继续开会。会上充满了埋怨情绪，认为中央“不理解下情”，普遍朦胧地感到中央发动的这场运动似乎脱离地方的实际。这种情绪同样也影响了下面各地的干部，他们纷纷拍电报、打电话向中央反映情况。浙江省委也认为形势发展已难以控制，便整理出 10 个方面的问题，向中央反映。

12月13日，周恩来给毛泽东、林彪的送上《关于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意见（草案）》的报告。周恩来在报告中写道：“通过这一文件的手续，请主席考虑，是在主席处约集常委和文革小组的少数同志一谈，还是仍采用上次方式请林彪同志主持召集政治局、书记处、文革小组、北京市委各同志一议，究以何者为好，请主席批示。”

12 月 15 日，毛泽东在周恩来的报告上批道：“退总理办。请林彪同志主持开会通过，旋即发出。”

《关于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意见（草案）》中有关于农村除允许成立红卫兵组织外，“其他的革命组织也可以建立和发展”的内容，周恩来请示毛泽东：“‘其他革命组织也可以建立和发展’一句可以考虑不要，因农村中已有贫下中农协会、文化革命委员会、民兵、红卫兵等组织。”

毛泽东同意了这一建议。

12 月 15 日，林彪主持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关于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意见（草案）》。谭震林在会上就草案的起草工作

做了说明："这个文件是以中央文革小组为主起草的；在讨论这个文件的过程中，大家都希望分期分批。"

林彪说："毛主席对这个文件有个批示：'请林彪主持会议，开会通过，现即发出。'"

他说："主张农村分期分批搞文化大革命的意见与派工作组是同个精神，都是不相信群众。

农村上下左右一起搞，两个席卷，一个震动。

一、农村

1、 积极搞文化大革命。

2、 农村实行大民主。

3、不愿意搞的不勉强。

4、 革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地富反坏右的命。

5、 依靠贫下中农和红卫兵。

6、达到抓革命促生产的目的。

二、我们要有足够的精神准备，要受得了。

1、 对干部的认识问题，我们过去把现状维持派当成好干部，好听现状维持派的话，没有弄清那些是革命的，那些是不革命的。

2、 现在又发生了'痞子'问题。最闹革命的终归有缺点，现在看，要允许人家革命。怎样看待这些人是当前最大的问题。

3、如何认识这次运动。这次运动是大批判、大审查、大教育运动，也就是一个批判干部的运动。既批判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也批判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不过性质不同，开始也很难分清楚。

4、如何安排自己。革命革到自己头上来了，如何对待，现在干部距离很大。有四种情绪：第一种抱怨情绪；第二种抱对立情绪；第三种抱抵触情绪；第四种抱无可奈何情绪。只有一条，紧跟主席思想，否则就抛开。

5、斗争很尖锐，很复杂。首先搞通自己思想，要检查一下。为什么过去我们落后思想容易接受？为什么精神不振？为什么运动以来“怕”字当头？不解决这些问题不行，一定要垮台。现在左派反对我们好得很，因为我们犯了路线错误。右派反对我们也好，还有黑帮反对我们，这就看你们顶得住顶不住。有人说自己没有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很值得深思。总之两句话，大民主，人人可以出来讲话，看你怎么办？

6、号召同志们学习十五期《红旗》社论。新的形势，两个利用，两个反对，五个标准。

7、现在干部有五种情况：

（一）能跟上主席思想，在游泳中已经游过去了。

（二）在游泳中淹得够呛，但也算游过去了。

（三）跟得很吃力，结果还是淹死了。

（四）不下水不革命。口头上也说几句革命的话，但什么都是人家的不对。

（五）也在那里游，但确实身体不好，游到半途了。这些水平不高，认识跟不上去，往前没有力气了，对这种人大家要帮助一下。

这次运动是全面地考查干部，看你是怎样对待革命的，怎样对待群众的，怎样对待自己的。”

会议一致通过了这个草案，文件下发的标题改为：《关于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

就在 12 月 15 日林彪主持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关于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意见（草案）》的这天，津浦铁路徐州段再次发生停车事件，长达 21 小时。

事情的起因是 12 月 5 日，徐州市“大中学校红卫兵总部”，简称“红总”被砸，学生们认为这是徐州市委挑动的。为此，12 月 14 日上午 8 时，“红总”向徐州市委提出“立即停止一切群众斗群众”;“揪出制造群众斗群众的罪魁祸首”等五项要求，并限市委 24 小时内给予答复。

15 日，24 小时过后，徐州“红总”并未能得到满意的答复，于是又发出“勒令”和“最后通牒”，但仍无效果。“红总”干脆劫持了徐州市委副书记进京评理。这一举动遭到了徐州市“工人纠察队”的反对，并发生冲突，造成津浦铁路徐州段停车 21 小时。

## 第334回：突然间，江青点周、雍二人
## 偷摩托，“联动”一冲公安部

12 月 16 日，林彪为《毛主席语录》写了再版前言，开篇即说：“毛泽东同志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并进一步指出：“毛泽东思想是在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的时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

他号召：“广大工农兵群众、广大革命干部和广大知识分子，都必须把毛泽东思想真正学到手，做到人人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

他提出：“学习毛主席著作，要带着问题学，活学活用，学用结合，急用先学，立竿见影，在‘用’字上狠下功夫。为了把毛泽东思想真正学到手，要反复学习毛主席的许多基本观点，有些警句最好要背熟，反复学习，反复运用。在报纸上，要经常结合实际，刊登毛主席的语录，供大家学习和运用。”

他最后写道：“现在我们伟大的祖国，正在出现一个工农兵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新时代。毛泽东思想为广大群众所掌握，就会变成无穷无尽的力量，变成威力无比的精神原子弹。”

12 月 16 日，北京中学生“首都兵团”按计划在北京工人体育场联合召开“北京市中学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誓师大会”，“首都兵团”司令、二十五中李东民任大会的执行主席，二中的高三学生刘龙江、二十五中的高三学生秦喜昌、外国语学院附中高三学生杨海峰和北师大附中的陈永康等人参加了会务筹备。

北师大附中的陈永康因为反对工作组早已名震京城。大学生反对工作组的代表人物蒯大富与刘少奇的大女儿刘涛同为清华大学的同学，而中学生反对工作组的陈永康与刘少奇的女儿刘平平也同为北京北师大附中的学生。所以，陈永康也有“中学蒯大富”之称。陈永康是在大会的前一天，12 月 15 日才接到李东民给他打来的电话，邀请他参加大会主席团，并希望北师大附中的代表在大会上发言。

陈永康已经知道李冬民在文化大革命初期与他有着类似的经历，同时也听说李冬民发起组织了“首都兵团”这样一个全市性的中学红卫兵机构。当时，陈永康对“红卫兵”还是有些抵触，因为他觉得，在北师大附中搞“劳改队”、打人的都是“红卫兵”那些人，因此，他在电话里向李冬民坦率地说出了自己对红卫兵的看法。

“老兄差矣，”李冬民听了陈永康对红卫兵的意见后在电话里笑着说道，“‘红卫兵’这个词应当说是不错的，而且我

们都应当是‘红卫兵’。严格地讲，真正的‘红卫兵’应当是我们，而不是你说的那些人。”

于是 15 日晚，陈永康如约来到位于东城区鼓楼附近一幢小楼，原来某民主党派的“中央委员会”。自陈小鲁他们勒令民主党派停止活动后，这里也人去楼空，于是便被“首都兵团”用作自己的“总部”，此时已成为“首都兵团”所在地。陈永康在这里参加了第二天会议的筹备工作。

12 月 16 日这天，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等人都出席了“首都兵团”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的“北京市中学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誓师大会”。那天，周恩来没有像平时出现在新闻照片中那样身穿灰色的中山装，而是和他身后的每个人一样，也穿着一套笔挺崭新的国防绿军装。恰好，这天陈永康的座位正好在主席台首长席后面第一排左侧的边上。当周恩来等领导走过来时，最先与他照面。周恩来面带微笑，十分亲切地同周永康握手，并拍了拍他的左肩。周永康心里那个激动啊：“周总理！这个从我记事时起就十分仰慕的伟大人物，如今就与我近在咫尺！”

会上，首先是学生代表发言。北京一中的代表揭批该校私设“公堂”、“监狱”；六中的代表披露该校学生王光华被残酷殴打致死；北师大附中等学校的代表也控诉了他们学校有些人在文革中搞“劳改队”，残酷打人、摧残人的情况。

接着，大会请首长讲话。首先上台的是江青，她向学生

们问好，立刻赢来一片热烈的掌声。

接着她说：“毛主席问你们好！”

又是一阵暴风雨般的掌声，学生们高呼：“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江青以兴奋的颤音继续说道：“他很关心你们，他的心情像你们今天这样的，非常关心你们！”

“你们刚才的讲话，水平都是很高的，我讲不出，我要向你们学习！”

又是一片鼓掌声，同时伴随着“向江青同志学习！”的口号声。

江青接着说：“我们没有做多少事，一个共产党员为人民做了一点好事是本分，如果做错了，就要批评，”

掌声再起。

江青接着说：“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就不怕批评。批评对了就接受，”

又是一片热烈的鼓掌和欢呼声。

江青：“批评得错了可以不要理他。如果他是反革命，那就要跟他斗到底。”

她说道：“斗争的锋芒对准什么？这是大是大非问题。刚才有些同学讲西城纠察队、东城纠察队、海淀纠察队，这些所谓的纠察队有一小撮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小家伙，他们的斗争锋芒是对着你们，这就是错了。今天，我们要自

我批评，我们对他们教育的不好，四十几岁的人，六十几岁的人没有把他们教育好。他们以贵族自居，以为血统高贵，盛气凌人，什么东西！可是我觉得周荣鑫是负有责任的，雍文涛也负有责任的，王任重也是负有责任的。让他们向你们检讨，他们是怎样支持他们这一小撮坏蛋向你们做宪兵工作的。我希望你们对这些青年，犯了错误的同学们要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态度，对于中年的、老年的、幕后的、顽固坚持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死不回头的要斗倒、斗臭、斗垮！要不要周荣鑫、雍文涛站出来看看？”

随着全场群情激愤的一声“要！”，主席台上已经有两个人闻声忽地站了起来。周荣鑫体态较胖，穿一身朴素的蓝布中山装。而正好坐在陈永康旁边的那位50岁左右的、瘦瘦的眼窝颇深、一看就是位广东人的老干部也一起站了起来，原来他就是雍文涛。

会议开始后，每一个学生代表发言时，雍文涛都低声地询问陈永康：“这是哪个学校的？”“叫什么名字？”并认真地做着记录。他肯定没有想到在今天的会上江青会点他的名。而周荣鑫在江青点他的名时，正低头认真地听着康生向他布置任务。

会场的目光瞬间集中在这两人身上。紧接着一声怒气冲天的断喝：“低头！”他俩又赶紧深深的低下已经低下的头。

在一片口号声中，江青接着说：“好，安静！小将们、

战友们！你们都认识他们啦！是不是让他们先回去？”

大家说：“对！”

江青说：“让他们回去！他们纵容他们，所以，我觉得要特别看重他们的责任。 ”

周荣鑫坐了下来。雍文涛一时还没有反应过来。陈永康悄悄拉了拉他的衣襟，雍文涛看周荣鑫已经坐下，这才随之坐下。

周荣鑫、雍文涛突然被江青点名，使许多人心中一震。尤其是周荣鑫时任国务院秘书长，他做的许多事情都是按照周恩来的指示去做的。从不当众抽烟的周恩来突然拿起一支香烟，点燃，默默吸着。

江青继续他的讲话：“现在，我讲讲专政与民主的关系。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是不是很稳固呢？我认为基本上是稳固的。但是有某一些地方、某一些人，有一小撮拿着武器到处要杀人、打人。在这一小撮面前萎缩、退却，无产阶级专政就不巩固了。没有很稳固的无产阶级专政，哪来的大民主啊！因此，我们要坚决反对那种萎缩的，所谓不介入的那样一种态度的专政机关。同时，对那种顽固的堡垒要坚决摧毁它！因此，对一小撮杀人犯、打人、破坏革命……这样一小撮，我们要坚决地实行专政！”

掌声，口号声再起。

江青接着说：“但是，我希望你们不要觉得有一小撮做

了这样的坏事情的小家伙，其他的人就都不好了，这一点我希望你们头脑要清楚，才能团结大多数。但是，对于这一小撮如果不实行专政，你们也就很难达到革命的团结。我的话完了。”

江青在一片掌声和欢呼声中结束了她的讲话。

接着,陈伯达登台讲话。他浓重的闽南口音，许多人都听不懂。他讲的不多，只有几句话：

“刚才江青同志讲得很好，她的意见就是代表我们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方针。”

“有一些年轻人被蒙蔽、被欺骗，走了迷路。我希望他们很快觉悟过来，同我们一起，站在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下，只有这样，才是他们的出路。”

陈伯达讲完话，李东民请周恩来讲话，周恩来说：

“我完全同意刚才江青同志、陈伯达同志的讲话，他们两人已经代表我们大家把应该说的话、重要的话都说了，我就不需要多说了。”

接着，周恩来肯定了红卫兵诞生后所取得的成绩，同时说到：“新生的事物诞生以来不可能没有毛病，没有缺点，甚至也可能出现错误，乃至于个别的严重的错误，这是事物发展的规律，你们不必为此惊慌。要晓得，任何一个新事物，一个新生的孩子，刚从胎里出来毛手毛脚的，生一个疮呀，长一个疱呀，把它割去就是了，新生的力量总是要成长起来

的。”

他希望“首都兵团”能够把最大多数的同学团结起来，对少数犯了严重错误，“甚至犯了罪的，这些孩子们、小家伙们，现在把他们采取专政的办法，逮捕起来了，加以法办了。”

他说：“但是因为他们是青年，只要他们诚心悔过，低头认罪，坦白出来他们所以犯罪、犯错误的原因，可以更好的教育我们大家。刚才两位同志都说了，应当给他们改过自新、将功赎罪的机会嘛！”

他再次希望“首都兵团”不要骄傲，“进步！进步！永远进步！”

接着是康生讲话，主要是讲毛泽东提出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五个条件。

康生讲完话，大会执行主席李冬民正想询问陶铸是否发言，不知是谁小声说道：“不让他讲……”

结果，陶铸真的没有走上讲演台。

大会结束时，周恩来指挥大家高唱《大海航行靠舵手》，会场上下一片欢腾。

“首都兵团”同日做出的决议：

“我们坚决拥护中央文革小组！谁反对中央文革小组谁就是反革命！谁反对中央文革小组就砸烂他的狗头！”

散会时，江青将吴德叫了过去，问他：“雍文涛是什么

人？”

吴德说：“雍文涛是中央派到市委工作的，分管中学工作。他去‘西纠’做工作是市委派去的，责任在我。”

江青让吴德回去写检查。

吴德回去后立即将自己的检讨送了上去。江青在上面作了批示，大意是：吴德还比较谦虚，但不能不讲原则，雍文涛是有错误的。

当天晚上，周荣鑫来到中南海西花厅，问周恩来，他该怎么办？

周恩来叹了口气，说：“工作恐怕是暂时不能干了，看看情况再说。”

“你就呆在中南海休息，不要出去。”周恩来嘱咐说。

于是，周荣鑫便在国务院烧锅炉，红卫兵再找他时，国务院说周荣鑫已经参加劳动去了。

雍文涛是1966年7月从中南局秘书长和广东省委常委、书记处书记兼广州市委第一书记等职调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一职，同年8月又兼任国务院文教办公室副主任，9月再兼任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这次被江青点名后，他在国务院文教办公室躲了几天。后来觉得在北京仍然危险，提出要回广东。于是，让广州来的造反派把他揪回去了。

12月16日这天，北京林学院召开“批判斗争李洪山之流反革命活动大会”，北航“红旗”开着校体工队的摩托车

前去助威，被北航附中“红卫兵”陈昆岗和叶文毅等人看见。由于对北航“红旗”的反感，叶文毅决定将“北航红旗”开到北京林学院的捷克产“佳瓦”摩托车偷走。陈昆岗觉得在人家地盘上惹事不妥，竭力劝阻，但未成功，他们还是将北航“红旗”骑来的摩托偷走了。

当天下午，北航附中“红卫兵”、高二学生马小冈和李冀安、叶文毅、黄建新等人正在学校楼前空地上练杠铃，忽见来了 5 位北航“红旗”的人，说是来找摩托车。这 5 个人正准备进楼，被马小冈等人上前阻拦，不让他们进去。双方发生口角，接着北航附中的李冀安一拳打在北航“红旗”一个高个子男子的腹部，将此人当场打倒在地。其他 4 人见势不妙，将此人搀起，迅速离开。

约 20 分钟后，北航广播站传出紧急集合的呼叫声，北航附中“红卫兵”情知不妙，马小冈和叶文毅急忙跑到教学楼，踹开体育器械室的房门，抢出一些体操棒和铅球，随后大伙把宿舍楼道用双人床堵塞。留校的约 15 位附中男女同学全部撤到宿舍 3 楼，并打电话向八一学校求援，但是电话断线。没办法，李冀安只好骑车到八一学校和石油附中告急，附中的学生岳小东则到清华附中告急。

这些中学生刚刚准备完毕，便看见教学楼东侧校门进来黑压压一大群人，很快就将北航附中宿舍楼团团围住，为首的是北航“红旗”勤务员井冈山。他们二话不说，上来就用

砖石将 1、2 楼的玻璃全部打碎。

已撤至 3 楼中学生不甘示弱，从窗户还击。马小冈还从 3 楼 309 房间冒着不断飞来的石块探出身子用照相机拍照，楼下的人群见状迅速闪开，可能以为他手里有什么神秘武器。马小冈看出对方虽然人多却无心硬攻，便与各位同学商定，死守待援。双方就这样僵持着。

大约半个小时后，北航附中的陈昆岗突然说："我下去和他们谈谈……"马小冈一把没拉住他，陈昆岗已从塞满床的楼梯空隙中钻下楼去。

陈昆岗走出宿舍楼，没人上前跟他握手，而是一拥而上，扭住了他的胳膊。由于用力过猛，顿时将陈昆岗胳膊扭脱臼。接着北航"红旗"的人又像捆猪崽一般将陈昆岗绑了个结实。中学生见状，明知寡不敌众，还是冲下楼去救陈昆岗。其中黄建新刚刚冲出门口，就被对方用大块炉渣拍在头上，鲜血顿时盖住了半边脸。王青抡着体操棒狂呼着冲进人群，可没几下就已力竭，很快就被人家按倒在地，接着被四脚朝天的拖走。叶文毅见状扑到王青身上企图奋力相救，但敌不过对方人多势众，陈昆岗和王青两人最终都被抓走了。

肌肉发达，号称北航附中"八大金刚"之一的马小冈见状，狂吼着奔向井岗山。北航"红旗"的人迅即将马小冈围成半扇……

井岗山见指着马小冈说："我知道你能打架，我不理

你……”

北航附中的女学生钟锦屏也冲进人群与大学生们厮打，董偃琴等其他几位女中学生则手挽手站在宿舍楼门口，欲堵住大学生进楼……

井岗山并没有与这些中学生纠缠，他指挥北航“红旗”的人迅速撤离。约半小时后，石油附中红卫兵“赤飙”战斗队的蔡东北、甘朝生、张小光等约 30 人赶到，可武斗已经结束。

石油附中蔡东北等人听说北航“红旗”把陈昆岗和王青抓走了，便直接到北航要人，当听说北航已将陈昆岗和王青送往公安部，于是乎，近 30 辆自行车风风火火直奔长安街而去。

其实，北航“红旗”开始只是将陈昆岗和王青扭送到了五道口派出所。但派出所认定这是群众之间的纷争，拒收。于是北航“红旗”又分乘两辆卡车，把人扭送到了公安部。

正当北航“红旗”在公安部接待室交涉时，石油附中蔡东北和人大附中王洪等人也赶到公安部北门前，此时大约是下午 4、5 点钟。中学生发现了正押在卡车上的陈昆岗和王青，一拥而上。北航“红旗”虽然人多，但看见眼前这群气势汹汹的中学生，还是眼睁睁看着他们把人抢走了。这时，北师大女附中的郑中伟等“红卫兵 16 纵队”的人也赶到了，她们迅速将陈昆岗塞进一辆小汽车里接走，王青则直接回到

距公安部不远的红霞公寓自己家中。

在争抢的同时，得到消息的各路中学红卫兵陆续汇集到公安部北门，与北航“红旗”的人发生激烈的争执。公安部接待人员看见局面几乎失控，便向中学生提出派代表向于桑副部长说明情况。于是石油附中蔡东北、甘朝生、张小光和人大附中王洪等人被请进接待室，北航“红旗”的人则悄然撤走了。

在接待室内，这些中学生七嘴八舌向于桑副部长大声嚷嚷，穿着军大衣的常务副部长李震突然出现在接待室并厉声说：“吵什么！把他们全抓起来！”

于是这群被请进去的中学生又被押到公安部大礼堂，紧接着就被一群警察戴上手铐，又用警车送到了陶然亭半步桥监狱监禁。

公安部门前的中学生越来越多，自行车队伍在不断扩大，中途相识的不相识的人纷纷加入，甚至在马路对面骑车的人也调过头来凑热闹。于是乎，上千人的自行车洪流直接涌向了公安部。

到了晚上 7、8 点钟，天色已黑，但聚集在公安部北门前的人群仍在不断增加。当人们得知被请进公安部的石油附中蔡东北、甘朝生、张小光和人大附中王洪等人也被抓了，这些中学红卫兵们更是群情激愤地狂呼：“放人！”

公安部对此突发事件不知如何处理。

人群开始骚动，一部分人顺势冲进公安部内。公安部紧急调派解放军战士组成人墙，封锁北大门，人群被分割成了门内门外两部分。

清华附中的卜大华他们听到北航附中岳小东跑来请求支援的消息后，觉得此事实在不能容忍：如果那两个学生红卫兵犯了法，需要抓他，应该由公安部门去抓。如果由北航“红旗”去扭送，去抓，那么，有那么多的群众组织，每个组织扭送一个人，公安部是不是都收？于是，他们二话没说，立刻带着人就去了。

当卜大华他们赶到公安部时，看见人大附中的红卫兵正在公安部接待室跟公安部的值班人员吵闹。卜大华他们进去后，就跟他们说：“都不要吵，我们就找他们公安部的领导。”

公安部副部长于桑来了，要求这些中学生选几个代表进去。于是他们推选了卜大华、张晓宾、邝桃生、宋柏林、岳小东、人大附中的杨小平等9人，来到北门东侧的一座小灰楼二楼的一间会议室。这时，屋里已有11 个人。卜大华立即提出抗议说：“不对，我们是对等谈话，我们几个人，你们也应该是几个人，你们多了两个人。”

于桑让撤走两人，9个人对9个人。学生们大声地朗诵《毛主席语录》：“凡是镇压学生的都没有好下场。”卜大华更是指称公安部下放专政权力，毫无道理。

公安部面对这种状况，不知如何是好，只好左右搪塞。

就这样谈了整整一夜，也没什么结果。当岳小东、卜大华等人离开公安部已是黎明时分，天上下起了小雪。

而彻夜在北门抗议和喧闹的人群，随着时间拖延，误解开始发酵。分割在院子里面的人饥渴难耐打算出去，但被解放军战士人墙阻挡根本出不去；外面的人以为里面的人也像蔡东北他们一样被扣押，于是口号声此伏彼起，一浪高过一浪，一时间闹得鸡飞狗跳不可开交。

为了支援里面的同伴，北航附中有人又骑车返回学校，掏出所有饭票求食堂大师傅给了一笸箩馒头，然后由李森和谷永胜硬是蹬着一辆平板三轮车从北航附中骑行两个多小时送到公安部门口，由众人举着笸箩将馒头越过人墙传进里面。但是里面人多馒头少，不够吃，于是他们又冲进公安部食堂，发现那里居然有粉肠，于是众人大吃一顿。

闹了一通宵，无论是围堵的红卫兵还是阻拦的解放军战士都已人困马乏力不能支，公安部撤走“人墙”，众人随即逐渐散去。

当卜大华他们回到学校，看到办公室里已是一片狼藉。原来，当天晚上，清华附中初634班红卫兵李建中、赵小津、李衍陵、吴辉、江远、吴辉、卜伟华等人在清华大学大礼堂前贴了“绞死反革命分子蒯大富”的大标语。结果清华大学“井冈山”把清华附中革委会的办公室给抄了，还把以前学校封存档案的两个柜子都扛走了。第二天，清华附中卜大华

去找他们要东西，质问说：“你们干嘛？打家劫舍啊？他们几个人去贴大标语，你们抄我们革委会干什么？”

清华的人说：“那你们拿回去吧。”

卜大华说：“我才不拿回去呢，你们怎么拿走的怎么给送回来！”

这就是后来人们说的“联动”一冲公安部。

## 第335回：开大会，撤销“西城纠察队”　教育部，陶铸谈五点意见

北师大林锋、向东彪 12 月 9 日贴出《也致林彪同志一封公开信》的小字报后，开始几天还没有反驳的大字报贴出。但是后来，有人将他们的化名“林锋”和“向东彪”拆解后，又重新组合成为“林彪锋向东”，然后指责他们的化名暗含了“林彪的锋芒指向毛泽东”之意；也有人说，“林锋”、“向东彪”的含意就是像树“林”的“锋”芒指“向”毛泽“东”和林“彪”；总之，是其“狼子野心何其毒也”，于是对他们的批判开始升级。

而 12 月 11 日给林彪贴大字报的北师大物理系刘中柱、杨以鸿，本来是和同学孙光启和李观韶 4 人在北京教学仪器厂边劳动边学习的。刘中柱、杨以鸿 12 月 11 日那篇批评林彪的大字报就是在北京教学仪器厂写好后带回学校贴出的，贴完他们又返回了工厂。12 月 17 日凌晨 3 时，北师大的谭厚兰派人将刘中柱和杨以鸿二人从北京教学仪器厂揪回学校的小红楼看管起来，同时被看管的还有张传亭和敦进田，即林锋、向东彪。消息当天在北京师范大学校园传开，在他们张贴的大字报旁新张贴出一些标语和大字报，其中多为口号：

“打倒反对林副统帅的现行反革命林锋、向东彪、杨以鸿、刘中柱！”

“攻击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敬爱的林副统帅罪该万死！”

“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等。

同时还新贴有大字报和标语，称“坚决支持、拥护‘中央文革’的正确领导”，“谁反对‘中央文革’就打倒谁”，正告：“反对中央文革者绝无好下场”，要“誓死保卫‘中央文革’，誓死保卫文化大革命的旗手江青，誓死保卫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

这一天，原来给“中央文革领导小组”张贴过大字报的学生中有立即表态转变立场的，也有“反戈一击”，很快就写出揭发杨以鸿、刘中柱还有其他“反动言论”的。

北师大当晚即在北饭厅召开了批斗刘中柱、杨以鸿、张传亭、敦进田的全校大会。校园的空气一时格外凝重。

12 月 17 日，北京“三司”又组织全国来京上访的群众组织代表召开“全国在京革命派为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夺取新的伟大胜利的誓师大会”，周恩来、陈伯达、江青、谢富治、刘志坚、张春桥、谢镗忠、王力、关锋、戚本禹、穆欣、姚文元、汪东兴等中央领导人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出席了大会。重庆造反派“124 惨案赴京控诉团”也参加了大会。

重庆“124 事件”发生后，外地赴渝红卫兵早已将舆论造向了全国。那天同重庆造反派一起冲会场的就有北京“三司”、“一司”、四川大学

“八二六”、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红色造反团”及西安交大、西北工大等外地红卫兵。各地造反派见到传单，也纷纷翻印、传播。

尽管这时重庆已经有传单、大字报澄清了“烈士遗体”的真相，指出是以“劳改犯”尸体冒充“烈士”，但这微弱的声音似乎无力与那些“主旋律”相争。而已经来到北京的重庆“124 惨案赴京控诉团”还不知道这些消息。

因为北京“三司”红卫兵直接参加了“124 大会”上的造反行动，又参加了事后的“联合调查团”和“赴京控诉团”工作，还有的“三司”红卫兵以“目击者”身份发表过控诉“工纠打死造反派”的文章，所以在北京“三司”负责人所致的大会开幕词中特别出现了这样一段话：

“在这场尖锐复杂、你死我活的斗争中，同志们，在重庆，在成都，在长沙，在上海，在北京等地，我们的一些革命战友为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英勇地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他们是真正的人民英雄，他们的死，是比泰山还要重的。”

在这段话里，重庆被排在第一位，足见当时重庆“124 事件”在全国同类事件中的分量。

接着，全体起立，为“殉难的革命战友致哀”。之后，一些群众组织代表分别发言。发言者除几个北京红卫兵外，还有一个外地代表，他

就是重庆“124惨案赴京控诉团”的代表、《红岩》作者罗广斌。其他人的发言都是声讨北京最近出现的攻击中央文革、攻击林彪的 “反革命逆流”，而罗广斌在其长达40分钟的发言中，却是“愤怒控诉重庆市委血腥镇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制造‘124’血案的滔天罪行”，并称此次血案有革命群众被打死。他强烈要求“严惩制造血案的罪魁祸首，立即解散重庆工人纠察队，打倒重庆市委，解放重庆山城！”会上，罗广斌还将有关“控告”材料通过主持大会的红卫兵，呈交给了周恩来和江青。

针对大会发言所声讨的社会上炮打中央文革的大字报、大标语，江青在会上说：

“我是一个无足轻重的人物，一个普通的共产党员，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如果说为人民做了一点好事，这完全是我的本分，如果我做错了，不妥当，你们完全有权利批评。但是对那一小撮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小家伙，我不愿意说出他们的名字，因为从我嘴里说出来就会提高他们的身价。我蔑视他们，他们根本做不出什么大事情来，他们只会干那些不可告人的勾当。因此，我希望你们这些革命的战友们，高举毛泽东思想的小将们，要作光明磊落的政治斗争，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原则上求同存异，把组织壮大起来。只要组织壮大起来，什么‘霹

雷’战斗小组、‘梅花’战斗小组……，这些家伙就会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毛主席从来是相信群众的，走群众路线，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脱离了群众，那一小撮人就会无所作为。那么你们要说他们一小撮人为什么干了那么多坏事，又打人骂人呢？就因为他们是当权派，掌握了一部分政权，因此就要摧垮他们！请问左派的队伍不壮大起来能摧垮他们吗？”

众：“不能！”

江青继续问：“能打倒他们吗？”

众：“不能！”

江青：“那么这个问题请你们回去好好讨论一下。我的话完了。”

陈伯达在讲话时说：“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 “我们准备为人民牺牲，我们已经牺牲了很多好同学、好同志，但是革命在前进！”

周恩来在讲话中再次提到了“西纠”，他说：“你们今天的大会开得很成功，我向你们致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敬礼！我完全同意江青、陈伯达同志的讲话。现在我不想多说了，只提一点意见，就是最近几天中学的小家伙，纠察队的一小撮人做了一些犯法的事，违反了中央规定，做了一些坏事，我们执行了中央批转的《重要通告》，逮捕了他们。因为他们经过我们多次教育，屡教不改，所以逮捕起来教育、改造他们。”

周恩来建议取消红卫兵纠察队，他说："我提议各校红卫兵取消纠察队的名字。纠察队这个名字是你们起的，起了相反的作用，希望你们自动取消，取消这个名字，不要我们命令。另外，几个坏分子犯了法，我们把他们逮捕了，对他们实行专政。纠察队的名字是你们自己起的，我们采用民主的方法，取消好不好？"

众人答："好！"

周恩来："既然好，希望你们好好学习毛主席在全国胜利以后发表的第一篇著作——《论人民民主专政》，就会懂得民主和专政的区别、关系和作用。好，我就结束我的讲话。"

会后，公安机关逮捕了李洪山。同日，谭力夫也被扭送公安部。

大会当天，重庆保守派组织"工人纠察队"赴京告状团驻地也被北京造反派查抄，人员被赶走……

文革初期的 6 月 4 日，教育部大院大约有 30 多名大院子弟宣布成立"红卫兵"，他们自豪地宣称，教育部干部子女红卫兵是继清华附中"红卫兵"和北大附中"红旗战斗小组"之后，世界上第三支红卫兵组织。红卫兵成员是四中、八中、女八中、三十五中和二龙路学校等校的中学生。最小的上初一，13 岁；最大的 19 岁，上高三。他们大多住在教育部大院里。文革一开始，学校都停了课，他们不再去学校，干脆就

在大院里“就地闹革命”。大院里称他们为“小红卫兵”，以区别于机关干部成立的群众组织。“小红卫兵”当中有近半数成员的家长是司局级干部。教育部大院里长大的孩子，对于谁的家长是什么级别，从小便耳熟能详。谁的父母级别越高，谁就越趾高气扬。大多数人的家长是中共党员，即所谓“革干”出身。有少数成员的家长不是党员，出身职员，算作“红外围”。红卫兵的头目是一名三十五中的高三学生。他的家长级别最高，母亲是部机关党组书记，父亲在海军大院任职。他本人后来还是“西城纠察队”成员。

高教部长蒋南翔被打倒后，中央指示高教部、教育部合并为新的教育部，由原教育部长何伟任部长。没过多久，教育部大院里一派造反组织“延安公社”开始炮轰何伟。教育部大院的“小红卫兵”保何伟，一是因为和他们观点近似的一派组织“北京公社”保何伟；二是听说何伟调任教育部长前在河南省委工作，是“毛主席的好学生，县委书记的好榜样焦裕禄”的上级。焦裕禄的上级怎么能是走资派呢？再说，何伟长相慈眉善目，不像坏人。

教育部卢正义贴出揭发批判副部长刘季平的第一张大字报后，成为响当当的革命左派。但是很快有人揭发卢正义解放年前曾被国民党逮捕，关押在江苏省反省院，有自首变节嫌疑。于是教育部的“北京公社”开

始炮轰卢正义，“小红卫兵”们也立刻到卢正义家造反，“打倒大叛徒、政治大扒手卢正义”的标语和侮辱卢家人的大字报糊满了卢家门窗。在此之前，“小红卫兵”抄家、打人等行为全都所向无敌，没有受到过阻止。但是，这次他们到卢正义家造反却遭到了保卢一派“延安公社”的指责。“小红卫兵”没有丝毫退缩，他们在斗争会上用攻击谩骂的语言激烈辩论。哪里有派仗的战场，哪里就有怒发冲冠和唇枪舌剑的“小红卫兵”。有一位女红卫兵的父亲和她不是一派，她在大会上“控诉父亲的迫害”。有一次她在操场上还指着父亲的鼻子当众辱骂：“你是小丑！”

正当教育部反卢、保卢之争日益激烈、难解难分之时，中宣部副部长刘祖春来教育部作重要指示，他说：“卢正义同志是坚定的革命左派。他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他是一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人。”

“什么？！不可能！”坐在下面听的“小红卫兵”简直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有人急得哭起来，他们登时大喊大叫，“他是大叛徒！”他们高喊着《毛主席语录》：“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追到中宣部，在礼堂里围住刘祖春数小时，和他激辩并逼他表态。

12 月 17 日，陶铸对教育部文化大革命提出五点意见。他说：

“教育部应集中力量彻底批判以何伟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不能转移目标，对赵秀山、肖克杰同志我虽不能保证他们没有缺点错误，但不能说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不能混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界线，不能拿赵秀山、肖克杰同志作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来批判，成为转移对以何伟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批判。

关于卢正义同志贴出第一张大字报，揭发教育部的问题，是革命的，大方向是正确的。把卢正义同志打成‘反党分子’、‘卢正义党’，说他的十点体会是反党纲领，这是错误的。过去已宣布过平反，现在要重新说明，他不是反党分子，不是卢正义党，他的十点体会不是反党纲领。至于卢正义同志历史上有些问题，不要拿到运动中搞。如果有新材料，将来由组织上审查解决。为什么早不审查，迟不审查，偏偏人家贴了大字报就来审查他的历史问题呢？这种做法是很不好的。

徐非光同志在南大四清中是犯有严重政治错误的，但不能说是大叛徒。因为当时不知道彭真是大黑帮，而是把彭真当作党的领导人。当然，他开始反对陆平，以后在压力下写了信，交了材料，这是极端错误的，是革命立场问题。如果立场坚定就应当保留个人意见，不要去迎合彭真。要允许人家犯错误，允许人家改正错误。一个人犯了错误就不要不许人家革命了。这次文化大革命，徐非光同志还是表现不错的，我认为应当采取欢迎的态度。”

第 336 回：情况变，伊林、涤西均被捕　设专案，江青见广院同学

12月17日这天，周恩来接见辽宁大学“八三一红卫兵”、“红色造反团大闹天宫战斗队”。接见时，周恩来的秘书对辽宁代表说：“总理两天没休息了。”

穆欣说：“我正在整理录音，我是请假来的。我提个建议，总理近来作了两个报告，都有录音，你们可以听一听。”

同学们送周恩来离去。

此时，给林彪写《公开信》的北京农业大学附中学生伊林、涤西的处境已经危险了。于是俩人作了分工，刘握中在校外活动，张立才在学校看情况。张立才的几个同学，利用学校已经停用了的浴室为张立才修建了一个密室。一眼看去，浴室里好像塞满了各种旧家具，实际上有个通道可以钻进去，里面是一块空地，有张课桌，还有床可以睡觉。如果一旦有情况，打开窗子就可以跑到外面去。张立才就住在这个密室里。

12 月 17 日，学校里没什么人，张立才在密室外边溜达。刚走上学生宿舍的台阶，一个同学突然过来拉着他就往浴室跑，把他推到密室里，然后把门倒锁上。

门刚锁好，北航“红旗”的人和农大附中“红旗”的人就过来了。他们在外边打那个拉张立才跑进密室的同学，让他开浴室的门。那个同

学就是不开。

张立才打开窗子就跳了出去，结果，当即就被操场上的人看见，大喊“抓住他”，追了过来。张立才飞快地逃跑，一米多高的栅栏，腾地就蹿了过去……天黑下来了，他迅速的躲到一个角落的阴影里，追他的人从他身边跑了过去，没抓到他。

第二天，张立才去了北航，得知北航的曹伟康、白晓宏已经被北航“红旗”扭送到公安局了。他又到北京图书馆找刘握中，恰好碰见他出来，脸上还化了妆。

张立才忙问：“你怎么变样了？”

刘握中说，是北航“向阳”、“红匕首”两个姐姐给他的化妆品，还给了钱和全国粮票，让伊林、涤西赶紧逃跑。

刘握中是听到北农大附中的“联动”说“要狠狠打击敢于反对林副主席的人……”后，悄悄离开北农大附中的。傍晚时分，他按照北航女学生“向阳”、“红匕首”俩人给他留的地址，来到北航女生宿舍 24 楼二楼右边第二间房门口。敲开门，只有“向阳”、“红匕首”俩人在屋里。她们一见是刘握中，赶紧把他拉了进去。“向阳”说：“17 日夜里，韩爱晶的‘红旗’将 13 号楼接待站抄了，将白晓宏、曹伟康他们几个人都抓走了。”

这时窗外的喇叭里正高声广播着：

“砸烂白晓宏、曹伟康狗头！”

“打倒反对林副主席的现行反革命分子！”

她们又和刘握中反复谈起了两个司令部的事，说：“你们别犯傻了。”

她们翻出 20 斤全国通用粮票和 15 元钱放到刘握中手中，要他快点逃出北京。还像姐姐嘱咐弟弟那样，再三叮咛：“一定要逃出北京，也不要在外省的城市里，逃到外省农村去，越远越好。”

她们到楼道里看了看没有人，给了刘握中一顶棉帽子。

刘握中用这顶帽子遮着脸迅速溜下了楼。

这时，张立才对刘握中说：“他们已经到学校抓咱们了。”

俩人商量后认为，这样抓他们是违反《十六条》的。所以，还得再写一张大字报，贴到中南海附近去，然后再往外地跑。

于是，他们先到了北京市委。因为那时候北京市委很乱，有不少空房子。但是没有暖气，屋里冷得呆不住人。这时，已经是凌晨了。刘握中就说：“上我姑姑家去，没人知道那里。”

他们来到刘握中的姑姑家，家里的人都睡着了。他们进了门，刘握中倒在床上就睡，张立才坐在写字台前起草大字报。还不到半小时，一道光柱从窗外照了进来，是手电筒。张立才知道是抓他们的人来了，肯

定是跑不掉了。于是对外边说："你关上手电筒吧，别闹大了。"

等外面的人关上手电后，张立才把记录着那些同意他们观点人的小本子掏出来，塞到炉子里面烧掉了，其中也包括万润南。然后把刘握中叫了起来，开了灯，一块出去了。

前来抓他们的是北农大"东方红"的人，开了两辆汽车。北农大的大学生怎么会知道这里呢？原来伊林、涤西同班有一个经常在一起读书讨论的同学，他知道这里，这次是他带着北农大的学生过来的。

伊林、涤西被抓到北农大，天亮后就被警车送进了半步桥看守所。

张立才进了监狱，首先问他有什么政治背景，写《公开信》是谁支持的？是哪个老帅？哪个副总理？

审讯员是个30多岁的军人，发脾气，吓唬这位中学生。当张立才回答说："我没有背景"时，他一下就将一杯水泼到张立才脸上，逼他说出背景来。

受伊林、涤西牵连的还有瓦罗佳，因为他把传单送到了苏联大使馆。他被关进了学校的"牛棚"，实施群众专政了。还有那个帮张立才逃跑的同学，北航"红旗"把他抓到北航去关了两天，挨了打。所有帮着张立才刻蜡板、印发传单的同学，多少也都受到了打击，全都退出了"八·一八红卫兵"，这个组织就这样散了。

坐牢期间，有时也把他们拉出去批斗，还游过一次街。清华大学批斗得很凶，后来刘握中见到蒯大富时，跟他："老蒯，蒯大哥，你可真了不起！当时差点把我们揍死了！"

蒯大富说："你当时反林彪呀。"

后来，刘握中听韩爱晶告诉他，当时，江青对蒯大富、韩爱晶说到这件事时，是这么讲的："这两个小家伙名字有点怪。你们对这两个小家伙的批判，不要搞得那么激烈嘛，盖上就是了。你们怎么这么傻，把这大字报撕了。撕了人家就有理由了，他们就开始到处发传单了。"她在北航还说："那篇文章很有文采嘛，你们要文斗。"

刘握中刚被抓进去时，拘留所的丁所长对这些孩子挺亲和的，每当他们挨批斗回来，他就来安慰他们，给他们送红药水，帮他们擦伤口，还安慰他们说："群众斗争嘛，反正是受点苦，难免有过火现象什么的。你们小孩子也不懂事。"

12 月 18 日，北师大刘中柱、杨以鸿、张传亭、敦进田他们 4 人又在外语系批斗了一次，随后就把他们 4 人押送到位于东长安街上的公安部，当晚，又被送到陶然亭西自新路半步桥北京市看守所分别关押。第二天早饭后，两个警察依次进各室向他们宣布，根据北京市公安局局长的命令，对他们实施拘留，并要他们在拘留证上签字。刘中柱拒绝签字。

警察没再多说一句话，收起拘留证转身就离开拘留室，并“咔嚓”锁上门。

18 日下午，在纷纷扬扬的大雪中，北师大那位给康生写信的“黑牛”李世取又贴出一张题为《一个“反革命”分子的话》的大字报，为林锋、向东彪和杨以鸿、刘中柱等辩白，称这些同学都是文革初期的热心参与者，他们大字报的内容并无对林副统帅的恶意攻击，而对林副统帅讲话中的“顶峰轮”、“天才论”有不同看法是很正常的，他们公开提出自己的不同看法，表现的是勇于探索真理的赤子之心，不能说有罪。又说，文革已经到了一个关键时期，对已经开展的文革做总结，针对存在的问题提出建议是真正关心文革的人应尽的责任等等。大字报的结尾还写到：“我自知张贴出这张大字报的后果，我知道前面等待我的是什么，但是真理和真相也在召唤我，……别了，我的家人，我的父母！别了，这段时间与我在一起踢球的小朋友们！别了，生我养我的劳动人民！”

大字报贴出不久即引来围观！

而“黑牛”在张贴完大字报后，到理发店先理发，又去澡堂洗了澡，吃完晚饭回到宿舍收拾换洗的衣物和《毛选》等书籍。这时，一位素不相识的教育系同学急匆匆地敲开他的房门，劝告他说：“黑牛，我佩服你的勇气，但是我希望你马上去将自己的大字报撤下来，并立即做检讨。

这种形势下你的努力是没有用的，……”

“黑牛”李世取没有听取这位同学的劝告，不到 9 点即安然入睡。

19 日凌晨，在同班同学的带领下，学校治保会的工作人员来到李世取的宿舍。

门开灯亮，李世取醒来，睁开双眼看清来人后的第一句话是：“是来带我走的吧？”

得到肯定答复后，李世取从容穿好衣服，抱起放在床头的衣物、背上书包，在治保会人员和同学的“护送”下来到治保会，那里有公安局的人正等着他……

据说，李世取在书写完最后一张大字报后还给自己的父母和哥哥写了信，信中感谢了父母的养育之恩，请父母原谅他的不孝，并请哥哥带自己尽孝。

后来在批判李世取时，多次问他：“黑牛”的化名是不是“黑帮牛鬼蛇神”的缩写，他是不是要代表“黑帮牛鬼蛇神”出来说话。

李世取回答说，自己的乳名就是黑牛。

李世取也被带到陶然亭西自新路半步桥北京市看守所。北师大19日被送进这里的还有物理系学生李文博，虽然他没有直接给林彪和中央文革的大字报，只是在刘中柱和杨以鸿给林彪的公开信上留言表示支持，

但却作为“重犯”，关进与“黑牛”等北师大其他5人不同的“号子”，和伊林、涤西等关在一起。

李文博“重”在何处呢？就是因为他在1966年10月17日贴出的一张题为《公社已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国家》的大字报，全文如下：

文化大革命的任务是“斗、批、改”。这里的“改”是指革新社会主义制度，改善无产阶级专政。通过发扬无产阶级大民主，触及人们的灵魂，形成一场大张旗鼓的思想革命。

资产阶级革命已经创造了使地主阶级不能继续存在，也不能产生的条件的一种制度，无产阶级则要创造一个使一切剥削阶级都不能存在，也不能再产生的条件，一种新制度。

我们现在的制度是从资产阶级那里来的组织形式，是一个没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国家。这仍然是产生资产阶级、修正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温床、社会条件。这种组织形式不能再继续下去了。这种领导机构从形式上与旧社会资产阶级专政机器是一样的。这种机构是官僚主义和奴隶主义的温床、社会基础。……

由于领导机关仍然沿用资本主义社会的一套方式（或者经过了某种改组），因此人们的社会实践是在社会思想下进行的。

要实现巴黎公社的原则。巴黎公社的原则主要有两条：第一，官吏

的工资不能超过熟练工人的工资；第二，人民有权随时罢免官吏。总之，人民需要一个廉价的、廉洁的政府。

马克思说：公社虽然被搞垮了，但它的原则是永存的。在无产阶级实现公社原则之前，它将一直大喊大叫。文化革命的目的就是要实现巴黎公社的原则。

共产主义航船的桅杆已经露出地平线了，让我们高举双手迎接它吧！

这张大字报在北师大反响不大，只是说他鼓吹无政府主义。但因这张大字报宣传了一种大民主、国家体制改革的新思潮，在校外影响极大。因此，伊林、涤西他们把李文博和北京大学8月26日写《造三个大反——用毛泽东思想改造旧世界，创建新世界》大字报的乔兼武并列称为“新思潮”的“祖师爷”，说他们起草那封《公开信》，主要是受到北京师范大学的李文博和北京大学的乔兼武的影响。

18日，陈伯达、江青、姚文元在人民大会堂西厅接见广播事业局“毛泽东思想战斗团”和广播学院学生代表。由于时间很紧，江青邀代表们共进晚餐，边吃边谈。

江青首先听了广院学生述说他们被保守势力迫害的情况。当江青听到丁莱夫不让学生冲进广播大楼，调动卫戍区的部队封锁大门的事情，江青叫人打电话把傅崇碧叫来。江青说：“我要先从思想上缴掉他的械，

打打他的威风。”

傅崇碧来了后，江青严厉批评他说：“这是头一回听到的发生在北京城、发生在毛主席身边的事，以后不允许再发生。军队要和革命群众，革命小将团结在一起，搞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她还说：“对丁莱夫我们已经观察半年了，我早已不称他是同志啦。你们要很好地组织对他的斗争。如果你们需要的话，你们准备好，我们中央文革小组全体成员都可以去参加，我也可以给你们作一发炮弹，你们准备一下。还有广播学院要搞一个像样的全面发言，批判丁莱夫和丁莱夫的工作组。上次去广播学院，不知道党内还有个丁莱夫。如果那时候知道，让他上台低低头，广播学院的情况可能会好些，不过像现在这样也好。”

江青让代表们回去警告丁莱夫，不许因为临时工、合同工在文化大革命中给领导贴了大字报，就随便解雇。临时工、合同工是为党工作的，不是为丁莱夫工作的。

江青看到有的代表带着《捍卫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的袖章后说：“在北京地区，时传祥搞了个捍卫团，是保守势力，已经臭了。你们是革命造反派，就不要用‘捍卫’这两个字了，就叫‘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毛泽东思想战斗团’好了。”

江青又提起血统论和形“左”实右，她说：“我准备着陶铸的女儿领着人来抄我的家。让他们来抄好了。如果他们不动我的文件就让他闹，如果她敢动我的文件，我就要把她逮捕起来。”

当晚22时07分至23时55分，周恩来在中南海国务院会议厅同时接见大连铁道学院观点对立的“红色造反团”和“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两个组织各20人。在接见结束时，周恩来语重心长地说：“你们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千万不要忘记！今天是1966年12月18日晚10点59分，在国务院会议厅讲这样的话。20年以后，你们40多岁了，正是当权的时候，以后你们真的这样做好了。”“20年以后，文化大革命的作用就看出来了。”

随着对“资反路线”批判的深入，刘少奇的女儿刘平平和刘亭亭接到去学校接受“阶级教育”的勒令，去学校了。王光美心里难过，她走进她们住的房间，翻看了刘平平的日记。突然，她看到这样一行字：

“亲爱的爸爸妈妈呀，你们为什么要生我？我本来根本就不该到这个世界上来。”

王光美心如刀绞，不由自主地拿着女儿的日记本，走进刘少奇的办公室。

刘少奇抬起头，看见王光美满脸泪痕，有些吃惊，走过来从她手里

接过日记本……

第二天，刘少奇把刘平平、刘源源、刘亭亭3个孩子叫来，对他们说：

“我犯了错误，可能要批判我几个月，你们要经得起考验和锻炼，要经得起委屈，要到大风大浪中去锻炼，许多革命前辈都是在大风大浪中锻炼出来的。”

他还说：“我可以不当国家主席，带你们去延安或老家种地。我的职位高，对党的责任大，犯了错误影响也大，但我没有反党反毛主席，我保证一定能改正错误。”

在 5 月北京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成立了中央专案审查委员会，下设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 4 个专案组，会议结束前，又设了一个田家英的专案组。后来，中央专案审查委员会下设一个办公室，主任是时任公安部部长的谢富治，副主任是汪东兴和戚本禹二人。

此时，社会上出现了一些揭发刘少奇、王光美有“历史问题”的材料。在中央碰头会上，议论了这些情况并提议组织班子进行审查。但当时刘少奇还是政治局常委、国家主席，因此不便直接设立审查刘少奇的专案组，决定先设立王光美专案组。

12 月 18 日晚，中南海西楼的一个小会议室里，谢富治、汪东兴召集从军委办公厅、公安部等单位抽调的 4 名工作人员开会，宣布正式成

立王光美专案组，对外叫材料组，指定军委办公厅的一位秘书处长负责，主要是审查王光美的问题。

会上，谢富治拿出一份名单，交给专案组一位工作人员，要他们好好保存。

这是份手写的、字迹潦草的“名单”上面写着：

谢富治(组长)

江青 汪东兴

萧华

叶群

伯达(顾问)

这份名单既没有标题，也没有日期，更没有注明是在什么会议上、由哪些人研究决定的。

“名单”中江青被圈掉了，在后面换成汪东兴。据当事人回忆，圈掉江青是江青自己提出来的。陈伯达当顾问是林彪提议。从字迹看，圈掉江青，添上汪东兴，是林彪的手迹，“伯达(顾问)”几个字则是陈伯达所写。这两处的字体和其余名字的字体不一样，应该是后来所作的增改。

保管的工作人员在“名单”的上方写上“王光美专案小组领导成员

名单 1966.12.18.富治同志交来”几个字。

这个“材料组”后搬到在中南海丙区，因此后来又宣布“名称暂叫中央办公厅丙组”。

## 第337回：中南海，春桥召见蒯大富

## 许明死，恩来见江西代表

此时，清华大学“井冈山”的人数迅速增长，已成为校内最大的群众组织，学校师生员工要求大联合的呼声很高，头头们都受到了很大的压力。12 月 18 日，清华大学“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八八总部”的头头唐伟主动找到 12 月 17 日刚刚从上海串联后回到清华大学的蒯大富，表示愿意和“井冈山红卫兵”合并，都用“井冈山”的名称，他也放弃争一把手，合并后的“井冈山”实行“巴黎公社”式的民主选举产生自己的领导。他建议“井冈山”总部筹备委员由清华“井冈山红卫兵”9 名代表、“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八八总部”7 名代表、“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临时总部”5 名组成。

这天中午，蒯大富突然接到中央文革的电话：“请你立即到中南海西门，张春桥同志要找你谈话。”

下午 13 时 30 分，一辆小车接着蒯大富离开了清华园，向市中心一路飞驰而去。

13 时 58 分，车子开到了中南海西门。蒯大富下车后，对门卫说：“我是蒯大富。春桥同志打电话，约我来的。”

门卫接通了张春桥的电话，张春桥说：“让蒯大富一个人进来。”

走进中南海，蒯大富看见张春桥穿着崭新的军大衣从屋里

走出来，他握着蒯大富的手说："你好，蒯大富同学。"

"春桥同志好。"蒯大富用力地握住张春桥的手问候道。

张春桥把蒯大富领到传达室右拐的一间套间内，把门关上，对他说："你坐。"

蒯大富坐下后，张春桥也在一张沙发上坐下，他点燃一支香烟后，望着蒯大富问道："你去上海串联的情况怎么样？你们清华的运动最近如何？"

蒯大富将上海和清华大学的情况向张春桥做了详细汇报。

张春桥静静地听着，不时点点头，偶尔也插上一两句话，然后说：

"从全国来讲，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相当猖獗，现在还是要深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中央那一两个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至今仍不投降。"

"你们革命小将应该联合起来，发扬彻底革命精神，痛打落水狗，把他们的反动路线批倒批臭，不要半途而废……"

蒯大富很激动，他明白张春桥的意思，"那一两个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就是指刘少奇和邓小平。张春桥单独找他谈此事，这是中央文革对他的信任。他当即向张春桥表示道："请首长放心，首长对我这么信任，我一定要给中央文革争气！"

当晚，江青、谢富治、张春桥、姚文元、关锋、戚本禹等人又接见了北京"一司"、"二司造反联络站"、"三司"、"首都

兵团”以及部分院校代表。张春桥首先问了各校抓“西纠”分子的情况以及群众的反映，到会的各单位代表作了汇报后，江青说：

“这几天我听到一些反映，听说你们抓了很多人，我很怕你们走到反面，犯错误。中共北京市委的《重要通告》是经中央批准的，不仅对他们适用，对你们也适用。抓来的人，你们可以交给公安部，让他们替你们看管。告诉公安人员要看管好，和他们说好随传随到，发生问题由他们负责。你们也要按《通告》办事，一定要严格遵守《通告》。你们不能私自拘留，也不能限制其人身自由。不要私设刑堂，私设刑堂不对。不够送公安局条件的，可以警告他：不许乱跑，老老实实在自己住的地方呆着，不许回家，否则一切后果由他负责。跟他们讲清楚，不要害怕，要好好交代，认识错误，回到正确的立场上来，同你们一起干革命。”

清华大学的同学说:“刘涛、贺鹏飞看住了,不许他们乱跑。”

江青:“你们要做艰苦的思想工作。你们这些人就怕认真做思想工作。刘涛的工作可以做，贺鹏飞的工作也不比李井泉的儿子的难做。争取过来，让他们揭发问题，也有利于做他们老子的工作。刘涛不是王光美生的，不是死心塌地跟她走的，不是不可以争取的。跟她讲，不要让她往家里跑，让她跟同学们住在一起。你们跟她说：‘我们帮助你，你要从政治上、思想上

和家里划清界限，如果跑了，一切后果由你负责。’你们要问一问她，看她要不要革命，如果要革命的话，就跟你们一块儿去！如果真的革命的话，就留在学校里，让她揭发王光美的罪恶。贺鹏飞也让他揭，他揭什么问题就揭什么问题。贺鹏飞，你们给他家里打电话：他在学校里呆得很好，请放心，我们帮助他。贺鹏飞在家里惯得太厉害了，过去根本就没有学习什么主席著作。他在学校里，你们好好帮助他，如果能学习进一些毛主席著作的话，就很好了。你们要帮助贺鹏飞，让他自己向家里打电话。帮助他，改造他。你们红卫兵不是要扣下他不理他。我看你们就怕做思想工作。贺鹏飞过去搞了些幕后活动，现在要帮他，做思想工作。你们把贺鹏飞的工作做好了，就很了不起了。如果你们实在不听，要那样做，犯了错误，你们负责。”

有学生问：“什么样的人可以抓？”

文革小组回答：“贴攻击毛主席、林副主席大字报的可以抓。贴江青同志大字报的要分析，如果是恶意攻击的可以抓。”

戚本禹：“贴关锋、戚本禹大字报的不能抓。”

文革小组：“像贴一问、二问、三问中央文革的不能抓。凡是行凶，动武的可以抓。”

江青：“在主流下的一股歪风一定要批倒，现在全国打人行凶的很多，北京的这股歪风一定要镇压下去，给全国作个示范。对于那些打人多的，态度不好的，年纪大一点的，可以镇压，

一定要判刑，年轻的可以判处死刑缓期执行。”

在谈到北京市公安局和“西城区纠察队”时，江青说：“红卫兵纠察队不管是什么样的，都要解散。”

关锋说：“把‘西城区纠察队’的后台揪出来，严重的枪毙。”

江青：“抓人交给公安部，不要送公安局。公安部是谢副总理管的，我们相信他。西城区公安局问题很严重，已经调了五、六十名干部去改组它，北京市公安局也肯定有问题，你们可以去造反。公安部队，监察院，最高人民法院都是从资本主义国家搬来的，建立在党政之上，监察竟然监察到我们头上来了，还整理我们的材料。这都是些官僚机构。他们这几年一直是跟毛主席相对抗的。我建议公安部队除了交通警，消防警以外，其它的全部由军队接管。”

谢富治表示同意。

有人提出合同工制度，并且说，全国总工会的书记、副主任不出来接见他们。

江青说：“现在的合同工制度是刘少奇提倡的，我们不知道，合同工是刘少奇搞的。有人讲是主席说要搞的，那只能是他们的主席，不是我们的主席。……他们（指全总主任、书记）不为工人服务，干脆让工人进到楼里去住，让他们滚出去，造他们的反。合同工这个东西像广播局就有500多个合同工，他们可以随时解雇，一解雇就是资本主义的一套。我们对于坏分子

还给他饭吃，让他劳动，而合同工一解雇就没饭吃了，这是培养奴隶主义。”

当谈到半工半读、半农半读时，江青说：“最初是毛主席提出来的，后来到刘少奇手里，就被歪曲了。刘少奇的老婆是个大资本家，真不得了。”

江青还说：“你们红卫兵的纠察队，不管是什么样的，都要解散，不要败坏红卫兵的名誉。红卫兵是毛主席的红卫兵，是毛主席支持的。红卫兵的国际影响很大。”

“各省委的驻京办事处以及各省在北京开的饭店是搜集情报做特务工作的。例如，四川饭店就是李井泉搞的，晋阳饭店就是彭真搞的，公安部要下令撤销，把这些坏家伙都赶回去，把房子收回来。这些要跟总理讲一下，都把它收回来。”

谢富治说：“可以，回去和总理讲一下。”

这时，“一司”有人递条子，说是准备揪刘少奇、邓小平。

江青说：“刘少奇和邓小平是党内的问题，中央可以解决，现在搞他们不适合，不策略。对于他们在党内、党外的影响，群众还需要一个认识过程。在清华和北大不是有人贴刘少奇的大字报吗？主席亲自派陈伯达同志去制止。

清华要揪王光美回去检讨是可以的，我们支持。让王光美回去作检查，这是合理的。把薄一波也揪回来，他哪来的那么多病呀！她与薄一波合伙搞蒯大富。

现在有些青年，有些不好的东西在影响着你们，你们有些青年搞无政府主义。你们抓王任重开了个 10 万人的大会，开得不太好，不得人心。你们抓人可以直接押送公安部。

周荣鑫、王任重、雍文涛、许明、孔原都是西城区纠察队和东城区纠察队的后台支持者。周荣鑫与彭真、薄一波有联系，雍文涛也很坏，以前总是通过王任重来拖着中央文革犯错误，做了很多坏事。”

北航“红旗”在“二司造反联络站”的一个学生递条子给江青，建议三个司令部联合起来。

江青说：“这个建议很好，现在是时候了。你们三个司令部可以商量一下，搞一个全市性的组织，就不要什么司令部了。这个我们不能包办代替。现在，革命派应该团结起来，一起战斗，浩浩荡荡地干革命。人少了，人家老抄。你们可以求同存异，统一思想，一起行动。不仅左派、中间派可以联合，右派也可以争取。我有一篇关于这个问题的讲话，现在发表还不合适，太早，等你们要联合起来时，我再给你们讲。”

戚本禹说：“三个司令部联合起来这个问题，应该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你们合并时，可以找聂元梓、蒯大富参加。”

张春桥：“从现在到明年 4 月份这段运动怎么搞，你们回去讨论一下。我们很想听听你们的意见。下次你们把意见搜集上来。”

12 月 19 日，周恩来接见江西省“联合赴京控告团”全体代表，他在接见时指出：江西省委不接受“炮轰江西省委，火烧江西省委！”这个口号是错误的。

他讲了三点：

“第一点是各级党的领导要在群众面前经受考验。”

“第二点，……省委引起群众斗群众……主要的根本的在于省委。”“省委决定的《紧急通告》(省委三级干部会时发的)，这是引起群众斗群众，这是错误的!”“希望转告杨尚奎同志、刘俊秀同志、方志纯同志、黄知真同志、还有其他同志，好好开一个省委的会议，检查批判自己的缺点和错误，才能团结江西省的劳动人民、革命学生和革命工友。”

“第三点，希望在座的同志们，……在革命的大前提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原则基础上并肩作战，共同革命。”

当晚 21 时至 23 时，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中央负责人集体接见外地来京师生和红卫兵大会，周恩来、陶铸、谭震林、李富春、李先念、刘宁一、肖华、童小鹏等人参加。

周恩来在会上讲了几个问题：

一、免费乘火车、轮船、汽车串联，到二十日停止，等到明年春暖再进行。

二、在冬季进行一次短期军事训练，时间十五至二十天。

三、外地在京人员除必要的留在北京外，其余的，大问题解决了，在今年年内都回去。

四、各种革命组织，都是要接受党的领导，接受毛泽东思想，按十六条规定办事。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团结起来。团结——斗争——团结，这是主要的任务。

五、斗争方式和工作方法。要文斗，不要武斗。不能让违法乱纪、打人的现象继续下去。

当晚，清华大学的蒯大富回到学校后，立即召集“井冈山”的头头们开会，传达张春桥下午见他时所说的“紧急指示”，并提出自己的意见：组织上街游行，公开提出“打倒刘少奇”的口号。

唐伟在会上说：“中央没同意公开呢，你这样上街合适不合适啊？”

第二天，19 日上午，清华大学“井冈山红卫兵总部”、“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八八总部” 、“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临时总部”三总部合并，宣布联合成立“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推举蒯大富为兵团总部司令，并发表了联合声明。

由于江青在 12 月 18 日晚上接见北京“一司”、“二司造反联络站”、“三司”、“首都兵团”代表时讲了“各省委的驻京办事处以及各省在北京开的饭店是搜集情报做特务工作的”话，第二天，12 月 19 日，首都“一司”、“二司革命造反联络站”，

“三司”和中学“首都兵团”联合行动，以各省政府驻京办事处是“情报机构”为名，冲砸了各省政府驻京办事处。

12 月 18 日晚，江青、谢富治、张春桥、姚文元、关锋、戚本禹等人接见北京“一司”、“二司造反联络站”、“三司”、“首都兵团”等院校代表时，再次提到“西纠”和“西纠”的后台，国务院信访办负责人许明非常紧张，不仅因为自己和丈夫孔原在会上被江青点名，而且“西纠”负责人孔丹就是她的儿子。当时党中央的信访工作是戚本禹负责，国务院的信访工作是许明负责，俩人常有接触。12 月 22 日，许明打电话给戚本禹，说：“总理批评我了，而且批评得很厉害，叫我停职反省。” 说她觉得压力很大，要戚本禹救救她，去跟江青说说。说着，许明在电话上就哭了。她说，她儿子孔丹“西纠”的事情，“具体情况他父亲孔原都不知道，总理更不知道。因为毛主席支持红卫兵，”所以周荣鑫和她就给予了支持，主要是为他们弄了些办公的房子、车子和一些经费。对他们那些无法无天的事她并不清楚，也绝没有在背后指使。她希望戚本禹能为她说说话。

戚本禹很同情，在电话中对许明说：“有合适的机会,我一定说说。”

许明向戚本禹我表示了感谢。

当晚，戚本禹见到江青时，向她汇报了许明的来电：“许明给我来电话了,她说她也不知道‘西纠’、‘联动’所干的那些事。”

戚本禹建议："让她检讨一下算了。"

江青表示同意，说："等我见了总理,再跟总理讲清。"

可是，就在第二天，12 月 23 日，许明和她的丈夫孔原一起服安眠药自杀，被送往医院抢救。

这天，孔丹被拘捕。

在中央文革 10 月的一次会议上,江青提出:"《毛主席语录》的前言要改一下,用林副主席的名义重新发表,这样影响更大。"陈伯达马上表示同意。当时没有找到林彪对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著作的系统论述，于是让唐平铸写了个初稿。并让唐平铸和胡痴报告总政。

12 月 15 日晚,中央文革小组在钓鱼台主持讨论修改过的《毛主席语录》前言。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王任重、张春桥、刘志坚、王力以及唐平铸、胡痴等人参加了讨论。会议以唐平铸起草的前言为基础，边议边改。唐平铸做了记录。陈伯达、康生发言最多，成为修改工作的中心。周恩来也多次发言，提出了重要意见，比如"毛泽东思想是在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的时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全面"和"全世界"这两个词，就是周恩来根据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决议强调写上的。

根据江青的意见，决定将修改过的前言改名为《再版前言》，署名林彪，落款日期为 1966 年 12 月 16 日。

12 月 16 日晚，唐平铸奉命到毛家湾林彪处，请他审定和签阅由中央文革主持、以林彪名义写的《再版前言》。

回到报社后，唐平铸立即向刘志坚汇报了他见到林彪后，林彪说的所有话，也就是指示，并报军委总政和中央文革。当晚，唐平铸根据林彪当晚所说的话，主持起草了《解放军报》社论：《句句熟读　句句照办》。

12 月 17 日，《解放军报》全文刊登了以林彪名义写的《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

12 月 19 日，《解放军报》社论：《句句熟读　句句照办》见报。社论说："在我国人民喜爱的宝书《毛主席语录》再版的时候，林彪同志为它写了前言，号召全国人民认真地刻苦学习，掀起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新高潮。"

自此以后，再印的《毛主席语录》就是带有林彪署名的《再版前言》的新版。该版应该是《毛主席语录》的第三版，它标志着《毛主席语录》由军内发行转向公开发行。原版中林彪的题词"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后面又加了一句"做毛主席的好战士"。

## 第 338 回：抓永嘉，姚文元来电解围

## 到复旦，“罗思鼎”“逼上梁山”

这期间，上海市委的“后院”出事了，市委机关干部起来造反了。

文革开始后，复旦大学历史系的一些政治指导员认为上海市委写作班“罗思鼎”小组里面的复旦大学老师，整天在学校外面，不参加学校运动，于是给“罗思鼎”负责人、复旦大学历史系的党总支委员朱永嘉，和历史系老师、“罗思鼎”小组成员朱维铮贴了大字报，认为他们是走白专道路的典型。这件事，当时就被历史系党总支批评了一顿，压下去了。后来朱永嘉也回系里开了些座谈会，讲了一些党委的好话，讲了总支的好话，介绍外面学术批判的情况。

到了 1966 年 9 月，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指示派朱永嘉去北京了解消息。根据陈丕显的指示，市委办公厅主任方扬亲自找朱永嘉谈话，并于 10 月下旬，将他派到上海市委驻北京办事处，为上海市委打探北京方面的消息，搜集中央首长的讲话。中央工作会议期间，陈丕显到北京后，跟张春桥、姚文元他们说，朱永嘉到北京来了。于是，张春桥、姚文元到上海驻北京办事处看了朱永嘉一次。

张春桥问朱永嘉来北京做什么？

朱永嘉说：“收集情况呀！你们的谈话、各个学校里面运动的情况，为市委抓运动作参考。了解中央信息，紧跟中央。”

张春桥说，“没用处！我有消息会告诉市委的！你也看不到东西，回去！”

朱永嘉说：“你们叫我回去，他们叫我来，叫我怎么办？”

张春桥、姚文元他们说："你回去，回到群众里面去，和群众站在一起。"

朱永嘉不敢擅自回沪，将张春桥、姚文元的原话转告了他的顶头上司、市委写作班党支部书记徐景贤。

11 月下旬，复旦大学"红革会"在历史系的走廊里贴出大字报，还在地上写大幅标语，"要求朱永嘉回来，接受群众的审查！"

复旦大学党委报告了上海市委，市委让徐景贤打电话通知朱永嘉返回上海。11 月 25 日，朱永嘉买飞机票回到上海，当晚就住在市委写作班。

朱永嘉回到复旦大学后，历史系党总支书记余子道专门约他出去，告诉他是怎么回事，并事先通知朱永嘉的家里，说"老朱要回来了，没有什么大事情，放心好了。"

谁知，11 月 28 日，历史系总支委员、指导员等教师亲自出马，在系里召开了批判朱永嘉大会，说他参加撰写的、用"罗思鼎"笔名发表的《从"投献"看吴晗的"自我批评"》、《<论清官>质疑》等文章是"明批暗保"的黑文，执行的是彭真搞的"二月提纲"的路线，勒令朱永嘉交代在学校里的修正主义言行，交代在市委写作班里，接受过陈丕显、曹荻秋什么"黑指示"，替他们写过什么"黑文章"，而且要揪朱永嘉的后台，说揪到哪一级是哪一级，还抄了朱永嘉在复旦大学的家。

第二天，一支复旦大学"红革会"红卫兵队伍气势汹汹的冲进上海市委写作班所在的武康路二号，要市委写作班把朱永嘉的"黑材料"

交出来，并勒令写作班交出文章底稿。

写作班党支部书记徐景贤认为写作班是张春桥领导的，不肯交材料。红卫兵看了写作班贴在会议室里的批判市委的大字报，说写作班是“老保”，专门保市委。接着就冲上二楼，把历史组的门强行打开，把朱永嘉等人的办公桌撬了，把所有批判《海瑞罢官》和“三家村”的原始材料装进麻袋扬长而去。

市委写作班党支部副书记、哲学组组长郭仁杰是山东南下干部，曾任复旦大学哲学系总支副书记，因为家在复旦大学，复旦哲学系的学生过去就跟他有联系，所以哲学系的造反派学生常聚到他家里面去，鼓动他起来造反。此时郭仁杰已被“红革会”聘为顾问。他当天就赶到武康路写作班，对徐景贤他们说：小将们来抄家事先他并不知道，复旦大学“红革会”也不太了解写作班、朱永嘉等和张春桥、姚文元的关系，“你们应该支持小将的革命行动。”

同时，郭仁杰也做了“红革会”的工作，希望他们把抢走的材料送回来。

徐景贤埋怨郭仁杰说：“你一忽儿装红面孔，一忽儿装白面孔，但是你不想想，红卫兵把批《海瑞罢官》的好多文字材料搞走了，我们怎么向领导交待？我担心资料里面有很多保密的东西，随便搞走外泄，会造成严重的后果。”

徐景贤十分紧张，不知该怎么办。向市委汇报？此时曹荻秋自身难保。他只好找老领导、已在北京的张春桥和自己的老朋友姚文元，他们现在是中央文革的副组长和成员，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而且，

朱永嘉在《海瑞罢官》上的问题也需要他们澄清。

11 月 28 日清晨，徐景贤拨通了北京“中央文革”的长途电话……

徐景贤 17 岁就在上海市委宣传部文艺处工作，当过干事，副科长，经历过上海市委三届第一书记：陈毅、柯庆施和陈丕显。

1964 年 8 月，当时上海市委分管文教工作的书记石西民把全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书记处书记、上海作协副主席、上海文学研究所副所长叶以群和上海市委宣传部文艺处干事徐景贤找去，告诉他们，决定成立市委写作班文学组，组长叶以群，副组长徐景贤。

8 月 10 日，石西民在丁香花园的东楼二楼召开了一个有 10 人参加的会议，与会者有叶以群的助手王道乾及作协文学研究所的 6 名青年文艺理论工作者，有华东师范大学毕业的戴厚英、复旦大学毕业的高玉蓉、吴圣昔、吴立昌、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的高彰彩、上海师院中文系毕业的陈冀德。另外还有来自华东师大的王绍玺、上海师院徐缉熙及剧作家协会的一人。石西民在会上宣布成立上海市委写作班文艺组，负责人叶以群，王绍玺是党小组长。

8 月 14 日，中宣部给中央书记处打报告请示公开放映和批判《北国江南》和《早春二月》两部电影。8 月 18 日，毛泽东在《中宣部关于公开放映和批判“北国江南”和“二月”的请示报告》上批示同意在全国中等城市公开放映，并说：“使这些修正主义材料公之于众。可能不只这两部影片，还有一些别的，都需要批判。”

《二月》即《早春二月》，公开放映时改名《早春二月》。

根据毛泽东的批示，上海市委写作班在原定要批判的《北国江南》和《早春二月》第一批“毒草”影片中又加上了《林家铺子》和《舞台姐妹》。由于市委写作班文学组面临着撰写大量重点批判文章的任务，人手不足，于是决定再从上海电影系统调集“笔杆子”。于是在文艺组建立后约 1 个月，徐景贤带着《大众电影》编辑部主任杨振龙，海燕、天马电影制片厂文学部编辑蔡建平、赵志强、范维珩 4 个人来到丁香花园，在东楼西侧的那个空着的房间组成电影组。大约一个月后，电影组的写作计划撤消，人员与文艺组合并。

石西民调北京后，市委写作班由张春桥分管，徐景贤担任市委写作班的党支部书记，一直到文革开始。

姚文元撰写批判的《海瑞罢官》的文章，就是在市委写作班完成的。当时写作班已经搬到武康路二号，他被安置在武康路二号二楼一间专门的写作室。张春桥亲自向徐景贤交代了任务，并向写作班宣布了保密纪律。

徐景贤和姚文元相交已经十多年了，关系密切。60 年代初期，徐景贤写了一篇杂文《不做“冷酷的观众”》，发表以后遭到了一些人的非议，姚文元马上挺身而出，写了一篇杂文《并非“挨批”》，为他辩护，因此，徐景贤很感激姚文元。以后，姚文元患肝炎，当时在市委宣传部工作的徐景贤，又把他的情况向市委写了报告，经过市委批准，让姚文元住院治疗。为了答谢徐景贤的关心，姚文元送给他一本著作《在前进的道路上》，并在扉页上题句：

“蝇死魔走战士在，黝励夜色听鸡鸣。”

文革开始后，张春桥和姚文元先后被调去北京，上海市委任命徐景贤和朱永嘉任上海市委文革小组成员，列席市委常委会，替市委到处“救火”。此时，徐景贤和朱永嘉一样，忙得最多的工作是为曹荻秋等人起草检讨书，并经常代表市委领导出席一些群众集会，成为替市委抵挡群众运动的“挡箭牌”。每当他在群众集会上替市领导接受完群众的批斗，回到市委，看到市委书记和常委们，一个个苦着脸坐在康平路小礼堂里，惶惶不可终日样子，再想想自己，心里非常苦闷，不知道出路在哪里，很想直接找到张春桥和姚文元。可是，张春桥、姚文元到北京以后，从不跟他们主动联系。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杨永直知道徐景贤和姚文元交情不错，让他用市委宣传部部长室的电话红机子给姚文元多打电话，但很难接通。只有一次，于会泳受江青之命到北京去搞京剧现代戏，上海音乐学院的红卫兵要把他揪回来，闹到了市委宣传部。杨永直急死了，让徐景贤请示姚文元，是否让于会泳回来？这次姚文元接了电话，他说：“于会泳前一时期到北京，是中央要他去搞样板戏的，不要随便揪人。”

而此次，徐景贤为朱永嘉的事给姚文元打电话，张春桥、姚文元的反应却是从来没有过的迅速和果断。第二天，11 月 29 日，张春桥即找姚文元、王力、关锋、戚本禹商量，张春桥觉得：复旦大学揪朱永嘉，名义上是搞市委写作班，整“罗思鼎小组”，实际上矛头是对着他的。他说：“朱永嘉怎么成了复旦‘资反路线’的代表？他也不在复旦参加运动啊？”

姚文元表现得特别激动，他说：“要揪朱永嘉的后台，后台就是

我，让他们到北京来揪好了！”并提出必须马上表态。

戚本禹、关锋也都表示了很大的义愤！

他们商量以后，决定由姚文元直接打电话给上海市委写作班，徐景贤在笔记本上记下了这次电话的详细纪录：

“二十九日晚，姚文元给丁电话（即丁学雷，徐景贤常用的笔名），听说复旦大学党委顽固地执行资反路线，搞罗（思鼎）小组，揪朱（永嘉）。姚（文元）、张（春桥）惊讶！关（锋）、戚（本禹）气愤！戚本禹还说要到复旦来贴大字报。有几个问题你记下来：第一个问题要追根的问题，你话要讲得硬，追根就是应该追到本单位、本校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才是根子。第二，去年十一月份以来，《文汇报》的方向是正确的、革命的。第三，朱永嘉的问题为什么要突然批判？要追根子就是想追到张春桥。你要记下原话回答他们。你可以转告复旦大学，整朱永嘉是错误的，我跟春桥同志商量了，复旦大学要追‘罗思鼎’小组的根子，你去告诉他们好了，根子就是张春桥，根子就是姚文元！我在北京，谁要揪，到北京来揪好了！”

姚文元在电话里还说，要用“丁学雷”的名义，对复旦大学所有红卫兵说，“罗思鼎”小组在对《海瑞罢官》的批判中做了很多工作，方向和路线是对头的，跟姚文元的合作是很好的。写作班在前一个时期，是张春桥直接领导的，跟杨西光没有关系。

放下电话，徐景贤立即向郭仁杰及“罗思鼎”小组成员吴瑞武、王知常、朱维铮作了传达，把姚文元电话记录原原本本地告诉他们，要他们记下来后详细地告诉复旦大学党委和红卫兵。他还在华山路市

委接待站约见复旦大学造反派红卫兵，向他们宣读了姚文元的来电记录。

复旦大学“红卫兵”在学生食堂召开全校大会批斗朱永嘉，当第一个学生上台发言批判时，已经听到徐景贤传达了姚文元电话精神的朱维铮和吴瑞武冲上台去，朱维铮抢过话筒，按照姚文元的电话精神责问复旦大学“红卫兵”，要把矛头指向哪里？并据此批判那些保守派的“红卫兵”学生。

朱永嘉一看，赶紧劝道：“朱维铮你别干！做什么啦！不要把事情搞乱了！他们批我跟你们有什么关系！一弄弄得不好，事态扩大了更不好办！开两次批判会也没什么了不得的事情！总归有办法收场！一塌括子就那么点事情，有什么啦！”

“一塌括子”是上海话，就是“总共”、“通通”的意思。

这时，“红革会”闻讯赶来，一下子人数猛增，把召开会议的“红卫兵”团团围在中间，但不是批朱永嘉，而是批复旦大学“红卫兵”，支持朱维铮的发言。后来，安文江要上去发言，“红卫兵”不让，拿走扩音器等，双方抢夺起来。由于造反派人数上占绝对优势，“红卫兵”的头头偷偷地溜了，其他人都还留着，结果这次会成了一次造反的大会，直开到第二天的凌晨 2 时。在会上，“罗思鼎”小组的成员发表了《造反声明》，口气很硬，校党委书记王零声称他也要“参加造反派”，也要“造杨西光的反”。“东方红”广播台连夜播放了“罗思鼎”的《造反声明》及校办“红卫兵大队部”一些人的退出声明，“红卫兵大队部”的“长征台”放音乐捣乱，双方反复播送，直到

24 时左右，震动人心。

第二天，复旦大学“红卫兵”再次开会批斗朱永嘉。这时，吴瑞武跑上去，在会上一字一句地宣读了徐景贤传达的姚文元来电记录，指出要揪朱永嘉、追“罗思鼎”小组后台的话，后台就是张春桥、姚文元，后台就是中央文革！这样一来，会场大乱，保守派“红卫兵”对校党委当场反戈一击，批斗会再也开不下去了。

接下来，复旦大学“红革会”就把朱永嘉抓走了，关在“红革会”那里，逼他造反。他们对朱永嘉说：“我们跟他们不一样，我们只要你表个态。”并让他读毛泽东写的《南京政府向何处去？》，还将当年毛泽东写给李宗仁政府的那几篇社论一篇一篇读给他听。

本来朱永嘉作为复旦大学的中层干部，和复旦大学党委、历史系总支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很难站出来造反的。张春桥在北京时就对他说过：“谅你也不敢造反！”

而此刻，经过“红卫兵”这么一冲，姚文元这么一保，朱永嘉反倒“逼上梁山”。他对“红革会”的学生说：“好吧好吧，我也给你们逼上梁山了！”于是就写了一张大字报：“我要造反！”

“红革会”拿到朱永嘉写的大字报，立刻就去广播。历史系“红卫兵”一听就火了，又将朱永嘉抓去开批判会，一上来火力就特别猛，但已是强弩之末了。

自从“罗思鼎”小组的《造反声明》反复播送以来，两天时间，复旦大学的保守派全线崩溃。12 月 3 日，学校中层干部也纷纷“起义”，到处都是一片“造反”之声，真真假假，无法分辨。当晚，学

校造反派接管了校广播台。

接下来，朱永嘉帮“红革会”做复旦大学党委副书记葛林怀、刘杰的工作，动员他们起来造杨西光和王零的反。同时还将他熟悉的，包括余子道等总支一级的干部，自学成才的工人专家、时为复旦大学电光源实验室负责人蔡祖泉都动员起来造反。12 月 5 日，复旦大学召开“打倒杨西光，砸烂杨家店”大会。会议开得热气腾腾，人心振奋，聂元梓出席并讲话，已加入造反派的“赤卫军”的蔡祖泉上台发言作了揭发。蔡祖泉本来是复旦大学保守派旗杆式的人物，他们的工作一做通，复旦大学党委也就垮了！

整个“罗思鼎”小组在复旦大学和郭仁杰联合起来一起造反。他们感到，市委写作班再也不能为市委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服务了。于是决定杀回市委写作班，敦促徐景贤起来造反。他们来到武康路二号找徐景贤谈话，反复强调他们已经豁出去了，没有再回头的可能了，“你呢，直到现在还没有亮出旗号来。”“我们现在需要一面从市委里面杀出来的旗子”，这是郭仁杰的原话。他还说：“你在武康路二号写作班只能到静安公园看看大字报，但公园里两派的观点都可以贴出来，看不到尖锐性、揭露性的大字报。你有没有看到学校里那种如火如荼地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形势？”最后，他动员徐景贤到复旦大学去“留学”。

那几天，正好市委办公厅副主任苏超急着找徐景贤，要他去给曹荻秋市长起草检讨。徐景贤就给写作班的值班人员作了布置：“凡是市委通过保密的红机子来电找我，就说我外出了，不知道去哪里了！”

其实，他真的到复旦大学“留学”去了。

12 月 13 日，郭仁杰等人拉着徐景贤到复旦大学校园里看大字报，陪徐景贤一起来的还有写作班文学组的陈冀德。

此时，复旦大学的“南京路”，即复旦大学横贯东西的主大道，全部被大字报贴满了，一直贴到学生食堂。徐景贤感到，那些大字报确实与静安公园里的不一样，学校的情况与北京的文革运动互为呼应，首都来的消息非常多，大字报对市委的批判一针见血，使他受到很大震动。

看完大字报，他们又将徐景贤带到朱维铮住的第六宿舍日本式小楼前的院子里小坐喝茶。在座除了郭仁杰、朱永嘉、朱维铮、吴瑞武、王知常外，还有中文系教师吴中杰，他的妻子高玉蓉参加过市委写作班，和徐景贤也很熟。

文革前，吴中杰在学术上已是硕果累累，文革刚开始，他自然被中文系党总支作为白专道路的典型受到批判，周围的人对他都侧目而视，避之唯恐不及。但在 7 月底 8 月初的一天晚饭后，徐景贤却突然登门造访，令吴中杰惊讶万分，问他怎么到复旦来了？徐景贤说：“市委派我来看大字报，看得晚了，吴瑞武请我到他家吃夜饭，听说你家就在旁边，顺便过来看看，你好吗？”

当时的徐景贤已是上海市文化革命小组成员，吴瑞武则是上海市委写作班历史组的成员，也是复旦大学历史系的教师。虽然只是寒暄问好，没有谈什么实质性的话语，但在此时此刻，徐景贤能来看他，已对吴中杰是一个很大的安慰。

后来吴中杰也揭竿造反，揭发党总支，得到造反派学生的声援，自然也就加入了学生造反派的队伍，此时他是“红三司”的智囊。听说徐景贤到复旦来了，于情于理，自然都要过来看看。

在座的 4 位“罗思鼎”成员和吴中杰 5 人，发言热烈，一致动员徐景贤“揭竿而起”，站出来造市委的反。其中尤以王知常最为激动，他不是坐着讲话，也不是站着讲话，而是跳上椅子，蹲着，手舞足蹈地进行鼓动。只有陈冀德笑嘻嘻地一言不发。

之后，郭仁杰等又陪徐景贤到校园里第一教学楼的大教室里，给他介绍了“红革会”的负责人马立新、劳元一，“红三司”的负责人安文江，他们用自己的现身说法，讲了当初怎么受压制、后来怎么起来造反的历程，还送徐景贤两句话：“革命方觉北京近，造反才知主席亲。”他们说：“我们红卫兵本来感到北京那么遥远，党中央那么遥远，但造反以后，到北京去，毛主席接见我们，做我们的红司令，给我们作指示，指挥我们战斗，我们就觉得毛主席特别亲，假如你老徐起来的话，你一定也会有这样感受的。”

看了大字报，听了介绍，又想到姚文元这次来电话给写作班撑了腰，徐景贤开始有所触动了。在 1200 号楼的教室里，他和哲学系、中文系正在开会的红卫兵们见了面，听了他们的发言，便作了一个简短的表态，说：“我是到复旦大学来‘留学’的，复旦大学确实像‘解放区’一样，红卫兵小将就像高尔基所说的，是暴风雨行将来临前的海燕，我要虚心地向你们学习。”

第 339 回：何去从？徐景贤尚在犹豫　写作班，众秀才一致造反

其实，徐景贤是有很强的政治敏锐性，《十六条》公布之后，他自然悟出了新的政治动向。

国庆节后，徐景贤曾在红卫兵接待站以市委文革小组成员的身份接待过北京南下红卫兵，和中国科技大学的许小昆、忻鼎亮，北京大学的胡轲等人有过密切的交往。他们知道徐景贤是市委文革小组的成员，却不是当权派，只是市委写作班的一个普通的支部书记，就和他逐步接近起来，还约他到他们住的海关学校去，给他看他们撰写的文章，邀他到华亭路他们的工作据点去，参加那里的辩论会。甚至还让他们身边的中学红卫兵找到常熟路瑞华公寓徐景贤的家里，给他送各种资料。

他们告诉徐景贤："毛主席发表《炮打司令部》大字报的目的，就是要通过文化大革命，把共产党的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都检验一下，看他们能否过得了社会主义的关。"

徐景贤劝他们说："要相信干部的大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不能随便'炮打'，还是应该分清是无产阶级司令部还是资产阶级司令部，不然会犯 1957 年右派犯的错误。"

学生们则说："今天的形势和 1957 年不同了，那时资本主义改造刚刚完成，共产党的政权还需要进一步巩固，现在则是党的领导地位已经绝对巩固了，鉴于苏联变成修正主义的教训，毛主席在《二十三条》和《十六条》中都指出：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文化大革命是一场反修防修的大演习，和反右派时的阶

级斗争形势根本不同。”

“现在的体制和机制都是保护党的各级领导干部的，他们长期脱离群众，做官当老爷，搞特殊化，还凭借自己手中的权力千方百计地发号施令、镇压群众，听不得不同意见，所以群众一起来，他们因为害怕群众，就执行了压制群众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我们就是要按照毛主席的部署，对他们进行炮打，猛击一掌，把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打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也让其中的一小撮修正主义分子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得到充分的暴露。”

徐景贤说：“这样搞法岂非天下大乱了？”

学生说：“对！我们的前提就是要乱一乱，打乱原体制的阵脚，打碎它原来的一套。不然，这些领导干部一贯认为反对他们就是反对党，而且有原来体制的保护，他们有恃无恐，根本不会来理睬你。我们通过群众的批判和监督，搞得他们很狼狈，使他们不得不放下架子，他们才会听你们的。大多数人才会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坚定地走社会主义的道路。”

徐景贤问：“那么这场运动的最终目标究竟是什么？”

他们说：“毛主席教导我们要把无产阶级专政的命运，要把社会主义的命运，掌握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广大群众手里。现在群众觉悟高涨，需要通过群众帮助干部，把他们的立场转变过来。文化大革命就是这样一个过程：通过文化大革命确立反修防修的机制，建立群众今后有监督领导的权力制度，建立群众有充分发表意见的大民主制度，这才是毛主席发动文革的初衷，这才能保证我们的江山千秋万

代不改变颜色啊！”

许小昆直盯着徐景贤的双眼逼问：“你愿意做上海市委反动路线的工具，还是做一个真正和群众站在一起的马克思主义者？”

徐景贤不得不垂下头来，从内心表示折服：“这些年轻人来到上海，白天吃着粗糙的饭食，晚上睡在教室里的硬课桌上，没日没夜地找人谈话，调查研究，鼓动群众，就像‘五四’时期南下宣传的北京大学生一样。”他暗自思忖：“他们图些什么？他们什么也不图，他们只是想宣传他们最忠诚坚信的毛泽东思想，他们只是想把毛泽东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方针路线付诸实践。”

这次到复旦来看大字报，徐景贤更受到实际氛围的感染，对何去何从问题不能不有所思考。此时此刻，在朱维铮第六宿舍日本式小楼前的院子里，在如此热烈的气氛中，他既很感动，又很犹豫。

是啊，徐景贤和他们 5 人不一样，他始终没有受到过政治迫害，至今仍被上海市委的信任，而且政治地位处于上升趋势，让他造市委的反，这个决心是难下的。但是，他是聪明人，眼前的形势，他也看得很清楚，深知目前的局面维持不了多久，不造反，就跟着上海市委倒台，这又是他所不愿意的。

从复旦大学回到写作班，郭仁杰、朱永嘉催促徐景贤召开写作班全体成员会议，讨论写作班面临的形势和今后的道路。就在武康路二号二楼的玻璃棚洋台上，写作班的全部成员聚在一起，发言非常热烈。他们分别来自高等院校、文艺协会，电影系统和社科院、党校等，只有徐景贤一个人是市委机关的。大部分人的发言是劝说、启发徐景贤，

也有人的发言是直接炮轰他、对他“逼宫”。

郭仁杰在会上分析形势说：“我们写作班何去何从？现在是关键时刻，关键的关键是看徐景贤怎么样。”他指着徐景贤说：“你要触及灵魂，不触及不行，这样才能割断和市委千丝万缕的联系。”

朱永嘉分析说：“我们写作班分两个阶段，前一阶段在张春桥、姚文元领导下做了一些工作，方向是正确的；后一阶段，张春桥、姚文元到北京中央文革去了，我们在市委控制下站到了群众运动的对立面，基本上都是充当灭火器、挡箭牌。”他说徐景贤“既不同意市委的一些做法，又不同意北京红卫兵和上海造反派的一些做法，这是折中主义。”朱永嘉还“现身说法”说：“我这次站出来是靠张春桥、姚文元同志，没有他们的担保，我是出不来的。现在写作班没有别的路好走，看样子只有走造反这条路，靠市委靠不住，只有靠靠中央文革，靠毛主席。”

党校哲学教研室调到写作班哲学组的程绮华，是解放前的地下党员。她也对徐景贤作了帮促发言，说：“我们后期实际上执行了市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压制群众，包括你还为曹荻秋写检讨。”“你想想看，你变成什么样子了？你本来是写大批判文章的，现在去给曹老头写检讨，你不是变成资产阶级保皇派了吗？”

程绮华等人直截了当地说：“‘丁学雷’被你糟蹋了！你还打着‘丁学雷’的旗子。‘丁学雷’现在究竟做点什么事情？”

也有人的发言更不客气，简直是指着鼻子痛骂。历史组的王知常，外号“小老王”，原来在南京军区当兵，后来考进复旦大学历史系成

了调干生，年龄比较大，戴了一副深度的近视眼镜，头顶都有些秃了，朱永嘉当过他的老师，但两个人年纪相差不大。王知常毕业后留在复旦大学当教师，主攻近代史，知识面比较广，记忆力特好。他在会上站起来冲着徐景贤说：

“要说造反，我们造得最早，批《海瑞罢官》就是造反，我们不是比聂元梓还早吗？可是，你这个支部书记把写作班带到哪里去？后来，我们整天在市委门口值班，遭人围攻，历史组被抄，朱永嘉被绑，整个写作班成了市委的挡箭牌、消防队。你这样做对得起谁啊？对得起春桥、文元同志吗？对得起我们吗？你再这样‘老保’下去，我们一拍两散，对不起，只能在对你的批斗会上见！”说罢，他还气得双脚在地上跳了跳，把楼板踩得咚咚作响。

徐景贤埋头在自己的笔记本上做记录。他后来说：“听王知常这种发言，可以说是真正的‘触灵魂’了。”

写作班十几个人个个都发言表态，一圈兜下来，历史组、哲学组全部主张造反，文学组的陈冀德、吴圣昔等赞成造反，作家协会来的吴立昌和电影厂来的刘景清开始时不赞成造反，主张继续写文章，后来看到大势已去，就保留自己的意见。最后，就等着徐景贤一个人表态拍板了。

会议持续了两天，徐景贤的思想斗争非常激烈，会议结束后通宵不眠，反复思考利弊得失。他顾虑党的机制还是强大的，万一自己出头露面和市委对抗的话，风险很大，将来可能会有很糟糕的下场，这十几年来在市委机关里所做的努力将付之东流，既得利益不去讲了，

自己的声名也毁了。但是另一方面，他对当时党内的很多情况相当不满意：

首先，他对党内的特权思想不满意。斯大林逝世以后，揭露出苏联许多党的高级干部大搞特权，从中央到地方的官员，除了住宅以外，都有别墅，带了家属一起度假，大搞特殊化。而中国共产党在建国以后，和苏联的情况差不多。他曾到过云南、四川、湖北等地，又去过杭州、南京、苏州、无锡、扬州等城市，发现这些地方的党委都建造有高级的招待所，专给中央领导人和各地的负责人居住，这些招待所占有最好的地块，设施齐全、环境优美，四周都有广袤的园林，首长和他们的家属在这里休息宴请，或是小病大养。招待所备有大批的服务人员为首长们服务。所有的高级招待所都是警卫森严，老百姓连接近一下都没有可能，更不用说打听内情了。上海在这方面也不落后，除了专门建造的给中央首长居住的 414、415 招待所外，还有虹桥俱乐部、兴国路招待所、瑞金花园招待所、太原路招待所、岳阳路招待所……市委领导生了病，就占用了西郊的最好的招待所，还专门进口最好的医疗设备，组建最强的医疗班子。这些特权阶层的享受和老百姓的生活形成了强烈的对比。所以，毛主席提出发动文革的理由之一是：有些党的高级干部进城后脱离群众了，工资高，有洋房，有汽车，有服务员和厨师，贪图享受，而且对群众摆架子，群众对他们心里有气，所以要冲击他们。这些话徐景贤最听得进去。

其次，他对党内的等级制度不满意。什么东西都要讲等级。特别是他结婚时申请住房，因为当时还不是科级，就不能住稍微大一点、

朝向好一点的房子。明明其他房子都空着，但因为级别不够，就不能分给你。而那些部长们，则住着成套的大洋房，还有花园，他为此愤愤不平。举凡衣、食、住、行，都要讲等级，食堂吃饭分大灶、中灶、小灶，甚至发展到用什么办公桌，坐什么椅子，都要讲等级。他想：参加革命追求的是民主、平等，怎么现在等级越来越森严，封建余毒越来越厉害。所以，当毛主席号召要反对党内的不平等作风，主张上下级平等、官兵平等的时候，张春桥跟着写了《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的文章，赞扬军事共产主义的好处，历数等级制度的弊病，徐景贤是十分赞成的

除此之外，他对文化大革命以来上海市委的表现更不满意。他亲眼目睹了上海市委自恃一贯革命，一贯正确，对群众运动抱有严重的抵触情绪。凡是北京红卫兵或是上海的群众对市委提出比较尖锐的意见，或是贴出批评、炮轰的大字报，市委就要派专人外调，追查别人有没有政治历史问题，企图把他们打成反革命或是右派。他们把保市委的人封为左派，调动工人、农民和一些劳动模范站出来保市委，挑动群众斗群众，又把机关工作人员推到第一线，而领导自己却躲在幕后策划指挥。市委领导还把一批知识分子作为资产阶级反动权威抛出来，把一批民族资产阶级分子作为反动资本家抛出来，到后来实在混不过去，就把一些部、局级和大专院校的党员干部作为修正主义分子抛出来，自己却想蒙混过关。他认为市委执行的是一条打击群众、压制群众、挑动群众斗群众、转移斗争大方向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毛主席提倡的放手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和广大群众站在一起的无产

阶级革命路线背道而驰。

徐景贤觉得应该通过文化大革命的烈火，把党内的特权思想、等级观念和干部制度等好好地焚烧一下，把市委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真相揭露出来，特别对那些犯有走资派错误的干部，来一次冲击，正像毛泽东所说的，是十分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

在思想上逐步想通以后，徐景贤的心里还是不够踏实，因为写作班虽然准备造上海市委的反，重大行动没与必要再请示陈丕显、曹荻秋了，但还是要得到张春桥、姚文元的首肯吧？所以他决定给北京的张春桥、姚文元打电话汇报一下。给张春桥的电话没有打通，给姚文元的电话打了几次后终于接通了。徐景贤将写作班开会的情况向他作了介绍后说："我们写作班打算起来造反了，征求春桥同志和你有什么意见。"

姚文元听后没有直接表态，只是说："你们愿意革命，我们总是赞成的。""你们始终要把矛头对准市委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从中央工交座谈会看出，上海市委对文革的态度是错误的，对待群众的态度也是错误的。"他还说要争取马天水，让马天水从市委里分化出来。另外，他告诫徐景贤要多注意做舆论方面的工作。

听到姚文元的表态，徐景贤放心了，觉得自己有了强有力的后盾和靠山，足以抵御市委的压制和打击了。第二天下午，他召开写作班子全体会议，宣布自己接受大家的批评、帮助和督促，正式决定造反了。他向到会的人传达了姚文元的电话内容，并说希望写作班全体造反。大家听了都很兴奋，纷纷表示：

“我们不再做旧市委的‘奴隶’！”

“我们要照‘中央文革’的指示办事。”

“我们要杀回马枪！我们要来个‘里应外合’！”

“我们要向外抛出陈、曹的‘核心材料’，从内部攻破堡垒！”

会议从下午一直开到子夜，在亢奋的氛围中，大家最后决定：“写作班子一致起来，全体造上海市委的反！”

会议的温度升到沸腾之际，市委写作班党支部副书记郭仁杰激动万分的站起来，涨红着脸，像朗诵诗歌一样抑扬顿挫地说出了复旦大学造反派送徐景贤的那副对联：

“革命方觉北京近，造反才知主席亲。现在到了决定我们写作班命运的时候了，现在正需要一面从市委内部杀出来的旗帜——那就是我们！”

那么，用什么方式亮出他们的旗帜，通过什么方式宣布他们要造反、向市委开火呢？他们觉得市委写作班的造反和红卫兵、工人造反派不同，应该揭露出市委机关的内幕，亮出那些市委领导违背毛主席革命路线、“暗箱操作”压制群众运动的真相，方能震动全市，并取得各路造反派的信任。这个任务毫无疑问的落在徐景贤的头上了。因为他是市委文革小组的成员，又是市委写作班子的头头，一向受到市委的信用，还可以列席市委常委会，了解许多党内机密。所以，郭仁杰、朱永嘉等人对徐景贤建议说：“你要准备一个重点发言，在全市人民和机关干部面前亮相，我们这些人里面只有你一个人十几年来一直在市委工作，也只有你有条件作这个发言，你抛出这个重磅炸弹，

才真正是市委心脏爆炸、后院起火了。”

红卫兵向徐景贤他们建议，“你们写作班要把市委机关里各部、委、办的造反派都串连起来，各自准备自己部门的发言，然后开一个万人以上的大会，可以放在文化广场开，正式宣布从市委机关内部杀出来直接造上海市委的反，这样就轰动了。以前上海还没有一个造反组织能够把市委主要负责人统统叫到会场接受批判，他们开会批的都是个别领导人，比如复旦大学要批市委候补书记杨西光，就把杨西光叫去批判；工厂里要哪个工业部部长到场，就通知部长去。市委书记处书记很少去哪个会上听意见，第一书记陈丕显更是以生病为理由从不在公众场合露过面。市委机关干部如果打出造反旗帜，一定要把市委书记、市委常委特别是市委第一书记叫到会场来听取批判，这个影响就大了。”

对这样的建议，徐景贤很听得进去。他曾经参加过很多红卫兵召集的会议，看到过他们的批判架势，感到他们有经验。而且，要把所有市委书记、市委常委都叫来挨批，也只有市委机关干部起来造反才可能做到。因为当时的书记、常委们都已惶惶不可终日，每天东躲西藏。而他们的藏身之所只有这些机关干部知道。徐景贤觉得红卫兵的主意不错，决定采纳他们的建议。

但是，在这样的大会上只是徐景贤一个人代表写作班作重点发言就显得有点势单力薄了。

第 340 回：后院火，上海市“心脏爆炸”

影响大，“机联站”宣布成立

当时，市委机关内部也有一些小组织、小派别起来造反，比如复旦大学“红革会”支持市委办公厅下面的上海市委内部刊物《支部生活》编辑部已经成立了“革命造反战斗队”，他们造了《支部生活》领导的反，后来又宣布要造市委办公厅的反，但始终在机关内部活动，外面的人基本不知道。市委教卫部、宣传部和市委党校也有少数人跟外面串联，但都没有打出过旗子。

此时，市委一直在找徐景贤，问他到哪里去了。徐景贤怕时间拖久了消息泄漏出去将会出现很大的阻力，就赶快串连市委已经露头的造反派，请他们一起来共商大事。他亲自打电话到市委办公厅，找《支部生活》编辑部的“革命造反战斗队”。当时他们的负责人是陈坤生，由王承龙负责对外联络。徐景贤的电话正好是王承龙接的，他原是黄浦区五金行业的支部书记，后调到《支部生活》编辑部当记者。徐景贤告诉他：“市委写作班决定起来造反，现与你们联络，想要共同筹开一大会。”

王承龙听了很兴奋，马上带了一个叫朱玉佩的女编辑赶来。徐景贤又打电话给宣传部造反派刘耀宗，进行串连。写作班的其他人也分别打电话给教卫部、市委党校、社会科学院的造反派，把他们都请过来，于 12 月 15 日开了一次联席会议。

联席会议上决定：参加全市批判大会的各部门，各自准备一个发言，形成揭露市委全面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声势。同时，准备成

立一个联合的造反组织，名称叫“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简称“机联站”，把原来比较分散的力量组织起来，而且就在写作班宣布造反的大会上同时公布这个消息。“机联站”推选了四个勤务员组成勤务组：徐景贤、郭仁杰、王承龙和程绮华。

事不宜迟，大会召开的时间定在 12 月 18 日，由郭仁杰负责会议的组织和发言内容、程序，王承龙负责会议的后勤工作，包括会场布置和通知发放等，程绮华和朱永嘉负责串连市委机关造反派，吴瑞武负责起草《中共上海市委写作班造反声明》，徐景贤总负责，协调各项筹备进程，集中力量准备好自己的发言稿。

筹备大会的过程中，徐景贤要王承龙找到《解放军报》驻上海的记者甄文君，告诉他市委写作班的造反打算。

徐景贤在市委书记处多次见到过甄文君，知道市委书记们对他都非常尊重，向他介绍文革情况，但他只是“嗯、嗯”地听着，从不表态；而各个造反组织的头头，也纷纷找他反映情况，称他为“军报记者”、“中央文革特派员”。

甄文君很快就来到武康路二号，和徐景贤单独谈了一个小时。他很认真地倾听了徐景贤对市委的一系列看法以及筹开造反大会的各项安排，然后很热烈地紧握着徐景贤的手说，他会立刻向中央文革汇报。

随后，徐景贤又打电话给姚文元，汇报他们写作班已经和市委机关的有些部门进行了联络，决定联合召开大会批判市委，同时宣布写作班造反的情况。大会的名称就按照姚文元曾提醒过的主题，定名为

“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向上海市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大会。会上由徐景贤做重点发言，还组织了其他几个单位的发言，之后宣布成立“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会场拟设在文化广场，那里可以容纳一万多人，把市委书记、常委全部叫来接受批判，影响大一点。

姚文元仔细听了徐景贤的汇报，对会议的名称、批判的内容、叫什么人来接受批判等都没有表示不同的意见。他最后说，是否要开这么大的会，是否能小一点，放在市府大礼堂开就可以了。

徐景贤说，按大家的意见，要开就开大一点。

姚文元还是不很赞成。

徐景贤很为难，筹备会上大家决定会要开得大，市府大礼堂只有1000多个座位，红卫兵学生首先不赞成，工人造反派也说要派几千人来参加，1000多人的位子怎么容得下？再说，市委机关的工作人员也不止1000多人。所以姚文元对开会的规模说了两次，徐景贤在电话里不好反对，只好说跟筹备小组再商量一下。

随后，徐景贤将姚文元的意见向大家传达，所有人都不赞成，大家都说：“我们开，开起来，开大的，只有文化广场容纳得下。”

在会议的规模上，他们没有听从姚文元的意见。

批判市委领导人的具体口号怎样提呢？

因为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患鼻咽癌在西郊养病，从来没有出席过全市的批判会。大家觉得这一次不能再让他躲在幕后了，一定要他到场听取批判。而他是第一次公开露面，群众对他还没有太大的意见，

所以批判的温度不好太高，口号就叫“火烧陈丕显”。

曹荻秋，文革开始后一直在一线，压制群众，因此北京来沪的红卫兵和上海的造反派对他的意见最多，被骂为“曹老头”、“面包老头”，因为他总是给红卫兵和造反派发面包，但不支持群众造反，民愤较大，所以提“揪出曹荻秋”的口号。

分管文教的市委候补书记杨西光，当时在上海名声已经很“臭”，复旦大学造反派揭露他打击压制复旦大学的干部和群众，并把复旦大学党委抛出来，所以复旦大学造反派已经对他喊出了“打倒”的口号。而写作班对他印象也不好，因为他接替张春桥分管写作班以后，没有抓什么批判文章，反而让写作班做了市委的挡箭牌，因此写作班对杨西光也同意“打倒”。

最后确定了三个大会口号：“火烧陈丕显！揪出曹荻秋！打倒杨西光！”

口号拟定以后，派“罗思鼎”小组最年轻的朱维铮去借会场。但12月18日文化广场已给人家定掉了，是华东师大红卫兵召开的对市委教育卫生部部长、原华东师大党委书记常溪萍的批判大会。华东师大红卫兵是属于“红革会”系统的，朱维铮就直接跑到华东师大，对他们说：“我们市委写作班要宣布造反，市委机关要召开大会成立联络站，这是大事，你们一定要支持我们。”

朱维铮在华东师大碰到了北京大学的李醒尘，他是聂元梓大字报7名起草人之一，此时留在北大驻沪联络站，联合华东师大红卫兵共同批斗曾在北大蹲点的常溪萍。

李醒尘向朱维铮打听市委写作班是什么人造反？朱维铮说是徐景贤带领写作班起来造反，并介绍说："徐是支部书记又是市委文革小组成员。"

一闻此言，李醒尘和华东师大"红革会"商量同意把会场让给写作班使用，但提出要与徐景贤见一面，看是真造反还是假造反。于是朱维铮将李醒尘请到武康路二号，与徐景贤、郭仁杰和朱维铮一起见了面。

徐景贤把自己正在准备的发言稿的内容跟李醒尘说了，还介绍了他们串连市委机关的一些部门造反派的情况，并邀请李醒尘参加 12 月 18 日的大会。

华东师大红卫兵提出希望那天要把常溪萍也揪到会场批斗，徐景贤他们说这完全可以办到。他们又要求大会的口号要跟常溪萍有关，因为他们的会议本来是集中火力批斗常溪萍的。

按照常溪萍的职务，还不够这次造反大会的级别，通知到会听取批判的都是市委书记、候补书记和常委这一档次的。而且大会的口号已经用了"火烧"、"揪出"和"打倒"，再加上一个常溪萍，口号还能升级到哪里去呢？琢磨琢磨，比"打倒"再厉害的就是"砸烂"了，为了照顾华东师大出让会场的情义，写作班临时同意再增加一个"砸烂常溪萍"的口号。

一切准备就绪，徐景贤已经几天几夜没有回家了，只是在武康路二号的小房间内临时打个盹。12 月 18 日凌晨，在他决心迈出这关键的一步的当天清晨，独自走到武康路二号楼下大客厅里的壁炉旁。四

顾无人，他拿起炉台上的电话机给妻子葛蕴芳打去电话，告诉她这几天写作班开会的情况，告诉她写作班决定造市委的反。

作为解放前入党的葛蕴芳，闻听此言大吃一惊，问："你怎么造反？"

徐景贤说："在红卫兵和工人造反派的支持下，我们要在文化广场开一个大会，我将要在会上作一个发言，揭发市委。"

葛蕴芳担心这样做的后果："这么一开会，市委要对你采取措施的。"

徐景贤说："无非是最后把我下放到农村劳动去，我现在的职务，最多也就是写作班的支部书记，我再也不能做市委的挡箭牌了，我已经做好各方面准备，希望你支持我。"

徐景贤动员葛蕴芳下午到文化广场去，听一听会上的发言是怎么回事。他有些激动，在电话里的声音都有些颤抖，带有悲壮的味道。

12 月 18 日下午 14 时，以上海市委写作班为首的上海市直机关 4 个单位，在"红革会"、"工总司"的参与下，在市文化广场召开万人"批判上海市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会前，中学红卫兵派出很多人到马路上贴海报，让全市都知道。"工总司"派了工人队伍到文化广场压阵，"红革会"调来 3000 红卫兵到场维持秩序，壮大声势。市委机关的普通工作人员听说写作班和市直机关的好几个部门联合起来造市委的反，都很惊奇，区、县、局党委的机关干部也听到了这个消息，纷纷闻风而来，想听听到底说些什么。

这次大会由于是市委机关干部自己起来造反，勒令所有的中共中

央华东局和上海市委书记和常委都要到场，由市委办公厅负责通知，所以他们一个也没有缺席，破天荒地第一次全部到场听取批判。陈丕显、曹荻秋、魏文伯、马天水、王一平、梁国斌、王少庸、杨西光、宋季文、李干城等人在台上站成一排接受批判。

陈丕显后来在他的回忆录里这样描述他当时的心情："1966 年 12 月 18 日下午，这是我第一次作为群众批斗的对象站在群众的面前。文化广场是市里过去经常开大会的地方，这主席台是我经常做报告的地方，可今天我竟作为被批斗对象站在了这里。自参加革命以来，在党组织的关心下，我似乎没经历过什么明显的'逆境'，一直是处在'顺境'之中，没想到今天竟会走到如此地步。此情此景，此中心境，难以言表，非亲身经历过，是无法感受到的。"这恐怕是绝大多数当权派在被批斗时的心态。

和陈丕显等同时到会听取批判的，还有 20 多名市委、市人委的部、局级干部，不过他们只能站在主席台的台下，听候点到自己的名字才能上台揭发、交代。

大会由写作班支部副书记郭仁杰主持，他宣布："上海市委机关革命造反派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大会现在正式开始！"会场上响起了热烈的口号声，领呼口号的一男一女是朱维铮和戴厚英，他们两人在写作班合演过相声，嗓子响亮，普通话标准，呼口号时此起彼伏，配合得十分密切："炮打上海市委！""火烧陈丕显！""揪出曹荻秋！""打倒杨西光！""砸烂常溪萍！"被批斗的人也跟着举手，呼喊这几个口号。

接着，徐景贤以市委文革小组成员、市委写作班支部书记的身份，用他悬河般的口才，作了题为《造反才知主席亲》的重点发言。标题来源于复旦大学造反派红卫兵送他的一副对联："革命方觉北京近，造反才知主席亲"。

后来，"革命方觉北京近，造反才知主席亲"这一新潮口号，在上海广为流传，成为街上的大字标语，成为游行时高呼的口号，成为大会主席台两侧的对联。不过，秀才们喜欢钻牛角尖。有人反复推敲着，觉得"造反才知主席亲"一句语病甚为严重：第一，"主席"指谁？须知，当时主席是毛泽东，而国家主席是刘少奇，怎么可以只写"主席"呢？第二，即使写成"造反才知毛主席亲"，也不行。试问，你什么时候"造反"？还不就是在"文革"中才"造反"的。难道在此之前，你就一点也不知"毛主席亲"？这两点，不用"上纲"，就已经在"纲"上了。于是，赶紧加以修改，改成："革命方知北京近，造反倍觉毛主席亲。"如此这般，才终于"无懈可击"。

徐景贤在发言中历数上海市委的"反对毛主席革命路线"的罪行，采取提到哪个人就叫哪个人交代的做法。比如他揭发市委要在这次运动中"抓跳出来的反面教员"，而且说"五七年反右时，全国揪出几十万右派，这次可能还要多一点。"他要陈丕显、曹荻秋当场交代，陈丕显、曹荻秋两人都推说"不知道"。徐景贤紧接着就要市委秘书长李家齐站出来揭发，李家齐当场指证陈丕显、曹荻秋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讲过这些话，他自己又如何向下传达的，揭穿陈丕显、曹荻秋的"谎言"。徐景贤又让陈丕显的秘书出来揭发他如何接受陈

丕显的布置，向机关党委了解北京红卫兵的情况，说明陈丕显称病躲在幕后指挥的真相，搞得陈丕显十分狼狈。

这是徐景贤一生中最为亢奋、忙碌的一段时光。他在晚年的回忆录中这样写道："那年冬天，我甚至连自己的33岁生日都忘记得一干二净。每天每日，我骑着自行车，以市委联络站负责人的名义，往来奔忙于上海各个造反大会的会场之间。每到一处地方，我就从头上摘下那顶哥萨克式的皮帽子，解开对襟的中式棉袄，满头冒着热气，慷慨激昂地发表一通演说，然后匆忙地赶往下一站。在我看来，这真是一个火热的冬天啊！"

徐景贤在发言中特别坦陈了自己在造反过程中的矛盾心理，他说："造反就是要破私立公。怕造反的人，千怕万怕，归结起来就是一句话，怕丧失自己的既得利益。"这是他内心思想的真实写照。

发言后，主席台上的各路造反头头纷纷上前和徐景贤握手。已几天没有很好休息，心力交瘁的徐景贤，上台以前几乎有点支持不住了。此时的他，只觉得浑身乏力，汗湿衣衫，人像瘫掉一样，但是心里感到非常欣慰。

接着，市委办公厅、市委党刊编辑部、市委宣传部、市委党校等单位的造反派代表纷纷发言，抛出大量材料，揭发市委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真相。

吴瑞武代表"罗思鼎"小组和"丁学雷"小组在会上宣读了《中共上海市委写作班造反声明》。《声明》中说："上海市委内部一小撮赫鲁晓夫式的坏蛋的末日到了！我们——中共上海市委写作班子全体

工作人员和市委文革组成员徐景贤、朱永嘉郑重声明：我们要造反，我们要造上海市委顽固推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反，我们要造上海市委内部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反！大反特反，反到底！”“炮打上海市委！火烧陈丕显！揪出曹荻秋！打倒杨西光！砸烂常溪萍！”

坐在主席台上的“工总司”王洪文、北京大学李醒尘以及各个大学的红卫兵头目，听得非常有劲。他们说：“”市委机关干部造反，内部材料就是多，击中了市委的要害，这次真的是市委‘心脏爆炸’了！后院起火了！”

复旦大学“红革会”负责人马立新代表北京、上海等各红卫兵司令部和各造反组织在大会上发言，对市委机关造反派杀出来表示坚决的支持。

随即宣告“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 成立。

会后，徐景贤想到姚文元在电话中曾经着重提醒的：“要造舆论，这样才能争取更多的群众。”建议编出一期报纸作为大会专刊，广为散发，把影响扩大到全市、全国去。他说：“马天水在市委的几个书记中态度比较好，又可以代表市委批印东西，我们把大会发言稿和造反声明等编一张报纸，名称就叫《上海市委机关造反派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向市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大会专刊》，大量印发。编辑者名义是‘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

这时“红革会”提出：“我们红卫兵支持你们这么多，又给你们会场，又帮你们忙，我们要和你们联合编报。”

徐景贤同意，朱维铮担任执行编辑，亲自撰写了消息，用了大字标题：《市委心脏爆炸曹家后院起火》《市委机关革命造反派召开大会炮轰上海市委》，出版发行了 10 万份《大会专刊》，轰动全市。

“机联站”的刊物《机关炮》，也于同日开始发行。

徐景贤他们起来造反揭发，其影响可想而知。上海市委顿时陷入一片混乱之中。市委、市人委各机关部门的一些人纷纷仿效徐景贤的做法，一下子成立了上百个造反组织。这股造反风又很快波及到各局、各区、各县党政机关，一时间机关内造反组织林立，很快形成了从上到下的市委机关的造反系统，几乎所有的部门都有造反队，一直到市委最基层的工勤人员中连食堂里都成立了造反组织。就连市委警卫处的警卫人员也造反了，他们成立的造反组织叫“红色警卫员造反队”。警卫处的任务本来是保护首长的，群众刚起来时，要找首长谈判、开批判会，都由警卫员保卫；首长躲在什么地方，红卫兵、工人造反队根本找不到。现在警卫员一造反，你要陈丕显、曹荻秋他们到场，警卫员一下子就把他们找来了。这样一来，整个市委机关乱了套。

第 341 回：荣复转，不准单独建组织　轰陶铸，出版社贴大字报

12 月 3 日，中央军委转发毛泽东、林彪同意南京军区党委 12 月 1 日上报的关于转业、复员军人不准单独成立组织及不准冲击部队和到部队串联的《紧急请示》：

毛主席、林副主席同意南京军区党委十二月一日来电中所提的三条意见，批示通报全国同样照办。现将南京军区党委的原电转发你们，望遵照执行，并请转告各中央局、各省市委。

南京军区党委三条意见是:

（一）一切转业、复员军人不准成立红卫军或其他名义的单独组织，只应参加所在单位的文化革命组织。

（二）不准许冲进解放军机关及所属部队，也不许到部队串联和散发传单。

（三）所有转业、复员军人，必须保持和发扬解放军的光荣传统，并协助解放军加强战备，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南京军区反映的情况在全国各地都有出现。12 月初，哈尔滨散居社会的复员转业军人，在几天的时间里就成立了名为“红旗军”、“荣复军”和“战备军”三个群众组织，在黑龙江省简称“三军”，其中混杂着某些旧军人和社会闲散人员在内。12 月 5 日，“三军”组织约几千人，身着黄军装，分别佩带“三军”红袖章，分乘 100 辆大卡车，组成大车队，驶上街头，高呼口号，声称他们是天不怕地不怕的

老造反，是新时代的革命英雄，谁敢阻挡他们，就把谁砸个稀巴烂，其斗争的矛头直接指向黑龙江省的造反派组织“红色造反团”。

“三军”与一般的保守派组织不一样，他们中许多人是社会闲散人员，胆大妄为，干扰老百姓的正常生活，其破坏性，明眼人一看便知。哈尔滨“造反团大专总部”派人到北京向周恩来汇报，说明了情况。12 月 8 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通电黑龙江省委和省军区，宣布哈尔滨的“三军”是反动组织，必须立即予以取缔并逮捕其头头依法惩办。黑龙江省委和省军区立即宣布取缔“三军”。

12 月 14 日，总政治部副主任徐立清接见“天津市荣复转退军人革命委员会直属战斗兵团”代表，回答了他们关于对中央不准复转军人单独成立组织三条意见的疑问。他说：

“一、大家最关心的是要求澄清有没有毛主席、林副主席的三条批示。告诉同志们，有这三条批示。”

接着，徐立清原文传达了 12 月 3 日中央军委转发的三条意见。

这时，有人递条子，提出要看文件。徐立清将手中的电报展示给大家看，并说：“这是电报，电报密级是机密，不能张贴。”

他接着说：“二、‘如果解散了，我们如何交代，会不会说我们是黑组织，打成反革命，受打击怎么办？’把工作做好了，一般是不会的，省、市委也不会这样做，因建立组织时还没有这个批示，现在

听毛主席的指示是好事，原来组织也不是错的，是为革命。所以没有理由批评你们，如果批评你们是错的。”

“三、警备区的问题，市委的问题，你们按《十六条》办事，警备区传达方法不适当，应先向民兵讲，如果威胁你们，架机枪，挑动群众斗你们、打你们，如果事实确实是如此，警备区是犯严重错误，要受纪律处分。”

12 月 21 日，周恩来和总政治部副主任徐立清、内务部部长曾山、副总参谋长彭绍辉等人又接见了“首都大专中院校复员转业军人红卫兵总部”和全国各地区荣复转退军人组织代表，再次明确中央不准复转军人单独成立组织的意见。周恩来说：

“我见你们很晚了，你们大概也知道，现在工作很忙。明晚 9 点以后的时间自己还不能掌握。今天想有点功夫挤一下，又叫你们等了。”

代表们看见周恩来站着讲话，都请求他坐下。

周恩来说：“我坐的太久了，内脏还好，痔疮又来了，站一站是个锻炼。”

周恩来接着说：“荣誉、复员、转业、退伍军人希望有个自己的组织，这是原则问题。现在是搞各行各业组织再联合。比如学校，毛主席 5 月 7 日给林彪同志的信，学生以学为主。学校里有学生，上海第三司令部是复员军人复员后进大学，我还跟他们通过一次电话，叫赵全国。还有教师，以教为主，有的做教师，有的做行政工作。同样

在机关、财贸、文化机关、企业事业、科研、设计单位，应以那个单位的组织为主。”

“不能成立全国性的独立机构，联合机构可以考虑，现在还愿意帮助大家考虑。不少复员转业军人代表找我，开大会叫我去，因为我没有功夫，并且没有解决问题，所以没有去。后来开完大会后请愿，11 月 11 日冲进中南海，有几位副总理接见了大家，我没出席。不管怎么样，任何人不许冲进中南海，因为这是毛主席所在地，谁要冲，我们要誓死保卫。我做梦也没有想到主席的预见产生这么规模巨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3 个月接见 1100 万革命师生。”

“现在主席、林副主席作了三条原则指示，这是真的，难道这还是假的？有些人要见林副主席，这是逼我出来接见，我也应该见你们。这三条很清楚，给了荣誉、复员、转业军人极大的鼓励。我念一下：

一、一切转业复员军人不准成立红卫军或其它名义的单独组织，只应参加所在单位的文化革命组织。”

接着周恩来解释说：“复员转业军人就应该参加本单位的组织，然后全行业联合。”

他接着念：“二、不准许冲进解放军机关及所属部队，也不许到部队串联、散发传单。”然后解释说：“因为解放军是你们在过的机关，是专政的主要保卫者。”

他说：“我在你们中算老的一个，我是一个老复员转业军人，过去当过兵，打过仗。”

徐立清副主任插话说：“总理在红军时代就是红军总政治委员。”

周恩来接着说："打起仗来，我还得上前线，难道还能在后方？解放战争我跟毛主席在陕北打游击。

三、所有复员转业军人必须保持和发扬解放军的光荣传统，并协助解放军加强战备，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周恩来说："这是对大家的很大鼓励，要求大家保持发扬解放军的光荣传统。"

"你们应当回到本单位去，本着这个精神回去闹革命。如果本单位对你们歧视就不行。十条规定中有，出来串联的照发工资。要给革命群众被打成'反革命分子'、'假左派，真右派'的进行平反。11月5日中央批转军委总政平反和档案材料的通知，11月16日的补充规定，对你们的家属不许歧视虐待，对你们不许调动工作。"

代表们纷纷要求发言，周恩来说："我愿意等一个小时，来听听，如果你们有意见可以反映。"

听了几个代表发言后，周恩来问："在今天的座谈会中，我说没说原有的组织是非法的？"

众答："没有。"

周恩来接着说："我没有用毛主席的几句话，叫你们解散。你们的组织问题，靠你们自己去解决，我从来没有下命令解散任何革命组织。17日第三司令部大会上，提到纠察队这个名字成了管红卫兵的组织了，起到了相反的作用，我们提议，组织纠察队不好，大家同意解散。我们只是把几个犯了法的坏分子逮了起来。

你们的组织可以存在，可以和其它革命组织联合起来。刚才那位首都大专院校代表讲的，改个名称，另成立一个组织还是可以的。不要成立复员转业军人的单独组织，仅限于几个复员转业军人。复员转业军人在各个单位占少数，不能只是自己是革命的，人家就是不革命的，要善于团结大多数一道闹革命。”

“福建温州地区的问题比较严重，很多书记被抓到北京来蹲了十几天，他反而得到休息了。各地到底有多少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看斗争的形势，要把政治思想水平提高，从广度到深度。但对一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不要今天揪，明天拉，一点休息也得不到，不要搞疲劳战，弄得说胡话，怎么能检查好呢？不能动不动就停职、罢官、抓到北京来，这样他们反而好休息，罢官是后期的事。不要一个单位控制起来，你要斗，借给你用，斗完以后还得给我。有些人现在只想到抓尖子，死老虎不要。老虎并未死，彭真这个老虎死了吗？没有！陆定一也没有。他们是反党集团，是完全反毛泽东思想的，是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北京现在转了一下，对彭等进行批判斗争。要提高政治斗争的思想水平，不要总是罢官，各级党委 都罢官，谁来做工作？这种大民主、大自由过去从来没有过的，毛主席叫我们在斗争中学会斗争，在游泳中学会游泳。”

这时，周恩来听说天津、贵阳等地的复员转业军人正向北京进发，他赶紧对曾山说：“赶快去劝他们不要来，你应在他们每到一站，打一个电话，或拍一个电报，劝他们回去。每天用两个小时处理这件事，打一个星期的电话，看他们还来不来！”

曾山说："请大家打电话、打电报帮帮忙吧！"

周恩来："不是帮助，是闹革命，这是他们自己的事嘛！他们应该很好地进行工作。"

12 月上旬，江青办信组组长阎长贵收到一位在人民教育出版社政治编辑室工作的大学同班同学和他们单位的几个人寄给江青的一份材料，题目是《陶铸同志贯彻执行的是什么路线?》，历数陶铸从 1966 年 6 月到中央工作以来各次讲话的内容，指责陶铸：(一)是中央某些机关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关键人物；(二)是扼杀中小学"文化大革命"运动的主要角色；(三)玩弄折衷主义，充当极少数顽固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人物的"护法神"；(四)把矛头引向无产阶级司令部。大约有 1 万多字。阎长贵请示戚本禹怎么办，戚本禹看后说："太长了，摘要送首长阅。"

江青办信组做了摘要，压缩到三、四千字送给江青。

不几天，戚本禹把这份材料退给阎长贵，上面有江青批的"送主席阅"。而在"送主席阅"这几个字上有个圆圈。阎长贵一看就明白了，他们整理的材料毛泽东主席已经看了，他很高兴。

这时，戚本禹突然问他："他们敢不敢贴出去?"

阎长贵毫不犹豫地回答："他们既然敢寄来就敢贴!"

戚本禹又说："告诉他们可以贴出去，如有什么事情找我。"

阎长贵立即打电话将戚本禹的意见通知了他在人民教育出版社的同学，并告诉他自己在钓鱼台 16 楼的电话号码，让他有什么情况及时打电话来。

12 月 19 日，人民教育出版社李冠英等 5 个人贴出了《陶铸同志贯彻执行的是什么路线?》的大字报。结果，这张大字报遭到许多人的反对。

与此同时，也已经听到消息的吴传启、林聿时立即紧紧跟上，让学部的“红卫兵联队”也到中宣部大院贴出“打倒陶铸”的大标语和大字报。学部“红卫兵总队”认为陶铸是当时中央的第四号人物，怎么也不应该打倒。于是也组织人到中宣部大院贴出“谁反对陶铸，就砸烂谁的狗头”的大标语和大字报。

12 月 20 日，人民教育出版社李冠英等人给阎长贵打电话，说他们的大字报受到围攻，被说成“反革命大字报”，还有人写出大标语：“谁攻击陶铸同志，就是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就砸烂他的狗头!”请求帮助。阎长贵立即将这个情况报告给戚本禹，希望他想办法帮帮他的同学。

戚本禹听后说：“好办!我收到过教育部同志的信，我给他们写封回信，你用电话告诉他们。”

不到 20 分钟，戚本禹就将一封他写的短信交给阎长贵，信是写给教育部徐昕等人的，信中说：

“我对你们部里的事情，没有调查研究，不能讲什么意见，希望你们根据十六条和红旗杂志社论的精神进行讨论，将教育部的文化大革命搞彻底。教育阵线是文化大革命的重要阵地，希望你们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用毛泽东思想占领这个阵地。关于李冠英、钱国屏、齐泳冬、朱岩、刘德珍五位同志给陶铸同志写大字报的问题，我个人

认为是可以写的。对这张大字报有不同意见，可以辩论。但是说这张大字报是‘反革命’的大字报，并针对这张大字报说：‘谁反对陶铸同志就砸烂他的狗头!’这是错误的。有人把贴大字报的人说成‘反革命’，进行围攻、斗争，甚至扣押他们，更是错误的；任何人都没有权利这样做。

反对毛主席、反对林彪同志就是反革命，就是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革命的群众必须同反对以毛主席为代表的革命路线的言论和行动进行坚决的斗争。但是革命的群众也不允许任何人假借反对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名义，压制革命。”

这封信陈伯达看过后就发出去了，很快就被抄贴在沙滩北街 2 号中共中央宣传部院内的大字报席棚上。

学部哲学所周景芳等50余人闻讯后，也联名于12月23日贴出《陶铸在两条路线斗争中到底站在哪一边？》的大字报，同时动员其他所也贴出批判陶铸的大字报，大造声势。学部“红卫兵联队”与教育部“延安公社”、北师大“井冈山兵团”等造反组织联合成立“批判陶铸联络委员会”。但是陶铸曾在9月20日做过保吴传启的“四点指示”。吴传启、林聿时立即让人贴出批判陶铸9月20日保吴传启、林聿时的“四点指示”的大字报，说这“四点指示”是“陶铸反革命两面派的阴谋”，明里保吴传启，实际是“支持总队继续整吴传启的黑材料”。

戚本禹见到陶铸后对他说：“教育出版社有几个人因为给你提了些意见，被打成了反革命。我跟他们说不能因为给你意见，就把人家打成反革命。”

陶铸说：“对。是这样的，不能说反对我就是反革命嘛，这我早已经说过的。”

第 342 回：群起涌，北京大学反“黑风”　抓杨勋，聂元梓夜半抄家

12 月中旬，聂元梓自上海返京以后，北京正在反击“十二月黑风”。由于北京大学反对聂元梓的“井冈山”“红联军”砸了《新北大》编辑部，中央文革将其定为反革命事件，于是，北大校文革就把北大“井冈山”组织的头头魏秀芬送到了公安部门。

北大那位写“造三个大反”大字报的作者乔兼武虽然在大字报贴出的当晚就被群众自发批斗，但当时学生们也没有太难为他，批斗完了，他仍然可以自由活动。但在 11 月 15 日，北农大附中伊林·涤西在北大贴出《给林彪同志的一封公开信》后，乔兼武表示了支持。12 月 17 日，乔兼武又写了一份支持伊林、涤西的大字报底稿：《谈致林彪公开信的大字报》，他所在的东语系同学看到这份大字报的底稿后，当即揭发出来。如果说“造三个大反”还是认识问题，大家斗一斗是为了让他提高认识，那这次可就是立场问题了，是支持谁，反对谁的问题，北大校文革和北大“红旗兵团”决定把乔兼武押送公安部。校文革随即与公安部联系，公安部答复：“支持同学们的革命行动，公安部马上来人扣押乔兼武。”

12 月 18 日晚 19 时，北大“红旗兵团”的“伏虎团”将乔兼武扣押。当晚，校广播电台广播了将把乔兼武扭送公安部关押的消息，并宣读了“红旗兵团”、“北京公社”、“东风兵团”、“红教工兵团”的联合《通告》。19 日凌晨 2 时 30 分左右，乔兼武被公安部带走。但不久又释放了。

12 月 19 日，北大“红旗兵团”等组织查封了北大“井冈山”的

“红老虎”、“毛林陈之兵”，及“红联军”的“虎山行战斗团”。

这些组织被封，皆因炮轰中央文革。“毛林陈之兵”贴出的大字报是：《把运动推向更高阶段——从炮轰中央文革谈起》。而“虎山行战斗团”则是12月10日的那张大字报：《毛主席的大民主万岁!》

这张大字报认为：“炮轰中央文革小组是运动发展到今天的必然，是运动发展的关键之关键!”

大字报最后说：“‘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为了趋群众运动之势，为了文化大革命更深入地开展起来，我们就要炮轰中央文革小组！愿中央文革小组开门整风，深入群众，听取批评意见，愿全国人民对几个月的运动来个大检查、大总结、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把运动推向更高阶段!”

12月19日晚，在北京大学大饭厅召开批斗“虎山行战斗团”反对中央文革的罪行。大会即将结束时，收到了一张要为“虎山行”辩护的纸条。主持人打开一看，原来是哲学系杨炳章写的，此人当即受到大家的批判，并把他当作反对中央文革的现行反革命分子抓了起来，关在学生宿舍。学生们又立即到学生宿舍19楼杨炳章的住处搜查，抄出了一个笔记本，上面有一篇“红旗十五期社论摘评”的文字。这些学生不论是拥护聂元梓的，还是对聂元梓有意见的，都抢着用大字报把那篇“摘评”抄出来，贴在北大校园里，用了50张大字报纸。据说，那是当时最反动最恶毒攻击中央文革的言论。他们认定杨炳章反中央文革罪证确凿，是反革命分子无疑了。

杨炳章是北大哲学系的一名旁听生，烈士子弟，原是解放军外语

学院的学生。那年高考，北大的录取分数线是每科平均 74 分，清华的录取线是每科平均 76 分，而杨炳章高考成绩每科平均是 80 分以上，志愿报的是北京大学哲学系，但却被解放军外语学院录取了。当时军队院校招生有优先录取的政策，杨炳章根红苗壮，学习成绩优秀，自然就被选中了。可他一心想上北大，在解放军外语学院学习一年后就退学了，到北大哲学系旁听自学。1966 年 7 月 25 日晚上，江青在北大辩论会上的讲话触动了他。回到宿舍，他就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第二天一大早，年轻气盛的他带上写给毛泽东的信和几张北京大学校园大字报手抄件，来到北大佟府找他姐姐杨勋，约她一起进城去中南海找毛泽东反映情况。

杨炳章的姐姐杨勋是当时北大经济系老师，和聂元梓一样，她也是北大“社教”运动中的积极分子，北京“国际饭店”整风会议中重点斗争的人物之一。1966 年 6 月 1 日聂元梓的大字报广播后，她就成了经济系里 5 大左派之一。这 5 大左派为首者是经济系的王茂湘，穷苦农民出身。另外的 4 位是李志远、杨勋、矫作羽、杨娴。

此时，杨勋对她弟弟的想法开始并没有兴趣，说：“毛主席怎么会随便接见群众呢？”

但杨炳章年轻气盛，拿出他写给毛泽东的信和那些材料说：“我们可以把这些材料直接交给毛主席。江青既然说毛主席想见革命群众，还是可能见到的。”

杨勋最终还是被弟弟说服了，同意跟他一起进城去中南海找毛泽东。姐弟俩就这样从佟府出发，先来到中关园一公寓李志远家。

李志远是经济系党总支委员，抗战干部，1956 年从中央党校调来北大，杨勋很相信他，把弟弟杨炳章的想法告诉了李志远，然后就满怀信心地离开了他家。李志远的儿子李为群送他们出大门，并预祝他们成功。

大约 9 点钟左右，他们到了中南海新华门，门岗叫他们去文革接待站。在接待站他们填写了登记表就去吃早点了。当他们回到了接待站，只见一个高个子中年干部迎面走来招呼他们快上车，还埋怨他们说："你们登了记怎么不在这里等着，到处乱跑什么？快上车，首长要接见你们。"

杨勋和杨炳章没有想到会这么快接见他们，赶紧上了车。汽车从长安街往回开，最后开到了钓鱼台国宾馆，在一幢别墅楼前停下了。

陪他们来的中年干部将他们领到一个会客室的门口，让杨炳章先在门外的椅子上等，叫杨勋进去见首长。

杨勋一进门就看见江青坐在一个红沙发上。杨炳章不肯在外面等候，他坚持要进去。江青听见外面有人说话，就问："那青年人是谁？"

杨勋说："是一个学生。"

江青就喊："戚本禹，叫那大学生也进来。"

原来这名中年干部就是戚本禹！

屋里 4 个人，包括戚本禹，都是山东人，而且杨勋姐俩跟江青还是一个地区的，他们就谈起山东省和昌潍地区的事情，从解放前谈到解放后，真是无话不谈。江青说自己是诸城人，她还说自己每次离家去济南青岛也都是从潍坊上火车。杨炳章接话说，自己也去过诸城，

江青关心地问他为什么事去的，杨炳章说："前年暑假一个人去登泰山，回家为了省钱，从泰安徒步三天穿过沂蒙山区，从沂水到了诸城，投宿在东关一家马车店。"江青听的饶有兴趣。

江青很关心北大的情况，因为她当晚还要去北大主持全校大会！杨勋向她谈了北大社教的情况，国际饭店和民族饭店开会的情况，工作组的情况，"6．18"的情况。不知为什么，她竟谈到了自己的母亲，还流了眼泪。

杨炳章认为这个时候不该谈家里事，更不该哭鼻子、抹眼泪，批评了姐姐。

杨炳章迫不及待地要求见毛泽东，江青说："毛主席很忙，今天不能见，有什么问题可以跟我讲，我会转达毛主席。"

杨炳章不肯，坚持要见毛泽东，还说："有些材料和信件要交给毛主席。"

江青表示信和材料可以交她代转。

杨炳章不肯，还是坚持要亲自交给毛泽东。最后，真有些僵了，江青的脸色变了，不高兴地说："你这个要求太高了吧！"

杨炳章只好勉强地把他的信和材料交给了江青。

7 月 26 日晚上，中央文革小组继续在北大东操场召开全校辩论会时，江青宣布开会后，曾喊杨勋上台发言。杨勋没有去，因为她觉得自己了解的情况在那天上午已经向江青反映了，没必要再上台讲话。但是北大的人，特别是经济系的人，以为杨勋跟上面有什么联系，加上她接连不断地写了十几篇大字报，基本是每周一篇，评述北大文革

形势，于是，杨勋的影响很快在北大和经济系系里传开了。

北大文革筹委会成立时，要求每系选出一名委员，经济系里选了她。8 月 18 日毛泽东接见红卫兵，她和历史系吴惟能作为北大总指挥带队去了天安门。

但杨勋对经济系左派领袖王茂湘及聂元梓等人的一些做法有看法，而且在公开场合有所流露。8 月底她写了《我们和王茂湘等人的分歧》大字报，很快经济系就有一批人组成了反对王茂湘的“32111 战斗队”，把杨勋当成领袖。但是杨勋从不参加他们的战斗队活动，所以只能是精神领袖。

杨勋的大字报有很多是反对聂元梓的。10 月 6 日，在路远、周闯贴出《搬开聂元梓，北大才能乱》大字报的当天，她也贴出《北大文化革命又处在关键时刻——兼评聂元梓同志八月五日的广播讲话》的大字报。经济系教师大多数都站在她一边。著名经济学者闵庆全先生还帮她抄过大字报，樊弘老教授在大饭厅东墙上帮她贴过大字报。

当时从四院到学生商店的那条通道上，贴满了两派师生写的关于杨勋的大字报，这条通道因此也曾被称为“杨勋走廊”，吸引了不少校内外的读者。

11 月初，学生都出去串联了。杨勋写了最后一张大字报：《别了聂元梓》，也一个人踏着燕园的落叶，迎着寒冷的秋风，走出西校门，离开了北大，单身一人串连去了。后来聂元梓也杀向社会，到了上海。当时，喧闹的北大校园因众多师生外出串联而忽然冷清下来。而此时，在反击“十二月黑风”中，北大校园又开始热闹起来。

12月21日早上，北京大学“红旗兵团”、“北京公社”、“红教工”联合在五四操场召开“斗争反革命分子杨炳章、乔兼武誓师大会”。到会数千人，群情激昂。而“井冈山”、“红色尖刀连”同时在大饭厅举行斗争杨炳章大会，但人数不多，草草收场。杨炳章被送到了北京第一监狱。

12 月 22 日中午，在外串联了一个多月的杨勋回到了北京。当她兴冲冲地回到家——北大了佟府甲 8 号。没想到，一进门，就被丈夫赵履宽拦住了，说：“你不能在北大停留，要赶快走，北大正在抓人呐！”

杨勋不知道北大最近发生了什么事情，自恃自己是社教中的左派，出身好，在北大有一定的影响，坚持不离开北大。更何况一个多月没见面的儿子正在床上睡觉，他还没看见妈妈不远万里从中国大西南带回来的黄橙橙的柠檬果和小花篮，妈妈怎么就拔腿逃跑呢？她不相信聂无梓敢抓她。

她丈夫赵履宽对她说：“他们昨天已经把杨炳章抓走了，现在正等着你呐！”并不由分说地把她拉出家门，直接送她去了人民大学红三楼赵履宽的那间向阳的教师宿舍。

在人大红三楼，杨勋一头睡下，醒不过来了，直到第二天凌晨三点多钟，被一阵敲门声惊起。开门一看，是她所在的经济系五年级学生支书宋文带着北大“红旗兵团”一群人，不等杨勋穿好衣服就命令她下楼，并向她宣布：“你被捕了。”

杨勋问为什么？他们不理她，直接把她推上车。

汽车径直往城里方向开去，车上的几个人谁也不说话，一路鸦雀无声，

他们到公安部办理了相关手续后，最后将杨勋送到了宣武门附近的半步桥——北京市第一监狱。

逮捕杨勋是康生直接给聂元梓下的指示，要让学生把杨勋送到公安部去。

过了一两天，康生通知聂元梓到他那里去，而且必须很快就到。

聂元梓到了钓鱼台康生住处以后，康生问："上次催你让群众把杨勋扭送到公安部，你办了没有？"

聂元梓说："我办了。我叫学生把杨勋扭送到公安部，"并说是几点几分送到的。

康生听罢，当即拿起电话报告周恩来："杨勋已经被抓了。"

周恩来说："那么查一下吧。"

于是，康生又打电话给谢富治，问公安部有没有收到北大送来的杨勋？

谢富治回答说："收到了。"

康生又打电话向周恩来作了报告。

12 月 23 日，北京大学"红旗兵团"等组织还查封北京大学的"井冈山红卫兵"和"红联军"。

12 月下旬的一天下午，在北京大学红卫兵总部值班的历史系四年级学生何本方，接到校文革副主任姜同光老师的一个电话，说有一伙小流氓在聂元梓家里捣乱，让北大红卫兵去一些人把他们赶走。何

本方自告奋勇，先去聂元梓家里侦察。

过了大约一个小时，何本方回来了。一进办公室就唉声叹气地对红卫兵总部负责人牛辉林说："老牛啊，帮助老聂去撵人的事可不能干哪！"接着他讲述了自己的侦察结果。第一，这是一伙大学红卫兵、高干子弟。第二，领头的一男一女是聂元梓现任丈夫的儿女，男的是哈军工的学生，女的是北京邮电学院学生。第三，兄妹两人到北大与政治运动无关，是向聂元梓讨要家里东西的。据说聂元梓拿了老爷子和孩子们的不少好东西……

这时，聂元梓的秘书、哲学系青年女教师陈宝华给红卫兵总部来电话，说聂元梓要亲自过来。不一会儿，聂元梓就到了红卫兵总部办公室。她一落座就表扬北大红卫兵阻止外地串联学生，保护校门石狮、华表等重要文物的功劳，并借题发挥说："你们现在是北大的主人，对学校的一草一木都有责任。对北大的运动、师生们的安全更要负责，你说对吗？"接着话题一转："你们知道我今天来有什么事吗？"

"是不是有一伙小流氓到您家里捣乱？"牛辉林问。

"姜同光给你们打电话了吧？其实不是什么小流氓。领头的是兄妹俩，都是大学生，还是红卫兵。自以为是高级干部子弟，无法无天，谁劝都不听。"聂元梓口气很平和，颇有长者之风。

"是不是要我带人去把他们赶走？"

"也不是，北大这么多人赶走他们几个人还不容易。因为领头的兄妹俩和我有特殊关系，所以我请示了中央，让北大派人把兄妹俩送到中南海去，交给总理和康老负责教育。"

“总理和康老？”牛辉林一时惊得脱口而出。

“他们是来闹事的。我现在这个年龄和身份总不能和他们一般见识吧？因为这么个事，动用公安、保卫、‘校文革’也不太合适吧？想来想去还是由你们红卫兵小将出面比较妥当。我刚才也说了，你们北大红卫兵也有责任帮助我嘛。”

“您说得对！您说怎么办？”牛辉林赶紧表态。

“很简单，你带些人去家里，不要骂，更不能打，要讲道理，劝他们离开北大，由你们护送到中南海交给总理和康老。”

牛辉林立即集合了 20 多名在校的北大红卫兵来到聂元梓家中，几经交涉，软中带硬地带着兄妹两人乘坐“校文革”派的大轿车一起到了中南海北门。可没想到，在门外联系了几次，也联系不上周恩来和康生。时间到了半夜 23 时多，负责押送的红卫兵们开始发牢骚，埋怨牛辉林办事没谱。

正在他们进退两难时，聂元梓和陈宝华坐着小轿车到了。陈宝华把牛辉林叫到小车里。一见到聂元梓，牛辉林就没好气地问：“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呀?”

“中央今晚有紧急会议，总理和康老都没有时间。我请示过了，让你们把这兄妹俩送回他们自己家，交给他们的父亲管教。” 聂元梓有些不自然地说。

“他们父亲又是什么人?” 牛辉林问。

“彭（德怀）黄（克诚）分子、大黑帮。”

“让黑帮分子管教？”牛辉林一时还真转不过弯来。

“不是一般的管教，是要抄家！要严令他不准再唆使子女到北大闹事！”聂元梓也没好气地狠狠地说。

于是，北大红卫兵押着兄妹俩乘大车跟在聂元梓小车后面，来到一个大胡同口。聂元梓从车窗口指着胡同里一个亮着一盏灯的门楼，向牛辉林交代任务：

“这就是彭黄分子、大黑帮吴溉之的家。他的主要罪行，第一，彭德怀、黄克诚反党集团死党；第二，勾结安子文叛徒集团迫害干部，生活腐化；第三，纵容子女迫害左派。你们一定要勒令他低头认罪！”

当牛辉林准备起身时，聂元梓又小声地说：“你要注意，他家书房的桌子上有一部红色的电话机，你进去先要掐断它，防止他家的人向外通气！”

牛辉林等红卫兵采用从电影、小说中学来的“上房压顶”、“居高喊话”等各种办法才打开了吴家紧闭不开的大门。又在三进三出大四合院的外院与警卫干部和工作人员们进行了一番唇枪舌剑，才在二进院的正房客厅见到了一身睡衣、一脸病容的吴溉之老人。老人十分沉静，用浓重的湖南乡音问道：

“小同志，你们是什么单位的？”

“北京大学红卫兵！你少套近乎，我们和你不是同志关系！” 牛辉林想尽量表现出合法抄家的气势。

“噢，那就是聂元梓同志派你们来的喽？”

“我听不懂你说什么！”看到老人神秘的笑容，牛辉林一时心慌，竟没有听清老人把聂元梓说成“泥丸子”是什么意思。

“首长问，是不是聂元梓同志派你们来的？”扶着老人的工作人员翻译说。

“我们是奉了中央首长的命令来抄家的！”

“噢，是哪位首长啊？”老人仍然是面带神秘的笑容。

“总理和康老！”

“噢，是聂元梓同志给你们传达的吧？”

“用不着你问那么多！现在是北京大学红卫兵奉命来抄你的家！轮不着你来盘问我！”

“小同志噢，别动火气嘛，抄家也得向我说明个理由吧？”

“那，我问你，你知道不知道聂元梓同志是全国第一张大字报作者、北大‘校文革’主任、主席支持的全国第一左派？”

“怎么会不知道呦。元梓是我的爱人，我们是夫妻嘛。应该说我比你知道得多呦。”

老人一口一个“丸子”，一口一个“夫妻”、“爱人”地解释，让牛辉林感到有些滑稽，不以为然地反问：“那你为什么还要让子女去北大迫害她？”

“你到现在还没闹清楚我让孩子们去北大干什么嘛！”这位曾担任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法院党组书记的老人，抓住机会用长辈的口气驾驭场面。

“那你让他们干吗去了？” 牛辉林没好气地顶了一句。

“你看看你，做事没有调查清楚很不好嘛。两个孩子不是和你们在一起吗？叫他们进来当面问一问，不就清楚了吗？”

没办法，牛辉林只好让人去叫兄妹俩来。老人对兄妹俩说："噢，你们把我写给聂元梓同志的信给小同志看一看嘛！"

兄妹俩从身上拿出老人的信交给牛辉林。信的大意是："元梓，很希望你能回家来住。我还是很爱你的。如果你对我们的婚姻不满意，我也同意办理离婚手续，绝不拖累你。但你拿了孩子们的东西请还给他们，孩子们多次要去北大找你，我都劝阻过……"

牛辉林反复看着信，想着来以前何本方说的别管人家的家务事，感到很没意思，便转向兄妹俩问："你们去要什么东西？"

"那是两年前空军从香港捎回来的一只女表，很贵重，是刘亚楼叔叔送给我的结婚礼物。"当哥哥的那位不无自豪地说。

接着兄妹俩又简单说明了去北大的经过。老人和聂元梓结婚后，聂元梓不断从家里拿东西，竟然拿走了刘亚楼送的表，兄妹俩坚决要去讨还，老人家没办法才写了那封信。没想到聂元梓还给他们的手表竟被摔坏了，兄妹俩便与聂元梓闹起来。兄妹俩越说越气，当着牛辉林等人的面大骂聂元梓："这个坏女人，太毒了！她困难时找关系来巴结我们家，现在翻了身又来迫害我爸！"

"好了！我们不是来听你们家的控诉会的！" 牛辉林赶紧打住兄妹俩的话头，转向老人："告诉你，我们这次来一是要抄家，二是严令你管束子女不能再去北大闹事！"

"小同志，我来告诉你，我是中央监察委员会的常委，我家里的所有文件都是绝密！你可是动不得呦！"

"抄家又不是抄文件。我动你的文件干吗？不过你倒是提醒了我，

我们抄家没动你的文件也得有个手续凭证。凡是放文件的柜子一律封存，你要签字！省得将来说我们动了你的绝密文件，吃不了兜着走！”

说办就办。吴家工作人员找来了纸张和北大红卫兵们一起裁出纸条，写上封条年、月、日，再加盖牛辉林带来的“北京大学红卫兵”公章，按老人家指点的文件柜、办公桌，看也不看，一一封存。然后写好字据，老人家和牛辉林签了字。

封了文件柜，便开始抄家，没收了一副麻将牌，涉嫌赌博；一个木制类似八卦的古董，涉嫌迷信。牛辉林觉得抄的东西少了点，分量轻了些,猛然想起聂元梓还交代要把那辆吉姆车开走。老人很爽快地答应了，并在抄家清单上签了字。这时，陈宝华把我叫到屋外，低声传达：“老聂让你们把吴溉之拉到中组部门前批斗……”

“这都后半夜了。街上哪里还有人？批斗给谁看？再说了，这个人年岁这么大，又有病，万一出个事，谁负这个责任？这事我不干！谁干让谁干去！” 牛辉林说话嗓门大起来。陈宝华一看劲头不对，赶紧走了。

“抄家结束，全体撤离！” 牛辉林回到屋里大声宣布完，转身就走。“小同志，希望你再来。”老人在他身后还亲切地说了一句。

## 第 343 回：保“西纠”，“联动”再冲公安部

### 新疆乱，广州《红卫报》被封

12 月 20 日，周恩来接见西南区联合赴京告状团全体代表。他在接见时还特别关心的问到：“自贡的王典新那个小同学回去以后，有没有消息？回去以后不会整他了吧！你们回去后，第一件事就是关心那个小同学。那个孩子斗志很大，你们不要把他忘记了。再发现这样的事，我们要直接给自贡打电话！”

他鼓励代表们说：“你们回去继续搞路线斗争，廖志高不是说他回去后要检查吗？他犯了路线错误。”

他提到了李井泉：“李井泉他很气馁，一出来就很紧张，血压就高，中央的意思是先让他写个检讨，给大家看看，不行再检讨，然后再出来。开中央工作会议时，我接触过他，他比廖志高还紧张，廖志高也很紧张。你看，我跟你们谈了那么多次，也不紧张，血压也不高，怕就怕出病来了。”

周恩来号召：“你们成都地质学院、川大、成大都是左派的，为什么不可以联合起来，那不就力量就更大了嘛！最好大家都参加西南联络站，那就更好办了。你们要树立一个榜样，三省不行，四川设一个总站嘛。”

这时，周恩来看了看李井泉 13 日的检讨后说：“这个检讨不深刻，究竟是哪个地方错了，没有说。你们对这个检讨作个批评，我看看你们的水平，留下的 5 位写，要联系实际，现在你们会做文章了嘛！《红旗》十三、十四、十五期社论，工厂《十条》也出来了，抓住这些写

一篇批判得深刻的文章给我看看，看看你们的水平。你们接触的实际比我多，写一篇像样的文章出来。”

最后周恩来和大家在人民大会堂合影。

12 月 21 日，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会见波兰共产党临时中央代表杨力，康生、伍修权在座。在谈到反对修正主义时，毛泽东说：单反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是不够的，还要反我们党内的修正主义。过去我们做了一些，只是修修补补，没有当作整个阶级斗争去做。这不是个别人的问题，是一个阶级反对另一个阶级。

“联动”中相当部分人加入过纠察队。他们对于 12 月 17 日公安部公开抓纠察队头头一事，反应激烈，认为中央文革和谢富治违反了《十六条》，是镇压学生运动，是新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于是又组织人于 12 月 21 日再次冲击位于长安街上的公安部，要求谢富治“还我战友”。

12 月 13 日，广州的《羊城晚报》，此时已更名为《红卫报》被封。此次行动是由到广州串联的“武汉大专院校毛泽东思想红卫兵驻穗联络站”领衔，联合 “中山大学八三一红卫兵”、“中山大学一一七战斗队”、“华南工学院毛泽东思想红旗红卫兵总部”、“革命造反第四野战军广州地区联合造反兵团”、“珠影东方红公社”、“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红色造反团驻穗联络站”、“北京航空学院红旗战斗队驻穗联络站”、“驻《红卫报》南下革命造反团”等 24 个广东和外地的群众组织一起实施的。他们联合发出封闭和接管《红卫报》的通令，同时还在当天下午 14 时 30 分，发布《就〈红卫报〉（前

〈羊城晚报〉）被封告中南地区革命人民书》。

中南局书记处书记金明，首先对《红卫报》被封事件作了书面表态：“我只代表我个人支持革命同学和红卫兵们封闭红卫报的革命行动。”同时，他向报社做出三点指示：一、报社职工要支持封闭《红卫报》的行动；二、封闭期间，工资照发；三、 职工们要等待分配工作。

12 月 15 日，中南局宣传部正式发出了《红卫报》停刊通知。

一石激起千重浪。广州封闭《红卫报》的行动，迅速导致群众组织严重分裂。一部分热烈支持，而另一部分则强烈反对。

“毛泽东思想工人赤卫队广州地区大专院校总部”和广州发电厂、广州重型机器厂、广州红江织布厂、广州纺织机械厂、珠江电影制片厂“工人赤卫队”等一批工厂的工人组织，联络广东省气象局、广东省电业局、 广州市果品公司和一大批大、中学的红卫兵组织，联合组成了“中南地区反对封闭、停刊《红卫报》联络总部”。

封报之前，中山大学的学生曾与“毛泽东思想广州红色工人总部”的召集人梁锦棠谈及此事，梁锦棠表示：“你们是学生，我们是工人，如果学生的革命行动大方向是对的，我们工人阶级一定支持。”

《红卫报》被封后，梁锦棠已是反封派。那么，他们反对封报的主要理由是什么呢？梁锦棠后来回忆说：“我们最不服气的，就是中南局的那个封报通知，说（《羊城晚报》）过去办不好，今天办不好，将来也办不好。问题在第三句。‘过去办不好’，还可以高姿态地讲；‘现在办不好’也可以说现在办得还是不满意；‘将来也办不好’，

我们就不服气了。按照毛泽东思想来说，事物是发展的，它不对可以批判，怎么能说将来也办不好呢？这不合逻辑。我们工人就吵起来了。”

工人们反对封报，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觉得封报是以北方红卫兵为主，这些人目空一切，气焰熏天，有包办革命之嫌，令人反感。广州市部分工人、学生组织起“扫流寇队”、“劝架队”，专门攻击北方红卫兵。12 月 6 日，当一群上海红卫兵在龙津东路“破四旧”时，就被大批广州市民包围，并一直追到接待站。人群狂呼着“我们广东人联合起来，打死外地人”、“打倒北方串连学生”，用石块砸门，往接待站里冲。来不及躲避的外地红卫兵，几乎全部遭到殴打。

其实，报纸办得好坏，并非问题关键。项庄舞剑，意在沛公。中山大学的学生领袖黄意坚说：封报事件的关键，实际上是针对陶铸。“我们认为陶铸有问题。”黄意坚说，“按照毛泽东当时的说法，就是反走资本主义当权派，广州的当权派就是陶铸。如果陶铸在中央是得到毛泽东信任的，那等于广东不用搞文化革命了。”

广州的文革是从批秦牧开始的，而秦牧曾经担任《羊城晚报》的副总编；中南局最早挨斗的负责人是王匡，而他作为中南局的宣传部长，一直是分管《羊城晚报》的。更重要一点，陶铸在担任中南局第一书记期间，对《羊城晚报》，一向格外垂意，呵护备至。因此，当造反派的重炮口开始对准陶铸时，《羊城晚报》便不可避免地，成为首当其冲的目标。

《广州日报》原来是从《羊城晚报》分出去的，为了保住《羊城

晚报》，陶铸在 8 月曾建议把两报重新合并，改名为《广州晚报》。但事实上，要合也不易。从 7 月开始，《羊城晚报》社内部，已经一片混乱。在贴出的 1335 张大字报中，六成以上是群众之间互相攻讦，43％的报社职工被贴了大字报。1964 年 7 月以前在羊城晚报社工作的一般编辑、记者，被称为报社的“老晚报”，当时共有 37 人，其中 33 名上了大字报。人们哄传报社里“有一个 20 多人的反革命集团”，以致人人自危。

8 月底，《广州日报》社的部分群众，贴出了炮打中南局宣传部副部长萧洪达和中南局宣传部秘书长、《羊城晚报》社党委第一书记、社长丁希凌的大字报，导致两社的干部群众严重分裂，双方分庭对垒，激烈辩论，甚至爆发冲突，矛盾十分尖锐。

红卫兵对《红卫报》的一项重要指控是：该报在 1966 年 1 月和 4 月两次刊登同一篇文章《韶山的节日》，作者周立波，即长篇小说《暴风骤雨》的作者。这篇文章记述了毛泽东回故乡韶山的情景，被红卫兵认定是“丑化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反革命毒草”。

文章是如何“丑化”毛泽东的呢？

文章在记述毛泽东回乡扫墓时是这么写的：“毛泽东用一截松枝插在父母坟前说：不管三七二十一，鞠个躬吧。”这“不管三七二十一”引起了社会上的一些批评，湖南韶山“毛泽东旧居陈列馆”的工作人员写信给湖南省委，指文章“许多细节不确”，“根本就不应该在报上公开发表”。张春桥在看到文章后，也立即打电话给中宣部，认为该文“是歪曲毛主席形象，攻击毛主席”的大毒草，“因为这是

一篇不能或不便批评的文章，全国一登就麻烦了”，他要求全国报刊不得转载。2 月 2 日，中宣部通知全国报刊不能转载《韶山的节日》。

陶铸派萧殷核实情况，随后以报社名义写信给湖南省委宣传部，要求修改后重新刊登。周立波也通过湖南省委寄来了修改稿和更正启事。4 月 23 日，《羊城晚报》在请示了中央，得到“可以由你们自己处理”的答复后，将《韶山的节日》原文中“不管三七二十一”那句删掉了，第二次发表了该文。

张春桥就此事给康生写信质疑：“为什么要重新发表，重新肯定，而且打着‘多方核对’的招牌攻击毛主席？……我的政治经验不够，对中南的情况也不了解，请你考虑怎么办？” 康生办公室派了两名《解放军报》记者到广州调查此事。至 5 月份，在当时的《羊城晚报》社党委向中南局提交关于《韶山的节日》检查报告的当天，中南局通知羊城晚报社成立“文化革命领导小组”。“文革”就此早早降临《羊城晚报》。

红卫兵还指控《红卫报》的当权派，“大部分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坏蛋”。今年“直至 6 月 6 日到 7 月的一个月里，就有 15 天没有刊登毛主席语录”。

《红卫报》被封后，丰宁路的《红卫报》社门外，人山人海，“封报派”与“反封报派”两派群众在马路上展开激烈辩论，大标语和大字报贴满墙壁。12 月 16 日晚上，“武汉大专院校红卫兵驻穗联络站”与赵紫阳见面，向他提出抗议。双方正在开会，丰宁路《红卫报》社门口，又聚集了两、三千广州市民，驱赶外地学生。正在和赵紫阳开

会的武汉红卫兵闻讯后立即打电话通知中南局和广东省委，请中南局书记处书记金明和省委赵明一同坐宣传车赶到现场，这时现场的人数越来越多，许多人纷纷爬上宣传车，车的前身和后尾都坐满了人。他们隔着帆布打宣传车里的广播员，还切断了车上的广播线，随后又撕开了帆布棚，乱打里面的广播员，连坐在里面的中南局书记金明也挨了一拳。“武汉大专院校红卫兵驻穗联络站”与赵紫阳的会谈进行不下去了，于是同他一起坐车前往现场调查，谁知刚一下车也遭到围攻和毒打。

12 月 28 日，中共中央中南局、中共广东省委和广州市委，不得不公开发表声明，对事件做出解释，并重申支持立场，否定了启封和复刊的要求。

此时的中共广东省委和广州市委，基本上也转入地下状态，没有固定的办公地点，在市内到处打游击。有时在这人家里碰个头，有时在那人家里开个会。区委找不到市委，市委也找不到省委。很快连会议也召集不起来了，省人委和市人委也陷于同样困境。

12 月 19 日，远在西北边陲的乌鲁木齐又发生了上千人的绝食事件。在 8 月 24 日至 26 日期间，新疆建设兵团机关部分干部也紧随北京，成立了红卫兵组织。遂后，大批兵团人员陆续离开新疆，参加全国串联，直至 1966 年 11 月底，毛泽东接见红卫兵结束，这些人员才分批回疆，开始成立各种各样的群众组织，逐渐形成两大主要派别。一是以兵团农学院的“延安大队”和石河子中学的“无产阶级夺权造反司令部”为主的支持丁盛和裴周玉的一些组织，具有一定的官方

背景，成员多为党员、党支部成员和学校领导，成员众多。另外就是反对丁盛的组织。其中以兵团农学院的“兵农造”，全称是“新疆军区兵团农学院革命造反司令部”和农八师中学的“红旗造”最为出名。此外，还有既不属于“保守派”，也不属于“造反派”的第三方组织。

11 月后，许多声称在 6 月 24 日兵团设计院“小匈牙利事件”中受贺振新迫害的兵团设计院群众，在贺振新身体患病的情况下，仍坚持对他进行批斗，致使贺振新心脏病发作。1966 年 12 月 12 日，贺振新再次病发，晕倒在批斗现场。被送到医院后抢救无效，于当晚去世，终年 50 岁。

贺振新算是兵团老干部中第一个被批斗致死的。之前新疆建设兵团的高层互斗及群众批斗虽然也很激烈，但还没有斗死过人。而且贺振新是兵团任职领导中唯一既是 359 旅的战士，又是从新疆建设兵团的前身 22 兵团调出，15 年后又奉命重返兵团任职的将军。而重返兵团仅仅一年就逝世了。他的死令兵团老干部们非常寒心和恐慌，也让与他有着相似处境或共同立场的老干部们为自己的前途命运担忧。这些都激起了那些同情他的人的强烈不满，丁盛被看作应该为贺振新之死负责的“罪魁”，有人以贺振新之死的名义攻击丁盛、裴周玉。12 月 17 日，经新疆军区党委讨论同意，丁盛、裴周玉被王恩茂和新疆军区司令员郭鹏用飞机送往北京。

第二天，兵团农学院“少数派”学生召开“向兵团资产阶级发动路线总进攻誓师大会”，要求正在参加自治区三干会的兵团领导参加他们的大会，并就贺振新之死说明真相，回答他们的问题。结果没有

什么重要领导甘愿自触霉头去参加会议。

12 月 19 日，兵团农学院“兵农造”和塔里木农垦大学等大专院校部分师生和兵团驻乌市部分单位干部、工人、学生，赶到乌鲁木齐昆仑宾馆八楼要见兵团参加三干会的领导。此时，为了安全，自治区的会议早已易地到独山子部队营房，“兵农造”扑了空，气愤难平，当夜就在昆仑宾馆静坐，后来决定绝食。其实这时丁盛、裴周玉已在北京，但是这些学生并不知情。由于见不到丁盛、裴周玉，上千人绝食，而且事态还在扩大，乌鲁木齐市各大学、工矿企业 100 多个单位造反派群众支持绝食，采取罢工、停水、停电、停交通等手段向自治区和兵团领导施加压力。王恩茂等人不得不来到昆仑宾馆接见群众，绝食学生喊出“打倒王恩茂”的口号，吓坏了王恩茂。学生提出五项要求，王恩茂等人都不答应，谈话无结果，绝食仍在继续。

12 月 23 日，远在北京的周恩来听到新疆的绝食情况后，立即给新疆发来明码电报，劝说学生爱惜身体，吃饱饭干革命，并批评丁盛、裴周玉“不能拒绝接见学生”。

电报说：

新疆自治区党委、区人委、生产兵团党委并转各级领导和参加这次批判自治区党委和生产兵团党委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革命同学和工人们:

新疆这次批判自治区党委和生产兵团党委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群众革命行动，中央积极支持。

革命学生和工人激于义愤而采取的静坐、绝食和停工的行为，责

任完全在于自治区党委和兵团党委。中央对此，表示极大关怀。

中央对于革命同学和工人接受中央关于恢复饮食和工作的建议，表示极大安慰和热烈欢迎。

对于所有参加和支持这次革命行动的学生、工人、农民、市民、服务人员和机关干部，中央责成自治区党委和兵团党委必须保证:

1、动员全市、全疆人民支持这一革命行动。

2、欢迎参加斗争的同志进食和复工。

3、迅速医治身体遭受损伤同志的疾病。

4、不许有任何歧视和报复。

5、不许扣发工资和调换工作。

6、不许对他们家属进行迫害。各级领导如违反以上保证，将受到严厉处分。

中央急切等待参加这一革命行动的同学和工人立即推出负责代表，由王恩茂同志陪同来北京，解决一切问题。

中共中央

国 务 院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当天，周恩来派自己的专机和民航客机一起飞往乌鲁木齐，接“12.19”绝食代表和自治区、兵团领导到北京解决问题。

## 第 344 回：见西纠，李先念再遭炮轰
## 赤卫队，上海百万人聚会

就在给新疆绝食学生发去电报的当天，12 月 23 日，周恩来、陈伯达、江青、康生及中央文革的成员在人民大会堂再次接见北京红卫兵代表。陈伯达在讲话中，介绍大家学习毛泽东的三篇著作：《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反对自由主义》、《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训令》。

接着，江青在讲话时再次提到纠察队的问题，她说："西城区纠察队，还有东城区纠察队，海淀区纠察队的问题。这个组织形式是不妥当的。它凌驾于红卫兵之上，凌驾于党和国家之上，凌驾在我们最敬爱的领袖毛主席之上。对这个组织，从开始到现在，要看经过，看其多数和少数，关于它的功，我调查不够，初期在破四旧和接待工作中做了一些工作。后来被坏人利用，当了宪兵，打人。他们自己私设刑室，关人。听说广播事业局还有一个软禁室，关了许多人。""西城区纠察队我们调查了很久，伯达同志去了好几次。如果说这个组织没做一点好事，他们委屈。这个组织后来被坏人利用了，到处打好人，打死许多人。开始还打坏人，后来就打起好人来了。这是不允许的。我相信，西城区纠察队大多数青少年是好的，他们来了吗？"

答："来了！"

江青接着问："吴新起来了吗？我要认识认识你，你们自己改正错误这好啊。"

吴新起答："好！"

大家鼓掌。

江青："对极少数人要专政。如不专政，你们的大民主没保证，我们也没保证，他们可以抢小汽车。一会抄这，一会抄那，但大多数是好的。对极少数小家伙专政，是一种教育，有的通过他们的家长，让他们的子女自己去投案，这些人之中，可能有将军之子，元帅之子，国家主席、副主席之子，总理、副总理之子，部长、副部长之子。这些都不在话下。"江青说到这里，一拍桌子："谁要那样干！就得坐社会主义国家的牢。我就要鼓励他们，自己起来造反。吴新起给我来信说要解散纠察队，我们要鼓励他们自己起来批判。然后，他们愿意到那个组织去，你们都欢迎。好不好？"

众："好。"

江青："所有的纠察队都要解散，你们红卫兵以后不要再搞纠察队。"

康生说："反动的资产阶级路线绝不会轻易地退出舞台，它还要进行各式各样的反复，我们看到最后一小撮资产阶级的反革命分子像李洪山，像易振亚，像兰小冰，像赖锐锐，像谭力夫等人，在他们的后台的指挥下，进行反革命的第五

次反扑，我们当前就是要彻底地打垮它们的这种反革命的活动。

陈伯达同志的讲话叫你们学习三篇毛主席著作，江青同志的讲话不是让你们关起门来做检讨，而是叫你们掌握起这个武器把反革命彻底打倒（鼓掌），把两条道路的斗争彻底进行到底（掌声）！最近这个时候你们左派队伍在毛主席领导下不断地壮大，西城纠察队和其他一些地方受蒙蔽的同志逐渐觉悟起来，这种形势非常好，但是我们还不能放松，还不能松劲，他们还会用各种方法来活动，他们反革命还会作垂死的挣扎。我们应该特别提高警惕。我们一定要很好地掌握毛泽东思想，掌握毛主席的文化大革命的路线，把我们的队伍更加巩固、扩大起来，打击少数的反革命分子，争取教育团结绝大多数的同学，提高我们的警惕，加强我们的战斗力，加强我们的思想武装，准备迎接 1967 年的新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重大的胜利。”

掌声再起。

周恩来在讲话中再次肯定了江青、陈伯达、康生的发言。

12 月 23 日下午 15 时至 18 时 30 分，周恩来在国务院紫光阁与中央财贸各部、银行、合作社及直属院校群众组织选出的全权代表座谈，解决财贸口文革问题。参加座谈的有副总理李富春、李先念，中央财贸政治部主任、国务院财贸党委副书记姚依林，国务院财贸办公室副主任马定邦，财政部

副部长吴波以及王磊等各部负责人。晚 19 时 5 分到 20 时，周恩来、李富春、李先念又在国务院小礼堂继续接见以上各单位造反派代表 900 余人。

大会开始后，姚依林、马定邦、吴波、王磊及财贸各部负责人进入会场。

李富春：“总理去打电话，马上来。”

群众呼口号：“彻底批判财贸系统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打掉李先念的臭架子！”

“李先念必须老实交代！”

“李先念必须回财贸系统作检查！”

……

李富春：“好！各位同志，我先说几句。”

这时，周恩来进入场，群众高呼：毛主席万岁！……

李富春接着说：“支持财贸系统各部门、各院校的造反精神，可见十几年来我们当官做老爷，有许多四旧需要扫掉，我们在不同程度上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需要同志们来批判。你们对本单位部院党委不满，你们是有理由的。今天是个造反大会，我的话讲到这里，因为总理来了，请总理讲话。”

周恩来：“刚才富春同志讲得很好，我同意富春同志的意见，我和富春同志都很忙，没有时间，财贸系统事情我们

没有管，先念同志管，他又出国，还有许多业务要管。我对其它各个口都管了，例如外事、工交、文教、科研、国防、科学院……对财贸没管，跟你们接触了，问题确实不少。所以，我支持你们8个部门造反派的精神，支持你们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继续批判。”

代表们热烈鼓掌。

周恩来提到北京出现的炮打林彪、中央文革的一些现象，认为这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反扑的表现，应该给以打击。然后接着说：“我们同财贸系统造反派协商开一个财贸系统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我们愿意去参加。”

代表们热烈鼓掌。

周恩来继续说：“我替你们邀请中央文革小组的人也去参加。但只限于这个问题，不能出新题目，时间要协商，这个月内还有7、8天，如果不商量好，我们要失约。”

他说：“今天谈了3个多小时只是个开端。今天晚上我向中央文革小组提出派一个专门联络员和你们联系，现在我先请胡立教同志、童小鹏同志做你们的联络员。胡立教他年纪轻一些，好些,……”

没想到，这时有人站起来打断了他的话说：“我们银行不同意！”

又有一部分群众随之说：“不同意！不同意！”

又有一人站起来说：“胡立教有错误言论！”

周恩来说："有些错误言论就不能做联络员？这怎么行呢？难道要我做联络员？"

大家热烈鼓掌。

胡立教时任人民银行行长，童小鹏是国务院副秘书长。

周恩来："我每天讲话也可能有错，不能百分之百都正确，有百分之五、六十我就满意了。"

又是一片热烈的掌声。

周恩来又说："胡立教可以试一试嘛，不行再改。"

有人起立讲："胡立教从运动以来，一贯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现在顽固坚持，他不但不支持我们造反，还反对我们。"

另一人讲："我们有材料！"

周恩来："你们有材料可以交上来嘛！"

童小鹏从座位上站起来，手里拿着材料说："材料在这儿。"

下边又有人说："把材料亲自交给周总理。"

周恩来："说老实话，材料很多，我不能一下子都看完，还是开座谈会，可以相互了解、相互学习。"

"我支持左派，支持造反派，我还是个总理，我还得教育、帮助保守派，和他们不能不谈呀。所以要和大家见面，我答应你们开个大会交谈。好，我的话完了。"

大家高呼："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接着周恩来说："下面由李先念同志讲话。"

李先念刚站起来，下面纷纷喊口号：

"彻底肃清李先念所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影响！"

"李先念必须老实交待！"

"火烧贸易党委，火烧李先念！"

"李先念必须回财院作检查！"

"李先念必须回财政部作检查！"

"李先念必须回商业部作检查！"

"李先念必须回外贸部作检查！"

这时周恩来站起来说："你们再喊口号，我们今天这个会就无法进行下去了。一个中央领导同志要允许他承认错误，让他说话。"

群众马上安静下来。

李先念："我首先向大家承认错误，昨天没有接见你们，不管客观原因如何，昨天又搬家，早晨9点有宴会，后来阿尔巴尼亚访华代表团问到文化革命中的一些疑难问题，需要多谈一下，时间较长。原定3点半，后来改为晚上8点半接见你们，我的错误是没有向大家讲清楚。"

周恩来插话："好嘛，你的错误招来今天这么个大会！"

李先念："昨天让同志们受累了，天寒地冻的，我内心感到很痛心，很不安，这是句良心话。我9点才回来，听说你们要见总理，这是很对的，昨天的情况就是如此，再向你

们道歉，你们受苦了。

第二点，在这次伟大的文化革命运动中，首先表示态度，我犯了错误，是执行了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各部要求我们检查是合理的、应该的，欢迎同志们揭发。对同志们的揭发，我抱欢迎态度，希望同志们揭。在6、7月，就是在8、9月份，老实说，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我的脑子中仍然继续起作用。对两派——革命的左派、革命的保守派，看不清。同志们问我，多数派、少数派，谁是左派？我说都是革命派。所以，你们说我和稀泥，我接受，我是从阿尔巴尼亚回来，通过中央工作会议后才比较认识到这个问题。同志们对我的批评和怀疑是完全应该的，错了的，为什么不该怀疑呢？不该批评呢？

十几年来，站在上面做官当老爷，没有向你们学习，我们脑子中有了一条，批评有点听不进去，表扬的听得进去。对我影响很深的是外贸学院说，现在我们要管一管李先念。这话，听起来不舒服，因为过去我是管你们。仔细一想，要接受群众的批评监督，才能紧跟毛主席。所以，这件事用处很大，我坚决支持你们的革命造反精神，坚决支持左派。当然，你们可能不相信，还得看行动，你们现在已经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决支持你们。要下定决心，和各单位的革命左派座谈，交换意见，向你们学习。总之，支持左派，支持革命左派，支持造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反。我希望各部

领导同志也要如此，我说了不少错话，灵魂深处有这些东西，怎能不说错话呢？我今天先简单地讲几句，表示这样一个态度。”

上海“赤卫队”正式成立后的第三天，12 月 8 日，上海市委要求各基层单位重新宣读 9 月 25 日中央批转的总参谋部、总政治部的报告：《建议农村、工矿企业、事业单位和党政机关、群众团体不成立红卫兵等组织的通知》。这份文件中说：“建议农村，工矿企业，事业，党政机关，群众团体不成立红卫兵和赤卫队等组织，主要还是搞好民兵工作。”

本来文件中提及的“赤卫队”是指全国各地有些单位成立替代民兵组织的赤卫队，并非特指上海的工人“赤卫队”。但是，这份文件在上海工人“赤卫队”正式成立后的第三天宣读，引起了许多人的怀疑，各工厂“赤卫队”纷纷打电话向总部询问，上钢三厂有几个车间的总支书记甚至下命令解散“赤卫队”。12 月 10 日，“赤卫队”总部开会研究，最后决定同市委谈判，要求市委再一次明确承认“赤卫队”是“合法的群众性革命组织”，而且也要专门为此发文。

此时，参加全国工交座谈会的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马天水已经回到上海。会议期间，马天水受陈丕显、曹荻秋嘱托，提了很多意见。他的讲话遭到张春桥驳斥。在会上，他说一句，张春桥就驳斥一句。马天水不理会张春桥的驳斥，坚持讲完自己的意见。张春桥则说马天水糊涂，不代表上海。

12 月 6 日，林彪在工交会上讲话，点了马天水的名。会后，江青和张春桥一起找马天水谈话，对马天水影响巨大，开始转变。回到上海后，他立即在市委书记处传达了中央要求各级干部支持造反派的指示，在市委书记中引起震撼。

12 月 11 日，陈丕显主持市委各部委，各区委负责人会议，要大家转变立场。

12 月 12 日，马天水在全市区、县、局以上干部会议上传达中央工交会议精神，并现身说法，剖析自己的思想转变过程，在上海各级干部中引起很大的影响。市委将马天水谈自己立场转变的讲话稿，印发到基层各厂，还以播放录音带方式，将马天水的讲话传达到普通工人。

12 月 12 日上午，“赤卫队”总部派出代表团，在上海展览馆与华东局和上海市委谈判，但华东局和市委迟迟没有来人。“赤卫队”于是调动两万人去华东局请愿。中午 12 时，中共华东局书记韩哲一和中共上海市委书记王一平等，接见代表并进行谈判。赤卫队代表拿出前两天总部讨论的“四项要求”：

1、市委发文承认赤卫队是合法的革命的群众组织，并给予一切日常工作方便；

2、上海市委必须向上海人民检查所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3、承认邮电工人不夹送《红卫战报》是革命行为；

4、严格执行 11 月 20 日的通告。

王一平等不同意第三条。于是，在场的“赤卫队”顾问陈阿春建议将此条改为：“今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涉及到群众组织相互关系的重大问题，应该会同一起协商解决。”王一平签字同意。

12 月 14 日，由曹荻秋主持召开“工总司”等 18 个造反派组织的联席会，检查上海市委前一阵对文革的态度和立场。这个检查是和陈丕显讨论过的，陈丕显还建议曹荻秋在市委找一两个有“造反精神”的干部，帮助起草这个检查。但检查没有被通过。造反派一致认为市委这是“假检查，真反扑”。

马天水到友谊电影院找到“赤卫队”总部负责人，用现身说法做他们工作，明确指出“赤卫队大方向错了”。12 月 22 日，马天水打电话向张春桥汇报谈话经过以及“赤卫队”组织情况。

12 月 23 日下午，“赤卫队”在人民广场召开有 30 万人参加的“向上海市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夺取新的胜利大会”。参加大会的人，不但挤满了广场，而且还把周围的几条马路挤得水泄不通，光看这开会的声势，就比“工总司”要大得多。

曹荻秋、韩哲一、李干成等华东局和市委领导干部作为批判对象出席“赤卫队”的会议，而不久前，他们还是“赤

卫队”尽力保卫的对象。所有发言者都批判揭发市委，说自己不久前的行为是受了市委蒙蔽。

大会召开的上午，“赤卫队”总部常委、上海玻璃机械厂工人潘月法，在玻璃机械厂工厂食堂遇见“工总司”总部的王洪文、潘国平、王腓利等。潘月法邀请他们参加下午的大会。王洪文说自己没有时间，潘国平也说去不了。与黄金海同厂的造反派工人娄金宝在场，王洪文对娄金宝说：“那你代表工总司参加吧。”

会前，陈阿春与娄金宝在人民广场二楼主席台后大厅内会谈，讨论今后不要再互相冲突，两大派工人组织联合起来，共同批判走资派。又约定有事由潘月法与潘国平通过电话直接联系。开大会时，“赤卫队”总部请娄金宝坐上主席台。

大会结束后，大会执行主席李品银在后台交给曹荻秋一张纸，上面写着赤卫队总部提出的七项要求，要曹荻秋代表市委签字。

会前，陈丕显曾召开书记处会议，讨论出席大会时曹荻秋如何表态。陈丕显表示：市委一定要转变立场，坚决支持造反派，他要曹荻秋向赤卫队明确表态支持造反派，而且告诉保守派们，如果他们不转变立场，市委不再会支持他们。

曹荻秋坚持不肯签字，并再三对“赤卫队”负责人说，一定“要把斗争矛头对着我，对着市委的资反路线”。僵持了一个多小时，直拖到半夜 12 时，会场秩序越来越混乱，台

下的人冲上主席台，玻璃门窗被砸坏，照明电源被切断，曹荻秋被挤得几次昏了过去。后来，“赤卫队”以上北京控告、停电、停水、停交通相威胁，另外，曹荻秋主观上认为他们还是革命的，只要他们能够转变大方向就行。因此，顶到最后，曹荻秋提出再增加一条“彻底批判市委资反路线”，共八条，这才签了字：

同意代表市委并发文，下午发文

今天算公假

曹荻秋

十二月廿四日三点三十分

同意

曹荻秋

十二月廿三日十二时

## 第 345 回：张春桥，北京见上海代表
## 又反悔，“赤卫队”炮轰市委

12 月 23 日这天下午 15 时 30 分至 18 时 55 分，在北京的人民大会堂西厅，张春桥接见上海“红革会”和“工总司”代表。

“工总司”代表提出：张春桥在“工总司”五项要求上签字一事，毛泽东和中央文革都同意了，但“赤卫队”仍说是造谣。因此，他们想将毛泽东的原话登报，请示张春桥是否可以？同时他们还告诉张春桥，上海市委同意大批工人造反队的队长到北京来，现在已有 5000 多人在北京了。他们怀疑这是上海市委的一个大阴谋。他们说：“上海市委现在表面上是支持我们了，但实际上，是在造反派内搞分化活动。安亭事件以后，有一部分工人组成‘红旗挺进队’到北京来，向刘宁一要了一个公章，这个公章很大，还要了一面旗，他们准备打旗回上海造‘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的反，他们想挤垮‘工人造反总司令部’，他们根本就不是造反派。”

张春桥告诫他们说：“我希望你们把总部安在工厂里边，这样就保险了，人家砸也砸不掉。最好的堡垒是在群众里面，这个事情我们是有经验的。革命时期在敌占区里，周围都是敌人的碉堡，我们住在老百姓家里，成天在敌人眼皮下活动，他们也没有办法，我们却很安全。”“你们负责同志每月要参加几天生产，这样做，一方面不脱离生产，另一方面又不脱

离群众。”

接着，张春桥介绍了中央讨论上海问题的经过及毛泽东的讲话。他说：“主席的意见，中央开会的情况，上海市委都是知道的，市委始终没有传达，一直到24号也没有传达。那天，我第一次参加上海市委常委会，提出为什么不传达，我把主席的意见，中央指示讲给他们听，曹荻秋还公开表示想不通，我叫他们给中央打电报，直到现在还没有。这个事我过去一直没讲过，你们不是说没有炮弹吗？这就是给你们的炮弹。中央已经同意了，他们还反对，上海市委直到那个时候还顽固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个盖子怎样揭开呢？在苏州那天，我还和曹荻秋吵了两个钟头，那时斗争很激烈，要他签字。我说：你不答应，我签。后来他签了。我们不轻易用主席的名义来发表，因为主席的话影响很大，不要随便发表。口头完全可以讲，登报不必要，可以印成传单。”

工人说：“我们写好给主席看一看再发表。”

张春桥：“我看还是不要给主席看吧，我们希望尽量用自己的斗争去解决，我们还可以辩论嘛，到底‘工人造反总司令部’该不该成立，如果用主席的原话，人家就会认为我们用主席去压人。”

工人代表说：“外面造谣说，张春桥同志要我们暂时不动。”

张春桥解释说：“我建议你们暂时不动，主要的是你们

内部很乱，一、二兵团的划分是没有基础的。因为它既不是生产中组成的，又不是战斗中组成的，而是铁道部给你们搞的。我认为这样的组织形成不利于战斗，我认为按照地区和产业是比较好的。但是，这件事也得民主，总不得强迫你们解散。我们只有一个前提，就是有利于文化大革命，有利于战斗。干部也要民主选举……”

工人代表：“有的人要用兵团冲垮总部，这个苗头露出来了，很不好，有的同志不是为了干革命，而是为了夺权夺利。有人在北京搞了个‘工人造反总司令部驻京联络站’，我们总部的人都不知道，他们有一个公章，中共上海市委办公厅同意的。”

张春桥当即表示：“现在市委有这样一个情况，从什么都不同意到什么都同意，不管是合理的或不合理的，这对于保他们的人没什么，但对革命派很不利，这是一个坏主意。他会腐蚀革命派，而且会把罪名加在我头上，都是你同意的呀！”

工人代表接着说：“你走后，上海组织了‘工人赤卫队’，他们开了两次批判市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大会。他们的批判是假的，因为他们要火烧你，你是代表中央文革来的，他们的矛头是对准中央文革和你的，他们说，我们的组织是非法的。我们没有采取针锋相对的斗争，因为大部分参加‘赤卫队’的人都是热爱党、热爱毛主席的。他们的大方向和我

们是不一致的，特别是我们的 12 月 11 日大会开得很好，他们现在感到很孤立。他们执行的是一个抓生产压革命的路线。现在，他们反过来说，与我们大方向一致，我们不同意，因为他们成立的目的行动都看出与我们的大方向不一致。”

张春桥问到：“那天大会谁去了？讲了什么话？市委采取了什么态度？”

工人答：“杨士发参加了大会并发了言，王少庸也参加了大会。”

张春桥：“我知道曹荻秋是同意他们成立的，他讲话没有？大会的情况到底如何？如果要批评，就得抓住他们一些材料。”

他又问：“赤卫队有多少人？”

工人：“号称 40 万，实际上没有这么多人，他们的袖章发不下去，开了一次辩论会，他们自动拿下了。”

张春桥：“昨天马天水打电话给我，我问‘赤卫队’有多少人，他说，据我所知反正造反派多，还说总部有 7 个人有动摇。有的说方向错了，不干了；有的要回工厂；有的说不能走，应该留下来扭转方向，我们走后，可能有更坏的人，出来干更坏的事，据他说总部有动摇。”

工人：“实际上不是这样的，真正掌权的还不是工人，他们完全受当权派支配的。”

张春桥：“我认为这里分三种：一、是群众，二、是领

头里最坏的人，三、是幕后指挥。现在要揭露的是真正起作用的，并且表现很坏的。你们应该调查那些总干武斗的人，抓到这些人，他们内部会更乱，而且要抓幕后指挥者，北京西城纠察队在运动初还是比较好的，有些功劳，在扫四旧时，他们打人杀人是有问题的，但也有可打可不打的，那时我们没有出来讲话，因为，当时他们的大方向是对的。现在不同了，主要打的是革命群众，所以就抓了他几个，应该实行无产阶级的专政，这里也有幕后操纵者，主要幕后操纵者揪出来，听说，有劳动模范支持他们，现在还有几个？从蔡祖泉转变过来，你们应该看到，他们是能够转变的，那时候我就想到了，要是劳动模范站到你们这一边就好了。”

有人问：“北京的时传祥如何？”

张春桥：“北京的时传祥有可能变得很坏，这些人要给他们做工作，王铁人也表现得很不好，可能走向他的反面，这些年来，他们的地位发生了变化，到哪里都鼓掌，都受到欢迎，没有听到什么批评，但是，他们影响很大，一起来谈话影响就大了，应该看到这个严重性。他们是既得利益者，有名，有利，有地位，到处讲话作报告鼓掌，还有什么革命要求呢？他们不像一般工人，贫下中农，杨怀远现在有什么压迫？没有压迫。如果你们给他一点压迫，他就可能革命了。有些劳动模范，过去受苦容易满足，现在没有革命要求和远大理想，光知道现在甜呀，甜呀。所以，不能老是忆苦思甜，

闯吧！还要有个远大的革命理想。好吧，你们还有什么不了解的话？‘红革会’的同志谈谈吧，那天很对不起你们。那天你们走后，安徽的人保李葆华真是毫无道理，一个问题就搞了两个小时，开始就录音，就搞了一个多钟点，第二谈话一段就要整理一段，还要我签字，我说，为什么要这样呢？我们谈话是很随便的，如果说这样的话，那我就不谈了，你们干脆提出几个问题让我回去考虑一下，写成书面的当面来讲，为这事情就一直搞到第二天早上 7 点钟。好吧，‘红革会’，你谈吧。”

“红革会”问起上海市委与《评“海瑞罢官”》的关系，张春桥说：“关于《海瑞罢官》，上海市委一点力也没有出，这是主席的功劳，当时江青也在上海。从一至六稿是我与姚文元同志搞的，都没有给市委看过，直到七稿时才给市委看，这件事和市委根本没有关系。”

学生说：“当时流传定稿是上海市委讨论的。”

张春桥：“没有这回事。实际上，这事是我与姚文元搞的。我也不好，当时是为了搞好市委内部，此话在上海市委是讲过的，说市委讨论过几次。也为了不搞个人突出，谦虚，没想到这变成了保市委的资本……”

学生又问起周恩来打电话说“上海市委是革命的”是怎么回事？

张春桥解释说：“5 号早上我到这里，总理一见到我就对

我说，你看上海怎么搞的！总理很不满意。很多北京红卫兵一见总理就问，总理不知解释了多少遍。对一个问题也有一个认识过程，因为运动以前，上海是做了一些成绩，在柯庆施同志的领导下，中央是有一定评价的。总理是因为北京学生不了解情况，给他们讲一讲上海市委是革命的，要他们调查一下。但是怎么能够吹呢？是革命的也不一定是正确的。既然是革命的，人家红卫兵来了为什么连见一见都怕得要死呢？特别是宋季文讲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问题，我和姚文元听了都气死了！其实《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有成绩、有错误与宋季文一点都没有关系，他有什么可吹的？只要粘一点边，好像就和他们关系密切得不得了，就吹起来了。评《三家村》是我一手经手的，最后的稿子市委要去讨论过的，修改的地方、增加的恰好是吴晗的观点，我正好到北京开关于彭真的会议，没有参加讨论。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思想是主席的，具体是由江青同志搞指导的。

总理为这个很生气。主席说，北京找不到人写文章，才带到上海来。《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有成绩也好，有缺点也好，与宋季文毫无关系。”

张春桥：“你们还是集中力量攻市委吧！这样才能争取中间派，取得一些胜利，中间派会跟过来的。关于工人五项要求的问题，当时从市委书记处到常委没有一个人支持我！”

问：“上海市委决定党委停止对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据

说你是同意的？”

张春桥答：“当时我是看到党委领导运动盖子揭不开，他们给我说了，我也就同意了。但后来在《支部生活》办公室才知道是这么一回事。所以现在我也变得聪明了，他们用电话给我把情况反映一下就要我表态，我不发表意见，让他们自己处理，关于《解放日报》事件大体上我已经知道了，有不同观点的人写信给我，有同意你们的，也有不同意你们的，传单我也看到了，同意你们的是多数。”

问：“陈丕显到底怎么样？前一个时期他不是说生病，中央是同意他休息的吗？”

张春桥：“生病休息是有的，在这次中央会议上给他谈了，叫他站到毛主席的路线上来，江青同志也要他把工作抓起来，对他说：‘我和春桥做你的参谋’，但他没有这样做，特别使我吃惊的是他打电话(指关于五条问题给陈伯达同志打的那个电话)问了那么多的问题，‘到底中央文革给了他(指张春桥)多大的权力呀？！’‘他为什么不与我们商量？’态度很坏。实际上说我完全没有给他们打招呼也不对，我在去文化广场之前就已经给他们谈过了。马天水这次的态度还好，但他在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上态度很不好，批评了他，他在会上表示我改我改！

我最近回上海想了解一下上海的情况，市委老早就希望我回去，革命派也想我回去，揪我的人当然要我回去。”

12 月 24 日早上，陈丕显听说曹荻秋半夜已在“赤卫队”提出的条件上签字的消息后，很着急，立即在上午召开书记处会议。会前，市委曾打电话去北京，问张春桥如何处理是好？张春桥说：“我没办法。”

会上，主持会议的陈丕显说：市委已经决定支持造反派，曹荻秋签字是政治立场错误，这件事要由曹荻秋个人负责。

市委书记处书记、副市长梁国斌与市委候补书记王少庸一起，也严厉批评曹荻秋，说这签字不能代表市委，要他公开宣布作废，要开一个常委会作检讨。曹荻秋解释说是昏倒了才签的字。

陈丕显提出：要同“赤卫队”商量，让“赤卫队”主动取消签字；如果商量不通，最好由曹荻秋自己声明作废。他还要曹荻秋为自己的签字作检讨。

会前，中央文革小组驻沪联络员甄文君接到陈丕显的电话，通知他下午 3 点去开会，但直到天黑以后才有车来接他去会场。当甄文君到达会场时，只见陈丕显正在批评曹荻秋，说他违背中央关于支持造反派的精神，违背市委决定。这个责任要曹荻秋自己承担。

曹荻秋除了强调客观原因外，答应发表声明签字无效。

12 月 25 日下午，“工总司”曹荻秋声明自己之前的签字无效的全文如下：

12 月 25 日下午，上海“工总司”等八个造反派组织在

文化广场召开《为夺取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新胜利誓师大会》。会上，曹荻秋对两天前签字同意赤卫队“八项要求”一事，作了检讨，声明签字作废。

当天，“赤卫队”总部看到了曹荻秋的声明，全都惊呆了。一个“赤卫队”总部负责人事后形容自己的心情：“我当时思想混乱，信心丧失，仿佛幼儿没了母亲，不知所措了。”

下午，“赤卫队”总部立即在长乐路召开会议，研究如何应对。谁也拿不出主意。最后，大多数人主张赴北京控告。

晚上，“赤卫队”在共舞台剧院召开各工厂赤卫队队长以上负责人紧急会议。会上，人人情绪激动，纷纷主张立即北上赴京。一个火车司机上台宣布：

“我们铁路工人支持你们的革命行动，为你们准备好火车，送你们到北京。铁路上司机，检票员。调度员都是赤卫队员！”

紧接着另一位上海铁路机务段的赤卫队员上台宣布：“同志们，我是铁路局的，列车我们已经准备好了，司机也在这里，只等总部命令，全部出发！”

只有一个人表示反对，他是江南造船厂赤卫队负责人，上台抢了话筒，大声疾呼：“千万不能派代表去北京！一是不会起任何作用，二是会授人以离开生产岗位的口实。80 万赤卫队员会因此被击垮，不仅害自己，还会害家属！”

但是，他的讲话几次被打断。人们纷纷登台，抢话筒，

发表己见，主席台上一片混乱，总部负责人王玉玺被人赶到后台。代表市委出席会议的市委组织部长杨士法成为大家对市委不满的出气筒，被按脑袋，要他低头认罪，他头上戴的帽子也被掀掉。

经过两小时激烈争辩，会议组成 1300 人的“赴京控告团”，由总部常委金瑞章等带队，马上编组前往火车站。

人群潮水般涌出剧场，许多人事先没有准备，连钱和粮票都没带，就跟着队伍走了，丢下上百辆自行车在剧院门前的街道上。

杨士法请示市委，经同意，他也随控告团一起赴京。这时已是 12 月 26 日清晨 4 时 30 分左右。

陈丕显原打算由办公厅出头，也组织一个造反队。但没有搞成。12 月 26 日下午，陈丕显的秘书打电话到武康路二号市委“机联站”，说“丕显同志要来看望你们”。接着，陈丕显就乘车到了。徐景贤赶紧拉了几个“机联站”的工作人员，把陈丕显堵在屋外的院子里，不请他进室内，几个人就站在露天开始了对话。

陈丕显一反往常的首长派头，很谦恭、亲切，就在院子里站着和徐景贤他们对话。他说：“前一时期我一直在养病，市委的工作由荻秋同志主持，所以我对有些情况也不是很了解。你们起来造反我表示支持，有什么需要我做的事情请尽管提出来。”

徐景贤故意问他："那你对我们提出的'揪出曹荻秋'到底怎么看？"

"这个，荻秋同志处在第一线，他也有他的难处……"陈丕显说。

他表示："如果说这条路线以陈丕显为代表，那大家研究去，是否与我的策划有关系？我的秘书可以证明，我没有策划。开会、报告没有和我商量。有些事同我商量，我还发过脾气。"同时，陈丕显也替曹荻秋解释，说曹荻秋对张春桥代表中央文革支持工人造反派思想不通，是因为曹荻秋认为"多数、少数两派中都有左、中、右，应该一视同仁。"

随后，陈丕显说："现在市委机关受到冲击，工作很难开展，我有一个建议：市委和你们'机关造反联络站'可不可以合署办公？不过你们这里地方太小，可以考虑换一个地方，房屋、车辆我都可以提供，经费也没有问题。"

徐景贤断然回答说："这个问题不能考虑！"

站在旁边的程绮华、朱永嘉等人插嘴说："我们不需要房子、汽车和什么经费！"

陈丕显看看谈不下去，讪讪地说："那我们多保持联系吧。"就告辞走了。

陈丕显一走，武康路二号里就炸开了锅，有的说："想要和我们合署办公，休想！"有的说："他提供什么房子、车子、经费，这是要收买我们！"

王承龙说：“车子、房子，为什么不能用？只要造反需要，都可以拿来为我所用！”

## 第 346 回：彭德怀，成都说动大学生
## 王大宾，接指令紧急赴蓉

1966 年 6 月 4 日，西南局给中央并毛泽东报送《西南局三线建委办公室关于彭德怀同志半年主要情况简报》，讲了彭德怀 5 个问题。12 月，戚本禹又接到西南局一个报告，很简单，两张纸，说彭德怀现在在四川很自在，到处看大字报，并对自己的问题翻案。报告上说："当他看到批判刘少奇反对毛主席的大字报的时候，他就笑，说，你们现在才知道反刘少奇啊，我早在 1959 年就反对他了，你们还斗我呢。"

于是，戚本禹和关锋一起写了一个报告，说彭德怀的翻案活动应该引起警惕。

12 月 13 日下午，周恩来在钓鱼台主持中央文革碰头会，讨论到西南局写给中央的报告。江青说：

"我们在这里拼命战斗，他倒反而是个没事的人了，在那里幸灾乐祸，优哉游哉的。"她提出要把彭德怀带回北京进行批判，大家都同意她的意见，认为应该把彭德怀调回北京。

怎么把他带回北京呢？开始有人提派解放军去把他带回来。周恩来说："让部队去带不妥，还是由群众去带比较好。"

戚本禹、王力、关锋说，以红卫兵群众组织的名义去勒令他回北京，大家都说好。于是形成了一致的意见，让红卫

兵代表群众把彭德怀带回北京。

周恩来特别强调："不能坐飞机，要坐火车，因为飞机不安全容易出事，出了事说不清楚了。"

有人说："现在火车很紧张，又很乱。"

周恩来说："搞个专列车厢，我去跟卫戍区傅崇碧说。"

然后周恩来就让戚本禹去与红卫兵联系。

戚本禹问周恩来："带回来以后怎么办？"

周恩来说："带回来就跟我说，下面的事我来安排。"

当晚，人民大会堂一楼南部的一个小会议室里，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关锋、戚本禹等人接见聂元梓、朱成昭、韩爱晶、蒯大富、谭厚兰、叶向真和聂树人 7 位红卫兵代表。周恩来等人并排坐在一长溜桌子的北侧，与坐在南侧的 7 人相比，比被接见的人还要多。

聂树人是北京地质学院的学生，因为朱成昭忙于地质学院的运动，所以"三司"的日常工作就交由聂树人负责。此时，聂树人是以"首都三司"核心组负责人的身份参加接见的。

这次接见的时间不长，只是交换或通报了高校运动中的一些情况。在众人闲谈中，江青突然认真而激动地对 7 位学生领袖说：

"你们不是很能吗？你们为什么不去抓'海瑞'？听说他在四川经常上街看大字报，与人谈话，很逍遥自在么！应

该把他抓回来，要他交代问题，接受群众批判！”

在场的人都知道，这“海瑞”指的是彭德怀。可能是对彭德怀这类早已被打倒了的“死老虎”兴趣不大，聂元梓、蒯大富他们并没有对江青的话太在意。

14 日上午，戚本禹执行 13 日下午钓鱼台碰头会议的决定，将中央文革工作人员阎长贵叫到他的办公室，急匆匆地对他说：“现在‘海瑞’还在四川三线任副总指挥，表现不好，要把他揪回来，你去找朱成昭谈谈这件事，叫他们完成这个任务。”

当天下午，阎长贵到阜内大街地质部机关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的联络站找到朱成昭，向他传达了中央文革交办的揪彭任务。朱成昭当即表示接受任务，但是他有事去不了。不过地院“东方红”在四川串联的人很多，在成都也有联络站，他会安排他们完成这个任务。

阎长贵走后，朱成昭又接到周恩来的电话指示，要地院“东方红”负责把彭德怀从成都带回北京，并作了三点指示。

15 日，正在四川南充的北京地院老师王大来接到朱成昭叫他赴成都把彭德怀揪回北京的电话指示。

王大来出身铁路工人家庭，1950 年加入共青团，1954 年考入北京地院，1956 年加入共产党。1960 年大学毕业后，作为优秀学生留校任政工干部，担任党总支委员、团总支书记。1964 年他参加北京房山县四清工作队，担任领导。听了

焦裕禄的事迹后，深受感动，决心向焦裕禄学习，扎根农村，建设新农村。于是在四清后，就留在了房山官道公社任党委副书记、政治部主任，并于 1965 年 5 月正式办理了调离手续。1966 年 6 月初，应地院要求，王大来回学校参加文革运动。一回校就对工作队的一些错误做法有意见，带头支持学校老干部李贵上书党中央、毛主席，批评工作队，因而受到批斗。工作队撤离后，地院“东方红”成立，王大来被推举为“东方红”干部联队的负责人。

1966 年 10 月，陈伯达在一次接见地院学生时说：“西南的问题多，盖子难揭，你们大串联可以去四川。”因此，北京地院“东方红”到四川串联的师生比较多，并在成都成立了“驻蓉联络站”。他们部分同学到南充后，又成立了“四川南充造反派造反团”，王大来也在其中。

王大来接到朱成昭揪彭德怀指示后，立即从四川南充赶到成都“北京地院东方红驻蓉联络站”，然后，安排地院学生郑文卿和张华清去找彭德怀的住址。

到哪里去找彭德怀呢？郑文卿和另外一位同学根据彭德怀是三线建委副主任的线索，就到三线建委办公地的门外守候。守到天黑，看见一老一少从三线建委大院出来，年老的有点像彭德怀，于是紧随其后。只见这一老一少边走边看大字报，捡传单。因为天黑看不清面目，郑文卿跟得很近，听到了老者的咳嗽声，由此判断老者感冒了，可能会到药店

买药。于是他抢先来到附近的药店，果然这一老一少进了药店买药。郑文卿在灯光下辨认出这位咳嗽的老者就是彭德怀。

郑文卿还不放心，又主动上前询问："您是不是彭老总呀？"

彭德怀点头答道："是的，我是彭德怀。你们有什么事吗？"

郑文卿二人非常兴奋，立即跑回"驻蓉联络站"向王大来汇报。王大来和"北京地院东方红驻蓉联络站"的负责人钱新都很高兴。王大来当即决定：马上去三线建委办公地进一步落实彭德怀的具体住址，并直接找到彭德怀谈话。

当晚，王大来带着钱新、陈宝堂、杨文远等人就来到三线建委办公地，这是一个很大的院子，里面一栋二层楼房，没有门卫把守。

王大来他们很快就搞清了彭德怀的确切住址——永兴巷 7 号三线建委院内东侧还有一个小院，彭德怀就住在这个小院的小平房里，他的警卫参谋景希珍、司机赵凤池两家也都住在小院里侧，秘书綦魁英一家也是住平房，紧挨大院门口。

偏僻宁静的永兴巷，周围环抱着矮小的居民住房，路灯稀疏昏暗，夜晚行人稀少。这是个不引人注目的地方，彭德怀在这里已经住一年了，街坊百姓知道的人并不多。

王大来他们进到小院，见到彭德怀，做了自我介绍。彭德怀和他身边工作人员听说是北京来的红卫兵，非常热情。彭德怀连说：

“欢迎红卫兵，特别欢迎你们北京的红卫兵光临。”

按照当时流行的方式，人们见面后，先要亮明自己的出身。于是王大来首先自报家门：“我叫王大来，家庭出身铁路工人。1956 年入党的共产党员。1960 年北京地质学院毕业后留校任团总支书记。1964 年参加北京市四清运动后，留在房山官道公社任党委副书记，共青团九大代表。1966 年 6 月文革开始后，回地质学院参加文革运动，是反对工作组的造反派，反对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现在是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干部联队的勤务员。现在来要找你了解你现在的情况，了解你对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看法，对红卫兵造反的看法，也了解你对在庐山会议所犯错误的认识。你有什么想法都可以和我们谈。”

此时的彭德怀，也很希望与红卫兵交流。于是他从当放牛娃开始，谈到领导平江起义，再到井冈山和朱毛会师。他谈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历次重大战役的情况，说：新四军，刘少奇和他有矛盾，刘少奇挑拨他和毛主席的关系。

随后，这些红卫兵又向彭德怀提出了一些十分尖锐的问题：“你在庐山会议上为什么要向毛主席提意见？”

彭德怀笑着说：“那不是提意见，而是提建议。庐山会

议上毛主席是要快一点，我的意见是慢一点，都是建设社会主义，不是什么两条路线斗争。”

问：“是你的对还是毛主席的对？”

彭德怀答道：“不是谁对不对的问题，而是得服从真理，真理往往是要经过实践才能证明的。当时大跃进，几年就要超过英国，几年就要赶上美国，好像别人站在那里等你去赶去超，要知道别人也在往前走呀！我的态度就是实事求是，我当时说了，三年到五年翻一番就很不容易了，欲速则不达。”

他说：“毛主席的话不说百分之百正确，也是百分之九十九是正确的。”

当问到他在部队里搞“军事俱乐部”，组织“反党小集团”时，彭德怀显得有些激动地说：“我当时确实写了《意见书》，61 年还写了‘八万言的长信’对我的问题申诉。我这里保存有这两封信的原稿，将来你们可以拿出来看看。有错误欢迎你们红卫兵批判。但说我组织‘反党小集团’和‘里通外国’问题，那是没有的事，全是假的，杀了头也没有！这是具体问题，你们可以调查。我对毛主席也谈过，这两点我要保留！”

谈到文化大革命，彭德怀说：“我支持拥护毛主席发动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毛主席伟大，敢于发动群众来一场大批判大辩论，让人民群众在运动中分清路线的是非好坏。谁是

好人，谁是坏人，好事坏事，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只要让大家都说话，才有办法分清楚。”“共产党哪能怕群众说话的呢！文化大革命好，就是让大家说话，什么不好的东西都可以揭露出来。”

彭德怀还说：“文化大革命的矛头是对准刘少奇、薄一波这些人的。我完全支持拥护。从土地革命时期、井冈山时期起，在大的问题上我都是支持毛主席的。我是直性子，有什么意见我都对毛主席说出来的。但刘少奇这个时期就整我，井冈山、长征，到庐山会议，都是刘少奇出卖我，使毛主席和我产生了许多误会，造成大的矛盾。刘少奇怕我对他当接班人不利，借机打倒我。刘少奇说过，其他人都可以平反，就是我彭德怀不能平反。七大时，我就对薄一波这些人登报自首出狱有看法，不同意选薄一波为中央委员，是刘少奇支持他们。刘少奇他们一伙早就不听毛主席的了，毛主席退居二线，刘他们不卖毛主席的账，严重脱离人民大众了，许多人都变成官老爷，欺压民众。他们每次运动搞的都是下面的干部群众，只有 59 年庐山会议搞了我，还牵连下面许多干部。”“四清运动还不是搞基层干部。”

他说：这次文化大革命的深远意义，就是从上到下，从下而上的揭批那些的当权派，防止党变质。

谈到红卫兵，彭德怀说：“没有共产党的官怕红卫兵的道理。你光明磊落怕什么呀！红卫兵大都是十七、八岁的娃

娃，真是可爱可敬！我举双手支持红卫兵运动，我要向你们红卫兵小将学习。我在青年时期也有过这个造反劲儿。”

彭德怀说，此前，西南局保卫部门的领导曾劝他到内江躲一躲，他坚决不去，他说：“哪有共产党怕群众的道理。”还说“庐山会议后长期闲居在京郊吴家花园，盼望为人民做点事。”

谈到大串联，彭德怀对着地图给学生们指长征串联的路应该怎样走，路上要注意什么事。

彭德怀豪爽、直率的性格，一下就感染了王大来他们。谈话的气氛友好融洽，北京地院的学生还不断起身给彭德怀的杯子倒水。

谈话结束时，彭德怀把大家送到门口。他意犹未尽，希望红卫兵了解自己、理解自己，也希望有人愿意倾听他说的一切。他表示，欢迎红卫兵再来。于是王大来他们在 15 日晚与彭德怀交谈后，又在第二天的上午和下午，到彭德怀那里谈了两次，并作了 50 多页的记录。

回到住地，这些红卫兵对彭德怀的话进行了分析。这时，他们已经开始称彭德怀为“老头子”了，并认为“老头子是对的”，还支持文化大革命。最后，他们对彭德怀居然同情到了这种程度，认为“毛主席和党中央可能不了解彭德怀现在的情况，我们有责任把彭德怀目前的情况和他的看法向毛主席和党中央和中央文革汇报”。最后，大家的一致认为，

彭德怀是拥护毛主席，拥护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是支持批判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现实表现很好。现在不应该忙着去揪斗彭德怀，转移了批判刘少奇反动路线的大方向。应该先向中央文革汇报请示，暂缓执行中央的揪彭指示。

16 日晚，王大来将大家讨论后的这个意见向朱成昭打电话汇报。朱成昭在电话里说："你管那么多干什么？中央叫抓，你就去抓。我看你们右倾。"

王大来坚持己见，与朱成昭在电话里吵了起来。最后朱成昭说："这事你不要管了，我通知王大宾马上到成都来负责这个任务。"

此时，王大宾正在重庆。他是 1966 年 10 月中旬和同学结队乘火车外出串联。原准备先到韶山和井冈山，然后沿红军长征的路线步行。可是刚到郑州，王大宾就生病了，难以行走，只好在武汉下车，先到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驻武汉联络站，经他们安排将他送进汉口协和医院，在那里住了一个多月的医院。上大学后就没有见过面的母亲听说王大宾生病了，一定要他回老家德昌养病。此时中央已下令停止红卫兵串联，病情已有好转的王大宾就和两名同学一起乘"东方红轮"在长江上航行了 5 天，于 12 月 15 日到达重庆朝天门码头。

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在重庆也有联络站，设在市中区临江门附近沧白路街边的一座小楼，是重庆市政协办公

楼。王大宾他们找到这里。12 月 16 日，联络站的同学陪王大宾和陪护他的两个同学参观了白公馆和渣滓洞，学习和悼念革命先烈。17 日上午，联络站负责人张家声、费安琪向外出回来的王大宾汇报说：朱成昭来电话，说奉中央指示要把彭德怀揪回京。要王大宾速往成都，负责集合地院“东方红”在四川的同学，完成党中央、中央文革交给的这一重要任务。

在“北地东方红”驻渝联络站楼里，王大宾遇到北京地质学院 66 届学生陈永迪，他也是和几位同学步行串联到重庆，恰巧这天来到“北地东方红”驻渝联络站。

王大宾和陈永迪都是 1961 年考入北京地质学院的四川老乡，比较熟悉。王大宾告诉陈永迪，“东方红”驻成都联络站和驻重庆联络站都接到朱成昭从北京打来的电话，传达党中央、中央文革的指示，要把彭德怀揪回北京。他问陈永迪：“听说彭德怀在成都，不知道他住什么地方，你家在成都，有没有可能藏在军区大院？”

陈永迪母亲在成都军区作军医，他家一直住在军区大院。

陈永迪告诉王大宾：“成都军区机关已经开展‘四大’，大院内战斗队林立，抄家之风盛行。军区主要机关分布在北较场和西较场，还有一些直属单位分布在成都各地，这么大的范围要藏个把人不难。但是，彭德怀这样的大人物，要安全保密地藏起来很难，除非军区领导对他采取特殊保护

措施。可是司令员黄新庭、政委郭林祥已经被批斗了，主要罪状是紧跟贺龙、罗瑞卿执行资产阶级军事路线，他们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没有心思也没有能力去保彭德怀这样的‘死老虎’，彭德怀如果还藏在军区大院，早就被机关的战斗队抓出来了。”

王大宾将陈永迪说的情况记在本上。他决定：在渝的同学除办展览的留下，其余全部到成都集中。同时又通知在成都联络站的同学，抓紧时间了解彭德怀的下落，准备行动。

当晚，王大宾就带领在渝的张家声、费安琪、陈永迪等十多位同学乘火车赶往成都，于 18 日早上来到设在四川省地质局机关内的“北京地院东方红驻蓉联络站”。

## 第 347 回：王大来，回京汇报说情况

### 捉“海瑞”，“北航红旗”下蓉城

在四川省地质局会议室，北京地院“东方红”在成都联络站的几位负责人：钱新、陈保堂、郑文卿、谭保华、张华清等同学和北京来的王大来一起，向王大宾汇报几天来的进展，他们将与彭德怀的谈话记录交给王大宾看，并谈了他们的看法，其中以王大来的发言最具代表性。他说：

“‘老头子’是革命功臣。刚到四川一年，表现很好。最重要的是‘老头子’拥护毛主席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支持红卫兵运动，赞扬青年学生的革命精神。认为发动文化大革命对防止共产党脱离群众很有必要，中国有希望，过去解决不了问题，现在可以解决了……‘老头子’对文化大革命的认识比我们还深刻，他不仅支持红卫兵，而且理解红卫兵的过火行为。他还强调：你们要注意政策，要团结多数。”

王大来还说：“庐山会议的事是老账了。在庐山会议上彭德怀讲的是实际情况嘛，高指标、浮夸风就是不对，亩产万斤是吹牛，下面的人欺骗毛主席，‘老头子’讲的才是真话。在‘老头子’面前我们没有批判能力。”

听到这里，王大宾有感而发地说：“1958 年高一，我当班长带领全班同学种试验田，挖地 3 尺，积肥十万斤，誓要小麦亩产上万斤。在生物老师的指导下，一亩地播了 60 斤种子，结果收了不到 200 斤，全班同学在试验田大哭一场。”

王大宾认真看了王大来他们和彭德怀的三次谈话记录后，也很同情彭德怀的遭遇，认为王大来他们的意见有道理。但“耳听为虚，眼见为实”，揪彭这是中央交办的大事，王大宾想亲自见见彭德怀，否则也很难下决心，做决定。

午饭后，王大宾和王大来、钱新等人，坐四川地质局车队许彬师傅开的车，一起去见彭德怀。

见面后，彭德怀握着王大宾的手，王大来向他介绍了王大宾。一直握着王大宾手的彭德怀，看着王大宾，微笑着不断点头说：“好！好！”当彭德怀听王大来说王大宾是四川德昌人后，又对王大宾说：“谢谢你也来看我。你那个老家德昌、会理、东昌、攀枝花我都熟悉啊。”

大家坐下后，彭德怀就和王大宾聊起了他的老家德昌，这位八路军的副总司令让王大宾非常敬佩，觉得就像自己长辈一样和蔼可亲，慈祥可敬。大家都不设防，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想问什么就问什么，就像一群学生围坐在老师身边，热烈地讨论问题。

谈到三年自然灾害，王大宾问彭德怀：“大跃进时放卫星，你说你不信亩产万斤。毛主席、刘少奇他们也是出生在农村，他们就相信？”

彭德怀说：“毛主席就是不相信这些鬼话，才派他的秘书田家英带人去做调查，还种试验田。毛主席要听到粮食真实亩产的数字。”

话题又转到庐山会议。彭德怀说："庐山会议本是一个工作会议，研究总结大跃进的工作，大家畅所欲言。""讲大跃进有得有失，……刘少奇他们本来对我们的看法都是有同感的。……不料毛主席讲话后，发展成那样，这些人都翻脸了，不认自己过去说过的话了。"

……

不知不觉，谈话进行了两个多小时。当王大宾他们与彭德怀告别时，王大宾在思想上已经完全接受了王大来等人的意见，在回联络站的路上，他就对王大来等人说："我支持你们的意见，回地质局我马上打电话向朱成昭汇报。"

回到省地质局，王大宾直接到总机房，接通了朱成昭的电话。他在电话里对朱成昭说：

"王大来的意见是对的，彭德怀对文化大革命的认识比我们还深刻。他来三线工作是毛主席安排的。……对文化大革命，彭德怀坚决支持拥护，支持红卫兵的革命行动。过去的问题，庐山会议已经解决，现在又没有发现新的问题。……这时揪斗彭德怀会转移斗争大方向。我们应该将这个意见向毛主席、党中央，向中央文革汇报，请他们考虑后再做决定。"

朱成昭听了王大宾的话后说："你口说无凭，也难以相信你说的情况，我不好汇报。你还是应先执行中央的指示。"

王大宾说："这样，我就让王大来、郑文卿明天坐飞机回北京，带上彭德怀与我们谈话的记录材料，当面向你汇

报。”

朱成昭问：“飞机票好买吗？要有团级以上单位的介绍信才能坐飞机的。”

王大宾说：“这事好办，我会安排好的。”

朱成昭：“那就这样吧。我等王大来回来汇报后再说。”

放下电话，王大宾立即和王大来等人商议，决定派王大来、郑文卿两人回京汇报。随即王大宾和钱新一起去找四川省地质局的造反派帮忙。地质局机关立即为王大来、郑文卿两人开了介绍信，还是地质局的许师傅开车，送王大来二人赶往成都人民南路的民航售票处，很顺利的买到了 19 日上午 9 时直飞北京的飞机票。第二天上午，王大来、郑文卿带着和彭德怀的谈话记录飞回北京。

王大来和郑文卿一到北京，立即赶回地院，找到朱成昭。

朱成昭一见他们就劈头盖脸的骂道：“你们把宝贵的战机失去了。”

王大来争辩说：“彭老头挺好，抓他不合适。”

朱成昭说：“根本不是这个意思，不管如何，要先把他弄回来再说，后面的事不是你们考虑的。”

接着，朱成昭耐心地听了他们的汇报，也认真地看了他们带回的谈话记录稿，觉得王大来、王大宾他们的意见有道理，于是决定立即向中央文革汇报。

朱成昭怕王大来说话太冲，安排了地院“东方红”作战

部部长杨雨中同学去向中央文革汇报。中央文革戚本禹接见了杨雨中。他还没有看彭德怀的谈话记录稿，就冲口对杨雨中批评说："你们立场动摇！你们上了彭德怀的当了！"

杨雨中争辩说："这几年，彭德怀有很大的进步。他不反对毛主席，拥护文化大革命。"

戚本禹很不高兴，更加严厉地批评道："你们这是不相信毛主席！毛主席和彭德怀斗了 40 多年，对彭德怀还不比你们了解？你们要管这件事，就要不惜一切代价完成任务。要不你们就别管了。"

对地院"东方红公社"向中央文革上呈的不应"揪彭"的报告中引用的彭德怀的那句话："毛主席的话不能说百分之百正确，也百分之九十九是正确的"，戚本禹批评说："彭德怀说毛主席的话百分之九十九是正确的，就是说有百分之一是不正确的。这是攻击毛泽东思想的新罪行！"

他最后说："你们赶紧再派人去成都，将彭德怀揪回北京。"

杨雨中走后，戚本禹觉得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不能完成揪彭德怀的任务，他对阎长贵说："你看，叫他们去揪彭德怀，他们却被彭德怀征服了！"

在一次接见北京高校红卫兵时，北航"红旗"二把手井岗山与戚本禹谈起叶剑英女儿叶向真 12 月 3 日晚"7 分钟闪电"抓彭真一事，认为这是叶剑英在背后支持的。戚本禹批

评他说："叶帅是毛主席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不要瞎猜。没事干去把'海瑞'抓回来。"

回校后，井岗山把戚本禹抓"海瑞"的话与韩爱晶说了，两人商量后，也派了几个精干的学生赶到成都。

再说地院的杨雨中回到学校，立即向朱成昭汇报了戚本禹的意见。朱成昭决定，派作战部副部长胡乐成赶赴成都，督办揪彭。他对胡乐成说："这次一定要把彭德怀揪回北京。有什么意见也要将彭德怀揪回北京再说。"

因等待北京飞成都的航班，胡乐成 12 月 22 日上午 11 时才到成都北京地院"东方红"驻蓉联络站。因为事前朱成昭未打电话通知成都，王大宾他们对胡乐成的到来颇感突然。

胡乐成一到地院驻蓉联络站就召集王大宾他们开会。他身着军大衣，趾高气扬，盛气凌人，俨然一副钦差大臣的架势，上来就开骂："你们都是饭桶！右倾机会主义！中央指示叫你们揪彭德怀回北京，你们不执行，还找这样那样的理由。你们都让彭德怀给迷惑了。为这事，朱成昭受了批评。中央首长说，你们负责这事的王大宾，犯了严重的右的政治错误，被彭德怀征服了。你们怎么是他的对手，一上阵就败下来了，一个彭德怀你们都揪不回京。我今天奉中央指示、命令，乘飞机来，要求立即把彭德怀揪回北京。来前，周总理又给了朱成昭三点指示，我现在给你们传达宣读：

1、北地'东方红'要和成都军区一起，安全地把彭德

怀护送回去；

2、为确保安全，只能坐火车，不能坐飞机；火车途中，随时向中央报告；

3、不允许在成都开会批判彭德怀。此事要秘密进行安排，不声张。”

胡乐成刚说完，20 多人的会场就炸了锅，大家对他的态度和出口骂人极为不满，会场一时混乱。

胡乐成见众怒难犯，又说：“这是你们干的好事，不执行中央揪彭指示，还派人回京汇报，递交什么材料。就是这样，朱头才被中央严厉批评。受了批评，大伙心里都有气。江青同志批评朱头，说他，你这也能那也能，一个反党分子彭德怀都揪不回北京。朱头心中有气，派我坐飞机来了。刚才态度不好，骂人错了，请大家原谅。”

这时，王大宾站起来反驳说：“我是‘东方红’的主要负责人之一，就是地院的老保也尊重我的人格，轮不到你来骂我们是饭桶。我们按照党的组织原则办事，没有执行上级指示，及时向上级汇报了没有执行的理由，这有什么错？”

胡乐成说：“中央首长点名说你犯了右倾错误，你还不认账？”

于是王大宾对胡乐成说：“你是专程来揪彭的，我又犯了错误，这事我就不管了，由你来管。我回家看老母亲去了。”

在场的同学都不卖胡乐成的账，没有一个人为他说话。

胡乐成冷静下来，知道得罪了大家，没有这些人帮助，他一个人也无法揪彭，就再次认错，说“对不起，请大家原谅。”并请求王大宾不要走，还是要负责这事。

这时，探工系刘志耕老师出来调解说：“既然中央否定了我们不同意揪彭的报告，派胡来责成我们揪彭，我们就应该服从和执行中央的指示，安全地把彭护送回京，这是件大事。”

刘老师又对王大宾说：“中央知道你在成都，总理有明确指示，你要执行，不要意气用事。现在大家都不听胡乐成的，万一出什么事，你如何向总理交代？还是配合胡乐成吧，不要争论了。”

刘老师的话提醒了王大宾，他对胡乐成表态说：“既然你是专门来揪彭的，你任总指挥，我们协助。”

当场进行了分工，胡乐成坐镇指挥，王大宾协助；由谭保华、陈永迪、张华清负责去成都军区联系护送事宜；钱新、陈保堂和四川地质局机关车队的许彬等人一起去成都铁路局联系回北京的专列。

下午 16 时左右，派出的人马分别回来汇报。

到成都军区联系的谭保华等人汇报说：“军区已接到总理的指示，决定由军区的一位二级部长负责与地院学生联系，成都军区派部队护送彭德怀回北京。”

到铁路局联系的人汇报说，成都铁路局表示大力支持，

经请示铁道部，决定安排三节车厢：两节硬座，一节软卧，挂在成都开北京的特快上。和成都军区联系，决定乘 12 月 23 日成都直达北京列车。地院的学生可以同车前往。

12 月 23 日凌晨 3 时，成都北京地院“东方红”驻蓉联络站就有人在喊：“快！起来！去抓彭德怀！”

听说抓彭德怀，同学们一个个像弹簧一样跳了起来，房间已灯火通明。

早上 6 时，天还漆黑，寒风飕飕。王大宾他们乘坐许彬师傅开的一辆“嘎斯 51”苏式卡车从四川地质局往城里疾驰。不到 20 分钟，汽车停在长不足 200 米的永兴巷。街的西边，可以看见位于署袜街的成都市邮电局，那是一栋由英国人建于 1901 年的很有特色的西式建筑，在一片低矮瓦房的胡同里鹤立鸡群。

此时，天已大亮。只见永兴巷 7 号，西南三线建委办公大院的大门开着。他们走进大门往东，来到彭德怀住的那个小院。只见小平房客厅的大门洞开，昏暗的灯光照着一个人的身影。走过去才发现是彭德怀的秘书綦魁英，他正在收拾卫生。客厅里空空荡荡，客厅东侧是彭德怀的办公室兼卧室，卧室里摆着一张普通的办公桌、一把椅子、一张部队营房里常见的硬板床，墙角放着一只箱子，但是没有人。

綦秘书认得王大宾和钱新，见到他们马上过来说：“你们这几天怎么没来？彭总还问我你们这几天来过没有呢。我

说没来过。他说和你们谈得来，欢迎你们来的。昨天上午，来了北京航空学院‘红旗战斗队’的学生找彭总谈话。他们态度很不友好，彭总生气了。今天凌晨 3 时左右，他们翻墙进来，把彭总抓走了。景希珍担心彭总的安全，坚持跟着彭总一起走了。彭总硬要我留在家里守候。”

北京地院的学生又去找大院门卫打听情况，门卫告诉他们，确实是北航“红旗”的人把彭德怀带走的，说是奉中央的命令，现在可能在北航“红旗”驻蓉办事处。

原来，就在当天凌晨 3 时，地院“东方红”他们刚刚起床的时候，就已有一伙带红袖章的红卫兵翻过彭德怀小院的院墙入院。

急促的敲门声把綦秘书惊醒了，他双手揉揉眼睛，从床上坐起，看看手表，凌晨 3 时半，心想深夜来人干什么?他立即警惕起来，慢慢穿棉衣，故意拖延时间，希望敲门声能让里院的景参谋、赵司机听见。但他们始终没听见敲门声。

綦秘书打开电灯，开了门，镇静地问他们：“你们有什么事?天未亮就来敲门，你们不休息，我们要休息，我爱人白天要上班，娃娃要上学，弄得全家人睡不好觉!”

领头的红卫兵说：“我们要找彭德怀谈问题，领我们走一趟，把彭德怀喊起来。”

綦秘书问：“你们是哪里的?!”

两个领头的红卫兵自我介绍说：“我们是北京航空学院

的。希望你不要当保皇派，站在革命学生一边。”

綦秘书说：“你们要见彭德怀，我要请示西南三线建委领导，组织上有规定。我是军人，要服从组织命令，不能自作主张。”

经过一番争吵后，红卫兵同意綦秘书请示建委领导，表示等他回来再商谈。

綦秘书摸黑跑步到大院主楼招待所二层三线建委副秘书长兼综合局局长杨沛家。杨沛正在熟睡，听到綦秘书急促的敲门声，立即披衣开门。綦秘书走得急促，未注意到身后还跟着几个红卫兵，杨沛一开门，他们就和綦秘书一起拥入杨沛家中，其中一人抢先开口道：

“我们是北航红卫兵，来之前，江青同志接见了我们，她支持我们的革命行动。我们有任务，要将彭德怀带到北京，不会伤害他，赶快给安排飞机！”

杨沛一听，赶紧说：“我哪里有这么大本事安排你们乘飞机！”

这时，有人喊道：“这家伙是保皇狗，找他没得用，快去抓彭德怀，不要让他逃跑了。”

几个红卫兵调头就走，杨沛赶紧给住在总府街招待所西楼值班的三线建委钱敏副主任打电话请示。事关重大，钱敏答复道：“立即打电话请示国务院……”

院子里的吵闹声把彭德怀惊醒了。他拉开电灯，喃喃自

语："天还没亮，吵什么呀?"随手开门来看究竟。

有人发现了彭德怀，便冲了过去，大声说道："彭德怀!跟我们走一趟，有问题要和你谈，我们不会伤害你。"

彭德怀说道："走就走吧，让我穿件衣服。"

然后，彭德怀跟他们坐上一辆卡车疾驰而去。

第 348 回：周恩来，再下达电话指示

“天”“地”争，彭德怀专列离蓉

12 月 23 日清晨 6 时，西南建委与总理办公室的电话接通了。周恩来的秘书周家鼎听取了杨沛的汇报后，立即报告周恩来。

“哪里的红卫兵？”周恩来问。

“北航‘红旗’。” 周家鼎说。

“彭德怀同志现在在什么地方？”周恩来又问。

“现在还不清楚。”

周恩来吩咐：“立即告诉西南建委和成都军区，马上寻找彭德怀同志，找到后迅速报告中央！”

接着，周家鼎认真记录下周恩来的指示：“请以中央和我的名义给西南建委、北航‘红旗’的同学们、成都军区、北京卫戍区去电：中央同意彭德怀同志回京。但要严格执行以下三条：一、不要在成都斗争彭德怀。二、迅速把彭德怀接回北京。三、坐火车，不要乘飞机。接送由地质学院‘东方红’与军队负责。沿途一切事务由总理办公室安排（由北京卫戍区派出部队在北京等候，并负责安排彭德怀同志的生活和学习）。同时通知北航‘红旗’的同学。各单位必须严格执行，绝对保证彭德怀同志的安全，对他的生命安全各单位要向中央负责。”

周家鼎接通西南建委的电话后，传达了周恩来的指示。尔后，他又通知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到总理办公室接受任务。傅崇碧正在主持会议，就让政治部主任周述清前去代受任务。

周述清一到，周恩来立即布置：“你们卫戍区马上组织力量，近

日准备将彭德怀同志接过来，负责他的生活和学习，要专人负责。有问题要及时报告。”

周述清走后，周恩来叮嘱周家鼎：“要时刻注意西南的消息。”

北京地院“东方红”与北航“红旗”在成都地区各支持不同的造反组织。地院“东方红”支持“川大八二六”和“成都工人造反兵团”。北航“红旗”支持成都电讯工程学院的“成都红卫兵部队”，所以北航“红旗”驻蓉办事处就设在成都电讯工程学院。

得知彭德怀被北航“红旗”抓走的确切消息后，王大宾、胡乐成、钱新又让许彬师傅开车把他们送到了成都电讯工程学院，找到北航“红旗”驻蓉办事处，看见这里只有十几个北航学生。

王大宾、胡乐成开门见山，和北航学生谈判，要他们把抓走的彭德怀交给地院“东方红”，说：“是周总理、中央文革指示，要我们地院‘东方红’负责，将彭德怀送回北京。”

北航的学生开始不承认是他们抓走了彭德怀。后来虽然承认了，但坚持说，他们也是奉中央文革的指示，要把彭德怀揪回北京。并且说，是韩爱晶亲自打来电话，下达的命令。现在他们正在联系飞机票，准备乘飞机将彭德怀带回北京。

胡乐成一听便说：“周总理有明确的指示，其中一条就是彭德怀只能坐火车，不许走坐飞机，要保证彭德怀安全，为此周总理还指示成都军区派人配合我们。”

王大宾接着说：“你们一没有周总理的指示，也没有解放军支持，这是违背周总理指示的。要不你们把彭德怀交出来，我们共同揪他回

京。”

北航的学生说：“你们说的也有道理，但我们执行的是韩爱晶的指示，我们要请示韩爱晶。”

双方就这样耗了将近 3 个小时，四川地质局一人过来悄悄告诉王大宾：“彭德怀已经找到了，就在成都地质学院。”

听到这个消息，王大宾招呼胡乐成和钱新，说是要出去商量一下，赶紧离开了北航驻蓉办事处，赶回四川地质局。

原来，在王大宾、胡乐成、钱新他们在成都电讯工程学院与北航“红旗”的同学谈判的同时，北京地院“东方红”驻蓉办事处的同学也在通过成都造反派组织寻找彭德怀的下落。这时，成都地质学院车队的一人告诉地质局的许彬师傅，说彭德怀在他们学院，是北航“红旗”用他们车队的车去抓的彭德怀，就关在学校的一个大教室里。

许师傅听到这个消息，立即和北京地院“东方红”联系，并为他们派了两辆宣传车和一辆华沙牌小轿车。北京地院 30 多名师生赶紧乘车向位于城东北郊的成都地质学院进发。到那里后，即分头打探关押彭德怀的地点。很快就有人报告说，成都地质学院“解放大西南公社”占领的一座教学楼已被围护起来。北京地院的谭保华等人分析，彭德怀很可能就在这座楼里。他们很快就找到了这座楼，发现楼门口都用砖砌起来了，于是不管三七二十一，一窝蜂冲了进去，发现楼内空荡荡的没人，原来此时正是吃午饭的时候。谭保华来到二楼，在一间大教室里找到了彭德怀，只见他戴着一顶黑色毛料的前进帽，坐在实验桌边，旁边站着他的警卫景希珍。

彭德怀认识谭保华，很平静的向他点了下头。谭保华对彭德怀说："彭总，接到中央文革的指示，要我们护送你回北京。"

彭德怀爽快地说："去哪儿都行。"说着，提起他随身带着的手提旅行包。

这时，教室外已挤满了人，吵吵嚷嚷的。

突然，有人说："彭德怀出来了。"嘈杂的楼道突然安静下来。只见那间教室的门被打开，楼道里的人群开始向两边闪开，谭保华等人先从教室里出来，紧跟其后的是彭德怀。他们来到大楼外，彭德怀被送进那辆华沙牌轿车。轿车前有一辆宣传车开道，轿车后也是一辆宣传车。当他们来到成都地质学院大门时，遇到几个不明身份的学生阻拦。但他们毕竟人少势单，很快让出了通道。不久，队伍安全到达了四川地质局。

当王大宾和胡乐成回到地质局时，地院同学已把彭德怀安排在四川地质局局长那间带套间的办公室里，彭德怀住里屋，学生住外屋，每间房的面积大约 20 平方米。里屋有床和沙发，外屋的地上铺干稻草代床。四川的冬天潮湿而寒冷，地质局车队徐彬师傅专门给彭德怀住的屋子端来了火盆。考虑到彭德怀是上了岁数的老年人，专门给他开小灶。

彭德怀到地质局机关后，为了防止北航"红旗"再来抢人，许师傅将办公大楼进出通道都封锁了，一般人不能进办公楼。北京地院"东方红"将情况通报了成都军区，成都军区很快也派了一个排的军人过来警卫。

由于发生了这一波折，按照原计划乘坐12月23日成都直达北京列车已不可能，只好重新安排专列。王大宾召集谭保华等人开会，决定兵分两路：谭保华等人继续去成都军区联系共同护送彭德怀进京的事；陈保堂、钱新则再去成都铁路局联系专列。

谭保华他们到成都军区后，军区作战部部长汤野接见了他们，对他们说："军区也接到了周总理的指示。军区领导已安排军区副参谋长古万才负责配合你们执行这次护送彭德怀进京的行动。"

陈保堂这一路不太顺利。他们到铁局时，局领导正好有事，不能见，要等到晚上才行，而且还要请示铁道部才能最后决定。这样，王大宾他们一直等到23日深夜才得到成都铁路局回话，说已请示北京铁道部，最快也只能安排在25日。在成都至北京的34次普快后面加掛一节软卧。王大宾他们只能同意，回京时间就这样确定在25日。

当晚，王大宾过来看彭德怀，他正和几个地院同学聊天，谈得很热闹。彭德怀看见王大宾进来，和他点点头后就看着他。王大宾见状，便开门见山地对他说：

"中央叫我们负责接你回北京。""你在这里很安全，没有外面的人敢来动你。成都军区也派了解放军在大楼外站岗。周总理对接你回京有指示。我们按总理的指示，这在为你安排专列，""你回北京，要比在外地安全。"

彭德怀笑着说："你们地质学院的同学第一天来和我座谈，我就知道你们是有备而来的，有任务而来。你们很真诚，我喜欢和你们摆'龙门阵'。"

地院的同学都想趁这个机会和彭德怀见见面，聊两句。24 日上午，大家来到彭德怀住的那间局长套间，席地而坐，围着彭德怀向他提各种问题。

陈永迪好奇地问彭德怀多大年纪。彭德怀用浓重的湖南口音说："今年楼拾八，比李井泉大十一岁。"

有人问他怕不怕红卫兵。彭德怀说："我不怕红卫兵，我愿意和红卫兵交朋友。"

他接着说："红卫兵响应毛主席的号召闹革命，大方向是正确的，但是你们也有缺点，不注意团结人，打击面过宽。当年在井冈山的红军也犯过打击面过宽的错误，红军曾经把中农当作革命的对象，烧过他们的房子。"

有些学生赧然，红军一贯纪律严明，这可是第一次听说，居然还烧中农的房子！

还有人问他为什么要上街看大字报、捡传单。

彭德怀说："'五·一六通知'后，西南局停了我的文件阅读权，只有从街上的大字报和传单中了解运动情况。"

令人惊讶的是彭德怀分析街头信息的深度，虽然他看不到中央文件，但能准确地指出运动的矛头是对准刘少奇的

说到文革，话匣子打开，有同学说："我们的邻居北京钢铁学院院长高芸生经不起工作队的批斗跳楼了。地院同学怕我们院长高元贵出事，不少同学给他鼓劲：地院的大多数师生都是信任你的，千万不要出钢铁学院高芸生的事……"

彭德怀听了说："59 年庐山会议后，我向毛主席作了三条保证，其中一条是任何情况下都不会自杀，要相信人民，相信群众。"

当有同学说到地院党委周副书记生活作风不正派，搞婚外恋，文革开始后，这些事揭发出来，大家叫他"周八戒"。彭德怀听后说："'猪八戒'是天蓬元帅，还有点本事，除妖降魔是有功的，缺点嘛，好色！一见漂亮的妖精就迈不开步了。在信仰上不坚定，一遇到困难就发牢骚，想分东西回他老婆的高老庄，还有点小私心，大耳朵里攒私房钱……"

大家都笑了。

当探工系的同学说到地质部派的工作队打击一大片，以高元贵身为地质学院院长三年不进地质部的门为由罢了他的官，长工出身的院党委常委、保卫处长李贵去中南海上书，6 月 20 日学生在学院内游行支持李贵，彭德怀插话："看来李贵同志和我一样都是大老粗。"

学生们也向彭德怀提庐山会议的事，他只是反复强调他不反对毛主席。他说："毛主席的话不能说百分之百正确，也是百分之九十九是正确的。"

后来，有人又问朝鲜战争的事，听说他搞大国沙文主义，不能平等对待金日成。彭德怀说："志愿军和金日成的关系很好，完全平等，不存在大国沙文主义。双方也有些分歧，例如志愿军的后勤调度权掌握在谁手里，金日成主张火车一过鸭绿江调度权归朝鲜，我们主张过了鸭绿江也要归志愿军统一调度，分段调度会贻误战机，给志愿军的补给造成困难。"后来金日成也同意了他的意见。

彭德怀还说："第三次战役结束后，志愿军已经连续作战了三个多月，非常疲惫。后勤补给很困难，前线战士吃不上饭，伤员送不下来，弹药接济不上，急需休整。我请示毛主席要求休整三个月，毛主席同意。但是，金日成和苏联顾问非常不满。说世界上哪有打胜仗的军队不追击敌人的，他们主张趁热打铁。我坚决不同意。后来，毛主席提出志愿军守在汉江以北，金日成带他的部队打到南方去。"金日成最后被迫同意彭德怀的意见。

谈到朝鲜战争时，彭德怀对毛泽东的儿子毛岸英的牺牲表示了极大的内疚和自责。

1950 年 10 月，在毛泽东亲自说情下，彭德怀终于同意毛泽东的儿子毛岸英随他一起出征朝鲜。那年 11 月 25 日上午 10 点多钟，美军轰炸机机在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扔下了几十颗凝固汽油弹，正在山洞内值班的毛岸英被烧死在山洞内。

大火扑灭后，有人找到了毛岸英的手表，把他交给彭德怀，他噙着泪水，把表递给秘书说："暂时保管一下。"话音小得几乎听不清。过了一会，彭总突然大声哭喊起来，嘴里不断地重复着："毛主席把岸英交给了我，我太大意了……"

埋葬了岸英之后，彭德怀即令秘书给北京拍了电文：

"今天，志愿军司令部遭到敌机轰炸，毛岸英同志不幸牺牲。"

当毛泽东得知毛岸英牺牲的消息后，难过了很长时间，其内心的痛苦可想而知。后来，彭德怀回国向毛泽东汇报工作时，毛泽东没有怪罪彭德怀，而是宽慰他说："搞革命嘛，总是要死人的。岸英是一

位普通战士，献出了年轻的生命，他尽了一个共产党员应尽的责任，不能因为他是我的儿子，就不该为中朝两国人民共同事业而牺牲，世上哪有这样的道理呀!哪个战士的血肉之躯，不是父母生的?”

此时，彭德怀说：“我最感到对不起毛主席的事，就是在朝鲜战争中没能保护好毛岸英。我对不起毛主席。岸英牺牲，我三天不吃不喝，难过极了。”

彭德怀叙述了毛岸英的成长过程，然后说：“岸英牺牲那天，也是我一时固执，司令部的同志们都要我尽快撤离，我坚持不撤，是被强行拉出指挥部的。岸英同志忙于收拾司令部的文件，仅仅晚撤了一步，造成大祸。”讲到此，彭德怀流下了眼泪，半天不再说话，表情痛苦极了。

彭德怀生活朴素作风廉洁是有名的。同学们对他的生活习惯也充满好奇，当天吃晚饭的时候，在地质局机关食堂遇到一个穿便服的人，见他端了一碗清汤面正往办公楼走，说“彭总胃不好，平常就吃碗面条，生活很简单。”彭德怀生活艰苦朴素的美名果然名不虚传。

24 日，周恩来在电话记录单上批示：“通知总参，如带来京，应乘火车，不乘飞机。”

## 第 349 回：伤未愈，罗瑞卿首次被斗
## 封湘报，惊现“密令 007”

25 日下午，北京地院“东方红”钱新、陈保堂、谭保华等人再次和成都军区、成都铁路局联系，检查准备情况。专列是挂在去北京的 34 次快车尾部的一节软卧，供彭德怀和护送的部队乘坐，软卧前面又挂了两节车厢供地院师生乘坐。为了确保安全，出发前谭保华去火车站派出所，称：“有首长去北京，请准时打开首长专用通道。首长的车到时按三声喇叭，请派出所所长亲自打开大门。”

考虑到车过秦岭气温骤降，开车前谭保华还专门试了暖气，发现暖气管没有接通，立即要求铁路局派工人修复才出发。

依然是许彬师傅开车，在成都军区带队的谷参谋长和一个排战士的护送下，将彭德怀送进专列车厢。

待彭德怀坐定，王大宾对他说：“有谷参谋长和钱新同学陪你回京，我就不陪你去了。我还要回家去看我妈妈。”

彭德怀说：“好的，已经很麻烦你了，不用送了，快回家看你妈妈吧。”

王大宾又跟成都军区带队的谷参谋长说：“彭总就交给你了，你保护他回京，有事就找钱新，我的任务完成了。我要回家看老母亲。也要养养病。”说着就离开车厢下了车。

谷万才随后跟了下来。他对王大宾说：“你不能走，必

须和我们一起回京。总理知道你在成都。总理交办的任务，我们要一起完成。安全护送彭回京是大事，不能出差错。地院‘东方红’都听你的话，我指挥不了你们红卫兵。”

这时，北京地院探工系刘志耕老师走过来，非常严肃的对王大宾说：“谷参谋长讲得很对。你必须和他一起，按照总理的指示，护送彭德怀安全回京，这才能说是完成了任务。”

于是，王大宾又返回了专列，和钱新一起在彭德怀的那个软卧包厢内。地院同学都想过来和彭德怀聊聊，提提问题。都过来不可能，人太多，也坐不下。王大宾就和大家商量，统一安排，每次只能 4、5 人过来，时间不超过 10 分钟。

北京地院“东方红”到四川演出的宣传队也乘这趟车回京，他们主动提出给彭德怀表演节目。每到大站，同学们下车买了好吃的东西，上车后一定要请彭德怀品尝。

12 月 26 日，戚本禹给江青写信说：“彭德怀现在已经被红卫兵抓住，一二日内即要押送回京。北京的学生，已经做好了斗争的准备。”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罗瑞卿还躺在医院里接受治疗。这一时期虽然遭到批判，但比起正在台上的那些当权派，他还是比较安宁的，基本上没有什么人来骚扰。当时他右脚跟已经愈合了，但左脚的伤口怎么也　　长不好。1966 年 12 月 17 日，已经住了 9 个月医院的罗瑞卿提出要回家。周恩来同

意了罗瑞卿的请求。没想到，还没等出院，12 月 20 日深夜，一群红卫兵突然闯进了罗瑞卿的病房，罗瑞卿从梦中惊醒，只见那些红卫兵对他大声喊道："穿好衣服，走！走！"

罗瑞卿忙问："什么事？"

他们还是这两句话："穿好衣服，走！走！"

罗瑞卿仍然坚持问："到底什么事情?要说清楚才走。"

红卫兵们不管三七二十一，用病床上的床单将他一包，抬起还穿着病号服的罗瑞卿，连拖带拉塞上了汽车，带到了一个地下室里。接着他们又让罗瑞卿坐上汽车，将他拉到郊外罗道庄卫戍区警卫 2 师的驻地，关进有解放军警卫看守的一间房子里。一间小房里有一张床，门口放了卫兵。此时天还未亮。罗瑞卿就这样结束了他将近 9 个月的医院生活。

罗瑞卿以为终于可以安定了，他刚睡下，又进来 3 个穿军装的红卫兵，大声地把罗瑞卿叫起来，要他交代罪行。

罗瑞卿说："我不知道你们让我交代什么？"

他们说："哼!彭罗陆杨，你是第二名，你不知道交代什么?"

站在门外的一个人说："他妈的，要当国防部长，还反对林副主席。"

罗瑞卿争辩说："我没有。"

这几个人走后，又过来一个穿军大衣的人对罗瑞卿说："好好躺着想想吧，你是怎样反毛主席的?"

他走后，罗瑞卿问警卫战士："他是什么人？"

警卫战士说："是专管你们这号人的。"

同样是在这天夜里，子时已过，大约时凌晨1时多，罗瑞卿家里也来了一伙红卫兵，把郝治平抓走了，同一辆车还抓了肖向荣、梁必业，将他们一起拉到总后大院的一个楼上，面墙而坐，天亮后又被拉到高等军事学院。

郝治平因为抓走时很仓促，只穿了一件薄毛衣，一条薄呢子裤，寒冬季节，太冷了，就提出要穿棉衣棉裤，而且被抓走时没有带牙具、毛巾，脸都不能洗，红卫兵让她自己买一套。

上午，来了一个穿军装的人。一进门就很凶地吵着说："你这个人，连买个牙膏和肥皂都说不清楚，怎么搞的!"进到屋里，他就小声地对郝治平说："我给你把棉衣裤送来了，我到你家里去了，孩子们都很好。我去的时候他们还在看电视呢。"

这个人是谁呢？郝治平一下子想不起来。

那人悄悄地说："我姓李。"

郝治平问他叫什么，那人摇摇头说："北戴河，钓鱼。"

郝治平一下子想起来，他曾到他们家替过卫士长的班。说完这些话，那人又大吵大嚷地走了。这些棉衣棉裤对郝治平来说，送得太及时了。

24日早晨，罗瑞卿接到通知："今天要开会，穿上从家里

拿来的棉衣，要穿厚一点。”

一个卫生员拿来厚厚的两卷绷带，把罗瑞卿带着伤口的那只脚包了又包，扎了又扎。

吃过早饭，罗瑞卿被押上车来到了工人体育馆。这天,在京的 27 所军事院校和其他院校的红卫兵一万余人在工人体育馆召开“批判以罗瑞卿为首的篡军反党集团大会”，批斗罗瑞卿、萧向荣、梁必业，陪斗的有郝治平、王尚荣、陈鹤桥、史进前等人，他们也在这天一早被拉到了工人体育馆。

这是罗瑞卿首次被斗。

我们再看此时的湖南。虽然中央已明确表示不同意成立国际红卫兵组织，但几个远在长沙的北京与湖南的红卫兵异想天开，依然希冀让红卫兵运动冲向世界。这个天方夜谭般的主意居然得到不少青年人的响应，于是在长沙成立了“国际红卫军工人总部”，而且很快发展为一个拥有数万人的大造反组织。开始，还真有两个在一家大国营工厂实习的新西兰女青年参加了“国际红卫军”，也跟着去造了几天反，只是不久，中央来了文件明确指示，不能让外国人参加造反组织，“国际红卫军”负责人才将这两位新西兰女青年劝退。

长沙 “湖南井冈山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成立后，长沙中学生形成“长保军”与“造反有理军”、“井冈山红卫兵”三分天下的格局。12 月 3 日，长沙“井冈山红卫兵”封了《湖南日报》。“高司”驻该报矿冶“全无敌战斗队”对

此提出强烈抗议，并要求参加这次封报行动的湖南大学“河东战斗队”撤离。

12月5日，湖南“红色造反者赴京联合指挥部”在北京民族宫召开“愤怒声讨张平化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滔天罪行大会”，会上，“湘江风雷” 在“11．19流血事件”中被打的工人陈国亮的带伤上台控诉，中央文革小组和《解放军报》社派人参加了大会，会后慰问了伤员，并对大会执行主席张楚梗说：“同志们打得这个样子，湖南的问题很严重，我们一定马上向中央汇报。”

与此同时，长沙的“红色怒火”组织正式成立，该组织以长沙的“土联动”闻名，其组织负责人为区办工厂工人、武装民兵曾有根和区办工厂普通干部、基干民兵彭湘华等。它以原“长保军”和“八一兵团”的骨干为基础，成员以武装、基干民兵为主，下设了“红色怒火工人总部”“红色怒火贫下中农总部”和“红色怒火红卫兵总部”。

12 月 9 日，“长保军”、“八一兵团”强行启封《湖南日报》，“湘江风雷”总司令部派出“金猴战团”和“卷巨澜战团”前去支援“井冈山红卫兵”。第二天，双方在报社发生大规模武斗。“湘江风雷”、“井冈山红卫兵”等组织组成“长沙市革命造反者联合指挥部”，重新封闭《湖南日报》。省委派出代表，答应与封报组织谈判。到 12 月 13 日，“长沙市革命造反者联合指挥部”的代表与中共湖南省委代表通

过谈判，达成初步协议，并发表“联合声明”。“声明”同意《湖南日报》暂时停刊，停刊期间，《湖南日报》印发《人民日报》航空版发行。“声明”还说：“凡参加封闭《湖南日报》这一革命行动的工人、干部一律作公假处理，工资照发。”

12 月 18 日，长沙铝厂“亦工亦农”制人员，即农忙时务农、农闲时务工的非正式工人葛建华到“湘江风雷”总部反映，他 11 月 15 日在省委门前，看见从省委内疾驰而出的一辆军用摩托车上掉下一个小纸团。捡起来一看，脸都吓白了，原来是个发动兵变的手谕，署为“密令 007”。回去将手谕的字迹与中央领导人对雷锋的题词对比，发现为周恩来所书。他将手谕塞进挂蚊帐的竹竿，并向一位室友透露了这一秘密。随后，那位进厂才一个多月的室友便失踪了，手谕也不翼而飞。葛建华回忆说，手谕的内容是：“命令你部师、团和民兵师团，于十二月十六日晚统一游行会议，拟于元旦政变。手谕”

“湘江风雷”总部人员闻言大惊，随即派人赴京向中央反映。

其实，“密令 007”不过是一个漏洞百出、编造拙劣的天方夜谭。发动兵变何以要用手谕？送绝密的手谕为何要用毛手毛脚的普通通信兵？事关社稷安危、党国命运的发动兵变的手谕为何又会落到了市公安局这样一个县处级单位？后来被湖南军区关押的葛建华也承认是存心捏造，其目的无

非是想捞一个赴京向中央文革汇报的由头，以便看看天安门，游游长城。

12 月 20 日，“湘江风雷”、“井冈山”等 16 个组织讨论通过了“向中央文革小组的报告书”。报告书“恳切请求陈伯达同志、江青同志亲自接见湖南赴京代表团。” 并请求改组湖南省委，罢张平化的官。报告书还说：“湖南军区对抗中央军委指示，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与革命群众相对立，犯了严重的错误，破坏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崇高声誉，必须向全军指战员、全省人民做出深刻检讨。”

这天，湖南省委代理宣传部长徐天贵，《湖南日报》副主编曾汉基随湖南“长保军”进京告状。12 月 21 日，陶铸接见全国新闻界赴京人员，徐天贵他们和“长保军”赴京告状团也参加了接见会。

## 第 350 回：洪飙起，“湘江风雷”轰陶铸

## 发“九轰”，《四川日报》也被封

12 月 22 日晚，在中南海小礼堂，陶铸接见湖南赴京代表团。当陶铸走进会场时，群众高呼“罢张平化的官，撤张平化的职！”“打倒张平化!”等口号。湖南“红色造反者”赴京联合指挥部代表首先发言，强烈要求改组湖南省委，罢张平化的官。接着，湖南赴京代表团代表宣读了“向中央文革小组的报告书”，并要求陶铸表态。

陶铸听了湖南代表汇报湖南发生的“1119”流血事件后说：“我看到了很多遭受迫害的同志，我很难过，我讲一些看法，我希望早日恢复健康，回到工作岗位上去。我们支持你们。

同志们集中的一个问题，就是要改组湖南省委，打倒张平化，罢张平化的官。许多口号，我举了手，你们喊：‘打倒张平化，罢张平化的官，撤张平化的职’我就没有举手，但心里是举了手。我不好表示态度，因为中央没有做出决定，如果我举了手，那就是中央做出了决定。但是，同志不要以为我包庇张平化，同志的要求是正当的，合理的，有道理的。我内心是支持你们的，我一定要亲自反映给毛主席、林彪同志、周总理、陈伯达同志，反映给党中央，等做出了决定，我一定到湖南去举手。”

下边一片热烈掌声。

陶铸接着说："毛主席很关心湖南问题，如果我今天答应罢张平化的官，你们打电话回去，当然是一个好消息，这也是一个很容易办到的事，我一定报告毛主席，林彪同志、周总理、党中央会慎重考虑这个问题的。我们不妨等一等，看一看，改组一个省委也不困难，罢官也是容易的。如果改组罢官，3800万湖南人民就没有斗争目标，中央又派谁去呢？张平化是中央派去的，是党中央批准的，也是张平化自己请求的，他说是回去认罪造反的，如果罢了张平化的官，又派个什么人去呢？如果这个人又搞什么鬼名堂，同志们的斗争就没有目标。你们要做到仁至义尽，他死不悔改，你们都坚决罢他的官，张平化回湖南，运动搞得很坏，根据我所接触的省份来看，湖南的问题是很严重的省份之一，你们的要求是正确的，有理的。在这里，我不能做出肯定答复。我一定报告给主席、中央，由主席决定，我们一定要彻底批判湖南省委所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陶铸说："中南区的文化大革命有问题，我是有责任的。就是到了中央，中南局的工作，我在中央也是要过问的。工作没有搞好，湖南张平化调去，总的，是搞得很坏。挑起'819'事件是湖南王延春怕字当头，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所抛出的。湖南大学同学拿了几桶浆糊到市委贴大字报是好事嘛！发生事件是湖南王延春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搞的。'819'发生以后，中央认为王延春犯了严重错误，当时我们认为王延

春不行，张平化自告奋勇，张平化原是武汉市委第一书记，湖南省委第二书记，对湖南省情况比较了解，我们就把他调到湖南去了。这次从湖南回北京，在湖大讲了话，要认罪，造反，这还可以。过了几天就反击，我当众打电话警告了他。

我们看了张平化‘924报告’，这个报告是错误的。以后又搞了个‘中央八条’，又进行大反击，这样搞是错误的。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批判了他，在北京的革命师生开了大会批判了他，要他回去作检讨，彻底改正错误，把湖南文化大革命搞好。但他回去下的决心不大，没有成绩。”

“我们原来看张平化比较老实，工作能力不强，有点保守。这次在中央面前说，回去认罪，造反，可是回去就抓‘黑鬼’，这是为什么？这就是不老实。现在我讲一句老实话对他的看法不同了。我们原来还寄于一点希望，现在看来落了空，没有执行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打击革命群众，你们提出罢张平化的官，撤他的职，这是有道理的。”

群众插话：“张平化不是没有工作能力，‘长保军’带着凶器来北京的还要为张平化平反。”

陶铸说：“‘长保军’来北京，我不管他，我只接见了你们，没有接见他们嘛！”

代表长时间鼓掌。陶铸继续说：“对张平化还寄于一点希望，我不是包庇张平化，这不是折衷，再看一看。”

群众插话：“不能再看了，那又会要死人。”

陶铸："我们派他回去，不改，回去搞的错误很大，我看再让他搞一下，让他多暴露一些出来，我对他的看法，原来估计过高，张平化回去和我想象的不一样，照理讲是可以撤他的职的，你们回去造反，要猛烈的炮轰，猛烈的火烧。强迫他革命，我坚决支持你们！党中央支持你们！毛主席支持你们！"

长时间热烈鼓掌。

陶铸："张平化如果改变了，可以让他再搞一下。再看一两个月，时间并不长，这是我个人看法。如果今晚要罢，我同意罢，现在罢了他，再派一个李平化，可能比张平化更坏，他还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就把他打倒。你们有集会、出版、游行，结社的大民主，党中央支持你们，你们还怕张平化干什么？我们不允许张平化再犯错误，如果再犯，我们坚决打倒他！我看这个方针是正确的，中央文革，党中央是支持你们革命行动的！"

热烈鼓掌。

散会后，"湘江风雷"名誉队员、"首都三司"红卫兵、中央民族学院学生洪飙回到学校后，通夜未眠，起草《给陶铸贴一张大字报》，并于 12 月 23 日，以"湘江风雷战士"的名义，在中宣部贴出了这张大字报。12 月 23 日晚上，"湘江风雷驻京联络站"将大字报全文打电话告诉长沙的"湘江风雷"总司令部，总司令部坚决支持，后又抄成大字报并开

宣传车广播。

12 月 25 日，洪飙与“湘江风雷驻京联络站”一同讨论研究，又在中宣部贴出《炮打陶铸，揪出张平化》的大字报。

12 月 27 日，张家政打电话给“湘江风雷驻京联络站”彭克刚，要他们在北京成立“专揪陶铸战斗队”。“湘江风雷驻京联络站”于当天即成立了“专揪陶铸战斗队”。

12 月 29 日，“专揪陶铸战斗队”彭克刚和洪飚去学部“红卫兵联队”，与学部的“专揪陶铸战斗兵团”联系，互相交换了意见和材料，并成立“批陶联络站”。

此时，《四川日报》也在 12 月 18 日，被以四川大学“井野”为主的群众组织给封了。“井野”成立于 1966 年 10 月底，成立后杀向社会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炮轰《四川日报》。在两个月的时间里，他们陆续贴出 8 篇炮轰《四川日报》的大字报。到了 11 月 29 日，经过斗争，还让《四川日报》社将这“八轰《四川日报》”的大字报铅印出来，随《四川日报》发行。这些随报发行的大字报在成都刚一散发，即引起一场激烈斗争，省委有人要求《四川日报》编委和四川省邮电管理总局停止散发，并收回已散发的大字报传单。四川医学院保守组织“斗批改战斗师”更是派出数百人的队伍强行闯入报社，砸烂了铅版，撕毁了纸型，并烧毁了几万张印好的大字报传单。“井野”见状，即将“八轰《四川日报》”大字报印成小报散发，而且还仿照中共中央的“九评苏共修正

主义”的文章，在 12 月 15 日又写出“李家王朝的西南黑报——九轰《四川日报》”，凑成九篇炮轰《四川日报》的文章。他们在文章中发出这样的号召：“这样的报纸，是人民所喜欢的报纸吗？不是！这样的报纸，是中国共产党的党报吗？不是！这样的报纸，能传播毛泽东思想吗？不能！这样的报纸，不能办了！”

胸牌

最高指示

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剑不容使的民众大联合，我们应该彻底进行。

凡是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进舆论，总要先做组织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

《四川日报》是資产阶級的反动喉舌！

野火燒不尽，春风吹又生！

——代按語

步！对于我们调查《四川日报》为反对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真行的革命工作以来，他们的行径不胜枚举，他们的罪恶滔天，不是罄竹难书了吗？

总之，其罪状声音是逃不掉的，革命群众是饶恕不了。部分群众说：只有自杀灭亡！

我们亲工人同志们的天月协同下，坚决工篡夺大权，以同志们的意见，查查《四川日报》究竟成什么样的修正主义黑店！

我们要深刻印发给每《四川日报》的文章，组织《四川日报》每个角落、每个每的罪恶滔天的方法。

《四川日报》只能是无产阶级的喉舌，只能是宣传毛泽东思想的阵地。同志们，加油干吧！

井岡山野战軍川大縱隊

車馬要打倒，主帅保不了

——三查《四川日报》

前言

[附：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忌]

荷大次日：要图变天



3 天后，12 月 18 日，“井野”、“8.26 战斗团”、“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等 21 个群众组织发出“封闭《四川日报》造反声明”，宣布从 12 月 18 日起封闭《四川日报》，并提出 7 点要求，要求《四川日报》停刊期间，原编委会人员必须按时上班，不得擅自离开报社，保证随叫随到，还要保证进驻《四川日报》的群众组织的生活，并负责提供进行文化大革命的一切方便。

《四川日报》被封在成都引起轩然大波。首先是“产业军”等保守组织坚决反对，他们认为：“《四川日报》是经过党中央批准创刊的，没有党中央的指示或决定不能封闭，《四川日报》的刊头是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亲笔写的，决不能用其他任何字样代替。”他们认为封闭《四川日报》是非法的。

与此同时，封闭《四川日报》也引起昔日战友“红卫兵成都部队”的反对，他们发表了反对封闭《四川日报》的声明。“红成”认为，封闭《四川日报》就是造无产阶级的反。“红成”负责人石福全打电话给“8．26”的团长游寿星说：“你们封闭《四川日报》就是造无产阶级的反，如果吃饱了没事干，去挑黄泥巴耍嘛！”

“8.26”则认为“红成”右倾了，造反派队伍开始分化。

“井野”一进入《四川日报》社就遭到围攻，天天都有反对封报的群众组织来找他们辩论。每天从早到晚都要迎战一批又一批反对者。

不少中学生也陆续加入“井野”进驻《四川日报》社的队伍。这些学生首先在生活上遇到困难，没有饭吃，没有水喝，没有地方住宿。晚上他们只能呆在印刷车间里。车间里暖气关闭了，甚至棉门窗也被对立派取下来，饥寒交迫，他们只好倒在大字报堆里，盖着大字报睡觉。夜间寒气逼人，虽然穿着棉衣棉裤仍常常被冻醒，只能爬起来活动一下。后来他们在《四川日报》马路斜对面的省文联找到几间招待所的房间，但被子不够，正好当时著名作家沙汀天天在这里打扫卫生，他已被作为文艺界黑线人物被揪出来，于是这些小将就向这位可怜的瘦小老头借被子，说是借，实际上是命令他拿出来。这床被子被成都九中的几位初中女生欢呼雀跃地拿走了。

12 月 27 日，四川省委第一书记廖志高终于在这样一份声明上签字：

“目前《四川日报》已经停刊，我赞成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等革命组织提出的意见，为使广大革命群众能够及时听到毛主席和和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声音，在停刊期间按《红旗》《解放军报》《人民日报》及新华社电讯稿，社论和文章，尽快地出版‘红色电讯’，并请明朗同志负责派人组织编印。同意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等革命组织提出的报社编委暂时不用。李超、苑庄的问题请省委宣传部按照中央精神处理，在未正式处理前应到群众中去听取群众的批评，并认真向群众检查，检查期间在上班时间内，不应擅自离开。代印有关揭发批判西南局、省市委和四川日报的材料问题，我（同）意可根据报社印刷能力等具体情况尽可能予以解决。揭发批判材料的随报附送问题在不违反中央有关部门的规定的原则下，建议尽可能协助解决。”

最高指示

敌人是不会自行消灭的，无論是中国的反动派，或是美国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侵略势力，都不会自行退出历史舞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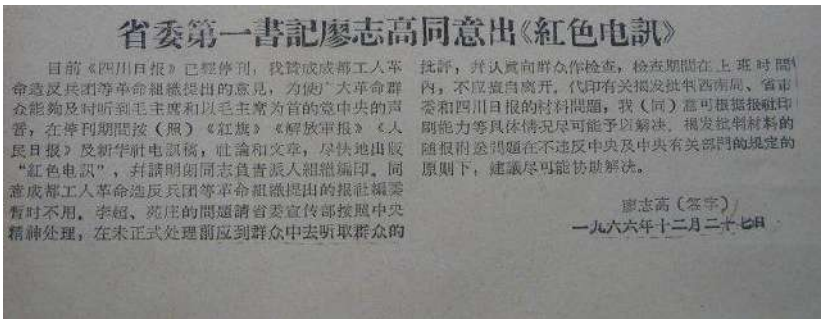
我們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們还将善于建設一个新世界。

我們坚决要出《紅色电訊》

使全省七千万人听到毛主席的声音

反毛泽东思想的《四川日报》应該封閉，封得好！

“井野”要求出《红色电讯》。12 月 27 日，四川省委第一书记廖志高同意。



省委第一書記廖志高同意出《紅色電訊》

目前《四川日报》已經停刊，我贊成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等革命組織提出的意見，为使广大革命群众能夠及时听到毛主席和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声音，在停刊期間按（照）《紅旗》《解放军报》《人民日报》及新华社电訊稿，社論和文章，尽快地出版“紅色电訊”，并請明朗同志負責派人組織編印。同意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等革命組織提出的报社編委暫时不用，杀超、死压的問題請省委宣传部按照中央精神处理，在未正式处理前应到群众中去听取群众的批評，并认真向群众作检查，检查期間在上班时間内，不应意自离开，代印有关揭发批判西南局、省委和四川日报的材料問題，我（同）意可根据报社印刷能力等具体情况尽可能予以解决，揭发批判材料的随报附送問題在不违反中央及中央有关部門的規定的原則下，建議尽可能协助解决。

廖志高（签字）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为了争夺《四川日报》这一宣传工具，“8.26”和“红成”都调集人马，前后组织动员约 30 万人争夺《四川日报》社和《成都日报》社，两派冲突的群众把两处报社的周围十几条街区包围得水泄不通，双方使用唾沫和肢体，用硬挤压的办法挤退对方组织的人，甚至大打出手。

《四川日报》无所适从，四川省委更是无能为力，于是出现了这样一种奇特的现象：当“826”控制了《四川日报》，

就出版他们的《红色电讯》。等到“红成”占领了《四川日报》，就出他们的《新川报》，两派轮流坐庄。

一天夜晚，双方数以千计的人员聚集在《四川日报》社大门前相持不下，一边的人往里冲，一边的人往外推，虽是寒冬仍挤出一身大汗，人群中升腾起阵阵热气，甚至于迷糊了眼镜片。突然听到喊声：“有人昏倒了！”原来是一娇小的女生，挤在人群中喘不过气而倒下，于是她迅速被人们从头顶上传出来送走。

最后，双方分别占据成都两家主要报社，大家都用自己控制的报纸发行名为《四川日报》的报纸，发表宣传本组织观点的新闻和文章。

成都 132 厂于 11 月 19 日成立的第一个上千人的群众组织：“11、19 革命造反兵团”，直属“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12 月 26 日这天，“11、19 兵团”举行集会，高音喇叭播放着《毛主席语录歌》，满天彩旗，满场口号，人头攒动，传单如雪。会散后，天已很晚了，人们余兴未尽，纷纷拥向工厂办公楼的党委办公室，要当时的党委书记黄明表态，承认今天的集会是“革命行动”。

党委书记黄明坐在沙发里就是不表态，于是有人提议，让黄明陪着“革命群众”到市里，找省市“当权派”表态，大家纷纷赞同。黄明还是不开口，坐在沙发上一动不动。

相持很久，一个惊人的决定产生了：找来一部运货的人力三轮车和几个年轻力壮的兵团女战士，将党委书记黄明连人带他坐的沙发，从三楼党委办公室众星捧月一般抬到楼下，端放在三轮车上，四周由那几个女战士围坐着，黄明坐在中间一动不动，大气都不敢出，否则稍有造次，便有“非礼”之嫌，到时真就“吃不了兜着走”了。

国营 132 厂地处成都西郊，到市里有 20 华里，再从城西到城东，还有 10 华里，路途不近，但人们顾不上饥肠辘辘，连晚饭也没吃，身披西下的夕阳，在兵团大旗引领下，数百之众，簇拥着一个矮个子光头男人，步行向成都市区进发了。

杂乱的队伍离开工厂所在地黄田坝，过清水河大桥，过峨眉电影制片厂，过通惠门，过人民公园，直奔当时新华路西南局办公地而去。

在市民们惊悚的目光中，天，完全黑下来。当成都 132 厂“11.19 兵团”的数百人簇拥着他们的党委书记黄明到达西南局礼堂时，夜已深了。西南局有关部门，安排大食堂赶紧为这几百人准备了饭菜。

西南局礼堂，灯火通明。四川省省长李大章和黄明出现在台上。

口号声，叫喊声，乱成一团。

台上没有桌椅，兵团头头和两位“当权派”都站着。随着李大章的明确表态，对大家的行动予以肯定，台上气氛一度紧张的气氛才缓和下来。

12 月 28 日，四川省委书记处书记许梦侠、杜心源、赵苍壁、杨超和副省长杨万选、张力行等人写了一张大字报，其中提到，中共中央西南局和四川省委的主要领导人在运动一开始就提出“普遍揭发，突出重点”的口号，是想要搞成一个火烧百分之百、混战一场的局面。大字报说，“8·22 工学院事件” 实际上就是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李井泉亲自发动的。

## 第 351 回：抓“联动”，王任重回到武汉　大游行，清华打倒刘少奇

再说北航附中红卫兵陈昆岗和王青被“联动”从公安部营救出来后，藏进离他们学校不远的北京八一学校。约一周后，王青耐不住寂寞，从八一学校溜回北航附中，被他们学校的对立派“北航附中红旗”发现。就在王青返回八一学校时，被跟踪而来的“北航红旗”再次抓捕。12 月 24 日夜半 2 时，“北航红旗”的大批人马在北京卫戍区的协助下，查抄了八一学校。此时八一学校的中、小学生已用各种家具堵住了通道楼房正门，大学生乘李富春的外孙子李莎莎熟睡之际，从他的房间越窗而入，绕过了值班人员防守的工事，把躲在这里的北航附中陈昆岗逮了个正着，同时把正在睡梦中的八一学校其他中学生也一并抓走。

12 月 24 日，关锋给江青写信说，“红旗杂志元旦社论稿，引用了主席的《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还引用了主席对人民日报评论员《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的批注。”“请您考虑引用主席这些话，公开发表出来，是否妥当”。

第二天，毛泽东在关锋的这封信上批道：

关锋同志:

都不要引用。

毛泽东

十二月廿五日

话说王任重离开北京后，先到海南岛呆了一段时间。12 月 21 日，中南局将他接回广州，但一到广州就遭到武汉“赴广州专揪王任重革

命造反团”、北京清华大学“井冈山”和广州本地造反派三方面的轮番揪斗。武汉“赴广州专揪王任重革命造反团”要求将王任重带回武汉批斗，清华“清华井冈山”则坚持把王任重带回北京，广州的造反派坚决要求将王任重留在广州，各地的红卫兵都等着面对面的批判王任重，三方争执不下，天天在中南局吵闹。

一天下午，武汉“赴广州专揪王任重革命造反团”在越剧院排练场批判王任重，天黑散场时，红卫兵突然蜂拥而上，把中南局的保卫人员挤到一边，将王任重拉上一辆中吉普，开车就跑。保卫人员开车急追，追到中山医学院门诊部，又中了红卫兵的“金蝉脱壳”之计，红卫兵把他们引上二楼，却从医院后门把王任重拉走了。

主管豫、鄂、湘、粤、桂四省一区的中南局一号人物被红卫兵抢走了，下落不明，这还了得？中南局书记处常务书记金明亲自出面，在中南局传达室与抢走王任重的武汉“赴广州专揪王任重革命造反团”红卫兵进行谈判。他们考虑到王任重曾在武汉任职多年，在那里有一定的群众基础，为了避免武汉、北京、广州三个地方的造反派因争夺王任重发生冲突，就跟武汉红卫兵达成“君子协定”：武汉红卫兵把王任重交还给中南局，由中南局派人护送王任重回湖北省委，武汉红卫兵派 10 名代表参加护送。武汉红卫兵同意这个意见。

由于担心广州和北京的造反派得知后闹事，中南局决定用专机秘密将王任重送回武汉。金明连夜将具体负责王任重保卫工作的中南局办公厅副主任朱汉雄从床上叫起来，就在传达室门外的黑影里向他交代:“你带上几个人、三部汽车，马上接出王任重，然后用飞机送回

武汉，由你接，由你送，要保证任重同志的安全。”当时朱汉雄正患痢疾，发着高烧。

广州的造反派不知怎么得到了消息，于 12 月 25 日凌晨四、五点钟，数十人气势汹汹来到机场，占领了候机楼，要求交出王任重。民航领导急忙出面安抚，告诉他们，王任重本人不在机场。

王任重当时的确不在机场，他还在中医学院。

朱汉雄从金明那里领命后，立即调了三部车和四名安全保卫人员，在武汉红卫兵带领下，来到隐藏王任重的中医学院学生生活区。王任重已经吃了安眠药，正在睡觉，被突然弄醒了，晕头转向地走不成路，被人架到汽车上。这时，北京来的红卫兵、广州本地的造反派都在四处寻找王任重。朱汉雄与武汉红卫兵不敢停留，上了汽车就直奔白云机场。

因为事出紧急，来不及跟民航局联系，汽车到了白云机场门口，机场警卫不让他们进，朱汉雄只得在哨兵亭子里给广州民航局副局长高天雄打了电话。高天雄命令哨兵放行，于是朱汉雄他们来到白云机场的飞行员招待所见到高天雄。朱汉雄说:

“中南局书记处要我送王任重同志回武汉，你现在就派一架飞机，我要马上送他走。你现在就打电话，让中南局书记处证实这个事情。”

高天雄说:“用不着，我相信你，我现在就给你派专机。”

专机机组人员还都在家里睡觉，他当即打电话，通知机组值班室，让机组人员立即到位;又通知调度室，马上把飞机从机库里拉出来。

这时，天快亮了。王任重身边只有两个人，一个是他的秘书曹志

勤，还有一名医生。王任重疲惫不堪，却又睡不成觉，曹志勤让他吃了两次安眠药，他裹着棉大衣躺在那里，像一根软软的面条，几乎完全昏迷了，大家就把他抬到楼上休息。武汉红卫兵也各自披上了招待所的毯子，休息去了。

朱汉雄问高天雄："准备工作用一个小时行吗？"

高天雄说："行。"

"飞机起飞后的气候怎么样？"

"气候有问题，长沙、武汉都在下雪，雪一化，跑道上结一层薄冰，降落有困难。" 高天雄答。

"有没有备用机场？"

"广州西郊南海县有一个很小的备用机场；乐昌以北、郴州以南，有一个军用轰炸机机场。"

"如果有人要冲进机场抢人，而武汉机场又不适合降落的话，我们可不可以先把飞机拉起来，到备用机场降落？"朱汉雄有问。

"可以。"高天雄说。

朱汉雄即向随他行动的保卫干部下令，把所有汽车开到招待所门口，统统把车门打开;所有司机都要坐在驾驶席上待命，随时准备开上停机坪登机。

打过仗的人，思路缜密。朱汉雄又在一支接一支地抽烟，他在想，飞机上天后，万一有人要强行飞机改变航向怎么办？必须要有措施。他给中南局打电话请示，中南局书记处的书记们都躲起来了，只有一个可供联络的电话号码。他马上按照这个号码打过去，是中南局常委

李尔重接的，朱汉雄向他讲了自己的忧虑，李尔重问：

“你的意见是什么？”

朱汉雄说：“我们可不可以带枪？”

“你等一下。”李尔重说。停了片刻，再接电话的是金明。金明说：

“可以带枪。”

“准许我带几支枪？” 朱汉雄又问。

“由你定。” 金明回答。

朱汉雄放下电话，就派一名保卫干部骑摩托车返回机关拿回四支手枪，他和四名保卫干部，一人一支。当过兵的人有了枪就有了胆。

他们刚刚准备就绪，高天雄就跑来告诉朱汉雄，飞机和机组人员都已到位，为了防止跑道结冰，武汉和长沙机场都有一个营的战士正在清扫跑道上的积雪。朱汉雄请高天雄下令，立即把飞机舱门打开，把登机的梯子靠上去，坐等气候转好。恰在这时，门卫打来告急电话，广州造反派快拦不住了。朱汉雄马上让保卫干部把王任重从楼上抬下来，又叫醒武汉的造反派代表，急速上了汽车，向停机坪飞驰而去。当他们登机时，造反派还在几百米外的候机楼内喧嚷，气氛非常紧张。王任重倒是神情自若，下车后微笑着向大家点头致意，随后，就和武汉“专揪王任重革命造反团”的人一起上了飞机。

飞机升到了天上，却还没有确定是在长沙还是在武汉降落。先让飞机往北飞就是了，眼下最要紧的，就是以亲切关怀的态度，让医生给红卫兵一人发一片预防晕机的药片，眼看着他们一一用温开水送服

到肚子里以后，朱汉雄感到心里踏实了，因为防晕药片的主要功能是让人睡觉，他觉得这一路飞行应该没有什么问题了。

这是一架名叫“伊尔 14”的小专机，有十个座位，前边有一张床，床对面还有两个小座位，是首长在飞机上休息的地方。造反派在机舱后边睡得好香好甜。王任重醒来后，趴在床上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他的秘书曹志勤把信交给朱汉雄，让他想办法转交给毛泽东。

信只有一页纸，没有折叠，也没有信封。朱汉雄匆匆看了一眼，大意是，王仁重表示他“衷心拥护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领导，坚决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等等。后来，他把这封信交给了中南局第三书记陈郁。

飞机到了长沙上空时，地面塔台通知说，武汉气候好转，可以在武汉降落。武汉有武昌南湖的民用机场和汉口王家墩的军用机场，要选择哪个机场降落呢？按规矩，民航飞机应该降落到武昌南湖机场。朱汉雄想，红卫兵肯定通报了王任重飞回武汉的消息，如果在南湖机场降落，出现麻烦就不好办了。过了长沙，他让机长给汉口王家墩军用机场塔台联系，塔台说那里可以降落。于是，朱汉雄又临时决定，飞机降落到王家墩机场。

果然，武汉红卫兵知道王任重要回来了，满街的高音喇叭都在广播这个消息,南湖机场早已挤满了人。

下午 13 时左右，飞机在王家墩机场悄然降落。机场上一片冷寂，除了调度室以外，什么人也没有。飞机上的造反派还在熟睡。

在机场等了好久，湖北省省长张体学、武汉军区副司令员韩东山

和湖北省军区的首长才到。他们原是到南湖机场接人的，得知专机改在王家墩机场降落，立即改变路线，避开人群，从小道上绕到王家墩来了。朱汉雄像完成了一次作战任务那样，向张体学报告:

“体学同志，中南局要我送任重同志回湖北，我的任务到此完成了。”

就在12月25日这天，北京清华大学在市内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打倒刘少奇”的大游行。

清华大学于12月19日宣布“井冈山红卫兵总部”、“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八八总部”和“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临时总部”三总部合并，联合成立“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后，21日，蒯大富公布了“井冈山”总部“筹委会”20人的名单，蒯大富正式就任兵团司令。他提议：25日率领“井冈山兵团”战士进城，把打倒刘少奇的行动公开化。

12月22日，即“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成立后的第三天，唐伟、朱德明、许胜利3位来自“八八派”的“井冈山”总部委员，以不同意蒯大富在刘少奇问题上的做法为由，公开宣布退出“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总部筹备组。本来“八八派”在“井冈山”筹委会只占4个席位，这样一来就只剩陈育延一人了。

12 月24日，唐伟贴出大字报，说周恩来12 月19日讲话中说“关于刘少奇问题还未定性”。

周恩来12月19日有两次接见讲话，一是接见江西省联合赴京控告团全体代表，二是在人民大会堂与陶铸、谭震林、李富春、李先念、刘宁一、肖华、童小鹏等一起出席中央负责人集体接见外地来京师生

和红卫兵大会。

随后，唐伟又贴出辞职声明：“自己常常跟不上形势，对兵团总部一些行动很不理解。”其实，他又组织了一些人成立了“向何处去串连会”，同“兵团”总部分庭抗礼。唐伟宣称：“反对蒯大富运动群众，我宁愿右倾，也不愿当阿斗。”

唐伟公开的周恩来 12 月 19 日的观点主要是：

第一，刘少奇问题是路线问题，但不一定要用解决敌我矛盾的方法去解决之，至少当时在中央内部关于刘少奇问题的最终性质还没有定论；

第二，刘少奇问题本质上不只是一个权力斗争问题，而主要是防止和平演变的问题或反修防修问题，因此解决这种问题的正确途径，是相信群众、发动群众、依靠群众，从而让广大人民群众真正将防止和平演变和反修防修成为自己的生活准则。

而蒯大富认为：刘少奇问题不仅是路线问题，而且更重要的是敌我矛盾性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问题。

当天，由蒯大富观点的铁杆分子在“井冈山兵团”内又成立了“28 团”，据说林彪在井冈山是“28 团”团长，以此起名表示像林彪那样忠于毛泽东。从此“蒯派”这个名称，在清华文革历史中逐步被“团派”这个名称所替代。

蒯大富认为，打倒刘少奇肯定不会错的，何况还有张春桥的支持。他们召开了动员大会。蒯大富对大家说：“刘少奇现在很猖狂，不投降。北京刮起了所谓的‘12 月黑风’，‘联动’，也就是高干子弟吧，

提出打倒中央文革等等。所以我们要发扬痛打落水狗的精神，点名打倒刘少奇。”

他们提出的动员口号是：

“反击 12 月黑风复辟！”

“刘少奇不投降，就让他灭亡！”

12 月 25 日清早，天气很冷。满天是厚厚低低的浊云，像是要下雪。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5000 多名学生和教职员工分 5 路进城，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清华大学几乎倾巢而出，上午 10 时许，他们来到了天安门广场，举行了“彻底打倒以刘邓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誓师大会”。而后，又以宣传车为前导，分兵 5 路，在王府井、西单、火车站、菜市口等市区集会、演讲、散发传单、贴大标语，高喊：“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和刘邓血战到底！”等口号，震动了整个北京城，也震动了全国。

广播车广播了“刘少奇破坏文化大革命、坚持资反路线的十大罪状”。同时广播的清华“井冈山兵团”的《声明》中，第一条是强烈要求王光美回清华大学检查、交代；第二条是强烈要求薄一波回清华检查、交代；第三条是王任重必须在 1966 年 12 月 31 日以前回清华交代反革命罪行。

王光美打电话请示周恩来，她是否可以去清华大学？周恩来在电话中对她说：“你暂时不要离开中南海。”

林彪的秘书张云生给林彪讲一份中央文革关于清华大学造反派学生领袖蒯大富的材料，林彪随口说道：“刘少奇是党中央的副主席。

蒯大富反刘少奇，实际是反党！”

第 352 回：体委乱，贺龙能否保过关　又北上，津浦线再次中断

12 月 24 日晚上，北京召开了全国体育界斗争荣高棠大会。

贺龙到了。周恩来对贺龙说："你血压高，我看你还是暂时休息一段时间。"

贺龙从周恩来的话中猜想出自己处境的不妙，但还是说："我干了一辈子革命了，是不会怕群众的，我还是想工作。"

周恩来说："工作我替你顶着，不要紧。你还是去休息一段时间，保重身体第一。"

周恩来在讲话中首先赞扬这次大会开得好，批评《体育报》没有高举毛泽东思想、不登《毛主席语录》的做法。

他说："你们说荣高棠是个修正主义分子，我看是对的。"他接着批评了体委在出国前搞的"誓师大会"和"国务院请愿"这两件事。

接着，陈毅讲话，他说："从体委同志发表了意见，揭露了各方面的事实，从思想上，政治上，整个体育运动的路线和反映在生活上，完全证明了荣高棠是变成了一个资产阶级分子，是我们体育运动的一个障碍。"

贺龙也在会上讲话，他说："没讲话以前我有个稿子，很感谢你们！感谢你们今天揭发的这些问题！大部分我都不知道。荣高棠根本看不起我们这些老粗的，因为我是老粗，根本看不起的。我非常拥护周总理的这一番话，陶铸同志、陈毅同志讲的我很拥护，讲得很深刻，我坚决支持！（热烈鼓掌）我刚才要拿起我的稿子讲，不拿起稿子讲，我讲了前一句，就忘了后一句。"

“在这场文化革命中，荣高棠自觉地、有组织地推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操纵党委，把持文革，组织一些没有改造好的知识分子，打击围攻和阴谋陷害工农兵出身的干部，镇压革命群众。他还蒙蔽乒乓球队一部分优秀运动员及其他运动员和干部，并挪用《体育报》的宣传工具和假借辩论为自己评功摆好，恬不知耻地以无产阶级司令官自居。尤其令人不能容忍的是在参加中央工作会议之后，继续搞他所谓的‘誓师大会’，请愿示威。当周总理、陶铸同志批评以后，仍然在玩弄新花招，采取新的形式对抗毛主席，对抗党中央，对抗革命群众，顽固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立场。长期以来，他还欺上瞒下，阳奉阴违，投机取巧，把持国内权威，搞宗派活动，大搞物质刺激，锦标主义，贩卖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货色，企图把我国体育事业引向资本主义的歧途。同志们，荣高棠的错误性质是非常严重的，这是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在体育战线上的反映，是个大是大非问题。在这段斗争中，是否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这一边，向荣高棠和他推行的修正主义（进行斗争），这是对每个同志的严峻考验。”

“荣高棠犯这样大的错误，我是有责任的。过去负责体育工作，抓得不紧；对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很不理解，很不得力；对体委机关和直属单位文化革命中的两条路线斗争，认识不清，强调团结多了一些，合了一些稀泥，对革命派支持不够；对荣高棠的错误察觉较晚，置之不理。有的同志给我提了些意见，我诚恳表示向他们致谢，”会场上响起热烈的鼓掌声。

贺龙继续说：“希望同志们继续给我提意见。”

最后，周恩来指挥大家唱《大海航行靠舵手》。

12 月 25 日凌晨，周恩来、陈伯达、江青、戚本禹等人再次接见北京体育学院造反派。江青在讲话中说："贺龙是保刘的一个干部，是站在反动路线上的人，应该搞一搞。贺龙解放后一直衰退，这回想混过文化革命，所以要触动触动他，但要适可而止。"

"这些人（指前《体育报》,《人民日报》负责人）口头上还宣传毛泽东思想，可把贺龙的批语用粗黑体字登出来，主席的指示都只在内部传达。"

李井泉在北航读书的儿子李明清考上大学后就和他哥哥一起住在东交民巷老 8 号贺龙的家里。因为李明清参与了北航 8 月 24 日质疑中央文革的大字报，一个星期六的晚上，"北航红旗"的学生闻讯来到这里，将贺龙的家团团围住，白天黑夜不散，大喇叭一声比一声高，坚持要进去搜捕李明清。

秘书一遍遍地催促贺龙："不交人，他们就要进来搜了。"

面对这些学生，贺龙真是没办法。在他看来，都是些娃娃，打又打不得，骂又骂不得，如何是好……

贺龙被秘书催得发烦，终于下定决心，把手中烟斗一放，走到门口，对警卫说："把大门开开。"

门开了。贺龙站在大门口，虽然他已是 70 岁的人了，但毕竟是元帅，统帅过千军万马，气势犹在，往那里一站，仍把那些大学生们镇住了，乱哄哄的门前顿时鸦雀无声。刚才还气势汹汹大吵大叫的学生，此时有的发怔，有的想往回缩，立刻老实许多。

“不要乱，怕什么？”几个头头喊叫着稳住阵脚，然后对贺龙说：“贺龙，我们是北航红旗战斗队，勒令你立刻交出李明清！”

“你们想干什么？”贺龙冷冷问。

“李明清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是西南最大的走资派李井泉的狗崽子，我们要把他揪回去接受群众批斗！”

“这是你们说的？”贺龙嘴角流出一丝讥嘲。

“这是无产阶级造反派说的！”

“你们说了，我还没说呢。”贺龙一字一板地说，“我告诉你们，李井泉同志是革命的老干部，好干部！李明清是革命的好青年，红孩子！”

北航“红旗”的学生们轰地乱了：“李井泉是黑帮！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李明清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是现行反革命！”

“贺龙对抗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绝没有好下场！”

门口的安静顷刻间被打破，学生们乱纷纷朝院门拥来，高喊着：

“交出李明清！”

“坚决把李明清打翻在地，斗倒斗臭！”

“不许进我的门！”贺龙突然吼出一声，乱哄哄的学生们突然一愣，僵在原地不再动。

“一个人也不许放进来。”贺龙接着向警卫战士命令到，“我看他们哪个敢进！”

学生们被镇住了，一时不知怎么办好。这片刻的犹豫，贺龙已经

点燃一支雪茄烟，缓缓吸一口，然后将捏着的雪茄烟朝学生们一指：

“你们听着，我不但不许你们进我的家来搜人，而且要求你们把李明清好好地给我送回来。你们跟我要人，我还跟你们要人呢！”

说罢，他转身走进院门。

这时，北航的学生们才知道，李明清不在贺龙这里。

事后，李明清等人还是被群众抓住扭送到公安部门关了一些日子，在毛泽东和江青的过问指示下，谢富治又将他放回了学校。从此，李明清等人当起了逍遥派，但对中央文革的所作所为和毛泽东的文革路线始终耿耿于怀。

北航的学生走了，周恩来让贺龙到钓鱼台六号楼暂住。12 月 25 日当天，贺龙住进了钓鱼台。

次日，12 月 26 日，周恩来又对贺龙说：“你身体不好，在家中，造反派天天找你，你得不到很好休息。组织决定你暂时搬到新六所去住。家中的事情由我来管。”

于是，贺龙又搬到了位于万寿路附近的新六所。

就在此时，南北大动脉的津浦线又发生了“赤卫队”北上告状，拦截火车，致使津浦线中断的事件。

12 月 5 日，许家屯与南京的造反派学生在北京达成“八项协议”的消息传到南京以后，南京造反派于 7 日第四次将省委工作队揪回南京大学批斗。

15 日，南京造反派以“江苏省革命造反派赴京代表团汇报会”的名义召集大型群众集会。会上，由许家屯代表省委宣读了与造反派

达成的“八项协议”。

江苏省委召开省委常委会，制定了《关于当前工作中若干问题的纪要》，主动“引火焚身”，明确表示各地区、各部门的错误主要由省委负责。

与此同时，省委书记处常务书记、江苏二号人物陈光在江宁召集地市委书记和部委办厅局长会议，作了一个主题为“猛转、快转、彻底转”的报告。陈光还告诉与会者：“你们一定要支持造反派，屁股要坐到造反派一边去”。随后，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一大批基层单位的党员干部因“收集、窝藏、转移黑材料”受到开除党籍、撤职等处分。仅南京地区就达到数千人。

这一切并没有使局面缓和，从 12 月 15 到 17 日，南京“赤卫队”和大学“黑字兵”总部动员了几千人冲到省委，要求省委撤销与造反派签订的“八项协议”。当省委领导层婉拒了这个要求后，一些保守派成员便仿效造反派先前的做法，挟持许家屯去北京请愿。造反派随即也派出人马挟持另一位省委书记处成员彭冲北上。并在北京与“赤卫队”“黑字兵”遭遇时，抢走了许家屯。

12 月 19 日晚，南京市委在长江路人民大会堂召开了有全市基层干部和各造反派群众组织代表参加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动员大会”，市委书记处书记、省文革小组副组长郑康做动员报告。造反派“八二七”代表在会上做了批判发言。随后，郑康与造反派代表达成“十项协议”，其主要内容是立即印发陶铸 12 月 5 日接见江苏省造反派代表时的讲话和八项协议；立即解散“红一团”、“红二团”、“红

三团”、“直属纠察队”等保守派组织，惩办首恶分子；对运动期间被打成“反革命”、“右派”、“反党分子”的群众应立即平反，当众恢复名誉；对南京大学“八．二七”、“红色造反队”、南京工学院“东方红战斗公社”等群众组织及个人进行全省、市范围的平反，开大会恢复名誉。

第二天，12 月 20 日，由南京大学“八二七革命串联会”发起，在南京大学操场召开了“南京八二七”成立大会，成员包括一部分工人和农民，主体依然是大中学校的师生。省委书记处书记、省文革小组副组长张仲良和南京军区政治部副主任谢胜坤出席大会，表示支持。当天，“八二七”方面根据“十项协议”采取行动，派人查封保守派组织“南京市警备纠察队”总部，不料遭到对方抵抗，引发武斗冲突。

12 月 23 日晚，由南大“八二七”发起，在人民大会堂、中山东路体育馆等九处同时召开了有数万群众参加的“揭发控诉南京市警备纠察队等组织罪行大会”。省市委代表郑康、省文革代表宋超、省公安厅高处长出席了大会。会上，造反派方面提出逮捕首恶分子、解散“警备纠察队”等六项要求。郑康代表省市委表态，答应了造反派提出的要求。

但是，南京“赤卫队”总部针锋相对，也于 12 月 21 至 22 日连续召集“摧毁江苏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誓师大会”。他们在 12 月 21 日下午，于南京五台山体育场召开“彻底摧毁江苏省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要求江苏省委派省委书记参加。

南京省委没有派书记去，仅派省文革小组的一位工作人员参加。

22 日傍晚，几千名“赤卫队”成员来到北京西路省委大院，要求省委书记接见，提出“七项协议”，其核心内容是承认“赤卫队”为革命群众组织，要求省委书记签字。

由于中央文革小组已有了态度，江苏省委难以表态支持。

24 日，聚集在江苏省委大院的“赤卫队”成员已达两三万人。25 日下午，更有 8000 多名满怀冤屈的“赤卫队”成员集中在江北的浦口车站，成立了指挥部，其中几千人爬上两列北上的火车，致使火车停开，津浦线中断。接着，千余名“赤卫队”成员徒步北上，准备走到北京去“告状”，向毛泽东、中共中央和中央文革小组汇报江苏文化大革命情况，请求中央解决江苏的问题。

江苏省委得到“赤卫队”成员北上的消息后，立即派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王楚滨、省文革小组副组长梅村于 25 日晚赶到浦口车站，劝说他们回南京解决问题。经过一夜的耐心劝说，没有效果。

26 日拂晓，几千“赤卫队”成员从停开的火车上下来，带着王楚滨一起徒步北上。一路走，王楚滨一路劝说，于当晚到达安徽省滁县，在县城内住下。

这时，前后两批到达滁县的“赤卫队”成员有一万多人。滁县是个小城，根本没有条件一下子容纳这么多的外来人口。再加上当时正值隆冬，大雪纷飞，天寒地冻，许多“赤卫队”成员没有地方住，只得在雪地中跺脚取暖。有的连饭也吃不上，处境十分困难。

江苏省委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即从南京紧急筹集了 5000 条棉被。为了解决运输工具，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亲自打电话给南京军区政委

杜平，得到了军区的大力支持。杜平当即批示后勤部经办。后勤部运输科抽调了 22 辆汽车，于 29 日装运 5000 余棉被到滁县，供“赤卫队”成员御寒。省委和南京市委还加派了部分干部和工矿企业的领导干部赶到滁县，配合王楚滨等人一起做工作。

# 第二部第五卷

## 各地文革章回索引

**北京：**

第 310 回；第 317 回；第 318 回；第 321 回；第 331 回；第 332 回；第 333 回；第 334 回；第 335 回；第 336 回；第 337 回；

**工交座谈会：**

第 302 回；第 309 回；第 317 回；第 318 回；第 321 回；第 322 回；第 324 回；第 325 回；第 330 回；

**北京大学：**

第 302 回；第 330 回；第 342 回；

**大串联：**

第 307 回；第 317 回；第 318 回；第 337 回；

**红卫兵：**

第 307 回；第 308 回；第 329 回；第 330 回；

**十一月、十二月黑风：**

第 308 回；第 309 回；第 310 回；第 317 回；第 322 回；第 330 回；第 332 回；第 333 回；第 334 回；第 335 回；第 336 回；第 342 回；

**北京航空学院：**

第 308 回；第 317 回；第 330 回；第 332 回；第 334 回；第 336 回；第 347 回；第 348 回；第 349 回；第 352 回；

**陶铸：**

第 310 回；第 317 回；第 325 回；第 330 回；第 332 回；第 341 回；

第 343 回；第 350 回；

**“联动”：**

第 310 回；第 323 回；第 326 回；第 334 回；第 335 回；第 343 回；第 351 回；

**军队：**

第 311 回；第 319 回；第 337 回；

**北京师范大学：**

第 315 回；第 330 回；第 335 回；第 336 回；

**“西纠”：**

第 318 回；第 326 回；第 329 回；第 334 回；第 335 回；第 337 回；第 343 回；第 344 回；

**彭真：**

第 321 回；

**临时工：**

第 325 回；第 337 回；

**清华大学：**

第 330 回；第 333 回；第 337 回；第 351 回；

**陈毅：**

第 333 回；

**刘少奇：**

第 336 回；第 337 回；第 351 回；

**专案组：**

第 336 回；

**荣复转军人：**

第 341 回；

**李先念：**

第 344 回；

**彭德怀：**

第 346 回；第 347 回；第 348 回；第 349 回；

**北京地质学院：**

第 346 回；第 347 回；第 348 回；第 349 回；

**罗瑞卿：**

第 349 回；

**贺龙：**

第 352 回；

**上海：**

第 302 回；第 303 回；第 312 回；第 313 回；第 314 回；第 326 回；

第 330 回；第 338 回；第 339 回；第 340 回；第 344 回；第 345 回；

**华北地区：**

**山西：**

第 304 回；

**东北地区：**

**辽宁：**

第 317 回；第 336 回；

**西北地区：**

**陕西：**

第 317 回：

**甘肃：**

第 326 回；

**新疆：**

第 343 回；

**西南地区：**

**四川：**

第 304 回（重庆）；第 305 回（重庆）；第 308 回；第 308 回(宜宾)；

第 316 回；第 317 回；第 318 回；第 324 回；第 327 回（重庆）；

第 328 回（重庆）；第 329 回（重庆）；第 330 回；第 332 回；

第 333 回；第 334 回；第 335 回（重庆）；第 342 回；第 350 回；

**贵州：**

第 317 回；第 326 回；

**云南：**

第 317 回；

**中南地区：**

**湖北：**

第 317 回；第 319 回；第 326 回（长办）；第 351 回；

**湖南：**

第 304 回；第 349 回；第 350 回；

**广东：**

第 320 回；第 343 回；

**华东地区：**

**山东：**

第 315 回；

**安徽：**

第 320 回；

**江苏：**

第 323 回；第 325 回；第 333 回（徐州）；第 352 回；

**浙江：**

第 308 回；第 333 回；

**江西：**

第 337 回；

**福建：**

第 306 回；第 327 回；

# 文革史话

## 之第三部 全面内战 第一卷

刘朝驹 著

# 文革史话

之

第三部

# 全面内战

第一卷

# 目 录

第 353 回：生日宴，祝“全国全面内战”　再拖延，“全红总”封劳动部.....1
第 354 回：允“三条”，江青接见“全红总”　“联动”反，矛头指中央文革.....9
第 355 回：毛泽东，再写信制止武斗　批刘邓，“三司”十万人再聚.....19
第 356 回：红海洋，北航“红旗”大行动　攻陶铸，犯方向路线错误.....28
第 357 回：彭德怀，抵京城住进地院　刘涛反，遣陶铸离开京城.....35
第 358 回：清华园，《合肥晚报》被接管　陶铸晦，见学生又起争执.....44
第 359 回：中宣部，大字报直指陶铸　无所惧，左方一封信造反.....52
第 360 回：“联络站”，外交部干部揭竿　军队乱，“联动”又冲公安部.....59
第 361 回：财贸会，李先念遭到炮轰　查穆欣，湖南“望江楼协议”.....67
第 362 回：康平路，数万“赤卫队”涌入　电话急，耿金章飞回华亭.....74
第 363 回：消息传，张春桥家被抄砸　一夜间，“赤卫队”分崩瓦解.....85
第 364 回：昆山乱，京沪线再次中断　元旦夜，通知陈丕显出山.....92
第 365 回：会议急，上海市情况堪忧　新年始，中南海群众造反.....100
第 366 回：北京市，反刘邓再掀高潮　话伤人，记者站炮轰王力.....108
第 367 回：陶铸见，南京大学诸代表　周恩来，急召铁路造反派.....117
第 368 回：再揭发，刘涛行大义灭亲　见北大，军队要批叶与陈.....123
第 369 回：南京市，一月三发生武斗　上海滩，群众接管《文汇报》.....131
第 370 回：寒冬雪，王任重武汉被斗　看三镇，造反派威信日增.....139
第 371 回：解困惑，陈永贵觐见总理　问详情，刘格平奉召进京.....145
第 372 回：返太原，陶鲁笳被揪山西　卫、王、王，元旦过即遭批斗.....151
第 373 回：按计划，北京斗彭罗陆杨　再接见，中学生“首都兵团”.....157
第 374 回：不同意，批判陈、叶两老帅　说陶铸，中南海西门鼎沸.....168
第 375 回：惊闻讯，昆明军区被占领　人熙攘，营区内乱如集市.....175
第 376 回：见群众，刘志坚有去无回　上海市，《解放日报》被夺权.....185
第 377 回：“红工司”，上海批斗曹荻秋　警卫难，到处争抢当权派.....192
第 378 回：约向前，毛泽东委以重任　上海滩，开大会批判市委.....202
第 379 回：通令三，请求改组沪市委　不低头，赵健民游街批斗.....210

第 380 回：不同意，刘少奇出去检查　说车祸，王光美被骗清华.....218
第 381 回：夜半寒，王、戚访清华附中　封长江，津浦线再次中断.....226
第 382 回：难安睡，陈、江又到新华社　如赶场，周恩来一夜未眠.....233
第 383 回：农口反，接见七级部代表　忙劝架，中南海再次告急.....242
第 384 回：不能冲，众人请进大会堂　连续见，七机部各派代表.....251
第 385 回：烧汉生，北京军区抓政委　戚本禹，接见山西众代表.....260
第 386 回：抢购潮，上海市乱批条子 忙制止，又起草《紧急通告》.....267
第 387 回：小麦峪，阎红彦夜半身亡　派法医，飞昆明刻不容缓.....274
第 388 回：转过身，不喊“打倒刘少奇” 毛泽东，肯定《文汇报》夺权.....284
第 389 回：“全红总”，召开对外记者会　外事口，“打到陈毅”呼声高.....293
第 390 回：装甲兵，许光达住进医院　看上海，调昆明三方进京.....301
第 391 回：换领导，新华社重组新班　回首望，印尼“九三〇”事件.....308
第 392 回：哈军工，二十七人大字报　指江青，矛头对向毛泽东.....318
第 393 回：军委会，林彪点贺龙问题　陈里宁，安定医院政治犯.....325
第 394 回：公安部，十三局夜遭围攻　销售快，《新时代狂人日记》.....333
第 395 回：戚本禹，接见强调批刘邓　铁路乱，毛泽东再赞上海.....341
第 396 回：见群众，要反对经济主义　反复讲，抓革命要促生产.....347
第 397 回：冬日寒，李葆华北京游街　贺龙燥，“联动”六冲公安部.....356
第 398 回：学生猛，接管上海公安局　联名电，上海掀“一月风暴”.....364
第 399 回：空军乱，全军新文革成立　慰朱德，周恩来安抚少奇.....374
第 400 回：河南乱，争报社发生武斗　回太原，三晋开夺权之首.....383
第 401 回：在家中，刘格平布置夺权　“我来干”，杨成效毫不谦让.....391

## 第 353 回：生日宴，祝“全国全面内战”　再拖延，“全红总”封劳动部

进入 12 月以后，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曾多次向毛泽东提出，希望在他生日的那天与他一起吃个饭，以示祝贺。毛泽东一直未作答复。

12 月 26 日下午 16 时许，毛泽东的秘书徐业夫打电话给戚本禹，让他立即通知陈伯达、张春桥、王力、关锋、姚文元 6 人，于当天下午 17 时到中南海游泳池“同主席一起吃饭。”

戚本禹问：“要不要通知康生？”

徐业夫回答：“不要。”

戚本禹随即用红机子分别通知到了每一个人，大家接到电话都非常高兴。

17 时前，他们陆续来到了中南海游泳池毛泽东的住处。毛泽东和江青已在游泳池等候他们。那天一起在场的还有李讷、毛远新、汪东兴、徐业夫、吴旭君和毛泽东身边的其他工作人员。

饭前，毛泽东和大家闲话聊天。他说：

“今天过个生日，我 73 了。你们要办庆祝宴会，这不好，因为党中央有不祝寿的文件呢。我们自己在家里简单办个家宴，请请小组的人，组长、副组长、组员。顾问就免了。这一年你们辛苦了，‘五一六通知’、‘马列主义大字报’、‘炮打司令部’、‘红卫兵大串连’，一波接一波，现在还没完。”

“斯大林是 73 岁死的。他死了，资本主义就在苏联复辟了。社会主义堡垒被赫鲁晓夫们从内部攻破了。我现在还不会死，但将来，资本主义会不会在中国复辟呢？这就要看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了。这个文化大革命是我们党同党内资产阶级的代理人，也就是走资派、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斗争。斗争也不是今天才有的，早就有了。但这一次是全面的斗争，从上到下，从红卫兵到工厂、农村、机关，全国都闹开了。”

当张春桥和姚文元走进来时，毛泽东对他俩说：“春桥、文元来了。你们想不想回老窝啊！”

张春桥一时没有明白此话的意思，只听毛泽东又接着说：“上海

可闹得厉害呀！形势很好呢！红卫兵起来了、机关干部也起来了，工人们也起来了，到处是火烧、批判、揪斗、打倒，还有砸烂。他们还很注意斗争方式，谁是要火烧的，谁是要打倒的，都有区别呢。他们懂得掌握党的政策。”

姚文元问：“上海市委强调‘内外有别’怎么办？”

毛泽东说：“‘内外有别’可以打破。过去讲内外有别，是讲牵涉国家机密的事情内外要有区别，不是讲革命运动不能搞。文化大革命，内外都要搞。机关的文化大革命很重要呢，机关的文化大革命一定要搞好。”

他对张春桥、姚文元说：“最重要的是工人们起来了！你们两个人可以回去看看呢。”

他说：“上海重要啊！京、津、沪，还有工业大省辽宁，是我们这一阶段的重点。”

毛泽东对关锋说：“关锋也来了。你太瘦了，要多吃点肉呢！你的老子研究怎样了？你送来的书，我还没来得及看呢。”

毛泽东看到张春秋不解的眼神，就解释说：“他认为老子是唯心主义的，陈伯达认为老子是唯物主义的，统一不起来。”

当时主张老子是唯心主义的还有杨柳桥等人，主张唯物主义的还有任继愈等人。

毛泽东接着说：“在我看来，老子是客观唯心主义。老子是周朝王室的官员，属于贵族阶层，但他同情农民，经常替农民说话，批评统治者压迫农民，税太重。所以出身贵族也可以革命进步呢！对人不能光看出身，我不赞成那副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形而上学。哲学家也不能都打倒，高亨要保呢，杨荣国也要保。”

高亨，山东大学教授，是中国研究先秦学术和文字学、训诂学的著名学者。本书开卷那首《水调歌头》词，即为高亨所作。

杨荣国，中山大学教授，哲学家，对中国思想史、哲学史，特别是对中国古代思想史、哲学史很有研究，对孔子思想一直持批判态度。

毛泽东说：有人借口抓生产来压革命，他们关心的是自己的乌纱帽，他们关心的是保存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那些旧框框。他们害怕群

众革命革到他自己头上。他们过去靠旧框框吃饭，离开旧的一套就不会走路，就不会说话。挑动群众停止生产，挑动群众斗群众，就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沿着这条路走下去，自己就要成为走资派。任何阻挡这场文化大革命发展到工人农民中去，一切抵制工人农民搞文化大革命的论调都应该驳斥，都是错误的。工人农民参加文化大革命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一切企图阻挡的人都要被历史潮流冲掉。他说，他同陶铸分歧的实质就是这个。

毛泽东还说：一定要有革命领导干部参加文化大革命，要打破清规戒律，打破束缚群众的框框，到群众中去，同工人农民学生在一起，参加斗批改，实现机关革命化。要坚持分清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对领导干部的批判要治病救人，团结大多数，团结两个百分之九十五。在毛泽东看来，越来越多的领导人会站到革命群众方面来，支持他发动的群众的革命运动。极少数不肯回头、坚持错误、阳奉阴违、耍两面派的人，一定要被群众打倒，这极少数人是“咎由自取”。这四个字毛泽东用的是陶铸的话。

毛泽东又说：斗、批、改，改什么？光在文化部门、机关学校改，改些什么？整个国家文化大革命改些什么？作为社会经济基础的工矿农村还是老一套，那还改什么呢？那就没有目标了。

毛泽东认为旧机器要改成新机器，旧方法要改成新方法，旧秩序要改成新秩序，旧的规章制度要改成新制度，对直接上级绝对服从的旧纪律要搞掉。毛泽东认为，过去旧的一套同资本主义、封建主义，同苏联差不多。他认为大民主好，便于攻击敌人，也能对各级领导机关、领导人直接监督，造成新的社会风气。他还讲了无产阶级专政是无产阶级大民主的保障，没有无产阶级专政，不但没有大民主，连小民主也没有。专政机关，必须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专政机关要保障群众大鸣大放、大字报、大串联的正常进行，专政机关不能干涉甚至压制大民主，不能乱抓人。只能对确有证据的杀人、放火、放毒、制造交通事故、暗害、间谍活动这些现行反革命要专政，依法制裁。革命群众要发动起来，帮助监督专政机关，保障实现无产阶级大民主。

毛泽东反复讲：放毒不是指思想上的问题，思想反动的，坚持资

产阶级思想的，只要没有违法，就不能抓。要摆事实讲道理，同他辩论。

他说：专政限于很小范围。党内问题，不管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也好，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也好，在党内、政府内、民主党派内部，即使确有证据的特务，也要一人不杀。

差不多 17 时 30 分左右，家宴开始。工作人员端上了八盘菜、一大盆汤水。那天吃饭依然是按毛泽东请客的惯例，四菜一汤，还有烤白薯、煮玉米。即使他招待外国人吃饭也是如此。江青作为家庭主妇，忙前忙后。

大家入座以后，工作人员为大家斟上了黄酒。大家都举起了酒杯说：

“祝毛主席万寿无疆！”

毛泽东说：“你们万寿无疆！你们年轻！”

今天的家宴多了中国人过生日的习惯，每人加了一小碗面条。当寿面上来时，大家又要站起来祝酒，毛泽东示意大家坐下，自己却站了起来，举杯说：“为明年全国全面内战胜利干杯！”“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他说“全面内战”这四个字的时候，一顿、一挫的，说得很清楚，但是“胜利”两个字的声音就比较小。

干杯之后，大家都在思考毛泽东祝酒辞的意思。“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是当时流行的口号，意思好懂。不好懂的是前一句。此时文革中的革、保两派已经有了武斗，这叫打内战。可是反对武斗、反对打内战是毛泽东的一贯主张啊，怎么为它干杯呢？而且还是“全面内战”！大家都在思索，却没有人提出来问，江青也没说话。

毛泽东似乎看出了大家对他的话不理解，在吃了几口面之后，他又陆续说起文革当中，不仅是学生被镇压，机关里的造反派、工厂里的造反派，也遭围剿。没有大民主，小民主也没有，给领导提意见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热气腾腾的群众运动一下子被搞得冷冷清清。那些被造反派反对的领导人，过去经常要群众无条件服从党的领导，做党的驯服工具。这次他们又挑动群众斗群众，组织党团员、积极分

子跟造反派斗。于是，许多地方在群众中形成两大派，一派要革命造反，一派要保护旧秩序，两派打起内战，有些地方甚至发生武斗。他说："我们要支持革命造反派，给群众宣讲文化大革命的道理，团结大多数，争取文化大革命的胜利。""前一阵子，我们怕文化大革命一下子铺开了影响生产，便想把工厂、农村的文化革命放后一步，哪知客观事实的发展常常会打破我们的预想。"学校、机关的革命造反派同工厂、农村的革命造反派结合起来了，一下子打开了文化大革命的新局面，上海就是这样。还有一个特点，党和国家机关的革命干部起来造反了。主力是工人，没有学生和工人的结合也不行，没有机关干部也不行。中国现代史上的革命运动都是从学生开始，发展到与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相结合，才有结果。这是客观规律。五四运动就是这样，文化大革命也是这样。明年全国的文化大革命都会走这条路。

吃完饭，毛泽东又和大家谈了一会儿话，主要是让大家们从思想和理论上全面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要抓大批判，并叫他们每个人都要写文章。

关锋说，他准备从伦理道德观上面批判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休养》。

姚文元说，他准备从《武训传》以来的文化路线批判刘少奇。

王力提出要批"三自一包"、"三和一少"。

张春桥说，他想从社会基础上，从走资派产生的社会根源上来批判刘少奇。

毛泽东对戚本禹说："你也要写。"

戚本禹说："我想写关于影片《清宫秘史》到底是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的这篇文章，因为从主席提出这个问题到现在一直都没人把它讲清楚。"

毛泽东说："好。"

戚本禹又说："但我对义和团那段历史还不是很清楚。"

毛泽东说："不要紧，你去写。写了给我，我给你看。"

饭后，陈伯达、江青、张春桥、戚本禹、王力、关锋、姚文元等一干人又一起来到人民大会堂接见全国性临时工组织"全红总"的代

表。

年关将近，“全红总”收到各地的投诉电报、信件日益增多，每天几大麻袋。12 月 20 日这天，“全红总”再次召开总部扩大会议，责成负责与全国总工会和劳动部联系的罗运泉、廖阁夫二人向全国总工会和劳动部提出最后通牒，要求他们在 23 日前确定三方会谈日期。12 月 22 日，全国总工会和劳动部共同答复“全红总”，确定三方会谈订于次日在劳动部礼堂召开。但是第二天，12 月 23 日，劳动部来电话通知会谈延期至次日。12 月 24 日，劳动部又来电话将会谈延期到次日。

这两次延期引起所有“全红总”总部委员的愤怒，他们召开了总部会议，做出决议：“如果明天劳动部和全国总工会再拖延日期，就在当天先把劳动部封闭，12 月 26 日再把全国总工会封闭，向全世界和全中国人民表达我们要真正当家作主的决心和力量。”

会议作了如下安排：

一、王振海立即到北京分团，动员北京分团全体团员处于紧急待命状态，动员人数不得少于 5 万人。

二、总部委员分成两部分--一部分由王振海和周牧、杨政带领，专门准备主持北京分团封闭劳动部和全国总工会的行动。其中，周牧负责拟定王振海在天安门广场集会时的发言，封闭劳动部和全国总工会后发表的宣言和声明。杨政负责组织 300 人左右的纠察队，以维持秩序，力争行动中不伤一人，不毁一物。另一部分由罗运泉、廖阁夫、郝维奇带领，先期进入全国总工会维持全国总工会的秩序和现状，准备迎接大队在 12 月 26 日封闭全国总工会。

三、拟定这次行动的口号：

(一) 向刘老板算总账的时候到了！

(二)彻底铲除一切资产阶级的剥削制度！

(三)我们要革命，要生产，要吃饭！

(四)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12 月 25 日上午，到劳动部和全国总工会联络的罗运泉、廖阁夫带着绝望和无奈的口气打回电话：劳动部和全国总工会又把 25 日召

开的三方会议推延了，而且这次是无限期的推延。他们说，劳动部和全总的负责人说元旦将近，过了新年再说吧。

“全红总”副秘书长周牧放下电话，立即通知总部委员根据昨天的决议进入自己的位置。他又拔通了王振海的电话，要他在下午 14 时前把人马带进天安门广场，14 时正准时集合，进行动员，天始行动。

25 日下午 14 时，“全红总”北京分团 5、6 万人，开着数辆宣传车，进入天安门广场，站满了金水桥两侧。王振海在一辆宣传车上，宣布了他们当天的行动。在王振海讲话的时候，许多外地来京的临时工、合同工和上访者、串连学生闻讯也赶到天安门广场，加上围观的群众，人越来越多，一直站到人民英雄纪念碑前，长安街的交通终于被阻断了。

王振海讲话结束后，队伍在宣传车的带领下徐徐移动。纠察队先行到达劳动部，在劳动部的群众组织配合和带领下，他们迅速封闭了劳动部除礼堂、二楼会客室和总机房外的一切办公室，并安排了人员，以防不测。

王振海带领的大队大约在下午 17 时左右到达，把劳动部围得水泄不通。他再次通过劳动部的广播系统发表谈话，宣读声明，宣布纪律，直到晚上 21 时前后，围困劳动部的人员才慢慢散去。

当晚 24 时左右，“全红总”总部委员们正在劳动部二楼会客室休息，几名纠察队员忽然带着两名军人走了进来，一进门就要找王振海和周牧。几位纠察队员颇为紧张，担心解放军会干预他们的行动，或者就是来逮捕周牧和王振海的。所以，其中一位迅速出去叫来几十位纠察队员把大门封住。这两位军人看到“全红总”他们惊疑满面、准备拼命的样子笑起来了，连声说：“请不要误会，请不要误会！我们是中央文革的联络员，是奉中央文革的命令来支持你们的！”

不知是谁带头喊起了口号：“感谢中央文革！感谢江青首长！誓死保卫中央文革！誓死保卫毛主席！”

一时间，口号声和掌声此起彼落，这两位军人和王振海与周牧又是握手，又是拥抱，一时间忙得不亦乐乎。

其中一位戴眼镜的军人自我介绍是《解放军报》的编辑，名叫邵一海。他悄悄对周牧说：“明晚中央文革首长要接见你们。你要注意保密！”

接着邵一海向周牧索要“全红总”总部人员的名单和简历。

周牧将情况悄悄告诉王振海，要他通知所有总部委员在 26 日下午 15 时前在西什库儿童工读学校集合，然后随邵一海二人，乘坐他们开来的一辆华沙牌小车回到西什库，把所有总部委员的简历副本交给邵一海。

26 日上午 10 时许，邵一海只身来到西什库，交给周牧一张刻印好的名单，一共有 16 人。他告诉周牧，中央文革决定接见这 16 名“全红总”的代表，让周牧分别通知这 16 个人，晚上 19 点前在西什库儿童工读学校右侧的街口等待。19 点的时候，会有一辆车前亮着三盏红灯的草绿色大客车来接他们。

## 第 354 回：允“三条”，江青接见“全红总”　“联动”反，矛头指中央文革

26 日晚上 19 时，一辆大客车如约准时将“全红总”一行 16 人拉到平安里《解放军报》社大院内停下，然后上来两位军人。邵一海向他们介绍，这两人就是《人民日报》代总编唐平铸和《解放军报》副总编胡痴。在大家的掌声中车子开动，直奔人民大会堂东门。当他们进入大会堂东会议厅时，墙壁上的大挂钟，正是 19 时 40 分。

“全红总”一行16人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坐下片刻，当时针指到19时58分时，康生、陈伯达、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戚本禹等人进入东会议厅。江青一进门就大声说：“同志门好！我代表毛主席向大家问好！”

周围顿时响起热烈的掌声和“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祝毛主席万寿无疆！”“感谢毛主席！”的口号声。江青先按邵一海给的那张名单的名字一一问了每个人的姓名和情况后才入座。她坐下后的第一句话就是：“毛主席是支持你们的！”

又是一片掌声和口号声。

代表说：“感谢中央文革领导首长对我们的关怀！”

江青马上表示说：“你们不要叫我们首长，我们都是革命同志。”

代表们纷纷反映说：“现行合同工制度，把工人阶级分为两个阶层，制造差别，分化瓦解无产阶级革命队伍，政治权力被剥夺，阻碍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这个制度是刘少奇1964年3月到河北各地视察做报告后，劳动部根据其报告后做出合同工、临时工制度的规定，在全国执行。”

江青说：“刘少奇嘛，也是主席啦，但是要看是什么样的主席啦！刘少奇是搞集体所有制的。”

代表们汇报了他们和劳动部，总工会的斗争情况。江青马上让人打电话，命令劳动部长和全总书记参加会议。她接着说：“什么劳动部长，让他当劳动科长，最好让他们当合同工，非造这个反不可，这个制度就像资本家主义对待工人一样！”

代表又说：“彭真在北京组织了一个大合同队伍，并给集中起

来……”

江青：“你们这些同志，完全可以斗争彭真一次，这是他一大罪状。封建主义也不能比这个制度残酷！”

她非常生气地说：“等他们来了让他们靠边站着，合同工就是没有前途嘛，真是气死人啦！都让他们当合同工去，你们解雇他们。”

江青这里说的“他们”，是指劳动部长和全国总工会的书记们。

代表们又说：“现在有的单位搞破坏，耍阴谋，如中国科学院在25日决定，把本单位合同工转正，用转正来瓦解工人斗志。”

江青说：“你们不要他们转正，不要合同工，要革命！”

这时，劳动部两个副部长郗占元、李正亭和全总书记王志杰进屋，戚本禹让他们到后面去坐。

江青问王志杰他们3人：“你们是干什么的？”

王志杰答：“我是总工会的。”

郗占元、李正亭答：“我们是劳动部的！”

陈伯达、江青指着“全红总”代表问他们：“你们认识他们吗？”

他们3人答：“有的认识。”

江青说：“我们听到同志们反映合同工制度，是你们发明的还是你们刘主席发明的？这是资产阶级反动的旧制度，你们不为工人服务，还是回家去的好。”

陈伯达：“你们和这些代表签了字的材料为什么你们又作废了，不承认？”

王志杰3人刚刚进来，不明就里，一时不知该如何回答。他们的窘态让“全红总”的代表很受鼓舞，说：“我们昨天把劳动部办公地点全部查封了，今天把北京劳动部所属单位也全部查封了，并向全国各地分团发出电报，把劳动调配部门全部查封。并决定明天封总工会。”

陈伯达表示：“封的好嘛，没有这个部工人照样工作！”

江青问劳动部长道：“你们工作具体内容是什么？有多少人员？”

郗占元、李正亭答：“有400多人！工作是劳动力调配，2、劳动保护，3、工资制度。”

江青又问："全国有多少合同工？"

李正亭答："说不清楚。"

江青极不满意的批评道："你们当部长一天到晚都是干什么的？说不清楚，做部长！"

她又问王志杰："你们工会负责什么工作？"

王志杰答："负责教育工人，组织工人。"

江青："你们不为工人办公，不为工人服务，你们既不向中央反映情况，又不给工人解决问题，你们有一点共产党员的样子吗？你们是不是一个共产党员？"

代表们即席控诉了合同工和临时工在合同工制度下所受的政治上、经济上的迫害，并说这个制度就是要把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他们在控诉临时工制度对工人的残酷迫害时，声泪皆下，泣不成声。

江青、陈伯达等人听到工人的控诉，身受感染，也都流下眼泪。在座的大会堂工作人员也都跟着痛哭。

郗占元表示："我们是执行这个反动制度的罪人。我有罪！"

江青马上表态："同志们，这次反映的情况对我们是很大的教育。我建议马上发给他们每人一枚纪念章，一本《毛主席语录》，你们把全国劳动力分配部门全部扫掉。你们进京工人全都住到工会、劳动部去，让他们给负责吃饭、住宿。"

她接着问王志杰3人："你们听到了吗？"

他们3人连忙答道："听到了！"

江青又问："能不能做到？"

3人连连说："能，能，能"。

康生："制定合同工制度就是赫鲁晓夫，那里是什么共产党员，想把中国变成资本主义，这是夺权的大问题，那些不给工人办事的全部给他们解散！"

江青："同志们，我不知道事情这样愚蠢，对不起同志们！"

陈伯达："提个建议，你们明天不要封全总啦，你们工人全部住到里边去，你们给他们封门，他们就没事可干啦！"

江青问："王志杰，你过去在什么地方工作？"

王志杰答："在铁道部。"

江青："吕正操那地方，是专门整黑材料的地方。"

康生："刘少奇在64年到处做报告，是相当严重的问题，今天这个制度，关系到我们国家变不变颜色的大问题，是社会主义工厂变为资本主义工厂，苏联就是一个例子，在向资本主义道路走。"

江青："最近，我建议开一次合同工、临时工的控诉批判大会，地点就在人民大会堂。今天咱们当家作主了。希望你们回去向大家讲，并组织好，发言时简单扼要，要说明问题，举出典型例子，不超过半小时。"

代表："有些单位负责人，对江青同志12月18日向广播局'毛泽东思想战斗团'的讲话不信任，抱怀疑态度。"

江青："他们是老爷，我是一个普通共产党员，我建议马上以中央文革的名义发个通知，"并要"全红总"代表当场以中央文革名义起草一个关于合同工、临时工的通知。于是"全红总"的周牧当即草拟并交给江青过目。内容是：

一、必须允许所有合同工、临时工等参加文化大革命，不得有所歧视。

二、在文化大革命中不得解雇合同工、临时工，从 1966 年 6 月 1 日以后解雇的工人，必须允许马上回原单位参加生产，工资补发。

三、1966 年 6 月 1 日以后被打成反革命的合同工、临时工。应宣布立即平反，赔偿损失。

江青接过周牧拟的这个"三条"，和陈伯达、康生交换看过后说："我建议修改一下。其中第三条在《十六条》中和中央军委的平反命令中已经提到了，不必再提。我听说合同工队伍中有不少地富反坏右分子，除了有现行反革命活动的，也要给他们一碗饭吃，我看这样修改好不好？"

接着，她念了自己亲手修改的"三条"：

"1、一切作为合同工，临时工等等必须允许参加文化大革命，不得有所歧视。

2、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不得解雇，必须照发工资。从1966年6月1日以后所解雇的工人，必须马上回原单位参加文化大革命，参加生产。工资补发。

上述两点，现行反革命分子例外。”

这次接见从晚上19时58分开始直至次日凌晨0时34分。其中，约有三分之一的时间是“全红总”代表的发言和江青等和劳动部两个副部长郗占元、李正亭及全国总工会书记王志杰的问答，其余的约三分之二的时间是江青讲话和康生、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的简短插话。江青讲话长达2至3小时。

在这次接见中，江青还要“全红总”办三件事：

一、开一个中型的控诉大会，地点在人民大会堂。

二、拟出改革临时合同工制度的方案，上报中央。

三，到门头沟煤矿作一次调查，立即将材料交中央文革。

接见结束时，江青给周牧留下她的电话，并指定唐平铸、胡痴、邵一海作联络员。

接见时，江青向“全红总”介绍了中央广播电台对内部听众联系组的临时雇员李晋暄。李晋暄带领中央广播局 500 多名临时合同工造反，成为中央广播局“毛泽东思想战斗团”的头头之一。在会议上，江青直接推荐李晋暄加入“全红总”。李晋暄也表示从此中央广播局的“毛泽东思想战斗团”成为“全红总”的一部分。

接见后，已是 12 月 27 日凌晨，全国总工会立即派出几辆汽车，将“全红总”负责人接到全国工人总工会大楼办公，住宿在小灰楼。从 12 月 27 日开始，全国工人总工会陷入瘫痪。

12 月 26 日这天，毛泽东看了李雪峰当天在华北局机关的检讨要点，删去其中的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列主义的顶峰，是最高最活的马列主义”等语，并批示：

“伯达同志：此件不知中央常委、中央文革小组各同志都有没有？请你们议一议，此件是否是正确的，是否有发给各地作参考之用的价值？因为各地很多同志至今还没有如实地诚恳地作自我批评的决心，极有帮助他们的必要，你看如何？”

当天，他在看了中共黑龙江省委12月23日给中央并东北局的报告后批示：

“陈伯达同志：请你和小组同志们看一看这个文件是否可以转发到县、团级作参考材料用。我看似乎比雪峰同志那个检讨还要好一些。文尾所说附件还未收到。”

1966年12月26日，是毛泽东73岁诞辰。也许是巧合，也许是天意，这一天，老红卫兵在中国政治舞台上匆匆谢幕。悲壮的尾声，成了他们献给最高统帅毛泽东的生日礼物。

这天，“联动”按计划在北京展览馆召开“破私立公誓师大会”，会议由北大附中“红旗”战斗小组负责人之一的周春英主持，清华附中等4个学校的“联动”代表就运动以来本红卫兵组织的成绩和缺点作“破私立公”发言。清华附中代表卜大华发言题目是《破私立公，继续革命》。

这次大会是“联动”第一次大会，由“联动”主要成员北京工学院附中的李单纲、项东平，北大附中周春英、宫小吉，人大附中张路宁，北京石油学院附中马晓军等人筹备，并邀请中央文革参加。

在此之前，中央文革戚本禹等人曾来到北大附中。北大附中高一2班学生、“红旗”战斗小组负责人之一的周春英，专门向戚本禹等人谈到准备在12月26日召开“联动”成立大会，想请中央文革的人参加。戚本禹当即表态说：“好嘛，我们争取去。”

这天，中央文革派了两个的联络员前来参加会议，是穿军装的《解放军报》记者。因为事先戚本禹说过要来参加会议，卜大华等4个发言人在后台聚齐后，就问那两个联络员：“中央文革的人什么时候来？谁来？”

联络员忙出去打电话，回来说：“快来了。”

其实这时，中央文革的人正在毛泽东那里吃饭。

又等了半天，展览馆这边冷场了……

不能再等了，中学生征求了两个联络员的意见后，决定先开会。

四中的戴小明首先代表“西纠”发言，他说：“不管运动如何发展，都要首先承认我们自己的错误。”

北大附中的学生项东平，是四中学生刘辉宣的初中同学，原来是一个很腼腆的人，此时却成了“联动”的首领。他指着正在台上发言的戴小明对刘辉宣说：“你们学校是怎么搞的？江青连刘主席都要打倒了，还检讨我们的错误？我们没有错误，是毛主席犯了错误。我们要彻底批判毛主席的错误路线！”

刘辉宣闻言吓坏了，这是他在“文革”中听到的最放肆也是最勇敢的言论。

卜大华最后一个发言。他在发言前，还在问中央文革的联络员：“他们来不来？再不来，我们的会就要开完了。”

回答依然是：“快来了。”

卜大华发言后，中央文革的人还没有来。这时，一份份署名“红后代”的传单在红卫兵头上纷纷扬扬撒了下来，会场上引起了一阵骚乱。抢到传单的，脸上满是兴奋；未抢到传单的，伸长了脖子四处打听。红卫兵三五成群，围在一起热烈地议论，会议暂时开不下去了。

石油学院附中的马晓军、贺邯生等人，索性走上主席台，向大家宣读这份口号传单：

“坚决批判中央文革某些人近几天发表的反毛泽东思想的讲话！”

话音落地，会场沉默了一会，接下来响起了暴风雨般的掌声。

再往下念传单：

“反对纵容、支持、鼓励反革干、军干子弟的行为！”

“沉默就是死亡！战斗以求生存！”

“揪出‘三司’后台，抢毙‘三司’后台！”

每读一句，会场就会有一阵巨大的反响。

当念到“反对乱揪革命老前辈！”时，全场同时发出“好！”的吼声。

“坚决批判以中央文革某些人为首的新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全国的革军革干子弟联合起来！”

“坚决拥护军委四位副主席的讲话！”

“一切单位一切部门都要置于军委领导之下！”

“谁敢乱捕革干、革军子弟小心狗头！”

“强烈要求释放被无理拘捕的全部干部子弟！坚决打倒镇压中学生的刽子手——第三司令部！”

马晓军将中气运得足足的，每念一句口号，他都要停顿一下，台下异口同声叫一个“好”字，震得整个会场都在抖颤。当台下的喧哗声渐渐平息下来，马晓军才接着念下一句口号。这个情景，像俄国作家肖霍洛夫在《静静的顿河》中所描述过的高加索兵营中的一组镜头。

当马晓军喊出“中央文革某些人不要太狂了！”这句口号时，全场几千人愣住了，一秒，两秒，三秒……突然，仿佛平地里卷起一团风暴，掌声大作，全会场突然像炸了锅似的沸腾起来，大家捶胸顿足地叫好，“联动”红卫兵们发疯似的蹦起来，跳到桌子上、椅子上，拼命鼓掌，大声叫好，鞋子、帽子、头巾、传单等物件抛向空中，在圆形屋顶下飘舞着。不知谁弄来了鞭炮，噼里啪啦，震耳欲聋的鞭炮声在剧场中炸开了，二踢脚直射舞台。

北大附中的彭小蒙对清华附中张新月说：“你们反不反？你们不反我反。”

宫小吉也高叫“反了！反了！”

彭小蒙按捺不住自己的兴奋，奔上台去，对刚刚念完口号的马晓军说：“念的好！我支援你，你们在学校干，我在家里给你们搜集材料。”还对周春英说：“你一定要顶住。大家情绪起来了，你要不支持就是右倾。”

当初，江青称赞的“我们的小太阳，中国的希望”的这群娃娃们，开始向中央文革反戈。

这一天，北京戏剧专科学校徐雅雅二人摆脱了监视，来到北京展览馆。她一下看到那么多老红卫兵，仿佛是吴清华在解放区见到了洪常青，心中像打翻了五味瓶，说不出是什么滋味。

“联动”老红卫兵的血液像火一样燃烧着。也有头脑还清醒的部分红卫兵意识到，在这种时候，过激的行为可能导致更严重的事端，会把“联动”引向彻底毁灭。

北京市八中老红卫兵计三猛立即上台发言说：“我们不能以自己

的境遇为出发点，一旦失宠就牢骚满腹……”

他的话，激起听众们极大的不满。台下骚动著，大声喧哗着，把桔子皮、饼干直往台上扔：

“你是干什么的？”

“哪里来的狗崽子！”

“你是什么出身？”

“滚下去！滚下去！……”

有的红卫兵一边喊口号，一边从主席台两侧往上冲，想抢走麦克风，不让他继续往下说。还有人叫着要把他从台上摔下去。

西城区的红卫兵纠察队赶紧冲上台，手挽着手，组成一道人墙，把计三猛围在中间，保护他继续讲演。

计三猛声嘶力竭地继续往下讲着。当他讲到他弟弟被公安局逮捕时，下面渐渐安静下来。他弟弟是 35 中学的初中生，他们几个红卫兵看大字报时与“三司”的大学红卫兵发生口角，被抓了起来。

接着他又谈到了他的父母亲，当时他父亲是一位局长，母亲是处长，他们都是 1937 年就参加抗日的老革命，现在统统被关进了“牛棚”， 计三猛兄弟几个，每天轮流给他们做饭。

这时，台下完全安静下来了。计三猛知道，台下许多人正和他一样，他们的父母亲，也正关在各种“牛棚”里，有的甚至更惨。正是在这一点上，他们的情绪慢慢勾通了。

大会结束后，他们又放了了两部电影：一部是毛泽东主席 8 月 18 日第一次接见红卫兵。当银幕上出现贺龙的镜头时，台下便使劲鼓掌。当出现江青、陈伯达时，就一片嘘声。

另一部是苏联电影《区委书记》，当游击队员们举枪宣誓“以血还血、以命抵命”时，全场立即响应，齐声高呼：“以血还血！以命抵命!”

电影放完已是凌晨4时，“联动”成员奔赴全市大街小巷，散发传单、张贴标语。他们不再向过去那样旁敲侧击了，而是公开把矛头指向中央文革。他们的口号有：

“江青不要太狂了！”

“反对纵容、支持、鼓励反革军、革干子弟的行为！”

“坚决打倒镇压中学运动的刽子手三司！”

“踢开中央文革！”

“打一打关锋、戚本禹，吓一吓陈伯达！”

北大附中彭小蒙曾写道：“我翻毛选，又拜读了《十六条》，认为中央文革所作所为都不符合。”“江青就会感情用事，江青太狂了！”

## 第 355 回：毛泽东，再写信制止武斗　批刘邓，“三司”十万人再聚

12 月 27 日，毛泽东就武斗问题给周恩来写了一封亲笔信：

恩来同志：

最近，不少来京革命师生和革命群众来信问我，给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牛鬼蛇神戴高帽子、打花脸、游街是否算武斗？我认为：这种作法应该算是武斗的一种形式。这种作法不好。这种作法达不到教育人民的目的。这里我强调一下，在斗争中一定要坚持文斗，不用武斗，因为武斗只能触及人的身体，不能触及人的灵魂。只有坚持文斗，不用武斗，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才能斗出水平来，才能真正达到教育人民的目的。应该分析，武斗绝大多数是少数别有用心的资产阶级反动分子挑动起来的，他们有意破坏党的政策，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降低党的威信。凡是动手打人的，应该依法处之。

请转告来京革命师生和革命群众。

毛泽东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继 12 月 25 日清华大学公开炮打刘少奇之后，27 日，“首都三司”又在工人体育场召开北京市大专中等学校师生十余万人参加的“彻底批判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誓师大会”，北京大学聂元梓在会上作了《向刘少奇、邓小平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的发言。她说：“刘少奇邓小平从来也不是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而是资产阶级革命家。他们所代表的是资产阶级利益，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最大的代表，是党内最大的资产阶级当权派。”

北京师范大学“井冈山兵团”谭厚兰发言说，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充分暴露了刘少奇的资产阶级的丑恶灵魂”。

清华大学“井冈山”蒯大富的发言题目是：“彻底摧毁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夺取新的胜利”。他在发言中历数了王光美在清华大学工作组时做的事情，并说：“王光美的罪恶实在太多了！她是清华园内地地道道的不折不扣的头号大扒手！她必须作第二次公开检查。可是，小小的王光美又算老几？她的大后台是刘少奇，刘少奇就

是镇压清华文化大革命的罪魁祸首！”

他还说：“刘少奇手下大将老奸巨滑的反共老手薄一波，也不甘示弱，为资产阶级反动潮流，推波助澜，迫不及待地登台表演，把黑爪伸进了清华园。他一面给亲信叶林下密令，与王光美配合，镇压文化革命。一面又亲自出马，赤膊上阵，两次来校当众与蒯大富辩论，亲手给蒯大富扣上‘假左派，真右派’、‘小牛鬼蛇神’的帽子，与王光美一吹一唱，配合得何其好矣！

薄一波还通过两面三刀的政客陶鲁笳，疯狂地扼杀了工交系统的文化大革命。在这里我们严厉正告：老扒手薄一波，罪责难逃，铁证如山。你必须回清华还帐！ 薄一波的黑根子在哪里！不在别处，就在刘少奇！

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十六条》公布以后，镇压革命群众运动的工作组滚蛋了！王光美溜了！薄一波也夹着尾巴逃跑了！但是，他们贼心不死，又耍了一个新的花招，一方面一手泡制了由高干子弟组成的伪‘临筹’。另一方面又派出王任重这只哈叭狗，假冒中央文革之名，行使刘、邓反动路线之实。

王任重这个政治流氓，阳奉阴违，两面三刀，阴一套，阳一套，明里支持革命的‘八八’派，暗中给保守的‘八九’打气撑腰，他表面是人，暗中是鬼。

就是这个王任重，当面摆出一副批判反动路线的架势，背后与王光美勾勾搭搭，密信来往。死心塌地的推行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对抗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就是这个王任重，背着中央文革，派出联络大员，左右清华运动，替刘少奇传话。为反动路线的制定者张目。

就是这个王任重，一手策划了连工作组也望尘莫及的‘八一九’‘八二四’等血腥镇压革命派的严重反革命事件，把直逼黑司令刘少奇的熊熊烈火扑了下去。

就是这个王任重，通过其女儿搞‘红旗红卫兵’，打着红旗反红旗，贩卖折衷主义，妄图把对刘、邓反动路线的批判引入歧途，保其过关。

就是这个王任重极端害怕、仇恨革命大串连，把到湖北去造反的革命师生视为洪水猛兽，布置层层围攻，无所不用其极。

也就是这个王任重，挥舞“秋后算账”的大棒威胁压制革命群众。

政治流氓王任重，年关已到，我们向你算总账的时候到了！

王任重必须回清华交帐！”

他最后说：“最近在重庆，在合肥，在哈尔滨，甚至在北京连续发生群众斗群众，武斗事件。这都是谁在幕后操纵呢？我们决心揪出黑后台来，扫除一切害人虫。

在北京，在全国，吹起了一股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妖风，攻击中央文革，攻击林彪同志，甚至把矛头指向我们的最高统帅毛主席。社会上一小撮牛鬼蛇神闻风而起，一些顽固追随反动路线的人也越走越远，李洪山、易振亚、伊林、涤西等小反革命喽罗也一个个杀将出来。什么‘霹雳’、‘梅花’、‘四野’也纷纷出笼。”

“从清华，从北京，从全国无数事实证明了，这是有组织、有计划、有指导、有后台的大反扑。这个后台是谁？就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制定者——刘少奇，邓小平！”

北师大一附中学生陈永康也在会上发言：《愤怒控诉刘少奇镇压我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滔天罪行》，控诉工作组在他们学校的“罪行”。

当天晚上，陈伯达、江青、戚本禹、刘志坚、张春桥、关锋、王力、穆欣、胡痴等人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一司”、“二司造反联络站”、“三司”、“首都兵团”及郑州的一个徒步串连长征队共 30 余人。清华蒯大富、北大聂元梓、地质朱成昭、北航韩爱晶都参加了接见。

陈伯达说：“今天请大家来，还是请教的多。听说你们现在搞红卫兵的条例、组织建设，是不是？”

江青：“受主席和中央的委托，要起草《红卫兵条例》，当然要听你们的意见。我们想，最好是你们起草。你们先起个草稿，我们共同研究。另外，你们考虑一下，大学、中学统一搞还是分开搞？大学、中学统一搞，小学分开搞。”

陈伯达：“条例力求简明。”

江青："工业有个《十条》，农村也搞个《十条》，你们红卫兵也要有一个。你们起草，成立起草委员会。"

经商定，决定成立起草 7 人小组，由清华"井冈山"、北航"红旗"、北大聂元梓、地质"东方红"、政法学院的"政法公社"、北京二十五中、北京二中各出一名代表组成。

张春桥说："主席前天（25 日）讲，特别反对要很多经费，反对红卫兵要很多经费。"

陈伯达："在新的阶级斗争形势下，阶级敌人用捧左派，拿钱收买左派。可怕的不是敌人的强大，可怕的是左派被收买。"

江青："时传祥已经完全成为一个工贼，他已被收买。"

陈伯达："红卫兵应该成为一个朴素的战斗革命团体，不要搞一套机构。行政瘫痪了，我们自己来管理，行政管理和红卫兵组织要分开。学校为什么要校长呢？学生就可以管理自己的学校，可以成立管理委员会。我们要建立新学制，社会主义的新学制。不但要关心国家大事，而且要善于管、要管理自己。"

江青："学校为什么叫校长？为什么不可以选举呢？"

江青一再强调说："红卫兵有无政府主义倾向，还不能说是无政府主义，有极端民主化的倾向。我现在觉得你们精神不振。前次我接见了从大庆来的 5 个人，他们经过四个省，一个自治区，一直住在贫下中农家里，现在他们又往南走了。他们的精神面貌比你们好。昨天我们听了工人的意见，是合同工，他们痛哭流涕，像你们开始一样，你们现在好像完成了任务。你们现在涣散了，而工人还受到很大压抑。想在你们这一代锻炼成为无产阶级的孙猴。"

陈伯达说："没有纪律就造不了反，就不能有力地造反。红卫兵不应该搞山头主义。老造人家的反，不造自己头脑的反，这怎么行！这样就可能被腐蚀。你们要向解放军学习。"

江青说："刘少奇的检讨不成话，在干部中没法通过，全国人民需要一个认识过程，我对邓小平已经认识了十几年了，对刘少奇是 1964 年认识的，当时我觉得我们党处在危险之中，那时我听了他一个报告，长达 7 小时，完全是赫鲁晓夫式的报告，他反对毛主席调查

方法，主张王光美那样的'蹲点'，王光美的蹲点也是假的。……王光美很不老实，她去印尼之前，我在上海，她对我说，她要戴上项链，作带花的衣服。我说：'你是个大国主席夫人，多做几件衣服倒可以，但你是共产党员，不能戴项链。'因为这件事，她好几夜没睡好，最后答应了，她说：'我接受了你的意见。'结果到了印尼后又戴起来了。"

这时，戚本禹插话道："凭她那金项链就不能革命，她完全是个资产阶级分子。"

江青又说："刘少奇、王光美访问印尼的电影是大毒草，电影为什么不放呵，到清华放一下。刘志坚同志，八一制片厂有片子没有，到清华去放，那是一株大毒草！要全国放！清华要揪王光美，我支持。"

蒯大富问道："江青同志，您在 12 月 18 日的讲话，说刘少奇的问题是党内问题，现在揪不适合，不策略，您如今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

江青说："那是几个月以前的事，你们要背对背，不要死揪回来，其他怎么都可以。"

"有人说我们中央文革小组不敢去清华，其实不是这样。那时中央有条纪律，不准去清华。这次没有这个规定了，因此我们要来清华听听各种意见。"

"你们都说没事干，其实有很多事情，你们看不到。例如，街上有一种不正常的现象，就是把原来可以贴大字报、大标语的地方都用红漆给刷上语录和标语了。这一方面是很大的浪费，一方面是有政治阴谋的，使得大家没有地方贴大字报了。这难道不是事吗？"

清华大学蒯大富、陈育延问戚本禹："刘涛揭发刘少奇可以不可以？中央同意不同意？"

戚本禹说："刘涛可以揭发她老子。大字报可以贴到中南海。让能进中南海的高干子弟，让刘涛他们去贴。抄好大字报，贴到外面，他看不到。贴到他家里去，让他看。"

蒯大富问王力："能否把中央首长对刘少奇的批评交给我们编入大字报？"

王力说："可以交给你们。"

江青讲话中提到的刷红漆一事，原来是北航“红旗”开展的“红海洋”活动。

在红卫兵人人身着绿军装，手拿《毛主席语录》，胸戴毛泽东像章的启示下，北航“红旗”的学生突发奇想：要把全国变成“红色的海洋”，于是北航“红旗”总部给他们驻各地的联络站下令，要求迅速行动起来，开展“红海洋”活动。就这样，在各地群众和红卫兵组织还没有明白怎么回事时，北航“红旗”便在几天时间里，在全国组织人力、物力，将各地大街小巷的店铺门面，房屋墙壁都涂上了红油漆，写上了各种革命的大标语和《毛主席语录》。在商店里、办公室里、居民家中，则以红纸为主剪辑各种忠于毛泽东的标志贴在墙上。许多单位的大门上，镶嵌着“忠”字或向日葵、红太阳等图案。大门两边的门上都用油漆写上诸如“抓革命、促生产”、“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敬爱的毛主席万寿无疆”等标语口号，大门两侧的影墙上，也一左一右设计了两块语录板，在农村各地，树有红色的大牌坊。许多居民家门上也用漆写上或喷上毛泽东头像和“最高指示”，家中最重要的地方一般都贴上毛泽东的画像摆上毛泽东的瓷像和石膏像。各大中小城市的商店、机关、医院、学校、饭店、旅馆等等几乎所有的单位，连同“破四旧”时改换的“革命”名称，一律被覆盖在红油漆之下。茶店、饭店、百货店、照相馆、五金店、土产铺都无法从门面上去分辨。连厕所的外墙上也被涂上油漆，写上《毛主席语录》。红色已是时代流行色，是最革命的色彩。

全国卷入了新的一轮“革命”浪潮，红色取代中国了传统的权贵颜色——黄色，于是街上卖蔬菜的菜摊上，黄瓜也被革了命，改称青瓜。

北京五十五中初三学生 16 岁的黄小宝像全国人民一样，热血沸腾，怀着对毛泽东的无限忠诚投身于文化大革命的浪潮中。那时，黄小宝出身小职员，父母都是小学教师，也被小学红小兵斗得不亦乐乎。他想参加红卫兵被拒之门外，正愁没机会表现，看见黄瓜改名，灵机一动，便紧跟时代大潮，张贴大字报，严正声明，更名为朱红。

也许是心底依然对“黄色”藕断丝连吧，在同学们纷纷南下江浙、广州串连之际，他却充差神使，踏上西去的列车，领略黄土高原的塞外风光。16 岁的朱红，从书本上读到“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心向往之。他又读到过，呼和浩特为蒙语“青城”之意，位于大青山脚下。他决定把呼和浩特作为他西行串连的第一站。火车上，他结识几个大学生朋友，北航“红旗”的红卫兵。

到了呼和浩特，大家下了火车，已是筋疲力尽，举目四望，更令人心灰意冷。深秋时节，应是满山苍翠，这里却是一片灰黄，举目远眺，光秃秃的山岭没有一棵树。火车站外，看不见繁华的街道商店，只有黄土垒起的土房，收割完庄稼的黄土地。土墙上不知为什么，用白色石浆划着一个个的圆圈，一打听说是吓唬狼的。朱红不由倒吸一口凉气。革命口号、大标语也多是用白色石灰浆涂写在干打垒的土墙之上。如此冷落，如此色调，与如火如荼的北京形成强烈反差。

“太差劲了，一定要把革命烈火点起来！”一个“红旗”战士说。

另一个“红旗”战士援引群众语言说，“第一步应该把革命的气氛制造出来。”

一行人住进内蒙古大学。第二天，大学生们忙着建立北航“红旗”驻内蒙古自治区联络站，与当地红卫兵、造反派取得联系。

朱红在学校本是逍遥派，捡了一个红卫兵袖章在北京还不敢带，怕被本校红卫兵撞见。到了黄土高原，料想不会与同学相遇，便放心大胆地把袖箍套上，招摇过市。他在校园里看到一辆没锁的自行车，一路打听着去昭君坟转一遭。破四旧的火焰已经烧过这里，碑毁亭残，惟有庞大的土坟上枯黄的小草，迎着习习凉风，可怜地拼命想挺直纤弱的细腰。

朱红沿石阶攀上坟顶，发现土丘上有几处被人刨过的痕迹。想来是破四旧的小将们有心掘坟挖墓，后来又因工程浩大力不从心，没有将革命进行到底。朱红站在墓顶，远望西下的残阳，感慨一番“独留有画向黄昏”的苍凉景象，转身朝下走。走出大门，却发现自行车没了。他骂了半天塞外番夷有失教化之类的话，只得迈开双脚往回走。

回到内蒙古大学已经快 9 点了，北航“红旗”驻呼市联络站里人来人往，正忙得热火朝天，一打听，原来北京总部来了命令：为坚决贯彻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最高指示，为建设一个红彤彤的新世界，世界革命的中心应以全新的面目出现在东方。中国的大地应成为“红色的海洋！”

联络站闻风而动，立即与呼市大中学校、机关商店的红卫兵。造反派组织取得联系，召集负责人连夜开会，布置工作。决定分三步走：第一步连夜刷出标语口号；第二步以最快的速度让主要街道成为红色大江、长河，让主要建筑物成为红色堡垒；第三步、动员群众自己动手，让红色巨浪涌入胡同小巷直至市郊农村。

会一散，各路人马按计划分片包干，四下出击。第二天人们在上班的路上，从大字报大标语中得知，新节目即将开演。

据说，苏联共产党在夺取政权之前，活动经费靠党员交纳的党费。一次，苏共在英国伦敦召开党的代表大会，由于经费不足，会议结束以后，没钱返回俄国。普列汉诺夫找到一个大资本家，由全体代表签名，写了一张借据，借了路费，才得以回国。说是一年以后归还，但直至革命成功，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才归还了这笔钱。“文革”期间，红卫兵小将效法革命先辈，以革命的名义乱开借据。后来，追还借出的财物时发现，其中大部分借据地址不详，查无此人。并非红卫兵小将个个都是骗子。他们当初签署的借据，用的一般都是红卫兵组织和更改得挺革命的新名字。学校、街道、派出所的档案中没有记载，当然无处查找。

朱红也是这样，当他率领一班人马冲进一家化工颜料商店，以革命的名义借走十几桶红、黄油漆，就是在借据的落款处写的：“首都红卫兵驻呼市联络站、朱红。”

不到两个小时，颜料店内的红、黄两色颜料全被拉走，留下的只是几张白条。商店售货员认真地登记下借物单位：

“鬼见愁”兵团，张永革；

“冲霄汉”战斗队，甄造反；

等等。

## 第 356 回：红海洋，北航“红旗”大行动　攻陶铸，犯方向路线错误

朱红对呼和浩特市旧城破旧的街道印象极深，决心亲手改造它。当地中学生不知从哪儿弄来一辆三轮平板车。于是蹬的蹬推的推，朱红上车，坐在油漆桶上，向旧城进军，一路走，他一路不停地手持话筒向路边行人宣传“红海洋”：

“革命的同志们，红卫兵战友们，首先让我们共同敬祝……”

敬祝之后，他又严肃地大声说：“我代表世界革命中心——中国的首都——‘文化大革命’的策源地——北京的红卫兵，向光荣的呼和浩特市的红卫兵战友、英雄的解放军战友、工人贫下中农同志致以革命的敬礼！”

朱红在北京时，有如不准革命的阿 Q，酸溜溜的，来到内蒙原本是打算欣赏塞外草原风光的，想不到这里的革命需要他，人民欢迎他，他不由自主地跑到革命队伍里来了。

板车放在旧城北门外的空场中央，朱红继续他的演说：“毛主席教导我们，没有无缘无故的恨，也没有无缘无故的爱。毛主席还教导我们，阶级斗争一抓就灵。自从人类进入阶级社会以来，一切事物就都打上了阶级烙印，颜色也不例外。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马克思就最喜欢红色。红色象征着革命。全世界的无产阶级、红卫兵战士都可以凭着红色找到自己的同志、朋友，找到自己的家乡。为了建设红彤彤的新世界，为了向毛主席他老人家献上我们红色的忠心，让我们行动起来，用革命的色彩占领一切阵地：红海洋万岁！”

朱红从板车上跳下来，几个人提着油漆桶冲向商店。商店职工热烈欢迎革命小将们的革命行动。众人齐动手，转眼间，门面、墙壁便革了命，红色的标语口号刷在黄上垒起的破墙上、门窗上，朱红累得腰酸腿疼，顺脖子淌汗，但心里很是舒畅。他终于有了行动。他终于看到自己也有能力呼风唤雨，改造世界。

不一会儿，十几桶油漆全部用光。朱红意犹未尽，带着人四处寻找颜料店。然而，革命形势发展得太迅速，所有油漆、甚至染料，红色均已告罄。

朱红与几位呼市红卫兵战友商量了一下，决定去生产油漆的工厂，直接从工厂提货。他们唱“造反有理”的造反歌，骑着平板车，转了大半天，也没找到油漆厂、染料厂。忽然，一家单位的标牌吸引住朱红的目光：×××屠宰厂。朱红立刻联想到一句歌词：“为什么战旗美如画，烈士的鲜血染红了它”。记得入队的时候，辅导员说过，红领巾是红旗的一角，是烈士的鲜血染成的。为了支持红卫兵的革命行动，工人把满满几大桶猪血无偿赠送给“红海洋”事业，连白条也不要。只是叮嘱红卫兵小将，行动要迅速，时间久了，猪血要凝固的。

从屠宰场出来，几个人飞奔回城，看见一家饭店，二话不说，上去就刷门框，涂墙壁，干得热火朝天。忽然，朱红觉得有些不对头，四周投过来的目光有些异样。再找那几个当地的红卫兵战友，早已不知去向。背后站了不少人，一言不发，不像刚才刷油漆的时候，围观的人都是指手画脚评论着。这伙人静得出奇，似是在等待什么重要的事情发生。饭店里的服务员也不同于别的店铺，一个也不出来欢迎，慰问。

朱红心中纳闷，手中的刷子不由停下来，抬头看一眼那饭店，门上挂着一块牌子上赫然写着两个他认得的汉字：清真。他的心一沉，知道要坏事。心中暗骂那几个红卫兵战友不仗义，不叫自己一声，偷偷溜了。他强作镇定，控制住自己的手不要抖，转回身，走到平板车前，装成涂料用完了的样子，瞅准人群中的一个缝隙，猛冲过去，冲出人群，撒腿就跑。

然而，已经太迟了。

迎面跑来一群中学生，个个左臂佩戴红卫兵臂章，与众不同的是，个个还头戴一顶白色小帽。原来饭馆的人不敢惹前来造反的红卫兵，从后门跑出去，到回民中学搬来救兵。

朱红陷入回民红卫兵的包围圈中。一场一边倒的红卫兵火并开始了。在打死他的恕吼声中，朱红被打得满地乱滚，哭爹喊娘。

朱红眼看就要惨遭不测。突然，他大叫：“别打啦，我是朱德的孙子！”

石破天惊，众人都不由住手，问：“你再说一遍？”

朱红蹲在地上，从衣兜里掏出学生证，说：“我是朱德的孙子。不信你们看证件。”

一个打手接过学生证，姓名栏中果然写着“朱红”两个字。说不定是真的。谁不知道朱德是红军的创始人，给孙子起名“朱红”以纪念红军，再自然不过的事了。

回民红卫兵们用目光交换了一下意见，大概是说：不要把事态扩大，万一他真的是朱德的孙子，打死他，咱们也吃不了兜着走。

众人丢下学生证，又踢了朱红几脚，说：“我们去调查，如果你欺骗我们，再找你算总账。”说完走了。

可怜朱红，一共混进革命队伍不到 24 小时，便吓破了胆，从那以后再不敢言“革命”二字。他躲在内蒙古大学宿舍里躺了 3 天，又趁着夜色溜到火车站，见到火车就上，逃离地狱一般离开了呼和浩特。

其实，回民红卫兵小将根本没去调查，也无处调查。他们激愤之后，不仅想不到去调查真伪，反而担心朱红率领大队人马杀来报仇。一个个磨刀擦枪，捡砖头，白天巡逻晚上站岗，忙了好几天，见没事才放宽心。那家饭店的职工也是好几天没敢上班，每天轮流到饭店门口探听消息，看有没有人来砸店。

12月27日，江青、王力将26日毛泽东家宴的情况分别向周恩来和康生做了汇报，周恩来和康生都认为毛泽东谈话内容深刻。周恩来说：“主席讲的内战，意思是以毛主席为首的革命派同党内走资派的斗争，是文斗，而不是枪炮武斗，打派仗。毛主席一贯反对两派武斗，打内战。”

江青把周恩来的意见告诉了陈伯达，当时陈伯达正在与王力、关锋和戚本禹一起商议为《红旗》杂志起草元旦社论，大家都认为，可以把“内战”一词改成“阶级斗争”。

周恩来又把毛泽东12月26日谈话的精神告诉了陶铸。

27 日下午，周恩来按照毛泽东的批示，主持中央政治局和中央文革在人民大会堂河北厅的联席会议。会议除了政治局委员以外，中央文革的人都来了，连一般工作人员也参加了会议。

会上，江青质问说：“为什么不许批斗余秋里、谷牧？谁作梗，

群众很不满意！”

陶铸看着江青说：“明年的国民经济要安排制定，是我不让斗。”

“你是犯了方向路线性错误，我看党内最大的保皇派就是你陶铸，你在继续推行着刘邓反革命路线，是没有刘邓路线的代理人。”江青也看着陶铸，语气更加尖锐。

“你不是怀疑一切吗？这些人怎么不怀疑？”戚本禹冷冷地说了一句。

“保皇派不投降，就叫他灭亡！”江青喊了一句口号。

王力说：“凡是他领导的单位，凡是他过问的单位，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就不能够得到贯彻，就要继续执行他的那一套。他的一套是什么东西呢？是什么货色呢？它是刘、邓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发言一边倒，都是批评陶铸。此时，政治局委员们都没有说话。最后，主持会议的周恩来看了李先念、李富春一眼，说：“其他同志呢，也说两句吧！”

李先念讲了两句工作方式方法上的意见，最后，李富春说：“我看让老陶回中南工作算了。”

晚上，陶铸很晚才回家里，他的面孔阴沉得如同严冬的天空，刚刚坐到饭桌旁，就用低沉的声音对他妻子曾志道：“曾志，告诉你一件事，今天中央开会，江青他们批评我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很严重。”

“江青他们为什么突然批判你呢？”曾志一边给他端来一杯热茶，一边关切地询问。

“说来话长，不是一两句说得清楚的，不过这次的事情，要从王任重说起。”

陶铸说起王任重在文革小组内受批评的经过，为此他给毛泽东写报告，建议王任重辞去文革副组长，回中南局工作。毛泽东在这份报告上批复：“王任重同志是文革小组副组长，离开文革小组，请政治局和文革小组开个联席会，对任重提提意见。”这个会当时没有开，王任重在 10 月底中央工作会议结束后不久，即离开北京去海南养病了。

当时，康生曾经面见陶铸，对他说："不要保王任重了，你保不住。也不要管那么多，你还是保自己吧……"

陶铸对康生说："我这都是咎由自取，我对我所做的一切负责。"

12 月工交座谈会后不久，陈伯达又找陶铸对他进行劝说："陶铸同志，正因为我和你是知己才来劝你，你应该悬崖勒马，赶快和刘少奇、邓小平划清界限才行，这场斗争的性质你也该清楚了。"

没想到陶铸问陈伯达："我先想弄清一点，你今天来是我们私人间的朋友聚会，还是奉他人之命来和我谈话？"

陈伯达笑笑说："也许两者都有吧。"

"那我就把我的态度彻底亮明。"陶铸说："首先，少奇和小平同志的问题还是人民内部矛盾，他俩还是中央常委嘛，少奇还是国家主席嘛，我不能未经中央讨论和批准而像红卫兵那样喊打倒他们么，关于《长征红卫兵》的宣传，是我首先发现的，大串连是我极力支持的。不过也没什么。红卫兵那有什么了不起！到街上拿八分钱就可以买一红箍箍戴着。我认为把自己划入红卫兵，水平那就太低了。"

陈伯达说："我认为你这种态度极其有害，你知道吗？北京和中南地区已经有你的大字报了。"

陶铸仍不示弱："大字报可以贴到大街上去，如果美国人愿意看，还可以贴到美国去嘛！还可以贴到华盛顿去，我觉得没多大意思，有一次我在文艺系统传达中央会议精神，进来一批红卫兵，把我当成肖望东。抢了我的话筒，夺了我的讲稿，拿了我的眼镜，我说：我很高兴，如果我是赫鲁晓夫，就会被搞下台。你们这批红卫兵真行！不过，我对他们说，我陶铸是一贯革命的，说我陶铸不革命就要和他们辩论。我相信，我基本上是无产阶级革命家。"

"你是中央文革的顾问，应该尊重一下小组内大多数人的意见。"陈伯达又说。

"是我不尊重还是个别人不尊重大多数人的意见？王任重同志有多大问题？他还是文革小组副组长呢，还有刘志坚，你们都不去听听人家的意见。"陶铸倔强的反驳说。

陈伯达叹了口气："既然你听不进去，我也只得如此了。"

陶铸说："这几天休息不好，有什么讲的不妥之处，请你不必介意，全当我没说！"

"言为心声嘛。"陈伯达笑了一下，向房门走去，没再回一下头。

然后，陶铸把刚刚在中央碰头会上发生的事情一五一十地对自己的亲人诉说了一遍。

曾志听罢，淡淡地说："你写给主席的那份报告，分明是保任重同志的，你保得了他吗？"

陶铸是个汽油性格的人，一点就燃，他一下子便冲动了起来："人家在那里怎么还能工作下去呢？身体又是那样的不好，我可不是那种落井下石的人，能帮总要帮人家一把么，这是做人最起码的一条。"

曾志慰藉他道："事已至此，就只好正确对待吧。"

陶铸成为"中央文革"的顾问，是江青提名的，他们的关系原本是很好的。江青后来发觉陶铸对邓小平很尊重，他曾经说过："如果党内允许拜师的话，当主席的学生我不够格，但我愿拜邓小平为师。"

陶铸向曾志倾吐他内心的痛苦与委屈说："曾志，你不知道，江青对我们，经常像训孙子那样的训斥，总是用命令的口吻，真是让人受不了！"他说起与江青在学部吴传启问题发生的大吵，最后以他向江青道歉暂告一段落。"自从同江青吵了那次以后，我的日子好艰难哟，每次去中央文革开会，戚本禹、姚文元、王力他们，总是对我冷嘲热讽，连我穿军装他们也要说风凉话，江青挖苦我：陶铸，你又不是解放军，你有什么资格穿军装？我说：我是广州军区第一政委，为什么没资格？你们也穿军装，你们又是解放军？如果我穿便装去开会，他们又会讥笑道：怎么？不敢当解放军了？真是盛气凌人！纪念鲁迅诞辰三十年的活动，张春桥说召开 100 人的纪念会就可以了，我照此办理。他们又指责我贬低鲁迅的革命影响，结果由他们自己主持召开了一个 1000 人的纪念大会，他们这是故意刁难我。唉，谁个会相信，我陶铸今天会受到如此的凌辱！现在我不得不顾全大局，若是过去，说什么也容不得他们如此猖狂。"

二人无言地对视了一会儿，曾志又坦诚地说："我和你的个性都太强，两人生活在一起，总要为一些事情而争论不休，有时还吵得很

凶。但是从今天起，我再也不同你争论了。”

## 第 357 回：彭德怀，抵京城住进地院　刘涛反，遣陶铸离开京城

12 月 27 日 16 时 25 分，彭德怀乘坐的 34 次列车到达北京火车站。车刚停稳，就看到北京卫戍区李钟奇副司令员带着一队军人已经站在车站的月台上。车门一开，王大宾走出车厢，李钟奇迎了上去，交给他一封北京卫戍区的大信封，上面写着："谷万才、王大宾同志收"。王大宾抽出信笺一看，里面写的是："奉总理指示，把反党分子彭德怀交卫戍区副司令员李中奇同志。"

王大宾立即将信交谷参谋长看，并向他介绍："这是北京卫戍区李副司令员"。

谷万才说："不用介绍了，我们是老战友。"

这时，彭德怀正准备下车，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一把手朱成昭也带人赶到了，说要带彭德怀回地院。

王大宾把卫戍区的信递给朱成昭，说："周总理有指示。"

谷万才也说："要坚决执行周总理的指示。"

朱成昭仔细看了北京卫戍区的那封信函后说："这封信有误，你们看。信里写的是交给'李中奇'，不是'李钟奇'，没搞清楚前人不能交，先回地院，我们不能再出错。我们要回去问清楚。"

其实朱成昭认识李钟奇。

李钟奇与其争辩，双方一时争执不下，于是李钟奇给卫戍区打电话请示汇报。朱成昭也给周恩来和中央文革打电话汇报。

此时，中央文革小组和政治局正在人民大会堂开联席会批评陶铸。戚本禹起身去接的电话。他回来后马上向与会人员通报说："彭德怀已由红卫兵押到北京站。"

很快，戚本禹赶到北京站，他动员朱成昭执行周恩来的指示，但朱成昭坚持己见，一定要先带彭德怀回地院。

因为彭德怀没有下车，34 次空车也不能开走，在北京站已经停了很长时间。为了不影响北京站的正常运行，戚本禹对双方说，火车先离开北京站，开到西直门火车站停放。可从那里先将彭德怀接到地院。

随后，戚本禹回到钓鱼台。当晚，陈伯达召集他和王力、关锋，

4个人根据毛泽东12月26日的讲话精神起草1967年的元旦社论。商定主题后，陈伯达、关锋编句子、口述，王力记录，戚本禹补充意见。28日凌晨草成未定稿，准备过一天再改。这篇社论的题目就叫《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这是毛泽东祝酒辞里的一句话。而社论主题就是："在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下团结起来，展开全国全面的阶级斗争。"

关锋提出："我们把主席的话作这样的改动，是不是好？"

戚本禹说："在意思上并没有多大的出入。再说，我们写的稿子还要送给主席审阅的。这和田家英的做法完全是两码事。不用担心。"

再说 34 次列车载着彭德怀和地院"东方红"等人到了西直门火车站时，北京地院已开来几辆大轿车等候在那里。大轿车接学生，小轿车接彭德怀来到了北京地质学院，朱成昭安排彭德怀住在办公楼的一个带沙发和床铺的套间，同学们到大食堂吃饭，王大宾叫食堂煮了一碗鸡蛋面送到彭德怀住处。

安顿好彭德怀，王大宾在"东方红"总部，让钱新将成都带来的一个皮箱和一个旅行袋，连同物品清单交给朱成昭。

朱成昭满脸不高兴，简单说了句："你们也辛苦了，今天晚上先好好休息吧。等会儿我过去看看老头子，坐了两天两夜的车，让他也先休息。"

随后，朱成昭在郑文卿的陪同下去看了彭德怀。考虑要休息，他们没有与彭德怀多谈就出来了。

当晚，周恩来指示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我叫戚本禹给红卫兵谈，还是交卫戍区管理，可以叫北航'红旗'和地质'东方红'参加管理。"

28日凌晨，傅崇碧又接到"中央文革"打来的电话：彭德怀由北京卫戍区和红卫兵共同管理。望卫戍区即派人与红卫兵协商管理办法。凌晨3时，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副司令李钟奇、公安部副部长于桑带人来到地院，再次传达周恩来的指示，并于中午11时，让彭德怀上了卫戍区的大轿车，送到北京卫戍区五棵松连队驻地监护起来。

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北航“红旗”、地院“东方红”可以派人和北京卫戍区战士共同看管彭德怀。于是地院“东方红”和北航“红旗”头头与周恩来的联络员共同商量后决定：由北航“红旗”和地院“东方红”各派出二人成立彭德怀看管小组，北航“红旗”任组长，协助卫戍区战士看管彭德怀。

再说 27 日晚，朱成昭与郑文卿从彭德怀那里回到“东方红”总部后，打开了彭德怀大皮箱的封条，翻看里面的材料。朱成昭找到彭德怀的万言书及其他申诉材料，连夜找来几个学生，将这些材料全部抄写下来。随后即在“东方红”总部的核心组成员中传阅，很快地院就出现了一股为彭德怀鸣不平的“暗流”。

几天后，朱成昭将彭德怀皮箱内的全部材料和清单上交中央文革。

蒯大富 12 月 25 日组织清华“井冈山”到北京市公开喊出“打倒刘少奇”的口号后，效果显著。一个星期来，打倒刘少奇的大字报、大标语铺天盖地遍布京城。清华“井冈山”找刘少奇的女儿刘涛谈话，要求她在全校做检查，揭发刘少奇。刘涛跑到蒯大富宿舍哭，坚持说：“我爸爸不是反革命，我爸爸不反毛主席。”

蒯大富说：“这个你说不管用啊，中央两报一刊的文章说，中央那一两个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中央那一两个最大的走资派。毛主席、党中央都说得这么清楚了，你说这个能是假的吗？按照《十六条》的解释，走资派是敌我矛盾啊！你爸爸肯定是反革命，而且是最大的！你是共产党员，你说你是跟毛主席走，还是跟你爸爸走？”

刘涛说：“我肯定跟毛主席走。”

蒯大富说：“那给你个机会，就是要你表个态，在全校大会发个言。”

刘涛终于答应了。蒯大富赶紧对外宣布：“刘涛同志要做检查！”

12 月 28 日，刘涛作了检查，很长。她做完检查，贺鹏飞也做了检查。他们检查后，蒯大富上去发言，他说：“刘涛表现是相当好的，我们欢迎刘涛与刘少奇划清界限，站到毛主席这边来。”

会后，刘涛的检查录音复制多盘拿到王府井等地去放。当时，听

录音的人把王府井大街都堵了。当天，刘涛的检查就用大字报贴了出来，题目是：《造刘少奇的反，跟着毛主席干一辈子革命》，长达 3 万多字。

来自自己女儿的揭发，对刘少奇的打击可想而知……

12 月 28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制止“红海洋”的通知：

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和人委：

根据各地群众反映，最近城市中有些党政机关部门，借口“写毛主席语录”“美化市容”等等，大搞所谓“红海洋”，就是用红色的油漆把大门和大片大片的墙壁涂成全红色，甚至强迫群众挨家挨户出钱。有些农村中，除了“红海洋”外，还搞了大牌坊。还有的别有用心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想用这个方法使群众没有贴大字报的地方，掩盖自己反毛泽东思想的罪行。他们的这种做法，不但完全违背毛泽东同志历来教导的艰苦朴素的作风，而且是一种抗拒大字报、对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恶劣行为。中央认为，各级领导机关必须坚决制止这种错误做法。特此通知。

中央、国务院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几天以后，那个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刷红漆的北京五十五中初三学生朱红回到北京，看到北航“红旗”在大街上贴的严正声明：要大造“红海洋”的反，矛头直指走资派。朱红简直有些目瞪口呆了，怀疑他们的头头是不是发高烧说胡话呢。才几天的功夫啊，就 180 度大转弯。再说，要骂“红海洋”，当初不干比什么不好呀，自己也不至于差点把小命扔在内蒙大草原上。

12 月 28 日，周恩来继续主持政治局和中央文革碰头会。与 27 日一样，会上还是批评陶铸。

12 月 28 日，毛泽东看了总后勤部副部长傅连璋 12 月 12 日再次给他的信，在上边批示：

“傅医生：前后送来各件，都看到了。政治安排问题，很多人同样，现在还谈不到，等将来再说。”

批完后又加一段：“对自己的一生，要有分析，不要只见优点，

不见缺点。毛泽东又及。”

这天，毛泽东在李雪峰 27 日送审的检讨修改稿上批示：“退李雪峰同志：修改得好，可照此发出。”

28 日，毛泽东在中共黑龙江省委文化革命办公室 12 月 25 日《关于城市街道开展文化大革命急需明确的几个问题向中央文革小组的请示报告》上批示：

“伯达同志：（一）应复电，同意按他们意见去做；（二）请省委在再做一段工作，取得更多经验后，写出具体条文若干条，报告中央。以上请酌办。”

黑龙江的《报告》说：“我们认为街道运动的重点，应该是斗争党内（街道办事处以上的负责干部）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反动的资产阶级分子。街道居委会的主任，不能算作当权派。在运动中，应该依靠工人、贫农、下中农家庭出身的职工家属和革命群众，团结其他劳动人民。”

28 日当天，中共中央复电黑龙江省委并告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同意按黑龙江省委的意见去做。

12 月 29 日，中共中央批转了中共黑龙江省委 12 月 23 日给中央并东北局的报告报告和李雪峰在华北局机关的检讨要点。

29 日上午，毛泽东主持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当陶铸一走进会议室，毛泽东就对他说：“陶铸，你为什么不说你是犯了很不理解这一条错误呢？”

“是的，我的确是犯了很不理解这一条错误。”陶铸说。

毛泽东说：“陶铸来中央后，工作是积极负责的，忙得很，做了许多工作。”他看了江青一眼，接着说，“陶铸是政治局常委，未经中央正式讨论，就说他犯了方向路线错误，随便在会议上批判，是违反党的组织原则的，你也太任性了！”

散会后，毛泽东招呼陶铸留下来，单独谈了一个多小时。他对陶铸说：

“江青这个人啊，容不得人。对她的言行不必介意”

“嗯。”陶铸点了点头。

接着，陶铸又直言不讳地向毛泽东面陈他心中的焦虑，他认为目前从经济建设到党的作用，从干部的思想到社会风气，都处于严重危急状态中。

毛泽东静静听着，脸上没有任何表情，手中夹着的香烟已挂上长长的灰蒂，沉默了一阵子之后，他突然漫不经心地问："你今年虚岁是 58，实岁应该是 57？"

"对的，主席记得这样清楚。"陶铸心中好像搬掉了一块青石板，感到一阵轻松。

"选你来中央工作，这也是一条。"

"从心里讲，我真愿意在外地工作，水平低。"

"京官难做，婆婆多。听说你以前讲过：在广州是个西瓜，到了北京就成了芝麻。西瓜、芝麻两样都是稀罕作物，都要的。"毛泽东笑着说，陶铸也跟着笑了。

而后，毛泽东又收敛笑容，语重心长地对他道："你这个人啊，就是说话不注意，爱放炮，在中央工作不比地方，要处处注意谦虚谨慎。"

毛泽东又猛抽了几口烟，有些不满地问："你为什么还不下去呢？"

原来，毛泽东 11 月份接到对陶铸的反映后，就交待陶铸和谭震林下到各省做调研。

陶铸急忙解释说："近来事情太多，总理一个人忙不过来。再说这次下去时间较长，需要把工作安顿一下，打算过几天就下去。"

"赶快下去才好，这次谭震林不去了。你自己去就行了。过罢新年，你到几个省、市去考察一下，去看看运动情况到底怎么样?还是老问题，'糟得很还是好得很'?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你亲自去看一看。几个省、市委第一书记，凡是能保的都要保。要救人于水火呀!你代表中央去，讲话的作用会大些。"毛泽东说着，又亲自拟了一个名单，大约有 20 多人，包括上海的陈丕显、曹荻秋、江苏的江渭清、云南的阎红彦等，他把名单递给陶铸说："这些同志烧是要烧的，但是千万注意不要烧焦了，你下去要把他们保下来。"

陶铸接过名单，毛泽东又叮嘱他道："你这次下去，要多听少说，多走、多看，遇事要谨慎，两个月时间不够，三个月也可以。"最后，他突然话题一转，"你的那两本书，曾志寄给我，我都看过了。《松树的风格》好是好，但是也没多大意思，还是粮食主要。在中南戏剧会演上的讲话，你说现阶段应当把人民内部矛盾提到重要位置上来，这可是个原则性问题。"

陶铸从游泳池毛泽东住处回来后，连忙整理了这次的谈话记录，当即向周恩来汇报。周恩来又谨慎地请示了毛泽东："具体地保哪些人，主席还有什么意见没有？"

"我看，凡是受严重冲击的，都可以保。"毛泽东回答。

当天下午，在中央会议上，周恩来正式宣布了毛泽东指示，并说："主席的指示，现在就作为中央的决定，把主要工作安排一下，过了新年，陶铸同志就出发。"

当晚，一直与陶铸关系很好的林彪召见陶铸，询问他情况，依然是叫他"现在就（要）被动……要被动被动再被动。"

29 日上午，周恩来又给傅崇碧打电话，询问了彭德怀的监护情况，而后再次指示："彭德怀同志的住处要保密，要绝对安全。不许武斗，不许游街，不许逼供信。"

12 月 29 日，北京大学校文革与中央党校、中宣部等四单位在工人体育场召开批斗彭真大会。原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刘仁、市委书记处书记郑天翔、万里、副市长吴晗等人在台上"示众"。

12 月 29 日，"全红总"周牧和杨政被中央文革联络员邵一海叫到全总 416 办公室，这是专门给邵一海使用的办公室。邵一海表情沉重地告诉他们：12 月 26 日江青答应他们的"三条"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没有通过。常委中阻力很大。

周牧他们听后感到非常吃惊。

邵一海走后，周牧立即打电话给中央文革，是戚本禹接的电话。周牧问他江青的"三条"在常委会没有通过是否真有其事？戚本禹肯定地告诉他："是真的。"

周牧又问江青有何指示？戚本禹说不太清楚，他要周牧半小时后

再打电话来，他请江青直接听电话。

半小时后，周牧和江青直接通话。江青先是问寒问暖，问全总的走资派是不是还在为难他们。周牧告诉她：他们按她的指示进驻全总后，一切顺利。还告诉她“全红总”第二次改组的情况。最后周牧问江青，常委会通不过“三条”，各地仍在大量解雇和迫害临时工合同工，怎么办？

江青在电话中略为思考，问道：“小周，你难道忘了‘我们工人阶级有力量’这首歌吗？”

周牧认为江青是要他们继续施加压力。放下电话，“全红总”立即召开总部会议，决定把全国总工会和劳动部的负责人找来，通过正常的程式，共同签发一个有行政效力的文件。

会后，王振海通知劳动部两个副部长郗占元、李正亭和全总党组负责人王志杰在 67 年元旦的晚上到全总大楼会议厅，与“全红总”共同签署《三家联合通告》。

12 月 29 日下午，周恩来接见北京农业大学等校代表。他首先批评他们说：

“这么一点事情，就这么难商量？你们要求见面，说好 21 人，我是同意的，后来又要增加两人，也同意了，可是你们还要增加人，彼此都应讲信用嘛！我昨晚只睡了两个小时，上午有事，下午参加你们的大会，下面还有好多项目的事情呢。”

周恩来说：“外面散发的一个讲话，说是我讲的，哪有这个事？我怎么能说王观澜没有错误呢！你们要是找我的错误，也能找到嘛！过去是好人，也会变嘛！我怎么能说他没有错误？毛主席对刘少奇还是很信任的，当接班人当了这么久。王观澜到现在不去检查，是不对的！”

归侨谢民亚同学说：“华侨青少年要到印尼和苏修大使馆示威。”

周恩来：“到印尼大使馆示威没有什么，因为他们把我们的大使馆搞成这个样子，过去主要让他更暴露些，现在开会还不是照样开嘛！”

有同学要求，开控诉揭发大会时，把印尼驻华大使揪去斗。

周恩来：“这不行！这里有个国际问题。这个我们可以马上答复你们，不行！文化大革命是国内的事情。反修路是女二中搞的，也不过搞到那儿为止。那一次搞得不错，并从学校转到社会上的斗批改，做了好多事情。后期十月份的我们关心少，中学发展有的抓人、打人，走上犯法。你们全怪他们，起初联系多，后来联系少，这点我们做领导的人恐怕也要负些责任。不管怎样，多数是可以教育过来的。”

## 第 358 回：清华园，《合肥晚报》被接管　陶铸晦，见学生又起争执

12 月 30 日，位于“三座门”的中共中央军委办公厅小会议室，总政治部主任肖华正在主持一个会议。与会人员有：军委办公厅副主任郑瀚浩、军事科学院研究员柴瑞林、总参谋部作战部副处长王亚志、原罗瑞卿办公室秘书邓汀、公安部的一位副局长、总政保卫部第四处副处长张英华，共 7 人。

肖华首先说：“康生同志几次来电话，督促我们成立罗瑞卿专案组。今天到会的同志都是专案组的成员，我们这个专案组就算正式成立了。”

会上规定了保密原则：办案内容不准向任何人透露；片纸只字不能带出；会议和外调记录一律记在保密手册上，有页码有编号，用完上交；专案之间不能串通，等等。

专案组的办公地点设在国防部大楼的肖华办公室，专案组人员对外称“肖办秘书”。

专案组的第一件事，是搜集在 1965 年 12 月的上海会议、1966 年 3 月的京西宾馆会议以及 1966 年 4 月公安部揭发、全军批判罗瑞卿会议的材料。

根据搜集的这些材料，专案组对罗瑞卿的问题进行了分类，分为“不突出政治”“抢班夺权”等几类。之后，又以 1949 年划线，将审查内容分为两部分：在革命战争年代的表现（包括个人政治历史）和解放后主持公安、军队工作时的路线错误。

12 月 30 日，江青、王力、关锋、姚文元来到清华大学，江青当众紧紧拉着蒯大富的手说：“你们干得对，干得好！毛主席向你们问好！”

江青在会上对大家说：“同学们、革命的战友们，你们好！向你们致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敬礼！”

群众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

江青接着说：“同志们，我也没有多少好讲的，我来看看你们，预祝你们在一九六七年，在新的革命形势下，获得更大的成绩！”

接着，王力说：

“同志们、同学们：

我们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我们江青同志来问候同志们了！我代表关锋同志、姚文元同志向同学们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敬礼！”

“1966 年，我们是在一个伟大的战斗的斗争中度过的，我们今天的斗争是人类历史上没有过的最伟大的斗争！现在 1966 年快要过去了，我们清华大学很多同学们，到各个战线上，以及到全国各地去串联，去参加战斗的同学已经回到学校了，新的战斗任务在等待着我们！（鼓掌）

现在大家都回来了，究竟干什么呢？刚才我们见到许多清华大学的同学向我们提出这个问题，我们把这个问题提出来请清华的同学们自己回答。1967 年新的战斗任务摆在我们面前，这就是：全国全面地展开阶级斗争的一年！”

众人高呼：“毛主席万岁！”

王力继续说道：“我们将在工业战线上，农业战线上，商业战线上以及全国的各条战线上，更加深入地、全面地展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的口号声再起。

王力：“毛主席经常教导我们：青年运动的方向就是要同工人、农民群众相结合。中国历次大革命都是从学生运动开始而发展成为工人运动、农民运动、革命的知识分子同工人、农民群众相结合。”

众人高呼：“毛泽东思想万岁！”

王力：“我们面前摆着新的战斗任务，为了迎接这个新的战斗任务，许多同学提出来要求进行军事政治训练，好不好？”

众人说：“好！”

王力：“让我们进一步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让我们进一步用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武装起来！”

群众高呼：“毛泽东思想万岁！”

王力：“1967 年就要到来了，1967 年是一个伟大的革命的年代，在 1967 年我们将要在各个战线上，进行更深入的文化革命，向资产阶级发动全面的总进攻！”

“彻底打倒刘、邓反动路线！”“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万岁！”的口号声响成一片。

王力：“1967 年也是我们革命的知识分子更广泛地和工农兵相结合的一年，几万万人的革命风暴正在中国的土地上兴起。我们一切革命的同志、革命的战友应该投入到这个风暴当中去锻炼自己，改造自己，使自己的思想更加无产阶级化，更加战斗化！我预祝大家在学习毛泽东思想，在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斗争中获得更大的成绩！”

蒯大富高兴极了。江青他们走后，蒯大富兴奋的说：“江青同志、王力同志和姚文元同志这次亲自来清华看我们，大大提高了我们清华‘井冈山’的威望和影响，说明我们打刘少奇对了，干得好，干得漂亮。就是打到中央文革、打到毛主席的心窝里去了。所以江青同志到清华接见我们。”

12 月 30 日清华《井冈山报》有篇文章，题目是：“清华园春来早”，专门记载江青接见他们的经过。

江青这次来，还提出要见刘涛和贺鹏飞，清华“井冈山”通过广播，通知刘涛和贺鹏飞到清华静斋。

不一会儿，刘涛和贺鹏飞来到了静斋。他们一见到江青，就喊：

“江阿姨。”

“江阿姨。”

他们开始谈话的时候，江青就让蒯大富他们出去了。

江青对贺鹏飞说：“你爸爸犯了严重错误，我们这里有材料。你告诉他，我可能要触动他啦！”还说：“你妈妈也不是好人。”

谈完话，江青出来对蒯大富说：“老子是老子，儿子是儿子，老子不革命，儿子还会革命的，不要为难他们。”

第二天，12 月 31 日，江青又派人找来刘涛和她弟弟刘允真，他们二人都是刘少奇与第三个妻子王前所生的孩子，后来一直由王光美带大。江青对他们说：“涛涛、丁丁，你们知道你们的亲生母亲是谁吗？你们不去看看自己的生母吗？” “你的生母是受压的。我也受压几十年了嘛。应该去看看你们的生母，你们共同揭发嘛。”并劝他们“要和家庭划清界限！和你们的生母一起揭发刘少奇！”不要“舍

后妈，保亲爸”。

12 月 31 日，清华“井冈山兵团”在其发行全国的《井冈山报》上，以《专刊》形式发表了刘涛 12 月 28 日的长篇检查。

由于安徽省委领导主要成员四处躲藏，省直机关干部公开起来批判省委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样的环境为广大民众起来造反提供了有利条件。首先是工厂的工人起来造反，各企业五花八门的各类造反组织纷纷成立。原有的保守组织因失去省委的支持而自行解体，多数都是反戈一击，站到造反派一边。基层群众的一边倒加速了基层党组织的权力的失控。安徽省暨合肥市党的各级组织基本瘫痪。

12 月下旬，在安徽省含山县西部独龙山与仓山东西挟持的清溪河畔的清溪镇，李葆华主持召开了省委常委扩大会议。会议指出：“必须当机立断，悬崖勒马，彻底与错误路线决裂，坚决回到毛主席的路线方面来”，“迅速、坚决、彻底地转，把屁股坐到革命造反派一边，支持他们革我们的命。力争在较短时间内把目前的被动局面扭转过来。”会议要求各级领导干部到群众中去做工作。会议气氛颇显悲壮。

这时，周恩来电召李葆华去北京开会，陶铸要张恺帆找到李葆华，通知他到北京，几经周折，最后在舒城县的晓天镇找到。12 月 26 日，李葆华来到北京。

此时，合肥市“向英雄的‘八•二七’学习！”、“向英雄的‘八•二七’致敬！”、“‘八•二七’革命造反精神万岁！”，这些颂扬“‘八•二七’”的标语到处皆是。“‘八•二七’”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所到之处，无不受到最热烈的欢迎。各种名号的造反组织像雨后春笋般的出现。12 月 27 日，“安徽省八•二七革命造反兵团”成立，办公地点就在省政协。工业大学的刘光裕为“八•二七兵团”总指挥，工大的李胜利、工学院的李文安为副总指挥。工业大学的梁守福为政委、安徽大学的吴波为副政委。

12 月底，《合肥晚报》社印刷厂造反工人联合起来接管工厂的管理权。这是安徽省第一家夺权单位。

就在安徽造反派苦于找不到攻打安徽省委的突破口时，原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通过各种渠道向他们传递李葆华 1962 年来到安

徽后刮“两风”，即翻案风和黑暗风的材料。根据这些材料，“八•二七”利用其宣传工具《安徽八•二七》报，向全省、乃至全国的某些省份，大量的、较为系统地揭发省委的问题。安徽文化大革命从“三天流血事件”以后，由于机关干部的造反，已不知不觉地将安徽干部间的宗派斗争引入文化大革命。

陶铸太倒霉了，他还没来得及离开北京，武汉“赴广州专揪王任重革命造反团”已到北京，坚决要见他。自 11 月 18 日中央文革接见武汉“二司”代表，表态王任重有问题，已离开北京的消息后，批斗王任重基本上就成了武汉地区群众组织的一致目标。12 月 5 日由武汉“二司”，“三司”和外地赴汉的红卫兵 50 多人，组成“赴广州专揪王任重革命造反团”，兵分两路，一路到广州揪王任重；一路到北京找陶铸。

12 月 30 日晚 22 时，武汉“赴广州专揪王任重革命造反团”在中南海小礼堂要求陶铸回答问题。他们一遍又一遍地唱着《大海航行靠舵手》、《造反歌》、《毛主席语录》歌，等待陶铸的到来。

本来陶铸是和他们约定是第二天接见的，但是红卫兵不同意，他们下了通令，如果这天晚上不接见，他们就全体绝食。出于无奈，陶铸只好推掉原来安排的会见，先来和武汉的红卫兵见面。

红卫兵的歌声在中南海上空回旋着。

这时中宣部文革主任阮铭出来对红卫兵们讲：“同学们，有几个事情和大家商量一下，看大家同不同意。陶铸同志有三个要求：第一，不要录音；第二、李一清同志也来参加；第三、问题集中一点，派几个代表商量一下。”

前两条学生们坚决不同意。他们说：“错误和挫折教训了我们，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我们要求录音。这个会不是接见会，是回答问题，我们要录音。根据陶铸同志的特点喜欢辟谣，已经引起过群众斗群众，我们要录音。李一清是我们带来的，由我们处理，陶铸同志与李一清很熟悉，他们俩单独谈更好，再说他们已经谈过一次。我们不派代表，我们80多个人都是代表的代表。我们有什么问题就提什么问题。”

这时已经快午夜23时了。学生们有些不耐烦了，他们喊道：

“陶铸，快出来!”

“陶铸，快出来!”

“快！快！快！陶铸快出来!”

一阵有节奏的喊声过后，又齐声唱起了《毛主席语录》歌：

“什么人站在革命人民方面，他就是革命派，什么人站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方面，他就是反革命派。什么人只是口头上站在革命人民方面而在行动上则另是一样，他就是一个口头革命派，如果不但在口头上，也在行动上站在革命人民方面……”

歌声还未停止，刚刚结束了一个会议的陶铸，满脸倦容的匆匆忙忙赶了进来。他等歌声停下后就说：“同学们，我们谈吧！你们来了好几天，19日到的……”

他的话被学生们的口号声打断了。红卫兵呼喊着：

“炮轰中南局！”

“打倒揪后算账派王任重！”

“推倒折衷主义！”

“打倒调和主义！”

“打倒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誓死保卫毛主席！”

“毛主席万岁！万万岁！”等口号。

待口号停下后，陶铸接着说：“原来希望和同志们谈的，因为你们不愿意同我们谈，要找中央文革小组谈，要文革小组、总理接见，我们赞成。你们总不能否认这个事实吧？后来你们说要我回答问题，我还认为是接见，以后同志们要我接见。我说好，派代表先谈，你们不愿意派代表，非要全体来，没有谈好，拖下来。我在中央工作，有工作任务，除联系八个部，还有中南、华东由我联系。今晚本约定南京大学，约了20多天，也是革命派，造反派，可见我很想和同志谈，不是铁石心肠，我没有理由不接见。一是同学们不愿接见，一是我有工作任务，每天都是11点以后接见，10点以前不知道什么时候要开会，前晚开会到深夜，来不及，总要安排。昨晚上3点要接见，我还在人

大会堂，今天中央开会，文件未看，我高兴同同学们谈，时间安排有时会出问题，有的时候我在旁的地方安排了活动，这完全允许。说我不愿接见不是事实。前晚来电话我不在，昨晚我与安徽八二七同学谈问题，今天约江苏同学谈。我很想接见同学们嘛。很多都要安排时间。我是中央工作人员，总是要有计划。”

学生说：“这个问题明确了就不要多谈了。”

陶铸再次和同学们商量是不是不录音？同学们不同意，说：“非录音不可！”

陶铸问：“为什么呢？”

同学：“要录音的原因很多，一、今天来是向陶铸同志提问题，解答问题，我们认为不是接见。”

陶铸坚持：“我讲是接见，各讲各的。”

同学：“二、每次讲话记录出去以后，陶铸同志在发生问题上辟过谣，造成群众斗群众。9月8日派了9个代表关于三点指示，纠缠了一个多月，10月份出来谈话要点，同我们的笔记对不起来，有原则差异，所以又搞了一个补充要点。这次陶铸接见革命造反司令部又有区别。”

还没开始谈，仅录音问题双方就唇枪舌剑，争执不下，火药味很浓。

陶铸耐着性子解释，毫无效果。他接着问：“你们几个代表讲？我好有计划。”

同学们依然是寸土不让，回答说：“谈了再讲。”

陶铸已经预感到这些学生下一步要做什么，他针锋相对的提出：“你们采取斗争会的形式我不能接受。”

水来土掩，这些学生也毫不客气的回敬说：“你是老干部，我们都是学生，有什么错误，你可以指出来，你这种态度我们不能接受。”

陶铸依然坚持：“你们几个代表提问题？”

同学：“共产党员应该胸襟开阔、胸怀坦白。我们都是代表，是赴京中的代表中的代表。”

陶铸的火已经快涌到头上了：“我请问你们几个代表谈话？80

个人总不可能都谈。”

同学：“还没有谈，你就发脾气，耍态度！”

陶铸：“这叫什么耍态度？”

同学：“怎么不是耍态度！”

陶铸：“你们这种会议形式，对我是不恰当的。我是中央政治局常委，文革小组成员，是接见你们，你们这种形式是不恰当的，这种形式我不赞成。”

一个武汉大学的同学高声说到：“今天是我们叫你回答问题，而不是你接见我们，所以对我们提出的所有问题，你必须老实回答！”

学生的勒令终于让陶铸像一头狮子一样被激怒了，他眉一竖，气一喷，举起双手大声说道：“你们这样强迫我，我们还有什么商量的余地？我还没有撤职，我提出抗议！你们对我太不信任了！”

会场更加骚乱，警卫人员怕发生意外，赶紧进入会场保护在陶铸身边，由于他们都带着枪，于是，被学生们发现，这更是火上浇油。学生们狂呼口号：“陶铸用武力镇压革命群众决没有好下场！”

会场顿时大乱，中央警卫局的人和陶铸秘书张汉青赶紧报告正在另一个厅里开会的周恩来、李富春和陈毅。陈毅一听学生要揪陶铸，“腾”得从沙发上一跃而起说：“我要保卫陶铸同志！”

周恩来对秘书周家鼎：“马上到会场去，帮助做工作。要保护好陶铸同志，不能让红卫兵带走”。并对几个副总理说，“都不要走，在一起等候陶铸，不要离开”。

## 第 359 回：中宣部，大字报直指陶铸　无所惧，左方一封信造反

这时，陶铸情绪也平稳了一些，他又耐着性子说："你们要相信我么，我是代表中央、中央文革小组来接见你们的，你们认为不是接见这个会可以不开，我是高兴和你们谈的，你们不愿意和我谈，你们找中央文革小组谈，找总理谈嘛。有人说我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代表，我不承认，我不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代表人物。不是胸怀不坦白。你们这种形式我不满意，是不适当的。我今天来接见同志们。我不是中南局书记。应该是合情合理，你们批评我可以，我讲几句话不可以，你们是来解决问题的，你们推几个代表，不要采取不恰当的形式，对解决问题不利，这种形式对待我具体人是不恰当的。"

同学说："声明一下，今天的会不是斗争会，口口声声讲同志怎么会是斗争会？"

双方又就对方的态度和参加谈话的人数争论不休。最后，同学说："按你的要求，15个代表座谈，其他同志听一听。今天陶铸同志没有诚意。"

陶铸："今天把江苏的都回绝了，怎么没诚意。"

同学："是因为我们绝食才见到你的。"

陶铸："绝食我是不赞成的，你们要是不吃饭我今天还不接见你们！"

同学："晓得这个样，就该不吃饭，看你出来见不见。"

陶铸："别扯这个。今天讲5个，讲了5个就不讲，我来回答问题。你搞个名单给我。"

同学："原来要排几个重点发言，其他人也可以谈。"

陶铸："我现在是代表中央接见，你们5个人提出问题，我来回答，如谈不完，还可再谈，为什么要逼人呢？"

同学："我们是'专揪王任重革命造反团'，旗帜鲜明。"

陶铸："开门见山，我欢迎。"

接着同学们依次谈起王任重的问题：

第一、在学生中反击右派，清经济，200名中学生带上脚镣手铐，秋后算账，枪打出头鸟。这种人应该打倒，是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当

权派？

第二、在揪王任重的过程中，遇到了你11月26日一封电报不知道有没有？说王任重在养病期间可以不接见，再一个电报说让王任重半天休息，半天检查。

第三、原来给武汉地区的三点指示。

第四、关于《湖北日报》在接见武汉革命造反司令部时的谈话。

第五、关于王任重的黑材料、黑指示。交出王任重的黑材料、黑指示。

第六、对中南地区文化革命的看法。

第七、给广西师院的电报问题。

第八、关于要张体学同志回湖北接受批判，接受教育、触及灵魂问题。

第九、去广州揪王任重的同学被围攻的问题。

……

林林总总竟有10个之多。他们还问陶铸：

“王任重怎样爬上中央文革副组长宝座的？有无后台老板？是谁？”

“为什么王任重有毒的东西放得那么多，陶铸是否发现，为什么提为中南局第一书记，中央文革副组长，提得那么快，他的后台是谁？”

他们还要求：“（1）立即解散‘革命职工联合会’。（2）将马学礼等人逮捕法办。（3）省市委必须交出幕后指挥人。张体学被保守派带到北京来，我们要求他回湖北去受批判。”

“陶铸是否负责中南地区的文化大革命，为什么阻力那么大。张体学用党籍保证王任重在广州，李一清又用党籍保证王任重不在广州，到底开除谁的党籍？”

同学谈完了，讲痛快了，最后说：“陶铸决不同意录音，我们也不打算再录音了，我们通情达理。”

对于学生的质疑，陶铸回答说：“好！我们搞一个书面记录。合起来，现在我倒赞成录音，准确一些。”

真是天意弄人，其实这时录音机坏了。

接着陶铸逐条回答学生们提出的问题：“（一） 对王任重的看法：我觉得王任重的问题是十分严重的，他的问题不单是贯彻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问题，而是性质比这更严重。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压制群众。他的很多东西是更早了，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到底最后这个人的性质怎么定，我赞成你们彻底揭，揭到什么就是什么，性质是根据事实，材料来定，先有材料、事实才能定性，现在初步不能定性”。

“王任重当文革副组长是中央提名，同意的。我一向对王任重印象很好，觉得这个人不错，比较信赖的，不是他自己要当的，也不是我提名的，因为我离开中南后，王任重代理第一书记。”

“同志们说：后台是谁，这我已看出，说后台就是我陶铸，陶铸是个大黑帮，要揪出来，还要我接见，我近 70 岁，形势看不出来吗？我认为这形势是不适当的，我讲，我不是王任重的后台老板，他是湖北省委的后台老板直接指挥湖北省委的。”

“我要讲清楚，我对王任重很器重，很信赖，他讲话比我会讲，也很有条理，也有一定的政治工作能力，年青有为是可以培养的干部。我走后中央决定提他为第一书记我也赞成，我对他是信赖的。他干的事我都不知道，中央文革也不知道。他的错误严重也在这里。”

“（二） 电报问题：中央是曾经同意他休养的。后来红卫兵要他交待问题，中南局发来电报，说他病得很厉害，是不是让他休养一段，病稍好以后再检查，也得到中央回电同意了。”

“关于电报问题，你们要问也是可以。我们起草也是很正常的，不存在责任问题，不存在包庇问题，电报是由我批发的。”

……

“张体学在不在北京，我不知道，如在北京，你们带回去。你们查，如查出在北京，你们带回去。如在北京，应告诉中央。省委第一书记来北京，是擅自离职守，怕字当头。”

接着，陶铸又回答了同学们提出的一些问题。

一个同学问：“北京贴了很多你的大字报，说你执行了资产阶级

反动路线，你怎样看法？”

陶铸：“大字报他贴他的，我不是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派工作组我赞成，走了一段错路，是有错，我改嘛。”

同学：“你讲你是中央常委、文革小组顾问，是来接见我们，但今天一开始提出抗议，想不通，不知犯了什么原则错误？张体学在洪山礼堂提出抗议，如果这样下去，是非常严重事件，是否要把我们打成反革命，如不回答，要总理、江青、伯达当面来讲清。”

陶铸：“我不是对红卫兵提抗议，是讲会议形式，你们那种方法是不妥当的。你们好好想一想，我来时你们到底把我当什么来对待，我商量的问题都不能同意，录音，代表，名字也不提，对我不信任。你们对我态度不对，怎么能把我当成反革命？”

同学：“我们没有对立情绪，你刚才的态度是出意料之外。”

陶铸:“同学们对我的态度也是意料之外的,我讲了抗议就算了。”

同学插话：“一定要收回，要批判!”

陶铸：“那是激动，以前同学们对我不信任。你们如对我的话是信任的，抗议可以撤销。怀疑是可以怀疑的，今天会议形式不恰当。”

同学插话：“是否是原则性的问题，值得向我们提抗议。”

陶铸接着说：“今天谈得还不错，情绪我们有些接近，怀疑是可以的，但问题没有商量余地，我是不高兴的，太不信任了。现在接近了。如果你们认为我还可以信任，态度是诚恳的，抗议可以撤销。”

同学问：“我们态度好不好？”

陶铸：“你们的态度是不好的……”

同学：“你在后勤学院向卫生系统作报告讲‘我基本上是无产阶级革命家’，为自己打保票，向我们提抗议，说大字报很多不是事实，不是无产阶级革命家风度，说‘和好’这些字眼都不适当。”

陶铸：“你们可以提意见，可以批评。”

同学：“抗议提得不恰当，不仅要收回，而且要批判。你一讲，我们就成了不革命的了。”

陶铸：“我不同意这样讲，我是对会议方式提抗议。”

同学：“应在这问题上触及一下灵魂。一是我们一来未找陶铸，

一是未达成协议，一是你进来未鼓掌，好像打破常规，失去尊严，这就是灵魂深处的东西。对老前辈应尊重，有缺点，错误应提出。”

陶铸：“批评完全可以，不是尊严的问题，同学们来时形式不是开诚接见，谈判，解决问题，是对我很不信任的形式，又要我解答问题，采取这样一个极端不信任的态度，发言派代表，名单不给我。整个会议不是给我机会商量解决问题，我是不满意的。后来说得很好，是我了解，能解答的提出来，开始有点脾气，现在同学们批评，撤销抗议，承认这是错了。”

大家鼓掌。

陶铸接着说：“还要看我是不是支持你们，如果真的支持同学们，我还可以信任，我还要革命的。好，再见!”

这一长达 6 小时的接见终于结束了。此时已是凌晨 4 时了，陈毅和李富春这才放心地离去。

几个小时后，中宣部大院便出现了记述这次接见的《特号新闻》：紧接着，要求批判陶铸的大字报、大标语铺天盖地般地刷满了中宣部大院。

12 月 31 日，中宣部“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和其他 90 余人，贴出题为《陶铸执行了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大字报。其中有一份大字报写的是广东《南方日报》记者左方写给江青的一封信，是揭发、批判陶铸在 1962 年全国话剧、歌剧工作者会议的讲话。

根据广东省委文革小组在 1966 年 5 月的部署，广东当时公开批判两个作家：秦牧和欧阳山。左方是批判秦牧小组的组长。一天，他在饭堂吃饭时遇见批判欧阳山小组的负责人、省委宣传部文艺处干部罗源文，他跟左方说：“陶铸有一个讲话，比秦牧的文章反动 100 倍。”

左方问：“什么讲话这么厉害？”

罗源文说：“是陶铸在全国话剧、歌剧工作者会议的一次讲话。”

左方说：“这个讲话陶铸收在他的文集《松树的风格》上，我看过，没有多么大的问题呀？”

罗源文说：“出书时是删节过的，现在省委想毁掉讲话原文，要把这个讲话的原文收回，我们文艺处有一份，到明天就要交回，你敢

不敢看？”

左方说：“我怎么不敢看呢？是你敢不敢给我看的问题。”

罗源文说：“给你看可以，但是你明天一早必须给回我。”

当天晚上，左方从罗源文那里拿到陶铸的讲话原文后，连续看了三遍，确实认为他和毛泽东的文艺思想、知识分子政策是对立得很厉害，确实是棵大毒草。星期六，左方回到《南方日报》的宿舍，将把陶铸的讲话内容告诉了同宿舍的黄衍辉。

黄衍辉听后对左方说：“现在陶铸已经是中央第四把手，那可是毛主席身边的定时炸弹，你要赶紧把这个事儿写信报告毛主席。”

左方说：“广东是陶铸的基地啊，如果万一这个事情泄露出来是要杀头的。”

黄衍辉说：“你就怕丢脑袋，不怕中国变颜色？要杀头我陪你，你来写我也签一个名。”

左方说：“现在文化大革命时期，从邮局寄一封信给毛主席能够寄得出去吗？没有出广东这个信就落到广东省委手上了。”

黄衍辉说：“不要紧，我认识广东省委一个机要交通员，你写好之后，我就让他插在省委给毛主席的文件里面去，那就保证能到主席手上了。”

就这样，左方把信写好后，黄衍辉交给机要交通员，这个机要交通员是学习毛泽东著作积极分子，黄衍辉采访过他，跟他交上了很深的朋友，那个机要交通员说：“省委没有直接给毛主席的文件，只有给中央文革和中央军委的。”他建议黄衍辉他们将信改成两份，一份给江青，一份给林彪。于是，左方他们又把这封信重新抄了两份送出去。

左方后来又成为《南方日报》红卫兵采访小组组长，经常和学生们接触。一天，他在《南方日报》一个叫林玲的好朋友对他说：“我女朋友是检查组选定的骨干，她告诉我说，你是一个危险人物，要监视你，叫我要跟你保持距离。”

左方一听，马上想到是不是他写给中央告陶铸的信泄密了。他叫黄衍辉赶紧去省委问一问这个机要交通员的情况。结果黄衍辉回来告

诉他说，这个机要交通员找不到了，失踪了。左方他们判断，那个机要员可能被抓起来了，现在省委不敢抓左方他们两人，是怕过早把陶铸的讲话扩散，但他和黄衍辉早晚要进监狱。

左方赶紧跑去找华工“红旗”的司令高翔，高翔对他说：“你不要怕，我们绝对跟广东省委干到底的，你如果有什么风险就来华工，我们保护你。”

高翔又说：“你也不要坐在那里等死，你应该回《南方日报》组织群众起来造反。各地的造反派都在反工作队，既然检查组说你是一个危险人物，你就把矛头对着检查组干。”

左方一想也对，反正不造反也要进监狱，破釜沉舟说不定还能杀出一条血路，险中求生。于是，他回到《南方日报》找了 6 个最好的朋友，成立了一个“遵义战斗队”，发表声讨检查组执行反资路线声明。没想他们这个声明一出来，《南方日报》就炸开锅了，没到一个礼拜就出现 30 多个战斗队。

## 第 360 回："联络站"，外交部干部揭竿　军队乱，"联动"又冲公安部

文革初期，外交部党委按照中央的统一部署，也将一些干部、群众打成"牛鬼蛇神"、"小三家村"。这些人当然不满，认为是冤案。在全国掀起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高潮后，12 月 16 日，外交部党委就运动中的问题作检查，认为他们"基本上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群众普遍对此不满，外交部新闻司、国际司等单位的一些年轻人私下串联，交流情况，认为以陈毅为首的部党委执行了刘、邓制定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要搬开部党委这块绊脚石，推动外交部的文革运动。

12 月 20 日晚，由外交部新闻司科员王中琪和国际司科员张殿清发起，串联外交部本部内各单位，和国际关系研究所、外交学会、世界知识出版社、外交部招待所等部直属单位，约 500 名一般干部，在东交民巷 30 号外交部办公楼一层小礼堂召开串联会，酝酿"造反"。

第二天，他们又开会，决定成立"革命造反联络站"，简称"联络站"，发表"宣言"，声称："要造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当权派的反，造一切牛鬼蛇神的反，造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反，造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当权派的反，造剥削阶级'四旧'的反，造一切不符合毛泽东思想言行的反。我们就是要造帝、修、反的反。"

这是一个没有当权派参加，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而成立的群众性组织，外交部党委当然很紧张，力图予以解散。但很快，12 月 26 日，周恩来在接见北京外语学院，简称"一外"，和第二外语学院，简称"二外"的代表时，肯定了外事口可以成立革命群众组织，并且特别提到"外交部成立了"。他还问身边的一位速记员："你参加了吗？"

那人说："还没有。"

周恩来说："那你的积极性不够哦！"

我们回顾 12 月 26 日这天，周恩来的接见：他首先询问了外语学院各个群众组织的情况。当问到各群众组织的团结情况时，周恩来说："现在是合的时候了，清华不是讨论合了吗？"然后问："保守派还

有多少？”

答：“土崩瓦解了，还有几个战斗组。”

周恩来又问：“你们那里是否有接近李洪山观点的？”

答：“有。”

“与李洪山有没有关系？”

“有。”

“揭出来没有？对保守派要教育。对李洪山类似的人可以辩论，可以检举。”周恩来说。

“二外”同学问：“总理怎么不到二外去？”

周恩来说：“主席一回来，我就选中‘二外’。江青，伯达同志到广播学院。原来想蹲点，后来被清华的问题拖住了，以后就多了，‘一外’也沾上了，还有中学。你们那里发展了没有？要争取扩大队伍，但不要太急，把保守派瓦解一下。今年快结束了，不可能再和你们讲话了，时间实在排不出来。

周恩来在听取了代表情况介绍后说：

“一、外事口各单位大势所趋，任何单位都可以成立革命组织，外交部成立了。过去对于外交机关是否成立红卫兵和革命组织需要看一看，现在看来不一定成立红卫兵，红卫兵是青少年的组织。革命组织可以打破框框。既然外交部可以成立，那么对外文委、对外经委、外文出版局、外文印刷厂、国际问题研究所、世界知识出版社等都可以成立革命组织。这要靠内因和积极性。

二、外事口串联的问题。是不是可以串联？既然成立革命组织就可以串联。要因势利导，把口子打开，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昨天与陈总讨论过了，原则上支持你们，允许你们串联。过去为什么加以限制？因为有国际政策，过去有些事捅出去了，我们还不知道。香港已发了消息，北京城里的大字报，有些我们还不知道，在电讯里，香港报纸上就出现了。又要提倡串联，又要注意政策，怎么办？政策和业务要区别开来。政策可以讨论，具体业务不要参与，总有一定的机密性。”“外交上的一些问题，不能都上大字报。”“外交战

线包括业务情报，还有一个杆子。为什么中南海，公安部，外交部不能进来，党和国家机密总有一部分。

既然能搞革命组织，就一定要和外交部、对外文委、其它机关的左派、积极分子联系在一起。大字报有的不太恰当，有的革命组织，他们可以告诉你们那些问题了，帮助解决。外交部有机密的，拿到这里来，我们负责审查，要尊重业务。外交学院两派观点不明确，可以去动摇内在因素，可以去联系。外交部有一、二百人，你们可以去联系，但不要替人家革命。‘二外’可以和文委联系，再影响外交学院。

外交部、外办，你们可以去串联。在那里找间屋子，搞个联络室。文委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大字报可以看。

三、‘黑材料’问题。外交部又发现了‘一外’的部分‘黑材料’，封起来了。‘二外’的‘黑材料’，找到宋寒毅追问，限他一周内将所存的‘黑材料’收回来。收不回来，不要让他过年。他找不到，你们可以给他介绍，让他带两个人一定要把‘黑材料’送回来。一星期以后，有隐藏的就处理。”

“四，把外事口都动员起来，联系起来。最近财经口联系起来了。财办的八个单位都有造反派，外事口还没有，我今天点火，你们也可以去说。机关的我说了，学校就三个，外交学院两派态度不很明确，你们去做工作，斗争再分化一些。外事口的单位和学校（外办、外交部、文委、经委、中侨委、外文局……）都活动起来，阵线就比较广了，解决问题就集中了。要深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不要一个目标，要把各方面的力量都动员起来，事情才能搞好。”

“一、二月份把党、政、军深入发动起来，各口就都发动起来了。”“我们期待左派更快地团结起来。保守派瓦解以后，要帮助他们，教育他们，争取多数，加强影响外交学院和其它部门。张彦问题和外办、文委联系起来；刘新权问题和外交部联系起来。外交战线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程度多深？时间多长？就可以搞清楚。

学校各革命组织的联合问题，还要做准备，不要强加于人。没联合以前，共同联系一些问题。”

在插话中，周恩来还谈到外文委工作组组长张彦，他说：

“我刚下飞机，他就要求见我，来三次电话要见，我就是不见，最后说有份材料要给我，拿来文委打成‘反革命’的 29 个人的材料，矛头是对准陈伯达同志的。我一号回来就负责审查他的案子。张彦是小饶漱石，是个两面派，是个个人野心家。他对我说：‘矛头绝对不是对准陈伯达同志。’我说我看了材料再回答你。我看了马上指出他有问题。张彦原来在我的办公室 3 年多，58 年成立外办，带着几个人过去了。刘少奇对张彦很赏识。他稍有才干，平常做些工作倒可以，到关键时刻就暴露出来了。张彦在饶漱石的时候就陷进了一些，到彭真的时候就陷得更多了。

张劲夫和张彦住在一个院，他们都是从华东来的。现在张劲夫孤立了。有一次张劲夫说到一句话，说是陈老总说的。我说你在科学院，陈老总也不管，你怎么知道的？他说他到科学院后，中央的消息很闭塞，每晚都到张彦家里，张彦对他说一堆消息。”

外文委代表说：“最近张彦为什么反攻？外办态度很不好。李昌的司机李振江被张彦打成反革命，住了二十多天公安局。文委革命同志要外办来平反，外办不管。郝德清却要文委革委会管，革委会就出个通告给李振江平反。如此草率，引起文委同志们的极大不满。”

周恩来说：“要郝德清自己去检讨。这个人做事太不认真！”

外文委代表说：“我们要求和‘二外’师生一起搞张彦。”

周恩来说：“我同意这样做。”

对陈毅，周恩来在充分听取了大家的意见后说：

“今天第一次听你们讲这些情况。需要到外事口去讲话了。不但在‘一外’、‘二外’，其它单位也要讲了。”

“陈毅同志作检查也要有准备，我已经请他准备了。外事口比财贸口单位多，你们既然认为你们的观点对，就宣传你们的主张，已经给你们开放了。现在更加证明我的四点建议的必要性。现在外事口可以串联了。我还要到外事口各单位做工作，争取在一月四号前，我先作报告。外事战线上，从去年以来有很紧张的斗争。你们既然要在外交战线上把毛泽东思想红旗插到全世界去，你们就要把基本观点弄清楚。所有口的工作都要做，先接触财贸口，第二个是你们外事口，你

们也要做些准备工作。张彦 6 月 24 日的报告坏极了，比在文委的还要坏，是最恶毒的报告。张彦在对外文委搞的完全是一套特务作风。你们好好地写一篇批评 6 月 24 日报告的文章，要揭其灵魂深处，搞得深一点，张彦没死，不是死老虎。”

第二天， 12 月 27 日，一直到 31 日，连续 4 天，外交部在“外交部革命造反联络站”主持下，召开了“外交部揭发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后来又在 1967 年 1 月 6、7 两天继续召开这个大会，控诉、揭发、批判“部党委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让前段运动挨整的人上台控诉，并让部党委负责人到会听取批判。外交部常务副部长姬鹏飞及部政治部副主任兼干部司司长符浩还被叫到台上，回答控诉、批判者的问题。

外交部党委承认了前段是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接着又给在运动初期受到批判的外交部副部长王炳南、陈家康，及司局长何方、陈理等领导，以及其他干部群众平反，使他们可以回各自单位参加文革运动；并且，部党委负责人还分别向运动初期受到伤害的干部、群众表示道歉。

12 月 31 日，外交部“联络站”相继查封了机要局、政治部等各部门的“黑材料”，由此掀起了一个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高潮。

12月28日上午，又有几百名“联动”冲击公安部。他们强行进入接待室的8个办公室，敲桌子，砸椅子，围攻、推搡里边的办公人员，迫使办公人员离开房间。他们砸碎玻璃窗、电话机，将痰盂、茶杯、墨水瓶等物品扔向公安部大院。工作人员在院内向他们喊话，请他们派代表出来谈。他们却向院内射弹弓，扔石头，射伤了一个人的眼睛，石头也打伤另一个人的头部。双方僵持到中午，终于有十几个学生忍不住跳进院内吵闹，当即被公安人员扣下。

但是公安部也没有为难这些学生，让他们吃了饭，对他们做了做工作，让他们都承认了错误也就算了。

到下午 3、4 点钟，在接待室的学生又从窗口跳进院里，将工作人员团团围住，连骂带打，致使一位患心脏病的女工作人员当场昏倒。

接着，学生们又闯入公安部大礼堂，把里面的东西砸了个乱七八糟。他们还高喊：

“打倒‘三司’！”

“打倒公安部！”

“抢毙‘三司’后台！”

“中央文革支持‘三司’乱抓人！”

“公安部权力下放！”等口号，并在墙上刷写大标语。

直到半夜，公安部一位副部长出来找他们谈话，他们拒不理会，反而大骂“狗崽子”、“混蛋”等，居然把这位副部长赶出了礼堂。

就这样，他们在礼堂里一直闹到第二天，即 29 日早上。

30 日，大批工人和大学生赶来声援公安部，“联动”一看对方人多，这才陆续退走。

事隔一天，12 月 31 日，“联动”又纠集近百人冲击公安部，强占了两间办公室，直到 1 月 1 日下半夜才走。

此时，军队的北京、沈阳、昆明、福州、广州、南京、兰州、成都、新疆等大军区和各总部、各军兵种的许多负责人遭到揪斗，被逼得东躲西藏，甚至奔赴异地。各大军区告急的电报、电话纷至沓来，要求军委给以保护。而北京的总参、总政、总后、空军、海军早已受到冲击。主管军委日常工作的叶剑英在军事科学院内的二号楼和西山住地，一时成了这些人的“庇护所”，这里住不下就送到京西宾馆。

而叶剑英此时的处境也很不妙，军队院校造反派准备召开军队院校在京人员第三次“万人大会”，批判陈毅和叶剑英在两次“万人大会”上的讲话。这次大会计划以地方学生为主，点名要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等几位老帅和解放军三总部、各军、兵种的负责人参加。

去，还是不去？叶剑英召集各总部和军、兵种负责人到他家里研究。叶剑英主张去，其他人则劝他不要去。他们担心批判会可能会开成批斗会，到时候，各种各样的体罚，甚至人身侮辱都不好说。就这样，他们从下午 15 时一直研究到午夜 24 时也没研究出个结果。这中间，中央文革的人几次打电话来催问他们是否参加，叶剑英都没有给

予明确答复。不得已，叶剑英分别给周恩来和林彪打电话汇报了情况。林彪这时已吃安眠药睡下了，周恩来则报告了毛泽东。

毛泽东很快否决了这个大会，他说："不能去，不能召开这样的会议。"他还责备江青："这种做法是错误的。"

江青马上通知："这个大会不开了。"但中央文革仍然坚持要叶剑英作检讨，说："大会可以不开，但是必须在一些会议上作检讨。"事情又告到毛泽东那里，老人家说："检讨一下，了此一案。"

1966 年的最后一天，12 月 31 日晚上 20 时，在北京京西宾馆礼堂、政治学院礼堂、总后礼堂、后勤学院礼堂、海军礼堂、总政排演场召开了一个军事院校师生代表 2000 人参加的电话会议，内容就是听取叶剑英作的检讨。

叶剑英念着刘志坚给他起草的检讨，时而也会离开讲稿做一些说明，但已经不像前两次大会上那样随意发挥了。

即便如此，当他刚念完检讨，台下就哄闹起来。只见一排排的学生手持大字报冲向主席台。见此情形，刘志坚赶紧和其他一些人保护叶剑英从后台走了。因为当时京西宾馆已经军管，任何人都不准冲击，学生们只能从前门进去，其他地方去不了，才使与会者安全脱身。

毛泽东原想让叶剑英检讨一下了事，谁想事情并没有像他想的那样简单，那些军队院校的学员依然是不依不饶，还是要揪叶剑英，检讨会差点开成了抓人会。毛泽东知道后很不高兴，说："这件事情一定要追查。"

于是，中央文革小组开会，江青在会上质问："刘志坚，你为什么要把四个老帅抬出来压制军事院校的文化革命？他们四个老帅的讲话归结到一点，就是给运动泼冷水。这个你知道吗？这些会议是你组织的吗？"

刘志坚还没有回过味儿来，陈伯达也开始大发雷霆："你胡闹！你说，四个老帅的讲话是谁给他们搞的？"

刘志坚分辨说："是我搞的，是我根据肖华主任的指示给他们准备的，但是他们讲话并没有完全按照我的讲话稿讲。"

江青说："好啊，你背着我们另搞一套！你严重的无组织无纪律！"

当天，江青就给林彪打电话，反映刘志坚的这些问题。林彪听后，好长时间没有说话。叶群赶紧对江青说：“你让林彪同志好好考虑一下，再作答复。”

## 第 361 回：财贸会，李先念遭到炮轰　查穆欣，湖南“望江楼协议”

继 12 月 23 日周恩来等人接见财贸口群众组织代表后，根据当时中央提倡大联合的号召，国务院财贸口各群众组织酝酿成立“国务院财贸系统革命造反派联络委员会”，周恩来表示支持。经过紧张的筹备，“全国财贸系统革命造反联络委员会”成立大会，于 1966 年 12 月 31 日下午，在北京体育馆召开。出席成立大会的有国务院财贸口各部门及直属院校造反派群众代表 5000 多人。周恩来、李先念出席大会。穆欣代表中央文革小组出席大会。

开会前，周恩来、李先念、穆欣等人在休息室，先行审阅大会准备的“全国财贸系统革命造反联络委员会成立宣言”、“全国财贸系统革命造反联络委员会成立大会给毛主席的致敬信”以及大会拟定的口号等文件。周恩来用铅笔勾掉了文件中有关批判李先念的字句与口号。如“李先念是财贸口最大的走资派”，“李先念是财贸口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总代表”等字句。

周恩来对大会主持人、中央财政金融学院“八八队”的敖本立说：“对李先念同志不能打倒嘛。他是支持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他告诉敖本立，因还有其它活动安排，大会开始他先讲话，讲完话后要先行退场。敖本立表示“按总理的意见办”，并请周恩来讲完话后绕场一周，与群众见面，同时接受群众献戴红卫兵袖章。周恩来高兴地答应了敖本立的这一请求。

敖本立宣布大会开始，请周恩来讲话。

周恩来说：“同志们，我首先要祝贺你们财贸系统革命造反联络委员会的成立！向你们致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敬礼！我现在代表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副主席、党中央和国务院向你们问好！

同志们，你们这个财贸系统革命造反联络委员会，是在有一天晚上，我和李先念副总理，他也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一道向你们建议，并且支持你们的。你们这个财贸系统革命造反联络委员会是我们国家系统各个战线上，第一个在一个系统中成立的组织，联络的组织。李先念同志，他也是第一个批判了财贸系统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

周恩来在结束讲话时说："我因为有另外一个会，现在已经超过时间了，我已经晚到了，一件事情接着一件事情，不可能再留下来，向你们表示歉意，但是我们支持了你们。"

讲话结束后，周恩来即带领李先念、穆欣，从主席台来到体育馆中间场地绕场一周，接见参加大会的群众。接见中，激动的群众代表跑进场中，给周恩来、李先念、穆欣三人献戴了红卫兵袖章。随后周恩来先行离开了会场。

周恩来离场后，大会按原定议程继续进行。这时，北京外贸学院学生所在的会场一角，忽然高呼起批判李先念的口号，并齐声呼喊：

"李先念，摘袖章！"

"李先念，摘袖章！"

这时，还有些学生将纸条递上主席台，交给了大会主持人敖本立，声称：如不答应北京外贸学院学生的要求，让李先念摘掉袖章，他们就要造大会右倾的反，并且要冲击大会主席台。

事态严重，敖本立很是着急。他觉得此时只有中央文革的代表穆欣出面讲话，才能劝阻群众的过激要求，保证大会顺利进行。

于是敖本立将纸条递给坐在旁边的穆欣看，请他出面处置，按周恩来的指示精神，劝阻这部分群众的过激行为。但穆欣表情冷漠，迟迟不敢出来表态。在敖本立的一再催问下，穆欣表示，他不好出面讲话，要敖本立自己处理。

权衡利弊后果，敖本立只得转而去做李先念的工作，请他自己摘下红卫兵袖章，以免出现冲击大会主席台，危及他安全的情况。脸色铁青的李先念考虑了一下，就主动摘下了红卫兵袖章。大会按原定议程继续进行，最终完满结束。

谁知，当天晚上，穆欣给敖本立打来电话说："敖本立，在今天的大会上，你们当众让李先念同志摘下红卫兵袖章，是对李先念同志的羞辱，是严重的不尊重李先念同志的行为，是错误的。中央文革是保李先念同志的。中央文革要求你们必须向李先念同志道歉。"

原来，在北京体育馆会场受辱的李先念回到中南海住地后，打电话责问中央文革，为什么见其受辱，中央文革的人在场坐视不理？为

什么不出面劝阻学生？陈伯达无言以对，只好责成穆欣给敖本立打电话，要求其向李先念赔礼道歉。

中财院“八八队”的敖本立及“八八队”都无法接受穆欣要其向李先念道歉的要求，认为如果要道歉的话，也应该是穆欣去道歉。因为穆欣明知周恩来总理保李先念的态度，事发时不表态，不劝阻，事后却追究，实难理喻。他们因此对穆欣十分不满，从此开始组织调查穆欣。

1967 年元旦后，中财院“八八队”的“孙大圣”支队来到《前进报》社对面的《光明日报》社造反，得到了《光明日报》社部分群众的欢迎。《光明日报》社的一些群众纷纷提供穆欣与他妻子张卉中的材料。很快“孙大圣”支队就写出了批判穆欣“有事当面不表态，事后做好人的两面派行为”等内容的传单 10 万份，在北京街头广为散发，引起轰动与广泛反响，外国众多通讯社亦迅速予以报道。

文革开始后，还没有一张穆欣大字报的冷冷清清的《光明日报》社，此时立刻热闹起来，七层办公大楼贴满了穆欣的大字报。“孙大圣”支队与《光明日报》社的造反派群众，又致信中央文革小组，强烈要求穆欣回报社接受群众批判。中央文革接受了要求，让穆欣回到《光明日报》社。

12月31日晚，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接见清华大学学生代表。他说：

“找你们来想和你们谈几件事。

因为你们的要求，我曾两次请示主席，主席还是不同意让王光美回清华，你们可以让他回答问题嘛。”

学生问：“她不回答呢？”

周恩来：“这个事我可以办嘛！你们把提纲交给我好不好？”

学生说：“我们要她揭发刘少奇。”

周恩来：“我不能回答，我如果说了，就是命令她揭发了，你们可以看她的检查和解答的问题嘛！当然，你们会区别真假。另外，你们可以找叶林、刘涛嘛！叶林是组长，工作组有什么问题都通过他，刘涛也知道，另外贺鹏飞也知道一些，李黎凤也了解一点。再远一点，乔宗淮，孙矩也知道一点，你们可以从他们那里知道一些，让他们说

真话嘛！”

“再有一个，不要把‘打倒刘少奇’的口号贴到天安门去，外宾问起来，我只好回答说我们国家发扬大民主，可以发表各种不同意见。这样提法，性质就变了。”

同学问：“难道刘少奇不属于敌我矛盾吗？”

周恩来：“你们可以这样认为嘛！但我不是这样看的，你不能把看法强加于我嘛！你们提的口号要恰当，你们在学校里怎么提都行，我不管。在外面，我一看这些口号就知道是左派同学干的，所以今天给你们说一下。有的人可以以一种右的方式来反对我们，如李洪山这样的人，但他们也可能以一种极‘左’的面目出现。他们把一些口号提高到不恰当的程度，这也要引起我们的注意。当然，你们中两个人在会场上激动了，喊这样一两句口号没有什么，就是一个组织一定要慎重，警惕有人钻空子。今天公安部就接到了政法学院的一个电话，要公安部公布十几年来处理犯人的数字，今天我把政法学院的同学找来了，事实上他们没有打电话。”

“另外，关于叶林那封信的问题，当时我看了之后，回去查了一下，发现是假的，不是今天写的，正想打电话告诉你们，谁知道你们已经印出来了。”

学生说：“我们已经裁去了。”

周恩来：“他们是很狡猾的，12月开黑会怎么会写出来呢？”“你们要求薄一波回清华，这是可以的，但他不在北京，工交部门有两个组织已经到广州抓他去了，我已打电话通知他们，不要他坐飞机回来，还是让武装部队把他送回来。他们去抓没有通知你们，你们在广州不是有联络站吗？可以打电话叫你们的人和他们联系一下，一块搞吧。回来后还是先让他在经委检查，然后再到清华来吧！”

学生说：“我们已有人去抓王任重去了，可不可以让他到清华来？”

周恩来：“王任重干的坏事不少，你们可以揭发批判他。你们不是已经揭发了不少问题了吗？他在武汉干的坏事就更多了，武汉的学生更要斗他。在5月份他就开始在武汉抓‘反革命’了，因此他回不

来，你们可以批判他嘛！”

学生问：“《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是毛主席写的吗？其中对刘少奇的评价是不正确的。”

周恩来：“这篇文章是在主席指导下写的，当时主要由胡乔木执笔，主席审定后定稿的。写这篇东西集中了大量的材料，对这些材料是有不同看法的，但对于总的精神大家是比较一致的。当时，总结三次‘左’倾错误，而刘少奇当时是右的。因此，现在看起来是有问题的。”

学生们说：“胡乔木是怎么搞的？”

周恩来：“这个人是不学马列主义的，他是地主出身，又不分析自己的家庭。我常说要首先好好分析自己的家庭，正如董老说的，凡事多想一想，才能比较正确，比较符合主席思想。”

学生说：“现在我们还没有一个像样的党史？”

周恩来：“没有，现在又忙，过去胡乔木有一本《中国共产党三十年》，现在你们都能批判了，我们全党全民的马列主义水平正在空前提高啊！”

同学们还问了关于王若飞、叶挺等遇难及刘少奇悼文的问题，提到了刘少奇临解放的投降主义思想及刘涛的生母王前的一些事情……周恩来走出会议室时，同学们对他说：“现在贴陶铸的大字报又很多了。”

周恩来说：“喔！现在又搞起来了！”

回到清华大学，在大礼堂召开的大会上，蒯大富传达周恩来的讲话时说：“周总理请示了毛主席，毛主席不同意把王光美揪回清华来斗，但同意把她揪回来批”。此时的唐伟虽然已经宣布退出了“井冈山”总部，但是蒯大富仍然通知他参加了当天晚上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的接见。这时唐伟认为蒯大富的传达不是周恩来的原话，上台去和蒯大富争吵、辩论起来，说他篡改了周恩来的讲话，原话不是这样说的。当时参加周恩来接见的“井冈山”总部委员有十几人，此时没有一个人站出来评判唐伟或蒯大富谁是谁非。

再说湖南。就在以“湘江风雷”和“长沙井冈山”为主的湖南“红

色造反者赴京联合指挥部”在北京与陶铸反复交锋时，12 月 22 日和 23 日，湖南省委正式通知“湖大问题要平反代表团”24 日上午 9 时到省委谈判。湖南“高司”总部派政治部主任龙会光到湖南大学组织“红色造反代表团”，并于同日发表了一个宣言和声明，称“张平化等同志要用自己犯错误的切身体会，教育下层各级干部以及那些受错误路线蒙蔽的群众组织如长保军、八一兵团，使他们迅速回到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我们将派遣要平反代表团到省委进行谈判。”12 月 24 日上午 9 时，“高司”湖南大学派出“湖大问题要平反代表团”前往省委谈判。

12 月 27 日下午 15 时至 22 时，“湖大问题要平反代表团”与张平化在湖南大学望江楼进行第一次谈判。28 日下午，“湖大问题要平反代表团”与张平化在省委党校进行第二次谈判。29 日至 30 日晨 4 时 45 分，“湖大要平反代表团”与张平化在岳麓山蔡松坡纪念堂第三次谈判，并签订了“红色造反者湖大问题要平反代表团，中共湖南省委谈判协议”，共 13 项条款，也称《十三条协议》。这就是后来常说的“望江楼协议”。同时还共同发表了“红色造反者要平反代表团与中共湖南省委张平化等同志谈判公报”。签字结束，张平化、王延春与代表团一起照相留影，省委韩江正答应送望江楼谈判代表每人一枚韶山纪念章。他们准备在 1 月 8 日召开全省大会，宣布为湖南大学平反，并为湖南大学授旗。

30 日清晨 6 时，“高司”湖大总部向全校师生连续 3 次广播《最新简报》，称：“经过全体代表共同艰苦努力和不疲倦斗争，谈判达成协议，胜利结束。”

《最新简报》说：“省委决心站在红色造反者一边，彻底改正自己严重错误，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这次大会是团结的大会，是革命的大会，是十分成功的大会。”

当天，“湘江风雷”湖大支队提出：“望江楼谈判协议是机会主义的代表性”。

12 月 31 日，“红色造反者湖大问题要平反代表团”做出《关于召开全省革命群众代表大会的意见》。

就在张平化与湖南大学“红色造反者”签订《十三条协议》的同时，12 月 29 日至 31 日，湖南造反派与“红色政权保卫军”在省委礼堂发生武斗，双方都想逼迫当时的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答应自己组织的要求，而先后进驻了省委大院，并在省委大院内展开了一场以拳脚武斗为内容的大搏斗。

12 月 31 日，湖南省政协又发生“省政协事件”。“长保军”、“八一兵团”与中医学院学生的武斗冲突，83 人受伤。“湘江风雷”等组织闻讯赶去支援。

发生在省委、省政协三天的争斗，以“红色政权保卫军”被造反派组织打败逃出而收场。其组织气势顿挫，军心刹时涣散，甚至，其成员都不敢到大街上再公开亮出“红色政权保卫军”的身份，以免遭到造反派群众的攻击。

1967 年元旦深夜，以黄杏英为首的长沙市一中“齐卫东”组织在长沙市中心的五一广场贴出《陶铸是赫鲁晓夫式的个人阴谋家和野心家》的大字报，说：“陶铸是中南地区修正主义的总根子，中南局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总根子，是王任重、张平化的后台老板，提出“打倒陶铸”！“打倒陶铸、王任重、张平化三家村！”

大字报一贴出，就遭到“长保军”围攻。“高司”也有人在大字报上批注说：“这是一张反革命大字报!”，“空洞无物，恶意攻击!”，“高司”湖大河东战斗队也发表评论，提出“把矛头指向党中央”，“小心李洪山式的人物！”

“湘江风雷”坚决支持这张大字报，并将戚本禹 12 月 20 日写给教育部徐昕等人的信贴出来。很快，“湘江风雷”也贴出批判陶铸的大字报和大标语。

1966 年底，毛泽东召集政治局委员和中央文革成员开会，谈到了当时社会秩序的混乱，毛泽东表示：还是派军队干部去训练学生吧，实行军训，加强纪律性。31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下达《关于对大专院校革命师生进行短期军政训练的通知》。

## 第 362 回：康平路，数万“赤卫队”涌入　电话急，耿金章飞回华亭

再说上海。12 月 26 日清晨，“赤卫队”的“赴京控告团”出发后，留在上海的“赤卫队”王玉玺等人于当晚 20 时在市委皋兰路接待站开会，一直讨论到第二天凌晨。面对大势已去的局面，谁也拿不出办法。“赤卫队”杨浦区联络站的负责人陈英烈提出去康平路请愿，要求曹荻秋承认对《八项要求》签字继续有效。王玉玺同意。总部推陈英烈为首席谈判代表，带着一大批赤卫队员，立即去康平路谈判。

陈英烈带人去康平路后，不断打电话到总部，报告人被打被抓，要求增援。赤卫队各区联络站于是陆续派人前往。去康平路请愿的赤卫队员们打出了“打倒曹老头”，以及“我们也要造反”的标语口号。

27 日凌晨 2 时，王玉玺等总部代表来到去延安西路市委接待站，发现这里已经被前往求见市委干部的赤卫队员们占据，唯独找不到市委工作人员。他们又赶回总部，电话通知纺织、公用两个系统，集中赤卫队员去康平路请愿。

上午，调集而来的赤卫队员们开始涌入康平路 165 号大院。

12 月 27 日下午，上海市委写作班的成员们聚集在武康路二号的草坪上，商量怎么进一步揭发批判市委的问题。忽然，文学组的一个青年从楼里跑出来喊徐景贤：

“老徐，北京有长途电话！”

徐景贤跑进办公室，电话听筒里响起了十分熟悉的声音——夹杂着上海口音和浙江口音的普通话：

“徐景贤吗？我是姚文元啊！今天要向你传达一下主席的指示……”

徐景贤喜出望外，赶紧掏出小本子准备记录。

姚文元一反平常冷静的语调，用一种按捺不住的兴奋语气说道：

“昨天晚上我们中央文革的几个人都到毛主席那里去了，祝贺主席生日，给主席敬酒。主席很高兴，他平时很少喝酒的，昨天和我们干杯了。主席对上海的形势很关心，他从中央文革的《快报》上看到了你们造反的消息。主席说：上海的形势很好．工人起来了，学生起来了，现在机关干部也起来了。我问主席：上海市委强调‘内外有别’

怎么办？主席说：‘内外有别’可以打破，机关的文化大革命很重要，机关的文化大革命一定要搞好。”

徐景贤一边听，一边嗯嗯，把姚文元电话传达的内容一字不漏地记了下来，心里激动得热血沸腾。

姚文元接着说：“主席很欣赏你们的口号：‘火烧陈丕显！揪出曹荻秋！打倒杨西光！砸烂常溪萍！’他说‘火烧’、‘揪出’，‘打倒’，‘砸烂’，这几个口号的提法有区别，好！”

姚文元最后说道：“主席在和我们碰杯的时候说：祝全国全面内战开始！这一期《红旗》杂志将要根据主席的指示发表元旦社论，你们要很好地思考一下这个问题。”

徐景贤问姚文元：“毛主席的指示我们可不可以在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的范围内开会传达？”

姚文元沉吟了一下，说：“不要开大会，你们先在小范围例吹吹风吧。”

徐景贤放下电话，兴奋万状，奔到写作班的草坪上，逢人便说：“刚才文元同志来电话了！文元同志向我们传达毛主席的重要指示了！”

正在徐景贤他们沉浸在接获“最高指示”的喜悦中时，傍晚，“市委办公厅造反兵团”向徐景贤紧急报告说，上海“工人赤卫队”有几万人包围了康平路市委大院。

这个消息太出人意料了，上海“工人赤卫队”在 11 月 26 日成立的时候，是公开反对张春桥支持的“工总司”的，对上海市委一直持“保”的态度，所以被骂为“保皇派”，现在怎么也“造反”了呢？

但是，此时还处在兴奋之中的徐景贤并没有太在意。晚上，他在武康路二号写作班二楼的玻璃棚阳台上，主持召开市委“机联站”骨干会议，正式传达姚文元的电话内容。当大家听了毛泽东 12 月 26 日的讲话精神后，都激动异常。哲学组、历史组，文学组以及市委办公厅《支部生活》编辑部的人员纷纷争着发言，有的噙着眼泪，有的庄严宣誓，每个人的神情都异常忠诚、肃穆。

在讨论中，徐景贤问大家：“毛主席说的全国全面内战开始了，

究竟有什么样的深刻含义？我们该怎么做？”

朱永嘉说：“我们市委联络站比其他造反组织条件优越得多，我们要利用这些条件继续开大会批市委。”

郭仁杰操着山东口音说：“毛主席不是说‘内外有别’可以打破吗？我们把市委档案室裹的档案翻出来，把有关内容摘录下来，作为批判市委执行反动路线的炮弹。”

徐景贤表示认同，他说：“可以，由我写条子给市委书记马天水批，过几天组织几个党员进市委档案室查档案。这次批判市委的大会要以《红旗》杂志的元旦社论为口径，由我们负责写出发言稿，大会要和‘工总司’、‘农司（筹）’、‘红革会’等组织联合召开，声势要大一点。大会由党校程绮华负责筹备，筹备处就设在淮海中路市委党校……”

一切商量定当以后，夜已深了，仍然处在亢奋、激动状态中的这些“秀才”，对着毛泽东的画像，轻声唱起了《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这支歌。徐景贤在他的回忆录里这样写道：

“我边唱歌，边感到自己的身心激动得颤抖起来：这场全国全面内战的结果是什么，我还不能预计．但是，我预感到自己将成为一场重大的历史事件的参与者，在即将到来的全国全面内战当中，我要坚定地站在毛主席的一边……”

他们唱得很轻、很轻，歌声只在室内回荡，因为就在市委写作班隔壁的一幢楼里，还住着一个市委书记和一个部长。时过午夜，人们早已进入了梦乡。他们不想惊动他们。

而此时，12 月 27 日至 28 日凌晨，已有近两万名“赤卫队”队员涌向康平路上海市委机关所在地。

他们拥立在康平路那一棵棵光秃的梧桐树下，使这条小马路连自行车都难以通行。

“赤卫队”总部也受到一些局和区“赤卫队”联络站的指责，说他们太软弱。许多人提出要停水、停电、停工，有人说：

“水、电一停，用不到几小时，中央就会出面讲话。”

上海公用事业局的赤卫队负责人表示：

“公用分部的人大部分是赤卫队，有啥事一句话，水厂如果一停马上就起作用。”

“公交不要通知，实际已经停了。车子开不出去。”

“如果叫清洁工人，一天不倒马桶，马上就变成一个臭上海。”

港务系统的“赤卫队”负责人说：

“如果我们港务一停的话，轮船上货物没有人卸，这时曹荻秋一定要出来公开向全市赤卫队认错，说不定中央文革还会派人来上海接见赤卫队。”

上海铁路分局的赤卫队负责人说：

“我们铁路已作了准备，我们大多数列车员是赤卫队员。”

“铁路已经停了，沿线各站正在通知，现在人已都集中，马上可以拉来。”

根据“赤卫队”闸北区联络站一个参加“赤卫队”总部会议讨论时作的讨论记录，有人甚至提出了具体的计划：

第一步骤：

1. 从今天夜里开会时起，向华东局，上海市委逐步增加人数。

2. 制造舆论、开动宣传广播机器，进行宣传，使得家喻户晓。

3. 采取行动前，要得到群众支持。

第二方案：

1. 要利用条条和系统结合，抽调人数。

2. 应该具体指挥，果断下达命令。

3. 要机动、灵活分析形势研究下步工作。

4. 具体分工，指挥部分二线或三线绝对不能暴露。

5. 以杨浦区纺织厂先停，外港停三、五、九，三个区，这样会有国际影响。

第三决定：

1. 停纺织；

2. 停财贸；

3. 停交通；

4. 停外港；

5. 最后全部停下来。

最后，“赤卫队”总部会议大家比较统一的意见是：

一方面继续派人支持康平路，并成立指挥部，另一方面决定先停纺织厂，其次停财贸、港务、公交跟上，具体时间由总部打电话通知。

会议结束后，12 月 28 日早晨，“赤卫队”总部向中央发了一份电报：

中共中央，国务院；北京：

曹荻秋挑起群众斗群众，赤卫队无法继续生产，遭绑架，揪打，甚至失踪；人身安全受到威胁，群情激情，有全市性停工危机，总部劝说无效，目前群众又出现系统停工趋势，但鉴于目前情况总部难息群众激情，事关全国影响国际，涉及抓革命，促生产的大问题，总部已处困境，特电呈总理务请速派人员于七点专机抵沪，急办十万火急。

捍卫毛泽东思想工人赤卫队上海总部

十二月二十八日五点十分于沪　王玉玺

28 日，王玉玺他们终于找到市委接待站负责人、市委副秘书长杜淑贞。他们要求杜淑贞打电话给张春桥。于是杜淑贞带着两名赤卫队员去铜仁路市人委的外事办公室，爬窗进去，找到一部能够接通中央的“红机子”，接通了中央办公厅，要值班人员马上向在北京的张春桥汇报上海的紧急状况。

杜淑贞还交给赤卫队的代表们一张小纸条，让他们按照上面的地址去找马天水。代表们按纸条，在陕西北路和北京西路交界附近教堂旁的一座花园洋房中找到马天水，将马天水带往康平路谈判。当天下午，赤卫队代表要求马天水打电话给张春桥，马天水便在张春桥家，借用他家的红机子给张春桥打电话。由于身边有赤卫队员，马天水只说“赤卫队”要求市委承认他们是革命群众组织，他们也要打倒市委和曹荻秋。

康平路不长，充其量不过公共汽车两站地，旧名麦尼尼路，位于上海市西南角，邻近交通大学。马路上几乎没有一间商店，也不通公

共汽车，平时很安静，行人稀少。马路两侧，大都是花园洋房。这里是中共上海市委的所在地，上海市委书记处的办公楼群，就坐落在康平路 165 号大院里。大院里有 3 幢四层楼的公寓，每一层楼有两套住房，一套是办公室，一套作为居住用，一套里有两室两厅，过去是给市委常委住的。公寓楼前面有一排两层楼的花园洋房，每套洋房都有独立的院子，种着果树，很考究。这些房子过去是柯庆施、陈丕显、曹荻秋、张春桥等住的。但此时，都已经撤走了。连一向声称自己不害怕群众的市委书记处书记马天水，也带着家属转移了。整个大院里，只剩下已故的原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的家属以及正在北京的张春桥的一家。

“赤卫队”有人进了柯庆施家。据当时在家的柯庆施女儿回忆：

忽然一位 30 来岁瘦瘦高高的女子发现了钢琴上的照片，轻声地一叫：“柯老！”人们立即都安静了下来，把目光投向照片。不知是谁带头摘下头上的棉帽，男子们都随着脱下了帽子。没有人说话，大家自发地向爸爸的照片鞠躬行礼，然后安静地退出小饭厅从阳台走了下去，从小庭院离去。

……第二天早上，发现家门外的墙上贴着一张纸，上面写着几个大字：“这里是柯老的家”。

徐景贤担心张春桥家的安全，下午，他手持市委机关工作证，挤过层层人群，进入康平路市委大院。只见市委书记处的办公楼里，到处挤满了人，每一间十几平方米的办公室，至少挤进几十个人，连不到3平方米的小厕所里，也挤着四、五个人。楼梯头、走廊边、草坪上，树荫下，全是戴着“赤卫队”红袖章的工人。

天气很冷，徐景贤怕被人认出来，戴了一个大口罩。他找到位于大院中部张春桥的家，从后面的水泥楼梯悄悄地绕道走上去，来到张春桥家的后门口，从玻璃门朝里张望，客厅里不见人影。

徐景贤又试着敲敲后窗，轻轻喊了几声，也没有人答应。

徐景贤返回到大院，只见赤卫队员们因为总部提出的要求得不到满足，情绪十分低落，有的人用毛笔在墙上写大标语：“曹老头决没有好下场！”“赤卫队要大造上海市委的反！”以发泄心中的不满。

现场没有人在作宣传鼓动，可能是通宵集合包围市委，大家一直没有休息，许多人就席地而坐，背靠着背，脸上显露出十分疲惫的神色。

有几个工厂的食堂，用黄鱼车给本厂的工人送饭菜来，吃剩的饭菜，连同写着各个工厂厂名的搪瓷盆碗，到处乱扔，满地狼藉；还有的单位送来几百箱饼干，高高地堆在空地上。

徐景贤走出康平路市委大院，忽然看见有许多打着红旗的队伍，从徐家汇、宛平路、余庆路等方向朝康平路涌来，红旗上印着醒目的黄字："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工人造反队"。在康平路大院门口，两支观点不同的队伍对峙着，互不相让，气氛顿时紧张起来。

徐景贤回到市委写作班，立刻召集郭仁杰、王承龙、王知常等人开会，商量如何对付"赤卫队"。徐景贤说："'工总司'这种做法真蠢，康平路市委大院现在是一座空城，让赤卫队呆在那里，没有几天就会溃散的。现在'二兵团'调了大批队伍去包围，反而刺激了'赤卫队'的情绪，弄得不好，可能要出事。"

哲学组的郭仁杰说："赶快想办法找找'工总司'和'二兵团'的头头，要他们把队伍撤走。"

徐景贤让市委写作班的机要秘书打电话找王洪文，可是到处找不到。

朱水嘉说："我们还是把重点放在准备召开全市的批判大会上，把大家的注意力吸引过来，让康平路去唱'空城计'，不要睬它。"

徐景贤说："这样对峙下去，双方很可能要大打出手，如果出了人命案子，造反派就被动了。我们还是搞文的，要大家把矛头对准市委，从政治上瓦解'赤卫队'。"

王承龙表示同意，并提出："向院子里的'赤卫队'进行广播"。

徐景贤认为这个主意很好，立刻通知市委办公厅"造反兵团"在康平路大院边缘上的181号楼里设立一个联络点，让《支部生活》编辑部"造反队"负责，在康平路大院四周高楼上，安装起几只高音喇叭。同时布置历史组、文学组的几支笔杆子，立刻起草传单。徐景贤自己也亲自撰写了一份《赤卫队为什么要大闹龙宫？》，呼吁赤卫队

员们反戈一击，杀回工厂去，向市委的反动路线猛烈开火。传单写好后立刻被打印出来，还抄成大字报，在康平路大院周围散发和张贴，并且通过高音喇叭连续向大院内广播。

12 月 28 日深夜，张春桥打电话回家，向妻子文静询问“赤卫队”进入康平路大院的情况。文静告诉他，“赤卫队”进入康平路大院，要求曹荻秋接见，要求市委重新承认“八条”有效，等等。张春桥对妻子说：赤卫队现在也提出了打倒上海市委口号，要提醒上海各造反派组织注意。胜利果实不能被“赤卫队”夺去。造反派应该赶快采取行动。

张春桥放下文静的电话，又给王洪文打电话，也是到处找不到他。张春桥又让秘书给正在北京的耿金章打电话，让他马上回上海。

这天夜里，北京大学未名湖畔的招待所响起了急促的电话铃声：

“马上找一下上海‘工总司’的耿金章同志！”

“你哪里？”

“有要事找他，快！”

耿金章拿起电话，里面传出张春桥秘书的声音：“老耿吗？春桥同志要你立即回上海！”

“什么事？”

“回去你就知道了。”秘书在电话里没有多说。

耿金章是 12 月 20 日坐火车到达北京的。那是张春桥给王洪文打电话，要耿金章赶往北京，处理两桩急事：

一是那个“北上返沪一兵团”的头头戴祖祥，虽然被王洪文一闷棍打了下去，还是不甘寂寞，带了一支人马来到北京，打着“工总司”的旗号，冲击中南海。

二是北京冒出了一个上海“工总司”的假联络站，用上海“工总司”驻京联络站的名义在北京印传单、发声明。

耿金章一到北京，就找聂元梓，住进了北京大学招待所。随后派人四出寻找戴祖祥，却不见他的踪影。一打听，原来他已经走了。

至于解决那个假联络站问题，耿金章叫人拟了个上海“工总司”通告，送到聂元梓那里。北大印刷厂哗啦啦印出上万份通告，红卫兵

把通告贴遍北京的大街小巷，声明那个所谓联络站绝非上海“工总司”“正宗”……

耿金章刚刚把两件急事办妥，正准备向张春桥汇报，却发生了如此紧急的事情。

第二天一早，29 日，聂元梓派车，将耿金章送到机场，张春桥已经为他准备好了飞机。

29 日凌晨，上海市委写作班的红色保密电话机铃声也响了。徐景贤拿起听筒，是张春桥的妻子李文静打来的，她放下张春桥的电话后，便打电话给徐景贤，转告张春桥的话。徐景贤马上派人去找“工总司”的王洪文和潘国平等人，但一个也没有找到。他只好先向“机关联络站”的负责人们传达张春桥指示：

“赤卫队”去造曹荻秋的反，上海的造反派为什么看着不动？希望上海的造反派想一想这件事的后果，如果曹荻秋投降了，签字同意“赤卫队”的要求了，那么上海造反派打下的天下就是“赤卫队”的了，桃子就要被“赤卫队”摘去了；想办法告诉工人造反队，赶紧动员工人去康平路，对“赤卫队”搞政治攻势，人去得越多，曹荻秋就越不敢轻易投降。

放下电话，徐景贤立即通知相关人员，在电话里传达张春桥的指示，并要求这些人“见到自己的同志，就要立即转告，以便有所准备。”

凌晨 3 点多钟，徐景贤在“联络站”召集会议，参加会议的是上海工人造反组织的头头和部分院校的红卫兵代表近 40 人，会议开了一个多小时。

徐景贤在会上一副大战将临的严肃面孔，向大家传达了张春桥的指示，他说：“春桥同志的提醒很重要，不然我们造的反，让‘赤卫队’摘了果子，岂不前功尽弃？我们召开大会的口号看来要升级了，不能再用‘火烧’、‘揪出’等提法，一定要提‘打倒’。大会一过年就开，口径要统一，按春桥同志的电话指示精神，正式喊出：‘打倒陈、曹！打倒上海市委！’”

他还对如何贯彻张春桥的指示做了安排与部署：“由‘工人造反队’负责向‘赤卫队’斗争……各高校造反派做好积极配合。”同时

强调“要防止胜利果实落入别人手中”，并布置“机联站”宣传组全体出动，写传单、出派刊，做好积极的舆论准备。

散会后，与会人员立即按照徐景贤的布置分头向有关的人员传达了这次会议的内容。徐景贤指派在场的人分头去找“工总司”等组织的头头，他自己也亲自打电话找“工总司”的头头王洪文，还是没有找到。

29 日上午，王承龙向北大驻沪联络处的李醒尘传达了张春桥的电话精神：“左派不能站在旁边看，把领导权掌握过来，不然变成‘工人赤卫队’和市委斗，将来胜利果实落到他们手里”。“要把矛头指向市委”。

当天，李醒尘又将王承龙传达的张春桥的指示精神向“新师大”红卫兵做了传达。他说：“昨晚张春桥和文静通电话，这件事革命左派不能坐视，要夺回领导权，不能让‘赤卫队’直接和市委接头，胜利果实可能被人抢走。‘赤卫队’进驻康平路，‘工总司’也要进去，夺回领导权。”

终于，29 日傍晚，曹荻秋进入康平路大院办公大楼三楼，与“赤卫队”谈判。赤卫队谈判代表指责曹荻秋“出卖了我们”，“是你自己拼命把我们培养起来的，现在你又把我们踢开！”曹荻秋无言以答，他只能说：“我并没有全面否定你们的大方向，如抓革命，促生产。你们起来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开火，我也是肯定你们的。问题要作具体分析。”

晚上 21 时，陈丕显从西郊宾馆打电话给曹荻秋的秘书，要他转告曹荻秋：如果赤卫队提出要市委承认他们是“合法的群众组织”，可以同意，其他要求给予物资上的方便等等也可以同意。于是，曹荻秋立即和“赤卫队”达成了部分协议。

可是，当已经达到目的的“赤卫队”开始散去时，发现自己已无法离去，因为所有的去路，都被“工总司”堵死了。他们像饺子馅一样陷入了“工总司”的重重包围之中，看上去，好像“赤卫队”仍然围困在康平路上。

29 日晚，徐景贤召集郭仁杰、王承龙等开会，进行分工，以解

康平路之围。首先，徐景贤去衡山饭店，把已经在康平路周围集结的造反队组织起来，解决“赤卫队”对康平路的包围。其次，王承龙负责宣传攻势，从政治上瓦解“赤卫队”。第三，郭仁杰去“二兵团”找耿金章，看能否把涌到康平路来的造反派组织起来。

当晚 22 时，郭仁杰和陈冀德在永福路找到耿金章。

## 第 363 回：消息传，张春桥家被抄砸　一夜间，“赤卫队”分崩瓦解

耿金章 29 日中午从北京回到上海的。离京之前，通过电话联系，对上海的形势已有了解。他怀着一种特殊的使命，按照张春桥的要求，决定回来后“处理好”这件事情。

当天下午 14 时，耿金章便召集“二兵团”的孙玉喜等相关人员开会，研究对付“赤卫队”的办法。

由于耿金章“二兵团”的住地与康平路比较近，对于市委那边的动静也就掌握得比较详细。当“赤卫队”派人包围市委大院时，耿金章的“二兵团”就早已派人悄悄地潜入里面，了解情况，并采取了一定的行动。所以参加会议的相关人员向耿金章汇报说，早已派人带队去康平路了。

耿金章问：“谁带的队伍？一共去了多少人？”

“是张虎根带的队，我们去的一共有好几千人吧。”

耿金章一听，立刻站了起来，大声喊道：“不行，只去了几千人，太少了，到时这些人会不够用的。”

耿金章虽然刚下飞机，也没有到康平路现场去实地观察，但对上海当时的形势是完全了解的。“赤卫队”这样的组织，全市上下总计也有数十万人，能到康平路市委机关来的队伍，也不会太少，因为这对于任何一个群众组织都是一件关系到整个命运的一场战斗，只派出区区的几千人，只会被淹没在“赤卫队”的人海中。

有人问道：“那怎么办？”

耿金章答道：“必须立急派人出去，迅速调集队伍，跑步向康平路方向集合，以便对付突发的形势，必要时对‘赤卫队’采取行动。”

有人问道：“一共要多少人才行？”

耿金章说：“两万人吧，最少也得动员两万人！”

耿金章“二兵团”的人大都是各厂的工人，虽然当时很多厂都已停厂闹革命了，但有时还是得到厂里去报到的，不到厂里就各自蹲在自己家里，人员分散，一下子组织如此大一支队伍，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有人提出：“是不是要向王洪文请示一下。”

耿金章向来就瞧不起王洪文，他将手一挥，说道：“来不及了，我们各干各的。”

然后，耿金章便对在座的人员进行了分工：孙玉喜、张虎根、陆家滨去康平路，方剑华在“二兵团”总部调人。

正在这时，耿金章接到王洪文打来的电话，传达张春桥的指示，对于“赤卫队”，“决不能让他们抢夺胜利果实，要想法将他们打垮。”

原来，在耿金章召集相关人员开会的同时，张春桥在北京中央文革的办公室里，也好不容易找到了这个王司令，立刻向他下达指示，无论如何都不能让“赤卫队”抢夺了“胜利果实”，如果形势紧迫，有必要对这个组织采取行动，将这个组织打垮。

王洪文得到张春桥的这个指示后，感到上海形势不容乐观，便召集“工总司”的相关头头们开会，商量对策。

这时王洪文已得知耿金章从北京飞回上海，并在组织“二兵团”对赤卫队采取行动，于是便下令“工总司”的各组织组织，密切注意形势的发展，随时准备给耿金章的“二兵团”以支持。然后和戴立清一起来到永福路“二兵团”总部，与耿金章和方剑华回合后商定：

一、康平路现场由“二兵团”耿金章组织火线指挥部负责解决；

二、各区、各基层的“赤卫队”及其老窝由王洪文、戴立清指挥“工总司”所属造反队去砸掉。

调动人员分工是：戴立清调动“工总司”总部各区人员，方剑华调动“二兵团”人员。耿金章、张虎根指挥。

在与康平路毗邻的衡山宾馆里，以王洪文的“工总司”为首，与上海 20 多个造反派组织联合成立了“上海革命造反派联合指挥部”。这个“联合指挥部”还在黄浦江东岸杨家渡附近，紧挨着康平路大院的荣昌路 60 号，原中共上海市委文革小组的所在地，设立了一个“前线指挥部”，“指挥”就是耿金章！

这时，从张春桥家又传出了意外的消息：12 月 28 日，“赤卫队”冲进张春桥的家中，大声叫嚷：“我们就是要造张春桥的反！”12 月 29 日，“赤卫队”又冲进张春桥的家，恐吓文静说：“如果中央负责同志不来，到六点钟问题还不解决，那上海就要停水、停电、停车了！”

于是，《赤卫队抄了张春桥同志的家》以至《赤卫队抄了柯庆施同志的家》之类传单满天飞，街头巷尾也刷满大字标语：

“‘赤卫队’抄张春桥同志的家，就是炮打中央文革！”

“‘赤卫队’抄张春桥同志的家，罪该万死！”

其中“张春桥同志”用红色颜料书写，而其他的字则用墨汁来写，朱墨分明！

耿金章听到这个消息，决定调整人员，调孙玉喜到“前线”担任指挥，将张虎根换下来去保卫张春桥的家。

张虎根回来后，耿金章对他说：“你带1000人去保卫张春桥、柯庆施的家。”

下午，张春桥的秘书何秀文闻听张春桥家被抄，立即赶去。文静对何秀文说道：“开始，有几个‘赤卫队’队员进到家里，是想找个地方坐下来。但是，看到是住家，家里有老小，所以很快就退出去了，就在门外走廊上和楼梯口站立或坐在地下，以后没有再进屋。于文兰同志给我打过电话，也说有人先敲门进屋，但一进屋看到柯老的遗像，随即退出来了，以后也没有再进去。”

于文兰是柯庆施的夫人。

过了一个小时之后，张春桥从北京打来的长途电话，电话是张春桥的女儿张维维接的，张春桥头一句话便是问家里情况怎么样，女儿如实答道：“‘赤卫队’并没有抄我们的家。”

“你妈妈在吗？让她听电话。”张春桥让文静接电话。

文静接过电话，一边不住地“嗯”、“嗯”，说“知道了”、“知道了”。

晚上20时过后，张春桥的秘书何秀文来到荣昌路60号找耿金章。是张春桥妻子文静打电话让他去耿金章那里，向耿金章当面传达张春桥的指示，一定要想办法将“赤卫队”的问题解决。

听了何秀文的传达后，耿金章满怀信心地对何秀文说：“春桥说‘赤卫队’现在提出造反的口号是想抓造反的旗帜，要摘桃子了，胜利果实不能让‘赤卫队’抢去，所以我们下定决心，非干不可，一定要打一仗的。”

送走何秀文，耿金章再次召开“二兵团”下属各区联络站头头的会议，除传达张春桥的指示外，还向大家通报行动计划和相关事项，要各区都做好准备，随时注意兵团总部发出的各种指令，到时行动要快，不能延误，对“赤卫队”下手要狠，要将其彻底打垮，不能让他们有死灰复燃的机会。

最后，耿金章在会上宣布：“在天亮前，‘赤卫队’还不撤离康平路大院，我们就冲进去，把‘赤卫队’赶出来。”

此时，上海市委书记处所在地“爱棠”大院周围的宣传车已经在不停地呼喊：

“‘赤卫队’是老保，大方向错了！”

“‘赤卫队’不投降就叫它灭亡！”

……

22时许，荣昌路和康平路大院门口不时发生小规模扭打。

30 日凌晨 2 时，耿金章“二兵团”的人马已冲到康平路市委大院的围墙外，正准备向大院里发起冲击时，却受到了许多在场的市委“机联站”干部的阻拦。这些干部围在大院外面，不让“二兵团”的人往里面冲，坚持要开展“政治攻势”，文斗瓦解，双方为此争吵起来。

“机联站”的王承龙赶来了，他也不同意此刻采取武力攻打。

正在双方争吵得难解难分的时候，只听的人喊了一声“老耿来了！”

这一声之后，全场立刻安静下来，人们顺着那人手指的方向望去，只见耿金章带着一队人马，风风火火地朝这边跑来。

两边争吵的人仿佛看见了“救星”，都看着耿金章不再说话。

耿金章奇怪地问道：“怎么哪？”

主张进攻的人们立刻喊起来：“工人最有发言权，老耿，我们听你的！”

耿金章看了一眼人群，认为这些人太“右倾”，于是便将手一挥，大叫一声：“上！”之后，耿金章通过广播，命令“工总司”的人立即冲进 100 号院内。

随着这一声号令，成千上万的“二兵团”队员按照早已准备好的方案，向市委大院里的“赤卫队”发起攻击。

夜色黛黑，寒风飒飒，两万多名处于重围的“赤卫队”队员正困倦难熬，吃着饼干充饥，突然看见“工总司”的队员高喊着：“赤卫队是保皇队！”“受蒙蔽无罪，反戈一击有功！”冲了过来，那从成千上万的喉咙里发出的呼喊声，震天动地，摇晃着康平路。一场大规模的武斗爆发了！

“工总司”边冲边打，把疲劳过度、毫无斗志的“赤卫队”打得落花流水。

很多赤卫队员也进行了还击，冲杀声和厮打声打破了夜的寂静，.....

此时，曹荻秋还没离开康平路，他在办公大楼的四楼，看到了康平路大院内两派冲突全过程。只见“工总司”从康平路北大门涌进大院，很快便冲进了一号楼，要赤卫队员高举双手，交出赤卫队袖章；甚至还强迫赤卫队员低头认罪，匍匐地上，从他们的人墙中挨着拳打脚踢，爬出院子。而在康平路大院南面，则由红卫兵开路。

“赤卫队”谈判代表潘月发和陈英烈都清楚地看到，曹荻秋流下了痛心的眼泪。“赤卫队”首席谈判代表陈英烈，让人将受伤的赤卫队员抬到曹荻秋面前，曹荻秋向伤员询问了冲突的情况，然后进入四楼楼梯旁的广播室，打开了广播机，一遍又一遍呼吁停止冲突。

曹荻秋的呼喊无济于事，没有人理睬他。造反派们冲上四楼，涌进曹荻秋和赤卫队谈判代表所在房间，押走了曹荻秋。

到清晨 6 时，康平路大院全被造反派占领。到处是狼藉一片，棉鞋、单鞋、帽子、手套满地都是，还有大批搪瓷的杯盘碗碟和吃剩的面包饼干，树木花草全被践踏。荣昌路的大铁门撞坏了，32 号楼的楼梯上的铜栏杆扶手有两公尺多长的一段被打坏了，办公大楼的玻璃大门打坏了，小礼堂的楼梯的木质扶手均被打坏作为武斗工具了，其他如椅子，沙发，门窗玻璃打坏的更多。

一万多名赤卫队员被迫脱下袖章，两手抱着头蹲着。

人们正在惊诧“赤卫队”怎么这么快就被打垮了？突然从远远的

前面传来阵阵口号声，大家不知发生了什么事，翘首向前望去。口号声似接力棒向四周传去，前面的队伍开始骚动起来，这骚动似传染一样逐渐向四周扩展，原来站在马路中央的人群纷纷向两边退让，让出一条路来。

只见被俘的赤卫队员排成长长的单列纵队，鱼贯走出康平路市委的大门。所有的人都被当场剥去“赤卫队”的袖章，高举双手做出投降的姿势，有的人手里还拿一根稻草，表示是到市委来“捞稻草”的意思，

7 时多，投降的两万多名赤卫队员分 6 路被赶到四马路上集中。

这是一支奇特的队伍，呈 3 路纵队。两边是“工总司”的队员，夹在中间的一路是“赤卫队”。“工总司”队员威风凛凛，一副胜利者的姿态，口中不断在威吓着，有的还不时动手按几下“俘虏”的头。

被俘的赤卫队员，高举双手作投降状，再被迫低头弯腰，在低垂的后脑上，顶着被撕下来的自己的“赤卫队”袖章，稍有反抗的，就被两边的造反队员架起双臂，被强制低头弯腰，这叫“飞机式”。

这些头顶袖章的人每走不多几步，就会被一些最最革命的造反队员拦下，打开《毛主席语录》，翻到印有毛泽东像的第一页，愤怒地要赤卫队员低头向伟大领袖毛主席请罪。

被押解的可怜虫不得不呈 90 度弯腰，口称：“我有罪，我有罪，我向伟大领袖毛主席请罪。”

顺从的放过去；稍有不从，雨点般的拳头就砸在他的背上；有的太依顺，头低得太低，头上的袖章滑在地上，也被最革命者送上几拳。这种折磨、虐待赤卫队员的“壮举”被不远几步的又一批最最革命的人所仿效，这些可怜的人就被这样一路反反复复地折腾下去。

突然在这群“俘虏”中，出现了一个头上缠着绷带的人，被双手反剪成“飞机式”走来。这是一个身材瘦小的汉子，他倔强地努力昂起头来，到了“红宝书”前，要他向毛主席请罪，这个汉子倔强地说他没有罪，话一出口，就被一顿拳头打翻在地，又被拖起来。但他仍高昂着头，不愿低头请罪，两个“好汉”硬是把他缠着纱布的头揿下去，他硬是抬起头，拳头又如雨点般砸下。

这样一来，“俘虏”的队伍被阻断了，有人吆喝起来，这个倔强的汉子才被人拖走了，押俘虏的队伍又开始行进。”

俘虏们的袖章全部被扯了下来，堆成 6 大堆。在这次事件中，一共伤残 91 人，送至医院治疗。现场还缴获几百箱饼干。

武斗结束以后不到半小时，张春桥从北京亲自打电话给徐景贤，向他详细询问了武斗的情况。

张春桥听完汇报，用他那有些沙哑的嗓音，斩钉截铁地说：“你们一定要始终把矛头对准上海市委，大造舆论，大造声势。指明这场武斗完全是市委挑动群众斗群众引起的，他们才是这次流血事件的罪魁祸首。”临了，他又说：“再也不要提‘赤卫队抄张春桥的家’了！”

徐景贤回答说：“我知道啦!最近几天，我们准备集中全力，召开一次‘打倒上海市委’的大会，牢牢把握斗争的大方向。”

姚文元也给徐景贤打来电话指示说：康平路事件“是市委造成的”，“是挑起群众斗群众”。并要求徐景贤针对这种情况，必须立刻采取措施，将“各个组织找到一起快点商量”。

姚文元在电话时同时还给出主意说：“无论如何不要放弃批判反动路线的旗帜”。

## 第 364 回：昆山乱，京沪线再次中断　元旦夜，通知陈丕显出山

就在耿金章率“二兵团”和“工总司”近两万人的队伍，对进驻市委大院的“赤卫队”进行围攻时，另一支队伍也在上海滩上秘密地开始了行动。

位于杭州路的上海“工总司”总部，负责值班的王腓利急急忙忙地走出大门，直朝上棉 17 厂跑去，见到了正在那里的“司令”王洪文，将康平路发生的情况向他汇报。

王洪文没有想到耿金章下手如此之快，便对前来的王腓利挥挥手，说了一声“走”，很快就冲出了厂门。

王洪文带领几个人跑到位于闸北的“工总司分部”，立刻对早已调集待令的人员进行安排，要他们迅速占领“赤卫队”闸北分部，同时将他们的物资缴获过来，全部搬到“工总司闸北分部”。

王洪文为什么首先要带队去闸北呢？因为上海火车站在这个地方，交通方便，为了防止被打散的“赤卫队”人员外逃，更为了防止他们乘机到北京去告状，因此首先必须占领这个地方。

在打垮了闸北“赤卫队”分部之后，王洪文又带领一支队伍，同曹德宏包围西藏路一带的“赤卫队”，收缴“赤卫队”的袖章，解散他们的队伍。同时在西藏路一带堵截、阻止“赤卫队”的人去火车站。

接着，王洪文又令另一部分队员，前往康平路协助攻打“赤卫队”。

王洪文说：“你们负责外围阻止任务，要是赤兄来增援部队，就很好揍他们一下，决不能让他们冲进去。”

30 日早晨，王洪文在位于衡山宾馆二楼的现场指挥部开会，向“工总司”的头头们下达命令：“你们回到各区后，尽量迅速地彻底摧毁‘赤卫队’的区联络站。”

此时，徐景贤在接到张春桥、姚文元电话后，也立刻在衡山宾馆火线指挥部，召集相关群众组织的联络员，传达张春桥的指示，要宣传“赤卫队”的“暴行”，宣传的旗帜不要称“赤卫队”抄张春桥的家，矛头要对准陈（丕显）、曹（荻秋）。

“这场群众斗群众是市委挑起的。”

“主要矛头要对市委反动路线”

“抄张春桥的家不能作为口号，要针对曹荻秋、陈丕显”

“12 月 30 日群众斗群众的流血事件是市委反动路线的结果，完全是市委曹荻秋挑起来的，‘赤卫队’是市委一手炮制的组织，……要把矛头指向曹荻秋为首的一小撮走资派，工人‘赤卫队’大部分是被蒙蔽的，不要上曹荻秋的当，继续和‘赤卫队’干下去，市委就可以捞到稻草了。“

“要赶快找革命组织把精神透露出去。”

“要赶快把矛头对准市委，要紧紧抓住这个事件，抓住市委”。

同时，徐景贤又以“丁学雷”的名义，打电话给“工总司”的董兴茂，要他将以上情况报告“工总司”的头头。

王洪文根据这个要求，在“工总司”内部召开大会，对这件事情进行了传达，要求大家能够“统一认识”。

中午 12 时，张春桥再次给徐景贤来电指示，让他们把斗争口号提得响一些，观点鲜明一些，明确指出曹荻秋是 12·30 事件的罪魁祸首。

12 月 29 日到 30 日清晨，整整一天一夜，“赤卫队”总部电话铃声不断，滞留在康平路大院内赤卫队员连连告急，各区联络站来电要求总部集中队伍对造反派反包围。一些联络站已经集结队伍准备出发，王玉玺考虑再三，没有同意

12 月 30 日，终于传来了“赤卫队”在康平路全军覆没的消息。“赤卫队”总部决定在人民广场举行集会抗议。

十几万赤卫队员，分四路集结在外白渡桥，长宁区、西藏路桥和天目路桥。但是，人民广场附近的道路都已被造反派布置堵截。在外白渡桥、北站，不时发生造反队与“赤卫队”的摩擦。王玉玺将集合地点改在北火车站。“赤卫队”总部决定北上告状。

大批赤卫队员在北站广场集中，按区、局集合队伍。总部规定：赤卫队员将毛主席像章佩戴在右胸，而不是通常的左胸，以区别于普通旅客。

上海市委得知消息后，立即派人驱车前往，希望找到王玉玺谈判。

但车子刚到西藏路，就被在那里造反的华东六省一市来沪人员扣下。

深夜至安亭。他们中的许多人一个多月前曾来过这里，那是在安亭事件中，为了劝阻“工总司”的造反派北上告状。现在他们自己也北上告状了。上万人沉默地通过安亭。

12月30日下午17时45分，“赤卫队”总部头头王玉玺率一万多名愤怒的赤卫队员，由一辆宣传车引路，冒着霏霏冬雨，步行北上，要进京控告“工总司”制造武斗，打击“赤卫队”的罪行。于是大批工人离开生产岗位。

其实，从27日开始，上海各区、各局的“赤卫队”就分头打电话通知自己系统的“赤卫队”前往康平路集中。纺织系统28日这天去了三四千人，仅王洪文工作的国棉17厂就有近2800多人离开车间，全厂40％的机器停转；公用事业局12月29日往康平路调了8000名赤卫队员，其中电车二场约300余人，造成许多电车因无人驾驶只能抛锚，个别路线更是只有二、三辆车行驶，而原来应行驶二十辆左右；上钢三厂6个转炉停了5个，大批化验员外出串联；印刷工人也大批离厂；上海机械厂6000个职工全部停工；港务局亦有大批工人离开生产岗位。上海形势严峻。

铁路和海港最先瘫痪。上海铁路局调度所的80多名调度员几乎都是赤卫队员。他们去康平路请愿，然后又北上告状，除几个人留守，绝大部分都离开了调度台。铁路交通无人调度，上海铁路再次全线瘫痪。

上海的煤和存粮告急；而煤无法正常供应，更使上海发电厂几乎停电。自12月31日早晨5点多，上海的吴淞地区部分工厂开始停工。六点不到，邮电部门开始停工。公交系统也部分停工。

针对这种情况，12 月 31 日，“工总司”发出《上海革命工人造反总司令部特急通令》，指责“赤卫队”破坏生产、破坏交通，并要求：“……把工人‘赤卫队’上海总部及各区、县分部的头头统统抓起来，押送公安局。各工矿企业工人‘赤卫队’头头中，有反毛主席、林副主席及中央文革小组的反革命罪行者，也一律抓送公安局。”

这天，一张题为《紧急辟谣》的传单在上海广为流传，再次引起

人们的关注。传单上写着：

“我是张春桥的女儿张维维，我向大家介绍一下情况，赤卫队员是到我家来过，也到柯老家去了，但他们并没有抄家。”

传单上印着张维维的签名手迹。

王洪文马上给文静打电话询问此事，文静告诉他：“维维是那么说的！”

后来，张春桥驳斥了他女儿的观点：

“什么叫抄家？非得砸烂了才算抄家？你们要从阶级斗争的观点来看问题。柯老家有什么理由进去？我的家又有什么理由进去？进去了，就是一个很严重的政治问题！”

其实，那份传单并不是张维维写的，而是南模中学的红卫兵范卫平等人写的。

就在赤卫队围攻康平路的一天，范卫平她们几个上海市委的干部子弟从南模中学回家，路过康平路、余庆路口的“爱棠”大院时，看见里面到处都是戴袖章的人，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便停下来观望，并听到传言说：“‘赤卫队’抄了柯老和张春桥的家。”

范卫平的家几年前也曾经在“爱棠”大院内住过，和张维维曾经是学校的同学。前不久，她们还和张春桥的女儿张维维、张蓉蓉围在“爱棠”大院西边的公寓门口议论“文革”中的一些事。

范卫平她们内心是倾向“赤卫队”的观点，认为“赤卫队”中老工人多、劳动模范多、党团员多，是比较守规矩的，他们不相信“赤卫队”会抄张春桥的家。于是，她们几人马上去找张维维，问是怎么回事？

张维维说，“赤卫队”并没有抄柯老和他们的家，“赤卫队”确实来敲过门，当发现是柯庆施和张春桥的家以后就退了出去……

范卫平她们了解到这些抄家的真相后，红卫兵小将的脾气起来了，马上就赶回去以张维维的口气写了传单，由她哥哥刻蜡纸，范卫平印刷，印了几百份，标题就是《紧急辟谣》，字写得很大，用铁笔将标题描得很粗，后面加了三个惊叹号。她们将张维维的讲话照原话的意思写在传单上，在“爱棠”大院康平路大门附近散发。

在“辟谣传单”出现的第二天，康平路大门的东侧又贴出一张用毛笔写的、只有半张白报纸大的大字报，内容是：“声明：近日来，很多革命群众到我家来访，很关心我们，我们表示感谢，在这几天中，我们和很多群众见了面，但是也有那么一些不戴袖章的‘赤卫队’员曾长时间在我们家门口纠缠，严重地影响了我们的工作和生活，我们必须千百倍地提高革命警惕。”署名是李文静。

于是，“工总司”与“上海炮司”、“首都三司驻沪联络站”等共同发表了《联合声明》，毫不客气地斥责张维维：

“张维维和她的父亲张春桥同志不是一路人。……张春桥同志是坚定的革命左派，而张维维是铁杆保皇分子。……

“为了澄清事实，我们特此联合声明，张春桥同志家确实被工人赤卫队闯进过，并且工人赤卫队曾经在张春桥同志家静坐示威。工人赤卫队的大方向肯定错了，而且一错到底。”

紧接着，文静也发表声明，说道：

“有人指望从这里捞取稻草，死死抓住赤卫队没有抄张春桥同志的家来表明赤卫队的大方向是正确的，这是绝对办不到的，赤卫队不抄张春桥同志的家，他们的大方向也是错误的。”

12月31日下午14时，步行北上告状的“赤卫队”队伍到达昆山县。上海市邮电局“赤卫队”与昆山邮电局联系后，在昆山邮电局召开了会议，商议是否还要继续北上。

下午15时，164辆大卡车满载着造反队员，在昆山桥镇追上北上告状的“赤卫队”。他们大部分是耿金章的“二兵团”，还有复员军人造反组织“红卫军”等其他组织。一共两万多人。冲突在昆山的镇洋桥上展开。桥这一头赤卫队员们手挽着手，高呼“要文斗不要武斗”；桥那一头，造反队员们也高呼着口号涌来。当地居民和附近农民围在河两岸，观看着这场上海两大派工人的冲突。不少昆山市民也加入助战。事态不断扩大，致使沪宁铁路部分列车行驶中断，公路也被堵塞，造成了“昆山事件”。

已更名为“上海市红色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红工司”的原“上海市临时工外包工革命造反司令部”，听说“工总司二兵团”

的人在昆山被围，一天没吃东西，连夜调了一辆公交车，上面装了几十个日用百货的大纸箱，里面装满了面包，前去支援“二兵团”。

车子开过武宁路桥，越往前走路上的人越多。当车快就到昆山时，已经开不动了。从车前往去，只见路上黑压压一片人头攒动，在昏黄的路灯下，激动的人群似乎围住什么人在争论或者辩论。

越过人群看过去是一座桥，桥的另一端也全是人群。他们急忙派人下车打听是怎么回儿事。一会儿，派出去打听情况的两人急急上车后，紧张地说：

“下面全是当地的老保组织，马上要过来查上海的造反派了。快！把袖章脱下来，不能被老保发现我们！”

大家一时慌了神，匆匆把袖章脱下藏到口袋里。带队的沈福祥忙问：“前面都是些什么人？‘工总司’的人在这里吗？”

那人说：“下面都是老保，是当地的农民，‘工总司’的人被围在河对面不远的地方，现在老保对上海来的人查得很严。”

他见沈福祥还戴着袖章，焦急地说：“快把袖章脱掉，不然会被这些农民打死的。”

车厢内空气顿时紧张起来，出奇的静。“阿胡子”老陆开腔了，他在“红工总”这十几个人中年龄最大，又是走江湖出身，见识多，他首先要大家不要多话，然后说：“我们统一口径，说我们是上海中百公司批发站的，是送这批货到苏州去，这批货都是日用百货。”他指了指盒上原来印制的上海中百站。

他接着说：“就这样应付，由我一个人对外回话。”

全车十几个人沉默在黑暗之中。

接着，乒乒乓乓，只听有人从两面用棍棒把他们的车子敲得震天价响，一伙人气势汹汹地大叫：“开门！开门！”几支手电筒从不同方向照进车厢。

老陆把门打开，对外面的人说：“请问有什么事？”同时用高大的身躯挡在门口，但还是有一个人硬挤上车来。

上车的人问：“你们从哪里来？”

老陆沉着地答：“我们是上海中百站的，送货到苏州去。”

手电照到纸箱上，扫过来，扫过去，在“中百站”几个字上停留了一会，“里面什么东西？”

“百货！”

看来他相信了，又问：“车上有造反派吗？”

老陆回答说：“没有！我们刚到 5 分钟，急着去苏州，前面是不是让一让路啊？”

那人不耐烦地说：“不行！前面有几万人，路不通了，你们绕道从太仓、常熟走吧！”说着就要下车，似乎又不放心，回头又用手电照一照他们每一个人的手臂，又看了一眼堆得满满一车厢的纸箱，下车挥手带人走了。

大家沉默了一会，老陆轻声问沈福祥：“怎么办？”

沈福祥说：“再派人前去探探路，我们步行进去看看。”

谁也不敢答腔。

还是“阿胡子”老陆说：“人家昆山人一听我们的口音，就会疑心我们是造反派。再说这一车子的面包一旦暴露，就说明我们是上海派来的造反派，那不就完了吗？”

大家一听都附和起来。

沈福祥还有点不甘心，心想：“既来了，尚未看到什么，难道就这样回去不成？”

尚在犹豫时，又有一伙人乒乓乒乓来敲车子，又是几支手电筒光照了进来，老陆这次不敢把门打开了，只是把头伸出窗外说：“已经有人上车检查过了。”

周旋了一阵，这伙人总算走了。

这样待下去太危险了，还是赶快回上海吧！不等头儿开口，司机已经把车发动起来，有两个人立即开门跳下去，到后面协助司机倒车。车缓缓地倒了十几公尺，突然又是一阵棍棒猛敲车子，传来一声：“开哪里去？”

老陆立在车门口说：“我们去苏州，前面不通，我绕道走太仓，这路怎样走好？”车子倒车开了好一阵子，直到找到能调头的地方，把车调过头来，车下的两个人像捡回了命似地跳上车，连催司机快开！

快开！当公路上再也不见人影后，大家紧张的心才放下，互相开了一阵玩笑。

“昆山事件”，京沪线中断，又一次震动了中央。此时曹荻秋被群众组织斗来斗去，有时连人都找不到。面对如此混乱局面，中央决定让正在病休的陈丕显出来工作，首先整顿铁路秩序。张春桥打电话将中央的决定通知陈丕显，并说周恩来将直接给他打电话。

得到消息的陈丕显立即赶到上海北站了解情况，并通知市委电话总机：“有周总理的电话直接挂到北站铁路公安局。”

## 第 365 回：会议急，上海市情况堪忧　新年始，中南海群众造反

1967 年 1 月 1 日零时 10 分，正在家中沉睡的徐景贤被一阵急促的电话铃惊醒，他拿起听筒，里面传来长途台女接线员的声音：“是徐景贤同志吗？北京张春桥同志要找您……”

只听见电话的那头，张春桥焦急地说：“上海的‘赤卫队’闹着要乘火车到北京来告状，中央不同意，但是上海铁路分局调度所有一个‘赤卫队’的头头，名字叫王玉玺，他利用职权同意调车，我们知道了都很生气。刚才中央开会研究了，已经由总理直接打电话通知上海市委陈丕显，要他到铁路分局去对王玉玺采取措施。同时，还告诉陈不显，让他召集各个造反组织的负责人开一个会，讨论一下怎么把上海的秩序稳定下来。‘赤卫队’几千人上北京的话怎么办呀？还是要‘抓革命．促生产’嘛！不过，现在陈丕显说话可能不灵了，造反派的头头们不肯听他的，所以我打电话给你，你可以在会上说一说中央的精神，做做工作……”

1 时 30 分左右，王洪文也接到张春桥从北京打来的电话，告诉他：“周总理马上给陈丕显打电话，要陈丕显把上海的工作抓起来，尽快把生产搞上去。”

“曹荻秋是不能再出来了。你们已经把曹荻秋搞臭、打倒。所以总理只能叫陈丕显出来主持工作。”张春桥说，“其实，陈丕显有陈丕显的账，你们照样要和他清算。别以为总理叫陈丕显出来，上海就是陈丕显的了。那只是临时性、过渡性的措施。上海不可能是属于陈丕显的！”

3 时多，周恩来的电话打到了上海北站：

“丕显同志吗?”

“我是丕显。总理，您这么晚还没有休息呀?”

“没法子啊，要处理的事太多了。阿丕，你身体好吗?”

“身体还好，可以坚持工作，有什么任务，总理您就下命令吧!”

周恩来地询问了有关“昆山事件”的情况，然后说：

“中央决定要你出来工作。‘昆山事件’要尽快解决，上海一定不能乱，南北铁路交通一定不能中断。”

他接着又说："对于昆山事件，不能使事态发展下去，要缓和一下形势。""革命秩序要搞好，这样才能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顺利进行。""与革命左派商量商量"。

陈丕显说："我听从总理指示。我现在已在铁路局，我们正在做工作，力争明天通车。"

周恩来高兴地说："那好，我等着你的回音!你还有什么问题吗?"

陈丕显思索了一下，讲了上海市委现在的状况和自己的担忧，说"荻秋同志处境异常艰难，"自己也不知究竟怎么搞好……

他诉说着自己对文革以来种种现象的不理解，越说越激动，一时竟说不下去了。周恩来听着他的诉说，也十分坦诚地说："阿丕，这些问题我很难回答你啊。但有一条，大不了就罢官嘛。没罢官之前，照样工作。你好自为之吧!"

听了周恩来的回答，陈丕显一时语塞。于是，他换了个话题："总理，您身体好吗?"

"身体还好，就是睡觉太少了!"

"总理，您多保重!"

放下电话，陈丕显久久不能平静。是忧虑、焦灼、愤慨，还是亢奋、激动，连他自己也说不清。他思索一阵之后，立即叫秘书通知各造反组织的负责人到市委东湖招待所连夜开会。

东湖路也是一条不足千米的短小马路，紧挨着繁华的淮海中路。此时，康平路已经是不平静的马路了，陈丕显便把东湖路的市委招待所，即"东湖招待所"作为临时的办公处。

很快，王洪文、徐景贤等人就接到陈丕显的秘书打来的电话，通知他们马上到东湖招待所开会。

徐景贤放下电话，赶快穿衣起床，妻子在一旁埋怨着："过年也过不安稳，"徐景贤说："可能这几天回不了家喽！"

几分钟以后，市委办公厅就派小车来接徐景贤。他先到武康路 2 号"机联站"，拉上朱永嘉后，这才一起奔东湖路市委招待所而去。

凌晨 5 时多，上海各个造反组织的头头陆续来到了东湖招待所的餐厅：有北大"捍卫团"、清华"井冈山"、北航"红旗"、北京地

质学院、体育学院、电影学院、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西安军事电讯工程学院的驻沪红卫兵代表，还有上海的红卫兵组织“红革会”、“红三司”、“炮司”、交大“反到底”、同济“东方红”等。“工总司”的王洪文来得比较迟，他穿着一身较旧的黄绿色棉军装，戴着部队的棉军帽，满脸病容，瓮声瓮气地对徐景贤说：“我这几天感冒了，正在发烧。今天开什么会呀？”

徐景贤把自己知道的情况告诉了他。

耿金章披着一件军大衣，一阵风似地卷进室内，大声说：“我刚刚从昆山回来。被我们从康平路打走的‘赤卫队’又集中起来了，他们在北站没有上得了火车，几千人转移到昆山，准备从那儿上火车。我已经把我们‘二兵团’的队伍调去了，把‘赤卫队’堵在昆山城里，要想办法把他们弄回来。”

大家听到他从昆山带来的消息，马上议论纷纷，对如何处理目前这种混乱的局面，各抒己见。

正当与会者在七嘴八舌的时候，陈丕显穿着一身军装进来了。因为他还兼着上海警备区的第一政委，所以特地穿上了军装。他一进门就操着福建口音告诉大家：

“我刚才接到总理的电话，总理说：要贯彻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的指示，做好赴京上访工人的思想工作，交通不能中断，革命的秩序要搞好，总理要我同各个群众组织的负责人协商，一起解决面临的严重问题。接到电话以后，我赶到上海铁路分局了解情况去了，那个调度所的负责人王玉玺，擅自签字同意发车，破坏交通，我已经按照总理的指示，把他扣押了起来……”

陈丕显边说着边脱下军大衣，然后在白布铺成的长条桌子前面坐下，继续向大家介绍上海当前的严重局势：

“‘赤卫队’要北上告状，现在被阻拦在江苏昆山一带。上海铁路分局调度所的 80 多个工作人员中，有 70 多人是赤卫队员，都离开了岗位，沪宁线的铁路交通已经完全中断。从 12 月 30 日凌晨到现在的 26 个小时中，已经停开客车 26 列，有 5 万多旅客不能上车，还有 5 万多旅客被阻在中途，喝水，吃饭都成了问题。停开的货车有 38

列，中途停下的还有 22 列，货物积压了好几万吨。还有最严重的，就是整个上海市只剩一个星期的存粮了。黄浦江上，有一百多艘轮船停在码头无人卸货，上海库存的煤很快要用光，杨树浦发电厂的煤仅够用两天了，若煤再运不进来，发电厂只好停电。所以，要和大家商量一下，怎么来扭转这个局面？”

各造反组织的头头们听到这么严重的情况，你一言我一语地嚷开了，有的指责市委挑动群众斗群众，有的要陈丕显自己到昆山去处理问题，还有一个红卫兵组织的负责人，乘机要陈丕显批条子给他们配备几辆摩托车做联络用。红卫兵们不相信中央会让陈丕显出来主持上海工作。交通大学“反到底兵团”的联络员杨小兵，把陈丕显的传达记录整理成文，然后跟陈丕显的秘书于宝年一起，用红电话机与远在北京的总理办公室核对，证实准确无误，大家这才相信。

徐景贤一看如此混乱，当仁不让的走到会场正中，站在陈丕显的对面，大声说：

“造反派的战友们，现在的当务之急，是要把散在昆山和其他地方的几千名赤卫队员弄回厂里去，使沪宁钱铁路畅通，把上海的社会秩序和生产恢复起来。究竟谁应该对这个局面负责呢，就是你，陈丕显！你这个市委第一书记长期躲在幕后指挥，让市长曹荻秋站在前台，你们先是不承认‘工人造反队’，扶植了一支‘赤卫队’，然后又想把‘赤卫队’甩掉。你们才是这次康平路事件和昆山事件的罪魁祸首，这笔账我们以后再跟你清算！”

接着，他又传达了刚才张春桥打给他的电话。大家一听，觉得徐景贤的来头不小，便安静下来，“炮司”的几个红卫兵还一字一句地记下张春桥的“中央文革特急来电”，马上出去印发传单。

徐景贤接着说：“现在我们这些造反组织，要根据中央文革的指示，出一个联合声明：号召全市群众把矛头对准以陈丕显、曹荻秋为首的上海市委，欢迎‘赤卫队’反戈一击，回到上海的各个岗位上来，抓革命、促生产。我们还要勒令市委的各级领导干部坚守岗位，听从革命造反派的指挥，维护上海的革命秩序，这个声明写好以后，让陈丕显签字马上送到市委印刷厂去，大量印发。……至于昆山那一边，

刚才我已经和‘工总司’王洪文、耿金章同志商量过了，我们立刻赶到那里去，做‘赤卫队’的工作，动员他们回上海。我们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坚决和各兄弟组织的战友们站在一起，并肩战斗！”

徐景贤的建议得到与会者的一致同意。接着，徐景贤又逼问陈丕显：“陈丕显，你同意不同意？”

陈丕显也立即表示同意。

耿金章介绍了昆山的情况，并提出，还有许多赤卫队员滞留昆山，要大家一起去把他们劝回来。

会议一致决定：1、全市红卫兵、革命师生紧急动员起来，到昆山、工厂、码头劝阻北上告状工人回原单位抓革命、促生产、2、造反派组织联名写一封给全市人民的信，指出赤卫队员北上告状是受蒙蔽的、是错误的。

在场的人立即做了分工，中央音乐学院驻沪的红卫兵舒泽池、王立平和上海交通大学“反到底”兵团的杨小兵愿意执笔起草《急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徐景贤和王洪文、耿金章等人赴昆山拦阻上海“赤卫队”……

陈丕显表示自己亲自去昆山解决问题，耿金章也主张陈丕显一起去。但是，“炮司”坚决反对，已经赶往昆山的西军电、哈军工、北航的红卫兵，也在半途打电话回上海说，“坚决制止陈丕显到昆山去”。陈丕显只好给张春桥打电话，要求去昆山，张春桥却同意红卫兵们的意见。陈丕显只得留下，造反派说是让他负责交通和食品供应。

此时，已经晨曦初露，东方微白，东湖招待所的食堂端出几笼白馒头，但徐景贤和王洪文、耿金章等人没有吃上，他们散会后，立即带着其他几个群众组织的负责人，跳上一辆耿金章调来的敞篷卡车，向昆山疾驰而去。可是，开了一通宵的会，大家肚子也已经饿得咕咕叫了，耿金章说他有办法。他告诉司机将车开到天山路附近装食品。原来他将禽蛋公司、食品公司的造反派已经都吸收到“二兵团”的旗下，所以当车开到天山路以后，只听他一声号令，很多人就扛着装有面包、桃酥、米花糖等各种点心的食品箱，一筐一筐地往车上搬。大

家的肚子正唱“空城计”，见到点心纷纷狼吞虎咽起来。

徐景贤对耿金章说：“你真有办法！”

王洪文说：“他不但把造纸厂、食品厂控制起来，还控制了上海民航、飞机场，把民航造反派纳入他 ‘二兵团’的范围，要坐飞机特别方便。”

中国就这样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的疾风暴雨中迎来了 1967 年。

元旦这天，整个中国都没有过节的意思。凌晨 2 时 20 分，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给中央军委发来急电：“昨晚 9 时，有数千名学生冲进军区大院，殴打警卫战士，揪斗军区领导，唐子安副司令员在揪斗中被打成重伤，生命垂危。目前，冲击仍在继续。请军委指示。”

凌晨 3 时，南京军区副司令员张才千急电：“昨晚 11 时，大约万名红卫兵搜抄了 8 名军区领导的住宅，两名部长和一名副政委被抓走，下落不明，请军委指示。”

清晨 6 时多，刘少奇家的大门就被人叫开了。随即有人进来在院墙上贴了许多标语，并且用排笔在院子里的地上浓墨写了“打倒中国的赫鲁晓夫刘少奇！”和“谁反对毛泽东思想决没有好下场！”两行大字。

此时的中南海，也成立了群众造反组织。由于“窃听器事件”，中办机要室主任叶子龙、副主任康一民、吴振英分别受到了党内警告处分，并先后调离了机要室。中办机要局局长李质忠被派到机要室兼任机要室主任。1966 年 5 月 13 日，李质忠在机要室三楼会议室召开机要室全体人员大会，在会上，机要室办公室秘书邹常进作了长篇发言，揭发了叶子龙、康一民、吴振英及李欣等人的“反党罪行”，并介绍了他长期以来和他们斗争的经过。邹常进的发言，震动了整个机要室。随后，李质忠宣布，叶子龙、康一民、吴振英以及李欣、王兆光、李润民、杨俊、韩增福、李翰泉、王少萍等人为“黑帮”或“黑线人物”，号召大家对他们进行揭发批判；由李质忠、赖奎、邹常进等人组成机要室文化革命领导小组，领导机要室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机要室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就这样在《五一六通知》前 3 天正式开始了，

这是中南海内第一个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单位。这天，机要室大楼的墙上，贴满了叶子龙、康一民、吴振英、沈剑心、李欣、王兆光、李润民、仲一、杨俊等“黑帮”的大字报。

继机要室之后，中央办公厅各单位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也相继开展起来，中央办公厅副主任曾三、龚子龙、邓典桃等作为“杨尚昆的亲信”被打成“黑帮”；刚刚提升为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的李质忠也被当作“黑帮”被机要局群众揪了回去；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兼秘书室主任、毛主席的秘书田家英于 5 月 23 日突然自杀。秘书室的主要领导和中层领导也几乎都被打成“黑帮”、“杨尚昆的亲信”，被揪了出来，并统统被扫地出门赶出了中南海，连同参加“四清”工作队的人员，另外从机关抽掉了一批人员，到红庙胡同举办学习班，专门搞文化大革命运动，批斗“黑帮”。

整个中央办公厅随之进行了改组，机要室和秘书室合并组成秘书局，调国务院副秘书长、总理办公室主任童小鹏任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兼秘书局局长，调国务院农办副主任曹幼民任秘书局副局长，原机要室副主任赖奎任秘书局副局长。中央办公厅直属各组因在丙楼办公，俗称“后楼”，也被撤销，留下少数人合并到秘书局成立秘书处，其他人都到红庙胡同学习班参加运动。

《十六条》公布后，中央秘书局党委正在酝酿将原机要室的张良源、张振昆和原“后楼”的邢进立、郝锡良等 8 人赶出中南海，并布置写这些人的大字报。

文电处的一些年轻人得知这个消息后，于一天晚上，来到时任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兼秘书局局长童小鹏的办公室“请愿”，表示不赞成将张良源等 8 个人清除出中南海。童小鹏表示，对他们的意见，局党委进行考虑。

8 月 17 日，秘书局党委在国务院小礼堂召开秘书局全体人员大会。童小鹏在会上说：“一处（即文电处）同志对局党委的批评完全正确，完全接受同志们的批评。”“希望同志们继续采取四大，对各级领导提出批评，不要有什么顾虑。”

但是仅隔了 4 天，8 月 21 日，汪东兴在怀仁堂主持召开了秘书局

全体人员大会，来了一个 180 度的大转弯。汪东兴在会上说：办公厅领导在运动中，“方向明确，基本上打得准，打得稳，打得狠。”会上，根据汪东兴的意见，公开点了张良源等 8 人的名，宣布让他们停职检查。这就是著名的“八二一”会议，中南海内运动风云突变。

11 月 25 日，信访处闵耀良等 6 人首先贴出了题为《彻底肃清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影响》的大字报，提出“八二一”会议“客观上起了压制群众、打击群众的作用”。紧接着，信访处洪雪竹等 9 人针锋相对地贴出了《秘书局八月二十一日的全体会议好得很》的大字报，反驳闵耀良等人的大字报。

11 月 28 日，闵耀良等人贴出了第二张大字报，点名批评了汪东兴在“八二一”会议上的讲话，在秘书局引起了很大的反响。随后，文电处、档案处等都贴出了大字报，有的支持、有的反对闵耀良等人的大字报，争论迅速在秘书局全范围内展开了。从而引起了一场大字报式的争论。

进入 12 月后，“造反派”成了当时最时髦的字眼。很快，中南海内也成立了各种“造反派”组织，两三个人也可拉起一个组织，整个秘书局成立的各种“造反派”组织近 20 个，也是“群雄四起，天下大乱”。这些“造反派”组织由于观点不同，逐步形成了以闵耀良为代表的“中南海红色造反团”和以洪雪竹为代表的“中南海红旗造反团”两大造反派组织。1967 年元旦清晨写在刘少奇院子里的大标语就是这些群众组织所为。

## 第 366 回：北京市，反刘邓再掀高潮　话伤人，记者站炮轰王力

1967 年元旦这天，《人民日报》、《红旗》共同发表社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社论中，根据毛泽东的想法，社论提出：

“1967 年，将是全国全面展开阶级斗争的一年。

“1967 年，将是无产阶级联合其他革命群众，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展开总攻击的一年。

“1967 年，将是更加深入地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清除它的影响的一年。

“1967 年，将是一斗、二批、三改取得决定性胜利的一年。”

当天的《红旗》杂志还发表了姚文元的文章《评反革命两面派周扬》。文中用黑体字引用了毛泽东的一段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它触动到人们根本的政治立场，触动到人们世界观的最深处，触动到每个人走过的道路和将要走的道路，触动到整个中国革命的历史。这是人类从未经历过的最伟大的革命变革，它将锻炼出整整一代坚强的共产主义者。”

元旦这天，北京26所高校数十万人统一行动，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声讨刘少奇、邓小平集会，大会宣读了《告全市人民书》。会后举行了示威游行，进行了一整天，游行的队伍走也走不完，经过了东西长安街、天安门广场、前门、王府井，行进复行进，无数面旗帜在空中摇曳飞扬，那无数穿黄军装、戴红袖章的红卫兵振臂挥动着语录本，宛如一片红色的森林，他们在咆哮着，在怒吼着，“批判刘邓反动路线！”“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的巨大声浪一浪盖过一浪，震撼着古老而又雄伟的北京城。

同日出版的清华大学《井冈山报》，在《炮打中国的赫鲁晓夫——刘少奇》的通栏标题下，刊登《看刘少奇的丑恶嘴脸》的长篇文章，列举刘少奇在中共历史上的 12 大罪状，并发表《把批判刘邓路线的斗争进行到底》的元旦献词，首次将刘少奇的问题公开见报。

元旦这天，刘少奇的女儿刘涛和弟弟刘允真去看望自己的生母王前。王前已经结婚，真是无巧不成书，她现在的丈夫就是聂元梓的哥

哥聂真，时任中央社会主义学院院长，不过，聂真此时也作为“黑帮”打倒了，家也被抄过。

元旦这天，部分“联动”成员以中共中央革干子弟、中共北京市委革干子弟、国务院革干子弟、人大常委会革干子弟、中央军委军干子弟、国防部军干子弟、十六省市委革干子弟联合行动委员会的名义，发布了所谓的中央秘字[003]号《中央、北京政军干部子弟（女）联合行动委员会通告》：

中央、北京政军干部子弟（女）联合行动委员会

中发秘字 003

中国共产党中央，国务院，人大常委，人民解放军各军种，中央军委，国务院各部革命干部子弟联合行动委员会于 1966 年 10 月 1 日于中南海政治局礼堂正式成立。

联合行动委员会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具体领导下工作。

联合行动委员会在中共中央主席和第一副主席直接指示下工作。

联合行动委员会在马列主义原则精神和中共历次党代会的一贯路线指导下工作。

联合行动委员会的任务：

1．坚决，彻底，全面，干净地粉碎中共中央委员会几个主席几个委员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取缔一切专制制度，召开中共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中央委员会，保证民主集中制在党的生活中得到坚决的贯彻，保证中央各级党委、委员的生命安全。

2．坚决地全力以赴地打倒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所产生的各级反动造反组织。

3．坚决肃清中共党内和国家机关的反党分子、蒋介石分子、赫鲁晓夫分子。

4．巩固三面红旗，加强国防，保卫社会主义建设和无产阶级专政。

5．保卫党的各级组织和优秀、忠实、英勇的领导干部。

组织路线：在中央委员会直接领导下，发展过程如下：（1）第一阶段由中共中央，国务院，解放军，省市委干部子弟组成。

（2）第二阶段由基层组织（地委专署与公社）干部子弟组成。

（3）第三阶段吸收全国工农兵和出身他种家庭而政治表现好的。

同盟军：包括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士、中共党员、共青团员、工农积极分子。

联合行动委员会号召各省市革命干部子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忠于马列主义和1960年以前的毛泽东思想，树立共产主义世界观，继承革命传统，在各地迅速组织联合行动委员会，贯彻中央、北京联合行动委员会的一切行动指示。

联合行动委员会号召各地区的成员要无限忠于党。忠于人民，戒骄戒躁，密切联系群众，贯彻党的民主集中制……克服资产阶级思想意识和党内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恶劣影响，为党为人民为共产主义奋斗到底，直到最后一滴血。

同志们，同胞们，应该认识到，我们肩负着党和人民的重大历史使命，肩负着历史赋予我们的共产主义战斗命令，“我们一定要英勇，忠实，干练，坚贞，艰苦耐心地做好各种工作，迎接大反攻战机的到来。”

我们的困难是复杂严重的，我们的处境是白色恐怖的，不斗争，必灭亡。无数的革命前辈和党员兄弟被围攻被拷打，被审讯被迫害，许多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的优秀战士英勇就义牺牲了，数以千计的党的好儿子被监禁监视和失踪，看到这些，我们还有什么不能拿出来啊！人民盼望我们，希望我们粉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他们罢工，停电，绝食，请愿，为我们做出了优秀的榜样，我们庄严地向人类和所有的敌人宣告我们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流鲜血，受迫害有何所惧，我们的事业——马列主义的事业必然胜利。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全党党员团结起来！

全党全民，全军团结起来！

中国共产党万岁！

中国人民万岁！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革命干部子弟、中共北京市委革命干部子

弟、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革命干部子弟、人大常委会革命干部子弟、中国人民解放军帅、将、校革命干部子弟、十六省、市委革命干部部分子弟联合行动委员会

公元 1967 年元月 1 日

元旦早上，当徐景贤、王洪文、耿金章等人的汽车开到昆山城外的一座公路桥边，就没有办法再往前开了。半边公路全部都是首尾衔接的车辆，都是各厂造反队开来的车，把昆山城里的“赤卫队”包围在里面。另外半边公路上只见一车一车的人从昆山城里出来往上海方向开，看得出是各厂造反派把本厂“赤卫队”装回去。当来车与回车交汇的时候，来车的造反派就痛骂回车是“死老保，臭老保”，回车上的人都灰溜溜地不出声。

汽车开不进去，徐景贤他们索性步行进县城。路上一道道封锁线，都是造反派布置的，赤卫队员想要单个或少数人从里面出来是不可能的，只能一车一车给装回上海。最后几道防线都是“工总司二兵团”的，耿金章说，他已经派“二兵团”队伍插进昆山城，把“赤卫队”分割瓦解，有些人被他们强行押上卡车返回上海，用的是抓俘虏的办法。但是他也说，有相当一批赤卫队员被冲散了，现在已经躲进昆山城的各个角落，甚至躲进居民家里。“赤卫队”在昆山已经做了很多宣传工作，说他们在上海时，上海市委不承认他们；到市委去，市委领导不肯接见；他们造市委的反，又遭到造反队毒打；被打出来后要到北京告状，又没有火车，希望昆山居民声援他们。昆山居民很同情他们，对后进来的上海“工总司”造反队很反感，有的造反队员还挨了昆山人的打。

还在赶赴昆山的路上，王洪文就一直心神不定，搭拉着脑袋。一是一夜没有好好睡觉，主要还是感冒了，鼻子嗡嗡地，一支接着一支抽烟。他告诉徐景贤，他已经下令要“工总司”把上海的赤卫队总部和各区的分部统统砸掉了。车子刚开出上海市区，王洪文就对随行的上棉十七厂青工廖祖康说：“小廖，你先回去，给我到厂里领 200 块钱买张飞机票，明天我要到北京去反映上海的情况。”

徐景贤感到很奇怪，觉得“周总理的指示，张春桥的电话，都给你转达了，怎么又要到北京去？”

但王洪文执意进京，徐景贤也劝不动他。

到了昆山，听说华东局和上海市委的领导韩哲一和马天水来了，正在城外的大客车上，想要找“赤卫队”头头谈话。王洪文对徐景贤说：

“这地方你负责一下，我跟他们谈，谈得成就谈，谈不成我就到北京告状去。”说着，急冲冲地下车走了。

徐景贤很不高兴，心想：“我们大家一起商量好来处理‘昆山事件’的，这么严峻的场面摆在面前，你倒走了，这局面叫我怎么处理呢？”

后来据说，张春桥将电话打给昆山，让王洪文立即进京。王洪文遂即带着陈阿大、廖祖康坐飞机去了北京。

陈阿大虽然在“工总司”成立大会上没有坐在主席台上，但他毕竟是“工总司”的发起人之一，在筹备“工总司”成立时被选为 7 名主席团成员之一，自然也就是“工总司”的常委了。但是，在“安亭事件”闹得沸沸扬扬之时，在安亭的现场却没有陈阿大的身影，原来此时他早已回上海良工阀门厂上班去了。

厂里的人看见陈阿大就问他：“良工阀门厂那么多人都在安亭，你怎么回来了干活了？”

陈阿大回答说：“在厂里干活，总比在安亭做反革命要好！”

但是 11 月 13 日，陈阿大听说张春桥要在上海文化广场与“工总司”签订了“五条”，他又带人前去参加，成为负责“工总司”总务的领导。

廖祖康是上海国棉 17 厂技工学校的学生，文革前王洪文担任技校民兵连指导员，廖祖康是其手下的民兵。在 1966 年盛夏，廖祖康和技校的几个学生在黄浦江里游泳，看见前面停泊着一艘轮船，鬼使神差的廖祖康竟爬上了轮船的舷梯。谁知这是一艘外轮，廖祖康当场就被中国边防人员扣留，押回国棉十七厂，幸亏王洪文保了他，不然，他若落了个“偷渡”的罪名，将永世不得翻身。从此，他对王洪文感

激万分，跟定王洪文。王洪文在国棉 17 厂造反，廖祖康带领技校学生紧跟、死保。“安亭事件”后，王洪文将他调到“工总司”，成为王洪文的秘书。

王洪文一行人一到北京，就直奔北京大学找老熟人聂元梓。聂元梓十分热情地招待了他们，让他们住在学校招待所里，随即给张春桥挂了电话。

再说昆山，徐景贤等人元旦这天在昆山活动了一整天后，与当天赶去的华东局书记处书记韩哲一以及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马天水一起，总算说服滞留在昆山的 2000 多名赤卫队员，让所在厂各派出车辆将他们接回沪。又赶往苏州，最后在城外的一所大庙里，将上千名散落在这里的“赤卫队”员们集中起来后，从铁路分局好不容易才调来一列客车，大家蜂拥上车，返回上海。

这天，无锡保守派组织“工联”与上海“赤卫队”互相呼应，也准备数万人赴京告状。而无锡的造反派组织“红总”接到上海“工总司”的电话，请求他们配合上海“工总司”拦阻上海“赤卫队”的北上告状队伍。无锡“红总”派出了交通系统的主力“海燕兵团”等队伍，从锡沪路开始，一直到无锡市区“五爱广场”截住了上海“赤卫队”6 卡车的“上京告状”人员。由铁路北上的上海“赤卫队”经过南京时，也被南京的造反派组织拦截。

元旦晚上，彭德怀从笔记本上撕下一页白纸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仔细叠好，放到眼镜盒里，随后要哨兵替他转交上去。他在信中写道：

主席：

您命我去三线建委，除任第三副主任外，未担任其他任何工作，辜负了您的期望。

12 月 22 日晚在成都被北京航空学院红卫兵抓到该部驻成都分部，23 日转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的红卫兵，于 27 日押解到京。现被关在中央警卫部队与该红卫兵共同看押。

向您最后一次敬礼！祝您万寿无疆！

彭

德怀

1967 年

1 月 1 日

1966 年底，中央文革记者站调几乎全部外驻记者回北京学习集训，听周恩来安排记者站下年度工作。

周恩来在接见讲话中，对记者们的工作做了充分肯定，给予了鼓励。他说记者在下边日夜奔波采访，很辛苦，发回的大量报道，对中央了解、解决各地问题很有帮助。他还对记者如何进一步做好工作，做了具体的指示。

周恩来讲完后，王力讲话。他批评记者报道还不深入、不得力，跟不上文革形势等等。在讲到原因时，他说这主要是因为军队的记者工资高、待遇好，养成了当官做老爷的作风，不善于学习，不钻研问题，作风飘浮，报道跟不上中央等等。

会一开完，记者站就炸了窝。大家纷纷议论，说王力的讲话不符合事实，批评不是出于善意，把整个军队都给歪批了。于是，由新华社驻北京、兰州、内蒙古军区的 3 名年轻记者牵头，其他人呼应，给王力提出了几个质疑：

一问军队的工资高、待遇好吗？当时在站工作的记者工资并不高，抗美援朝回国的不高于 19 级，很多 50 年代入伍的是 20 级和 21 级，60 年代以后入伍的绝大多数是 22 级、23 级，并且经过 1965 年取消军衔，都减了薪。

二问军人是长期当官做老爷吗？军队长期艰苦奋斗、吃苦耐劳，实行官兵平等，发扬军事民主等形成了一套优良传统作风，这是中央和全党全国都肯定的。

三问王力讲话为什么同总理讲话截然不同？

一连提了好几个问题，让站领导电话传给了中央文革小组办公室，并强烈要求王力到记者站回答问题。还有人要给王力贴大字报，被站领导说服，最终没贴。这事闹了好几天，中央文革小组办公室另一名负责人来记者站做解释工作，再三说服大家不要搞乱工作秩序等等，这才平息下来。就在此刻，中央文革小组办公室又改成中央文革

办事组。原来，毛泽东的女儿李纳在钓鱼台 16 楼贴了一张小字报，批评中央文革办公室的工作“杂乱无章”，“不得要领”，无法适应文化大革命的需要。江青等文革小组领导也觉得办公室的工作不得力。他们认为原因是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兼任办公室的领导，无法集中精力管好办公室，于是决定：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一律不再兼任办公室的领导工作。随后指派《解放军报》社调来的记者部主任宋琼改组中央文革办公室，他提出了改组办公室的工作方案：首先，将中央文革办公室改名为中央文革办事组；其次，加强办事组的集体领导，组成了以宋琼为组长，陈满池为副组长的办事组，这个组的成员共 5 名，除正副组长外，还有杨子才、张文荣和王广宇。这个方案得到中央文革小组的批准。

办事组集体直接为中央文革小组服务，管理整个办事组的日常工作，提高工作效率，过去重要情况随时一事一报，小组领导嫌麻烦、琐碎。办事组成立后创办了《要事汇报》，把每天重要的情况及时打印出来分送给毛泽东、林彪、周恩来及小组成员和个别列席小组会的人。《要事汇报》不定期，有时一天一期或几期，有紧急、重要情况随时上报。中央文革办事组组长宋琼列席中央文革小组会。每次会前，宋琼要把每日要事，需要提交小组讨论的文件先向陈伯达、江青口头汇报，由陈伯达、江青决定小组会的内容和参加人。这套会前汇报形成了制度。

王力的主任头衔随着办公室的撤销也就被撤掉了。记者站的军人们也因此觉得出了口气，就不再要求揪他了。

元旦的晚上，中央文革小组召集记者站全体人员开会，说是给大家祝贺新年，实际是布置新一年的工作。陈伯达、康生、江青、王力、姚文元等人到会并讲了话。江青先说了一段“同志们很辛苦，遇到了不少的困难，及时向毛主席、中常委和我们小组反映了许多有价值的情况”的话，然后话锋一转，“但是，是否全面，是否有重点呢?不是的……西藏和新疆现在就还是空白点，没有人去，这使我很吃惊。齐齐哈尔的人撤回来了，我也不知道。你们的工作要全面，要有重点，西南就是重点。那里有直升飞机，可是连机场在哪儿我们也不知道，这是人

家准备与中央对抗的呀!”她接着说:“同志们,那边来的红卫兵小将说,渡口只挂刘少奇的像,不挂毛主席的像；只喊刘少奇万岁,不喊毛主席万岁。情况很复杂呀!”

接着，1 月 1 日夜至 1 月 2 日凌晨，中央文革小组与北航“红旗”座谈“红海洋”的问题。上海“赤卫队”北上告状，造成京沪铁路的中断，影响极大。陈伯达在座谈时特别指出：“现在有的厂矿，码头完不成任务，好多工人不干了，影响了外汇。你们要去宣传，要抓革命促生产。”

江青指出：“搞红色海洋，用红漆把墙上漆满了，漆也没有了，贴大字报地方也没有了。我们怀疑里面有阴谋，使革命群众没有贴大字报的地方，要赶快制止。红卫兵起来宣传，留一些就可以了。”

康生说：“红卫兵普遍存在着组织涣散问题，要搞军训。”

对军训问题，有同学问：“有人不参加怎么办？”

江青说：“搞军训不参加，这样人还能参加红卫兵？又说解放军来了，要服从解放军。同学们希望首长讲话以后多谈怎样学好毛泽东著作。现在有的同学学毛著时间少，看首长讲话多。”

同学反映说：“同学们急着下乡下厂。”

江青说：“你们对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还很不理解。下乡下厂，要有组织有计划。北京和全国路线斗争还没结束。但有的同学就说没事干。你们的领导问题本来就没有很好解决，这次应当很快解决，我看应由部队领导。”

有人提到在赵如璋笔记本上看到的聂荣臻关于怀疑北航“红旗”里面“有坏人”,“有后台”的那几句话，陈伯达、江青等人说：聂荣臻有缺点,可以烧烧。结果会后,北京街头立刻出现了“炮轰聂荣臻”的大字报。

## 第 367 回：陶铸见，南京大学诸代表　周恩来，急召铁路造反派

1月1日晚22时25分至2日子夜1时许，陶铸、谭震林在中南海小礼堂接见南京大学赴京代表和被他们挟持的省委领导彭冲、许家屯。会议正式开始后，南京大学文凤来带领大家一起学习《毛主席语录》，接着他又代表大家讲了话，问首长新年好。陶铸站起来亲切地说："同学们新年好！在中南海给你们拜年啦！"

南京大学学生葛忠龙代表全校造反派控诉了他们对彭冲和江苏省委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意见。这时，到会代表高喊：

"彭冲站起来！"

"彭冲把头低下来！"

彭冲马上站起来，并低下了头。

接着，葛忠龙又宣读了学生们的五项要求后，请求首长指示。

陶铸说："请谭震林同志先谈谈，他是老华东，情况比我熟悉。先解决这个五项要求好不好？五项要求你们同彭冲交换过意见没有？"

葛忠龙答："基本上是知道的。"

陶铸对谭震林说："你讲讲，你讲讲。"

谭震林："我不了解情况，没有研究。"

两人推托了一番，陶铸问学生："你们都是南大的吧？上次是来的一部分，我这是第三次跟革命造反派的同志见面了。也有一次接见保守派，不是单独见的。"

陶铸在这里说的"第三次"是指第三次接见江苏省造反派学生。尽管此时陶铸依然试图调和造反派与省委和保守派之间的矛盾，但是言谈话语之间，肯定造反派、批评保守派、要求江苏省委转变立场的基调非常明显。

陶铸还原则上支持了造反派提出的"五项要求"：

第一条、强烈要求罢彭冲的官，撤彭冲的职，彻底改组省文革小组，省文革小组成员必须有革命造反派参加。

第二条、江渭清、彭冲等人必须深刻检查交代对南大工作队中革命造反派梁辑卿、杜方平、吴大胜等同志以及省机关造反派的政治迫

害。

第三条、省委责成公安厅立即解散一贯违法乱纪的破坏文化大革命的南京直属纠察队，警备纠察队，红一团、红二团等黑组织，对其中的首恶者及其后台，必须逮捕法办。

第四条、坚持文斗，不用武斗。对于用罢工、破坏国家财产，挑动武斗等手段来破坏文化大革命的事件，省委必须立即出面制止，并且要严肃处理，对其中主谋者及后台要严加惩办。

第五条、江苏省委必须不折不扣地执行陶铸同志在场、江苏省革命造反派和省委书记达成的八项协议。

接见时，也有教育部的代表，陶铸说："我知道贴我大字报从你们教育部开始，北京我的大字报还不多，可以贴么！我欢迎贴我的大字报。戚本禹同志说我的大字报是可以贴的，这个话我早在卫生系统讲过。我的问题就只有那么多，我看最多贴一星期就过去了。有人说不打倒陶铸就不算左派，现在要打倒我太过分了。批判我、贴我的大字报可以，说我是反革命过头了吧！革命的贴大字报也倒不了，不革命的不贴大字报也要倒。现在外面谣言很多，说我不是中央文革顾问了，我还是中央文革顾问嘛！你们不要听社会上的流言蜚语。"

当有人问："现在有人说社会上出现炮打司令部的黑风，是陶铸讲了除了毛主席和林彪以外，其他都可以怀疑。"

陶铸说："是戚本禹先讲的，他说不错，我说就错了吗？"

1966 年过去了，这一年全年工农业总产值为 2534 亿元，比上年增长 17.3%。其中，农业总产值 641 亿元，超额完成计划 6.8%，比上年增长了 8.6%。工业总产值 1686 亿元，超额完成计划 11.5%，比上年增长 20.9%。基本建设投资总额 209.42 亿元，比上年增长 16.6%。国家财政收入 558.7 亿元，比上年增长 24.4%；支出 541.6 亿元，收大于支 17.1 亿元。生产的发展速度是十分迅速的。

但是，由于铁路接二连三的出现停驶中断的情况，1月2日，周恩来亲自召集铁路部门20余个单位，100余名代表参加的大型座谈会。会议一开始，周恩来首先说：

"请你们来商量一个比较着急的问题。""你们直接掌握运输工

具，其他工厂、路局机务段、车务段等，断一下行不行？很不利。”“我和吕正操商量把你们请来，……这不只是铁路系统的问题，而且是全国性的问题。铁路绝不能瘫痪，一刻也不能中断。最近上海、蚌埠发生了停车事故，这是严重的问题。这是考验我们的时候，面临这个任务怎么解决？它不仅直接影响生产，也直接影响了文化大革命和第三个五年计划，国际影响也不好。上海来电话说货船两天不能卸货，停在黄浦江上。”

周恩来批评了上海“赤卫队”，称其为保守派。他讲了京沪线中断的原因：“保守派中有坏分子，把正常的车停下来，上边调度室主任非法开出了两列车，现已有一辆抵京，把其他车停下来。因此我们采取措施，让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带着到北京亲自指挥，把调度室主任逮捕了，非法开车是不允许的。”

“蚌埠本来分两派，影响了市的工人运动。造反派支持市工人造反派，保守派反对，打伤3人。本来市委能解决，但市长不出面，被打的工人当然义愤填膺，造反派就把车停了。这一下子南北就停了，旅客们给我打电话提抗议。31日市委才出面解决。停车后再解决就难解决了。领导有两怕：一怕见群众；二怕群众包围起来什么都叫签字。两派都签字，这没有立场。造反派停车是公民行动，让市长签字这不能同意，责任由市委负，行为不能同意。我提出两点：一、支持工人造反的革命行动，因此受伤的表示关心慰问。市委不理，群众义愤，责任完全在市委。在我国不需要罢工。停车不只是对市委，是对国家，对毛主席。”

“火车停了不是哪个市委的问题，而是全国的问题。蚌埠和上海局不同，造反派义愤，但不是革命行动。中央向他们呼吁复工开车。现在已经开车了，造反派是讲理的，我相信这一点。”

周恩来接着说：“动员大家，动员铁路职工，同时不赞成同学和工人卧轨，抢车。希望你们把铁路联络委员会搞起来，写个呼吁书，把群众动员起来，比我们有力。真正实现抓革命、促生产，就能更好的为文化大革命服务，为第三个五年计划服务。”

他对铁路系统“革命造反联络站”和全国铁路职工“革命造反团

总部”的代表说：“你们两个造反组织应联合起来，也要请其他组织参加。”“你们不是说要‘胸怀祖国，放眼世界’？我对你们不要求那么高，只要求你们胸怀母校，放眼全国。”

1 月 2 日，“全红总”与劳动部副部长郗占元、李正亭和全国总工会的书记王志杰，在江青 12 月 26 日的“三点指示”基础上作了些修改，共同签署成了一个《联合通告》：

联合通告

经全国红色劳动者造反总团提议，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部、中华全国总工会协商，联合做出以下紧急决定：

一、为了保证“合同工”、“临时工”、“外包工”等参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参加生产的权利，一律不得解雇。

二、1966 年 6 月 1 日以后被解雇的“合同工”、“临时工”、“外包工”等，必须立即召回本单位，参加运动，参加生产，补发被解雇期间的工资。

三、凡遭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迫害的“合同工”、“临时工”、“外包工”” 等，必须当众恢复名誉，赔偿损失，妥善安排，认真处理。

以上决定，通报全国。

全国红色劳动者造反总团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部副部长郗占元签字

中华全国总工会　书记王志杰签字

一九六七年元月二日

《三家联合通告》签发后，立即送《工人日报》印刷厂套红大字铅印，同时由中央文革联络员邵一海向中央文革报告，由郗占元向国务院报告。

在上海，1 月 2 日，“工总司”联合本地和外地 20 多个群众组织在武康路 2 号召开联席会议，成立了“打倒上海市委大会筹备委员会”。召开全市“打倒上海市委大会”的意见就是“机联站”1966 年 12 月 28 日根据文静转达的张春桥的电话精神讨论决定的。

当天，姚文元又从北京打电话到“机联站”。徐景贤还在昆山处

理昆山事件没回来，“机联站”朱维铮接的电话。姚文元再一次告诫造反派们，一定要抓住批判市委资反路线的大旗，不要就事论事地批判“赤卫队”，要把“赤卫队”问题挂到上海市委推行的资反路线上。据朱永嘉后来回忆，他们本来虽已决定召开大会，但对这个大会还是没怎么太重视，因为那时这种批判大会很多，喊“打倒”也就是显示造反性和革命性强而已。在张春桥和姚文元一再提醒和引导下，上海造反派们终于意识到这个大会的重要性，决心将这个大会开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打倒上海市委大会。

晚上，“机联站”的郭仁杰立即在武康路 2 号的联席会议上传达了姚文元电话，讨论如何从康平路事件和昆山事件批判市委资反路线。参加会议的有：“工总司”戴立清、“红革会”马立新、“首都三司驻沪联络站”姜涛、北京大学李醒尘，以及中央文革小组驻沪联络员甄文君等 40 多人。戴立清说他们工人笔头不行，不会写发言稿，郭仁杰于是让王知常去帮他们起草。这次大会的全部发言稿，都由写作班历史组的朱永嘉、吴瑞武负责撰写；大会准备颁发的一、二、三号《通令》，则是由哲学组郭仁杰和上海作家协会的几个人负责撰写；大会的组织工作，由市委党校的程绮华抓总。郭仁杰又打电话给正在昆山的徐景贤和王承龙，要他们马上回上海，商议大会日期和议程。

徐景贤将散落苏州的上海“赤卫队”收拢起来乘火车回到上海的时候，已经是 1 月 3 日的清晨了，他第一件事就是急急忙忙找来《红旗》杂志和《人民日报》的元旦社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仔细读了几遍，领会中央的精神。接着，他又到市委“机联站”了解“打倒上海市委大会”的准备情况。他对“机联站”的战友说，这次大会“只能由我们先做幕后工作；到开会的时候，大会的主持人、发言人，宣读通令和给毛主席致敬电的人员，要由各造反派的负责人来担任，因为只有他们能够拉出工人和学生的队伍来。这次大会要正式宣布打倒以陈丕显、曹荻秋为首的上海市委，必须有一个大联合的声势，如果光靠我们这些机关造反派，那是孤掌难鸣的。”他们又在市委党校召开了几次各群众组织的协商会，经过激烈的争吵和辩论，最后确定大会在 1 月 6 日召开。

面对如此动荡不定、岌岌可危的上海的局势，陈丕显感到力不从心，难挽狂澜。他和曹荻秋商量后，决定向中央汇报，向中央求援。1 月 3 日，陈丕显挂通陶铸的电话，向他汇报了上海的情况，倾诉内心的苦衷，请求中央的支持和帮助。陶铸听完之后急切地问道：

“你们能坚持一个星期吗?最好能坚持两个星期!”他在电话中又加重语气说：“总之一句话，坚持就是胜利!”

放下电话，陈丕显将通话情况向曹荻秋说了，他们一起分析陶铸电话的含义和精神，似乎觉得：党中央可能会有新的决策、新的精神。因为原先中央就曾说过，“文化大革命”搞三个月，以后又说最多搞半年。按以往搞运动的经验，他们觉得中央可能要结束“文化大革命”了。其实，这只是他们的希望。更大的风暴还在等着他们。

1 月 3 日下午，正当徐景贤为大会的筹备工作忙得不可开交的时候，忽然接到姚文元北京打来的电话，问他：“武康路二号写作班的地方，现在干什么用？”

徐景贤回答：“现在成了‘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的内部办公地点，我们对外联络，都在淮海中路市委党校。”

因来来往往的人太多，此时，徐景贤他们已把“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的牌子挂到淮海中路最热闹的地段 622 弄 7 号，原中共上海市委党校，将这里作为“机联站”总部所在地。

姚文元接着问：“春桥和我想要用武康路二号这个地方，你看行不行？”

徐景贤连忙回答：“行的，可以的！”

徐景贤向姚文元汇报了一下“打倒上海市委大会”的筹备情况，姚文元没有表态，只是说：“这件事我需要和春桥商量一下。”便把电话挂了。

## 第 368 回：再揭发，刘涛行大义灭亲　见北大，军队要批叶与陈

1 月 3 日这天，刘涛和弟弟刘允真把他们和生母之间的谈话整理成大字报，题目是：《看刘少奇的丑恶灵魂》，一式三份分别张贴在清华大学和中南海职工食堂门口等地方。

大字报批判了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说它不宣传毛泽东思想，不去树立毛主席的绝对威信，而是要大家按孔孟知道去修身养性。

大字报从历史上批判了刘少奇的右倾言行。特别是揭发刘少奇在白区工作时，将党的经费“打成一个金皮带圈和一个金鞋拔子”予以贪污。这在当时对任何人都是致命的打击。

大字报还说刘少奇在和王前谈恋爱时竟隐瞒年龄 11 岁。

这张大字报对刘少奇的打击可想而知，痛苦不堪的刘少奇气愤的说：“要是说我在政治上犯了错误，我可以反省，可以自我批判。但是，从生活作风方面这样诽谤、中伤我，这是不可能容忍的。多年来，人们对我生活作风的印象是非常好的。我虽然结过五次婚，但每次都是正大光明地正式结婚的。迄今为止，我没有淫乱的男女关系。另外，我也根本没有对王前隐瞒年龄。把党费留下来买金带子是根据党的规定做的。当时，党有一个规定，党在白区工作的重要领导人，必须在身边保留某种值钱的东西，以便在突发事件出现后，贿赂敌人。金带子已被王前拿去了。金鞋拔子则是毫无根据的捏造。至于吃小亏占大便宜的说法，那是随便地把片言只语拼凑起来的东西，牵强附会，根本不符合原意！”

刘涛的这份大字报后来辗转传抄，加上各种红卫兵小报大量翻印，很快流传全国。

1 月 3 日，《人民日报》转载《红旗》杂志一九六七年第一期刊登的姚文元文章：《评反革命两面派周扬》。文章系统总结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思想战线上的几次大的斗争，即：1951 年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1954 年对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和胡适思想的批判；1954 年到 1955 年反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1957 年的反右斗争。

文章特别提到 1954 年 10 月 16 日，毛泽东在给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其他一些人的一封信中的一段话："事情是两个'小人物"'做起来的，而'大人物'往往不注意，并往往加以阻拦，他们同资产阶级作家在唯心论方面讲统一战线，甘心作资产阶级的俘虏，这同影片《清宫秘史》和《武训传》放映时候的情形几乎是相同的。被人称为爱国主义影片而实际是卖国主义影片的《清宫秘史》，在全国放映之后，至今没有被批判。《武训传》虽然批判了，却至今没有引出教训，又出现了容忍俞平伯唯心论和阻拦'小人物'的很有生气的批判文章的奇怪事情，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文章在后面的注释中特别说明："《清宫秘史》是一部彻头彻尾的卖国主义的影片。""可是这部卖国主义电影出来后，由于党内一小撮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鼓吹，不但没有被批判，反而被捧成是'爱国主义'影片。""鼓吹《清宫秘史》的'大人物'当中，就包括有在当前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他们反毛泽东思想的反动资产阶级世界观，他们保护剥削阶级、仇恨革命的群众运动的本质，早在建国初期吹捧《清宫秘史》时就表现出来了。"

姚文元文章中所说的那个"鼓吹《清宫秘史》的'大人物'"是谁呀？人们纷纷猜测……

当天傍晚，中南海造反队的 20 多人闯进了刘少奇的住所，将刘少奇、王光美揪到走廊门口批斗了 40 多分钟，强令刘少奇背诵《毛主席语录》，并勒令他每天去怀仁堂前看大字报。

1 月 3 日这天，中央文革小组陈伯达、江青、康生、王力、穆欣和杨成武等人接见北京大学代表。参加接见的北大代表是聂元梓、夏剑豸等 5 人。

会见开始前，陈伯达和江青还没有来，康生拿着一迭信对聂元梓等人说："北大技术物理系有人写信给我，讲到乔兼武，李洪山，杨炳章等，意思是替他们伸冤，说有大字报批判他们，他们感到有压力，抬不起头来，你们知道吗？"

原来，北大技术物理系 132 班崔子明、席关培、张拯于 1966 年 12 月 12 日致信康生。从 12 月 24 日开始，北京大学批斗"井冈山"、

“红联军”的重要成员，出现了坐“喷气式飞机”、拧胳膊、揪头发，拳打脚踢等现象。于是，他们 3 人又于 26 日再次致信康生，对随便把学生打成反革命分子表示不同意见。元旦那天，康生致信中央文革：伯达、江青及文革小组诸同志阅：

这是北大技术物理系三个学生来信，他们用“质疑”的手法，来保李洪山、乔兼武、杨勋、杨炳章等反革命分子的。

康生 1/1 .67

同时，康生还对这两封信的内容作了具体的批语：

当崔子明等人写到12月12日给康生公开信错误之一是“在于当时我们对形势作了错误的估计”时，康生批语：不对，是反动阶级立场问题。

崔子明等人认为：“李洪山等一小撮反革命分子跳出来反对中央文革乃蚍蜉撼大树，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他们翻不了天”。康生批语：“一小撮反革命分子和反革命的小走狗，是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他们翻不了天”，但是你们给我的信完全不是这种观点，而是同反革命分子李洪山、乔兼武、杨炳章反革命言论相呼应，为这些反革命分子叫屈。

当崔子明等人谈到错误之二在于：“对于全国陆续发生的群众斗群众，群众斗学生的问题，我们没有看到问题的本质和主流”时，康生批语：不对，李洪山等人不是群众，是革命群众向反革命分子进行斗争。北大同学批判你们这封反动的信，是正确的，作得对，作得好。

当崔子明等人谈到：“当前桥和船的问题在有些时候也会成为主要矛盾。尤其在目前运动正向纵深发展时，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万万不可小视。我们不仅仅要敢于革命，而且要善于革命”时，康生批语：你们不仅仅是反对革命，而且是破坏革命。

当崔子明讲到，“他们由于刚刚串连回来没有什么事可做（当然我们主观能动性也发挥得不够）”时，康生批语：你们反革命的能动性发挥得很够。在李洪山等反革命分子被镇压后，你们还要垂死挣扎，还写这样的反动信来进行反扑。

崔子明等人说：“他们在信中发了些牢骚，这是极不严肃的。”

康生批语：可耻的狡辩。

崔子明等人认为，公开信在“客观上使亲者痛、仇者快，影响很不好”时，康生批语：这正如来信所讲的：一小撮反革命分子跳出来反对中央文革，乃蚍蜉撼大树，没有什么了不起。

崔子明等人对同学们的批判感到“我们目前所受压力很大，几乎抬不起头来”时，康生批语：好得很，这对你们是很好的教育，不是“几乎”，而是要将一切反动言论使它永抬不起头来。

崔子明等人说：“我系文革的一位副主任则说：现在我认（为）你们是人民内部矛盾，继续下去就是敌……（康生在省略号之处加了“我矛盾”三字）谈到这儿，他把敌字咽了下去，改口道，继续下去就是对抗性矛盾。……”时，康生同志批语：讲得对，不应该咽下去！应该如实的讲。

崔子明等人说：“有一些人叫我们‘反革命’，‘跳梁小丑’，或许大多数同学在开玩笑”时，康生批语：他们不是开玩笑，而是严肃的阶级斗争。

崔子明等人要求同学们对他们的态度能否缓和一下！康生批语：对错误为什么要缓和呢？

当写到一位哲学系五年级的同学批判他们时，“我们还是陪着笑脸听了他的意见，心情您老是可以想见的。”康生批语：我了解你们的心情，但是同你们所说的是相反的。

崔子明等人说：“我们的信件（经同学建议成了公开信）的观点在认识上有错误，起了很不好的作用，我们感到很痛心。”康生批语：欢迎自我批评，但是要诚恳的、坦白的、革命的，不是玩两面手段的。你们的信原来就是准备公开张贴的。给我的信写明是十二月十二日，公开信贴出也是十二日。

崔子明等人在信中问：“我们的信件究竟是不是反革命信件？是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大毒草？”康生批语：是大毒草。

崔子明等人在信中写道：“我们有了想不通的问题可以不可以反映给你们？对中央文革的同志们有意见可否提出？（当然意见不一定正确）认识上有错误就一定是立场问题吗？” 康生批语：对中央文

革小组有意见，完全可以提出，也完全可以批评。我们对于任何批评，不管是对的或是不对的，都愿倾听。但是你们的来信，一不是反映情况，二不是提出意见，进行同志式的批评，而是伪装成提意见进行商讨的样子来，（1）反对对彭、罗、陆、杨进行斗争，（2）歪曲两条路线的斗争，（3）抗议对李洪山等反革命分子的镇压，（4）反对中央文革小组和陈伯达、江青同志，（5）打击革命左派，包庇反革命分子，（6）反对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维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7）反对无产阶级对反革命分子实行专政。在我们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里，绝对不允许反革命分子有言论自由。

崔子明等人写到："我们提出的问题看来还有一定的代表性，您的指示对于我们和持有我们同样意见的人都有好处。"康生批语：大概能代表李洪山、易振亚、万会秦、赖锐锐、伊林、乔兼武、杨炳章及《虎山行》等一小撮人。

崔子明等人对康生说："上次给您的公开信就是很不认真地写出来的。"康生同志批语：不，很认真地写的。不要用谎言去掩盖错误。

最后崔子明等人要求康生说："我们急切地等待着您的答复。"康生批语：对此信的批语，就是对你们两次来信扼要的回答。

康生 3/1 67

聂元梓等人听到康生问及此事，就向他汇报了北京大学"反黑风"的情况和他们的看法。康生听后表示同意说："对，不是几乎，就是要使反动言论永远抬不起头来！他们感到有压力，压得好。"

这时，陈伯达和江青走了进来，接见正式开始。陈伯达说："今天听听大家意见，你们说说北大情况，……"

聂元梓开始汇报情况，说到王力接见"三司"时讲到北大"井冈山"的问题时，王力说："有人传说，聂元梓搞刘邓路线，你们北大'井冈山'应与她合作，这个传说不对。聂元梓是坚定的革命左派，是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作者。我是讲要革命的同志和她合作。我讲话时，周围就有'三司'的同志，他们不承认北大'井冈山'是'三司'的，'三司'主要领导人都不知道，听说只是一个组织部胡里胡涂就搞过去了。"

这时，有人问，12 月 20 日江青是否接见过北大“井冈山”负责人魏秀芬时，江青说：“最近造谣很多，我无须辟谣。”

说到江青接见杨勋时，江青说：“那时很乱，有很多人在国务院找中央文革，不知怎的，就把杨勋也找来了。上次我讲同一个反革命小丑说话，我都不想说她的名字，这个人就是杨勋。”

谈到军训问题时，陈伯达说：“你们 5、6 日就可开始。”

杨成武：“要突出政治，学毛主席的文章。北大、清华、北航、地质、男二中、男二十五中 6 个单位搞试点。”

江青：“军训两周，以后家里经常保持两千多主力，其余下厂，下乡，军训期间可以搞大斗争，大批判，大改。军训后，可以搞小斗，小批，小改，北大可以初步搞点斗批改，等到春暖花开，人家又来了，你们北大自然是重点。毛主席支持过你们，你们自己考虑一下，能不能自己搞？我们不当工作组，最好你们自己搞出点经验来，那怕教训也好。”

说到军训有人不愿意回来，特别是与聂元梓等人观点对立的人，例如孔繁、杨克明等人不回来时，江青说：“军训必须都回来，否则由他们自己负责。他们‘虎山行’也回来，编队时可以拆开，不要让他们在一起。”

有人问能否以战斗队、战斗团为单位参加军训时，江青说：“你们内部左派都应拆开，不能搞自由结合。王任重就主张自由结合，这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发展到宗派主义。”

陈伯达：“这是资产阶级的东西，是王任重的观点，要破这个东西。”

江青：“你们军训可以过抗大式半军事的生活。”接着江青讲她自己在延安时的生活，然后说：“军队可以派人和你们一起搞，军队的连、排长可以给你们当营，连长。”

对不同观点的人，陈伯达说：“对他们如果放弃旧的观点，你们不要再抱成见，要欢迎他们。”

谈到王任重、孔繁、张恩慈、杨克明的问题时，江青说：“中央文革没有派，王任重到北大联系，王任重是作为北京市委的顾问，那

些联络员，也是他自己派的，他实际上是包打天下。清华也是这样，他想拖我们犯错误，关于北大停止斗黑帮，搞选举，王任重没告诉我们。”

陈伯达：“按我的意思，暂时停斗黑帮，搞选举，选完再斗也不坏，但王任重这个人真是两面派，你（聂元梓）选，他说你争位置。王任重说你（聂元梓）容不下人，我们是为了保护你，让王任重对你说应气量大一些，可是王任重对你只说好话，背地却对孔繁，杨克明说你的坏话。”

江青：“你们八一五开的斗陆平大会，当时我们不知道，第二天我们知道后，我们说这个大会开得好，而那天王任重打死红卫兵的小流氓的会是坏的。可是王任重却硬说八一五大会开得不好，王任重完全颠倒黑白。我们能作证，当时我们说你们那个会开得好。”

谈到校文革时，江青：“你们学校刘邓路线具体表现在孔繁、杨克明手上，王任重耍两面派，可厉害了。王任重不是一般执行反动路线的错误，而是耍手法，耍两面派。”

江青：“张恩慈这个人不正派。”

王力：“张恩慈自己讲支持孔繁、杨克明。”

说到路远、周闯的大字报时，聂元梓说：“我当时刚从医院里出来就迎接了‘搬开聂元梓，北大才能乱’的大字报。”

江青说：“不是迎接是遭遇。”

王力：“那时你们不应承认这些大字报是革命的大字报。你们北大从 6 月 1 日，可以说从 5 月底以来到现在，已经有 5、6 个月的时间了，可以总结一下，其中还有一些坏蛋搞乱，你们还可以适当搞些斗，批，改，总结出来，那怕是一点教训也好，回去自己研究一下，然后就起来搞。”

聂元梓和校文革成员回校后赶紧布置批判崔子明、张拯、席关培 3 人。好在他们的出身都很好，平时同学关系也不错，虽然班上个别极左的人想揪住他们不放，但大多数同学还是同情他们的，只是象征性地写了几张大字报，开了几次小范围批判会。没有再为难他们。

此时，北京大学因反工作组而出名的生物系三年级学生樊立勤串

联回来，一些人来找他，说起学校反“十二月黑风”，批斗“井冈山”、“红联军”学生头头，提出“谁反对聂元梓谁就是反革命”的口号，认为这跟文革前的思路、手法完全一样，只是人变了，聂元梓也成新的标准了，碰不得反不得了。

当时北大实行开串联会，樊立勤决定召开串联辩论会。他和生物系四年级的学生冯德荣两人，到各楼宿舍四处散发串连会的广告。

尽管周恩来和中央文革再三劝阻，1月3日，全国49所军队大专院校和文艺团体的造反派还是在北京召开了10万人大会，炮轰叶剑英、陈毅等人，并成立“军队院校部队文艺工作者红色造反者揭发控诉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筹备处”，计划在5日召开“批判叶、陈大会”。叶剑英知道后，急召刘志坚。

同日，北航“红旗”炮轰聂荣臻，北京街头大量出现炮轰几位老帅的标语和传单。

刘志坚刚到叶剑英那里，周恩来就来了电话，要刘志坚火速赶往钓鱼台。到了钓鱼台，周恩来也是询问关于“军队院校部队文艺工作者红色造反者揭发控诉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筹备处”的事情。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他们已经收到这个大会的筹备处给他们发出的请帖。请帖分两种，有两种颜色、两种写法，发给陈毅、叶剑英的是“到会接受再教育”，颜色是白的。给其他人写的是“到会指导”，颜色是红的。叶剑英收到请帖后，向周恩来作了汇报。周恩来当即问：“是谁同意他们开这个大会的？为什么不报告？”

当天晚上，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杨成武、肖华、袁子钦、刘志坚、谢镗忠、李曼村、辛国治、王力、叶群、唐平铸、胡痴、宋琼等人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这个大会的筹备处的 100 多名代表。大会筹备处代表们向中央首长汇报了大会筹备情况。汇报还没有结束，周恩来因有其他会议，提前结束了会议，决定 4 日晚继续接见。

## 第 369 回：南京市，一月三发生武斗　上海滩，群众接管《文汇报》

1 月 3 日这天，南京又爆发了“一三事件”，这是南京市自文革以来的第一次群众之间的大规模武斗。

事情的起因还是南京“赤卫队”北上告状的延续。1966 年 12 月 31 日晚上，经过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王楚滨等人的反复劝说，滞留滁县的南京“赤卫队”总部负责人终于答应返回南京。

12月31日，省委在五台山召开大规模的“平反大会”，江渭清再次代表省委在大会上作检查，并根据19日“十项协议”精神，公开宣布为在此前受到打击迫害的造反派群众平反。

第二天，也就是元旦下午，负责拉回滞留滁县的南京“赤卫队”任务的南京军区后勤部的一个运输营 45 辆汽车，分批从轮渡渡过长江，在浦口会合后驶往滁县，于当晚全部到达。2 日上午，滞留滁县已达一个星期的数千南京“赤卫队”成员，分乘汽车返回南京。当晚，“赤卫队”将王楚滨等从滁县带回浦口，住在浦口礼堂。第二天，陆续过江回到城区，并将王楚滨等人带至“赤卫队”总部，一部分“赤卫队”成员分散回厂、回家。但仍有 2000 多人不肯分散，住进了太平路上的江苏饭店。还有一些人住进了中山东路 307 号省委招待所。另外还有数千人暂时在江北浦口火车站等处等着过江。

江苏饭店是江苏省人委的招待所，大批“赤卫队”住进江苏饭店，立即引起马路对面“红总”朝阳区总部人员的高度警觉，一些“红总”人员过去侦察，甚至前去张贴斥责、辱骂“赤卫队”的标语、大字报，于是双方发生摩擦，前去张贴标语、大字报的“红总”人员被“赤卫队”扣押。

南京“八二七”闻讯后立即行动起来。经南京大学“八二七革命串联会”的曾邦元与“首都三司”、“全国革命串联会”和“上海工总司”等一些造反派组织驻南京联络站的头头商量后，于当天晚上 19 时，打电话给省委文革小组和省公安厅，要他们派人到南京大学参加会议。会上，曾邦元煞有介事的说：“据可靠情报，全国工人‘赤卫队’的头头正在江苏饭店开会，要抄‘红总’的司令部。浦口、下关正有‘赤卫队’集结，无锡的‘赤卫队’也准备到南京支援……”

等等。并且说：造反派将力争避免冲突，已通知下面不要武斗。但如果“赤卫队”动手，造反派将给予有力地回击。省公安厅对这一消息十分重视，立即派人到下关、浦口了解情况，结果发现那里除了滞留等待回南京的“赤卫队”外，没有曾邦元所说的“赤卫队”集结的情况。公安厅随即用电话跟曾邦元联系，将这一情况告诉他，要他向“红总”说明情况。

但这一切已不能影响事态的发展，1 月 3 日晚 21 时许，随着一阵刺耳的哨子声，一队队手执木棍、长矛的“红总”成员从四面八方聚集在太平路上的江苏饭店门口，有三、四千人之多，分别将江苏饭店总店和分店包围得水泄不通。

正在病中的江苏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和值班的常务书记陈光得知“红总”包围江苏饭店这一消息后，首先想到的是必须尽一切力量制止武斗的发生，否则无法向中央交代。他们紧急磋商之后，派出了一批批领导干部赶到现场。先后来到江苏饭店门口的有：省委文革小组第二副组长周一峰，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市长岳维藩，省委文革小组副组长宋超，省公安厅厅长洪沛霖。

这时，江苏饭店内睡梦中的“赤卫队”们也已被惊醒，他们看到处境不妙，也都做好了准备。

数千人有组织的群发事件靠几个领导是很难控制的，4 日凌晨 1 时左右，随着一阵嘈杂声，大批的“红总”成员叫喊着冲向江苏饭店总店，里面的“赤卫队”成员出面阻挡，一场混战还是发生了。

事发后，周一峰、洪沛霖立即请曾邦元随他们到现场进行斡旋、调停。但“省红总”方面的战斗队员对他们的劝说不予理睬。接着，曾邦元在现场被“赤卫队”扔下的椅子砸得头破血流，当场昏迷，被紧急送往鼓楼医院抢救。

凌晨 3 时，“红总”又冲向街对面的分店，怪叫声、喊打声在夜空显得特别恐怖。一些“赤卫队”员爬上了房顶，掀起瓦片向下掷去，“红总”的人冲不上去，双方剑拔弩张，互相大骂。省委领导见此情况，立即调 300 多名民警赶到现场，将双方隔离开。省委书记处书记陈光、李士英也赶到现场做劝阻工作。省委同时还决定，通知工矿企

业的领导，不让“赤卫队”出厂增援；在通往江苏饭店的主要路口设置宣传站，劝阻去江苏饭店支援的人，并派李士英、岳维藩做“红总”的工作，要他们停止冲突，派周一峰、洪沛霖进江苏饭店分店做工作。

“红总”的头目不听劝阻，竟将李士英、岳维藩扣在他们的指挥车上，同时下令“红总”往里冲。“赤卫队”终因人少力薄，至天亮时，一场混战以“赤卫队”的失败而告终。这就是震惊全国的“一三事件”。

由于进攻江苏饭店的“红总”使用了长矛、棍棒、钢筋等凶器，致使酿成流血事件，据事后统计：双方共有 1006 人受伤，其中重伤 47 人；“赤卫队”受伤近 700 人。1 月 4 日天亮后，被打垮的“赤卫队”有 2000 多人被“红总”押往附近的公安机关，后大多数放回家，少数“赤卫队”的负责人被扣下审查。

1 月 3 日晚上，聂元梓带着从上海飞到北京的王洪文、陈阿大和廖祖康乘上北大的轿车来到了平安里 3 号《解放军报》社办公楼。当他们刚刚在二楼小会议室坐定，张春桥、姚文元就进来了。

王洪文一看见张春桥，急忙站起来迎上前去，伸出手热情地同张春桥握手道：“春桥同志，您好！”

“这是文元同志。”张春桥向王洪文介绍说，随即又对姚文元说：“这是王洪文。”

王洪文也介绍道：“这是陈阿大，这是小廖。”

他们互相握手寒暄。

坐定后，王洪文就向张春桥、姚文元汇报了近来上海的运动情况，他说“赤卫队”搞“三停”，即停水、停电、停工。

张春桥说：“他们真要搞三停，停上半天，他们就完蛋了。安亭事件，我和你们的被动，就是由于交通问题。”

王洪文问：“目前市委普遍唱高调，王少庸找到我们，什么条件都答应，行动跟不上；马天水回去就找我……本来陈丕显不出来，现在出来了，比任何人都急．听说总理和你都打过电话给他，他找我们想办法，他们都表示坚决站在革命左派一边。他们是要溜，他们现在要什么给什么，我们不要。”“陈丕显出面，出乎我们意料。他秘书

说他病得厉害，怎么突然出来了？我们想请示一下。”

张春桥：“这件事我们商量过。曹荻秋说话显然没人听了，没人出来不行。我们三番五次劝陈出来工作，他硬是拖着，不着急出来。你们从上海来的人都说陈丕显是幕后操纵，应该拖他出来表演一番。现在出来了就好了。”

王洪文：“陈丕显一出来就高姿态。”

张春桥：“假的真不了，真的假不了。”

“上海处于历史的转折点。”张春桥依然在高瞻远瞩地说着，“大乱而后大治。上海这个烂摊子、乱摊子，陈丕显是收拾不了的。1967 年的 1 月，将是上海革命派向走资派夺权的历史性时刻。”

王洪文恳切地说道：“春桥同志、文元同志，上海现在是群龙无首，只有你们出马，才能压住阵脚。”

“你们也应该马上回上海去，现在上海到了关键的时刻。”姚文元对王洪文他们说。

“好，我们马上就返回上海。”王洪文道。

张春桥说：“我们很快就会又见面的。”

就在 1 月 3 日这天，上海《文汇报》社“星火燎原革命造反总部”联合本地及外地驻沪造反派接管了《文汇报》社。这个“星火燎原革命造反总部”是由《文汇报》报社机要秘书、共产党员朱锡琪和邵传烈、周国荣 3 人发起成立的。

1 月 4 日上午，当上海千万市民接过邮递员手中的《文汇报》时，都发现当天的《文汇报》有些异样。这张创办于 1938 年的报纸，原来一直以孙中山手迹拼成“文汇报”三字作报头，沿用了近 30 年，1967 年 1 月 4 日，突然换用三个黑方体铅字“文汇报”作报头，取代了原来的手写体。头版头条的位置上，还套红刊登了毛泽东 1957 年 7 月 1 日所写的那篇著名的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

头版下半版，刊登了《文汇报社“星火燎原”革命造反总部告读者书》。其中写道：“我们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宣告：经过一段时期的艰苦斗争，从今天起，我们‘星火燎原’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接管了

《文汇报》……”表示“一定要把《文汇报》办成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革命造反派报纸。”

这天，徐景贤正在武康路 2 号起草准备 1 月 6 日召开的“打倒上海市委”大会的程序，桌上电话铃响了，拿起听筒，姚文元的大嗓门仿佛就在近旁：“徐景贤吗？春桥和我已经到上海了！今天下午，你找几个写作班的核心，等在武康路 2 号，我们想来听听情况，关于那个大会怎么开，也一起谈一下。关于我们来上海的事，暂时要保密。”

原来，张春桥和姚文元已于当天上午飞往上海，他们降落在上海机场后，就直奔兴国路上的兴国招待所。

放下电话不久，张春桥留在上海的秘书何秀文就带着市委警卫处的人员来检查武康路 2 号的会场。

1 月 4 日下午两点多钟，穿着军装、披着军大衣的张春桥和姚文元来到武康路 2 号的小楼，徐景贤、朱永嘉、郭仁杰、王承龙、程绮华、吴瑞武、王知常等一班秀才早已等候在那里。张春桥、姚文元热情地和他们一一握手。大家围着长桌子坐下，张春桥首先开了腔，他说：

“写作班的造反在上海，在全国的影响都比较大，推动了全国省、市一级的党政机关干部起来造反。最近，中央文革正在起草党政机关文化大革命的若干条，里面也吸收了你们的经验。毛主席在接见中央文革的成员时，肯定了你们的造反，文元已经给你们传达过了，所以今天我们想先见见你们……”

张春桥说到这里，略为停顿一下，脱下军帽放在桌上，用手抚了一下他那稍带卷曲的头发，慢悠悠地点了一支烟，接着往下说：“这次我和文元到上海来，是中央文革派我们来的。我们两个来了当然是和你们站在一起的，‘联络站’就作为我们的工作机构。我们到上海来的任务，是做调查研究，然后向中央报告。所以我们不想介入上海的具体活动，同时，我们到上海来的消息，暂时也不想公开。你们的工作还是按照原来的计划进行，不必等我们。”

这时，姚文元说：“你们讲一讲最近有些什么动向，那个大会打算什么时候开？”

徐景贤把“康平路事件”以后的上海形势，作了一个概要的汇报，特别提到自从张春桥打来电话，指出“赤卫队”已经提出了“打倒上海市委”的口号，提醒不要让别人把胜利果实夺走了之后，“联络站”就集中全力，准备召开“打倒上海市委”的大会，现在已经准备就绪。接着，他把大会的名称、发起单位、8 个发言的题目和发言人的姓名，3 个通令的内容等，统统作了汇报。当他谈到有一个重点发言准备让“工总司”王洪文来讲，内容是“安亭事件”以后市委常委围攻张春桥的情况时，张春桥马上表示出很大的兴趣。他用好奇的目光看着徐景贤问道：“这个情况你们怎么知道的？”

徐景贤回答：“我们翻阅了市委档案室里的档案，这些情况是从当时市委常委会的原始记录中摘出来的。”

张春桥恍然大悟，说：“大会发言稿给我看一下。”

徐景贤马上答应：“草稿已经送到报社排印去了，等清样出来以后就送给您审查。”

张春桥点点头。

徐景贤又说：“开大会的准备工作经过几个发起单位的讨论，大都取得一致了，我们提出 1 月 6 日上午开会，要求陈丕显、曹荻秋和市委常委们都要到场接受批斗，根据气象预报，那天可能有雨雪，所以我们建议大会放在文化广场室内开，‘工总司’提出要拉到人民广场露天去开，我们怕效果不好，所以还没有最后定下来。今天你们两位来了，关于开会的时间、地点，要向你们请示，请你们决定。”

张春桥沉吟了一下，征求了姚文元的意见，然后说：“关于大会的开法和内容，我和文元都没有什么意见，就照你们的安排开。至于会场究竟放在文化广场还是放在人民广场，我们打算明天找‘工总司’的人见见面，到时候听听他们的意见再定吧！”

张春桥询问了铁路交通的情况，一再强调：“你们还是要抓住批判市委这个重点，让各级当权派去顶在第一线，不要把什么事都揽到自己的身上！”

座谈会后，张春桥先走了，姚文元留了下来，晚上单独接见了上海“红革会”常委。

徐景贤听说姚文元回到上海后还没有见过他爱人，所以，经姚文元同意，他派人去把姚文元在卢湾区任街道党委书记的妻子金英，接到武康路 2 号来见面。在等候的间隙中，姚文元向徐景贤单独详细询问了市委写作班人员在造反过程中的表现。他告诉徐景贤：这次回上海张春桥和他都住在兴国路招待所。这里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委员才有资格住的地方。他让徐景贤今后通过红色保密电话机和他们直接联系，但是电话号码只能徐景贤一个人知道，不要外传。

随后，姚文元又专门找朱永嘉和写作班的几个人谈话，询问了朱永嘉在复旦大学被批斗的情况。

此时，正值晚餐时间，姚文元就在武康路 2 号，和大家一样，从食堂里打来了两份饭，把菜往上面一倒，和罗思鼎小组的朱维铮两人就这样吃了起来。

武康路 2 号当时是造反派们活动的中心，底楼、二楼办公室人来人往，乱哄哄的。于是，罗思鼎小组的人把姚文元带上三楼寝室。姚文元就这样一边站着，饭粒、菜汁飞溅地吃着，一边与罗思鼎小组的人有说有笑。

吃完饭，姚文元的爱人金英来了。写作组文学组组长陈冀德将姚文元带到楼下自己的宿舍，姚文元的爱人金英已经在那里了。

陈冀德正要离开时，忽然想起一件事。五十年代，姚文元的关系还在作协机关的时候，曾认购过 500 元公债券。一直存放在作协机关主管后勤的杨仁初那里。文革以后，单位里乱哄哄的。杨仁初怕万一丢失，对姚文元没个交代。便把这 500 元公债券交给了陈冀德，让她方便时转交给姚文元。

陈冀德到楼下办公室里取了公债券返回宿舍的时候，看见房门依旧开着，只见姚文元夫妻俩相对而坐。陈冀德把公债券递到姚文元手上，他随手往桌子上一放。陈冀德急了，500 元，几乎相当于他大半年的工资，便对姚文元说：“你倒是放放好啊。”

姚文元用他双水泡眼瞪了陈冀德一下，明白过来，把公债券塞到军大衣的口袋里了。

上海《文汇报》“星火燎原革命造反总部”并不知道张春桥和姚

文元已到上海，他们接管《文汇报》社后，派人连夜赶往北京，要求向中央文革小组汇报“接管”报社的事，希望得到中央的支持，结果没有见到中央文革的领导，只见了《人民日报》的负责人。

## 第 370 回：寒冬雪，王任重武汉被斗　看三镇，造反派威信日增

1967 年的元旦也没有使武汉群众的革命步伐稍有停顿。1967 年 1 月 1 日、2 日、4 日，连续 3 天，数十万学生、工人在新华路体育场批斗王任重。大会的总指挥是武汉机床附件厂工人、“工总”发起人之一的彭国华。

会场上的巨幅标语是“枪打出头鸟　油炸九头鸟!”这是针对王任重和张体学的两句话而来的。文革初期，王任重指示湖北省委，“要枪打出头鸟”，抓那些给工作组和领导提意见的学生。1966 年 9 月份，武汉揪斗南下学生时，张体学说的话：“天上九头鸟，地上湖北佬；我就是湖北佬，我不是好惹的!”

批斗前，王任重坐在后台，跷着二郎腿哼着京戏。学生问他：“你俩不是主张‘枪打出头鸟’，‘秋后算账吗’？我们今天就斗你这个出头鸟，你秋后还会和我们算账吗？”

王任重说：“秋后算账可不是我的发明，你们认真看《十六条》了吗？运动后期酌情处理，是什么意思？至于枪打出头鸟，从古到今都是这样，也不是我王任重的创造。”

批斗会开始，当大会宣布“把王任重押上台”时，全场鸦雀无声。

王任重从后台休息室走到舞台，只见他披着军大衣，举起右手向左右摇摆着，走向台中央，但是迎接他的却是“打倒王任重！”的口号声。彭国华令人将王任重披着的军大衣拿走，几个学生和工人将他押到台上，站在主席台长条水泥石桌上，把一个写有“黑帮分子王任重”的牌子往他脖子上挂。王任重将牌子摘下，说：“我不是黑帮分子。”

学生再给他挂上，他又摘下，反复3次。最后，在武汉重型机床厂工人、“工总”勤务组成员之一的姜诗存等人强行压制和湖北大学学生杨闯的劝说下，王任重才放弃了反抗，头带高帽子，挂着牌子接受了批斗。

张体学、赵修等省、市领导参加陪斗。

湖北大学教师、共产党员“新湖大”勤务组成员之一张维荣在大会上控诉了王任重制造的“620事件”。张维荣说：“晚上11点多钟，

湖北大学到处是荷枪实弹的民兵，戒备森严，杀气腾腾，要抓到省委反映情况的代表。许多武装民兵抓住我的后背领子，压着我的头部，反抓我的双手，拳打脚踢，还用枪托砸，用十几支枪把我押上台去，沿途我不断遭到毒打，押到台上就戴高帽子，强迫我低头，还企图要我下跪，进行残酷斗争。其他学生代表也被武装押上台去，惨遭毒打和人身侮辱。全校的电话被封锁，校门也被武装民兵看守，只准进、不准出，一片白色恐怖。斗争会后把我押进学校设置的牢房，用十几个武装人员把我看守起来，窗户全部订死，剥夺了我一切政治权利和任何人身自由，进行一系列残酷折磨。”

1967 年初武汉的冬天十分寒冷，批斗会的几天还飘起了武汉罕见的大雪。虽然参加批斗的省市委领导都穿着军大衣，在主席台上依然冻的鼻涕直流。会议组织者只好让他们一部分在台上示众，一部分到后面小房间暖和一下，然后再把台上的人换回来，轮流陪斗。

王任重就不行了，他要一直在台上。可怜患有肝炎的王任重脸色铁青，耷拉着头，顶着一顶高帽。那个强制给王任重戴上高帽子的姜诗存担心他冻坏了，将自己的大衣脱下给王任重穿上。

1月4日上午11时到下午14时，武汉以新华路体育场为中心会场，同时在人民公园又召开了第二次斗争王任重大会。武汉市墨水湖中学青年教师肖伯晏在大会上发言。

1966年6月11日，为响应党中央和毛泽东的号召，肖伯晏等3名教师给学校党支部贴出大字报，说校领导在17年中执行了修正主义的教育路线。6月16日，汉阳区教育局向墨水湖中学派出工作组，在工作组的动员下，有人揭发肖伯晏在不久前的一次文艺演出中，用一张印有毛泽东照片的报纸包过用作演出道具的炸药包，是妄图将毛主席炸死。肖伯晏被立即逮捕，中共湖北省委报请王任重签发同意，判处肖伯晏死刑，缓期两年执行。罪名是“反对毛主席的现行反革命分子”。这一判决报到中央，中央未批准。肖伯晏一直被关押，直到1966年12月30日才被释放出来。另两位教师一个无期徒刑，一个15年徒刑。

肖伯晏在会上声泪俱下的发言激起了会场群众极大义愤。当天，武汉市委发出通知，宣布“六一六墨水湖事件”为革命事件，一律平

反，所办展览宣布作废。

遭到王任重“枪打出头鸟”的水院学生郭明正，9岁被打成“小右派” 的小学生宋学明以及蒲圻工人代表，金星大队贫下中农代表也先后在会上发了言。参加斗争会的除了本市工人，学生及外地赴汉串连的学生外，还有市郊及特意赶来参加大会的全省各市、专、县的群众。

北京清华大学的“井冈山”红卫兵也要揪斗王任重，他们的人就在批斗现场。那时候，谁拥有当权派，谁就有资本。因为你可以随时拉出当权派批斗，制造声势，提高这个组织的名气。

为防止参加批斗会的清华“井冈山”红卫兵将王任重抢回北京，每次散会后，组织会议的“首都南下革命造反大队”都让一名西安军事电讯工程学院的学生，假扮王任重，穿同样衣服，坐同样的汽车先走。王任重本人则在另一辆车里，在武汉三镇兜好大圈子，确认无人跟踪后，才能回到住地，天天如此，精疲力竭。

王任重的情况很快传到周恩来那里，他立即要求保护好王任重的健康和安全，并亲自指示“首都南下革命造反大队”和武汉群众，要把王任重留在本地批判。南下同学遂与周恩来办公室建立正常联系，不断汇报武汉运动动态，进而联系安排了 1 月 29 日凌晨，周恩来对武汉“批王联合指挥部”的接见。

本来，武汉“二司”和“工总”已经将以张体学为首的省、市委领导干部控制起来，集中安排在武昌红楼居住。1966年12月25日，王任重被揪回武汉后，也安排在红楼，由各大系统轮流批判。由于各组织、各单位之间，经常发生抢人事件，在红楼居住不安全。1967年1月10日晚，在夜深人静之时，陈再道亲自将张体学、王树成、刘惠农等20余人接到武汉军区招待所滨江饭店达半月之久。而王任重，则在1967年1月上旬到1967年2 底，转到武汉水电学院。接着张体学、姜一、赵修、韩宁夫、张旺午、王海山、李衍授、宋侃夫、刘惠农、陈扶生、史子荣、张华等湖北省、武汉市的主要领导干部20多人，也都到了武汉水电学院，集中住在行政大楼，由水院“井冈山兵团”的余杰华等几个同学看管，负责他们的生活、安全，陪同他们到外单位接

受批判。到外单位接受批判，必须有“二司”的条子，没有条子不能放人。各单位来人，都是由余杰华接待，不能事先与被批判者联系。被批斗的人如果有病，余杰华就不同意放他们外出接受批判。

批斗王任重，激发了武汉批斗领导干部的高潮。一时间，各级干部都站在汽车上被带到武汉三镇游斗。被斗者头戴高帽，帽子样式五花八门，最别出心裁的是旧戏中县官戴的官帽，两根弹簧一跳一跳，十分滑稽。被斗的人多了，也无所谓了，有的人满不在乎，游斗时四下眺望，以至自己都觉得好笑……

此时武汉的保守派组织基本已无太大的能量了。就在武汉“职工联合会”成立后的第 7 天，1966 年 12 月 18 日，汉阳第三色织布厂造反派抢“四清工作队”封存的材料，认为是“黑材料”。厂里的干部不让抢，四清工作队队员林焕运在阻止抢材料时，突然心脏病发作，送医院后不治身亡。

这事一时轰动了武汉全市，人命关天，法院、医院、公安局全都出动，最后的检查结论是因病死亡，不是被打死的。纺织工业局的工作组准备抓人，但公安局和法院都认为不是打死的，没再插手。

“职工联合会”的头头们不愿就此罢休，他们自成立后，只要上街游行，就被造反派冲击成几截，首尾不能相顾，十分被动，在社会上影响有限。因此，他们想利用这次机会，借机闹出点名堂来。于是决定，在全市组织一次抬尸游行，压一压那些不听领导的话，专门和领导作对、捣乱的造反派，同时展示一下自己的力量。

12 月 25 日，就在王任重与造反派一起回到武汉的同一天，“职工联合会”在汉口中山公园举行“林焕运同志追悼会”，声称林焕运为“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所殴致死，要“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偿还血债，并强迫武汉市委降半旗。会后，他们举行了抬尸游行，有 5000 多工人参加。

“职工联合会”的这次行动，也是他们在武汉全市的首次亮相，但还是失算了。因为毛泽东早在几个月前就明确指示，反对这种“用死人整活人”的做法，为此还特别通报批评了天津市委，因为天津市

委为了市委书记万晓塘的逝世，召开了全市性的追悼会。毛泽东责问天津市委：做给谁看？向谁示威？

12 月 25 日当天，中南局书记处书记李一清就在广州表态，不支持“联合会”抬尸游行，并指出“联合会”是保守组织。

“联合会”群众闻讯后极为不满，数千“联合会”工人包围省委，强烈要求中南局收回李一清的表态。

“职工联合会”的行动，同时也遭到了“二司”和“工总”等造反派组织的反击。学生们立即组织宣传，指责这是“反革命游行”，特别是游行选在毛泽东寿辰前一天举行，追悼队伍还高举着毛泽东的巨幅画像，学生们认为：“这不是公开侮辱伟大领袖吗？”他们将这次行动看作是“保皇派”、“资反路线”的新反扑，27 日，武汉工人、学生造反派 20 万人以“誓死保卫毛主席、坚决镇压反革命”的名义集会，针锋相对的反对“职工联合会”组织的“抬尸”游行，批判“大专院校红卫兵”与“职工联合会”。会后，“工总”、“九一三”、“二司”、“新华工”、“新湖大”、“三司”和“南下造反大队”等成立了“联合批斗王任重指挥部”。

12 月 30 日，陶铸在接见武汉进京代表时也谈到此事，他颇为不满地说：“一个工人死了随便下半旗，我们死了都下半旗，那还得了。下半旗是要对那些有重要贡献的。这是错误的，要充分揭露，这是反对文化革命的行为。”

湖北省委也严厉批评了“联合会”的做法。

“职工联合会”闻讯，于 1 月 2 日至 4 日，也就是在武汉造反派组织批斗王任重的同时，发动全市的基层组织数千工人学习造反派的做法，停工北上告状，围堵车站、机场，到湖北省委造反，包围省委，强烈要求中南局收回李一清表态，部分“职工联合会”头头还要组织去广州揪斗李一清。

1 月 3 日这天，武汉“职工联合会”1000 多人来到火车站要强行登车上京“告状”，受到车站的阻止。下午，他们就又来了几千人包围了武昌火车站，扬言要卧轨拦截车辆，但只持续了 1 天。

“职工联合会”的成员基本上都是本单位的积极分子，习惯于按领导指示办事，真要造反，“反”劲是有限的，战斗力不强。包围省委的“职工联合会”群众，在省委坚持了 3 天，他们的头头却没有出面。3 天后的一天，由于送饭车在路上受阻，围困湖北省委的“职工联合会”群众一哄而散，他们的这次行动又告失败。

5 日，武汉“工总”开始采取行动，打压 “职工联合会”。他们自行决定拘留 3000 余名“联合会”的人。“职工联合会”为了保卫自己的权利和地位，也密谋用暴力抗争。

1 月 5 日这天，“职工联合会”揪李一清战斗队在省委集合时，人到不齐，后来经研究，由崔景德带几十人上广州揪斗李一清，杨庭峰带人上北京上访。倒霉的杨庭峰到北京后，发现北京有个“全国职工联合会”，他劲头来了，马上与“全国职工联合会”取得联系，并代表武汉“职工联合会”集体加入，参加后用电话告诉武汉，所有“职工联合会”袖章都改为“全国职工联合会”。这个牌子够大，似乎能压倒“工总”了。哪知不到两个星期，周恩来讲话，中央不同意成立全国性群众组织。第二天，北京取缔了 28 个全国性群众组织，“全国职工联合会”也在其列。武汉造反派得到消息，对“革命职工联合会”来了个全市猛砸。杨庭峰出师不利，只好返回武汉，一到汉口，就被武汉市公安局逮捕了。

不过，武汉各个学校、机关和工厂党委，也在批判王任重和湖北省委的浩大声浪中，相继瘫痪，造反派在许多单位里实现夺权，运动的实际权力乃至业务权力，开始归造反派群众。这时的武汉，就连小孩子都知道：造反派是正确的，保皇派是错误的。造反派威信日增。1967年的元月，武汉市民和工人在街头辩论曲直、甚至有夫妻纠纷闹离婚的，也虔诚地来找学生造反派评理、论断。武汉好像回到了1927年湖南农运“农会决定一切”的年代。

## 第 371 回：解困惑，陈永贵觐见总理　问详情，刘格平奉召进京

山西昔阳县的大寨村，在文革的串联高潮中，也成了人们争相前往的圣地，十几万人如潮水般涌来，一时道路拥塞，衣食无着，又赶上寒冬将至，当地政府不得不向中央告急。中央军委命令部队连夜赶制大饼，并调动直升飞机向大寨和井冈山空运大饼、衣服和毯子。

在数以万计的朝圣者眼里，大寨党支部书记陈永贵显得极其神圣。他也出来接见群众，也向人群招手致意。每逢此时，人群中就爆发出“向陈永贵同志学习”，“向陈永贵同志致敬”的欢呼声。神明般的永贵大叔先后接见了 20 多万红卫兵小将，许多红卫兵见了陈永贵之后，都说自己有一种“浑身是劲”的感觉。这些敢做敢为的红卫兵小将敢砸井冈山的展览馆，敢揪斗井冈山管理局的老红军，但是在陈永贵面前他们毕恭毕敬。曾有一伙天不怕地不怕的红卫兵想冲大寨展览馆，把展览改得更合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陈永贵“哼”了一声，立刻有大寨的农民手持镢头严阵以待，展览馆的大门也用砖头封起：“想动展览？门也不让你摸！谁敢动一下试试!”

尽管陈永贵空前地显赫，尽管他在红卫兵们的欢呼声中招着手，很和气地笑着，他此时心里却乱得不知如何是好。

看上去，陈永贵跟形势跟得很紧。批“三家村”时他就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批判文章，打倒反动权威时他也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反驳权威，其实他心里是没谱的。学大寨需要大量艰苦细致的组织工作，没有强有力的党组织和干部队伍是不行的。因此，陈永贵在骨子是要组织纪律，要铁腕权威，不要混乱和造反。昔阳中学的红卫兵和外地红卫兵搅在一起冲冲杀杀，还要冲县委，他听说了就不痛快。偏偏这些红卫兵还来找陈永贵，请他出面支持，陈永贵哼哼哈哈地应付一通，支走了红卫兵后颇不以为然地哼道：“动不动就打倒这个打倒那个，就凭他们这几个毛娃娃能掌了权？哼，害去吧！”

“害去吧”是昔阳土话，即“玩去吧”。

许多陈永贵熟识的大队书记已被打倒，戴着高帽子游街游田，站在板凳上挨斗，很有点像一年前搞四清的“形左实右”。这么下去谁来当干部？谁来组织学大寨？谁来组织生产？对此，陈永贵感到十分

的忧虑。

另外，文革开始后，晋中地区的“十月事件”再次翻了出来。

“十月事件”也称“任王张反党集团”事件，是指原晋中地委副书记任井夫，原昔阳县委书记张怀英和祁县的县委书记王振国等人在山西晋中地区 1964 年 10 月召开的晋中地委召开扩大会议上，被打成反党集团的事件。

“四清”前，昔阳县委和县政府的内部也有两派，一派以原昔阳县委书记张怀英为首，他已于 1961 年 3 月调到山西文水县任县委书记。另一派以原阳泉市副市长张润槐为首，张润槐是在张怀英走后接任的昔阳县委书记。

张润槐为人颇粗豪，说话也常有放炮走火的时候。上任的第七天，他带着几个人去大寨查土地和产量是否有浮夸时问陈永贵：

“你究竟整出了多少地来？”

“三、二十亩吧。”陈永贵说。

“到底是二十亩还是三十亩？”张润槐追问。陈永贵不明来意，揣摩着这位新书记应该喜欢大数，心想十亩二十亩怕碰不上他的心，就看着他的脸色说：

“三十亩”。

没想到这位新书记不是来问农田基建成绩的，他把新造的 30 亩地往原来的地亩数上一加，再拿粮食总产量一平均，原来的单产 600 斤就降到了 500 多斤。张润槐吩咐陈永贵：“你以后你不论到任何地方开会，要讲我给你安排下的这个数字。”陈永贵当即点头答应下来。

回到家里，陈永贵越想越觉得窝囊。辛辛苦苦多造了地，反而要把单产拉下来？1961 年正是大饥荒的年代，粮食单产是极其引人注目的重要指标。陈永贵咽不下这口气，就找了一位驻晋中的记者贾春太，让他代笔写信告新县委书记张润槐。陈永贵拿出来的理由颇像是村里农民吵架时的攀比：“全县扩大地亩上不上账？全县上我们也上，全县不上我也不上。”

贾春太替陈永贵写了信后，又直接找地委书记王绣锦反映了陈永贵的意见。王绣锦说：“算啦，就照旧办吧，亩数不变，新土地不加。”

张怀英当县委书记时，每年总要开劳模会，会上还要征求陈永贵、王殿俊、张老太等劳模对县委工作的意见。平时贯彻新政策时，张怀英也时常征询陈永贵等劳模的看法。陈永贵对自己能参与上层决策很满足，可是张润槐上任后根本不来这一套，很少征求陈永贵的意见。陈永贵很在意，1963 年在一次鸣放会上专门拿张润槐与张怀英做比较，给张润槐提了意见。

当时，昔阳的上一茬干部，如县长王贵科，副县长王富元，县委常委赵满仓、李韩锁等人私下聚会，一个主要的话题就是骂张润槐。原县委书记张怀英虽然身在数百里之外，也相当积极地通过往来信件参与了反对新书记的活动。他还给陈永贵写信，让他给张润槐提意见。

1963 年 9 月 25 日，中共昔阳县第五届党代会召开，361 名代表出席。一些对张润槐不满的人私下商量，联合起来不投张润槐的票，结果张润槐少得了 20 多票。在习惯全体一致的干部们看来，丢了 20 多票是一件非同小可的事情。更何况中国共产党的传统一向是严厉禁止一切派别活动，凡搞派别活动便有了搞分裂和反党的嫌疑。

果然，张润槐将选举结果上报晋中地委后，地委书记王绣锦大怒，说："共产党不选共产党，这不是反党么？"随即派人来查。

1964 年 9 月 26 日，晋中地委召开扩大会议解决昔阳县的宗派活动问题，要求昔阳县常委参加。陈永贵只是县委候补委员，还不够资格，但是考虑到他是全国劳模，又与此事有些关系，便把他扩大进来了。

结果，到了 10 月，一个反党宗派活动的大案就定下来了，共 373 人涉入其中，95 人被定为"反党成员"，278 人被列为"消毒对象"，张怀英被撤消党内外一切职务，28 名原昔阳的实权人物被调离昔阳。这一场昔阳政界的大地震就是所谓的晋中"十月事件"。

文革开始后，县长王贵科和县委常委李韩锁等人被关进昔阳商业局的大院里，张怀英在文水县多次挨斗，他的 4 岁女儿也被拉去陪斗，群众当着他女儿的面打断了他三根肋骨。这些被斗的人和陈永贵都有很深的感情，大寨第一任党支部书记贾进才责备陈永贵说："你咋也不出面说说？再不管，怀英还不得让人弄死了？"

1966 年 12 月 17 日，在中央关于农村开展文化大革命的通知下发后，陈永贵称病去北京。他跟勉强支撑着的昔阳县委请了假，带上一筐大寨产的苹果到了首都。

陈永贵在京西宾馆住下，立刻求见周恩来。12 月 30 日的晚上，周恩来在中南海怀仁堂召见陈永贵。

见到周恩来，陈永贵咧开嘴笑着，恭恭敬敬地握着周恩来的手说："我给你带了筐苹果，大寨产下的。"

周恩来笑道："哎，你们的苹果我可不敢吃，给主席送去吧。"

这年年初，大寨曾给毛泽东寄过苹果，毛泽东收下了，中央办公厅还特地回了封信，回赠大寨大队一张毛泽东亲笔签名照片。

寒暄几句之后，陈永贵就开始向周恩来诉苦，他有一肚子话，一肚子问题，简直不知从何说起。他说大寨乱得不行，红卫兵多得没法办，一群娃娃不是打倒这个就是打倒那个，好多人还带着小刀刀。周恩来笑道："那不是小刀刀，那是匕首。"

陈永贵问道："为什么每次运动，非把矛头都对着我们？这个文化革命到底是怎回事？怎么一上来就把我的老战友都打成反革命了？"他讲了一通"十月事件"，又讲到"十月事件"受害者目前的处境。

周恩来听了陈永贵的述说，答道："这个问题，各级党委都解决不了。这样吧，我给你几个红卫兵袖章，你们自己去斗嘛，自己解决问题。"

陈永贵似懂非懂地接过红袖章，心里有点纳闷自己怎么能让文水县放出张怀英，让临行前他曾去请假的昔阳县委放出李韩锁等干部。他把红卫兵袖章收好，又谈起了生产问题。他说，大寨的红卫兵一拔接着一拔，每天都有几千上万的人来，大寨的地方小，盛不开，乱成这样，明年的春耕生产怎么搞？

周恩来让陈永贵抓好春耕生产，至于乱哄哄的局面，周恩来让陈永贵找县委，由县委出面帮助大寨解决这个问题。

后来又说起了化肥。陈永贵请总理帮个忙，批准他们建一个化肥厂："我们县里连续要求了三年，为了搞化肥，我们的干部出去请客

送礼，‘四清’整死了 40 多个人。”

周恩来说：“这个好办，明天国家计委要开会，我让他们把你们的化肥厂纳入计划，你现在回去就可以办，国家支持你。”

陈永贵闻之大喜，别的事也顾不上提了，着急回县里办厂。他后来这么说当时的心情：“这一下我就不顾反啦，你愿反就反吧，就跑回来建厂啦。”

在回山西的路上，陈永贵在火车上与山西省副省长刘格平的妻子丁磊相遇。丁磊对陈永贵说，他们正准备在省里组织夺省委的权，请陈永贵站出来支持他们。

“夺共产党省委的权？”陈永贵想都不曾想过。他吃不准局势，没敢吭声。

是啊，夺共产党省委的权，谁有这么大的胆子？！

刘格平，行政三级干部，仅比毛泽东低一级，这可是中共资深人士。他 1922 年 9 月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3 年 2 月，主持建立了天津津南地区第一个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支部----大堤东支部。1925 年 12 月，和中共早期党员张隐韬一起发动领导了中国北方共产党领导的第一次武装起义-----津南农民自卫军起义。1926 年 7 月，经天津党组织负责人于方舟、李季达介绍，由共青团员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27 年 3 月底，以中共津南特派员的身份，主持建立了中共津南特委，并任特委书记。1934 年 4 月，在领导河北省庆云县河工罢工斗争中被捕。1936 年，与 60 多位共产党人一起被国民党关在北平草岚子监狱，就是南开大学红卫兵调查出来的那 61 个叛徒集团的草岚子监狱。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指示他们按国民党的要求履行手续出狱。刘格平认为在报纸上公开发表叛党声明有损气节，宁可不出狱也不肯执行中央指示。他渡过了漫长的狱中生活，直到 1944 年 4 月才被国民党放出狱。经当时的渤海区党委派遣，到天津开展工作。同年 8 月，中共天津市临时工作委员会成立，任书记。1944 年 10 月下旬，回到渤海解放区。同年年底，调山东分局工作。1949 年 9 月，作为少数民族的首席代表，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并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10 月，中央人民政府民族事务

委员会成立，任副主任委员。1952 年，任中央统战部副部长、中央民委党组书记。1955 年 3 月，任中央民族学院院长。1956 年中共八大上被选为中央委员。1958 年初，受党中央委托，到宁夏筹建回族自治区，任筹委会主任、工委书记。1958 年 10 月，任自治区主席、区党委书记处书记、代理第一书记。因为在民族工作中与刘少奇、邓小平、李井泉、王震和此时任宁夏自治区党委书记汪锋等人的意见相左，被指为“犯有地方民族主义错误”，1960 年秋，调离宁夏，到中央党校学习。1965 年后，任山西省副省长。

刘格平虽身为中共八届中央委员，可是连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都未能参加。他认为自己是“受刘邓司令部迫害”的，于 1966 年 11 月 23 日，给毛泽东、林彪、康生写了一封长信，反映薄一波、安子文等人发表声明出狱，而他自己如何坚持斗争的情况，建议“中央应该查清”。

毛泽东收到刘格平的信后，决定让他进京，以便了解他的情况和过去受处分的事情。毛泽东对刘格平的印象很深，认为刘格平能掌握全局。还认为刘格平担任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主任时在处理新疆少数民族和四川大小凉山彝族问题上反对王震和李井泉过火的做法是对的，而王震和李井泉当时的做法是不对的。毛泽东说：“山西就让刘格平搞吧，让他把山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起来。”

12 月 9 日，康生电话通知山西省委办公厅转告刘格平进京谈话。当天刘格平便奔赴北京，第二天周恩来和康生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与他见面。周恩来对刘格平说：“毛主席要你站出来，山西省委瘫痪了，你回去找省委的一些同志组织一个小组，把工作管起来，山西的煤炭很重要。”

当刘格平表示不好办时，周恩来说：“不要紧，中央支持你。”

康生向刘格平详细询问了薄一波、安子文等人的出狱情况。这次谈话后，刘格平于当天又给康生写了一封信，信中说：“根据您的指示，将安子文、薄一波等几个人出狱前的表现再作一些补充。”信中还说：“如还需要问我的，请予指示。”

## 第 372 回：返太原，陶鲁笳被揪山西　卫、王、王，元旦过即遭批斗

刘格平回到太原，按照周恩来的指示，首先找到省委常委、副省长刘贯一，告诉他，中央已指示刘格平联合一些老干部站出来，组织一个领导机构。

刘贯一问刘格平："中央哪位具体领导和你谈的？"

刘格平说："你不必问这方面的情况……"

刘格平让刘贯一在太原联系一些老干部，将中央的精神告诉他们。

受刘格平委托，刘贯一先后同省委常委、书记处书记、原中共太原市委第一书记袁振，省委委员、中共太原市委书记处书记陈守忠，省委常委、省政协副主席何英才谈话，动员他们"站出来革命"，他们完全同意。

刘贯一与省委常委、省军区第二政委张日清联系后，在省军区招待所与张日清见面。他说："我们都是新四军的老同志，彼此可以随便说说心里话。"他接着说："山西的领导权基本控制在走资派手里"，"山西的领导干部虽然派系很多，什么太行、太岳、晋西北、晋察冀，但是基本路线上是一致的。"他向张日清介绍了刘格平的情况，称"刘格平是个老同志，行政三级，1923 年加入青年团，1926 年入党，长期在白区工作，在北平草岚子监狱关押的时候坚决斗争，不在反共声明上签字。抗日战争和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在山东工作。解放后担任过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全国人大民委主任，是受迫害的干部。"

刘贯一又说，有几位革命领导干部准备站出来"和群众一起革命。"

张日清表示："你们站出来革命，我支持你们，省军区支持你们。"

此时卫恒和山西省委多数领导人的处境更加内外交困，各地党组织基本瘫痪。中共晋东南地委书记王尚志被造反派批斗后突然不知去向，几天后在水井中发现其尸体。根据华北局的指示，山西省委决定设立一、二线两套班子，卫恒、王谦、王大任、郑林、武光汤、贾俊

等人为一线班子，主要负责搞文化大革命运动；赵雨亭、刘开基为二线班子，主要负责抓工业农业生产并了解面上的文化大革命情况。

为了防备这两个班子被造反组织冲击而无法工作，以省委书记处书记赵雨亭为首，还组织了一个准备转入地下坚持省委领导的三线班子，并要求各地、市、县也成立相应的一线二线和三线班子，以保持省委与下级的联系。

一线领导班子继续留在太原的省委大院，二线和三线领导班子则悄悄转移到了坐落在祁县平川上的乔家大院里工作。但是，他们万万没有想到一个更大的风暴向他们袭来。

1966 年 12 月 21 日，省委在晋祠招待所召开省委常委会议，由省长王谦和省委二线班子的主要负责人赵雨亭主持会议，传达中央制定的《工业十条》和《农业十条》，同时传达林彪、周恩来、康生、陈伯达等 9 位中央领导人的最新讲话精神。省委第一书记卫恒缺席会议，他病了。

会议刚开始，省委常委、书记处书记、太原市委第一书记袁振，省委常委、省军区第二政委张日清，省委常委、副省长刘贯一，立即先后发表声明：退出“黑省委”，和山西省委脱离关系，再不参加省委召开的会议。

山西省委分裂了。

第二天，12 月 22 日，“太工红旗卫东支队”进驻《山西日报》社发动群众造反。

12 月 25 日夜，《山西日报》社的群众组织，支持和配合“京晋学生驻山西日报社造反联络站”的成员，砸开报社文书档案室的档案柜，强行取走文革初期《山西日报》上发表过的 8 篇社论底稿。

12 月 29 日，“山西革命造反兵团”派人干脆将《山西日报》社查封。

12 月下旬，“首都赴晋造反大队”和其他一些组织的学生把原山西省委书记陶鲁茄从北京揪到太原，他们和太原工学院“太工红旗”商定，联合全市各造反派组织于 12 月 29 日在杏花岭体育场召开批斗陶鲁茄大会，建议由“太工红旗”主持大会。为了安全起见，他们作

了周密的准备。为了防止在开会期间有人捣乱，“红联站”派人在会场前面警戒,并且请荣军疗养院的老红军老八路坐在会场的最前面压阵。为了防止大会结束时发生意外，他们决定在大会结束前几分钟，诡称陶鲁茄想上厕所将他先行转移，对转移路线也都作了周密的安排。

大会前一天，大会筹备组对会场进行了必要的布置。“太工红旗”李青山、 十三冶“决死纵队”的车成林，“山西革命造反兵团”的左锋等带人到会场做筹备工作。

29 日大会秩序井然，没有发生武斗等举动，也没有人公开捣乱。“红联站”的代表、“山西革命造反兵团”的代表、人称兵团“叶大将军”的山西大学学生叶积凯、太原六中的段建中，以及其他组织的代表相继发言。

会议快结束时,陶鲁茄被带领离开，会场出现一阵骚动，“太工红旗”李青山立即起身解释说是陶鲁茄要上厕所，会场安静下来。

“太工红旗”的宣传车早已等在在主席台后面，一见陶鲁茄出来，立即将他拉往太原工学院电机馆，另一辆车则横在道路中间，防止有其他方面的车追踪。

陶鲁茄被带到太原工学院电机馆，李青山给了他纸笔，希望他揭发问题。陶鲁茄说话不多，但很和气，与学生和造反派群众也没有什么敌对情绪。学生们也没有太为难他，用学生的饭票给他打了饭。学生怕人家说他们不让陶鲁茄吃饱，李青山特别嘱咐给他打细粮。

第二天，李青山再去见陶鲁茄，问他揭发了什么吗?陶鲁茄对他苦笑一下，没有说话。李青山再看那几张纸，一个字也没写。李青山也知道他不会揭什么，也没有为难他。

第三天，当天晚上，听说曾有群众组织来工学院要人。为安全计，他们把陶鲁茄转移出工学院，随后交给了北京的学生送回了北京。

这时，江青也在当年北平草岚子监狱共产党员自首出狱的材料中，发现山西省副省长刘格平拒绝执行刘少奇指示，宁可不出狱也不自首的惊人之举，于是再次电召刘格平进京。

刘格平和妻子丁磊一起再次来到北京，却一直没有见到江青。于

是丁磊先回了太原，在火车上遇见了陈永贵。

1967 年元旦这天，太原“红联站”抢占了太原市有线广播站，并播放了“红联站”的《元旦献词》，革命造反的矛头，依然直指中共山西省委。

元月 2 日，在太原市湖滨会堂，山西大学“八八红旗战斗队”召开了批斗省委主要领导人卫、王、王的大会。批斗现场与迎泽大街上的高音大喇叭接通了，那声势，充满了革命造反的腾腾杀气。开批斗会前，“八八红旗战斗队”的队长李大纲带着几位同学来到晋祠宾馆，找到拖着病体工作的省委第一书记卫恒，提出要揪他和省长王谦、省委常务书记王大任去参加山西大学革命师生对他们的批斗会。来晋祠要揪斗卫恒的，还有别的群众组织，但卫恒先答应了山西大学“八八红旗战斗队”的要求。在卫恒身边工作的省委办公厅干部向李大纲提出，要他保证在批斗会后，安全将指第一书记卫恒等领导送回晋祠宾馆，李大纲也当着卫恒的面，以党性对这一点做了保证。

卫恒被李大纲等学生们带到了湖滨会堂，同时被押上主席台的，还有王谦和王大任。会上对卫、王、王的批判，字字句句充满了火药味儿，会后，李大纲遵守诺言，带着几个同学将卫恒、王谦、王大任又送回了晋祠宾馆，因为还有其他的群众组织在那里等着呢。卫、王、王三位省委的主要领导人，马上就被久候于此的卫生系统造反组织又一并带走，继续在下一个会上去接受批斗。

元旦刚过，“太工红旗”和“首都赴晋造反大队”在榆次晋中地委“点火”的人遭到地委保守派的围攻，据说北京外语学院的学生还用外语向太原战友求援。1 月 3 日，李青山和几个“红旗”的学生匆匆驱车赶往榆次晋中地委。他们被引入一个大房间，里面有很多人站着或坐着，在炕上坐着的那个浓眉大眼的人就是晋中地委书记王绣锦。卫恒上午来过，刚刚走。据说，这里保守派势力很大，地委机关针插不入，水泼不进，省委放“黑材料”的文件柜也放在这里。李青山听到这里，心中生出一个计划，他告诉他的队员，详细调查清楚那些“黑材料”柜存放的具体地点位置，数量，明日天黑前回太原告他。随后立即返回太原“红联站”，建议说：“明晚到榆次，出其不意，抢

回那些省委放‘黑材料’的文件柜，捅一捅晋中地委的马蜂窝。”

“红联站”研究后,都同意这次行动。他们调集省委党校“东方红”,“太工红旗”,“太机红旗”等下属组织，于元月 4 日晚 20 时到“红联站”集中。

4 日晚 20 时,“红联站”多辆卡车和作为指挥车的大轿车已经待命。“红联站”负责人杨保明、段立身等召开各组织负责人会议,根据事先侦查好的情况分配了各单位的任务,规定晚 22 时 30 分左右从太原出发，估计到达榆次地委应在晚上 23 时 30 分到 24 时左右。如果顺利的话，搬文件柜应在一小时左右完成,大约应在凌晨 3 时以前返回太原。他们规定:“如行动中发现异常情况,必须立即向指挥车报告,以便采取相应的行动。”还规定:“所搬的‘黑材料’柜一律送到省党校保管,任何人不得私自处理。”

这次行动相当顺利。听到保守派正在召集人马的报告后，他们立即下令加快行动,迅即撤离。

大队人马回到太原后,大家为行动成功而兴奋不已。有人提议,干脆把太原市委机要室的黑材料柜也抢了算了。于是,他们又来到太原市委，抢了那里的 20 多个文件柜。尔后，又有人提议：这里离于府东街和北肖墙的交界路口西北角的太原市有线广播站不远,他们已和那里的造反派联系好了，不如一鼓作气，把太原有线广播站控制起来。

于是,“太工红旗”的 20 多人又向在府东街上的太原有线广播站走去。由于事先与那里的造反派有约定,不费吹灰之力,就进入广播站,宣布造反。这时，已是 5 日清晨 5 点多了。从此,太原有线广播站就以“红旗广播站”的名义开始广播。

由于这些事发生在元月 4 日晚上，故又称“元四事件”。5 日当天,《太原晚报》社也被查封。

此时在山西各群众组织中雄居首位的仍然是“山西革命造反兵团”。虽说杨成效脱离了“兵团”，但“兵团”又成系统跨行业的成立了若干个司令部，如：由工人组成的“工总司”，由农民组成的“农总司”，还有“商总司”，工农商学兵，除了兵,“兵团”已样样俱全。

而且，“兵团”在华北局设立了联络处，成天在北京闹着为袁振平反。他们还刻了大红印章，介绍信上一盖大红印，“兵团”战士就可以走遍全国。18 岁的司令刘灏不知下一步该怎么办，又来找袁振商量。

袁振这回却一点儿也不急了，反倒沉着气说：“你甭急嘛，刘格平已经向中央反映了山西的问题，中央马上就要解决山西的问题了。我们几个已经表了态，和省委彻底脱离了关系。”

袁振娓娓道来，看得出来，他脸上积下的忧郁正被喜悦所取代。可他提到的那几个人，刘灏却一个也不认识。袁振点拨他说：“格平同志这几天太忙，你先找找刘贯一去，他会对你说明白的。”

刘灏直奔省委常委、副省长刘贯一的住处。他想先问问袁振能否翻案的事儿，可人家仿佛胸有成竹，一句也不提袁振的事儿，只是向他谈省委的问题。先一桩桩谈罢，开始总结了：“搞运动嘛，怎么能怕群众呢？我们当年打土豪分田地时，不是整天和群众滚在一起吗！共产党得天下，就是靠前方打胜仗，后方搞运动呀！”临到最后，这位副省长才告诉面前的革命小将：“康生同志已经对格平同志讲啦，山西的问题不仅仅是省委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问题，而是要考虑夺权的问题。”

夺权？刘灏心头不禁一颤。以前想的只是炮轰省委，揪出卫恒黑帮，可万万没有想过夺权。要证明自己是革命造反组织，就得去找省委表态，要想为袁振平反，就得让省委下文，就是在五一广场批斗卫、王、王时，一边批，一边还得逼他们承认革命小将革命无罪，造反有理。“下一步要夺省委的大权取而代之，这是不是毛主席他老人家的主张呢？”从副省长刘贯一的家中讨教回来，正踌躇满志的刘灏，头脑中突然出现了一片困惑。

## 第 373 回：按计划，北京斗彭罗陆杨　再接见，中学生“首都兵团”

1966 年 12 月底的一天夜晚，“西纠”另一个负责人、国家副主席、共产党“一大”代表董必武的小儿子董良翮也接到投案自首的通知，是他的姐姐董良翚接到父母从广州休养地打来的长途电话，说接到中央通知，要董良翮去公安局投案自首、交代问题。董必武嘱咐儿子老老实实地按中央的指示去办。

第二天一早，董良翮在姐姐的陪同下，骑着自行车往北京革命历史博物馆东侧的公安部投案。董良翮检讨了自己自“文化大革命”以来的一些行为……说完，公安局的人就让他回家了。

董良翮回家后，又在父亲要求下，把投案过程报告总理值班室备案。

1967 年 1 月 4 日凌晨，北京市公安局打来电话，通知他立即带牙具去投案报到。于是董良翮报到。

“西纠”负责人粟寒生，开国大将粟裕的次子也被拘捕。

就在 1 月 4 日、5 日这两天的下午，北京的“东方红红卫兵联合会”以及中央音乐学院“毛泽东思想战斗团”、“东方红公社”、中央戏剧学院“毛泽东主义战斗团”、中央乐团“井冈山革命造反团”，按照与吴德的约定，共同组织在北京工人体育馆连续召开“誓死保卫毛主席，斗争彭、陆、罗、杨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大会”，成为当时轰动北京城的一大新闻。

1 月 4 日上午 9 时起，与会者就排着队，举着红旗，有序地进入会场。一时间，会场上朗读《毛主席语录》和唱《语录歌》的声音连绵不断，同时还教唱大会新歌《谁反对毛主席，我们就和他拼!》

激昂的气氛一直持续到下午 13 时 30 分，大会正式开始，音乐学院的王义新地质学院蒋良甫主持大会，全场齐唱《毛泽东语录》歌，齐声朗读“最高指示”。当大会执行主席充满激情“首先代表大会全体同志敬祝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的话音刚落，“祝毛主席万寿无疆”！“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的喊声便从会场的四面八方迸发出来，群众的情绪也被最大限度的激发起来。

接着，彭真、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挂着分别写着自己的名字，并画有红×的一米见方的大牌子，被红卫兵押上会场。

罗瑞卿因左腿骨折，伤口未愈，缠着纱布，用大箩筐抬了出来，并因此有幸坐在凳子上。

陪斗的有刘仁、万里、吴冷西、周扬、童大林、萧向荣、梁必业、安子文、曾三、严慰冰和郝治平，他们挂着写有各自姓名的大牌子，像彭、陆、罗、杨一样，分别被两个红卫兵扭着胳膊，面向四周。

大会发言一个接着一个，口号声此起彼落。每一部分发言结束，被批斗的一大串人便由红卫兵押着绕场一周。这时，场上口号声四起，与会者无不伸长头颈以便看清被批斗者的模样。被批斗的人由于受到长时间精神和体力上的折磨，面色灰白，痛苦不堪。彭真的鼻涕往下流，也没法擦，长长地挂在面前。周扬流鼻血，一直流到胸前的牌子上。

江青本来不让中央文革小组的人参加这个会，周恩来不同意，说："这么大的事，中央文革一个也不去，不太好。"他让戚本禹、王力、关锋几个人去一下。

江青让叶群也不要去。但叶群后来还是换了便装，戴上帽子和大口罩，悄悄地去看了。

会前，1 月 3 日，王义新曾找清华蒯大富，要他在大会上发言。而此时蒯大富正发烧躺在床上发烧，只好对王义新说："你去找聂元梓吧。"王义新又到北大，不巧，聂元梓去市里开会了。第二天，快开会了，蒯大富来了，说能发言。但这个时候发言人及议程已经定了，不能再改了。

为了会场的安全，解放军的工兵在会前用扫雷器把会场整个的扫了一遍。

戚本禹会后觉得这个批判会开得很没有水平，他认为：斗彭真的时候就是喊喊口号，念念稿子；罗瑞卿放在一个箩筐里抬上去斗，弄得现场的群众都看不下去；而陆定一很紧张，斗他时一直在大喊大叫；而斗杨尚昆呢，连窃听器事件都没说。

1 月 4 日这天，陈伯达、康生、江青再次与北京中学生组织“首都兵团”座谈。大家谈起中学的运动情况，有同学说起中学的红五类组织，江青说：“什么叫红五类？……有些人的父母可能就是黑的。彭小蒙我早就发现她浮躁，她很好，但要批评她。”

同学说：“他们根本不是辩论，就是压，只要意见不同，反对反动‘对联’，动手就打。”

江青说：“这些人只要是拿刀子捅人，就是现行反革命分子，就要镇压。”

同学：“我们认为没有无产阶级专政，就没有无产阶级大民主。”

康生：“对嘛！你们这个观点很好。”

江青鼓励说：“不要怕，不管他是谁的孩子，什么主席、副主席，将军、部长就甭提了，只要是反革命，就不客气，你们讲嘛，随便讲。”

同学们谈到“西纠”时说：“他们也是红卫兵，对他们不好办。”

江青：“他们不叫红卫兵，叫纠察队！”

同学：“他们要解散我们。”

江青：“我们还要解散他们哩！”

同学们对“西纠”打人很有意见，这时李峰给康生写了一个条子，问谢清泉是不是谢镗忠的儿子？并说了谢清泉干的两件事。康生递给江青，江青对谢镗忠说：“回去让你的儿子去派出所自首。”

同学们反映说：“最近确实有一种反扑形势，他们砸其他地方都是坐汽车去的，我们的纠察队也得准备，比较紧张。”

江青：“你们不要把形势估计得那么高，他们只是一小撮，有幕后人，我们帮助你们，你们不要怕，其实他们那么几个人，从东城跑到西城，从西城跑到东城，就那么几辆车。”

同学：“现在红卫兵打人都合法了。”

江青：“不合法，你们帮我们辟谣。说我的什么秘书是张久舜，

有人还说李润贵是林彪同志的秘书，我也要造他的反。”

同学们汇报了红卫兵抢东西等恶劣作风。他们问：“他们为什么这么硬，敢于炮打中央文革？”

江青：“主要是背后有人。”

同学：“我们认为市‘联络站’没有立场，把严肃的阶级斗争看成哄小孩，对谁都一样。”

康生：“这个意见对。”

江青：“我看这个‘联络站’应该解散，就怕打仗，实际支持打。廖承志就是这样，把阶级斗争看成哄小孩，罗青长的孩子现在也打人，现在一个秘书长就了不起了。”她对同学说：“你们明白，我们是支持你们的，对他们酌情处理。”

同学反映，西城分局的拘留所，“西纠”的人可以随便出入。……

江青说：“我昨天解决了，他们帮了资产阶级专政。”

同学：“我认为应该给无缘无故死去的同学平反，平反应该包括这些人，死得要有价值，要死得其所。”

“王光华昏死几次，一醒就喊：‘要文斗，不要武斗’，坚持党的政策，最后 5 分钟，给做人工呼吸后，还在喊。”

江青：“他是你们应该学习的英雄。”

戚本禹问：“他喊‘毛主席万岁’了没有？”

同学答：“我记不清了，反正‘要文斗，不要武斗’我记得清清楚楚。”

戚本禹说：“他贴第一张反党委的大字报，可以算左派学生。”

江青连声赞同道：“对！左派，左派！”

同学问：“他出身算什么？”然后讲了王光华的出身情况。

戚本禹说：“不算资本家，小业主。”

江青：“不管什么，看他表现嘛！”然后问同学：“救活了吗？”

同学：“说实在的，打人的还有董必武的儿子。”

江青问：“董良翮在哪儿？”

同学说：“在广州，听说要办个农场。”

江青对姚文元说：“要广州军区注意，把他们叫回来。”

姚文元有些迟疑："那是陶铸抓的。"

江青："那……管他陶铸呢！"

同学说："'联合行动委员会'耍弄中央文革。"

陈伯达："六中的红卫兵还要同我们辩论呢？"

江青："不要理他们，该抓的抓起来，该平反的平反。"

康生："你就说，我不同杀人凶手辩论！"

江青："你们就是要辩论，像谭力夫臭哄哄，你们不要理他，不要同他们辩论，提高他们的身价干什么？你们要正正派派地搞政治，不要学他们搞特务，你们要揭发他们，要有胆量斗争，保证你们的安全，专政。我们帮助你们。我们接见你们晚了，应作自我批评。"

同学："六中教员几十人到国务院要见负责同志，周荣鑫不让…… "

江青："碰到鬼了，你们可以质问周荣鑫：你究竟支持不支持我们？你们贴他的大字报，在国务院许明贴我的大字报，你们可以贴她的。"

江青对康生说："康老，她还是你的学生呢？"

康生："是啊！你们都是我的学生，一分为二嘛！"

江青："许明是我的同学，在外办，她们对你们什么态度？她可能有里通外国的问题呢！你们可以揭发她，没有群众压力，她才不交代呢！"

同学："最近，成立那个'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我校的王昌明说中央文革犯了错误，毛主席不在北京，就像上次派工作组一样。"

江青："谣言。王昌明是谁的孩子？"

同学："全总王稼祥的孩子。"

江青："是个造谣专家嘛。"

同学谈到几个纵队的情况。江青问："'八一纵队'负责人是谁？"

同学："赖锐锐。"

江青："可以抓了。"

同学："我们希望解放军帮助我们搞军训。"

另一同学："我不同意，中学运动必须大乱，刚刚搞起来，又要搞军训，等于阻止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同学："军训有战备意义。"

另一同学："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最好的战备。"

江青："现在一切服从文化大革命，这最重要，我的意见不派，派不是好办法。"

同学："总理讲过。"

江青："什么时候？"

同学："11 月 9 日。"

江青："那天他还生气，'西纠'打了解放军记者，可能就讲了，我们不是这样。"

这天，北京多所中学的平民红卫兵与"联动"在北京展览馆召开辩论大会，对"联动"进行讨伐。由于《联动宣言》中包含了很多轻视工农、轻视民众、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内容，被平民子弟驳得十分狼狈。

此后，"联动"成员因力量单薄，常遭围攻、谩骂和殴打。无处发泄的"联动"成员有时骑着自行车在大街小巷疾驰，高喊"打倒三司"、"油煎江青"等口号。在高干子弟集中的学校如八一学校、北京小学、育英学校等，"联动"由于与对立的红卫兵组织时常发生冲突，图书馆被捣毁，教学仪器、标本被砸坏，桌椅板凳被拆卸，双方甚至以教学楼为依托构筑工事进行武斗。

1 月 4 日这天，康生在人民大会堂将一份刘少奇的讲话材料单独交给蒯大富，并交代"回去后要组织批判"。

1 月 4 日上午，周恩来、康生、江青在北京工人体育场接见全国文艺新闻体育界职工代表。接见完毕，已是中午。周恩来坐上吉姆轿车，急匆匆赶往人民大会堂。按工作日程安排，下午 14 时，他要在人民大会堂召集有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和全军文革小组成员列席的政治局会议。

周恩来草草地吃了点炒饭，便和陶铸一起商谈政治局会议需要议定的有关事项。

而在此时，陈伯达、康生、江青等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正在大会堂的另一个会议室接见“武汉赴广州专揪王任重造反团”。

江青说：“王任重的后台是谁？是陶铸！你们呐，先不要去广州，先在北京，先揪陶铸！他是你们中南地区最大的走资派！为了挽救他，我不遗余力，我对他很耐心，费了很大的劲去帮助他，可他就是不肯改悔！他是刘邓路线的新的代表人物！”

陈伯达：“陶铸到中央来，并没有执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实际上是刘邓路线的忠实执行者。刘邓路线的推广同他是有关系的。他想洗刷这一点，但后来变本加厉。比如你们到中南局去，你们了解了很多情况，的确是有后台的。这个后台老板是陶铸。他在北京接见你们的那个态度是完全错误的。他是文化革命小组的顾问，但对文化革命的许多问题，从来没跟我们商量过，他独……”

江青插话：“独断专行。”

陈伯达：“……断专行，不但背着文革小组，而且背着中央，他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中央的新的代表人物，是中国最大的保皇派。你们揭得很好，给我们很多支持，感谢你们。”

这一切，同在人民大会堂的周恩来和陶铸并不知晓，他们商谈完工作后，已是下午 13 时 30 分。周恩来又给广东省省长陈郁打了个电话，告诉陈郁：“我已通知蒯大富向‘武汉赴广州专揪王任重造反团’传达主席的意见：不要把王任重同志揪到北京来，让王就在武汉检查。”

而陶铸则到隔壁房间里与安徽省委书记张恺帆谈话，然后又赶回中南海接见安徽来京的学生。

政治局会议开始的时间快要到了，陈伯达、康生、江青等中央文革小组成员还没到。周恩来来到陈伯达他们接见湖北代表团的会议室，一来抓紧这十几分钟的时间听一听武汉揪王任重的情况，二来催促陈伯达他们及时结束接见，过来开政治局会议。

周恩来进去时，接见已是尾声，只听见江青说：“同学们，你们回去斗争要注意两条：一条是实事求是，核实材料，才能立于不败之地。二要作艰苦细致的工作，争取多数。使自己由少数变成多数。不

要把敌人看成铁板一块，多数派同学很多是受蒙蔽的，不是不能做工作的，是可以分割的。一定要作细致的工作。这是策略问题，希望大家注意这几点。”

康生：“同志们把材料整理出来，有材料摆出来了，你们就胜利了。再见！”

在 1 月 4 日下午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江青提出：“军队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有代表的”，她说贺龙“搞阴谋”，“是个坏人”，“要把贺龙端出来”，“不把贺龙端出来，群众能够信服吗?”

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等人开完政治局会议后，又在大会堂接见“军队院校部队文艺工作者红色造反者揭发控诉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筹备处全体人员，继续1月3日晚上的议题。这时已是1月4日晚上，与会代表汇报了一些情况后，提出要彻底批判陈毅、叶剑英两位军委副主席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刘志坚主动对这一切承担了责任，他在会上作了初步检查，说：

“我是全军文革小组的组长，8月前文革小组经过几次变动，最早是谢镗忠当组长，但肖华同志不在总政，我也是在总政主持工作的，都是我负责的，我犯了许多严重的方向路线性错误，我是刘邓反动路线在军内的代表，应该受批判的是我，这一阵虽中央文革同志多次批评过我，但是我觉悟得太迟。我长期停留在军队和地方不同、军队要稳一些，强调《十六条》中的第十五条。《十六条》中的十五条不是说吗：军队的文化大革命按军委总政的指示去做，长时间在这么一个错误的思想方面，一直到这一次座谈会上。昨天晚上，总理提醒我，今天上午全军文革小组开了许多钟点会议，小组同志对我进行了批评帮助，这样我才有所触动，下面我分别讲一讲我的错误。下午总理、伯达同志、康生同志、江青同志对我进行了批评帮助。”

当他讲到“特别是接见问题，接见外地学生让陈、叶副主席讲话，很仓促，仓促上阵，我要负责任，把他们推到第一线，仓忙上阵。陈毅同志的讲话如有不妥之处，首先的责任在于我，因为我是全军文革小组的组长……”

康生突然说：“刘志坚，你就是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军队

里的代表。要揭开军队里阶级斗争的盖子，首先要批判刘志坚，打倒刘志坚!”

江青接着说：“像刘志坚这样的人物，我们帮你们揭发。我名义上是军队的文化顾问，但是他从不向我汇报。去年开了个座谈会，他有了政治资本。因为肖华有病，病了两年。他的手伸得很长，当了中央文革的副组长……他是典型的两面派。”“在军内贯彻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就是刘志坚为首的全军文革小组。它不和军委联系，也不和中央文革联系。刘志坚不向中央文革请示，他谁也不请示……主席回来叫撤工作组，他迟迟不撤，全军文革小组要改组。”

陈伯达则说：“刘志坚是叛徒!”

会场上立时沸腾起来，“打倒刘志坚”的口号不绝于耳。

当刘志坚讲到“没有向中央文革、军委全面的反映军队院校文化革命情况”时，康生插话：“不是没有全面，而是没有。”

刘志坚辩解道：“我们最近反映了一次。”

江青反驳说：“那是我们要你去汇报的。”

周恩来插话：“你就没有汇报过，是我们要你去汇报的。”

刘志坚接着检查，康生插话：“话要说大问题。”

周恩来：“不要讲这些小问题。”

杨成武插话：“黑暗，一塌糊涂，只讲阴暗面，一片黑暗。”

刘志坚：“我犯路线错误的原因是上没有执行主席思想，林副主席指示，下也没有深入群众，在全军文革当中很不民主，很多意见没有采纳，没有听，骄傲自满，脱离群众，下不着地，必然走到他反面，必然犯严重错误，我辜负了主席、林副主席、军委总政领导对我的信任，也辜负了群众对我的信任，自己感到非常惭愧和沉痛，我还有许多其他的错误，时间很仓促，没有很好的回忆和准备，我准备与文革小组、总政、各军区的同志们、中央文革的同志，请他们进一步揭发批判，今天由于匆忙只能简略初步的检查，检讨很不够，很不深刻，但我决心革自己的命，接受同志们对我的揭发批判，低头认罪，脱胎换骨，彻底改正错误，接受任何处分，检讨不够的地方，请同志们再揭发。就简单的谈一下。”

晚上 20 时，周恩来中断与军队院校学生代表的谈话，从人民大会堂赶到毛泽东处开会。

会后，毛泽东突然问周恩来：“江青说陶铸镇压群众，这是么子回事？”

周恩来知道，江青说的是陶铸 12 月 30 日接见武汉“赴广州专揪王任重革命造反团”时发生的那件事，他向毛泽东汇报了事情的经过，并说：“不是镇压群众，是陶铸压不住火，态度有些不好。”

“哦！是态度有些不好。”毛泽东表示：不要把王任重揪到北京来，让他在武汉检查。

## 第 374 回：不同意，批判陈、叶两老帅　说陶铸，中南海西门鼎沸

周恩来从毛泽东那里出来，回到大会堂东会议室，继续与军队院校学员代表的座谈。他首先表示："我完全支持你们各院校的造反派，在全军各院校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这种革命造反精神我们是完全支持的！"

对陈毅和叶剑英的两次讲话，周恩来说："你们提出的陈毅、叶剑英副主席的两次讲话确实有原则错误。不但你们这样认为，我们研究也是这样认为的。叶剑英同志去年12月31日作了检查，我认为基本上是好的，因为他指出了在军队要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承认了自己的错误，承认了压制了各院校的革命左派，同时也坚决主张在军队院校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我们认为大方向也是好的。"

周恩来又说："军队内的斗争是复杂的，"

江青插话："也很激烈。"

周恩来："激烈的。我们军队是保卫无产阶级专政，没有人民的军队就没有人民的一切，林彪同志在5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保卫无产阶级专政，保卫毛主席的正确路线，是靠枪杆子，当然枪杆子是人掌握的，是靠人的，一切阶级敌人和反党分子都很重视军队，都要钻这个空子。我们不要看着一个部分，一个侧面，要看全局。我们的副统帅林彪同志很关心你们，要我把全面情况告诉你们，他是关心你们的，很支持的。"

关于两位老帅讲话的责任由谁来负呢？这似乎不应该是个问题，应该由讲话者本人负责吗。不然，周恩来说："根子在哪里？就是全军文革小组，今天刘志坚作了初步检查，最近我们才帮助他。你们的汇报，使许多事情我们才知道，帮助了他，也帮助了我们。全军文革小组放在总政之下，不和军委联系，也不和中央文革小组联系，"

江青："这是不符合组织原则的。"

周恩来："而他是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陈伯达是组长，江青是第一副组长，他不汇报，也不讲。你们揭了，一查才知道是全军文革小组搞的，三点指示是没有请示军委第一副主席，林彪同志他不但是军委的第一副主席，而且也是党的第一副主席。"

众人呼口号："坚决支持中央文革小组的领导！"

周恩来："你们这样做我是举双手赞成的。这三条指示是违背紧急指示的。"

"军队是不适合单独接见的，你们要单独接见，军委主席毛主席、副主席林彪同志，他们很忙。在11月13日林副主席是不同意接见，但结果呢，在13日其它副主席出席，把我也找去了。"

江青："言多必失嘛！"

周恩来："是呵，言多必失，祸从口出，两次会都是临时打电话通知的，对会怎样组织的和内容我都不知道的，我认为这是两次多余的接见。主席教导我们总是少说话，谨慎言行，所以肯定13日是不接见的，就是接见了，要4位副主席讲话也是不对的，4位副主席讲话都没有提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江青说："我们知道都没有提。"

周恩来："而稿子也是全军文革起草的，林副主席不知道，我们根本不知道的。"

有同学们问："叶副主席说大会是经林副主席批准的，发言稿都是林副主席看过的、讨论的。"

周恩来："哪里讨论的，是打电话通知说开个会，没认真讨论过。"

江青说："可以算黑会。"

周恩来："说他们犯严重错误，但不能说他们一直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的，对刘、邓路线他们是反对的，而且斗争是尖锐的，但在全军文革小组还不是全部的，也有反对派，胡痴、谢镗忠、唐平铸等同志，他们是经常提出意见，不能指向反对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两位副主席身上。现在你们有人提议，全军文革小组要改组，我们可以考虑的，"

肖华说："林副主席也是同意全军文革小组要改组的。"

周恩来："中央文革小组为什么有这么高的成绩？就是干革命嘛！你们到国防部门口的事，我的想法是不睡觉也应当去的，刘志坚就是不接近你们，我就经受过他这种事，如冲国防部的问题，他睡觉了就不去了……所以我说他上不着天，下不着地。全军文革小组就不多说

了，他们还要检查，中央文革小组也要干涉。”

周恩来立即将话题转到这次接见的主题上：“现在谈谈开这个大会。你们开这样的大会，我不同意，不同意你们开，开了对全军不利，矛头攻错了，大方向是对头的。我们不同意你们开这个大会，可以开小会嘛，每个单位你们比我们清楚的多，不但我们不同意开，就是毛主席、林副主席、中央常委，都不同意你们开。但你们一定要开的话，我们也不干涉，但我们不能参加这个大会。”

一同学问：“我们的票都已发下去了，怎么办？”

周恩来问：“发了多少票？”

同学回答：“7000多张。”

周恩来：“没有关系，我在9、10月份，在临近开会两个小时，我说服了两个10万人的大会不开，我有这个经验。”

康生说：“矛头错了。这不能怪你们，责任是谁的呢？是刘志坚的。”

同学问：“是否可按原计划开会，在会上批判以刘志坚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江青：“要有准备，不打无准备之仗，要进行调查研究……”

周恩来：“你们要求批判刘志坚，可以和全军文革小组联系。最近我们要求他们向中央文革小组汇报全军文革小组的情况，看他究竟搞了些什么还不知道。好了，还有人等着，我们还有会。”

周恩来、江青他们还不知道，就在此时，中南海西门已经炸开了锅。陈伯达、江青当天下午接见“武汉赴广州专揪王任重造反团”时的讲话，已经成为北京“爆炸性”的新闻，迅速传遍京城内外，大江南北。当天傍晚，北京街头传单、大字报、大字标语飞舞，醒目的新口号是：“打倒中国最大的保皇派陶铸！”

很快，中南海周围的街上就贴出了揪陶铸的大字报，游行的队伍也随之而来，声势浩大。“打倒陶铸”标语已经贴遍北京、武汉和全国。

本来，由学部的“红卫兵联队”、教育部“延安公社”、北师大“井冈山战斗团”、人民教育出版社“红旗战斗联队”等单位发起，已于

1 月 3 日组成了“批判刘、邓路线新代表陶铸联络委员会”，并把队伍开进了中宣部，还把“过去阎王殿，今日鬼门关，彻底砸烂”的对联和“打倒陶铸”、“陶铸是中国最大的保皇派”等大标语刷到中宣部，并在中宣部大楼里设立了“联络委员会”的办公室。当他们听到江青、陈伯达 1 月 4 日下午的讲话后，立即闻风而动，联同北京和外地造反派 1000 余人，在 1 月 4 日晚上 19 时 30 分，排成 5 路纵队，浩浩荡荡地朝着中南海的方向进发。

1 月的北京，夜晚是异常寒冷的，迎面的风像刀子一样割着人们冻紫的脸面，无情地撕扯着他们的衣帽。但这些人的心中燃烧着一团团怒火，他们顶着刺骨的寒风，不断地高唱着“下定决心”的语录歌，高呼“打倒资产阶级保皇派陶铸”、“誓死捍卫毛主席”等口号，决心不拿下陶铸誓不罢休。

转眼间，中南海西门就到了，1000 多人秩序井然地在门前就地坐下，领队一面让警卫传达他们的要求，一面组织人们高唱《造反歌》、《毛主席语录歌》和念《毛主席语录》。

这期间，不断有大批人马像潮水一样汹涌而来，北医“八 •一八”、“井冈山战斗团”、地院“东方红”、人大“红旗”、“红卫兵”、“东方红公社”、中国医大“红卫兵”、“红旗”、西苑医院“红旗战斗兵团”、北工大“东方红”以及浙江美院、广东粤剧院、南京大学在北京的造反派约 3000 余人闻讯纷纷赶来支援。晚 21 时，中南海西门外已经是一片“打倒陶铸”的口号声，高音喇叭一次又一次广播着陈伯达的讲话：

“陈伯达说：陶铸到中央来，并没有执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实际上是刘邓路线的坚决执行者，刘邓路线的推行同他是有关系的。他是文革小组的顾问，但对文化革命问题从来未跟我们商量过(江青插话:他独断专行)。他独断专行，他不但背着文革小组，而且背着中央。你们到中南局去，你们了解了很多情况，的确是有后台的，这个后台就是陶铸，他在中南海小礼堂接见你们那个态度是完全错误的。康生说：同学们把材料整理出来，有材料就胜利了，这是策略。”

夜，急电发往全国各地。各大城市的红卫兵、造反派连夜刷出大标语：“北京急电——打倒中国最大的保皇派陶铸！”

当晚，陶铸夫人曾志看到了散发的“打倒中国最大的保皇派陶铸”的传单，到陈毅家去询问。陈毅很纳闷地说：“前几天主席还保了他，除非主席又改变了主意？”

此时，陶铸正在中南海国务院小礼堂接见安徽来京的学生……他对外边发生的事情也是毫无所知。幸而被接见的那些学生还不知道陈伯达、江青已经点了陶铸的名，不然的话，他们群起哄之，这次接见的会场马上就会变成批斗会。

23 时，中南海警卫出来对学生们说：“陶铸离不开工作岗位，已将此事向中央汇报。”

这下子可不得了，在场的那些学生们怒不可遏，如疯如狂，他们挥动着拳头咆哮如雷：“打倒资产阶级保皇派陶铸!”、“打倒反革命陶铸!”、“陶铸快快滚出来!”

当陶铸回到家时，已是深夜 24 时多了。在家中忐忑不安等待他的曾志赶忙诉说了中南海西门所发生的一切。

望着曾志托人要回来的那张传单，陶铸被这突如其来的打击搞懵了，他连忙打电话给周恩来询问是怎么回事。

周恩来正在人民大会堂召集首都工作小组会议，同有关负责人商谈做好接待红卫兵工作和北京卫戍区看管彭、罗、陆、杨那些被打倒的干部问题。尽管早已有不祥的预感，但接到陶铸的电话，周恩来还是大吃一惊。陈伯达、康生、江青等接见“武汉赴广州专揪王任重造反团”的事，他是知道的。但他压根不知道他们会有这样的讲话。

事情太突然了，周恩来需要先了解一下情况。他安慰陶铸说：“别着急，我正在同有关同志开会，会议结束后我再打电话给你。”

开完会后，周恩来迅即向有关方面了解了情况，证实了陶铸所反映的已是事实。24 时 50 分，中南海西门警卫对示威的群众说说：“总理有指示，派三、五个代表入内谈。”

于是，静坐示威的造反派推派北师大“井冈山”等 5 单位各派一人进入中南海里面谈判。

1 月 5 日凌晨 2 时多，周恩来打来电话告诉陶铸，说江青他们的讲话他也是才知道的！

清晨 5 时，周恩来打电话把陶铸召到了西花厅。他神情沉重地说："江青他们的讲话我也是刚刚了解了一下才知道的。昨天，我们分手后，我去给陈郁同志打了个电话，后来见他们接见红卫兵，我坐下来听了一会，陈伯达、江青、康生他们话已经讲过了，我没有听到。"

"主席是否知道？"陶铸的眼中闪出最后的一丝希望。

"不知道。不过，昨天我去主席那里，主席曾问我，江青说陶铸镇压群众，这是怎么回事？我向主席汇报了那天事情的经过，我说不是镇压群众，是陶铸态度有些不好。主席说：'哦，是态度有些不好。'也就没再讲什么了。"

陶铸的眼神黯淡了。他明白，江青他们向毛泽东告了那天接见"武汉赴广州专揪王任重造反团"一事的状。

周恩来关切地嘱咐陶铸："这几天你就不要出去了，在家好好休息，外面的红卫兵正要揪你，不要惹出麻烦。"

周恩来送陶铸出来时，陶铸低头无语。周恩来心情沉重地与陶铸握手道别。这以后，周恩来再也没单独见过陶铸。

夜深了，这是滴水成冰的寒夜，刺骨的寒风正酿着严寒，像是要将地球也冻死。但是，饥饿和寒冷吓不倒这些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狂热的红卫兵们，他们斗志昂扬，当场写下了"敦促陶铸投降书"、"陶铸论陶铸"等稿，由 3 辆宣传车轮番广播，歌声、口号声、《毛主席语录》声此起彼伏，彻夜震荡在中南海的夜空，搅得中南海不得安宁。

送走陶铸，周恩来又来到中南海西门接见要揪陶铸的群众。这时，已是 1 月 5 日清晨 5 时 30 分。周恩来一整夜未合上眼，那布满红丝的眼睛里充满着焦虑和忧愁，他对学生们说："天气这么冷，你们等了一夜，我心里非常难受。这个地方实在没法谈问题，你们在这里天也很冷，你们不走我也没法睡觉，你们的大喇叭不要再喊。毛主席没法睡觉，我也一直不赞成在北京装大喇叭。"

"那陶铸的问题怎么办？"一个群众代表问。

“你们是给我出了个难题，我必须向毛主席请示，而且经过党中央讨论。陶铸问题是个大问题，我不能答复，需要请示党中央，请示毛主席。你们各单位派代表留下你们的地址，我一定在两天内和你们见面。”

大家同意周恩来的意见。

江青、陈伯达的讲话太突然了，堂堂的一个政治局常委转眼之间就这样不可思议地突然被打倒了。陈毅、谭震林、李先念来到政治局常委李富春家，询问这是怎么回事？李富春回答说：“我也不知道，常委没有讨论。”

这四位副总理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激愤地议论说：“把几个副总理和老帅打倒，下一步就要打倒周总理了。”

中宣部副部长、学部负责人张际春拿到陈伯达、江青接见所谓“专揪王任重革命造反团”代表的传单后说：“陶铸同志是政治局常委，陈伯达、江青有什么权力随便点名打倒？党内怎么能这么干？我要报告给毛主席。”他将传单立即装入信封派人送给毛泽东。

此时，康生、江青已经在向毛泽东汇报情况。

康生说：“现在已经查明，几次接见红卫兵，报纸、电影、电视上中间都有刘、邓的镜头，这是陶铸有意安排的，他管中宣部。”

江青也说：“熊复按照陶铸的旨意，伪造了主席和刘少奇在一起的照片，这张照片发出以后，被许多省市报纸利用，在全国起了极恶劣的影响。”

毛泽东抽着烟，皱着眉头听他们的汇报，久久地沉默着。

## 第 375 回：惊闻讯，昆明军区被占领　人熙攘，营区内乱如集市

中南海西门的群众还没散尽，1 月 5 日清晨，西南边陲昆明又传来惊人的消息：昆明军区被造反派占领，军机要地作战室被冲。

1966 年 12 月 14 日，以红卫兵为主体的云南群众组织要封闭《云南日报》的地方版编辑部、采访部，云南省委予以拒绝。12 月 15 日，群众组织强行封闭《云南日报》。12 月 19 日，《云南日报》地方版暂停，改出“新闻电讯”。

还在北京参加中央工作会议时，云南省委第一书记兼昆明军区政委阎红彦就和昆明军区司令员秦基伟商议，将云南省委书记处大楼划为军管区，指定云南省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王银山负责，会同公安厅副厅长毛崇横组成 3 人小组，担负保卫机关的任务。省委书记和办公厅部分人员穿上了军装。秦基伟要求王银山保证阎红彦绝对安全。

王银山全力以赴，尽心竭力，给阎红彦安排了几个“秘密”可靠的地方。可是，他都不肯去。有一天，阎红彦被群众连续围攻达 11 个小时。王银山怕阎红彦身体经受不住连续的批斗，找到了当时已转业到昆明市汽车公司工作的、自己原来的一位老驾驶员，要他以拉阎红彦去批斗为名，把阎红彦从造反派手中抢出来。

这位驾驶员开了一辆大卡车，上面坐满了佩带红袖章的人，他们佯称是某个造反派组织派来的，冲进会场，抢出了阎红彦。在城里绕了几个圈子，在夜雾迷蒙中，把阎红彦送到了王银山的家里。王银山把阎红彦安排在楼上自己的卧室休息，自己则在楼下搭了地铺。

1967 年 1 月 2 日，昆明工学院“八二三战斗兵团”、云南大学“毛泽东主义炮兵团”等 100 多个造反派组织联合成立了“昆明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指挥部”。他们决定：1 月 4 日傍晚，在检阅台召开“彻底揭发批判黑省委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勒令阎红彦等省委领导人必须到会接受批判。

1966 年 12 月底，根据西南局书记处的建议，一直在西昌、渡口躲避的李井泉通过秘书向中央办公厅电话请示，想去北京，没有得到回复。此时，西南局和四川省委的工作实际上已经中断。

1 月 3 日下午，阎红彦在省委书记处碰头会上说：“李井泉来昆，

要到上海。吃住我一人安排，要绝对保密。”

当晚，李井泉沿成昆线由禄丰来到昆明。阎红彦亲自秘密安排，住到小麦峪云南省军区警卫团，李井泉和阎红彦俩人谈到深夜，说到刘澜涛历史上的自首问题，阎红彦如何检讨等等。然后，阎红彦亲自送李井泉于 1 月 4 日飞往上海。

1 月 4 日上午 10 时左右，昆明市检阅台对面的工人文化宫前广场上，聚集了几个工厂千余名“8.23”派人员召开批判省委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大会。昆明机床厂的群众组织头头唐天锡，紧握着扩音器话筒，高声喊道：

“云南省委的走资派，派工作组到我们工厂划框框、定调调，千方百计阻挠群众起来造反，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我们坚决不答应！”

会场上，不时有男声或女声领头振臂高呼口号：

“彻底批判云南省委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革命无罪，造反有理！”

更换人员发言的间隙，也还有人带领全场唱《毛主席语录》歌：“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暴烈的行动。”

最后，北京某高校学生大步走到主席台中央，大声说：“我们今天的大会，不能就这样批判一通就算了，我建议，以大会的名义，勒令省委第一书记阎红彦到会，与我们革命造反派一起批判省委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当场回答我们提出的革命要求，同志们，你们说好不好？”

“好！”会场上爆发出一片响声。

云南省委书记处专门开会研究阎红彦是否前去参加大会。阎红彦征求大家的意见：“怎么办？要我去，我就去。”

赵健民首先表示反对。他说：“我坚决反对你去。你是第一书记，不能去。”

会议出现了两种意见，个别人主张去，觉得还是去参加的好，不

要和群众对立下去。多数人同意赵健民的意见，不能去。

赵健民说："现在在压力下屈服出去，等于投降。"并叫其他书记、常委都不要出面，说红卫兵抓不到人，阎红彦就可以避一避。会议最后决定拒绝出席。

会后，书记处成员、常委及省委各部委负责人纷纷下乡躲避。就这样，广场上的大会从上午 10 点多钟，直等到下午 13 点，各路派出人员陆续返回会场报告："从省委书记办公室到宿舍院，都不见阎书记的踪影！"

省、市委的头头们都不见了。批判阎红彦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也开不下去了。大会主席决心："一不做，二不休，只要阎书记一时不到会，我们就等他一时，一天不到会，我们就等他一天！"

大会马拉松式地拖延着，至下午 15 点左右，还是没有结果。在文化宫广场上等得不耐烦的群众，听到有人吆喝："听说阎红彦躲在昆明军区大院不出来，我们干脆找他去！"很快，大家接连响应，手擎红旗，高呼口号，向昆明军区大院的方向涌去。只见昆明机床厂的群众组织头头雄赳赳、气昂昂地走在前头，领着这支浩浩荡荡的队伍，一路振臂高呼：

"秦基伟！把阎红彦交出来！"

"捉拿阎王爷，捣毁阎王殿！"

街上的人们，询问他们要到哪里去，一位群众气愤地说："我们到军区大院去找阎红彦算账！"

路途中，还不时有人，打着自己战斗队的队旗加入。一些胸佩红小兵符号的小学生，只当是去从事一件神圣的革命使命，冲出家门，紧跟着造反派的队伍飞跑。

队伍高唱《毛主席语录》歌，以游行示威般的气概，径直冲到昆明军区大院营门口。警戒军区机关的部队早已接到命令，要想尽一切办法劝阻造反派冲进机关大院，但又要做到"不能动手打人，不能伤害群众。"营房门口中央放下了拦阻汽车进出的横杆，两侧增加了卫兵，一位解放军干部，手持半导体高音喇叭，对着迎面冲来的造反派队伍高喊：

“这里是昆明军区机关大院，为保证军事指挥机关的正常工作，请大家赶快退回去！”

然而，这支包裹着一片红色的队伍，来势汹涌，仅凭十几个哨兵阻拦，几声喊话的劝阻，又怎能阻挡得住？！

冲在队伍最前面的头头，用双手把横在大门口的横杆向上一推，让它伸向了半空。紧跟在后面的人，不容分说，猛力将哨兵掀向大门两边，还有人将红旗杆横握，将哨兵拦腰阻挡在门边。可以说是没费吹灰之力，队伍也似乎丝毫没有停留，就如轻轻提起的闸门，哗啦啦地在军区大院广场上灌满了造反派群众。广场前，就是四层高耸的军区机关办公大楼，门窗紧闭。楼前是一排警卫战士。

现场没有“8.23”的头头，全是情绪激昂的群众。就在这时，只见一位胸前挂着大会“主席团”胸牌的人大喊“让开!”于是，人们纷纷让开一条道，那人趁机将一支工人队伍带了进去，下命令把大门和周围的窗户都围起来，禁止任何人进入。此人是昆明印染厂造反派头头汤克文，那支队伍就是他们印染厂的工人。汤克文对大楼前指挥警卫战士的负责干部说：

“我们是来找闫红彦的，不是来冲军区的。”

那位军队干部对他说：“这里是机要大楼，里面作战处正在指挥越南战场作战，不能冲。”然后他把汤克文拉到一边，轻声说：“我是支持你们的，但你们如果一冲进去，性质就变了，军区就要镇压反革命了。”

汤克文一听事关重大，就叫印染厂的工人唱《毛主席语录》歌，念《毛主席语录》，在大楼门口组织人墙，手挽手挡住了后面的队伍。然后他爬上窗户，大声喊道：

“大家静一静，服从命令听指挥!”

人群渐渐地安静下来了。

这时，那位军队干部过来了将门口的警卫战士都撤了，然后对汤克文说：“闫政委确实是没在军区，你们不信可以派代表进来搜。”

于是汤克文和后来陆续赶来的几个头头，进到大楼，看了一楼的几个房间，都是办公室。这时，汤克文的心里也有些发慌，“为什么

黄兆琪和其他头头都不进来？”他想退出去，那个军队干部对他说：

“我们在一楼腾出一间会议室给你们，你们头头可以休息，也可以开会用。”

汤克文和几个群众组织的头头都来到一楼左手第一间的会议室，昆明军区参谋长崔建功和群工部的几位部长在这里和他们谈判，要求群众马上撤回去，汤克文他们则要求昆明军区交出闫红彦，双方谈了几个小时也没有结果。汤克文就和衣躺在会议室的长条椅子上睡着了。当他醒来时，天都黑了，人都走了，屋里只有他一人。他吓出一身冷汗，生怕被军区抓了，赶紧走出会议室，看见战士们都坐在楼梯口，不让上楼。他走出大楼，院子里已经搭起了帐篷。

造反派冲进军区大院的消息，迅速传到了“8.23”造反兵团总部，勤务组头头黄兆麒高兴的说：“这太好了！这把大火烧起来了！”他们马不停蹄地通知勤务组开会，议定要趁热打铁，抓住阎红彦这张牌，掀起批判“资反路线”的高潮。

1 月 4 日傍晚，昆明地区 100 多个造反派组织组成大会联合指挥部。

入夜，只见昆明军区大院的广场上，东燃一堆火，西亮一盏灯，一些单位的群众组织围着圆圈，在广场上召开批斗会。接受批判的各单位当权派，胸前挂着“走资派”、“黑帮分子”的牌牌，头上有戴高帽的，脸上有画花脸的，在那里低头接受批斗。还有的被群众押着，在前面鸣锣高喊：“我是走资派！”在大院里游街示众。也有不少街头小贩，像赶庙会似的，趁机来做买卖，提灯挑担地涌向军区大院广场。在广场四面八方的角落里，闪烁着一盏盏跳动摇曳的小油灯，有卖过桥米线的，有卖小锅米干的，也有卖糖油果子的。一时间，这镇守西南边关的军事首脑机关大院，竟成了春城最大的集贸市场！

夜里，昆明军区司令员秦基伟和军区其他常委来到空军昆明指挥所主任刘懋功家，说他这里安全，要刘懋功让他们在这里躲一躲。

李懋功家住在一栋二层小楼的上面，一层是党委会议室和司令部办公室，还有一间住着秘书。他只好让秘书暂时搬出去，他们全家搬到楼下打地铺，把楼上让给秦基伟他们，加了行军床暂时住下。秦基

伟一看窗子没有窗帘，让刘懋功找窗帘挂上。刘懋功说："家里从来不挂窗帘的。"

秦基伟说："没有窗帘怎么行？那屋里的活动就让人家看见了。"

刘懋功说："弄个窗帘就异常了，更引起人们怀疑。"

秦基伟坚持说："不行，不行，要挂窗帘。"

买窗帘要布，那几面窗子要三四丈布。那时买布要布票，一时根本不可能买来。还是秘书有办法，找了顶报废的降落伞，几个人七手八脚连夜加班赶做成窗帘挂上了。

过了两天，云南省军区一些群众组织不知怎么得到了消息，说秦基伟等军区领导在空军"昆指"，于是跑到"昆指"的院子外面吵闹，要揪斗秦基伟他们，被"昆指"机关的干部战士顶回去了。

那些人走后，秦基伟对刘懋功说："这个地方不行，不安全，还有什么地方安全些？"

刘懋功想了想说："一是去 20 公里外的空军西山营房，二是去巫家坝机场，那里离市区近一点，又有部队保卫，比较安全。"

秦基伟："那就去巫家坝机场吧。"

刘懋功用他乘坐的红旗轿车把秦基伟送到巫家坝机场，还派了个秘书跟着他，帮助办公，照顾生活。对其他军区领导，他也让"昆指"派车把他们一个一个送走了。

再说昆明军区大院这边，直到 1 月 5 日凌晨 3 时，大院才逐渐寂静下来，守卫在大楼内的部队警卫人员此时也已疲惫不堪。虽曾想，就在这时，聚集在广场上的群众突然发起了冲击办公大楼的行动。只听在一声号令后，一些人抬起事先准备好的大木桩，砰、砰、砰，撞开了办公大楼一楼的大门。楼里的警卫人员听到撞击声，迅速赶来，手挽着手，在大门道里组成三、四层人墙挡住去路。顷刻间，群众与解放军便在大楼门道里形成了"两军"短兵相接的局面。只见冲在最前面的人，让后面的人高举着，不顾一切地强行从解放军的人墙头上往里爬。先冲进办公大楼的群众，乒乒乓乓地撞开大门两旁办公室的门，迅速打开朝向广场的窗户。早已布置在广场上等候行动的群众，把卡车掉过头，放下后面的挡板，呼呼地倒退着抵近窗户，在卡车厢

里的人，一下子就越过大楼一层的窗户，冲进了机关办公大楼。不一会儿，大楼里就涌满了群众。守卫大楼门口的解放军队伍已失去了坚守的作用，也就随即撤退了。

群众冲进办公大楼，就挨房挨屋地强行搜查。当他们冲上三楼时，军区一位副司令员正在作战室里，手握电话机话筒向北京中央军委报告这一紧急情况。两名敞领挽袖的群众，呼呼几脚，踹开了作战室的房门，冲进室内，不问情由地一手就压断了正在讲话的电话机。面对这无理的行动，副司令员怒不可遏，厉声喝道：

“这里是作战室，你们要干什么！”

一听是作战室，这两人顿时减刹了气焰，连声回答：“我们找阎书记！我们找阎书记！”他们环视一下四周，见墙上挂满了地图，室内站立的都是解放军，赶紧退了出去。

办公大楼的四层有机要室，为了防备万一，警卫战士在群众冲进大楼时，就已奉命迅速赶到这层楼道，人挨人地贴墙站成两排，保护着机要室，防备群众砸开门窗冲进去。

当群众蜂拥般地冲上四楼，争吵着要强行搜查机要室时，警卫战士据理劝阻。群众见冲击不成，便也排成一字形的队伍，与守卫的警卫战士，面对面地站立着。有的还以温和的口气向警卫战士做工作：“你们千万不要当保皇兵，要支持红卫兵的革命行动，快把阎红彦交出来！”他们中还有人猜测：“门窗关得这么紧，把守得这么严，难免阎红彦不会躲在里面！”

警卫战士并不恼怒，只是对造反派善意地劝说：“你们要相信解放军，这里是机要室，是绝对不允许外人进入的。阎红彦政委怎么会在里面呢！”双方就这样相视而站，对峙着。

这时的军区机关办公大楼，已完全失去控制，任凭群众自由出入，人来人往，涌上涌下。昆明军区机关的人员也奉命撤离到了大楼后面的营区。大楼前的广场上，人群熙熙攘攘，气势沸沸扬扬，宣传车的高音喇叭不时对着大楼后面的营区高喊：“昆明军区机关指战员们，我们呼吁你们支持我们的革命行动，尽快交出阎红彦！”

其实，阎红彦和妻子王腾波一起，已于 1 月 4 日下午 17 时左右，

与省长周兴一起转移到了距离市区 10 多公里的小麦峪云南省军区警卫团，省委书记处书记刘明辉、孙雨亭等人则转移到林家院。

“8.23”总部找不到省委领导，迅速做出了相应的对策。他们从省委书记的办公室到宿舍院，都派出强兵悍将“坐镇”，不论是谁，只要见到一个，就揪住不放，非要他交待出阎红彦的下落不可。

1 月 5 日，阎红彦得知群众组织冲击昆明军区大院的消息，立即表示：“让我出去向造反派讲清道理”，但是云南省委的领导人都不同意。

这天，社会上就传言：进驻军区大院揪阎红彦说是“反革命暴动”。

此时，省委地下司令部转至西山，电话通知各地委说：“省委已转入地下”，并就打游击的问题与各专、县联系。同时，在省公安厅、省委一号宿舍等处设立了若干“联络站”、“联络点”，并指定了联系人和联络办法。

涌进昆明军区机关广场上的人越来越多，有不少人也不是造反派，只是想进军区大院看看热闹。广场上，宣传车横七竖八地摆着，高音喇叭胡乱播送着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战果”，也不时播放着《毛主席语录》歌和口号。上午 10 时左右，从军区机关大楼一层中央的大门里突然跑出两列解放军战士，顷刻左右分开，奋力挡开人群，让出一块空地，一人拿着个方凳跑出来，放在了空地中央。不一会，只见一个身材魁梧，年约 60 左右的解放军首长，站在方凳上，手握半导体高音喇叭，大声对全场喊话：

“造反派同志们！我是昆明军区司令员秦基伟，我以共产党员的身份向你们保证，省委书记阎红彦不在军区机关大院。我们这里是昆明军区领导机关，为保证军事指挥工作的正常进行，我请求大家迅速撤出军区大院！”

他喊了一遍，群众中没有反应，他又喊了一遍，似乎还是没有太大的反响，但当再喊过第三遍时，人群中有人发出嘘声，也有人高喊：

“如在军区找到了阎红彦，是不是就开除你秦基伟的党籍？！”

有人开始起哄，拥挤着冲撞维持秩序的战士，有时竟拥到秦基伟的身边，使他左晃右摆地，无法在小凳上站稳。喊话难以继续进行，

秦基伟只好在警卫战士的保护下，退回了办公大楼。

这一天，阎红彦度日如年，在煎熬中挨到了天黑。他决定让妻子王腾波回省委，他和周兴去军区大院，力图通过工作，扭转混乱的局面。

阎红彦的车子在茫茫的夜色中开进了城。但他不能进军区大院和省委办公楼。省委办公楼此时已被造反派占领，各式各样的群众组织旗子，在夜风中哗啦啦飘扬。省委办公楼的门上、窗上、走廊里，到处贴满了“砸烂黑省委”、“打倒阎红彦”、“批判保皇派”等等大标语。办公室被占领了，办公厅的工作人员也没处落脚办公了。阎红彦只能在远处观察一下，在一个僻静的处所听了汇报。

云南省省长、省委副书记周兴，乘车来到了军区大院广场，他要求群众派出代表与他谈判，地点就设在军区大院广场门口右边的传达室里。

造反派对周兴的到来丝毫不感兴趣，黄兆麒等人一开口就冲着周兴说：“你周省长来干什么，我们要找的是阎书记！”

两眼泛着红丝，显得有些疲惫的周兴强打着笑脸说：“我是代表省委和省政府来听取你们的意见的，不能把我与阎书记截然分开，我还是云南省的省长呗！对你们进驻军区大院的这种行动，我与阎书记反复交换过意见，都认为是十分不妥的。你们应该好好想一想，军队现在不搞‘四大’，对地方的文化大革命也不介入。云南地处边防，担负着保卫祖国西南边疆的重任，你们这样进驻军区机关大院，影响他们正常开展工作，这能对谁有利呢？我们的意见是，只要你们撤出军区大院，阎书记就来参加你们召开的群众大会。”

“不！这是一个大是大非的原则问题！既然阎红彦书记躲在军区，我们进驻军区大院的目的，就是要他从这里走出来，向我们低头认罪！”黄兆麒回答说。

周兴无可奈何地将身子往后一仰，摊开双手说：“我们要求你们撤出军区大院，完全是为了保证军区机关能尽快恢复正常工作，不应该把它看作是开展批判省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先决条件！你们有意见，尽可以向我们省委、省政府提出，不必采取冲击军区的行动！”

“那不行!这正是问题的原则分歧点。在文化宫广场召开大会时，我们请阎书记出来，他不来，连个人影也看不到。如今，我们来到了他躲藏的军区，他哪天不出来，我们哪天就不撤离！”

谈判就这样僵持着，一直谈到吃晚饭，饭后又谈到深夜，造反派死守住两条防线：一是不能撤离军区大院；二是必须由阎红彦书记亲自出面。他们紧握进驻军区大院这个砝码，声称：

“我们进驻军区完全是出于对省委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气愤！至于影响军区正常工作的责任，一概由阎红彦自己来负！”

“阎红彦要不低头认罪，向造反派投降，就别想我们撤出军区大院！”

谈判到最后，周兴几乎处于一种孤立无援的状态，至深夜 24 时多，周兴只好暂时提出结束谈判，请造反派能认真考虑一下他们的建议。但当他坐着小轿车离开军区大院时，造反派已在广场四周的墙壁上贴出了醒目的大标语：

“周兴滚回去，阎红彦滚出来！”

当周兴疲惫地乘车驶出军区大院大门时，一眼扫过横挂在大门上空的这个大标语，心内不免一惊，心想：今晚的谈判，恐怕又要枉费心机了……

周兴省长从军区广场返回小麦裕后，与阎红彦交换了情况。对军区大院造反派的态度和要求，阎红彦既焦急又反感。他来回地在会议室踱步，嘴里不停地说：“看来，造反派是非要我在军区去见他们不可！你说，我若真的出去了，不就证明他们进驻军区大院的行动是对的？！我们绝对不能支持他们这种错误的行动！他们对你不感兴趣，看来矛头是对着我的，要不怎么会提出‘周兴滚回去，阎红彦滚出来’的口号！如果我要是真的出去了，他们就在军区大院召开大会又怎么办？！……。”

斜依在沙发上的周兴，显得很疲惫，看一下手表，说：“现在已快深夜一点了，今晚先休息，明天我们再商量一下，由我再去与造反派谈判一次！”

## 第 376 回：见群众，刘志坚有去无回　上海市，《解放日报》被夺权

而此时的北京，1 月 4 日晚上出现的声讨陶铸的风暴一直持续到 1 月 5 日。这天，北京的街头，批判陶铸、刘少奇、邓小平的大标语已经满城都是，宣传车纷纷出动，北京城鼎沸了，所有的人都是那样的亢奋。新华社“毛泽东思想战斗团”等组织这天封闭了新华社革委会，批判熊复伪造美化刘少奇照片的罪行。

陶铸在东北解放战争时期曾是林彪的老部下，也是林彪极少数能谈得来的人。他被公开点名后，给林彪写了一封信，说他“来京后辜负了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的信任，工作没有做好，本想过年后离京去各地搞点‘调查研究’，但万万没想到顷刻之间变成了‘罪人’。”林彪见信后默默不语，叶群则赶紧叫内勤偷偷将这封信烧掉。

与此同时，北京外语学院“616 红卫兵”贴出大字报：《周恩来你要干什么》，苏联、德国、日本、南斯拉夫等国的广播电台播发了这份大字报。

这天，北京还有 5000 余名红卫兵前往国防部，要求叶剑英、肖华接见并交出刘志坚。叶剑英、肖华拒不接见。刘志坚怕事态扩大，便给叶剑英打电话说：“我去国防部见学生。”

叶剑英叹了口气说：“你去了就回不来了！”

刘志坚冒着严寒去了。到了那里，他立即被重重围起，帽徽、领章被揪了下来，头上还被戴了一顶高帽子，“打倒刘志坚”的喊声震耳欲聋。果真应了叶剑英“去了就回不来了”的话，批斗结束后的当天晚上，刘志坚便被押上一辆大卡车，带到一间空房子里关了起来，全军文革小组也被群众组织查封。1 月 8 日，刘志坚被交给北京卫戍区，转到北京卫戍区顺义县的营房部队关押。

1 月 5 日深夜，沸腾了一天的空军司令部管理局的职工，强烈要求成立群众组织。第二天，1 月 6 日，空军司令部的二级部也开始成立名目繁多的“革命组织”。接着，作战部、领航部、司令部办公室先后有人冲击司令部党委。

而在 1 月 5 日这天，上海市委机关报《解放日报》的“革命造反联合司令部”继 1 月 4 日《文汇报》被群众接管之后，也宣布接管报

社领导权。他们在《告读者书》中首次提出："这个权，我们是夺定了！"

这天上午，上海"工总司"接到通知，让他们到武康路 2 号市委写作班开会。

当"工总司"的王洪文、潘国平等十几人拥进市委写作班东厅坐下后，不知道是开什么会，便问徐景贤。

徐景贤故作神秘地笑笑，没有答复。

一会儿，张春桥、姚文元两人走进会场，王洪文惊奇地叫了起来："咦、春桥同志！文元同志！前天在北京还见到你们……"

张春桥扫视了一下到会的人，微笑着说："是呀，把你们召到北京来，我们又不好告诉你们，我和文元马上要回上海去了。所以，在北京见了你们一面，要你们赶快回上海，现在，我们不是又见面了吗？"

张春桥坐下以后，王洪文一一介绍了与会人员，何秘书递上一迭白纸，几支削得很尖的铅笔，放在张春桥面前：这是张春桥的老习惯，一边听报告，一边随手记下几个字。

会议开始，张春桥一下子转入正题："现在'赤卫队'垮了，你们这支队伍的步调是不是一致，关系到上海的全局。上海的 200 万产业工人，是我们的基础，上海的工人阶级要能够左右上海的形势，工人运动不要受红卫兵特别是外地学生的操纵。这就是我和文元到上海以后首先要接见你们的原因。"

张春桥点上了一支烟，接着说，"现在对市委不必再抱什么幻想了，当前最重要的问题是要把要害部门都控制起来，包括海港，铁路，电厂、水厂、煤气，电话等，你们看要注意一些什么问题？"

张春桥开了一个头，"工总司"的与会者纷纷开始汇报情况。这时，报社印刷厂送来了排印好的"打倒上海市委大会"的发言稿和通令的小样，徐景贤马上整理出一式两份，分别送到张春桥和姚文元的面前，他们俩又立刻翻阅起来。张春桥抽出其中的一份发言稿，拿起铅笔，一边听取汇报，一边就在稿样上修改起来。

张春桥边修改着稿子，边要徐景贤把第二天召开"打倒上海市委

大会”的筹备情况以及开法、打算向大家讲一讲，还有什么问题需要商量，也一并提出来。徐景贤作了概要介绍以后，提出了两个问题：一个是大会的主持人，他提议由“工总司”负责人担任，请“工总司”考虑；另一个是大会预定在1月6日上午开，天气预报有雨雪，会场究竟放在人民广场还是文化广场，急需定下来，马上要进行布置。徐景贤倾向于放在文化广场。

徐景贤的话音未落，会场里就像开了锅一样地沸腾起来。一个圆圆面孔，胖墩墩身材的汉子站起来，用一口地道的绍兴话开了腔：“不行，不行！文化广场太小，非放在人民广场开不可！落雨落雪算什么？就是下刀子，也要放在那里开！这次大会要宣布打倒上海市委，到会的人要多，气魄要大！”

发言的人是陈阿大，看着他抓下头上的那顶罗宋帽，用劲地拍打着自己的胸膛，徐景贤忍不往笑了，说：“人民广场开会，要几十万人参加，这么多人，有把握调来吗？再说，调来以后，会场内外的音响不好，将影响大会发言的效果。”

陈阿大瞪了徐景贤一眼，解开上衣的前排纽扣，左手插在腰上，右手用力地又拍了两下胸部：“调队伍的事包在我身上，调个10万、20万，小意思，我想调他100万人。过去‘赤卫队’号称有80万，现在我们就调100万造反派来，显显威风，假使人民广场进不去，队伍可以站在广场四周的马路上，我马上通知市内电话局，连夜在全市的主要马路上拉线，装上高音喇叭，让大家直接听大会的实况广播。”

陈阿大的话音刚落，大家就嚷嚷起来，都说要到人民广场开会。张春桥这时也下了决心，说道：“好，既然大家的意见要开得大一点，那就放在人民广场开吧！会场的秩序一定要维持好，保证不出问题。”

接着，他们又议论了大会的主持人。因为“工总司”王洪文要在会上作重点发言，大家就推举潘国平主持大会。

基本情况已定，徐景贤站起来说：“时间紧迫，我马上去落实会场！”他走出会议室，赶紧找来《支部生活》编辑部派到市委机关联络站工作的王承龙，要他马上组织市委和市人委办公厅“造反兵团”，布置人民广场的主席台，因为光是拉一条大会名称的会标，就有几十

米长，要横贯广场主席台的上空，还要写字、剪贴、安装扩音设备等，恐怕要忙到晚上了。

王承龙听说大会放在人民广场开，劲头十足，向徐景贤提议说："明天我们把陈丕显，曹荻秋、马天水等市委书记处的书记和所有的常委，统统押到会场，接受批斗。人民广场的台很大，还要把各部、委、办和市人委系统的主要局级干部，统统带到会场陪斗！"

徐景贤问："这么多人怎么集中呢？"

王承龙说："没有问题，现在市委警卫处也成立造反组织，叫'红色警卫员'，所有的市委书记和常委，都可以由警卫处的这个'红警'造反队负责带去。其它各部、委、办的陪斗对象，由我们办公厅'造反兵团'负责，今天晚上就把他们集中到东湖路招待所，明天一早用大客车送去会场。"

徐景贤觉得他的主意不错，表示同意，并说等一下再向张春桥和姚文元报告一下。

这时，有人将当天的《文汇报》送到徐景贤的手里，只见头版下半版整个半版的篇幅赫然刊登了11个群众组织在东湖路招待所共同商定起草的《急告全市人民书》。

元旦那天在东湖招待所陈丕显主持的会议上确定的《急告全市人民书》初稿是在 1 月 3 日由上海交通大学"反到底"的杨小兵执笔完成的，当时作为一张给赤卫队员讲政策的传单，题目是：《抓革命，促生产 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急告全市人民书》，内容的基本精神是依据《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的元旦社论,强调 1967 年将是全国全面开展阶级斗争的一年，是向党内走资派"展开总攻击"，"深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夺取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的一年。

传单说："最近在很多工厂中出现部分或者大部分的赤卫队员停止生产、离开生产岗位的现象，这就直接违反了中央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规定，直接影响了人民的生活和国民经济建设的发展。"

接着，传单规劝工人赤卫队成员"明辨是非"，"赶快觉悟"，"回到生产岗位上来，回到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我们革命造反派

的同志们一定会热情欢迎你们回来”。

传单最后号召：“更坚决地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打垮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切新反扑，将工厂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推向一个新高潮！”

4 日，初稿经参加起草的“工总司”、“红革会”、“反到底”等 11 个群众组织修改后，签了字，送交陈丕显。他当即签了“同意”两字，派人送交《文汇报》社作为传单，印了 20 万份，在市内广为散发。

《文汇报》“星火燎原”总部看到这份《急告上海人民书》后，决定在已被接管的《文汇报》转载这份传单。他们于 1 月 4 日晚上打电话给市委“机联站”的宣传组，当时徐景贤征求姚文元的意见，姚文元说：“我和春桥同志刚回来，事情很多，许多情况不了解。看了以后也没法表态。登不登，由《文汇报》他们自己决定吧。”

于是，《文汇报》便把那张传单推上了1月5日头版版面，落款时间是1967年1月4日。

徐景贤觉得此事关系重大，便拿着《文汇报》急匆匆走进东大厅。这时张春桥在东大厅的接见已近尾声，张春桥、姚文元讲了几句结束语，就散会了。“工总司”的人走后，徐景贤把报纸递给正在东厅休息的张春桥、姚文元看。

事发突然，张春桥边翻报纸边说：“这件事我们事先一点也不知道呀！”

徐景贤回答说：“他们接管报社没有和我联系。”

姚文元很郑重地说：“这件事我们还需要向中央请示汇报。”说罢，他们就匆匆返回兴国路招待所。

1 月 5 日下午，张春桥、姚文元又在武康路 2 号召集“工总司”在铁路、电力、煤气、港口、自来水等交通和公用事业等部门的造反队负责人开会，“工总司”总部来的人是范佐栋。他反映，目前有为经济而造反的倾向，一些人要求发钱，补工资，还有抢房子，而市委和各级领导却答应这种要求。范佐栋说：“我们认为这样不好。”

张春桥说：“四川已经发了一百万。主席听了这些材料很重视，指出对走资本主义当权派来说，增加了一条新的罪状。对于左派来说，

这也是一个考验。”大家反映生产的形势十分严峻，有的部门因大批工人外出，面临停产。

张春桥说：“当务之急是恢复生产。”他再三建议：“希望你们造反队把要害部门巩固起来，使左派占优势。……你们要考虑一下如何把要害部门工作加强。”

工人们说：“现在许多干部都躲起来，找不到了，生产无人管，都是我们造反派顶上去的。”

张春桥说：“他们不管，你们管，先把生产搞上去。”

在会上，张春桥特别关心交通问题和这些要害部门的生产秩序。他讲港口联系到国外，要专门研究一下这个问题。还指出，当权派乱签字发钞票是新的资反路线，要安排人在 6 日的大会上发言揭露这个问题。

散会后，张春桥交给徐景贤一份经他修改过的大会发言稿，徐景贤接过一看，原来就是他们代王洪文起草的重点发言：《揭露上海中委把炮口对准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滔天罪行》。张春桥在稿样上用铅笔改了多处，有的地方还加了几段。

张春桥说：“你们找到的市委常委会围攻我的那次会议记录，基本上是符合事实的。当时，他们一个劲反对我签字同意‘工总司’的五条，特别是承认‘安亭事件’是工人的革命行动这一条，责问我为什么事先不跟市委打招呼就签字同意了。曹荻秋还指责我这样做使市委陷于被动，说什么春桥到了中央文革工作，还是上海市委书记处的书记嘛！言下之意，要我和他们站在一起。我当场在常委会上就顶了他们，我说，工人运动起来了，我们不要做陈独秀！陈独秀当年就是压制了工人运动的右倾机会主义者。后来我回到北京后向毛主席作了汇报，毛主席保护我，肯定了我的做法，主席说：总是先有事实，后有概念嘛，……刚才，我已经把这些情况补充修改在稿子上了，你们再看看吧！”

徐景贤高兴地说：“我们马上送去改排，重新打出清样来。……另外几份发言稿和通令，你们两位还有什么意见？”

姚文元说：“我们带回去再看看，有意见告诉你。”

徐景贤又向他们汇报了大会上的主斗对象和陪斗对象的安排，并且乘机发出了邀请："明天是否可以请春桥同志和文元同志参加大会，和群众见见面。"

张春桥挥挥手说："不去喽，不去喽！明天你们开吧，我们在家里看电视转播。"

听到张春桥的这句话，徐景贤马上通知电视台准备大会转播，由此开创了全国用电视转播批斗大会的先例。

## 第 377 回："红工司"，上海批斗曹荻秋　警卫难，到处争抢当权派

1 月 5 日，张春桥接见"工总司"和上海各行业造反派的当天，上海拥有 40 万人的"红工司"计划在人民广场召开批判上海市委的大会。之前，华东局负责与"红工司"联系的黄宇齐来到乌鲁木齐路"红工司"总部，对"红工司"的组织部长沈福祥说：

"你们1月5日在人民广场开会，我们一定支持，经费已经拨下，不过你们提出的名单，我们有困难。"他面露难色，继续说下去："曹荻秋被造反派带走后，已经几天没有消息了，我们也不知道他在哪里。"

沈福祥一听急了，曹荻秋是"主角"，大会如果少了他，那就要逊色不少。而且，大会还要请全市的造反派组织的头头参加，如果没有曹荻秋怎么能体现你的造反精神？"红工司"的面子往哪放？沈福祥立即用不容置疑的口气说："那不行，请华东局一定设法找到，这个会没有他，我们是不会同意的！"

黄宇齐说："实在是因为没有消息啊！我们已经派了不少同志去打听也找不到。"

沈福祥问："他是被哪一个组织揪走的？"

黄宇齐为难地说："原来的组织又交给其他的组织，转来转去也不知现在哪一个组织的手里。"

沈福祥说："请你们无论怎样也要设法去找，没有他不行！"

黄宇齐无奈地说："到时有困难，我们再商量吧！"

沈福祥没有理解"到时有困难再商量"的意思，大大咧咧的回答说："好吧！到时有困难，我们再商量。"

这时，"红工司"一把手费敏璋又带来一个意想不到的消息，"工总司"的王洪文要求"红工司"取消 1 月 5 日的大会。这一要求当然被"红工司"拒绝。沈福祥与费敏璋找王洪文商谈此事。

王洪文开门见山地对他们说："今天约你来，想同你谈的是，你们5日的会还是不要开了。"

沈福祥不客气地说："这是我们'红工司'决定的事，我们筹备工作都已做好，通知也发下去了，没法取消的。"

王洪文说："你好好考虑，还是不要开的好。"

沈福祥认为王洪文这是在威胁他，不服气地说："我们有我们的历史使命，这个会是一定要开的。"

王洪文马上把他的话接了过去："我们工人阶级的历史使命是夺走资派的权，要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我们是上海两大工人组织，我们要团结起来。"说到这里，他伸出双臂热情地同沈福祥拥抱起来："我们都是工人兄弟，何必要分成两家呢？"

沈福祥心里那个气呀，心想："好你个王洪文！在需要我们退让的时候又想起'团结'了？当初我们'上海市临时工外包工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成立时，我三番五次去请你，你瞧不起我们，回避不见，也不来参加。色织24厂事件，我们仗义相救，说好了第二天共同商量联合声明一事，没想到第二天你们既没有同我们商量，也没有征求我们意见，自己就付印了，根本就没有把我们临时工放在眼里！现在又想起我们'红工司'是上海两大工人组织之一了？你刚才不是一开口就向我下令了么？在我口气也硬的时候，你却会演出外国人才用的礼节！"

沈福祥轻轻推开王洪文。

王洪文继续说："我们'工总司'6日在人民广场召开打倒以陈丕显、曹荻秋为首的市委的大会，你5日的大会我看就没有必要召开了。我们两家本是一家嘛！两个大会可以并在一起开嘛！"

沈福祥态度坚决地说："我们5日的会一定要开，这是我们的事，但是我可以组织人参加你们6日的会，费敏璋上你们的主席台。"

王洪文没有接他的话，继续说："我们是上海两大工人组织，没有什么原则的分歧，都是造反派，大方向是一致的，我们两个司令部干脆合并起来，共同对付陈、曹不是很好么？"

沈福祥断然拒绝："我们'红工司'的事，由我们决定，5日的会非开不可！"说完后，扭头就走。费敏璋连声叫他，他也不理。

就在张春桥、姚文元 1 月 5 日接见"工总司"负责人，安排 1 月 6 日"打倒上海市委大会"的时候，上海"红工司"批判上海市委的大会已经在人民广场如期召开。整个的广场被十几万人挤得满满的，

华东局及市委的一些当权派也已早早到场，唯独市长曹荻秋还没有到，这个主角不出现，大会如何向市委“声讨”和“开火”啊！大会迟迟不能宣布开始。

曹荻秋到哪里去了？谁也不知道。华东局的黄宇齐再三向“红工司”说明曹荻秋被造反派揪走后音讯全无。言下之意，“我在这之前就已经向你打过招呼了，我们不是有言在先：有困难再商量吗？”

“红工司”组织部长沈福祥不信他的话，认为这是托词，执拗地坚持：“今天这个会一定要把曹荻秋揪来，他不到，我们就在广场不散。”

沈福祥咄咄逼人的态度，急坏了华东局的韩哲一和黄宇齐，他们同手下的人焦急地商量着。

此事，如果任其发展，这十几万人的大会不就完了吗？时间已近中午，大会还迟迟不能开始，不断有人报告，群众有向广场外走散的趋势，大会纠察队长朱力军又派人前来请示：“群众已大批向外涌，怎么办？”当机立断，沈福祥下令封锁各通道，不准出去。这是不得已的命令！人们还是在等待，但显然已经不耐烦了。

台上坐席中那些请来的造反组织的代表和其他的人员已经不那么正襟危坐了，他们在交头接耳，似乎在切切私议大会的总指挥无能。遥望台下，十数万人的队形已经紊乱，不像原先那样按各单位序列排成行。不管司令台上如何领呼口号，领唱《毛主席语录》歌，下面响应已经稀稀拉拉，不像早先那样划一雄壮。后来干脆不能再用这种呼口号唱歌来拖延时间了，人们全松了劲，应了“士气三鼓而泄”的古训。

这时大会纠察队长朱力军又派人来告急：有的单位集体排着队要求离场，已经同封锁道口的纠察发生了摩擦。怎么办？沈福祥跨上摩托车，驶向道口，向要带队离去的头头交谈，向他们解释会议不能如期召开是因为曹老头没有到，向他们抚慰一番，平息了他们的不满，人们重又回头向广场中心走去。沈福祥索性绕场一周，向人们招手，请群众安下心来，利用自己在造反中树起的威望，总算稳定了人们的情绪。

当他回到主席台时，市委的工作人员说，已经打听到曹荻秋的下落，他被同济大学的“东方红”红卫兵组织扣留住，华东局和市委再三向他们协商要人，他们就是不肯放。沈福祥问：“难道你们没有告知他们，我们‘红工司’在人民广场要批斗他吗？”

来人为难地说：“我们什么话都说了，他们就是不放人。”

沈福祥怒火中烧：“这些同济的学生，太目中无人了，太小看我们‘红工司’了！”他对市委工作员人说：“我亲自去。”返身上台叫上“红革会”的代表，一位女红卫兵和华东局的黄宇齐、加上市委的工作人员，带着他的随从，分乘好几辆小车，直奔同济大学。他让“红革会”的头头与他乘同一辆车。

在车上，带路的市委工作人员向他介绍说，曹荻秋在同济大学被“东方红”批斗。他们已经关押他好几天了，一直不放他回家，也不让其它的组织带走。

沈福祥对身旁“红革会”头头说：“我们今天的大会一定要曹荻秋到场，这个场面你也已经看到了，所以等会请你以‘红革会’的身份做做‘东方红’的工作，务必把曹老头交给我们，就算是借给我们，会后我们再送还给他们，你说好吗？”

“红革会”头头答应帮助去做工作。

车队很快进入同济大学，东拐西转在一礼堂前停下，会场内不时传来阵阵口号，看来，他们还在批斗曹荻秋。下车后，市委的人让沈福祥稍等，他们进去交涉。

“同济东方红”在上海浩大的造反大军中还是一个刚冒出来的无名小卒，其知名度远不能同“红革会”相比。这个组织直到半年后才闻名全市，被上海人讥为“投机（同济）东方红”，是以其头头陈敢峰善于在政治上投机，因此叫他“陈看风”而得名，这是后话。

进去的人终于出来了，他们告诉沈福祥：“东方红”还是不愿交出曹荻秋，说他们下午还要继续批斗。沈福祥一听火就上来了，他声色俱厉地对“红革会”头头和市委的人说：“告诉他们，如果不立即将曹荻秋交给我，我立即把人民广场的40万人拉来，踏平同济‘东方红’，我倒要看看小小的一个同济‘东方红’有多大的能耐。”

这一下市委和华东局的人全围了上来："这不行呀！这不是造成工人和学生的流血事件了吗？"

黄宇齐着急的说："这责任我们负不了，怎么向中央交待呀！"

沈福祥还是造反派脾气："我说到做到，在5分钟内还不交人，我马上就去调人。"

市委和华东局的领导顿时处在两难的境地。可以肯定，他们在学生们面前也遇到了蛮横不讲理的造反者，于是一时手足无措地呆立在那里。

沈福祥愤怒地带着他的人向会场内走去，这一举动吓坏了在场的人，他们生怕临时工和学生当场发生冲突。市委的人马上拉上"红革会"的头头抢先朝后台走去。沈福祥站在后面观察形势的变化，其实，他也不希望发生冲突。

不一会，"东方红"让步了，宣布散会，答应交人。只见上海市市长曹荻秋，微低着头神情疲惫地走了出来，从他满面的倦容来看，连日的批斗，对他的折磨是多么的巨大。但是，沈福祥仍然感到，曹荻秋满头的银丝下，他的面庞还是透出一股刚毅之气。他走几步还不忘停下来回头对台上的那几个刚才还在批判他的头头看一眼，大概算是一种告别的招呼，似乎对刚才的批斗毫不在意。

礼堂外面，青翠的冬青树旁，站满了红卫兵，这些刚从会场里散出来的学生，还要在近处看看这位上海的市长"走资派"，稚气未脱的脸上充满了好奇，当市委的警卫人员把曹荻秋引向一辆小轿车，进入车子后，仍有学生把脑袋伸向车窗，再度仔细看着这位市长。修得整齐的冬青树是那样青翠，高大的梧桐光秃的枝干指向晴空，冬日的太阳暖洋洋地照在身上，四周那样宁静，学生们看着这些人上车，刚才从会场内爆出充满杀气的口号声，似乎从来没有发生过。

车队飞快地驶出同济大学转入四平路，进入市中心，一路没有红灯的打扰，那时的红绿灯还是交通警用手操作。车队从南京路的人民公园大门直驶到广场的主席台下，沈福祥一行人一踏进台后宽大的休息室，原来坐在沙发上的华东局及上海市委的当权派纷纷站立起来迎接他们。沈福祥很清楚，他们迎接的是曹荻秋，而不是他，他只是他

们表面上必须应付的“造反头头”。此时的各级领导，已经将参加批斗会作为他们工作中的一个内容了。

人们围住了曹荻秋，曹荻秋向他们挥了挥手，示意大家坐下，自己随即在中间的沙发上坐下，让宋日昌副市长坐在他的边上，立即低声交谈起来，他是在抓紧时间交换这几天的形势和情况。

沈福祥马上让人通知台上，大会立即开始！不一会外面响起了《东方红》的乐曲声。整个人民广场的十数万群众在会议主持人的领读下，读《毛主席语录》。当主持人宣布大会开始时，沈福祥走上主席台，宣布曹荻秋已经被揪到了，他大喊一声：“把走资派押上来！”以曹荻秋为首的一行十数人挂着牌子走了出来。在曹荻秋的后面是宋日昌等人，最后是官衔最小的专司临时工工作的劳动局局长王克。

这一长溜上海大大小小的当权派的出现，使广场上爆发出了热烈的欢呼。欢呼声和旌旗的摇动有如大海的波涛，一阵接一阵地向广场的边缘滚去。

海涛般欢呼轰鸣了一阵后，有人领呼起打倒曹荻秋的口号，广场上的群众也随着高呼口号。

曹荻秋已经经历了太多的批判会了，这位市长大人对于给他扣上的诸如“反革命修正主义”等等的帽子，再大他也不怕，但只是涉及到具体的某一事，某一政策时，他就装糊涂：“我不知道。”“我不清楚。”逼急了，就转移方向，不正面回答。他虽然低着头，看来是那样的驯顺，但透过他的金丝边的眼镜，一双老年人特有的充满自信的眼睛在狡猾地闪动，当沈福祥大喊口号：“打倒曹荻秋”时，他在同济园中看到的曹荻秋脸上那股刚毅的神态，复又闪现出来，近在咫尺的沈福祥，深深地感受到了曹荻秋的这股气势。

批判曹荻秋的大会还在进行，一批华东局及市委的警卫人员又找到沈福祥，以异乎寻常的客气，把他让入沙发落座，对他又恭维了一番。

一个曾同沈福祥打过几次交道的警卫人员说：“我叫郑方南。风雨操场时，你的大会保卫工作做得太好了，没有你的配合和指挥，我们真不好办呢！首长的安全是我们的职责。首长在台上受到造反派的

批判，但我们还是要为首长的安全和健康考虑。”

原来，11月15日，“上海市临地工外包工革命造反司令部”成立后，一直没有得到上海市委的承认。他们就连续几天几夜的在市委门口游行。正好那几天发生了安亭事件，可能是上海市委无暇顾及，最后是由华东局的韩哲一和黄宇齐代表华东局在衡山宾馆附近的衡山路风雨操场接见了“临时工造反司令部”的全体人员。风雨操场是室内运动场，没有座位，十分空旷。在接见过程中，不时有人冲击会场，会场秩序很乱。华东局韩哲一和黄宇齐的警卫人员找到沈福祥，请他协助做好韩哲一和黄宇齐的保卫工作。年轻气盛的沈福祥一口答应，在那天的会上，很好的组织了对韩哲一和黄宇齐的保卫工作。

此时，沈福祥在华东局和上海市委警卫人员的吹捧下，有点飘飘然了，随口说道：“那当然，我们‘红工司’既请当权派来了，就有责任安全地把他们送回去。”

郑方南马上说：“是呀！你们‘红工司’搞得好，我们对你的保卫工作是了解的，我们曾经合作过，今天只有你才能做好首长的保卫工作。”

郑方南接下去的话，却让沈福祥愕然：

“首长在这段时间被一些造反组织揪来揪去的批斗，已经几天几夜没有回过家。现在的问题是，在主席台的前后，已经被许多群众组织包围了，他们就等着大会结束后揪走他们了，小沈同志你看怎么办？”

这消息大大出乎沈福祥的意外，会场的其他工作人员也插话证实说，各个组织已经向他们提出要求“借”当权派。他们要借当权派的真实意图是：许多刚成立的群众组织还没有得到承认，他们要合法的地位和组织经费等等，因此，急于借当权派去斗，逼迫当权派签字承认。

那些警卫人员继续说：“一些人已经把主席台的出路围住了，我们商量下来只有请你想办法才能解决问题。”

沈福祥又随口说道：“这样吧！我们送当权派出去，不用理会外面的这些组织。”

但这些警卫人员是老练而又负责的，他们要沈福祥谈得再具体一点。

沈福祥仔细一想："是呀，那些人要当权派心切，绝不会轻易放弃这个机会，一旦他们动手抢人怎么办？"但他一时也想不出用什么好办法把这批当权派在光天化日下稳稳当当地送出去，只好说："大会结束后，我亲自送你们走。"

郑方南还是不放心，紧盯着问："请你具体谈一谈。"

沈福祥想不出具体的办法，但是他年轻好胜，尤其是还沉浸在刚才的兴奋之中，他不愿示弱，反攻为守地问："那你们有什么办法，也谈谈么！"

这一来，那些警卫人员也面面相觑，被难住了。是啊，他们如果有好的办法还会来找你吗？

沈福祥看着他们的窘相，不无自信地说："既然没有什么现成的办法，你们这些老革命碰上了新问题，就看我随机应变吧！"

他骄傲地指着他的纠察大队说："你们放心吧！我总部的人有的是办法，每辆车上都安排上我总部的人，到时保证送你们出去！"

显然他们对沈福祥的回答是失望的，但又说不出什么反对意见。他们聚在一起商议了一会，最后，郑方南说："到时请你安排了。"

沈福祥撇下这些警卫人员，到外面去察看了一番。通人民公园的路，在他从同济大学回来时，还是一条清静的安全通道，现在已经涌满了人群。仔细辨认，不是"红工司"组织的人，这些人是怎么进来的呢？他们怎么进到主席台后面了？沈福祥立即派人，把外围的纠察人员全部向主席台后面集中，用来对付这些人。

有人报告，台上的乐队吹鼓手们就是一个什么组织的，他们已经提出要借劳动局王克局长，就是他们发现了后面这条通道，于是将这些人引进来了。

纠察队负责人朱力军带着他的全部人员进入主席台的后台，沈福祥要他布置人力，随机应变，用各种办法把这些当权派护送出去，一个也不能交给其他组织。同时要他把广场同主席台的通道封死，不准再放人进来。

然而，晚了。这时，大会已接近尾声，当宣布把走资派押下去时，主席台后人群骚动，广场方面更是不断有人向台后涌来，纠察队只得极力筑起人墙进行阻拦。

在休息室内，会场工作人员和市委的人员闹哄哄地乱成一团，当权派挂在颈上的牌子被摘下扔了一地，人们像逃命似的，心慌意乱，每个当权派都听着他周围的人摆布，忙乱地向外涌去。朱力军的手下调动一长串的小轿车向这边靠拢，沈福祥大叫："快上车！快上车！"

这时，突然有人高叫："快让开，快让开，有急救病人。"只见会场的工作人员极力排开众人，从休息室抬出一付担架来，一位病人躺在上面，居然戴着一副大口罩。这位病人是副市长宋日昌。远处的一辆救护车被招引来，病人一上车，急促的铃声摇将起来，那时的救护车是用人手摇铃铛来警告人们避让，人群后退了几步，沈福祥对后面的车大叫："赶快跟上！"但可惜只有两辆车跟着冲了出去，人群又合拢起来，把道路阻塞了。

纠察队冲上前去，努力把人群压向后面，企图挤出一条路来。人们在相互推挤，从广场不断有人涌来，欲把进人民公园的道路阻挡住。

没有别的办法了！沈福祥走到最前面的一辆车前，对后面的车辆大叫：

"紧跟我的车，一切听我指挥。"

他坐进车内，对司机说："快开车，冲过去。"

司机扭头看了他一眼，不明白怎么能在这么窄小的人缝中开过去。沈福祥说："我是'红工司'的组织部长，一切由我负责，快！"

眼看前面的路有进一步被阻的危险，人们还在向前涌，沈福祥不顾一切地说："你只顾开快冲过去，一切由我负责。"

他打开车门，探出半个身大叫："让开！"

只见纠察人员一阵努力把人群稍稍压向后面，让出一条窄窄的路来，这辆车抓住时机快速向前冲去，人们一惊，本能地向后倒退，车不顾一切地冲上前去，人们一路纷纷后退，车已经横冲直撞到葫芦口了，只要冲过这口子前面就没有阻拦。沈福祥往后看了看，担心后面的车子没有跟上。

果然在他后面的两辆车在慢慢起步，不敢一下向前冲，而第三辆车正是市委曹荻秋的座车，它一下从后面冲出来，以异乎寻常的技巧和速度超过了前面两辆车，冲到沈福祥的车后，填补了空档，这时后面的司机才反应过来，紧紧地咬往前面的车辆。这时，沈福祥的车子已经冲出了人群，前面已经没有阻拦的人群了，待他们转弯要进入公园时，沈福祥探身一看，车后一长串的汽车紧紧地一辆接一辆地都冲出了人群。

转入南京路，车队向西开去，待开过几条马路后，长长的车队越来越短，最后不复存在，因为各人的车各自奔向回家的路了。华东局的韩哲一、黄宇齐由“红工司”的人直接送回了东安新村的家。

## 第 378 回：约向前，毛泽东委以重任　上海滩，开大会批判市委

1 月 6 日，天安门前出现了一条长 15 米的巨型标语，赫然写着“炮轰周恩来”的字样。

这天，杨成武从总参五所打电话给徐向前的夫人黄杰，约徐向前和黄杰去五所，说有要事谈。见面后，杨成武向徐向前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由向前同志担任全军文革小组组长。”

徐向前毫无思想准备，半天没有说话，会客室里气氛沉寂。沉默了许久，徐向前说：“我多年有病，对干部不熟悉，请转告毛主席，这个工作我担当不了。”

杨成武说：“不行啊，这是江青提议，主席决定的。”

于是，徐向前去见毛泽东，当面表示自己确实干不了。毛泽东说：“天塌不下来，你就干吧！”

自 1966 年秋冬起，海军领导干部和直属各大部领导干部、各院校领导干部、各舰队领导干部，大多数遭到揪斗或围攻，没有被揪斗的是少数，没有被围攻的恐怕更少。戴高帽，挂黑牌，翻穿棉大衣，海军领导人人自危，党委开会也要躲起来，或打游击式的召开。李作鹏、张秀川等人和肖劲光、苏振华这些人，差不多同时成了被揭发、批判的对象，揭发批判的内容越来越深。

当时海军领导机关基本上分为三派：反对李作鹏、王宏坤、张秀川支持苏振华派，这是主流；支持李作鹏、王宏坤、张秀川，简称李、王、张的，这是支流；还有所谓观潮派或称“逍遥派”，这是极少数。一个大派之内又有许多小派。什么“红联总”、“红色舰队”、“井冈山”、“毛泽东思想战斗队”等等。单独一人也能成立一个组织，号称“独立团”。

海军院校的造反派，大批涌进海军大院与机关造反派合成一股，冲击领导机关，其主要矛头又是对准李、王、张。李作鹏、王宏坤、张秀川几乎天天被揪去批斗，有几次围攻批斗李作鹏长达几十个小时，有时是通宵达旦，有时是从早到晚，不让吃饭、不让喝水、不让抽烟，甚至不让上厕所。

有一次院校造反派在海军礼堂开批斗苏振华的群众大会，同时把

李作鹏和张秀川拉去陪斗。碰巧那天苏振华重病，不能起床，这样他们就决定背靠背的批判。

1966年冬天的一个夜晚,灯火通明的海军第二礼堂里正准备召开一场批斗大会。被批斗的对象是海军副司令员刘道生和周希汉。

此时,周希汉正皱着眉在家里走来走去,点着的香烟也不吸。楼下，前来揪斗他的群众正在等待着。

“你就不能给周总理打个电话?”不知何时进来的妻子向周希汉建议说：“总理说让你去你就去,总理说不去,死了也不去。看他们能怎么样?”

“这……好吗?为这种事?”周希汉在犹豫。他和周恩来是建国后才熟悉起来的。在1954年的一个国务院专题会议上,周恩来对周希汉能在很短时间里熟悉海军业务特别欣赏。有一次在首都机场迎接外宾,在向外宾介绍到周希汉时,周恩来充满自豪地说:“这是我们自己培养出来的海军专家周希汉。他的名字在我们中文里的意思是少有的英雄。”

由于一时想不到更好的办法,周希汉决定听从妻子的建议,打电话给周恩来。

电话是通了,可惜周恩来不在。工作人员问有什么事需要转达的,周希汉犹豫了一下说不用了,就挂断了电话。

找不到周恩来,周希汉又想起了徐向前。红军时期,周希汉曾在徐向前身边工作多年,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建国后,他还常去看徐向前,却从未为个人的事向徐帅开过口。倒是徐向前似乎早有所料,当电话接通后,徐向前镇定而关切地问:“周希汉?怎么不讲话?遇到什么问题了?”

“是。他们要开我的批斗会。人都拥到我的院子里了。我……”周希汉欲言又止。

徐向前没等周希汉说完,就直接打断他说:“不要理睬他们,就在你的屋里不要动。我找李作鹏。搞什么名堂。”

李作鹏在电话里听到徐向前的质问,便说：“马上了解一下情况。”

徐向前说:“我不要你了解。立刻把人给我撤走,周希汉家里的一根草也不许动!”

放下电话，徐向前又要通了叶剑英，说了此事。叶剑英也立刻给李作鹏打电话，让他做工作。很快,造反派都撤走了,408 号楼的院子里恢复了平静。

海军直属机关“红流”等造反组织，串联海军院校造反派组织，在“炮轰”、“火烧” 李、王、张一阵后，提出要开张秀川的控诉会，要戴高帽，要抓“中的”、“大的”和“黑帮”。

李作鹏听到这个消息后，于 1967 年 1 月 6 日到杨成武家，说海军现在的局势是“颠倒是非”，并提出三个方案：一是请军委对海军“三三会议”决议表态，把问题揭开，看究竟谁搞“刘邓路线”；二是将林彪在 1966 年 8 月 13 日对李作鹏等人的评价公布；三是把所有的问题重新揭开，进行大辩论。

恰巧这时林办来电话，说林彪有事叫杨成武过去，李作鹏即请杨成武把海军情况顺便向林彪报告，并将他提出解决海军问题的三个方案以书信的形式交杨成武。

1 月 6 日上午 11 时左右，北京“联动”纠集 100 多人第四次冲击公安部。这次他们直接从公安部大门冲了进去，在里面散发传单，写着 “活着干，死了算”、“以牙还牙，以血还血”等。接着又冲入礼堂，砸东西，并在礼堂内点燃鞭炮，涂写标语。第二天早上，公安部广播室把他们的所作所为广播出去，他们慌了，到处找广播室，但没找着，便割电线、砸喇叭。他们又想冲进南大楼，没有成功，转而进食堂，把食堂几十斤粉肠和猪头肉抢食一空。他们一边吃一边说：“这是革命行动”,“他妈的，公安部的猪头肉真好吃。”但公安部的广播播出后，大批群众赶来声援,“联动”一看形势不好，这才一溜烟地仓惶遁去。

当晚，数百名“联动”成员打着“联合行动委员会”的旗子冲进北京市委接待站。狂呼“打倒中央文革”,“刘少奇万岁!”等口号，被群众当场抓住。

一天后，又有数百名“联动”，带着菜刀、匕首，一路高喊“打

倒‘三司’!”，甚至喊“打倒江青!”等口号，企图冲入公安部。由于不少群众闻讯自动赶来保卫公安部，他们的企图没有得逞。但他们却用“二踢脚”装上铁钉，向负责警卫公安部的站岗执勤的解放军战士射去，致使好几个战士受伤。

我们再看 1 月 6 日的上海，“工总司”、“红革会”等组织计划中的“高举毛泽东思想，彻底打倒以陈丕显、曹荻秋为首的上海市委大会”要在这一天召开。灰蒙蒙的天穹开始放亮，天色阴霾。昨晚下了雪，屋脊上、树梢上都有残雪。突然一阵朔风呜呜地吹起，无数晶莹的雪粒劈里拍啦地掉落下来，砸在瓦上，玻璃窗上，马路上。地上的雪大部分已经融化，被人们踩过以后，变成了随处可见的湿漉漉，滑溜溜的泥浆。

清晨 7 时，一个戴着眼镜的青年闯进武康路 2 号点名要找徐景贤。他自我介绍说是上海市环境卫生局的造反派，他们预定今天上午召开全局范围的批斗会，谁知道局长昨天晚上就被市里集中起来了。今天凌晨，他赶到市委东湖路招待所去要局长，被办公厅“造反兵团”的王承龙顶了回来，答复说今天全市所有的局以上干部，都要到人民广场去陪斗市委书记，要放人除非徐景贤批准。这样，那个造反派就乘着局里的小轿车赶来了。徐景贤心里想：“这个王承龙真厉害，把环卫局这样的小局局长都集中起来了。”经过那个造反派的一再要求，徐景贤终于说：“这样吧，我和你一起到人民广场去，看看情况，如果可以的话，就把人给你。”

大街上，一队队打着各种群众组织红旗的队伍，都朝着市中心人民广场的方向行进。还有许多卡车，满载着人，也向人民广场驶去。几条主要的街道上全部新装起了高音喇叭，里面播放着从人民广场直播出来的歌声：“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

人民广场上旗似海，人如潮，万头攒动，水泄不通。由于融雪，地下稀湿，无法坐下休息，人们都像插蜡烛似地站在那里。那些迟来的队伍没有机会再挤广场、就分别排在福州路，西藏路，武胜路，龙门路，望亭路上……人群以广场为中心，向四周辐射，延伸出去，人

头上飘动着各单位的旗帜，一眼望不到边，场外的人数比场内要多得多。一位俏丽的女青年站在麦克风话筒前，不断振臂高呼口号："彻底打倒以陈丕显、曹荻秋为首的上海市委！"、"陈丕显、曹荻秋必须向人民低头认罪！"

广场上传来了巨大的闷雷一般的呼应声。

大会在全市设了 369 个分会场，其中包括 252 个大厂，117 个工人俱乐部，影院，剧场和大专院校。4 条大马路、12 个交通要道，安装了上千只喇叭，并通过 14 个广播中转站向全市市民广播，上海电视台同时转播批斗会的实况。因此，号称有百万人参加。

市委办公厅"造反兵团"的人员，指挥着市委和市人委各部，委，办以及各局以上的领导干部，总共有 100 多人，鱼贯而入，走到了主席台的后部。一位办公厅的女干部，命令这些领导一一站在毛泽东的巨幅画像下面，低头。她看见徐景贤过来了，就急匆匆地走过去对他说："这些当权派昨天晚上就到东湖路招待所报到了，一夜没有睡，刚才我们用两部大客车把他们装来的。"

徐景贤对那几排领导队伍扫了几眼，看见队伍中有几个是张春桥、姚文元的老同事，还有自己的老领导，多年感情，内心难免有些不忍，但他知道这是原则立场问题，革命吗，岂能人情脉脉，小资产阶级情调十足？他故意掉过头去，说到："群众运动嘛，让他们烧一烧也好。"

他看见和他同来的那个环卫局小伙子还跟在后边，就告诉办公厅"造反兵团"，同意把他们的局长还给他，那人千谢万谢，带着局长走了。徐景贤又把上海电视台的负责人找来询问电视转播的准备情况，那人对徐景贤说："我们上海电视台的造反派，今天一定全力以赴，现场转播好大会的实况，请你把大会的顺序告诉我们。"

徐景贤向他介绍大会的程序，心里想："今天张春桥和姚文元都坐在电视机前，这场转播非同小可呀！"但是，他不能把张春桥和姚文元看电视的情况向那个电视台的头头披露，就换了一种方式叮嘱他："今天是第一次用电视向全市人民转播批斗大会的情况，你们要认真检查一遍，只准播好，不能出纰漏。今天在上海的外国领事馆人

员和外轮上的船员，很可能看电视，我们已经关照有关的人在大会上对批斗对象不搞喷气式，不搞武斗，但是假如还有些场面不太合适播出的话，你们要把镜头避开一些，免得给外国人提供口实。”

电视台的负责人连连点头答应，马上去进行布置了。

时间接近预定的开会时间 9 时了，徐景贤把大会发言人集中了起来，却不见大会主持人潘国平。问“工总司”的人，他们都摇头，其中只有一个人昨天深夜听潘国平讲过：“要找一个地方打游击睡上一觉。”至于他究竟睡在哪里，谁也不知道。徐景贤很生气，直接去问在旁看发言稿的王洪文，王洪文骂了潘国平几句。又踌躇觉得难以从“工总司”其他几个常委里挑出主持大会的人选，他想了想说：“这样吧，叫范佐栋主持，他是我们‘工总司’负责宣传工作的，主编《工人造反报》，又参加过大会的筹备工作，普通话说得还可以……”选这样一个人主持，大家都没有话讲，范佐栋就上场了。

按照当时的惯例，念过《毛主席语录》后，范佐栋宣布“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彻底打倒以陈丕显、曹荻秋为首的上海市委大会”正式开始，他一声高喊：“把陈丕显、曹荻秋押上来！”只见市委警卫处“红色警卫员造反队”的几个人，把华东局和市委的领导人陈丕显，曹荻秋、魏文伯，韩哲一、马大水，王一平、杨西光、王少庸、梁国斌等，从后台带出来。每个批斗对象交给两名工人看管，虽然说是不搞喷气式，但仍然在他们的脖子上挂了大纸牌子，悬在胸前，牌子上颠三倒四地写着他们的姓名，还用红笔在名字上打了几个大“ x ”。主席台上搭了几张乒乓桌，陈丕显书记和曹荻秋市长被带上桌子，低头弯腰，面向着广场上的群众。

由于大会筹备组事先通知陈丕显不准穿军装，所以他今天改穿了一件灰色的棉袄，曹荻秋仍然穿着他日常穿的蓝卡其上装，满头白发已经很久没有理了，被强劲的寒风吹得乱蓬蓬的。其它的市委书记、候补书记和常委们，数十名部、局长，都分别在乒乓桌的两旁，发言中叫到谁的名字，问到谁的事情，就让他上乒乓桌去“示众”。

在大会发言揭发批判的时候，每当发言人要陈丕显回答问题，陈丕显总是顶得很厉害，曹荻秋则用满口四川话一再说：“前一个时期

是我在主持上海的工作，我应该负责！”这时候，立席台上领呼口号的一男－女就大声呼喊：“陈丕显必须老实交代！”“曹荻秋必须低头认罪！”“打倒陈丕显曹荻秋！”“打倒上海市委！”

当工交系统的造反派在发言中点到马天水的时候，他跑上乒乓桌，佝偻着腰，抓住前面那个放得很低的话筒，主动地说：“我有罪，我要向上海人民请罪，我要交代！”接着就作起自我检查。徐景贤示意范佐栋停止了他的“检查”，让下一个揭发人发言。

会上，徐景贤作了长篇发言。其中，他对陈丕显的批判甚为精彩：

“陈丕显！在 1964 年某日，当你传达完中央的 23 条以后，你对曹荻秋说了什么话？”徐景贤把手里的笔记本向半空中一扬，逼问陈丕显。

“我说的话很多，时间长了，早已忘记了。”陈丕显回答。

“陈丕显！你想用忘记来抵赖你的滔天罪行，完全是徒劳的！你忘记了，我来帮助你记忆，你在那天对曹狄秋说：‘咳！老曹啊，你看我们的大老板啊，只要国家的仓库里有一点粮食储蓄了，就要想办法搞运动来折腾人了！’”

当徐景贤在揭发的时候，像模像样地学着陈丕显当时的说话声调，还看着陈丕显脸部的反应，当他看到他的旧主人迟迟没有反应时，又非常激动的大声地说道：

“陈丕显，你现在老实回答，你有没有说过？”

“好像是说过的。”陈丕显想了一回，眼见是赖不掉的，只好承认。

“什么好像？说过就是说过，没有说就是没有说！陈丕显！你到底有没有说过？”

“说过的！”陈丕显被迫到悬崖边上，只好坦然承认。

“陈丕显！你说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是不是恶毒攻击毛主席？”

“我不应该这样说话！这是对毛主席的不尊敬！”陈丕显不敢正面回答说是，但是他巧妙地回避了‘恶毒攻击’这个吓人的字眼，只是比较含糊又不痛不痒的回答。

“陈丕显，你知罪吗？”

“我罪该万死！”

“你有什么罪？”

“我不应该这样说。”

“这是什么性质的问题？”

“我罪该万死！”

别小看这个红小鬼，他虽然被揪斗，头脑还非常清醒，他不说别的话，只是翻来覆去的说我罪该万死。他的意思就是说，我已经万死了，你们还要怎么样呢？上面这几句对话，通过强大的高音喇叭，传送到上海人民广场的每一个角落，也通过广播电台和电视转播传达到千家万户。于是在上海市人民广场的上空，发出一阵又一阵的怒吼：“打倒陈丕显！”

“陈丕显必须老实交代！”

“陈丕显不投降，就叫他灭亡！”

“陈丕显恶毒攻击毛主席罪该万死！”

“……”

陈丕显也跟着群众一起大喊口号，群众举着拳头，他也举着拳头；群众喊“打倒陈丕显！”他也跟着喊“打倒陈丕显！”群众显得义愤填膺，他也显得义愤填膺。旁边的曹狄秋和魏文伯等其他当权派看了，立刻向阿丕学习，于是台上台下，斗争的人和被斗的人，都喊着同样的口号，都是义愤填膺，成了这次斗争大会最特别的一个场景。从此以后，许多被斗争的对象，都向陈丕显学习，只要群众喊口号，被斗的人也一定会跟着喊，跟着群众高喊要打倒自己。

## 第 379 回：通令三，请求改组沪市委　不低头，赵健民游街批斗

上海打倒市委的大会开了许久，潘国平忽然气喘吁吁地出现在大家面前，徐景贤和王洪文不约而同地问他："你到哪里去了？"潘国平不好意思地笑了笑，眯起了他那双小眼睛说："我……我一个人睡在武康路 2 号三楼的小房间里，睡过了头，也没有人来叫我……"

徐景贤埋怨说："谁知道你躲在小楼上，不然今天一早我就来喊醒你了。"

潘国平在主席台上转悠了一圈，看看主持人的位置已经落到了别人手里，只好自讨没趣，搭讪了几句走了。

大会开到一半的时候，张春桥、姚文元打电话到会场找徐景贤，让他和郭仁杰："你们在批斗会中间休息的时候到我们这里来一下。"

徐景贤和郭仁杰坐专车直奔兴国路招待所，张春桥、姚文元见了二人，对电视转播的批斗现场很满意，同时针对台上马天水的揭发表现说："这样做很好。让他们狗咬狗，使他们内部产生矛盾，让各种人都出来表演，不要怕。"

徐景贤跟郭仁杰得到他们的指示以后，重回会场，索性放开了：谁愿意上台揭发都可以上台，不加限制。这样，市委书记处的马天水、王少庸，市委办公厅的主要领导，曹荻秋、陈丕显的秘书们都上台抢话筒，纷纷作为知情人站出来揭发，揭发的材料很有质量，有些材料连"机联站"事先都没有掌握。

王洪文代表"工总司"作了《上海市委把炮口对准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滔天罪行》的长篇压轴发言。他的发言稿经过张春桥修改。王洪文先敬个军礼，然后念稿子。他说：

"我以万分愤怒的心情，向大家揭发陈丕显、曹荻秋一伙在安亭事件中，反对毛主席、对抗中央文革、围攻张春桥同志的反革命罪行。"

他在发言中一次又一次引述张春桥的话，多次提到"春桥同志指出"。在谈到"安亭事件"和如何看待"工总司"的问题时，他说：

"春桥同志指出，今天上海之所谓乱，不是因为有了这个司令部

才乱的，不能因果颠倒，因为乱才有司令部，不是因为有了司令部才乱。承认这个组织，不仅是宪法上已有规定的问题，还有个对群众组织采取什么态度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你去解散它，岂不成了陈独秀？”

他最后说：“十分明显，安亭事件集中暴露了以陈丕显、曹荻秋为首的上海市委早已变质为资产阶级司令部。在这样一个大是大非的问题上，从市委书记处到常委，没有一个人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没有一个人支持中央文革，没有一个人支持张春桥同志。对于这样一个受刘少奇、邓小平的反动路线指挥的司令部，我们革命造反派就是要打倒它，就是要砸烂它！”

王洪文振臂领呼口号：

“打倒以陈丕显、曹荻秋为首的上海市委！”

“谁反对毛主席，就砸烂谁的狗头！”

王洪文标准的普通话，到位的语气以及对陈丕显、曹荻秋的质问，取得了很好效果。

人民广场上的群众，在凛冽的西北风中整整站了 5 个小时，斗争大会一直到下午 15 时结束。最后，北京体育学院驻沪联络站的一个女红卫兵上场，代表各群众组织宣读了大会的三项通令：

一、宣布从即日起不再承认曹荻秋为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和上海市市长；

二、勒令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七天内向全市人民交代自己的罪行；

三、请求中共中央彻底改组中共上海市委，命令各级干部坚守岗位。

并在当天以急电形式发给毛泽东。

张春桥、姚文元在兴国招待所观看电视实况转播。当天，姚文元抑制不住内心的喜悦，写下了一篇《情况简报》：

“上海开了十万人大会，从上午10时到下午3时。有机关、工人、学生代表参加。中心口号：打倒陈丕显，打倒曹荻秋；陈、曹、魏、韩均到会。会后有通电、通令。不承认曹的市委书记，要求彻底改组

市委，立刻军管，陈一周内交代自己罪行。会议是成功的，秩序很好，市委可以说是肯定垮台了。革命形势大好。”

大会结束之后，上海外滩的一幢十几层大楼上，出现四条从顶至底的红色巨幅标语，上海，一下子为之轰动了。这四条巨幅标语是：

欢迎张春桥同志当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

欢迎姚文元同志当中共上海市委第二书记！

欢迎张春桥同志当上海市市长！

欢迎姚文元同志当上海市副市长！

四条大标语，一下子传遍上海滩。

大标语是“工总司”挂的，标语的字句是徐景贤拟的。

会后，郭仁杰建议，把电视斗争会的内容出专刊发行，把会上所有的发言及反映会场情绪的场面、当权派的表现等照片都刊登出来，还配发评论。专刊卖三分钱一张，很畅销。有的人看了电视后觉得不过瘾，还要看细节；有的人没看到电视，都去买专刊报纸看，在上海一时“洛阳纸贵”。

就在上海掀起一月革命风暴，不再承认曹荻秋为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和上海市市长的 1 月 6 日，云南省委第一书记兼昆明军区第一政委阎红彦的家被抄，大门贴了封条，大字报、大标语贴满了墙。

中午 11 时许，进驻昆明军区大院的部分群众，到省委书记处办公大楼找阎红彦，这时赵健民正在书记处办公楼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议，听到这一消息，立即宣布：“你们都走，我一个人留在这里。不然，全部被抓走，就非把阎红彦逼出来不可。”

省委书记、常委们很快离开了会议室。

大批群众开着宣传车，直奔书记处办公楼而来。赵健民从窗子里看到他们爬墙而入，立即叫人把门打开。

省委办公楼里没有人，冲进楼里的群众也不知道赵健民在哪个房间，这时有人提议用镜子从下边的门缝照进去，看里边是否有人？果然在一个房间的门缝下看见里面有人穿着皮鞋走动，冲击去一看，果然是赵健民。

领头的昆明印染厂汤克文认识赵健民，就说：“哈，赵健民，原

来你躲在这里啊？”

赵健民气冲冲的回答道：“躲什么躲？我在这里办公。”

汤克文追问闫红彦的下落，赵健民说：“不知道，即便是知道也不能说，这是组织原则。”

大家冲动起来，嚷成一片，把赵健民带到书记处小礼堂，开批斗会。后来人越来越多，冲到台上把赵健民押了出去，将他推上卡车，带到了昆明军区大院。，继续追问：“阎红彦到哪里去了？”

赵建民说：“我知道阎红彦在哪里，但不能告诉你们。不过我可以和你们商量、谈判、定几条，然后约个时间、地点，阎红彦和你们见面。”

“哪几条？”

“第一条，你们的人撤出昆明军区大院；第二条，阎红彦同志来后，不能进行人身污辱，不戴高帽子……你们答应这几条，我一个电话他就来了。”

造反派怒吼道：“不行！”他们逼着赵健民说出阎红彦哪里？

赵建民倔强的说：“阎红彦是第一书记，我是书记，我知道阎红彦在哪里。阎红彦在哪里，我知道也不告诉你们。只要你们撤离军区大院，我就让阎红彦来同你们见面，参加你们的大会。”

话音刚落，“打倒李井泉！”“打倒阎红彦！”“打倒赵健民！”的口号声就铺天盖地。

黄兆琪用高音喇叭高声问道：“赵健民知道阎红彦在哪里，就是不告诉我们，怎么办？”

底下的人喊道：“戴高帽子！”“游街！”

立即，有人将早已准备好的高帽子，扣到赵健民头上。赵健民怒发冲冠，伸手便把高帽子扯下来，撕掉了。他厉声抗议：“我是共产党员，省委书记，本届中央候补委员……”

他的话更激起了在场群众的愤慨，大家一拥而上，推推搡搡地将他拽上一辆公共汽车车顶，再次给他戴上高帽子。赵健民在汽车上奋力反抗，先后撕毁了 6 顶纸糊的高帽子，大骂这些人是反革命，高喊：“这是对共产党的污辱！”试图从汽车顶上跳下去。

两个彪形大汉生怕他跳车，死死地将赵健民的双手反拧在身后，他越挣扎，就越往后拧，用力将他按坐在公共汽车棚顶，不让他说话。

汽车缓缓启动，驶出军区大院，驶向春城街头，赵健民在汽车顶的行李架上，沿昆明市主要街道，游行示众达 3 个多小时。从下午 14 时 15 分驶出，到 17 时 30 分才回到军区大院。

游街中，公共汽车棚顶上的两个彪形大汉，始终死死地按着怒不可遏的赵健民。渐渐地，赵健民大汗如雨，全身湿透，腰背酸痛，以致完全麻木。游完街，赵健民被扶下汽车，谁料，双脚刚一触地，一阵剧烈的痛楚从后背传出，额头上滴落大颗汗珠，一下子瘫软摔倒，昏晕在地下了。在场有几个解放军干部碰巧看到，不禁“哇”的一声。过往的群众，看到如此情景，也发出不满的“啧、啧”声。

身体受到严重摧残的赵健民，疲惫不堪，气息奄奄，被送进了昆明医学院附属医院检查治疗。夜里，省委卫生所的医护人员，又把他抢出来，送到了昆明军区总医院。很快传出消息：他已处于病危状态。当天下午，那两位挟持赵健民游街示众的彪形大汉中的一位，头发蓬乱、面带愁容地对中央文革派往云南的记者肖健卿说：“当时我们只想按着他不让他动，还生怕他在途中跳车出事故。如果真要出了人命，那就糟糕了！”继而他又说：“我不相信，这肯定是造谣！”

赵健民被造反派强行扣押、挟持着在公共汽车棚顶上戴高帽子游街示众，并被扭伤腰脊住院的消息传到小麦峪，阎红彦听后难过得要流眼泪，继而气愤地说：“这成什么体统，怎么能这样对待老赵！叫老赵好好休息、治疗，其他一切有我们顶着，用不着担心！”他听说那顶给赵健民游街时戴的高帽子，原本是准备给他戴的，心里便产生出一股难以抑制的愤恨。听完这些情况，他以坚定的语气对周兴说：

“你与造反派谈判时，一定要严肃地提出，我若出去接见他们，一定不能再搞戴高帽子游街那一套。这种办法，是当年穷苦农民对待恶霸地主使用的，现在怎么能这样做，何况我如今还是在位的省委书记、大军区的政委！”

但不一会，他又低声自言自语说：“看来我要是出去，真还要有一个思想准备，说不定会比对待老赵还要厉害些？！”

6 日夜晚，周兴与造反派代表再次谈判时，提出了这一意见，要求在阎红彦书记出来接见群众时，一定不能给他戴高帽子游街示众。但是，那些被“造反有理”的理论武装起来的群众，按照毛泽东当年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所写到的办法，就是要给“走资派”戴高帽子游街，并说：“你若不投降，就要打翻在地，踏上一只脚，叫你永世不得翻身”。他们还未等周兴离开大院广场，就在昆明军区大门口的上端特意横挂出一条醒目的大标语：

“把阎红彦揪出来，戴高帽子游街示众！”

周兴乘坐小车，目睹了这条分外刺眼的标语，缓缓地从它的下面驶出军区大院广场。

晚上，云南省委副秘书长王甸在西山地下参谋部对工作人员说：“打游击这件事早一天下决心就好了，就可以多带一些人出来了”，又说：“如果联系中断，我们组织一个战斗队去串连，每人戴袖套，作旗子，这样好活动一些，到地、县委去。”

深夜，阎红彦与周兴在小麦峪商量怎么办？他们一致认为“昆明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指挥部”的做法是错误的。最后，由周兴主持起草，以省委名义给昆明工学院“823”的黄兆琪等写了一封“抗议书”，表示“一切后果由你们负责”。他们将“抗议书”连夜派专人送到军区大院。

7 日凌晨 3 点多钟，中央文革派往云南的记者肖健卿在睡梦中被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惊醒，他听到门外有汽车的马达声。隔门询问，站在门外呼叫的就是白天找过他的那位挟持赵健民游街示众的彪形大汉，他气喘吁吁地说：“请记者同我们一道去军区总医院探望一下赵健民的病情，我们不相信他真的处于病危状态，一来好放心，二来也好辟谣！”

肖健卿原本就想去军区总医院采访，了解事态的真相，如今造反派登门相邀，当即起床，与另一位同行记者和他们同车前往军区总医院。

夜阑人静，位于昆明郊区的军区总医院，一道铁制栏杆大门紧闭着，没有一点亮光，更显得格外静谧。在铁栏杆大门的后面是广场，

过了广场才是医院治疗、住院的大楼。造反派乘坐的卡车被阻挡在紧闭的铁门外。他们的到来，打破了总医院的寂静，任凭他们怎样鸣叫汽车喇叭，呼喊打开大门，但一直没有人前来搭理。那个“彪形大汉”特别着急，见此情景，便不顾三七二十一地攀着铁栏杆大门翻了过去，从里面砸烂铁锁，把大门打开。顷刻间，轰隆隆、轰隆隆，两辆卡车驶进了军区总医院广场，其中一辆车上的高音喇叭，对着医院大楼大声广播：

“我们是‘823’总部派来探望赵健民书记病情的代表，请军区总医院的革命左派支持我们的革命行动，把大楼的大门打开，放我们进去！”

随着喊声响起，原来漆黑一片的医院大院，从上至下，从下至上，接二连三地亮开了电灯光。不一会，大楼一层中央的大门打开了，但迅速被 3、4 列解放军，手挽着手，排成人墙，在门道里阻挡着。有一位解放军干部，手握半导体喇叭喊道：

“革命造反派同志，我们这里是军区总医院，是不开展‘四大’的军队医疗单位，住的都是伤病员，请你们不要大声喧哗，影响伤病员的休息。更不要随意冲击，破坏医院医疗工作的正常进行！”

汽车上的高音喇叭，以更高的声调压倒对方：

“请不要颠倒是非，诬蔑我们是来冲击军区总医院的！我们是要进去探望赵健民书记的病情！请大力支持我们的革命行动！”

这时，从军区大院广场又开来两卡车造反派。那位“彪形大汉”主张采取冲击军区办公大楼的办法，强行从人墙的头顶上爬进去。在门道口排成人墙的解放军同志，见此情景，手挽得更紧了，并齐声反复朗诵着毛主席语录：“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尽管如此，造反派中有 7、8 人，有意死命往前冲，让后面的人举着他们的身子，从人墙的头顶上，七蹬八踹地爬了过去。人墙自然地向后退缩，最后的一排，站立不稳，接二连三地一屁股坐在地上。这伙如同“敢死队”一般的造反派，趁势推开人墙，冲进了医院的大楼。

造反派涌进大楼，一时还找不到赵健民住在哪里，便满楼乱窜，

四处搜寻。医院领导见此状况，也有些着急，担心这近百名造反派蜂拥进大楼，万一闹出点什么乱子，自己也不好交代，他们被迫与造反派进行谈判，要求由造反派派出代表，有组织地到赵健民病房去看望，其余的人退出大楼，在广场上等候。

协议是合情合理的，很快便达成了。冲进大楼的造反派全部退出，然后指派 7、8 名代表，连同记者一起，前往赵健民病房看望。

代表走进赵健民所住的单间病房，只见他平躺在铁制的白色病床上，头部和双脚用特有的器械拉牵着，丝毫不能动弹。据医生介绍，他腰背的第 6 根骨椎，在游街时，被强制损伤错位了，如今正在采取牵引固定的办法进行治疗。赵健民环视四周站立的造反派代表，感慨的说：

“请造反派同志相信我，我赵健民出生在山东，曾做过地下党，不论在白色恐怖时期，或者在枪林弹雨的战场，我都从未动摇过革命意志。请你们一定相信我，我赵健民是绝对不会反对毛主席，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说到最后，他的眼眶里已滚动着激动的热泪，缓慢地流淌在两颊……

大家目睹此情此景，内心也异常感动了，同时，原有的疑问也全部消除，赵健民书记并未处于病危状态。发动深夜前来“探视”的那两位“彪形大汉”，也没等这场特殊的“探望”全部结束，就悄然地走出了病房……

## 第 380 回：不同意，刘少奇出去检查　说车祸，王光美被骗清华

1 月初，北京建工学院“井冈山红卫兵总部”、“前锋”、“八一战斗团”等群众组织先后向刘少奇发出“勒令”，要他前往该院作检查，并声称，如不能按时前往，他们就要“采取行动”。刘少奇于 1 月 5 日致信毛泽东：“北京建筑工业学院井冈山红卫兵总部来信，要我在一月七日四时以前到该院作公开检查。另有该院‘八一团红卫兵’来信，也要我到该院作检查。我是否到该院去作检查？请主席批示！”

1月6日，毛泽东对刘少奇关于北京建工学院红卫兵要他去公开检查的5日来信作了如下批语：

总理：

此件请你酌处。我看还是不宜去讲。请你向学生方面做些工作。

当晚 21 时左右，正在和陈毅、李先念、谭震林、谢富治几位副总理商谈工作的周恩来，突然接到刘少奇打来的电话，告知王光美被清华“井冈山”扣留。

原来，清华“井冈山”的学生见王光美对他们 12 月 25 日的最后通牒没有反应，以电机系二年级为主的几十个同学，便成立了一个“捉鬼队”，为首的叫李振言。他们策划了一个很详细的计划，准备把王光美骗出来。

1 月 6 日，李振言他们找到蒯大富，对他说：“我们想把王光美从中南海揪出来。”

蒯大富说：“我们提过要求，总理说了，不同意王光美回清华面对面做检查，要背靠背的写检查。等中央的部署吧。”

李振言：“那得等到什么时候？我们有办法，可以把王光美骗出来。”

“我们有办法。”其他同学也纷纷帮腔。

蒯大富不相信，说：“你做梦呢，刘少奇搞白区工作的，那么多年的地下工作经验，你想骗就骗了？”

李振言他们说：“老蒯，你给我们几辆车，我们准能做到。”

蒯大富说：“给车没问题，你们能成吗？”

这些低年级的同学在蒯大富的眼里就像是孩子，虽然他只比他们

大几岁，但总觉得比他们成熟。他以为这只是一群孩子在胡闹。

李振言说："你给我车吧，就让我们试试嘛。"

是啊，同学们的革命积极性不能打击。不就是要几辆车吗，"井冈山"当时控制着几十辆车呢。于是，蒯大富说："那你试试吧。"他并没有指望李振言他们能试成。

就这样，按照李振言的要求，蒯大富给了他们一辆吉普，一辆大轿车和一辆小轿车。

1 月 6 日这天，清华"井冈山"、北航"红旗"等 16 个单位召开"彻底打倒我国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刘少奇、邓小平大会。"会后，下午 14 时 30 分，一辆吉普车从清华大学开出，直奔北师大一附中。

15 时 30 分，清华园又开出了一辆大轿车。从车中不时传出一阵阵"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的《毛主席语录》歌声。这辆车上坐的是"井冈山兵团"的"雪莲花"、"傲霜雪"等 6 个战斗组的学生共 40 人，他们直接来到西单交通中队和北京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而清华"捉鬼队"的学生，首先来到北师大一附中找到刘平平。原来那天，刘少奇的女儿刘平平正在北师大一附中做检查，因为她支持工作组，积极参与了对学生的批判。

天渐渐黑下来，刘平平检查后的批判会也已结束，北师大一附中的学生陆续离校了，清华学生却将刘平平留下，要与她"座谈"。

……

18 时 10 分，快到吃晚饭的时候了，中南海刘少奇家中，电话铃声响了：

"喂！你是刘平平的家长吗？……我是交通队呀！……您的孩子刘平平今晚 5 时 40 分在和平门附近被汽车撞了，伤势很重，我们通知他们学校了，现在北京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请你们马上来！"

接电话的王光美一听这事，脑袋顿时"嗡"了一下，她正想细问，

对方已经把电话挂断了。

就在这时，电话铃声再度响起："喂！你是刘平平家长吗？……我是师大一附中呀！……刚才交通队通知我们。刘平平在和平门附近被汽车撞了……腿轧断了，要动手术，请家长去医院签字。"

刘少奇听说女儿出了车祸，十分着急，站起来说："马上要车，我到医院去！"

王光美忙说："总理不让我出中南海呀！"

于是，王光美让女儿刘亭亭和警卫班长骑自行车先去医院看看。

刘亭亭走后，王光美还不放心，又叫儿子刘源源骑自行车去医院。

此时，北京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的 12 台电话，在医院的协助下，已全部被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的"捉鬼队"控制。他们的人员正在急诊室，等候着即将到来的"客人"。

出乎他们的意料，一名中年军人和一名 14、5 岁的小女孩闯入医院。军人是刘少奇的警卫班长，小姑娘就是刘婷婷。

"刚才平平送到医院了吗？"刘婷婷一进急诊室就急切的问。

"没有。"该院的护士回答。

"噢……"刘婷婷和警卫班长一愣……

军人马上转身走向电话机，当他拨到电话号码时，被守卫在电话机旁的人按住了电话。

"这是急诊电话，你不能用。跟我们到那边去。"

进了另一个房间，清华"井冈山"的人问他：

"你是要站在毛主席一边，还是站在刘少奇一边？"

"当然是要站在毛主席这一边。"

"你要做口头革命派还是实际革命派？"

"实际革命派。"

"那好，把行动拿出来。"

"井冈山"的人想让这位军人将王光美骗出来。但是，几十年的职业警卫生涯和警卫职责，使这位军人除了他的领导对他的指示，是不会答应任何人的要求，包括这些素不相识的学生以任何名义和说辞，对他提出的任何要求。

“井冈山”的学生商量了一下，决定把他看起来，再争取年仅14岁的刘婷婷。

“婷婷，你应该造你爸爸的反，造你妈妈的反！”

到底是 14 岁的女孩子，她终于同意给她妈妈打电话了。当她拿起话筒，依然是十分犹豫的只说了一句：“妈妈，……”就停了一下，然后又接着说：

“……平平左腿伤了，……大夫说要动手术。”

“怎么样？到底伤得怎样，”十指连心，电话那边王光美则是焦急万分，电话中甚至可以听到她的哭声。“快！让大夫跟我说！”

医生很快接过了话筒：“喂！伤得很重，粉碎性骨折，正准备动手术，按规定，需要家长来签字。……”

“是不是让婷婷他们签？”王光美颤抖地问。

医生不知该怎样回答，按住了话筒，想让刘婷婷再跟她妈妈说。

“妈妈，妈妈”婷婷又说话了。但是，“王光美已去了。”对方电话中传出这样的回答。

原来，电话那边，刘少奇对还在犹豫的王光美说：“马上去医院！我们一定要去。你跟我的车去！”

“准备战斗！”医院里的“捉鬼队”发出了战斗指令。

20时左右，刘少奇他们到了医院。一下车，就见刘源源、刘婷婷和警卫班长与一群青年人在那里，没见到刘平平。

“平平在哪儿？”刘少奇劈头就问。

“呀！刘少奇！”在场的人都愣了，他们想都没敢想，富有“白区斗争工作经验”的刘少奇也被骗来了。随后，王光美下来了，她眼圈发红，不时拿手绢擦鼻涕。

“你们受骗了！”警卫班长喊道。

“妈妈，他们就是为了要抓你！”刘源源也喊了一声。

“清华园第一号大扒手王光美留下，其他人统统回去！”清华大学“井冈山”的学生以命令的口气说道。

刘少奇气得脸都白了，愣在那里……

学生们见王光美来了，目的达到了，对其他人的控制也放松了。

刘少奇的警卫班长迅速跑出去向上级做了报告，得到的答复是："刘少奇立即回中南海，王光美可以去清华。"

这时王光美哭了，她将刘少奇挡在身后说："好吧，我是王光美，我跟清华同学走。不是王光美的都走！"

警卫贾兰勋反应快，一把将刘少奇架进汽车，开回中南海。他生怕再生出什么事来。

王光美留了下来，她瘫坐在长凳上，左手托腮说道："让我镇静、镇静，镇静、镇静，……"

"跟我们去清华！"学生们命令说。

王光美站起来走了几步，又一屁股坐到沾满泥土的楼梯上说：

"咱们谈判，谈判……请坐。"她用手指着楼梯，让学生们也坐。

"你去不去清华？！"学生们喝道。

"谈判，谈判，……我们先来学习最高指示……"王光美说，就是不肯走。这时周围的人越来越多……

"井冈山"的学生怕生意外，一面围着王光美，一面要她快走，终于将她送上了吉普车。

"砰——"车门关上了，吉普车迅速离开了医院。

"你们是哪个系的？"王光美似乎已经从刚才的紧张情绪中缓和过来，她笑着问车上的学生。

"好几个系的！"不知是谁冷冷地回答。

"怎么样，受惊了吧！"另一位学生反问道。

"啊呀！你们搞得很富有戏剧性啊，不过你们的医院电话中有个小漏洞……"

"那你怎么还来呢？"

"当时听到平平被撞了，哪还有心思研究这个呀！"

……

"嘿！今天我棉鞋也没有穿，很冷。"沉默了一会，王光美又说"我很娇气，坐在后面颠得厉害，掉个位吧！"

……

回到中南海的刘少奇和他的几个孩子在院子里散步。夜黑如墨，

寒气逼人。走着走着，刘婷婷哭泣起来，伤心的呜咽声断断续续，在刘少奇的耳边和心里回荡。刘婷婷说，她这几天一直被造反派扣在学校里，亲眼看着姐姐刘平平挨批斗，现在妈妈又被抓走了……。

刘少奇爱怜地抚摸着刘婷婷的头，轻声安慰说："这不怪你们，是我犯错误了。我一定想办法把你妈妈接回来。"

进屋后，刘少奇马上给周恩来打电话，这就是正在和几个副总理研究工作的周恩来突然接到的刘少奇的电话。

周恩来放下刘少奇的电话，立即给清华大学蒯大富打电话询问情况。他对蒯大富说："无论如何，明晨 5 点之前，必须让王光美回到中南海！"

同时，周恩来让秘书孙岳立即坐上他的"吉姆"车赶往清华大学了解情况。

王光美被带到清华大学后，"捉鬼队"在化学馆给蒯大富打电话说："老蒯，王光美被我们抓回来了。"

蒯大富开始还不相信，忙问："真的？"

"当然是真的，现在就在化学馆呢。"他们说道。

蒯大富高兴异常，忙说："好，告诉广播台，马上通知批斗呀！"

高音喇叭响了，通知全校师生到西大操场开重要大会。很快操场上挤满了人。这种会总是有什么重大的事或重大的人物来临，所以师生们都会积极参加。

北京的 1 月，天很冷，那么多人全都站在那里。王光美说她冷，她出门的时候没穿好衣服，学生们就给她找了一件军大衣穿上。这军大衣是学生们去农村参加"四清"时借用的。她又说脚也冷，又有一个女同学把自己的棉鞋脱下来给她穿上。

批斗会还没开始，一位中年男子匆匆来到了主席台，自称是"周总理的秘书，是总理派来的。" 来人就是周恩来的秘书孙岳，在蒯大富与周恩来第一次谈话时，就是他在现场做的记录，蒯大富认识他。

孙岳一见到蒯大富就说："总理听说这件事后，立刻就派我来找你。"

蒯大富问他："总理同不同意我们批王光美？"

孙岳说："同意，但是总理要我告诉你，有几条指示：不能打，不能侮辱，斗完以后立刻让我带走。"

蒯大富说："那行，可以。"

蒯大富来到会场，用大喇叭宣布说："总理同意我们斗王光美，但是不能打、不能侮辱。"

22 时左右，王光美被带到清华大学西大操场主席台上，她穿着与同学换来的棉鞋，外面套了一件军大衣。

蒯大富问王光美："打没打你？"

王光美说："没打。"

蒯大富又问："侮辱你没有？"

她说："没有。"

但是第三条"斗完带走"，蒯大富没有宣布。

批斗会开始。因为事前毫无准备，学生们乱哄哄地批判。有些同学问什么问题，王光美也不回答，有的问题王光美随口辩答也就是反驳。因学生们只是按照报纸上写的或听说的王光美罪证来批判，这些罪证往往不是真实的，王光美的辩护也就显得有理。学生说不过王光美，斗不下去，就说王光美狡辩，将她带到办公室，逼着王光美写四条保证：一是承认清华师生揪斗她是革命运动；二是保证以后每个星期送一份检查过来；最后一条就是要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生活上揭发刘少奇。王光美前几条都接受了，最后一条当中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揭发刘少奇她也都同意了，但是从生活上揭发刘少奇她不同意，她一直不同意，就僵在那里了。

这时候，孙岳秘书在另一个房间不停的催蒯大富，让他赶快把人带走。

周恩来也亲自打电话过来问蒯大富："你们斗完了没有？"

蒯大富说："斗完了。"

周恩来说："斗完了就让孙岳同志带回来。"

蒯大富答应道："马上就让孙岳同志带回去。"

周恩来的电话放下时间不长，江青也亲自打电话来找蒯大富："蒯大富啊，听说王光美给你们揪回去了？"

蒯大富说："是啊，她欠我们清华的账，我们叫她还。"

江青在电话里"哈哈"直笑，她说："蒯大富，你不准打啊，不准侮辱啊，还有总理不放心，叫我给你打个电话，让你赶快把王光美放回来。"

蒯大富说："我一定执行。"

放下电话，蒯大富来到批斗王光美的那个办公室。僵持在那里的同学们看见蒯大富进来，就让开一条路。

蒯大富走到王光美跟前，她用一种很陌生的眼光看着他……

蒯大富问："王光美，你认识我吗？"

王光美说："不认识。"

蒯大富说："好啊，你差点没把我斗死，你还不认识我？"

王光美这才知道眼前这位就是她一直认为的那位反革命学生。她说："哦，蒯大富同志。"

她说着站起来，要和蒯大富握手。

蒯大富没理她，冷冷的对她说："坐下。"

王光美坐下后，蒯大富继续问她："群众批斗你、让你写保证，你为什么不写！你赶快写，写完回家。"

不知为什么，当时"生活上"三个字也没有划掉，王光美就签字了。就这样，她坐上周恩来那辆苏联产的吉斯牌老式防弹汽车，和孙岳秘书一起走了。

王光美回到中南海，刘少奇见到她，只说了一句："平平、婷婷哭了。"

过了几天，清华《井冈山》报整版刊登一篇文章《智擒王光美》。这时候的清华《井冈山》报发行量仅次于《人民日报》。蒯大富拿着这期报纸回到宿舍说："戚本禹称赞说：'这文章真好，可惜《人民日报》不能登。'"

## 第 381 回：夜半寒，王、戚访清华附中　封长江，津浦线再次中断

1月6日半夜，清华大学送走了王光美，王力、戚本禹突然来到了清华附中。他们先到“井冈山”那边，谈了一阵后说要看看卜大华他们的“红卫兵”，又来到“红卫兵”宿舍楼一楼的一个房间。卜大华等几个“红卫兵”都在屋里，戚本禹对他们说：

“我们过去有过一段战斗的友谊，现在呢，我们希望还能够保持下去，希望你们还能听毛主席的话，好好地把文化革命进行下去。”

王力、戚本禹到清华附中的消息很快传开，不一会儿，房间内外就聚集了好多人，有“红卫兵”的，也有“思想兵”的，也有“井冈山”的，连楼道里都挤满了人。人多嘴杂，秩序混乱。有一个学生在门外高声问道：“戚本禹同志，请问什么叫革命群众？”

戚本禹大声回答道：“你就是革命群众。”

那个人继续说：“那他们为什么说我们不算革命群众？”

卜大华说：“没有那么回事。我们‘红卫兵’写了《紧急呼吁书》，我们是反对打人的。”

戚本禹说：“你们反对打人，为什么还要‘绞死蒯大富’？”

有人说：“王任重是他们的黑后台，他们受王任重操纵。”

卜大华说：“王力同志在这儿，他很清楚。我们和王任重有过什么接触，我们都向他们做过汇报。”

王力没有说话。

王力、戚本禹走了以后，清华附中掀起了轩然大波。“红卫兵”认为戚本禹此次过来，是教训了他们一顿，这让“红卫兵”十分恼火。第二天，几个人在教学楼一楼大厅正面墙上刷了一条大标语：“王力、戚本禹 1 月 6 日的讲话糟！糟！糟！”署名用的是“联合行动委员会延安战斗兵团”。

还有人比他们行动更快。此时，在门厅东面墙上已经有了一条大标语：“王力、戚本禹，你们这样的人，十个有十个要失败！”

清华附中“井冈山”则针锋相对，把王力和戚本禹的讲话整理出来，贴在教学楼门厅里。并且还贴了大标语：

“王力、戚本禹一月六日讲话好！好！好！”

“联动”12月26日大会后，清华附中的红卫兵去医院看望因患肝炎住院的骆小海，将“联动”12月26日晚上展览馆大会的情况告诉他。骆小海激动之下，写了一篇《问罪中央文革》的文章。稿子拿回学校，卜大华看后说：“这个东西不能写，不能拿出来，拿出来是授人以柄。说也行，谈也行，但不要用文字的东西。不管是谁，把这个东西拿出去，只能一个结果，就是被抓起来。”他将稿子扣下了。

王力、戚本禹到清华附中后，邝桃生忍受不了了，他将骆小海在医院里写的那封《问罪中央文革》的题目改为《致中央文革》，自己做主，于 1 月 8 日晚上，用“延征”的笔名抄成大字报贴了出来。

《致中央文革》中写道：“且不说中央文革小组破坏了‘学生中的问题一律不整，不许用任何借口去挑动学生斗学生，即使是真正的右派分子，也要放到运动后期酌情处理’这一条写到十六条上的规定，单是擅自动用公安机器镇压批评，践踏十六条的做法，就是十分错误的。镇压批评，是国民党的作风，是‘左’倾机会主义的作风。国民党害怕批评，禁止批评，谁批评他就逮捕谁，迫害谁。中央文革小组比我们熟悉党史，当时谁批评，谁反对‘左’倾机会主义的中央，就给谁扣上一个‘右派’的帽子，‘反革命’的帽子，并加以逮捕，甚至枪毙。他们叫做‘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中央文革小组今天的作法，同当时‘左’倾机会主义的作法，何其相似乃尔！”

“既然中央文革小组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你们有缺点，就不应该害怕别人批评指出，不管什么人，谁向你们指出都行，只要我们说得对，你们就必须改正。如果我们说得不对，你们也应该以此加勉，引以为戒，而不是如江青同志说的‘不要理他’。我们晓得被中央文革小组批驳的‘要革命的站过来，不革命的滚蛋’这一句谬言是从江青同志所说的‘要革命的站过来，不革命的走开’这一句话翻造的。毛主席批评江青同志狭隘，我们加一条‘感情容易冲动，爱感情代替政策，说话不负责任’”。

《致中央文革》指名道姓地批江青，批中央文革。它一出来，就像一颗重磅炸弹，迅速传播，造成很大影响。清华附中贴出了很多大标语：“坚决镇压反革命分子延征！”此时邝桃生已经隐姓埋名，跑

到外地躲起来了，再也不敢在任何场合出现。

清华大学的唐伟、朱德明、许胜利三名“井冈山兵团”总部委员自 1966 年 12 月 22 日宣布退出清华大学“井冈山”总部后，于 1967 年 1 月 2 日又单独另组了“毛泽东思想纵队”，名义上仍属“井冈山兵团”。唐伟在策划成立这一组织时，他的同伴说：“我们与他们针锋相对，他们是‘团’，我们是‘纵’”，遂取名为“毛泽东思想纵队”，后来形成了“纵队派”。

1 月 4 日，一直与唐伟并肩战斗的“八八派”“玉女”陈育延贴出大字报，指责唐伟退出清华“井冈山”总部的行为是个人主义。她在出大字报中写道：“唐伟同志在个人主义的泥坑中是不会有所作为的”。

1 月 5 日，清华“井冈山”“28 团”将唐伟等抨击为资反路线在革命队伍中的代言人。清华“井冈山兵团”的分裂开始了。而清华大学的骗斗王光美的“1.6 行动”，更进一步加剧了清华“井冈山兵团”的分裂。

1 月 7 日，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内进行大辩论，由唐伟的“毛泽东思想纵队”对“28 团”，唐伟反对蒯大富他们采用欺骗的手段批斗王光美。这次辩论，使相当多的人站到了“纵队”一方，并且，新成立了一批支持唐伟的“纵队”：如：“八八纵队”、“东方红纵队”。与唐伟的纵队一起，被合称为“三纵队”。后来又出现了“毛主席警卫团”、“天安门纵队”等新组织，支持“三纵队”。

1月4日，北京大学校文革联合49个单位召开声讨刘、邓“反党”罪行大会，并通过《告全国人民书》说：“刘少奇是党内头号走资派，邓小平是党内第二号走资派”，“要把刘、邓彻底批倒、批垮、批臭”。

1月5日至8日，北大校文革联合北航“红旗”等21个院校的造反组织走上街头，举行“向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开火”的连续示威游行。

1 月 6 日，长江浦口轮渡停摆，京沪线再次中断。

事情的起因还是南京的“一三事件”。1 月 4 日上午，南京几千名“赤卫队”为“一三事件”聚集到江苏省委，部分“赤卫队”队员

还上街游行，谴责“红总”是“一三事件”的凶手。

1 月 5 日，南京大学“八二七”发出《紧急声明》，坚决支持“红总”朝阳区总部和一切造反派的革命行动。并强硬地提出：“以江渭清为首的江苏省委必须对此严重流血事件负全部责任。我们强烈要求，江苏省委立即交出凶手，由司法部门严加惩办！否则，我们将采取我们认为必要的、坚决的革命行动，由此产生的一切严重后果由江苏省委和江渭清负完全责任。”

曾邦元等人还向中央文革告状，称“赤卫队”是江苏省委组织的保皇派，江苏省委挑起了这场流血事件。

而“红总”方面也调集人马，以“不让浦口赤卫队过江”为由，封锁长江，停开轮渡。当时南京还没有长江大桥，火车要通过南京和浦口之间的轮渡才能抵达对岸。轮渡一停，京沪铁路线因此中断。

1 月 6 日凌晨 4 时，陈伯达以中央文革小组的名义给江苏省委打来电话，宣称南京的“一三事件”“是一场罕见的白色恐怖。江苏省委必须立即改变这种局面，坚决制止‘赤卫队’肆无忌惮的暴行”。并说：江苏省委“如果袖手旁观或者幕后操纵，一切后果都由你们负责”。

1 月 6 日下午 13 时，南京 20 多万造反派群众在人民广场举行了“一三惨案”控诉、声讨大会。大会由“省红总”司令部发起和主持。南大“八二七”、“南京八二七”、南京“红二司”、“红三司”和“首都红三司”、“全国革命造反串联总队”的代表出席大会。大会发言严厉声讨了“赤卫队”和江苏省委的“罪行”，并发出如下勒令：

一、四十八小时内江渭清出来向革命造反派低头认罪，并亲自探望受害者及其家属。

二、省公安厅和市公安局必须立即法办凶手，履行无产阶级专政，否则格砸勿论。

三、江渭清必须立即采取措施把所有外地来宁的赤卫队送回原地，并下令解散省委所控制的黑字系统的所有组织，逮捕其为首者，以恢复市内的正常秩序，保障文化大革命的顺利进行。

这天，江苏省委周一峰等人代表省委前往医院探视在“一三事件”

中被砸伤的曾邦元。

到了下午 16 时，江苏省委、南京市委负责人和“省红总”代表紧急达成“九项协议”：

一、立即追查一月三日在江苏饭店挑起武斗事件的南京市工矿企业赤卫队幕前、幕后的策划者，挑动者依法予以严惩。

二、凡参加工矿企业赤卫队的基层干部（党的支部书记、副书记、车间主任和副主任）。要立即一律退出。如果今后他们中间一小撮人在幕前、幕后挑动策划武斗要追查出来，是党员的一律开除党籍，是干部的一律撤职，情节严重的依法严惩。

三、以省、市委名义发出通告，立即要外地赤卫队员迅速离开南京，返回本地抓革命、促生产，其中的基层干部拖延不走者按旷工论处。

四、省、市委对在江苏饭店发生的武斗事件没有能够制止，是有严重责任的，必须向全省革命造反派和其它革命群众公开检讨、认罪。今后坚决依靠革命造反派采取有效措施，积极作好工作，防止类似事件的发生。

五、要动员离开生产岗位的工人立即回厂抓革命、促生产。凡是中共中央抓革命、促生产的十条规定（草案）下达以后，干部策划破坏生产的要追查责任，坚决处理，造成严重后果的要罢官，其中是党员的要给以党纪处分。

六、省委、市委组织慰问团对受伤者进行慰问。

七、省委、市委立即和革命造反派协商，固定办公地点。

八、认真解决外地来南京的革命造反派的吃、住生活问题。

九、在江苏饭店发生的武斗所造成的一切经济损失，应由省委、市委负全部责任。

京沪铁路线再次中断，让周恩来焦急万分。1 月 6 日晚，周恩来亲自打电话到江苏省委值班室，点名要找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江渭清立即赶到值班室，向周恩来汇报了“一三事件”的情况和省委的善后处理办法。

放下电话，周恩来又于当晚 22 时 16 分，在中南海会议厅紧急召

见南京大学赴京代表团 27 名代表，询问了每一个代表的姓名和籍贯以后，就立即详细地向他们了解了南京“一三事件”的情况，但这些在北京的南京造反派对南京的突发事件竟毫不知情，结果变成了周恩来向他们通报相关信息。

周恩来说：“交通问题关系太大，上海的煤也不够了，码头停了几十条船。你们既然是左派，一说就通了，不能再停了。江渭清讲已经达成了九条，我说九条比八条更加支持你们。省委最先站在革命造反派方面，我们就很高兴喽！”

同学们说：“‘赤卫队’在省委把桌子、椅子都劈了。”

周恩来：“连省委的东西都给劈了怎么行呀！现在的问题首先是交通要恢复。如果《九条》对你们有利，轮渡一定要恢复，你们应该恢复。”

他看到《九条》的第二条时，对彭冲说：“参加了工矿企业‘赤卫队’的有直属干部，彭冲同志，这就不好了，我们懂这个道理，党内基层干部有些思想保守的，没有想得通的，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偏爱保守派。这是一个原因，这也是一个重要影响。你们造反派不是坚决拥护和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吗？你们要帮助党，不要让老干部继续增加反感。除了少数坚持不改，甚至还在顽抗，那些自然是自觉的；还有那些不是有意顽抗的，是不自觉的，你们提口号不要一律骂到，要跟我们合作，你们这些勇敢的闯将，是帮助我们党中央作好工作，同我们一起克服这一时的困难，一时的波折。一种是自觉的，一种是不自觉的，分两类，成为一般逆流。当然要一分为二，否则对我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不利了。”

这时，周恩来又出去和江渭清通了一次电话回来说：“这个《九条》已经签了字，他们正在印，还没有公布，问国务院有什么意见。这是比较支持左派的一个协议，会不会下面会出事情？这个协议不管将来执行如何，文字本身是支持造反派的。”

此时已是深夜 24 时 35 分，中南海西门、西北门、北门仍然聚集着大批群众，据总理值班室当时的电话记录：“(中南海的)西门和西北门各有三四千人，北门有一千多人，南门(新华门)也有二百多人。”

当时，中南海的几处大门已经被围得水泄不通，高音喇叭对着中南海广播，要揪斗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学生们还时常突破警卫防线，造成中南海四个门频频告急。

告急电话打到周恩来这里，他让南京的代表们先休息一下，然后急急赶去中南海西门接见“批判陶铸联络委员会”的代表。

1 月 7 日凌晨 1 时，周恩来在中南海西门对“武汉专揪王任重代表团”说：“王任重主要在湖北，省委想卸包袱，揪他到北京，不行，要在湖北批深批透。他身体不好，主席意见让他留在湖北。”

在谈到陶铸问题时，周恩来对“批判陶铸联络委员会”的代表说：“陶铸同志要检查，不能马上见你们。因为他是中央常委。首先要在常委中检查。现在你们手头材料还不多，你们根据实事求是整他的材料交上来。现在你们举行批判陶铸的大会不合适，因为中央常委对这个问题没有讨论，你们开，我们不能参加，那就不好了。你们现在要多收集他的材料，可以贴大字报。”

## 第 382 回：难安睡，陈、江又到新华社　如赶场，周恩来一夜未眠

周恩来在中南海西门回答完“批判陶铸联络委员会”代表们提出的问题，已是凌晨 2 时 10 分，他又回来与南京代表们接着座谈，继续商议《九条协议》。他问：

“你们从电话中还得到什么消息没有？你们得到的反映有工人赤卫队还在南京，刚才得到消息，三元巷 500 名赤卫队和 1000 多造反派有点冲突，新街口也有事，在街上捉他们游街，遇到挂黑袖章的就捉，肯定要发生摩擦。学校有个不同，可以到外地串联去，工人不同，还是要回到工厂生产。这次工人运动来得猛，本来想学生左派搞好了再搞，十一中全会后，学生左派也没搞好。

十一中全会前，江苏省会搞了一个报告，搞了个摆擂台辩论，还说南大最好的方式是辩论。第一次是上《新华日报》的一次，第二次是辩论省委的一次。第三次是关于给匡亚明戴高帽子的辩论。”

周恩来说：“这样形式，为了说服保守派，我还介绍了，让江渭清、谭启龙到清华作介绍，江渭清还生动地摆了擂台。原来才知道工作组的报告还不确实。这是十一中全会以前，实际上是一样执行了刘邓路线，那时候他们还以为不是方向、路线的错误，很自负。这样反而把意见加深，辩论 8 次之多，继续支持保守派，压制左派，这样就把错误加深了。”“江苏省委对错误的认识不那么明朗，”他问谭震林：“你听到他的检查没有？”然后对学生说：“我没有听到，听别的同志告诉我，很不深刻，错的一定要改并且要采取具体步骤，进行实施，我委托许家屯同志回去作检查，省委写给那个总部的信是你们查出来的，江渭清的检查你们嫌不够，他们嫌高，希望许家屯同志回去坚决执行中央指示，支持左派，加强教育保守派，最后才能团结 95 %的人，省委要做工作，你们也要做工作。”

“省委来电话说：坚决站在左派方面决不动摇。”接着他念了江苏省委的来电，继续说：“实际上不信左派，还要宣传教育保守派，干部可以退出‘赤卫队’，教育保守派认清形势，摆脱被动的形势，批判省市委的错误，应该有这样的决心才好。”

周恩来又将话题转到《九条协议》上来，他边读《九条协议》边

说："如果立即追查幕前幕后的，查出省市委的人幕前幕后的一条处理，这样可以按第一条处理，第三条是要引起波动的，最好不要引起冲突，昨天 6 点我又跟铁道部的谈，说交通还未恢复，轮渡只能运客车，货车还不能运，这是最关紧要的事，南京是枢纽，上海的存煤只有两天了，当然北方的船可以运，不过冬天有的地方冻了。这是最紧急的事，影响到国内外，影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进行。"

"今天晚上联络站开会，要把我的话告诉他们。交通问题我最担心，问家里的意见怎么样？你们开会的情况，南京现在的情况，对《九点》有什么意见？"

"《九条》我是同意了，就是到现在还没有发表。我要江渭清赶快到'红色造反司令部'去联系。省委支持造反派，这是个基本转变，这是最大的前提、大方向喽。追查出幕前幕后策划的人要惩办。要省市委号召外地来的'赤卫队'回去，江渭清要作检查。"

"我认为省委的这个态度，大方向是转过来了，一下子转 180 度很困难，这基本上是 180 度了，应该欢迎这个转变，我打电话给许世友，要江渭清无论如何要回来，要支持革命造反派，中央文革也打电话给江渭清，要他无论如何要支持革命造反派。"

有同学出去接电话后，回来向周恩来汇报说："北京去南京的火车不开了，我们要回校的 20 多位同学等在车站走不了。"

周恩来马上说："派飞机送你们，《解放军报》社两个记者与你们一起去。"他立即让人安排飞机，就在上午起飞。然后，周恩来对许家屯说："你们省委有一个地点公开办公，与造反派联系。"

说罢，他又对学生说："你们不要去搞，这样可以与我们保证联系，要求快。"

同学提出："造反派准备把江渭清带到北京，并希望中央能否有个书面的意见，让我们带回去。"

周恩来说："你们回去与'827'和'红色造反派'说清楚，让他们有机会考验他，彭冲在南大问题太多，你们带他回去，其他人将功赎罪，希望干部在大风大浪中考验，总要给他们考验，现在初期，没有同志代替，中央不同意停职反省太多。叫他们做工作，又去批评他，

你们回去与领导、造反派说通，否则领导不了解，回去与总部共同商量，把意见告诉我们。”

接着他又对许家屯说：“省委要引咎自责，号召群众不要把矛头指向群众，要认罪，认过，这样中央指示才能对症下药，究竟现在说什么，还需要你们回去以后给我们打电话。《九条》太具体了，有困难，搞原则些比较好，你们这个建议很好……”

1 月 7 日凌晨 2 时 30 分，已经吃了安眠药的陈伯达、江青也从被窝中被叫了起来，与戚本禹、唐平铸等人一起到新华社，为 1 月 5 日封闭新华社革委会一事接见新华社的群众。陈伯达先让江青讲话。江青说：“我想同志们很关心毛主席的健康。我告诉同志们：很健康！”

现场群众热烈鼓掌，高呼：“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她接着说：“我没有什么更多的话来讲，因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

……

我这次来就是因为这一张传单。”

江青给大家看新华社“新闻造反团”印发的传单，题目是：《揭穿一个大阴谋》，揭发熊复伪造毛泽东和刘少奇在一起的照片。

江青说：“有的同志就是拿着这张，这张东西我收到以后就跟伯达同志商量来看看同志们。虽然没有调查研究，但知道你们这里好像挺复杂的。……刚才接到一个信，是新华社江苏分社赴京代表团。我们想单独地谈一下，”

“有一个同志写的条子，说要我肯定一下，封闭了你们这个革委会是革命的行动，这点我不太清楚。如果这革委会已经不能领导你们进行斗争，进行革命了，那么可以改选，也可以部分改选。这点我觉得是可以商量的。但是如果这个革委会是革命的，那么可以不要封它。如果它已经阻碍你们革命了，封了它是可以的。”

下面群众热烈鼓掌。

江青接着说：“当然罗，革委会里不一定都是不好的人，也可能是好的革委会，不过最近出了这样一些怪事儿啊，这革委会可能也有点儿问题。这个怪事就太大了。因为这张照片看起来令人气愤，并且

是完全是弄虚作假了。这在新闻摄影方面是不允许的，这是资产阶级作风。并且是对于我们目前现实的政治情况不符合的。对于两条道路的斗争、两条路线的斗争都是不符合的，这样排列伪造出这么一张照片来，而且在全国发行。大概只有《人民日报》、《解放军报》没有登了，很多地方登了，你们自己讲得很对了。”

“有的同志要我介绍熊复同志的情况。我对这个人不了解，不熟悉。不过就他这一段工作来看，我觉得做得不怎么好，应说是有点坏。因为这些照片什么的都通过他手嘛。还有在 10 月 1 号的时候又发生口号的问题，你们知道不知道？”

群众高声说：“知道！”

江青：“出尔反尔，搞了好几次，搞得群众差一点……红卫兵又要保卫毛主席、党中央。解放军也要保卫党中央、毛主席。那么，这差一点就要发生误会了。就是因为他这样反反复复，改了三次，是吧？……不过有一个情况可以提供同志们，我也没有最后核实，但是已经有相当程度的核实，就是熊复究竟是不是一个共产党员？有疑问。就是他到延安的时候不是共产党员，是带着一个民先队员的介绍信，这个同志还在，他很好。在海军工作，他提供了这个情况，我们还要找他再去核实，已经核实了一次。那么他自己的填表呢？就填成是共产党员，并且把这个年代提得更前。所以他的党的介绍人也就发生问题了，这很可能有伪造的可能。当然罗，也可能他是以后入党了，想把党龄搞长一点，或者怎么样，这个我就不清楚了。……了解的情况不够多，所以也没有更多的话讲。就请陈伯达同志讲一下吧！”

陈伯达说：“我这个讲话首先是承认错误。我来过新华社两次。那个时期，因《人民日报》工作组的关系来的。因为新华社和人民日报的工作有密切的联系，来看了两次大字报，……后来，在 6 月中旬以后，我就说了，新华社我不管了，我这个人工作能力太差，管不了这么多，《人民日报》都没有能够很好的管，又要管新华社，又要管广播事业局，我不管了。那个时候有一些人到这里来，我说，马列主义研究院有人到这里来，我说你们是学生嘛，只能学习，后来听说又当成中央工作组看待了，我就发了很大脾气。我说是什么工作组呀！

去学习，当学生，所以这里出现了一个假工作组，这是一个假工作组，因为这些人我根本不认得他。”

“今天晚上我老实说我已经吃安眠药好几个钟头了，江青同志提议说来看一看大家，见见大家。这有两个传单：一个是‘揭穿一个大阴谋’，这个照片，是新华通讯社‘新闻造反团’揭露的；还有一个传单是新华社‘毛泽东思想战斗团’发的。新华社革命群众造反行动好得很。因此江青同志建议来看看大家，我同意她这个建议，同时向大家进行自我批评，就说明我有官僚主义嘛！可能我的官僚主义不只是在你们这个地方，好多地方。连《人民日报》在内，《人民日报》我也不大管了。无形当中工作组就消灭了。《人民日报》的工作组大概干了一个月的时间吧！”

“从新的中央宣传部陶铸同志接管宣传部以后，就接管了新华社。这个新华社在他接管以后，搞了好多非常糟糕的事情，同党的十一中全会相对立的一些照片，明明把中央所批判的以刘邓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样一些代表人跟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凑在一起，硬要凑在一起，有好几次，你们今天这张，只是其中一张。刚才有个同志递了个条子，才可笑哩，说有一张邓小平的照片，身子是陈毅同志的，头是邓小平的。这么凑的！就是想各种办法要在他所操纵的新华社发表的消息，发表的相片和电影，把刘邓美化。这些算是什么东西？是什么性质的？”

众人说：“反党！”

陈伯达：“由你们判断，是不是呀？”

群众呼口号：“打倒陶铸！”“打倒中国最大的保皇派陶铸！”“敬爱的毛主席万岁！”

戚本禹插话：“还有些电影，我把情况说一说吧！主席接见几次，拍了一些电影，这些电影在审查时，发现他们在拍的电影当中，他们突出刘邓，把刘少奇、邓小平的画面搞得很大，形象搞得很大。当时，江青同志、伯达同志指出了这个问题，后来才不得已作了修改。”

陈伯达：“所以，我们看的很清楚，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新华社这个斗争很激烈的。在一切文

艺界斗争是很激烈的，现在还是很激烈的。你们挺身而出，来揭露这些事实，我们感谢你们！至少使我增长了许多知识，识别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怎样搞阴谋。这些照片你们还有一些，还可以找出来，作为教育的材料，作为反面材料。我这个讲话就完了！可以了吧！太长了吧！”

这时，围在中南海外面的北京建工学院“八一战斗团”、“井冈山”又下了《最后通牒》，要求在 7 日凌晨 4 时之前给予答复，否则就要采取行动。凌晨 2 时 50 分，周恩来匆匆结束了与南京大学代表的座谈，于 3 时许，赶到国务院会议室接见北京建工学院和清华大学的代表。在场的还有建材部部长赖际发，建材部政治部主任钟炳昌和建委的孙敬文。

周恩来逐个和代表们握手，当问到建工学院一位“八一战斗团工人红卫队”的队员时说：“你是瓦工。瓦工，学生能不能学？”

众人答：“能。”

他又问赖际发：“你会不会？”

赖际发说：“不会。”

周恩来笑着说：“要学嘛。”

问到另一油漆工人时他幽默地说：“你是油漆工，现在好啊！红海洋、南京市、南昌等地很多，一片红，完全故意抵制大字报上街。”

周恩来问赖际发：“赖锐锐怎么样？这孩子还很顽固，怎么这样顽固？家教怎样？孩子是否有抵触情绪，受谭力夫影响，觉得对老干部怎样。西城区纠察队开始还好，从第三号通令起，强调保卫老干部，老干部好，不许动，以后更不对头。家长和儿子互相影响，老干部影响后代，儿子影响老子，有股怨气，还有抵触的不好。过社会主义关不容易，不光过社会主义，还要怎样过共产主义。红卫兵起来冲我们是好事，这半年我一直和红卫兵在一起，一直为你们服务。”

他问“八一战斗团”：“‘八一团’最近大发展了！现在有多少人？”

“八一战斗团”的代表做了回答，接着说：“刘少奇（去年）8 月到我院放了毒，‘八一团’和‘井冈山’都勒令他回建工学院检查。”

周恩来说：“你们下了通令，说 4 点让答复，否则，要揪。所以，

把我揪出来了。你们要送大字报，我们可以转送。要揪不行，主席让我来劝你们不要揪，你们可以送大字报。”

建工学院：“要不揪他，起码得让他给我们一个书面检查。”

周恩来：“你们要他写书面检查，我得报告主席。清华也要揪……刘涛过去写个检查，大家看水平那么高，后来才知道是王任重搞的，他要秋后算账。”

“八一团”代表：“刘少奇也是这样，他说：‘要蛇出了洞才能打。’”

周恩来：“刘少奇是一去就讲话吗？”

众答：“是。”

周恩来：“他向两面调查了没有，调查了受打击的没有？”

众答：“没有。”

周恩来：“这倒是新事，我到二外先连着看了 5 天大字报才讲话……”

接着，学生们又和周恩来谈起了“黑材料”的问题，周恩来对赖际发说：“下命令嘛！怎么还收不上来？我给你们解决问题，想树立个典型。凡是一切在文化大革命中整的材料，包括两个部（建工、建材）建委，包括他们建工学院在内，在 1 月 7 日、8 日、9 日三天之内，每天上午专门停几天，所有单位专门清理一下。”

建工学院的学生又提出：“我们今天下午要搞联合行动，到中南海揪刘少奇。”

周恩来说：“不要揪了，总要照顾党和国家的影响。现在反正 4 点已经过了，4 点前你们同意不揪，我要向主席汇报。”

“八一团”交给周恩来一封给刘少奇的信。周恩来说：“反正动员我是最容易。我说老实话，中上层干部都是有抵触情绪，要做艰苦细致的工作，要配合我们，要减少阻力。运动为什么发生不利因素，如铁路断了，本地不解决矛盾上交。不让来，就抢车，卧轨，造反派占了上锋，保守派就不行，完全不答应也不行。 工人运动起来了，铁路工人也参加。工人参加就两派，有造反派就有保守派。铁路工人分两派，说开车就开车，上海、蚌埠、南京停了 12 天……外轮到上海卸不了货，英国写信抗议，罚款，本来阻力是少数人，但影响最大

的。绝食，领导有人抵制，怕字当头。问题越闹越大，一不敢见面，二不解决，青年没办法，就绝食。不仅西安还有新疆……铁道学院。

绝食还不能马上批评，绝食我们从没说过是革命行动。还不能答应条件，否则都用绝食来要求，成为规律也不好。主席在第一次就说："'劝大家吃饱了饭干革命。'现在是毛主席绝对领导。还有人闹到中央，要么打电话，要么到北京。等他们到北京了，精神恢复了，再说绝食不好，但责任在机关。有些工人自己呼吁不要绝食，这事又有，最近又有一次。找你们动员点力量，做好了建筑系统，在全国试点。这是个大队伍，然后全国大串联起来。"

他又对赖际发说："你们（被揪）来国务院，创了最高记录，5天5夜还这样。"

他对代表们说："我们谈过了，大喇叭成天在中南海门口广播，我们睡觉都没个时间，我身体还好，毛主席也在中南海，影响休息。喇叭不要早早到中南海去。要搞军事训练，一要有革命性，二要有科学性，三要有组织纪律。"

他对赖际发说："不支持左派力量，他们不信任你，便没依靠，眼睛得向他们嘛！"

同学问："主席是否写了第二个大字报？"

周恩来说："没有，我不知道。那篇'论左派'很反动，还加给姚文元，说他写的，这你们也能看出来。主席诗词也是这样，有些不是，比如上井冈山，主席是写过，一直在修改，但未定稿，结果不知怎样传了出去。因为没完，后面几句是别人加的，根本不是主席的。"

当周恩来拖着疲惫的身躯回到西花厅，秘书又报：以部队在京院校为主，加上清华大学"井冈山"等20个单位组成"彻底打倒贺龙反党篡军集团联络委员会"，准备7日在工人体育场召开批判斗争大会，并要把贺龙揪出来示众。周恩来又赶紧找有关人员做工作，劝阻揪斗贺龙。

7日早上，周恩来派"子爵号"专机送许家屯、彭冲及中央文革记者站南京组的记者郑钧亭、邢文举和南京的学生回到南京。邢文举到南京后，立即找到"红总"了解情况，有人激动地对他说："'一三事

件’十分严重,已死了许多人了,这是阶级敌人向革命造反派报复,血债一定要用血来还!”

但是,邢文举和郑钧亭经过实地调查,始终没发现一件死人的证据。

这天，江苏省委召开书记处会议，决定派李士英、许家屯等人去做“红总”群众的工作；派包厚昌等人去做“赤卫队”群众的工作；派陈光等人去做机关干部的工作。

听说中央文革记者站的记者已经回到南京,江渭清专程到华东饭店找到他们说:“邢记者啊,请你们帮帮忙吧,一定要调查仔细,如实向中央报告啊……”

邢文举对他说:“据我调查,‘一三事件’一个人也没死,……请江书记放心,我们会妥善处理。”

江渭清听了这话,似乎松了一口气。

在各方的共同努力下，“一三事件”终于平息。此后不久，包括南京大学“红旗战斗队”在内的保守派组织纷纷宣告解散。其成员或者成为“逍遥派”，或者参加了“红总”或“八·二七”。

## 第 383 回：农口反，接见七级部代表　忙劝架，中南海再次告急

上海市开完“打倒上海市委”大会的第二天，1 月 7 日，徐景贤来到兴国路招待所见张春桥和姚文元，一方面急于听到他们对大会的反映，另一方面要向他们请示大会的发言稿、通令和致敬电如何发表的问题。

兴国路招待所位于上海西南部安静的一角，是过去法租界里面外国大老板的别墅区，一个广袤的大花园里错落有致地矗立着十几座欧洲风格的建筑物，里面有非常现代的设施，院子周围是高高的围墙，墙上还安装着铁丝网。这里属于市委招待处管理，专供中央来的要员居住，环境幽静、戒备森严。新来的警卫战士都不认识徐景贤，他们从传达室打电话进去通报。过了一会儿，张春桥的秘书何秀文出来接他。

走进会客室，徐景贤看到张春桥和姚文元正坐在沙发上谈话，在靠墙的一条长桌上，安放着一台电视机，他这时邀功心切，招呼了一声后，脱口就问：“看了大会的电视实况转播没有？”

张春桥一边示意徐景贤在旁边的沙发上坐下，一边回答：“看了，我们昨天从头到尾都看了。大会开得很成功，特别是下面群众的情绪很好，一直坚持到底，你们把陈丕显、曹荻秋揪上边批斗，搞臭，很好。就是开会的时间长了点。”

张春桥平时很少说赞扬的话，从他这几句评价可以看出，他对这次大会是很满意的。

和张春桥比起来，姚文元今天显得更加喜形于色，一反他平时说话稳重的样子，他讲话时的习惯，是用右手食指频频地戳点着面前的桌子，说到兴奋处略为有些口吃，同时喜欢重复使用词语：“上海的工人阶级真好，真好……那么冷的天，地下又是湿的，站在那里几个小时，一动也不动，真有纪律，真有纪律，了不起！”

张春桥深深地吸了一口烟，朝面前茶几上的烟灰缸里弹了一下灰，徐缓地说：“几个人当中，陈丕显态度最差，曹荻秋老把事情揽到自己身上，比较起来，还是马天水的态度好一点，这和过去上海造反派的反映是符合的，也和我们在北京中央工交工作会议以后，和他

打了招呼有关系……”

姚文元侧过身来问徐景贤：“你们把魏文伯拉到会上去干什么？他不是已经调到华东局去了么？”

徐景贤答道：“魏文伯过去长期担任市委书记处书记，机关干部对他意见很大，他在市委工作时的那些账，应该清算。”

张春桥淡淡一笑，眼睛从镜框后面看着墙壁：“这个人看来民愤比较大。”

接着，徐景贤向他们汇报了《支部生活》的造反派提出的要求：希望把大会的全部发言稿，通令，致敬电等，全文在《支部生活》刊物上发表，出版一专刊，印 100 万份，向全市、全国发行，这样既能扩大大会的影响，又能在实际上把市委党刊的权夺到手了。徐景贤支持他们的设想，但涉及到点名批判，所以需要请示一下。

张春桥沉思了一下，说“在中央没有批准在报纸上公开点名以前，我想，批判发言稿在内部刊物《支部生活》和《工人造反报》，《红卫战报》上登登，还是可以的。他看了一下姚文元说：“文元，你看怎么样？”

姚文元从沙发的靠背上挺挺身子：“同意，只要《解放日报》、《文汇报》暂时不点名，就可以。关于在大报上公开点名的问题，我们以后要向中央写一个请示报告。”

正说着的时候，姚文元的妻子金英回来了，她这几天也住到兴国路招待所，和姚文元在一起，金英是卢湾区五里桥街道的党委书记，她说：“今天全区的街道党委书记被集体批斗了一次，我也上了台，挂了牌子，造反派对我还算客气。”说罢，姚文元和她一起上楼去了。

张春桥的儿子毛弟，10 岁左右，从花园里蹦蹦跳跳地跑进来，拖他爸爸到客厅外边的阳台上去玩。张春桥答应着，招呼徐景贤一起过去。阳台上用白瓷砖铺地，放着一张圆的藤桌和几把藤椅。阳台前面是一排明亮的落地长窗，晴天可以让阳光洒满整个屋子，阴雨天又可以遮风蔽雨。打开玻璃门，跨下几级台阶，有一条水泥铺成的小路，横亘在天鹅绒草地上，曲径通幽，一直伸展到远处的香樟树林里。

张春桥和徐景贤在藤椅上坐下，毛弟靠在张春桥的膝头，张春桥

指着徐景贤对他说："毛弟，你不是说要看看'工总司'的王司令吗？喏，这里也有一个司令，他是机关里造反的'徐司令'。"

毛弟不相信："不，徐叔叔不是'司令'，他不戴袖章。"

张春桥和他的儿子戏谑了一阵子以后，把毛弟打发走了，他点着了一支烟，忽然问徐景贤："你们的那些大会发言稿，还有通令，有没有报送中央？"

"没有呀，"徐景贤嗫嚅着说，"我以为……你和文元同志已经……报告中央了……"

张春桥的脸色马上变得严肃起来："我们汇报是我们的事，你们开了大会，宣布了打倒上海市委，你们又念了通令，宣布不再承认上海市委书记和市长……可是，你们又不向中央正式报告。如果得不到中央的批准，那你们的大会和通令，怎么能生效呢？不能开过大会就算了，大会后怎么搞，不能都由我们两人包办，你们要直接报送中央……"

"那好，我马上回到康平路去办。"徐景贤紧张得脑门上都沁出了汗珠，"你看……用什么名义报？"

"就用你们几个发起开大会的革命群众组织的名义报，"张春桥说得非常轻脆，而且具体地传授了上报文件的方法："一式印 15 份，直接通过机要交通送中央办公厅，这样毛主席和中央文革的成员都可以看到了！"

徐景贤急忙赶回市委写作班，布置重新印刷大会的全部发言稿，通令和致敬电等，整理出一式 15 套，由他亲自装进大信封，贴上了"绝密件"的签条，写上了"送中央办公厅收启"的字样，然后打电话叫来了两个机要交通员，当面布置他们明天一早就乘飞机到北京去，把档案袋直送中南海中共中央办公厅。办完了这件事，他又打电话给张春桥作了汇报，才算舒了一口气。他心里不断地埋怨自己："怎么就没有想到要向中央报告呢？这次亏得张春桥的提醒……"

1 月 7 日晚，北京中南海西门再次人声鼎沸，这次是农林口造反派集中到这里要揪谭震林。1966 年，除了"全红总"这一全国性的临时工组织外，全国性的知识青年组织也相继成立。1966 年 8、9 月

间，广西、湖南等地赴京的知青占领了国务院“安置城市知识青年办公室”，砸开档案柜，公布了某些奸污迫害下乡女知青的案例，还在“安置办”开办接待站，接待更多的来北京造反的下乡知识青年，并多次召开大会，对国务院“安置办”领导进行批判。11 月至 12 月，数万名来自全国各地的下乡上山知识青年涌向北京上访造反，成立了各种造反组织。到了 12 月，“全国上山下乡知识青年造反司令部”开始进驻万寿路 10 号的农办大院，很快就让原本冷清安静的大院来了个“轰轰烈烈”。本来，农业大学的大学生两次冲击农办大院，已经使大院迅速分裂成以老农工部的老人为主体的“保谭震林”派和以农林政治部的人为主体的“反谭震林”派，“全国上山下乡知识青年造反司令部”的进驻更加剧了这里的两派斗争。

12 月 12 日，北京农业大学“东方红”成立了“农口革命造反联络站”，28 日在农机学院召开了有 8000 多人参加的“彻底揭发批判谭震林为首的农办党委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第一次提出“打倒谭震林，解放农林口”的口号，掀起了反谭震林的高潮。31 日，农大“东方红”派出数百人连同农林口各单位数千人到中南海西门游行，开去了广播车，口号是“揪出谭震林过新年！”

1966 年底，林彪与谭震林谈话时说到农林政治部主任秦化龙，林彪说他在莫斯科就认识秦化龙，对他的评价是“白面书生，见人不见灵魂”。

1967 年 1 月 7 日晚到中南海集中的不仅是农林口，还有教育口和外地来北京请愿、串连的工人、师生、干部，甚至军队院校学员，共约 3000 多人，也分别集结在中南海大西门，西北门，和新华门三个大门外，这次是北京市的统一行动。这些人手举《毛主席语录》牌，散发传单材料，高喊着：“造反有理，革命无罪”，“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把刘少奇、邓小平、陶铸揪出来批倒、批臭”，“誓死保卫中央文革”，“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毛主席万岁”等口号，要揪陈毅、李先念、刘少奇等人。

这天晚上 22 时 45 分，周恩来正在中南海国务院会议厅和七机部部长王秉璋、国防工办副主任袁成隆一起接见七机部“916 革命造反

兵团”和“915 捍卫团”的 20 名代表，解决他们之间的武斗问题。

七机部是从事导弹和火箭研究、开发的单位。文革开始后，七机部也对部里的一些人进行了思想摸底排队，整理了材料。这项工作，一直持续到 1966 年的 8 月中旬。到了 9 月，七机部一部分群众要求公布这些材料，而另一部分群众，则坚决反对公布材料。两派都不断到党中央、国防部大院，申述理由，寻求支持。负责七机部运动的副总理李富春主张将七机部的这些材料全部封存起来。他于 9 月 14 日将自己的意见和理由，电话告诉了聂荣臻。聂荣臻表示完全同意李富春的意见。15 日中午，周恩来找李富春、聂荣臻研究这个问题，也同意将材料封存起来。于是 9 月 15 日这天，主张不公布材料的一派，以日子取名，成立了“915 捍卫团”。第二天，9 月 16 日，要求公布材料的一派群众，成立了“916 革命造反兵团”。

“915”和“916”两派的武斗直接影响了部里的科研和生产。接见一开始，周恩来首先询问了武斗的情况，这时，“916”报告说：“周总理不知你知道不，‘915 ’有队伍在中南海北门。”

周恩来问：“干什么？去看一下，是不是有队伍？用群众向我示威，我说好，让派代表来，你们这样子，我也静坐示威吗？”

接着，周恩来问他们，发生武斗后，业务还有人搞吗？

“916”答：“没有人搞。”

周恩来说：“这怎么行哪？抓革命、促生产十条不是下来了吗？如果这样干怎么行？”

“915”：“过去我们一直抓革命促生产，现在我们抓不下去了……”

“916”：“现在整个七机部生产全停顿了。由于‘915’占了整个部直大楼，使生产完全处于瘫痪状态，今年计划下不来，外地的工厂也停了生产……”

“915”：“我们现在受压制回去吃不上饭，人被打伤。天天有人被打伤，回不去，人身安全没有保障。我们的张月英就被绑架到公安部去了。”

“916”分辨这起绑架事件。

周恩来："我劝你们不要打架，我一脑子的问题。""我不懂得，思想革命嘛，又不是敌我矛盾，两派不对是思想不统一，反映社会上阶级斗争这应用民主的方法，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我不懂得两派为什么这样对立，一个说在七机部，一个说在国防工办，你们还会往上摆，那怎么行呢？"

两派又发生争吵，周恩来激动地说："我不知道，你们要吵，只好散会！我还要抓革命促业务。停止生产，王秉璋你下得了这个狠心，我可下不了！赵尔陆病了，袁成隆被扣，我没有办法。王秉璋你是直接领导，几个部我都问过，但没有一个像七机部，我当然承认你们有成绩了。你们又该说我偏袒工办、国防工办有关系，我宣布，工办不管你们行不行？"

"915"："我们一直坚持文斗，抓革命、促生产，……武斗是从批判工办以来发生的……"接着他列举了几个事件。

周恩来："你短一点好不好？循环不已，这样下去怎么行？我不想听。我提个问题，可以宣布工办不管七机部嘛？"

"916"："从 9 月 26 日起，工办就不管七机部了。"

"915"："情况我们想向总理反映……"

周恩来："袁成隆、赵尔陆不管你们行不行？先搞部不行吗？国防工办罗瑞卿抓出来了，现在他不能插手了。袁成隆、赵尔陆是工办的，袁成隆不插手七机部行不行？你们先把部搞好，我直接和你们联系。"

"915"："我们批工办，工办就插手了。"

周恩来："你怎么就不回答我的问题，我身体不好，支持不了，你们这样子，我只好打瞌睡了。工办不管你们，先搞部里嘛。"

"915"："我可以简单讲几句……

周恩来："我只能给你 5 分钟。"

"915"："现在，我们没有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权力，串联站被砸了……"

周恩来："说那么多，我也记不住，可以拿材料来给我看。'915'什么时候成立的？"

“915”：“9 月 15 日，……”

周恩来：“从 9 月 15 日到现在，你们打了几仗了？”

“915”掰着手指头说：“从 12 月 9 日起，12 月 10 日、12 日、14 日、26 日、1 月 6 日、1 月 7 日……5 次大的。”

接着周恩来问了武斗中的受伤人数，两派又争论不休……

23 时 10 分左右，周恩来出去接电话，40 分钟后才回来，继续解决七机部的问题，两派依然是争论不休。

周恩来问：“你们有宣传车吗？”

“916”答：“有。”

周恩来接着问：“没有被砸吧？”

“916”答：“一个宣传车在工办门口被搞坏了，还有一个车和前面一个‘915’ 的车撞了。”

周恩来说：“我看，宣传车都砸了的好，省得对骂，对着中南海，主席都休息不好。”

这时，又有电话打到周恩来这里，他一听，没有多说，立即调车奔中南海西门而去……

原来，7 日晚聚集在中南海几个大门外的群众与 8341 警卫部队僵持到了 8 日凌晨，农大“东方红”的学生终于冲进了中南海西门，随即又被 8341 部队挡在门内十几米处。

其实，当时 8341 部队看情势不对，已经关上了西大门，但农大的广播车高呼：“最高指示：中南海的大门永远不能关！……”接着就有人挥舞着农大“东方红”的大旗爬上了大门，几个农大气象系的学生率先从门上跳了进去，虽然他们的脚还没落地，就被训练有素的 8341 部队战士捆了起来，但是接着又跳进数十人，迅速从里面打开了大门，一下就涌进了 200 多人。

8341 部队的战士马上手挽手围成几道人墙挡住学生，并立即涌上数十名干部、战士拼命要关上大门，同时赶紧向周恩来报告。于是，正在国务院会议厅接见七机部两派代表的周恩来立即中断会议，赶往现场。此时，西门两扇几吨重的大铁门虽已合拢，还有排起的人墙顶着，但因外面人多势众，撞击力大，铁门在不断地来回晃动，并发出

可怕的巨响。尤其让人揪心的是，在大门 3 米以上铁栏杆之间的狭窄空间内，骑满了从外面爬上来的群众，他们不顾零度以下的严寒，纷纷脱掉棉外衣，一个接一个地向里面跳下来，因此更加剧了铁门的晃动幅度，随时都有倒塌的危险，后果不堪设想。

就在这危急关键时刻，周恩来乘车赶到。他一下车，直接来到大门下，首先劝说骑在门上的人不要急于往下跳，一定要慢慢下滑，并指示干部、战士在下边做好接应的准备。转身又问那些跳进来的人：

“你们谁是群众组织的负责人？”

有六、七个人同时回答：“我们是。”

“能指挥外面的人吗？”

“能。”

“好，现在你们告诉他们，立即停止向里面冲的错误举动，已经冲进来的人，必须立即撤出，这是最高纪律，没有任何申辩、讨论的余地。现在你们把外面的队伍，全部带到人民大会堂去，在那里我们再谈。”

这几个群众组织的头头，被周恩来的突然出现和威严有力的讲话镇住了，加上周围众多严阵以待的部队，他们连声回答：“是，是……”但他们谁都不动。造反派似乎感到冲进来很不容易，不能就这么轻易退出去。

因为走得很急，周恩来没穿大衣就上了车。当时气温零下十几度，周恩来就这样站在寒夜里与他们谈话。工作人员拿来军大衣要给周恩来穿上，周恩来不穿，怎么劝他都不穿。

20 多分钟过去了，这些代表犟不过周恩来，又不忍心看着周恩来就这样长时间挨的站在寒冷的室外，最终答应周恩来提出的选出代表商谈的条件。工作人员借机劝说周恩来走进西门警卫室，在那里接见造反派代表。警卫室里有暖气。

周恩来与几个造反派代表一一握手，招呼他们坐下。接着，再次指出他们冲中南海是错误的，冲进来更不对，提出揪斗谭震林也是错误的。“谭震林是在毛主席身边做实际工作的，怎么能随便揪斗呢？”他要求冲进西门的农大学生必须马上退出中南海。

学生们要求见谭震林，周恩来提出两条意见，第一要他们承认冲中南海是错误的，第二是把所有的人集中去人民大会堂大礼堂，请谭震林到场与大家见个面。开始学生们不答应第一条，周恩来说，不承认第一条，就不存在第二条。

几个代表退出警卫室，开了个小会，统一了意见，接受周恩来的批评和意见。周恩来命令部队闪开一个口，放他们出去。

## 第 384 回：不能冲，众人请进大会堂　连续见，七机部各派代表

此刻，在中南海的西北门、南门（新华门），同样围堵了很多人，口号震天，秩序很乱，劝阻者与不听劝阻者双方发生争执，还动起了手脚，吵得周边居民也都无法安睡。

稍事休息后，周恩来首先肯定西门的警卫工作布置是严密的，处理与学生们的关系也合情合理。同时，他也指出，预防措施欠周到，今后无论如何，不能让任何人冲进中南海。如果形势紧张，靠人挡不住，可以把大门关上。

接着，周恩来、陈伯达、江青、关锋、王力、穆欣、戚本禹、汪东兴等人来到人民大会堂 118 厅。

此时已是 8 日凌晨 2 时许，人民大会堂的大礼堂里已坐满了人，包括冲击中南海的军队院校学员和外地进京请愿的红卫兵代表及大中专院校 65 年毕业实习生、首都“三司”、教育部“八一八红卫兵”代表、“全国中等学校革命教工联合战斗总部”工作人员、“首都战斗团”部分代表及“首部革命造反者”，周恩来全都让他们到人民大会堂参加接见。

周恩来等人在 118 厅等谭震林到后，一同走向礼堂的主席台。他首先说：

“同志们，同学们，红卫兵战友们！因为你们刚才都在中南海西门、西北门、南门那些地方，我们不好谈话，不好接见，所以把你们约到这个地方来见面。我们支持你们这种要求，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这种群众性革命斗争，我们也支持你们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决拥护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接着，他说：“你们刚才在中南海西门，有一些单位提出要批评我们中央政治局、国务院，有些部门的领导人的错误，我们应该说你们提出的一些同志（或者没有提出的），比如我们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或者候补委员，像谭震林同志、陈毅同志、李富春同志、李先念同志、谢富治同志、计委副主任余秋里等等，这些同志在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确实在某一方面，某一个时候，说了一些错话，也可能做了一些错事，写了一些错误的文章，犯了一些原则性的错误。但是，

我应该告诉你们，这些同志的错误，是属于在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那一段时间犯的错误，而在当时提出这个反动路线的责任在于刘少奇、邓小平两位，而不是刚才说的这些位同志。这个问题在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已经作了结论。当然，检查错误不限于那个时期，以后还有错误也应该检查，这些同志有的已经作过检查，有的正在准备进行检查，我们必须要给他们时间来进行准备。为什么？因为这些同志都是处在我们党和政府工作的第一线，大家可以看出，刚才说的几位同志，谭震林同志主持农林战线的许多工作，李先念同志主持财经战线的许多工作，李富春同志主持党的常务和计划工作，陈毅同志主持外交方面的工作，谢富治同志主持公安、保卫、政法方面的工作，余秋里同志主持计划工作，而且包括大小三线的工作。这些同志都是非常繁忙的人，每天都有党和国家的大事需要他们参与，这些同志都是在毛主席、林副主席周围做实际工作的同志，他们检查错误（有的已经作过，有的正在准备检查），也应该检查，但是，应该说他们的错误，不同于那种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代表人，像刚才所说的刘少奇同志和邓小平同志，也不同于继续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陶铸同志，应该有区别。所以我们在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时候，一定要辨别方向，不要把方向指错了。”

在这里，周恩来在每个人的姓名后面逐一强调了“同志”二字。

他说：“你们现在在北京，要到中央和国务院来请愿这是合理的。但是，我要提醒在座的同志们，你们要按照中央和国务院的规定到接洽的地方去。现我们有几百名接待人员，集中在劳动人民文化宫，接收你们提出的问题，转达给中央有关部门，也回答你们一些急迫的问题。次之，你们也可以到政协，我们准备在那一个地方，也设一些接待室，可以接洽。这个地方是中央或中央文革小组分别接见你们，跟你们会谈的地方。至于中南海、大会堂、钓鱼台这些地方，我们是要誓死保卫的！”

众人鼓掌。

周恩来继续说：“你们要晓得，中南海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和党中央、国务院工作的中心。那些地方，应该给他们一点安静的时间，

以便我们伟大的领袖能够操心国内国外大事。”

众人高呼“毛主席万岁！”的口号，热烈鼓掌表示拥护。

周恩来：“所以，不管在任何时候，我们都要挺身而出，保卫中南海。”掌声再起，表示赞同。

周恩来说：“我们一定要把这样一个劝告，告诉在北京串连、请愿、联络的外地的同志们，同学们，工友们，也告诉在北京的一些同学们，同志们，工友们，我们大家自觉的共同的遵守这样一个纪律。至于我们保卫中南海工作人员，由于他们急于保卫，可能有时候，他们态度生硬一点，急躁一点，如果对一些要冲进去的同学、同志、工友们，有莽撞的地方，我替他们向你们道歉。”

代表们热烈鼓掌。

周恩来：“另一方面，我也要要求你们，对于毛主席的好战士中国人民解放军，要给予应有的尊重。”

“同志们，你们要批判以刘、邓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现在要批判陶铸同志继续执行的反动路线，这都是对的。但是，你们现在要到中南海揪他们，我们党中央、毛主席劝大家不要采取这样的行动，因为我们要进行党中央内部的批判。他们一些公开的材料，你们可以在公开的场合批判，但是揪的办法不适于采取。”

周恩来讲完后，江青接着讲话，她说：“我代表毛主席问你们好！我知道你们非常关心他的健康，因此，我要告诉你们，他很健康。此外，我代表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向你们致以无产阶级革命敬礼！”

江青立即切入主题：“同志们，斗争的锋芒应该比较准确地针对一小撮制定这条错误路线的人，以及死不回头执行这条错误路线的人。至于那些或多或少地执行过或者在日常工作中说错了话、犯了错误的同志，就不应该采取像对付执行错误路线的那一小撮资产阶级当权派那样的态度，你们说对不对？”

“可能也有个别分子是假的，打着‘红旗’反红旗，我们应该提高警惕。中南海、大会堂、钓鱼台以及其他有关重要的党和政府部门是应该保卫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有这个职责的，北京的红卫兵也说他们要保卫。因此，我们希望你们不要因为一时的激动就冲进去。这

样，以后就不好办事了。你们说对不对？”

江青接着说：“你究竟是什么目的？假使有个坏人混进你们那里头冲进去，作了你们十分不愿意的事情，同志们想想看，后果是什么？今天听说有 100 多人冲进中南海，我劝告你们以后可不能这样。我的劝告是完全出于好意。”

“你们会说，为什么不接见我们，不是接见你们，我们最近差不多都是工作通宵，我们的总理有时到七、八点钟才睡觉，我们差不多也都是到天亮才睡觉，就是要看到全国的事情，不停地进行接见、座谈，并不是我们有意不接见你们，有些事情我们排的很满，这要请同志们原谅。”

江青又讲：“同志们、红卫兵战友们，你们的革命热情是可贵的，革命干劲是可钦佩的，我向你们学习。”“毛主席不是有一篇著作吗？‘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我学习的不够，我希望跟你们一块学习，你们赞成吗？”

“至于我个人有什么不周到的地方，或者有什么错误的地方，同志们完全可以提出批评，贴大字报，也可以写信给我，我还要这样声明，同志们赞成吗？”

众人答：“赞成！”热烈鼓掌。

会见至凌晨 4 时结束。周恩来又赶回中南海国务院会议厅，继续与七机部“915”、“916”的谈话。

他坐下后解释说：“到人大会堂处理了一个问题，现在又有人要冲中南海，对你们是个教育，你们要从大处着想，你们是几万人，整个国家有多少大事啊！”

“当前有的矛头指向错了。本来主攻应该是彭、罗、陆、杨。挖他们的根子，就是挖资产阶级根子嘛。制定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是刘少奇、邓小平，其他都是执行者，执行的和制定的不同，现在提出陶铸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还要看嘛！制定的，不顽抗也可以嘛。要警惕滑到混淆两类矛盾上去，现在有些单位不是这样。如在经济计划工作方面，不对准薄一波而对准余秋里，余秋里同志在石油工作上作了许多工作。大庆是一面红旗。近两年计划工作没管，可三线计划工

作有很多成绩嘛，有些人就看到局部问题，把余秋里当黑帮，几千人斗他，让他拿块牌子，写着反动的修正主义分子。只看局部不看全体，怎么能相称呢。我不责备小将们，可他干了许多好事，你们把他身体搞垮了，我痛心。放着薄一波不管，搞余秋里，大庆这两年有些浪费，但比新疆兵团省多了。

一向拥护毛主席的谭震林，说成是农林战线最大的黑帮，非要揪，还要揪李富春，这怎么行？把毛主席身边的都揪了，这怎么保卫党中央呢？中南海冲了 5 次，你们的喇叭对着中南海……”

秘书插话：“那是 11 月 7 日，他们对着中南海叫李富春出来。”

周恩来：“毛主席怎么能安静休息。刚才，我到人大会堂去讲了一下，江青同志也讲了一下。希望你们开门整风，现在他们造七机部的反，你们造工办的反，都说是革命造反派，你们是以造反派自居，我也就不好说了，国防工业我没抓起来，一抓就脱不了。你们要把敌对情绪取消，是思想矛盾，又不是敌我矛盾，生活方面退退不要紧，为大家服务嘛。明天他们又要在天安门开会，揪刘、邓，我们不赞成，总是党中央常委，我还得保。要把敌对情绪取消，我呼吁马上解决思想对立，双方都要做，这样子，我愿意见你们群众一次。刘有光，你们‘916’把他看起来了，当然是保护，他是有历史问题的。”

“如果你们同意，刘还回部里检查，‘915’也可研究。袁成隆可以回工办做别的事情了。业务班子要搞起来。”

周恩来又对七机部的“915”、“916”提了 5 点建议：

1、不要武斗，要恢复正常生活秩序，但绝不放弃原则和稀泥。

2、开门或闭门整风。

3、不要揪人，不但副总理不能揪，刘、邓也不要揪，陶铸也不要揪。

4、有没有可能搞个业务会议，把业务抓起来。

5、建议搞个军训，可以一个月，每天不要占时间太多。

“916”表态说：“我们坚决拥护总理的五点指示，我们认为发生上述一些问题完全是一些当权派一手挑动的。去年 12 月 25 日，部院领导干部在香山开黑会，统一思想，搞集体转变，支持‘916’的大

方向。但在会议中发生了严重的分歧，一些干部支持‘916’的大方向，一些人坚决反对支持‘916’。在这种情况下，三院的几个当权派、院务部副部长白文奎、院政治部组织处长罗殿英、701 所副所长刘光奇，在 12 月 27 日凌晨两点，派来车送了一封机密信给 701 复转红卫兵戴 XX ，上午三院就派了一车精悍人员直奔会场，抢了材料，绑架了部院领导干部。”

“915”方面也表示拥护周恩来的指示，同时也提出：

“1、目前的情况由批工办引起的，我们要求有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权力，但是我们批工办受到了很大的阻力。2、要求部党委撤消支持一方，打击一方的决定。3、‘915’、‘916’应该团结起来，群众组织斗群众组织是不对的，要求‘916’承认错误。4、七机部问题复杂，总理是否派人去调查。国防工办一定要批判。”

周恩来：“当前首先是要有一个正常的秩序，不要再这样对立，‘916’你们先把刘有光放了，这是对你们这个组织的考验。”

“916”：“我们保证明天 8 点以前把刘有光放回去。”

王秉璋：“我拥护总理的五点指示，目前这个情况是我们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造成的。群众严重的对立，我们应该负责任。”

“916”：“这些情况是你眼瞅着的。”

周恩来：“他已经表了态嘛，不要这样说了，袁成隆同志你说几句话。”

袁成隆：“我完全拥护总理的指示，过去一段我们执行了错误路线。”

周恩来在接见七机部“915”和“916”的代表时，谈到清华大学 1 月 6 日揪王光美的事情，他说：“他们就是想把王光美骗出中南海，到清华批判。本来斗王光美我们都赞成，因为她在清华压制民主，打击群众。但是斗争的方法是多方面的，如背靠背的，面对面的，也可以书面的，因为斗王光美不仅是她一个人的问题，十一中全会以后，要看一段时间，不要扩大这个问题，这个问题跟清华左派同志谈了，他们赞成。政治局都支持主席的意见。但是清华几个同学说不过瘾，昨天晚上打电话给王光美，说是王光美女儿的腿压断了，要父母签字

才能开刀，赶快去人。结果他们不加思考地都去了。当时我派车去赶，已经赶不上了。到医院门口，实际上他们女儿没有压断腿，清华同学把他们请上汽车到清华去了。

这是一场什么戏呀！恶作剧呵，不正常。骗去斗，还是斗了。现在不是揪斗了，而是骗斗了。这是不正常的，共产党不这样。以后听说是清华左派抢的，因为清华左派我熟悉。我放心了。我打电话问蒯大富，当时我认为是他搞的恶作剧，他说他不知道，确实蒯大富不知道。既然你可以用这种方法，那么坏人也可以搞这个方法。他们批评 8 个同学，8 个同学感到委屈。跑到我这儿要我接见，从 10 点纠缠我的秘书，我只有 5 个秘书， 24 小时不断换班。我是不赞成这种作风的，这种作风不能提倡，这种作风我告诉你们，就是彭、罗的作风，是彭、陆、罗、杨的坏作风。就是背后捣鬼，不是堂堂正正的政治斗争。刚才的事情全跟你们讲了，把真实的事情告诉你们好。如果你们也是偷听就不好，真正的政治斗争不是偷看别人的笔记，偷听人家的讲话，现在要肃清这个坏作风。这是罗瑞卿从江西苏区作起，学苏联的又吸收了国民党的旧东西，这个坏作风主席经常反对，主张党的绝对领导和走群众路线。”

“以党内斗争来看，主席一贯是堂堂正正的，最反对你记我的小事，我记你的小事。在苏联有三个时期，一个时期是十月革命不久，中国派了一批学生到东方大学，回来把苏联那套作风学来了，那时好一点，有严格的纪律。以后大革命失败的时候，中山大学东方支部多数离开了党，或者叛变，或者到国民党中去，留到现在比较少，但是有的比较好，如我们党杰出的理论家陈伯达同志。他是把主席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在实践中结合的阐明比较好的。第三个时期，就是我们解放以后，派到苏联一批学生，不但学政治，还学自然科学的，这里当然有学得好的了，但是思想上是否有修正主义的东西带来，这点要检查检查。这么大批留学生传来的东西有好有坏。到第二时期，党内作风很差了，专门注意琐碎的事情，也带来了资本主义的东西，实际上是修正主义的东西了。而我们党内工作落到林学文手里，这个人是政治不挂帅的，是自首的一批。这是组织路线干部政策，思想工

作落到陆定一手里。这次文化大革命为什么遇到这么大的阻力？为什么文化大革命老干部、中级干部不如青年朝气蓬勃，不容易接受呢？这是有思想根源的，历史根源，当然也有社会根源。由于中国阶级复杂性存在，所以必须把坏作风加以肃清。”

清晨 5 时 30 分左右，接见结束。但是周恩来没有休息，又继续接见七机部“113”组织的 5 名代表，他们要揪李富春。接见从 8 日晨 5 时 45 分到 6 时 10 分，周恩来说几点意见：

1、李富春是临时管七机部的，他说话可能有错误的地方，有错误可以回来检讨，但现在矛头应是部、院和工办。

2、对于“炮打李富春就是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说法，周恩来说：“李富春倒也不是无产阶级司令部。无产阶级司令部是主帅毛主席，副帅林副主席，我们都是围绕他们进行具体工作的。李富春、陈毅、谭震林、李先念、叶剑英、余秋里，还有聂荣臻等同志在一段时间里可能有错误，错误有多有少，有浅有深，有些也可能是原则性的，但是是一段时间内的。他们是执行的，和制造反动路线的刘、邓不能相提并论，也不能和继续执行的陶铸一样，陶铸还要看他的检查。”

3、关于要求李富春回来作检查的问题，周恩来说：“他现在确实病了，关于他讲话的记录，可以给他自己看看。”

4、对七机部，周恩来说：“七机部主要是两大派，对立情绪很严重，现在都成了敌对的了。都是革命组织嘛！总是有革命友谊，都是同志关系，这样的敌对怎么行呢？当然思想的分歧也反映了阶级，但不是阶级的对立。不恢复正常生活，就无法进行大民主，所以按我的五点建议去做。首先是恢复正常的关系，工办和部、院都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都可以批判，领导上有错误都应做检查，但要客观一些。”

周恩来说他担心现在七机部的对立情绪往外传，现在二、三、四机部也闹起来了。他指示“113”可以向王秉璋询问他刚刚在接见“915”、“916”时的讲话内容。

周恩来接见七级部代表时，在人民大会堂的北京农业大学师生还

不走，把 1 月 8 日准备接待外宾的计划都打乱了，直到戚本禹去了，将他们又带到政协礼堂继续接见。戚本禹说：

“下面讲谭震林的问题，你们最关心的问题。总理讲了，你们不服气，我明确表态，我是同意总理意见的。……首先，在刘、邓反动路线问题上谭震林过去有些错误，但是在农业走什么道路上谭震林是跟着毛主席走的。我可以告诉你们一件事……当时我看到谭震林在三个材料上亲笔写的意见，他逐条驳了包产到户的建议，在那么困难的条件下，他出来反对包产到户……所以要我改变这个成见是比较困难的，因为这是我亲眼见到的事实。

听了周恩来、江青、戚本禹的讲话，农大“东方红”知道反谭又犯了错误，回到学校后，曾和“东方红”一起造反的“红旗”就到处写大字报，说“东方红”犯了三条错误：一是冲中南海；二是占人民大会堂；三是反谭副总理。农大“东方红”开始请罪，一条“向谭震林同志请罪!农大东方红”的标语出现在北京大学 41 楼外的院墙上，正面对海淀马路，乘坐 32 路汽车的人，都会看到。

从此，农大“东方红”在校内再一次抬不起头了。

## 第 385 回：烧汉生，北京军区抓政委　戚本禹，接见山西众代表

1 月 8 日上午，北京军区政委廖汉生被抓。

北京军区是全军批准开展“四大”的几个大军区之一。1967 年 1 月初，北京军区司令员杨勇向林彪汇报工作，同时请示，军区的“四大”应该如何开展？林彪指示说：“烧掉廖汉生，北京军区文化大革命趁势展开。”

廖汉生的前妻肖艮艮,是贺龙的二姐贺戊姐的女儿，廖汉生从红军时期一直到解放战争初期都在贺龙领导下战斗、工作。廖汉生此时的妻子白林是杨尚昆的妹妹。1966 年 5 月 26 日，政治局扩大会议结束的当天晚上,廖汉生因为参加首都工作小组会议,直到深夜才回家。白林没有睡，一直在等着他。看到廖汉生，白琳神情沉重地对他说：“今天在工作单位看到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5 月 16 日通过的两份文件，得知五哥尚昆犯了严重错误。”

白林在教育部机关党委办公室工作，这天看到了中央的文件，得知哥哥杨尚昆出了问题。当时她控制住情绪，马上向部党委领导报告了情况。

其实廖汉生早在 4 月 14 日就听到了传达，后来参加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对杨尚昆犯错误一事知道的更确切了，但一直严格遵守保密规定，没有向妻子透露一个字。此时，他听了白林的叙述，不知怎样才能安慰她，只能按照中央文件的精神劝她两句。这一夜，他俩都没有睡。20 天以后，廖汉生向白林转达了上级的意见，要她接受组织的考察。随后，廖汉生分别向贺龙、叶剑英和军区党委第一书记李雪峰、第二书记杨勇、副书记郑维山汇报了情况。白林按照中央文件精神和领导的意见写了一封信，给贺龙并转呈周恩来总理，表示拥护中央的决定。

“烧掉廖汉生？”杨勇感到很为难，一个是司令员，一个是政委，应该怎么烧掉政委廖汉生呢？他没经历过……从林彪那里出来后，杨勇还是不明白军区的文化大革命应该怎样“趁势展开”？于是又去找总政治部主任肖华，问他怎么办？

肖华想了想说：“我先请示一下中央文革小组后再说吧。”

很快，肖华就有了答复，说由上面派人到北京军区贴大字报、点火，这样，军区机关的“四大”就可以乘势展开了。

1月5日，杨勇主持召开军区党委常委会，传达林彪关于“北京军区文化大革命趁势展开”的指示，但没有传达“烧掉廖汉生”这句话。这时，廖汉生正在保定驻军参加“四好连队”年终总评工作，没有参加这次党委常委会。

会后，按照军区常委讨论决定，通知廖汉生务必于6日回北京。同时，机关做好开展运动的准备工作，起草一个召开动员大会用的讲话稿。准备8日召开军区常委扩大会议，主要是向军区炮兵、装甲兵、工程兵领导交代军区司、政、后机关开展“四大”，要他们抓好部队工作，保持部队稳定。

当晚，林彪办公室打电话通知谢镗忠、李曼村、唐平铸、胡痴几个人到毛家湾林彪家里去。当他们到达毛家湾时，看见陈伯达和江青也在那里。林彪、陈伯达、江青当面向他们布置了给北京军区政委廖汉生写大字报的任务。

这几个人回去后，连夜写出大字报，又找了一些人签名。

7 日夜间，总政治部值班室通知北京军区：上面来人到北京军区大院贴大字报，要军区迎接，帮助张贴。

8日凌晨，正在军区值班的副司令员郑维山接到总政治部谢镗忠、李曼村、唐平铸、胡痴等人从军区大门打来的电话，对他说：“我们是到军区大院贴大字报的，你跟卫兵说一下，让我们进去。”

郑维山疑惑地问：“什么大字报？”

“你不要问了，看了你就知道了。”

郑维山犹豫了一下，说：“等我请示一下，再答复你们。”

郑维山赶紧打电话向司令员杨勇请示，杨勇说：“这个事情我已经知道了，你通知门卫让他们进吧。”

8 日早晨，当北京军区机关干部走进司令部办公楼上班时，突然看到主楼横梁上贴着一串大字报，说廖汉生“是贺龙的黑干将”，“是三反分子”、“贺龙的中坚分子”，必须要“批倒批臭”。大字报的署名很吓人，都是全军文革小组的成员：谢镗忠、李曼村、唐平铸、胡痴

等。

这无异于一颗重磅炸弹落在了北京军区机关大院，顿时议论纷纷，秩序大乱。

这天上午，军区党委常委按计划在原军区政治部办公楼庆王府二楼会议室召开扩大会。常委们陆续来到，他们互相打着招呼，有的点点头，有的伸伸手，然而，在很多人的表情里都有一种心照不宣的神秘。军区副政委陈先瑞最后一个走进会议室，他身边坐着的副司令员傅崇碧轻声对他说："迟到了。"

陈先瑞似乎感觉到了空气中的异样氛围，悄声问："出什么事了？"

傅崇碧用手在嘴巴上面比划了个"八"字。"八"字代表着八字胡，是当时贺龙的独特标志。

主持会议的军区司令员杨勇，看看人已经到齐，清了清嗓子宣布："现在开会。"

"现在'四大'已经在地方上轰轰烈烈地展开了，军委要求各军区的'四大'也要尽快开展起来……"杨勇从容不迫地开始讲话，刚讲了几句，会议室外面就传来一阵吵闹声，紧接着，北京军区战友文工团的一些人冲进了会议室，高喊：

"廖汉生出来，到北京军区看大字报！"

"廖汉生必须明确回答群众提出的问题！"

会场气氛骤变。郑维山站起来，将文工团的人劝出会场，在外面与他们交涉。

这时，列席常委会议的干部部董奋部长说："今天早上，在西山的军区司令部办公楼里，有人给廖政委贴出一张大字报。他们大概就是为着这张大字报来的。"

会议室里的气氛紧张而压抑。会议无法再开下去，大家都坐在那里默默地等待。

过了一会儿，郑维山进来了，他对着廖汉生，也是对着大家说道："没有事，他们要廖汉生同志去看大字报。"

会场骤然沉寂，大家面面相觑，谁也不说话。

廖汉生看到这种情景，便大声问：“你们看怎么办吧？”

会场上静的出奇。

杨勇想了想说：“我看还是去看大字报，正确对待群众嘛。”

廖汉生一脸怨气的说：“好吧，我看你们是商量好了。”

边说边掏上衣口袋里装的保密本，往皮包上一放，说：“小眼镜，交给你！” 说完，昂首挺胸，很有几分悲壮地走出会议室。

走到门口时，他又说了句：“我出去见他们，请常委将情况报告军委和总政。”

“小眼镜”是指那位戴眼镜的党委秘书。

廖汉生一出会场，就失去了自由，被人押着回到家。

他家已被抄过，一片狼藉。文工团的人来了二、三十个，领头的冲着他高呼口号：“打倒廖汉生！”

廖汉生也高声回答他们：“我是革命的，你打不倒！”

文工团的人在楼上楼下又翻了一阵，把他的日记本、笔记本等一切带字的东西都作为“黑材料”抄走了。然后，以命令的口气对他说：“跟我们走，到军区大院去！”

廖汉生就这样被带走了。汽车将要驶进西山军区大院了，廖汉生忍不住问了一句：“究竟是因为什么事呀？”

其中一人说：“有一张给你的大字报。”

廖汉生又问：“大字报里讲些什么东西？”

文工团的人简要讲述了大字报的内容：“你有四条罪状：一是杨、廖两家关系密切，杨尚昆的问题出来以后，你为什么不揭发？二是1964 年大比武的错误，政治委员难道不负责任吗？三是你身为北京军区政治委员，为什么插手第一军？四是对总部不尊重。”

车子进了营区，廖汉生被押下车，关进一间小房子里。廖汉生被关后，看押人员从他家里取来牙缸、牙刷、毛巾、肥皂等洗漱用品，递给他。他接过来一看，这些东西不是他的，而是妻子白林的。造反派这时也发现忙乱之中拿错了，于是又很快换过来。从他们的这个疏忽中，廖汉生猜到白林和他一样也被关起来了。

廖汉生被关以后，首先被摘去军装上的红领章、红帽徽，取而代

之的是被挂上一块写着“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大牌子，在军区大院进行了一番游斗。8 日晚上，总参代总长杨成武为稳定北京军区局势，临时把军区部分领导召到翠微路总参招待所，对大家说，杨勇司令员是无产阶级司令部里的人，要大家加强团结，抓好运动与部队工作。

随着军队“四大”的展开，北京各军、兵种总部和各大军区不断受到冲击，各级领导东躲西藏，究竟军队的文化大革命应该怎样搞？谁也说不清楚。经请示毛泽东同意，从1月8日开始，中央军委在北京的京西宾馆召开军委碰头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是各大军区、军委各军、兵种负责人，还有全军各大单位和军委直属院校的有关领导，共45人。会议由徐向前、聂荣臻和叶剑英3位元帅主持，主题是研究军队的文化大革命问题，其实也是想借开会的名义，把军队的主要领导人接来北京，暂时脱离本单位的运动，让他们休息一下。林彪还特别规定：不经过林彪、叶剑英和徐向前3人的批准，任何人不得返回原单位。每天会议的情况都要向林彪汇报。

在 1 月 8 日召集的中央军委常委会上，林彪宣布，关锋任总政治部副主任。

1 月 8 日，军委将海军的肖劲光、苏振华和李作鹏一起叫到办公厅，由代总参谋长杨成武出面谈话。杨成武对肖劲光、苏振华和李作鹏说，李作鹏给他的信，他已送给了林彪，林彪又让他转送毛泽东、周恩来。杨成武对肖劲光说：“主席、总理的意见是按第二方案办，请你出面传达一下。”

1月8日，戚本禹接见山西“红联站”、太原纺织厂“红卫队”、“红卫兵辟谣战斗队”、太原纺织厂“红卫兵”、太原晋安化工厂“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等组织的赴京代表以及北航“红旗”、福建文化系统“红色造反兵团”、上海市“机关革命造反联合委员会”等单位62人。

在这次接见中，戚本禹点了刘少奇的历史问题。他说：“要把目前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与17年来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联系起来。实际上从1945年以来，从七大以来，就有两条路线的斗争。当时刘少奇

就要搞妥协，毛主席从重庆回来后就把这个对国民党的妥协搞掉了。当时有股搞妥协的思潮，意大利和法国的共产党在二次大战都掌握了很多军队，如果他们要夺取政权，那完全行。 但他们要参加议会，怕再打仗，结果把军队交了出去，但果实没有拿在人民手里，当时刘少奇也要同国民党妥协。这个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解放以来也是一直贯彻的。

有一次我在会上说刘少奇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有人不同意，我是这样认识的，从理论上讲也是这样，我有理由，不管他们怎样讲，我是这样认识的。

他们认为中国的老百姓不是剥削多了，而是剥削少了，不仅在东北说，在华北也说，他们在农村要发展个人经济，说什么出了新富农，这可以组织贫下中农，你们看这是什么话？这不是搞二次革命吗？在工厂搞新资本家，搞王光美那一套，叫王光美的哥哥等是大哥大嫂，还要资本家入党，东北同志向他请示新富农能不能入党，他说也能入党，这就是搞资本主义，搞三和一少，说美国反对我们，苏联也反对我们，我们孤立了，他要和，以和为贵，和印度、和苏修、和美国不进行斗争。对支援外国要少，这不是搞和平共处吗？他对资本主义感兴趣，到印尼去丑态百出，你们看过这个电影吗？简直把中国人的脸丢尽了，王光美和苏加诺跳阿飞舞。他在国内搞三自一包，搞自由市场、自负盈亏、自留地，搞得可热火了，他们认为自由市场好，能活跃经济。我对自由市场是调查过的，一个7元多的热水瓶，在自由市场上卖30多元。企业也不搞国营的，而搞自负盈亏。尤其在60～62年的困难期间，党内斗争一直很激烈，以前都是党内斗争，保密。现在搞文化大革命都揭出来了。

刘少奇是当权派这没有问题嘛，而且是大的，又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那叫什么呢？至于毛主席按什么矛盾来处理，我不管，我的认识是这样的。”

对当时各地文化大革命的形势，他说：“斗争越尖锐的地方，斗争就越有希望，我看北京有希望，上海、天津有希望，山西也有希望。”

接着，戚本禹批评了“太纺红卫兵”秦洪亮等一些人在北京抓“太

纺红卫队”赴京代表的行为。他说：“你们在北京还敢这样对待红卫队，那在太原就更凶了。”“你们都是工人阶级，都是阶级兄弟，为什么要这样干，为什么要被杨丕夫挑拨。”

他问：“这次有打伤的人没有？”

下面答：“这次没有。”

戚本禹：“你们还敢打人，我就叫公安部逮人！如果这次有流血事件，我们马上叫公安部逮人”。

这时，“太纺红卫兵总部”负责人之一的秦洪亮站起来说他不知道此事，山西“红联站”的代表马上站起来说：“他们抓人时，公开宣称他们就代表太纺红卫兵。”

戚本禹说：“你们手下的人干的事情，你们都不知道，你们不配做领导。回去查一下，要处理打人凶手，据说打女同志打乳房，简直是流氓！山西有同志来信说，解悦同志在工作时间也围着人进行围攻，怎么能搞生产哪？”

## 第 386 回：抢购潮，上海市乱批条子 忙制止，又起草《紧急通告》

元旦那天，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在东湖招待所召集造反派开会，市长曹荻秋也根据陈丕显的“独立作战，独力思考”、“经济问题放松些不要顶”的指示，召集王一平、宋日昌、宋季文等人在香山路中山故居开会，订立了五条。即：

1、1958 年以后精简下放的工人全部回原厂安排工作；

2、社会青年要积极安排工作；

3、街道工业可以先戴国营的“帽子”，适当增加劳保福利；

4、郊县五类地区的工资可考虑升到八类地区的标准；

5、长期临时工和外包工改为长工。

1 月 3 日，副市长宋季文打电话给市计划委员会副主任熊中节，传达了这“五条”，熊中节立即向市经济计划委员会的处长作了传达，还向外贸局、商业二局作了布置。当天，几百个单位到银行提款，有的一次提取几十万元，单位越来越多，金额越来越大。华东电业管理局原来每月工资总额只有 33 万元，而 1 月 5 日竟提取补发工资 128 万元，接近四个月的工资总数！

这些天，在外滩的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下面总是挤满了卡车、吉普车、小轿车、三轮卡、摩托车、自行车和不计其数的各色造反人员，由于各工厂发了大量的串联费、加班费、补助费，甚至还“补发”好几年的工资，这些人手持他们逼迫当权派签字的纸条，海潮般不断地冲击着银行，要领钱。上海各家银行纷纷告急：仅从 1967 年元旦到元月 4 日，4 天时间里货币流失量就达千万元！

上海刮起了“签字”风。许多过去要经过处、局、部层层审批的请示、报告，这时，只要抓住一个领导签一个字，就解决问题了。很多批斗会的目的就是要领导签字，不签就斗，狠斗，一直斗到你签字为止。其中有要汽车的，有要军大衣的，有要房子的，有要买红布做袖章的……现在上海市委文革档案里，还可以查到这样的条子：“刻一个上海人力运输装卸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的图章，并且供应红布，做红袖章，上面印上黄字。共红布十匹，立即供应。”

1 月 5 日，“工人支农回沪造反队”1600 余人占了上海大厦四个

楼。1 月 6 日，他们成立了“上海工人支农回沪革命造反司令部”准备提出“十条要求”，其中：（1）责令上海市各公安机关迅速将支农工人户口迁回上海；（2）支农工人立即回厂复工；（3）支农工人按下放日期每月补发原工资 30%补助金……

在当时的上海，除了“工总司”、“赤卫队”外，五花八门的“司令部”也应运而生：

1 月 5 日组织批斗曹荻秋的“上海红色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即“红工司”，就是临时工，包括合同工、外包工、轮换工的组织，当时已有 40 万人，是上海“赤卫队”解散后仅次于“工总司”的第二大组织；

1 月 6 日成立的“上海工人支农回沪革命造反司令部”——由那些被下放农村的工人组成的“造反司令部”；

“上海市个体劳动者革命造反总司令部”；

“上海市学徒造反革命委员会”；

“红卫军”，是由转业、复员、残废军人组成的，其中绝大部分是工人。

这些名目繁多的工人“造反司令部”，代表各自的经济利益起来“造反”：“红工司”的“红色工人”要转正，支农工人要回沪……这些“造反司令部”在全国各地比比皆是。

自 1 月 6 日上海市召开了打倒上海市委大会以后，从各区、县、局到各基层单位也纷纷召开批判打倒当权派的大会。有些人打着造反的口号，提出了补发工资、提高津贴、提前转正、发串连费等经济要求，而各级当权派中的某些人又根据市委“经济上放宽一些，政治上可以争取主动”的指示，纷纷签字同意发放钱款和满足某些人的经济要求。如此一来，银行的钱款在几天中几乎被提取一空，一些重要岗位的职工大量外出串连，港口、铁路的运输物资严重积压。

自 1966 年 12 月 31 日以来，上海市区就发生了抢房子的风潮，一些住户全家出动，不管是公家的房子还是“黑五类”的空房子，住进去就算，一些人甚至拿一张草席往空房一放，便宣布，“此房子属我了”。

一天晚上，王洪文带了“工总司”的几个头头来到武康路二号，说是要找张春桥、姚文元紧急汇报情况。知道张、姚在兴国路的红色保密电话的号码的徐景贤帮王洪文拨通了电话，王洪文汇报说：“刚才到发电厂去，上海只剩下 4 天剩煤了，需要采取紧急措施！”

这几天，上海各银行清晨还没开门营业，门口就挤满了人，直到晚上关门，人群还不散。各单位为种种补发款项大宗提钱，严重影响了市民信心，造成恐慌心理，个人存款户也争先恐后地挤兑提款。据不完全统计，全市银行 1 至 7 日支出共 3800 万元，最多一天支出现金竟达 2800 万元。

1 月 6 日，上海市人民银行小东门分理处部分职工，给毛泽东和周恩来发出特急电报：

这几天，在我们的银行柜面，发生了一个新的情况，这一情况发展极快，由于我们面对这一情况不能作出正确判断，特急电向您老人家汇报，请求指示。

在上海目前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有些革命群众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中，对一些不合理的分配制度发起猛烈开火，其中主要的有工资和集体积累两方面，有些单位在揭发的同时，采取了行动，于是大量的补发工资和分配积累的情况发生了，造成一股“补发风”。……

这股风目前正在发展，现在这股风影响下，有的单位生产资金被占用，货币大量投放冲击市场，有的人在拿到工资后，出现了挥霍现象。我们认为，这种情况是不符合当前斗争大方向的，而且也不利于人的思想革命化。……

为此，我们现立即向全市革命群众宣布，凡属以上性质的款项，在您老人家没有指示以前，一律暂时停止支付，一俟您老人家指示后，立即坚决遵照您老人家指示贯彻执行。

当天，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根据市人委计划委员会意见，派员赴京向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告急。

上海市造反派也万分着急，1 月 7 日，“工总司”、“红革会”、“首都三司驻沪联络站”、“炮司”等组织不约而同地来到位于外滩的人民

银行上海市分行，同银行造反派一起，于当夜发出了紧急通令，宣布从 1 月 7 日下午 17 时起，在没有接到中央指示以前，银行不得发放补发工资和其他补发的福利费用；工会经费、工厂基金、集体积累资金一律冻结。当天下午，银行闸北区办事处向分行提取 100 万元现金，银行领导已同意拨给，在将要装车时，被造反派发觉，坚决制止。

1 月 8 日早上，上海中百一店一开门，300 多人冲向自行车柜，甚至连平常不大有人买的 400 至 500 元的进口手表也几乎销售一空，高级呢绒衣料的销售量更是成倍增长。顾客购买商品普遍有种紧张心理，不怕不合用，不怕价钱贵，就怕买不到。有一港务局的人说："我以前的工资是 40 元，现在一下增加到 62 元，加上补发工资 300 多元。现在我只当没有增加，没有补发。"据不完全统计，1 至 9 日上海港发出现金 148 万元之多。同时，大批生产工人离开码头，离开生产岗位，大家都去找干部签字，使上海的运输几乎瘫痪，港口物资严重阻塞，情况极为严重。自 1 月 1 日起，各港口纷纷停止发运货物，日装卸量从日常的 9 万吨下降到 3.5 万吨，9 天中，平均每天约有 70 多艘中外轮船无人装卸，有一天竟停了 114 艘轮船。外国运输船在港时间超过规定期限，就要赔偿他们非生产停泊损失。仅此一项，在 9 天中，要损失好几万英镑。同时，由于上海港货物堵塞，北方海区各港口也起了连锁反应，造成恶性循环。特别是在政治上造成的影响更是严重。一个英国船长大副向上海的驻船员说："你们搞文化大革命生产下降了。""你们工人都到街上去了，没有人装卸。""我今年来过三次，一次不如一次。这不是一天天好起来，而是落下去。"1 月 4 日，有一艘希腊船应在 5 时 30 分开，直到下午 17 时 50 分才有人去解缆，船长将中国国旗倒挂以示抗议。

1 月 8 日，"工总司二兵团"的耿金章想召开一次各个群众组织的联席会议解决这些问题。他上午给张春桥打电话，请他参加。张春桥那天正好要召集"工总司"铁路、交通、海运系统的造反组织开会，讨论如何解决交通部门三停的具体问题，所以就说："你们开好了。"于是耿金章又找到陈丕显。

下午，耿金章在锦江饭店九楼召集会议。他把陈丕显找来，把各

个部、局的负责人找来，也找了各造反派组织，包括回乡职工和临时工的红色劳动者造反队也来了。会议由耿金章主持，他和陈丕显坐在前排。

耿金章首先讲话，他埋怨和批判部局长们乱签字，翻来覆去地逼着陈丕显宣布撤他们的职。陈丕显不肯，说对部局干部的任免要通过中央，他个人没有权力撤他们职。

会上，大家针对当时全市运动的形势和经济主义问题展开议论。陈丕显看见“机联站”参加会议的代表朱永嘉，便招呼他：“小朱，来来来。”他让朱永嘉做记录，。

朱永嘉将大家讨论的问题整理成文，最后集中成十条。其中有一条是针对抢房的，朱永嘉感触颇深。因为他的父亲是资本家，此时房子被抢占，全家都被扫地出门，父母只能寄住在亲戚家，而且都有病在床。生活上的颠簸弄得朱永嘉很头疼，所以他在起草意见时专门写上这条。

十条意见的最后一条是“责令市委、公安局照此执行”。对此，陈丕显说：“这样大家都主动，便于我们去做群众的思想工作。”

写完后，朱永嘉当众宣读，大家又议了议，就定稿了。定稿后，哪个组织同意就在文件上签字。

在各个群众组织签字的时候，朱永嘉请陈丕显把文件再看一遍，并问他：

“这个文件是否叫《紧急通告》好？”

陈丕显说：“可以。”

朱永嘉还问：“开头这段关于形势的分析如此表述是否可以？”因为关于形势的分析是把上海“三停”与经济主义的问题都归在陈丕显和曹荻秋为首的上海市委头上，并且定性为“上海市委坚持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形式”，目的是“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以物质利益来腐蚀群众的革命意志”。这是 1 月 6 日上海“打倒上海市委大会”的口径。

陈丕显看了一下说：“可以。”

最后在十条意见上签字的有 32 个组织。第一个签字的当然是上

海最大的工人组织“工总司”。当时王洪文没有在场，他奉张春桥的指示，在上海港、上海站发生严重混乱、瘫痪，工矿企业严重停工的情况下，到上海外滩的广东路 20 号海关大楼召开紧急会议，成立了“上海市‘抓革命、促生产’火线指挥部”，担负起了上海工交财贸的领导工作。于是，耿金章作为“工总司”常委，代表“工总司”签字。

在“工总司”之下，应该是“红工司”了。他们有 40 多万人，是当时上海仅次于“工总司”的第二大组织。但是“红工司”参加会议的一把手、常委主任费敏璋提出要增加条文，对外包工有所区别，要求补充修改。他这种不合时宜的发言，当即遭到与会者的一致反对。费敏璋没有签字。因此，在“工总司”后面的组织是“上海工人北上返沪第二兵团”，作为“上海工人北上返沪第二兵团”的“司令”，签字的还是耿金章。他一人代表两个组织签字。

在起草《急告全市人民书》时，耿金章只作为“工总司”的代表签字。当《急告全市人民书》在《文汇报》上发表后，他挺后悔：为什么不把“二兵团”也写上去呢？于是，这一回，来了个“工总司”、“二兵团”并列。除了“二兵团”外，还有“工总司”属下的“三兵团”也作为独立的组织签了字。

随后签字的有“红革会”、“上海市学徒造反革命委员会”、“上海革命造反委员会红卫军指挥部”等32个造反派群众组织，包括外地在沪的联络站也都签了，上海各大学的造反组织基本都签了。这次签名的组织比《告上海全市人民书》要多得多，呈现出大联合的局面。

但也有几个组织拒绝签字，如前面提到的“红工司”，还有回乡职工、崇明农场职工等造反司令部，因为这个文件跟他们的造反要求不一致，把他们的要求压下去了。所以有三、四个组织说他们反对，没有签字，有的中途即退场了。

陈丕显代表上海市委签了字。

他们刚签完字，楼下就传来一片喧哗，一个新近成立的“上海工人纠察队”要闯入锦江饭店。那时红卫兵也好，工人组织也好，袖章

都是红底黄字，唯独这个组织是白底红字袖章。据说用白色是仿照1927 年大革命时，上海工人在周恩来领导下三次武装起义时的“上海工人纠察队”的袖章，故这个组织的名称也以此名命，人员基本是原“赤卫队”人员组成。于是人们纷纷下楼去了，陈丕显也走了。只有朱永嘉与两个红卫兵留下，3 人一起将大会上通过的文件在文字上作最后的整理后，已是晚上 21 时多了。他们在锦江饭店一人吃了一碗光面，随后朱永嘉就回武康路 2 号将定名为《紧急通告》的十条意见交徐景贤审定。他向徐景贤汇报了会议的过程，说：“通过了一个文件，你看要不要让《文汇报》明天发吧。”

徐景贤看了一下，点头说：“行，马上叫《文汇报》拿去。”随后在文稿上签了字，然后打电话通知《文汇报》派通讯员来取去付印。

这天，大批港务、邮电、海运、交通运输、长江航运六个局的工人和大批学生来到上海港、上海站。同时，交大、同济、新师大等大学的学生也成群结队地开到车站、码头、工厂等地，深入到车间、工场、宿舍、家庭，动员受蒙蔽的工人重返岗位。

当天，大街上，特别是银行附近贴了很多“要政治挂帅，不要钞票挂帅”，“革命不是为了钱”，“当你拿到补发钞票时，你就上当了”等大标语。

第二天就有一些工厂、单位和职工个人，主动到银行退还不合理收入，受到了银行和工人造反派组织的热烈赞扬。

## 第 387 回：小麦峪，阎红彦夜半身亡　派法医，飞昆明刻不容缓

1 月 8 日，从西南边陲昆明又传来一个惊人的消息，镇守云南的云南省委第一书记、昆明军区第一政委、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上将阎红彦于 1 月 8 日突然身亡。

1 月 7 日早上，“昆明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指挥部”又到云南省军区找阎红彦，云南省军区政委张力雄出来对学生们说：“我拿我的 38 年党龄、政委身份和脑袋保证，阎政委不在我们云南军区及其所属单位。”

这天上午，阎红彦决定给中央写报告。报告写好后，经省长周兴、阎红彦爱人王腾波修改后当天即发往北京。阎红彦在《报告》中说自己已作了好几次检查，冲军区“是有计划的行动”，并报告赵健民半身麻木，骨折。

同时，阎红彦对下发出指示：“能活动就活动，不能活动就隐蔽起来，保存实力，观察动向。”

省公安厅接着设立了秘密办公室，组织一群人单线联系，使用暗语，汇报情况，每天都向阎红彦、孙雨亭等人汇报。

这天，昆明官办的三大群众组织“红卫兵总部”、“捍卫总部”、“无产者联合司令部”举行 7 万人的游行，特意从昆明军区门口经过，向“823”派示威。

昆明街上掀起大辩论的热潮，核心议题是：“该不该进驻军区大院”，“该不该给赵健民戴高帽子游街”。

1 月 7 日下午 15 时左右 ，阎红彦接到昆明军区司令员秦基伟的电话，他们在电话上交换了对当前工作的意见，阎红彦委托秦基伟负责筹备省委书记处会议，并确定开会的时间、地点。

放下电话，阎红彦高兴地告诉夫人王腾波：“等一会儿秦司令员要来，你赶快告诉炊事员，准备点儿菜。秦司令员是南方人，喜欢吃米饭。”

傍晚，叶剑英打电话到昆明军区询问阎红彦的情况，云南省军区副司令员王银山接的电话。

晚 20 时左右，云南省军区副司令员王银山和秦基伟的秘书同车

来到小麦峪。秦基伟托秘书带给阎红彦一个条子，大意是："情况有变化，我不能来了，我的处境很不安全。"

阎红彦一惊，他没想到形势会这么严重。

秦基伟的秘书向阎红彦汇报了昆明军区大院被冲击后的一些情况。王银山汇报了省委发往北京的电报，昆明军区已乱得无法发出去了，是经由云南省委发出的。

王银山接着又向阎红彦报告："叶帅从北京打来电话，很关心你的安全。"

阎红彦盯着王银山急切地问："叶帅怎么说？"

王银山一字一句地将电话内容做了详细汇报。他说：

"叶帅问：'阎红彦现在什么地方？安不安全？'

王银山回答：'电话不保密，不好告诉你。'

叶帅又问：'他身边现在都有些什么人？'

王银山回答：'秘书，爱人，司机，警卫员。'

叶帅问：'你们能不能绝对保证他的安全？'

王银山说：'一定尽全力保证阎红彦同志的安全。'

叶帅指示：'要说服造反派，不能抄阎红彦同志的家。'

王银山回答：'他的家已经被抄了。'

叶帅难过地叹了一口气，放下了电话。"

阎红彦默默地在屋子里踱了几步，然后说："叶帅也管不住了！"

接着，他催问书记处的会议准备得怎样了？王银山边说边画了两个开会地址方位图。一个是机场警卫部队驻地，一个是林家院子监狱。

阎红彦急切地说："这个会，明天就开。"

想了一下，又说："8 号如果开不成，最迟 9 号开。开会地点，两个地方都可以，你征求秦司令员的意见，由他最后定了就行。"

7 日晚，周兴继续前往军区大院广场与造反派进行谈判。那些"下定决心，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造反派坚决表示说：

"我们进驻军区大院，完全是出于革命义愤，如果造成了什么不良后果，一切责任都应由阎红彦本人负！"

最后，造反派还发出"警告"说："你周兴不要再当阎红彦的说

客了，还是让他自己来！”

周兴又拖着疲倦的身子返回小麦峪。他们所住的那排半椭圆形屋顶的水泥平房，第一间住着阎红彦，第二间住着阎红彦的爱人王腾波，第三间住着周兴，以后依次住着阎、周的秘书和警卫员。整排房间的中间，有一间较为宽大的会议室，这里有与外界沟通联络的电话机。周兴每次谈判返回，都是在这里与阎红彦交谈。

阎红彦焦灼地听着周兴讲述情况，不时以反问的口气对周兴说：“我真不理解，为什么文化大革命竟会闹到如此地步，在军事指挥机关重地，竟可以随便让造反派进驻，中央文革连一句话也不说！？”

周兴觉得一时难以回答清楚这个问题，便岔开话题说道：“看来再谈判也不会有什么新的结果了，造反派的情绪只会越来越对立。”

阎红彦略微深思一会儿说：“事情已经闹到了这一步，我就是舍命也要出去了！老周，是不是你再到军区与造反派谈判一次，要他们在我出去之后，立即撤出军区大院。”

周兴看看手表，时钟已过了 24 时，便对阎红彦说：“今晚就先商量到这里，明天再说，要去谈判，我明天一早就去！”

他们谈话时，在场的还有王银山、王腾波及阎红彦、周兴、秦基伟的秘书。谈话结束后，王银山和秦司令员的秘书驱车回城，此时已是 8 日凌晨了。

阎红彦对王腾波说：“抽烟的人多，屋子里烟雾沉沉，我头都发昏了。你先去睡，我再溜达几步就睡。明天早点起来，还要开会。

1 时许，中共云南省委办公厅响起北京的长途电话。接电话的是中共云南省委副秘书长王甸。陈伯达要找阎红彦！

王甸知道阎红彦的秘密行踪，他马上给小麦峪挂了电话。秘书曹贤桢哪敢怠慢，叫醒了阎红彦，说：“省委办公厅王甸副秘书长转来了陈伯达从北京打来的长途电话。”

“哦？陈伯达……”

“首长……”曹贤桢站在阎红彦面前等待指示。

“把电话接过来！”

不一会儿，电话里响起了难懂的闽南话。阎红彦听不太懂他说些

什么，但听得出是在斥责他，便十分反感地说："我听不懂你的话！"

恰巧汪东兴正在陈伯达那里，临时由汪东兴充当"翻译"，转达他的话。

陈伯达在电话中反复指示 "你们要到群众中去，不要怕群众……"

阎红彦强调说："我们不是怕群众，这里的情况根本不是你们讲的那样……"

陈伯达继续说："你不要像老鼠一样躲在洞里，去见见革命群众嘛！你的命就那么值钱？你没有了命我负责赔你一条命！我可以给你立个字据，你不要胆小，不要养尊处优，当老爷当惯了，见不得风雨。斗过一次两次就怕了？十次、八次也不怕！这就是中央的意见！"

阎红彦一听，肺都气炸了，大声吼道："我怀疑你是不是代表中央讲话!我就不承认你是代表中央讲话!文化大革命这样搞，谁高兴？你们坐在北京，只知道乱发号令，了解不了解下面的情况？你们对云南的经济建设怎么看？对边疆怎么看？你们究竟想干什么？把地方领导机关搞成这个样子，怎么领导？你们这样干下去，是要出乱子的！"

陈伯达气得大声指责阎红彦"顽固"，他说："中央'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写得明明白白的嘛，你还怕出乱子？要依靠群众解放自己，靠毛泽东思想领导。你这么害怕群众，难道要毛主席出来为你保命……"

"我们又不是怕群众。"阎红彦心头在剧烈地颤抖，实在平静不下来。放下电话，他来到周兴的门前。

周兴与阎红彦分手后，刚刚洗漱完毕，服用了安眠药，正准备脱衣上床睡觉，阎红彦又突然急促地敲响了他的房门。周兴立即披衣起床开门。阎红彦走进屋后，很不高兴地告诉周兴：

"我刚才与陈伯达通了电话，他的话我根本听不懂，是由别人作的翻译。他们根本不听什么具体情况，只说要相信群众的大多数，非要我出去接见群众不可！这到底是什么意思，连一句对造反派责备的话都没有？！"停一会，他又说："既然这样，我就只好出去了！"

周兴听后，以安慰的口吻说：“不要着急，我们不是说好了，先由我明天再去与造反派谈判一次，你再出去的吗。半夜三更的去了又有什么用？还是明天早上去好了。”

“那好，明天我们再商量。”说完这句话，阎红彦便离开了周兴的房间。

1 月 7 日深夜，进驻昆明军区大院广场的造反派，偶然听到一位曾在云南省军区当过驾驶员的司机透露，阎红彦这几天就躲藏在云南省军区小麦峪警卫团里。此时已经是 1 月 8 日凌晨 3 时多了，这些人来不及向“兵团”总部报告，立即抽出 20 多人乘一辆安装有广播设备的卡车，直接驶往小麦峪。当他们到小麦峪警卫团的营房门口时，被站岗的卫兵拦住了。值班的团参谋长接到报告，立即赶到大门口，在传达室和颜悦色地再三劝阻造反派不要冲击部队驻地，马上离开小麦峪。但造反派中有人指着他的鼻子，愤怒地喊道：

“我们连军区大院都敢进驻，你一个小小的团部又算得了什么！赶快放我们通行！”

这时，造反派卡车上的高音喇叭，冲破深夜山谷的寂静，对着部队的营区喊叫：“阎红彦滚出来！阎红彦滚出来！”

凌晨 4 时多，造反派在半推半就的状态下，开车闯过了大营门，直驶山谷里的部队团部。到达团部营区后，他们纷纷跳下汽车，三五成群地挨房挨屋进行搜查。

这时，阎红彦的秘书和警卫员已经接到团参谋长的告急电话，立即去敲阎红彦的房门，谁知不见动静，接着他们便去敲第二间阎红彦的爱人王腾波的房门，王腾波匆忙摸黑起床，又一同再来紧扣阎红彦的门，仍然听不见阎红彦的答话。他们预感情况不妙，便决定把房门砸开。当他们在手电灯光的照射下走进室内，只见阎红彦和衣躺在床上，伸手一摸，双手冰冷，两眼紧闭，早已停止了呼吸！警卫员打开了灯，看见桌子上放着一张纸条，上面写着：“腾波：我对不起你，我是陈伯达、江青逼死的，你不要难过。”

见此情景，秘书曹贤桢立即打电话给团参谋长，说：“首长得了急病，赶快派医生来。”

医生火速赶到阎红彦的房间，施行人工呼吸进行抢救。

抢救无效，王腾波悲痛异常，秘书和警卫员便将窗帘放下，在阎红彦的身上掩盖上两床黄军被，关闭房门，搀扶着掩鼻哭泣的王腾波，一同登上后山……

前往小麦峪的造反派冲进警卫团。此时，警卫团的部队大部分在生产基地劳动，营区里只留下少数人员看守。在警卫团搜寻的造反派在一间单人宿舍里，发现有一位省委机关的驾驶员在蒙着被子睡大觉。造反派觉得蹊跷，便把他从床上捅醒，询问他是怎样到小麦峪来的。这位驾驶员尚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一边发着牢骚，一边告诉造反派，他是昨夜 12 点后，因周兴省长的驾驶员一时不在，临时派他驾车到军区大院广场，将与造反派结束谈判后的周省长送回到小麦峪的。

造反派问他周兴省长现在在哪里，他也说不清楚，只知道周兴省长的住房，就在团部机关右边山坡上的一排平房里，小车嘎斯 69 就停放在平房后面靠山坡的小平坝里。造反派迅速找到了周兴省长所住的那排平房。这座平房依山建造，一字形排列，水泥盖顶，呈一个一个半椭圆形，显得异常别致。在平房后面的小平坝里，果真并排停放有两辆越野性能好的 69 型嘎斯车，每辆车里都备有行军床、简单被盖、煤油炉、米面等物。从这些食物、用品推测，这是以防万一，流动荒郊野外食宿使用的。

小车仍然停放在这里，这就证明周兴省长没有乘车出沟，那此时又在何处？这辆 69 型嘎斯车，其中一辆是周兴乘坐的，而另一辆又是谁的呢？造反派对周兴所住的那排别致平房引起了注意。他们挨屋认真搜寻，只见间间房门紧闭，透过玻璃窗户观察，见有的房间里，床上的被褥被蹬向一边，有的写字台的抽屉拉出，还未来得及推回去，有的连室内的痰盂都被踢倒，污水洒满一地。从这些景象判断，住在室内的人，是在一片漆黑中慌忙离开的。唯有平房的第一间，前后窗帘下垂着，无法观察到室内的情景，房门上又另外增加了一把明锁。为什么这间房屋特别？造反派引起怀疑，找来团参谋长询问，参谋长推说连他也不知道。造反派要求打开房门检查，参谋长面呈难色，摊

开双手说："钥匙被人带走了，没留在家里！"造反派不信，再三索要，参谋长仍然坚持说钥匙不在手上。这时，造反派中有人沉不住气发火了："没有钥匙，就把门砸开！以后换一把新的！"随后，一阵乒乒乓乓声，房门被造反派砸开了。他们心急难耐地走进屋，顿时被眼前的景象吓呆了：

一张双人床上平躺着一个用两床黄军被，从头到脚盖得严严实实的人！为首的一个造反派掀开被子一看，不是别人，正是阎红彦！只见他双眼紧闭，脸色煞白，早已停止了呼吸！

造反派面面相觑，不知所措，连室内的空气都似乎出现了短暂的凝固。突然，有人醒悟似高喊："快！快！我们都全部出去，保护好现场！"走进室内的造反派，这时才惊魂不定地相跟着走出房间，立即向"兵团"总部打电话报告"阎红彦虽已在小麦峪找到，但已死去"的惊人消息。

"阎红彦被红卫兵打死了"，"阎政委光荣牺牲"。当天，昆明的大街小巷就到处是这种传言。

1 月 8 日上午 8 时多，空军"昆明指挥所"主任刘懋功突然接到陪同秦基伟去巫家坝机场的秘书从机场打来的电话，说："阎政委死了。秦司令员叫派人去查看是怎么死的。"并告诉刘懋功，秦基伟眼睛都哭红了。

刘懋功闻讯非常吃惊，他立即派气象处长刘星启带人去看，但他们到西山筇竹寺前就被群众组织拦住，坚决不让过去，只好回来了。刘懋功又派通信处长王友忠和军务处长赵炳彦去，在受到群众拦阻时，通讯处长王友忠对群众组织说："要去龙潭街空军部队执行任务，必须放行。"造反派看他是空军，就放行了。他俩回来向刘懋功报告说："阎政委住在警卫团，死在他睡觉的床上，穿着整齐，从外表来看，没有任何被打现象，脸和手上均无外伤，不像被打死的样子。找不到与他同住的妻子王腾波。省长周兴也找不见了，但茶杯里的水还是热的。看来走得不久，不知去向。"

刘懋功立即将这些情况向秦基伟做了报告，并同时报告了北京。

上午 9 时多，"823"总部头头刘殷农亲自乘一辆北京牌小汽车来

找中央文革记者站驻云南记者肖健卿，略露惊愕地对他说："阎红彦书记在小麦峪找到了，但却死了！我就是来找你，赶快一同到那里去看看的！"

这消息如同晴天霹雳，肖健卿怔惊不已，不住地反问刘殷农："是怎么死的？你们又是怎样知道的？"

刘殷农不在现场，说不清事情的具体经过。他是接到前往小麦峪的造反派电话才得知这一消息的。然后，便马不停蹄地坐着小车，来邀记者一同前往。

肖健卿立即与刘殷农一同上车，火速赶往离昆明 30 余公里的小麦峪，上午 10 时许，便到了那里。

小麦峪，警卫团驻地，异常幽静和隐蔽，团部的营门设立在沟口，进门之后，眼前呈现出一个扇形储水库，沿水库一条公路，直达山底，那里依山修建着许多建筑，便是团部机关和各营、连的营区了。营房的后面，青灰一片，是东西一眼望不见尽头的山岗。

这天一大早赶赴这里的，还有昆明军区政治部保卫部的两人，其余就是昨夜从军区大院广场赶到这里，发现阎红彦已经逝世的 20 多名造反派群众了。

刘殷农和肖健卿立即与军区保卫部的两人走进了阎红彦尸体躺卧的房间。这房间大概有 15 平方米左右，设备也较为简陋，是为战备紧张时，特意为军区和省委领导同志短暂居住时使用的房间。进门靠右，贴墙摆有一套单人木靠椅，正面靠窗，有一张书桌，临桌的左边，有一张双人床，床头立着一个衣架，上面挂着一件军呢大衣。大家的注意力很快集中在躺卧双人床上的阎红彦身上。军区保卫部的人，熟练地戴好手套，将两床黄军被慢慢依次揭开，观察阎红彦的神态，只见他身着黄军装，上衣领口敞开着，双眼和嘴唇紧闭，看不出有与人搏斗、痛苦挣扎的痕迹，接着搜寻上衣袋，除发现心脏病急救药——硝酸甘油片之外，其余也未看到什么。

再继续搜查，发现临床的书桌上面留有两个小空药瓶，一个药瓶标签上写着降压灵，另一个写着眠尔通。屋角的痰盂里，还漂浮着两个棕褐色的小针药空瓶，上面印有白色的字样，也是属于硝酸甘油之

类的药物。从衣架的呢大衣裳口袋里，搜寻出一张小纸条，上面写着请求阎书记在某某时间到哪里会见某某人。其余也就未再发现有什么特殊异样的东西。

两位军区保卫部的干部，将搜到的这些药瓶、针药瓶等一一包好，以备带回去进行化验检查。在这一切工作结束之后，大家相随退出室外。通过协商，这间屋子和阎红彦的遗体，暂由警卫团和造反派共同监守，未经昆明军区批准，任何人都不得进入室内。

接着，大家又急切地找到警卫团参谋长询问。团参谋长神情拘谨，满脸疑惑，答话也异常简单，一再推说："我们只知道负责守卫军区和省委领导的住处，至于其他的一概不能过问，也根本不知道发生了这种事情！"再继续向他提问，他只是摊开双手，摇头以示回答。

军区保卫部的人和"823"头头刘殷农等人在现场开会协商，认为当务之急，必须马上进行尸检，用科学的手段弄清死因。对此，刘殷农毫不隐晦地发言说：

"从目前所作的一切看，我们对军区总医院很不信任，因为那里两派闹得很凶，也难保不出问题，我们的意见，只有立即将情况电告中央，请求中央从北京派来法医进行解剖！"

双方还进一步达成协议：在阎红彦的死因尚未完全查清之前，绝对封锁消息，凡是昨晚进入小麦峪山沟的造反派群众，一个也不准离开。军区保卫部的人和刘殷农以及记者，因为工作的需要，可以不受这个规定的约束，但必须坚决做到，目前除向上级和中央反映情况之外绝对不能向社会公开透露任何一点消息。

王腾波逃到小麦峪后山，省委派车将她接回昆明后，立即乘飞机去了北京。

周恩来得到阎红彦的死讯后，很快就打电话给空军昆指主任刘懋功。刘懋功不在，空军昆指副主任朱刚接的电话。周恩来说："要用冰块把阎红彦同志的遗体保护好，北京马上派法医前去检查。"朱刚向刘懋功报告了周恩来的指示，并立即照办。

8 日深夜，云南省委组织部副部长兼共青团省委第一书记张曙光等人得知阎红彦的死讯后，分别带了几十人跑到南窑车站，计划立即

上山。张曙光说：“我怀疑这是不是毛泽东思想，如果共产主义是这样搞法，我要退党，把枪一提，上山打游击。”

## 第 388 回：转过身，不喊“打倒刘少奇” 毛泽东，肯定《文汇报》夺权

周恩来处理完围堵、冲击中南海的事情，接见完七机部的三派代表，已是 1 月 8 日的早上。这天的北京，天气很冷。大庆一万多学徒工和半工半读学生也跑到首都，要揪余秋里。大庆油田的生产因此受到很大影响，有些单位面临停产的困境。对此，全国劳动模范大庆油田铁人王进喜十分着急，他也来到北京，请求周恩来接见全国石油系统在京全体人员，动员他们回大庆“抓革命，促生产”。周恩来答应了他的请求，准备在 8 日下午接见他们。

下午 16 时，北京工人体育馆聚集了全国石油系统的数千名工人、干部、学生，其中有造反派，也有保守派。主席台上方挂着“批判石油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横幅。主席台对面贴着“打倒余秋里”、“打倒康世恩”的大字标语。

一直等到到晚上 19 时 30 分，开会的时间到了，但是没见周恩来出现。主持会议的北京石油学院学生出来向大家解释说：“周总理问会场内贴的什么标语，我们汇报了，周总理不同意，要求把打倒余、康的标语撕掉，大家同意不同意？”

马上有不少人起哄：“不同意！”

主持人又回去商量，大约几分钟后，主持人又出来说：“周总理说不撕掉标语，他就不讲话，大家同意不同意？”

经过这样来回两次折腾，会场内打到余秋里和康世恩的大标语终于被撤掉，开会时间也被拖延了半个多小时。

20 时 10 分左右，周恩来终于走进了北京工人体育馆，全场报以热烈的掌声，周恩来不停的向大家招手致意。王铁人首先讲了几句开场白，接着周恩来向与会群众发表即席讲话。他首先表示：

“你们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在石油战线上取得胜利的一些无名的英雄。现在你们在进入这半年多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你们现在会师在北京，要响应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号召，要高举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红旗，要彻底批垮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样的一个斗争精神，我们支持你们！”

他接着说："在进行路线斗争中，你们许多单位，比如像石油学院，比如像大庆油田，还有其他的单位，曾经受到过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迫害、压迫，以至斗争、围攻，甚至于错打成右派分子、反革命分子等等，这一切应该由部党委、院党委和前工作组他们来负这个严重的责任。"

口号声起。

周恩来："我现在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对你们这些错打的同志，工友们宣布恢复名誉，一律平反。"

口号声再起。

周恩来强调："如果哪个单位不按照你们的要求，不按照中央的规定执行，那么，你们查出来，就要报告上级，报告党中央，凡是违反这个规定，过了期限不交出来的，那末查出以后，照规定所说的那些条件，凡是犯了规定的，应该报告上级，报告党中央，给他们严厉的处分。"

他说："现在许多地方，从部党委起到院党委，或者前工作组，或者某个单位的党委，在这个斗争中没有挺身而出，承担责任，承认错误，有时候躲起来，等到群众揭发了以后，又软下来，什么都承认，不讲原则，不应该批的条子也批，不应该给付的款子也付，这样又变成了另一个错误，就从怕群众怕革命走向发展经济主义，这些都是不允许的。"

他再次强调要把斗争的矛头指向制定这条反动路线的人，"就是刘、邓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场内有一群众领呼口号："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全场随之响应，但这时周恩来却没有举手，而是转过身去，背对着群众，面向主席台上悬挂的毛泽东画像。当又一群众领呼："打倒刘、邓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时，周恩来才转身面向群众。他说：

"这两个口号是有区别的。我们彻底批判刘、邓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彻底打垮！另一个口号，今天在十一中全会的决定上，他们两位还是在党中央常委。今天，我代表党中央讲话，这样的口号在我面前喊，使我处于为难的地位。"

他特别说明："许多次，北京的同学们、战友们保卫中南海，冲进中南海，毛主席的指挥中心、党中央的指挥中心、国务院的指挥中心。要去做什么？要去把刘、邓两位揪出来，毛主席给我的任务是要说服同学们、战友们不要这样做。你们可以彻底地批判，批判他们两位为代表的这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但不需要用揪斗的办法，可用批斗的办法。不需要面对面，可以用背靠背的办法。就是说，斗争可以面对面，也可以背靠背。斗争可以是口头的，也可以是书面的，送大字报不就是书面的嘛！今天在这样的会场，你们想一想，有这样的问题，组织的问题，你们要信任毛主席，信任我们伟大的领袖采取的每一个步骤都是对的，对不对呀？"

群众齐答："对！"

周恩来："昨天晚上，也就是今天快天亮了，我们还办了这么一件事。中南海的 4 个门，新华门、西南门、北门、西北门都被包围了，"

这时王铁人过来，"请周总理坐下讲。"

周恩来说："我习惯站着。"

众人报以热烈地掌声。

周恩来继续说道："来包围干什么呢？他们要冲进去，结果在西南门有 100 多人爬着铁门冲进去了，同学们、工友们，你们想一想，不是大家说要誓死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捍卫毛主席为代表的中央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吗？这么个情况，我怎么样？我只能挺身而出挡住！"

现场长时间热烈鼓掌，高呼口号。

周恩来："我只好去劝阻，我们不能跟群众对立，只能去劝。"

"这样的事我处理了五件：两次冲进北门，三次冲进了西南门。这是第五次，说服了很久，结果，我引导他们到人民大会堂去开会，今天 3 点钟，我同文革小组各位同志，陈伯达同志，是我们常委、江青同志、王力同志、戚本禹同志、关锋同志、穆欣同志我们都去了，还有汪东兴同志，中央办公厅主任，我们都去了，讲这个道理。我们希望再不要出现这样的事情，我们希望在座的同学们、工友们、战友们你们有机会宣传宣传这件事。劝他们不要这样做。"

他再次建议大家不要使用大喇叭宣传车。

周恩来说："路线的错误一般的我们是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坚持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一直到进行反党活动的两面派，像彭、陆、罗、杨集团这样，那已经转变为敌我矛盾了。但是，如果对错误路线，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顽抗到底，坚持不改，那也就要滑到反党反社会主义泥坑里去了。所以，这个斗争既区别两类矛盾；又要警惕着注意看一些坚持不改顽抗到底的人，因为这都是阶级斗争在党内，在人民当中的表现和反映。"

"现在我说到本题，石油系统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时期，在这一段时间里头，领导上是犯了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错误，有的还没有改正，这是严重的，应该敲起很大的警钟，警告他们，批判他们。"

"另外，对石油战线，我们必须有一分为二的精神。我相信在座的工友们、同学们、战友们，你们会承认任何事情都要一分为二的，何况这个胜利的石油战线，石油战线，当然我们从开国以来就搞油田，可是最大的发展，最大的收获，是大庆这面旗帜。"

周恩来回顾了 7 年前石油战线的大庆会战，充分肯定了余秋里的成绩。他说："石油部的创业者余秋里同志，在这个工作上有他的成绩，当然还有其他领导同志，我不一一列举了，但他是主要的负责人。"

"余秋里同志在这个时期也同样地犯了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严重错误，在这两年工作中也比在大庆的 5 年中有了骄傲了，不那么虚心了，民主作风不够了，相应地就造成严重的错误。但是这两个功绩不能抹杀的，如果不这样说是不公道的。不能怪你们，我丝毫没有责怪你们的意见，我仅仅感觉我知道这个情形，又受主席的委托，我必须向你们说清楚，这是我的责任。"

会场上再次响起掌声和口号声。

周恩来说："在以刘、邓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执行的时候，是谁来指挥工交部门的呢？不是余秋里，也不是李富春同志，而是薄一波，是工交政治部的陶鲁笳。为什么在这个工交战线的主要矛盾，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甚至更深入挖到、联系到彭、罗、陆、杨反党活动的时候，矛头不是指向薄一波、陶鲁笳，而是指向李富春、余

秋里两位同志呢？同志们，希望大家好好地想一想，这是两个不同的方向和性质。”

“现在谈到经济建设的时候，矛头不是对准揭露彭真、薄一波的活动，反过来要对准李富春同志、余秋里同志，甚至于在最近一个斗争会上硬是要给余秋里同志挂上黑帮的牌子，硬是要他手举反动的修正主义分子的牌子。余秋里同志说的对，他说我不能对抗群众，我只能俯首听命，但是我心里是有数的，他不是。我觉得他的态度是对的，我曾经把这件事告诉最近把他押到中南海的那两位青年同志，一位石油学院的同志，一位矿业学院的同志，两位青年同志很讲理，我一说就懂了，我把这个事情也报告了毛主席，主席听到不同意这样做法，临走还嘱咐我，还是要向同学们指示出，这个方向就是说，不应该对准余秋里同志。”

周恩来再次重申了他在人民大会堂的说的那段话：“现在在中央和国务院做日常工作的像李富春同志、陈毅同志、李先念同志、谭震林同志、谢富治同志，他们都是在辛辛苦苦地在第一线工作，当然还有别的副总理哪，象聂荣臻同志，我在军事院校的会上也讲了，也是一样的辛苦，不错，这些同志在一段时期内，在不同程度上犯了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错误，但是必须为他们说明，当时经过林彪同志、主席和其他同志揭发了彭、陆、罗、杨反党集团的时候，刚才说的那些同志是坚决批判他们的，坚决站在毛主席、林副主席、党中央一起的。同样，在十一中全会主席贴出第一张大字报，批判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时候，他们也是跟着主席站在一起的，所以他们在实际工作中。不论在前或者在后犯的一些错误，他们必须要向他们工作有关的单位或者那个方面进行检讨，允许他们经过准备，不放弃日常的工作来进行检讨。如果一次不行，再进行多次，但是不能多次把他们揪来揪去，无法工作。”

“昨天包围中南海的时候，要揪谭震林，要揪其他同志，我们都不能同意。我们答应，两天内让他们准备某些地方可以去检讨，但是某些方面，我们要研究考虑。为什么？因为不能把斗争的方向搞乱嘛！”

“至于石油战线的本身，我们很支持你们在石油工业部成立一个全国石油系统的一个联络的组织，联络站或者叫联络委员会。”

“事实上，我们大庆油田，在工人中是一面模范的红旗，就是王进喜同志。他这次抵制了部党委，油田工委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些压力。甚至于部要大庆用官办方式组织一个赤卫队把他委成总指挥，他没有到职。他相反的不赞成工委抵制中央的指示，不让红卫兵，工友们去到大庆串联的，这就对了，等到大庆油田工委瘫下来了以后，什么都推的时候，在×万工人的大庆油田让×万人要批条子让出来串联，工委随便答应时，他也反对。这个反对也对。因为你们想一想×万工人的大庆油田，让×万多的学徒工，一小部分的半工半读的学生还有其他的统统离开大庆油田，放弃了生产不管，无数的井停下来了，我们能忍心这样的情况吗？抓革命、促生产是这样的抓法吗？大庆本身就会闹革命嘛！放着大庆工委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不批判，要出去串联，你们说好不好？”

群众齐答：“不好。”

“现在许多机关因为闹革命，把业务统统放下来了，这个不好的呀，其结果许多急事找不到人，许多电话也接不到。我们不能使我们业务工作瘫痪。当然有许多官僚手续是可以打倒的，但是不能说紧急的事不办了。”

“我们不能把应该进行的业务、联络、通讯、指挥、调度，把这些都停摆呀！我们不能把这些生产上的重大的业务因为造反停下来，那不是造反的方向又错了吗？”“最后，我们希望在机关，在厂矿的同志、工友们，注意我这个呼吁。”

“好，占的时间很多了，我现在又要开一个紧急会议去了，结束这个讲话。 ”

下午，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 118 室参加毛泽东召集的政治局和中央文革碰头会，出席会议的中央文革成员有陈伯达、江青、王力、关锋、戚本禹、唐平铸、胡痴。

毛泽东说到陶铸的问题，他说：“陶铸的问题很严重。陶铸是邓小平介绍到中央来的，这个人不老实，邓小平说还可以。陶铸在十一

中全会以前坚决执行了刘邓路线，十一中全会后也执行了刘邓路线。在红卫兵接见时，在报纸上和电视里照片有刘邓镜头，是陶铸安排的。陶铸领导下的几个部都垮了。那些部可以不要，搞革命不一定非要部。教育部管不了，文化部管不了，我们也管不了，红卫兵一来就管住了。

“陶铸的问题我没有解决了，你们也没有解决了，红卫兵起来就解决了。

“在中南局宣传毛泽东思想是假的，没这回事，树立自己的威信，打倒中央，希望你们开会能把陶铸揪出来才好呢！”

在会上，毛泽东专门提到《文汇报》接管的事情，他充分肯定了上海《文汇报》和《解放日报》的接管，他说：

“上海形势发展之快，出人预料，令人鼓舞。”

在这里，毛泽东使用了“夺权”二字。他说：

“过去各省市的造反派，批判报纸宣传了资产阶级的反动路线，都是采取把报纸封掉的方式，现在《文汇报》造反派宣布夺权以后，宣布自己来办报纸，这种做法很好。《文汇报》现在左派夺了权，4号造了反。《解放日报》5号也造了反。这个方向是好的。《文汇报》夺权后，三期报都看了，选登了红卫兵的文章。有些好文章可选登。《文汇报》5日《告全市人民书》，可以转载、广播。他们内部造反，过几天可以写一个综合报道。这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这是一场大革命。许多报纸，依我说，封了好。但报还是要出的，问题是由什么人出。《文汇》、《解放》改版好，这两张报一出来，一定会影响华东、全国各省市。这件大事对于整个华东，对于全国各省市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发展，必将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

搞一场革命，一定要先造舆论。6月1日《人民日报》夺了权，中央派了工作组，发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我不同意另起炉灶，但要夺权。唐平铸换了吴冷西，开始群众不相信，因《人民日报》过去骗人，又未发表声明。

两个报纸夺权，是全国性的问题，要支持他们造反。我们报纸要转载红卫兵的文章，他们写得很好，我们的文章死得很。中宣部可以不要，让那些人在那里吃饭，很多事宣传部、文化部管不了，你（指

陈伯达）我都管不了，红卫兵一来就管住了。

上海市革命力量起来，全国就有希望，它不能不影响整个华东，以及全国各省市。《告全市人民书》是少有的好文章，讲得是上海市，问题是全国性的。

现在搞革命，有些人要这要那，我们搞革命，自 1920 年起，先搞青年团，后搞共产党，哪有经费、印刷厂、自行车？我们搞报纸，同工人很熟，一边聊天，一边改稿子。

我们要各种人，左、中、右都要发生联系。一个单位统统搞得那么干净，我历来就不赞成。（有人反映吴冷西他们现在很舒服，胖了）太让吴冷西他们舒服了。不主张让他们都罢官，留在工作岗位上，让群众监督。

我们开始搞革命，接触的是机会主义，不是马列主义，年青时《共产党宣言》都未看过。

要讲抓革命、促生产，不能脱离岗位来搞革命嘛！保守派不搞生产，这是很大的阶级斗争。你们不要相信‘死了张屠夫就吃浑毛猪’，以为没有他们不行，不要相信那一套。”

毛泽东点燃了一支烟，又接着道，“这是一个大革命。这件大事必将对于整个华东，对于全国各省市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发展，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你们中央文革马上起草一份贺电，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的名义致上海各革命造反团体，向他们表示坚决的支持，热烈的祝贺！要通知北京的各家报纸，要发社论，要让全国人民懂得：这场斗争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革命，即无产阶级消灭资产阶级的大革命！”

陶铸既然不行了，宣传口由谁接替？毛泽东决定成立中央宣传组，接替陶铸，王力被任命为组长。

陶铸夫人曾志听到毛泽东 1 月 8 日这天对陶铸的评价后，不相信毛泽东会说陶铸不老实，认为可能是说的“不老成”。她特地写信去问毛泽东，毛泽东阅后用铅笔在“不老实”这三个字的下面画了一横杠，并打了个“？”号，然后，将信退还给曾志。

在政治局会议上，经毛泽东批准，新华社 1 月 8 日晚 20 时的新

闻联播节目，播发上海的《急告全市人民书》，题目改为《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同时还播发了《人民日报》的编者按，全文如下：

编者按：上海《文汇报》一月五日发表的《告上海全市人民书》，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文件。这个文件高举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红旗，吹响了继续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反击的号角。这个文件坚决响应毛主席的抓革命，促生产的伟大号召，提出了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关键问题。这不仅是上海市的问题，而且是全国性的问题。随着上海市革命力量的发展，崭新面貌的、革命的《文汇报》和《解放日报》出现了。这是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反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胜利产物。这是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这是一个大革命。这件大事必将对于整个华东、对于全国各省市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发展，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

编者按是王力起草的，经毛泽东亲自审定。其中末段“这是一个大革命”起的一段话，是毛泽东的原话。

## 第 389 回："全红总"，召开对外记者会　外事口，"打到陈毅"呼声高

1 月 8 日晚上，"全红总"继《三家联合通告》后，又做了一件让中央文革和江青瞠目结舌的事情，他们自己召开了一个对外记者招待会。

本来，"全红总"和劳动部、全国总工会三方签署了《联合通告》后的第二天，1 月 3 日，中央文革驻劳动部联络员邵一海告诉"全红总"，中央文革认为这个文件很好，可以发往全国。当天，"全红总"五人小组的金展云在"五人小组"碰头会上提出：为了让国际上了解"全红总"，应该召开一个记者招待会。"五人小组"一致同意他的提议，并责成他和美国人李敦白筹备这个会议。

金展云并不是临时合同工，而是中央广播电台对外部波兰语高级翻译。他进入"全红总"的领导核心后分管对外联络工作后，通过李敦白的关系，向各国左派驻京代表、外国专家、外国记者和外交官们介绍了"全红总"。

但是 1 月 4 日一大早，邵一海又气喘吁吁跑到"全红总"找到周牧，说中央文革决定缓发《三家联合通告》。周牧问他是何原因？他只是说"这是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叫缓发就缓发，你必须执行。"说完就匆匆走了。

1 月 4 日上午 10 时，"全红总"周牧接到江青的电话，也是要他们缓发《三家联合通告》。周牧询问缓发的原因，她只说："现在发太被动"，就放下了电话。11 时，"全红总"李晋暄又接到戚本禹的电话，内容同样是缓发《三家联合通告》。

1 月 5 日邵一海找到周牧和杨政，告诉他们："中央文革决定要销毁《三家联合通告》。"

就在这天凌晨，"全红总"贵州分部的萧碧璜、杨爽秋回到北京。周牧将《联合通告》的原件交给萧碧璜，并对他说："你看，这上面可是劳动部长兼党组书记郗占元和全国总工会书记王志杰的亲笔签字。还有'全国红色劳动者造反总团'、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部和中华全国总工会三枚大红公章。"

接着，他把这两天中央文革的态度突然转变的情况告诉他们两人，然后说："这一份是我和毛胜年保存的原件，交给你。只要有一份，就不愁会有几千份，几万份。你带回分部，去设法大量翻印，发到全国。我们先把这《联合通告》送回老家去，就地闹革命，……"

毛胜年突然打断周牧的话说："好呀，小周牧，你这是阳奉阴违呀！当着中央文革的面，你同意销毁，背着中央文革，你叫老萧大量翻印。对抗中央文革，这个罪名，你吃得消吗？"

周牧笑了笑，说："先造成既成事实，再由下面给中央施加压力。这下一步，全看萧碧璜的了！至于对抗中央文革的罪名……"周牧说到这里，抬眼望望大家，用手做了个割脖子的动作说："了不起是碗大一个疤罢了！"

萧碧璜问："总部会议上，大家对这问题的意见怎样？"

周牧说："绝大部分人不同意销毁，而且态度坚决。毛胜年也是激烈的反对销毁者之一。只有极少部分人同意销毁"

萧碧璜问周牧："你呢？"

毛胜年抢先一步答道："他嘛，当然是同意销毁的那一派了。"

萧碧璜接着问他："总部能给我什么配合？"

周牧说："除了时间，什么也没有。总部只能在时间上配合你。周总理已指示：叫在北京的全国性组织，撤销总部，回家闹革命，并叫咱们'全红总'当这个带头的模范，口号就是：'打回老家去，就地闹革命'。我们的策略是拖，拖他两三个月，拖不下去了，再明撤暗不撤，把总部迁到广州。"

他略略停顿了一下，又接着说："总部迁到广州，这也只是公开的一面，而最主要的是，秘书组已做出决定，要你在西南地区建立一个可靠稳固的基地。总部明迁广州，实际上，各主要的负责人都去西南，西南才是真正的'全红总'总部所在地。"

毛胜年等周牧谈得差不多了，才接着说："好了，我也把组织部的决定告诉老萧：组织部收到昆明分团的电报，说昆明酱菜厂的临时合同工因参加'全红总'昆明分团被全部解雇，共 800 多人。昆明分团的处境危险，向总部告急，叫总部派人去协助他们。据他们的报告，

云南省共解雇了近 10 万名筑路民工，叫总部火速去人。总部抽不出人，决定派你到昆明，协助昆明分团，发展组织，解决这些被解雇工人的复工问题。另外，为配合秘书组和组织部的决定，总部决定成立西南区总指挥部，负责统辖云贵川三省的‘全红总’组织。我现在以组织部长的身份，向你宣布组织部的这一决定：任命你为‘全红总’西南区总指挥部的总指挥，这是公章。”

他递给萧碧璜一枚“全红总西南区总指挥部”的公章，接着说：“老萧，据各分团汇报给总部的材料都谈到，各地的走资派在这几天突然变本加厉，成批地大量解雇临时工合同工，年关将近，他们是要卡这些起来造反的临时合同工的脖子，想让他们连年都过不成，从组织上整垮我们‘全红总’。其中以东北、华东、华中，及湖南、云南、陕西等地最为厉害。你火速带人到昆明，给点颜色给他们看看。总部给你一个月的时间，解决了昆明的事，再到成都。

老萧，现在已在组织部登记的，总部已正式承认的分团已有 24 个，还有不少是尚未与总部取得联系的，全国除台湾、西藏外，几乎每个省都有我们‘全红总’的分团。党中央有八大局，我们‘全红总’也准备搞个八大区，将这 24 个分团由八大区统一指挥，你的西南区总指挥部却是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一个，未来总部的所在地就在你西南区。老萧，云贵川省的事，总部可算交给你了。”

接着，周牧将昆明分团的联络地址和分团负责人的名单交给萧碧璜后接着说：“明天，我会叫人给昆明分团发电报，说总部已派人来协助他们。”

最后，周牧说：“萧碧璜，总部是拖，你是要快，越快越好。”

在毛胜年的安排下，萧碧璜和杨爽秋坐着全总书记王志杰的小车直奔火车站。他们从踏足北京到离开北京，前后不足 18 个小时。

此后，国务院、中央文革又再三要求销毁已经印好的“全红总”和劳动部、全国总工会三方签署的《联合通告》。

再说“全红总”1 月 3 日确定召开对外记者招待会后，金展云和李敦白的办事效率很高，才一两天时间就筹备就绪，并把通知发给被邀请与会的外国人，决定在 1 月 8 日召开这个会。关于会议名称，原

订为“国际记者招待会”，但考虑到这个名称太敏感，改为“五大洲革命左派座谈会”。会期确定以后，金展云在总部会议上作了简报，大家也准备了与会的资料。周牧把“全红总”的这一决定告诉了中央文革联络员邵一海。

邵一海听说“全红总”要召开“五大洲革命左派座谈会”，非常吃惊，他对周牧说：“对外交往是需要中央批准的，你们要特别小心，最好少和外国人打交道。这些外国朋友中混有别有用心的人。我要立即向中央文革报告，你们等中央文革同意后再开会。”

周牧对他说，请帖都发出去了，希望他催促中央文革早些批准。

8 日中午吃饭时，周牧告诉邵一海，中央文革到现在没有否定的指示，会议应该如期召开，他希望邵一海能出席这个会议。邵一海听后脸色一变，情不自禁地说着：“胆大妄为，胆大妄为……”放下半碗没吃完的饭起身就走，也没和大家打招呼。食堂里的人把眼光一下都集中在王振海和周牧身上。不言而喻，大家都想知道，在这种情况下，这个会还开不开？

王振海用肘碰了周牧一下，周牧从王振海的眼神中看到了肯定的目光，于是对王振海，也是对大家眨了眨眼。食堂里的人不约而同鼓起掌来，他们都是北京和各地的临时工，因各种问题到北京上访，现在都是“全红总”成员，吃住都在劳动部。

1 月 8 日晚 20 时，“五大洲革命左派座谈会”在西苑饭店大会议厅召开。有 100 多名各国外交官、驻京记者、左派组织驻京代表、援华专家参加。“全红总”全体总部委员出席了会议。

会议由周牧主持，李敦白担任司仪和英文翻译。王振海代表“全红总”作了主题讲话，其他的总部委员：辽宁张宝成、贵州余洪珠等人也介绍了本地区的临时合同工所受到的不公的待遇，讲得痛哭流涕。“全红总”的几位代表发言结束后，外国朋友纷纷提问，由周牧和王振海回答。会议进行到近 24 时才结束。

会议结束后大家进行了合影。

中央文革联络员邵一海出席了会议。新华社、《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的记者近 20 人到会摄影采访。中央电视台、

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全程摄像录影。会议结束后，所有的中国记者都来请示邵一海，关于会议的新闻发不发？邵一海黑着脸说了 4 个字："一律不发！"就匆匆走出会场登车而去。

会后，周恩来与"全红总"负责人通了电话。他在电话中批评他们说："你们就是不听话，不听打招呼。在外国人面前哭哭啼啼像什么话！家丑不可外扬嘛！你们这样做置中央于何地？！"

"五大洲革命左派座谈会"以后，中央文革较少和"全红总"直接电话联系了。邵一海虽然经常来，但多是默默地观察，很少再提建议。

1 月 8 日至 1 月 9 日子夜，周恩来接见外事口"造反派联络总站"代表。他首先询问了外事口各单位造反派的情况，当听说外办没有造反派时，他质疑道："外办没有造反派？我看该有吧！"

他接着说到上海《文汇报》、《解放日报》的夺权："上海两个报造反，报纸改版了。《文汇报》的造反派、北航'红旗'、北京'三司'、哈尔滨的造反组织，还有西安的一个组织接管了《文汇报》，发表声明，相当好，我们广播了，明天登《人民日报》你们可以看看。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高举毛主席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说得很透。特别是提倡业务机关，生产机关，过去是保守或者右倾，压制革命，真正抓革命时，他把生产丢开，到外地去。另外出现了经济主义。我们提倡就地革命，回原地革命。北京的情况很多，接待发生极大困难。没有免费乘车，上车也不付费，不是大搞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际上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不利。上海两个报纸的造反宣言在北京很值得提倡，是继聂元梓同志第一张大字报之后的重大文件。"

周恩来问："你们代表开了三次会，有什么设想？"

代表说："开批判以陈毅同志为首的外办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请总理点火。"

周恩来说："最近很忙，中南海几个门很难抽身。我带动你们组织成立，就是点火。外交部的事我知道的多一些，外办我可以贴一张大字报，外文局还看过大字报，外轻的工业我知道，但内部情况、活

思想，就不知道了。外办知道的多一些，点火只能在外面，主要还是靠里面，外办多少人？”

答：“81 个。”

周恩来：“场地问题好办，一万人，咱们晚上开，反正外交系统只有一个，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外事系统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要经过中央同意。昨天对冲中南海的同志临时召集的紧急会议上，我讲了一部分，江青同志讲了一部分，文革小组都参加了，斗争的方向和矛头应有区别。考虑一个办法，祝贺你们组织成立大会，我去讲，供给你们一点材料，开誓师大会，我们得商量，口号得研究，不然就不好办了。”

有人说要打倒陈毅，周恩来说：“我反对，我不能接受。这样简单不行，我可以和你辩论一番，但我现在不和你们辩论。一外有的同志说，不是打倒陈毅，而是要把陈毅烧成红通通的无产阶级外交家。”

代表们说：“现在没有这些标语了，而是要打倒。”

周恩来说：“没有开辩论会，怎么能这样武断，烧烧我不反对。我把所有材料都给他了，他正在写长长的检查。这样的一个老同志还能不帮助？你们还告我一状，不要紧，那天（ 12 月 26 日）我很注意两个同志的发言，把你们的话听完了我才说的。无论如何，斗争的方向和矛头应有区别。在人民大会堂我讲的，今天我在石油战线上还讲过，不止我一个人，整个中央文革都是这样讲的。你们开成立会我想去讲，祝贺你们，彼此都自由一点，我讲我的，你干你们的，祝贺你们‘联络站’的成立。开誓师大会，要我到会，我就不好讲话了，我去我不是代表个人的，是代表中央的。你们‘联络总部’研究一下，让钱家栋同志参加。总之不要束缚你们，也不要使我为难。我代表中央庆贺你们。”

一外代表问周恩来：“陈总问题这么严重，总理为什么不着急？”

周恩来说：“你怎么知道我不着急？我的想法同你们的想法有距离，我今天不和你们辩论，上次听你们一直说完，我才说。”

接着，几个单位的代表也都说，要求陈毅到他们的单位检查。周恩来回答说：“你们要一个个单位检查，我想的是集中检查。外交系

统我主张按照中央的方针点火，我是支持你们的，不准串联现在突破了。”

有人提到：“ 12 月 15 日，外交部不让贴大字报。”

周恩来说：“不是国际来往的地方可以贴，我说过，你们要有联络机构，也要有贴大字报的地方。外宾来往的地方也不适当。对外的问题，总有个国际信用，还要反修，大街和外交部要区别。斗争矛头一定要根据中央方针，你们商量后定办法，我给你们找场地，找时间在 11、15 日举行，太晚我就忙不开，南京的问题我连搞了 3 夜，石油系统事儿更多了。上海春桥同志回去了，东北还搁着。如果给我多点时间讲话，就要点火，总有倾向性。我只能根据中央方针点火。我给你们找地方，工人体育馆是可以的，你们第一次集会，我实在没有准备。”

他说：“外事口是一个重要的口。我提议成立外事口联络总站。财经、侨务、工业也搞起来了。外事不能落后，关系国家命运，第一次和你们碰面，上一次是部分，今天比较广泛，时间晚了，我不准备多讲。如果你们同意我讲，我就准备系统讲话。”

外文局谈外文局局长罗俊的情况，周恩来说：“我对罗俊的看法同你们比较接近，但也没有全面调查。……我会系统地讲外事系统问题。我不能说敷衍的话，不能作片面的决定。我不能擅自决定。在大会堂的讲话，中央文革的讲话。形势是发展变化的，中央有新的指示，主席的决定我得遵守。我可以把你们的意见反映给中央。”

一外的同学向周恩来索要陈毅在广州会议上的讲话供他们批判。周恩来说：“陈毅在广州会议上的讲话我有，我看过，是有错误的，但是这是彭真在反党最后两个活动中攻击一批人的子弹。”

外文委有人讲：“张彦搞陈伯达是陈总同意的。”

周恩来说：“我是 7 月 1 日回国的。我第一件事是解决对外文委的问题。张彦目标虽然是对准陈伯达同志，我们 4 人商量过的，我们都没有这个看法，张彦是两面派，小人物，完全是反党，我们的看法是一致的，张彦搞特务活动，点了 29 个反革命分子后，中央常委才注意，我一回来就告诉我。张彦的阴谋就在这里。”

有人问周恩来：“说毛主席有了批示：陈毅同志对党赤胆忠心，胸怀坦荡，不必怀疑，有没有这回事？”

周恩来说：“我没有看到这个批示，但这并不意味着毛主席对陈毅同志不信任。”

## 第 390 回：装甲兵，许光达住进医院　看上海，调昆明三方进京

1 月 8 日晚上，军委装甲兵机关的造反派在工程兵学院造反派学员的串联和鼓动下，在司令部大礼堂召开了“批判装甲兵内以黄志勇为首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批判装甲兵政委黄志勇的“三反”言行和生活作风等问题。参加会议的有：装甲兵学院、第一坦克学校、第二坦克学校、第四坦克学校、第五坦克学校、装甲兵工程学院、装甲兵科学技术研究院、装甲兵司令部直属机关等单位的群众组织及陆、海、空军院校的造反派代表。出席会议的装甲兵领导人有：司令员许光达、政委黄志勇、副司令员贺晋年、程世才、顿星云、钟人仿、张文舟、参谋长邓家泰、副参谋长林彬、胡鉴、严振衡，政治部主任邱相田，副主任李毅、诸敏、杨昆山，后勤部部长宋庆生，副部长孙三、李海清、夏云超、李春林、张健民等。

会议进行中，从主席台的两侧走出几名戴红袖章的军校学员，他们拿着钢丝编制的高帽子给黄志勇戴上，痛得黄志勇“嗷—嗷—”地叫喊。装甲兵司令员许光达当即上前制止。学员们用力推开许光达，并高声斥责他。

许光达生气地说：“你们不守信用，你们还是军人呢，这么无组织无纪律！要戴高帽子，那就先给我戴上好了！”

许光达边说边抢高帽子。激动的情绪，无法抑制的愤怒，使许光达的心脏病突然发作倒了下去，全场哗然。台上的人忙着抢救许光达，台下的人闹闹嚷嚷。批斗会折腾了一个通宵，全军文革小组也来人和装甲兵的造反派头头谈话，一直到第二天早上……

许光达被送到了解放军总医院，经过医务人员的紧张抢救，慢慢地恢复了知觉。造反派也来到医院，他们还带来一副对联，要贴在许光达病房的门上，遭到护士的拒绝，他们就把对联贴在了许光达家的大门上。上联:小将造反有理；下联:老将理应支持；横批:造反有理。

我们再看云南。1 月 9 日上午 11 时左右，中央文革记者站驻云南记者肖健卿突然接到周兴省长的电话，要求肖健卿尽快到他那里去一躺。周兴与阎红彦是一同住宿在小麦峪的，此时此刻他主动要求接见记者，这对肖健卿来说当然是求之不得了。

肖健卿赶紧赶往周兴省长所指定的地点。省长热情接待，让座、倒茶。他启齿之前，神情略显惊异，劈头便说："我上午 10 点左右到家，才听说阎红彦同志不幸逝世在小麦峪了！"

这是怎么一回事呢？肖健卿急切地提问："周省长，你不是同阎书记同住在小麦峪的吗？他逝世的消息，你怎么回到昆明才知道？"

周兴省长把椅子向前一挪，略微靠近记者，然后仔仔细细地向他叙述了自己与阎红彦在小麦峪相处时的一些情况。当他讲到 1 月 8 日凌晨 4 点多钟，周兴还在熟睡，秘书突然敲响了他的房门，急促地说：

"团参谋长打来电话，说军区广场上的造反派，开着卡车找到沟口来了，蛮不讲理的，非要冲进来不可，建议我们赶快到后山躲一躲！"

听到这话，周兴也不敢开亮房里的电灯，摸黑翻身起床，从抽屉里拿出公文包，快步走出了房门。他看到眼前人影绰绰，喊声急促，便悄悄地问秘书："阎书记知道了吗？"秘书回答："他们正在敲门叫他呢。"周兴心想，阎红彦听到这个情况，也可能会到后山躲避的，便没有停下来等候，与秘书、警卫员一道摸黑登上了后山坡。待到天色发亮后，周兴等人得知造反派已冲进部队营区，便翻过后山，绕道到附近一个乡镇，打电话给省政府，派车将他们接回昆明市区。

周兴返回昆明，才惊闻阎红彦已逝世在小麦峪的噩耗。

1 月 9 日中午，昆明地区"造反派大联台指挥部"在检阅台召开 10 万人大会，介绍阎红彦的死讯，提出要求派代表上北京向中央汇报。这天下午，"823"总部头头刘殷农在军区大院广场通过广播车大声宣布：

"我'8.23'造反兵团，庄重地向大家宣告一个消息：省委书记阎红彦已经被我们找到了，他躲藏在昆明郊区小麦峪云南省军区警卫团，但已经于昨日凌晨死去。我在这里，向大家详细报告现场所见到的情景，以正视听……"。

记者肖健卿听到广播，大吃一惊："这是怎么一回事呢？造反派与昆明军区的同志，不是已在小麦峪达成协议，在阎红彦同志逝世的原因未弄清楚之前，严密封锁消息，绝对不向社会透露的吗？！情况

一定又有了新的变化。”

他以最快的速度赶到广场。看见刘殷农正站在一辆广播车的棚顶上，手握半导体高音喇叭，直接向全场喊话。肖健卿立即钻进这辆广播车，看到一个群众组织的头目，就用手指指车棚项，不解地问道：“这是怎么一回事？不是暂时封锁消息，不向社会公开发布吗？”

那位头头不满地说：“他妈的！军区撕毁协议，自行先在内部公布了消息，我们如果再不说话，就会要被诬陷致罪了！”

这时，“8.23”的一些头目，也不断以不满的口吻谈论着从部队方面传来的消息：

“有的部队干部、战士不分是非，袖戴黑纱、胸别白花，召开追悼会……”

“有的部队变换形式，以学习座谈为名，召开悼念阎红彦的会议，有人在会上痛哭流涕地发言，说阎红彦的逝世是造反派暗害的……”

从街头走过的解放军，大多神情严肃，低头沉思，匆匆而去，几乎没有交头接耳，面露笑容的。

下午，云南省委书记处召开紧急常委会议。赵健民派他妻子到书记处说：“健民不相信阎政委是自杀。”

赵健民说：“他们只能将我压碎，不能把我压扁。我宁可个人牺牲，也要和他们斗到底。”并秘密召集一些人到军区医院写了一封“控告信”，控告桂尤喜、黄兆琪对他的迫害。

至夜，昆明街头张贴出了公布阎红彦逝世消息的大字报，造反派发行的小报也到处散发，上面登载出详细的现场目击记。

这消息，来得如此突然，震惊了春城的大街小巷，引起千万群众的关注。

入夜，隐隐隐约约可以听到一些楼里传出的哀乐声、哭泣声。这声音十分低沉，只有凝神静思的人才能听到……

昆明市委、公安厅等单位还分别由赵增益等人主持开了追悼阎红彦的大会。

“红卫兵总部”公开宣称：“悼念阎红彦”。

深夜，周恩来亲自打电话给昆明“大联合指挥部”负责人询问情

况，并表态支持造反派，同意造反派、军区、省委三方面派代表赴京汇报，商讨造反派群众撤离军区机关大院的有关事宜。

按照周恩来 1 月 9 日深夜的指示，第二天，1 月 10 日，昆明造反派代表 13 人和云南省委书记郭超、云南军区副司令员王银山一起，乘专机到北京向中央汇报云南的情况。

1 月 11 日，昆明“8.23”头头黄兆琪兴高采烈地告诉大家：“总理很关心、爱护我们，要我们今后一定要支持昆明军区的工作。并说，中央考虑，准备由国务院、中央军委与中央文革联合发出一个呼吁信，呼吁我们尽快撤离昆明军区大院。”

但此时，全国其他地方并不知道云南阎红彦之死，大家更多的是被 1 月 9 日《人民日报》转载的上海《文汇报》1 月 5 日发表的《急告全市人民书》所震动！当天，中央各报和全国各省市报纸步调一致，舆论一律，全都刊登了《人民日报》编者按和《告上海全市人民书》。

这天，徐景贤把起草《紧急通告》的经过向张春桥、姚文元作了汇报，张春桥埋怨他说：“你们刚刚搞了一个《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得到了主席的肯定，怎么又发了一个《紧急通告》，这不乱了套吗？”

徐景贤为此惶恐不已，还对朱永嘉说张春桥生气了，朱永嘉也惴惴不安。

1 月 9 日，陈丕显到国棉十七厂接受批斗。他对王洪文说：“你们这里很好嘛，我搬来和你们一起联合办公，只要给我装两部电话机，一部红的，一部黑的就行了。”

王洪文回答说：“我们这里庙小，装不下你这个大菩萨。”

由于“康平路事件”，“赤卫队”工人大批离岗，从 1 月 1、2、3 日起，上海火车发车就不正常。从 1 月 4 日开始，几乎全线停车。1 月 4 日下午，就在张春桥、姚文元来到上海后，与“机联站”徐景贤他们见面的同时，上海“工总司”就在开会讨论如何恢复生产和交通。会后，他们立即派人去火车站恢复通车，准备发出 14 次特快列车。但上海列车段乘务员大多加入“赤卫队”，乘务员人手严重不足。于是，红卫兵主动提出，由他们来做临时列车乘务员。

1 月 6 日，上海铁路瘫痪后第一列全程开往北京的客车，由“工

总司”的列车司机张生堂亲自驾驶，驶出了上海火车站。火车开到北京时，受到周恩来总理接见。这趟 14 次列车，被誉为“第一列红色列车”。

张春桥 1 月 5 日接见工人造反派后，参加会议的谢鹏飞回去就组织造反队到上海铁路的各单位恢复生产，疏通运输。此时的上海北站，人山人海，挤满了乘不上车的人，火车站里趴满了开不出去的列车，调度所连续几天只有几个人上班工作，而通常往往是二三十人。

“工总司上海铁路工人革命造反联合指挥部”，简称“铁联”的万金荣原来担任过运转车长，对铁路运输业务比较了解。他找来十几个以前做过调度工作的造反队员，1 月 9 日去调度室顶班。当晚，“铁联”与同济大学“东方红”一起，宣布接管调度室。

当时杨树浦发电厂仅余下两天的煤，情况万分危急，发电厂已告急。当天，五列车装着一万多吨煤奔向发电厂。同济“东方红”当天即向北京报告：上海火车站客、货运输情况大为好转。

1 月 10 日，“铁联”接管上海铁路分局。

1 月 12 日，“铁联”接管上海铁路局。这天，上海铁路恢复每天发出客车 21 列。这个数字已经是原来的客运发送的计划数。1 月 13 日，上海站发送旅客 3806 万人，货运发送 6.4938 万吨。铁路运输开始恢复正常。

1月13日，生产处于严重瘫痪的上海港，也被“工总司海港联合指挥部”接管。

1月9日中午12时15分，张春桥、姚文元在上海延安中路友谊电影院与上海各高校“红革会”负责人谈话，解决当时上海面临的问题。张春桥说：

“今天报纸不知道大家看过没有？《人民日报》发表了编者按语和你们红革会等十九个单位联合签名的《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发表在造了反的《文汇报》上，毛主席看了这个材料，毛主席看过后，认为《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写得非常好，《解放日报》《文汇报》的反造得好。为此，《人民日报》为这篇文章加了编者按语，这是毛主席和党中央对上海革命学生、革命工人的最大关怀，最

大鼓舞。关于这一点不要写大字报，可口头传达。”

“动员一切力量打退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把资产阶级的新的进攻彻底打倒，不只是把经济斗争转过来，而且要把革命左派队伍真正壮大起来，把工厂、农村的左派队伍真正壮大起来，使我们革命左派队伍在上海真正取得优势，这样上海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才能更深入、更广泛、更全面、更好地开展，这是我们今天来的希望。”

“你们‘红革会’也好，其它革命组织也好，希望你们分分工，大家做做宣传工作，要把这个当作很重要的任务来完成。同学们对经济斗争没有经验，参加这个斗争对我们同学有很大帮助，人家还会以经济手段来向我们进攻，例如：一个码头停工，要造成什么样的影响？不仅在经济上有损失，政治上也有损失，外国已有二十几只轮船在中国开不出去，莫斯科的广播电台也在宣传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搞糟了，上海的工人要求加工资罢工了。这是对我们最大的考验，我们要有勇气迎接他们的这个新挑战，老实说这没有什么了不起的，究竟是资产阶级力量大还是无产阶级力量大？”

“能力、权力在我们工人手里，但现在被利用了，被蒙蔽了。所以，需要学生不只是到工厂，也要到街道、里弄，也要到自己家里去宣传，使群众了解什么叫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两条路线的斗争。从政治上揭露这一阴谋，如果跟这一条路线走，那我们文化大革命要失败，有的人搞了1000多元钱，但文化革命不搞好，我们眼前的这点利益也没有了。我们的矛头不指向工人，艺徒，不责备他们，不要抓小人物，要抓就抓大人物，要揭穿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搞阴谋，大家来批判揭发，可登在你们的《红卫战报》上，也可以登在《解放日报》上，《文汇报》上来揭露他们的阴谋，把矛头对准这些人。”

“毛主席讲过：‘一九六七年将是全国全面开展阶级斗争的一年，在这些阶级斗争中，中央要抓重点，一北京，二上海，三天津，四东北。’毛主席把上海放在这样一个地位，这说明，毛主席对上海的运动很关心，并寄予无限希望，我们两人每天要打电话回去。”

“我和姚文元是奉命来到上海作调查工作的，是中央文革派来的

调查员，市委希望我们回来作他们的挡箭牌，我们不干。赤卫队要把我张春桥揪回来斗，我不接见他们，因为要首先说清楚一条：究竟是他们对，还是我对，说清楚了再接见。我们到上海来，是向上海人民学习的，我们主张快点把消息转给中央，我们当义务传递员，把《红卫战报》转给毛主席。”

这天，张春桥向毛泽东报告上海成立“上海市抓革命促生产火线指挥部”的情况，毛泽东表示“知道了”。

张春桥后来说：“火线指挥部可以称为‘经济苏维埃’，代替市人委。” “火线指挥部实际上就是夺权。现在，火线指挥部发个通告，什么事准，什么事不准，大家都照办。责令公安局，什么人要抓，公安局就抓了。你们看，一个普通的革命群众组织在向公安局下命令了。外国人一看就知道，毛泽东的国家把一切权力都交给人民了。市委还有什么权？市人委还有什么权？没有了嘛！我们到上海来了以后，还没有看到他们发过什么通知。火线指挥部是一个伟大的创造。但我们自己可能还不知道这是一个创造。自己干了一件很大的事，并不一定都懂得……”

## 第 391 回：换领导，新华社重组新班　回首望，印尼“九三〇”事件

1月9日，陈伯达、王力再次来到新华社，宣布中央昨天刚刚决定的宣传口负责人变更的精神。新任新华社社长胡痴还没有到，陈伯达说：“主人没到，我们客人先到了。我们前天晚上来，你们就出了一张号外，说话是随便讲的。你们新华社文章应该斟酌一些，我这个人对中国文法是不通，你们无非是要说明这个问题，要不然为什么要出号外呢？是不是这个意思？”

众人答：“不是。”

陈伯达：“不是这个意思就应该严肃些，第一次可以原谅，第二次再这样就不好了。发行了多少份？应该让我看一看再印。”

王力笑着说：“新华社的消息很快！”

陈伯达：“是不是成了路透社了。中央文革决定胡痴代理社长。他还没有来。”

因为等胡痴，陈伯达和王力先看了看大会会场，横幅是“彻底批判张海涛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于是问：“张海涛来了吗？”

张海涛：“在。”

陈伯达说：“张海涛从印尼回来的，在印尼干的不错，不要打倒，应该给一个改正错误的机会。”

众人鼓掌，表示赞成。

陈伯达继续说：“我不认识张海涛，但是听说他在敌人面前是勇敢的，可能这几个月和大家相处的不是那么好，是不是骄傲了？是上了陶铸、熊复的当了。王唯真是从巴西回来的，一个人要经得起考验，在敌人面前是勇敢的，这样的人要好好的团结他，有错误，有缺点大家帮助他，批评一下可以嘛！”

张海涛答：“完全可以。”

陈伯达提到的张海涛、王唯真都是新华社编委会成员。

张海涛原是新华社驻印尼雅加达分社社长。1965 年 10 月 1 日，他正陪同总部设在雅加达的亚非记者协会一个代表团访问中国，在天安门观礼台上得知印尼 9 月 30 日发生“九三O”军事政变的消息，立即向总社领导要求准许他立即返回印尼。

1965 年 9 月 30 日夜，以印度尼西亚总统卫队三营营长、印尼共产党员翁东中校为首的一批激进的中级军官，听到印尼 40 名陆军高级军官组成“将领委员会”在军法学院秘密集会，准备于 10 月 5 日印尼建军节时发动政变的消息，决定先发制人，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发动“九三Ｏ运动”，夺取军队领导权。这就是震惊世界的“九三〇事件”。

翁东中校没有通知印尼共产党最高领导人艾地，也没有告诉印尼总统苏加诺，即于 10 月 1 日凌晨，指挥他的部队分头袭击了印尼陆军司令雅尼中将和原武装部队参谋长、国防和安全统筹部长纳苏蒂安等 7　位将领的住所，绑架了以雅尼中将为首的 6 名将领，并把他们带到哈利姆空军基地。其中纳苏蒂安翻墙逃脱，他的小女儿被打死。

早晨 6 时左右，苏加诺总统听到了有关雅加达出现“不正常事件”和纳苏蒂安等将领被袭击的消息，匆匆赶回独立宫。途中发现独立宫被来历不明的军队所包围，便改道去他另一个妻子哈尔雅蒂夫人的家暂避。遂后，他又接受空军司令奥马尔·达尼的劝告，来到哈利姆空军基地。

此时，哈利姆空军基地已成为“九三Ｏ运动”的司令部。艾地也被护送到这里，以指挥共产党参加“九三Ｏ运动”。

上午 7 时，翁东中校通过电台向全国宣布，他已粉碎印尼“将领委员会”的政变阴谋，并成立“革命委员会”。这时，印尼共产党也仓促行动起来，成立起民兵组织，协助“九三Ｏ运动”。

与此同时，正在家中睡觉的陆军战略后备部队司令苏哈托少将也接到一名部长的报告，说民族英雄纪念碑和独立宫附近出现了许多来历不明的部队。苏哈托立即穿好野战服，驱车赶往陆军战略后备司令部，并得知 6 名陆军高级将领遭到绑架。

抵达陆军战略后备司令部以后，苏哈托迅速了解到，苏加诺总统没有到独立宫来，而是直奔哈利姆空军基地了。7 时整，苏哈托在收音机听到翁东中校的声明。

对于翁东中校，苏哈托并不陌生，早在他担任梭罗第 15 团团长时，翁东是 444 营的一个连长，同时他也清楚地知道，翁东曾是印尼

共领导人阿育民的养子。这些使他得出结论，“九·三〇运动”是印尼共产党策动的一个政变阴谋。

苏哈托立即召开陆军战略司令部工作人员会议。会议的结论是印尼共产党操纵了这次“政变”。会议结束时，已是上午 10 时。苏哈托同海军司令、警察总监和空军司令联系，向他们阐明自己对形势的看法。并通报说，因雅尼中将被绑架，他已暂时接管陆军的领导权。与此同时，他即向各军区下达命令，要求各军区控制局势，并接受陆军战略司令部司令的命令。

苏哈托决定首先夺回印尼共和国电台和中央电报大楼，并确定傍晚发起进攻。

傍晚时分，苏哈托的部队顺利地夺回电台和中央电报大楼。翁东中校指挥占领电台的部队没有抵抗，逃之夭夭。而电报大楼是由印尼共产党的人民青年团守卫，他们误认苏哈托的部队是他们自己人，结果被轻而易举地解除了的武装。

19 时整，印尼国家广播电台广播了苏哈托的录音讲话。他在讲话中告诉全国听众，1965 年 10 月 1 日，在雅加达爆发了一起反革命暴乱事件，他们自称“九三〇运动”。这些人绑架了 6 名陆军高级将领，并非法占用了雅加达印尼共和国广播电台和电讯总局。他还宣布，“陆军的领导权暂由我掌握。印尼共和国陆军、海军和公安部队之间互相理解、互相合作、团结一致，共同平息‘九三〇运动’所发动的反革命活动”。同时，他宣告苏加诺总统阁下安然无恙。

苏哈托的陆军战略司令部的部队首战告捷，接着，准备攻打哈利姆空军基地。苏加诺总统的副官班邦从哈利姆空军基地给陆军战略司令部打来电话，告诉苏哈托说，总统已于晚 23 时 30 分离开哈利姆空军基地。午夜时分，准备就绪的苏哈托的部队开始向哈利姆空军基地挺进，在那里同空军部队发生了短暂的小规模战斗。

此时，翁东中校早已不在那里，印尼共产党领导人艾地也已乘空军的飞机飞往中爪哇日惹。空军司令奥马尔·达尼及其家属受到苏哈托总统的保护，在茂物宫内避难，苏哈托夺回了哈利姆空军基地。这一胜利，标志着翁东发动的 “九三O运动”政变的失败，它提高了

苏哈托在军中的威信，使这位不知名将军的名字一夜之间传遍了整个印尼，成为印尼反政变的英雄。

10 月 2 日中午 11 时左右，苏哈托接到苏加诺总统对他的无线电通知，要他立即去茂物宫一趟。在那里，苏哈托见到了总统和空军司令达尼等人。苏加诺总统要求苏哈托以政治方式解决危机，但遭到了苏哈托的拒绝。最后，苏加诺被迫任命苏哈托为负责恢复治安和公共秩序的陆军司令。

10 月 2 日，印尼共产党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及《忠诚报》被禁止发行。10 月 3 日，印尼国家通讯社《安塔拉》被封，旋被军管。

10 月 4 日，被翁东中校杀害的 6 名将军和一名副官的尸体在哈里姆空军基地附近的鳄鱼洞枯井里发现。这些人的尸体已残缺不全，有的甚至眼睛被挖掉，生殖器也被割掉。

10 月 5 日，纳苏蒂安下令全国和驻印尼的外交使团降半旗一周，为“九三〇事件”中被杀将领致哀。中国使领馆坚决拒绝。但为避免刺激右派势力，根据国内指示，在此期间不挂旗。

10 月 6 日，印尼陆军的《战斗报》说：“难道‘九卅运动’仅出自翁东的想法，而没有作为幕后主使者的国内或国外的政治活动家的参与谋划吗?难道‘九卅运动’的反革命冒险仅靠他们各自的物质力量，而没有国内或国外广大阶层在物质和精神上的支持和帮助吗?”

10 月 7 日印尼伊斯兰教联合会的《社会使者报》说：“在雅加达全市，包括外国使馆都下半旗，惟独中国大使馆没有下半旗……难道没有外国的手参加捣乱。”

印尼陆军“六将军”和纳苏蒂安小女儿被残忍杀害的照片激起了印尼人们的愤怒，雅加达响起了“粉碎印尼共”，“绞死艾地”的呼声。10 月 8 日，雅加达召开了 50 万人的大会，游行队伍焚烧了印尼共总部，并在中国驻雅加达总领事馆示威。

10 月 8 日至 10 日，印尼共产党、人民青年团、全印尼中央职工会和印尼妇女运动协会等的总部办公处相继被捣毁。

印尼各大学，特别是雅加达大学各校园里都沸腾起来，他们的斗争矛头由反对印尼共产党开始指向苏加诺总统，一些暴民也开始攻击印尼华侨，袭击华人学校，抢掠华人街。

10 月 8 日，新华社社长吴冷西在请示中央批准后找张海涛谈话，同意他回雅加达。此时，印尼的局势已十分的紧张，张海涛此一去可能就是永别。

10 月 9 日，张海涛飞抵柬埔寨首都金边。当晚，他给妻子江红写了一封信，信中说："为了献身于国际共产主义事业，我已下决心牺牲在雅加达。"这些信，当时被视作"遗书"。

新华社雅加达分社社长张海涛(前排左)与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主席艾地在一起。(张海涛供照)

10 月 10 日，张海涛飞抵雅加达。此时，新华社雅加达分社的房子已破损，有同事受伤，通讯线路中断。张海涛带领新华社雅加达分社的同志们，印制传单，想方设法向国内发回报道，。

印尼《武装部队报》10 月 10 日说："为何'九卅运动'选择 10 月 1 日，正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日，作为民族悲剧的开端"。

10 月 11 日，"九三O运动"的领导人翁东中校被捕，被送到法庭并被判处死刑。

10 月 16 日下午，40 余名全副武装的印尼军人，突然包围了中国大使馆商务参赞处，并用刺刀劈开办公室的箱柜，搜查文件，抢劫财务，制造了外交史上罕见的恶劣事端。

中国外交部和驻印尼大使馆就此事件分别照会印尼驻华使馆和印尼外交部，提出强烈抗议，并授权新华社发表声明，驳斥印尼对中国大使馆未下半旗事所进行的诽谤和无理指责。

当时中国的方针是：坚决支持印尼人民的革命斗争，集中打击和孤立右派，缩小中间派的欺骗作用并促其分化，对右派的攻击给予坚

决回击。为适应印尼革命人民有可能开展武装斗争的形势，还特意把休假后在返回使馆途中的政务参赞召回，改派游击队长出身的姚登山去印尼任临时代办。

姚登山抗日战争期间，在山西组织游击队，打得敌人闻风丧胆，在汾东威名大震，日伪军称他“姚神仙”。

1965 年 10 月少将苏哈托（左）与印尼总统苏加诺的一名警卫在一起

印尼共产党领导人艾地在从哈利姆空军基地逃往日惹后，也于 11 月 22 日被军方追杀。当时，追捕他的印尼陆军雅西尔上校把艾地带到一个井边，向他做最后交代。艾地发表激昂演说，使雅西尔及部下大为愤怒，连开数枪，直穿艾地胸部。这位时任印尼副议长兼统筹部长的政要倒身古井，葬身井底。

1965 年 12 月，毛泽东写了一首《卜算子·悼国际共产主义战士艾地同志》的词：

疏枝立寒窗，
笑在百花前。
奈何笑容难为久，
春来反凋残。

残固不堪残，
何须自寻烦？
花落自有花开日，
蓄芳待来年。

1966 年 2 月 21 日，苏加诺总统被迫改组内阁，但学生们不满改组，继续示威。示威的青年学生队伍想冲进独立宫，警卫人员被迫开

枪打死一名学生，这引起学生抗议示威更加高涨。苏哈托借此压苏加诺总统全面取缔印尼共产党。但苏加诺总统在解散印尼共产党的问题上寸步不让。

苏加诺总统迟迟不解散印尼共产党的暧昧态度引起一些人的更大不满。3 月 11 日上午，苏加诺总统在独立宫召开内阁会议。在会议进行中得到报告，来历不明的部队包围了独立宫。苏加诺借口有急事，便同两位副总理匆匆离开会场，乘直升机飞往茂物。最终，苏加诺被迫签发了一份《命令书》，称苏哈托可以总统的名义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以维持治安和社会稳定，保证政府的正常工作。从此实权就紧紧地握在苏哈托手中。

苏哈托接到苏加诺总统的《命令书》的第二天，就做出了“解散印尼共产党”的决定。紧接着又宣布不准其他政党或群众组织接受原印尼共产党成员，并要求印尼共产党成员向就近的政府机构报到。据不完全统计，印尼共产党有近 30 万人被杀害和判刑。

1966 年 3 月 9 日，一个连的印尼士兵，穿着便服，带着燃烧瓶，一把火烧了新华分社，张海涛受伤。这消息很快传回国内，张海涛在北京育英学校上学的儿子张小兵从广播里听到这条消息后，急得哇哇大哭。张海涛再次给妻子来信：“夜已深，拂晓要送伤员回国，只能简单写几句，暴徒 3 月 9 日袭社，想必已知……我受了小伤，无碍……”

1966 年 3 月 9 日，印度尼西亚苏哈托政权派一个连的士兵，身穿便服，带着燃烧瓶，冲破新华社驻雅加达分社大门并闯入院内，和手持棍棒与石头的暴徒一起，疯狂对分社展开打砸烧，部分暴徒正向外逃窜。（方学辉摄）

1966 年 4 月 1 日，张海涛接到关闭分社的命令后，随即率领分社全体人员撤回国内，从广州到北京，一路掌声，他们受到的是英雄一般的欢迎。

1966年3月25日，印度尼西亚苏哈托政权下令封闭新华社雅加达分社后，张海涛（前排右四）于当年4月1日率分社工作人员，乘专机从雅加达回到广州。广东省副省长曾生、王阑西，广州市副市长罗陪元，以及广东省和广州市各新闻单位负责人等到机场热烈欢迎。

4 月 10 日，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他们，他问张海涛："你今年多大了？"

"39 岁。"

"从使馆发回的电报看，我以为你已经 50 岁了，没有想到你还这么年轻，还可以为党做更多的工作嘛！""中央是准备你们牺牲在雅加达的。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献身，是光荣的。现在你们回来了，中央非常高兴。"

4 月 10 日，周恩来接见从雅加达归来的张海涛等人，前排右六为张海涛

1966 年 4 月 10 日，张海涛与周恩来总理亲切握手

回到国内后，张海涛要求下乡参加“四清”，没有批准，而是被借调到外交部，协助外交部部长助理龚澎工作。

5 月下旬，文化大革命爆发，尚在外交部帮助工作的张海涛，被新华社国际部的群众选举为新华社文革小组组长，于是被新华社党委又调回新华社。6 月，经中央书记处讨论决定，报毛泽东批准，陶铸在中宣部宣布改组新华社党组，由熊复任新华社社长兼新华社文革小组组长，张海涛为第一副组长。新华社编委会由熊复、朱穆之、广州军区政治部主任王敏昭、张海涛和新华社国际部副主任王唯真 5 人组成。陶铸、熊复出事后，1967 年 1 月 5 日，张海涛的办公室被群众封了。

这时，陈伯达又接着说：“我前天晚上来，也希望你们批评。我官僚主义80%大概有，不要客气。80%的官僚主义，因为我只来过两次，给大家宣布一下：中央决定王力、唐平铸、胡痴同志负责宣传工作。胡痴同志代理新华社的社长，王唯真同志担任你们的副社长，可以吗？”

大家回答：“可以！”

陈伯达：“胡痴同志是解放军报的总编辑，他那里的事情也很多，还担任解放军新改组的文革小组成员，他比较忙，日常的事务工作由王唯真多做一些，可以吧！信任不信任？”

众答：“信任！”

陈伯达：“一个人工作做得不好，可以改嘛。巴黎公社的原则要靠大家。现在的文革合适不合适，要大家决定，看大家的意见，你们认为要改选就改选，不要按我的什么话去作。我看到资产阶级革命时

代就是这样，担任一段就改选，不能选上你就一辈子都当了，像袁世凯终身总统，一辈子总统都选他。张海涛的工作再商量，王力、胡痴、王唯真同志和大家商量，这样行不行？”

众人答：“行。”

陈伯达：“但是主要的是靠大家的积极性，如果大家都躺在几个人身上，不管那几个人多么高明，也搞不好，我们是依靠群众的力量，赞成不赞成？”

答：“赞成。”

陈伯达：“你们的号外，没经过推敲，字稍少了一些，糟了，主人不来，我没话可说了，大家讲嘛！随便登台演说，可以的。不一定要长篇大论，你们现在有谁要登台演说。”

新华社有几个人轮流上台讲话。

王力：“今天原来要和胡痴同志一起来的，刚才到处找他也找不到，现在才知道他在同几千名群众谈话，回答问题，出不来了，因此他今天就不能参加这个会了。因为我和伯达同志有别的事情，就不等了，就开到这里。现在我再讲一讲，伯达同志已经讲过，新华社由胡痴同志代任社长，新华社事务工作由副社长王唯真同志负责，胡痴、王唯真同志和革命同志一起商量提出名单，再征求同志们意见，建立领导小组，负责新华社的日常工作，要学习《文汇报》、《解放日报》的经验，各单位的工作都要由革命同志自己掌握起来，刚才伯达同志讲了3人小组，这个小组是受中央文革小组领导的，宣布就这些。”

## 第 392 回：哈军工，二十七人大字报　指江青，矛头对向毛泽东

1 月 9 日这天，哈军工惊现贺珍、周涛等 27 人的大字报，标题是：《树立毛泽东思想绝对权威——给江青同志提几点意见》，矛头直指江青。

此事的缘由还要从哈军工“红色造反团”的发起人之一的徐卫河说起。

徐卫河是北京军区空军司令员徐深吉中将的儿子。1966 年 10 月，周恩来接见哈军工“红色造反团”时对徐卫河说：“你们这些高干子弟千万不要介入派别斗争。积极关心‘文革’，参加运动是应该的，但是不要当头头，不要参加领导班子，让工农子弟去负责。你们可以到外地走一走，看一看，看看全国‘文革’的大好形势嘛。”

于是，徐卫河就退出了哈军工“造反团”总部，到南方串联，于 12 月初回到学院，就在系大楼四楼一间大教室里搭上张床，住在那里。

出去串联的学员陆续返回了学院，徐卫河住的大教室又大又宽敞，干部子弟都喜欢跑到这里闲聊。一来二去，这里就成了哈军工干部子弟聚集的“文革沙龙”。与卜大华等北京的老红卫兵们差不多，这些 8 月初哈军工俱乐部大辩论时的骨干，秋天还是意气风发，冲在前面的干部子弟，经过两个月的大串联，冬天回来时，脑子里已是乱糟糟的。一路上耳闻目睹，所到之处，省、市、地、县各级领导班子全部瘫痪，数不清的叔叔、阿姨，亲戚、长辈变成了“黑帮”。他们现在想的是自家的大门已经或即将被造反派踢破，自己的父兄亲朋也要尝到戴高帽，挂黑牌，被踏上千万只脚的滋味。

周涛和贺铮等老造反也加入进来，不少工农子弟也参加进来，每天从早到晚，大教室里热热闹闹，思想活跃，最多的时候有近 200 人参加讨论。

有人谈到了北京成立的“联动”组织及北京出现的“联动”大标语和传单：“坚决拥护中央军委四位副主席的讲话”“江青不要太狂了！”“坚决打倒镇压中学运动的刽子手三司！”

大教室里立即响起了掌声，跟着，这些嘴上不把门的老造反们也开了腔：

“江青也太张狂了，什么东西！”

“中央文革就批评不得吗？他们代表真理吗？”

“文化大革命到底是为了什么？”

不知谁冒叫一声：“给江青贴张大字报！”

“好！”

“同意！”

人声嘈杂。

周涛沉思一会儿，点点头说：“冯海晴作过记录，就让海晴起个草吧！”

冯海晴，电子工程系 64 级女学员，她的外公是中共早期的著名领袖张太雷烈士。

冯海晴遵命执笔，把近一个月来大家议论的内容整理成提纲，起草了一份大字报，计算机系 64 级学员郭银军比较冷静，对大字报内容做了修改，尽力避免那些过激的话。定稿后那天晚上，吴保安碰见刚从北京回来的毛远新，讲了写大字报这件事，毛远新听了听，未置可否。

大字报抄好以后，摆在那儿让大家看了几天，没有人签名。

徐卫河生气了：“都是天桥的把式，光说不练。我来签第一个名。”

那天，陈赓的儿子陈知建在路上碰到滕海清中将的女儿、空军工程系的滕爱华，说起干部子弟正给江青写大字报的事，陈知建说：“写什么大字报呀，议论议论就算了嘛，走，我们俩劝劝他们，别贴出去了，免得招惹是非。”于是两个人走进大教室，但是劝说无效。徐卫河反问陈知建：“你同意大字报的观点吧？”

“同意啊，那天我不是发过言啦？”

“那你怎么不敢签名？我知道你胆儿小，快回去吧！”

徐卫河这么一激将，陈知建脸红耳热，拿起毛笔，签上了自己的名字。滕爱华也改变了主意，坚定地签上大名，又提出不少意见。

吴保安数了数，已经 24 个人签了名，惟独缺了周涛和贺铮，他拿起毛笔说："我代他们俩签上！"徐卫河也代傅海玲签了名，一共 27 个人。

1 月 9 日，大字报张贴到俱乐部的走廊里。顿时，这里又变得人山人海……

在这张长篇大字报里，江青被 17 次点了名，其中说道：

"……属于'文化大革命'领导地位的江青等同志，是不是真正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放手发动群众了呢？我们以为并不完全如此！"

"……江青同志却不认真听取他们的意见，其实就是不相信他们，所以他们也不相信你们！你要压服他们，他们决不会服。你要群众相信你，信服你，那就必须首先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发动群众，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认为江青同志的一些做法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现在'文化大革命'中出现了一些令人深思的现象：有部分群众不是如饥似渴地学习毛主席著作，而是争先恐后地去收集各种各样的首长讲话，有的人不用主席的思想去衡量一切，而是把某些人误认为是主席的化身，盲目地崇拜！有些人不是紧跟党中央和毛主席，而是紧跟'三司'和'北航红旗'，在紧跟形势的幌子下盲从盲动……"

"江青等同志在有些问题的处理上违背了主席的思想，为什么就批评不得呢？为什么说给中央文革提意见就是反对中央文革，就是反革命呢？难道'言者无罪'过时了吗？为什么人人都可以触及灵魂，而中央文革的同志就不可以触触灵魂呢？难道他们已改造成彻底的无产阶级的革命家了吗？为什么竟然有人提出'决心跟江青同志赴汤蹈火，向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旧文化开展一场你死我活的搏斗？'这是树立毛泽东思想绝对权威，还是树立什么个人权威？难道文艺路线的胜利仅仅归功于江青一个人吗？江青同志你这样做不就是私心太重，只保自己吗？我们说，毛主席就是毛主席，任何人也不能代替，毛泽东思想就是毛泽东思想，任何其他的思想也不能代替。"

"我们希望江青等同志能够按照主席的指示办事，能触及自己的灵魂，不辜负党和毛主席对你们的信任。"

大字报的落款是：哈尔滨军工红色造反团“活着就干，死了就算”战斗队，签名左右上下，纵横八方，有：

徐卫河、吴保安、周涛、贺铮、冯海晴、陈知建、戴小湖、方太南、滕爱华、傅海玲、左奇、陈曦、郭银军、郭延金、强小兵、李敬东、申兆怀、郭东岳、曾维、陈捷、朱红军、刘华奇、梁晓蓉、杨建恒、杨学明、陈加安、汤澄东。

27 个人，清一色的干部子弟。不知什么时候，有两位胆大的学员跳出来，在大字报上加了个小批：“我们也同意！”留下的名字是“丁小丁、盛铁军”。

当天，导弹工程系 65 级学员王楚涛、范青锐、卫耀民、李大凌 4 人写了张支持性的大字报，题目是《中央文革为什么批评不得？》，贴在“27 人大字报”的旁边。

哈军工出了批江青的大字报，这消息立即传遍哈尔滨市，哈 13 中高中学生胡致本、凌文中等 5 位哈军工子弟，也写出支持的大字报。

大字报经过潘复生直达中央文革。同时，有人转抄，有人张贴，从哈尔滨市流传到全国其他大城市，甚至贴到北京中南海的红墙外，最后，这张大字报摆到了毛泽东的案头。

毛泽东表态了：“表面上是给江青提意见，实质上矛头是对着我的。”

江青要求：“调查！我就不信军工那群高干子弟翻了天！”

康生指出：“苏修电台已经广播了这件事，在时间上，行动上，军工是完全配合‘联动’的。”

正在延边的毛远新也跟着表了态，他委托“红色造反团”抄出一份大字报，题目是：《27 人大字报是地地道道的反革命大字报》。

从北京传来康生的讲话：“军工出了一个’27 人大字报’，矛头指向中央文革，非常嚣张，这个大字报是反革命性质的！”

省里奉命迅速下达通缉令，省公安厅说：“根据《公安六条》，要抓人！”

27 人大字报的签名者大都是哈军工“红色造反团”的发起人，但是他们这次的行为同时也激起了群众的震怒，有些平时看不惯干部子

弟的学员也到总团施加压力，“造反团”总团如泰山压顶，连续两天召开全体大会，辩论 27 人大字报的问题，最后确定捉拿 27 人大字报的首要分子。

然而，首要分子已经逃出哈军工大院，其余签名者也四下藏匿，藏不住的被揪斗，他们的宿舍也被查抄。

徐卫河心急火燎地回到北京，一进家门，父母吃了一惊：“你怎么突然回来了？”

“没事，回来看看!”徐卫河不想让年迈的父母为他担惊受怕，他抓起电话，打到周涛的家里。周涛压低声音：“你千万别来！北航的人已经围住了我们家的楼，我可能要被抓了!”

徐卫河还是跑到三里河计委大院找周涛，结果自投罗网。当天，徐卫河和周涛被押送到公安部，没多大工夫，申兆怀也进来了。

公安部的人问：“怎么回事？”

抓他们的人回答说：“他们是哈军工的反革命，反中央文革!”

“哈尔滨的人送我们这里干什么？” 公安部的人说，“不是讲就地闹革命吗？送哈尔滨去!”

徐卫河 3 个人被关了一个晚上。第二天，公安部的人又简单问了问，录了一个口供。

“大字报是谁起草的？”

徐卫河和周涛交换一下眼色，坦然道：“是我和周涛起的草!”

这时，哈军工 65 级的十几位“解差”赶到，与公安部办好了手续，对徐卫河 3 人说：“咱们回哈尔滨吧!”

申兆怀哭丧着脸央求道：“回哈尔滨还不知道是死是活，你们总得让我们回家跟爹娘说一声吧!”

65 级小将们说：“别逗咱们哥们儿了，让你们回家，跑了，我们找谁去？”

徐卫河拍拍胸脯：“我们跑哪里去？到处是捉我们的人，再说都是‘造反团’的，我们是大哥哥，怎么能骗你们小弟弟呢？”

65 级小将们本来就赞成大字报上的观点，“好吧，你们先回家，下午 3 点在联络站集合，晚上上火车，你们可别为难我们呀!”

不跑白不跑，3 个人如脱笼之鸟，一去不复返。

徐卫河和周涛俩躲藏到天宁寺街老华北局大院，那里自文革开始后，办公室就是空的。周涛的弟弟和妹妹送来被褥和吃的。

同是天涯沦落人，徐卫河和周涛在患难中相爱了。爱情的火花多少给逃亡生活带来点慰藉。

又是无巧不成书，一位“解差”的弟弟，偏偏认识周涛的妹妹，那小子看哥哥因为大意放走了“钦犯”，整天愁得吃不好饭，就自告奋勇当侦探，他终于发现周涛的妹妹向天宁寺街送饭的秘密，一个多月后，徐卫河和周涛再次落入“法网”。

“27 人大字报”的参与者中一共有 6 个人被逮捕，3 位男学员：徐卫河、贺铮和申兆怀；3 位女学员：周涛、滕爱华和戴小湖。支持他们的哈 13 中学生胡致本也被捕入狱。

在黑龙江省公安厅，他们被戴上手铐，反复提审，徐卫河等人把什么事都揽到自己的身上。

哈军工掀起了对这几个人的揭批和围剿高潮，“造反团”内部成立了“肃反大队”，批斗“27 人大字报案”的“反革命罪犯”。徐卫河、周涛等人被押上俱乐部的舞台上，他们的棉衣被扒下来，只穿一件衬衣，在数九寒冬里，冻得瑟瑟发抖。他们被强迫跪在台上，趴伏于地，双肩被两个红卫兵的大头鞋踩住，另有一红卫兵专门管揪头发，让他们仰起脸来看台下，并随时拳打脚踢和拍照留念。抹黑脸、戴高帽、坐喷气式，这些他们曾经用来对付黑帮的手段，现在又还给了他们。

徐卫河这些血气方刚的青年学生，他们当初对“文革”的狂热和真诚，对中国政治的信任和远大抱负，都在冰冷的拳头和刺耳的辱骂声中砸得粉碎。

其余的 21 名大字报签名者，在高压威逼下，只有一条路：低头认罪，杀回马枪。“肃反大队”乘胜追击，“造反团”里一片恐怖气氛。

正在这个时候，刘小林从井冈山串联回来，她强烈反对这种以学员为目标的“白色恐怖”，她约上赵文龙、贺平，上北京告状，在杨成武的帮助下，批斗徐卫河等人的照片送到周恩来的手中，周恩来十

分气愤，他说：“这简直是法西斯！小将们犯了错误，改了就是了，怎么可以这样摧残人？”

在周恩来的直接过问下，随后成立的黑龙江省革委会以“犯思想错误，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口径，把这 6 位在押学员释放出来。

## 第 393 回：军委会，林彪点贺龙问题　陈里宁，安定医院政治犯

1 月 9 日，海军副政委李作鹏让秘书将他起草的一个提纲送到肖劲光那里。提纲前面有个说明："肖司令：我上午有外事活动，下午又有会议，因此替你讲话写了一个短提纲（我认为不需要讲得更多），能不能用，请你考虑。"这个以肖劲光名义起草的提纲，即林彪 1966 年 8 月 13 日对海军工作的那个讲话，即"813 指示"："李作鹏、王宏坤、张秀川同志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拥护毛主席的，是突出政治、旗帜鲜明的，对海军工作转变做了很多工作，反对罗瑞卿是有功的。"

当晚 22 时，海军在西苑旅社礼堂召开海军机关 17 级以上干部会议，肖劲光以受毛泽东、林彪、周恩来委托的名义，传达了李作鹏写的这个传达提纲，即"林彪 813 指示"。

肖经光刚传达完林彪的"813 指示"，杜义德突然站起来说："我还要补充一句，毛主席对肖、苏也有评价，肖劲光是个老同志，苏振华是个好同志。"

1 月 9 日，林彪主持军委会议，陈伯达、江青等中央文革人员参加。在会上，中央军委做出《关于三部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宣布总参三部暂不进行文化大革命。

会上，林彪就刘志坚的问题发表了长篇讲话，他说得十分具体，指出："现在全党全国是全面的内战，一方面是把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战斗坚决地打下去，另一方面是不该打的地方不要乱冲。也就是又要革命，又不要乱冲。这次全军文革小组要大改组，刘志坚犯了大错误，实际上他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军内的代理人，他发表了许多不正确的指示。比如，运动初期撤销工作组的问题上他本来同意了陈伯达的意见，下来后他不知听了什么人的话又转向反对陈伯达的意见。在处理海军的问题上，他支持非左派来打击左派。海军这几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过去是以军事为重点，转为以政治为重点；以过去的非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为重点，转为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为重点；以过去的官僚主义作风，转为非官僚主义作风。总之，海军这几年的工作成绩是不能抹煞的。但是刘志坚给李作鹏同志、王宏坤同志、张

秀川同志扣上了什么夺权的帽子，扣上了‘地下活动’的帽子，这是不公道的……”

“刘志坚主张军委的领导同志接见革命师生，把几个老帅推向前线，推到第一线当炮灰，完全是别有用心的，是有他对抗中央文革小组的目的的。这几个老帅是好同志，他们是做工作的，不是不做工作的；他们是正派的，不是不正派的；是光明磊落的，不是不光明磊落的。现在有的造反派要把他们炮轰、打倒，这对军队是不利的。相反真正要打倒的未打倒。在军队里并没有炮轰贺龙，贺龙到处夺权，搞山头主义。但是却不炮轰，没有人炮轰，这不正常。贺龙是不正派的人，是搞两面手法的人。我们这次文化大革命是资产阶级挑起来的，是资产阶级进行反扑，我们被迫应战的。”

林彪还点了红三军团一些干部的名，说彭德怀原名彭得华，是有野心，妄想要得天下。

“刘、邓、陶铸和刘志坚，是他们向无产阶级挑战。贺龙这个人手伸得很长，不但军队到处伸手，而且地方也到处伸手。贺龙搞大比武是个大阴谋，罗瑞卿的后台就是贺龙。贺龙是大土匪，土匪出身，用送礼、拍肩膀、介绍老婆，搞旧军队一套。40 年来灵魂深处是个大野心家，他吃了饭不干事，经常在家请客，拉拢干部。许多军区、军种、兵种都有他的人。贺龙是反对毛主席的，他是一个封建地主野心家，混进党内捞资本……”

林彪又说：“空军的成钧就是要夺权的，这是贺龙搞的。这些坏家伙，你不斗倒他，他就斗倒你。不是什么宗派斗争。你想躲也是不行的，想防御也是不行的，只有进攻，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我们一定要认真地进行‘文化大革命’，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会上，戚本禹说：“贺龙是个土匪，他是想当皇帝的。现在他还保留着当北洋军阀的照片。他要上台不是搞资本主义，而是封建主义，脑子里尽是男盗女娼。他是军阀，他曾是我们的同路人，这是毛主席的伟大策略调动他的力量。但是，他是假的，他们真是要吃人的，不批臭他们就要犯历史错误。”

1 月 9 日，江青在接见解放军政治学院造反派时也说："贺龙有问题，你们要造他的反。"

当天，解放军政治学院的造反派就传出消息：要到新六所抓贺龙。薛明急了，3 次向周恩来告急。但是，没有回音。此时的周恩来正忙于处理云南问题。1 月 9 日刚过，刚刚处理完云南问题的周恩来，又在 1 月 10 日的子夜，得到清华大学"红教工"等大专院校的师生冲击公安部十三局的消息。

"红教工"是 1966 年 11 月清华大学成立的一个以教职工为主的群众组织"红教联"演变而来。清华大学教师队伍中红五类不多，大部分人出身或历史上都有问题，经过历次政治运动的冲击，早已成惊弓之鸟。在重视阶级成份和出身的形势下，一般的群众组织不愿接收这些出身不好或历史上有些问题的老师和教授。"红教联"的成立，让这些教师感到有了自己的组织，于是，许多教师纷纷参加，几天时间就有近百人加入。

"红教联"的出现很快就遭到一些人的非议，说它是"神仙会"。

神仙会是共产党邀集一些党外有影响的社会人士海阔天空发表意见的一种座谈会，标榜不戴帽子、不抓辫子、不打棍子，即说什么都可以，与会者也就得了个"神仙"的美称。到了文化大革命，这些"神仙"成了"杂七杂八"的人，和牛鬼蛇神混杂在一起不好分了。

放这种风，无非是说"红教联"的参加者多是政治上不清的人。后来，由于土建系车间及校设备工厂的工人也要求参加"红教联"，于是，1966 年 11 月底，"红教联"改为"红教工"，学校的许多工人参加进来，成员近 200 人，这就不是单纯的知识分子的组织了。

12 月下旬的一天，"红教工"组织的简秀文、刘韵琪向"红教工"负责人陶德坚说起外语教研组有位名叫方天心的党员教师，文革前曾因反对清华党委和陆定一被送进北京市安定门外的精神病医院----北京安定医院。当时报刊时有介绍苏联将一些政治上的反对派送进精神病院加以迫害的报道，因此，她们怀疑这是否与苏联的"疯人院"类似，认为"红教工"作为教工的组织，应该过问此事。

于是，陶德坚约了工程化学系的青年教师、共产党员朱起鸣一起去了安定医院。他们在病人接待室里见到了方天心，只见他呆若木鸡，脸上毫无表情。陶德坚和他握手时，有意将一枚毛泽东像章放在他的手中，并告诉他现在全校都开展文化大革命了，但方天心都没有反应。陶德坚只好告别。出来时，见朱起鸣正和安定医院的王医生、梁医生及金弘敏大夫谈得很投机。

原来，北京安定医院在文革初已改名为红卫医院。11 月 2 日，北京红卫医院部分医护人员成立了红卫医院“红旗战斗队”，王医生、梁医生就是“红旗战斗队”的头头。金弘敏大夫则是“红旗战斗队”队员。

朱起鸣对陶德坚说，他们正谈到金大夫的一个名叫陈里宁的病人，本是公安部关押的犯人，过去曾送来住院多次，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又给送来了。金大夫介绍说，陈里宁是湘潭市委机关的一般干部，时年 32 岁。前几年因不断给中共中央写信，批评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还反对修建刘少奇在家乡的故居花明楼，认为王光美随刘少奇出访印尼时的打扮有失国体……，于是就被秘密逮捕了。金大夫说，从她和陈里宁的接触看，陈的精神平时是很正常的，只是在作精神病的治疗，施用大量药物后，才出现暂时的精神错乱。

陶德坚一听，马上觉得：仅仅是用信件向中央反应对某一领导人的意见，这完全是一个党员也是一个公民的合法权利，竟然就被秘密逮捕，如果定为犯罪，为何又送到精神病院？如果真是精神病人，就不能定罪，为何又由公安部作为犯人对待？总之，这里面横竖有问题。

陶德坚问金大夫：“医院里还有没有类似陈里宁的病人？”

金大夫说：“院方管理很严格，每个医生只能管自己的病人，不许了解别的医生的病人的情况，我也不清楚。”

陶德坚和朱起鸣回到清华大学，立即召开“红教工”核心小组会，陶德坚介绍了在安定医院听说的情况，然后说了自己的意见：

“我们首先要拿到陈里宁的病历，查清他是否真是受迫害，如果是，就从此打开缺口，查清安定医院是否真是苏联式的迫害政治犯的‘疯人院’，我们应当把受迫害的人都救出来。”

大家听了都很激动，一些不是核心组的“红教工”成员也闻讯跑来，纷纷表示应该把这个问题查下去。朱起鸣提出，精神病人的病历，院方是作为机密材料保存的，一般不给外人看，看来得给院方施加压力才行。于是大家一致同意去安定医院“造反”，即靠人多势众，强迫院方交出陈里宁的病历。但当时在场的“红教工”成员都是教师和职工，真正要去造反，谁也没有干过。于是有人建议，还是请学生一起干。

此时清华大学原来的红卫兵组织已垮台，由蒯大富领头组织的“井冈山红卫兵”已从少数发展成多数，并与校内其他群众组织联合，扩建为不问出身，教职工也可参加的“井冈山兵团”。“红教工”早就与“井冈山红卫兵”相互支持，许多“红教工”成员也参加了“井冈山兵团”，其中“红教工”的林贤光就在“兵团”总部动态组工作，和许多学生都很熟悉，所以很快找到了他们的负责人。

“井冈山”的学生听了“红教工”介绍完情况，马上就集合了 50 多人的学生，加上“红教工”的 20 多人，大家骑上自行车，来到了安定医院。

他们聚在院子里高呼口号，要求医院负责人把陈里宁的病历交出来，还将大标语贴在医院的墙上。医院不敢交出病历，双方相持了一个多小时，突然，金弘敏医生站了出来，她说：“陈里宁的病历就在我手里。”并表示愿意交出来。

“红教工”留下朱起鸣在安定医院研究病历。陶德坚则在医院连夜给中央文革写了一份紧急汇报材料，报告在安定医院发现陈里宁的情况。天快亮时，材料写就，由安定医院“红旗战斗队”的王医生开摩托车和她一起将这份材料递交中央文革接待站。

朱起鸣经过一夜查看病例，得知陈里宁被秘密逮捕到北京之前，就曾多次在湖南被捕过，被捕后老母都不知其下落。在对他进行一种是否精神病的鉴定时，要施以大量的药物，造成精神亢奋，错乱等等，最后才经公安部谢富治部长的亲笔签批，将陈里宁秘密逮捕到北京公安部十三局。

朱起鸣将谢富治的批件拿给陶德坚看，并说，陈里宁在关押期间，时而表现得很清醒，时而又吃草根，甚至粪便，于是才多次送到安定医院来治疗。

后来，朱起鸣见到陈里宁。陈里宁很清醒地对他说："我吃草根粪便都是装出来的，我相信总会有一天有人会把我解救出去。"

这时，地质学院"东方红"和北京医学院"八一八"战斗团闻讯也纷纷派人杀向红卫医院，他们与医院的"红旗战斗队"等 5 个单位组成"驻红卫医院革命造反联络站"，造红卫医院的反，结果查出安定医院内包括陈里宁在内，至少有 4 名是政治犯，他们认定这些人都是遭受迫害的所谓"精神病人"。

陈里宁也给"中央文革"写了一封信，经由造反派之手顺利转交中央文革。在这封信里，陈里宁列举了他一直以来怀疑的"刘少奇问题"，还控诉了"有关当局"对他的迫害，最后表示："我对以上问题一直找不到答案。如果我错了，又错在什么地方？我承认我水平很低，没有社会经验，我怀疑了一个庞然大物——刘少奇。但是矛盾并不是可有可无的，既有明显的矛盾，我有权利以一个共产党员的革命名义，理解这些矛盾。头可断，血可流，都在所不辞。问题不弄出个水落石出，决不罢休，死不瞑目。"

中央文革小组王力、戚本禹于 1967 年 1 月 7 日 16 时来到北京红卫医院。他们在医院的洗衣房同红卫医院"红旗战斗队"全体队员及清华"井冈山兵团"、清华"红教工"、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北京医学院"八一八战斗团"部分师生，进行了长达一个多小时的谈话，还看望了陈里宁和其他几名政治犯病人。王力对造反派说：

"我们支持你们的革命造反精神，必须彻底造精神病院的反，全国有类似的精神病院，都要造反。"

戚本禹也极力称颂造反派："从这里揭露也是对刘邓路线的揭露，也是重要的揭露，你们作了重要的贡献。"他询问了陈里宁的一些情况，对他说："你从 62 年就批评刘少奇的错误，你没有精神病，你要出院。刘少奇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你的材料写的很好，他们才有精神病。"

又有一位叫王福显的病人被领来与王力、戚本禹握手，握完手即高呼："啊！天亮了！"他又当场提议："同志们，咱们唱个歌好不好？"于是，齐唱"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

戚本禹也问了王福显的情况，又重复说了那句话："我看他们才有病。"

王力说："旧社会就用精神病来陷害劳动人民，鲁迅所写的《狂人日记》中的'狂人'就是被统治阶级认为是狂人，是精神病的。你们是社会主义革命新时代的'狂人'。"

戚本禹附和道："要是修正主义变了天，我和王力都得了'精神病'。"

戚本禹当天从红卫医院回来后，向王广宇介绍了同红卫医院"红旗战斗队"及清华大学、地质学院、北京医学院部分师生座谈的情况，说他们在精神病院发现了一个因为写信、写文章批判刘少奇，而被公安部门抓起来关在精神病院的人，叫陈里宁。据陈里宁的主治医生说，陈里宁没有精神病，因为反对刘少奇而受到关押迫害。他们见到的陈里宁神志很清楚，谈吐也很有条理，根本不像精神病人。戚本禹赞扬说，这个人很了不起，那么早就看出刘少奇是"修正主义者"，他自愧弗如。戚本禹还说，据清华大学红卫兵讲，陈里宁的文笔不错，能写文章，他想把陈里宁接出来，找个安静的地方，专门写批判刘少奇的文章。戚本禹觉得，这种人可以现身说法，批判一定很有力度。

不过，戚本禹也担心，陈里宁被关在监狱好几年，又在精神病院受折磨，身体情况怎么样?能不能出院?出来后能不能写文章?于是，他让王广宇去红卫医院同主治医生商量，看陈里宁能否出院。

1 月 8 日，王广宇遵照戚本禹的嘱咐来到红卫医院，见到陈里宁的主治医生金弘敏及护士，向他们咨询了陈里宁的情况。他们表示，陈里宁没有精神病，但由于长期大量用药，对这些药物有了依赖性，不过出院没有问题。

金弘敏还把清华大学"红教工"的朱起鸣介绍给王广宇，说他是清华大学的老师，是清华大学红卫兵驻红卫医院的负责人，以后有什么事情可以找他商量。王光宇对他们说："关锋、王力都知道这事了，

他们原来不知道精神病院这种角落还有这么严重的问题，你们是立了大功了。”

陶德坚向他汇报说：“现在的关键是要拿到陈里宁的档案，下一步工作才好开展。”

王光宇说，回去后就向上级汇报。叫他们要有耐心，要等待。

王广宇将在红卫医院了解到的情况向戚本禹作了汇报。戚本禹让他考虑找一个适合的单位接收陈里宁。王广宇提出他的原单位马列主义研究院．戚本禹同意了，后来又改变了主意，让陈广宇到《人民日报》社，说已经同唐平铸说好了。

1 月 8 日，戚本禹在国防部接见解放军测绘学院红卫兵时又说起陈里宁，说他“62 年就反对刘少奇”，“别人说他是神经病”，“医院里给他上电刑、吃药”，“但是他还要反对刘少奇”。他说：“我看这个医院简直是法西斯，我建议他们起来造这个医院的反。他们的条件比你们差吧，我看你们还不如那个‘神经病’。”

## 第 394 回：公安部，十三局夜遭围攻　销售快，《新时代狂人日记》

1 月 9 日，清华大学“红教工”的陶德坚和朱起鸣为陈里宁档案事又去问中央文革的王光宇，王光宇说：“我已经去十三局看过陈的档案了，但未能调出来，你们要看只好由你们自己想办法解决了。”

听到王广宇的这一答复后，陶德坚立即和“驻红卫医院革命造反联络站”的几个单位和红卫医院的“红旗战斗队”一起开了联席会议，她在会上讲了王光宇的意见，大家都认为应该到十三局办公的地方去造反，通过造反示威的行动，迫使十三局交出陈里宁的档案，并为陈里宁平反。

陶德坚他们将前往十三局索要档案的行动计划向王光宇做了电话汇报，王广宇请示后答复，同意他们的计划。

但是，十三局到底在什么地方，办公区和监狱之间的关系又如何？这许多具体问题陶德坚他们都不知道，这些如果不搞清楚，跑到监狱里去造反，弄不好不是去革命，反而成反革命了。北医“八一八”的学生说：“我们和陈里宁已混得很熟了，问问陈里宁不就清楚了。”

于是，他们立刻去找陈里宁，不一会儿，就拿了陈里宁画的平面图回来了。

原来，十三局办公区和监狱是前后院，中间有围墙隔开，围墙开了一个门。陈里宁说他每次到安定医院来坐在汽车上，眼睛都是蒙着的，所以不知道十三局在什么地方。安定医院的人说他们只知道十三局是在秦城，但也没去过。

不过，有了陈里宁提供的情况，“驻红卫医院革命造反联络站”的几个负责人心里就踏实了，他们只在前院办公区造反，不到后院监狱区去就行了。于是，会议做出决议：这次行动由陶德坚任总指挥；各单位负责组织自己的队伍，于当晚 12 时整到十三局外集合；出发前对本单位的战士进行教育，绝不允许进后院监狱的院门；十三局的具体地点由“红教工”负责打探清楚，并在晚 22 时前通知有关单位。

陶德坚和朱起鸣等人赶回“红教工”总部已经是傍晚时分，马上召开紧急核心会，研究去十三局的行动。不少“红教工”已闻讯赶来，大家也不管自己是不是核心组成员了，群情激奋，七嘴八舌地纷纷发

表意见，对于这次行动均无异意。此时的关键是怎样能快速地找到十三局的准确地址。“红教工”成员张昌龄教授说，他时常到秦城那边山上打野鸭子，看到山脚下有一组建筑类似陈里宁画的图，当地老百姓说是圈人的地方。大家都认为那恐怕就是十三局了。于是当即派张昌龄和来晋炎骑摩托车前去打探。

接着，“红教工”又继续对晚上去十三局的行动作了安排：由陶德坚和侯虞铿带领“红教工”第一梯队 40 人；张家廉和林贤光作为留守，必要时张家廉作为第二梯队负责人支援第一梯队；林贤光负责组织第一、第二梯队的“井冈山”兵团的学生队伍；朱起鸣留守安定医院与王光宇保持联系，并在第一梯队们出发后及时向王光宇报告他们的行踪，必要时争取中央文革具体的支持。

陶德坚抽空回家与丈夫告别，她对丈夫说：“这次行动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了，我万一回不来，两个孩子就全靠你了。”颇有些上战场，生死离别的味道。

大约晚上 21 时左右，张昌龄教授和来晋炎风尘仆仆地回来了，他们按照张昌龄的记忆，在山脚下找到了十三局。十三局外有一大开阔地作为停车场，他们怕暴露只在远远的路口上，看清十三局有卫兵守门，院后靠山的岗亭有荷枪卫兵把守。朱起鸣问清了去十三局的具体走法，就立即赶回安定医院去通知各单位了。

林贤光和陶德坚去“井冈山”兵团发动了约 60 名学生参加第一梯队。晚 23 时，“红教工”约 40 人和这 60 位同学一起分乘两辆轿车出发了。这次出发前赶印了大批造反守则及造反宣言，分发给所有参加这次行动的人。造反宣言主要是讲他们这次行动是要求交出陈里宁档案及为陈里宁平反。造反守则的要求是：不许进监狱院门；不许私自动档案；不许动武器；不许向外泄露十三局的具体地址；这次行动不许向外宣传。

晚 24 时正，北医“八一八”、地院“东方红”、清华“井冈山”、清华“红教工”及安定医院等 5 单位分乘 5 辆车均到达了十三局门外的停车场上，陶德坚原打算把队伍集合在离十三局大门外 100 米处，每单位派一负责人进十三局交涉，但是学生们笑她太胆小，根本不听

指挥，一下子都涌到了十三局的门口，近 300 人在大门前很有声势，陶德坚赶忙挤上前去让各单位负责人先进去交涉，十三局的干部也表示愿意与他们的代表谈判，铁门刚打开一条缝，代表们还没有全进去，学生们便一涌而入。这时，探照灯把院内照得通明，半山上的机枪正俯视着他们。陶德坚怕学生们冲过界限，赶忙请安定医院的工人师傅组成 10 人的人墙，紧紧把住通向监狱的门院以防止他们的人误入监狱。接着他们在院内寻找档案室，准备贴上封条，以免陈里宁的档案被转移。但所有的办公室都已黑灯锁门，在外面也看不清哪间是档案室。这时，候虞铿告诉陶德坚，已分别与张家廉、朱起鸣通了电话，朱起鸣说王光宇他们正关注着这边的行动。

又过了一会儿，总机房通知陶德坚，周恩来要她接电话，陶德坚赶紧来到电话机旁，她对周恩来说："周总理，您好！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卫兵，我们是守纪律的，我们已派人守住通向监狱的门，我们的战士绝对不会到监狱里去的，请您放心。我们来十三局的目的是要求十三局交出陈里宁的档案，为陈里宁平反。"

周恩来说："我知道你们是毛主席的红卫兵，是革命的，你们守纪律，很好，我支持你们，你们先撤出来，明天上午，谢富治副总理接见你们，解决你们的问题。"

陶德坚说："这里的运动冷冷清清，我们准备向工作人员及家属作宣传，我们可以先撤到家属区，做完宣传后再撤出行吗？"

周恩来说："好的，我答应你们，你们明天早上撤出，然后谢富治副总理接见你们。"

周恩来又让十三局的负责人听电话，他交代他们要好好接待红卫兵小将。同时也要做好监狱的保卫工作。

陶德坚将周恩来的电话指示向各单位负责人传达后，地院"东方红"贾继承说："既然周总理叫撤，我们就撤了吧，别做宣传了。"

因为十三局的负责人已去组织参加座谈的人了，于是决定地院"东方红"、清华"井冈山"、安定医院 3 个组织的人先撤，其余的人留下作完宣传再撤。大约在凌晨 3 时，前来造反的师生员工们全部撤离了十三局。

1 月 10 日凌晨，朱起鸣到陶德坚家叫醒她，告诉她说，陈里宁的档案已拿到了，是十三局的李子明处长陪着他一起送来的。陶德坚要他先把档案留下，等天一亮就去找“红教工”的人来摘抄，争取中午前抄完，然后送“井冈山”总部保管，并通知参加这一行动的各单位一起来审查。

朱起鸣告诉陶德坚，李子明很支持他们的行动；十三局的负责人还说，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后，他们就想到给陈里宁平反了。而在陈里宁这件事上，李子明告诉他，当初上面怀疑陈有后台，查后台比对陈里宁本身还更着力，有关的查对材料用了两个房间才装下。

这天一大早，陶德坚就把陈里宁的档案带到“红教工”总部，找了近 20 人来分头摘录，过了一会儿，马春浦发现档案袋中有一捆毛泽东著作的单行本，每一本封面上毛泽东的名字都被涂改了，在当时，这可是要定为反革命的。他急忙找陶德坚过来看，果然书上“毛泽东”3 个字都被用墨笔涂掉，并在旁边写上“陈剑鸣”3 个字，还注有日期。再翻开封面，里面的文字也有不少被涂改过，多是改为与原文相反的意思，但零乱无序，看不出他的用意。从所注明的日期来看，集中在两三天内，正是他在湖南被捕并被送去作精神病鉴定的那几天。他们认为这可能是由于他被施用药物，出现了短暂的精神错乱，所以做出这些不可理解的涂改。但此事关系重大，他们不能自作主张，赶紧如实上报中央文革。

这天上午，“驻红卫医院革命造反联络站”各单位负责人来到了公安部，谢富治出来接见了他们，说：“总理让我接见你们，解决你们的问题。”

陶德坚介绍了陈里宁被秘密逮捕的原因及经过，她说：“在陈里宁的病历中我看到，秘密逮捕陈里宁的命令是您签署的。”

谢富治说：“是吗？我不记得了，如果当时你处在我的位置上，我想你也会这样做的。”

陶德坚摇了摇头说：“现在，我们希望您让十三局将陈里宁的档案交给我们；为陈里宁平反；释放陈里宁。”会上还有人提出要在十三局成立联络站，继续清查类似陈里宁的人，谢富治说：“联络站就

不要搞了，陈里宁的档案可以交给你们，其他的事等你们看了档案后再说吧。”谢富治一再表示，他是忠于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接见就这样结束了。

在此期间，朱起鸣特地给王广宇打了一个电话，说公安部推卸罪责，耍花招，认为必须把平反和释放作为一个问题由公安部来解决。他说不达目的决不撤出公安部。

朱起鸣的电话刚打完，公安部副部长李震也给中央文革小组打来电话，一再解释公安部给陈里宁开释放证没问题，但作平反决定还需要研究。接朱起鸣电话时，王力正好到值班室，王广宇向他汇报了朱起鸣的电话内容。王力说：“当然应该由公安部做出平反决定，我们中央文革小组不能作这种决定。”王广宇把王力的意思转达给李震。

一切安排妥当，王广宇同陈里宁的医护人员联系好，便去红卫医院接陈里宁。那天，在红卫医院一个小会议室召集了有近 20 人参加的会，除陈里宁外，部分医院造反派和清华大学的红卫兵也参加了会议。王广宇在会上说，要接陈里宁出院，参加批判刘少奇的战斗，然后把戚本禹送的棉衣、他送的旧绒裤交给陈里宁，会场报以热烈的掌声。

这时陈里宁还没反应过来，金弘敏对他说：“还不快说感谢毛主席，谢谢戚本禹和王同志。”

陈里宁跟着说“毛主席万岁”、“谢谢戚本禹同志”。随后，王广宇又把戚本禹给的红卫兵袖章当场交给了陈里宁的医护人员，与会者都流露出羡慕的眼光。全场又一次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陈里宁被送到《人民日报》社招待所后，王广宇即向戚本禹汇报。戚本禹问王广宇：“你看陈里宁像有精神病吗?”

王广宇回答说：“我看不出他有精神病，不过他有些迟钝，眼神呆滞，可能是长期受迫害留下的后遗症。”

陈里宁开始专心写作批判刘少奇的文章。在王广宇的印象里，他是个好“笔杆子”，手快，动辄就是两三万字，但内容不符合戚本禹的要求。戚本禹先后让阎长贵、陶文鹏、程里嘉等人修改，最后也没修改成。戚本禹利用陈里宁写批判刘少奇文章的计划未能实现。

戚本禹经过了一番思考，决定把陈里宁安置到中国科学院社会科学学部历史研究所，交给历史所造反派负责人傅崇兰，算正式调入，恢复他的工资级别和党籍，等他适应了外界环境后，愿意回湖南原单位就让他回去。

关于为陈里宁平反问题，红卫医院的内部一开始就有不同意见，一些人认为陈里宁确有精神病，陈里宁的主治医生说陈里宁没有精神病是政治需要。

戚本禹接到陶德坚她们关于发现陈里宁涂改毛泽东著作的报告后，告诉王广宇说："有人反映，陈里宁除了批刘少奇以外，还有批毛主席著作的问题。你去把他的档案调来看看，若有批判毛主席的问题就不能用他了。"

于是，王广宇便向公安部调陈里宁的档案，公安部对他说，陈里宁的档案早就被清华大学学生抢走了。王广宇又打电话问朱起鸣，朱起鸣说档案是在他们那里。

王广宇询问陈里宁档案中是不是有批判毛主席著作的材料？朱起鸣告诉王广宇，只是在毛主席著作中有些批改，看不出有反毛泽东思想问题。

当天王广宇就派人来把陈里宁的全部档案取走，给戚本禹送去。戚本禹说没时间看，让王广宇看后向他汇报。

王广宇翻看了陈里宁的档案，总的印象是，他批判刘少奇著作的观点明显，特别是他的日记，反对刘少奇是很明确的。然而他批改的恩格斯、列宁和毛主席的著作则很混乱，他把作者的名字如"恩格斯"或"毛泽东"改成"陈里宁"，把"辩证唯物主义"改成"马克思主义"，把"无产阶级"改成"工人阶级"，或改动一些连接词，大多是用同义词替代原著中的词汇，就变成他的著作了。他还在著作的扉页空白处写了"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马克思主义万岁！"等口号。

王广宇向戚本禹作了汇报。戚本禹让王广宇再去找陈里宁的主治医师问问，看陈里宁是不是真的有点精神病?不然他为什么要这么干?

王广宇又去找陈里宁的主治医生。他们看了档案后，认为从陈里

宁涂改的毛主席著作情况看，没有明显的反毛泽东思想，但也不像正常人干的事。他们说在医学上有一种“间歇性精神病”，即患者清醒时像正常人一样，而发病时就处于癫狂、无意识状态，涂改毛主席著作可能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的。王广宇认为这种解释有道理。陈里宁的主治医生提议去问陈里宁。王广宇又去找陈里宁，陈里宁很紧张，他说：“我都记不得了，好像有一次给我吃一种药，脑子产生幻想，稀里糊涂地就把毛主席著作乱画了，真的不是反对毛主席。”

王广宇向戚本禹转述了陈里宁的主治医生的解释。戚本禹也感觉到陈里宁是“有点精神病”，但并没有把这件事看得多么严重。

十三局在审问陈里宁时，也认为他涂改毛主席著作是精神病发作时所为，所以没有当作罪证。

稍后，“中央文革”下发通知，和十三局原来的看法相同，说陈里宁涂改毛主席著作是精神错乱时所为，不是他的问题，这个人可以宣传。

“红教工”的成员曾昭奋根据陈里宁档案的摘录，编了一本《狂人日记》，有陈里宁的日记摘抄，也有这一案件的发生与揭露的经过。“红教工”自己找印刷厂一次印了 5000 份，没有几天就卖光了，全国各地纷纷翻印，而且还在许多城市被摘抄成大字报张贴在显著的位置。大概不仅因为陈里宁的遭遇使人同情，他在日记中有许多语言也增强了对人们的感染力，引起了普遍的共鸣。

一时间，陈里宁成了新闻人物。甚至毛泽东也知悉了陈里宁其人其事，据红卫兵小报的大字新闻说：“江青同志将‘狂人日记’递给主席看，主席阅后说：‘好！’”

陈里宁出院前，曾在 1 月 10 日红卫医院召开的控诉刘邓反动路线大会上发言说：

“1962 年，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经修订后重新出版，我将新旧版本进行对照，发现修改本把恩格斯、斯大林的名字勾掉了，并很少提毛主席的教导，带着刘少奇的问题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竟然发现该书存在 50 多个问题……”

## 第 395 回：戚本禹，接见强调批刘邓　铁路乱，毛泽东再赞上海

1月9日，戚本禹在接见解放军技术工程学院、测绘学院的军队学员时说："你们造反有一个重要问题忽略了，你们讲了两个钟头，没有讲到这个重要问题，你们谁谈一谈？"

有人说："没有归纳上纲，没有用毛泽东思想分析。"

戚本禹问："上什么纲？"

有人答："归纳到两条路线上。"

戚本禹："都没讲对。一个重要问题是什么纲，要上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纲。你们今天没有涉及，造反造了半天，造什么反都不讲，究竟你们怎么认识？怎么配合这个高潮？你们写过几篇反对刘邓的文章。……陶铸你们还没有谈呢？王光美你们还没有说，刘志坚与刘邓是什么关系？"

有人说："搞不清。"

戚本禹："搞不清，又不去搞，我看刚才那位讲的对，不要认为自己很高明了，我老实说，我是很不高明的。

我认为刘邓就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有的人批判我，反对我，你们有没有不同认识？我的意见就是这样，你说他是不是最大的，是不是党内的，是走社会主义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是不是当权派，所以我说他就是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全国解放前夕，毛主席提出要提防'糖衣炮弹'，刘少奇就中了'糖弹'，'糖弹'就是王光美，搞了个王光美结合起来篡党，用他们的观点来改造我们的党和国家，刘少奇本来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他愿意吃这个'糖弹'。

王光美是什么人你们知道吗？王光美是个大资本家，他哥哥也是天津的大资本家，刘少奇过去在苏联留学时，受到布哈林的影响很深，他讲中国农民受剥削不是受多了而是受少了。有个党员变成富农，有人主张开除，刘少奇说党员可以变成富农，富农可以入党，可以剥削人。刘少奇见王光美的哥哥嫂嫂说：'大哥大嫂，你们好啊！你们应入党啊……'共产党的电影也不愿看，我过去在中南海工作过，他整天就看看戏，资本主义黄色电影很感兴趣，江青同志反对他，说了以

后，还偷看。”

戚本禹又说：“要把部队的斗争和路线斗争联系起来，要调查一下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还是刘邓司令部的人，分别这个人是哪个司令部的，两个司令部的人是不同的。毛主席司令部的人，有时也会说几句刘邓司令部的话，对他们不能打倒，不能火烧，也不能油炸，刘邓司令部的，即使是不太有名，不那么高，就要打倒，就要火烧，也可以油炸。油炸不是真的放在油锅里炸，是斗倒斗垮的意思。情况不太清楚，找个可靠的人问问，问问他是哪个司令部的，再考虑烧到什么程度，不要大水冲了龙王庙，自家人打自家人，不打不相识，但打到什么程度要考虑，不要烧焦了。如谢镗忠我们接触过，基本上是个好人，是个老实人，缺点也有，都是小辫子，我们不要抓小辫子，要抓大辫子，刘志坚不要看他官多大，他是刘邓司令部的人就要‘油炸’。不清楚就可以串联一下。”

有人说：“总参不让串联，进都不让进，杨代总长不接见我们，做官当老爷。”

戚本禹：“这话我不赞成，杨成武同志我接触过，他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忠于毛主席的、林副主席的。他是有战功的，立下过汗马功劳的。长征时，曾指挥过十八勇士抢渡大渡河。过去的英雄，现在又是紧跟毛主席的，是大大的好人。”

有人问：“肖华呢？”

戚本禹：“是毛主席司令部的，有缺点可以批评。这次文化大革命，杨成武是有特殊贡献的，有特殊的功勋。没有他指挥部队顶着，罗瑞卿早就政变了。他事情很多，要调动部队等等，是可以理解的，他跟我的任务不一样，要叫我调动部队，我也不能来见你们，你们可以写信问问他，我想他会告诉你们的，这样，目标不就准确了吗？你们可以找别人，找毛主席司令部的人，如解放军报社胡痴，是毛主席司令部的可以找他嘛！”

“说冲国防部的都是反革命，我不赞成。叶副主席讲了是错误的，他检查了，他检讨了不等于你冲国防部是正确的，冲进来是错误的。不是反革命的事，不一定是对的，这个形势逻辑你们是清楚的，不是

反革命的事有是正确的，也有是错误的，错误的事就不能坚持，你们张家口学院的事，如果总参没有调查，或调查的不对，没有可以提出，可以坚持，进到国防部就是不执行最高指示，军队院校十几万人，如果都进来怎么行，你们知道总参任务很大，负有重大责任，所以中央指示过不能冲，我们对中央指示都不尊重的话就不好。”

“还有中南海、钓鱼台，你们不该到钓鱼台，我们不会见你们的，开先例不行。里边不光住着我们，还有许多外宾，江青同志说过，你们一万个人，有一个人不好，进去出了事，谁也负不了责任。”

随着工矿企业文化大革命的开展，铁路系统的文革浪潮同样是越涌越高。1966 年底，铁道部部长吕正操“失踪”了几天，原来是造反派为了揪斗方便，把他藏起来了，直到元旦后的一天，瘦了一圈的吕正操才又出现在西花厅。接着，又有数千名铁路职工涌入北京，住进铁道部，要求解决他们的问题。周恩来继 1 月 2 日召集铁路部门 20 余个单位，100 余名代表参加的大型座谈会后，又于 1 月 10 日，抽出时间接见了铁道部乘务员代表。他说：

“同志们，乘务员同志们：我们听到你们沿途受到一切阻碍，甚至受到委屈，我们很关心你们的事情，所以今天接见你们。”

“你们在这里差不多等了 5 个多钟头了，我很不安。”

接着，周恩来照例讲了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意义，并说：“这次斗争不可能一点损失没有，成绩是伟大的，我们在运动中受点损失也是运动中的代价，使我们从中吸取教训。你们有的被打被骂，国家财产受到损失，你们心里很难过，这一切，我们是要解决的。这是运动中总是要出现的一些波折，出现了一些非解决不可的事情，把它解决了，运动就前进一步。”

周恩来充分肯定了铁路职工在毛泽东接见红卫兵的 4 个月中，运输了 1200 多万人次的成绩，同时承认，在推动工矿企业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高潮时，开始时注意不够，缺乏经验，许多准备工作不可能做好，因此出现许多的问题。但是，这些都不能成为影响生产的借口。

他再次提到 1 月 9 日《人民日报》转载《文汇报》发表的《告上

海全市人民书》，提出现在走资派不像运动初期那样，用抓生产压制革命，而是“像‘告上海全市人民书’上说的那样，现在是丢生产，跑革命，或是喊革命，这些当权派，不在本地抓革命，却号召一部分人到北京来闹革命，跑到北京来，还闹什么革命？比如：从齐齐哈尔来的车，斗争对象在他本厂而跑到北京来，这怎么来闹革命？要来北京可以按照六条规定讲的，派来几个代表，为什么偏偏要来几千人呢？这些当权派就是为了掩护自己，并进一步提出经济要求。不是搞集体利益，而是讲个人的经济要求，我们的工资制度。当然有些是从苏修那里学来的，封建主义的也有，但这必须要在运动后期改变，否则不能变动，这样做，就是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把工人都涌向北京。全国两、三千万工人、职工，北京怎样接待呢？他们去铁道部可以看出来，铁道部里住满了，还是解决不了问题，这必须改变。”

周恩来接着说：“你们乘务组，大部分是从东北来的。你们知道大庆职工有几万人，这次大庆领导也犯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错误，运动初期，学生串联，大庆领导拒绝。本地职工起来了，他们压制，等到大庆的职工觉悟了要革命，大庆领导害怕了，当大庆领导揪出后，让学徒工、半工半读的学生一万人离开大庆，跑到北京。结果，大庆油田许多事停下来，这就是最大的损失，这就叫做丢生产，跑革命，是假革命，不是真革命，他们随便离开岗位，数量较大，把许多青年职工支到北京造反，本来应造他们的反，却把他们支到北京来，我举这个例子，你们是会理解道理的。抓革命、促生产，就是在本地闹革命，首先是解决政治思想的革命，不是解决经济的革命。职工到北京的数可大大超过我们的设想。”

周恩来提出六条：

首先，抓革命、促生产。他说：“在本地搞革命才能促生产，跑到外地去不能促生产，只能破坏生产。”

二、今后应由各站做好水、饭、食品供应。他说：“控断供应是错误的措施，是不负责任的措施。”

三、保证乘务员的人身安全，保证列车正常运行。

四、运输要按计划进行，按计划卖票，严格计算票数，不能卖超

员的票，票超只能超 10% 左右。他说："现在都在加倍的售票，这样不许可。"

五、进行铁路员工全面地动员，从铁道部到各分局、支线、站段，包括铁道部的各工厂、各学院、医学院，从北京一直动员到各县，保证运输安全，人身安全。

六、责成铁道部负主要责任。他说："铁道部不负责任，前五点就不能执行好。铁道部以前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吕正操部长应负主要责任。现在批判他的错误，有两种办法：一个是各学院、单位把他揪来揪去，这种做法对铁道部不利，对他个人却有好处。揪吕部长把他带到长辛店去，摆在那批四、五天，我找不到他，这个事情对谁有利？对国务院没有好处，我连部长都找不到，事情办不了，这个办法并不好。还是让他从工作上去考验，你抓业务，就要抓革命。"

周恩来说："现在各地都叫造反派。大家丢开业务不管，这是要批判的，丢开业务，光抓革命，那不落空了吗？抛弃业务，怎么搞好革命？现在铁道部里只有调度室保存，其他室都住满了，怎么搞业务，是不是可以分他一层楼，既抓业务又要搞革命，然后再腾出时间同你们接触，讨论工作，讨论革命。两者结合起来，当然要政治挂帅。"

周恩来动员这些乘务员们回本单位，他说："要求你们不要坚持原来的态度，留在北京不走。有人说：你们的行动本身就是革命的行动。我不同意，但是这也不能责备你们，应同情你们，要给你们以解决。"

"这一次我同李先念副总理一道研究你们的问题，重视你们的问题，以便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推向新高潮。还有一个建议：建议铁路系统成立一个总的联络站，鼓励各方面的铁路系统成立革命的组织，根据十条说的，铁路系统应提倡把革命组织，铁道部里局、分局、站、段、组、工厂、学校都有革命组织，按铁路系统，设立联络站，把革命组织联合起来，国务院依靠这样的革命左派组织，抓革命、促生产就更有利了。"

1 月 10 日上午，上海由银行、财政局的造反派组织联合上海"红革会"、"炮司"、清华"井冈山"驻沪联络站等组织在中国人民银行

邀请内航公司、立新船厂等八个单位财会人员进行座谈会，鼓励财会人员继续坚持原则，把守岗位。各单位希望与这些造反组织保持联系，协同把“反对经济主义”斗争进行到底。于是，他们联合组成了“反对经济主义联络总部”，开展审查提款、取缔经济主义组织等活动，配合银行和工厂单位进行宣传、联络、调查研究等工作，并协助银行处理一些具体问题。“反经济主义联络总部”共 77 人，其中 47 人为红卫兵学生。

同一天，上海“红革会”、“机联站”和清华大学“井冈山”驻沪联络站等组织进行了打倒经济主义，坚持抓革命促生产的游行宣传，把上海市负责生产、财政的宋季文、张承宗、胡铁生、马一行等人押在宣传车上游行示众。

这天，1 月 10 日晨，毛泽东阅江青报送的两篇新华社电讯稿，一篇是《上海革命造反派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发起总攻击》，一篇是《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等革命造反组织，在〈文汇报〉〈解放日报〉发出〈紧急通告〉》。毛泽东当即将这两个电讯稿批给陈伯达及中央文革小组：

伯达同志及小组同志们：

（一）此两件很好；（二）请你们在二三日内，替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起草一个致上海各革命造反团体的贺电，指出他们的方针、行动是正确的，号召全国党、政、军、民学习上海的经验，一致行动起来。起草好了之后，开一次较大的会通过发表。

批语最后补充说：

关于反经济主义的文件不要发了，上海这个就很好。但需要写一篇解释文章。

陈伯达立即与王力、关锋、戚本禹、唐平铸、胡痴一起，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精神起草了贺电和《人民日报》为此配发的社论。

## 第 396 回：见群众，要反对经济主义　反复讲，抓革命要促生产

1 月 10 日，就在毛泽东肯定了上海《紧急通告》的当天，周恩来、陈伯达、江青、康生、关锋、王力、戚本禹、胡痴等人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学生、工人和军事院校代表时，由王力首先宣读了上海市 32 个群众组织发出的《紧急通告》和《文汇报》《解放日报》记者对上海地区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好形势的评述——《上海革命造反派向着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发起总攻击》，以及即将发表的《人民日报》社论草稿：《反对经济主义，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向大家征求意见。

接着，陈伯达讲话。他说：

“今天开这个会，介绍上海的经验，上海的经验对全国普遍适用。现在，阶级斗争很复杂，阶级敌人更加狡猾，他们采取各种手段，差不多在全国各地存在。比如在北京，就有些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在耍阴谋诡计，他们的手段很毒辣。比如铁路运输中断，这不是铁路职工的过错，是铁道部的负责人吕正操的过错，他们一伙发了传单，支持铁路工人罢工，中断火车交通，这都是重大的事情。”

周恩来说：“铁道部的领导人吕正操一伙人发了 50 万传单，支持鼓动工人罢工。”

陈伯达继续说：“他们破坏文化大革命。刚才社论说了，敌人如不向人民投降，就叫他灭亡！大家同意不同意啊？”

众人答：“同意！”

接着他说到陶铸：“陶铸是在刘邓路线推行时坚决执行刘邓路线的，中央毛主席想挽救他，在十一中全会上有人揭发过这件事，中央和毛主席是知道的，想让他过来，挽救他。但十一中全会以后，他没有过来，没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还继续执行刘邓路线，并且继续推广了。他和王任重所领导的中南局出现了很多典型的反革命事件，镇压革命的事件。在武汉逮捕了相当大量的革命群众，这是在其他地方还未出现过。我们想帮助他，但帮不过来。他的世界观，思想不能接受毛泽东思想，因为他是资产阶级的，坚持资产阶级世界观，他就不能接受无产阶级世界观。

我们中央文革小组批评过他，十一中全会批评过他，大家批评过他，但是他的灵魂没有被触动，好像是不是我们帮助不够呢？在他看来可能是这样，在我们看来，在十一中全会以前就帮助过他。在那时，他坚决执行刘邓路线就帮过他，希望他成为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人，当然那时我们劝阻比较婉转，后来，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他就闹，我们就公开摊牌了。他说：‘这样摊就好了，不然我就不安了。’

街上贴了那么多大字报，叫做‘打倒陶铸’。这是不是我们文革小组的过错，或者是我陈伯达的过错？他后来写了一封信，叫‘咎由自取’，给党中央和毛主席写这样的信并不合适。什么‘咎由自取’？！事实上是‘咎由自取’！他自己要这样嘛！所以，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也不以自己的意志为转移，他转来转去，最后还是转到他的路线，我们想帮忙帮不上。

除陶铸之外是否还有旁人呢？可能还有个把子吧，至少！我们根据毛主席的教导‘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能治就治，但是有些病是不可以救的。当然，能够治的，尽量治好，但是有的是的确治不好。大街上的标语那么多‘打倒陶铸！’但是还是要看看他，这几个月来他的表现是够呛的了，有群众压力可能会好一点，看吧！也有的人在民主革命时期能过得来，但到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就要有许多人过不了关了。”

“譬如上海、黑龙江、西安、重庆等很多地方，他们都是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人。看情况不妙了，他就拿出钱叫你北上告状去，好多地方如此，上海就是这样。”

周恩来：“好多地方，铁道部就是这样，假装同情职工，结果铁路中断，这是我们原来没预料到的，现在恍然大悟了，上海事件给我上了一课。”

陈伯达：“现在我的话完了。”

马上，他又说：“再补充几句，免得犯片面性，虽然这样，但不要搞乱了，乱抓一通。没有全面考查一个人就抓，这样也不一定合适，对你们不一定是一个很好的锻炼吧。譬如在我们中央里面有很多经过

长期考验的同志，譬如你们现在想要抓的谭震林同志、李先念同志、李富春同志、聂荣臻同志、谢富治同志、叶剑英同志、陈毅同志、徐向前同志、余秋里同志等。”

江青：“抓谢富治同志的人中有一部分是很坏的，跟你们坦白地说，我们是支持谢富治同志的。他不抓西城区纠察队一小撮人，就会失掉了作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公安部门的责任了，很有许多人功过要全面的比较，余秋里也作了很多工作，谭震林等同志是经过长期考验的好同志，我们和同志们对他们是有好感的，他们不搞阴谋。他们说错话，作错事，写错文章是有的，但是同大是大非区别开来。这是不是折衷主义呀？”

众答：“不是！”

外语学院的同学说：“陈毅还有许多问题未揭出来！”

江青：“陈毅的问题是同志间的问题。”

周恩来：“陈毅正在写检查。”

接着江青讲话，她说：“目前在全国有两个大问题：一，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用经济主义和我们作斗争，刚才发给的三篇材料，有两篇是上海的，一篇是中央文革小组研究的社论，这些问题是普遍存在的。我不想多说，提醒一句：敌人想腐化瓦解我们的队伍，收买贿赂一些不明真相的人，这就会给党和国家造成很大的损失，如铁道部的吕正操是自己跳出来的，本来就是桃园三结义的人，揭发彭真时保护了他一下，他挑动一些不明真相的铁路职工，使铁路不能正常运输。他采取的手段就是这样，经济上有，政治上也有，有的乘务员受气挨打，这应该解释。他挑动铁路职工，以至于许多重要交通枢纽不能出车，他们利用经济主义来破坏国家生活，使国计民生都要遭到困难，用这个抗拒毛主席的领导，抗拒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在北京也是相当普遍存在的，在数字上没有上海那么厉害，四、五天以前我们采取了紧急措施，除了特殊需要外，冻结资金，否则，他就要使我们工厂，什么地方都破产了。

我们要牢记毛主席的教导，艰苦朴素闹革命。例如市委送给‘北航’10 辆自行车、两辆摩托；余秋里给地质‘东方红’25 辆自行车、

5 辆摩托车、1 辆吉普车。他们哪里来的？我说还不是国家的，我希望你们退回去。”

众答：“回去马上就退！”

江青接着说：“有的单位都喜欢搞宣传车，满街跑，吵得人睡不着。”

周恩来：“工厂区有问题，它是三班制，用广播车去广播不合适，希望同志们注意。”

江青说：“当前主要是击溃他们的经济主义，他们破坏经济，破坏文化大革命，抗拒中央、毛主席的领导。他们哪里来的钱？还不是人民的。”

江青又讲了陈毅、谭震林、李富春、李先念、谢富治等人在历史上的功绩。她说：“例如陈毅同志说过错话，写过诗词，说话有过头的，有不正确的，我跟他当面争执过，这个同志不是两面派，他有错误就改，他可以和我争得面红脖子粗，最后承认了。但陶铸不能，他和王任重背后搞我们，甚至镇压我们，所以这种情况能不能一样？”

“陈毅、刘伯承、聂荣臻、叶剑英、徐向前他们的大方向是跟毛主席走的。聂荣臻最近已向北航作了检查，同学们反映说好。桃园三结义是彭真、林枫、吕正操他们三个人在东北整林总的黑组织，他们也整过聂荣臻同志。

吕正操跳出来了，拿出了杀手锏，使铁路瘫痪，这个事非常容易揭穿。

同学们要作这个工作，像刘志坚这样的人物我们帮你们揭发；我名义上是军队的文化顾问，但是他从不向我汇报。去年开了个座谈会他有了政治资本，因为肖华有病，病了两年，他手伸得很长，当了中央文革的副组长，肖华同刘志坚比哪个好？肖华好。

刘志坚最大的阴谋是对叶剑英，陈毅，徐向前等提供了不正确的情报，没有必要让他们出来讲话的场合出来讲话，使他们讲了一些错话，影响不好，使军事院校整个锋芒都对准了我们几位元帅，而他呢？则躲在后面了，他是典型的两面派，他在你们面前充当革命左派，自称是中央文革副组长。

不久前，叶剑英同志向你们做了自我批评，他（指刘志坚）又拉了一些人，指挥我们和刚才讲的几位老帅误会，我们挑动你们去斗他们。肖华休息了一、二年，实际上他担任一线去了。去年刘志坚捞了点资本，中央委托我搞了一个军队文艺座谈会纪要，他参加了，这次他做了文革副组长，他很隐蔽，他再隐蔽还是在我们面前露出了马脚。目前锋芒集中起来，我们不能把斗争锋芒对准他们，可以批评他们，但不能用刘、邓、陶铸、王任重、刘志坚的方法对待他们，要是这样，我们国家还剩几个人工作，我不知这个问题讲清了没有。能不能给大家解开思想上的扣？”

同学们答：“能！”

江青接着说：“除了这个以外，今天收到了一封信，北大同学提出要召开一个 40 万人批判刘邓路线的大会，我们提点意见，你们已经搞过游行了，是不是有必要再搞，分散到各处去？因为外来的人很多，容易堵塞交通，是不是变化一下方法，体育场是不是可以接线，可以搞得广一些，深一些，冬天比较冷，队伍挤在一起吃不上饭，喝不上水，冬天又有传染病。已经搞过了，是不是有必要再这样搞？”

有一个同学站起来说：“可以改变！”

江青：“那就好了。现在外地来北京的有 70 至 80 万人，有的同志要动员他们回本单位，抓革命促生产，矛盾上交到北京，负担太大，我们能保证这么多人吃住，这说明了什么呢？说明了我们国家经济稳定，目前有一小撮人抛出了经济主义，你们应该做工作、宣传。中央工作会议上林彪同志和陈伯达同志的讲话，《文汇报》提出了抓革命促生产，发表了《告上海全市人民书》，他们的杀手锏就是破坏生产，我们能允许他们这样吗？”

众答：“不能！”

江青：“要动员劳动群众回到生产岗位，坚持革命。”

接着，她又讲了第二个问题：“第二，把斗争锋芒引错，不该搞的搞了。今天，把这两个问题讲清楚，党中央国务院主要好的都点出来了，李富春同志给统战部送了大字报，才揭开了盖子，叶剑英同志代我接见了少数派，北航红旗、地质东方红在困难的时候，叶剑英同

志是支持他们的，我那时处境困难，我曾经感谢他，搞他这合理吗？在困难的时候他能过来跟着毛主席、林彪同志走，所以我们不能像对待刘、邓、陶那样对待他们，要善于分清敌友，对领导阶层也要分敌友我，要调查研究，我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特别是军队院校的，就是，最近军队的文革小组要改组了。”

随后，康生讲话，表示同意陈伯达、江青的讲话。他说：“关于陶铸，我要讲几句。他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不是偶然的，在毛主席面前，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批评了他，他不改，甚至有时他讲话相当‘左’，实际上形‘左’而实右。我们可以告诉你们，解放十七年来，经过三次大的斗争：一次是高岗、饶漱石；一次是彭德怀、黄克诚；一次是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陶铸在高、饶问题上犯了错误，他是拥护高岗的，在一九五五年代表大会上，他检讨，头次滑过关，严厉批评了他。第二次勉勉强强过去了，他不像你们《井冈山战报》写的《陶铸论陶铸》，他不是这样，他的错误不是偶然的。你们检查一下《羊城晚报》、《广州日报》，看看他们怎样对待文化大革命。周××写了一篇《毛主席到韶山》，这是一篇大毒草，《羊城晚报》登了，大家反对，《羊城晚报》过了些时候，又登了一次，加了按语，说得一点也不错。我再举一个例子，四月十六日彭真弄了个假把戏，搞‘三家村’，《北京日报》作了按语，发现这个后，我们立即通知全国各地报纸不准登载《北京日报》的假检讨，不到两个星期，广州的报纸全部登载，他反对彭真还是拥护彭真呢？王任重的一套也就是陶铸的一套，武汉的白色恐怖是陶铸、王任重搞的。还有一件事，全国都登了姚文元的文章，唯独《湖南日报》没登。陶铸在中央，林总作了很多工作，结果没效果，他用两面手法，所以，我们宣布不是仓促的。陈伯达同志元月四日有关陶铸问题的讲话是我们讨论过的。他同谭震林、李富春、李先念、叶剑英性质不同。”

随后，周恩来请上海《文汇报》和《解放日报》的代表发言。然后他说：

“中央文革小组是毛主席最好的参谋部，军委是司令部，我们国务院是执行机构……”

陈伯达插话："中央文革不是参谋部，只是个工作机构。"

周恩来继续："……我们要以上海为起点作个榜样。对中央文革小组我是坚决支持的，上海三十一个团体发表的十条我们完全赞成，左派有了分化，我们希望在大前提下统一起来，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基础上团结起来，我们都愿意接受批评，接受同志式的批评。我个人，同志们批评我是可以的，我们要处理那么多事，不可能没有错，军事系统在运动初期仓促上阵，也是有错误路线的，军队派出的工作组因为长期没有做群众工作，执行了错误路线。批评是需要的，派到文化部所属各院校的军队工作组主要由文化部肖望东负责，肖望东不是好人……"

江青插话："是，肖望东，还有煤炭部的张霖之。"

周恩来："对解放军的工作队员可以批判，对他们的军人标志要尊重，不要随便脱军装、摘帽徽。"

"以搞革命为名破坏生产，方法就是实行经济主义，也就是修正主义。交通的问题过去曾经发生过抢车、卧轨等事件，但是都很快的解决了，没有影响运输，现在铁道部本身要罢工，引起了运输的停顿，那些罢工的原来大部分是保守派，现在要造反了，造反嘛就罢工。北京的列车乘务员受了点委曲，完全可以做点工作，把事情解决，但铁道部的吕正操没有那么干，反而挑动工人罢工，铁道部的武竞天，他是个花花公子，他犯了很多罪，就在毛主席坐的列车上，他窝藏了17 大箱的黑材料，是'三司'搜出来的。"

"为什么铁路出现了打人，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他们把矛盾上交到北京，我们怎么解决得了？打人最厉害的是京广线、长沙、株州、衡阳，有 3000 多人抢车，一部分买票，另一部分不买票，与乘务员发生冲突，这种方式不是阶级兄弟的态度。这件事陶铸打电话同意了，有些是中央没同意，是直接来北京的，像东北、齐齐哈尔等。给大家介绍这一个例子，大庆 7 万人的地方，有 1 万人出来串连，不能不影响油田生产，到北京来要钱给钱，矛盾上交，幸而王进喜站出来了，张洪池栽了跟斗，王进喜说：我心里非常难过。王进喜准备回去把问题解决。"

“现在各地方除了司局长以上的，都起来造反了，不工作了。有的部、司、局长以下的以搞革命为名都不抓生产，我主张外交系统开门，外交系统的造反派起来了，把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挤垮了，但中心一定要抓革命，促生产，不抓就偏，我现在主要抓石油战线、铁道、外交，这 20 天我就做这些工作。我不能什么事都管啊！只能抓一下，还得靠各个部抓到底。”

“要大搞军政训练，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搞大联合，春暖以后向全国推广……

总之，这次和大家见面，我说得多，以后不一定要我出面，可以让文革小组跟你们谈。”

江青接着说：“我们今天的目的是向你们亮底，很信赖你们，这是一。二、我们现在小组的成员、总理都是工作到天亮，因此，请你们帮助做工作，不是责怪你们，而是向你们亮底，不要灰溜溜的走，我每次都是赞美你们的，我们现在成了救火队了，到处去救火，所以希望你们协助。”

“鞍钢、包钢有几炉铁水已不再加热，如一凝结，钢水、炉子得全部完蛋。很多铁路不通……严重的很。目前，这是中心问题，任务：抓革命，促生产！”

“有的同志提出第三司令部合并为北京公社，这个我们不能包办代替，现在合并很难，应该在革命的行动中结成战斗友谊，逐步达到组织上的统一，如果不在实践中去分辨同志，联合就不巩固。

另外，有同志说今天有保守派参加，这个不怕，因为大多数是受蒙蔽的，如果我们能够通过揭发改正错误，归队，我们是欢迎的。第二个是坚持错误的，如昨天晚上陈伯达同志本来可以早休息，我们去看一下保守派同学，他们居然要把王力、关锋扣下来，我们说不行，回来。但你们也不要围攻他们，他们这样作目的是要我们周总理、陈伯达同志接见他们，不见！必须改正错误，他们什么时候改正错误，我们什么时候见他们。我们是把你们当国家的财产、接班人来看待的，你们跌了跟斗有什么了不得的？第一是欢迎走错误的检查归队，第二，如果要挟我们，我们不理他们，我们就是不妥协，如果和他们的

错误妥协，那他们的错误还是要发展的。我们对有些人实行了专政，专政也是要教育人，有些人为此老要冲公安部，这办不到，我们希望你们回到正确的道路上来，作了自我批评，欢迎归队；第二条我看是撒娇，我们不能妥协。”

## 第 397 回：冬日寒，李葆华北京游街　贺龙燥，“联动”六冲公安部

1 月 10 日下午，寒风呼啸，滴水成冰。沿长安街向中南海西门缓缓驶来一支队伍，前面是一辆卡车，车上一位头戴棉帽，身穿绿色军用棉大衣的人，胸前挂着一个牌子，被人反剪双手，正在游街。细看那牌上写着：“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李葆华。”“李葆华”三个字都用红笔划了圈圈，打了叉。

李葆华是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怎么跑到北京来游街了？

1966 年 12 月 26 日，李葆华被周恩来召到北京，住在北京饭店，但依然不得安宁。很多安徽人，特别是蚌埠、怀远一带的农民，打着各种造反司令部的名义来这里找省委批钱。随李葆华一起来到北京的副省长张恺帆被他们搞得毫无办法。

1967 年 1 月 5 日，住在北京饭店的李葆华被安徽造反派抢走，带到北京师范大学批斗。

1 月 9 日，安徽“827”的梁守福和李文安及清华串联队的戴勤发来到北京饭店，找到住在这里的李葆华、张恺帆。当他们看到走廊和屋里乱哄哄前来批条、签字、要钱的群众，认为这种现象显然不符合中央关于反对经济主义的精神，于是决定出面制止。于是梁守福和李文安、戴勤发他们 3 人从屋里出来，亮出安徽“827”的牌子，宣传中央的政策，要这些人回到本地区解决问题，不能直接到北京来要钱。这几个大学生还告诉这些人，以前省委任何人批的条子都不算数，都得听中央的。

当李文安说出这番话时，口气非常硬。外地人不认识他们，自然不把他们几个毛孩子放在眼里，还在那里吵。这时李文安把梁守福抬出来了：

“你们知道他是谁？他就是全国有名的梁守福。”

他这一手还真管用，围在走廊里的人一下子不吵了。那时人们不怕领导，在大的官也可以批斗、抄家、打倒。红卫兵就不一样了，那可是毛主席支持的天兵天将，他们打人、斗人、给你戴高帽可是不和任何人商量的。这些人不吵了，梁守福他们又做些工作，人退走了。从下午到晚上，就这样劝走了好几批这样的人。到了晚上，梁守福他

们和李葆华、张恺帆坐在一起聊天，张恺帆说："你们早几天来就好了，今天不是你们几个来，我还不知道被他们围到什么时候呢？"

这几天连遭批斗的李葆华话不多，因为他不知道这些学生的真正来意。

李文安说："我们是想让你们回去，一面接受群众批判，一面还要工作。省委已经瘫痪，你们老在北京，省里出问题，责任还是你们的。"

李葆华说："我们也准备这两天就回去，但周总理还准备接见我们，做做工作。"

梁守福说："你们老这样接待批钱也不是办法，不如找个地方躲几天再说。"

张恺帆说，他们准备搬到香山饭店去，那个地方离市区远，一般人找不到。当晚，梁守福他们就在地毯上睡了一夜。

第二天下午，北京师范大学和其他高校红卫兵又将李葆华揪走批斗。他们让李葆华站在一辆卡车上，胸前挂一块纸板做的大牌子进行游街，从北师大所在的北太平庄出发，进入长安街后，一路游街示众到中南海西门，成为全国省委第一书记中第一个在北京被游街的人。虽然李葆华穿了军大衣，戴着厚厚的棉帽，但依然可以看到他被冻得鼻涕拖得老长。

车过新街口，人群中有一个中年女教师见此情景流泪掩面而去。她是鲁迅的弟弟周作人的儿媳张芳。张芳知道 1927 年 4 月，李大钊被张作霖逮捕后，李葆华就藏在八道湾周作人的家中，也经常听丈夫说起李葆华 1927 年夏去日本留学后领导中国留学生英勇斗争的种种事迹。她想不通："怎么能对一个为革命出生入死的老共产党员这样？！"

车过西四牌楼，人群中猛地冲出一个青年，他是李葆华的大妹妹李星华的长子贾森林。在延安长大的贾森林，知道大舅是忠贞不二的共产党员。他见到贴满车帮的大标语上，李葆华三个字都打着红叉，怒不可遏地冲上去撕扯标语，并向车上大喊："李葆华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

没有人理睬他。他的怒吼被高音喇叭声淹没了。车过沙滩，路过那里的贾森林的妹妹贾凯林目睹了大舅游街，这个女中学生惊呆了，心痛如割，却无力救援。

押着李葆华游街示众的卡车在冰天雪地中缓缓驶来，背景就是他父亲李大钊当年传播革命的北大红楼。

1 月 10 日，王新亭、关锋、戚本禹接见总参三部工作人员，由关锋宣读中央军委《关于三部文化大革命的决定》：

“三部全体同志们和技术工程学院的同学们，军委1月9日召开了会议，中央文革小组陈伯达、江青同志参加了这个会议，军委考虑到三部所担负的战备任务极为繁重，决定三部机关的文化大革命暂时不进行。三部什么时候进行文化大革命，军委将根据以后的情况再决定。

中央军委

一九六七年一月九日”

然后戚本禹讲话：

“现在我准备把你们递的几个条子谈一谈我个人的意见：

一个就是刚才同志们给关锋同志提出的问题，说是一方面愿意服从军委的决定，但一方面还希望搞革命。这个心情我完全理解。正像你们这里一位同志所讲的，三部像一堆干柴，一点火就着。我观察恐怕是已经着了，要爆发！也已经在爆发的过程里面，想爆发。”

“什么时候烧，是今天烧还是明天烧，还是过一个短时期以后再烧，什么时候烧有利，是这么一个问题。火是一定要烧的，斗争是一定要爆发的，但是什么时候爆发，什么时候烧起来，这个中央军委可以有自己的考虑，可以有自己的决策，因为三部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机关。……我看军委做这样的考虑是完全正确的，我拥护军委这个决定！”

“还有个问题，文化革命暂停期间，我们强烈要求批判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我部的流毒，行不行？我看一批判流毒，就要联系实际事，那就要开展文化大革命了，（笑）那就和军委这个指示不太符合，为了我们长远的利益，我看暂时让那流毒流一会也没有关系。”

“有一张条子说是：军委指示我部文化革命暂停，我完全同意，

坚决拥护，坚决执行，如果在暂停时期，有某些领导干部（科级以上）继续不断搞文化革命中问题，如材料问题，那怎么办？军委这个指示不仅仅对群众有约束力，对干部、部长，中央有指示，他们暂停，你们也暂停，你们不暂停，还要搞点材料，就叫非法，违反党纪国法。如果发现这样事情，那么运动开展以后，要严肃反省。”

台下热烈鼓掌。

“还有坚决要求江青同志担任全军文革小组长，这个要求前天我接见的张家口开座谈会的同志，昨天接见总政文工团的同志，都有同样要求，我今天早晨来之前，我给江青反映了这个要求，江青同志不很赞成，但是你们要求我还可以继续反映，我想江青同志已经是你们的顾问了，她很关心部队的文化大革命，她担任组长，不担任组长，她都可以在军队文化大革命中发挥她的作用。

条子太多了，是不是就这样，好不好，同志们？我给同志们说老实话，因为我还有三个会都是非常急的，有的等了两个晚上，我必须去处理，不然的话，我今天交不了账了，是不是同志们允许我们以后再见面，你们搞文化革命时候我们再来。”

1月10日，“联动”在展览馆召开“炮轰公安部、火烧谢富治”的大会。大会就一条：按照中央历来的政策，不得镇压群众，不得私设公堂，不得私自抓人。尤其是不能允许群众组织乱抓人。卜大华为大会写了一个决议草案，把这几条都列上了。

1月11日，“联动”五、六百人六冲公安部。由于这次自动前来保卫公安部的群众达数万之众，他们没有冲成，只好气势汹汹地向公安部提出“最后通牒”：限公安部于48小时以内，把非法抓的红卫兵都放出来。并高喊“油煎江青!”、“打倒陈伯达!“打倒谢富治!”，“刘少奇万岁!”最后甚至喊出“打倒周恩来!”的口号。

12日晚上，公安部所在的长安街上依然到处都是人，很多人都是前去保卫公安部的。

1 月 10 日深夜，新六所的贺龙又听说空军的造反派也要到这里来揪他，十分焦躁。他在室内来回踱步很长时间，突然停住脚对薛明说：“我们回家，回东交民巷，有什么了不得。”

此时已是 1 月 11 日凌晨，当他们的汽车经过人民大会堂时，贺龙说："去看看总理，告诉他我们回家了。"

周恩来正在人民大会堂开会，他的秘书转达周恩来的话，要贺龙不要回家，先到周恩来的家中休息。于是，贺龙、薛明来到中南海周恩来的家中。邓颖超让工作人员在西花厅为贺龙、薛明搭了张床，让他们先住了下来。邓颖超还叫秘书带上便笺对贺龙夫妇说："想吃点什么就写上，请厨房的同志们做。"

1 月 11 日刚到，周恩来即向毛泽东报送了陈伯达起草的给上海市各造反团体的贺电稿和《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社论稿《反对经济主义，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毛泽东当即在报告上批道：

总理、伯达、江青同志：

两件及另三件已阅，很好。请林彪同志主持，在今日下午或明天召开一次政治局会议，有文革小组及其他某些同志参加，将五个文件讨论、通过，然后发出。如同意，请告林彪同志。

毛泽东

一月十一日上午二时

随即又批道：

同意这三个文件一并在今天或明天的政治局会议通过。

毛泽东

一月十一日二时

毛泽东批示中所说"另三件"和"三个文件"是指陈伯达、江青 1 月 9 日送审的《关于反对经济主义的通知》稿、《关于制止腐蚀群众组织的通知》稿和中共中央《关于广播电台问题》的通知稿。

当天，根据毛泽东提议，由林彪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和有关方面负责人出席。毛泽东也参加了这次会议。在会上，徐向前、叶剑英、朱德先后发言。

朱德认为，社会上出现的破坏生产、武斗等现象，是有反革命分子捣乱。

徐向前说："军队不同于地方，不同于学校、工厂、农村，不能和一般单位那样搞大民主，否则就会搞乱，搞瘫痪，要定下来这么一

个方针。”“军队一定要保持稳定，否则像地方一样一哄而起，就没有办法控制。”

叶剑英在发言也强调要稳定军队。他说：“地方越乱，军队越要稳。不然，敌人乘虚而入怎么办？”他拿着全国军分区以上单位受冲击的统计表说：全国 13 个军区，有 7 个军区在搞运动。全军 157 所院校都在搞运动，抓反动路线的代表人物，目标是各个军区、军种兵种的领导人。三个总部，总后瘫痪了，总政几乎瘫痪，总参部分瘫痪。海军瘫痪了，空军瘫痪了。凡瘫痪了的单位，所有的办事机构、会议室、招待所全部被占领。领导人来一个抓一个。他激动地说：“现在空军指挥部只好转移到战备工事中去。如果全国空中有什么事，指挥中断了，事情谁去办！”

会上谈到外面有很多贺龙的大字报，周恩来说：“主席说了，只是要贺龙去登门听取大家的批评，不公开点名，我们政治局的同志和常委同志不要在公开的场合点他的名，当然也不要让红卫兵去揪他。”

会议决定：取消刘少奇、邓小平、陶铸、陈云、贺龙出席政治局会议的资格；改组全军文化革命小组，徐向前任全军文革小组组长，江青为顾问，肖华、杨成武等为副组长。

会议通过了 5 份文件：

（1）中央、国务院、军委、文革小组联名致上海市各个革命造反团体的贺电。这是“中央文革小组”第一次与“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并列，是毛泽东提议加上的。从此以后，中央重要的电报、文件，便以这样的共同署名的形式下达。

（2）中发[67]16 号文件《中共中央关于反对经济主义的通知》。

（3）中央、国务院发出《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制止腐蚀群众组织的通知》。

（4）中央、国务院、军委发出《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关于保护银行的通知》。

（5）中央发出《关于广播电台问题的通知》。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关于保护银行的通知》说：对各地的要害部门，开始实行军事管制，各地银行一律由人民解放军和公

安部门负责保护。中共中央《关于广播电台问题的通知》规定，凡是在内部发生斗争的广播电台，一律由当地人民解放军实行军事管制。

同日，中央军委发出改组全军文化革命小组的通知。

1 月 10 日，江青曾派人给徐向前送去全军文革小组名单及改组军委文革的通知，征求意见。徐向前阅后准备提 3 条修改意见：

第一、新的全军文革未组成前，是否请中央文革出面先与各派群众座谈一下，交代一下政策；

第二、要讲革命性、科学性、纪律性，军队搞“文化大革命”，不要党委领导不行。现在有的机关干部起来要求成立革命战斗组织，有这种苗头。尤其是空、海军，担负着保卫空海防的任务，战备任务比较频繁，指挥失灵了不好。机关干部成立战斗组织，形成几派就不好办了；

第三、部队中哪些人是“牛鬼蛇神”，建议在适当范围讲一讲。北京军区抓廖汉生，又要抓杨勇、郑维山；空军今天又把王辉球、成钧和常乾坤带走了，这个问题要研究解决一下，否则大家没有底。

但是，他这三条意见还没反映上去，11 日的政治局会议就已经通过了全军文革小组名单。

1月10日，《新北大》刊发李清昆在校文革常委会上的发言：《孔繁、杨克明同志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北大的代表》。其中说：“江青说孔繁、杨克明的活动就是刘邓路线在北大的代表”。同日，《新北大》发表《乘胜追击，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社论。社论说，要弄清孔、杨“的反动面目，彻底摧毁他们的社会基础”。说“反革命分子杨勋”等和“虎山行”、“井冈山”、“红联军”中的“某些领导人充当了急先锋”。“他们围攻校文革、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说，“谁要坚持反革命，就要对他实行专政”。

当晚，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力学专业谢定国，看了《人民日报》1月9日转载《文汇报》发表的《告上海全市人民书》，被报纸所洋溢着的澎湃的革命热情所激励，当即奋笔疾书，以“扬子浪”笔名写出一篇稿子：“最最热烈欢呼全国又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写完后在北大“红旗兵团”写作组“横扫千军战斗队”读了一遍，大家都说好。

谢定国建议北大“红旗兵团”应该学习上海造反派，接管《北京日报》，历史系“红梅战斗队”王复兴马上赞同，于是决定“红梅战斗队”与扬子浪一起去《北京日报》。他们密谋策划了一回，但因没有找到摩托车，未能成行。

第二天，1 月 11 日上午，他们来到了《北京日报》社，首先和报社的造反派“星火战斗队”取得联系。扬子浪为“新北大红旗兵团”起草了《“北京大学毛泽东思想红旗兵团”致〈北京日报〉革命造反派的公开信》，抄成大字报贴出，并在报社予以广播。他们还想争取此文见报，但没做到。此时，北京师范大学“井冈山”已先到达报社，北京大学的王复兴去找北京师范大学“井冈山”的负责人联络，商量如何联合行动，没有结果。

后来，北航“红旗”也有人来到《北京日报》社，他们很快与北师大“井冈山”产生矛盾，北航支持报社的工人组织，而北师大“井冈山”则支持“星火战斗队”。“新北大红旗兵团”倾向北航“红旗”。他们组织成立了“彻底摧毁旧《北京日报》，促进《北京日报》新生革命造反联络站”。

## 第 398 回：学生猛，接管上海公安局　联名电，上海掀“一月风暴”

上海复旦大学“红三司”的安文江，看到 1 月 9 日《人民日报》编者按充分肯定上海《文汇报》的接管后，也想搞一个大的行动以提高自己的声誉。因为“红三司”在上海的《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和《紧急通告》上都没有签名，其锋头已明显落在了“红革会”的后边，受到了组织内群众的指责。他想到最近江青和谢富治对公安工作的批评，于是决定接管上海市公安局。

1 月 11 日 16 时，安文江坐着吉普车，带着四五百人的“红三司”学生，用 14 辆大卡车拉着，浩浩荡荡的来到人民广场，经过简短动员，便直扑位于福州路的上海市公安局。顿时，公安局大门口红旗招展，院子里人头攒动，安文江拿着手提喇叭，站在高处大声演讲，宣布接管市局和各区的公安分局。“红三司”的大旗在公安局楼顶飘扬。

上海市公安局于 1967 年 1 月 5 日成立了“上海市公安局革命造反委员会”，简称“公革会”，负责人是文保处干部王维章。他们事先并不知道“红三司”要来接管公安局，但是对“红三司”的接管仍然表示欢迎。

“上海市抓革命促生产火线指挥部”就在市公安局旁边的上海市高级法院二楼。正在这里的朱永嘉被外边的喧闹声吸引出来，看见了安文江，便问他是怎么回事？当听说是在接管公安局时，他提醒安文江：

“这样的行动是否请示过上面？”

安文江回答说：“没有。”

朱永嘉立即回到“火线指挥部”给张春桥的秘书何秀文打电话报告此事。

据“火线指挥部”负责人王明龙回忆，朱永嘉向“火线指挥部”传达了张春桥的三点指示：一是武器不能动，不能接管公安局的武器；二是监狱不能动，不能接管监狱；三是接管主要还是应该依靠公安局内部的造反派，红卫兵要和公安局造反派联合接管。

王明龙立即到市公安局向“红三司”传达了张春桥的这三条意见。

这时，上海其他的群众组织听说“红三司”接管市公安局的消息

后，也纷纷行动起来。上海交大的“反到底”和复旦大学的一些群众组织与公安局的其他群众组织到建设西路 75 号和 394 号的市公安局办公大楼宣布接管。他们与公安局党组签订：由市公安局的“公革会”为主接管市公安局，在参加接管的群众组织监督下，仍由公安局领导干部主持工作。

“红三司”对这样的结果不满意，认为这样的接管不彻底。

下午 16 时许，王洪文带了一批人来到公安局，提出：考虑到专政机关的特殊性，建议联合接管。经过十分钟谈判，在场的 29 个群众组织大家一致同意联合成立“上海市公安局联合接管委员会”，安文江任主任委员。后来，安文江的母亲听说儿子接管了公安局，吓得语无伦次，安文江却傲然一笑。心想：“有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的支持，怕什么？接管公安局，不正是亮旗帜争头功的好机会。”

一个多小时后，傍晚 18 时许，王洪文等人又匆匆赶来，一个个拉长脸宣布退出联合接管。王洪文还要求安文江“两小时之内撤出。”

安文江燥火蹿了几丈高，骂王洪文“变色虫”。

王洪文不恼，只是冷冷一笑，甩下一句：“不撤就对你们采取革命行动！”转身而去。

“红三司”的学生们则高唱“滚滚滚，滚你妈的蛋”，欢送王洪文他们离开。

王洪文不过是工人造反派的头头，红卫兵不太卖他的账。但他两小时的突变使安文江不能不想到促使他急转弯的幕后人物，他估计是张春桥。

果然，没过多长时间，曾经被安文江在复旦大学保过的朱永嘉从丁香花园匆匆赶来，把安文江拽进厕所，好意地劝他撤退。朱永嘉对安文江说：

“春桥表了态：不支持。”又怨怪安文江：“这么重大的行动怎么能不向他请示？！”

安文江情绪大跌。张春桥以中央联络员的身分主持上海工作，他的表态等于是最终宣判，安文江能不懊丧吗？

差一刻 20 时，公安局门口贴了大字报：“张春桥同志指示：对‘红三司’接管公安局，一不支持，二不反对，三不表态。”

这是不表态的表态，对“红三司”更是迎头一闷棍，安文江心里咯噔一下，他想到了完蛋、垮台、坐牢……甚至想到了潜逃。但面子上的工作还是要做的。他装得镇定自若，一面电令复旦、交大、师院、政法学院等派人增援，一边请已在公安局内的其他组织的头头和代表近 50 人到会议室，向他们介绍情况。

介绍会很快变成辩论会，大家唇枪舌剑争得十分激烈。政法“红三司”和公安局内的造反派拿出关于上海市公安局局长黄赤波、杜蔚然从政治言论到生活作风的一些材料及他们按照上海市委的指示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证据，证明接管上海市公安局是正确的。于是，“红三司”在 4 小时的辩论中始终占着上风。“工总司”的一位代表当场撕了“工总司”的证件，表态说：“我支持你们！”

财政厅“财革会”头头对“红三司”头头安文江说：“我们和你们站在一起。”

首都红卫兵驻沪代表表示：“北京红卫兵愿做你们后盾！”

公安局大院里挤满了“红三司”队员。隆冬子夜，北风凄厉，红卫兵唱着如泣如诉的歌：“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

当晚，《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发表社论：《反对经济主义，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同时发出《中共中央反对经济主义的通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了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给上海市各革命造反团体的贺电，肯定上海 1 月 9 日的《紧急通告》好得很，肯定《紧急通告》提出的方针和采取的行动，是完全正确的，是高举了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是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模范。并“号召全国的党、政、军、民各界，号召全国的工人、农民、革命学生、革命知识分子、革命干部，学习上海市革命造反派的经验，一致行动起来，打退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沿着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胜利前进。”

上海的群众组织从广播中听到中央的联名贺电后欣喜若狂，上海市一片欢腾，到处喜气洋洋。

其实，当天中午，中央文革小组就给给张春桥和姚文元打来电话，告诉他们：毛泽东指示《人民日报》转载《紧急通告》，并委托陈伯达，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和中央文革联名给“工总司”等上海造反派组织发一个贺电，高度评价《紧急通告》。贺电已送毛泽东处，正由毛泽东审阅。

贺电当日下午发到上海，上海立即赶印《红色号外》散发全市。此时，整个上海已经沸腾了。张春桥、姚文元兴高采烈地通知徐景贤：“马上在淮海中路市委党校召开各群众组织负责人的紧急会议，我们也去，和大家商量如何庆祝中央贺电。”

当夜 23 时，在党校召开的“工总司”等 40 多个群众组织代表或负责人会议，张春桥传达了中央贺电，并说：

“我和姚文元到上海才一个星期，上海的形势已发生如此大的变化，毛主席、党中央两次肯定了上海的形势。……

以中央四个组织的名义给革命群众组织，而不是给上海市委，这是从来未有的。上海解放时，中央与中央军委发过贺电，再也没有发过贺电。”

会上，大家决定第二天在人民广场召开一个盛大的庆祝会，会后举行游行。张春桥和姚文元主动提出：这一次他们两个要参加大会并讲话，和上海的广大群众公开见面。

徐景贤安排好第二天的庆祝大会，又到兴国路招待所去向张春桥汇报，看见张春桥正坐在办公桌前，用左手支在额角上，起草他自己在明天庆祝大会上的讲话稿。

听了徐景贤的汇报，张春桥同意他们对大会各项工作的安排，接着说：“我已经找陈丕显谈过话了。”

徐景贤觉得有点意外，问道：“是在哪里谈的？”

张春桥说：“把他找到兴国路来谈的……”

他看到徐景贤有些不解，稍作停顿后又说，“去年 12 月，主席生日的时候，提到你们写作班造反时的口号‘火烧陈丕显’，主席很风趣，他当时还说：‘烧一下可以，不过不要烧焦了！’”

听到这里，徐景贤不由得愣了一下，心想：“去年姚文元打电话

给我，传达主席指示的时候，没有讲这句站嘛。”

张春桥继续他的话题：“这次我们来上海以前，中央的意见，是希望陈丕显还能出来工作，所以，我在找他谈话的时候，对他说：我们在和群众见面之前，先找你谈谈。我把中央的意见也告诉了他，陈丕显听了以后表示：在现在这种情况下，他出来工作有困难。”

张春桥长长地吐了一口烟，慢悠悠地说：“我看，他现在也确实难以出来工作。”

徐景贤没有接口，只是坐在那里默默地想：“主席说‘不要烧焦了’，可是现在经过你们同意、大会也开过了，通令也发布了，人也打倒了，不是已经‘烧焦’了吗？一切都已成为事实，不可改变了，反正，现在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和中央文革联名发来的贺电，也是经过毛主席亲自批准的，所以，管他‘烧焦’不‘烧焦’，还是照开庆祝大会吧！”

原来，张春桥也是在 11 日当天从北京那里得到了毛泽东的最新批示精神，他立即让秘书何秀文找陈丕显，了解陈丕显有没有在《紧急通告》上签过字。陈丕显在电话中对何秀文说：

“报上登的《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和《紧急通告》，市委表示支持。那个《紧急通告》是前天晚上我和各个左派组织开会，还找了有关部局的负责人参加，造反派提出意见，我表示同意和支持，一起共同搞出来的。”

张春桥很快接见《文汇报》的造反派代表说：“《告上海全市人民书》中有些想法，我们在北京时曾讲过。我曾说，‘赤卫队’这样搞，我们只有高举‘抓革命、促生产’的旗帜，才能把他们打下去。”

同时，他还表扬了起草《紧急通告》的朱永嘉，说这么个“历史学家”，能够投身于“火线”，是很“了不起的”……

聚集在上海市公安局的“红三司”学生们是在第二天，12 日清晨听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的《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联合社论：《反对经济主义，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其中一段话是“一切无产阶级的革命派，应当像上海市的革命造反派那样，在毛泽东思想的大旗下，进一步联合起来，把文化大革命和无产阶级领导权

紧紧掌握在自己手里……自己掌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命运，自己掌握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命运……”

这段话，让他们顿时有一种被解放的感觉，尤其是社论中“自己掌握无产阶级专政的命运”一句，让彻夜不眠的上千名上海“红三司”红卫兵激动地狂呼：

“我们胜利啦！”

“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红三司”头头安文江更是感动的涕泪横流。因为这说明，他们接管上海市公安局，就是“自己掌握无产阶级专政的命运”，是符合中央精神的，是正确的。

而在此之前，清晨 5 时，上海“工总司”、交大“反到底”、“炮司”、“红革会”、“机联站”等 18 个群众组织还在市公安局门口贴了一张《联合紧急通令》，要求“红三司”立即撤出市公安局。

12 日这天，全国各报都在头版头条地位，刊载了由陈伯达起草、毛泽东阅定、林彪主持通过的，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于 11 日给“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等三十二个革命群众组织”发出的贺电。《人民日报》还同时转载了上海“工总司”等 32 个组织发表的《紧急通知》。

这天上午，上海人民广场上红旗如林，人声鼎沸，数十万上海及外地造反派在此举行“上海革命造反派欢呼中央贺电，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反扑大会”，陈丕显和曹荻秋及其他上海市委、市人委以及部局领导再次被揪到台上批斗。

那天的大会，声势浩大，锣鼓喧天。群众一遍一遍地高呼口号：

“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热烈庆贺中央来电！”

“打倒陈丕显!”

“打倒曹荻秋!”

“砸烂上海市委！”

还兼任上海警备区第一政委的陈丕显，12 日早晨，特意穿上了军装，心想：“这可以‘油炸’，那可以‘火烧’，我穿着军装，你们

总不好拳头棒子往身上乱砸吧？”临走时，他淡淡地说了一句：“我上班去了，你们多保重。”当他刚说完“再见”时，妻子、孩子一齐拥了上来，他的小女儿一把抱住他喊了声“爸爸”便泣不成声。谢志成拉住他的手说：“阿丕，你要多加小心。”

陈丕显点点头，悄悄地对她说：“如果我出了事，你就带孩子们去找陶勇。”然后嘱咐孩子们要听妈妈的话，说完转身就走了。

果然，进会场之前，一个押解陈丕显的群众对他说：“陈丕显，你这身军装换下来。”

陈丕显坚持说：“不能换，我是上海警备区第一政委，你们有什么权力要我脱军装。我有什么错误你们可以批判，但是军装我决不能脱。”

他的强硬态度使造反派为难了。他们商量了一阵采取了一个折衷的办法，叫陈丕显把领章、帽徽取下来，军装仍由他穿着。大会开始后，他和曹荻秋被押上台。还好，这次没让戴高帽子、弯腰和挂黑板，只是让他们低头站着。台下一遍遍呼喊：

“打倒陈、曹！”

“陈、曹不投降，就叫他灭亡!”

张春桥、姚文元身穿军装，挥动着《毛主席语录》登上了主席台。在万众欢呼声中，大会主持人宣读了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文革、中央军委的贺电。接着，张春桥和姚文元分别在大会上讲话。

张春桥谦逊地、笑容可掬地站在话筒前，称自己到上海来是来当小学生的，是来学习上海革命造反派经验的。他在短短几分钟的讲话里，他 32 次提到“毛主席”，几乎每一句话里都有毛主席：

“我非常高兴地参加今天的会，并且我们非常高兴地告诉大家，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的身体非常健康，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的身体也非常健康，这是我们全国人民最大的幸福。毛主席对上海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向是非常关心的。”

“毛主席同上海的革命人民是心连心的，毛主席不只是非常熟悉上海的情况，甚至于上海革命群众提出的中心口号毛主席都能够一字不差地背出来！上海文化革命中间，每当出现了一个新的事物，都是

首先得到毛主席的最坚决最热烈的支持……”

接着，姚文元讲话，他也跟张春桥一样，十分谦虚，说：

“这次，春桥同志和我来到上海，或者说回到上海，我们是来做小学生的，是来老老实实做小学生的。在上海革命人民面前，在上海无产阶级革命派面前，我们确确实实是小学生……”

王洪文作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代表，宣读了“工总司”等造反组织共同发出的重要倡议：《关于建立上海市革命造反派组织联络总站的倡议书》。这是昨夜 23 时，由张春桥、姚文元召开的上海各造反派头头紧急会议上，根据张春桥的意见，刚刚议定的。王洪文念毕《倡议书》，广场上响起一片热烈的掌声。

大会结束后，举行盛大的游行。

这时，有几个造反队员突然对陈丕显采取“闪电行动”，抓起他就走。上车前，陈丕显问：“带我去哪儿?”

“让你去哪儿就去哪儿!少废话!”

“你们凭什么抓我，限制我的人身自由?”

“革命无罪，造反有理。”说完便不容分说地将他推搡上车。原来是王洪文派人抓走陈丕显，将他关押在上海国棉 17 厂“永忠队”队部。

从 1 月 12 日这天开始，上海滩乘中央“贺电”之势，风暴骤起。“工总司”、“红革会”、“炮司”、同济“东方红公社”、交大“反到底兵团”……以“喝令三山五岳开道”的气势，先后接管了华东局、上海市委、市政府、港务局、铁路局……巍巍机关成风化岩石，沉沉乌纱似秋风落叶。这就是震撼世界的“一月风暴”。3 天内，市、区、县、局级单位有 49 个被接管。上海，乃至全国开始了夺权高潮。

1 月 13 日，陈丕显被押上国棉 17 厂的大卡车，卡车上挂着“打倒经济主义的罪魁祸首陈丕显”的大字标语，车上的高音喇叭不断高呼“打倒经济主义”、“打倒陈丕显”等口号，开始在上海市区主要街道游行示众。王洪文开创了上海汽车“游街”的先例。1 月 14 日下午，上海市市长曹荻秋，被勒令跪在一辆鲜红色修理无轨电车电线的专用车上，在全市游街！

13 日上午 10 时 30 分，张春桥亲自召见“红三司”的安文江等四人，明确表示：“我的态度嘛，一句话：我支持你们！”

原来，1 月 11 日深夜，张春桥就“红三司”接管公安局一事请示了中央文革，答复是：“要坚决支持。”

安文江压下心中的不满，即令下属组织把“春桥同志支持我们”的标语刷满全上海。

张春桥和姚文元在接见了“红三司”安文江等人后，又亲自赶到永嘉路市公安局的政保三处，接见这里的公安局造反派，了解“公革会”成员的情况。对接管公安局一事，张春桥说：

“有些事你们事先最好不要先问我，你们干了再说。因为有些事我也很难表示态度。”

“接管公安局这件事，中央没有讲过，但是你们已经接管了，话也说出去了，再不支持也不行。希望大家不要对‘红三司’过多指责。”

他还建议：“可以成立一个联合组织，工人、学生应该抽一些人进入公安局，这有好处。”

下午，“工总司”等 25 个造反派组织代表主动找到安文江，承认对上海市公安局的夺权“有个认识过程”，表示要再发一份支持“红三司”接管行动的《联合声明》，以挽回 1 月 12 日清晨 5 时那份《联合紧急通令》的影响。

而在这天的中午，上海“红三司”头头安文江乘上午张春桥对接管公安局表态支持之兴，匆匆赶回复旦大学，针对“红革会”在公安局接管问题上站在“工总司”王洪文一边的态度，贴出了《向红革会某些负责人大喝一声》的大字报，指控他们“制造分裂，排斥异己”，“学市侩争名夺利”。

次日，“红革会”反击，贴出《是谁制造分裂》的大字报，指控“红三司”是“脑袋开始发热的投机商”。

随即，“红三司”又贴出《分歧从何而来》的反驳大字报。

因为上海三大红卫兵组织的头头都是复旦大学的学生：“炮司”的马立新，“红革会”的劳元一、周谷声和“红三司”头头安文江。复旦因此被张春桥称作“藏龙伏虎之地，虎豹豺狼之窝”，被徐景贤

称作“上海的晴雨表”。复旦园的内战很快波及全上海。安文江自称“是挑起这场内战的祸首之一”。

## 第 399 回：空军乱，全军新文革成立　慰朱德，周恩来安抚少奇

空军机关支持吴法宪、余立金的党委办公室兼司令部办公室主任王飞、科长周宇驰和秘书何汝珍等人在 1 月 5 日后成立了自己的造反组织。

1月11日，司令部办公室有人到司令部党委要求马上召开群众大会，并问参谋长何廷一支持不支持？何廷一说：

“如果是群众的革命行动，我就支持。”

对方又说：“开群众大会，部党委要派人参加。”

可是司令部党委没有人愿意参加，最后何廷一提议部党委委员都去参加。

1月11日当晚，何廷一走进第二食堂。刚坐下，便有人给会议主持人递条子：“这个会与何廷一有关，让他退出会场！”

台下有人拉长声音起哄表示同意。何廷一立即起身回家。

这个会开了个通宵，会上把空军副参谋长姚克佑、梁璞、作战部部长石国英等轮流批斗了一夜，还给石国英穿了纸马褂。

空军司令部办公室的秘书们也彻夜行动，向林彪、叶群写报告、送材料，吴法宪也从院外打来电话，要王飞等人“吃饱一点……坚决顶住”。

1月12日，林彪接见了空军党委会全体成员，做了如下指示：

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大好，要坚信不移。会有曲折，会有反复，大联合了，还可能有分裂，不要怕。

二、不要怕乱，乱透了就好。乱的过程，对于每一个人都是斗私批修的过程。

三、不要急，天塌不下来。天塌下来了，有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有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也可以撑过来，也可填平。反映情况要四快一慢。

四、 要看主流，不要看支流。要调查研究，不要把话说死，不要打包票，有的组织大方向对，政策策略不对，也会失败，南昌起义就是这样。

五、要心明眼亮，看清敌人，但不要夸大敌人，要相信群众大多

数。

六、支左就是支持毛泽东思想，支左不支派，符合毛泽东思想就支持，不符合毛泽东思想就不支持。支左不要搞小动作，不要支持一派打击一派。

七、反映情况要准，不要虚构，要全面，要客观。

八、争取主动，不要怕吃眼前亏，有错误要认真检查，从根本上改造世界观。

九、既要防“左”，又要防右。防“左”就是防干扰毛泽东思想，防干扰毛主席最新指示，坚决站在毛主席一边，防右就是防老保翻天。

1 月 12 日，新的军委文革小组正式成立，徐向前任组长，肖华、杨成武、王新亭、徐立清、关锋、谢镗忠、李曼村任副组长。后又增补谢富治委副组长，江青任小组顾问，组员有叶群、王宏坤等 10 人，共 18 人。下设秘书组、简报组、机关组、院校组和联络站，办公地点在三座门 1 号。即大高玄殿，建于明朝嘉靖年间，是一栋老式的 2 层楼房，雕梁画栋，红墙绿瓦，原来是中央军委的招待所。

新的全军文革小组由中央军委和中央文革小组直接领导，不再隶属于解放军总政治部。

在全军文革小组第一次会上，宣布了三条方针：一是不要怕乱，放手发动群众；二是要彻底批判刘、邓，消除他们的反动路线在我军的影响；三是老干部不要怕群众，要自觉革命。徐向前说：“当前高级干部害怕群众的‘恐惧症’是主要的，此病不除，搞不好文化大革命。”

就在新的全军文革小组成立当天，1 月 12 日，沈阳军区的造反组织就来到北京北海前街三座门 1 号的全军文革小组办公楼外请愿，要求给他们解决问题。

而空军院校有些人还是揪住叶剑英1966年11月的讲话不放，他们也到三座门要求全军文革接见。

关锋接见了他们的12名代表，劝说他们，要把炮口对向刘志坚。他说：

“对刘志坚知道一些，逐渐了解的。他是搞两面派的，暴露有个

过程，在六、七月份，原来就有些观察，但是想争取他。那时不知道他搞两面派。那时主席还没回来，当时文革也很困难，想争取刘志坚。他经常到中南海去，我们这些人不能去，他是支持刘、邓的。攻击文革小组不要党的领导。

主席回来后，批评了他，当时表示承认错误，我们也没有根据说他是假的，所以我们还是一看二帮的态度。后来他就很少和我们接触，不参加会议。他和王任重住在一起，他们是无话不说的，王任重的一些阴谋活动，他是知道的不少，没有和我们说。

后来他把刘涛接到他家里，有些大字报是口授的，实际上是支持保守派，但又和造反派接触，把得到的情况告诉保守派，真是岂有此理。

北京几个司令部，你们都知道的。我们是支持第三司令部的，但不指挥他们，他们的大方向是正确的。刘志坚相反，有一次会议说：‘三司可能有希望’。遭到他的激烈反对，他的女儿在一司。一司、二司不能一概而论，二司不是现在造反了吗！

在派工作队的问题上，刘志坚是大力支持的，积极的很。王任重要人，他痛快的很，文革要人很费劲。

他过分地强调军队的特殊性，忘了普遍性，他背着林彪副主席搞了一套东西。现在彻底清理一下，告诉大家，刘志坚这条反动路线是和刘、邓相联系。至于说军队内还有没有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是谁，这个话我不讲，不清楚，你们可以看一看。陈、叶副主席，江青、总理、伯达同志都讲了，都是正确的，是符合主席思想的。陈、叶都是好人，老老实实的，不要两面派，好处就是想到就讲。

叶剑英是老实人，大节上跟紧主席的，他不是搞鬼的人。目标你们自己考虑考虑吧，我看批判叶的会在这个节骨眼上不要开。现在紧紧抓住刘志坚，从刘志坚这里看看是怎么回事，我希望同志们读一读《告上海市人民书》，这是大局，这是毛主席亲自决定发表的。这又是一个伟大的战略决策。

我提议你们两条：一条关心大局，好好读读这些东西。再一条是坚决批判刘志坚，批判完刘志坚再看吧！”

1 月 12 日下午 17 时 35 分，江青、徐向前、肖华、李曼村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军队院校进京汇报团。

江青说："刚才我们开了会，报告同志们、同学们，就是全军文革小组今天开了成立会。"

众人鼓掌，高呼"毛主席万岁！"

江青："我来介绍一下，文革组长徐向前同志、副组长肖华同志、李曼村同志。"

肖华："文革顾问江青同志。"

江青说："同志们的情况我们又不了解，只是听说准备去造反，这点我们赞成！赞成!！造反动的资产阶级路线的反，当然罗！造反的过程中还是应该讲策略的，按照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大方向对了，斗争的锋芒应该集中，目标要准确，如果目标不够准确，调查研究又不深刻，那我们就容易打败仗，这点我支持。请听几点建议，另外同志们的情况，我应该说没有调查研究，应该是没有发言权，现在赞助你们去造反，这是有发言权的，只是赞助吗，是吧？另外一个呢，在大方向一致的底下要讲一讲策略。讲究策略，这点我想同志们斗争经验不多，当然都有一些的，你们是造反派吗。现在请徐向前同志给我们讲一讲，好不好？"

众答："好！"热烈鼓掌。

徐向前说："今天我们是第一次见面罗，江青同志刚才讲话是很好的。"

众喊："请首长坐下！""请坐下！"

徐向前："不要紧，不要紧。希望同志们按她的指示，按她的意见办事。你们为什么造反呢？还有个道理，我们中国的这个反动资产阶级这样的专我们的政，不造行不行？不造，那我们中国就要出修正主义，可是我们中国就不让他出现修正主义，所以毛主席就发动号召，他发动群众，领导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那么革命成功依靠什么呢？就是依靠你们的造反精神，你们能不能完成这个任务，就是看你们的造反精神，首先是有没有革命的干劲，要狠，革命要有狠劲！要狠，对付以刘邓为代表的那些支持这个犯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要

狠，要狠狠地革他们的命，要革得准，就是目标不要打错了，因为革命过程里边问题是很复杂的。所以自己要有识别能力，哪些是敌人，哪些是我们的朋友；哪些是保卫我们的社会主义果实的，哪些是反对的；哪些是革命的，哪些是复辟的。可是，今天我们说你们是造反派，少数的先锋队，坚持正确方向，善于用策略，团结多数不要把自己孤立起来，先锋队脱离了多数就没有办法了。因为我们是第一次见面，究竟你们怎么样，我不太认识你们，你们也不太认识我，对不对？只要我们是造反的，我们的目标是共同的。

我们在毛主席、林副主席的领导下，坚持造反的，我们就是一个目的。我们以后见面的机会就多了，希望大家坚持起来造反，要造什么样的反，把方向搞对头。和同志们就讲这么点儿。同志们还有什么意见？”

众人热烈鼓掌，高呼口号，江青、徐向前离开会场，肖华继续讲话。

1 月 12 日，中央文革小组代中共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起草了三个文件，报林彪审批。林彪当天即转毛泽东。这三个文件是：

一、中央关于不得把斗争锋芒指向军队的通知稿。

二、中央、国务院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稿。

三、中央军委1月7日关于重申军队绝不允许当防空洞的通知稿。通知稿指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我们曾三令五申，军队（包括医院、疗养院、招待所等）决不能成为防空洞，窝藏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庇护那些坚持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以及逃避群众斗争的人。但是，至今仍然有一些单位没有这样做，甚至有的参与了压制、打击和镇压革命群众的行动。”“各级党委对此必须引起严重注意，立即采取坚决措施，杜绝类似情况的继续发生。”

毛泽东当天在这三个文件上批示：“同意。”接着又写道：

恩来同志：

因是重要文件，应当由政治局通过，请你酌办。

毛泽东

一月十二日下午五时

第二天，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了这三个文件。

当天，中共中央、国务院公布中发（67）19 号文件：《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规定》指出："公安机关是无产阶级专政的重要工具之一，必须适应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采取恰当的方式，加强对敌人的专政，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保障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大串连的正常进行，保障无产阶级的革命秩序。"为此，做出依法惩办现行反革命分子等六项具体规定，后来被称之为《公安六条》。

1 月 12 日，在钓鱼台 16 号楼，戚本禹召集中共中央办公厅的一些人开会。他说："中南海冷冷清清，外面轰轰烈烈。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在中南海很舒服，你们为什么不去斗他们？朱德也是反对毛主席的。你们可以贴大字报揭发朱德，可以去妇联点火揭发康克清。"

散会后，当天傍晚，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几十人就闯进刘少奇的家中，在院里、办公室里贴满大标语，并批斗了刘少奇。然后他们又来到朱德的家，在朱德家的楼前呼喊："打倒大军阀朱德！""朱德必须低头认罪！"的口号。批斗了朱德的秘书曹全夫，逼迫他写了"揭发"朱德的大字报。

据后来戚本禹回忆，这件事是江青布置戚本禹做的，因为朱德的夫人康克清和江青的矛盾由来已久。江青和毛泽东在延安刚结婚的时候，康克清就说江青"是妖精,把主席和贺子珍拆散了。"当时延安党内的老大姐们都同情贺子珍，因为贺子珍人缘好，是和她们一起浴血奋战打出来的。作为永新一枝花，大家都认为贺子珍和毛泽东挺般配的。但是贺子珍脾气大，她和毛泽东吵架，拿着板凳就往毛泽东身上砸，亏得警卫员挡住了。其实江青和毛泽东结婚的时候，贺子珍和毛泽东已经离婚，而且是在毛泽东再三挽留的情况下,贺子珍执意要走的。可这些老大姐们不这么看,她们认为，贺子珍要和毛泽东离婚，那都是说说而已的，不能当真的。

1 月 12 日这天，恰巧朱德去了玉泉山，不在家，秘书局的人就围斗了康克清，一边高喊着口号，一边要她交代"反党罪行"，问他

们有没有去看大字报，指责康克清在延安反对江青，还提出要把朱德一家轰出中南海。

康克清说："不好的人当然要轰出中南海，我们是不是要离开这里，只能由中央来说，你们能决定吗？"一句话问得那些人哑口无言。他们看闹不出什么名堂，就在地上刷上了大标语，墙上贴满了大字报。

康克清把家中发生的一切，用电话告诉了玉泉山上的朱德。

朱德决定下山回城去看大字报。工作人员为他的安全和健康考虑，说："现在是群众运动的风头上，还是暂不回去好。大字报让他们去贴！"

朱德坚持下山回城。工作人员劝不住他，只好备车下山。

朱德乘坐的小汽车，穿过大街小巷，缓缓地开进中南海的西门。此时的中南海里也不安宁了，人来人往，吵吵闹闹，楼前屋后，到处都刷上了大字报，白纸黑字，再加上红色的"×"，格外刺眼。

朱德下车后，依旧迈着他那稳健的步伐，不急不慌地走向家门。此时，他脚下踩的不是红地毯，而是大标语，两边不是鲜花和彩旗，而是大字报。他看到家里大标语铺地，大字报盖天，心情沉重，但依然镇定自若，处变不惊。

康克清生气地向朱德细说了发生的一切。

朱德对忧心忡忡的康克清淡淡一笑，说："只要毛主席在、周总理在，就没有关系，他们是了解我的。你不要怕，个个都打倒，个个都倒不了。"

朱德前脚进家，造反派后脚就送来了勒令，要求他必须去看批判他的大字报，并要他老实交待反毛泽东思想、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三反"罪行！

朱德拿着手杖出去看大字报。当他看到关于他的十几条"三反罪状"时，不住的在摇头、叹息，用手杖不停地敲打着地面说："完全是造谣诬蔑！全是编造出来的假话，上面只有两个字是真的，那就是'朱德'！"

12 日晚，刘少奇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

毛主席并转政治局：

近来全国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发展对我震动很大。经过反复思考，我决定向中央提出两项要求：一、这次路线斗争的主要责任在我，广大干部是好的，特别是许多党干部是党的宝贵财富。我恳求中央尽快把广大干部解放出来，恢复他们的工作；二、为尽早结束文化大革命，使党和国家少受些损失，请主席和中央准予我辞去国家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职务。我愿携妻子儿女回老家种田，做一个自食其力、遵纪守法的普通公民……。

13 日，周恩来赶到朱德家中，询问了昨天造反派冲击的情况，安慰了朱德。同时劝朱德回玉泉山去休养，不要把那些不实之词放在心上。

朱德接受了周恩来的意见，又上了玉泉山。

中南海的造反派到全国妇联贴出大字报，说时任全国妇联副主席的康克清攻击江青，还说她是“走资派”等等。康克清不理解：“我怎么会是‘走资派’呢?我怎么会反对毛主席呢?”回到家中，她对朱德说：“现在你成了‘黑司令’，我成了‘走资派’，往后还不知会怎么样呢?”

朱德不紧不慢，颇为沉着地对康克清说：“你不要怕，‘走资派’多了也好，都成了‘走资派’，就都不是‘走资派’了。形势不会总是这样下去的。”他还全康克清要到群众中去，接受群众的批评。

于是，康克清就穿着一件棉大衣，和老百姓一样，天天挤乘公共汽车到妇联机关，打扫卫生、生炉子。然后几个“走资派”在一间屋子里写检查，接受群众监督。

一天，十多名群众给康克清戴上一顶纸糊的，写有“走资派”字样的高帽子，让她和另一名戴高帽子的“走资派”，全国妇联第三届书记处书记李宝光一起，站在一辆大卡车上出去游街。他们沿路高呼：“打倒康克清!”“打倒李宝光!”卡车在北京市区慢慢地行进着。她回来对朱德说，“我今天算经风雨见世面了！”

第二天，莫斯科塔斯社播出了朱德妻子康克清游街的消息。

刘少奇看到报纸上批判经济主义，又扯上他，就说：“现在批经济主义是什么意思？我早就不过问中央工作了，为什么又同我连上？

如果是为了打倒我，我可以不当国家主席，回乡种地嘛！早点结束文化大革命，使党和人民少受损失。”

王光美看到中南海里的大字报上批判朱德和陈云、邓小平等人，回家后讲给刘少奇听，并说：“我实在看不下去了。”说着拿起安眠药瓶向刘少奇示意。

刘少奇摇了摇头说：“不能自己作结论。主席说过，罗长子要不是自杀，问题还不至于那么严重。”

刘少奇给周恩来写了封信，让秘书送去。信上说：“我看了中南海的一些大字报，感到很不安，这里是中央所在地，很不严肃；我现在的处境很困难，已经没有说话的权利了，他们已经把我当敌人了，怎么办？”

第二天，他收到了周恩来的回信：“少奇同志：要克制自己，好好休息。你提出的问题，我已报告了毛主席。”

## 第 400 回：河南乱，争报社发生武斗　回太原，三晋开夺权之首

1 月 12 日，《河南日报》社发生武斗。

自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刘建勋于 1966 年 9 月 3 日调任华北局书记处书记、北京市委常务书记后，河南省委第一书记职务由原河南省委第二书记文敏生代理。1966 年 11 月 12 日，“郑大联委”和“豫北地区革命造反司令部”200 余名学生冲击中州宾馆，要求出席全省三级干部会议的全体人员参加他们组织的“揭发批判以文敏生为首的河南省委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14 日，郑州大学学生又把文敏生和正在参加省委三级干部会议的地、市、县委书记 100 多人拉到郑州火车站广场批斗和游街示众。11 月 26 日，郑州市 30 所大、中学校的学生组织 2000 多人到省委造反，在省委院内召开“向以文敏生为首的河南省委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开火”大会。会后，把文敏生等领导人拉到宣传车上游斗。此后，全省城乡各级党委基本上无法正常工作了，基层党组织被迫停止活动。河南全省几乎处于无政府状态。

文敏生是中南局调到河南的，当陶铸和王任重被打倒后，社会上便传说文敏生是“陶、王黑线上的人”，要打倒他，文敏生思想压力很大，生病住进了医院。而河南省委有些领导在“大跃进”时期曾跟着吴芝圃搞得很“左”，1961 年中南局改组河南省委时，批评和处理过他们的问题，这些人不服气，看到刘建勋调走了，文敏生也快不行了，就想乘机为他们过去的错误翻案。

戴苏理在“大跃进”的时候当过省委秘书长，这时他找到纪登奎说：“老纪，你看这形势，省委搞得这么被动，要不，咱们俩也起来造反吧？”

纪登奎没有同意，他说：“老戴呀，你看，刘建勋调到北京了，现在形势这么困难，咱们省委应当团结。再说，人家文敏生当第一书记，一共才几个月时间，能有多少错误呢？”

到了1967年元月，河南省“郑大联委”串联省会各大专院校造反派再次组织了“专揪吴芝圃联络站”，一方面深入信阳等地调查材料，另一方面又派人赴广州揪吴芝圃。“郑大联委”始终坚持清算以吴芝圃为首的原河南省委左倾蛮干、大刮五风、饿死数十万人的滔天罪行

的大方向，因此得到多数群众的支持，队伍也不断壮大，由少数派成了多数派，郑州保守派“战斗师”已基本瓦解。

1 月 8 日，郑州工学院“革命造反队”、“毛泽东思想野战军”、“东方红战斗团”等造反派组织出动大批人员，闯进《河南日报》社，宣布查封《河南日报》和《河南日报》农民版，并在重要部门派人接管。这引起了已经接管《河南日报》社的报社内“天不怕”组织的抵抗。双方发生武斗，造成数人受伤。

1 月 12 日，《河南日报》社的“天不怕”头头经过密谋，组织了以报社人员为主、外来援军为辅的大批人员对进驻报社的郑州工学院“革命造反队”进行反击。双方再次发生冲突，引起大规模武斗。“天不怕”驱逐了占据《河南日报》社的郑州工学院红卫兵，夺回报社。

围绕《河南日报》事件，很快形成观点不同的两派。双方不断攻击对方“破坏了毛主席的战略部署，”“顽固坚持刘邓资产阶级的反动路线”。为此，各种与此相关的传单、小报在郑州大量散发。

1月12日这天，河南省委领导纪登奎、戴苏理、王维群召开省委文革各办公室主任会议，动员迎接革命造反派大联合、大夺权的风暴。纪登奎说：“要迎接大高潮，坚决支持革命造反派，要一边倒。”

虽然上海掀起了“一月风暴”，但是，全国首先实施夺权的并不是上海，而是山西。早在 1 月 12 日子夜 1 时，上海的造反派还在准备当天上午的庆祝大会的时候，山西省委、省人委的所有印章就已经被群众装进了麻袋收走，有半麻袋之多。他们之所以敢如此作为，也是因为有中央的支持。

刘格平在 1966 年底被江青召到了北京，却一直没有见到江青。直到 1967 年 1 月 4 日，他才在北京饭店迎来了受毛泽东委派前来与他谈话的王力和关锋。

王力、关锋让刘格平先谈拒绝出狱的问题和解放后因民族问题受处分的情况，然后让刘格平赶紧回山西去，把革命群众组织联合起来，争取革命领导干部，把山西省革命和生产的大权掌握过来。

于是，刘格平于 1 月 6 日从北京回到太原。他没有回家，而是直接到山西省军区招待所找住在这里的省委常委、副省长刘贯一，将中

央的意见告诉他，并询问刘贯一，刘格平在 1966 年 12 月从北京回到太原后，委托刘贯一与老干部串联的情况。刘贯一做了汇报。

1 月 7 日，山西省军区政委张日清主持召开了山西省军区常委会，讨论军队介入不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的问题。当时山西省军区第一政委是由省委第一书记卫恒兼任。除了卫恒，山西省军区党委还有 13 名常委。在这次常委会上，有 12 名常委表示军队不能介入地方的文化大革命，只有省军区第二政委、省军区党委书记张日清一人坚持："军队必须支持地方上的革命左派，介入地方上的文化大革命。"争执到最后，张日清说："那就我打我的报告，你们打你们的报告，咱们请中央军委最后批示吧。"

这天晚上，刘格平派人秘密将"太工红旗"的李青山、"太工红旗省委支队"的梁裕权、"太工永红战斗队"的队长高祥、俞俊明及太原机械学院等造反派组织的负责人召集到山西省委西院的一个房间开会。在会上，山西省副省长刘贯一神秘而紧张地对这些造反派头头说：山西省卫恒、王谦、王大任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他和刘格平、太原市委第一书记袁振、太原市委书记处书记陈守忠、省政协副主席何英才，奉中央文革之命,准备站出来，领导山西文化大革命。他们要写大字报，揭发旧省委的问题。

他还说：一旦他们的大字报贴出来亮相，震动将会很大，卫、王、王一定会疯狂反扑，迫害他们，希望造反派保护他们的安全。

刘贯一的话让在座的年轻人即吃惊，又兴奋，他们完全没有思想准备。但也让"太工红旗"的刘青山心生疑虑。他觉得：

1、袁振早在 5 月份华北局会议上就提出山西省委有问题，你，三级干部刘格平、五级干部刘贯一、八级干部陈守中都是山西省的领导,刘格平、刘贯一还是山西副省长，文化大革命烈火还没有来得及烧向你们，你们本人是不是革命的,即没有经过群众的审查，也没有听说你们与卫恒有过什么分歧，作过什么斗争，如何能相信卫恒他们就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而你们却成了革命干部呢？

2、你们自称奉中央指令，却没有出示任何证据。中央文革会让一个没有经过文革审查的本地干部来领导一省的文化大革命吗？

3、省委主要领导卫、王、王，他们对待文化革命的态度有严重问题，但是否已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没有足够材料支持，还正在审查之中。高级干部站出来揭发他们，当然欢迎。但是要看看刘格平他们究竟能揭发出些什么材料，能证明卫、王确已成了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

另外，中央第四把手陶铸到中央才几个月就被打倒了，现在除了毛泽东主席、林彪副主席、周恩来总理和中央文革能够相信，其他人一概不敢轻易相信。

于是，李青山当即表示："欢迎并支持你们揭发省委的问题,其它事项待我们商量后决定。"

回到学校后,李青山立即召开"太工红旗"队委扩大会议，通报上述情况，并进行讨论。大家基本同意李青山的看法，决定立即派人赴北京，设法向中央文革落实：中央文革是否任命刘格平等领导山西文化大革命？

也就在 1 月 7 日这天，华北局决定给袁振平反，将贾俊调离太原市委。"山西革命造反兵团"驻华北局联络站立即将消息电告太原的"兵团"总部。这消息对"兵团"司令刘灏来说，无疑是太重要也太让他振奋了。

接着，"山西革命造反兵团"驻华北局联络站又硬逼着华北局的候补书记张帮英，与"联络站"的兵团战士一起来到太原，亲自宣布华北局给袁振平反的决定。刘灏决定要好好开个庆祝会，首先派出宣传车开进省委大院，向省委机关的全体干部们宣布了这个"重要消息"，然后又安排手下，满大街贴出大字报宣布这一好消息。对于刘灏来说，革命的目的业已达到，下一步，是省委如何检查和改正迫害袁振的错误。

1 月 8 日，刘贯一、何英才分别找到省委书记处郑林、朱卫华和省委常委郭钦安，动员他们也"站出来革命"，却分别遭到这 3 人的拒绝。

刘贯一将情况向刘格平作了汇报。刘格平让刘贯一召集愿意跟着他们起来造反的老干部，第二天上午到军区招待所开会，传达中央的

指示精神。

1 月 9 日，在山西省军区招待所，刘格平召集张日清、刘贯一、袁振、太原市委副秘书长续纯实和太原市委书记处书记陈守中开会。刘格平说："我在北京见到了总理和康老，中央领导同志让我负责把大家组织起来，革山西省委的命。"

怎么革山西省委的命呢？按照文革当时的通常做法，他们议定：一是写揭发原省委的大字报；二是成立山西省核心小组。省核心小组由 4 人组成：刘格平、袁振、刘贯一、陈守中。张日清是否应该参加核心小组？经反复讨论，最后议定：张日清不参加核心小组，但以顾问身份参加核心小组的活动。

当天，一份署名为刘格平和刘贯一的大字报：《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究竟干了些什么坏事情？》，分抄成若干份贴在山西省委门前和太原五一广场等地，这份由山西省的两位副省长联合写出的大字报，公开点了省委第一书记卫恒和省长王谦的名字，将他们称为"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并且公开将山西省委与彭真、薄一波、安子文这条"黑线"联系在一起，号召全省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联联合起来，"必须彻底追查，弄清这一反革命案情。"

接着在 1 月 10 日，还是由刘格平挑头，有省委常委、副省长刘贯一，省委常委、太原市委第一书记袁振，省政协副主席何英才，省委委员、太原市委常委、太原市委书记处书记陈守中 5 位领导干部共同署名的《请看以卫恒、王谦为首的钻进党内一小撮反党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修正主义分子在文化大革命中所犯的罪行》大字报，史称"五人大字报"，贴在省委、省人委门前的墙上。

大字报分五个部分：一、抱着彭真的二月提纲不放；二、坚决贯彻执行并进一步发展了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三、纠缠袁振问题使山西文化大革命一错再错；四、玩弄"三干会"继续欺骗、镇压干部和群众；五、省委以卫恒、王谦为首的一小撮人是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罪魁祸首。

"五人大字报"写道："山西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已经不是再检讨什么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问题了，而是属于钻进党内一小撮走资本

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问题了。”并号召各造反派联合起来，“向以卫恒、王谦、王大任等为首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进行夺权斗争”。

大字报结尾套用了《人民日报》、《红旗》杂志 1967 年元旦社论结束的 7 个口号并加了“中国共产党万岁”一句。

“五人大字报”很快被转抄张贴在太原市委机关和五一广场等多处地方，并打印成传单上社会上散发，立即引起强烈反应。

北京农机学院“全无敌纵队”当天发出《致山西革命干部的一封公开信》，为《五人大字报》叫好，称《五人大字报》“吹响了决战的冲锋号”，鼓动党政机关干部“站出来，冲上去”，“向卫恒反党集团发起总攻击！”

“山西革命造反兵团”散发题为《目前时局和我们的任务》的传单，赞扬刘格平等人“率众造反”是“大气岿然，斗志大振”，并把山西干部队伍分为这一派和那一派，指控山西省委领导人与所谓“黑帮”彭真、薄一波、安子文、陶鲁笳的“黑线”关系。

一时间，这 5 位领导干部的名字在省城家喻户晓，成了各路造反派们一致拥戴的毛主席司令部在山西的代言人。

1 月 10 日晚，王力、关锋在北京《红旗》杂志社接见山西群众组织代表时说：“刘格平是经过考验的干部，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你们要支持刘格平”。

1 月 11 日下午，刘格平和刘贯一在山西省军区招待所和“首都赴晋革命造反大队”、北京农机学院“全无敌”纵队、太原工学院“永红战斗队”等组织的负责人，商讨山西省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局势与任务，决定当晚 20 时整，在刘格平宿舍召开山西省左派联席会议，研究成立全省统一的造反派组织，以山西造反派统一组织的名义给上海“工总司”等 32 个组织发贺电，并商讨夺权问题。当天，刘格平和张日清派人通知省城的各路造反组织头头到刘格平家中开会，内容是“通报和研究山西文化大革命进展情况”。

当晚，张日清带来部队，在刘格平家的门前院后站岗。

到会的领导干部还有：刘贯一、陈守中及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遗

孀、现为陈守中夫人、时任山西省委农村政治部副主任、十级干部刘志兰。而刘格平的爱人、省人委办公厅信访处干部丁磊，则里外忙着招呼。

从北京来山西串连的学生头头们来了，省城各路造反组织的头头们也来了。别的不说，一看刘格平门前院后布满站岗的解放军战士，所有参会的人就能感到今晚的会议气氛绝非寻常。代表山西大学“88红旗战斗队”来开会的是外语系的大一学生方培泉，他是山西最早成立的“炮轰省委指挥部”的成员，也是“炮轰省委指挥部”的决策人之一。按照刘格平的安排，他还带了一些山西大学体育系的学生前来参会。这些山西大学体育系的“88 红旗”战士们个个体格健壮，丁磊就地安排他们配合解放军担任警戒任务。

刘灏的“山西革命造反兵团”前来参加会议的是太原工学院“瑞金兵团”的司令宋捷。

这次会议，没有“红联站”的人参加。

“红联站”可是山西的一大造反派组织，不仅有太原工学院的大学生，也有山西省委党校的大学生，与这些大学生一道革命造反的，还有不少中学的中学生。他们革命造反劲头十足，仅“红联站”勤务组的领导班子中，就有不少当时在学校和社会上因革命造反而名声大噪的学生领袖，如太原工学院的杨保明、李青山，省委党校的赵奋田，太原十中的马尚文等等。为什么他们之中，竟然没有一人参加这次会议呢？

原来，刘格平以为“山西革命造反兵团”和“红联站”原本就是一家，既通知了“兵团”，也就无须重复通知“红联站”了。而刘格平的夫人丁磊以为，山西大学“88 红旗战斗队”的方培泉就是“红联站”的头头，方培泉到会了，“红联站”不也就到会了？但丁磊不知道，方培泉与刘灏商定一起组建“兵团”后，就忙着外出去调查山西大学校长刘梅的问题了，年底才回来。此时，“炮打省委指挥部”里的太原工学院和山西省委党校的那些大学生们，已组建起“红联站”，而方培泉回到学校后，则成为“88 红旗战斗队”的领导人之一，将山西大学“88 红旗战斗队”，变成了与“兵团”、“红联站”并肩战

斗的造反派组织。总之，与刘灏一起最先向山西省委造反的“红联站”，偏偏在刘格平要向山西省委夺权之际，被遗忘了。

## 第 401 回：在家中，刘格平布置夺权　“我来干”，杨成效毫不谦让

11 日晚上在刘格平家中的会开得很激烈，刘贯一主持会议，刘格平开门见山，先谈山西的文化大革命已经被“黑省委”领入了歧途，接着讲他亲自去中央文革小组领回来的中央精神：“我们要坚决向‘黑省委’夺权，这样才能最后打倒‘黑省委’。”

此话一出，满屋哗然。有叫好者，也有窃窃私语者。夺权者，改朝换代也。这种大事，在场的造反派们还真不知如何下手。

刘格平说：“今天晚上请来大家，是要研究夺权问题。我们认为夺权这个问题已经迫在眉睫，非解决不行。卫恒等人把山西的文化大革命已经引上邪路了，不把他们手中掌握着的党政财文大权夺过来，山西的文化大革命就会夭折。夺权靠一两家造反组织不行，各个组织必须联合起来，组成一个总的组织，这个组织的名称就叫‘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吧。这个总指挥部既是大夺权的领导机构，又是夺权以后的临时权力机构。今天我们向大家宣布，我们几个人，有贯一同志、张政委、袁振同志、守中同志已经成立了一个山西省党的核心小组，这个核心小组代行省委职权。但我们核心小组每个人都不参加总指挥部，我们核心小组是总指挥部的顾问机构，我们当你们的顾问。总指挥部采取巴黎公社的选举办法，由你们自己推选领导人，我们几个人作为个人意见，也可以提一些人名，供你们参考。”

省政协副主席何英才没有参加核心小组，因为他解放前有过被国民党逮捕入狱的经历，当时省政协机关也有造反派贴出大字报，说他是“大叛徒”。

布置完这一切，刘格平请张日清政委讲话。张日清当场表了态：“我的部队是造反派的坚强后盾，决不保护走资派。不要看卫恒是省军区第一政委，他甭想动我一兵一卒，调我一炮一弹。现在不能再等了，必须立即夺权。”

刘格凭、张日清等召开“左派”联席会议，策划省城造反夺权

这时，刘志兰给了刘贯一一份《关于省委特务活动及黑二、三线人物名单》的揭发材料，刘贯一当众宣读了这份材料。突然太原十二中“红旗战斗队”的负责人梁振华跑进会场，向与会者出示了从卫恒住宅中抄查出来的“反革命特务罪证”：一尊前臂断掉的毛泽东全身石膏像和若干张当时台湾国民党当局向大陆空飘的反共传单，系山西省公安厅从本省收集起来作为敌方动态送省委领导人的和一张蒋介石画像。与会者一见十分愤慨。有几个造反组织的负责人提出：“先把黑省委二、三线人物抓起来，抄他们的家”。这一动议立即得到与会者的赞同。

恰在这时，王中青副省长的秘书罗广德被门口警卫人员反拧双臂，押进了刘格平家的客厅，丁磊指着他大喊：“这狗特务是王中青的秘书，是来替‘黑省委’打探消息的!”

一听这话，刘格平家中的造反派们一个个怒火冲天，杨成效率先大叫一声：“得先把这些特务抓起来，再把卫、王、王的家抄了!”见刘格平点头，杨成效立即带着到会的造反派头目和门外担任警戒的随从们，涌出了刘格平家，冲向省委和省人委大院。

罗广德怎么会被刘格平家门口的警卫人员抓住呢？

原来刘格平在家中召开的这个会议，共有北京和太原的 26 个造反组织的头头到会。这些人在刘格平的家中聚会，外面则是岗哨林立，这种情况，使正在省委办公厅例行值班的一些省委机关干部产生了怀疑和警觉。王中青已经被省委点名，在《山西日报》上成为大批判的

对象，但他的秘书，还在正常上班，正常工作。那天晚上正好罗广德是值班，出于责任心，他决定去刘格平家看看，他觉得，一位副省长的秘书去另一位副省长家看看，不会有什么不妥。没想到，他刚刚走到刘格平家的门前，就被站岗的解放军挡住了。他让他们进去通报一声自己的身份，刘格平的夫人丁磊闻讯后带着几个人出来，一看是王中青副省长的秘书，便大喝一声："他是特务，抓住特务！" 罗广德就这样以特务的身份被扭送到了刘格平的客厅。

不消两个小时，在省委、省人委办公厅值班的干部全部被造反派抓获，押至刘格平家。刘格平一顿训斥后，张日清又一声令下，这些人就全被解放军关押起来了。

接着，与会人员又立即调集各自组织的人员，分头查抄卫恒、王谦、王大任、贾俊、武光汤、赵雨亭、刘开基等省委领导人的住宅，并对太原市委书记处书记赵力之、副省长兼省人委秘书长卫逢祺和省人委办公厅干事，代管省人委党组机要文件的赵承亮实行控制，限制人身自由。

抄家以后，当杨成效带领众人得胜回来，刘格平继续让大家抓紧时间，推选"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的总指挥。同时让大家在早已起草好的那份"夺权公告"上签字。于是，参加会议的 26 个群众组织的代表，有 25 个组织的头头，分别签下了自己组织的名称和自己的名字。唯有方培泉没有代表山大"88 红旗"签名，他说要回去和其他的头头们商量一下，众人也不再催他。

紧接着大伙儿又是一阵哄吵哄嚷，一时竟难以形成统一意见。毕竟"兵团"的威望高，刘灏是第一个炮打卫恒的革命小将，吵来嚷去，就有多数意见开始趋向统一，建议夺权大事，还是由"兵团"挑头，总指挥嘛，自然是刘灏无疑。

可刘格平瞅来瞅去，却发现袁振向他举荐的这位革命小将，今晚竟然没有到会。大家的目光，便全部扫向代表"兵团"来开会的那位副司令宋捷。然而，这位副司令却一时无法表态了。刘灏让他来开会，没想到这"通报和研究山西文化大革命进展情况"的会，竟是要向省

委夺权。刘灏不在，他可不敢做主给自个的司令戴上这顶总指挥的帽子。

众人举荐刘灏，而到会的“兵团”副司令偏偏抓耳挠腮地一时难以表态。他说要派人去找刘灏赶来参加会议，有人又说怕是时间赶不上了，万一找不到咋办？

就在这山穷水复之时，突然出现了柳暗花明的场面。“十三冶革命造反决死纵队”的司令杨成效拍起了胸膛：“他妈的，谁也不用去找了，你们不干我干！”

还是工人阶级有气魄。刘格平、刘贯一和张日清大喜过望，众造反派面对杨司令毛遂自荐，纷纷点头，谁也不再提异议了。

有了总指挥，还得有副总指挥才行。于是刘格平提名，众人应声，副总指挥也有了：“首都赴晋造反大队”的头头朱永庚，从毛主席身边来的红卫兵，算一个副总指挥。刘灏虽然没有来，但宋捷来了，也是响当当的革命小将，算另一个副总指挥。

如何夺权呢？刘格平又向杨成效作了具体的交待：“夺权的具体任务便是占领省委、省人委的各个办公大楼，查封各个办公室和文件柜，没收省级机关各个部门的公章，扣押卫、王、王的二三线特务。”

有了刘格平的指点，一下子由“决死纵队”的司令变成了向“黑省委”夺权总指挥的杨成效，当即调兵遣将，安排部署。张日清紧密配合，下令调走了省军区在省委、省人委担任保卫任务的警卫部队，为夺权行动扫清了障碍。

话说方培泉奉刘格平和杨成效之命，回山西大学调集人马时，先将当晚的会议情况向山大“88 红旗”的几个决策人李大纲、侯光天、王守仁作了通报。在参与不参与今晚夺权行动的问题上，“88 红旗”的几个决策人中间一下子产生了分歧。他们原本对刘灏领导的“兵团”死保袁振有看法，认为袁振也是走资派，不过是被卫恒舍车保帅先行抛出来罢了。眼下听说袁振这样的走资派也成了夺权的核心领导，便怀疑这种夺权是不是走资派在向走资派夺权？争来吵去，这种认识逐渐占了上风。以这种认识，再去分析方培泉刚刚在刘格平家参加过的会议，这会议就越加充满疑点：你刘格平说中央文革小组支持你，口

说无凭，如何让人相信？你刘格平说中央让你成立山西党的核心领导小组，又是一个口说无凭，怎么能没有任命文件？你刘格平本身就是一个副省长，是不是走资派？向“黑省委”夺权可以，但这里面搅进来一个走资派袁振，又有一个啥也说不太清楚的刘格平出面，这不是山西的一伙走资派在向另一伙走资派夺权是什么？

越分析问题越多，山大“88 红旗”的侯光天就让其他大小头头稍安勿躁，等他先去找见附近的山西驻军首长，请教一下再说。

当时山西的驻军是 21 军，军部与山西大学相距不远。时间紧急，有一位首长接见了他。侯光天说明了情况，那位首长表了态：“我们驻军没有接到中央和军委的命令让我们支持革命造反派向省委夺权，所以我们也不支持你们要参加的这种向省委夺权的行动。”

解放军的态度了解清楚了，侯光天回校后将情况一说，其他头头马上同意与解放军的态度保持一致，责令方培泉连夜赶回刘格平家去，先撤回体育系的队伍，下一步怎么办，好好研究一下再说。

方培泉重新来到刘格平家，让留在刘格平家院子里的那些体育系的“88 红旗”小将们撤回学校。

丁磊一看，忙问方培泉怎么回事？方培泉支支唔唔不愿细说。这时，山大中文系一年级的学生叫王文超，他在文革中改名为左锋，是“88 红旗战斗队”派驻省委联络站的联络员，此时他正从刘格平住的小楼上下来，便问方培泉为何这般行事？方培泉便将“88 红旗战斗队”几位头头的怀疑和想法，一一告诉了左锋。并安顿左锋，要静观事态发展，便带着队伍先撤了。

原本要等方培泉带来夺权人马的刘格平夫妇，想不到等来的却是山西大学的这支造反队伍中途撤兵。此举让刘格平夫妇大为不满。再问留下的左锋，左锋便将方培泉的话，一一告诉了丁磊。丁磊一听大怒，马上展开原先拟定好的夺权组织名单，将上面山西大学“88 红旗战斗队”一笔勾销。出于保护自己和丈夫的考虑，她又调来了太原工学院“永红战斗队”的一些大学生，接替了原先由方培泉带来的人。

这时，杨成效又向刘格平和丁磊建议，在“夺权公告”的造反派组织署名中，加上“山西工人革命造反兵团”。

“山西工人革命造反兵团”的司令是太原重机厂水压机车间的工人张建国，副手是与他同一车间的工人李保顺。两位年轻的工人师傅响应伟大领袖号召，参加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扯旗造反，在刘灏这些中学生们的支持下，在山西大学“88 红旗战斗队”大学生们的帮助下，队伍迅速扩大，成了一支跨行业的工人造反大军，其人数可要比杨成效的那个“决死纵队”多得多。虽然刘格平没有通知张建国来开会，但听了杨成效的建议，还是把“山西工人革命造反兵团”的名字补进了“夺权公告”的署名中。山西大学“88 红旗战斗队”已经中途退出去了，算起来，向省委夺权的，还是 26 家造反组织。

1 月 12 日凌晨 1 时，杨成效带领各路造反大军万余人，分两路来到太原市府东街山西省委和省人委驻地，新建北路太原市委和市人委驻地，查封了办公室的文件档案柜，取走印章，实施夺权。黎明时分，杨成效提着集中起来的半麻袋“印把子”，回到刘格平家向刘格平和刘贯一、张日清复命来了：“咱们他妈的向省委省人委、向市委市人委的夺权，全部成功啦！”

刘格平、刘贯一、张日清 3 人，听杨成效汇报完情况，自然不会去清点那些“印把子”的。殊不知，中共山西省委的大印，杨成效一伙根本没有夺来。省委办公厅掌管这枚大印的，是一位女机要员李爱卿。她面对来夺权的杨成效和他身后“决死纵队”的工人们，只交出一个省委办公厅属下办公室的红印章，把造反的工人们给骗了。事后，她偷偷把省委的大印带回家中，放没地方放，藏没地方藏，为了保护这枚大印，就想了个办法，用细绳子将大印的印柄拴牢，再将绳子捆在腰上，将那枚大印藏在裤子里。就这样每天还得上班下班。可下一步怎么办？她也不知道，每天惴惴不安之心可想而知。

由刘格平组织，杨成效带头实施的大夺权，天不亮就成为爆炸新闻传遍太原。省委机关一早也乱了营，都在议论昨晚发生的事情，弄不清是咋回事。早饭后，贫协张志德把政治研究室的李辅和刘志英叫到他的办公室，对二人说，昨晚他参加了刘格平、袁振、刘贯一、陈守中、何英才召集的会议，宣布成立“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采取革命行动，夺了省委“卫、王、王”的党、政、财、文大权，对他

们已实行了军管。刘格平列举了“卫、王、王”的严重罪行。并说，省军区政委张日清支持昨晚的夺权行动。

李辅是 1964 年从省委党校毕业后分到省委的，接着参加“四清”，文革开始后回到省委。1966 年 8 月，社会上开始破“四旧”，李辅看到他们“四清”办公室资料组所在的东花园西小院，还在油漆、粉刷阎锡山居所的雕梁画栋，认为这是在搞“四旧”。而且，省委有书记宿舍楼、部长宿舍楼、处长宿舍楼，而一般干部多数没有住房，有许多人住在阎锡山骑兵营的窑洞内。因此，对分管省委机关行政工作的副秘书长李志敏写了一张大字报，敲锣打鼓给李志敏送去，并在大院内，当面把批判李志敏的大字报念给他听。大串联开始后，李辅等人成立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战斗队”，还请卫恒给他们题写袖标。12 月，各大学的造反组织纷纷进驻省委机关，“太工红旗”、“山农火炬”、“党校东方红”等群众找省委机关的“依靠力量”，调查省委的问题。其中李辅的名声较大，就成为他们主要的寻访和联络对象。这时，李辅所在的研究室又成立了“太行游击队”。

对于张志德介绍的这个突如其来的消息，李辅不知如何应对，而且对刘格平领导夺了省委的权，他在思想上也根本就接受不了。因为刘格平调来山西不久，他曾听省委办公室副主任刘贯文说，刘格平是在宁夏工作期间，犯了严重政治错误，本人腐化严重，搞了六十多个女人，而且是周总理亲自与其谈话，宣布处理结果的。“卫、王、王”再不好，也比刘格平强啊。刘格平凭啥领导夺权？省军区政委张日清为啥又站出来支持？他搞不清，想不通。

接着，被刘格平遗忘的“红联站”主力“太工红旗”的李青山、陈新谋、于永革、杨子贵等来找李辅询问情况，李辅将他知道的告诉他们。

“太工红旗”立即召开队委扩大会议研究局势。经过讨论，他们决定：

1、立即再派人赴京向中央汇报这一情况，看中央有何指示；

2、立即发表文章，表明观点，即：

A：是否夺权，怎样夺权，夺了权由谁领导 ，只能由中央决定，中央任命，群众参加，不能由某几个当权派自行宣称；

B：提醒全省人民要谨防政治扒手混水摸鱼。

山西省委的机关干部并不承认这次夺权行动，他们坚持上班，直至 19 日，省委办公厅办公室主任等坚持逐日向中共中央和华北局电话汇报。省委“文革办”的干部“造反大队”还贴出了反对刘格平夺权的大字报。

为防不测，“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于 13 日又从下属组织中调集了 5000 余人到省委、省人委驻地担任警卫。

当天，“红联站”紧急磋商。杨保明、段立生等“红联站”的领导认为，刘格平“112 夺权”行动只是抢图章，抓人，并没有真正掌权。他们要采取行动，发动要害部门的革命干部起来造反，夺取要害部门的权力。确定的要害部门是公安厅、广播电台、山西日报社，然后分别组织力量，落实行动计划。

当晚，“太工红旗”按计划前往山西日报社，与报社石敬铭领导的一个战斗队联合，宣布山西日报社的革命派造反，不再承认《山西日报》是省委机关报，暂时只发新华社的通稿，不发地方新闻。

其他几队人马，在公安厅、广播电台都不顺利，有的还发生了冲突，僵持在那里。

# 文革史话

## 之第三部 全面内战 第二卷

刘朝驹 著

# 文革史话

之

第三部

# 全面内战

第二卷

# 目 录

第 402 回：生疑问，“太工红旗”发“一告”飞春城，北京法医抵昆明.....1
第 403 回：赫然见，劳动部大红印章　从这里，《联合通告》传全国.....11
第 404 回：一一三，大字报震动军报　肖力谁？大楼内人头攒动.....20
第 405 回：“好叔叔”，为何成明日黄花　周恩来，接见华北局代表.....30
第 406 回：铁道部，批斗部长吕正操　立战功，江青保空军司令.....40
第 407 回：大会堂，接见空军造反派　何廷一、刘震、成钧被打倒.....48
第 408 回：毛泽东，深夜约见刘少奇　周恩来，电话到昆明现场.....59
第 409 回：出分歧，“炮兵团”坚持不撤 再通电，周恩来艰难劝说.....68
第 410 回：终答应，全撤出军区大院　检讨三，吴法宪终于过关.....77
第 411 回：见“诸侯”，周恩来谈阎红彦　看政协，一一五档案事件.....88
第 412 回：一一五，一轻部学生夺权 陈伯达，讲话反对“接管风”.....96
第 413 回：耿金章，开进上海康平路　毛泽东，明确“就是要夺权！”.....105
第 414 回：追凶手，浙江省军区被封　说“兵变”，许光达会后被关.....117
第 415 回：电话劝，撤出浙江省军区　民院打，北京市夺权声声.....126
第 416 回：城门火，唐平铸亦被殃及 议海军，苏振华当晚揪走.....137
第 417 回：见张本，周恩来肯定夺权 一一八，北京掀夺权高潮.....148
第 418 回：再座谈，听工厂代表意见　议夺权，点名批判王光美.....158
第 419 回：乱哄哄，北京左派起纷争　长春市，“主义兵”剑走偏锋.....168
第 420 回：晋夺权，不服气要打游击　抢大印，保守派冲锋在前.....178
第 421 回：亮观点，王力、关锋态度明　借东风，李井泉上海被捉.....186
第 422 回：再升级，刘少奇电话被撤　一一九，韦国清桂林游斗.....197
第 423 回：难支撑，天津市委终解体　军委会，突然要打倒肖华.....208
第 424 回：西花厅，与贺龙正式谈话　周恩来，深夜见安徽代表.....217
第 425 回：表态度，支持二机部夺权　受不了，马思聪出逃海外.....226
第 426 回：冲电台，学生监督新华社　林彪怒，两老帅大闹京西.....236
第 427 回：烧杨勇，郑维山遵命布置　鄂军区，俩领导自戕身亡.....250
第 428 回：哈尔滨，接管省市公安局　周恩来，连续见各地代表.....259

第 429 回：无头案，陶勇惨死在井中　下指示，军队要介入文革.....270
第 430 回：清华园，质疑康生波及广“三司”称，开除北大“井冈山”.....279
第 431 回：忙制止，不同意炮打康生　煤炭部，张霖之毒打身亡.....289
第 432 回：抓“联动”，铁道部宣布夺权　揪杨勇，郑维山也被关押.....298
第 433 回：毛泽东，接见军委碰头会　发号召，打回老家闹革命.....307
第 434 回：点清华，蒯大富立即行动　做工作，炮打康生火终熄.....317
第 435 回：再座谈，与北京大专院校　说接管，工农兵学商代表.....326
第 436 回：出分歧，长沙造反派分裂　搜材料，冲击湖南省军区.....335
第 437 回：听安排，谭启龙再到青岛　问中央，王效禹派人进京.....345
第 438 回：一二二，青岛市全面夺权　谣言飞，江青已来到广州.....355
第 439 回：抓生产，赵紫阳主动交印　抢舆论，广州市热闹非凡.....365
第 440 回：夺权风，劲吹在呼和浩特　报社打，军区派部队介入.....376
第 441 回：发《决定》，解放军开始支左　“全红总”，王振海遭遇绑架.....387
第 442 回：一二三，河北省开始夺权　七机部，叶正光割柜取印.....398
第 443 回：不落后，广西自治区夺权　重庆市，学生与工人分裂.....408
第 444 回：渝夺权，朱成昭思考文革　一二三，陈伯达写信批评.....417
第 445 回：外事口，陈毅大会作检查　见林彪，亲自口述定“九条”.....427
第 446 回：施援手，邱会作零点得救　稳军队，连夜开联席会议.....435
第 447 回：发社论，中央支持晋夺权　遭囚禁，关押中卫恒身亡.....446
第 448 回：一二五，贵州与新疆夺权　涉机密，广州公安局翻天.....459
第 449 回：轮船会，无锡市“和平让权”　周恩来，接见财贸口代表.....471
第 450 回：要文斗，驻外大使也弯腰　反苏修，莫斯科“红场事件”.....482

## 第 402 回：生疑问，“太工红旗”发“一告”飞春城，北京法医抵昆明

刘格平似乎已经觉察到忽视了“红联站”这支造反力量，他于 13 日中午紧急召见“红联站”主要负责人、“太工红旗”的二把手杨保明,要求“红联站”支持山西省的夺权。并说,如果“红联站”参加夺权，“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副总指挥的位置留给“红联站”。

杨保明回到“红联站”征求意见,末获支持。他又匆匆赶到太原工学院“太工红旗”队部,劝同学们改弦更张,退一步,那怕暂时支持刘格平也行。“太工红旗”召开全体大会展开激烈讨论。但是，大多数队员都不同意他的意见。

“太工红旗”于 1 月 13 日下午向外界散发和广播了由李青山执笔，在“太工红旗”群众大会讨论通过的第一份《告全省人民书》，简称“一告”。一时间，对“112 夺权”的指责纷涌而至，抨击其为“宫廷政变”、“不是左派夺权”,“没有造反派参加”等。

与“红联站”一样，太原开会紧急研究针对山西省“112 夺权”对策的还有张志安领导的“山西革命工人联合会”、刘普德领导的“太原红卫兵纠察队”和“山西红卫兵团”这 3 个保守派的群众组织。1 月 13 日，由山西“山西革命工人联合会”、山西“红卫兵总部”、“山西红卫兵团”等组织在太原的湖滨会堂急匆匆召开了一个“抓革命促生产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大会，会上也批斗了卫恒、王谦、王大任，还宣布成立“山西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行动委员会”。从字眼上看，他们要当“革

命派”，而不是“革命造反派”。对刘格平、杨成效他们的夺权，他们既没有敢公开反对，当然也不会表示赞成，而是以“抓革命促生产”的口号表示了他们的主张。会后他们举行了大游行。游行罢，年轻的工人诗人张志安连夜组织人马，一边搜集材料，准备向中央文革小组和周恩来总理办公室反映山西“112 夺权”的情况，一边筹划工人请愿团进京请愿，请党中央采取措施，平息山西发生的这场“反革命夺权事件”。当时与张志安和刘普德持同一观点的两位市委干部，也主动向张志安表态，愿去北京向党中央反映山西的夺权事件，太原的火车站已经被杨成效的“决死纵队”控制，这两位市委干部只好先到榆次，这才登上了去北京的火车。学生模范刘普德也支持手下，一边准备向党中央反映山西这场变故，一边观察事态发展。

这几个保守组织的行动，在激怒刘格平和杨成效的同时，也激怒了山西“兵团”和“红联站”。以杨成效为总指挥的“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立即刷出大标语，将“山西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行动委员会”的大会和游行，斥之为保皇派向造反派的公开示威。刘格平也马上表态，给张志安领导的“山西革命工人联合会”，还有刘普德领导的“太原红卫兵纠察队”和“山西红卫兵团”，同时戴上了反革命保皇组织的帽子。

1 月 13 日晚上，“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下属各组织的代表 1000 余人在省委礼堂集会，在一片“毛主席万岁”和“造反有理”的口号声中，杨成效先登台讲话，随后张日清也相继讲话，表示了对杨成效总指挥领导的这场夺权斗争的支持。

孰料有新华社山西分社的记者对张志安、刘普德组织的大会

和游行做了报道，并在 1 天后的 1 月 14 日的《人民日报》上刊发了这条报道。“红联站”、山西“革命工人造反兵团”认为此举是支持保皇组织，派人到新华社山西分社造反，声讨新华社山西分社支持山西保皇派的罪行。还派人到北京新华社要求予以更正。陈伯达立即做出指示，由新华社在 16 日《人民日报》发表“重要更正”，称“在元月十四日有关太原问题的报道中有严重的政治错误，应予撤消。”

卫恒、王谦、王大任他们对在太原发生的夺权一事开始并不知晓。此时的山西省委领导们已经被各路造反派们揪斗的无法正常联系了。1 月 5 日，“山西红卫兵团”头头刘普德，这位被毛泽东接见过的山西大学学生领袖，接到省委通知，要他去太原饭店开会，研究接待阿尔巴尼亚一个代表团的事情。他也想趁机请示一下省委第一书记卫恒，看下一步如何能紧跟毛主席和党中央，搞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料卫恒书记刚一来到太原饭店，就被蜂拥而入的太原工学院“永红战斗队”的大学生们揪走了。

卫恒被揪到榆次县批斗，遂后被省委机关的秘书们接了回来，悄悄藏在了省人委机关事务管理局设在太原北营地区的一座仓库里。1 月 12 日，卫恒在和省委常委、秘书长史纪言研究写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错误的检讨稿时，史纪言向卫恒谈了刘格平等人写的大字报并问他对这份大字报有什么看法，卫恒称：“这 5 个人闹，我不怕，好得很！这个大字报我未看到，总之是：事实可以查对，也可批驳。他们总要无中生有的造谣哩！”

1 月 13 日下午 17 时左右，卫恒改好了他的检讨，让史纪言

从北营仓库出来和王谦、王大任联系开省委常委会讨论他的检讨。18 时多，史纪言来电话，准备 20 时在宾馆开常委会。过了一会儿，又说 21 时左右在晋祠招待所开。卫恒正要动身，又来电话说常委会开不成了，因为袁振、张日清、刘贯一宣布和省委脱离关系，拒绝参加。卫恒又让史纪言请王谦、王大任、贾俊到北营仓库开会讨论检讨稿。王谦说："谁退出都可以，留下我们自己干。"

卫恒、王谦、王大任、贾俊 1 月 13 日晚在太原北营仓库研究修改省委关于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检查稿时，得悉了"112 夺权"的消息。当省委文革办公室请示造反派索要省委印章如何应对时，王大任说："没有中央指示，省委印章不能交出。"他们认为刘格平、张日清、刘贯一、袁振、陈守中策划的这场夺权，不会得到群众的信任，他们表示没有中央的指示绝不把权交给他们。

1 月 14 日，卫恒检讨稿的大样排出来了，卫恒、王谦和王大任、贾俊，史纪言互相看清样，提意见，修正稿子，期望能跟上毛泽东的战略部署。

就在卫恒躲进北营仓库写检讨的时候，杨成效领导的"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在省委大院和省城多个地点贴出了《海报》，宣布要于 1 月 15 日在五一广场召开批斗卫、王、王大会。省委办公厅的干部，趁天黑揭下一份《海报》，送到了北营仓库。

面对这份《海报》，卫恒等几位省委领导开始表示拒绝参加。可是在见到《海报》落款署名是省城几个闻名的大造反团体时，他们又决定 15 日准时到五一广场挨斗。

1 月 14 日这天，“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发出了夺取省市党政财文大权后的第一号《通告》，称：

“卫恒、王谦、王大任在省委某一楼内建立了一个地下司令部”，“秉承其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的旨意，企图把山西搞成一个在山西进行资本主义复辟的战略根据地。”

“原山西省委对文化大革命的一切领导权，自即日起由本指挥部接管。为了保卫无产阶级专政，防止反革命政变，我们于元月十二日夜晚夺了省委、省人委、市委、市人委等党政机关的权和抄了一些坏蛋的家，搜出了大批私藏的枪支、弹药和黑材料，彻底捣毁了卫恒等反党分子的巢穴”。

《通告》还要求：

一、所有的工人、农民和干部，都要照常上班，牢记毛主席的“抓革命，抓生产”的指示，坚持生产岗位，完成和超额完成生产任务；

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凡是反对毛主席、林副主席、中央文革小组和破坏文化大革命，就是现行反革命，立即由公安部门依法处理；

三、勒令山西文革接待站冻结流动资金，停发一切车辆；

四、各革命组织要广为宣传上述各条，协助执行。

署名中，没有刘格平答应杨成效加上的“山西工人革命造反兵团”的名字。原因是“山西工人革命造反兵团”的头头张建国，在 1 月 13 日才接到刘格平辗转递来的消息。在如何对待刘格平、杨成效他们向省委夺权这件事，这位工人师傅动了不少脑筋，他要和学生战友们商量，最终接受了山大西大学“88 红旗战斗队”

和“红联站”一些大学生们的影响，认为这是走资派在向走资派夺权。于是急匆匆找到刘格平，责问为何在他不在场的情况下，就将“山西工人革命造反兵团”写进了名单？一番争吵过后，以刘格平答应划掉“山西工人革命造反兵团”的署名了事。于是名单上又成了 25 家造反组织。

而此时，春城昆明，还在调查阎红彦的死因。1 月 12 日下午，北京的两名法医和两名化验员，乘专机飞赴昆明，空军昆指副主任朱刚在机场迎接，并陪同他们前去小麦峪验尸。

北京法医一行到达小麦峪警卫团后，立即前往阎红彦同志尸体停放的房间。虽然采取了一定的防腐措施，在房间里陈放了大量的冰决，但春城毕竟属高原气候，白日阳光充足，气温仍在 10 度左右，走近那间房屋时，已能弱微地闻到点气味，从门缝的下边，流淌出一滩化解了的冰水……

尸体很快从小麦峪运至昆明医学院解剖。这是，昆明医学院解剖室外的小草坪上，已站满了造反派群众。解剖室门口有人严密把守，不许外人进入。

解剖室是一个圆形的整体建筑，四周修有平台，显然是供学生见习时站立的，中间凹陷，修成圆形，正中立一水泥长条桌就是解剖台。如今，这中央长条水泥桌上，平躺着阎红彦一丝不挂的尸体。仔细看去，从脚底至大腿处，已隐约泛出青紫色。双眼紧闭，嘴唇紧咬。

解剖、化验的准备工作已经就绪，正待进行，突然，全权负责这项工作的省委书记处书记薛韬，急匆匆地走进解剖室告诉法医：

“暂时不要解剖，室外造反派的意见不一致。有一个造反组织突然提出疑问，坚持说死者不是阎红彦，是与他相貌相似的某某交际处长，非要等把情况弄准确后，才准许解剖。不然，他们就要冲进解剖室把尸体抢走。”

原来，这是一队从外地串连来的红卫兵，也不知他们是从哪里听来的这个消息，此时正在室外小草坪上，一声高过一声地发表意见，坚持首先要把“是不是阎红彦”的问题弄清楚，才能进行尸检。

个子较矮小的薛韬书记，被这些半路杀出的程咬金推来搡去的，汗流满面，不知如何是好。但他始终坚持一条原则，就是谁也不许冲进解剖室。他想找“823”派的头头替他做点工作，但他们并没有到这里来，现场找不到他们。

争吵相持有一个多小时，时针已指向深夜 12 点多了。一丝不挂的阎红彦，就这样直挺挺地躺在冰冷的水泥解剖台上……

就在此时，忽然有人贴近薛韬的耳根，悄悄告诉他：“阎红彦在战争年代，头部曾负过伤，留有一条伤痕，牙齿脱落较多，镶嵌假牙，可以当场请法医检验，以证明身份。”

薛韬立即接受了这条建议，征得在场群众同意后，立刻请法医进行验证，证明死者就是阎红彦。当薛韬书记擦着额头上的汗珠，将验明身份的情况，向群众说明之后，僵局才算解除。解剖、化验的工作开始进行。

法医解剖取出食管和肠胃中的粘液进行化验。化验的结果，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只向中央负责，不得在当地自行公布。法医一行 4 人，走出解剖室后，携带从肠胃中取出的粘液，一刻也未

在昆明停留，直奔机场，坐专机返回了北京……

1 月 12 日下午 14 时，周恩来给云南省委和昆明军区打来电话，指示：

请告诉周兴、秦基伟二同志并转告云南省委、人委、昆明军区、云南军区：

一、你们必须改变立场，站到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不容许有任何动摇。

二、你们必须坚定地、彻底地批判过去云南省委继续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严重错误。

三、你们只有采取这一立场和态度，才能改变你们过去追随阎红彦继续执行这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所造成的严重恶果。

四、你们现在必须支持拥护毛主席党中央提出的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有力打击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

五、你们必须坚决支持昆明市和云南省厂矿、农村、学校、机关中的革命造反派，教育那些过去受省委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蒙蔽的保守派和一些不明真相分子，使他们觉悟过来，特别是要把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十六条决定和两个十条草案，以及这次中央关于抓革命，促生产，反对经济主义，反对矛盾上交，全面反击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和新挑衅的一切文件，给他们双方讲清楚，以便促使他们能在毛泽东思想的原则基础上联合起来，向资产阶级和它的代理人进行全面进攻。只有这样，才能证明省委真正改变错误，而不是继续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对抗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真正信任群众、依靠群众，放手发动群众闹革命，而不是挑动群众斗群众。

六、我希望省委接受我上面所提出的五点建议，并坚决执行，我相信如果这样做，云南省现在的紧张局势，可以随着群众革命运动的高涨扭转过来，走向健康的发展。

1 月 12 日晚上 19 时至 13 日凌晨 2 时 38 分，周恩来在中南海东会议室接见昆明造反派赴京代表，对他们说：

“我打电话给刘殷农同志，叫他们写一个《告昆明市，云南省人民书》，局面会很快得到扭转，就可以改变面貌，不要怕。

云南还只是初期苗头，这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到一定时期是会强调经济要求的，用物质利益来毒害工人，你们要坚决反对，反对谁呢?反对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第二个，他们会把矛盾上交，保守派要比你们还“左”，提出极“左”的口号，使领导无法答复，然后到北京来，你们赶快回去，戳穿他们的阴谋，揭穿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的新反扑，劝阻他们不要上北京来，上北京来也不能解决问题。”

接着，周恩来介绍了上海《文汇报》夺权的经验后，强调说：“同机关串连，不要使业务停顿，抓革命，促生产；抓革命，促业务。”

对一些上海支边人员提出的回上海的要求，周恩来说：“支边人员厂子在本地，领导也在那里的，应该在那里闹革命，难道只有在上海能闹革命，而云南就不能闹革命了吗？现在在建厂的，要是不把工厂建好就不好了，对三线建设不利，如果当权派挑动地方与外地工人的纠纷，你们要进去，做工作，要戳穿这个阴谋。”

对三年自然灾害中回农村落户的人员要求回城的，周恩来说：“63 年下放的，已恢复在农村安家或在其他工厂工作的，就不

能再回来了，再回来经济秩序就破坏了，若确是有遗留问题没有解决的，可以放在文化大革命后期再解决。

合同工，临时工有许多不合理的办法，利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停职辞退的，这是不行的，要回来。但在以前早就停了的，现在提出要补发工资，这是经济主义，是不行的。”

在谈到阎红彦自杀问题时，他说：

“8 日阎红彦就搬到西山小麦峪自杀了，可耻的叛徒。经北京去的法医检验后确实是自杀的，是他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是一个可耻的叛徒。我现在公开给你们讲，这与进入军区大院的革命造反派毫无关系，对保守派的工人、学生也没有关系。我代表党中央向你们正式声明，这件事与两派中的任何人都没有关系，我向毛主席汇报时说过，任何人要想拿这样的事件来嫁祸给谁都是空想，任何人想要造谣诬蔑都不行，造反派要继续调查是可以的，有新材料就上报中央，同时我们责成省委、军区进行调查，要有新材料要向中央、军区报告。”

## 第 403 回：赫然见，劳动部大红印章　从这里，《联合通告》传全国

与此同时，春城昆明还发生了一件并不起眼，但却对全国产生影响的事情：国务院、中央文革再三要求销毁的“全红总”和劳动部、全国总工会三方于 1 月 2 日签署的《联合通告》，经这里流向全国。

就在“全红总”在北京西苑饭店召开“五大洲革命左派座谈会”的那天，1 月 8 日下午 16 时多，“全红总”的萧碧璜和杨爽秋到达贵阳。他们一下火车就直奔他们的贵州分部，召开分部扩大会议，向大家介绍了总部封闭劳动部，取代中华全国总工会，签署《联合通告》等情况。大家传阅了带回来的《联合通告》原件。但国务院、中央文革有关销毁《联合通告》的指示，周恩来叫“全红总”撤销总部，“打回老家去，就地闹革命”的指示，他们没有对大家说。与会人员看了他们带回的《联合通告》的原件，自然都很兴奋，于是会议做出了如下决议：

一、各基层组织坚决贯彻落实“全红总”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部”和“中华全国总工会”签署的三家《联合通告》。

二、“全红总西南区总指挥部”筹备组正式成立。在西南区总指挥部正式成立前，由分部代行西南区总指挥部总指挥的职权。

三、组成“全红总西南区总指挥部驻云南代表队”，第二天就去昆明，协助昆明分团，解决云南被解雇的临时合同工的复工问题。

四、“全红总西南区总指挥部驻云南代表队”的一切财务开支，

由贵州分部负责，由贵州分部向贵州省委领导下的机构“工人联络站”实报实销，除请昆明分团安排驻地而外，不增加昆明分团一分钱的负担。

五、以“全红总”昆明分团为基础，联合其他组织，成立“全红总云南省指挥部”。

六、由于贵州分部抽调了主力赴云南，分部由邬光顺曹绍忠负责，部分大队长成为分部委员。

第二天晚上 21 时，萧碧璜和杨爽秋一行 7 人，坐上火车前往昆明。10 日下午 17 时多，到达昆明火车站，与“全红总昆明分团”的人凭袖章相认。

“全红总昆明分团”第一负责人叫金翠莲，30 多岁，是昆明酱菜厂的女工。另外两个负责人叫李春林、黄茂林，是云南省小汽车修理厂的工人，都是年轻力壮的小伙子。金翟莲用浓厚的昆明腔说：“我们 7 号已收到总部组织部的电报，说总部已派人来昆明，真没想到你们来得这么快。昨晚又收到贵州分部来的电报，我们昆明分团已经安排好了你们的驻地和办公地点，就在昆明市工人文化宫。

一路上，金翠莲把昆明的各造反派组织情况向萧碧璜做了介绍，当时昆明最大的、也是成立最早的工人造反派组织是“巴黎公社”，全称是“云南省昆明地区毛泽东思想巴黎公社工人战斗兵团”，有 50 多万人，都是工人，相当于贵阳市的“红卫军”和“赤卫队”，湖南的“湘江风雷”。

第二大组织是后起的“昆明临时工合同工革命造反司令部”，人数约 10 万。为首的两人皆姓王，自称“司令”，一个

30 多岁，一个 27、8 岁。

第三大组织是“云南省临时工合同工造反联合总部”，人数不到 1 万。

与“全红总”总部有组织联系而得到总部承认的“全红总昆明分团”人数较少，只有 3000 多人。

说话间，他们到了昆明市工人文化宫里，一幢两层高的小洋房，周围是花园，有围墙与外界相隔，前后各有一个大门。这是一个市中心的公园。

刚坐下，萧碧璜就对金翠莲说：“金大姐，我们想走访‘巴黎公社’，拜访一下他们的头头。”

金翠莲说：“好，你们先好好休息，我安排一下，过两天去见他们。”

萧碧璜说：“不用过两天，就是今天晚上。”

“今天晚上？你们才到下，这么累。” 金翠莲问。

萧碧璜说：“金大姐，时间紧迫，一刻也不能耽误。你们酱菜厂被解雇 800 多工人的事，找过当权派，开过会没有？”

金翠莲说：“开过几次了，走资派死活都不同意复工，劳资科把问题推给厂领导，厂领导又推给市劳动局，市劳动局管我们酱菜厂的副局长也找了几次，就是不签字，我们也拿他无法。”

萧碧璜说：“明天晚上，组织开会，既然‘巴黎公社’也有不少人被解雇，这个会由‘昆明分团’和‘巴黎公社’联合召开，务必把那个副局长叫来。”

当晚 19 时 30 分，金翠莲、李春林、黄茂林等人带着贵州代表队 7 人来到“巴黎公社”总部。由于金翠莲与“巴黎公社”的

头头们都熟识，所以谈话就比较直接而无拘束，双方很快就达成了共识。

第二天，即 11 日晚上 19 时 30 分，“全红总昆明分团”与昆明“巴黎公社”共同在昆明市红旗剧场召开了“争取昆明酱菜厂被解雇工人的复工复职大会”，会场全部坐满了人，连后面和通道都站满了人。

金翠莲主持大会，她简单介绍了昆明酱菜厂被解雇工人的情况后，接着叫人把昆明市劳动局副局长喊到了主席台前。那个副局长冷静地站到台前，一言不发，他早已见惯了这种场面，似听非听地看着几个被解雇工人在台上控诉。安排的工人发言控诉差不多了，金翠莲下到前排对萧碧璜说：“我们安排的工人发言到最后一个了，小萧同志，你准备上去了。”

当最后一个控诉的工人走下台，萧碧璜走上主席台。台上的副局长看了他一下，以为又是从哪里请来打气助威的造反派代表，并未太在意。

萧碧璜向大会介绍了“全红总”的宗旨，表示完全支持工人们的复工要求以后说：“我们这次奉总部之命到昆明来，就是为了解决这一问题的。”

接着萧碧璜把目光转向了那位副局长：“这些工人在酱菜厂工作了多年，突然将他们解雇，是完全不合理的。我希望你答应工人的要求，签字同意给他们复工。”

那位副局长依然是一言不发。

萧碧璜再问他：“中央文革小组成员 12 月 26 日晚接见‘全红总’的代表的讲话你看过没有？”

那位副局长还是一言不发。

萧碧璜拿出一份传单，递到他面前："这是接见的记录。你看看后面，中央文革首长对临时合同工问题的几点指示。"

他用眼角瞟了一眼，终于说话了："这个，我早就见过了。"

"那你为什么不执行？难道你敢对抗中央文革，对抗江青的指示？"

"那是传单，不管用。请问，一份传单，我怎么知道是真是假？就算是真的，如果说是每个中央首长的讲话，我们都要遵照执行的话，那不知该执行谁的？"

"那你说，你应该执行谁的？你要在什么情况下才签字，才给他们复工复职？"

"除非上头有文件。否则，你打死我也不会签字。"他伸出一个指头，向上空指了指。

"你的上头是谁？"

"我是执行劳动部的指示。除非有劳动部的红头文件。"

下面的工人群众开始有些焦躁不安，以为这次又会像过去几次那样，批判控诉一阵，无可奈何而收场。"

只见萧碧璜从文件袋里取出了那份《联合通告》，递到他面前说："你看，这是什么？"

那位副局长赫然看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部"和"中华全国总工会"的公章盖在上面，但又不知为什么文件的名称却叫《联合通告》？

萧碧璜将《联合通告》对着下面的工人大声地读了一遍，又再将《联合通告》递到了那位副局长面前："你仔细看清楚吧。"

副局长接过《联合通告》，非常认真地仔细看了起来，全场一下子安静下来，没有一点声音，几乎掉颗针在地上的声音都听得到，下面的群众都屏住了气，全部的目光盯住了萧碧璜和那位副局长。

从那位副局长抽眼镜的次数和头的起落可以看出，他看了起码 3 遍，鼻子贴近了那上面盖的公章，似乎还想嗅一嗅公章的印泥味。

他猛然抬起了头，看了萧碧璜一眼，说："请问，你是谁？"

萧碧璜用手指一指自己的袖章："我是'全红总西南区总指挥部'驻云南代表队的队长。我们到昆明就是来落实这一文件的。那上面有我们总部的公章。"

他看了看萧碧璜的袖章，又低下头看着《联合通告》。他无论如何也不敢相信，国务院劳动部怎么会和一个群众组织签订事关全国劳动政策的文件？难道这个大红公章是假的？

萧碧璜等得不耐烦了，问他："看清楚没有？是真的还是假的？"

那位副局长连忙说："真的，真的。"

"看到你们部长的签名吗？是不是真的？"

他赶快回答："看到了，是真的。"

"那还等什么？还不赶快签字。"

"签，签，我马上就签。"

他从内衣口袋里取出了笔，在金翠莲她们早已拟定好的复工要求书上签下了如下的几个字：

"同意复工。请酱菜厂领导按中央文件的精神办理。"

他所指的“中央文件”当然是指《联合通告》。

萧碧璜把那位副局长的签字向下面的工人大声念了一遍，寂静的会场，突然沸腾起来，一片欢呼声，有人带头喊起了口号：“毛主席万岁！”“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胜利万岁！”“全红总是我们工人阶级的革命群众组织！”

……

萧碧璜走下主席台，立刻被激动的流着热泪的群众围住了，他们把他抱了起来，高高举起，抛上天空，接下又抛起。

台上的那位副局长，呆呆地站立着，看着眼前发生的情景，工人们在欢呼，在哭泣。他可能也被这情景感动了。

金翠莲满脸流着泪，泣不成声地对那些向她打听萧碧璜他们身份的工人们自豪而骄傲地解释着：“他们是我们‘全红总’总部从北京派来的人。”

萧碧璜对她说：“金大姐，赶快派人，叫部车把那个副局长送回家去，一定要平安地把他送到家里。”

虽然散会了，工人们久久不散。酱菜厂的工人们把萧碧璜他们簇拥到工人文化宫。

第二天，萧碧璜他们又用《联合通告》迫使云南省小汽车修理厂领导同意为该厂 200 多工人复工。

从元月 13 日起，《联合通告》的消息不胫而走，传遍了整个昆明市，说“全红总”从北京派人到了昆明，带来了中央文件，任何当权派看了都会乖乖签字。萧碧璜他们的驻地一清早就挤满了工人，都要求他们到自己单位去解决问题。代表队只能分组行动，两人一组，留下杨爽秋在驻地接待。

一两天后，两人一组都不行了，只能一人一组，仍然满足不了众多工人的要求。而且有的工人还为争夺到他们而出现了争吵，更有甚者，不由分说，冲进门来，抬着他们就走。

由于《联合通告》的威力，第三天，昆明市拥有 50 万人的最大的工人造反组织“巴黎公社”全体加入“全红总”。

一个星期后，昆明拥有 10 万人的造反组织“昆明市临时工合同工革命造反司令部”和“云南省临时工合同工造反联合总部”以及“云南人民印刷厂红色工人造反队”、“毛泽东思想东风工人战斗队革命造反司令部”等相继加入“全红总”。原来只有 3000 多人的“全红总昆明分团”在极短的时间内发展成拥有 60 多万人的“全红总云南省指挥部”。

接着，金翠莲带着“巴黎公社”的头头们来见萧碧璜，问那份《联合通告》可不可以翻印？

萧碧璜马上答应：“完全可以，我立刻同你去印刷厂办这件事。”

金翠莲把萧碧璜带到了云南省印刷厂，找到了该厂“红色工人造反队”的头头，他一看《联合通告》，高兴得不得了，问萧碧璜：

“请问首长，要翻印多少份？”

萧碧璜说：“先印 4000 份。”

“要不要套红？”就是将公章印成红色。

“一定要套红，请问，要多少钱，什么时候能印好？”

“这样好的文件，完全免费。我会叫工人丢下一切，今夜加班，明天下午就印好。”

第二天一早，金翠莲告诉萧碧璜：“小萧同志，印刷厂‘红色工人造反队’的头头们把《联合通告》私自多印了 2000 份，而且昨夜就散发了，要不要追究责任？”

萧碧璜一听，忙说：“太好了，不要追究，他们愿意印多少就印多少。我们的 4000 份印好了，你去取来，小部分给我，其余的由你们散发，寄到全国各地，请昆明分团的人寄给他们在外地和乡下的亲友。”

就这样，已被中央明确销毁的《联合通告》流传开来，发往全国。结果如同王年一在《大动乱的年代》中描述的那样：“不少工人闹转正，闹晋级，闹福利待遇。一些人以江青的话为‘尚方宝剑’，掐着领导的脖子强令发款。一些单位，慑于江青一伙的淫威，把合同工、临时工一律转正，甚至把 1961 年至 1963 年下放到农村的工人也恢复工作，同时补发几个月、几年甚至十几年的工资、夜班费、加班费等。”

仅在昆明，半个月不到，他们就间接、直接地为昆明市数万名被解雇的临时工、合同工复了工，恢复了职务。

由此可以看出，为什么江青应允“全红总”的 3 条要求在政治局常委会上没有通过，并且当机立断，紧急下令销毁《联合通告》。

## 第 404 回： 一一三，大字报震动军报　肖力谁？大楼内人头攒动

1 月 13 日，寒风凛冽，北京《解放军报》社的编辑记者们陆续前来上班。他们一进报社办公楼，就觉气氛异常，只见一楼大厅人头攒动，一张标题醒目的大字报用绳子悬挂在一楼的大厅正当中：《解放军报向何处去？》8 个字的大标题，用了斗大般的字，横排在大字报正文的上方，十分醒目。不用看正文，只看这标题，就可以估量出这张大字报的份量。

只见大字报一开始就说："文化大革命初期《解放军报》在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和军委的直接领导下，曾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起了先锋作用，受到了军内外群众的普遍赞扬。但是，从 6 月下旬以后，特别是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以来，在刘志坚反动路线的直接影响下，报纸的宣传和社内的文化革命就背离了以毛主席为代表的革命路线，走上歧途。"

接着，大字报罗列了《军报》党委的三条"罪状"：

第一条是关于报纸宣传。大字报严厉斥责军报"忠实地执行了刘志坚的'愚民政策'，把部队和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隔离开来，以部队特殊为借口，去搞什么正面教育，去宣传学习'老三篇'，单纯提倡做好人好事。"

第二条是讲报社内部的运动。大字报说："几个月来，军报宣传方向偏了，报社内部的文化革命也相当一段时间冷冷清清，党委一开始就为运动划框框、定调子，继而又整理黑材料，抓扒手，压制革命群众的积极性，包庇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大字报进而指出："军报之所以出现这种状况，完全是党委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恶果，胡痴同志身为党委书记，在这方面是负有严重责任的。"

第三条"罪状"是讲报社党委在"组织上包庇了一批犯有反党罪行的、有严重错误的人，把他们放在主要领导岗位上"。第一个被点名的是副总编冯征，说他是"彭德怀的吹鼓手"。因为他曾随彭德怀出访，写过若干篇彭德怀的出国访问记。第二个被点名的是总编室主任王焰，说他是"彭德怀的忠实走狗"。彭德怀任国防部长时，王焰曾任彭办主任，"忠实走狗"由此而来。第三个被点名的是副总编张秋桥，他是张春桥的弟弟。大字报说他"反对记者学习毛著，具有严重的资产阶级新闻观点，采通处革命群众写了许多揭发的大字报，他并不作检查交代，这样的人却代表党委领导全社文化革命。"最后一个被点名的是主持日常工作的副总编吕梁，说他" 一贯右倾，软弱无力，却主持日常工作"。

大字报还说："另外还有不少犯有严重错误的主编和处长，在党委包庇下也没有得到充分的揭发批判。"

大字报由此提出质问："请问报社具体工作的领导究竟掌握在什么人的手里？在这样一些人把持下的《解放军报》，怎么能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怎么能完成时代赋予我们的光荣的历史使命？如果这样下去，将被革命的群众唾弃，以至彻底垮台。"

大字报的署名是"革命造反突击队"。

这是"文革"以来在军报首次亮相的一个战斗队。后面排列

了以“肖力”为首的 8 个人的名字。时间是：1967 年 1 月 13 日 6 时 30 分。

大字报上签名的 8 个人，多数是刚调到《军报》不久的年轻人，其中一大半，报社的人都不太熟悉，对军报多数人来说，为首的肖力，不仅没见过其面，连名字也都是陌生的。

人们匆匆地看完了这张大字报，走到办公楼的三楼，在最醒目的地方又看到了另外两张大字报。一张大字报的标题是：《革命的同志们，勇敢地起来造反》。大字报对以肖力为首的“革命造反突击队”的造反行动，表示了最热烈的响应和最坚决的支持。接着又用了一连串短促有力的句子，亮出了大字报的观点：

“必须起来造反！必须一反到底！”

“必须彻底肃清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必须砸碎一切与革命形势极不相称的官僚机构！”

“无产阶级专政的重要工具——报纸，必须由坚定的无产阶级掌权！”

“冯征、王焰滚开！”

“张秋桥、吕梁等同志，必须认真检查！”

“胡痴同志必须猛省！”

大字报的署名是“革命到底造反纵队”，有 9 人签名，多是《解放军报》的老人。

另一张大字报紧贴在这张大字报的旁边，标题是《特急呼吁》，呼吁立即成立新的领导班子，并宣称“从今天起，报纸由新的领导班子和革命左派来办”。署名是以胡学方为首的“金猴战斗队”。

但是，这三张大字报张贴出来之后，并没有出现“登高一呼，群起响应”的局面。如果说，当人们在一楼大厅看“革命造反突击队”的大字报的时候，还是不动声色的话，那么，看了后两张大字报之后，谴责之声立刻不绝于耳，愤怒之火就像干柴烈火一样燃烧起来。整个编辑部三五成群，议论纷纷。锋芒所向，直指“革命到底造反纵队”，斥责这几位军报老人要干什么！

“革命到底造反纵队”的老同志不过就是表示支持“革命造反突击队”年轻人的造反行动，为什么大家会将矛头都指向这几个老家伙呢？

因为“革命造反突击队”签名的 8 个人都是刚调到军报不久的“小字辈”，年轻人造反似乎可以理解，而“革命到底造反纵队”的主要成员却多是资深的“老家伙”，而且还都是主持《快报》工作的领导，同胡痴的关系密切，怎么也跟着年轻人起哄，批起胡痴来了？

《快报》是文革初期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创办的“绝密”等级的内部刊物，专门刊登文化大革命中的重要情况，篇幅小、速度快、频率高，多是一事一报，有时一个钟头出版多期。仅供政治局常委等有限的领导阅批。快报组的成员主要由《军报》的记者组成。开始由宋琼负责主持，宋琼调中央文革办事组后，则由和谷岩、栾保俊等 5 人组成的一个领导小组负责。

而胡痴这时正受重用，刚被任命为新华社代理社长，同时还兼管《解放军报》，在 1 月 11 日的政治局常委会上，还成为新的全军文革小组成员，可以列席中央政治局和中央文革小组的会议，这才过了两天，怎么又批起他来了？

所以，有人猜测，这 3 张大字报很可能是“革命到底造反纵队”的几个老家伙一手导演的。有些人甚至猜测很可能胡痴才是真正地幕后总策划，这么做是为响应上海《文汇报》的夺权行动，自己搞了一个“胡夺胡权”的闹剧，。

下午，军报办公大楼五楼的大会议室，人头攒动，喊声一片。人们正在质问“金猴战斗队”的胡学方，要他交代题为《特急呼吁》的那张大字报，呼吁成立新的领导班子是怎么炮制出来的？！

有人抢话筒，有人站在凳子上大喊大叫。这时候，胡痴来到会场。他上午正在出席中央召开的一个会，接到了肖力的电话，问他能不能回报社？中午，又接到了栾保俊的电话，说是报社同时贴出了 3 张大字报，形势有点乱，要他下午回报社看一看。当他一进五楼的大会议室，立刻成为大会的质问对象，让他站在那里，质问他同时贴出的这 3 张大字报，搞的是什么“阴谋”？

胡痴平静的说：“头两张大字报要造反，我知道，我都表示支持，但是都没见过原稿；第三张大字报我不知道，我没有搞什么阴谋。”

人们喊声一片，纷纷要求肖力出来表态。这时，很多人都不知道的肖力，终于站出来亮相了，原来是一个年轻的姑娘。只见她从容不迫地站出来说：“我们‘革命造反突击队’同他们没有关系，根本是两码事。他们为什么要贴那样的大字报，我们也不知是怎么回事！”

3 张大字报，在内容上相互呼应，一环套一环，环环相扣，明明是“一码事”，怎么一下子变成了“根本是两码事？”人们毫不客气地要肖力回答写大字报的经过，有的人甚至在她面前挥

舞着拳头，《快报》的领导栾保俊赶紧站到肖力前面，一边竭力保护她，一边说："你们怎么能这样对待肖力姑娘！"

群众越加激怒，斥责栾保俊是"走狗""铁杆保皇派"。从此，他落了个雅号叫"栾保定"。

但是，现场也有不少头脑稍微冷静的人感到肖力讲得不像是辩解，倒很像真是对那两张大字报也存在着迷惑不解，这其中是否真有点蹊跷？

这天的"质问会"结束之后，在办公大楼又贴出了一张题为《严正声明》的大字报，对下午的"质问会"提出斥责，认为下午的会"极不民主，极不平等"，"只兴自己讲，不许别人说"，"蛮横地剥夺别人的发言权"。大字报严正声明，下午的大会"不符合《十六条》的精神"。大字报的落款把肖力为首的"革命造反突击队"排在首位，然后依次是："革命到底造反纵队"、"金猴战斗队"、"平型关战斗兵团"、"五敢战斗队"、"遵义战斗队"。

当晚 22 时，肖力的"革命造反突击队"在三楼最显著的地方，又贴出了题为《强烈抗议》的大字报。这张大字报和下午贴出的那张《严正声明》调子截然相反，劈头就说："今天的会是一个革命的会，造反的会。报社革命群众开始起来揭发和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解放军报社乱了，乱得好，好得很！大会的方向是正确的。"

《强烈抗议》笔锋一转："但是，革命到底造反纵队、金猴战斗队、平型关战斗兵团、五敢战斗队、遵义战斗队等组织，却采取极其恶劣的手法，不征求我们的意见，在他们的所谓《严正

声明》上签了我们的名。对此，我们表示强烈的抗议!！并呼吁全体革命同志，擦亮眼睛，团结起来，为彻底肃清我社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而奋斗！”

这张大字报立刻成为编辑部关注的焦点。它用张贴大字报的实际行动，向报社广大群众宣告：以肖力为首的“革命造反突击队”，同“革命到底造反纵队”、“金猴战斗队”，确确实实“没有关系”，地地道道是“两码事”。

这张《强烈抗议》一出，形势大变。第一张题为《火烧胡痴》的大字报，很快贴了出来。大字报声称，“革命到底造反纵队”的大字报“玩弄的夺权阴谋，完全是胡痴一手策划的”，“其目的，是为了破坏报社革命群众对他的揭发批判”，是“一个阴谋”。大字报的落款是：“井冈山战斗队”、“云水怒战斗队”、“红彤彤战斗队”。

《火烧胡痴》这张大字报一出，栾保俊感到形势不妙，连忙和《快报》的众领导一班人乘车到钓鱼台，同宋琼商量对策去了。

而此时，人们也知道了，“革命造反突击队”为首的那位肖力，原来不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小人物，她就是毛泽东和江青的女儿李讷。

话说三个月前，1966 年 9 月下旬的一个中午，杨成武给《解放军报》总编胡痴打来电话，说江青通知，要他俩下午 15 时到钓鱼台 15 号楼陈伯达处去接受一个任务。他们分别按时到达那里，江青、陈伯达已在等候。江青说：

“请你们来，是想把我女儿李讷送到军队去，交给你们负责，让她到《军报》锻炼锻炼，这事主席也同意。”

她还说："这孩子刚出大学门不久，她学的是历史，肯用脑子，也能写点东西，我看比林豆豆要强些。你们放心，她在政治上是跟我们走的。她的缺点是看问题有些片面，有点固执，要多帮助她。"

江青嘱咐说："对她不要抓得太紧、管得太严，要发挥她的主动性。为了保密，给她改名肖力，你俩知道就行啦，否则，她的活动和安全都会有问题。"

接着，陈伯达又讲了些夸奖的话。

杨成武对李讷到军队来表示欢迎，胡痴也赶紧表态同意。胡痴还说："《军报》归总政管，此事应该通知总政肖华主任和刘志坚副主任。"

江青说："那就由杨代总长转告吧。"

离开钓鱼台回来的时候，杨成武又特意叮嘱胡痴："李讷是主席的女儿，要好好帮助、照顾。"

这实际上也是胡痴当时的主要心情。

于是，李讷于 1966 年 10 月中旬改名肖力，正式踏进《解放军报》的大门，穿上了绿军装，成了一名女记者。胡痴把她分配到《快报》组，并交代主持《快报》工作的记者处副处长宋琼直接管肖力的工作。

宋琼特地从军事博物馆选调一名叫宋玉芬的女干部到《解放军报》社当记者，与李讷同住一间宿舍。

据宋玉芬后来回忆：

我到平安里三号报社报到时，记者处宋琼副处长(副师职)对我说："我们这里过去只有两名女同志搞内勤。现在工作需要女

记者，她二人都有孩子，不能外出采访，就调你和另一位同志来了。”我说：“我没有经验，可当不了记者呀！”宋副处长说：“我调查过你的情况，你可以边干边学。”正说着，一位身着战士装的女青年走进来。宋琼忙站起来介绍说：“这是肖力同志，也是刚调来当记者的，以后你们二人就住在一起吧！”我看这位女同志，高高的身材，匀称的体形，白晰的面孔，素白框的眼镜，齐颈的直发，面带调皮的微笑。我们互相握手问好。她给我的第一印象就是：朴素中透着潇洒，祥和中带着活力。我很高兴，我相信她将是一位很好相处的同志。

我和肖力被安排住在报社办公大楼五层的一间向阳的房间里。里面有两张单人床、两张三屉桌和两把椅子。我打开行李摆放各种物品。闲聊中，肖力告诉我，她大学毕业不久，刚参军，部队里的好多事情都不懂。她问我什么时候入伍的，我告诉她我入伍已经六年。她说：“那你是老兵了啊！”她看到我带来的一本《入伍须知》便问：“你还看这个？”我说：“是啊，部队是人手一册，军委要求全军都要学习它！”我说着随手将《入伍须知》递给她：“你可以看看这个。”我这个人实在，她说过部队规矩她不懂嘛。肖力笑了笑把书放下。

“你是干部子女吧?”我有把握地问。

“是呀！你也是吧？”

“嗯。你爸爸是谁呀？”我又答又问。

肖力笑问：“你说呢？”

我怎么说？她叫肖力，必定姓肖，“是肖华（总政治部主任）？”长相不像。

“不是，你再猜猜看。”她的表情像在逗我。我又想了几个姓肖的大干部，但又一一否定，猜不着我就不猜了，人家不愿说，我也就不再问了。

我根本就没想到她是毛主席的女儿，换句话说，我绝想不到她的爸爸是毛主席。

从此，我就和肖力结伴出入，朝夕相处了。

## 第 405 回："好叔叔"，为何成明日黄花　周恩来，接见华北局代表

根据江青的叮嘱，李讷到军报工作，采取了保密措施，全社只有 4 个人知道她的真实身份。《快报》组的众多记者只知其人，而不知她是何人?后来，宋琼调到"中央文革"任办事组组长，肖力的工作就由栾保俊直接管理。那时，栾保俊同肖力的宿舍只有一壁之隔，不仅工作中经常在一起，就是回到宿舍，也时常见面。肖力会唱京戏，有时她一面漱洗，一面哼着青衣花旦唱腔，非常乐观、爽朗。她用的皮箱是旧的，说是爸爸过去用过的。她对栾保俊说，她在中南海并不和爸爸一起吃饭，而是自己到大食堂里吃。她不仅不能坐爸爸的车，也不能坐别人的车，爸爸不允许。因此，肖力经常骑自行车上下班。有一天下大雪，北风呼号，她要回家。栾保俊说："你不要骑自行车了，我派车送你回去。"肖力赶紧阻止："好叔叔，千万不要派车，爸爸知道是要批评的!"

1966 年 12 月下旬，《解放军报》到京西木城涧煤矿调查，带队的是作战参谋出身的军事编辑方抚时，女干部只有肖力和同住一室的宋玉芬，其他 5 人大都是刚从部队调来的年轻人，共 8 人。

在京西煤矿调查时，肖力从广播和报纸上获悉《文汇报》和《解放日报》已经夺权，并发表了《告上海全市人民书》的消息，就对同去的人说："我们回去也造反。"1967 年 1 月 12 日的下午，肖力从京西煤矿调查回来，向《快报》的领导小组做汇报，谈到下面已经不像"文化大革命"初期那样爱看《解放军报》了，特别是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以来，《军报》没有一篇关于路线斗

争的文章，尽在那里搞什么“正面教育”。肖力说：“我们下去，人家听说是《解放军报》的记者就不感兴趣。”她认为：《军报》已经到了“严重关头”，要改变《军报》的面貌，“必须起来造反。”

当时，报社内部也有少数人闻风而动，贴出大字报，要造报社领导的反。当肖力他们 1 月 12 日从木城涧煤矿回到报社时，在楼梯上就看到一份“古田战斗队”的大字报，肖力当即对和她一起回来的几个人说：“他们的观点同我一致。”

听说肖力要造反，宋琼连声表示支持。《快报》领导小组当晚召开会议，决定支持她造反。有人建议，此事应该向胡痴代总编报告。胡痴当时经常列席中央文革小组的会议，也临时住在钓鱼台。于是，《快报》领导小组的一班人，于当晚 23 时左右来到了钓鱼台。

这时，肖力他们一起到京西煤矿搞调查的 8 个人也分为两摊，一摊由领队方抚时牵头给《快报》写调查报告；一摊由肖力牵头起草造反大字报。

起草大字报的这一摊 3 个人，实际上由肖力口授，另两位记者执笔并润色，边起草边议论，就这样写成了那篇题为《解放报向何处去?》的大字报。大字报的落款是“革命造反突击队”，并署上了在京西煤矿调查的 8 个人的名字，肖力排在第一位，她让方抚时任队长。

起草完大字报，也已是深夜 23 时，肖力拿着大字报底稿匆匆赶往钓鱼台，向江青禀报。

见过江青后，肖力又来到“中央文革”办事组组长宋琼在钓

鱼台的住处，向他征求对大字报的意见。这时，《快报》领导小组的一班人向胡痴汇报后，吃过夜餐，也来到宋琼处准备向他告别。宋琼对他们说："一起听听，提提意见。"

听肖力念完大字报，宋琼建议增加一句："胡痴同志身为党委书记，在这方面是负有严重责任的。"就是肖力他们那张大字报第二条的最后一句。到了 1 月 13 日子夜 1 时，宋琼等人还在议论大字报时，江青将胡痴叫到钓鱼台 15 楼的会议室，对他说："小将们要起来造反，你要坚决支持他们。这是大势所趋，顺之者昌，逆之者亡。自己有缺点错误，要主动检讨。"

江青又说："《军报》同《文汇报》不一样，《文汇报》是上海旧市委领导的，《军报》是林副主席领导的，而林副主席的领导是正确的。所以造反只能在报社内部搞，不能像《文汇报》那样公开在报上搞。"

胡痴听了，当即表态说："我一定支持他们造反，自己好好检讨。"

从 15 楼会议室走出来之后，胡痴感到责任重大。凌晨过后，大字报一贴出来，点了四、五个报社领导的名，万一打趴下了，报纸出不来，他作为代理总编辑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正好这时候《快报》领导小组的一班人还没有回去，于是胡痴就同他们一起商定了一个临时领导小组名单，预备万一出现那种情况，可以有一班人马出来负责报纸的出版工作。

那个"金猴战斗队"的胡学方也是军报记者，但他并没有参加钓鱼台这天晚上的这一系列的活动，只因他写的一笔好字，《快报》一班人临时把他拉来抄写大字报，他也就势在"革命到底造

反纵队”那张大字报上签了名，后来他又根据栾保俊言谈中透露出来要成立“临时领导小组”的说法，也组织了几位老记者，抢先以“金猴战斗队”的名义写出了《特急呼吁》这张大字报。

当 1 月 13 日上午，大字报引发的《军报》编辑部矛头直指《快报》几位领导的群情激愤的情况时，栾保俊觉得局势严重，他们已控制不了局面了，就去找肖力商量。谁知肖力对他非常冷淡，只冷冷地说：“营垒不清，情况不明。”没有深谈。往日称他为“好叔叔”的那股热乎劲，一点也没有了。栾保俊觉得不对劲，不知肖力为什么这么冷淡。无奈之下，给胡痴打了电话，请他回报社稳定局势。结果不但没有稳住，反而更糟更乱。

到了 1 月 13 日的晚上，人们已经知道，肖力就是毛泽东的女儿。原来毛主席的亲人率领一支“革命造反突击队”，正在自己身边造反，由此激起心灵上的感情波涛，那是无与伦比的。于是，报社编辑部的这个夜晚灯火辉煌，通宵达旦。有些人是在“抓革命”，还有不少的人是在“促生产”，忙着编报。1 月 13 日的这天夜晚，已经公开亮相的肖力，开始到一些办公室走动，同一些人交谈，回答人们提出的问题。

这时候，有人提出，应当把宋琼、栾保俊那伙人从钓鱼台揪回来，请肖力同“中央文革”联系一下。

肖力回答说：“不需要我联系，如果你们行动的大方向是正确的话，我相信，‘中央文革’是会支持的。”于是，一辆大轿车从《军报》驶向了钓鱼台，这时已是 1 月 14 日的凌晨，这辆大轿车来到钓鱼台，同传达室一联系，居然顺利地把宋琼他们揪了回来。临行前，宋琼悄悄对栾保俊说，江青接见了他，要他们回报

社参加运动，并关照不要和群众对立。

宋琼、栾保俊等人就这样被从钓鱼台揪回到报社，被集中在办公楼的一楼一间房子里，席地而坐，席地而睡。从此，在“革命到底造反纵队”的大字报上签名的 9 个人，连同对大字报都没有看过，更没在上面签名的胡痴，都成为群众专政的对象。

肖力要造《军报》的反，乃至对大字报修改、定稿，都是同“革命到底造反纵队”的主要成员进行过磋商的。平时她对他们也非常尊重，视他们为长辈，称他们为“好叔叔”。而这些“好叔叔”们对肖力的造反行动，又表示了最热烈的响应和最坚决的支持。肖力在“质问会”上为什么会突然宣布同他们“根本是两码事”，并由此令很多人的命运发生了重大转折？这后来成为很多人迷惑不解、众说纷纭的话题。后来，栾保俊在关押室中写下这样一首顺口溜：

肖力姑娘干劲足，

一耙子打倒仨叔叔。

叔叔有冤无处诉，

大被蒙头一场哭！

1 月 14 日下午，关锋和叶群奉林彪、江青之命，来到《军报》调查，同肖力和她的队员们在三楼的小会议室里开会。在这个小会上，肖力和她的队员们，侧重阐述他们那张大字报的观点，诸如报纸在宣传上背离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不讲两条路线的斗争，尽在那里搞什么“正面教育”呀；为祝贺新的全军文革小组成立而发表的社论，调子太低，是官样文章呀；报纸的实际领导权没有掌握在左派手里呀，等等。

关锋说：不能在报纸上公开发表“政变社论”，也不能发“羞羞答答的政变社论”。

当天晚上，肖华在“三座门”接见了《军报》的几位领导和群众代表，就“113 事件”，听取大家的看法。

发言结束后，肖华表示了他的意见：一是对胡痴要“一烧二保”；二是报社要稳定，不能乱；三是抓革命促生产，报纸要办好；四是经群众充分酝酿，提出报社新的领导班子名单，报总政、军委审批。

《解放军报》社“113 夺权”后，一直是由军报主办的文革《快报》也停了，原来由《解放军报》记者组编辑的、以中央文革办公室名义出刊的《快报》同中央文革记者站合并，《解放军报》的快报组撤消，由中央文革记者站统一编辑出版《文化革命简报》和《快报》。《快报》在 1967 年 1 月以前，主要报导北京地区的文革情况，而中央文革记者站办的是《情况反映》，主要报导除北京以外的全国各地的文革情况。直到一月夺权以后，记者站接收了北京地区的报导工作，将《情况反映》改名为《快报》，记者站的任务范围扩大到北京这一大片。

此时在中央文革记者站工作的记者共有 210 多人，大体分为四类：

一、新华社、《人民日报》的记者、编辑共 40 人。其中军事记者 27 人，是来自战争年代的战地记者和建国后培养的军事新闻工作干部；新华社总社的记者、编辑 7 人，《人民日报》社的记者、编辑 6 人。都是党培养的老新闻工作者和建国后从大学生中吸收的新闻工作新人。此外还有《工人日报》记者两人。这些

人是记者站的骨干。记者站的主要领导、编辑组的几乎全体编辑、北京组的主要岗位，由这些人充任。

二、马列主义研究院来的 13 人，都是建国后成长起来的年轻知识分子，大都在 30 岁左右。解放军政治学院来的 24 人，其中多数是教员，少数是机关干部。这些两院干部大部分是理论工作者。

三、来自空军、海军及北京、沈阳、济南、广州、成都、福州、兰州、南京和内蒙古等军区的军队干部 135 人，其中多数来自各级机关，少数是团以下干部。

四、中央办公厅来的是一名年轻干部。

其中，从中央机关和马列学院、《人民日报》、新华社等单位调来的地方人员 29 人，其余全是现役军人。现役军人使用《解放军报》记者证，是经解放军总政治部选调，经《解放军报》承认，组织上合法的军事记者。但是由于要隐瞒身份，所以多数记者又不让穿军服，不少人用的是《光明日报》、《红旗》杂志记者的名义。但这些人原来大多数不是记者，只是一般干部。因为，这种反映文革情况的记者并不需要多高的文字水平，既不需要文学性的描写，也不需要深刻的理论阐述，只要能如实纪录下别人的谈话就可以胜任。

当时的报道，特别强调真实、快捷。外驻记者对重要的事情，基本是当天发生，当天电话传到北京。编辑组立即编审处理，根据内容急缓程度，分别印成《快报》和《简报》，并立即派机要通讯员直送中央领导办公地点。因此，全国各地当天发生的紧急事件，当天晚上，最迟第二天上午就能摆到中央领导的案头。

后来，《简报》、《快报》的送阅范围有了改变，扩大到中央政治局委员，有个时期还扩大到国务院副总理。开始，中央文革对《简报》管得很严，稿件打印前，要由中央文革成员穆欣等人审查，得到他们的批准再印。后来，这个印前送审制度作废，改由记者站领导把关，记者写的重要稿件，基本都能打印上送。

此时，到北京华北局造反、上访的人越来越多，有时达万人以上。特别是天津南开大学“卫东”、天津大学“八一三”、山西“革命造反联络站”等组织，甚至进驻华北局。1 月 13 日，周恩来在中南海办公厅接见华北局机关群众组织和天津、山西的代表。他看到南开大学的同学说：

“我在南开也挂了名，但只能说我是南开中学的毕业生，因为我只上了半年大学，闹学潮，但和你们现在闹学潮不一样，你们现在是幸福的。对‘八一八’要分化、教育、争取，但不要分化得太激烈了，不然他们接受不了。‘八一八’也做了点好事，调查集体自首是他们首先搞的，在北京第二司令部谈话时，他们很坦率，有马骏的孙子，他们承认他们是保守的，他们说他们要开门整风。”

周恩来在这里提到的“八一八”是南开大学的一个红卫兵组织，关于草岚子监狱 61 人自首的问题就是他们最先向中央反映的。

南大“卫东”同学提出：“‘八一八’说周荣鑫是‘卫东’的后台。”

周恩来说：“因为他女儿是造反的，她还上过天安门，我当时不知道，不认得她，所以他们说周荣鑫是你们的后台，这根本不

是。你们应提高战斗水平，不要搞小动作，要堂堂正正，最近清华把王光美骗出去了，后来蒯大富给我打电话，说他不知道。”

周荣鑫的女儿周少华是南开大学外文系的学生，也是南大“卫东”组织的发起人之一。

华北局机关“卫东战斗队”谈起华北局的接待问题，周恩来说：“华北局接待工作，你们要提意见，在接待工作中要反对经济主义，要什么，给什么，这就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形式。

你们是机关的造反派，一定要负起责任，查清驻在机关里各派的来源。”

他指着天津大学“八一三”红卫兵和南开大学“卫东”红卫兵说：“他们来源很清楚，是两个大学的造反的。”

他又指着山西“革命造反联络站”的中学生说：“他也来源清楚。来源闹不清要出大乱子，化工部就出了乱子，名义上是‘三司’，实际上是黑组织，前天他们冒充‘三司’，撞进去，把所有的门都打开了，抢走了许多军事机密，有坏人钻空子，你们要想法保卫好华北局机关。”

周恩来说：“接待就是让他们回去，到本单位闹革命，一个是为他们服务，另一个是劝他们回去，打回老家去。”

华北局机关“卫东”的代表说：“同志们认为，李雪峰和陶铸是刘、邓司令部的哼哈二将。”

周恩来笑了笑说：“那不见得。”

南大“卫东”、天大“八一三”的代表说：“李雪峰的检查很不彻底。”

周恩来：“李雪峰的检查送到中央来，主席、中央常委、中央

文革看了，提了几点意见，他加上，又缴上了，主席看了，日子没改。李立三的问题，中央停止他出席会议，因为他没有参加文化革命，以前犯机会主义错误，还有其它问题，这个人不适合在中央做工作，他最近还给中央写了封信，对停止他出席会议表示不满。李雪峰也有问题，所以他就没有参加中央书记处会议。以前彭真根本没有把雪峰同志放在眼里，他指挥不动他，八千人大会（四清工作会议）是彭真留下的烂摊子，本来不应该开，这是老实人开的，同志们有意见，没有对旧市委，而对新市委。你们向书记处和李雪峰要什么材料，可以提出来，我们帮助你们商量。李雪峰是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你们采取行动以前应给我打个招呼。李雪峰的文件你们既然封了，就暂时封着。解学恭的文件你们已经拿去了，应该送回去，我们派代表，军区政委黄同志去，由他、解学恭和你们的代表三方签字，先封起来，你们需要什么材料再商量。”

## 第 406 回：铁道部，批斗部长吕正操　立战功，江青保空军司令

1 月 13 日，铁路系统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铁路系统抓革命、促生产，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誓师大会”，周恩来继 1 月 10 日接见铁道部乘务员代表后，又于这天出席了这个大会。他在大会上提出：

“这个大会你们是响应上海的工人、学生、职员的倡议和中央的号召，提出在铁路战线上同样的要抓革命、促生产，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在铁路战线上代表这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是铁道部门的少数领导人。所以在你们铁道部门要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应该集中力量彻底批判吕正操、武竞天所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严重罪行。在抓革命、促生产当中要集中力量来反对经济主义。”

他说：“在抓革命、促生产当中，要反对矛盾上交，把一切的问题都推到中央来解决，把各条铁路战线上的工友、职员提出的问题都推到北京来，把工厂、各院校的问题也都推到北京来，这样子就使铁路的运输的工作，全国交通大动脉容易陷于停顿，这正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反扑中的一项阴谋。”

他号召：“铁道沿线的工友、职员、学生在党中央的号召下，真正的动员起来，团结起来，通过各个铁道学院，不是一个，而是所有的联合起来，站在毛主席的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下作动员工作，宣传工作，解释工作，一个车站、一个列车的宣传，我相信这个矛盾上交的问题会解决的，就地解决的。”

“三、四天前，我和各单位谈了话，我和在北京的乘务员们见了面讲了话，把刚才这种精神讲了，他们马上响应党中央毛主席的号召，回到岗位上去交通就好起来了嘛！这就是一个证明。我相信具有二七革命光荣传统的铁路的员工，一定不会辜负党对你们的期望。”

“现在还剩一个问题，铁道部长怎么办？三天前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和我与北京各大学造反派也有一部分保守派谈了话，我们宣布了这个事。我们说，尽管吕正操、武竞天犯了这些罪行，我们还给他们一个机会，给他们一个最后机会，看他们能否将功赎罪，看他们能不能做。我们向你们呼吁！允许我们国务院给他们十天到一个月的功夫，最后机会，看他们是否能将功赎罪，所以我向你们提议，不要用你揪他抢的办法，这样形式上好像是打击了他，实际上他得到了休息。有一个铁道学院把吕正操搞到了工厂去，搞了四、五天，他晓得我作总理的总要找部长办事，这一段我没有打电话，因为这是他们一个合谋，一边抓，一边愿意去，四、五天不是休息的很好嘛！这不是办法，我就找不着这个机会，还让他在最紧张的前线，站在最前线指挥，有问题找他，看他能不能将功赎罪。”

“我赞成刚才你们的口号：打回老家去，就地闹革命！”

“我号召铁道上具有二七革命传统的工人不要留在铁道部、铁道部的招待所和北京城，应该经过这次誓师大会后要回去闹革命！”

“我再向你们提议，住在铁道部的无论如何要让出二层楼办公的地方，让铁路恢复指挥系统，你们可以派一部分代表，组织

一个管理委员会来监督他们的工作好不好。”

台下众人：“好！”鼓掌。

周恩来：“我们工人支援学生组成管理委员会来监督他们的工作，这样子，使我们全国交通大动脉不仅恢复正常而且跟过去 5 个月一样还超额完成任务。这个管理委员会如何组织，我们明天晚上就召开一个座谈会，邀请你们今天出席的，或者没有邀请的补行邀请，在北京串联的各单位的代表，各铁路分局在北京的代表，各车务段、机务段有组织的代表，所有铁道学院，6 个铁道学院，两个铁道医学院的代表统统参加解决这个问题，听取你们的意见，你们看好不好？”

众答：“好！”鼓掌。

“我相信在铁路运输上比过去做的更好，在这个系统上更好的来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新阴谋、新挑衅，这一点我相信只要得到你们赞成，什么事都能做成的。让我们高呼：

光荣的“二·七”革命传统胜利发扬万岁！

我们要团结起来，在毛泽东思想上团结起来！

抓革命、促生产，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

打倒铁道系统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无产阶级专政万岁！

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伟大的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周恩来走后，群众又把吕正操从主席台上拉了下来，给他胸

前挂上黑牌子站在台前批斗。那天寒风凛冽，吕正操冻得鼻涕直流……

1 月 13 日，李曼村代表新成立的全军文革小组接见炮兵机关 72 个群众组织代表，解答了大家提出的一些问题。他说：

“对大家提的问题，全军文革小组没有很好地研究，谈谈自己的看法：

1、机关文化大革命要不要党委领导？这是个大问题，全军有这个问题，全国恐怕也有这个问题。党、政、军机关的文化大革命要不要党委领导？据我了解，中央正在研究，军委也正在研究，所以这是个很大的问题。请同志们稍等待一下。但是在没有定下来以前，假定说，还是在党委领导下，大家也还要看党委是不是革命的，是不是按《十六条》办事的，是不是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如果是革命的，是相信群众，依靠的是按十六条办事的，那就接受它的领导，这样对运动只有好处，没有坏处。如果不革命的，甚至是压制群众不相信群众、不依靠群众、不按《十六条》办事，就不能采取奴隶主义，就要造他的反。问你们对不对呀？”

群众答：“对！”

李曼村接着说：“2、成立战斗组织问题：这七、八天以来，北京机关差不多普遍地成立了革命组织，我看这是好事情。这也是群众的结社自由嘛！这是群众革命积极性在组织上的表现，应当欢迎它，不应该反对它，更不能取消它。

3、串联问题：过去军委有过规定，各军、兵种之间不能串联，兵种内部是可以串联的，像你们炮兵司、政、各大部之间是可以串联的。机关和院校之间，实际上在《紧急指示》之后，就打破

了。如果没有院校学员闯入大院，恐怕机关是搞不起来的，我们应该感谢他们，他们给我们带来了战斗气氛、革命气氛，冲破了原来的局面，有很大好处。军兵种、各总部之间是否串联，机关和院校不一样，院校可以放假闹革命，工厂坚持八小时制，你们各军兵种之间工作也不同，空军嘛有敌机还要去消灭。敌人来侵犯你们还要去打，炮兵有炮兵的工作，我看机关至少要坚持半日制，大串联不可能，也很难做到的。”

群众问：“我们是说是在左邻右舍之间的串联，不是到全国去。”

李曼村：“这个问题，我可以向军委反映。我想，从院校的经验来看，只会有好处，没有坏处。军委规定没有改变，我只能讲到这个程度了。

4、科研单位文化大革命的搞法问题：在《中共中央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十条规定（草案）》中已经提到了。我看军队的科研单位和地方的科研单位，除了穿军装和研究项目不同外，其他没有什么不同的。应该按《十六条》办。

5、黑材料问题：党委应该按《紧急指示》和《补充规定》，把整革命群众的黑材料集中、清点，交给群众。私自转移、销毁、隐藏都是违抗中央指示的。

6、辛国治到炮兵机关检查问题：袁副主任上次已经答复了，我同意他的意见。

7、战斗组织同党、团和行政的关系问题：总的应该接受党的领导，接受党的领导，就是按毛泽东思想办事，就是接受党中央、毛主席的领导；就是按军委、林副主席的指示办事。如果各级党

的领导符合毛泽东思想，就接受他的领导，不符合就造反。

8、关于批判刘志坚问题：北京据我了解已有三个筹委会，观点都不一样，你们可以根据自己的观点和筹委会联系。一是在揭发和批判刘志坚的同时揭发本单位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二是不仅揭发批判刘志坚，还要往上追，公开追到叶剑英的头上去。12月31日叶剑英检查你们看过没有？”

群众：“看到了。”

李曼村：“我们看他们的矛头是不对的。他们说周总理是保叶剑英的。总理的意见是代表中央的，代表中央文革小组的。”

群众：“我们拥护总理的意见。”

李曼村：“叶剑英是拥护毛主席的，是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的，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不是刘少奇司令部的人。知道这些，还把矛头指向叶剑英是错误的，我们不能支持。还有第三个，现在观点还不明确，你们可以找观点相同的去参加。”

群众：“到什么地方去联系？”

李曼村：“可能都在后勤学院，也可能慢慢地经过协商后，联合起来斗争就更好了。”

当天，谢镗忠接见了部队“红色造反者批判斗争刘志坚大会筹委会”部分人员，他说：

“昨天全军文革小组开会，讨论了批判刘志坚大会的问题。”“全军文革小组的意见，要把这个会开好，要通过批判刘志坚执行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把我们全军文化大革命推向一个新的高潮。”

“从现在看，大会总的方向是对的，就按这个方向来进行筹

备工作，争取越快越好。昨天在会议上，我把你们筹备和辩论的情况汇报一下，江青同志问：地点确定了没有？我说：地址我们争取安排在体育馆，究竟哪个体育馆，现在没定。江青同志的意见是搞一万人左右。搞到体育场太冷，还是争取在体育馆来搞。她还是叫关锋同志先给大家谈一谈。”

1 月 13 日这天，台湾国民党空军有 5 架飞机，沿福建海上飞行，有进入大陆的迹象。接到报告，空军司令吴法宪立即赶到指挥所，命令华东地区空军部队的雷达全部开机，严密监视敌情；命令福建军区空军、广州军区空军指挥所，以及台湾国民党军飞机可能进入地区的飞行和高炮部队，进入一级战备。

果然，敌机在福建晋江以东海面突然改变航向，直飞大陆。得知这一情况，空八军航空兵按照命令起飞迎敌，在福建漳州上空击落了一架敌机，立了大功。不久，部队找到了被击落敌机的残骸，证实这是一架美制 F—104G 型战斗机。

吴法宪当即报告了林彪、周恩来和叶剑英。当天下午，叶群派秘书郭连凯在西郊机场找到吴法宪，对他说：“江青已经决定，晚上在人民大会堂接见空军院校师生的代表，保你出来正常工作，但是要准备揪出刘震、成钧、何廷一。”

郭连凯向吴法宪解释说：揪出刘震、成钧是林彪的决定，揪出何廷一是江青的意见。叶群要他告诉吴法宪这个情况，好让他有个思想准备。

叶群让吴法宪写几条关于刘震、成钧、何廷一的错误，以便转交江青，让她讲话时作参考。吴法宪当即写了几条，交给郭连凯带走了。

## 第 407 回：大会堂，接见空军造反派　何廷一、刘震、成钧被打倒

就在《解放军报》挑灯造反的 1 月 13 日晚上，人民大会堂南大厅人山人海，徐向前、江青、杨成武、关锋、谢镗忠、叶群等人在此接见空军机关及院校群众代表。

徐向前首先说："今天和同志们座谈一下。我们都是革命的，我们究竟革谁的命，这个问题，是每一个革命者必须解决的问题，如果不明确这个就不是革命派，也没法革，没法称为革命者。我们革命就是以毛主席为首的革命派革以刘少奇，邓小平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的命，这一点必须弄清楚，不能含糊，如果含糊就不是真正的革命者，起码不是坚定的革命派。目标要选准，要集中火力斗，一定要斗倒、斗臭、斗垮。斗争要注意策略，不能把打击面放宽了，不能把牛鬼蛇神放过。不能把好同志，不能把犯过错误，已经改正的同志当成敌人，当作革命对象。不能随便乱打，不能打错了，这样就不讲策略就不成为毛主席的好战士，就不成林副主席的好战士。

吴法宪是个好同志，他是忠实执行毛主席正确路线的，是坚决贯彻执行林副主席指示的。你们空军有真正的牛鬼蛇神，如果把他们放过去不打而要打革命同志那是不得了的，这是要同志们深思的！"

关锋接着说："昨天下午我和空军院校的 12 位代表座谈了几个小时，听取了同志们的意见，回来向江青同志、徐副主席以及其他领导同志作了汇报，看了一些材料，对你们的革命精神很赞

扬，你们的革命精神很好。现在徐副主席叫我讲几句，我讲错了欢迎大家批评，请徐副主席、江青同志纠正。我讲的供大家参考和大家商量。”

关锋首先讲了上海夺权的经验，然后说：“我觉得昨天 12 位代表反映大家的情绪和要求，基本上是好的，对吴法宪同志有意见可以提，可以批评，但在这里我向大家说明一点情况，有些情况昨天我和 12 位代表见面时我也不了解，你们不了解这也不奇怪，好多同志在三座门等了两夜三天，大家火了，这是可以理解的。

我在这里向大家说明一点情况，为什么这几天吴法宪同志没和大家见面，有两个原因：一个原因是他担负着重要的备战任务，组织上要他作最紧要的事情，现在向大家报告一个好消息，我们打下了一架敌人的飞机，这是林副主席根据毛主席的战略思想指挥的，但是吴法宪同志做了具体工作，他执行了这个任务，很紧张的战斗任务；第二个原因是吴法宪同志除了执行备战任务还要写检讨，还没有写好，组织上让他写好了再和大家见面，向大家检讨，这是两个原因。

你们一些同志对吴法宪同志提了一些意见，意见是善意的，吴法宪同志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犯了一些错误，但总的看来，在大关节紧要问题上是紧跟毛主席，紧跟林副主席的，从根本上看是一位好同志，我们认为徐副主席是对的，有错误不要紧，改嘛！

听说成钧和他们见过面，他应该了解吴法宪同志的情况，但是他和你们见面时不但没有说明这些情况，而且说了些不三不四

的话。有的同志讲成钧讲的说明了问题的本质，说明了吴法宪同志的问题的本质。同志们，不是的，这正好说明了成钧问题的本质。”

关峰接着说：“刘震，那是反党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彭德怀的死党，还有个何廷一，他是反党分子罗瑞卿、杨尚昆的卒子。成钧这个人是另外一个大坏蛋手下的死党。这三人搞阴谋煽动一些不明真相的同志反对空军党委，他们从中捣乱搞鬼，要夺空军的权，他们要趁机夺吴法宪同志的权，今天到会的有空军司令部机关的同志，你们要和广大群众一起揭发他们。同志们在院校受了打击，但根子在刘志坚那里，大家很激愤，这种心情是可以理解的。我们同情你们，支持你们，但对空军党委的问题要看清楚，哪是真正的好同志哪是坏蛋，要把坏人揪出来，刚才讲的这三个人就要揪出来。斗倒斗垮。”

接着是江青讲话。她说：“同志们，战友们，你们好！我名义上军队的文革顾问，实际上既没有顾，也没有问。”

徐向前：“过去刘志坚不让你顾，也不让你问嘛！”

江青：“怎么说呢！向你们承认错误，向你们检讨，请你们谅解。就是这个刘志坚，从去年春天，林彪同志委托我召开全军文化工作座谈会，指定他参加，他捞了点政治资本，当了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他到中央文革说军队的事情很多，回到军队又说三分之二时间在中央文革工作，实际是两头都不沾边，他搞另外一套。这个人是坚决执行刘少奇、邓小平、陶铸那一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他参加座谈会后回到中央，在中央文革开会，那时我不在北京，是伯达同志告诉我的，撤工作组他是投了票的，后来

参加刘、邓主持的会议，他又马上投降了。”

徐向前：“他还攻击伯达同志。”

江青：“在上海，他也不请示，就自己走了。我感到在紧急关头，这个人靠不住。但是我多年来养成了一个习惯，就是不轻易怀疑一个人。现在才发现他是一个两面派，一方面对你们装出支持你们的样子，在另一方面破坏文化革命，把斗争的锋芒指向了不应指向的方向。这次把他识破是一个大胜利。”

她接着说：“我相信同志们是满腔热情的，是要决心搞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我第一次接见同志们，更多的情况不了解，我听了关锋同志的汇报，看了一些材料，也听说过一些东西。现在出现了一些情况，你们是不是住到空军司令部去了？”

众答：“是。”

江青：“就是一些不允许住的地方，你们住进去了。国防部、海军司令部，因为他们有战备任务：一是准备对付外国的敌人，二是保卫文化大革命。因此，在北京第一司令部、第二司令部成立时，我出席了他们的会议，曾向他们建议，对这样的一些部门不要去冲击，他们同意了。今天和你们关上门谈话，现在是由于你们受了气，气愤极了，冲进了司令部，现在是不是可以考虑退出来？要当心敌人颠覆我们，因此作战机关不能打乱。我今天建议你们退出来，不要把你们司令员逼得到别的地方去完成任务。”

徐向前：“如果把你们司令员抓去，今天的飞机就可能打不下来的”

杨成武：“今天你们的司令员是在别的地方指挥的，你们那指挥所不灵了。”

江青："我接到一个报告……"她念了打下敌机的情况报告，然后说："吴法宪同志要是个不成材的司令员，在这种情况下，他还能去打下敌机吗？从这点上看，我就要保吴法宪同志。我保吴法宪同志，并不是保他的错误，他的错误应该检讨，你们可以作同志式的批评，但是他不是犯路线错误，他是紧跟着毛主席、林副主席走的，在大是大非问题上他是好的。至于在具体作法上有缺点错误、有的甚至很严重，听说他抓过你们的一个同志，他是上了刘志坚的圈套，上当了。至于你们那里真正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就是关锋同志讲的成钧、何廷一、刘震。这 3 个人的材料我过去看过，今天听了，并且又拿了一些。今天他们又兴风作浪，利用同志们只看到一个侧面，看不到整体，造谣生事，企图打乱我们的阵营。这个何廷一是罗瑞卿、杨尚昆的人，杨尚昆是个里通外国的家伙，他们有个小集团一天到晚吃喝玩乐，一句话，不干革命，专干反革命的勾当。甚至刘震，是彭德怀的死党。成钧是赤膊上阵，自己跳出来的。"

杨成武："成钧这个家伙，跳了两次了。"

江青："一个空军司令部，就出了 3 个，够你们揪的。现在也有空军机关的同志，这些问题大家都很清楚，我们如果没有确凿的材料，是不会讲这些问题的，正是有确凿的材料，才向同志亮这个底。同志们要分清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分清敌我友非常重要，有许多同志是受了蒙蔽，要赶快醒悟过来。这种革命造反精神是可贵的。我们的军队是毛主席亲自缔造的，是世界上无敌的。正因为这样，我建议你们退出司令部，并替我们做工作，最好是退出去。我们的人少，不可能到处去'救

火’，”

下面的群众笑了.....

江青：“我们相信你们，今天把这个底毫无保留地交给你们，相信你们完全可以作好这个工作！”

院校师生代表大声说：“明天我们就退出去！”

江青举手高呼：“同志万岁！”

与会人员共同高呼：“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接着，徐向前讲话，他首先表示说：“江青同志、关锋同志的讲话，我完全拥护。这真正是毛泽东思想挂帅的，我们要很好的领会。

刘震原来是四方面军的，他家是湖北孝感的，很小参加革命，以后在徐海东的部队里，照理说应该是革命的吧！可是到社会主义这一关就不行了，过不了这一关了。这不仅对你们是教训，对我们也是很大教育。军队中有一批牛鬼蛇神，他们从革命的立场上转到反革命的立场上去了，我们一定要把他们揪出来。”

杨成武:“现在美蒋就是要趁我们搞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来袭击我们，破坏我们，我们的情报机关早就得到了消息，所以我们的情报指挥、机要部门是不能乱搞的。”

江青：“今天就钻进了 5 架敌机。”

徐向前：“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空军你们自己搞乱了就危险。刘震这个人去年 7 月间，他自己承认他夺权。成钧，去年 7 月是要停职的，我们是保了他的。何廷一是坏蛋杨尚昆的死党，事情是明摆着的。昨天我讲了吴法宪同志的情况，说我是保吴法

宪同志，你们说，我不保吴法宪同志，难道还保成钧、刘震吗？吴法宪同志是一方面军的，刘震是四方面军的，为什么要保一方面军的不保四方面军的呢？这有个标准，就是看谁是毛主席的好战士。”

杨成武：“成钧在防空军时是副司令员，我那时是北京军区司令员兼防空军司令员，那个时候成钧就不好，这个人很阴险，不是毛主席的好战士，他是反对毛主席的，他是有后台的，这一点你们都很聪明。”

众高呼：“打倒贺龙！”

徐向前：“所以我们要好好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分清谁是好人谁是坏人，分清敌我友，不然就要打错了方向。”“最高军事机关，他们的工作都很紧张，不能冲击，这点要明确，……应该响应江青同志的号召，从空军司令部退出来。”

江青：“不怪你们，你们受骗了，怪刘志坚。”

杨成武：“怪刘志坚、刘震、何廷一、成钧。”

徐向前：“刘志坚的情况，在毛主席、林副主席刚刚接见了后，他还要我们接见院校革命师生，我们说不要了，他不听，非要我们接见不可。”

叶群：“林彪同志也不赞成接见。”

徐向前：“林副主席的话他也不听，还要我们四位副主席都讲话，我们要他搞出讲话稿，在军委常委会上讨论通过，他是在要讲话了才把稿子送来，叫你连看都没有时间看。”

叶群：“搞突然袭击。”

徐向前：“对！搞突然袭击。陈毅副主席本来不准备讲话，

他临时也拉上去讲。这仅是我最近对他的一些感觉。你们应该恨，应该气，恨谁气谁呢？不要把目标搞错了，就像飞机扔炸弹，不要扔到自己人的头上来。但有的同志打错了，应该向打得准的同志学习。我们就是要把我军办成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

江青：“刚才有个同志递了一个条子，关于斗争方式问题。这个问题说起来很复杂。我们只提倡文斗，不提倡武斗。因为文斗是建立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的。武斗只能触及皮肉，文斗才能触及灵魂，在斗争激烈时出现一些反常情况，这也没有什么，但是，总的我们还是提倡文斗。”

“你们住进了司令部，这不怪你们，据我所知，住到国防部的同学就是有人接进去的，他们上当了。你们是不是有坏人捣鬼，还不知道。”

“作战系统是昼夜值班的，从这个角度上看，我还是向你们提出建议，退出来，我不是怪你们。我们支持你们的革命行动，但不要打乱作战机构。你们不仅自己退出来，而且要做说服工作。

杨成武同志是个好同志，他的党性是最纯的。去年 10 月份他昏倒了，在他醒来的时候，首先想到的是毛主席、林副主席的身体健康。他虽然也有弱点，但他对毛主席是忠心的，对林副主席是忠心的，我个人也很感激他。

王尚荣现在有人要替他翻案，雷英夫也在闹翻案，雷英夫是个国民党的小军官，同志们说他要翻案行不行？”

众喊：“不行！”

江青：“徐副主席带病出来工作，担任全军文革的组长。要讲山头的话，他人最多，山头最大，但他没有私心，他坚决斗刘震、

成钧，要坚决斗倒、斗垮、斗臭他们。

斗争刘震、成钧、何廷一，你们要费点力气， 要做深入地调查研究工作，要善于斗争，在战略上要藐视敌人，因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是那么一小撮人，在战术上要重视敌人，因为他们掌握了财权、兵权，要讲究作战方法。

小将们，战友们，仗是有得打的，要充分准备，不能只是横冲直闯。斗争的方法，我们还是主张文斗，不能武斗。”

21 时 40 分至次日凌晨 0 时 45 分，中央文革小组和全军文革小组徐向前、江青、杨成武、关锋、谢镗忠、叶群等人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完空军机关及院校群众代表后，又马不停蹄的转到另一个会场，接见筹备斗争刘志坚大会的全体人员。

关锋在接见时讲话说：“看了你们的宣言、宗旨、口号，了解了你们筹备大会的方针、意图。我们认为你们的方针、意图是正确的，（掌声）我们坚决地支持你们。”

“同志们，你们筹委会的宗旨是符合这个方针的，（掌声）好得很，（掌声）刚才在那边开了一个会，有关空军司令部问题，刚才有的同志问到这个问题，我无妨简略谈谈，空军院校同志对吴法宪有意见，在三座门等三天两夜，没见吴法宪同志，他们很生气，这是可以理解的，刚才江青同志讲了话，和他们说明吴法宪同志这几天没见到他们有两条原因：一条是在执行任务，现在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可能广播了。在上饶昨天下午一点钟打下敌人一架飞机。”

众人鼓掌。

关锋接着又将空军刘震、成钧、何廷一批了一遍，解释了前

几天有人冲进国防部大楼后，他和王力前去劝说发生的一些事情，如：有人说他们压制民主；有人说呼喊“祝毛主席万寿无疆”口号时，关峰没有举手，等等。

他说：“那一天在国防部大楼，我表扬了一个青年同志，因为他很坦率，二十多岁的青年，他直接向我提出：我有两个问题想不通，他第一个问题：如果说我受蒙蔽的话，那我不是受刘志坚的蒙蔽，我是受《十六条》中第十五条的蒙蔽，就是军队上按总政的指示进行；第二个想不通的，就是正批判陈、叶的时候，突然把刘志坚抛出来了。我说你们很坦率，一个解放军、一个军人应该坦率，你应该带着这个问题，按着林彪同志的指示，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我给他作了一点解释。有的就不同，他打着批判刘志坚的口号、旗帜，实际上矛头不是指向刘、邓，不如那个年轻人坦率，他坦率讲出来了，刘志坚我们识破他这一套有一个过程，他自己暴露要有一个过程。”

他又说：“还有几个军委副主席接见军事院校学生，也是因为他搞的鬼，本来林副主席不同意，他说，主席刚接见了么！为什么还要搞单独接见，不同意。他说他还要搞，让四位副主席一起接见，徐向前同志说，不要都讲话了，光一个人讲话就可以了。他说，不！都要讲话，这是他玩的鬼。……徐向前同志、叶剑英同志、陈毅同志都是好同志，都是跟主席的，都是跟林彪同志的，他们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这个，江青同志已经讲过，总理也讲过，伯达同志也讲了，康生同志也讲了，可能叶剑英同志的讲话，陈毅同志的讲话，你们军事院校造反同志动感情，这个要向他们作解释，要顾大局，刚才说的三位同志，都是跟毛主席跟林

彪同志的，都是坦率的，有什么就讲什么，心里怎么想就怎么讲，不搞阴谋，心直口快，错了就错了，错了让大家批评……如果把矛头对准叶帅那就错了，那就上当了，你们的意见是正确的。”

## 第 408 回：毛泽东，深夜约见刘少奇　周恩来，电话到昆明现场

1 月 13 日晚 23 时 30 分，周恩来、康生、肖华、戚本禹在人民大会堂接见 1965 年大中专毕业生、实习生，谈到了陶铸的问题。周恩来说：

“陶铸同志管文教方面的事情，陶铸同志满口答应下来。经过调查，转正是极少数，绝大多数没有转正，统统回原来学校这就是一个方向问题，工作的方向问题，革命的方向问题，所以这个问题我们和你们谈清楚。去年 12 月第二次接见了你们的代表，正巧还有六六年的毕业生代表，双方座谈讨论，陶铸同志也参加了，当时我说不可能这样做，不能所有同学回母校，陶铸同志闯出这个祸，中央就是要重安排，重新讨论，也取得了同志们的同意。不久发现了陶铸同志一些问题，福建、广州革命师生来京揪王任重，在北大接见揪王任重同志代表时，陶铸表现了对党对立情绪。陈伯达同志、江青同志、康生同志接见赴广州揪王任重代表的讲话时揭露了陶铸的问题。十一中全会以后陶铸还是继续执行刘邓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陶铸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工作连续犯了错误，出现了很多乱子。刚才说的去年年底对于武汉、广州等革命的同学的对立态度是一次最大暴露。在群众的揭发中联系到六五年毕业生问题，不单是这一问题，许多问题是陶铸干的，作了很多坏事，陶铸到中央先是书记处常委，后担任了政治局常委，作很多这样的破坏工作，根据群众要求，党中央的要求，现在正准备作书面检查，今天我在这里揭发陶铸的错误使你们知道

了这个来源，我把这问题说明白了，陶铸同志的问题清楚了，问题的性质清楚了，我也好说话了。”

1 月 13 日深夜，毛泽东让秘书乘一辆华沙牌小轿车，将刘少奇接到人民大会堂去谈话。

平时，刘少奇总要吃两次安眠药才能入睡，他吃过一次药效轻微的安眠药之后，拿一些文件翻阅一下，然后再吃第二次药效较重的安眠药，服完就安然入睡。这一天他吃完二次安眠药，刚刚躺下床睡了一会儿，就被秘书叫醒了。他一听说毛主席要接见他，睡意一下子烟消云散，立刻起身洗把冷水脸，泡一杯茶清醒一下头脑，而后，就兴冲冲地跟着毛泽东的秘书一道去人民大会堂。

一见面，毛泽东的第一句话便问：“平平的腿好了吗？”

刘少奇苦笑着解释：“根本没有这回事，是个骗局。” 刘少奇叙述了事情的经过。

“噢，原来是这么一回事。”毛泽东也紧蹙起眉头。

刘少奇的双手手指交叉在一起，局促不安地坐在棕色的沙发上，他犹豫了一下，终于开口说：“主席，我想向你汇报两点想法。”

毛泽东在认真地听。刘少奇心情沉重地说：

“主席，我想了很久，始终感到这次路线错误责任在我，我应当承担主要责任。但是，广大干部是好的，特别是许多老干部是党的宝贵财富，希望尽快解放他们，使党少受损失……”

毛泽东递给刘少奇一支烟，二人都点燃了香烟，他吐了口烟说：“少奇同志，文革这把火是我放的，但我不是要打倒你的。

我看红卫兵也不一定要打倒你。路线错误改了就好，你们过不了关，我也着急啊。”

“第二点想法，主席，我准备辞去国家主席、中央常委和《毛泽东选集》编委会主任职务，和光美、孩子们去延安或老家种地，以便尽早结束文化大革命，使国家少受损失。”

刘少奇是真不明白毛泽东发动文革的用意，还是以退为进？如果刘少奇真的是到现在都没有弄清楚文化大革命的目的，下面各级领导对文革的不理解也就可想而知了。

毛泽东听刘少奇说罢，沉吟不语，只是不住地吸着烟，而后又慢慢地说：“少奇同志，你的想法。我需要时间……考虑考虑。”

是啊，看来俩人在思想上的距离之大，不是用几句话就可以沟通说明的。

在刘少奇和各级领导及相当一部分群众眼里，眼下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可以说已经乱到了极点，社会的正常生产、秩序甚至群众的部分正常生活都受到了影响。如果文化大革命是为了打倒刘少奇及部分领导干部的话，那就尽可以现在就结束这场大革命了，以维持社会和政权的正常运行。

而在毛泽东看来，这场运动应该说才刚刚开始，方兴未艾。如果说 1966 年下半年学生运动的波澜壮阔，那只是在全国点燃了这场运动的熊熊大火。只有到了现在，1967 年 1 月，全国的工人群众才真正发动起来了，各级领导的权威完全扫地。现在任何一个普通百姓，都可以随时将他的领导揪过来批斗一通，这是中国自古以来从没有过的事情。群众不再怕领导了，一个可以随意监督各级领导的大民主时代似乎已经到来！只是怎样才能把这

种氛围持续下去？还不知道，还要摸索。

当然，是不是这场文化大革命真的存在问题呢？

毛泽东建议刘少奇认真读几本书，他专门介绍了德国动物学家海格尔写的《机械唯物主义》和狄德罗的《机械人》。他俩谈了 1 小时 45 分钟，气氛融洽。临别前，毛泽东亲自送刘少奇到门口，嘱咐他："好好学习，保重身体。"

刘少奇从人大会堂回到家，情绪极好。他对王光美说："主席对我是有限度的，但是群众发动起来了，主席自己也控制不住。"他还说："主席的伟大，不仅是在关键时刻，他比我们站得高，看得远；更重要的是有些设想暂时办不到时，不坚持己见。"

1 月 13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给昆明地区革命造反派发出支持电，劝说他们撤离昆明军区大院，电文如下：

昆明革命造反派大联合指挥部转革命工人、革命农民、革命职工、革命学生、革命知识分子和革命干部：

你们站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方面，坚持彻底批判以阎红彦为首的云南省委继续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严重错误，你们做得对，做得好，我们完全支持你们。

由于你们的革命斗争遭到种种阻挠，你们激于义愤，一时进入昆明军区大院，这完全要由云南省委负责，而不应该责备你们。

为了贯彻中共中央关于我人民解放军不介入党、政、民各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规定，我们呼吁你们离开昆明军区大院，使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武装工具得以确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顺利开展。

我们热切地希望你们继续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再接再厉，团结昆明市人民和云南人民，坚决响应上海各革命群众组织的倡议，和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的号召。抓革命促生产反对经济主义，反对矛盾上交，为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新挑衅而奋斗。

中共中央、国务院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三日于北京

中央的支持电报在春城大街小巷高声广播，传单也紧接着广为散发。当天晚上，进驻昆明军区大院的群众组织大部分离开昆明军区大院，但也有一部分不撤离。在是否撤离军区大院的问题上，群众组织产生了分歧。以昆明工学院“823 兵团”为首的大多数学生、工人组织认为中央已有了态度，开始陆续撤离了军区大院。而云南大学“炮兵团”等少数组织认为：撤出军区大院，就是右倾，“要反右倾”，“造反派内部必须大乱”。

后来，撤出军区大院的组织，名称仍为“昆明地区革命造反派大会联合指挥部”，因为是以昆明工学院“823 兵团”为首的，后来成为“八派”。继续坚持在昆明军区大院不撤离的云大“炮兵团”等少数组织重新命名为：“新云南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联络站”，后来被称为“炮派”。

1 月 14 日凌晨 2 时 5 分至 4 时 35 分，周恩来在北京中南海小礼堂再次接见云南各界代表，动员他们回昆明。他说：

“阎红彦尽管他对党有贡献，他不是高岗分子，高岗压迫他，和刘志丹在一起，也不满意李井泉，他和中央谈过，他到云南前，还专门和我谈过，他说李井泉不民主，专断。那么这样立场的人，

他的下场为什么和高岗一样，更可耻呢?他之所以走到绝路上，是他自己落后，中国有句古话：不进则退。”

“这是一个教训，不管过去有多大功劳，但你现在不革命也是不行，我们解剖云南的麻雀，可以教育全党，使我们全党得到教训，提高，但有的领导也可能不接受这个教训，就得闹革命，现在，由于这个原因我们同意云南造反派联合指挥部派代表到北京来，他们和我畅谈了两次，各方面的问题都考虑到了，他们在北京任务基本完成，明天他们就要回去了。在北京只能解决大方向，具体问题要到本地解决。自己解放自己，问题在本地。我们有一句话说：‘打回老家去，就地闹革命’。”

“由于省委压制群众，所以昆明群众激于义愤进入了军区大院。你们都要回去。解放军要遵守中央军委的指示，你们也同样要尊敬解放军，凡属解放军负责保护的地方，你们都不要去，有事要好好商量，我们对解放军战士有五点指示：(1)不动气，(2)不动手，(3)骂不还口，(4)打不还手，(5)打伤了也不开枪，如果红卫兵同学们打伤了解放军，我就说‘你打了毛主席的解放军’，如果他是一个革命者，他一定会听毛主席的话的，他们一般都是遵守的，红卫兵向解放军学习，尊重解放军战士。

希望把我的这段话转达给前线的战士，请秦基伟同志转达我们对前线战士的问候，他们保卫国防有功，我们希望台上台下的同志们今后不要再冲入军区大院，我们确实查证了周兴、阎红彦、郭超、赵健民确实没有住军区大楼。关于档案问题，军委有指示，重要机密文件要保管在军区，我们已责成军区检查有无关于文化大革命运动文件，如有立即交出来。我们信任广大的群众，你们

回去要坚决的闹革命，你们也要考验市委、地、县委，看他们是否做了。如果是真正的共产党员，不走阎红彦的路就要走革命的路，中间的道路是没有的，你们青年人，有年青的工友，你们有朝气，但免不了犯错误，这是容许的，经验少嘛！正因为这样，中央和军委决定要进行军训，学政治、学军事，革命不但要有干劲而且要有科学知识，要学习毛主席著作，不但要学语录，而且要学习成文的东西，还要学习十六条，学习社论，这些我们同学要在斗争中学习，还要学习老三篇，学习党的政策，要向群众请教。有了这两点还不够，还要有个组纪律性，不管团体多大多小都要有组织纪律性，学习解放军的三八作风，要把这套学好，才能战斗好。”

1 月 14 日凌晨，周恩来得知昆明军区大院还有部分群众没有撤离，亲自将电话打到昆明军区大院：

“喂，是昆明军区吗？我是周恩来，我想同进驻军区大院的群众代表通话。”

昆明军区大院的值班干部听到周恩来的声音，十分激动，连忙问道：“您是总理啊！请南下‘三司’同学高志伟同志来讲话好吗？”

周恩来说：“可以。”

北京“三司”的高志伟异常激动的接过电话问道：“您是总理吗？”

周恩来说：“嗯！你哪位？你是北京哪个学校？”

高志伟：“我是农机学院的，您不是要我说话吗？”

周恩来：“今天不是中央和国务院有个电报给你们吗？完全支

持了你们，责任完全在于省委。希望你们按照中央的希望去做。这个电报毛主席、林彪副主席都亲自看了。我们希望你们跟昆明的同学、工人讲，说服他们按照这个希望，按照你们大会的决定，今天夜里还是退出离开军区大院，具体事情我跟你们这里的代表谈。你们北京的同学在这里不是有一位吗？他们都已经谈好了嘛！明天就坐飞机回昆明去了，我希望你们帮助中央对还没有离开军区的同学和工人好好做点工作。”

高志伟：“总理！当地的工人同志听到总理的电话和中央的电报以后，感到很高兴。因为中央支持了他们的革命行动，长了革命派的志气，所以感到很高兴。问题是什么呢？工人同志也坚决响应中央呼吁，准备撤，问题分歧在于怎么撤法。”

周恩来：“他们工人用罢工来支持革命行动，我们也很懂得的。如果怕回工厂后，保守派和工厂负责人还要对他们敌视的话，我现在就可以打电话给省委、省人委，要他们按照中央 12 月 19 日《中央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十条规定》去做，其中不是有一条，不许……吗？明天就贴出布告去，明天，应该就是今天白天贴到各个厂矿去，替他们声明，保证他们的工作不许歧视，不许尅扣工资，不许任何的打击报复，家属也不许虐待等等，都可以保证的。对军区大院你们应该主动撤出，比较主动，给他们说清楚！”

高志伟：“总理啊！工人同志和我们的态度也是坚决响应党中央的呼吁的，已经撤了，现在分歧啊！和大会主席团并不在这个问题。”

周恩来：“多少问题，进行民主商量吧！”

高志伟：“问题是没有民主商量！大会主席团刘殷农提出了三

个决定，都没有很好的征求大家的意见，做出决定又反啦，现在工人同志特别有意见。大会主席团不是走群众路线。”

周恩来：“你们可以批评他们。”

高志伟：“问题是大会主席刘殷农都跑了。”

周恩来：“这是工作嘛，你们不是第三司令部的吗?就是要在造反派中做工作嘛！领导同志要经过训练锻炼嘛！学习领导嘛，不然的话中央国务院出面了，毛主席自己批的文件都没有效了，我也不好交待了嘛!”

高志伟：“总理，不是这个意思。我们坚决响应中央的电报，我们还准备明天上午开完大会以后，我们考虑一下要撤的，不是不撤。现在的主要分歧是和大会主席团的分歧。”

周恩来：“我懂你的意思。现在里面的人不是太多了吗？你还是去讲一讲 ，你辛苦一点嘛！我为昆明市连日连夜都在搞，你辛苦一下嘛!”

高志伟：“现在已经有 170 多个单位成立临时联络站，现在已经组织起来啦!”

周恩来：“临时联络站嘛！中央的这个电报还是对他们有效。”

高志伟：“有效，有效，明天上午准备 10 点钟开大会，准备由 120 多个单位发起开一个大会，在军区开一个大会，开完会就准备撤。”

## 第 409 回：出分歧，“炮兵团”坚持不撤 再通电，周恩来艰难劝说

周恩来：“我告诉你一件事，今天中央通过了一个通知：不管任何组织任何人都不能进入军事机关，必须尊重人民解放军这个专政工具。正是因为这样，我们把支持云南革命斗争的电报加快的发了，你们不是前天下午开了这个会吗?我 12 点以后就给你们发出去了。中央通知的这个文件我报告了毛主席，我压了一天多，明天才发出。如果你们再不走，明天中央的这个通知一到，你们就变成了被中央的通知命令走的，这样就不好了嘛！我请你做工作嘛，你懂得不懂得？他们主席团不讲民主，明天上午开会可以提嘛，可以讨论，应改换就改换嘛！今天晚上离开问题……”

高志伟：“您的意思是什么?”

周恩来：“我的意思是希望今天晚上离开比较好。”

高志伟：“现在马上就离开?”

周恩来：“嗯！”

高志伟:“现在就离开?”

周恩来：“嗯！”

高志伟：“您的意思是现在就离开?”

周恩来：“嗯！这个通知，我压了一天，明天发出。我们提‘今后不要’，你们就不包含在这里边，你懂得不懂得！那就没有一点责任。不然，中央通知发表了以后，你们才走，保守派就会来指责你们违反中央的规定了，那就不好了嘛！”

高志伟：“我现在请一个工人同志和你谈好不好？！”

周恩来："好！"

云南大学刘先礼接过高志伟手中的电话："总理，我刘先礼啊！我是大会主席团的成员。"

周恩来："你哪个工厂的?"

刘先礼："我是云南大学政治系的。刚才刘殷农找代表去了，听说你要和代表们谈话，他去找代表去了，他一会就来。"

周恩来："你不可以谈一谈吗？"

刘先礼："可以。"

周恩来："你是云南大学的，刘先礼。刚才我不是和北京农机学院的同学讲了吗！"

刘先礼："我们工作中有一些缺点，没有走群众路线，工作没有做好。在 12 点钟以前大部分的工人同志已经撤出去了，剩下一部分同志组成一个联络站……"

刘先礼："刘殷农一会就来了，让工人同志给你讲吧！"

工人陆林接过话筒："我是陆林，工人代表。"

周恩来："陆林同志，中央不是给了你们一封电报吗？支持你们嘛！我们希望你们还是今天离开的好。"

陆林："我们坚决拥护中央的决定。我们今天和主席团有一些分歧。"

周恩来："你们主席团不民主，会开得不好，明天开会可以批评嘛！"

陆林："您的意思就是叫我们现在撤出去？"

周恩来："因为你们现在不走，你们明天就被动。我刚才告诉你们那两位同学：一位北京的同学，一位云南大学的同学。因为

中央最近发了一个通知，今天通过的，就是所有的解放军驻军的机关，一般的学校同学和工人不要进去。我们希望这个规定发表以前，你们先离开，我们后发表，……我们不要给保守派一个机会，你懂不懂啊！”

陆林：“好！懂。”

周恩来：“我还有一句话，你们要在军区大院设联络站，这个事情不要搞。因为军区不介入这个运动，不能在那儿设联络站。你们和军事院校去联系，军区大院是不能设联络站的。这个电报毛主席自己批准的。给你们的贺电你知道了吗？听话嘛！”

陆林：“知道了，知道了！总理，我们对大会主席团有很大的意见，他们没有走群众路线。”

周恩来：“这个事情我晓得，这是你们内部的事，这个你们有自由，要批评他们嘛！”

陆林：“我们走的时候太乱，说撤就撤，撤了什么也没有，撤得灰溜溜的，那些保守派真是要讥笑我们了！”

周恩来“怎么会讥笑？中央给支持你们的电报，你们可以印出来到处发嘛！”

陆林：“好！好！”

周恩来：“中央支持你们嘛！批评云南省委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你要分别考虑其性质嘛！”

陆林：“我们还有一个要求，我们要求云南省委公开作检讨。”

周恩来：“我告诉你，我已经给你们代表团讲清楚这件事了，如果云南省委给你们作检讨，你们才撤出，如果云南省委作的检讨不满意，就不撤……”

陆林："不是这个意思，不是这个意思。我们明天也撤出。我们发出了一个紧急呼吁，因为在今天不能撤出去，我们发表了一个紧急呼吁，今天上午 10 点撤出去，就是这个条件。"

周恩来："你们不要提条件，提条件反而被动。"

陆林："我们提的目的就是要让他们给我们答复。"

周恩来对秘书说："你去给我把代表找来，他是昆钢的，刚才的一个是农机的，一个是云大的。"然后又对着话筒说："你们的代表都在等着听电话，我跟你们代表讲得很清楚，他们明天下午就飞回去了。"

陆林："明天下午就飞回来了，好！"

周恩来："我告诉你，这个形势很有利，你们应该要采取主动，不要在枝节问题上在这里纠缠，这样对你们很不利的。我完全了解你们的全部情况，我们完全支持你们，你们不要在枝节问题上和我争，同志！"

陆林："知道了，听懂你的意思了。现在，我们还有一个工人同志，昆明机厂的，他要和你谈谈。"

王旭辉："总理，我是昆明机床厂的工人代表王旭辉。"

周恩来："你听到我刚才讲的吗?"

王旭辉："我没有听到。"

周恩来又和王旭辉说了一遍。王旭辉说："现在天已经黑了，我们是郊区的，离这个地方几十公里，今天就没有办法撤走。我们是郊区厂矿，根本没有准备，天黑了突然通知撤离，那不是前几天下着雨，我们搭了一些帐蓬，现在怎么撤法也不讲，就限昨天 24 小时以前撤出，这是办不到的。工作中一点准备也没有，

大会主席团就是他们说了算，工人的意见他们根本就不听。从大会主席团的成员来讲，从我们进来以后，从来没有听说过宣布什么大会主席团的名单。我们都不知道哪些是大会主席团的成员。工人有多少，红卫兵小将有多少，我们根本就不晓得。撤了，咋个搞的，一天就做了三个决定，上午说通知撤，结果工人的意见怎么撤，他又不讲，下午又做了一个决定，暂时不撤，但是到了天要黑的时候，又说要在昨天 24 点以前全部撤出。外边又下着雨，这个情况大会主席团根本不考虑我们工人的死活问题，叫我们郊区的撤了睡在露天坝上去？像这样下着雨，有老的，有小的，有的还是家庭妇女，这些在露天坝里怎么睡呢？他们根本就不考虑这个问题，就是他们大会主席团说了算数，工人向他们提出反对意见，他们根本就不接受。”

周恩来：“同志，你说的是你们主席团跟你没把事情搞好，这个你们有权利批评他们了。但是我问你，中央国务院给你们的电报你看到吗？看到了中央完全支持你们嘛！这个事情是很清楚的嘛，是不是？！所以你们不要再提什么办法了，如果 12 点以前撤不了，现在已经过了 12 点都快天亮了嘛，同志，应该要他们想办法把你们送回去，多少人呀！”

王旭辉：“我们 300 多人。”

周恩来：“现在不是还有车子在大院里吗？”

王旭辉：“没有，还有几部宣传车。”

周恩来：“只有宣传车，别的都没有啦！有车子嘛，同志，你们还可以用嘛！你们刚才的条件是内部的事情，你提条件跟军区一讲，就不好啦！他不能负责任嘛。你们的代表在北京就谈清楚

了，他们回去会告诉你们，你们有意见，你们看大的问题。如果你们回到工厂受到什么压迫，我们可以告诉省委、省人委出一个通告贴到各个厂各个矿，不许压迫你们，不许歧视你们，不许尅扣你们的工资，不许改换你们的工作岗位，应该好好的对待你们。这个意思我们可以发通告。把 12 月 9 日《十条》中的一条公布来保护你们，这个事情我可以叫省委、省人委搞的。关于你们在郊外怎么回去，你们可以找他们，有车子可以分一部份把你们送回去嘛！”

王旭辉：“总理，我们今天 10 点钟开会，开了会以后我们就撤了。”

周恩来：“不是呀！你们到了 10 点钟开会，又发生新的问题，中央电报就一点效也没有了。”

王旭辉：“我们说今天 10 点钟开完会就撤了。”

周恩来：“如果开完会又不走又怎么办呢？”

王旭辉：“我们一定走。”

周恩来：“那你何必等着开会呢？你为什么一定要开了会以后再走呢？开了会以后又变卦了吗？不好嘛，同志！”

王旭辉：“总理，我们如果像这样半夜三更的走，我们不愿意走的，现在天黑了，我们走不回去，有车子也送不回去，现在才 5 点多，走回郊区去不好走。”

陆林接过电话：“我们是坚决拥护你的决定。我们就是要开个会庆祝，我们在军区这段时间斗争的胜利，关系重大，通过开个大会庆祝庆祝；另一方面，抓革命，促生产，我们回去响应党中央的号召。我们想开个会，想拖延到 10 点钟再走，是这样的。”

周恩来："热烈拥护中央这当然好啦！我问你：如果那时有人不走怎么办呢？"

陆林："会走的。"

周恩来："这个事情就是夜长梦多呀！你那儿有人提出条件来、军区如果不答复怎么办呢？"

周恩来太疲劳了，他和陆林在电话上发生了争论……

陆林："我们还可以不让军区答复，如果军区负责人要答复，我们也不让他答复。云南省委的问题就不同了、我们认为责任完全在于云南省委，在于阎红彦。周总理，我们有三个条件，这三个条件是这样说的：……"

周恩来："这三个条件不行嘛！"

陆林："不行啊！这三个条件是这样说的：还要求在今天上午10 点钟答复，鉴于目前阶级斗争的复杂性、尖锐性、为了响应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的伟大号召，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戳穿云南省委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破坏社会生产的新的阴谋，在上述三个条件暂时不能达到时，可以大部份革命群众撤离军区大院，但是要在军区大院内设立革命工人代表、革命红卫兵及一切革命组织的联络站。"

周恩来："我告诉你：现在中央前天通过了一个通知，任何组织任何个人不能到解放军机关里面去。你这个在解放军大院里设联络站不合中央的规定嘛，同志！"

陆林："我们完全按中央的指示办事啊！"

周恩来："按中央的指示办事……"

陆林："到 10 点钟，我们完全撤。"

周恩来："你第三个条件等到 10 点钟变了卦，我怎么办呢？"

陆林："我们完全撤走，只是提出三个条件。"

周恩来："提出条件不一定能实现，你们怎么好撤走呢？那不是反而被动了吗？"

陆林："我完全按照总理的精神动员了。"

周恩来："我告诉你，你不要提那个条件，你听一听我的话嘛！"

陆林："我坚决听你的话，总理。"

周恩来："你提三个条件，那明天开会……"

陆林："总理，你是不是去休息，我们坚决听你的话。"

陆林："刘殷农同志来了，总理！"

刘殷农又接过陆林递过来的电话筒说："周总理！"

周恩来问："你是刘殷农同志？"

"我是刘殷农，他们说我跑了，我没有跑，我回来了，我在院子里面的。"

周恩来："我告诉你，你们今天群众大会开完后没有布置好，你们没有把中央的那个电报读……"

刘殷农："声音小，我听不清。"

周恩来："我告诉你，我们今天不是赶了一个电报给你们吗？完全是支持你们的。"

刘殷农："是啊！我们领会这个精神了。"

周恩来："那问题是你们在主席团里没有讨论成熟，就宣布撤退了，他们就不了解。他们现在不是要提三个条件吗？这三个条件不好实行啊！我们已经给你们代表谈了，你们代表现在就坐在我的旁边，等一下他们再给你讲一讲。三个条件为什么不好，我

给你讲一讲，第一个条件要省委承认错误，你们才好撤。中央的电报已经说了责任完全在于省委，就责备了省委了，将来出去了你们可以叫省委检讨。检讨不满意，还可又再检讨嘛！如果你们要现在检讨，如果不满意，你就不好撤了嘛，就被动了嘛！你这个条件不要提得被动，懂不懂啊？！”

刘殷农：“我们原来各战斗团、队的负责同志讨论了两次，都是无条件的撤出，没有提出任何条件。”

周恩来：“对的嘛！”

刘殷农：“事实上，绝大多数同志也支持主席团的这个决定，已经离开军区了。”

周恩来：“但是不是还有少数同志？”

刘殷农：“是啊！我们工作没有做好。”

周恩来：“对、对！你们慢慢的做，我们不会怪你们的。”

刘殷农：“是啊！我们工作没有做好，要……”

周恩来：“现在这样子，你们还是跟他们好好的商量，不要等到今天白天开大会再撤出去了。第二个条件，要军区给你们平反，这不需要了。”

刘殷农：“我们也觉得没有必要，完全没有必要。”

## 第 410 回：终答应，全撤出军区大院　检讨三，吴法宪终于过关

周恩来："中央支持你们的斗争嘛！难道军区比中央还大，中央的声音你们都不听，还要军区平反，怎么……"

刘殷农："我们同志认为中央已经这样关怀支持我们，没有必要再叫省委给我们平反。"

周恩来："中央电报这是毛主席批准的，你看了嘛，这是第二件事。第三件事，你们要在军区设立一个联络站，这是不合适的，中央今天通过了一个通知，说明了地方上任何人任何组织都不能够到军事机关里面去。"

刘殷农："我们会坚决执行的。"

周恩来："因为照顾你们的情况，我们加了个今后，也就是以前的不提了，保守派就没有借口了，懂不懂啊！所以你要在那儿设一个联络站，你不是被动了吗？将来军区不答应你们条件，不是很被动吗？我把我们内部的事情都告诉你们了嘛！"

刘殷农："是啊！是啊！我们很感谢中央对我们造反派的支持。"

周恩来："你们的代表今天下午就回去了，你跟几位同志谈一谈。你们，我看还是决定离开，大会还是可以开，开个更好的大会，把中央的电报铅印出来。"

刘殷农："我们已经布置了，印了。"

周恩来："我告诉你们，你们通过一个向毛主席致敬电，表示坚决支持中央的电报号召。你们要继续为彻底批判云南省委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而奋斗，抓革命促生产，反对经济主义，反对

矛盾上交。你们把气势拿出来，保守派就没有话可说了，你听懂了吗？你看可以不可以不讲条件，明天上午开会以前，就撤出去开会去嘛！不回来了嘛，这不就是一个办法吗？你看做得到做不到啊？”

刘殷农：“我尽量做吧！”

周恩来：“如果尽量做，做不到怎么办呢？”

刘殷农：“总理，因为有些情况也不大好说，其他几个同志还想跟你讲，讲不讲?”

周恩来：“我已经讲了三、四回了，我累得……同志，我请你们的代表给讲几句好不好？”

电话里面又换了一个人：“总理，我是‘红色人民军团’的，对于刚才的几个问题想跟你谈一谈，就是关于大会主席团决定撤的问题。”

周恩来太累了，在他身边的云南“8.23”代表黄兆琪接过他手中的电话：“你是哪位同志？”

“‘红色人民造反军团’的。”

黄兆琪：“你是‘红色人民造反军团’的，我是黄兆琪。我想给你谈一个问题，刚才周总理亲自给你们打了电话了，我们一直坐在周总理旁边，有几个问题跟你们谈一下。”

“黄兆琪同志，我谈是有些真相，刚才机床厂那个代表谈的有些不真实，情况不真实。我想谈一谈，重申一下，关于这个决定，决定撤的问题。昨天早上主席团决定撤，但是遭到一部分人阻挠。说什么这是因为前天中央有一个指示我们就坚决照着办，但是有人说这是什么投降主义呀！折中主义呀！”

黄兆琪问："是哪一部分人讲的？"

"逃跑主义呀！"

黄兆琪继续问："这是哪一部分人讲的?"

他听到话筒另一端在问别人："哪一部分人讲的……"接着回答他说："有一部分有分歧，所以在中午的时候，主席团就决定暂时不撤，到了下午叫大家讨论，主席团决定还是撤，无条件的撤。就出现了这些意见，象机床那位工人讲的，现在天气晚了不能撤，这是没有道理的。现在 5 点多钟，为什么几点以前不能撤呢？他为什么不能开车呢？认为委屈了，我们不同意！现在给别的同志讲。"

话筒理又换了另一个人的声音："总理，我给你讲一件事.....”

黄兆琪问："你是谁呀？"

"我是首都三司的，清华大学'八·八战斗队'的。"

黄兆琪："清华'八·八战斗队'的，你是哪一位呀？"

"我——，我给你讲一件事，今天南下造反兵团的串联了一些暂时不愿意撤离军区的一些工人，组成了一个临时联络站，已经宣传接管大会主席团的全部工作。明天上午，大会主席团，就是原来的那个主席团，不是临时联络站，要在检阅台召开一个大会，他们联络站要夺权，可能会发生冲突，甚至可能会发生武斗，请周总理给我们指示。"

黄兆琪："你看南下的同学另外还有没有同志在？"

"还有。"

黄兆琪："那请他来接电话好不好？请陈汉来谈一谈好不

好？”

“要我们队的吗？”

黄兆琪：“不是你们队的，是‘南下造反兵团’的。”

“‘南下造反兵团’的刚才在宣传车上，好，来啦！”

话筒里又换了一个人：“总理啊！”

黄兆琪：“不是。”

“黄兆琪啊！总理在不在？”

黄兆琪问：“你是不是老桂啊？是不是高仰义啊？”

“我是高志清，我姓高，高志清。成立联络站的问题，是不是你回来再谈好不好？谁串联的，谁组织的，为什么要组织，为什么要串联？这个问题，你回来给我们讲。”

黄兆琪：“你是不是南下同学？”

高志清：“我是三司南下串联队的。”

黄兆琪：“请陈汉同志给你讲几句好不好？”

高志清：“好！”

陈汉：“高志清吗？”

高志清：“嗯，你陈汉吗？”

陈汉：“‘南下造反兵团接管大会联合指挥部’是怎么回事呀？！”

高志清：“我们没接管，谁接管啦？我们没有接管。”

陈汉：“没有啊？！”

高志清：“没有啊！刚才是清华‘八·八’打的电话呀！这个问题怎么理解，‘红旗’在场嘛！这个问题怎么说，什么接管这个问题，你清楚嘛！这里的有些问题，在这方面没必要再作过多

的解释，你回来可以讲清楚这个问题。关于紧急呼吁问题，是这样的情况，已有 170 多个单位成立‘联络站’，为什么撤离啊，对撤军区的问题啊，这个问题是工人一时的认识问题。”

陈汉：“喂！高志清啊，给你说一下，你转告‘南下革命造反兵团’，坚决按照中央的电报办事情。”

高志清：“对对对！”

陈汉：“坚决按照这个办，不折不扣地。”

高志清：“好！”

陈汉：“立即撤消驻军区这个‘联络站’。”

高志清：“这个‘联络站’要撤消？”

陈汉：“哎！”

高志清：“哙？”

陈汉：“对！”

高志清：“这、这个不行。”

陈汉：“不是在军区要搞一个什么‘联络站’吗？”

高志清：“这个‘联络站’不驻在军区的。这是一个联合起来的组织形式，准备开会什么的。这样的形式完全不是驻在军区的‘联络站’。是这样的情况，是像大会联合指挥部那样性质，这不像驻军区的什么联络站那个问题，所以你说，这个问题扯到哪儿去了，这就不好办了。”

俩人在电话里发生争吵.....

接着，陈汉又问：“军区的人都撤走了？”

高志清：“全撤走了。”

陈汉：“全走了？”

高志清："还有一些啊！"

陈汉："还有谁啊？"

高志清："还有，还有那些工人。坚决撤就是了。要撤，究竟怎么撤?问题是和大会指挥部有些分歧，所以其他单位就串联起来，准备开个大会，开完大会以后就撤，就这个问题嘛！"

陈汉："是这样啊！根据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电报，还有电话指示，就是照这个办事情，不开什么大会了，撤走！"

高志清："今天撤走，我和其他……"

陈汉："马上就撤。"

高志清："今天撤，还得和其他同志商量。"

陈汉："你们商量商量好不好？"

高志清："可以啊！可以，可以。"

陈汉："就这样吧！"

高志清："行，喂！刚才，我们提出的意见是不现实的。有份紧急呼吁书，周总理说提出的三个条件……，提出的三个条件暂时不能达到时，也可以撤离军区大院。但是要离开大院的话，设立由革命的工人代表、革命的红卫兵一切革命组织代表组成的联络站，刚才……"话筒里出现争吵声.....

陈汉："喂喂喂！"

高志清："意见有分歧啊！意见有些分歧啊！"

陈汉："现在不论分歧，回去可以进行辩论，回去辩论也好，现在的人那还必须撤出军区，按照中央的指示办事。"

高志清："可以可以，我们没有意见。"

陈汉："好不好？"

高志清："好。"

北京这边，黄兆琪又接过话筒："喂！请你找一找刘殷农啊！"

高志清："好，你等一会儿，黄兆琪同志。"

黄兆琪："哎哎。"

"总理在不在旁边啊？他们刚才在这儿谈的话，完全是欺骗！……"

黄兆琪问："你哪位啊？"

"我是'红色人民造反军团'的唐天锡。"

黄兆琪："喂喂！"

唐天锡："喂！现在请刘殷农同志讲。喂！"

黄兆琪："党中央的电报翻印了么？"

唐天锡："喂！"

黄兆琪："喂！你是'红色人民造反军团'的吗？我跟你讲，这个争论问题不要再啰嗦了，有些问题……"

唐天锡与黄兆琪在电话里发生争吵。

黄兆琪："喂！现在有些问题，有关争论问题，有关辩论问题，现在不是辩论的时候，你现在先跟同志们讲清楚，照中央的那个电报办事，不折不扣地马上就撤出去。无论如何，现在一个也不能留，只能够全部马上撤出去。"

唐天锡："是。"

黄兆琪："还有个问题，'联络站'怎么也不准留，如果哪一个留，你们就找他……拖出去。"

这时，昆明那边刘殷农已接过话筒："请你转告总理一句，你就说：我们驻在军区大院里边的绝大多数的同志是坚决的不折不

扣的实行中央指示，拥护中央的呼吁，我们是说到做到，不是口头上说，实际上是另外一样，我们是无条件的撤！”

黄兆琪：“好好好！”

就这样，1 月 14 日，在周恩来苦口婆心的反复动员下，进驻昆明军区大院的群众终于全部撤走了。第二天，云南省省长周兴在省委机关召集省委机关干部及省级机关各厅局负责人开会，传达周恩来六点指示，并介绍了阎红彦自杀经过。

1 月 14 日，陈伯达给毛泽东送审一篇文稿：《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陈伯达在送审文稿上写道：

“王力和关锋两同志给《红旗》写了一篇评论，请顺阅！”

毛泽东当天即在文稿上批示：“伯达同志：写得很好。”

这篇文章于 1 月 16 日发表在《红旗》杂志第二期。当天的《人民日报》也全文转载了这篇文章。文章中用黑体字刊出毛泽东所说的：

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里夺权，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革命，即无产阶级消灭资产阶级的革命。

这篇评论员文章还写道：

上海工人阶级、其他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提出的革命方针和采取的革命行动，给全国树立了榜样，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提供了极其宝贵的新经验。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给上海市各革命造反团体的贺电中指出：“你们实行了无产阶级革命派组织的大联合，成为团结一切革命力量的核心，把无产阶级专政的命运，

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命运，把社会主义经济的命运，紧紧掌握在自己的手里。”这是对上海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崇高评价，也是向全国革命人民发出的伟大号召。

1 月 13 日当晚，空军副参谋长何廷一在家中被空军技术学院的“红色恐怖”组织抓往工程部办公楼。1 月 14 日，即江青等人接见空军机关和院校的第二天，打倒刘震、成钧、何廷一的大字报、大标语贴满了空军大院，甚至贴上了北京街头。当天，空司机关的一些秘书拉上一些与他们观点相近的人搞起串连，公开亮出了“革命造反队”的大旗，队长是空司办公室的周宇驰。

“空司造反队”除批斗刘震、成钧、何廷一外，还抓了军务部长邢永宁、领航部长尉剑畴、司政主任王少江，说他们跟着何廷一“反党”，并对贴过他们大字报、斗过空司办公室主任王飞的人进行打击。司令部办公室有 3 位干部在 1 月 11 日晚开会斗王飞时，提供材料揭发王飞等人，遂被点名，作为 “叛徒”给抓了起来。一时间，“空司造反队”在人们毁誉交加的态度中，名声大噪。

1 月 15 日，空军造反派在空军大院广场召开了有几千人参加的批斗刘震、成钧、何廷一大会。空军技术学院的“红色恐怖”组织把何廷一拖到露天舞台上，强迫他跪下，一人还在他背上狠狠地踏上一只脚，表示将他“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让他永世不得翻身”。

他们用墨汁将刘震、成钧、何廷一的脸刷得像个非洲黑人。正值数九寒天，北风凛冽，墨汁涂在脸上冻如刀割，全身打颤，两手麻木。

不知过了多久，“红色恐怖”又把他们 3 人装上一辆吉普车，拉到院外胡乱地转了一大圈，游街示众。

空军政治部主任黄玉晷，因叶群说“黄玉晷也不是好人”，结果《空军报》社“造反队”立即贴大字报说他“反毛泽东思想”，宣称“黄王不倒，挖山不止”。王是即空政副主任王平水。黄玉晷在空军党委常委会上当场被“造反队”抓走，不久就被拉往空军学院批斗。这次批斗会，阵容极为庞大，挨斗者除“刘、成、何”外，还有张廷发、黄玉晷、王平水、王静敏等人。空军政治部副主任王静敏没站多久，心脏病发作，差点儿倒在台上，可有人还凶恶地说：“你不要装死?”批斗会结束，这些人大都气息奄奄，新挨斗的黄玉晷不知什么时候被打掉了两颗牙。他们被拉回空军大院，上车时张廷发爬了几次都上不去，何廷一用力把他扶上车。在车上两人小声搭话，张廷发喘着气说：“怎么，你也被拉来斗了。”何廷一回答：“我已被揪斗好几次了。”

虽然江青说了要保吴法宪，但吴法宪还是出不来，因为他的检讨造反派通不过。他们说：“吴法宪必须再检讨。”结果吴法宪又在空军大院连续作了三次检讨。每次检讨，他们都让吴法宪站着，最后吴法宪实在支持不住了，才允许他坐在地上。

2 月底，三次检讨作完，吴法宪才算过了关。不久，空司、空政的一些机关干部及造反派的头头，开始到京西宾馆找吴法宪汇报和商量工作。

成钧被江青点名以后，写了一份检讨。他在检讨里说：这次“文化大革命”，是一种宗派主义斗争，是一方面军的整二、四方面军的，是四野的整一、二、三、野的。成钧的这份检讨交上

来后，吴法宪与余立金商量，共同签名将成钧的这份检讨送给林彪。林彪又直接报给了毛泽东，毛泽东又批给中央常委和中央文革传阅。

康生看完后，大笔一批："检讨中有些话是反动的，例如说，文革是一种宗派斗争，这是对文革的一种污蔑，是以检讨名义借机放毒。这个人是反革命，必须予以逮捕。"

文件又转到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那里，他们都画了圈表示同意康生的意见。

余立金接到毛泽东、林彪、周恩来同意的康生批示文件，马上跑到京西宾馆找吴法宪，问怎么办？

吴法宪说："没有办法了，只好照办吧。不过最好把文件拿给成钧自己看一看。"

就这样，成钧被抓起来关了好几年。

后来，刘震、何廷一等人的检讨，吴法宪、余立金再也不往上送了。

1 月 14 日，军委碰头扩大会议制定的《关于不得把斗争锋芒指向军队的通知》经毛泽东批准后，以中央文件的形式下发各地。文件题目为：《中共中央关于不得把斗争锋芒指向军队的通知》。

## 第 411 回：见“诸侯”，周恩来谈阎红彦　看政协，一一五档案事件

1 月 12 日，安徽合肥工业大学的梁守福和李文安、戴勤发和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李葆华他们一起来到北京香山饭店。李葆华特地给他们 3 人开了一个房间。平时吃饭，李葆华他们吃的是省委干部的伙食标准，3 个学生吃得的是 7 角钱的伙食标准，这对学生们来说已经相当不错了，但是和省委干部的伙食标准悬殊那就很大了。有一次晚饭后，梁守福和李文安与张恺帆走在路上，张恺帆小声说：“你们的生活太差了，我想给你们点补助，用我自己的工资。”两个学生赶紧回答说：“这比学校里的伙食好多了，不用了。”

1 月 14 日接到中央的通知，说晚上中央领导接见在京的各大军区、省军区、省委常委以上的负责人。李文安说：“我们也去试试。”于是他和梁守福也跑去了。但在门口，同去的胡松涛主动介绍梁守福是造反派司令时，被门卫拦下。后来听说，会议开始后，有人告诉周恩来，安徽还有个司令没进来。周恩来说：“快请他进来”。后来有人说，是造反派司令，周恩来笑着说：“那就算了，今天的会与他们没有关系。”

这天晚上，林彪、周恩来接见各大区和省委书记时，周恩来说：

“早就想开各区，省委书记的会，是林彪同志叫我做的，总抽不出功夫，现在力争争取主动，究竟什么时候争取到，不好预计，主席大方向抓得很紧，大家跟不上，要紧跟，主要是政治思

想工作不够，思想不通，思想对立着，有的立场对立着，中央各部委、各口、各部、地方大区、省市思想跟不上，认识一下赶不上来，现在是情绪抵触，有的还站在对立的立场，不执行无产阶级路线，后两种情况多过前一种这种情况就很被动，江苏情况好一些，常熟最惨了，江华到上海养病，李井泉也到上海，刚才是内部情况，我只是概括地说了。”

“对文化革命很不理解，很不得力，这话现在还有效，到现在还是很不理解，很不得力。主席有预见，我们也太落后了，参加革命 30 年的、40 年的，在社会主义最高的阶段，不能过社会主义关了，值得深思。不怨天、不尤人，许多人在大半年前在主席面前就讲过很不理解很不得力，怎么现在还是跟不上呢？”

“主席问大家，如果北京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大家敢不敢造反？”

“吴晗罢官，是文化革命的一个影子。主席要点名，彭真当耳边风，主席到上海组织力量，姚文元的文章是这样出来的，当时主席指出少数人说了算，多数人跟着走，这样也可能出修正主义。当时刘、邓在场，吴晗为代表，彭真当耳边风，雪峰是认真了的，当时就感到彭真认识上有距离，我把雪峰的话告诉了彭真（当时内部问题），雪峰看出了这个问题，但没有抓这个问题，雪峰批判彭真是积极的，但同样执行了刘邓路线，错误是比较严重的。北京市委现在还瘫痪，为什么，就是因为看得不深、跟得不紧。 陈伯达同志听到主席这两句话，他很忧虑，他认为如果主席不在中央，发生错误的领导，下面跟着做了怎么办？也向我讲过。他就注意观察主席身边的同志，那些是执行主席路线的。

他不仅观察到刘邓，而且观察到陶铸。所以我们推荐了林彪同志，也推了陈伯达同志，是我党杰出的理论家。富春同志犯了个错误，在传达我的意见时加了一句话，说陶铸也是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的，我怎么能这样说陶铸呢？ 谢富治同志能看出问题，敢于说话，过去向邓小平提过意见，也提得最早。”

“李葆华现在很被动，中央工作会议上没听他说像样的话。李葆华，大家知道还是比较老实的。”

“9 月 15 日，林彪同志说了个无产阶级司令部，大家抓这个稻草，这样就更被动。”

“妇联又揪出康克清，总工会搞得最晚，搞得最凶，现在中央各部无一例外，直接冲到国务院了，各位副总理要做精神准备。中央不比各省好过，你们来中央是休息，我们可不能到你们那里去休息。”

“好多问题没有揭发，山西未揭发，天津已揭开，内蒙已揭开了，但未解决，北京已瘫痪了，各单位的底子我们不很清楚。现在人大会堂、中南海、钓鱼台可以开会，京西饭店有危险，北京饭店又有人要接管，广大人民和解放军是可以信的。但是，有个青黄不接的问题，十一中全会后，华北局觉得不好，彭真搞的乱子，新市委承担，说话不灵，就是没有一个依靠的力量，当然不会有大问题，十月工作会议表现出来的，华北如此，别的区域也是一样。陈伯达同志谈得比较尖锐，林彪同志语重心长，是领导同志谈法，大家应结合起来理解，和刘邓有共同的思想，用反动路线去抵抗运动，但又说自己是无产阶级司令部，这就更严重，所以非提出批判反动路线不可。群众运动决不因为我们阻挡就不

前进，滚滚洪流是一直向前的。”

“12 月发表两个十条，十条就是支持和迎接革命的洪流冲向工矿企业单位，冲向农村。中层干部是否通了，现在还在观察，地县现在根本没通，烧到他本身怎么办，宋任穷，本机关就闹得他混不下去了，这也是一个典型。”

“对石油部不能采取对吕正操、武竞天的办法，对彭罗陆杨斗得太多并不利，罢官的休息了，停职反省也是睡大觉，吕正操一直是自由出入于铁道部，对吕正操撤职留用，三个月为期，戴罪立功，以观后效，铁道部造反派组织了监督管理委员会。再解剖一个云南，原来估计云南比四川好点，整个西南不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西藏怎么样，西藏以军队为主，可能好点。云南最近出了一件事，是想避开也不行的，就是因为云南省委对李井泉不满，但是不是站在正确方面来斗争呢？阎红彦从本位主义出发，得不出正确的结论。三省落后性相同，但是四川顽抗，搞白色恐怖，打击群众，因此还有人起来反抗，四川的盖子还没有完全揭开。阎是一肚子不满情绪，群众起来后自杀、叛党。不管你过去有多大的功绩，过去的几关都过了，但是顶难过的一关过不去了。薄一波不揪出来，但也有人议论要打倒他。阎不走这条道路，可能还有人认为他是好同志。现在就不能这样说了。他的家庭……他的父亲抽大烟，他的老婆是个封建婆，他上不请教主席，不读主席的书，最近事件发生后，郭超同志来反映，谷牧有个报告是错误的，对林彪同志的报告不看，读语录是说说的，作报告也是说说的。下不请教于群众，怕群众怕得要命，然后把自己放在一个什么位置呢？也是根本不民主，个人说了算。军区

党委也要想一想主席为什么要搞大民主呢？ 我们应当想一想，哪一点应请教主席，哪一条不符合群众要求，哪一点对同事（志）不以平等态度待人，第一次乒乓比赛时，阎只批评李井泉，而根本不批评自己，他和高岗不一定相同，他是以和高岗不同自我标榜，上不请教主席，又不自我批评，势必走到反党的道路上去。他给他父亲鸦片烟吃，张思尧我们是为了利用他向蒋帮做工作，可以给点鸦片吃，革命干部的父亲为什么要给鸦片吃？反高岗使阎背上了包袱，平时也只是抓生活，不抓阶级斗争，思想历史根源如此，必然走了绝路，对红卫兵不欢迎，是防，是挡。十月工作会议后，还是依靠保守派压左派，对造反派不相信，不支持。十月以后支持造反派是对的。元月四日，左派冲向军区大院，阎红彦、周兴一齐逃跑，跑到西山，后又在西山开省委会，要周兴去见群众，群众叫‘周兴滚回去’，‘阎红彦滚出来’，更不敢出来了，把军区暴露在群众面前，冲向了大楼，把赵健民揪出来，一说群众是反革命，二说阎红彦的去向知道也不能告诉群众，群众听了把他押到车上游街了，三、四个钟头，住到医院去当防空洞，扬言干部听到泣不成声，不吃晚饭。 我也犯了个错误，听说李葆华同志在福香楼被围 4 昼夜，签了许多条子，陶铸讲了后，中央通知叫李回来，造反派同意了，结果叫保守派抢出来，逃难到肥西县，发生了 3 天打架，这是什么样的感情？赵健民咎由自取，叫阎红彦出来见群众，陈伯达同志打电话，阎问周兴怎么办，周兴说睡觉吧，明天再说。我们这里急如星火，不负责任，如此威风，吃眠尔通几十片就自杀了。这么大的事情，用这么个态度，不单是压制群众，而且反抗毛主席为代表的革命路线，抗拒中央

的领导，自绝于党和人民。”

“斗争锋芒不能向着军区，军区也不能当防空洞，进入军区责任在省委，中央呼吁撤出来。希望他们抓革命促生产，矛盾不上交。中央各部和省委谁都没有过了关，高高兴兴地回去准备过好这一关。林总叫我做思想工作，我就讲这些。”

安徽“八二七”的梁守福、李文安和清华大学的戴勤发 3 人，没能参加林彪、周恩来这次对各省、市、大军区领导的接见。他们回到香山饭店，在房间里一直等到大约 15 日凌晨三、四点，李葆华他们才回来。梁守福忙问张恺帆接见的内容，张恺帆说：“今晚是林副主席和周总理接见，林副主席没说什么话，主要是周总理说云南省委第一书记阎红彦自杀的问题。对李葆华批评得比较厉害，要他立即回安徽接受群众批判。同时，还要把安徽的工作抓起来。批评了‘三天流血事件’打伤这么多人不好。”

1 月 15 日当天，梁守福、李文安、戴勤发和李葆华、张恺帆等人坐飞机先到南京，再由安徽工学院派车到南京将李葆华、张恺帆接到安徽工学院住下。李葆华留在安徽工学院写检查。张恺帆觉得在工学院比在家安全，也自愿留在工学院。

本来，1966 年 12 月 31 日，中央广播事业局“毛泽东思想战斗团”进驻北京市广播电台总编室，已经掌控了北京市广播电台的广播权。到了 1967 年 1 月 11 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广播电台问题的通知》，决定对电台实行军事管制，要求地方电台只转播中央台的节目。但是，在上海《文汇报》、《解放日报》夺权的影响下，特别是 1 月 11 日晚新闻联播广播了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 11 日给“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

等三十二个革命群众组织”的贺电，全国再次欢腾。1 月 12 日、14 日，北京广播学院“北京公社”联合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一些人，两次在北京市广播电台再次夺权，并违背中央指示，通过电台 9 次播发了“夺权宣言”。

1 月 14 日，毛泽东审阅陈伯达报送的王力、关锋起草的《红旗》杂志评论员文章《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批示：“伯达同志：写得很好。”文中用黑体字引用了毛泽东的一段话：“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里夺权，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革命，即无产阶级消灭资产阶级的革命。”

1 月 14 日，全国政协的一些群众组织也宣布在政协夺权，引起了另一派群众组织的反对，双方发生冲突。1 月 15 日凌晨 1 时 15 分，中央统战部“东方红”和学部民族研究所“彻底摧毁中央统战部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红色联络站”，简称“红色联络站”200 余人，将全国政协自建国以来的全部档案，包括人事档案，全部抢运一空。2 时 20 分，“红色联络站”原班人马又跑到统战部，将统战部 1949 年以来的全部机密档案 100 多柜以及大批资料、文件装车运走，结果在路上一些档案从车上掉下来，散了一路。这是一起严重的档案丢失事件，当时被称为“115 档案事件”。

15 日当天，民族学院“红卫兵总部”和统战部“革命造反团”的部分群众就将“红色联络站”的头头、学部民族研究所洪涛和统战部“东方红”组织的负责人、统战部宗教处副处长、国务院宗教局第一副局长刘郢扭送到公安部。统战部部长张经武也向周

恩来汇报了这件事。周恩来指示：由中央并公安部为一方，抢档案的为一方，民族学院“红卫兵总部”为一方，三方面协商，追回档案。

下午，国务院办公室副主任、公安部副部长严佑民，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副局长曹幼明亲临现场。严佑民说：“我们来是总理指示的，总理很关心，怕国家机密被弄走。”并指出：“这个事件是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抢档案事件。”“这是严重的政治事件”。

## 第 412 回：一一五，一轻部学生夺权 陈伯达，讲话反对“接管风”

1 月 15 日凌晨，北京轻工业学院 “红色造反委员会”的“井冈山战斗兵团”到第一轻工业部夺权，发表了《关于接管第一轻工业部的通告》。2 时，戚本禹在政协礼堂接见了北京轻工业学院“红色造反委员会”部分代表。

戚本禹说：“都是老熟人了，大家随便谈谈吧！你们是中央文革最早支持的，现在对你们的情况我不太满意，可能我不太了解你们的情况。我们从你们学校发现了‘逆流’；当时刘、邓路线压得很厉害，就写了报告，那时我还没意识到是刘邓路线，知道你们受迫害的情况，我好几夜没睡好觉。我去你们学校去得早了，这一点你们可以批评我，我接受你们的批评。去晚一点，让他们多暴露、暴露就好了。同志！受到迫害有好处吧？”

同学答：“有好处！”

戚本禹：“那时是 7 月初吧？”

同学：“7 月 6 日。”

戚本禹：“到你们学校里，那家伙（工作队的）凶凶的，还要赶我走，还报告保卫科、武装部都出来了。”

同学：“你的汽车号码都记下了。”

戚本禹：“当时对我很厉害，后来你们整他一下没有？”

同学：“整了，他们还整理了你的材料哩！”

戚本禹：“他们整理了我的，我也整理了他们的。我先告状了，陈伯达同志批了，让戚本禹当观察员，第一天赶我回去，我回来

就向他们抗议。我知道是薄一波搞的，薄一波还装样子。

我觉得你们不如北航‘红旗’，你们是中央文革最早支持的。清华蒯大富也在后，现在不如北航‘红旗’，你们是否觉得有差距？”

同学：“有差距，还不小呢？我们学校反对中央文革的家伙们还没回来，老在外地‘避难’。”

戚本禹：“那你们把他们揪回来，揪回来不一定送公安部，送公安部他倒轻松了，他吃的好，住的好。回来斗他，给他压力，叫他坦白交待，检讨好了还可以，检讨不好就不行。有些人的改变是要有一定压力的。”

同学：“我们学校里，最近忙于下厂、下乡的同学很多，当权派还给他们很多钱，还给介绍到专业工厂里去；还要到上海、广州、昆明等地去找工厂。”

戚本禹：“都是搞经济主义，钱不能乱给，谁给的？”

同学：“院党委。”

戚本禹：“要院党委给追回来，为什么不在北京找工厂？你们和党委谈判，下厂、下乡要有组织的下，应统一安排，和工农相结合，提倡步行，不要发路费。钱要追回来，不然就扣发党委的工资，叫他们赔。乘车串联已经停止了，和工农相结合应当步行出去。下厂、下乡发助学金就行了，你们多少助学金”

同学：“17．5 元，这是最高的。”

戚本禹：“不低了，只要有饭吃，能劳动就行了，要那么多钱干什么？不够可以适当的补助。告诉你们，毛主席当年在湖南搞运动只 40 块大洋合人民币 120 元，就搞了全省的运动，你们一

个人就几十元，你们可以回去宣传一下。有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用经济主义抗拒毛主席的领导，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阴谋，不要上他们的当，相信大多数不会上当，极少数还是要上当的，你们回去可以宣传吗？”

同学:“目前学校里下厂、下乡和学校里斗批改如何结合起来，下厂、下乡有的三三两两就走了。”

戚本禹：“这两个月大部分应留在学校里搞运动，主要批判刘邓路线，批判经济主义，同学也可下厂下乡和工农兵结合，但一定要有组织。三三两两去干什么呢？你们把他们组织起来。你们应当把薄一波好好斗一下，你们学校应当演主角。”

戚本禹正在与轻工业学院的同学谈论轻工业学院的运动情况时，政协礼堂的两派组织突然闯进会场，要求戚本禹接见。戚本禹对他们说：“今天接见同学，你们协商一下，双方各留下一名或两名服务员，其余的同志都回去好不好？”

政协礼堂的两派群众回去了，戚本禹对轻工业学院的同学说：“你们看，哪里都有斗争，有斗争就有希望。”

同学：“我们已经 48 小时没有睡觉了。”

戚本禹：“辛苦了，我 3 天睡了 4 个小时。”

他看了北京轻工业学院“红色造反委员会”、“井冈山战斗兵团”关于接管第一轻工业部的《通告》后问:“你们准备怎么干？”

同学答:“我们要监督轻工业部的工作，监督轻工业部的财政开支，我们不当部长，当不了。”

戚本禹：“那不一定，要破除迷信，我相信年青的一代，只要努力学习毛泽东思想就能干嘛，不要当官，但要关心国家大事，

掌握国家命运。”

同学：“我们主要是监督他们工作，恢复正常的工作秩序。”

戚本禹：“行，你们这样干行。”

同学：“一轻部住了 6000 多外地工人，吃饭不给钱，有的还要钱，要小汽车，要汽油……”

戚本禹：“这个问题你们集体商量一下，再和工人商量一下，吃饭不给钱这太不合理，工人与学生不同，……一定要监督轻工业部的财政开支，流动资金冻结。”

同学：“温州地区银行两天就发出 1000 多万元……”

戚本禹：“都是搞经济主义，有些人想从经济上搞垮我们，很恶毒。我们要为国家着想；一个人多从国家拿一块钱，这要给国家造成多大负担啊，大家不要上当。你们回去讨论一下，可以和别的组织联合发通告嘛，上海这个联合行动搞得好，你们回去想想办法，一定比我想出来的好。”

在谈到有全国性的组织时，戚本禹说：“当前成立全国性的组织是不适宜的，我们一个都没有承认，比如有 3 个人搞了一个什么‘全国工农兵造反委员会’。他们自己说，一个是工人，一个是农民，一个是军人，还刻了一个公章，随身携带，到处盖章，后来他们抢了××部的机密档案，我们就把他们全部逮捕了。”

同学：“余秋里的全权代表林乎加说有价值的黑材料应当拿出来批判，不能一烧了之。”

戚本禹：“同学整的黑材料应当一烧了之，我们应当有无产阶级的胸怀，他交出来连看也不看，就把它烧掉。林乎加这个人很坏，你们应该揪他。”

同学："据我们了解有的整同学的黑材料已经装入个人档案了。"

戚本禹："档案不要动，现在主要是夺权，否则即使现在把材料拿出来，他以后还要整你的，斗争胜利了，我们再把档案审查一遍。"

同学："我们学校有人说：中央文革有人参加了'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召开的会议。

戚本禹："没有这回事，这是造谣。他们给了我请帖，我没去，'联动'的大方向是错误的嘛！"

在谈到"一切权力归左派"时，戚本禹说："'一切权力归左派'这样说法是有片面性，应该是给归以左派为核心的革命群众。你们看毛主席的指示，就是要夺权，把权夺到以左派为核心的革命群众手中。革命左派要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大方向下团结起来，左派队伍要联合起来。毛主席指出要组成浩浩荡荡的革命队伍，否则就成了毛主席所说的'为丛驱雀，为渊驱鱼'了。"

当谈到左派队伍的出身时，戚本禹询问了同学的出身后说："什么'红五类'，根本不科学，我就不赞成。不过，出身好的大多数都很好，我接触过很多出身好的，他们都很好。李洪山出身贫农，但他反毛主席、林副主席就抓，戚本禹是可以反对的，是不怕反对的。你们不要叫我首长，我是无足轻重的。我和关锋都是一般干部，和你们一样，不要弄得我很被动。"

同学："有人污蔑江青同志是小资产阶级感情。"

戚本禹："江青同志的无产阶级感情很深厚，旗帜很鲜明，我很佩服她的。你们要对这些人说：你不仅是小资产阶级感情，而

且是资产阶级感情。”

中央文革让北京市委书记吴德出来与北京造反派商量共同夺权一事。1 月 15 日早上，北京一些造反派组织的头头被召到大会堂，吴德出来和他们商量北京市的夺权问题。但他还没说几句话，就当场受到一阵炮轰，说他是走资派，错误路线代表等等……

吴德不再说话，一脸无奈的从会场上退了出去，找到正在人民大会堂的周恩来。

周恩来将吴德带到中央文革小组那里，然后自己来到会场，对大家说：“吴德是个老实厚道人，他犯了错误要给机会，允许他改正，……”

最后，周恩来对大家说，正要召开一个全国性的抓革命，促生产誓师大会，他让大家先去参加这个大会。

为响应上海的《紧急通告》，1 月 15 日下午，北京及外地 150 多个组织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首都和外地在京革命造反团体抓革命、促生产，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新胜利誓师大会》，欢呼中央给上海造反派的贺电。陈伯达和周恩来先后在会上讲了话，号召各地造反派向上海造反派学习，反对经济主义、搞好“抓革命促生产”、实行大联合。

陈伯达在讲话中回顾了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走资派”反对群众参加文化大革命的过程，他说：“后来，工人、农民起来了，投入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他们先是借口要搞生产，不搞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现在，“要用让大家革命的名义来破坏生产。他们企图用停止生产、中断交通的办法来瘫痪我们的国民经济，败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名誉。”“刚才我在休息室里，上海工

人同志和我讲，他们又有一个新花样：工厂让你们接管嘛！……他们好跳到后台去，让我们的社会秩序、经济秩序搞不好，他们想在那里看笑话。”

陈伯达说：“刚才同一些工人同志商量，一般不用接管的办法，采取派群众代表监督的方式，他们想偷懒，想让我们忙得不得了，他们好坐山观虎斗。我们如用监督的形式就更好、更主动一点，当然个别地方、个别机关也可用接管的办法，但大量的不要用接管，大量的接管是要上当的，因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代表人物要看我们笑话，要当心呀！”

陈伯达号召“无产阶级革命派要联合起来。”他说：“大家的行动、大家的口号是：无产阶级革命派要联合起来。有什么问题，大家，各个无产阶级革命派要商量，开联席会议，这样妥当不妥当？不要搞小团体主义，而要搞联合。”

“总之，一切无产阶级革命派要联合起来！

革命的工人、革命的农民、革命的师生要联合起来！

革命干部和革命群众要联合起来！

在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下联合起来！”

接着，周恩来讲话，他说：“刚才陈伯达同志的讲话我完全同意。你们的誓师大会，响应上海革命群众组织对上海全市工人书的倡议，抓革命、促生产，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你们做得对，做得好！”

周恩来在讲话中也强调不要形成接管风。他说：“我欢迎上海革命群众派来的代表参加我们的誓师大会，他们不愧为上海先进工人，革命学生的代表，我们支持你们高举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

阶级革命路线，支持你们继续抓革命促生产，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我们支持你们反对经济主义，支持你们反对矛盾上交，主张打回老家去，就地搞革命。刚才陈伯达同志说得对，我们要像上海工人警告的那样防止接管风。革命靠自己，每个工厂、单位，都应提高革命造反派，把力量组织起来，监督他们认真抓业务工作，不要让他们躲在后面，叫我们上当。”

当天，周恩来在财贸系统“革命造反派联络委员会”代表座谈会上也说到“接管”一事。他说：

“在上海有个接管风，陈伯达在体育场回答了这个问题。当前是反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但新反扑不止经济主义一种形式，最突出的是矛盾上交。经济主义和矛盾上交是分不开的。……现在又出现了一个问题，就是接管，一个单位内部烂透了，内部起来闹革命，外力给予支援，实行接管。现在接管变成一个风气，本单位内部还没有形成革命力量，外边就去接管。”

“接管是监督的性质，监督的好处是业务可以继续。对领导，严重的像铁道部吕正操，武竞天，现在决定采取撤职留用，考察三个月。”

“夺权是夺的监督权，不是管业务，否则你们就陷入业务圈子，影响闹革命。粮食部革命派写来一封信，说从今天起夺监督权。我赞成由先念同志找你部几派商量一下。粮食调度是很灵敏的，不要影响业务。接管《红旗》十六期刊登了，是我们主张的。但不能一下子说接管都接管，中央商量了，采用监督方式，不接管业务。”

会后，周恩来又把参加讨论北京夺权的各组织代表召集在一

个小会议室里，讲了话。

## 第 413 回：耿金章，开进上海康平路　毛泽东，明确“就是要夺权！”

上海市虽然开接管、夺权之先河，但还没有人像山西那样去接管上海市委、市人委的大权。1 月中旬，不知从什么地方冒出来一个“工八司”，是“工人造反第八司令部”的简称。这个“工八司”联合了几个小组织，装了几卡车人，直接开进了康平路市委大院，把除了档案室和机要室以外的地方，统统占领起来，贴出大布告，宣布夺了上海市委的权。徐景贤急忙向张春桥、姚文元汇报，他们听后大为恼火，要徐景贤打电话通知“工八司”等组织马上撤出。徐景贤把电话打进康平路总机室时，只听得电话那头一片乱哄哄的声音，原来是夺权者要接管电话总机，正在和接线员发生激烈的争吵。徐景贤就势找到“工八司”的头头，在电话里严肃地告诉他：“你们没有和上海的主要组织协商，是没有资格接管市委的，要马上撤出来！”

那个头头提出抗议说：“我们的大方向是正确的！”

徐景贤也不客气的警告说：“这不是我的意见，是中央文革首长张春桥同志和姚文元同志的意见，你们如果不执行的话，一切后果由你们自己负责！”说完就把电话挂上了。

电话那头的人一听张春桥和姚文元都不支待他们，只好贴了几张大字报便灰溜溜地撤走了。

“上三司”的负责人赵全国也想接管上海市委和市人委，他去找“二兵团”耿金章，成立了有 11 个群众组织参加的联合机构。1 月 14 日晚，赵全国和耿金章又召开第二次会议。赵全国

主张成立临时督管委员会，让张春桥和姚文元担任主任和副主任。他请耿金章问张春桥是否同意，耿金章当场给张春桥打电话，张春桥说："需要请示中央再给你答复。"

耿金章放下电话便将张春桥的话告诉了赵全国。赵全国却说"先斩后奏，先接管起来再说。"

这时，"二兵团"常委张虎根带来一个消息，说"红革会"也有进驻上海市委和华东局的打算。大家觉得形势紧迫，"红三司"已接管了市公安局，说不定"红革会"也正准备接管上海市委，"上三司"常委们当即决定立即行动。

1 月 15 日凌晨 3 时 30 分，"上三司"和"二兵团"300 多人以及一些其他造反组织的造反派，冲进康平路市委大院，守门的警卫来不及打电话通知，就被这些人控制起来。接着他们直奔市委办公室，将存放公章的办公桌砸开，夺了上海市委权力象征的大印，接着是一片欢呼，宣告"成功地"进行了"夺权斗争"。随后，赵全国所在的上海戏剧学院"革命楼"的红卫兵，占领了延安西路 33 号市委办公大楼，插上"上三司"的大旗，以示接管；接着外滩的市人委办公大楼也被占领。他们又在上海的大街小巷到处张贴大红喜报，散发传单，宣告接管胜利。

和山西一样，他们也将各种图章收了半袋子，同时向北京发出"给毛主席的致敬电"，汇报他们已经夺了上海市委的权，要求中央承认；同时还在汇报中提名由张春桥担任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兼市长，提名姚文元担任市委第二书记兼副市长，请求毛泽东和党中央批准。

他们还发布了三项《通令》：

第一，声讨上海市委、市人委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罪行，宣布接管上海市委、市人委；

第二，任命张春桥为上海新市委第一书记兼市长，姚文元为新市委第二书记兼副市长；

第三，责令原上海市委、市人委的所有机关干部，回原岗位办公。

第四，向所有外出“串联”的赤卫队员发出紧急通令，希望他们自通令生效时间起二周内全部返回原单位(在本市的三天内)。

这第四个通令，赵全国说暂时不要发，等中央表态后再发。但下面的人还是马上就发了。

耿金章的“二兵团”早在 1966 年 12 月上旬，就联络了上海 14 个造反组织，成立了“上海市革命造反派联络部”，简称“联络部”，位于与淮海路相邻的永福路 252 号，其斜对面 121 号就是“二兵团”的总部。离此不远的巨鹿路 691 号则是王洪文和潘国平的“工总司”总部与“炮司”总部所在，三个地方相距都不是很远，彼此间纠纷不断。

当时的永福路附近，全都控制在耿金章的手里。“二兵团”和“工总司”经常互相派出探子，探体内部对方的虚实。有一次，王洪文派王金海来“联络部”探听情况，被耿金章当场抓住，关进楼梯间里。不知耿金章是忘记了有人被关在里面还是有其他原因，没有给人家送饭，饿得王金海哇哇大叫。那天“联络部”只有少数几个人值班，几个值班的听得有人大叫，一看是王金海。没有办法，几个人只好一起出钱买点心给王金海吃。王金海求值

班的放了他，可是值班的都不敢，因为老耿知道了，谁也担当不起。“联络部”经常接到报告，说某某人带着多少人马向“联络部”过来，耿金章马上电令亲兵出动来一个反包围，很快把这些来犯的人逼退。但有一次老耿的亲兵来得晚，来人冲进“联络部”，说要捉拿耿金章，幸亏当时联络部里有 20 多个人，手挽着手堵住耿金章所在的小房间，不让来人靠近耿金章，老耿总算没有被抓。大约 10 分钟以后，耿金章的大队亲兵赶到，那些来犯的人，才纷纷逃散。

此时上海民航局以及造纸公司、食品公司的造反队，都归到“二兵团”的名下，谁要坐飞机或是办小报，甚至开大会准备食品等，都要有求于他。

清晨 7 时，就在耿金章、赵全国他们接管上海市委、市人委不到四小时，张春桥秘书何秀文打来电话，要耿金章立即去兴国路招待所。

耿金章赶到后，张春桥问他：“你占领这些空房子干什么？你占领这些空房子根本没有用，市委这些领导照样可以办公。”张春桥要求耿金章他们马上撤出去。

耿金章连忙打电话过去，让进占市委、市人委的“二兵团”撤出。

1 月 15 日这天，张春桥、姚文元在上海按计划接见各群众组织代表。

张春桥说：“现在接管成风！有的有利，有的不一定有利。”“我建议把总工会接管，把‘工人造反司令部’的牌子挂上，抽一部分来接待，快速调查一下，多少空房子，有多少炊事员……

目前不做 50 万人来沪串连的人的打算是要被动的。主席很关心上海，一是经济问题，全国都有；第二是上海工人阶级强大，在党政机关瘫痪以后，自己搞起来。”

这时，有人提出要彻底改组上海市委，姚文元说：“那你们提个方案，谁当第一书记？”

“工总司”的代表说：“要中央派嘛。”

张春桥：“现在叫谁当上海市委第一书记，一样过两天就变成斗争的对象，黑龙江省委改组了，下面一套班子没动，思想没过来，潘复生同志是个好同志，现在压力很大。”

张春桥说的应该是反映了当时中央文革和毛泽东的看法：省、市的权夺了，但机关的工作人员没有变，还在沿袭文革前的工作方式，那这种夺权、革命不就是换了一块牌子，政府的职能并没有改变，换汤不换药而已。

张春桥接着说：“分裂这个问题要做思想准备，我可以公开讲，我希望要把‘工人造反司令部’这个旗号举起来，不要把这个旗号放下，‘工人造反总司令部’，不但在国内有影响，在国外都有影响，外国通讯社有影响，外国通讯社都转播了《告全市人民书》，说‘工人造反司令部’是毛泽东一派，‘赤卫队’是反毛泽东一派。”

他对“工总司”说：“你们总司令部搬到市总工会去，集中起来可以自己搞点警卫队员，不行可找公安人员，到必要时我要向中央提，叫解放军保卫你们，集中就好保卫，现在正在进行经济方面的斗争，一定要把这仗打好。毛主席对上海关心很细致，主席对‘火烧陈丕显，揪出曹荻秋，打倒杨西光，砸烂常溪萍’这

个口号都背熟极了，我还背不出来呢。”

“要善于联合，毛主席提出两个中间地带，这只有毛主席才能提出来的，现在不是打倒一切帝国主义，要联合法国，打倒美帝国主义。”

“希望上海的革命派联合起来，把文化大革命搞好。”

赵全国不相信张春桥不支持他们接管，当天下午去衡山饭店找耿金章，了解张春桥的意思。耿金章告诉他们说：

张春桥同志听到夺权很恼火，要你们马上撤出去。张春桥还讲“你们十一个组织联合夺权是想把市委的烂摊子压在我身上，使我在上海待不下去，最后将我压出上海”。

中央在 15 日当天也收到上海“工总司二兵团”发来的接管市委和要求张春桥任上海市一把手的电报。就在“首都和外地在京革命造反团体抓革命、促生产，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新胜利誓师大会”散会后不久，毛泽东就知道了大会的情况。

15 日夜，中央碰头会在怀仁堂召开，周恩来主持。16 日凌晨，会议转到人民大会堂 118 室继续进行，改为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由毛泽东主持。毛泽东说：“我们的干部十几年来有些人变质了。”

说到各地的夺权，毛泽东说：“左派群众起来夺权，这是好的。右派夺权当然不好。左派的力量发展很快。上海的左派工人去年 11 月上旬只有 1000 多人，今年 1 月上旬 100 万，再加上学生，就是主力。”“军队接管电台，只能在左派不占优势时暂时接管，如左派占了优势，就交给他们去管。过去是军队打江山，现在是

工农自己打江山，军队帮助。军队完全不介入是不可能的。领导去和大家见面嘛，运动中不要怕群众。聂荣臻同志，你去见了半个小时，人家不是就鼓掌欢送你嘛。无论什么时候都要平等待人。群众运动像雨后春笋一样，问题是看你怎样下雨。”

对上海耿金章推荐张春桥、姚文元任上海市委书记的做法，毛泽东说：“群众选举新的干部，就让他们选嘛！厂长、书记让他们去选。被接管的地方可以选。”

他再次表示了对“接管”的赞同：“接管很好，只管政务，不管业务，事情还是原来的人去搞，我们只管监督。”

王力立即给张春桥打来电话，向他传达了毛泽东当天的讲话内容。

16 日凌晨，徐景贤接到张春桥秘书的电话，通知他到兴国路招恃所去。

徐景贤来到兴国路招待所五号楼。张春桥在客厅里见到徐景贤后，对他说：“今天就找你和耿金章两个人来，要和你们谈一些事。”

耿金章来了。客厅里，他与徐景贤面向张春桥和姚文元，并排坐下。张春桥和蔼的问道：“老耿呀，你们‘二兵团’这次调了多少人进康平路呢？”

耿金章十分自豪的回答：“里面的几百人都是我调去的，他们‘上三司’根本没有几个人，其它参加夺权的组织更是摆摆样子的！”

张春桥又问：“这么说，‘二兵团’是这次夺权的主力了？”

这时，服务员端茶上来，耿金章呷了一口，把顺带喝进去的

一片茶叶吐在地毯上，抹抹嘴巴，大大咧咧地说“是呀，没有我们‘二兵团’，他们谁也夺不成！”

姚文元插嘴问到：“你们夺权以后给毛主席、党中央发了一个电报，你知道不知道？”

耿金章十分干脆的回答说：“知道。电报我没有看过，但是‘二兵团’的联络员给我说过这件事。”

张春桥这时转入正题：“今天找你来，就是要谈这个问题。你们和‘上三司’等夺权，只是少数几个组织干的，别的组织都没有参加，要是承认你们的话，会引起很大的矛盾。前一时期，别的组织的夺权，我们都没有承认。最近，我和文元准备召开上海各个造反组织的联席会议，你们也可以参加，大家共同来讨纶上海夺权以后政权的形式问题。所以，希望‘二兵团’能够从康平路退出来。”

耿金章点起一支烟，抽了几口，默不作声。

张春桥接着说：“但是，有一件事应当告诉你们，就是你们发到中央去的电报，提名张春桥担任市委第一书记兼市长，姚文元担任市委第二书记兼副市长，毛主席已经看到了，毛主席还有指示。”

耿金章和徐景贤一听“毛主席有指示”，马上瞪大了眼睛，集中注意力，正襟危坐，屏息静听。

张春桥缓慢地，一字一句地传达道：

“王力说：今天政治局开会，毛主席要我打电话给张春桥，要张春桥告诉‘第二兵团’的群众组织，赞成他们推选张春桥任上海市第一书记兼市长，姚文元任第二书记兼副市长。对‘二兵

团’和‘上三司’通令中提到的名字，我赞成，这两个人我知道。但总不能只有两个人，还应当有一个更多人的名单。酝酿一下报告中央。也同意春桥的意见，暂不宣布，做一做工作，多搞几个回合，再宣布。原则上是自己解放自己。告诉‘第二兵团’等接管组织，让他们知道党中央和毛主席是支持他们的。

毛主席说：上海这个办法好，群众接管这个办法是好的，比以前改组北京市委办法好。

毛主席说：我们过去的革命，是军队打江山，农村包围城市，进城以后，组织原封不动，自上而下派人接管，旧人员包下来，解放战争发展很快，老党员进了城，。我们的干部十几年来有些变了质，主观得很。现在是工农自己打江山，军队帮助，群众选举新的干部，就让他们选嘛！厂长、书记让他们去选。被接管的地方可以选。这个办法，群众起来夺权，上海这个办法好。左派起来夺权，这是好事。右派夺权当然不好，左派的力量发展很快。看起来，上海的左派工人十一月上旬，革命力量小，只有一千多人，今年一月上旬，两个月，有上百万，再加上学生，就是主力。群众的力量不可抗拒。

上海应成立两个正式班子，一个市委。一个人委，名单报中央批准。让他们开会酝酿。

毛主席批评一些人不懂道理，骂群众。革了这么久的命，变成了保守派。有些人组织什么非常委员会，联合行动委员会，等等，都是从娘老子学来的。我们的干部要赶快觉悟，站到群众一边来。不转就靠边站，给他饭吃。他们骂群众是洪水猛兽，对他们来说，就是洪水猛兽。不以你的意志为转移。群众是压不住的。

军队干部要教育。军队不介入，其实很介入，不沾边，办不到，不站在保守派一边，就站在革命派一边。过去是军队打江山，现在是群众起来闹革命。”

说到这里，张春桥微微仰起头，用右手的食指和中指夹看一支香烟，深深地吸了一口。他的高高突起的额角上泛着红光，他的眼神在淡黄色边框的玳瑁眼镜后面凝住了，仿佛在思索将来的事情……

他继续平静地说道：“因为这是毛主席看了你们的汇报以后的指示，我和文元考虑不好对你们封锁，所以决定找你们来传达一下，让你们知道。但是，因为你是这几个夺权组织中最主要的组织，所以我向你传达毛主席的指示，希望你去找其他几个组织一起谈一下。不便把‘上三司’等其它组织统统找来，就找你耿金章作为代表。至于要我提名市委委员的问题，现在看来时机还没有成熟，需要在运动发展的过程中再考察了解一下。”

耿金章听到毛主席支持自己的行动，非常高兴。问是否马上成立联合夺权委员会，让张春桥和姚文元任主任、副主任。

张春桥没有立即回答。等了一会儿才说：“时间还早，没成熟，上海的文革运动刚开始，搞得还不深，马上成立这个机构还过早。”

耿金章不解，问道：“中央已经同意了，为啥还要拖？”

张春桥说：“我已经对你说了，时机不成熟”，“你回去要对赵全国，张虎根做好工作，对他们讲现在时机还不成熟，我准备向中央汇报。”

张春桥又说：“你们这次夺权，大方向是对的，提的建议也是

好的，但是因为只有几个组织夺权，还有很多组织没有参加，所以我考虑还是要搞联合夺权。你们几个组织是还是从康平路撤出来，再和其他组织商量联合夺权。”

接着，张春桥谈起耿金章的身世，还提到耿金章从小是他姐姐领大的，因为父母去世得早，所以他对穷苦的姐姐感情很深，等等。耿金章一听，张春桥对自己竟然了如指掌，十分惊讶。

张春桥笑笑说：“你的档案材料我都看过。你们‘工总司’几个人的材料我全看过，过去市委不是说你们‘工总司’的头头都是一些‘社会渣滓’吗？我对你们这些‘社会渣滓’总应该有所了解呀！”

耿金章嘿嘿地笑起来。客厅里的气氛非常融洽。他当场就爽快地表态说：“那好，我回去就通知‘二兵团’，还要做做‘上三司’的工作，至于什么时候开联席会议，我就等春桥同志和文元同志通知吧！”

此时，徐景贤的内心异常兴奋和激动，因为张春桥和姚文元在召见耿金章的时候特意让他到场，向他们传达了如此重大的消息，这说明张春桥和姚文元对他信任有加。徐景贤颇有点受宠若惊。

谈话结束，张春桥特地关照何秘书备夜宵，厨师做了满满的一大锅肉丝汤面，似乎是对耿金章和他随行人员的犒赏。耿金章他们把一锅面稀里呼噜地吃了个精光。

吃完饭，张春桥和姚文元又亲自送耿金章上车。耿金章的轿车开动了。回头一看，张春桥和姚文元还在那里向他频频挥手。

一清早，耿金章把张春桥传达的毛泽东的指示，告诉了“上

三司”的头头赵全国。

对此，赵全国很不服气：“你张春桥和姚文元当市委书记还是我主张向中央打电报提名的哩，可是现在居然把我撇开了，单独召见耿金章，也太小看我们了”

但是，在拥有几十万人马的“工总司二兵团”撤出康平路之后，“红三司”等 10 个组织势单力薄，不成气候，赵全国策划的第一次夺权也只好流产了。

赵全国很生气，这个上海市第一个站出来贴党委大字报的大学生，曾在 1966 年底将华东六省一市的省、市委书记揪到上海，准备以“上三司”为主在虹口体育场召开一次华东地区批斗大会，被周恩来亲自打电话予以制止的人，岂肯就此善罢甘休？他当即组织了一个 5 人代表团，飞往北京告状。

## 第 414 回：追凶手，浙江省军区被封　说“兵变”，许光达会后被关

真是一波刚平，一波又起。1 月 14 日，昆明群众在周恩来的艰难劝说下刚刚撤离昆明军区，1 月 15 日下午 17 时，浙江省杭州市又发生 85 个群众组织联合行动，封了浙江省军区司令部大楼的事件。同日，另一部分造反派又以要省军区文工团 26 名演员回省歌舞团参加文化大革命为由，进入浙江省军区政治部大院。学生们在传单中引用《解放军报》社论：“在军队的文化大革命中，到底有没有两条路线的斗争？事实证明，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在军队内部不仅存在，而且是尖锐的、复杂的。”“军队的文化大革命一定要搞好，搞彻底，这一点是共同的，毫无疑义的，决不能借口军队情况特殊，而有丝毫的动摇！”他们在传单中指责浙江省军区在文化大革命中窝藏黑材料、隐藏走资派、包庇杀人凶手、纵容杭州市“大中学校红卫兵司令部”践踏《十六条》、挑动解放军斗群众、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最后说：“难道这样的司令部不该火烧吗？这样的司令部不该炮轰吗？这样的当权派不该揪出吗？这样的当权派不该打倒吗？就是要把他们一个个揪出！一个个打倒！”

原来，1966 年 12 月 23 日深夜，“浙江省红色造反联络站”等组织 1000 余人为追查省委存放在浙江省军区内的“黑材料”，在“首都三司驻杭联络站”的策划支持下，冲进了浙江省军区司令部大院。

第二天，12 月 24 日，浙江大学“红色造反联络站”为了寻找浙江省委书记处书记兼浙江大学党委书记陈伟达也来到浙江省军区司令部大院。

25 日，浙江省军区司令员龙潜带领数十人到司令部大院接见浙江大学的红卫兵。龙潜不承认陈伟达在省军区，同时指出：上级有指示，不得冲击军事机关，浙江大学红卫兵的做法是错误的。为此，浙江大学派出张根生等 6 名学生赴北京向中央军委反映情况，状告浙江省军区窝藏“黑材料”，窝藏当权派。

27 日，南京军区政委杜平电报向林彪报告浙江省军区与浙江大学“红色造反联络站”谈判情况，当天下午 17 时 30 分，林彪指示：

要把学生的工作，当作群众工作来做，这是送上门来的群众工作。不但不应该就这个问题引起军队与学生的对抗，而且应当借这个机会，大力加强和革命学生的团结。处理这个问题的原则要重申以下三条：

（一）领导同志要挺身而出，同群众见面。既不能躲、也不能压，愈躲愈压愈糟糕。

（二）对学生提出的正确批评，要诚恳接受、完全接受。自己做错的要坦率进行自我批评。他们合理的要求，凡能做到的，要完全做到。对他们不正确的意见和不合理的要求，要进行解释和教育。

（三）从头到尾要贯彻对学生热情、友好、耐心的态度。在耐心的问题上，军队上要做出榜样。听了反面的话，绝不能粗暴，发脾气。

当天，毛泽东在《林彪关于浙江问题的指示》上批示：

林彪同志，此件应发到全军营以上各级机关去。

1966 年 12 月 29 日，中共中央转发《毛主席、林副主席关于浙江问题的重要指示》：

1966.12.29；中发［66］622 号

毛主席的批示：

林彪同志：

此件应发到全军营以上各机关去。

毛 泽 东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12 月 30 日，《浙江日报》社被“浙江省革命造反联合总指挥部”，简称“省联总”，联合省内外 22 个造反组织查封。这天，浙江大学张根生等 6 人也到达北京。

1967 年 1 月 2 日，南京军区政委杜平给浙江省军区打来电话：“浙江大学张根生等 6 人，去年 12 月 30 日到达北京，向中央军委告浙江省军区政委龙潜的状，说龙潜干涉地方文化大革命，窝藏省委黑材料和省委负责同志等，军委答复三条：一、你们的革命行动我们坚决支持，你们揭浙江省军区的问题我们欢迎；二、浙江省军区有错误就要认真检查；三、责成南京军区派人到浙江省军区共同商量解决问题。”

1 月 7 日，杭州街头贴出龙潜、张秀龙窝藏杀人凶手张进沪、杨春生的大字报。

张进沪，时为杭四中学生，是浙江省军区司令员张秀龙的儿子。1966 年 8 月 30 日，他和一些学生在“破四旧”时，将杭州

四中一教师的妻子和岳母打死。1967 年初，在造反派的一次集会上，死者家属哭诉了此事，愤怒的群众来到浙江省军区，要求张秀龙交出其作为杀人凶手的儿子。张秀龙不同意，事态扩大，最终群众冲进了浙江省军区。

1 月 13 日，杭州市学生和群众数百人再次到军区政治部大院，强烈要求张秀龙交出杀人犯法的儿子张进沪。13 日下午，张秀龙被群众抓走，龙潜忙命令部队去抢回来。

1 月 14 日，中央《关于不得把斗争锋芒指向军队的通知》一下达，浙江省军区马上通知司令部大门口拦住，不准学生出去。

14 日这天，杭州市 8 名红卫兵在军区 117 医院绝食，要求见省军区阮贤榜副司令员。晚上，“省红色造反联络站”等数十个群众组织，到省军区司令部大院，要求交出省军区司令员张秀龙和副参谋长杨信的儿子张进沪、杨春生。到了 15 日下午，终于发生了群众封闭省军区司令部大楼的事件。

而在北京，15 日这天，万寿路的海军司令部大院，海军机关的“海军红色造反联合司令部”，简称“红联总”，斗争海军第一政委苏振华上将。他们把军大衣的白色里子翻过来穿在苏振华的身上，然后围成一个大圈，将苏振华置于中间，挥舞拳头、喊着口号要他交代问题。

在此之前，海军“红联总”在海军机关贴出了关于贺龙搞“二月兵变”的大字报，还油印了许多“战报”。

第二天，1 月 16 日，海军党委下发文件，将“林彪 813 指示”转发海军各院校、海直各大部，并要求传达到师以上单位的党员干部。当天，海军一些群众组织召开“摧毁海军苏记黑司令部”

大会，再次揪斗海军第一政委苏振华。

1 月 15 日，装甲兵司令部机关的造反派到海军司令部调查，核实贺龙和装甲兵司令许光达、海军政委苏振华等人在“二月兵变”中是否有联系，正赶上“红联总”揪斗苏振华。1 月 16 日，装甲兵机关一个造反派在装甲兵司令部大院内贴出了一张从海军司令部“红联总”那里传抄来的大字报，说贺龙搞“二月兵变”，许光达是“二月兵变的总参谋长”。这张大字报顿时在装甲兵大院引起了轰动，许多人看了大字报后，不相信，特别是“东风”、“革造”和“烈火兵团”等群众组织更是如此。“烈火兵团”的王宝湖、屈景富询问贴大字报的人：“你们的消息是哪里来的？”

贴大字报的人回答说：“是海军‘红联总’说的。”

原来那天下午，李作鹏在海军机关对军队院校来京的红卫兵代表及各总部群众代表讲话时说到:“贺龙要搞‘二月兵变’，许光达是总参谋长，还有王尚荣、廖汉生、黄新亭……”这些人听见风声，便行动起来了。

这天，正在住院的许光达回装甲兵司令部主持一个会议。晚饭过后，他正准备回医院，突然跑来一些机关干部和军校的学员，其中一个小青年喊道:“许光达，走，到办公室回答问题去。”说着，就将许光达拉走了。

许光达跟这一群人刚走，又来了一伙人闯进许光达的家中，为首的竟是他的生活秘书陈志文。一进门，陈志文就直奔许光达书房，打开保险柜，哗啦哗啦地把里面的东西全翻了出来。没有找到要找的东西，又开始翻许光达的写字台、书柜，还是一无所

获。后来，他又冲进其他房间，仍然没有搜出什么，就把许光达爱人邹靖华卧室里的一石膏仕女像给砸碎了，说是砸“四旧”。

之后，陈志文直接找到许光达的夫人邹靖华说出来意:“把‘二月兵变’的黑名单交出来！”

邹靖华这才明白他们要找什么。她心里那个气呀，不客气的说：“你是秘书，你都知道，还用问别人？！”

陈志文没办法，让其他人继续寻找，依然没有找到名单，却抄出了一面日本旗，如获至宝，说这是许光达叛国投敌的罪证。其实，这是许光达在抗日战争中从日军手中缴获的战利品。

再说许光达，他跟着那些人并没有去办公室，而是被带到装甲兵俱乐部。这里已经有好多人坐在那里，其中有装甲兵所属院校的学员，还有解放军三总部的群众代表，装甲兵机关大院里的人当然更是来了不少。俱乐部的气氛相当严肃，谁也不敢高声说话。一排戴着红袖章的军校学员坐在主席台上，手里都拿着《毛主席语录》。他们见许光达进来后，其中一人对他大声说道:

“许光达，你知道我们要你回答的问题吗？主要有三个：一、你交代‘二月兵变’的阴谋、篡夺总参谋长职权的罪行；二、你鼓吹‘没有技术就没有装甲兵’，是反对突出政治，是资产阶级军事观点；三、听说你有三个老婆，除了北京的一个，老家还有两个，这是犯重婚罪。”

许光达平静地扫视了一下全场，义正词严地说:“好吧，我现在来回答第一个问题。你们说的‘二月兵变’，我不清楚。谁都知道，如果搞‘兵变’，那是要掉脑袋的，我跟贺龙搞‘兵变’，我把脑袋挂在裤带上才抢个总参谋长当，而我现在就是国防部副

部长、大将，这个买卖太不划算，亏本的买卖我不干。”

会场上有人笑了，也有人在大声地质问。关于许光达有 3 个老婆之说，因为纯属无稽之谈，不了了之。会场吵吵闹闹，主持人也让许光达问得张口结舌。只好散会，但是将许光达关押起来，没让他再去医院。

1 月 16 日，《人民日报》全文转载了《红旗》杂志 1967 年第二期的评论员文章：《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文章中用黑体字刊出毛泽东的一段话：

“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里夺权，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革命，即无产阶级消灭资产阶级的革命。”

这篇评论员文章还写道：“光荣的上海工人阶级，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组成了百万革命造反大军。他们联合其他革命组织，迎头痛击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手中夺了权，建立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新秩序。势如破竹，锐不可挡，他们正在乘胜追击，扫荡抗拒历史车轮前进的垃圾。……

上海工人阶级，其他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的这一革命行动，标志着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到达了一个新的转折点，标志着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一个新的阶段。”

这篇评论员文章是王力、关锋写的。1 月 14 日，陈伯达送毛泽东审阅，他在这篇文稿上写道：“王力和关锋两同志给《红旗》写了一篇评论，请顺阅！”

毛泽东在文稿上批语：

伯达同志：

写得很好。

毛泽东

一月十四日

1 月 16 日，周恩来在接见石油系统职工造反联络总站和北京石油学院的代表时，表态支持夺权。他对北京石油学院“大庆公社”的代表说：“你们夺权的方向是对的，但是夺权的指导思想不纯洁。”

“考虑成立一个联合委员会，新的联合委员会就叫‘大庆公社’也未尝不可。我不强加于你们。总之，要建立一个联合委员会，掌握石油系统的文化大革命。” “搞个联合声明，把全石油系统领导权夺过来。”

他说：“联合委员会要有联合总站，部里的造反派，大庆公社和大专院校方面，可以提以下几点：第一、几方面发表联合宣言，接管文化革命的领导权。第二、大庆这面红旗不能倒。过去生产受了影响，是能搞好。第三、文化革命要夺领导权，生产还是监督好。”

周恩来对双方代表说：“回去后要消除对立情绪。‘大庆公社’总的方向符合中央精神，缺点是没有商量，太急躁了。”同时他对“职工革命造反联络站”代表说：“你们要照顾大局，不要再发联合声明了。和人家对立不好，生产还是监督，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权可以拿过来。”

这时，石油工业部领导康世恩、唐克、张定一、孙晓风、吴星锋、任成玉等人进入接待室。周恩来对他们说：“双方讨论了

一下，我们认为‘大庆公社’的大方向是对的。石油工业部领导文化大革命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有严重错误，甚至还有些罪行。‘大庆公社’提出接管文化革命的领导权，文化革命的领导权应该夺。”

他对康世恩等人说：“生产你们管，生产任务出了问题，还得找你们。”

## 第 415 回：电话劝，撤出浙江省军区　民院打，北京市夺权声声

16 日 0 时，国务院冶金部群众组织“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联合战斗团”和北京高校的一些群众组织，组成“‘抓革命促生产’指挥部”，宣布接管冶金部“抓革命促生产”的大权。

毛泽东 1 月 15 日支持上海造反派到市委夺权和 1 月 16 日关于夺权的讲话迅速传开，加上 1 月 16 日《红旗》杂志的那篇评论员文章《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北京的学生立即行动起来……

16 日这天，地质学院“东方红”联合地质所和地质部的“革命造反兵团”、“东方红革命造反兵团”、“保卫毛主席兵团”、“后勤革命造反兵团”，组成接管委员会，首先在地质部夺权，宣布成立“地质部革命造反委员会”。在成立大会上，何长工等部领导被叫到台上示众。

照片上并排站立的那 8 个人是被夺了权的原地质部领导，自

左至右依次是地质部副部长兼党组书记何长工、副部长胥光义、刘汉生、崔振东、宋应、张同钰、李轩、地质部政治部的副主任赵承丰。

1 月 16 日清晨 2 时，《北京日报》社“促使《北京日报》新生革命造反联络站”开了一个紧急会议，决定下午组织一次示威游行活动。

上午，北大“红旗兵团”参加“促使《北京日报》新生革命造反联络站”工作的扬子浪到北京地院、政法学院、矿院联络。当天，清华“井冈山”、地院“东方红”、北邮“东方红”等许多组织也都进驻《北京日报》社。“彻底摧毁旧《北京日报》，促进《北京日报》新生革命造反联络站”下午组织了游行，还发表了《呼吁书》。

总参三部下属的张家口技术工程学院造反组织消息也很灵通，16 日这一天在学院夺权。

1 月 16 日，哈尔滨 23 个单位的“红色造反者”在哈军工集会，宣布成立“哈尔滨红色造反者联合总部”，并发表《红色造反者联合接管省、市党政财文大权的公告》。

1 月 16 日，《云南日报》、云南广播电台被昆明“大联合指挥部”和本单位造反派组织夺权。

16 日晚，谭震林召集农口各部领导人谈话说：“看来夺权是势在必行，怎么夺法？你们讨论讨论。”

第二天，17 日上午，农业部支持谭震林的“延安兵团”公布了《夺权公告》，宣布要夺农业部党、政、财、文、生产和接待的大权，而他们的对立面，反对谭震林的“井冈山”、“红旗”等

组织则指控“延安兵团”是“假夺权、真保权”，拒绝和他们联合，随即串联了在京直属单位的同派组织和农业大学、劳动大学、农机学院的“东方红”等组织，提出成立“监察委员会”，对“延安兵团”的《夺权公告》予以抵制。农业部的夺权派成立了一个“农业部无产阶级革命造反联合管理委员会（临时）”，由“延安兵团”、“毛泽东思想游击纵队”、“红色职工造反团”等 5 个组织组成，聚集了 20 多位代表，瞒着对立面组织，悄悄地前往和平宾馆，同农业部代理部长江一真等人进行了长达 6 小时的谈判，江一真终于签名同意夺权，这就是著名的“农业部 117 夺权事件”。

与此同时，国务院农办“接管委员会”、水产部“红色革命造反接管委员会”、农垦部“文革委员会”的正、副主任、中央气象局“红卫”组织都纷纷宣布在本部、办夺权。林业部“革命造反团”也与部党组达成夺权协议。

1 月 16 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他在讲话中说：“我们的干部十几年来有些人变质了。左派群众起来夺权，这是好的。右派夺权当然不好。左派的力量发展很快。上海的左派工人去年 11 月上旬只有 1000 多人，今年 1 月上旬 100 万，再加上学生，就是主力。”“群众选举新的干部，就让他们选嘛！厂长、书记让他们去选。被接管的地方可以选。接管很好，只管政务，只管监督，不管业务，事情还是原来的人去搞。”“军队接管电台，只能在左派不占优势时暂时接管，如左派占了优势，就交给他们去管。过去是军队打江山，现在是工农自己打江山，军队帮助。军队完全不介入是不可能的。”“领导去和大家

见面嘛，运动中不要怕群众。聂荣臻同志，你去见了半个小时，人家不是就鼓掌欢送你嘛。”“无论什么时候都要平等待人。群众运动像雨后春笋一样，问题是看你怎样下雨。”

1 月 16 日晚，陈伯达、江青接见北京大学的聂元梓、孙蓬一，谈了王任重的问题。

聂元梓问:“到北京吃饭不花钱听说是主席批的，有这事吗？”

江青说：“不知道，这也是糖衣炮弹，到北京来什么人都有。”

聂元梓、孙蓬一汇报了北大按军训编制下厂做宣传，反对经济主义，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时，陈伯达、江青认为是做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指出到北京来的大多数是工人，对他们要进行宣传、动员。但是也有少数坏蛋，要分化瓦解他们。

聂元梓汇报说，有一些工人反映，有些学生尽当指挥，不当学生，工人依靠不了学生，要同学下去学习。工人起来，自己干！

陈伯达说：“有主人翁思想，很好！这样学生可以当学生了。一个工厂不能去很多。要计划安排一下，不要下去乱跑一气。第一机床厂可去看一看，现在少数派已经把时传祥的‘捍卫团’打败了，掌权了。”

当汇报到有些同学要求去外地时，陈伯达、江青指示，现在不要去外地，可以在北京下厂、下乡。北京是打响文化大革命第一炮的地方，现在有些落后了！因此搞好北京运动很重要。学生下乡不要搞人海战术，进工厂同市委联系一下，下去不要指手画脚，要当学生。 一定要帮助北京市委搞好下乡工作。

江青说：北大的风格不是“过”了，而是太温了。希望注意克服无政府主义、小团体主义、极端民主化。希望北大同学能做

出样子来。yS″；q

- M TO=#5z

1 月 17 日凌晨 4 时，周恩来又将电话打到浙江省军区，与进占浙江省军区的群众组织代表和绝食代表进行了长时间的通话，动员他们进食，撤出浙江省军区。

周恩来问在浙江省军区还有多少人？浙江大学的刘英说，大约还有 200 多人。

周恩来说："你们这个问题在浙江不容易谈好。我们中央很关心你们的事，怕你们事件耽搁久了不好。我们想叫你们派几个代表，也想叫省委的同志和军区的同志到北京来谈。你看好不好？你们想派几个代表？"

刘英答："派 10 个。"

周恩来说："你们同意的话，我们把浙江军区负责人张秀龙就是你们说犯有严重错误的，龙潜就是政委，还有何以祥叫到北京来。何以祥你知不知道？"

何以祥，时任浙江省军区副司令员，刘英认为不需要他去。他说："我们要求是政委江华、龙潜、张秀龙。"

周恩来追问："我问你，何以祥要不要他去呀？"

刘英："我们认为不需要他去。"

周恩来问："按照你们的意思，就是江华、龙潜、张秀龙。是吗？龙潜、张秀龙是没问题的罗！龙潜被弄到衢州去了，许多同学把他包围起来，你们知道不知道？"

刘英说："不知道。"

周恩来继续问："这样好不好？张秀龙是肯定会来的罗！因为他人是在杭州。肯定在杭州，可以同你们一道来的。龙潜听说在衢州，我们打电话去问他。如果在衢州，我们在衢州派几个学生代表把龙潜带来。第三个江华同志一直在上海养病，如果他病不是很重的话，我们可以把他找来，如果他病很重的话，可以把李丰平找来。"

刘英说："不！李丰平不在。江华是一定可以去的。"

周恩来："那我们打电话去问他，中央工作会议以后一直在上海养病，没到北京来，也没到杭州去。我们可打电话问。同学，我们和空军商量，杭州有飞机的话，明天就是 17 日上午 9 时坐飞机起身行不行？"

刘英说："好。周总理，我跟你讲一个事情。"

周恩来："你讲啊！"

接着刘英提出要和阮贤榜副司令一起到北京，他说军区附属医院想害死阮贤榜。

周恩来说："我不清楚浙江军区的情况。"

刘英继续说："张秀龙事件发生后，他来参加我们的群众大会，大会上他表示了态度，是比较好的。后来在医院里他讲的话态度也是比较好的。是和群众站在一起的。可是他在医院里受到很坏的待遇。一个副司令员病床非常简陋，非常寒冷。这个病房不是一个高级首长的病房，是在门诊部旁边的一个病房。他是犯有严重心脏病的，这个房间里除了一张桌子、一张床以外没有其他东西。他开始入院时，病情还不是那么坏，据说打了一针后就打坏

了，病就越来越严重，起不来了。曾经发生休克，休克以后给他输氧，输氧输到半中间，氧气发生故障。”

周恩来：“哦？！”

刘英：“然后发现他有痰，将痰从喉咙里吸出来，利用电动吸痰，后来电源切断了。”

周恩来惊讶：“啊哟！”

刘英继续：“经过抢救，活过来了。我们同学看到护士医师都在那儿很忙碌，出了不少差错，找这样东西没有，找那样东西没有，反正很乱。我们觉得这儿是有阴谋的。阴谋有二个方面。第一方面生病起因，由于他参加群众会议以后身体疲劳，起先病没有那么严重。这个会是革命造反派开的，开好后他就离开了，到医院里去了。我们可以说，阮副司令员如果死了，那他们可以给革命造反派加一个罪名，就是阮副司令员是让我们逼死的。”

周恩来：“噢，我懂了。”

刘英：“第二方面，我们根据阮副司令员的谈话来看，他对浙江军区其他一小撮人是有不同的看法的，和张秀龙、龙潜观点不太一致的。他在医院里曾对我们说：我离毛主席路线很远了，我有罪。我要到革命师生中去，毛主席的红卫兵万岁！我很想到革命师生中去。他说了很多这样的话，他很感动，我们听来是发自肺腑的话。可是在这种情况下，被护士拦住，不让他继续给我们讲下去。我们觉得他们有个企图要把阮副司令员拖垮，拖死，企图灭口。我们觉得有这么个问题。”

周恩来明白了。接着，他又和绝食代表通话，动员他们进食。17 日通话后，周恩来代表党中央、中央军委、国务院决定：派

飞机接张秀龙、阮贤榜、龙潜与红卫兵代表一起去北京解决浙江问题。

1 月 17 日晨，人民大会堂，戚本禹接见北京、上海等地的工人造反派，主要谈工厂夺权问题。“批判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委员会”、安徽“八·二七革命造反联络站”、哈军工“红色造反者”驻京联络站、天津大学“八·一三”驻京联络站等组织参加了接见。戚本禹专门通知北师大“井冈山”与会。戚本禹说：

“你们夺权，还定什么框框？！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权就应该夺，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权就不应该夺。如组织部是资产阶级司令部就应该夺权。上海市委曹荻秋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应该夺他的权。铁道部、劳动部的权就是要夺。吕正操最近跳出来了，应该夺他的权。至于怎么夺，应该由内部的左派来夺。”

“115 档案事件”发生才一天，公安部突然来了个 180 度的大转弯。1 月 16 日，昨天才被扭送到公安部的学部民族研究所洪涛和统战部“东方红”组织的负责人、统战部宗教处副处长、国务院宗教局第一副局长刘郢就被公安部释放了。

1 月 17 日，公安部办公厅秘书处印发了 3000 份谢富治的《公安部某负责人就一月十五日“红色联络站”接管中央统战部档案问题的讲话》，全文如下：

一、彻底摧毁中央统战部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红色联络站的革命左派同志，为了保护国家档案，于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五日晨，接管了中央统战部一批档案，并封存，这完全是革命行动，大方向是正确的。

二、中央统战部革命造反团的一小撮人，盗用公安部的名义，

非法绑架、斗争、拘留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洪涛、中央统战部东方红公社刘郢、林祉成等革命同志。这是犯法行为、是直接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行为。

中央民族学院文革临时筹委会材料组，又于一九六七年一月十六日十时印发传单，佯称“中央民族学院革命造反派红卫兵总部……于一月十五日……把现形反革命分子洪涛等人扭送公安部。公安部已签字拘留。”特郑重声明：洪涛、刘郢等同志是革命左派，大方向是正确的。说“公安部已签字拘留”了他们，这是彻头彻尾的造谣。

三、公安部接待站的个别人于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五日晚十一时五十三分，趁接待站来访人员较多，秩序混乱之际，不分是非逮捕了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韦清风同志，是完全错误的，是违法乱纪的。

事后，经我部调查了解，韦清风同志是革命左派，并于一九六七年一月十六日上午宣布释放，公开道歉予以平反。对上述所犯错误的有关人员，我们已责令其作公开检讨，并于处理。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办公厅秘书处印

一九六七年元月十七日

洪涛被公安部释放和谢富治的讲话引起民族学院“红卫兵总部”群众的不满，部分人员在民族学院“红卫兵总部”头头郑仲宾带领下跑到公安部找副部长严佑民辩论。严佑民站在二楼的阳台上，对同学们说：“事情清楚了，你们回去吧”，就进屋去了。

学部民研所洪涛组织人，和民族学院“东方红”的人一起，到民族学院郑仲宾的宿舍，越窗而入，以“冲公安部”为名，将

郑仲宾抓到公安部，在公安部押了 13 天。

以此为开端，从 1967 年 1 月 18 日到 2 月 4 日，民族学院发生了一系列武斗。学部“联队”、统战民委系统的洪涛派及北师大，派了大批人马砸了民族学院的“红卫兵总部”，地质学院、中央高级党校、马列主义学院的一些组织表态支持北师大，但也有相当一部分人支持民族学院“红卫兵总部”。对“1.15 事件”的看法，引发了北京造反派的分裂，一派认为“1.15 事件”是革命的，一派认为“1.15 事件”是反革命的。

17 日这天，夺权风潮不仅刮在农口，医科大学的“红旗公社”、中医研究院的“红旗战斗兵团”等组织也不甘落后，跑到卫生部和部机关的群众组织一起，宣布夺了卫生部党、政、财大权。外贸部也被部机关“联络总站”宣布夺权。北京政法学院的“政法公社”则跑到北京市公安局宣布夺权。他们与市公安局造反派联合发出《重要通告》，宣称：“为了誓死保卫毛主席，为了誓死捍卫毛泽东思想，为了誓死捍卫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为了确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顺利进行，为了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为了维护社会治安，我们北京政法学院政法公社和北京市公安局革命造反派，郑重宣布：自今日起，由政法公社和北京市公安局革命造反派正式接管北京市公安局。特此通告。”

当天下午 17 时 5 分，北京政法学院“政法公社”和北京市公安局造反派的接管北京市公安局报喜队，到公安部报喜，受到热烈欢迎。公安部部长谢富治，副部长李震、杨奇清在热烈的掌声中接见了他们，表示坚决支持他们的夺权行动。谢富治在讲话指出：“公安部要保护左派，反击右派，镇压反革命。例如‘联合

行动委员会’、‘西安红色恐怖队’，这些组织是反动的，头头是反革命。” 他说：“我们坚决支持你们，北京政法学院《政法公社》接管北京市公安局的革命行动。你们的革命行动好得很！你们干得对！干得勇敢！你们完全是按照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办事的，你们办得好！我们公安部全体革命同志热烈欢迎你们！坚决支持你们的革命行动！”

## 第 416 回：城门火，唐平铸亦被殃及 议海军，苏振华当晚揪走

对北京市广播电台的“二次夺权”，中央广播事业局“毛泽东思想战斗团”总部和大多数人肯定是不支持的。但也有少数人认为，“战斗团”总部和大多数人不支持这次夺权，是右倾机会主义。他们以“红卫兵总部”名义，于 1 月 14 日、1 月 16 日两天召开“支持市台第二次夺权、炮轰战斗团总部右倾”大会。“毛泽东思想战斗团”内部出现了分裂。1 月 17 日下午，中央广播事业局为北京市广播电台的“二次夺权事件”开会争论得不可开交，快要打起来了。有人打电话请来了江青、陈伯达等人。

当陈伯达、江青、关锋、戚本禹、王力等中央文革小组的人来到广播剧场，大家不吵了，请他们讲话。江青、陈伯达他们先到另一个房间听了双方的意见。

在听取代表们汇报时，“红卫兵总部”与“战斗团”又发生争吵，江青劝说道：“情绪首先不要对立。你们就是不理解这是人民内部矛盾。不要专造人家的反，不造自己头脑里的反。内部不好这样对立，应该造资产阶级的反嘛！”

陈伯达、江青出来后，接见了中央广播事业局全体群众。江青对大家说：

“同志们！革命的战友们，你们好！

我今天是来向你们致敬！”

掌声和“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的欢呼声起。

江青继续说：“你们的文化大革命干得好！”

又是掌声！

“做得对！”

掌声再起。

江青表示：“我是向你们来取经来了！刚才就在另外一个房子听了几种不同的意见，才知道你们这里闹得热火朝天呢！”

台下一片笑声，有人喊：“江青同志坐下讲！”

江青：“站着有劲，站着有劲啊。我现在跟反动的资产阶级路线斗争越斗争越神气了！还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毛主席身体很好！”

掌声，欢呼声响成一片。

江青接着说：“同志们，由于我们晚上还有一个活动，不能够把你们的意见听完全了。刚才我们已经初步地了解了一些情形，就是说，你们一些好的作法，我们也知道。我们过去曾经派了副组长张春桥，组员姚文元同志来过。我们还是关心你们的！（鼓掌，欢呼：毛主席万岁！万万岁！）本来，伯达同志是在别的地方，可是我一打电话请，就请了来了。（鼓掌）我今天来取经取到火头上了，（江青笑）我看你们这个火现在有点要消了，是不是？

我只想讲这么一个问题：就是如何正确对待内部矛盾的问题。”

江青说，广播事业局两派的争论属于人民内部的矛盾应该通过学习和批评与自我批评解决。最后陈伯达起头，大家齐唱《大海航行靠舵手》，齐呼：“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接见结束。

1 月 17 日，毛泽东会见马来西亚共产党总书记陈平等人。参加会见的有康生、刘宁一。毛泽东说：

“我们党内有党，这点你们过去不知道。表面上是一团和气，实际上是斗得很厉害。例如同高岗、饶漱石、彭德怀的斗争。关于社会主义教育究竟走什么道路，采取什么方针和政策，同刘少奇同志的这个斗争是从 1964 年夏天开始的。1965 年制定的《二十三条》就是这场斗争的结果。”“没有这场文化大革命，我们毫无办法。讲了多少年了。虽然我的名声很大，但他们还是那么搞法。在北京就是没有人听我的话，《人民日报》就不听我的话。”“广播电台和保守派很厉害，所以需要夺权。”“为人民服务，我们党过去也讲了许多。但我有怀疑，有的人到底是为人民服务还是为资产阶级服务。”对上海工人中的造反派，他抱着很大的希望，说：“上海工人已经起来了。1949 年上海解放，工人是欢迎解放军去接管。现在他们自己起来接管，他们接管了工厂、机关、学校。”“列宁说过：没有干部，为什么不在革命当中训练干部？革命才能出干部。”

毛泽东在讲到王明时说：“王明到现在还不承认错误。他在莫斯科写文章反对我们。他现在还是中央委员。下次代表大会，他恐怕选不上了。刘、邓是不是能选上?我的意见还是应该选上。党内总有左、中、右，那么干净就不太好。但很危险，可能红卫兵不同意。”

1 月 17 日，林彪就“军报 113 夺权事件”致信《解放军报》社，表示了对肖力等人大字报的支持。他在信上说：

同志们：

解放军报社由肖力，方抚时，孙浩刚，李志高，宋玉芬，武将，杨秉文，刘福小等八同志组成的革命造反突击队，在报社内部点起了革命火焰。你们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坚决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你们的行动好得很！我坚决地支持你们。

“乱”不要紧，“乱”然后才能治。

解放军报，非常需要革命。只有搞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报纸才能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为了照顾人民解放军的威信，照顾国际影响，对于《解放军报》要“内批外帮”的方针，在报社内部革命烈火烧的越旺越好。但形式上不能采取《文汇报》、《解放日报》的作法，不能在报纸上公开发表解放军报社的革命造反宣言，告全军书之类的东西。以胡痴为首的小集团，要那样做，完全是阴谋，对于这个阴谋必须揭穿，对胡痴等人，必须彻底揭发，彻底批判。

报纸的社论，评论，责成总政肖华同志和关锋同志负责，重要的社论，送中央文革小组，全军文革小组审阅。

解放军报是保护单位之一。你们要耐心说服学生和其他机关干部，不要到办公大楼上去。你们可以在办公大楼外边设接待站，接待来访的学生和干部，听取他们的意见和批评，欢迎他们送大字报。劝他们不要到解放军报社揪人，要相信报社的同志自己可以把革命搞好。

致以

无产阶级革命的敬礼

林

彪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七日

此信林彪首先请示了毛泽东：

主席：

解放军报的问题是否如此答复，请批示。

林彪

一月十七日

毛泽东当天批示：

同意，这样答复好，退林彪。

毛泽东

一月十七日

林彪的这封信出自关锋之手。同日，林彪还对《解放军报》指示："一、热烈地拥护毛主席。二、热烈地支持左派。三、坚决地打击右派和一切牛鬼蛇神。四、永远保持鲜红的旗帜。"

当晚，徐向前、叶群、肖华、关锋等来到《解放军报》社，宣读了林彪的信和毛泽东的批示,正式肯定了肖力等人的造反行动。

据后来王广宇说，肖力曾对阎长贵讲，林彪为此还接见并鼓励她："你都 27 岁了，还没信心搞好一个军报吗？我 25 岁就当军团长了，29 岁担任军政大学校长。"

《人民日报》代总编辑唐平铸，原任《解放军报》总编辑。1 月 17 日这天,《人民日报》和新华社也举行了批判大会，批斗唐平铸。当天，陈伯达、王力、关锋接见《人民日报》社的代表。陈伯达指着王力、关锋说：

“他们是 5 月 31 号同我一起到《人民日报》的。今天这个会我看开得很好。你们造唐平铸的反，造得对！”

大家热烈鼓掌。

陈伯达继续说：“我们 5 月 31 日到《人民日报》社来，是带着毛主席的革命方针来的。从 6 月 1 日以来。在一些同志共同合作下写了一些社论，这主要是 6 月这一个时间，6 月以后的社论基本就不管了。先当群众的学生，后当群众的先生也是我主持搞的。有些社论我是不同意的。第一期‘抓革命促生产’是我搞的，第二期‘再论抓革命促生产’是陶铸主持搞的。当然在我主持的社论中不能说一点错也没有，但基本方向是对的。在 6 月以后我就想摆脱《人民日报》的工作，对《人民日报》社的情况不大了解。我们这些同志对唐平铸的工作是不满意的，有怀疑的。”

“6、7 月份中，6 月基本是革命的。但没有一篇是唐平铸有份的，是我们一些同志具体搞的，当然一句两句也可能，但有的只是不关重要的。

“5 月 31 日以前，我们跟唐平铸没有见过面，跟胡痴也没见过面，临时从《解放军报》来些人，他们是刘志坚推荐的，我们不了解他们，我跟王力一起谈过很多苦恼问题，《人民日报》问题没解决，这样下去，江河日下，以后我觉得江河日下了，除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篇社论外，很少像样的，我对唐平铸、胡痴说：集中精力，把社论搞好，社论要能集中反映党中央的精神。可惜我的话没用，他们的世界观是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改造好，没有改造过来他的资产阶级世界观。”

“那么怎样才能办好《人民日报》呢？我相信你们这里面有

很多优秀人才能掌握毛泽东思想，能把报纸办好！要走群众路线，让大家共同办报，你们打算组织一个什么委员会？”

群众答：“成立了‘抓革命，促生产委员会’。”

王力说：“那是工厂的，总编室呢？”

群众答：“总编室成立了‘革命造反委员会’。”

另外一群众说：“这个委员会不符合巴黎公社的选举制！”

陈伯达：“希望今后群众选一个总编委员会，不一定要选总编，你们看总编都垮台了嘛！一个邓拓，一个吴冷西，一个唐平铸，统统都垮台了。不要总编辑，只要一个总编委员会，是不是选 7 人或 9 人，或 11 人，你们自己决定，大家协商，各个团体协商按原则办事，如果不称职可以随时撤换，撤了吴冷西换了唐平铸，唐平铸又不称职，不是也撤了吗。”

“建议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由王力，关锋同志同《人民日报》负责联系，因为关锋同志实际负责《红旗》杂志常务副总编，”

王力插话：“实际是总编辑。”

陈伯达：“今后和你们联系多的可能是王力同志。”“唐平铸必须交给群众批判！”

关锋：“《人民日报》有两条路线，一条是陈伯达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条是陶铸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陈伯达：“可惜我没有一直做下来！”

他问群众：“明天可以好好出版吗？”

群众答：“可以！”

陈伯达说：“《人民日报》可不能停！一天也不能停！不能像《工人日报》，《大公报》那样啊，还要办的更好哇！革命派万岁！

毛主席万岁！”

唐平铸因被怀疑牵涉到“113 事件”中，被揪回《解放军报》社内批斗。胡痴、和谷岩、宋琼、栾保俊等人，则以“胡痴小集团阴谋夺权”的罪名，押送北京卫戍区关了起来。肖力被人们心悦诚服地拥戴为群众领袖，心甘情愿地听从由她率领的“革命造反突击队”的指挥。肖力的倾向乃至只言片语，也就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成了人们的指路标。

肖力在《军报》公开自己的身份之后，曾在全社大会上讲过几句话。她说：“我爸爸让我告诉大家，我只上过几年学，还很年轻，很幼稚，也很蠢。爸爸要我向叔叔阿姨学习，希望大家多多批评教育我。如果有了错误，怎么批评都行。‘炮打’、‘火烧’都可以。”

大家对她的话感到非常亲切，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113 事件”之后，肖力那张题为《解放军报向何处去？》的大字报和经毛泽东批示的林彪《给解放军报社革命同志的一封信》，很快被许多红卫兵小报全文刊载，肖力的名字也就随伟大领袖的批示和副统帅的信而传遍全军、全国。人们由此知道，肖力与李讷实为一人。肖力也就成为风云一时、万众瞩目的人物。

对肖力的颂扬开始升温。在《解放军报》社，毛泽东像的两侧，还有两帧条幅，一帧书“向肖力同志学习”，一帧书“向肖力同志致敬”。条幅均用红纸，每个办公室无一例外，非常醒目。后来，发展到有些家庭宿舍也照此办理。 开会发言，不论是大会小会，言必称肖力，这是一个态度问题，并且都尊称“敬爱的肖力同志”、“毛主席的忠诚战士肖力同志”、“毛主席派来的

亲人肖力同志”、“肖力同志是代表毛主席在军报工作的”、“紧跟肖力同志，就是方向，就是路线，就是胜利！”“紧密地团结在敬爱的肖力同志的周围，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这一类提法和口号，越来越频繁地见诸大字报和会议发言稿上。于是，“谁反对肖力同志就打倒谁”、“谁反对肖力同志谁就是现行反革命”，不仅成为开会必呼的重要口号，而且成为《军报》开展“文化大革命”的重要内容。那个声言要“向叔叔阿姨学习”的年轻姑娘，一下子成了《军报》至高无上的权威。此后，判别是非的标准，都以肖力的口径为标准。

在总政治部主任肖华的主持下，《解放军报》社成立了临时党委，由原副总编辑张秋桥任副书记，主持工作。入伍、入党才几个月的肖力成为党委委员。稍后，总政治部调原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副院长赵易亚到《解放军报》社任总编辑、临时党委书记。赵易亚上任不及半年，肖力再次造反，将赵易亚挑落马下，并取而代之。这样，肖力从一个“新兵蛋子”陡然跃升为全军瞩目的军级单位的第一把手。

还是在林彪给《解放军报》写信的 1 月 17 日，当晚，军委常委扩大会议在人民大会堂江苏厅召开。参加会议的有林彪、徐向前、叶剑英、陈毅和各总部、各军兵种领导。会议听取和批准肖华在文革中所犯错误的检讨，还讨论了将苏振华交群众批斗的决定，罪名是“彭、黄漏网分子、三反分子”、“贯彻执行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代表”。

徐向前代表军委和全军文革小组发表讲话。他说：“当前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很好，要继续发动群众，把运动搞深搞透。今天

院校的学员要开大会，要打倒苏振华，打倒杜义德。海军问题主要是苏振华问题。苏振华是坚决贯彻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是刘邓、贺龙安在海军的钉子，这种人不能保。海军党委扩大会议期间，不是肃清罗瑞卿的影响，而是把李作鹏、王宏坤、张秀川置于死地。林副主席给海军的信，不知为什么落到刘、邓手里去了，并且经过修改。苏振华要斗倒、斗垮、斗臭。海军文革要改组，肖劲光任组长，王宏坤任第一副组长，李作鹏任常务组长。以哪些人组成，他们 3 人提出。只准打毛主席的红旗，不准打白旗，不准打灰旗。苏振华是贺龙政变的主要人物，班子都配好了。贺龙给苏振华许的愿，当军委秘书长，许光达当总参谋长。”

这次会议结束后，全军文革小组派王宏坤等人去向群众组织宣布了军委的决定，当晚造反派群众就把苏振华揪走了。

第二天，1 月 18 日，海军党委召开 174 次常委会议，会议由肖劲光主持，传达和讨论了军委和全军文革关于苏振华问题的决定，并统一了“苏振华是海军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军事路线的代表”的认识。

在讨论海军党委常委今后的工作时，肖劲光提出自己身体不好，希望不再主持常委工作，他提议由李作鹏主持常委工作。常委们一致同意，决定李作鹏任党委第二书记，并被指定主持海军常委工作。

会议同时决定改组海军文革领导小组：肖劲光任海军文革领导小组组长，李作鹏任常务副组长，王宏坤任副组长，张秀川任办公室主任。

接着，在海军第一招待所门前召开“庆祝以李、王、张为核

心的海军新党委成立大会”，把一些海军的领导揪去斗争。会议开到一半，突然有一人冲到肖劲光面前，指着他说：“肖司令，你反对毛主席！”

肖劲光立即予以否认：“我没有反对毛主席。”

那人又说：“你反对林副主席！”

肖劲光没说话。因为林彪确实说过肖劲光反对过他，再申辩也没有用。

这时，大喇叭里口号震天响：

“谁反对毛主席就打倒谁！”

“谁反对林副主席就打倒谁！”

“打倒肖劲光！”

又有两名机关干部跑上台来，要揪肖劲光。

肖劲光看了看坐在旁边的李作鹏，李作鹏没有表情。肖劲光腾地一下站起来，把披着的棉大衣一甩，厉声喝道：“你们哪个敢上来！”

那两名干部被肖劲光的突然发作弄愣了，一时间呆在那里，不知是前进还是后退好。李作鹏见状，挥了挥手，让那两个人退了下去。

散会后，肖劲光怒气未消，驱车紧随李作鹏来到他家，质问李作鹏搞的什么名堂！李作鹏连连解释说不是他搞的，他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肖劲光说：“你不搞，别人哪个搞啊？”

李作鹏连连说：“下次不搞了，下次不搞了。”

## 第 417 回：见张本，周恩来肯定夺权 一一八，北京掀夺权高潮

1 月 17 日，国家科委也准备夺权。下午 17 时 40 分，周恩来在国务院小礼堂接见国家科委和科学院“革命造反团”代表张本等人，聂荣臻、刘西尧参加了接见。国家科委政策研究室主任张本首先汇报了国家科委夺权的情况，她说：“党权、政权、财权全部接管”，并说，“他们是勤务员，不是班长。”

周恩来插话说：“勤务员。勤务员你们总得起个名字，总得有个班子，党员不够也可以是非党员嘛！不见得都是党员，群众也可以，群众都通过了，党还批不准吗？如果当时中央宣布罢官，并不难的，但你张本必须要顶下来，完全是悬空了。吴德、刘建勋、丁国钰都是比较好的，但现在也是悬空。”

张本提出：“我们四个单位准备组织一个大会，希望总理定一下时间、地点和召开大会的基调，对韩光、张劲夫的性质等。”

周恩来答道：“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是可以肯定的，这两个集团都是典型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也有修正主义的。科学院夺取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权，要由革命左派夺过来。夺权以后，分四类处理，区别对待：1、完全罢官，纯粹斗臭的就没用了；2、撤职留用，三月为期，戴罪立功，以观后效；3、停职留用，改过自新，以观后效；4、留用，另外分配工作。这是我的想法，我在中央、主席那儿谈过，你们还可以创造。

夺权要夺党、政、财的领导权，事务工作还是叫他们去做，

监督他们去做。石油部听说夺权以后，都回去睡大觉了，只有康世恩在工作，把你们都搞到事务主义中去了。你们要合法夺权，按中央方针政策办事，中央就承认了。”

代表们提出要求刘少奇、邓小平参加大会，周恩来说：“报上还没有提刘、邓，当然你们开会还是可以开的，刘、邓还是政治局常委，你们把他拉去，我们不好出席。当然你们把彭、陆拉出，我们也用不着去了。”

张本说：“我们不喊打倒刘邓、不斗黑帮、不揪聂总。”

周恩来：“你们可以把陈伯达同志也请去，他还是你们副院长嘛。”

周恩来问：“刘西尧同志是否到你们那里去工作？”

众人答：“我们欢迎！”

周恩来：“有几个尖端任务可以抓起来，你们的批改要在三个月以后进行。”

“就这个造反司令部夺权，编制不要太大。各局领导小组可以小一些。每个勤务组要有一个班长，不是党员也可以，希望你们去创造。现在取得了一个经验，关键时刻，革命左派要自己奋斗。”

最后，周恩来同意在星期日下午 15 时在人大会堂召开科研系统大会，两万人参加。

周恩来要张本他们在当晚召开的各单位造反派座谈会上把夺权的经验介绍一下。

17 日当晚 19 时，刚刚接见了国家科委造反派代表张本等人的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小礼堂主持召开由北京各大专院校，机

关部门的造反派代表参加的座谈会，专门研究夺权问题，陈伯达、康生、江青、戚本禹、王力等人出席了座谈会。周恩来说："我们今天邀集大专院校各部门的革命造反派的代表开个座谈会，先听听你们的意见。"

代表们纷纷发言，周恩来边听边记，一直持续到 18 日凌晨 0 时，然后江青讲话，她希望北京的左派队伍能尽快地联合起来。

对外地人员大量涌入和滞留北京，江青提出批评说："现在外地来京很多，已经有 100 多万，这其中很多是好意的，是来搞革命的，告状的，也有的是来游山逛景的……如果是革命的话，就应回本单位，联合本单位的，本城市的左派向本单位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去斗争。来北京把矛盾上交，消耗很大的人力物力。同志们！你们说这样对不对呀？"

众答："不对！"

江青："他们住在这里不走，要什么、给什么、比如在文化部也住了一些人，这是陶铸搞来的。每天还给几毛钱的补助，应该大部分让他们回去。"

"原来，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北京，毛主席亲自点起这个熊熊烈火，现在来看是落后了。你们要下北京的工厂、农村，不一定走很远。北京有十多个县，彭真在那里搞了反攻倒算。他们要真正革命，就要他们回去夺权，谁也不能代替。要顾全大局，不要计较个人。"

"我想的不成熟，以后成熟了再讲好不好？现在让周总理讲几句。"

周恩来说："同志们、战友们、刚才江青同志讲的我完全同意。

由于时间关系我不多谈了。

今天本想多邀些同学来讲，因……昨天晚上才决定，有些造反派来了，有的没来，在这里向他们道歉。明天再邀工厂的造反派来，以便过些天再开一个来北京的，徒步串联的学生，请愿的、控诉的、上告的、也有把矛盾上交的、解决经济问题的，100 万人的大会，开个会把道理讲清楚，打回老家去，彻底闹革命。”

周恩来宣布了几个组织有问题：“比如发现的‘中国红旗军’，东一撮、西一撮，也不清楚，这些头头不是好人，他们欺骗了我们。‘全国工农兵夺权司令部’的两个头子来历不明，我们逮捕了。这是外部的，我们内部的也有，如‘联合行动委员会’，形式上是中学生的组织，实质是有后台的，我们对他们要说服、帮助他们，唤醒他们不要再受蒙蔽。比如石油学院附中开始搞红卫兵，做了些事情，但后来受了谭力夫的影响，走了一些弯路了。如思想上能说服的话，要尽量说服，你们要多做工作，给予帮助，这很重要。”

“现在更重要的是响应毛主席亲自提出的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上海、天津的工人组织的倡议、党中央的号召、要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这样一个新的课题摆在我们面前，这个工作由大专院校、工人组织的革命造反派都应承担这个责任，这与我们各学校的整风，军队训练及企业抓业务都有关，这是中心任务，这是主体。”

他号召：“革命造反派要在原则的基础上实行大联合，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反对经济主义，反对矛盾上交，这是当前的任务。”

他要求："到北京来的工人、学生、职员要回去，就地闹革命。"

他批评北京市："整个北京市，不仅联合行动落后于上海，工人运动也落后于上海。明天的座谈会，'三司'、'二司造反联络站'、'首都兵团'也可以派些人来听一听，把学生和工人阶级革命造反派组织起来。"

对夺权问题，周恩来再次予以肯定："要不要夺权？要夺权！《红旗》杂志评论员文章写得清楚，要夺权。需要夺权的，决不能迟疑。现在'政法公社'宣布市公安局夺权，中央领导和中央文革小组要帮助他们搞好这一工作，这个工作很复杂、繁重。条件成熟的要夺权，不成熟的就监督嘛。"

江青："可以先监督后夺权。"

周恩来："科委的造反派有一套完整的经验，应该开个大会，让他们介绍。他们 5 个月由少数变成多数。把以韩光为首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完全暴露出来了。

我们夺的是领导权，可以先夺权再逐步改造。政法系统，北京公安局就夺了权嘛！中央文革要帮助他们，条件成熟的先夺权，条件不成熟的先监督，夺权！第一是领导权，就要管它，监督它。"

江青："业务不懂也要夺，业务可以慢慢学嘛！"

座谈会一结束，北京的学生们立即行动起来，响应中央的号召，到处跑着夺权。1 月 18 日，整个北京市再掀夺权风暴。

但是这权究竟该怎么夺？学生们还是很茫然。散会后，聂元梓跑到地院找朱成昭商量此事，正好蒯大富和其他学校的人也在那里，他们商量成立一个"北京革命造反公社"，议着议着，发现人越来越少，都干什么去了？原来都忙着夺权去了，去晚了权

就让别人都夺完了。

聂元梓年纪毕竟比那些学生大，她又来到清华大学找蒯大富。蒯大富正在主持开会，还是筹划如何联合工厂、机关、学校夺权。听说聂元梓来了，大家都很欢迎。但是会正开着，蒯大富又跑了，不辞而别，把大家甩在清华大学。原来，他听说北京市委夺权了，就顾不上在学校里光动嘴皮子了，赶紧带着人跑到市委夺权去了。

当时人们对于夺权的理解，就是以为夺权就是夺大印夺公章，把一个机关的印章拿到手里，这就是夺权了。好像谁跑得快，谁先到，先把公章抢到手，夺权就是谁的了。但公章拿到手以后怎么办？谁也没有想，总之不能叫坏人掌权，可是好人是谁？叫谁来掌权？谁也说不清楚，但是还要赶紧跑，跑得越快越好，哪个学校的学生先跑到那个单位了，先入为主，就算是那里的头了，谁甘落后？

这天，北京光华木材厂以刘锡昌为首的“红卫兵团总部”夺了工厂的权，成为全市第一个夺权的基层单位。

这天上午 10 时，国家科委造反组织宣布夺权，建立以张本为首的 9 人“革命造反司令部”作为临时权力机构，并发布公告，称“本司令部于本月 17 日晚业经由周总理代表党中央批准、承认”。

这天，中央组织部的群众组织责令在部里临时主持工作的副部长曾涤和刚调到组织部不久的原 1 军政委聂济峰停职反省，实施夺权。

当天，全国财贸系统造反派举行“反对经济主义”誓师大会，

周恩来、李先念等人出席并发表讲话。新华社于 21 日对此次大会以“把财贸系统的大权夺回到无产阶级革命派手里”为题加以报道。

由于北航“红旗”和北师大“井冈山”在《北京日报》的问题上分歧日益尖锐，倾向北航“红旗”的“新北大红旗兵团”也对《北京日报》社的造反派组织“星火燎原”疑心重重，深觉问题不少。进驻《北京日报》社的“新北大红旗兵团”扬子浪认为，“这个挑动群众斗群众的人不在工厂就在‘星火燎原’。北师大‘井冈山’《北京日报》犯了方向性路线性的错误。”在 1 月 18 日的形势讨论会上，他写了一张大字报：“星火燎原的成立与红卫兵指挥部的土崩瓦解”，认为“星火燎原”是保皇组织，是保资产阶级办报路线、办报方向和旧知识分子对办报的垄断权的保字当头的组织。并且高度地赞扬了以报社工人为主的“红色工人造反队”。但是大字报未能通过。

1 月 18 日这天，北师大“井冈山”支持《北京日报》社“星火燎原”等组织宣布夺了报社的权，成立了“革命造反夺权委员会”。

1 月 18 日晚上，北京大学“红卫兵”和“红旗兵团”，还有以京西煤矿为核心的“首都职工革命造反总部”、以北京光华木材厂为核心的“首都职工红色造反总联络站”，以北京第一机床厂为核心的“一机部革命造反联络委员会”，这三个全市性工人总部，大约有 30 多个单位的群众组织到北京市委夺权。其间，他们也遇到两个市委群众组织的阻挠，但相持没多久，还是让他们进去了。他们占领了市委大楼，并宣布夺了市委的大权。当天，

“首都革命造反派夺权斗争委员会”宣告成立，有 36 个单位参加。他们发表了《夺权宣言》，接管北京各委、办，实际上夺了市政府的权。他们还把新北京市委的负责人吴德、丁国钰、刘建勋等人都关到虎坊桥

这天中午 12 时，“外交部革命造反联络站”也宣布了夺权。他们发表声明称：“自 1967 年 1 月 18 日中午 12 时起，我部运动和业务的领导权全部由我站掌握。我站建立监督小组，凡有重大问题和决定（包括政治和业务方面），部党委必须取得我站同意。部党委任何成员，均不得以任何借口消极怠工，否则即以破坏‘抓革命，促生产’的最高指示论处。”

12 时 20 分，“外交部革命造反联络站”负责人张殿清带领数名群众将仍在办公的姬鹏飞、罗贵波、韩念龙、乔冠华、徐以新 5 名外交部副部长和龚澎、宦乡两位部长助理等部党委委员召集到东交民巷 15 号的外交部大楼部长会议室开会，宣布：“由于外交部党委顽固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所以不能领导外交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能有力地领导对外斗争。因此，‘外交部革命造反联络站’立即接管外交部文化大革命的一切权力，成立监督小组，对部党委的工作进行监督；部党委在对外的重大问题上做出决定和采取行动前，必须取得监督小组的同意。”

在场的副部长们，即包括姬鹏飞、罗贵波、乔冠华、韩念龙等，逐一表态支持造反派的革命行动，服从夺权决定。

会后，常务副部长姬鹏飞即向总理办公室作了汇报。下午 16 时，“外交部革命造反联络站”向周恩来总理汇报了夺权情况。

当晚 22 时 20 分，陈毅受周恩来委托，在人民大会堂山东厅

接见外交部“联络站”核心组全体成员，代表周恩来和他本人对“联络站”夺权表示坚决支持，代表部党委对夺权胜利表示热烈祝贺。对于外交部的夺权方式，周恩来明确规定：外交大权在中央，不能夺。外交部夺权应是领导运动，监督业务，成立部、司两级业务监督小组。周总理还态度鲜明地指示：“（今后）没有部监督小组签名的文件，我不看。”

陈毅在接见外交部“联络站”核心组全体成员时转达了周恩来的指示，并说：“联络站”所夺之权是“外交部领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权”，外交部业务工作中的重大问题仍由部党委研究决定，由造反派组成的“业务监督小组”实行“监督”。陈毅说：“希望你们很好地掌握这个权，要把过去的业务大大地提高，要真正体现毛泽东思想，那么这个权才能真实。我希望你们能够做到这一点”。陈毅还补充说：“你们走了第一步，就要走第二步，你们还要团结其他同志，要和他们商量，争取他们完全站到革命方面”。

而此时的周恩来正在人民大会堂小礼堂与工人和学生代表继续座谈夺权问题。

1 月 18 日，毛泽东在中央军委碰头会上提到朱德，他说：“朱德在国际国内是有威望的，朱德还是要保的。”

这天，周恩来在京西宾馆各大军区和军、兵种领导参加的军委扩大碰头会议上传达毛泽东对军队文化大革命的指示，并作了解释：

毛主席对军队文化大革命问题指出：

1，我认为十三个军区不要同时搞，要有前有后。

2，地方文化大革命正在猛烈开展，夺权斗争还在激烈进行，我们军队要支持地方革命左派进行夺权斗争，因此军队和地方文化大革命要叉开。

3，现在国际上帝、修、反正在利用我们文化大革命继续大搞反华活动。如苏联在镇压学生，新疆边境飞机活动多了，地面部队也在调动。凡是前线的大军区部队要有警惕，要有所准备。如济南、南京、福州、广州、昆明军区。所以文化大革命的时间要稍推一下。将来一定要搞的，顾大局。

这天，叶剑英主持制定的《关于各军区开展文化大革命步骤问题的决定》，提出：各大军区、省军区机关运动分期分批进行，不要与地方同时展开；济南、南京、福州、武汉、广州、新疆、昆明 7 个军区推迟或暂停文化大革命。

## 第 418 回：再座谈，听工厂代表意见　议夺权，点名批判王光美

从 1 月 18 日晚上 20 时 30 分开始，周恩来和中央文革在人民大会堂小礼堂召集北京的工厂造反派和学生代表继续座谈夺权问题。当周恩来、陈伯达、江青、王力、戚本禹等人走进会议室时，全场响起热烈地掌声。神态严肃的周恩来用手势压了压，止住了场上如雷的掌声，开始讲话。他首先问候大家好，然后讲了一下全国的形势，接着说道："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取得了决定性胜利，但国外的帝国主义和国内的阶级敌人蠢蠢欲动，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也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正在进行垂死的挣扎，无产阶级革命派要联合起来，夺取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

他特别强调不是监督，不是改良，而是要彻底把权夺过来。并说在这方面上海工人阶级已做出了榜样。这时有人递条子问："夺权包括哪些部门？"

周恩来斩钉截铁地说："要全面夺取党政财文大权。"

有人问："如何区分当权派是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呢？"

周恩来说："夺权是一场大演习，先夺过来再说，他如果是革命的，以后还可以结合进新的领导班子。希望大家回去以后，要立即贯彻执行，把这场关系文化大革命成败的夺权斗争搞好。"

他说："今天召开工矿企业造反派同志的座谈会，学生也来了一部分人，各部门也来了，主要是和工厂造反派座谈，过去我们和工厂接触较少，这是我们的责任。上海的同志已经走在前面了，我们要急起直追。"

接着，北京国棉一厂“东方红公社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北京第一机床厂“红色造反者”等10个单位的代表先后发言。

随后江青讲话，她说：“今天开的会，是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的群英会。同志们提了许多宝贵的意见，使得我们了解了不少情况，增长了不少知识，以后还要和你们交换意见，现在，让我祝贺同志们夺权！”

众人高呼：“革命无罪！夺权有理！一夺到底，就是胜利！”

江青接着说：“我们刚进城时，是军事接管，人民解放军管，也是夺权，现在是革命人民大联合，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一切权力归革命的工人，革命的农民，革命的知识分子，以及其他劳动人民，预祝同志们胜利，我们的意见以后有机会谈。”

她接着说：“本来我不想辟谣，但是有些问题牵涉到群众运动，所以我要说一说。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造了不少谣言。有一个叫建工部‘革命造反联络委员会’总部的反映，说中央文革在他们那里建立党组，还说是中央指示的。中央没有这个指示，你们别上当。”

众人大声喊：“造谣可耻！”

江青：“此外，今天到会的有工人和北京的大中学校代表。广州有消息说，我到广州去了，城里还贴了许多欢迎我的大标语。他们骗人去广州，广西就去了 20 万。广州的当权派给机关干部每人发100元出去串连，这样外地去的人吃住就无法解决，这是破坏文化大革命。江青在北京，哪里也未去。”

周恩来插话：“前一段谣传毛主席不在北京，也出去了，主席哪儿也未去，一直在北京。”

江青："不久前，有一个人，叫张文彩的，冒充是我的秘书，到东北活动，成立了红卫兵东北联络站。他们有枪、有汽车和摩托，要钱、要粮，我们要公安局去调查。这些组织都是反动的组织，什么全国性的组织，我们中央一个也未承认。我们要对这些反动组织的头头实行专政，这是反革命的组织。东北的同志回去可以辟谣，教育这个组织的大多数群众，把他们的头头抓起来。"

有代表说"联动"和时传祥的"捍卫团"阻扰他们夺市委的权，代表中有人喊："把他们抓起来！"江青说："我建议，把他们的头头抓起来，对他们的群众要争取过来，教育改造他们。"

地质部一代表反映说，他们夺权，总理办公室值班室不同意，要求对此事查办。江青说："你们权夺得不好，要查办。"

江青："今天时间不早了，以后再听大家的意见和发表我们的意见。"

陈伯达说："阶级斗争不是平坦的，会有很多曲折，无产阶级夺了权，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又要反夺权，所以精神上要有准备，不可能一下子全部夺完，阶级敌人也不甘心它的灭亡。许多同志经得起战争考验，但经不起糖衣炮弹。我们现在可以抛开那些不能为人民服务的人，凡不适应无产阶级专政的，都要斗垮它！毛主席给我们指出了斗争的方向。……敌人不投降，就让它灭亡！"

在陈伯达做了简短发言后，周恩来做了长篇的讲话。他说："方才江青、陈伯达同志的讲话，我同意。今天的会开得好，得到了很多知识，了解了很多情况。例如，刚才的北京车站的同志所讲的，我们本来为了要把将近 100 万外地来京的工人群众运走，前几天，跟铁道系统研究过，他们已经夺了吕正操的权，为

了解决问题，打算增开列车，去年一天北京站开出列车最高达到每天 70 列，至少也有 50 列，现在只能开出 40 列，有潜力增开 20 列，分两个站安排开出，到底怎样布置还要研究。和工人‘联络总站’研究，但是从管运输的副部长到站长那里就变了样，他们想搞分裂，把革命性强的东北同志调到永定门送走。这事说明斗争当中有一些反党分子或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口头上答应，背后干坏事。这也证明了，我们一定要夺权！要夺到底！

从这个问题也看到了我们今天的会开得很有必要，昨天开了大中学校的座谈会，着重谈了夺权问题。今天开这个会，也是研究夺权问题。我们要把夺权斗争汇成一个总的运动。目前主要是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这里面关键问题是夺权斗争。如果哪个单位还是被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或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所掌握，那么我们就不能搞好文化大革命，因此一定要夺权。刚才江青同志讲了，我们十几年前夺权，是人民解放军在毛主席的领导下，把蒋介石的几百万军队扫到大海里去啦。简单说来，这是打江山。我们由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在大中城市实行军事管制。这次不同了，这次是我们无产阶级专政已经十七年了，但是还存在着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这个领导权必须夺过来。怎样夺？就是在毛主席领导下自下而上，群众自己动手来夺领导权。这个权上面是毛主席授给我们的，下面是群众授给我们的。”

“北京存在着两种情况，一种是中央各个系统的，一种是市委的。中央各系统，一种是党的各部，现在已经开始夺权了。政府各个系统是按各系统来进行的，比如政法系统，外交部系统等

八个系统。铁道部应该把铁道系统的大专院校造反派联合起来，这样形成一股力量进行夺权。以内因为主，吸收外部力量来解决。”

“另一方面，就是北京市的，今天晚上已经开始有 30 多个单位到北京市委去夺权了，已经进驻了北京市委大楼，我们祝贺他们的胜利。今后的任务首先吸收一些主要的工厂，吸收更多的职工帮助加强力量。

夺权中会出现一些问题，但不能陷到事务当中去。北京市的一些综合性大学，像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人大、师大等在北京的夺权当中要下大的力量。不是派一小部分人去的问题，也不是就开几个大会的问题，要起主要作用。具体的工作要由原单位的人员来做好，我们去监促他们，只许他们好好地工作。不好就批他，撤他。

夺权这是一个严肃的问题，大家应当认真地研究这个问题，要把政权夺过来。我们上面有无产阶级专政，毛主席的领导，下面有广大群众，夺权就一定能胜利。”

“现在比较完整的，有典型经验的是国家科委张本同志他们那里……本来要找张本同志在会上作个报告，因时间关系，准备将来在科技界的大会作个完整的报告。”

“夺权，这是一个严肃的问题，也是锻炼造反派的一个大好机会。”“今天多说几句，因为是演习，可以锻炼，不能半途而废。夺权问题对党中央、国务院、中央文革小组、解放军也是一个新课程。我们要向你们学习，这事是史无前例的，大家应当认真地研究这个问题。我们上面有无产阶级专政，毛主席的领导，下面

有广大群众，两头结合，我们结合你们。我们信任你们，同样你们也应当信任我们，夺权就一定能胜利。重大步骤希望你们有重大事情及时反映给我们。你们有事应通知中央文革、国务院办公室，他们一天工作 24 小时。”

周恩来再次提到“红旗军”的问题。他说：“昨天我们曾提到有两个反革命组织，一个是‘中国红旗军’，另一个是‘中国红色革命夺权总部’。就是‘全国工农兵夺权司令部’。他们夺谁的权呢？他们夺无产阶级的权，那怎么能行呢？我们已抓了红旗军两个头子。群众已经发动起来了。”

“他们蒙蔽了许多人。昨天发现他们有七、八个头子，一个叫黄老头的，有一个叫刘海清，是李井泉的警卫员，他们霸占了中医学院一座大楼，我们去抓他们的时候，他们竟然缴了我们八支枪，扣了我们公安部副部长。我们勒令他们 15 分钟把人交出来，否则就要采取必要措施，结果把他们瓦解了。

他们在北京有 7 个支队，每个支队 400－500 人。因为来京请愿的人中有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给他们钱来的，特别是文化部门，每天还有七角钱补助。来的时候已经领了，到北京后又重领，大吃大喝。‘红旗军’就发展这一些人，他们住着招待所，”

有人揭发说：“上星期我们发现他们打信号弹。”

周恩来：“是的，我们也发现了，广大群众只要一说明就清楚了。希望在座的革命造反派广为宣传，制止谣言，要识破一些反动的活动，有人冒充全国性的组织，其实全国性的组织我们一个也没同意！有的利用什么‘全国退伍转业军人委员会’，复员军人都是有岗位的，在厂矿、学校、公社、机关等工作，不应该单

独成立全国性组织，复员军人应在各单位参加文化革命，不应该抽出来单独组织。一般的组织是有来源的，但退伍军人无来源，有的是酗酒的或是开除的人。有的以前被开除的和受其处分的，现在也要翻案，那是不行的。

现在有些人要翻过去的一切案，中央规定，平反是从去年 5 月 16 日以后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击的革命群众，在此以前所做的处理不能说全都错了。以前的除了个别的以外，都不能翻。比如说 57 年的反右派斗争也要翻，那怎么能行？四清工作队大多数是好的，大多数搞的是好的，个别是搞错了的。不是过去的一切都错了，我们要好好学习主席的“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方法。全国复员军人不要成立全国性组织，这个中央已有指示。我们都是工农兵学商，各行各业都有自己的组织，如果退伍军人是教员就参加教员组织，如果是学生就参加学生组织，还有中学生的‘联合行动委员会’这个名字也和修字号的差不多，他们不以战斗队为单位，名字不暴露，现在有种作法不好，不署名写大字报，只写某某战斗小组，今天署名这个战斗队，明天署名那个战斗队，我们不赞成这样做。我们是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大民主，是光明磊落、正大光明的，为什么要这样呢？”

周恩来说：“不要隐姓埋名，这是刘少奇的做法，搞什么扎根串联，化名躲躲藏藏，王光美到桃园大队化名董璞。”

江青说：“戴个项链，抹了胭脂给苏加诺点烟，丢中国人的脸。”

众人喊：“打倒王光美！”

周恩来：“用化名容易被反革命分子钻空子利用，很长时间才能查出来，我们有解放军的保护，在斗争中不要被反动分子钻空

子，我们要严阵以待，不要掉以轻心。”

“我们今天的座谈会仅仅是开始，今后还要开。”

众人鼓掌。

七机部“916”组织告状说：“周总理接见‘915’、‘916’以后，我们‘916’夺了权，但‘915’搞破坏，砸坏了我们好几处。

江青说：“七机部有个刘允若，是苏联货，里通外国，你们可以把他抓起来。”

没过几天，刘允若就被逮捕，投入北京第一监狱，一关就是8年。这是后话。

周恩来又说：“916的事我们知道，江青同志说的要把头头抓起来，七机部有后台，你们不要闹内部矛盾。”

江青说：“‘916’也是有缺点的，你们两边人都很多，一个一万多，一个七千多，你们内部矛盾自己回去解决。”

二轻部有人反映，有人抢了他们1100元，周恩来说：“把头头抓起来。”

上海工人说：“我们要向北京工人学习，回上海去夺权。”

王力说：“上海工人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夺权！”。

江青讲：“我们研究了你们的经验后，所以今天才来和同志们座谈。”

七机部“915”走出座位喊：“总理，我们要澄清事实！”

江青说：“这是内部矛盾，要他们都回原单位去，回去好好解决。如果北京做的超出了上海，上海就要向北京学习。

接着，陈伯达又做了长篇讲话。他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际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夺权的革命斗争。文化大革命就是从反对

彭、罗、陆、杨开始的，这是一个夺权的斗争。”

“中国夺权斗争经过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全国解放起，是军事接管，人民解放军夺权。现在是另一个阶段，是革命群众接管，工人阶级接管。因此只有军事接管还没有完全解决无产阶级夺权问题，也不可能彻底解决无产阶级夺权问题。因为那个时候，解放战争刚取得胜利，民族资产阶级都留下来了，还作为一个阶级存在。我们接管的机关还保留了许多旧人员，旧的知识分子，他们还是在起作用，想和平演变，想把无产阶级政权倒退，变成资产阶级、封建地主的政权。如果他们的这个企图实现，中国就有亡国的可能。毛主席进城以前就警告了我们，许多人可能经得起战争的考验，经不起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考验。你们看王光美是不是个糖衣炮弹呀？”

下面呼口号：“是！打倒王光美！”

江青说：“王光美在桃园的经验完全是编造出来的，假的。她在桃园涂脂抹粉，挂项链，这是给我们无产阶级丢脸。”

座谈会结束前，周恩来指挥大家唱《大海航行靠舵手》

最后，江青领唱《国际歌》，周恩来指挥。

群情激奋，群情高昂，人们为没有赶上俄国的“十月革命”而感到遗憾，今生却有幸参加了中国这场史无前例的大革命，这怎能不让在场的人心潮澎湃。

座谈会在 1 月 19 日凌晨 1 时 30 分结束。

会后，代表文化部系统群众组织参加座谈会的叶向真立即组织了对文化部的夺权。

根据周恩来的讲话精神，北京大学聂元梓派出 13 路人马，进

入北京市委、市政府、华北局、高教部、教育部、《北京日报》、《光明日报》、统战部、中监委、交通部、全国总工会、物资部、团校等。前面一些单位是派人去夺权，后 4 个单位北京大学本来就有学生在那里协助清理外来人员，这次正好就地参加夺权。

师大“井冈山”和哲学社会科学部的“红卫兵联队”等组织在民族文化宫开会，策划北京市的“夺权”事宜。会后，他们以师大“井冈山”和学部“红卫兵联队”的名义，向中央文革小组写信，建议迅速成立以戚本禹为总指挥的“北京抓革命促生产指挥部”，领导北京市的夺权。

而地质“东方红”朱成昭主持，在政法学院开会，商讨成立“北京工农兵联合夺权指挥部”，北大、清华、北航等院校的造反派组织代表参加了会议。

## 第 419 回：乱哄哄，北京左派起纷争　长春市，“主义兵”剑走偏锋

1 月 19 日这天，首都出版系统造反派向全国出版系统造反派发出紧急呼吁书，其中第一条就是“立即夺取出版毛泽东著作的大权，夺取每一个出版阵地”。新华社 21 日全文播发此呼吁书，《人民日报》22 日转载时还配发了评论员文章“出版毛泽东著作的大权我们掌”。

1 月 19 日上午，外交部“外交部革命造反联络站”所属各“战斗队”在各自的司、局向司、局长宣布夺权，很顺利。下午，“联络站”召开了庆祝夺权胜利大会，并传达了周恩来 1 月 18 日的指示。外交部“联络站”迅速发展到 1700 多人，那时外交部全部人员也就 2200 多人，其中 1800 多人是一般干部。“联络站”成为当时外交部唯一的全部性群众组织。

这天，北京钢院红卫兵学生的“革命造反”、“红旗”等组织联合到劳动部宣布夺权。中央广播电台的“毛泽东思想战斗团”也在 19 日下午宣布接管了这座中央最高喉舌的大厦管理权，声明专为造反派服务。

北京大学“新北大公社”众多大学生来到华北局，支持华北局机关“一联”等造反组织成立“夺权委员会”，冲进正在开会的华北局会议室，宣布夺权，要求所有人员次日早晨 8 时准点上班，并发布四条通令。

很快，中央文革给华北局夺权总指挥打来电话，下达 3 条指示，说“这是中央的权，你们不能夺”，并说：“中央文革不同意

你们这种做法。”“通知‘新北大’同学立即撤出华北局。”

于是，北大学生撤出了华北局，前后也就两个小时。华北局第一书记李雪峰后来嘲笑说：“两个小时的政变被粉碎了”。

周恩来 21 日接见中科院代表时说：“中央局是中央的派出机关，代表中央，不能由群众夺权。”

1 月 19 日，林杰在《红旗》杂志社与参加《北京日报》社夺权的北师大“井冈山”、北邮“东方红”等学校红卫兵和《北京日报》社造反派见面，他说：

“《红旗》杂志社全体革命同志向你们夺权表示热烈祝贺。《北京日报》革命同志依靠自己艰苦斗争，在社会革命力量支持下，从黑帮手里夺了权。这个革命行动好得很！我们《红旗》杂志社全体革命同志坚决支持你们的革命行动，向你们这种敢于革命，敢于胜利的精神学习。《北京日报》过去放了许多毒，因为权没有掌握在革命派手里，掌握在彭真、刘仁、范瑾、翟向东等手里。权掌握在革命派手中，报纸才能革命，为人民服务。毛主席教导我们。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我们就是要夺权。我们的号召是：一切革命派联合起来，向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手中夺权！把一切掌握在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夺过来！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无产阶级专政万岁！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向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

当晚，北航“红旗”方臣负责带一车人去《北京日报》。北航“红旗”王端等人和以北航“红旗”驻《北京日报》联络站为首的“首都革命造反派创立新北京日报联合委员会”，简称“联委会”，对《北京日报》社进行“二次夺权”，并发出通告，宣布《北

京日报》社的“一切大权归联委会”，遭到北师大“井冈山”等组织的反对。之后，北航“红旗”与林杰进行了辩论。

《人民日报》能不能夺权？报社内的两派争执不下。1 月 19 日，王力在《人民日报》社接见极力主张夺权的一派时说：“上海革命造反派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两个字：夺权。这样一场文化大革命，《人民日报》不能无动于衷。”“你们报社死气沉沉，没有革命气息，你们同北京文化大革命没什么联系，可以请北航‘红旗’、清华‘井冈山’、‘新北大’、北师大‘井冈山’、‘首都兵团’、‘政法公社’和革命造反派的工人进驻报社，参加报社的工作。”“《人民日报》不要不让人进来，”他对随他一起来到报社的北航等校学生说：“欢迎你们监督，这个报不单是他们的，也是你们的。你们外来的应有主人翁的态度，是否把你们办的《红卫兵报》的同志调一部分人来办报呢？”“每个办报的同志，首先是文化大革命的战士，然后才有资格办报，不然就请靠边站，养老去，不配在党报工作。”“都那么不偏不倚，一视同仁，完全是错误的，”“如果是保字派，就要打一点儿官腔。”

他还说：“1949 年以来，有些人变成了资产阶级，”“这次要彻底打碎一切旧机器，创立新机器，”“要在一切部门，一切领域，凡是不掌握在无产阶级手里的权，都要统统把它夺过来。”

教育部，有 30 多个单位的群众组织云集在这里，他们组成了“联合夺权委员会”，领头的是清华“井冈山”。1 月 19 日，北京大学“红旗兵团”的人和在北大组织军训的 63 军的军训解放军来到这里，联合其他群众组织支持教育部的“北京公社”夺权。北大学生一到就把所有办公室的印章都抄了，还抄了 7、8 个司

局长的家。

随后，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地质学院等北京许多高校的学生也纷纷赶到教育部夺权。人一多，现场就乱了。人多嘴杂，究竟应该将北京大学学生收来的这些教育部大印交给谁？学部吴传启、北师大的“井冈山”谭厚兰等人支持高教部以卢正义、徐非光为头头的“延安公社”出来掌权。而发起夺权的教育部“北京公社”自然是绝不同意。他们说卢正义是叛徒。

本来在 1 月初北京各高校在宣传部成立“批陶联络站”时，为是否接纳教育部“延安公社”加入，北京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就发生了分歧。吴传启、谭厚兰等人支持“延安公社”加入，北京大学等单位反对“延安公社”加入。因为有人揭发“延安公社”的头头卢正义解放前在江苏省反省院有自首变节嫌疑。

为此，林杰亲自来过问，当场就和北京大学的代表顶了起来。

林杰说：“凭聂元梓的权威，不能把‘延安公社’排除在外。”

北大的代表把桌子一拍，说：“凭你林杰的权威，也不能把卢正义拉进来”。

经过大多数组织的坚持，“延安公社”没能参加第一次批陶大会。但是，批陶组织也从此分裂。

此时，在教育部夺权的分歧中，北京大学当然是支持教育部“北京公社”。

面对两种意见，清华大学“井冈山”驻教育部代表胡宗华在会上说：“‘延安公社’，一个公社，5 个叛徒”，在请示蒯大富后，发表了一个中立的宣言，不介入北大和北师大的矛盾，宣布退出教育部、高教部夺权，只在高教部留了一间办公室，大多数人连

夜撤回了清华。

1 月 19 日，北京大学另一路夺权大军也进入了统战部。这时，地质学院“东方红”联合统战部的“东方红”刘郢已经夺权。当时北大认为地质“东方红”是左派，于是向他们表示道歉就撤出来了。后来北大知道统战部内还有三个组织“114”、“革造”、“东方红”，第二次又派队伍进入统战部并正式表态支持“114”。

19 日晚，聂元梓在北大广播讲话中指出：“当前夺权斗争是两条路线斗争的新阶段，是文化革命取得胜利的关键。我校已组成夺权指挥部。下阶段大部分人军训，一部分人搞社会夺权，一部分人宣传反经济主义。”

动态报

英4版

第卅五期 1967.1.20. 新北大捍卫毛泽东路线联络站

毛主席万岁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

* 在接见工人组织座谈会上周总理、陈伯达同志讲话(摘录)

(时间：1967.1.18 地点：人大会堂小礼堂 清华井岗山口头传达)

总理说：今天30多个单位夺了北京新市委的权，我们祝贺他们的胜利。今后的任务首先要吸收一些主要的工厂，吸收更多的职工帮助加强力量，特别是大学要负起主要责任，如北大、清华、师大……要负起主要责任，而不只是配几个人参加几次会的问题。首先是监督他们的工作，不行的就撤他们的职；参加的就要加强，没参加的就要参加。既然前进就不允许半途而废。党中央、文革、解放军都帮助你们，完成这项史无前例的任务。我们信任你们，你们同时也应信任我们。这样大的事情，随时都要和我们取得联系，24小时内我们都有听电话的。

* 昨晚聂元梓同志在我校广播讲话中指出：当前的夺权斗争是两条路线斗争的新阶段，是文化革命取得胜利的关键。我校已组成夺权指挥部，下阶段大部人回校军训，一部人搞社会夺权，一部人宣传反经济主义。

最新消息

* 我校“红教工”、“概述”今天下午8:20接受了高教部、教育部，并发了一号通告

北大动态报第 35 期

这是北大动态报第 35 期照相版。聂元梓的讲话是 19 日讲的，报道的稿件也是 19 日写的，所以原稿有“今晚”字样。报纸是

20 日出版，由于编辑的疏忽，有了“今晚”的错误，油印后才发现有误，随后用手工作了改正，改为“昨晚”。去高教部、教育部夺权的日期也有同样错误，但没有注意将其改正。

同样是受 1 月 16 日《红旗》杂志评论员文章《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的影响，1 月 18 日上午，长春市红卫兵“二总部”联合 62 个群众组织召开“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猛烈开火”的大会。在会上，他们提出“革命造反派联合起来，向党内走资派展开夺权斗争。”

下午，“二总部”得到“教大主义兵”和体校“造反大军”、“吉林省工人造反大军”、“长春市群众自发造反大军”要到省委夺权的消息，立即研究夺权问题。

“教大主义兵”的全称是吉林师范大学“红色造反兵团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破四旧”时，他们把吉林师范大学的校名改成了“毛泽东主义教育大学”，这个组织的全称也就成了“毛泽东主义教育大学红色造反兵团毛泽东主义红卫兵”，连着念下来，一口气喘不上来，得噎死，于是长春人就叫他们是“教大主义兵”，听起来，跟个邪教似的。这“教大主义兵”其实是长春“保皇派”中的精英。大字报写得漂亮，传单也漂亮，油印材料上的手刻的小楷，让人爱不释手。他们在学校是死保师大党委书记黄彦平，辩护大字报写得振振有词。当他们杀向社会时，却是反对吉林省委书记赵林的，因为他们与南开大学“八一八”红卫兵一起，发现赵林也是那“61 个叛徒集团”的一员，于是，一方面猛攻吉林省委，一方面仍然死保学校黄书记。他们猛攻省委，赢得了不少喝彩。

但是，他们也有对立面，就是师范大学的“造反大军”。这师大的“造反大军”也不是善类，个个能说能写。有一天，他们忽然向全市人民揭露，“教大主义兵”有人竟敢宣称：“黄彦平书记是我们心中的黄太阳！”这还了得！

原来，这是“教大主义兵”一名女同学说话时出现的口误，她错喊出来：“黄彦平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这一下，全市大哗，街头巷尾都喊黄彦平是“黄太阳”，师范大学的副书记叫李铁心，一时间也被称之为“李月亮”，弄得“教大主义兵”是百口莫辩，从此，“教大主义兵”名声一落千丈，成了笑柄。

1 月 16 日《红旗》杂志评论员文章《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发表后，长春“教大主义兵”知道中央号召夺权，于是剑走偏锋，准备抢先夺权。

1 月 18 日下午 17 时许，吉林省委机关“造反大军”正在召开全体大会，快结束时，师范大学的“造反大军”来人报信：“‘教大主义兵’要接管省委，我们要先下手。‘二总部’正在开会，准备和你们联合接管.....”这消息顿时在会场上引起一片混乱，很多人离开会场，急忙回去清理材料往外送，有的裹在大衣里，有的赶紧送到档案库。

吉林省委机关“造反大军”一直都是主张“要少和学生联合”的，听说“二总部”和师大“造反大军”要和他们联合接管省委，立即由总部负责人纪清慧主持召开各兵团代表会，决定先下手为强，首先接管省委的档案局、印刷局和汽车队，他们认为这三个部门最重要。不过，当他们在档案局馆贴“接管声明”时，总部负责人范国田又突然打来电话，指示撕掉“接管声明”。总部另

一个负责人马文举后来解释说："我们在档案局馆的接管，主要是为了挡挡门面，别叫学生控制了。"

本来，省委机关"造反大军"对"二总部"要来与他们联合接管吉林省委一事，一方面表示支持，同时在行动上采取"不表示、不参加、不反对"的"三不政策"，据说后来是听到了宋任穷的一个电话内部指示，于是在第二天，1 月 19 日召开的各兵团大会上，他们改变了态度，主持人姜念增说："参加不参加'二总部'接管省委，这是'二总部'考验我们省委机关'造反大军'是不是革命造反派的时候。我们马上和'二总部'接管委员会联系，报名参加。"于是，吉林省委机关"造反大军"发表声明，与师大"造反大军"接管人员联系，参加了"接管委员会"。

当天，"接管委员会"发出《六条通令》，将省委有关部门贴上封条。

东北人民大学"红旗野战军"驻长春"二总部"代表王政和听到师大"造反大军"接管省委的消息后，立即给"二总部"的邬孟庄打电话，说：师大"造反大军"接管省委是不合适的，东北人民大学"红旗野战军"坚决反对。邬孟庄表示同意。随后人大"红野"和农大"造反团"的人前往省委制止师大"造反大军"的接管。但是他们到那里时，接管已经结束。

据说，长春市委第一书记宋洁涵 1 月 17 日就在长春通往农安的汽车上与长春的几个常委商量了交权的事情。宋洁涵觉得："'教大主义兵'有问题，'省工造大'、'自发造大'政治面貌不清，要依靠市委机关'造大'和'二总部'夺权。"并于当天与市委"造大"负责人李景阳取得了联系。

1 月 18 日，“长春市革命造反派《长春日报》接管委员会”主办的《新华电讯》，代替《红色电讯》。

当天午夜，长春市委完成了向市委机关“造反大军”的交权，但是被人指责是“假交权”。

第二天，1 月 19 日，中共长春市委、市人民委员会、市公安局、《长春日报》社等领导机关和重要部门被本机关群众组织夺权。同时，省内各地普遍发生“夺权”风潮。

1 月 24 日，在长春驻军和公安部门协助下，长春市红卫兵“二总部”等群众组织发动好几千人围攻吉林省体校的“革命造反大军”。

“吉林省体校革命造反大军”是死保吉林省主管体育的副省长张文海的。1966 年 11 月 5 日，长春市红卫兵“二总部”在体育馆批斗张文海，体校“革命造反大军”就跑到会场大砸了一通，简直成了张文海的御林军，有他们在，谁也动不了这位张省长。他们在大街上，公然贴出大标语说：“张文海就是毛主席的好干部！”当然，在“二总部”的努力下，11 月 7 日，吉林省委还是报东北局批准，将张文海停职反省。

1 月 24 日这天，吉林省体校所在的南岭热闹非凡，大喇叭反复播放毛泽东的《敦促杜聿明投降书》，敦促“吉林省体校革命造反大军”投降。体校“造反大军”固守青年四舍大楼，拼死抵抗，拿砖头往下砸。“二总部”这边也派出了体育棒子队，即师范大学“造反大军”体育系的学生，块头儿并不亚于省体校的“造反大军”，一个个抱着为革命不惜献身的精神，不顾一切的往上冲。长春市公安局的“红色造反兵团”还组成第二线包围圈。驻

长春的部队也派出部队前来压阵。当天全市的“二总部”支持者，都在关注着南岭这边的事态。

体校“革命造反大军”一层一层的往上退。这边师大体育系的拽下来一个就揍，然后公安局的人就上来给他们戴手拷子。天黑前，“战斗”结束。当天，“二总部”还顺便把“吉林省工人造反大军”和“长春市群众自发造反大军”这两个组织总部的一些头头抓走，并宣布：这 3 个组织是省、市委和省人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操纵的“反革命组织”，把被逮捕的人定为“现行反革命”。

## 第 420 回：晋夺权，不服气要打游击　抢大印，保守派冲锋在前

我们再看正在夺权过程中的山西。

1 月 15 日一早，准备前去参加批斗会的山西省委第一书记卫恒对他的同僚们说：“多吃点，今天怕是凶多吉少。”

早饭后，他们乘一辆吉普车直奔五一广场。刚到广场，卫恒一干人就被杨成效手下的一群工人从车里揪出来，连推带搡地押上了主席台。中共太原市委的代理书记贾俊也被揪到主席台上与卫恒、王谦、王大任一道接受批斗。他们每个人都被挂上冠以“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硬纸牌子，上面的名字上还都打上了红×。这几位省、市委领导绝没有想到，他们从文革一开始就力图站在运动前列，真心实意地想领导好这场运动，结果，是自己变成了这场运动的敌人；更想不到的是，他们坚定不移地跟着毛泽东，在这场运动中理解的执行，不理解的也执行，结果却成了反对毛主席的修正主义分子。他们不能接受这种历史的误会。更不能忍受这种人格的侮辱。卫恒一把将挂在脖子上的牌子揪下来，扔到脚下。其他几位领导也将牌子揪下来几把撕毁。

看到这些人把纸牌子撕坏了，杨成效另有高招。他一声令下，负责押送这些走资派的“决死纵队”队员们，又把早就准备好的木牌子，挂在了这几位领导人的脖子上。他们强迫卫恒低头，卫恒厉声喊道：“我有错误甘愿向人民低头，决不向坏人低头！”

于是，他被压倒在地。省委第一书记依旧不屈，不顾扭着他双臂的工人师傅的按压，扭头对正在喊着“毛主席万岁”的工人

师傅们愤然高呼："头可断，血可流，毛泽东思想不可丢！"

在批斗大会上，卫恒、王谦、王大任、贾俊被施以拳打脚踢、坐"喷气式"的行为引起一部分人的反对，因为这明显是违反共产党的一贯政策的。台下"要文斗，不要武斗"的口号声此起彼伏，大会批判发言不得不中断。还有不少人冲上主席台上与主持大会的杨成效等人辩论。批斗大会就是在这种气氛中进行着。

大会后，"山西革命造反兵团"、"太原机械学院第四野战军"的负责人趁混乱之机，率人把卫恒、王谦、王大任、贾俊挟持到上兰村太原机械学院。第二天，机械学院的造反派围攻卫恒。卫恒进行驳斥，并称："刘格平、刘贯一、袁振等人所写的大字报，是政治迫害。他们 5 个人的底子我们清楚，他们掌权不如我们掌权。现在我还是省委第一书记，要对中央和山西人民负责。你们把我软禁在这里是非法的，赶快放我，我要大摇大摆回省委去办公。"

对山西的"112 夺权"持反对态度的不仅是卫恒等人，正在养病的省委书记处书记郑林听了"112 夺权"的消息后，也十分生气。他同省委书记处书记朱卫华商量一起去北京向党中央和周恩来反映情况，说明他们是反对山西省委夺权的。但是省委常委郭钦安认为，"112 夺权"有来头，更何况两位老病人到北京困难重重，恐怕也无济于事。在郭钦安的劝说下，郑林、朱卫华二人拟议中的北京之行作罢。

15 日晚，"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在太原市迎新街的一个学校召开下属各组织负责人会议。刘格平、刘贯一、袁振、陈守中等人在会上介绍各自的个人简要历史情况及"受刘邓资产阶

级司令部迫害”的情况，以消除社会上传扬的对他们的种种不利说法。并再次表态：“一定与革命造反派同生死共命运”，以便进一步取得造反组织的信任。

1 月 16 日，山西省委书记处书记赵雨亭在太原新民东街六号给参加省委二线工作的柴守约打电话说：“刘格平、袁振他们夺省委的权，我们不能交权。啥时候中央有了指示让交才能交。”同时，赵雨亭还给各地、市委的负责人打电话说：“省委的电话随时可能中断。如果你们和省委联系不上，就依靠中央的《十六条》，独立思考，独立工作”。并称：“现在的情况和战争时期差不多。在第一线的被冲跨，第二线的要顶上。根据实际情况处理问题。总之，不能影响了工作”。正在盂县主持召开全省计划工作会议的副省长刘开基也在会上说：“刘格平、张日清、袁振等人在太原发动了政变，我是做农村工作的，准备上山打游击”。

16 日，刘格平、刘贯一、袁振、陈守中等人联名向中央及中央文革小组报送了一份关于省委的材料，标题是：《关于卫恒、王谦等人破坏文化大革命的罪行向中央文革小组并中央的报告》，罗列了山西省委领导人进行“反革命阴谋活动的十二大罪状”。称省委“成立了地下黑司令部、设立了黑据点，在组织上准备和安排了应变对策”。还说：“赵雨亭、武光汤、郑林、焦国鼐、刘开基、胡晓琴、史纪言和副部长以上的大多数干部转入地下，正以全部力量向革命群众和革命左派反扑，成为山西广大革命人民的公敌”。

他们在《报告》中称卫恒等人是“美、蒋特务”，“卫恒黑帮和美蒋的关系值得重大怀疑”，“在卫恒家中革命群众抄出了

暗藏的蒋介石像片和反动传单，像片背面还有反攻大陆的行动纲领”；“在卫恒的亲信副省长卫逢祺家中查出地下室，并在地下室的夹壁墙内洞已挖空，其中放置的东西已转移，此人是否美蒋特务打入党内，确实嫌疑很大，山西省委这一反党集团是否里通外国实属可疑。”

其实，卫逢祺的宿舍是建国前旧政府的一个办公室，里面的地下室就是原来的防空洞。

《报告》中将山西省委根据华北局的指示组织的第二线班子，称之为“省委的特务组织”，在《报告》中称：“特务组织有组长刘贯文（省委办公厅办公室主任），组员李玉明（卫恒前秘书），周文（郑林前秘书）等三人”。

《报告》中还称：山西是“刘少奇、邓小平、彭真、薄一波、安子文囚禁革命者，保护反革命的保险柜。是刘、邓、彭、薄、安的战略后方。”“卫恒、王谦、王大任在他们后台的指示下，跟踪搜捕革命左派，正加以杀害。自从刘格平五位同志大字报贴出后。这种活动急剧增加，白色恐怖严重，面对这种短兵相接的决战关头，如果不放手发动群众，壮大革命群众力量，直捣敌人的老巢，打断和打乱他们的统治，就可能出大事。”《报告》请中央批准“对省公安厅、市公安局实行军事接管”。

1 月 16 日，王力在接见为新华社山西分社 14 日报道山西保守派大会一事到北京告状的太原机械学院“红旗战斗队”时说：“山西的革命形势我认为很好。14 日的事，《人民日报》没有错，主要责任在新华社山西分社，新华社从中得出了一个教训，不清楚的就不要登。”

对太原机械学院“红旗”战斗队代表提出的如何看待山西“112 夺权”的问题，王力没有明确表态，只是鼓励他们夺权。他说：“我们对山西的情况缺乏了解，就简单谈到这里。我们祝贺同志们取得胜利！你们要打回山西去，时间很宝贵，赶快回去参加火热的阶级斗争，参加战斗！祝贺同志们大胆向上海学习，赶快回去夺权，时机宝贵的很，这一点作为给同志们的送行。”

1 月 16 日，山西大学拥护省委的“八一四”派头头们也认真学习了当天《红旗》杂志评论员文章《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立即认识到夺权是党中央、毛主席发出的最新号召，是当前的首要任务，必须听毛主席的话，跟党中央走，首先要改变观点，同时付之行动，积极参与到夺权斗争中去。

当晚 21 时左右，山西大学校党委秘书姚桂兰正在党委办公室看书，忽然听到一阵嘈杂的人声，哐当一声，房门被重重地踢开。一群学生推搡着校党委书记李希曾闯了进来，说是要夺权。很快，办公室里就挤满了人，沙发上，窗台上、桌子上到处都是学生。他们不时举起拳头，高呼着“打倒走资派!”“打倒保皇派!”等口号，要李希曾交出山西大学党委的印章。领头的就是中文系学生、“814”派头头朱永成。

学生们推推搡搡，将姚桂兰和李希曾推挤到放机要柜的墙角处，指着姚桂兰大声说到：“马上交出党委图章!”

姚桂兰说：“党委没有指示，我不能交。”

学生们高呼：“打倒保皇派!”

又对李希曾喊道：“你是书记，让她打开柜子交出图章!”

党委印章，李希曾怎敢随便交出？执意不允。

学生们又气又急，又不能动手打人，只能在那里不停地高呼口号，念起 1 月 16 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发表的毛泽东的一条最新最高指示："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里夺权，是在无产阶级条件下，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革命，即无产阶级消灭资产阶级的革命。"

这时有人提出砸开保密柜。

砸党委的保密柜会不会被人说成是搞打、砸、抢？会不会被打成反革命？但是，夺权是党中央、毛主席的号召，是革命。革命是什么？"是暴力，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力的行动。"这可是伟大领袖毛主席说的，怎么能文质彬彬，温良恭俭让呢？

为了证实他们的行为是革命的行为，避免给人以打、砸、抢的口实，学生们把学校保卫处长李志学拖了进来，当着他的面，将保密柜砸开。

保卫处長哪经过这事？他不知该如何是应对，于是便爬在地上，捂着眼睛，以表示自己什么都没有看见。

子夜 1 时 40 分左右，学生们砸开了保密柜上的锁，把党委的图章和党委办公室的图章拿了出来。他们兴奋的高呼："我们胜利了！我们夺权了！"

学生们在欢呼声中，拿着两枚公章离开了党委办公室。

众人走后，李希曾让姚桂兰起草了一份声明，内容是："从 1 月 17 日 1 时起，学校党委和党委办公室的图章被'八一四'革命造反派组织夺走，以后发生的一切问题，我们概不负责。"署

名是李希曾和姚桂兰。随后即在校广播站播出。

第二天全校贴满了关于夺权的大字报和漫画，其中一幅题为《看保皇派的嘴脸——姚桂兰》的漫画，将她画得两条辫子翘了起来，两手抱着大图章不放。

17 日一早，在山西大学夺权成功的朱永成，又带人杀向省委。这时，工人诗人张志安领导的拥护省委的“山西革命工人联合会”一伙年轻工人们也来到省委，他们也是连夜学习了 1 月 16 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发表的毛泽东那条关于夺权的最新指示后，立竿见影，活学活用，跑到省委夺权来的。两支人马在省委门前相聚，决定联合行动。此时，早有人得到消息说，杨成效的人马还在省委，而省人委那边，现在还没有其他造反组织把守。于是这批工人和大学生们，便改道直扑省人委大院，冲进了省人委办公厅。

省人委办公厅有几名 1963 年几乎同时分配来的大学生，分别是来自中山大学的黄锐庵、来自山西大学的杨瑞武、苏培田、南开大学的王浦源等。他们在省人委办公厅上班不久，也被派到四清前线，“文革”开始回到机关，由黄锐庵挑头成立了“山西东风革命造反兵团”，积极参加运动。当刘格平带头起来造卫、王、王的反时，黄锐庵就带着这个组织成了刘格平的积极支持力量。

当山西大学和张志安领导的“山西革命工人联合会”这批工人和大学生们，冲进了省人委办公厅时，正在这里值班的恰巧是参加刘格平组织的山西夺权的“山西东风革命造反兵团”杨瑞武。此时，机要室的门和存放省人委大印的保险柜钥匙，全在杨瑞武手中保管着，他拒不开门。于是那些工人和学生们就用铁棍撬开

窗户，破窗而入，反拧住杨瑞武的双手，从他身上搜出保险柜钥匙，然后打开了机要室的保险柜，抢走了省人委的政府大印。

刘格平和杨成效得到保守派的“山西革命工人联合会”夺了省人委的权这一消息后，立即以“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名义向全省发出“紧急通告”，认定这是一起“反革命夺权事件”，杨成效的“决死纵队”和其他盟军，又砸了“工人联合会”，抢回了那枚大印。但刘格平只闻大印抢回，却不见大印原物。这个大印日后流落何处，终于不知所终了。

1 月 17 日，刘格平、张日清、刘贯一以及“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总指挥杨成效和“红联站”负责人杨保明等人在刘格平家中开会，研究接管省、市公安机关一事。

会后，“红联站”立即宣布夺了省公安厅和市公安局的权，张日清到场祝贺，刘格平向中央电话报告。

当天，“红联站”和“首都赴晋革命造反大队”宣布夺山西人民广播电台、《山西日报》社、《太原晚报》社以及太原市电讯局的权，并派人抢占了这些单位。接着，他们又陆续夺了太原铁路分局、太原钢铁公司、太原纺织厂、太行仪表厂、大众机械厂、共青团山西省委、山西省文化局、山西大学、山西省委党校、太原工学院、山西医学院、山西农学院、山西财经学院、山西矿业学院、太原机械学院、太原重型机械学院等 40 多个单位的权。

夺权！夺权！夺权！一时间，“红联站”在太原市夺权成风！

## 第 421 回：亮观点，王力、关锋态度明　借东风，李井泉上海被捉

1 月 17 日晚，王力、关锋在北京民族饭店再次接见太原一些群众组织代表。这次，他们对山西的“112 夺权”已经是态度明确了：坚决支持！

接见时，关锋问：“‘山西红色造反联络站’来了吗？”

答：“来了。”

王力说：“当前最大的问题，就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发展到一个新阶段，到了转折点。在这个新阶段，摆在我们面前头等重要的问题就是：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向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向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夺权。上海有这样那样的经验，但归结起来就是二个字：夺权！山西的问题千头万绪，但是最重大的也是：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夺权！……

根据这样一个大原则，我们研究了昨天接到的《山西革命造反派总指挥部》第一号通令。有多少条？有 4 条。对这样一个行动，我们昨天没有表示态度，现在我宣布：我们支持这样一个行动，我们支持山西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从卫恒、王谦、王大任手里夺权！”

群众热烈鼓掌，高呼“毛主席万岁！”

王力：“在山西出现这样一种接管的情况，这种情况的出现，我们要看到它的主流，这是群众首创精神的表现，是新生事物。有人叫：不行啦！乱得不得了啦！在这样一个大革命，是否会出

现一些乱呢？当然会，但这不是主流。”

关锋插话说：“有乱才有治嘛！”

王力：“只有大乱才有治。所以我们要看到主要的方向。是否有一种假接管呢？以达到保护自己的目的，会有的。但是在这样一个大革命中出现一些这些情况，我们不怕它，群众会识破的。

上海的革命群众在研究写了接管的经验后，认为：（1）机关的接管应以本单位的革命群众为主，以其他单位的革命群众为辅。（2）在斗争中建立联合委员会，在接管方面建立联合，不是一个组织接管一个部门，而是有计划，有配合地来做这件事。（3）在接管后，原机关的机构与人员，还可以在群众监督下执行任务。

这个办法也还好，这是群众的创造，我相信，你们山西的群众也会有新的创造。

你们的情况与上海不一样。

毛主席说：过去的斗争是农村包围城市，接管城市以后，实行军事管制，把原有的机构保存下来，从上面派人下去。这次文化大革命，是革命群众，革命组织，自下而上的接管。不但掌握自己单位的命运，而且要把主要的工厂，矿业，运输单位，党政机关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建立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成为坚强的堡垒，巩固的阵地。没有这样的阵地，就不能取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

昨天，有一位副司令的儿子提出了一个论点：‘军区第二政委张日清居然加入了地方的文化大革命，违反了中央的规定，破坏了党的纪律。’我们研究了他的意见，我们认为他的意见是错误的。事实上没有不加入的，公安部门也有人说‘我不加入’，有

没有不加入的？”

众答：“没有！”

王力：“问题是你支持那一派，是支持革命派，还是抵制革命，我们认为，解放军和公安部门应当鲜明地表示态度：支持革命派！支持造反派！支持一切革命的正义行动。”

关锋：“张日清同志支持你们反对卫恒、王谦嘛！”

王力：“张日清同志反对卫恒、王谦，支持你们造反派，我们赞扬他的革命精神，今天我们给你们亮明这个观点。

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就是要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保卫文化大革命，保卫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大民主，如果他不支持造反派，我们怎么办呢？”

众高呼：“造反！”

王力：“对！造反！在这一点上我们要相信解放军，相信林彪同志的领导，军队的问题可以在解放军内部解决，不要冲击解放军。

要改变一个观念——有了什么问题都要求省委解决，这没有必要，那等于要他们的命嘛！你们要干什么就干什么，你们可以依自己的意见去改组省委，造反派可以安排省委的名单，一句话：要夺权！”

群众高呼：“拥护中央文革的正确领导！毛主席万岁！”

关锋：“不多讲了，时机要紧，要趁上海的东风赶快行动起来。”

王力、关锋的讲话迅速被山西驻京的造反派以“特大号外”、“中央来电”等形式传回太原，公布于社会。一直持观望态度的“山西革命造反兵团”贴出大标语：“32111 的方向就是我兵团

的大方向”，公开倒向刘格平一方。

此时,“太工红旗”又发出“再告全省人民书”，即“二告”，表示响应中央号召,向各级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但他们仍然认为山西文化大革命比全国落后两个月,省委的问题还没有真正揭开，刘格平等人并没有群众基础，此时夺权实不相宜，我们有责任向中央反映真实情况。接着，“红联站”连续发表三篇由“太工红旗”写作组写的文章，评论山西的“112 夺权”，史称“三评”，不厌其烦地把他们的疑点和看法告诉群众，希望大家保持警惕。

1 月 18 日，刘格平在“红联站”与山西“革命工人造反兵团”和首都赴晋的几个造反组织联合成立的“红色造反总部”筹备会上说：“你们可以成立第二指挥部，同‘总指挥部’并肩作战。”

听到王力、关锋的明确表态，山西省委机关已经联合起来的群众组织感到压力很大，强烈要求参加“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他们给自己的组织起名叫“七一公社”，头头就是省委政治研究室“太行游击队”的李辅。此时他知道大势已定，必须紧跟中央，开始与陈守中的妻子刘志兰接触，并提出加入“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申请，请她帮助。

此时，那枚将省委大印藏在身上的省委办公厅女机要员李爱卿，也知道中央是支持和号召夺权的，但是又不愿将这大印交给刘格平和杨成效们，就偷偷与办公厅的同事商量。1 月 18 日下午，李辅的老同学、省委办公厅干事任传兴找到李辅，对他讲述了这枚省委大印经过，并说：

“为了省委图章的安全，办公室的同志认为，机关内你们最

可靠，所以想把省委的章交给你们。”

李辅听完表示：“我得和其他负责人商量一下。”

“七一公社”研究后决定，再搞一次造反夺权，以这种形式将省委大印转给“七一公社”保存。

当晚，200 多名省委机关干部包围了省委办公大楼，然后还砸坏一个门，将山西省委大印交到了他们手里，交由“干部造反大队”张杰德保存。

虽然“七一公社”有印了，却还是无权，因为刘格平新的党的核心小组已经取代了原省委，执掌了山西的大权。李辅虽然有了省委大印，但也不敢用它来做什么具体的事情。

山西大学“八八红旗”的决策者们，也从北京传出的声音中找到了他们的斗争方向，那就是要与“红联站”一样，赶快去支持工人阶级从基层开始的向走资派夺权。但是，他们对王力、关锋 17 日的讲话却是另一种态度。他们的决策者们将王力、关锋 17 日的讲话分析来分析去，确定这一定是关锋个人的观点，不代表中央文革小组和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想法。因为关锋在接见时，代表中央文革小组明确表态支持的太原纺织厂女劳模解悦领导的“太纺红卫队”是保皇派，关锋支持“太纺红卫队”，那还不是支持了保皇派？于是，方培泉带着一批“八八”小将进驻太纺，支持工人阶级“太纺红卫兵”起来造反，向走资派夺权。这些大学生们以强大的火力，就是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和大标语，开始炮轰关锋。

正在祁县乔家大院的山西省委二线指挥部临时驻地，负责山西省委二线工作的省委书记处书记赵雨亭，副省长刘开基也在这

里分析形势，他们认定山西省委并没有变成走资派，刘格平挑头夺省委的权是错误的。两人决定立即赶赴北京，通过华北局，向党中央、毛主席、周总理、中央文革小组汇报山西的情况。他俩没有回太原，而是从寿阳登上去北京的列车。于 19 日到达北京，当即向华北局书记赵谦益报告了山西的情况，并将两人联名给周恩来和中央文革小组写的报告交给赵谦益，请他迅速转报党中央。

周恩来看过这份报告后，让赵谦益转告赵雨亭和刘开基，准备找他俩谈谈。

1 月 10 日前后，西南局办公厅收到中共中央办公厅发来的电报，要李井泉到群众中去，有错误就检查，不要怕群众。

这时，西南局机关也已经有了起来造反的群众组织。电报被群众组织拿到。他们于 1 月 15 日找到正由西南建委造反派监管的西南局书记处书记程子华，向他询问：中央给李井泉的电报应该转到何处？

程子华说，李井泉已到上海养病，但他也不知道李井泉在上海的具体住处。

1 月 15 日当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红旗》杂志 1967 年第二期社论《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到群众里面去》。社论指出："肯不肯和敢不敢到群众里面去，这是无产阶级世界观和资产阶级世界观的一个根本分界线。"社论还严厉警告：如果领导干部不到群众里面去，"他们同群众感情的距离，就会越来越远，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距离，就会越来越远。有的人甚至要一步一步发展到指责群众运动、压制群众运动，对抗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抗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这样，他们同党同人民矛盾的性质就会起变化，从非对抗性的矛盾转化为对抗性的矛盾。”

纲上的很高，领导干部不到群众中去检查，问题很严重。怎么把中央的这封电报转到远在上海，地址不详的李井泉手里呢？此时成都红卫兵正为两派冲突闹得不可开交，四川大学“8.26战斗团”自从与以成都电讯工程学院为首的“红卫兵成都部队”在1966年11月13日“揭发批判西南局、省市委贯彻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的大会上产生矛盾后，到封闭《四川日报》的过程中彻底决裂，最终发展到1967年1月15日“8．26”的“红卫兵川大支队”严正声明退出“红卫兵成都部队”，根本无暇顾及李井泉，怎么办？

正好重庆大学“815”有一个几百人的“赴蓉挺进纵队”在成都，主要目的就是要将李井泉揪到重庆去批判。他们参加了1966年11月18日在成都人民南路广场的大会。可是没想到那次大会闹得不欢而散，更没想到会后听说李井泉失踪了！

重庆大学这个“挺进纵队”抓不到李井泉，怎么好回去交差？遍寻不得之后，他们以红卫兵名义向这位西南地区最高领导人发出了《通缉令》。这样的《通缉令》虽然文字上杀气腾腾，但是既无任何法律效力，也没有多少实际作用。单凭这些年轻人的满腔“革命热情”，是不可能抓到李井泉的。

这个“挺进纵队”有一个驻西南局支队，正在到处打听李井泉的下落。于是西南局机关造反派，就把中央来电要李井泉出来见群众和李井泉在上海的消息，告诉了重庆大学红卫兵。重庆大

学红卫兵如获至宝，立即决定赴上海抓李井泉，并拟定了“战斗方案”。

上海这样大，到哪里去找李井泉？看来，还得通过华东局的走资派设法智取。

1 月 17 日下午 17 时 30 分，由重庆大学红卫兵 3 人和西南局机关造反派 2 人组成的“战斗小组”，押着向西南建委造反派“借”来的程子华及其秘书，带着中央电报，乘飞机飞赴上海。

因为程子华当时还担任着国家建委和国家计委的副主任，到达上海后，“战斗小组”成员便冒充国家计委工作人员，给中共中央华东局书记处打电话，谎称程子华从北京开会回来路经上海，有事要找华东局书记魏文伯、韩哲一商量。

华东局办公厅行政处得知“国家计委”来人后，便派来人员将他们安排到了锦江饭店住下。

在锦江饭店，“战斗小组”先找来了华东建委一位副主任，从他口里打听到，华东局的几个当权派中，曹荻秋已被打倒，正在监督劳动；魏文伯已经停止工作，在作检查；韩哲一还在造反派监督下管一些事务工作。他们分析，只有找韩哲一才可能打听到李井泉的下落。于是，他们便通知韩哲一前来。并向程子华规定了韩哲一来时的讲话口径。

电话打出后，他们在房间里足足等了两个小时。直到深夜，韩哲一才在两个工人的押送下赶到饭店。

韩哲一到来后，事情却没有像“战斗小组”预定的那样进行，发生了意外。　　原来，韩哲一进门，程子华就没有按“战斗小组”规定好的口径进行，而是开门见山向他说明了真实情

况：他不是开什么会路过这里，而是被红卫兵押着来抓李井泉的。

重庆大学红卫兵一看假戏不能再演下去了，便马上掏出红卫兵袖章、胸章，公开了自己的身份，并让西南局机关造反派拿出那份中央电报给韩哲一过目，说是必须交给李井泉。要李井泉按照中央电报要求，回四川接受群众批判。

韩哲一自然不敢封锁中央声音，对抗文化大革命，便如实说出了李井泉住在上海市委瑞金街招待所。

“战斗小组”为了防止走漏消息，“以革命的名义”将韩哲一扣留在饭店里。他们得知李井泉带有秘书、医生、护士、保卫干部、警卫人员共 7 人，还有警卫武器，而此次前来上海的重庆红卫兵学生不仅人少，而且手无寸铁，怎么办？这难不倒他们，因为他们有中央的电报。

上海市委招待所门前有警卫岗哨，不能随便进去。“战斗小组”便派出两人，立即找上海市公安局造反派求援。这时已是凌晨 4 点，满城的造反喧嚣已经停息，上海街头只有寒风在撕扯满墙的标语、大字报，但自认为是在为真理而斗争的红卫兵小将只感到“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

上海公安局仍然有造反派在废寝忘食、夜以继日地坚持“战斗”。刚好在 17 日，中共中央批转了公安部给各级公安部门关于开展文化大革命的通知，要求公安部门“坚决执行和保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坚决支持革命左派，支持左派的一切革命行动”。上海公安局造反派听了四川造反战友的介绍，当即决定，派 3 人配合他们的行动。

这时已是 18 日凌晨 6 时左右。“战斗小组”押着韩哲一

的秘书，到了李井泉住宿的瑞金街招待所。有公安人员引路，他们顺利进了大门。进去时，李井泉的随行人员正在楼下餐厅里准备用早餐。“战斗小组”要这些工作人员交出李井泉，教育他们“站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来，同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划清界限。”

但是，仍有人流露出抵触情绪，觉得自己的职责所在，不愿意配合红卫兵的行动。红卫兵便不客气的质问：“你是保卫毛主席还是保卫李井泉？”

人们当然要站在毛泽东这一边。

随后，“战斗小组”留下几人继续对李井泉的随员做工作，其他人与上海公安局的 3 个造反派一起直奔二楼房间，顺利找到了李井泉。他们先对李井泉进行了搜查，然后拿出中央电报给他看，并向他宣布，要将他押回四川批判。

李井泉未对电报表示任何怀疑，只是提出应等医院体检表拿到后再走，这自然被红卫兵学生认为是“耍花招”而否决了。

早饭后，“战斗小组”负责人、重庆大学红卫兵向李井泉一行宣布：从现在起，一切听他们指挥。李井泉和秘书、警卫员及医生一人跟他们一起回四川，其他 3 名随员，在他们走后 24 小时内不得离开招待所，不得向外打电报、电话，然后自行回川，到成都向驻四川大学的“重庆大学八一五战斗团赴蓉挺进纵队”报到。并且警告：“若有违抗，后果自负。”

其间，还发生了一个小插曲：李井泉的一位随员，在听了造反派宣传后，为表明自己与李井泉划清了界限和坚决站到毛主席

一边的革命决心，冲过去打了李井泉一记耳光。

然后，“战斗小组”找华东局要了一架专机，向成都方面打去电话，十分兴奋地告之：“货已到手”，请派车于当天下午到机场接人。

这天上午，“战斗小组”押着李井泉、程子华等一行，乘专机飞返成都。

李井泉被秘密送到四川大学内的重大“815”挺进纵队驻地，第二天凌晨，“挺进纵队”用汽车将李井泉押往重庆。

## 第 422 回：再升级，刘少奇电话被撤　一一九，韦国清桂林游斗

1 月 16 日的深夜，周恩来给王光美打电话说："光美呀，要经得起考验。"王光美很感动，不知道该说什么，只说了一句："总理，你真好。"

1 月 17 日，中央办公厅的造反派又冲进刘少奇家中，强迫刘少奇和王光美站在桌子上接受批斗！

面对这一切，刘少奇只是反复重复着一句话："我从来没有反对过毛泽东思想，只是有时违反了毛泽东思想；我从来没有反对过毛主席，只是在工作上有过意见分歧。"

大家认为刘少奇的态度仍然是坚持反动立场，于是宣布拆除刘少奇办公室里的专用电话。当中南海电话局的人来到刘少奇家里时，刘少奇沉不住气了，他挡住他们说："这是政治局的电话，没有毛主席、周总理的亲自批示，你们不能撤，也无权拆！"来人只好回去了。第二天，又来了两个人，不管三七二十一，将电话强行拆去。刘少奇从此没有了同外界的联系渠道，每天只能从儿女们抄回的大字报以及买回家的各种红卫兵小报中得到一些外边的消息。

在 1 月 12 日上海庆祝中央贺电的大会上，王洪文宣读了《关于建立上海市革命造反派组织联络总站的倡议书》，但是这个"联络站"一直未能成立，大家都忙着各自的接管。1 月 19 日晚上，张春桥在余庆路接见上海"火线指挥部"以及铁路、海港、商业一局、商业二局、粮食局等系统造反派。他再次提出建立造反派

联络站之事。明确地指出，夺权必须联合，并告诉大家，这是毛主席的思想。张春桥向大家传达了毛泽东的话：

“上次你去的时候，造反派只有几千人，现在有 100 万人，上海工人革命力量是不可阻挡的。……”

“上海最重要的经验是革命大联合，革命大联合就是夺权。”

他说：“你们不要认为斗争胜利了。在我们的面前还有严重的斗争，我们还要准备打几次硬仗。”

这句话他反复讲了两遍，姚文元在旁边又重复了一遍。

张春桥接着说：上海革命造反派当前的中心任务是夺权，要接管。他说：“夺权的问题是革命的根本问题。权一定要夺回来，一定要夺到无产阶级手中，这是革命的百年大计、万年大计、是文化大革命的中心问题。我们一定要花很大的力气，花很大的功夫，把权夺到无产阶级手中。”

他说：“目前还有很多群众卷在经济风中，所以上海目前运动的焦点是反对经济主义。如果不反对经济主义，文化大革命就要中断。经济主义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通过反对经济主义，我们可以达到革命的大联合，可以争取群众，创造新的经济命脉，彻底打垮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他对代表们说：“正像你们刚才说的，陈丕显还没有打倒，他还在活动，曹荻秋也只是表面上被打倒，他也还有势力。市委机关的阶级斗争盖子也没有真正揭开。‘赤卫队’还在改头换面，转入地下活动。社会青年、里弄干部、下乡支农返沪人员的工作都没有人去做。”

他最后说："现在考验一个组织革命不革命，革命得彻底不彻底就是看他在反对经济主义问题上的态度。"

张春桥对上海"铁联"负责人谢鹏飞等人说："毛主席说，你们接管上海站，接管得好，给全国树立了样板。毛主席要你们关于接管上海车站的详细材料，赶快送去。毛主席要你们好好干。"

当晚 21 时，各造反派组织在淮海中路上的市委党校召开上海"革命造反派组织联络总站"第一次筹备会议，推选"工总司"、"机关联络站"和"上海新闻界革命造反委员会"，简称"新革会"为召集人。

接着，对"联络总站"的名称进行讨论。有的建议叫"上海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总联络站"，有的建议叫"上海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委员会"。"抓革命促生产火线指挥部"代表、华东师范大学红卫兵霍达说，"联络总站"这类名字不响亮，容易和一般群众组织混淆，全世界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叫巴黎公社，华东师范大学的红卫兵组织叫"新师大公社"，这个组织是不是叫"上海公社"。大家一致叫好。一位北京红卫兵又提出再加一个"新"字。于是定名"新上海公社"。有人提出："应该给目前的形势定个名称，我们现在的情况，跟苏联十月革命时期差不多，可称为'一月革命'。"又博得大家赞同，把准备起草的宣言名称定为《一月革命万岁——新上海公社宣言》。会议推举"机关联络站"的徐景贤、"新革会"的周国荣、北航"红旗"驻沪联络站的徐险峰、清华"井冈山"驻沪联络站的薛珍等人起草《宣言》，每人起草一节，最后由徐景贤统稿。

这次筹备会议的召开让张春桥十分的高兴，第二天，1 月 20

日，由姚文元执笔、张春桥阅定的给中央的《上海工作简报》上写道：

“在斗争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顽固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小撮人的破坏活动中，各单位都普遍展开了夺权斗争，革命左派用各种形式的大联合，把领导权夺到自己手里。这个革命行动，是推动生产前进的根本因素。革命的工人和革命群众的许多新创造，实际上已形成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新形式，把过去的部长、局长、处长、科长……庞大的官僚机构，一扫而光。这就使革命大大推进一步。”

姚文元还报告道：“联络总站成立，日前已实际行使着政权的作用。”

1 月 19 日，广西自治区第一书记韦国清在桂林被游斗。

1966 年底，桂林“老多”已成为在桂林压倒多数的群众组织。1966 年 12 月 18 日，由“工人红卫兵总部”和“大中学校红卫兵总部”等组织发起，正式成立桂林市“革命造反联合指挥部”，简称“造反大军”，由桂林师范学院的学生黄沃南、李宝雄、师院中文系老师杨福庭和桂林“工人红卫兵总部”一把手高桂英 4 人组成领导核心。

1967 年 1 月 7 日，《广西日报》社“硬骨头”等 19 个战斗组联合“广西革命造反指挥部”、“广西地区革命造反司令部”、“桂林八一红卫兵驻邕联络站”等组织成立“封闭《广西日报》行动委员会”，发布“封闭《广西日报》通告”，决定从元月 7 日起，改出《每日电讯》，由《广西日报》社职工主办。

1 月 12 日，桂林“造反大军”接管了桂林广播站。

1 月 15 日，广西“自治区直属机关造反总部”成立，并与“广西工总”、“广西建司”、“广西红总”、“南宁 831”等 25 个群众组织联合组成“广西革命造反大军”，简称“造反大军”。他们在成立后的当天，首先成立了“广西革命造反大军封管《广西日报》行动委员会”，发表“封闭《广西日报》声明”，称 1 月 7 日“封闭《广西日报》行动委员会”是盗用造反旗号，大搞折衷主义、改良主义、温情主义。因此，“广西革命造反大军”决定从 1 月 15 日起，重新封闭并立即接管《广西日报》。“在新的《广西日报》诞生前，出版《新闻报道》。”

1 月 16 日，由“广西造反大军封管《广西日报》行动委员会”主办的广西《新闻报道》出版。

这时，桂林师院“老多”向自治区党委提出来要批判韦国清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前去南宁的桂林师院外文系学生、“老多”头头刘振林他们对韦国清说：“我们批斗你，但我们保证你的人身安全，为了你的安全，你住在我们的学生宿舍。”

1 月 17 日，韦国清带着自治区书记处书记贺希明，区党委常委、区工交政治部主任段远钟，书记处候补书记霍泛和办公厅主任黄继全，还有他的秘书小黄，警卫员小邓坐着吉普车来到桂林，直接开进广西师院。

“老多”刘振林果然将韦国清安排到外语系二楼一间学生宿舍。宿舍里边有 3 个架子床，韦国清就睡靠里边那张架子床下边的铺位。中间有张学生自习用的桌子，周围摆了些凳子，就是当时大学生宿舍里的那些设施。这一切，桂林市委事先并不知道。

当晚 22 时左右，桂林市委副书记王同连和刘竹溪接到通知，

叫他们到桂林师院来见韦国清。当他们走进师院韦国清住的学生宿舍，看见刚刚来到桂林的韦国清他们，吃完饭正在那里等他们。韦国清坐在凳子上，贺希明坐在床边，段远钟在那里走来走去。

韦国清对段远钟说："老段，你坐下来，静下来好不好？你像没有魂似的。"

段远钟心情很沉重，听韦国清这么一说，他才在靠近窗户那张椅子坐下。

韦国清没问桂林的情况，而是开门见山地对王同连和刘竹溪说："看来过去我们对中央的精神领会的不够，我们的一些想法和作法，看来是有问题的，那么现在就应该紧跟中央的有关指示，都要支持桂林的革命派。""你们要支持他们咯，你们也不要想不通。也不要再犹豫了。""我呢，看来这一关，是一定要过了。"

王同连说："我们尽可能地给学生这些头头做工作，既然要批判，就要文明的批判，不要搞一些越轨的东西，不要搞不文明的举动，这个呢，我们要尽量去做工作。"

韦国清没说什么。

从韦国清那里出来，王同连和刘竹溪看见有几个学生在走廊里活动，像是警戒、监督。这是师院学生刘振林不想让更多的人知道韦国清住在这里采取的防范措施。

王同连和刘竹溪找到刘振林，希望他们在批判过程中要文斗，不要武斗，要注意政策。

刘振林当即表示："可以考虑，可以考虑。你们放心，你们放心。"

据说，刘振林曾私下对韦国清说，希望运动后能送他继续深

造。韦国清说："你去找伍晋南吧，我不管这些事，我是管党政和干部的，他是管文教的。"

从 1 月 19 日起，桂林"造反大军"连续 3 天在桂林市体育场召开几万人大会，批斗韦国清、黄云等一批区、市领导干部。批斗大会由师院学生黄沃南主持。在批斗过程中，刘振林亲自给韦国清戴上高帽，韦国清的警卫员小邓，上去把那个高帽子从韦国清头上拿下来，戴在自己头上。学生们一见，又冲上去把小邓戴在自己头上的高帽抢过来，将他推到一边，把高帽子重新戴在韦国清头上。

当时被批斗的还有：区党委书记处书记贺希明，桂林市委副书记刘竹溪、徐为楷，桂林地委书记王祝光、副书记李云亭，区党委派来桂林市的"文革"顾问林中等一批领导干部。

会后，数十辆载着许多当权派的卡车队，缓缓驶向桂林市中心十字街，进行大游斗。韦国清盘腿坐在第一辆大卡车驾驶楼的顶棚上面，身上披着一件用"工人赤卫队"和"红旗红卫兵"的袖章缝制的又大又宽的长袍，活像个红衣教主，胸前挂着块白底的大木牌，写在上面的"韦国清"三个大黑字，打了个大红叉。他头上戴着顶用白纸糊成的长长的尖顶高帽，高帽上面的"韦国清"三个黑字，也打了红叉。两个红卫兵学生站在他身后，二人一手抓着他的后胸，一手摁他头上的高帽，很是神气。

韦国清坐在那高高的卡车驾驶棚上，一动不动，一声不吭，紧闭双眼，脸憋得红红的。

19 日当天，韦国清连夜就回南宁去了。

游斗又搞了两天，桂林市委副书记王同连和刘竹溪游斗结束

后回到家。王同连的家属没在桂林，就到刘竹溪家里吃饭。疲劳加上心里难过，刘竹溪拿来一只大大的玻璃杯，倒满桂林三花酒就喝，喝完以后，落泪哭了。他问："同连呀，这样下去，我们怎么办？"

王同连说："怎么办，现在我们在这里，已经是这种形势啦，我们是区党委支持，叫我们这样工作，那我们有什么办法呢？只有顶着，能顶到哪天算哪天咯。我心里也没有底。"

他劝刘竹溪想开一点，不要太难过，这样伤身体。他说："我看这个事情，不是短期能解决的，我们还要做长期的打算，我们总不能够逃离职守呀！都要坚持呀！"

那顿饭，刘竹溪老伴为他们包了饺子。

副市长牛命之游街后，想不通，和老红军、城建局长屠利尤找到王同连，流着眼泪问他："怎么办？你是市委副书记呀，你主持工作呀，你说怎么办呢？"

王同连又能怎么办？他只能说："哎呀，你们都是老同志啦，你们看这种局面怎么办？现在中央表态就是这个样子。"

到了 1966 年 12 月，天津市委机关内部也开始造反。市委文革办公室有人给市委书记处上书，注明"十二万分火急"：

赵武成、谷云亭、张淮三、胡昭衡同志：

群众骂我们，轰我们，斗我们，我们成了群众造反的对象，成了固守资产反动路线的天津市委的替罪羊。这是情有可原的，但对群众骂我们是市委的特务、保皇派、骗子这些激烈言辞，感到莫大的耻辱！有时给群众解决不了问题，相反地吵起嘴来，形成群众斗群众，这都是你们造成的。

要知道，我们是革命干部，是革命群众。我们是有造反勇气的。群众对我们骂也激起了我们的革命斗志。我们也要站起来造反了，我们已成立了捍卫毛泽东思想战斗队，强烈要求市委火速整顿文革领导机构。

送上一对联。上联是“敢字当头，彻底革命，快快快”。下联是“怕字当头，坚持错误，慢慢慢”。横批是“当机立断”。

如何“当机立断”？ 市委文革办副主任王辉急忙向市委几位书记汇报，建议撤销文革办公室，抽调的人员回原单位闹革命。一阵沉默后，胡昭衡首先点头，其他人没有异议，就通过了。王辉回去以后立即宣布。那天晚上，大家慌慌张张收拾文件资料，屋内纸张散乱不堪，一片狼藉，真有点像电影里军队兵败撤退的样子。办公室秘书组组长陈文毅拿着大家交来的一大串钥匙不知如何是好，王辉说：“交给我吧”，自己心里其实也是叫苦不迭。天津市委下发红头文件成立的文革办公室，仅仅折腾了 4 个月，就这样“寿终正寝”了。

1967 年 1 月 2 日，中央正式发了电文：天津改直辖市，任命解学恭为天津市委第一书记，阎达开为第二书记。

1 月 4 日，天津反修锦纶厂的造反派头头张承明联合天津各大单位的造反组织，于下午 14 时 30 分在体育馆批斗张淮三，到会的有胡昭衡、路达、解学恭、赵武成等人。

天津最早起来造反的学校是十六中，最早给市委贴大字报的学校是“劳二半”，第一个给市委贴大字报的工人组织就是反修锦纶厂。没想到那天到会的人员太多，上万人！坐落在成都道和贵州路交口处的天津市老体育馆根本装不下，批斗大会又临时改

到民园体育场。等把人都组织好，已经是下午 16 点多了，一中王小勇致开幕词。

会场很乱，有几个单位发生矛盾，当场有十八中、劳二半退出会场……

张淮三没有到会，造反派找胡昭衡要人，没有。僵持到 17 点半，天都快黑了，胡昭衡站起来了，他在主席台一进门的一个水泥台上开始讲话：

“我跟你们说，今天你们批斗不了张淮三。”

他停顿了一下后，转了个话题说：“现在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中央已定了，从 1967 年的元月一日起，天津市由省辖市升格为直辖市！第二，中央已经任命解学恭为天津市委第一书记、阎达开为第二书记。第三条，我告诉你们实话，张淮三现在太原监狱关押。”

可是与会的群众坚持要批斗张淮三，解学恭就和群众组织的头头们商量，让他们派个代表，和公安局的人一起，把张淮三从太原押回来，然后再批斗。天津反修锦纶厂的张承明是批斗大会的召集人，于是就派张承明和市公安局的人一起去了太原。

张淮三为什么被关到太原监狱了？原来，1964 年天津市成立了“审干办公室”，天津市公安局长江枫任办公室主任。他们从公安局封存的解放前伪警察局档案中，发现了张淮三曾经被捕过的案卷。当时抓捕张淮三的是天津市伪警察局，他们向上峰汇报后，还没来得及审问，第二天张淮三就被军统局的人给带走了。时间不长，军统局又把张淮三给放了，扣押在伪警察局的贵重财物也都悉数退还。从伪警察局档案中看，只有逮捕张淮三的手续，

没有审讯笔录，到了军统以后的情况也没有留下任何线索。

1966 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这一情况反映到了中央，中央指示将张淮三隔离审查。但是放在天津不放心，于是就关押到了太原监狱。

张承明他们将张淮三带回天津后，于 1 月 9 日下午，在民园召开批斗张淮三的大会，给张淮三带的牌子上写着：“自首叛党分子张淮三”。

此后，张承明没有将张淮三送回太原，而是一直关在反修锦纶厂。

## 第 423 回：难支撑，天津市委终解体　军委会，突然要打倒肖华

1967 年 1 月，市委秘密办公地点从河东招待所迁至天津铁路分局台儿庄路招待所。这里，只有几位书记和各自的秘书。办公厅有两名工作人员在这里昼夜值班，处理公务。一切都陷于瘫痪，唯一的几部电话，是由市委机关交换台安排的内线。各部委、区委虽然不知道这个秘密地点，但是通过交换台的总机可以打电话过来，当时来电话请示市委的问题无非三种：一是被群众组织围攻，下不了台，要求市委解围；二是群众要求罢某某人的官；三是两派之间的矛盾和冲突。面对这些问题，市委也是束手无策。当时各级党委已经基本瘫痪。有位区委书记打来电话尖锐批判市委领导自己躲起来，不管他们的死活。一位区委副书记来电话求助，因为被围攻下不了台，其哀求的口吻，令人沮丧。市委又有什么办法呢？赵武成曾喃喃自语："一筹莫展！"

1 月 13 日晚，天津市委在常德道警备区司令部礼堂台上的幕后开会。在这次会议上，市委主持工作的领导人讲了讲当前的形势和任务，调子低沉，苍白无力，然后提出要揭发批判"万张反党宗派集团"，引起与会人员的震惊。因为这是市委第一次提出这个问题。没有说明来由，实际上是华北局的旨意，因为在 12 月份华北局已决定对张淮三进行隔离监护。与会人员对此并不理解，但没有怎么讨论就匆匆结束了会议。

1 月 17 日，天津市委文革接待站强烈要求见市委领导人。下午，市委书记处书记王亢之来到接待站。大家当场提出许多尖锐

的意见。王亢之表示虚心接受，可是有什么办法解决呢？王亢之说："我进城 17 年来从未遇到过这样困难处境……"说着，不禁潸然泪下。

王亢之刚讲完，外边又来了群众组织，接待站的人赶紧带着王亢之他们躲进另一间小屋。到了吃晚饭时，王亢之拿出两角钱，让接待站的人买面包充饥。到晚上 21 时多，接待站的人才让他们回去。

此时，是人都能看出，天津市委的气数已尽，台儿庄路招待所的一位值班人员终于向市委机关群众组织告了密，该组织于 1 月 18 日凌晨抄了台儿庄路招待所这个秘密点。

这天下午，在干部俱乐部召开市委机关全体干部大会，勒令市委书记处几位书记与大家见面，解学恭、赵武成、胡昭衡、谷云亭、王亢之、宋景毅等都出席了。机关群众组织代表上台进行了质询、批判。17 时 30 分左右，大会结束，"天津工农学和荣复转退军人战斗兵团"的人一拥而上，将几位书记都揪走了。天津市顿时陷入了真空。

当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天津市重要目标军事管制委员会成立，开始对仓库、电台、监狱和重要工厂等 58 个重要目标实施军管和警卫。

1 月 20 日凌晨 1 时 30 分，天津大学"八一三"红卫兵封了《天津日报》。

1 月 21 日，天津市公安局被群众组织夺权，挑头的是公安局内的群众组织"政法公社"，他们联合了天津大学"八一三"、南开大学"卫东"等天津一些有名的群众组织。

当时天津市公安局局长江枫是1938年参加革命的老干部，长期从事公安工作，从1960年开始任市公安局局长。

天津解放时，天津市公安局除当时军管会留下一部分四野的部队干部外，主要是由市委书记万晓塘带来的冀鲁豫公安局的一些人和江枫带来的晋察冀社会部和冀中公安局的一部分人共同组建的。晋察冀来的人主要负责政治保卫工作，冀鲁豫公安局的人主要负责经济保卫工作。两批来自不同山头的人马，工作中难免会有些矛盾，但基本上还都相安无事。“文革”开始后，矛盾开始激化。支持江枫的一些人成立了公安局“造反总部”，反对江枫的一些人成立了“政法公社”。前者反市委，后者保市委。而时任公安局二处处长的张露，是万晓塘的夫人，她自然是支持“政法公社”的。

万晓塘猝死后，江枫最早提出万晓塘是不是自杀。

1月18日以后的天津市，基本陷入无政府状态，连交通民警都不上班了。

1月23日，天津驻军66军奉命支左，正式介入天津市文化大革命。

29日，66军接管《天津日报》社。30日，《天津日报》停刊，31日复刊。

我们再回到北京。1月19日，军事院校造反派在北京体育馆召开10万人参加的大会，批判罗瑞卿、萧向荣、梁必业、王尚荣、雷英夫等军队将领。同时，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内召开批斗刘志坚的大会，关锋等人参加。

邱会作自1966年11月17日在后勤学院礼堂连续十多个小时

的大会批判中晕倒在会场上后，被叶剑英送到西山军委战时指挥所躲了起来。当时在西山“躲反”的还有海军副政委杜义德、国防工办副主任赵尔陆、空军副司令员兼七机部部长王秉璋、罗荣桓的遗孀林月琴等人，都是经林彪和叶剑英同意接上山的。“躲反”、“跑反”本来是战争年代老百姓用来形容为躲避战乱或匪患而暂时逃离的土语，在这里被这些当年在山上打游击的“土八路”用来形容躲避造反派的批斗。

本来 1966 年底，二医大“红纵”大部份人都从北京撤回到上海。1967 年 1 月，他们在张春桥接见时提出军队的文化大革命冷冷清清，于是张春桥报江青批准，“红纵”大队人马再次杀回北京，提出要批判邱会作。

中央指示各级领导要和群众在一起，接受群众的批判和检查。已担任全军文革组长的徐向前首先叫他的老部下杜义德下山和群众在一起搞革命，叶群不想让林月琴在西山，聂荣臻也叫赵尔陆回国防工办了。

1 月 19 日下午，徐向前给躲在西山军委指挥所的邱会作打电话，对他说：

“现在总后机关的造反派对你意见很大，你不要在西山呆下去了，立即回去参加文化革命。你的问题，江青同志和我共同研究过不止一次，都认为不简单，不能很快地解决。我现在不是以全军文革组长的身份给你打电话，是以军委副主席的身份向你下命令。你马上回总后去！”

邱会作手拿电话，立正回答：“坚决服从命令！”

叶剑英闻讯，赶紧派秘书赶来劝阻：“叶帅说，你回去就是进

虎口……”

邱会作表示不怕，并说：“已经牵涉两位元帅了，为了叶帅，我也要回去！”

叶剑英马上向林彪报告，随后向邱会作转述了林彪的话说：“林总说了，既然人家已经下了命令，就要按军规办事，你那里和我（林）这里都要交代专人密切注意邱会作回去以后的动态。如果发生严重情况，当采取紧急措施。”

果然，邱会作一回到总后机关大院，即被 “红纵”拉到总后卫生部办公室关了起来。从第二天晚上开始，每晚都要对邱会作“审讯”，每次时间都在 4 个小时以上。

就在徐向前给邱会作打电话命令他回总后的 1 月 19 日下午 15 时许，江青到毛家湾来找林彪，叶群也在场。

江青走后，叶群急促的按铃，让秘书快去。张云生秘书来到叶群办公室，叶群第一句话就是：“要打倒肖华了。”

几天前，张云生从电话记录中还看到，江青给叶群来电话，说揪出刘志坚以后，造反派还不满，当前群众的主要呼声是揪出肖华。

叶群说：“这个事，我请示过林彪。林彪的意思是：肖华是总政治部主任，不能轻易点名打倒，这样大的事必须请示主席。”

张云生正在纳闷儿：“怎么突然又改变了主意了？”只听到叶群继续对他说：

“首长本来是不同意打倒肖华的，现在主意变了。刚才 11 楼从一组那里来，与首长研究决定，立即开会批判肖华。过一会儿，先在京西宾馆开小会批判，然后晚上 7 点在工人体育场开万

人大会批判。现在，我要到京西宾馆区，代表首长参加批肖华的会，快给我准备车。另外，你和老赵跟我一起去。”

这里的“首长”是指林彪。江青住在钓鱼台 11 号楼，所以叶群称之为“11 楼”。“一组”是指毛泽东。

叶群在车上嘟囔着：“打倒肖华后，总政治部主任谁来当呢？我得去搬老夫子的兵！”她的车经过钓鱼台时，拐进了陈伯达住的 15 楼。

叶群下车后进了 15 楼，约一刻钟后，叶群重新爬上车说：“走！老夫子刚起床，不等他了。”

叶群坐在车上，又念叨：“批肖华，发言时，我讲点什么呢？你们快帮助我想想。”对于批肖华，她没有一点思想准备。

当叶群到达京西宾馆时，会议已经开始了。她让秘书们坐在外面休息等候，自己进入会场。

这是由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全军文革共同在京西宾馆三楼第二会议室召开一个军委碰头扩大会，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军委领导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及各总部、各大军区、各军兵种负责人和陈伯达、康生、江青、叶群、姚文元、王力等中央文革成员共 40 余人。会议由关锋主持，主要研究在军队中开展“四大”的问题。

叶剑英说：“军队不能和地方一样，要区别对待，军队搞‘四大’要是放了羊，万一有了战争，军队一时集中不起来，出了问题，谁向主席、林副主席交待？”

聂荣臻、徐向前都支持叶剑英的意见。

这时，江青突然说：“肖华是总政主任，发文件，把总政和军

委并列，是什么意思？”

陈伯达则说：“肖华，你这个人骄傲自满，看不起中央文革。中央文革小组的会议请你参加，你一次都不来。你动员军事院校的师生离京，都不通知中央文革一声。你这种作法，就是和中央文革唱对台戏，就是抵制文化大革命，就是违背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决定。”

肖华当时坐在主席台上，脸上一阵阵变色，最后终于忍不住，站起来说：“让我申辩几句好不好？”

陈伯达却说：“我们不愿意听你的讲话，要讲，到斗争你的大会上去讲吧。”

这时，坐在角落里的叶群突然要求发言。只见她从口袋里拿出事先准备好的稿子念道：“……肖华反对林副主席，破坏文化大革命。”她质问肖华说：“你为什么反对江青同志？你算什么总政主任？你就是总是专革命政的主任！你今天晚上要向全军院校的师生检讨你的严重错误！”

江青指着肖华问：“今晚工人体育馆召开的军队院校师生十万人大会，你敢不敢去？”

与会者都很意外，徐向前等人事先并不知道这个会还有批判肖华的内容，而且也不清楚叶群、江青这两个女人到底是代表了谁来发动批判肖华的，叶剑英马上问叶群：

“请问叶群同志，是不是林副主席有了什么新指示呢？”

叶群说：“谁反对江青同志，我就反对谁，首长也是坚决支持江青同志的。”

然后，站起来高呼：“向江青同志学习！向江青同志致敬！”

陈伯达、康生、谢富治、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等人也纷纷站起来跟随喊口号。肖华也喊，叶群马上制止说："肖华没资格。"

陈伯达说："肖华，你很骄傲，江青同志你也不放在眼里，你是绅士，不是战士，不是毛主席、林副主席的战士，你把解放军变成了私人军队，变成了资产阶级军队，你是专门搞投机的，你的错误是严重的。"

江青说："肖华，你很狂妄！你是不是毛主席的兵？我看你不是！你是资产阶级的近卫军！你搞资产阶级那一套，搞到了中南海，欺骗伟大领袖毛主席，你真是狗胆包天！我是准备和你们这些资产阶级的在军队的代表作战到底的！我提议，由向前同志主持总政工作，徐帅是老革命了，主席多次说，徐向前坚持红军不打红军，建国的时候，谁的山头最大？毛主席说是徐帅的山头最大，可是，向前同志从不居功自傲，很谨慎，很好。我建议。"

徐向前马上表态说："这事要请示毛主席、林副主席和总理再定。"

陈伯达说："肖华是个资产阶级政客，他把部队的政治工作引导到了资产阶级的轨道上去了。军队的文化革命搞得冷冷清清。军队已经走上了修正主义的边缘。我一路过三座门（军委所在地）就有气，那里的官僚主义严重，政客风气难闻，是个阎王殿。我们都不敢进这个三座门。"

肖华低头坐在那里，不发一语。

叶剑英站起来说："既然会议有了新动向，我准备先回去学习一下。"他向徐向前请了假，提前退场了。

随后，聂荣臻也提前退场。

叶剑英退出会场后，立即将会议情况报告周恩来，周恩来在电话中对叶剑英说："没有我的命令，肖华不能到大会检查！"并叫叶剑英和他一起到毛泽东那里汇报此事。

叶剑英走后不久，毛泽东的秘书徐业夫打电话通知京西宾馆军委碰头会扩大会，让周恩来和叶剑英立即去毛泽东那里议事。

很快，周恩来也来电话通知，军委碰头会暂停，中央文革和列席会议的几个人到人民大会堂江苏厅，等他从毛泽东那里回来后，再研究下一步的工作。于是，会议主持人徐向前宣布休会，并说："会议的内容严格保密，不准外传。这是条纪律。"

人们陆续离开了会场。

江青出来后，走在最前面，肖华跟在江青后面，涨红着脸，想要说点什么，江青根本不听，她声调很高，盛气凌人的训斥肖华说："你这人有民愤，批你活该！"说着，就先上电梯走了。

叶群尾随其后，出来后，用眼神示意坐在外边的张云生和赵根生两位秘书跟她一起上了电梯。

"上大会堂。"叶群上车后，吩咐司机说。然后又对两位秘书讲："总理和叶帅被主席召去了，说不定与我们这个会有关。会议暂停。"

停了一会儿，她又说："批肖华我还没来得及发言，你们帮我想想，我讲点什么呢？"

## 第 424 回：西花厅，与贺龙正式谈话　周恩来，深夜见安徽代表

19 日这天，毛泽东和周恩来在中南海专门研究贺龙的问题，毛泽东决定对贺龙采取隔离措施，并要周恩来亲自去落实。周恩来先在北京西郊的山区找了一所房子，要北京卫戍区预先作了安排。

贺龙住到周恩来的家里后，很少有时间与周恩来交谈。因为周恩来每天回来很晚，回家以后，还要批阅文件，有时只能叫人把他准备好的饭拿到贺龙夫妇住的地方来，利用吃饭时间和他们说说话。贺龙很觉不安，多次对薛明说："不应再打扰总理了。"

19 日下午 16 时，周恩来、李富春来到西花厅，同贺龙正式谈话。所谓正式谈话，就是说，这次谈话是代表组织，代表中央的。

周恩来说："本来这次谈话还有江青同志，但她临时有事，不来了。"

此时，江青正在京西宾馆参加军委碰头扩大会，准备打倒肖华。

周恩来对贺龙说："林副主席说你背后散布他历史上有问题。说你在总参、海军、空军、装甲兵、通信兵到处伸手，不宣传毛泽东思想，毛主席百年之后他不放心。"

延安整风期间，贺龙曾向王稼祥的秘书、中共中央办公厅党务材料室副主任陶铸了解林彪的一些事情。当时，陶铸掌握着军委系统领导干部整风学习的大量的笔记。

文革开始后，陶铸将贺龙和他谈及林彪的事情向林彪、周恩来做了汇报。周恩来问及此事，贺龙承认，并说："我只是问他知道不知道林彪在历史上的问题，就是在延安。"周恩来说了一句："这就够了"

周恩来还谈到一些历史问题。他说："还有，关于洪湖的'肃反'扩大化问题，你、夏曦、关向应都有责任。你要好好地想一想。"

贺龙听了周恩来的话，按捺不住，站起来想申述，周恩来不等贺龙说话，便阻止道：

"你不要再说了。毛主席不是保你的嘛！我也是保你的。中南海这个地方也是两派，也不安全，连朱老总的箱子都撬了。我给你找一个安静的地方，去休息休息。你可能不习惯，也许过些时候就习惯了。你缺什么东西告诉我。等到秋天，我去接你回来。"

这时，秘书进来叫周恩来接电话。

周恩来接完电话回来，看见贺龙还木然地呆在那里。原来，周恩来的"正式谈话"使他伤心极了，半晌，才自言自语地说了一句："我没想到把我看成这样的人。"

周恩来没有再说什么，只说了一句："我还有事要办"，便同李富春匆匆离开了西花厅。因为，他刚刚接的就是叶剑英打来的电话，此时京西宾馆那边正为肖华问题闹得沸沸扬扬。他要和叶剑英一起去向毛泽东请示此事。

中央文革等人在江苏厅等了近一个小时，周恩来和叶剑英才走进来……

散会后，叶群出来对秘书小声说："走吧，回毛家湾。"

张云生问："不是要开会批肖华吗？"

叶群说："不批了，主席指示，对肖华还要保，不能批。"

叶剑英也上了叶群的车，他们一起到毛家湾向林彪传达毛泽东关于保肖华的指示。原定晚上在工人体育场召开的万人批肖华大会因此告吹。

当晚，陈伯达写了一张纸条，通过军委办公厅转告叶剑英："昨天因为安眠药吃多了，讲肖华是'绅士'，不是'战士'，这个话要收回。"

北京军区司令员杨勇在这天下午的京西宾馆会议上也是提前离开会场的。他赶回北京军区，因为下午的京西宾馆会上说要在晚上召开批判肖华的万人大会，并给北京军区分配了参加会议的人数，他要回来安排布置，因此不知道后来周恩来传达的毛泽东关于肖华问题的指示。

吃完晚饭，北京军区召开军区常委扩大会，杨勇传达了下午京西宾馆会议的精神，讲了军委会议决定批判肖华，并安排了参加晚上批判会的单位和人数。

恰巧，当日军委会议后，总政也有人看了参加会议的总政治部副主任袁子钦的会议记录本，知道了当晚要批判肖华的消息。

于是，总政文工团和北京军区战友文工团的造反派们立功心切，当晚就跑到位于景山东街的肖华家里去揪他。

肖华家与聂荣臻家挨着。午夜，聂荣臻家突然有人猛烈的砸门，原来是文工团的人来揪肖华，有的人还要越墙而入。正在此时，有人喊：

"弄错了，弄错了，是北面一家。"

于是，人群又蜂拥向北。

而肖华，就利用这短暂的时间差，慌忙从后门逃出，欲去邻近的徐向前家。但是，看见徐向前家门口也有两卡车的人，遂又跑到附近总政治部副主任傅钟家。然后，坐傅钟的车直奔西山的叶剑英住处。叶剑英收留了肖华，并给徐向前打电话告知肖华家被抄。

徐向前闻讯大惊，“是谁泄露了军委会议的内容？”他立即要求全军文革小组追查此事，很快得知，是杨勇传达了会议内容。

徐向前打电话给杨勇，追查此事，杨勇并不知道事情发生了变化，但事已至此，只能赶紧承认了错误。

当天晚上，着急、紧张的还不仅是肖华和杨勇。江青的秘书阎长贵走进钓鱼台 16 楼值班室，看到江青和陈伯达并排坐在沙发上，陈伯达哭丧着脸，低头不语。江青对陈伯达说：“看你那熊样，这么怕，这有什么了不起……”

阎长贵见状，赶紧退了出来。原来，陈伯达听说毛泽东讲：“肖华还是要保，”吓坏了。因为他刚刚讲了“肖华是绅士，不是战士……”

当晚，周恩来、李富春按计划是在中南海国务院会议厅接见国务院二机部 19 名群众代表，听取他们对二机部文革运动的情况汇报。19 时 40 分，李富春首先走进会议厅，自我介绍说：“我代表总理来与你们座谈，我叫李富春。”接着他和每一位代表一一握手，然后说：“总理临时开会去了，本来我们要一起来的。”

此时周恩来正在人民大会堂江苏厅，向中央文革和列席会议的人员传达毛泽东关于肖华问题的指示。

中南海国务院会议厅，二机部九院代表向李富春反映说："刚才来了一位 221 厂的保守派，想参加会。"

李富春说："不是造反派的不要来！请同志们讲一讲二机部的情况，二机部造反还有什么问题讲一讲，我们第一支持你们造反，第二帮助你们造反。"

代表们纷纷汇报二机部的运动情况。这时又有人来说："221 厂有两人要进来参加会，并说明是造反派的。"

位于青海省西宁地区的二机部 221 厂是研制核武器的重要基地。1966 年 9 月 14 日午夜，聂荣臻办公室接到二机部刘杰部长的李秘书打来的电话，说：221 厂少数派"草原红卫兵"要求来北京，劝说无效，"19 名代表已经在今天由西宁乘火车来北京了。"当时西宁地区正流行鼠疫，这 19 个人是突然来京的，没有做检疫处理。他们到京后，受到周恩来的接见，当然周恩来也批评了他们，随后返回了西宁。这时，221 厂两派为夺权问题，关系再度紧张，曾经发生过零星的小规模武斗。

这时，李富春表示："一定是造反的？你们能保证？"

众人答："一定是造反的，能保证。"

李富春说："是造反的请进来。"

代表们继续汇报二机部文革以来发生的事情，一直说到最近二机部及所属各院、所夺权的情况。李富春对他们的夺权表示支持，他说："夺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权，你们的大致做法我同意。""你们的做法总的是夺文化革命领导权，领导权归你们，监督权也是领导权的问题，逐步地熟悉业务，慢慢地接收。监督主要抓两点：一、监督生产、财政；二、监督人事、干部调动。监督生

产权、人事权、财政权。财政开支要通过监督小组，不能乱花钱。人事处、干部科，你派干部，经我审查，经我同意。生产你们去管，但要受我们监督，不准用任何借口停止生产。这样才能摆脱日常事务，否则天天批条子，搞吃饭，埋头业务，左派很可能会变成保守派。

原来的筹委会应该取消，造反派领导文化大革命。将来做到造反派力量占优势了，再举行巴黎公社式的选举，现在还不占优势，不进行巴黎公社式的选举。大印现在不交，在没有证明部党委、部长、副部长彻底改正错误、彻底接受造反派的监督以前，不能交印。要用印，我替你盖宁肯麻烦些。要组织强有力的监督组到部里去，掌握印把子。财政上，日常应该开支的可照例开支，让他们去干。买几斤米，要我们盖章子，发工资要我们开条子，我们不干！我们只注意特殊开支，特别是部长基金的开支。总之防止一条：搞经济主义，用钱收买人心，浪费国家财产。”

“现在的问题是第一战役，先把在京单位领导权接收过来，然后搞京外，京外单位，本身要做艰苦的工作外，总部要派人去。”“先把在京单位的权抓过来，京外单位再一个个地去夺，看那个单位强，就去点火去造反。这是你们第二号通告，”李富春拿着二机部“革命造反总部”的第二号通告说：“根据我刚才的精神可以发第三号通告，第四号通告……。京内外确有国家核心秘密，选出可靠的人来掌握核心秘密。”“以后我们直接与‘造反总部’联系，不与刘杰联系，他工作好坏，抓生产好坏听你们的。在国防工办改组以前有事直接找我或总理，每礼拜向我汇报一次。今天先谈京内的，第一个战役先把京内的打好，第二个战役再搞京

外的。”

23 时 15 分，周恩来让人来通知李富春去参加接见安徽赴京代表，并告诉二机部代表，周恩来就要来接见他们。

“全红总”和劳动部、全工总三方签署的《联合通告》在全国造成了很大的影响。19 日深夜 24 时，周恩来和李富春、谭震林等中央负责人在北京工人体育馆接见安徽赴京代表，其中有些人也是要求转正的临时工、合同工。

周恩来说：“今天主要是接见安徽工人、农民、学生等方面的代表，他们要走了，我们会接他们，好让他们回去。今天参加接见和会见的有李富春同志、谭震林同志。”

他说：“你们是带着问题来的，我们只能在原则问题上跟你们讲一讲，工人、农民、学生、教师、文艺工作者来北京控诉安徽省委以李葆华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所加的压迫，所犯的罪行。你们的控诉我们是支持的！！！你们要解决这个问题，要到合肥、蚌埠、芜湖……到安徽去，彻底批判安徽省委以李葆华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那里把他们批臭、批垮！斗争的锋芒，应该向着安徽省委，打回老家去，就地彻底闹革命！”

接着他说：“根据安徽的材料，和全国一样，也是关于合同工、临时工的问题。当然这里有很多不合理的制度，在运动后期必须改革，临时工、合同工进行革命串连不能扣工资，不能调动工作，更不能撤销工作，回厂不能歧视，不能虐待家属。

去年 12 月 9 日，抓革命，促生产十条（草案）已定了的，但这些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故意闹经济主义，把临时工、合同工，不经分析，现在一律转正，把合同工已经离开工

作岗位的一律复员，把 61 年、62 年、63 年下放到农村的也恢复岗位，补发了工资，这样就使国家超过了国家计划，这些用经济个人眼前利益来收买、欺骗工人，这是有光荣传统的觉悟了的工人不允许的，刚才我和一个工人谈话，那个地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增加工资，发几十万给工人，觉悟了的工人把钱退给了银行，他们做得对，做得好！所以这种行动必须揭，这种经济主义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种经济主义侵蚀工人，是修正主义，是无产阶级不许可的。”

周恩来说：“这事在上海、东北、广州各地都出现，财政制度增加了，所以中央下命令一切银行，从中央到地方完全要军事保护，按计划开支。超过计划，无论哪级党委，哪个厂矿企业都无权开支。现在不仅从工资、奖金多开支，而把矛盾上交北京中央，免费车票一开就是几十、几百、上千人来北京，很多地方连接待都发生困难。他们不像红卫兵，毛主席和林彪副主席接见后就走了，他们住在北京不走，人越来越多，接待拥挤的很，接待的机关，也要搞革命，会影响他们，文艺界刚从本省领了钱，粮票，又到文化部，又要每天七角钱的补助，开支大，不利市场稳定，出现抢购，有些高价布和冬季物资，现在就卖光了。公园挤得很，他们不是来闹革命的，来交流经验的，是来闲逛的。”

周恩来强调：“企业厂矿在生产岗位上的同志要在本单位抓革命促生产，不能抽空到别的地方游逛，不要矛盾上交，就地闹革命……”

他再次指出：“我们不赞成组织全国性组织，全国组织一概没有承认，我正式宣布：全国转业、复员、荣誉残废军人联合会，

我们没有承认，毛主席、林副主席没有批准，因这些转业军人绝大部分是好的，从军事岗位上转到行政、党政，工厂、学校、服务行业、公社，在那工作就成了那里成员，不需要把全国军人组织成一个组织，……我也是复员军人，工作不做？到全国串联？这是一个党员不许可的。”

“现在北京有反动组织，最近破获两个，一个冒充为‘全国工农兵红色造反夺权总部’，他要夺谁的权？是夺无产阶级的权，……霸占了中央化工部，在地下室里秘密活动。抢了化工部绝密文件、国防尖端资料，被化工部革命群众发现，揪了出来，把两个头子抓了起来。还有一个‘红旗军’，在东北哈尔滨有，北京有，湖南有，最近杭州也有，说这组织是毛主席批准的，根本是造谣。这头子是反动的，逮捕了两个头子，刘沙、胡国光。”

## 第 425 回：表态度，支持二机部夺权　受不了，马思聪出逃海外

到子夜 24 时 36 分，周恩来接见安徽赴京代表结束，又于 20 日 1 时整，在李富春陪同下，从北京工人体育馆赶回中南海，来到国务院会议厅，。这时，一直等在这里的二机部代表们都站了起来，挥动《毛主席语录》高呼："毛主席万岁！"

周恩来坐下后，逐一念代表们的名字，问是什么学校毕业的，家住在什么地方。

202 厂代表反映他们单位的新书记因支持造反派被扣一事，周恩来说："事情总是有这样的。北京'红旗军'闹得很猖獗，欺骗了一些人，最近他们占领了军区大楼，对军区也要接管，夺无产阶级的权，那还行啊！你们造反派可不要与他们乱串联。'湘江风雷'是陶铸搞的，也是这样。夺权那么容易啊？"

有人对周恩来说："我们夺了大印……"

周恩来打断他的话说："你们非常注意这个'印'，我就反对这个'印'，要破旧立新，印也是封建的东西。"他接着问："部里哪个单位先夺权？"

代表答："401 所、五所。"

周恩来："你们现在作了当权派，责任就大了，保密问题就靠你们了，帝、修、反到处钻空子 。""领导权夺过来了，我就要找你们，不但找业务小组，也要找领导小组，我就有依靠了嘛！找你们可靠些，否则我和他们谈，你们监督，在口头上监督，主席说不能做口头革命派，要做行动上的革命派，你们真正在行动

上领导了二机部，那你们就是革命派，完全的革命派，要把行动具体化。”

代表说：“刘西尧问题很大，九院、 221 厂要求他回去触及触及灵魂。”

周恩来：“科学院现在只烧了一半，还未烧透，夺权夺了 50 多个单位，把事情告一段落再回去，将功赎罪嘛，否则派你们去！派刘西尧我也是奉命，是中央文革小组推荐的。我也向你们诉苦嘛，你们给我一个人当联络员好不好？清华、科委、科学院我都要管，我尽管这些烂摊子。国家科委张本是真正的夺权，夺得彻底，我只是帮了一手，让他们自己烧，现在烧得很透。科学院因为没有找到这样一个人。原来造反派力量很小，慢慢扶植起立的。张劲夫下面都是牛鬼蛇神，保守派保张劲夫保得很厉害，最后保守派彻底垮了，头头与李洪山有来往，李洪山反对毛主席、林副主席，是反动头子。我倒不愿意刘西尧留在科学院，你们抓走了，我可找不到他了，科学院没法夺权了。”

代表说：“保留批判的权利，二机部、九院开大会他要到会。”

周恩来：“对，保留批判的权利，参加了会，你们可得负责把他送回。一月份权全夺完了，再回去。科学院哪象什么院，土豪劣绅的班子。”

周恩来仔细阅读了二机部“造反总部”的第二号通告后说：“你们通告中，夺文化革命领导权，生产监督权，完全用对了。水平不低嘛，你们的通告是 17 号出的，我也是 17 号说的，你们在我的前面。里边少写一个对基本建设的监督，要熟悉业务，真正人事大权也要管，运动中调人，十分必要的可以调一般的不调。

好哇，那我们就找出一条出路来啦！”

他对李富春说：“你看了吧，我们完全坚决支持。上海造反派5 号要夺市委的权，要中央同意，中央 16 号才答应，条件要成熟了才行。外地的可以第二步，革命靠自己。”“我和富春同志都支持你们。”

周恩来接着说：“今后国防口哪个单位夺权向我们打个招呼，你们可以去帮助帮助。七机部看来没有办法，给他们开了一夜的会，满以为可以停战几天，可他们第二天又打起架来了。”

有人反映七机部“915”在北京老打信号弹，周恩来：“在首都北京打信号弹，不成样子。我们有的同志分不清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用什么手段来解决人民内部矛盾。一个绝食，一个卧轨，你绝食，法西斯国家是不会管你的，对我们怎么能绝食？还有抢车、抢人，把人揪得不见了，那是防空洞。铁道部有一派把吕正操抓去作为交换条件要见我，我才不上他们的当呢？‘916’，你要慢慢争取‘915’的群众嘛，我们想帮助他们做‘915’的工作，他们不晓得。‘916’急着要夺权，不懂得策略，老是打架。两派都是敌对的，总是人民内部矛盾么。我希望你们帮助他们做些工作，带了头就要做工作。”

有人反映京外单位问题，周恩来说：“短时期内解决，不可能。领导小组你们参加，生产你们也要管，京内设一个联络点，找两间房子，有长途电话，办公人员不能超过 10 个，轮流制度也好么，一次换三分之一。就讲到这里。还有一句话，我把副部长们找来了，我给他们嘱咐几句，你们参加不参加？”

代表们：“总理定吧！”

周恩来："要我定？一起听吧？"

代表们："好！"

这时已是凌晨 3 时 10 分，二机部的副部长们进来了，周恩来对他们说："现在宣布一下，我与夺权领导小组谈了，中央支持他们的《告全部革命同志书》和《第二号通告》。你们都看了吧？夺全部的文革领导权是符合中央精神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联合起来夺取继续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的权，我们认为，他们的办法是可行的。夺全系统的文革领导权，对生产、财政等监督权，成立一个生产监督小组监督生产。"

周恩来对代表们说："通告是一般的，以后还要具体化。不但要表现在文字上，而且要表现在行动上。""今后总要吸收一部分经过考验的干部。京内造反派还没有超过半数，总部是临时革命状态，巴黎公社式的选举是个精神，巴黎公社是用暴力夺取政权，我们是用暴力保护你们夺权。你们这样做整个国防工业系统都可采用，是大同小异。"

他又对副部长们说："业务怎么分？他们管你们，我们放心了，你们要好好工作，可不要偷懒。革命群众管你们了，也不要怕揪了。"

然后对代表们说："思想总是有两重性的，你们年纪大了，不要也保守思想占主要了。关于刘西尧，科学院问题解决了再回去。参加你们的会，你们可得把他保回来，现在揪风很盛。"

又对副部长们说："他们夺权，因为你们执行了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包括刘杰在内，一个个地改造，结论在运动后期作。我看了很高兴，革命有望，业务有望了。搞好了你们还是一面红

旗。你们要政治挂帅，更好地工作，不能松懈，有人管了更好了，老年人是要青年人管一下才好呢！我相信他们也不会骄傲的，会不断前进的。富春同志嘱咐几句。”

李富春：“在革命造反派革命领导、生产监督下彻底脱裤子改造思想，同时把工作抓紧，在革命造反派领导监督下革命革好、生产抓好，将功补过，将功赎罪。搞不好，再顽固下去革命群众是不会放过你们的。这是对你们的要求，也是对你们的希望。”

代表们要求部长们到大楼里一起办公。

周恩来：“去办公嘛，不要逃避，怕什么，灰溜溜的哪像个革命党？让群众监督。”

他对代表们说：“不要揪来揪去，对保守派不要对打，要分化瓦解他们，我们支持你们，回去后与中央通气。谁再闹就是反对革命。”

又对副部长们说：“要坚决站在革命造反派方面，不要和稀泥。刘杰批了六五年大学毕业生出外串联，不要乱批条子。部长副部长要坚决地站在革命造反派方面，真心诚意地站过来。”

这时已是 20 日凌晨 3 时 40 分，接见结束。

1 月 19 日，香港的几十家中英文报纸几乎用《中国著名音乐家马思聪逃抵香港》这样的同一标题，报道了马思聪出逃的消息。

马思聪时任中央音乐学院院长，文革开始后，他自然也成了“资产阶级反动权威”、“三名三高的修正主义分子”。“三名三高”是对名作家、名演员、名教授和高工资、高稿酬、高奖金的简称。往日热闹的马宅冷清了下来，学生再也不上门学小提琴。“文化大革命”，这个陌生的名词，让马思聪感到惶恐、不可理

解。在朋友和家人的劝告下，他发表了一个声明，表示坚决、热情地支持“文化大革命”，愿意接受广大革命师生的批判。1966年6月中旬，文化部系统的艺术院校的“黑线人物”500多人，被集中到北京郊区的社会主义学院的校园内。他们当中，有各院校的领导，知名的教授、画家、音乐家、导演、名演员、作家，马思聪也是他们中的一员。后来有人将他们在这里居住的宿舍称之为“牛棚”。

8月3日上午，一辆贴有“黑帮专用”标语的卡车，把马思聪等10多位中央音乐学院的“黑帮”押回了学院，接受“红卫兵小将”们面对面的批判。刚下卡车还没来得及站稳脚跟，一桶浆糊就倒在马思聪的头上，接着，一张大字报贴在他身上，一顶写有“牛鬼蛇神”字样的纸糊高帽子戴在头上，脖子前后挂上两块牌子，前面写着“资产阶级音乐权威——马思聪”，后面写着“吸血鬼”。一个戴着“红卫兵”袖章的年轻人顺手将一只破搪瓷盆和一根木棍塞在马思聪手中，逼他一面走一面敲。

马思聪被这情景惊呆了，他同一群“黑帮”一起被“红卫兵”押着在学院内游街，一群狂热的学生高喊着口号，向他们身上吐着口水。昔日学院的一排琴房，此刻成了关押“黑帮”的“牛棚”。马思聪每天早上6时起床，学习、劳动、写检查，还要被迫唱着承认自己有罪的歌曲。只要那些“小将们”一高兴或一不高兴，马思聪等人就要遭殃，轻则挨骂，重则挨打。

8月14日晚，学生们又涌进马思聪的家贴大字报，第二天又批斗马思聪的夫人。在这种情况下，马思聪的夫人王慕理和女儿马瑞雪在她家厨师贾俊山的帮助下，仓促离开北京南下，想暂时

避一避，等运动结束再回来。她们先来到南京，投靠到王慕理的妹妹那里，结果听说中央音乐学院的造反派得到消息，追到了南京，她们不敢停留，又跑到上海、广州，投靠亲友。在广州，王慕理感到十分恐怖，觉得这次的运动没有结束的迹象，再这样下去一家人性命难保，危急之中产生了到香港暂避的念头，就委托她的哥哥王友刚帮她想办法。王慕理让女儿马瑞雪悄悄回北京一趟，和马思聪见面。

1966 年 11 月，马思聪说肝病复发，被批准离开“牛棚”，回家居住。此时，他们家的四合院已搬进了四、五户人家共同居住，马思聪一人住在一间偏房里。这月下旬，他的女儿马瑞雪悄悄回到北京，在厨师贾俊山和马思聪的朋友、私人针灸医生倪景山的资助下，马思聪父女二人化装离开北京，来到广州，住在郊区丹灶的亲戚家。当时的广州、深圳等地，暗中存在着到香港的“偷渡线”，一些“蛇头”为谋取暴利进行“偷渡”。

马思聪的失踪引起了中央音乐学院红卫兵的重视，他们向公安部门报了案，并在马思聪的亲友中查找。

此时，摆在马思聪面前有两条路，一是回北京继续接受批斗；另一条路是偷渡香港，但这就是叛国呀！这将意味着永远不能回到自己的祖国，从此与自己的亲朋好友一刀两断，天各一方。而且偷渡的风险极大，一旦被抓住其后果可想而知，但偷渡成功则可以换来全家安全，远离这个喧嚣的世界。

马思聪进行了激烈的思想斗争，为了保全性命，他选择了偷渡。

1967 年 1 月 15 日夜，马思聪以 5 万港币的代价，带着夫人

王慕理、儿子马如龙、女儿马瑞雪，在新州登上了新州渔轮厂的电动拖船“002 号”。这次偷渡的组织者为广州一街道服务站的工人何天爵和原“002 号”拖船的司机何炳权，船是他们偷出来的，乘坐者共 5 户 13 人。

16 日晨，拖船在香港大屿山靠岸。马思聪一家在一个岩洞中躲了一天，当天晚上，来到九龙的一个亲友家暂住。由于香港的报纸登了丢弃在大屿山的“002”号拖船的照片，使马思聪感到香港也不安全，担心被引渡回内地。经过反复思考，马思聪选择了到美国去投靠他的九弟马思宏。他要到美国定居，凭着自己的提琴来养活一家。

马思聪通过一个朋友同美国驻香港领事馆取得了联系。1 月 18 日，英国驻香港人员和美国驻港领事人员，会见偷渡到香港的马思聪。1 月 19 日下午，在美国驻香港领事的陪同下，马思聪一家 4 口登上了飞往华盛顿的飞机，踏上了一条漫长而艰难的流亡之路。

1 月 19 日，香港报道了马思聪出逃的消息。4 月 12 日美国国务院公布，北京中央音乐学院院长马思聪逃出中国大陆，来此避难。马思聪同夫人及两个孩子，一起被批准避难。此后不久，马思聪为了澄清社会上对他出走的众多流言，在纽约公开露面，在寓所接待外国记者，发表了题为《我为什么逃离中国——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可怕真相》的讲话。文中说：

“我是音乐家。我珍惜恬静、和平的生活，需要适宜工作的环境。况且我作为一个中国人，非常热爱和尊敬自己的祖国和人民。当然，我个人所遭受的一切不幸和中国当前发生的悲剧比起

来，全是微不足道的。‘文化大革命’在毁灭中国的知识分子。去年夏秋所发生的事件，使我完全陷入了绝望，并迫使我和我的家属成了逃亡者，成了漂流四方的‘饥饿的幽灵’。如果说我的行为在某种意义上有什么越轨的地方的话，那就是我从中国逃跑了……”

马思聪这一举动，立即在全世界引起了一阵不小的轰动。不久，马思聪迁往美国马里兰州居住，后又迁往费城郊区，在一所高层公寓里定居，直到他 1987 年离开人世，在他生命的最后 20 年间，他仍然以开音乐会和创作为其生活的全部内容。作为世界著名的小提琴家，他多次在美国各地和东南亚、台湾等地进行演出，他坚持以自己的演出收入作为全家的生活费，而拒领美国政府的“救济”。这一时期，他还创作了大量的音乐作品，如舞剧《晚霞》、歌剧《热碧亚》，以及一些小提琴和钢琴曲。在他的演奏作品和创作作品中，蕴含着他浓浓的思乡情结，他将其中的一首乐曲名为《相见时难别亦难》，而他音乐会每次必演的则是《思乡曲》。

从香港、美国的报纸上得知马思聪已经出走后，中央音乐学院的“毛泽东思想战斗团”和“北京公社”，立即派专人追查此案，在马思聪的亲友中进行调查。他们把初步查到的材料汇总整理后，上报了“中央文革”和公安部。公安部将这作为要案，于 1967 年 5 月成立了“马思聪专案组”。由于马思聪出逃乘坐的电动拖船为“002 号”，这个专案组为了保密，就以“002 号”为专案组的代号。专案组在审查中，马思聪夫妇在大陆的所有亲戚都被审查，有的被投入监狱，帮助马思聪离开北京的贾俊山、

倪景山也被捕，后来有的被判刑。

1968 年 1 月 18 日，在经过 8 个多月的专案审查后，专案组终于结案了，谢富治、康生批准了专案组的结案报告，将马思聪定为“叛国投敌”。

## 第 426 回：冲电台，学生监督新华社　林彪怒，两老帅大闹京西

1 月 20 日凌晨 3 时，就在周恩来通宵没有休息，还在接见二机部造反派代表的时候，中央警卫团，8341 部队的杨德中和负责警卫工作的杨青成护送贺龙夫妇乘贺龙的红旗车已经到了玉泉山。他们在这里换乘北京 212 吉普车。杨德中对贺龙说："到前边还有一段路，乘红旗太显眼，只好改用吉普车了。"

薛明闻之心头不由一颤，贺龙的脸也由黄变白，由白变青。他一抬手怒喊了一声："老杨!"

跟随贺龙多年的警卫杨青成跑过来了，向贺龙敬礼说："老总，我在这里。"

贺龙咬着牙说："我迟早要回去的，那些人害我，害不死我!告诉他们,他们要是不照顾好我的孩子,我回来找他们算账!"

此时贺龙的女儿黎明、晓明才十几岁，儿子鹏飞 23 岁……

贺龙一脸怒气地上了吉普车。1 月 20 日，正是北京最寒冷的季节，吉普车上没有暖气，贺龙、薛明坐在车上，沿着不平的山路，驶向北京西山一个与外界隔绝的地方，叫象鼻子沟，是国务院为战备搞的工事,偏僻，也没人住。一处建在半山腰的平房院落，三面环山，有一条路可以出入。这里，除了贺龙夫妇和几个警卫战士之外，看不到什么人。环境清静，没有尘世的喧啸。如果是文人学者来此读书、写作，自是一处佳境，然而，对于大半辈子都是在激烈的战斗和紧张的工作中渡过的元帅，实在是难以

忍受。更何况，此时的贺龙不知来日之短长、命运之祸福，又怎能安得下心来在此“休息”呢？他躺在木板床上，叹着气对薛明说：

“我是真不愿到这个鬼地方来呀！我真不明白，别人不了解我，难道总理还不了解我？”

说着，他坐了起来：“洪湖的事我可以考虑，其他事情都是林彪对我的陷害。我在旧社会见过各种人，碰到过各种主义，选择来选择去，最后认定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从此以后，我就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共产党和共产主义。两把菜刀闹革命、北伐、南昌起义、陕甘宁、晋西北，谁不知道我贺龙？毛主席不是表扬过我吗？我要回去，找他们算账！”

周恩来的“正式谈话”，看来深深地刺痛了这位元帅。据薛明后来回忆说，这段日子里，贺龙同她谈的，反反复复都是围绕着这次谈话。贺龙对她说：

“说我背后散布林彪历史上有问题，这完全是无稽之谈。说我到处夺权，不宣传毛泽东思想，也是林彪他们编造的。你有证据吗？能有人相信吗？这话听起来厉害．实际上，完全是胡扯。”

谈起洪湖的“肃反”，他感到委屈。他说：“湘鄂西‘肃反’，说我要负多大责任，我想不通。当时，我不是‘肃反委员会’的委员，审讯、杀人我都不知道。”“过去，周逸群曾经跟我说过，要警惕‘老鸡婆’（机会主义分子），我懂得什么‘老鸡婆’？我参加党才那么几年，政治水平只有那么高。要说我当时作为最高负责人之一，最终没有保住段德昌这样的一大批好同志，使党的事业受到了损失，我是有责任的，但也不能各打三十大板。那

样是不公平的。”

北京的夺权依然在继续。

1 月 20 日凌晨 3 时，就在贺龙前往西山之时，中国人民银行被**中央财政金融学院“八八战斗队”**宣布接管夺权。

当天，财政部也被**中央财政金融学院“八八战斗队”和财政部**“革命造反司令部”**一起夺了**权，副部长吴波被批斗。财政部另一位副部长杜向光支持夺权，表现活跃。李先念也表态支持夺权。

**“八八战斗队”还**和商学院“造反军”等学生组织联合商业部机关“红色造反团”于这天在商业部联合夺权。

1 月 20 日，以卢正义、徐非光为首的教育部“延安公社”在北师大“井冈山”等组织的支持下，组织了数百人，又在教育部搞了反夺权。

大约在这天，参加北京市委夺权的“首都职工革命造反总部”主要负责人、京西煤矿工人李思聪和“首都职工红色造反总联络站”主要负责人、北京光华木材厂刘锡昌到北航找韩爱晶。因为参加北京市委夺权的“一机部革命造反联络委员会”、“首都职工红色造反者总部”和“首都工人革命造反者总部”这三个全市性工人造反组织成立的时候，韩爱晶都代表北航“红旗”去现场讲话表示支持。这时，李思聪和韩爱晶在北航校园的马路上边走边说：

“我们去北京市委夺权了，你们北航‘红旗’应该积极参加北京市的夺权。”

韩爱晶当即表示同意。他送走李思聪他们后，立即和北航“红

旗”总勤务站的几个人商量，决定由韩爱晶带领一系的几百个学生去参加北京市夺权。当时在一系帮助军训的空军 20 名干部、战士也都随同前往。空军军训部队的负责人米志高和政委程舒怀向韩爱晶表示：“你们走到哪里，我们支持到哪里。”

北航“红旗”集合好队伍，立即赶往北京市委。当他们进入北京市委大楼，只见里面人群杂乱，夺权的群众和上访的群众混在一起，墙上到处刷满了大标语。那些上访的群众坐在楼梯上、过道上，吃饭就在地下室。大食堂热气腾腾，免费包吃。米饭、馒头、窝头，轮流供应，清水煮大白菜。

这时，“首都革命造反派夺权斗争委员会”，简称“夺委会”，成立了领导小组，李思聪是组长，韩爱晶是副组长。后来韩爱晶回了北航，“夺委会”的工作就由北航“红旗”对外作战部的七系 47 大班学生方臣负责。

这天上午，有 5 名大学生来到新华社社长办公室，要监督新华社的工作，并要求新华社编委会编委王唯真签字接受他们的监督。王唯真没有签字，打电话报告了中央文革。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在电话中指示：“不能签字。新华社是党中央重点保护单位，不能冲，谁冲后果由他负责。已进驻的社外人员，请他们先退出去，以后再说。走时欢送，可开欢送会。”

这时，又有人到北京市委“夺委会”找到正在这里的北航“红旗”韩爱晶，要求北航“红旗”派人参加《人民日报》社的夺权。韩爱晶当即从北京市委打电话到北航，让学校派人参加。北航去了两汽车人到《人民日报》社。不一会儿，王力、关锋来了，说中央文革刚刚开了紧急会议，《人民日报》不夺权，采用监督小

组的形式。下午 13 时 20 分，王力在《人民日报》社向在场的群众宣布了中央文革的六条决定：

一是支持学生们的革命行动。

二是支持报社内部的“遵义红旗小组”建立一个监督小组，监督编辑、出版、校对、印刷等报纸的工作。

三是赞成北京的各群众组织和外地的革命群众组织成立一个监督小组，监督《人民日报》的工作。

四是希望报社的工作人员继续工作，必须坚守岗位，一天也不能停止出版报纸。

五是在版面上不发表内部变动的消息。

六是《人民日报》不用接管的口号。重大问题，中央文革小组没有权力，要请示毛主席。

接着，报社内的“遵义红旗战斗团监督小组”和“首都红卫兵监督小组”正式宣布成立，北航吴介之任《人民日报》红卫兵监督小组组长。

会上，关锋讲话特别强调要“火烧理论部”，“砸烂评论组”，“要把理论部的保守势力打垮”。

当夜，“遵义红旗战斗团”在报社贴满了“砸烂理论部”、“火烧理论部”、“砸烂评论组”、“打垮顽固保守势力堡垒”等大标语，广播里不停地播放王力、关锋的讲话录音，公布“社内监督小组”、“社外监督小组”成立通告，宣布全面“夺权”。

这天下午 15 时多，又有北京邮电学院“东方红”和清华大学“井冈山”以及北京广播学院的一些同学，跑到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夺权，往里面冲，要控制播音室，要直接开辟节目。王力又赶

过来予以劝阻。他首先肯定：

“同学们的这种愿望是很好的，”“一切革命的要求，合理的要求，我们都应当认真的对待，认真研究，认真地接受，同时采取适当的方法来解决。但是广播电台不能够采取冲进广播电台来用群众接管的办法，不能采取这个办法。各式各样的团体如果都有权来占领广播电台，就是群众组织都有权冲进广播电台，都有权占领广播室，那我们这个无产阶级专政还要不要？这是我们党直接控制的工具，它不仅是对全国有影响，对国际上有影响。”

“对你们要参加和协助广播电台的工作，我们要创造适当的条件，采取适当的组织形式，吸收你们参加这个工作。”

王力讲话以后，群众情绪仍然很激动，递上去很多条子，有的写着“打倒王力的官僚主义作风，打倒王力的不作调查研究轻率表态的作法。”

王力还到新华社，对在这里的北航“红旗”、清华“井冈山”、地质“东方红”、上海“三司”、北京“三司”等群众组织代表说：

“新华社是我们国家的通讯社，也是我们党中央的通讯社，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机关。这一个党中央的通讯社，要保护它，不能中断工作，一时一刻不要停止。”

他要求新华社的工作人员：“要保证新华社不中断工作，保证党和国家的重要宣传机关不中断工作；第二，他们要帮助你们来识别到新华社来的哪些是革命派，哪些是保守派，同时，他们帮助你们同革命派建立联系；第三，他们要监督新华社的宣传工作，首先是文化大革命的宣传工作，要符合毛泽东思想，符合以毛主席为代表的革命路线。”

我们再来看肖华。

1 月 20 日一早，经过 19 日夜半喧嚣的聂荣臻秘书，赶紧跑到肖华家去看看，只见保险柜被打开，文件撒了一地。

聂荣臻听秘书回来的报告后说："这还了得，是谁干的，必须追查!"

上午，军委扩大会议在京西宾馆继续进行，叶剑英坐在第一排，江青在他的左侧。会议由徐向前主持，他首先问："谁作记录？"

葛秘书起立回答："我和陈秘书。"这时陈秘书也站了起来。

徐向前接着追问："昨天会议情况谁透露出去的？"

葛秘书说："昨天晚上，我们没出门，也没有向外打电话，也没接触别人，我们没有透露一个字。"

接着，徐向前又当面批评杨勇不该违反纪律，传达前一天的会议内容。

这时，江青见会场上没有肖华，便问："总政治部主任怎么不见了？他躲到哪里去了？"

没有人说话，会场气氛非常紧张。

过了一会儿，肖华进来了，徐向前问他："昨晚你到哪里去了？"

肖华低头没有回答。徐向前生气地拍着桌子对他说："你是胆小鬼!你怕什么？他们能把你吃掉吗？"茶杯被震得滚到了地上。

江青也紧追不舍，逼问肖华昨晚躲到哪里去了。这时，一直沉默的叶剑英一拍桌子站了起来，大声地说："他昨天半夜里跑到我那里去了，是我把他收留下来的。如果有窝藏之罪，我叶某

担当!”

与会的军中高级将领们见两位老帅对拍桌子，谁也不敢说话，有的见势不好，干脆溜走了，会场一时大乱。

聂荣臻说肖华家被抄，保险柜被砸开。

江青说：“这要怪肖华的秘书，这个秘书是胆小鬼，要是我，死也不能让他们砸保险柜，要保卫国家机密的安全嘛。”

会上，叶剑英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肖华是好人。”同时他还宣布扩大会议的所有发言稿，不论是自己发言内容或记录别人发言内容的笔记本，一律当场销毁，并要绝对保密，不准外传。

散会后，叶剑英又跑到林彪那里，把上午会议情况向林彪做了汇报。林彪当即要秘书打电话，叫江青专门来一趟。

下午 15 时，江青来见林彪，没想到林彪一见江青怒火冲天，不等江青开口，就大发脾气，连珠炮一样的责问江青：

“你们说解放军已经走到修正主义的边缘，已经被我们带到了资产阶级轨道上去了，有什么根据？说‘三座门’是阎王殿，你们一见‘三座门’就有气，你们太放肆了！这完全是对军队和军委领导的污蔑。”

林彪搬出了毛泽东，他说：“解放军是毛主席亲自缔造和领导的，是毛主席指挥的，军队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何解释，你们这样仇视军队，仇视军委领导，我干不了，不干了！我辞职总可以吧。我要报告毛主席，你们不同我商量，大骂肖华，鼓动抄家，抢档案，这是为什么？你们不通过军委，就直接插手军队的工作，想搞掉总政，这符合毛主席的指示吗？我要找毛主席，请求毛主席免去我的一切职务。”

江青见状，就想解释，但是，林彪连说带骂，根本不让江青插话。等林彪稍一停，江青才说：

“林副主席，你请息怒，我说几句行吗？军队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这句话，不是我说的，陈伯达是组长，我是副组长，我没有权力制止他的发言。”

林彪说：“中央文革是你说了算嘛！陈伯达出席军委会议你不知道？他要讲什么你也不知道？不经过你的同意他敢随便讲？”

江青说：“昨天晚上，他讲什么我事先确实不知道，这句话不是我要陈伯达讲的，陈伯达对总政、对肖华有批评是可能的，中央军委对文化大革命的清规戒律多一点也是真的。”

听到这里，林彪火了，一下子把身边的茶几也掀了，大声喊道：“什么叫清规戒律，你们一定要把军队搞乱才罢手吗？搞乱了军队，究竟对谁有利？”

这时，林彪连声高叫警卫员备车，说：“我们两个人，马上去见毛主席，把事情说清楚，是我的问题，我辞职，我不干了。”同时又大叫：“叶群！叶群！”

叶群赶紧走进林彪的办公室，只见林彪气得脸色青紫，身上一阵阵发抖。他看见叶群进来，大声说：“叶群你来得好，我同江青闹翻了，快把江青给我赶走！”

江青在旁边说：“林彪同志，我有缺点错误，你可以批评，何必生气呢？”

林彪说：“我马上去见毛主席，提出辞职，我不干了。不让辞职，我还要提辞职。”

这时，警卫李文普已把车调到门口，叶群急得喊李文普千万

不能让林彪上车，由李文普和郭连凯秘书分别堵住两道门，不让林彪冲出去。她不顾一切的跪在林彪面前，死死抱住林彪的腿，哭着说："你和江青同志是老朋友，有话好说。你们应当相互谅解，闹出去对你们两人都不利，你们这么闹怎么得了？"

她又劝站在旁边的江青："您不要见怪，林总脾气不大好，现在正在火头上，等他冷静下来，再好好商量，把问题讲清楚，现在不要急于解决问题，更不能到毛主席那里去，影响主席的休息，分散他老人家的精力。"

江青也赶快向林彪道歉说："你是中央副主席，军委副主席，我有错误，你可以批评我，你批评我，斥责我，甚至骂我，我都可以接受，何必一定要到主席那里去呢？那句话的确不是我说的，骂肖华，抓肖华，抄家都是不对的，绝对不是我支持的，你可以检查，这件事情我已经报告了毛主席，是我错了，我检讨。"

叶群又赶紧劝林彪："江青同志已经接受了批评，向你表态了，就不要再闹了吧。"

林彪这才像泄了气的皮球，瘫软到沙发上，叶群拉着江青的手也坐了下来。叶群又向江青说了许多好话，然后陪江青坐车回到了钓鱼台。

那天叶剑英回家以后，端茶杯觉得右手无力，秘书陪他到军事科学院门诊部拍了片子，才发现右手掌骨远端骨折。可见他上午开会时拍桌子用力之猛！

此事后来林彪向毛泽东汇报时，毛泽东批了 16 个字："军中多年，很大火气，可以理解，允许放屁！"

当天，徐向前在三座门接见军队造反派时再次强调："军队机

关的军委领导不能取消，照管日常行政工作和战备。军队机关可以成立战斗组织，党委不许干涉战斗组织活动，但党委有权指挥日常工作。军队内不采取夺权。要把文化大革命搞好，我们军队是保卫文化革命的。军队要准备打仗，飞机要随时准备起飞。”

对部队内的串联问题，徐向前表示：“军队机关串联问题还在研究，新的指示还没下来。”

当有人问起肖华的问题，徐向前说：“我不能表态，我没有这个权利，中央没有让我表态，我是党员，我要负责任，还要请示主席。关于他（肖华）的问题，我们已经开了两天会，问题是严重的，但发展到什么范围还没有定。我看总政党委必须改组。全军文革成员没有走群众路线，在关键时刻这些人露出来是好事。”

1 月 20 日，杨成武传达陈伯达、江青关于肖华问题的指示：

一、传达和记录一律收回烧毁。

二、凡是贴在墙上的大字报、传单都盖起来。

三、肖华同志的大字报不准上街，因为他是总政主任，有国际影响，中央未定性质。

四、向外传达了的，告诉他们不要相信。

五、中央文革办事处准备发声明，对陈伯达、江青同志的讲话有很大的歪曲和造谣，传到哪里，从哪里追回。

1 月 20 日晚上，林彪通知叶剑英和徐向前，让他们两人主持召集军委会议，请中央文革的陈伯达、江青、康生等人参加会议，传达毛泽东对肖华问题的处理意见，并通知肖华本人参加会议。

当天晚上的会议，中央文革的成员只有关锋一人到了会，其他人都没有来。会上，关锋代表中央文革对肖华的问题作了解释。

他说："陈伯达昨天的讲话，是因为开会之前喝了一点酒，糊里糊涂乱说的，讲了一些错话，造成了不良后果。对此，江青同志已经请示毛主席，及时作了纠正。江青同志在中央文革的会议上已经批评了陈伯达，陈伯达也已作了检讨，他承认事前没有和江青同志商量。"

徐向前接着问大家有什么意见。

肖华第一个站起来说："你们说我反对文化大革命，难道稳定军队就是反对文化大革命吗？军队乱了又怎样保卫祖国，保卫文化大革命？"

得知毛泽东不同意揪斗肖华的态度后，参加军委会议的将领们争着发言，发泄自己心中的愤懑。

时任广州军区司令员的黄永胜更是直言文革小组"不听毛主席的话，不执行毛主席的指示，胡乱批评解放军，乱斗解放军的干部，要夺解放军的权，希望中央文革做出认真、深刻的检讨。"他还说："希望中央文革多听毛主席的话，特别是江青同志要多听毛主席的话……"

"你这样说，是指责江青同志吗？你是反对江青同志吗？"关锋打断黄永胜的话，马上责问道。

徐向前赶紧说："黄永胜是乱说的，有意见提嘛！不要指责江青同志嘛！江青同志是拥护毛主席的。"

方觉失言的黄永胜赶紧解释说："我只是说，江青同志、中央文革应该多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

吴法宪也赶紧说："江青同志是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是听毛主席的话的。"

接着叶群也说："江青同志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不能乱说"

这样，会议的气氛才稍稍缓和一些。大家逐渐冷静了下来，但还是纷纷提意见，要求中央文革注意稳定解放军，不要把军队搞乱。

关锋回去以后把会议的情况向陈伯达、江青、康生作了汇报，江青、康生听了以后大怒，江青说："今天这个会议是个反对毛主席、反对中央文革、反对我的会议，军委文革组长徐向前召开这样的会议，是斗争我们的。"

问题一下又追到了徐向前身上，问他为什么要开这样的会议，徐向前没有办法，只好说："既然是黄永胜放的炮，那就由黄永胜来做检讨吧。"

以后徐向前几次催黄永胜写个检讨，由他转交中央文革。黄永胜跑去请示林彪，要不要写检讨。林彪说："绝对不能写这个检讨，要坚决顶住，我去直接报告毛主席。"

江青对林彪一点办法都没有，只好把这笔账算到徐向前的身上，并建议林彪撤换徐向前的军委文革小组组长之职。吴法宪后来回忆说："林彪事后对我说：'谁当全军文革的小组长，过不了多久，就会被打倒。如果一定要撤换徐帅，全军文革那就让他名存实亡吧。'"

## 第 427 回：烧杨勇，郑维山遵命布置　鄂军区，俩领导自戕身亡

20 日下午，正在北京军区的郑维山突然接到叶剑英办公室打来电话："请郑维山副司令员今晚到京西宾馆参加碰头会。"

"杨勇司令员已经去了，为什么还要我去？"郑维山问道。

"具体情况我们不清楚。"对方是一种公事公办的语气。

晚上，郑维山准时来到京西宾馆第二会议室。环顾四周，在会议室的正面，一身戎装的关锋和一些中央军委负责人正在说话；东南角，杨成武、肖华低头看着材料；西北角，杨勇正襟危坐。郑维山发现了会议室西南角桌边的空位置，他迅速走过去，轻轻地坐下。刚坐下不久，叶剑英小声地把郑维山叫到宾馆的一间小会议室，会议室里没有别人。叶剑英注视着郑维山，尽量压低了声音说：

"杨勇要火烧，要烧焦。"

郑维山只觉得血往头上直冲，他忙问："杨司令出事了？"

叶剑英没有再往下说，只是用手拍了拍郑维山的肩膀。

郑维山回到会议室，但是没有回到他在西南角的坐位，而是来到全军文革小组组长徐向前面前，他把徐向前拉到小会议室，叶剑英还在里面。郑维山轻声叫道："叶帅，请您把刚才的指示再讲一次。"

叶剑英看看徐向前说："杨勇要火烧，要烧焦。"

徐向前用疑惑的眼神望着叶剑英，叶剑英说："你们先回会议室吧，不要问了。"

郑维山又把聂荣臻叫出大会议室，告知此事。他们来到叶剑英身边，叶剑英转头对聂荣臻说道："上峰指示，杨勇要火烧，要烧焦。"

郑维山来到会议桌东南角，坐到总参代总长杨成武和总政治部主任的肖华身边，悄声将叶剑英的命令告诉了他们。

当晚的会议结束后，郑维山没有马上走出会议室。他心里盘算着："叶剑英已经把命令重复了三次，意思是由我这个副司令去执行火烧杨勇司令员的命令。这是一件非常残酷的事情。副司令如果执行打倒司令员的命令，会不会有人说这是郑维山为当司令，搞杨勇？"他坐在京西宾馆二楼电梯东侧的一间小房间里，踌躇再三："这样大的事情没有个文字依据怎么行？"

郑维山正在苦思冥想时，杨成武进来了，看见他还没有走，便问："怎么你还在这里，还没有回去？"

郑维山说："事情重大，我想等到天明以后要个文字根据再去执行。"

杨成武知道他说的是"火烧"杨勇的事，便说："你再到叶剑英那里去一趟。"

郑维山说："他已经回西山休息去了。"

杨成武说："你打个电话再请示一下嘛！"

郑维山为难地说："他已经当我的面讲过三次，不好再问了吧。"

正在这时，电话铃响了，郑维山接起电话，是徐向前打来的，他说："刚才讲的问题你等一下执行，我再请示一下。"

接到电话，正犹豫不决的郑维山拨通了叶剑英的电话："叶帅，

徐帅叫先不要执行，他请示一下。”

谁知，叶剑英只是说：“不要请示了，徐帅不知道情况，你执行吧。”

郑维山惟恐出任何差错，他说：“那么，请叶帅打电话跟徐帅说一下。”十几分钟后，电话铃又响，郑维山拿起电话，那头传来徐向前的声音：“郑维山，我请示过了，你执行吧。”

长夜漫漫，星光稀少……郑维山坐上吉姆车赶回位于北京西山八大处脚下的北京军区，此时已是下半夜了。郑维山立即打电话给军区司令部和政治部，将“火烧杨勇”一事向军区副参谋长成少甫、宋玉琳等人进行了传达，对他们说：“杨勇是彭德怀分子”，“这次杨勇为肖华的问题跳了出来，要把他烧焦、打倒。”他让司令部和政治部各派一个人立即来布置写大字报事宜。不一会儿，司令部党委办公室秘书林国栋、政治部法院干部李廷宾两个人来到了郑维山的办公室。郑维山对他们说：“杨勇是漏网的彭德怀分子，要砸烂，要烧焦。怎么搞法，你们要好好研究一下，这个任务就交给你们几个人了，你们一定要保密。”

第二天，1 月 21 日，关于杨勇的大字报贴满了北京军区大院，其中有一张是这样写的：

一、杨勇是彭德怀的忠实走狗，彭德怀的心腹干将，他是彭安在北京军区的一颗定时炸弹。

二、杨勇是彭德怀的大红人，他们来往密切。他把北京军区的绝密地图，军事部署都送给彭真，阴谋搞政变。……

三、林副主席兼任国防部长后，据我们调查，杨勇一次也没有向林副主席汇报过北京部队情况，他和罗瑞卿一起对林副主席

进行封锁。……

革命的战友们，北京军区何止一个廖汉生，让我们睁开火眼金睛，奋起千钧棒，把杨勇这个三反分子揪出来！

在此前后，北京街头和军内都出现了署名“总政红色造反团漫天雪战斗队”的传单：《揪出三反分子杨勇》。

早 8 时，徐向前接见北京军区“红色尖兵战斗队”。他在回答的提问时说：

“杨勇是彭德怀式的人物，关于怎样斗他，你们自己解决，关于其他人，你们自己去揭发。”

同日，陈伯达在讲话中说：“我请示军委四位副主席后，四位副主席说，北京军区问题很严重，是夺权和反夺权的问题。杨勇的问题准备在运动后期解决。但是他现在跳了出来，因此由你们行动解决。”

在此之前，几位老帅曾商量过杨勇的问题。徐向前为杨勇打保票说：“杨勇是个好同志，是员战将，不论在战争年代还是和平建设时期，均做出了重要贡献，杨勇同志主持北京军区的工作，担子很重，也很尽职，有事及时向我们请示汇报。”曾几何时，就已经时过境迁。

1 月 19 日晚，装甲兵工程学院，代号为总字 212 部队的“红色造反团”驻北京航空学院联络员回来报告说：“北航‘红旗’和清华‘井冈山’已经夺了《人民日报》社的权，我们军队造反派也应该去夺《解放军报》社的权。”于是，第二天一早，装甲兵工程学院“造反团”头头王澍召集炮兵技术学校，即总字 152 部队的造反派及其他军事院校的 7 个造反派组织头头商量去《解

放军报》社夺权一事。由于情况不明，议定王澍和 152 部队的隋振兴等先去《解放军报》社交涉，家中做好准备，其他人等王澍他们通知后再去。大家早早吃了午饭，十几辆卡车停在装甲兵司令部大礼堂边待命。

20 日中午时分，驻后勤学院联络员回来说，后勤系统的造反派也准备去《解放军报》社夺权。大家一听，都等不急了，立即上车来到《解放军报》社院外，下车后列队到《解放军报》社楼前。这时王澍他们正在楼东食堂和报社交涉。随后其他院校的造反派也陆续到达，吵吵嚷嚷，要送代表进报社大楼。《解放军报》社赶紧在二楼阳台安上大喇叭，又赶印出传单，同时广播和撒传单，说报社内部已经由革命派掌权，要求他们退出报社大院。报社的人在报社大楼门口组成人墙阻挡那些军内造反派进入。

此刻，装甲兵工程学院“造反团”头头王忠信又带着几卡车人直接开进报社大院，停到报社大楼门前，头一辆卡车上装有高音喇叭，由装甲兵工程学院的女广播员不停地广播《夺权公告》和“造反有理”“砸碎旧世界”等语录口号。院子里上千名年轻的学员列队向军报办公大楼内冲，并且扬言：

“军兵种领导机关都被我们占领了，何况你小小的报社！”

“总政治部都犯了错误，你军报还不交权！”

这时，有的人已翻过人墙冲进报社大楼。

13 时左右，狂热人群有的爬上二楼阳台扯断大喇叭线，有的攀爬外墙排水管等附着物登上楼顶，挥舞着他们的大旗。

四楼记者处办公室内，一位老记者打电话辗转找到中央文革告急。下午 14 时，陈伯达闻讯，赶紧打来电话，紧急通知说：

《解放军报》只能由本单位革命派自己闹革命，外单位都不得冲，违犯者，就会犯错误。

陈伯达

1967.1.20 2时

接着，又于15时再次来电话制止：

解放军报社内部革命派前几天已经自己闹革命，外单位又去冲，又去冲闹，这在道理上是说不过去的。外单位革命派可以提意见，但要照顾大局，照顾解放军的伟大荣誉，请冲进去的外单位同志再三思考，深思熟虑。我的意见以退出为好。这边是照顾你们，有问题以后再派代表商量，祝同志们好！我建议你们退出比较妥当，不然报社不好工作。这是好意的建议，请同志们好好学习毛主席著作中所告诉我们的革命方法，严格遵守无产阶级的革命纪律，避免犯错误。

伟大的、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陈伯达

1967．1．20 3时

基本无效。并不知道《解放军报》社已由肖力掌权的军队院校造反派依然没有撤出。

天渐黑时，报社外边开进来一辆黑色轿车，车顶装有高音喇叭，边开边广播："我是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总政治部副主任关锋，我是关锋，请你们停止行动，立刻退出《解放军报》社，返回各自驻地，你们留下代表，我和你们代表商谈。"

经过关锋的反复广播,激动的人群这才作罢，纷纷撤离《解放军报》社，留下装甲兵工程学院的代表王澍、王忠信和一位姓谭

的学员 3 人与其他军队院校的代表与关锋谈判。谁知半夜，只见王忠信和姓谭的学员情绪沮丧，脸色刷白的回来说：人们撤走后，北京卫戍司令部就来人逮捕了王澍和炮兵技术学校的隋振兴，关锋还警告他们，今后不许再去冲击军事领导机关，违者就是王澍的下场。王澍和隋振兴关押了十几天后，于 2 月份放了出来，回到院校。

1 月 21 日早晨 6 时 15 分，关锋在《解放军报》社接见总字 642 部队“105 革命造反团”等 9 个军内群众组织。他说：

“有些单位冲《解放军报》社，不听毛主席、林副主席指示。这里面多数同志是要革命的，承认了错误，我们欢迎。其中有两个恶意攻击，我们就要专政。西城区纠察队早就镇压了，什么等运动后期处理！”

“总参、总政情况我们不了解，三部暂停文化大革命，因为是我军神经系统。是否不搞？不是，要和地方错开。军以下单位，坚持正面教育和战备。总政要好好批判刘志坚，别着急，什么事要有一个步骤。刘志坚是全军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代表。这个是伯达、江青和军队负责同志了解半年多，暴露充分了，可以公开讲了。以刘志坚为代表，要肃清他的影响。”

“关于伯达、江青讲肖华问题这种传单，我只能说一句话，销毁它，这是江青同志的指示，希望你们去做工作。”

20 日这天，陈伯达还针对到新华社夺权的学生指示：“新华社是党中央重点保护单位，不能冲，谁冲后果由他负责。已进驻的社外人员，请他们先退出去，以后再说。”

1 月 20 日，在北京参加军委碰头扩大会议的武汉军区司令员

陈再道、政委钟汉华，从北京打电话给临时主持武汉军区党委工作的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叶明说："军委在查贺龙的问题，我们军区也要查有没有贺龙分子，开常委会查这个问题。"

当晚叶明召武汉军区开常委会。由于军区大院已有不少揭发、批判副司令员唐金龙与贺龙关系密切的大字报，会议形成的疑问自然就集中到了唐金龙的身上。唐金龙在会上表示：

"要从这里（指与会者）揪贺龙分子，那只能是我了！"

会后数小时，1 日 21 日凌晨，唐金龙在家里，坐在他的办公桌前用手枪开枪自杀，脑浆喷得到处都是。

祸不单行，几小时后，21 日上午，武汉军区政治部副主任、武汉军区文革办主任吕炳安死在军区第四招待所的客房，验尸结果：死亡是由于凌晨前后服用大量安眠药所致。

刘志坚被打倒后，吕炳安受到猛烈冲击，武汉部队造反派要求他承认武汉军区也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吕炳安职务所限，无法答复，于是找到军区常委，请示应该如何解释？面对如此棘手的问题，常委们都不表态。吕炳安很伤心，也很生气，他悲愤的说："你们是舍卒保车呀。"

一夜之间，两位军区领导人身亡，引起人们各种猜测和议论，还出现种种谣言。有很多大字报说是"杀人灭口"。造反派提出要揭开武汉军区"阶级斗争的盖子"。为了躲避造反派的质问，军区领导纷纷回避。叶明更是一天到晚四处躲藏。

武汉军区副司令李迎希打电话给在北京的陈再道，说军区机关和党委基本瘫痪，请陈、钟至少先回来一个，主持解决当前问题。陈再道说："还在开会，不能回去。"

李迎希问："现在群众追问军区领导的问题主要是军区文革运动中是否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我们能不能承认？"

陈再道回答："绝对不能。"

陈再道还对李迎希说："你要学南京军区的张才千，造反派怎么闹，张都不表态。"

李迎希听说军委当时并没有开会，于是以个人名义给军委发了一个电报，内容是唐、吕事件后，军区机关、党委基本陷于瘫痪，请军委让陈、钟回军区主持工作，解决问题。

这封电报让陈再道和钟汉华对李迎希产生了怀疑，认为李迎希让他们回去是想让群众揪斗他们。钟汉华对陈再道说：

"老李建议军区党委承认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不是想要打倒你这个党委一把手呀？"

这时，因患高血压和心脏病，经军区党委批准在咸宁养病的军区副政委、军区党委副书记张广才，听说唐、吕事件后军区大乱，军区领导中基本上只有李迎希一人能去机关上班，便从咸宁返回，对李迎希说："武汉军区搞成这个样子，我们怎么向军委交代哟！我不能看着你一个人这样顶着，我要帮助你"。

李迎希劝他说："现在群众说我们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又出现唐、吕的事，情况很复杂，既然你已经停止工作去养病，何必再陷进来"。

但张广才执意去机关上班。果然，张广才一到机关就被群众提出的种种问题弄得头晕脑胀，没两天就住进了军区总医院。

## 第 428 回：哈尔滨，接管省市公安局　周恩来，连续见各地代表

1 月 21 日凌晨，周恩来在中南海会议室接见铁道部“东方红公社”等组织代表，听取他们汇报最近的铁路运输情况和北京铁路分局接管情况。

周恩来问：“北京局接管的，内部还是外部？”

答：“内外都有。”

接着代表们汇报了北京站的夺权情况。

周恩来问：“你们拿过来会不会误事？”

代表说：“向总理保证，误不了事。”

周恩来嘱咐造反派要团结多数派群众，他说：“他们也是群众，不要对立，要带过来，要不然就上了当权派的当。对一时被欺骗蒙蔽收买的群众，不要和他们对立。有时气势压人，有时耐心说服，是两手。要有政治气势，也要有气量，这就是毛主席思想，不然就不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革命造反派。”

代表们向周恩来做了保证。

周恩来：“铁道部不成立一个左派联合，业务就不容易搞好。林彪副主席讲过要有革命性、科学性、组织纪律性。铁路要最讲这三性。没有革命性就不敢干、不敢闯、不敢造反。没有科学性，铁路就要撞车。铁路工人最讲究组织纪律性。不敢造反就只有老一套。在这 10 天当中抓革命促生产就只有老一套。先把部内革命造反派组织起来，经过协商成立领导小组，造成革命气势。现在多数人还采取观望态度，你们北京服务员要帮他们冲一下。你

们还是文质彬彬，像毛主席语录所说的那样温良恭俭让，当然也不要利用暴力，这也不对。”

“铁道部本身要把革命造反派联合起来抓革命促生产。监督生产筹委会主要是监督生产。革命造反派就是要指导革命。监督生产就是监督现有的人，老老实实认真搞好生产，10 天以内先做到每日到发 55 至 60 列车。配合我们明天动员大家回去抓革命促生产。夺权就要有个闯劲。帮助铁道部闯一闯，他们造反精神不够，一定要把部内革命气氛搞得浓浓的。革命干劲搞得足足的，这是第一件事。第二件事就是把全国铁路的革命造反派联合起来。路局、工厂、工程局、院校、部机关也要参加进去。第三，北京站夺权要全面掌握住，推动分局和其他各站。第四，抓革命促生产争取下旬每天到发列车达 60 列以上。今天就解决这四个问题。有问题你们再和徐彬同志联系。已经两点半了，我还有其他的事要办。”

接见完铁道部“东方红”等组织的代表后，凌晨 3 时 10 分，周恩来又来到中南海接待室，接见哈尔滨市公安局和《黑龙江日报》接管委员会赴京代表。

1967 的中共中央 1 号文件，是转发解放军报记者撰写的《哈师院红色造反团在两条路线斗争中是怎样团结大多数的》长篇内部通讯，哈师院“红色造反团”因此在哈尔滨威信大增，他们的对立面，师院“八八团”自行解散。

此时，由于各级党委和政府在文革的冲击下处于风雨飘摇之中，社会上一时谣言四起，生产、流通受到冲击，商店开门时段不准。虽然在这个时候，社会上并没有偷盗、杀人或破坏分子的

活动，也没有抢粮、抢商店的事件发生，无论男女老幼，开着门就可以走，一个人什么时候出门也不必担心安全问题。但是，毕竟一般市民的常规生活开始受到骚扰，致使人心动荡不安。

面对这种形势，哈尔滨“红色造反团大专总部”一时举棋不定，他们在省委党校召开会议，由黑龙江大学张连科主持。经过讨论，大家认为，要改变目前的混乱局面，进入建立文革新的临时权力机构阶段，最好的办法就是像上海《文汇报》一样，进行接管。会议决定分两步走，首先接管两个关键部门：一是省、市两个报社，把舆论工具夺过来；二是省、市公安机关，把专政机关夺过来，形成对文革反对派和社会上其他阶级敌人的威慑力量。第二步，在此基础上，接管省委机关。

1 月 10 日，哈军工、哈工大、黑龙江大学、哈尔滨师范学院等大专院校的“红色造反团”，联合接管了《黑龙江日报》、《哈尔滨日报》和省、市广播电台及省、市公安局。

他们接管省、市两个报社和广播电台比较顺利。但是，夺两个公安部门的权就遇到了麻烦。哈尔滨市公安局内部反对“红色造反团”的力量很大，他们又事先得到消息，作了防备。当学生们来到公安局门口，市公安局内的造反派没有按事先的约定予以配合，市公安局拒绝学生入内。学生们强行进入，被市公安局的人推了出来，双方发生争斗。师院“造反团”总部立即调人前去支援，靠着人多势众，这才接管了哈尔滨市公安局的大权。

接着，哈军工“红色造反团”、省委机关“红色造反团”等 7 个单位联合组成省委机关接管委员会，接管省委机关。

面对“红色造反团”的行动，1 月 15 日晚，哈尔滨市还在活

动的“红旗军”、“战备军”、“荣复军”与“八八团”、“赤卫队”的头头召开联席会议，决定成立黑龙江省“革命造反派联络总部”，参与夺权。

第二天，1 月 16 日，哈军工等 23 个单位的“红色造反团”在哈军工集会，宣布成立“哈尔滨红色造反者联合总部”，并发表接管取省、市党政财文大权的“红色造反者联合接管公告”。

1 月 17 日，“红旗军”向已被“造反团”接管的哈尔滨市公安局冲击，进行反夺权。接着，“八八团”包围了黑龙江省委、省军区。

以上就是 21 日周恩来接见黑龙江代表前的黑龙江的形势。

21 日凌晨，周恩来健步走进在中南海接待室，与哈尔滨市公安局和《黑龙江日报》接管委员会赴京代表们一一握手，询问了每个代表的所在单位。当问到《黑龙江日报》社的代表时，他拿着最新一期的《黑龙江日报》说：“啊！我看到你们的报纸了，很好嘛！”

随后问哈尔滨市公安局的代表：“你是造反派？你们造反派的力量怎么样？”

哈尔滨市公安局的代表回答：“是少数。”

周恩来：“刚才我通了电话，省委被包围。‘八八团’、‘红旗军’、‘战备军’、‘赤卫队’受一些人鼓动，包围了省委、总工会，省军区，封锁消息，用白毛巾包头，白口罩。现已暴露，更大的暴露是臂章。为什么不用红的呢？因为夜间看不清，用白的，就暴露你更反动。以前西城区纠察队夜间活动就是带白口罩。在南岗子到底有多少工人，不清楚。‘八八团’包围了省军区，

包围省军区的首先是军工‘八八’。我告诉‘八八’：‘红旗军’、‘战备军’头子是反动的。你们是革命学生，跟他们站在一起，把自己放在什么地位了？‘造反团’接管公安厅、公安局，是革命行动，你们‘八八’应该支持嘛！你们同‘红旗军’、‘战备军’一同行动，把自己放在敌对地位。‘八八’不参加，也不应该和‘红旗军’、‘战备军’站在一起。我号召你们赶快转回来，要支持“红色造反者”。这是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的一致意见。

后来军工大的有不少都哭了。我告诉‘八八’，让他们说服‘赤卫队’，再不要参加这个行动了。这是反动组织。现在是个转机，告诉‘造反团’，要欢迎他们立功，以后再去说服‘赤卫队’，要求‘八八’和‘赤卫队’去立功，去瓦解‘红旗军’、‘战备军’，孤立‘红旗军’、‘战备军’的头子，以便我们逮捕，支持‘造反团’的夺权斗争。

北京已经宣布（红旗军）是反革命组织。你们还有什么问题，向我们的联络员提出，好解决。我还有个会。夺权是连锁反应，16 号下决心夺权，今天才 5 天嘛！我们力求不流血最好，不开枪更好，要考虑国际影响。‘红旗军’也有后盾，他们把中医学院欺骗了，我们宣布后，‘红旗军’就瓦解了。东北局宋任穷今天夜里赶回哈尔滨，支持你们的行动。我告诉他第一个目标是哈尔滨，支持你们夺权。”

代表们提出：“军区态度不明朗。”

周恩来说：“军区态度不明朗不行，现在火烧眉毛了，他们不到烧眉毛不着急。”

这是次短暂的接见，前后只用了不到 10 分钟。随后，周恩来通知东北局书记宋任穷去哈尔滨，参加“红色造反团”的会议。

1 月 21 日凌晨 5 时，周恩来又在人民大会堂小礼堂接见了各军、兵种机关、学校科研等 37 个单位、900 余名“四清”工作队员，回答他们提出的关于“四清”和文化大革命的相关问题。由于许多地方要求“四清”工作队回原“四清”单位复查问题，对于代表提出的这些问题，周恩来说准备提请中央制定一些文件予以解决。但是，他说：“把工作队员全部揪回去，甚至把四清中正确的人，变成为反面的人，这是对我们的社会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极端不利的。”“比如说，军队参加四清的几十万人，全国有几百万，都要回去，这个来往是很大的，这就是一个新的人调动，新的‘大串联’。那我们这个文化大革命的大串联，就又有了新的‘串联’（笑声）。这不是串联，而是大调动。这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四清中一些有问题的人提出翻案是不行的。如果给他们翻案，那就等于革命倒退。提出这个意见，是另有意图，别有用心的。提出这个问题不可能实现的，如果这样作，那我们就上当了。”

接见完部队的“四清”工作队员代表，周恩来又接着接见科学院在北京地区各单位的代表，支持他们夺权。谈到北京驱逐“黑五类”一事，周恩来说：“文化大革命初期，总要把地、富、反、坏弄走。有些不稳当的人也调一调，组织一个工作小组，但又担心会扩大，有点踌躇，请示主席，主席指示，除个别劳改犯外，其它自己消化，不要把矛盾上交，也不要把矛盾下放。前阶段红卫兵把四类分子赶回农村，后来他们回来参加‘红旗军’，

过分了就有不好的反映，还是主席讲的自己消化对。6 月 10 日我请示过主席，6 月 13 日回来，传达主席指示，这个工作就停了，当时将一些坏人向新疆送了些，可能送的多了些。这个工作和后来的刘，邓路线将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完全是两回事。你们抄‘黑材料’也发现了这些。在 6 月中旬，停止这个工作的指示都传达下去了，可能有些部门没有传达下去，6 月份传达的，以后还搞就不对了，我和你们讲讲，你们就不要造了，不要说黑线了，这种事在几万人大会上讲也不适合。”

他要求造反派把生产抓起来：“现在你们夺权了，就要创造条件，促生产，科学院被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掌握，你们批，就会促生产，参加任务联系起来。你们已有 35 个单位夺了权，今天 21 号，这个月你们可以解决夺权问题。所谓联合，是造反派联合起来夺权，要一边夺权一边批，把刘、邓路线批臭。”

周恩来最后号召：“科学院造反派联合起来，取得全面的胜利！”

9 时 5 分，周恩来又在中南海小礼堂接见中国科学院京外单位造反派代表。当他身着军装走进会场时，全体代表起立热烈鼓掌欢迎。

周恩来说：“你们等了好久了。开不完的会，做不完的事，讲不完的话。”

然后他问：“科学院的夺权斗争，你们有什么办法？你们京外所有没有什么问题？你们有双重任务，在这里也可以，更重要的还是回到本地区、本单位，我本来说两方面一起谈……我听取

你们的意见……”

他问代表们：“你们是全体？”

众人答：“我们是代表。”

周恩来似乎不解：“代表？”

答：“一个所一个代表。”

周恩来接着说：“夺权靠自己，我只能支持你们夺权……京区有本身的问题，京外有京外的问题。你们可以由一部分人参加院的，主要是本身，各个地区不同，有的没有任务，贵州有任务问题，有夺权问题，总的管不过来。”

他又回顾了文革的历程，然后说：“群众的洪流不限于初期的范围，不能象原来设想的那样，分期分批进行，运动有自己的规律，群众发动起来后由学校冲向全社会，由北京冲向全国，由学校冲向工厂，由城市冲向农村所以得迎接新的高潮。”

他说：“去年迎接 1200 万革命师生和红卫兵，秩序很好。”“去年 11 月份以后，一些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用强调生产来压制革命不成了，便把矛盾上交，把人推到中央。好像他要革命……把矛盾交给中央。本来，你们串连为的是推动你们本单位的运动，分期分批的来，但却把人都推来了，”

刘西尧插话：“上海的出来的最多。”

周恩来：“结果不限于科学院，连其他科研机关，工厂也推来了，……许多地方受经济主义影响，加上文教战线由陶铸领导，他有意把事情扩大，文艺界、体育界、小学老师都来了，我们也不知道。到北京来还发补贴费，一天 7 毛钱。工交战线有些当权派也这样，对合同工、临时工用修正主义的办法腐蚀他们。起初，

他们用扣工资来压制串连，后来中央文革提出三点指示。6 月份以后的不许他们扣工资，不准开除，不准阻止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后来，他们把临时工也补发了工资。有些地方从 61 年开始补发，在哈尔滨一个地区就要两亿元开支。我们不答应，他们就要接管银行，我们就实行军事管制，保卫银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用经济主义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把人员都推到北京来。去年 1000 多万红卫兵到北京来没有什么问题，12 月份以来商店的一个季度的高价品，几天就卖光了。10 号左右增加到 100 万人，又不想走。我本来准备迎接第二个高潮，可是，不是这里发生问题，就是那里发生问题，都要去。使我们工作很被动，几乎每天都要打运动仗。”

“领导和群众的对立情绪还未改变过来，不是所有的都是这样，有些顽固分子挑动工人卧轨，冲这冲那，揪来揪去，革命搞不彻底，这些行动不能都说是革命行动。但有一些当权派却不假思索地就签字说革命行动，要不就反过来说成是反革命的，造成群众对立，群众之间的斗争，完全是挑动群众斗群众。本来十一中全会已经指出两条路线斗争，凡是革命的我们都支持，本来八、九月份革命造反派和保守派已经开始分得比较清楚，十一中全会后应该支持革命派，但是他们不是这样做，在思想感情上还是支持保守派，助长了保守派继续犯错误，因为保守派保过他们，造成群众之间的对立。领导上又搞经济主义，这时又插入了一小撮反动分子的活动，最近北京就出现‘红旗军’的活动，经过调查，他们的组织头目大部分是不满分子，是被判刑和国家开除出去的。他们欺骗了全国各地来串连的同志，把荣誉、复员、转业、

退伍军人组织起来，我们是不允许的。我在这里也向他们讲过。他们不能成立单独组织，他们有自己的工作岗位，可以参加本单位的运动。从开国到现在，我们 900 万复员转业军人，他们三分之二在农村，三分之一在城市，要把他们组织起来，不等于有第二个军队组织吗？”

周恩来接着说：“65 年的毕业生也组织起来了，这就像资产阶级的同学会，是封建主义同乡会，我们要它干什么？65 年毕业的不外有两种：一种在本单位工作的可以转为正式工作人员，另外一种人，他们本单位不是很急需，本人又愿意回母校参加运动，可以回母校参加一段运动，不转正，暑假再回本单位。但陶铸却没有把转正问题讲清楚，变成都可以了，造成二、三十万人外出串连，又领工资又不在本单位服务，造成经济困难，增加了文化大革命的复杂性。上海先进的工人阶级，革命学生发表了声明和十项建议是很及时的，所以我们，中共中央、国务院、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出支持信件，号召大家抓革命、促生产，击退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

长春光机学院代表提到吴德问题，说吴德是三反分子，要揪他回去。周恩来说：“你们先别定调子嘛！现在还不能这样说，吴德的问题未解决。前几天我们找了他 3 天才找到，我们知道他不是落在坏人手里，但是他们和我们捉迷藏，在北京，在毛主席身边，不必这样搞，这样做法不全对。

我不赞成揪他，你们那儿急，北京更急，北京的烂摊子不是吴德搞的，是原来有的，他们是从外面加进去的。你们的要求我现在不能同意，你们先回去把吉林所有的摊子搞好。”

## 第 429 回：无头案，陶勇惨死在井中　下指示，军队要介入文革

1 月 21 日，海军东海舰队司令员,同时兼任海军副司令和南京军区副司令的陶勇，突然死于东海舰队一所招待所院内的井里，终年 55 岁。

这天上午，上海警备区司令员廖政国陪同两名记者来到陶勇办公室。陶勇对记者说："有些运动中的问题，想通过你们向党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反映一下。希望中央根据存在的问题，做出进一步明确的规定，以便我们好好掌握，使运动健康发展。"

两位记者请陶勇具体谈谈。陶勇接着说：

第一，东海舰队是战备部队，中央明文规定不得开展"四大"，但有些单位不顾中央规定，硬要开展"四大"。举例来说吧，舰队的训练团按其性质来说，不属于搞"四大"的单位。可是，那里的一些学员和干部，受到海军各院校南下学生的影响，执意要搞"四大"。虽然我们多次解释、说服，他们依然顽固坚持。类似这种情况，中央需要作进一步的明确规定。

第二，"四清"运动的成果要巩固。近来在上海不少工厂、农村基层单位的群众组织，不断到部队揪斗参加"四清"的工作队队长、组长，甚至队员。这是对革命军人人格的侮辱。参加"四清"工作的干部，执行的是舰队党委的决定，他们没有责任。希望中央早日做出不准揪斗的进一步规定。

记者走后，陶勇又和廖政国聊起了上海的形势，说他绝不相

信陈丕显会是走资派。

就在陶勇和廖政国与两位记者交谈的同时，东海舰队政委刘浩天、副司令员高志荣和海军李作鹏派来的工作组在司令部一号楼开会，自然也没有通知司令员陶勇参加。

约 12 时 40 分，陶勇提着皮包走出办公楼，向招待所走去。

招待所离办公楼不远，后楼的 105 房间是专为陶勇准备的，他午后经常到那里去休息。中午，陶勇请廖政国司令员在招待所吃饭，他喝了两盅茅台酒，饭一点也没吃。

大约 14 时多，陶勇到院子里散步，看见招待所曹所长，让他叫理发员来，说要理发。曹所长叫陶勇的警卫员去叫理发员。理发员周妙基正在洗澡，听说首长要理发，马上就收拾出来。也就过了大约 10 分钟左右，警卫员和理发员来到后花园，却没看见陶勇和曹所长。他们四处找，也没找到陶勇。

陶司令不见了，这可是大事。这天是周六，按规定下午是舰队机关政治学习和党组织活动时间。下午刚上班，机关各部门就接到舰队电话通知找陶勇。于是大院各部门发动大家到处寻找陶司令……

这时，有人在招待所花园看到花房井台上有一顶海军干部帽，他过去一看大声呼叫：“井下有人！”

人们马上跑过去，只见一双脚朝天，几个人很快将井下的人拖上来，大家一看，正是陶勇司令，口角鼻孔还流着鲜血。

这口井不深，井底还有一块大石头突出水面，井底面积也不大，只有三分之一见到水面。

人们马上将身材瘦矮的陶勇抬到招待所他休息的 105 房间，

放到三人沙发的茶几上。保健医生程心培闻讯，带着两名医生，立即奔向招待所。

在给医院打电话的同时，有人发现：从陶勇身上脱下的丝棉背心还没有完全湿透；从他的衣袋里找到一份上海市政府的文件，边上湿了，里面却是干的。这都说明陶勇落井时间并不长。

东海舰队卫生部刘振民部长命令："全力抢救！"

抢救组紧张而有序地抢救，约 5 分钟后，王主任向刘部长报告："要开胸做心房按摩抢救！"

刘部长让人马上向舰队刘浩天政委报告请示。

刘浩天在电话里说："得开党委会研究后再定。"

报告人说："陶司令现在危急，应分秒必争，开会后再定，来不及了。"

刘政委说："不开会，我也得与高副司令研究一下。"说完，就挂下了电话。

刘振民部长听了刘浩天的答复后，当时脸就气红了。他也管不了许多，救人要紧，立即命令抢救组开胸抢救，并说："一切责任我负责。"

虽然采取了一切措施，陶勇终究还是没有抢救过来。一个身上被敌人子弹 7 次击伤都没有带走的顽强生命，却在一瞬间被一口深不没顶、宽不及肩的水井淹没了。

刘浩天政委立即得到报告说："陶司令抢救无效已死亡，请政委来现场看看。"

刘浩天答复说："死了就死了，请示上面再说。"

卫生部刘部长发现陶勇后脑部有一个大血肿，他们分析：陶

勇可能是先被打昏，死后扔到井里，造成自杀现场。而完成这些，没有三、五人是不行的。

事发不到两小时，医生还在抢救陶勇时，海军东海舰队政委刘浩天就在办公室里宣布："陶勇一贯争强好胜，这几天，他害怕自己卷到苏（振华）、罗（瑞卿）圈子里去，所以才走这条绝路。我看他是畏罪自杀、抗拒运动，是叛徒行为。"

同时，由他审定的《陶勇自杀的经过和初步分析》的电报发往北京。不到 4 小时，海军党委发出通报："叛徒陶勇，畏罪自杀！"

陶勇开胸后的的胸部切口还没有缝合好，东海舰队体工队、文工团、护校的几十人就高呼着："打倒大叛徒陶勇！""陶勇罪大恶极！"等口号冲进招待所大院，有人揭发陶勇在抗日战争期间曾经借道给敌人，说他是日本特务。

陶勇穿的棉衣血迹很多，右肩棉衣被井水湿透了，管理处沈处长拿了件新棉衣给陶勇遗体换上，被一些人看到后立即抓住，押着沈处长在大院里游街，敲着面盆喊：

"我是陶勇的小爬虫！"

接着，他们将陶勇的遗体拖到招待所内的草坪上，将早已准备的写着"打倒大叛徒陶勇"大牌子挂在遗体上，还戴上高帽子，帽子上写着："罪大恶极陶勇"。并让陶勇的遗体一手拿酒瓶，一手拿稻草。然后给陶勇的遗体拍照，还向陶勇遗体吐痰，用脚踢。

第二天，周日，不放假，舰队布置机关干部写小字报开批判会，大造声势批判陶勇，并强调每个机关干部要与陶勇划清界线。

并且向各部门传达了陶勇的十大罪状。

1 月 21 日，北京。原装甲兵政委、时任军事科学院副政委的向仲华，在装甲兵科学院解答群众提出的问题。当有人问到关于许光达与贺龙等人关系时，他说：

“一、许光达与贺龙的关系

（一）许光达从没有去过林副主席那里，其他几个老帅更不用说了。但到贺龙那里，就去得比较多。

（二）贺龙常说要一个大将当总参谋长，别人压不住。大将中间：黄克诚、谭政垮了；徐海东、张云逸久病在身；王树声身体不好，只能在军事科学院。那就只能是许光达了。贺龙和彭真是串通在一起的，就是要许光达当总参谋长。

（三）罗瑞卿在 1964 年带着一批人（各军种、兵种负责同志）到新疆看地形，装甲兵司令部的张文舟也去了。据说，新疆军区提出要一个坦克部队去。以后他们回来讨论，64 年没有去，66 年上半年又去了。罗瑞卿、贺龙是否想：因为许光达是装甲兵司令，利用他调动坦克部队来加强他的新疆力量。贺龙的手各地区都伸。武汉、成都、北京、新疆等军区，有计划地加强他的实力，准备搞政变。

（四）据宋庆生揭发，在写第二方面军军史的问题上，应当由了解的人来写。许光达有一段时间到苏联去了，很长一段时期不在二方面军，但军史实际上由许光达负责领导写的。

（五）许光达本来不够大将资格，最多是个上将。但为了照顾山头，一、四方面军都有大将了，就是二方面军没有，所以给他个大将。但后来贺龙对许的级别还有意见。

二、许光达与彭德怀的关系

（一）彭德怀当国防部长时，两次调许光达到总参去工作。（当时黄克诚当总参谋长）叫许去当副总长。另一次是叫他到军事科学院当院长，他没有去。这说明他与彭德怀的关系不一般。

（二）许光达那时经常亲笔给彭德怀写信，装甲兵建设多少个坦克师等问题都亲自写信给彭。据我所知，林总主持军委工作以来，他没有请示过，没有汇报过，更没有亲笔写信。

（三）1958 年以前张文舟与我谈过：在一野时，彭德怀对许光达是很器重的。那时许光达是一野三纵队的司令员，后来是兵团司令。彭德怀在很多问题上，如打哪一仗的方案，都要先征求许光达的意见。

（四）在 1959 年的反彭斗争中，开大会时，许光达担任一个组的组长。据我的记忆，许光达对彭德怀没有揭发什么问题。

三、许光达与罗瑞卿的关系

（一）罗瑞卿的问题被揭发后，1966 年 2 月许光达还到彭真家去谈了 5－6 小时。

（二）对林总的指示许光达很少传达，对罗的指示则经常传达。

（三）罗的问题揭发后，在 1966 年新年团拜时，许还说“祝罗总长身体健康”。

（四）大比武时，跟罗跟得很紧，亲自领导装甲兵大比武，还写了一个报告，多次让罗批，后来罗批准了。”

这时的安徽，由于基层党组织的瘫痪，企业为了维持生产，工人造反组织开始自觉地接管企业的管理权。到了 1967 年元月

中旬，安徽合肥市的厂矿企业有90%左右都由工人造反组织接管。群众热情很高，各级基层企业大都是满负荷生产。但是省、市一级的生产协调就十分混乱。1月20日晚23时，安徽省委书记处书记兼秘书长任质斌代表安徽省委约“827”兵团的主要头头到稻香楼的一个会议室里谈判。他一开始就说明省委目前工作的窘境，请示中央能否派人来安徽主持工作，周恩来的答复是，中央没人派，让他们是否可以找‘827’的头头们商量，考虑与他们联合办公的问题。并且说：“827”是个长期不发生问题的学生组织。

“827”答应说：“如果省委工作确实有困难时，需要‘827’出面帮助，我们会尽力协助省委工作。”但是，“827”担心与省委联合办公容易引起造反派内部的误解，否决了联合办公的动议。

1月21日，安徽省造反派组织准备在第二天召开“批斗省委第一书记李葆华大会”，要求安徽省军区派部队保护现场，维持秩序，并限时答复。南京军区党委当天即向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林彪并中央军委报告：

“顷接安徽军区报告，首都第三造反司令部驻安徽联络站等单位向安徽军区提出，廿二日到廿三日，在合肥召开15万到20万人大会”，“要安徽军区派出三百到五百名部队警卫会场。他们提出，如派部队就是支持文化大革命，如不派就是不支持文化大革命，并限安徽军区廿一日十四时前答复。是否派部队，请速指示。”

并转呈了安徽省军区的请示报告。

此报告林彪尚未请示毛泽东，毛泽东已于当天在安徽省军区的请示报告上批示：

林彪同志：

应派军队支持左派广大革命群众。以后凡有真正革命派要求军队支持、援助，都应当这样做。所谓不介入（文化大革命）是假的，早已介入了。此事似应重新发布命令，以前命令作废。

请酌。

毛泽东

秘书把毛泽东的批示念给林彪听，林彪听完，让秘书记下他的意见：

完全赞成主席的方针，全军必须坚决支持左派广大群众，请向前、剑英同志迅将主席批示转发全军照办。

林彪

1 月 21 日

当天下午，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谈军队要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问题，要王力抓紧起草一个指示。

周恩来在这天的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传达了毛泽东这条“支持左派”的指示。

谈到夺权问题时，周恩来说：“关于夺权，报纸上说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的权，不是这样的能不能夺？现在看来不能仔细分。应夺来再说，不能形而上学，否则受到限制。夺来后，是什么性质的当权派，在运动后期再判断。”

当天，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根据毛

泽东关于人民解放军应该支持左派广大群众的指示精神，做出了五条指示：

（一）以前关于军队不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以及其他违反上述精神的指示，一律作废。

（二）积极支持广大左派群众的夺权斗争。凡是真正的左派要求军队去援助他们，军队都应当派出部队积极支持他们。

（三）坚决镇压反对革命左派的反革命分子、反革命组织，如果他们动武，军队应当坚决还击。

（四）重申军队不得做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顽固分子防空洞的指示。

（五）在全军深入进行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斗争的教育。

并就此拟就《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稿，上报毛泽东。当天，毛泽东就在这份《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稿上批示："照发。"

1 月 20 日，张日清以山西省军区第二政委的名义给中央军委写请示报告，反映山西省军区支持左派的情况，并提出军队参加地方文化大革命和支持左派的意见。22 日，林彪在张日清 1 月 20 日《关于军队参加地方文化大革命支持左派的请示报告》上批示："这个报告很好，值得注意。是否需要回电支持，请全军文革酌定。"

## 第 430 回：清华园，质疑康生波及广“三司”称，开除北大“井冈山”

在北京一片夺权声中，又有一股“炮打康生”的呼声跳了出来，顿时吸引了很多人的注意：

1 月 17 日，清华大学叶志江、刘泉等 4 人联名写出《康生同志，我们怀疑你!》的大字报。这是清华园和北京市出现的第一张把矛头指向康生的大字报。

刘泉，清华工程力学数学系的学生，因反对工作组而全校闻名，也是周恩来在 1966 年 8 月 4 日清华全校大会上，冒雨亲自为其和蒯大富平反的名人之一，清华“井冈山”的第二把手。他们怎么想起来炮打康生呢？他们揭发康生的那些材料又是从何而来呢？

那是 1967 年 1 月的一天，还是那位清华大学又红又专的标兵叶志江，在清华园中一个始建于清朝乾隆年间的曲廊迂回，树木扶疏的古建筑庭院——工字厅的一间小屋里，阅读文革期间多如牛毛的红卫兵小报。他被北京大学红卫兵印发的一份关于 1964 年“北大社教”的资料吸引。当他将康生在不同时候和不同场合说的话加以比较后，突然感到康生是一个两面三刀，文过饰非的阴谋家。于是，他决定“跳”出来写一张炮打康生的大字报。

工字厅，据说，国学大师王国维自沉于颐和园昆明湖前曾在这里度过了他的最后一夜。人们无法知道，工字厅的最后一夜是否给了王国维自沉的启迪或暗示，但是叶志江在文革的洪流中的这次纵身一跳，确实是在工字厅这间小屋里得到了某种“灵

感”或“诱惑”。

康生负责中央党校的文革运动。叶志江忽发奇想，去中央党校调查康生的问题。

时值隆冬，中央党校门可罗雀，院中人迹稀少，几张残破的大字报在寒风中摇曳。正当叶志江颇为无从了解党校的情况而感到失望时，迎面走来一个穿着军大衣的女孩子。

也许是命中注定，这个女孩子恰恰是康生治下的一个“叛逆”。1965 年，中央党校成立了一个学制 5 年的青年训练班，以培养优秀的理论人才。首批招收了 30 名男生和 15 名女生，他们大多是有些背景的高干子弟。这位女孩就是党校青训班的学生，父亲是军队干部。她十分乐意帮助叶志江调查康生的问题。

女孩子风风火火，立即带他去见著名哲学家艾思奇的遗孀王丹一女士和艾思奇的秘书卢国英。深受毛泽东器重的哲学家艾思奇文革前夕英年早逝，他的秘书卢国英作为党校“红战团”的一个负责人，当时正遭受康生支持的党校“红旗队”的压迫。谈话中，叶志江明显地感觉出王丹一和卢国英心情沉重和对康生不满。卢国英同他谈了党校的问题所在和康生支一派打一派的错误，但一再表示他们不会公开反对康生。

女学生又帮叶志江约见的第二个人是她的青训班同学，海军政委苏振华的儿子苏承德。这苏承德可是中央党校里敢于公开反对康生的人，此时因为怕被抓，已处于“地下状态”。他们是在一间窗户遮得十分严实的房间里见的面。只见苏承德戴着鸭舌帽，帽沿压得很低。虽然是在“密室”，他还是一边用低沉的声音回答着叶志江的问题，一边东张西望，仿佛康生在党校的追随

者会随时冲进来将他们一网打尽。

对叶志江准备出来公开炮打康生，苏承德十分高兴。他说："中央党校的人都已噤若寒蝉，但清华的学生有资本和胆量向康生公开挑战。"

这番话顿时让叶志江油然而生出"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的感觉。

可能是家庭背景的关系，苏承德说话无忌，口无遮拦，有问必答，对康生的许多行为显然有深入的了解。叶志江从他这里第一次听到康生在延安整风时搞了个"抢救运动"，伤害了很多人，知道党内有很多高级干部对康生侧目而视。

苏承德还说："康生喜欢附庸风雅，欣赏齐白石的画而给自己取了个笔名鲁赤水，平时好题字作画，和文革中被打倒的黑线人物往来密切。邓拓曾写文章赞扬鲁赤水的画。"

是啊，康生知识广博，对中国古代的文学艺术，几乎无所不通，特别是中国戏曲史。此外，书法、篆刻功底也十分了得，真草隶篆样样皆能，画也可登大雅之堂，但他从不拿出来。如果说邓拓有赞扬康生字画的文章，那绝非溜须拍马之作。

苏承德认为康生的这些字画都是封资修的东西。他特别提到邓拓和孔原，说可以从这两个人的家中找到康生的字画。

邓拓的《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此时早已被批得臭不可闻了，其中一些谈论风月的文章都被作为反党的黑话而全国共讨之。假如人们突然发现邓拓居然在《燕山夜话》中写文章吹捧鲁赤水的画，也就是康生的画，又发现康生本人也有不少疑似黑话黑画的作品，那岂不是又为全国人民挖出了一颗"定时炸弹"！

一不做，二不休，叶志江决定马上查寻邓拓和孔原两家的地址，到那里搜寻康生的黑字画，用作炮打康生的“物证”。

邓拓的女儿邓小岚是清华大学工程化学系的学生。她得知叶志江炮打康生的行动后主动跑来找他，秘密地和他一起骑自行车到她家“踩点”。

邓小岚此时身处逆境，却不畏风险参与炮打康生一事，自有她的切身感受。当她父亲的《燕山夜话》被指为黑话连篇时，她难以理解家中挂着的那些康生字画何以能清白无辜。她说：“康生书赠她父亲的一幅字，‘月如无恨月常圆’不同样流露出一种阴暗心理吗？”

叶志江闻之大喜：“康生的狐狸尾巴果然露了出来。面对社会主义的美好生活，康生居然怀恨在心。”

其实，“月如无恨月常圆”是北宋文人曼卿对唐代诗人李贺《金铜仙人辞汉歌》中的名句“天若有情天亦老”的对子，当时被传为绝对。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时，毛泽东挥笔写下“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1965 年 7 月，毛还致信陈毅：“李贺诗很值得一读，不知你有兴趣否？”

对毛泽东偏爱李贺的诗，康生当然知道。他给邓拓题写“月如无恨月常圆”是否是投毛泽东所好，不好妄言。但清华学生不知其中，兴师动众，在康生给邓拓题写的“月如无恨月常圆”上大做文章，确实有些浅薄幼稚了。

当邓小岚带着叶志江来到她家时，这里已被北京航空学院的红卫兵占领，他们不允许未经许可的学生进入，这使叶志江他们无缘一窥“月如无恨月常圆”的意境。

寻找孔原家的地址颇费了一点周折。

孔原，中央调查部部长，国务院外事办公室主任。他的夫人许明是国务院副秘书长，儿子孔丹是“西城区纠察队”的头头。“西纠”被取缔后，孔丹遭到拘捕，其父母孔原、许明和国务院秘书长周荣鑫等被江青点名为“西纠”的后台。在巨大的政治压力下，夫妇两人一起服安眠药自杀。结果许明死了，孔原被救活。

叶志江向一些高干子弟打听孔原家的地址，但无人知道。他突然想到，孔原是国务院外事办公室主任，时任外交部副部长的乔冠华应当知道孔原家的地址。

乔冠华的儿子乔宗淮和叶志江是同系同年级的同学，曾担任数力系“文革临筹会”的负责人。

叶志江设法找到了一个外交部的电话，接电话的是外交部传达室的人。叶志江向他说明是清华大学的，有重要事找乔冠华。那人推说他不知道乔冠华的电话，但在叶志江的坚持下，只得将叶志江的电话转给了他的上司。

电话被转了三、四次，接电话的人都不敢轻易挂断这个声称有重要事情，并以清华大学学生名义打来的电话。最后，电话的另一头终于传来了：“我是乔冠华”的声音。

叶志江压制住成功的激动，告诉乔冠华说：“我是清华大学的学生，要求你转告乔宗淮，回清华做检查。”

这当然是“子虚乌有”的事。搬出乔宗淮的名字，不过是借此证明叶志江确是清华学生，而“做检查”云云也只是为了“正式谈判”前给乔冠华一点心理上的压力。

大名鼎鼎的“乔老爷”果然上当，在电话里一再承诺会做他

儿子的工作，并对叶志江的通情达理表示感谢。

叶志江随即切入正题，要求乔冠华告诉他孔原家的地址。乔冠华慌忙辩解他和孔原没有关系。他说国务院外办和外交部不是一个系统，他不知道孔原住的地方。

叶志江对他说："我们并没有怀疑你和孔原有牵连，但我们有十分重要的事情需要知道孔原的住址。"

乔冠华在沉吟片刻并和他的秘书交谈了几句后，将孔原家的地址告诉了叶志江。

叶志江带人来到孔原家，其室内陈设之奢华和孔原夫妇两人自杀后凌乱的卧床引起了学生们的唏嘘和感慨，他们被满屋子稀奇的洋玩意儿和摆设所吸引。叶志江赶紧申明纪律："除了书报字画，其它一切物品都不准触动。"大家都知道这次抄家的目的和严肃性，没有一个人违背这条纪律。当然，"一饱眼福"还是允许的。

他们找到了几幅字画并拿走了几本杂志。叶志江将所有取走的物品写了一份清单，并签了名。当他将清单交给孔原的亲属，一个面容姣好的少妇，并请她清点物品时，她看了叶志江一眼，似乎对他们的文明态度和拿走这些字画的用意有点好奇。

叶志江觉得材料已经很充足了，他即刻动手写炮打康生的大字报，写完时，已是晚饭时间，相邻宿舍的同学刘泉端着饭碗笑嘻嘻地走进他的宿舍。叶志江开玩笑地问他是否愿意签名。不料他看完大字报后，不假思索便签上了自己的名字，并给大字报拟了一个标题：《康生同志，我们怀疑你！》

刘泉说自己早就怀疑康生是坏人，但称康生为同志可以留有

余地。

第二天，1 月 18 日，这张大字报被刊登在《清华井冈山通讯》上。

1 月 19 日，叶志江又以《117 独立营》的名义贴出大字报：《谭力夫的后台就是康生》。“117”是大字报《康生同志，我们怀疑你》贴出的日期，而取名“独立营”则是想表明叶志江炮打康生的行动和任何群众组织无关。

《康生同志，我们怀疑你!》的大字报贴出后，在清华乃至北京引起轰动，当叶志江再贴出《谭力夫的后台就是康生》时，清华园里已是一片“炮”声，从者如云了，许多人卷入了炮打康生的行列。

清华学生炮打康生事件波及北京十多所高校。据说聂元梓也跑到清华大学向蒯大富打听消息了。

当晚，北京大学也贴出了标题为《康生你是什么人？》的大字报，署名是北大生物系三年级学生樊立勤。

樊立勤，北京密云人，颀长瘦弱。1967 年 1 月 6 日晚，他在北大大饭厅召开了他和四年级学生冯德荣联合串联发起的辩论会，发表了演讲。

冯德荣，来自上海，虽然戴着眼镜，但结实粗壮。与樊立勤正好一高一矮，颇像塞万提斯笔下形影不离的唐.吉诃德与桑科。冯德荣长于实干，而樊立勤则擅长演说，他在大饭厅的主席台上口若悬河，滔滔不绝，作了一个十分折中、十分公允，却是针对北大校文革的讲话，抨击了北大的政治现状。他除了依然大段背诵《毛主席语录》外，又增加了鲁迅语录，颇有煽动力地说道：

“沉默啊沉默，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当场获得了很多的掌声。

北大数学力学系力学专业谢定国，笔名扬子浪，他和中文系“东方红战斗队”的队长索世晖先后登台与樊立勤辩论，谢定国在他的日记中这样形容当时的情景：“盛况绝不亚于谭立夫的发言。当时把我气得浑身发抖，一时勇气倍增，拼命挤上台去，大叫樊立勤发言是大毒草，必须批判，并作了简短发言。这是我的第一次上台辩论，但决不是最后一次。”

最后北大“红旗兵团”有个中文系高年级的同学上台，他说樊立勤用的是诡辩术，是彭真《二月提纲》里那一套“错误言论人人有份”，要通过批判聂元梓来扭转斗争大方向，干扰批判刘邓资反路线。樊立勤一时无言以对。

历史系马西沙在台下高喊：“樊立勤，你滚下来吧！”

马西沙所在的历史系“红梅战斗队”马上呼应，很多人也跟着响应，樊立勤只好离开了。

樊立勤他们认为，聂元梓之所以敢于镇压北大反对她的“井冈山”和“红联军”组织，主要是由于康生的鼓动。当他们听说清华大学炮打康生的消息后，立即跑到清华打听消息，得知农大、地院、中央党校等学校也都在准备炮打康生，坚定了他们给康生贴大字报的决心。他们在清华召开了北大各系在反击“十二月黑风”时被整的“井冈山”“红联军”学生座谈会。会上，多数人都说，“北大的事情没法办，聂元梓是毛主席支持的。”樊立勤最后说：

“毛主席也没说把学生打成反革命。毛主席是她的后台，也

是咱们的后台，更是全国人民的总后台，文化革命就是毛主席让搞的嘛。康生支持她，支持她抓人，说明康生是她的后台，我们就炮打康生。”

炮打什么呢？直接反对康生支持聂元梓的讲话和表态，一定会落个“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罪名。樊立勤胸有成竹，说：“抓他的封、资、修”。他说自己知道康生的一件事，就是给画家潘天寿题词。

潘天寿，现代著名画家，美术教育家。浙江宁海人。建国后，曾任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浙江美术学院院长。擅长写意花鸟和山水画，能融诗、书、画、印于一炉。著有《中国绘画史》、《治印谈丛》等。康生曾参观过潘天寿的画展，并留题词，曰：“画坛师首，艺苑班头”。如今“文革”一来，潘天寿便成了“资产阶级反动权威”、“反动画家”被打倒，其画被定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于是便有了樊立勤的《康生你是什么人？》这张大字报。而此时，聂元梓正忙于教育部及北京市的夺权。

1 月 21 日，中央党校大礼堂前也贴出了打倒康生的大、小字报，有人写了《康生同志，我们也怀疑你》的大字报。其中，有一张《勒令》尤为引人注目：

“正告老奸巨滑的康生，你这个制造天下大乱、祸国殃民、残害无辜的野心家、阴谋家、两面派、刽子手，你作恶多端，罄竹难书，限你 24 小时之内，必须交代你的滔天罪行。如不交代，誓与你血战到底！”

这天，清华“井冈山”联合中央党校“红战团”、天津大学“813”、体院“毛泽东主义兵团”等组织成立了“调查康生问题联络委员

会”，并由清华“28 团”的“烈火战斗组”戴国珍起草了《调查康生问题联络委员会公告》。

1 月 21 日，北京师范大学“井冈山”、北京邮电学院“东方红”等学校和《北京日报》社“星火燎原”等组织发表《北京日报》的《夺权宣言》，再次引起进驻报社的其他 30 多个群众组织的不满。

1 月 21 日，北京“三司”发出总字第一号通告称：“自新北大井冈山红卫兵成立以来，背弃了我司令部的宣言，把斗争的矛头指向坚定的革命左派聂元梓同志，充当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急先锋，井冈山红卫兵的大方向始终是错误的……本司令部决定将新北大井冈山红卫兵开除出我司令部。”

## 第 431 回：忙制止，不同意炮打康生　煤炭部，张霖之毒打身亡

1 月 22 日凌晨 2 时 50 分，中央文革对炮打康生一事马上做出反应，陈伯达给蒯大富打来电话，说：

“我是陈伯达。我和你讲一件事，今天我们收到一份《公告》，是由‘调查康生问题联络委员会’发出的。这个组织内部有你们‘井冈山兵团’，你知道吗？”

蒯大富答：“知道。”

陈伯达：“你们的态度怎么样？”

蒯大富答：“准备退出。”

陈伯达说：“你们应该出一个反公告。出这份《公告》这个行动是错误的、反动的，是同中央文革作对！康生同志是中央文革顾问，是中央信任的。”

此时，由于陈伯达的福建话话听不清楚，话筒转交给了关锋，由陈伯达口授，关锋传话，问：“怎么样？你们能说服他们吗？

蒯大富回答说：“能。”

陈伯达：“如果不能说服则开除！你们这样干就等于同中央文革决裂！我们是支持你们的。康生同志一直是反对杨献珍、反对林枫的。你们的矛头完全错了。‘红战团’是反动的。不能与他联系。”

“红战团”就是中共中央党校“红色战斗团”。

关锋接着说：“那天谈话是受伯达、江青同志委托的，在你们困难时我们支持你，我们不愿看到你跌倒，愿意你继续革命，你

们不要随便收拢组织，要保持革命派的纯洁性，不然你们的旗帜就会倒下去的。以上意见我们和你们商量，你们自己愿意怎样做就怎样做，我们不勉强，但中央文革小组的意见是肯定的!”

关锋说的“那天谈话”是指 1 月 20 日凌晨，康生、王力、关锋接见清华“井冈山”代表时的座谈。

到了凌晨 3 时 35 分，关锋再次来电话对蒯大富说：“伯达要我补充几点。你们学校贴了一些攻击康生同志的大字报，建议你们挺身而出痛加驳斥！高级党校的权不能接管，那里的权在左派手里。向高级党校夺权，就是向左派夺权，向无产阶级夺权。建议你们撤出，那里的左派是李广文、知春、吴保华。

你们不要丧失你们的荣誉，要阶级分析，不要迷失方向，革命的首要问题是分清敌、我、友，要懂得这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斗争的继续，防治坏人混水摸鱼。

再说一句，要作阶级分析，不要迷失方向。”

蒯大富立即传达了这些讲话。

1 月 22 日凌晨，又传来 59 岁的煤炭部部长张霖之被殴打至死的消息，这是文革中第一个被打死的国家部长。

1966 年 8 月，煤炭部党委召开民主生活会，张霖之主持。出乎他意料的是，会上，煤炭部机械局局长萧声远指责他说：“张霖之身为部长，不但不带头学好毛主席著作，反而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我记得在一次党委扩大会议前，他说了这样一段恶毒的话——‘第一任皇帝都很厉害，秦始皇是第一任，毛主席也是。’同志们呀！看看吧，这不是赤裸裸的反动言论吗？！”

一时间，大字报铺天盖地。张霖之的夫人李蕴华写信给周恩

来，请求中央允许张霖之到外地休息一段时间。

1966 年 9 月 2 日，经国务院主管工交口的负责人批准并报请周恩来同意，张霖之暂时离职休养。当天，他踏上赴大庆油田的列车。

9 月 14 日、9 月 18 日、10 月 18 日，煤炭部萧声远司长又先后三次写信上书中央文革，以“愤怒揭发张霖之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一次讲话”为题，揭发张霖之“与彭真的关系不正常”，“是彭真死党”等等。

到了 12 月，正在大庆的煤炭部部长张霖之接到了让他立即返京接受群众教育的电报。张霖之于 12 月 18 日傍晚抵达北京站。在此之前，他的家已经被抄，张霖之无家可归，老同事段君毅派出自己的红旗轿车把他接到京西宾馆。

次日凌晨，张霖之服从组织的安排，去北京矿业学院接受“群众的批评教育”，被安排住在矿业学院学一楼的一间学生宿舍，睡在双层床的下铺，四周都是看押他的学生。他在这期间能与学生展开对话，也接受询问和批判。

1966 年 12 月 24 日，戚本禹在矿业学院对学生说：“张霖之是彭真的死党，你们的炮火还不够猛烈，要集中火力狠狠地打击”，“要狠狠地斗！”有学生当场问他有没有这方面的材料供群众批判用，戚本禹答“材料你们自己找！”“要活材料不要死材料！”

12 月 25 日，煤炭部的萧声远表示，戚本禹的讲话是“动员令”，“我们应该坚决响应”，“我们有百分之百的把握说张霖之是彭真的死党”。

随后从 12 月 26 日开始，张霖之被先后拉到煤炭部机关、煤

炭文工团、煤炭科学院等单位游斗，遭受毒打，在短时间内被批斗了 50 多次。

12 月 28 日，他被揪到批斗台上，强行按倒跪下。他使劲抬头，被强压下去。接着又有 4 个人一齐踩在他的小腿上，让他无法再站。又有一些人拿着一根钉着木牌的棍子插进衣领，张霖之拼力反抗，棍上的倒刺把他的耳朵、脸、鼻子都划破，顺着脖子淌血。会刚开完，又被拉到院里斗、大门口斗，让他站在一把凳子上，上衣被扒光，在零下 17 度的严寒里冻着。他遍体鳞伤，双手举着木牌，又气又冻，全身哆嗦……批斗他的人，有矿业学院的学生，有教师，有学校和部机关的干部，甚至有负责学生军训的解放军。

张霖之被批斗中

1967 年 1 月 12 日，汾西矿务局作了一个几十斤重的铁帽子。……斗争会一开始，几个人就抬着铁帽子往张霖之头上扣。张霖之双腿打颤，脸色蜡黄，汗珠直往下掉。不到一分钟，铁帽

子就把他压趴在台上，口吐鲜血。这么折腾了几次，张霖之奄奄一息，昏死过去。

当张霖之的女儿来到矿业学院一号楼找她父亲时，她惊呆了，十几天不见，父亲的形色枯槁憔悴，本来就虚弱的身体在寒风中摇曳。爸爸下身穿的那件黑棉裤，是妈妈为他总跪着挨斗专门做的。因为长，还挽了一截。“阴阳头”上的一半头发散落在脸上，胸前背后各挂着一块大木牌。手里还举着一个牌子，上用大字写着“三反分子”，“彭真死党”。 张霖之的名字被倒过来，划上了红×。

就在这一瞬间，张霖之麻木、呆滞的眼睛忽然亮了，他认出站在面前的女儿，情不自禁地喊出了她的名字：“非非！是你！”

“干什么的，你是他什么人？”几个一把抓住张霖之的女儿，逼问张霖之她是什么人，张霖之不肯回答。他们就用皮带抽打他，边打边骂：

“看你说不说，看你说不说……”

看着爸爸挨打，张霖之的女儿哭了，她喊道：“要听毛主席的话，要文斗不要武斗！”随后承认：“我是他的女儿，我是来看看他的。”

“狗崽子！狗崽子！”

“给她学校打电话，把这家伙带走。”

趁此短暂空隙，张霖之的女儿赶紧问父亲：“爸爸，我们都好。您、您还有粮票吗？”当即被喝止。父女俩相对无言。直到张霖之的女儿要被押走时，张霖之才缓慢地说：

“回家告诉你妈妈，我一定革命到底！”

张霖之的女儿被工业学院造反派带走，在学校内关押，开大会批斗，也失去了自由。

张霖之这一天整整 24 小时粒米未沾，滴水未进。在敌意、冰冷的盯视下，在芒刺在背、鬼魅缠身般的厚重痛苦中，他在写交代用的白纸前坐了 5 个多小时，最后端端正正写道："我再次申明，说我在党的会议上攻击毛主席的那些话，纯属造谣陷害。你们搞了我这么多天，费了这样大的工夫，给我扣上死党的帽子，可是没有任何事实，今后像这样的逼问，我一律拒绝回答。"

1 月 21 日晚 18 时，张霖之瘫倒在床上。这一天，北京矿业学院举行"庆祝夺权胜利"游行。他举着"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牌子，陪游陪斗 6 个小时。沿路任何人都可以对他随意殴打。此时的张霖之已经无力抬头，他被架着拉着批斗，头垂得很低，以至于造反派未能拍下他面部的镜头。

回到屋里的张霖之没有一点气力了。忽然，外面一阵纷乱的脚步，又进来几个人，未等老人张口，他已被拖到地上，接着又被按跪在一张长方条凳上，脖子上挂上一捆东西。张霖之只觉得沉重无比，汗珠噼里啪啦掉下来。原来那是一个用褥子裹着的大铁炉。这些人大声问他：

"张霖之，你是不是彭真的死党？"

"是正常的工作关系，上下级关系。"

"你是不是常常深夜到彭真家开会？"

"很少。"

"干什么去了？"

"商量工作。"

“胡说……”

接下来又是一顿暴打，打得老人嘴里连血带沫子淌下来，眼角挨了一拳，他一只眼被血糊住，另一只眼大睁着盯着打他的人。

“你还敢不老实——”不知是谁，照准凳腿一脚踢去，凳倒人翻。张霖之的头被那个铁炉子拽着，重重磕在水泥地上。

张霖之起不来了，他必须要有人“拖”才能动。这样的拷打延续到夜晚，他真的再也没有起来。

张霖之死了。矿业学院即没有通知家属，也没有验尸，而是将尸体拉到东郊火葬场火化。由于火葬场坚持要家属到场，去的人干脆将尸体扔在火化厂一走了之。

那天天一亮，张贴在煤炭部机关里的大字报上写着：“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张霖之于 1967 年 1 月 22 日早五点五十五分畏罪自杀”，但很快有人觉得说法不妥，马上又被撕掉。

有人私下将张霖之死亡的消息告诉了他的家属，张霖之的两个儿子立即赶到矿院，寻找父亲的下落，得到的答复是已经送火葬场了，不让看尸体，要他们“划清界限”。当张霖之的孩子离开时，有人还不忘提醒一句：“你爸爸还有半个月的粮票没交呢！”

当周恩来得知张霖之惨死的消息后，极度悲愤。他拿着张霖之遍体鳞伤的照片，眼含泪水，大声地质问道：“你们把张霖之部长扣押 40 多天，不让他回家，也不向我报告，批斗几十次，刑讯逼供，是谁给你们的权力？别说对一个部长，就是对一个普通老百姓也不能这样啊！”

周恩来指示公安部验尸、调查，并通知张霖之的家人去见最

后一面。

那天深夜，张霖之全家蜷缩在几只椅子搭的床上。屋里没有暖气，房间里空荡荡的，更觉得寒气逼人。当远处电报大楼的钟声敲过 12 点后，扔在屋角的电话忽然响了。二儿子张世平抓起电话，刚听了一句，就惊讶地跳起来，冲着妈妈大叫："妈妈！妈妈！快来呀，是周总理办公室打来的！"

全家都呆了，只有泪水像山泉般涌了出来。张霖之的爱人李蕴华激动得全身发抖，她几乎是扑在听筒上在捕捉着对方的声音："李蕴华同志，我是总理秘书周家鼎。总理十分关心霖之同志的问题，指示我们要立即通知公安部，通知谢富治同志，由法医、煤炭部、矿院和家属四方组成调查团，查明霖之同志的死因。他还让我告诉您，要节哀，多保重。"

李蕴华含泪"嗯、嗯"地应着，使劲地点头。

就这样，张霖之的妻子李蕴华和她的子女们在张霖之死后的第 3 天被允许去看尸体。天寒地冻，孩子们搀扶着母亲，路途遥遥奔向东郊火葬场。一位火葬厂的工人告诉他们："3 天前矿院来人把尸体扔下就走了，要不是你们找到这里，再过些时候就火化了。"

赤膊的张霖之被扔在火葬场一间小房子里的水泥地上，下身穿棉毛裤，脚穿着棉鞋没穿袜子，全身青紫，口微张，背后是大大小小各种形状的三十多处伤痕，脖子上有勒痕，脑后有一个血洞，血痕尚在，前额偏左处有塌陷，这些都记录在验尸报告上。

张霖之的尸体没有解剖检查，死因也未进行认真调查，因为张霖之死亡时的尸检报告开篇写着："死者系反革命修正主义分

子”，验尸的结论是“缢死”，至于是他杀还是自杀，说是“不在调查之列。”

## 第 432 回：抓“联动”，铁道部宣布夺权　揪杨勇，郑维山也被关押

周恩来 1 月 21 日凌晨接见铁道部“东方红公社”后的当天，铁道部的图章和部长名章就被造反派夺走了。第二天，1 月 22 日上午 9 时，铁道部机关“东方红公社”宣布接管铁道部的一切党政权力，“立即联合各革命造反派组成铁道部革命委员会”，并要求“机关各局（委、处、室）要相应组成局（委、处、室）革命委员会”。同日，“东方红”负责人张茂指定由铁道部与外单位共 23 个群众组织，组成“铁道部革命委员会筹委会”。

张茂夺权的第二天，坐在部长办公室里给司机班打了个电话，命令把部长的小车开来接他，司机接到通知就把吕正操的红旗轿车开到大楼前，可左等、右等不见张茂下来，司机跑到部长办公室一看，张茂还在那儿喝茶呢。司机就问：“您什么时候出去？”

张茂哈哈一笑说：“我不出去，我就是为了考验考验你。”

司机一听，鼻子都气歪了。

还在 1 月 17 日时，戚本禹曾给“三司”打电话谈到“联动”的问题。他指责“三司”：“在‘联动’问题上，你们是不是手太软了？连个‘联动’都对付不了，今后还想当左派？”

1 月 19 日下午，谢富治带着大学红卫兵 3000 余人，突然包围了石油附中，搜捕“联动”成员。矿院附中杨冀平、苏振生和石油附中贺邯尘、任志明、马晓军等人，坚守在石油学院的一个地下室，坚决不出来向“三司”投降。几次冲击，未能得逞。无奈，大学生用高压水龙头往地下室灌水。时值数九寒天，杨冀平

等人在地下室的水里，顽强抵抗 3 小时，决不屈服。“一司”的甘佩、楚泽涵等人都是干部子弟，于心不忍，就主动要求，下到水中劝说这些小弟弟们，他们对小弟弟们说：“你们不向‘三司’投降是好样的，但你们可以向解放军投降，这没有什么不光彩的。”杨冀平、贺邯生商量了一下，同意只向解放军投降。当时正在现场指挥的谢富治同意，将现场的“三司”人员撤走，派来一队解放军，把他们从水中捞起逮捕，投入监狱。

当这些老红卫兵戴上手铐、押上卡车时，依然迎着寒风唱起《国际歌》，仿佛像是电影中慷慨就义的烈士。一天之内，“联动”各个据点纷纷被摧毁，大部分头头被抓。“联动”心里这个憋屈呀！想当年在大兴县灭“四类分子”时是警察给他们带队，怎么一转眼全变过来了？他们想骂、想打、想闹，可人家“三司”跟他们耍的根本就不是一路拳，三、四个对一个，像拎小鸡仔一样抓过来就丢进囚车。此时他们倒真有几分俄国“十二月党人”的血性：在冰凉的囚车里，稀稀落落地响起了《国际歌》声。

101 中的楼道、宿舍的墙壁上，到处写着中学生们的诗。其中有：

“满天风雨满天愁，三年归报三司仇。”

“毛主席啊毛主席，我们想念杨阿姨！”

在北大附中的“联动”总部里，“联动”总联络员于增寿死死抱着电话机不撒手，几个大学生冲上来，从他怀里抢走了电话机……望着洗劫后的总部，于增寿禁不住大放悲声。

1 月 21 日，以首都中学红卫兵为主，在北京召开了“彻底批判‘联动’大会”，号召广大中学生同“联动”划清界线，从内

部瓦解“联动”组织。接着，由公安局的人领队，“三司”几万人在全市进行围剿。在中学，新的平民红卫兵组织不断涌现，对“联动”发动了“中心开花”式的进攻；在大学，“联动”成了过街老鼠，人人喊打；在社会上，浪迹街头的“联动”成员更是无处藏身。“联动”设在北京 101 中学、北京工业学院附中、北京石油学院附中、北师大附中、人大附中、十一学校、八一学校等校园内的据点先后被摧毁，分散在上海、沈阳、武汉、南京、广州、长沙、新疆等全国各地的“联动”力量均遭到镇压，大批“联动”头头被逮捕。

1 月 25 日下午，公安部与北京“三司”红卫兵配合，调集了 3 万多人，拔掉“联动”的最后一个据点：八一学校。他们把八一学校围了个水泄不通，师生一概只许出不许进。下午 17 时左右逮捕开始，共抓走 32 名“联动”红卫兵。

随后，在八一学校内举办了“摧毁反革命组织‘联动’展览”。这个展览，在北京曾名噪一时，其中的罪证，有一些确是“联动”成员搞“红色恐怖”时的凶器。其中：

北京六中森严恐怖的“劳教所”；

惨无人道的各种法西斯刑法；

杀人灭迹，血债累累的暴行；

……

这一桩桩、一件件，让参观者不由自主地回想起黑暗的旧社会。人们很难理解，怎么解放翻身这么多年，在中国的土地上还会出现这种罪恶。无产阶级既然已经取得了政权，按照某些人的说法，剥削阶级已经被消灭了，阶级斗争不存在了，国内的主要

矛盾也变了，按说该太平了吧，可怎么一转眼旧中国的东西又回潮了？看来他们的生命力还很顽强，顽强到超乎人们的想象。

展览获得空前的成功，每天都有络绎不绝的人参观，这中间包括共和国的一些开国功臣们。当他们看到自己家宝贝在外面干的这些事后，从心底生出阵阵凉气：这不就是国民党吗！这不就是法西斯吗！自己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干了大半辈子革命，不就是为了推翻这些吗？怎么这些东西又从自己儿子身上出现了？大半辈子的辛苦，无数战友流血牺牲换来的红色江山，难道要由这群小兔崽子来执掌？过去是国民党祸害老百姓，难道以后要换成他们来祸害？那自己革命还有什么意义！“爱孩子，是老母鸡都会做的事，可要懂得教育他们，那就是国家大事了。”陈士渠将军带着自己的儿子前去公安局。在他的带动下，一些将军们纷纷带着自己孩子去自首。

展览会期间，残存的“联动”成员多次组织冲击展览会场，高呼“还我‘联动’!”“‘联动’永存!”等口号。在北京 101 中学，100 余名红卫兵降下国旗，升上老红卫兵的旗帜，并且降半旗致哀。部分“联动”成员贴出大字报，认为文化大革命“如同黑暗的旧社会”，质问“社会向何处去？党向何处去？”，甚至还出现了“毛主席正确不正确，十年以后见!”之类的大标语。

1967 年举办的“联动罪行展”展出的一位“联动分子”一封信：

爸爸、妈妈，你们好！

北京市内白色恐怖，“三司”乱抓人，许多无辜同学因和“三司”观点不一致而入狱，公安局也拘留人，我们成立了“联合行

动委员会”，主要成员是八一八前老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被群众认为是反革命组织，在马路上凡戴“联合行动委员会”袖章的，随时都有被抓的可能。28 号若不去天津，可能也只得被公安局拘留。

“联合行动委员会”明着是跟“三司”干，但醉翁之意不在酒，实际上是跟中央文革干。我很怀疑江青，她干了些令人不理解的事。现陶铸被江青陈伯达等人点了名，北京开始炮轰陶铸，要知陶是 4 号人物，而现在一点陶的事都指不出来。

江青水平太低，她现在的错误往轻点说是资产阶级思想没改造好，对无产阶级东西还不理解；往严重了点说，就是怀疑她有野心。在信上不便于一一细说。

现在大街上炮轰陈老总又轰叶剑英，文革现在又把陶铸、王任重、刘志坚、周荣鑫抛了出来，我怀疑文革把责任错误都摊在一个人身上，保住自己。北京现文化大革命方向不对，文革很不胜任。

我是个有抱负的人，愿干出点东西来，不过现在形势所迫，走为上策。

女儿

1.7 晚

清华附中卜大华表示：“我要学会全部马、恩、列、斯著作，来驳倒毛泽东思想。”“我现在怀疑有一个人，非常残暴，想把所有的老干部都踩下去。”“我担心会出现斯大林时代的大疯狂”。

北大附中牛皖平说：“不是文化大革命方向错了，就是毛主席领导不得力。”甚至怀疑“毛主席正确不正确，十年以后看。”

张春桥，在后来释放“联动”分子时，称“联动”为“12 月党人”。

张春桥没有解释他这个比喻的用意。不少老红卫兵觉得这个比喻很确切。至少，其中有许多相似的地方，像是被历史着意导演过的一样。

在一些老红卫兵眼里，俄国十二月党人大失败后的流放也是充满诗意的。闭上眼睛，他们能想象到那位贵族青年军官的漂亮妻子在风雪中蹒跚而行，她在地上跪下，亲吻丈夫脚下冰冷的脚镣……。

现在，轮到老红卫兵失败了。

即使失败，他们也不愿低下高贵的头颅。

在 2 月 10 日北京《中学文革报》第三期上发表了专题文章：《联动的骚乱说明了什么？》他从四个方面对联动进行了尖锐的挞伐：（一）物质上的特权阶层；（二）精神上的特权阶层；（三）丑恶的灵魂；（四）阶级斗争的必然产物。

文章结尾对“联动”分子发出了善意的呼吁：“从泥坑中伸出你们的双手来吧！革命的同志是不会见死不救的！让我们团结在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下，共同战斗，共同革命，共同建设一个红彤彤的新世界吧！”

这篇文章出自遇罗克之手。

1 月 21 日，周恩来在人大会堂接见部分来京军事院校学生时说：

“在十一中全会上，我推荐了林彪同志，他是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最好，跟毛主席跟得最紧的，我推荐他为副统帅。他毛泽

东思想红旗举得最高，用毛泽东思想教育解放军最好。另一个是把毛泽东思想领会得最好，从理论上阐述和宣传得最好，这就是我党杰出的理论家陈伯达同志。他们是经过几十年考验的。我们要用尽一切努力消除诽谤。”

火烧杨勇的烈焰刚刚在北京军区燃起，1 月 22 日清晨，几辆卡车就开进京西宾馆，从车上跳下来一群人，是北京军区司令部作战部的造反派，他们吵吵嚷嚷地要找杨勇。杨勇的秘书告诉他们，杨勇住在几楼几号。

杨勇的警卫员小孙见势不妙，急忙叫醒还在床上熟睡的杨勇，机警地护着他直接从电梯下到地下室，然后从后门出来乘车去了卫戍区。

没想到，他们刚进卫戍区食堂，北京军区的造反派和杨勇的秘书也赶到了这里，一下把杨勇堵在了小食堂里面。警卫员小孙急了，拔出枪，挡在食堂门口，对那些要闯进来的人喊道：“你们谁敢往前冲？！再冲，我就开枪！你们谁不怕死就进来！”

北京军区造反派对他说：“杨勇是三反分子，你保护他，就是保护反革命！你要把人交出来！否则，你也是反革命！”动员他让开。

小孙根本不听，坚持说：“杨司令现在还是北京军区司令员，这个职务是毛主席、党中央任命的。我没有接到通知撤他的职，我的任务就是保卫首长安全，没有上级命令，我不能交人。如果有人硬抢，我就开枪。”

双方僵持在那里。

有明白人赶紧给郑维山打电话，郑维山将电话打到卫戍区小

食堂，让小孙接电话。他对小孙说：“杨勇有问题，这是领导的指示，你交人吧！”

大概是感情使然吧，即便如此，小孙还是无奈地堵在门口……

杨勇怕连累更多的人，便自己走了出来。机关造反派一拥而上，要把杨勇带走，但卫戍区的炊事员们不干了，一齐嚷起来：

“不管有什么问题，也该让他吃了饭再走啊！”

他们将做好的一碗鸡蛋挂面端到杨勇面前，杨勇感激地望着这些普通人，吃了面，同每一个工作人员握过手，跟作战部的造反派走了。

被带到军区大院的杨勇，立即给戴上了用铁丝网做的高帽游斗。支棱的铁丝把杨勇的头皮划破，鲜血直流。造反派往下按他的头，让他低头认罪，承认自己是“三反分子”。杨勇不服，用他那浓厚的湖南乡音对着话筒说道：“我不反党，不反毛主席，不反社会主义。”

在后来的一次批斗会上，杨勇和廖汉生分别被人揪着胳膊押上大礼堂的主席台。他们两人，一个司令员，一个政治委员，就在这种场合下再次相见了。廖汉生是 1 月 8 日被抓起来的，两个星期以后，杨勇也被抓了起来。

在杨勇被抓的当天上午，郑维山去京西宾馆开会。刚到京西宾馆时间不长，北京军区就来了 10 个代表，要求见军委首长，说是谈杨勇的问题。

这时，叶剑英、聂荣臻都没有到，郑维山赶紧报告了军委文革小组组长徐向前。徐向前马上起身去接见这 10 个人，郑维山也跟着一同前去。这时，秘书小跑着来到郑维山身边：

“军区有急事找你接电话。”

军区电话的内容是通知郑维山必须马上回北京军区处理急事。当郑维山接完电话回来，军区代表已经接见结束。他赶紧乘车赶回西山。

出人意料的是，汽车开进北京军区，郑维山一下车就被北京军区政治部秘书处的人反缚起了双手。一群人带着他来到政治部的一间保密室里，派人将其看管起来。

林彪让杨勇“烧掉”廖汉生，不到半个月，郑维山又奉叶剑英之命“火烧”杨勇，谁知，还不到一天，他自己也被莫名其妙地抓了起来。

经常在军区的保密室开会，郑维山对于这里的情况十分熟悉，他知道屋里有一部可以与外界联系的保密电话，但是，看守郑维山的政治部秘书处人员并没在意。中午，趁看守在门外吃午饭时，郑维山用保密室的电话拨通了徐向前的电话：

“徐帅，我现在被人扣在军区政治部保密室里。”

徐向前忙问：“是谁干的？……知道了。”

徐向前是郑维山的老上级，得知郑维山被扣以后，徐向前亲自给军区造反派的群众组织打电话，让他们立即放出郑维山。

下午，郑维山被放了出来。

## 第 433 回：毛泽东，接见军委碰头会　发号召，打回老家闹革命

1 月 22 日中午 12 时 30 分，毛泽东和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军委扩大碰头会的高级将领。主席台就摆了一把椅子。周恩来、几位老帅和其他领导同志都坐在台下。毛泽东看到这一情景，表示请老帅们上台来坐。大家都没有吭声。陈毅笑着说："我们坐在下面，好听啊。"

毛泽东又笑着对叶剑英说："好我的叶参座，怎么样，火气都发过了？我早说过，有话就说，有屁就放，要搞阳谋，不要搞阴谋，话说到当面，问题解决于面前，天就塌不了。"他问叶剑英碰头会的情况，叶剑英扼要地做了汇报。

毛泽东对大家说："你们要真正站在革命左派一边，要支持造反派。他们人数少，也要坚决支持，像唱戏一样，要亮相。有些地方亮到了保守派一边，要站过来。"

他表扬了成都军区第四政委甘渭汉，说两派群众他都敢见，结果家里很安全。

接着，毛泽东又讲了一番要支持革命左派的道理，他说："我们的基本方针，要站在革命左派方面。过去不介入，其实是假的。"

然后，他问大家："还有什么问题？"

北京军区的干部说到杨勇被抓走的事情，毛泽东说："那还了得，到处抓人怎么行！"

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站起来说："戴高帽子，对地富反坏可

以戴，对我们几十年的老干部这样做，我们想不通。我们犯了什么错误?”

刚从西藏回来的西藏军区政委、西藏自治区第一书记张国华正好在许世友旁边,他暗中扯他的衣角让他不要说。

毛泽东与许世友开玩笑：“看你不要化装,就像个猛张飞。”

然后接过许世友的话题说：“他们把我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讲的法子用上了。戴高帽子,打翻在地,还要再踏上一只脚,那是对付土豪劣绅的。现在,动不动就戴高帽子、搞喷气式,是不好的。你们不好讲,要中央文革讲。同样的话,我讲行,你们讲不行。”

第二炮兵政委李天焕向毛泽东报告说：“副司令员吴烈被包围了。我们现在根本不能工作，要求主席允许我们工作，有错误我们检讨。”

接着,将军们纷纷向毛泽东诉说他们在运动中被批斗的情形,毛泽东对他们述说的委屈以及因此而表示的不满感到震惊。他说:“这样做,里面一定有坏人!”

毛泽东告诉大家:“如果碰到这种情况,要退避三舍,使坏人暴露出来。”

他还说：“军队里对廖汉生、刘志坚、苏振华搞‘喷气式’，一斗就四、五个小时，污辱人格，体罚，这个方式不文明。造反派造反有理嘛，搞‘喷气式’干什么?”

“决不能过分，过分了就不得人心。现在动不动就戴高帽子、搞‘喷气式’是不好的。”

“对青年人要进行教育。这些人不知天高地厚。他们以为一

冲就行了，一冲不行就两冲。你们那些苦处，把它当作经验来对待。”

“犯了错误就一棍子打死，都不用，那还得了?哪个不犯错误?我也犯。”

他又说：“对群众我们不能泼冷水，但要说服。”

“张体学、江渭清这些人过去总是做了一些工作的，犯了错误，要给他们改的时间，错了就批。还是按照延安整风的办法：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李大章、张平化、张体学、韦国清、江华、江渭清、谭启龙、刘俊秀、李丰平、杨勇要保，都不能打倒。廖汉生、苏振华、刘志坚不能一点工作不让做。要搞好团结，以大局为重。我们在座的这些人不搞好团结，还得了！要搞大团体主义，不要搞小团体主义。不管熟悉不熟悉，反对不反对自己，只要他能做一些工作，就要团结。陈老总过去反对过我，我要同他合作。朱德，我要保他。”

毛泽东还说：“军队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开始时是不介入的，但实际上是已介入了，如材料送到军队保管，有的干部到部队驻地躲避等等。在现在的形势下，不可能不介入。介入就必须支持左派。”

他说：“老干部多数到现在对文化大革命还不理解，多数靠吃老本。过去有功劳，要很好地在这次运动中锻炼改造自己，要立新功。”

这时，毛泽东讲了《战国策》上的“触砻说赵太君”的故事，并说：要坚决站在左派方面，不能和稀泥，坚决支持左派，然后在左派的接管和监督之下搞好工作。

关于夺权问题，毛泽东说："报纸上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顽固分子的权，不是这样的能不能夺？现在看来不能仔细分，应夺来再说，不能形而上学。否则受限制，夺来后是什么性质的当权派，在运动后期再判断。夺权后报国务院同意。"

他还说：夺权后的老干部和新夺权的干部要共同搞好业务，保守国家机密。

毛泽东安抚大家说："军队要抓紧战备，要稳定，要团结，不要你搞我，我搞你，不要闹分裂。"

开完会，大家怀着宽松的心情回到京西宾馆。谁知，当晚甘渭汉就接到成都来的电话，说他的家已被群众组织占领了。此后，又不断听到一些军区领导被群众批斗的消息。

晚上，叶群找到下午被放出来，此时正在京西宾馆开会的郑维山，要求他写一个关于不是林彪下令抓杨勇的证明。郑维山想："通知我火烧杨勇的确实不是林彪，是叶剑英。"于是，不假思索地写下了证明。

后来，林彪把北京军区副职以上的领导干部叫来，查问杨勇、廖汉生被抓事件。最后他说，抓杨勇、廖汉生是北京军区大鬼小鬼之间打架，是军区副职捣鬼陷害。他要求军区领导成员向毛主席写保证书，讲清事情的经过。

就在 1 月 22 日中，毛泽东接见参加军委碰头会议的全体成员后的当天晚上，刘伯承、陈毅、叶剑英、聂荣臻 4 人在西山一号楼聂荣臻的住所开了个碰头会。大家认为毛泽东接见时所说的话，对军队是个支持，感到欣慰。

叶剑英说："我们要搞个法，搞个命令，搞个章程，不能把军队搞乱了。"

聂荣臻说："军队不能乱下去了，军队要有个限制才行。"

原来，这段时间，位于甘肃酒泉的国防科委东风基地下属一个团的参谋长，与该团政治处主任商量，决定也响应中央的夺权号召，在该团进行夺权。这位参谋长原来是该团后勤处处长，也是该团的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后被提升为团参谋长。他们宣布夺权后，也组织批斗团长李振海和政委竹林。之后，东风基地其他一些单位也乱了起来。基地办公楼和东风礼堂前贴出了大字报，二部一些人也夺了部领导的权。

第二天，1 月 23 日，主持国防科委工作的罗舜初，根据聂荣臻的指示，秘密将国防科委各基地司令员和政委召到京西宾馆九楼的会议室。午夜时分，聂荣臻带着秘书赶到这里。

"人都到齐了吧？"聂荣臻环顾了一下周围，一边掏出一个小本一边问道。

"都齐了。"罗舜初回答道，"几十号人都安全到达，在这里已等了很长时间了。"

聂荣臻依次同大家握手后说：

"深夜把大家找来，实在是迫不得已，想急于同你们商议一下。我有个想法，就是不能把地方上搞'四大'的那一套搬到部队科研基地去，我们的导弹发射这两年并不顺利，现在卫星工程又面临困难，我还是倾向于搞正面教育。否则的话，火箭部队一乱，核基地一乱，我们的国防科研事业就危险了……"

随后，聂荣臻让秘书刘长明向大家念了一篇事先起草好的决

议，获得了与会人员的一致通过。聂荣臻随即带着这份“零点会议”的意见，赶到军委碰头会议那里，和几位老帅们开会研究，迅速形成了一个简要的书面意见。其中，专门针对东风导弹基地少数群众搞“四大”的倾向作了明确的指示：

“东风基地仍然要坚持正面教育的方针，稳定部队，执行好试验任务。”

军委扩大碰头会议期间，南京军事学院的群众组织两次派人到京西宾馆找军事学院院长张震,还给他带来了一顶高帽子,勒令他立即回去作检查。张震向他们说明,军委正在开会,会后一定及时赶回去向群众说清自己的问题。军委办公厅也出面做工作。但他们就是听不进,扬言不回去就抢。

许世友知道了这件事,他问张震：“你带了几个人、几支枪?”

张震不知道他是什么意思,如实答道:“带了两个人、两枝枪。”

许世友听了,高兴地说:“我带有 3 个人、3 枝枪,也来保护你。这样,造反派就不敢抓你了。”他让张震把带来的人交给他指挥。

一天，从华东来了几百名群众找许世友，负责京西宾馆警卫的卫戍区部队把这些群众阻拦在宾馆外面。这批南京群众围在宾馆外面不走，而且得到北京造反派的支持，人越来越多。从楼顶一看，好家伙！院墙外黑压压一片，口号声、歌声此起彼落，震耳欲聋。宾馆的警卫部队急忙关大门、设人墙，同时派干部穿便衣出去，一面观察形势发展，一面做工作劝阻。

许世友和南京军区政委杜平住在 7 楼，同住一层的还有福州军区司令员韩先楚、副司令员皮定均等大军区领导。几位老将见势不好，马上召集随身的秘书、参谋和楼层服务员，加在一

起 20 多个“兵”，分成两个战斗小组，每一组把守一个楼梯口。

皮定均叫人搬来一把椅子，请许世友坐在大厅中间，说：“我们听你指挥！”他让许世友当指挥员，自己自告奋勇当副手。还有韩先楚，在旁边当 “高参”。

许司令进入“指挥位置”，迅速作了“战斗部署”。他们先将电梯调上来，停在半空，这样造反派往楼上冲时，非走楼梯不可；又叫人把各个房间的热水瓶集中起来，分别摆在两个楼梯口上。只等造反派一上来，就往下倒开水，来不及倒就甩水瓶。

“这叫‘水雷弹’！”许世友说，“不是骂不还口、打不还手吗？咱们不打他们，也不骂他们，倒开水烫总是可以的吧？”

又给楼梯口的“守兵”做了具体分工，有负责“阻击”的，有负责运“弹药”的。楼道摆开了“战场”。住宾馆开会的其他军区领导就站在楼厅里看热闹。大家都劝许世友冷静处理，有人向中央作了报告，周恩来亲自给许世友打来电话。许世友在电话里说：“我出生入死为革命，枪林弹雨都不怕，造反派抓我更不怕。谁抓我，我就向谁开枪！”

周恩来立即让许世友的老领导徐向前和北京卫戍区司令傅崇碧赶到京西宾馆做许世友的工作，与此同时，中央文革小组也派关锋到宾馆做造反派的工作。

许世友一见徐向前，非常激动，说：“我许世友犯了什么错误？有错误，中央批评我可以改，为什么让造反派来抓我，还污辱我？谁侮辱我也不行！”

关锋赶到后，动员那些群众撤掉了对京西宾馆的围攻。

1 月 22 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

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社论指出：

“一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大联合展开夺权斗争的伟大革命风暴，在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伟大号召下，正以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钧之力，席卷全中国，震动全世界。”

“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要展开夺权斗争，就必须大联合。没有大联合，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就只是一句空话。”

当天下午 16 时 25 分，北京召开外地来京群众 80 万人参加的有线广播大会，中心会场就在人民大会堂。到会的还有正在中国访问的阿尔巴尼亚政治局委员卡博。陈伯达主持大会，他首先请周恩来讲话。

周恩来号召：“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向一小撮党内走资产阶级道路的当权派夺权。”

他说：“现在，党内一小撮走资产阶级道路的当权派玩弄经济主义用一种恶劣手法发钱、发车票、发粮票……煽动人们到北京来，把矛盾上交，中央一些人像陶铸、文化部肖望东、总工会马纯古、劳动部的郗占元就是这样一些人，他们收买人心破坏文化大革命，对中央施加压力，煽动文教工作者、小学教师、合同工、临时工、上山下乡知识青年、机关干部大批来北京……”

因为和“全红总”签订了《联合通告》，总工会马纯古和劳动部的郗占元这次也榜上有名，在劫难逃。

周恩来号召外地来京群众：“我们要打回老家去，彻底闹革命。现在是大好形势，机不可失，赶快回去闹革命。”

他说：“同志们提出的一些问题不是在北京所能解决的，只要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真正联合起来，只要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掌

了权就能解决一切问题。”

周恩来介绍了上海的夺权经验：“一、在接管时要实行大联合，有计划有组织的进行，反对分散主义，防止各自为政。二、夺权要从本单位为主体，外界起帮助作用。三、原来机构、单位的工作人员能够工作的应当照常执行任务，革命群众组织起监督作用。”

周恩来还表扬了山西，他说：“山西省也向我们提供了宝贵经验，发挥了首创精神，各地也创造了很多新经验。”

周恩来指出：“夺权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不是个人主义争夺权利，小团体主义争夺权利，提倡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提倡组织纪律性，提倡民主集中制，反对个人主义、小团体主义、反对分散主义、反对无政府主义等等不良倾向，有些地方不能采取群众夺权，如军队，战备单位这些单位也有阶级斗争，但因他们单位任务不同，如果这些单位有夺权问题，只能在本单位按中央规定进行，群众有意见可以提，可以贴大字报，但不要进到里边搞夺权斗争，这一点希望同志们注意。”

他再次号召：“毛主席和党中央号召你们赶快回到本地和那里的广大群众一起向那里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

周恩来特别指出：“‘中国工农红旗军捍卫军’、‘全国工农兵夺权司令部’、‘北京革命造反联合行动委员会’、‘西安红色恐怖队’、‘湖南红色政权保卫军’都是打着‘红旗’反红旗的，都是反革命组织，对这些组织的首恶分子坚决施行法律制裁，其中受蒙蔽的群众赶快觉悟起来揭发首恶分子。现在我们认为各组织建立全国性领导组织还不成熟，这些成员应回本地进行革命斗争。”

周恩来讲话结束后，陈伯达说：“周恩来同志是代表毛主席、林副主席、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的意见，希望同志们响应周恩来同志号召，回到本地闹革命。”

## 第 434 回：点清华，蒯大富立即行动　做工作，炮打康生火终熄

1 月 22 日晚，周恩来、陈伯达、江青、康生、王力、关锋、戚本禹等人在人大会堂福建厅接见北京“三司”代表和北京大学的聂元梓等人。

“三司”代表介绍他们在夺权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说：“夺权中造反派有分裂，工农大众没联合，个别单位阻止。”他们建议成立“工农联络站”，打倒山头主义、宗派主义……

江青直接说道：“‘调查康生专案小组’有清华‘井冈山’。中共中央党校‘红战团’是反动的。前三个是造反派，对敌人提高警惕不够。我们是很惊讶的啊！清华要明确表态。”

江青说的“前三个”，是指清华“井冈山”联合中央党校“红战团”等组织成立的“调查康生问题联络委员会”于 21 日发出的《调查康生问题联络委员会公告》上前三个签名单位，即：北京工农兵体院“毛泽东主义兵团”、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天津大学“八一三”。

听到江青要清华“明确表态”，蒯大富马上站起来表示，坚决反对“调查康生问题联络委员会”的一切行为。

江青说：“同志们，我来讲几句。今天到会的大多是我们共患难的战友，今天我们交交心，就是现在讲了大量诽谤陈伯达同志、康生同志及跟随主席工作过的同志。今天北京出现了这样的攻击，我们表态了没有？这就是敌人的一种新方式。就拿蒯大富同志来说吧，当王光美、薄一波、叶林等人联合整你们的时候，就

是陈伯达同志派人给你平反，你还记得吗？

但是对我们的战友，希望你们成长得更快一些，你们‘井冈山’内部要好好整一下，你们和北大‘虎山行’的问题，‘联动’的问题，你们清楚。‘联动’天天在作战，要绞死蒯大富。那些想绞死你的人，也想绞死我。‘红战团’这个组织是保林枫的。过去有人诽谤聂元梓同志，尽管她有缺点、有错误，但大方向是一致的。联合不起来的主要原因是你们内部不纯，其次是外部有人挑动，我完全相信你们，可是在你们那里出现了大量诽谤我们的传单，你们就是不表态，这就不好了。我们现在在北京的只有6个人，一个顶一个地干，我们有错误，缺点是可以批评的，但是不能中敌人的计。有人说我们内部有几派，我和戚本禹一派、伯达和王力一派，这是造谣。我们都是一派，都是追随毛主席闹革命的那一派，……”

蒯大富又要表态，戚本禹插话说：“你应当首先检讨错误。”

聂元梓接着发言，表明自己态度……

康生说：“清华大学攻击周总理的大字报截至今天下午5点钟还在贴着。”

北师大“井冈山”代表说：“现在我们内部问题很大，在《北京日报》问题上，我们和北航‘红旗’是有严重分歧的，我们认为《北京日报》新一期第三版是大毒草。”

外院代表也提出贴周恩来大字报的‘六一六兵团’头头刘令凯被释放问题。

外院的“六一六红卫兵团”是外院学生刘令凯于1966年底组织成立的。1967年1月5日，“六一六红卫兵团”在天安门前贴

出了题为《周总理你要干什么？》的大字报，公开把矛头指向周恩来。北京商学院的“决战纵队”也公开炮打李先念和周恩来。外贸学院也有人贴出了“火烧周恩来!”的大标语。1 月 21 日凌晨，“六一六红卫兵团”砸了“红旗战斗大队”筹备的外事展览会，双方发生冲突。“红旗战斗大队”以刘令凯说“中央文革不是没有错误”，并反对周恩来为由，将他扭送市公安局，交给在那里接管的“政法公社”，当周恩来知道此事后，让公安局将刘令凯放了。

江青针对刘令凯的问题说：“我们今天还是内部会议，犯了错误要让他检讨。关于刘令凯问题，不在于他贴了大字报，关键在于他前面向我们赔礼道歉了，但后来又全反过去了。政法学院逮捕了他，也是对的。刘令凯第一次作这样的检讨也是可以的。关于北大‘井冈山’贴康生大字报的不要都开除，可以把他们的头头开除。青年人么！要给他们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我相信通过一场辩论，你们这些左派一定会团结起来的，能够大联合的。”

江青在这里说的北大“井冈山”贴康生大字报的事，就是指樊立勤写的那张《康生你是什么人？》的大字报。对北师大“井冈山”代表提出的《北京日报》夺权中与北航产生的分歧，江青说：

“我想讲一点，几个会上都碰上这个问题，因为今天已经很晚了，明天再开会。你们对报纸兴趣很大，想抓报纸。目前我们为了党中央的威信，维持《人民日报》这样一个版面已经非常辛苦了，我们为了《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花费了很多精力。你们有小报，可以出嘛。你们的小报还少吗？《北京日报》

不用办了吧！你们搞《北京日报》，我看过几天，就成架架了。”

陈伯达插说：“它出来就死了一半了。”

江青：“你们自己的报纸很好嘛！你们小报办的很活泼，比如《兵团战报》，清华的《井冈山》，但可能走弯路。不要去抓这几张报纸，《北京日报》社不要进去了，我们意见是让那些编辑大老爷们，记者大老爷们，参加文化大革命，到工农兵那儿去，好好改造思想，《北京日报》、《工人日报》是否可以不要了。让他们停止，不出这几张报纸，不要消耗这些精力。

我们内部，一定不要忘记我们共过患难的战友啊！去年虽然我们不能明确地支持你们，但我们是支持你们的。只剩下毛主席、林总，这么大的国家怎么能领导啊！现在内部有矛盾，敌人很想利用你们。北京大学的乔建武就提出一个‘怀疑一切’的口号，这是极反动的。”

江青又特别提到肖华的问题，他说：“肖华同志不是不可以批评的，但他与刘、邓不同，是在军委内部讲的，不知道谁传出去了，当天抄了肖华的家，这是别有用心的。肖华同志不是刘志坚的后台，你们不了解他么，我们也不了解他。有人别有用心的把我们的话歪曲了。党中央军委内部问题，但坏人传出去了，有人想引起混乱，搞垮我们，这是办不到的。我们的团结是很紧密的，犯了错误的同志，你们想一想在困难的时候战友们是怎样支援你们的，可现在你们糊涂了，你们要有明确的态度，但我们希望你们不要用对敌人的态度对待犯错误的同志，要帮助他们，我们对敌人要狠，对自己人要和。我们希望犯错误的同志好好想一想，你们对那么大的刘、邓、陶不感兴趣了。贴自己人的大字报这是

亲者痛，仇者快！有人贴总理、康生、伯达等同志的大字报，这是不行的，我应当鲜明的表态。对刘令凯，先释放他，因为我们现在没有任何材料说他是反革命。”

外院的代表发言，提到陈毅的问题，江青插话说：

“我插你们一句，陈毅同志在做深刻的检查，他是做过一些错事，说过一些错话，甚至跟别人走过一段，现在跟着毛主席走，对这样的一个好同志也要把他打倒吗？他的检查写出来你们就知道了。他是一个非常坦率的共产党员！”

周恩来：“关于这个问题我已多次和你们讲了，保证让他检查。我坦率地说：对我可以提意见，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江青最后说：“同志们，我认为这个会还有必要开，明天晚上八点好不好？”

众人答：“好！”

散会后，蒯大富立即组织广为散发传单，四处贴出“康生同志是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炮打康生同志，就是炮打中央文革”的大字报和标语。

1 月 22 日晚上，周恩来、江青、康生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北京体院“毛泽东主义兵团”，再次批评了几个高校组织调查康生的问题。

江青说：“中央党校‘红色战斗团’，这是一个反动组织，他是保林枫黑帮的，他是诽谤康生同志的，你们要提高警惕呀，你们这几个组织（调查康生同志发起单位）中，有一个是反动的，你们就上当了，你们把矛头针对康生同志那就错了，你们站在哪一边，要明确表达。”

周恩来说："你们的公告（指调查康生同志的联合公告）无论如何是作了一件很大的错误事，又是你们革命造反派，清华'井冈山'，天大'八一三'红卫兵，你们造到我们这儿来了，你们怎能写这么一份调查康生同志的公告呢？我们是这样的相信你们，你们怎么把自己摆在反动的地位呢？康生同志是中央常委，中央文革顾问，每次接见都和我们在一起，你们把自己摆在什么地位，不是摆在反动的立场了吗！造反派允许犯错误，你们是青年嘛！我们对你们信任，推诚相见，你们不应陷到里面去，你们应当采取明确态度，声明，登报。那个公告把三个造反派摆在前头，完全是他们搞的阴谋。康生是很好的，很认真的同志。对材料必须加以分析、核实，可能拿来就捅出去，现在大街上大字报有两类：一类是敌我矛盾的，另一类不是，也可以贴，但措词要恰当，否则就混淆了，你们没把握就要问一问，不能轻信，另外供给你们的材料有两种。一种是老老实实的，把材料供给你们，这是许可的，另一种是有意识地供给你们，恶意的，尽给一些诽谤的材料，党校'红战团'就把你们拖下了水，供给贺龙的材料，一种是好的，另一种就是挑拨，想把军队搞乱，对李广文问题是挑拨，党内比较好的同志，康老说几句话保是应该的。"

康生说："革命要有阶级性，有无产阶级的，有资产阶级的，你们革命要对准矛头，分清敌我。你们联合敌人把矛头对准我，不夸张，我和党校中的反毛泽东思想作了 10 年斗争，周总理、陈伯达、江青同志可作证。杨献珍反对大跃进，反对毛泽东思想，从 57 年我就一直跟他斗争，后来他撤职了，又换上了林枫，你们知道吗？中央党校是刘邓搞的，斗争不容易呀！这么大的盖子

压着，他们整我的材料反我，党校十几年来，是顽固的反毛泽东思想的。李广文是被坏人迫害的，曾三年不给他工作，林枫拆人家给毛主席的信，是在我的指示下把林枫盖子揭开的。

‘红战团’一开始就与林枫一伙反左派，刘海英是林枫的走狗。林枫的被撤职是‘红旗’给主席写信要求的，不是‘红战团’。‘红旗’当时拉刘少奇，‘红战团’反对。后来为什么垮台了呢？由于他们的头子与李洪山等人有联系，一揭内幕就瓦解了，后来卢国英到你们那去了，造了许多谣，说我是谭立夫的后台，我根本没见过谭立夫，电话是林枫的老婆搞的鬼，她查到我的电话号码告诉谭立夫就给我打电话，我不在，我爱人接的，他说要见我，我爱人拒绝了。还有说我是‘联动’的后台，告诉你们，‘联动’是我指挥抓的，他们的头就是我们抓住送给谢富治同志的。还有说我和刘少奇一起搞过土改，胡说！我当时是和伯达同志一起的。关于《刘少奇选集》的问题，是毛主席指示编的，主席很谦虚说，给我编也给刘编。把这个任务交给了我。我们尊重主席，但不愿意编。他的文章很长，有 350 万字，也挑不出好文章来，后来就坐飞机到长沙，让刘自己挑出几篇好的，结果编了一冬还是没有编出来。

关于我爱人的问题，是 5 月份，我爱人等五个人组成一个调查小组，目的是调查彭真在学校里搞了哪些阴谋和发动左派写文章，根本与工作组没关系。聂元梓同志的大字报就是当时在我爱人他们的促动下写的。总之，造了我那么多的谣言，你们不要上当，这样搞下去，你们就要垮台了。‘红战团’开始是三、四十个青年，头子是坏的。党校反我们多了，这是第四次了，你们出

了这个公告，我断定这是保林枫的反动组织。党校其实一直不是我主管的，而是陆定一，就在 63 年前，我管了 3 年，后来一直是陆定一管，直到文化大革命即将开始，才让我去管一管。说我与党校关系密切也可以，因为我与他们斗争了 10 年，你们这样干，林枫、彭真是高兴的

原来‘红战团’已快垮台了，你们这样一支持，他们又起来了，卢国英又出来了，原来我还要分化瓦解这个组织，出了这个公告就完全走向反面了。李广文是我的部下，他当然有缺点，错误，他身体不好，思想活动范围小，有些狭隘，但他不是资产阶级人物，他是反林枫、反刘邓的。”“当然‘红战团’也不完全都是坏的，绝大多数是受蒙蔽的，头子是坏的，青年人犯错误不是不能挽救的，但这在文化大革命中很不好。林枫的老婆很坏，我有个错误，林枫要办青训班，是刘邓决定的，问我，我不太同意。他说试试看，我就没阻拦。当时，他们把我和伯达的两个孩子也送进了青训班，我们没有让他们去。现在感到道义上很过意不去，我自己的孩子没让去，怎么就让人家的孩子去呢？我爱写点字，画点画，谁要就给谁，但你看一个人要有分析，不要上当，所以我说革命要有阶级性，科学性。林总还说过要有组织纪律性。你们出这个公告，就说明你们纪律性不强，通过这次教训，今后你们还要加强警惕！

你们是受蒙蔽的，不是故意要搞我。”

康生讲完话，周恩来又补充说：“有人挑拨中央文革、军委是不应该的。”

很快，“打倒康生”之火被扑灭了……

清华大学刘泉因他的“井冈山兵团”二号人物地位，成了叶志江那张炮打康生大字报的罪魁祸首，并因此一生坎坷。

## 第 435 回：再座谈，与北京大专院校　说接管，工农兵学商代表

1 月 22 日晚至 23 日凌晨，周恩来、江青、陈伯达还在人民大会堂与北京大专院校的师生代表座谈，江青主持，她说："同学们、同志们，现在周总理给我们讲几句话："

周恩来说："同学们，我今天还有另外四个会，刚才参加了三个，没有到这里来。刚才与江青同志交换意见，我了解了会议的一些情况，我想我还是出来说几句好。前天吧，是关于我的问题了。一外的'六一六'刘令凯同志是犯了一些严重错误，但这些问题的性质在我看，大概是前天，21 号发生的，我在这里还是劝大家把它看成这是一个人民内部矛盾。人民内部矛盾有各种各样的矛盾，有的可以有严重的错误。如果不改，可以滑到另外一个性质上去，但这中间幅度还是很大。这些年我一直跟主席学，学的不大好，有时候说的不那么准确。同志们给我贴大字报，我都表示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包括刘令凯同学在内，他听过多次的嘛！一外语同学和其它外语系统，我和你们开座谈会数量也是多了，尽量能听到你们的意见，能够向中央，向陈毅同志，向外办转达，所以我们尽量少回答一些问题，因为事情还要经过一个发展过程，今天在座的其他同志有许多不知道这个过程。21 号天亮以前发生这件事，我感到总应该处理谨慎比较好。对这个事情解释一下。"

周恩来接着说："同学们提了我们做的一些事情，比较关键的事情大概不外乎两件：一件就是左派，革命造反派里有几派了；

在多数派少数派之间有争论，其中一个争论就是关于外事展览会。这个展览会是一外‘红旗战斗大队’同学们搞的，他们在这个问题上是按照革命纪律搞的，向外交部打招呼，也向我打了招呼，我想，这个不能叫走上层路线。因为它是外事展览会，对外交工作中的批评，分寸如何掌握？这是和我们的国际对外政策有关联。所以我对这个展览要看看，然后再出去。这是遵守革命纪律，不能说成走上层路线。”“钱学东的秘书去看，他告诉我，说里头有越南，对陈毅同志的批评比较严厉，口号不那么恰当，所以和同学商量，是不是把这个去掉。‘红旗战斗大队’进行了一些加工，后来搞得很好，就是没有严厉批评陈毅同志的部分了，没有很不恰当的口号了，去掉了最后这个展览部分。秘书长还让我再去看看。我说，一定还去看。但正要去看，‘616’同学比较激烈了，就给砸了一部分。当然‘红旗战斗大队’同学们很气愤，说这回事如何如何了。‘红旗战斗大队’愤慨有他的道理，因为各方面自由嘛！一方面要展览，一方面要求高。你们可以批评辩论嘛！但是砸就不好了。都是革命造反派，左派互相砸，这个事情我们不赞成。昨天江青同志讲了，我们讨论问题要平心静气说服，摆事实，讲道理，我们革命造反派要创造这个风气，这个事情‘红旗战斗大队’气愤是有他的道理的。结果他们自己出去了，不需我看了。”

周恩来接着说：“另一个事情，就是那天我们召集了大中学校的一些代表性的同学，把两类矛盾与大家谈了，陈伯达同志的介绍在我们党中央、毛主席、林彪同志的周围的几个副总理的情况和军委副主席的情况，江青同志说了康生，顺便也提到我。”

康生插话说："当时为什么我提出这个问题？会议上说要分清敌我。就是这一天，我看到国民党的报纸，他们兴高采烈地登载这张大字报。同时我也听到日美资产阶级反动政府的广播，同苏联修正主义的广播兴高采烈地提了这个大字报。这样情况下，我把这个问题提出来了。而说这个是反革命的，不是我说的，我已经睡了啊！是这么回事，同学们，在我说的时候，他们承认错误，说怎样消灭这个影响呢？我说不管他，我说检查一下，反正他们整天搞嘛！我们自己检查一下，自己承认错误。他们说：'不是我们一个人，是我们一个小组搞的。'我说：'小组也不要紧嘛，大家检查一下，承认错误就行了。'"

周恩来接着说："因为当时我认识刘令凯同志，也因为他向江青和我承认了一些错误，我说：'不要紧，不要那么紧张。同志们批评过火一点，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我现在这么说，昨天也说了，不过有条件，就是出于好意，不是恶意，不是诽谤。大字报确实有两种人，有的是好人，好意地批评，即使言过其实，我们应该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这是毛主席曾经教导我们的。如果属于恶意，属于诽谤性的，那我们有时候是要辟谣的，也不是事事都辟谣的。刚才他们说的这个问题，我后来才知道，确实是敌人利用了，敌人也利用这个事情了。"

江青说："没有什么可怕的。"

周恩来："没什么可怕的。他如果敢来挑衅，我相信全国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民团结，军队团结，我们全党团结，尤其青年，你们做了后备军的。"这事"后来又闹起来了，这点就不好了。江青昨天提出来了。我们是青年人，革命者要经得起锻炼，错了

不要紧，我和你们谈过，谈得很多嘛！我在党内犯过错误嘛！过去民主人士我都敢和他们讲的，如何犯错误，如何改。现在我也是这样，我们跟毛主席，就是要跟紧，我们现在在大风大浪中，毛主席是有预见的，我们是跟主席来学习的，我们要紧做、紧学、紧跟。”“紧跟毛主席有时掉了队，跟不上，有时忙了，不那么冷静了，有些事务拖住了，那就冷静想想，紧做，紧学，紧跟，这是我在这半年多大运动中检验的，怎么能说没错误呢？没有说错的话呢？比如，我在十一中全会选举后，在中南海和国务院门口出了陶铸的大字报，当时我的责任是说明，揪出第四号人物，我说不要这样提，错误是有的，但是要相信他。十一中全会刚选举出，你能不相信‘陶铸同志’？那个时候还叫‘陶铸同志’，我没根据嘛！后来逐渐发现一些问题，感到不对头了，越发现越多嘛！”“特别是到了年底，我们内部批评他，主席还谆谆告诫他。他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毛主席批了，我们看了。今年 1 月 2 日，对武汉赴广州同学还盛气凌人，那些话等于不满，我们是批评了他的。他那个牢骚，当时我们每个人都感到不大对头，那时我们在等着，也想帮助，如果揪他的话，还要出来解释，即从中南海抓出来总不好嘛！他承认了一个错误才解了围。他开始时抗议，后来他说抗议错误了。对这样的人，我们一步一步地认识嘛！类似这样的事情还可以谈很多，今天不可能，我是举个例子。你说我没有讲错话？确实好像前后矛盾，其实不矛盾。另外说了错话没有？你对左派认识也是逐渐的嘛！如果一开始就说你们是坚定的左派，我能说这样的话吗？如果这样说，那就是主观主义。事情经过是从 7 月底和你们打交道，5 个月，经过这么多风浪，现

在可以说你们绝大多数是左派，是革命造反派，才能这样说。”

“你做的事人家不同意也可以批评，不应该砸了，这个不好。”“我们只能说成不应该，不能说成是多么重要。因为‘红旗战斗大队’是有他愤慨的道理的，我们不能够去责备‘红旗大队’，这样就不好。事情我是毫无所知，因为是他们自己做的，然后现在公安局执行职权的‘政法公社’他们决定，我都是不晓得的。公安部也不晓得。电话打给我时天快亮了，我说这个事情还是这么劝说吧。”“我以为这个事情，可以公断、调解的，还作为人民内部的矛盾。”“后来实际上没有这样做，出现那样一种情形，那天下午戚本禹同志告诉我，也告诉陈毅、江青同志了，我们 3 个人还是劝解，还是承认下错误以后放出来比较好，这个态度我现在也是这样子。”“如果我们不尊重你们的愤慨，不听取你们的意见是不对的，但是另一方面，既然‘六一六’的同学昨天也写了一封信，今天他们集体写了一封信给我，我看这个就是恳切的态度，我们就应该看嘛！所以江青同志告诉我，我一见刘令凯，我和他点了头嘛！他批评的时候我能受得，我听了 3 小时。他们那个组，几乎有两次和他采取原则性的妥协，我说不是非原则性的指示，因为他要多人进场，我说原则上不应进，但是进场不进场就不是原则性的问题，大家让他进来，而且都发言，有准备的。对陈毅同志的批评尖锐极了，我几乎没有插话，我插不进去……”

“对于外语系统对陈毅同志的一些错误上的批评，多数是有道理的，我都告诉了他。明天他还要做总结回答。我告诉你们这个消息，因为你们勒令等等，要完成任务嘛！中央文革小组也看的嘛，答应了的，……我将来有时间再和你们谈吧！我今天还有

另外的事。”

接着江青讲话，她说：“同志们，战友们，本来这个会我应该从头到尾听完……忽然间我们俩就得走了。那么留下伯达同志，康生同志其它同志在这儿吧！听同志们的意见。

‘首都兵团’的同志们！小将们不平，觉得没有把他们置于一个比较重要的位置吧！我想这个不平我们能够谅解的。如果我们时间来得及，还可以单独跟你们开会，我觉得有一个最大的问题，今天听了两天了，就是内部的矛盾闹得很厉害，而对于内部矛盾如何处理呢？据我看都太缺乏自我批评精神了。我觉得还是应该掌握批评自我批评这个方法来达到团结的愿望。有了这样的团结，我们才能够夺权。如果不能使不同的意见取得一致的话，就来搞这个大联合，那也是不可能的，那个部队是拉不起来的。”

“你们最怕的是做思想工作。哈！一来就讲开除，一来就对立起来，就这么吵起来了。我觉得如果说你们文明，其实也不文明。你们最大一个原因是你们和工农结合很差。刚才有一个条子说附近郊区有这样的不好的现象，就是那个地方，五类分子在那里煽动，不交公粮，把多年积累下来的东西全部分光。大概是清华‘井冈山’的王良生同志写的。我觉得他这个意见很好，因为北京周围的四个县，彭真是尽可能在这四个县里搞过反攻倒算。”“那个地方的权有许多不是在无产阶级手里，是应该去帮助工人、农民，起这个桥梁作用，点火作用。支持贫下中农，支持革命的工人，起来造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反。”

周恩来、江青走后，陈伯达接着讲话。他批评学生中存在小团体主义，宗派主义，个人风头主义；有些人把斗争矛头指向中

央文革小组、周恩来、康生、江青；在夺权过程中发生的小团体互相争夺，看谁先夺到等问题。他说：

“主席、中央号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斗争矛头对准以刘、邓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斗争中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已取得了伟大胜利！可是现在有很多人把矛头对准无产阶级革命派，转向中央文革小组，转向总理、康生、江青同志，转向关锋、王力、戚本禹同志，对这种情况难道不是要用无产阶级世界观来观察一下吗？看他们这种作法是代表哪个阶级的灵魂，是不是资产阶级灵魂在作怪。我有一个想法，在全市夺权应当是像巴黎公社那样，工农兵学商召开代表会议的形式进行夺权，是不是请你们考虑一下，你们要跟工农、革命师生、机关工作人员、店员商量考虑成立一个筹备委员会，代表北京市的工农兵、革命师生、店员、街道居民搞这样一个权力机关，哪怕是临时的，比一个小团体或者一些小团体你夺过来，他夺过去来得好，大家看怎么办？那么叫谁去承认呢，应当人民去承认你，人民授权去夺权，无产阶级授权才有效。一个小团体夺了一个全国性单位的机构，主席说这样就不好解决，这样另外一个小团体就又要来夺权，还是搞大联合。”

“不要因为夺权反而发展了许多小团体主义，宗派主义，所以大联合和夺权是分不开的。”

他说：“毛主席说，在中国无产阶级接管政权有两个阶段，一个是进城的时候，是军事接管，自上而下地下命令。现在出现了一个新阶段，是群众接管了。所以我们的经验比巴黎公社、比十月革命的经验要丰富一些，我们的经验比较多，我们接管应该

接管得更好一些嘛！现在是一个过渡阶段，要总结经验。建议你们搞工农兵学商开个临时联席会，筹备一个比较大范围的工农兵学商的代表会议。”“现在你们这个小团体主义成了全国的模范啦！这个模范并不值得称赞哪！”

“你们其中一些人去参加什么调查康生同志问题的委员会，这简直是荒唐了，我要声明一下，从文化大革命以来，表现很好，起过好作用的个人或团体，我们热情地希望大家，能够有继续革命的精神，能够和我们合作下去，他们自己之间也能够合作下去。要做到这点，就一定要在斗争中不断改造自己的旧世界观，改造自己的资产阶级世界观，就一定要用毛泽东思想来代替一切剥削阶级的影响和思想，内部问题要用批评自我批评的方法去解决，用批评自我批评方法来提高自己，这是我们的愿望。这两天的会，你们不要难过，我们也不难过，作为一个经验吧！作为一个教训吧！”

“你们说武斗能解决问题吗？这个人声音比那个人的声音更大，是不是能够解决问题？我到天津附近农村去做一个调查，回来经过天津，看看天津什么样子，在最热闹的街道上，这边的喇叭是一派，那边的喇叭是另一派，这边声音高，那边声音提得更高，吵得一塌糊涂，我们在汽车里听得不那么舒服，这样群众不一定有好感。”

“有同志要我顺便提一下你们的斗争方式。用‘喷气式’的斗争形式，抓了一个黑帮，不一定是黑帮的，就用喷气式飞机的办法，斗争会上大家都见过这种形式，不一定要采取。”

康生说：“毛主席前几天和外宾谈话。外宾都是到大街上去

看大字报，毛主席对他们说，你看大字报要一分为二的，有的是革命的大字报，绝大多数是革命的大字报，有的是反革命的大字报，少数的，很少数的大字报。有的是好的真实的大字报，有的是不好的或者是谣言的大字报，为什么？因为有张大字报说罗瑞卿自杀了，邓小平剖腹自杀了，外宾就问我罗瑞卿是不是死了，邓小平是不是死了。我就用主席的话告诉他：一分为二，有的是真的，有的是假的。这个是假的嘛！毛主席的新诗词有二十几首的，有三十几首的，有的人都印出来，印成小本本了，你们千万不要上当。”

可能是夺权夺得太累了，也可能是陈伯达、康生讲的太长了，有些学生睡着了，陈伯达说：“那就散会了，同意吧！睡觉，好好睡觉啊！”

## 第 436 回：出分歧，长沙造反派分裂　搜材料，冲击湖南省军区

1967 年的元月，发生分裂的造反派又何止是北京。1 月 6 日晚，几乎是在一夜之间，本来是互相支持、声援的湖南长沙学生和工人造反派突然变成了势不两立的对立面。

1 月 3 日下午 14 时，张平化在湖南大学礼堂召开处长以上干部会议，邀请湖南大学全体师生员工参加，并请“高司”湖南大学红卫兵做会议的保卫工作，张平化作了一个多小时报告，　当讲到为湖南大学平反，“高司”是真正的革命左派，及“望江楼谈判”的内容时，获得“高司”湖南大学数次热烈的掌声。

当晚，由湖南省委秘书长苏钢出面，“高司”主持召开了一次全省电话会议，传达“望江楼谈判”情况，宣读“公报”、“协议”和“‘红色造反者要平反代表团’关于召开全省革命群众代表大会的几点意见”。

但是，就在这天，湖南大学驻《湖南日报》“夺取新胜利战斗队”贴出了第一张批判《望江楼协议》的大字报，题目是：“丢掉幻想准备斗争”。大字报抨击“高司”湖南大学少数决策人向走资派乞求平反是右倾机会主义思潮。

“高司”政治部主任龙会光看后对该队贴大字报的人说：“我们愿意听你们的反面意见，因为正面意见听得差不多了。”“你们这个时候贴这样的大字报，是什么意思?影响很坏！”

1 月 5 日，“高司”在中(苏)阿友好馆二楼会议室，主持召开长沙市部分造反派组织负责人会议，讨论“高司”提出的“‘红

色造反者要平反代表团’关于召开全省革命群众代表大会的几点意见”。会上发生了激烈的争论，湖南大学学生、“井冈山红卫兵”成员周国辉认为,《望江楼协议》是右倾协议,高司“右了”、“修了”。

“长沙井冈山”谢若冰同意周国辉的意见，她说：“准备于1月8日召开的‘全省红色造反者大会’由张平化召集，要他承认谁是革命左派组织，要他来为被打成‘反革命’、‘右派’的革命群众平反，要他以自己犯错误的切身体会来教育下层各级领导干部回到毛主席为代表的革命路线上来，这真是拿千千万万受迫害极深的同志的政治生命和血泪仇恨来开玩笑，这简直是犯罪，是右倾，是修正主义。”她坚决反对这个大会。

“湘江风雷”的代表支持谢若冰的意见。

第二天，1月6日，继续在“高司”中(苏)阿友好馆二楼会议室召开长沙市22个组织代表60多人的会议，由“高司”湖南大学负责人黄绍贤主持。“湘江风雷”负责人在会上表示坚决反对召开“高司”提出的全省革命群众代表大会，并对望江楼谈判的“协议”和“公报”进行了批判。“湘江风雷”负责人叶冬初等人攻击“高司”是修正主义的司令部，提出要批判“高司”的修正主义观点，并因此而批评“高司”：“你们下乡、下厂不是积极地与工农群众相结合，而是为了捞点材料，写几分传单”等等。

经过激烈辩论，会议否定了在1月8日召开全省革命群众代表大会的动议，选举产生了由“湘江风雷”、“三司联络站”、“北航联络站”、“高司”等13个组织组成的全省“红色造反

者代表大会”常委，“湘江风雷”被选为大会筹备主任，并决定于 1 月 15 日重新召开全省批判张平化的夺权动员大会。

当晚 20 时过后，湖南大学“东方红联合指挥”召开全校会议，传达当天中阿友好馆的会议精神。“高司”政治部主任龙会光在会上提出要造“1．15”大会的反，并说明理由。湖南大学反“湘江风雷”的情绪在这次会上达到高潮。“工人造反军”、“造反有理军”等几个组织约 30 多人将正在湖南大学的“湘江风雷”负责人叶卫东围在中间，辩论、斗争了几个小时。

这晚，谢若冰领导的“长沙井冈山红卫兵”的宣传车攻击“高司”，并在大街上和“高司”门口贴出了“踢开高校司令部这块绊脚石，彻底闹革命”等标语。

当晚，“首都三司驻长联络站”的高继红、高飞、陶毅等 5 人和张平化在省委蓉园单独谈判 7 个多小时，直到 6 日清晨 5 点才乘小汽车离去。

当时湖南最大的，拥有百万成员的“湘江风雷”及“东方红总部”、“青年近卫军”等工人造反组织，以及在湖南影响甚大的“首都三司”成员：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高飞、高继红，中央民族学院“东方红公社”洪飙等人和“北航红旗”驻长沙联络站、解放军艺术学院“星火燎原”的暴建云、代述国、陈玉兰等均迅速站到了谢若冰领导的“长沙井冈山”一边。而由胡宜民领导的“毛泽东思想红卫兵长沙造反有理军”，则与谢若冰及“井冈山红卫兵”持相反的态度，坚决地站到了“高司”一方。

湖南造反派在保守派的“长保军”、“赤卫队”、“八一兵团”土崩瓦解的 1967 年初，发生了第一次分裂。

1 月 10 日，湖南长沙“高司”召开“为湖南大学平反”的全省大会，“湘江风雷”带人砸了这次大会。“高司”与“湘江风雷”相互攻击的大字报、大标语贴满长沙市。

1 月 12 日，“湘江风雷”组织的大游行中，拟定的 17 条口号中，有 13 条是攻击“高司”和湖南大学的。

1 月 13 日凌晨 4 时左右，“高司”负责人詹先礼亲临指挥，强行封闭了“1．15”大会筹备处，并紧急通知长沙市各造反派即日上午 9 时到湖南大学北楼开会，重新选举全省“红色造反者代表大会”筹委。这天，攻击“湘江风雷”、 “三司联络站”、“北航联络站”的大字报、大标语、大横幅贴满了市中心的大街小巷。

1 月 14 日，湖南大学赵祝庆串连几个单位，发出倡议策划“1．18”大会筹备会，由“贫下中农”代表莫国勋主持，莫国勋推赵祝庆主持。

这天，“高司”组织游行，高呼“打倒叶卫东!”的口号。原定 1 月 15 日召开的“1·15”批判省委领导大会因此流产。

当天下午 19 时，“湘江风雷”和“三司驻长联络站”在新华电影院召开了“湘江风雷”所属支队长以上干部 400 多人开会，布置了攻击“高司”和湖南大学的“策略”和“措施” ，要求在 15 日晚 24 时前发动所有赞同“湘江风雷”观点的组织贴出攻击性文章。

当时的湖南省军区认为：“高司”组织成份较纯，而“湘江风雷”则成份较杂乱；“高司”组织纪律性较好，比较听话，相比之下“湘江风雷”就不大听从招呼。因此，1 月 15 日，湖南省

军区几乎不假思索地明确表示支持组织健全、队伍单纯的“高司”。“湘江风雷”与“高司”之间的争斗迅速演化为针对省军区的浪潮。

1 月 16 日，湖南“红旗革命造反司令部”，即“红旗军”，听说湖南省军区内藏有湖南省委的“黑材料”，并正在烧毁，于是，派人前去封闭湖南省军区一、二、三楼，并要求“湘江风雷”总司令部派人前去支援他们封闭省军区的四楼。“湘江风雷”没有答应派人进入军区，只同意大造声势，大造舆论，支持这一行动。

这天，湖南大学“东方红联合指挥部”总指挥、“高司”湖南大学总部组织部部长赵祝庆和魏臣海、龙会光二人商量后，起草了两份分别发给江青和中央文革的电报，状告湖南“湘江风雷”。电报稿经“高司”负责人付琪审议后，于当天在“118”大会筹委会上宣读，遭到部分代表反对，引起会场混乱，无法继续，“118”大会也无法按时举行，遂改到 1 月 20 日召开。

1 月 17 日，北京航空学院驻长沙联络站的 8 位学生乘“湘江风雷金猴战团”的宣传车到河西湖南大学旁边的中南矿冶学院宣传，遭围攻。“金猴战团”负责人去矿冶交涉，又遭围攻。第二天，1 月 18 日清晨，“湘江风雷”组织了 100 多人前去矿冶，矿冶的大喇叭进行广播，招来大批学生将“湘江风雷”这 100 人围住。到了晚上，“湘江风雷”又组织了近 600 人前往矿冶，将躺在宣传车前的学生一个个劝走，好不容易才把这个宣传车接到河东。

1 月 19 日晚上，湖南大学召开“时局讲演会”。通篇讲的都是“‘湘江风雷’有大国沙文主义”；“形”左“实右”，“破

坏团结，制造分裂”，还说“当前是革命胜利的前夕，是夺权的前夕，因此，对‘湘江风雷’的斗争，成了主要矛盾。”……

接下来的几天，“湘江风雷”、“红旗军”也冲砸了“高司”派的几个群众组织。

再说“红旗军”于 1 月 16 日封闭了湖南省军区一、二、三楼后，与省军区谈判达 48 小时之久。在此期间，接连几天，湖南省军区大院内人来人往，一片沸腾。和昆明军区、浙江省军区一样，一个高度戒备、保密的军事单位成了闹市，局面几近失控。

1 月 19 日晚 23 时左右，湖南“红旗军”将湖南省军区四楼一部分查封。这里是湖南省军区机要指挥系统，战备指挥因此中断。

20 日，从北京传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湖南“红旗军”、“红导弹”等组织到湖南省军区动手打人、抓人问题的“来电”：

军队负有战备任务和保卫文化大革命任务。不能允许外人冲入指挥、保密等系统，不许接管。红旗军是反动组织，必要时将其少数头头逮捕，可起分化瓦解作用。军区负责人，应挺身而出，对群众进行说服教育工作。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日凌晨

这天清晨，湖南省军区宣传车立即上街，宣布北京“120 来电”：“红旗军是反动组织！必要时将其少数头头逮捕，可起分化作用！”

湖南省军区执行中央“120 来电”指示，抓捕了“红旗军”的负责人贺孟宣、肖勋吾等头头。

长沙“井冈山”、“湘江风雷”、“首都三司驻长联络站”等造反派组织闻讯后，无法接受这一事实。湖南省军区要求《湖南日报》登载“红旗军”是反动组织的消息，“湘江风雷”、“首都三司驻长联络站”等组织拒不答应。被“湘江风雷”等群众组织接管的《湖南日报》因此也不发“红旗军”的消息。相反，“红旗军决不是反动组织！”“红旗军是响当当的革命造反组织！”等标语，迅速上街。并且，质疑中央“120 来电”的真伪，要求省军区出示这份指示原件的呼声甚高。也有人向北京的群众组织及中央文革直接打电话询问以求证实。对这份 “120 来电”的署名，有说是中央军委、有说是军委文革、有说是叶剑英办公室、还有说由“首都三司”转，莫衷一是。“湘江风雷”的成员还多次拦截解放军的宣传车，查看是否有被抓的“红旗军”成员。

相反，“高司”旗帜鲜明的支持湖南省军区采取的行动，当晚即查封了湖南“红旗军”总部。

“高司”的态度更激怒了“湘江风雷”等组织，他们纷纷找“高司”辩论，双方聚集在湖南大学自卑亭周围，唇枪舌战，吵得不可开交。这时，“高司”游行队伍也不时在河东遭到围堵。

1 月 21 日凌晨 3 时左右，湖南的“湘江风雷”、“青年近卫军”、“红旗军”等组织 1000 多人翻墙破门，砸了中(苏)阿友好馆的“高司”总部，打伤多人，并将中(苏)阿友好馆内的“高司”学生抓到天主教堂。

当天，“红旗军”，“湘江风雷”在东风广场集合两万人开会，抗议湖南省军区镇压“红旗军”。会后游行，并派出代表去军区提出下列要求：

(1)看中央拍来的关于红旗军冲军区问题的电文原稿。

(2)看红旗军冲军区的现场。

(3)看望被打伤的解放军战士。

以上要求未获同意。

下午，湖南“东方红”总部、“湘江风雷”等组织就“红旗军”事件发表严重声明：

就1967年元月20日，湖南军区出动军队，宣传车干预地方文化大革命，我毛泽东主义红卫兵东方红总部、湘江风雷挺进纵队司令部、红卫兵长沙市大专院校造反司令部、中国科学院矿冶研究所革命造反总部、湖南省直属机关东方红公社、衡阳矿冶工程学院驻长联络站发表声明。

元月20日下午4时30分，湖南军区一小撮混蛋盗用中央名义，把湖南红旗军打成反革命组织，连夜出动宣传车，并伙同“八一兵团”等四处捕人，抄总部，连红旗军普通战士也不放过，造成全城性的白色恐怖对此严重事件，我们发出严重声明：

一、强烈要求湖南军区交出中央关于湖南红旗军电文的原稿，澄清中央关于红旗军电文的真相。

二、湖南红旗军的绝大多数战士是革命的，其中许多同志是敢闯敢干的革命闯将，决不允许把他们打成“反革命”。

三、湖南红旗军等革命组织从湖南军区抄出黑材料的革命行动好得很，我们坚决支持。

四、“八一兵团”“长保军”在此事件中又一次充当了镇压革命群众的打手，到处抓人，为此，我们提出最最强烈的抗议，其中顽固分子必须逮捕法办，高校司令部的某些人充当了极不光彩

的打手。

五、此事件所引起的一切严重后果由张平化和湖南军区负完全责任。

长沙市一中红卫兵“齐卫东”和“夺军权”两个战斗队，更是针锋相对地提出“夺权必夺军权”的口号，他们在街头刷出“武装夺取政权，战争解决问题”的大标语。而黄杏英领衔的一中“红造会”内，则盛行“暴力不可免”的议论。

但是到了第二天，1 月 22 日，当周恩来在这天接见外地来京的群众大会上讲话，明确指出：“‘中国工农红旗军、战备军’、北京‘联动’、西安的‘红色恐怖队’、湖南的‘红色政权保卫军’”等，“都是打着红旗反红旗的反动组织！”传到长沙后，很多造反派又组织大批力量，分别将湖南“红色政权保卫军”的各总部及各单位分部，抄查一空，并联合发布了勒令“红色政权保卫军”组织必须立即解散的通令。此后“红色政权保卫军”组织全部停止活动。

1 月 22 日当天，“湘江风雷”立即改变口径，就“红旗军”事件重新发表声明，表示拥护中央指示：

一、红旗军、红导弹的少数头目挑动不明真相的群众冲击军区，冲入指挥保密系统，并扬言“夺取军权”这是一次严重的反革命事件，我纵队坚决拥护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元月二十日凌晨的指示。

二、红旗军、红导弹的首恶分子，必须按党纪国法严肃处理，对他们实行无产阶级专政。

三、决不允许以任何借口把红旗军、红导弹的广大革命群众

打成反革命、严禁随便打人，捕人。

四、提高警惕，擦亮眼睛，分清真假，“八一兵团”“长保军”“三八娘子军”等组织中一小撮混蛋如趁机实行阶级报复，进行反革命的反扑，我纵队将协同有关单位立即镇压。

五、严重警告高校司令部等组织中的一小撮叛徒，你们如果胆敢混水摸鱼，把矛头指向广大革命群众和坚强的革命左派，请当心你们的狗脑壳。

六、张平化之流转移斗争目标，挑动革命群众与军队之间的关系其罪恶不赦，必须彻底清算。

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大民主万岁！

最最敬爱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湘江风雷挺进纵队司令部

1967 年 1 月 22 日

## 第 437 回：听安排，谭启龙再到青岛　问中央，王效禹派人进京

1 月 22 日，继山西、上海、长春之后，山东青岛和南粤广东也同日进行了夺权。

先说青岛。而说青岛又不能不提山东。自 1966 年 11 月以后，山东省会济南的工厂商业等单位职工大规模参与造反，企业造反组织相继出现。11 月 23 日，山东大学“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简称“主义兵”，其下属的“工人大队”抢占山东省工会机关，挂出了“济南工人革命造反联合会”的牌子，第二天改称“山东省工人革命造反联合会”。9 月份，山东师范“串连兵”的负责人王竹泉发起成立了山东各高校红卫兵的联合组织“红卫兵济南指挥部”，王竹泉被推举为召集人和主持人，基本左右了省城济南的局势。10 月 20 日，山大“主义兵”又另行成立了一个“山东红卫兵造反联络总站”，简称“山红联”，该组织迅速成为济南最有影响的红卫兵造反组织。而山东师范“串连兵”则继续主持“红卫兵济南指挥部”。

在山大“主义兵”和“山红联”的支持下，1966 年 12 月 17 日，济南 500 多个造反组织的 3000 多名代表在济南珍珠泉礼堂召开大会，宣布成立“山东省革命工人造反联合会”，简称“山工联”，标榜 30 万人，号称全省最大的造反组织。“山工联”主任张金城，指导员是山东大学的职工、山东大学“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工人大队”和“山东省工人革命造反联合会”的负责人董金福。省委书记、副省长栗再温代表省委到会表示祝贺。后来，山

大“主义兵”和“山红联”又支持成立了“山文联”、“山农联”等各行业的造反组织，真可谓是群雄并起，八方呼应。

因为“山工联”主要负责人之一的董金福是山东大学的职工，也是山大“主义兵”的成员，山东师范“串连兵”主持的“红卫兵济南串联站”指责“山工联”就是山大“主义兵”的变种。

与此同时，山东师范“串联兵”也在济南市成立了另一个工人造反组织“济南革命工人造反团”，负责人韩金海，1935 年出生，曾在济南馆择街建工队、五金厂干过焊工和焊壶匠。相比“山工联”，韩金海的组织要小一些。但他有一段特殊经历，1942 年至 1947 年，青岛副市长王效禹的妻子刘崇玉在济南任小学校长时，韩金海是该校学生，他们有师生之谊。

此时，与全国其他省、市基本一样，山东省委机关业已瘫痪，省委主要领导人无法集中办公，只能四处转移，找秘密点到处打游击，三天一搬家，两天一换防。一段时间曾转到省公安厅，后来又躲进刚刚建好尚未启用的监狱里。电话联系先经中转站鉴别，再转入秘密办公地点。群众组织在省委办公大院南边的四里山和北边的市委办公楼几处制高点设立观察哨，专门观察小轿车的流向，分析判断省委主要领导人的办公地点，一旦发现就会蜂拥而来。省委领导人每到一处就得隐蔽汽车。有时去接待学生，地点在北，偏要司机向南开车，地点在南，偏要司机向西开车。

谭启龙在北京之行中，陶铸在肯定他是“人民内部矛盾”的同时，曾指导他应该做到“既做革命的对象、又做革命的动力”，还面授机宜：要坚决倒向左派，哪个组织反对你最厉害，你就支持哪个组织。谭启龙认为，山东大学是全国重点大学，山大“毛

泽东主义红卫兵”是全省造反最早、影响最大的群众组织。他决定坚决倒向这一边，他自己亲自跟山大“毛泽东主义红卫兵”拉起的“山红联”建立联系。

12 月 2 日，“山红联”发起召开"批判谭启龙为首的山东省委顽固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大会实况通过有线广播系统向全省播送，谭启龙到会作检查。

12 月 9 日，“红卫兵济南串联站”也在省体育场召开批判省委大会，谭启龙到会接受批判。

12 月 12 日，“山红联”把谭启龙扣留在珍珠泉礼堂。“红卫兵济南串联站”召开批判省委大会，前去揪谭启龙。“山红联”为了垄断批判大权，拒不交人。双方争执不下，围困了一天一夜。最后，“山红联”将谭启龙化装秘密转移出去。

“山红联”把谭启龙揪到山东大学，指责他转得太慢，对他们支持不够。谭启龙保证：“一定把屁股转过来，和你们站在一起，如果有必要，就和你们一起办公。”

12 月 17 日，谭启龙按照“山红联”的安排，来到青岛。临行前，他嘱托省委书记和常委们：“要坚定不移地站在革命造反派一边；政治上、身体上不要垮台；再不要东躲西藏，要到群众中去；要准备集体领导中断时，大家大胆独立负责。”

谭启龙一到青岛，便对青岛市委讲：“我这次来，不是来处理问题，是来检查认罪；过去的罪责我负，这次来后讲清楚了，还不转变就要各人自己负责了。”

12 月 19 日夜，青岛王效禹的家第三次被围被抄，两派群众组织在青岛市沂水路一带发生冲突。

12 月 25 日，谭启龙在青岛群众大会上作了检查，承认青岛市从 8 月 25 日至 9 月 1 日发生的事件是压制革命群众运动的严重事件，他在处理学生和工人之间纠纷问题的过程中犯了严重错误，一度把青岛市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引向邪路……

青岛市、区两级党政领导机关已经混乱，机关内的造反组织于 12 月 27 日联合发起成立“青岛市革命干部造反联络总部”，简称“革干总部”，负责人是市委机关一般干部鞠洪林。青岛市委、人委在造反组织冲击下已经基本瘫痪。

面对如此状况，谭启龙很着急，他在 12 月 30 日，利用批斗他的间隙召开青岛市委常委会议，决定由李元荣、王效禹、冯起、鞠维信、郑干、李克组成“六人小组”，维持青岛的工作，李元荣代理青岛市委第一书记，王效禹代理市长。但是王效禹拒绝代理市长，只要求分管公检法。

王效禹既然已作为青岛主要负责人之一，按照当时市委领导居住标准，住在沂水路 8 号王效禹家楼下的车迈全家立即迁走，市委配备一套秘书班子和 2 名保卫人员，住在王效禹的楼下。

1967 年元旦，山东省省长白如冰清晨到达青岛，与谭启龙商议有关济南的问题。1 月 2 日上午，谭启龙与白如冰在青岛谈了 4 个小时，并约定 3 日再谈。但 2 日当晚白如冰不辞而别返回济南。

王效禹 1 月 3 日在莱阳路 3 号主持召开李元荣、鞠维信等 4 人参加的会议。王效禹说：“今天这个会议是造反会议，就是要把省市委的问题摆开。”

会上，以李元荣为主，揭发了省、市委的问题。李元荣发言

后，王效禹问他敢不敢把这些材料公开，李元荣回答：“敢。”

王效禹又说：“你们是否可以以个人名义向中央如实反映情况？”

李元荣说：“好。”

第二天，王效禹让鞠维信找李元荣和 1 月 3 日参加王效禹在莱阳路 3 号召集的”4 人会议“中那位市里领导，要求他俩马上公开站出来，揭发批判省、市委，先发表声明，暂时不用向中央发电报。

谭启龙这天上午在青岛起草《我的一张大字报》，当天送往济南，并在这天下午，给山东省委办公厅主任张子明打电话，将《我的一张大字报》告知省委，要求省委机关工作人员起来“揭开省委阶级斗争的盖子”，揭发批判省委主要领导人。

青岛市“革干总部”1 月 6 日在青岛人民会堂召开“揭发批判省市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3 位老干部造反派：王效禹、青岛海洋学院党委副书记兼副院长冯起和青岛市南区区委书记鞠维信联名发表《致青岛市各革命造反组织、革命同志的一封公开信》，号召各造反组织成立联合机构，“接管原中共青岛市委文化革命领导小组的一切工作”。会上，青岛市委代理第一书记李元荣宣读了由他和李克两人署名的“声明”，批判谭启龙、张敬焘，称王效禹“是坚定的革命左派，我要虚心向他学习”。因为造反派不同意李克署名，这份声明后来以李元荣个人名义发表。

同日，王效禹还以个人名义发出《给全市革命造反派同志们的一封信》，号召造反派联合起来，造省、市委的反。

1 月 10 日，青岛的 8 个造反组织封了《青岛日报》。

1 月 11 日，《青岛日报》和青岛人民广播电台被夺权。

13 日，青岛大中学校总部等 7 个造反组织发出《告全市人民书》，宣布：“市公安局工作由公安局革命造反派接管。”

1 月 15 日，“青岛东方红”等造反组织冒着风雪把谭启龙押到卡车上，在全市游街示众。对于游斗的这段经历，文革后谭启龙在回忆录《“青岛事件”与山东“文革”》中作了描述：“有一天，寒风凛冽，天空阴沉，造反派们把我强行架在一辆敞蓬汽车上进行游斗。汽车上放着一张桌子，4 个红卫兵把我架在上面，把一块写有‘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谭启龙’的大牌子挂在我的脖子上。游斗从青岛市人民会堂出发，经中山路、市区，一直到崂山，然后再游回来。在汽车行进中，我被一根横过马路的电线勒住脖颈，倒在桌子上，差一点造成窒息。”

游斗的第二天，1 月 16 日，谭启龙通过驻青岛部队，向毛泽东、中共中央、中共华东局发出在任的最后一封电报，称自己犯了不可饶恕的罪行，并说明当前自己一个人陷入青岛，与各方面联系中断。

16 日当晚，王力给王效禹打来电话，谈接管的问题。

放下王力的电话，王效禹找来鞠维信，研究王力电话所谈的接管，不得要领，不知应该怎样去接管青岛市委、市人委？接管后又该如何开展工作？原来的干部又该如何处置？机构该如何设置？等等。约 23 时，俩人决定，请张子石亲自去北京找康生，详细询问关于夺权的问题。

张子石是康生的长子，1948 年参加革命，时任青岛市教育局局长。半夜时分，张子石被请到沂水路王效禹家中，连夜研究赴

京问题。

第二天，1 月 17 日，张子石、孙枫丹、张汉祥和山东大学“主义兵”王世歧一行 4 人，受王效禹派遣离青赴京。18 日他们到达北京，住进中央组织部的中苑招待所。19 日 17 时，王力来到招待所见到他们 4 人。

王力一进门第一句话就是：“你们不要来了，你们来干什么，现在就是夺权。”

他在谈话中批判了刘、邓、陶、谭启龙等人，同意揭发批判全国总工会前副主席陈少敏，明确表示支持王效禹，要求他们 4 人马上返回青岛，并说：“你们赶快回去，机不可失，一天一个变化，旗帜不要让人家拿去”，“现在就是要夺权”。

他们谈了约 2 个小时，这时，孙枫丹提出希望“康老”接见。王力楞了一下，回答说：“我得回去请示，不知道康老是否有时间？”

当晚深夜，康生、王力、关锋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青岛张子石 4 人，康生说：“现在又有个新问题，来了个夺权”，“两条路线的斗争，实际上只是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更加集中的更加尖锐地暴露出来罢了。其实，它是长期就存在着的东西。

什么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最本质的东西是什么？同志们可以回想一下。它的本质就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我们的国家是 1949 年 10 月 1 日宣布成立的。就在那一年的五月间，刘少奇就作那样一个报告，也就是他从天津视察工作回到北京所作的那个报告。”“这个报告概括地说就是两句话：中国不是资本主义多了，而是

资本主义少了；工人阶级不被资本家剥削反而很痛苦，被资本家剥削反而很舒服。结论是什么呢？53 年刘少奇在组织工作会议上所得的结论是：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这实质上是说，中国不能走社会主义道路，还得走资本主义道路。”

接着，康生叙述了 49 年以来围绕走社会主义道路党内的斗争情况。然后说：

“革命运动总是先从学生、知识分子开始，然后发展到工厂和农村。五四运动、五卅运动、一二九运动都是这样。”

“工厂能不能产生资本主义？干部懂得农村是小生产，可以产生资本主义。工厂搞大生产，社会主义的工厂能否产生资本主义，很多干部就没有想过。什么叫社会主义工厂？第一要承认它是社会主义的，因为生产资料完全变了，是公有制，与过去不同了。因而工人劳动的性质变了。过去是为资本家生产剩余价值，现在是为社会、为国家而劳动。因此，它应该是社会主义的工厂。第二，为什么社会主义的工厂还会产生资本主义？按列宁讲：它是从资本主义社会产生的，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它存在资产阶级的法权，还有遗留下来的资产阶级瘢痕。具体说，生产是社会主义的，但是分配却是以商品等价交换为原则的，是按劳付酬的。按马克思的说法，这是资产阶级法权残余。按劳付酬，现在还不能取消，相反的还要保护这个方针。因为它可以促进生产的发展。按劳付酬是商品等价交换原则，是资产阶级法权残余。所以工厂里一方面生产是社会主义的；另一方面报酬却是资产阶级法权的。”

“刘少奇提出的新工厂要用合同工，主要是利润原则。刘少

奇说过，两种劳动制度，两种教育制度能走向共产主义。这实质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毛主席提出的半工半读与刘少奇的有着根本的不同。了解这些情况，才能懂得工厂为什么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起来。”

“现在运动到了左派要团结起来，向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的时候了，实质上是像毛主席说的：过去我们到一个地方，是用解放军打江山的办法，解放那个地方接管了，不是通过群众暴动，从底下起来接管的。军队占领，军队接管，包括许多留用人员，当时是需要这样的，现在革命深入一步，又要自下而上，以群众运动接管革命，就更加深入，接管的道路就在这里。”

青岛代表插话：“青岛市委是不是全部接管？”

康生：“那要看你们的具体情况，青岛有个好条件，还有个王效禹。第二个是革命造反派接管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权，但对于某些人还要撤职留用。”

“谭启龙让王郊禹当市长，可能是想拴住他，搞不好再把他轰下去。所以要有革命性，又要有科学性，要注意不用陷入被动状态。”

他说：“你们青岛有个王效禹，夺权的条件比上海更成熟。你回去就干，不但要夺青岛的权，而且要夺山东省委的权，搞好了，我给你们发贺电，发社论。”

接着，康生沉吟了片刻，又道：“你告诉王效禹，现在看来，上海的夺权，除了打个头阵以外，算不得什么。山东的夺权要出经验，要载入文化大革命的史册。”

接见完毕，张子石 4 人于 20 日凌晨回到招待所，根据记录连

夜回忆，整理出《康生同志谈两条路线的斗争及其他》和《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九日中央文革小组王力同志与我们的谈话》两份材料，打电话向王效禹汇报。

与此同时，王效禹在青岛也加紧夺权的筹备工作。17 日，张子石 4 人赴京后，王效禹在青岛起草了《坚决向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夺权》的文章。当天，又在人民会堂召开批判大会，省、市委的谭启龙、郑子久、石华山、李秉政、张敬焘、周华南、郑干、李克等十几名负责人及夏乃建等多名“保皇派”被揪到台上批判。当晚，冯起、牛家骥等海院“主义兵”的代表来到沂水路 8 号王效禹家中，王效禹认为时机已经成熟，可以实施夺权。但海院副书记冯起和海院的学生此时还不清楚上海等地接管市委的情况，更不知道党中央及毛泽东当时的具体想法，坚持认为应该先建立类似北京“三司”等革命群众组织，进一步推动青岛的文革形势，而不是急于夺权。双方为此发生分歧，争论到 18 日凌晨 2 时依然没有结果，不欢而散。

## 第 438 回：一二二，青岛市全面夺权　谣言飞，江青已来到广州

为了躲避对立面组织再去找麻烦，1 月 18 日，王效禹搬到青岛交际处在太平角环境幽雅的一栋欧式 2 层小楼中，这栋小楼的庭院有两个门牌号，分别为太平角一路 16 号和湛山二路 1 号。王效禹居住的小楼对面，就是湛山二路 1 号的对门，也是交际处的一栋 2 层别墅楼，连同庭院，占地大约 6 亩。这座楼也是两个门，分别是湛山二路 2 号和太平角一路 14 号，14 号门常年不开，只走 2 号门。

这天，重新恢复出版的《青岛日报》，以“新 1 号”为新的编号，刊登王效禹 17 日起草的文章：《坚决向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夺权》。

也是在这天，王效禹在青岛木器一厂说：“现在市委已经乱了，它不能领导文化大革命，造反派要起来夺权。”

青岛明胶厂职工杨保华领导的造反组织“全国革命造反红卫兵联络总部青岛轻工分部”，简称“轻工分部”于 1 月 20 日主持召开本系统 29 个工厂参加的“抓革命、促生产，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誓师大会”，宣布夺了轻工局党政财一切大权，成立“青岛市轻工业革命造反接管委员会”。王效禹出席大会并讲话，表态支持。

在轻工局夺权会议上，杨保华提出接管青岛市委。

21 日，青岛供电局、自来水厂等多个单位实施夺权。

21 日 10 时，青岛“东方红”、“轻工分部”等 12 个造反组织

负责人，汇集到湛山二路 2 号的 1 楼大房间，召开青岛夺权预备会议。杨保华首先发言，提议接管青岛市委、人委。

王效禹在会上发表长篇讲话，提出：“把市委、市人委一脚踢开”，“建立一个指挥全市的领导班子”，主张对反对派“抓一批、关一批、杀一批”等等。

会议确定“轻工分部”杨保华，青岛医学院“东方红”张汉祥，大中学校“联络总部”的杨云良 3 人为夺权行动的临时总指挥；决定夺权后的新权力机构名称“青岛市革命造反委员会”，并立即着手刻制新图章，由大中学校总部负责起草《告青岛全市人民书》、《给毛主席致敬电》、《第一号通令》3 份文件，准备在第二天召开的揭发批判资反路线的大会上宣布夺权。会议 15 时结束。

当晚 23 时，青岛“东方红”、“轻工分部”等 19 个组织的负责人在湛山二路 2 号继续开会。图章已刻好，新增加了 7 个组织，王效禹依然出席。

会上，杨保华念了起草的《告青岛全市人民书》，文艺造反联络部的人念了《第一号通令》和《致敬电》。会议讨论通过了修改后的《给毛主席致敬电》、《第一号通令》两份文件。对《告青岛全市人民书》提出修改意见。并布置了 22 日的工作。

22 日凌晨 3 时，预备会议结束，各造反组织迅速赶回去，组织队伍参加当天上午的夺权大会。牛奔东等人负责重新起草的《告青岛全市人民书》。几个人连夜分头赶写，把《告青岛全市人民书》起草完毕，东方已经发白。几个造反组织的负责人再一起修改润饰完，已是 22 日的 10 点多了，他们拿着起草好的文件，

坐车直奔青岛东方红（汇泉）广场大会主席台，在主席台下面的房内，几位夺权负责人的临时开会，将重新起草的文件宣读了一遍，通过了。接着，这几人来到主席台上。

1 月 22 日 11 时 05 分，大会正式开始，主席团由杨保华、杨云良、孙相银、张珂亮、季铭铃、李守丰、于景瑞、牛奔东等人组成，主持人杨云良。青岛的“八一兵团”、“青岛东方红”和公安局造反组织的人员，佩戴“赤卫队”的袖章，负责大会的保卫工作。先播放乐曲《东方红》，杨保华第一个讲话，说明夺权的重要性。

“外地赴青造反团”的代表、山东大学的学生“主义兵”牛奔东宣读《告青岛全市人民书》，宣告“青岛市革命造反委员会诞生”。

大会发布《第一号通令》，宣布“前青岛市委、青岛市人民委员会的一切权利，自即日起完全归青岛市革命造反委员会所有。前青岛市委、青岛市人民委员会予以封闭，停止其一切活动。”

工人于景瑞宣读了《给毛主席的致敬电》。

21 日晚参加预备会的“首都三司驻青联络站”负责人、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的曹智水等人，因为没有海院“主义兵”等组织参与夺权而退出夺权。因为不知道曹智水抵制夺权，《告青岛全市人民书》上仍旧署名 19 个造反组织，包括“三司驻青联络站”。

王效禹、鞠维信因领导干部身份没到主席台上。但王效禹当天即发表声明：《坚决支持青岛市革命造反委员会夺权》。

《声明》中说，“坚决支持和拥护青岛市革命造反委员会夺取

了青岛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大权”；“从今天起,辞去青岛市人民委员会副市长的职务,愿意在青岛市革命造反委员会领导下,当好普通一兵。”

这份《声明》的发表，为青岛的夺权凝聚了大部分造反派及中间派的力量,孤立了小部分分裂出去的造反派；瓦解了保守派队伍；吸引了部分干部对夺权的支持。

正在青岛的谭启龙在 1 月 22 日耳闻目睹了青岛市委、市人委被夺权。

有些青岛的造反派组织没有参与青岛的“122 夺权”，他们对只有 18 个组织参与的夺权行动不满。22 日夺权的当天晚上，反对派就开始反击。到了 23 日凌晨 3 时，“三司驻青联络站”发表《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驻青岛联络站就“一二二”大会的严正声明》，认为 1 月 22 日夺权“是一个政治大阴谋，这个大会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产物”等等。

“三司驻青联络站”表态反对王效禹夺权，这给反对派们很大的鼓舞，马路上很快就贴出了很多攻击夺权的大标语、大字报。海院“主义兵”、“主力军”、各中学的“红旗”等众多反对派开始张贴大标语、大字报，向王效禹和夺权派发难。青岛的“122 夺权”让青岛的造反派出现了第一次公开的大分裂。

1 月 23 日 山东海洋学院“红卫兵”和青岛第三十九中学“红旗军”闯进《青岛日报》社印刷厂排字车间，勒令不准拣排有关青岛市夺权的一切稿件。

有中央文革的支持，王效禹对这些反对派并不太害怕。夺权的第二天,王效禹就致电中央文革小组,称“权是夺过来了,目前

看还有被夺回去的可能。”建议中央尽快表态支持。

这天，王效禹继续在太平角小楼主持会议，他妻子刘崇玉也在场，省外贸畜产公司经理贾金生等人参加。

贾金生原任德州市长时，与降职后在那里的王效禹关系不错。他在会上提出所在公司的“畜产红总”组织希望参与青岛夺权，另外还有 4 个组织也提出同样要求。22 日已有 18 个组织，加上 23 日新加入的这 5 个组织，24 日约 14 时才印刷出来的当日《青岛日报》，刊登了 23 个群众造反组织在青岛市夺权的报道。这 23 个造反组织的名单中，已经剔除了“首都三司驻青联络站”。

王效禹在 23 日太平角小楼的会上说：“权夺过来了，就得有坐镇的，花果山上要坐个孙猴子嘛。”1 月 24 日，参加夺权的 23 个群众组织负责人召开会议，讨论“青岛市革命造反委员会”的组成问题。确定各组织派出委员的名额。经过协商，决定夺权后青岛市首届权力机构----革命造反委员会有 9 名常委组成，由青岛市 9 个主要造反组织各出一人，他们是：“轻工分部”杨保华、青岛“东方红”张珂亮、“大中学校总部”杨云良、青岛医学院“东方红”张汉祥、化院“东方红”高志宏、“八一兵团”孙相银、“革干总部”鞠洪林、崂山“东方红”李守丰、“公安造联”季铭玲。

王效禹名义上没有进入权力机构的人员名单，他指定杨保华和张汉祥为常委召集人。

青岛从 1 月 23 日到 27 日，支持和反对夺权的两派互相攻击，打的异常热闹。一度出现围攻《青岛日报》社和青岛人民广播电台的抗争。

我们再来看同样是在 1 月 22 日，发生在广东省的夺权。

广州《红卫报》被封引发的广州大学生与工人之间的分歧在继续。广州重型机器厂、广州氮肥厂、广东麻袋厂、卷烟总厂、珠江造纸厂、广东电影机械厂、广州市建筑一公司、白云山农场机械厂等 24 个工厂的工人代表，分别于 1966 年 12 月 21 日、23 日两日召开座谈会，对封闭《红卫报》事件展开激烈辩论。电影机械厂的莫超海是“反封派”代表之一。他力言产业工人应该打破以往的沉静，投入到这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斗争中去。经过两日酝酿，12 月 25 日，24 个单位一致决定，成立广州地区的工人组织。于是，“毛泽东思想工人赤卫队广州地区总部”的成立大会，于 1967 年 1 月 2 日在广州中山纪念堂召开，由 11 个单位各推举一名常委组成领导核心，莫超海担任主任，广船工人杜德担任指导员。这个组织简称“地总”。

1 月 8 日，“地总”召开代表大会，明确提出，当前斗争的大方向是“万炮齐轰省市委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据 2 月份统计，“地总”号称拥有 15 万工人和 1028 个分部，是广州地区最大的工人组织。

随后，“毛泽东思想广州红色工人总部”，简称“红总”也成立了。这是继“地总”之后，广州地区第二大工人组织，人数达 4 万左右。“红总”第一次正式筹备会早在 1966 年 10 月就召开了，参与者约 30 人，地点在华南缝纫机厂，广州电机厂工人梁锦棠是召集人。那次会议决定，以新港线的工厂企业作为骨干，成立自己的工人组织，不参加“中南地区联络总部”。

1 月 11 日，广东省委机关报《南方日报》被以左方为首的群

众组织“联合总部”接管。广州的前街后巷，贴满了“红一司”的通告：定于 1 月 14 日召开“揭发批判刘、邓、陶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

社会上谣言满天飞，盛传江青将出席这次大会，又传说陶铸将被揪回广州批斗。于是便有了 1 月 18 日江青在北京工矿企业夺权座谈会上的辟谣。

“地总”要求参加 1 月 14 日的大会。但由于在封《红卫报》的问题上，他们与“红一司”的立场截然相反。因此，“地总”的要求遭到“红一司”断然拒绝。争吵之间，双方几乎动手打了起来。几经交涉，“红一司”勉强答应给“地总”200 个名额。“地总”觉得受到了蔑视和侮辱，愤然决定另行召集大会。定于 1 月 18 日召开“控拆、揭发、批判陶铸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

1 月 17 日，“地总”的宣传车，驰驱广州全城，到处散发大会海报。

1 月 18 日的越秀山体育场，挤满了忿怒不安的群众，充满了震耳欲聋的吵叫声。他们不是忿怒陶铸，而是为“地总”与“红一司”之间的纠纷彼此不满。人们挥动胳膊，喊口号，撒传单，你推我挤，叫骂不绝，骚动纷起。“珠影东方红”、“八一战斗兵团”的人，在混乱之中，早与“地总”的人扭打成一团。一次批斗广东省委领导陈郁、金明、赵紫阳等人的大会就在这样的混乱中进行。

1 月 20 日，中山大学学生黄意坚，通知召集广州的“红旗工人”、中大“红旗”、“广州工人联合总部”、珠影“东方红”、暨大“东方红”、省直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广州体院“革命造

反总部”、广州医学院“红旗大队”、广东艺专“东方红”9 个群众组织，以及清华“井冈山”、北航“红旗”、哈军工“红色造反团”、武汉“二司”、“三司”5 个外地造反团体的驻穗代表，在中山大学开会，商量夺权问题。参加会议的 30 多人中，有 20 多人是外地组织的代表，还有一位公安局的造反派代表。会议主持人是中山大学学生、中山大学“红旗公社”和“八三一战斗队”负责人武传斌。

会上，哈军工主张立即夺权，但上海“红革会”的代表不赞成，他们觉得广州的造反派还未成熟，“夺了权以后怎么办？”他们提出这样的疑问。一些本地组织也认为时机未成熟。“广医红旗”和“红旗工人赤卫队”的代表，认为各革命组织还没有形成联合，夺权的时机尚未成熟。不赞成立即夺权。而“中大红旗”等单位的代表，则认为夺权的大方向是正确的，不能等时机完全成熟了再夺权，可以先夺权，以后再逐步发展壮大自己的队伍。由于双方意见无法统一，“广医红旗”和“红旗工人赤卫队”宣布不参加对省委的夺权行动，退场。

反对派退出后，该不该夺权的问题，便无形打消了，会议讨论的焦点，集中在如何抢先一步把权夺到手。当时社会上有许多传闻，说其他造反派组织，如“广州三司”，也在策划夺权。省委内部一些部门已经开始夺权了。此时，省委宣传部的 70 多个公章，已经被一位副科级干事联合外单位的一些人夺去了，大家听了都不由得心急火燎。最后决定：一、先夺省委、公安机关、广播电台和报刊的权。二、夺权时成立一个联合组织，名称为“广东省革命造反联合委员会”，简称“省革联”。三、分配任务，

组成“省革联”勤务组，确定行动时间。

会上，由哈军工的人执笔起草“省革联”夺权宣言（通令），并由北航“红旗”派人乘飞机送往北京，争取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同时通过《红旗》杂志驻广州的记者把一份宣言样本送交周恩来。

勤务组推选珠影工人陈辉当组长，中山大学陈家吉为副组长。

当天，已经在《南方日报》宣布接管的报社群众组织“联合总部”的头头左方接待了一位造反派代表，那人对左方说：“《文汇报》夺权第二天北京两报一刊就发社论支持，你们夺权 10 天了中央都没有表态，原因是你们夺权没有大动作。”说着，这人拿出一条消息稿说：“最近广东保守派的工人组织在越秀山体育场召开了一个 10 万人的批陶大会，实际上是假批陶，煽动工人搞反革命的经济主义。如果你们敢于批这个保守派的工人组织，中央就会支持你们。”

左方此时也急于希望得到中央的支持表态，也知道这人说的那个保守派的工人组织就是“地总”，他们一直都是反对封闭《红卫报》的，所以左方也一直将他们视为保守派。左方很痛快就同意将这位代表带来的消息稿登在报上。当天，《南方日报》对 1 月 18 日“地总”在越秀山体育场召开的大会作了批评性报道，当然立即引起“地总”的强烈不满。1 月 21 日，有人打电话到《南方日报》告诉左方：“今天晚上保守派的工人要来围攻你们。”

傍晚，报社果然来了两个工人代表，他们一见到左方，就对《南方日报》诬蔑他们的批陶大会一事提出强烈抗议，要求《南

方日报》必须在第二天的报上对“恶毒攻击 118 大会”做出公开道歉。

左方当然不会同意，跟那两位工人争辩起来。这时，有个报社工作人员进来给左方送一张大样让他签字。左方接过大样一看，上面只有一行字：“报社被包围了，你赶紧躲躲！”

原来就在这时，几千名“地总”和“红总”的工人已将《南方日报》社包围，痛骂喊闹，勒令接管报社的“联合总部”立即“交出当事记者和幕后指挥人”。双方隔着大门，百般辱骂，言语不堪入耳。有人呼吁马上封闭报社，也有人要求接管报社。赞成和反对的声音，喧嚣尘上，吵得耳聋。

左方见此，假装应付了那两位工人代表几句后，说上厕所，便跑到铸字车间躲起来了。

“地总”是以反封《红卫报》起家的，当然不便赞成封《南方日报》。但接管报社也不可行，他们对报社内部情况，一无所知，既不了解谁是“真正的革命造反派”，也不懂得报纸的出版发行。他们发现左方逃走了，便冲进了报社。但是这些工人很守纪律，他们宣布来的目的只是要求道歉，保证会保护生产。他们宣布所有生产车间，“地总”的工人都不许进，怕有人混进去破坏生产，会将罪名加在他们身上。他们还宣布编辑、记者在三楼可以自由办报，但是不许下楼，而印报厂工人带着工人的臂章就可以自由进出。

## 第 439 回：抓生产，赵紫阳主动交印　抢舆论，广州市热闹非凡

1 月 21 日星期六，大寒。刮了几天的北风，突然停止了，但广州的气温变得更加寒冷。“红旗工人”、“中大红旗”那几个准备在广东省夺权的群众组织继续在省委党校开会，这时参加会议的已经扩充到 20 多个单位了。珠影“东方红”的工人陈辉没有来，大家就推中山大学陈家吉当组长主持。会议决定了行动时间：“当晚夺权！”空气变得骤然紧张。华工“东方红”曾派人向“北航红旗”提出参加夺权行动，但被拒绝了。而“新北大”在 1 月 21 日接到聂元梓指示，要他们退出，说广东的夺权不彻底，是假的。于是“新北大驻穗联络站”匆匆退出。

这天上午，暨大“东方红”、“誓死保卫毛主席工人造反团”等组织，把主管政法工作的副省长寇庆延抓来，勒令他通知公安厅、局长晚上开会，然后通过“北京政法公社驻穗联络站”，于当晚宣布接管。当天下午，武汉“三司”也抓到广州市公安局副局长王丰业，令其将局里所有当权派集中到“省直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简称“省联站”，于晚上 24 时，以“省联站”名义口头宣布对市公安局进行接管。接着，由“北航红旗”、“哈军工”、武汉“三司”、“北京政法公社”、“中大红旗”、“广医红旗”、珠影“东方红”等 9 个组织派出 13 人成立监督小组。

此时广州市公安局内有 3 个群众组织：一个是“毛泽东思想一二五造反联合总部”，简称“一总部”，1966 年 12 月 30 日成立，人数约 2000 至 3000 人；还有一个“毛泽东思想红色战斗兵

团”，简称“二总部”，1967 年 1 月 3 日成立，人数约 1000 人；第三个是“誓死捍卫毛泽东思想红旗联合总部”，简称“三总部”，1967 年 1 月 9 日成立，人数约 800 至 900 人。宣布接管市公安局时，这 3 个群众组织都未参与。在成立监督小组时，经“北京政法公社驻穗联络站”说明，吸收了市公安局“一总部”的 4 名代表参加。

同一天，广州市委机关报《广州日报》也被“毛泽东思想工人赤卫队广州日报总部”和“誓死捍卫毛泽东思想硬骨头赤卫队广州日报总部”两个群众组织接管。

这天下午，省委机关的群众组织在省委党校礼堂，召开“批判省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大会。赵紫阳参加了大会。开会之前，赵紫阳已约好当晚去中山大学“红旗公社”。会议结束时，他被带到中山大学的宣传车里，看见广东省政协主席区梦觉、广东省副省长尹林平、寇庆延、广东省委秘书长张根生 4 人已在车里。学生们要他也上车，说是一同去中山大学，传达中央指示。

汽车载着他们朝中山大学飞驰而去。当晚，赵紫阳他们在中山大学吃了晚饭，学生并没有和他们谈什么中央的指示，而是让他们等待，说要等其他革命组织代表到齐了一起谈。在那里坐的时间长了，学生们就和赵紫阳他们随便聊了起来，问省委对今后运动有什么打算等。随后又问赵紫阳，元旦社论和最近的社论看过没有？

赵紫阳说：“看了。”

“你有什么感觉？”

赵紫阳：“夺权问题要由革命造反派决定。一种是派代表监督，

一种是夺权。”

这时，“红旗公社”一位姓吴的同学又要赵紫阳检查了文化革命以来有什么错误，就这样，一直扯到半夜 24 时，有学生过来通知赵紫阳他们：“今晚情况有变化，你们现在这里休息，明天再谈。”

当晚，赵紫阳他们就住在中山大学。

半夜，《南方日报》社的一位工人给躲在铸字车间的左方送来了一个稿子，说是要求《南方日报》在第二天刊登。

左方接过稿子一看，傻眼了，原来是“省革联”宣布在广东省夺权的公告。左方知道自己上当了。20 日那个造反派代表给他送来的关于“地总”假批陶的消息稿，就是想把“地总”的工人都引到《南方日报》来，好让他们顺利夺广东省委的权。

左方问送稿来的工人：“都是哪些组织夺的权？”

那工人说：“送公告来的人不肯讲，只回答‘省革联’就是‘省革联’。”

夺权公告究竟该不该登，左方没把握，只好在车间打电话请示中央文革，中央文革办事组的人在电话中对他说：“我们把你们的情况报告中央文革首长，如果中央文革首长有指示，我们马上打电话给你们，如果没有指示我们就不打了，登不登由你们自行决定。”

左方等了几个小时没见中央文革回电话，又有一个工人给他送来了一篇新华社发的两报一刊的社论稿，号召无产阶级革命派夺走资派的权，左方好像明白了：这次“省革联”的夺权是响应中央文革号召的统一行动。那就不能不支持了，他让工人通知报

社一个写评论的编辑王初文，让他穿着工人的工作服，戴着工人的臂章到左方躲藏的铸字车间来，他们就坐在机器底下写了第一篇支持“省革联”夺权的社论，题目是：《这个权夺得好，夺得有理》。

到了 22 日早晨，那些包围报社的工人吵了一夜，也没吵出个结局，都回工厂上班去了。

22 日清晨 6 时许，中山大学“红旗”的两名代表，把赵紫阳单独叫进另一个房间，郑重向他宣布：“从现在起，我们造反派夺了你们省委走资派的权！省委的一切权力归革命造反派，省公安厅、市公安局有关文化大革命的一切决定，均须省革联通过后方能有效。”

然后，这二人又宣读了《夺权通令》：“我们庄严宣告：今天，我们革命造反派夺了广东省委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大权！”

学生念完《夺权通令》后，问赵紫阳有什么意见？

赵紫阳表示：“夺权是毛主席的号召。夺权要由革命造反派决定，你们夺权我支持。”

学生们要他把省委、省委办公厅和省委文革办公室的印章交出来，并说：“以后你们听我们的，我们听毛主席的。”

赵紫阳当即给广东省代省长林李明写了一张条子：“本地和外地革命造反派，向省委夺权，这是革命行动。请把省委、办公厅、文化革命办公室三个印交给他们。”并且，拍着胸脯对学生们表示，“生产方面搞不好会饿死人的，我不要脑袋也要抓好它。”

言下之意，政治方面的事，他就不管了。

林李明当时正在省委值班。早晨 8 点多钟，有人敲门，他一开门，看见门口是两个红卫兵，台阶下面还有两个，便问："你们是哪里来的？"

红卫兵答："是中山大学的。"

他们将赵紫阳写给林李明的条子递给了他。

林李明看着条子，脑海在急剧的转动着，他想："赵紫阳他们几个人被揪去后，是不是被迫写的条子？"于是，对来取印的学生说："你们造反有理，但这是大事，我不能做主。印也不在我手里。"

学生说："叫管印的人来。"

林李明想，省委书记处多数人都不在，在家值班的就只有自己一个。于是，他将综合处负责保管印章的胡庆勋叫来，对他说："紫阳同志说把大印交给他们。"

胡庆勋说："印在我这里，最好省委做个决定。"

林李明又把省委办公厅主任韩宗祜找来。韩宗祜的意见也是："要有省委的决定才能交印。"

红卫兵很生气，大声的质问："赵紫阳来信，你们为什么不交？"

林李明说："交印不是我一个人决定，省委决定的。革命行动我支持，最好书记处谈一下，但我一个人不能做主。"

红卫兵威胁说："中央办公厅来通知交，你们不交，将来责任由你们负责。"

林李明说："这样吧，我们打个电话给中央办公厅，请示一下。"

韩宗祜和保管印章的小胡也表示赞同说："要中央命令或者省委决定才能交印。"

学生们不答应，说："我们已经向毛主席报喜了，你们还打什么电话？"

林李明说："造反派何必怕中央？你报你的，我报我的。"坚决去打电话，学生们无奈，就跟他一起去了。

中央办公厅的电话接通了。林李明向对方请示："外地和本地革命造反派要求夺省委的权，赵紫阳写给条子，这件事情请示中央一下，中央同意交印，我就交。如中央认为不能交，应将印交给中央，我即派人送去。"

中央办公厅接电话的只是一位值班的人，不敢定夺，答复请示一下以后，等一会再回电。

学生们不让林李明再讲下去，随即把他和韩宗祜一起揪到中山大学。

在林李明被拉到中大之前，广东省委书记处候补书记张云也已经到了。10 时左右，林李明、韩宗祜与赵紫阳等广东省委的书记们在中山大学见面了，他们和学生们坐在一起商量交印的事。林李明、韩宗祜仍然认为应等中央答复以后再决定是否交印，学生们不同意，林李明和红卫兵又争执起来。

赵紫阳见状，就说："考虑到请示中央也不能马上答复，就一边请示中央，一边交印吧。"在场的书记也都表示赞同。于是，由赵紫阳亲笔起草，在座的省委书记、常委们共同签署了一份交印协议：

省委书记处（一部分同志未到会）决定省委大印立即冻结（短

时期），办公厅、省文革印章由造反派派人监印，省委大印由造反派派人监管。并一律转移地方。上述印章在使用时，必须在造反派派出之监督人员同意时方能使用。钥匙掌握在造反派派去的人手里。

赵紫阳　　林李明

区梦觉　　张　云

一月二十二日

这时，武汉“二司”、“三司”、哈军工、清华“井冈山”、北航“红旗”、华中大学的红卫兵也来到会场。赵紫阳强调说：“不是交印给他们带走，是在他们监督下使用。”

韩宗祜说：“要报告中央。”

赵紫阳则再次强调：“不是交印给他们带走，是派人监督使用。”

这天，“省革联”在《广州日报》刊登接管《广州日报》的“告全市革命人民书”。

上午，“省革联”也派人来到《南方日报》对左方说：“我们已经夺了省委的权，《南方日报》是省委机关报，理应由我们来接管。”

左方说：“毛主席号召的是群众夺权，没说谁服从于谁。你夺你的权，我夺我的权，都听从毛主席的指示。而且我们夺权是完全支持你们造反派，你看我已经发了社论。以后你们可以给我发出指示，但是报纸还是由我们负责，我们不同意你们进来，如果你们一定要进，跟我们搞僵了，我们就不会听你们的指示了，也不接受你们的领导。”

“省革联”的人怒冲冲走了，并声言要抓左方。

这天下午，广东省委在省委大院东一楼召开书记处会议，省委书记都参加了。有 4、5 名红卫兵学生也参加了会议。会议研究如何起草《中共广东省委告全省党员、干部、人民书》，同时决定当晚召开常委扩大会议，省委部委、各战线负责人都出席，“省革联”也派代表参加。

这次省委全体书记会议主要是表明省委对这次夺权的态度，并要求各部委、厅局支持这次夺权。赵紫阳在会上作了三点指示：

一、省委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犯了方向、路线性错误，对此错误长期以来觉悟得慢，认识得差，改正不够。

二、各级党委在造反派提出夺权时，只能接受，不得抗拒抵触。

三、我们不仅要像过去一样工作，而且要更加努力工作，各部门干部都要坚守岗位，机关工作、接待工作照常进行，不能瘫痪。

“省革联”表示：“省委的态度是好的，但言行要一致。”

赵紫阳强调：“夺权以后，要继续积极工作，否则就是对抗夺权。”

会上，将省委、省委办公厅、文化革命办公室 3 个印交给参会的红卫兵代表。

对省公安厅和市公安局的接管，省委同意签名盖章。

那 4、5 个参加会议的红卫兵拿到印后，兴高采烈，草草签了一张收条：“兹收到省委办公厅、文革、省委章子三个。”

这天晚上，省委各部委的印章也统统交了。在晚上的省委常委扩大会议之后，省委办公厅“革命造反联络部”又写了几条通令，要书记处签名。于是，赵紫阳他们又写了一个通知，各书记都签了名：

省委书记处同意省委各部委（不包括办公厅及文革）和办公厅属下的各单位的印章，今晚一律暂时由广东省革命造反联合委员会收存。然后再由该委员会交给派往各单位的监督小组监督使用。

赵紫阳、林李明、李坚真、张云、李子元、刘田夫、区梦觉、尹林平

元月二十二日夜十一时

“省革联”把省委书记们集中在省委大院东一楼办公，规定“今后造反派拉书记们要通过监督小组安排”。

广东省委被夺权的消息传到广东省人委，以省政府办公厅为主的一群干部，匆匆召开会议。他们认为，对省人委的夺权，也只是迟早的事情。这时有人提议，与其让外单位的人来夺权，不如自己先夺了权。这个主意，得到许多人支持。此时，中大“红旗”的十几名学生已闻讯赶来。他们没有吭声，只是坐在那儿听。当听说省人委机关干部要自己夺权时，就纷纷跑出去了。他们找到省人委的印刷厂等几个下属单位的工人串联，动员他们站出来夺权。

晚上，省人委的几个处室开会，通知林李明、赵卓云、李嘉人、罗天等几个省长，还有秘书长欧初过来，向他们声明：“我们准备夺权了。”

忽然下面有人发言，说现在有保守派，不能让他们夺权。接着就点了几个处室的名。

会议气氛顿时紧张起来，一部分已经和中大“红旗”串连起来的科室和印刷厂工人在会上宣布由他们夺权。紧接着，中大“红旗”十几名学生排着队走进会场，表示支持印刷厂工人夺权。最后办公厅干部退出会场，那几个夺权的处室，立即把林李明等人拉到楼上，勒令他签字交出大印。在场的省长、副省长都签字了，但监印的干部却乘乱溜走，赶到办公厅，看见干部们还三五成群，在那里议论纷纷。

监印的干部是个老人，处事沉稳，他马上对其中几个负责政治工作的处室人说：“现在他们要拿印，省长也答应给了，好不好给？给了以后弄丢了怎么办？我可不能负责。”

“不能交印给他们！”大家忿忿不平地嚷着。

“他们是工人，我们干部怎么跟他们斗”？

“他们会找工人，我们也会找。”

“对呀，他们找印刷厂，我们找招待所、幼儿园的工友！”

大家连夜分头串联，并跑到礼堂向大家说：“印给人家拿走了，给外单位的人拿走了！大家起来保卫印啊！”

人们一听外单位的人要来夺省人委的权，都愤激不已，立即从四面八方赶来，将正在夺权的那个房间围住了，不让里面“中大红旗”和印刷厂的工人出来。这时，印刷厂的工人已经拿到了省长的签字，正准备走了，一下子被办公厅的这些干部联合幼儿园和招待所的职工人围住，就是不让他们走。双方就这样在严寒中僵持着，直到下半夜，终于达成协议，由省人委办公厅、机关

印刷厂、“中大红旗”3 方各出一人，负责监印。用印时至少要两方签字，加上林李明的签字，方才有效。印放在办公厅保管，派两人日夜住在那里，谁也不能单独使用。

## 第 440 回：夺权风，劲吹在呼和浩特　报社打，军区派部队介入

1 月 23 日，广东省委发表由省委副秘书长杨应彬起草，赵紫阳审阅，监督小组通过，并批准印发的《告全省党员、干部、人民书》。其中写道："省委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执行了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犯了方向、路线的严重错误。由于我们对自己所犯的错误　认识很差，改正很慢，已经产生了严重的恶果。现在，省委置于革命造反派的监督之下，将更有利于我们改正自己的错误，更有利于清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恶劣影响，更有利于我们坚决贯彻　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同时，通过这种形式，将使我们能够更好地向革命造反派学习，学习他们的革命造反精神，学习他们的聪明智慧，依靠广大革命群众，抓革命，促生产，夺取运动、生产的双胜利。"

这份通告引起了社会广泛注意，并马上触发另一场更大的危机。其中最具争议性的文字是：

"省委郑重表示：我们在革命造反派和广大革命群众的监督下，将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来弥补过去所犯严重错误带来的巨大损失。省委在接受革命造反派的监督之后，一定更加积极工作，决不消极怠工，敷衍塞责。"

有人说，这意味着省委并没有真正被夺权，没有靠边站，没有停止运作，相反，居然还"更加积极工作"。街上迅速贴满了攻击省委"假让权，真反扑"的大字报。一些造反派组织，引用

《人民日报》1 月 22 日社论《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的一句话：“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要展开夺权斗争，就必须大联合。没有大联合，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就只是一句空话。”他们称，“省革联”只是几个组织临时拼凑而成，没有与所有造反派实行大联合，是单方面夺权，不能承认它的合法性。“地总”的大字报更是挖苦“省革联”是“散夹乱”。

1 月 23 日 20 时，“省革联”宣布对广东人民广播电台、广州人民广播电台和广东电视台夺权，并在《广州日报》发布“通令”。

当天，“地总”、“红总”集合了数千工人，再次围住《南方日报》，群情汹涌，喧嚷不休。

入夜，突然风驰云聚，天地变色，降下倾盆大雨。包围报社的“地总”工人，留下 2000 人，继续摇旗呐喊，作为疑兵，其余大部人马，冒雨驰赴广播电台。

由于天气恶劣，又是深夜时分，广播电台门前守卫松懈，“地总”工人一声大噪，蜂拥而入，把已经在电台夺权的“东方红公社”团团围住，逼令其交出大印。“东方红公社”虽然惊得手忙脚乱，却也有几个脾气犟的，拼死不从。双方展开对骂，声震屋瓦。解放军闻声赶来。“地总”一头头声明，他们并非破坏军管，只是因为《红旗》杂志社论说得很清楚，夺权必须从下而上，必须依靠本单位革命职工，必须夺到无产阶级革命派手中。广播电台是国家的机要单位，不能给别有用心的人占领。“地总”准备把权夺回来，交给军管会。

解放军客气地要求“地总”退出电台，同时也要求“东方红公社”立即交出大印。双方都不敢违拗，只得签订 6 条协议。天亮时，在解放军的监视下，“地总”整队退出电台。

此时，夺权之风也在青城呼和浩特刮起。那时，内蒙古最有名的造反派组织是简称“呼三司”的“呼和浩特大中专红卫兵革命造反第三司令部”和简称“河西八一八”的河西化工机械公司“八一八革命造反团”。与这两个造反组织“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的另一个较大的造反派组织是“内蒙古党委机关红旗总部”。该组织是由自治区党委宣传部、组织部和《实践》编辑部等党委机关的 7 个战斗队和《内蒙古日报》社的 6 个战斗队联合组成。成立于 1966 年 12 月 15 日，其成员多是党委机关的工作人员。在内蒙文革的舞台上，这三个组织构成了呼和浩特造反派的基本阵营。

1966 年 12 月 7 日，内蒙古“呼三司”发起召开“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发动攻击大会”后，内蒙古的工厂、机关内一些群众纷纷成立战斗队，宣布造反。12 月 12 日，全区各地一些造反派组织聚集呼和浩特市，由“呼三司”出面组织召开“全区革命造反者控诉内蒙党委执行的资反路线大会”。但是，从整个社会而言，参与造反，支持造反的人仍是少数。

与此同时，那些视党组织高于一切，与党组织有各种共同利益的老党员、老模范、老先进，他们从朴实的阶级觉悟和历次运动的经验中得出“谁反对共产党决不会有好下场”的结论。他们认为，这些学生、知识分子比当年右派分子更猖狂，他们无法理解持有“呼三司”观点的人为何如此作乱。在这样的背景下，加

上各级领导暗中支持，社会上从基层渐渐酝酿出一些与“呼三司”观点对立的反对派组织。1966 年 12 月 18 日，王逸伦书记支持的“内蒙古自治区革命职工红卫军” ，简称“红卫军”成立。第一负责人为呼和浩特市橡胶厂 29 岁的工人张三林。

“红卫军”联合以师院“抗大兵团”为首的“呼一司”，也召开批判资反路线大会，批判内蒙党委书记高锦明、权星垣、康修民等人，说他们纵容“呼三司”，给“呼三司”的牛鬼蛇神平反。

1966 年 12 月 30 日，呼市又出现了一个新组织：“内蒙古自治区工农兵革命委员会”，简称“工农兵”，负责人叫樊俊智，曾经是内蒙军区副司令黄厚的警卫员。这个组织以复员、转业军人为主体，由呼市玉泉区“荣、复、转、退军人战校”和“八一”纵队合并而成。在这两个组织筹备联合之际，北京传来消息，不准转、复军人成立单独的组织。这两个组织遂以各机关、工厂、企业和农村的荣、复、转、退军人为基础，并吸收了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干部凑成了一个跨行业的组织。改名为“工农兵革命委员会”。其成员近 4 万人。基本立场是维护十七年建立的政治信条、社会规范和价值标准。具体表现为保护老干部和紧跟党委。因此，他们与“呼三司”等组织形成了尖锐的对立。

“红卫军”总部在分析 1967 年的策略会上，众口一词：“搞大会发言、写传单、刷标语这些文化人的事，我们比不过‘呼三司’，要采取另外一种斗争形式。”

于是，1967 年 1 月 9 日上午，“红卫军”出动上千人把位于火车站南的原锡林旅社楼上的“呼三司”总部团团围住。他们冲

上楼去，将值班人员痛打后赶出，把总部的文件抄走。当天，“红卫军”下属组织，在市内砸了“呼三司”观点的呼和浩特手工业系统“东方红”组织，殴打、绑架了该组织两名负责人。这是呼市地区出现的第一次绑架事件，造成该厂文革中首次停工停产。

1 月 11 日，“红卫军”、“工农兵”再次出动几路人马，乘汽车袭击了“呼三司”的新址——内蒙古工会大楼，再次捣毁“呼三司”办公地点，同时袭击了持“呼三司”观点的“呼市革命职工造反总部”及《内蒙古日报》社。

《内蒙古日报》社的“东方红造反队”为了采取主动，在被袭击的当天晚上突然宣布夺取《内蒙古日报》社的领导权，主持今后《内蒙古日报》的出版发行工作，报名暂定为《东方红电讯》。

《内蒙古日报》报社的夺权，全自治区为之震惊！18 日，“东方红战斗队”的对立派组织呼和浩特“革命造反司令部联合总部”的人马，冲进了报社大院。“东方红战斗队”措手不及，寡不敌众，报社被转手接管。

1 月 19 日、20 日，内蒙古人委办公厅“东方红联合总部”响应中央号召宣布夺权，内蒙农业厅“东方红革命造反纵队”也宣布夺权。“呼三司”等十几个组织发表声明支持。20 日晚，“呼三司”师院“东方红纵队”得到“红卫军”将去砸呼市“革命职工总部”的消息，急派红卫兵前去“职工总部”所在的中山西路民族旅社守卫。“红卫军”看到造反派已有准备，只用广播车大骂一顿，砸了十几块玻璃后扬长而去。在场的造反派因屡遭砸抢，十分愤怒。当场决定，去砸“红卫军”总部。于是结队前往，当夜把位于新华街的“红卫军”总部砸了，绑架了正在值班的人

员，带到内蒙党委“红旗”总部，连夜令其交待“红卫军”、“工农兵”的活动内幕，并当场录音。

1 月 22 日，《人民日报》《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的社论发表后，师院“东纵”高淑华等人与内蒙党委“红旗”负责人、内蒙党委宣传部干部李枫，内蒙直属机关“东方红”总部负责人，内蒙轻工业厅干部张志蓬，华建“井冈山”霍道余，铁路“火车头”的“三刘”，呼市“工总司”，“工人公社”、内蒙古大学“井冈山”贾国泰、林学院“红旗”陈晓林、农牧学院“井冈山”石磊等多次座谈，大家认为，中央的夺权号召说明文化大革命已进入一个决战阶段，进入谁胜谁负的关键时刻。他们分析了内蒙党委几位书记的情况，认为高锦明、权星垣、康修民、李树德、李质等几名领导人，需要进一步帮助并支持其工作，他们正在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王铎书记虽然犹豫，应该争取他。与会者决定各组织均成立一个小而精的“运动情报部”，师院“东纵”为情报的汇集点。

《内蒙古日报》被“革命造反司令部联合总部”冲击接管后，“东方红战斗队”串连“呼三司”又进行了反夺权，并将他们控制的《内蒙古日报》新版，准备于 1 月 23 日问世。

1 月 22 日上午，“红卫军”、“工农兵”千余人围住《内蒙古日报》社准备重新夺权。下午，“红卫军”、“工农兵”在报社内的呼和浩特“革命造反司令部联合总部”的人接应下，冲进《内蒙古日报》社。“呼三司”和“河西 8·18”、 “党委红旗”等呼市的造反派组织闻讯赶来，由工学院的“井冈山”一马当先，围住“红卫军”、“工农兵”，双方形成对峙。广播车大

喇叭的对骂声，数千围观群众的吵嚷声，乱成一团。先是舌战，不久即发生肢体冲撞，进而开始拳打脚踢，打人、砸车。大规模火并一触即发。

就在内蒙古的“呼三司”与“红卫军”在《内蒙古日报》社武斗之际，当晚 18 时，从报社逃离的“红卫军”和“工农兵”组织的“头头”到内蒙古军区求援。

内蒙古军区是军委批准开展“四大”的单位之一，自华北局 1966 年前门饭店会议以后，揭批了司令员兼政委乌兰夫，到了 1967 年 1 月，批第一副政委吴涛的调门越来越高。刘昌副政委写出“首长的第一张大字报”，称吴涛是三反分子。他在 1 月 9 日晚军区政治部全体人员会议上，明确地把吴涛视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执行者。说吴涛在 1966 年 8 月 1 日的讲话是“不相信群众”的证据。

1 月中旬，政治部副主任张德贵在政治部文革办公室回答“谁是内蒙军区刘、邓资反路线的代表人物”的提问时，说：“内蒙军区的文化大革命是在军区党委领导下，吴涛是第一副书记，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权是在吴涛手里，当然这个代表人物是吴涛了。”

吴涛成了众矢之的。1 月 20 日晚，训练部又召开了更大规模的会，研究了批吴涛大会的主席团构成、日程安排、大会宣言、对吴涛的四条勒令等事宜。张德贵在 1 月 21 日军区小礼堂对政治部全体干部说：“吴涛和乌兰夫早就认识，跟乌很紧，对乌兰夫有言必听，有令必从。”“他传达乌兰夫的指示比传达中央的快”。“乌兰夫对吴涛是信得过的，乌兰夫准备提吴涛当区党委

书记。”

虽然此时，内蒙古军区反吴涛搞得热火朝天，但是运动一直限于部队内部，除了组织到内蒙古党委大院等单位参观大字报外，并没有介入地方的造反活动和它们的派系之争。

1 月 22 日晚 23 时，内蒙古军区黄厚副司令员出来接见了“红卫军”和“工农兵”组织的头头。

主持军区工作的副司令员肖应棠同军区其他领导商议后，认为情况严重，决定请示中央军委。

很快，内蒙古军区作战值班室接到全军文革小组组长徐向前元帅的答复，共有三条：

一、军队不得动武；

二、对两派群众组织情况不明时，不要轻易表示支持任何一派，要站在革命左派一边；

三、如群众组织发生武斗，派部队徒手前去劝解。

值班员李廷武将徐向前的指示报告了肖应棠和参谋长王良太。根据这一指示，军区党委命令群众工作部副部长高碧先去“工农兵”总部了解情况。群众工作部平时兼管民兵工作，常与地方打交道。

这时，报社武斗已趋激烈。军区领导决定派一个连，全副武装赶往报社，制止武斗。这个连由高碧带队。

当 1 月 23 日凌晨，高碧带着一连全副武装的军人闯进报社印刷厂，现场已是一片混乱。

带队的指导员当场宣布：“双方人员退后，报社问题由军队主持解决。”

高碧按照军区指示，当即宣布对报社实行军事接管，报社的所有门口全站上了解放军战士，他们端着上了刺刀的枪，只许进不许出。实际上，他们动身之前已接到军区领导王良太的密令，到报社去是支持“红卫军”观点。事后，其中的一个战士透露：“……出发前指导员给我们讲，这次去是支持‘红卫军’夺权的，但是去了报社要是有人问我们支持谁，我们不要表态，就说是来保护国家财产的。”

报社内部的“革命造反司令部联合总部”立即挂出巨幅标语：“坚决拥护解放军接管报社！”

而“呼三司”等造反派组织则怒不可遏地上前质问：

“为什么军管？”

“奉谁的命令？”

高碧的答复是：“我们奉军区的命令而来，军事接管就是军事占领，一切听从军区的指挥。”

军队组成的人墙名义上要把两派群众隔开，实际上是把“呼三司”观点的人分割包围开来。“红卫军”对被包围的“呼三司”成员拳脚相加，介入的军人并不阻拦。更奇怪的是，军队的干部、战士，许多都戴着大口罩，有意掩盖。

很快，呼市地区很多造反派负责人不约而同赶到师院“东纵”。进门后，他们来不及相互打招呼便开始诉苦。粗略统计，被打的人数超过 200 多，有轻重伤患 50 余人。“内蒙军区一出兵就支一派，压一派，明显地把我们的人围住，支持‘红卫军’的人打我们。”

接着，《内蒙古日报》社又传出消息，介入报社的军人勒令报

社的造反派负责人检查。他们正在斗争，要求支持。

“呼三司”头头高树华、郝广德等人研究到近天亮，最后决定：要求军区领导出面解释。各单位宣传车分片广播。

开会过程中，“东纵”几个写作快手，把“1.22”事件真相写成传单，写、刻、印连续操作。散会时，一气呵成的传单已经交到每个人手中。

1 月 23 日晨 6 时，军区领导派副政委刘昌来到报社，“呼三司”当即与之辩论。刘昌再三对造反派解释：这次行动是“来保卫工厂”、“怕发生冲突”。由于报社内的“造反派”群情激愤，刘昌不得不下令部队撤离报社。但“造反派”仍然与他继续辩论。这场辩论从《内蒙古日报》社转移到了内蒙古师院“东纵”的会议室，13 个内蒙古的群众组织和北京清华大学“井冈山”的代表，要求刘昌承认“三点结论”：

第一，军管名为“保护机器”，其实并未采取任何措施如此做；

第二，军区支持“保守派”，打击了“造反派”；

第三，这次错误的性质是军区与“保守”势力相勾结，镇压“革命群众”，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经过长达数小时的辩论和争执后，刘昌不得不承认：“此次行动没有调查研究，没有依靠报社内部的革命同志，没有按照毛主席的路线办事，犯了错误，愿意接受同志们的批判。”

刘昌表示：“这次派军队，在客观上，实际上是从精神上镇压了革命造反派，犯了政治立场错误。”

刘昌认错之后，造反派组织并没有选择适可而止，而是步步

紧逼，要成立调查组，弄清事件真相；同时责令内蒙古军区的负责人于 1 月 24 日下午 14 时到《内蒙古日报》社做检查。

## 第 441 回：发《决定》，解放军开始支左　“全红总”，王振海遭遇绑架

1 月 23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联合发布《关于中国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指出：“在这场伟大的无产阶级向资产阶级的夺权斗争中，人民解放军必须坚决站在无产阶级革命派一边，坚决支持和援助无产阶级革命左派。”并就“执行毛主席的指示”做出五条规定：

（1）以前关于军队不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以及其他违反上述精神的指示，一律作废；

（2）积极支持广大革命左派的夺权斗争，凡是真正的无产阶级左派要求军队去援助他们，军队都应该派出部队积极支持他们；

（3）坚决镇压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左派的反革命分子、反革命组织，如果他们动武，军队应该坚决回击；

（4）军队不得做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防空洞；

（5）要在全军深入进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以刘少奇、邓小平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斗争的教育。

军队支持左派群众的行为，后来被简称为“支左”。

当天下午，林彪出席在人民大会堂江苏厅召开的军委碰头会，在会上发言指出：军队的革命气氛、革命劲头不足，缩手缩脚，怕字当头，要求部队在被动状态中争取了一些主动。林彪讲话中谈到夺权问题时说：“无论上层、中层、下层都要夺。有的早夺，

有的迟夺”，“或者上面夺，或者下面夺，或者上下结合夺”。

当天，内蒙古军区党委根据军委指示，开会讨论“支左”问题。副司令员黄厚讲，要支持“工农兵”这些组织。他认为，该组织主要是由复转军人组成，就是不穿军装的战士，不会有什么问题。

这天，由首都“三司”、清华“井冈山”及北京、天津、上海等地造反派组织驻内蒙联络站的人共同发起，在内蒙古人委礼堂召开大会，揭露“1.22”事件真相，在呼市地区引起的反响很大。他们从外地人角度看问题，一方面毫无顾忌地揭露“红卫军”的打砸抢，同时把矛头对准了内蒙古军区，言辞激烈，当场喊出“打倒军阀!”的口号。

与此同时，“呼三司”到军区大院外张贴大字报，要求内蒙古军区副政委刘昌公开检讨。

也是在 23 日这天，内蒙古军区召开批斗政委吴涛大会，军区副司令员黄厚等人主持会议，吴涛的军装被剥下，弯腰、“喷气式”、挂牌子。大会宣布：吴涛是“三反”分子，停止一切工作，每隔 3 天交一份检查，群众要批斗时必须随叫随到。会议结束时，还给吴涛及其陪斗者照了“百丑图”的相。此后，军区连续召开批斗吴涛大会。

当天下午，内蒙古师范学院“东纵”情报部有人报告，有几位身份、举止不同寻常的人在师范院内看大字报。师院高树华让化学系的两个女学生去当向导，嘱咐她们要态度和蔼、耐心，要机灵，多察言观色，弄清来者身份。两个女孩子回来后只说其中一个官架子拿得很大，其余三个像保镖，说话还和气，她们尽可

能回答了客人提出的问题。之后不久，社会上传出“内蒙军区首长王良太来师院看大字报遭到学生围攻”的消息。

1 月 24 日下午，内蒙古军区党委开会，与会的军区党委会成员黄厚、王良太、刘昌、张德贵、王勇成、蒋文奇等人对“呼三司”提出的关于刘昌公开检讨的要求统一了认识，做了两项决定：

第一，暂不检查，因为真相不明；

第二，出兵、军管、撤兵都是正确的，是为了保护报社和工厂，并没有支持哪一派。因此，军区拒绝按照“造反派”的要求到报社作检查。

这天，“内蒙古自治区无产者革命总部”宣告成立，简称“无产者”。当天，“无产者”与“红卫军”、“工农兵”一起，在呼和浩特市郊区人民公墓的办公室开会，决心与同情“呼三司”观点的内蒙党委书记高锦明、权星垣、康修民、李质及郭以青、内蒙党委农牧部主任雷代夫等人斗争到底；拉住王铎书记，坚决支持书记王逸伦、刘景平，及自治区副主席沉新发、张鹏图、朋斯克等。要向他们和内蒙军区首长们及时通报情况，以得到支持。会上组建了“内蒙古自治区工农兵学商联合总部”。

再说呼和浩特的“呼三司”等造反派组织，一直等到 24 日下午 14 时过后，也没有看见内蒙古军区的领导人到《内蒙古日报》社向造反派做检查，他们感觉受到了莫大的侮辱。“呼三司”、“河西 818”、“党委红旗”的头头们召开联席会议，决定集合人马，到军区大院门口静坐示威，“直至取得最后的胜利！”

对此，内蒙古军区领导仍然是置之不理。

1 月 23 日这天，广州军区按照中央的决定，全面介入地方文

化大革命，执行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的“三支两军”任务。广州军区为此从驻穗机关、部队中抽调 6000 多名干部，又陆续调了两个步兵师和 1 个炮兵师进入广州。

1 月 24 日，周恩来亲自给中山大学“八三一战斗队”的黄意坚打电话说：“你们‘省革联’夺了权，要搞好大联合，要和军区取得联系。”

电话刚讲完，广东省军区政委陈德就已经来到中山大学“八三一战斗队”。当时“八三一”驻“省革联”的代表是蔡登望，他是“省革联”监督组的副组长。组长陈家吉，此时已去北京向中央汇报广东的夺权情况。

陈德找到蔡登望，传达周恩来的两条指示：“第一是你们要搞好大联合，第二是要和军区取得联系，将这个夺权搞好。”

陈德对黄意坚说：“黄司令员命令我立即来这里和你谈话，商量怎样搞好夺权。”

这时，广州军区司令员黄永胜正在北京参加军委扩大会。

与此同时，广东省军区还派了 4 名干部进驻“省革联”在新河浦的总部办公室。这里原来是区梦觉的家，现在被“省革联”占用了。

当天，广州市部分群众组织也仿照“省革联”形式，成立“广州市革命造反联合委员会”，简称“市革联”，并发出《夺权通告》，宣布“从 1967 年 1 月 25 日零时起，中共广州市委的一切权力归广州市革命造反联合委员会”。

有了省委夺权的样板，市委夺权就变得非常简单和顺利了。1 月 25 日，当时担任市委代理第一书记的焦林义及市委的一些人

被造反派召集起来，要交权。焦林义就打电话找赵紫阳请示："现在他们强迫要交权，怎么办？"

赵紫阳说："现在都是一样了，我们都交了权了，你们也交吧。"

焦林义问："群众组织那么多，交给谁呀？"

赵紫阳说："你看看究竟哪一个是革命的，就交给那一个。"

这可把焦林义难住了，他也不知道哪个是革命的，反正都是起来造反的。就在这个时候，中央又发来电报，把广东省副省长兼广州市市长曾生抓走了，市委也搞不清是怎么回事。后来造反派主持开了一个会，焦林义宣布交权。

我们再回到革命的中心北京。1 月 18 日清晨，中央召开北京各大专院校，机关部门造反派代表研究夺权问题的座谈会后几个小时，首都"三司"驻"全红总"联络站的史学忠、宗祥荣找到"全红总"的王振海和周牧，告诉他们：中央希望"全红总"做"抓革命，促生产，打回老家去，就地闹革命"的模范，自动撤销组织，通告全国。

这个要求被王振海和周牧拒绝。他们对史学忠、宗祥荣说："要撤你们带头撤。这个模范你们去当吧。"

宗祥荣生气地喊道："难道你们敬酒不吃要吃罚酒？你们要知道革命小将的脾气不是很好！"

周牧冷笑着对他说："脾气不好应该多做自我批评，你们想和工人阶级主力军较量较量吗？"

很快，中央文革打来电话，要"全红总"迅速自动撤销组织，不要让中央文革太被动。

1 月 19 日，国务院总理办公室赵秘书给周牧打来电话，告诉他，中央不允许有全国性组织。他说："地方组织可以夺地方上的权，你们全国性的组织是不是要夺中央的权？中央拟在最近就要下达撤销全国性组织的通知，希望你们自己主动撤销，带头遵守中央的指示。"

接到这个电话，周牧在总部会议上向大家传达，并提请大家讨论，是否主动撤销组织。讨论的结果，没有一个人同意撤销。

1 月 20 日，北京的主要街道出现"砸碎反动组织'全红总'！"的大型标语。当天下午，王振海来找周牧，陪他去国家科委。国家科委已被夺权，掌权的是原国家科委副主任张本，她要找王振海谈谈。

周牧和王振海来到科委，傍晚时分见到张本。一见面，张本就说她是奉周恩来的指示找王振海谈谈的。她指着周牧对王振海说："警卫人员是否先到外面去。"

王振海连忙解释说："对不起，对不起，忘了介绍，这是我们'全红总'的年轻理论家周牧。如果我们的谈话涉及'全红总'，必须有他在场，只有我们两人定的事才能决定。"

张本连忙道歉："对不起，对不起。想不到大名鼎鼎的周牧这样年轻！欢迎你，欢迎你！希望大家为了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能坐在一起。"

接着，张本开门见山地说："周牧在场也好。周总理要我转告你们，'全红总'应该主动撤销。因为你们的历史任务已经结束了。你们迎来了工矿企业文化革命的新高潮。这个新高潮目前正在被走资派利用，走资派正在全国范围内煽动反革命经济主

义，破坏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

她说到这里停下，斜靠在沙发上，一支手撑着下巴一侧，一支手的手指敲打着沙发扶手说：

“中央决定取缔一切全国性组织。至于你们，你们有些功劳。江青首长支持过你们，你们的确有一定的号召力，有一定的影响。所以总理要我告诉你们，最好有个善始善终。振海可以回到情报所，也可以到科委来，作我的副手，你认为怎么样？”

她说到这里，双目紧盯着王振海，等待着他的反应。

王振海说：“我可以到科委，那么周牧他们怎么办？总部一大摊人怎么办？怎么对群众交待？”

张本不慌不忙地说：“有什么不好办？他们从哪里来，回哪里去嘛。回到本地区，本单位去抓革命促生产嘛，去夺本地区、本单位的权嘛。群众，要靠你们去做工作，做耐心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

张本说到这里，转过话头问周牧：“周牧的家乡是哪里？原来做什么工作？”

周牧告诉她，家乡是贵阳，文革前是一名合同工教师。

张本听后说：“振海如果愿意来帮助我，做科委班子的副手，也可以带一些人来协助你工作。如果周牧愿意，也可以来嘛，在科委可以搞一些理论研究嘛。你的意见怎样？”

周牧和王振海互相看了一眼，王振海站起来说：“周总理的指示我们会给大家传达。你的好意和器重我们长记在心。对不起，我们要告辞了。”

说完，他们抱起大衣走了。

第二天，1 月 21 日，约有近 300 名“三司”的红卫兵来到“全红总”，看见全总大楼周围站着近千名由北京地下铁道工人组成的“前进战斗队”，他们是“全红总”总部卫队。红卫兵在门外喊了几句口号后就走了，还是敦促“全红总”解散。当天晚上，“全红总”开会决定，为了显示“全红总”改革临时合同工制度的决心和争取临时合同工的权益，1 月 22 日中午在天安门广场集会和示威。

1 月 22 日，“全红总”在天安门广场集会示威。交通警察和广场守卫部队截断了长安街的交通，而且把天安门广场的广播系统借给他们使用。王振海主持了大会并作了长篇讲话。当天他们的主要口号有：

“要革命，要造反。要吃饭，要生产。”

“誓死砸碎一切剥削制度！”

“‘全红总’是革命群众组织！”

“青松不老，‘红总’不倒！”

集会后，游行队伍从天安门广场游行到复兴门外大街的全国总工会大楼。在全国总工会前，高昂悲怆的“国际歌”声响彻云霄。当天寒流滚滚，天气阴沉。

当晚近 24 时，周牧和王振海正在商量“全红总”于 1 月 27 日撤出全总大楼，搬到广州、上海或长沙一事时，郝维奇急急忙忙地送来一份铅印的传单。这份传单以“首都三司”的名义印发，内容是陈伯达的“六点指示”，大意是：

（1）十二月二十六日中央文革没有接见任何临时合同工代表。所谓江青支持“全红总”的讲话是伪造的，中央文革正式辟

谣。

（2）临时合同工制度中的不合理部份，留待运动后期改革。

（3）“全红总”是非法组织。

（4）《三家联合通告》是非法文件，应予取消。

（5）所有来京的外地工人，必须迅速回到本地区本部门参加那里的夺权斗争。

（6）各地的“全红总”分团必须立即解散。

“全红总”看到陈伯达的“六点指示”后非常气愤，周牧立即打电话给陈伯达，问他是否作过这“六点指示”？陈伯达在电话中一口否认，并认为这是严重的政治问题。有人在挑拨中央文革和广大临时合同工的关系。要周牧和王振海立即带着这份传单到中央文革。此时已是 1 月 23 日凌晨。

周牧和王振海商量一下，决定通知分管与中央文革联络的“五人小组”成员李晋暄一起去中央文革。李晋暄也是江青给“全红总”推荐的，此时她已经入睡。接到周牧打来的电话后，马上起床，等候周牧他们去她家接她。

为防不测，周牧叫杨政通知了几个“前进队战斗队”的队员一同前往。他们分乘两辆小车，周牧和王振海、杨政 3 人坐前面一辆“别尔卡”黑色轿车，其他几名“前进战斗队”的队员乘坐一辆“嘎斯”吉普在后，驶向李晋暄家。

突然，一辆大客车横在“别尔卡”黑色轿车前面。“别尔卡”黑色轿车司机鸣喇叭要前面的大客车让路，这时，从这辆大客车上冲下来几十名戴着“国家科委革命造反兵团”袖标的人。周牧一看不对，立即叫司机掉头，发现后面那辆吉普早已失去了踪影。

未等“别尔卡”掉过头来，另一辆大客车已横拦在后面路上，同样冲出几十人。

这一前一后几十人迅速围住“别尔卡”黑色轿车，问：“王振海在吗？”

王振海说：“我就是王振海，你们要干什么？”

“请和我们走一趟！”来人说着拉开车门，其他人一拥而上，两、三个人架一个，将小车里的人强行架到前面的大客车上，关上车门就开走了。

大客车很快驶到公安部门口停下，几个人进去交涉了好长一段时间才出来，看样子是公安部不肯收留，车子又驶向北京市公安局。大约交涉了半小时左右，北京市公安局的一位 50 来岁公安人员随交涉的人上了车，把杨政和周牧带进北京市公安局。

这个公安人员十分客气地招呼杨政和周牧坐下，首先向他们道歉，说：“让你们受惊了。”他接着说，国家科委系统的造反派已查明王振海是混入群众组织的坏人，现将他揪送到公安局审查。公安局不予收留，因为这是他们本系统内的事。现在他们把王振海带走了。希望周牧他们回去后不要告诉“全红总”的群众，以免造成群众斗群众。如果发生了这种情况，周牧和杨政要负一切责任。

同时，这位公安局的干部劝告周牧他们快回家乡去“抓革命，促生产”，等等。说了近两小时，当将他们送出北京市公安局大门时，已是 23 日清晨 7 时。

周牧和杨政出了门，立即找了一个公共电话亭将夜间的事向中央文革和国务院总理办公室报告。得到的答复是：“中央将迅

速去查明情况。在情况不明前，千万不要把王振海被劫持的事告诉群众，以免造成群众斗群众。”

周牧和杨政二人还到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接待站找到负责人，请他和戚本禹通了电话。戚本禹听到报告后很生气，说中央文革将立即派专人清查，叫周牧他们先回去休息。

## 第 442 回：一二三，河北省开始夺权　七机部，叶正光割柜取印

当周牧和杨政回到“全红总”已近中午时分。只见全总大楼里里外外都贴满了大标语，内容是：“王振海反对党中央已被逮捕法办！”“坚决砸烂反动组织全红总！”

这时，“全红总”北京分团数千名团员和总部卫队“前进战斗队”近千名值班队员挤满了全总一楼大厅，人人神情焦虑气愤。一看见周牧和杨政进了大门，不约而同呼叫起来。大家问的第一句话就是：“王振海呢？”

周牧告诉大家，王振海已被来历不明的坏人绑架。接着，把昨晚他们被劫持经过简要地告诉大家。一时，人群激愤，不少人大喊：“去科委把王振海救回来！”周牧希望大家先冷静，现在王振海是否在科委还不清楚。他要大家先等一等，他去打个电话问问科委系统的“全红总”的人再说。

周牧上楼进入自己的办公室后，看见总部委员正在毛胜年、余云庆主持下开紧急会议，只有李晋暄、金展云没在。郝维奇正在隔壁的通间焦急地拔电话。大家一见他和杨政回来，轰的一下围上来问长问短。周牧和杨政又把昨晚被劫持的情况又简要地给大家讲了一遍，让大家继续开会。

周牧到隔壁找郝维奇，问他可否打听到王振海的下落。他说：“昨晚你们失踪后，总部已下紧急动员令。今天上午有王振海被捕的消息传来，但不知道有科委造反派插手其中。”

周牧请他立即返回情报所，动员一切力量到科委找寻王振海。

郝维奇急急忙忙走后，周牧又打了一个电话问张本。张本在电话中一口否认科委造反派插手此事。她说，昨天那些戴“科委造反兵团”臂章的人是冒充的，是有意混淆视线。周牧请她马上打电话去公安部说明和报案。

“全红总”紧急会议做出决议：

一、以杨政、郝维奇为首成立王振海事件调查小组负责营救王振海的工作。

二、通知北京分团，每隔八小时派一个纵队来总部轮流值班，协助总部卫队保卫总部。

三、一旦有人来砸总部，力争做到骂不回口，打不还手，做好说明解释的工作。

四、责成李晋暄立即去中央文革向江青报告，希望中央文革向公安部查清王振海的去向。

五、由周牧拟出《告全国人民书》，以备出现紧急状况时散发。

六、通知金展云和李敦白，随时准备在全总会议厅召开外国记者招待会。

1 月 23 日晚 19 时左右，“全红总”总部卫队从楼下打来电话，说有 10 车左右打着首都“三司”、“二司”、“一司”等旗帜的红卫兵包围了全总大楼。周牧立即通知大家紧急集合应变。

20 时左右，全国总工会大楼外大约集结了近万名打着各种旗帜的红卫兵在那里呼喊口号。大楼内有几千名“全红总”北京分团的团员和 1000 名左右武装的总部卫队----“前进支队”。与此同时，听到总部被围的消息后，又有许多“全红总”北京分团团员纷纷赶来，又将这近万名红卫兵反包围在里面。

22 时左右，外面响起轰轰的汽车声，几十辆卡车运着更多的红卫兵赶到全总大楼下，把反包围的北京分团的群众再反包围。此时，周牧正式通知北京分团各纵队各派三分之一的群众火速增援。

到了子夜时分，各纵队增援群众赶到，又把第三批红卫兵围个水泄不通。这时，外面人声沸腾，如一锅烧开的开水，余洪珠用广播带领“全红总”群众高唱“国际歌”，“我们工人有力量”，“工人阶级硬骨头”，“下定决心”等歌曲。

到了 24 日凌晨 1 点多钟，双方开始扔石头砖块，形势危急，大有一触即发失控之势。周牧多次打电话给中央文革、国务院总理办公室报告情况，并说学生如不撤走，一旦发生严重后果，“全红总”不负任何责任。

快天亮时，“全红总”的群众齐声大喊：

“前进战斗队快开枪！”

“前进战斗队快开枪！”

周牧看局势发展如此，向总理办公室打了最后一个电话，告诉他们：“如不在一小时内叫红卫兵撤走，任何人都无法控制局面！”

打完电话，他连电话带电线一起扔了。

不到半小时，几辆黑色小车从广播局方向开来，终于把红卫兵动员走了。

24 日下午，“全红总”总部委员们，顾不得一夜的紧张和疲劳，召开总部会议。会议做出以下决议：

一、2 月 1 日撤出全国总工会大楼。发表声明，说明“全红

总”总部将迁往广州。

二、杨政、余云庆、廖日海、周泉 4 人在 2 月 2 日前飞到广州做好总部搬迁的准备工作。

三、总部搬迁至广州后，北京建立“全红总”驻京联络站，地址设在冶金部第二招待所。

四、通知“全红总”西南区指挥部负责人萧碧璜在云、贵、川三省物色一处条件具备的地点建立基地。

五、北京分团 2 月 1 日撤出劳动部，迁往石景山钢铁厂。

六、郝维奇立即和各全国性组织和外地驻京联络站联系，召开一次全国性组织座谈会，建立全国性组织革命造反统一战线。

显然，“全红总”的决议与中央不成立全国性群众组织的精神仍然是不一致的。

河北省会保定市也在 1 月 23 日这天进行了夺权。

还在 1967 年 1 月上旬，保定造反组织就联合天津、北京、石家庄、唐山等地来保串连的红卫兵，查封、控制了《河北日报》和《保定日报》，他们利用报社印刷厂的设备来印发传单，为本派的政治观点制造舆论。持不同观点的保守派群众组织，决定对“两报”实行反查封，并发动农民进城，搞一次大规模的袭击。1 月中旬，他们在保定三中、河北影剧院、中级人民法院、河北饭店等处连续召开了 7 次会议，对于行动方案、袭击重点、力量分配备等问题进行了研究和部署，并派人到满城、清苑、徐水、安新等县发动组织农民进城 ，配合这次行动。

有着光荣的华北平原抗日游击战传统的保定地区农民，对袭扰保定府的游击战术还是十分熟悉的。1 月 21 日清晨，各县进

城农民和市内“保守派”组织的人员共计 1 万多人，按计划集结后开始进入各自的“阵地”。8 点多钟，警报器响声过后，各点统一开始行动。农民们手持棍棒、钳子、斧头等武器，断绝了市内交通，掐断了戏校、保师等重点袭击单位的电话，接着进行分割包围，实施攻击。被袭击的造反派组织进行了还击，双方扭打在一起，混战达 3 个多小时，两派群众组织有数十人受伤，很多单位被砸抢，大批公共财物遭受严重损失。

“1.21”事件是保定第一次大规模的武斗。

1 月 22 日上午，保定 482 厂技术员杨连甲组织保定各路形形色色的造反组织和京、津、唐、石各地来的红卫兵一起，在体育场召开两万多人的批斗大会。省委书记刘子厚等省、地、市领导干部人被指控为“1.21”农民进城事件的后台在大会上批斗，然后游街示众。

1 月 23 日，保定各造反组织纷纷夺权，一夜之间，省、地、市各级党政财文大权统统被夺。这就是河北省“1.23”夺权事件。躲在安新县农场的保定地委书记李悦农被造反派抓回，关入看守所。

第二天，1 月 24 日，河北省军区和驻保定 69 军按照中央指示，奉命介入保定地区文化大革命。驻保定各部队全副武装上街游行，表态坚决站在革命左派一边。

与此同时，北京七机部也在 1 月 23 日晚上实施了夺权。这天晚上 22 时过后，七机部部长王秉璋和钱学森等其他几个副部长被七机部“916”组织召集到部长办公室，通知他们七机部夺权了。钱学森听了，一下子面无血色，差点昏了过去。“916”组

织的头头叶正光赶紧扶住他，让他坐下，然后告诉他不要担心，他是受到保护的，不会撤他副部长的职位。然后，叶正光让各位部长们表态，钱学森和另外两位副部长立即表示支持夺权，王秉璋和另外两位副部长则表示反对，而且王秉璋拒绝交出印章。于是，“916”的人用焊枪割开了放印章的保险柜，取出印章，并宣布王秉璋被罢官，叶正光成了七机部的“总勤务员”。

说起来，叶正光也是将门之后，他是叶挺将军的儿子，这次受毛泽东对于上海“一月风暴”的赞扬的鼓舞，要在七机部夺权。事先，他请示过周恩来、聂荣臻和李富春。对于夺权，他们当然不会反对，叶正光认为是得到准许了后，于是就有了上面的一幕。

时任七机部部长兼空军副司令的王秉璋身患肝炎，他的妻子通过吴法宪、叶群找林彪求情。林彪让叶群报告毛泽东，说七机部是重要的机要部门，把王秉璋搞掉了，就无法维持七机部的工作。毛泽东让叶群安排王秉璋住到西山养病。几个月后，周恩来在宣布七机部的这次“123”夺权无效，权力和印章又回到了王秉璋的手里，这是后话。

1 月 23 日，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驻《北京日报》新联络站发表声明称：“一、联委会是虚假的大联合，原地质驻《北京日报》联络站不能代表地质‘东方红’，声明退出此联合委员会，并勒令其立即解散。二、目前《北京日报》实权已被以北航‘红旗’为首的少数人操纵，新生的《北京日报》把矛头指向革命群众，犯了严重的方向路线错误，新生的《北京日报》必须停刊，它所表现出来的形左实右的机会主义思潮必须彻底批判。”

1 月 23 日，“三司”发出总字第二号通告和总字第三号通告。

其中，总字第二号通告称：“北外六一六红卫兵在元月五日写了一篇《周恩来你要干什么》的大字报。1 月 17 日又去捣毁周总理即将去参观的红旗大队的展览会等等。……决定开除北外六一六红卫兵。”

而总字第三号通告称：“我司令部所谓‘文艺部’的成立是非法的，干了许多坏事……现开除刘利吉、艾国成、陈志国出司令部。”

1 月 23 日，《新北大》发表批判朱德的文章：《把大军阀大野心家朱黑司令揪出来》。

23 日，聚集在北京的军队院校的造反派为批判刘志坚，组织了两个批判刘志坚大会的筹委会，就在“全红总”在全总大楼被围，闹得沸沸扬扬之时，这两个筹委会为抢夺刘志坚发生了冲突。所以，也难怪周恩来和中央文革无暇顾及“全红总”那边的热闹场面，因为 1 月 24 日 0 时 24 分至 2 时，周恩来、徐向前、江青、杨成武、关锋正在人民大会堂召集军队院校和文艺团体代表座谈，解决这些军人造反派的冲突。

周恩来首先婉转的批评了参加会议的代表未按规定的人数前来。他说：“因为最近时期到北京来的军事院校及文工团比较多，除昨天广播讲话以外，我们想通过座谈向这两部分同志、战友谈一谈。因时间仓促，同时 90 多个院校来的不怎么齐，我们本来规定每个单位来 3 位代表，造反派 2 位，保守派 1 位。查了一下有的不足 3 位，有的超过，有的未来。我们所要传达的话，可能没有听到，我们过几天再传达一次。今天讲得较短，徐向前同志、

江青同志身体不好，最多开一个小时。”

“我们要听听你们的意见。但这样大的会，是不行的，要分头开。”“你们有各种思潮，每个单位可预先酝酿，没到的院校可通过你们联系，传达，文教组织也一样，同时在这个月内我们找出两次时间，来听听你们成熟的意见，你们提出的问题，我们研究好了再回答。”

周恩来重申了他在 1 月 22 日下午召开的外地来京群众 80 万人有线广播大会上，“代表毛主席、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一致同意”的讲话精神，动员外地来京的军队院校和文工团回到本地区。他说：“希望你们外地来京的院校和文工团响应党的号召，回到本地区就地彻底闹革命。另外你们来京已有一段时间，你们对领导机关有意见，欢迎你们贴大字报，提意见。……院校机关串联是有规定的，那些指挥机关不能进去，如国防部，军区司令部，可把大字报送进去，学校代表留下不要太多，只要少数几位就行了。”

对于军队院校的学生批斗各部门军队领导的做法，周恩来说：“应给他时间准备和休息，更不要不允许他回去工作，揪出来后押起来。”“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倡议，请你们仅仅是要检讨的同志给他时间好考虑让他检讨，不要扣留他太长时间，现在许多单位的领导，一会这边要，一会那边要，妨碍他工作。”他举了郑维山的例子说：“我们信任郑维山同志，对这样好的同志，现在批评他时，把他扣起来是不公道的，还一定要徐副主席下命令才能解决，这就影响了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进行。”

他“同时建议后勤机关部门，邱会作同志是人民内部矛盾，

他犯错误已检讨，还要检讨，一次不行可多次，但不能使之失去自由。因其身负全军后勤任务，我们要给解释清楚，今年夏季服装及战备任务都需要他参加，文革也包含着你们的后勤在内，他们检讨了就要工作。”“国防大楼有总参，总政，《解放军》报，西郊还有总后等许多军事机关，都不能停止工作。”

他说：“我们不能根据一般工作关系来划类，如果是反党的，我们有专案审查，不能把有工作关系的都看成是反党的，你们若有问题可以提请中央审查。邱的行动我们清楚，他和另一种人也没关系。把人抓去多少失去自由，一有怀疑马上包围抄家，这样不能解决问题。下次准备听听你们的意见，因时间关系，只作提议，请你们考虑。”

周恩来再次强调了这种民主和集中的统一，自由和纪律的统一，说：“人民享受着广泛的民主和自由；同时又必须用社会主义的纪律约束自己。”

接着，江青讲话，她说：“对军队调查的很少，没有更多的意见讲，和总理商量，先听听同志们的意见，经过分析，然后再提出一些建议。斗争刘志坚两个筹委会，能不能合起来？这样可以节省我们很多时间。”

“军队文化革命，周总理讲了很多，我只讲不负担战备的，军队院校、艺术团体，以及不负责作战的单位，和地方一样搞。但有战备任务的，保密的，从今天起都不要冲了。以前的，我们都替你们承担了。比如郑维山、杨成武，他们负担繁重任务，有时候半夜里就要找他们。今天扣留了郑维山 6 个小时，如果这时需要执行任务，就找不到他们。这件事不一定是你们搞的。你们

回去以后可以发表声明，以后担负保卫任务，保密单位，不可以这样。我们正式声明，凡是再冲国防部、国务院、中南海及其他重要指挥机关，就要实行专政。同志们说对不对？”

众答：“对！”

江青接着说：“以后谁对高级的科学机密文件和国家党政重要保密文件实行抢夺，对未定性者就逮捕了，希望同志们回去讲，不可以这样子，如果这样，就象 20 早晨那样，我就说：谁抢我们文件，马上逮捕，抢中央文件要不要逮捕？！”

大家回答：“要！”

她说：“我们接到了他们冲会场的同志的检讨信。你们双方都有不妥嘛。你们自己要做工作。今天就谈到这里好不好？”

有人说：“他们不但冲会场，还抢了我们的东西，《毛主席语录》也给抢走了。”

江青：“抢去的东西全部送还，赔礼道歉！”

## 第 443 回：不落后，广西自治区夺权　重庆市，学生与工人分裂

1 月 23 日，“山西工人革命造反兵团”近万名工人，在头头张建国和李保顺的带领下来到太原纺织厂，支持“太纺红卫兵”向厂党委夺权。“太纺红卫队”出面阻拦，并说中央文革小组的关锋支持他们。山西大学“八八红旗”方培泉带着一批先期进驻太纺工厂的学生们当即刷出了炮轰关锋的大标语。

张日清知道关锋支持女劳模解悦领导的“太纺红卫队”，他对那个在刘格平家里开夺权会时出尔反尔的山西大学造反派方培泉也不感兴趣，当即调出军区的部队，赶到太原纺织厂支持“太纺红卫队”。“太纺红卫队”士气大振，解放军当场抓捕了方培泉等一批山西大学“八八红旗”的学生，张建国和李保顺等“工人革命造反兵团”的头头，也一并被抓。太原市声势最大，人数最多的“山西工人革命造反兵团”就此散伙，山西大学“八八红旗”也从此背上了炮打中央文革小组的罪名。

杨成效不失时机，招集原来张建国的旧部，换上了“决死纵队”的旗号。“山西工人革命造反兵团”的一些头目，感恩杨成效夺权时替他们这个组织署名一事，对张建国退出刘格平夺权一事顿生悔意，反戈一击，便背离张建国，成了杨成效的部下。杨成效一下子整编了“山西工人革命造反兵团”16 个工厂的组织，其“决死纵队”势力激增，威名赫赫。

1 月 23 日这天，华北局书记处致电刘格平，对“112 夺权”表示支持，并要刘格平与华北局书记处“联系”。

这天，中央批准山西军管，张日清任军管会主任。但直到此

时，“太工红旗”赴京代表仍然没有与中央文革取得联系，只找到《人民日报》社。《人民日报》的人讲，他们不知道中央对山西夺权的态度。

1 月 23 日、24 日，远在西南的广西自治区也进行了夺权。

1 月 22 日凌晨 2 时，广西自治区党委书记处书记安平生在南宁西园饭店召开自治区、南宁市厅局级以上的部分领导干部会议，针对当时南宁面临的夺权形势，传达区党委第二书记乔晓光的指示：“区、市党委的屁股一定要坐在‘工总’方面，一要支持‘工总’封管《广西日报》行动，二要支持‘工总’夺权。”傅雨田、江平秋、黄荣、肖寒、韦纯束等区、市一些领导干部参加了这次会议。”

22 日当天，“广西工总”、“广西红总”、“南宁 831”等 20 多个造反派组织在南宁也组织了首次大游斗，以区党委书记处主管文教的书记伍晋南为首的 23 名在南宁的自治区领导干部和文化名人被游街。当晚，首都“三司”南宁联络站召集南宁各组织头目开会，响应中央号召，开始策划夺权。决定成立以“工总”为主体的“广西造反大军夺权行动委员会”。

23 日凌晨 3 时，以“工总”为首的南宁 26 个造反组织联合组成夺权队伍进驻自治区党委，夺取了自治区党委及各部委的大权。相继被夺权的还有自治区人委、公安厅、高等法院等单位。此后，区直各机关，各地、市、县被层层夺权。

24 日，广西军区遵照中央《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开始“三支两军”工作。各军分区、市县武装部和当地驻军，也分别在 1 月下旬介入地方“文革”。

当天晚上，“广西造反大军夺权行动委员会”在南宁朝阳广场召开“夺权祝捷再战誓师大会”。参加大会的有 146 个单位 4 万多人。广西军区的代表在大会上讲话，表示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夺权斗争。

当晚，由桂林市“工人红卫兵总指挥部”、桂林市“大中学校红卫兵总部”、“教工井冈山总部”、“职工、干部革命造反团”和外地“驻桂联络站”等 12 个群众组织组成“桂林市夺权行动委员会”。他们在桂林市委内的小操场上，召开市党政及其下属的主要领导干部和一般干部二、三百人开大会，由市“夺权行动委员会”主任委员、桂林“造反大军”头头、师院中文系老师杨福庭宣布夺桂林市党政财文大权。

从 1 月 24 日晚 20 时开始，“桂林市夺权行动委员会”，分别进驻桂林市委、市人委、市“文革办”、市公安局，并发布《第一号通令》，规定中共桂林市委、市人委、市“文革办”、市公安局等党、政、财方面工作，必须在“夺权行动委员会”人员监督下进行。

1 月 25 日，《桂林日报》上即登载《桂林市夺权行动委员会第一号令》向全市宣布了这一大事。从 1 月底至 2 月份，“夺权行动委员会”发布了 12 个通令，陆续在《桂林日报》上登了九个“令”，都是杨福庭亲自撰写的。

这天，广西《新闻报道》发表《只准革命造反派夺权》的社论。当天晚上，广西“造反大军”围抄南宁“赤卫队”、红卫兵“盾牌”组织总部。

1 月 26 日，桂林地、市“造反大军”召开夺权胜利大会，驻

桂部队、桂林军分区、步校等代表到会发言，支持夺权的革命行动。

26 日至 28 日，应广西“造反大军”的要求，广西军区先后派出 5 批部队，分别到交通厅、区党委、区公安厅、南宁市委、南宁汽车修配厂、罐头厂和“工总”财贸分部等单位，支持“造反大军”。

1 月夺权后，各级领导几乎统统靠边站。大批领导干部被抄家、戴高帽、挂黑牌游斗。1 月 29 日，“工总”及所属分部在南宁市组织大游斗，被戴高帽、挂黑牌的有伍晋南、霍泛、钟枫、贺亦然、谢望岗、陆地、肖寒等自治区、市和各厅、局、部、委、办领导干部近百人。

当天，韦国清在区党委大院内贴出大字报：《揭发刘少奇、邓小平的几个问题》。

2 月 1 日，韦国清在自治区党委大院内又贴出《揭发两面派陶铸》的大字报。

当天，南宁市内出现“广西工总”搞打、砸、抢、抄、抓的大字报和传单。主要内容说：“工总”参加夺权以来。吸收大批“牛鬼蛇神”、“中上层领导严重不纯”等等。

同日，由“广西汽车工人革命造反司令部”发起召开有 60 多个群众组织、自称有 4 万人参加的朝阳广场誓师大会，宣布正式成立“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广西联合司令部”，简称“无联”。

而此时山城重庆，却在夺权前发生了最早起来造反的工人和学生之间的分裂。

早在重庆“12.4 事件”前，就有许多人对重庆“工人造反军”黄廉提出：“工人学生要团结和联合起来！”于是黄廉等人就到少年宫找重庆大学“815”的头头周家喻，谈了工人、学生造反派联合的想法。周家喻听后想了想说：“我要回总团研究一下，过两天再答复你。”遂后发生的“12.4 事件”显示了联合的力量。事件后，周家喻回复黄廉，同意成立“山城八一五派联合指挥部”。他们在图书馆占了一栋房子作为新成立的“联合指挥部”办公地点，周家喻担任总指挥，黄廉担任政委。学生派出师专的聂珍荣、重庆大学教师赵云生等 9 名老师和学生，“工人造反军”派出了陈发荣、张勇、刘忠海，还有“二七工人造反团”王庭学等 9 人，共同组成“联合指挥部”工作人员。

1966 年 12 月 15 日，西师“八三一”等组织在“124 惨案调查团”召开“炮轰团部右倾机会主义思潮”大会。他们炮轰的“团部”就是“124 惨案调查团”的团部，当时的负责人是重庆大学“八一五”的政委熊代富和“首都一司驻渝联络站”钟东等人。又过了几天，西师“八三一”等组织又召开第二次炮轰团部右倾思潮大会，随后即改组了“124 惨案调查团”团部，重庆大学“八一五”熊代富等退出，换成西师“八三一”岳朝亮和北京“三司驻渝联络站”刘连仲、工人周又强等人。重庆造反派内部矛盾显现。

重庆“工人纠察队”更名的“工人战斗军”等重庆市保守派组织准备于 1967 年 1 月 4 日在体育场再次召开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1967 年 1 月 2 日，由重庆市“工人造反军”和重庆大学“八一五”联合组成的“山城八一五派联合指挥部”得知

这一消息，当晚由黄廉主持召开会议，准备在 1 月 4 日针锋相对的召开“124 事件”一周月纪念大会。重庆大学“八一五”代表在会上力陈不能召开这个大会，因为担心这个大会可能再次引起群众之间的流血冲突。学生与工人意见分歧，双方辩论至凌晨 2 时，最终以“大会延期举行”暂告结束。

可是，黄廉认为工人阶级是主力军。他没有在乎学生的意见，仍然于 1 月 3 日，以“山城八一五派联合指挥部”的名义，通知于 1 月 4 日召开“124 事件”一周月纪念大会。重大“八一五”闻讯后发表声明：拒绝参加。

1 月 4 日，“工人造反军”、西南师专“八三一”等组织在体育场召开“124 惨案一周月纪念大会”。1 月 6 日，首都“三司”、“一司”驻渝办、“工人造反军”、西师“八三一”和交院“九一五”等组织的代表又在牛角沱客运站紧急开会密商，认为重庆大学“八一五”右倾。1 月 9 日，四川大学“826 战斗团驻渝办”在重庆召开大会，批判重庆大学右倾，被重大“八一五”造反，冲了会场。

面对各组织的指责，重庆大学“八一五”在重庆大学松林坡礼堂召开大会，辩论当前的形势和任务。“我们是否右倾？”会上大家议论纷纷，吵吵闹闹，争相发表意见。快结束时，参加“山城八一五联合指挥部”工作的教工分团勤务员赵云生突然站起来，将一只手臂高高举起，直指天空，说：“我说一个问题！我就说一个问题！”

赵云生身材清瘦，永远穿一件黑色的灯芯绒，小胡子，精力极端充沛。他的每句话都斩钉截铁，让人感到极具份量。他说：

“关于‘联合指挥部’，我们的意见是：‘框烂!’。”

文革那会儿，红卫兵动辄就“砸烂”这个，“砸烂”那个。赵云生这位大学老师，把这个司空见惯的“砸”字读成了“框”，顿时引来满堂大笑。他不知道出了什么事，把高举的手臂又挥了挥，再次重复：“对！就是要彻底框烂！”

他说：“胜利是重大‘八一五战斗团’开创的，没有‘造反军’、西师‘八三一’这些杂牌军，单靠重大‘八一五战斗团’也能夺取全市文化大革命的胜利。警惕政治扒手从峨眉山下来摘桃子，坚决框烂‘山城八一五派联合指挥部’!”

赵云生的意见得到了重庆大学广大师生的普遍认同，第二天，重庆大学“八一五战斗团”政委熊代富就带着几十个人来到图书馆“联合指挥部”，让“联合指挥部”秘书陈发荣把“联合指挥部”的公章拿出来。熊代富拿到公章之后，亲手将公章一劈两半，留一半给“工人造反军”，另一半带回重大“八一五”。

熊代富的行为，让重庆“工人造反军”中很多工人气愤难平，都喊着要去把“八一五”砸了。黄廉制止了，但是，西师“八三一”、“工人造反军”与重庆大学“八一五”之间的裂纹却更深了。

从 1 月开始，夺权的风暴也席卷重庆。

1 月 6 日，重庆市沙坪坝区造反派与区委机关“七一战斗队”、区人委机关“星星之火战斗队”宣布接管区委、区人委，成立沙坪坝区“革命造反联合委员会筹备组”。

1 月 14 日，重庆人民广播电台“红色造反者”接管电台。《重庆日报》也被接管，规定只准印新华社规定的稿件，一律不得发地方稿件。

1 月 16 日上午，重庆大学“八一五战斗团”接管校内各行政领导部门。当晚，又发出“勒令以鲁大东为首的黑市委 18 日晚 12 点以前到重庆大学报到，23 日公开向全市人民做检讨，否则格抓格斗勿论”，并勒令解散市文革的《通令》。

“通令”发出后，副市长段大明、候补书记丁长河、书记处书记廖苏华、书记处书记鲁大东先后到来，按时报到，分别安排在各学生寝室住宿，由专人监管。事后检点，只有书记处书记岳林缺席，他已被交通学院“九一五战斗团”的造反派们提走了。

1 月 17 日，重庆市经委“红色造反团”等宣布在经委夺权。

这天，市委常委、副市长段大明写出第一张大字报，揭发“黑市委”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李井泉”镇压革命群众运动。

1 月 18 日，重庆市大渡口区造反派夺权。

1 月 21 日上午，重庆大学风雨操场上人头攒动，重庆大学“八一五”总部在这里进行开门整风。会场坐得满满的，想发言的都可以上台，只要事先向主持会议的提出即可。

会议主持人说：既然是开门整风，按照毛主席在“关于纠正党内错误思想”里的教导，欢迎对“八一五”提出建议、意见和批评，欢迎不同的意见和观点发表，目的是加强“八一五”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使之更有战斗力。

上去发言的从不同的角度发表看法，有提出建设性意见的，也有进行激烈批评的。总的来说是有理有据，令人折服。

下午，一个人上去发言，他首先自报是本校的工人，以前参加的是保守组织，他对“八一五”作了严厉的批评，举的事例较多，发言时间较长，口才较好，场内大部分是“八一五”的人，

对他的批评，没有表示出多大反感。

孰料他发言刚结束，就有一人径直走上台去拿麦克风，主持人认为不该轮到这个人发言，欲制止他，两人发生争执，他最终夺过麦克风，声音很大：

“八一五的战友们，我是罗广斌，今天我和杨益言同志来了……”

场内顿时热闹起来。罗广斌，小说《红岩》的作者！

短暂的骚动后，罗广斌接着讲话，但下面的发言，却语惊四座。他说：“我认为‘八一五’让刚才这个保皇派上台放毒，简直是敌我不分……”

此语一出，场内哗然，议论纷纷。当他再次强调他的那个观点时，台下就有很多人发出有节奏的喊声：“罗广斌，下台来！罗广斌，下台来！……”

罗广斌的讲话被打断，使他没法再说下去了，气愤地放下话筒，走下台来，与杨益言一起离开会场。场内仍有 10 多个学生追上罗广斌，质问他：“为什么是敌我不分？”

罗广斌说：“就是敌我不分，造反派的讲台怎能容许保皇派放毒，这不就是典型的右倾机会主义吗？！造反精神到哪去了？！”

“八一五”的学生说：“毛主席教导我们，要团结大多数，不但要团结与自己意见相同的人，而且要善于团结反对过自己，并在实践中被证明是反对错了的人。”

罗广斌说：“他这样恶毒攻击，认什么错呀，就是一个不认错的人，你们就是敌我不分……”然后就上了车，离开了。

## 第 444 回：渝夺权，朱成昭思考文革　一二三，陈伯达写信批评

1 月 21 日晚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了次日《人民日报》社论:《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重庆市也是连日连夜的游行欢呼。而以重大“八一五”为首的“重庆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听了当晚的《人民日报》社论广播后，立即向全市造反派发出紧急呼吁，倡议由“重庆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出面召集各造反派组织开一个联席会议讨论大联合大夺权问题。

第二天晚上，“重庆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就在驻地少年宫邀请 37 个群众组织开会，商讨按照《人民日报》社论精神联合夺权之事。讨论中，工人“二七战斗团”负责人提议说：“当前最迫切的任务是大联合，大夺权。要抓革命，促生产，首先把大权夺过来。”他的建议得到大家的同意，会议决定按系统分工，于 24 日由学生配合工农开始进行全面夺权。

1 月 23 日，“重庆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继续召集 12 所大专院校和六中、二十九中、师专附中等校群众组织开会，商讨夺权分工，决定：重大“八一五”、重庆“革命教职工造反司令部”配合其他组织夺市委办公厅、市委组织部的权；六中“32111 战斗团”、四川美术学院“红色尖兵团”夺市监委、市委宣传部的权；西师“八三一”、西农“八二六”、川外“八二六”等八所院校配合其他组织夺市人委的权；并决定于 24 日下午 13 时同时动手。

当天，重庆工人“二七战斗团”总部、重庆“工人造反军总部”、重大“八一五战斗团”、“北航红旗驻渝联络”、市经委、《重庆日报》社、广播电台的造反派等 7 个组织倡议，在工交系统召开一个“抓革命、促生产誓师大会”。

此时，重庆驻军 54 军也根据中央《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闻风而动，军长韦统泰、政委谢家详及蓝亦农、刘润泉、唐兴盛等驻军领导，迅速召见重大“八一五”勤务组周家喻、黄顺义、吴庆举、秦安全、熊代富、查正理等 10 余人。韦军长明确称重庆大学“八一五战斗团”是“左派组织”，表示坚决支持，并要周家喻等人主动联合其他造反组织夺取重庆市的权。同时，军队还向“八一五”推荐了财贸系统造反派头头王绍川、军工系统阳增泰，以及干部代表段大明和重大“八一五”在造反第一时间就想打倒的“镇压革命运动的刽子手”辛易之等人。

24 日下午 13 时，重庆“八一五”按照 1 月 23 日、24 日商量的计划，进入重庆市政府，周家喻、熊代富等站在市委机关宽大的办公桌前，左手握《毛主席语录》本在胸前，右手作天王托塔状，举起市委印章拍照留念。印章直径只有 36 毫米大，但是后来宣传画为使其突出，画得硕大如斗。

由于原计划主持市人委夺权的西师“八三一”迟迟未来，“八一五”周家喻等人干脆毫不客气的将市人委印鉴、钥匙全部收缴，文档封存，将市人委的权也一并夺了。

重庆市经委“红色造反者”为落实 1 月 23 日重庆 7 个组织提出的倡议，尽其所知通知了重庆市 31 个造反派组织，于 1 月 25

日开会协商讨论，一致同意召开“重庆市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大联合大夺权抓革命促生产誓师大会”，并联合组成“大会筹备处”，在第二天正式发出于 29 日上午召开“重庆市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大联合大夺权抓革命促生产誓师大会”的通知。

这天，重庆大学“八一五”广大群众，为重庆警备司令部，即 54 军向他们推荐的三结合干部辛易之一事，闹得不可开交，一塌糊涂。

1 月 26 日，罗广斌、黄廉等人从市委机关“造反司令部”得到重庆警备司令部要重大“八一五”结合辛易之的确切消息，即请西师“八三一”、交院“九一五”、重庆大学徐光明的“红岩公社”和北京“一司”、“三司”等各组织负责人在罗广斌家开会，表示了对重大“八一五”的不满。

这天，重庆地区 6 所军事院校学生示威游行，16 辆军车在山城街头隆隆驶过，年轻军人一路高呼：

“八一五好得很！”

“坚决支持八一五的革命行动！”

1 月 24 日至 26 日，重大“八一五战斗团”等 50 多个造反派群众组织，在重庆驻军 54 军代表支持下，组成“重庆市无产阶级革命造反联合委员会筹备会”，简称“革联会”，宣布夺取重庆市党政机关一切权力。

1 月 27 日，重庆军队院校学生在大田湾体育场集会，召开“红色造反者联络站”成立大会，重申支持“八一五”的立场。

1 月 28 日，重庆驻军 2000 名指战员举行“坚决支持重庆革命造反派夺权斗争”的武装示威游行，战士们肩扛半自动步枪，

刺刀出鞘，寒光闪闪。

1 月 29 日，重庆造反派群众及解放军驻渝部队指战员 30 多万人在市体育场冒雨举行“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大夺权抓革命促生产誓师大会”，宣布造反派已夺取重庆市党政机关一切权力，向全市发出了《紧急通告》。大会筹备处责成大会主席团在会后负责组成筹备处，准备建立全市临时最高权力机构。会上，将市委第一书记任白戈、书记处书记鲁大东、辛易之、孙先余、廖苏华及中共中央西南局宣传部部长刘文珍等揪到会场戴高帽、“喷气式”批斗，会后游街示众，并当众焚烧了刘少奇、邓小平像。大会向毛泽东主席发了致敬电。

这时，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的朱成昭，思想也开始发生变化。他自从看了彭德怀写的材料后，深受震动，和他的伙伴们一致认为：彭德怀说的都是实话。随着文革的进行，朱成昭在上海当副局长的父亲也被打成了黑帮，这些对朱成昭的思想无疑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当 1966 年 12 月，梅建明串联回到学校，朱成昭见面就问他：“你对文化大革命什么看法？”

梅建明说：“老干部已经检讨得差不多了，反动路线也肃清得差不多了，不该再没完没了地整下去了。”

朱成昭想了想说：“文化大革命是不是应该改弦更张了？是不是不要再这样搞下去了？我汇总以后，跟‘中央文革’谈一次。”

1967 年 1 月 4 日，朱成昭对王大宾说：“彭德怀的事你已尽心尽力了，我误会你了。对老头子的看法，你是对的。”

1 月 8 日，65 军到地院军训，支持“东方红”开展内部整风。“东方红”总部成立整风领导小组，由各联队、战斗队推举宫保

军同学任组长，发动大家给总部的头头们提意见。

1 月，朱成昭召开了一个“东方红”联队骨干的内部会议，分析文革运动形势。他在会上说，自己对文革的前途很担忧。中央文革叫干啥就干啥，今天打倒这个，明天又打倒另一个。中央被打倒的人太多了，老干部被打倒的太多了。他说：“我们跟在中央文革后面跑还跟不上，会不会犯打击一大片的左的错误？大家要思考、分析。中央文革现在搞的这样左的路线，有没有问题？符不符合毛主席的一贯思想？真有这么多坏人吗？陶铸不是刚提到中央来的吗，怎么又给打下去了？不好理解。”

很快，朱成昭的这次内部讲话就被传了出去。广播台勘探系二年级的两位同学以“丛中笑战斗队”的名字贴出大字报，揭发“东方红”总部朱成昭等头头有攻击和反中央文革的思想和言论。

“东方红二团”周永璋、蔡新平因为在“四进地质部”时与朱成昭有意见分歧，后来被朱成昭排挤出“东方红”核心组。此时，他们看到“丛中笑”的大字报，立即指责朱成昭和“东方红”总部头头炮打中央文革，要彻底揭发批判。“东方红”内部一下乱了起来。

与此同时，周永璋他们还根据“丛中笑”大字报的内容，加上他们的看法，将朱成昭的思想动向和言论写成材料，通过蒯大富送往中央文革。

在此前后，地院“东方红”派驻“三司”核心组的田春林也与朱成昭有过一次谈话，劝朱成昭与叶剑英的女儿、中央戏剧学院“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的头头叶向真分手。

这次谈话的起因是一天晚上，田春林到北京人艺找那里的造反派头头蔡安安，碰到了中央戏剧学院导演系女生王敏，她和叶向真是中戏的同班同学，听说田春林在北京“三司”核心组工作，就向他介绍了自己学校的运动情况。

王敏说，叶向真的“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不是造反派组织，而是假造反真保皇，是工作队的打手。叶向真是个投机派、保皇派。文革初期，中戏工作队是由解放军军事科学院派来的，叶向真的父亲叶剑英是军事科学院院长。工作队进院后成立了校文革小组并扶持叶向真当文革小组长，整了反工作队师生的“黑材料”。当 7 月下旬毛主席回到北京并开始批判资反路线的时候，叶向真见风向变了，也可能听到了内幕消息，就摇身一变扯起了造反的旗帜，在中戏率先成立了“毛泽东思想红卫兵造反团”。工作队撤出后，她又组织人到军事科学院去抢“黑材料”，冲击档案室并发生了严重冲突，打伤了军事科学院警卫战士。

而王敏参加的“红旗战斗队”才是真的造反派，少数派、挨整派，头头叫魏阳，也是她的同班同学。王敏提出申请，要求“红旗战斗队”参加“三司”。

第二天，王敏陪中戏“红旗战斗队”头头魏阳等人，又到劳动人民文化宫“三司”的办公处来找田春林。魏阳说他们学校被整过的同学至今都没宣布平反，“黑材料”也没退还。说到激动处甚至痛哭流涕。

听了他们的叙述，田春林对中戏“红旗”产生了极大的同情，也引起了他的震惊和高度的关注。在此之前，叶向真和她的丈夫刘诗昆一起带人曾到“三司”来过，采取封门、刷大标语等方式，

扬言要踏平“三司”，说“三司”是黑五类的保护伞等等，后来叶向真又去找朱成昭，要求中戏“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参加“三司”。此时“三司”也正在考虑朱成昭的意见，准备接受叶向真的“毛泽东思想红卫兵”。

为了弄清事情的真相，田春林请清华“井冈山”派到“三司”核心组的数力系一年级学生张云辉和他一起到军事科学院调查了解中戏文革的真相。之所以请张云辉一起去，是因为他有一辆摩托车，是清华大学的。二人骑着摩托车来到位于西北郊玉泉山下的军事科学院。警卫看了介绍信后叫出一名干部，将他们引入后院接待室。

不一会，进来一位中等身材的首长，那位干部介绍说是胡主任，即军事科学院教研馆主任胡秉权。大家相互介绍落座后，田春林开门见山直奔主题：

“我们来就是证实中戏‘红旗’魏阳他们反映的有关叶向真和中戏文化革命情况。”

胡秉权将军也毫不掩饰和盘托出：一、中戏工作队由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派出；二、工作队在中戏期间扶持成立了校文革领导小组，组长是叶向真；三、工作队在中戏领导运动期间也无例外地执行了刘邓错误路线，整了反工作队的少数同学，但在工作队撤出学校时，这些“黑材料”都全部移交给了校文革；胡秉权说：“我们是军事机关，要那些材料有什么用呢？”四、中戏“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来军事科学院抢“黑材料”并冲击军事机关档案室，是十分错误的，造成了极坏的影响。为了保卫档案室，军事科学院的警卫战士手挽手组成人墙，中戏有的人对战

士大打出手，造成战士负伤，有的当场昏倒。但战士始终坚持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原则。

田春林问胡秉权："叶向真明知这里没有'黑材料'，那她为什么还要策划这次行动呢？"

胡秉权笑笑说："赶时髦呗！"

田春林又问："为什么军事科学院要向地方文艺院校派出文革工作队？按照惯例，中央戏剧学院是文化部直属院校，工作队理应由文化部组织派遣，就像地院工作队由地质部派遣那样。"

胡秉权稍微迟疑后回答："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我们是奉命令而为。"

田春林又进一步追问："叶帅是你们的院长，向中戏派工作队是不是叶帅的意思？"

胡秉权对田春林的这个问题坚决予以否定，并且以长辈对晚辈的口吻说："万万不可将叶向真的问题和叶帅扯到一起，你们年轻人革命热情很高，但考虑问题往往不全面。"

从军事科学院调查回来后，田春林联想到朱成昭最近一段和叶向真打得火热，平常接触中又发现他对中央文革首长，对肖力、江青出言不逊的作派，感到发展下去十分危险。经过一番思想斗争，他决定将军事科学院调查之行的结果向朱成昭作一次长谈，并劝他与叶向真一刀两断。

这天晚上，田春林来到朱成昭住的宿舍，将军事科学院调查等情况和盘托出，并将自己对叶向真的看法以及中戏"红旗兵团"及其他文艺界人士对叶向真的看法如实告之，劝朱成昭远离叶向真，不要再与她来往。

田春林讲完后，看到朱成昭强压怒火，抽一口烟，对他解释说："我们和叶向真来往主要是想更多了解中央路线斗争的消息，避免走弯路。"

田春林说："我们不是可以通过肖力这条线更及时、更准确地了解上层路线斗争的信息吗？老兄，实践证明，我们'东方红'在这之前所走的每一步都得到肖力的点拨，并且每一步都取得了伟大胜利。"

朱成昭勃然大怒，猛一下站起来，脸色通红的说："田春林你以后在我面前少提肖力！"

田春林说："肖力怎么了？有哪些地方对不起你朱成昭和'东方红'了？"

朱成昭对我田春林说："田君，你以后可以继续支持中戏'红旗'，我以个人名义支持叶向真的'毛泽东思想红卫兵'。"

话说到这个份上，已经谈不下去了，于是田春林告辞退出，二人不欢而散。

田春林将这次与朱成昭谈话的情况告诉了伏庆是。朱成昭叫伏庆是转告田春林：若再干预他和叶向真的事就白刀子进红刀子出。

以后，朱成昭周围就少了一个田春林。

1 月 19 日晚，叶向真安排其父叶剑英在家中与朱成昭见面。但那天下午发生了京西宾馆会议上"打倒肖华"的事情，叶剑英到毛泽东处汇报。朱成昭在叶家等到半夜后，被告知会见取消。

1 月 24 日，陈伯达把中央文革办事组的王广宇叫到他的办公室，关锋也在场。陈伯达对王广宇说："我们看了一份地质学院

一个战斗队送来的材料，说朱成昭和地院‘东方红’的头头不和我们保持一致了，从造反派变成保守派了。你去找朱成昭传达我对他的批评，按我写的向他宣读。”

说着，陈伯达把一封“批评信”递给关锋。关锋看后，对王广宇说：“传达伯达同志的批评，口气尽可能婉转些，不要叫他感到有压力，批评他是爱护他。”

陈伯达马上说：“不！原原本本，逐字逐句地传达我的话。”

陈伯达这封信是 1 月 23 日写的，不太长，大约 200 字左右，但口气非常严厉、尖刻，带有严重警告或“最后通牒”的味道。内容是：“过去关锋、戚本禹同志受伯达同志委托和你们谈，过去关照你们，现在还有责任来和你们打招呼。听说你们要搞中央文革，还要斗到底。一定不要这样，不要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我们是无所畏惧的，招呼你们是为了照顾你们。如果你们不听，那就要陷入泥坑里去，那是自作自受。”

王广宇立即赶到地院，在朱成昭住的房间内，向朱成昭一个人宣读了陈伯达的批评信。朱成昭当场作了记录后，又和王广宇一起核对了陈伯达信的原稿。朱成昭很冷静，他问王广宇：“陈伯达同志这个批评是不是往下传达？是不是先向我们‘东方红’勤务组传达一下？”

王广宇说：“伯达同志没说，传达不传达，传达到什么范围由你自己来定。”

## 第 445 回：外事口，陈毅大会作检查　见林彪，亲自口述定“九条”

1 月 24 日下午 16 时 30 分，周恩来和中央文革小组遵守自己的承诺，在人民大会堂由周恩来亲自主持，召开陈毅“检查”大会，外事口各单位的群众组织均派人参加。大会是以国务院的名义召集的，李富春、李先念、叶剑英、江青、陈伯达、谭震林、王力、关锋等人出席。

周恩来首先说：“因为今天检查不可能占大家很多时间，不能对一个单位、一个部门的具体问题作检讨，只能原则性的，提纲要领，实质性的作检查。至于详细的问题，将来有可能在本部门座谈会和群众会上和你们一起座谈，这样比较合适，这是对人民内部矛盾采取的方针。”

话虽不多，但已经肯定了陈毅的问题是人民内部矛盾。

对于一些学生因为陈毅迟迟不做检查提出的抗议，周恩来解释说：“刚才有的单位向我们提出抗议，开会晚了。我们很忙，中央人手很少，有的同志还要动脑子、写文章。占去你们一些时间我们向你们道歉。我们力求准确，但也希望你们理解实际情况。陈毅讲完以后，还有其他同志讲话，现在请陈毅同志讲话。”

接着，陈毅在大会上念检查。这篇不到 3000 字的检查，是经周恩来再三修改、推敲后定稿的，其要点是：

一、在运动初期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犯了方向、路线错误。他说：“外事口执行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严重表现是：派出了大大小小的 50 个工作队或工作组。”“这批工作队

中，以张彦和刘新权两个工作队的问题最为严重。张彦工作队已成为全国闻名的坏典型。”“陈伯达同志、康生同志、江青同志最早发现张彦的错误，张彦就怀恨到心，不择手段的挑拨和陈伯达同志的关系，企图假借我的名义，对抗陈伯达同志。特别恶劣的是搜集材料，企图陷害陈伯达同志，陈伯达同志是我们党内杰出的理论家。我从 1944 年认识他以来，一贯很尊重他，向他学习了不少东西。陈伯达同志、康生同志、江青同志他们学习毛泽东思想学得好，他们有高度的无产阶级政治敏感，他们能很快发觉张彦的阴谋诡计，我却远远地落后，在事实暴露之后辨别出真假。张彦企图挑拨我和陈伯达同志的关系，无损于我们之间的团结，却暴露了他自己的反革命政治扒手的真面目。刘新权工作队也采用逼供信，整理黑材料等等办法，在外语学院镇压革命群众，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其他的一些工作队或工作组，也都程度不同地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各工作队和工作组所犯的错误，我应负很大的责任。”

二、犯错误的思想上的原因是因为对这场文化大革命“很不理解”。他说：“八届十一中全会，毛主席纠正了这条错误的路线，我开始觉悟到，运动初期我不自觉也站到了资产阶级反动立场上，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我在中央的两次会议上，都沉重地检查了自己的错误，决心改正错误，站到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立场上来。”“但是，十一中全会以后，我纠正错误很不彻底，在执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中，还继续发生了一些错误。表现在：对群众批判工作组的错误，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支持得不力，过多的强调保护干部，

原谅工作队的错误，在少数派和多数派之间调解的立场，强调避免冲突，对左派支持的很不够，没有抓住运动的主流，过分重视了非本质，作主流方面的问题，从纠偏的角度出发，列举偏激的事大讲政策，说了很多的错话。”

三、他检讨了在军事院校师生大会上的讲话。他说：“在军事院校革命师生两次大会上的讲话，错误很严重，打击了左派，压制了革命群众。讲话稿流传各地，影响很大，对进一步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深入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起了阻碍作用。”

四、检讨了文革前的错误。他说：“回溯到文化大革命以前，我也曾讲过不少错话，其中错误特别严重的是 1962 年广州文艺工作者和科学工作者会议上的讲话。那次讲话的主要错误是对知识分子无原则的捧场，评价过高，而没有强调政治上、思想上的改造，以致被一部分拒绝改造的知识分子所利用。还有 1961 年，对北京高等院校应届毕业生的讲话和以后几次关于学习外语的讲话，在红专关系上都没有强调突出政治，而过分强调了专业，助长了一些人的不闻政治倾向。这些讲话有的曾公开发表，流毒全国，影响很坏，这是我值得深刻检查的。”

五、欢迎大家继续给予批评、帮助，以便“改正错误”。

陈毅讲完后，周恩来请陈伯达讲话。陈伯达说：“我代表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同志向大家问好！我觉得陈毅同志的讲话很好。像这样的老同志在群众面前以小学生的态度坦白、谦逊、正确地对待自己的错误，表白自己彻底改正他的缺点和错误，这是我要向他学习。陈毅同志的讲话我认为有一个缺点，就是对我的赞扬，

我不敢当，我愿意同大家一起，同陈毅同志一起，继续好好学习毛主席著作，好好当毛主席的小学生，当群众的小学生，我还要向你们学习。”

毫无疑问，这是中央文革的态度。

最后，周恩来发表讲话，他说：“我完全同意刚才陈伯达同志的讲话。我同意他讲的前段和后段，当中一段他是谦虚话，我现在不想多说，在结束会议前我讲三个问题。”

周恩来首先指出：“陈毅同志的检讨是经过了一个痛苦的认识过程，我们在分工方面，他管的事情多，不能再加重陈毅同志的工作”；“他为党工作了 40 多年，当然也犯了不少错误，但晚年还是跟着毛主席走的同志，希望大家以同志式的态度、以阶级兄弟的态度来帮助他”；“这样，我才可以比较放心外事口的事，让他多出面，我把力量转到别的口子上去”。

第二，“外交、外事口的重大方针、政策、路线确实都是我国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制定的。”所以，“17 年来我们在对外一系列上已经形成了很辉煌的奇迹。”

这是在婉转的告诫那些学生，不要为了“打到陈毅”，而去延伸声讨建国后的外交政策。在那个“怀疑一切”的年代，连林彪、江青都敢贴大字报，对毛泽东发动的文革都敢质疑的学生，什么事情都可能做出来。

周恩来对外事口各个单位，各个部门正在进行的夺权及正在筹备整个外事系统的总联络站的筹备工作表示：“我们愿意派些同志帮助你们进行。使你们能够开好外事系统联络机构的群众大会。”

群众鼓掌表示欢迎。

整个大会，用一个半钟头便告结束。

虽然 1 月 24 日凌晨，周恩来、江青在接见军队造反派代表时劝告他们，总后勤部部长邱会作不是敌人，但是没有效果。就在当天，邱会作还在接受残酷的批斗。1 月 23 日、24 日两天，上海第二军医大学“红纵”、军艺“星火燎原”、后勤学院的造反派在总后大院大操场组织召开“彻底揭发控诉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邱会作大会”。

24 日上午的批斗会由二医大钱信莎主持。邱会作一被押上台，钱信莎就将他的领章帽徽扒掉了。一个大个子走上前去，一拳打在邱会作的胸前，邱会作侧身倒下，大个子又将邱会作拉起来，给他挂上一块几十斤重的铁牌子，让他跪下，进行“向毛主席请罪”、“向造反派请罪”、“向革命群众请罪”、“打倒镇压群众的凶手”、“打倒刘邓反动路线”、“打倒反革命分子”、“文化大革命万岁”、“向造反派致谢”等 7、8 种体罚行为。他们还给邱会作剃了阴阳头。被打倒在地的邱会作，大口喘息着，而批斗他的那些造反派依然在大声的喊着：

“起来，你糟蹋女孩子的劲头到哪里去了？”

“不要耍死狗，交待问题，你还奸污多少女人？”

邱会作当天被打掉两颗门牙，打断一根肋骨，肩胛骨骨膜、两片肌肉断裂，造成终生残疾。

躺在地板上奄奄一息的邱会作，当天下午趁看管的人不在，在地上检了个纸烟盒，用铅笔给毛泽东、林彪、叶剑英写了一封求救信：

现在我有生命危险，向主席、林副主席、叶帅求救。

文化大革命万岁！

毛主席万岁！

他将这封信交总后保卫队人员、自己原来的警卫员蒋平安，让他给邱会作的孩子送去，设法转送到在通信兵后勤部工作的邱会作的妻子胡敏手里。

胡敏这几天已多次打电话向叶群求救，说是第二军医大学的“红纵”把邱会作给抓去了，请求林彪、叶群出面救护。全军诸如此类众多的求救请求很多，当叶群接到秘书传来胡敏的求救口信后，曾不屑一顾的说：“活该，邱会作的小姘头一大串，现在人家都起来揭他，叫我们怎么说？”她没有理睬。

1 月 24 日这天，胡敏收到邱会作的这封求救信后，立即给中南海毛泽东、周恩来和毛家湾林彪办公室打电话。她语调凄伤、声音颤抖地在电话中对林彪的秘书张云生说：“我们老邱天天挨打，现在快不能动弹了，快被折磨死了！.....”

言语未尽，已泣不成声。

放下电话，张云生向叶群做了汇报。听完电话记录，叶群这次没有再骂邱会作，而是把电话记录要过去，立刻去找林彪。

在林彪的办公室里，叶群对林彪说：“这里有份邱会作的老婆胡敏上午来的电话记录。”

“念念。”林彪一边说，一边划着一根火柴，眯着细眼盯住那火苗。一会儿，火苗熄灭，冒起一缕白烟，他把燃尽的火柴梗举到鼻端，嗅了嗅那股轻烟，接着，他又划燃一根火柴，……

叶群念了起来：“林副主席、叶主任，我们老邱被二医大红纵

的造反派抓去了，他们开批斗大会把老邱斗得死去活来，连心脏病也发作了，眼看着就要折磨死去。我们老邱平时对林副主席一贯忠诚，对叶主任处处尊重，求林副主席和叶主任快救救他的命吧！”

林彪思索了片刻，起身取过纸笔，匆匆写了几个字。然后让叶群拿着去找江青。

叶群来到江青住地，正好戚本禹也在旁边。叶群递上林彪写的字条，叙述了邱会作几次求救的情况，并说：“邱会作是个很好的同志，可就一点不好，是个‘花花太岁’。”

江青叫来陈伯达。随后，陈伯达随叶群一起去了毛家湾。

晚上 21 时左右，叶群兴冲冲地走进秘书办公室，将一张纸条往办公桌上一放说：

“首长决心保邱会作。”她指了指那张纸条继续说，“这是首长和老夫子亲笔写的。老夫子今晚来见首长，我把他抓住了。你们都来看看！”

几个秘书上前一看，只见上面写着几个鸡蛋大的草体字：

立即放出邱会作。

林彪

陈伯达

前边几个字是林彪的字体，在林彪的签名下边，是陈伯达的亲笔签名。

“老夫子是中央文革组长，有了他的签字，就更好办了。”叶群抑制不住兴奋说道，“这个事我得亲自出马，邱会作是首长的老部下，能够见死不救吗？”

她接着布置秘书张云生和李春生以及负责警卫工作的刘吉纯陪她一起去总后大院，另外还要带几名警卫中队的战士，以便应付“意外”。同时让郭连凯秘书在毛家湾守着电话，一旦他们在总后被学生围住不放，就立刻打电话给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让他派部队去“解围”。

布置完毕，叶群领着几个人分乘两辆小汽车驶往总后大院。秘书坐前车引路，叶群与警卫随后。

一天傍晚，陈伯达给北航“红旗”韩爱晶打电话，说北海公园大桥那边城墙上贴着邱会作的大字报，有很多丑事，让韩爱晶派人去把它盖上，不要说谁让去的。

韩爱晶告诉了“红旗”几个主要负责人之后，通知一个系勤务员调了几卡车同学来到北海公园大桥。这时，天色已晚。韩爱晶看见城墙上贴着很多大字报，大都是军委总部机关和军队院校贴的，其中很多大字报是揭发邱会作男女关系的，有的还是总后勤部机关女兵的口述。

北航的的学生就在这些大字报上刷上浆糊，再贴上大纸，写上大标语。路过的人过来张望，觉得奇怪：怎么把人家才贴的大字报盖上了？但是一看是北航“红旗”的，也没有说什么。

## 第 446 回：施援手，邱会作零点得救　稳军队，连夜开联席会议

1 月 24 日这天，林彪、叶剑英、徐向前先后同意聂荣臻 1 月 23 日主持起草的《中央军委关于国防科委所属试验基地不开展“四大”的通知》。当晚，徐向前坐车直趋林彪住地毛家湾。林彪的秘书见徐向前突然到来，报告林彪后，将他领进会客室。

徐向前走进会客室，看见林彪和陈伯达正在交谈。稍事寒暄，徐向前便向林彪汇报了正在召开的军委碰头扩大会议的情况。他对林彪说:

“这样乱下去不行,军队要稳定,要搞几条规定,不然,整个局面就不好收拾了!”

林彪连连点头说：“是的……”稍事片刻，林彪又说：“军队这样下去很危险，要搞一个‘条条’。请叶剑英、聂荣臻和杨成武过来研究一下。”

陈伯达见状，便起身告辞。

叶剑英、聂荣臻和杨成武很快来到毛家湾。经过讨论，林彪将大家的意见当场归纳为：不准随便揪斗军队领导人，不准冲击军事机关，不准泄露军事秘密，不准到基层部队串联，不准成立跨单位、跨地区的战斗组织，部队搞四大必须加强党委的领导等。他一边口授，一边让秘书郭连凯记录并整理出来，共九条。徐向前、叶剑英、聂荣臻看了,都表示赞成，建议连夜召开中央军委、中央文革联席会议讨论后，以军委命令的形式发下去。

林彪同意，让秘书通知陈伯达。

徐向前、叶剑英、聂荣臻从毛家湾出来后，即赶往中央文革所在地钓鱼台召集中央军委和中央文革的碰头会议。徐向前还特意给陈毅打了电话，请他到钓鱼台开会。

他们到钓鱼台时，陈伯达及中央文革的人已在那里，他们还将周恩来请来。

平时一向积极列席中央文革会议的叶群，这次没有参加。因为此时她正带着秘书前往总后大院搭救邱会作。

总后机关大院里，夜深人静，多数办公室里没有灯光，各个角落都黑乎乎的，很少有人行走。

两辆小汽车直向中心办公楼驶去。他们在一座有灯光的楼外停了下来。

张云生下车到楼里探问消息。一位 30 岁左右的干部用吃惊和怀疑的口气问：

“你是哪里的？”

“我是林副主席办公室的，叶主任就在外面的汽车上。我打听一下，邱会作被群众组织抓走之后，现在什么地方？”

闻听此言，那人茫然不知所措。他隔着窗子望了一眼停在外面的汽车，半信半疑地打量了一下张云生，这才慢吞吞道：

“邱会作就在这个大院里。你们想找他吗？”

“对，我们想找他。”

“你们从这向东走，再往南拐，遇横道向西拐，右侧第二幢楼便是。”

叶群一行很快找到了关押邱会作的那座楼。

学生们听说叶群来了，个个兴奋异常，有的女生甚至拉着叶

群的手欢跳起来。这也难怪，学生们是响应“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号召才起来造反的，那满腔的“革命豪情壮志”自己不必待言。而今“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重要成员、又是副统帅夫人的叶群驾到，红卫兵小将们焉能不激动万分？他们众星捧月般地拥着叶群走进一间会议室，请叶群坐在会议桌前排中央，大家则分坐在四周。

“叶群同志，我们真想不到您会来到这里。”一个 20 岁左右的女学生兴高采烈地对叶群说：“我们见到您，心情激动极了！”

在场的许多人都附和说：“太好了。”

叶群亲切地对大家讲道：“同学们！红卫兵小将们！林彪同志让我代表他向同学们问好！林彪同志听说大家住在这里，派我来看看大家。他让我告诉你们，他非常支持你们的革命造反精神！…… ”

每句话都博得学生们的长时间真挚热烈的掌声。

“请叶主任代向林副主席问好！” 有一个学生带头喊道。

“谢谢！我一定转到。哪位同学是负责人？”叶群问。

“我是。”一个坐在叶群对面的男学生回答说。

“你真年轻。”叶群夸奖说，“这样小年纪，就能领导这么多人，真不简单。我要向你学习，向你致敬！”

“向叶主任学习！向叶主任致敬！”那个学生带头呼起口号。

“向小将们学习！向小将们致敬！”叶群回答说。

接着，叶群又装作关心的样子问了些问题，绕了半天圈子，终于书归正传。她找到学生中间负责的男生问：“听说邱会作在你们这里，是吗？”

“是，在我们这里。”负责人答道。

“邱会作这个人太坏了，”另一个学生插话。“他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疯狂镇压群众。到现在态度还很坏。我们要求，坚决把他打倒！”

“邱会作在总后机关也干尽了坏事。他品质恶劣，阴一套，阳一套，疯狂对抗毛主席……”说话的是个 30 岁上下穿军装的人。

“你也是二医大的吗？”叶群看这个军人的年纪不像学生，问了他一句。

“不是．我是总后机关的。”

叶群不再追问什么，赶紧调回话头，继续对学生们说：

“今天能见到大家，我们很高兴，大家反映的情况，明天我一定很好地向林彪同志汇报。对同志们造邱会作的反，林彪同志非常支持。但听说邱会作现在的身体不太好。林彪同志的意思是：放他出去把病治一下，这样如果他病情恶化了，大家也没责任。你们看好不好？”

一听说要放邱会作，小将们顿时显出不高兴的神色。“邱会作做尽坏事，执行资产阶级路线，就应该坚决打到批臭，怎么能轻易放了他？”他们心里虽这样犯嘀咕，但表面上可不敢硬顶。几十个人屏住呼吸．大眼瞪小眼，谁也不吭气。

叶群见“红卫兵小将”们默默抵制，终于沉不住气了。她慢慢地从口袋中把“圣旨”掏出来，尽量心平气和的说道：“不瞒同学们说，我这次来，是执行林彪同志和陈伯达同志给的一项任务。”

她一边说，一边把纸条递给学生负责人看了看，然后赶紧收回来，接着又向四周展示了一遍，继续说道：

“这是林彪同志和陈伯达同志亲笔写的字：立即放出邱会作。大家不会怀疑吧？”

叶群把小纸条一亮，收到了立竿见影的成效，在场的二医大“红纵”和总后机关造反派的头头全都惊呆了。他们立即明确表态，愿意放出邱会作。那位学生负责人说：

“我们坚决执行林副主席和中央文革的指示，同意邱会作去看看病。但说心里话．他出去后，我们不放心。”

叶群答道：“不要紧，你们把他交给我。你们要相信我们，我们绝对不会包庇邱会作的。我们承认你们是革命行为，承认你们的组织是革命组织。”

“林副主席是不会受骗的，现在不能说林副主席已经受骗了。不能给林副主席作结论。如果说林副主席已经受骗了，那就不会让我们来做调查研究了。刘志坚是反对紧急指示的。林副主席起草的紧急指示，刘志坚在原稿上划了很多，这个证据已经被我们抓住了。”

有人问：“今后我们要批判他，能保证随叫随到吗？”

叶群道：“这个没问题。大家要批判他，可以找全军文革联系。”

“我们见叶主任一次，机会难得，我们有一大堆心里话要说，有一大堆问题想解决。可以提一提吗？”一个学生问道。

“不行了，”叶群故意看看表，撒谎说：“我很愿意和大家在一起，好好谈谈心，但实在太忙。你们看，还有一个几万人的群众大会等着我去参加。邱会作的问题现在不能作结论，运动要继

续往下搞，对邱会作的问题要继续揭深揭透。揭发和批判邱会作的问题，不能算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这是我个人的意见，大家的意见我回去向上反映。”叶群起身，表示就要离去。

学生们无奈，只好放掉他们批斗了好几天的邱会作。面容憔悴的邱会作从关押他的房子里走出，在警卫人员的搀扶下，跟着叶群走了。

邱会作上了叶群的坐车走在前面，秘书的车跟在后面。刚到总后的大门口，叶群的车突然掉头向院子另一个方向开去。后面的车莫名其妙，也只能跟着绕圈。原来他们后面还跟着一辆车。叶群见甩不掉这辆车，只好在转弯处停了下来，只见后面车上下来的人原来是总后的政委张池明，他听说叶主任来了，总应该过来见见面吧。叶群此刻哪有心思与他搭话，应付几句就分手了。

他们出了总后勤部大院，开进市内，拐进了翠微路 5 号总参招待所的院子里。

下了小汽车，叶群让几个警卫人员扶着邱会作进了一所房子。刚走进房间，邱会作当着工作人员的面便给叶群跪了下来，痛哭流涕地说：“叶主任，你可救了我啊！……”

叶群赶紧将邱会作扶起来坐下，然后对他说：“我是奉毛主席、林副主席、周总理、陈伯达组长、叶剑英副主席的命令来救你的。这里是杨代总长暂时住的地方。现在你就在这里休息，以后到什么地方去，叶副主席早已有安排。”

邱会作后来回到西山住地，立即写下题为《零点得救》的日记：

零点得救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五日零点四十分，是我新生的时刻，是我一辈子，是我的妻儿子女一辈子不能忘记的时刻。

我听到“林副主席办公室派人去”，我就知道得救了，抑制不住的感动从内心象炸弹一样爆发出来。当时我的心脏阵阵发痛，我服了一片药之后，我也不管它了。但是我用最大的忍耐忍住了没有掉泪，因为我发誓了。

最后她（叶群）又说：林总要我六小时以内办妥这件事，否则林总就要亲自到你们机关找你去了。他的脾气你是知道的，到时我不回去，他真要出来了，可了不得。

林总亲自挺身而出，并派夫人去接一个人，以我所知还是头一份，写到这里又不能不感动，不能不使人流下温暖的热泪。

邱会作

一月二十五日

注：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五日林副主席派叶群同志来我们院子里抢救我。从八点到十二点，林副主席打了几次电话询问情况，他的汽车加温三次，准备亲自到我这里来。

当叶群他们回到毛家湾时，已过午夜 24 时了，郭连凯秘书说：“你们这么长时间不回来，可把首长急坏了。他以为你们准是出了什么事，一直不肯休息。如果再不见主任回来，他就要亲自去总后大院了。”

就在叶群前往总后搭救邱会作的同时，中央军委和中央文革的联席会议也在钓鱼台激烈的进行中。徐向前首先讲了产生这个

文件的因由，让人念了“九条”的内容。经过逐句逐条唇枪舌剑的激烈争论，会议一直开到第二天的凌晨 3 点多钟，终于通过了“七条”。散会时，叶剑英说：“今天是舌战群儒！”

周恩来听到后马上指出：“这是错误的，你们把我们看成是另一圈了。”

这时陈伯达赶紧把文件稿塞到徐向前的口袋里对他说：“已经通过了，你快点走吧。”

回到住处，叶剑英立即打电话给林办说：“我们昨晚在钓鱼台讨论军委命令的稿子，争论非常激烈。我们拿去的九条，通过了七条，还有两条，就是军内运动必须在各级党委领导下进行；另一条是各开展四大的单位不能成立跨系统、跨行业、跨行政单位的战斗组织。暂时很难通过。”

稍停片刻，叶剑英又说：“请你报告林副主席，通过七条就很不容易了，应当争取早些把它发出去。剩下的那两条，可以在以后再争取机会。”

林彪一般早晨 6 点左右就起床了。秘书将叶剑英的电话记录报告林彪，林彪点点头，然后问：“通过的七条，送回来了吗？”

秘书说：“还没有。”

当天，徐向前也给林彪写信，汇报了刚结束的中央军委和中央文革联席会议情况。他在信中写道：“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支柱，一面要大力支援地方的真左派，一面又要进行内部的阶级斗争，因之必须要稳当点才好办事。否则，军队不易控制，指挥失灵，副作用即会更大多了。”

1 月 25 日，《解放军报》发表题为《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无

产阶级革命派》的社论，指出：人民解放军“不能折中，不能调和，不能中立，……应该鲜明地、积极地支持无产阶级革命左派，……对于那些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和反革命组织，必须坚决镇压，实行无产阶级专政。”

这天，中央军委对山西省军区第二政委张日清的报告批语道：“山西省军区第二政委张日清同志的报告是一个符合毛泽东思想的好报告，现将林副主席的指示和张日清的报告转发给你们，请引起注意。”从此，张日清被誉为全军支左的一面红旗。

当天中午，毛家湾收到钓鱼台发来一份铅印的军委命令草稿清样，就是昨夜讨论通过的那“七条”。林彪看后，在上面批了“即送主席批示”，同时附了一封给毛泽东的信，说明拟订“七条命令”的情况。还将徐向前的信及军委收到的关于各地军队受冲击的情况报告也一并附上。林彪在信中写道：

昨天下午徐向前同志来谈到，军队许多高干被随便抓去、任意抄家、变相体罚，有些机关已处于瘫痪状态，有些处于半瘫痪状态。此次来京开会的干部，心情都很紧张。接着聂荣臻、叶剑英、杨成武同志来继续谈了这些问题。大家一致认为，面对这种情况，一方面要使军队文化大革命更有序的开展，一方面要去掉一些使军队发生不稳现象和不适合于作战部队与指挥机关的具体做法。因此，需要发出新的指示，使运动能正常开展。他们在这里谈了大意后，即到中央文革开会，与文革小组成员、总理、陈毅共同讨论，写出七条规定。

林彪随信所附军委收到的各地军队受冲击情况是：

一、徐向前 1 月 25 日上午 10 时给林彪的信，信中报告了“七

条”讨论情况，并重申：“总之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支柱，……必须要稳当点，才好办事。否则军队不易控制，指挥失灵，副作用即会更大多了。”徐向前在信中还提出：“全军文革工作，或直由中央文革领导进行，由你直接挂帅抓总。层次不宜多设为好。否则甚易误事。我只能作一点具体工作，免吃老本。”

二、1 月 25 日上午 9 时，南京军区许世友司令员及其秘书的电话记录。许世友的电话记录内容是：“现在军区很乱。全国三军院校各造反团体，都在南京闹。军区 3 个常委被罚了跪，政治部正、副主任都罚了跪，后勤部正、副政委被拳打脚踢。司令部把张才千副司令抓走了，现在下落不明。”10 时，许世友秘书报告“昨天下午，军区首长被罚跪、撕掉帽徽、领章”的具体人员名单。

三、1 月 25 日上午 10 时，全军文革办公室一工作人员的电话记录，内容是：“乌鲁木齐第二造反司令部、军区步校造反团、新疆军区参加五大的代表共五、六百人，1 月 23 日到司令部大楼，要开大会，罢官夺权。”

四、邱会作给林彪、叶群的信和邱会作妻子胡敏的电话记录，反映邱会作被总后造反派揪斗的情况。

五、1 月 25 日下午 13 时 40 分南京军区王必成副司令员的电话记录，内容有二：“一、许司令来电话说，可调一个营的部队，保护军区机关，如果有坏人来搞，可以自卫。二、如果有人来搞我们军区的指挥所，如何处理。”

25 日，毛泽东召集陈毅、叶剑英、徐向前、刘伯承等人研究

军队问题。当天，军委文革小组向毛泽东呈送《军队文化大革命运动情况要报（第五号）》，《要报》中刊登了“关于夺权的若干情况和问题”。

## 第 447 回：发社论，中央支持晋夺权　遭囚禁，关押中卫恒身亡

在北京炮轰康生期间，山西“太工红旗”听说刘格平和康生、关锋解放战争时期曾在山东渤海军区一起工作过，而此时山西大学也在太原贴出了炮轰康生的大标语。于是，“太工红旗”就怀疑康生和关锋在山西夺权问题上可能背着中央搞了什么鬼，于是又派出第三批代表，由王步祥带队赴京。临行前，“太工红旗”负责人李青山亲自交待他们，到北京后不要找康生、关锋，直接向周恩来、江青反映情况。

“山西革命造反兵团”的刘灏对杨成效的领导山西的夺权也不服气，心想我“兵团”能把市委大礼堂的天翻了，能把五一广场的天翻了，就不信眼下翻不了你杨成效这个天！1 月 24 日傍晚，刘灏决定奇兵突袭，亲自带着五中“井冈山”的小将们直奔省委，逼迫刘格平表态，罢免杨成效的总指挥职务。但令刘灏和他的小将们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当他们刚刚来到省委门口，即将喊着口号要发起向省委的冲锋时，省委大门口的喇叭突然传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音员高亢而嘹亮的声音，是在播放“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的那份《第一号通告》。

这不是中央的声音吗？豪迈的五中“井冈山”战士们突然豪迈不起来了。他们的司令刘灏倒吸一口凉气，头上也沁出了一滴滴冷汗：“啊呀妈呀，中央这是肯定山西的夺权了，也就是说，毛主席和党中央正式肯定杨成效这个总指挥了。”

这还还折腾什么呀，赶快撤吧！

1 月 24 日晚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了《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通告》。这份《通告》一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参与夺权的人马顿时精神大振，当即欢呼雀跃。很快，街道上有敲锣打鼓的，有燃放鞭炮的，游行队伍也开始出动，欢庆胜利，欢呼党中央的英明决策，整个太原沸腾起来了。

与此同时，批判“太工红旗”的大字报、大标语也铺天盖地，都说“太工红旗”反对夺权罪该万死。“太工红旗”设在省委机关大门口的广播站，首先被砸了个稀巴烂。

有人揭发：在夺权的时候,走投无路的卫、王、王在北营仓库曾议论要投奔“太工红旗”，这表明“太工红旗”是“假造反,真保皇”。

“太工红旗”气得在太原工学院电机馆前的马路上贴出大标语：“青山不老,红旗不倒”，随即又被对立面说成是吹捧“太工红旗”的坏头头李青山。

山西省军区的部队也到太原工学院武装游行,“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也放出话：“红联站”不开除“太工红旗”就休想参加总指挥部。“太工红旗”遭受到空前的压力。

此时，“太工红旗”首先想到的是：“应当立即到五一广场去向毛主席请罪，向社会承认错误,表明痛改前非的决心。其次是应当立即整风,找出错误根源,争取得到刘格平和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的谅解和接纳,以便在他们的领导下,继续紧跟毛主席干革命。”

但是“太工红旗”的一把手李青山怎么也想不通，不知道自己错在哪里？他躺在床上，一言不发。随后又用被子蒙头，嚎啕

大哭。他已打定主意，宁可坐牢， 也不违心地到五一广场请罪。

他的同学心急如焚，生怕请罪迟了刘格平会说他们顽固抵抗、拒不认罪，因此把李青山也抓起来，把“太工红旗”打成反革命组织。众多老师来到李青山的床前苦口破心，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劝他以大局为重，赶紧带领大家到五一广场向毛主席去请罪。张素萍、金季凤两位老师更是声泪俱下，而李青山当时却心如死灰，抱定了决不屈服的决心。

无奈之下，队部决定由队委王步祥率领“太工红旗”的战士到五一广场向毛主席请罪。

第二天一上班，省委“七一公社”的李辅就去西院找刘志兰，将“七一公社”夺来的那枚中共山西省委的大印交给她，并催促其尽快帮助“七一公社”参加“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在路上，李辅看到山西大学“八八”请罪的队伍。

1 月 25 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山西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的社论，并且使用了“毛主席支持下”的提法，表示了中央对山西“112 夺权”的支持。同时，《人民日报》还全文刊登了“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的《一号通告》。

中央对山西夺权的公开表态，使山西省委、省人委的干部立即意识到卫恒、王谦、王大任等人问题的严重性。他们中间的不少人，特别是被认为“长期受到卫恒、王谦、王大任等人排斥”的原晋察冀和晋绥干部中的相当一部分人，迅速向刘格平、刘贯一、袁振等人靠拢。在山西干部圈子里原本就流行着这样一句顺口溜：“太行的天下，太岳的党，晋绥干部后娘养，晋察冀干部歇凉凉”。还有受过省委处分的部分干部也表示“支持刘格

平”。

但是，对山西省委的领导人来说，这可是灭顶之灾。省委常委中有人听了广播和看了社论之后，竟然流下了眼泪。赵雨亭、刘开基当时正在北京东方饭店等待周恩来和中央文革小组的接见，以表明他们不同意夺权并请示解决山西省委在文革中的组织问题，周恩来也表示准备接见他们。国务院秘书长周荣鑫三次通知赵雨亭和刘开基，说周恩来总理准备接见。可是未等周恩来接见，赵雨亭从《人民日报》上看到报道山西夺权的消息和社论，认为这是党中央的态度，也就不再找周恩来谈了。但赵雨亭对此很不理解，不相信夺权是正确行动。很快他和刘开基就在东方饭店被刘格平和杨成效的“山西造反派驻京联络站”揪住批斗，押回太原关押。

此时，山西各界人士怀着不同的心情学习《人民日报》1 月 25 日的社论。对照形势，对照自己，都在转弯子，自觉地，努力地要与“毛主席和党中央保持一致”。

紧跟刘格平夺权的组织，从头头到普通成员，捧着这篇社论热泪盈眶；反对刘格平夺权的组织，也开始一边高喊支持刘格平和杨成效的总指挥部，一边朝着各种目标去夺权了。

原本还想要去反夺权的“兵团”司令刘灏的脑袋瓜子疼了，也怕了。他以最快的速度，做出了转弯子的表态，“兵团”的大标语不到一天就刷满了省城的大街小巷：

“坚决支持 112 夺权！”

“坚决支持刘格平同志！”

“坚决支持工人阶级杨成效！”

“誓与决死纵队团结、战斗、胜利在一起！”

“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的革命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

在 1 月 14 日太原散发的《一号通告》上,只有“六中 32111 战斗队”的名字，没有“山西革命造反兵团”的名字,但是，在 1 月 25 日《人民日报》刊登的“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名单中,“32111”的名字就被“山西革命造反兵团”所代替。

刘灏暗自庆幸天不灭曹，却又由不得暗暗感叹：政治斗争真他妈的凶险！

1 月 25 日，山西省会太原的五一广场上人山人海，几十万造反大军在这里召开誓师大会。大会由杨承效主持，刘格平、张日清、刘贯一、袁振、陈守中到会。

刘格平在讲话中表示“坚决和革命造反派奋斗在一起，战斗在一起”。

张日清代表驻山西的解放军全体指战员宣布：“坚决支持革命群众和革命造反派，如果你们需要部队支持，我们立即派出部队，支持你们，援助你们。”还称：“我们坚决镇压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左派的反革命分子，反革命组织，如果他们动武，我们坚决进行还击。”

在红旗翻卷的主席台上，陈永贵、李顺达、解悦这 3 位著名劳模与杨成效等造反派首领坐在一起谈笑风生。陈永贵的胳膊上还戴着周恩来总理亲手送给他的红卫兵袖章。

山西有几位全国著名的劳动模范，其中最有名的就是陈永贵和李顺达了。这两位全中国最有名的庄稼汉在山西举足轻重，谁都想拉。不管是谁夺权，有了这两位喝过毛主席的酒，得过毛主

席的批示和表扬的人物的参与、支持，哪怕只是声授，其地位也会大不一样。

开始，是太原纺织厂的女劳模解悦从太原给李顺达打来长途电话，动员他出山：

“老李！喂！老李，赶快决定，喂，劳模都要出山啊！你吭声呀！你咋不说话？喂！革命形势需要你出来啊。喂！”

李顺达吞吞吐吐的答道：“情况我不大了解啊！是啊，我身体也……，啊，看看吧，是啊，我看看吧，再联系吧！”

李顺达放下电话，心里直犯嘀咕。不出山？会不会闹个对抗文化大革命？出山？夺共产党省委的权不是闹着玩的！除了上海这个直辖市，省级夺权毕竟还没有先例。他忽然想起了老搭档陈永贵：

“给我挂昔阳，陈永贵！”李顺达拿起电话，吩咐县总机。办大事前先看看左邻右舍的动静，这也是中国农民处世小心的传统习惯。

“喂！老陈吗？我是李顺达！”

“啊，老李呀，我早就等着你的信呢！”陈永贵笑道。

“老陈，你说咋办呀？”李顺达劈头便问。

“什么咋办？啊？哈哈！”陈永贵问。

李顺达将解悦打来电话的事说了，刚讲完，陈永贵就说道：“老李呀，你拿个主意吧！”

李顺达道：“我就是问你哩！你倒问开我啦！你去不去呀？”

陈永贵道：“哎呀，老李，你去我就去！”

李顺达也同样答道：“哎呀老陈，你去我就去！”两个人聊

了一会儿，最后相约各自从家里出发，共赴太原参加造反夺权。

在陈永贵与李顺达相约赴太原参加造反之前，二人已经有了联合行动。当时文水县出过一件事，北京的一批红卫兵大闹文水，将原昔阳县委书记张怀英抢了出来。文水方面马上发出追捕令，搜捕逃亡的“反革命分子”张怀英。消息传到昔阳，县有关方面估计张怀英可能逃往大寨，便派人严密监视了通向大寨的道路。陈永贵听说了红卫兵抢人的举动，恍然大悟地说道：“噢，总理给我袖章，叫我们自己解决问题，原来是这个办法呀！”于是，他也让郭凤莲组织起红卫兵救出张怀英。并一度与西沟李顺达手下的红卫兵联合，统称“太行红卫兵”。

从文水逃出来的张怀英果然打算躲进大寨。他没敢走大路，绕了一个大圈子，从虎头山翻过来往大寨走。尽管这条路很偏，县里派出的监视人员还是发现了这位逃亡的“反革命分子”，便立即召人追捕，县里的摩托、车吉普车火速出动。

这时，已经有人向陈永贵通风报信了，陈永贵马上派出大寨的贾进才、贾承富等人提着镢头去接张怀英，把他背到正在修梯田的小背峪沟的石窝里躲了起来。追捕的的人在山梁上喝令站住，贾承富挥着镢头叫：“狗日有种下来，下来哇！”追捕者见对方人多，又是谁也惹不起的大寨人，便不敢下来，走了。过了两天，陈永贵又派人秘密护送张怀英到太原，请省里将其保护起来。

1967 年元月中旬，陈永贵和李顺达如约会师太原，他们与另外一些劳动模范一起在《山西日报》上发了一个联合声明，表示坚决支持省城造反派的革命行动。造反派的腰更硬了，劳模们也

更红了。

1 月 25 日，山西省军管会正式宣告成立。

1 月 26 日，省军区和 21 军指战员在五一广场武装集会，支持“112 夺权”，刘格平、刘贯一、袁振到会讲话。会后，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武装游行。《山西日报》为此发表题为《敌人不投降就叫他彻底灭亡》的社论。

这天，太原工学院“红旗战斗队”就其发表过的“三评”、“两告”问题，在五一广场“向毛主席请罪”。但是，“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还真的以请罪不是李青山带队进行的而大为不满，其下属组织贴出大标语，说“太工红旗”是假检查真顽抗。“太工红旗”几次请罪都不能过关。

刘格平的核心小组和杨成效的“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再次对“红联站”的那些夺权行为进行反夺权。他们派出大批人马，组成造反夺权工作队，对被“红联站”夺了权的省直部门和各个地市，进行了“再次夺权”。

张日清派出数十辆汽车，满载全副武装的解放军指战员进入太原纺织厂，宣布“工人兵团”下属的“太纺红卫兵”是“反革命组织”，其“夺权是非法的”，并逮捕其成员数十人。

“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宣布“红联站”夺省广播电台的权是非法夺权，从即日起，省广播电台由“总指挥部”接管。“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还把对“112”夺权持不同意见的组织打成“反动组织”、“保皇组织”，其成员中不少也被投进牢房案。“112”夺权的领导者认为，这是保卫“红色政权”必须采取的重要手段。

“山西革命工人联合会”这回彻底栽了。刘格平的表态，变成掌了大权的“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的决定，他们宣布“山西革命工人联合会”为反革命保皇组织，立即予以解散，总指挥张志安也被抓进了监狱。

被山西的新政权宣布为反革命保皇组织的，还有“太原红卫兵纠察队”和“山西红卫兵团”。他们的头头们，和刘普德的脑子一样转不过弯子，没有赶紧表态支持刘格平和杨成效的新政权，而是随着刘普德以回家过年为理由，一个个悄悄离开太原，这两个在山西也曾风云一时的群众组织，就如鸟兽散了。然而，刘普德回到代县老家阳明堡，那个年没有过成。“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还是派出几位解放军连夜赶到阳明堡，把刘普德抓捕回太原，投进了监狱。

1 月 28 日，“太工红旗队”开始开门整风。对立面多个战斗队的代表，以及“首都赴晋革命造反大队”的代表列席。“首都赴晋革命造反大队”是和“太工红旗”一起从反对资反路线斗争中冲杀出来的战友，夺权时他们站在了刘格平一边。这次，他们是代表“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来监督“太工红旗”整风的。在整风会上，“太工红旗”队长李青山作了检查，并且辞去了“太工红旗”总勤务员的职务，由队委李宪林接任。

在炮轰“黑省委”的革命造反中，曾立下过赫赫战功的“红联站”全体将士，不得不服输了，不得不认罪了。这可是一种心甘情愿的服输，更是一种充满忏悔的认罪。

“红联站”开始“整风”。“红联站”勤务组做出决定：由省委党校“东方红造反兵团”的头头之一段立生，取代“太工红

旗”杨保明，出任“红联站”勤务组的第一把手，杨保明降为勤务组一般成员。

段立生找到刘格平，提出“红联站”也愿意加入“革命造反总指挥部”。没料到 3 级高干刘格平摇摇头，又提出了一个条件，就是“红联站”必须开除“太工红旗”。

“红联站”勤务组在段立生领导下，只好做出决定，将杨保明和他的“太工红旗”开除出“红联站”。杨保明被他一手创建起来的“红联站”开除了，他和“太工红旗”在“红联站”的工作人员撤回学校。此举总算让刘格平满意了。

社会上许多人对“太工红旗”仍然非常关心，他们不希望这个山西响当当的造反派垮下去。“山西革命造反兵团”司令刘灏让他的高参汤建忠到工学院找到李青山，希望“太工红旗”和他们一起干，但是李青山婉拒了他的好意。不过，从此他和刘灏、汤建忠成了好朋友，

除了太原工学院的这些大学生，山西大学的“八八红旗战斗队”自然也是在劫难逃，一下子也变成了倒霉蛋.....

省城太原，大雪飞扬，五一广场，银装素裹。山西大学“八八红旗战斗队”的大学生们，扛着他们的队旗，全没有了当初气吞如虎的那种革命造反架势。面对主席台上毛泽东巨幅画像，在“八八红旗战斗队”的队长、山西大学外语系三年级的学生李大纲，和“八八红旗战斗队”的作战部长、山西大学教育系三年级的学生王守仁的带领下，一遍遍地向老人家请罪，请求老人家饶恕他们退出“112 夺权”和炮打中央文革小组的罪行。李大纲和王守仁这些大学生造反头头们痛哭了，他们麾下的“八八红旗”

小将，那一大批听毛主席的话奋起造反的大学生们，竟跟随着他们的队长和作战部长，齐刷刷地跪在雪地上，面对主席台上的领袖画像，失声痛哭，一掬掬热泪，融进了白雪未消的广场地面.....

在山西大学，与“八八红旗战斗队”对立的一派组织，是“八一四捍卫毛泽东思想战斗队”。当中央表态支持刘格平们的夺权后，“八一四捍卫毛泽东思想战斗队”的队长、山西大学中文系的二年级学生朱永成和他手下头头们的立场，立刻来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弯。朱永成下令表态支持刘格平，同时派人进城刷出大标语，由过去的“坚决支持和保卫山西省委”，变成了“坚决打倒山西黑省委、坚决揪出卫、王、王、将他们批倒批臭!”他们还在校园内和市区给对立面刷出了一批大标语：“山大八八炮打关锋就是炮打中央文革小组，就是炮打毛主席无产阶级司令部!”“保皇派山大八八不投降就叫它彻底灭亡!”等等。

袁振在太原又掌权了，但经刘格平提名后又经刘格平为首的中国共产党山西省核心小组研究，中国共产党太原市的核心小组组长，却由陈守中出任。成员呢？自然全是跟上袁振起来造省委的反，支持袁振翻案的原市委的一些党员干部。这个党的核心小组类似于中共太原市委，下一步，由谁来出任太原市革命委员会的主任呢？袁振找来刘灏，征求这位革命小将的意见：“党的核心小组组长定下陈守中了，下一步市里革命委员会这个新生红色政权的第一把手，你看由谁出任最好？”袁振接着说：“我的意见嘛，你当最合适，可要说工作经验，还是陈守中比你强。你说是不是？”

刘灏当然得点头了。陈守中原来是省委委员，太原市委书记处书记，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是与刘格平、袁振、刘贯一、何英才一道写出“五人大字报”向“黑省委”造反的革命领导干部。他怎么能和陈守中去争官呢！

在袁振的安排下，经刘格平同意，1 月 28 日，太原市革命委员会在市委礼堂宣告成立。陈守中既是中国共产党太原市核心小组的组长，又出任了太原市革命委员会的主任。

在这次大会上，将曾跟着原省委批评和反对过袁振的市委常委、代理秘书长郭庆年和市委的普通机关干部阎秉贞、刘建民、张贵堂、潘守德 5 人当场五花大绑，投入监狱。同时，会议主持人王承琚还宣布了对原市委、市政府一大批领导干部“开除党籍、监督劳动和停发工资的处理决定”。。

此时卫恒、王谦、王大任和贾俊被杨成效囚禁在太原迎新街杨成效“决死纵队”的总部了。1 月 29 日下午，卫恒被押走了。他这次被押走，是因为中央专案组的于寰海和戴嘉煌前来询问卫恒与彭真、薄一波、安子文、陶鲁笳的关系。

卫恒被押到另一间囚室，当时在场的，有杨成效和“决死纵队”的另一名头头姚恩泉和一名骨干郭耀忠。他们责骂了一通卫恒就离去了。于寰海和戴嘉煌开始审问卫恒，由太原市委办公厅秘书郭俊楼在现场记录。

谈话结束后，杨成效把卫恒用车送走了。第二天，发现卫恒已经在关押他的房间里身亡。当卫恒的妻子张坤秀第二天在火葬场停尸房看到丈夫的遗体时，只见他头下枕的是砖头，牙关紧咬，双眉紧锁，铁青的面部，黑青的腹部。她悲愤交加，又看到丈夫

戴的奥米伽手表，还有身上的 30 多元现金，19 斤粮票也不知道哪里去了。

1 月 31 日，在太原五一广场，袁振又亲自主持了“愤怒声讨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贾俊等滔天罪行”的大会。曾跟着贾俊反对过袁振的赵力之、刘舒侠、苏平、徐镇海、李文杰、郭庆年等太原市委的领导们，一个个被押上了主席台接受批斗。省委的王谦、王大任也被押上来了，但是，他们的行列中已经没有了卫恒的身影。

1 月 31 日凌晨 4 时，警车将王谦等押至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看守所。当天上午，又将他们押解到五一广场进行批斗。并不是中共党员的杨成效当场宣布：“撤销卫(恒)、王(谦)、王(大任)党内外一切职务，永远开除党籍，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旋即，王谦等被投入监狱。

## 第 448 回：一二五，贵州与新疆夺权　涉机密，广州公安局翻天

上海的夺权斗争在贵阳市也引起了连锁反映，1967 年 1 月 15 日，贵阳矿山机器厂的造反派率先在厂内夺权。从 16 日至 19 日，《贵州日报》社、贵州省公安厅、贵阳医学院、贵阳市人民汽车公司、省文化局、贵阳棉纺织厂、贵阳钢铁厂、贵阳造纸厂、林业厅汽车场、省建一公司等单位的造反派都先后夺了本单位的权。

还在 1966 年 12 月 27 日，贵州省军区副政委、省文革领导小组副组长李再含就曾将贵州“红卫军”头头李铁乃和地化所徐英年找到贵州省军区。他对李铁乃说：“老李，你以前领导‘红卫军’很辛苦，但现在文化大革命已经到了一个阶段了，以后由地化所领导是否有利一些？”

服从一个知识分子的领导？李铁乃当场表示不同意，遂后不久，他就带着“红卫军”宣布退出贵州“统一行动指挥部”，另行成立了“贵州省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委员会”，共有“红卫军”、“赤卫队”等 74 个大小组织参加，并举行了“打倒折衷主义”大游行，矛头直指地化所。李铁乃说：“地化所他们知识分子想垄断贵州文化大革命，办不到！”“老子三天就可以踏平地化所。”贵州的“炮轰派”由此分裂。

1967 年 1 月 3 日，“红卫军”中另一个头头从“红卫军”中拉出一部分人成立了另一个山头----“红卫军造反联络站”，据说是李再含支持的。愤怒的李铁乃准备进京告状。北上之前，他先南下昆明，约上云南“炮派”的范喜莲，再到重庆，找到重庆

“工人造反军”的黄廉。

此时的黄廉，面对席卷重庆的夺权风暴正不知如何应对。夺重庆市的权？黄廉自我感觉还没有这个气魄。让别人夺权？肯定又不服气。罗广斌对黄廉说：“夺权没有中央支持不行，你是不是还是去北京一趟？”

黄廉给周恩来发了个电报，说“重庆非夺权不可了，从生产和生活秩序看，从社会思潮看，都是一片混乱，为了不出现瘫痪局面，我把情况汇集了，想到北京向您汇报。”

罗广斌借了 400 元路费给他，要他尽快去北京。

恰在这时，贵州“红卫军”的李铁乃，云南的范喜莲，都跑到重庆来找黄廉，约他一起去北京，找中央文革讨教方寸，于是他们结伴来到北京。

李铁乃找到曾在贵阳帮助过他的一位《光明日报》记者寻求帮助，在北京刷出了“打倒李再含”的大标语，还举办了记者招待会。他的所作所为，终于使李再含无法容忍。怒吼道：“这哪里还有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味道!”

1 月 17 日下午，贵阳的“红卫军”出动 20 多辆汽车到贵州省委大楼去夺以李立为组长、李再含为副组长的省文革小组的权，因大楼内无人，未达目的，绝大多数人走了，留下 20 多人守候大楼，至 18 日凌晨 1 点多钟，发现有 2 名武装流动哨兵。“红卫军”增派一车人来，并问：“是谁派你们来的？军委有命令，解放军不干预地方文化大革命，你们为什么要保旧文革 ？”

言语不和，双方发生冲突。“红卫军”抢了对方手枪 1 支，子弹 24 发和军大衣 1 件，并拍了照片，作为军队干预地方文化大

革命的证据，打电话要求李再含处理。

李再含没有答复，而是于 1 月 20 日给总政治部并中共中央文革小组发出关于贵州“红卫军”头头李铁乃及其总部的若干问题，请求对他们实行专政的电报。

1 月 21 日，毛泽东在贵州省军区副政委李再含 1 月 20 日的电报上批示：

总理：

似应将李再含、军区司令员、省委个别革命干部及若干群众革命造反派的可靠领袖，共若〈约〉十几人，找来北京，加以研究、确定政策，然后叫他们回去执行。请与文革小组商量决定。

毛泽东

一月二十一日

每一个省、市似可都照这样办，一个一个地解决。一九六七年元月二十一日

也就在 1 月 21 日这天晚上，李铁乃在北京请黄廉吃火锅，说晚上两点半，总理要在四马桥接见他们。李铁乃叫黄廉一定要和他一起去参加。

晚上 23 时左右，黄廉和李铁乃一起来到了指定地点，看见门口站了一个解放军战士。他们在接待室等到子夜时分，屋里进来很多便衣带枪的人，问谁是李铁乃？

李铁乃刚答应了一声：“我是”，那些人就一下子冲过来，将他铐了起来。

在场的人都被带走，黄廉自然也不例外。后来才知道，这是北京卫戍区奉中央文革之命将他们都管制起来了。后来知道误抓

了黄廉，又将他放了出来。告诉他：“李铁乃犯了滔天大罪，把造反派开进不该进的地方。”很快，贵州“赤卫队”的黄世明、“贵州兵团”的施其利等工人组织的头头也在贵阳被捕。

1 月 23 日，贵州由地化所、“红色工人战斗团”、“贵阳战斗团”和“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司令部”等组织成立的“贵阳地区革命造反联络站”在省图书馆开会酝酿抢先“红卫军”开展省、市夺权斗争。会后他们请示省军区，省军区表示支持，并提出将逮捕“红卫军”的事一起配合起来。

1 月 24 日，根据毛泽东批示，周恩来派飞机接李再含和贵州省军区司令员何光宇等贵州代表团 12 人到北京。

1 月 25 日，贵州省和贵阳市的造反派联合行动，冲进省府大楼，未受任何阻力，一举夺了中共贵州省委和省人委、中共贵阳市委和市人委的党政财文大权。成立了贵州省“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总指挥部”，参加单位 40 个。

接着，他们连夜在邮电大楼前的广场，俗称喷水池，开一个大会，宣布夺权。贵州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总指挥部发布《第一号通告》，向全省人民号召：

1、一切权力归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

2、抓革命，促生产；

3、坚决反对经济主义；

4、加强无产阶级专政。

总指挥部共设 21 名常委,其中工人 3 名,干部 7 名,学生 11 名。

在人头涌动的现场，一个姓罗的工人造反派头头满怀狐疑地

问中央文革记者站记者张云勋："我们就真的成了省委领导了吗？"

张云勋无从回答，一笑置之。因为他自己也不清楚和不相信。

新华社贵州分社记者戚休、地化所徐英年、孙昌德等人未经贵州夺权"总指挥部"常委们同意,就在地化所商定成立 7 人核心小组，引发学生们异议。当天，"红卫军"、"赤卫队"调人包围《贵州日报》社，阻止报社发布夺权"号外"。第二天凌晨，贵州驻军和省公安厅"113"组织在其他群众组织配合下，查抄了"红卫军总部"和"红卫军甘荫塘分部"，抓了 100 多人。随后两天，省军区宣传车在贵阳市街头和市郊反复宣传"红卫军是反革命组织"。

在"红卫军是反革命组织"的舆论攻势下，1 月 27 日，贵阳煤矿"工纠"向"红卫军"反夺权，抓捕、吊打"红卫军"54 人之多。与此同时，贵阳钢铁厂、贵州水泥厂、七冶公司、九化公司、红星拖拉机厂、贵州柴油机厂、市邮局等"红卫军"夺权单位也都发生类似事件。"工纠"反夺权后纷纷到省军区报喜。

1 月 28 日，中央文革小组代理组长江青等接见贵州代表团。江青问："李铁乃是什么人？"听了代表们的介绍后，江青说："李铁乃是流氓！他想当西南王。情况我们搞不清楚，我们是根据李再含同志掌握的情况和电报决定逮捕的。"

代表团中的南下串联队代表反映了"红卫军"在贵州文化大革命中的作用和 26 日以来被打成"反革命组织"的遭遇后，江青说："'红卫军'当然不是反革命组织。对广大群众，不能这样说。主要头头已经抓了。"

1 月 28 日,贵州省总指挥部发出《第二号通告》,限令原省委书记处书记、省委常委三日内到省总指挥部报到。省、市各部、委和厅、局负责人,分别到省、市总指挥部报到。

1 月 30 日，总指挥部发出《第三号通告》:“关于被社会上的牛鬼蛇神打入和篡夺领导权的群众组织的若干规定”，要求红卫军中队长以上骨干要到公安部门登记自首。

1 月 31 日，毛泽东对 1 月 26 日《新贵州报》登载的《贵州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总指挥部通告》批道：

恩来同志：

这个通告很好，你看是否可以发表？新近搞的那个文件，待他们回去商量修改后，可以再发表，作为第二篇。如何，请酌。

毛泽东

一月卅一日

毛泽东所说的“那个文件是指《贵州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总指挥部十项通令》。

2 月 1 日，《人民日报》以“西南的春雷”为题发表社论，祝贺贵州夺权胜利。

李铁乃被押回贵阳在邮电大楼前广场批斗，他站着挨批斗的台子就是他自己安排搭的用来斗走资派的。此时的李铁乃，平日那种耀武扬威的样子消逝了，只见他双眉紧锁，搭拉着脑袋。公审大会之后，尽管中央明确提出，“红卫军”广大成员要与为非作歹的头头李铁乃等人区别开来，但“红卫军”总部随即解散，其下属组织纷纷发表宣言退出“红卫军”，“红卫军”这个曾在贵阳不可一世的“革命造反组织”，顷刻间自行解体，销声匿迹

了。

1 月 25 日这天，新疆也进行了夺权。

1 月 12 日，《新疆日报》社被造反派宣布接管。

1 月 19 日，新疆“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即“红二司”及乌鲁木齐各大专院校群众组织响应中央的夺权号召，在乌鲁木齐市人民广场召开“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誓师大会”，并发出《紧急呼吁》、《紧急通告》，呼吁新疆造反派组织实现大联合，向走资派夺权。

1 月 24 日，新疆大专院校造反派 27 个单位连夜召开紧急会议，并取得新疆军区的支持，决定由“八农东方红”、“八农红旗”、“新疆大学星火燎原”等单位实施夺权。

1 月 25 日，上述各大院校造反派组成“新疆夺权总指挥部”，向全国、全疆发表了《夺权声明》，命令自治区党委、人委以及各部、委、办、局交出公章。结果集中了约两麻袋，算是夺权“成功”。后来，自治区水利厅水利机械厂工人王金波等人夺了乌鲁木齐市委、市人委的权。自治区夺权，由三人组成核心领导：欧阳维超任总指挥，刘鸿科、王玉成为副总指挥。“夺指”按山西省和黑龙江省的作法，先向中央上报“夺指”结合领导干部的名单，再由领导干部提名群众组织人选，经“夺指”研究，决定自治区党委书记处书记武光、自治区党委第二书记、自治区人委主席赛福鼎、自治区党委宣传部部长富文、自治区农办主任铁木尔.达瓦买提等 9 人为“夺指”结合干部名单，由王玉成到北京上报名单。与此同时，王恩茂在北京发表谈话，表示支持“红二司”。

但是中央对新疆的“夺权”未表态，虽然中央给全国各地发

布的各类指示和电报中也有“新疆夺指”的名字，其实“夺指”并无办事职能，“夺权”后自治区党政各项开支、签发支票银行仍然只认原自治区党委、人委主管领导的签字，“夺指”有名无实。

1 月上旬，新华社军事记者张景发被中央文革记者站派往广州，负责了解和反映广东省、广州市的文化大革命情况。

张景发一到广州，就被广州军区安排在第二招待所吃住，并派了一辆在朝鲜战场缴获的美国吉普车供他使用。这在当时，可是部队团一级领导才能享受到的待遇，可见接待规模之高。

当时，广东省、广州市已经大乱，但尚未受到严重冲击，行动还算自由。张景发的第一件工作就是预约采访了省委书记，请他谈对文化大革命、对广东和广州形势、对两派群众组织的看法等问题，并把他的看法和意见写成稿子，报到北京。同时，抓紧时间，深入群众组织，了解他们的组织情况、主要观点、批斗目标和近期活动。也与广州军区政治部主任相炜，副主任、军区“文革办公室”主任江民风取得联系，了解部队文化大革命及其对地方特别是对中南局和广东省、广州市党政机关文化大革命形势的看法和态度。

当张景发电话采访军区“文革办公室”主任江民风时，他对张景发说，黄永胜拒绝接见群众，而要他带警卫连去抓人。他担心这样做会激化矛盾，认为黄永胜不应该惧怕群众，而应该出来与群众见面。

1 月 25 日这天，已经被接管的广州市公安局发生“二次夺权”。问题的起源是因为公安局的业务性质。由于公安局内部的大多数

文件，对外都是保密的，不能让外单位的人看，而公安局的监督小组大部分是外单位的人。许多需要盖公安局大印的文件，很多都是涉及对台、对境外内容的，属于国家机密，不能让外单位的监督小组成员看。而外单位的某些监督小组成员因为看不到公安局的文件，也无法对公安局的工作实施监督，于是就误认为这是监督小组组长、北京政法学院的学生邹力志“独断专行”，从中操纵的结果。这样一来，在监督小组内部，以邹力志和“一总部”的公安局 4 名委员为一方，以其他组织的 8 名成员为一方，发生了矛盾。到了 1 月 23 日，一些监督小组成员提出，把市公安局“一总部”代表逐出监督小组，要他们交出大印。1 月 25 日，“省革联”驻市公安局的监督小组开会时，要求“一总部”和“北京政法公社”成员退场，并交出大印。当天下午，“一总部”派人到省公安厅与政法系统各群众组织开会研究，决定成立“省政法革命造反委员会”，宣布由这个组织接管广州市公安局的一切权力。下午 16 时，“省政法革命造反委员会”全体代表齐赴市公安局，宣读了《夺权通令》，要求监督小组离开公安局。这就是在广州震动一时的市公安局“二次夺权”。

“省革联”代表认为市公安局“二次夺权”是“反革命政变”，随即调集数千名群众向市公安局冲击。市内各大造反派组织闻风而动，由中科院中南分院下属单位的 10 个战斗队共 400 多人组成的中国科学院中南分院“革命造反总部”，简称“中造总”打电话给下属各单位：“北航‘红旗’被围了！北航‘红旗’是江青同志肯定的，是响当当的造反派，各单位立即派人增援！”

于是，中国科学院中南分院“革命造反总部”、省重工业厅

“革命造反联合总部”、省水产厅系统驻穗单位“革命造反联络站”、中南林学院“红卫军”等组织的上千群众，闻讯趋集，围裹拢来，密密匝匝，一时间把公安局大院围得水泄不通。大家呼喊如雷，骂声动地。正闹得兴起，不知什么人从楼上掷下椅子来，把两个倒霉蛋砸得头破血流。

“动手啦！他们动手打人啦！”

“要文斗，不要武斗！”

“同志们别怕，要革命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

“造反有理！”

“毛主席万岁！”

所有人都在声嘶力竭地乱嚷。现场情绪迅速升温，接近爆炸程度。有人抄起了木棒，一边在头顶挥舞，一边吐着唾沫，前挽后推，朝对方猛冲过去。街上宣传车的喇叭，高一声低一声地叫嚷：

“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拥挤在门外的群众不知里面发生什么事情，鼓噪起来，一涌而入。大院内的两派，早已打起来了。人们拳脚相交，互相践踏，混战一场。

26 日凌晨，包围公安局的群众组织愈聚愈多，约有上万人之多，殴斗之激烈，是广州地区文革以来，在群众组织的冲突中，前所未见的，铸成了“一二五事件”。在这个事件中，有 18 名干警和群众被殴打、踩挤成重伤送医院。“政法革委会”被“省革联”宣布为“反革命组织”，命令立即解散，几千名干警被打

成“反革命”，北京政法学院学生邹力志（共产党员，贫农出身，复员军人）被挂上黑牌、戴上高帽斗争，斗争后又在市公安局院内“游院”，还扣押了邹力志和“一总部”负责人。

广州军区司令部办公室秘书科副科长迟泽厚受命到现场调解，他所看到的是里里外外一万多人的混战。市公安局“125 总部”很多人在公安局院里面顶住，关起铁门。外面是人山人海，拼命往里面攻，他们使劲往里挤、挤、挤。顶到最后像决堤一样，“哗”的将大门冲开了，一下子冲进去了。

1 月 26 日，广州市警备司令部宣布派军代表接管市公安局。

这天，“省革联”召开控拆大会批斗市公安局“一总部”负责人，指其为“反革命组织”，同时发表声明，谴责 1 月 25 日的再夺权。而“地总”则发表声明，不承认 1 月 22 日的夺权，并支持 1 月 25 日的再夺权。下午 16 时，在离市公安局不远的“地总”总部，也爆发了另一场冲突。一大帮“珠影东方红”、“武汉三司”、“八一战斗兵团”的群众，从肮脏的小巷子里，一窝蜂冲上街头，朝着位于仰忠街口的“地总”总部飞奔而来。“地总”头头正在开会，突然听见“砰”的一声巨响，一块石头砸碎了窗玻璃。这可是个凶兆，一名头头从窗口往外张望，不禁吓了一跳。街上三五成群，各式各样，挥动着长短棍棒的人，竟有几百人之多，正朝这里扑来。

“是中科院中南分院造反总部的人！”

“这可怎么办？”有人惊恐地问。

“还怎么办？快跑吧！”

这名头头连忙拉开抽屉，把印章揣进怀里，从后门溜之乎也。

这时愤怒的人群已经破门而人。翻箱倒柜，找不到大印，一怒之下，索性掀翻了所有桌椅板凳，把家具杂物，一律捣毁净尽，绑走了 10 个人，作为对“地总”支持公安局反夺权的报复。

在这天的事件中，两派都互相指责对方犯了“路线错误”，是“现行反革命”，要求军队镇压。对军队力主协商调解的态度，双方都表示极为不满。认为是“和稀泥”、“搞折中”，甚至说军区是“制造”这次事件的“幕后人”、“凶手”。

## 第 449 回：轮船会，无锡市“和平让权”　周恩来，接见财贸口代表

1 月 26 日，广东省委书记处开会，监督小组提出四点意见：一、省委文革办公室要做好接待工作，不能说没有权。二、抓革命促生产，要组织一个班子，由省委提出名单，经监督小组审查后可抓工作。三、监督小组决定省委书记集中在东二楼办公。四、省委一定要大抓防治脑膜炎工作。

这天，驻“省革联”的 4 名军区代表突然全部撤走。

军区后来指出，广东省委“‘夺权’后旧的机构丝毫不动，只是成为书记处和‘省革联’的联席会议，而实际上一切工作依然通过原来的‘书记处’，书记处照样发指示，作决议……赵紫阳不止一次地对其他书记说：‘这是象征性的夺权’，‘我们还有权，我们还要管。’” 这意味着广东并没有真正夺权。

1 月 28 日，广州军区与中山大学“831”的武传斌、黄意坚进行了一次谈话。要求他们修改“省革联”的夺权社论，否定派监督小组的形式。武传斌和黄意坚二人均不同意。双方激烈争吵，不欢而散。

这天，广州又发生了所谓的“李淑兰事件”。

李淑兰是解放军的女子射箭运动员。1960 年进入解放军体育学院学习射箭，1963 年，她打破了世界女子射箭记录，为解放军女兵夺得第一枚世界金牌。至 1966 年，李淑兰已先后 17 次打破八项射箭世界纪录。1964 年更成为第四届全国政协委员。1 月下旬，广州解放军体育学院突然传出消息，说李淑兰起来造反了。

中山大学“831”随即发表声明，支持李淑兰造反。

不管李淑兰造反的消息是真是假，但广州军区认为这是军内的事情，地方群众组织不应插手。广州军区副参谋长兼作战部部长阎仲川打电话给黄意坚，追问这份声明是不是确实代表了中大“831”的立场。黄意坚作了肯定的回答。“造反派造反，我们一定支持，不会不支持。”其实，这份声明是一位“831”成员个人发表的，并非总部决定。

当晚，由军事体育学院“毛泽东思想战斗团”、部队文艺工作者“红色联合造反团南下造反团”、广州军区战士歌舞团“千钧棒战斗队”等组织，抄了部分广州军区领导的家，并把萧元礼副政委带走了。这是广州地区发生的第一次冲击军区事件。

“千钧棒”成员后来在给周恩来的信中说：

“‘千钧棒’的部分成员和属下造反团、南炮工、军体院毛泽东思想战斗团的革命群众一起，于 1 月 29 日凌晨一点钟到了军区文革小组负责同志家里抄有关文化大革命的黑材料，由此构成了一•二八事件……

在一•二八事件中，萧元礼副政委是被军体院的革命群众拥上汽车的。而在上汽车前，革命群众曾经将萧元礼围住，不让他离开司令部大院，说他是挑动群众斗群众。”

天亮以后，又有几百名部队文体工作者和军体院学员冲击了军区大院，造反派要求军区领导和警卫营连以上干部集中到战士歌舞团开会。

当天，广州驻军近万名指战员，召开“坚决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派誓师大会”。会后，荷枪实弹的解放军队伍，乘坐军用卡车，

以巨幅的毛泽东画像开路，在广州大街上举行武装示威游行。战士们高举着《毛主席语录》，呼喊着“坚决执行毛主席的命令！”“坚决支持革命左派夺权！”“向革命左派致敬！”的口号。刺刀和机关枪在冬日下闪着寒光。道路两旁的群众，不断高呼：“向解放军学习！向解放军致敬！”“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这种场面，广州市民已经很多年没有见过了。在日益混乱的局势之下，解放军显示了巨大威力。

1967 年 1 月的无锡，和全国一样，所有的造反派神气了，在大街小巷的人群中几乎人人的左臂上都戴着各种名称的造反队员的红袖套。受到内外冲击的无锡市委，市人委基本瘫痪，书记，市长和他们的常委们已转入“地下”，机关工作人员大部分躲在家中观望，一部分还坚持的机关工作人员，也已无法正常工作。社会处于“权力的真空”，一度进入“无政府”状态。但全市的生产，人民群众的生活还要继续下去，群众中的许多实际问题需要解决。东家家中夫妻相骂找谁调解？西家家中自来水笼头坏了，由谁管理？有些人就找到造反派以求解决。可是造反派对于处理日常的行政工作实在是没有实际解决能力。于是一些造反派就要求政府出面来恢复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和社会秩序。

1 月 19 日上午 10 时，一艘编号为“741”的轮船悄然驶离无锡大洋桥码头，走运河向西行驶，通过“大扇口”进入太湖。船舱内坐着 5 人，那位身穿黄呢军大衣，戴着军帽和红领章就是时任无锡市委书记的韦永义，此时他还身兼无锡军分区第一政委，所以穿了一身当时十分时髦，并且颇能护身的军装。另外 4 人是无锡市“机关兵团”负责人徐志纯、无锡市“野战军”的周雷、

航运公司的“海燕兵团” 的姜文泉、轻院“6.26”兵团浦湘海。

这 4 人可都是当时无锡响当当的造反派，他们和无锡市第一号当权派、他们的斗争对象如此隐秘的乘船外行，所欲何为？

原来，这是由无锡市“机关兵团”牵头，联络无锡“红总”下属“野战军”、 航运公司、轻院“6.26”兵团等群众组织，约无锡市委书记韦永义在航运公司的一艘轮船上见面，是要商量无锡将采取什么样的途径，恢复正常的社会秩序。之所以搞得如此诡异，是想排除可能发生的干扰。

会议由“野战军”周雷主持，“机关兵团”徐志纯首先介绍了上海“一月革命”的情况，陈述了周恩来在接见群众代表时所说的“在那些不能夺权的地方，可以由革命群众组织联合起来，对市委，市政府进行监督，促使机关工作正常运转”的讲话精神，以及“机关兵团”对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的分析和看法，提出了无锡市群众组织不能照搬上海的夺权模式，而是要根据本市党政领导干部的实际，没有足够的证据认定谁是“走资派”的情况下，“按照周总理的指示先由革命群众组织联合起来，对市委，市人委（市政府）实行监督管理，让市级党政机关的所有各个部门和全体人员正常上班，坚持在工作岗位上抓革命，促生产。对那些有问题的干部该批的批，该斗的斗，该工作的工作，使机关的工作正常起来，解决无政府状态，以恢复全市的生产秩序和市民的生活秩序。”

4 位造反派和市委书记韦永义很快达成了共识，一致同意：

一、建立“无锡市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监管委员会”，监管委员会由“红总”、“6.26”、“野战军”、“机关兵团”、市一中“红

革会”、市二中“725 兵团”、无线电工业学校的“抗大临革会”等 17 个群众组织组成。

二、由“机关兵团”起草“监管会”文告。韦永义提议，起草文告可与市委副秘书长邓平一起商量。

三、立即召开一个有 17 个群众组织参加的联席会议，商讨全市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共同参加并承担监督管理的责任。

根据“741”轮船会议商定的计划，1 月 20 日，无锡市第一次 17 个群众组织联席会议在轻院“6.26”总部如期进行，由轻院“6.26”兵团浦湘海主持，徐志纯讲了建立“无锡市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监管委员会”的性质，任务及如何开展工作等。联席会议一致决定在无锡市实行对市委，市人委进行监督管理，尽快恢复正常社会秩序。

1 月 22 日上午，第二次 17 个群众组织的联席会议继续在“机关兵团”会议室进行。与会人员一致通过了“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监督管理委员会”组成的勤务组，组长由“红总”的江汛担任，副组长，有浦湘海、周雷、徐志纯。“监管委员会”下设办事组，分市委监管组和市人委监管组，分别负责对市委，市人委各部门进行监督管理，会议还一致通过了市委副秘书长邓平起草的“无锡市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监管委员会”的 1、2、3 号公告，并确定 1 月 23 日上午 8 时，在市机关小礼堂召开全体机关工作人员大会。

1 月 23 日上午 8 时，无锡市全体机关工作人员大会按时召开。会议结束后，颇感新鲜的机关工作人员欢欣鼓舞，立即进入各自的办公室，准备新的工作。

这天，无锡抗大一机校“红色造反兵团”等组织发出《全市革命造反派联合起来，接管无锡市委、市人委的倡议》，反对“红总”等组织当天对无锡市委、市人委的单方面接管。于是，无锡市从“123 接管”开始，从此形成两大派。

1 月 25 日早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解放军报》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派》的社论，人们奔走相告：“中央要派解放军到地方参加‘三支二军’了！”这天下午，“机关兵团”负责人徐志纯等人代表“联合监管委员会”，满怀喜悦的带着“联合监管委员会”的 1、2、3、号通告，前往无锡驻军 27 军军部请示汇报。27 军军长尤太忠亲自出来接见，在场的还有 27 军保卫处长王明清和参谋林镇廉等人。

尤军长听完徐志纯的汇报之后，当即表态：“你们这种联合监督管理，是不彻底的革命，是改良主义的，我们不能支持，你们如果像上海造反派那样向走资派夺权，我们坚决支持。”

“741”轮船会议被定为是“和平让权，联合办公”。

1 月 25 日，周恩来、李先念在中南海国务院办公厅接见财贸系统造反派代表。

中国人民银行“红色革命造反兵团”代表首先向周恩来汇报了他们总行 20 日夺权的情况和问题：

1 月 20 日凌晨 3 时，由中国人民银行原“造反兵团”分裂出来的 3 人联合财院“88 队”驻总行的一部分人把中国人民银行代行长、党组书记胡立教从家里拉了出来，坐上门口已经准备好的吉普车来到中国人民银行。这时大门、院内、室外完全由他们监视，不准胡立教与党组秘书交谈，甚至把在场的党组秘书也禁

闭了，然后要求胡立教签字，答应被接管、夺权。胡立教一再表示，要开会研究讨论，他们坚决不肯，最后胡立教在另外一张纸上代表个人签了字。

“红色革命造反兵团”代表说：“从这个夺权经过看，完全是搞的突然袭击，搞的强行签字。”

“金融公社”的代表司马说：“情况不是这样，当时胡立教是签了字，交了权的。”他念胡立教给他的签字条子。

“红色革命造反兵团”代表继续陈述他们认为总行在夺权的问题上存在的问题：

“总的讲不符合总理提出的三条夺权原则。

1 、没搞大联合，就进行了夺权，这不是个方法问题，是指导思想问题，是原则问题，这是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来对待反动路线的，因为在他们眼里只有他们自己，而无别人。

2 、夺权是以‘造反团’名义夺的，夺了后，归于极少数人，先控制了权，再发表成立一个什么‘金融公社’组织，这是明显的压低别人，抬高自己，私心太重。胡立教本人也承认：我交权，在思想上也是交给了‘造反团’，因为：一、‘88 队’是个革命组织，二、司马就是‘造反团’的负责人之一吗，‘金融公社’我认为就是原‘造反团’改了名了，现在‘金融公社’，某几个同志说他们已经夺了权，显然是假的，是抢权，是骗取权。司马还声称，夺权首先是以一、两个战斗组开始，再以大联合而告终。我们认为这是直接违背中央没有革命派的大联合，夺权就是一句空话的英明论断，故是形‘左’实右的。

3 、15 号党组派方皋找‘造反团’负责人司马谈过一次话，

谈话中方皋同志找代表党组把交权夺权问题向司马交了底，最后方说，我代表党组你代表造反团，你回去研究研究怎么夺法，司马当面也向方表示要研究。但司马知道了党组的想交权底，没有向‘造反团’任何人谈，于 20 号串联了三、五个人搞了个‘政变’，这是典型的投机，全行革命造反派已识破他的高明手法，所以至今他才有 27 人，如果是真正的革命造反派，为什么文化大革命开展了这么长的时间才 27 个人呢？这个权形式上夺，实际上没夺过来。”

最后，“红色革命造反兵团”代表将矛头指向了胡立教，说他“拿着总行大权当儿戏，随随便便地，不经商量研究擅自交给极少数人，这是失职行为。”“胡立教在其中耍了个大阴谋，想牺牲别人，保存自己，想把胡景云打下去，一棍子打死，不会反咬我胡立教。”

周恩来听后说：“哦！交权了。”

“红色革命造反兵团”代表说：“他们强迫胡立教签字，党组的权，没有交出来。”他们大声说：“胡立教表态！”

周恩来：“强迫签字不行，没有真正夺权，可以重新夺嘛。”

胡立教：“我不同意他们的几个意见，没有签字，是写在另一个条子上，是代表我个人，当时我产生了误会，不知道‘中国金融公社’是从‘造反团’分化出来的，我们认为司马他们就是‘造反团’，当时他们没有让我开会。”

接着又有人谈了给周恩来贴大字报的事情。周恩来说：

“你们在大原则问题上应该团结起来，这几天我身体不太好，少说一点。”

“最近财政部提出陈云的问题，我可能同别人讲的口径不一样，先念可能说得多些，我不能随便说，他现在还是中央常委，我只能说到这个程度，我的地位不同，我不反对你们批判。”

“现在群众运动许多是超过预计的，以后可能超过更多，党的斗争是从实践中发展的，我们要从实践中学，不像刘少奇在《论共产党员修养 》那样唯心主义，反对毛泽东思想，我们要紧跟毛主席，强调在实践中学，在实践中提高，你们在大风大浪中学，我们只能说到这个程度，我只能推动你们，不能把话都说完了。”

“外债还光了的只有中国，外贸上还是自力更生的，从去年就不是进口粮，这不是外贸自力更生的成绩吗？”

“外贸部夺权就是夺领导权，你们参与领导，把新的革命血液要灌输到外贸部领导中去，要朝气勃勃，只要立场站稳了，和大胆地干。夺领导权，就是夺领导文化大革命的权。这个权要拿到手。业务上夺监督权，培养造反派，慢慢熟习业务的能力，现在‘长’字号不要了，将来不能永远不要吧，总是逐步吸收。”

“造反派第一要大联合。”

“外贸业务是千头万绪，要逐步熟习，否则就要犯形式主义，事务主义。如果他们把你们推到事务主义中，他们不告诉你们，就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

“国家科委韩光不能用，铁道部的吕正操撤职查办了戴罪立功，以观后效，但这个人希望不大，他与反党集团合流了。停职留用，给一个时期改造自新，以观后效。”

“但现在不能按巴黎公社选举原则办，还应是造反派为基础掌握，我们支持造反派。”

“外交部陈毅作了一次检查，下一次财贸系统开会，李先念同志作检讨，同你们一块前进嘛！”

“银行也是监督，要在监督中学习，学习时间很长，文化大革命要靠你们，你们首先把行里搞得火热，再推动下级，总的是自下而上，中央要能帮助地方。”

李先念插话：“18 号大会总理到处表扬。”

周恩来接着说：“‘政法公社’接管北京公安局，我们很不安，非要管，半年把你们青年摆在火车上，不然，对不起党和人民。应首先把公安部门群众发动起来，吸收其他部门合作，把某些学校吸收合作，同时上层一部分干部督促他们做工作。抓人都要上报，杀人没有不报告的，现有些我们都不知道。夺权进入新阶段，这个问题很重要，革命造反派，过去受压制，共患难，当然也有争执，在大前提一致下，要团结起来。”

“财贸政治部是多余的，你们要把它的权夺过来，反而是个大包袱，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中央直接领导和指示，根本用不着通过它。他们有 30 多人，你们只派一个人去点点火就行了。”

中国人民银行司马递条子，要求发言。并说：“我们夺权是有缺点的，急急忙忙的没有造反派联合好。”

周恩来：“总行夺权要联合起来夺，你们内部争论我不参加，别把我卷入内部争论，你们把胡立教搞在一个屋子里，叫胡立教表态，我不同意。你们到处抓人，人都不见了，给我们带来很多困难，不是我们提倡的，自由抓人体罚，就是黑帮也不用这个方式，体罚对后代不好，我们提倡真文明不是假文明，要文斗，不要武斗，反对分散主义，小团体主义，分裂主义，我们彻底挖修

正主义根子，不能学资产阶级那种旧风俗，旧习惯，旧作风，我们要破剥削阶级的四旧，立无产阶级的四新，把党内的一切旧作风去掉。大前提是无产阶级夺权，就要联合，如果是保的，那当然除外。

北京抓人很盛，有时长期失踪，游街不能解决问题，当然必要的黑帮，我也不反对，这是革命的感情。那样作对争取中间人不利。我们不能硬强迫签字，那样签字我不承认，一个人签字不能算数。”

众人说：“对，就是不能算数。”

周恩来：“我们要做光明磊落事，私心杂念去掉不是一朝一夕的事。”

司马和“88 队”王兴涛对 20 日仓促夺权一事做自我批评。

众问：“各部接管委员会同中央怎么联系？中央文件都给我们，当权派靠边站？”

周恩来：“我问你们，把中央文件都交给你们，怎么办？文件中不都是政治文件，如那样，不就变成形式主义。有关业务问题，接管小组同当权派一起来中央，运动当中的文件，当然发给你们的，实际党内生活很久未过了，许多党员听不到的你们听到了，我从不问你们是不是党，团员，框框早就打破了。你们怎么还有这个？真奇怪。

最后希望你们认真对待财贸系统的事，以后有些事，李先念单独决定，特殊情况找我。”

## 第 450 回：要文斗，驻外大使也弯腰　反苏修，莫斯科“红场事件”

1 月 25 日，周恩来接见回京的驻外使馆工作人员。他说：“驻外使馆三分之二的人员回国参加文化大革命，是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决定的，向你们问好！”

众人鼓掌。

周恩来接着说：“驻外使馆，留学生在内部进行了文化大革命运动和教育，你们做得好，做得对！你们的革命干劲不比国内差，也叫大使站出来弯腰了。但是外交战线根据《十六条》怎么做？光学主席语录还不够，还要学毛泽东选集。要向林彪同志学习，要活学活用，林彪副帅五个月前的讲话我们还要好好学习。”

周恩来念林彪接见红卫兵时的讲话。

他说：“打击钻进党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个性质不能由上级来定或别的机关来定，而是由揭露的问题来定，他们犯多少错误，你们和他们生活在一起，你们清楚，上级可能有偏听偏信。对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问题要调查研究，执行了多少？犯了多少错误？这一般还是我们的同志，因此，斗争批判也要有分寸，《十条》，《二十三条》，《十六条》都要最后团结 95% 以上的群众和干部，对一些中间的，教育，帮助过来，不断扩大左派队伍。要用文斗，不要用武斗。林彪副主席讲话一段：‘……武斗只能触及皮肉……随便抄家，随便打人，变相体罚，喷气式飞机，下跪，都是封建的。’主席 22 日讲：‘我们是无产阶级，斗争要文明一点，为什么要把封建的东西搬出来？’希望你们要

文斗不要武斗，树立新风气。”

“有同志递条子，说我是泼冷水。不知你们是怎么想的，我是老老实实地把半年的经验介绍给你们。贴我的大字报，我认为没什么，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北京的学生闹得很厉害，我还去作思想工作。我没泼冷水这个意思。”

说到外交部的夺权，周恩来说：“外交部的夺权我是支持的，外办口的夺权我们没经验，要研究。”

他再次强调：“外交政策是主席亲自抓的，是毛泽东思想的外交政策。外交风习上受到修、资、帝的影响，要彻底改。外交部女同志穿旗袍形成风气，我没下过这个命令。我们在外交上是有错误的，中央批准的，我负责，部党委批准的，部党委负责，使馆批准的，由使馆负责人负责。只能烧这三级。”

“今天陈毅同志把我找来，没先当你们的学生，哇喇哇喇讲了一通，过后再和你们个别谈谈。我不找你们馆长，参赞，大使，找你们革命造反派。让他们放下臭架子，包括我在内。我谈这段话，是和大家一起谈心，认为不对可以退回来，对我做个参考。”

1 月 25 日，在地球的另一面----苏联的莫斯科红场上，又发生了一件与中国文化大革命相关的事件。

1966 年 9 月 19 日，中国高教部送交给各国驻华使馆一份相同的《备忘录》：“从现在起，在华外国留学生（包括大学生、研究生、进修生）回国休学一年。”针对中国的这个通知，苏联立即予以回击，它要求在苏联的中国留学生立即办理休学，限令他们 10 月份离开苏联。

国内的文化大革命已经影响到全世界，当然也影响到中国驻

外使馆和留学生，驻欧洲一些国家的留学生不再安心读书，纷纷要求回国参加文化大革命。

在巴黎的中国留学生，每天晚上 22 时准时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对西欧的普通话广播；他们从法国报刊和广播电视中能不断看到和听到国内文化大革命的消息及沸腾的场面；在街上偶尔碰到从中国回去的法国人，有的还臂戴“红卫兵”袖章，头戴缀有红五星的帽子，绘声绘色地描述中国的革命。无论法国人，还是其他国家的人，到处在谈论中国的文化大革命、“红卫兵”、“小红书”……对这一切，有赞成的，有反对的。为此，巴黎某大学的外国留学生组织还牵头召开了一次辩论会，辩论“中国文化大革命对世界文化、人类文明是个大促进？还是大促退？”并邀请中国留学生参加辩论。

中国部分留学生和进修生到会发言，着力抨击“大促退”派，使大会最后表决时，“大促进”派占了多数。

对同学更具感召力的是国内来信，其中说到：“如果不参加这场大革命，将是终生最大的损失和遗憾。……”

以上种种，使绝大多数同学不安心学习，渴望回国参加文化大革命，风风火火地进行造反。甚至有同学到使馆贴“小字报”，说使馆执行了什么“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1967 年 1 月 18 日，中国驻法国大使黄镇专程到留学生住地传达中央关于同意所有出国留学生回国参加文化大革命的文件时，同学们欢欣鼓舞，摩拳擦掌，像渴望打仗的战士马上要开赴前线一样。24 日，60 名男女留法学生飞抵莫斯科，假道苏联回国。

这批留法学生在中国驻苏使馆遇到 4 名早他们先到的留芬兰学生，商定同路而行，乘 26 日的国际列车回国。他们憧憬着即将回到国内，参加正在开展的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有人提出："在十月革命的故乡，我们应该到莫斯科红场去，向列宁和斯大林墓敬献花圈。"这一提议立即得到留学生的一致响应，他们向中国驻莫斯科大使馆临时代办安致远提出了这一要求。安代办向他们解释说："按照国际惯例，除我国的正式访苏的代表团外一般过往客人都不搞此活动。特别是还要给斯大林献花圈，苏方更是不会允许。"

但是，安致远未能说服这些中国留学生，只好请示北京。

次日，这些留学生进一步向使馆提出在向列宁和斯大林墓献花圈时还要念《毛主席语录》。因事关重大，使馆只得再次请示北京。外交部指示：可以由中国使馆给苏联列宁墓管理处打电话，告知中国留学生将前往红场拜谒列宁墓并献花圈，请苏方协助。但未提及中国留学生要在列宁墓前读《毛主席语录》一事，苏方答复同意。

同学们心里明白，当时中苏关系已极其恶化，两党来往中断，公开论战，边境上大军对垒。并且在一个多月前，全部留苏中国学生已被苏方驱赶回国了。在这种形势下，中国学生手举《毛主席语录》，不但抬着献给列宁的花圈，还有献给已被苏联否定的已故领导人斯大林的花圈，"出事"就不是万一，而是"一万"了。

但是既要革命，就不怕"出事"，甚至不惜流血牺牲！

1 月 25 日午饭后，天气阴郁，气温在零下 30 度左右。下午

13 时许，中国留学生们在使馆外交人员陪同下乘车从使馆出发。车行 20 分钟即到达红场西端。苏方一少校警察过来同他们联系，态度也比较和蔼。

红场上的参观者已排着一字长蛇阵，直达列宁墓门。苏军少校引导他们抬着献给列宁、斯大林的两个花圈进入红场。等了一会儿，警官把他们插进参观者的行列，在他们身后很快又排上了近百人。后来发现，这批人都是便衣警察和特工。

这时，苏联警官不许留学生把献给斯大林的花圈抬上列宁墓，争辩无效，留学生不得不把献给斯大林的花圈放在陵墓一侧的小道上。随后，这位苏联警察带领留学生来到列宁墓前，要大家排好队，先献花圈，然后入内瞻仰列宁遗容。

于是，留学生在列宁陵墓门前的大理石上排成方阵，献上花圈，开始脱帽默哀。献花圈和默哀毕，接着在一位学生指挥下，留学生们突然全都拿出了《毛主席语录》，一名学生走出队伍领读。他学着国内学生每次开会前的仪式，高喊："请打开《毛主席语录》第 22 页，"然后高声念道：

"最高指示，我们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导师、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教导我们：'社会主义制度终究要代替资本主义制度，这是一个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不管反动派怎样企图阻止历史车轮的前进，革命或迟或早总会发生，并且将必然取得胜利'。'斯大林是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忠实朋友。中国人民对于斯大林的敬爱，对于苏联的友谊是完全出于诚意的。任何人的挑拨离间、造谣诬蔑到底都没有用处。'"

这两段语录的矛头显然是针对当时的苏联最高领导层的。

开始，不懂中文的苏联警官还不知道中国学生在做什么，一面说“请”，一面示意大家进去。但学生们不予理会，仍站着不动。这时一同学开始领唱《国际歌》。第一段唱完后苏联警官还请大家进去，但学生们又唱起了第二段……这时列宁墓的铁门倏地关上。带领学生们献花圈的警官和周围的军警、便衣一拥而上，把学生们推离列宁墓地。双方推推搡搡，冲突发生。

69 名留学生和驻苏使馆的工作人员手挽着手，高唱《国际歌》，演绎着他们从电影上看到的中国“五四运动”、“一二九运动”等中国现代史历次学生运动中，学生与军警冲突的场面。

这时，苏联警察架走了他们中间的一个小个子同学，劈头盖脑地将他打倒在地，用大皮靴踢踩他的胸部。其他同学急忙冲上前去营救，队伍被拆散了。

在几名苏军中校、少校的指挥下，几百名警察和士兵将中国留学生、中国大使馆的陪同人员以及新华社记者分割包围起来，几个人围着一个拳打脚踢，留学生献给列宁和斯大林的花圈也被苏联士兵撕得粉碎，一位女同学上前阻拦，被一个人高马大的军官拦腰抱住摔倒在地。几个士兵学着样子，抓住女同学的腿或腰部，扔进红场边的雪堆中。

这些苏联警察和士兵在棉手套里藏有铁块，将留学生打得鼻青脸肿，鲜血直流，甚至伤筋断骨。雪地上到处丢弃着他们的眼镜、围巾、鞋和帽子。同学们竭力挣扎、反抗、互相搀扶着，义愤填膺地高呼“打倒苏联现代修正主义”、“列宁主义万岁”，高声朗读《毛主席语录》：“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前往红场的 69 人全部遭到毒打，30 多人受伤，9 人重伤,4 人被当场打昏。

驻莫斯科的各国记者和不少市民闻讯赶来，红场周围人山人海。几位苏联老人高喊：“不要打他们！不要打学生！”有些苏联人还冒着危险冲上前来，引导留学生撤出包围圈。

留学生撤离红场。当大轿车行经闹市时，他们打开车窗，将拳头伸出窗外，拼命高呼：

“打倒苏修！”

“打倒勃列日涅夫！打倒米高扬！打倒柯西金！”

还高唱《国际歌》。

晚上，在使馆电影厅召开了“控诉苏修血腥镇压我留欧学生罪行大会”。朝鲜、越南、阿尔巴尼亚驻苏联大使馆都分别派了医生来中国使馆帮助救治伤员，对他们表示同情。

中国留学生在莫斯科红场被苏联警察打伤的消息很快就传到了国内。北京，1 月 26 日早上天还未亮，一队队的游行示威队伍已经开始向苏联驻中国大使馆进军。8 时整，各单位的高音喇叭开始播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联播。广播中报导了莫斯科红场发生的流血事件，中国政府向苏联政府提出了强烈抗议。广播中还说：“苏修的暴行激起了全中国人民的强烈反对和极大愤慨。现在，北京的大街上已人山人海，游行示威的队伍正向苏联大使馆挺进……”

最先到达苏联大使馆门口的是北京航空学院的游行队伍。“北航红旗”早在 25 日晚上就接到了他们派驻《人民日报》的同学打回的电话，说：“刚收到中国驻苏联大使馆急电，一批即将回

国的中国留学生在莫斯科红场瞻仰列宁墓时被苏联警察打伤，发生了流血事件，消息刚刚通知外交部和党中央。”

“北航红旗”的韩爱晶等人一听，立即召集主要头头们开会。大家一致认为：“这是‘苏修’对我们的严重挑衅，是可忍、孰不可忍！作为中国人和毛主席的红卫兵，我们必须立即采取行动，迎头痛击‘苏修’的挑衅，捍卫我中华民族的尊严。”会议决定立即组织大规模游行示威，声讨“苏修”的暴行，并发电给中国驻苏大使馆，对受伤的留学生表示慰问和声援。

1 月 26 日早上天还未亮，“北航红旗”广播站就以最大音量向全院广播了莫斯科红场发生的流血事件，要求“红旗”战士们立即起床参加游行示威，并欢迎广大革命师生积极参加。

于是，全院师生数千人很快集合好了队伍，由屠海鹰和戴维堤带队，举着“北航红旗”的大旗，浩浩荡荡地出了校门，直奔东直门内的苏联大使馆。这时天刚刚放亮，其它大专院校和单位也陆续得到了消息。很快，一支支游行队伍跟在北航的队伍后面，向城里进军。

一路上，红旗飘扬，歌声嘹亮，群情激奋，斗志高昂，抗议“苏修”法西斯暴行的口号声震天响。北航的师生们唱起了李劫夫创作的《我们走在大路上》：

我们走在大路上，

意气风发斗志昂扬。

毛主席领导革命的队伍，

披荆斩棘奔向前方。

我们走在大路上，

革命道路多么宽广。

共产党指引我们的航程，

无限幸福无尚荣光。

向前进！向前进！

革命洪流不可阻挡。

向前进！向前进！

向着胜利的方向。

李劫夫是沈阳音乐学院院长，著名作曲家。《我们走在大路上》这首歌，是李劫夫的代表作，写于 1965 年，在文革前及文革中风靡一时。

文革中李劫夫为毛泽东的许多诗词和语录谱写了曲子，有些成了脍炙人口的歌曲，有些语录歌也风靡一时。他谱的《蝶恋花——答李淑一》和《沁园春——雪》等歌曲很有水平，至今还无人能超过他。

李劫夫文革初也被打成“黑帮”，“北航红旗”派人把他“抢”来保护了起来，他对“北航红旗”革命小将十分感谢和赞赏。为表达感激之情，他为“”北航红旗”写的《红旗战歌》谱了曲。

书归正传。经过几个小时的行军，北航游行队伍到达了苏联大使馆门口，立即把使馆大门围得水泄不通。

使馆大门向南通东直门内大街的路文革初已改名为“反修路”。顷刻间，“反修路”和东内大街上，游行示威的队伍人山人海。“打倒苏修!”的口号声震天动地，响彻北京上空。

苏联大使馆大铁栅门紧闭，门内有几个苏方人员向外张望。北京卫戍区的警卫战士和警察已将使馆保护了起来。示威群众举着拳头，对着使馆大门不停地高呼：

“打倒苏修！”

“向苏修讨还血债！”

“坚决抗议苏修的法西斯暴行！”

“坚决反对现代修正主义！”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

“毛主席万岁！”

……

惊天动地的口号声几乎要把苏联大使馆震塌。

这时，一位卫戍区负责人找到北航负责人戴维堤，要他们注意不要抓人、打人。他转达卫戍区领导的话说：“只要学生们不冲进使馆，干什么都行。万一‘苏修’把我们的学生扣住，那就把人抢出来，‘苏修’抗议就抗议，由外交部处理后事。”

正在这时，有人报告说，有一辆“苏修”大使馆的伏尔加车从外面开来，现被堵在反修路口。愤怒的学生们已向车上倒了许多墨汁、浆湖，贴满了标语。车里的人吓坏了，不敢出来。学生们请示戴维堤可否把送上门来的“苏修”分子揪出来批斗，把车掀翻，点火烧了算了。

正在激奋状态下的戴维堤也是才 20 来岁的热血青年。他想：“把苏修分子揪出来批斗一下，把车烧了也算不了什么，谁让苏修打了我们的人呢？以牙还牙，以血还血，这是合情合理的。红

卫兵嘛！出点格没关系。”当然，理智最后还是占了上风，他最终觉得，不能蛮干，这是国家大事，不能让中央为难。

于是，戴维堤分开众人，来到伏尔加车前面。透过车窗，见车里坐着一男一女，男的开车，是个胖子。戴维堤举着拳头挥舞着，对着车内的人用俄语大喊：“混蛋！法西斯！打倒苏修！”然后，要大家让出一条路出来，用手势引导着伏尔加车向前开。

这时有人大喊：“别让苏修轧死你！”

他笑着说：“他敢！”

车内的胖子向戴维堤作了一个揖，慢慢地发动了车，跟着他一步一步地向前蠕动，在两边学生们的口号声中，一直开到了使馆门口。使馆的大门开了，伏尔加车鸣着喇叭开了进去，大门又立即关上了。

1 月 27 日，雪，北京各界群众十几万人继续冒雪在苏联驻华大使馆门前游行示威，把勃日列涅夫、柯西金、苏斯洛夫等人的模拟像处死，烧毁。苏联驻华使馆内的全体中国工人也进行了罢工。中国各地连日举行集会和示威游行，抗议苏联当局对中国留学生的迫害。

# 文革史话

## 之第三部 全面内战 第三卷

刘朝驹 著

# 文革史话

之

第三部

# 全面内战

第三卷

# 目 录

第 451 回：英雄归，陈毅火车站迎接　未曾想，赵全国转瞬被囚.....1
第 452 回：红革会，上海市四次夺权　心不甘，复旦质疑张春桥.....13
第 453 回：工农兵，北京筹备代表会　周恩来，接见工交口代表.....22
第 454 回：下命令，民航局宣布军管　一二六，军艺“星火”闹福州.....32
第 455 回：冲军区，众学生调兵遣将　见“三司”，韩先楚请示中央.....43
第 456 回：通电话，徐向前透露“七条”　大辩论，福建造反派分歧.....54
第 457 回：陕西省，夺权后对外办公　听广播，安徽省组织夺权.....64
第 458 回：一二六，湖北省进行夺权　有分歧，造反派争吵不休.....76
第 459 回：同一天，苏云赣相继夺权　枪声响，新疆发生大血案.....88
第 460 回：周恩来，连夜见新疆代表　两头按，西北边陲不能乱.....100
第 461 回：一二七，宁夏自治区夺权　为《七条》，林彪面见毛泽东.....112
第 462 回：批斗会，杜义德怒上西山　周恩来，接见工交口代表.....121
第 463 回：说铁路，提倡议保护古籍　发消息，北京支持王效禹.....132
第 464 回：下命令，中央军委定“八条”急部署，南京军区“四大”停.....142
第 465 回：围京西，周恩来出行受阻　批杨勇，不要再扩及他人.....154
第 466 回：苦口劝，反复再批刘志坚　命令到，北京军区“四大”停.....164
第 467 回：沙发后，青海上演空城计　一二九，西宁“八一八”夺权.....175
第 468 回：“红革会”，上海扣押徐景贤　春桥急，军队开进复旦园.....184
第 469 回：愤而起，申城炮打张春桥　涉窘境，张、姚亲临“红革会”.....195
第 470 回：齐声唤，炮声隆隆震复旦　急电到，上海乾坤大挪移.....204
第 471 回：搞情报，游雪涛“扫雷纵队”　提倡议，要过革命化春节.....216
第 472 回：周恩来，接见浙江省代表　发文件，红卫兵撤出军区.....227
第 473 回：陈里宁，演讲成反刘明星　论夺权，王力谈《人民公社》.....237
第 474 回：“井冈山”，河南炮轰刘建勋　黑龙江，三结合组织夺权.....246
第 475 回：华北局，李雪峰派往天津　飞北京，秦基伟片刻不停.....257
第 476 回：说不听，徐向前接见“红纵”　为夺权，北京公安局武斗.....265
第 477 回：周恩来，听取工交口汇报　“工字楼”，众部长暂时稍歇.....276

第 478 回：打报告，丁盛再议“石河子”说“联合”，春桥讲《上海公社》286
第 479 回：教育部，为夺权发生武斗　上海滩，耿金章又生枝节.....295
第 480 回：上海市，“红革会”批判头头　周恩来，办公室前大字报.....307
第 481 回：齐鲁乱，两派抢印动干戈　王效禹，泉城夺权二月三.....318
第 482 回：定宗旨，黑龙江精简机构　围矿冶，长沙河西师生急.....332
第 483 回：陈伯达，“二四批示”抵长沙　转眼间，“湘江风雷”遭镇压.....341
第 484 回：抓人多，电影院亦成监狱　扣学生，内蒙军区调部队.....353
第 485 回：枪声响，韩桐被杀在青城　上海市，人民公社告成立.....363
第 486 回：二月五，甘肃省夺权分裂　陈毅见，西安大学生代表.....374
第 487 回：批文革，接内蒙代表进京　财政部，杜向光拒抓业务.....387
第 488 回：说京西，张春桥“三点指示”　韩大胆，福州市形势逆转.....395
第 489 回：议新疆，雪域西藏也夺权　陈伯达，接见二医大“红纵”.....407
第 490 回：再规定，军以下不搞“四大”　江城乱，《二八声明》分两派.....417
第 491 回：停“四大”，武汉军区闹哄哄　年三十，众人围广州军区.....425
第 492 回：周恩来，接见江苏省代表　锦州城，二八社论挑风波.....435
第 493 回：性格爽，陈毅检查受欢迎　做规定，支左中不能开枪.....446
第 494 回：“肃流毒”，“高司”成了保皇派　辟谣言，福州“思想兵”请罪..456
第 495 回：查事因，接见内蒙古代表　听谏言，主席批中央文革.....464
第 496 回：接江华，先调李迎希进京　西安乱，军工厂武斗停产.....475
第 497 回：抓春耕，接见农口夺权派　摸屁股，重庆两派大辩论.....486
第 498 回：命多舛，罗广斌跳楼身亡　“革联会”，成立大会出情况.....497
第 499 回：河南乱，新疆参谋长被斗　赴甘孜，“炮轰团”终被轰跑.....506

## 第 451 回：英雄归，陈毅火车站迎接　未曾想，赵全国转瞬被囚

1 月 26 日下午 15 时 50 分，莫斯科的中国留学生乘火车回国。他们该拄拐杖的拄拐杖，该包扎的包扎。一些无伤的，也拄根棍子，跛着走路。使馆给他们每人胸前戴朵大红花，敲锣打鼓地送行。苏联则派出摩托车“开道”，两旁警车“保护”，后面是装有对讲机的小轿车压阵，几十公里，一路绿灯。几十名革命豪气冲天的中国学生，就这样踏上了回国的路程。

许多外国记者在火车站等着他们。有的请他们讲昨天的事件真象，进行录音，有的用照相机拍摄他们的伤情。留学生扔手捧《毛主席语录》，高声朗读，唱《国际歌》，喊口号。苏联警察不断地大喊：“不许你们扰乱社会秩序！”他们根本不予理睬，仍旧使劲地读、喊、唱，吸引了许多外国旅客的目光。

中国列车在苏联国土上行驶时挂的是苏联餐车。留学生去吃饭时，发现每个餐桌上都放着中文的反华小册子，诸如《关于中国的事件》、《莫斯科新闻》、《中国红卫兵在红场上》等等。他们立即向苏联列车长及餐车主任提出强烈抗议，要求立即撤掉小册子。他们口头上答应，但下一餐吃饭时，看到不但未撤，而且增加了份数。他们又一次提出强烈抗议。苏方列车长威胁说：“要知道，你们现在是在苏联的领土上，再这样胡闹，就不给你们饭吃！”这更加激起同学们的革命义愤，大家一致决定绝食。他们在毛泽东像前庄严宣誓：“在苏联的旅程中许多昼夜，我们坚决不去苏联餐车吃饭。”

从 1 月 27 日早晨到 30 日晚上 3 个多昼夜，这 60 名学生和 9

名援阿尔巴尼亚专家以及全体中方乘务员真的没有喝苏联一滴水，没有吃苏联一片面包。

27 日，列车广播里传来了给他们的慰问电和中国外交部发表的“最最强烈抗议苏修疯狂镇压我留欧学生”的声明,传来了《人民日报》社论和国内愤怒抗议苏联暴行的一系列消息报道，大家万分激动，泪流满面，更增添了绝食斗争的勇气和信念。

1 月 29 日，中国留法回国的第二批留学生来到莫斯科，他们被“苏修叛徒集团”的“暴行”激怒，又来到中国驻莫斯科大使馆，向中国大使馆提出还要继续去红场向列宁墓献花圈和读《毛主席语录》并唱国际歌，甚至有人扬言要第二次血洒红场。

1 月 30 日晚 23 时许，不依不饶，已经完全丧失理智的中国留学生正在加紧做去红场闹事的准备,他们制作了一个很大的花圈，并要求使馆翻译把一些“打倒”和“万岁”之类的含有挑衅成分的刺激性政治口号译成俄文，以便翻译教他们呼喊。而更令人担忧的是不少留学生想在红场大干一场，准备直接挑起武力冲突以“暴露苏修叛徒集团的真面目”，他们决心“不在红场献花圈就坚决不回国”，大有敢死队般的视死如归的决心。

此时苏方已经将列宁墓用木板围隔起来，并在报上发表了一则“列宁墓因修葺而暂停对外开放”的消息。苏方此举明显是防止中国留学生去红场闹事。

这时，留学生们又提出要在中国使馆正面院内停车场上示威游行，这一要求获得同意。然而这些好斗的留学生只要见有苏联人经过就冲着他们挥拳用中文呼喊反对苏联和反对当时苏共中央总书记勃列日涅夫的口号。而苏方人员则把这中国留学生的这一

切挑衅行为都拍了下来。

中国驻苏使馆根据北京的指示把“红场事件”中于苏方不利的新闻照片在使馆橱窗内展出。并加上一条俄文大标题：“红场上的流血事件”，还在其他几个橱窗里展出了与国内文化大革命有关的内容。引来一些苏联市民驻足观看。有人看后摇摇头说一句“不像话”就走了；有人则愤愤然骂中国留学生是“流氓”；也有人在橱窗玻璃上吐唾沫并涂写下流话。

为防止出事，守卫中国使馆的苏军警干脆不准过往行人在橱窗前停留观看。后来苏方就此通过外交途径向中方提出交涉要求中方在苏联领土上停止一切“反苏”的宣传活动，并要求中方迅速撤除橱窗里的“反苏”照片。否则苏方只好采取行动，由“苏联劳动人民自己去拿掉这些具有‘反苏’内容的新闻图片”。由于中国使馆采取不理睬的态度，以至于苏方终于采取行动，以密实的人墙围护住橱窗及拆除橱窗的人，以防止中方人员的阻止而必然会发生的肢体冲突。

由于苏方是有备而来，且人多势众，故中方人员被苏联个子高大的军警组成的人墙隔开。中方人员虽多次试图冲破人墙以保护橱窗，但在推推搡搡中始终无法接近橱窗，无可奈何。最后苏方终于成功地拆除了他们认为在进行“反苏”活动中国使馆的新闻橱窗。

30 日晚 19 时，中国留学生乘坐的国际列车抵达苏联边境站——拉乌斯基。苏联进行出境检查。这时要求不许随便说话，保持安静。留学生不管那套，这边车厢在检查，那边车厢齐声朗读毛主席语录：“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这就

是帝国主义和世界上一切反动派对待人民事业的逻辑，他们决不会违背这个逻辑的。”气得苏方人员目瞪口呆又无可奈何。

31 日晨 6 时许，列车抵达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中国驻蒙古大使馆的工作人员带着面包、馒头、罐头等食品早已等待在月台上。大家紧紧地拥抱在一起。使馆的人说：“你们为正义、为真理而绝食，好样的，你们辛苦了！”不少同学感动得流着眼泪说：“毛泽东思想和革命的意志鼓舞着我们，一点也不觉得饿。”

2 月 1 日下午 14 时，他们到达北京站。陈毅副总理代表中央到车站迎接，和同学们一一握手。在车站举行的欢迎仪式上，给他们每人左臂上套了个“反修红卫兵”的红袖章。陈毅亲自指挥大家高唱《大海航行靠舵手》，他穿着厚厚的军大衣，戴着放下帽耳的棉军帽，打拍子的双手戴着挂在脖子上的军用棉手套，显得笨拙而可亲可爱。

上海的“上三司”赵全国联合耿金章的“二兵团”到康平路夺权被张春桥制止后，他带着 5 人代表团到北京告状，没有见到中央领导，却听说《人民口报》将要发表支持夺权的社论，他更认为“上三司”在上海夺权的大方向没有错，又急忙飞回上海，于 1 月 22 日上午，再度联合“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上海兵团”等 4 个组织杀进康平路，200 多人，分乘十多辆彩车，五六辆轿车，以一辆宣传车开路，沿南京路等主要马路游行。中午 13 时 30 分，他们进驻康平路市委书记处，迫使工作人员交出钥匙，接管了市委办公厅机要室，占领了市委印刷厂。耿金章闻讯，急令“二兵团”按兵不动。

下午 15 时，赵全国对参加接管群众发表讲话，宣布今天中午

他们刚接到“上三司”驻京联络站电话，说陈伯达接见驻京代表，转达周恩来夺权指示。赵全国将其归纳成四点，向大家传达。据当天传单《赵全国讲总理来电4条》记载：

一，立即召开上海各革命造反组织代表会议，成立上海人民委员会，在条件成熟时由工农兵(包括革命师生员工)召开全市代表大会，按巴黎公社原则选举新的全市性领导机构。

二，在市人民革命委员会未成立之前，由上海各革命造反派组织成立临时的督管小组。

三，责令市委各级干部立即回原工作地点办公，接受临时督管小组领导。

四，市委所属各部委已经由各个革命造反组织接管者，立即同督管小组联系，建立全市性临时督管纲。

1967.1.22

后来赵全国说：“这是当时上三司制定的一些夺权措施，不是总理指示。”

赵全国在讲话时宣布接管上海市委，呼吁立即筹备和建立工农兵学代表会议进行选举，在选举之前，暂以“上三司”为主，成立“督管委员会一一上海市工农兵造反委员会”，监督市委日常工作。同时也表示了对张春桥不满：

“张春桥到了上海，被几个群众组织控制住了，不下来和群众见面，不把上海情况向总理，伯达和江青报告”，“有人说市委内部已经有造反派了，你们为什么还要接管？我说，不要看他们接管了，要看他们是什么货色：大老爷下台了，小老爷上来了！”

不过“上三司”也向中央发电报捷，在电文中再次提议张春

桥担任上海市委第一书记、上海市市长；提议姚文元担任上海市委第二书记、上海市副市长。

电报发出后，赵全国等一干人就坐在会议室里等待中央的回电。他吩咐手下，每隔半小时去邮局发一封电报。

晚上，赵全国又给徐景贤打去电话，让他转告张春桥和姚文元，“上三司”已经夺权，正在康平路等候张、姚的接见。

此时，张春桥、姚文元正在余庆路招待所召开紧急会议，继续 1 月 19 日的会议内容，召集讨论成立上海“革命造反派组织联络总站”的问题。

会上，张春桥讲了一番文革的大好形势，布置了继续向基层夺权的“战斗任务”后，突然话锋一转：

“同志们，我要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下个月，上海就要成立‘上海人民公社’啦，这是继巴黎公社之后，人类历史上的又一个伟大创举。伟大领袖毛主席非常非常支持，他老人家同意我当公社的第一书记，文元同志当第二书记。这是毛主席、党中央、中央文革对我们最大的信任和器重啊！根据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建议，并且得到发起成立上海人民公社的各革命造反派组织的同意，姚文元同志和我两个人即日起参加上海人民公社临时委员会的工作。……”

张春桥的话音刚落，会场上掌声雷动。

徐景贤将赵全国的电话转告了张春桥，。张春桥一面让秘书打电话去北京核实“周总理四点指示”，一面让“机联站”朱维铮打电话告诉赵全国，他正在接见造反派，请赵全国也来开会。赵全国没好气地回答：“不去！你告诉他我们这儿也在商量夺权问题”，

“你叫春桥到这儿来！说我们找他十几天了，他现在架子大了，希望他深入基层！”

与会人员都让徐景贤打电话给赵全国，让他来“联络总站”参加会议，大联合夺权。而赵全国那边却不同意，他要求大家到康平路里去开会，因为市委的权他们“上三司”已经夺下来了。赵说：“你叫他到这儿来，我们等他一小时！”

中央文革王力的回电很快来了，否认“周总理四点指示”。他说：

总理没有打电话，也没有这样的意见。陈伯达的意见也觉得值得研究。

昨天主席谈军队，积极站到无产阶级革命派一边，要求部队支持援助，都应支持。不介入是假的。不许当防空洞是一面，还要积极支持左派。干部不要吃老本。陈丕显、红小鬼，动员人家保自己，走到彻底垮台。广播电台马上发补充指示。左派下要求，不广播。

江渭清、谭启龙、江华、张平化，是否可以一批二保？你们保，就垮。

要一点旧的人，黎元洪也好。

我们造反有理，有理就不采用这种方法。用整风的方法。左派内战。

张春桥立即将王力的电话内容向众人宣布，随后与姚文元离开了会场。

赵全国的态度惹恼了与会代表，正在主持会议的“工总司”

潘国平气得跳了起来，站到椅子上指挥大家："赵全国这小子破坏上海的联合夺权，去年他要召开华东六省一市的造反大会，还伪造周总理的指示……走，我们一起去把他抓起来。"他一声号令，几十个造反组织的头头一拥而上，分乘两辆大客车，从余庆路直开康平路，冲进"上三司"设在市委大院内的指挥部，将坐在会议室里等待中央回电的"上三司"头头赵全国团团围住。潘国平指责赵全国私自抄家并侵吞抄家物资等行为，赵全国说潘国平是造谣诬蔑，俩人当即争执起来。大家你推我搡，前呼后拥，当场把赵全国推上大客车扭送到市公安局。

公安局一名值班干警听说是张春桥指示抓人，便递上一张纸请押送赵全国一同前来交涉的徐景贤履行手续签个字，徐景贤客客气气将纸递给王洪文，王洪文又转递给了潘国平，潘国平当仁不让伸手拿笔正要签，忽一想不对，就在纸上写了"革命群众"四个字。

"上三司"的又一次夺权也就此结束。

22 日这一夜惊变让"上三司"的学生们看得云里雾里，上海"红革会"、"炮司"等红卫兵学生组织也惊得目瞪口呆。

复旦大学"东方红公社"的胡守钧这天晚上恰巧碰上一位刚从市里回校的同学肖昌雄，听说了在余庆路招待所召开紧急会议，讨论成立上海"革命造反派组织联络总站"的消息，便和肖昌雄一起来到余庆路招待所会场。这一晚上发生的事情让胡守钧等人大为震撼，进而产生怀疑：在 1 月 6 日的大会后，是赵全国提出"成立以张春桥、姚文元为首的新市委！"1 月 22 日中午夺权后，他还向中央发电报，提名由张春桥担任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兼市长，

姚文元担任上海市委第二书记兼副市长。怎么晚上张春桥就让“工总司”将他拘捕了呢？

胡守钧认为张春桥这是以“我”划线，两面三刀的作风，无产阶级革命派怎么会有这种政客作风呢？而张春桥在上海夺权问题上大耍两面派手腕，那么，他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呢？

第二天，胡守钧他们开会，分析形势，表示了对张春桥的怀疑。胡守钧对同学们说：“张春桥一旦得逞，上海将暗无天日，我们必须将他拉下马！”

与此同时，“红革会”总部派人去北京搜集炮打张春桥的材料。

无独有偶，复旦大学“红三司”也召开勤务组扩大会议研究张春桥问题，会议得出一致意见：“我们不保张春桥！”

是日夜晚，寒风呼啸，胡守钧等人骑着装满浆糊桶、白纸、墨汁、排笔的黄鱼车，开向北站、外滩、南京路、淮海路……凡是看到有拥护张春桥、姚文元的标语，便针锋相对地贴上“警惕陶铸、王任重那样的反革命两面派”、“张春桥不等于中央文革”、“坚决反对目前成立以张春桥、姚文元为首的新市委”等标语，后面一律署名“孙悟空”。瞬时，上海形势发生逆转，一场山呼海啸般的倒张运动，在上海拉开了帷幕。

天还未亮，1 月 24 日凌晨 3 时，复旦大学“红革会”、“红三司”、“东方红”三大组织的头头胡守均、周谷声、安文江，劳元一等四人就被叫到市里开会。主持会议的徐景贤质问胡守钧他们：“为什么要刷这样的标语？”

胡守钧回答：“中国的语言是最丰富，最精确的，我们的标语充分表达了我们的观点。”

“红革会“的劳元一一言不发；“红三司”的安文江则模棱两可地说：“脑子里怀疑是可以的，但不同意‘孙悟空’把口号贴到街上去”。

徐景贤宣称这是反革命事件，勒令胡守钧收回大标语，这当然不能为胡守钧所接受，他当即顶了一句：“炮打张春桥不是炮打毛主席，根本谈不上反革命！”

“东方红”负责人周谷声也针锋相对地说：“徐景贤，我警告你，你刚刚的发言是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当心你自己！”

徐景贤冷笑道：“这样下去，你们不会有好结果的！”

大学生红卫兵们风头正健，哪里会在乎这种威胁，反而激起他们更大的愤怒。这怀疑，这愤怒，又感染了其他造反组织。当天，“孙悟空”又贴出大字报：《一问张春桥》。他们质问：张春桥对于群众组织为什么耍两面派手法？为什么上海市委都烂掉了，而独你张春桥是左派？……

当晚，“机联站”二把手郭守仁把安文江请到他家里吃狗肉，劝他说：“徐景贤和我想让你进市写作班子，春桥、文元也没意见。不过，你现在没毕业又当着头头。毕业以后再说吧。”

这天下午，“工总司”按照 1 月 22 日余庆路招待所召开的紧急会议上，“联络总站”制定的计划，召集各群众组织的代表和上海警备区解放军的代表在党校开会讨论夺权问题，。到会群众组织 60 多个，是公社筹备会议中最多的一次。会上，重新组成公社文件起草小组。由于“红革会”这次未被推选进入起草小组，引起“红革会”代表极大的不满，认为这是对红卫兵组织中造反

最早的“红革会”的排挤。“红三司”则代表不卖账，与“红革会”代表激烈争论起来。最后只好决定，上海学生红卫兵组织全都不参加起草小组，另选出“工总司”、“机联站”、“新革会”和一些外地红卫兵驻沪联络站等共 8 个组织，组成起草小组，连夜修改夺权宣言和通令，准备第二天见报。王洪文于当晚将会议情况向张春桥、姚文元作了汇报，并连夜在大街小巷贴满“欢呼临时权力机构即将诞生”的大标语……

就在这天深夜，上海街头忽地冒出一支支骑着摩托车的奇兵。车上的人物，几乎都穿军装，但是没有领章、帽徽，臂上佩戴红色袖章，上面印着毛泽东手迹“红卫兵”三个大字，还印着一行小字：“上海市大专院校革命委员会”。这个样式的袖章的红卫兵，在《解放日报》事件中已为上海人所熟悉，一望而知是“红革会”。

那天夜里，兴国招待所的电话不断，令人吃惊的消息，不断传入张春桥耳中：

“‘红革会’袭击中共中央华东局！”

“‘红革会’袭击中共上海市委！”

“‘红革会’袭击上海市人民政府！”

……

像一阵狂飙，“红革会”的年轻人在一夜之间，夺走了中共中央华东局、中共上海市委、上海市人委以及各区委、区人委 23 颗大印。接着，“红革会”的负责人占领了上海展览馆内的一幢房屋，作为他们的指挥部，并通知上海警备区派解放军保护他们这些“左派”。

原来，就在当天，“红革会”总部也在上海展览馆开了整整一天的紧急会议。在下午的会上，李功佐极力主张夺权。会议最后决定：各高校“红革会”统一行动，进行全市性夺权。以 1 月 6 日“打倒上海市委大会”参加大会的群众组织为成员。大家于是分头打电话，但找不到人。后来李功佐总算找到“工总司”的潘国平。

傍晚，潘国平赶到展览馆。“红革会”负责人马立新、李功佐等对潘国平，说不能让那些没有影响的中小组织夺了权，应由影响最大的造反派组织主宰上海大局。“红革会”希望“工总司”领头。潘国平同意，并马上打电话找王洪文商量。王洪文没有反对。

接着，“农司(筹)”夏桂伯也来了。

## 第 452 回：红革会，上海市四次夺权　心不甘，复旦质疑张春桥

当 1 月 25 日黎明，手里拿着大饼、油条的上海市民，忽见墙头贴着《特大号外》：

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的号召下，在革命造反派一片造反夺权声浪中，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上海市农民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筹备委员会、红卫兵上海市大专院校革命委员会等革命造反组织，在本月 24 日二十三点二十分采取了果断的革命行动，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夺了旧上海市委的大印！

这一革命行动大长了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志气，大灭了资产阶级保皇派的威风！

这次“夺印”成功，是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又一新胜利！

现在此印正由上述有关革命造反派组织保管，待全市工农商学兵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联合组织机构成立后，即行移交，共同掌权。

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

上海市农民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筹委会

红卫兵上海市大专院校革命委员会

1967 年 1 月 25 日

上海市民这才知道，“梦里依稀慈母泪，城头变幻大王旗。”一夜醒来，上海市又被夺权了。屈指算来，这该是上海市的第几

次夺权了？

其实，这些上海市民还不知道，上海政局的变换，比他们看到的还快。所有这一切，早已是昨日黄花了。

就在 24 日的晚上，“红革会”总部负责人、复旦大学的马立新打电话给徐景贤，说他们已经夺了全市的大印，“红革会”愿意和“工总司”、“农司（筹）”以及市委“机联站”一起联合夺权和掌权，希望徐景贤能够马上前去会商，共同签署联合夺权声明。

放下电话，徐景贤赶紧来到张春桥，姚文元那里紧急请示。

经过与张春桥、姚文元商议，时近深夜，徐景贤 “单刀赴会”，直奔南京西路上海展览馆内的“红革会”临时指挥部而去。在这里，果然看到如张春桥，姚文元所说的那样，在一幢房屋的四周由上海警备区增派了许多解放军巡逻哨。张春桥说过，在“红革会”提出派军队保护的要求之后，警备区作战处曾向他们作过报告，他们也表示同意，理由是不但要保护那些“左派”，而且要保护那些落在他们手里的华东局，市委，市人委等等的大印啊！要是有人在出国护照上盖上了钢印，完全可能堂而皇之地跑到国外去了……

走进“红革会”总部的临时指挥部，只见满满的一屋子人，他们的头头几乎都在场，有复旦大学的马立新、赵基会，上海师范学院的李功佐、小缪，还有“红革会”二处专门负责情报工作的劳元一等人，“工总司”的潘国平和“农司（筹）”的夏桂伯早已被他们请来了。夏桂伯是浦东村的一个大队长，因为打出造反旗帜比较早，所以成了农民造反组织筹备组的负责人。师范学院的李功佐是“红革会”常委中的一员女将，长于辩才，说起话来

像开机关枪一样，此时她正和潘国平等人侃侃而谈，看到徐景贤进门，就请他在桌边坐下。

所谓桌子，就是屋子中间用几张写字台拼成的一个长条形会议桌，桌上杂乱无章地放置着茶杯、水瓶，还有吃剩下的面包。会议桌旁边围着一圈长板凳。在房间的墙壁旁边，挨个排列着两排上下双人床，有些床上还躺着和衣而睡的穿军装的红卫兵，大概是白天行动太累了，现在正在睡梦里发出有节奏的鼾声，会议桌边的大声讲话对他们毫无影响。

“红革会”的马立新走过来对徐景贤说：“我们夺大印事先没有和你们打招呼，因为怕知道这次行动的人多了可能会走漏风声，所以我们单独采取了这个革命行动。但我们‘红革会’不想一家掌权，今天请你们来，就是想商量一下共同发布一个夺权声明。我们这四个组织是上海最大的或最有影响的，只要我们四家的步调一致，那么，上海的党，政，财，文大权，就由我们掌定了！”

听起来很有道理，应该没有理由拒绝。但是徐景贤肯定不会同意，因为他已从张春桥那里知道，这样做不符合中央大联合的夺权精神，但又不能明确表示出来，担心这样会把关系搞僵，这些学生造反脾气一上来，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只好耐着性子对他们讲：

“‘红革会’想搞联合夺权的想法是可取的，夺权以后当然要掌大印，可是夺印并不就等于夺权，关键在于掌权者说的话有没有人听，发号施令有没有人执行。这就涉及到联合夺权究竟是‘小联合’好还是‘大联合’好的问题。我们上海的造反组织，光是在《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和《紧急通告》上署名的，就有 20 多个，

而且都是得到中央贺电肯定的，再加上北京和外地的驻沪红卫兵组织，平时经常在一起联合开会采取共同行动的，总共已经有 32 个组织，至于其它各种名义的组织，还有好几百个，如果我们 4 个组织夺了权，把别的组织都撇在一边，就有可能出现上海造反派大分裂的严重局面。因此，我希望‘红革会’总部的常委们要慎重考虑夺权的方式，我的具体建议是：由 4 个组织出面，召开全市各造反组织的联席会议，共商夺权大计。”

其实，徐景贤的这个主意，就是刚才和张春桥、姚文元共同商定的。

潘国平在徐景贤到来之前本来已经松口，表示可以考虑“红革会”的意见，此时听徐景贤这么一说，缄口不言，不再表态了，“红革会”的小李、小劳等又提出另外一个方案，主张先由 4 个组织出一个声明，肯定这次夺印是一次革命行动，这些印章由“红革会”负责保管，直至联合夺权达成协议以后，再移交给上海各造反派的联合掌权组织。

这一来潘国平又不同意了，他主张大印应该交给“工总司”保管，因为工人阶级应当握主要的领导权。而徐景贤则以这些印章长期流散在外，可能造成严重后果作为理由，向他们提出警告说：“我问他们：如果有人钻空子利用这些印章跑到国外去，谁能担当得起这样的政治责任呢？”

这些当然也是张春桥、姚文元嘱咐他的。他们就这样从半夜 24 时一直谈到凌晨 3 时左右，直说得筋疲力尽，还是没有得出一致的结论。“农司（筹）”的夏桂伯，本来就是作为农民的造反代表被拉来做点缀的，此刻他坐在长板凳上摇晃着身子，直打瞌睡，

潘国平越谈越没有劲，索性爬到他身后的一张上下双人床上，呼呼大睡起来。徐景贤则趁这个冷场的机会，走到隔壁一间办公室，给姚文元打电话,汇报了谈判的情况和各方的态度。姚文元一直没有睡觉，就等着徐景贤这边的消息。他听了徐景贤的汇报，说还要和张春桥再商量一下，让徐景贤再等一等。

过了十几分钟，姚文元直接打电话来，先要潘国平听电话。

睡眼蒙眬的潘国平被叫醒了，听到姚文元在电话中明确告诉他："工总司"决不能在四方夺权的声明上签字，一定要说服"红革会"跟其它造反组织一起搞大联合夺权，并说这是张春桥和他两个人的意见，"希望小潘照办。"

潘国平当即在电话里允诺下来。

接着，姚文元又要"红革会"的马立新听电话，姚文元说："上海的很多造反组织对'红革会'的这次夺印有意见，准备要造舆论，'炮轰红革会'。春桥和我认为，在上海夺权斗争的关键时刻，造反派决不能打'内战'，现在春桥和我已经说服了那些组织，停止'炮轰'。同时希望'红革会'也要顾全大局，和大家一起搞大联合夺权。"

姚文元说："张春桥和我准备亲自召集各造反组织的联席会议，商讨上海各造反组织如何联合夺权，还要讨论新的政权机构的形式和组成等问题，他们在会上将专门讲一讲'红革会'夺权以后把大印保存得很好，而且主动表示愿意和其它组织联合夺权和共同掌权，'红革会'的风格值得肯定。"

姚文元还告诉他："为了不影响上海市和 10 个区的日常工作，希望'红革会'今天就把印章全部交给上海警备区，由部队出面

交回各单位。”

最后，姚文元又让徐景贤听电话，把这些话都告诉了他。

听完电话，四方会谈继续，潘国平明确表态要搞大联合夺权，不签四方声明，徐景贤马上对“工总司”的态度表示支持，“农司（筹）”的夏桂伯在一旁随声附和，“红革会”的头头们一个个都像泄了气的皮球，马立新嘟囔着说：“算了，就照春桥，文元的意见办吧！”会议就此结束，警备区的负责人随后就来取走了印章。

就在“红革会”、“工总司”、“农司（筹）”和“机联站”四方商谈联合夺权的这天晚上，上海又出了一件事：当天，上海柴油机厂的“联司”组织扣押了“工总司杨浦联络站”沈克祥，“工总司杨浦联络站”当即调 1000 多人包围了上柴厂。当晚，“工总司”黄金海闻讯赶到上柴厂，看见工厂的大铁门关着，“工总司杨浦联络站”有人正准备冲击大门。这时，王洪文赶到，他听了黄金海的汇报后，对他说：“不要冲，这是张春桥的意见，让他们表演表演。”于是黄金海动员“杨浦站”的 1000 多人撤离了上柴厂。

上海“红革会”组织的第四次夺权依然是不了了之，但是学生们对张春桥的不满并没有消退。1 月 25 日，“炮司”参考消息第四期刊登了以下内容：

（一）炮打司令部

1、关于张春桥的材料可能有以下几方面：

（1）安亭事件

（2）公安局事件

（3）柴油机厂事件

（4）罗恩鼎、郭仁杰、朱永加、丁学雷造反问题

（5）上海市委、复旦党委倒台问题

（6）复旦化学系总支副书记死的问题

（7）电影局、外事处运动初期贴过张的大字报

（8）红革会

（9）杨西光、曹荻秋交待情况

（10）蔡祖泉的问题

（11）经济风

（12）文静的问题很大

……

1 月 25 日，徐景贤出面召集各大学红卫兵负责人在上海大厦开会。徐景贤说："在新上海公社即将诞生之际，社会上刮起一股针对春桥同志的阴风，很值得同志们深思。"他点名要复旦红卫兵的几个负责人表态。

"炮司"负责人周谷声说："如果张春桥是左派，一万张大字报也贴不倒。"

"孙悟空"负责人胡守钧说："相信群众嘛，你们紧张个屁！"

"红三司"负责人安文江虚晃一枪："假如没有材料证明张春桥有严重问题，我就承认他是革命左派。"

"红革会"负责人马立新以攻为守："希望机关联络站的秀才们认清形势，擦亮眼睛。"

1 月 26 日，"红革会"的"将革命进行到底战斗组"在复旦大学贴出《上海必须第二次大乱》的大字报，提出了 10 个"为什么"，

矛头直指张春桥和“机联站”。如第 8 条说：

“为什么黑市委的一些保皇机构在大势已去之时宣布‘集体造反’？但是‘造反’一个月来却未交代揭发出什么像样的东西？为什么这些原封不动的保皇机构竟成了左右运动的决策部门？”这明显是针对以徐景贤为首的“机联站”而发的。

又如第 9 条和第 10 条说：“为什么在毛主席和党中央号召革命造反派大联合的时候，上海各造反派内部组织之间却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大摩擦、大分裂，甚至武斗？这样以新形式出现的群众斗群众现象是谁挑起的？根子在什么地方？”

“为什么 1 月 23 日《文汇报》还报道上海三司作为革命造反组织之一参加了‘上海革命造反派联络站’，而一夜之间竟成了非法组织，而被强行解散？”这是直接指向张春桥，认为他是挑起上海造反派内战的黑手，是反复无常的政客，其突出的事例就是“上三司”事件。可见“上三司”事件不但引起了胡守钧的怀疑，同样也使得“红革会”反感。

在此之前，复旦大学还贴出了一批言词含混但所指明确的大字报：《怀疑一切的革命精神万岁》，《警惕反革命两面派》，接着又贴出针对徐景贤“机联站”的大字报。

接着，《为什么？——再问张春桥二十个为什么》，《警惕中国的赫鲁晓夫》，《我们不保》……等一大批矛头直指张春桥的大字报相继贴出。

26 日这天，复旦校园里成了“孙悟空”的天下，到处都是他们贴的大字标语：

“张春桥就是不等于中央文革！”

“坚决反对目前成立以张春桥为首的上海市委!”

“张春桥为什么怀疑不得!”

“怀疑一切的革命精神万岁!”

但是许多人对炮打中央文革的代表张春桥很难理解，认为这是“一小撮”“反革命分子”在炮打中央文革。

复旦伤风，上海感冒，来复旦大学看大字报的人比南京路上的人还多。从全市涌来复旦看大字报的人把大字报区塞得水泄不通。三路有轨电车出现通车史上第一个高峰。

“红革会”还大量散发传单。对张春桥的质疑，迅速弥漫开来。

## 第 453 回：工农兵，北京筹备代表会　周恩来，接见工交口代表

此时，北京的夺权也在中央文革的指导下紧锣密鼓地进行着。

由于 1 月 23 日在与北京大专院校代表座谈时陈伯达说：“我建议，工农兵学商开一个临时政协会议，再筹备一个比较大范围的工农兵学商代表会议。”于是，北师大“井冈山”和学部“红卫兵联队”等组织立即在民族文化宫开会商议此事。会后，他们以北师大“井冈山”和学部“红卫兵联队”的名义，向中央文革小组写了一封建议信，建议迅速成立以戚本禹为总指挥的“北京抓革命促生产指挥部”，领导北京市的夺权。

与此同时，由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朱成昭主持，有北大、清华、北航等院校的造反派组织代表参加，在政法学院也召开了一个造反派组织头头会议，商讨成立“北京工农兵联合夺权指挥部”。

1 月 25 日，北京“三司”发出关于迅速成立“工农兵联络站”的倡议，发表了《首都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告北京市革命造反派书》。

当晚 21 时，中央文革小组在人民大会堂召集北京市“首都职工革命造反总部”、清华“井冈山”、“首都中等学校革命造反红旗兵团”等群众组织举行座谈会，陈伯达、康生、李富春、江青、关锋、戚本禹、王力、刘建勋等参加。

第二天，1 月 26 日，陈伯达、江青给北京航空学院“红旗”电话指示：

起草一个决定，不必开誓师大会，考虑准备北京市工农兵和革命师生代表会，组织市人民政府，不一定用市长这一形式，标语和传单暂不印，转告（其它组织）。

工农兵都派代表参加。哪一些可以接管，用什么形式，应经代表会研究。

立即放吴德同志回去，监督其工作，代表会马上准备工农兵代表会，代表会不能交给这一派，也不能交给那一派。北京市学生多比例可多一些，可搞主任，轮流主持会议。接管问题，可在会上充分讨论。

陈伯达通知传达毛主席的一句话：凡是搞宗派主义，小团体主义，最后都搞不成的，把这个精神传给其他组织。

当天下午 15 时至 18 时，陈伯达、江青等人又在人民大会堂与北京大中专院校代表座谈。

座谈刚开始时，江青看见地院的李贵不像学生，便问他："你是学生？"

戚本禹说："他是地质李贵，曾经被打成反革命。"

戚本禹接着问地院的代表："你们把朱成昭软禁起来了？"

地院的代表回答："没有。"

戚本禹："没有？不要软禁！"

陈伯达："今天和大家交换一下意见，建议在北京搞一个红卫兵代表会议，先搞北京的，然后搞全国红卫兵代表大会。这也是无产阶级革命左派大联合的重要步骤，看大家对这个问题有什么意见，赞成不赞成？"

大家都说赞成。

陈伯达："这样有利于搞掉小团体主义，宗派主义，本位主义，风头主义，个人主义，好不好？"

众答："好！"

陈伯达："既然是红卫兵，怎么不能联合起来？完全可以，你们认为条件成熟不成熟，可以不可以，怎么搞法，分几个步骤，行不行？我们希望早一点搞，请大家发表意见。"

有同学提出："三个司令部合起来，不要以战斗队名义，干脆来一个大联合。"

林学院代表："我们呼吁戚本禹同志主持召开一个会议，主持联合问题。"

戚本禹："这不成了包办代替了吗？"

陈伯达："不能包办代替，现在有人诽谤我们，说我们是新的大工作组。"

同学："同学们有一个大联合的迫切要求，……但有阻力。"

江青问："对反动的要警惕，'首都兵团'来了吗？"

答："来了。"

江青："你们要注意，据我们掌握的材料，你们里面混进了相当一部分'联动'的人，不要太纯，纯洁队伍是相对的，但要保证队伍中不能存在反革命分子，防止反革命分子钻进你们的队伍里来，特别是领导核心要注意。"

师院提出："左派队伍大联合，要自下而上的联合，联合之前要大辩论……"

矿院"东方红"、地院"东方红"、"一司"代表纷纷表示：同

意自下而上大联合，但不同意开展大辩论，因为容易造成对立。

陈伯达："聂元梓同志讲讲话吧。"

江青："聂元梓、蒯大富都应该表表态度吧！"

聂元梓："我愿意大联合的，有的地方做得不够，有的做了，同学们不太了解，大联合要在思想完全一致的前提下大联合。"

陈伯达："在大方向一致的前提下联合。"

接着，聂元梓谈到蒯大富的问题。江青："是他的错误的，他应该改正。"

聂元梓谈了一下她们搞联合的情况，准备工农兵学商联合。

江青："商比较复杂一点，先搞工农兵学，工农兵学中先搞学生左派大联合。"

陈伯达："红卫兵代表大会这是第一步。"

蒯大富："我有缺点，想在中央文革小组面前把问题讲一下。"

江青："大家对你意见不少了，你应该好好检查一下，大家不想把你一棒子打死，我们也是不愿意把你一棒子打死，想保你，还希望继续战斗。"

蒯大富："我是有错误的，我心里很不平静……我下面准备写些东西，我对革命造成的损失是很大的，打错了人……现在我觉得内外压力都很大……"

陈伯达："我们是爱护你的，希望你成长，但要在原则的基础上，如果离开了原则，我们就成了无原则的人，中央文革就站不住脚了，原则就是最重要的了，要用原则来衡量每一个人，同时也衡量自己，离开了原则就危险，'三司'在全国有很大威信，要爱护这个威信，不要随便丢掉这个威信，要在原则基础上爱护它，

这是个学习过程，在斗争中不断学习，不断地锻炼自己，不可能一下子什么都要求的十全十美，但要有原则性，要严格要求自己。”

江青：“总之，不是为联合而联合，为夺权，为人民，为了无产阶级革命而联合。如果不掌握政权，就会失败。联合是为了夺权。革命力量不联合起来，怎么能夺权呢？……我说还是在三个司令部的左派队伍基础上联合，不要让别人以为三个司令部不起作用了。”

江青还说：“你们不要以为自己是胜利了，现在能说你们是初步胜利了吗？比如‘联动’，昨天你们打了一仗。‘联动’，‘红旗军’，还有一个‘全国工农兵反帝反修造反团’也是反革命的，他们的袖标构图是‘刘主席万岁’，他们行动是有目标的，你们行动没有目的，他们上反毛主席，林副主席，中反中央文革，下反‘三司’，反你们，并且打进一些人来，而你们却联合不起来。”

“哈尔滨军工‘红色造反团’驻京联络站 20 多人，在这里长期脱离群众，最后走到反面。他们之中有的父母被斗，弟弟妹妹被公安局押起来，就产生了抵抗情绪，反对我们，现在指向我们，贴了我的大字报没有什么。这是一小撮，像这样，一个学校，就想在北京设个站，那还了得！这样北京不太好控制，一个部住好多人，你们要帮助动员他们回原地闹革命。我们自己的战士也应回来整训，我们文化大革命期间，今年春节不放假，否则铁路运输紧张。斗争也很紧张；这也是破四旧。请伯达同志讲话。”

陈伯达说：“我们建议，请你们这几天就开始学习主席著作，几篇文章，号召你们学习，你们要带头学习，改造自己头脑是不容易不流血的痛苦，这种痛苦比流血的痛苦还要痛苦，所以要下

定决心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加强无产阶级专政，要有大眼光，大气魄。主席在《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对批评自我批评提出了方向，不要纠缠在枝节上，批评与自我批评为了团结，不是为了离心离德，在毛泽东思想的大旗下团结，在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基础上团结起来，要抛掉旧社会给我们的一切影响。这就叫无产阶级夺权。不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团结起来，夺权就成功不了。你们在这里讨论一下，怎么样？怎样组织自己的代表大会，你们小团体，组织代表大会后还保留不保留，你们考虑考虑，有的有声明搞联合，是否溶合大团体里。我的话完了。”

有同学问：“现在发现江青对天津临时工一个讲话，有没有这件事？”

江青：“对合同工我们没有做具体规定，原则上暂时不变，经济主义，临时工更复杂。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都不要变动。我们看，问题是湖南省来的两个坏家伙给我传出去的，他们有的是造谣。现在这两个家伙在公安部里押着呢。”

又有人问：“济南铁路局制造新式步枪，问中央文革知道不知道？”

江青：“不知道，铁道部没有生产枪的任务吧！”

陈伯达：“我们调查，要提高警惕。”

同学说：“大庆武斗现象严重，现在比较乱，听说大庆造步枪，手枪，不知中央文革知道不知道？”

江青：“不知道。”

她接着说：“北京市委完全瘫痪了，你们心里要有个底，一定

要搞工农兵学联合，这样才有基础。兵可以参加联合，卫戍司令部出人，刚进城时军事接管，现在搞人民群众接管，由左派来掌握监督，山西搞得比较好，北京是否能创造一种新的形式夺权，北京市委不能再瘫痪下去了。我们这些不是包办，引导你们办，由你们实践。”

陈伯达：“你们交换一下意见，我们还有两个会要参加。”

江青说：“下一个是小学教师会，你们也应该动员他们回原地。”

陈伯达：“他们留在北京，留这么多天干什么，有很多工作需要大家帮忙，有一个群众会，还有一个外国人的会。”

1 月 26 日下午 17 时至 21 时，周恩来在国务院礼堂接见工交口革命造反派代表。他说：“批判薄一波、陶鲁笳的斗争至今没有展开，学校将薄一波抓回来后没有示众，都斗争薄一波，但不揭发，薄一波领导财经 17 年，1953 年那么多人批判，为什么现在批判不起来？抓彭、陆、罗、杨不怎么困难，为什么抓薄一波那么困难？今天工交口都在场，这个问题值得深思。”

他又说：“有一件事值得提出来。你们把部长弄得我们找不着。其实部长知道的很多，没有时间揭发，余秋里你们这样搞他，总有人在后面捣鬼。”

周恩来接着询问各单位的情况，然后说：“余秋里进行了 6 次检讨，心脏病发了，至今还没恢复，你们总要有一点阶级感情嘛！余秋里的问题是人民内部矛盾。大庆油田建设他有功；这两年计划，他把三线建设抓出来了，这些成绩都是大家有目共睹的。我们需要他，党中央需要他。这不是为余秋里辩护，他是经过长期

的考验，是从‘红小鬼’上来的，他身上的伤疤就是证明，他不是全靠吃老本的那种人。我说过，余秋里是部长级里的标兵。主席讲过几次，余秋里要保。”

有人递条子问：“中央保余秋里又要夺权，如何理解？ ”

周恩来：“这是两回事嘛！外交部没有烂也夺了权，陈毅还去祝贺，现在夺权，不完全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才夺权，现在是连锁反应，上海开始第一仗《文汇报》提倡后，十号登了报。中央决定《人民日报》公布后，估计北京会产生连锁反应，这是大势所趋，势不可挡。”

“当权派不能统统看成铁板一快，都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坚持反动路线的人，如都是这样，还有什么一小撮？这不符合事实，不符合毛泽东思想。”

“政府部门夺权一般首先夺运动的领导权。”

“一个科长、一个处长、一个组长，在他管的那个单位也是当权派，因此，对‘长’字号的，都要经过广大群众审查、考验，要分清性质，区别对待，如何区分，用批评自我批评的方法，要自己检讨，自我革命，同时允许答辩。”

“在北京各部的夺权，一般分两步走，第一步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权，归革命造反派领导，过去的革委会，筹委会，临时筹委会都处于无权的地位。业务主要实行监督，一方面通过革命，个别吸收‘长’字号参加造反派，使懂得业务的人都起来；另一方面青年成长起来，学会业务，逐步代替老年，当然不是不要老年，由监督转向领导。这是一般的作法，当然也有不同的，有的造反派业务能力强，能担当起来既夺运动的领导权，又夺业

务权，如广播事业局，新华社等，造反派有中层干部参加，能把业务搞好。”

“另一些单位，革命力量没有准备好，可以推迟一些，积蓄革命力量，过一个时期再夺。

还有一些单位没有什么业务的，如党内部门，妇联，青年团没有什么业务，现在男女青年都在闹革命，作用也不小，可以彻底闹革命。组织形式，你们去创造，叫革命造反委员会或叫联络站。”

“以上仅供参考，完全由你们在实际斗争中去创造，这不是框框。”

对中央各部的夺权，周恩来说：“中央各部，不一定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才夺权，这样就要先争论是不是？时间拖得很长，现在是连锁反应，势在必行，中央下了决心，因势利导，帮助你们，由上而下的搞，但我们不能代替。”

“我们提出的口号是：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高举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不是他们当权的也要夺，把权夺到群众手上，进行一次演习。”

“革命造反派夺权是在高度集中领导下发扬最大限度的民主进行的，这种夺权世界上是没有先例的。即使党权，军权在我们手里也可能发生和平演变，要最大限度的发动几万万人民，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进行夺权的斗争和演习。现在夺不单单是对一小撮，凡领导不好的就要建立革命组织监督，也可能监督组织成为长期的。对今后形势现在很难预言，所以必须大联合，凡是一

个组织革命的主流是对的，就要联合，不能独霸，独霸是资产阶级的，不是无产阶级的。这不是毛泽东思想，从逻辑上说就站不住。”

“一个系统的夺权必须是一个一个的单位来搞，不能一下子夺权。如石油煤炭铁路等系统，系统夺权当然是以工人为主，要先搞部，先搞本单位然后再搞全系统，铁路系统既要搞本单位的，又要搞马上联合全系统的。革命左派，开始是少数，争取中间，分化右派，孤立最右的达到团结大多数，然后又分化成为少数，再由少数发展到多数，螺旋式上升，分合不能像《三国演义》上说的‘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成为循环系统论。组织应当是由多到少，由小到大，而不是愈来愈多，搞那么多小组织。”

## 第 454 回：下命令，民航局宣布军管　一二六，军艺“星火”闹福州

1 月 24 日，北京工业大学“东方红”贴出大字报，称铁道部“东方红公社”单方面接管铁道部党、政、财一切大权，是改良主义的假夺权，宣布退出“筹委会”。“首都革命职工造反总部铁路分部”、上海“工总司铁路联合指挥部”等 24 个铁路群众造反组织以及 13 所大专院校、中学红卫兵组织发表特急联合声明，强烈抗议铁道部“东方红公社”单方面接管铁道部，宣布“东方红公社”发出的接管铁道部《公告》无效，倡议铁道部所属各单位造反派另行联合接管铁道部。

1 月 25 日，铁道部“东方红公社”批斗了铁道部部长吕正操、副部长武竞天。又以铁道部政治部名义，从铁道兵请来了一车全副武装的军人进驻铁道部大楼，以壮声威。

对安全要求更高的民航业也面临着如何保证安全运行的问题。1966 年 11 月以后，民航机关开始受到冲击，民航下属工厂、学校来京造反的学生和工人，开始在民航总局机关办公楼对面的一条马路上静坐，每天红旗招展，围着民航大楼呼喊口号，同时在民航大楼周围贴大字报和标语，要揪斗民航总局局长邝任农和政委刘锦平。但是，这一切看上去好像相当紧张，其实民航机关的工作人员仍然可以正常上班，国内外航班的正常飞行和安全生产并没有收到很大的影响。

到了 1967 年 1 月中旬的一天下午，随着夺权高潮的汹涌澎湃，民航大楼外的造反派串联总局机关内部的一些人，突然冲进了民

航机关的办公大楼，占据了办公室。

事发突然，总局领导立即打电话向吴法宪告急，他们担心总局机关会被冲垮、瘫痪，以致影响国内外航班的正常运行。

住在京西宾馆的吴法宪接到民航总局的电话后，马上把这一情况报告了叶剑英。叶剑英让吴法宪向林彪办公室打电话，请示怎么办。吴法宪当即给林彪办公室打电话，汇报了这一情况。

当天晚上，叶剑英在征得林彪同意后，通知北京卫戍区派出两个连的兵力，把冲进民航大楼里的工人、学生全部劝了出来，同时还十分严肃地告诫他们："不能再冲击民航办公楼，要保证航班的正常飞行。"

1 月 25 日，针对民航系统的情况，周恩来嘱秘书告空军司令员吴法宪："应以国务院、中央军委的名义起草命令，宣布由军队接管民航系统（包括整个民航系统所有机场、港站）。接管后，业务工作仍由原领导班子来掌管。"

1 月 26 日，国务院、中央军委颁布了《关于民用航空系统由军队军管的命令》。

命令发布后，空军派出的代表进驻了民航总局机关。经请示中央、中央军委、国务院和中央文革批准，空军规定：除总局以外，各大区的民航管理局以及下属单位，一律不搞"四大"，只进行正面教育。

1 月 25 日，全军文革小组编印的《军队文化大革命运动情况要报》第五号上，登载了《关于夺权的若干情况和问题》材料，反映了军队一些已被夺权单位的情况，并提出几个需要研究加以统一规定的问题：（1）什么样的院校领导权可以夺，什么样的院

校领导权不能夺？（2）各个左派组织是单独夺，还是联合夺？（3）警卫分队的权交给谁？（4）机关科研单位能否夺权？（5）医院、文工团等单位是按照机关还是按照院校对待，能不能夺权？

第二天，毛泽东在这份要报上批示：

林彪同志：

此件反映群众提出，究竟哪些机关可以夺权，哪些不能夺权；夺了权的人们对待不同意见的群众应取什么态度（应争取多数，不能排斥）。请加以研究。

毛泽东

一月廿六日

26 日，毛泽东说："接管是不可避免的现象。我们这个政府是上面派去少数干部和下面大多数留用人员组成的政府，不是工人农民起来闹革命夺得来的政府。这就很容易产生保留封建主义、修正主义的东西。"

教育部 1 月 19 日夺权的风波还在延续。

1 月 24 日下午，高教部"延安公社"一些人来到北京大学，高呼：

"卢正义、徐非光是坚定的革命左派！"

"反卢正义没有好下场！"

25 日深夜，高教部、教育部的"八一八红卫兵红旗造反团"、"工人革命造反委员会"30 多人再次来到北大，高喊"新北大夺权兵团在高教部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批判"等口号。

26 日下午，铁道兵工程学院"革命造反团"、装甲兵工程学校、

交通部的群众组织也相继冲进北京大学示威。大连海运学院“红色造反团”的四、五十人还冲进北大夺权指挥部，说“我们就是要搞一搞大北大主义”,“管一管你们的修正主义办公室”。他们将办公室中的两人从楼上拖到楼下,骂前来劝阻的63军军训解放军是“保皇派”。在高教部，他们贴出大字报，说“聂元梓的反造定了”、“想保聂元梓办不到”、“不把北大所谓夺权兵团赶出高教部我们誓不罢休”等等。

北大“红旗兵团”则针锋相对的提出：“反新北大就是反动，反聂元梓不是别有用心的一小撮，就是混蛋糊涂虫”。

高教部“延安公社”反对聂元梓是因为教育部夺权的事情。交通部是因为北京大学进驻交通部参与夺权的人员倾向交通部的“红交通”群众组织，自然就引起了“红交通”对立派的不满，他们认为“红交通”是保守派，于是也来北大示威，表示对聂元梓的不满。而部分军事院校反对聂元梓则是因为北大反对他们冲击《解放军报》社，到《解放军报》夺权。

1月26日，福州发生了围攻福州军区的“一二六”事件。

事情的起因可以追溯到1月18日，福州军区召开“福州部队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由于福州军区是面对台湾海峡的前线部队，因此，除学校、文艺团体、体工队、军事工厂等单位外，领导机关是不开展文化大革命的，所属部队也不开展“四大”。所以，在积极分子代表大会的发言材料准备上，日程安排上，都难免和当时运动的新形势有些脱节，例如代表发言中没有安排当时最热门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内容。从20日起，有人发现了这一问题，开始对这个大会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要求批判福

州军区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此时，《福建日报》和福建省电台负责报导的记者，也指责这个大会犯了方向性、路线性的错误，并声明对大会不予报导，退出大会。

到了 21 日下午，北京广播学院“北京公社红旗兵团”的南下学生开着宣传车来到大会的住址——福州军区招待所进行宣传。他们张贴大标语，坚决反对把学习毛主席著作同文化大革命对立起来，坚决反对脱离激烈的阶级斗争空谈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

在外界舆论的压力下，大会连忙专门组织学习了毛泽东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指示，以及中央首长有关指示和讲话，学习《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的有关社论，负责人还介绍了文化大革命两条路线斗争的情况，多次组织代表上街观看大字报。

但是，那些南下学生们还是不依不饶。22 日上午，北京广播学院“北京公社红旗兵团”的宣传车再次开到福州军区招待所，除了攻击这次大会，还喊出“打倒肖华”的口号。大会组织者当场就把那辆宣传车扣留下来，理由是学生播出了“打倒肖华”的反动口号。

23 日，北京广播学院的学生再次到军区招待所，要求军区负责人和韩先楚出来接见。从中午一直闹到深夜，但遭到了韩先楚严词拒绝，理由是：

一、你们广播了“打倒肖华”的口号，这口号是根据反动传单来的；

二、冲击军区；

三、干扰了大会；

四、态度不好。

韩先楚还传话说，“凡是革命左派一律支持，你们不改变这种做法一律不接见，几时改变，几时接见。”

那些北京广播学院的南下学生岂能服气，当场提出了强烈抗议，并于25日下午又跑到军区招待所张贴大字报，要求军区给他们贴大字报的浆糊，遭到了拒绝。于是他们在晚上20时发出了《第一号通令》，要求韩先楚在22时前必须出来和他们辩论，否则，由此引起的一切严重后果由韩先楚本人负完全责任。

到了晚22时，韩先楚并没有出来。那些天不怕、地不怕的学生就在招待所的门口水泥地上刷写大标语，公开点韩先楚的名。

1月26日上午8时30分左右，福州部队“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正在开“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誓师大会”，解放军艺术学院“星火燎原”南下造反队的6个人来到会场门口，要求在大会上发言，大会工作人员劝阻说：“要请示大会组织委员会，这是组织纪律。”

但“星火燎原”的人顶撞道：“什么纪律？是黑纪律，是刘邓的纪律，你们这个大会是刘志坚反动路线的产物，不让我们进去，说明你们心里有鬼，怕我们揭穿这个阴谋。我们这次来，就是要砸烂这个大会。”

双方唇枪舌剑，这时又有福州部队卫校“革字派”、福州部队政治部话剧团和歌舞团、前线广播电台等单位200余人赶到会场门前，要求进入会场。大会组织委员会主持会议的执行委员和工作人员拦在礼堂的门口，对他们说：

“你们不能进去，会场里已经坐满了代表，没有位子容纳你

们这么多人。”

“明明会场里还空了那么多位子，为什么不让我们进去？”那些造反派高声争辩道。

双方争执了一个多钟头，脸红脖子粗，依旧相持不下。那些军内造反派意识到靠嘴皮无济于事，只有“革命行动”才是最权威的，他们便呼喊着“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口号，强行冲进了会场，并登上讲坛，抢占了麦克风话筒，会场顿时陷入了一片混乱。

一个卫校“革字派”对着话筒大声说：“同志们，大家打开语录本，念第 10 页第二段‘敌人是不会自行消灭的。……’”

可是，那些积代会的代表们根本不卖这些造反派的账，一致对他们无理取闹的行径表示强烈的愤慨，不断地振臂高呼口号：

“不许捣乱会场！”

“我们要开大会！”

愤怒的声浪盖过了麦克风的声音，致使那些军内造反派半天也不能说一句话。

后来，组织委员会的一位大会代表夺过麦克风话筒说：“同志们，我向大家提三点建议：一、大家在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下团结起来；二、欢迎各个造反派的同志一起来控诉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三、待大会代表发言后，安排造反派的同志发言。”

他的话音刚落，全体代表便报以一阵地动山摇般的掌声，然而，那些军内造反派却坚持要马上发言，两边又拉锯了半个多钟头，迫使会议中断，暂时休息。

由于大会组织委员会的大人物到底对造反派的小人物还是畏

惧三分，休息后，被迫同意让话剧团、前线广播电台等单位造反派组织的代表在会上发了言，其中解放军艺术学院“星火燎原”南下造反队的学生的发言最为激烈，他声嘶力竭地喊道：“这个大会是刘志坚反动路线的产物，是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修正主义的会，我们有十足的革命的理由要造这个大会的反，要把这个大会砸得稀巴烂，要夺这个大会的权！福州部队党委的官老爷们，你们快滚一边去，由我们革命造反派来主持大会！”

对于“星火燎原”学生的杀气腾腾的演讲，那些思想还停留在廖初江、黄祖示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水准上的未参加过“四大”的代表们当然接受不了，即便是福州军区的军内造反派中也有不少人对北京军艺大学生的大胆妄为感到震惊，会场上又发生了骚乱，有人在抗议，有人在起哄，有人则喊着“打倒保皇派”的口号，也有人要退场，一直闹到 12 点半，大会执行委员宣布暂时休会，下午 15 时继续开会，人们这才陆续散去。但是，卫校“革字派”的学生没有走，他们又把福州军区邓副司令员团团围住，要他回答，他们 1 月 25 日将军区后勤部龙部长游街批斗是不是革命行动？

邓副司令员劝说他们：“同学们，军委对军队文化大革命是有规定的，不要抄家，不要抓人，不要戴高帽游街，希望你们要按军委的有关规定办事，按党的政策办事。”

这时，正好福州医学院“东方红红卫兵团”60 多位学生也来到会场。他们是中午 11 点左右列队来到福州军区要求韩先楚接见的，还开来了一辆广播车。但是在军区招待所门口受到岗哨的阻拦。几经交涉后，这些学生不管三七二十一，一拥而入，正好遇

见卫校“革字派”的人正围着邓副司令，便也停下脚步，聚围上去旁听了一阵子。接着，他们灵机一动想出花样，要求邓副司令帮助他们去找韩先楚。

这位邓副司令员是一位中将，年龄已近 70 岁了，虽然头上戴着军帽，但从鬓角看出他的头发已经花白了。在那宽阔的额角上有几道刀刻似的深深的皱纹，还有两道又浓又粗的霜眉向两边平射出去，眉下掩着一对深邃的眼睛。只是他的脸色看上去不怎么好看，显得有些疲惫，大概是被这些造反派的折腾已经搅得头昏脑涨，但还是耐着性子听完医学院“东方红”大学生的一席话，不急不徐地说：“同学们哪，韩司令工作很忙，身体又不好，有什么事可以跟我谈，我帮你们转告韩司令。”

那些大学生拒绝说：“不，我们不跟你谈，我们跟你谈是一减一等于零，你是解决不了问题的，我们要跟韩司令当面谈。”

“唉呀，同学们，现在已经两点零五分了。”副司令看了看左手腕上的手表。“我还没有吃午饭咧，我的肚子也在造反了，人是铁，饭是钢，总不能不吃饭呗，有什么话等我吃完了饭再谈，好吗？”

医学院的大学生们只好同意等他先吃了饭再说，他们留下 40 多人连同广播车留守在会场门口，另有十几个人则跟着那位邓副司令员来到了司令部第二食堂，甚至在邓副司令吃饭时，也有 3 个人在旁看守。学生们的这种做法让邓副司令的秘书看着好不恼火，他沉着脸问他们说：“喂，你们几个人叫什么名字？”

那几个大学生面面相觑，一味支吾地道：“这个……你问这个干吗？……我们……我们叫红卫兵。”

秘书不友好地扫视了他们了一眼，又盘问说："那你们今天来干什么的？"

"来学习的。"那几个大学生也是一板对一眼地回答。

当邓副司令刚刚放下筷子，那些大学生一拥而上，迫不及待地道："邓副司令，请你现在就打电话找韩司令。"

"你们可不要搞八二九啊！"一个大学生警告说。

"这里有什么八二九呀？！"邓副司令一时还不明白学生的意思。

"哼，想当初叶飞怕群众怕得像钟鼓楼上的麻雀一样惊破了胆，你韩先楚可别成为叶飞第二，也怕群众如叶公好龙一般。"学生的话一个比一个难听。

"怎么能这样说呢？韩司令一贯是支持革命群众和革命小将的，他的态度始终是很明朗的，你们的说话不对头。"邓副司令批评他们。

但是，在大学生的纠缠下，邓副司令还是答应打电话给韩先楚。

电话好一阵子才挂通，韩先楚的秘书在电话里转达了韩先楚的意见："医学院的同志要接见可以，现在正在开会，最好另外安排时间。如有急需解决的问题，可由邓副司令转告。"

邓副司令打完电话就想走掉，可是，那些医学院"东方红"大学生又拦住他，非要他带路去找韩先楚不可。这位副司令无可奈何，只好答应再跟韩司令联系看看。

这一次韩先楚同意了，他说："如一定要见，可以派少数代表，但要等一等，现在有事。" 于是他们又来到第二食堂等待接见，

那些像猛张飞一样急性子的大学生催问他说:“韩司令怎么还不来呀？他要到什么时候才来呀？”

“韩司令正在与周总理通电话，要等一段时间来。”肖副司令告诉他们道，接着又问，“你们要韩司令接见，主要谈什么问题？”

“我们要谈‘八二九’事件的情况。”“东方红”头头韩卫华眨着带有许多血丝的大眼睛说。

邓副司令一时还转不过弯来，正正经经地回答道：“‘八二九’事件，韩司令是从开始至今，一直是很支持的。”

“我们希望军区不要重演‘八二九’事件，你不要扮演刘永生。”韩卫华总算道破“天机”。

邓副司令听罢这话，忽然一下子明白了这些大学生们的用心，愤慨地质问道：“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韩卫华眉毛底下同样也射出两道电光，冷冰冰地道：“这话你自个儿心中明白。”

邓副司令显然被这几个大学生的话惹怒了，决意不再搭理他们，便摆摆手，气呼呼地晃着身子走掉了。

## 第 455 回：冲军区，众学生调兵遣将　见“三司”，韩先楚请示中央

此时已接近下午 15 点时分，参加福州军区“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的会议代表们又相继来到会场，医学院那 40 多名大学生也混在大会代表中间进入会场。因为会场里没有位置了，他们那队人马只得站到主席台前念《毛主席语录》。

而解放军艺术学院“星火燎原”那些闯将们则采取了更激烈的行动，他们在主席台的桌子上贴上了“勒令军区党委靠边站”、“大会的权由革命造反派掌握”等标语，讲台上的话筒也被拿走了，通往另外六个分会场的广播线路也被弄断了。他们还向军区党委勒令四条：（1）暂由“星火燎原”南下造反队接管大会的领导权，尔后由造反派研究，大会由造反派掌握；（2）军区党委靠边站，当权派随叫随到；（3）代表一个不能走，否则由军区负责；（4）不按以上三条办，一切后果由军区负责。

医学院“东方红”的那辆广播车也对着会场广播，代表们见大会无法正常进行，陆续退出了会场，大会只得散会。

下午的大会解散了，军区卫校“革字派”的学生从大会会场给司令部接待室打了一个电话说：“卫校有 40 多人，医学院有 60 多人，要找韩先楚谈问题。”于是，接待室即派了两人到大会会场与他们洽谈，经过一番费力的交涉，“革字派”的人勉强同意推出 7 人去见韩司令，被带到第二食堂等待接见。

才过了半个小时，医学院“东方红”的宣传车也开到了第二食堂门前的公路上，车上满载着医学院“东方红”和卫校“革字

派”的人，他们一下车就一窝蜂拥进了第二食堂。不久，军区卫校“革字派”对立面的“红字派”的人也来到第二食堂，因为他们也获准一起参加韩司令的接见，致使食堂又出现如中午开饭时那样热闹异常的场面。

邓副司令员带着陈、石二位副参谋长再次来到第二食堂，他一看见食堂里的人骤然增加那么多，好像是孙猴子身上的毫毛变出来的一样，不由地就火冒三丈，他强压抑住自己的情绪，尽量用平稳的语调责问他们说:“你们为什么不遵守诺言？你们同意派代表，为什么又全部来了？请你们还是按照原来的协议派代表，其余人一律先回去。”

“不，我们不回去，我们要参加接见。”

“对，既然我们都来了，就让韩司令一起接见我们。”

学生们围着邓副司令员吵嚷着。

“既然你们不肯派代表，那我也没办法，随你们去，我不管了。” 邓副司令员气愤地又坐上小轿车走掉了。

这天下午，韩先楚确实有事，他正召集福州军区常委会，研究解决军区积代会被夺权的问题，并打电话请示中央。17 时许，韩先楚正打算结束会议时，邓副司令员回来向他汇报了第二食堂的情况。

这几天，韩先楚患了感冒，加上积代会出现问题，着急上火，嗓子哑了，讲不出话来。考虑接见时人多讲话更听不清楚，他觉得还是派少数代表接见效果要好些。于是邓副司令再次来到第二食堂，此时食堂已是开晚饭的时间，邓副司令把医学院的学生带到食堂对面的一间房子里，对他们说:“韩司令马上就要接见，不

过只能接见 10 个代表，其余的都回去。”

一名医学院的学生立刻嚷起来：“不行，我们这 60 多人就是代表，我们要求全部接见。”

邓副司令瞟了他一眼，又环顾四周，说：“同学们哪，你们这么多人，人多口杂，是不能解决问题的。”

“如果这样，那我们保证只有 10 个代表发言，其他同学要发言可以写条子，既然来了，再出去到门口等，到底是什么理由呢？”学生说。

“不，韩司令只能接见 10 个代表，多一个也不接见！”邓副司令像拨浪鼓一样摇着头，拒绝道。

另一个精瘦的大学生高声说：“你韩司令摆什么臭架子，人家毛主席那么忙都抽出时间来接见红卫兵，而且一次能接见几百万，为什么韩司令几十个都不行？”

“不行就是不行，你们要是想接见的话，就赶快推出 10 个代表来。”邓副司令也像牛一样固执。

“嗯，那我们提二个方案请邓副司令考虑：一、再请邓副司令与韩司令商量，我们坚决要求全体接见；二、如果把话讲绝了，‘只能接见 10 个人’，那我们自己就去找，由此引起的一切后果由你们负完全责任。”学生发出最后通牒。

邓副司令一听也不由地火冒三丈，他那军人的火爆子脾气终于发作了，怒目相视，态度强硬地道：“那好，你们自己去找吧，有责任我不负。中央有规定，对军队不能冲，冲了一切后果由你们负责。”

“冲了又怎么样？国防部都可以冲，你这个小小的司令部为

什么不能冲？”有个大学生十分狂妄地叫嚷着。

“你们敢冲就冲吧，冲了一切后果自负！”邓副司令不再理睬他们，头也不回地径自走掉了。

这下子，事情弄僵了，要韩司令接见一事眼看就要成了泡汤。此时已是晚间 19 时，浓郁的夜色笼罩着大地，医学院“东方红”的大学生一面打电话向自己学校的同伙以及全市几个造反派大组织告急，说要在军区召开大会，要求搬兵驰援，同时整队向福州军区司令部进发。他们挥舞着队旗，高唱着造反歌，还真颇有一番声势。

当向福州军区司令部进发的医学院“东方红”队伍离司令部大门还有二、三十米距离的时候，他们远远看见许多解放军正从不同方向涌向大门，并推来了一个木架子来挡在大门口。木架子上面贴着 1 月 14 日中央下发的《关于不得把斗争锋芒指向军队的通知》。

学生们怕解放军把大门关上，于是，那个执旗领头的大学生将旗子一扬，大声喊道：“冲！”

学生们一拥而上，与堵在门口的几十个解放军发生了冲突。

警卫营的战士口气强硬地说：“韩司令只接见左派，没时间接见你们。”

学生则反驳道：“什么没时间，这是屁话，韩司令早已答应接见我们了，我们就是要进去，冲也要冲进去！”

造反派学生与战士们越吵越激烈，那些医学院“东方红”的大学生一个个都像吃了豹子胆，硬是鸡蛋碰石头地要往里面冲，而战士们则竭力地阻拦学生们冲进去，互相拉扯着，推来搡去，

有的学生衣服被撕破了，红袖章撕裂了，纽扣扯掉了，手表被碰坏了，手表带弄断了，眼镜也被打坏了。至于学生们则更凶了，他们大打出手，有几个人用手卡住一位部队干部的脖子，还有一位戴眼镜的看上去顶文雅的女大学生居然打了一个战士一记耳光。

战士们组成的人墙堵不住像野兽一样发了性子的造反派学生，缺口终于被凶暴的洪流打开了，有几十名医学院大学生冲进了门口，朝办公大楼的方向奔去。

早已隐蔽在暗处待命的两个警卫连的战士随着一声令下迅速出动，他们如同切豆腐一般把学生们一小块一小块地切割包围，声色俱厉地警告说："不许冲，里面是司令部，不能进！"

学生们一听说那幢外观普普通通的白砖楼房就是司令部，不由地为之一愣，而且，他们又被这么多的警卫战士像猎犬捉猎物一样困住了，确实也着了慌，知道自己捅了一个不小的漏子，只得规规矩矩地束手就擒，让警卫战士带到一个灯火球场上集中。

医学院"东方红"的学生们席地而坐，又开始念《毛主席语录》。这时候，从门外又赶来两个警卫连，外调一个营的兵力，数百名解放军高举着"不要把斗争锋芒对待准解放军！"等大幅标语，把这些大学生团团围住。而学生们则一再呼喊：

"韩先楚镇压学生运动罪责难逃！""韩先楚是镇压学生运动的刽子手！"等口号，场上的气氛依旧十分紧张。

军区副参谋长出面对他们说："你们今天冲击军事机关的行动是极端错误的，希望你们不要再冲击军事机关了，应该赶快退出去，有事情派代表商谈……"

但医学院“东方红”大学生们不予理睬。接着，副参谋长又向他们宣读了 1 月 14 日《中共中央关于不得把斗争锋芒指向军队的通知》，学生们安静下来，听着《通知》，但是仍然坚持要韩先楚出来接见他们。

副参谋长见学生们安静下来了，即下令将包围他们的部队撤下去。

再说在校的医学院“东方红”大学生们接到了自己战友的告急电话，马上集合队伍奔赴军区。当队伍走到离军区司令部还有 5 里多路的军区支左接待站时，他们停下来，要借接待站的电话询问军区是否开会，在电话机旁的一位解放军说：“你们不能打电话，不过，我可以替你们问问情况。”接着，那个解放军真的挂了一个电话到军区，得到的答复是：“今天军区及周围军区各部门都没有开大会。”

学生们一下懵住了，因为他们接到的电话是到军区开大会，现在不知道哪个电话的消息更可靠，该进还是退呢？正当他们在彷徨迟疑之际，恰巧看见“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福建省总部里的人也赶来了，于是，他们又重新排好队伍，排成三路纵队，高举着红旗，唱着《造反歌》向福州军区进发。在他们走到离军区还有 2 里路时，遭到了由一个排解放军战士组成的人墙阻拦。他们不听劝阻，强冲过去。然后又整好队伍，仍然是三路纵队，昂首挺胸继续进发。

他们走了一段路程，前面又是解放军战士组成的一堵人墙拦住去路，这时候，他们发现赶来声援的农学院“思想兵”及北京广播学院“北京公社”的宣传车也被拦在那里，三路人马会面，

欢天喜地，农学院的“思想兵”拍手欢迎医学院战友的到来。他们聚在一起，士气更加高昂，呼喊着“下定决心，不怕牺牲”的口号，一股锐气，全无惧怯，冲破了第二道人墙，接着，又冲破了第三道人墙，终于到达了福州军区司令部的门口。

此时在司令部的门口早已布下了重兵，战士们目光炯炯，严阵以待。那些学生先上去同解放军交涉，而门口的解放军便把中央 1 月 14 日的《通知》分发给他们。看了中央的《通知》，学生们一个个就像皮球被戳破一样一下子泄了气，不再敢往军区门口里面瞎硬冲了。他们聚集在门口，向先来的同学了解情况，而北广“北京公社”的南下学生在一些医学院大学生的帮助下，强行把宣传车开到司令部大门口，高声喊道：

“革命的解放军要积极行动起来!”

“韩先楚滚出来，爬出来见我们!”

“韩先楚是人还是鬼？”

“韩先楚必须向毛主席、林副主席低头认罪!”

这当儿，北京“三司”驻福州市联络站的 3 个南下学生也闻讯匆匆忙忙地赶到现场，他们先是分别向在场的解放军、医学院“东方红”及军区卫校“革字派”的同学提出两点意见：

1、保证部队和同学不要再发生冲突；

2、在任何情况下，保证前线的指挥机关不能失灵。

在他们的说服下，医学院“东方红”、军区卫校“革字派”的人勉强同意了这两条意见，叫已进去的就地整顿，后面的不要再进去了，里外学生都排好了队伍。

接着，“三司”3 位南下学生以调停人身份，要求韩先楚接见

他们 3 人。韩先楚电话答复是："（1）昨天卫校'革'字派组织军人游街，是错误行动。（2）今天两次冲进我们的代表大会，这是一个错误行动。（3）今天晚上冲击了军区司令部是违背了中央指示，这是严重的错误行动。承认以上 3 条错误，卫校和医学院同学各留下 3 个代表，其他人统统回去，以后韩司令再接见。如果不按以上处理，谁都不能走。"

韩先楚的强硬的态度再次激起了学生们的无比愤怒，那暂歇下来的广播车上的高音喇叭又发出了尖声刺耳的狂呼乱叫：

"万炮齐轰韩先楚！"

"揪出韩先楚游街示众！"

"韩先楚必须向毛主席、林副主席缴械投降！"

"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

"三司"的代表对韩先楚提出的 3 条，要求交军区党委讨论通过，并提出他们的 6 条意见：

1、今天，革命学生、红卫兵战士要求韩先楚接见，这是个革命行动；

2、我们支持造代表大会的反，因为这个大会不突出两条路线的斗争；

3、如果有材料完全可以炮打韩先楚，我们不反对；

4、保证军队和学生之间不要发生武斗；

5、在任何情况下，保证前线指挥部不能失灵；

6、要求韩先楚立即接见革命学生。

他们对韩先楚的秘书道："我们希望韩先楚同志不要重蹈'八

二九’的覆辙。”

这几天，韩先楚的脑袋涨得要炸开了，恨不得在脑壳上钻个窟窿来减压。没想到围绕着积代会的问题，竟掀起狂波巨澜。那些军内造反派两次冲击了代表大会，而且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医学院“东方红”大学生也跑到军区来闹事，这不是成心要跟他过不去吗。本来今天他为积代会的事就已经伤透了脑筋，可是，那些大学生还想揪他回答问题，这叫他如何不恼火呀？况且，他确确实实是忙得不可开交，连嗓子都撕哑了，没办法接见那么多人。岂料到这些医学院“东方红”大学生蛮不讲理，居然耍起性子要冲司令部！简直把这军事重地当作儿童游乐场了，岂有此理！好吧，你们要闹就闹吧，要冲就冲吧，难道我韩先楚还没有办法收拾你们？你们敢冲司令部，我就抓你们几个，看看你们还敢不敢冲？他正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做了，有中央 1 月 14 日文件这尚方宝剑，他便在司令部的里里外外布下了一道道重兵防线，决心跟这群无法无天的毛头大学生们摊牌较量，硬碰硬。

韩先楚是一个一向比较谨慎的人，他事后又思量了一番，感到如果连充当调解人的“三司”南下学生也不接见的话未免是不太妥当的。虽然他相信自己的政治地位还是稳固的，毛泽东对他是信任的，但是，他也不是无所顾忌的，在这场运动中多少党政军要人垮台了。他无法预料今后将是什么样的命运在等待他，因此，他也不希望事件闹得太大，事情闹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对他未必有好处，倘若能够有一个更好的收场办法，岂不是更好？

正好“三司”的南下学生再次提出要求他接见，他知道那些本地的造反派学生是比较听“三司”话的，如果“三司”的南下

学生肯帮忙的话，说不定僵局会出现转机。鉴于上述原因，他突然改变主意，决定接见那 3 个“三司”南下学生。在一间会议室里，韩先楚和这 3 个“三司”南下学生一一握手，并问了各人的名字，然后说：“好的，同学们的意见，我们可以考虑。”

“三司”代表竟滔滔不绝地做起韩先楚的“思想工作”，他说：“我们奉劝韩司令，不要重演‘八二九’事件，不要步叶飞的后尘，重蹈其覆辙，希望你能够立即接见学生，不要把事态发展扩大，造成流血事件……”

“不，他们不承认那三条错误，我决不接见！”韩先楚断然拒绝了，又愤愤地说，“他们敢冲，我就敢抓，就是打死几个也没关系，我负责！”

这样拉锯了两个多钟头，双方都犟得如两头野牛，谁也说服不了谁，最后，“三司”代表提议道：“这样吧，请你们让我们打电话给周总理，报告请示这件事，可以不可以呀？”

韩先楚略略思索了一会儿，说：“好的，我们同意给中央挂电话，给周总理挂电话，不过，得由我们部队方面来通话。”

于是，福州军区石副参谋长给周恩来打电话，由于周恩来的电话没打通，又给中央军委文革小组组长徐向前挂电话，这一回挂通了，接电话的是徐帅的秘书。副参谋长汇报了医学院学生冲击司令部的情况，并请示如何处理，北京方面的答复是需要研究。这时候，“三司”代表几个人要求和韩先楚一起等待徐向前的电话答复，他们便一直等到 27 日天明。

那些冲进福州军区里面的医学院“东方红”学生此时仍在灯光球场上静坐着，他们从中午起就没有吃饭，部队的人几次劝他

们到机关食堂吃饭，都被他们拒绝了。军区食堂送来馒头，他们也不吃，说是“黑饭”、“臭饭”、“经济主义的收买”等等。半夜，军区给他们送来一些大衣，有些人到底还是穿上了，毕竟冬天的深夜是十分寒冷的，那些医学院“东方红”大学生们的骨头再硬也硬不过大自然的无情法规。

## 第 456 回：通电话，徐向前透露“七条”　大辩论，福建造反派分歧

27 日凌晨 4 时，徐向前给韩先楚回了电话，他支持韩先楚对冲击军事机关的学生采取强硬措施，并透露说：“军委有几条命令很快就要公布了，你们可以按照这几条命令的精神处理这一事件，学生们要说服他们退出去，若不听劝阻，你可以相机行事，出了问题我负责。”

韩先楚立即召开常委会，传达了徐向前的电话内容，并研究应该采取什么措施。

而 26 日至 27 日这一通宵，对那些冲进福州军区司令部的医学院大学生们来说，可真是一个不眠之夜，这里是与台湾一海之隔的最高军事指挥机关，时刻处于战备之中，戒备森严，他们的行动受到了严格的限制，连大小便也有人跟随监视。当然，这一切不完全是为了战备，而是生怕他们偷偷溜掉。而且，福州军区在营房门口安装了两个大功率的高音喇叭，彻夜广播《毛主席语录》和 1 月 14 日的中央《通知》，及福州军区自己写的指控医学院学生受到幕后人的指使、冲击了军区司令部、违背了中央指示的稿件。

27 日天亮后，卫校“革字派”、北京广播学院、福州医学院又聚集了 300 余人在福州军区大门外，与福州军区展开了喇叭战。这是音量对音量的较量，彼此都把音量放到了不能再大的程度，喇叭中充满着可怕的噪音。

由于军区高音喇叭的功率大大超过宣传车喇叭的功率，那巨

大的声浪淹没了对方的声音，学生们气急败坏，恨不得把福州军区大门口的那两个喇叭一拳砸掉。

就在这时，从军区内驶出一辆“伏尔加”小轿车，刚出军区门口，就被那些愤怒的学生们拦住了。他们认出汽车里面坐的是军区廖副政委，昨夜他也在现场，此时正好有要事要外出。学生们岂肯放过，一下子就把他的车子团团围住，愤怒地吼道：

“车上的人快滚出来！”

“不出来我们就砸烂小轿车！”

无奈，廖副政委只好硬着头皮从车里钻了出来，那些发狂的学生就势把他里三层外三层地团团围住，就如同美国尼克松回忆他在 1958 年任美国副总统期间，南美之行所遇的危机一样。这些学生对廖副政委又是推，又是搡，高喊着：

“你回答，你昨晚为什么对我们的革命行动进行污蔑？”

在场的几个福州军区机关干部赶忙过来劝阻，而学生们又提出条件威胁说：

“你们必须把那两个高音喇叭摘取下来，不然，我们就把他拉去游街。”

廖副政委的心里确实也有几分畏惧，害怕那些高举的拳头会像雨点似的落到自己的头上，也害怕真的会被拉去游街，这在当时的中国实在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就连人大委员长朱德朱老总的夫人、中国妇联主席康克清不也一样挂着牌子在汽车上游街吗？但是，尽管如此，廖副政委仍不肯为避免皮肉之苦而拿原则作交易，他摇摇头说：

“这个不行啊，我也做不了主。”

此时此刻，一个军区卫校“革字派”的学生攀爬上去，欲将福州军区的大喇叭摘下来。下面的一个解放军战士见状，急忙拉住他的脚，要把他硬拉下来。

在旁的医学院学生忙警告那位战士说：“这样硬拉，摔下去会死掉的。”

那战士怒目瞪了他们一眼，发火地嚷道：“死了我负责！”他依旧紧扯住那人的脚不放，还有几个解放军也想抓住那卫校学生。

可是，这些医学院“东方红”大学生也不示弱，有两个愣小子竟爬到廖副政委的小汽车顶上，声色俱厉地威胁说：

“如果你们敢抓他，我们就马上砸烂小轿车！”

又是无奈，那些解放军只好眼巴巴地望着学生摘下了那两只喇叭，一个被他们砸坏了，一个被没收了。这时，学生们才勉强放了廖副政委，那两个学生也从车上爬下来，但车顶和车门已经被他们弄变形了。

我们再看福州军区内。还在福州军区内等候中央回电的北京“三司”代表一直坐到次日天亮，还不见中央的回电，便跑去探听消息。福州军区陈副参谋长答复他们说：

“中央的电话已回了，是打到别处去的，现在韩司令正在开常委会。”

“噢。”“三司”代表眉头一皱，估计又有了新的情况，他们必须了解中央的态度，与中央保持一致。于是开口道，“陈副参谋长，我们要派人回‘三司’联络站联系情况。”

“不行。”陈副参谋长一口拒绝了。

“为什么不行？”学生代表的双眼像刺刀一样尖锐地盯住陈

副参谋长的脸逼问。

“不行就是不行，在事情未解决之前，你们任何一个人都不得离开这里。”陈副参谋长的态度十分强硬。

“那让我们打一个电话，总可以吧？”学生又采取迂回战术。

“你们要打什么电话？”陈副参谋长那审视的目光停留在这位学生的脸上。

“我们让‘三司’来一个人。”

陈副参谋长略略想了想，便同意说：“好吧，就让你们打一个电话。”

“三司”的代表打电话将此时的情况告诉了外面。

早上，韩先楚过来见“三司”的代表。这一回，他的语气截然不同了，硬梆梆地对几个学生说道：

“中央军委文革已经回电话了，中央的态度是十分明朗的，你们的六条是错误的。我还是那三条，前天卫校‘革’字派组织军人游街是错误行动；昨天两次冲进我们的代表大会，并非法夺取大会领导权，这也是一个错误行动；昨天晚上冲击了军区司令部是违背了中央 1 月 14 日的指示，这更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错误行动。过去认为你们是左派，现在看来还得考验，小伙子呀，你是辜负了我的希望，你们要好好地做检查，从这一次犯错误汲取教训。”

这个戴眼镜的“三司”代表也沉下脸，激愤地道：“我们对你的话提出抗议，到目前为止，我们还不认为我们是错误的，有些事情的真相如何还有待于进一步调查，我们准备回去之后，组织学习《毛选》，等几天再来和你们辩论。”

约莫 9 时许，“三司”、“新北大”、哈军工、哈工大又来了一些人，那 3 个“三司”代表向新来的同伴们介绍了情况后，又用咄咄逼人的目光直视着韩先楚说：

“韩先楚同志对这件事的处理是错误的，在今后的斗争中，我们要经受党和毛主席的考验，我们决不辜负党和毛主席的希望，而不是其他什么人的希望，但是，我们更希望在今后的斗争中，考验韩先楚同志究竟是跟毛主席司令部的，还是刘、邓司令部的！”

韩先楚显得有些犹豫，他知道倘若今天不接见这些医学院“东方红”的学生们，除非荷枪实弹的镇压之外，看样子这出闹剧是难以收场的，不如暂时先让一步，要接见就接见他们一下，以求尽早打烊收摊。于是，他就和北京“三司”南下学生协商决定，已经进入机关院内的以及在门外的卫校“革字派”学生一起集中在灯光球场，由韩司令接见。其余在外面的组织则派一两个代表参加。

清华的学生到底是见过比较多的世面，一转念就觉得在灯光球场接见有些不妥，其一是既然已知中央指示，再呆在军区里面会给不怀好意的人揪住把柄的；其二韩先楚这个人像闷葫芦一样令人捉摸不透，假若一会儿争吵起来，会被一些人钻空子的。而且，万一韩先楚翻下脸来，到时候关起门来打狗，吃亏的不正是学生们吗？还是撤到外面为上策，一则外头人更多，势更众；二则外面不是军事禁区，出了笼子更自由自在，若出了事情，也便于外界接应。因此，他皱皱眉头，改了主意，在同几个伙伴商量后，便单方面改变协议，突然把军区内的学生队伍全都拉到大门口外面去，造成了既成事实，迫使韩先楚不得不再作迁就，答应

到门口外面接见。

下午 14 时，韩先楚司令终于来到了大门口，“三司”几个人一边拿来烟和茶款待韩先楚，一边又由调停人摇身一变为大会主持人，控制了麦克风话筒，像古希腊的克里底亚一样唾沫四溅地说：“我们经过两天一夜的艰苦斗争，终于把韩司令给请了出来，这是毛泽东思想的又一伟大胜利，同时，这也说明了韩司令极端害怕革命群众和革命学生，我们坚决要求韩先楚司令必须向我们公开赔礼道歉，并给予平反……”

医学院“东方红”、卫校“革字派”以及“三司”、北广、“新北大”的南下学生等像走马灯一样轮番上台发言，他们翻来覆去逼迫韩先楚对三个问题表态：

1、拉后勤部的领导干部游街，是不是革命行动？

2、冲击大会会场，是不是革命行动？

3、医学院“东方红”的人冲进了营门，是否算冲击军事机关？是不是革命行动？

尽管一宿未眠的韩先楚疲惫不堪，两眼布满了红丝，嘶哑的嗓子犹如老唱片一样发出沙沙响的声音，但是，在他的身上依旧有一股凛然不可侵犯的将军的威严。他从容不迫地回答说：“我已经多次明确回答这些问题了，卫校‘革字派’同学拉领导干部游街是违背上级精神的，冲击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是干扰了大会，至于医学院‘东方红’等革命组织闹革命的大方向是对的，但把矛头指向解放军不能是革命行动，冲击指挥机关是不对的。”

医学院“东方红”头头韩卫华迫不及待地把话筒夺了过去，

冲动地叫嚷道：

“刚才韩先楚同志回答问题的态度是十分傲慢的，是极不老实的，他污蔑我们医学院‘东方红’把矛头指向解放军，这罪名是‘莫须有’的，我倒要问问韩先楚，难道我们要求你接见的革命行动就是‘把矛头指向解放军’吗？原先我们不知道不准进军事机关的规定，当我们知道中央规定后，就立即停住了，没进入司令部机关，集合停在球场上，为什么还要说我们是冲击了军事指挥机关呀？难道说找韩先楚就是把斗争矛头指向解放军吗？”

韩先楚浓眉一挑，瞟了韩卫华一眼，反问说：“我是不是解放军呀？”

下面的学生齐声回答：“是！”

那个韩卫华又激动地嚷嚷着：“韩先楚的逻辑荒谬到了极点，他把自己和整个解放军划等号起来，众所周知，罗瑞卿、贺龙、刘志坚这些都是军内反党分子，打倒他们并不等于把矛头指向解放军，同样的，你韩先楚也不是解放军的化身，批判你韩先楚，决不等于把矛头指向解放军！”

韩先楚司令一时语塞，说不出话来。

这当儿，学生们又是抢话筒、摔话筒、拍桌子，气势汹汹地逼问韩司令说：“韩先楚，你承认不承认我们是真正的左派？”

韩先楚扫视了他们几眼，平心静气地说：“真正的左派要经过运动的考验，要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来证实，是要经过群众公认的，一个人说了是不算数的。”

那些造反派学生见韩先楚不肯承认他们是真正的左派，便发起火来，又责骂韩先楚的态度极不老实，是个两面三刀的人，北

京广播学院“北京公社”的人还向军区党委发出了《第二号通令》。接见一直持续到下午 17 时多才结束。

福建“八二九联司”林学院红卫兵也赶到现场，他们针锋相对地刷出了反对医学院“东方红”冲击军区行动的大标语。当晚，他们还贴出了《绝不允许把斗争锋芒指向军队，绝不允许冲击军事机关》的大字报，这是第一张明确反对“126 行动”的大字报，也意味着“八二九联司”与其他造反派组织之间的分歧。

晚上，“八二九联司”在东方红大街省成套局前面的空地上临时搭起了一个简易的辩论台。19 时左右，两派的群众都来了，一方是以医学院“东方红”为主的“思想兵”，另一方是“八二九联司”的学生，他们有秩序地分别坐在辩论台最前面的左右两边。而后面是聆听辩论的群众，那一大片黑压压的人头一直延伸到马路边，把马路也占据了一大块。

约莫 19 时 30 分，辩论会开始了，第一个发言的是医学院“东方红”头头韩卫华，他滔滔不绝地叙述了一番关于“126 事件”的经过，只听他道：“我们整队前进，高唱着战歌，当离大门还有二三十米时，我们看见许多解放军从不同方向涌向大门，并推了一个木架子来挡道，我们怕他们把大门关上，就赶紧跑过去。这时候，有五六十个解放军在门口拦住我们，说什么‘韩司令只接见左派，没时间见你们’，”但是，我们认为韩先楚已答应要接见我们，并不是没有时间，坚持要进去。于是，他们就把我们几个同学手反绑架起来，有的甚至动手打人，我们同学有的衣服被撕破了，袖章被撕裂了，钢笔、纽扣也掉了，眼镜被弄坏了，有二块手表被打坏了，手表带也被扯断了，还有一个同学被割破了一

道 2 厘米多长、0.5 厘米深的伤口，鲜血淋漓。他们还极力抢我们的大旗，有的人则被推进去，这样一直到了大门后不远的操场上，有几百多名解放军把我们团团包围住，为了避免发生冲突，我们马上集中坐在球场上念语录、唱革命歌曲，此刻他们才拿出中央《114 指示》给我们看，而事先我们根本不知道有这个文件……”

韩卫华发言后，接着是“八二九联司”总勤务组成员、“新厦大公社”的一个头头黄朝晖登台辩论。

黄朝晖用金属般响亮的嗓音说：“刚才医学院‘东方红’的发言好像说得天衣无缝，其实这是一件‘百衲衣’——破绽百出。他们狡辩说事先并不知道中央的《114 文件》，如果他们硬要装糊涂不知道的话，那么，就不妨用事实来说明问题吧。在他们 1 月 26 日往军区司令部机关大门冲击前，两个解放军战士把一个宽一米、高二米的木板搬到大门的正中间，这木板就是刚刚韩卫华说的‘木架子’，上面贴着正是中央的 1 月 14 日《通知》，解放军同志们叫他们看这份中央文件，可是这些‘好汉’们却不把中共中央的文件放在眼里，竟狂妄地叫嚣什么‘不要把这个当作挡箭牌’，公然对抗中共中央指示。事实是胜过雄辩的，它是最好的反驳词，它将把谎言与狡辩击成齑粉！”

“他们一会儿说他们是‘被推进去’的，一会儿说他们‘不是冲进军区，而是走进军区’的。这些理由就像竖在桌面上的火柴梗是立不住脚的，恐怕连三岁小孩子也不相信他们不是自己冲进军区、而是被解放军‘推进去’的神话，试问，他们这么多的人，一个个都是长着一百多斤肥肉的大汉子难道就这么好‘推’

么？并且，他们进去不是一米，而是好几十米，真要把这么一大群人推进几十米的话，所花的气力恐怕也可以搬动一座大山了。至于他们说是‘走进军区’的，这话多少比说‘推进去’要恰切一点，因为腿是长在他们的身上的，要往哪个方向走是完全要凭你们的大脑意志的。不过，众所周知，军区司令部是军事重地，可不像这条东方红大街那么好自由自在地走来走去，由于你们的发言又‘揭露’了有大批的解放军在阻拦你们的行动，可见要像逛马路一样走进军区司令部是不可思议的，准确一点说，还是冲闯进了军区。”

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这样的辩论是很难有结果的……

## 第 457 回：陕西省，夺权后对外办公　听广播，安徽省组织夺权

就在福州发生冲闯军区的“126 事件”当天，1 月 26 日，陕西、安徽、湖北、江苏、云南、江西 6 省也相继进行了夺权。

1966 年 11 月前后，西安地区的造反派队伍迅速发展壮大，保守派势力开始土崩瓦解，各级党政部门及企事业单位的党组织基本瘫痪。针对当时的形势，12 月 12 日，西安“大专院校革命造反统一指挥部”，简称“统指”召开讨论会。西安交通大学文革总会主席李世英在会上提出这样一个观点：造反派和保守派的斗争大方向是一致的，应该和他们搞统一战线，和他们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并通过“谈判” 和他们消除分歧，共同对敌。造反派将这段话简称是“三句半”。以西安军事电讯工程学院、西安工业大学等院校为首的大部分造反派头头明确表示不同意李世英的意见，说这是修正主义、投降主义、折中主义和右倾思潮。双方激烈辩论，但谁也说服不了谁，最后不欢而散。和其他省市一样，曾经团结一致、风雨同舟的西安大专院校造反派组织在即将获得胜利的前夕，也出现了裂痕。起初，双方的分歧只限于内部互相辩论，以后愈演愈烈，公开到社会上，甚至出动宣传车、贴大标语和大字报互相指责、攻击、谩骂对方。

陕西工业大学与西安交通大学相对，中间只隔一条大路，但是分属两派。两校的高音喇叭互相对骂，陕工大骂西交大为“狡老总”，西交大骂陕工大为“傻瓜大”。

12 月 31 日，《陕西日报》终于被“红色造反者”查封。《陕西

日报》的总编辑是由陕西省军区副政委李一松兼任的，他的《陕西日报》总编辑一职也随之被撤销。

受上海“一月风暴”的影响,1967 年 1 月 16 日，陕西省委办公厅被宣布夺权。紧接着，17 日，陕西省委宣传部也被宣布夺权。19 日，陕西省委组织部同样被宣布夺权。1 月 22 日，《人民日报》刊登西安军事电讯工程学院文革临委会《一切权力归革命造反派》的文章。1 月 23 日，西安“统指”召开夺权会议，商议夺权事宜。并商定了夺权的分工：

由陕西师范大学、陕西工业大学、西安石油学院、西安外语学院等单位造反派组织和“西安地区红卫兵造反司令部”夺中共中央西北局的权；

由西安交通大学、西安冶金建筑学院的造反组织和“西安地区炮打司令部战斗队”等造反派组织夺陕西省委、陕西省人民委员会的权；

由西安矿业学院、西安工业学院、陕西财经学院的造反派组织夺中共西安市委和西安市人民委员会的权；

由西北电讯工程学院、西北工业大学、西北大学等院校的造反派组织夺取省公安厅和西安市公安局的权。

但在夺权中，各造反派组织都想掌握更大的权利，西交大和西军电、西工大争着要夺公安厅的权，因互不相让，再次不欢而散。

25 日，陕西省委机关“革命烈火战斗队”、“西安地区炮打司令部战斗队”、“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 105 游击队”组成夺权小组，宣布夺了陕西省委书记处的领导权。

他们夺权后，责令省委第一书记霍士廉、第二书记李瑞山、书记处书记章泽、肖纯等彻底交代问题，揭发刘少奇、邓小平和西北局、陕西省委的问题。

1 月 26 日，夺权小组正式对外办公，30 日向各地、市县委、直属各党委、党组发出通知，宣布“今后陕西省委的一切权利归夺权小组行施。”与此同时，各地、市、县委以及各地专员公署，市、县人委也相继被夺权。从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书记刘澜涛，到全省各地各单位的负责人相继“靠边站”，并被批斗和关押。西安市委书记、市长徐步、市委委员、副市长张少康、省人委委员、西安市副市长海涛等部分干部被批斗后自杀。

在夺权风暴中，西安庆华电器制造厂 11 个群众组织的造反派组成“文化大革命临时委员会”，也夺取了该厂运输科、财务科、厂党委、政治部等重要部门的权。

该厂保守派组织“联合总部”头头为阻止“文革临委会”夺权成功，与厂党委达成协议。协议中写有：“关于我厂党委、政治部、厂部的移交、接受，应遵照《红旗》杂志评论员文章关于《无产阶级革命联合起来》一文的精神，不得擅自移交给一个或一些革命组织，必须由我厂各个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组织协商、移交、接受。”厂领导还签署了意见：“党委只能解散或改选，不存在接受问题。”

该协议遭到该厂“文革临委会”派的坚决反对。

1 月 27 日下午，该厂“联合总部”的负责人召开会议，确定了实行本派反夺权的方案。晚上 24 时，“联合总部”派出人马，截断庆华电器制造厂通往洪庄、灞桥和田王庄等方面的交通要道，

熄灭路灯，切断电话线。1 月 28 日 1 时左右，“文革临委会”发现电话不通，感到事情严重，立即派车向西安的造反派求援。车刚开出没多远，就被路旁埋伏的“联合总部”派拦住，双方展开了武斗。

“联合总部”迅即抢占了厂广播台，并利用广播宣布“开始夺权”。接着，“联合总部”砸开办公室抢公章和文件等物。厂区内到处是双方武斗的打斗声和叫喊声。

经过一场激烈的搏斗，人多势众的“联合总部”派人员，将“文革临委会”11 个组织的负责人都抓了起来。“联合总部”把俘虏的“文革临委会”派的 100 多人，关进厂消防车库、地下室。

天快亮时，“文革临委会”派的大批援兵赶到庆华电器厂，向“联合总部”派发起反攻。经过双方激烈战斗，“文革临委会”派很快夺回了被“联合总部”派抢去的阵地。“联合总部”的大批人员被殴打。

在这次武斗事件中，双方使用了石头、砖头、木棍、钢钎等“冷兵器”。 武斗造成数十人负伤。

这次武斗，是陕西省最早发生的武斗事件，对陕西和西安市的文化大革命形势，产生了很大影响。

1 月 26 日，安徽以“八二七”组织为首，也组织了夺权。

1 月 21 日毛泽东关于解放军应该支持左派的批示，等于同意了合肥批判李葆华的大会。1 月 23 日，安徽省与合肥市造反组织召开“斗争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李葆华之流大会”，批斗李葆华、李任之、杨效椿等人。之后，李葆华等人被连续游斗 3 天。

冬季正是农闲时间，安徽大量农民进城造反。23 日下午，“八

二七” 梁守福和张恺帆、周炳山等人乘坐安—2 型飞机到凤阳地区撒传单，解决农民进城问题。传单是以省委和省人委的名义印发的，意思是要求农民兄弟赶快回家，不要在城里静坐。有问题，省里马上派人处理。

还在 1966 年 12 月 26 日，合肥街头就突然出现了上百名持枪的人，横冲直撞，高呼口号。他们臂上戴着“红卫军”的袖章，是淮南市的荣复转退军人组织，刚成立时叫“23 省红卫军造反总司令部”。发起人是一个叫张家祥的残废退伍军人，长的像京剧《沙家浜》里的刁德一，言语举动却像《沙家浜》里的胡传魁。据他自己讲，他的脑袋里还残留着小日本的弹片。

据安徽“八二七”动态组汇报：这次淮南“红卫军”到合肥是省林业厅厅长程明远搞来的，据说还抢了安徽纺织总厂民兵的枪支。

建设厅的“八二七”宣传队也报告说：“红卫军”把档案垫在地上睡觉，将材料搞得乱七八糟。

总之，合肥人对“淮南红卫军”很反感。

24 日上午，“八二七” 梁守福请“淮南红卫军”的各路头头到“八二七兵团”，协商与他们联欢一事，想借机劝说他们回淮南。就在“八二七”和“红卫军”众头头商议正欢时，有人过来小声对梁守福说：“他们中间有人身上带枪。”

梁守福不太相信，就出来亲自验证一下。只见那人站在小舞台的桌子北头，30 来岁，长方脸，大高个，身子向前微倾，腰间有个盒子炮样的东西清晰可见。梁守福不敢断定是枪，还是包，就主动过去和他打招呼，顺势将自己的右臂向他腰间靠近，挤压

式的碰一下，感到很硬，于是认定他身上带的就是一支枪。

梁守福不动声色地回到原来的位置上，向开会的头头们说："'淮南红卫军'到合肥来与'八二七'并肩战斗，对'八二七'的支持很大，我代表'八二七兵团'和全体战士向你们表示衷心的感谢！春节快到了，我想你们也想回去与家人团聚，'八二七'也没有什么好送的，决定今天下午，由兵团宣传队与你们联欢，表示欢送。联欢后，请你们会餐，晚上用汽车送你们回淮南，如果大家同意，就请鼓掌。"结果，大家一致鼓掌表示同意。

当天下午，"八二七"的梁守福、李文安、葛庆尧等人又前去参加由安徽省省长黄岩、安徽省副省长王光宇、安徽省委书记处书记兼秘书长任质斌主持召开省厅局长和合肥市有关部门联席会议，商议解决当时合肥市日常生活急需解决的问题。

由于正是游斗李葆华的第二天，大街上游行的、报喜的、欢呼的人很多。原定下午 14 时开会，结果将近 15 时任质斌才到。他一进门就解释说："省委机关瘫痪了，连小汽车司机也造反了，我是走过来的。长江路人很多，走小路远一些，来迟了。"

接着他问："合肥市的同志来了没有？"

有人回答："范涡和没来"。

任质斌很生气地说："今天的会主要是他发言，他不到怎么行？合肥市的同志赶快把他找来"。

正说着，范涡和满头大汗赶到会场。

任质斌对他说："你不要慌找地方坐，先把迟到的原因跟大家说说。"

范涡和说："被要求解决问题的群众堵在办公室里。"

会议开始后，范涡和报告说："合肥市的供应马上就要出问题，储备粮只够供 20 多天，按规定应该在 40 天以上。生活用煤，也只够供应两个星期……到春节也只有半个多月的时间。"

接着黄岩补充发言说，巢湖地区有粮食，但无车运输，淮南淮北有计划内的煤，但没有计划内的车皮。

会议乱哄哄地议论半天，谁也拿不出好主意。

会议刚结束，安徽省委又通知"八二七"晚上去省军区参加紧急会议，由省公安厅汇报凤阳、定远农民暴动问题；省林业厅厅长程明远与"红卫军"的问题；大、中学校的军训问题。

安徽省军区的会议由安徽省军区司令员严光主持，公安厅副厅长首先介绍凤阳、定远一带农民的情况，又提到淮南这些地方的复员军人可能会煽动当地的农民发生暴动，并把这些问题与程明远的"红卫军"联系起来，而且此时程明远已不知去向，情况非常危急，希望省军区动用军队。

省林业厅厅长程明远支持的合肥市"红卫军"，其"委员会主任"是长期居家休养的原安徽省民政厅副厅长于得水。他 1931 年参加农民协会，1935 年参加中共胶东特委发动的胶东农民武装暴动，腹部两次被枪弹击中，留下难以痊愈的伤残，属二等甲级残废。著名小说《苦菜花》和《山菊花》中，于得海、于震海的原型就是于得水，在山东胶东是个传奇英雄，当时几乎家喻户晓。1963 年他因伤口复发进行手术治疗，其后便丧失工作能力。"文革"开始后，"红卫军"请这位已是年逾花甲的老转业军人于得水出任一把手，以壮声势。

对"红卫军"的问题，"八二七"梁守福在会上谈了自己的意

见：由公安厅继续侦查，弄清情况，根据周恩来在 1 月 19 日讲话中提到的“复员军人应在各单位参加文化革命，不应该抽出来单独组织”的精神，先通缉程明远，再由省军区给荣、复、转、退军人写一封信，希望他们回本地区“抓革命、促生产”。

安徽省军区司令员严光首先表示同意梁守福的意见。

会议最后决定：（1）情况不太确实，都是“可能”不行，要求公安厅继续侦察，把情况弄确定。（2）军区不能派部队。（3）通缉程明远，解散程明远控制的“红卫军”。（4）由省军区再写一封给荣、复、转、退军人的信，希望他们解散组织。

当晚，看完“八二七”宣传队的演出，又大吃了一顿的“淮南红卫军”，乘坐“八二七”为他们准备的汽车离开了合肥市。随后不久，合肥的“红卫军”被取缔，抗日英雄、名誉上的“红卫军”一把手于得水也被关押，并在一个月后，2 月 26 日死于狱中。

1 月 25 日早晨 6 时，安徽“八二七”头头梁守福听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重播的山西省夺权的消息，十分兴奋，连早饭也没吃，就找到安徽工业大学的刘兴路，问他听到山西夺权的消息没有，刘兴路说他昨天晚上就知道了。

梁守福说：“我们找李胜利，刘光裕到‘兵团’开常委会研究夺权的事吧。”

上午 9 点钟左右，“八二七”兵团常委到齐，会议由刘光裕主持。梁守福先问大家听到山西夺权的消息没有？

葛庆尧说：“报纸都登出来了，谁还不知道？你说怎么搞吧。”

梁守福说：“先听听大家的意见。”

这时李文安说：“大家还有什么意见，我的意见是夺。山西能

夺，为什么我们不能夺？实际上，‘八二七’早就代替省委行使职权了。”

大家决定趁热打铁，下午召开常委扩大会。会上决定，第二天就夺省委的权。

按中央的要求，夺权必须实行革命的大联合。因此，要在安徽夺权，只有“八二七”决定还不行，还要征得其他各造反组织的同意才行。为了争取时间，兵团常委内部作了分工，梁守福与“工联会”联系；李文安与省直机关的造反组织联系；葛庆尧与省军区联系。通知各大造反组织头头晚上到“八二七”兵团开会研究夺权的事。

晚上到“八二七”参加会议的人很多，但省军区未派人来，只是表示支持。参会人员觉得，夺权的具体事宜由“八二七”全权处理就行了，夺权的文件起草后，大家来签名就可以了。

“八二七”连夜起草了有关夺权的文件，并于 1 月 26 日晨 7 时，合肥市同意夺权的造反组织开会讨论通过，还研究了相关事宜。

夺权场地定在省人委北楼门前广场，时间定在 26 日上午 12 点前。参加人员除参加夺权的造反组织外，省委李葆华、黄岩、张恺帆要参加。李葆华戴顶高帽子，其他人不戴。这时李文安提议：“要让张恺帆陪斩，他不戴高帽子，但他的帽子要反过来戴，以此证明‘八二七’还在挽救他。”

李文安的这个提议很快得到与会者的同意。

最后讨论议题是：以什么组织名义夺？经协商，最后确定用“革命造反派夺权联合指挥部”称谓，以体现中央要求“无产阶

级革命造反派联合起来，向走资本主义当权派夺权”的精神。这个“联合指挥部”由 28 个群众组织组成。

夺过来的印章放在哪里？有的认为就由“八二七”保管；有的认为已经没有用，烧掉算了。葛庆尧提出放在省军区，并由军区派人用汽车将印章护送到军区。大家同意。

就这样，26 日上午，合肥地区这 28 个造反派组织联合宣布夺了中共安徽省委、安徽省人民委员会的党、政、财、文大权，并宣告“安徽省革命造反派总指挥部”成立，进占中共安徽省委、安徽省人民委员会机关。同日，中共合肥市委、合肥市人民委员会也宣布夺权。

下午 13 时，安徽省人民广播电台播发了“安徽省革命造反派总指挥部”《夺权通告》和《罢官通令》。在这两份文件上，都有安徽省军区的签字。

从下午 18 时开始，合肥市长江路一片欢腾，报喜的游行队伍延绵不断。安徽省军区及驻合肥部队举行坚决支持革命“左派”誓师大会，会后武装游行，表示对夺权的支持。这一晚几乎是通宵达旦。第二天的《新安徽报》全文刊登了《夺权通告》和《罢官通令》，同时发表了《全面大夺权的高潮来到了!》与《群众罢官好得很》两篇社论。此后，“夺权”、“罢官”之风席卷全省。各专区、市、县党政领导机关、企事业单位乃至农村社队、城镇街道等基层单位，也先后被造反派夺权，各级领导干部被批斗。

1 月 26 日的下午，安徽省在合肥夺权的消息就传到了华东煤城淮南市，这里的大街小巷轰传着这个轰动人心的特大新闻，夺权的“号外”飘满了煤城每个角落。淮南的造反派自然不甘落后，

由市“红司”、“工司”、“贫司”为首发起倡议，决定于 1 月 27 日正式向淮南市委、市人委夺取党政财文大权。

1 月 27 日天刚放亮，整个淮南就哄动起来了，她鼎沸了、疯狂了！激情燃烧的沸点即时融化了冬日寒凝的冰点。宣告夺权的大会，定于当日上午 9 时在田家庵市体育场隆重召开。只见全市各地人流如川、摩肩接踵，争向市体育场集结参加大会。西部地区距田家庵近 20 公里之遥，人们见车就拦，拦车就上。大卡车的车厢都用着粗大的绠绳横拦固定起来，每辆车都超倍地满载参会的人众，全然把交通安全抛之脑后。路边集聚着大量的拦抢过往车辆的人群，人们都翘首待望能有车辆进入自己的视线，其灼热急切的心情全写在了各人的脸上。

再看淮南市体育场内人山人海，旗帜漫卷几乎遮掩了天空。主席台上方悬挂着一条会衔，“淮南市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夺权大会”赫然入目。

9 时整，主持人宣布大会开始，随着他的一声断喝：“把以刘廉民为首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押上历史的审判台！”市委书记刘廉民、市长潘效安、市委副书记李振友、杜炳南、淮南矿务局党委书记刘驾鹏、副市长周盛国、谢英等市矿两委的负责人均被“红司”的红卫兵两个挟持着一个，推上了大会主席台前，扭着胳膊按着脑袋，胸前挂着大牌子，牌子上的他们的姓名自然也被打着红 X。大会庄严宣告：“淮南市宣告夺权！会议之后立即成立淮南市临时权力机构，行使原市委、市人民委员会的一切权力！”

会场上顿时沸腾起来，口号声、欢呼声震天动地，人们的狂

热已是接近了疯狂。在一片鞭炮、锣鼓、口号声中，淮南市夺权宣告成功！随即成立了“安徽省淮南市临时革命委员会”，简称“市临委”，由原市武装部部长杜重山任主任委员，武装部政委曲士良和结合的干部代表、原副市长王发等担任副主任委员。以“淮南总司”的班子作为班底，“市临委”开始了政权行使工作。

## 第 458 回：一二六，湖北省进行夺权　有分歧，造反派争吵不休

元旦前后，武汉市由于许多职工进京告状，很多工厂面临停产或已经停产。此时，武汉“工总”、“九一三”、“二司”等造反派组织与“三新”、“工造”、“新一冶”、“长办联司”等造反派组织的分歧已经出现，难以成立共同的“抓革命、促生产”指挥机构，只好各自成立自己的“抓革命、促生产指挥部”，负责各自控制范围内的促生产工作。

由“工总”、“九一三”、“红工兵”、“二司”、“红教工”、“新闻战士”等 13 个组织组成了一个“抓革命、促生产”指挥部，而由“工造”、“新华工”、“新湖大”、“新华农”、“三司”等 44 个组织则成立了“湖北省红色造反者抓革命、促生产指挥部”。两个指挥部都分别发出了《紧急呼吁》，呼吁工人、农民、财贸战线职工及各厅、局机关干部立即行动起来，“抓革命、促生产”，“打退反革命的经济主义”。

由于 1 月 8 日晚 20 时的新闻联播节目播发了上海的《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同时还播发了《人民日报》的编者按，1 月 9 日，由武汉“工总”发起，邀请了 13 个在武汉有影响的造反派组织开会，实际参加的有 40 多个组织，商量造反派大联合的问题。与会者都同意实现联合，并起草和通过了《武汉造反派联合指挥部告武汉全市人民书》。但签字后没几天，这次大联合就散伙了

1 月 10 日，武汉“工总武重战斗兵团”发出《紧急呼吁》，呼吁全体职工停止上京“告状”，制止闹工资、福利、经济主义的

歪风，回厂“抓革命，促生产”。

这天，湖北省省长张体学作《关于我们压制和打击红八月造反队的检讨》。第二天，1 月 11 日，湖北省委副秘书长、原水利电力学院工作组组长刘真写了一封致张体学的公开信，指出张体学在对待“职工联合会”、《湖北日报》及王任重问题上的错误立场，公开表示支持革命造反派。在此前后，省委农村政治部主任任爱生也写了大字报揭发王任重、张体学的问题，站出来造反。

1 月 14 日，由武汉“工总”发起，“二司”、“九一三”、“工造总”、“红工兵”、“红教工”、“新华工”、“新湖大”、“北航红旗”、“西军电临委”、“南下造反大队”等 14 个组织在武昌红楼开会，又商讨成立“无产阶级革命总指挥部”。

此时，接管、夺权之风也开始在武汉兴起。

还在 1966 年 12 月，张体学曾和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商议，如果局势一旦紧张，电台就进行军事接管。1 月 15 日下午 15 时，根据中央的通知精神，湖北省军区对湖北、武汉人民广播电台进行军事接管。湖北、武汉广播电台的群众组织见状，自己起来接管了湖北、武汉人民广播电台及武汉电视台。

1 月 16 日，“工人总部电信分部”接管了武汉市电信局。

1 月 17 日，“工造井冈山兵团”夺了市机电局的权，武汉市银行“红尖兵”等组织接管了市银行系统。

1 月 18 日凌晨 3 时，“新华工红色造反团”的聂年生等人配合湖北省公安厅的“毛泽东思想战斗兵团”和“红战士”夺了公安厅的权，封了厅内其他组织的办公室、书橱等。“二司”等驻公安厅办事处认为这次夺权是一次假夺权，反对这次夺权。

当天，省公安厅的其他组织联合成立了夺权委员会，在“工总”、“九一三”、“二司”的配合下进行夺权，也没有成功。

当晚，张体学派省委秘书长张华、副秘书长刘真和吕汉荣等人到武昌阅马场红楼找“工总”、“九一三”、“二司”、“红工兵”、“红教工”等组织商谈有关湖北省夺权和联合办公等事情，参加的有“工总”的胡厚民、姜诗存，“二司”的杨道远，“九一三”的李想玉，“红工兵”的杜向东，“红教工”的田桂林等。张华说，这次来是同造反派商谈有关交权及联合办公问题的。

会议在二楼礼堂召开，双方还没有谈出个结果，就有一群人冲进了红楼，从一楼向二楼砸去。与会人员赶紧保护着张华等人上顶楼躲避，杨道远下楼去处理此事。

只见冲进来的这些人，将一楼到二楼的“工总”、“九一三”、“二司”、“红工兵”、“红教工”五大组织办公室全部砸开，将里面的桌、椅，广播器材狂砸一通，办公用品、自行车、纸张、旗帜、袖章等悉数搬到车上。虽然没有打人，但逢人就往车上拉，共绑架了 11 人。“二司”被绑走的工作人员被扔在东西湖的野地里，直到第二天下午才回来。

闻讯前来的造反派迅速赶到红楼，那些人见状这才仓皇上车离去，但有一辆吉普车在彭刘杨路口被造反派设路障拦住，将车及车上的人一并扣下，一审才知，车上的人是肉联厂“职工联合会”的，这次行动就是“职工联合会”组织的。

过去各单位内部，不同派别的组织互砸事件很多，但是，由一个全市性组织去砸另一个全市性组织，这在武汉还是第一次。但是，这次行动也是“职工联合会”的最后一跳了。

1 月 20 日，武汉“工总”、“九一三战斗兵团”、“工造”、“红工兵”、“红教工”、“二司”等 20 多个群众组织及外地赴汉学生数十万人，分别在汉口人民公园、 武昌体育场、青山等地集会，并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许多干部被戴高帽子游街。

晚上，由“工总”首先发起，有“工造总司”、“红工兵”、“二司”、“红教工”、“新华工”、“新湖大”、“北航红旗”、“西军电临委”、“南下造反大队”等 11 个组织在武昌红楼开会，再次商讨成立“无产阶级革命总司令部”或“总指挥部”等问题，准备联合湖北的主要造反派组织，在省、市委夺权。讨论结果，大家一致同意首先成立“毛泽东思想湖北地区革命造反联合总司令部筹委会”。第二天，又增加“九一三”、“红卫军”、“三司”等组织参加，共同商讨成立“联合总司令部”的问题。会上决定，“工总”为“筹委会”临时负责人，“工造总司”为办公室主任，成立“抓革命促生产小组”和“省、市委夺权小组”，并通过了总司令部《宣言》。

20 日前后，武汉相继夺权的已有市总工会、省科委、市人民邮局、湖北人民出版社、哲学社会科学联合会、《江汉学报》、市教育局、团市委、省文联等以及许多厅、局、公司、部门和厂矿企业。

1 月 23 日，“工造总司”等 20 多个组织在汉口友益街 16 号开会，又成立了一个“毛泽东思想武汉地区革命造反派总司令部”。深夜，“工造总司”等组织又在湖北大学召开了有关夺权问题的会议。这次会议没有通知“工总”、“二司”、“九一三”、“红工兵”、“红教工”等组织参加。

24 日下午，在“工总”主持的“毛泽东思想武汉地区革命造

反联合总司令部筹委会”会议上，“工造总司”代表殷德才领读《毛主席语录》，意图主持大会。并在发言中提出：“我们对‘工人总部’有看法，‘工人总部’当领导，我们不同意。如果‘工人总部’当领导，我们就不参加大联合。”

25 日上午，“革命造反联合总司令部筹委会”继续开会，选出“筹委会”常委 7 人：“工总”、“工造总司”、“九一三”、“红工兵”、“二司”、“新华工”、“三司”各 1 人。“工造总司”在会上散发了铅印的以“工造总司”为首的 11 个组织联合署名的《公告》，当即遭到与会者不少人的反对，“工造总司”代表殷德才对此事做出检讨。晚上，讨论在总司令部《宣言》上签字时，“工造总司”坚持要把在汉口成立的“毛泽东思想武汉地区革命造反派总司令部”与武昌成立的“毛泽东思想武汉地区革命造反联合总司令部”并列，签字问题未得到解决。

1 月 26 日上午，“革命造反联合总司令部”各组织代表继续在湖北大学 1 号楼二楼会议室里开会。用课桌拼成的一个长方形的大会议桌，四周坐满了武汉地区主要造反派组织的头头，他们有“工总”的朱鸿霞、胡厚民，“二司”的周孔信、庞道铭，“九一三”的李想玉、杨连城，“新华工”的王富山，“新湖大”的龙铭鑫、张维荣、彭勋，“新华农”的谭志发，“工造总司”的吴焱金、丁及，“省交通联司”的余明生，“红工兵” 邮电系统工人杜向东，以及“首都南下革命造反大队”的李金春、张立三、叶传发和哈军工、西军电等外地来武汉串联的学生组织，共有 30 多人，会场上不断有人进来参加会议，到会者随意就坐。这时武汉的造反派还没有形成领导核心，多数场合是由湖北大学教师，中

共党员，“新湖大”勤务组成员之一的张维荣主持。这天会议的主持者是“新湖大”勤务组成员之一的龙铭鑫，会议的议题是确定夺权的最后事宜。

“新湖大”彭勋在会议上讲，把大家召集起来就是为了联合夺湖北省委的权。“新湖大”拟定了一个 9 人的筹委会，起草了《告全省人民书》和《夺权公告》两个文件，请大家讨论审议。这两份文件的起草者分别是湖北大学政治系学生杨定发和湖北大学计统系学生罗思凡，

“新湖大”张维荣布置了 1 月 26 日夺湖北省党政大权的计划和安排。

接着，朱鸿霞宣布了由夺权秘书处草拟的夺权方案：湖北省的夺权筹备委员会由 9 名常委组成，具体分配名额是：“工总”2 名、“九一三”1 名、“二司”1 名、“新华工”1 名、“新湖大”1 名、“新华农”1 名，还有两个名额打算留给“工造总司”和省直机关的造反派组织“省直红司”。这个方案一提出来就炸了锅，与会者吵成一团。

“二司”周孔信第一个发言。他说：“你们‘三新’三个学校 3 个名额，我们‘二司’这么大的组织才 1 个名额。‘新华工’、‘新湖大’各 1 人我们没意见，‘二司’是跨校际的全市性组织，我们才 1 个名额，不公平。‘二司’应该增加一个名额。”他还说：“‘工造总司’干嘛要参加这次省里的夺权，他们可以到市里去搞，‘工造总司’是小手工业者、小摊小贩，有的是卖烧饼油条的。”

湖北大学的彭勋解释说：“‘新华工’、‘新湖大’、‘新华农’虽然只是 3 所大学，但在发动湖北、武汉的文革运动中贡献很大。

中央提倡革命造反派回到本单位去闹革命，武汉成立的‘革司’、‘联司’的方向是正确的。”

接着，“二司”庞道铭发言，他重复周孔信的讲话，再次要求“二司”增加一个名额。

随后是“九一三”的杨连成发言，他说：“‘工造总司’来干什么？都是卖烧饼、油条的，‘工造总司’没有必要参加省里夺权。你们‘三新’中的‘新华工’、‘新湖大’在文革初期有贡献还情有可原，那‘新华农’呢？‘二司’和‘913’是反对这个筹委会分配方案的。”

一连 3 个人发言都是这个基调，尤其是“二司”“铁嘴”周孔信几次三番说“工造总司”不是产业工人，是卖烧饼油条的等等，激怒了“工造”吴焱金，他愤起对周孔信说出：“我和你是水火不容的，有你无我，有我无你。”顿时引起轩然大波，一时间，你有来言，我有去语，争吵得一塌糊涂。

就在大家争吵不休时，“首都南下革命造反大队”的张立三突然站起来说：

“‘工人总部’的头头修了！砸烂‘工人总部’！”

此言一出，整个会场大哗。胡厚民当即表示：“如果说‘工人总部’的头头有缺点错误，我们可以改正，我们可以开门整风，欢迎提意见。但说‘工人总部’的头头修了，我们坚决不同意。如果砸烂‘工人总部’，则是使亲者痛，仇者快，走资派和阶级敌人高兴的事。”

张立三提出他此论的三条理由：“第一，你们在内部排除异己，把老‘工总’的发起人统统排斥在‘工总’领导班子以外，甚至

还打这些老‘工总’的发起人；第二，‘工总’的组织严重不纯。他举了几个人的例子；第三，‘工总’成立后，在武昌红楼的领导班子拿公款吃吃喝喝。”

这时，会议期间，又进来一些小组织的代表。他们支持“首都南下革命造反大队”的观点，说：“革命不分先后，组织不分大小，你们‘工总’是老子天下第一！”

这些人与“工总”的人在会上吵了起来。

“工总”的人说“一下子冒出这么多组织来了，都来摘桃子来了”。

吴焱金反驳说：“革命不分先后，组织不分大小。要正确对待各个革命群众组织，不要动不动就说别人摘桃子。席位问题是可以商量的。每个组织都有表决权，应按得票数量多少确定谁是常委。我们‘工造总司’不是你们说的小摊小贩，我们也有产业工人，有肉联、长办、汉纸、汽配等大厂、大单位，我们有 7、8 万人。讨论省里夺权的大事，我们为什么不能参加省里的夺权？不要搞组织之间的互相攻击，如果‘二司’坚持这个意见，那就有你无我，有我无你，我们就退出夺权。”

周孔信指责吴焱金说：“你完全是机会主义托派的观点！”

原“职工联合会”的组织部长吴春泉，此时是一个工人组织的代表。他大声喊道：“我们就是反对‘工人总部’、‘二司’参加联合！”并威胁说：“‘二司’参加我们就退出！”

朱红霞见状，劝说“二司”顾全大局，暂时不参加常委，保证下午夺权会议的召开。

根据与会多数代表的意见，“二司”代表声明暂时退出常委，

但保留参加常委的权利。庞道铭激动地说："同志们哪，革命造反派的战友们，今天的会议，使我想起了布加勒斯特会议，我们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正在遭受严峻的考验。黑云压城城欲摧。我们不在乎席位，我们'二司'退出夺权。"

布加勒斯特会议是 1960 年 6 月,中共代表团参加在布加勒斯特举行的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苏共在会议上以突然袭击的方式组织了对中共代表团的围攻。

"二司"陆续有人退出会场，朱鸿霞说："常委的名额暂时这样定了，夺权以后再增加，夺权计划不变。下午两点到洪山礼堂开大会。"

虽说是明确了下午两点召开夺权大会，其实一直拖到 1 月 26 日下午 18 时,湖北省夺权大会才终于在洪山礼堂的门前广场正式召开了。上午开会的头头们除"二司"退出外,"工总"、"工造总司"、"一冶"、"新华工"、"新湖大"、"新华农"、"红工"、"交通联司"、"省直红司"和一些小组织都参加了大会。大会在洪山礼堂的门前广场召开，由"工总"朱鸿霞主持，他首先宣布把走资派带上来，湖北省省长张体学、武汉市委书记宋侃夫被戴上高帽子，押上洪山礼堂二楼的阳台，接受群众的批判。朱鸿霞宣读了《夺权公告》，彭勋宣读《告全省人民书》。会后举行了大游行。

湖北人民广播电台于当晚 22 时 15 分报道了"武汉地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省委夺权的消息，并播发了《夺权公告》。

当天，湖北省委代理第一书记、省长张体学代表省委、省政府通电湖北全省各市、专区、县，要求各地各级党政领导承认这一夺权。

“二司”虽然没有参加下午的夺权大会，但是也没有闲着。就在上午湖北大学的会议结束后，“二司”司令部20多人立即召开紧急会议。会上，庞道铭、周孔信把湖北大学会议的情况做了详细介绍，与会人员十分生气，决定：决不能让他们把权夺走，立即派人包围省委，乘他们召开夺权大会之时，抢先夺了省委、省政府的大印，并以“二司”名义发出《告示》，声称“我们不是夺权，我们是保护权不让别人夺走。”

当天下午，“二司”不管三七二十一，冒雨抢了湖北省委、省政府的大印。但是负责省委印章的女秘书抱着印盒钻进桌子底下，不停地喊着：“你们要抢印章，除非把我杀了！”死活都不出来。没有办法，指挥这次行动的水院“红旗兵团”黎良能将电话打回水院总部，总部曾文立叫上蒋继清，由蒋继清开车来到省委一号楼。最后，曾文立对那位女秘书说，将她和印章一起送到湖北省军区，那位女秘书才肯上车。还是由蒋继清开车，曾文立坐副驾驶位置，将那位女秘书和一直抱在她怀中的印盒一起送到了省军区。湖北省军区的一位领导在省军区大院迎接。他们在大院口头办了交接，称：公章只能由“二司”去拿。

当晚，“工造总司” 勤务组成员兼联络部长王锦铭，通过武汉市农委副科长、市机关“红司”一号勤务员魏绳武，也带领一些组织进驻武汉市委，召开夺权大会，宣布夺了武汉市委、市政府的权，并发表了《夺权宣言》、《第一号通令》、《告全市人民书》。在这些文件上签字的有“工造总司”、“农造总司”、“三司”、“新华工”、“红体兵”、“南下革命造反大队”等23个组织，而“工总”、“二司”、“九一三”、“红工兵”、“红教工”这些组织当然事先也

是毫不知情。

“工造总司”组织的武汉市夺权行动一直持续到第二天，1 月 27 日凌晨才结束。他们将武汉市委的公章装了一帆布书包拿了回来。

“二司”、“工总”认为“工造总司”他们在武汉市的夺权是单方面夺权，他们在 1 月 26 日当晚 23 时左右，通令《湖北日报》和湖北人民广播电台不准登载和广播“工造总司”他们在武汉市委发表的《夺权公告》和消息。

1 月 27 日，《湖北日报》按计划发表了 1 月 26 日下午在洪山礼堂前夺权大会上的《夺权公告》，标题为《一切权力归革命造反派》。

当天，“工总”、“二司”、“九一三”、“红工兵”、“红教工”5 个组织发表《联合声明》，宣布“1.26 夺权无效”，要求立即解散为夺权而成立的造反派联合组织“毛泽东思想武汉地区革命造反派总司令部”。“工总”头头胡厚明召集开会，讨论大联合、大夺权的问题。会上，“二司”杨道远发言说：

“造反派工人最能体现党的领导，我们明确表示，夺权是以‘工人总部’为主体。谁把一些小节作为问题，总想砸烂‘工人总部’，我们就砸烂他的狗头。”

这天，“工总”和“二司”等组织成立了一个“湖北省公安厅夺权委员会”，夺了“新华工”等组织 1 月 18 日刚夺过的公安厅权。“二司”还电告在各地、县的联络站，要求他们立即返汉参加武汉的夺权。

为确保对湖北省委的再夺权成功，“工总”领导层成立了接管

省、市委的 9 人夺权领导小组。

关于“1.26 夺权”失败问题，“新湖大”发表了与“工总”、“二司”相对立的声音：《揪住张体学幕后指挥“一•二六”假夺权的黑手》，指责“二司”在省委的“126 夺权”是张体学幕后操纵的假夺权。

一时间，为湖北夺权问题，武汉市造反派闹得是热热闹闹，莫衷一是。

## 第 459 回：同一天，苏云赣相继夺权　枪声响，新疆发生大血案

再说云南的“126 夺权”。

由于在撤出昆明军区的问题上出现了分歧，1 月 22 日，以“南下造反兵团”和云南大学“毛泽东主义炮兵团”为主的 62 个群众组织，在省地质局大会议室召开串连会，成立了“新云南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大联合联络站”，从 1967 年 1 月 2 日与昆明工学院“八二三战斗兵团”等 100 多个造反派组织联合成立的“昆明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指挥部”分裂出来。从此，昆明地区出现了两大派组织：一派是以昆明工学院“八二三战斗兵团”为主的“昆明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指挥部”，即“大联委”，简称“八派”；一派是以云南大学“毛泽东主义炮兵团”为主的“新云南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大联合联络站”，也叫“新云南”，简称“炮派”。

1 月 26 日上午，“新云南”兵分两路：一路夺了云南省人委所属各厅局的权；一路夺了云南省委和昆明市委的权。

这天，云南省政府所在地五华山上红旗招展、人山人海，“新云南”涌进省政府各个部、委、办、局夺权，搜缴了许多大印。

当晚，“大联委”在检阅台召开 10 万人参加的“大联合、大夺权誓师大会”，指责“新云南”夺省人委的权是假夺权。会后，“大联委”所属组织冲进省委机关，当着周兴、赵健民的面再次宣布夺中共云南省委的权。昆明市委、市人委也于当晚被两派造反组织冲击，逼迫市委、市人委交出机关印章，宣布夺权。

次日，云南省呈贡县造反派也夺了县委、县人委的权。《云南日报》发表了《让农民运动的风暴来得更猛烈些吧》的评论，宣称呈贡县是全省第一个被夺权的县，为全省树立了活的榜样。至此，夺权之风遍及昆明地区，昆明市属各企事业单位，就连农村公社、生产大队都被当地群众组织夺了权。

1 月 26 日，“江西省造反派革命委员会”万里浪等人在江西夺权。

我们再看江苏。

1 月 10 日，南京造反派乘“1.3 事件”之势，接管了《新华日报》。

1 月 16 日，周恩来的秘书打电话给南京大学“八二七革命串联会”发起人之一的葛忠龙，告诉他南京造反派应该尽快提交一份夺权方案。

周恩来的秘书为什么打电话给葛忠龙？因为葛忠龙曾在 1966 年 12 月，率领一个南京大学代表团到北京控告江苏省委，并在 1 月 6 日、7 日和 8 日连续三次参加了周恩来对江苏省代表团的接见。

葛忠龙在接到周恩来秘书的电话后，立即向其他造反派头头做了传达，同时也向江苏省委统战部长高啸平、南京军区的梁辑卿、杜方平、吴大胜等人做了通报。

高啸平是江苏省委领导中较早支持造反派的省委干部，他的妻子是南京大学中文系调干生，也是南京大学“八二七”成员。

据南京大学“八二七革命串联会”、数学系团总支书记曾邦元回忆，当时周恩来也给他打电话，询问他对上海夺权事件的看法。

曾邦元回答说：

“我们支持中央的决定，支持上海造反派夺权。”

周恩来接着问他，南京的造反派是否也准备夺权？

曾邦元说：“没有。”

周恩来又问：“那你们如何以实际行动支持中央的决定呢？”

曾邦元回答说：“我们觉得自己没有能力管理江苏。”

停顿了一会后，周恩来在电话里说道：“所谓夺权，并不是真地要造反派们接管政府，而是要他们监督那些在任的官员做好工作。”

曾邦元回答：“如果是那样的话，我们可以夺权。”

周恩来指示曾邦元与南京军区取得联系，尽快提交一个夺权方案。

中央文革记者站驻南京的记者邢文举也接到葛忠龙的通报。邢文举随后起草了一份夺权方案。

1 月 17 日，南京造反派几大组织的代表们决定成立“江苏革命造反联合会筹委会”，南京大学政治系讲师、南京大学“红色造反队”一把手、“红总”的文凤来和南京大学数学系学生、数学系团总支副书记、系学生会主席、南京大学“红色造反队”和南京大学“八二七革命串联会”的主要领导人张建山当选为主要负责人。

1 月 21 日，周恩来的秘书再次给葛忠龙打电话，敦促造反派加快夺权行动的步伐。

1 月 22 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的社论，同时发表了《一切权力

归革命造反派》和《造反就是要夺权》等文章。当晚，以文凤来为首的江苏“红总”立即响应，在新街口中苏友好纪念馆召集会议，讨论关于大联合夺权的问题。参加会议的除了“红总”几个发起单位的负责人外，还邀请了南京市大部分造反派组织的负责人和《解放军报》记者邢文举。但是在讨论“大联合”时，“红总”和“南京八二七”对相互之间的统属关系争论不休，会议不欢而散，没有来得及讨论夺权事宜。

第二天下午，“红总”撇开“南京八二七”召开第二次会议，首先由《解放军报》记者邢文举提出由各大造反派组织分工接管财贸、接待、农林水、政法、宣教、工交、计划 7 个口的方案，得到与会者的一致同意。然后，会议又决定成立“江苏省革命造反派联合委员会”，下设“生产委员会”、“夺权委员会”和“文化革命保卫委员会”。

1 月 23 日，周恩来打电话给南京军区梁辑卿，表扬他和南京军区“帮助揭开了江苏阶级斗争的盖子”，并要他们考虑一下夺权问题。

24 日下午，造反派再一次召开了各大群众组织代表联席会议。当时出席会议的有 11 个单位，约 300 多人，其中包括南京军事院校群众组织的代表和《解放军报》记者邢文举，他起草了一个“夺权委员会”名单。南京军区的梁辑卿、杜方平、吴大胜也出席会议表示支持。会上，文凤来宣布了夺权分工的具体方案，以及过渡性权力机构“夺权委员会”的组成人选。

“夺权委员会”由 32 位委员组成，其中文凤来担任主任委员，来自“南京大学八二七”的张建山和来自“省级机关干部造反总

部”的杨华担任副主任委员。文凤来的提案遭到以中学生为主体的南京“三司”代表和以工人为主体的“南京八二七”代表率先反对，大概是因为在文凤来宣布的夺权方案中，分工接管 7 个口子的主要是来自各高校的造反派组织。华东水利学院的“革联”代表也以这个方案“没有经过民主讨论”、“脱离群众”为由，加入反对的行列。在双方争执不下的情况下，文凤来宣布休会。等到上述 3 个反对派组织的代表离开会场以后，文凤来当即宣布剩下的 8 个组织继续商讨夺权问题。最后确定成立“夺权指挥部”，设在南京师范学院，26 日开始夺权。但是南京大学“八二七”的头头曾邦元等人被排除在委员会之外。

1 月 25 日下午，“红总”派人与南京军区梁辑卿和《解放军报》的邢文举联系，将造反派准备夺权的情况向他们作了汇报，然后提出三个要求：第一是请南京军区公开表示支持；第二是请南京军区派部队保卫几个地方，包括“夺权指挥部”所在地南京师范学院及省委和市委机关等；第三就是请南京军区领导出席鼓楼广场群众庆祝大会。

梁辑卿当即向正在北京开会的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政委杜平做了汇报，邢文举同时也向中央文革和周恩来汇报。之后，梁辑卿对“红总”的代表说：“我们已经请示过了，你们提出的三个要求都可以满足，你回去吧，我们马上派军队维持秩序。”

“红总”代表在回去的路上，已经看到军区大院的部队在集合调动。当他们回到南京师范学院的时候，大门口已经有解放军战士在那里站岗了。南京军区当天就出动了 4 个连队予以支持。

1 月 26 日凌晨 1 时，南京造反派正式向江苏省委夺权。其实

也很简单，就是把省委领导，像彭冲啊，许家屯啊，还有各厅局的负责人啊，总之，13 级以上干部全部都喊到一个大会议室，然后把省委、省人委、还有各个厅局的大印都拿出来放在那张大会议桌上，从大到小，排了一大长溜，然后，文凤来就代表大家宣布："从今天开始，江苏省的一切大权归革命造反派所有！这些公章全部作废！"

接着，参加夺权的群众组织联合召开"庆功会"。当天，周恩来给文风来他们打来电话，说明由于南京"造反派内部意见很不一致"，中央不会对这次夺权给与支持，希望"红总"方面不要在报纸上宣布夺权的消息。

但是，当天晚上，在南京大学"文革楼"开会讨论夺权消息是否见报时，有人说："总理不了解江苏情况，也许登报以后，会促使总理对江苏更有所了解。"

还有人说："不登报就意味着我们对这次夺权的看法有动摇。"

众望所归，最后文凤来拍板说："权已被我们夺过来了，准备明天见报，就不通过中央了，大家看看有什么意见？"

台下高呼"同意！"鼓掌通过了这个决定。

由于"南京八二七"向江苏省《新华日报》施加了压力，夺权消息的公布被推迟了一天。

1 月 28 日凌晨，周恩来的秘书又打来电话说，由于造反派们意见分歧，中央准备召集各有关方面代表赴北京汇报夺权情况、商谈组建过渡权力机构事宜。尽管如此，1 月 28 日这天，"红总"控制的《新华日报》还是发表了《江苏省革命造反派联合夺权声明》，参加署名的造反派组织有 52 个，其中 30 个是南京本市的。

当天晚上，这些组织再一次开会讨论“掌权方案”。最终议定由学生 4 人、工人 4 人、农民 2 人、省级机关 1 人、解放军 1 人、新华社记者 1 人等组成“江苏省革命造反派联合委员会筹备会”，委员会负责人依然是文凤来、张建山、杨华。在上述组织名称中加上“筹备会”三个字是文凤来的意见，其主要考虑是在中央态度没有明朗之前留有余地。

1 月 29 日，“南京八二七”、南工“东方红”等组织发表联合声明，承认这个夺权，但认为有严重错误，还是当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

1 月 30 日，“江苏省革命造反派联合委员会筹备会”在五台山等处同时召开了声势浩大的“大联合大夺权誓师大会”，30 万人参加。“南京八二七”也去了 5 万人参加大会。在这次大会召开之前，周恩来再次打来电话，希望“红总”方面在大会上只宣布夺权，不要谈成立什么组织，并明确表示：“我们准备邀请所有左派代表人物和省委、省人委、军区支持你们的同志，来北京商谈有关政权组织形式和工作方针。”

然而，“红总”方面还是在群众大会上宣布成立“江苏省革命造反派联合委员会筹备会”和“生产委员会”。

在会上，一个中学生上台发言时，批评“南京八二七”。

大会提出“谁反对一二六夺权就是反革命”。并在《新华日报》上刊登了这一口号和“一二六夺权好得很！”

南京军区派出 4000 名指战员参加大会，军区一位副司令员在会上发言支持夺权，会后还在市区举行了军民联合武装大游行。

2 月 2 日，“江苏省革命造反派联合委员会筹备会”又在五台

山召开大会，公布了有李士英、陈扬、包厚昌等人参加的“生产委员会”名单。

和其他地方的夺权一样，江苏的夺权也在造反派内部引起了巨大的分歧。

就在全国各地热火朝天的夺权之时，西北边陲新疆却传来了“126 血案”的枪声。

1967 年元旦之夜，新疆建设兵团“八一野战军总部”成立。这是一只以 1964 到 1966 年间接收的复员转业军人为主要成员的群众组织，简称“八野”。在短短十几天内，“八野”就发展成一支 3 万人的队伍，下设 12 个方面军、两个独立师、两个独立团，后扩展到 20 个方面军。“八野”总部负责人称“勤务员”，有潘苏灵、郭雄、邵定远等人。和底层群众自发形成的组织不同，“八野”有着十分强大的官方背景，不仅得到新疆建设兵团独立团团长许光途、农八师主管武装的副师长龚建楚等人的支持，还得到新疆建设兵团和新疆军区主要领导人丁盛等人的支持。

1 月 26 日，也就是在新疆自治区刚刚进行夺权的第二天，新疆石河子生产建设兵团发生了开枪杀人事件，震惊中央。

石河子原来只是一个只有几十户人家的小村庄，经过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几十万军垦战士的开垦，到“文革”前夕，这里已成为拥有 30 万人、城乡结合的城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司令部设在乌鲁木齐，而重要机关却大多在石河子。这里有兵团农八师、工二师、工一师的工四团、兵团公交部所属汽车二团、八一糖厂、八一毛纺厂、兵团独立团、兵团农学院、兵团医院、兵团政干校、兵团设计院、石河子管理处等 17 个单位。

1 月 17 日，农八师武装处副处长张俊义、副科长王世昌，指挥“八野一方面军”接管了农八师政法科，搜走公章，宣布夺权，并于次日接管农八师总机，控制通讯权。

1 月 22 日，八一糖厂的“造反团”宣布夺权，但公章却让糖厂领导人给了“八野”的“红色造反司令部”。而且“造反团”夺权，兵团公交部不予承认，糖厂“造反团”几百人宣布绝食斗争，形势顿时紧张起来。

1 月 23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出《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的当天，建设兵团独立团团长许光途看到这一决定，高兴地说：“这下可好了，我们可以参加文化大革命了，若‘造反团’再胡来，我就打他个王八蛋！”这天，“八野”勤务员潘苏灵找到许光途说：“我们要在石河子搞一个赤色恐怖。”立即得到许光途的首肯。

同一天，“八野”的对立面组织，由“兵农造”、“红旗造”等建设兵团各学校、单位的造反组织联合组建而成的“石河子革命造反联络总部”成立，简称“石造联总”，主要成员为支边人员、自流人员、部分老干部、起义人员子女，以及造反的学生红卫兵，以兵团农学院教师彭正云为首要负责人。“石造联总”的口号是“打丁盛、裴周玉”，他们得到新疆建设兵团老领导的支持。

1 月 24 日，新疆建设兵团独立团召开会议，决定“支左”夺权。当晚，农八师参谋邱吉荣在农八师电影队楼上，召开石河子各单位“八野”头头开会，表示支持“八野”夺权，要坚决镇压反革命组织。他说：“左派、右派，我们心中有底。我们认为左派就支持，认为右派就镇压。‘造反团’都是右派。”又说：“我

们坚决支持支左五条，坚决镇压反对革命左派的反革命分子和反革命组织。”“你们什么时候需要武装部队，我们就支持，要多少，有多少！”

1 月 25 日，独立团打电话向兵团武装部请示，得到同意，调集了 8 个武装值班连队集结待命。当晚，23 团武装值班连队 1 连和 4 连、总场 3 连、师警卫连、基建处 9 连，共 382 名武装人员，到武器库和看守所集结待命。宣布：“必要时可以抓人，可以开枪。”并提出“四开枪”原则：“问三声不答应就开枪，叫站住不站住就开枪，捣乱会场开枪，有夺枪者就开枪！”

独立团团长许光途向“八野四方面军”军长李松林说：“我们根据中央指示，接受‘八一野战军’的要求。经兵团党委批准，支持‘八一野战军’的夺权斗争！”

与此同时，“八野”的对立面“石造联总”也在开会策划夺权。

1 月 24 日晚，“石造联总”彭正云召集总部和农八师分站负责人会议，分析石河子地区形势和两派力量对比，研究夺农八师的权。

1 月 25 日下午 14 时，彭正云再次召集“石造联总”总部和农八师分站负责人会议，决定当天 18 时 30 分在农八师实行夺权。夺权以八师机关“造反团”为主，离农八师师部近的单位组织全部人马去支援夺权，离汽二团“八野”总部近的单位，组织人马去二团，牵制那里的“八野”总部。

1 月 25 日下午 18 时整，按“石造联总”总部安排，毛纺厂、石河子中学、经管处、汽二团的造反派约 2000 多人，以营救 1 月 24 日被汽二团“八野”从工四团抓去的“石造联总”战友为

名，团团包围了汽二团团部和“八野”总部，并同前来救援的“八野二方面军”和“八野四方面军”近千人展开大辩论。“八野”头头赶紧打电话给独立团，要求派兵救援。独立团派出三营营长李树春，率 92 名荷枪实弹的军人，乘 3 辆卡车赶到汽二团。全副武装的军人端着上了刺刀的步枪、冲锋枪冲进辩论的人群，“石造联总”的汽二团“工人革命造反联合司令部”头头张振奇下令：“先将独立团战士围住，再缴他们的枪。”

经过一个多小时的夺枪混战，“石造联总”夺得步枪 19 支，冲锋枪 7 支，手榴弹 64 枚，子弹 1307 发，这可是一起严重的事件，独立团立即将汽二团抢枪事件上报新疆建设兵团。

就在汽二团夺枪当晚 22 时，“石造联总”另一路人马几千人按计划将农八师师部机关大楼团团围住，逼农八师副政委晋怀中、李光、副师长龚建部、政治部主任杨廷柱 4 人签字，交出农八师党政财文大权。并强行接管了总机房。

当晚 23 时，新疆建设兵团接到汽二团发生抢枪事件的报告后，兵团机要局长王宝铨跑到武装部作战室，命令值班参谋张振东：“你赶快把坦克团准备好，石河子发生暴乱了，抢了值班部队的枪。”

新疆军区接到报告后，立即将情况报告中央，说石河子地区发生了暴乱，抢了值班部队的枪。现准备出动部队，包括坦克团。

当晚，农八师负责人在武器库，召开武装处参谋和农八师“八野”头头联席会议，研究向“石造联总”的“反夺权”。会议做出“四项决定”：

1、支持“八野”“反夺权”；

2、次日拂晓值班部队开进师部大院，占领机关；

3、部队进驻前，先由“八野”发出支援夺权的请求，后由武装处发表“支左夺权”声明；

4、按拟定的名单，抓捕政法科“石造联总”人员。

会议研究了兵力部署、指挥位置、人员分工和车辆准备。会后，给值班部队增发了弹药。

## 第 460 回：周恩来，连夜见新疆代表　两头按，西北边陲不能乱

1 月 26 日凌晨 1 时，独立团几十辆卡车开进石河子毛纺厂，上千名军人和“八野”人员包围了工人住宅区，封锁道路，切断电话线。独立团战士进入工人住宅，搜查 25 日晚独立团被“石造联总”抢夺的枪支。

而此时，毛纺厂“石造联总”的工人早已将昨晚抢夺的武器，连同扣押的三营营长李树春和两名战士，于 26 日凌晨，先一步用车押往乌鲁木齐，行程 4 小时，送交新疆军区，并打了收条。

作为“独立团镇压革命群众的罪证”，他们还将其中 3 支卸了枪栓的步枪，由毛纺厂工人带回厂里，藏进羊毛仓库。

押送枪支和人员的毛纺厂工人王克明，上缴枪支后，又亲自向新疆军区副政委左齐，副司令员徐国贤，参谋长何家产汇报了夺枪经过。

再说石河子这边，独立团在毛纺厂搜查了 3 个多小时，一无所获。凌晨 4 时，他们准备撤兵，这才发现，自己已被“造反团”的人团团围住，非要辩论出个水落石出不行。

“八野”见势不妙，立即组织队伍，向包围独立团战士的“造反团”发起冲击。几千人密密麻麻挤成一团，互相推搡。一个矮个子的战士被人推搡，火气冲天，端起枪来，朝天就是一枪。枪声一响，全场霎时静了片刻。紧接着枪声大作，战士和军官手中的枪，有的朝天打，有的朝人群中开火。“造反团”吓得哭喊着，在一片惨叫声中，纷纷跑回家，赶紧关门。在这次血案中，当场

打死 4 人，伤 7 人，送医院后又死 1 人。

在事后的审查中，带兵的三营副营长韩玉泉供认："4 时许，部队被群众挤散，部队就打枪，开始向天开枪，群众要夺枪，开始向群众射击。当时我也挨了枪，是七连打的，约三、五分钟，一边打一边退。"

而就在此时，1 月 26 日清晨，农八师机关的"八野第一方面军工农兵兵团"正在反复广播《紧急呼吁》："紧急呼吁解放军根据中央支左五条，支援我们夺回党政财文大权，粉碎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暗送权的罪恶阴谋，使无产阶级的权力，掌握在真正的革命派手中。"

5 时 40 分，"八野"大批人员冲进农八师师部，接管总机。6 时，武装处调动 4 个连，对师部大楼实行武装占领，"石造联总"的人被赶出去。战士在大院布满岗哨，屋顶和阳台上，架起 13 挺轻机枪，3 门 60 炮。随即宣布由副师长龚建章、萧凤瑞等 5 人主持八师工作，有倒向"石造联总"之嫌的师政委刘丙正等领导停职检查。

8 时左右，"石造联总"总部调来几千人，后增至上万人员，将被值班部队武装占据的农八师师部各楼和总机房包围，要部队和"八野"交出权力，撤出农八师。

武装处赶紧又调动基建处 9 连赶来增援，又被人群围住辩论。9 连指导员高砥平命令战士上刺刀，子弹上膛。他端着手枪喝令群众让开。兵团子女一校 13 岁的王万东高呼："要文斗，不要武斗！"被高砥平一枪打死。部队顿时朝人群开枪，当场打死 3 人，伤 6 人。

霎时，愤怒的人群向防守部队冲了过去，前面的人开始夺枪。有的十几人围住一个战士，苦口婆心地讲："你们要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劝他们放下武器，站到造反派一边来。"造反团"头头又组织人群继续包围和喊话要值班部队缴枪投降。值班部队全部退守于师部大院几座大楼内，架枪架炮固守，并回答："不交枪！弄火了还打！"

10 时，新疆军区参谋长何家产打来电话，命令双方脱离接触，问题由双方代表协商解决。

而"造反团"要部队交枪，惩办凶手，否则决不撤退。人群手挽手，高呼口号，一浪接一浪，继续向楼房内的部队发起冲击。步枪、冲锋枪、机枪和楼顶的炮口都对准了楼下的人群。

11 时 30 分，新疆军区派出副司令徐国贤、副参谋长马森等赶到现场，却没有到现场与群众见面。失望的人群加紧了冲击，不让部队往外撤。

再看已发生血案的毛纺厂这边。早晨 7 时，"八野"和独立团再次将毛纺厂住宅区包围，抓走"造反团"一些骨干。中午 12 时，独立团在从毛纺厂撤离时，正好在木工厂附近大路上与"石造联总"前去声援毛纺厂的大队人马相遇，"石造联总"的人手拉手拦住独立团的去路。这时一个战士用刺刀刺伤了"石造联总"的郑小风，"石造联总"人员立即上去夺枪。工四团的子弟卫中与五、六个工人夺了一支枪，他拿起枪就跑，被战士开枪打死。

下午 14 时 40 分，依然被围困在农八师办公楼的武装处副科长王世昌打电话给坐镇武器库的副处长张俊义，请示怎么办？张

俊义指示部队突围。10 分钟后，奉徐国贤副司令命令，23 团副团长高庆森打电话给武装处："值班部队立即撤出师部大院。"王世昌电话通知总机房和东、西楼部队："15 点 15 分从北门强行突围，如遇包围，可鸣枪警告，驱散群众。"

15 时 13 分，守东、西楼的部队撤出。一出大楼，看到那么多人堵住去路，23 团副营长李可志朝天就是一枪。顿时，部队指挥员全部开火，有的冲天打，有的朝人群射击。守卫北门的部队立即成战斗队形散开，卧倒后用步枪、机枪、冲锋枪朝密集的人群开火。

密集的人群，在密集的枪声中，像打飞的鸭子，跑的、跳的、滚的、爬的、哭的、喊的，四散逃去。

随后，大批部队从北门、东便门或翻过土墙，向八师武器库撤退。

乱枪中首先被打死的是一名叫马路的 12 岁学生。他家就在大院内，小小的年纪，已经知道帮妈妈干活了。当时，他正担水走在回家的路上。孩子小，担不满一挑水，每只桶里只有小半桶水。孩子死后，两只硕大的水桶，一左一右立在尸体的两边，桶里的水已经冻得硬硬实实的了，而那条扁担，则横在尸体的下面。事后各地公布的马路死亡照片中，孩子弱小的身影与水桶形成强烈的反差。

在独立团团部的指战员焦急地等待着被围困的独立团和八师师部的消息。突然，八师方向响起了剧烈的枪声，还有手榴弹的爆炸声。枪声由西往东，慢慢稀疏下来。打过仗的独立团张参谋听着枪声说："突围了，开道的最少有 10 挺机枪。"

一个江苏口音的战士说："都是 64 年大比武的尖子，就是肉博也出的来。"

直到 17 时，部队全部撤完。留下现场白雪皑皑，红血片片。八师大院内和北门外躺下了十几具尸体，有的中了十几枪。受枪伤的 20 多人，被送往医院抢救。

撤至八师武器库的部队，经过短暂休整和训话后，分两路撤出石河子。一路乘车驶向老沙湾，一路步行经总场向 23 团撤退。

乘车撤退的部队路经石河子汽车站时，正好一辆客车进站，车站门口人很多。部队以为又遇上了造反派，3 辆卡车车顶的机枪和战士手中的冲锋枪一起开火，当场打伤 9 人，卡车疾驰而去。

3 辆满载战士的卡车驶上乌伊公路，刚一转弯，迎面又碰上一对高举红旗，手捧毛泽东像的中学哈萨克红卫兵长征队，他们路经石河子，早晨刚去总场为职工进行宣传演出回来。

车上战士大喊："什么人？"

手举红旗的中学生帕利莎答："红卫兵！"

"打死你们！"第一辆车上的机枪立即开火，当场打死 1 人，重伤 3 人。据红卫兵小报称：死伤者都是十六、七岁的哈萨克姑娘。帕利莎面部中弹，倒在雪地上，手中还握着那杆"毛泽东思想红卫兵长征队"的红旗。

16 时，工程连乘车撤退到石河子总场汽车连附近，停在路旁。这时，四分场九连的汽车也向这边开来，一见公路上堵了大批人马，指挥员下令："准备战斗！"举手就是一枪。顿时，步枪、机枪、冲锋枪一齐扫射，当场打死二连机务排长和炊事员。双方开始混战。待发现是"大水冲了龙王庙"时，已打死 3 人，多人

受伤。

天刚黑，三辆部队的吉普车来到独立团团部门口，车上下来几个军人。一个上了点年纪的矮胖军人掀开棉门帘进来，站在那里，很不高兴的样子，他身边的干部说："徐副司令来看大家。"

团长迎上前说："首长你好,我是许光途。"

新疆军区副司令徐国贤看着他问："谁让你们开枪的!"

"老百姓抢我们的抢!"一个黑睑高个子战士在那里喊着。

徐副司令吃了-惊，他对这个战士也吼到："老百姓要枪就给他们!"

黑睑战士没吃那-套，大声说到："你是个怂司令，枪是军人的命根子，抢枪就是反革命!"

空气似乎凝固了，不知谁喊了句："都给我滚开!"

战士们悻悻地离去。

几分钟后，有人在院子里喊："全体撤退!"

漆黑的夜，汽车碾着积雪，哼哼着向前开，路两边是撤退的兵流。

远处又响起了枪声，这枪声来自另一个师的武装部队，他们接到的任务是就地歼灭"叛军"。

石河子"126"血案终告结束，这一血案震惊朝野，周恩来曾下令解散"八一野战军"，并指示严禁开枪，不准出动坦克，停止冲突，听候查处。

京西宾馆是中央军委开会的主要场所。1 月 26 日，中央军委对京西宾馆文化大革命做了专门决定："京西宾馆同中南海、人大会堂、钓鱼台一样，属于保护单位。京西宾馆的文化大革命，要

按照军以下部队的办法搞正面教育，不搞四大，不搞战斗组织，不搞串连，军队和地方战斗组织不许冲击。”

但是，就在军委的决定通告贴出去两个小时后，新疆农学院“红旗造反团”企图强行进入京西宾馆大楼揪人。宾馆警卫人员耐心但强制地劝阻。气愤的“红旗造反团”涂抹了军委的决定，大骂宾馆“保皇”。

1 月 27 日晨 3 时 45 分至 7 时，周恩来接见新疆“1219 绝食”代表。他说：“你们冲进过新疆军区，没有引起什么问题，这很好。现在新疆军区的文化大革命已经停了，这是中央的决定。应该以祖国的利益为重，我们不要被苏修利用。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造反派，只要我们的军队在，敌人是不会翻天的。不要这也怀疑那也怀疑的，毛主席有这样的信心，对你们这样信任。你们应该对中央军委有起码的信任，第一，新疆要把军队稳住，新疆这么多问题，先抽出一条来，什么应爱护？解放军嘛！”

群众谈到对新疆自治区党委和新疆军区党委领导及建设兵团党委的看法时周恩来说：“你们怀疑新疆搞政变，多少人到新疆也没有把新疆拖跑。现在新疆有强大的国防工业，巩固的边防。这些你们应该好好想想。小道理服从大道理嘛！”

谈到夺权时，周恩来说：“夺权斗争，我很支持你们。”

关于石河子惨案，周恩来说：“关于石河子死伤人的问题，即使是反动的群众组织，也不能开枪，只能揪住头头，我立即起草电报，给区党委和兵团党委，命令停止撤出部队，立即派调查组去那里调查。新疆那位大学生死了，成了无头案，这次石河子事件不能搞个无头案，一定要调查清楚。”

对新疆建设兵团的张仲瀚，周恩来说："张仲瀚我本想挽救他，但他不努力，我在石河子，看到那样铺张浪费，批评了他，本来想调他，但考虑给他个机会，他自己不想挽救，不接受批评，这次运动来，就把他的问题搞出来了，王震保了张仲瀚，又保自己，王震调了一个学生团体来保护他。"

他接着说："新疆夺权问题、军区问题都要很好处理。兵团问题很复杂，需要我们很好研究。贵州夺权很好，它比山西夺权经验还好，准备把他们的经验介绍给各地。夺权你们要考虑民族干部。"

关于"12.19 绝食事件"，周恩来说："'12.19 ' 绝食、停工全是出于激愤，可以理解。责任归区党委和兵团党委。但不提倡。你们回去着重宣传我们这几条。"

有人问："丁盛是革命左派，那我们怎么办？能不能批判？"

周恩来："可以批判，有错误当然可以批判。"

有人问："对丁盛的问题怎么理解？"

周恩来："可能是说他中印边境打得好吧？这次他偷偷跑到北京，就是错误的。"

这天，根据中央指示，新疆军区派出 7971、8010、8011 部队进驻石河子市。驻军代表召集"八野"和"石造联总"代表协商，达成《四项条件》：

一、一切组织所存武器弹药一律上交军队保管，如有违背，以现行反革命论处；

二、确有证据的杀人、打人凶手，交解放军看管，一般群众

立即释放；

三、立即停止互相抓人、打人、抄家等做法；

四、宣传以上三条。

27 日上午，独立团除高炮营在克拉玛依施工外，所有的人员都集中到了一营。中午，团长接到报告，一营的北面发现不明身份的武装人员。团长从炮队镜里看到，远处密集的步、骑兵呈散兵线正在往前推近，大概 10 分钟后，对方停止了前进，开始构筑野战工事，团长和几个领导紧急商量了一阵，决定针锋相对，好汉不吃眼前亏。

炮连的六门 7.62 口径的加农炮一字排开，战士们一边骂娘，一边挖助锄，这些兵都是沈阳军区大比武的尖子，个个身手不凡，很快，炮架支好了，瞄准手快速摇着方向机，六门火炮分头对准了远处的重机枪。

对方的指挥官从望远镜里看到了这一切，他知道，一个营有 18 门火炮，如果来几个齐射，后果是什么。事后才知道， 指挥这次行动的是师侦察科长，他是工二师的，不了解情况。终于，这些武装人员撤走了。

“126 事件”发生后，新疆刚成立的“夺权总指挥部”派“八农红旗”负责人张文成和北航红旗驻疆代表谢德齐、北师大来疆串联学生李磊前往石河子了解事件情况。新疆“夺权指挥部”二号人物、新疆大学“星火燎原”二号勤务员刘鸿科认定：“兵团‘八野’、‘石造联总’向手无寸铁的学生开枪，显然是反革命行为，应当取缔这两个组织。”他指示八一农学院学生、新疆“红二司”的王玉成前去表态，宣布“八野”、“石造联总”为反动组织。李

磊则以“红二司”副司令的身份要求新疆军区立即出兵弹压“八野”和“石造联总”。

1 月 28 日，新疆“夺权总指挥部”率 18 个群众组织发出《联合紧急通令》，并在乌鲁木齐组织大规模示威游行，王恩茂、丁盛被当作“八野”的后台，和“126”血案的黑后台，受到猛烈攻击。

这天，中央军委给新疆军区党委发来电报：

绝密

新疆军区党委：

军委认为王恩茂、郭鹏、左齐、张希钦、徐国贤、熊晃、丁盛、裴周玉等八同志的问题是人民内部矛盾，他们不是“三反分子”，不是贺龙分子，望你们向大家作妥善解释。

中央军委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八日

血案发生后，新疆自上而下都在利用死难者的鲜血大做文章。

“126”血案后，“石造联总”要为“死难烈士”报仇，“八野”声称“石造联总”制造了“反革命暴乱”。两派互相抓人、打人、抄家，闹得天昏地暗。

1 月 29 日，“石造联总”发布《第一号通令》，声称要逮捕“八野”头头、杀人凶手等十种罪犯。他们在石河子管理处广场举行“126”血案控诉大会，万众激愤。一些“八野”头头和骨干被揪上台，罚跪、揪头发、搞“喷气式”、戴高帽、挂黑牌等，会后游街示众。

“石造联总”在石河子地区搞了几天“红色恐怖”，掀起了

抓、抄、搜捕凶手高潮，不少单位私设公堂，刑讯逼供。

兵团参谋长陈实在“126”血案发生时，正藏到他弟弟陈殿信家躲避两派批斗。军代表调查组也将“策划者”的罪名往他头上扣。刑讯逼供，要陈殿信改口，结果逼死陈实两位亲人。

1 月 29 日，在乌鲁木齐人民广场召开批斗张仲翰大会，会后张仲翰即被新疆军区部队看押。第二天，张仲翰被当作“126”血案的“幕后黑手”，押往北京问罪。

由于新疆地处“反修前哨”，不能乱。对于“126”血案，新疆军区和兵团电告中央，是群众组织向兵团部队夺权抢枪，引起双方武装冲突。于是，中央将其定性为“双方武装冲突”。

1 月 31 日，中央文革小组在《文化革命动向》上刊登了《新华社记者评述石河子反革命事件》,认为是一起镇压革命群众的严重的反革命事件。当天，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对石河子的指示：

新疆自治区党委、人委、新疆军区、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并自治区革命夺权总指挥部：

（一）立即劝阻人民内部的一切武装冲突。凡是有群众的场面，我武装部队绝对不准开枪。如有群众夺取部队武器，首先应该劝阻；不听，也应向天放枪以示警告。对武装反革命分子和过境窜入的武装反革命分子，也要力求逮捕，只有敌人首先开枪时，才能自卫还击。

（二）新疆军区和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的武装值班部队，担负着保卫祖国边疆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繁重任务。新疆军

区领导机关及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的武装、机要部门和武装部队，任何人、任何群众组织均不准冲击，不准夺权。

（三）石河子地区的武装冲突问题，待中央派人调查处理。目前在石河子、乌鲁木齐等地区已经发生的乱抓人、打人的行为，应该立即停止和劝阻，已经抓了的群众，必须立即释放。

中共中央

国 务 院

中国中央军委

一九六七年元月三十一日

林彪秘书张云生把石河子事件的情况和两种对立的看法向林彪作了报告。林彪听后只问了一句："整个情况主席知道吗？"

张云生说："这些报告材料，主席都有。"

林彪没再说话。

## 第 461 回：一二七，宁夏自治区夺权　为《七条》，林彪面见毛泽东

1 月 27 日，宁夏自治区夺权。

地处西北一隅的宁夏，当北京文革已发展得轰轰烈烈时，这里还在搞“四清”社教运动。宁夏自治区党委把文革作为社教的延续，各单位社教工作团直接领导文革的开展，他们建立黑名单，把黑五类和其他有历史问题的人，划成右类并进行批斗。

1966 年 6 月 2 日，在聂元梓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的影响下，宁夏大学的 9 名学生也贴出了一张“检查我校领导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精神状态”的大字报。其实，这张大字报的内容就是模仿北京大学聂元梓七人大字报，署名都是学生干部和积极份子，但是依然震动了宁夏自治区党委。依据惯例，区党委向宁夏大学派出了调查组并对学生进行严密监控。同时，宁夏大学组织学生对大字报的作者进行了批判，把他们定性为“反党份子”。

6 月 4 日，按照刘少奇发出的中央指令，宁夏自治区党委派出工作组进驻银川各校领导文化大革命。与全国其他地区一样，宁夏文革工作组也是把运动的矛头指向教师和下层干部。6、7 月间，仅宁夏大学就有 83%的老师和基层干部受到大字报的批判，42%的教师和 59%的干部划为坏份子被批斗。某些工作组还把斗争矛头指向学生。银川一中高考准备班的大部分学生出身于非红五类家庭。工作组把他们定为“资产阶级的小苗苗”加以批判。这种做法引起了班里出身红五类的干部的质疑。于是他们在中央宣传舆

论的影响下组织了“保卫校园”的反工作组行动。该行为也被区党委定性为反革命事件，学生们被遣送到郊区农场进行整风。

工作组撤离学校后，各校的文革筹备小组予以替代。直至 9 月底，银川文革基本被控制在自治区党委的轨道内。

大串联开始后，来自北京的红卫兵将造反的火种带进宁夏。他们一进银川就把攻击宁夏区党委的大字报贴到区党委门前，并要求杨静仁出来接见。

杨静仁亲自出来欢迎，并对他们提出的问题做了谨慎的回答。但是，北京红卫兵的行为本身已经在银川造成了极大的震动，这让银川极少数有造反意识的人看到，不仅本单位的领导可以反，就连自治区党委也是可以挑战的。在杨静仁出来接见北京红卫兵的第二天，在北京红卫兵的指引下，银川的学生开始在区党委门前贴出大字报，如“毛主席派来的红卫兵要挖出彭真埋在宁夏的定时炸弹”、“杨静仁已经对北京红卫兵表示了支持”等等。

8 月，群众开始炮轰自治区党委。在中央罢免了宁夏大学党委书记江云后，宁夏大学的激进学生在 9 月 2 日召开了批判江云的大会，并把斗争矛头直指宁夏自治区党委。在会上，学生指责江云的检查是区党委给准备的，他们要宁夏大学工作组组长哈炯磊和江云的秘书王钊到会场对证，自治区党委拒不同意，并否认曾包庇过江云。激进学生于是聚集在自治区党委前，提出“区党委拒不交人是为了掩藏江和区党委之间的阴谋”。“九二行动”是宁夏学生对区党委的第一次直接挑战，在社会上造成很大的反响。

面对日益激进的学生，9 月 12 日，自治区副主席陈养山作报告称，“宁夏的工作组并没有犯路线错误，只是犯了方法错误；

杨静仁领导的区党委在执行文革中采取了正确的道路”。此后，银川大街上贴满了攻击宁夏大学造反学生的大字报，批判区党委的大字报几乎消失。

对此，银川造反派在北京红卫兵的支持下策划了更为激烈的行动。9 月 21 日，宁夏大学激进学生组成的革命串联队贴出大字报，号召在 25 日召开“揭露宁夏区党委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大会。20 多个单位的造反者对通知做出了响应，并一起组织了大会筹委会。

大会尽管遭到自治区党委的阻挠，但还是如期举行。会上提出了“炮轰司令部”、“火烧区党委”的口号，并点名批判了自治区党委领导人马玉槐、杨一木、陈养山等人，同时也出现了“杨静仁是宁夏牛鬼蛇神的大红伞”、“宁夏区党委是黑线黑帮”、“踢开党委闹革命”等口号。这时，北京红卫兵在银川虽然被驱赶，但是宁夏党委的权威已大大受损。会后，银川市街头开始出现了大辩论，围攻自治区党政领导人的现象时有发生。

9 月底，大量宁夏学生冲破区党委的控制到北京串联。在串联中，银川学生的思想也发生了根本的改变。正如一名红卫兵所讲，“串联彻底解放了我的思想。看到北京那么多高层干部被批斗，我感到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遍地都是。批斗地方党委干部是绝不会犯错误的。”至 12 月中旬，银川群众已充分发动起来。

12 月 4 日，银川市的红卫兵召开大会。这天一早，自治区书记处书记马玉槐跑到军区离休干部院的牛化东家里，对牛化东说：“杨静仁告诉我无论如何不能参加今天的大会，要躲一躲。我想来想去没个去处，就来你这里了，到你这里，弄不好会把你牵连

进去。”

牛化东和马玉槐商量一番后，决定要马玉槐躲到宁夏军区司令员朱声达家。上午 11 时，马玉槐来到朱声达家，朱声达劝马玉槐不要太紧张。

马玉槐说：“中央不说话，我们实在没办法，群众不让我们说话，有些事实又不符合，稍一解释，又说我态度不老实。”

朱声达再未多说，便让秘书领马玉槐去招待所吃饭休息。

12 月 11 日，杨静仁代表自治区党委向群众做了检讨，承认区党委在工作组问题、对待群众组织问题和串联问题上犯了错误。15 日至 16 日，宁夏大学红卫兵要求杨静仁罢马玉槐的官，杨静仁说他也没有权力答应此事。造反派学生决定将马玉槐拉到北京评判。16 日下午，宁夏大学红卫兵卧轨拦车将马玉槐带到北京。中央责成杨静仁和区党委副书记甘春雷赴京处理马玉槐的问题。在北京，当中央表示明确支持造反派学生后，甘春雷转而支持学生，并对杨静仁进行了揭发。

1967 年 1 月 12 日，宁夏造反派在北京召开了批判杨静仁、马玉槐的大会。

《宁夏日报》社造反派因消息灵敏，得知上海的夺权消息，也于 1 月 13 日，由“宁夏日报革命造反战斗团”等组织率先夺了《宁夏日报》的权。夺权风潮由此开始在银川迅速扩散。

15 日，杨静仁、马玉槐从北京回银川接受群众批判。杨静仁刚下火车就被带上牌子游街。

1 月 17 日，银川召开“揭发批判自治区党委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极少数坚持反动路线顽固分子大会”。18 日，陈

毅在北京接见宁夏大学“毛主席思想红卫兵”，表示杨静仁、马玉槐不是不能被打倒。

此后，宁夏保守派群众意识到自己“站错了队”。他们或重新改组，或改变组织名称以适应新形势。

与其它省市相似，银川的造反派中有不少是历次政治运动中各单位的受害者或受牵连者，特别是在宁夏的“反地方民族主义”和“反坏人坏事”运动中和文革初期的受害者。

“反地方民族主义”和“反坏人坏事”运动是宁夏在1960年发动的两场地方性政治运动：“反地方民族主义运动”于 1960年上半年在自治区党委中进行，以刘格平为首的老区党委领导班子被认为是“搞地方民族主义”而被罢官或降职，以杨静仁为首的新领导班子代替了他们。而“反坏人坏事运动”则是1960年下半年，宁夏自治区党委以消除地方民族主义的社会根源为名，在社会上进行的一场大规模运动，许多群众在这次运动中受到了打击。

自治区党委被打倒后，银川陷入了全面的混乱。生产停滞，经济主义风潮蔓延，同时在“反地方民族主义”和“反坏人坏事”运动中受到打击的干部和群众要求平反的呼声日益高涨。

1月中旬，自治区书记处书记甘春雷让区党委造反派头头与社会上的造反派联系商讨自治区党委夺权事宜。1月17日，银川13个造反派组织开会讨论此事。会上对夺权时机出现争议，北京“三司”驻宁夏联络站强调宁夏夺权的时机还不够成熟，宁夏文革还需要大混乱、大动荡。在北京红卫兵的宣传下，中学生红卫兵从大会退出。

虽然如此，13 个组织中的大多数还是同意联合夺权。1 月 22 日晚，银川地区 22 个群众组织联合成立“宁夏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联合委员会”， 简称“联委会”，并决定于 1 月 27 日夺取自治区党政财文大权。宁夏大学学生安建国任主任。其他成员还有：革干子弟冯贤、复员军人出身的中文系大学生杨长春、物资局干部牟元礼、区文工团干部华方佐，及若干工人代表。结合的领导干部是区党委书记处书记甘春雷。

1 月 25 日，《宁夏日报》发表了“银川地区革命造反联合司令部”等 22 个组织的“紧急通令”，号召造反派团结起来，“坚决开展全面的夺权斗争”。

“联委会”几个头头于 1 月 26 日夜来到宁夏军区，要求军区给予支持，并派 1 名领导干部参加夺权。军区领导经过紧急研究，立即向中央军委和兰州军区发报请示，但未得到答复。情况紧迫，军区党委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仓促表态支持“联委会”，并派副司令员张怀礼参加夺权的领导机构。

1 月 27 日，银川市体育馆举行庆祝“宁夏革命造反派联合委员会”成立大会，宣称“革命造反派”大联合夺了自治区党委、人委，银川市委、人委等党政机关的权，大会通过了“夺权公告”。

“联委会”在“夺权公告”中宣称：“一切领导权，由本联合委员会接管，委员会下设文化革命委员会和生产建设委员会。”

夺权后，“联委会”立刻进行游行示威庆祝夺权胜利。宁夏各地造反派群起效尤，各市县、单位相继夺权，夺权之风更加迅速的刮遍宁夏各地。

我们再说林彪1月25日给毛泽东送去的关于军队文革运动的“七条”意见。对林彪1月25日的信和送来的这“七条”，毛泽东十分重视，他在林彪的信上多处划了着重号，又在1月25日南京军区许世友司令员及其秘书的电话记录上划了多处杠杠。1月26日，毛泽东在“七条”上批示：“所定七条，很好，照发”后来又写上：“再加上一条关于管教干部子女的问题。”并在第五条“冲击领导机关问题。过去如果是反革命冲击了，要追究，如果是左派冲击了，不追究”后面加上：“今后右派冲击，要抵制，左派冲击，要欢迎”。最后，毛泽东在文件上批道：“此文件经过讨论修改后，再发出。来北京开会的同志，停一周后再回去。又及”。

当天，毛泽东在全军文化革命小组1月25日编印的《军队文化大革命运动情况要报》第五号登载的《关于夺权的若干情况和问题》上批示：

“林彪同志：此件反映群众提出，究竟哪些机关可以夺权，哪些不能夺权；夺了权的人们对待不同意见的群众应取什么态度（应争取多数，不能排斥）。请加以研究。”

1月27日，周恩来传达毛泽东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一）军队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在运动开始时，是不介入的，但实际上已介入了。（如材料送到军队去保管，有的干部去军队。）在现在的形势下，两条路线的斗争非常尖锐的情况下，不能不介入，介入就必须支持左派。

（二）老干部到现在多数对文化大革命还不理解，多数靠吃

老本。过去有功劳，要很好的在这次运动中锻炼改造自己。要立新功，立新劳。(这是毛主席引用了《战国策》上的“触詟说赵太君”)，要坚定站在左派方面，不能和稀泥，坚决支持左派，然后在左派的接管和监督之下搞好工作。

（三）关于夺权。报纸上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顽固分子的权，不是这样的能不能夺？现在看来不能仔细分，应夺来再说，不能形而上学。否则受限制，夺来后是什么性质的当权派，在运动后期再判断。夺权后报国务院同意。

（四）夺权后的老干部和新夺权的干部，共同搞好业务，保守国家机密。

1 月 27 日，叶剑英在军委扩大会上再次传达毛泽东的指示：

一、我认为十三个军区不要同时搞，要有前有后。

二、地方文化大革命正在猛烈开展，夺权斗争还在激烈进行，我们军队要支持革命左派进行斗争，因此军队和地方文化大革命要差开。

三、现在国际上帝、修、反正利用我们文化大革命继续大搞反华活动。如苏联在镇压学生，新疆边境飞机活动增多了。地面部队要有所警惕，要有所准备。如济南、南京、福州、广州、昆明等地区。所以文化大革命时间要稍推一下。将来一定要搞的，顾大局。

1 月 27 日下午，林彪午休起来，二话没说就去了中南海，面见毛泽东，汇报军委《七条命令》的起草情况。他从毛泽东那里

回来后对秘书说："主席已经同意这 7 条，又亲笔加了一条加强对干部子女的教育。草稿退中央文革，让他们整理后，再由我转主席正式签发。"林彪再次强调此件千万不能压。

经过在京参加军委扩大会议的军队与会领导讨论，在原来的"七条"基础上，又加了"管教干部子女"一条，"七条"修改成"八条"。

## 第 462 回：批斗会，杜义德怒上西山　周恩来，接见工交口代表

海军传达了林彪对李作鹏、王宏坤、张秀川的评价和军委关于苏振华问题的决定后，海军机关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发生了显著变化。原来支持李、王、张的，当然兴高采烈，觉得长期受压，终于翻了身；原来观潮派基本上转向支持李、王、张；原来支持苏振华的则发生了分裂，多数转为观潮派，部分转为支持李、王、张。于是，海军机关大院内，支持李、王、张的群众组织联合起来，组织进行了对苏振华及那些拥护、紧跟苏振华的骨干分子的批斗。

一次，在海军大院广场召开联合批斗苏振华等人的大会上，群众先将苏振华推倒在地，踏上一只脚，再拉起来，让他在毛泽东的画像前下跪认罪，又拖起来向台下正面的造反派群众下跪认罪，再拖起来向两侧群众下跪认罪，最后就是长时间的“喷气式”。

李作鹏躲在大会的角落偷偷观看，他觉得造反派的批斗方式比自己当年农会斗地主恶霸还利害，这样的残酷批斗是会把人整死的。他反复权衡，最后下决心，当天派人以海军党委的名义，把苏振华从群众组织手里要了出来，然后交给海军政治部保卫部，将他秘密藏在北京以外的地方。随后是东躲西藏，待形势稍微稳定后，将他疏散到湘南海军一个机场内隐蔽居住。2015 年苏振华、李作鹏的子女聚会，苏振华的女儿苏燕燕特别向李作鹏的儿子李冰天表示，感谢李冰天的父亲在文革中救了她父亲一命，大概就

是指这件事情。

此时，中央把苏振华列在“彭、黄”专案组内进行审查。

虽然海军领导机关文革形势有了变化，但是海政“红流”、海航“红司”和文工团“思想队”等群众组织认为，苏振华是当权派，应该打到，李、王、张也是当权派，也有问题，依然坚持炮轰李、王、张。虽然在机关中他们已是少数，但他们与军队院校造反派联合在一起，能量也不能小觑。其中海军院校有个“镇虎口战斗队”，他们和海军机关的“红流”、“红司”、“毛泽东思想战斗队”等造反组织联合在一起，对李、王、张的冲击围斗始终没有停止。

青岛北海舰队机关造反派要来北京海军领导机关造反，围住北海舰队副司令员潘焱，要他派飞机送他们去北京。潘焱请示李作鹏怎么办？李作鹏说：第一不同意他们来北京，上级早有规定，舰队机关不准大串联。第二不同意派飞机送他们。于是，北海舰队这群人改坐火车来到北京。他们冲进海军大院，将李作鹏围住辩论，从下午一直到半夜，连水也不准喝。李作鹏的爱人急得给叶群打电话，请她转告林彪。林彪让叶群给李作鹏打电话称：有紧要事情要李作鹏去接受任务。李作鹏宣布了林彪电话内容，这才赶紧脱身前往毛家湾。他一进林彪家，林彪就问他：

“怎么样？”

李作鹏说：“真他妈的胡闹，首先要我背《毛主席语录》，背不出来就说我不学毛著，不学毛著就是反对毛主席，反对毛主席就应该打倒。”

林彪听后苦笑一下说：“你暂时避开一下，让他们闹去。”

并要叶群把李作鹏安置到京西宾馆。

遂后，又传来消息说，肖劲光被人劫走了。事发突然，谁也不知道是被哪个院校揪走的，也不知道揪到什么地方去了。后来，李作鹏接到肖劲光亲自从天津某旅社给他打来电话说，他被海军工程学院造反派揪到天津去了。李作鹏立即找到那个造反派组织的头头戴涛，把林彪对肖劲光的三条评价告诉他们，同时要求他们立即把肖劲光接回北京，否则就要去报告林彪。戴涛他们答应派第二号头头到天津去接肖劲光回来。第二天，1 月 27 日，肖劲光回到北京，正赶上这天在工人体育馆召开海军“万人大会”。

大会一开始，海军政委苏振华和副政委杜义德就被揪到台上，一伙人推推搡搡地给他们挂上牌子。接着，海军司令部、政治部、装备技术部、航空兵部的领导傅继泽、李君彦、罗斌、赵晓舟也相继被揪上台陪斗。

李作鹏等海军党委中的其他人坐在主席台上，肖劲光虽然也在台上就坐，但是，却被安排在李作鹏等人的侧对面，以示区别。肖劲光上台的时候，身后还跟着 9 个人，说是保护他。

会场上口号声此起彼伏、震耳欲聋。有人冲上台去，不由分说地撕下了杜义德的领章、帽徽，往后扳起他的双手，一个“喷气式”，用力把他的头摁到地上。“嗵”的一声，杜义德只觉得两眼直冒金星。额头上顿时已经肿了起来。紧接着，一阵拳打脚踢。但是，杜义德咬紧牙关，使出浑身的力气，挺直了身子，昂起了头。

台下有人喊，“打倒杜义德！”

杜义德倔强地说：“共产党员是打不倒的！”

“你反毛主席！”有人责问杜义德。

“我没有反对毛主席，我还要和反对毛主席的坏人斗争到底！”杜义德大声说。

又有人上前摁他的头，他往旁边一偏，又抬起了头。“共产党员的头永远不能低下；我杜义德一辈子不懂得低头。”

杜义德大声嚷着。但是，他的声音被口号声给淹没了。紧接着，就是一阵拳打脚踢。时值隆冬，寒风凛冽，豆大的汗珠却从杜义德的额头渗出。杜义德被打得小便都失禁了，裤子冰冷冰冷的裹在身上，晕过去又被打醒过来。和他一起挨斗的几个人都被折磨得遍体鳞伤。杜义德一张脸碰得青一块、紫一块，满是淤血，肿得变了形，眼睛成了一条缝，睁也睁不开，让人惨不忍睹。

批斗大会后，杜义德跌跌撞撞地回到公主坟海军大院。一进门，把屋里人吓了一跳。工作人员赶紧把他扶到沙发上。刚坐下，就晕倒了。他妻子齐静轩失声大哭，赶紧叫三女儿小京拿毛巾来。小京拿来毛巾，见状吓得手直哆嗦，把毛巾塞给妈妈，就跑出去了。只听到大门“嘭”的一声，接着传来小京撕心裂肺的嚎啕声。哭声居然把杜义德惊醒了，他挣扎着起来说，：“不行！我得找李作鹏去。”他推开齐静轩手上的毛巾。脸上挂着乌青和血污，摇摇晃晃的，直闯李作鹏家，一进门，就大声嚷嚷：“李作鹏呢，你给我出来！”

见到李作鹏从屋里出来，杜义德气不打一处来。他指着李作鹏，破口大骂：“李作鹏，你混蛋！我问你，谁让你们打人的！谁给你的这样的权力！”

李作鹏的妻子董其彩当过医生，她慌忙上前拿蘸了水的棉花

来给杜义德擦脸上的污血。杜义德手一扬，说："去！不用你管。"又以毋庸置疑的口气对李作鹏说："李作鹏，你马上派车把我送到叶帅那里去。"李作鹏无奈，只好吩咐派车送杜义德去西山叶剑英的住处。

叶剑英听说杜义德来了，立即出来，见到他一脸的乌青和血迹，大吃一惊，忙问："杜义德，你这是怎么回事？"

杜义德满肚子的委屈："都是李作鹏他们干的！"

叶剑英掉下了眼泪。"这些人太不象话了。我一定会找他们算账的。"

他急忙叫医生给杜义德疗伤，又立即吩咐秘书："给我接李作鹏。"

电话通了。叶剑英用颤抖着手抓住电话听筒说："作鹏啊，你怎么把人打成这样啊？"

李作鹏问："哪一个呀？"

"当然是杜义德啊！"

李作鹏还要解释。叶剑英说："你不要解释了，人还在我这里呢。"

放下电话，叶剑英想了想，对杜义德说："我看你先不要回去了。我马上派人去海军大院把你爱人也接来。你们就在我这里住一阵子再说。"他对秘书吩咐说："先给杜义德家里打个电话，要他们准备一下。"想了想又说："汽车不要进海军大院，那里人多眼杂。打个电话要杜义德爱人出来。"

眼看着天黑了，齐静轩见杜义德还没到家，正在着急，西山来电话了，要她给杜义德带几件衣服，一小时后，到海军大院外

的公主坟转盘边等着。

齐静轩知道是叶剑英那里来的电话，心里一颗石头落了地。赶紧收拾了几件替换衣服，带着在家的二女儿小平出了门。

天色已黑，路上行人稀少。只有暗淡的路灯在寒风中闪烁。不大一会，一辆挂着“辰”字牌的黑色吉姆轿车悄悄从西边驶来。一位军人开窗问这母女：

“是齐静轩同志吗？”

齐静轩赶紧说：“是的。”

那人下车，让齐静轩母女上了后座，立即又开动，消失在夜幕中。

杜义德被秘密安排住在北京郊区的一座平房小院里。叶剑英吩咐他不必与外界联系，每天只是吃饭、休息、散步、读书、看报。当时，空军副司令刘震、第二炮兵司令员李天焕等人，也先后被叶剑英安排在这里“休息”。

1 月 27 日这天，海军另一派组织也在海军大院贴出“火烧李王张”的大标语。

“李”是指李作鹏，“王”是指王宏坤，“张”是指张秀川。

从 1 月 24 日到 26 日，高教部、交通部和一些军事院校的造反派到北京大学游行，反对聂元梓。但此时的聂元梓忙于夺权，似乎无暇顾及这些。1 月 27 日，她同清华大学蒯大富等 20 多人筹划，由北京第一机床厂“红色造反联络站”、北京第二机床厂“革命造反总部”、石景山发电厂“毛泽东思想东方红兵团”、北大“北京公社”、清华“井冈山”、地质“东方红”、师大“井冈山”等 30 多个群众组织发起，后来包括北京市大中学校、工矿企业共 200

多单位参加，组织成立了“北京革命造反公社”，简称“北京革命造反公社”，并在广播事业局的广播大楼里举行了成立大会，总部就设在广播大楼。参加“北京革命造反公社”的广播事业局“毛泽东思想战斗团”的负责人就是那位美籍人士李敦白。

会上，他们通过、发表了《北京革命造反公社倡议书》，说要把北京市的“党权、政权、财权、大权小权统统夺过来，夺它个一干二净，统统归还人民！”

《倡议书》说：“没有人民的授权，没有人民的承认，即使夺了大印也是白搭！革命的人民群众不买你的帐，一切等于零！

搞小团体主义、宗派主义、个人风头主义来抢权吗？不成！想‘下山摘桃’窃权吗？不成！搞阶级调和、大杂烩式的夺权吗？也不成！打着‘造反’旗号，搞名夺实保的假夺权吗？更不成！

总结前一段斗争的经验，根据北京的特点，要实现全市范围内的大夺权，必须有一个巴黎公社式的、自下而上的、各基层单位革命造反派的大联合，通过工农兵学商革命造反派代表大会的形式，制定夺取北京市各级大权的方案，进行全面的夺权。这种代表大会，既适合北京的情况，又适合巴黎公社的原则。它是北京革命造反派大联合、大夺权的新形式，是北京革命造反派在夺权斗争中的一个伟大创举。”

“为此，我们向全市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提出最紧急的倡议：

迅速召开“北京市工农兵学商革命造反派代表大会”，从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手里全面夺取北京市的领导权！”

1 月 27 日下午 16 时，周恩来继续接见工交口各部委的造反派代表。他说：

“昨天我们谈到革命组织，特别是革命造反派，一切行动都要光明正大，不要对我们中央，中央军委，公安部，卫戍区，国防部等一些专政机关采取保密态度，有行动要通知我们。你们是革命左派，你们的行动要加以保护嘛！否则你们会遭到损害。”

“你们做了，目的对，手段不对不要紧，如铁道部群众把吕正操送到一个地方去，想从他身上挤材料，而他也想借此机会休息一下，其次目的想见我，我不能接见，已和铁道部革命派谈过几次。

现在出现坏人，把我们的人揪去，没有消息了。1 月 18 日，天津市召开机关干部大会，传达中央指示，下午 5 点半散会后，‘天津工农学和荣复转退军人战斗兵团’的人，一拥而上，将 5 个书记全部抓走，加上过去抓的一个共 6 个。

全国荣复转退军人绝大多数是好的，……但去年有一个风气，要成立全国性的‘荣誉转业军人委员会’，我当时说成立全国性的不合适，在地方成立一个联络站还可以，可设在民政部，在南京发现他们把各单位的转业军人都吸收了，甚至还吸收了一些社会上自称是转业军人的人参加组织，这就使情况复杂起来了。毛主席和林彪副主席有三条批示，不赞成成立全国性组织，当时有谣言，怀疑这是假的，我曾与来京请愿的代表谈过话，证实主席批示是真的。确实有人想利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荣誉。我也是一个老转业军人，成立全国性组织我不赞成，现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国联系，还是靠串联。要成立全国性组织还早，在 22 日广播

大会上也说了这一点。夺权要一个一个单位夺权，逐步发展到全国，只有铁路部门的这个时间要短。至于各单位抽人出来，参加全国性组织，尤其是复员军人一类的，是不利的，会被坏人利用，如‘中国红旗军’吸收转业军人参加就是一例，最近在长沙，杭州，贵州等地破获了一些反动组织，都有一部分自称转业军人的混在里头，鱼目混珠，糟蹋了转业军人的荣誉。天津的‘荣复转退军人战斗兵团’，社会舆论是不赞成的，他们加上了‘工农学’的名称。改名后，市委和社会上不承认它，一些活动也不吸收他们参加，他们很孤立，进行秘密活动，偷听电话，到处探听消息。采访消息可以光明正大，公开来往吗。他们探听了市委 1 月 18 日在河西俱乐部开会，就准备了汽车，汽车也是抢来的，抢汽车不可提倡，不是艰苦朴素的作风。学校里也不要抢汽车，不要不服气。‘你们老爷们坐，我们也要坐。’老爷们可以不坐，你们也不要坐，不要学老爷们。”

“从红卫兵运动以来，我从来没批过钱，这种事管起来无穷烦恼，最后还要检讨。私人汽车交公是可以的，但个别红卫兵把缴获的自己坐就不对。”

“天津工农兵和荣复转退军人战斗兵团把市委书记拉走，用分隔监禁的办法，逼书记承认他们的组织，解决经费问题，几个书记都没同意，只有赵武成答应批给两辆汽车，4000 元。这个人很软，看他有油水，扣住不放，而其他书记放出来了，有些部长，司长就是不坚持原则，在强迫压力下签字，我看强迫压制下签的字，可以不算数。你们同意不同意？”

群众答：“同意！”

周恩来："我们要以理服人，不要强迫。宣传车大喇叭不是北京的产品，是哈尔滨'88 团'带来的，围绕中南海转，神经衰弱的人睡不好觉，我希望各政府部门造反派不用这个办法。"

"被扣的天津几个书记从 18 日到 24 日，8 天时间中，转移了 6 个地方，……3 个书记押在一个偏僻地方的小楼里，内外有三道岗，大门外楼内外都有人看守，连报纸都不给看，只写检查，这不是个别现象，是带有普遍性。我们做一个无产阶级的革命家，不应这样，这样对后代不利，决不能使我们的子女学美国三 K 党的行为。"

周恩来谈到"首都工作组"的事情。他说："关于首都工作组，是在彭、罗、陆、杨反党集团发现后，主席感到首都的保卫很重要，责成我来管这件事，组织了首都的工作组，由军委、公安部、国务院、中央办公厅和其他一些部门组成，任务：

1 、保卫中南海安全。

2 、保卫首都，增强卫戍力量。

3 、保卫要害部门，如：中南海，钓鱼台，国防部……等等。

4 、为保卫首都安全，把黑户口，五类分子搞走。

5 、处理外国侨民中一些不受欢迎的人。

以上五条，6 月初向主席汇报，主席对第四条原则上不太赞成，主席提出：把矛盾上交中央，中央怎么办；矛盾下放到公社没有土地，也不好办，交到其他省，是以邻为壑，还是自己消化。

这个指示，我已通知首都工作组，但用工作人员的问题和当时红卫兵运动的迅速发展，有的单位没有传达下去，现在各单位在查封'黑材料'中，如发现有那时的黑户口，五类分子名单，

要鉴别开来，封存起来。”

1 月 29 日，天津 66 军军事接管《天津日报》社。30 日，《天津日报》停刊，31 日复刊。

## 第 463 回：说铁路，提倡议保护古籍　发消息，北京支持王效禹

1 月 27 日晚上 23 时 15 分至 28 日早上 7 时，周恩来又在国务院中南海会议厅，用了近 8 个小时的时间，接见铁路系统各单位群众组织代表。他首先一个一个的点了铁道部机关各组织代表的名，当他问道："张茂来了吗？"

已经在铁道部夺了权的张茂还以为周恩来要表扬他，蹭的一下站起来大声说："报告总理，我来了。"

没想到周恩来批评他说："张茂，你好大的胆子，敢私自调动军队！""请铁道兵是完全错误的。矛盾增加了，使矛盾复杂化了。这件事应该让我知道嘛！……我命令铁道兵马上撤回。'东方红公社'签发的关于精简下放职工回原单位参加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通知是错误的，是把矛盾上交，应该取消。"

接着，周恩来说："张茂在夺权问题上犯了严重错误，必须认真检查。"

代表们高声喊道："必须在路消毒！"

周恩来说："张茂犯了严重的错误，我们其他同志要把工作负担起来嘛！我们 20 个革命机关造反组织先负起责任嘛！铁路运输一时一刻也不能停下来。"

他又说："权不能退回，也不能下放，也不能上交给我，交给我我也不接，要自己站起来嘛！

一、你们 20 人不要散了，选出 3 人集体办公，运输一时也不能停；

二、唐山铁道学院‘红旗’是卖了力气，但是最近的作法出了不少毛病，但大家还是不要排斥。手不要伸得太长了，都包了那就什么也做不好，最后必定走向反面。10 个学院至少要照顾嘛！兄弟院校阶级兄弟嘛！10 个手指头，按 10 个跳蚤，结果 1 个也抓不到。”

周恩来提起 1 月 13 日的誓师大会：“那天可以不打那个架，那天我还是支持你们了，我还是出去了。结果你们把吕正操拉下去了，搅乱了我的讲话。”

周恩来十分关心铁路运输的情况，他督促他们：“你们要成立一个业务小组，要值班，立刻就推选，保证业务不中断，我每分钟打电话都要有人，吵了架也要干革命嘛，不能吵了架就回家睡大觉的，要干就得像干革命的样子。干革命靠的是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统帅一切，每天要学毛著，半小时在一起学，学军训布置的。半小时认真学就不少了。以后部里各方面统统由你们管，部局长的罢官等都由你们定，对停职反省的要他们 6 小时工作，4 小时劳动，对他们就是要严点，把他们的油挤净，要不就养肥了，活的更长了。

刚才掉了一点，外来单位不要撤出，清华、北大、矿院、石油、工大、外院参加我们也欢迎和推选一个。

第二件事就是要筹备全国铁路系统革命造反筹备联络组织，那就是今天到会的人，还要扩大，部里算一个，17 个局也都要有代表，工程局、设计院、学院、外单位 7 个方面，一定要推动革命造反派，革命造反派还没起来，要派人去煽风点火，不过不能去多了。”

“第三、各机务段的机务人员，那么多人请病假，回母校串联是主要原因吗？”

众人答：“不是！主要是思想问题。”

周恩来：“靠你们组织人下去，动员动员，讲讲抓革命促生产的道理，小道理服从大道理，很快就动员起来嘛！

有很多路局，尤其××好多工人都要求回来闹革命，要负责说服他们，回去搞生产，各厂局、段要发出通令，国务院也要出通令，宣布吕正操以前出的错误通令都作废！

学生要组织小组下各段，动员司机上车，把生产搞上去，今天你们在这里也打架了，什么事都说了，说了就算了吗，回去再不要说了，再说就不是毛泽东思想的学生、战士了。

现在各地都在进行夺权斗争，你们这个组织最重要了，要跟大家讲清抓革命促生产的伟大意义。”

周恩来说的“这个组织”就是指“全国铁路交通系统革命造反筹备联络组”。

周恩来还对张茂说：“张茂要写一个检讨，承认你在这个夺权问题上犯了严重的错误，在全国电话广播会议上做检查。”

第二天，铁道部机关大院里就贴满了“打到张茂”的标语和大字报。

“破四旧”期间，对很多文物、书画、古籍破坏严重，戚本禹、关锋为此事专门向江青作了汇报，并得到康生、陈伯达的支持。江青报告了毛泽东，他对这种行为也十分不满，责成戚本禹召集有关部门开个座谈会，想办法制止这种行为。

1 月 27 日下午，戚本禹在全国政协礼堂三楼会议室召集北京

文博界和造纸厂 12 个单位造反派代表座谈，主要是研究红卫兵抄家抄出的古旧书处理办法。他首先说："陈伯达同志、康生同志有个意见，和大家商量一下。在文化大革命中抄了不少书，有的当废纸卖了，版本书不能造纸，要鉴别一下。文物管理工作要抓一下，看存在什么问题，提些什么办法。抄出不少东西，大家想个办法，大家研究一下。"

戚本禹开头语讲完后，让代表们谈谈有关具体情况。

中国书店代表反映："有些学校认为古旧书没有用了。建筑科学院满楼都是书，我们拉回了几车。住户有烧字画的。"

戚本禹问："为什么？"

回答："怕。"

新华书店代表说："旧书现在停售了，内部同志也有这个意见。地方上反映，县里烧书较多，八月份破四旧时烧了不少。"

北京造纸总厂代表说："古旧书现在收了一部分，有些已经造了纸。大部分还没造纸。但这些古旧书都当成原料了。"

戚本禹听到这里，插话："问题很严重。"

接着，北京图书馆代表反映了类似情况："北京图书馆清理了书库，送造纸厂的不少。"

中国书店代表埋怨："现在没人买旧书，不敢收购。"

戚本禹对此不以为然，表示："我就要去买，有些书需要看。当然这些书不要大量到群众中去。你们造反派也不赞成烧书。你们可以搞个倡议，线装书不要烧，你们看怎么办？有的书可以低价收购，低价售出。搞文科的要看这些书。将来可以内部发行。少数人要搞这些东西。不论哪个阶级起来造反，都要拿这些东西

在制造舆论。”

在谈到历史上秦始皇焚书时，戚本禹他原则上肯定秦始皇焚书，但做法上表示不赞成。他说：“秦始皇焚书是有道理的，商鞅也焚过书，他代表新生产力么！他是为了统一思想。他们当时不懂得批判。我们无产阶级不能这么办。要批判才能解决问题。”

戚本禹在座谈中表达了这样一种想法，即大多数人不能看这些书，只有少数人可以看。他说：“有的书广大青年是不需要看的。”“一个青年读这些古书干什么？广大群众不看那些古东西是个大解放。但少部分人要看这些东西。研究历史可以看。这是为了批判，为了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发展科学，不是为了吹捧这些东西。过去经史子集是每个知识分子都读，这是套在我们头上的枷锁。现在不读这些东西是大解放。搞理工的读它干什么。”

他对中国书店说：“有些古书一部几百册，今后大批印不可能，还是要收下来。收书没有地方放，我给解决。图书馆送给你你就要。”

又对北京图书馆的指示：“北京图书馆的书是国家财产，任何人不许动，这是群众的财产嘛！”

同时向北京造纸总厂等单位建议道：“你们造纸单位可联合开个会，历史研究所、文物局、北京图书馆、中国书店、科学院图书馆出人帮助搞。”“阿英的书封着，告诉他们不要动。”“不管是哪一派，都要执行。”还说：“解放后出版的书也不要烧。有的印数不多，需要保存。无聊的可以销毁。批判黄色的书找不到书也不行。”

戚本禹最后说：“你们搞个倡议给我们看看。难处理的，可以

搞个单子。”

他对倡议的具体内容作了明确指示：“你们倡议要写破四旧。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烧些书是革命行动！恨起来一把火烧了，但是不能解决问题。所以不能再烧了。过去这点损失是不可避免的。要看到大成绩。倡议要把主流写出来。烧了不能触及灵魂，要批判，要化毒草为肥料。”

他进一步表示：古物、古书画有的集中起来。我是不赞成烧的，真的烧了就烧了，没什么了不起，要想开一点，以后要保护。红卫兵抄了多少，放在哪里调查一下，写个报告。古书画、古物先集中保管起来，这是全国性的。这些东西将来归故宫，归历史博物馆保管。地方上的东西不少，要送文物局选，抄家的文物要管起来。有的可交文物商店。东西不要落入个人手中。一切交回国家。文物局、故宫博物院、中国历史博物馆共同搞。这些事明天就组织搞。不管是哪一派都要管。第一、图书鉴别；第二、文物保管；第三、不要烧。

戚本禹的讲话公开发表后，日本通讯社很快作了报道，接着其他国家也有报道。毛泽东从《参考消息》上看到这些报道后，很高兴，肯定了戚本禹的讲话和提出的办法，说这些做法都是对的。

根据戚本禹的指示，19 天后，这 12 个单位的造反派联合向全国红卫兵和造反派发出《关于保护古旧书刊、字画的倡议书》，号召“红卫兵和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同志们，立即行动起来，加强对古旧书刊、字画、文献史料的保护工作”；“全国大中城市原古旧书刊的收购部门，应该恢复收购，限制流通；全国各地图书馆、

文化馆以及机关、团体、学校等单位所存古旧书刊、字画、文献史料，在未鉴别前，暂行封存，不得随意处理；各造纸厂收到的古旧书刊、字画、文献史料，要暂行封存，妥善保管，与当地有关部门革命造反派共同鉴别处理；”“个人所藏古旧书刊、字画、文献史料亦不得随意销毁。个人交售、捐献的古旧书刊、字画、文献史料，各有关部门应该欢迎、收购。”

青岛“122 夺权”时发布的《第一号通令》中的第 2 条要求：“前青岛市委书记、常委、委员、各部委负责人，前青岛市市长、副市长、各局局长、处长，自本通令公布日起三日内，向本委员会报到，听候处理。”

当时青岛市委常委中有 3 位驻青岛部队的负责人，他们是：北海舰队第二政委卢仁灿，67 军政委陈继德，青岛市武装部长何传修。

北海舰队第二政委卢仁灿不清楚夺权的情况，对这份《通令》没有理会。他不仅没去造反派那里报到，1 月 23 日还对舰队机关少数准备上街支持夺权的人员表示：不要上街游行，不要写支持的标语。

67 军的陈继德，根据 1 月 23 日中央发出的军队支左文件，说服军长李水清，于 1 月 25 日按照《通令》的要求自觉前去报到。负责登记的工人造反派于景瑞，根本不知道青岛市委中还有军人常委。当他看到一位驻青岛的军队领导干部前来登记，真有些受宠若惊。

王力把青岛的情况向林彪作了汇报。

1 月 27 日晚，中央召开会议，承认王效禹在青岛组织的夺权。

当晚，关锋的电话打到王效禹家中，刘崇玉先接的电话，马上叫来老公。关锋在电话中告知王效禹,中央已承认青岛的“122 夺权”。

毛泽东批准了青岛市的夺权,林彪直接指示驻青岛部队要支持青岛市的夺权。27 日深夜，军委叶剑英发出电报，要求驻青岛部队支持王效禹。

命令首先下达到济南军区。

当晚 22 时左右，青岛 67 军作战值班室接到全军文革小组打来的电话，正在值班的副军长齐威接的电话。全军文革小组下达三条指示，提到可以调动部队武装游行，支持青岛夺权。

67 军军长李水清得知消息，立即从家中赶回军部，给军委负责人打电话询问，得到肯定答复后，他又让政委陈继德给正在北京开会的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得志打电话汇报。杨得志说，中央是刚开过碰头会。

于是，67 军连夜派人到王效禹家中，把他请到位于武定路的 67 军军部礼堂，这里正在召开师以上干部会议。王效禹等人到后，立即被请到会议主席台上，有位军人喊了声“起立！”，全场站起，67 军军长李水清上前报告：“奉叶剑英同志命令，67 军支持夺权！支持王效禹同志!”

王力电话通知蒯大富的首都“三司”，中央承认王效禹在青岛的夺权。首都三司知道“三司驻青联络站”是反对派，27 日 20 时多，发加急电报通知青岛的曹智水等人。紧接着又于当天午夜，直接从北京发电报给王效禹：“青岛市造反委员会及王效禹同志：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全体战士充分支持你们夺市

委的权，你们的行动好得很！一切站在你们对面反对你们的人都是极其错误的。祝你们夺取新的胜利！”电报发出时间 1967 年 1 月 28 日零时，明确表达了“三司”对青岛夺权的支持。

第二天，28 日，北海舰队也派出部队与 67 军一起在青岛市举行武装游行，支持“青岛市革命造反委员会”。67 军在武装游行前，部队列队完毕，军首长首先乘敞篷车举行了阅兵仪式。

同日 “青岛市革命造反委员会”公布《第三号通令》，号召抓革命、促生产，要节约闹革命，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发布的关于反对“经济主义”的通知。

1 月 29 日，他们又举行了“抓革命,促生产,粉碎反革命经济主义誓师大会”。王效禹和驻青岛的 67 军和海军北海舰队的领导分别在会上讲话,青岛海、陆驻军都表示“坚决支持青岛市革命造反委员会的革命行动,坚决站在革命造反派一边”。

1 月 29 日，山东《大众日报》报道青岛夺权。

1 月 29 日晚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青岛夺权的消息。

1 月 30 日,《人民日报》就青岛夺权发表社论《关键在于大联合》。社论赞扬青岛夺权“是继上海、山西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成功地夺权之后,毛泽东思想的又一次伟大胜利”;指出青岛夺权的经验“是多方面的,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实现了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的大联合”；号召一切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实现最广泛最紧密的大联合,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新胜利！”

这是全国第三个在《人民日报》上报道的夺权单位，也是唯一得到中央承认的市级夺权单位。《解放军报》30 日也刊登了此

消息。

## 第 464 回：下命令，中央军委定“八条”急部署，南京军区“四大”停

1 月 28 日，《人民日报》用红字标题登载毛主席《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一文，引导各群众组织“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克服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非组织观点、个人主义、流寇主义、盲动主义等资产阶级思潮。”

这天，叶群、陈伯达、江青和刘伯承、聂荣臻、徐向前、肖华，与总政所属单位就肖华的问题举行座谈。会上，叶群说：

“肖华同志以前在关键时刻都是紧跟毛主席的，肖华同志是属于毛主席司令部的。”

“罗瑞卿整了七包材料，罗瑞卿跳楼自杀时，把其它材料都烧光了，单把肖华同志的留下，转给彭真，彭真在被揭露出来以后，把几麻袋材料烧毁，也只留下关于肖华同志的材料。彭、罗、陆、杨都是很恨肖华同志的。”

在讲到罗荣恒时，叶群说：“虽然他死了，但他是反对学习毛主席著作的，梁必业是罗荣恒的人，肖华同志是与他们做斗争的。”“肖华同志过去搞了学习主席著作的经验，梁必业也不肯往下发，后来林总很生气，才发下去。”

讲到肖华所犯错误时，叶群说：“肖华同志以前在大节上是好的，是紧跟毛主席的，在小节上有问题。”“肖华同志主要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错误，已经滑到了危险的边缘，尤其在刘志坚被揪出来以后……肖华同志有错误可以批评，火烧，但要允许他改正错误。”

江青说："对肖华同志要烧而不焦。"并说："关于肖华的材料一律不准外传。"

叶群说："几个老帅每天只能工作二、三小时，都活不了几年了，大将中跟我们的身体都不好，身体好的又不跟我们，而上将又都在前线，选来选去只有肖华同志。""肖华不是降不降，而是应该升的问题。"

肖华最后表态，表示要检讨，并不断革命。

1 月 28 日晨，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碰头会，讨论中央军委"八条命令"稿。下午，在毛泽东处开会。然后，周恩来同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一起修改"军委八条"。

下午 17 时，林彪和徐向前一起去见毛泽东，将中央军委"八条命令"送毛泽东审批。

毛泽东看后，将第五条原稿中他加上的"今后右派冲击要抵制，左派冲击要欢迎"一句又修改为"对于冲击军事领导机关问题，要分别对待，过去如果是反革命冲击了，要追究。如果是左派冲击了，可以不予追究。今后则一律不许冲击。"并当场批示："所定八条，很好，照发。"

据说，林彪拿到批示后，对毛泽东说："主席，你批了这个文件，真是万岁！万岁！万万岁啊！"

林彪当天即签署命令，代表中央军委发出《中央军委八条命令》，即后来人们习惯所说的"军委八条"，全文如下：

《中央军委八条命令》

所定八条，很好，照发。

毛泽东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八日

根据毛主席的指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进入全面阶级斗争的新阶段，军队必须改变过去不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的规定。为了适应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发展的新形势，特规定如下：

一、必须坚决支持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争取和团结大多数，坚决反对右派，对那些证据确凿的反革命组织和反革命分子，坚决采取专政措施。

二、一切指战员、政治工作人员、勤务、医疗、科研和机要工作人员，必须坚守岗位，不得擅离职守。要抓革命，促战备、促工作、促生产。

三、军队内部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单位，应该实行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充分运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严格区分两类矛盾。不允许用对待敌人的方法来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不允许无命令自由抓人，不允许任意抄家、封门，不允许体罚和变相体罚，例如：戴高帽、挂黑牌、游街、罚跪，等等。认真提倡文斗，坚决反对武斗。

四、一切外出串连的院校师生、文艺团体、体工队、医院和军事工厂的职工等，应迅速返回本地区、本单位进行斗批改，把本单位被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篡夺的权夺回来，不要逗留在北京和其他地方。

五、对于冲击军事领导机关问题，要分别对待。过去如果是

反革命冲击了，要追究，如果是左派冲击了，可以不予追究。今后则一律不许冲击。

六、军队内战备系统和保密系统，不准冲击，不准串连。凡非文化革命的文件、档案和技术资料一概不得索取的抢劫。有关文化革命的资料，暂时封存，听候处理。

七、军以上机关应按规定分期分批进行文化大革命。军、师、团、营、连和军委指定的特殊单位，坚持采取正面教育的方针，以利于加强战备，保卫国防，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八、各级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用毛泽东思想严格管教子女，教育他们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认真与工农相结合，拜工农为师，参加劳动锻炼，改造世界观，争取作无产阶级革命派。干部子女如有违法乱纪行为，应该交给群众教育，严重的，交给公安和司法机关处理。

以上规定，从公布之日起，立即生效，全体指战员、院校师生、文艺团体、体工队、医院和军事工厂的职工同志，必须严格遵守，违者要受纪律处理。

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八日

这天，中央军委还发出《重申军区文化大革命分期分批进行的指示》：

一、军区的文化大革命，遵照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的指示，应分期分批进行。

二、目前全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进入全面阶级斗争的新阶段。中国人民解放军有积极支援革命左派和保卫文化大革命的任务。

三、帝、修、反正在加强反华，蠢蠢欲动，蒋匪也想乘机袭扰。因此处在反帝、反修第一线的军区（济南、南京、福州、广州、昆明、新疆）和有随时策应各军区任务的武汉军区的文化大革命运动，都应照前次指示暂缓进行，把自己稳定起来，以便支援地方文化大革命，保卫国防。何时开始，听候军委命令。

各军区开展文化大革命的情况究竟怎么样呢？我们先来看看南京军区的情况。

南京军区自许世友 1966 年 11 月 12 日在南京军区进行了文革动员后，各部门都贴出了大字报，但只是些鸡毛蒜皮的事情。两个多月过去了，南京军区机关一直动静不大，各级领导还在等待、观望。但是，上海“一月风暴”后，机关干部等不及了，1967 年元月 18 日，军区政治部宣传部的全体人员，自愿结合，分别成立了“只争朝夕”和“捍卫东”两个“战斗队”。南京军区《人民前线报》社也成立了一个“风雷激战斗队”。随后，其他各部门也纷纷成立了自己的“战斗队”。短短几天内，军区政治部大楼的前大厅四周墙壁，上上下下，都贴满了一张又一张大字报。有的以部门名义，有的是“战斗队”署名，也有个人写的。有些大字报颇有“气派”，从一层楼一直“糊”到四层楼上，可谓“壮观”。政治部大字报数量之多，居军区各机关之首。这些大字报上提的意见，很多早就聚蓄于群众之中了，只是没有机会讲出来，如今

党中央提供的“机会”来了，于是就爆发了。

这些大字报中，有许多是直接向军区领导“开炮”的，直呼领导的“尊姓大名”。有些胆大的甚至点了许世友的名，向许世友“开炮”！这样做，是要冒很大风险的。早有耳闻，许世友是“老虎屁股”摸不得的人物，过去给他提意见的人，倒大霉的屡见不鲜。但是，往往事情也怪，有些人偏偏不信邪、不怕鬼，“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明知许世友是不能碰的“老虎”，偏要碰一碰。这类大字报，保卫部副部长李树和特别派人跟踪登记，直接呈送许司令过目审查。

军区政治部有不少部长出面写了大字报。例如：政治部副秘书长孙海云、组织部副部长赵树湘，青年部副部长孟祥海等人，都给军区领导写了大字报。这种现象是过去少见的。

此时，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政治委员杜平，都在北京开会，南京的动态每天都报给他们，他们也不断给南京打电话，要求机关干部不要急躁，一定要服从命令。

1 月 24 日，南京军区政治部以宣传部、文化部和《人民前线报》社几个“战斗队”为主体，召开了第一次批判大会，在军区政治部二楼小礼堂举行。主持人是文化部干事方泽浦和南京军区机关报《人民前线报》社编辑高丕忠。出席大会的军区领导人有：副司令员王必成、副政委鲍先志，政治部主任王六生，政治部副主任史景班、符确坚。这些领导人也和地方领导一样，在主席台上站成一排，接受群众批判。

大会开始后 20 分钟，突然从外面闯进了几十人，自称是南京军区“三团两队”，即前线话剧团、歌剧团、歌舞团、军乐队、体

工队的造反派，还有北京南下的军内造反派。他们的头头冲上主席台，抢过话筒说："你们这叫什么批判大会呀！太温和了，一点火药味都没有。革命是一场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不是请客吃饭，不是逛马路"。

接着，他们强令王必成、鲍先志等诸位老将"低头"、"弯腰"、"请罪"，会场顿时一片哗然。

这时有人甚至强令老将们跪下接受批判。老将们当然不服，他们就动手迫使老将们"跪下"。面对这种羞辱领导人的行径，政治部许多人纷纷站起离开会场，以示不满。这件事成为"轰动性"的新闻。

这次批判大会后的第三天，即 1 月 26 日，南京军区后勤部军械部一些人串联了后勤司令部、政治部、运输部、油料部、物资部等单位，也自行召开群众大会，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要求后勤部领导澄清问题。大会由军械部王家恩主持，被请到会场的后勤部领导有郭金林政委、钟贤文副部长等。大会设在后勤部办公大楼前面广场上，人群密集，气氛热烈，声势很大，"打倒刘邓陶"之类的口号此起彼伏，住在大院里的部队家属们也参加了。

会上，群众要求郭金林政委，钟贤文副部长回答群众提出的问题。这两位首长，没有满足群众的要求，对大会召开也没有表态支持，于是引起与会人员愤慨和不满。在一片喧闹声中，部分群众要求给郭金林政委，钟贤文副部长戴高帽子并要求他俩下跪。主持大会的王家恩应台下群众要求，命令首长下跪，旋即站起，继续接受群众批斗。各业务部部长也都被勒令到会，站立两旁陪斗。大会群众要求到会的这些领导戴高帽子游街，运输部周乃馨

出来打圆场，劝说群众改为游办公大楼。结果，钟贤文副部长被迫游了办公大楼。

1 月 28 日，正在北京开会的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见到中央军委的《八条命令》和关于南京军区暂缓开展“四大”的指示后，片刻都不耽搁，立即吩咐给南京军区打电话，让在家主持工作的领导迅速传达贯彻。

真巧得很，就在许世友打电话到南京军区时，南京那边，张才千副司令正在司令部接待室接见南京“红总”和“八二七”的代表。造反派的脾气忒冲，其中一人把事先准备好的纸糊高帽子一下就扣在了张才千头上，说：“不支持革命行动就是大军阀。”

许司令的老秘书、当时负责军区机关警卫任务的魏金山团长赶忙进来，想给张才千解围。这时有人问他：

“你是魏团长吗？”

“是。”魏金山答。

话音未落，另一顶高帽子又扣到魏金山头上，说他是“保皇派”。

就在这时，魏金山一眼瞥见跟进来的警卫员正在伸手摸枪，赶忙使眼色制止。

恰在此时，军区党委秘书拿着电话记录稿匆匆赶到。

张才千接过电话记录一看，顿时精神陡长，摘下高帽子一摔，正色宣告：“伟大领袖毛主席批准军委发布《关于军以上领导机关文化大革命的几项规定》，你们今天的行为是错误的！”

几个地方造反派群众闻听此言面面相觑，刚才还是“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解放军首长，怎么忽然神气起来了？有个机灵

点的跑出去打了个电话，回来跟同伙咬了一阵耳朵。几个人换了一副面孔，连声说“对不起”，“感谢张副司令接见”，边检讨，边赶紧撤走了。

南京军区主持工作的王必成副司令，接到许世友的电话指示，要他对军区的那些组织开大会批斗首长，搞戴高帽子、下跪、游街的骨干分子执行纪律，全抓起来。素有“王老虎”之称的王必成犯愁了：“这么个天大的问题，不经过常委讨论怎么能行？”他又说：“真他妈的难办，要我在家里主持抓人！还叫我拿出虎劲来！”一句话才讲完，他霍地站起来，快步走向办公桌拿起内线电话直通北京。

“接京西，6楼18间！你是肖海吗？许司令在不在？”

“许、杜首长在小会议室，正在开会。”

“把电话给我转过去！”

“是！”党委办公室秘书科长肖海诚惶诚恐。

京西宾馆小会议室，一色的紫红丝绒小靠椅上坐满了人，正在开会。

“叶帅，这《八条命令》一定要坚决贯彻，抓几个人有什么了不起！杀他妈的两个也不碍事！”许世友对叶剑英说。

“群众运动你要正确对待，党纪、军纪要执行，但不能乱抓人，更不能给人家吃‘米子’，你要干你负责，我有话在先。”叶剑英严肃地回答。

“徐老总你表个态，你是军委文革组长，《八条命令》我双手拥护，不能放空炮，南京乱得一团糟，不抓人不行。我这个司令员讲话还算数不算数？打起仗来，你指挥还是我指挥？”许世友

又对徐向前说。

“总理有指示，不准在军队里抓人！你火气小点嘛！”徐向前同样严肃地批评了许世友。

“杜平同志，你是政治委员，你要帮助他（指许世友）掌舵，不要把车开到山沟里去！”叶剑英对杜平说。

“请叶帅、徐帅放心，我们不会越轨。”杜平用清脆而松软的湖南口音，规规矩矩地回答叶剑英元帅的嘱咐。

许世友在军委扩大会议上要求批准抓人，福州军区司令员韩先楚，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广州军区司令员黄永胜，都七嘴八舌表示赞同。

“许司令员，你的电话，南京来的。”一位年轻的女干部轻轻地报告。

“田崽子，你给我去接一下，又是老虎来讲情！他妈的，他手软怕死！”南京军区党委办公室主任徐玉田立即站起来，快步走出小会议室。

“王副司令，他正在发脾气，要我来接，你看行吗？”徐玉田小心翼翼的问道。

“不行，非要他来不可！”王必成不耐烦了。

“是！”徐玉田毕恭毕敬，他同样怕王必成。

“许司令，王副司令电话，……有要紧事请示你，非要你接不可。”徐玉田抖声抖气地说。

许世友听说“有要紧事情请示”，这才忽地站起来走进电话间，徐玉田也跟着进去。

“……你给我抓，通通抓起来！政治部那些乌龟王八秀才知

识分子，不老实的一起抓起来。什么政治工作，见他妈的鬼。叫司令部来接管政治部。”许世友在电话里给王必成打气。最后，他又加了一句，“王六生也是草包！”

王六生，南京军区政治部主任。

许世友接着说：“叫王蕴瑞、蒋科大胆干，一切我承担。”

王蕴瑞，南京军区司令部参谋长。蒋科，南京军区司令部军训部部长。

许世友又说，“部队不够用，从 60 军调。179 师不能动，从 181 师调。你不要手软。”

“什么？孙海云造反了？逮捕法办！一起抓！”

孙海云，南京军区政治部副秘书长。

“知识分子最坏，又尖又滑，不可靠。尾巴翘上天了，他们想戴乌纱帽，老子连草帽也不给他们戴，政治部瘫痪了，那就干脆取消政治部。什么政治部，通通抓，一个不留。”

南京军区党委办公室主任徐玉田告诉秘书科长肖海，叫他马上起草一份电报，发给军区所属师以上单位。用密码，等级核心机密，用党委的名义。要求师以上部队，接到电文后再以原电文发给南京军区党委，声援军区党委，保卫军区党委，保卫军区首长！要求镇压反革命！要大造舆论。他还特别问了一句：“明白了没有？”

“是！马上就办。”肖海回答。

许世友要求军区党委常委连夜学习《八条命令》，深刻领会，坚决执行，按照规定办事，特别强调军以下不搞“四大”。他斩钉截铁地说：“没有叫你搞‘四大’，你偏搞‘四大’，把你抓起来，

那有什么可说的！你为什么不听指挥？为什么不听命令？为什么要把部队搞乱？该抓的抓，该关的关，那有什么可说的!”

军区常委很快统一了思想，提出了一套行动方案：

对跳得高，闹得凶的人，抓一批，关一批，隔离审查；指定军区政治部保卫部副部长李树和等人具体负责抓人行动，指定军区司令部参谋长王蕴瑞、军训部长蒋科等人参加这次行动，并要求司令部接管政治部；军区党委由副司令员王必成坐阵指挥，直接负责组织实施。

把政治部领导的“三团两队”下放到各野战军，由部队代管搞正面教育。

责令《人民前线》报停刊。

拆散步兵学校，疏散人员，连同有造反倾向的军区机关干部，一律派往省军区、军分区和人武部去参加“三支两军”。

1 月 29 日，南京军区司、政、后机关除宣传部等先行单位继续开展“四大”外，其他部门都主动停止了“四大”，等待着党委的新部署。写大字报的人主动把大字报揭了下来。群情不再激昂了，人心不再浮动了。工作转入正常状态，司政后机关平静了。

对闹得凶、跳得高的群众组织和造反派，采取了硬性措施。军区机关和驻三省一市的所属部队共有 22 人被逮捕、8 人被开除、475 人被看管或隔离反省。南京市有 10 个群众造反组织被取缔，有 330 多个造反派头头被关押。所有被看管、被隔离、被关押的人都要写检讨，交代问题，向毛主席请罪。

## 第 465 回：围京西，周恩来出行受阻　批杨勇，不要再扩及他人

1 月 28 日下午，周恩来和叶剑英、聂荣臻正在京西宾馆开会，总参管理局一些群众组织为了向总参管理局施加压力，包围了京西宾馆，封锁出入口，甚至检查了阿尔巴尼亚军事代表团进出的车辆，致使在宾馆开会的周恩来、叶剑英、聂荣臻无法离开宾馆。王新亭副总参谋长严令宾馆领导出去做工作，让这些人撤走。但是，周恩来等人还是被困在京西宾馆一个半小时之久。当他赶到国务院会议厅接见北京军区造反派时，已经过了 29 日 0 时了。

1 月 29 日凌晨 1 时 05 分至 4 时 45 分，周恩来、徐向前在国务院会议厅接见北京军区战友文工团及机关的“燎原”、“新燎原”、“重上井冈山”、“火炬”、“革命青年”、“革命敢死队”等群众组织的代表。北京军区副司令员郑维山参加接见。接见前，周恩来指定要军区党委办公室秘书记录接见内容，郑维山让办公室秘书林国栋去了。

和大家一见面，周恩来就向大家介绍徐向前说：“徐副主席你们认识吧？他身体不好，和大家见面不多，可能不认识。”

这时，代表们纷纷递条子给周恩来。有人报告说：“外面还有军乐队的同志要见。”

周恩来说：“等一下，不要一起见，昨天我见过他们。”

“新燎原”的一个代表说：“总理不要看条子了。”

周恩来：“看看不怕，还是看看好，看看就清楚了。”

他接着说：“今天我和徐副主席来晚了，在京西宾馆被围住了

一个半小时。今天 28 日，不，29 日，这里的日历准得很，过 12 点就变。每次都是你们问我，今天我问你们几个题目。”

周恩来一边看接见名单，逐个认识，一边说：“名目繁多。天下大事，合久必分，我看也分久必合，但不是封建的走马灯，如果是螺旋形的，那是合乎辩证法的。

‘重上井冈山’，你们原来到井冈山来！我都不敢说重上井冈山。主席前年重上井冈山，写了诗，没发表，外边流传主席好多首诗，其中有几首是主席写的，不知怎样传出去了，很多人来问我。你们重上井冈山，另一个意思可能是打仗时要打游击的意思。”

“重上井冈山”的代表答：“是，我们是原来的‘满天红’，砸了另成立的。”

周恩来问：“谁砸的？”

答：“自己砸的，因为里面有保皇派。”

徐向前：“打仗不一定非上井冈山，革命到农村劳动 3 年，就很革命啦。”

周恩来：“在北京，上太行山就行了。战友文工团天津人多，是吧？《长征组歌》你们还唱不？”

答：“不唱了。”

周恩来：“为什么不唱？我还要放一段，找来放一段。我还是乐意听，欣赏欣赏有什么不好！肖主任作的嘛！不能因肖主任犯了点错误就否定一切，否定一切那不行！”

“燎原”一名代表说：“不是不唱，是全力投入文化大革命。”

周恩来：“那可以。贾士骏不敢讲话了，没有勇气啦？”

已经担任战友文工团领导的贾士骏说：“我是当权派。”

周恩来："啊！有了包袱，应该勇敢一些。"

徐向前："那要看是什么当权派。"

周恩来："肖主任经过长征，肖主任写的，我就唱。要一分为二，要分清两类矛盾。"

他转头问秘书："《解放军报》排版没有？叶副主席和肖华同志迎接巴卢库回来，不仅要发消息，而且还要登照片，林副主席当面向我交代的，我几乎忘了。林副主席嘱咐的，我负责，不怪你。"

他又问徐向前："那个贾士骏你见过吧？"

徐向前："我病多，见他们不多。我是个老粗。"

周恩来："唱革命歌曲，贾士骏是有贡献的。"

徐向前："应当大唱特唱。"

周恩来计算今天到会有几个组织。有人进来报告："文工团那5个人来了。"

周恩来："那就进来吧！"

郑维山："他们可能是来反映情况。"

这时，进来 6 个人，其中有马国光，还有清华"井冈山"刘慧奇。周恩来向他们介绍："这是徐副主席，认识吧？哦！不止5位，是6位"

刘慧奇："我是清华'井冈山'，'三司'的，我们在八大处那里住了几个人，鲍长康，总理认识，他也去了。"

这时，周恩来针对北京军区有这么多的群众组织问道："我先问你们一点事，为什么越分越细？"

没有人回答。周恩来指指王文浩，王文浩答："大方向不一致。"

“大方向不一致！？什么叫大方向？”周恩来问。

答：“分清敌我，矛头指向谁的问题。”

周恩来：“这是一个。你们是否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有不高举的吗？”

答：“没有。”

周恩来：“当然有的可能举得高，有的可能举得不高，总不能不举吧！这是一个大前提，全国如此，世界也如此。接受不接受毛主席和党中央的领导，或者是半接受，行不行？第二，是否按主席指示的走社会主义道路？”

大家回答：“是。”

周恩来：“不走社会主义道路，就走资本主义道路。这都是肯定的吧！第三，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按《十六条》办事，不能跳出《十六条》，另搞一套。这是总的。……”

王文浩：“有的人就讲《十六条》是框框。”

徐向前：“《十六条》也成框框了，那什么不是框框？”

“新燎原”贾全仪解释说：“他讲这话是指我，我没讲过……”

周恩来：“不要争了，他声明没有讲过就行了，我知道了，就不要再争。”

他指着“燎原”一代表问：“你说还有方向问题，是什么？”

“火炬”一代表讲：“有人讲要先扫清外围，不扫外围不能斗当权派，所以保皇派要清除，党团员没资格参加战斗组织。”

周恩来：“马国光你胆子大点，我刚才还讲到你唱《入云南》，那主要是主席的遵义会议后，第一个最大的战役，正好你来了，这是巧合。清华‘井冈山’在你们那里是观察员的身份？”

“井冈山”代表答：“我们也贴了大字报，他们有的组织想赶我们走。我们一到八大处就听到扫清外围的说法，一听很耳熟，这是王光美在清华搞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周恩来问了后来 6 人的组织名称，6 个组织报告了自己组织的总人数：“燎原”38 人，“新燎原”25 人，“重上井冈山”17 人，“星火”18 人，“火炬”7 人，“革命青年”5 人。接着说：“没参加战斗组织的还有 100 多人，是游击队。”

周恩来：“没参加组织的叫游击队！？就是散兵游勇嘛！游击队也要 3、5 人，梅花型。除这 6 个组织还有多少？”

答：“有 20 多个。”

周恩来问：“现在是合的多，还是分的多？”

答：“是合的趋势，有人认为，现在合还太早。”

周恩来问：“你们 6 个组织，那个是左、中、保守一点的？”

没人回答。对于这个问题，大家在心里都想回答自己是左派。

周恩来接着说：“还是在运动中考验，你们自己都认为自己是左派，是吗？”

众人齐声说：“是！”

声音洪亮。

徐向前问：“以什么证明你们是左派？”

周恩来说：“他们做了几件事。第一，大斗廖汉生，抄廖汉生的家，这是一件；和军区大楼串联，后来发生分裂。”

郑维山插话说：“抓廖汉生后就分了。”

有人问：“为什么要揪出杨勇……最近军区出了这么多事，是有阴谋的……”

周恩来接着讲："你们得了肖华同志的消息，要捉肖华同志，后来转向杨勇，这以后就扩大了，连郑维山都不信了，政治部一个组织扣郑维山，你们参加了没有？"

有人回答："没有。"

"新燎原"的一个代表说："捉杨勇我们也没去。"

周恩来："没抄杨勇的家吧？"

有人说："那是机关捉的、抄的。"

郑维山答："没抄。"

对于抄杨勇的家，郑维山没有布置，所以不知情。实际上，在抓杨勇的那一天，杨勇的家已经被军区机关的造反派抄了。

周恩来："除去郑维山，其他副司令员、副政委还有没有被扣的？"

答："有张南生、吴岱、吴先恩。"

周恩来拿个小本子一一记下："岱是一个代字下面一个山吧？他兼没兼副政委？"

一个带着红袖标的青年干脆地回答："没有。斗他们 3 人是按三反分子斗的。"

"新燎原"一人说："那个会不严肃，让步校给砸了。"

周恩来接着问："我问你们，要不要继续扩大下去？"

依然是沉默……"燎原"有人答："不应扩大，要用材料说话。"

这时，周恩来出去接电话。

徐向前："扩大，我听说北京军区常委要一个一个来。"

"燎原"一代表说："我们不同意，那是秘书处一个组织的意见。"

郑维山："开始有个意见，要把副参谋长、副主任都扣起来。"

这时，周恩来接完电话走了进来，"燎原"有人递条子给他，并说："这是昨天张正光副主任传达郑副司令员的三点意见。"

"新燎原"的代表说："我认为这三条有问题。"

郑维山解释说："我讲的三条，一是要集中火力对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牛鬼蛇神，不要群众斗群众；二是群众有意见可以辩论，不要武斗；三是群众之间不要扣人，不要互相搜家。这是个意见，要大家考虑。"

"燎原"代表："我们拥护这三条。"

周恩来："明天军委要发个八条，先向你们打个招呼。过去说错话不要追，不要算老账；第二，军委八条不能一下理解，要说明，要解释，不然凭意气还行？大风浪中喝几口水不要笑他，我胳臂受伤，下水游泳，要喝水的，你看到不拉我，那不是阶级感情，要拉他一把。"

"新燎原"一人说："有人可能还给一棒子。"

周恩来："给一棒子那是另一种人，另一性质。"

有人讲："私设公堂在礼堂地下室把我们打成反革命，把非编工人调来，……"

周恩来说："够了，说个事实就行了。"

周恩来说："徐副主席身体不好，还要休息，他已瞌睡了。现在和你们谈个事。北京军区有个'卫东彪'战斗队吗？"

答："有，防化部的，后勤还有一个是物资部的，报社一个'卫东'，干部部一个'卫东'。"

周恩来接着问："我想打听，你们还有没有叫这个名字的，还

有个叫张红军的？”

答：“没听说过。”

有人说好像听说过有这么个名字。

周恩来：“27 日下午 6 点半，他直接给林副主席办公室打电话，说明他掌握林副主席的电话号码，他说：‘我们是‘卫东彪战斗队’，我们坚决要求罢三反分子杨勇的官，他是彭德怀、彭真、罗瑞卿分子，一贯反对毛主席，反对林副主席。’他给下了结论：‘这样的人必须罢官，廖汉生是贺龙的忠实走狗，我们也强烈要求罢他的官。’他对廖汉生只讲了这么一条，然后就下了哀的美敦书说：‘我们希望两天之内罢他的官，现在是 27 日下午 6 点半，如果在 29 日下午 6 点半还不罢他的官，我们就要集合我们的战斗组织所有的人到林副主席的家里来，林副主席的家我们是知道的。’对我们副主席、副统帅下最后通牒，这是一种威胁。下面他又说：‘我们坚决要求罢他们的官，因为我们知道林副主席是很英明的，对他们这两个人也很了解，所以这个问题就很容易解决。我们就说这些，不再谈了。’接电话的同志问他叫什么名字，他说我们是战斗组织，不要记我的名字，接电话的同志说你不告诉名字，无法报告首长，他才告诉叫张红军。这个名字是否是真的，是北京军区那部分的，是不是北京军区的？我们想找这个同志谈谈，开导开导他。我叫郑维山同志找了一下午没找到，请同志们帮助找一找。这样就带来三个问题。

一、为什么用战斗组织的名字，而不用真名字，给林副主席打电话，还要保密呢？这是一种风气，不把自己的名字写出来。你们不同，是拿了自己的名字来的，来了要填个名字，我建议全

军文革也这么办，填个名字，你们闹革命，怎么隐瞒呢？不应用假名，这是对反动派的办法，对本阶级领导人，名字都不敢讲是不妥当的，不能用这个办法对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身边的人。这样我们在明处，你们在暗处。为什么见你们几个，上次见了，这次还叫你们，如要组织来，来一次他就换人，每次都有区别。这种办法不是对付人民内部的办法，贴大字报也是这个办法，怕报复，可原谅你们。对负责同志用这个办法不好，这样思想见不了面，不能抓活思想嘛！

二、这种秘密方法，易被坏人利用，钻空子。利用你们的名字，如‘卫东’，他就可冒充、利用。

三、电话上随口讲一个张红军的名字显然是假的。

根据这三条，对群众对上面，都不能隐瞒，所作所为不能弄假。现在要你们打听一下。另外对问题本身讲讲。

不管任何一个人民，一个战士，有权向林副主席提议罢杨勇、廖汉生的官，只是方式值得考虑。这种方式没法找到他，找的目的不是要怎么他，是借题谈谈，找来开导开导他，估计不易找到。所以毛主席、林副主席要我俩找大家谈谈，只是他的方式不好，你们不要去贴大字报说要冲林副主席住地，这样一搞，好象要追究这个人，你们之间也可能互相猜，打起来，只是提醒这个方式不好。今天来，只是讲不必去冲，可以谈谈，如果有这个人，他听到了就不要冲了。”

“廖汉生和杨勇的问题，要批深批透，由大家先揭发，不仅是军区大院内，北京是个大军区，又在首都，下面这么多部队，这么严重的错误，下面不理解，有人会问的。8 号贴出廖汉生的

大字报，才 20 多天；杨勇是 21 日才揪出来，时间这么短。当然有些人弄不清，首先要在军区范围内，知道他们错在什么地方，要揭深揭透，不急于罢官，这是主席一贯的方针。对各部、各省都如此。现在知道廖汉生在北京军区一向不突出政治，不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不宣传毛泽东思想，不按林副主席指示办事，不贯彻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三八作风，……”

## 第 466 回：苦口劝，反复再批刘志坚　命令到，北京军区“四大”停

周恩来又出去接电话，徐向前接着说：“你们（指文体单位）是专门闹革命，机关是抓革命，促生产，要一面革命一面工作，主要是闹革命。你们要坚持文斗，反对武斗，要摆事实讲道理。斗争总是不平衡的。你们现在主张怎么革命？”

“新燎原”一代表答：“我们主张揪出幕后人，不仅保卫部，上面还有线，扶植一方，压制我们一方。批判反动路线，才能斗批当权派。”

徐向前问：“你们认为斗杨勇、廖汉生到时候没有？”

“没有。”有人说。

“没到，什么时候到？”徐向前站起来：“你们认为阻力是什么？”

“爪牙没抓出来。” 一个梳着大辫子的女青年干练地指出。

徐向前说：“你们的观点是根本错误的，你们这样搞会把打击面扩大，杨勇、廖汉生这样的活老虎毛没拔一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多得很，刘、邓路线，刘志坚……。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是少数。凡是斗群众，凡是犯过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错误的，都是斗争目标？那个军区那个部队没执行过。为什么对杨勇、廖汉生你们斗过几次？我劝你们把廖汉生斗斗，杨勇是个什么东西，斗斗去。我非常不同意你们的做法，你们不斗杨勇、廖汉生，要去抓郑维山，造郑维山的反！方向错了。你们造反，对！造什么反？要狠造杨勇、廖汉生的反，这个反不造，你们要扩大，就会

扩大到你自己头上，如都搞成杨勇、廖汉生的爪牙、走狗，这就不得了啊！要集中火力。一个是对杨勇、廖汉生要斗垮、斗臭、烧焦；一个是团结到批评到团结，不要打击自己的朋友，我和你们商量研究，革命不容易，不能分散火力，我看你们要好好的学习《十六条》。革命怎么革，革谁，革命的目标都不知道你们革谁的命？放着老虎不打，硬拉自己的朋友！如果让我参加你们的‘新燎原’、‘星火’，我不参加。”

“火炬”代表说：“如果这样，大方向一致，就团结一起干。”

徐向前：“放着活老虎一毛不拔，还到处去找，究竟有多少老虎？要打多少老虎？”

马国光：“就因为这个说我们是铁杆保皇。”

周恩来走进来，听见马国光这么讲，他说：“我最不喜欢‘铁杆’两字。”

徐向前：“杨勇、廖汉生放在那不斗！我保郑维山，我不成了保皇派，保皇就要斗，斗我时，下面还有很多人，有秘书、司机、警卫员……等，结果那中国没有好人啦。……‘星火’、‘新燎原’这个方法不对。”

周恩来：“廖汉生和贺龙的关系，跟的很紧。如果他政治上很强，几个老帅就会帮助他。我们原来对他抱有希望，所以中央提拔他，任国防部副部长，北京军区政委，中央候补委员等职务，很信任他，但他没起好作用，竟向相反方向发展。”

徐向前：“搞独立王国。”

周恩来：“例子很多，比如，主席接见红卫兵，照片很多，为什么北京军区印的画页要加上贺龙的，贺龙就那么一次嘛！主席、

林副主席的照片很多，为什么不用？这是对林副主席不尊重。”

徐向前：“政治局会议，林副主席关于夺权斗争防止政变的讲话，他不传达，只传达刘、邓和其他人的，企图何在？你们好好想想，你们去调查研究，我说你们目标搞错了，不然，走下去错误更大。你们可以去作详细调查。”

周恩来：“为什么揪出杨勇，他在北京多年，从不到林副主席那去汇报，这也是出乎意料之外，廖汉生封锁林副主席，杨勇也封锁林副主席。当然杨勇也揭了点廖汉生的问题。你们问我时方法也有问题，你们把郑维山与杨勇并提，我只能讲他们是好同志，这个话我讲过。我要守纪律，你要问，陶铸你也讲过，那是有人讲他是四号人物，这个不对，怎么能说几号人物？政治局一改选，国务院北门就有人贴他的大字报，是私人有意见，那时我只能说信任他，没有了解他现在这么多材料。杨勇也是这样，不能讲，讲了等于小广播。那么郑维山是不是这样，郑维山我们一直信赖，不是他组织几次接见，我们还会犯很多错误，经常下半夜决定接见，上百万的人，八个小时全出来检阅，工作那样紧张，没有对毛主席无限热爱无限忠诚是不可能的。

刘志坚问题揭出来，他在总部，在总政，肖华同志有责任，他只发现一部分。现在小青年一动，好就绝对好，不好就一棍子打死，中学生可以这样，你们是大学水平！再不提醒你们，我们就要犯错误，你们不能把党内的坏作风学去。”

“肖华同志犯错误，是内部矛盾，解放军建军他是有功的，他是个红小鬼上来作总政主任的，养病几年，刚回来工作，有错误主要作批评与自我批评，不能一棍子打死，肖华与刘志坚不同。

刘志坚64年在广东参加调查大比武冲击政治，那主要是叶群同志的功劳，林副主席得到第一手材料，提出突出政治，所以重用他，才有65年底到66年初的文艺座谈会，那个座谈会，实际上是江青同志主持，是她的功劳，刘志坚是召集人，当然也有刘志坚一份。让他任全军文革组长，他就骄傲，把自己的缺点放松，对全军文革和中央文革，他两头推，军委文革找他，他说中央文革有事，中央文革找他，他说军委文革有事，特别是冲国防部大楼那次，他应去，不去，我过问时，他还没去，结果其他人去解决不了，越挤越多，天亮了他还不去，越挤越凶，他把老帅请去开会想办法，伯达同志让张春桥、戚本禹去，去就解决了，他如果早去早就解决了。两条路线提出来，《红旗》发表社论，主席接见，林副主席讲话，军委紧急指示发了，问题本来解决了，他11月还把老帅推向一线讲话，不需要嘛，他片面反映情况，只反映阴暗面，接见军队院校学生，连我也拉去奉陪，我那时忙的不行，只是转一圈。他说在天安门上看不清，还不是去了。他们讲话，讲的什么就不晓得，实际上是他制造圈套。他本身思想右，所以偏右。他本身过去有问题，投靠张国焘；和李伯钊演反毛主席的戏；抗战时被捕，那时是王任重管他。在钓鱼台他和王任重一起，不揭发王任重。他个人主义极重，他支持一司，他女儿在一司，三司他就不去。”

郑维山：“我拉他才去了一次。”

周恩来：“你拉他才去一次。全军文革是直属军委的，他放在总政以下，由他管，不是对军委负责。这个人够三反分子。这时杨勇出个主意，把矛头对向肖华同志，这完全是错误的，搞的一

部分人，有北京军区文工团，总政文工团，爬门进去到肖华同志家里把东西拿出来，送给我，我怎么能收？”

马国光：“还有海军文工团，不要他们去，偏要去。”

“肖华同志的爱人给叶群打了几次电话。她也是个红小鬼。这是个大方向问题，说明杨勇要把水搞混，他自己可以逃脱。他和刘志坚有关系。我就怀疑抓廖汉生是他有布置的，你们很谨慎，来问我，你们应当揭。”

贾全仪等几个人说：“是他布置的。”

郑维山：“这是个阴谋，他不揭发廖汉生的问题，王尚荣问题出来后，一天他问我，我无意讲了王有后台，他马上跑到杨代总长那里，要揭发廖汉生，要见林副主席，杨代总长问我，我才知道。”

周恩来：“他总是不到林副主席那去，在这个情况下才去。他告诉你们，来试探我们，我们察觉，是否他来考察我们的态度，他有意把郑维山同志拖到一起。”

有人讲：“他是摸底了，第二天找我们，问我们信不信得过他。”

周恩来：“那次，你们一走，我就打电话找他，就在这个小屋，你们许多同志到过这个小屋，有一刻多钟找不到他，总机讲，他在一个小屋，没有电话，找不到他。一个大军区司令，找个没电话的地方躲起来，”

郑维山：“后来我知道他在空军找个房子躲起来，心里没鬼躲什么？”

有人讲：“据我们知道，出廖汉生那张大字报就是杨勇搞的鬼。”

徐向前："是唐平铸……"

郑维山："他们要求贴大字报，不告诉杨勇，告诉我，要我通知西山，我过去和他们都不熟。"

周恩来："唐平铸、胡痴、何同叶这些人是太行的。宋琼不是。"

马国光："当时周广祥怀疑是杨勇搞的鬼，就被打成反革命了。"

"新燎原"贾全仪："这个话我说的，他当时说不能斗廖汉生，要等中央讲话……"

徐向前："讲清就行了。"

周恩来："杨勇要转移目标。怎么传的那么急。一下子传到东北，东北军区政治部一下子就贴出大字报，围攻陈锡联。有些人坚决要保护，陈锡联是中央决定的，肖华同志代表去讲的。"

当时沈阳军区围攻陈锡联，中央军委派肖华前去沈阳做工作，保陈锡联。

徐向前："我到旅大，讲是军委确定的。"

周恩来："这一张大字报传到朝鲜，弄的他们很紧张，东北军区又出问题啦？一张传到福建，围攻韩先楚，大喇叭天天喊，不是传给敌人啦，动摇东南前线。同志们，你们想想！"

周恩来秘书过来汇报说："明天上午，科学院请总理去。"

周恩来："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做点工作就是不容易。你们也是知识分子不少的地方，你们要好好团结起来战斗。就拿杨勇这件事，这是指向谁的大事。杨勇是违法乱纪，他不报告中央，弄的一时很紧张，阶级斗争很复杂，把林副主席弄的很紧张。林副主席身体好起来了，我们很高兴。"

“现在军区郑维山同志负责，实际上是代理司令员。你们文工团一方面要搞好斗、批、改，你们还要保护机关。你们文工团600 多人，团结起来力量不小。你们做了几件好事嘛：你们演长征组歌，肖华同志一家和你们是有感情的，是无产阶级的感情。”

马国光：“那天我去他家，肖华同志的爱人是我捉的，我当时是保护她的，我们还给她念语录。”

“她是个红小鬼，不是敌我矛盾。”

马国光：“我们去是受骗，我们对肖华同志也是有感情的，把他家抄了。”

周恩来：“不应该抄，既然抄了也有好处，她也有点骄溜溜的，有娇骄二气。把东西翻出来，不要去展览。这样一个斗争，你们回去要宣传。体工队、杂技队，杂技队不是可以飞檐走壁嘛！要保卫军区，军区作战指挥不灵怎么行？”

“郑维山同志我们很信任他，现在他没办法，只好在城里设个小指挥所，这怎么行呢？应当保卫，要劝说机关的战斗组织，要养成好作风。不要随便抄家、封门、挂牌、戴高帽子，这对我们解放军是个污辱！这样做，你们将来犯了错误，也会这个样，所以工厂学去了就扯领章帽徽，解放军怎么能随便扯领章、帽徽，但群众要做，不要去责备，要创造新风气，要文斗，不要武斗。”

“你们不要主观划线，向上划个什么表，把廖汉生和肖华划到一起，那不把解放军的光荣历史全否定啦。如彭、黄、高、饶出在中央，能说中央都不好！？”

“解放军高级将领，出生入死，如果美国主义来了，我们不怕他现在就来，他来了，百分之九十九的将军还要上阵，反正你

们现在不能当将军，指挥不了嘛！”

徐向前：“当下级指挥官，还可以。也要学，也要锻炼。”

周恩来：“我讲完了。”

“火炬”一代表：“我提议，在总理面前，我们的大方向一致，新老燎原回去谈判一下，我们团结起来，一起干。”

“新燎原”：“我同意要团结起来。”接着下面他要讲清楚廖汉生家的材料和地图等问题。

郑维山：“现在不谈这些具体问题，总理很忙，总理讲的几条，大家都同意，要求同存异，慢慢协商，慢慢一致，今天是否谈到这里，总理还要接见别人，我们多让总理休息一会，好不好？”

大家说：“好！”

有人提问：“部队夺权问题怎么办？”

周恩来：“部队夺权交中央，明天中央军委要发个指示。”

有人提：“听说有人要揪谢镗忠。”

周恩来：“不要揪，他还在中央文革，揪太多了并不利。你可贴大字报，只要材料可靠。”

接见结束，周恩来与大家一一握手，他请徐向前先走。“星火”又有 6 个人进来，见到“燎原”的人就喊：“打我的人滚蛋！”接着朗读《毛主席语录》。

周恩来走过来一一同他们握手，让他们坐下，这时，周恩来的秘书几次请大家简单的谈，因为外面还有湖北工人要见周恩来，是原先没安排的，“希望大家多给总理留一点睡觉的时间。”

周恩来：“你是军乐队的？”

六个人开始诉说情况……

周恩来说："你们开始闯司令部，人家受委屈，现在你们多受了点委屈，要看大前提。杨勇、廖汉生是罪有应得，还有很多老将被罚跪，南京军区，许世友以下的，他们文工团都把他们拉出跪下，他们就跪，共产党员对待群众的态度，群众要跪嘛，俯首甘为孺子牛。你们青年人，我同情你们，我不乐意说同情话，说同情话对你们不利，你们掉泪，我不掉泪，打断胳膊的也有嘛，受这么点委屈就不行。韩先楚经过多少年战争，他带病躺在担架上出来，群众不骂他，他是在前线指挥的，担子多重！你们青年人受这点锻炼，正反两面，才能成材，不要那么气虎虎的。军区出这么多的事，是有阴谋的，今天揭露了杨勇搞的阴谋，安排抓廖汉生，抄了肖华同志的家，现在揭露出是杨勇搞的。现在要集中目标，要对杨勇、廖汉生挖的深，挖的透，再作结论。今天因为有这封信，我们奉命找大家来谈谈。主席在党内多次受委屈。三次离开红军。四次宣布开除党籍，一次作政委，开除党籍不能作政委，不行就作师长。"

"一次我也犯了错误，主席走时对我说，只要前方需要，打个电报我就回来，那是 32 年秋，我印象很深。只要组织决定，即是错了，不说一句怨言。主席领导我们，要我们做的，没有别的话好讲。我保了多少人，刘少奇、邓小平、王光美……在这住着，我还不是'保皇派'，我奉命'保'。你们作的都对，不要那样。郑维山没有阴谋，他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郑维山同志回去会做工作的，我委托文工团开个大会，请郑维山给你们做个报告。不要让外单位乱冲机关大院。"

"我已了解你们，我同情的话已讲了。'新燎原'、'重上井冈

山’的同志已听了，我不重复，要他们回去给你们传达。你们只有大方向一致，团结一致，才能把杨勇、廖汉生挖深挖透，才能把刘志坚的问题批倒批臭，不要扩大范围，你们方向就作对了。你们不要互相不让，马国光就很坦率。你们如果革命，大前提一致的，你们会把气平下来。”

有人问郑维山：“我们被拘留你知道不？行动有人监视，1 月 24 日调兵，一级战备，架机关枪你知道不？”

郑维山：“我事先不知道你们被拘留，知道后就要他们放你们。架没有架机关枪，可以调查嘛。”

周恩来：“你们斗郑维山，我就不见你们。这是为什么？是郑维山把你们找来见我，你们还这样，怪事！完全意气用事，你们斗郑维山，我就不见你们。你们当初冲机关，”

几个人讲：“我们没冲。”

周恩来：“你们那天晚上有很多疑点使人怀疑，我没宣布这个事。你们对郑维山同志这样气，就都对？我都作自我批评，你们就不作自我批评！对杨勇组织的抓廖汉生，试探党对他信任否，刚才这个同志揭发的，”周恩来指着指贾全仪说。

贾全仪肯定道：“是。”

周恩来继续说：“把郑维山与杨勇并提。杨勇散布肖华同志的问题，全国都轰动，全世界都轰动。”

很多人闻之惊讶，有人提出：“我们斗当权派，为什么对我们这样？”

周恩来反问道：“对当权派所有都是这样？我也是当权派。”

有人告状说：“我们打电话有人在总机旁偷听。”

周恩来："我的电话也有人偷听。"

有人争辩说："我们是造反派。"

周恩来不同意："你这个观点不对，对我的电话就可以偷听。我和新疆打电话有人偷听，不仅如此，我和昆明军区讲话，还有人录音。我懂这个，我讲话听不清，有杂音，我问他们，他们老实承认了，不能说谎。彭、罗、陆、杨还录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音，这绝不是小事。你们这点小事，郑维山同志会给解决的，他不解决我会督促他解决。"

还有人不依不饶，在那里告状。周恩来太累了，他说："我拿主席受委屈作比喻，你们还不理会？我一句也不多说了。"

根据中央军委的命令，北京军区机关的"四大"搞了 20 天，停下来了。

29 日，周恩来宣布：郑维山任北京军区代司令员，李雪峰兼任军区第一政委，陈先瑞为副政委中"牵头的"。

## 第 467 回：沙发后，青海上演空城计　一二九，西宁“八一八”夺权

1 月 29 日，青海省造反派也组织了夺权。

自 1966 年 8 月以后，随着大串联的兴起，外地来青海串连的红卫兵大批涌到西宁，他们听说了《青海日报》“六三社论”的事情。奇怪的是，所有这些外地红卫兵对青海的“六三社论”的看法是空前一致，都认为“六三社论”是正确的，青海省委对“六三社论”的批判，恰恰说明青海省委压制文化大革命，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这些年轻、单纯的红卫兵执拗而又不畏艰辛地奔波于北京、青海之间，向中央文革反映青海“六三社论”的问题。他们的汇报，得到康生、戚本禹充分肯定，康生和戚本禹说：“六三社论是革命文章”，并且说：“六三社论的作者是想革命、要革命的。”

中央文革的表态，使青海文革形势发生急剧变化。因为拥护“六三社论”而被打成的“黑帮”和“反革命”的群众纷纷起来造反，在青海又出现了一个大字报高潮，这次大字报的矛头直指青海省委。一拨一拨的红卫兵、工人再次涌进省委，大字报贴满省委大楼。这次不批大毒草了，是批省委。高呼“‘六三社论’好得很！”的高音喇叭汽车在省委门口从早到晚播放，一些外地中学红卫兵更是直呼青海省省长、青海省委第二书记王昭的大名，要他出来说话。《青海日报》成为关注焦点，每天都有红卫兵向省委报社工作组讨说法。

但是，已经很难在省委机关大搂找到主持日常工作的负责人

了，在这一汹涌浪潮下，报社工作组悄然撤退，省委常委楼基本上空了，就连省委门口的警卫岗哨也不知何时不见了。

一天，《青海日报》记者孙正荃去常委楼找省文革小组组长、省委常委、副省长韩明审稿子，只听外面一阵喧嚣。他从窗户往外一看，一群红卫兵已经进了大搂。孙正荃正要告诉韩明副省长，回头一看，只见这位领导竟然以少有的敏捷，嗖地一下躲到沙发后面去了！当小将们闯进办公室时，只见孙正荃一人独自坐在沙发上。他们向他打听：

“这屋里的人哪里去了？”

“刚才还有人见文革领导小组的人在，怎么一转眼就没人了？”

孙正荃说：“我是报社的，也是来找人的。”

学生们停了一、两分钟，便稀稀拉拉地朝外走了。孙正荃见人都走没了，才轻声喊道：“韩明同志，他们走了，真的，全走了。”

韩明从沙发底下爬了出来，孙正荃给他拍了拍身上的浮灰，说：“没惊着吧，快快坐下来休息休息。”

这时的西宁已是一片混乱，省、市机关也纷纷成立战斗队。打到省长王昭和原省委秘书长王仲方的大标语贴满了西宁的大街小巷。省、市领导被揪斗，王仲方家已反复被抄。

王仲方曾是罗瑞卿的秘书，从公安部调来青海任青海省委常委、政法领导小组组长、省委秘书长。文革初，本来已被任命为西北局办公厅主任了，因罗瑞卿的关系，不能到任，留在西宁，多次被戴高帽游街批斗，此时被勒令每天在常委楼清扫厕所和楼道。

《青海日报》在北京红卫兵帮助下，首先成立了“八一八红卫兵小组”。很快，青海就出现了各类“八一八红卫兵”组织。以达洛、刘明乾为首的青海大学“昆仑红旗”、以王中山为首的“八一八红卫兵”、以马集文、隆光前为首的“八一八工人造反团”等群众组织，旗帜鲜明地向青海省委挑战。那些已经是“反革命”的“六三社论”拥护派，纷纷成立战斗队，最后汇合成“青海省八一八革命造反总司令部”。

群众一股脑儿地倒向“八一八”，声势浩大的造反派形成了，过去拥护省委，反对“六三社论”的保守群众也纷纷倒戈。青海省中学红卫兵司令、第一个向“六三社论”开炮的西宁实验中学女学生李春荣也“反戈一击”。后来，她还和“六三社论”的起草人陈怡一起在青海省“八一八”驻北京联络站工作。一时间，西宁市迎来了第二次革命高潮。

刘明乾、王中山都是部队送到青海大学畜牧兽医学院兽医专业学习的现役军人，文革开始后，他们跟着其他学生，响应党中央的号召，以北大聂元梓为榜样，起来给学院党委写大字报，被工作组定为坏学生闹事，受到打击。此时，他们在外地红卫兵支持下起来造反。一个是“八一八”红卫兵司令，一个是“大联合”总司令。

青海是全国主要的劳改地，不少释放人员在当地就业。因此，许多文革之前挨整的人也加入“八一八”。按当时的标准，“八一八”组织人员成分复杂，有问题的比较多。例如“八一八”主要负责人、“八一八红卫兵战斗队总联络站”站长、青海著名造反派马集文，文革前就被劳动教养过。

保守群众多数是党团骨干，历次运动他们都是革别人命的，如今岂容乾坤倒转！于是，他们也揭竿而起，拉起队伍，最后汇合成“红卫兵总部”、“贫下中农红卫军”和“捍卫毛泽东思想战斗队”。“八一八”声称自己的“大方向始终正确”，保守派组织则高喊：“只许左派造反，不许右派翻天”。两派围绕着“六三社论”和平反、追“黑材料”，发生激烈冲突。从 10 月份开始，爆发了一连串大规模的武斗，如：10 月底的 136 厂事件、一二·五的大通桥头事件、一二·九的民和事件、一二·一四的毛纺厂事件……在不断升级的武斗中，两派群众积累了冲天的怨气，甚至是刻骨的仇恨。

青海省委书记杨植霖因为参加了中央文革小组，所以很快就转变了对“六三社论”的看法，并在省委传达了康生肯定“六三社论”的指示，坚决支持“八一八”。省长王昭则坚持认为“八一八”队伍不纯，支持“捍卫队”，即“捍卫毛泽东思想战斗队”。青海的群众组织分成了“八一八”和“捍卫队”两大派。青海省委因为对“八一八”和“捍卫队”的态度又出现了一、二把手杨植霖与王昭的两种意见。但是，在全国批判资反路线的大形势下，省委终于在 12 月 2 日做出“撤销关于《青海日报》6 月 3 日社论所犯错误的处理决定的声明”。

与此同时，随着刘少奇、邓小平被公开批判，大量的大字报陆续揭发出王昭与邓小平的问题：

1966 年 3 月，毛泽东召集杭州会议之际，邓小平正在三线视察。当时，他带着薄一波、刘澜涛、杨成武、贾拓夫等人到青海视察，主要是到核武器制造、实验基地 211 厂。

为了接待邓小平，王昭成立专门的班子，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包括每顿饭吃什么，都经过精心安排。他知道邓小平爱吃狗肉，于是要公安厅将一只警犬宰杀。他还事先指示玉树军分区派出两个班到高山打雪鸡。雪鸡生活在海拔 4000 米以上的雪山上，以高山雪莲为主要食物，营养丰富、味道鲜美。为了首长购物，他特地从全省各地调来贵重野生皮毛。邓小平原来是准备住在专列火车上的，不住西宁市。可是王昭多方请求，要他住到高锋当第一书记时盖的胜利公园宾馆。邓小平盛情难却，住到了胜利公园宾馆，并在张昭要求下，接见处以上干部，和他们合影留念。公安厅为确保安全，将宾馆服务人员全都换成公安人员，炊事人员也由公安人员在一旁密切监视。对每一个房间，每一件家具的摆放，王昭都要亲自检查。为邓小平住的房间那张床的摆放位置，就先后改了 3 次。为了突出政治，房间里摆什么书他也煞费苦心，最后决定放《毛选》四卷和《毛主席语录》。中央其他领导人的著作，只摆放了一本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

其实邓小平只住了一个晚上。他喜欢打麻将，哪会看书呀？不过，当时全国掀起学习毛泽东著作的高潮，王昭这样做是可以理解的。只是他把刘少奇的著作也放到房间里，如今成了造反派揪斗他的重要理由。可是当时他的后脑勺哪长眼呀？

邓小平在青海视察，极少说话，闷闷不乐。他到宾馆住下，不愿意动。而薄一波在刘澜涛等陪同下到 50 公里外的塔尔寺参观，由于道路不好，耽误了时间，没有按时回来。可是总书记不能不按时吃饭，于是就先开饭。领导虽然不多，但是随员不少，整整四桌。雪鸡好吃，吃完再上。一共只打了 3 只雪鸡，炊事员

不知道有人到塔尔寺去了，将做好的雪鸡统统上了。邓小平吃了雪鸡，赞美味道不错，却没有吃狗肉。等薄一波他们从塔尔寺回来后，王昭见没上雪鸡，几次大声喊："快上雪鸡！"可是哪里还有！负责接待的省委办公厅主任马万里悄悄告诉王昭，雪鸡吃完了。还是薄一波解了围，笑着说："总书记代我们尝了鲜就行了，我们吃狗肉。"

给首长准备的贵重皮毛等土特产品，邓小平根本没有心思买。不过北京来的工作人员倒是买了一些。

邓小平一行离开青海后，王昭就累病了，到外地治疗。青海的"六三社论"出来后，西北局领导刘澜涛叫王昭不要回青海了，安心在北京治病。但王昭没听刘澜涛的劝说，还是回到了西宁，处理了"六三社论"的相关人员。

随着文化大革命的深入，王昭接待邓小平的详细情况，都在大字报上贴出来了，说王昭为了接待邓小平一行，花了几万元，光招待吃饭费就花了 1 万多元，而每人只交了 1.65 元，加起来才几百元。尤其是派两个班兵力打猎 10 天，战士在高山上非常辛苦，有的人冻坏手脚。为了招待党内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邓小平和 61 个"叛徒"集团中的薄一波、刘澜涛，如此大动干戈，不惜花费民脂民膏，这说明王昭本人就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分子。有大字报说他"把伟大领袖毛主席和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著作放在一起，更是罪该万死！"

造反派把王昭关押起来，轮番批斗。一天晚上，王昭胳膊摔伤，向西北局请假，于 1967 年 1 月 2 日深夜，由警卫员苏太福用苏联嘎斯 69 吉普车载他离开西宁，经大通、祁连，翻越祁连山脉，

到达甘肃张掖，然后坐火车到达洛阳。王昭改名换姓，住进洛阳骨科医院治疗。

1 月 12 日，青海“八一八红卫战斗队”、“青海日报社革命职工造反司令部”等组织在“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和北京航空学院“红旗”赴西宁支队的支持下，夺了《青海日报》的权。

中央下发《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后，中央军委连夜电告各大军区。22 日夜，青海省军区司令员兼党委书记刘贤权接到兰州军区转发过来的电报，并于 1 月 23 日立即召开党委会议，传达中央这一指示，并做出支持青海“八一八”的决定。会上，没有人表示反对，但省军区副司令员赵永夫和大多数军区党委成员从心里认为 “八一八”成分复杂，组织不纯，不赞成“八一八”的观点。

在王昭是否应予打到的问题上，刘贤权与赵永夫的意见也不一致。刘贤权认为，王昭和彭真、罗瑞卿的关系密切，应该打倒。赵永夫则认为：“王昭有错误，如果和彭、罗没有关系，是批判的问题，不是打倒的问题。”

军区领导层和军区机关的大部分干部倾向赵永夫的观点，同情王昭，因此，大部分人不赞成军区党委支持“八一八”的决定。就在省军区党委做出支持“八一八”决定后不到 3 小时，军区机关干部便自发召集会议，选出 15 名代表，效仿地方群众组织，成立了“青海省军区机关革命造反群众司令部”，后改为“指挥部”，要求赵永夫支持他们的行动。赵永夫当场表态说：“你们造反我当然支持。”于是，“指挥部”让赵永夫坐在椅子上，并请他做“指挥部”的顾问，并以“顾问”名义成为指挥部乃至军区的实际领

导人。

“指挥部”宣布省军区党委支持“八一八”的决定无效。是夜，“指挥部”印发“紧急通告”，出动宣传车上街广播，宣布刘贤权是顽固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当权派。军区机关干部和家属在刘贤权家的院墙上刷上大标语，将刘贤权软禁在家，电话被切断，警卫员、秘书也不得与他接触。

1 月 24 日零时左右，刘贤权再次主持省军区常委会议，大家认为，现在无论表态支持哪一派都难以稳定局面，于是决定，把原来支持“八一八”的提法改为支持一切真正的革命左派，考虑这样提法笼统些，比明确支持某一派更好解释。

1 月 25 日，赵永夫邀请青海驻军各部队负责人开会，得到总后勤部青藏办事处主任张晓川支持。1 月 28 日，青海各驻军部队，亮出了“部队统一行动支持地方文化大革命”的旗帜，青海省的驻军，基本上取得了一致。赵永夫成为青海的实际最高领导人。

“八一八”不卖赵永夫的账。他们在省军区楼前张贴大字报，提出“当指挥员叛变革命时，革命战士不仅不应该听取他的指挥，而应该掉转枪口对准他。”并拉出巨幅标语“打倒军区一小撮混蛋！”“坚决揪出青海军区内一小撮混蛋！”

1 月 29 日，青海“八一八”一举夺了省委、省人委的大权，发出《向毛主席致敬电》、《告全省人民书》，虽然冠名 40 个造反组织，其实都是“八一八”一派的。这次行动，与中央文革没有直接联系，所以中央对夺权没有表态。

“捍卫队”坚决反对“八一八”单方面的一派夺权行动。他们和部队“指挥部”在市区一些街道，张贴大字报，指名道姓揭

发“八一八”组织不纯，是社会渣滓……

“夺权”是受中央鼓励和支持的，无法抗拒，与其被“夺”，不如交权。在 1 月 29 日之前，杨植霖已经几次召开省委会议，决定支持“八一八”夺权。王昭虽在外地治病，多数省委领导仍和他通气，策划支持“捍卫队”夺权。因此 1 月 29 日青海“八一八”的夺权，毋宁说是省委、省人委和平转交政权给“八一八”。

## 第 468 回："红革会"，上海扣押徐景贤　春桥急，军队开进复旦园

1 月 29 日这天，上海的张春桥也遇到了他加入中国共产党后的第一次最大困境。

上海"红革会""125 夺权"没有成功，1 月 26 日贴出质疑张春桥的大字报，当晚，在复兴中路 1367 号总部办公处召开常委会。会上，劳元一提出先不针对张春桥，而是针对写作班，"火力侦察"，看张春桥如何反应，再定下一个步骤。劳元一认为，徐景贤和张春桥关系很近，揪住他，就是揪到了张春桥的材料袋，这样也可留有回旋余地。

晚上 20 时多，清华"井冈山"驻沪联络站给上海市"红革会"打电话，要他们派人去交流情况，劳元一等人前往。到会的北京红卫兵都不支持炮打张春桥。会议开到次日凌晨 1 时多才结束，最后共同拟定了几条支持张春桥、姚文元的大标语。

27 日下午，复旦大学"红革会"的赵基会去市"红革会"总部，正式通知总部负责人马立新，他们准备去抓徐景贤。不管市"红革会"什么态度，复旦"红革会"都要行动。

当天晚上 23 时左右，复旦"红革会"的谢葆晨、赵基会等在复旦大学开会，中文系学生说，他们已经准备好 50 人，可以马上行动。

1 月 28 日凌晨 1 时，复旦"红革会"的谢葆晨、金应忠等人分别带领三路人马，同时向市区进发：一路去"机联站"所在的淮海路市委党校，一路去武康路 2 号原市委写作班所在地，一路

去康平路市委机关大院。每路队伍都专门配有认识徐景贤的人。

就在此时，“红革会”驻北京的贺学军给上海总部打来电话，记录如下：

1 月 28 日凌晨一时许，红革会驻京联络站贺学军同志长途电话，对反对张春桥同志的这股歪风必须坚决回击，毛主席的指示就是直接传给张春桥的，这次文化大革命中，春桥就是跟主席跟得很紧的。

凌晨 2 时，劳元一刚回总部，马立新告诉他，复旦“红革会”的已经派人去“机联站”抓徐景贤了。他拿出“红革会”驻京联络站池东明打来打来的长途电话记录，说蒯大富问过中央文革了，说张春桥是坚定的革命左派，要保护。他要求立即将人追回来。

当天，师范学院“红革会”的头头池东明也从北京给上海“红革会”总部打来电话，记录如下：

春桥紧跟主席，是坚定左派。蒯已命清华井冈山联络站痛击反张逆流。

本来，在上海“红革会”炮打张春桥之前，“红革会”总部就已经派池东明赴北京调查张春桥的历史问题。

池东明和另一名同学在北京高校听说陕西省委书记霍士廉说过张春桥历史有问题，就奔赴西安，在西安交大的“牛棚”里讯问了霍士廉。询问的具体情况不清楚，据说，霍士廉亲口对他说：“我用脑袋担保，张春桥是叛徒！”于是，两天前，池东明将“张春桥是叛徒”的消息传回上海。但他从西安回到北京后，住在清华大学蒯大富的宿舍。蒯大富坚决反对炮打张春桥。于是又有了 1 月 28 日的电话记录。

劳元一虽然暗自庆幸，自己此前与北京驻沪红卫兵组织拟定的保张春桥标语，是“保对了”，但还是有点犹豫，问：

“这个消息真实不真实？1.18 抢黑材料之前，听了陈丕显的一句话，结果上了当，现在他们(红三司、炮司)大反我们右倾，搞得我们好苦。”

停了一下，他又说：“不过，这一次是张春桥，姚文元，他们是中央文革小组的，你们主张保，就保他吧！”

马立新立即打电话找已经带队出发去抓徐景贤的复旦大学谢葆晨，希望告诉他们，如果还没有行动，就马上撤回复旦，停止行动，但是电话没有打通。

此时，复旦大学“红革会”的摩托车在金应忠带领下已驶过上海淮海中路，鱼贯进入中共上海市委党校。金应忠从“机联站”所在党校给“红革会”总部打来电话，说没有找到徐景贤。马立新正想劝他们立即停止行动，那边的电话就挂断了。

原来市委党校这边，写作班党支部副书记、“机联站”的另一个头头郭守仁正好从房间里出来，与迎面而来正在挨屋搜索徐景贤的“红革会”学生碰了个对面。

学生们问：“徐景贤在吗？”

徐景贤本来是约好与“红革会”的头头再见面，郭守仁看到“红革会”的学生登门，自然十分高兴，马上说：“欢迎你们！我带你们去他那里吧。”

郭守仁将学生们带到三楼会议室，徐景贤正在这里。学生们进屋就说：“徐景贤同志，总还得麻烦你，你这个 18 级的夺权总指挥，请你到我们复旦走一趟，给大家吹吹你的观点，开导开导

我们的笨脑瓜。”

他们说徐景贤是“18 级的夺权总指挥”可能是说徐景贤的干部行政级别是 18 级吧。

徐景贤见是“红革会”的学生，笑着站起来，伸出手迎了过去，准备和他们握手。他怎么也没有想到，那几个身强力壮的小将，昔日共同造反的战友，不仅没有向他伸出手来，反而就势将他架起，往外就走。徐景贤这才意识到情况不对，一边挣扎，一边高声的喊道：

“我抗议！我抗议你们这样对待我！”

屋里其他的写作班人员也被这突然出现的情景惊得不知所措，徐景贤的抗议声将他们从震惊中惊醒，但这群秀才遇到这种事情，也只能动动嘴而已，屋里顿时响起一片乱糟糟的“抗议”之声。

“红革会”学生对他们的抗议根本不予理睬，只是将徐景贤连拖带拉往外走。

写作班的王知常闻讯赶来，见此情景，一把抱住徐景贤的腰，想把他拖住。但是“红革会”人多势众，那几名红卫兵行动队队员都是五大三粗的小伙子，他们就像老鹰捉小鸡一样把徐景贤连王志常一起从楼梯一层层往下推，从三楼一直推到底楼。市委“联络站”的程绮华和从三楼一路跟下来的郭仁杰等人赶忙堵住党校的前门想要拦阻，那些学生却突然将徐景贤二人拖向党校后门，那里早已停着一辆事先准备好的吉普车，他们将徐景贤和紧抱着他的王知常一起塞进了车厢。吉普车疾驰而去……

浩浩荡荡的车队，出现在子夜时分的上海街头：吉普车前有

摩托车开路，后有摩托车压阵，左右有摩托车护送，如同国宾车队一般直奔复旦大学而去。

到了复旦大学，他们把王知常拉走，将徐景贤带到了一间有人看守的大会议室关押起来。徐景贤乘人不备，撕掉了身上的记录本和电话簿。

徐景贤被绑架了，郭仁杰赶紧给兴国路招待所的张春桥打电话报告。

“什么？徐景贤被抓走了？”张春桥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当他确认无误后，又继续追问：“抓到哪里了？”

郭仁杰回答：“不清楚，抓他的人说是‘红革会’的。”

徐景贤下落不明，这怎不让张春桥火往上窜，他立即让秘书打电话给市“红革会”负责人马立新和市“红革会”勤务员、上海师院的缪财生，要他们立即释放徐景贤。马立新接到电话后，马上与在场的劳元一等人简单商量后，决定放人。马立新和劳元一立即赶往市委党校。

与此同时，“机联站”也给上海警备区打电话，说有身份不明者绑架徐景贤，还打人，要求警备区保护徐景贤人身安全。警备区作战处立即打电话，请示张春桥如何处理，张春桥说要“派兵追查”。

作战处又问：“是全副武装还是徒手？就是部队要不要带武器？”

张春桥说：“这还用问，没有武器还算什么军队？如果不带武器，我就不会同意派兵了，当然要全副武装！”

上海警备区委派独立师政委徐海涛处理此事，并报告了张春

桥。

徐海涛亲率一个摩托化步兵连，全副武装赶到市委党校。这时，徐景贤早已被“红革会”的学生带走。徐海涛又带着武装车队奔复旦大学追去。

28 日凌晨，随着一阵“嘭嘭”的发动机声，一股绿色的车流涌入复旦大学的校门。摩托引擎的轰鸣惊扰了寂静的复旦大学校园，一道道惨白的光柱在黑暗的校园里一闪一闪，18 辆带斗的绿色三轮摩托车井然有序地开进了校园，每辆摩托车上都坐着 3 名荷枪实弹的解放军战士，有的摩托车上还架着机关枪。

摩托车队之后是一辆越野指挥车，一根天线高竖在绿色篷布车顶上，指挥车后面还有两辆解放牌军用卡车，车上满载着全副武装的解放军战士。这支浩浩荡荡的绿色车流驶进复旦校园后，迅速包围了“红革会”总部所在的红卫楼。

无须任何召唤，大学生们都闻声奔向了红卫楼，与解放军对峙着。内战未息的复旦大学三派红卫兵，在此时大军“压境”之际，又立即结成了“反张同盟”。原本在观望犹疑的学生也在枪口下呼出了“保卫复旦园”的口号。

“红革会”总部办公室里，“红革会”头头与徐海涛进行着谈判：

“徐政委，这儿是学校，没有敌情，你们大驾光临，有何贵干？”“红革会”头头提出质问。

“我们接到命令，有坏人破坏文化大革命，市委‘机关联络站’负责人徐景贤遭到绑架，至今下落不明，我们奉命保障他的生命安全，请同学们协助。”徐海涛政委说明来意。

“怎么？你们要搜查？”

“不，是寻找。”

“打开天窗说亮话，我们请徐景贤来解决有关运动的问题，他不是保护对象，对他的审查不违反地方开展‘四大’的精神，谈不上‘破坏’，更用不着部队兴师动众……”

红卫楼的走廊里，越来越多的学生把战士们团团围住，他们不断地高呼口号：

“向解放军学习！向解放军致敬！”

“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

有的大学生还向战士们演讲：“毛主席最支持革命小将，解放军同志们，你们是执行最高指示的模范，要同红卫兵心连心……”

然而，战士们一个个都保持沉默着，脸上一点表情也没有。

“你们必须马上释放徐景贤！”徐海涛斩钉截铁般说道。

“徐景贤？徐景贤在哪里？我们不知道！”红卫兵们摇着头。

“你们必须马上释放徐景贤！”徐海涛重复这句话。

“徐政委，人，我们是不交的，除非你用刺刀说话，那样你就出了名，全上海、全中国都会知道你是上海文化大革命以来第一个向红卫兵动枪的人，是镇压革命学生的刽子手！”

“我们要向毛主席报告，上海解放军镇压红卫兵！”

人们常说：“秀才遇着兵，有理说不清。”这一回倒过来了，兵遇着秀才，竟然说不清了。特别是红卫兵们说要向毛主席报告，不能不使徐海涛心虚了。他在屋里拨通了兴国招待所的电话，汇报了情况。

张春桥告诉徐海涛，首先要确保徐景贤是否安全。如果徐景贤安全无恙，可以撤走。

凌晨 3 时 30 分，复旦大学“红革会”的十几个头头来到徐景贤所在的大会议室，坐了下来，将徐景贤围在中间。这些平时稔熟得可以随时拍肩膀开玩笑的红卫兵战友们，此刻却个个紧绷着脸。穿草绿色军大衣的马立新，首先用浓重的山东话开了腔：

“徐景贤！我们‘红革会’总部今天对你采取了革命行动，现在，你要老实回答我们的问题！”

徐景贤不服气的问到：“你们凭什么？”

瘦瘦的长着一副长脸的劳元一跳了起来：“你是当权派，我们红卫兵就是有权审讯你！“

“我算什么当权派？！”徐景贤不解。

“你是市委写作班的支部书记，你要管历史组、哲学组、文学组和自然辩证法组这么多笔杆子，你又是市委文革小组的成员，你这个丁学雷怎么不是当权派？”嘴唇上长着一层茸毛的劳元一振振有词的说道。

“你为什么不提我现在是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的负责人呢？以前，你们还口口声声称我为战友……”徐景贤记不服气的争辩道。

“你们是全民造反！”

“市委写作班是假造反！”

“你们市委机关全部造反，我们信不过！”

就像四五挺机关枪一样，几个学生劈劈啪啪一齐响起来。

“那好，我们市委写作班开造反大会，你们‘红革会’为什

么要把文化广场的会场让给我们？在这次大会上，你们为什么要到会祝贺，大会开过以后，你们的《红卫战报》为什么要和我们市委机关联络站合编《大会专刊》？还有，你们说我们是假造反’那么为什么上个星期你们还要拉我们和‘工总司’一起联合夺权？”徐景贤也不甘示弱，一连串“迫击炮”轰了回去。

“上海市委搞修正主义，陈丕显、曹荻秋被打倒了，张春桥也当过市委书记处书记，抓过思想文化工作，难道就没有问题吗？为什么就不能‘炮打’？我们认为：上海的阶级阵线还不清楚，上海必须第二次大乱！张春桥、姚文元现在不能当市委书记和市长，他们都领导过市委写作班，他们和你都应当接受造反派的审查！”马立新说。

“红革会”勤务组的谢德裕　，方方的脸盘，脚上还上着石膏，腋下正拄着拐杖、他指着徐景贤说：“你徐景贤在市委工作了十几年，你最了解张春侨和姚文元，你是张、姚的‘材料袋’。现在在上海，张春桥和姚文元是老大、老二，你徐景贤就是老三。今天，你‘徐老三’应当站出来揭发张春桥和姚文元嘛！”

“‘徐老三’赶快老实交代！”

“‘徐老三’应当马上反戈一击！”

又是一阵连珠炮。

徐景贤也不示弱：“张春桥和姚文元组织和写作了《海瑞罢官》，揭开了全国文化大革命的序幕；他们又通过《评‘三家村’》这篇文章，端出了‘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北京市委，你们都知道，这些斗争都是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自领导和直接指挥下进行的。他们这次来上海，也是毛主席和中央文革派来的。

你们自称是最忠于毛主席的红卫兵，可是你们却干出了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我奉劝你们赶快悬崖勒马！”

“张春桥和姚文元如果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为什么要镇压革命的学生运动？”一个学生质问道。

徐景贤不解的问：“你这话从何说起？”

“刚才张春桥和姚文元派了军队要到我们学校里来搜查，我们已经和上海警备师的政委展开了大辩论。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凡是镇压学生运动的人决没有好下场！张春桥、姚文元派出持枪的解放军，枪上还上了刺刀，把枪口对准红卫兵小将，强行要进入我们学校，这不是镇压学生运动是什么？”

徐景贤这才知道解放军在找他，胆子索性壮了起来说：“哦，你们这是什么逻辑？我们都学习过毛主席亲自批准发布人民解放军应该支持左派的中央文件，几天前，你们夺了全市的大印，不是也请求上海警备区派军队保护过你们的吗？今天，你们突然袭击，绑架了上海一个造反组织的负责人，解放军派出战士来寻找我，完全合理合法，这能叫做‘镇压学生运动’吗？”

“‘徐老三’你别嚣张！”

学生们气得嗷嗷叫，其中一个人霍地站起来，把面前的折椅踢翻在地：

“你这个黑秀才，老的就是一张嘴！”

徐景贤继续说道：“我既然来了，愿意奉陪到底！第一，我要提出强烈抗议，抗议‘红革会’总部侵犯我的人身自由，无故绑架一个造反组织的负责人，你们要当面向我道歉！第二，刚才在市委党校，你们绑架我的时候使用暴力拗我的手，上车以前还殴

打我的头部，我到现在还觉得头晕头痛，我强烈要求去医院验伤，并且要你们交出打人凶手，不然我要向全市提出控诉！”

马立新见徐景贤态度如此强硬，一时也问不出什么东西，和大家商量一番后说：“我们不跟他多啰嗦，还有重要的事情要讨论，大家到总部去！”说罢，他们呼啸而去。

清晨，看守徐景贤的学生从食堂里给他打来了一碗稀饭和一碟酱菜。徐景贤刚坐在乒乓桌旁喝着稀饭，就看见“红革会”的头头带着 3 名解放军走了进来，其中一名解放军是干部模样，腰里挂着手枪。另外两名是战士，手里都拿着上了刺刀的冲锋枪。“红革会”的头头指着徐景贤对他们说：“喏，这不是徐景贤吗？他好端端地受到我们的保护哩。”

那个干部模样的人朝徐景贤注视片刻，不再说话，带着战士走了。

徐景贤跟到门口，看守的学生把他挡住。他从敞开着的门朝外望去，只见有人正在校园的围墙上刷大标语：

“张春桥、姚文元是镇压学生运动的罪魁祸首！”

“谁镇压学生运动决没有好下场！”

看到徐景贤平安无恙，徐海涛下达了撤回的命令。在大学生们不礼貌的欢送声中，绿色的车流又离开了校园。

## 第 469 回：愤而起，申城炮打张春桥　涉窘境，张、姚亲临“红革会”

此时，拥有 6 万之众的上海“红革会”深深地愤怒了。1 月 28 日，上海爆发了规模空前的“炮打张春桥”运动。“红革会”在上海街头，刷出排炮般的大字标语：

“镇压学生运动的人，决没有好下场！”

“警惕反革命两面派！”

“警惕陶铸、王任重式的人物！”

“张三反对毛主席就打倒张三！”

这里的“张三”指谁，上海人没有一个不明白的。

不点名的标语，很快被指名道姓的“炮打”标语所代替：

“张春桥算老几？”

“张春桥≠中央文革!”

“谁说张春桥的屁股摸不得？我们偏要摸张春桥的老虎屁股！”

“重炮轰击张春桥!”

“炮打狗崽子姚文元!”

“张春桥是反革命两面派!”

“坚决反对目前成立以张春桥为首的新市委!”

“坚决反对张春桥当上海第一书记、姚文元当第二书记！”

“打倒张春桥！火烧姚文元！”

这真像是一颗重量级的核弹爆炸，惊动了黄浦江和上海滩！上海的人们议论纷纷，有人说：“张春桥是中央文革的副组长，是

毛主席亲自挑选的人，是绝对不会有问题的，一定是‘红革会’炮打错了。”

可是也有人说“‘红革会’革命小将，既然敢于在太岁头上动土，一定是抓到了张春桥的什么真凭实据，也像他们进攻《解放日报社》一样，后来的事实还是证明他们是正确的。毛主席一定会支持他们的，看来一定是张春桥有问题。”

也有的人说得更加具体：“‘红革会’小将开始只是对张春桥有怀疑，可是就在 25 日深夜，他们在夺权的时候，问过了许多知道张春桥底细的人，也查了张春桥和他老婆的档案。所以他们有把握。否则，难道他们是吃了豹子胆了吗？敢炮打中央文革小组的人？”

“红革会”在全市散发上海警备区夜闯复旦大学的传单：《一二八事件真相》传单，南京路贴出“张春桥是调动解放军镇压革命造反派的罪魁祸首！”等大幅标语。

这天，“红革会”劳元一给北京美院的学生包炮打电话，说张春桥用军队来围困学生。包炮一听很激动，“怎么能对学生这个态度呢？”于是他把上海 10 个区、10 个县的造反派头头，包括“工总司”的王洪文全拉到复旦大学看大字报。

这天，上海“炮司”、“红三司”与“红革会”的矛盾似乎还在继续，上海街上依然出现“炮司”、“红三司”、交大“反到底”等组织贴出的大幅标语：

“红革会头头是托派分子！”

“打倒布哈林式的阴谋家！”

“警惕陶铸、王任重式的人物！”

“炮司”传单质问：“谁是真正的英雄？”矛头直指“红革会”，提出对“《解放日报》事件”要重新估价；“红革会”把革命造反派大联合的功劳、把工人阶级的功劳统统归在自己名下是不对的。

这天一早，“机联站”郭仁杰赶到复旦大学，自愿陪徐景贤一起囚禁。因为正是他把“红革会”的人带到了徐景贤的房间。他的到来，是为了表示一种歉意，也希望能助徐景贤一臂之力。在文化大革命运动初期，郭仁杰曾回到复旦造反，与“红革会”某些头头有着密切的关系，他希望通过这层关系，能说服“红革会”头头改变态度。但是在政治斗争面前，没有私谊可言，何况，这时“打张战役”已经发动起来，不是谁能够停得下来的。

上海的大学生还提出：“北京在揪康生，上海就要揪张春桥！”

这天，上海师范学院的学生高呼“炮轰张春桥，保卫毛主席”的口号上街游行示威。但是当他们走进交通大学校园时，却被“反到底兵团”关起大门全部抓住，在教学大楼里关押一夜。

这天下午 13 时 30 分，上海各高校“红革会”负责人和“上三司”等组织的头头们云集上海“中苏友好大厦”北大厅的那间长方形的咖啡厅开会，安大峰和曹振发等几个中学红卫兵头头，公安系统的造反组织“联合兵团”的代表也参加了这个会议。会议开始是分析当前形势，在如何进一步炮打张春桥的问题上，“红革会”内部还有分歧。

一个复旦大学的学生就张春桥问题一连问了十几个为什么：

“既然上海市委是‘修正主义’的，为什么身为上海市委书

记处书记的张春桥是‘革命’的？”

“既然上海文艺界‘毒草丛生，群魔乱舞’，为什么身为上海市委宣传部长的张春桥是‘干净’的？”

……

等等，等等，诸如此类。炮打张春桥的火药味越来越浓。

中学红卫兵安大峰问上海师院“红革会”头头李功佐：“复旦‘红革会’主张坚决炮打，你们有所保留，怎么办呢？”

李功佐是上海师院的女学生，“红革会”头头，长相文静大气，说话缓慢而有条有理，在造反派中挺有威信。她说：“张春桥拿着上方宝剑占着上风，‘红革会’坚决炮打的话，可能一条道走到黑，就没有回头路了，但你们看到，这个会议是一边倒了。”

会议从下午一直开到晚上。19 时，一辆轿车驶入中苏友好大厦大门，径直朝北大厅驶去。从车上下来 4 个穿军大衣的人。

惊人的消息飞快地传入会场，“红革会”的头头们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张春桥、姚文元各带一名秘书来了！”

有几个中学红卫兵正在咖啡厅门口，当他们看到张春桥从一辆轿车上下来时，甚为惊讶。

此时张春桥的脸，一直保持三分笑，每一步都是那样的平稳。他径直走向会场的中心，坐在一把最显眼的椅子上。姚文元紧随着他，坐在他的旁边。

学生们一下子被镇住了，会场顿时鸦雀无声。

很快，照相机马上对准了他俩。接着，两台录音机就放在了他们前面：有人甚至还写了“打倒大叛徒张春桥”的牌子，要给张春桥挂上，被劳元一制止。

当张春桥刚刚说了一句“红卫兵小将们，你们好！”“红革会”的头头们从刚才突如其来的惊讶中缓过神来，有人高声地打断了他的话，大声说道：

“打开《毛主席语录》，十三页，第二段，最高指示：”顿时，大厅里响起一片背诵声：“什么人站在革命人民方面，他就是革命派，什么人站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方面，他就是反革命派……”

“十四页，第二段，最高指示——”

“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

语录念毕，就有人直呼“张春桥”，“今天凌晨，派解放军到复旦大学镇压学生运动的，是谁？”

“为什么派军队镇压学生？”

大家高呼口号：“镇压学生运动的人绝没有好下场！”

张春桥以一副十分诚恳的样子答道：“同学们，今天凌晨的事，当时不知道是什么人抓徐景贤，虽然也有人报告说是‘红革会’，但‘红革会’与徐景贤关系不是一向很好吗？而且我和姚文元在北京时，北京高干子弟的红卫兵组织‘西城纠察队’经常半夜抓人，所以我们以为是其他什么组织抓人，就同意了出动军队。后来了解到真是‘红革会’干的，就和姚文元商量让部队撤走。

复旦“红革会”宣读“十问张春桥”的传单：“为何在打倒陈丕显的口号声中，一些造反的市委知情人没有揭出什么东西，只放了几个空炮？为何现在有人鬼鬼祟祟，提出要成立以张春桥为首的市委？这风从何而来？文艺界盖子为何没有揭开？为何市委

大保皇机构突然起来造反？造反后又揭了什么？写作班的罗思鼎，连对复旦历史系党总支都没揭发出什么，更没有揭发复旦党委杨西光，而他们却成了左右上海革命的决策机构，很多大会都由市委写作班控制。为何上三司一夜之间成了非法组织？到处都在砸上三司？张春桥为什么对红三司接管公安局支持，对上三司接管市委却不支持？”等等。

“你同写作组是什么关系？”

“你说，旧上海市委是修正主义的。你也是旧上海市委的领导干部，你难道不是修正主义的？”

“你说，《海瑞罢官》是大毒草。上海上演《海瑞上疏》，你没有责任？”

“上海的夺权是否经过各组织充分讨论？徐景贤，是谁封他当核心的？”

“你为什么镇压‘红革会’？”

学生们的质问像排炮一样，铺天盖地而来。

张春桥极力保持着镇定，和颜悦色的说：“把问题都提出来，好不好？”

“一个一个回答！”学生们异口同声地喊起来。

“大家安静，让张春桥同志回答。”大会主持人高声喊道。

张春桥说道：“同学们，刚才用的《语录》已经超过了同志范围。关于警备区的事，是‘机联站’的同志请求解放军保护的，在当时情况下，来不及判明情况，所以就出动了部队。”

大会主持人站起反驳说：“军队找的明明是‘红革会’，再说‘机联站’也调不动军队。”

“同学们，”张春桥提高嗓门道，“我知道这件事对大家的震动很大，我理解你们的心情，但是，我也认为你们把‘机联站’的徐景贤同志扣留住是不妥当的。‘机联站’大多数造反队员虽然都是旧市委写作组的，但他们后来在小将们推动之下起来造反了，我们应该欢迎他们的革命造反行动，所以，请你们立即把徐景贤放了。”

“你们对‘机联站’保护，对复旦大学却武装镇压，打一个保一个，这是什么意思？”

“中央刚刚指示军队要支持左派，就发生军队镇压学生运动的事件，这个调遣军队的人究竟是谁？”

“红革会”学生对张春桥群起而攻之。

“红卫兵小将们，你们要提高警惕，不要被陈丕显、曹荻秋所利用……”张春桥终于忍不住了，从嘴里挤出这句话。不过，这下子，更像是火上加油，锣里加钹，红卫兵们更加气愤了。于是，有人不客气地揭开了老底：

“张春桥，你的臭老婆是什么货色？”

“姚文元，姚蓬子是什么货色？”

言辞激烈，语无遮拦，张春桥、姚文元只好沉默以对。

一个红卫兵指着姚文元，要他起来揭发张春桥，姚文元瞪着两个水泡眼睛，看着天花板一声不吭。

“红革会”的人提出要给中央打电话，而且指名要周恩来、陈伯达、江青三人中的一位听电话，张春桥说话了，他说周恩来、陈伯达、江青三人很忙，指名要他们接电话不合适，要打电话只能打给王力，由王力转达。这下更引起了“红革会”的怀疑，质

问道：

“你同王力是什么关系？”

红卫兵们抽走了张春桥和姚文元的椅子，让他们站在那里，低头认罪。

张春桥是在兴国招待所得知“红革会”头头们正在开会。他经过紧张的思索，最后决定，和“红革会”见面。当他把这一决定告诉姚文元时，姚文元大吃一惊，觉得这样做太危险了。

张春桥笑了，他说姚文元太缺乏“群众斗争经验”。

毛主席一直教导领导干部要到群众中去，中央文革也是要求各级领导干部不要怕群众，事到临头，难道自己就退缩了？张春桥觉得自己应该像“安亭事件”那样到群众中去，说服这些学生。

与张春桥相比，姚文元毕竟年轻得多。他只好跟着老领导张春桥坐上车，一起来到“红革会”的会场，没想到竟陷此窘境。

这两个大左派第一次尝到了被批斗的滋味。虽然正值天寒地冻之际，张春桥一身冷汗，衣衫湿透。他们的秘书被红卫兵看管起来，无法出去打电话。就这样，从晚上 19 时，一直斗到 1 月 29 日凌晨 1 时，整整六个小时！红卫兵坚持说，张春桥和姚文元不承认错误、不讲清问题，就不放他们走。双方僵持不下。

这时，突然有人报来消息，一批红卫兵，可能是“炮司”的，又包围并强行进入解放日报社。

正在与“炮司”在《解放日报》问题上闹矛盾的“红革会”学生们闻听此言，又急不可耐，一窝蜂乱哄哄的赶往解放日报社。张春桥也趁机说道：“事关重大，必须去处理。”便招呼姚文元随学生们一起出去，然后钻进汽车，就这样一溜烟走了。

当晚，复旦大学也在召开 2 万多人参加的“炮打张春桥誓师大会”，“孙悟空”头头胡守钧在大会上慷慨陈词，历数了张春桥的历史后说：“同学们，张春桥是个铁腕人物，我们反对他可能会坐牢的，你们怕不怕？”

“不怕，我们愿为真理而献身！”场上的人齐声回答。

接着，全场高唱毛主席语录歌《革命不是请客吃饭》：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

那雄壮激昂的歌声像插上了翅膀，回荡在复旦大学校园的上空。

接着，全场的人宣誓：“不打倒张春桥誓不罢休！”

与此同时，上海同济大学“东方红公社”主办的《东方红报》编辑部开会。同济大学李国群代表《东方红公社》总部则表示：“对张春桥同志的问题，不准在大街上搞，可以用适当的方式去提。”

## 第 470 回：齐声唤，炮声隆隆震复旦　急电到，上海乾坤大挪移

29 日凌晨，张春桥回到兴国招待所，立即给中央文革副组长江青打电话，汇报了上海发生的的情况。

29 日这天，上海滩几乎全部被“炮轰张春桥”的炮声所覆盖。

当天，上海同济大学“东方红”总部讨论是否参加针对张春桥的行动。

“东方红”的头头陈敢峰坚决不同意给张春桥贴大字报，他说：“张春桥同志是坚定的革命左派。”并写出《声明》明确表示：“张春桥是坚定的革命左派，是老保的死对头！”

“东方红”的其他负责人也纷纷表明自己的态度。

姚铁红说：“给张春桥提意见是可以的，但大方向是什么？不能攻击中央文革小组！”

黄兆彬问：“这样搞，什么时候才能结束？”

王皖城说：“他这种腔调不是造反派的脾气！”他认为：“对张春桥的看法，很快就会由怀疑转到大揭发阶段。如果陈锦林（即陈敢峰）把自己的观点强加给‘东方红兵团’，那是不行的，而且可能会因此而引起一场大辩论。”

黄兆彬说：“我们还是听中央的。中央对他们了解。”

当晚，“炮司”失踪几天的周谷声突然出现了，“炮司”红鸥问他到哪里去了，他说：“被‘红革会’绑架了，关了三天，要我抛张春桥的材料。林翌也被师院‘红革会’绑架，至今还未放出来。‘红革会’欺人太甚，火力侦察居然侦察到我们头上来了。”

周谷声气得脸色惨白。

由于害怕“红革会”再找事，上海“炮司”100 多红卫兵转移到国棉十七厂礼堂召开“炮打张春桥誓师大会”。红鸥向大家汇报了搜集的张春桥材料，最后说：“我们是国家的主人，有权罢张春桥的官！”

“炮司”许云飞一直认为炮打张春桥不是闹着玩的，弄不好，真会戴上反革命帽子，所以，始终是要大家先整材料。但是 28 日张春桥派兵包围复旦的消息让他变成另一个人了。此时，他跳上国棉十七厂的桌子，学五四青年，举起右臂，发出激动人心的呐喊：

“红卫兵战友们，一场围剿反革命两面派张春桥的战斗已经打响，我们要准备再当一次少数派，准备上山打游击，准备去坐牢。为了保卫毛主席，我们愿，愿把牢底坐穿！让我们向毛主席宣誓：革命不怕死，怕死不革命！”

“炮司”试图说服“工总司”王洪文参与炮打张春桥，王洪文不允，并马上于 29 日中午来到兴国路招待所找张春桥，张春桥让秘书将耿金章也叫来。秘书打电话找耿金章，始终找不到。原来，此时“工总司”与“二兵团正在闹纠纷。27 日，“二兵团”听说他们的常委方剑华等人被“工总司”南市区联络站绑架，于是他们调动上万人当晚便将“工总司”南市区联络站砸了。1 月 28 日，“工总司”也马上派人砸了“二兵团”南市区联络站，并在南京路上刷出轰动一时的大字标语：

“打倒王洪文！揪出黑后台！”

此时，耿金章正在南市区斜桥布置反击“工总司”南市区联

络站。当他得到转告，匆匆赶往兴国路，看见张春桥正与王洪文谈话。张春桥见耿金章进客厅，便问：

“你们在干什么，都在打内战，是不是让人家看我们的笑话？”

红卫兵的宣传车正好在兴国路附近一遍又一遍地高喊口号。张春桥起身打开窗户说：

“你们听，外面还在炮打我呢！”

他关上窗户，坐在沙发上，对王洪文和耿金章说：“你们两个都是共产党员，‘工总司’中最早造反的共产党员就你们两个人。你们为什么总是合不起来？总是闹分裂？你们有没有想一想，你们两个的分裂会造成上海工人造反派的分裂！你们这样是让人看笑话！”

张春桥将 28 日这一天发生的事告诉了王洪文和耿金章。耿金章当即表态：“我们不打内战了！”他马上给“二兵团”总部打电话，让他们立即将队伍调到兴国路招待所附近的淮海路和高安路一带，保护张春桥住处。

王洪文也表示要一致对外，他通知“工总司”总部立即将陈阿大等人召到张春桥住处来。一会儿，陈阿大、戴立清、黄金海等人赶来了，同来的还有包炮。张春桥把刚才对王洪文，耿金章讲的话又重复了一遍。陈阿大、耿金章当即表示，说这是矛头针对无产阶级司令部，要找他们算账，要揪出他们的坏头头等。王洪文附和，没明确表态。黄金海与“红革会”、“炮司”、“红三司”关系密切，不赞成“工总司”调人去和红卫兵学生对抗，但没有表态，只是悄悄和王洪文说了自己的想法。王洪文“嗯”了两下，

没有说话。

包炮在 29 日这天上午曾打电话给劳元一，表示支持“红革会”炮打张春桥。下午 14 时，他又特地去复旦大学，找马立新和劳元一，说派军队就是镇压学生运动。此时，他在会上当场表态说：“我反对冲红革会，我想不通。即使红卫兵犯错误，为什么用枪口对付他们？”

张春桥马上解释：“我没有意思叫大家砸红革会。我只是同大家谈谈。”

这天晚上，上海“红革会”也召回了走向工厂、走向社会的同学，在复旦大学登辉堂召开誓师大会。

晚饭后，被扣押在复旦大学的徐景贤发现整幢学生宿舍里面的人忽然都离去了，只留下一名看守，而那名看守正好是郭仁杰的学生，姓韩。徐景贤和郭仁杰交换了一下眼色，郭仁杰走过去悄悄问他：“小韩，今天晚上有什么事？”

那个姓韩的学生推了推眼镜说：“晚上全校开誓师大会，你们可以听拉线广播。”

虽然一天都是阴雨霏霏，“红三司”头头安文江却浑身燥热：“妈的！把枪对准我们红卫兵等于对准伟大统帅毛主席！”他的几个朋友劝他不要急于表态，再看看发展动态。他说：“不行！张春桥动枪，我们起码得动口、动笔！”他急匆匆赶到大礼堂，和正在与“红三司”打内战的“红革会”头头紧紧握手。

本来，在“打杨战役”之后，复旦大学的几派组织矛盾日大，逐渐发展为内战，不但大字报上你来我去，互相指责，而且还在登辉堂进行通宵辩论，闹得不可开交。现在，在张春桥的问题上，

却又自动地联合起来了。当晚，除“红三司”外，复旦大学另几派群众组织：以“孙悟空”为核心的“东方红公社”、“红教工”、还有“红卫兵大队部”的造反派等 9 个群众组织也都一起前来参加“红革会”的誓师大会。

召开这次会议的是“红革会”的劳元一等人，他们首先介绍了对徐景贤采取“革命行动”的经过以及张春桥、姚文元“镇压学生运动”的情况。声称这次“火力侦察”取得了成功，达到了“引蛇出洞”的目的……

“红三司”安文江在会上作了《再问张春桥八个为什么》的发言，极具鼓动性。

“孙悟空”胡守钧、“红革会”赵基会等几个学生头头争相上台，提出各种疑问，表示战斗的决心。胡守钧呼吁停止内战，各派联合起来，共同对敌。

台下有人喊“炮打张春桥”，原来开会时并没有这个口号，经台下人呼喊，全场的人都同意了，这次大会也就被称之为“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炮打张春桥誓师大会”。大会主席团还收到满满一书包支持炮打张春桥的条子。

有人提议：明天上午 8 时举行全市“炮打张春桥”游行示威。

会议开到 30 日凌晨 1 时 30 分时，复旦“八二七”和“炮司”的代表说：“上海的阶级阵线还不清楚，上海必须第二次大乱！抓‘徐老三’不是我们的目的，我们要把炮口对准张春桥和姚文元。”他们提议：“明天 1 月 30 日在人民广场召开一个有 10 万红卫兵参加的炮打张春桥、姚文元誓师大会，把徐景贤拉到大会上去斗。开完大会，全市红卫兵再举行‘炮打’大游行，到张春桥、姚文

元住的地方去示威！”

听完他们的倡议，会场里呐喊起来：“对，给徐景贤挂上牌子斗！”

“让徐景贤也尝尝戴高帽子的滋味！”

“张春桥，姚文元不等于中央文革！”

“张春桥、姚文元镇压学生运动罪该万死！”

会场群情激昂，吼声震天。大家决定立即成立联合指挥部，联合上海各高校学生，造成既成事实，迫使中央承认，这在“文革”中是不乏先例的。

会上还对第二天的行动作了分工：“红革会”揪张春桥。其他组织分头通知全市造反派开会。

正在学生们摩拳擦掌，争表决心之时，台下有一个人悄悄溜出门去，登上自行车，直奔市委“机联站”而去。此人名叫邹道喜，原是复旦大学的一个工人，“文革”前被调到一个工厂里了，“文革”初期复旦大学又派人到那个工厂把他打成反动分子。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之后，他回到复旦，在郭仁杰的支持下得到平反。于是，他对郭仁杰感恩戴德，忠心耿耿。这时，郭仁杰虽然还与徐景贤一起被关在复旦，但他已认识写作班的人，所以马上跑去报信。

同时，正在收听学校有线广播的徐景贤和郭仁杰也心急如焚。徐景贤从床上站起来，对郭仁杰说：“老郭，无论如何要制止事态的发展。明天我个人安危事小，群众冲突事大。开完大会红卫兵要游行到春桥同志、文元同志的住处去，王洪文和耿金章他们肯定要调动‘工总司’的队伍来保卫，这样，势必发生工人和学生

的大武斗、大流血，我们怎么向中央交代？”

郭仁杰用门牙紧紧地咬着下嘴唇，他的脸庞也因为紧张而扭曲了，那个负责看守的姓韩的学生，正好坐在他们的对面，听到徐景贤的话，也露出了惊愕的神色。

徐景贤和郭守仁在宿舍里焦躁地来回走动，嘴里不住地说：“一定要想办法把消息带出去！”

郭仁杰走到那个学生面前，声音略带颤抖地说：“小韩，我们都是哲学系的，彼此的了解也不是一天半天的了，现在只有你能帮助我们……”

那位小韩露出了迟疑不决的神色。

徐景贤也恳切地说：“小韩，我们过去不认识，你对我可以有自己的看法，但是，一个真正的红卫兵，决不会对一场流血惨案袖手旁观的。希望你能带我们出去打一个电话……”

小韩用手推了一推眼镜，终于下了决心，站起来说：“走！”

三个人找到一处公用电话，徐景贤拨通了兴国路招待所的号码，要何秘书请领导听电话。过了片刻，他听到了张春桥那略带沙哑的嗓音。徐景贤急促地告诉他：复旦正在开“炮打”誓师大会，自己是在一位看守自己的学生帮助下，偷着出来打的电话。明天复旦的学生准备在人民广场召开 10 万人的大会，把徐景贤拉去批斗，会后还打算到兴国路一带示威游行，很可能会和工人队伍发生冲突……

徐景贤一口气汇报了这些情况，张春桥紧张地听着，嘴里嗯嗯地答应着，最后，徐景贤向他请示：“我已经跑出来了，下一步该怎么行动？”

“你现在还回得去吗？”张春桥问。

“回得去。他们还在开大会，没有其它人发觉我们。”

张春桥沉吟了一下，最后说：“你还是返回原处，免得他们节外生枝。不管发生什么情况，你都要顶住了。”

“那好，我现在就回去了，再见!”徐景贤的鼻子有些发酸。

“要坚信中央一定会正确处理这个事件的!”张春桥叮嘱了这句话，就把电话挂上了。

徐景贤他们回到关押他们的宿舍，大会还在继续。徐景贤想到明天可能会挨斗，睡不着觉，看见桌上铺着大字报纸，放着墨汁瓶，便和郭仁杰商量，合写一张大字报，谈谈他们的观点。于是，徐景贤说，郭守仁写：

“一、为什么在打倒上海市委的关键时刻，有人把矛头指向中央文革的领导？这样的大方向难道是正确的吗？

二、为什么在上海各个造反组织联合夺权的重要关头，有人提出‘上海必须第二次大乱’的口号，做出‘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这不是搞乱我们自己的阵线吗？

三、……”

徐景贤一口气提了 6 个为什么，最后，加上标题《六问》，便和郭仁杰一起在大字报后面签上名，并写上“我们现在住在第 x 宿舍 x 楼 x 室，欢迎大家前来交换意见。”然后把大字报交给小韩，请他下班以后，帮他们把大字报贴到校园里去。

大会散了，“红革会”的头头们和看守的红卫兵们都拥进了徐景贤住的房间，看徐景贤他们没有什么动静，就没有理睬他们，而是在一边紧张的写起大标语来。

接着，几千名“红革会”学生涌上街头，连夜张贴海报：

一月三十日上午，举行全市炮打张春桥大游行。下午，在上海人民广场举行上海市炮打张春桥誓师大会。

30 日凌晨，张春桥召见王洪文、耿金章等人也基本结束。出了张春桥的住处，王洪文要大家跟他驱车前往复旦大学看大字报。已是半夜，一行人转了个圈子，没看到什么动静。不料回到校门外，却发现他们停着的面包车车身上，也被贴上了打倒张春桥的标语。

从 1 月 27 日至 29 日，张春桥，姚文元一直与王力保持联系。王力要“机联站”将上海发生的情况写个报告报中央文革小组，张春桥让“机联站”王承龙办理此事，并提出，由市“红革会”总部和“机联站”各自向中央文革发电，报告自己观点，但“红革会”负责人认为这是个“大阴谋”，拒绝了。“机联站”于 29 日晚，将给中央文革小组报告的电报稿交市委办公厅。但正当他们准备拍发时，被正在市委办公厅的“红革会”负责人马立新以及机关另一派造反派“市委办公厅造反兵团”的人看到。他们认为电报不符合事实，扣押了电报稿。王承龙等人急得和他们吵了一架，但电报还是没能发出去。他们只得急忙赶到兴国路招待所向张春桥汇报，张春桥也无可奈何。

王力没有等到上海发来的电报，他很着急，向江青，康生和陈伯达请示后，于 29 日深夜打电话给张春桥，将准备以中央文革小组名义拍发的电报，逐字逐句告诉了张春桥，让张春桥记录下来，并说，这份电报发不发，何时发，由张春桥决定。

张春桥再一次催促王承龙，于是王承龙他们又重新起草了一

份电报，由驻沪空军用明码发出。并以接到王力电话的时间：1月29日，作为中央文革小组来电时间，批示：“印八开，二十万份。”同时，让清华“井冈山”驻沪联络站马上通知“红革会”，制止1月30日“红革会”批斗徐景贤的大会召开。还让秘书何秀文打电话给“机联站”，让王承龙立即去市电报局等候王力电报。此时已经是1月30日早晨6时左右。

30日清晨5时左右，从复旦大学校门口的方向，传来一阵阵高音喇叭的广播声，把忙碌了一夜的学生们从梦中惊醒。学生们从高音喇叭中听到：

“我们是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和‘新北大捍卫毛泽东思想战斗团’驻沪联络站的联合广播车，现在开始了播中央文革的特急电报，现在开始广播中央文革的特急电报……

中央文革特急电报

上海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同志并转复旦大学的同学们：

（一）复旦红革会的某些负责人，最近把斗争的矛头指向张春桥和姚文元同志，指向中央文革小组，而不是指向以陈丕显、曹荻秋为代表的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是完全错误的。

（二）复旦红革会的某些负责人，无理绑架上海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的革命同志，必须立即释放，并向他们道歉。

（三）人民解放军采取保护革命群众组织的行动，是完全正确的。扣押了人们解放军的师政委和参谋，是十分错误的，是绝对不能允许的。

（四）各群众组织内部之间的争执，应当采取协商和谈判的

方式解决，而不应当采取绑架、拘留等等非法手段。

（五）希望复旦和上海的同学们，帮助红革会的某些负责人立即改正错误。如果他们坚持错误，你们要同他们划清界限。我们将要采取必要的措施。一切后果应由制造这次事件的红革会的某些负责人和幕后的操纵人负责。

（请你们立即印成传单，出动广播车，广为宣传）

中央文化革命小组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九日”

接着，“工总司”的宣传车也开到复旦大学，反复播放“一二九中央文革特急电报”。在此之前，“工总司”在总部大楼上拉了一副“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的标语。

这时，关押徐景贤的宿舍房门“砰”的一下开了，有人高喊着：“紧急集合！快，紧急集合！”双人铺上睡觉的红卫兵们赶紧爬起来，一阵风似地奔出去，消失得无影无踪，房间里只剩下徐景贤和郭仁杰两个人，只见那些没有写完的大字标语，飞满了一地。

大街上，“炮打张春桥”海报纷纷被“中央文革特急电报”所覆盖。宣传车的高音喇叭，一遍又一遍播送着《中央文革特急电报》。一时间，上海到处是《中央文革小组特急电报》的大幅传单。人们目瞪口呆，许多人不信这份电报是真的，提出许多怀疑。还有人提出：即使真的是中央文革发出的电报，也要坚决抵制！

复旦园里一片肃杀之气。但是，组织“炮打”的红卫兵头头们并不服气，他们首先就怀疑这份特急电报的真实性，最先提出张春桥问题的是“孙悟空”和“炮司”，而不是“红革会”，电报

却完全是针对“红革会的某些负责人”；其次，也是最主要的，自从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立以来，还没有发过这样的特急电报。他们怀疑是张春桥自身搞的鬼。于是“红革会”、“红三司”、“东方红公社”，还有“大队部”的头头们：赵基会、劳元一、安文江、胡守钧、金应忠等人一起奔赴北京打探消息，并准备告状。他们担心上海北火车站被封锁，先乘公安干警的组织“联合兵团”提供的吉普车到达无锡，然后在无锡的一个小站转乘去北京的列车。他们组成“复旦革命师生赴京控告团”，胡守钧任团长。他认为“特急电话”有两个可能，一种可能是假的，另一种可能是张春桥欺骗中央，不管哪种可能，他们都要核实电报，上告中央。

## 第 471 回：搞情报，游雪涛“扫雷纵队”　提倡议，要过革命化春节

1 月 30 日早晨，“红革会”立即决定：

一、停止行动，包括大会、游行；

二、撕下一切反对张、姚的大字报，大标语；

三、释放徐景贤，朱永嘉和郭仁杰。

因为此时，“红革会”负责人劳元一已经接到清华大学“井冈山”负责人蒯大富的电话口信：

一、中央文革要发给上海一个电报，康生看过，语气很重，对上海会有震动，要劳元一有准备。

二、文革总会有牺牲，要想得开。

三、以后不联系了。

劳元一接到口信，立即打电话去北京，请蒯大富帮忙将上海“红革会”的情况转告中央文革小组，蒯大富没答应，并要红革会慎重考虑。蒯大富告诉劳元一说，特急电报是真的，中央文革已经给他蒯大富打过招呼，叫他不要卷入。蒯大富还说：“当初我在监狱中，张春桥是第一个来看我的，你们这样，我从感情上是不通的”。

上午 8 时，上海各造反组织在淮海中路市委党校开会，听取中央文革小组的急电。市“红革会”总部负责人马立新表示：“执行中央文革小组决定，但保留意见。”

上午，同济大学“东方红兵团”召开紧急会议，宣读中央文革小组的紧急通知。“东方红兵团”声明：“一定要保护张春桥同

志，态度要明朗，并立即进行大力宣传。”听说“红革会”要在人民广场召开“打倒张春桥大会”，“东方红兵团”决定派人去冲会场。

但是，这天的“炮打张春桥大会”流产了。

当天，同济大学“东方红兵团”出版的《东方红》第 9 号中，对“红革会”大加鞭挞。称“红革会”“炮轰张春桥，直逼中央文革，刮起一股反革命反攻倒算黑风”，要“砸烂他们的狗头”。并翻出老帐，称“红革会”在《解放日报》事件中，犯了左倾机会主义错误，它的头头犯了机会主义、分裂主义、大国沙文主义。

上午，复旦大学校园里到处是“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主席”的对联，几乎每个宿舍房间的门口都有，一进门则是“早已森严壁垒，更加众志成城”，横批是“我自岿然不动”。广播里播送的是“红军想念毛泽东”，“毛主席永远支持咱”。大字报栏尽是“红革会”、“三司”、“炮司”成员的表态：“张春桥就是不等于中央文革”、“坚决拥护中央文革的正确领导”，言下之意就是《特急电报》是不正确的、“谁欺骗毛主席就砸烂谁的狗头”，等等。校外十几部宣传车对着复旦大学广播《特急电报》，骂“红革会”是混蛋。

但就在上午，“红三司”发表声明，承认错误，表示坚决拥护《特急电报》的五点指示。

中午以后，校园里起了变化。“红革会”勤务组发表了《请罪声明》，复旦大学“东方红公社”中午经过讨论后也发表声明，承认错误，表示坚决拥护五点指示，并发动了新的宣传攻势。

“红革会”的许多成员不承认他们勤务组的“请罪书”，下午、

晚上接连开会，公开说“中央文革的电报是一株反毛泽东思想的大毒草”。当晚，复旦大学“红革会”1000 余人召开炮打张春桥大会。

31 日早晨,“红革会”总部从上海第一医学院转移到师范学院。“红革会”设在人民广场、南京路、外滩的有线广播台中，播音员依然在高音喇叭中持续炮轰张春桥：“张春桥欺骗毛主席，绝没有好下场！”“红革会”的文艺宣传小分队，还在外滩等处进行街头演出，炮轰张春桥。

这天，“红革会”仍在贴大标语：

“炮打张春桥!”

“张春桥是调动军队镇压学生运动的刽子手!”

“张春桥扼杀‘红革会’，目的就是保市委写作班、保市委、保自己!”

“张春桥就是不等于中央文革，谁欺骗毛主席，欺骗中央文革，就砸烂谁的狗头!”

大标语的落款是：“上海铁道学院‘杀到底’革命造反队宣”

31 日,“赤卫军上海市大专院校革命委员会”,简称“赤革会”,其所属复旦大学“赤革会”发表 7 点声明，支持炮打张春桥。上海外语学院、机械学院、铁道学院也有红卫兵组织表示支持。

1 月 31 日,“炮司”许云飞写了一封信给张春桥，要他在 2 月 2 日前接见“炮司”，不然上北京告他。许云飞又拿出要挟“走资派”的办法，误认为张春桥会做出让步。这回许云飞失算了，张春桥已不像过去那样，他一有要求，张春桥就会接见。这次，张春桥对他的要求完全没有理睬。许云飞买好了飞机票，准备和“炮

司”另两个头头红鸥、周谷声赴京告状。31 日晚，“炮司”在华东纺织学院召开核心小组扩大会议，红鸥、周谷声、许云飞 3 人坚持要到北京告状，其他人坚决反对，说你们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许云飞不服气，他一向认为自己是正确路线的代表，挑战似地反问：“对张春桥怀疑有什么错？”“张春桥是当权派，我们整他的材料，算什么黑材料？”

2 月 1 日，上海师院因为是“红革会的天下”，对立情绪比 31 日上午复旦大学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们甚至说：“我们就是怀疑中央文革的电报!”他们还进行了“炮打张春桥”的游行。

这天，张春桥和姚文元一起接见上海的一些红卫兵代表。姚文元说：

“上海的形势很复杂，左派要联合，右派也在集中。走资派在造反派里寻找代理人，我看，‘红革会’就是走资派的代理人!”

张春桥说：“确实，阶级斗争最复杂的地方，就是上海。上海两个阶级的力量都很强。这一次，牛鬼蛇神、帝国主义、美蒋特务都出来了，是大好事。不能把‘红革会’看成孤立的现象。‘红革会’代表了一种势力，是阶级斗争的反映。”

再说 30 日的徐景贤看到监视他的学生都跑光了，听到宣传车上高音喇叭广播的中央文革《特急电报》，高兴万分，知道他和郭仁杰自由了，正想着下一步何去何从时，看见“扫雷纵队”的游雪涛进来了。

游雪涛看见徐景贤后欣喜万状，亟不可待的握着他的手说：“可找到你了。一听到中央的特急电报，我就找了一辆车过来了，到处找你。走吧，赶紧回‘机联站’。”

说起这个游雪涛，那可是在上海文革史中不可或缺的人物。他是江苏无锡人，生于 1935 年，时任上海《青年报》文艺组副组长。他的家庭很贫苦，母亲 28 岁时便成了寡妇，靠她一个人做工养活了游雪涛几兄妹。

游雪涛 16 岁进工厂，1956 年，21 岁时入党，凭自己在工厂里业余刻苦学的文化，养成了爱读书、写文章的习惯，还特别爱写诗。因为经常给报社投稿，最终让报社看中，由工人变成了上海团市委《青年报》的记者、编辑。徐景贤和游学涛在文革前就有过多次接触，游学涛多次向徐景贤约过稿，特别是 1965 年，他们二人一起到北京参加全国青年文学创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互相更加熟悉了。

徐景贤在市委机关起来造反了，游学涛在《青年报》和团市委系统也造反了。但是，他不像其他参加造反的人们那样，眼睛盯着那些当领导的“走资派”，而是悄悄地物色了一些对特别活动有兴趣的年轻人，组建了一个总部就设在他自己的家里、名叫“扫雷纵队”的地下组织，开始了一种专业的情报特务生涯。

他在文艺界熟悉的人很多，他的妻子吴锡敏，是上海戏剧学院表演系毕业生，和祝希娟同班，很熟。毕业后分配在青年话团工作，与青年话剧团的造反派头头刘贵琴也很熟。因此，游雪涛与文艺界造反派来往很多，这些人是他家的座上客。游雪涛的第一份情报，就是 1966 年 10 月间，几经辗转而送到张春桥的案头的，反映上海话剧团某著名女演员因造反而受单位打击的情况。

造反后，游雪涛曾来到武康路 2 号找过徐景贤，说要给中央文革送材料，很紧急，买了飞机票，但团市委没批准报销，请徐

景贤给他在市委机关联络站报销。徐景贤听说他给中央文革送材料，就支持了他。

1967 年元月 4 日，张春桥与姚文元到上海后不久，游雪涛又找到徐景贤，说有一些重要的材料要送张春桥、姚文元。他拿出两份已经打印好的《扫雷简报》给徐景贤，里面都是反映上海一些当权派如何随便给群众签字发钱、刮经济主义歪风的情况，同时还附了一些照片和其它证据，如签字条实物等。

徐景贤看到材料的署名是“扫雷纵队”，便问：“这是一个什么组织？谁搞的？”

游雪涛说：“是我们几个人搞起来的。”

“地点呢？“

“就在我家里。”

“为什么要起这个名称呢？”徐景贤对这个在当时听起来并不是特别革命的、也不时髦的名字感到不解。

游学涛说：“我们的宗旨是要扫除无产阶级司令部前进道路上的一切暗雷。”

徐景贤将材料收下了。因为张春桥、姚文元每天都要派警卫员到武康路 2 号找徐景贤拿各种各样的动态和情况，“机联站”每天也都编《情况动态》给张、姚二人看，他就将游雪涛的这两份简报一并送给张、姚二人。

过了几天，游学涛又送来一些材料，是关于炮打中央文革领导人的动向，可在当时，上海并没有发生炮打中央文革任何成员的行为，但是在游学涛的材料里实实在在的反映了北京几个知名红卫兵在上海音乐学院宿舍里咒骂张春桥、姚文元的事情，于是

引起了徐景贤的注意。他问游雪涛："这些材料的来源是什么？"

游学涛说："我们'扫雷纵队'有一个人，跟北京红卫兵住在同一个宿舍里，这些话都是他当场听到的。"

徐景贤觉得消息比较可靠，答应他可以转送给张春桥和姚文元，并嘱咐他说：

"这次材料比较尖端，以后你要密封好了，亲自送来，你一式两份，假如我不在，你就送给留守的两个人，一个叫王钢，是从上海社会科学院调来的写作班机要秘书，另外一个叫陈冀德。"

徐景贤当场把王钢叫来，说："以后游雪涛送材料来，你收一收，但是要封好的。"

游雪涛当即对徐景贤说："好，我送一式三份来，有一份是给你的。"

《扫雷简报》送上去以后，很快就引起张春桥，姚文元的注意。有一天，徐景贤到兴国路去，姚文元当着张春桥的面问他："我们看到了《扫雷简报》，游雪涛这个人究竟怎么样？"

徐景贤说："这人过去是《青年报》记者，当过文艺组副组长，造反以后，他对无产阶级司令部还是紧跟的。"

姚文元又问："他的材料究竟是从哪儿来的？很奇怪，人家说的秘密话、私房话，他都有。"

徐景贤说："我只知道，有些材料是他派人伪装身份后，采取打进去的办法弄来的。"

姚文元听了，有些不大赞成此作法的意思，说："这么做，恐怕值得考虑一下。"

张春桥在旁边一直没说话，这时他说："'扫雷'这个组织我

知道，他们写的材料我都看了，还是提供了不少有参考价值的东西，比如北京的那几个学生，在上海音乐学院，那么咬牙切齿地骂我们，我是看了《扫雷简报》后才知道。当然，那些材料里肯定是有水分的，不可全信。”

张春桥让徐景贤叮嘱游雪涛：“要小心谨慎，你去搞人家的特务活动，人家也会来搞你的特务活动的。”

受到张春桥的默许赞扬，游雪涛受宠若惊，决定放手大干。

1 月 30 日，当游雪涛听到中央文革“129 特急电报”后，立即找了一辆汽车，到复旦校园里到处找徐景贤，终于将他们找到。在回“机联站”的路上，游雪涛对徐景贤说：“我们‘扫雷纵队’的人开始多起来了，而你们市委‘机关联络站’已经搬到市委党校去了，能不能把市委‘机关联络站’的对外接待处在湖南路口那幢资本家的房子让给我？”

回去后，徐景贤和“机联站”大总管程绮华商量，将那地方让给了游雪涛。于是整个“扫雷纵队”搬到湖南路口的洋房里，有了一个正式的地点。但是，他们仍属自发性团体，没有固定的经费来源，完全凭其成员自行解决。“扫雷纵队”的成员们之所以愿意跟着游雪涛这样做，除了他们都是些有冒险精神且狂热性格的人之外，当时文革造反的风潮形势允许，以及为中央首长张春桥、姚文元工作的说法，无疑会使他们深觉荣幸；同时，特工活动的神秘感，可能也是吸引他们投身于此的一个重要因素。

这时的上海玻璃机器厂，又爆出一个全国瞩目的大新闻。

上海玻璃机器厂，因为出了个潘国平，总是得风气之先。当时，上海人都知道“工总司”有个“潘司令”，还不清楚“王司

令”是谁？1967 年伊始，为了反对经济主义歪风，上海玻璃机器厂动员人们不回家，就地“抓革命，促生产”。眼见着春节临近，厂里又动员家在农村的工人春节期间不回家，在厂里坚持生产。

这天，上海玻璃机器厂 18 岁的青年工人章仁兴被厂里管宣传和政工的造反派头头找了去，拿出一封以他的名义写的倡议书请他过目。倡议书写道：“我到底要不要回乡呢？这个问题最近一直在我脑子里打转。经过再三考虑，我决定不回乡了。为什么我要做这样决定呢？我想，我是个革命工人，又是个造反队员，应当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做‘抓革命，促生产’的模范。”

章仁兴被挑中并不是偶然的。还在“工总司”成立那天，章仁兴跟着厂里的人去看热闹，当场参加了造反队，而且当即扔下自行车，跟着队伍爬上火车进京讨说法，见证了炮打中共上海市委的“安亭事件”。

他不但是厂里小有名气的造反队员，而且家在外地，每年都要回乡探母，这在以本地人为主的厂里是不多的，这就使得他成为春节不回家的豪情造反形象的最佳代言人。

对于春节不回乡的动员，作为造反派成员，章仁兴毫无疑问是积极表示支持的。如果连这点觉悟都没有，那还不如回家抱孩子，何必冒如此风险参加造反呀？章仁兴没有任何犹豫就在倡议书上签了名。

1 月 25 日，署名“章仁兴”的倡议书在《解放日报》以“革命造反派来信”的形式登了出来：

“在两条路线和夺权斗争进行得这样尖锐激烈的时刻，我们怎能丢下革命和生产,回乡去过春节呢？不能!不能!坚决不能!”

该报同时刊登的还有国棉31厂“毛泽东思想战斗队”的类似来信，并配发“本报评论员”文章宣布：“春节算得了啥！我们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的最盛大的节日来到了！”

国棉31厂，跟上海玻璃机器厂一样，也出了“工总司”的发起人之一的黄金海。上海《文汇报》发表“本报评论员”文章《战地黄花分外香》,深情地称赞“章仁兴的话说得多好啊。回乡探亲，毕竟是私事，是小事；听毛主席的话，抓革命，促生产，巩固刚刚夺来的大权，才是公事，才是大事。”

从1月25日这一天开始，全国各地的报纸纷纷刊登所谓“读者来信”和“倡议书”，大造舆论，提出：

“‘不破不立，不塞不流，不止不行’。我们要大破大立。围绕春节，大造几千年来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旧风俗、旧习惯的反。大立无产阶级的新风俗、新习惯，大立毛泽东思想。什么敬神、拜年、请客、送礼、吃喝玩乐，都统统见鬼去吧！我们工人阶级从来没有这些肮脏的习惯。我们有的是改造旧世界的力量，我们有的是砸烂一切旧制度的革命造反精神。地主阶级、资产阶级遗留下来的糜烂货色，我们要连根铲除，彻底焚烧。我们是旧世界的批判者，我们是新世界的创造者，让我们在全国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大联合，展开夺权斗争的关键时刻，度过一个最最具有历史意义的春节！”

4天之后的1月29日，中央便顺应“广大革命群众的要求”，发布了春节不放假的通知：“国务院决定：一九六七年春节不放假；职工探亲假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暂停执行，以后再补。”

北京火车站，宣传车开始反复广播该通知。许多准备回家探

亲的人，立刻到车站售票处退票。从包头去杭州的一个干部在北京转车时听到广播，毫不犹豫的换了回包头的车票。

## 第 472 回：周恩来，接见浙江省代表　发文件，红卫兵撤出军区

1 月 17 日，周恩来为解决红卫兵在浙江省军区绝食一事，代表党中央、中央军委、国务院决定，派飞机将浙江省军区司令员张秀龙、副司令员阮贤榜、政委龙潜和红卫兵代表一起接到北京来解决问题。

当浙江省军区领导阮贤榜等人和浙江的造反派红卫兵代表到京后，还没等中央解决他们的问题，杭州那边又出事了。中央《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公布后，1 月 26 日，浙江省军区举行全副武装游行，拥护中央这一决定。就在游行队伍回到省军区门口时，却与聚集在这里的“省联总”发生了大规模冲突，造成多人受伤。周恩来一方面严厉批评了龙潜、张秀龙；另一方面要在京的造反派代表给杭州“省联总”打电话，让他们立即组织工、农、学、干各方面组成的代表团赴京。

26 日下午，一个包括工、农、学、干各方代表的“浙江省革命造反代表团”，由浙江大学学生、“省联总”的李显通带队，从杭州乘火车前往北京，于 1 月 29 日到京。他们到京稍加休息，吃过晚饭后，就受到周恩来的接见。参加接见的还有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南京军区政委杜平，和先期已在北京的浙江省委常务书记李丰平、省军区副司令员阮贤榜以及首都驻杭联络站的林岗、浙江大学的刘英、石芸等人。

周恩来走进会场，先与被接见的代表一一握手，然后询问了浙江在文化大革命中发生的一些情况，还饶有兴致地向李显通问

及了杭州大学目前有多少师生员工及其在文革中的表现等。当省委办公厅的李菊麟汇报省级机关文化大革命情况时提了一个问题：

“周总理，我是办公厅机关党支部书记，每个月收党费时，总是多收了一位同志的党费，而且数量极大，这位同志究竟是谁，至今还不知道？”

这时，周恩来从坐位上站了起来，郑重地说：“这是一位十分可敬的革命老人，他就是我们的周建老！长期以来，他一直以民主党派的身份默默无闻地为我们党做统战工作。这在全国解放以前是很普遍的，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难能可贵的是，解放以后我们党取得了掌权地位以后仍一直不公开自己的身份继续以民主党派身份为党做统战工作，太令人敬佩了！这是毛主席决定的，叫我去做周建老的工作，而周建老则愉快地接受了这个任务。现在是应该公开他的身份的时候了，没有必要再隐瞒他的共产党员的身份了。”

然后，周恩来才又坐下非常感慨地对代表们说：“我今天看到你们在毛主席亲自领导下参加这场伟大的革命，从内心深处为你们感到幸福，感到自豪呀！想当初八一南昌起义，没有毛主席领导，起义失败了，后来到了井冈山，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四次反围剿都取得了节节胜利。第五次反围剿，由于王明路线占了统治地位，排挤毛主席，结果失败了！迫使红军不得不撤离井冈山，在国民党几十万大军的前堵后截下，红军从八万人到了遵义锐减到不到两万，付出了多么惨重的代价呀！遵义会议确立了毛主席的领导地位，红军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很快甩掉了国民党几十万

大军的堵截胜利地到达了陕北，建立了抗日根据地。毛主席指挥打仗，真是出神入化，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我们党有不少老元帅、将军，不少人出过国，留过洋，也有不少人在国内的军事院校毕业，他们都带过兵，打过仗，但打起大仗来谁都不好跟毛主席相比较！今天，你们在毛主席的亲自指挥下参加这场伟大的文化大革命，真的是太幸福啦！不过，你们要作好思想准备，一旦没有毛主席，你们都得要作好坐牢、杀头的思想准备！”

当杭州市“工人革命造反总部”代表向周恩来汇报杭州市“红总”有关临时工、合同工的问题后，周恩来对谭震林说：“他们的话说明了一条真理，这个问题 6 月 1 日以前有，6 月 1 日以后也有。过去的临时工，都是农民来做的，亦工亦农不是很好吗？都变成了正式工，行吗？你们脑子里要想一想，他们为什么变成正式工，国家的财政开支合理吗？到底是产业工人，他们懂得这件事，我们没有他们懂。不要以为他们哭哭啼啼都是有道理的，有些人生活很困难，就作个别问题处理，个别问题个别解决。刘邓反动路线一定要批判。什么问题都是刘邓反动路线，这样不科学，我非常赞成你们夺权，国家大事大家的处理，我们花了几十年才取得一些经验，你们比我们幸福，有毛主席领导，不用那么多时间，有句封建的话：‘当家才知柴米贵’，这句话是封建的，但反映了一部分的真理。”

当“省联总”的代表汇报省委有人搞经济主义，给步行串连学生发六大件等情况时，周恩来说：“我准备向中央提个建议，春节以后，初中生可以考虑开课，数理化可以教，语文与政治可以学习毛主席著作和毛主席诗词，教师不行，你们大学生可以去教

嘛！中学教师有没有，解放后培养出来的，不能都打倒，打倒了没有事好做了。”

当周恩来听完代表们汇报有关浙江省军区的事情后说：“你们到军区去的斗争是对的，我们支持你们，这是第一条。

最近军区的事件，由浙江省委应负完全责任，军区一些领导人员有部分责任，这些可都是省委引起来的嘛！这是第二条。

第三条，冲突不仅一次，有大有小，这说明军区部分负责人没有真正站在中央，军委这边，没有很好执行军委关于军队要站在革命左派这一边的命令，特别严重的是最后一次，没有坚决站在革命左派这一边，中央对此很关心，主席很关心。现在中央决定，派出南京军区杜平同志去浙江，浙江军区副司令员阮贤榜同志也一起回杭州，会同浙江革命造反派联合总指挥部指定的正式代表，进行彻底调查，查清肇事凶手，对受伤者进行慰问，如查有幕后指挥者，严加查办。

关于两个孩子的问题，应交到杭州市公安局去，公安部也派一个代表去。有原告，有造反派代表，按中央规定原则，严肃处理。打人的可能不止两个。

最后一点，对待群众运动犯有严重错误，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责成他们向群众检讨。”

周恩来提到的“两个孩子”的问题，就是指引发围困浙江省军区事件的那起浙江省军区领导的孩子打死人的事情。

接着，周恩来叫秘书周家鼎拿来《中央军委命令》，即“军委八条”给代表们看，并询问他们：“今后大家都按这八条办能行吗？”代表们看了后一致表示坚决执行。周恩来很高兴，又拿出

事先打印的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关于浙江最近发生事件的决定》逐条与代表们一起边读边修改，征求大家的意见。

当浙大的一位同学坚持要求周恩来把浙江省军区定性为“资产阶级司令部”时，周恩来十分耐心地对浙江大学的这位同学说：“你把它定为资产阶级司令部，那么军区下面的战士们会有什么样的感受？战士们都是无辜的，他们不应该背这样沉重的包袱，少数领导人犯路线错误总不能殃及无辜。再说，犯路线错误的人，我们也只能教育，希望他们能认识错误，改正错误。”

在谈到如何处理军区事件时，周恩来对代表说：“你们搞政治斗争，应抓大是大非问题，不要抓一句两句错误的话，我们党内有一批人是从东方大学回来的，多数是好的，有不少牺牲了，但他们的作风不好，尽抓一些琐碎的事情，还有一些从中山大学回来的更坏，大家讲话，他不发言，都记下来，到党小组会上整你，搞特务活动，弄得大家一天到晚过那惶恐生活。主席从遵义会议后，就抓党内整风，抓了 10 年，才把党内思想统一了，七大主席作了报告，3 年多时间，取得了全国胜利。”

然后，周恩来对当时在场的阮贤榜副司令员当面交代，要他接受教训，转变立场，支持造反派。阮副司令当场表态，回去以后一定要坚决按中央的要求支持浙江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

周恩来说：“中央希望造反派同志见到中央的决定后，立即离开军区。”

他最后对大家说：“我想同你们再谈谈夺权问题。”

他说：“至于浙江目前的形势，省里的夺权问题想征求大家的意见，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山西的形式，先建立省革命委员会

等，另一种是先成立军管会，然后过渡到成立省革命委员会。”

代表们一致赞同以军管会的形式过渡为好。周恩来又说，“夺权怎么夺？我们有五点建议：第一，夺权要发动群众，从下而上。如果条件不成熟，宁可暂时不夺。造反派要联合起来。造反派如果不能团结起来，怎么夺？”他说：“浙江是国防前线，不宜夺权太晚。”

“第二条，以造反派为核心来夺权。”

“第三条，夺权应该以本单位革命造反派为主，外面革命造反派为辅，革命总是靠自己嘛！”

“第四条，夺权，一般是夺革命的领导权，生产业务监督权。”

“第五条，一个部，一个省的夺权，总是从上而下地夺。先把一个部或一个省夺过来，省里不夺，地，县委一起来更被动，省里夺了，省里可以派人到下面去煽风点火。”

浙江代表问：“江华该不该打倒？”“浙江省委被夺权后，要成立‘革委会’，结合谁比较合适？”

周恩来说：“浙江省委的工作在文化大革命前是好的，成绩是主要的，是有贡献的。在三年困难期间，浙江省委顾全大局，遵照中央要求支援上缴了大批粮食；江华是井冈山的老同志，是少数民族，主席多次住在杭州，安全工作做得好，主席再三表示要保。”

1 月 30 日，中央发出《关于浙江最近发生事件的决定》。决定中说：“浙江省革命造反联合总指挥部最近关于追查黑材料，寻找陈伟达进行批判，要求当局执行军委三点指示，要求当局将高干子弟交出归案法办等等，所进行的群众斗争是革命行动，中央予

以支持。”“由于上述斗争不仅为浙江党政军当局所压制，而且引起多次群众斗群众恶例，特别是一月廿日事件，又在中央、军委上述的决定发表之后，更加不能容许，这样引起革命造反联合指挥部所属群众，先后进驻军区大院、礼堂，其责任应完全由浙江省委，部分由军区某些领导人来负。中央对此表示极大关怀。”“中央希望浙江革命造反联合总部所属群众在中央这一决定传达后，主动离开军区大院、礼堂。在未离开前，双方不许再有任何挑动对方的言论和广播，传单宣传。”

当天下午，周恩来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休息室应“浙江省革命造反代表团”的带队、浙江大学外文系学生、“省联总”的李显通的要求，单独接见了他。

李显通一开始就问：“昨天您在接见我们时曾给我们打招呼，一旦主席不在了，要我们作好坐牢、杀头的思想准备。我听后怎么也想不通，所以要求您单独接见一次。”

周恩来听后，笑笑对他说：“年轻人，听了你提的这个问题，说明你很单纯，也很坦率。我们是过来人，应该把我们一些真实的情况和经验教训告诉你。从你所提的问题中，我觉得起码有三个基本问题需要解决：第一，你必须记住，人的一生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

说着，周恩来拿起一份材料说：“这是浙江支左部队对你的调查材料，就拿你来说吧，你从小学到大学是全靠党和人民用助学金把你培养起来的，你懂事也早，学习很用功，个人表现也好，年年被评为三好学生、优秀共青团员，又担任学生干部，应该是一帆风顺过来的吧！但这不能保证你今后的一生都能一帆风顺，

没有坎坎坷坷了，实际情况却往往相反，哪怕是生老病死也是不可避免的。有句古语，人无远虑，必有近忧！何况社会上阶级斗争这么复杂，眼光要放远些，后还有很大的一段路要走。

第二，你脑子里要消除一个观念：不要认为一个人的地位高、职位高，他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水平就高，人品就高。这两者是不能划等号的。尤其是处在那个年代，大革命的风暴一来，很多人跟着历史的潮流，纷纷参加革命，更何况有些人是抱着各自的目的来的，什么样的人都有。在战争的年代里，一场大的战役打下来，许多人英勇牺牲了，活下来的人自然一步步地上来了。有些人地位越来越高，职务越升越大，这是历史的原因造成的。但不少人脑子里想的却是过去农民起义的那一套，总认为天下是老子打下来的，革命成功了，老子就要坐天下，就应该享享福了。”“我们在进北京城之前，毛主席就向全党打了招呼，我们共产党人就不能走过去农民起义的老路。”

“第三，要充分认识这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这是一场反修防修的伟大斗争，是一场涤荡一切帝修反污泥浊水的大革命，是革我们曾经革过命的命，而且还要在人们灵魂深处闹革命，要触到每一个人的灵魂。因此，国内外一切反动派都对文化大革命怕得要死，恨得要命，他们竭尽一切造谣诬蔑之能事，千方百计地对文化大革命进行丑化和攻击，时时刻刻地对文化大革命进行全面的否定。”

1 月 31 日，浙江省赴京代表团向中央文革小组汇报情况，中央文革小组王力接见了他们。接见时，王力问他们什么时候回去？并对他们说：“越快越好，大革命要快，越快越好。”

代表们汇报到杭州“红色劳动者总部”，拿了中央劳动部和全国总工会与“全红总”签的“联合通告”，要合同工、临时工统统转正时，王力说志：“总工会、劳动部那个文件是非法的，临时工都统统接受进来，扩大了工人队伍，又要重犯 58 年的错误，要有几条办法。上海也是这样，合同工、临时工、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精简回乡的工人，回去了 100 多万人，都要求分配工作，成立了这个总部。这些组织不是社会主义的组织，不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革命组织，要取缔。他们在那里做工就参加那里的革命组织，不要单独搞什么组织。

总工会、劳动部发那个文件，是故意捣乱，对文化大革命是破坏。造反派要讲原则，讲道理，他们要斗你就让斗吧，斗得光荣，“全红总”的头头已经抓起来了，组织也已经瓦解了。造反派要讲原则，要坚持原则。临时工、合同工问题要搞几条，请你们先写几条给我们参考，一条是反对这个制度，一条是在运动中不能打击他们，一条是按原则办事，该回去的还是回去。再一条是不能单独建立组织。请你们根据下面碰到的问题，写四、五条，最多六条，再不要多了。”

学生代表回到杭州后，大量散发“周恩来谈江华”的传单。但“省联总”还是坚持要打倒江华。在周恩来谈话之前的 1 月 26 日，“省联总”主办的《红色风暴》就在第一版以《砸烂省委，打倒江华》为通栏标题，发表了《江华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罪行铁证如山》的文章。说江华“与彭真唱一个调子，矛头直指毛主席”；“公然对抗毛主席的号召，篡改毛主席的话”；“公然反对三面红旗”，等等。“省联总”觉得：不打倒江华，

浙江的“文化大革命”怎么搞法？炮打司令部，江华是主帅，因此非打倒不可。而浙江大学“红暴会”则坚持要打倒曹祥仁、赖可可和沈策。从此，浙江的造反派开始分为两大派——“省联总”和“红暴会”。

2 月 2 日，进驻浙江省军区的红卫兵撤出军区大院。周恩来指示浙江省军区：要打锣放鞭炮热烈欢送。

## 第 473 回：陈里宁，演讲成反刘明星　论夺权，王力谈《人民公社》

1 月 30 日，北京大学“新北大捍卫毛泽东路线联络站”的《动态报》43 期刊登了从国民党江苏省反省院《半月刊》摘录的高教部“延安公社”卢正义的《转变》一诗：

转变

卢树森　　（卢正义的化名）

我抛弃了旧日的路程，

　踏上了新的道路。

这不是因为旧路的荆棘丛生，

　是因为荆棘的尽头找不到花园。

我抛弃了旧日的路程，

　踏上了新的行程。

这不是因为旧路的崎岖险恶，

　是因为崎岖的道上找不到山泉。

我憧憬着美丽的花园，

我渴望着清澈的山泉，

我抛弃了旧日的行程，

踏上我新的道路。

《抄自伪江苏省反省院半月刊第二卷第七十一期，民国二十四年二月十六日见报》

他们认为这是一份变节书。

1 月 30 日，清华大学“红教工”召开“控诉刘邓反革命专政大会”，请陈里宁去做报告。经戚本禹同意，陈里宁被接到清华大学大礼堂演讲。

陈里宁对批判刘少奇的材料早已烂熟于心，演讲时口若悬河、滔滔不绝，现场气氛十分火爆。清华的大礼堂被慕名而来的学生挤得满满当当，可仍有许多革命热情高涨的年轻人不能涌入，最后只得在外边安装上高音喇叭，让坐在草坪上的人也听得清楚。

陈里宁在报告中说：

“从 1957 年开始，我就怀疑上了刘少奇。1956 年 9 月，在‘八大’会议上，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作了政治报告，宣布中国基本上已经消灭了剥削阶级，‘我国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现在已经解决了’。我把这个论点与列宁、毛主席著作对照，察觉到刘少奇的观点是反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

“1959 年 9 月，从批判彭德怀的庐山会议上下来，刘少奇在军委扩大会议上讲话，说，‘一个时候的、范围不大的一左一右的领导，就是正确的领导’，飞机驾驶员‘一个时候左一下，一个时候右一下，他就是一左一右的’。又声称，‘我这个人，历来是积极的提倡个人崇拜的，现在我还要搞毛主席的个人崇拜，还要搞林彪同志的、小平同志的个人崇拜’。这两句话，我用心琢磨一段时间后，对刘少奇就更怀疑了。”

“我认识到，不揭发刘少奇反毛泽东思想的言行，我们革命者是有罪的。如果刘少奇的阴谋得逞，就会使党和毛主席以及无数革命前辈、革命先烈打下的无产阶级江山付之东流！想到这里，

我就坐立不安、通宵不眠。”

1963 年 11 月，陈里宁给毛泽东写了长达万字的信，交给湖南省委书记张平化，托他转呈毛主席。结果，不仅信被扣下，自己也再次被送进精神病院。

此次“二进宫”，医生发现陈里宁的病更为严重了。此间的一份病历，记下了病人对刘少奇的十多个怀疑，主要有：

刘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和《论党内斗争》违背了《矛盾论》和《实践论》；

刘少奇与普列汉诺夫亲如一家、亲密拥抱；

刘带领爱人出国游马路，游山玩水；

刘当权以来，不是过左，就是过右，像开汽车一样，一左一右；

怀疑刘的爱人是特务；

刘发表的反修文章观点不对，很勉强；

刘工作不深入基层；刘访问越南后多了一个“万岁”，“刘主席万岁”。

几个月的治疗后，陈里宁又回到了机关。可没过多久，又旧病复发。1964 年 7 月，陈里宁向机关党支部宣传委员王某倾诉自己对刘少奇的怀疑，王某立即写了检举信，机关党支部遂召开大会，勒令他检讨反刘少奇的罪行。到了这一年 10 月，陈里宁的病情日趋恶化，反刘言论也就更为密集，连续写了 30 多封信，单是给毛泽东主席，他就写过三封信，其他还分别致林彪、周恩来、康生等中央领导。10 月 13 日，他在致林彪的信中说，他读了《解

放战争回忆录》里的一篇文章，知道在毛主席去重庆谈判期间，刘少奇在党中央的一次会议上做出决定，把南方的一些部队调驻北方，这样既可巩固北方的解放区，又可使这些部队在内战发生后，不致孤悬敌后而被敌人吃掉，同时对谈判也有好处。陈里宁断定刘少奇的决定是“犯罪行为”。他说：“我仔细想过此问题，认为与毛主席的战略战术思想是根本对立的，实质是与蒋介石遥相呼应，摧残有生力量，布置一次围剿，使伟大的工农红军集结一处，便于在半路拦击，暴露我游击队目标。”陈建议“林彪元帅同志”，“派人专题调查研究一下这些事件的真相。”

从陈里宁的信上看，他思想上已走火入魔，但行文上却是文从字顺，不见病态。这真让医院和他的机关犯了难，医院的诊断总是“精神分裂症”，却也加上了这样的鉴定文字：“生活上一直表现尚正常，仪态整洁，表情自然，意识清楚，定向力、理解判断力、记忆力，相当好。”

1964 年 11 月，陈里宁第三次送进精神病院。医生的诊断是：精神病复发，仍为精神分裂症。又不忘加上一句：“其所以出现反动言论，乃是原来反动思想在精神病症状上的反映。”

陈里宁在清华大学的报告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中央和地方上的各机关都派人来请他作报告，历史所为此还专门成立了接待办公室。《新时代狂人日记》不断被翻印，全国各地翻印的数量更是不计其数。陈里宁的报告录音带也流传于全国各地，甚至包括农村。

1 月 28 日，主管农林口的副总理谭震林给毛泽东并中央文革小组写报告，谈了农垦部、农业部、水产部等单位开展文化大革

命的情况及自己的看法，表明态度。30 日，毛泽东将谭震林的报告批给林彪和周恩来：

林彪、恩来同志：

此件值得一阅。党、政、军、民、学、工厂、农村、商业内部，都混入了少数反革命分子、右派分子、变质分子。此次运动中这些人大部都自己跳了出来，是大好事。应由革命群众认真查明，彻底批倒，然后分别轻重，酌情处理。请你们注意这个问题。谭震林的意见是正确的。此件请周印发较多的同志看，引起警惕。

毛泽东

一月卅日

1 月 30 日，毛泽东还在陈伯达 1 月 29 日送审的《红旗》杂志一篇题目叫“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的社论稿上批道：

林彪同志：

此件我看了，认为很好，并作了一些修改，请你看一下，退还陈伯达同志。

毛泽东

一月卅日

如有修改，请告伯达。又及

毛泽东对社论稿做了如下修改：

一、“必须用毛泽东思想为武器，去克服自己头脑中和自己团体中的本位主义、小团体主义、分散主义、非组织观点、极端民主化、自由主义、主观主义、个人主义等等错误倾向。所有这些违背毛主席教导的、妨碍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的思想和行动，

都是资产阶级世界观的表现，都是当前尖锐的阶级斗争在革命队伍内部的反映。这些问题，属于人民内部矛盾，要根据毛主席一贯提倡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政策和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去解决，多做自我批评，而不要互相攻击。”

二、“认为只要是当权派，就一概不相信，这是不对的。不分青红皂白，反对一切，排斥一切，打倒一切，是违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阶级观点的。”

三、“对于犯有错误的干部，要正确对待，不能一概打倒。只要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而又坚持不改和累教不改的，就要允许他们改过，鼓励他们将功赎罪。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这是党的传统政策。只有这样才能使犯错误的本人心悦诚服，也才能使无产阶级革命派取得大多数人的衷心拥护，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否则是很危险的。”

四、“各级干部，都要经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考验，都应该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建立新的功劳，不能躺在过去的成绩上自以为了不起，看轻新起来的革命小将。对自己只看见过去的功劳，而看不见今天的革命大方向。对新的革命小将则又只看见他们的某些缺点错误，而看不见他们的革命大方向是正确的。这样的看法是完全错误的，必须改过来。”

五、“在当前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及其在党内一小撮代理人决战的阶段，坚持反动立场的地主、富农和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坏分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美蒋特务，都纷纷出笼。这批牛鬼蛇神，造谣惑众，欺骗、拉拢一些不明真相的人，成立反革命组织，疯狂地进行反革命活动。例如，所谓‘中国工农红旗军’，

所谓‘荣复军’、‘联合行动委员会’以及其他一些被修正主义分子组织起来的名为‘革命派’，实是保字派的组织，就是这种反动组织。这些组织中的多数群众是受蒙蔽的，是应当争取教育的。但是，这些反动组织的一小撮头头，却处心积虑地炮打无产阶级的革命司令部，向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袭击革命群众组织，暗害革命群众，收买职工，停止生产，中断交通，破坏和抢劫国家财产。他们趁火打劫，妄想变天。这种反动组织，有的就是在顽固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指挥下进行反革命活动的。这种反动组织，是建筑在沙滩上的，一旦被群众识破，就会立即土崩瓦解，一小撮头头就会被群众揪出来。”

六、“毛主席号召人民解放军积极地支持和援助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坚决地反对右派。毛主席亲手缔造的伟大的人民解放军，热烈地响应毛主席的号召。人民解放军正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为社会主义事业创立新的伟大的功劳。这是人民解放军的光荣任务。”

这篇社论是作为 2 月 3 日出版的《红旗》杂志第三期社论撰写的，却在 1 月 31 日《人民日报》上提前转载。社论高度评价了上海的一月夺权过程，将其称为“一月革命风暴”。社论说：“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里夺权，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新阶段的战略任务，是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同资产阶级及其在党内代理人的决战。这个革命的大风暴是从上海开始的。上海的革命群众把它叫做伟大的‘一月革命’。”“‘一月革命’的风暴正在席卷全国。”

这是“一月革命”一词，第一次见诸于中央报刊。虽然社论

里说“上海的群众把它叫做伟大的一月革命”，而这一新名词的“发明权”其实应属于张春桥。他曾说过：“苏联的‘十月革命’，是一场伟大的人民革命。我们上海的‘一月革命’，也是一场伟大的人民革命。苏联的‘十月革命’发生在 1917 年。整整半个世纪之后——1967 年，在我们上海爆发了‘一月革命’。这两次革命，都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深刻的大搏斗。”

社论说：“去年六月一日，毛主席就把北京大学的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称为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北京人民公社宣言。这时，毛主席就英明地天才地预见到我们的国家机构，将出现崭新形式。”

就在毛泽东对这篇社论作出批复的当天，1 月 30 日，王力在接见北京广播电台两派群众组织时提出了“北京人民公社”的设想。他说：“北京市联合，要按毛主席指示，要有三方面的人：革命群众、军队、北京市委内坚持站到毛主席这方面来的人，这样形成一个核心。将来的形式，可能还是‘北京人民公社’。”在这里，他提出了由群众、军队、干部三方面的人共同成立“北京人民公社”的说法。

1 月 31 日晚，王力在《人民日报》社谈论《红旗》杂志第三期社论精神时再次提到这个问题，他说：

“现在是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了……三方面协商建立临时的权力机构，散着不行，这是临时的政府，是过渡，过渡以后就成立巴黎公社式的北京人民公社、上海人民公社。我们主张建立人民公社，毛主席 58 年就想建立的城市人民公社。这要经过一个过渡，可能再要经过一个筹委会，才能达到彻底的完全的形式。”

他还说："你们要作理论上的准备，要学习二月革命到十月革命的历史，研究苏维埃的经验，我们 17 年的经验，巴黎公社的经验。其实苏联有很多的东西是不彻底的。"

他还按照《红旗》杂志第三期社论的精神提到了干部问题。他说："现在要提出对干部的问题，像刘格平、王效禹……他们比较早的拥护毛主席的路线，受到了刘邓路线的打击，有这样的干部，但还是少。主席的思想是要这些人参加这场大革命，'从床底下拖出个黎洪元来'，这样的都要，只要他站在毛主席一边，只要不是死顽固。《红旗》社论提出要立新功，这是主席思想，不能老躺在过去的成绩上，不能像过去那样当老爷，不能恢复到过去一样；……请同志们注意：主席在社论中加了两个地方：社论两次指出：'惩前毖后，治病救人'都是主席加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这是党的传统政策。'只有这样才能使犯错误的本人心悦诚服，也才能使无产阶级革命派取得大多数人的衷心拥护，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否则是很危险的。'这是主席加的。"

他说："《人民日报》、新华社、广播电台也是人民公社，一切都是公社原则，要创造，这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创举。"

## 第 474 回："井冈山"，河南炮轰刘建勋　黑龙江，三结合组织夺权

1 月 22 日，郑州又爆出了一个大新闻，曾受到毛泽东表扬的，在文革中第一个写出大字报支持学生造反的省委第一书记，已调任北京市委任常务书记的原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刘建勋，在郑州又受到了炮轰，大字报的标题是：《27 个为什么——刘建勋是什么人》，署名是全国赫赫有名的左派组织----"清华井冈山驻郑联络站"。

大字报对河南省的文化革命运动提出质疑，认为河南省委的阶级斗争盖子没有揭开，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没有得到彻底批判，其原因就在于没有把矛头对准河南省的头号当权派刘建勋，而是"翻 58、60 年的老账，先搞死狗吴芝圃"。文中说："为什么中南局从陶铸、王任重到张平化，出了那么多两面派，而偏偏刘建勋是个'单面派'？如果刘建勋果真是个革命派，为什么革命群众把陶铸、王任重揪出来之前，不见他揭发陶、王问题，揪出来后还是无声无息？刘建勋和陶铸、王任重究竟是什么关系？为什么从省委揪出来的黑帮分子，全是吴芝圃的老班子，而刘建勋带来的班子却纹风未动？为什么一些全省闻名的革命派，一度敢冲敢闯，后来却对刘建勋态度变得非常暧昧？为什么一些人高喊炮轰省市委，却放过省委的头号当权派刘建勋？……刘建勋究竟是什人？"其实大字报是暗指刘建勋一再表态支持的"郑大联委"与刘建勋关系暧昧。在列举了 27 个"为什么"后，大字报明确提出："千军万马，杀向省市委！万炮齐发，猛轰刘建勋！"

由清华“井冈山”出面炮轰已调任北京的刘建勋，这张大字报在河南引起的思想混乱可想而知。本来这时郑州市大中学校造反派在夺权问题上已经出现了矛盾。郑州工学院“革命造反队”等少数造反派主张先揭发斗争文敏生、纪登奎、戴苏里和郑州市委第一书记王黎之，并把他们看管起来。而“郑大联委”、河医“东方红”等多数造反派组织则主张先联合起来夺省委文革小组的领导权，再揭发批判。

1 月 18 日，河南“红卫兵造反司令部”等组织在郑州批斗文敏生、纪登奎、戴苏里等人。当晚，文敏生在郑州粮食学院召开省委常委会，决定：1、如果文、纪、戴被看管起来，由王维群、李庆伟、王庭栋负责主持工作。2、如果“郑大联委”等革命造反派要夺省委文革小组的权，坚决支持。“革命造反派夺权，坚决支持，保守派夺权，坚持顶住”。

就在郑州《27 个为什么》的大字报贴出第二天，1 月 23 日，河南省军区按照中央军委的指示，正式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他们首先表态支持“清华井冈山驻郑联络站”这个全国闻名的左派组织，并将刘建勋、纪登奎作为走资派上报上级党委——武汉军区党委，同时还在河南省把是否支持“清华井冈山驻郑联络站”，是否打倒刘建勋，是否支持《27 个为什么》的大字报作为衡量是不是左派的标准。凡是不同意打倒刘建勋的群众组织就不是“左派”，而是“保守派”。

1 月 24 日，郑州部分造反派组织召开“重炮猛轰省市委中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建勋、文敏生、王黎之”大会。《27 个为什么》的作者应邀出席了大会，并在会上代表“清华大

学井冈山兵团驻郑联络站”发言，表示坚决支持这个革命的大会，坚决揪出河南的头号两面派刘建勋，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27 个为什么》这张大字报的作者，原来就是与蒯大富在刘少奇问题上出现分歧的清华大学学生、烈士子弟唐伟。1 月 25 日，由郑州工学院“革命造反队”等组织掌控的《郑州晚报》第三版上登载了署名“清华井冈山兵团驻郑联络站”唐伟的发言稿:《撕破河南省委两面派的画皮!》

1 月 27 日，郑州工学院“革命造反队”等组织召开的会议，还是要夺《河南日报》的权，“郑大联委”、河南医学院“东方红”等组织坚决反对。晚上，双方在《河南日报》社发生冲突。

28 日，河南医学院“东方红”和“狼牙山纵队”为《郑州晚报》连续刊登唐伟的《27 个为什么？》和《撕开河南省委两面派的画皮》等文章，查封了《郑州晚报》社，并和报社门口的“清华井冈山驻郑联络站”广播宣传车发生冲突。解放军 155 部队，即郑州炮校的“红造委”赶到现场，说“清华井冈山是真正的革命造反派，其驻郑联络站也是真正的革命造反派”，支持唐伟。

此时，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长征》纵队的鲁梦铭等人正在郑州大学，他们明确表态不同意唐伟的做法。1 月 30 日，署名“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长征》纵队”发表了《致唐伟同志一封公开信》，信中说：“在学校唐伟同志就多次犯了右倾错误，这次是唐伟在反击 12 月黑风时所犯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重演，并且比以前更大，更严重。”

同日，北京传来蒯大富发表的关于河南问题的《严正声明》：

（1）清华大学井冈山没有指定任何人在郑州设立联络站，所谓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驻郑联络站根本不能代表我兵团总部。

（2）唐伟同志在我校兵团总部充当托派，一贯投机，搞分裂。但是这次在郑州的行为是否是革命的，请郑州革命群众监督。

（3）我们坚信郑州市人民，能在毛泽东思想阳光下，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4）河南军区同志要坚决支持真正的革命左派，对一小撮混蛋或坏蛋进行专政，不管他们打着什么旗号。

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　蒯大富

一九六七年元月三十日下午两点

1 月 30 日，河南省军区 3000 多人举行武装游行，欢呼中央军委《八条命令》的公布。郑州工学院“革命造反队”和保守派组织“公安公社”、河医“红卫公社”、郑大“红卫兵战斗师”、六厂“赤卫队”等紧随其后。队伍行至郑州大学门口时，前面部队高呼：

“镇压反革命组织！”

后面群众高呼：

“打倒刘建勋，气死党言川！”

这天，郑州工学院“革命造反队”再次闯进《河南日报》进行夺权。《河南日报》的“天不怕战斗队”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与他们进行了一场口头和肉体相搏，最终还是被赶出了报社大楼。郑州工学院“革命造反队”查封了《河南日报》，并成立了“河南省革命造反派查封监管《河南日报》委员会”。

1 月 31 日，《郑州晚报》发表号外：“热烈欢呼解放军支持清华井冈山驻郑联络站”。这天，已经濒临垮台的“郑大战斗师”、“省直造总”等保守派组织重新崛起，拉起队伍纷纷去河南省军区报喜。

面对唐伟以清华“井冈山”的名义炮打刘建勋，许多人尚可理解，因为他是当权派吗，谁都可以炮打。但是面对造反派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曾跟着刘建勋支持造反派的河南省大多数领导干部却不知所从了，只好采取观望等待的态度。省委代理第一书记文敏生到河南省军区找第二政委何运洪为造反派学生说话，被拒绝。

1 月 21 日，受周恩来委派，宋任穷和东北局书记喻屏来到哈尔滨。

1 月 23 日，黑龙江省 23 个单位的“造反团”在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潘复生、黑龙江省军区司令员汪家道的支持下，成立了“联合总部”，发表《红色造反者联合接管省市党政财文大权的通告》。

1 月 27 日，哈尔滨“大专总部”在哈军工大礼堂召开各高校“造反团”分团负责人会议，东北局第一书记宋任穷在会上作了检讨。他说：

“我和喻屏同志这次来哈尔滨，一是我们坚决支持哈尔滨红色造反者的一切革命行动。因为红色造反团的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一是向你们学习。并在这里，我代表东北局作初步检查。我们忠实地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镇压了革命，打击了一大批革命小将，现在回想起来，感到十分痛心，我向大家沉痛地检讨，并表示坚决改正！同红色造反者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

在一起！”

与会者以热烈的鼓掌，表示通过他的检讨。

1 月 28 日下午，“红色造反团”31 个总部的联席会议在北方大厦三楼会议室召开。师院学生范正美在会上提议夺权。

范正美的意见遭到工大“造反团”负责人刘录等人的反对。刘录认为，黑龙江省夺权的时机还不成熟，一是省委主要领导人潘复生，文革前期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虽然表示支持造反派，但还没有彻底亮相，还需要有一段观察和考验的时间；二是黑龙江省工人运动还没有完全起来，现在运动主要控制在大专院校造反派手里，领导者是学生造反派领袖，属于小资产阶级分子，而不是工人领袖。

哈尔滨石油配件厂的刘雪峰首先表示不同意刘录的意见，他说：“潘复生在文革初期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但他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之后，立即转变立场，站到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边，作了检讨，承认错误，态度是好的。至于还要考验，这是相对的。”

说到学生领袖，刘雪峰说：“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有过教训，当时有人强调要工人领袖领导，结果把一个理论水平很低，能力很差的工人出身的向中发推向领导岗位，使革命吃了大亏，难道我们还要重复以前的错误不成？”“目前哈市工厂造反派头头，大多数也是工厂里的技术员，他们也是大学生或中专毕业生，千万不能唯出身论，搞形而上学。”“我就是工厂夜校的教员，现在当上了石油配件厂的造反派头头，得到广大工人群众的拥护。照刘录等人这么说，我就不够格。”

来自工厂的孙宝生也插话说：“我也是工厂的技术员，我们厂

造反派的主要头头基本上是工厂的技术员。照你这样说，工人不起来，我们就不能造反了。岂有此理？”

接着是农民代表、郊区总部的杨锡山等许多人发言，都反对刘录的提法。

范正美补充说：“至于潘复生，应该说已经亮相了。在八届十一中会上，他明确站在主席一边；在造反派最困难的几个关键之时，他敢于挺身而出，支持造反派，应该说是非常难能可贵的。毛主席说，允许犯错误，允许改正错误。我们同意刘雪峰等同志的看法。像他这样的干部，能高姿态地检讨，就是好的。我们也觉得可以了。如果连潘复生这样的干部，我们也不敢依靠，那就只能自己孤立自己。”

这时，工大其他人发言表示，刘录的意见，只是刘录本人的意见，并不代表哈工大。刘录等人也没有在会上表示继续坚持己见，会议对哈尔滨市造反派近日采取大联合大夺权行动形成了决议。会议转到成立什么组织机构来接替旧省委、旧省政府的议题上。

范正美说：“我认为，这个组织叫做‘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掌握全省党政财文大权。这是个过渡性质的组织，以后再通过直接选举的形式成立新的政权组织。这个‘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实行军队、干部、群众组织三方面的代表组成。由省军区和驻军的领导人、革命干部代表和联合总部的负责人三方面组成领导核心，叫做勤务组。”“我们搞军、干、群三结合，‘红色造反团联合总部’负责人，同省军区驻军首长和省委、省政府里的革命干部代表联合夺权，以军队为后盾，这是对《二十三条》的

发展，也是学习山西等地解放军参加夺权的经验，有利于建立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的革命权威。”

他的这个发言得到与会者的一致认同。会议决定于 1 月 31 日召开“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大联合大夺权誓师大会”，并准备以多路广播车和海报的形式通告全省。

1 月 29 日下午，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联合总部”讨论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勤务组成员人选。勤务组由 5 名成员组成，分别是：师院学生范正美、石油配件厂刘雪峰、军工“造反团”的代表游兴懋、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潘复生、黑龙江省军区司令员汪家道。大家一致推选范正美担任“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勤务组的班长，石油配件厂刘雪峰、军工造反团的代表游兴懋任副班长，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潘复生、黑龙江省军区司令员汪家道任成员。

1 月 30 日下午，由范正美和刘雪峰邀请潘复生、汪家道来到北方大厦三楼“联合总部”会议室同造反派一起开会。开会前，范正美、刘雪峰与潘复生、汪家道交换了意见，通报了夺权后的领导班子由军、干、群三方面的代表组成和勤务组的人员名单，提出夺权后的临时办公的地点先设在北方大厦，潘复生住九楼，几个群众代表分别住在三楼的一般房间，不得住高级房间。

潘复生、汪家道听后，再三表示：“你们考虑得很周到。完全同意联合总部的意见。”

当谈到哈工大刘录等人的反对意见时，潘复生接过范正美和刘雪峰的话头，很谨慎的说：“左派学习很重要，有时间应该读读《共产党宣言》和《论‘左派’幼稚性和小资产阶级性》。”

潘复生的这几句话令范正美和刘雪峰很震惊，因为在当时，潘复生以正在接受群众批判和考验的当权派身份，能够对群众的意见提出批评，那是很需要勇气的。

之后，他们又一同来到起草组参加夺权文告的讨论。潘复生、汪家道一边说："向革命小将致敬！""向革命小将学习！"一边向会场走来。在大家一再让座的情况下，他们才落座，两人几乎同时说：

"我们得从头学习，我们是来向你们学习来的。你们的水平比我们高，你们定吧，我们都同意。"

潘复生还说："我是个有罪之人，文革开始我也是很不理解，很不得力，执行了刘少奇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我应该向你们请罪。我要向你们学习。通告写得很好，很有力，我没有什么意见。"

他的话语略带沙哑，语气平和，显得沉重而诚恳。屋子里十分安静，只见潘复生稍稍提高了声调，严肃地说了一句："要学习巴黎公社的彻底革命精神，彻底打碎旧的国家机器。"略停了一会儿，便起身说道："我要回去准备明天我的发言稿。我写好以后，还希望你们多多提出宝贵意见。"

汪家道显得兴致很高、很激动，爽快地说："你们有理论有水平，希望把第六条（指公告的第六项关于加强公安工作，打击地富反坏右）再加一点，既要讲严打，也要注意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既讲打击地富反坏右和牛鬼蛇神，也要讲团结，争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对于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要坚决打击，从严处理。我们解放军坚决支持你们！"

1 月 31 日上午，在哈尔滨市北方大厦门前广场上举行了"黑

龙江省红色造反者大联合大夺权誓师大会”。时值隆冬，与会者穿着整齐，胸前佩带毛泽东像章，左臂戴着“红卫兵”袖章，右手高举《毛主席语录》，一个个精神抖擞，按单位排成六路纵队，早早地从四面八方进入会场，省军区和驻军指战员 5000 人持枪列队威武雄壮地站在队伍的最前面，会场四周竖立了无数面红旗，整个会场显得隆重热烈，给人一种革命火爆的热烈气氛。

主席台由几张办公桌连接而成，上面铺着红布，“红色造反者联合总部”的负责人范正美、刘雪峰、游兴懋等人和东北局第一书记宋任穷、东北局书记处书记喻屏、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潘复生、省军区司令员汪家道、23 军军长游好阳站在主席台上。大会于 10 时 15 分正式开始，先奏了一曲《东方红》乐曲，接着由主持人张连科宣告“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正式成立，之后按议程顺序宣读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第一号通告》和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呼吁书》。《通告》宣告：“黑龙江省委、省人委的党、政、财、文等一切大权，自即日起，归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停止黑龙江省委、省人委的一切领导权。”

在大会上，造反派的工人、农民和学生代表先后致辞，热烈欢呼“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的成立，表示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为争取夺权斗争的彻底胜利而奋斗。

宋任穷代表东北局发言，他对大联合大夺权表示支持。他的讲话措辞极其严谨，去掉 7 行口号，实际不到 400 字，却赢得了全场 10 万人的多次鼓掌。虽然他在讲话时，还是多少有些紧张，声音有点儿发颤。

刚到哈尔滨时，宋任穷因为受沈阳造反派攻击而堆起来的满

脸愁云，此时被黑龙江省造反派上上下下的这份难得的支持而眉开眼笑，清瘦的他，迎着刺骨的寒风，显得格外的精神。事前，他曾一再要求，希望范正美等人看看他的讲话稿，范正美说："既然请你参加就相信你，我们不检查，也不看。"

接着，潘复生、汪家道、游好阳先后讲话。

潘复生的讲话稿也不长，比宋任穷多不了几个字，但却比宋任穷要显得更热情，言语之间洋溢着其内心的无比喜悦，因为他没有宋任穷那份对沈阳的牵挂。

汪家道和游好阳分别代表省军区和驻军广大指战员向大会表示最热烈的祝贺和最坚决的支持。同宋任穷、潘复生两位地方干部大不一样，这两位部队首长，显得特别地轻松自若，底气足。

最后，由范正美宣读了《给毛主席的致敬电》。大会在热烈的掌声和欢呼中通过了《给毛主席的致敬电》之后，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

## 第 475 回：华北局，李雪峰派往天津　飞北京，秦基伟片刻不停

1 月 31 日，中央文革记者站驻哈尔滨记者组用电话将黑龙江省三位一体夺权的稿子传往北京。当晚 22 时多钟，正在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所在地哈尔滨市北方大厦的范正美，突然听到周恩来办公室打电话找他。他好生奇怪：“总理办公室给我打电话做什么？”

电话转到了大厦三楼服务台，范正美接过电话筒，传来一位中年男子的声音：

“你是范正美同志吗？”

“我就是范正美！”

“我是总理办公室。我想问问潘复生同志和汪家道同志在‘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中是怎么安排的？”

“革命委员会设常务领导核心，叫做勤务组，一共 5 个人，设班长 1 人，副班长 2 人。我是班长，刘雪峰、游兴懋为副班长，潘复生和汪家道为成员。”范正美回答说。

“好，我就是问问这个情况，没有别的事。谢谢你。”

黑龙江省的夺权顺利的完成了，但是工大刘录等人并没有放弃他们的意见。在此之前，哈工大“造反团”的领导人之一陈造反等人，同刘录等人进行了多次谈话，但刘录等人始终不放弃自己的看法。1 月 31 日当晚，哈尔滨还沉浸在庆祝黑龙江夺权的欢庆气氛中，哈尔滨工业大学的大礼堂，哈工大“红色造反团”内一场关于形势的辩论大会也在进行。以总团领导刘录为代表的坚

持认为，黑龙江省夺权的时机还不成熟。而“红色造反团”九系“红九团”陈造反、刘佐文则坚持范正美、刘雪锋等人的意见。陈造反还说：“目前刚刚诞生的黑龙江革命委员会是经中央支持和肯定的新生革命政权，我们应当像爱护自己的生命一样爱护和保卫她，而不是百般指责……”

辩论僵持不下，主楼礼堂里黑压压坐满了人，许多外校的师生也来听大会辩论，甚至连过道上都坐满了人。

黑龙江省“造反团联合总部”调动全市造反派一万多人到工业大学示威，谴责哈工大“造反团”在省革委会新生政权刚刚建立时，就唱反调，斥责工大“造反团”是“大杂烩”。

在这种情况下，哈工大“红色造反团”九系“红九团”陈造反和刘佐文等人毅然另拉旗帜，从哈工大“造反团”里打出“哈工大新曙光红色造反团”的新旗,因为是“捍卫”新生省革委会，当时全市多数组织的造反派支持了他们的行动。工大“造反团”分裂了，这是夺权后哈尔滨最早分成的两派群众组织。这天也被称为“131 事件”。

1 月中旬后，中共华北局机关干部也起来造反了，但是他们找不到他们的领导、斗争对象李雪峰了。原来，毛泽东派李雪峰到天津去了。1966 年 12 月 29 日，毛泽东批转了李雪峰在北京的检讨，同时，决定派李雪峰到天津去解决一下那里的问题。华北局的机关干部不知道这些情况，他们也要响应中央号召，在华北局夺权。1 月 31 日，周恩来接见华北局机关“革命造反联络总部”代表，对他们说：

“你们不是就三个问题吗？一个文件，一个夺权，还有揪李

雪峰。我不给你们出主意，夺华北局机关的权可以，不能夺华北局书记处的权。华北局是中央派出机关，你们夺权就等于夺中央的权。这个问题，我请示了主席。如果华北局书记处有问题，可以改组嘛！夺权不成。夺了权，你们谁准备当书记呀！你们有没有准备？把你们的意见谈一下。你们造反，中央是支持的，但你们要夺华北局书记处的权，大概是你们感到没有事做了吧。现在雪峰在搞天津问题。天津很乱，很紧张。天津市委的 6 个书记都被揪走了。叫雪峰把天津问题搞出一个头绪来，再回机关作检讨。不是不叫他回来参加你们的会。主要是时间问题。”

代表说：“从已揭发出的问题，我们认为李雪峰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要开批判斗争大会，可是书记处却传达了所谓中央的三点意见……”

另一位代表说：“我们要继续贴揭发李雪峰的大字报，并要开揭发斗争李雪峰大会。”

周恩来说：“可以贴大字报。你们把‘打倒李雪峰’的大字报都贴到街上去了，李雪峰三个字都倒过来了。我每天都看到，也没有制止过。这两天，雪峰不能回来，是主席派他出去的。伯达同志和我都很关心天津的问题，北京正在搞夺权，很紧张，首先抓北京。其次华东，包括上海，第三就是天津、华北、东北，然后再抓西北和西南。现在正在紧张时期。雪峰检讨不是不可以，最好时间晚一点。他也没说不给你们检讨。主席也说过，检讨检讨就够了，总是检讨干什么？”

“64 年主席提出过批判吴晗的问题。65 年 3 月 31 日我到石家庄，4 月 2 日到邯郸碰到刘子厚、雪峰。雪峰对我说，主席批

评了彭真，说彭真认为批判吴晗是个人问题。6 号回来，我对彭真说，雪峰对你有意见，说你对主席指示听不进去。彭真表示：‘批评得对。我的认识同主席的话有本质的区别。’我当时还认为彭真还有点觉悟。雪峰当时就认为彭真是有问题啦……”

1 月 31 日晚，周恩来、陈毅、聂荣臻、徐向前、叶剑英、肖华、江青、徐立清、关锋、王宏坤等人在京西宾馆接见外地军队院校、文艺团休、体育工作队、医院、军事工厂等单位进京造反的部分代表，传达军委《八条命令》，动员他们尽快离京回本单位。大会由徐向前主持，周恩来、江青讲话。

周恩来说：“由于文化大革命形势的发展，军委发布了《八项命令》。毛主席、林副主席要我向在座的同学们、同志们、战友们讲一讲，并通过你们向在京的、来京的院校文艺团体，体工队等同志们转达。”

在叙述了文化大革命的过程后，周恩来说：“毛主席亲自抓了夺权斗争，及时推荐了上海夺权斗争经验，而且推荐了山西夺权斗争经验。今天主席批给我贵州夺权斗争的经验，让我转新华社明天发表，这种夺权斗争很快就普及全国。在中央各部门，当时我们还没有经验，有些部门呢，是资产阶级的。系统夺权斗争，我们只发表了一个财贸系统夺权斗争的紧急措施十二条。”

他说：“军委发布的《八项命令》，改变过去不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的规定，就是为了这个目的。过去的不介入，是要保卫红卫兵和革命群众游行示威，即使打了，也不还手，骂了也不还口，不动气，不开枪。因为那个时候阶级斗争的阵容不清，在当时是对的，但到了阶级斗争，两条路线斗争尖锐化，明朗化了的时候，

再不介入，那就不对了，就是不支持无产阶级革命左派。10 月 5 日中央军委发布了紧急指示，不介入是刘志坚把这个意思加进去的。他把不动气、不还口、不还手、不开枪解释成不介入。现在已经进入到夺权斗争，我们要挺身而出，作坚强的革命左派的后盾。我们武装部队要支持革命左派夺权，团结群众大多数，逐渐使得中间状态的人靠拢左派，孤立和打击少数右派。揭露反革命分子，证据确凿的，重的逮捕，更重的要镇压，保卫革命左派大联合夺权的胜利。”

周恩来动员军队院校、医院、文艺团体、体工队、军工厂的在京人员离京回本单位。他逐条解释《八条命令》，在谈到“高级干部子女的教育”一条时，提到了国家副主席董必武的儿子：“董老有一个儿子。叫董良翮，做过一些坏事，我打电话给董老，他当时在广州，他亲自叫他的儿子到公安局去投案。我们是通过教育使他们成材嘛！希望你们后来居上。”

他再次提到北京军区的问题：“譬如北京批判杨勇、廖汉生等是对的，但是不能把它扩大化，不能因此牵连很多，搞的扩大化也不能把杨勇联系到许多人。这样就会重复我们当年红军历史上肃反的扩大化，这是很不利的，不利于我们全体团结的，这是全国大军区中的第二个大军区，又在北京，我们就不能够按照你们的意见办。在座的有北京军区的人吧，我曾经跟徐向前同志，就是前天晚上嘛，讲了许多问题。目的是什么？是说服，不要犯这样的错误，因为这不是一部分群众，这样传下去，造成我们党内，军内不好的风气。”

接着江青讲话。她强调了民主与纪律的关系，“希望同志们和

战友们响应中央军委《八条命令》，回本地回单位去闹革命。”

再说大军区中最早受到冲击的昆明军区。群众组织退出昆明军区大院后，秦基伟等人回到了机关，但仍然不断受到军内群众组织的冲击。秦基伟还多次被军内造反派罚跪、批斗。1 月 31 日，周恩来在叶剑英转来的秦基伟申请来北京治病的报告上批写道：“告叶剑英，赞成将秦基伟接来北京。”

同时，周恩来让秘书通知空军“昆指”刘懋功说：“北京来一架飞机，停在昆明军用机场，接秦基伟同志。”

刘懋功也不知道秦基伟此时身在何处，费了很大的周折，才打听到秦基伟的藏身地点。这时，秦基伟也得到了消息，打来电话，问刘懋功是否接到了周周恩来秘书的电话？刘懋功回答说：

“接到了。”

秦基伟急不可待地说：“那你马上派车来接我吧。”

刘懋功问：“你自己坐车过来不行吗？”

秦基伟：“不行，还是派你的车来，要直接开到我的门口。”

刘懋功派去的车刚开到秦基伟栖身的门口，早已准备好的秦基伟突然从屋里出来，一步就跨到车里。“昆指”副主任朱刚坐在另一辆车在后面跟着，以防万一秦基伟被群众组织劫持时好有个线索。

到机场后，秦基伟不去招待所，让汽车直接开到飞机旁，随即上了飞机。刘懋功说：“秦司令，离起飞还有好几个钟头。机舱里面冷，到招待所去休息一会儿，搞点饭吃。”

已成惊弓之鸟的秦基伟说：“不吃饭也行，还是坐在机舱里吧。”

没办法，刘懋功只好叫飞行员把饭菜送上飞机。

2月1日凌晨4时，周恩来主持铁道部关于夺权问题的辩论会。他对铁道部夺权后两派无休止的争吵十分着急，一上来就问他们："为什么就联合不起来？再这样下去，我要把铁道部实行军事管理，你们这样做是玷污了二七传统的铁路工人的声誉。"周恩来念了1月31日《人民日报》上刊登的北京"三司"一篇文章的最后一段后说："你们就是没有学习学习报纸，这篇文章写得很好，不知哪一位革命小将写的。权不是从手中夺过来吗？夺的好吗？我相信你们能管好的。你们不少是工人、贫农、革命干部、革命知识分子，出身也很好，难道可以保证没有私字吗？不会没有的，都要在脑子里夺权。"

周恩来回顾了自己的革命历程后说："革命烈士很多，革命者前赴后继，我们是留下来的人，多做一些工作，就多为世界革命服务。你们应该全心全意干革命，要胜过我们。我给你们大小会开过7次，全国交通大动脉不可一刻中断，你们有时就不顾一切。你们想想是一个单位重要还是全国重要？一个人重要还是7亿人民重要？现在是在锻炼你们，不管在小道理面前，大道理面前都要抛掉一个私字。""我不相信工人、学生就是不行，过去在二七时要组织全国罢工，为什么在毛泽东时代，你们都比我们那时多了，怎么全团结不起来？就是私字没有去，就是没有反省精神。"

周恩来问起运输进展情况，铁道部有人回答："根据李副总理指示，二月份计划货运增加，客运减少。"

周恩来："派同学到机务段下去宣传，不仅去站台，还要到大站，到工厂，到码头搞交通疏通，把铁路院校的学生都派下去，

保守派不去的我就采取措施。”

他询问了 10 个铁路学院的在校学生情况后说：“已经留很少的同学，现在阶级斗争非常尖锐，上海‘红革会’把矛头指向张春桥就是不对，同意你们发呼吁。”

他再次强调：“就是要联合，不联合就是破坏，破坏文化大革命就是分裂主义，从 2 月 1 日起以往的事都不提了，总是提不完的，要小局服从大局，小道理服从大道理，我把这些道理给人民大会堂服务队讲都讲得通，对你们就是讲不通，愈说愈不通，什么道理？”

他斥责说：“现在你们是大民主与个人独断结合起来，你们这样脱离群众会走向反面的。”“有些学校过去还不错，现在意见多就是大联合不起来，像北大、清华、北航、地质，就是你挑我的毛病，我挑你的毛病。”“对老干部不要笼而统一，一概打倒。现在副总理不是一个一个站出来了吗？对你们单位的当权派也要分析，要监督他们参加业务，在其中一个一个吸收他们。再不能砸了，具有二七传统的铁路工人后代会联合起来！”

## 第 476 回：说不听，徐向前接见“红纵”　为夺权，北京公安局武斗

邱会作被林彪、陈伯达联名保出来以后，林彪办公室很快就收到总后机关的大多数人签名的一个誓言书，要求打倒邱会作。1 月 29 日，由二医大“红纵”领头，301 护校“红色造反大队”、总后“政干红色造反革命纵队”和总后机关各群众组织派人到三座门 3 号全军文革办公室静坐，坚持要揪出邱会作。

2 月 1 日，徐向前接见这些群众组织的 9 名代表。

徐向前说：“你们干劲可真大呀！你们都是哪个组织的？我本应该找你们早一点谈一谈，因为事情很忙，顾不上，你们送上来了，这很好，你们是不是推举一两个人把问题集中的讲一讲？”

代表们简单地介绍一些情况后，有代表问：“徐副主席，你说邱会作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根据是什么？我们想听一下，你对邱会作的问题的看法，现在我们要邱会作来开会也要不到。”

徐向前说：“邱会作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今天我还是这样看，尽管他有错误、缺点，做了些错事，说了错话，但不是反革命，这我们军委都了解他，要看他的历史，他是拥护毛主席、拥护林副主席的，是属于好人的，你们要认清什么是敌人，这两条路线斗争的锋芒，是指向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也就是指向牛鬼蛇神和他们搞政变集团的那伙人。”

“对邱会作我们并没有看成是三反分子，我以前是这样看，现在这样看，以后还是这样看，邱会作是无产阶级司令部里的人，因为你们没有足够的材料说明他是三反分子，从你们揭发的材料

来看，都是思想上、工作上、生活上的问题。不能说明他是刘邓的人，这些并不是我说的，军委对这些干部还是了解的。”

“邱会作在文化大革命中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犯了严重错误，正因为有错误，才叫你们彻底批判，彻底揭露。”

“你们那天汇报 4 个多小时，没有一条能说明他是三反分子，是搞政变集团的人，我并没有说他是三反分子。你们对邱会作彻底批判揭露斗争是你们的事，我还是我的看法，我是完全站在你们这边的，赞成你们的彻底造反精神，我不是保皇。你们总后的真正的牛鬼蛇神一定要揪出来，不揪出来，我们决不罢休。刀锋一定对准敌人，你们那里哪些是坏人靠你们调查研究，分析。这些人不同于好人犯错误，我们军委几个副主席对邱会作有一致的评价，过去后勤工作只抓业务，不抓政治，我们观察了好几年。没想到他在生活上这些问题引起很大公愤，这些性质是严重的。但是他并没有站在彭德怀、罗瑞卿一边反对毛主席。而北京军区的廖汉生、杨勇这些人，我们一定要把他们斗倒、斗臭、斗垮。”

“我认为邱犯了那么大的错误是可以烧的，但烧而不能焦，烧焦了就会犯错误，应按主席教导，团结——批评——团结的原则。那天那么多人的大会我不能讲，今天少数几个人，我说心里话，这是军委的看法。他的身体的确有病，特别是武斗以后，他身体不太好了。”

群众插话：“我们没有武斗，这完全是造谣诬蔑。”

徐向前说：“你们去批判斗争。”

群众：“我们要人。”

徐向前：“没有他也可以批判，斗争嘛！我们要以大局为重，

他肯定不是牛鬼蛇神，我可以保一万个险。对于这些高级干部，哪个拥护，哪个反对，我们心中大体上有个数，是了解的。所以我们要顾全大局，保他出来就是由于身体不好。林彪同志、陈伯达同志都亲自写了信，你们看了没有？”

答：“看了。”

徐向前：“叶群同志也表了态，她的态度也和我一样。我和你们讲他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现在周总理和我保了，林副主席，伯达同志也保了。我们要以大局为重，斗争以小局服从大局，你们再不要向总理提意见，递条子啦，他们从井冈山开始，他们了解。”

代表们说：“刚才你讲了许多，邱会作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请举些例子，以便我们思考和说服群众。”

徐向前：“那么我问你们，你们说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与资产阶级司令部的人如何区别？”

群众：“就是看他是否拥护毛主席、拥护林副主席、是否执行毛主席的路线。”

群众：“刘志坚是什么人？刘志坚包庇邱会作，紧急指示下达前，刘给邱打招呼，通风报信，是什么关系？”

徐向前：“刘志坚、罗瑞卿等人与邱的关系，都是一般的工作关系。但他的基本立场是站在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我看到你们的材料都不能把他打成反革命，他的那些错误都是思想认识问题。现在没有材料能说明邱与刘、邓、罗、梁有关系。他说过错话，做过错事。军委看法，邱会作做后勤部长比任何一个后勤部长都好。过去后勤工作从不抓政治，单纯业务观点，他还突出一点政

治。”

有人问：“29 日给你送的材料你看了没有？”

徐向前：“我还没有看。”

那位代表说：“我给读一段。”

接着他读了材料中关于邱会作的一段三反言行和不突出政治的材料。

徐向前说：“这些问题都是工作上思想上的问题，你们不要断章取义。我们军委对这些同志都有评价，这不是我一个人的意见，那次你们大会上讲的材料，不能证明他不学毛著。今天我们讲过去后勤部不搞政治，邱搞了政治，他就是突出政治不够。今天革命主要是针对牛鬼蛇神，我不同意你们把他打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我今天还是这样讲，烧而不焦。军队里不突出政治的军事干部多得很，不是他一个人，但不能说他们都是资产阶级司令部的人，你们拿不出一点根据来证明他与刘、邓、彭、罗、梁等人有关系，我们认为他在后勤工作上是有成绩的，我们体谅你们。我们并不保牛鬼蛇神。他与刘、邓、罗、梁不是一个山头的人，都是工作关系，我们为什么要斗廖汉生，你们应该清楚，如果邱会作是这样的人，我们早就把他揪出来了。”

代表们又抓住了徐向前的这句话，问他：“廖汉生这个人，不是群众揪出来的吗？”

徐向前说：“你们可以这样认为，但我们心中有底，这并不是群众揪出来的。”

代表问：“刘志坚你知道吗？”

徐向前：“刘志坚揪出来我感到很突然，他不仅有这些问题，

他还被日本人俘虏过。”

群众：“被俘虏过的人怎么还能让他当这么大的干部？”

徐向前：“过去有些成了叛徒的人，也有留用下来的，刘志坚被俘虏过，邱会作就没有被俘虏过嘛。”

群众：“邱是会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

徐向前：“他可以吗？我们提倡文斗，不用武斗，就全军来讲，打人还是有的，对邱会作你们提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我看不要那样提。你们还说砸烂他的狗头，他不是狗嘛！怎么能砸烂狗头呢？我坚决支持你们揭发批判，但从我们掌握的材料来看，他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开火。要有分析，解放军要有纪律，要实事求是，要有革命性、科学性和纪律性。如果你们有材料，拿出一个定时炸弹来更好嘛！如果你们有大量事实，我可以承认错误，你们要顾全大局。邱会作不到会照样可以斗争，我肯定说：他不是资产阶级司令部的人，而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

“王峰你们不要揪他了。要揪就揪我，那些话是我让他说的，他的错误就是到总后不应该先到张池明那里去，而应该先到造反派那里去。你们一定要注意以大局为重，你们想一想，林彪同志、伯达同志、周总理他们会不会保牛鬼蛇神？他们是不会的。

以上我讲的那些问题，如果你们不通，回去就不要给大家讲了，我是和你们商量的，交心的。”

这次接见后，静坐的学员认为没有解决问题，还不撤走。

为落实装甲兵司令许光达是否参加“二月兵变”一事，2 月 1 日，装甲兵“烈火兵团”的王宝湖、屈景富特地来到海军“红联

总”，调查许光达是“二月兵变”总参谋长的消息来源和可靠性。海军“红联总”的头头对他们说：“这个消息绝对可靠，你们可以去问李作鹏。”

王宝湖、屈景富二人又马不停蹄地来到李作鹏办公室，此时已是中午时分。李作鹏不在办公室，他们又跑到李作鹏的家里，李作鹏在会客厅接待了他们。

王宝湖、屈景富二人直截了当的问道：“徐副主席在点苏振华时是否点了许光达的名?”

李作鹏也干脆利落地答道：“没有。”

二人又问：“徐副主席是在什么时候点的苏振华？在什么会议上点的？”

这次李作鹏就不是那么干脆了，而是笑了笑说：“具体情况不好给你们讲了。”

二人问：“传单上说许光达是贺龙兵变中的总参谋长，是事实吧？”

李作鹏答：“有那么回事情，总参谋长是事实。”

继续问：“这是不是中央点的？”

回答的同样干脆：“当然是中央点的，但不是徐副主席点的。”

“是谁点的？”

“我不能告诉你们。”

“‘二月兵变’是怎么回事？”

“去年‘二月兵变’，贺要把一军改调北京来，由于中央及时识破贺的阴谋，才使兵变未遂。北京有那么多部队，为何要调

一军呢?”

从李作鹏那里回来后，王宝湖、屈景富二人立即整理一份名为“李作鹏访问记”的材料。

1 月 30 日，清华大学“井冈山”、北京矿业学院“东方红”等组织与北京石景山区的造反派一起到石景山公安分局夺权，结果与已在这里实施接管的北京政法学院“政法公社”发生冲突，双方发生武斗，石景山公安分局出动了大批警察，抓了 100 多名矿院“东方红”和清华“井冈山”的学生。2 月 1 日，谢富治、戚本禹、李震接见北京政法学院“政法公社”、矿院“东方红”和北京市公安干部。

会议由公安部副部长李震主持，在矿院“东方红”代表和“政法公社”代表分别阐述了自己的观点后，戚本禹说：“我代表中央文革领导小组向公安局的全体革命同志，向矿院‘东方红’的同志，向‘政法公社’的同志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敬礼！‘政法公社’与矿院‘东方红’这两个组织都是革命组织。我都接见过。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做了很多事情，做出了很大贡献。‘政法公社’开始只有 200 人，团结得很紧，对高院的、学校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作了坚决地斗争，不愧为左派。他们是经过大风大浪的。矿院‘东方红’也是一样，斗争很艰苦，我也去过，他们把张霖之揪出来了，揪出张霖之不是我们，也不是煤炭部的群众。而是他们。

现在两个革命组织在公安局发生了斗争，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识一家人。家里发生了这样大的斗争，惊动了北京市，连总理也惊动了。发生了流血事件，双方都打人了嘛，这双方都

得考虑考虑。刚才你们说的话，有一点不大好，我不大满意，我们都是老同志，都是熟人嘛，可以提提缺点吗？”

众答：“可以。”

戚本禹：“就是在讲话中双方缺乏自我批评，连一句话也没有。我觉得，在这两天里，两方面都说话，政法学院想一想，如果同意请你们先讲一讲，两方面都来讲一讲，好不好？”

“政法公社”代表陈荣金、徐贵春作了检查。

戚本禹接着说：“陈荣金同志检查是诚恳的，徐贵春也作了一些检查，但后面说得多了一些，有些话应由矿院的同志来讲或公安局的同志来讲，自己讲不合适，引起了一些不满，徐贵春的讲话调子高，但不大深刻，调子高是对的……”

矿院的代表说：“这是在煽动！”

戚本禹接着说：“矿院也要作检讨，应该允许矿院的同志作检查，我想民警同志会同意的。我们文化革命小组是抱着解决矛盾而来的，你们两个组织之间的矛盾是人民内部矛盾，应用毛主席提出的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来解决。但我怀疑在这些矛盾中坏人在起作用。石景山方面可能有，你们这边也可能有，大家要提高警惕，内部要搞好团结。下面就让矿院的同志作检查。”

矿院“东方红”代表检查后，戚本禹接着讲：“刚才我听到矿院的检查是抽象的，但检查的态度是好的。把打伤的人弄到台上来就不能解决问题了，当然对打伤了的同志应该慰问，建议你们去看看。

我们考虑，斗争很需要考虑整个斗争形势。现在是什么形势？是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到了一个决战的时刻，这样就要考虑怎么

斗争了，像现在这样打起来就是不符合当前形势需要的，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斗争了十七年，当前的斗争达到了最高峰，也是到了决定我国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大问题。矿院‘东方红’与‘政法公社’的斗争是不符合当前斗争形势需要的。经过八年抗战，十年内战，我们胜利了，革命胜利后的果实为谁？胜利果实谁来摘？对这个问题，资产阶级想，无产阶级也想。资产阶级统治了十七年，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刘少奇说：‘剥削越多越好’，‘中国人是欢迎剥削的，要用无产阶级专政来保护这种所有制。’这些都是写在书上的话。”

众人呼口号：“打倒刘少奇！”

戚本禹：“对，是应该打倒的，不应该打倒‘政法公社’，也不该打倒矿院‘东方红’。高岗是里通外国，发展资本主义，要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反右派时有人反对大跃进，62 年他们提出‘三自一包’，‘三和一少’，1964 年又提出‘海瑞罢官’，这样资产阶级不断向我们进攻。在资产阶级向我们进攻时，左派组织应该联合起来，不应该扩大矛盾，打内战，这样我们就要联合，就要团结。”

在谈到矿院和“政法公社”之间发生的武斗时，戚本禹说：“你们这个事件是否由敌人挑起来的，我相信公安机关会调查研究的，谢富治副总理会处理这个问题的。关于革命组织接管夺权之间的问题是内部矛盾，应该好好解决，为什么要抗议？为什么要来最后通牒？这个问题一定要分清楚。”

“你们矿院‘东方红’没有弄清分局的问题。就发动那么多人去围攻，这样做不对。矿院‘东方红’摘掉民警的帽徽，这也

是不对。刚才矿院代表认错赔礼道歉是应该的。”

“刚才矿院检讨了，民警同志不爱鼓掌，不热烈，徐贵春说了几句就热烈鼓掌。刚才陈荣金讲话矿院给倒了一杯水，谢富治同志热烈鼓掌了，他喜欢你们团结了。谢富治同志是公安部门的最高统帅，他鼓掌了，你们不鼓掌，这是有差距的。《水浒传》里李达和张顺二人打架后拥抱，你们连这点精神都没有。谢富治同志是关心你们公安战士，与你们心连心的，他要靠你们去工作的。谢部长鼓掌，你们为什么不鼓掌？不打不相识，打了拉拉手。

对石景山分局，根据总理指示，暂由卫戍司令部派人接管，这件事由傅崇碧、李震同志负责处理。

北京市公安局怎么办？首先应该肯定，过去在黑帮统治下干了许多干事，改组后黑线还未肃清。在这样情况下‘政法公社’造了市公安局的反，接管是革命行动，这个行动好得很！应该承认是有功勋的，应该给他们鼓掌。徐贵春辛辛苦苦几天几夜没睡觉。有错误他承认了，学生嘛，又是一个单位接管，允许改正。他们接受了合理的批判。矿院来做也会犯错误，不要以为自己高明。我们做也会犯错误。”

“最近正在考虑成立一个联合组织，北京人民公社，中央有这个意思，要进行筹备，要按巴黎公社原则选举它。现在中央文革在讨论，由谢副总理负责。谢副总理是各部第一个支持左派的，他首先支持了‘政法公社’，他在左派组织中有崇高的威望。傅崇碧、李震来筹备，你们是否允许一个筹备时期。在这段时间怎么办？说要军队接管，首先是‘政法公社’提出的，可是现在矿院‘东方红’也提出。”

## 第 477 回：周恩来，听取工交口汇报　“工字楼”，众部长暂时稍歇

2 月 1 日晚，周恩来召集工交口 23 个部门的造反派座谈，商谈那里的文革运动问题。

首先由各部进行汇报。当建筑工程部汇报到建筑工程兵的问题时，周恩来说：“关于建筑工程兵的问题，要谷牧回答，要允许人家回答问题。最近，中央有些直属部门批判有问题的当权派，总是轰上台去，也不允许他回答，好像斗地主、恶霸、反革命等最残酷的敌人一样，根本让他无法说话。那是对反革命，对内部问题要允许人家答复，这种方法不符合主席的整风思想和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思想。《红旗》三期社论你们好好学一学。谷牧有错误要回来向建委、建工部检讨，但关于成立建筑工程兵的事，我向主席汇报过，林副主席也知道此事。工程队伍东调西调，家属搬迁工程忙闲不均，工程急时劳动力不够，工程少时间急，问题很多，要搞工程兵的问题，中央研究过。至于叫第二解放军的问题，我没听见过，详细可问谷牧同志。任何事情要作调查研究，可以问别人，问本人，也可以问主管机关。建筑工程兵现在是试点，以后逐步扩大，因为对老职工要逐步改编。改编工程兵师是试办，又不是作战部队，应开展文化大革命。内地运动迟一些，所以要谷牧去发动。但这次叫他回北京，到车站我都没见面就给拉走了，他工作做得怎样我还不知道。你们怕他见到我后，给他交底，这是对我们不信任，我们充分信任你们，要彼此互相信任。他是工作去的，到现在我还没见到谷牧，听说已放了他，谢谢你

们交还回来，只要不是定了性的黑帮，要斗，通知我们作安排，在工作上有问题要批判的也要通知我们安排去检讨。再一次向你们提出这个问题，尤其是工交系统。”

原来，谷牧在一个月前离开北京到四川、云南、贵州了解“三线”建设的情况，其中就涉及到建筑工程兵如何开展文化大革命，及改编为现役军人等一些具体的问题。1 月 30 日中午，一架从西南方向飞来的飞机降落在北京机场，谷牧顺着舷梯从飞机上走下。谁知刚下飞机，迎面就遇上早已在此等候的国家建委的造反派群众。他们不由分说，就把谷牧推上汽车，揪到甘家口批判，要他回答关于建筑工程兵的问题。

谷牧被揪的消息被周恩来派出的联络员知道了，立即报告周恩来。周恩来对他说：“你找建委机关的造反派谈一下，要他们把谷牧同志送到中南海，我要听谷牧汇报关于三线建设的情况。”

第二天，造反派开完谷牧的批斗会后，把谷牧送到中南海北门交给了周恩来的联络员。后来，周恩来见到谷牧后，叫他不要回家。周恩来在中南海给他找了一间房，让他就住在中南海里头。

当时，国务院各部的部长白天要接受批判，晚上还要工作。最主要的是有的部长常常被群众揪走后找不到了，特别是张霖之在揪斗中被折磨致死，让周恩来悲痛不已。于是他想了一个办法，以国务院通知开会、汇报工作、写检讨等名义，让这些国务院受冲击的部长们轮流住进中南海作短暂的休息，少则几天，多则半个月。周恩来告诉联络员：如果群众要来揪这些部长们，可以说他们的“检讨”还没写好，等写好了再出去。对性格刚烈的几位

部长，周恩来还特别嘱咐："不要轻易出去，要离开中南海须经过我批准。"

中南海西门进去往北走，有一幢外形呈"工"字形的宿舍楼，俗称"工字楼"。此时，国务院的这幢"工字楼"宿舍，成了国务院许多部长们的"临时避难所"。除谷牧外，当时的国家计委副主任余秋里，财政部副部长吴波，商业部部长姚依林、副部长王磊，八机部部长陈正人，铁道部部长吕正操、副部长刘建章，四机部部长王诤，农垦部部长王震，冶金部部长吕东，文化部部长萧望东，农业部部长江一真，水电部部长刘澜波、副部长钱正英，卫生部部长钱信忠、副部长黄树则、崔义田、张凯、贺彪，一机部部长段君毅、副部长周子健，国务院秘书长周荣鑫，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主任方毅，华侨事务委员会主任廖承志，石油部副部长康世恩，纺织部副部长钱之光等近 100 位部级干部都先后在中南海避过难。

这些部长在中南海住了一段时间，李富春来找他们，对他们说："总理受压力太大，你们如果经过这一段休息以后，身体还可以坚持的，是不是出去，还是接受群众的教育。"

水电部副部长钱正英首先报名："我身体可以了，我出去了。"

这就是中南海"工字楼"的情况。

我们接着说 2 月 1 日晚国务院工交口汇报会。建工部的代表继续汇报他们部长刘裕民 1 月 18 日同意恢复借调关系，致使大批借调到西南支援内地建设的三线工人离职回到原单位。

周恩来当即说道："'打回老家去，彻底闹革命！'的口号是指外地来北京的人说的，不是说最先从什么地方来，回什么地方去，

那我们打回延安去呀！我与富春同志是从法国留学回来的，打到法国去呀！这也是变相的经济主义，完全是一种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在西南搞建设，应在西南闹革命，跑到上海去干什么？你们把这个写个详细报告，把你们的建议也写出来，将来国务院和你们造反总部一起下命令。这些当权派，都是在关键的转折时期出来，讨好部分工人，保他们自己。这样，搞不好会犯罪的，结论以后再下。”

轮到建材部汇报时，谈到“黑材料”的问题，周恩来说：“材料查封，是否保证没遗漏的了，赖际发同志来了没有？”

建材部部长赖际发站了起来，周恩来问：

“各单位检查了吗？再有，要以革命性、党性来保证。有的材料没封，有些人是有意的，有些人是忘了，要区别对待。如经委叶林在封材料时，抽屉内遗留了 3 年前一封薄一波写给刘少奇的信。这封信给蒯大富突然袭击查出来了。蒯大富没弄清时间就将此信印成传单传出去了，说薄一波 11 月份给刘少奇还写信。我与江青同志一分析条子上的日期，是 11 月 1 日，薄一波 9 月就去广州，他11月份在广州怎能在北京写给刘少奇报告要12月开会？经过了解这是 3 年前的事。我向他们说了，才把传单收回去。”

“这里我要替谷牧同志说几句话，他不是黑帮，不是薄一波的助手。”

“大庆最近很乱，把康世恩、徐今强等几个部长副部长都揪回来了，反对余秋里，甚至反对王铁人。”

台下有人喊：“还游了街！”

周恩来很激动的说：“我很着急，恨不得飞去看一看。大庆前

几年确实不错，很有成绩，油田技术很先进，我去过罗马尼亚，罗马尼亚十九世纪就开始搞石油，现在技术上比我们落后得多。在这个运动中要把这面红旗毁了，我们很痛心，一面红旗为什么要毁了？有错误可以改嘛！我一提起这事就很激动，5 年的成绩，确实不错。后两年骄傲了。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段，秋里、谷牧有错误，秋里作风不民主，但在大庆还是走群众路线的。主席点的将，哪些人反对？贺龙、邓小平反对，薄一波更反对，我们打电话给贺龙，主席点将不能反对。”

周恩来说：“计委的造反派，你们年轻，要谨慎，你们掌了权了。你们要让余秋里把计划问题向你们汇报，我同意。余秋里是军人，惯于发令，有缺点。‘智者必有一失，愚者必有一得’嘛！我同意国家计委向你们谈，但你们的队伍一定要纯，谁泄露了按国法处理。在政协会议上，有个张东荪把我们的预算送到香港去，现在我们还看管他。计委的同志，我委托你们，信任你们，你们要负责任！严格审查。如果计委上层分子传出去，同样严办。高干子弟杀了人，我们投案，何况泄密！过去有一句话：‘王子犯法，庶民同罪。’”

“谷牧有谷牧的帐，关于谷牧的问题我早讲过了。他犯了错误，执行了刘邓路线，应该让他向建委的同志检讨。但到今天为止，我们的材料说明这还是人民内部矛盾，要允许他住在国务院。他在国家院有工作，检查定好时间，叫他回去，不要揪来揪去。秋里、谷牧要允许他们作为富春同志的帮手。秋里、谷牧不是他们那一派的，余秋里肯定不是贺龙派，他是二方面军的，是王震部队的，当勤务员上来的。谷牧是山东来的，与彭、薄没有历史

关系。”

接着，周恩来又念《红旗》杂志第三期社论中的第四段：

“对于犯有错误的干部，要正确对待，不能一概打倒。只要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而又坚持不改和累教不改的，就要允许他们改过，鼓励他们将功赎罪。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这是党的传统政策。只有这样才能使犯错误的本人心悦诚服，也才能使无产阶级革命派取得大多数人的衷心拥护，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否则是很危险的。”

周恩来说：“这是主席加的。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接近右的，要教育，一次不改，两次，允许他们将功赎过。主席最反对一棍子打死。好人也不是百分之百都好。‘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这是主席在党内取得领导地位之后 30 几年来一贯的方针。主席对王明，博古，瞿秋白，陈独秀都这样。”

“在你们看来，凡是犯错误的，都要戴高帽子挂牌子，那全国有多少？这不是把主席的干部路线贯彻下去，而是高岗的路线！”

周恩来又念了社论的第六段后，说：“同志们，社论的这一段很全面，各方面都说到了，你们要好好学习。”

一轻部开始汇报他们的接管过程，周恩来看了一轻部及院校 11 个造反派组织于 1 月 31 日签署的关于大联合的公告后说：“这个公告基本上不错嘛，两方面都照顾到了嘛。”

但是，一轻部的两派还是争了起来，互相指责对方。周恩来说：“你们双方都没有检查自己，只是责怪别人，现在，我给你们读一段报纸。”

周恩来再次念了《人民日报》转载的“首都三司”的那篇文章“打倒‘私’字，实行革命造反派大联合”其中的一段，然后说：“我建议你们部里的 4 个组织，院所的几个组织，北京和天津学校的几个组织，三个方面，各派 6 人，18 人，开个圆桌会议，共同协商接管问题，设一个临时机构搞接管工作，不要排斥任何一方。各革命组织内部的问题，回去整风，内部解决，不要拿到圆桌会议是争。这样一个方法能不能解决？”

一轻部代表答：“我们回去协商。”

二轻部汇报到一些全国性联络组织时，周恩来说：“你们回去检查一下，任何全国性的联络站都不能成立，只能留一两个，我们研究一下。其他一律撤消，统统都不允许成立！”

有人反映：“外面有传单说，总理曾在国务院小礼堂说过江青同志对临时工、合同工讲的三条指示，不执行就造你们的反。”

周恩来回答说：“我根本没有说过江青同志指示，不执行就造你们的反，这根本不是我的话！还有人说我跟刘宁一搞过一个什么劳动工资五点指示，我根本没有与刘宁一一起接见过工人。今后凡没有正式文件下来的都不算，不能根据一个负责人说的话，认为要研究的问题，就当指示执行，正式文件没有发下去嘛！北京街上贴满了大字报，到处都照办？你们要顶住。凡是没有正式文件都不能信。”

周恩来接着说：“还有三个部，化工、劳动、林业，以后分别谈。工交口 24 个部门，首先是夺权问题，这是现阶段最紧迫的事，运动进入到新阶段，从思想革命进入新阶段，就要夺权。基本上夺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权。但

是也和炮打司令部时一样，红卫兵一到各省市不管司令部是否走资本主义道路都要轰一下，那时我们劝地方不要反对，不要自封是无产阶级司令部，这样封就定调了，就把炮轰的红卫兵放在错误的地位了，因为炮轰了无产阶级司令部。要让他们打一打，革命的还是革命的，如确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揪出来是好事，所以我们对炮打司令部向省市打个招呼，并不是说每个领导机关部、委、省市统统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不能那样讲。炮轰的结果，有许多领导与群众站在一起，过了关。炮打司令部如此，夺权也是如此，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屡教不改的人的权，也不是每个部所有当权派都如此，……财贸系统，外事系统、农业、文教系统都要夺权，各省市也如此。我们摸了，好多自己搞起来了，山西是第一个起来的典型，是自己搞起来的；上海市大、复杂、有反复；贵州昨天出了公告，来谈过，回去可能发表第二次宣言。我们一个个摸，一个一个阵地夺取，这样不能都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如这样统统变成黑的铁板一块，那毛主席的红线如何与广大群众结合，但通过夺权斗争考验一下有好处。我们分析真正烂掉的是少数，从部来说，完全烂掉了的要接管。”

周恩来又讲了对四类干部的不同处理方式。他接着说：“初期，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要把党，政，财权夺过来，业务上进行监督，计划预算要经你们同意，经济主义不能乱搞。机关党委不起作用了，革命造反派组织起作用，无所谓党员、非党员，党员都要经受考验，主要看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态度。

所有夺权的单位，今后我们发文件，一方面发给管业务的单

位，一方面发给夺权单位，不管党员非党员都发。

要逐步吸收业务熟悉的人到业务班子里来，个别吸收科长以上的。革命意志衰退，虽然业务熟悉，只能监督留用，不能领导。首先要吸收革命的，充实革命委员会，逐步增加群众，从政治优势变为数量多数，思想要前进，推动革命。现在夺权斗争，如有好的，敢领导革命又领导业务，就更好。现在未发现。”

周恩来说：“要把国务院各部组织起来，要切实抓业务。管业务的有李富春、陈毅、叶剑英、李先念、谭震林、谢富治，6 位分管业务口子……我们有分工，富春同志处理你们的具体问题。我呼吁你们，现在就来建立正常的革命秩序。提几个要求：一般的事情，你们可以写给国务院秘书厅，让他们摘写给我。紧急的事情，在国务院搞一个联合办公室，每个副总理搞几个秘书联络各方。设几台普通电话、军用电话和专用电话，号码告诉你们。十分紧急的，把我们归口副总理的电话告诉你们，但要稳定了后。一方面告诉管业务的当权派，一方面告诉你们。属于革命的问题，一定和你们打招呼，关于业务的，找上当权派，与你们一块儿谈。”

“国务院的联合办公室要联合各方面，要有帮手。工交口找了谷牧和余秋里。文化部、教育部还未找他们，文教口多数去找中央文革，要让他们闹革命。小学、初中准备开学，开学后就有工作。现在最乱的是卫生部，医疗预防不能丢下。运动，业务班子怎样结合很复杂。关于文化大革命的问题，可发直接给中央办公厅，转给中央文革，转给我；关于业务问题，可以找国务院秘书厅，有时可直接找我。电话告诉你们，保持联系。文革小组管

政策，国务院管业务，业务当然也有政策。”

“关于各部的规章制度过去错误的东西，与文化大革命有关的，如经济主义，引起派别斗争的首先要废除，你们提出来交秘书厅，下通知废除，其余的文化革命以前的制度如临时工、合同工、劳保制度、奖励制度、复员军人等问题以后，要一个一个研究解决。

还有一个问题，造反派监督业务，掌权了，部长、副部长的行动由你们负责，谁揪走了，你们管，你们要他们 8 小时工作、劳动都可以。在大门上可贴出别的单位来揪走部长要与你们造反派交涉，我把人完全交给你们了，丢了人找你们负责，全部交给你们了，好不好？”

众人答：“好！”热烈鼓掌。

李富春说：“总理今天讲话可以原原本本向群众传达。”

## 第 478 回：打报告，丁盛再议“石河子”　说“联合”，春桥讲《上海公社》

2 月 1 日凌晨，周恩来主持了铁道部关于夺权问题的辩论会后，又在当天晚上，再次接见铁道部群众组织的代表，责令铁道部机关和直属单位群众组织代表协商推选出 14 人，组成了铁道部临时业务监督小组。他说：“我不愿意军事管理，很复杂。”“希望‘二七’那天能见到你们的大团结。”

正在北京的新疆建设兵团副司令员丁盛于 2 月 1 日再次就新疆“126 石河子事件”向中央文革小组写报告称：“早在 1966 年的 11 月间，驻石河子的工交部汽二团的领导(8 个领导，7 名是国民党旧军官)就被该团的群众组织拉下了马，”“被赶下台的当权派，不甘心失败”，“展开了反夺权。”并于“25 日再次进行了反夺权。”“毛纺厂七号楼第一单元二，三楼”有 12 个向值班部队疯狂发射的“火力点”。“是一小撮国民党残渣余孽和对党、对社会主义制度不满的坏分子，开枪打死打伤部队一些干部、战士。部队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对这一小撮歹徒进行了武装镇压。”

2 月 1 日，复旦大学成了上海运动的中心。人们纷纷前去了解“一二八事件”的真相。复旦校园内贴满了红对联：“抬头望见北斗星，低头想念毛泽东。”他们贴出的大字报是“坚决拥护中央文革小组”“张春桥就是不等于中央文革小组”，并揭发市委写作班黑幕。

上海部分大学生和一些中学生仍然在复旦大学、上海师院和大街上举行炮打张春桥的游行。

但是，此时的张春桥已不再把这件事情放在首位了，1 月 31 日发表的《红旗》杂志第三期社论高度评价了上海“一月革命风暴”，而上海的夺权至今没有完成。“一月革命”发源地的上海，反而落后于山西、黑龙江，甚至青岛。此事不能再拖了！2 月 1 日，上海街头鲜红的大幅标语，覆盖了那些“打倒张春桥”的标语。新标语都是一句话：“一月革命胜利万岁！”

2 月 1 日这天，张春桥和姚文元接见上海同济大学“东方红兵团”、上海市第一医院“星火燎原兵团”、华东工学院“红旗兵团”、清华“井冈山驻沪联络站”、北大文革驻沪联络站、北京工农兵体院驻沪联络站的代表。张春桥对这些学生说：

“北京叫‘北京人民公社’，我们上海也叫‘上海人民公社’，《人民日报》里有句话，不知道你们注意了吧！去年 6 月 1 日毛主席就把北京大学的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称为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北京公社宣言。这时毛主席就英明地、天才地预见到我们的国家机构，将出现崭新的形式。这里有谁参加起草。”

他是在问上海“革命造反派组织联络总站”的文件准备情况。

同济大学“东方红”回答：“我们参加了。”

姚文元：“只有大联合才有权力，一个组织讲话没有人听，30 个组织讲话就有人听。在当前正需要，这是我的感觉，不知你们有没有这方面的要求，能不能通过斗争先弄成雏形。”

张春桥：“关于成立新市委问题，赵全国已被捕入狱。赵全国到北京回来就反对我，不知是什么道理，我在北京时，陈丕显打电话到中央要我回来，说市委支持不住了，是不是想把我推到第一线，设陷阱？我总觉得这里面有玩意。当前在街上没有打倒陈丕

显的大标语，这是不正常的。真正革命的同志，应该掌握革命的大方向。”

他说：“你们都是青年，要注意在大风大浪中锻炼。陈丕显参加革命时，还是红小兵，在那艰难困苦条件下，受得了，他们还没想到今天会走资本主义道路。你们以后当权了，要注意。条件变了，不注意就会慢慢滑下去，现在分裂了，可能你们人少了，少没有关系。毛主席说：真正的革命左派总是少数。”“现在有的人说：‘我这个组织好，即是科长以下的人组成。’把科长当成当权派统统拉来斗，这是非常错误的。”

“当前怎么搞，‘红革会’是不是会作为斗争的一个内容？前一阶段有些打击面太广。对‘红革会’要把某些负责人和‘红革会’战士区别开。矛盾会转化，很多群众组织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原来是革命的组织，现在也不一定是革命的，本来是革命的也会走向反面。”

姚文元接过来说：“他们炮打春桥同志，矛盾确实会转化的。‘红革会’两次要求警备区派队伍，还是带着威胁性口气说的。24 日夺华东局和上海市委的夺权警备区派了队伍，26 日开常委会又要派部队保护他们，30 日下午开炮打张春桥会说：‘我们要开大会，要派部队保护我们，要警备区副司令员和师政委及上次参加行动的部队听我们的揭发控诉。’一个革命组织可以调动军队对付别人的革命组织，那这种情况发展下去怎么办？‘红革会’恨我们的另一个原因是：因为我打电话给‘工总司’，叫他们搞大联合。”

有同学说：“破坏大联合的罪魁祸首是‘红革会’。”

张春桥："他们已到了无聊的地步……他们幕后有人。他们的'炮打'，适应了陈不显、曹荻秋的要求。我今天收到曹荻秋的一封信，说要跟我个别谈话。曹荻秋的信，早不写，晚不写，就在今天写来，看来跟'红革会'是相呼应的。曹荻秋曾对我说：'你来上海尝尝味道！'"

姚文元："一点也不错，曹荻秋讲过这话。他对我也说：'你们在北京、中央发号施令，这一回你们到上海尝尝味道！'他所说的'尝尝味道'，就是指尝'炮打'的味道。可以清楚地看出来，'红革会'是有后台的。"

张春桥："同志们，你们注意到中央文革特急电报中的措词了吗？电报中总是提'红革会的某些负责人'，这就把'红革会'的某些头头与广大'红革会'战士加以区别。'红革会'某些头头是什么性质？我看，以后会下结论的。"

姚文元："一个组织不敢展开辩论。处处以武力来压别组织，发展到这个地步？……同志们注意了吗？最近，马路上批判陈丕显、曹荻秋的大字报没有了，有的只是炮打春桥同志的大字报。曹荻秋根本不承认自己被打倒，陈丕显的问题根本没有揭透。'红革会'的'炮打'，适合了谁的需要，不是很清楚的吗？'红革会'转移了斗争的矛盾，'红革会'的大方向错了！当前，上海广大革命造反派有两项首要任务：第一，斗争陈丕显、曹荻秋等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第二，大联合，大夺权。这两项首要任务，都给'红革会'破坏了！"

张春桥："'怀疑一切'是错误的口号，是无政府状态的口号，是反毛泽东思想的口号""希望同志们考虑下一步怎么办？和'红

革会’斗争只是一部分。”

姚文元：“大联合之所以有必要，集中起来有威力，有必要集中起来，成立一个‘上海人民公社’。”

上海“机联站”、“工总司”、同济大学“东方红”、“首都三司驻沪联络站”等几个上海主要的造反派组织，在上海市委党校成立了夺权宣言的起草小组，他们根据马克思《法兰西内战》一书，提出要把巴黎公社的革命精神写进上海的夺权宣言，主张“彻底砸烂旧的国家机器”，“公社委员由群众直接推选”，“公社委员是人民公仆，工资收入不得超过普通工人”等等。初稿起草出来以后，命名为“上海人民公社宣言”。

徐景贤把这些设想向张春桥、姚文元作了汇报，二人基本同意起草小组的设想，并且要徐景贤把夺权宣言的初稿统改以后，交给他们两个定稿。

徐景贤将张、姚二人的意见向起草小组的成员作了传达，大家听了欢欣鼓舞。徐景贤又说：“毛主席在听到《文汇报》夺权以后，曾经指出这是一个历史的创举，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大革命。根据毛主席的教导，1967 年 1 月发生在上海的这一场革命，更具有很大的历史意义。俄国的十月革命，解决了无产阶级领导广大人民向资产阶级夺取政权的问题，这在历史上是一次创举，而我们的一月风暴，又解决了当无产阶级的政权被修正主义分子篡夺以后，如何再把它重新夺回来的问题，从夺取政权到巩固政权，这又是一次历史的创举，是毛泽东思想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发展。我们的‘一月革命’，可以说是‘十月革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续和发展。因此，我建议，我们夺权宣言的题目

可以定名为《从‘十月革命’到‘一月革命’》，副题是《上海人民公社宣言》，这样既有深刻的思想意义，又有恢宏雄伟的气魄。大家觉得如何？”

徐景贤的意见得到大家一致赞成，夺权宣言的草稿就这样草成并付排了。

2 月 1 日午后，上海市“红革会”常委在上海师范学院开会，刚从北京回到上海的池东明，听说张春桥派兵镇压复旦学生，又听说中央文革特急电报偏袒张春桥，非常气愤。他对“红革会”总部勤务组的马立新说：“老马，我豁出去了！炮打张春桥，不怕坐监牢，打倒张春桥，宁愿去坐牢；砸烂张春桥，坐牢就坐牢！”

马立新和李功佐在会上再一次表示，张春桥不等于中央文革。

当晚，池东明率领“红革会”勤务组负责人，在师院东部礼堂召开了“炮打张春桥誓师大会”，他第一个登台发言，痛斥：“张春桥逆历史潮流而动，出兵镇压复旦大学学生，创‘文革’以来全国第一例！他狗胆包天，这是北洋军阀的行为！他要抓一小撮，我看是一大群。中央文革特急电报，不管是真是假，我认为都是张春桥谎报下情，对毛主席的欺骗！我明天第一个把大字报贴到南京路去！我建议张春桥把人民广场改成集中营，为了免除下一代的苦难，我们准备把牢底坐穿！”顿时，台下“红革会”声泪俱下，齐声呼喊“炮打张春桥，不怕坐监牢！”

但是，池东明没有介绍西安之行讯问霍士廉的情况，也没有讲霍士廉说：“我用脑袋担保，张春桥是叛徒！”

会后，已是 2 月 2 日凌晨，上海师范学院“红革会”1000 多名红卫兵，在池东明、金文明等勤务组成员及总部联络员的率领

下，由学校向市区进发，一路上，“舍得一身剐，敢把张春桥拉下马”、“炮轰张春桥，保卫毛主席”的口号声震天。继而，上海第一医学院、上海机械学院、上海中医学院的“红革会”，也纷纷涌向街头示威游行。掀起了全市高校“炮打张春桥”的最高潮。

但这一切，不过是回光返照而已，上海“炮打张春桥”失败的命运已是无法挽回了。

再说复旦大学“红革会”、“红三司”、“东方红公社”的几个头头组成的“复旦革命师生赴京控告团”2 月 1 日到达北京后，先到北京大学找聂元梓。但前不久在上海揪斗曹荻秋时还得到上海造反派红卫兵头头们热情接待和大力援助的聂元梓，这次却说“离不开会场”，他们没有见到她。

上海的这几个头头只好转而到清华大学去找蒯大富，蒯大富坦诚相告：这个特急电报的确实是中央文革小组所发，而且是经江青、康生批阅后拍发的。他说：“历史要为现实服务。你们想想，毛主席的战略步骤是大联合大夺权，上海开了个好头。这个时候，上海能乱吗？”他劝他们：“你们不要告状了，赶快回去吧。”

2 月 2 日，上海这几个赴京头头给上海打回电报，发表五点声明，表示要“向毛主席请罪”。在复旦大学的“红革会”头头马立新看到北京的回复后，嚎啕大哭，对围在周围的学生们说：“这个电报是真的！”

当天，复旦大学形势巨变，复旦大学“红革会”举行“保卫无产阶级司令部，坚决击退反革命逆流”誓师大会，宣布接管勤务组，接待室被封闭。

复旦大学的神童欧阳靖写出“和同志们谈心”的大字报，表

示在张春桥的问题上，“红革会”犯了错误。他说：“虽然大多数出于好心，但这种革命情绪容易被坏人利用。”

蔡祖泉写出“向毛主席请罪，向革命造反派请罪”的大字报。表示以前保上海市委、校党委是对毛主席犯了罪，向毛主席请罪。又说：“张春桥同志是坚定的革命左派。”

“红革会”宣传组及以前坚持炮打张春桥的人纷纷写检讨书。

下午，“首都三司”、哈军工、二军医大、东北工学院等单位的 10 部宣传车开进复旦，主要口号就是：“揪出‘红革会’中炮打张春桥的混蛋！”复旦校园内轰动一时。王洪文的“工总司”和耿金章的“二兵团”冲进复旦大学，砸了“红革会”。他们都是工人群众，不是军人，学生们无可奈何。

当天，交通大学“红革会”所属“遵义纵队”宣布接管总部；上海师范学院红革会成立“造反联络站”，宣布“彻底清算总部负责人的罪行”。

当晚，“红革会”大小头头们秘密集中到师范学院体育馆开会，认为从大局考虑，还是先向毛主席请罪。他们以“红革会”总部勤务组名义发出《向毛主席请罪》。各大学和部分中学的“红革会”马上步调一致，也纷纷请罪。

2 月 2 日，就在复旦大学为炮打张春桥一事沧桑巨变之时，上海市淮海中路 622 弄尽头的中共上海党校，此时也是人来人往，热闹非凡。“上海市委机关造反联络站”正在召集上海 38 个群众组织召开“全市性革命群众组织代表会议”，继续研究上海的夺权问题。根据中央的指示，新生政权必须是“三结合”组成，即群众代表、革命干部和解放军。于是，上海驻军也派代表参加。

晚上，他们又来到余庆路招待所，再次讨论了夺权宣言和通令之后，“工总司”等几个群众组织负责人迫不及待的站起来嚷嚷说：既然“红革会”等都不参加筹备了，那末新政权机构的建立应当越快越好，只争朝夕嘛！他们一起哄，当时就决定成立“上海人民公社委员会”，而且立即抬着一张张的大红喜报连夜给张春桥、姚文元报喜去了，要求在第二天，即 2 月 3 日就举行全市的成立大会。与此同时，欢呼最高权力机构诞生的大标语也很快贴满了街头。

## 第 479 回：教育部，为夺权发生武斗　上海滩，耿金章又生枝节

上海炮打张春桥基本尘埃落定，夺权工作紧锣密鼓。北京的夺权工作中央也抓得很紧。

聂元梓 1 月 27 日在广播事业局成立的“北京革命造反公社”虽然有 30 多个单位签名，其实起作用的主要是北京大学的“校文革”和广播事业局“毛泽东思想战斗团”，其他很多单位只是挂名。

聂元梓派人找蒯大让他过来，蒯大富说：“韩爱晶已经要我参加他们的‘首都革命造反派夺权斗争委员会’了。”

这个“首都革命造反派夺权斗争委员会”，简称“夺委会”。聂元梓又派人到北京市委请“夺委会”的北航韩爱晶和京西煤矿工人李思聪。韩爱晶们接受了邀请，组成了“大联合谈判团”，由北航“红旗”的方臣为团长，清华“井冈山”的李磊落，中学生向军等十几个人参加，连夜开会，分析形势，制定方针，准备文件，然后在风雪交加的夜晚，由市委大楼乘车沿长安街直奔广播大楼，在那里的与“北京革命造反公社”聂元梓、李敦白见面。

这是韩爱晶第一次和聂元梓见面。这时他才知道，聂元梓原来比他妈妈的岁数还大。韩爱晶对她很尊重。

聂元梓态度明确，要“夺委会”从三大工人总部里挑一些大工厂和她一起组织新的夺权斗争指挥部。韩爱晶觉得，不应该把三大工人总部撇开，于是客气地表示了自己的意见。

美国人李敦白发言，他上来就说：“毛主席不但是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也是世界人民的伟大领袖”，赢得满场掌声。

接着，李敦白又说：“毛主席是我们全世界人民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

又是一阵热烈的掌声。

会场的气氛越来越热烈，好像在冬天里生了火一样。李敦白讲着讲着，谈到夺权，他和聂元梓的意见自然是一样的。

韩爱晶和李思聪发言，他们首先对美国人民热爱毛主席表示感谢，但是，坚持必须保留三大工人总部。

2 月 1 日，蒯大富也来参加谈判，最终双方达成五点协议：

（1）革命派要联合起来，成立组织，建立“北京人民公社”筹委会。各参加单位不许武斗，有分歧协商解决；

（2）互相之间不要攻击，不要在街上暴露内部矛盾，有离间相互关系者必须改正；

（3）各单位必须进行思想整顿和组织整顿，学习《关于纠正党内错误思想的决议》克服山头主义、个人主义等。对混进来的“捍卫团”变种和保皇组织格除勿论。对打进来的坏分子和革命组织中的腐化变质分子格罢勿论；

（4）热情欢迎真正的革命造反组织加入筹委会；

（5）筹委会必须坚决执行上述几条。

北京大学《动态报》于 2 月 3 日对这次协商结果作了报道。

就在北京“夺委会”和“北京革命造反公社”达成“五点协议”的 2 月 1 日夜至 2 日凌晨，教育部为了夺权发生了武斗。教育部的“北京公社”和“延安公社”两派分别在北京大学“红旗兵团”和北京师范大学“井冈山”的支持下，在教育部打了起来，

数百人受伤。

陈伯达闻讯，立即给已经回到北京大学的聂元梓打电话，叫她把在教育部参加夺权的北大学生撤回学校，并且要向谭厚兰道歉。戚本禹甚至说，北大的军训部队和学生一起到高教部冲谭厚兰，解放军搂抱女学生，污辱了女学生，聂元梓必须到高教部给谭厚兰道歉。

63 军闻听此事，十分的紧张。解放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明确规定“不许调戏妇女”，如有此事，那可是天大的事情，这还了得？！他们连夜在内部追查，一个战士、一个战士的问，在高教部都有什么举动，结果没有查出有上述行为。63 军立即给中央文革写了报告，澄清此事。

聂元梓随即赶到高教部，没有见到谭厚兰，便和 63 军一起把在那里的北大学生召回学校。

2 月 2 日下午，关锋、王力给北大打电话。北大孙蓬一拿起电话，关锋对他说：

“孙蓬一同志，我通知你一件事，中宣部前些天搞了一个所谓夺权，阮铭勾结反动组织‘职工红色造反团’一起搞的，他们夺了印刷厂，印刷厂本来已归《红旗》杂志夺了，把中宣部的印收了去，钥匙也收了去。中宣部的权中央早就夺了。阮铭的问题很严重，勾结反革命。已经向阮铭交待，要他老老实实，向真理投降，将功赎罪。你们要注意跟他划清界限。你们为什么说徐非光是叛徒？当时大家的水平都那么高吗？要说检查的话，聂元梓也有检查嘛！阮铭也有嘛！徐非光是叛徒，那他们算什么？师大的同志还是顾大体、识大局的，没有公布聂元梓的材料。你们现

在有些做法，恐怕是要考虑的。自己解放自己，但是中央文革的意见还是要听的。……下面王力同志有话和你说。”

关锋之所以说“印刷厂本来已归《红旗》杂志夺了”，是因为《红旗》杂志社在中宣部院内，后勤系统如汽车班，印刷厂隶属中宣部。他提到的阮铭、徐非光，在北大社教时，都是北大工作队的。

王力接过电话继续对孙蓬一说：“昨天夜里，接到师大‘井冈山’同志的情况反映，今天又听到一些反映，关于高教部的事情从几个方面得到反映，在你们的支持下，砸了‘延安公社’，抢了北师大的广播台，然后北师大又去抢回‘延安公社’。你们又调了一、两千人，还有军队。他们遭到你们的围攻和打骂。据说北大同学还要师大同学承认是反革命事件，师大提出不能这样做。结果你们绑架走了 7 个人，围攻了 300 多人。民族研究所支持你们的人中有的是绑架过洪涛的人，这个问题我们感到很严重。……”

孙蓬一反驳说：“我们掌握的情况和你了解的情况恰恰相反，是不是我把情况向你汇报一下？”

王力说：“我们不听了，你们两家打架的情况我都不愿意听了。……”

关锋对孙蓬一说：“你们就不应该去，你们应该严格要求自己。”

受到中央文革员王力、关锋的严厉批评后，聂元梓即召回北京大学各路夺权队伍，在学校内开始整风。此时，清华、北航、地质、师大等许多高校也都开始了整风。

2 月 2 日，下了西山的国防工办副主任赵尔陆，终因心脏病、

哮喘病去世。林彪闻讯后派叶群去看望赵尔陆的夫人郭子瑞，并把郭子瑞接到毛家湾休息。郭子瑞问林彪："怎么革命了一辈子倒成了反革命，走资派！？"

林彪说："不要怕戴帽子，走资派是党内问题，应该在党内解决。"

这时，国防科委有人说赵尔陆是自杀，是叛徒，要打倒，林彪写了个条子批示到："赵不是反革命，其家属也不是反革命。"

在国防工办批判赵尔陆时，林彪曾对赵尔陆的问题这样说过："对赵尔陆的错误要狠狠地批，对他的工作要重重的用。"

毛泽东的女儿李敏在一次回家见到毛泽东时，也谈到赵尔陆被整的事。毛泽东不解的说："赵尔陆是井冈山的人，为什么要整他？"

2 月 2 日，毛泽东对王任重就医看病的报告作了这样的批语：

"我意应说服红卫兵，让他就医。红卫兵有事，视王病情许可，随叫随到。"

为协调国务院业务和文化大革命运动的进行，2 月 2 日，周恩来给陈伯达、江青并中央文革小组写了一封信：

伯达、江青同志并文革小组各同志：

一、提议今后每星期一、三、五晚十时起在钓鱼台开碰头会，以文革为主，我参加，讨论形势和政策及有关文件草案，其他有关同志按问题性质临时通知参加。

明（3）日，我提议讨论初中和小学开学文件、工业生产问题（文件在印发），下一次讨论农业。

二、提议今后每星期二、四、六下午三时半在怀仁堂或国务院会议室开碰头会，以常委四同志（周、陈、康、李）为主，副总理（陈、李、谭、聂、谢）和剑英参加。务请文革江青同志或指定的同志参加，分别讨论党政一些业务问题。

敬礼！

周恩来的提议，毛泽东没有同意。2 月 4 日，毛泽东在周恩来的信上批：“此件不用，退周。”

我们再看上海。2 月 2 日晚上 21 时多，张春桥和姚文元接到“工总司”谢鹏飞打来的电话，说：“我们上海人民公社成立了，向你们报喜。”

张春桥和姚文元感到很突然，说：“你们怎么来的这么快呀，也不和我们商量一下。”

谢鹏飞说：“明天开成立大会，你们来参加，现在我们就向你们报喜。”

张春桥说：“这个事情要报告一下中央才行啊！”

于是，姚文元立即给北京打电话，说上海 38 个组织今天晚上宣布夺权，宣言、委员都弄好啦，要向我们报喜，我们准备到他们那里去给他们谈一谈，去接受他们的报喜，同时请中央考虑还有什么指示没有。

张春桥和姚文元二人立即赶到武康路 2 号召开各群众组织主要负责人的紧急会议。张春桥一到场，就开门见山地说：

“今天把你们紧急请来，就是要商量成立‘上海人民公社’的大事。你们急着要建立自己的政权机构，急着马上就开成立大

会，这种心情我和文元都是理解的，我们当然也是支持的。但是，一个新的政权的建立，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啊！在这个权力机构里，光有你们这些群众组织的代表还不行，还应当有革命干部的代表。可是上海市一级的干部都没有‘解放’，那么，就算我和文元是革命干部的代表吧，我们的机构里还要有军队的代表，驻沪的陆、海、空三军究竟派谁来参加三结合的权力机构呢？他们三军的领导机关还得商量一下吧？”

姚文元接着说：“成立新的权力机构这样的大事，我们还要向毛主席和党中央作报告呢！再说，召开这样大规模的成立大会，有许多准备工作要做，不宜太匆忙……”

张春桥接着说：“是呀、我们还应当发表一个像样的宣言，现在宣言的初稿已经写出来了，可是我和文元还没有来得及看，我们想要仔细推敲修改一下，请你们也要认真看过，我们再在全体委员会上讨论通过，向全国发布。还有，成立大会上各方面的代表要发言，我们也要讲讲话，这些都需要时间准备。所以，我建议成立大会是不是推迟几天。”

这时，王洪文急不可耐地站起来说：“‘上海人民公社’开成立大会的事，我们已经布置下去了。我的意见大会不要延期太久，不然群众的情绪会受到影响。”

其他的人也都主张趁热打铁，尽量早开，最后张春桥拍板：1967 年 2 月 5 日下午在人民广场召开“上海人民公社”成立大会。

会后，王洪文立即带着一批人，开进南京路市体委大楼，具体筹备大会的组织工作。

徐景贤和文件起草小组一起，争取宣言早日定稿，并且负责

审改各界代表的发言。

而张春桥和姚文元刚回到兴国路招待所，北京的电话来了，回答他们刚才报告的关于上海造反派将成立“上海人民公社”一事，说这样子不好，没有三结合。

张春桥请示说：“三结合市里没有人站出来啊！”

中央临时决定，让张春桥和姚文元参加。

放下北京的电话，张春桥立即将正在筹建“上海人民公社委员会”的王洪文、王明龙和上海警备区司令员廖政国叫到住处兴国路招待所，向他们传达了中央要他和姚文元参加“上海人民公社”的决定。张春桥征求廖政国的意见，廖政国说“按毛主席指示办。”

就在这个时候，张春桥又得到消息：有 32 个群众组织的代表正在“机联站”所在地，上海市委党校西边二楼的小客厅里开会，成立了“上海市革命造反派大联合委员会”，简称“大联委”，也在商量夺权计划，也在起草“夺权宣言”和“通令”。他们要成立“新上海人民公社”，声称“上海一切权力归“新上海人民公社”！”这个“新上海人民公社”的首领，就是“二兵团”的耿金章！

原来，“1.28 炮打事件”中，张春桥要耿金章和王洪文不要闹分裂，于是耿金章在“1.28 事件”后，准备找王洪文谈判。2 月 1 日，他听说王洪文在市委党校开会，便和“二兵团”的几个人去党校找王洪文，楼上楼下都没有找到，却在门口碰上“一兵团”、“三兵团”和“工三司”等组织的负责人。他们对耿金章说：

“‘工总司’等组织正在偷偷摸摸地成立‘上海人民公社’，

你知道吗？”

耿金章立即打电话给张春桥，秘书何秀文接电话。耿金章问：“你和春桥同志是否知道王洪文成立人民公社的事？”

何秀文答：“知道的。”

耿金章又问：“你为啥不告诉我？还把那么多组织排斥在外？”

何秀文解释说：“我们事先找过你，但没找到你，所以没跟你商量。”

耿金章大声说：“好！你们成立人民公社，不让我们知道，我们也有权成立第二个人民公社！”然后气呼呼地扔下了话筒，转身将电话内容告诉一旁等候的其他组织负责人，大家都非常气愤。“工三司”和“挺进军”负责人提出：“王洪文他们成立人民公社夺权，我们也成立联合夺权机构，和他们对着干！”

于是众人立即就在市党校开会，召集人就是耿金章。

2 月 2 日，就在“工总司”等组织继续研究上海夺权问题时，耿金章他们也正在通宵开会，也起草宣言和通令，也给毛主席发致敬电，也宣布夺上海市的党政财文大权，也要张春桥和姚文元当负责人。他们还起草了一份给中央文革的紧急电报，控告“工总司”单方面成立“上海人民公社”是搞分裂，排斥老造反，有人甚至提出：“如果‘上海人民公社’明天见报，这个紧急电报一定要和它一起刊登，不然就不让《解放日报》出版。”

2 月 3 日，张春桥得到耿金章另立公社的消息后，立即派“机联站”的朱玉佩到上海大厦找耿金章，要他来兴国路招待所面谈。

就在耿金章他们正在商议夺权大事时，一个清脆的女声在他

耳边响起：

“耿师傅，您出来一下。”

耿金章回头一看，原来是联络员朱玉佩。

“什么事？”耿金章问。

“春桥同志请您去一趟。”朱玉佩说。

“要我去干什么？我正忙！”耿金章回答道。

“耿师傅，请您去一下吧，路又不远。”朱玉佩又说道，那话音近乎哀求。

“既然路不远，为什么张春桥不能来，非要我去？”耿金章傲然答道。

“这儿人太多，说话不方便。还是委屈您去一趟吧。”联络员缠着耿金章，再三恳求。

“好吧，那就去一趟吧。”耿金章终于站了起来。

小轿车的轮子才转了几圈，就已行驶在兴国路上了。轿车一进兴国招待所的大门，耿金章远远望去，张春桥已伫立在五号楼前静候。

“老耿，”这一回张春桥不喊他“金章同志”，而称之为“老耿”。不过，在客厅坐定之后，张春桥一开口，说的还是那句老话：“你我都是共产党员。今天，你我都站在党的立场上，进行这次谈话。”

耿金章没有说话，等待张春桥的下文。张春桥呢，也不兜圈子，开门见山，直截了当：“老耿，听说你在搞‘新上海人民公社’？”

耿金章依然沉默着。

“老耿，你不能那样做。”张春桥的声调，也变得很严峻，“你违背了毛主席的教导！”

怎么会呢？耿金章忍不住了，质问道：“为什么只允许你们搞‘上海人民公社’，我们就不能搞‘新上海人民公社’？我们一搞，就是违背毛主席的教导？”

张春桥说：“因为‘上海人民公社’是毛主席支持的！”说毕，他站了起来，对秘书说了几句。

没一会儿，秘书拿来一纸公文。

“这是来自党中央的电话的记录稿，老耿，你看一下。”张春桥燃起一根香烟。

耿金章接过电话记录稿，上面写着这样一段话：

“毛主席指示：要搞革命的三结合，要张春桥、姚文元同志参加上海市临时最高权力机构领导工作。”

耿金章一连看了三遍，顿时像泄了气的皮球，瘫在沙发上。因为这段“最高指示”尽管并没有直接对“上海人民公社”表态，但“要张春桥、姚文元同志参加上海市临时最高权力机构领导工作”一句，意味着什么，已经很清楚了。

张春桥加重了话的分量说：“我和文元同志已经参加‘上海人民公社’，‘中央文革’也支持‘上海人民公社’，你再搞‘大联合委员会’，再搞‘新上海人民公社’，就会造成上海的大分裂，你就会犯大错误——破坏‘一月革命’！”

耿金章沉默了半晌，说出了经过思索的话：“春桥同志，你说我搞分裂，可是，你们搞‘上海人民公社’，把我们 32 个造反派组织撇在一边，实际上就造成了大分裂的局面！”

张春桥十分惊讶的说：“谁把你撇在一边？我跟文元同志不止一次地说过，耿金章同志与王洪文同志一样，都是上海工人造反派的领袖人物，是经过安亭风暴的考验。在酝酿‘上海人民公社’常委名单时，我就提到过你的名字。”

耿金章一怔。张春桥用非常肯定的语气说道，“老耿，我看你还是把‘新上海人民公社’解散了吧，我可以用‘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的名义向你担保，在‘上海人民公社’成立大会上，你一定上主席台，你一定当选为‘上海人民公社’常委！”

耿金章宣布加入“上海人民公社”。而他为首的“上海市革命造反派大联合委员会”和“新上海人民公社”，当然也就再一次的不复存在了。

## 第 480 回：上海市，“红革会”批判头头　周恩来，办公室前大字报

2 月 3 日，上海“红革会”出现了大乱，下面纷纷造反。上午，上海“红革会”造反派召开大会，批判本校的头头，但将责任推到“红三司”和“孙悟空”身上。但外语学院、一医、中医学院、机院等“红革会”还是坚持炮打。

这天，张春桥应部分红革会红卫兵要求，发表三点意见：

一、欢迎红革会战士起来造反。

二、对于一般红革会战士来说，不是请罪的问题，而是造反的问题；要请罪的不是广大战士，而是少数负责人，责任在红革会的某些负责人。

三、这一场斗争，不是一个小问题，也不是个人问题，而是关系到中央文革的正确领导能否贯彻的问题，关系到上海运动大方向的问题。红革会战士要造反，就要彻底肃清少数负责人对这次事件所造成的恶劣影响。

2 月 3 日，去北京告状的上海“红三司”头头安文江他们回到上海，等待他们的已是刷遍上海的大标语：

“坚决反击炮打中央文革的反革命逆流！”

“坏头头不投降就叫他灭亡！”

“绞死劳元一！”

“砸烂周谷声！”

“油炸安文江！”

“红三司”立即召开整风大会，统一思想，连续发表声明，

表态拥护中央文革特急电报，批判“炮打”头头。

连顶得很厉害的复旦大学“东方红公社”，也发表了《坚决执行五点指示的声明》。

2 月 3 日，上海“市红革会接管委员会”成立。第二天，2 月 4 日上午，上海 38 个院校的“红革会”近 8 万人，联合在文化广场召开“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迎头痛击炮打中央文革的反革命逆流誓师大会”，把市“红革会”总部常委马立新、劳元一、李功佐 3 人，作为炮打祸首，押站在前排接受批斗。同时，“红三司”的安文江、“炮司”的周谷声等人也被押在台上，勒令他们就炮打张春桥事件做出交待。大会由郭仁杰主持，张春桥、徐景贤、王洪文、陈敢峰等都出席了大会。会上，一些“红革会”学生冲上主席台喝令头头们靠边站、低头认罪。

大会宣布，成立“红革会临时接管委员会”。会后分三路游行，高呼：

“‘红革会’大旗永远不倒！”

“跌倒算什么，爬起来再前进！”。

接着，马立新、安文江他们又分别押往全市高校巡回批斗，先到上海财院，再到华东政法学院……

2 月 3 日，毛泽东、林彪、周恩来在北京会见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代表团。

毛泽东说：“我这个人是不大行的，你们同志们也知道。你们看看，中国搞得这么乱，没有搞好嘛。现在天下大乱。什么时候谢胡同志到中国来的呀？”

周恩来回答：“去年 5 月。”

毛泽东说："去年 5 月我就向他讲这个问题，究竟还是修正主义胜利，还是马列主义胜利，这两条道路，两个阶级，还是资产阶级胜利，还是无产阶级胜利，还是马列主义胜利，还是修正主义胜利？我也说，究竟哪一方面胜利现在还看不出来，还不能作结论。有两个可能，第一个可能是资产阶级胜利，修正主义胜利，把我们打倒；第二个可能就是我们把修正主义、资产阶级打倒。我为什么把第一个可能放在我们会失败这一点上呢？我感觉这样看问题比较有利。就是不要轻视敌人。

多少年来，我们党内的斗争没有公开化。比如，1962 年 1 月，我们召开了七千人的县委书记以上干部大会，那个时候我讲了一篇话，我说，修正主义要推翻我们，如果我们现在不注意，不进行斗争，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中国会要变成法西斯专政的。这篇讲演没有公开发表，在内部发表了。以后还要看一看，里面也许有些话还要修改。不过在那个时候已经看出问题来了。1962 年，63、64、65、66，5 年的时间。为什么说我们有不少工作没有做好？不是跟你们讲客气的，是跟你们讲真话。就是过去我们只抓了一些个别的问题，个别的人物，比如 17 年来，就有和高岗、饶漱石的斗争，他们一个集团，我们把他整下去了。这是 1953 年冬到 1954 年春。然后是 1959 年，把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这个集团整下去了。此外，还搞了一些在文化界的斗争，在农村的斗争，在工厂的斗争，就是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有些情况你们也知道。这些都不能解决问题，就没有找出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所以这次要搞文化大革命。

这场斗争也准备了一个时期，前年 11 月，对一个历史学家吴晗发表一篇批判文章，这篇文章在北京写不行，不能组织班子，只好到上海找姚文元他们搞了一个班子，写出这篇文章。

卡博："受毛泽东同志指示写的。"

毛泽东："开头写我也不知道，是江青他们搞的。搞了交给我看。先告诉我要批评。他们在北京组织不了，到上海去组织，我都不知道。文章写好了交给我看，说这篇文章只给你一个人看，周恩来、康生这些人也不能看，因为要给他们看，就得给刘少奇、邓小平、彭真、陆定一这些人看，而刘、邓这些人是反对发表这篇文章的。文章发表以后，各省都转载，北京不转载。我那个时候在上海，后头我说印小册子。各省都答应发行，就是北京的发行机关不答应。因为有些人靠不住嘛！北京市委就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市委。现在不是改组了吗？改组了的市委还不行，现在还要改组。当着公开发表北京市委改组的时候，我们增加了两个卫戍师。现在北京有三个陆军师，一个机械化师，一共有四个师。所以，你们才能到处走，我们也才能到处走。原先那两个师是好的，但是，分散的一塌糊涂，到处保卫。

现在的红卫兵当中也有不可靠的，是保皇派，他们白天不活动晚上活动，戴眼镜，戴口罩，手里拿着棍子、刀，到处捣乱，杀了一些好人，杀死了几个人，杀伤了好几百。多数都是一些高级干部的子弟，比如像贺龙、陆定一、罗瑞卿这些人的子弟。所以，我们的军队也不是没有问题的。像贺龙是政治局委员，罗瑞卿是书记处书记，总参谋长。把罗瑞卿的问题处理了，那是前年 12 月；把北京市委这些人处理了，是去年 5 月。发动大字报运动，

是去年 6 月 1 号。发动红卫兵，是去年 8 月。你们有人不是见了北京大学聂元梓吗？谁人去见的呀？”

卡博：“什图拉同志。”

毛泽东：“她在去年 5 月 25 号写了一张大字报，那个时候我在杭州，到 6 月 1 号中午我才看到，我就打电话给康生、陈伯达，我说要广播。这一下大字报就满天飞了！”

巴卢库：“大字报就发出信号。”

毛泽东：“也不是我写的，是聂元梓她们 7 个人写的。红卫兵是清华大学附属中学、北京大学附属中学两处搞起来的，他们有一篇材料给我看到了。到了 8 月 1 号，我就写了一封信给两个学校的红卫兵，后来就大搞起来了。8 月 18 号我接见了红卫兵几十万人。接着 8 月上旬到 8 月中旬就开了中央八届十一中全会，这个时候我自己才写了一张二百个中国字的大字报，说，从中央到地方某些负责人，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上，反对学生，反对无产阶级，搞白色恐怖。这才揭露了刘少奇、邓小平的问题。现在，两方面的决战还没有完成，大概 2、3、4 这 3 个月是决胜负的时候。至于全部解决问题可能要到明年 2、3、4 月或者还要长。才别相信我们这个党里都是好人。好几年以前我就说要洗刷几百万，那不是讲空话吗？你有什么办法？毫无办法。只有发动群众才有办法，没有群众我们毫无办法。他不听。一个《人民日报》（中央机关报），就不听我的。《人民日报》是夺了两次权的，第一次是去年 6 月 1 号；第二次是最近 1 月份。过去我公开声明，我说，《人民日报》我不看。当着《人民日报》总编辑也说，我不看你的报纸。讲了好几次，他就是不听。我的这一套在中国是不灵的，

所有大中学校都不能进去。因为控制在刘少奇、邓小平、陆定一的宣传部、周扬的文化部这些人手里，还有高等教育部、普通教育部这些人的手里，毫无办法。

我们党内暴露出许多人，大概可以分这么几部分：一部分是搞民主革命的，在民主革命阶段可以合作，他的目的是民主革命，要搞资本主义。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主义，他是赞成的；打倒官僚资本主义，他也赞成；实际上打倒民族资本主义他就不赞成了。分配土地，他是赞成的，分到农民手里，要组织合作社他就不赞成了。这一部分人，就是一批所谓老干部。

第二部分人就是解放以后才进党的一批人，百分之八十是1949年以后进党的。其中有一部分人当了干部，支部书记、党委书记，甚至更高的县委书记、地委书记、省委书记，还有中央委员，这么一批人。

第三部分就是我们收容下来的国民党的这些人，其中有些过去是共产党被国民党抓去，然后叛变了，在报上登报反共。那个时候我们不知道他们反共，不知道他们所谓‘履行手续’是一些什么东西。现在一查出来，是拥护国民党，反对共产党。

第四部分人就是资产阶级、地主、富农的子弟，解放以后他们进了学校，甚至进了大学，掌了一部分权。这些人也不是都坏，有许多是站在我们方面的。但是，有一部分是反革命分子。

大概就是这么几部分人。总之，在中国人数并不多，百分之几。他们的阶级基础只有百分之几，比如地主、富农、资本家、国民党等等，顶多有百分之五。那么，7亿人口里面也不过是3500万人。他们也分散，分到各个乡村、各个城市、各个街道。如果

3500 万人集中到一起，手里有了武器，那就是一股大军了。”

巴卢库：“尽管合在一起也是一个没有思想的军队。”

毛泽东：“他是灭亡的阶级，他们的代表人物，在 3000 多万人里顶多有几十万人，也分散，分到各城市、各街道、各农村、各学校、各机关。所以，大字报一出来，群众运动一出来，红卫兵一出来，他们吓得要死。

另外，还有一些什么东西也搞得很乱，又是什么毛泽东思想，又是什么毛泽东主义，我就不喜欢这个‘主义’，就不喜欢这个‘ism’。 ”

周恩来：“我们说就是将来也用毛泽东思想，这也是一个体系嘛。”

毛泽东：“又给我封了好几个官，什么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我就不高兴。但是，有什么办法！他们到处这么搞。有人建议保留一个 Teacher，我是个小学教员嘛，就是一个普通教员多好。至于什么 Professor（教授）谈不上，我没有进过大学，你们都进过大学吧？”

卡博：“一个都没有。”

毛泽东：“马克思是大学生，列宁是大学生，斯大林读了中学，我也是只读了中学。大学生，有很大一部分人我是怀疑的，特别是读文科、社会科学的。这些人如果不进行教育，不搞文化大革命，很危险，这些人将来就是修正主义。搞文学的不能写小说，不能写诗；学哲学的不能写哲学文章，也不能解释社会现象。还有学政治的、学法律的，都是一些资产阶级的东西，我们没有搞出什么好的教科书。还有学经济的。修正主义分子可多了。但是，

现在看来有些希望，斗得厉害。”

毛泽东：“取得了相当的胜利，巨大的现在还没有。在明年这个时候也许可以讲。但是，我们还不能断定。也许我们这批人要被打败，我时刻准备着，打败就打败，总有人起来继续战斗。中国这个国家有人吹牛皮说是什么‘爱好和平’，才不是那样，爱斗争，动不动就打，我也是一个。

不过红卫兵也在不断的分化。在去年夏天左派是极少数，站在我们这边，受压迫，他们被打成‘右派’、‘反革命’等等。到了冬季起了变化，少数派变成多数派。你们到过清华大学吗？”

卡博：“去过。”

毛泽东：“‘井冈山’，过去是少数派，是受打击的；北大的聂元梓也是少数派，受打击的。现在变成多数派。过去受压迫，他们少数派很革命，一到了冬季变成多数派。去年 12 月，今年 1 月有一些就分化了。有一部分人夏季是革命的，到了冬季就变成反革命的。当然，聂元梓、蒯大富这两个人，我们是在那里做工作，说服他们。但是，这种人究竟靠得住靠不住，我们还要看。不过，闹起来总会有好人在里头。

现在流行着一种无政府主义思想，口号是一切怀疑，一切打倒，结果弄到自己身上。你一切怀疑，你自己呢？你一切打倒，你自己呢？资产阶级要打倒，无产阶级呢？

他那个理论就是不行。不过，整个潮流看来，斗来斗去那些错误的人总是最后站不住脚。你们看，北京街上有打倒我的标语，打倒林彪同志的标语。什么打倒周恩来、康生、陈伯达、江青等等的标语都有。至于要打倒李富春、谭震林、李先念、陈毅、叶

剑英、聂荣臻、肖华的标语就更多一些。比如杨成武，他是代总参谋长，总参管好几个部，其中一个作战部的部长、副部长写大字报要打倒他。那是贺龙挑起来的。打倒肖华是北京军区司令员挑起来的，要搞他。昨天挑起打倒肖华，过了一两天他自己被人家打倒了。中国第二大军区呀！一个军区司令，一个政委还有个副政委张南生几个都倒了。但是，有一条真理永远是真理，天不会掉下来的，绝大多数人民，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干部、党员、团员是好的，我们要坚决相信这条真理。”

巴卢库：“他们都是活生生的力量。”

毛泽东：“虽然有些人有些错误、缺点。我也不来包庇叶剑英、杨成武、肖华、王树声一点缺点，但是他们基本上是好人。”

巴卢库：“工作上可以犯错误，可以改呀。”

毛泽东：“可以改嘛！我也犯了一些错误嘛，只有人家犯错误我就不犯？我就犯了一些错误。政治、军事各方面都犯了一些错误。至于犯了一些什么具体的错误，现在没有时间，你们如果多呆几天可以跟你们讲，我不隐瞒自己的错误。有些人吹，说我一点错误也没有，我就不相信，我就不高兴。你那么吹我就不相信，我是一个啥人，自己还不知道？有一点自知之明嘛。”

如果中国天黑了，地也黑了，你们也不要怕，要相信一点，全黑也不会的。秦始皇统治十六年就倒了，有两个人首先起义，一个叫陈胜，一个叫吴广，他们都是那个时候的农奴。现在中国贴大字报的红卫兵，在去年夏季被打击，被打成‘反革命’的这些人，就是陈胜、吴广。我们都是斯巴达克，在社会上是没有地位的，被看不起的小人物，受压迫，组织共产党。”

2 月 3 日，在中南海周恩来的办公室门上，贴出了一张针对周恩来的大字报，全文如下：

周恩来同志：

我们要造你一点反，就是请求你改变现在的工作方式和生活习惯，才能适应你的身体变化（大姐〔指邓颖超〕加）情况，从而才能够为党工作得长久一些、更多一些。这是我们从党和革命的最高的长远的利益出发，所以强烈请求你接受我们的请求。

大字报是由周恩来的秘书、卫士、医护人员等人共同署名，邓大姐也在上面签了字。因为周恩来那阵子总是夜以继日的工作，从各地进京告状的群众他要接见，还要找有关人士谈话，参加一个又一个的会议，经常是在天亮后才疲惫地回到西花厅，而一回来就又是坐在办公桌前批阅那些似乎永远也批不完的文件。他太累了，让他身边的工作人员十分担心。但是，无论是邓颖超写字条还是工作人员的当面劝说都不奏效，就连医生也对他无可奈何。于是，采取了当时十分流行的革命方式，写大字报，希望能用这种特殊的方式来让他注意休息。

写大字报草稿的任务就由赵茂峰负责，因为赵茂峰平时爱看书，字也写得好，连周恩来向客人介绍时都说他是西花厅的秀才。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地开始凑词儿。第二天，赵茂峰就把大字报的草稿写好了，交给大家传阅修改。邓颖超看了大字报的草稿后，在第三句的“身体”后面加了“变化”两个字，因为那时周恩来已经患有心脏病了。

大字报经邓颖超修改后就定了，大家觉得周恩来办公室的门

是贴大字报的最佳地点，这样他一进办公室就可以看到。

果然，周恩来一回来就看到了这张大字报，他认真读了以后笑了笑，第二天把大字报取下来在上面批了八个大字：“诚恳接受，要看实践。”

大字报贴出后，引起了许多人的驻足，周恩来身边的工作人员，中南海的其他工作人员、医护人员，还有常到周恩来这里商议工作的中央领导人，如陈毅、聂荣臻、叶剑英等，一共有 20 多人签了名。后来，邓颖超又写了几条补充的具体意见，写成 1 个小条，贴在了大字报上面：

一，力争缩短夜间工作时间；

二，开会谈话及其它活动之间应稍有间隙，不要接连工作；

三，每日节目规定应留有余地，以备临时急事应用；

四，从外面开会工作回来之后，除非紧急事项，恩来和有关同志之间希望不要接触，(以)得到喘息；

五，学会开会要开短些，大家说话要简练些。

以上几点希望恩来同志坚持努力实践，凡有关同志坚持大力帮助。

邓颖超

1967.2.5

但后来周恩来又无奈地说：“我不能休息呀，你们看，这么多的文件等着我批，这么多的事情等着我办，我能休息吗？”

## 第 481 回：齐鲁乱，两派抢印动干戈　王效禹，泉城夺权二月三

青岛夺权的成功极大刺激了山东省会济南的群众。早在 1 月 10 日，山东省委机关报《大众日报》的“革命造反联络总部”就接管了这家报纸。第二天，《大众日报》发表《告读者书》宣布了这件事，并且发表了“山工联”等 11 个组织支持接管《大众日报》的联名文章。

但是不久，济南以“串连兵”和“主义兵”为首的两派群众造反组织之间的矛盾开始显现，起因竟是为了争抢批斗省委走资派。

1 月 9 日，山东师范的“串连兵”一派决定，1 月 15 日召开全省有线广播大会：“山东省各界革命群众愤怒声讨以谭启龙为首的山东省委一小撮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罪行大会”。

而山东大学“主义兵”联合了济南 162 个造反组织，抢先于 1 月 13 日召开“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展开全面总攻击大会”，并向毛主席发去致敬电。因为谭启龙在青岛，他们把白如冰押到会场批判。大会结束后，白如冰被扣在山东大学内，“主义兵”又通知青岛扣住谭启龙不放，致使“串连兵”两次派到青岛去揪谭启龙的人都空手而归。

15 日，山师“串联兵”联合近 12 万人召开的全省有线广播“山东省各界革命群众愤怒声讨以谭启龙为首的山东省委一小撮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罪行大会”按计划召开，亦向毛主席发去致敬电。因受到“主义兵”刁难，只揪来山东省委书记处书记刘秉

琳、山东省委组织部部长秦和珍，最后是把白如冰抢来后才押到大会示众。

对于 15 日的批斗大会，《大众日报》准备报道，两派又在报社冲突。

两个大会，表明两大派造反组织都要以自己为核心，对上争取毛泽东和中央的支持，对下召集更大的势力。山东造反派的分裂、对立开始了。

在上海“一月风暴”的鼓舞下，1 月 23 日上午，“山工联”和山东大学“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在省科委会议室召开会议，筹划夺权问题。当晚，山东省公安厅“革命造反总部”、“济南革命工人造反团”、“红卫兵济南串联站”也在山东剧院召开会议，研究向省委、省人委夺权问题，决定成立“夺权委员会”，并商定次日上午 8 时进行夺权，对“山工联”方面保密。

第二天清晨，“山工联”负责人董金福得悉“济南革命工人造反团”等组织要在上午 8 时夺权，惊呼一声：“不能叫他们夺去！”立即召集总部及各分会骨干分子会议，董金福开门见山地说：“今天一律停产，到省委、省人委、市委、市人委夺权，一个地方去他几千人。”

有人提出：“炼钢车间和翻砂车间的炉子不能停。”于是决定：除炼钢车间和翻砂车间外，其余一律停产投入战斗。

有人问：“夺权不知道怎么个夺法？”

董金福当机立断地说：“突然袭击，夺了大印就走。”

最后他吩咐：“你们都听山大同学的指挥。山大来的人，省人委去 15 个，市委去 15 个，市人委去 15 个。省委那里有‘敢死队’，

不用再去人了。”

上午 8 时，“济南革命工人造反团”、“红卫兵济南串联站”方面的人马已到省委、省人委，并在“山东省级机关革命造反联络总部”的配合下夺了权。

而“山工联”、“红卫兵山东联络总站”，简称“红联总”，他们直到 9 时之后才出发。但是他们人多势众。在省委，他们与山东大学“红色敢死队”会合，先联合省委办公厅的“联合战斗队”抢了省委办公厅的大印，又迫使“山东省级机关革命造反联络总部”及在各部、委的群众组织夺权。刚刚才在“红卫兵济南串联站”和“济南革命工人造反团”方面支持下夺了权的，他们都又重新夺了过来。

在省人委，“山工联”和“红联总”出动了两、三千人，封锁了省人委大院的三个大门，抢了省人委、省人委办公厅的大印，把办公室的门和保险柜贴上盖有山东大学“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图章的封条。他们的行动受到了“山东省级机关革命造反联络总部”及其下属组织的抗议，他们只好把夺得的图章交给受他们控制的省人委办公厅“燎原战斗队”，并向全省发布通告，宣布省人委及省人委办公厅的一切大权，已于 1 月 24 日由“燎原战斗队”接管。

还有部分“济南革命工人造反团”、“红卫兵济南串联站”等组织的代表，直到上午 10 时，还在济南剧院召开联合夺权的筹备会议，“山工联”和“红卫兵山东联络总站”也派了一名代表参加了这个会议。会议持续到 11 时，又转移到省委大院西南楼一会议室里继续进行。当会上决定联合成立向省委、省人委夺权筹备委

员会，并起草夺权宣言时，兼做“山工联”和“红联总”的那位代表，提出“山工联”方面的几个组织应该参加夺权。但他的意见被其他代表否定。这位代表感到孤军奋战，难以协商，就说了一句：“事关重大，我代表不了。”便退出了会场。参加会议的北京“首都三”代表也因持不同意见而退了出去。

下午 15 时 20 分，“山工联”和“红联总”给山东省人委财政厅打电话：“你们必须于 3 点半以前，带着最大的当权派和行政大印到‘山东工人革命造反联合会’报到，把山东的财政大权交给全省 5700 万人民。否则，由此引起的一切后果，完全由你们负责。”

15 时 30 分，“山工联”几百人即冲进财政厅。但是，财政厅“革命造反指挥部”向他们宣布：“财政厅的一切大权已由我们接管。”

“山工联”无奈，提出联合接管，遭到拒绝，他们只好退走。

24 日上午，“红卫兵济南串联站”、“济南革命工人造反团”支持济南“市级机关革命造反联络总站”夺了济南市委、市人委的权。由他们组成的“大联合革命委员会”在济南市职工剧院召开全市有线广播大会，宣布济南市委、市人委的一切权力归“大联合革命委员会”。会议发出了《给毛主席的致敬电》，通过了《告全市人民书》。

中午，“山工联”几百人乘济南市委人员开会之机占领了市委办公大楼，封了各办公室的门，抢去了 28 个公章。另外几百人跑到市人委，把装有市人委、市人委办公厅公章和市长名章的保险柜抬上汽车拉跑了。

在一些部门，“济南革命工人造反团”、“红卫兵济南串联站”

方面的人和“山工联”、“红联总”方面的人发生遭遇，双方激烈地辩论和争吵，你争我夺，相持不下。

面对两派冲突的升级，山师“串联兵”负责人、“红卫兵济南串联站”召集人王竹泉会同山东大学“主义兵”驻“红卫兵济南串联站”代表宋书星，骑车到省委大院找“红联总”负责人、山东大学“主义兵”邵长文，商讨能否联合夺权。

他们在省委大院东南楼二层，山东省委办公厅，见到邵长文，说明来意。谁知二人话未讲完，邵长文便打断他们的话说:

“联合？怎么联合！你们是‘济南串联站’，我们是山东‘山东省联络总站’，真想联合，只能申请加入!”

王竹泉和宋书星当即气得说不出话来。最后，王竹泉说:

“如果你们改称‘国际红卫兵联络总站’，你就能成为全世界领袖？!”

说罢，扭头就走。

回到历山旅社，王竹泉宣布:“从今天起，“红卫兵济南串联站”改为”红卫兵山东指挥部。”并安排专人去制作标牌。

24 日夜间，“济南革命工人造反团”在省公安厅“革命造反总部”支持下，出动大批人马，对“山工联”发动袭击。几千名工人、学生预先部署在“山工联”总部机关附近。他们先出动宣传车攻击“山工联”的夺权行动。当一辆宣传车被“山工联”扣住时，三颗信号弹腾空而起，千军万马蜂拥而上，霎时间便捣毁了“山工联”总部机关，抓走了“山工联”负责人董金福等 80 多人。这些人在遭受了一顿皮肉之苦之后被放回，董金福则于 25 日凌晨被转送到省公安厅。一夜之间，济南市大街小巷都贴满了大字标

语：

“打倒工贼董金福！”

“打倒个人野心家邵长文！”

“打倒曹靖！”

邵长文是“红卫兵山东联络总站”负责人，曹靖则是山东大学“毛泽东主义红卫兵”负责人。

1 月 25 日，山东师范“串联兵”的王竹泉将“红卫兵济南串联站”改名“红卫兵山东指挥部”，韩金海的“济南革命工人造反团”也改名“山东省革命工人造反总指挥部”，从此简称“山工总”。

1 月 25 日，济南军区支左指挥部成立。此时，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得志、政委袁升平都还在北京开会，支左指挥部由济南军区副司令员张仁初、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李耀文负责组建，成员有济南军区副参谋长李燧英、军区后勤部营房部长谭道皆、军区作战部长周运西、副部长冯文贡等。

驻济南解放军部队于 1 月 28 日举行了“全力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誓师大会”。

28 日这天,“山工联”派的薛其禄等 7 人又在风动机械厂被抓，山大“主义兵”和“山工联”到省公安厅要求放人，被拒绝。

1 月 29 日，以“济南革命工人造反团”和“红卫兵山东指挥部”为首的“山东联合夺权筹备委员会”致电青岛市革命造反委员会，欢迎他们“带着夺权斗争的丰富经验前来参加夺权的筹备工作，共同并肩作战。”

30 日，青岛市革命造反委员会“夺山东省委、省人委大权赴

济代表团”发出《最紧急呼吁》，号召“全山东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联合起来，把以谭启龙为首的省委、省人委的权夺过来！”

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得悉济南的情况后，也于 1 月 30 日凌晨 4 时，给王效禹家中打来电话，要他到济南看看，由济南军区接待。于是王效禹带着康生的儿子张子石、青岛疗养区党委书记孙枫丹、王效禹的妻子刘崇玉和赴青岛的山东大学“主义兵”王世歧、牛奔东、警卫陈新茂、青岛轻工机修厂的彭士杰等 22 人组成青岛代表团，31 日乘火车离青赴济，大约 21 时到达济南，安排住在经十一路 39 号的济南军区第五招待所。

而就在 31 日上午，济南“山工联”等组织在省体育场召开“庆祝青岛夺权胜利和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大会。同时，“山工联”400 多人拥进省公安厅要求释放董金福。

省公安厅人员拒而不见，只以高音喇叭广播攻击“山工联”的稿子。

“山工联”的人爬上办公大楼，拔掉正在广播的高音喇叭线，从而与公安厅工作人员发生争斗。“山工联”群众殴打了公安厅人员。

下午 15 时，在“山工联”开会的群众几千人开赴省公安厅，拥进公安厅大院。这时天正下着雪，大院内外秩序混乱。到下午 18 时，群众高喊着：“抢救被迫害的阶级弟兄！”冲击办公大楼。他们冲垮围阻的公安人员，强行破门而入，楼上楼下窜来窜去，闯进办公室，并砸开一些房间，砸毁了办公用品，抢走了一些档案材料。他们还殴打了公安人员，大骂公安战士是“谭启龙的兵”、“罗瑞卿的兵”、“保皇狗”。

省公安厅人员去济南军区要求解放军给予援助。本来，济南军区支左指挥部已经派作战部副部长冯文贡带着约 40 人的徒手排到公安厅维持秩序，“山工联”向冯文贡要求释放董金福，公安厅拒绝。支左指挥部军人到省公安厅的主要目的，是劝阻“山工联”和“山红联”不要冲击公安厅，可公安厅 25 日关押“山工联”董金福至今已 7 天不释放，“山工联”和“山红联”岂能善罢甘休？于是与到场的济南军区军人也发生冲突。大约 16 时左右，支左指挥部成员、济南军区副参谋长原星来到现场，还是无法解决问题。于是，济南军区副司令员张仁初，山东省公安厅政治部主任花光隆便一起来到济南军区第五招待所，找刚刚到达济南的王效禹征求意见。

王效禹与花光隆战争年代都是渤海区的干部，王效禹还曾任过山东检察院副检察长，都是公检法老熟人。他听了花光隆汇报“山工联”冲砸省公安厅一事后，当场表态说：“首先应当解围。不管哪个组织，这种做法都是错误的。如果在青岛，我们就把它的头头捉起来再说。这里边定有坏人捣乱，不然是不会这样做的。”

闻听此言，在场的济南军区工作人员当即起身给济南军区支左指挥部打电话，说：王效禹表态冲击公安厅是错误的，可以抓坏人。此时也就 21 时 30 分刚过。

支左指挥部立即行动，调动部队，由原星现场指挥。

本来王效禹是带着山大“主义兵”一起来到济南的，而且在 1966 的“青岛事件”中，山大“主义兵”给予当时的王效禹极大的支持。此次他率领的“青岛赴济南代表团”中，有三分之一的成员是山大“主义兵”，他到济南本来也是打算先找山大“主义兵”

的。世事弄人，没想到他在济南刚下火车，首次表态中说的这一句“捉起来再说”，一下子就将山大“主义兵”打入了另类。

有了王效禹“捉起来再说”这句话，公安厅和济南军区立即统一采取行动。当晚，山东省军区济南卫戍区负责人宣布：“这次袭击公安厅事件是反革命事件，‘山东工人革命造反联合会总部’是一个反革命组织，立即取缔。”

晚上 22 时，部队封锁了进出省公安厅的各个路口。23 时 30 分，全副武装的解放军战士进入公安厅。24 时 05 分，省公安厅的高音喇叭以“冲击专政机关”的罪名宣布“山工联”为“反革命组织”，当场逮捕 200 多人，对其中 60 余人五花大绑。行动持续到次日凌晨 4 时。

随后，部队配合“红卫兵山东指挥部”方面的群众一鼓作气砸了“山工联”在济南各区的分会，接管了其控制的“济南东方红广播台”，又来到山东大学砸了“红卫兵山东联络总站”和山大“主义兵”总部。

济南市沸腾了，大字报铺天盖地，大喇叭震耳欲聋，“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坚决镇压反革命”的口号声声入耳，“抓坏头头”的传单纷纷扬扬。

2 月 1 日凌晨，关于济南卫戍区宣布“山工联”为反革命组织的传单已在济南散发。“山工总”和“红山指”查抄了“山工联西山分会”，那里只有“山大主义兵”的孟昭凤和孙连科，他们将孟、孙二人分别押上两辆汽车带回。结果，凌晨 3 时左右，汽车行至刘家堂路和机场拐弯处，孟昭凤所在汽车翻到水沟中，车上 38 人，伤 3 人，只有孟昭凤一人死亡。

当天，“山东革命工人造反总指挥部”、“红卫兵山东指挥部”等群众组织两万多人在省体育场集会，声讨“‘山工联’一小撮反革命分子的罪行”。同日，部队还在军区的八一礼堂召开“愤怒声讨‘山东省工人革命造反联合会’反革命组织滔天罪行大会”，省军区部队代表参加，批判“山工联”头头董金福、邵长文等人。山东省军区济南卫戍区并发出通告，宣称中国人民解放军坚决镇压反革命，宣布“‘山东工人革命造反联合会’是个地地道道的反革命组织”，并指出“山大‘主义兵’一小撮坏头头”在该事件中“起到非常丑恶的作用”。

当天，王效禹召集山东造反派研究山东的夺权问题，此时前来的只有已改称“山东革命工人造反总指挥部”，简称“山工总”的负责人、原“济南革命工人造反团”头头韩金海；原“红卫兵济南串联站”，此时已改称“红卫兵山东指挥部”，简称“红山指”的负责人、山东师范学院学生、“山师串联兵”负责人王竹泉；省公安厅“革命造反总部”的负责人花光隆；及山东省军区方面的代表。原来准备依靠的山大“主义兵”已经不能再用了，王效禹迅速做出调整，弃用山大“主义兵”等组织，将错就错，转向依靠他们的对立面组织----“山工总”和“红山指”。王效禹先向大家介绍了他在青岛市夺权的经历，然后说：“夺权我们是实践了，我认为就是你夺我抢，谁先下手，谁敢夺权，谁就主动。因为夺了权，就能发号施令，就能把中间的群众拉过来。”他最后说：“这就是我们的一点体会，建议省的夺权越快越好。”

在济南、山东省两级军区的支持下，王效禹于 2 月 2 日联合“山工总”等 25 个组织 2000 多名代表在济南军区八一礼堂集会，

宣布“山东省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大联合革命委员会”成立。简称“山东大联委”。随后立即去省委、省人委夺权。这时，1 月 24 日在这里进行夺权的山大“主义兵”还有一部分人坚守在这里，“山东大联委”的大批人马到后，把他们硬赶出去轰走了。

2 月 3 日，济南近 10 万人在省体育场集会，“山东大联委”宣布夺取了中共山东省委、山东省人民委员会的一切大权，并宣称“以谭启龙为首的山东省委和以白如冰为首的山东省人委是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山东省军区司令员童国贵到会讲话，对夺权表示祝贺和支持。王效禹代表青岛市“革命造反委员会”讲了话。大会通过了《给毛主席的致敬电》、《告全省人民书》和《山东省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委员会第一号通令》。

被扣在青岛的谭启龙得知济南的“23 夺权”后，致电“山东大联委”表示拥护，并说明自己听候处理。

2 月 4 日，王效禹按照青岛夺权的手法，给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关锋发去了加急电报，称“可能出现一场反夺权的大反扑”。

这天，济南部队领导机关暨全体指战员发表声明，支持“23 夺权”，谴责“山工联”，赞扬青岛革命造反委员会挥师来济、夺权有功。

2 月 5 日，省、市各界群众组织和山东省军区在济南八一广场集会，庆祝“23 夺权”。

在“23 夺权”前一度被打懵的山东大学“主义兵”和“山工联”很快清醒过来，开始反击。他们贴大字报，组织游行、控诉会，反对“23”夺权，还假造了《北京来电》和“政治谋杀案”，希望用上压下反的方法聚集力量，进行“反夺权”。各界来山东大

学表示“向英雄的鲁大毛泽东主义红卫兵致敬”的工人、学生也很多。济南处处仍然是围攻、辩论的工人和学生。

就在 2 月 5 日山东各界群众组织和山东省军区在济南八一广场集会庆祝“23 夺权”的同时，山大“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在省体育场也召开了一个针锋相对的“追悼孟昭凤烈士大会”。到会人数达数千人，工人、学生都有，均为相同观点，也有很多原山东大学红卫兵保守派成员。他们“杀了回马枪”，要以实际行动表明“回到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人人戴白花，黑袖章。愤怒声讨，大喊口号，攻击解放军把枪口对准造反派，群情激奋，火药味甚浓。

济南军区派出两架直升飞机撒传单，在广场上空盘旋，洒下大批传单，标题为“造谣污蔑挽救不了你们必然失败的命运”，宣布这次追悼会为反革命集会。与会者对天空高喊：“打倒保皇派!”，集中传单，大火焚之，烟火直冲高空。会后冒倾盆大雨，沿文化路、历山路进城大游行，当他们与庆祝“23 夺权”的游行队伍相遇时，他们故意阻拦解放军的车队，高喊：

“打倒保谭启龙的兵!”

“打倒保皇狗!”

“打倒谭启龙！”

“打倒白如冰！”

“打倒李耀文！”

“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等等。

李耀文时任济南军区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其矛头直指济南军区是显而易见的。

他们高唱《国际歌》，高喊“还我战友邵长文！”“还我战友董金福！”等口号。气势汹汹，可惜，这是山大“主义兵”最后的疯狂。他们的游行队伍遭拦截殴打被冲散。许多人负伤洒血而归。随后在山大校园及全省范围内施行大搜捕。山大“主义兵”纷纷逃离校园，四散逃亡而垮台。山大“黑字兵”、“东方红”起死回生重新复辟。据说当时“主义兵”被抓者 2000 余人，济南拘留所和监狱一时人满为患。

随王效禹一起从青岛返回济南，为王效禹上台立下汗马功劳的山大“主义兵”王世岐激愤之下，写了篇《王效禹走后门夺权大揭秘》到处散发。于是王效禹便发出通缉令，派人四处缉拿王世岐。

2 月 6 日，王效禹又写信给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关锋，交由山师“串联兵”头头王竹泉送往北京。王效禹同时发表声明，谴责山大“主义兵”、“山工联”，号召“彻底粉碎阶级敌人的疯狂反扑”。

2 月 7 日，中央文革王力、关锋接见了王竹泉等进京代表，表态王效禹的夺权是正确的。并对他们说：

“能不能登报、广播、中央承认不承认你们的权力，关键在于这个常委会，你们要把具体名单报上来，要组成一个中央信得过的常委。对原来的干部，要分析，要排队，要正确对待。”

关锋说：“你们的情况知道了，就等电报，看看名单。对科、处长以上干部都要排队，选几个标兵，看看干部怎么处理。”

王力：“这是个重要的政策问题，什么权都要夺过来，要不就是占了房子，抢了大印，也没用。对于领导干部要区别对待，这

样才能掌权。”

2 月 8 日，在济南街头大喇叭上宣读了中央文革接见山师“串联兵”头头王竹泉的全过程及王力、关锋 2 月 7 日的讲话。

当天，济南军区部队集会游行支持“23 夺权”。武装的战士分乘 200 多辆汽车和牵引着大炮的汽车通过省城市区的各主要街道，8 架喷气式飞机飞驰在市区上空，直升飞机低空散发传单。驻山东空军表示“坚决捍卫无产阶级红色新政权”；北海舰队表示“决心粉碎阶级敌人的新反扑”；空军战斗英雄舒积成发表文章，称“坚决支持革命左派夺权，彻底粉碎阶级敌人的新反扑”。山大“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几处围攻解放军游行队伍，高喊：“打倒保皇狗！”

2 月 9 日，正是阴历大年初一。“红卫兵山东指挥部”、“山东革命工人造反指挥部”等群众组织 1 万多人，在数十辆满载着全副武装的解放军的军车配合下，开进山东大学校园游行示威，高呼“坚决镇压反革命！”

## 第 482 回：定宗旨，黑龙江精简机构　围矿冶，长沙河西师生急

2 月 4 日，已经是黑龙江省一省主宰的大学生范正美，主持黑龙江革命委员会勤务组扩大会议，讨论制定《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第二号通告》。

《二号通告》主要阐述三个方面的问题：新政权的宗旨、组织形式和干部政策。

关于新政权的宗旨，一共写了五条：首先是要“在巴黎公社和苏维埃的经验的基础上，创造一种更为高级的、加速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新政权。”其次就是强调“必须强化专政机器。”第三要做到“最接近基层，最接近群众，最富有革命造反精神，最有办事效能，最能为人民服务的原则，彻底摧垮过去那套机构臃肿重叠，人浮于事，互相扯皮，不能办事，培养资产阶级贵族老爷的官僚主义化的机构。”最后强调，“革命委员会的工作人员，不加任何官衔，不要任何待遇，视条件并报中央批准，实行共产主义式的‘供给制’加‘补贴制’，取消高薪制。坚决摧毁产生新资产阶级分子和特殊阶层的一切条件和基础。一切工作人员，都要经过巴黎公社式的大民主选举产生，受革命群众拥护的可以连选连任，不称职的可以随时撤换，人人都能上能下，把革命委员会建成毛泽东思想大学校。”

当时，所有成员都有一个十分强烈的共识，即认为旧政权的选拔任命制是不科学的，必须搞巴黎公社式的普选制，将政权真正置于人民群众的直接监督之下。监督的最好形式就是四大：大

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所有工作人员，都必须能上能下，不搞终身制，不能特殊化。

关于新政权的组织结构，《通告》规定：省革委暂由 17 名委员组成，以后再增加一些，设班长一人，副班长二人，在 17 名委员中，由 5 人组成勤务组，许多重大问题在革委会全体委员未讨论决定之前先由勤务组考虑提出意见。在革委会下，设立三委一办，即一个政治委员会，一个生产委员会，一个群众工作委员会，一个办公室，各委办下设若干职能组。原省委、省人委等一切机构，宣布废除，其工作由各单位接管委员会，逐渐过渡到省革委会来。

按照这个方案，革委会的人员编制比原省委、省人委的人员编制可以缩减四分之三。被缩减的人员怎么办？潘复生说：

“可以搞两条出路，一条是充实基层，一条是下放劳动。”

2 月 9 日，《人民日报》全文转发新华社《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夺权斗争的基本经验》一文。

湖南，工人造反派和学生造反派之间的矛盾愈演愈烈。1 月 20 日这天，湖南全省的造反派代表纷纷来到长沙，参加湖南大学“高司”筹办的批斗张平化、王延春、苏钢的“贫下中农代表大会”。大会在湖南大学操场召开，湖南省委王延春、苏纲参加。“湘江风雷”等组织拒绝参加，也拒绝交出张平化供大会批斗。

由于张平化不能参加批判会，1 月 21 日，在湖南大学的操场上，王延春、苏钢面对与会者的质问，都说张平化在“湘江风雷”那里，顿时激起与会者对“湘江风雷”的极大不满，会场群情鼎沸，“打倒湘江风雷”的口号声四起，这个大会成了向“湘江风

雷”发动总攻击的大会。

22 日晚，参加“贫下中农代表大会”的农民代表围攻了“湘江风雷”总司令部，要求交出张平化。

第二天，23 日，“高司”湖南大学的学生和参加“1．20”大会的代表来到河东，继续包围“湘江风雷”总司令部，“湘江风雷”总司令部的牌子也被砸烂。

1 月 24 日，“湘江风雷”在东风广场开斗争张平化大会，会后张平化戴高帽子游街示众。当天，“湘江风雷”有人继续散发支持“红旗军”的传单，并在湖南省军区附近张贴“解放军战士坚决起来造反，彻底打垮军区！”等标语。

1 月 25 日上午，河西“1．20”大会代表与“高司”学生再次过河，继续围攻“湘江风雷”总司令部。下午，“1．20”大会邵阳地区代表与“湘江风雷卷巨澜战团”谈判，“卷巨澜”同意将张平化交给他们斗争。围攻“湘江风雷”总部的学生和农民这才撤回。

1 月 25 日当天，湖南省委书记处候补书记、副省长章伯森给周恩来和陈伯达写了一份报告，说：

“我以一个党员的身份，向中央反映两点情况：

一、目前湖南文化革命运动形势越来越好。造反派在政治上已完全取得优势，保守派正在分化瓦解中。但省委工作暂时处于瘫痪状态，领导机关的工作也基本停顿。如何依靠造反派，团结大多数，建立新的革命秩序，这是一个急待解决的问题。

二、目前有很多单位要求对犯错误的干部罢官、开除党籍。自一月中旬以来，要求开除党籍的更是络绎不绝，如果这样处理

下去，后果很难设想。”

章伯森在电报中还请求中央批准他到北京作一次汇报，并请中央对以上两个问题给予指示。

这天夜里，“高司”等十几个群众组织封闭了由“井冈山”掌控的《湖南日报》。

1 月 26 日，“湘江风雷”等组织发出特急通告，把矛头指向湖南省军区，并写出要“夺军权”的标语，再次向军区示威。

1 月 27 日，“湘江风雷”等组织到河西游行，高喊“打倒高司！”“打倒湖大一小撮！”等口号，向河西大学区的中南矿冶学院、湖南大学、湖南师范学院高校的师生示威。第二天下午 14 时，“三司驻长联络站”、“北航红旗驻长联络站”等 20 多个单位在“湘江风雷”总司令部开誓师会，高喊：“高司必败！”“湘江风雷必胜！”“打倒湖大一小撮！”等口号，随后砸抄了“高司”所属矿冶学院、师范学院驻《湖南日报》的“全无敌战斗队”。

这天，毛泽东在章伯森反映湖南问题的报告上批示：“总理：湖南也应照贵州那样予以处理。章伯森是去年运动初期在省委坚持工作、没有逃跑的唯一省委书记。似可找他来商量一下，看有无别的较好干部以及造反派领袖，可以找来共同商量？请酌处。”

毛泽东所说的贵州处理方式，是指他 21 日在李再含电报上写给周恩来的批语。

1 月 30 日，湖南省军区开动 10 多部宣传车，出动庞大的队伍进行武装游行。“湘江风雷”后勤部的葛建华等人坐在地上拦阻省军区的宣传车，被架开。

这天，大街上贴出“炮打湖南军区，火烧龙书金!”署名是总

字 341 部队，即驻长沙的解放军工程兵学校的“硬骨头战斗队”。

1 月 31 日，“首都三司”设在中南矿冶学院的一个联络点被矿冶的“高司”砸了，还把他们赶出矿冶，并将抄出的私人日记和相互间的情书公布在大字报上，说他们是以串连的名义来谈情说爱的；还说湖南的运动不要“钦差大臣”，不许他们下车始伊，指手画脚。被赶出矿冶的北京大学生狼狈之际，看见湖南大学自卑亭旁簇拥着一群戴着领章、帽徽的解放军，他们赶紧跑过去，操着长沙难以听到的标准普通话，自我介绍是“首都三司”的，他们的宣传车刚被矿冶的“高司”砸了，要求解放军主持公道前去处理。而那些军人却以“解放军不介入两派斗争”为由推辞了。这几个“首都三司”的只好悻悻的离开，朝河东走去。

原来，这些军人是解放军湖南政治干校的造反派，这天，他们是游斗原山西省军区副司令蔡爱卿和原湖南省军区副司令吴自立，这二人皆因庐山会议后为彭德怀打抱不平而被罢官，现退休住在长沙。游街队伍来到了河西，正停在自卑亭旁小憩，对这些北京大学生的要求，他们当然无法满足。

1 月 31 日上午，白马公社一批“青年近卫军”农民在长沙参加大会后，乘车回公社的路上，被“高司”矿冶游行队伍包围，48 人全部被带到矿冶，关进文革楼。“青年近卫军”总部负责人闻讯后派出代表到“高司”矿冶总部，要求放人。“高司”矿冶总部干脆将谈判代表也一并扣押。到了下午 17 时许，“首都三司”、“北航”联络站和 341 部队“红色硬骨头”，“东方红”总部的 3 部宣传车陆续开到矿冶，强烈要求矿冶立即放人。

湖南省军区长沙军分区已事先打电话通知“高司”矿冶这 3

部宣传车要到矿冶。因此，当这 3 部宣传车刚进矿冶校门，“高司”矿冶的广播就立即通知“高司”的人紧急集合，并大声朗诵《毛主席语录》：“有来犯者，只要好打，我党必定站在自卫立场上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消灭之（不要轻易打，打则必胜），绝对不要被反动派的其势汹汹所吓倒。”

当宣传车开到造反楼前时，“高司”矿冶数百人立即围上去，将宣传车上的人全部抓走，关进造反楼。“湘江风雷”，“东方红”总部和 341 部队的群众组织闻讯，立即派出代表到湖南省军区反映情况，强烈要求省军区出面解决这一事件。同时，“湘江风雷”当晚在省展览馆三楼阅览室开会，由叶卫东，李敬林主持，商量对策。由于北航的联络站被砸，北航高飞同学也被“高司”矿冶扣押，他们跑到“湘江风雷”要求支持。几件事加在一起，责无旁贷，“湘江风雷”决定调人过河游行要人。

此时，矿冶校园内也非常紧张，一会有人说“青年近卫军”要来抄家，一会又有消息说“湘江风雷”来了一万多人……于是不少人通宵不睡，忙着转移物资。造反楼戒备森严，墙上到处贴满了“誓与湘江风雷血战到底！”的标语。

到了 2 月 1 日子夜 1 时左右，湖南省军区派来 4 名人，在矿冶造反楼召集“高司”和“湘江风雷”双方谈判。“东方红”总部和北京学生各派一人参加。

谈判最终没有结果，随即“湘江风雷”的谈判代表也全部被扣。

2 月 1 日凌晨 4 点多钟，“东方红”总部，“青年近卫军”等组织冒雪来到矿冶，冲击造反楼和学生宿舍六舍、八舍、九舍。

工人们用石块向楼里的学生投掷，并不停地向楼里攻击。学生用消防水龙头冲击工人群众，许多工人被喷得满身透湿。上午 9 点多钟，军区宣传车赶到，劝说工人回去，并警告说："谁坚持武斗，就采取坚决措施！"

大约 10 点多钟，再次由军区出面，双方继续谈判，仍无结果。

下午，一波一波的"东方红总部"和"湘江风雷"的游行队伍朝中南矿冶学院涌来，队伍中夹杂数辆宣传车，还有卖食品的卡车作后勤支援。

晚上，"东方红"总部、"湘江风雷"等 31 个组织再次来到湖南省军区，紧急呼吁，要求司令员龙书金接见。

龙书金立即派派出一个 300 多人的加强连，由长沙军分区副司令员率领，前往矿冶学院制止武斗，尽量避免事件的扩大化、严重化。但没有接见 31 个组织的代表，也没有回复他们的紧急呼吁。

当晚，"湘江风雷"砸了"高司"在中南矿冶学院的总部。2 月 2 日凌晨，"湘江风雷"、"青年近卫军"、"东方红"总部数千人再次来到矿冶，砸了位于矿冶机电楼内的矿冶广播室，搬走了部份广播器材。他们还冲进电子学实验室和俱乐部，顺手拿走了一些教学仪器。清晨 4 时 40 分，一直坚守在矿冶学生九舍一楼电话机旁指挥的"高司"负责人詹先礼将这一情况对全员师生广播说："电话总机和广播全部被'湘江风雷'抢了！"矿冶师生群情激奋。

与此同时，2 月 2 日清晨，与矿冶相邻的湖南大学和师院的喇叭都在广播矿冶的"高司"总部被砸的消息，说他们还会到湖大

和师院进行打砸抢的，要大家作好准备。

河西的气氛更紧张了，师院在荣湾镇渡口设立了暗哨，当发现“湘江风雷”的队伍过河了，就立即打电话通知学院，院广播站发出警报，说又有“湘江风雷”的队伍开来了，大概几百人，要全校师生做好准备。果然半个小时后，就看到“湘江风雷”的队伍过来了，人员良莠不齐，他们穿过师院、湖大，径直朝矿冶走去，师院的人这才松了口气。

下午 15 点多钟，30 多个支持“湘江风雷”的群众组织数千人在临时总指挥谢若冰的指挥下过河西游行，要求矿冶放人。

游行队伍在晚上 18 点多钟才来到矿冶。当游行队伍通过湖大、师院门口时，这里的气氛又紧张了起来。当时“高司”传出的消息说：“湘江风雷”的口号是“踏平矿冶，砸烂湖大，扫荡师院”，河西大学区里人心惶惶。

“湘江风雷”矛头似乎只对准矿冶“高司”，他们的游行队伍来去都穿过师院、湖大，对这两所院校秋毫无犯，只是弄得师院、湖大整天紧张兮兮的，不敢出手援助矿冶。

游行队伍到矿冶时，谢若冰用纸条通知走在队伍最前面的一辆宣传车，广播通知队伍去矿冶造反大楼前面停下来，排好队伍，集体呼口号，绝对不准动手打人，严防武斗。前面宣传车将此通知连续广播了 10 多次。

此时，矿冶造反楼的大门处堆满旧家具等杂物做路障，用以阻挡“湘江风雷”冲进大楼。还有许多住在矿冶学院接待站的外地串连学生们组成人墙，守在大楼的前面。许多学生趴在路障上，不让“湘江风雷”清除路障。他们被“湘江风雷”拖了下来，又

爬了上去，来回折腾。

师院、湖大的广播整天都在叫。黄昏时分，师院的学生在凤凰山下的马路上设卡，把两辆 5 路公共汽车栏住，放掉轮胎的气，成人字形堵在马路上，不让车通过，但人可以穿过，由于人手不够，师院只留有几个人守卡，但河西的这条马路也因此断绝交通，看不到汽车在行走了。

晚饭后，湖南大学办公楼的“高司”总部前已站了不少师生。突然科学馆大楼靠马路边的东门大开，一队全幅武装的解放军从楼内跑出来，约有一连人，无声无息的穿过马路，跑到对面办公大楼的右边，消失在黑暗中，这时马路上的人群欢呼起来，立即被“高司”湖大总部的人制止了，说要保密，他们是去保卫湖大实习工厂的。于是人们鼓掌欢迎，解放军是什么时候来的？来了多少？埋伏在哪些楼内？大家一概不知。但是看到有解放军支持，在场的师生无疑是士气大增。

天渐渐黑了，矿冶学院所有宿舍和教学楼都没有亮灯，漆黑的学院里，只有学生七舍的灯光在那里闪烁。河东的游行队伍奔向七舍。

通往七舍只有一条小路，当河东的队伍涌向这条小路时，早已埋伏在这里的学生和外地串联学生一起，向游行队伍发起了猛攻。河东队伍顿时被冲散，矿冶的学生将他们一片片地分割包围起来围攻、殴打……

此时，从矿冶后山的公路上自上而下冲下来 300 多名全副武装的解放军，力图隔开双方，制止武斗。游行队伍已溃不成军，河东游行指挥部赶紧通知将游行队伍撤出矿冶。

## 第 483 回：陈伯达，“二四批示”抵长沙 转眼间，“湘江风雷”遭镇压

接近 2 月 2 日午夜，湖南大学、师范学院的广播又发出警报，说“湘江风雷”又从矿冶杀回来了，在湖南大学“高司”总部前的马路上聚集了许多人，大多数是青年男教师，他们在紧张的等待着。

突然，两辆北京吉普从矿冶方向急速驶来，每辆车的车门踏板上都站着两人，车的后门处也站着两人，都是彪形大汉，他们挥动着手臂大声喊着，车灯耀眼。车子飞速的朝人群冲过来，没有一点减速的迹象，人们纷纷避让，第一辆车冲过去了，人们这才清醒过来，有几个不怕死的人跳到马路中间，手牵手的死命的要拦住第二辆吉普，这辆车的司机可能胆小了点，也可能不愿出事，踩了刹车。车还没停稳，人们便一涌而上，将车上和车里的人都拖了出来，一齐扭送到“高司”总部。

大家纷纷猜测冲过去的那辆车里一定坐着“湘江风雷”的大头目。而那辆闯过湖南大学的吉普车，开到凤凰山下的师范学院设卡处，过不去了，只好停下来。从车上下来不过 10 人，一齐动手，把一辆做路障的公共汽车推开后，发动车逃离了虎口。而师院那几个守卡的学生，自知不是这些人的对手，根本不敢阻拦，眼睁睁的看着他们扬长而去。

不久，从马路的南端传来宣传车的高音喇叭声。渐渐的，可以看到一辆解放牌货车改装的宣传车开着大灯走在前面，车两旁和车后都是黑压压的人群，把整条马路都塞满了，走在队伍前面

的人举着红旗和毛泽东的画像，这是“湘江风雷”从矿冶撤回来的大部队。

湖南大学办公大楼前面的马路上聚集了“高司”100 多人，只一个回合，就被“湘江风雷”的队伍挤到马路边上，紧靠在大字报栏上。虽然双方零距离接触，但并没发生肢体冲突。“高司”主要力量派去把守重要的大楼了，留在总部前马路上的人并不多，因此不敢动手。而“湘江风雷”刚被打散，人心惶惶，快撤回河东为上策，所以也不愿惹事，只是不停的喊“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护着宣传车，勇往前冲，闯过湖南大学“高司”总部前的这段马路后，快步朝师院走去。

恰在这时，把守多座大楼里的湖南大学学生涌了出来，“高司”的力量大增。人群中有人说，那汽车里藏有“高司”的人，人们一下子又激动起来了，不知谁喊了一声：“追！”一部分人纷纷抄近路赶到师院，拦在了“湘江风雷”队伍的前头，还有一部分人跟在“湘江风雷”队伍的后面，紧追不舍，形成围堵之势。

“湘江风雷”的队伍约有上千人，走到师院设卡处时，师院和湖大的增援部队都已赶过来了，真是前有堵截，后有追兵，东边是山，西边是高出路面一米多的菜地，山坡和菜地上此时也站满了“高司”的人，将“湘江风雷”的队伍团团围住，压缩在不到百米的狭长马路上，“湘江风雷”的宣传车被迫停在队伍的中间，车上的女播音员扯着喉咙喊“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鼓动着队伍冲过去。

可是“湘江风雷”的队伍中男女老少都有，经过整天的奔波，早已疲惫不堪，只盼望能早点回去。眼下陷入困境，四面都是“高

司”的人。况且，头头已溜走了，无人指挥，斗志全无，只是呆在原地不动。“高司”的人气焰愈加嚣张，喝令宣传车上的人全下来，车上的人不卖账，不愿交车，“高司”的人就要冲向宣传车，被车下“湘江风雷”的人拦阻，好不容易冲到车旁，又被车上的人阻挡，几经反复，仍没得手，宣传车的广播大喊“要文斗，不要武斗！”

“高司”有几个人爬到路边的树上，再从树上跳到车顶的蓬布上，这一着有效，车上也爬出两个年轻人与“高司”对峙，双方在车顶蓬布上展开搏斗，四周“高司”的一面吆喝助威，一面用十几支手电照射“湘江风雷”那两人的眼睛，“高司”继续从树上跳下增援的人，车顶蓬布和蓬架不堪负重，塌了下去，罩住车里的人，吓得车上的人纷纷从车上跳下车来，那位女广播员也连声喊起了“救命”了。

就这样，“高司”凭借着人多占领了宣传车。

宣传车熄了火，广播喇叭也哑了，在一片欢呼声中，宣告了“高司”的胜利，这时已是 2 月 3 日的凌晨 2 时。

天亮时，战场已清理完毕，但师院的关卡还没撤，那两辆公共汽车仍作为路障，只是守关卡的人是由师院的中、轻年教师担任，他们有近百人，对往河东去的陌生人进行盘查，一直持续到中午。

这时，“高司”又有人说：“湘江风雷”打死了“高司”的人。一时间，“向死难烈士致哀！”“为死难烈士报仇!”“死难烈士万岁!”之类的巨幅标语贴满长沙市，一些外地来长沙串连的同学也写起“壮烈啊！……”的诗句。

“高司”向中央文革上报“矿冶发生血案”。

2 月 3 日，在总字 341 部队“红色硬骨头”的提议下，“湘江风雷”等 20 多个造反派组织在红色剧院开会讨论形势。中午 12 时，“湘江风雷”总司令部，政治部、组织部发出内部《最紧急通告》：“军区与‘长高司’合伙挑起大规模武斗事件，想把‘湘江风雷’打成反动组织。我们被打伤几百人，我们的同志未还一下手。他们这一阴谋未实现。明天(4 日)‘高司’将把被他们抓住的我们的同志，搞过河游行，企图触怒群众挑起大规模武斗，我们决不要上‘高司’的当、决不能冲入游行队伍，或到游行队伍中抢我们的同志，希望各区、战团、各单位准备录音机，照相机等将游行实况纪录下来，为要。切切不要遗误大事。”

与此同时，湖南省军区也将 2 月 2 日夜发生在矿业学院的武斗事件向全军文革小组作了报告。在报告中，他们提到“湘江风雷”有枪，下发“001”号密令，“想夺取军权，准备在 2 月 5 日搞武装暴动，上山打游击”，“湘江风雷大搞反革命经济主义”，“湘江风雷大搞打、砸、抢、抄，矿冶事件损失国家财产几百万元，打死矿冶学生 9 人”等等，其结论就是“湘江风雷”是一个罪行累累的保守组织。全军文革小组把这个报告报到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编成了《要事汇报》。在中央文革小组开会讨论全军文革小组的报告时，叶群前来参加。她说，湖南省军区司令龙书金是林彪的一员战将，很能打仗，要中央文革支持他。于是，王力和关锋起草了一个批示，经陈伯达、江青同意，于 2 月 4 日，由陈伯达在这份《要事汇报》上写下了如下批示：

湖南军区对“湘江风雷”和“红旗军”的头目，应当立即采

取专政措施，分化瓦解其中受蒙蔽的群众。这个意见并电告广州军区。

全军文革办

一九六七年二月四日七时

全军文革办接到中央文革小组陈伯达的批示后，没有耽搁，当即给湖南省军区打电话，向他们做了口头传达。

2 月 4 日这天上午，长沙各派群众如同往日一样，又都涌上街头，用大字报、大辩论开始了这一天的“文化大革命”。男人和女人，老人和青年，他们倾巢而出，来到大街上，激辩，雄辩，辩论“红旗军”的问题，辩论“高司”与“湘江风雷”和“井冈山”的纠纷……

他们为了什么？既不是为了自己的经济利益，更不是为了个人的私利，而是为了革命，为了中国革命、世界革命、共产主义，这些伟大理想，人类的命运……

由于驻长沙的“首都三司”“北航红旗”等北京红卫兵是支持“湘江风雷”一派的，加上造反派中的工人大都是属于“湘江风雷”、“东方红总部”等组织，因而，在大街上的实力较量，“高司”是显而易见的处于劣势。他们新贴上的标语大字报，很快被人撕掉或覆盖，声音宏亮的宣传车喇叭，不时遭到石块的掷击，有时周围群众起哄的嘘叫声还会压过宣传车的广播声。湖南大学生的状况，似乎又跌回到 5 个月前的市委大院“819 事件”时的景象。不同的是，虽然都是遭到工人的围攻，但“819 事件”中围攻他们的工人，是市委调来的“赤卫队”，而此刻围攻他们

的却是在“819 事件”中支持了他们的工人，也是他们曾千方百计呼吁为其平反，唤醒他们，帮助他们举起“造反有理”大旗的工人！

“湘江风雷”一派以为与“高司”的斗争已经胜券在握。虽然时值隆冬，但“湘派”群众热火朝天，同仇敌忾的劲头使长沙市中心地带的街头巷尾寒气尽消！

这天，“湘江风雷”联合 34 个群众组织开会，研究联合在湖南夺权的问题，要求省军区表态。会上，叶卫东慷慨激昂地说：“军区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要打倒是有把握的，但反扑一来，我们可能会坐牢，甚至会杀头！”会议决定 5 日全市性大游行，抗议党内一小撮纵容“长高司”挑起武斗，提出“打倒龙书金！”的口号。

2 月 4 日，新华社向全国播发了《贵州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总指挥部通告——关于被社会上的牛鬼蛇神打入和篡夺领导权的群众组织的若干规定》，提出“对打入革命群众组织、篡夺领导权的牛鬼蛇神中的首要分子及其死党，必须立即逮捕法办。”“必须以阶级斗争的观点来对待所有群众组织及其行为”等等。

当晚 22 时左右，湖南“湘江风雷红色支队”的头头陈益南与同组织的小李，在支队办公室誊抄完一批大字报后，感到有点儿饿了，便决定上街去吃一点东西，顺便到街上遛达遛达。虽然已近午夜，长沙市的五一大街等处仍热闹非凡，不知疲倦的人流，一峰又一峰地在大街上涌腾，或围观趁夜刷出的新标语、大字报，或挤围在“湘江风雷”一派或“高司”一派的宣传车旁，对慷慨激昂的宣传车广播，或以鼓掌欢呼表示赞同，或以嘘声甚至掷石

块砸宣传车表示反对。

不知不觉，到了午夜时分。陈益南与小李觉得疲倦了，便从五一大街往回走，想回“红色支队”队部办公室睡觉。突然，一辆从湘江西岸驶过来、在车头上挂着“高司宣传车”牌子的宣传车，沿着五一大街，在缓行中以异常宏亮的声音广播着一条令人惊骇的消息：

“最新消息！最新消息！中央文革今天来电批示：‘湖南省军区对湘江风雷、红旗军的反动头目，应立即采取专政措施，分化瓦解其受蒙蔽的群众。全军文革办转，一九六七年二月四日七时。’……”

高音喇叭的声音越来越清晰：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批示：湘江风雷、红旗军是反动组织…”

宣传车驶向五一广场。接下来又是一辆宣传车，重复着刚才的宣判，一遍又一遍……

长沙 20 世纪 60 年代的五一广场

大街上的人们，全被这条消息镇住了。一时间，没有了鼓掌欢呼，也没有了唏嘘喊叫，大家全静静地在听这辆宣传车不停在重复广播这“最新消息。”陈益南站在马路上，像被钉住了，惊愕得好半天还回不过神来。中央文革批示？！“湘江风雷”反动头目？！立即采取专政措施？！分化瓦解？！乖乖，这是怎么回事？

“是不是真的？”小李满脸困惑，神色紧张在问。

“不可能吧？”陈益南也不知该怎么判断这事。

几分钟后，沉默的人群突然又爆发出喊叫声：“‘高司’在造谣！”“‘高司’胡说八道！”随即这些喊叫声迅速扩展为如雷鸣般的呼喊：

“‘高司’造谣！”

“‘高司’造中央文革的谣，罪该万死！”

“打倒‘高司’一小撮坏蛋！”

“打！打!! 打!!! ……”

那辆最先广播“最新消息”的宣传车，一下子被愤怒的“湘江风雷”派群众围住，咒骂声，石块直冲宣传车，甚至有些人已爬上了汽车，扯断了喇叭电线，使宣传车广播顿时哑了。

“过去看看！”陈益南对小李说。可是，就在他们准备跑过去时，突然看见一辆辆解放牌绿色军用卡车驶来，并在五一大街十字路口处停下。随即，从车上跳下一批批红领章红五星的解放军士兵，荷枪实弹，五六式步枪的刺刀一律打开，寒光闪闪，就像一股强大的寒潮，顿时将五一大街的热闹气氛冻住。大街上的人，都惊骇得不知所措，目瞪口呆，停止了一切行动，停止了一切声音。陈益南又一次惊骇得立住了，他的腿似乎僵硬了，怎么

也迈不开步子。

大街上仿佛只剩下士兵们列队荷枪跑步“蹬蹬蹬”的声音，打开刺刀和拉动枪栓的“哗哗”响声，以及军官们下命令的威严声……

“真的抓人了！”

好一会儿，人群中终于有人敢低声说话了。这低低的话音，亦如一股寒流，刹时将周围人们的心灵迅速冰冻。

荷枪实弹的战士并不理会大街上的人群，只是有计划地朝各自的目标奔去。五一大街两侧凡驻有“湘江风雷”组织分部、战团、支队等基层组织的招待所、机关、饭店，统统被士兵包围，然后，冲进去。大街侧有几条通往“湘江风雷”总部所在地的巷街，全部由解放军封锁，不准任何人再进。五一大街临街有一座旧教堂，此时由“湘江风雷”派的一个青年组织驻住，威风凛凛的士兵们很快将旧教堂包围，在大街对面，甚至架起几挺轻机枪，对准教堂的大门。

不一会儿，冲入教堂的解放军，将十几个身穿工作服的青年人押了出来，推上教堂大门前一辆早已等候的囚车。

在藩后街口的一家药店门前，数十名“高司”的人要往里面冲。灯光下，几个十二、三岁的孩子昂头挺胸，满脸不屈的表情，声音嘶哑地和外面要冲进来的人争辩着。这家药店是“红少年”司令部，也是“湘派”造反组织。

“我们不是反动组织，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少年！”这些孩子斩钉截铁地喊道。可是“高司”派的人同样情绪激昂，他们揪着这些孩子不放，并要把他们拉走。他们确实认为这些小孩都是十

恶不赦的反动分子！

沿着蔡锷路——解放路——黄兴路直到南门口，几乎所有的“湘江风雷”、“红旗军”以及“湘派”其它组织的据点都被查抄，贴上封条，人被带走。马路上还有不少的“湘派”群众在和越来越多的“高司”派辩论，而他们的心情已经和刚才迥异。就在这一瞬间，从胜利跌落到失败，从革命派变成了反动派，这种突如其来的改变使他们无法接受，胸中充满了悲愤、失落、痛苦，他们的争辩已属徒劳，他们的声音渐被淹没……

一个个“湘江风雷”基层组织被捣毁，一批批“湘江风雷”的人员被拘押，推上不断增加数量的临时囚车。

一个年龄比陈益南大，戴着“湘江风雷”袖章的工人，轻轻地碰了他一下，把正目瞪口呆看着眼前这不可思议一幕的陈益南从麻木中唤醒。

“快到那里去！”他轻声对陈益南说，同时嘴角朝大街边一座公共厕所翘了一下，陈益南很快明白了他的意思，连忙与小李随他一道迅速跑进了厕所。厕所里，已有不少人，大家相互并不讲话，有的人则只自个低声地咒骂着，但都在做同一件事：将自己臂上戴着的“湘江风雷”袖章或胸前的“湘江风雷”布符号迅速取下，塞进自己口袋里，有的则干脆将袖章、符号统统扔进了厕坑里。

“丢不丢？”小李拿着已取下的袖章问陈益南。

陈益南有些舍不得，同时也觉得将袖章丢入厕坑太损他们的形象。

“藏好！”他对小李说。

他们将袖章塞进里衣的口袋，然后装着若无其事似的走出厕所。

突然涌来的数辆“高司”宣传车，欢快地在大街上转来转去，那辆被围观群众扯断电线的宣传车，喇叭也恢复了宏亮的声音。此刻，回荡在大街夜空下的声音，只剩下了一种音符：

“坚决拥护中央文革的批示！”

“打倒反动组织湘江风雷！”

“绞死叶冬初！”

“坚决拥护人民解放军的革命行动！”

“向人民解放军学习、致敬！”

……

几辆“湘江风雷”的宣传车，被解放军士兵扣押，临时改作了囚车。属于“湘江风雷”一派的其他造反组织的宣传车则都停车熄火，一声不吭地停在马路边，车上的宣传人员围站在车头前，闷声不响地看着“高司”宣传车劲头十足的在大街上抖尽威风。

大街上围观的人群中，也出现了热烈的口号声，不断地重复着“高司”宣传车广播的口号，并向“高司”的宣传车和跑步而过的解放军士兵报以热烈的如雷震天的掌声。这些群众，除了少数是支持“高司”一派的造反派工人外，大多数则是原已瓦解不复存在的“红色政权保卫军”组织的成员，看到自己的老对手“湘江风雷”一下子变成了反动组织，他们顿时觉得出了一口恶气。20 多天前，当“湘江风雷”等造反组织，借着《红旗》杂志那篇评论之势，踏平他们的“红色政权保卫军”总部之时，他们只有愤恨，却又不能反抗。而此刻，他们竟突然间找到了这样一

个发泄愤恨的机会，如何能不兴高采烈呢？在“高司”派的口号中，他们自发地加二条：“坚决镇压湘江风雷反动组织！”“坚决镇压一切反革命分子！”

## 第 484 回：抓人多，电影院亦成监狱　扣学生，内蒙军区调部队

湖南省军区按中央文革《二四批示》精神，逮捕了“湘江风雷”支队长以上全部头目，一夜之间，便彻底摧垮了这个庞大的造反组织。谢若冰等为“红旗军”与“湘江风雷”抱不平的红卫兵学生，也同时被捕入狱。

2 月 4 日夜半，师院、湖大的喇叭也突然都响了起来，早已沉睡的众人在梦乡中被吵醒，以为是“湘江风雷”又来了，仔细一听，原来是中央文革的《二四批示》，宣布“湘江风雷”是反革命。校园内已是欢呼声一片，大家都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中，这胜利来得也太快了，快得有点难已置信，昨日还如惊弓之鸟，今天就以胜利者的姿态出现。湖南最大的造反组织“湘江风雷”一夜之间成了反动组织！

“高司”派狂欢通宵达旦，他们要干的事情太多了，只能加班。一夜之间，长沙大街小巷贴满了《二四批示》。天蒙蒙亮的时候，一路上的标语比比皆是：

“打倒反动组织湘江风雷、红旗军！”

“高司”在大街上组织了盛大的游行。而恐怖依然笼罩在“湘江风雷”组织人员的头上。大街上一队队荷枪实弹的士兵不时地穿来穿去，进一步查抄“湘江风雷”组织。高大一点的建筑物顶上，到处可以看到武装军人。街、巷中的封锁虽已解除，但停在马路边逮捕人的汽车，仍到处可见，不时还可以看见一队士兵押着一、两个被五花大绑的，显然是“湘江风雷”头目的人，走向

囚车。

大街小巷的标语，几乎已全部更换成“高司”派的了。在“坚决拥护镇压湘江风雷反动组织！”的标语上，“湘江风雷”字上已被划了几个大红“×”，以示判其死刑。“高司”派的宣传车继续兴高采烈地欢叫着，庆祝他们的胜利。“湘江风雷”的宣传车自然已不复存在，就连“湘江风雷”同一派的其他造反组织的宣传车，亦不见影子。

除了公开的“湘江风雷”总部及几大分部、战团的地点外，对于各单位的“湘江风雷”组织，军队似乎并不太清楚，连“高司”的大学生也不清楚。但，各单位却曾有过“红色政权保卫军”或“工人赤卫队”组织，这些垮了台的保守组织人员，眼见向包括“湘江风雷”在内的造反派报仇雪恨时机来临，于是，不用号召，不用鼓动，他们都自动积极地去为军队的士兵充当耳目，反映情况，甚至带领战士们到本单位一一指点“湘江风雷”人员。这一来，很多“湘江风雷”基层组织负责人都被抓了去，有些其他造反组织的人，也被原保守组织人员领士兵抓了起来，因为他们被说成是“湘江风雷的外围”。幸亏，负责收容的军队指挥官严格执行只抓“湘江风雷”头目的命令，才当即被甄别释放。军队大白天所捕捉的人，甚至超过了昨夜突然行动的数量。

后来，湖南省军区承认抓了 5000 人。实际是，3 天内，省军区统一部署，逮捕大小头目 1 万多人。全省各地大小头目数万人被抓捕拘押。抓人之多，使监狱、看守所人满为患，甚至省军区礼堂、长沙的几家已无电影可放的电影院，也被用来作为临时拘留所。

但这不但没有能平息风潮，反而引起更大反弹。就在大抓捕的高潮中,时年 17 岁的一中学生杨曦光和几个同学组织了“夺军权战斗队”，针锋相对地提出“夺权必夺军权”的口号。他们和本校的“齐卫东”红卫兵一起，公开张贴大字报、撒传单，指责省军区镇压群众组织是“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杨曦光也因此被关进了市公安局的看守所。

湘江中学学生顾新绪等人，则于闹市中心，贴出挑战“高司”与湖南省军区的大字报，扬言“等着抓”。

就是在“高司”的亲密战友“造反有理军”内，也有人拒绝胜利者的荣耀。早在“高司”与“湘江风雷”因为 1 月 15 日的大会分裂后,以“造反有理军”三中军分部汤建平为首的一批骨干，就另组“红色造反团”与“高司”分道扬镳,《二四批示》出来后，他们更将斗争矛头指向湖南省军区。

说起来好笑，“湘江风雷”的主要罪状之一是：“私藏武器，图谋不轨！”而经最后查实是：市博物馆员工绝大多数参加了“湘江风雷”。馆藏的展品中，确有几支老式步枪，但早已生锈，且没有枪栓，根本无法打响！就这几支只能看、不能用的破枪，成了拥有百万之众的“湘江风雷”“私藏武器、谋图不轨”的铁证！

我们再来看北国青城呼和浩特。1 月 22 日发生在《内蒙古日报》社的风波还在继续。1 月 25 日下午，首都“三司”、清华“井冈山”驻内蒙联络站的红卫兵借用师院的广播车到内蒙古军区南门口广播了“1.22 事件”真相，求见军区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刘昌。这时，从军区院内冲出 20 多名战士，围住宣传车，不问青红皂白，把车上的人拉入军区院内，把广播器材砸坏。其中清华大

学学生陈鼎极力反抗，被几名战士掀翻在地，同时高喊：“红卫兵打人！”有个战士扯下陈鼎的红卫兵袖章抛向空中，对其他几个红卫兵喊到：“这就是你们的下场!” 广播车的司机见状，急忙开车冲出，回去报告情况。

此事立即引起造反派的极大义愤，他们从各个方向来到内蒙古军区南门口要人。18 时 20 分左右，内蒙工学院“井冈山造反兵团”的 39 名红卫兵，从学院出发，步行到军区北大门，由两名代表与门卫交涉，求见军区副政委刘昌。再三请求均遭拒绝，39 名红卫兵推开门卫，列队行进到军区主楼门口，军区大院的值班负责人命令警卫营封锁主楼大门，并把 39 名红卫兵包围。一个多小时后，军区一位负责人让 39 名红卫兵进入军区小礼堂内，军区 4 名干部对他们进行说服、动员，劝大家离开。红卫兵们表示，见不到刘昌就决不离开。

几位内蒙军区文工团员闻讯后，找到刘昌副政委，向他反映了刚刚发生的情况，力劝首长出面见学生，刘昌来到小礼堂。

开始，相互间的谈话很平和，互相尊重。“井冈山”红卫兵反映了呼市地区文化大革命情况，介绍了“1.22 报社事件”的真相，并代表内蒙造反派，请求军区首长对事件进行调查，支持真正的革命左派。刘昌认真地听着，同意深入调查。

这时，政治部副主任张德贵和参谋长王良太组织 200 多名军人突然拥进小礼堂，高喊着“把反革命分子抓起来”，“别和他们费嘴，先捆起来再说”等等，致使会场气氛急转直下，激烈的辩论骤起。内蒙军区两位文工团员，当场表示反对这样对待学生，当即被扭送出去，关押起来。刘昌没有说话，只是在一边微笑观

望，随后被军区干部护送出去。

39 名学生在小礼堂里被围攻到第二天，军区干部要求他们承认“冲击了军事机关”，并做出书面检查，方可放行。

一时间，内蒙古军区大院成了全自治区运动的漩涡中心。

随后，内蒙古军区又召开紧急会议，研究对策，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军区各单位人员严守岗位、昼夜值班，进入战备状态；

将集体收存的枪支弹药全部发还个人，没有武装的工兵、测绘队员、退休干部也一律武装起来；

军区作战部增派 2 个连，加强后勤部和司令部的保卫工作；

下令 4931、4925、4754 等部队的 5 个连向呼市秘密集结；

动用驻呼和浩特市驻军的 5 个连，接管重点单位，如呼和浩特铁路局、电厂、内蒙古自治区党委等地；

出动 11 辆宣传车上街宣传，组织军区政治部人员到待命的部队中进行反对“呼三司”的宣传工作；

向下属各军分区发文，进行形势教育，并大量印发宣传品，介绍“呼三司”“反党乱军”的“罪行”；

指示“工农兵学商联合总部”组织派人到全国各地说明“真相”；

由内蒙古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张德贵赴京向中央军委汇报。

1 月 26 日，内蒙古军区又在办公室对吴涛进行了“只要死不了就行”的审讯和逼供，抽嘴巴、踢肚子、跪横木。吴涛腿上有一颗未取出来的子弹，跪了 3 个小时之后，手腿皆肿，汗如雨下，几乎爬不起来。会后，怕他逃跑、自杀或被人劫持，把他反扣在

宿舍里，夜里不关灯，派战士严密看守。

这天，内蒙古军区参谋长王良太命令两个连待命，一个连进驻军区大礼堂，一个连进驻后勤部门，并批准某师机关干部的武器归个人保管。

这天下午，闻讯赶来的内蒙党委书记高锦明，内蒙党委常委、自治区人委副主席李质和内蒙古军区党委座谈。高、李向他们介绍了内蒙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劝解军区领导支持“呼三司”等群众组织，要求立即放出小礼堂的红卫兵，遭到拒绝。

高锦明和李质离去后，王良太对在座的军区负责人说：“内蒙党委一直抱住‘三司’不放，高锦明和李质刚才的话，也说明他们把其它组织都当成保守派，我们不能听高锦明的。”

1 月 27 日，内蒙军区作战部根据副司令员肖应棠、参谋长王良太命令，向呼市秘密调进 5 个连，动用了驻呼部队 9 个连。

内蒙古军区党委给中央军委的汇报材料中说：“呼三司”、“八一八”等组织“反党乱军”，“死保”内蒙古自治区党委负责人高锦明、权星垣、李质等人，维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些“造反派”组织成员的政治成份复杂，混入了各种“阶级异己分子”，其成员的 60%出身于“地、富、反、坏、右”，受高锦明、权星垣、李质等人操纵，是不折不扣的“反革命组织”；而“红卫军”、“工农兵”、“无产者”等群众组织则多由工人、农民、复员转业军人、下层干部组成，“出身好”、服从领导，是“革命左派”组织。

1 月 28 日，中央军委给内蒙军区打来电话批评他们：“内蒙军区竟敢违背中央指示，出动武装部队压制革命派。”

王良太分辨说："电报没有以中央名义发，中央不了解。""毛主席听了一面之词，不管他!"

说归说，命令还是要执行的。被围的几十位红卫兵还是被放出。

当天，王良太在军区党委会上说："中央军委抓了我们典型，说明对我们情况不了解。"他的话，当场得到其它党委成员、副司令员、副政委的支持。

下午，王良太指示呼和浩特军分区负责人宋发富迅速和呼市的"红卫军"、"工农兵"、"无产者"这些组织联系。

1 月 29 日，"呼三司"几千人马，包围了军区南大门，静坐示威。严寒中，红卫兵们用嘶哑的喉咙一遍遍背诵《毛主席语录》，口号声如山呼海啸，震天动地。赶来加入和围观的群众络绎不绝。清华"井冈山"驻呼市联络站的人也出谋划策，深深卷入了当地的造反运动。

与此同时，从 1 月 26 到 28 日，"红卫军"、"工农兵"、"无产者"等组织也赶到军区大院南墙外声援军区。他们在呼市贴大字报，说"呼三司"冲击内蒙军区，揪斗了军区副政委刘昌。有的甚至说刘昌的领章被撕掉，并被红卫兵毒打等等，抗议"呼三司"把斗争矛头对准人民军队，斥骂"呼三司"是冲击军区的反革命，有的干脆说"呼三司"准备夺军权。他们与"呼三司"辩论争吵，冲突时有发生。整个呼和浩特市分裂成了"呼三司观点"和"军区观点"两派。

2 月 1 日，内蒙军区党委会研究支持哪一方的问题，由副司令员肖应棠主持会议。

参谋长王良太，这位曾发现并培养出雷锋这位共产主义战士的原沈阳军区工程兵主任，死活看不顺眼“呼三司”这些造反派。他在发言时说：“我从内心反对‘呼三司’，他们的所作所为是反革命的。应该支持‘红卫军’。”

“把‘呼三司’砸了，犯错误，杀头，我愿意。”黄厚、张德贵连声附和。

王良太进一步提出建议：

1、立即把“呼三司”头头抓一批；

2、对河西公司“八一八”采取镇压行动；

河西公司是位于呼和浩特郊区的一家大型的国营公司，负责研制尖端武器，隶属于北京的七机部，其职工干部大多来自复员转业军人。由于是高度保密企业，基本不与地方来往，因此文革之前，当地人并不知道这个企业的存在。文革开始以后，河西公司一方面要参加北京七机部的文革，同时也要参加呼市当地的文革。或许由于受北京方面影响较大，对全国文革的情况了解更多，该单位绝大多数干部职工，都支持“呼三司”的观点。“八一八”是该公司造反派组织的名称。

3、把内蒙公安厅的保守派“红革联”扶植起来掌权；

4、对内蒙党委开刀，先把高锦明、权星垣、康修民三人抓起来。

他催促肖应棠快下命令，肖应棠感到事情重大，自己难负其责，不肯下令。

会后，王良太在自己管辖的司令部，命令下属写传单《坚决打倒呼三司一小撮坏蛋及其幕后操纵者高锦明一伙，戳穿“呼三

司”在 1.22、1.25 事件上散布的谰言》，直接与群众组织打起传单战。

与此同时，内蒙军区在所属范围内，开展了清洁内部，修理“吃里扒外”的运动，开始镇压对军区有不同意见的领导、干部和战士。调动 200 多名通信兵，把军区文工团新成立的“红色造反团”捣毁，砸了他们的油印机、电话机，抢走了材料，还打伤了 3 人。机关干部及家属中，凡对造反派持同情、支持态度的，一律要检查，甚至隔离关押起来。

这天，在内蒙古军区党委开会研究呼市运动的同时，呼和浩特地区的造反派也召开万人示威游行大会，“揭露”刘昌等军区领导“镇压群众”的罪行。

2 月 2 日，内蒙古工学院“红旗”、“东方红”宣布 2 月 2 日 21 时 15 分开始绝食。晚上，静坐的学生召开揭批刘昌大会，军区放高音喇叭予以干扰。到 2 月 4 日上午，内蒙古军区南门前静坐的人员已增加到几百人。军区在南门设立了三道警戒线，明确告知：军区“执行的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军区机关是军事要地，严禁任何人非法闯入。否则一切后果自负！”并调来两辆军用卡车堵住大门。

2 月 4 日晚 18 时许，静坐的各单位派了 100 名代表，打着“见刘昌代表团”的旗子再次要求见刘昌，并要求军区在 10 分钟内答复。军区不予理会，于是该“代表团”举旗列队绕过大卡车进入军区大院。他们刚进大门 20 多米，便有数百名武装军人从大楼里冲出，瞬间将队伍冲成数段。军区大院内的家属小孩也上前助威，扬沙土、扔石头。学生们则拼命反抗，高声斥骂解放军是“反革

命”、“不拿枪的敌人”、“中国人民的败类”、“要文斗不要武斗”等等，呼喊声此起彼伏。面对数倍于己的军人，他们当然只有束手就擒的份了，这些代表被押进军区大楼，要求他们交待出自己的头头，揭发他们的黑后台。而自认为奉毛泽东“造反有理”号召的学生代表们则个个大义凛然，以高唱《国际歌》、高呼“毛主席万岁”来回答军人的审问。而愤怒的军人们干脆对这些学生架起了机枪，以示威胁。这情景与中国民众在以往充满了意识形态宣传色彩的电影中非常熟悉的镜头极为相似。唯一不同的是，大义凛然的不是“中共地下党员”或“抗日游击队员”，而咆哮威胁的也不是国民党特务或日寇；相反，对抗中的双方都是“为毛主席而战”的“革命造反派”和“人民子弟兵”。

而此时，在呼和浩特市的大街上，架着机枪的部队摩托车巡逻游弋，军区宣传车的高音喇叭彻夜不停，“红卫军”、“工农兵”、“无产者”等组织则到处张贴标语、散发传单；军队枕戈待旦，重要机关的门口都设立了武装岗哨，内蒙古自治区的首府气氛十分紧张和恐怖，人们似乎都失去了理智，只剩下疯狂。

## 第 485 回：枪声响，韩桐被杀在青城　上海市，人民公社告成立

2 月 5 日清晨，呼市造反派重整队伍又在内蒙古军区大院的门口聚集。这里已经被造反派围攻六、七天了，南墙外的交通阻断，人声鼎沸。而军区内则森严壁垒，一片死寂，车辆、行人进出一律禁止，日常工作陷于瘫痪。军区领导电询总参谋部：一旦造反派冲进军区重地，是否可以开枪？总参请示叶剑英、徐向前。

内蒙古军区一边等候总参的指示，同时做好最坏的准备。大楼前堆起了临时工事，架起了机枪。同时，在军区大院南门外的胜利路两端也各放了一个连，准备相机行事。

上午 10 时，内蒙古军区向围坐在军区大院外的造反派颁布了 3 条命令，要求他们撤离军区大院的门口，否则后果自负。而造反派则根本不予理会，继续在大门外静坐。

随着时间的流逝，静坐示威的人群逐渐激动起来，气氛更为激烈。中午，数百名“呼三司”学生和“河西公司八一八”再整队伍于内蒙古军区南门外静坐，抗议内蒙古军区以“支左”的名义，镇压造反派，要求军区负责人出面接受质询，向造反派赔礼道歉。现场围观群众达上千人。一个 20 多岁的学生拿着扩音器，带领着不知疲倦的示威者高呼口号：

“强烈要求军区检查错误！”

“刘昌不投降就让他灭亡！”

“用鲜血和生命保卫毛主席！”

军区大院里一片沉寂，大门口的卫兵不知何时已消失的无影

无踪，士兵们持枪悄无声息地蜷缩在军区办公大楼前临时工事的后边，主楼顶架着机枪，枪口对着大门外，原来堵在大门口的两辆卡车早已驶离南大门。

“河西公司八一八”的工人中不少人是复员军人，凭经验已觉得军区气氛不正常。有人向现场指挥者建议：“情况不对，事态紧急，军区可能要对造反派下手。是否可以考虑撤退？”

而造反派头头则认为：“军区的走资派不敢对群众开枪！绝不妥协，要坚持到底！”

12 时 15 分，内蒙古军区军训部副部长柳青右手插在裤兜里，从军区办公楼里走了出来，径直来到大门口，朝着那个手执电动喇叭、带头喊口号的学生喝道：

“不许胡喊，这是军区！”

学生回答：“就喊！”

柳青威胁道：“再喊就毙了你！”

学生的回应是：“革命不怕死！怕死不革命！”

柳青插在裤兜里的手突然掏了出来指向那位学生，那是一把手枪。说时迟那时快，还没等那位学生和周围的人反应过来，“砰！砰！”两声枪响，只见那位学生应声倒地，鲜血从前胸泊泊涌出。柳青将枪放回裤兜，转身走进大院，消失在主楼里。

当军区外的人群从惊愕中反映过来后，顿时乱成了一团。

“军区开枪了！”

“打死人了！”

气愤难当的“呼三司”学生挽臂挺胸要往里冲。而在军区大院的主楼里，埋伏在临时工事里的战士已接到了“准备战斗”的

命令，个个精神振奋、摩拳擦掌，准备在这次镇压“反革命”的战斗中立功受奖。

在一场大规模的流血冲突即将发生的千钧一发之际，“河西公司八一八”的工人们拦在了学生的前面，他们面向军区大院，一面高喊：“不要上当，这是阴谋！”一面拉起手来一齐后退，阻拦住背后向前涌动的人群。最后军区门外愤怒的人们止住了脚步，而军区主楼里却传出了一阵失望沮丧的咒骂声。

当时，驻呼和浩特的《红旗》杂志记者于顺昌和《解放军报》记者宋学礼正在现场。他们迅速将枪击事件上报中央。

三个小时后，那位学生伤重死亡。他的名字叫韩桐，内蒙古师范学院外语系四年级学生，托克托县人，学生组织“呼三司”的成员。医生从他的肺部取出一颗手枪子弹，诊断结果是：子弹打穿肺动脉，因失血过多而死亡。

此时，内蒙古军区广播说，解放军不会开枪打革命学生。是“八一八”自己打的。而“红卫军”等军区支持的群众组织的人则包围了医院大门，要抢尸体。

就在韩桐喋血青城的当天，中国第一个省级人民公社----《上海人民公社》宣告成立。

本来，当日的新闻，总是见于第二天的报纸。1967 年 2 月 5 日当天的上海《文汇报》，却破例在头版醒目推出长篇新闻《上海人民公社今天宣告诞生》。

新闻一开头就说：“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新巴黎公社----上海人民公社，在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切关怀、热烈支持下，今天宣告诞生了。从此，上海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

时期，上海的党权、政权、财权、文权，真正回到了无产阶级革命派手中，上海人民获得了第二次解放，真正成了自己土地的主人。”

2 月 4 日下午，张春桥、姚文元把经过他们修改的宣言退给徐景贤，题目改为《一月革命胜利万岁!》，副标题仍为《上海人民公社宣言》，他们还通知徐景贤要在宣言后面署上参加“上海人民公社”的各个群众组织的名称，送给《文汇报》排印，以便晚上开筹备会议。

文稿一到报社，消息马上传了出去，有几个组织对排名的顺序不满意，首先闹将起来，要求将自己这个组织的名字排在前面。接着，全市其它的造反组织听说要成立上海市的新政权了，都要参加签名。一夜间，平日冒出来许多过去从来没有听说过的组织，纷纷派出负责人到市体委大楼的大会筹备组争吵，其中也有当时没有在《告上海全市人民书》上签字的“红工司”，还有类似“支持新疆知识青年返沪造反司令部”这样的组织，更有一个组织居然叫做“上海住房困难户革命造反司令部”，还有一个以复转军人为主体的“红卫军”，人数最多，势力最大，要和“工总司”平起平坐。“红卫军”还派出一批人员进驻《文汇报》社，守候在排字房里，声称如果不让“红卫军”组织在上海人民公社宣言上署名，就要砸掉报社，还要带领队伍冲击筹备会的会场。《文汇报》“星火燎原造反总部”的朱锡琪，打电话给徐景贤反映了这个紧急情况。徐景贤当即向张春桥和姚文元作了汇报。他们商量后又向中央请示。

当晚 22 时，张春桥通知徐景贤：马上将在《宣言》上署名的

32 个群众组织负责人集中转送到上海展览馆的咖啡厅开筹备会议，对外不要宣布开会的地点。

徐景贤放下电话，立刻告诉了在市体委大楼的王洪文、王承龙等人，由他们分批把各组织的头头送上大客车，转移了几个地方后，最后秘密来到上海展览馆。徐景贤则单独通知了上海各新闻单位的负责人。

23 时，徐景贤陪着张春桥、姚文元来到上海展览馆的咖啡厅，只见全场被水银灯照得雪亮，新华社上海分社、上海电视台等新闻单位的记者都来了。张春桥还通知了驻沪陆、海、空三军的领导，他们早已在主席台第一排就坐。

张春桥主持会议，唱罢《东方红》，他让工作人员给到会的人员每人发一份《一月革命胜利万岁——上海人民公社宣言》，然后由北京体育学院的一个女红卫兵全文朗续，《宣言》指出："我们一切任务的最中心任务，就是夺权。

读罢《宣言》，张春桥让徐景贤介绍《宣言》的起草经过，到会的人听说《宣言》是经过张春桥、姚文元精心改定的，一致鼓掌表示拥护。但是，当讨论到《宣言》后面的署名问题时，会场上又哄闹起来，《文汇报》的朱锡琪伸直脖子用沙哑的喉咙喊道：

"这样写不来事的，'红卫军'在我们报社里守了一天一夜了，他们说要是不让'红卫军'在宣言上署名，就把报社砸掉！"

王洪文恼怒的站起来说："他们敢砸？我今天晚上就调队伍去砸掉他们在华山路的总部！"大家都跟着鼓掌，表示响应。

正在这时，上海展览馆延安中路和南京西路两个入门处的警卫人员进来报告：有好几个没有接到通知的造反组织负责人，听

说这里在开会，正在入口处吵闹，说他们为什么不能参加会议，一定要挤进来在宣言上签名。

会场更加混乱了，有人主张坚决抵制临时要来参加会议的人，也有人为在大门外的组织说情，要求把他们放进来。

徐景贤一把抓过放在桌子上的话筒，生气地说："大家别闹！我们成立上海夺权以后的权力机构，是一件很严肃的事，又不是挤公共汽车，谁挤进来就算数，这像话吗？再说，这几天全市一下出了 600 多个组织，都涌到大会筹备组来，宣称自己是正宗的市一级组织，你们能承认他们吗？如果现在让大门口的这些人进来参加会议，那末，其它组织都会大闹，谁来负责？"

大家听他一说，不吵闹了，但又想不出该如何解决？只能干着急，低声抱怨。

张春桥没有发火，他在话筒前慢悠悠地开了腔："同志们哪，现在可不是造反派搞分裂、打内战的时候啊！今天在座的这 32 个组织的负责人，确实在上海的夺权斗争中做了大量的工作，你们是即将成立的'上海人民公社'的当之无愧的成员，我们要共同来掌管上海市的党、政、财、文大权。可是，大家应当考虑到：上海有一千万人口，上海的革命人民除了那一小撮地、富、反、坏、右、叛徒、特务、走资派以外，都应该是'上海人民公社'的社员呀！如果新成立的'上海人民公社'只由我们这三十几个组织组成，那末势必要把很多群众都排除在外，这样，有相当的一批人会不高兴，也会影响到我们新的权力机构的权威性。告诉大家一件事，就在我们来开会以前，'工总司'二兵团的耿金章已经找了另外的三十几个组织，在其它地方成立了'上海市革命造

反派大联合委员会’，准备召开会议，宣布成立‘新上海人民公社’，这样我们上海的群众队伍就分裂了。我和文元同志刚刚跟耿金章他们做了工作，同意今后让他们参加到‘上海人民公社’里面来，他们才答应不再另外成立第二个政权机构。所以，我们的团结面一定要越广泛越好。”

张春桥说到这里，稍稍地停顿了一下，点起一支烟，徐缓地吸了一口，胸有成竹地说“我和文元同志商量了一下，我们提出了一个方案，请大家考虑行不行？”

大家听说张春桥、姚文元有新方案，都凝神谛听：

“我们今天晚上，宣告建立‘上海人民公社临时委员会’，作为我们夺权以后的最高权力机构。在座的 32 个群众组织都是上海人民公社临委者的当然委员，按照巴黎公社的原则，各组织可以自己推选代表参加临委会，也有权力撤换和罢免自己的代表。当然，这个权力机构应当是‘三结合’的，除了群众组织的代表，还要有军队的代表和革命干部的代表参加，我们已经向中央作了根告：驻沪三军的负责人作为军队的代表，我和文元作为革命干部的代表，参加上海的三结合权力机构，已经得到了中央的批准！”

会场响起热烈地掌声，特别是到会的各组织负责人听说自己是属于“当然委员”之列，就像吃了一颗定心丸，格外兴商采烈。张春桥看火候已到，就把话锋一转，继续讲述他和姚文元提出的方案：

“正因为这样，我们建议：今天到会的 32 个组织，不作为‘上海人民公社’的组成单位，而是作为发起单位，在‘上海人民公社’的宣言上，也不必把 32 个组织的名称统统写上去了，只消署

上一个统一的权力机构的名称——“上海人民公社临时委员会”。这样，既代表了军队，革命干部和我们这些发起单位的群众组织，又避免了因为署名引起的许多麻烦，至于在外面的那些组织要参加‘上海人民公社’的话，都可以提出申请，今后由‘上海人民公社临委会’统一审查批准，这样的处理方式，如果大家赞成的话，今天晚上散会以后，请大家到外面去宣传，凡是想要参加‘上海人民公社’的组织和单位，欢迎他们明天都到人民广场去参加成立大会，这样可以使很多人和很多组织安定下来，大家看这个办法是否可行？“

徐景贤由衷地佩服张春桥的能力，他带头叫喊起来：“赞成！”其他的人也都纷纷嚷着：

“我们同意！”

“赞成！”

紧接着，全场响起一片热烈的掌声。

场内的水银灯照得雪亮，摄影机嚓嚓地响，到会人员一齐举手通过了《上海人民公社宣言》。最后一项议程是确定 2 月 5 日的上海人民公社成立大会由张春桥和姚文元做主要讲话，上海警备区司令员廖政国代表驻沪三军，王洪文代表工人，夏桂伯代表农民、徐景贤代表机关干部、同济大学“东方红兵团”陈敢峰代表红卫兵，在成立大会上发言。

筹备会议到此圆满结束，姚文元兴奋地站起来，用手指连连敲击着桌面，大声地说“明天……哦，不对……”他低头看看手表，“现已经是1967年2月5日的凌晨1点钟了。应该说进今天……今天下午两点，在人民广场召开大会，宣布‘上海人民公社’成

立！”

2 月 5 日的上海，晴空万里，暖气荡漾，整个上海市都沉浸在欢乐之中。一大早便有锣鼓声，鞭炮声。街上出现了大幅标语，和一道道横幅“欢呼上海人民公社诞生！”“上海人民公社万岁！”等。

下午，人民广场内一片红旗，人海如潮，水泄不通，气球带着大幅标语飞向高空。百万人聚集在那里，举行“上海人民公社成立大会”。各个组织都打出自己的旗号前来参加，表示拥护《上海人民公社》的成立。

14 时整，爆竹齐鸣，无数小气球腾空而起，一群鸽子也扑啦啦飞起来，人们沸腾了。张春桥、姚文元率驻沪三军的领导人和 32 个群众组织的负责人登上主席台，天空中出动两架飞机撒下五彩缤纷的传单……

大会还是由“工总司”副司令潘国平担任执行主席。大会庄严宣告：旧上海市委、旧市人委被无产阶级革命派砸烂了！一切权力归上海人民公社！

在暴风雨般的掌声中，张春桥发表讲话。他说：“姚文元同志和我两个人即日起参加上海人民公社临时委员会的工作。我们下决心，在上海人民公社临时委员会的领导下，努力学习，努力工作，同上海革命造反派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做上海人民的勤务员……”

他这样评价上海的“一月革命”：“我们的‘一月革命’，确实是伟大的人民革命。……这场胜利，如同 1949 年 5 月 27 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上海一样，将将永远记在上海人民的心里。”

那天的姚文元，眼睛布满红丝，眼皮也浮肿起来，看得出，他这几天是日夜连轴转的。他在会上发表演说："'上海人民公社'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新形式。"

作为"勤务员"之一的王洪文，成为主席台上第三号人物。他以高亢的声调，念着《上海人民公社》发布的通令：

"宣判旧上海市委、市人委死刑，剥夺它的一切职权。……一切权力归上海人民公社临时委员会。"

大会结束已近傍晚。会后举行了盛大的庆祝游行，开头是一辆解放牌卡车，车头竖着"上海人民公社"木牌。为造声势，长长的游行队伍不走福州路近道，特意从西藏路绕道到上海的中心南京路，再到外滩后转弯到市政府大楼。

上海市政府大楼原是"汇丰银行"大楼，在外滩"万国建筑群"中，被号称是"从苏伊士运河到远东白令海峡最华贵的建筑"，现在又改为"浦东发展银行"。

这座大楼门前的两个门柱，曾挂着两块木牌：一块是"上海市人民委员会"，另一块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

游行队伍到达市政府大楼时，天色已晚。只见大楼前围出一圈空地。17 时 30 分，长达数米的"上海市人民委员会"木牌被摘下来，放在地上。两把 24 磅大榔头上下飞舞，传来"嘭、嘭"的砸牌声。接着，人们点起了火堆，将砸碎的木牌丢在火堆里烧掉。这表示旧政权被"砸烂、火烧"了，人群发出一阵阵欢呼声。同时挂着红布的"上海人民公社"牌子，挂上原位，从痕迹看，新牌和老牌尺寸一模一样。这时，除了路灯，天已黑了。王洪文

在这一“历史性时刻”，对记者宣称：“我们建立了《上海人民公社》，自己坐天下，掌大权，腰杆子挺起来了！”

第二天，《上海人民公社》临时委员会的成员们进入外滩大厦办公。

## 第 486 回：二月五，甘肃省夺权分裂　陈毅见，西安大学生代表

早在 1966 年 10 月 19 日，中共甘肃省委第一书记汪锋、书记李友九就已被兰州铁道学院揪到该院批斗。

10 月 31 日，兰州以大中学校老红卫兵为首的“红联派”兰州市中等学校红卫兵组织进占中共甘肃省委机关办公大楼。

11 月 10 日，中共中央通知，甘肃省委第一书记汪锋、书记处书记陈曾固停职反省，由胡继宗代理省委第一书记，增补詹大南、刘昌汉为省委书记处书记。

1967 年 1 月 6 日，《甘肃日报》、《甘肃农民报》被这两个报社的“革命造反委员会”查封。《甘肃农民报》停刊。《甘肃日报》改为只发表新华社电讯稿的《红电讯》。17 日，在一派群众组织主持下，《甘肃日报》重新出刊。

2 月 5 日，在全国的夺权声浪中，兰州 34 个造反派的群众组织，也宣布夺取了中共甘肃省委、甘肃省人民委员会的领导权。当天，围绕权力分配问题，造反派发生分裂。以大中学校老红卫兵为首的“红联”，掌握了夺权后的主要权力。2 月 10 日，“红联”的领导权逐步转移到 1966 年 12 月成立的铁路工人群众组织“火车头”手中。接着，“火车头”犯了一系列的错误：他们开除了党政机关中最早炮打汪峰的兰州团市委的七·一战斗队”一些对“红联”不满的组织，或被“红联”开除，或自己杀出去对“红联”造反。

2 月 5 日这天，于“上海人民公社”成立的同一天，《人民日

报》根据王力“人民日报、广播电台、新华社要成立三角人民公社”的指示，也成立了“人民日报公社”。

这天，毛泽东针对外单位群众组织到工人日报社夺权一事，指出：工人日报社的问题，外单位不要在那里辩论。那里的事由报社内部革命同志自己来解决。

2 月 5 日，谢富治接见北京大专院校红卫兵三个司令部的工作人员，表示支持成立“首都红卫兵代表大会”。提出目前的学生组织互相吞并是不对的，应该联合起来。大联合是大趋势，势在必行。三个司令部的人员多次开会，讨论这个问题。在此之前，清华大学《井冈山报》连续发表了 7 篇《论无产阶级大联合、大夺权》的评论，提出了“反托派”的口号。但是在 2 月 5 日这天，中央文革小组办公室阎长贵给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红卫兵总部打电话说:“我前几天来你校看了一下大字报,发现了你们反‘托派’，这是不对的，不应该把矛头指向群众，而应当指向当权派，一般同学有错误缺点应当批评帮助，反托派对本身不好，对团结也不好，请转告蒯大富。”

后来，陈伯达在接见他们的时候，批评说：“你们知道托派是什么吗？托派是很厉害的反革命匪帮，这是一个很厉害的口号，我劝你们不要随便地提出这个口号。”

2 月 7 日，蒯大富公开为“反托派”口号承认错误，并为此做了几次检查。

这时，西安造反派之间的矛盾越来越激烈。2 月 2 日下午，西安“统指”在西安冶金建筑学院，简称“冶院”球场召开“西安地区右倾机会主义表现在何处辩论会”。各大专院校差不多都去

了，唯独西交大说“反右倾”就是反他们交大，拒绝参加。西交大在本校独自召开“誓师大会”。

在“冶院”召开的“辩论会”发言中，许多人对西交大的做法进行了不点名地批判和谴责。

冶院距西交大很近。此时，西交大校园内的大标语和大字报内容大部分是对着西工大和西军电的，说他们这些院校“一直抓着李世英讲话中的‘三句半’不放，无限上纲上线，妄图把西交大打成保皇派，实际上他们抓住的是‘三根稻草’，挽救不了他们失败的命运”，“西工大才是真正的保皇派，保霍士廉，搞打砸抢”“反右倾就是反交大”等等。

就在 2 月 2 日下午，西安各大专院校在冶院开辩论会之际，西安保守派“工农总部”的一些工人和群众也在大街上向西安“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示威游行。当西北大学的宣传车在经过游行队伍做宣传时，游行队伍说宣传车破坏了他们的游行，怒气冲冲地来到西北大学北门抗议。此时，西大师生大部分都在冶院参加辩论会，在校师生赶紧把校门关起来。“工农总部”的工人在前面一边骂一边向里冲，西交大的人也在人群后面高喊助威。终于，“工农总部”用汽车将西北大学的大门拉坏，冲进校园。而此时，西工大和西军电的在校学生也都闻讯赶来增援，这才解了西北大学之围。当晚，西安的大专院校得知西交大的行为后非常气愤，在西交大校门口召开现场会，声讨他们煽动工人打骂风雨同舟的战友。

西安交大指责“统指”：“夺权小组里没有工人、农民”等，“统指”立即让“工矿联”、“农总会”等工农造反派组织参加

夺权小组。但是，西交大说：“工矿联”和“农总会”是受“统指”控制的，是他们的傀儡。当时，大街上多处张贴的两首顺口溜：

一是：“工矿联是空架，里面坐着西工大。包办代替西电临，掌权不是咱工人。工人起来造了反，大权工人要接管。令你收起指挥棒，不然和你算老账。”

二是：“农民总会没农民，里面坐着西电临。包办代替西工大，掌权不是田幸云。”

“西电临”是指“西军电”的造反派组织“临委会”；田幸云是“农总会”负责人。

由于西安交大和西工大的矛盾，尤其是在陕西夺权过程中产生的意见分歧，西安造反派代表进京面见中央，希望中央予以定夺。

2 月 5 日上午，中央分工负责西北地区的陈毅接见了西安交大文革委员会的 9 名代表和西安医学院“八三一”代表 2 人。他首先抱歉地对他们说：“你们久等了，我们向你们道歉。今晚江青、康生同志可能接见你们。我先同你们谈一谈，下午再找指挥部的同志谈一谈。我们把李世英同志请来，明天我们见一见，你们就可以回去了。”

接着陈毅谈起他所熟悉的外交斗争，然后又转到当前的文革斗争。他说：“不要打倒一切。万里长征本身是光荣的，但是万里长征是垮台的结果，毛主席上了台，把坏事变成了好事。本来没有必要万里长征。马上可以从江西北上，解放上海，中国解放就可以提前 10 年，就是因为打倒一切，党内打倒一切，包括把

毛主席也打倒，党外打倒一切，党内所有犯了错误的都要打倒，党外打倒一切，所有资本家、手工业者、地主、富农都要打倒，那时像你们三个戴眼镜的人，都是知识分子，穿长袍的人，都不行，都要打倒。现在中国又有了这个情况，国内打倒一切，国际打倒一切，这是个很危险的办法，这样来理解毛泽东思想是错误的，不要一打倒就打倒一切，我们是没有这个本领的，这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打击面不能过大，要像毛主席那样分化一切，瓦解一切。不论他几十年老革命，犯了几个月的错误，都要打倒，有打倒一切之风。我们要争取一切，分化、瓦解一切，孤立一小提。毛主席的伟大就在这里，毛主席说：中央里面还要有几个右派、中间派，左派的中央是不行的。”说到这里，他似乎觉得又有失言，马上又对学生们说：“这个你们不要贴大字报，否则就不得了。”

交大的学生说：“我们同意陈总的话。”

有了知音，陈毅自然很高兴，又继续说：“我们这里也有左中右，”

当然这是指参加座谈会的这些人。

“在某个问题上你是左派，我是右的，在另个问题上你是右的，我是左的。这是必然的，符合自然规律。好，言归正传，我希望活泼一些！交谈交谈活思想。郑叔良同志交来的材料我们看过了，你们还有什么要谈的，或者重复谈一谈，到 12 点结束，下午接见指挥部的同志。”

陈毅说的“指挥部”就是西安交大的对立面西安“大专院校革命造反统一指挥部”。

这时，西安市委书记处书记薛焰来到会场。

交大代表发言："首先请陈总代向毛主席问好，祝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万寿无疆！"

陈毅表示："我代你们转达你们的祝愿，这几天见到主席了，一定转达。毛主席对你们交大是熟悉的。"

接着，交大代表开始向陈毅汇报他们和西安工大及西安地区"大专院校革命造反统一指挥部"之间的分歧情况，特别提到了西安 1 月 28 日大会的情况。陈毅看了他们递过来的西工大《红卫兵报》第 15 期上的文章："只有彻底批判右倾机会主义，才能真正实现大联合，大夺权"，并念起了文章中的口号："打倒折衷，打倒调和，打倒投降，消灭叭儿狗！"陈毅笑了。

西安医学院的代表汇报西安医学院在对交大问题上也分成两派，西医"临委会"砸了支持交大的西医"831"。

交大和西医的代表都反映说："他们有人喊'打砸抢万岁！'"

陈毅问："'西安地区大专院校统一指挥部'有几个学校？"

交大的代表答："11 个常委。"

陈毅问："11 个常委，10 票赞成，1 个交大反对？"

交大代表说："我们怀疑背后有人在挑拨离间，使这次夺权发生了很大困难。"

陈毅问："不是都夺权了吗？"

交大代表汇报了"大专院校革命造反统一指挥部"开会分配夺权任务的经过，并讲了他们的反对意见：（1）没有工农代表参加，（2）没有被夺权单位造反派参加。同时认为西北局，公安局他们做了一段时间工作，应该由他们参与夺权。

陈毅问："我提个问题，你们准备怎么解决问题？下午我们也要同他们谈。"接着陈毅一个个念了西安地区"大专院校革命造反统一指挥部"代表的名字。

交大代表说："我们的态度：（1）有右倾坚决反右，我们多次炮轰总会，火烧李世英。"

陈毅说："就是你们不包庇任何人，能不能说服他们实现大联合？"

交大代表说："我们的愿望是这样，但他们提出要打倒李世英，交大是朝鲜。"

交大继续讲交大的态度："（2）坚持原则、坚持团结、坚持联合，反对分裂，在原则问题上决不退让，在枝节问题上决不纠缠。"

陈毅问："有没有具体建议？"

交大代表说："我校文革号召大家学习《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及老三篇和接班人五项标准，首先破私立公，克服已经露头的宗派主义情绪。"

陈毅说："你们对西北地区、陕西地区接管和抓革命，促生产有什么意见？马上就要搞春耕，抓生产，没有饭吃怎么办？起码西北局、省、市委活动起来，你们内部问题并不重要。"

他指着陪同这些学生代表一同前来的西安市委书记处书记薛焰说："他一个人也莫得办法。你们有什么表示，可以使'指挥部'一方满意？截止目前为止，他们对你们是不满意的。今天下午我同他们见个面，晚上两家见了面，不要吵起来，吵起来，我们就不好办啰！你们在北京与他们见过面吗？"

交大代表说："见过面，在一次国务院接待室召开的了解情况

会议上，我们只谈了两分钟，他们就不让我们谈了。”

陈毅问：“是否现在我先去同他们谈谈？不然晚上江青同志、康生同志见面都成问题，两派争起来怎么办？军区的态度怎么样？”

交大：“有的支持他们，有的支持我们。我们担心左派内部的分裂引到军队中去。军区胡炳云是否是反动路线的执行者？”

陈毅：“如果他们（指军区领导）承认了错误，支持左派，但不介入你们内部分歧，你们团结起来，他们支持，你们看怎么样？”

交大代表：“我们完全同意。”

陈毅说：“你们要把军区与西北局分开，区别开。胡炳云是我的老部下，是可靠的，作战很勇敢，作战还得靠他们。他还是跟毛主席走的，我希望你们区别对待，他们是机械化，受了蒙蔽，是会觉醒，站到毛主席一边的。从他们出发要保西北局，省委、省委书记是军区第一政委嘛！广大人民解放军战士是完全可以信赖的，要照顾解放军的威信。”

西医代表说：“他们想到用军队来压交大，利用军区，宣布我们‘831’是保皇组织。”

陈毅说：“现在是毛主席、林副主席、周总理、军委要军区站到左派方面。如果他们过去犯了错误，可以检讨。现在要站到你们一边，他们不好表态。你们分成两派，有两个左派，他们怎么办？”

交大：“解放军同志最好不要介入两派分歧。”

陈毅：“这个一定不能介入。”

交大：“还希望新华社也注意，有些报导只是加深分歧。”

陈毅："新华社里也很乱。"

交大："8134 部队表示支持西工大。"

陈毅："那他们不了解情况。"

薛焰："公安局也是这个问题，解放军开进去了，后来又撤出来了。"

交大："我们有个小要求，他们指挥部应该承认错误。"

陈毅："把李世英的问题摆得比夺权还高，摆得比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还高，这个不对，说我是和稀泥，我还是坚持这个看法，我把这个要求带给江青同志，康老、总理，他们接见你们。我的意见，大方向是一致的，团结起来，抓革命，促生产，观点不一致，互相讨论，作些自我批评，不要认为自己百分之百正确。三期社论与《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很能帮助你们解决问题。三期社论中很多章节是毛主席的手笔，是毛主席加的，很多中央文件都是毛主席的手笔，一看就看得出来。"

交大："我们顾全大局，中央有什么指示要我们让步，我们坚决执行。"

陈毅："今天下午同他们见见面，然后同他们协商，看看晚上能不能？"

交大："根据您讲的精神，交大同学可以停止辩论，今天晚上打电话回去。"

薛焰："只要有一个停止，就会慢慢冷下去。"

陈毅说："毛主席在 1 月 22 日讲过，戴高帽子，下跪是对土豪劣绅的办法，不能用来对犯了错误的同志，不能用来对人民内部，战犯犯了罪，不杀他，对我们还有些好处，也许我观点右了，

讲了这番话。文化大革命左了不行，右了也不行。中央还没有提出，我提得是否太早，就是要进行两条路线的斗争，要反右，要反左，李世英讲的不要冲三级干部会场我很欣赏，蒋文清不同意，这是中央的决定，中央还叫他们搞个秘密地方，不让学生知道，好好开会。冲就不对，李世英讲的对！我不认识他，不必为他辩护。刘澜涛有罪，王林有罪，霍士廉犯了错误。但不能说西北的干部都有罪，开个三干会，说是大阴谋，去冲掉。要说服‘指挥部’的人，说服他们，你们掌了权就会知道，你们将来要当权的，犯了错误怎么办？戴高帽子？游街？毛主席说：准许犯错误，准许改正错误，准许革命，准许在革命中改正错误。这是最伟大的思想。刘澜涛愿意改正错误的话你们不能拒绝他，他不愿意改正你们就砸烂他的狗头。今天晚上接见时你们不要闹对立，今天跟你们谈了，对西安的情况更清楚些，李世英可能讲了错话，可以在内部自我批评，‘指挥部’作法不好，他们作自我批评，你们不要去指责他们，不要互相攻击，文化革命中革命左派有分歧就非要对方投降，一讲就是‘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根本不是这回事，自己做自我批评就行了。掌了权，天天都会犯错误。”

交大：“西安的谣言很多，有人说，李世英的后台是陶铸。”

陈毅：“肯定是不对的，没有的事。”

交大：“西安市工农群众来京的很多，是否首长可以同他们谈谈，作些指示。”

陈毅：“要把生产搞好，革命是精神，动力，引起生产上的变化。精神变物质，这也是一个考验，搞革命把生产搞坏，他们就

秋后算账，刘，邓的反动路线就是这样，你搞革命，结果火车不通了，米没有了，布没有了……他们就会说，那你们不是和我一样。目前斗争的焦点不是造反派内部问题，有些问题一是解决不了，把它挂起来，明年再讲。你们年青人还可活几十年，我们是60多岁的人了，活不了几年。刘少奇，邓小平看了他几十年。不要马上下结论，我这个话是‘黑话’，（众笑）水平高的一看就理解，水平低的就认为是‘黑话’，不要说陈老总又在和稀泥了。大革命是无穷的，你们在座的我现在承认你们是左派，但以后 10年怎么样？还永远是左派吗？还要看！毛主席那时就是这样，35年以前就是挨打受气，那时你也夺权，我也夺权，但都不行，我也反对过毛主席，只有毛主席行，1935年上了台，1944年在七大成为全党领袖，1949年解放成为全国各民族领袖，现在开始全世界承认是世界领袖了，但还有些人不承认，文化革命搞好了，越南把美国打败了，苏联人民起来造反了，将来全世界共产主义者开个会，承认毛主席是领袖。‘是非不可不清，是非不可太清。’这是典型的和稀泥，毛主席在遵义会议一上台就不主张争论，先把军队救出来，10年之后，安静了，在延安全党整风。今天我可以劝他们，你们可以听得进我的话，他们如果不行，听不进，那叫更高级领导同志和他们谈。夺权了，只搞接待，别的不干，那不行。现在最重要的是打破新反扑，搞生产，麦子，工业。西安是个大工业城市，你们看这些话他们听得进听不进？我说的错话比李世英还要多，但毛主席，周总理还要我，”众人大笑，陈毅：“要我接待外宾，还有内部接待。”

交大：“李世英在我校已作过几次检查，炮轰过几次。”

陈毅："也用不着炮轰，要帮助，要用批评和自我批评，左派之间的民主问题，如果不民主，一定分裂，现在你们夺权，等于没有夺，瘫痪在那儿，一开始工作，争执很大，怎么办？一言堂？那可又要犯刘澜涛的错误，以后一大堆问题你不民主地处理，那过了几年又是一个刘澜涛的命运。搞文化革命不能专断，谁专断，砸烂谁的狗头。根据错误的性质分析，李世英讲错了一些话，但性质不那么严重，又不是反党集团。就是为了团结他们（指联络站）一部份的人，讲了那些话，用谈判有什么错？今天下午同他们打通思想，外边的谣言不要轻信，没有中央文件不能信，北京大街上的大字报，不能轻信，以中央文件为准。有些人看热闹，通风报信，有些人别有用心，搞乱你的阵营，欺骗那些没有判断能力的人。一部分人的确别有用心。省委不能让他瘫痪，我们要抓头头。现在你们两派不一样，我们抓那一派？有些话一讲就改头换面地送到街上，我根本没有讲，李世英是关键人物，也没有讲过可以公开批判，我只是说是内部矛盾。运动中一大批新人应该培养，有很多新人物，也有很多意见，中央做工作，允许改正错误，准许革命，准许再革命。你们回去，下午我们打电话告诉你们。"

交大："我们的电话坏了，我们打电话来。"

吴彬："那半小时打一次。"

陈毅："我们可以把同他们谈的情况预先告诉你们，大约下午5点可以结束。好吧，就谈这些。"

交大一名代表："我代表交大全体革命师生员工毛泽东主义红卫兵把红袖章赠给陈副总理。"

陈毅笑着说：“呵，我可是老犯错误的。”

交大同学把红袖章给陈毅戴上，陈毅很高兴：“革命的交大，好，谢谢你们，再见。”

## 第 487 回：批文革，接内蒙代表进京　财政部，杜向光拒抓业务

2 月 6 日,审阅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革命师生和红卫兵进行步行串连问题的通知》稿，批示：“照发。”

这份通知指出：长途步行串连，在全国都停止，已到各地的步行串连队要迅速返回原地，返回时原则上应当步行。串连期间的伙食费、市内交通费一般应当自理。来北京的师生和红卫兵的食宿自 2 月 8 日起，不再免费。

2 月 6 日下午，毛泽东召开中央常委扩大会议，谈夺权问题，叶剑英、江青也列席参加。毛泽东说：各个城市夺权，要有广大革命群众代表、军队代表、机关革命干部代表三结合，没有三结合，就不能承认。军队不能夺权，要有人夺权，就抓起来。

他批评中央文革小组，对陈伯达、江青说：“你们这一摊子要接受批评，你们毫无政治斗争经验，也没有工人农民斗争经验，更没有军队斗争经验，只是在文艺方面做了一些调查研究。对陶铸的问题，没有经过我、林彪和总理同意，你们只用两三个小时就把他解决了，是事后报告的。伯达对我有事也不商量，骄傲起来了。一切老干部都打倒，你就是要打倒一切。你们早晚会被打倒。我从来都说要团结更多的人嘛，你眼高于顶，把见面笑不笑，拉不拉手，都当成政治问题来判断。你们这摊子有错误。所有省市都叫人民公社，那全国就叫中华人民公社啦，也不要中央、国务院了。今天上海要登报成立人民公社，要压下来，不要搞。上海人民公社是你们通知搞的。以后登报的各省的重要消息，要给

我看。你们代替了书记处。常务工作，由总理主持。我也是常委嘛，每周开一次会，我来主持。”

2 月 6 日这天，载有韩桐在内蒙古军区门前被枪杀的“东纵”《东方红》小报摆在毛泽东的案头，毛泽东指示周恩来处理此事。周恩来当即以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名义发出特急明码电报：

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内蒙古军区、呼市三司和呼市红卫军（均请军区转）：

在内蒙古军区发生的事件，应该立即停止，事态不要扩大。请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内蒙古军区、呼市三司和呼市红卫军四方面各派 3-5 名代表来北京商谈解决。我们于 2 月 6 日派飞机来呼市接你们的代表。据悉，军区周围有一师范学院同学中弹致死，如确，应严追凶手和指挥者，查出后应予法办，并向死者家属致唁和予以抚恤。

当天，两架专机从北京起飞，1 小时后，徐徐降落在呼和浩特白塔机场。四方代表共 20 来人，分乘两架专机，直飞北京。

这天，已被造反派夺权的《内蒙古日报》刊登了“韩桐事件”的消息，发往外地的《内蒙古日报》被周恩来下令停发。

2 月 7 日，“呼三司”的小报将周恩来发给内蒙的特急明码电报全文转载。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电台立即播出消息：“内蒙古军民冲突，一学生中弹致死。”

2 月 8 日，《内蒙古日报》在第 1 版头条发表了“上海 14 个革命造反团体来电声援内蒙古造反派”的消息。在第 2 版报道了打死韩桐的消息，并配发了评论员的文章，同时宣布了“韩桐治丧

委员会”的成立。接着，又组织一次汽车队伍治丧大游行，将韩桐的尸体放在卡车之上，覆盖着红旗。在灵车的引导下，有数百辆汽车在市区游行，呼市万人空巷。

2 月 9 日，内蒙古军区机关和直属分队的干部、战士数百人在军区门外与 100 余名“呼三司”学生和三军院校的学生再次发生冲突。参谋长王良太亲自指挥，将 70 余名学生拉进军区大院关了起来。当天，军区以“机关联总”的名义出动了 60 余辆卡车，满载全副武装的士兵在全市武装游行。

看守被军区拘押的“呼三司”学生的一名军人对学生说：“我们真佩服你们的策略，当时，你们没冲，如果冲的话，机关枪一突突，两千个也死了。”

另一个军人纠正道：“甭说两千，就是三千也玩儿完。”

再回到北京。财政部虽然在 1 月 20 日被中央财政金融学院“八八战斗队”夺权，1 月 24 日，财金学院“八八战斗队”与财政部的群众组织又联合成立“接管委员会”。到了 1 月 27 日，财政部再次宣布夺权。《人民日报》2 月 5 日第四版报导了财政部夺权的消息。周恩来得知后，于 2 月 5 日做出“五点指示”，让联络员传达给财政部的“接管委员会”，指出：“财政部的业务权不能夺；业务工作请示先念同志；财政计划指标要在三、五天内下达；吴波同志因被斗身体不能支持，要休息；总理准备亲自接见财政部的同志。”

2 月 6 日，中央财政金融学院“八八战斗队”抄砸了本院对立派“东方红公社”总部，迫使“东方红公社”宣布解散，并独揽了财金学院的一切权力。

周恩来让李先念向支持造反派夺权的财政部副部长杜向光传达他的指示，动员“接管委员会”交出财政部的业务权。

2 月 7 日，杜向光来到李先念办公室，李先念劝他按照周恩来的指示将财政部的业务工作抓起来。对此，杜向光明确表示反对。他说：

“我念一段语录：‘共产党员对任何事情都要问一个为什么，都要经过自己头脑的周密思考，想一想它是否合乎实际，是否真有道理，绝对不应盲从，绝对不应提倡奴隶主义。’总理联络员董枫同志找财政部接管委员会常委，传达了总理指示，我后来参加了。总理指示是：一、财政部的业务权不能夺；二、总理要接见财政部的同志；三、财政指标要在三五天内下达；四、业务工作由杜向光请示李先念同志；五、吴波休息。按照这个精神，我个人意见：

造反派夺权问题：财政部业务权昨天说不能夺，根据当时形势，中央精神，《红旗》社论，财政部的实际情况，财政部造反派夺业务权是应该夺的，夺得对的。因为党组瘫痪不能工作。这样把业务权交给造反派有什么不好？我坚决拥护造反派夺权，坚决站在造反派一边，我不理解总理指示，为什么不找造反派商量，要找我把业务抓起来？我不同意这种作法，实际上 1 月 20 日夺权后，由司局到部业务都由革命造反派组织人抓，现在让他们把权交出来，这里有相信不相信群众的问题。

党组大部分不能工作了，司、局长大部分不能工作了，为什么一定要相信这些人。群众对此是有意见的。我也不理解。当时党组无人能领导，接待工作时期，秘书也指挥不动了。革命造反

派从对党，对人民负责出发采取这样的行动（指夺权）是对的。

现在革命造反派是占绝对优势的，我们过去工作推不动，现在革命造反派一抓就抓起来了。这一点李副总理是否了解？造反派和我个人都有这样的意见，李副总理应到财政部去深入群众，到群众中去。

现在夺了权，又交出来是相信不相信群众的问题，支持不支持革命造反派的问题，是脱离群众。

我不理解总理的指示，不能执行这个指示。”

李先念十分惊讶和不满，他问道：“总理的指示你不执行？”

杜向光十分坚决：“不理解，不能执行。难以盲目执行。夺业务权的问题想听听李副总理的看法,对革命造反派是如何支持的。业务权和领导是不能分开的。为什么让交出？不能理解。司局长看来大多数不能用。”

李先念问：“你对主席的指示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干部，又如何理解？”

杜向光说：“司局长现在都不好工作了。”

李先念说：“你是高级干部，对主席指示的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干部如何理解？《人民日报》5 日四版报导财政部造反派夺权的报导，昨天王力同志告诉我这篇文章是错误的，你知道不知道？”

杜向光回答说：“我看过，不知道王力同志的批评。”

李先念问：“吴波看过没有？”

杜向光：“不清楚。”

李先念解释说：“财政的权不能夺。我事先也并不知道，是中

央的决定。总理的指示，你不执行？你说要独立思考，不盲目执行。不对。你应该坚决执行，不应当怀疑。造反派绝大多数是好的，敢于革命，敢于造反。这一点我不动摇，还是支持他们。但刘振玉不对，我两次请他他不来，我是以副总理名义请他，他说跟李先念无话可谈。即使对我有意见，可以当面谈，为什么不来？他们夺了权，当时我是支持的。我告诉吴波转告请他来。他说要研究。第二次办公室打电话请他，他说跟李先念无话可谈，那我有什么办法？

现在责成你坚决执行总理的指示。把业务抓起来。既然业务权不能夺，应当抓起来，司局长要区别对待，要让他们积极工作。不能说大部分不能用。这些司局长经过批评或斗争后应该说大部分还是能用的。只要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三反分子，都要用。对革命造反派的同志要保护他们的革命热情，要让他们积极协助司局长做好工作，他们有监督业务之权，可以对司局长加以监督。如果司局长是三反分子，不能用，但是这只是一小撮，现在通过两条路线进行工作。一条是向司局长宣布除三反分子外要他们工作考验他们是不是积极工作，是不是能站起来工作，一条是保护真正革命左派和群众的热情，拿毛泽东思想，真正的革命左派和群众的热情要保护。如果是真正的左派的话，要坚决执行总理的指示，要坚决贯彻中央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立即同司、局长一起把业务抓起来，当前的任务是把 1967 年的财政指标下达，不要求百分之百的准确。”

杜向光表示：“今天可以讨论，可以在三、五日拿出来。现在党组没有人管事，吴波、江东平休息，就我一个人。”

李先念说："党组可以考虑恢复工作，运动由'革命造反司令部'负责是可以的，党组讨论业务，'造反司令部'可以参加。"

杜向光："党组没有人管事，姚进、王程远另行处理。当时'接管委员会'提出的四条你是支持的。"

李先念："支持过他们的革命精神，现在情况变了，总理有指示嘛，党组开会开不起来，你可以召集司局长开会，造反派可以参加，工作通过两条线，一条是司局长，一条是真正革命造反派协助。当前的工作，把 1967 年的下达，再则是抓收入和支出。"

杜向光："指标可以下达，安排××亿左右，要向财办、小计委汇报一下。"

他最后又提出三个问题："一、总理指示财政业务权不能夺过去，夺得对不对？"

李先念："过去支持过他们的革命精神，现在中央已有指示，情况变了，应当按总理指示办事。"

杜向光："二、我现在是参与业务工作，你的意见首先应同'革命造反司令部'谈。"

李先念："请你传达给'革命造反司令部'。今天是你要见我的。"

杜向光："三、我认为夺权夺得对，我不理解，在不理解精神之前，难以执行。革命造反派对李副总理有很大意见的，这样做，支持左派如何表现出来？"

李先念说："革命造反派对我的意见，我知道。但请你（一）坚决贯彻执行总理指示；（二）向'造反司令'转达；（三）向司局长进行传达。"

杜向光："现在我的权已被夺了，没有权了，能不能召开会？"

李先念："总理指示了，你应该有权；你是副部长嘛！"

杜向光："指标下达，坚决执行，夺权交权问题，我不理解前，总理未接见前，难以执行。我保留意见。"

李先念态度明确："你这是错误的。"

李先念让秘书把杜向光送走后，即将这次的谈话情况向周恩来做了汇报。

周恩来听到李先念报告后，十分恼火，随即和李先念商量，决定接见财贸系统群众组织的代表，确保财政部业务工作的正常进行。

杜向光回去后，也将李先念同他的谈话内容向财政部"接管委员会"作了传达。财政部"革命造反司令部"很快就贴出大字报，称李先念与杜向光的谈话是大毒草。

北京，江青和陈伯达找吴德等人谈话，江青说："上海市的工人阶级夺了走资派的党政财文大权，毛主席给了高度评价，张春桥受毛主席对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北京公社的宣言书'的影响，将新成立的权力机构定名为'上海人民公社'。这个提法不一定好，将来可以改。但是意义是具有普遍性的，吴德你也要考虑和李雪峰划清界限，站出来革命呀！"

陈伯达说："吴德在新市委中的作用是有限的，新市委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不能让吴德负主要责任，责任是应该由李雪峰来负的。"

## 第 488 回：说京西，张春桥“三点指示”　韩大胆，福州市形势逆转

由于在军委扩大碰头会议期间，北京京西宾馆频频受到群众组织冲击，2 月 6 日，周恩来指示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京西宾馆从 1967 年 2 月 7 日零点起，开始实行军事接管，未经北京卫戍区允许，任何人不许进入。如果有人要进的话，讲清道理。避免冲突，说明这些人(中央军委首长、各军区首长)来开会，是中央请来的。”“……京西宾馆要设接待室，有问题到接待室谈，……不许冲击，不许进去抓人，不许把人揪走，卫戍区要绝对负责。”

2 月 7 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卫戍区发布《通告》，对京西宾馆实行军事接管。《通告》张贴在宾馆各出入口。

当天下午 16 时，周恩来派秘书周家鼎专门对京西宾馆军事接管问题进行了检查，周恩来指示说：“接待室不能设在大楼，可以设在东小楼(即现在东大楼的位置)，要把力量配备好。未经许可不能进入宾馆，不但前门不能进，后门也不能进，一定要管好。”

当天晚间，周恩来又亲自到京西宾馆查看了《通告》张贴的情况，并指示：宾馆接待室安一部直通总理办公室的电话。

再说上海“红革会”,2 月 4 日上午召开了上海 38 个院校的“红革会”近 8 万人参加的“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迎头痛击炮打中央文革的反革命逆流誓师大会”，批斗了自己的头头,“红革会”总部常委马立新、劳元一、李功佐 3 人和“红三司”的安文

江、“炮司”的周谷声等人，2 月 5 日“上海市人民公社”成立后，2 月 6 日上海出版的“红革会”第 22 期《红卫战报》上，又刊载了“红革会”的“向毛主席请罪！向革命人民请罪”书。请罪书开头第一句是“最最敬爱的毛主席：我们以最最沉痛的心情，向您老人家请罪！”，以后的三段，第一句都是从 “毛主席啊毛主席”开始，确是很感人肺腑。

1967年2月6日 星期一 第三版

最 高 指 示

“成千成万的先烈，为激人民的利益，在我们的前头英勇地牺牲了，让我们高举起他们的旗帜，踏着他们的血迹前进吧！”

“错误和坏东西割了我們，使我們比較地聰明起來了，我們的事情就办得好一些。任何政党，任何个人，錯誤总是难免的，我們要求如科少一点，犯了錯誤則要求改正，改正得越迅速，越好越，越行。”

向毛主席请罪！向革命人民请罪！

敬敬敬爱的毛主席

我们以最最沉痛的心情向您老人家请罪！

自从一月下旬以来，我们收到入一位“反中央文革”的反革命流氓中不法分子，利用中央文革一月廿九日的“特急电报”提出要我们向中央文革“特急电报”的抵为电报的地步！

（略）

毛主席啊毛主席，您是全人民的伟大导师，您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大统帅，您是我们最最亲爱的毛主席！

毛主席啊毛主席，我们在今

“最高指示”

“成千成万的先烈，为激人民的利益，在我們的前头英勇地牺牲了，让我們高举起他們的旗帜，踏着他們的血迹前进吧！”

“錯誤和坏东西割了我們，使我們比較地聰明起来了，我們的事情就办得好一点。任何政党，任何个人，錯誤总是难免的，我們要求如科少一点，犯了錯誤則要求改正，改正得越迅速，越好越，越行。”

敬敬敬爱的毛主席

我們以最最沉痛的心情向您老人家请罪！

自从一月下旬以来，我們收到入一位“反中央文革”的反革命流氓中不法分子，利用中央文革一月廿九日的“特急电报”提出要我們向中央文革“特急电报”的抵为电报的地步！

（略）

毛主席啊毛主席，您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大统帅，您是我們最最亲爱的毛主席！

毛主席啊毛主席，我們在

【本报报】复旦大学委会近期以来在复旦的上海市委的反革命集团反革命活动的事实，进行批判写出大字报，公开如下：

敬请指示，凡事应当抽时间一想。

七 問

1、为什么在陆定一讲话以后，复旦的有不得了的人物，在地下活动？

2、为什么在打倒三家村以后，复旦的有不得了的人物，在地下活动？

3、为什么在打倒三家村以后，复旦的有不得了的人物，在地下活动？

4、我们要问复旦的人物，是否要反对毛主席？

再看上海复旦大学，由于文革开始后，造反派势力大，党委垮得早，因而被称为“解放区”。徐景贤在下决心造反之前，曾到复旦来取过经，在他宣布造反的 1966 年 12 月 18 日大会上，郭仁杰公开号召大家到复旦来学习，引来不少单位的人群。复旦的造反派也以先觉者自居，到工厂、到社会上去鼓动造反，人们都以尊敬的口吻称他们为“革命小将”。而此时，随着中央文革“特急电报”的传播，“炮打”失败，世情大变，他们成了炮打中央文革的罪人，被围攻、被驱逐，一个个灰溜溜地从社会上回到学校。而在校园里，他们所感受到的也满是充满歧视的眼光，反差之大，

使他们感觉到世态炎凉，有的垂头丧气，有的灰溜溜的，有的不知所措，有的心灰意懒，回家去了。当然，也有一批人留下来坚持战斗，在进行批判。

2 月 6 日晚上，复旦大学“红革会”召开批判“头头”的大会，结果还被机院“红革会”给造反冲掉了。

2 月 7 日上午，安文江向“红三司”战士作检查。

对于“炮打”头头的批斗会一个接着一个开，颇有应接不暇之势，就像不久前他们批斗“走资派”一样，有些人身上也被挂了牌子。真是：风水轮流转，今日到我家。但过去有“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之说，可见风水之轮转还是需要一些时日的，可是这次的这一转，只有一两个月之隔，实在有点让人眼花缭乱。

好在是“红三司”占绝对优势的院校，学生们对他们很文明。上台前先打招呼：“说得过火处别放在心上，批判嘛。”在复旦大学更是“惺惺惜惺惺”，大家心照不宣，除极少数人和极个别对中央文革怀着真诚感情的同学，谁也没想要和“坏头头”划清界限。毕竟是一起冲杀过来的造反派，自称为“一个战壕里的战友”，而且这些头头们既建立了威信，要从内部打倒他也不是易事。许多群众并不认可新头头，因为他们具有更大的投机性。群众认为他们没有冒过风险，只不过是乘机捞一把，故谓之曰：“捞稻草”，常常用大字报或漫画加以讥讽。

即使被树为全市红卫兵正确路线代表的同济大学“东方红兵团”司令陈敢锋，也不被老红卫兵所看重。在张春桥们看来，上海的红卫兵组织头头只有一个陈敢锋没有参加炮打，难能可贵，所以将他作为红卫兵唯一的代表，安排为市革会委员，后来又在

中共九大会议上被选为中共中央候补委员。但是，在大学造反派中，他被称之为“陈看风”，讥讽他是看风使舵，一贯投机。

当安文江等人不断受到批斗时，复旦大学中文系教师吴中杰跑到“机联站”去找徐景贤，想为安文江说情，毕竟同为造反派战友，还有师生情谊。这时，想找徐景贤说事的人太多了，“机联站”的办公地点，淮海中路原市委党校入口处挤满了人，都是来找徐景贤的。没办法，徐景贤只好躲着不见。吴中杰将名字通报进去，有人出来将他引入。不过接待他的不是徐景贤，而是郭仁杰。郭仁杰将他带到大楼的屋顶平台上。

吴中杰提出要保安文江，理由是：安文江在“机联站”造反时出来支持了他们，现在他们应该放他一马。

郭仁杰则说，在原则问题上不能做交易。并竭力劝说吴中杰，要与安文江等炮打张春桥的学生划清界线，并动员吴中杰站出来跟他们一起反对炮打逆流。

最后，他们二人各自坚持自己的意见，不欢而散。

在“红三司”整风会上，大家叫安文江作动员报告。气得郭守仁直骂：“怪事一桩！让安司令作整风动员报告，整谁的风嘛！”

这时，张春桥就“炮打张春桥”的问题，发表了三点指示：

一、欢迎“红革会”战士起来造反；

二、对于一般的“红革会”战士来说，不是请罪的问题，而是造反的问题，要请罪的不是广大战士，而是少数头头，责任在于“红革会”的某些负责人；

三、这一场斗争不是一个小问题，也不是个人问题，而是关

系到中央文革的正确领导能否贯彻的问题，关系到上海运动的大方向问题。“红革会”战士要造反，就要彻底肃清少数头头在这次事件中所造成的恶劣影响。

我们再说福建。1 月 28 日下发的中央军委《八条命令》，为困扰在福州“126 事件”中的韩先楚解了围。素有“韩大胆”之称的韩先楚，胆子放大了，索性下令把多次冲击军区、冲击“积代会”会场、抓军区干部游斗的军区卫校革字派和红字派的几个军内群众组织头头以及解放军艺术学院“星火燎原”中的为首的几个人抓起来，予以纪律制裁。福州军区请示军委，要求把一些经常冲击军事机关的打砸抢分子集中到一个岛上管制，叶剑英考虑到福州地处前线，批准了他们的请示。福州军区还大量印刷了《福州部队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关于我们大会真相的说明》等传单在福州市散发。

1 月 30 日，福州军区起草并通过了《前线部队公告》，并于 1 月 31 日公布。《公告》称：“我们遵照最高统帅的命令，坚决支持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坚决反对右派，加强战备，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那些证据确凿的反革命组织和反革命分子，坚决采取专政措施!对不执行中央军委命令者,坚决实行纪律制裁!”“为着维护最高统帅命令的尊严，对军队内部极少数违抗中央军委命令的违法分子，实行了纪律处理。外部如有借此进行造谣诬蔑，或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继续冲击军事机关，丑化中国人民解放军者，我们一定按照最高统帅命令，坚决采取必要的措施。”

韩先楚所做的这一切，再次激起福州“思想兵”总部、“省直联总”、“工联总”以及北京“三司”、“新北大”联络站等一派人

更大的反抗。他们把《前线部队公告》称之为“韩氏公告”，当作大毒草大批特批。“工联总”、“省直联总”主编的《革命造反报》，还专门出了社论《向解放军致敬!向韩先楚开炮!》。“火烧韩先楚”、“炮打韩先楚”之类的大标语刷满了福州市的主要街道，一个反军倒韩的浪潮如海啸一般在福州市铺天盖地而来。

但是，2 月 6 日，经毛泽东批准，中央军委转发了福州军区《前线部队公告》。当天上午，福建的“思想兵”和北京“三司”那些南下学生听到中央军委正式批转《前线部队公告》的消息后，登时懵了，有些张惶失措。很快，他们又按照当时习惯的逻辑思维进行形势分析，认为韩先楚抓人、关人比工作组执行的资反路线有过之而无不及，“韩氏公告”就是以“战备”压革命，是名副其实的大毒草，他们反对韩先楚没有错误。

但是，中央军委为什么还会批转这份《公告》呢？他们认为：首先是这一消息是否可靠？会不会是福州军区在造谣？即使这一消息是真实的，那也不会是毛主席批转的，而是徐向前批转的，因为两条路线斗争必然会在各地表现出来，中央军委也不例外，叶剑英、陈毅的讲话不也是错的吗？于是，他们由怀疑韩先楚发展到怀疑中央军委和徐向前。鉴于如此，他们一方面设法打电话、电报给中央文革反映情况，同时，还派了一些人赴京汇报。

福建支持福州军区的“八二九联司”，6 日上午也知道了中央军委批转了《前线部队公告》，一个个高兴得像弹簧一样蹦起来。这天，厦门大学“红卫兵独立师”的几个学生路过《福建日报》社门口时，听见里面的高音喇叭仍在大声广播：“韩先楚公告糟得很！臭得很！韩先楚公告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反革

命宣言书!”即闯入报社，对报社的人说：“你们立即把反革命的广播稿交出来，我们要批判!”

《福建日报》“三联造反队”一口拒绝道：“《福建日报》社是代表全省的造反派，你们有什么权利来索取广播稿!”

厦大“独立师”的学生把翻印军委批示的传单压在桌面上，理直气壮地说：“中央军委的批示给了我们这个权利!”

对方对传单看也不看一眼便说：“你们别捞稻草了!”说着，随手就将传单撕个粉碎。

这一下，那几个厦大学生如同被火柴点燃的酒精冒起火来，声色俱厉地责问他们:“你们这是什么行为？竟敢明目张胆地把中央军委的批示当作‘稻草’呀？!”

对方也毫不示弱，怒目相视地反问说：“哼，你们今天又是什么行为呢？这是右派向左派夺权!”

在旁的人们也高呼：“打倒新型保皇派!”对厦大学生进行围攻。

有一个厦大学生见势不妙，便悄悄地溜出了房间，跑到附近的市一中，要求一中和他们同一派观点的“66818 部队红卫兵”支援。市一中“66818 部队红卫兵”的大多数成员是从原“前线红卫兵”中冲杀出来的，是福州市最早属于“八二九联司”的组织之一，当即就有十几个“66818”的一中学生跟着那厦大学生跑到报社参加辩论。

下午 14 点多，在福州市东方红大街宣传中央军委批示的林学院学生，获悉厦大“独立师”的学生正和报社的人舌战犹酣，立即把宣传车开进了报社大院，广播《前线部队公告》。以后，福州

军区支左办公室的解放军也赶来了，一位解放军登上了宣传车，郑重地宣读中央军委对《前线部队公告》的批示：

“最高指示：‘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转发前线部队公告》‘各军区、各军兵种、各基地、并各总部：兹将前线部队公告转发你们，望参照执行。中央军委一九六七年二月六日’……”

此时，报社的人见“八二九联司”学生和解放军开进越来越多，形势对他们很不利，连忙借“三司”联络站之名，打电话给他们所属的组织，搬兵求援。不久，大批的增援人马像救火车一样风风火火地陆续赶到了报社，堵住了大楼里头所有的进出口。报社大院里的人已挤得水泄不通，多数是围观的群众。只见那辆“八二九”的中型面包宣传车，就像浮在人海里的一艘炮艇，只露着它的车顶。车顶上，厦门大学的学生林金铭头戴着一顶旧军帽，手臂上戴着“八二九”红袖章，手执着一个牵线的麦可风话筒，正在大声的喊着：“我们‘八二九联司’向《福建日报》社发出最后通牒，勒令你们必须在 10 分钟内交出现行反革命分子何磊和攻击《前线部队公告》的反革命广播稿，否则，我们将采取暴烈的革命行动，由此产生的一切严重后果一概由你们负责。”

据守在报社里的人却依然高呼：

“中央军委受了韩先楚的欺骗！”

“中央军委的批示是错误的！”

“中央军委是可以怀疑的！”等口号。

时间一秒一秒地过去了，“八二九”方面有 100 多人，准备采取行动。

10 分钟很快就过去了，林金铭从车顶上爬下来，亲自打头阵，带领着厦大“独立师”的学生向报社大楼冲去，4 个解放军战士在后头保护他们，一场短兵相接在大楼门口处展开。

大楼里面的人远比“八二九”学生为多，他们对“八二九”学生大打出手，阻止他们进入。

傍晚时分，报社继续调来大批人马，其中有“思想兵”总部、“南联”、“三司”、“新北大联络站”等等，他们把“八二九”学生团团围住，扬言要捣毁宣传车，将“八二九”学生统统抓起来。

“八二九”学生人数不及他们多，寡不敌众，便派人向福州军区要求支援。韩先楚满足了“八二九”学生的请求，派出了数百名全副武装的解放军赶到报社，还开来了宣传车。以后，又有一部分老区农民也赶来支援“八二九”学生，形势发生了转机。

本来，报社大院的范围就不大，现在挤了这上千人，饱和得如若盛满大米的米缸，那些感情冲动的人群拥来挤去，好像沸腾的岩浆在缓缓地流动着。这时候，军区政治部歌舞团中的几个人翻过围墙，把“一二六革命行动好得很！”的大幅标语贴到报社墙上，引起了他们一派人的一阵欢呼和喝彩。

由于有解放军作为强大的后盾，“八二九”学生终于占据了报社大楼，封闭了报社。

而在此时，东方红大街也热闹极了，到处都是人群。福州军区出动了好多宣传车上街宣传中央军委批示和《前线部队公告》，同时，大量散发印有中央军委批示的《前线部队公告》的传单，每张传单都有一版的《福建日报》一般大。

大街上，“工农红卫军”的宣传车也开出来了，高音喇叭不断

地在高喊着："坚决拥护中央军委批示！坚决支持《前线部队公告》!"、"一二六行动臭如大便!"

7 日凌晨 6 时，封闭了《福建日报》社的"八二九"学生和解放军撤出了报社。他们的队伍刚刚离开，报社的人就将他们的封条撕掉，继续出报。当天的《福建日报》发表了《二·六事件的策划者必须低头认罪》的社论，还在第一版登出了毛泽东 1949 年 8 月 14 日发表的《丢掉幻想，准备斗争》的文章。

这天，位于金门前线的厦门市驻军奉命取缔了 16 个群众组织，但在泉州、厦门、福州一些地方也同时出现了"拥护解放军，炮打韩先楚"的标语口号。

7 日下午，"省直联总"、"工联总"、"思想兵"总部、"三司联络站"等组织又在福州市省体育场召开了一个控告韩先楚镇压革命造反派大会，会后，还举行了示威游行。

2 月 8 日，即中央军委批转《福建前线部队公告》第 3 天，福州街头贴满《北京来电----陈伯达同志的 4 点表态》。造反派的宣传车也满城游走，高声广播"四点表态"：

"一·二六"事件是革命行动；

韩先楚可以炮打；

支持《福建日报》造反夺权；

支持"首都三司驻榕联络站"的革命行动。

韩先楚立即给北京打电话，先是叶剑英、徐向前，后是林彪、周恩来，汇报陈伯达的"四点表态"，希望求得事实真相和指示。

陈伯达不但是中央文革小组组长，而且分管福建的"文化大革命"，可不管你是谁，那《福建前线部队公告》是军委批发的，

是毛泽东席同意的，他韩先楚理直气壮。

2 月 8 日下午，“八二九联司”的学生再次包围了《福建日报》社。

2 月 8 日晚上是除夕之夜，这一年的除夕几乎没有一点点过年过节的景象，到处都是革命氛围。特别是年青人火热的心已完全被“革命”所占据，根本就没有过节玩乐的心思。

据守在报社大楼里面的人为了要对付“八二九”学生的围攻，把大楼的电灯全部关闭了，顿时，报社大院里面漆黑一团，到处是乱轰轰的人群奔来跑去，其混乱的程度不亚于汽车炸弹突然在大街上爆炸所引起的混乱。

“八二九”学生不断地向报社大楼的大门猛冲，如若汹涌的浪潮冲击着礁石一般。

一边硬冲着，一边硬顶着，人们摩肩接踵，忽地冲向前，忽地又倒回来，再蜂拥而上，又被挡了回来，发出了一片愤怒的喧哗声。

大楼久攻不下，“八二九”学生改变战术，派出一群学生绕到大楼的背后，大声嚷嚷着：“大家都赶快去搬床架，把床架叠起来，爬进去！”

于是，又有一大群人跑到大楼后面的一间平房，像蚂蚁抬苍蝇一样抬来了几架双层的木床架。

9 日凌晨，报社和“三司联络站”的一些人又编造了一个“特大喜讯”，说陈伯达托王力于 9 日凌晨 3 时给“三司驻福州市联络站”打来电话说：“一二六是革命的行动”，“我坚决站在你们这一边，你们要坚持到底”云云。这个“特大喜讯”像仙丹一样，使

那些高喊“一二六好得很”，而又被“八二九”冲击得昏昏然的人们顿时“精神抖擞”、“斗志昂扬”，于是乎集合，于是乎游行，昂首阔步，红光焕发，煞是壮观。岂料好景不长，当福州军区将此事报告了中央，当日上午 11 时 25 分，中央即来电答复说：“肯定是谣言。”

本来，一些“好得很”派的学生因为谁也没见过电稿全文，对此事就有点将信将疑，这一下见到中央真的来电辟谣了，顿时惊慌，也赶紧在 9 日晚上出来辟谣。

## 第 489 回：议新疆，雪域西藏也夺权　陈伯达，接见二医大“红纵”

军委扩大碰头会议期间，周恩来指示童小鹏,派飞机将时任西藏自治区第一书记的张国华接到北京。1 月 19 日，接张国华的飞机还没到北京，西藏驻京办事处的一些造反群众就得到了消息。他们来到张国华在北京的家,找张国华的妻子樊近真要人。

樊近真很生气，对他们说:“你们是听的广播,我也是听的广播,我也不知道他在哪儿!”

这些群众走了。

夜里 2 点多,张国华推开北京的家门。这时，樊近真还没睡。她看见张国华脸肿得厉害,往床边一坐就起不来了。原来，张国华已经发烧几天了。樊近真问他想吃点什么？张国华说：“别忙了,要弄就弄点稀饭吧。”

樊近真见张国华的脚也肿得像馒头似的，就对他说，洗洗脚能消肿。可张国华怎么也脱不下毛裤，孩子们过来帮着脱，还是脱不下。张国华喃喃说道:“我已经 4 个月没脱衣服上床了……”

清晨，周恩来打来电话，让张国华到京西宾馆去。张国华从床上坐起来，一看表已经是早上 5 点多了，说：“总理打电话总有事,不用休息了。”他出门刚上车，就见一辆小汽车在他家门口戛然而止。车上的人下来走近张国华，贴近他耳朵说:“先到人民大会堂。”

2 月 5 日，“拉萨革命造反总部”等群众组织在拉萨市开大会，宣布夺权，西藏军区表示支持。群众代表在发言中有一些攻击西

藏军区的言论。军区参加会议人员退出会场。

第二天，2 月 6 日，西藏军区党委给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来电报请示说:“拉萨革命造反总部”及其所属组织认为张国华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并说军区党委是“保皇派”、“黑窝子”，群众因不明真相，动荡很大，军区机关一部分干部和驻拉萨部队的部分干部、战士也出现了思想混乱。此种状况，如果继续发展下去,后果是严重的。建议中央对张国华尽快表明看法。

西藏军区的请示电报很快转到毛泽东手里。2 月 7 日,毛泽东在上面作了批语：

林彪、恩来、叶、聂、徐各同志：

请你们研究一下，张国华、周仁山、王其梅等究竟是好人、坏人，一二日内拟电告我，发出表态，是为至盼！

有些问题处理太慢了。新疆问题应当快点解决。

毛泽东

二月七日

另有一些重大问题处理太快，不经常委从容讨论，似乎不妥。

又及

周仁山，时任中共西藏自治区委书记处书记、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王其梅，时任中共西藏自治区委书记处书记。

接到毛泽东的指示后，2 月 7 日、8 日，周恩来接连约聂荣臻、叶剑英、徐向前同新疆自治区负责人谈新疆问题，认为新疆夺权条件不成熟，拟对新疆自治区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实行军管，以

推动和促进“三结合”。

2月9日，西藏“拉萨革命造反总部”等群众组织冲击西藏军区。

2月12日，中央军委给西藏军区复电。

2月22日，“拉萨革命造反总部”、“拉萨革命造反公社”、“首都赴藏革命造反总部”、“首都三司驻藏联络站”、“北航红旗赴藏小分队”从拉萨给中央文革发来电报，查询2月12日中央军委给西藏军区复电的真伪。

2月24日，中央文革给他们复电：

西藏台转拉萨革命造反总部、拉萨革命造反公社、首都赴藏革命造反总部、首都三司驻藏联络站、北航红旗赴藏小分队等各民族革命造反派：

我们收到你们2月22日从拉萨发来的电报。对你们提出的问题，答复如下：

（1）中央军委2月12日给西藏军区的电报是代表毛主席和党中央意见的，中央文革小组完全拥护这个电报所说的。张国华同志是站在毛主席路线一边的，尽管他在工作上有缺点和错误，但基本上是个好同志，望军区党委同志向革命同志作些工作。

（2）中央文革小组欢迎你们要掌握斗争的大方向，捍卫和实现伟大领袖毛主席提出的革命的“三结合”联合夺权的伟大方针。你们要同张国华同志和西藏军区革命领导同志合作使西藏地区的文化大革命不走弯路，此致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敬礼！

中央文化革命小组

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四日

2月6日后，谭震林、陈毅等人根据周恩来的指示，给周恩来写了两封信：

（一）

总理：

我们建议把叶飞、谭启龙、江渭清、杨尚奎、刘俊秀等同志调到北京来，一方面可以打通思想，另方面也可使他们身体得到休息。

震林、陈毅

（二）

总理：

建议把下列同志调来北京，如张平化、张体学、韦国清、霍士廉、陈丕显、刘子厚。一方面可以打通思想，一方面使之休息一下。

陈毅、震林、先念、富春

2月7日，中央碰头会拟定先将浙江省委第一书记江华、书记处书记曹祥仁、福建省委第一书记叶飞、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谭启龙、江苏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江西省委书记处书记刘俊秀等人接到北京养病，并进一步打通思想，同时对北京、天津两市实行军管。

2月8日，周恩来将谭震林、陈毅和陈毅、谭震林、李先念、李富春的两封信转报毛泽东、林彪，并致信报告2月7日中央碰

头会的决定："对叶飞、谭启龙、江渭清、杨尚奎、刘俊秀、江华等同志均拟先接来北京养病。对北京、天津两市实行军管。"

当晚，毛泽东阅周恩来本日来信，并批示：

已阅，退周存。

周恩来立即打电话给福州军区副司令员皮定均，要他设法把叶飞送到北京。

叶飞在哪里？皮定均不知道，他好不容易打听到叶飞在省委汽车队一人的家里。2 月 8 日，正是中国农历大年三十。半夜，皮定均带上秘书，找到叶飞，把周恩来的电话内容转告给他。

叶飞毫无思想准备，但是听到消息后，和秦基伟一样，立即由小女儿陪同，驱车经福州大学沿江边的小路，飞驰到机场，匆匆上了飞机，衣服也没有带一件，连牙刷毛巾都不拿了，钱更是分文没有。

叶飞的小女儿是个机灵人，她随父亲一到北京，就直奔解放军军事科学院，找到院政委钟期光的夫人凌奔。钟期光此时也正被隔离审查，凌奔什么也不问，立即把身上的 200 块钱交给这个小女孩，让她马上去购置一些生活急需之物。

2 月 8 日晚上，周恩来还通过军委一号台要通了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得志的电话：

"得志同志，你还好吗？谭启龙同志现在在哪里？"

"听说现在被关在山东医学院。"杨得志回答说。

"好。得志同志，请你立即派人把谭启龙同志接出来，护送到机场。明天早上 7 点，中央派飞机到机场接谭启龙同志来北京。"

“请总理放心，我一定找到谭启龙同志。”

晚上 22 时，杨得志司令员派出的人直接把车开到了山东医学院教学楼，谭启龙就在这里。

开始，群众组织拒不交人。济南军区的人斩钉截铁地说：“中央有紧急指示，要谭政委马上去北京。”谭启龙此时还兼着济南军区第一政委的职务。

当谭启龙突然见到一位穿军装的人对他说：“你是谭启龙吗？拿上你的东西跟我走。”

已习惯于听造反派的“命令”的谭启龙，什么话也没讲就随他下了楼。他们来到停在院里的一辆小汽车跟前，车上下来一个人又问：“你是谭启龙同志吗？”

这一段时间里，谭启龙两耳所闻，都是直呼其名的要打倒他的口号，现在猛一听到“同志”二字，感到既陌生又亲切，心知自己的问题可能会有转机，赶忙说：“我是谭启龙。”

那人又说：“杨得志司令员接到周总理的指示，说要接你到北京去。明天早上 7 点钟，总理派来的专机在机场等你。杨司令派我先来接你去机场休息。”

在十分孤独、前途未卜的境况里，突然得知周恩来的这一番安排，谭启龙内心的激动真是难以名状。

车开到济南军区五所，稍作停留，当即换车直接到了机场。谭启龙被安排住进一座专家楼里。在这里，他别无旁骛，美美地洗了一个澡，吃了一顿很好的西餐。第二天早晨，即乘上飞机，抵达北京，住进了京西宾馆九楼的一个套间里。

华东地区的几位省委书记，差不多都住在京西宾馆的九层楼

面。谭启龙是最早来到的一个。接着来的是叶飞、江渭清、杨尚奎。后来的有江华，另外还有湖北的张体学等人。中央派有一位联络员，在这里负责他们的生活管理。

在这段时间里，尽管外面世界的文革浪潮汹涌澎湃，但在京西宾馆的这个楼里面，空气却是比较平缓的。他们这些老干部相互之间可随意地走动走动，碰在一起，就摆龙门阵，交流戴“高帽子、坐喷气式”的“经验”。

上海二医大“红纵”和总后机关、部队院校的造反派代表还在军委所在地三座门静坐，2 月 1 日徐向前接见他们，劝他们撤离没有效果。

2 月 4 日，上海二医大“红纵”出版的《红色造反报》发消息称：“［本报北京二十五日讯］昨天深夜至今日凌晨，叶群同志（全军文革小组成员，林副主席办公室主任）受林副主席和陈伯达同志的委托，带着林副主席和陈伯达同志对我们的亲切关怀和亲笔信件，来到我校红色造反纵队勤务站，会见了我红纵代表和总后机关，四、七医大、兽医大、后勤学院的革命造反派代表，听取了我们的汇报，并作了重要指示”，“叶群同志说，我们认为你们红纵是很革命的组织，我们支持你们，向你们学习”

同一期的小报还刊载了《邱会作的滔天罪行》一文，称邱会作“是披着羊皮的狼，是混进党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一贯反对毛主席、林副主席，推行刘少奇的黑货。在组织上，搞宗派，任人惟亲。在生活上腐化堕落，荒淫无耻。在文化大革命中，顽固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镇压群众运动的刽子手”

2 月 8 日，陈伯达到三座门接见了“红纵”及总后机关、院校

其他造反派代表。

陈伯达说："你们贴的大字报，标语我从这里过了几次了，我看了看。你们要准许犯错误的人改正错误，要给改正的机会，这是毛主席的一贯方针。我看了有些大字报后很难过，有些是黄色新闻，有些是低级趣味的，这不好。文化大革命是思想革命，是阶级斗争、政治斗争，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斗争，你们贴这些低级趣味的东西干啥，我看了很难过，我叫别人把你们大字报贴掉了。"

他说："你们在这里待了好几天了，我们没来看你们，很抱歉。我希望大家回本单位去，在大街上不好，回本单位去，回学校去，有问题可以到那里商量。在这里吃不好睡不好，毛主席、林副主席都不安心。我建议你们吃完饭就回去，有问题慢慢商量，你们在这里呆久了不好，有的人已经病了。我今天不是来答复问题，我是来请求大家早点回去休息。"

代表说："首长对我们的关怀我们感谢，我们一定照办，但是徐副主席 2 月 1 日的讲话是不对的。"

陈伯达："徐副主席的讲话你们要辩论，有的人还要打倒。"

代表说："我们没有要打倒。"

陈伯达："你们也不一定打倒邱会作同志，打倒了他就不能工作了。让邱会作在工作中改正错误。"

代表说："他跑不了，他是三反分子。"

陈伯达："我说先作结论不对。"

代表："我们有材料。"

陈伯达："你们的大字报我大体上知道了。"

这时，他们听到了大街上广播车高音喇叭的广播声，陈伯达继续说："我也不赞成这喇叭车在到处响。"

代表问："邱会作反毛泽东思想的言行是否要批判？"

陈伯达："你们可以继续写墙报、大字报，也可以写信送来。"

代表继续问："我们批判他是否能到会？"

陈伯达："他可以到会，也可以不到会。他身体不好，你们不要动不动就下命令，这样不对。"

代表揭发："邱会作的病是假的，他欺骗了军委，假造了病历。"

陈伯达："你们过半年就知道他有病没有，我检查没有检查出病来，但我要算是有病的。你们有揪邱会作的权力，徐向前有保邱会作的权力。"

代表又把矛头指向了徐向前："徐向前的讲话是违背毛泽东思想的。"

陈伯达："你们批评是可以的，我也是保徐向前和邱会作的，思想对就保对了，思想错就保错了。我不赞成用这个'揪'字，我力气不够，我不赞成你们用这个'揪'字。斗刘志坚我也不赞成，什么喷气式，戴高帽子不好。这是触及人们灵魂的革命，林彪同志早就讲了。就是要触及人们灵魂。我在街里看见一个汽车，上面站着一排戴高帽子的人，真难看，我不赞成，对犯错误和反革命的界线要划清。犯错误不能当成反革命，当然也不能放过反革命，我们人民解放军是镇压反革命的，问题还没有闹清，就揪，揪出来就戴高帽子，这不好。你们赞成不赞成八条命令？"

众答："赞成。"

陈伯达："赞成还要看行动，回去好好睡几天，研究研究军委

命令，毛主席（的）批示很好，你们回去想一想。”

代表说：“邱是两面派，对上一套，对下一套，他欺上瞒下。”

陈伯达：“我是保护你们，也保护邱会作，不是没有原则的保，我保他的同时，也就是保护你们，你们这样呆下去不好。这是文化大革命……自我革命，我今天来看你们，我让一个学校把你们的大字报贴掉了。我不是发疯，我是提倡大字报的，你们要回去好好商量，一点回旋余地也没有就不好了，那些大字报不是文化大革命的方向。毛主席和林副主席都很关心你们，我代表向你们问好。”

会场再次高呼：“毛主席万岁！”

“祝毛主席万寿无疆！”

“祝林副主席万寿无疆！”

陈伯答：“希望你们不要辜负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的期望，要很好地学习《十六条》，这是毛主席亲自制定的。”

代表问：“徐向前说邱会作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那我们就不能批判？”

陈伯达：“我没有给你们定这个调子。”

陈伯达讲话比徐向前管用，他接见了部队造反派代表并讲话之后，在三座门静坐已有 10 天的军队造反派撤离。

## 第 490 回：再规定，军以下不搞“四大”　江城乱，《二八声明》分两派

2 月 8 日这天，中央军委根据毛泽东批准的《八条命令》精神，经林彪批准，做出了两条规定：

一、海军和空军的飞行航校和军以下单位，一律不搞四大，进行正面教育。

二、海军舰队，领导机关和军区领导机关暂不开展四大。

当北京的吴德听说军委的这两条规定时，脱口说出：“我要是能到了军队，那可就谢天谢地了。”

2 月 8 日，中央军委还发出关于外出串连人员限时返回本单位的通知，要求“一切外出串连的院校、机关、文艺团体、体工队、医院、军事工厂等单位的同志一律于 2 月 20 日前返回本地区、本单位，不得再在外地逗留。革命群众组织设在各地的联络站也一律撤销。各单位的接待站，从 2 月 21 日起一律停止接待。凡过期不归者，不予报销差旅费。凡违反上述规定者，一律按 1 月 28 日命令给以纪律处分。”

湖北“126 夺权”失败后，武汉的局面混乱。由于停工现象严重，造成运输紧张，港口堵塞物资囤积以至腐烂等严重现象，市场供给出现危机，春节物资供应紧张，部分日用品甚至中断。面对如此局面，奉命介入地方文革的武汉军区颇费脑筋。1 月 31 日《红旗》杂志第三期社论《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也引起了正在北京开会的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的注意，他让秘书给他念了好几遍，其中加强无产阶级专政这一条是他最感兴趣的，

他认为在武汉目前最需要的就是加强无产阶级专政。为此，他特地打电话向他的老上级徐向前请教。

徐向前对他说："这篇社论是百分之百的毛主席的声音，现在中央政治局实际上已经没有了，就剩中央文革小组和毛主席、林彪和周总理这几个人，我们内部已经叫无产阶级司令部了。各省的领导班子已经不存在，控制全国形势和传达毛主席声音及贯彻落实的任务，完全落到解放军身上了。你们要拿出力挽狂澜的主沉浮气概，一定要把握好武汉的局势，绝对不能让领导权落到一些别有用心的坏人手里。"

陈再道觉得心中有数了，不能让武汉的领导权落到一些别有用心的坏人手里，于是，陈再道等人根据形势自行决定了他们对武汉文化大革命的对策，他要用自己的标准来衡量好、坏人，他要把稳定武汉的局面放在首位，他认为这就是加强无产阶级专政。

根据中央《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武汉军区召开常委会，决定成立"支左指挥部"，也叫"支左办公室"，由副司令员韩东山任主任，也称支左指挥长。因为韩东山1965年前任湖北省军区司令员，比较了解地方的情况。从此，武汉军区开始正式介入湖北、武汉的文化大革命运动。面对混沌不清的武汉局面，他们没有马上表态，只是笼统的表示支持包括"工人总部"、"二司"在内的所有造反派群众组织。一周后，军区常委会上，认为支左工作很繁重，支左的力量须加强，孔庆德副司令员自告奋勇参加支左工作，党委同意。于是武汉军区"支左办公室"就是两个指挥长了。

2月1日，湖北省直工交、财贸系统30多个组织的代表和"新

华工”、“新湖大”等学生代表在湖北大学革命造反大楼召开“抓革命，促生产”，彻底粉碎反革命经济主义大会。为了保障市场供应，武汉“工人总部”、“九一三”、“红工兵”、“二司”、“红教工”等 12 个群众组织联合发表了《关于加强市场管理的紧急通告》。他们还在武汉“支左办公室”的动员下，发出号召，动员 3000 多人、数百辆卡车，于 2 月 2 日至 2 月 4 日连续 3 天，在二七车站、武昌车站、轮船码头、硚口、汉阳堆货场等地突击搬运积压物资。

此时，王任重还在武汉水院。1 月 29 日，王任重的妻子萧慧纳给毛泽东写信说：王任重病重垂危，现被揪斗，不知去处，朝不保夕，请求给予治疗。2 月 2 日，毛泽东阅信批示：

林、周阅后，交文革小组商处。

毛泽东

二月二日

我意应说服红卫兵，让他就医。红卫兵有事，视王病情许可，随叫随到。

2 月 3 日，中共中央在给湖北省委并武汉军区党委的电报中说：“王任重最近以来病情加重。为了使他能进一步检查错误，中央常委和中央文革小组建议能让王就医一段时间，红卫兵有事，视王病情许可，随叫随到。请武汉军区党委援助省委办理此事。”

2 月 4 日，武汉《长江日报》登载了王任重戴高帽子挨斗的照片，这张照片被香港报纸转载。

在此期间，针对武汉的“126 夺权”，武汉三镇也出现了一批

反对“工人总部”、“九一三”和“二司”的大标语：

“工人总部、二司大方向错了！”

“工人总部、二司的头头修了！”

“砸烂工人总部！”

“工人总部、九一三组织严重不纯！”

“九一三领导班子是投敌分子的集合体！”

“九一三战斗兵团是反革命组织！”

等等。

有的还说要架起 120 门火炮猛轰“工人总部”，对“九一三”进行“全民整风”。

接管后的《湖北日报》本来是由报社内部造反派和“三新”、“工人总部”、“二司”、“三司”等组织共同主持的。但到元月下旬，由于意见分歧，常常引起纠纷。没有办法，最后不得不协商达成一致：各组织调到《湖北日报》社的工作人员从 2 月 3 日起全部退出，由报社内的造反派组织“捍卫毛主席路线总部”全权主办。

为应对武汉三镇出现的反对“工人总部”、“九一三”和“二司”的局面，“二司”、“工总”、“九一三”等组织在武汉水利电力学院开会，决定发表一个联合声明予以回击。声明的初稿决定由“二司”起草，“二司”又将此任务交给了武汉水利电力学院的丁家显。

2 月 5 日晚，武汉“工总”在红楼召集“九一三”、“二司”等 12 个组织负责人开会，原打算是为了应对“126”夺权失败后，其他组织对“工总”的指责，通过开门整风，检查自己的问题，

争取主动的。没想到，在会上，武字 151 部队造反派代表张智华发言时说：

“目前，出现一股批判你们、反对你们的风气，在这个时候大搞左派是极端错误的。你们现在很被动，整了赔礼道歉，现在不是整风检查的时候。对武汉部队我们是有看法的，他们是不是真正支持你们？！目前你们四面受敌，你们面临四大敌人，四大矛盾：省委、军区、保皇派、机会主义（托派）。”

他的讲话，引起与会者的共鸣，“九一三”、“工总”当即宣布不再整风，决定发表声明，对那些攻击“工总”的言论和组织予以回击。

于是，2 月 7 日，武汉“工总”等 12 家造反组织发布《紧急动员令》，称“一场夺权与反夺权的殊死决斗拉开了序幕。”

接着在 2 月 8 日，这 12 个组织在他们掌控的《长江日报》上联合发表了《关于武汉地区目前形势的声明》，指责武汉“工造总司”将斗争矛头指向武汉“工总”和武汉“二司”，是“充当了湖北黑省委的别动队”的作用。声称“湖北省的大联合、大夺权还面临着托派的大分裂、假夺权的威胁。总之，湖北省武汉地区还没有乱透、还没有大乱。所有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要紧急动员起来，行动起来，牢牢掌握住斗争的大方向，决不要陷入反革命的分裂混战。”这就是后来著名的武汉《二八声明》。

面对《二八声明》的指责，“工造总司”当然是强烈不满。当天，“工造总司”负责人吴焱金赶到汉口洞庭街红旗大楼旁的《湖北日报》、《长江日报》联合印刷厂，阻止印好的《长江日报》流向社会。在他的强行阻挠下，有一辆满载当天《长江日报》的卡

车始终没有开出报社。“工造总司”等组织的群众也包围了《长江日报》社，阻止《二八声明》的散发。武汉军区派部队到现场维持秩序，防止武斗。经过后字 248 部队“红野”穿军装的学员利用红旗大楼的广播，进行宣传、劝说后，包围报社的群众才于午后 14 时左右纷纷离开红旗大楼。吴焱金在印刷厂内跟联厂印刷工人、“工总”成员辛会元谈了很长时间的话，天黑后，辛会元才把他从印刷厂里带出来。因为此时报社印刷厂门口已有后字 248 部队的解放军学员站岗。

《二八声明》在造反派内部引起更加严重的分歧和内战，造反派分裂为拥护声明的“香花派”和反对声明的“毒草派”，武汉的“钢”“新”之争演化成“香花派”和“毒草派”之争。

2 月 9 日，“三司”发表《谁是分裂的制造者》的文章，批驳《二八声明》。文章指出：

“是谁在省委夺权会议上出尔反尔，因为自己当不上常委，就宣布夺权无效，反诬别人排挤自己呢？是二司！

是谁破坏了革命造反派战士之间的战斗友谊，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早上还是同志，下午就去砸别人的总部呢？是二司！

是谁调回大批人马，开动全部宣传机器，高叫‘打倒三司’、‘砸烂三司’，公开挑起‘分裂混乱’呢？是二司！

是谁无理赶走在武汉展览馆工作的革命造反派战士，接管展览馆，一手遮天，称王称霸呢？也是二司！

是谁歪曲展览内容，别有用心地涂改展品，大刀阔斧地删节，拼命突出自己，贪天之功据为己有呢？还是二司！

这一切，都不叫排斥革命派，都不叫分裂造反阵营，而别人

给你们提几条意见，就成了“湖北黑省委的别动队”，就是在搞分裂了！这真是混蛋的逻辑！

你们说我们是‘机会主义的产物’，最充足的理由就是三司成立得比二司晚 8 天。”

2 月 9 日当天，支持《二八声明》的《长江日报》发表社论，说《长江日报》是他们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支援下”接管的。

《二八声明》发表后不久，“工造总司”由 6 万多人发展到 17 万多人，因为“职工联合会”也是反对《二八声明》的，许多原“职工联合会”的人也加入到“工造总司”，于是街上出现“工造总司是职工联合会变种”的大标语。

许多保守组织纷纷加入反对《二八声明》的行列，“一司”、“红武兵”等组织以及军队的一些支左干部强烈要求武汉军区对《二八声明》和《长江日报》2 月 9 日社论表态。军区支左指挥部的干部甚至扬言要“罢工”，他们找武汉军区副政委叶明表示：“军区再不表态，我们就不干了！”

其实，武汉军区副司令韩东山、副政委叶明在 2 月 8 日当天就商议决定批判《二八声明》，并且很快在社会上公开表态。武汉军区的态度得到造反派中的“新华工”、“新湖大”和“三司”的赞扬，他们希望通过拥护军区压倒对方。而参与起草《二八声明》的“工总”、“二司”等组织当则要求武汉军区改变态度，支持自己。

此时，北京五大学生领袖之一的谭厚兰也对正在北京开会的陈再道司令员说：“‘工总’的声明大方向错了。《二八声明》是大毒草。陈伯达同志已经批评了清华大学‘反托派’的口号，他们

还这样看问题，这就是错误的。不但我们这样看，《红旗》杂志的革命左派林杰同志也是这样看的。”

陈再道急忙问：“是不是那个和关锋一起写《〈海瑞罢官〉、〈海瑞骂皇帝〉是两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的林杰？”

谭厚兰说：“是。林杰看到那个声明后，在接待武汉‘新华工’在京代表时，明确地说：《二八声明》是反毛泽东思想的，是与《红旗》杂志的社论相违背的。”

武汉三镇很快就到处张贴了《中央文革成员〈红旗〉杂志社林杰同志谈〈二八声明〉》的大字报。

面对纷乱的武汉形势，陈再道也觉得心中没底，究竟谁是左派？谁不是左派？左派的标准是什么？两派组织，吵得一塌糊涂，势不两立，到底应该支持谁？反对谁？他没有把握。作为军人，习惯于服从。他想看中央文革支持谁，他就支持谁。但是，各派组织似乎都有后台：北航红旗支持“工总”、“二司”，他们说是中央文革支持的；北京师范谭厚兰支持“三新”、“工造总司”，他们也说是中央文革支持的，都是北京的五大学生领袖，都是手眼通天的人物，背后都有中央文革的支持，究竟中央文革是什么态度？

## 第 491 回：停“四大”，武汉军区闹哄哄　年三十，众人围广州军区

就在武汉造反派为夺权争得不可开交的时候，武汉军区内也在为夺权闹得不亦乐乎。

军委《八条命令》下达后，武汉军区决定解散各机关的群众组织，停止“四大”，“稳定内部”。2 月 6 日，军区党委在礼堂召开军区机关大会，在家的常委都要求参加。一些军队院校的造反派也参加了这次会议。大会开始，叶明副政委宣布军区党委关于机关停止“四大”、解散“战斗队”的六条规定。

叶明刚讲完，会场就乱了，造反派纷纷站起来指责六条规定是“镇反群众的黑六条”，还提到军区副司令员姚喆派兵镇压群众，继续执行“资反”路线的事情。

这件事说的是几天前，军区动员部部长信俊杰向军区副司令员李迎希报告说，军区大院进驻一个排，造反派说是来镇压群众的，双方发生争执，要动手了，请示如何处理？

李迎希问：“这个排是谁派的？”

信俊杰答：“是副参谋长张显扬派的。”

李迎希又问张显扬，张显扬说是按姚喆副司令员指示派的。

李迎希让张、信二人请示姚喆。张、信说找不到姚喆。李迎希只好指示张显扬：“暂时把这个排撤出去，明天请示姚副司令后再定。”

这就是造反派指责姚喆派兵镇压群众一事。会上，造反派“要求姚喆将作战工作交给李迎希”，李迎希对造反派说：“我不能接

这个作战工作，这是党委分工的问题”。

有人又提出军区常委们要签字保证李迎希的安全，当场就有人逼着常委们签字。会场局面十分混乱，谁也控制不了。

副政委叶明设法离开会场，跑到位于孝感的 15 军军部，在那里打电话向在北京的陈再道、钟汉华汇报当天大会的情况，请示如何处理？陈再道、钟汉华又向军委文革组长徐向前做了报告，徐向前认为李迎希这样做是要“抢班夺权”。

钟汉华建议，速调李迎希来北京解决问题。

2 月 6 日的晚上，军区文化部干事、军区俱乐部放映员约六、七人来到李迎希家，要求李迎希接见。这些人乘李迎希的秘书上楼向李迎希通报的空档时间，偷偷在会客室桌下安装了录音机。李迎希来后，这些人指责李迎希不接管作战工作就是不支持革命群众。李迎希解释说，作战工作属党委分工，是个组织原则问题。后来，造反派在批斗李迎希时播放了这次的录音，其中谈话内容有：

群众提：“你来接管作战工作，好不好？”

李迎希答：“好!”

群众提：“你拿不拿得下来?”

李迎希答：“我指挥过 7 个军。”

等等。

结果，这次接见被说成是李迎希同这些群众策划夺武汉军区的指挥权，李迎希本人当然不承认，因为 1955 年李迎希调任武汉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时就是负责作战工作的，1962 年后，经军区常委研究决定，由 1960 年调任武汉军区副司令员的姚喆协助李

迎希主管作战工作，后来，作战工作才完全交给姚喆的。所以，他觉得根本不存在“拿不拿得下来”之说?李应希在1967年至1973年给中央和军委的申诉中多次提出，当晚他被这些群众纠缠约 3个多小时，后来批斗时先后放的录音有两个版本，一个是半小时左右，一个只有五分钟左右，都是伪造的。当时自己是十分明确地拒绝那些人要自己接管作战工作的，而批斗会中所放录音完全没有这些话。

而与福州军区、武汉军区相邻的广州军区在“一二八事件”后，还在受着造反的冲击。

1 月 31 日，广州军区的造反派再次冲击广州军区政治部。当晚，他们要在军区礼堂开斗争胜利大会，并要军区副参谋长以上干部和警卫部队连以上干部参加这次大会。当时哄传陈伯达对桂林步校的人说：“广州军区应撤销一切警卫部队，给革命师生一切方便。”造反群众闻听此说，更是头脑发热，兴奋不已。

就在广州军区政治部闹得人仰马翻之际，中山大学“红旗”、珠江电影制片厂“东方红”和中科院中南分院的一些造反组织，也在中科院中南分院召开秘密会议，讨论军区问题。到了 2 月 5 日，广州军区部分文体工作者和军体院学员，联合中大“红旗”、珠影“东方红”等20多个群众组织的几十人，闯到军区第二门诊部。到了下午，这里的人愈聚愈多，达到几百人，直到次日清晨才陆续离去。但是人们似乎感到，广州军区的问题比较严重。第二天，省“革联”在科学馆召开“炮轰军区”的会议，声称军区是“刘、邓、陶的工具，必须彻底打倒，才能扭转广州的局面”。他们说陶铸长期担任广州军区的第一政委，必然在军队内部，培

植了大量“党羽”， 犯下了“滔天罪行”。现在陶铸已被打倒，军区不能置身局外。

在这样一种大环境下，广州军区部分外出串连回部队院校的学员和文艺团体的成员，在 2 月 7 日提出要烧一烧军区。这天，军区卫生学校“革命造反联络站”等单位，包围冲击了军区后勤部和陆军医院。打了一些领导干部，给一些人戴了高帽子。

2 月 7 日晚上，广州军区战士杂技团开会，在喊“毛主席万岁”口号时，有一名演员没喊，当别人质问他时，他说“不搞形式主义”，顿时引起公愤，当即遭到批斗，并将情况上报。23 时 50 分，广州军区政治部闻讯派人到杂技团了解情况，但他们到那儿时，杂技团的队伍已经押着那名演员，直奔军区礼堂去了。

军区保卫部一名姓郭的副科长，匆匆赶到礼堂，此时已是午夜 12 时 20 分左右。当他刚进礼堂前面的大厅，就被一群人围了上来，要他交代军区政治部对此事是怎样处理的。郭副科长刚刚讲到一半，就有人用扩音器大声向大家说：

“我们抓了一个反对毛主席、林副主席的现行反革命分子，保卫部说不管，郭×这个混蛋说坚决不管！”“保卫部不镇压反革命！”

这还了得？保卫部不镇压反革命！当即就有几个人上来，撕掉郭副科长的领章，扯下他的帽子，将他强行按跪在地上，要他承认是包庇了反革命，并说：“如果不承认，就是污蔑革命群众！”

郭副科长要解释，但他的双手随即被扭到背后，并用绳子捆绑起来，随即而来的是一顿拳打脚踢，又抓头发，又揪耳朵，还打耳光。他的头被按到地上，还给抹了黑脸，用脚踏在他的背

上……就这样，他被批斗了两个多小时。

就在广州军区礼堂的斗争会开得正热闹时，凌晨 1 时 40 分，政治部广播室广播员接到政治部值班部长的指示，广播中央军委的《八项命令》。刚广播到“所定八条，很好，照发。毛泽东”，就听到楼下吵吵嚷嚷，刚广播完命令的第二条，只听得门外一声高喊：“广播室在这里！”接着几个人冲进广播室，一把夺下广播员手中的《中央军委命令》和《中共中央关于不得把斗争锋芒指向军队的通知》，有两个人跳到桌上，一个人抢过话筒，对着话筒喊道：

“广播室被我们占领了！广播器材我们革命造反派使用了！”

接着，他们质问广播员：“你为什么要广播？我们在抓现行反革命分子，你广播《八条》，是什么意思？”

“谁叫你广播的？”

他们将广播员抓到靠窗口的凳子上，对下面的人喊：“刚才就是这小子广播的！”喊完，几个人推着广播员去找值班部长。

有人在现场认出其中有一人是中山大学“八三一”的，他表示支持军区造反派的革命行动。当晚，军区派车把中山大学“八三一”的黄意坚及另外一位“八三一”头头接到军区，广州军区副参谋长阎仲川问他们：“毛主席说过要文斗，不要武斗，你们为什么对那位演员拳打脚踢？”阎仲川要求他们承认错误，黄意坚他们当然不同意，双方发生激烈争吵。黄意坚和他的同伴拂袖而去。

次日凌晨 3 时，广州军区派部队拘留了 20 多名闹事人员。当天，广州军区文体工作者和军体院学员 2000 多人来到军区大门外

举行静坐示威，抗议军区拘留他们的战友。他们的行动得到北航“红旗”、哈军工、中大“红旗”、珠影“东方红”等组织的支持。

2 月 8 日，除夕。大街上没有丝毫过节气氛。上午，广州军区司令部、政治部、后勤部和警卫营的大门外，聚集了大批群众，他们来自省“革联”属下 30 多个群众组织，据说，是接到七中“红旗”的通知，说军区把军区机关“千钧棒”等军内造反派抓走了，于是赶来声援“千钧棒”，抗议广州军区逮捕广州军区造反派。他们在军区领导机关的地下、墙上、电线杆上到处涂写和张贴“万炮齐轰广州军区党委”、“打倒黄永胜，解放广州军区”等标语，还画了漫画。几部宣传车堵住军区机关的大门不断广播，并在车上开“控诉会”。珠影“东方红”甚至向军区警卫部队广播说：“解放军不要受蒙蔽，要调转枪口对准你们的指挥员”。

军区派人到省“革联”，请中山大学“红旗公社”社长、省“革联”勤务组的陈家吉前去“开导地方群众散去”。黄意坚也从中山大学坐车赶到军区司令部。当他从车上下来后，立即被情绪高昂的人群团团围住。

下午，军区让群众组织派代表到司令部大院内，和军区领导见面。于是每个组织选派一名代表，共计 32 人，由黄意坚带队，在军区大门口的传达室内等候接见。最初说广州军区刘兴元政委要接见，等会又说：“汕头蒋介石有飞机来，刘政委很忙，暂时要处理军务，没空，你们等一下。”于是，又是茶又是水的招待挺好……

到了傍晚 17 时 30 分，正在军区大门口传达室内等候接见的黄意坚等人突然听到军区的高音喇叭广播中央军委的来电：

军队院校和文艺团体的同志们：

我人民解放军应该坚决捍卫和执行最高指示，坚决执行军委命令。昨晚部分同志冲击广州军区领导机关和无命令自由抓人打人，是直接违犯毛主席批发的军委八条命令的，是一种错误行为。广州军区坚决维护军委命令，是完全正确的。希望你们分清是非，立即离开军区机关营区。

地方各革命组织和革命师生同志们：

昨晚所发生的事情，纯属于军队内部的事情，请你们不要介入。请你们自觉捍卫毛主席批发的军委八条命令，立即离开军队营区。

黄意坚等人听到广播里说他们昨晚冲击广州军区，气懵了，走出去就要找石头扔那个喇叭……附近找不到石头，那些学生就用树下的泥土去扔那个喇叭。他们从下午 14 时一直等到傍晚 19 时，刘兴元始终没有出来。到了晚上 20 时 30 分，中央军委第二道命令下达：

军队院校师生和文艺团体的同志们：

今天下午 17 时 30 分，军委已经下了命令，要你们坚决执行毛主席批发的军委八条命令，你们没有执行，现再命令你们，立即撤退。你们有什么问题，可以立即向北京打电话或派代表来北京解决。否则一切后果由你们负责。

地方各革命组织和革命师生同志们：

广州面临港澳，情况非常复杂，希望你们提高警惕，不要介

入这场冲击，应坚决拥护最高统帅的八条命令。

当天，广州军区发表了措辞严厉的公告：

有极少数别有用心的人，竟敢公然违抗毛主席的指示和中央军委命令，知法犯法。他们煽动一些不明真相的群众，甚至假借中央负责同志名义，造谣惑众，冲击军事领导机关，企图把斗争锋芒引向军队；他们随便搜家抓人，侮辱人格，实行体罚，甚至捆绑罚跪，毒打群众；他们到一些担负战备任务，按照中央军委指示暂不开展“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或实行正面教育的单位去煽风点火，强行逼迫那里的群众和领导立即开展“四大”；他们还提出一些无理要求，愿意刁难和要挟领导干部，甚至恶意诋毁毛主席的指示和中央军委命令；等等。这是公开违抗最高统帅毛主席的命令、严重违犯纪律的行为，是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战备的行为。

我军是毛主席亲手缔造和领导的人民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工具，是人民利益的最忠实保卫者，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最忠实保卫者，是毛泽东思想的最忠实保卫者，谁违抗毛主席的命令，谁就是反对毛主席！谁反对毛主席，谁就是我们的敌人！

中央军委在 3 个小时之内一连两道金牌，就像泰山压顶一样。终于，省“革联”动摇和后退了。军区门前的人群渐渐散去，但他们仍在市内举行游行示威。

当晚，省“革联”和一批泰国客人进行交谈时，再次表明了他们与广州军区尖锐对立的立场。

省“革联”说：“我们认为自下而上在夺权也是一个办法，而我们自上而下的夺权是根据上级指示来夺权的……我们根据不同情况做出不同处理，也就是‘全夺、监督、留用、罢官’等四种办法。”

外宾问：“你们夺权是否得到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协助和支持？部队对你们这次夺权表示过什么态度？”

省“革联”的代表摇摇头说：“当地驻军不行，我们这次夺权，他们没有协助也没有支持，而是相反，他们是和我们唱对台戏的，军区都是大老保。”

外宾问：“部队是大老保和你们唱对台戏有什么根据？”

省“革联”回答：“我们是有根据的，赵紫阳是省委第一书记，原来就是广州军区第三政委，陶铸是第一政委，因此不能说他们没有关系。由于这样，所以我们夺了赵紫阳的权就痛在军区的心上，他们不支持我们的夺权是预想得到的。在夺权以前，广州警备区副司令员是经常和我们取得联系的，并给我们联系的电话号码，但当有了事情要他们协助和支持的时候，这个人却失踪了，到处找不到他的影子。另外，我们曾抓到了一个现行反革命分子送交军区处理，军区不但不处理，反而把反革命分子放走，反过来还要抓我们的人。这是他们搞的对台戏。广州目前还没有大乱，应该来一次大乱特乱。在乱中来考验左派。”

第二天，2 月 9 日，广州军区派飞机在市内散发中央军委 2 月 8 日下达的两项命令，并调走了军体院同情造反派的原警通连，同时派一个加强连配带报话机进驻军体院，门岗从原单岗增加多人岗，院内还派出巡逻组，武装接管电话总机，对出入人员严加

审查盘问，断绝军体院、歌剧团、歌舞团和军乐团之间的互相联系。

2 月 13 日，广州中山大学“红旗”、珠江电影制片厂“东方红”、军体院等 1000 多人在省中级党校举行“声讨广州军区镇压革命学生誓师大会”。

2 月 14 日上午，广州军区的宣传车开到珠影厂，散发军委《八条命令》和 2 月 8 日的两道命令。珠影“东方红”的群众在厂门口筑成人墙，阻挡宣传车前进。

## 第 492 回：周恩来，接见江苏省代表　锦州城，二八社论挑风波

我们再看江苏。面对江苏“126 夺权”在造反派中引发的分歧，周恩来指示南京军区组织一个代表团赴北京汇报。他强调这个代表团必须包含支持和反对夺权的两派造反派代表、原省委领导干部代表和南京军区的代表。南京军区杜方平受命组建代表团，并担任军方代表。原省委书记处成员李士英和包厚昌被选为“革命干部”代表。文凤来和其他几位来自高校、工厂和其他单位的造反派头头被选为“夺权派”代表。反对夺权的造反派们希望由曾邦元代表他们，但是遭到夺权派的激烈反对。最终，南京大学生物系调干生、“八二七”二号人物袁服武和来自其他高校的两位造反派头头当选“反对派”代表，在由 28 人组成的江苏赴京代表团中仅占 3 席,“红总”占多数。周恩来审阅了代表团名单，指示在名单中增加江苏省委第二书记陈光。

2 月 5 日，南京大学召开群众大会，欢送“革命的工作队员”离校。大会上，参加造反的南京军区工作队成员梁辑卿、杜方平、吴大胜等人被群众戴上大红花，受到热烈称赞。而没有参加造反的汪冰石、林克、赵复华、薛文、吴骏等人被宣布“开除党籍，给以专政”。

这天，江苏省赴京代表团启程，2 月 7 日抵达北京。当晚，便有一位自称是中央办公厅干部的人造访，说是请李士英去见“一位中央高级首长”。他拒绝回答为什么中央首长要单独接见李士英，也拒绝了其他人陪同李士英一起去见那位“中央首长”的请

求。结果代表团没让他带走李士英。

2 月 8 日，周恩来、谭震林接见江苏代表团

听完汇报后，周恩来还是强调要学习《红旗》三期社论。他说："学习最近的毛主席的关于夺权的指示才行。《红旗》三期社论是毛主席亲笔改的，是毛主席的最新思想，尤其是第三段，主席改得最多。"

他翻开《红旗》三期社论第三段说："这一段对于你们今天接见很重要，各方面都说到了，你们夺权我们已看到，中央要经过与你们会谈才能表示支持或不支持。这是一个很重大的问题，没有党和毛主席领导，没有无产阶级专政保护，没有解放军的大力支持，又怎么能够夺权呢？今天的夺权，是 1949 年夺权斗争的深入和继续。但情况不同了。主席批示我，各省夺权后，要一个一个地接见。昨晚我委托康生同志先找李士英同志来谈一谈，你们要派人来监视，来记录。我们这样支持你们，你们这样不尊重我们，我很难过。你们对包厚昌、李士英什么态度？究竟是可以合作呢？还是带来见工人的呢？给不给中央权利呢？主席写这一段是有的放矢的。"

李世英长期在康生手下工作，1960 年代初调任江苏省委书记处书记，分管政法工作。包厚昌曾任无锡市委第一书记，1960 年 2 月任江苏省委书记处候补书记，1964 年 9 月任江苏省副省长兼计委主任，1965 年 6 月任江苏省委书记处书记、江苏省副省长兼计委主任。

周恩来又谈了复员转业军人的问题，当他听到南京的复员转业军人的组织已经解散了，称赞说："解散了，应当称赞，还要说

服人家。中央至今没批准过全国性的组织，临时工、合同工中央没批准过任何正式文件，但有人编造说全部转正，造成经济主义泛滥。61 年、60 年、62 年下放的工人、干部如果都回原单位工作，单哈尔滨就要多支出 6 亿，全国就得多支出 100 亿以上。上海工人阶级觉悟高，首先反对经济主义，《文汇报》首先登出来的，主席一看到，就把我们叫去了，当晚就广播了，蓬蓬勃勃的夺权斗争展开了。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第二个高潮。”

周恩来最后说：“建议不采用‘江苏人民公社’的名称，用了发生政权问题。中央承认不承认的问题，国际上震动问题。”

第二天，2 月 9 日，谭震林单独召集江苏省委干部和杜方平开会。他批评了江苏省委的政治错误，同时强调江渭清是近年来敢于质疑刘少奇“桃园经验”的少数几个省委书记之一。他随后提出以江渭清为首的革委会成员方案。

2 月 9 日，南京军区派人前往南京炮兵指挥学院，将被造反派关押在这里的江苏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接走，并用北京派来的专机送往北京。江渭清在北京接受了体检，又洗了澡刮了胡子，在京西宾馆与2月8日已经到这里的谭启龙和叶飞在一起交流坐“喷气式”的“经验”。

锦州是一座新兴的工业城市，1965 年，在国务院召开的杭州“全国工交政治工作会议”上被命名为“大庆式新兴工业地区”。文革开始后，围绕着支持或反对锦州新兴工业的问题，这个城市分为两派。

当时的锦州市委书记是陈一光，副书记是兼管工业的杜良，市长是刘慕文。反对新兴工业的人喊出的口号是：“打倒刘、邓、

陶！打倒李、杜、马！”这个“马”是锦州新兴城市的代表企业晶体管厂的马厂长。而保卫新兴工业的人认为，许多的市委和市人委的走资派都没有人去揪，而只揪杜良一个人甚至还揪来个厂长充数，这是在保护陈一光等大走资派，他们的口号是：“打倒陈一光！打倒刘慕文！”

保卫锦州新兴工业的工人和学生，于 1967 年 1 月 1 日成立了锦州“革命造反联合总司令部”，简称“联合总部”。

1 月 10 日以后，随着上海一月革命的夺权风暴，锦州的各单位和学校也展开了大夺权。因为市、区两级的机关干部大都是反对新兴工业一派的，近水楼台，锦州市的市、区级党政大权，基本都掌握在反对新兴工业的人手里。而保卫新兴工业的人大多数是工人和学生，他们只是夺了一些本单位的权，没有夺得任何市、区级的大权。

锦州广播电台和《锦州日报》社这两个重要的舆论阵地还没有被人夺权，于是各群众组织都把目光盯上了这两个单位。锦州驻军 40 军组成了锦州卫戍区。根据中央的指示，锦州卫戍区司令部军管了市广播电台，而《锦州日报》暂时没有军管。锦州“联合总部”麾下的“工人总部”、“大学总部”和锦州师范学院“红色造反团”等群众组织，决定于 1 月 13 日晚上 20 时 30 分去报社夺权。

消息走漏，《锦州日报》的人立刻在当晚 20 时宣布夺了报社的权。消息传出后，心有不甘的锦州师范学院“红色造反团”等组织赶到了锦州日报社。这些大学生红卫兵们掏出早就准备好的“夺权声明”进行宣读，但《锦州日报》的人堵在大楼门前不让

他们进去，于是双方就在报社的楼下展开了大辩论。

《锦州日报》的人宣称他们已经夺了权，而前来夺权的人说他们是“假夺权”是在欺骗群众。这场大辩论从晚上一直持续到第二天的上午 10 时。《锦州日报》的人占着地利，有面包和饮水的供应而斗志不减。“工人总部”的工人们因为还要上班，在第二天清晨首先撤走了。锦州师范学院“红色造反团”等大学红卫兵们，见夺权无望，最终也不得不撤离了锦州日报社。

2 月 5 日，持保卫锦州新兴工业观点的锦州“联合总部”举行了 7 万余人的夺权誓师大会，准备联合起来，重新夺回市委和市人委的大权。

当时驻锦州的海字 437 部队，即海军通信学校是开展“四大”的单位，学校的师生们成立了“革命造反兵团”和“红色反修总队”，他们直接参加了锦州地方上的文化大革命，而且是站在保卫新兴工业这一方的。他们也参加了 2 月 5 日的夺权誓师大会。

2 月 8 日，由持反对新兴工业观点一派组织夺权的《锦州日报》，发表了一篇题为《打退翻案风，掌握斗争大方向》的社论，并配以锦州新兴工业地区是一个黑典型的报道，明确提出杜良是隐藏在锦州市委内部的走资派，“大庆式锦州新兴工业地区”是一个黑典型。

与武汉《二八声明》在武汉引起的剧烈反响一样，锦州的《二八社论》在锦州也引起了极为强烈的连锁反应。有说“好”的，有说“糟”的。《二八社论》成为一道分水岭，这个城市的不同群众组织就以此为据，划分成“好字派”和“糟字派”旗帜鲜明的两大派。

“好字派”人数比“糟字派”少得多，主要是市直机关的几个组织。

2 月 9 日，锦州以海军通信学校“革命造反兵团”和“红色反修总队”、锦州师范学院“红色造反团”、锦州医学院“红色造反团”、锦州工学院“千钧棒”革命造反团、锦州陶瓷厂“毛泽东主义战斗总队”、锦州市卫生系统“革命造反总部”、锦州市五金交电公司“硬骨头”革命造反总部、四机部二十八所“反到底兵团”和“追穷寇”战斗队、锦州地区“工人革命造反总部”和锦州市大中教工“革命造反总部”等为主要力量的“糟字派”，在辽宁大学“八三一红色造反团”驻锦联络站、大连铁道学院“红色造反团”驻锦联络站和北京邮电学院“东方红”公社等外地红卫兵的支持下，在全市发表了《联合通告》，称“锦州日报 2 月 8 日社论是彻头彻尾的反毛泽东思想的大毒草”。

2 月 10 日凌晨 1 点多钟，“糟字派”的大队人马一举包围并冲进了锦州日报社，与报社的人进行激烈的辩论，并在报社所有的办公室门上都贴上了封条。

当晚 20 多时，“好字派”大批人员和车辆赶到报社声援，连郊区东方红公社的农民也被拉进城来助阵。报社的人见援兵到来就撕掉办公室和车间的封条，赶走了留守在报社里的少数“糟字派”人员。

已经撤出报社的“糟字派”大队人马得到“好字派”又夺回报社的消息，立即又回来增援。两派谁也不肯示弱，于是又拉开架式在报社门口展开了大辩论。只见报社前的大街上，到处都挤满了互相辩论的人群。

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谁能辩得清？很快，辩论变成了辱骂和推搡。站在最前面的海军通信学校的部队师生首先遭到了一些“好字派”群众的推搡。这些海军战士手里举着《毛主席语录》，高呼：“要文斗，不要武斗！”他们是军人，有《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约束，奉行打不还手骂不还口。

一些农民挤了上来，口中骂道：“文斗个屁，打这帮灰兔子！”

因为当时海军穿的是灰军装，所以被当地人称之为“灰兔子”。这些农民掏出藏在大衣里面的木棍和铁鞭，劈头盖脸打了过去。立刻就有几个海军战士头上流出鲜血。

锦州师范学院“红色造反团”的学生们见状，立即冲了过来，与那些农民打了起来。

经过一场拳打脚踢的混战，“糟字派”人多，那些农民招架不住，纷纷跑进锦州日报社的大楼躲避。前来报社声援的“好字派”组织主要是市委机关“红旗公社”和“东方红公社”。这些市委机关人员搞文可以，要武就不行，一见发生武斗，赶忙就撒丫子撤走了。一辆华光电子管厂的“好字派”宣传车没有来得及跑走，被锦州师范学院“红色造反团”的人给砸了。

“糟字派”趁势包围了锦州日报社大楼，宣传车上的大喇叭高叫道：“立刻交出打人的凶手。”

当晚 23 时 50 分，“糟字派”的人马终于开始发起攻击，有的人从大门两侧的窗户向里攻打，也有的人爬上了门楼砸开窗户进入了二楼。

他们首先砸开门窗冲进了一楼，报社里的“好字派”和农民们守在大门口和楼梯口，与进入一楼的“糟字派”进行推搡和厮

打。但不料，已经进入二楼的“糟字派”们从其背后攻了过来，于是楼里的“好字派”们纷纷向楼外夺路而逃。以海校为首的“老糟”们就这样又重新占领了《锦州日报》。

“糟字派”们在报社楼里抓了几个农民，经过审问，原来这些农民都是来自西郊的东方红公社，以每小时 8 个工分雇来的。当问到是什么人雇的他们时，这几个被俘的农民支支吾吾起来，就是不肯说。

在几个“老糟”动手逼问之下，他们方才招供出来：“是锦州的 40 军。”

“你们可不要胡说啊。”

“我们可不敢瞎编，这是真的。”那几个农民连忙点头说道。

海军学校的人让那几个农民在纸上写好并按了手印。

“其实，我们真不懂得什么是好、糟的，就是为了挣点工分，以后再也不敢了”，那几个农民弄出一副可怜的样子说道。

“行了，回家去吧。”海校的人把那几个农民放走。

在当时的锦州市，各大、中院校的红卫兵大多数都是“糟字派”，而“好字派”只是占有一小部分的红卫兵。而且在一月的夺权斗争之中，各校的老糟红卫兵们又基本掌握了学校的大权。所以锦州“联合总部”老糟初期的主力，基本是 3 万多名市内各大、中院校的红卫兵。

后来越来越壮大的“工人总部”，其成员达到了五、六万人。如果再加上锦州铁路局的老糟工人和葫芦岛的老糟工人，其总人数已达到 10 来万人的庞大组织。

“联合总部”的老糟们，在夺取锦州日报社的第二天，

即发出了“抓革命、促生产”的公告：要求报社所有的工作人员在 24 小时以内，到《锦州日报》接管委员会报到听候安排；如拒不上班，将按照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论处。由于日报社的人基本上都是“好字派”，所以没有一个人去报到，也没有一个人去上班，《锦州日报》的一切工作处于瘫痪中。

“糟字派”没有人懂得报社的工作流程，无法正常地出版和发行报纸，他们只好印制和发行类似传单式的“新华电讯”。直到 2 月 19 日，由于得到《辽宁日报》派过来的工作人员支援，以及从《锦州日报》社杀出来的一小部分工作人员的配合，这才开始正常的出版和发行《锦州日报》。

在《新锦州日报》的创刊号上，“糟字派”发表了“锦州日报二.八社论是反对毛泽东思想的大毒草”的社论。在短短的十天内，《锦州日报》发表了观点截然不同的两篇社论，无疑在锦州的各地城乡再次引起巨大的反响。

锦州 40 军奉命支左后，在锦州卫戍区司令部成立了“支左办公室”，由 40 军 118 师的副政委李湖担任负责人。40 军以城市卫戍区司令部的名义，在锦州市的主要街道上进行了大规模的武装示威游行。这支部队以八一军旗为前导，然后是装备精良的侦察兵、防化兵、通信兵、工程兵、摩托化步兵，还有装备有 122 毫米榴弹炮、130 毫米加农炮、160 毫米迫击炮和多管火箭炮等火炮的炮兵。可能是怕把大街上的柏油路面压坏，所以其装甲部队没有开进城来。

为了配合 40 军地面部队的游行，空军第三航空学校还出动了几架飞机前来助威。这几架低空进行盘旋的飞机，在锦州市的上

空撒下了大量的传单。

听说 40 军支持“好字派”，2 月 16 日，“联合总部”又出动了上万人，包围了锦州卫戍区司令部，并且喊出了炮轰和火烧 40 军军长兼卫戍区司令员吴忠的口号。

为防止群众冲进锦州卫戍区司令部，40 军立即在司令部的大门口增加了两个班的警卫力量。20 多名全副武装的士兵堵在了锦州卫戍区司令部大门口，立刻引起了大门外群众的不满，许多人在队伍中高喊：

“他们在吓唬谁啊？”

“冲进去！”

“缴了他们的枪！”

站在队伍最前面的 100 多名“联合总部”工人和学生头头见状，忙转过身来，努力劝说已经骚动的人群：

“大家不要乱，要听从负责人的指挥！”

“不要往前挤，要防止老好们混进来捣乱，不能进入军区大门一步！”

这时，有人喊：“他们拿枪了！”

警戒线内的战士此时也把背着的枪拿起来端在手里，枪口冲下。

一名学生头头转身向这些战士走去，他理智的站在了警戒线以外，对着战士们高喊道：

“解放军同志们，请保持冷静！我们不会进入大院的，也不会踏过这条警戒线一步！”

其他的头头们也在指挥着人群往后退一些，以防发生突然的

不测事件。

## 第 493 回：性格爽，陈毅检查受欢迎　做规定，支左中不能开枪

1 月 31 日，在“外交部革命造反联络站”，简称“联络站”的主持下，外交部召开了揭发批判陈毅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大会，陈毅在会上再次做了捡查。他在会上表态：接受群众对他的批判，对群众对他的批判，他很受感动。

由于陈毅的坦诚、直爽的性格和态度，再加上他在外交部的威信，群众对他的检查非常欢迎。“外交部革命造反联络站”主要负责人、国际司青年干部张殿清，在“外交部革命造反联络站”出版的《革命造反报》上宣布：“欢迎陈毅同志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陈毅是我们的红司令。”

2 月 2 日，外交部“联络站”召开战斗队队长会议，研究撤销“联络站”，成立“外交部革命委员会”，实现彻底夺权。会上有人表示反对，有人建议：“必须先请示周总理同意后再采取行动。”

可是，部里一些单位的造反派要坚决砸烂外交部“一切旧的官僚机构”。他们把本单位的党、政、财以及人事调动、文件批阅等权力，全都夺了过来。有的单位成立监督小组，监督司、处长的工作。有的单位取消司级、专员级、处级的“官衔”，司长、专员、处长等当权派和一般工作人员一起办公，大家都做具体工作。他们取消按级别阅读机密文件的规定，认为这项规定是“封建主义和修正主义的东西”。有些单位全由造反派掌权，带长字号的领导干部全都靠边站。造反派指令当权派们集中时间和精力写检查，交代揭发问题。“有问题”的当权派还必须参加打扫卫

生等体力劳动。

开始，被造反派命令“靠边站”的部、司（局）级领导干部不敢反对，因为造反派夺权是得到中央支持的。而留任的领导也设法配合造反派工作。但他们无缘无故的被别人夺了权，其内心是不服的，有的甚至故做比造反派更造反的姿态，在当时发生中国留苏学生在莫斯科红场读《毛泽东语录》而被苏军警殴打事件后，东欧司一位副司长竟提出，应该到克里姆林宫贴大字报去！

由于外交工作业务反应要快的特点，业务监督的工作方式显然不适应，而全面夺权具体究竟应该怎么办？中央又没有指示。于是根据陈毅的意见，夺权不久，2 月始，造反派便同意部党委的安排调整，让一些司、局长重新处于全权主持部门业务工作的位置。外交部的工作一度朝恢复文革前的秩序行进。

国内运动如火如荼，驻外使领馆留守人员当然也不甘寂寞，跃跃欲试,纷纷来电要求在国外使领馆内也开展“四大”,搞“大串连”，也进行“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1967 年初，有些大使馆已经开始成立战斗队，破“四旧”，批判大使馆的当权派并计划也在大使馆夺权。

2 月 6 日，陈毅将外交部起草的一份电报送周恩来审批。电报指出：使馆工作人员，不建立战斗组织。已建立的，应在使馆党委领导之下，转为文革学习小组。

这份电报，陈毅是让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外交部部部长助理宦乡起草的。陈毅说，他查了一些资料，历来的国家关系，都是内外有别。国内搞运动，不能把外国人牵上。陈毅布置他们根据惯例，参照军委的作法，外交部也规定几条，如：不得揪外国

人来批斗；不得强迫外国人接受红色宣传品；不得逼外国人背诵《毛主席语录》；并决定中国驻外人员分批分期回国参加文革，及内外有别，驻外使领馆一律不准搞“四大”，即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等。

这份电报，周恩来阅后即呈送毛泽东。2 月 7 日，毛泽东签发了这份电报，发给中国驻外使馆、代办处。即外事口的《二七指示》，从而稳定了驻外使领馆。

2 月 9 日下午 13 时至 17 时 30 分，周恩来、康生、陈毅在国务院小礼堂接见外交部“联络站”负责人及其所属各战斗队队长，听取汇报。

外交部“联络站”核心组张殿清在汇报时说：“我们现在成立了两个班子，一个是领导运动，一个是领导业务。”

周恩来当即问到：“是‘领导’还是‘监督’？我跟你们讲过，主要是领导革命，监督业务。我提的是‘监督’，从来没有提过‘领导’。你们罢免了司长、处长，我们都不知道。你们是不是得到外事口批准？你们这样做要不要通过中央？你们夺权只限于监督业务，人事权力直属中央批准。……你们现在做的超过了中央授权给我和你们谈的‘领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监督业务’。我没有提过你们可以把旧机构砸烂。这个班子是直属中央的。”

第一亚洲司的一位代表辩解说：“刚解放时毛主席指示新中国外交工作‘要打扫干净房子，再请客；要另砌炉灶’。”

周恩来耐心地解释说：“那是主席对国民党旧的外交说的，那时候王世杰的外交我们一点没要，只有三个起义过来的做了顾问；整个外交大权都是掌握在我们手里。……上海没有全部另砌炉

灶。”

陈毅补充说：“希望监督小组和部党委很好合作，这样对我们斗争有利。我们相信年青人要掌权的，但是从监督到掌权不是一下子。这是伟大的毛泽东思想，但是要有阶段，不是跳就跳过去，像跳高一样，一点点升。”

他还说：“对部党委几个同志叫他们靠边站，我看是不公平的。让他们工作还是可以的。对大使、参赞一下飞机就拉去斗，我是不赞成的，章文晋我打了电话去也没制止住。”

“去年 7、8 月份，我讲了许多话，被说成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今天讲话可能被说成新反扑，我不怕，还是要讲。我知道，只要我讲话，就会有人说陈毅又跳出来了。对！全国大乱，快要亡党亡国了，此时不跳出来讲话，更待何时？批判和斗争，要分清敌我。搞路线斗争我愿意参加，但动不动就下跪，搞喷气式，发泄私愤，发泄感情，这样的斗争方式我不同意。……在中央我是挨斗出名的，现在看到同志被斗，我的血管就紧张了，以前是斗完马上拉出去枪毙，不容你说一句话，我是刀下投生。我自己也犯过错误，我也斗过人。我在这里大胆地说，这种斗争方式，这样下去要犯方向、路线错误。在中央会议上我讲过这个话，在这里我对你们还讲这个话。斗争搞左了，伤了很多人，你们怎么能掌好权？对同志，不能动不动就说他是反革命，有证据是反革命，可以报公安部门逮捕法办嘛！”

“在国外不要搞战斗队组织，不要搞夺权斗争，这是主席批准的。要一致对外，不要让大使、参赞前面和敌人斗，后面失火，自身难保。”

此时的北京，由于观点和利益的分歧，各造反派之间在夺权过程中的矛盾不断出现。以北京大学聂元梓为主的“北京革命造反公社”虽然在 2 月 1 日与北航“红旗”为首的“夺委会”达成了“五点协议”，但是 2 月 6 日，“北京革命造反公社”又发生了分裂。这天，与北航在夺权过程中发生矛盾的北京地院“东方红”，与北大聂元梓矛盾不断激化的北师大“井冈山”，还有北京农业机械化学院“东方红”、北京林学院“东方红”、北京师范学院“革造”等一些群众组织宣布退出“北京革命造反公社”，他们自己又另行组织了一个全市性的“夺权”联合组织——“首都革命造反派大联合筹备委员会”，在北京饭店。于是，北京全市性的“夺权”组织中，最大的组织除以北京大学聂元梓为主的“北京革命造反公社”、北航“红旗”起重要作用的“首都革命造反派夺权斗争委员会”，即“夺委会”外，还增加了以地院“东方红”和北师大谭厚兰“井冈山”为主的“首都革命造反派大联合筹备委员会”。另外，还有“首都革命造反派大联合总部”、“首都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工农兵联络站”、“首都革命造反派联合夺权总部”。有许多造反派组织是同时参加了几个全市性的“夺权”联合组织。

2 月 9 日，谢富治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参加北京“夺委会”的“一机部革命造反联络委员会”、“首都职工红色造反者总部”和“首都工人革命造反者总部”这三个工人总部的代表。谈北京的夺权问题。他说：

“今天已是第八次会议了，但是成绩不大，打架的还很多，应该是团结在伟大领袖的身边，在中央文革的领导下，搞好大联合。搞大联合以前，要有一个筹备委员会，建立一个筹备小组。”

接着，谢富治就北京 7 个单位的《紧急倡议书》发表意见说："这 7 个单位，我只知道'首都革命造反派夺委会'，'北京革命造反公社'我就没有听说过，其他 5 个我根本就不知道。你们'夺权委员会'的工作，不要松懈下去。""你们要分工，哪一个工厂归谁，哪一个区归谁，要互相支持，互相帮助，不要互相拆台，我的意见是，工人搞工人的，学生搞学生的，农民搞农民的。然后大联合。前两天，我给 50 多个大学的代表开了一个会，大家都愿意联合起来，搞一个工人的，搞一个学生的，但是他们的头等人物不愿意，要搞工农兵的。一、二、三司还没有联合。7 号那天，他们吵了五、六个小时。后来愿意联合了，我们也没有意见。我的意见是工人、农民、学生各自组织起来，然后再联合。"

关于夺权的问题，谢富治说："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强调，夺权必须三结合，否则中央不承认。基础单位最起码是两结合。例如革命职工群众组织代表和革命技术人员代表结合。反对打倒一切，是当权派就打倒，这是违背马列主义的。"

最后，他又谈到了生产问题："目前应以'夺权委员会'为主，要开会讨论农副业生产。要有两部分代表参加，第一部分是原来的县委书记、县长（比较好的）一个县来一个。单纯地布置一下生产，顺便问一下夺权的情况怎么样。第二部分是城区单召开会议，讨论工商业生产。参加的单位也要有当权派（较好的），明天、后天你们就可以开会。

关于以前赶走轰走的四类分子，绝大部分是正确的，也有少数是错误的，错了就要纠正。有意不走的可以赶走。"

2 月 9 日上午，毛泽东在林彪 2 月 7 日报他送审的中央军委《关

于军队在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斗争中不准任意开枪的规定》稿上作了修改，并批道：

有一些修改。

关于支持真正左派广大群众问题,现在出现许多搞错了的事，支持不是左派而是右派，陷于被动。此事应总结经验，写出几条指示。请速办。

毛泽东

二月九日上午

当天下午，又在第二次送审稿上批示：

林彪同志：

又改了一些，请酌定。此件应在总理主持的党、政、军联席会上讨论通过，然后发出。

毛泽东

二月九日下午

经毛泽东两次修改后的中央军委《规定》全文是：

各军区、各军兵种：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人民解放军在支持真正的（不是假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斗争中，已经遇到各种复杂情况，以至发生武装冲突事件（如新疆、内蒙）。因此，特作如下规定：

（一）对徒手的群众，不管属于哪一派，都不能开枪。

（二）对徒手的保守派、右派、反革命派，可向他们宣传党

的政策，开展政治攻势，进行分化瓦解。在必要时，可以逮捕他们的头目，但不要开枪。

（三）略

（四）对杀人、放火、放毒、抢劫等现行反革命分子，确实查明无误者，如敌人拒捕、顽抗和武装暴乱，在说服无效时，可开枪镇压。

（五）要相信，即使是反革命组织，大多数群众仍然是好的，是可以教育争取的，坏人只是少数个别分子。

（六）要沉着应战，即使有几万人向我军示威、包围、冲击、打人、抓人、侮辱人，也不要紧。若不沉着，怕字当头，就是大错。

以上规定，大部分要向全军指战员认真进行宣传教育。

但第三条（诱敌深入、迂回包围）只能临战时下达，事先必须保密。

中央军委

一九六七年二月九日

原来的《规定》稿是四条，毛泽东审阅时加了五、六条，并将标题改为《关于军队在支持无产阶级真正革命派夺权斗争中不准任意开枪的规定》，在“革命派”前加了“真正”两字。

第二天，2 月 10 日，该《规定》发出。

叶剑英在传达《中央军委关于军队在支持无产阶级真正革命派夺权斗争中不准任意开枪的规定》的会议上，只将第 3 条念了一遍。会后，各军区请求将第 3 条单独发给他们再读一遍，以便

掌握，叶剑英又将《规定》的第 3 条以《毛主席最新指示》单独打印出来，并说明看后收回。叶剑英将此事写信报告林彪，让林彪报告毛主席。

32 年后，已经离休的原福州军区副参谋长石一宸回忆说，1967 年 2 月 10 日前后，他们奉命进京，在京西宾馆，让他们看文件，只有一页，是《毛主席最新指示》：“造反派冲军区，抢你们大楼，攻占大楼，你们不要让，坚持在上头。他们在东头，你们在西头，把他们包围起来，开展政治攻势，抓坏头头。”

文件上有林彪批示的四个字：“完全同意”。

当时要求他们，只准用眼睛看，用脑子记，不准用笔抄录。与他同时看文件的有南京军区副司令员张才千、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得志。各大军区都去人了。

2 月 9 日，中央军委下发关于解放军艺术学院学生参加“湘江风雷”的通知：

最近在湖南长沙，解放军艺术学院三人参加了反动组织“湘江风雷”，进行反革命活动，还有部分学生特别是艺院“星火燎原”在湖南、沈阳、福州等军区造谣，抄家，任意抓人，带头冲击军事领导机关，进行残酷武斗，抗拒毛主席批准的八条命令。为了坚决贯彻毛主席的指示，以护军纪，保卫文化大革命，军委决定：艺术学院所有人员，限五天之内返回本校进行整风，违者以军纪处分。

中央军委

一九六七年二月九日

叶剑英感到中央军委的《八条命令》还不够，也未完全落到实处，还要再规定几条加以限制，又和聂荣臻主持制定了《中共中央军委关于军以上领导机关文化大革命的几项规定》，共七条，后称《七项规定》。

2 月 9 日，叶剑英把《中央军委关于军以上领导机关文化大革命的几项规定》稿送林彪审阅。报告称："遵照主席在上次常委会上的指示，起草关于军以上领导机关文化大革命的几项规定。今天上午召集 32 人参加的会议，进行讨论和修改。特呈上请审查批示。"

## 第 494 回："肃流毒"，"高司"成了保皇派　辟谣言，福州"思想兵"请罪

1966 年 9 月，患有美尼尔氏综合症和脊椎肥大症的薄一波，在家里的盥洗室跌倒了，造成尾椎骨移位，不得不卧床休息。周恩来在他需要病休的报告上批示："同意薄休养 6 个月。"在周恩来的安排下，10 月 13 日，薄一波到广州一处疗养所疗养。

薄一波解除职务后在广州小岛

1967 年元旦清晨，北京地质学院组成的"抓叛徒战斗队"从北京直奔广州，来到疗养院，冲进薄一波的房间。正在整理文件的薄一波，看到红卫兵突然冲进屋里，不免吃惊，赶忙起身相迎。

"把薄一波揪回北京去！"这些红卫兵毫不客气，蜂拥而上。

薄一波忙说："回北京可以，我要向家人交代一下。"

这些大学生不同意，说："有什么好交代的？！你们还想搞反革命串连!!!"

薄一波想到手中拿着的是绝密文件，既不能交给这些学生，也不能丢失，便急中生智，冲向隔壁国家副主席董必武居住的小

院，大声呼唤：“董老！董老！”

年过八旬的董必武正在院中散步，应声过来，看见年近六旬的薄一波已被学生推推搡搡，站立不住，赶紧拄着拐杖，匆匆赶到薄一波跟前，问有何事？

薄一波举着手中的文件对他说：“文件……”

董必武接过薄一波递来的文件。

随后，薄一波被北京地质学院“抓叛徒战斗队”乘火车押往北京。

2 月 9 日，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批斗薄一波大会。会上，薄一波几次冲到麦克风前，高声说：“我不是叛徒!我是共产党员!”

“胡说！”红卫兵冲过去，狠狠地抓住薄一波的头发，把他拽开，并对着话筒大声说道：“他是从国民党狗洞里爬出来的！”

薄一波不顾疼痛与安危，依然大声说：“离开国民党监狱的每个步骤，都是遵照党中央指示进行的,毛主席都知道。”

无济于事，也仅仅是他个人的抗争而已，在当时，是不为社会所认同。

2 月 7 日，湖南“高司”等 9 个群众组织发起，召开了 10 余万人的批判、斗争“湘江风雷”、“红旗军”、“红色政权保卫军”头目大会。“湘江风雷”的头头叶卫东等人带着铁镣，被押上台批斗。

“湘江风雷”组织庞大，号称百万之众，被抓捕的各级头目上万人。在这次大会上，一批与其观点相同或相似甚至立场模糊但与“高司”有一定距离的组织都被“高司”强迫倒旗，结果引起轩然大波。会后，遭羞辱的“井冈山”红卫兵、“东方红总部”、

“青年近卫军”、“红旗工人”等组织发出强烈的抗议声浪。支持“高司”的工人造反派只有“革命工人造反军”、“真理军”等人数寥寥的几个组织，绝大多数造反工人组织思想上并不认同“高司”。

2 月 8 日，在省军区的支持下，由“高司”、“长沙地区公检法夺权委员会”等 12 个组织发起成立了“湖南省红色造反者联合筹备委员会”，简称“省红联”。主要成员有：“高司”、“毛主席的真理军”、“湖南革命工人造反”、“毛主席故乡红卫兵”、“贫下中农造反军”、“湖南公检法革命造反司令部”、“长沙地区公捡法夺权委员会”与“毛泽东思想红卫兵长沙造反有理军”等。

2 月 9 日，湖南省军区发布《第二号通告》，提出“肃清湘江风雷流毒”的口号。

“高司”根据省军区《第二号通告》的精神，在省军区的支持下，派出大量的战斗队奔赴各地和各大厂矿，肃清“湘江风雷”的流毒。这次他们与张平化“924 报告”后采取的态度相反，是在各地市，各大厂矿普遍打击造反派。在曙光厂，他们支持“工总”伤害了“联总”；在汽电厂，他们支持“汽电真理军”打击了“造反有理总队”；在长机他们支持“怒火铁骑”排斥“三三一造反团”；在红旗厂，他们支持“无联”，打击“红总”等。而在长纺厂、省航运局、建筑工程公司、湘药这些单位，本来就是“湘派”的一统天下，于是统统都在打击之列。

“高司”胜券在握，弹冠相庆，但其战果却是脆弱的。在“肃清‘湘江风雷’流毒”的口号下，“高司”也将众多的造反派组织推向了自己的对立面。它失去了广大工人市民的支持，丧失了控

制运动的主动权，在“肃流毒”的过程中又伤害，打击了“井冈山红卫兵”、“青年近卫军”“东方红”等组织。至于地县一级，由于“肃流毒”全由支持或同情地县委的军分区、人武部主持，结果成为了保守派向造反派的反攻倒算。因此，就湖南全省而言，除长沙及湘潭、株洲、衡阳、邵阳等几个地级市外，“高司”派已成了保皇派的同义词。

再看福州，就在 2 月 8 日、9 日，福州为了《北京来电----陈伯达同志的 4 点表态》闹得翻天覆地的时候，2 月 10 日早晨，陈伯达给韩先楚发来一份电报：

韩先楚同志：

刚才我们得知：2 月 9 日，福州市出现关于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两张传单。传单捏造说：“一·二六是革命行动”，“韩先楚可以炮打”等等。这纯粹是无耻的恶意造谣。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全体同志，是支持韩先楚同志和福州军区的，根本没有也不会发出这样的电话或电报。请警惕敌人的造谣中伤和挑拨离间。

如果你认为必要，此件可广为印发张贴。

此致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敬礼！

陈伯达

二月九日

这份电报一经公布，反响巨大，“八二九联司”这一派的人们欣喜若狂，他们又是欢呼，又是拥护，而“好得很”派的人们一下子全沉默了，那些日夜骂韩先楚的喧嚣刺耳的高音喇叭骤然间

都喑哑了，陈伯达的“29 电报”彻底否定了“省直联总”、“思想兵”总部、“三司联络站”等这半个月的所作所为，宣判了他们在政治上的死刑。几个月前，“前线兵”，“赤卫队”所遭受的厄运，如今就要在这些组织的身上重演一番……

晚上，福州军区“支持革命左派接待站”首先向各学校派出解放军传达林彪来电：

今天上午九时，福州军区首长给林副主席打电话，林副主席说:“陈伯达同志托王力同志的来电是造谣。中共中央军委批转《前线部队公告》是经过周密的研究，要一字一句往下发。”

一九六七年二月九日

面对陈伯达和林彪泰山压顶般的中央来电、批示，福州形势急转直下。一些下午头脑还发高烧到 40 度，拼命反对福州军区和韩先楚的学生，到了 10 日的晚上，已经冷静得出奇。只见一位“思想兵”学生头头面孔严肃，表情激动地说：

“同学们哪，我们再也不能执迷不悟了，继续沿着错误的危险的犯罪的道路走下去了，前面是陷阱，前面是塌方，应该立即止步！我们毛泽东思想红卫兵附中九一五兵团在这股反革命逆流中充当了急先锋，成了炮打中央军委、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炮灰和丑角，干了许多坏事，我身为‘九一五’的勤务员，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我对不起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在这里，我以极其沉痛的心情向毛主席请罪，向党和人民请罪，向解放军请罪，向韩先楚同志请罪……”

他的脸孔如若石膏像一般僵硬，只有嘴唇颤动着，当他说到

最后时，眼睛里竟沁出了眼泪，那豆大的泪珠沿着他的面颊流淌了下来，好像自来水龙头漏水一样。

其他人也相继起来发言，他们唱的是同一个调，都承认犯了错误，表示“要向毛主席请罪”。

许多人都要求立刻集合队伍上街向毛主席请罪，最后决定第二天上午到大街上向毛主席请罪。

这天，福州军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陆续进驻各学校。

2 月 11 日上午 9 时 30 分，师院附中“红九二红卫兵团”、“九一五兵团”、“海防兵”几个组织的学生扛着“向毛主席请罪”的标语牌，上街游行向毛主席请罪。

尽管“九一五”的很多学生没有来，即使来了的也有些人依然在那里肆无忌惮地发牢骚、讲怪话，但大多数同学还是保持着理智的头脑。大家的心情像石头一样沉重，步履也像石头一样沉重，长长的队伍，无言地低头，脸上流露出负疚的表情，缓缓在街上走动着，如若是一支送葬的队伍一般，完全没有往日那样上街后振臂高呼口号的激情场面。他们是真诚地向毛主席请罪，街上的路人也默默无语地注视着他们。请罪的队伍还特地来到省军区的门口，向人民解放军请罪。

韩先楚听说学生站立街头，胸前举着、挂着牌子，上面写着“向毛主席请罪”、“向韩司令请罪”。马上通知，进行宣传，不要搞请罪活动，特别是学生，学生无罪。

2 月 11 日下午，福州市 20 万军民举行了规模盛大的“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又一次新反扑的誓师大会”,全副武装的陆海空三军指战员分乘数十辆汽车和一队队抬着毛主席画像，挥舞着

《毛主席语录》的红卫兵、群众组织，汇集在宽阔的五一广场上，会场上红旗猎猎，朗读语录声此起彼伏。这时候，天空中传来了飞机的引擎声，人们抬头仰望，两架军用直升机正在广场上空盘旋着，那直升机飞得很低，机上的八一军徽清晰可见，甚至连机上驾驶员的人头都可以看得见，忽然间，有人喊起来："传单！"只见直升机上撒下了不计其数五颜六色的传单，那传单如若雪片一般漫天纷飞，正是："飞雪带春风，徘徊乱绕空。君看似花处，偏在洛城东。"

当传单纷纷扬扬即将落下时，会场上掀起了欢腾的波涛，人们欢叫着，雀跃着，伸出了森林般的手臂争抢着那些传单，大会尚未开始，群众的情绪就像春潮一样不断上涨。

下午 14 时 30 分，大会在《东方红》的乐曲声中开始，韩先楚代表前线陆海空军全体指战员在大会上作了讲话，他在讲话中说："福建省、福州市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公然把矛头指向人民解放军，掀起了一股反革命逆流……""这个大会是庆祝胜利的大会，是奠定革命左派大联合基础的大会，是夺取新胜利的誓师大会。我省广大革命群众在这一场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又一次新反扑的斗争中，大长了无产阶级的志气，大灭了阶级敌人的威风。""当前，我们一切无产阶级革命派的迫切任务，就是实行革命派大联合……组成一个由革命群众组织的负责人、当地驻军负责人和党政机关中的革命领导干部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负责领导全省范围的夺权斗争。"

韩先楚今天的心情很激动，无可掩饰的喜悦情绪洋溢在他的脸上，那本来是呆板的声音也变得有些抑扬顿挫了，还有些颤音

和不定的音符。近一个月来，多少的风风雨雨，雷鸣电闪，使他夜不能寐，心力交瘁，他好像驾着一艘冲锋舟在布满暗礁的危险的航道上航行，其凭着将军的巨大气魄和自信心，硬是闯了过来，当年他靠着木船解放海南岛时也是这么干的，如今，他又赢得了这场斗争的胜利，而这场胜利是多么的来之不易，可以说，是比那无数次真枪真炮的打仗更来之不易。此时此际，他站立在高高的主席台上，面临着这“风展红旗如画”的壮阔场面，怎能不感到万分兴奋，欣喜异常呀。

接着，革命领导干部代表、省长魏金水也在大会上作了发言。在大会上发言的还有:“八二九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的代表、省“农民革命造反联合司令部”的代表、省“工人革命造反联合司令部”的代表、省“机关革命造反联合司令部”的代表。最后，大会还通过了给毛主席的致敬电。

大会结束后，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走在游行队伍前头的是前线陆海空三军指战员，他们抬着毛主席的巨幅画像，戎装威武，英姿焕发，乘着军用摩托车、汽车，沿途受到广大群众的欢呼。紧跟在人民解放军后头的是“八二九联司”红卫兵的队伍。再接下去就是“省工联司”、“省农联司”和其他一些组织的队伍。

## 第 495 回：查事因，接见内蒙古代表　听谏言，主席批中央文革

2 月 10 日下午 14 时，谢富治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北京大专院校造反派代表。他说：

“各校到外地的人（包括派出到各地的联络站）都要回来，整风、整顿思想。首都的夺权到了关键时刻，它是毛主席住的地方，但现在还没有建立统一的组织。北京应该搞一个工农兵学的筹备小组，中央文革支持。夺权要三结合（即群众革命造反派、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党政负责人、军队负责人），大专院校选 20 名代表参加筹备小组，两三天就搞出来。”

“……上海有个公社，北京就不一定叫公社，现在还是叫革命委员会。”

谢富治将“北京革命造反公社”负责人聂元梓和北京“夺权斗争委员会”负责人方臣都叫到了人民大会堂，让他们谈判解决大联合问题，双方最后达成了一致。谢富治听取了他们的谈判汇报后，比较满意。

2 月 10 日下午 17 时 50 分至 19 时 50 分，周恩来、肖华在人民大会堂小会议室接见内蒙古党委、内蒙古军区、呼市“三司”、“红卫军”四方面各 5 名代表。内蒙军区副司令员刘华香列席会议。

会议开始，周恩来一一询问了内蒙古军区代表的姓名、成份、参军年限；问了内蒙古党委代表姓名、民族、在内蒙工作年限；问呼市群众组织代表的姓名、年龄……

当周恩来问到："谁叫高树华"时，高树华站起来。

周恩来又问："你是师范学院的教师？哪里毕业的？"

高树华答："师范学院。"

周恩来问："你们'三司'有一个同学被打死，怎么不让检验尸体？"

高树华回答："因为他们要抢尸，毁灭罪证。"

周恩来浓眉一扬，问"是谁要抢尸？"

高树华说："红卫军。"

周恩来转向"红卫军"代表说："怎么能抢尸体呢？为什么搞得这么对立？人是怎么打死的？"

高树华："当时韩桐正在喊话，希望军区刘昌出来辩论。"

周恩来说："找刘昌辩论可以写封信嘛！用现在这个办法包围军区怎么能行呢？"

高树华接着说："正在这时，一个军官提着手枪跑出来，韩桐同志喊：同志们现在是用鲜血和生命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的时候了。接着这个军官便开了枪，时间是 2 月 5 日中午 12 点 15 分。"

周恩来："韩桐是几年级学生？"

高树华："四年级学生。"

周恩来："那里人？"

高树华："托县。"

周恩来："哪个盟？"

高树华："乌盟。到附属医院的时间是 12 点半。"

周恩来："当时人已经死了？"

高树华："当时还没有死。"

周恩来："伤口在什么部位？"

高树华："从左边第五根肋骨下打进去的，把肺动脉打穿，子弹还留在死者体内。"

"三司"负责人郝广德说："我们当时已经拍了照，到医院以后，'红卫军'、'革命战士'的人包围了医院大门，要抢尸体。抢救了 5 个多小时，到 5 点 50 分，当时给北京协和医院打电话，协和医院说：停氧 20 分钟已无法抢救。军区广播说，解放军不会开枪打革命学生。是'八一八'打的。"

高树华补充说："打的时候我不在，抢救时在。"

周恩来问："是你们的学生吗？"

高树华："是的。"

周恩来问内蒙古军区的人："开枪打死人是怎么回事？"

内蒙古军区副司令员黄厚回答："我不了解这个情况，姜部长知道这个事情。"

军区司令部军务部部长姜文启说："那天 12 点打死人，到了下午 3 点才听说。后来有个老工人反映说，他看见放了两个爆竹，还冒了一股烟……"

周恩来一摆手，打断了他的话："放爆竹怎么能打死人？他自己能把自己打死吗？你们检查枪膛子弹没有？"

姜文启答："没有。"

周恩来挥手让他坐下，神情严肃的说："你们没有检查枪膛子弹，怎么能断定不是你们打死的？你们这就输了一着嘛？如果我是个司令员，我马上就把人集合起来，检查枪膛子弹，你们没有

做到这一点。你们追查凶手了没有？”

黄厚答：“没有查出。”

周恩来继续问：“你们接到国务院、中央军委发的通知没有？”

姜文启答：“见到了。”

周恩来指责道：“见到了你们为什么还这样做呢？”接着，他缓和了一下语气说：“我们都是军人嘛！我是个老军人，后来退伍，现在因为工作需要，又穿上了军装。打死人很容易查清，一清点武器、弹药，就清楚了嘛！”

姜文启检讨说：“我们当时没有验枪，这是我们的疏忽。”

周恩来问：“静坐有多少人？”

刘文研说：“当时我在现场。”接着他举例指责姜文启讲的都是谎言。

内蒙古军区副司令员黄厚说：“下午 4 点才广播枪打死了人。”

周恩来问：“你当时在现场吗？”

黄厚：“不在。”

周恩来又问姜文启：“你在现场吗？”

姜文启：“不在。”

军区代表敖长锁说：“我当时在现场。在迫不得已时发了三条通告，这个通告是在 11 点多宣布的，我没有看到打倒的现象，要打倒，一定要哄起来冲击，在下午 3 点多钟才听到广播，因而军区没有检查枪支弹药。”

周恩来：“这个问题先停止到这里，派人进一步调查。”

学生代表郝广德：“必须查清，交出凶手。”

周恩来问学生：“派谁都可以吗？”

郝广德说："只要总理派人去，我们就相信。"

周恩来："中央派法医去检验，内务部去一个部长或副部长，带上个秘书和两名工作人员，乘飞机去。能不能夜航？"

周恩来的秘书立即打电话问能否夜航？回答说不能夜航。

周恩来说："那就明天拂晓起飞。"

周恩来问"三司"：你们负责人是哪位呀？

郝广德答："我，郝广德。"

周恩来继续问："飞机到了你们那边谁负责去机场接呀？"

郝广德答："薛贵元。"

周恩来又问："军区谁去接呀？"

黄厚答："杨明先，训练部部长。"

周恩来："由军区去个吉普车去接。公安厅夺权了吗？"

郝广德："原来是造反派夺权，现在保皇派反夺过来了。"

"红卫军"代表张三林立即反唇相讥："左派不是自封的。"

周恩来予以制止："到底谁夺权，谁是保皇派，还要看看罗！'红卫军'方面要不要派人参加呀！"

张三林答："我们不参加，因为这件事与我们没有直接关系。"

周恩来接着问："区党委要不要参加呀？"

王铎答："总理看，需要参加就参加，此事与我们没关系。"

"红卫军"代表张三林指责说："你们支持'三司'冲军区，怎么没关系？"

周恩来说："中央调查组、内蒙军区、呼市'三司'共同处理这件事，查清后将尸体火化，一定惩办凶手。"

军区军务部部长姜文启提出："韩桐的弟弟在军区后勤部工

作，他要求看尸体。”

郝广德说：“我们没有听到这个要求。”

周恩来说：“死者的父、母、弟弟都可以参加验尸，把事实弄确实，如确实是枪伤，由政府负责抚恤。这个问题双方都不要再扩大宣传了，到中南海宣传很不像样子，在北京在呼市都不要宣传了，查清后办案就是了。对待人民解放军要注意影响，不要丑化。”

他对“三司”代表说：“你们将来夺权还要靠解放军协助嘛！”

周恩来接着询问了“红卫军”和“三司”及“工农兵革命委员会”的情况，并再次强调：“不论哪一派，都要注意不能跨越产业、职业、行业来组织，这容易被坏人利用。”

接着周恩来又问了内蒙铁路的情况。而后突然问到：“高锦明同志放出来没有？”他对自治区党委代表说“你们还叫高锦明来吗？”

郭以青答：“高锦明同志是我们首席代表，要叫他来。”

姜文启说：“如果让高锦明来，王逸伦也应该来。”

周恩来问：“你们几个方面有什么意见？”

郭以青等自治区党委代表说：“我们同意让高锦明同王逸伦一起来。”

郝广德说：“我们也同意。”

周恩来：“那就明天一起来，都不要带秘书了，区党委派一个工作人员来就行了。”

这时，“三司”代表递上“八一八”和军区“红色造反团”给周恩来的信，周恩来看后问黄厚：“你们那里还有造反派？怎么没

有他们的代表？是不是怕他们？”

黄厚说：“我们不怕。”

最后商议决定，让内蒙古军区“红色造反团”派一名代表王建荣来了。

张三林见状，说道：“我们也应该增加代表？”

周恩来赶紧说：“不谈了，不谈了，如果需要增加代表，以后再考虑，先搞打死人的问题，今天就谈到这里。”

接见完内蒙古的代表，周恩来又赶去参加毛泽东召集的常委扩大会，与会者除常委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李富春 6 人外，还有军委秘书长叶剑英、中央文革副组长江青，中央文革成员王力列席。毛泽东说：

“今天专门谈谈中央文革小组的事。前几天我说过，中央文革实际上代替了书记处，你陈伯达就成了总书记了。你的官越做越大了，说话也是金口玉言，怎么能说是小小老百姓呢？难道还嫌你的官职小吗？”

叶剑英说：“有些人言行不一，说的一套做的又是一套，根本不把毛主席的指示放在眼里。”

李富春说：“我看也是这样。别看有些人把毛主席捧得很高，实际上对主席的话各取所需，对他们不利的东西并不执行。这个现象如果不纠正，我认为文化大革命就不能搞好。”

陈伯达说：“请剑英、富春同志说具体点！”

毛泽东说：“我看你陈伯达就有这种表现！如果说具体些，这两个多月来的行为就足够了。过去你专门在我和刘少奇之间进行投机，你当我真的不知道？我和你相处这么多年，如果不扯到你

个人的事，你从来不找我！上个月群众大会上，这个陈伯达，你是一个常委打倒一个常委，还说是小小老百姓，我看那都是唬人的。”

“小组成立以来，没有一次提出要我主持开会。去年 6 月以来，代替了书记处，也是独立王国。骂别人独立王国，自己独断独行，否认政治局常委存在。”

“文化大革命，闹一二年，总要停顿。现在有打倒一切的风气。干部统统打倒，怎么行？”

“怀疑一切，打倒一切，是无政府主义。”

“把工人、学生提上来，掌握了权，没有经验，几个月就变了，很不稳定。”

江青说：“事情要一分为二，许多事情，比如打倒陶铸的事，并不能都推到陈伯达身上。”

毛泽东说：“是不能光怨伯达，还有你！你这个江青呀，眼高手低，志大才疏。你眼里有谁？我看只有你自己！打倒陶铸，别人都没有事，就是你们两个人干的。我看了 1 月 4 日你们接见中宣部专揪王任重造反团的讲话记录，别人都没说话，就是陈伯达讲话，还有你的插话。你们一点民主集中制都没有！”

江青说：“陶铸干了那么多的坏事，就是没人管，我作为一个中国共产党员，就是要革命。谁不让我革命，我就造谁的反。主席，你不让我革命，我也要造你的反。”

毛泽东说：“我不是赵老太爷，怎能不让你革命？我批评你是从组织纪律上指出你的错误。革命不能你一个人单枪匹马冲锋陷阵，群众呢？党的领导呢？我看现在还同过去一样，重大事情从

不向我报告。还是对我实行封锁。只有总理除外。总理凡是重大问题都是向我报告的。你们几位就不是这样了。总想对我瞒着什么。这种风气要改变，改变不了就要出修正主义。这个问题我已讲过多次，就是没有实行起来。我看中央文革小组要开会，好好批评一下陈伯达和江青。王力，你通知春桥、文元，让他们回北京专门开这个会。除了小组内部的人外，其他人先莫介入。陈伯达、江青的问题，只准在这个地方说，或者在中央文革小组内部批评，在别的地方一律不准议论，否则就是违反纪律。”

李富春说：“主席今天讲得很好，说出了我们想说而又不便说的话。”

叶剑英说：“不是不便说，而是不敢说。中央文革已经成了老虎的屁股，谁也摸不得。稍微给他们提点意见就要砸烂狗头，就要千刀万剐，大字报、大标语铺天盖地盖来。像这样，谁还敢讲话？”

毛泽东说：“偏要讲，你们就来个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嘛。怕什么，还能不给饭吃？共产党是不兴饿人的。只要给饭吃，照样要革命。我看，在我这里召开的会议范围要扩大，陈毅、谭震林、徐向前、李先念、谢富治要参加，中央文革的那几个秀才如关锋、戚本禹、张春桥、姚文元也要参加。可以不通知陈云、朱德、聂荣臻。”

周恩来说：“是不是叶群、杨成武、肖华同志也参加的好？”

江青说：“肖华不能参加！群众对他的意见相当大，总要考虑到造反派的情绪嘛。”

散会后，叶剑英、李富春将会上毛泽东批评陈伯达、江青的

情况透露给了其他元帅和副总理。李富春是周恩来指定的“副总理小组”的组长，他向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国务院副总理们传达了毛泽东对陈伯达、江青的批评，顿时群情欢跃。

2 月 10 日晚，周恩来主持碰头会，讨论通过由毛泽东提议起草的《中央军委关于军以上领导机关文化大革命的几项规定》。会后，将《规定》送毛泽东、林彪阅批。

林彪当天即将此件转报毛泽东。毛泽东批示：“照办。如昨夜会议上有修改，照修改稿办。”

次日，2 月 11 日，毛泽东又两次审阅该《规定》，于当晚在周恩来当天报送的 10 日晚中央碰头会讨论过的修改稿上批示：“送总理照发。” 这《七条规定》主要条文是：

“军以上机关（各总部、军种、兵种，各大军区、省军区，军区空军、海军舰队）的文化大革命，必须坚决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分期分批进行四大。由军委决定已经开展四大的单位，除因必要暂停进行的以外，要继续充分发动群众，坚决依靠真正的而不是假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争取团结大多数，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把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揪出来。军委决定暂时不开展四大的单位，必须进行正面教育，何时开始，必须听候军委命令。”

“陆、空军的军以下单位，海军的基地以下单位，海、空军的飞行学校，北京卫戍区，上海、天津、旅大警备区，以及军委指定的特殊单位，一律不搞四大，坚持进行正面教育。绝对不准任何人、任何组织以任何借口到这些单位进行串连。”

“各级军事领导机关一律不允许自下而上的夺权，不允许任

何人、任何组织冲击。”

“军以上机关的文化大革命，必须由党委领导。党委个别成员问题严重的，可以撤换，党委不能领导的，可以改组，但都必须经过上级批准。军队领导机关必须保持严密的、完整的指挥体系，不宜成立各种文化革命战斗组织。已经成立的各种文化革命战斗组织，必须以行政单位进行改组。这些文化革命战斗组织，对党委有批评和建议之权，但不能代替、监督党委和行政领导行使职权。”

“坚持毛泽东思想、坚持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领导干部，是党和人民的宝贵财富。一定要分清是无产阶级当权派，还是资产阶级当权派。认为只要是当权派，就一概打倒，是完全错误的。各级领导干部，要敢字当头，到群众中去，虚心倾听群众的意见，同群众紧密结合，一道闹革命，为人民建立新的功勋。对于犯有错误的干部，应该根据问题的性质和情节的轻重，严格区别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分别对待。只要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而又坚持不改和累教不改的，就要允许他们改过，鼓励他们将功赎罪。凡是没有上级命令停职、罢官的领导干部，应该坚守岗位，抓革命，促战备，促工作，促生产，努力完成自己的工作任务。”

“要反对无政府主义、极端民主化、小团体主义、个人主义和主观主义不良倾向。”

2 月 11 日当天，中央军委《关于军以上领导机关文化大革命的几项规定》发出。

## 第 496 回：接江华，先调李迎希进京　西安乱，军工厂武斗停产

浙江省委第一书记江华接到北京较晚。他由于患甲亢，从 1966 年中央工作会议后就在上海住院。1967 年 2 月上旬，江华被造反派从上海华东医院里抓了回去，关在浙江美术学院的“牛棚”里，准备召开批判江华大会。江华住的“牛棚”四周贴满了批判他的大标语、大字报，室内只有一张桌子和一张木床。他的老警卫员赵连福住在外屋，可以外出购买生活用品。有一次，赵连福在路上遇到浙江省军区保卫处长，就请他将江华的情况报告省军区领导并报中央。

此时，浙江“省联总”已到处张贴海报，定于 2 月 12 日在浙江省体育场召开 10 万人大会，批斗江华。浙江省军区政治部主任罗晴涛于 2 月 10 日打电话向总理值班室汇报了情况，请示省军区是否参加？如何表态？

周恩来 2 月 11 日凌晨回到西花厅，看到浙江省军区的请示后，做出三点指示：

一、第二天的群众批判会省军区要参加。

二、省军区在会上可以不讲话，不表态。

三、江华身体不好，工作上有缺点，可以背靠背批判。

随后，周恩来要秘书给南京军区政委杜平打电话，传达上述指示。

本来，周恩来在 1 月 17 日与进驻浙江省军区的群众代表电话交谈时，就已确定江华参加北京的浙江问题会谈，于是 2 月 11

日确定，当晚派飞机到浙江嘉兴机场，接江华进京。

2 月 11 日上午，浙江省军区会议室，南京军区政委杜平召集驻浙江空五军政委陈励耘、浙江省军区政委南萍、浙江省军区副司令员阮贤榜等驻杭三军负责人和群众组织代表张永生、罗晴涛等人参加的紧急联席会议，传达落实周恩来指示，研究如何保证安全地把江华送到嘉兴机场。此前，中央已委派杜平以中央驻浙江代表的身份负责处理浙江问题。

为确保江华安全到达嘉兴机场，会议决定实行分段负责制：第一段，江华从浙江美院出来到上车，由造反派代表张永生负责；第二段，上车后到海宁盐官，由空五军负责；第三段，从盐官到嘉兴机场，由浙江省军区负责。

当天，周恩来办公室联络员宋杲来到江华所在的浙江美术学院，握住他的手说："首长，周总理派我来接你到北京。"

此时，江华坐在被关押的房间里问道："我去了，吴仲廉怎么办？"

吴仲廉是江华的爱人，时任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党组书记。他们相识于大革命时期，同是湖南人、中共早期党员，都参加过井冈山斗争、二万五千里长征，携手走过八年抗战烽火，三年解放战争，一起建设新中国，风雨同舟，共同生活了近 30 年。文革开始后，批判她的大字报、大标语也是铺天盖地。

1967 年 1 月，浙江省军区的一些老战友得知了吴仲廉遭冲击、批斗的情况，秘密把她转移到杭州疗养院。后来，又将她送到杭州附近的临安一家医院治病。不过，后来还是被造反派从临安抓回来接受批判，就呆在浙江省高院她的院长办公室里，每天扫地、

扫厕所，“劳动改造”。如有事要回家，须经群众批准。

1 月 18 日，吴仲廉请假回家拿换洗衣服。19 日早上，吴仲廉请厨师老张烹杀了一只鸡，留下半只，带了半只，又匆忙赶回了法院。可是，就在这天 17 时左右，吴仲廉却蹊跷地离开了人世。

据吴仲廉的秘书刘敬廉后来回忆：“勤务员后来告诉我：‘那天下午 5 点左右，我去给吴院长送饭、送水，进门一看，吴院长坐在三人沙发上，头伏在沙发扶手上，已死了。我吓得赶紧叫人，马上来了很多人，发现吴院长身体还是热的，就赶紧给她做人工呼吸，但已经来不及了。’事发当时，我被隔离在机要处的办公室里，我想去看一下吴大姐，但被造反派拒绝了。”

吴仲廉死后，法院内外有大字报说她是畏罪自杀，是走资派、叛徒、对抗文革……27 日，省市造反派在人民大会堂广场召开“声讨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吴仲廉大会”，还扎了一个模拟稻草人在现场批斗。同时，把省公、检、法等系统的领导也都拉来陪斗。

江华的警卫员赵连福一直不让人告诉江华有关吴仲廉去世的事情，怕他承受不了。可到这个时候，赵连福也只好如实相告：“吴大姐已经死了。”

闻听此言，江华一下子就瘫了，站不起来。在场的张永生见状，将江华背上了汽车，并一直送到机场。

谁知江华到了机场，又立刻精神抖擞站起来说自己没病。张永生感到自己受了骗，坚持要把江华再带回去。江华一听，当时脸就白了。经在场的空军人员劝说，张永生才放他上了飞机。

当晚，江华到了北京，住进京西宾馆。此后，陈毅、李先念、

谭震林分别前来看望他。江华躺在床上，默默地流泪。这些老人十分了解江华和吴仲廉。李先念气愤地在房间里不停地来回踱步，边走边说："阶级报复、阶级报复。"谭震林的话更加直截了当："文化大革命成了葬送老干部的运动"，文化大革命"搞坏了"、"搞糟了"。

江华沉默寡言，身体也显得虚弱不堪。周恩来得知情况后，遂派人安排江华到解放军 301 医院治病。

我们再说武汉。对《二八声明》的分歧还在继续。2 月 10 日凌晨 2 时 30 分，武汉"三司"、"新华工"等上千人砸了"二司"主办的武汉展览馆。武汉机械学院"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出于气愤，奔赴江汉路，砸了"新华工"广播台汉口分台。以后，观点对立的组织互砸广播台、联络站、总部办公室的现象频繁发生。武汉展览馆被砸了后，"二司"武汉展览馆总部连续几天展出了被破坏的现场。同时，"二司"也拘留、扣押了"三司"参与行动的人员。两派发生了武斗。

"武展事件"加深了"二司"与"新华工"、"三司"的矛盾。2 月 11 日早上，《湖北日报》在"红教工"、"红工兵"等的配合下把与"二司"不同观点的人全部赶出了红旗大楼。

也是在 2 月 10 日这天，中央军委根据武汉军区政委钟汉华的建议，给武汉军区发电报："请李迎希副司令员、张广才副政委立即来京，商谈问题。"

李迎希、张广才当天收到中央军委的电报，即命武汉空军调飞机飞往北京。

当秘书向一直在北京等待武汉方面消息的钟汉华报告说：李

迎希、张广才所乘飞机已经起飞时，钟汉华一拍巴掌，高兴的说："调虎离山成功了。"

李迎希、张广才于当晚飞到北京，再乘车到京西宾馆时，已是 11 日凌晨。当天，徐向前接见李、张二人，简短交谈后，要他们写一个武汉军区文革运动的情况报告，有哪些主要问题和李、张二人的意见。

李迎希、张广才的报告送上去后，2 月 17 日 ，徐向前和军委文革副组长王新亭在京西宾馆召集陈再道、钟汉华、李迎希、张广才开会。

会上，徐向前说："军委《八条命令》下来了，为什么武汉军区还稳定不下来？"

李迎希说："群众说军区党委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也不检查，因此还在闹。"

徐向前对李迎希、张广才说："你们是做了群众的尾巴。"

他又问李迎希、张广才："你们说要打倒陈再道？"

李迎希说："我与陈司令有分歧，但没有说过打倒他"。

徐向前问："是谁说要打倒陈再道？"

李迎希、张广才说："是群众这样提。"

徐向前道："群众？群众里面有坏人！"

在李迎希反映军区的情况时，徐向前屡屡打断李迎希的话。李迎希对徐向前说："你不要插我的话嘛！"

徐向前拍着桌子对李迎希、张广才说："你们的问题是抢班夺权，你们要检查！"

李迎希打开《毛主席语录》念道："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

权。”

徐向前没想到部队的老同志，他的老部下居然在他面前也学起了红卫兵的做法，生气的说：“你少来这一套。”说完，拂袖而去。陈再道、钟汉华也随徐向前一起离开会场。

王新亭对还坐在会议桌前的发愣的李迎希、张广才说：“你们呐，就是摆老资格。”

李迎希指着徐向前刚才坐的位置没好气地说：“谁有他资格老！”

会后，军委办公厅通知李迎希、张广才的秘书：“徐帅指示，李迎希、张广才二人不得外出，不得打电话及对外联系。”

同时陈再道、钟汉华下达了赶快行动起来抓人，以“稳定内部”的指示。

2 月 8 日，由西安“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主办的《革命造反报》刊登出西交大“六六兵团”的一篇攻击“西工大”的文章，同时，还刊登一篇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的文章，指责“西工大”一派批判右倾思潮是转移了斗争大方向，当前应该是大联合、大夺权。当晚，西工大一派出动几十个单位查封并接管了《革命造反报》。

2 月 10 日，陈毅接见与西安交大有分歧的“西安大专院校联合指挥部”、西安地区“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10 名代表。这次，他已不再庇护他的老部下胡炳云了，他说：

“陕西军区几个负责人作三结合的负责人都不够格了。军委决定派一个人去作军区司令或政委，你们要信任他，这是军委派去的。让解放军保卫国防工厂，保护劳动人民的生命安全，支持

你们。把军区胡炳云等几个人调到北京，接受批判受教育。你们造反派要把胡炳云个人犯错误和伟大的解放军分开。解放军是毛主席和林副主席一手缔造的。他们拥护党、拥护毛主席、拥护人民。”

“军事院校和连队的解放军要分开，因为在学校里也有造反派和保守派。”

“造反派成立统一组织，辨别谁是造反派，防止你也去夺权，他也去夺权，防止‘保’字派打起‘造反’旗号，扰乱你们的阵营。”

“关于你们西安提出的三条要求，你们考虑交大同学能否接受，我看不大可能。你们若不善于大联合，将来掌权后会给自己造成混乱，你们得考虑后果。”

“中央要我解决西安问题，我总不能公公正正，不偏不倚。总之是为了大联合、大夺权。不要掌握权之后，为自己造成麻烦。”

“你们造反派有两派，斗争这么长的时间，其他任何地方也没有。如果你们的问题很好地解决了，这标志着你们已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这是毛主席、林副主席非常关心的。在解决造反派内部的分歧上，你们给全国树立个典型，但这不是和稀泥。你们要考虑一下。不过不要用公社这个名字。上海公社《人民日报》就没转载。因为这个如果转载了，可想全国很快就会搞起来。现在革命委员会或临时委员会最好。革命浪潮越来越高。你们创造新形势，改变和防止你去接管、他也去接管的混乱局面。几个主要造反组织联合起来。抓革命，促生产。你打你的。我打我的这是万不得已的办法，交大内部的事由他们去处理。革命群众自己

会解决。我讲的话仅供参考。”

“还有个事情，春季来了，如果抓革命，不促生产，是不利的。资产阶级破坏生产，你们不要上他们的当，他们是给文化大革命抹黑，特别是农业，蔬菜，没有菜吃，人家不给你造谣？还有工业生产，你们要做些宣传。再者治安，治安北京是比较好的。北京的秩序要由造反派来维持。过去赶出去十几万五类分子，多数是对的，少数是错的。现在错了的回来。赶对了的回来还成立了造反团，我们不允许他们造反。他们造谁的反？我们还要对他们专政。”

就在陈毅接见西安代表的当天，2 月 10 日，西北光学仪器厂的两派为该厂夺权又发生武斗,东郊韩森寨国防工厂的 1000 多工人前去支援，冲击厂区，致使该厂装配车间停产，国家财产遭到严重破坏，武斗规模超出了本厂范围，成为轰动全国的“210 事件”。省军区把这一事件定为“严重的反革命事件”，把罗有、王法法等 6 人定为“现行反革命分子”，逮捕法办。

当天，陕西省军区打电报将“210 事件”向中央军委副主席林彪和中央文革小组做了汇报。

当天晚上，又有一万多名反对西工大的东郊工厂的“工总司”工人冲击 2 月 8 日晚被西工大查封并接管的《革命造反报》报社，企图夺回该报社的领导权。他们打不开门，有些人就翻墙而入把大门打开。众人蜂拥而入，高喊“工人要说话！工人要掌权！”冲入院内。当守卫报社的解放军阻止他们时，他们一哄而上，把解放军的衣服撕破，帽子、领章和腰带抢走。

西工大听说后，几乎全部出动，一路小跑来到报社，虽然抓

住几个人，但报社中支持他们观点的工人已经被绑架走了。

西安交大也出动宣传车，在大街上贴大字报和大标语，宣传西工大大搞“打、砸、抢”，“声讨西工大的法西斯暴行！”

西工大则说：“我们这是革命行动，如果硬说我们是‘打、砸、抢’的话，那这种‘革命的打、砸、抢好得很！’”

第二天，2 月 11 日，陕西省军区副司令员王明坤又用电话向中央文革小组做了更正。王明坤说：

（一）昨天晚上，我们向林副主席和中央文革发的电报，看法有问题。原来的观点倾向于西安交通大学，现在看来交大有问题，我们犯了错误。现在纠正错误观点，站到西安解放军电讯工程学院和西北工业大学这边，把西安交大排除在外，成立了“西安地区革命造反委员会”。今晚开会发表“西安地区革命造反委员会”声明。

（二）西安东郊二八工厂 10 日被该厂保守派破坏，估计半年可能修复生产。今晚又有一二万人开大会，可能是要砸八〇三厂或者冲击省军区机关。有谣传说，要在二十日以前把东郊的工厂都砸掉。对以上两个问题的处理，请中央文革迅速予以指示。

第二天，2 月 12 日中央文革办事组在编印的《要事汇报》第八号上即登载了陕西省军区副司令员王明坤的这份电话报告。

2 月 11 日，周恩来接见西安地区 8 个单位赴京代表。他在接见时说：“王任重病的很厉害。毛主席叫我找王任重回来，休养一个时期再批判。我找了 10 天都不见，昨天我才给军区下命令，限时间，今天才把人交出来。你看，连我都不相信了，这是什么问

题？无政府主义。主席命令我亲自打电话，要找王任重，有一些人还不相信，这样自由主义就泛滥到边缘了。王任重要是死了，主席找我，我怎么回答？为什么现在要发表《古田会议决议》呢？主席在 40 多年前写的东西，今天一样还很亲切，40 年前是我们那一代，40 年后是你们这一代。现在你们重复 40 多年前的错误，我心里很难过。你们只能比我们更好，如果你们比我们当初作得还差一点，那是我们犯罪。我这样说，并不是保王任重。如果传出去，有人又给我贴大字报，说我保王任重，那我也不怕。我这里说的是心里话，这样下去怎么行！”

在谈到西安的革命造反组织时，周恩来说：“力量很强大，内部问题多。西安的群众基础好，内部斗争很激烈，你们政治上不仅占优势，人数上也占优势，组织上也占优势。现在夺权斗争落后了。有共性，也有个性，各有各的特点，不过后来居上嘛！你们不要泄气。”

当谈到陕西驻京办事处与西安交大同学的争执时，周恩来说：“看你们争来争去，在这些小事上争，争鸡毛蒜皮的事情，抓了芝麻，丢了西瓜。”

周恩来接着说：“巴黎公社的原则要正确运用，滥用就成了自由化了，选出干部要稳定一个时期，对干部要给一个锻炼的机会。领导干部要稳定一些，不要不称心就换。你们这样气鼓鼓能夺权吗？我们对西安寄于很大希望。如果你们这样，必然推迟联合，推迟夺权。”

“现在要开门整风，准备夺权。”“你们的问题靠自己解决，革命靠自己，教育靠自己，解放靠自己。夺权也要靠自己。你们

现在街上互相斗，我是不同意的。你们一定要把自己的队伍真正的而不是假的锻炼成无产阶级革命左派才有力量，才能推动省、市委领导同志出来亮相，推动军区左派出来支持你们，不然你们你争我抢，他们不好表态。”“军区的问题我知道，干部中总有好的，在于你们发现。军区问题好改变，好办，哈尔滨说解放军支持保皇派，后来他们作了努力，一下子就转过来了。解放军是可以信赖的，毛主席是军委主席嘛，不管怎么样，三结合必须实现。”

## 第 497 回：抓春耕，接见农口夺权派　摸屁股，重庆两派大辩论

农业部“117 夺权”后，国务院农办、农政机关部分人按照谭震林的安排，宣布成立“国务院农林口革命委员会”，由机关“红卫兵”、“工人造反团”一派实行掌权。并模仿上海“一月夺权”的做法，发布《一号通令》，宣布机关持不同观点的群众组织为反革命组织，勒令解散。斗争的矛头主要指向农口政治部副主任秦化龙及其同情者，一些人被宣布为反革命，勒令他们接受批斗和监督劳动。

1967 年春节后，秦化龙直通中南海的保密电话被撤去，职务也被宣布撤销。其罪名是：一、执行刘少奇的资产阶级修正主义路线；二、追随苏修搞农业党；三、参加平江史编委会为彭德怀翻案；四、与反党分子张子意（中宣部副部长）、高登榜（国务院副秘书长）过从甚密。

这一切在农办、农政机关里掀起轩然大波。农口政治部大部分干部是与秦化龙一起从部队转业到这里建立政治部，加强农口政治工作的，对于秦化龙的这般处理，他们当然是很不服气，于是贴出大字报，强烈要求为秦化龙翻案，恢复名誉。秦化龙本人也上书毛泽东、林彪、周恩来，提出申诉。

2 月 2 日，北京农业大学“农口革命造反联络站”召开大会，称农办夺权是谭震林一手制造的假夺权，要坚决进行反击。

2 月 4 日，夺权派北农大“红旗”砸了反夺权派“农口革命造反联络站”和北农大“东方红”红卫兵的广播台，称中央已批准

其“夺权”。

2 月 11 日，在谭震林的安排下，周恩来把农业部、农垦部、水产部、气象局、农办等机关“权力接管委员会”的代表和“农口红色造反联络总站”的代表召集到国务院会议厅开会。分管农林口的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农业部副部长江一真等也参加。

接见一开始，周恩来就问农垦部造反派代表李朝山：你们造反派多少人？叫什么名称？造反委员会有多少人？保王震的还有多少人？他们还工作不？你们应叫他们工作。

李朝山一一作了回答。当问到夺权情况时，周恩来又问：业务是监督还是直接接管？部长怎么办？抓业务的革命生产委员会有多少人？组成人员怎么样？业务是否受了影响？

对这些问题，农垦部代表也都作了回答。

周恩来接着问：“你们承认不承认谭震林同志的领导？”

众答：“承认。”

周恩来：“总得承认中央领导嘛！王震就是典型的不承认。”“王震，主席那样保他，谭震林、李先念副总理去保他，我还在后面，他还那样闹，总那样闹就要走到反面去了。”

周恩来又说：“那次我提出让王震背靠背的检讨，叫他去休息，你们没有完全接受这一点，自己造成一些困难，现在你们胜利啦！我才给你们说这个话。在你们困难时我不说这句话。当时中央估计到要遇到这些困难，所以才建议你们采取这种办法，当然你们也受到了锻炼。不按主席的最高指示办就要造成困难的，”说到这，他指着农垦部的李朝山说：“这点你是有责任的。”

周恩来依次问了水产部、农业部、气象局的夺权情况，然后

问谭震林："像今天这样的会开了没？"

谭震林答："没有。"

周恩来说："为什么不开个会呢？要开嘛！"周恩来翻阅记录后说："农垦部夺权派占绝大多数，主要是外部冲击，水产部夺权派占优势，农业部也占优势，外面有些冲击……"

众说："气象局主要是'红旗'和农大'八一八'冲击。"

周恩来说："唔！冲中南海也是'八一八'？占着人大会堂不走的也是他们吗？"

众答："是，还有'军垦战士造反团'。"

周恩来："'军垦战士造反团'还在北京吗？他们还自称革命派？"

众说："还有气象局的'红旗'三次包围和冲中南海。农政的黄天祥也参加了，反正'农口革命造反联络站'所属的组织几乎都参加了。"

最后，周恩来问到农办、农政的夺权情况和各群众组织的情况，然后说："那你们占绝对优势了。"他又问到反对派的情况："他们不做工作吗？"

农办代表答："我们分给他们工作，他们不做。他们还说给谭震林脸上贴金的事不干。"

周恩来："那么仇恨呀！这是阶级斗争嘛！"

代表说："他们说总理 1 月 8 号凌晨在人民大会堂的讲话只能做参考。农大'东方红'有人说中央不了解情况，所以他们到处向黑帮分子收集谭震林同志的材料。"

周恩来："中央不了解情况，他了解？"

代表继续告状说："周总理讲话之后，他们继续声称'打倒谭震林'，'火烧谭震林解放全农口'，'谭震林是资产阶级革命家'，说'砍合作社是谭震林搞的'，'后十条也是谭震林搞的'。他们的大方向是错的，他们是大杂烩的组织，他们不批判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不批判斗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把矛头指向谭震林同志。"

周恩来又问了农口各大专院校学生组织的情况，然后对农办代表说："农口，你们是站一边，他们站一边，"

农口"红色造反联络总站"的代表答："他们是农口'革命造反联络站'的，他们是一砸、二抄、三抓人，搞白色恐怖。"

周恩来问："他们多少人？"

答："论各部、局的机关工作人员，他们没有我们多，若他们加上农大、劳大、气专学生，他们比我们多。"

代表们反映说："'农口革命造反联络站'，秦化龙、黄天祥是后台。"

周恩来问："秦化龙是农政主任，黄天祥是谁？"

答："黄天祥是原农政宣传部长，是三反分子，是'农口革命造反联络站'负责成员之一，他是保秦化龙的，冲中南海是黄天祥现场指挥的，他是原团中央胡耀帮智囊团里的人，有大量的、非常尖端的三反言论。"

周恩来点头说："哦，我知道、我知道。"

代表反映："农大'东方红'把廖鲁言、张修竹、秦化龙等反党分子抓去，也把我们的革命同志抓去，但待遇不同。他们要这些反党分子提供攻谭震林同志的材料。"

当周恩来问完各单位的情况后，向到会的代表说："你们农口面临夺权斗争，农口的确有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你们夺权了，也有反夺权的斗争。你们是真正的革命左派，你们胜利了。……当前春耕生产到了，你们要抓革命促生产，今晚我就找你们来谈谈，要打好春耕生产第一炮，你们要全力地抓。"

"两条路线的斗争，在农口的夺权斗争中更加尖锐化。尽管已经夺了权，但形势还没有完全决定下来，在一个单位数量上占优势，但是整个农口还不是这样。因此你们要真正的抓革命促生产。要很好地搞联合斗争。"

"以后希望谭震林同志多与你们会面，要一步一步地抓，因为我没有很多时间。""搞个像样的向全国呼吁书，真正抓革命，促生产，不是光写砸烂你的狗头，打的稀巴烂等口号就能行的。现在街上到处贴的这些标语，是和《红旗》杂志，中央文件不相称的，你们既然是革命派，你们要认真地学习，认真地工作，更好地抓革命促生产，起草个像样的呼吁书。"

当有的代表提出农大学生开除了 5 个党员的党籍问题时，周恩来说："非党员开除党员的党籍怎么成呢？"他接着说："我不仅跟你们见面，还要跟他们见面。你们是夺权派，我也要听听他们的意见。"他对谭震林同志说："好！今天就谈到这里，你来谈谈。"

谭震林说："按总理的指示办事。"

周恩来说："不是指示，是建议。"

这时江一真汇报了农业部六个直属单位的夺权情况。

接见后，谭震林对"农红总"组织所属的 5 个夺权组织的代

表说："这就意味着我们的夺权得到了党中央的肯定。"

夺权派"农红总"成了"左派"，而反夺权派"农口革命联络站"则被打成"黑组织"、"反动组织"，被强行解散。参与帮助成立"农口革命联络站"的农大"东方红"组织，自冲进中南海后，被认为是犯了错误，曾和他们一起造反的农大"红旗"到处写大字报，说"东方红"一是冲中南海，二是占人民大会堂，三是反谭副总理，犯了三项大错误。这次，这些"东方红"学生又被打成了"反革命"，还到公安局备了案。农大校园内，到处都是："谭副总理是毛主席司令部里的人！""谁反对谭副总理就打倒谁！""农大东方红反对谭副总理决没有好下场！"的大标语，从此，"东方红"在校内又一次抬不起头了。

2 月 13 日，北农大"红旗"又捣毁了农业部的"井冈山"和"红旗"等几大造反组织。

再说重庆。

对重庆"八一五"的"124 夺权"，1 月 30 日，重庆"工人造反军司令部"、"工人造反军总部"、《红岩》作者罗广斌、西师"831"及"首都三司驻渝联络站"等 40 余造反组织在上清寺人民路小学集会，表示反对。他们成立了反对重庆 "124 夺权"的"联络站"。

1 月 31 日，重庆大学"八一五"联合全市 48 个群众造反组织，与驻渝部队领导和原重庆市领导段大明、辛易之一起，开始协商筹备成立重庆市"革命造反联合委员会"，简称"革联会"。

这天，罗广斌在大渡口重庆钢铁公司向造反派工人群众作报告。当晚，"北航红旗驻渝联络站"在重庆城里发动"打倒罗广斌"的宣传攻势，到处散发传单，张贴批判罗广斌的大字报：《罗广斌

很像革命造反派内部的定时炸弹》。

由于罗广斌在“联络站”内的特殊影响，“八一五”决定擒贼先擒王，马上以“叛徒”的帽子泰山压顶，对罗广斌万炮齐轰。2月1日后，重庆大学“八一五”四处散发传单、张贴大字报，说罗广斌“历史有问题”、“是周扬黑线上的人物”、是“山城头号政治大扒手”、“埋在山城革命造反派内部的一颗定时炸弹”。

与此同时，2月1日后，“革联会”经过3天协商讨论，成立了工业、农业、计划、交通、文教卫生、武装保卫、组织、宣传、联络十个部门的革命造反委员会，暂选出37名“革联会”委员，其中又选出12名常委。然后发了一个联合公告，由各个群众组织传达到基层，征求意见。

参加1月29日大会发起和筹备组织者之一的重庆“工人造反军总部”，又参加了1月31日“革联会”的筹备会，并于2月1日上午到会参加了协商，而后就没再到会。

原来，2月1日这天，在“首都三司驻渝联络总站”的出谋划策下，重庆“工人造反军总部”、西师“八三一战斗纵队”及“首都三司驻渝联络总站”等50多个造反派群众组织，联名向中央发出“加急电”，称：

“以重大八一五战斗团周家喻为首的一些群众性组织的领导人，执行了一条右倾机会主义和右倾投降主义路线，他们完全违背了毛主席关于大联合大夺权的指示，完全违背了毛主席的群众路线，客观上迎合了黑市委的需要，于1月24日，以重庆12所大专院校学生为主体，以重大‘八一五’为核心，排斥了所有的工人革命造反组织，单方面的接管了黑市委和重庆市的全部市一

级党政领导机关的大权。”“我们认为，这不是真正的夺权，而是假夺权，这不是真正的大联合，而是在搞分裂。其实质是欺骗群众，使黑市委窃据的各种大权名亡实存，使我市文化大革命流产。”

这份电报尚未发出，已有与会者到重庆大学告密。“八一五”马上还以颜色。当天中午，“八一五”全体总动员，在松林坡礼堂开会，宣读了周孜仁临时起草的一篇揭露“联络站”反对“八一五”夺权的文章。那一天会场的气氛十分激愤，文章刚读完，群起应合，立即通过。接着印发各战斗组抄写成大字报若干，随后几千人顷刻出动，一个下午，便将全市七区三县的大街小巷全部覆盖。

第二天，2 月 2 日，反对重庆“八一五”1 月 24 日夺权的重庆“联络站”召集 50 多个群众组织开会，讨论批判重大“八一五”右倾机会主义和右倾投降主义及联合夺权问题。罗广斌所在的市文联贴出大标语：

“革联会，大杂烩！”

“要革命的三结合，不要大杂烩！”

重庆“工人造反军总部”此时也贴出了“坚决反对拉郎配的假联合！”等大标语。

西师“八三一”等组织提出“踢开重大八一五，自己闹革命”，甚至大骂“革联会”是“枪口下的大联合”，要求“砸烂革联会！”因此，这一派也被重庆简称为“砸派”。“联络站”也因为是以黄廉和罗广斌为核心组织起来的，被“八一五”戏称为“廉罗栈”。

2 月 2 日这天，周家喻任司令的“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发

出《通缉》：“抓捕罗广斌！”《通缉》上贴着罗广斌和杨益言的合照。罗广斌似乎已经感觉到自己的处境非常危险，他没有再回家。2 月 3 日，他又躲进文联一干部家里；4 日，又躲进另一家，还请别人把门锁起来；5 日，罗广斌回家取出存款，计划逃走。但是已经来不及了。这天，重庆建工学院“八一八”、西南农学院“八二六”、北航“红旗”和“哈军工”等各路人马杀进文联。罗广斌把自己锁在一间小屋内，一声不吭。文联刘德彬等人出面打掩护：“罗广斌出去了。”但从房门的锁眼里，“革命小将”看到里面躲得有人，于是踢开了门，把罗广斌抓走了。下午，他们把罗广斌送到重庆建工学院建筑物理教研室二楼看管。

2 月 6 日，重庆大学“八一五”与西南师范“八三一”分别代表“革联派”和“砸派”在解放碑举行规模浩大的辩论会。辩论双方可能当时都没有意识到，这大概是两派主要首领，当着全市老百姓的面，最后一次仅仅用语言进行的平等较量。

“革联派”主辩人为重庆大学周家喻、秦安全、熊代富，“砸派”方主辩人为西南师范的周荣及其他成员。其日春雨霏霏，寒意犹浓，而解放碑四周的街道上人山人海，热气腾腾，气氛空前火爆，连楼房上全都是人头攒动。客观地说，作为文科高材生，周荣是极具辩才的，但在工科学生逻辑严谨、不紧不慢的对抗面前，他却越来越力不从心。开始，主席台下四条大街一直阒无人语，所有人都神色专注屏息静听。辩论至一半，周围大楼的窗口便陆续挂出大标语：

“砸派毫无道理！”

“革联会好得很！”

“815 好得很！”

继而听众开始向“砸派”辩手起哄，听众山呼海啸般的喊叫宣布大会以“革联派”大获全胜而告终。

重大“八一五”有个专业的辩论组，番号为“101 部队”。组长叫柴天祺，动力系五年级学生。他曾经介绍说：辩论成败，很重要是事前要组织好听众，一定要让同一派的听众坐前面，辩论过程中要不停给对方辩手提问题、递条子、甚至起哄，千方百计扰乱对方思路，破坏对方情绪。柴天祺讲了一个非常有趣的故事：有天他和首都“三司”一位女辩手辩论，题目自然是关于以周家喻为首的重大“815”右倾诸问题。辩论中该女辩手模仿毛泽东一贯的口气，说一句气吞山河的话：“周家喻的老虎屁股摸不得吗？偏要摸！”由于被台下精心组织的听众搅昏了头，该女士一急，把“老虎”二字说漏了，上面的话就成了：“周家喻的屁股摸不得吗？偏要摸！”柴天祺马上提醒女辩手，说：“周家喻是个男生，你摸他的屁股不合适吧？”一阵大笑顿时把这位北京人哄下了讲台。

大辩论的失利，加上罗广斌这一位精神领袖被抓，对反对“革联会”的“联络站”下边群众组织打击是很大的。参与“联络站”的组织三三两两，悄然退出。

“革联会”又经过 3 天讨论，起草了一个公告，经 200 多名代表讨论通过后，于 2 月 8 日，重庆“革联派”正式发表《重庆市革命造反联合委员会公告》，宣称：“重庆市临时最高权力机构——重庆市造反派联合委员会成立，负责行使重庆市的党政财文大权。”公告号召造反派继续全面夺权。解放军重庆警备司令部政

治部副主任刘润泉出任“革联会”主任，副主任有重庆大学“八一五”的政委熊代富、财贸“八一五”的王绍川、原重庆市第二商业局副局长徐正身。常委 12 人，除军队代表 2 人和领导干部重庆市第二商业局党组书记兼局长徐正身 1 人外，其他名额分配给：“八一兵团”阳增泰，“二七战斗团”王庭学，重庆工人“九八战斗团”陈万明，红岩“八三一战斗团”1 人，“红农八一五”赵行贵，“革命农民造反军”艾启贵，财贸“八一五战斗团”王绍川，文艺界“革命造反司令部”谭柏树，重庆“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熊代富。

## 第 498 回：命多舛，罗广斌跳楼身亡　“革联会”，成立大会出情况

2 月 10 日，曾经影响新中国一代人的著名小说《红岩》的作者罗广斌自杀身亡。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2 月 6 日晚上，罗广斌被转到大坪马家堡后勤工程学院，即代号为“242 部队”的八一楼三楼，由建院“八一八”和西南农学院“八二六”红卫兵看管，强迫他写“认罪材料”。

罗广斌虽尽量镇静，但内心极度不安和惶恐可以想见。他不能预测这些无法无天的“小闯将”将如何处置他。他多次向看守他的人发问：“你们不会把我当作敌我矛盾吧？工作组也最多把我划为三类干部，当成内部矛盾！”

罗广斌也弄不清楚抓他的人是谁，向看守打听：“你是重大‘八一五’的吧？是学生吗？”又自言自语：“不，你不是学生，你是干部！”罗广斌外表镇定，显得很有修养，但又明显表现出身陷虎口的无奈。他对看管他的人很谦逊，要做什么事，总是先问“可以吗”？然后说“谢谢”。因为他已猜到看押他的是瞎胡闹的学生娃娃，他要用自己的文明行动使红卫兵知道他不是坏人。但一旦屋内来了身份不明的生人时，他就立即停止做自己的事，眼睛一直看着来的人离开为止，处处表现出内心的不安。2 月 8 日，“242 部队”广播了《罗广斌该抓》的广播稿，这个广播稿绘声绘色地披露了罗广斌成为“叛徒”的细节，声调激昂地说：“罗广斌这个大叛徒，是重庆黑市委组织部长肖泽宽包庇下来

的……罗广斌打着‘造反’旗号跳出来，完全是铤而走险，孤注一掷，妄图伺机为四川和重庆的‘走资派’翻案！”罗广斌再也支撑不住了，他不断地写他狱中生活和怎样出狱的交代，写写停停，一支烟接一支烟地抽，显得极端烦躁。他几次想向看管他的红卫兵申诉、辩驳，但红卫兵不理他……他只好闷着头抽烟。直到 9 日晚上。看押他的红卫兵发现他深夜 12 点才上床，整夜翻来覆去，睡不安宁。

杨益言、刘德彬没法在重庆营救罗广斌，便于 2 月 9 日，由北京大学侯均初、中央美术学院附中余刚勇等学生护送，杨益言乘吉普车逃离重庆经贵阳上京告状。

10 日上午 8 时半左右，罗广斌在三楼卫生间小便和洗脸，建院“八一八”一个姓张的同学在厕所外守候他。罗广斌把他的大衣、围巾、帽子，脱下来挂在厕所墙上，把钢笔、手表放在大衣袋里，然后爬上窗台。姓张的同学在门外守了约一、两分钟，不见罗广斌出来，转身进门。一看，罗广斌已在窗台上弓身欲跳了。他急忙喊了声：“你要做啥子？”

罗广斌高喊一句：“共产党万岁！”冲着三楼下的一块石阶就跳了下去，脑袋砸在石梯坎上，当即头破血流，脑浆四溅……著名作家罗广斌在“革联会”一派的关押地，马家堡解放军后字 242 部队，即后勤工程学院，就这样跳楼自杀了，年仅 43 岁。“革联会”一派随即宣布其为“畏罪自杀”。

关押他的屋内，罗广斌留下了一本《毛主席语录》和一封写给江青的信，上面的大标题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我的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从罗广斌死后所摄照片看，他右侧半边脑袋摔得稀烂，

面部有一裂口，大约 27.5 厘米长，由颈部后缘至面部鼻尖，左眼瞪得挺圆，其状十分惨烈恐怖。可想他一定死不瞑目！

罗广斌是“自杀”的吗？罗广斌的夫人胡蜀兴，始终认为罗非“自杀”。据马识途说：“在罗广斌死的前一天，有人送来一张罗广斌亲笔写的条子。条子上说，他一切还好，要她带钱和粮票去。看样子他是准备长期斗争下去的，哪里有一点自杀的迹象呢？他在自认必死的国民党监狱里，还总是那么乐观和活跃，现在不过是造反派抓了他，他凭什么要自杀？”胡蜀兴和战友杨益言、刘德彬等人，事发后上北京告状，坚持认为“罗广斌是被重庆地区的反革命势力谋杀的”。主要依据是罗广斌惨死的现场情景，其脑袋破碎，仅存的一只眼睛圆睁，似在愤怒抗议……

罗广斌的自杀丝毫也没有影响重庆文化大革命的进程。2 月 11 日，“革联会”一派的四川“工农兵业余文艺革命造反兵团重庆分团”进驻重庆市文联实行反夺权，并宣布文联“造反军前哨支队”等 3 个反“革联会”的组织为“反革命组织”、“保罗组织”，勒令解散。罗广斌已被宣布为“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的反革命。

这天，重庆“工人造反军”、西师“八三一”等组织听说 2 月 12 日重庆警备区和“革联会”要在大田湾体育场召开重庆市“革联会”正式成立大会，便在当天晚上组织几千人冲进了大田湾体育场，赶走了守卫的解放军，破坏会场布置，撕毁标语……担任会场保卫工作的重庆大学“红号兵”组织立即带人赶到大田湾，看到“砸派”来了那么多人，有些人动摇了，问会还开不开？重庆大学“红号兵”带人冲上主席台，又在解放军的配合下冲进了

广播室，抓了“砸派”的人。整理好了大会会场。

2 月 12 日，重庆市“革联会”正式成立大会在大田湾体育场如期召开，重庆警备司令部政治部副主任刘润全任主任。

重庆“工人造反军”、“西师八三一战斗纵队”等组织再次到场造反，经奋力冲撞，终于占领了会场一角。“革联会”警卫“红号兵”、重大“八一五”等一批壮汉呼喊着：

“政权就是镇压之权!”

“没有什么力量能阻挡我们!”

他们在一片欢呼声和军乐声中高举“革联会”红旗冲过去，抓了一批人。

当晚，西师“八三一”到《重庆日报》社抄砸大会报道铅版，双方人员再次发生冲突，伤十多人。

原《重庆日报》报头是邓小平题字，夺权后，便在鲁迅手迹里集字，拼成《新重庆报》的报头。《新重庆报》欢呼“新山城”诞生，几个“八三一”撕毁了几张报纸，公检法以撕毁毛泽东像为由，对“八三一”为首人员实行了抓捕。军队旋即开入报社实施警卫。

以后几天，西师“八三一”美术系在各大街上贴出《大杂烩，拉郎配》的漫画：周家喻穿着裙子，高跟鞋，脸蛋上涂抹着两块红姻脂粉，婀娜妖艳，拉一个李逵似的嫖客，男人不干，嫖客要熊代富，不要周家喻。围观的群众里三层外三层，全市轰动。

街上到处散发《伪革联之歌》的传单：

铜制的大印，

铁制钥匙，

这就是伪革联夺的权，

大印 不能抛，

钥匙不能甩，

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快把辛易之结合过来，

不准工人、农民来夺权！

滚开！滚开！

靠边！靠边！

这个“好得要死”的伪革联，

永远屹立在石桥铺那边，

石桥铺那边，

石桥铺那边，

石桥铺那边！

2 月 10 日，重庆军工企业江陵厂“红旗”兵团串联军工系统“赤卫军”，重新成立“军工造反兵团”。“军工造反兵团”除人多外，还有党员多、干部多、转业军人多的特点。

“革联会”筹备成立的消息刚一传来，“军工造反兵团”的康云鲍就提出：“军工造反兵团”要申请加入“革联会”。这个意见得到大家一致赞同。随后，康云鲍写了一个申请加入“革联会”的报告，叫上“军工造反兵团”的李木森一起，到人民大礼堂对面原市人委办公楼，去找“革联会”筹备组，递交了申请报告。接待的人叫他们 3 天后来听研究结果。

过了 3 天，他们再去，却得到了令人不满意的答复：因为已进入“革联会”的国防系统“八一兵团”不同意“军工造反兵团”加入“革联会”，“革联会”筹备组正在给他们做工作，要李木森他们再等两天。

李木森和康云鲍耐着性子等了两天再去，“革联会”筹备组主要负责人、财贸“八一五战斗团”的王绍川接待了他们。他首先对“军工造反兵团”申请加入革联会表示热烈欢迎，其次，“八一兵团”的思想工作还要做，不过要在一两天内做通是不现实的，但是也不能等到把思想工作做通了才让“军工造反兵团”加入。他们已经同“八一兵团”主要负责人谈妥了，先让“军工造反兵团”参加“革联会”成立大会，会后再继续商谈加入“革联会”的具体细节问题。

康云鲍和李木森对这样的安排当然表示感谢。

2 月 12 日，在“革联会”成立那天，“军工造反兵团”按照筹备组的要求，组织了 1000 人的队伍前来参加大会。他们身穿整齐的劳保服，胸佩红底黄字的胸章，由无线电厂选出的一个身强力壮、人高马大的大汉何汉瑞为旗手，高举着鲜艳的“军工造反兵团”的大旗走在前头，后面的队伍在“一、二、一”的口哨声中，踏着整齐的步伐，高呼着口号：

“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向重大八一五学习！向重大八一五致敬！”

“八一五好得很！”

“革联会好得很！”

……

雄赳赳气昂昂地绕场半周，在会场上其他组织的热烈掌声中，来到足球场中的指定位置，旗手何汉瑞在工作人员的带领下，把大旗插到了大会主席台旁边。1000 名“军工造反兵团”队员，无不感到光荣和自豪。

不料，才兴奋了一会儿，他们忽然发现，他们“军工造反兵团”的大旗竟然成了一些人的袭击目标！在主席台上，几个人围着“军工造反兵团”的大旗在激动地争吵，有人开始抓旗杆，扯大旗，何汉瑞拼命护旗，与那伙人撕拉推扯，只见那大旗歪了又正，正了又歪……

台下“军工造反兵团”的人愤怒了，一齐高喊着：“不准打人！不准打人！要文斗不要武斗……”

但是，他们还是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大旗被人扯下来撕碎了，撕旗的人就是当天的大会执行主席，“八一兵团”的负责人。

何汉瑞紧仍然抱着那根光旗杆，顽强地站在主席台旁，最后，终于无法站立，慢慢倒下……

他被大会工作人员送到附近的工人医院去了。1000 名“军工战士”当时没有造反，开完了这个庆祝大会。

大会结束后，这 1000 名“军工战士”，气冲冲走向市人委那幢旧大楼，把“革联会”筹备组围了个严严实实。康云鲍代表他们，进去向“革联会”提出抗议，要求“革联会”主持公道，追查打人、撕旗这一严重事件，惩办凶手及幕后指挥者……

刚成立的“革联会”，没想到会遇到这样一个“群众斗群众”的难题。“革联会”常委中的许多人，都认为“八一兵团”个别头头的做法不对，希望他们能出面向“军工造反兵团”赔礼道歉。

但是“八一兵团”坚决不答应。僵持之下，“革联会”迟迟不能答复。“军工造反兵团”留下一些代表，坚持了整整 48 小时。后来被称为是“静坐示威”。

最后，还是王绍川代表“革联会”出来向“军工造反兵团”表了个态，大意是：“军工造反兵团”参加“革联会”成立大会，是“革联会”同意了的，打人、撕旗肯定是不对的。经“革联会”研究，决定派专人前往“八一兵团”总部做工作。在适当的时候，请你们两大总部负责人到“革联会”开会解决这一问题。

“八一兵团”始终拒绝派人与“军工造反兵团”商谈。因为其负责人是“革联会”常委，“军工造反兵团”认为“革联会”偏袒“八一兵团”，因此对“革联会”也很有意见。

反对“革联会”的“联络站”意识到“军工造反兵团”是纯正的产业工人，在军工系统势力强大。他们的负责人闻听此讯后，立即于 2 月 12 日当天赶到江陵厂。

“军工造反兵团”勤务员高德安、傅之光等人见“联络站”代表到来，大喜过望，双方恳谈，观点很快达成一致。

“军工造反兵团”总部开了 3 天会，“兵团”一级的主要勤务员都来了。大家一致赞同反对“革联会”。会后，“军工造反兵团”大反“革联会”，加入“砸派”行列的油印传单，就满天飞舞了。

组织上，黄廉提出“军工造反兵团”加入“工人造反军”。军工忌讳“工人造反军”是些乌合之众，提出与“工人造反军”并列；其他组织也不想“工人造反军”山头垒大，同意“工人造反军”、“工总司”、“大专院校红卫兵”等几大总部并列。5 个小时

后，协商一致。

2 月 13 日，山城又贴满了“军工造反兵团”的大标语：

“八一五右了，修了！”

“砸烂伪革联！”

“军工造反兵团”以后演变成强大的“军工井冈山”。

## 第 499 回：河南乱，新疆参谋长被斗　赴甘孜，“炮轰团”终被轰跑

2 月 10 日，新疆军区的造反派批斗了新疆军区参谋长何家产，给他戴上高帽子。经中央军委批准，新疆军区拘留了这一事件的策划者和肇事者。

第二天，2 月 11 日，新疆“自治区夺权指挥部”组织几千名学生和群众包围了新疆军区大院，要求军区将何家产停职检查，把军权交给支持造反派的军区领导人。当天，中央军委给新疆军区发去明电：

新疆军区并转全体指战员和革命师生，革命群众：

新疆军区对公然违抗毛主席批准的中央军委命令的分子执行纪律是完全正确的，全体指战员，革命师生，革命工人，革命干部都必须支持这个正确的措施，希望所有包围新疆军区机关的革命群众，都自觉的回到本单位去。向违抗中央军委命令的现象作坚决斗争，否则一切后果，由冲击新疆军区的人员负完全责任。

中央军委

1967 年 2 月 11 日

收机，11 日 23 时 50 分

译出，12 日 0 时

中央决定将支持造反派的军区个别领导人和四个部长调北京学习。这次事件得以平息。

2 月 11 日当天，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还发出《关于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文化大革命的规定》，宣布对新疆建设兵团

实施军管，建设兵团各级均不实施夺权。规定“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在军事管制下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地方上任何革命群众组织和个人对兵团的文化大革命不许干预和串连”；除大中学校、医疗单位、文艺团体和科研部门外，“其余所有单位一概不搞夺权斗争”；“所有武装部队，只进行正面教育，不搞‘四大’，以利战备”等。

2 月 13 日，新疆军区副司令员张希钦宣布军区文工团“喀喇昆仑”等 6 个军内群众组织为“反革命组织”。从此，一直到 5 月，新疆先后开始了“二月镇反”、三月军队“支左”和军管，新疆的造反派开始受到镇压。自治区、新疆军区、和建设兵团领导丁盛等人支持的新疆“八野”、“联总”、“工农革委会”和“红促会”等多数派组织，大规模抓人、打人、捕人。那些在“石河子 126 事件”中的参与者及家属，有的被批斗，有的被关押，有的扣发工资。石河子总场还为“八野”召开声势浩大的万人平反大会，会场周围架设轻重机枪和 60 炮，31 个“造反团”头头和骨干被批斗。会后，游街示众，开除公职，认罪检查。新疆军区以“126 肇事者和凶手”的罪名，共逮捕了 46 名“罪犯”，关押长达 6 年之久。

我们再回到中原河南。蒯大富 1 月 30 日的声明，对清华大学唐伟在河南的活动没有丝毫的影响。2 月 2 日，唐伟与郑州工学院“革命造反队”和“中医学院八三一”等组织召开“河南省革命造反派总指挥部”筹备会议，简称“河南造总”。副省长李庆伟、齐文俭批给筹备会 5000 元活动经费，调省委的吉普车、司机供他们使用。会议得到了河南省军区第二政委何运洪和河南省委副书

记赵文甫的支持，河南省军区在会上再次明确表态，坚决支持“清华井冈山驻郑联络站”，坚决支持《27 个为什么》。

自视甚高，一直以河南运动领袖地位自居，且势力很大的“郑大联委”等组织，对 1 月 30 日《河南日报》的易手岂能甘心？他们决定要“夺回极为重要的《河南日报》，坚决打击保皇派的嚣张气焰。”于是，以高校红卫兵组织为主体，郑州大学“郑大联委”、河南医学院“东方红战斗团”等组织，与《河南日报》的“天不怕”组织联系，制定了“反击”方案。2 月 5 日，“郑大联委”等几个组织出动上千人，声势浩大地冲进《河南日报》社，将占据报社的郑工“革命造反队”一派人员再度赶走，控制了《河南日报》社。在这场冲突中，双方发生武斗，有人受伤，矛盾进一步激化。

2 月 7 日，郑大“联委”、河医“东方红”、粮院“联委”、“豫农红总”、国棉六厂“工人赤卫队”、郑大附中“红旗”、新乡“八一八”、洛阳“八一六”等全省 74 个群众组织联合成立了“河南二七公社”。第二天，河南省军区即派出“安二型”飞机向全省散发不支持“二七公社”的《严正声明》。

《严正声明》排好大样后，河南省军区政委何运洪说：“这个声明要印几十万份，要派飞机散发。”“要再搞几个团来，搞一次更大规模的游行。”“下一步就是镇压反革命了”。

《严正声明》已公布，“河南造总”等组织立即成群结队到军区报喜，表示拥护军区的《严正声明》。

2 月 9 日，郑大“联委”、“造委”、“东方红公社”召开会议，听取赴京调查刘建勋问题的同学汇报，根据刘建勋到北京后

的表现和北京几个主要造反派组织对刘建勋的看法，统一了认识，决定保护刘建勋。2 月 10 日，“郑大战斗师”在行政楼开始活动。社会上出现许多针对党言川的铅印大传单，如：《党言川是个政治大扒手》、《揭开河南省委收买党言川的内幕》等。这些传单大都是以刘建勋、文敏生、纪登奎是省委“走资派”，党言川是省委的“御用工具”、“保皇派”等为内容。

2 月 10 日，河南省委代理第一书记文敏生给中央文革小组的写信反映情况说：“河南郑州市各大专院校无产阶级革命派原早已取得绝对优势。但自元月中旬起即开始分裂为两大派。在元月三十日河南省军区和人民解放军驻郑部队举行了游行之后，斗争即转移为以军区为中心展开了。一派支持军区。军区和另一派则处于对立。斗争十分尖锐，工人、农民、机关干部也参加了。不仅郑州市如此．据说开封等地也有类似情形。我认为斗争锋芒应该是对向省、市委，但目前不是这样的。河南省委目前已完全处于瘫痪状态，我除虚心听取和接受广大群众的批判斗争并老老实实向群众检讨认错外，只要有一点可能还要按主席的教导站起来为党工作。现在我诚恳的请求中央文革小组能派人来郑州。对当前运动予以指导，以便早日实现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完成夺权斗争的历史任务”

2 月 13 日晚，郑州大学“联委”、“造委”、“东方红公社”三组织召开合并大会，统称“郑大联委”或“郑大革联”。14 日，党言川接到清华大学“井冈山”负责人蒯大富支持“二七公社”的电报。接着，北京和全国许多著名的造反派组织都发表《严正声明》，表态支持“郑大联委”和“河南二七公社”。

这时，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的文化大革命也进行得如火如荼。早在 1966 年 10 月中旬，在四川大学“8.26”总团辩论大会上，就有人提出：凉山州、甘孜州、阿坝州这三个民族自治州和雅安专区的文革尚在起步，“8.26”应派人前去这“三州一专”组织发动文化大革命。在辩论大会上，分析起形势，一个个初出茅庐的大学生，均摆起“政治家”、“战略家”的风度，大谈“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以开辟“革命根据地”为己任，大有“舍我其谁”之风范。

受甘孜州“工人造反兵团”组织的邀请，怀揣开辟“三州一专革命根据地”的壮志，1966 年 11 月，四川大学中文系学生王恳带了十多个“8.26”战士，奔赴康定。

到了泸定，恰巧碰上“研究生长征队”。这支队伍，由四川大学研究生、搬迁到峨嵋县的唐山铁道学院研究生、四川医学院研究生、清华大学研究生及少数本科生组成，100 多人，为首的是四川大学生物系研究生王喜忠。他们沿着红军长征路线，一步步走过来的，纪律严明，每到一地，都要进行文艺演出，宣传毛泽东思想。

由于“研究生长征队”对当时全国的造反形势不太了解，王恳便以“革命学生要投身文革，要誓死保卫毛主席”等言进行劝说，并批评他们：“名为长征队，实是文革当逃兵”，最后把这只研究生长征队一起拉向康定。和他们共同组建了“成都革命造反派康定炮轰团”，王喜忠和王恳是勤务组主要负责人

“炮轰团”喊着“炮轰省市委”、“打倒李井泉”、“炮轰甘孜州走资派”等革命口号，列队，威武雄壮地开进康定城。

“炮轰团”深入机关、学校，接触群众，发现群众反映最多最大的不是走资本主义当权派的问题，而是“四清工作组”整群众的问题。很多群众一觉醒来，发现自己已经是“三类”人或“四类”人了。群众强烈要求这些定类材料公之于众。“炮轰团”决定以此为突破口，一来发动群众，二来赶跑四清工作团。

“炮轰团”要查抄这类材料，称之为“黑材料”。而当局以“党的秘密”、“档案材料”为由，拒不公布和交出。于是，“炮轰团”静坐示威康定县人大，要与四清工作团分团长李英对话。李英就是不下楼，但是迎来了官办保皇派组织“贫下中农革命造反团”，这是以四清运动中的积极分子为骨干组成的，大多为苦大仇深的贫下中农和四清中的基层代表，以居民和农牧民为主，多是老大爷、老太婆。他们人多势众，分割围攻“炮轰团”。“炮轰团”逼不得已，宣布“绝食”斗争。李英怕事情闹大承担不了责任，不得已下楼与“炮轰团”见面，被“炮轰团”请上一辆大货车，直接开往成都，说是要借成都大好革命形势教育教育他。四清工作团的“黑材料”也随即被封。

顷刻间，县人委大院乱成一团。一张大字报贴了出来：《把绑架李英的黑手揪出来示众》。县城内更是谣言四起，保皇派四处串联，发誓要把“李部长”解救回来。他们立即组织了精兵强将，追到雅安，在那里把李英解救回康定。

这就是李英事件。时间是 1966 年 12 月 30 日。

李英本人不承认被绑架，说也没有受迫害，是他自愿随“炮轰团”去成都的。后来，四清工团被赶跑了，群众开始动起来了，甘孜地区受“炮轰团”发动、影响形成的造反派组织，统称“炮

轰派”。

有人向“炮轰团”告密，说时任四川省副省长、民委主任天宝才是甘孜州最大的走资派，康定的走资派，根子在天宝，甘孜州的干部，不过是执行问题。学生们听说有最大的当权派可斗，那是多么鼓舞人心呀！于是，“炮轰团”的王恳立即返回成都，准备揪天宝回康定批斗。他在成都民委找到天宝，但总觉得他不像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

天宝个子不高，一米七左右，较瘦，汉语、藏语都很流利。文化似不太高，说话直率，不绕弯子，想什么说什么，不说一句留半句，没有官僚味。传说，长征中他是毛泽东的马夫。

但是感觉毕竟只是感觉，革命就是革命，不能用感情代替政策，王恳还是对天宝下达了“命令”，要他尽快回康定接受群众批判，正确认识文化大革命，跟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前进。

天宝态度很好，表示坚决拥护文化大革命，愿意接受群众批斗。回到甘孜，天宝召开了甘孜州县委书记会议，要求领导干部不要与文化大革命对立。他自己也明确表态，支持“炮轰团”。

1967 年元月 6 日，“炮轰团”与康定的“炮轰派”公开批斗天宝。天宝态度极好，再次公开表态支持“炮轰派”。他在检讨时说：“过去把自己看作是党的化身，反领导就是反党，听不得反对意见，这不符合毛主席教导。”他向“炮轰团”建议：“要多宣传，深入群众，多做解释、教育工作。”

天宝还对保守组织的人动员说：“不要保我了，你们应该起来造反！”

康定的一月夺权，一则“炮轰派”势力大，二则有天宝的支

持，似乎表面上还顺利。但甘孜地区的政权毕竟不是天宝一个人能说了算的，反夺权的巨大洪流，依然是滚滚而来。泸定县委的负责人决意把权交给“信得过”的“贫下中农造反兵团”。于是，在县领导授意下，“贫下中农造反兵团”一举夺了泸定县党政财文大权。

造反派当然不承认这种夺权，组织反扑。泸定县“炮轰派”力量较弱，便向康定“炮轰派”求援。康定“炮轰派”立即支援泸定，并且要天宝一同前往泸定，欲借天宝否定泸定保守派夺权，压服县委干部。

天宝真的表了态，但没有用。泸定县人武部定性“炮轰派”是反革命组织，并向天宝发出“警告信”。接着数十辆军车出动，一个营的部队开到了泸定。公安人员虽穿便衣，仍十分活跃。贫下中农打先锋，一场大抓捕开始了。

在泸定水运处二楼的“炮轰派”处，他们抓出天宝，几掌打下楼来，五花大绑起来，当即宣布逮捕天宝，然后广播说“天宝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三反分子”，党中央批准逮捕天宝。1967 年 1 月 28 日，一天时间，这里绳捆索绑了 783 个“反革命”，其中 130 多人当即关进监狱。

“炮轰派”当然不甘心，纷纷上京告状，同时还寄希望于成都“8.26”派，希望依靠他们扭转康定泸定的文革形势。

从康定泸定跑出去的“炮轰派”在成都大造舆论，说泸定“1.28”事件是公然反对中央文革，公开镇压造反派。成都造反派积极筹划，组织了一个“解放大西南调查团”，有 180 余人，浩浩荡荡，威风凛凛，奔向康定。还有“028”赴康调查人员，“雅

安调查团”等等。都是些能征惯战的造反派。

然而，在军分区、武装部等部队支持下，泸定的老百姓与这些“调查团”展开了“大辩论”和“大围攻”。围攻的对象是“炮轰派”、“调查团”，特别是外来大学生。围攻者是甘孜州贫下中牧民，居民积极分子，一批接一批，而被围攻者则不让你吃饭睡觉休息。围攻者的提问、辩论有人教导、训练，千篇一律。围攻并不打人，最多也就是朝你吐口水，“行转转礼”——即把被围攻者左右前后拉转向毛主席请罪，向贫下中农道歉。

贫下中农嫂子、老太婆们，脑壳上盘着红头绳，戴着绿军帽，带着红袖章……那一身革命打扮，除了康定泸定外，恐怕全国都找不着。也有不少穿藏族服装的老太婆。她们把你围住，说是要实行大辩论，然后质问：“你为什么要造反？为什么要反党反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和我们贫下中农站在一边？”

王恳，号称“铁嘴”，是个能言善辩的明星，成了围攻的主要目标，硬是被不停地“辩”了 8 个小时。有一次行转转礼，转得他头昏脑胀，干脆坐在地下装死狗，任你怎么拉怎么吐口水也不起来。最后，“王铁嘴”也只得甘拜下风。摘下被唾沫浓痰沾糊得看不清东西的近视眼镜，向革命阿婆们告饶说：“我几天没洗脸了，谢谢你们的口水，帮我洗了一个干净的脸，我饿了，饶了我吧！”后来，还是“炮轰派”强行冲入，把他解救出来。这以后，看见几十个大嫂、太婆找人“大辩论”，他便急急逃之夭夭。有一次，他坚持不承认自己是王恳，说“王恳在幕后指挥，早跑了，我是无辜的，被王恳这个大坏蛋蒙蔽了……”居然蒙混过关，如丧家之犬，逃回成都。

在“大辩论”、“大围攻”、再加上大抓捕的围剿下，这些气冲霄汉的“调查团”在泸定纷纷如丧家之犬，铩羽而归，逃回成都。遂后又有“川医医疗队”开赴泸定，同样落得如此下场。

# 文革史话

## 之第三部 全面内战 第四卷

刘朝驹 著

# 文革史话

之

第三部

# 全面内战

第四卷

# 目 录

第 500 回：独断□，二一一涪□生变　大□捕，成□军区□围攻.....1
第 501 回：声声□，叶帅“请教”□伯□　传批示，军委碰头会结束.....12
第 502 回：举大旗，众劳模出山□反　回大寨，□永贵昔□夺权.....22
第 503 回：□北京，毛泽东接见张、姚　承受□，□伯□痛不欲生.....31
第 504 回：周恩来，接见哈尔滨代表　“密杀令”，细了解江苏事情.....44
第 505 回：派专机，中央召云南代表　大换□，学生突审张□天.....55
第 506 回：□不满，谭□林□怀仁堂　汇报后，毛泽东只说四条.....67
第 507 回：继续讲，□毅接见留学生　气□消，谭□林愤笔书信.....79
第 508 回：再接见，内蒙古四方代表　□宵谈，勿将矛头指军□.....90
第 509 回：见群众，总理□走杜向光　讲监督，恩来再提老干□.....102
第 510 回：发社论，支持福建□先楚　谢富治，督促北京大联合.....111
第 511 回：《出□论》,《中学文□报》出版 争相购，北京城为之□动.....123
第 512 回：接大宾，朱成昭地□检查　军委信，成□抓捕“八二六”.....136
第 513 回：攻报社，□州市万众空巷　开封打，河南实施大□捕.....147
第 514 回：见张、姚，周恩来再谈夺权　保肖华，江□、王力看林彪.....162
第 515 回：发社论，要正确对待干□　说夺权，周恩来见国□口.....170
第 516 回：毛泽东，深夜发□□之怒　调干□，充实中央专案组.....180
第 517 回：二一八，南京军区大抓捕　同一天，武汉军区发声明.....189
第 518 回：“红武兵”，“职工联合会”解散 牢房满，涪□城宣布戒严.....198
第 519 回：二二二，万县市枪声大作　夜半渡，谢英富□离宜宾.....210
第 520 回：渝□反，川大“八二六”□会 接尚奎，桂“工总”开□整□.....224
第 521 回：做工作，广西《二一九声明》 抓春耕，“新北大公社”成立.....234
第 522 回：看贵州，“叫□命委员会好”　保穆欣，肯定山东省夺权.....244
第 523 回：□稳定，西安分“东”“西”两派　《群丑图》，众□导明确叫停.....254
第 524 回：砸汽□，□春“公社派”瓦解　围报社，□海省形势紧张.....265
第 525 回：二二三，枪响在湟水河畔　现场惨，众群众血泊尸横.....275

第 526 回：西宁市，牢狱内人满为患 维系□，广东“省□联”解散.....285
第 527 回：为春耕，周恩来写信检讨　海军乱，围报社“□楼事件”.....297
第 528 回：几周折，上海□委会成立　生活会，□、谭、徐接受批评.....307
第 529 回：□便谈，欲了解云南情况　批剑英，晏章炎揭发贺□.....322
第 530 回：赵健民，见康生□说想法　武汉市，看“工总”纷纷请罪.....335
第 531 回：说无□，许世友设宴压惊　生活会，中央支持□夺权.....346
第 532 回：抓□西，周恩来语□心□　搞整□，西安似乎趋平稳.....357
第 533 回：周恩来，接见工交口代表　水电□，汇报夺权后工作.....366
第 534 回：再听取，冶□、化工□情况　抓生产，责成军□要负责.....377
第 535 回：说新疆，众人保肖华检查　苏军管，师大炮□谭□林.....388
第 536 回：剩一派，党言川河南被捕　命令下，定张、梁入主四川.....400
第 537 回：“打□□”，□庆市抓抄“砸派”回山城，□廉下□即被抓.....413
第 538 回：搞联合，天津军训团探索　抓军训，毛泽东“三七批示”.....422
第 539 回：出经□，延安中学成焦点　反“□流”，北京冲击农展□.....432
第 540 回：成“英□”，赵永夫介绍经□　分别见，内蒙古两派代表.....445
第 541 回：谈意义，康生系统批《修养》再批□，章士□斡旋毛、刘.....460
第 542 回：访北航，公开“打倒谭□林”　“红中会”，中央查“□海事件”
.....471
第 543 回：周恩来，说全国军管形势　大游行，北京反“二月□流”.....487
第 544 回：□仁杰，“反□流”主政复旦　安徽省，夺权后也分两派.....497
第 545 回：“三一五”，合肥游行大冲突　浙江省，下文件决定军管.....507
第 546 回：五羊城，也开始“三月□反”　下决心，广东省宣布军管.....515
第 547 回：有信心，毛泽东不怕混乱　戚本禹，动员范正美让位.....526
第 548 回：在军□，肖华布置批刘、□　周恩来，见国□科委代表.....536

## 第 500 回：独断□，二一一涪□生变　大□捕，成□军区□围攻

在“一月风暴”中，四川省涪陵地区造反派也找到了“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的那种感觉，享受到了“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革命，即无产阶级消灭资产阶级的革命”胜利的欢乐。凭着那种感觉，享受着那种欢乐，在那个“盛大的节日”里，涪陵的中学红卫兵积极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只要有哪个单位的群众组织来报信、来要求，他们都会和那个单位的造反派喊着口号，奔到那个单位“揪出走资派”，勒令立即交出大印。

为了夺回被“走资派”掌握的涪陵县委大权，涪一中“红卫兵 11.11 革命造反战斗队”的负责人罗成胜在发表了一通慷慨激昂的演说之后，高呼着口号，带领着学生红卫兵和县委内的少数造反派干部冲进了县委大院，冲进了县委办公室，并勒令立即交出县委大印。他们又以同样的方式占领县广播站……

在短短的十来天的时间内，以涪陵造反派中学生红卫兵为急先锋，涪陵的工人、农民、街道居民、职工以及机关干部中的造反派很快就对上至涪陵地、县党政下到工厂、农村、街道等各个单位实行了“全面夺权”。

面对如此混乱的局面，已开始奉命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的涪陵军分区司令员刘绍堂，两次找到涪陵专区商业局政治部副主任赵树金，让他发动组织群众，以便掌握涪陵的运动发展。

刘绍堂之所以找赵树金，因为赵树金是一个抗战时期的老革

命，1940 年参军，1942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排长、连长、营长，1947 年 7 月进军西南任军事教员，50 年至 52 年在贵州军区步校、重庆军区步校任战术系主任，58 年调成都军区军训处任干训科长，1963 年调涪陵军分区任副参谋长，1966 年 11 月转业到涪陵专区商业局任政治部代主任，干部行政级别为 13 级。

由于赵树金刚到地方，与地方的干部、群众都没有太多的瓜葛，又是老革命，所以，涪陵专区商业局的群众有事都喜欢找他商量。赵树金也想积极响应党中央的号召，投身到文化大革命的洪流中去。于是，他和商业局的干部写出揭发涪陵地区领导的大字报，因为大字报涉及到一些一般群众不清楚的具体内容，一时影响很大，反响强烈，结果他成为涪陵地区最早起来造反的领导干部，在商业局的群众中威信极高，赢得了声誉。

1966 年 12 月 24 日，他帮助涪陵商业局的群众成立“红贸军总部”，并给予大力支持。1967 年 1 月 21 日，他又正式参加“红贸军总部暴烈战斗队”。虽然他不是“战斗队”的领导成员，但“红贸军总部”什么事都请示他，总部开什么会也要他参加，所以他就成了不是队委的队委，不是常委的常委。

根据刘绍堂的意见，赵树金找了商业局下辖的医药、外贸、生资、土产四个公司的教导员到专区商业局。涪陵军分区司令员刘绍堂的爱人朱翠业就是涪陵专区商业局下属的涪陵地区医药公司的教导员，相当于党支部书记，归商业局政治部管辖。赵树金将刘绍堂的想法向大家做了传达，于是 1 月底，由涪陵地区商

业局的“涪陵红贸总部”和涪陵地区邮电局的“涪陵红色邮电军”等群众组织发起，有绝大部分涪陵地县造反派组织参加、并得到涪陵军分区支持的“涪陵革命造反联合司令部”成立了。“涪陵革命造反联合司令部”代行涪陵地、县的职权。一些作为这个“联合司令部”常委组织的头头进驻地、县委。

在接下来的大联合过程中，赵树金自恃有军队背景，领导工作的经验又丰富，与其他组织相互商量日益渐少，独断专行的事情愈来愈多，几乎与所有的学生和工人造反组织都搞翻了。尤其是在涪陵的外地学生组织，如：“首都三司联络站”、重庆“八一五”、成都“红成”等组织，都站在赵树金及“涪陵红贸”的对立面，他被指责为个人野心家、阴谋家，妄图大权独揽，排斥造反的学生和工人。2 月 8 日，当时涪陵最大的造反派红卫兵组织之一“红卫总部”，在外地学生组织联络站的策划下，并得到部分工人组织的支持，以“联合司令部是自上而下成立的官办组织”为由，将“涪陵革命造反联合司令部”砸了。2 月 11 日，学生造反组织又砸了赵树金的“红贸总部”。这就是当地有名的“2.11”事件。

“2.11”事件后，涪陵军分区立即表态，认为这是一起破坏革命大联合的行为，是一次打砸抢事件。第二天，2 月 12 日，涪陵军分区即对涪陵地县公检法实行军事管制，并很快就宣布：地区公安处的“政法公社造反兵团”是反革命组织，逮捕了该组织的负责人马泽林、洪孟。与此同时，由军队派出装有高音喇叭

的宣传车在当时只有一条街道的涪陵城里巡回广播，人们时时都可以听到宣传车在高声宣读《军委八条》，高声宣布“政法公社造反兵团”是反革命组织。

配合军分区的宣传，“红贸总部”也刷出大标语，并不断组织游行，喊出：

“坚决支持军分区镇压反革命组织政法公社！”

“坚决支持军分区镇压破坏文化大革命的反革命分子！”

“砸红贸总部就是破坏革命大联合！”

“反对红贸就是反对解放军！”

“打倒赵树金就是反革命！”

然而，自认为有红司令毛主席他老人家支持的天不怕地不怕的学生红卫兵仍然高举着“造反有理”的大旗针锋相对的刷出大标语，组织不断的游行，高喊：

“坚决砸烂红贸总部！”

“砸烂赵树金的狗头！”

并且喊出了“坚决支持革命组织政法公社！”的口号。还在“红贸总部”的所在地，地区商业局门前游行示威。他们常常拦住军分区的宣传车和军人辩论。

涪陵“红卫总部”的红卫兵、涪陵师范学校学生杨柏林，甚至跳上宣传车夺过解放军的麦克风高喊：

“坚决砸烂红贸总部！”

“砸烂赵树金的狗头！”

杨柏林也因此而出名，当然也因此而被捕。

军队方面的态度愈加强硬，学生、工人造反派这边就更认为是因为赵树金在军队中关系较深，指责军队有的人偏袒赵树金及“红贸总部”，有私心。这样，就由造反组织内部与“红贸总部”及赵树金的矛盾，转化成为了学生组织、工人组织与军队的矛盾。写出的大字报开始涉及刘绍棠等部队个别领导。2 月 15 日下午，北京“三司”的几个红卫兵来到涪陵军分区，要求见军分区司令员刘绍堂。他们在军分区门口站了几个钟头，军分区没有一个人出来接见，也不让他们进去。这几个红卫兵在军分区大门外不走，一直僵持到了深夜 12 点多。

这时，涪陵“红卫兵总部”的学生跑回学校，动员学生前去军分区支持北京“三司”的学生。2 月 16 日凌晨 2 时，涪陵一中的罗成胜听到这一消息，立即通知“红卫兵总部”所属的各战斗团派人到军分区声援“首都三司”的红卫兵，他自己也立即叫了几个同学，一起赶到军分区门口。

当罗成胜他们来到军分区门口时，涪陵“红卫总部”已有好几百名红卫兵坐在那里，一遍又一遍的朗诵《毛主席语录》，唱《毛主席语录》歌：

“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

“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根据这个道理，于是就反抗，就斗争，就干社会主义。”

并高喊：“革命无罪，造反有理。”“坚决砸烂红贸总

部！”“砸烂赵树金的狗头！”等口号。

天快亮了，仍然不见军分区的人出来，于是有人开始领头唱起：

“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想念毛泽东。迷路时想您有方向，黑夜里想您照路程……”

那悲壮的歌声直唱得很多学生热泪盈眶。

学生们和涪陵军分区又僵持了一整天，仍然无人出来与学生们见面。

这时，四川成都的形势也发生了变化。

四川大学“8.26 战斗团”与以成都电讯工程学院为首的“红卫兵成都部队”，即“红成”，从 1966 年 11 月 13 日大会产生矛盾，到封闭《四川日报》的过程中彻底决裂，最终发展到 1967 年 1 月 15 日，“8.26”的“红卫兵川大支队”严正声明退出“红卫兵成都部队”。

1 月 27 日，“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街道工业分团”召开支队长会议，研究到公安局造反的事情。1 月 28 日，他们再次开会，做出了到公安局造反的决定，并立即调人，把守住 8 个主要街口。1 月 29 日上午 11 时许，以“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街道工业分团”为主的千余人冲进成都文武路市公安局机关大院，切断电话线路，控制电话总机，扣押公安局负责人，破坏办公门窗，抢走大批档案、公章、空白介绍信，以及逮捕证、拘留证、搜查证等法律文书，历时 3 小时，绑架 21 名公安干警后呼啸而

去。

成都军区应市公安局一个群众组织的请求，于 1 月 30 日凌晨派出部队，在公安局群众组织的配合下，对设在古中市街“少年之家”内的“街道工业分团”团部住地实施戒严，逮捕了“1.29”事件为首抢劫公安局的宋立本、黄全章等 7 人，查获被抢走的所有文件档案资料和各种物资，救出被劫持的公安干警。

当晚，成都又有两万多人在市中心广场集会游行后，将市公安局团团围困，高喊“冲击公安机关是革命造反行动”，并三次越过部队警戒线，冲进市公安局院内，再次抓走 7 名公安干警作为人质，胁迫部队放还当天拘捕的宋立本、黄全章等 7 人。

2 月 1 日起，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川大“8.26 战斗团”等组织在成都地区散发传单，说“1.29 事件”是“党内走资派玩弄白虎堂阴谋，指使公安局设置陷阱，诱骗造反派上当”。

为反驳“工人革命造反兵团”，川大“8.26战斗团”的“白虎堂”说法，成都市公安局的毛思寇、罗克刚两人连夜疾书，草拟印刷了《1.29事件真相》、《与工人革命造反总部的答辩》的传单，在全市散发，指责“1.29事件”是混入“造反派”的少数社会渣滓冲击公安机关，大搞打、砸、抢的肇事罪行，驳斥当时社会上流传甚广的关于公安局准备了“二十万副手铐”镇压造反派是谣言等等。

与此同时，2月初的一天，由四川农机校应届毕业生高斌、四川大学中文系学生李秉铎、成都四中高三学生汪贤裕、成都四

中高二学生朱希亮组成的“井野尖刀纵队”前往成都军区声援成都军区“红色造反纵队”，空字028部队“红色造反总团”，成都军区战旗文工团的“红色造反团”等军内造反派，结果在军区大院门前被营房门口的警卫战士拦住，不让他们进去。高斌带头甩开两个战士冲了进去，因为解放军对群众有“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纪律，警卫战士不敢武力阻挡。这时来了一位矮胖的部队干部，他把高斌挡住，高斌要甩开这位干部，与其发生拉扯，这位干部的手表滑落下来。这位干部气愤地捋下手表并掷向高斌，指责高斌想抢手表，高斌将手表捡起还给那位干部后，继续冲了进去，另外3人也随其后跟着冲进军区大院。已在大院内的空字028部队“红色造反总团”的人把他们接到军区大礼堂后台，给他们找了一间房住了下来，其它房间还有战旗文工团、北师大、成都七中等单位和学校的人员。这些进驻军区的学生，就在军区食堂打饭吃，也没有人来干涉。他们在一起开会，传递北京及外地消息，分析形势，传闻“军内有人要搞兵变，反对毛主席”的消息，大家都认为形势很严峻，要有牺牲生命保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准备。

早在 1966 年 11 月，成都军区司令员黄新庭、成都军区第三政委郭林祥就突然被双双停职，此时成都军区的工作是由成都军区第四政委甘渭汉主持，副司令员韦杰、参谋长李文清协助。

2 月 11 日这天凌晨，在凛冽的寒风中传来一阵阵不寻常的声音，有部队整队集合的哨声、脚步声，有朗读《毛主席语录》

整齐划一的声音。人们来到操场一看，一大队全副武装的士兵，正面对一队空字 028“红色造反总团”的队员，双方队伍整齐，每人手执《毛主席语录》，正在打语录仗。

一边朗读：“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 ’。……根据这个道理，于是就反抗，就斗争，就干社会主义。”

另一边就针锋相对地读：“对于任何敢于反抗的反动派，必须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之。”

总之，各找一段适合自己立场的毛主席语录来驳斥对方，这是文革中一种奇特的斗争形式，用《毛主席语录》来反驳《毛主席语录》。

这两支队伍互相读了一通语录，谁也说服不了谁，于是开始抓人。士兵们冲上去，几个人对付一个，028“红总”成员们一个个被五花大绑地带走了。接着清理礼堂后台，每个学生都被几个全副武装的战士抓住，一路推推搡搡地从军区营房门口推出。当天，成都军区逮捕了 50 余名军内造反派，驱逐了军区内的地方红卫兵。上午 9 时，又在北较场内逮捕了空字 028 部队，即空军第十三航空学校的造反派 16 人。

当天，四川大学“8.26 战斗团”就成都军区“2.11 大逮捕”发表严正声明，指出“2.11 事件”是全省反革命大反扑的重要一环，是资本主义复辟的信号弹，并强烈要求：“成都军区立即释放非法逮捕的革命同志，公开平反；立即停止全市全省的反革

命大逮捕。”“8.26”办的小报《八．二六炮声》发行了“批判成都军区专号”，发表了“成都军区顽固推行刘邓路线大事记之一、之二”，号召“砸烂成都军区黑司令部”。

“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川大“8.26战斗团”还在这天下午举行“声援成都军区造反派”的示威游行。游行队伍来到成都军区，在军区南营门和东营门静坐示威，将成都军区围了个水泄不通，要求当时主持军区工作的副司令员韦杰出来回答问题。虽声势浩大，但军区门口的一条红色警戒线，却没有人敢越雷池半步。

北京地院“东方红联络站”将四川地质局一辆客车装上高音喇叭改成宣传车，将宣传车堵在东营门军区门口。他们静坐的这条街叫白下路，一条东西走向、长约百米的死胡同，街西头是军区东营门，街北面是军区大院围墙，街南面是民房，街东头与人民北路交叉的十字路口是静坐者唯一的出口。静坐没有整齐的队伍，有人站，有人坐。

成都军区战旗文工团在距东营门大约一两公里远的东通顺街，昔日大作家巴金的祖居，小说《家》描写的许多故事就发生在那里。东通顺街静坐的人比白下路的还多，打着红旗和横幅的队伍排列整齐，许多大叔大妈模样的人坐在自带的小凳子上，这些人就是成都人叫的“居民老孃儿”，从打出的横幅辨认，大部份人属于“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街道工业分团”。战旗文工团的大门被桌椅板凳堵死，谁也别想进出。

2 月 11 日晚，军区派部队去战旗文工团抓人，有人大喊："老保抓人了！"喊叫声吵闹声惊动了附近的居民，人们闻讯赶来堵住了大门，抓人的部队只有一个排，被困在大院内动弹不得。"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街道工业分团"派代表与部队谈判，提出立即放人，部队方拒绝放人，"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街道工业分团"拒绝撤离，双方僵持不下。

以后，军区大院出奇的安静，没有继续抓人，也没有镇压静坐示威的群众。

韦杰没有出来。2 月 12 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成都部队发布《紧急公告》称："凡冲击军事机关的，都要以现行反革命论处。"

静坐的人们以为还会像以前一样，只要把横幅一打，人往那儿一坐，当权派就会乖乖地投降。大家在寒风中坚持静坐 6 天 7 夜。当时寒雨纷纷，满地泥泞，"工人造反兵团"还给静坐的学生送来席子，棉被和木板，并搭起席棚遮雨，四川地质局送来帐篷，"工人造反兵团财贸分团"则送来糕点、开水。一支支宣传队到静坐现场演出文艺节目以示慰问，各地的慰问信更像雪片似飞来……

成都军区大门外成了一片沸腾的海洋。中央文革小组派了一个摄影小组到各地拍摄文革运动情况，见成都军区大门前气氛热烈，静坐群众黑压压一大片，认为这个场面造反精神特别强，于是拍摄下来，带回北京汇报。

## 第 501 回：声声□，叶帅“请教”□伯□　传批示，军委碰头会结束

1967 年 2 月 11 日，周恩来在中南海怀仁堂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碰头会，也叫怀仁堂碰头会，讨论生产形势问题。出席会议的有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余秋里、谷牧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陈伯达、康生、关锋、王力。

会议尚未开始，叶剑英看见陈伯达，就对他说：“老夫子来了，正好请教几个问题。你是毛泽东思想的解释家和理论家，我们都得向你学习。”

这两天接连受到毛泽东批评的陈伯达正很郁闷，听叶剑英这么一讲，赶紧说：“叶帅，你这样讲，我就无地自容了。”

叶剑英问道：“你说说，全国形势搞得这么乱，老干部都统统打倒了，还怎么抓生产？”

陈伯达按照文革的思维方式一本正经的解释说：“乱是正常现象，只要群众运动搞好了，生产……”

叶剑英打断他的话说：“奇谈怪论！现在群众运动已经反了天！四川有个‘成都工人造反团’，提出什么‘砸烂成都军区黑司令部’的口号。这种乱，对我们有什么好？他们也算群众吗？”

陈伯达说：“我还不大了解情况。”

谭震林也凑过来说陈伯达：“八届十一中全会上，你说你是个刘盆子，我还有点不大相信。现在看来，你倒真有点那么个味

道，我看你还是不要作阿斗的好。我问你：搞文化大革命还要不要党？要不要一大批老干部？要不要人民解放军？”

叶剑英继续说道:“老夫子,你们中央文革少发议论好不好？你们熟悉军队吗？你们把党搞乱了，把政府搞乱了，把工厂、农村搞乱了！你们还嫌不够，还一定要把军队搞乱了，想干什么？”

陈伯达辩解道：“究竟是谁把军队搞乱了？是走资派，还是革命派或者群众！这是个大问题。”

徐向前拍着桌子说：“军队是无产阶级的支柱。你们这样把军队搞乱下去，还要不要这个支柱。难道我们这些人都不行啦？要蒯大富这些人来指挥军队吗？他们能行吗？你们还要不要军队？如果不要，我就不干了。”

康生不客气的反驳说：“军队不是你徐向前的，你有什么了不起？你知不知道别人怎么看你，怎么议论你的？”

徐向前说：“我是军委文革小组的组长，我有权力捍卫军队的尊严，起码我的这些话是代表军队的！军队的同志拥护我。”

聂荣臻也出来助阵说：“不错，我同意徐帅的意见，军队必须稳定。军队不稳定一切都乱了，这符合最高指示的精神。”

康生说：“你们说的这些符合不符合主席思想，请示一下主席便明白了。”

叶剑英又问陈伯达：“上海夺权，改名为‘上海公社’，这样大的问题，涉及国家体制，不经政治局讨论，就擅自改变名称？”

陈伯达说：“马克思高度赞扬了巴黎公社原则，这些在马克

思著作里都有详细论述。”

叶剑英不无讽刺地接着说：“我们不读书，不看报，理论水平低,也不懂什么是巴黎公社原则。向你请教一下,巴黎公社的原则是怎么回事?革命，能没有党的领导吗？能不要军队吗？”

面对叶剑英等人的步步紧逼，颇感委屈的陈伯达退让了，他对叶剑英说：“叶帅，我向来是尊敬你的，……”

关锋实在看不下去了，生气的将皮包往桌上一摔说：“要这样讲，我还有许多话要说哩！既然你们口口声声说自己是党的领导，那为什么那么害怕见群众？群众提一些合理的要求，为什么不敢答复？难道说共产党还能对人民群众没有一点感情？如果这样，你这个党究竟是什么党？我看是国民党！人民军队的基本出发点是保护人民的，但一些地区的军队领导却把走资派窝藏起来，成为走资派的防空洞，这样的军队究竟保护了谁？”

周恩来出来圆场说：“今天的议程上没有你们争论的问题。你们愿意争论可在以后再说。现在开会吧!”

散会后，陈毅有意同叶剑英走在一起，靠近他的耳朵，撂过去一句话：“剑公，你真勇敢!”

叶剑英面露微笑，低声地回了一句：“彼此彼此!”

会议结束的当晚，叶剑英就向毛泽东汇报了会议情况，说：“今天和伯达打了一仗。”毛泽东回答说：“此事我已经知道了，你的对!”

2 月 11 日，叶剑英给林彪写信解释 2 月 10 日下发的《关于

军队在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斗争中不准任意开枪的规定》中第三条内容的传达情况。他在信中写到：

“关于军队在支持无产阶级真正革命派夺权斗争中不准任意开枪的规定，我们把六条作为五条发出，第三条只在会议上念了一遍（发稿呈上），会后各军区请将第三条单独发给他们再读一遍，以便掌握，我们已单独打印发给他们，说明看后收回（已经收回）。请报主席。”

毛泽东对如何处理部队受冲击的问题作了书面批示：“绝不容许右派群众组织肆意冲击部队，但处置要妥当。首先要做说服工作，如果无效，他们硬要冲，可以放他们进来，他们占了一楼，部队可以退到二楼，继续做说服工作，如果他们强占二楼，部队可以退到三楼，如果他们以解放军的一再忍让为可欺，进一步抢占三楼，部队可以开枪自卫。但仅限镇压带头闹事的右派骨干，对大多数胁从者，则重在批评教育，仍可放他们回去。”

2月12日，林彪看到毛泽东的批示后把叶群叫去。不一会儿，叶群拿着原件回到办公室，叫来秘书说：

“这是主席的批示，很重要。首长让速送叶帅。可以在军委扩大会议传达一下。”

秘书走了，叶群又对内勤说：“冲击军队机关的事是要限制一下，首长是国防部长，这不是给首长脸上抹黑吗?可是有些人……唉！我也难哪!”

过了一会儿，叶群又到卫生间去打电话：

“叶帅吗，你好哇！”

“噢，叶主任，你好!”

“秘书送文件，主席批示，看到了吗?”叶群问。

“看到了。太好了!我们昨晚开会，气氛很紧张。现在才弄明白，好多东西，原来以为是主席的，其实不是．而是他们打着主席的旗号……”叶剑英说。

“老帅们对他们做了不少工作，见效不太大。林总对他们也有意见。他们竟说军队跌到了修正主义边缘。你说奇怪不?林总说：‘军队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我怎么不知道呢?’最后他们向林总道了歉。”叶群说。

叶剑英：“我对陈伯达说，听说你们支持什么‘上海公社’，这是做不得的。我们的传统是党和政府，成立了什么公社，还要不要党和政府呢?上海这样做，别的地方呢?可是，那时候，你陈伯达听不进我的话呀!在你们眼里，还有我们这些老家伙吗?现在主席表了态，证明你们是错误的!……”

叶群：“主席是不支持上海成立公社的。林总也不支持。一开始林总就对我说，怎么能随便改变国家体制呢?”

叶剑英：“陈伯达说：‘叶帅，你这样讲，我就无地自容了。’我对他们说，现在搞得这么乱，责任完全在他们．我问他们：‘你们是不是想第一步把党搞垮，第二步把政府搞垮，第三步把军队搞垮?你们想干什么?……’我这几句话，可把他们惹翻了。那个关锋直摔皮包，嘴唇打哆嗦。……”

叶群："叶帅，你的气真大呀!何必呢?哈哈哈……"

叶剑英哈哈笑道："最后总理收了场。总理说，今天会议的议程，没有你们争论的问题。愿意争论，以后可以专辟时间。会后陈毅对我说：剑公，你真勇敢。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哪!"

叶群："最后怎么样子?"

"怎么样?嘿、嘿!以后也不会怎么样?没有什么，无非是秀才造反!他们还能成了什么大气候?"叶剑英说。

就在叶群给叶剑英打电话之前，林彪的秘书已经将毛泽东的批示送到西山附近的叶剑英住地。叶剑英接过批示看了一遍后，高兴地对前来送批示的"林办"姜秘书说：

"姜秘书，你坐等一会儿，我再看一遍，太好了。"

就在这时，叶群的电话过来了。打完电话，叶剑英与姜秘书一块来到西山军委碰头会会场。2 月 6 日，经林彪同意，军委碰头会已经从京西宾馆转移到西山继续来开了。2 月 12 日正好是军委扩大会议的最后一天，出席会议的各军、兵种和各大军区领导，约有 50 多人。

叶剑英和刘伯承、徐向前、聂荣臻陆续进场。叶剑英主持会议，他说：

"同志们，会议今天就结束了。在请刘、徐、聂几位副主席讲话之前，我先传达一下主席的重要批示。"

他一字一句地念了毛泽东批示原文。接着各位军委副主席做了简短的讲话。之后，叶剑英又说：

“从主席的最新批示中我们可以看到，主席对部队的稳定是非常重视的，非常关心的，对我们军队的干部是非常爱护的。前一段地方上比较乱，我们部队某些单位也比较乱。搞文化大革命，史无前例。我们都是头一回，谁也没有经验，可是也不能洪洞县里没好人哪!一概否定，统统打倒，推倒重来，叛徒、特务满天飞，随便罗织罪名，这怎么行呢?这怎么能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呢?有些同志原来以为这是毛主席的意图，其实根本不是那么回事。某些人打着毛主席的旗号，唯恐天下不乱，挂羊头卖狗肉，贩卖自己的私货，假公济私，我们再不能上当受骗了！”叶剑英说到这里，用手在桌子上捶了一下。他的话一停，全场沸腾了。

有人高喊：“他们有野心！他们要篡党夺权！”

有人喊；“他们打着红旗反红旗．我们要和他们辩论。”

肖华尤其怒气冲冲，挥舞着拳头说：“他们要把我打成三反分子！”

“各位不要动肝火，留得青山待砍柴!”叶剑英双手做着向下压的手势，说：“斗争只是刚刚开始，更艰苦的斗争还在后边，所以我们要加强纪律性，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不可轻举妄动．小不忍，则乱大谋。”

他还说：“本来《八条》一个文件就可以解决问题了，现在又搞了个《七条》，这些都是我们斗争来的!”

会议结束后，姜秘书回到林办，向林彪汇报了会议情况，林彪既未表示赞许，也未表示异议，只是在听到叶剑英说“各位不

要动肝火”时，微微笑了一下。

也是在 2 月 12 日这天，上午 8 时，外交部长陈毅去首都机场欢迎毛里塔尼亚政府代表团。外交部、对外经委、对外文委、外贸部等单位的造反派代表 10 至 20 人及各单位有关负责人也都去了。在机场休息室等候时，一名参加这次外事活动的“外交部革命造反联络站”核心组成员向陈毅请示，是否可以用造反组织的名义参加外事活动？陈毅当着外事口许多领导干部的面，没好气的说道：

“你们都是造反派，造我的反，我是什么，是反革命？”

随后走进休息室坐下，生气地说：“我不同意造反派参加，我不批准。”

他又问旁边一位负责干部：“你是不是造反派？”

那人回答：“是。”

外交部另一负责人说：“现在就是来向你请示的。”

陈毅：“请示？请示不敢当，不斗我就要感谢你们了。你们现在来请示，背后还不是又搞一套，骂我的祖宗，典型的两面派！毛主席，林彪同志，周总理还团结我，你们就不团结我。我奋斗了 40 多年，自杀？我没那样卑鄙！”

他气愤地站起来说：“革命革了 40 几年，没想到落到这种地步，我死了也不服气，我拼了老命也要斗争，也要造反。前几天我到外交部开大会，就是要我低头认罪。我犯了什么罪？我没有罪！有罪还当外交部长？不要太猖狂了，太狂了没有好下场！”

陈毅一发不可收："现在把外交部搞成什么样子了，动不动就斗，弄得人心惶惶，人人自危，早晨还不知道晚上怎么样？无组织，无纪律，把外交机密都捅出去了。我就不相信龚澎会是三反分子，你们还要开除她的党籍。笑话！非党员居然要开除党员的党籍，我还没有听说过。把有的司长的职都撤了，我都不知道，我还当什么外交部长？！"

"章文晋大使一下飞机就抓去批斗，戴高帽子，下跪。先让他睡个觉嘛！"

"对外经委斗方毅斗了 7 天，还不放出来，工作不能做。"

"毛主席讲了，林总讲了，周总理讲了，军委八条下来了，还这样，看你们有什么好结果！造反！造谁的反？造我的反，你们怎么不到越南……"

……

最后，陈毅对坐在一旁的对外文委副主任楚图南说："楚老啊，我们都是上了年纪的人了，我们交班不能交给赫鲁晓夫式的人啊！"

2 月 12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取缔全国性组织的通告》：

在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期间，北京和各地出现了许多所谓全国性组织，它们都不是自下而上地在全国各地真正的革命派大联合的基础上，经过民主选举产生的，而是少数人临时凑合在一起组成的。其中，还有极少数组织是地、富、反、坏、右分子

搞起来的。

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

一、所谓全国性组织，中央一律不予承认，所有这些组织应当立即取清。它们的成员应该立即从北京等地回去，到原单位参加运动。

二、这些组织以各种名义冒领的公款，应一律由批款单位如数追回。在本通告下达前已经花掉的款项必须开列清单，由批款单位进行审查，购买的实物，除已经清耗的以外，也应一律追回。本通告下达后，领到的款项，不准动用。如有携款逃匿者，追查法办。

三、这些组织，如发现有反革命活动，其成员必须向公安部门揭发报告，由公安部门负责审查处理。

特此通告。

2 月 12 日，中共中央公布了《关于党员党籍问题的处理通知》，指出："群众组织无权对党员实行党纪处分，党员的党籍问题要等到运动后期集中处理。"

## 第 502 回：举大旗，众劳模出山□反　回大寨，□永贵昔□夺权

2 月 5 日，全国劳动模范陈永贵、李顺达、解悦、牛发和倡导成立的以农工为主要成分的群众组织“山西革命造反派联络总站”问世，并加入“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开创了劳模造反夺权的先例，这在全国是没有的。陈永贵出任“山西革命造反派联络总站”政委，李顺达、解悦、牛发和三位劳模任副政委。他们在太原湖滨会堂举行庆祝大会，刘格平、张日清等人出席大会并讲话。

劳模中的牛发和原是齐齐哈尔北满钢铁厂工人，1958 年调入济南钢铁厂，在“冶金设备安装公司汽车修理组”任组长。这位 27 岁的青年工人，自学《汽车修理学》等技术书籍，提出并被采纳数十项技术革新建议,解决生产难题近百项；他带领全组 28 人苦干巧干,月月年年超额完成任务；他关心他人疾苦,经常接济生活困难的同志,在生产救灾时期,他曾分别为小组里有困难的同志向家乡汇款 10 多次,达 280 多元，而他当时月工资不足 50 元；他通读《毛泽东选集》四卷,并联系实际指导自己的行动。

1964 年二月,在学雷锋、学大庆、学王铁人的热潮中,济南团市委根据市委的指示组成工作组,带着行李到东郊牛发和所在的汽车修理组,在工棚里,和工人同吃同住 14 天,挖掘总结了牛发和的事迹。当他们回到市委向市委作汇报时,市委第一书记段毅越听越兴奋,不断提问并连连赞叹:“这个青年了不起,确是个

突出典型!”当即表示“要专为表彰这个典型开大会,要在全市宣传他的先进事迹。”这一提议得到了市委其他领导的一致赞同。次日,市委秘书长兰子安带领几位同志到这个汽车修理组,找有关干部和小组的工人逐段逐项地核实材料,经过 3 天的核查,结论是：材料完全属实。市委当即召开了“向牛发和学习”有线广播大会,介绍了牛发和的先进思想和事迹,宣布了市委、团省委授予牛发和“优秀共产党员”、“模范共青团员”的《决定》,号召全市人民向牛发和学习。《中国青年报》、《大众日报》、《山东青年报》都以头版整版的篇幅,报道了牛发和事迹的长篇通讯,并配发了社论、评论。

随后，牛发和先后被济南钢铁厂提升为机械工程师，被长春中国第一汽车制造厂聘为特邀设计师。1965 年调往西安冶金建设指挥部，担任指挥员工程师。1966 年在十三冶大修厂任副厂长，来到山西。文革开始后，牛发和与十三冶的技术员陈广仁等人共同成立了山西十三冶“捍卫毛泽东思想红总部”。

陈永贵等劳模领衔的“山西革命造反派联络总站”一成立，立即吸引了许多群众组织前来归附他们的大旗下，几天内前来参加的人数竟多达近 40 万人。1967 年 2 月 6 日，《山西日报》在头版以醒目的大字标题报道说：“陈永贵同志‘杀’出来了”。为这条消息配发的编者按特别指出了陈永贵“杀”出来的重要意义及影响：“革命形势越来越好。陈永贵、李顺达、解悦等一批劳动模范‘杀’出来了！正如毛主席指出的，劳动模范有带头

作用，骨干作用，桥梁作用，劳动模范站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前列，带头闹革命，这是一件有重大意义的事。这一个头一带，浩浩荡荡的革命造反大军就会更加迅速地形成。”

2 月 5 日这天，“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宣布成立山西省公、检、法接管委员会，接管省公安厅、省检察院、省高级法院。同时，山西省军区也宣布对公、检、法进行军事管制。同一天，山西省委机关“七一公社太行游击队”贴出题为《卫恒、王谦、王大任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特务活动》的大字报，同时，印成传单，大量散发。这张大字报有两个附件：一是《原山西省委地下活动已用备用黑据点（太原区）》，二是《山西特务组织系统一览表》。在这份《一览表》中，他们把彭真、薄一波、安子文、李雪峰和陶鲁笳、卫恒、王谦、王大任、武光汤、赵雨亭、贾俊、史纪言、刘开基等 38 人说成是所谓“山西特务组织系统”的头目和成员。

陈永贵和李顺达虽然在太原举旗造反，但心里总放不下各自村里的那一摊活动。闹了几天，陈永贵和李顺达就离开太原回到自己的家乡。他们麾下的各路人马不久也自行解体。当然，省里的政治家们并没有忽视富于政治号召力的农民旗手。

在省里参加了造反夺权活动的陈永贵，佩戴着周恩来总理亲手赠送的红卫兵袖章，如同众星捧月一般地回到了昔阳。在昔阳有十几年根底的原昔阳县委书记张怀英也随着陈永贵回来了。

这时的昔阳十分混乱。1 月 22 日，外地到昔阳串联的学生

联合昔阳的几路造反人马夺了昔阳县委、县人委及所属各部门的权。一周后，接任张润槐不过一年多的昔阳县委书记原耀先从县委大楼三层落地身亡，据称是自杀。

昔阳的“122”夺权带点学生们一时兴起的性质。那些来自北京、太原、太谷和昔阳育红中学的红卫兵小将本来就缺乏行政管理经验，连个衙门的架子也撑不起来，更解决不了行政和生产方面的实际问题。面对乱成一团的局势和杂七杂八的火烧眉毛的事务，这群小将束手无策。

昔阳县城一乱，关押在商业局大院里的“十月事件受害者”们自然都跑了出来。两年前被地委强令调出昔阳的“宗派活动分子”也纷纷离开流放地。这些人都不约而同地赶到大寨。1 月 29 日，“十月事件受害者捍卫毛泽东思想决死队”在大寨宣告成立，前县长王贵科任队长，前县委常委李韩锁、越满仓任副队长。

于是，混乱中的昔阳立刻将目光转向“毛主席的好学生”陈永贵，大寨立刻成了全县实际上的决策中心。各派组织纷纷派人到大寨建立联系。

陈永贵在一群老谋深算的前昔阳领导人的拥戴下，召集一些造反派组织开了一次会，宣布了自己对时局的主张：“趁春节时机大斗王乡锦、谢子各、张润槐等黑帮走资派，猛促春耕生产。”王乡锦是晋中地委书记，谢子和是晋中行署专员，张润槐是前昔阳县委书记。

陈永贵明智地避开了各路人马争执不休的权力问题，提出了

谁也不敢小看，谁也不敢不拥护的行动纲领。如此陈永贵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了无可非议的决策人和领导人。

1967 年 2 月 8 日，农历大年三十，陈永贵在除旧迎新的爆竹声中进了昔阳县城。除夕之夜，全县 400 多个大队的头面人物蜂拥而至。2 月 9 日，农历正月初一，陈永贵 52 岁的生日。这一天，昔阳县城里的工农兵广场上红旗招展，锣鼓喧天。全县 20 个公社 415 个大队的 1500 名代表和县城附近的 6 个公社的 2800 名群众会聚于此，号称万人。陈永贵、张怀英、王贵科和赵潢仓在众人的仰视中出现在插满红旗的大会主席台上。陈永贵朗声宣告："掀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新高潮誓师大会开始！"话音刚落，会场上掌声雷动，只号声此伏彼起。随后，在万众一声的怒吼中，晋中地委书记王乡锦、专员谢子和、前昔阳县委书记张润槐、地委常务副书记王荣和其他领导人卜虹云、苗枫、张哲生、张子仪、肖岗等几乎全部当权派被押上台来。

陈永贵首先发言，他谈起了积怨达两年之久的十月事件："十月事件的性质，绝不是个人私怨之争，绝不是宗派之争，也不是工作方法之争，而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争，是拥护三面红旗和反对三面红旗之争，是捍卫毛泽东思想和反对毛泽东思想之争！"

接着，陈永贵又"揭露了地、县领导人反大寨的罪行"，譬如四清工作队砍大寨红旗企图。当年激怒过陈永贵的四清工作队队长张子仪，说陈永贵这个粗腿抱不住的地委副书记王荣都在台

前撅着。

陈永贵讲完之后，张怀英发言控诉走资派对他本人和十月事件受害者的迫害。张怀英不久前挨斗挨打受伤尚末痊愈，本人与昔阳各方面的关系又好，口才也佳，于是，会场上那些群众“听到怀英同志为坚持社会主义方面而惨遭折磨时，纷纷落下了激动的热泪”。

会后便押着“黑帮”们到下边的公社和大队去游街，用陈永贵的话说：“让大家都看一看他们的万恶滔天罪。”

联合批斗会和游街从春节闹到正月初三，小小的昔阳县城和附近的农村连续沸腾了 3 天。

经过三天普及而深入的批斗，陈永贵见时机成熟了，便准备动手再次夺权，把全部权力从你争我夺的“筹委会”等各派红卫兵手里夺过来，夺到他自己和“十月事件受害者”手里。陈永贵对张怀英说：“我夺权，你来帮我掌权。”

2 月 10 日晚，陈永贵组织各路造反派开代表会，专门讨论第二次夺权问题。陈永贵高声问众人：“这权该不该夺？”众人如军人般地齐声高呼：“该夺！”

2 月 11 日，正月初三晚上，陈永贵主持召开了“昔阳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大夺权大会”，32 个造反派组织参加。大会宣布昔阳革命造反总指挥部正式成立，并一致推举陈永贵任总指挥。刚刚当选的陈永贵在强光的照射下，满脸庄严地宣布了总指挥部第一号通告：“从即日起，昔阳县委、县人委的党、政、财、

文大权归总指挥部！”

当晚，32 路造反派代表涌上夜色笼罩的昔阳街头，“敲锣打鼓地欢庆总指挥部夺权胜利。”

陈永贵带头造反夺权的消息很快就传向全国。1967 年 2 月 26 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陈永贵题为《永远当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文章。3 月 5 日，《人民日报》以大字标题报道了陈永贵在昔阳夺权的消息，引题是：“同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一起把昔阳县的大权全部夺到无产阶级革命派手中”，主题是：“陈永贵响应毛主席号召站在斗争前列”，副题是：“为全省全国劳动模范树立了光辉榜样。”

陈永贵掌权后，立即动手整顿机关工作作风。和所有的庄稼人一样，陈永贵对坐机关的干部没什么好印象。“国家干部，脱产干部，吃饭，拿钱，熬时间”，陈永贵说，“那群众就让你呀？你认为铁饭碗不能打？非打不行！一成了脱产干部，什么也有了，一天不上班，十天不上班，仨月不上班，钱也少不了。”

陈永贵打破铁饭碗的办法是把机关干部赶到县办的牧场、农场、林场和五七干校等处去种庄稼。当时县机关共有干部 300 多人，陈永贵当了革委会主任，只留用不到 100 人，原有的人马一下子砍去三分之二，原来的一堆部、局、室并为 4 个组：生产指挥组、政治工作组、政法组和办事组。

剩下的那些幸运的干部也不能整天在机关里坐着。陈永贵要求县级干部每年参加劳动 100 天，公社每年 200 天，大队干部每

年 300 天。他本人也带头参加劳动。陈永贵很少介入日常的机关工作，只管拿大主意和督促检查，再就是进京上省或者下地干活。新华社驻大寨记者冯东书曾经悄悄盯了他一年，计算陈永贵每年到底劳动多少天。冯东书在 20 多年之后在《文盲宰相陈永贵》一书中写道：1971 年，陈永贵已是中共中央委员、山西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还兼着中共昔阳县委书记，又是大寨党支部书记，杂事很多。但是他和社员一起劳动不少于 150 天。

2 月 10 日，“中共山西核心小组”会议决定增补徐志远、刘志兰、胡炜（陆军 21 军军长）、陈永贵为组员。宣布其为“领导全省工作的党的领导核心”。并宣布“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行使山西省人委的权职。

2 月 13 日，《山西日报》发表《人民日报》通讯员、记者评述山西造反派夺权的文章。文章一开头就称：”山西省革命造反派夺权斗争的重大胜利，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史册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并称它为全国各地”“提供了新的经验”，“做出了新的贡献”。文章评述山西夺权经验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实行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实行革命的三结合”；“彻底打碎走资派控制的资产阶级专政机构，建立无产阶级革命的权力机构”；“充分运用革命的权威，开展全面的夺权斗争”。

2 月 23 日　山西省核心小组会议决定将小组新增加的成员和分工电报中央审批。上报名单共 9 人。分工是：

组长：刘格平；

副组长：张日清；

秘书长：刘贯一；

副秘书长兼办公室主任：刘志兰；

组员：刘贯一、袁振、忻县地委书记徐志远、陈守中、21 军军长胡炜、陈永贵、刘志兰。

2 月 26 日，根据山西省委核心小组的决定，山西省无产阶级专政委员会成立，张日清任主任，山西省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兰敏任副主任。刘格平、张日清、刘贯一、袁振等参加了成立大会。《山西日报》在显著位置给予了报道。

随后，3 月上旬，太原市及各地、市、县无产阶级专政委员会相继成立。甚至有些基层单位，如太原纺织厂也成立了无产阶级专政委员会。

## 第503回：□北京，毛泽东接见张、姚　承受□，□伯□痛不欲生

2月5日，“上海人民公社”成立。2月6日，《人民日报》和中央电台对此事均无报道。

紧接着，2 月 7 日、8 日、9 日……日复一日，北京的宣传机构依然对“上海人民公社”没有声音。尽管上海的《文汇报》、《解放日报》天天在为“上海人民公社”欢呼，而《人民日报》的沉默，愈加形成鲜明的对照。

于是，社会上的流言多起来了：

“因为上海没有实行‘三结合’，所以中央不批准。”

“毛主席不同意张春桥，姚文元当‘上海人民公社’的领导人，所以不发消息。”

……

徐景贤跑去问张春桥和姚文元：“黑龙江省夺权以后，成立了省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人民日报》很快发了消息，还配了祝贺的社论，新华总社又转发给全国报纸刊登，为什么‘上海人民公社’的成立消息他们没有发？”

张春桥、姚文元没有回答他。

又过了几天，上海街头出现新的引人注目的大字报：

《一问上海人民公社》；

《二问上海人民公社》；

《三问上海人民公社》；

《老造反要求了解实事真相》；

《老造反强烈要求王洪文与耿金章展开公开的电视辩论！》；

《王洪文不敢与耿金章展开公开的电视辩论就是孬种！》；

《打倒王洪文！揪出黑后台！》；

……

“问号”随着《人民日报》天天的沉默与日俱增，相继增加到《八问》、《九问》、《十问》！

那些被排斥在《上海人民公社》之外的群众组织又开始兴奋起来，因“炮打张春桥”而濒于覆灭的“红革会”通过各种渠道在群众中散布：“‘上海人民公社’没有请‘红革会’参加，所以《人民日报》不登！”他们甚至写出大字报说：“上海人民公社里没有最最革命的老造反红革会的参加，所以中央不肯承认，《人民日报》也不肯祝贺！只有迅速释放被逮捕的学生领袖，并向他们赔礼道歉，吸收他们加入人民公社，中央才会承认，《人民日报》才肯祝贺！”

更有人说：“一切权力归‘上海人民公社’这句口号是完全是错误的！因为它是由少数人搞起来的，所以中央不承认！”……

2月9日下午，上海人民广场又召开了几十万人参加的大会，又一个新的组织“上海革命造反派大联合委员会”宣告成立。在主席台上站着为首的是耿金章，其余差不多都是原“联络部”的人员。大会高呼“打倒王洪文”和“揪出王洪文的黑后台”等口号，会后还进行了几十万人参加的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一个星

期前被打垮的“红革会”，虽然头头还没有放出来，但其余部也要东山再起，它那面被上海人民熟悉的“红革会”会旗，在游行队伍中飘扬得特别醒目，看来它又成了耿金章和“二兵团”的亲密战友。戴祖祥的“一兵团”经过一段时间的寂寞，也重新拉出了队伍，加入了老耿的反王大军。

2 月 10 日，上海人民广场召开打倒陈丕显大会，不知是由于天冷还是由于这种大会开得太多了，参加的人不多。偌大一个广场，只有台前一小块人，不过数千而已。

春节刚刚过去，毛泽东要找张春桥、姚文元谈话。2 月 11 日，张春桥把徐景贤单独找到兴国路招待所去，对他说：“明天我要和文元同志到北京去，向中央汇报关于上海夺权和建立新的权力机构的事……”张春桥再三叮嘱，这个行动只让徐景贤一个人知道，千万不要外传，免得在上海引起不必要的猜测；上海有什么情况，可以随时打电话到北京告诉他们。

2 月 12 日早上，农历正月初四，奉毛泽东之召，张春桥、姚文元从上海飞往北京。他们一下飞机，就看见王力、戚本禹站在机场迎接，稍加寒暄，就一起驱车直奔中南海游泳池。

毛泽东穿着他那件睡衣，在游泳池等候张春桥、姚文元和王力、戚本禹的到来。

毛泽东问王力：“你跟他们讲没讲找他们来干什么？”

王力答道：“讲了一些。”

毛泽东说：“小组成立以来，没有一次提出要我主持开会。

去年 6 月以来，小组代替了书记处，也是独立王国。骂别人独立王国，自己独断独行，否认政治局常委存在。目无政治局，目无常委。”“文化大革命，闹一二年，总要停顿。现在有打倒一切的风气。干部统统打倒，怎么行？怀疑一切，打倒一切，是无政府主义。有人提出彻底改善无产阶级专政，这是错误的。”

毛泽东说：“人民公社这样大事，你们不拿出来，不讨论，别的大事，也不讨论。”

“你们成立‘上海人民公社’，一系列的问题你们考虑过没有？”毛泽东问张、姚二人。他接着说：

“上海人民公社的消息，一直压着没有发表，如果一发表，各地都叫人民公社了，那党、政、军还要不要？一切都管？北京市也号召搞人民公社，叫北京革命造反公社。各地都叫人民公社，势必冲击中央，那就要改国号了，改政体，叫中华人民公社。问题不在于形式，而在于内容。”

“巴黎公社是 1871 年成立的，到现在诞生 96 年了。如果巴黎公社不是失败而是胜利了，那据我看，现在已经变成资产阶级的公社了，因为法国的资产阶级不允许法国的工人阶级掌握政权这么久，这是巴黎公社。再一个是苏联的政权的形式。苏维埃政权一出来，列宁当时很高兴，认为是工农兵的伟大创造，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新形式。但当时他没有想到这种形式，工农兵可以用，资产阶级也能用，赫鲁晓夫也可以用。从现在的苏维埃看来，已从列宁的苏维埃变成赫鲁晓夫的苏维埃了。”

“英国是君主制，不是有国王嘛？美国是总统制，本质是一样的，都是资产阶级专政，还有很多例子，南越伪政权是总统制，它旁边柬埔寨西哈努克是王国，哪一个比较好一点呢？恐怕是西哈努克比较好一点。印度是总统制，它旁边的尼泊尔是王国，这两个，哪一个好一些？看起来还是王国比较印度好点。就现在来看啊，中国古代是三皇五帝，周朝叫王，秦朝叫皇帝，太平天国叫王，唐高宗叫天皇。你看名称变来变去，我们不能看名称，问题不在名称，而在实际，不在形式，而在内容。总统制、国王制、君主制，所谓资产阶级民主制，这些都是形式。 我们不在名称，而在实际，不在形式，而在内容。总统这名称在英文里和校长是一个词，好像校长就低得多，总统就高得多，在英文里是一样的。”

他又举了历史上的王莽：“这个人最喜欢改名字的了。他一当皇帝就把所有的官职统统改了，把全国的县名统统改了，有点像红卫兵，把北京街道名称全改了差不多。他改了后仍不记得，还是记老名字。王莽皇帝下诏书就困难了，改得连县名都不知道了。把老名字写在诏书里面，这样，使公文来往非常麻烦。”

毛泽东又举了很多例子说明不能叫“公社”的理由，最后说：“现在建立的临时权力机构，不要叫公社了吧。是不是叫革命委员会？革命委员会好！”

“大学里的，还是叫文化革命委员会，因为这是《十六条》所规定的。”

“革命委员会要实行革命的‘三结合’，有革命干部的代表，

有军队的代表，有革命群众的代表……”

听到这里，姚文元赶紧问：“主席，我们上海怎么办？”

毛泽东思索了一下，扳着手指头道：

“我看，有三种办法。

“第一种是不改名字。不过，这么一来，全国只有你们一家叫‘公社’，那不是很孤立吗？而且，又不能在《人民日报》上登载你们成立‘上海人民公社’的消息。一登，全国都要叫‘公社’，否则人家有意见，为什么只准上海叫，不准我们叫？”

“第二种是全国都改，那么就要发生刚才提到的问题，要改变政体，改变国号、旗号，发生外国承认不承认的问题。

“第三个办法是上海改一下，和全国一致。”

这时，张春桥才明白了《人民日报》为什么不登“上海人民公社”成立的消息。他连声对毛泽东说：“改，改，我们一定照主席的意见改！”

在与张春桥和姚文元的谈话时，毛泽东提到了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修养》，他说：“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修养》，我看过几遍，这是反马列主义的。现在我们的斗争方式要高明一些，不要、不能老是‘砸狗头’、‘打倒×××’。我看大学生应该研究一下，选几段写些文章批判。”

张春桥、姚文元离开毛泽东那里，才从王力嘴里得知北京最新的“政治行情”：前天，2 月 10 日，毛泽东在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严厉地批评了陈伯达、江青，并要陈伯达、江青作检查，

特地让王力通知张春桥、姚文元进京。难怪毛泽东这次谈话，故意撇开了陈伯达！张春桥懊悔地对王力说："我们正式成立公社时，打个电话来请示主席就好了！"

张春桥和姚文元一走，上海反对派更加活跃，王洪文成为众矢之的，"打倒王洪文！揪出黑后台！"等白底黑字的大标语，覆盖了所有"热烈欢呼上海人民公社成立"的红色大标语。2 月 12 日当天，"工三司"也积极活动，想搞垮"工总司"。

以"二兵团"为主力，联合"一兵团"、"三兵团"、"工三司"，即"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第三司令部"，还有那个"工革会"，即"上海市工人革命委员会"和"战到底兵团"及跟在后面的许多小组织，都发誓一定要打倒王洪文！"大联委"还发动了一次示威大游行。耿金章嫌徒步游行的声势还不够浩大，来了一个"卡车的大游行"，游行的车队在早上 7 点，先到上海北部的闸北公园集中，整理好队伍以后，就浩浩荡荡的向市中心进发，坐在车上的人们，一边慢慢地开车，一边高喊着"打倒王洪文！"。大卡车的两侧，全都贴上了"打倒王洪文"、"揪出黑后台"大幅标语。成千上万辆的大卡车出现在西藏北路，跨过泥城桥，游行到繁华的南京路，再到人民广场和淮海路，整个大上海都轰动了。

王洪文派人到外面去看看情况。派出的人回来报告说：耿金章的大卡车大约有几千辆，他们在中百一店的楼上观看，足足看了两个小时，后面的大卡车还是源源不绝！

那些天，《人民日报》成了上海人最关心的报纸，因为他们要

从中窥测中央的态度，用以决定今后行动的政治方向。

反对派的声势愈来愈大，也越来越起劲，他们觉得光在上海闹还远远不够。于是，采用当年王洪文对付上海市委的办法，决定进京告状。“二兵团”、“一兵团”、“三兵团”、“工三司”，“战到底”和“工革会”联合在一起，组成了“进京控告团”，到国务院接待站去告张春桥和姚文元，也到中南海去控告王洪文和“工总司”。从天安门广场一直到王府井大街，从东西长安街到前门大街，都出现了“打倒王洪文!”、“揪出黑后台!”的大幅标语!

这时的中央文革，也正为落实毛泽东批评陈伯达和江青的指示而紧张的准备着。陈伯达万分紧张，他在钓鱼台对王力说：“精神很紧张，想自杀。”

王力赶紧劝慰：“何必如此呢?主席批评你，是爱护你，是好事。主席说过，对没有希望的人就不批评了。可见主席把你当成有希望的人，所以才批评你。”

陈伯达却说：“我查了书，拉法格是自杀的，列宁还纪念他，证明共产主义者是可以自杀的。”

拉法格是马克思的女婿，次女劳拉的丈夫，坚定的共产主义者，在 1911 年 11 月 25 日与劳拉一起双双离世。

王力劝陈伯达不要想那么多，还是先把检讨写了。陈伯达心乱如麻，检讨怎么也写不下去。

“我心里乱糟糟的，怎么写检讨?”陈伯达对王力说。

“你先简单写几句，在主席那儿挂个号，备个案，以后再详细检讨。” 王力给他出主意。

陈伯达摇着头说：“连简单几句，我也写不了。要不，你替我写几句，我抄。”

“那天，要我在接见‘专揪王任重造反团’时讲打倒陶铸的事，事先我一点也不知道。”陈伯达向王力诉苦，“那天我服了安眠药，没有醒。我是从被窝里被叫去讲话的。江青要我去讲，我乱讲了一遍。”

陈伯达每次出了漏子，都是搬出他那“安眠药”、“糊里糊涂”的一套话推卸责任。这次他也不例外，又是老调重弹。

陈伯达也对戚本禹说：“我都不想活了，主席骂我骂得那么凶。”

戚本禹说：“你可不能自杀，那是叛党啊。”

陈伯达又搬出了马克思的女婿拉法格，说：“马克思的女婿就是自杀的，也没人说他是叛党。”

戚本禹赶紧劝道：“主席骂你，那是对你抱有希望，是为你好。他对你不好就不这么骂了。你看他后来骂过田家英吗？”

陈伯达想了想说：“是啊，主席倒没骂过田家英呢。”

江青听说后也特地跑去安慰陈伯达，对他说：“对主席的批评，我们听着就是了，不要同主席硬抗。主席的脾气你还不知道？不要同他顶。主席常说‘春雨润物细无声’，主席相信的是材料。我们应该把材料收集了给主席看，让主席认识陶铸这个最大的保

皇派的真面目。而且光我们说不行，要让群众来说，主席最相信群众了。”

于是，陈伯达、江青让戚本禹他们在红卫兵的小报中，特别是广东、湖北的小报，把所有批评陶铸、王任重的消息都集中起来，送给毛泽东看。同时又叫戚本禹去查陶铸和王任重在那段时间里所批发的文件。结果发现，在所有中央局里面，中南局所发的坚决执行“资反路线”的文件是最多的。早在 6 月份，陶铸就根据刘少奇的指示，支持在北京各大学开展反右派、反干扰运动，号召打歼灭战，要追根，要在群众中进行排队摸底。刘少奇 1966 年 6 月 20 日批转北京大学《九号简报》后，中南局接连发出了 5 个正式文件，要各级党委坚决贯彻落实。7 月初，陶铸在北京大学讲话时说，反对工作组就是反对党的领导，反对党的领导就是反革命。要绝对服从党的领导，没有商量余地，要群众抓住反党这一条掀起一阵打倒反革命的风暴。

刘少奇、邓小平批发的中南局《关于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报告》，其中说学生中有很多右派，要等他们充分暴露后，及时反击。广东省公安厅还用对付现行反革命的特种技术手段，来侦察大专院校的学生动态，有一个学院竟有四五个班级被列为严密侦察的对象。有许多工人、学生被捕、被打、被审讯。仅武汉市，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就逮捕了四五百人，而且都给他们戴上了手铐脚镣。甚至还有被判处死刑的。王任重说这次运动，湖北要抓三、四十万个右派。直到 1966 年 7 月 18 日毛泽东回京前，陶铸和王

任重还在向中南局发指示说，这次运动要打击的右派，可能比1957年反右运动时还要多。

2月11日，北京卫戍区奉命接管北京市公安局，建立军事管制委员会。公安局所属机构一律派出军事代表，实行军事管制。

2月12日，傅崇碧、李震在北京卫戍区和公安部代表座谈会上讲话。傅崇碧说："有些单位一个晚上夺了七个部的权，光夺了印，这不算夺权。'政法公社'夺公安局的权20多天了，他们作了不少工作，但是还有缺点，甚至错误。根据各造反派的倡议，要解放军接管。现在中央批准了军队的接管。我们'革命军事管制委员会'表示：坚决支持革命左派。有几个问题希望大家注意：一、左派在夺权中打架：如铁道学院情报研究所等；高教部谭厚兰和聂元梓的队伍也干起来了。比如八一学校抓'联动'，一共才一百多个'联动'，一下子去了一万多人，'联动'没抓好，自己反而混战一场。最近在石景山，矿院'东方红'、地质'东方红'、清华'井冈山'和'政法公社'发生冲突，他们指责我们偏向'政法公社'，我们不承认，这是左派打架。二、不要乱抓人，抓人要报告公安部，我们派人去抓。三、不要搞'马路新闻'，各取所需，断章取义。四、我们要协助人民解放军、人民警察维持公安。其他工作还要和大家商量。"

2月13日，戚本禹为"北京革命造反公社"一事给聂元梓、蒯大富打电话：

聂、蒯同志：

关于北京造反公社情况我不了解，他们的代表们曾找过我，因为抽不出时间，一直未能见到。我曾表示过，希望北京市革命组织，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搞大联合，不要搞小团体主义，所传我们对造反公社的批评，如果指的是这个意思，是有的，但是，这不是批评，而是一种愿望。另外，大联合组织，是否用北京公社的名义，希望你们商量一下。

祝你们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联合起来。

戚本禹

1967.2.13

再说北航韩爱晶和北京市三个工人总部组成的“夺委会”守着市委大楼，时常有区县打电话来请示工作。对这些请示，工人李思聪不知该如何回答，跑来找韩爱晶商量。大学生韩爱晶脑子里更是一片空白，只好说：“咱们不能陷到这种事情里去，再有电话，让他们学习毛主席著作，自己处理。”

有时他们被找来的人纠缠的没有办法，只好跑到被抄过家的北京市领导人家里躲起来。

这天，人民大会堂打电话到“夺委会”，通知方臣过去。

方臣来到大会堂，在一间小会议室看见谢富治、郑维山。他们和方臣握手后落座。郑维山是刚从天津处理问题回来，很劳累的样子，正向谢富治讲述他的天津之行。约过了半个多小时,有人通报说北京大学聂元梓到了。

谢富治把方臣领到聂元梓在的那个房间，对二人说：“今天

请你们俩来就是解决大联合问题，你们俩先谈。”说完他就出去了。

聂元梓与方臣再次谈判，聂元梓同意参加“夺委会”工作。谢富治听了二人的谈判汇报，比较满意。

2 月 13 日，北京“夺权斗争委员会”和“北京革命造反公社”又达成了四条协议：

一、按系统组织代表（工人、学生）；

二、北京夺权斗争委员会保持现状；

三、学生由一、二、三司等组成红卫兵代表大会领导，凡参加“北京革命造反公社”的一律撤出；

四、由三个工人组织和“北京革命造反公社”派一个工人组织组成四人小组，负责召集工人讨论筹备工人代表大会的问题。

## 第 504 回：周恩来，接见哈尔滨代表　“密杀令”，细了解江苏事情

2 月 13 日，周恩来在接见哈尔滨“红色造反者联合总部”在北京的代表时，说起了全国各地发生的冲击军队领导机关的情况。他说：

“现在全国各地和解放军冲突的好多，大喇叭在街上喊，攻击解放军，这很不好。前天在三座门全军文革接待站那儿围了不少人，陈伯达同志刚劝走，第二天又来了，在那儿喊，我们最不赞成。呼和浩特、福州、广州，一直到长沙，还有开封，喇叭特别多。”

他对哈尔滨的代表说：“我建议你们哈尔滨‘造反团’把主力调回来，搞全东北的，那么大的东北、矿山、煤矿、林区、石油、工业城市，还不够你们搞的？”

“大庆太重要了，不能不注意。大庆关系很大，不能不采取军队来接管。但这是暂时的。东北的农业还没有过关，大豆还要出口，大连港口也很大，吨位最大的港口！这还不够你们锻炼的？我看，做艰苦的工作，还是到东北、伊春去，那儿是林区，东北搞不好，就没完成造反任务，我们很吹捧你们东北的，一定要造出红彤彤的天下来。当然在外边也有地位了。可以留下一、两个人，都搬走也不好。东北当然也有很多大学。哈尔滨有传说：钢铁公司——鞍山，与市委很对立，钢铁学院我们也不赞成多去，闹的很对立。煤炭减产，钢铁本身还没减产，交通也有问题，机

车出不了，病勤多了。农业——黑龙江农业季节晚一些，也该动手了。为什么那么多人和你们对立。你们那里学校工作比北京还落后，是不是你们照顾这些小弟弟小妹妹不够？”

代表说：“我们力量不够。”

周恩来：“都下厂下乡那怎么行。大寨每天都有四、五千人，可把陈永贵同志搞苦了，光握手都握不过来。非握不可，还要签字，也没有经验。我坚守这一条，不签字。陈永贵问‘主席不签字吗？’主席在天安门上，签字就几千人。要照相。把你们高中组织起来。初中要开学了。”

周恩来说起西安的情况：“西安的组织发展的普遍些，工人、农民。他们的特点不仅政治优势，而且组织也优势。内部争论不休，见面互相打，比哈尔滨凶，北京也面临这么个形势。”

对反对黑龙江夺权的工大刘录，周恩来说：“可以组织批判刘录的行动。团结一批群众，巩固左派，向外发展，支持全市行动。”

“你们《新曙光》还是要发扬光大。”“即使都是左派也还是有矛盾的。当然是内部矛盾。你们注意他们。可以下厂从下面瓦解他们。组织上建立起来，每个厂都要建立核心。不在人多。如果他们真要活动，军区要站出来说话了。和革命委员会闹对立就要走向反动。”“军队做后盾，不要过早的使用军队。不要过早的使用法庭去抓人，回去和潘复生、汪家道说一声。希望他们都努力。这都是做参考的，不当指示，军区过早亮相没好处，让他们

多暴露一些。当然太晚也不好。军工外地联络站都要撤回。”

代表说：“当地群众不让，军区有指示，军队院校在外地的联络站一律撤回。”

周恩来：“那当然不包括你们，有历史关系的留两个人就行了。根据情况，人家同意留的可以留一两个。主要是煽风点火，真正造反派起来了就撤。”

谈到生产问题时，周恩来说：“问题是党政干部亮相太少，你们回去帮潘复生搞一批《红旗》杂志三期社论所指的二类干部做具体工作。革命委员会是个权力机关，不能搞业务，你们要陷入业务就不能行使权力了。一定要帮助省委搞出一批来。”

代表说：“干部有对立情绪，谁上去就搞谁。”

周恩来：“不服气这是私字，要破私立公，功过分明，检查两次就行了嘛！还老检查吗？干一段不成可以撤换嘛！”

“省革命委员会可以派人去，派确实是左派人去，人不要太多，要懂政策，不要学小红卫兵乱冲。主席讲：斗争要文明一些，我们是无产阶级专政。要高姿态，高风格。北京街上标语水平不高，到处都是‘打倒’、‘砸烂狗头’，哪有那么多狗头，都是人头，这样搞法群众很难理解。还搞喷气式照相。相片登报贴在大街上，让外国记者搞去了。现在要将斗争水平提高，现在水平太低，8 月初也没有那么凶嘛！斗倒斗臭要在政治上斗。要对后代进行教育。不然他们将来掌权了也这样干。这就太简单化了。他们认为这样就叫斗臭了。还有把别人生活的事也拿出来了。也叫

斗臭了，我看不合适，主要是要在政治上斗臭。”

代表们请示关于成立革命审判委员会问题，周恩来说：“现行犯可以审判。过去的案子，定性、判刑、开除党籍要到后期搞。”

“有错误就开除党籍，这是一个人的政治生命，典型先搞几个。三结合，领导群众审判。有两个好处，一个是立场鲜明，一个是传播快，杀一儆百，比机关判案好。群众判案总有个主管的，你们建议法院、检察、公安三位一体，一元化是应该的。三派鼎立是不对的。过去法院专学判案，是资产阶级残余法权，专政机关和群众结合是主席的一贯思想，民主集中，但死刑要上报。

最近要起草一个文件，任何党的处分，只能党组织决定。”

尽管南京“红总”利用夺权抢得先机，在《新华日报》上喊出了“126 夺权好得很!”的口号，众多群众也紧跟中央的号召，纷纷贴出“126 夺权好得很!”的大标语，但是，终归中央对江苏的“126 夺权”始终没有明确表态，本来就对“126 夺权”心存芥蒂的南京“827”开始对江苏的“126 夺权”提出质疑，“126 夺权好个屁!”的大标语也渐现南京街头，且越来越多。于是，南京的造反派围绕着“126 夺权”之争愈演愈烈，逐渐分裂成以“红总”为首的“好派”，和以“827”为首的“屁派”。

“屁派”在南京街头张贴漫画：“红总”派的人背着一袋子公章。

南京“屁派”也组成“江苏控告团”，于中央首长 2 月 8 日接见江苏代表团后的第三天，2 月 10 日，也来到北京,住在煤炭

部招待所。

两派在向周恩来和“中央文革”汇报情况时都说：“我们的情况《解放军报》记者邢文举知道。”周恩来当即指示：“让《解放军报》邢文举马上进京汇报。”

于是,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打电话通知邢文举:“刚刚接到周总理通知,要你立即赶到北京。我已经安排军区的伊尔-14 飞机,明天上午保证把你送到。”

邢文举到了北京,刚在西苑旅社安顿好,记者站就通知他,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要接见他,听取江苏省的情况汇报。

邢文举按时赶到中南海谭震林住的四合院。在谭震林的办公室，邢文举向他汇报了自己所经历的江苏省“夺权”前后的情况。谭震林听后,让他赶快把刚才说的情况写个材料，准备上报周恩来。 邢文举当即写了一份简要报告,交给了谭震林。

当晚,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江苏厅接见江苏省委常务书记陈光、省委书记李士英、鲍厚昌以及南京军区的杜方平、江苏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高啸平等。随后，又通知邢文举前去汇报。邢文举到后，先在旁边一个房间等候。22 时多,工作人员过来告诉他：“周总理让你到江苏厅去。”

邢文举走进江苏厅大门，按习惯面向周恩来立正敬礼。周恩来看见邢文举进来,立即从沙发上起身向前,没等邢文举敬礼的手完全放下来,便伸出手来和他握手，随后将他拉到自己的身旁坐下。

坐稳后,周恩来拿着邢文举写的报告,对坐在一旁的江苏省委几位领导说:“你们说,怎么能这样搞呢?要搞好‘大联合’,搞‘三结合’嘛!”

接着,周恩来谈了江苏省“126 夺权”中出现的一系列问题,最后对江苏省委领导说:“你们是党的高级干部,怎么能这么做?怎么能支持一派,反对一派!你们知道这将会给党和国家带来多大损失吗?”批评过后,他又语重心长地说:“你们一定要接受这次‘夺权’教训,回去以后,把江苏省的问题解决好。”

江苏省委领导离开后,周恩来将邢文举留下,就他写的那份情况报告,一一仔细询问,一直持续到次日凌晨 2 时多才结束。

第二天,谭震林在他中南海住处办公室再次召见邢文举，问他：“你们看下一步,让江渭清出来工作可不可以?江苏的造反派和广大群众能不能通过? ”

邢文举第一次遇到中央首长向一个小记者征求人事问题的情况,一时不知如何应答。他想了想说：“如果现在就让江渭清出来主持工作,可能困难太大。因为在江苏,不管是‘好派’还是‘屁派’,都说江渭清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刘少奇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江苏的代理人,现在造反派和革命群众会通不过。我建议，请中央领导最好再找一下江苏省两派,征求一下他们的意见再决定。”

谭震林未至可否。

过了两天,周恩来在西花厅再次听取邢文举的汇报。

坐下后,周恩来先问邢文举："怎么到的北京？"

邢文举回答说："我是坐许司令派的飞机来的。他担心我坐火车时间长误事，亲自调飞机，整架飞机就我一个人。"

接着,周恩来让他详细谈谈江苏省委领导干部在文革中的表现，及邢文举对他们印象如何，嘱咐邢文举一定要敞开谈。

于是,邢文举根据到南京后了解的一些情况和印象,汇报说："陈光是书记处常务书记，也是老书记了，他人很稳健，一般不多说话；省委书记处书记李士英，属于造反派'红总'观点；省委书记处书记包厚昌，人忠厚老实，也不多说话，沉默寡言，对各派的态度不明显；省委常委、统战部长高啸平是江苏省老干部中最早起来造反的，他反对江渭清，认为江渭清忠实执行了刘少奇的资反路线……"

周恩来边听边不时批阅秘书送进来的文件,不时询问许多细节问题。听了邢文举汇报江苏省委领导的情况后,他又问了江苏两大造反派的有关情况。特别问道："这两派为什么联合不起来？症结究竟在哪儿？今后怎样实行联合？"

邢文举汇报说："红总"和"827"的对立情绪相当严重,在短时期搞大联合,可能希望不大。但是双方并非铁板一块。总的讲,"827"群众比较多,讲究政策,参加武斗少些……他建议：中央要和"827"的头头好好谈一谈,征求他们的意见。因为"红总"夺权后,"827"的造反派和群众情绪很大。

接着,按周恩来的要求，邢文举详细介绍了"827"派头头的

一些情况。期间,周恩来还问起了南京长江大桥的建设情况。

这次汇报从上午 8 点多一直持续到中午 12 点多,长达 4 个多小时。整整一上午,周恩来没顾上喝一口水。

事隔数日,总理办公室通知邢文举再次去西花厅,向周恩来第三次汇报情况。

这次召见时间不长。周恩来说:“现在看来,江苏的问题一时难以解决,如果实有必要的话,可能在全省军管,你从记者角度看,南京军区哪位领导出面合适?”

邢文举说:“许司令员是军事干部,处理复杂问题,面对造反派和群众,有时容易急躁。我个人认为,杜平政委比较合适,他政治经验丰富,对造反派工作很有耐心,性格也很温和,善于处理棘手问题,既能服众,又能稳定江苏局势。”

邢文举从南京回到北京 10 多天后的一个深夜,中央文革记者站领导徐学增把他从睡梦中叫起,一起来到办公室,看到王力和戚本禹已在那里等候。只见他俩神情与往日大不一样，屋里弥漫着一派紧张气氛。看到邢文举他们进来，他俩拿出两封匿名信的影印件，非常严肃的问邢文举：

“这两封信到底是怎么回事？你知道不知道？”

邢文举紧张地接过影印件,看过之后,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

原来，这两封信他早在南京就看过。那是 1966 年 12 月的一天，省委常委、统战部长高啸平说，有人在江苏省公安厅的档案里，发现两封神秘信件。信纸是老式的竖写红格宣纸，上面写着

流利的毛笔字写着："渭公：林彪要篡党夺权，请速派人去北京，秘见胡服夫人，号召一、二、四方面军，直取北京，消灭肉体后，报告周总理。"

胡服是刘少奇做地下工作时的别名，当时，江苏省委有人看过此信后，就十分肯定地认为，能写这封信的，在江苏只有两个人，一个是江渭清的小舅子，一个是南京军区副司令员郭化若。邢文举他们在南京时将这些情况写成简报，上报了"中央文革记者站"。

"密杀令"事件发生后，一些莫须有的传闻在南京上层不胫而走。有人说，江渭清接到信后，曾在省委常委会上说："我们这些老干部跟毛主席没有问题，但是，林彪有没有宗派情绪不一定。"据高啸平说，江渭清就这一事件，曾亲自复信让转给党中央。

戚本禹严厉地问道："这么重要的事情，为什么不报告？"

徐学增说："当时因为没有公安机关调查，在无法弄清真实程度之前，匆忙向中央领导反映，有些不妥。"

接着，戚本禹问邢文举："你回北京干什么？是谁让你回北京的？"

邢文举如实回答说："是周总理让我来北京，向他和谭副总理汇报江苏夺权问题。"

戚本禹显得非常不满，既像对邢文举，又像对王力说道："今后，江苏的问题不要向他们汇报，江苏问题我们得接过来。"

听了戚本禹的话，邢文举赶紧对王力和戚本禹说："是总理找我们汇报的，我乘许世友司令员派的飞机来京，到北京的活动都是记者站安排，到中南海和人民大会堂接受谭震林和周总理的召见，记者站领导都知道。"

王力和戚本禹没再说什么。邢文举离开办公室回到宿舍，刚刚睡下，徐学增又把他叫醒，说："中央文革领导让你找到高啸平，马上赶到钓鱼台康生处，有紧急任务，越快越好。"

邢文举乘车到高啸平的住处，接上他驱车来到钓鱼台康生住处。有人引导他们来到一间大会议室。这时，中央文革的陈伯达、康生，江青、王力、关锋、戚本禹等人都已经在场。

邢文举向在座人敬礼，接着自我通报单位、姓名，室内所有人对他的到来和敬礼，没有任何反应。

邢文举和高啸平在会议室的长条桌一边坐下，会议马上开始。先是高啸平汇报"密杀令"以及江苏"文革"情况。

汇报中，戚本禹说："以后，江苏的问题我们要接过来，你们记者今后要直接向我们汇报，你听懂了吗？"

邢文举点头答应说："懂了，但是通过什么方式汇报呢？"

戚本禹说："你们记者有情况可以直接打电话到'中央文革'，今后就不要向他们汇报了！"

高啸平又开始他的汇报，江青望了邢文举一眼，说："邢文举，你做记录，呆在那里干什么！"

邢文举不敢怠慢，连忙取出纸笔。而江青并不总是坐着听汇

报，她一会儿站起来走走，一会儿喝水吃药，一会儿又走到邢文举的身后，看他记录。每当江青走到邢文举身边，他就紧张得连气也不敢喘。

汇报结束后,在场的人七嘴八舌议论起来。有的说:“看来,事情发展严重,现在要把高啸平他们保护起来!”有的说:“高啸平是活口供,绝不能发生任何意外!”还有的说:“他们现在住的不安全,要立即转移!”这时有人说:“现在已经没车了,接邢文举和高啸平的车子回去了。”话音未落,陈伯达用浓重的福建口音高声喊道:“用我的车!用我的车!”戚本禹说:“我看还是把他们转移到北京航空学院。”

于是，邢文举他们乘坐陈伯达的车子,连夜赶到南京“827”的“控告团”住处,将住在那里的 20 多人一个个叫起来,坐上从南京带来的大客车,由陈伯达的司机带路,很快到了北京航空学院。北航“红旗”把高啸平和江苏“告状团”的人安顿下来。

第二天早上,周恩来的联络员宋皋打电话到记者站,向邢文举询问说:“邢记者,你知不知道江苏省的同志都到哪里去了?现在怎么找不到他们了?”容不得仔细思考，邢文举下意识地回答说:“我不知道啊!”接了这个电话,他内心慌乱,六神无主。

然而,事情的发展并不像邢文举想象的那样糟糕。后来,总理办公室不知通过什么渠道,还是找到了在北航的“告状团”的人,也没有追查邢文举参与连夜转移江苏“告状团”的事。

## 第 505 回：派专机，中央召云南代表　大换□，学生突审张□天

2 月 14 日下午 15 时，中央文革在钓鱼台 16 楼召开会议，落实毛泽东批评陈伯达和江青的指示。

开会前，周恩来在钓鱼台 14 楼同陈伯达谈了几个小时，陈伯达打消了自杀的念头。随后，陈伯达又找康生谈了一次，说了情况。

那天下午，王力和关锋去请康生开会时，康生拍着桌子说："这都是江青搞的，要开会就批江青。伯达让她逼得都要自杀了。"

关锋哀求说："康老，无论如何不能这样发脾气，要忍住，这样你到会上骂江青同志，怎么得了？"

那天出席会议的是清一色的钓鱼台中央文革的人马：康生、陈伯达、王力、关锋、戚本禹、张春桥、姚文元。连周恩来都没有参加。

对陈伯达，都是轻描淡写，大家都怕说重了，陈伯达真的去自杀了。对江青，更是没有几个人敢说，只有张春桥字斟句酌的说："主席虽然同时批评了伯达同志、江青同志。但是主席用语不一样。主席说伯达是'进行投机'，这是一个路线问题；主席说江青同声'眼高手低，志大才疏'，这只是一个作风问题。所以，我认为伯达同志的错误性质，跟江青同志不同。不能混为一谈。伯达同志'进行投机'，性质是很严重的……"

陈伯达、江青都在会上做了检讨。

与江苏同一天实施夺权的云南，社会秩序依然动荡，“126夺权”前产生的“炮”、“八”两派，分歧也愈发明显。2 月 10日，中央电召云南省委书记处书记周兴、赵健民、郭超、薛韬，常委刘林元，省监委副书记周力赴京，讨论云南问题。两大派群众组织也分别推派代表赴京。但这时谁也不知道周兴在哪里？

周恩来的秘书给空军“昆指”主任刘懋功打来电话，说北京派一架飞机到昆明，要接省长周兴和副省长郭超去北京，让刘懋功找到他们并送上飞机。

刘懋功说：“现在这里乱得一塌糊涂，已好几天没有周兴他们的消息了，一时不知到哪儿找呀？”

周恩来的秘书说：“总理说了，一定要找到并保证他们的安全。”

刘懋功立即派出几个人分头去找，交待他们找到后直接送到他家里来。

这时，周兴正藏在昆明市弥勒寺省委办公大楼后面云南机械厂的一间平房里。当“昆指”办公室主任、刘懋功的秘书刘鸿弟走进这间平房，只见屋里漆黑一团，什么也看不见。原来周兴很紧张，以为又是造反派要揪斗他，不敢开灯。

刘鸿弟告诉周兴说：“是刘懋功主任要我们来接你到他家里去。”

周兴将信将疑地跟着刘鸿弟上了车。当他们到刘懋功家时，

天已快亮了。周兴一见到刘懋功就作了个揖，感激地说："你老兄救了命呀！"

刘懋功连忙扶住他解释说："不是我，是周总理派飞机接你们去北京的！"

周兴一听，又作揖说："总理呀，救了命呀！"

周兴已经几天没有好好吃饭了，刘懋功家正好做了米浆粑粑，又给他炒了盘回锅肉，他一下子吃了很多。大概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吃饱了，倒头便睡，呼噜打得山响，睡得很香。

找副省长郭超费了更大的功夫，终于也找到了，并接到刘懋功家里。在送他们去机场时，担心再被群众组织发现抢走，刘懋功找来两件军棉大衣给周兴、郭超穿上，还给他们带上棉帽遮住脸，然后坐上吉普车，先到机场转了几圈，看清楚民航局大楼附近没有群众组织的人了，这才敢让他们登机。

2 月 14 日，谢富治接见云南赴京代表小组。他说：

"左派内部有缺点、有分歧，要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要共同对准大方向。不要把自己内部的问题拿到外面去公开。不要公开在外面贴大标语，更不能撒传单，更不能写大字报在外，像这样做都是不对的。现在你们两派内部要停止争吵，可以由你们哪一边先停止，如果那一边不停止，也不要计较这些。"

他还说："关于人民内部矛盾用批评与自我批评方法解决。一般不能叫托派，托派是很坏的敌人。而且不是一般的敌人。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不提倡这样搞。'造反派内部必须大乱'，中央

哪里提过这个口号，报纸上也没有提过。全国也没有这个口号，哪里也没有提过这个口号，听说昆明街上都是标语，这不好，这是你们造反派内部自己的事情，不要公开出去嘛，主要是造反派内部自己要评批与自我批评。”

“你们要赶快打电话回去叫家里面停止论战。”

“黑龙江的那个报告与社论都是很好的，非常重要。对于干部，你们要发动机关的革命干部、革命群众来分析，召开中小型座谈会，来分析对比嘛。只要不是‘三反’分子，就要照红旗第三期社论办。关于干部那一段是主席亲自修改的，修改最多的就是那一段。对犯错误的干部大家要认真分析。”

代表问道：“云南有一个不好的情况，所有的上层干部都靠边站。与上层干部接触就说是走上层路线。”

谢富治说：“这不好，不能这样看，这些老干部只要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份子，他们都是革命几十年，经验较丰富，都要争取团结，犯错误的要允许别人改正。关于走上层路线这个口号，在北京也有这么一股风，凡是有当权派参加的造反派，就认为不好，这种看法是不对的。走上层路线这个口号可能是当权派和保守派提出的，他们想挑起造反派内部起矛盾。把造反派打成保守派，以极‘左’的面目出现，特别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当他们被抓出来以后，恨不得把所有的干部都打倒。一定要认真分析，不能采取一律打倒的态度，一定要找出一个比较好的来，否则三结合就搞不成了。”

就在谢富治接见云南赴京代表小组的当天，2月14日，昆明军区军医学校、外语学校、步兵学校、文工团等军队单位的群众组织与其他群众再次冲击昆明军区机关。2月15日，中共中央军委下达制止昆明各军事学校机关冲击军区的通知：

昆明军区军医学校、外语学校、步兵学校、文工团和四〇三厂同志们：

昨天军区军医学校少数人和今天外语学校少数人都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人，竟敢煽动群众，冲击军事领导机关，是违抗军委命令的错误行为。昆明军区为了维护最高统帅命令的尊严，所采取的措施，是完全正确的。你们应当坚决捍卫和不折不扣地贯彻执行军委的八项命令，立即退出后勤大院。如果你们对军区有何要求，可以派少数代表到军区商谈，但广大群众应该劝说他们退出后勤大院。好让后勤部门进行备战工作。否则，你们中间的负责人，要对这一行动负责。

中央军委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五日

各地抓叛徒战斗队的一条条重要线索，汇聚到天寒地冻的北京城。在调查过程中，许多人都说是柯庆施指示他们写的自首书。于是，学生们给中央文革写了一封信，汇报此事。2 月 14 日，中央文革小组办公室主任阎长贵传达中央文革首长指示的电文时，宣读了中央文革特地给南开大学“八一八”红卫兵发去电报：

“柯庆施同志是个好同志。华北一批人叛变自首的问题，柯

庆施同志没有责任，不要对柯庆施同志采取任何不好的措施。”

于是，在北京的南开大学“抓叛徒战斗队”决定提审张闻天，因为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是张闻天，在同意自首的报告上签字的也是张闻天。2 月 14 日当天，他们来到张闻天的住处，将他团团围住，你一言我一语，“愤怒揭发张闻天反毛泽东思想的滔天罪行”。

张闻天似乎并不把小将们放在眼里，只是吸烟，喝水。问得急了，他就声辩说：“我是一贯紧跟毛主席的。”

这很是激怒了小将，他们质问张闻天：“59 年庐山会议上，你伙同彭德怀，恶毒攻击三面红旗，进行反党反人民的罪恶活动，这难道就是你的所谓一贯紧跟毛主席吗？”

张闻天只好承认：“我就反了这一次。”

小将这才大声喝住了张闻天，单刀直入问：“你历史上一贯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在 1936 年，你就曾经勾结刘少奇，指示别人自首出狱。”

张闻天被突然袭击，半晌说不出话来。小将再三要他“放老实点”，张闻天含糊其辞：“也许刘少奇给我打过电报。”

小将步步紧逼：“什么内容？”

张闻天：“我不能说。”

“为什么不能说？”小将们喝问。

张闻天答：“记不清了。”

张闻天显然采取了拖延战术，他不知道自己到底该如何说？

2 月 14 日只是一审，以后接下来的二审三审，他也在故意拖延。张闻天夫人刘英后来回忆说，被南开大学小将审问的那段日子，张闻天“很为踌躇”。他考虑再三，决定给知道此事真相的康生去信。在信中，张闻天说，此事回忆的结果是“经中央批准”，这样回答是否可以，望康生查了档案后明示。

接连去了两封信，都不见回音。于是，2 月 18 日，张闻天终于在给南开大学“抓叛徒战斗队”的“交待材料”里写道：“我现在记得，当时我没有把此事报告毛主席，或提到中央特别讨论。”

当天，他给毛泽东等人写信，附送了一份证明材料。材料中说：“刘少奇初去北方局（一九三六年春）不久，就给我写了一封关于如何解决白区工作干部问题的信。”“他说，现在北平监狱中有一批干部，过去表现好，据监狱内部传出消息，管理监狱的人自知日子不长，准备逃走，也想及早处理这批犯人，所以只要履行一个不反共不发表的简单手续，犯人即可出狱。他信中提议即办此事。”“他还附带寄来了狱中干部提出有三个条件的请求书，要我签字，好使狱中干部相信，中央是同意那样办的。我当时很相信刘少奇的意见，觉得不要什么代价就可以解决当时确实缺乏的工作干部问题，岂不很好”，“就复信表示同意他的意见，并也在请求书上签了字，退回去了”。

毛泽东在张闻天的这封信上写道：“张闻天关于一九三六年处理北方局领导人，要求中央批准履行‘简单手续’，以便早日

释放关在北平监狱中的干部，给中央的信及附件（印发政治局、书记处、中央军委常委及中央文革小组）汪办。”

2 月 14 日，毛泽东看了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 2 月 12 日《要事汇报》上刊载的陕西省军区副司令员王明坤 2 月 11 日给中央文革小组的电话汇报记录后，批示：

“林彪、恩来同志：排斥交通大学一派，支持极左派的主张，值得研究。应当继续做调查工作，不必急于公开表态。破坏工厂，极左派是有嫌疑的，而交大不主张破坏工厂。以上请酌。并告文革小组。”

2 月 15 日，谢富治、傅崇碧与北京“夺委会”、“北京革命造反公社”座谈。谢富治一一点名后说：

“好几天没见面了，向大家问好。”他说了今天座谈的目的，就是要和大家商量“如何真正夺权？”

他说：“今天第一件事是和同志们商量北京市三结合问题。北京市的夺权与其他各省市不一样，北京市已经夺了一次权。夺了彭真、刘仁、郑天翔、万里、赵凡、陈克寒等的权，是在毛主席指导下夺的。李雪峰、吴德成立了北京新市委，现在是第二次夺权，与其他各省市是不一样，各省市是第一次。今后如何提法，应好好商量。派到北京市的干部，也犯了些错误。商量一下，究竟哪些干部可以参加三结合，看看怎么三结合法，看看哪些人可以哪些人不可以。”

说到北京“一司”、“二司”、“三司”的联合，谢富治说：

“第一，应尊重人家的意见，‘三司’做了很多工作，作出了贡献，要做好‘三司’的工作。第二，红代会应该有清华。”

谢富治强调：“全国性的组织在北京一概取消。这些是几个人凑起来的，没有代表性。你们要帮助中央讲一下，取消它，与卫戍司令部和公安局联系。这是第一步。第二步是撤销在京联络站和各地联络站。他们过去起过促进革命和造反的作用，现在各地都造了反了，不需要了。甚至有些人观点变了，不能代表原单位了。北京在外地不要设联络站，外地在北京也不要设联络站。”

“‘三司’是否保留，你们自己处理，我不能包办。以后不要什么司令部了，可不要那么一套官僚机构，要改成行政组织。”

“怎么合？是按工农商学兵好一些，还是按工厂、学校.....按行业联合队伍严明些。”

“关于工人组织的问题，第一，停止发展，整顿内部，将久经考验的造反派提到领导岗位上来，不要在一个工厂中分几派，将来合并。这样保守派无孔可钻。”

“三个工人总部如果有不纯，可以帮助清理整顿、整风，但决不能把三个总部搞垮，应当充实它，加强它，巩固它。总部也好，总站也好，都不要听下面的片面话，就调人去砸。”

“北京不一定用‘公社’这个名字。现在农村有公社，还有政法公社……上海有一个公社。现在北京搞的倾向革命委员会。上面有人焦急，下面有些人焦急，是好心，但是准备工作要做到家，否则心不齐。现在要搞三结合权力机构。”

傅崇碧说："有人拦车，绑架，这是犯法的，你们要帮助，要支持公安局的工作。""'马路新闻'不要搞，不要太感兴趣，要学习报纸，学习毛泽东思想，什么政策报纸上都有。"

同日，北京市公安局军管会发出布告：

经查：全国红色劳动者造反总团、全国灭资军造反团总部、全国国营农场红色造反兵团等组织，为反动组织。他们大肆进行造谣污蔑，挑动武斗，大搞经济主义，冲击国家首脑机关，抢劫、破坏国家财产，霸占房屋，奸淫妇女等一系列罪恶活动。根据广大革命群众的一致要求，坚决予以取缔，逮捕其首要分子和个别极坏分子，对受蒙蔽的一般成员，只要他们承认错误，揭发反动头目的罪恶，立即返回原地区、原单位，一般不予追究。

另查：全国上山下乡知识青年捍卫真理革命造反团、全国上山下乡红色革命造反团、全国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红色第一线战斗队、全国军垦战士革命造反团、国际红卫军中国支队、全国聋人革命造反联合总部等组织，为非法组织，坚决予以取缔。其他所在北京的所谓全国性群众组织，都是非法的。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的通知，应当立即解散，它们的成员要立即回到原区、原单位。

2 月 15 日，中央军委电令：

"奉毛主席、中央命令，为了更好地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加强战备，决定对陆军第 21、69、38 军的部署，做出调整：

21 军，由山西移驻西安、宝鸡地区，由北京军区调归兰州军

区建制。驻甘肃平凉地区之陆军第 62 师，归还 21 军建制。69 军，由河北保定地区移驻山西，接替 21 军防务。38 军，由吉林通化地区移驻河北保定地区，接替 69 军防务，由沈阳军区调归北京军区建制。”

“以上部队接到命令后，应迅速做好行动准备，尽快开动。21 军、69 军务于 3 月 5 日以前全部到达指定地区，38 军务于 3 月 8 日以前全部到达指定地区”。

三个军的连环调动，牵动大，时间紧。38 军于 2 月 15 日凌晨 4 时许，受领移防预先号令。当日，军部分主要领导即乘飞机先期到达沈阳。16 日 0 时 15 分，受领沈阳军区转“部署调整”电令，18 日 19 时 12 分，先头部队第 334 团 1 营乘火车离开通化，从下达预先号令到第一列列车发出，中间仅有 3 天时间。

38 军移驻保定地区后，代号改为 4800 部队，军长李光军，年 48 岁，政委王猛，年 47 岁，皆为 38 军的新人。

李光军，江苏睢宁人，新四军——三野出身。1947 年任华东野战军 2 纵 6 师 17 团团长，后任由 6 师整编的 21 军 63 师师长，1956 至 59 年赴苏联总参高等军事学院学习四年，回国后历任 39 军副军长、64 军军长，1964 年由大校晋少将，同年接替邓岳，任 38 军军长。

王猛，河北盐山人，八路军——二野出身，在二野 16 军 46 师历任团政委、师政治部主任、师政委。1954 年调任长春第二政治学校政治部主任，1961 年任学校政委，正军级。同年二政

校撤销，向沈阳军区政委赖传珠要求回野战部队，当时没有正军职务可以安排，降任 38 军副政委，在所不计。1964 年与李光军同时晋升少将，1966 年 12 月，接替于敬山任军政委。

关于保定的军事地位，明末顾祖禹《读史方与纪要》有云："重山西峙，群川东汇。宣府、大同为之屏障，倒马、紫荆为之阻隘。联络表里，翊卫京师，诚重地也。在昔河朔有难，保定恒先受之"。

上世纪 50 年代初，河北省省会、河北省军区、69 军军部同驻保定。1958 年，省会、省军区搬至天津。1966 年 4 月间，中央酝酿天津为直辖市，河北省会、省军区再由天津回迁保定。

此时，38 军初抵新防区，于 2 月 24 日奉命与河北省军区一起担负保定地区的支左任务，成立支地办公室。军党委分工，第一书记、军长李光军管"三支两军"，常委、副军长刘海清、副政委邢泽辅之，并主管保定市支左，挡在第一线。第二书记、军政委王猛管军内，对外不出面。介入保定地区支左之初，面对地方纷杂的局面，38 军尚无一定之见。

## 第 506 回：□不满，谭□林□怀仁堂　汇报后，毛泽东只说四条

2 月 16 日下午，周恩来继续在怀仁堂主持党、政、军日常工作的负责人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碰头会，准备讨论的议程是：（一）国务院各口“抓革命，促生产”问题；（二）讨论文革运动中的政策规定等文件共 6 件。

中央政治局委员陈伯达、康生，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候补委员谢富治以及协助周恩来主抓经济工作的国家计委第一副主任兼秘书长余秋里，还有中央文革成员王力、张春桥、姚文元出席了会议，叶群代表林彪出席了会议。中央文革小组的江青、关锋、戚本禹因故未参加。

每次开碰头会时，陈伯达都紧挨着周恩来坐。可能因为刚挨了毛泽东的批评，上次会上又受到叶剑英、徐向前的攻击，这次，他不敢坐周恩来右首第一的位置，躲到后边的桌角了。周恩来发现后，又让他坐回原来的位置。

前来参加会议的谭震林在怀仁堂门口，碰到夹着皮包走进来的张春桥，便问道：“陈丕显同志来了吗？”

谭震林之所以问到陈丕显是否来京，毫无疑问是是因为中央把一部分省委书记接到北京，可是陈丕显仍被上海的耿金章扣押着。张春桥听谭震林冷不丁这么一问，随口答道：“群众不答应啊！”

“群众？党组织可以做工作嘛！”谭震林有些不满的说。

“党？党现在不管用了。”张春桥回答说：“在上海，科长以上干部统统靠边站了！”

“哦!”和张春桥并排走进会议室的谭震林侧头望了张春桥一眼，说:“原来,靠边站,打击一大片,都是你领导的啊!”

两个人就这样一问一答地走进会议室。谭震林一坐下，就对周恩来说：

“研究经济问题不能忽视管生产的干部。现在许多业务干部都打倒了，我们还怎么抓生产？”接着，他又对张春桥说：“比如上海的陈丕显同志，他有什么问题，你们揪住不放？几个大区书记、许多省委书记都有什么问题？为什么不让他们来北京？我请春桥同志回去保一下丕显同志，把他解放出来。”

“群众不答应啊，这些事都要和群众商量，我们回去同群众商量一下。”张春桥说。

“什么群众？”谭震林说：“老是群众、群众，还有党的领导哩!不要党的领导，一天到晚，老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自己搞革命。这是什么东西？这是形而上学！”

张春桥说：“依靠群众这是毛主席的教导。”

谭震林指着张春桥说：“你们的目的,就是要整掉老干部,一个一个打光，把老干部都打光。老干部一个一个被整。陈丕显同志从小参加革命，是红小鬼，40 年的革命，落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我声明：我不是为我自己,我是为了整个老干部,是为了整个党。”

张春桥说："话不能这么说。你只看到这些干部参加革命、根红苗正的一面，没看到他们后来脱离群众，高高在上的一面。陈丕显家的扶手连我们去了还用紫外线消毒，更别提普通群众了。批判他是帮助，怎么是形而上学！"

谭震林说："这叫什么问题？就算老干部有缺点，他们的子弟有什么问题？为什么也挨整？高干子弟统统挨整，见高干子弟就揪，这不是反动血统论是什么？这是用反动的血统论来反对反动的血统论。这不是形而上学吗？"

他又说："你所谓的群众，就是蒯大富之流，蒯大富是什么东西？他是个反革命！搞了个百丑图。这些家伙，就是要把老干部统统打倒。今天会上我敢打保票，曹荻秋、陈丕显、谭启龙、江渭清、江华这些人没问题。江华一家子死了大半，这叫什么革命？"

陈毅也跟着说："这一次是党的历史上斗争最残酷的一次，超过历史上任何一次。我看不仅这次是错误的，而且延安整风也是错误的。"

张春桥说："这是翻历史的案。陈毅同志，你要对这话负责。"

谭震林说："别来这一套！错不错有事实为证。你们整我，不就是说我捕了几条鱼吗？连续逼我 4 次。说政治上造成很大影响，经济上造成很大损失。江青要把我整成反革命，她是当着我的面说的。"

谢富治说："这就不对了嘛。江青和小组的同志多次保谭震

林同志，从来没有说过什么‘反革命’。”

谭震林说：“你不要和稀泥。我就是不要她保！我是为党工作，不是为她一个人工作！”

谢富治说：“你这是对毛主席的态度问题，是不跟毛主席走的问题。”

谭震林嗓门提高了八度说：“难得参加中央会议，既然参加了我就说几句，我恨我为什么活过 65 岁，使我看到现在这种乱糟糟的局面，今天把共产党搞成这个样子。我一生犯了三个错误：第一，我不应该活到今天；第二，不应该跟着毛主席干革命；第三，不应该加入中国共产党，不该革命，不该跟了毛主席 40 年。从 41 年起我不跟了，让你们这些人干，我不干了。砍脑袋，坐监牢，开除党籍，也要斗争到底！我以后还要上山打游击去，我说话就算数。”

耿直的谭震林已经气愤得不能自已，他站起来，离开座位，拿了文件，边走边穿上大衣，要退出会场。

周恩来拍着桌子说：“你给我回来！谭震林，你好大的胆子。有什么话好当面讲，干什么就要走！还有没有组织纪律性？你的大衣还是人民给你的！”

陈毅也劝他说：“谭老板，你不要走，留下来就是要跟他们斗！砍脑袋，坐监牢，开除党籍，也要斗争到底！”

谭震林说：“我就要和他们斗，我还有三千御林军哪。”他回过身，面向陈毅说：“陈老总，我，讲就不怕，怕就不讲，我哪

儿也不走！”他气呼呼的又坐回原来的座位。

陈毅接着说:“这些家伙上台，就是他们搞修正主义。斯大林搞出了一个赫鲁晓夫，以后又怎么样？延安整风搞出了一个刘少奇，现在又怎么样了？在延安，刘少奇、邓小平、彭真，还有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这些人，还不是拥护毛主席最起劲！他们没有反过毛主席，他们根本没有见过毛主席！反毛主席，挨整的是我们这些人。总理不是挨整吗？”

周恩来马上说：“延安整风还要肯定。我应该检讨，当时是整得对的嘛。”

陈毅继续放炮：“历史不是证明了到底谁是反对毛主席吗？以后还要看，还会证明。斯大林不是把班交给了赫鲁晓夫，搞修正主义嘛!”

周恩来又接口说：“所以才搞文化大革命。”

陈毅越说越来劲儿：“在延安整风运动时,整老干部整得很凶。延安抢救运动搞错了多少人?!”

康生冷冷地插了一句:“我是整人的。”

“斯大林死后,就出了赫鲁晓夫。斯大林在世,他比谁的调子都高。现在是斯大林的晚年!”李先念说。

“你们不能这样讲。”周恩来又制止道。

陈毅说：“虽然没有人选我当老干部的代表，我也要为老干部说话。如果说，我们的解放军是在‘大军阀’、‘大土匪’领导下打仗的，怎么能解释人民解放战争取得的伟大胜利！”

“老干部是党和国家的财富。”叶剑英接着说道，“对犯错误的干部为什么要一棍子打死?要治病救人嘛!不能动不动就打倒!照这样下去,人身安全还怎么保障?还怎么做工作?”

谭震林说:“许多老干部,战争年代受了伤,现在又遭残酷虐待。”

“许多干部被揪出来斗,”身受其苦的余秋里,愤怒地说,“这样残酷对待干部，怎么行！计委不给我道歉，我就不去检讨,你们要怎样就怎样吧!”

谢富治插了一句:“中央文革从来没有说过要整全体老干部，对在座的老同志他们都是要保的嘛。”

李先念冲着他说：“你不要和稀泥好不好？现在可以说是全国范围内都在搞大逼供信了。不但老干部挨整，连他们的子女也挨整。把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打成反革命就是证明。‘联动’怎么是反动组织哩？十七、八岁的娃娃，会是反革命吗？”

聂荣臻也说：“对干部子女采取关监的办法，是不教而诛。毛主席在《八条命令》中特别加了一条，各级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严格管教子女。如果父母不教育，责任就在父母。你们把干部子弟和许多青少年说成是联动成员，纵容另一些不明真相的青年人批斗他们，这种不教而诛的做法是极其错误的。不能因为要打倒老子，就揪斗孩子，株连家属。残酷迫害老干部，搞落井下石，这就是不安好心！”

谭震林说:“‘黑五类’，有人讲话；高干子弟，怎么没人

说话！高干子女统统挨整，见高干子弟就揪，这不是反动的血统论是什么？这是用反动的血统论来反对反动的血统论。”

他接着说：“我从来没有哭过。现在哭了三次。哭都没有地方哭，跟前又有秘书，又有孩子，只能背地流眼泪！我从井冈山到现在，你们检查一下，哪里有一点反毛主席。”

谢富治又劝道：“考虑问题不要从个人出发，要从大局出发。”

谭震林大声说：“我哭不是为自己，是为全体老干部哭，为我们这个党哭！”

李先念感慨地附和说：“迫害老干部是什么全局？毛主席说要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我看有些人要打倒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我也哭过三次。”

陈毅说：“他们不把老干部斩尽杀绝是不死心的！”

叶剑英、徐向前相继说：“连国民党都没有达到的目的，他们达到了！”

周恩来说：“你们说打倒老干部有什么根据。从什么时候开始的？都给我说清楚！”

李先念：“从《红旗》十三期社论开始，那样大规模在群众中进行两条路线斗争，号召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开火，全国就乱了。还有什么大串连，老干部统统打倒了。这样做就是错误的。”

周恩来问康生：“《红旗》第十三期社论你看了吗？”

康生说：“我没看。”

周恩来说："起草这么重大的社论，为什么常委没有研究？为什么我也不清楚，你们谁起草的？"

陈伯达说："我不清楚。"

周恩来说："今后写这种文章要事先给我们看一看，征求一下意见。"

陈毅说："不但《红旗》十三期社论有问题，就连林彪同志去年国庆节的讲话也有问题。什么叫反对革命的路线？这就把矛头指向了广大干部，我看林彪同志也要负责任。"

叶剑英说："我搞了这么多年的革命，从来没见过什么大串连。大串连把正常的革命和生产都搞乱了。这种干法本身就有毛病，我根本不赞成。"

徐向前说："中央文革关于军队院校文化大革命的五条指示也不正确，使人民军队失控。"

周恩来在会议中间出去打电话，将会议情况报告了毛泽东，毛泽东派汪东兴前来听会。汪东兴赶来时，会议的高潮已经过去。会议开到晚上 19 时。最后，周恩来说："这是党的会议，当面大家可以畅所欲言，下去绝对不能犯自由主义。现在时间到了，以后再说吧。"就宣布散会。

散会后，周恩来向汪东兴介绍了会议情况。每次碰头会议一结束，周恩来都在第一时间向毛泽东汇报会议情况。而这次会议结束后，他没有马上去毛泽东那里，而是由汪东兴回去后向毛泽东作了汇报。他则在听取了从内蒙呼市回到北京的内务部部长曾

三汇报后，于当晚 22 时 25 分，与曾三、总政主任肖华一起，再次接见内蒙古四方代表。

怀仁堂会议散会半天了，参加会议的姚文元才清醒过来，他看着还在发呆的王力，忙说：“王力，你要站稳立场，这是一场大的斗争。”

几位文革秀才驱车回到钓鱼台住地，张春桥把姚文元、王力约到他的房间说：“今天这个问题很大，我们把情况对一对。”王力记下了要点，3 人核对各自的记录后，张春桥提出向江青汇报，姚文元和王力和他一起到了江青那里。

张春桥他们 3 个人夹叙夹议的报告让江青惊呆了。良久，她才突然暴跳如雷的说：“这是严重的政治事件，这是一场新的路线斗争，陈毅、谭震林、徐向前是错误路线的代表，叶剑英、李先念、余秋里是附和错误路线，周恩来、康生、陈伯达在错误路线中动摇，只有谢富治一人站在正确路线一边！”由于李富春在会上一言未发，所以江青没有提到他。

事关重大，江青劝张春桥、姚文元推迟一天回沪，并对他们说：“要立即报告主席，你们 3 个人都要去。”

江青马上给中南海游泳池打电话，徐业夫接的电话。江青对他说：“张春桥、姚文元就要回上海了，请主席今晚接见。”

过了一会儿，徐业夫回电话说，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北京厅会见他们。

晚 22 时左右，江青他们来到大会堂北京厅。毛泽东见到他

们，就问张春桥：“你们什么时候走？”

张春桥说：“准备 18 日回上海去，主席还有什么指示？”

毛泽东说：“没有了，都谈过了。”

简单说了几句后，张春桥说：“今天发生了一件事，要向主席汇报。”接着，他把他们 3 个人整理的记录情况，向毛泽东汇报了一遍。

毛泽东边听，边笑，边抽烟，边插话，开始并没有当回事，还偶尔说几句幽默话：“几个老兵，发点牢骚，我没听见，你们也装没听见，算了。”

当张春桥汇报到“谭起来，拿文件，穿衣服便走。要退出会场说：‘让你们这些人干，我不干了！砍脑袋，坐监牢，开除党籍，也要斗争到底！’”时，毛泽东说：“他不愿干，让他走嘛！”

摸不清毛泽东的意思的张春桥继续一条条的如实汇报。当汇报到李先念说:“斯大林死后，出了个赫鲁晓夫，斯大林在世，他比谁唱的调子都高。现在是斯大林晚年”时，毛泽东脸色严肃起来。当张春桥汇报到陈毅说延安整风的问题时，毛泽东的脸色变了，他问：“怎么，难道延安整风错了吗？要想翻案吗？要把王明请回来吗？”

当张春桥提到，周恩来对《红旗》杂志 13 期社论没有送他审查有意见时，毛泽东说：“党章上没有规定吧，中央的刊物社论，还要经过政治局常委会讨论。”他叫张春桥与周恩来谈一次话。

张春桥汇报完了，毛泽东没有说话，现场一阵寂静。沉默片刻后,毛泽东说:“第一要抓军队,第二要抓地方,第三要抓干部,第四生产要搞好,要抓铁路和煤炭。”最后，毛泽东让王力把他的意思转告林彪、周恩来和中央文革。

王力说：“我根据主席和总理最近反复讲的干部政策，写了一篇社论，叫《必须正确对待干部》，早已送主席了，主席看过没有？”

毛泽东说：“你马上再送一份到这里来。”

这次汇报大约用了两个小时。

当晚，毛泽东在张春桥、王力、姚文元整理的怀仁堂会议记录上批示：“退陈伯达同志。”

当天，毛泽东审阅林彪报送的中共中央军委《关于军队夺权范围的规定》稿，批示：“已阅，同意。”

这个《规定》指出：

一、军队可以夺权的范围，只限于学院学校（机要学校、尖端技术学校、飞行学校和有外训任务的班、系除外）、文艺团体、体工队、医院（只限于解放军总医院，军区、军种总医院，教学医院）、军事工厂（有尖端技术试验任务的工厂、海军基地所属工厂和绝密工厂除外）。

二、夺权必须是由本单位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来进行，不准联合本单位以外的革命组织参加夺权。在夺权斗争中，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组织之间互相发生争执时，要通过民主协商来解

决，绝不能武斗。

三、各院校、军事工厂等单位的警卫、通信、练习、勤务和运输分队的权不能夺，也不准参加夺权。

四、除第一条规定可以夺权的范围以外，其他一切大小单位都不准采取自下而上的办法进行夺权。

此件于当天发出。

## 第 507 回：继续讲，□毅接见留学生　气□消，谭□林愤笔书信

16 日怀仁堂的碰头会散会后，陈毅与警卫秘书宫恒征一起走回中南海庆云堂四号院陈毅的家。宫恒征见从怀仁堂出来的陈毅浓眉微蹙，怒气未消，试探着问了一声："老总，是不是哪里不舒服？"

陈毅似乎在想心事，所答非所问地嘟噜一句："快走，吃了晚饭还要赶到机场为外宾送行！"

在驱车去机场的路上，宫恒征说："老总，送外宾回来怕很晚了，接见留学生的事就改个期吧？"

"谁说改期？"陈毅说得斩钉截铁，"看着娃娃们犯错误，我陈毅睡得着觉吗？！"

宫恒征所说的接见留学生，是陈毅约见外事口"归国留学生革命造反联络站"负责人一事。2 月的一天，北京中南海庆云堂四号院。陈毅办公室的大办公桌上，端端正正地摆着一张大红请帖，上书"恭请陈毅副总理出席批判驻外使领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等字样，落款是"归国留学生革命造反联络站"。

在当时，用"勒令"一词通知领导人出席这类批判会是司空见惯的，而使用如此恭敬的措词，实属少见，由此可以想象当时陈毅在群众中的威信。

这时回国的留学生约 500 多人,先分住在北大、清华、北医、北航等高等院校，后集中住在友谊宾馆的外国专家局。此时，他

们当中名目繁多的“战斗队”也已如雨后春笋般地建立起来，进而组成了“归国留学生革命造反联络站”，以协调各战斗队的活动和统一行动。

“联络站”成立后的第一个重要决定，就是在北京召开批判外交部驻外使领馆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其时，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热潮已过，留学生们为了表明跟上“革命”的步伐，决定要补上这一课。

在讨论邀请陈毅出席批判大会的方式问题时出现了分歧：一种意见是，驻外使领馆的“资反路线”，同作为外交部长的陈毅有不可分割的关系，应依惯例通知他或勒令他出席；一种意见是，陈毅是人民景仰的元帅和老革命家，应用大红请帖向他发出邀请。讨论的结果，后一种意见占压倒多数，通过。

2 月 16 日晚上，中南海外事口会议室灯光如同白昼。20 多名“归国留学生革命造反联络站”负责人作为 500 多名归国留学生的代表，围坐在罩着白台布的长条桌周围，等候陈毅的接见。主持人告诉大家：“陈毅副总理因有外事活动，请大家稍候。”同时发给每人一张小卡片，填写各人的姓名、年龄、家庭出身等情况。

21 时许，陈毅在秘书宫恒征陪同下步入会议室，边脱大衣边致歉说：“对不起，让诸位久等了！”随即在长条桌的一头坐下来，拿起一张张小卡片念着，和大家一一认识。

“哟，已经过 9 点了！”他看了看手腕上的表，清了清嗓子说：“我讲起话来，往往长得吓人，你们要有思想准备。不过，我这个人也有个好处，讲民主。在座哪位瞌睡来了，就放心大胆地睡。哪位要行方便，会议室边上有卫生间，来去自由。我不会给他扣帽子、打棍子的！”

肃静的会议室里有了轻微的笑声。

陈毅问了一下留学生们在国外的学习生活情况，随即转入正题：

“同学们，你们从国外回来刚刚十来天，对国内情况不了解，对‘文化大革命’也不了解。‘文化大革命’究竟怎么一回事，究竟怎么个搞法，也弄不清楚。你们首当其冲应该做的事情是深入到群众中去，多调查研究。你们要革命，我们并不反对。但是，年轻人不要光满足于轰轰烈烈。我希望你们把这个运动搞得正规一些、好一些，不要犯我们过去犯过的错误。要踏踏实实，不要轰轰烈烈。你们一回国就要开批判驻外使领馆资反路线这样的大会，不是满足于轰轰烈烈吗？可要谨慎从事呀！……

我可以告诉你们，今天政治局会议讨论了干部问题。前一段是为革命小将说话的，现在要为干部说话了。《红旗》杂志马上要发表一篇社论，题目就叫做《必须正确地对待干部》。社论中要引用毛主席《学习和时局》中提出的对于人的处理应取慎重态度，既不含糊敷衍，又不损害同志，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纠正对干部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

路线斗争是很残酷的。我讲这些话，有些人不爱听，可这是真理。”

宫恒征用手碰碰陈毅，示意他把好嘴上的关,别“走火”。陈毅全然不为所动，继续说道：

“现在一斗就是祖宗三代，挖祖坟，动不动就炮轰、打倒、戴高帽子游街，把一场严肃的斗争当成儿戏。前几天,先念同志召开财经口的会，部长、司局长都来了，一问都戴过高帽子，大家相视而笑。这不是瞎胡闹吗？”

陈毅越讲越激动、越愤怒，语气越严肃：“现在有些人，作风不正派！你要上去，你就上嘛，不要踩着别人嘛，不要拿别人的鲜血去染红自己的顶子！中央的事，现在动不动就捅出来，弄一些不懂事的娃娃在前面冲。”

宫恒征又向他递眼色，他置之不理，照样往下说：

“去年我是最坚决反对大字报的一个，这也是我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条罪行，不是我个人害怕，从党的利益出发。现在把刘少奇的 100 条罪状贴到王府井，这是泄密！‘八大’的政治报告，是政治局讨论通过的嘛，怎么叫他一个人负责呀！

前一时期大字报很有水平，现在大字报越写越多，字越来越大，水平越来越低。打倒朱德，打倒贺龙中央根本不同意，贺龙是政治局委员、元帅，怎么一下成了大土匪了呢？朱老总今年 81 岁了，历史上就是‘朱毛’、‘朱毛’，现在说朱老总是军

阀，要打倒，人家不骂共产党过河拆桥呀？！这不是给毛主席脸上抹黑吗？！

现在胡说八道的东西太多！我看到一张红卫兵小报，大标题是：《打倒大特务杨尚昆之弟杨尚奎》。这真是滑天下之大稽！一个是四川人，一个是江西老俵，怎么是兄弟呢？这不是胡说八道吗？胡说八道是要整死人的，是要出人命的呀！”　　陈毅怒不可遏，从座位上站起，转到靠椅后面，双手撑着椅背说：

“你们谁都不相信，只相信毛主席、林总、总理、陈伯达、江青、康生 6 人，承蒙你们宽大，加上 5 个副总理，才 11 个人，这样一个伟大的党，就只有 11 个人是干净的？我不愿当这个干净的，把我揪出去示众好了！”

“有几个人没反对过毛主席？很少。林副主席没有反对过，很伟大，我反对过两次，后来承认了，改正了错误。”

话音戛然而止。整个会议室像突然凝固了，连外交部造反派埋头速记的人也僵坐着一动不动。陈毅对全场扫视了一眼，仍旧回到座位上，用两根指头敲敲脑袋说：

“现在你们这里发热，包括我们这些老家伙中很多人头脑发热。说中国是世界革命中心，自己以为了不起，好像中国在世界上举足轻重！什么举足轻重，我们是举足撞头哟！我们居然有这么一个驻巴基斯坦的武官，把反造到国外去了。他先是同章文晋大使闹矛盾，继而发展到支持使馆的造反派造大使的反，弄得鸡犬不宁。前些天，章文晋大使从巴基斯坦回国，这伙造反派早就

通了气，他一下飞机，就被按着头戴高帽子游街。现在，外国报纸上照片都登出来了，叫他怎么回去工作，怎么向巴基斯坦方面拜会辞行？！真是岂有此理！”

话音未落，在旁速记的一个外交部的造反派倏地起立分辩：“陈老总，关于对那位同志的看法，我们和你有分歧！”

“你算了吧！”陈毅不容分说地猛一挥手，“我对他比你们了解，他是华东的干部，这个人历史上就投机！”

会议室里鸦雀无声。他继续沿着自己的思路往下讲，语气中不无责备的意味：　　“对于干部的缺点错误，可以揭发，可以批评，但反对乱斗，反对胡来。你们在座的这么多干部子弟，你们的爸爸妈妈为中国革命赴汤蹈火，出生入死，现在因莫须有的罪名被批斗，你们不心疼哪？！在座的还有工农子弟，你们的爸爸妈妈为工农大众辛辛苦苦打天下，现在他们无辜地被冤枉，受委屈，你们也无动于衷罗？！……我这样讲，准备惨遭不测，准备人家把我整死，我要不讲的话，我这个共产党员一个铜钱也不值。过去我犯过执行刘、邓路线的错误，现在你们这样搞，我要不讲，就轮到你们犯错误了。”

陈毅还讲了历史，讲他在红军初创时期曾经反对过毛泽东，曾一度使毛泽东离开了红四军前委领导岗位。但实践证明毛泽东是正确的，比自己高明，便心悦诚服地向毛泽东作检讨，赔礼道歉，仍旧把毛泽东请回前委领导岗位。还讲了中央苏区打 AB 团时捕风捉影、刑讯逼供的惨痛教训，冤死了很多人。他自己也被

怀疑为AB团长，只能向人家低头，不敢抬头，走路都得靠着边边走，差一点杀了头。后来他给毛泽东写信反映了这一情况。毛泽东很快回信支持他，不但使他幸免于难，还向他委以重任，把当时的军费和自己的手稿托他保管。他要大家牢记这些历史教训，不要重犯过去的错误。

接着，他心情沉重地说：

“事物都是对立统一的，有马克思、恩格斯，就有伯恩斯坦、考茨基来修正他，有列宁、斯大林，就有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来修正他，我们有毛主席，就没有人来修正他呀？……

我不是乱放炮，我是经过认真思考的。要我看，路线斗争要消除后果需要很长时间。这场文化大革命的后遗症，10年、20年不治！……

我们已经老了，是要交班的。但是，绝不交给野心家、两面派！不能眼睁睁看着千百万烈士用自己宝贵生命换来的革命成果付之东流！我还要看，我还要斗争！大不了罢官嘛！大不了外交部长不当了，我还可以去看大门，扫大街。我是四川人，我还会做担担面嘛！没有什么可怕的！

倒是你们还年轻，要学会受委屈，要学会用脑子想问题。你们现在就那样凶，动不动就要打翻在地，踏上一只脚，如果掌权，那还得了？要出人命的呀！

不是要向毛主席学习吗？毛主席就最能受委屈。毛主席挨王明路线整的时候，鬼都不上门！老实说，毛主席没有 10 年忍耐，就没有今天的毛主席！”

2 月 16 日的晚上，参加完怀仁堂会议的陈毅，又给留学生滔滔不绝地一气讲了 7 个小时。

散会时，已是 2 月 17 日凌晨 4 时许。留学生们似乎都有一种沉重的使命感，当他们离开中南海时，一个个神色庄重而严肃。

在长达 7 个小时的接见中，神经最紧张的要数警卫秘书宫恒征。他随时准备给陈毅某种暗示，提醒他别因说“过头话”而惹来麻烦，直到接见结束才松了一口气。他不得不承认，一开始就小视了这些留学生，以为他们肯定“左”得出奇，不知会找多少麻烦。其实这些留学生是很守规矩的。他认为这是一次成功的接见。学生们显然被陈老总的讲话深深打动，气氛融洽，神情专注，整整 7 个小时没有一个人随便走动，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

留学生代表们对陈毅的讲话，除个别人外，反响很好。乔晓阳说，听了陈老总的讲话心情非常激动，前些日子百思不解的事，此时豁然开朗。“文化大革命”会错吗？他以前想也不敢想。现在懂得了要学会用脑筋想问题，要不断提高分析判断能力。留学生代表们相约不把陈毅讲话的内容向不可靠的人泄露。这些讲话的尖锐程度，随便摘取几段都可以致人于死地。而且，外交部造反派到会担任速记的人，也没有扩散有关讲话内容。

16 日当晚，散会后的谭震林依然沉浸在气愤难平的激动中，

夜不能寐的他在 17 日凌晨分别给毛泽东和林彪写了内容大致相同的信，倾述心中的愤慨。他在信中写道：

林彪同志

昨天碰头会议上，是我第三次反击，第一次是上前天在电话中，第二次是昨天一早写了一封信。我所以要如此，是到忍无可忍的地步。他们不听主席的指示，当着主席的面说："我要造你的反"。他们把主席放在什么地位，真比武则天还凶。他们根本不作阶级分析，手段毒辣是党内没有见过的。一句话，把一个人的政治生命送掉了，名之曰"冲口而出"，陶铸、刘志坚、唐平铸等等，一系列人的政治生命都是如此断送的。对于这些的错误批评过吗，只批评陶铸，其他人都未批评，而且，批评陶铸为时很短，根本不给人改过的机会。老干部，省级以上的高级干部，除了在军队的，住在中南海的，几乎都挨了斗，戴了高帽，坐了飞机，身体垮了，弄得妻离子散，倾家荡产的人不少，谭启龙、江华就是如此。我们党被丑化到无以复加了。北京《群丑图》出笼后，上海、西安照办。真正的修正主义、反革命分子，倒得到保护。这些无人过问，他们有兴趣的是打老干部，只要你有一点过错，抓住不放，非打死你不可。我是主席反复说过要保的，无可奈何，只好整，一次、二次、三次、四次，戴上反革命高帽不行，因为这样太露骨了，又来一个政治上、经济上巨大损失的罪名，非把我整倒不行、对于丑化党的行为，对于老干部倒下去，他们一言不发，少了几顿吨鱼，就如此大发雷霆，就可看出他们

喜的是什么，恨的是什么。他们根本不做检查，把责任推得一干二净，他们能当政吗，能接班吗，我怀疑。

我想了好久，最后下了决心，准备牺牲。但我决不自杀，也不叛国，但决不允许他们再如此蛮干。

总理，已被他们整得够呛了，总理胸襟宽，想得开，忍下去，等候，等候，等到何时，难道等到所有老干部都倒下去了再说吗。不行，不行，一万个不行。这个反，我造定了，下定决心，准备牺牲，斗下去。拼下去。请你放心，我不会自杀。

此致

敬礼

谭震林

2 月 17 日

谭震林所说的三次反击，是这样：

第一次反击：

由于担心水产部的职工在出公海捕鱼作业时，两派之间的发生纠纷，谭震林决定渔轮停港，水产职工在港内停产搞文化大革命。2 月 15 日，陈伯达就渔轮停港之事，打电话给谭震林，批评他停产闹革命是不对的，少捕捞了多少吨鱼，使生产受到损失。谭震林不服，在电话里对陈伯达大发其火。

第二天一早，谭震林又给江青、陈伯达写了一封信，就渔轮停港事件进行分辨。这就是谭震林说的第二次反击。这天早上，

叶群也给谭震林打电话，称“101 还是很关心谭老板的”。“101”是林彪在东北时的代号，谭震林和林彪都是从井冈山出来的。

在当天下午的碰头会上，就发生了谭震林大闹怀仁堂的一幕。这就是谭震林说的第三次反击。

林彪和叶群听秘书念了这封信后，林彪沉默半晌，什么都没说。叶群则赶紧从秘书手里拿回这封信，并一再叮嘱他们“对谁也不要讲。”

## 第 508 回：再接见，内蒙古四方代表　□宵谈，勿将矛头指军□

2 月 16 日晚 22 时 25 分直至次日凌晨 1 时 45 分，就在陈毅在中南海接见留学生代表时，周恩来也在大会堂，与肖华、曾山一起，第二次接见内蒙古军区、自治区党委负责人及内蒙“三司”、“无产阶级革命造反联合总部”四方面代表共 25 名。

5 天前，2 月 11 日，周恩来第一次接见内蒙古四方代表后的第二天拂晓，内务部部长曾山即按照周恩来的指示，立即乘专机飞抵呼和浩特市，总政保卫部也派侦查处有经验的技术员王士一随同前往。

2月12日，总理办公室的工作人员用电话分别向正在北京的内蒙古四方代表传达了周恩来关于内蒙古问题的指示：

“内蒙的问题很大，总理正在全面进行研究，一定要很好解决。现在武斗很严重，要求四方面代表分别给家里做工作，停止武斗，不要使事态扩大。”

当中央开始追查内蒙古军区门前杀人的责任者时，内蒙古军区也深知闯下了大祸。此前，军区个别领导为掩盖错误，企图将枪击事件嫁祸于地方造反派，造出舆论说：“凶手是呼市河西公司造反派的人。”同时，军区也成立了一个调查组，组长是内蒙古军区的一位营职干事。内蒙古军区给调查组布置的任务是：

一、提供证人，证明军区没人开枪；

二、设法证明此案是“呼三司”或“八一八”自己制造的；

三、证明那些可能提供案件真相的人是“反革命”、“坏份子”。

然而，事情发展到这一步，已经不是军区所能控制的了。

曾山部长抵达呼市后，立即着手调查。验尸结果，打死韩桐的是五九式手枪子弹，而且子弹正是来自军区方向。实际上，早在开枪当天，就有群众在南门外拾到子弹壳，上交给军区保卫部。保卫部当晚便命令侦察科科长青吉如木调查。青科长带人来到南大门，在右侧门柱上发现了弹痕。撬开上面的五合板，终于找到了钻进里面的一颗五九式子弹头。五九式手枪是 1959 年的新型国产手枪，当时在内蒙古军区只有师职以上干部才配备，数量有限。验枪结果，只有柳青的枪最近使用过，而且缺少两发子弹。同时，司令部有几名干部密报：2 月 5 日，他们目击了柳青开枪的全过程。保卫部立即将柳青的手枪、弹头和弹壳上交总政保卫部，柳青被拘押起来。

在柳青开枪之前，内蒙古军区曾命令军区管理局临时组织了一支担架队，他们中的两个人也曾亲眼看见柳青开枪。在柳青杀人的当晚 24 时，这支担架队的 12 名成员被内蒙古军区逮捕，收缴了他们的枪支和笔记本。此后，他们被秘密审讯多次，并以“阶级异己分子”的罪名将这些军人关入大牢。此外，内蒙古军区还逮捕了抢救过死者韩桐的医生田光、将韩桐送到医院的司机高交云，甚至监禁了曾传播此事的军区干部家属侯凤英。

曾三回到北京后，周恩来于16日当晚，和总政主任肖华、内

务部部长曾三一起再次接见内蒙古四方代表。

周恩来一开始先询问了高锦明和王逸伦的情况，接着问军区文工团“红色造反团”的代表张淑琴：“你是‘红色造反团’的？”

张淑琴说：“我们的代表是王建平，他们在监狱里，到现在死活都不知道。这群匪徒……”

周恩来拦住她的话说：“不要这样说嘛！你怎么能这样说呢？文工团还有和你们对立的组织吗？”

张淑琴答：“有。”

周恩来问：“叫什么名字？”

张淑琴答：“叫‘尽朝晖战斗队’。”

周恩来不解：“什么‘尽朝晖’？”

张淑琴说：“‘芙蓉国里尽朝晖’，主席诗词里的一句。”

肖华又念了一遍……周恩来恍然大悟：“啊！明白了，芙蓉国里尽朝晖。”

张淑琴：“还有叫‘争朝夕战斗队’的。”

周恩来这次明白了，他说：“能叫‘争朝夕’，不能叫‘尽朝晖’战斗队，这有动词形容词的关系。你知道芙蓉国在什么地方吗？”

张淑琴：“在湖南。”

周恩来：“还是知识分子知道的多。‘尽朝晖’有多少人？”

张淑琴：“20多人，他们参加了军区联合行动总部，叫‘联动’。”

周恩来：“你没有看看它是不是有‘联动’的思想。”

张淑琴：“我们叫它‘联动’。除军区3%的少数派以外，都参加了‘联动’。这个组织的行动纲领是‘联合起来，一致对外’，也就是对付‘三司’。还有几句口号是：服从指挥、绝对保密、勇敢战斗、不怕牺牲。”

周恩来说：“这都是解放军的口号。”

张淑琴继续控诉：“我们20多人都被打过，有的已快被打死。他们用针扎、用脚踢、我被打成脑震荡。”

周恩来问：“其它被捕的多少人？”

张淑琴：“现在下落不明的9人。据同情我们的人透露，这些人在里面被打的遍体鳞伤。”

周恩来问：“清华‘井冈山’的宁魁喜来了没有？”

北京清华大学“井冈山”驻呼联络站宁魁喜答：“我来了。”

周恩来问：“你就是宁左吗？你什么时候去的呼市？”。

宁魁喜：“9月去过，到包头钢铁学校看了看，半个多月就回来了，1月18日去的呼市。”

周恩来问了宁魁喜关于清华“井冈山”呼市联络站的情况后，接着翻了翻面前放的《内蒙古日报》问呼市“三司”代表：“你们10日、11日的《内蒙古日报》还有没有？”

“三司”代表郝广德答：“邮局让他们夺了权，邮不出来。”

周恩来说：“报纸我们扣了，”他手里拿着师院东纵出版的小报《东方红》继续说：“我今天就要和你们谈谈这个问题，你

们公开在报纸上点解放军。你们完全没有从国家整体利益出发。”

郝广德辩解道：“我们骂的只是一小撮。”

周恩来说：“这样也不行，主席和林副主席看了以后很不安，你们的脑子有点热了，你们想到没有，没有毛主席的领导，没有人民解放军的保护，你们能实行大民主吗？我知道你们没有考虑这个问题，你们在给人民解放军脸上抹黑呀！”

他站起来，很激动地说：“我今天是抑制着感情说这些话的，你们当中不少是左派，现在我还承认你们是左派，但是这件事你们错了，就是死了人也不能这样做呀！我们不知有多少人民解放军英勇地牺牲了，我们这样做了吗？他们可以忍受各种委曲，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打伤了就说一句话：同学们啊，你们打错了，你们打了毛主席的人民解放军。保卫中南海就是这样，北京的卫戍部队，一句话没说。尽管红卫兵错了，我们也不说我们的红卫兵，更没有登过报。我们不能骂他们，不能说他们，要保护无产阶级的荣誉，近来到处出现冲击军事机关的事件，昆明冲过军区大院，进驻了军区大院内，使我们军区很难堪，杭州也是这样。大概，正是这样，你们以为什么地方都可以冲。现在冲军事机关成了风，这怎么能行呢？长沙冲了，贵州贵阳要缴解放军的械。我们说有坏人指挥，长沙不仅冲了，而且占了军区大楼，最后我们下令抓头子。是‘红旗军’和‘湘江风雷’合起来搞的。广州、南京是军事院校文工团冲的，沈阳也是这样，肖主任去解决的。不久又扩大了，他们要捉我们几十年转战南北的陈锡联同志，还

抄了家。北京冲中南海，冲三座门，不仅抄了肖主任的家，还要找徐向前同志出来辩论。一直搞了五、六天，那怎么能行呢？这是我们绝不答应的。这样做，就是对解放军不信任。如果有一小撮坏人，可以报军委嘛，我和首都‘三司’也讲过。

就没有想一想，我们这样搞大民主，只有毛主席才能下这样大的决心。我就没有敢这样想过，也可能你们是先知先觉，我反正是后知后觉。过去农村包围城市，解放军席卷全国，解放全国，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夺权斗争是个长期的斗争，主席说这是长期的问题。从49年以来，两条路线的斗争，一直没有停止过。三反五反的斗争，包括清匪反霸，57年反右斗争，62年毛主席提出社会主义时期矛盾，阶级、阶级斗争的学说，63年出来的前十条。这次是有领导地自下而上的夺权，夺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这次夺权靠什么？靠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亲自领导，靠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靠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靠社会主义道路，靠《十六条》。没有这个前提，革命组织怎么成立呢？怎么斗争，怎么夺权呀！我去年9月给首都‘三司’讲过，9月我们强调路线斗争，3个月后强调夺权斗争。毛泽东思想是精神力量，还有物质力量，这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没有解放军，无产阶级专政靠谁来保卫，有个“岿然不动”战斗队，没有解放军能岿然不动吗？帝国主义、修正主义为什么不敢把我们怎么样呀？我们为什么能进行文化大革命的呀，这就是因为我们有伟大领袖，有人民群众，有人民解放军。当然，解放军的某一个人有错

误，但不能给我们的解放军安上。8月初主席表扬过的清华附中那3位同学现在怎么样呀？“

清华“井冈山”的宁左，即宁魁喜说：“成了‘联动’。”

周恩来：“我们的工作做的不够，我们应该帮助。你说蒯大富没有错误？聂元梓没有错误？要帮助嘛！红卫兵的领导成了‘联动’，我们很痛心，我们是有责任的。他们有过功劳，我有时间还想找这3个同学谈谈。主席看得远，抓住了红卫兵这个新事物，8月18日接见，我们饮水思源，还不是清华附中带动起来的吗？他们首先冲向社会，震动全北京城，我们感到措手不及，这是历史的发展嘛！那时打人的、抄家的、剃阴阳头的也有，但那是初期。国庆以后，我们重视大学，中学就抓得少了，就出现了些问题。组织纠察队违法乱纪，我们也有责任。谭力夫的讲话，不但保守派受影响，对造反派也有影响。是哈军工‘红色造反团’的一个战斗队，首先大量印的谭力夫的讲话。陈伯达同志的那篇讲话后，才开始纠正。这个问题还要很快地做工作。现在‘联动’发展到全国，不能光靠公安部门抓，另一方面坏人钻空子，所以才有‘红旗军’，‘战备军’等。群众是好的，这是内部问题，我们绝不在报上登，即使登也只登头子，这是党中央、毛主席对群众运动的态度。”

他又说：“韩桐同志牺牲了，我们派曾山同志去，电报写的很明白，我们是支持你们的。如果解放军有错误，你们可以提出来，中央可以解决。……不能因牺牲了一个同学，一些同学被捕，

你们就这个样子。事情闹成这样子，双方都有责任。现在你们把问题激化起来，这样怎么能保卫无产阶级专政，保卫文化大革命呀？怎样备战备荒？这样无法夺权，三缺一嘛！”

郝广德辩解说：“因为他们围攻。”

周恩来：“你们那些围攻都对吗？北京围攻，你们‘三司’开始也支持过。西安砸了光学仪器厂，这里边主要有坏人。工人、学生我不相信会去砸，这些军事工厂不能让外面的人去串连，现在出现的现象已经超过《十六条》所许可的范围。……尽管你们有千条万条道理，中央给你们的这份电报是内部的，你们把它登在报上，这样一登，拿出国外一散发，外蒙古马上就有了。我看了这个以后，很后悔，说老实话，后面的一段是我加的。当然是经过林副主席批准的。本来能够电话通知，主要想把你们赶快叫来。不料，你们给登了报，同学们，你们年轻，就这样不爱护我们解放军吗？这个问题我负责到底。你们登报这件事，我们是很不安的。我们已电话告诉军区，他们已停止宣传，地方还没有停止。”

清华“井冈山”宁魁喜：“他们也没有停止。”

“三司”董玉华：“今天下午3点，他们还在宣传，有30多辆军队宣传车，以给报社报喜为名，从新城游行到师院。当时师院同学说‘欢迎解放军，’他们还宣传‘三司’是反革命组织。至于我们韩桐同志的灵堂，我们已不接待了。韩桐同志的家属，曾山同志验尸以后，我们派人送了回去，但遭到军区的围攻和软

禁。”

“红卫军”张三林：“周总理，我们根据您的指示，再没有搞宣传。可是他们，在呼市大量印发传单，还搞了假录音，15日他们召开了两万人的大会，宣布了伪造的中央三项决定。”

说完，他将近几天收集到的“三司”方面的传单交给周恩来。

宁魁喜也说：“保守派在军区配合下，夺了邮电局的权。”

“红卫军”代表与之争辩，和呼“三司”代表又争吵起来。

周恩来打断他们的争吵，问：“师院还有没有？”接着又详细询问了呼和浩特市人员的失踪情况，特别问道：“外地到呼市串连的人怎么样？”

宁魁喜说：“截止15日11点，清华‘井冈山’有3个人还没有下落，军事院校的一个人也没有放出来。”

军区代表：“昨天有30多人，军区给买好火车票，用汽车送往车站，一下汽车，全跑了。”

张淑琴：“今天二医大回来11人，打得太厉害，住了302医院。有一个吊起来打，把手脸给打坏了。

宁魁喜：“我们现在打电话不灵。”

周恩来：“现在正在夺权，不要说你，我这个总理说了也不算啰。”

张淑琴提出：“三军院校也要派代表来。”

周恩来说“我派人去调查，不能都来，”他问“三司”代表：“工人方面，以及别的组织和你们有联系的有哪些？”

郝广德答："有工人的、农民的、职工的、共有八个组织。"

周恩来问："能不能叫他们一个组织来一个代表？"

郝广德说："他们强烈要求来。三军院校也要求来。"郝广德写了一个名单交给周恩来。

周恩来对联络员说："联络员同志通知，让他们八个组织各来一名代表。"

内蒙古军区军务部长姜文启说："我们来京解决文化大革命的问题，要解决，得找一找根本问题。内蒙地区现在究竟执行的是毛主席的路线，还是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周恩来回答说："如果现在问区党委执行什么路线，对方也会提出军区执行什么路线。"

姜文启："主要看看事态为什么形成的？"

周恩来不同意他的说法，指出："你好像抓住了要害，好像我抓不住似的。如果像你那样，问题怎样解决？这不是用大帽子压我吗？得把事态先平息下来才行。你的意思无非是说后头有人指挥，指挥的就是区党委。你胆子小，我替你说。应该先把事态平息下来，以后再考虑下一步的问题。"

"红卫军"代表曹文生："总理10日接见我们以后，指示不要把事态扩大。我们坚决执行了总理的指示。我们发现有一张传单是我们下面财贸系统的，我们马上进行了制止。但'三司'却变本加厉，造谣生事，他们来了200多人，他们打着来京告状的旗号来到北京以后，他们把我们的联络站封闭了，抢走了东西。

我们建议在北京的人都回去，抓革命促生产。”

周恩来：“我劝你们首先不要对骂。联络员，你负责以我的名义打电话，通知各方面，从18号零点起停止对骂，宣传车、传单都停止，一切报纸都暂停几天，登中央消息，不然越骂越激动。这个问题要求你们负责。因为内蒙问题影响很大，不能搞亲痛仇快的事情。要停止互打，抓的人要放。如果18号再发生互打，我要查肇事者。双方暂时不要开游行示威大会，你们应该给我一个礼拜的功夫，从下礼拜起我们几个人分头做工作。内蒙报属于哪一派？”

“红卫军”张三林答：“我们。”

周恩来说：“你们可以转载《人民日报》的文章，不要登载攻击性的文章。”

“三司”郝广德：“他们军区尽搞武装游行和武装巡逻。”

周恩来指示：“要停止市内武装游行。”

两派又开始互相告状，可见呼市此时是一片混乱……

周恩来问：“铁路局现在是不是军管？”

“红卫军”曹文生：“由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接管。”

周恩来：“现在还有没有军队？”

曹文生：“已经撤走了。”

郝广德：“还有军队撤到一楼了。”

曹文生：“那是军运处的。”

周恩来：“过去有吗？”

曹文生：“过去就有，那是负责转运的。”

郝广德：“现在到处都有军队，连火车上也有军队。”

周恩来：“那是我们派的。局势的发展，就看你们能不能执行我提出的四条。能不能执行四条，是听不听中央的话的问题。现在要首先共同维护解放军的荣誉，这是我们的最高利益。我今天只能谈到这里。从明天起，分别派人和你们谈。”

## 第 509 回：见群众，总理□走杜向光　讲监督，恩来再提老干□

接见完内蒙古的四方代表，周恩来稍事休息，又接着于2月17日凌晨2时40分起至5时30分，在中南海小礼堂，接见财贸口群众组织代表。接见前明确通知，只接见群众代表，不接见“当权派”，以便专门做各派群众的工作。

会议开始前，与造反派一起参与夺权的财政部副部长杜向光也和群众代表一同进入会场。因为在这次被接见的代表名单中没有杜向光。李先念的秘书郝志学发现后，劝他退出，他不走。郝志学也因此同时受到一些群众代表的围攻，质问郝志学：“代表名单是谁提出来的？”并威胁说：“不让杜向光参加，我们就全体退出。”就这样乱乱哄哄的闹了有一个多小时。

这时，周恩来和李先念已到小礼堂东侧的武成殿，听到这一情况后，周恩来非常生气，让秘书正式通知杜向光退出会场，杜向光仍不听从。实在难以容忍，周恩来进入会场说：

“今天，我请财贸各部委的造反派还有各学校的造反派谈话。没请部长、副部长、司局长，我准备分别跟他们谈。我严守这个规定。因此，财政部杜向光同志，请你站起来！虽然你参加了造反派，但是我不同意你是代表造反派，因为代表造反派有很多人。你是个副部长，你到底是不是呢？你已经抵制了我一次命令了，请你走出去！”

周恩来说了几次，杜向光就是不听，其他部门的群众代表喊

道：

“走！”

“走！”

杜向光还是不走。

周恩来：“哪有这样子办法的！”

很多人喊道：“出去！”

周恩来：“不行！没有话讲！”

众人喊道：“出去！”……

周恩来：“那么党中央的命令都不能接受啊！”

众人气愤：“滚出去！”

周恩来：“你们大家听一听，用这样的办法来混乱哪！”

众人喊：“走！”

周恩来：“走！走！那么你不听最高指示啊？”

众人喊：“这是总理的命令！”

周恩来再也忍不住了，他离开座位，来到杜向光面前，愤怒的目光看着他说：“再次命令你，马上退出会场。”

杜向光还是无动于衷。周恩来生气的命令说：“我奉主席命令来开这个会，你就这样做啊？红卫兵，执行命令！”

众人轰赶他：“走！滚！”

周恩来大声说：“解放军同志，把他逮捕起来！”

众人赞同：“逮捕起来！带走！”

杜向光就这样被在场的警卫战士带走了。少数原来跟着起哄

的也被这种气势镇住了。

周恩来回到座位，说："这样子来破坏我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啊！给他的命令他不服从。"全场长时间鼓掌。周恩来说："谢谢你们支持党中央决定。"

他接着说："他是来夺党中央的财政大权哪！有一些同志被蒙蔽了，你们要好好地觉悟过来！"

台下高呼："打倒保皇派！"

周恩来继续说："给他命令说，财政部不能夺权，财政大权只有监督，不能夺权。敖本立同志来了没有？"

台下敖本立答道："来了！"

周恩来："请你过来，你帮助我来解释一下。我讲了嘛，业务只能监督嘛，是不是？你坐在这边，你要老老实实……，你要完全忠于党，是不是这样说的？"

敖立本说："是的。"

周恩来："既然监督业务，他还夺取财政大权，我能容许吗？我能够代表中央答应吗？你回答。"

敖李本："就杜向光来说……"

周恩来："嗯，他来代表造反派？"

敖立本："他不行……"

周恩来："他就抵抗我的命令嘛！财政部监督业务是最大限度嘛，我们还在考虑当中嘛。

我第一步说，你监督业务可以。他说：'总理的命令我怀疑，

不能执行。’这是什么话！你们听听！这是哪天呢？2 月 7 号。你想想吧，今天是十几了？天亮是 17 了，已经 10 天。可是今天还来蒙混，这样对待党中央啊！”

众人呼口号“谁对抗党中央，就砸烂谁的狗头！”

“受蒙蔽的同志醒悟过来！”

周恩来继续说：“而且信任他。你们听听，怎么传达的这几条决定的。我经过联络员董执同志找财政部接管委员会常委，传达了总理指示：一、财政部的业务权不能夺；二、总理要接见财政部的同志；就是要接见你们造反派喽！三、财政指标要在三、五天内下达，因为这个计划已在 12 月搞出来了，时间已经晚了，希望他们下达嘛；四、业务工作由杜向光同志请示李先念同志。信任他呀！他站在造反派方面，我们信任他，还不够信任哪？！五、吴波同志休息。因为吴波同志被斗的身体不能支持了，所以要他到国务院里头来休息。”

李先念说：“我的秘书在这个地方，你今天来围攻。”

周恩来：“对于杜向光，我们是这样照顾他的呀！他的回答是什么？我念给你们听听。他说：‘我个人意见，造反派夺权问题，根据当时形势、中央精神、《红旗》社论、财政部的实际情况，财政部的造反派夺业务权是应该的，夺的对的！’你们听听。先念同志问他：‘那么总理的指示你为什么不执行呢？’他说：‘不理解，不能执行，难以盲目执行。’党中央、国务院的命令在这样的关键问题上，他可以说不能盲目执行！我们党内有保留自己

意见的权利，但是要执行。你们看看党章嘛。他是一个副部长，当一个副总理代表中央和国务院要他执行一个决定，执行财政部造反派只能监督业务这样一个决定，他竟敢拒不执行。现在各个部都是用监督业务的办法嘛，外交、公安、财政……，公安到现在还没有监督，我们不打算执行监督了，外交也到这个程度嘛！李先念兼财政部长嘛。我们信任他，他竟然这样来对抗，玩弄这样的手腕，把这个决定挡住，使财政部的造反派犯错误，夺了全部的权，自己宣布吴波如何如何，我们不能承认哪！党中央没有批准嘛，党组也解散了，你们看看，党的组织怎么可以由群众解散呢？”

“各部门的造反派要夺取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权和监督业务，应当主要由他本身的造反派为主。比如说，商业部就是以商业部造反派为主，外贸部以外贸部造反派为主，粮食部以粮食部造反派为主，银行以银行造反派为主。至于有关的学校是否参加？根据情况以本部门的造反派为主，有些部不能让外边的来参加。比如公安部肯定是不能让外边的人参加的。我们曾经一度允许政法学院‘政法公社’去夺北京市公安局的权，允许他们试验一下，结果效果不好，他们自己也承认。因为他就那么几百人，不可能管那一万多人。……本来都希望他们能够把公安局本身造反派的火点起来，把彭、罗时代的那些黑手检举出来，把北京市公安局来一个彻底革命。寄了这样的希望，但是后来证明，这样的试验失败了，不得不实行接管，我们把失败的经验告诉你们，希望你

们在内部好好检讨。……天津公安局比这还要严重，天津是内部的坏人造反派、反动的造反派造革命派的反的，一小撮人在那个地方夺取了公安部门的大权。天津比北京秩序更差，岗楼上没有人了，交通岗都没有了，这样十几天，人民真是好哪！没有办法，也只好派军队接管。天津人民真是欢腾已级。天津公安局的假造反派也还挂个名字叫做‘政法公社’，鱼目混珠。所以你们要防止啊。你们一旦有名了，人家到处想沾你们的光呢！你这个‘八.八’队事情管多了，你就要防止本身的尾巴不掉咯。北航是北京革命派，有威信的嘛，很多地方就利用北航的名字，实际上不是北航，盛名之下，其实难符，不要骄傲。一旦出了名，就很得小心翼翼。北京出名的北航‘红旗’、地质‘东方红’、清华‘井冈山’、北大，你们财金学院的‘八.八’，都会要栽跤。所以我看到一个规律，就是发展处于政治优势的时候，保守派分崩离析，觉到自己落后了，要开门整风，甚至要接受革命造反派的领导。但是到革命造反派吸收得太多，变成组织优势的时候，危险就来了，因为这个时候，他们不但把革命的包含在里边了，保守的也包含在里边了，有左的、有中间的、有偏右的。这时内部就发生问题了，思想不那么一致了，行动不那么一致了，有些事情就管不了啦。同时，坏人就钻空子了。所以凡是当着组织的优势的时候，更应该注意思想上要继续前进，才能不断革命，不至于落后。当然，这个问题要跟你们多次谈，你们要实践才能懂得，你们也会慢慢认识这个问题的。”

谈到老干部问题，周恩来说："我刚才举个例子，就是方毅同志，这是我们党的好干部，曾经入过一次狱，最后出来是国共合作了，他放了出来，没有什么手续，这是审查过的。在对外经委主任这个时期，工作很有成绩，机构最小，有很多专家在外边，帮助人家几千个的项目，要不断签署合同。我刚才说了，今天签署援助合同，他没有到场，一问，才知道机关检查某人的错误，造反派勒令方毅必须到场，你看，这样一个大的援外合同的签字，对外经委主任不在场，那会给群众什么印象呢？这怎么行呢？我们宁肯推迟签字等着，许多国家都晓得他这个人，非洲人都熟悉他，越南、朝鲜都知道他，特别是越南，他在那里做过经济代表。怎么能对待这样一个同志，随便一棍子打下去呢？这不符合主席的政策。还有，对干部一斗就是十几天，连续不放。我现在说一个例子，到现在我都很难过。张霖之到底是怎么死的？硬是矿业学院把他关在一个地方 40 多天。尽管他有很严重的错误，他和彭真、薄一波特别是跟彭真也有一些关系，但是今天不能作结论。这个同志还有他的长处。煤炭工业部的造反派和矿业学院的造反派斗住不放，40 多天我不晓得，他死了才突然晓得。所以我今天一听到段君毅，还有今天你们要回来的王磊，"

李先念："王磊现在已进医院了。"

周恩来："我们也应当拿历史唯物主义的眼光来严格地来跟着主席走呀。你乱用他的东西，你就是不合乎主席思想啊。可以把我们三、四十年的老干部统统一概打倒吗？统统靠边站吗？如果

我们这样做，是犯罪的。

我把知道的事都告诉你们哪。关于干部的斗争，不能这样子斗，一斗几十天，十几天，不放出来，那怎么行！把业务耽误了，把身体也摧残了。老干部都这样对待，你们不感觉到，你们用敌对的态度对待他们。但我们就感觉非常深，我们不安，几十年的战友哪。”

“主席一向反对党内斗争中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照现在这样下去也是一种残酷的斗争。而且那种斗争的方法：戴高帽子、挂黑牌子、弯腰、喷气式飞机，照出像来展览在大街上，让外国报纸拿去登载。我们红卫兵报纸，甚至省报都登出来了，许多中央同志看到很不安，很难过。”

李先念：“老实讲我就流了泪，那样下去还得了！”

周恩来：“老干部是党的财富呀！当然要一分为二，也有坏的，但坏的是少数。”

李先念：“我看了陕西那个百丑图，那里边我认得好些人哩，那都是反党分子？”

周恩来：“不仅是对老干部，就是对彭真也不需要这样的方式，斗的要文明一点嘛。我们无产阶级，不要丑化我们自己嘛。对老干部，不能都是用敌视的眼光看待呀。那好，我想你们将来当了政，管了事，将来下一代也这样看待你们，代代相传，把我们党造成什么作风。那是资产阶级封建主义的作风，不是无产阶级的作风。想到这个地方，我就睡不着，我就难过。但是我不会流泪，

这种时候我是要挺起来说服大家的。我觉得责任重大，我不说我要犯罪的。但别的同志发言权比我低呀，他们有什么办法？你们要懂得我们老干部的心情哪，你们觉得现在可以统统抛开，你们为所欲为，行吗？主席首先就不赞成这样做。我们不能放心哪，这是害你们的呀。”

## 第 510 回：发社论，支持福建□先楚　谢富治，督促北京大联合

2 月 16 日，新华社向全国播发了福建省 2 月 11 日召开的“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又一次新反扑的誓师大会”的报道和大会《给毛主席的致敬电》及韩先楚在大会上的发言。

第二天，2月17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坚决捍卫“三结合”的正确方针》。社论写道：

“海防前线福建，传来了令人振奋的好消息。

福建省、福州市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力量，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经过尖锐激烈的搏斗，粉碎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英勇地捍卫了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做出了新贡献。

我们热烈欢呼福建无产阶级革命派这一辉煌的胜利！”

2 月 18 日，《解放军报》发表社论：《彻底粉碎反革命逆流》。

这两篇社论都总结了福建省的经验，向全国发出号召：坚决捍卫“三结合”的正确方针，彻底粉碎反革命逆流。

两篇社论的发表，如同平地一声春雷，福州市震撼了，全城沸腾了，几天来，东海之滨披上了节日的盛装，到处是火红的标语，火红的旗帜，锣鼓声、鞭炮声、口号声惊天动地，通宵不绝，从工厂到农村，从机关到学校，工人、农民、干部和红卫兵的队伍，抬着毛泽东的巨幅画像，高举着《毛主席语录》本和大红喜报，像百川归海一样从四面八方涌向“福州军区革命群众来访接

待站”，向党中央毛主席报喜，向人民解放军报喜。

当然，对于支持“一二六”行动“好得很”这一派的学生来说，这些日子就像被镇在五行山下的“渴饮溶铜捱岁月，饥餐铁弹度时光”的孙悟空一样日子难过了。他们所受到的压力越来越大，纷纷开门整风，对自己组织的勤务组展开激烈、尖锐的批评。

在福建师范学院中文系，师院“红九二”召开了一个组织内部的揭发批判他们头头王泉金大会。会上，王泉金做了检查。他用低沉的声调说道：“我有高级政治扒手的概念是在去年 12 月，当时，韩先楚同志有一个讲话，曾说到好人坏人要分清，要谨防高级政治扒手云云，从此，我就很注意高级政治扒手。”

……

大会主持人打断他的发言，紧绑着脸孔问道：“王泉金，你有没有说过，‘抓高级政治扒手，要准备 4 年不得翻身’这句话？”

王泉金掉头瞥了瞥他，回答说：“我有说过这句话，……我这是从北京回来之后讲的，《红旗》杂志社的记者也支持我的看法。”

“王泉金，你跟《红旗》杂志社、新华社记者有什么联系？你老实交代！”

“我跟他们没联系，不过，《红旗》杂志社、新华社有几个记者我认识，我从来没到过新华社，连新华社在什么地方，我也不知道。”

“那你跟《福建日报》社有什么联系？有人揭发说，你上北京之前，曾经收到过他们的信，有没有这回事？”另一位大会主持人、一剪短发的女大学生也正言厉色地喝问。

“我与他们没有联系，也没有收到他们的信。”王泉金否认说。

“你跟谁还有联系？你还到过什么地方进行秘密串联？”

“我没跟谁有联系，自从北京回来到请罪，我一共只上街看过一次大字报，其他时间都在总部，我的眼力不行，只有 0.3，在总部被抄以前，都在总部睡。”

“你跟公安厅有什么联系？”女大学生继续刨根究底地追问。

“我与公安厅没有联系，当时我认为公安厅是支持我们的。”

那女大学生又高八度地嚷起来。“我问你，你跟‘八二九联司’有什么联系？”

“我与‘八二九联司’没联系。”

“哼，没联系？别空肚打饱嗝说假话了。”女大学生脸上露出不相信的神情说，“我问你，既然没联系，那为什么‘八二九联司’的人会打电话给你呀？”

王泉金不禁愣了一下，两眼瞧了瞧那两位会议主持人，好一会儿才回答：“那是我的一个同学打来的，是一个与我比较要好的女同学，她告诉我说老区要来抄‘红九二’总部，她怕我被杀

了。……这些是我的个人关系，我可以向组织交代，这里不讲了。”

“王泉金，我几次接到从交际处给你打来的电话，那可不是花腔女高音，而是地地道道的男低音，请问，这究竟又是怎么一回事？”主持人又不留情面地揭发说。

“我有几个比较熟悉的‘八二九’同学住在那里，是他们打电话来的，我的同学不会有什么关系，因为与我的观点是完全对立的。”

此时此刻，王泉金有些激动了，热血冲到了脑门顶，涨红着脸大声道，“同学们哪，事到如今，我也没有什么好隐瞒的了，丁是丁，卯是卯，该说的我都说了，请你们相信我，至于我个人的关系，我想完全没有必要讲。”

这些问题显然是触痛了王泉金的心，他无法抑制住自己那冲动的感情，心中泛起了阵阵潋滟。

原来，刚刚说到的那个女同学是厦门大学的学生，和王泉金是青梅竹马的好朋友，中学又在同一个中学、同一个班级。他的语文很好，写作能力很强。而她的数理化成绩优异，还是班上化学课代表，俩人经常在一起讨论学习上的问题，交流思想的看法，在革命化的年代里，两个青年男女能够时常这样接触，不言而喻地意味着彼此内心里暗存着爱慕之情。

中学毕业后，他考入福建师范学院中文系，而她则考取厦门大学化学系，在即将离别前夕的一天晚上，他把她约出来散步。

月亮高高地悬挂在湛蓝色的夜幕上，把乳汁似的光辉洒在大地上，道路两旁的树木也投下了朦胧的荫影和班驳的月光，周围的环境颇幽静，路上没有多少人在走动。

二人缓缓地走着，彼此之间保持着二尺左右的距离。他的脸色苍白，而她则静静地等待他的开口。

默默地走了好一段路，他总算说话了："今晚月亮好圆呀！"

她也有意无意地抬头仰望了一下夜空，那月亮的确圆得像一只白玉盘，不由地发出赞叹道："是呀，今晚的月亮真圆，美极了！"

又是一阵沉默之后，他终于说道："咱们很快就要分手了，你到厦门去，我到省城去，我真舍不得咱们分离！"

"我也是，我会永远怀念我们的中学时代的。"她也发出了肺腑之言。

"咱们分手之后，你愿意保持书信往来吗？"他犹豫了一下，鼓足勇气问道。

"只要你写信来，我会给你回信的。"

于是，进入大学之后，他俩保持着频繁的通信往来。文化大革命的龙卷风席卷而来，起初他们的观点一样，雪片似的信件交流着他们共同的语言，激烈的政治词藻代替了卿卿我我的甜言蜜语。以后，她随厦大"独立师"的人来省城造反，二人又重新见面了，"革命"加恋爱使这段日子变得富有罗曼蒂克的气味，他们每次见面，谈爱情，也谈革命，更多的时候是谈论这场文化大

革命，革命使他们的爱情得到了升华。

岂料好景不长，随着运动的发展，他们的政治观点发生了严重的分歧，最初是在王泉金抛出两张揪扒手的大字报时，后来到“一二六事件”发生，他们之间的裂痕已大得无可弥补了。政治上的分歧导致了爱情上的破裂，她好些天不理睬他，致使他的内心深深地陷入于痛苦之中。不过，他是一个性格刚强的男子汉，情不露于形，何况现在运动正面临着一个紧要关头，作为一个组织的领导，他没时间叹息，没时间抽泣，更顾及不上儿女情长的事情。

前几天，她突然给他挂来一个电话说：“泉金，告诉你一件事，你不要对别人讲，听说老区组织要来抄你们‘红九二’总部，你可要千万小心呀！”

“谢谢你，谢谢你对我的关心，我会多加小心的。”他被感动了，心灵又一次受到强烈的震撼。

“我可真害怕人家会把你杀了，你千万要当心呀！”她再三叮嘱说。

“我会当心的，谢谢你！”一股热流传遍了他的全身，放下话筒，他激动的心情仍久久难以平静下来。

想不到，这些人明明知道他的女朋友在“八二九联司”，偏偏又故意在上面大做文章，这叫人怎么不恼火异常，假如今天不是他做检查，那他肯定要大发作的。

就在王泉金检查后的第三天上午，几辆满载着全副武装的解

放军的军车开进了师院校园，一位解放军干部向他出示了军管会的“逮捕证”说：“王泉金，你被逮捕了！”

王泉金脸色苍白，急忙申辩说：“我不是反革命，你们凭什么理由抓我？”

“你少啰嗦，你就是现行反革命分子，给我铐上！”那名干部命令说，几个战士一拥而上，将明晃晃的手铐把王泉金的手铐上，押上了军车。

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公布了《关于取缔全国性组织的通知》后，“全红总”发出《二告全国人民书》，贴出大字报并印发了传单，质问中央：“为什么全国总工会、全国妇联、全国学联、全国青联、全国工商联这些‘全国性组织’有权存在，我们的全国性组织却要勒令撤销？”

中央 2 月 17 日直接针对“全红总”发出《关于文革期间对临时工、合同工、轮换工、外包工处理问题的通告》：

（一）全国红色劳动者造反总团、劳动部、中华全国总工会一九六七年一月二日的联合通告是非法的，应予以取消。各省市劳动局根据“三团体”的联合通告所决定的一切文档，一律作废。

（二）临时工、合同工、轮换工、外包工等制度，有些是合理的，有些是很不合理的，错误的，中央正在研究，准备分别情况予以改革。在中央未做出新决定以前，仍按原来办法进行。

（三）各企业、各单位的临时工、合同工、轮换工、外包工，应和正式的职工、工作人员享有同等的政治权利，有权参加无产

阶级文化大革命。

（四）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初期，因为对领导上提意见而被打成“反革命”的临时工、合同工、轮换工、外包工，应当平反。因此而被解雇的，应当回到原生产单位，按原合同办事，克扣的工资应当补发。

（五）要把混入临时工、合同工、轮换工、外包工中坚持反动立场的地、富、反、坏、右分子（不是指家庭出身）清除出去。假冒组织名义招摇撞骗者，必须坚决揭露。

（六）临时工、合同工、轮换工、外包工没有必要成立单独的组织。全国红色劳动者造反总团以及各地的分团应当取消。参加这个组织的革命群众，可参加本企业、本单位、本地方的革命群众组织。

中共中央　　国务院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七日

中央的这个文件发出后，尚未离京的“全红总”外地委员和北京藉的总部委员约 30 多人在冶金部第二招待所二楼开了“全红总”在京总部委员的最后一次会议。“五人小组”成员金展云、郝维奇和周牧一起主持了这次会议。

会议决定，搬迁到广州的“全红总”全国总部鉴于中共公开取缔“全红总”，立即改名为“改革临时工合同工制度联络总站”。分团各自更改组织的名字，进一步整顿基层，等待有利时机。北京分团改名后，可参加本地区、本单位的夺权，保障组织

不散。会议最后决定印发《三告全国人民书》，大家尽快离京，约定在 1967 年“五一”劳动节在广州汇合。

2月1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同时还发出《关于支援内地和边疆建设的职工应就地参加文化大革命的紧急通告》和《关于处理下乡上山知识青年外出串联、请愿、上访的通知》。

在《关于处理下乡上山知识青年外出串联、请愿、上访的通知》中规定：

“凡尚在外地进行串连、请愿、上访的下乡上山知识青年、农场职工，所有人员应立即返回本单位，参加文化大革命，并搞好生产。所设联络站，一律撤销。”

对“还要出外串连、请愿、上访的下乡上山知识青年、支边青年、农场职工中，有少数行踪诡秘，不报真实姓名和工作单位，到处招摇撞骗，扰乱社会治安，破坏国家财产的分子，要彻底查清，依法惩办。”

“对于安置工作的问题，应按中共中央"关于反对经济主义的通知"第三条"前几年下放农村业已参加农业生产的群众、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应当安心参加农业生产，参加农村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安置工作的问题，应由各级党委负责逐步加以解决执行。”

“前几年精简下放、现居城镇的人员的安置问题，也应按上述第三条的精神执行，不得回原工、交企业和事业单位强求复工。”

2 月 16 日晚，谢富治参加“首都革命造反派夺权斗争委员会”会议，“夺委会”成员北航方臣、一机田文海、矿院林志祥、清华陈育延等参加了这次会议。谢富治最后说：“过去是左派，在这次大联合的过程中，搞分裂的不是左派。”

第二天，2月17日的中午、下午和晚上又连续开了三个会。会上，谢富治看了“新北大红旗兵团”印发的传单后问：“为什么要发声明？这个作法……”他摇头。

又看了一张登有许多照片的传单后说：“这不是反动的吗？你还给他宣传，这是给敌人宣传，这究竟是什么人干的？一定要严肃处理。我不管他是哪的联络站，都要取消他，你不处理，我就派人处理。”

他一一点名后说：“跟你们商量一件事情。春天到了，北京市结合还没解决。又要搞座谈会，听听造反派同志们的意见。在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领导下，站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革命路线一边。在毛泽东思想红旗下，革命造反派要联合起来，团结起来，实现三结合，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开火。

对北京的形势，北京和其他地方不同。就是6月3日改组了北京市委，到现在已是7个月。又是第二次夺权，又是首都。夺权的事还要商量。今天要谈就一件事。对市委书记要给他们一个检查改进的机会。给他们检查错误，进行工作的条件。在检查错误进行工作的过程中，来判哪些人好些，哪些人差些，哪些人更好些，哪些人更差些。今天还是商量这件事。北京市哪些干部可以

三结合，要给他们做工作，那里有错那些检查，给他们自由，不要限制自由。”

有的代表说：“我们没有经验，要革命干部站出来。”

谢富治：“你们要给他们自由，不要老关在房子里。”“各级要三结合才行，不然疏通不开是不行的。”

有人提出市委，市人委中的一些人，不听话不干工作。傅崇碧说：“就是因为你们没有三结合嘛。”

谢富治：“这是一个好办法，上海有一个。在三结合以前有过渡时期。你们讲的有道理，要创造条件。我问张春桥上海的情况，他说还是按产业系统搞好。不要分得太细，主要是工人、农民和学生等。”

“夺权斗争委员会”的代表提出成立一个“春耕火线指挥部”，谢富治看了关于“火线指挥部”的建议后说：

“这是好办法，这个办法不错。上边加以承认。要有干部，要有造反派的工人、农民、红卫兵,解放军也派人参加，成立一个指挥部，有十几个人，由刘建勋负责召集。只要是革命的，是符合毛泽东思想的，是站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革命路线一边的，那就可以合在一块。

市委的同志在不同的程度上自己犯了一些错误，要让他们开展工作，将来一定有一些人要参加三结合，不管怎样，要给检查的自由，工作的自由，不要老派两个人在后跟着，那样不行。”

他说：“生产任务一定要有人来抓，不管是什么方式。”“现

在要防止打倒一切。”

会上，具体讨论到粮食、棉花、油、猪的产量。

## 第 511 回：《出□论》,《中学文□报》出版 争相购，北京城为之□动

2 月 17 日，北京中学生在工人体育馆召开了一次万人大会，“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会上，由北京几个中学生自己创办的《中学文革报》代表遇罗文上台讲话，宣讲《出身论》，引起现场武斗冲突，在北京轰动一时。

说起《中学文革报》，还要从 1966 年 12 月底讲起。当时，北京四中的学生牟志京在北京西什库后库的一个电线杆上，看到一份油印的传单，题目是《出身论》，署名是“北京家庭出身问题研究小组”，内容是批判“血统论”的。牟志京读罢，钦佩之感油然而生。他觉得，这份传单能把出身问题上升到理论去研究，而且文章逻辑之严密，正气之凛然，文风之清新，无不让他十分的钦佩。

早在 1966 年“红八月”前后，“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对联刚出现，牟志京就觉得不对。他查阅了《毛泽东选集》和中央文件，为自己找理论根据，然后写了批判“对联”的大字报，贴在了清华附中。8 月 1 日，他又听说中央音乐学院召开“对联”辩论会，就和同学李家柱一起骑车去了那里。在音乐学院，他们看见著名音乐家马思聪，胸前挂着大牌子正在铲煤。会场内外人山人海，几乎都是身着黄军装的红卫兵。主持大会的是个梳两把刷子的女生，牟志京报名发言，没过几分钟，就有个女生过来让他准备上台，说发言大都是支持“对联”的，让他这

反对派上台，好增添大会的辩论气氛。

没想到，他上台还没讲几分钟，刚才还举止文雅的几个女生突然冲上来，满嘴脏话，抢夺他的话筒，还用拳头在他背上乱捶，见没有什么效果，几个女生又转到他面前，朝他脸上吐唾沫。牟志京的发言只能在这样滑稽的场面中结束了。

下台后，气愤难平的牟志京借来纸墨，在中央音乐学院也留下大字报，并署了名。过几天回去一看，居然有不少回应，大多是谩骂。明明是一帮女生，却在大字报的结尾处学男人的粗鲁腔调："你他妈的要是有种，就到我们学校来，让我们给你点教训！"

不久，他又在班上与同学辩论出身问题，还是被大家骂了个狗血喷头。其中一位出身不好的同学在批判他到最后时，情绪高昂地喊道："我出身反动，我就是王八蛋。你不承认我是王八蛋，那你就是王八蛋。"讲到那最后 3 个字，他满面通红，脖上青筋都暴出来了。

牟志京在学校的处境日渐险恶，遭红卫兵的追打，于是便借大串连之机，到外地跑了两个多月，走广州，绕黔贵，上新疆，下农村。夜里挑灯读《毛选》，西安徒步奔延安，最后带着一身虱子回到了北京。

而此时的京城，风向已转，第一代老红卫兵不再是天之骄子了。1966 年 12 月 16 日的工人体育场大会，宣判了"鬼见愁"对联的死刑，牟志京同班同学王祖锷和高二五班汤池也在会上分别作了《宣判反动对联死刑》和《摧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

堡垒----西城区纠察队》的发言，其中特别提到牟志京反对“对联”的经历和代价，周恩来在随后的讲话中，还对“这位同学”予以赞扬，牟志京在四中成了正确思想的代表。

但是，牟志京反对“鬼见愁”对联只是出于本能的反感和义愤，而《出身论》却能从理论上系统完整的去批判“血统论”的错误，这让牟志京赞叹不已，他当即抄下油印稿下面的联络地址：北京六十五中遇罗文。

牟志京和同学王建复很快找到了遇罗文。大家相见恨晚，话语投机。他们想把《出身论》铅印出来，以扩大宣传。牟志京便利用自己在四中反对“对联”所形成的地位，当即向学校总务室借了 500 元钱，打了张借条。然后又通过小学同学朱大年弄到了北京“三司”宣传部的一张介绍信，闯进人民解放军 1201 印刷厂，即《解放军画报》印刷厂，商量妥了印刷事宜。纸张在那个大字报和宣传品铺天盖地的年头是十分紧张的，他们在六部口纸张批发部没买到，但通过批发部介绍，到农工民主党中央买到了两令上好的道林纸。所有这些事情在短短的时间内办成，遇罗文喜出望外。随即由他联系“家庭出身问题研究小组”，送来了一份新的《出身论》手稿，准备以铅印传单形式散发。

谁知，牟志京在仔细拜读了新稿之后，感到有诸多不太满意的地方。他特别反感的是，在文章的调子中，一些地方渗透出一股怨气，另一些地方下笔刻薄，两者的结合，就失掉了客观理论的身份，让人情不自禁地猜想作者本人在出身上的恩怨利害。革

命小将敢想敢干，于是，他对《出身论》的新稿刀砍斧伐，作了大量的修改。

在理论上，牟志京没有什么新的建树。但是他觉得，自己在为其他人完成一项与自己利益无关的事业，是不是太伟大了？自豪感油然而生。

不料，遇罗文见到被牟志京涂改的《出身论》之后，竟一反温文尔雅的常态，勃然大怒，拂袖而去。

第二天早上，遇罗文又来到四中，但却是换了一个面孔，是向牟志京道歉来的，说“小组”的人很欣赏他的改动，《出身论》可以按他的修改稿付印。

于是，他们到 1201 厂找到业务科的金科长商酌，决定采用四开版五号字，本以为差不多，没想到排好版竟多了个“天窗”。金科长问如何利用这一空间？“两页一对折，那不就是一份报纸吗？”牟志京忽然产生了办报纸的念头。

当时毛泽东给了学生结社、办报、宣传的充分自由和权力，北京的小报多如牛毛，牟志京他们决定，将《出身论》这份传单改成一份报纸，报纸的名字就叫《中学文革报》，以“首都中学生革命造反司令部宣传部”的旗号出版发行。

学生都很胆大，敢想敢干。牟志京请四中的语文老师毛宪文做技术咨询，毛宪文出于对政治的谨慎，拒不参加组织工作，只提供文字咨询。牟志京又让擅长美工的三中学生朱维理拼毛体的报头题字，就是从毛泽东手书中拼凑“中学文革报”这五个字。

其中“文”字取《解放军报》的“放”字右半边。再从牟志京的小学同学朱大年和刘姜仁处各征一文，还用了牟志京四中同班同学李宝臣署名“敌敌畏”的一篇杂文，又选用北师大女附中陶洛诵和汪静姗编的一组动态消息。准备完毕，他在四中语文教研室连夜撰写《出身论》的编者按，和署名“司令部”的一篇坚决砸烂“联动”的公告。天近拂晓，他把版面、字体、字号、花边等编排好，将坐在椅上打呼噜的遇罗文唤醒，打了招呼，只身骑车到 1201 厂交稿。第二天，又经过校订、签字，几个人忙了几天几宿，1967 年 1 月 18 日，刊有《出身论》的《中学文革报》创刊号终于公开出版发行了。

印刷《中学文革报》的时候，那些印刷工人一边印，一边往自己兜里揣。问为什么？工人说，他们觉得这报纸内容写的特别好。

就这样，第一期《中学文革报》因为刊登了《出身论》而一炮打响，立刻轰动了北京城。人们纷纷猜测《出身论》的作者是谁？在街上还有人议论说：“这是反右以来最敢说话的文章了。”

创刊的第二天，《中学文革报》在四中的办公室一下子就门庭若市，来访者不断。大多数人是来索购报纸的，也有很多人是以他们的亲身经历来说明为什么要反对“鬼见愁”对联。

卖报的场面也非常感人。买报的人排起长长的队伍，时常达到 200 多人。热情的读者把几个卖报人团团围起来，形成人墙，

维持秩序。

有一次，遇罗文的小弟弟遇罗勉在卖报时，发现买报的队伍有骚动，为避免被哄抢，他抱着未售完的《中学文革报》就跑。跑着跑着，一回头，后面跟着一长队想买报的人群，还是排着队追，不愿意把队弄乱。追得实在不行了，遇罗勉躲到一个院子里，外面的人还排队在外面等着，并对他说“我们都排好队了，你别害怕，你再卖吧。”

第一期《中学文革报》只印了 3 万份，很快就卖完了。最后只剩下印坏了的也有人央求买走。小报、纪念章交易市场上，有人甚至花 2 元钱去买原本 2 分钱一份的报纸。

2 月，《中学文革报》第一期又以特刊形式重印 6 万份，依然被一抢而光。

那时毛泽东的像章是特别珍贵的，沈阳高中生孙钢从北京回沈阳时，恰巧在北京站看到了《中学文革报》，买下看完后，他把一枚毛泽东像章给了卖报的人，让他带给《出身论》的作者。

对《出身论》拥护的人数众多，反对者也为数不少。首先是原来的“老兵”，北大附中的彭小蒙曾率百余之众，骑车呼啸而来，把正在四中《中学文革报》现场的王建复吓得夺窗而逃。四中联络处的外墙上也贴满了反对和咒骂《出身论》与《中学文革报》的大字报。

当时，北京众多的红卫兵小报卷入了对《出身论》和《中学文革报》的辩论。除《首都风雷》、《中学论坛》、《只把春来报》

3 家由朱大年、刘姜仁和四中同班同学主持编办的小报，是为《出身论》和《中学文革报》辩护外，其余如《东风报》、《旭日战报》、《红鹰》、《教工战报》、《雄一师》、《北京评论》等众多报纸都是严厉批判《出身论》和《中学文革报》。两派小报相互攻击，甚是热闹。此外，李冬民的《兵团战报》还以“首都兵团”的名义登出了“取缔中学文革报”的“通令”。

《中学文革报》在北京四中设立了接待站，每天从早到晚接待非常多的来访读者。这些读者绝大部分是深受血统论的迫害，关心《出身论》和《中学文革报》 的前途并控诉血统论的。也有一些青年不顾自身处境的危险，毅然前来投奔，一起办报。更多的，则是全国各地的读者来信。往往每天多达几百封、上千封，很快就达到了邮递员不能负载的程度，只好每天用三轮车去邮局取邮袋。多数来信只是附款邮购，但也有不少来信是倾诉他们的遭遇和心声。其惨烈与真诚，往往使《中学文革报》的工作人员潸然落泪。

一个贵阳市的青年来信，讲到他在市中心闹市见到人们簇拥在一份长大字报前看不知哪位热心人抄写的全文《出身论》。他好奇之余，从头读起，读了一小部分，就再也抑制不住眼泪，嚎啕大哭起来。为避免尴尬，便跑回住宅，痛哭之余又想起回去读，便勉强抑制眼泪，赶回现场。不想此回才读几行，便又控制不住。这位读者说，他就这样不知痛哭着跑回住宅多少回才终于读完了《出身论》。

牟志京和王建复在《中学文革报》第一期出版时，就很想知道“家庭问题研究小组”的组成，希望与他们见面。遇罗文将他们带到自己的家中，介绍了自己的哥哥遇罗克。

这位身材瘦小的，面色苍白到令人难以置信地步的遇罗克，一副圈圈重重的眼镜，扇风耳，严重驼背，可谓其貌不扬。但他一张口，声音宏亮，语言爽朗，妙趣横生，就连眼睛也能从厚厚的镜片后射出犀利的光芒。

当遇罗文把牟志京介绍给遇罗克时，他半开玩笑地说了句“久闻大名如雷贯耳”，就爽朗地大笑起来。之后的交谈，让牟志京、王建复他们感到他与“家庭问题研究小组”之间一定有着某种关系。

第二期《中学文革报》出版后，遇罗克与牟志京和王建复的交往渐深，他终于向牟志京他们说明，他自己就是“家庭问题研究小组”的全体成员，是《出身论》真正作者。他请牟志京绝对替他保密，所以报纸的多数成员，在办报期间，从未正式地被告知小组的组成。

遇罗克时年 24 岁，是一名徒工，出身在一个“黑五类”家庭，父亲 1950 年被定成专政对象时，他才 8 岁。在新中国的社会环境中，他一直坚持不懈地要求政治进步，要求加入少先队、共青团。然而，出身的原因，他的履历表中操行栏却由“优”降到了“中”。1957 年，遇罗克的父母双双被定为右派，撤职劳动。从此，遇罗克的操行一栏又降为“中下”。接着，入团无望，

高考落榜，参军没有资格，一连串的打击接踵而来。此时，遇罗克似乎才慢慢明白，在中国，有着相当一批数量的“贱民”，他们从一生下来就低人一等。换句话说，他们的出生就是不幸的开始。

“鬼见愁”对联的出现和“血统论”的盛行，促使遇罗克写出洋洋万余言的《出身论》。但是，如何将自己的文章宣传出去，让更多的人知道？最重要的是如何让党中央、毛泽东知道并认可？

1966 年 10 月，遇罗克的两个弟弟串联到了广州，在那里发现一种很简单的油印方法，他们写信告诉了遇罗克。遇罗克知道后很高兴，连夜将自己写的《出身论》署名为“家庭问题研究小组”，寄给他们。他的两个弟弟就在广州用油印方式印了几百份，一半邮回北京给遇罗克，另一半他们在广州贴了不少，沿途一路上贴了不少，一直从广州贴到北京。

遇罗克将弟弟寄来的油印材料分头寄给党中央和中央文革小组，然后大量张贴在北京街头。就这样，1966 年 12 月，一篇署名“家庭出身问题研究小组”的油印材料《出身论》，一夜之间张贴到了北京众多公共场所，在传单贴出的地方，总是围着大群的人群，议论纷纷。

遇罗克的大作在《中学文革报》上以《出身论》为始点，但并非终点。在以后几期的《中学文革报》中，先后刊登了遇罗克的《谈纯》（2月2日）、《联动的骚乱说明了什么？》（2月10日）、

《论郑兆南烈士的生与死》（2月21日）、《反动血统论的新反扑》（3月6日）、《为哪一条路线唱颂歌》（4月1日）等文章，都是批判血统论的内容。遇罗克的写作速度惊人，只要头一天向他索稿，便能在第二天交出。他在报纸各期发表的所有长文，都是这样一夜交稿的。

在此期间，四中《中学文革报》的接待站也异常繁忙。记者、工人、学生等纷纷来访或索报。50 年代以来一直不敢涉及的出身问题，现在被公开捅到了社会上，并且有人站出来公开为出身不好的“贱民”说话，使不少“贱民”受到了鼓舞，感到振奋。

2 月 6 日，康生在与师大一附中师生座谈时，有的同学提出：“现在报上刊登的这篇《出身论》，有的认为好得很，有的认为不好，可能将掀起一场大辩论。”

康生说：“有辩论就好嘛，可以提高我们的思想和思辨能力。”

陈伯达也曾被直接问到对《出身论》和文革报的看法，他说没看过。人们递上一份给他，他当时读得入了神，直到别人提醒他，请他回去再读。另一次会晤时，人们再问到他的看法，他说：“太长了，没时间看。”

帮牟志京开过介绍信的北京“三司”宣传部长来向他索取全套《中学文革报》，说是受中央文革之托要为毛泽东准备 8 份最有影响的红卫兵小报，他认为《中学文革报》应在其列。

牟志京本人也曾在人民大会堂一次与包括江青在内的中央

文革小组的会晤时，亲自递交了一套《中学文革报》。

《中学文革报》创刊之始，就有两名自称《红旗》杂志社记者的神秘人物定期造访。在第三期前后，他们对牟志京传达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关锋的指示，即大方向错了，必须“悬崖勒马”。

牟志京陷入激烈的思想斗争，几天不在报社露面。再次召集会议时，他向所有成员传达了关锋的话，指出前途的危险，并请求对牺牲无准备的成员离开报社。令他难以忘怀是，没有一个人畏退。然而，13 年后的 1980 年，部分当年的《中学文革报》成员再相聚时，牟志京却从不少人嘴里听到了对当时冒失所为的懊恼，这使他惘然。

2 月 17 日，一些学生组织邀请《中学文革报》成员在工人体育馆召开一次万人大会。大会内容是“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中学文革报》成员决定以批判“血统论”为主，由遇罗文代表《中学文革报》在会上发言。他们连夜加班起草发言稿，待到一切全忙完，天已经大亮。遇罗文又看了两遍发言稿，担心讲话的时候打磕巴。

上午 9 时，大会准时开始。容纳两万多人的体育馆座无虚席，连过道上都站满了人。原来反对《出身论》 的组织也派了很多人来到了会场，使大会远远超出预定的人数。前两个发言都很简短，顺利通过。遇罗文一上台，会场就有点儿乱。当遇罗文念到一半的时候，会场已经乱成一锅粥了，有些人开始往主席台这边拥。遇罗文加快了念稿的速度，有人点燃鞭炮，还有人朝主席台

冲上来。负责保卫是一帮初中生，被当时的情景吓得呆若木鸡。坐在主席台上的人纷纷离开座位去阻挡冲过来的人群。当遇罗文刚念完最后一个字的时候，话筒就被抢走了。他总算松了一日气，旋即被狂热的人流轰出主席台，拥进了后边的“贵宾休息室”。《中学文革报》的几个成员被分开后团团围住，耳边一片恐吓、吼叫、漫骂声，根本无法听清都在说些什么，只觉得唾沫星子像下雨一样喷在脸上。那阵式，估计稍有辩解，这种噪音和口水的攻击就会变成拳脚相加，他们只好一言不发。

这次大会被破坏了，但是《中学文革报》 也造成了轰动效应，而这正是《中学文革报》希望达到的目的。

遇罗克姐弟

## 第 512 回：接大宾，朱成昭地□检查　军委信，成□抓捕“八二六”

而此时，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也为他们的头头朱成昭怀疑文革的言论展开了批判，批判朱成昭反对中央文革的大字报不断贴出，很多人要求朱成昭表态。

就在朱成昭看了陈伯达 1 月 23 日写给他的信几天后，地质学院的蒋良朴带着叶剑英的女儿叶向真来到北医三院，接元旦后即在这里住院的地院“东方红”二把手王大宾到梅建明同学家开会。这个会是朱成昭和叶向真召集的，参加会的还有地院的杨雨中、杜金山，及叶向真的朋友、最高检察院检察长张鼎丞的女儿张九九，即张延忠。

大家聚齐后，朱成昭再次说了他为文革的前途、命运的担忧，认为中央文革打倒的人太多了，连刚提上来的陶铸也打倒了。他说：“把许多管生产的干部弄出来批斗或打倒靠边站，谁来抓生产？谁来管生产？干部打倒那么多，毛主席都要成孤家寡人了。老干部都是跟着毛主席打天下的，现在怎么成了反毛主席的，我们不理解。”

他对抓“联动”不满，认为中央文革是在搞“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很危险。并说“现在军委和中央文革有明显的矛盾。军委是抵制反对中央文革这条路线的。我们要站在军委这一边。”

梅建明也认为，运动扩大化了，不像群众运动，是挑动群众斗群众。朱成昭随即问道：“这像不像运动群众？”

叶向真讲了她爸爸叶剑英在 1 月 20 日京西宾馆会议上与中央文革发生冲突，说老帅们与中央文革发生了激烈争执，她父亲发怒拍桌子把手掌都拍骨折了。

朱成昭说，他的这些想法和李贵交换过意见。李贵说："你有什么意见就直接找中央文革谈。"

朱成昭问王大宾的意见。王大宾说："我支持李贵的看法，我们有什么意见与想法，应该主动找中央文革汇报反映。你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打击面过宽我也不同意。"

朱成昭说："我已经多次联系中央文革，要求接见汇报我们的看法。但中央文革的人总说现在没时间，要我们等一下，有时间再谈。中央文革实在不愿意听我们意见，我看就要写大字报了。"

王大宾说："写大字报不好。提意见的方式方法一定要注意，想办法直接找中央文革谈出我们的担心与忧虑。我们和中央文革毕竟是一条战线上的战友。"

他还建议说："中央文革的同志一时见不到，是不是可以再找肖力同志谈，请她向毛主席汇报。"

朱成昭说："最近肖力同志也联系不上，红机电话打到中央文革办公室，都说不在。"

讨论后，大家将意见归纳成八条：

一、《人民日报》社论《红卫兵不怕远征难》发表早了，大串联搞早了。

二、关于批判“刘邓路线”问题。

三、关于揪与保的问题上，认为对老干部打击面太大。

四、关于大联合大夺权问题，认为大联合大夺权搞早了。

五、关于中学生的“文化大革命”和联动问题，认为抓人太多。

六、关于坐牢问题，都认为，不怕坐牢、不怕杀头。

七、聂元梓问题。

八、关于康生和高级党校问题。

1 月 29 日，朱成昭和蒋良朴、杨雨中共同发表了《关于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目前形势的几点声明》。《声明》说：“我们过去、现在、将来都坚决拥护中央文革的正确领导，这是我们早已确定的信念。谁也不能指望我们与中央文革分离开来。”

但是，这样一纸《声明》并没有对朱成昭怀疑文革的言论有任何的触动，当然也不能平息“东方红”内部的分歧和争论。同时，以宫宝军为首的“东方红”整风领导小组，也要求朱成昭对反对中央文革问题做出交代和检查。

2 月 3 日，朱成昭、梅建明他们又开了第二次会议。会上决定，先请中央文革派人来进行内部沟通，不行就贴大字报。会后，朱成昭回到地院，给中央文革打电话。中央文革很快就派了人来。但是听了他们的八大观点后，斥为“一派胡言，纯属反动言论”。

第二天，2 月 4 日晚，“东方红”3000 人聚在地院大饭厅，听朱成昭作检讨。大礼堂外面也挤满了人。口才很好的朱成昭将

陈伯达 1 月 23 日对他的批评原原本本地作了传达，同时以检查的名义亮出了“八大观点”：

1、对运动中一些问题的看法。

2、关于批判刘、邓路线问题。

3、关于揪与保的问题。

4、关于大联合大夺权的问题。

5、关于中学生的文革和联动问题。

6、关于坐牢问题。

7、聂元梓的问题。

8、关于康生、高级党校问题。

并作了全面系统的阐发。

朱成昭说：“要搞清一些问题必与杨勋他们联系，现在没有别的法子，只有到监狱。”因为此时北大的杨勋和她弟弟杨柄章因为炮打中央文革的问题被抓进监狱。朱成昭还揭发杨勋、杨柄章曾说：“文化革命是林彪的革命，是宗派斗争……是林彪的一派把刘邓的一派打下去。”

他讲的时候，全场都安静地听。地院“东方红二团”的人做了录音。

“散会后，很多人碰见我说，讲得太好了！你们的胆子也太大了！”梅建明后来回忆说。会后，有人根据记录写成大字报贴出来，朱成昭的观点因此流传很广。

由于朱成昭以“检查”为名系统“放毒”，受到造反派学生的

一致反对和声讨，但也受到了相同观点的高干子弟和保守派的欢迎。

2 月 5 日，中央文革阎长贵与地院李贵一起来到北医三院看望在这里住院的王大宾，动员王大宾出来主持“东方红”的工作。在此之前，阎长贵已代表中央文革和江青，与在地院军训的 65 军田政委一起来北医三院看望过王大宾，希望他放下思想包袱，搞好“东方红”的整风，和李贵一起站出来坚持工作。阎长贵说：“这是江青同志的指示。”

王大宾立即办理了出院手续，回到地院，先住在李贵家，由李贵的爱人照顾他的生活。

2 月 8 日，阎长贵代表中央文革在地院召开“反朱”和“保朱”两派师生座谈会。阎长贵讲了四点：

1、现在斗争非常紧张，大联合，大夺权。现在进入紧要关头。北京大联合，但不是无原则的，不搞合二为一。

2、北京、全国夺权很紧张，你们整风要和整个形势结合起来，要尽快结束，抽出人去搞北京的大联合，大夺权。要小道理服从大道理。要抓住大联合、大夺权的大道理，来指导我们的整风。

3、搞整风，不要忘了阶级敌人，不要忘了党内走资派，不要让他们舒服，养得胖胖的，没事干。那不行，要劳动，写检查，不要让他们坐山观虎斗，这一点不要忽视。

4、“地质东方红”的大方向是正确的，“东方红”的红旗不

应倒，也不能倒。对朱成昭有什么问题要调查，有错误要检查。允许犯错误，允许改正错误。即使朱成昭的问题是反革命，“东方红”还是要继续战斗下去。“东方红”与朱成昭要分开，应把“东方红”办得更好。

会上，阎长贵传达了江青对朱成昭问题的指示，要他改正错误，认识、检查错误。

2 月 17 日，地院“东方红”全体在 65 军军训部队的带领下，来到天安门广场，向天安门的毛泽东画像宣誓：“永远忠于毛主席。”以此表示地院“东方红”这面红旗未倒。“三司”许多组织前来助阵。文艺界的胡松华、郭兰英等人也带队参加。晚上还到地院慰问演出。

2 月 18 日，朱成昭和蒋良朴、杨雨中在全体“东方红”大会上做第二次检查。朱成昭的检查仍未通过。“反朱”一派将朱成昭的检查录音后，印成题为“朱成昭反中央文革的八大罪状”的小册子，广为散发。

我们再看四川，2 月 11 日成都军区内部的大逮捕引起的对成都军区的围攻还在持续。2 月 17 日下午，成都军区门前静坐的四川大学“826”组织与“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等组织又以“解放大西南革命造反联合总部”的名义，在成都人民南路广场召开了“砸烂以韦杰、甘渭汉为首的成都军区黑司令部誓师大会”，会后举行示威游行。

当晚，广播中突然传来《中央军委给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

川大八．二六战斗团同志们的信》，后来简称“217 信件”，信中肯定：“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大部分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组成的，川大八．二六战斗团大部分是革命师生组成的。”同时要求“兵团”和“826”不要围堵、冲击成都军区，并用最后通牒的口吻警告这些组织的头头：“如果你们继续围攻成都军区，一切后果由你们完全负责。”

午夜，军区一位干部模样的人拿着中央军委给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和川大“826”的“217 信件”电文来到军区门口，向围在那里的“826”宣读后，就进去了。而东营门这边，也有军人出来向静坐学生散发“217 信件”的传单。

时间很快就到了 2 月 18 日凌晨 1 时 12 分,四川大学“8.26 战斗团”收到成都军区转交的中央军委来信。1 时 30 分,“8.26”开始从军区门前撤出。撤离前,“8.26”的政委江海云在军区大门前发表五点声明，指出：“坚决执行中央军委命令，立即撤离军区大门；我们是抱着誓死保卫毛主席的信念来到军区门前的；我们没有冲击和围堵军区，而是要韦杰出来回答问题；如果成都军区向中央谎报情况，后果由成都军区负责；保留要求韦杰回答问题的权利。”

“826”的队伍刚撤出，即被“红成”包围,被抓数人,数十人被打。

而在东营门这边静坐的队伍中，此时也突然冒出一些人，大喊道：“抓反革命！”原来是“产业军”埋伏的卧底乘机制造混乱。

再看白下路东头静坐者那条唯一的出口，已经有“产业军”组织的队伍手挽手组成方队喊叫着压过来……

在东营门静坐的学生依仗着人多，迎着“产业军”的方队冲上去混战一场。这时有同学提醒开车冲出去，可是怎么也找不到开车的师傅了。危急中一位高个、腿有点微瘸的同学宣称他会开车。在大家怀疑的眼光中，他爬上司机座位将那辆地质局客车改装的宣传车开动起来，像巨大的推土机将挡路的人群推开，静坐学生紧随其后往外冲，刚冲过路口，大伙便一哄而散，各奔东西了。

接着，人们突然听见从北边万福桥方向传来汽车的轰鸣声，转瞬间十几辆摩托车开道的军车疾驰到白下路，从车上跳下大批带枪的士兵，杀气腾腾地将路口封锁。大街小巷已经有戴袖标的人在巡逻，不时盘查行人。

“2.17 信件”如一个炸雷响彻四川天空，一夜之间，仿佛全四川的高音喇叭都集中到成都军区，都上街了，声震大地，如雷贯耳。到了 2 月 18 日下午，成都军区的直升飞机已经在成都地区，其后在全川，散发《中央军委给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川大八．二六战斗团同志们的信》。那信件，从直升飞机上如雪花飘落。“产业军”、“二月镇反派”，包括“红卫兵成都部队”，在大街上游行，庆祝这个伟大的节日。公检法一个派出所长在宣传车上兴奋地大声喊道：“57 年反右又开始了！”

四川大学又是一番景象：直升飞机超低空飞行，“2.17 信件”

已厚厚铺满了操场、道路，高音喇叭一刻也未间断，其中不时传来成都工学院“红卫兵成都部队”的广播，校园内几乎不见一人，死一般沉寂，如火如荼的文化大革命，似乎在这里突然寿终了

也有不怕事的人。偶尔可以看见几个“826”学生，依然戴着红卫兵袖章，站在大操场中央，指着飞机大叫：“有种的，你就下来！”

不知何处传来《远飞的大雁》动人歌声……

“红成” 各战斗团到川大示威游行，高呼：“打倒 826！”冲进“826”团部，将里面洗劫一空，甚至抢走教学楼和食堂的喇叭。他们闯入学生五舍、七舍抢走宣传用品和相关物资，随意乱翻私人信件日记。江海云的寝室被抄。

当时流传成都军区韦杰的话：“我不需要一军、一师、一团的人，我只要一排人，一挺机关枪，就可以把‘兵团’和‘826’解决了。但是我不愿意这样做，我只要一封公开信就行了。”

2 月 18 日，重庆“革联会”得悉中央军委“217 信件”后，连夜向所属组织发出书面通知，要求把四川大学“826”、“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的人员抓起来，并提出“如有抗拒者，以革命行动对待。”

2 月 19 日，重庆“革联会”布置凌晨在全市抓捕四川大学“826”人员，包括从贵州经重庆返成都在火车上的“826”人员，砸了川大“826”驻渝联络站。

面对中央军委的“2.17”公开信，川大“826”于2月19日清

晨召开全团辩论会，辩论自己的“大方向”是否错了？辩论的结果，大多数人确认自己的“大方向”错了。辩论会结束后，川大“826”组织本团群众开始向毛主席、中央军委请罪，向全国人民请罪，向解放军请罪，向成都军区广大指战员请罪。成都市到处张贴落款为川大“826”的巨幅标语：

“2.17信件是毛主席和党中央对八二六战士的最大关怀！”

“欢迎解放军进驻川大镇压反革命！”

2月19日下午，中文系在校内游行请罪；化学系到成都军区门口请罪。

2月20日上午，“826”勤务组发出“给毛主席的请罪电”。

2月21日，“826战斗团”政委江海云率川大部分“826战斗团”到军区请罪，“工人造反兵团”在人民南路广场下跪请罪。只听一声口令，全体下跪，去掉胸章袖套，团旗倒挂，以示请罪。

成都军区提出三条要求：（1）必须向毛主席，向全国全省全市人民请罪；（2）必须在广大群众中消毒，因为你们在群众中干了很多坏事，说了许多反动话；（3)立即交出你们的“黑后台”。声称：“这三点作不到，请罪无效。”

“产业军”的宣传车阻挠请罪队伍并高呼：“不准 826 假请罪，真反扑！”

2月23日，“826战斗团”政委江海云以“现行反革命”罪被逮捕。

与此同时，重庆大学“815 赴蓉联络站”主任郑全体及其他

同学多人被抓，关押于成都大慈寺。当时被抓的人太多，许多临时拘留所都人满为患。重大“815”在川内各专、县串联的学生也多有被抓捕、捆绑、刑讯者。

公安、军队走上街头，整个成都市，只听得见他们的高音广播，满城肃杀的气氛。在此情况下，“826”及“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惊恐中不知所措，许多人纷纷逃向北京告状、申诉，求援的信件也不断寄往北京。

## 第 513 回：攻报社，□州市万众空巷　开封打，河南实施大□捕

河南省围绕着对《河南日报》的争夺愈演愈烈。郑州工学院“革命造反队”不甘心 2 月 5 日的失败，立即策划反击。他们联系了与自己观点相同，且极欲“在今后的运动中大显身手”的河南中医学院“八三一公社”、“河医红卫公社”等组织，决定再次发起对《河南日报》对立派的反击行动，声称“要不惜一切代价，坚决夺回失去的阵地，誓死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头可断，血可流，毛泽东思想舆论阵地不能丢!”2 月 17 日，他们组织了 2000 人左右的队伍，向《河南日报》发起进攻，在《河南日报》发生了大规模的武斗，双方使用石头、砖块、棍棒等作为武器。一时间，郑州市万众空巷，都跑到《河南日报》来围观这场武斗。

中午，“二七公社”的袁庾华组织一支“二七”派中学生队伍潜入正对着河南日报社后门的八中大门，准备黄昏时冲过对方的封锁，增援报社内的守卫力量。

袁庾华是郑州肉联加工厂第一个群众组织“燎原战斗组”的头头，该组织后来联合厂里其他群众组织成立了“革联”。“革联”也是郑州“二七公社”发起组织之一。

河南省军区闻讯派出军队赶到报社，逮捕了在造反夺权中大出风头的“郑大革联”、“河医东方红”等组织 40 多人，并电告中央，建议对《河南日报》进行军事查封。

当天下午 17 时 30 分，周恩来对河南省军区发出指示：

一、中央命令：迅速派部队让武斗的双方立即隔离；

二、宣布：对河南日报进行军事接管；

三、接管后停刊几天；

四、派出代表到北京谈判，代表包括省军区、省委、武斗的双方，以及其他革命组织的代表。由何政委出面召集有关各方拟定名单，上报中央，在中央批准后再来北京。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七日下午五时三十分

半小时后，周恩来又发出第二次指示：

以上命令，望立即执行，各方代表谈判的时间、地点、另行通知。

河南省军区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七日下午六时

将近黄昏时，河南省军区广播车宣读周恩来的指示。袁庚华看了电报，并在上面签了字，然后通知“二七”派撤出报社。

《河南日报》的武斗平息了。但是这场武斗造成大批人员受伤。据不完全统计，仅河南中医学院“八三一公社”就有 200 多人被打，受伤 40 人，5 人被绑架。

第二天，2月18日，河南省开封市也发生了广播站争夺事件。

和全国各地一样，早在 1967 年 1 月，开封保守派组织“赤卫队”势力就已日渐衰败，造反派势力越来越占上风。开封市的造反派力量，基本上都集结在开封师院“八二四革命造反队”的

大旗下。乘着上海的一月风暴，1 月 5 日，开封“八二四猛攻市委血战到底兵团”封了由陶铸题写报头的《开封日报》。1 月 6 日，查封了开封市公安局。1 月 8 日，开封市广播站“造反总部”查封了开封市广播站。这天，开封“赤卫队”总部召开会议，感到如果再不批判开封市委书记徐学龙，保皇的帽子就要死死地扣在自己头上，于是他们和开封市委文革小组一起召开了一个批判徐学龙大会。会后举行了游行。

1 月 16 日，开封地区卫生学校“红造委”在负责人吴宝生带领下，封了开封地委机关七个文革办公室，并夺了地委文革第一办公室的印章。

1 月 18 日晚 23 时，一些群众组织夺了开封市委、地委、市人委以及市直、地直各个区、局、委机关的党、政、财、文大权。一夜之间，开封日报社、开封市广播站、开封市邮电局、开封市银行、开封地、市各个工厂、机关、学校等 90%的单位都实施了夺权。这次夺权行动后来被称为“开封 118 大夺权”或“ 118 夺权事件”。第二天清晨，夺权后的开封市广播站向全市广播了开封市夺权的消息，新成立的“开封市革命造反派临时指挥部”发出第一号《紧急通令》，要求各夺权单位造反派成立“红色监委会”，行使行政经济之权。

1 月 23 日，中央下达《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后，开封驻军也开始“支左”，介入开封的文化大革命，却迟迟没有表示对“八二四”夺权的支持。

开封除了军分区、卫戍区、人武部这些常备地方武装部门外，主要还有 1 军司令部，代号为 8172 部队；空 15 军 43 师，代号为 7249 部队，还有一个空军飞行大队，代号为 7317 部队。

据 1967 年 8 月开封师院“八二四”的“中流击水支队”编印的《红色里程 开封师院八二四革命斗争史》记载，就在开封驻军开始介入开封文革的第三天，1 月 25 日，开封师院“八二四”的学生到开封驻军 8172 部队，即 1 军军部，找开封师院教育室主任吕连瑞索要“黑材料”。因为吕连瑞是 1 军政委聂济峰的爱人，住在 1 军军部的家属院内。但是部队大院是有警卫战士站岗警卫的，当然要阻止学生进入了。学生们和警卫战士据理力争。警卫战士请示部队有关领导同意后，派战士与学生们一起来到吕连瑞家，即 1 军政委聂济峰的家里。此时，聂济峰作为中央组织部的军代表，正在北京。学生们在聂济峰的家里找到了几份他们认为的“黑材料”。

1 月 26 日晚，开封“赤卫队”和 1 月 17 日成立的开封“公安公社”等组织上街游行，高喊：

“打倒‘八二四’!”

“粉碎白色恐怖!”

并在开封的大街上贴满了“打倒八•二四!” “向八•二四宣战!” “欢迎解放军接管邮电局、广播站、日报社”等大标语。

当晚，开封“八二四”派代表到 1 军，要求解放军支持他们。1 军副军长王时军在接待时表示：“需要调查。”

1 月 27 日，开封“八二四”派代表到河南省军区反映开封 1 军的支左情况，受到冷遇。在纪登奎的帮助下，他们向武汉军区和中央文革拍发电报，汇报开封 1 军在支左中的问题。

据“八二四”1968 年 5 月编印的《开封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记》中记载，在中央军委《八条命令》公布的 1 月 28 日，1 军军长徐文礼要求 1 军政治部副主任黎明，在“三天内制定出一个镇压‘八二四’的行动计划。”对这份计划，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的批复是：

“查八•二四，如系反革命组织，应坚决镇压。”

1 月 30 日，1 军组织了全副武装的游行。

2 月 1 日，开封师院“八二四”发出《紧急通知》，要求不得以任何借口冲击军队，在未得到“八二四”正式同意之前，任何人不得以“八二四”代表身份到军队中交涉问题或汇报情况。当天，开封师院“八二四”派出陈红兵等四人再到 1 军汇报，同时检查他们在夺权中出现的缺点错误，希望得到解放军的帮助和支持。但是没等他们把话说完，便被 1 军领导打断，说他们是“蜕化变质分子”、“资产阶级分子”。

2 月 3 日，开封市“工农联合总部”、开封师院“八二四革命造反委员会”等 18 个造反派群众组织负责人在开封师院开会，决定成立“开封市红色革命造反委员会”，于 2 月 4 日上午在开封市中心的鼓楼举行“开封市红色革命造反者大联合、大夺权誓师大会”，宣布对开封市委、市人委进行全面夺权，并通过了《夺

权公报》和《第一号通令》。

会后，他们派代表到 1 军汇报，并邀请驻军派代表参加第二天的夺权大会，遭到拒绝。

2 月 4 日，开封市 10 万余人聚集在市中心的鼓楼广场及周围的四条大街，召开“开封市红色革命造反者大联合、大夺权誓师大会”，宣告开封 18 个造反派群众组织已于 2 月 3 日联合成立了“开封市红色革命造反委员会”，通过了《夺权公告》和《第一号通令》。

开封市委副书记芦贤阳在会上讲话，表示坚决支持这次夺权斗争，坚决和造反派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

当晚，1 军散发传单，认为开封市的夺权是“假夺权”，“开封市红色革命造反委员会”是“反革命小联合”，是“把斗争锋芒指向人民解放军”。

2 月 4 日，从全国各地来开封进行串联的 80 多所大专院校红卫兵成立了“大专院校赴汴反到底兵团”，表示誓与开封“八二四”生死与共，并肩战斗。

对开封“八二四”的夺权，多数人是心有疑虑：“就让这些人掌权吗？就这样掌权吗？文化革命革来革去，就革成这个样子吗？”

而且，对“八二四”的夺权，也引起了多数组织的质疑和抵制。其中最强有力的劲敌是公安局的“公安公社”，“八二四”恨透了他们，刷出大标语要“踏平”、“活剥”、“油炸”、“清蒸”“公

安公社”。

此时，一些初中学校的学生看到“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得到中央文革的支持，于是也在 2 月 1 日成立了“开封红卫兵第三司令部”，简称“开三司”，一开始就和开封的“赤卫队”搞在一起，是反对“八二四”很坚决的力量。

开封的工人“赤卫队”此时已被冲击得七零八落，其成员经过短暂的游移、观望后，谋求改换旗帜。2 月 2 日，开封化肥厂成立了反对“八二四”的“化肥厂革命造反司令部”。翌日改称“开封市革命左派造反司令部”，简称“左司”。他们首先得到了开封驻军的支持。于是，大大小小的“造反兵团”仿佛在一夜之间平地而出，“八二四”咬牙切齿地诅咒他们是：“兵（冰）团，兵团，6 月化（融化，即瓦解）完”，开封化肥厂是新建的大型部属企业，工厂的骨干多是复员退伍军人，是开封市工交行业的领头雁，“左派造反司令部”的头头叫周树凡，是转业军人出身的中层干部，很有领导才能。

2 月 5 日，开封驻军公开宣布“开封市革命左派造反司令部”、开封市郊区农民“1.25 兵团”、开封市“公安公社”、开封市搬运公司“67.11 兵团”为开封市的“革命左派组织”。后来被称为开封的“四大左派”。开封驻军派出全副武装的军人参加这四个群众组织的游行示威活动。游行队伍一路高喊“打倒八•二四！”、“八•二四是反革命！”、“支持左派，镇压右派！”等口号。“八二四”在开封鼓楼下与开封驻军展开辩论。

由“红五类”组成的“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经过解体和重组，成立了“红色造反联络站”，简称“红造联”。他们努力与开封化工厂的“左派造反司令部”等部队支持的工人组织建立联系，结果。很快成为驻军最早支持的，全市唯一的学生组织。

2 月 6 日，开封师院“八二四”游行示威，并发布“紧急通告”，张贴标语，声言“坚决与驻汴部队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血战到底”。

2 月 7 日，100 多名外地“大专院校赴汴反到底兵团”开着宣传车到 1 军军部的红洋楼门口宣传，1 军对其进行拍照，引起学生的不满，要求 1 军首长接见，并交出胶卷。1 军开出宣传车指责这些大学生“冲击了军事机关”。于是，这些学生宣布当夜零时开始静坐绝食，以示抗议。

2 月 8 日，农历的腊月二十九，除夕日。正是天寒地冻、滴水成冰的时候，刚刚下过一场小雪，中原古城笼罩在银白的世界里。红洋楼的大门东侧，皑皑白雪之中搭着窝棚。此时这里牵动了全市 32 万人的心，有的同情，有的好奇，有的拍手称快，有的忧心忡忡。

凌晨，开封师院“八二四”得到 “大专院校赴汴反到底兵团”在 1 军门外遭到围攻并进行静坐绝食的消息后，立即前往 1 军军部，支援那里的静坐斗争。

上午 8 时许，“八二四”派 3 名代表与 1 军领导谈判，被扣留。1 军大门前，部队宣传车讽刺学生们：“绝食触及肠胃，静

坐触及屁股”。被 20 多名学生爬到宣传车上把喇叭摘掉。还有部分学生冲进 1 军军部，现场 1 军副军长赵静生下令驱赶学生。军部里面涌出大批战士，把学生团团围住。

静坐学生和“八二四”负责人陈红兵见状，涌进部队大门解救，结果全被抓走。

第二天就是春节了，但 1967 年的春节，各种复杂的情绪在古城涌动。单位里，街市上流行着各种传言，不少人说，绝食的人偷偷跑到厕所里喝葡萄糖盐水，绝食是假的。

为了解 1 军门口之围，2 月 10 日，驻开封部队发表《严正声明》称：“二月八日，这一小撮反动分子……猖狂地冲击军事机关，砸坏我军的‘毛泽东思想宣传车’，劫走了枪支弹药和其它军用物资，殴打、绑架我军的干部战士。更加不能容忍的是，他们竟然在光天化日之下，当着我军干部战士和革命群众，砸毁了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的画像。反革命的嚣张气焰简直疯狂到了极点。”

“我们严正声明：开封市的夺权问题。是关系到开封市三十八万人民的大事，没有革命群众组织的负责人、驻军负责人和党政机关的革命的领导干部，经过酝酿和协商，而采取非法手段强行拼凑起来的任何权力机构，都是完全无效的。”

这天，开封支左办公室在空军大院召开有开封市委“红旗革命造反总部”、开封市“左派造反司令部”、开封市搬运公司“67.11 战斗队”等群众组织的负责人参加的会议。1 军军长徐文礼在会

上说：

“今天晚上，‘郊区 1.25 农民造反兵团’、‘开封市左派造反司令部’集合两万余人去抄师院‘八二四’的老窝。指挥部设在铁塔公园。我们驻军不好出面，由‘左司’负责人周树凡统一指挥，由‘公安公社’予以援助。”

当天，数万农民乘坐开封驻军安排的“戍”字头军车，从四面八方涌进开封城，将开封师院围了个水泄不通。当晚 19 时许，开封东北角的古城墙内外、开封师范学院周围，人群密集，火光冲天。

2 月 11 日凌晨，“左司”和郊区农民组织“125 兵团 ”包围了开封师院，市公安人员进入师院抓走了一批“八二四”骨干。但是 1 军门前的静坐绝食人员并没有因此而撤离。

2 月 17 日，1 军派人到北京，向中央军委文革领导小组汇报开封支左工作情况。中央军委文革小组组长徐向前在一个批示中赞扬说：“一军对待八•二四很讲策略，其他部队要学习一军的支左经验”。

2 月 18 日下午 14 时，开封驻军和开封“四大左派”及数万农民，在开封市区举行大游行。

16 时 30 分，游行队伍对开封市广播站形成包围。

17 时 30 分，全副武装的 1 军战士占领了广播站周围的制高点，把机枪架在广播站南边的鼓楼和东边的百货商店楼顶上，枪口对准了市广播站。

这是由 1 军副军长赵静生亲任总指挥，1 军和驻开封空 15 军 43 空降师、开封军分区、开封市武装部共同组织，动员工人、农民 3 万多人参加的行动。当一切准备完毕后，1 军军长徐文礼、副军长赵静生向在北京的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武汉军区政委钟汉华电话请示：

“怎么办？”

钟汉华回答：“把广播站夺过来！”

随后，按照赵静生命令，一辆挂着“戊”字牌照的吉普车开进开封市广播站大院，以中国人民解放军开封市卫戍司令部的名义，命令拆除“八二四”在广播站设置的障碍。接着，开封“公安公社”、“左司”等群众组织冲进广播站，占领广播站大楼。

开封市各单位的“八二四”闻讯，纷纷赶来保卫广播站，于晚上 19 时多攻进广播站。但是，更多的“公安公社”和“左司”随后又冲进广播站，几个人抓一个，将楼里的“八二四”一个个的从广播站里抓出来，扭送到开封地委大院里的临时看守所。

播音室里，女播音员孙爱英始终在大声呼唤：

“八二四战友们，‘老保’已经冲上来了！赶快抢救，赶快，快……”

一群人冲进播音室，强行阻止孙爱英广播，并威胁说：

“你敢再喊就掐死你！”

孙爱英坚持不动，继续喊话，被几个人掐住她的喉咙。孙爱英广播的最后一句话是：

“毛主席万岁！”

当她没有喊完第二句时，就被活活掐死了。

开封化建公司的工人杜聚明和几位“八二四”顺着后院的一个梯子往上爬。就要爬上三楼时，突然枪响了！鼓楼上有解放军战士喊：

“谁敢爬上来打死谁！”

原来是把守在鼓楼上的一名解放军战士朝天鸣枪。

梯子上的杜聚明他们没有理睬，继续往上爬，然后朝着三楼平台猛冲过去。

枪声再次响起，杜聚明应声倒了下去。和杜聚明一起冲上去的另一人也腿部中弹。

正在梯子上的师院“八二四”学生牛福林见状大叫一声，随即把杜聚明接住，传递下去。师院“八二四”负责人黄泽生一看，杜聚明胸口的血一直在流淌，摸摸鼻子，已没有呼吸……

作为野战军开枪打死群众，开封是全国第一家，性质十分严重。据后来中央派人调查，那天在开封广播站和鼓楼广场，开封驻军一共开了八枪。

2 月 18 日下午 14 时多，学生组织“红造联”通知到华北体育场集结游行。一路上红旗招展，人头攒动，到处都是崭新、鲜艳的“兵团”旗帜。

队伍并没有在体育场停下，而是朝市中心鼓楼进发。在行进到鼓楼西约百余米时，随着前面的队伍停了下来，八路纵队分别

站到了马路两边，形成一个长廊。

这时，已是薄暮冥冥。不一会儿，就见不断有几个人押解着一个人从东边奔来，跌跌撞撞向西而去。被押解的是“八二四”的人，是从开封市广播站被揪扯出来，沿着游行队伍护住的通道，向西押解到开封地委。

但是很快，鼓楼也遭到闻讯赶来增援的“八二四”派反包围，游行队伍随之又涌向鼓楼东侧。等拥挤结束时，已是晚上 20、21 时了。这时，有线广播喇叭里传来了开封市卫戍区发布的“戒严令”，宣布对以鼓楼为中心的市区繁华地段实行戒严。这说明广播站已经回到驻军支持的“左派”手中。

当晚，部队开进市委、银行、开封饭店等几个在一月夺权中被“八二四”占领的部门。

第二天，许多“八二四”基层组织负责人和骨干分子被抓，部队宣传车一遍又一遍的广播《开封八•二四的十八条罪状》。开封黄河水利学校“黄校九九”被围攻，勤务组宁锁钉和 21 名队员被“公安公社”抓走。

从此，“八二四”这个在开封市最早的造反组织，开封一月革命中的夺权者，其公开活动戛然而止，转入了地下，一场对它的讨伐在全市展开。

2 月 22 日，开封在当时开封市最大的集会场所，位于龙亭北面的华北体育场召开了全市“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的大会。

这次大会的规格恐怕在开封历史上是空前绝后的。不仅在于参加大会的人多，而首先在于大会布置的威严。周围房顶站满了荷枪实弹的解放军战士；大会进行时，会场上空传来“隆隆”的飞机声，抛洒的传单漫天飞舞；会场门口的道路上，人们用大扫帚蘸着石灰水刷的“打倒八二四”等宣传口号，每个字有两、三米见方。

在大会上，解放军代表、几个群众组织的代表都发了言，表示了对“八二四”幕前幕后一小撮坏人的愤怒谴责。会上，一位市委领导干部卢贤扬也发了言，他原是一位副书记，是一位参加过长征的老干部。

在这次大会散发的传单上，“红造联”被正式列为开封第八个左派组织。

“赤卫队”总部没得到驻军的支持，有些忿忿不平。驻军对他采取了比较和缓的分化瓦解政策。动员其中的学生组织“开三司”出来，反戈一击，站到“左派”、“兵团”一边来。“赤卫队”不久就寿终正寝了。

“开三司”被驻军承认后，军队承认的学生组织就有三个：开封师院“八二四”的对立面“红卫兵战斗师”、“开三司”和“红造总”。这三个组织都被称为开封的左派组织。

与此同时，紧随着《河南日报》武斗的平息，2 月 20 日，河南省军区在河南全省也展开了大逮捕。在印染厂的一次大逮捕时，河南省军区政委何运洪、政治部主任李善亭亲临现场指挥，

仅印染厂“八一红卫兵”在一天内就被抓走 237 人。当时下着小雨，一辆辆军车，荷枪实弹。被抓的人，五花大绑，游街示众。路的上空，悬挂着“二七派”的七中“8.16”和省一技校“造反大队”的草席横幅：“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未干的墨汁随雨滴下……

河南省军区派人整理了“郑大联委”、“河医东方红”、“豫农红总”、黄委会“东方红”、印染厂“八一红卫兵”、六厂“工人赤卫队”等组织的材料，在批语上冠以“反动组织”、“反革命组织”罪名，准备在河南省进行更大规模的逮捕。

接着在国棉二、四、五厂，电缆厂等，开始了全市、全省的大逮捕。

## 第 514 回：见张、姚，周恩来再谈夺权　保肖华，江□、王力看林彪

2 月 18 日凌晨，毛泽东第三次接见从上海回到北京的张春桥和姚文元，同他们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毛泽东说："夺权一定要搞三结合，福建的问题不大，贵州、内蒙的问题也不大，乱就乱一些。现在山西省夺权的机构里 53%是革命群众，27%是部队，20%是机关干部。你们上海应该向他们学习。一月革命胜利了，二、三、四月更关键，更重要。你们要往下传达：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口号是反动的。陶铸鼓吹这个口号，完全是别有用心的，姚文元要写文章批判他。"

毛泽东在同张春桥、姚文元的三次谈话中讲到："刘少奇看来九大还要选他当中央委员。"

从毛泽东那里回来后，当天早上，张春桥、姚文元即飞往上海。离京前，张春桥向周恩来谈了 2 月 16 日晚向毛泽东汇报的情况。后来王力向周恩来汇报 16 日夜毛泽东的指示时，周恩来对他说："张春桥已来谈过了。"

自张春桥、姚文元飞往北京后，徐景贤一直小心谨慎，守口如瓶，对他们的行踪连"机联站"的人都讳莫如深。他每天晚上都往兴国路招待所跑，来到张春桥住的五号楼二楼，通过加密机，即在普通保密电话机下面，再安装一只扁扁的保密箱，互按按钮以后，可以加倍保密，连长途电话接线员都无法窃听的电话机，向北京的张春桥汇报上海各条战线的动向。然后，又在第二天向

大家传达张春桥和姚文元的指示，仿佛他们两个人仍在上海。

这出“空城计”唱了一个星期左右。这天，张春桥忽然打电话对徐景贤说：“我和文元很快就要回上海了，问题都解决了，你先组织几个人起草一份关于当前上海的形势和任务的决议，我们回来以后开全体委员会议要用……”

徐景贤赶紧照办，决议草稿刚起草好，张春桥和姚文元就回来了，当天就把徐景贤召到兴国路招待所。张春桥说：“这次我们到北京的当天，毛主席就接见我们，主席说：一月革命胜利了，二、三、四月更重要。主席对上海非常关心，对夺权表示支持；但是，主席对我们夺权以后成立‘上海人民公社’这件事有意见，他说，你们把名称改成‘上海人民公社’，原来北京也想建立‘北京人民公社’，如果各省、市、自治区都改叫人民公社的话，我们的国号就要改，中华人民共和国要改成中华人民公社，还要设社长。那就涉及到国家体制改变的复杂问题，改变国号，牵涉到外国对我们国家要重新承认；外国大使都作废了，要重新换大使了。”

徐景贤一听问题这么复杂，赶紧问：“现在怎么办呢？当时我们根本没有想到这些问题！”

姚文元主动把责任揽了过去，说：“这件事不能怪群众、怪你们，主要是我和春桥考虑欠周到、欠妥当。”

张春桥微微一笑，继续往下说：“2 月 12 号那天，我们已经向主席当面作了检讨。主席考虑得真细致，连改什么名称都代我

们想好了，他说：还是叫革命委员会好。主席还说，一时改不过来，可以过一段时间，你们再回去商量一下。我和文元考虑，晚改不如早改，至于具体的改名活动怎么进行，我不是要你组织起草一个关于当前上海的形势和任务的决议吗？”

徐景贤说：“已经起草好了，今天我也带来了。”

张春桥说：“那好，这个决议就用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署名，在全体委员扩大会议上通过一下，同时由我在会上传达毛主席的指示，并且作一些说明，这样就很自然地把‘上海人民公社’改成了‘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不至于引起任何波动。我们设想的这个方案也向主席作了报告，得到了主席的批准。”

“那么关于改名的问题新华总社和《人民日报》发不发消息？”徐景贤还是担心全国的报刊不登上海成立权力机构的事。

张春桥仰天大笑，说：“我们已经和新华总社打过招呼了，开过大会、通过决议以后，由上海分社写一则报道：‘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举行全体委员扩大会议，一致通过《关于当前上海形势和任务的决议》’，由新华总社转发全国，根本不用提‘上海人民公社’改名的事，这不等于向全国宣布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已经成立并且开始行使职权了吗？”

“对！对！这样好。”徐景贤恍然大悟，击节赞赏。

2 月 18 日凌晨 3 时到 7 时，周恩来接见财贸口各部司局长以上的干部。他说：“现在进入夺权，来势之猛，不像我们主观想象的那样。不要说你们对运动有时不理解，就是我们在主席身

边紧学、紧改、紧跟、紧赶，还赶不上。我们号召造反派夺权，我们也做过一些规定，如对业务权不能夺，只能监督。尽管这样，夺权还是发生了偏差。我们要帮助造反派把偏向加以纠正，这是有利于夺权，不是泼冷水。因为他们夺权超过了业务监督的界限。造反派只能监督业务，不能超过这一界限，中央的大权，如党的领导权，是毛主席亲自领导的，怎么能夺？政府的大权，财经、公安、外交、国防这些大权怎么能夺呢？”

周恩来还说：“国防工办不能夺权，也不能监督。财政大权不仅不能夺，全部监督也不行。商业部我声明了，姚依林不是黑帮，他身体不好，应当让他休息。那样斗不符合中央精神。我要姚依林回中南海休息，他们跟着就下了通缉令，说谁要隐藏姚依林，以破坏文化大革命论处。这还了得，这等于是通缉我了！中南海还是不是无产阶级司令部？！这样夺权，走到斜路上去了。各部部长、司局长，还要转告所有的处长、科长，都要振作精神，要敢于创立工作条件，勇于负责任。如果在夺权中把监督业务变成管理业务，争论不休，中央就要考虑采取别的办法。”

周恩来还说：对有错误的干部，不能“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不能无休止的斗争。这不是党和毛主席关于“文化大革命”所要采取的方法。

2 月 18 日，李先念在财政部召集司局长以上干部会上，传达周恩来 2 月 17 日接见财贸口群众组织代表时的讲话和五点指示。

2 月 18 日，叶群、陈伯达、江青、刘伯承、聂荣臻、徐向前、肖华与总政所属单位座谈。叶群在座谈会上说：

“肖华同志以前在关键时刻都是紧跟毛主席的，肖华同志是属于毛主席司令部的。罗瑞卿整了七包材料，罗瑞卿跳楼自杀时，把其它材料都烧光了，单把肖华同志的留下，转给彭真，彭真在被揭露出来以后，把几麻袋材料烧毁，也只留下关于肖华同志的材料。彭、罗、陆、杨都是很恨肖华同志的。”

在讲到罗荣桓时，叶群说：“虽然他死了，但他是反对学习毛主席著作的，梁必业是罗荣桓的人，肖华同志是与他们做斗争的。肖华同志过去搞了学习主席著作的经验，梁必业也不肯往下发，后林总很生气，才发下去。”

讲到肖华同志所犯错误时，叶群说：“肖华同志以前在大节上是好的，是紧跟毛主席的，在小节上有问题。肖华同志主要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错误，已经滑到了危险的边缘，尤其在刘志坚被揪出来以后……肖华同志有错误可以批评，火烧，但要允许他改正错误。”

她还说：“几个老帅每天只能工作二、三小时，都活不了几年了，大将中跟我们的身体都不好，身体好的又不跟我们，而上将又都在前线，选来选去只有肖华同志，并说，肖华不是降不降，而是应该升的问题。”

那天参加座谈会的还有陈伯达、江青、刘伯承、聂荣臻、徐向前、肖华。

江青在会上也讲："对肖华同志要烧而不焦。"并说："关于肖华的材料一律不准外传。"

肖华最后表态："要检讨，并不断革命。"

这天下午，江青和王力向林彪报告 16 日怀仁堂"碰头会"情况和毛泽东的谈话内容。江青让王力在京西宾馆等着，她先去林彪那里。然后，她又从林彪家到京西宾馆，跟王力同车前往林彪家。在秘书的导引下，江青他们直奔林彪卧室，未见，又来到叶群会客室。当时，林彪正在叶群会客室闲聊。林彪说：

"秦始皇焚书坑儒遭到历史的非议。修万里长城却褒贬兼半，中国人对秦始皇没有好印象，认为他是一个残暴的君主。"

"秦始皇修阿房宫，把六国的美女全弄到咸阳，供他享用。他根本就没把女人放在眼里，只有到了社会主义社会，男女才得到了平等。"

叶群附合着林彪。从秦始皇又谈到日本，叶群说："据说秦始皇让徐福去东海取仙药，吃了可以长生不老。徐福带了五百童男、五百童女，一去不回头。据说现在的日本就是徐福繁衍的后代。"

林彪说："姑妄言之，姑妄听之。也可信也不可信。世界上的事谁也闹不清楚。"

"我小时候听奶奶说过白娘子盗仙草救许仙的故事。听说人吃了灵芝草就长生不老。我要是能得一棵灵芝草，先送给首长试试。"内勤也凑趣插话说。

林彪笑了笑说："药典有对灵芝的记述，说是安神益智，益寿延年，有可能。"

叶群说："我就爱吃蔬菜，营养高。"

林彪说："福建的藕粉纯正，吃了生津止汗。山西莜麦生温暖胃，山东的大枣和青龙桥的水吃了不拉肚。这些都是我百试百验的。60 年我冒冒失失吃了羊肉煮黄芪，拉肚子，差一点把我折磨死。所以后来我就让人试用。"

正说到这里，江青、王力在秘书的引导下进来了，林彪，叶群赶紧站起来迎接。江青迫不急待地说："林总啊，又出事了，大闹怀仁堂!"

叶群赶紧让她们坐下。

内勤给他们送了茶，退了出来。

江青将 16 日怀仁堂会议的情况向林彪大概的讲了一下。林彪和叶群都没有吭声。

王力说："我和张春桥、姚文元同志把会议的情况凑了一个记录。我们已向毛主席汇报，现在再向林副主席汇报一下。"

王力一边念"记录"一边解释会议当时的气氛。当王力讲到"徐向前说：'难道我们这些人都不行了，让蒯大富他们来指挥解放军'"时，林彪说："他徐向前代表不了解放军。"

当谈到老帅们质问陈伯达时，林彪说："陈伯达是好人，一个书生掌握这么大的局面不容易呀。"

后来，林彪的这句话传到陈伯达那里，使正处于困境之中的

陈伯达感激涕零。

王力汇报结束以后，林彪把谭震林给他的信让江青转交毛泽东。林彪在给毛泽东的附信中写道："主席：谭震林最近的思想竟糊涂堕落到如此地步，完全出乎意料之外。现将他的信送上，请阅。"

汇报结束，江青让王力先走，自己又单独留了下来与林彪、叶群商量。

江青走后，叶群赶往钓鱼台陈伯达处。

毛泽东看了林彪托江青转来的谭震林的信后，在信上批示："已阅"，"恩来同志阅，退林彪同志"。然后将原件退回毛家湾，林彪见到毛泽东的批示后，将原件撕得粉碎，扔在纸篓里。后来叶群又背着林彪将这些碎纸片捡回，并将它贴在一张白纸上，藏在自己的文件柜里。

## 第 515 回：发社论，要正确对待干□　说夺权，周恩来见国□口

2 月 18 日这天，周恩来阅改了 2 月 17 日陈伯达送来的《红旗》杂志社论《必须正确地对待干部》。这篇社论是王力请示毛泽东后写的。

社论强调："对干部队伍，要有正确的基本的估计。我们的干部大多数是好的，钻进党和国家领导岗位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只是一小撮。在夺权斗争中，必须从这样一个正确的估计出发去对待干部。必须清醒地看到，大多数干部是好的，犯有错误的干部，甚至犯有严重错误的干部，在党和群众的教育下，大都是可以改正的。我们绝不能把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钻进干部队伍里来的阶级异已分子估计得过多。如果错误地扩大打击面，把斗争的矛头指向广大的干部，也是敌我不分，那是很危险的。

半年多来，一些人产生了一种错觉，认为只要是当权派，就是不好的，不能依赖的，应当一律打倒。这种观点，是完全错误的，是违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是不符合事实的。对当权派，不作阶级分析，一切怀疑，一概否定，一概排斥，一概打倒，这是一种无政府主义思潮。要把干部一概打倒的观点，就是抹煞 17 年来的基本事实，就是否认 17 年的伟大成就。"

社论还强调："革命干部是党和人民的宝贵财富。而且他们能够成为当前夺权斗争中的领导力量。现在，必须有大批德才兼

备的领导干部成为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的核心领导，才能完成摆在我们面前的新的战斗任务。经验证明，这些革命领导干部参加核心领导，他们同广大群众结合起来，就能比较顺利地进行夺权斗争，就能比较快地把权真正掌起来。按照党的政策办事。反之如果排斥革命领导干部，就不能建立强有力的核心领导，就会形成群龙无首，各自为政。”

周恩来阅后，在社论稿第二部分“革命干部和广大革命群众相结合”中的三段文字旁划了竖线，批道：“在这一部分，可以把地方上的三结合和机关内部三结合加以解释和阐明。”

周恩来阅改后，即转报毛泽东，并注明：“这篇社论很重要，很及时，我看写的还不错。提议在党、政、军、文碰头会上讨论一次再发表。妥否，请予批示。” 同时，在社论稿第二部分讲“革命干部和广大革命群众相结合”的几段文字旁注明：“在这一部分，可以把地方上的三结合和机关内部三结合加以解释和阐明。”

当天，毛泽东即审阅、修改了这篇社论稿，并用粗粗的铅笔在“主席”这两个字上重重地划了一个圈，而后批道：

退总理：

同意你的意见，讨论后再发表，并把三结合的思想写进去。再则，以后重要社论都应这样做。

毛泽东

二月十八日下午八时

写完后，毛泽东又在“重要”二字下面重重地加了两个圆点。

毛泽东审阅时作了一些修改。社论稿第八页讲到对犯错误干部的使用问题时写道："有的干部，还可以吸收他们参加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夺权的临时权力机构。"毛泽东将其中的"有的干部"改为"有许多干部"。

在社论稿的末尾，毛泽东删去了以下三句口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万岁！""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毛主席万岁！"此外，还有一些文字方面的修改。

接毛泽东批示后，周恩来致信陈伯达、王力："现将红旗社论和主席批语送上，阅后请退还，拟即付印，发参加怀仁堂碰头会各同志。定下星期一（二十）晚间讨论。如何，请告。"

2 月 18 日晚，周恩来接见国防工业口造反派代表。李富春、聂荣臻在座。

周恩来说："今天是和国防工业各部院，国防工业、国防工政造反派负责人谈话。凡是部外、院外、京外的单位，我们没邀请他们参加。按规定，应当是本部、本院、京内的造反派。如果不是，那我问到你们时，你们声明一下。例如'全无敌'中有两位哈军工的造反派要来参加，我们不同意……"

他问二机部的代表："你们现在对部的权还是监督吗？"

二机部代表说："业务监督，党委靠边站。"

周恩来说："你们没有报过中央呀，也没有叫你们监督党委的领导权。同志们，你们简直是没有边了。你们造反精神很好，

但也不能这么个造法啊！部党委上面还有中央，不能叫党委靠边站，只能叫某个人靠边站。革命不能革到无产阶级司令部，革到毛主席头上。”

二机部代表有点心虚，解释说：“党委刁难我们，弄得我们很被动……”

周恩来：“故意刁难，你们就告状嘛。领导革命，监督生产是同意的。你们不能头脑发热。我们允许你们夺权，但是有限定的范围。中央各部是夺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权，监督业务是有限的嘛。”“这是中央再三申明的。业务权属于国务院，中央各部党委直属中央。即使你们‘造反团’领导层成员是党员也只能领导群众组织，要夺文化革命的领导权是赞成的，要夺党权就是毛主席的权，夺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权，夺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权。中央广播事业局，中央想夺业务权试点，但不成功。成立了革命班子，业务班子，由于没有全面经验，容易根据一时决定。他们也善于请示汇报，结果广播事业局出了几个问题。他们领导业务，把领导干部，中层干部完全排开了，就不行了。”说到这里，周恩来举例说明，并说：“宣传大权属于中央，应由中央选派，由各方面代表监督业务，必须三结合。我们应该提拔一些新的青年积极分子，新的积极分子上来要有个熟练过程，否则不行。财政、外交、国防、国防工业……等大权属于中央，你们不能夺。”

周恩来又举了财政部副部长杜向光的例子，对这些代表说：“财政部有个副部长杜向光出来亮相参加了造反派，好啊，要他

与造反派商量监督业务。我通过李先念副总理把几点决定通知他，他拒绝接受，说我是造反派，国务院的指示要保留，毛主席的指示我也要保留。党章上规定保留是允许的，但不能不执行，这个党员连党章都忘了。第二，他说我们财政大权就是夺定了，拒绝召开党组会议研究今年预算，拒绝接受国务院指示，要夺中央财政大权。我们再叫他来，他也不来。好，我就召开财贸口造反派会议。今天我给你们谈，明天或后天我要召集国防工业各部部长、司局长开会，除党中央宣布停职反省的外，一个也不能扣留。先给你们打个招呼，否则，你们就要犯错误。我们有中央领导，不能拒绝中央领导，超越中央领导。你们宣布罢官，没经中央批准是不算数的。”

接着，周恩来叙述了 2 月 17 日接见财贸口造反派代表的情况：“财贸口造反派来了，发现这位副部长与一个副司长勾掉了两个人名字混进来了，于是我们联络员请他们出去，造反派说不行，如果要他们两人退出，我们就全部退出。与国务院如此对立。第二次李先念副总理来了，请他俩退出，造反派还是这样说。我想事不过三嘛，我来，派了一个秘书叫他两退出，他们还是不干。这样向我示威。他们还把印好的传单放在我面前，这是造反派常用的手法，这对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是可以的，但也要按毛主席的摆事实讲道理的办法。他想利用造反派来伸手篡夺中央的财政大权。我把他对抗中央的情况告诉造反派，他就孤立了，造反派也不那么说了，我也来了个区别对待，副司长就一次混进会场，

可不退出，副部长三次对抗要退出。大家同意我的意见。杜向光退出会场，我们就把他逮捕，隔离反省。因为部长是我们任命的。群众是讲理的，真理绝大多数人是会懂的，但群众会一时受蒙蔽。你们掌握了文化大革命大权，在这关头，你们要注意，先给你们讲清楚。”

针对造反派代表汇报的夺权当中的一些具体问题，周恩来说：“图章也夺过来了，那就不是监督了，现在有些部长、司长、处长都靠边站了，主要是他们的责任，这些人想反正是豁出来了，不想干了，应付一下，放弃日常工作的领导。现在把夺权意义给大家讲一下，借此把有些问题澄清一下。”

周恩来从 1949 年共产党夺取全国政权开始讲起，一直说到当前的文化大革命。他说：“如果说第一阶段是毛主席亲自决定发表聂元梓的大字报，第二阶段，毛主席亲自抓了《文汇报》刊登上海 11 个团体的《告上海市人民书》， 32 个团体的《紧急通告》，跟着夺权斗争就开始了，当时估计必然会引起连锁反应，不一定那个单位都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也会夺权，当时上海出现了接管风，这确实是人民的要求，不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反扑，只能因势利导。”

他说：“前些日子，‘三司’写的《打倒‘私’字实行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要夺私权，比《红旗》三期还深刻。‘三司’又写了一篇关于团结革命干部的文章，很好。我们推荐到《光明日报》上，也广播了。什么算顽固，界限也没有定，在社论第三

段毛主席改过很多，即使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而不是屡教不改的，也应该允许改正。如果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指出了，改就好嘛。有什么证明，不是 57 年的右派帽子就摘了不少吗？”

“我们允许他们改。你们会听我们宣布的。吕正操、武竟天、就是撤职留用，将功赎罪，限期观察，以观后效。听说铁道部造反派让他半天扫茅厕，半天检讨，就无法考察，以观后效。给一定适当劳动很好，对改造思想有好处，不能老是劳动。”“夺权斗争对领导有改造任务。所以不反对每个部都夺权，这使各部都动起来，锻炼你们。但监督业务，不能成为妨碍业务。财政部连下达任务都不执行了。杜向光参加造反派，但这样的造反派我们不放心。你们国防工业更懂得了，监督业务，也必须十分谨慎。但据了解，各部监督都超过了范围。例如外交部，现在办文很快，但不深刻，不能分析，外交文件质量下降了，对国际影响很大。被动了。各单位夺权幅度也不同，彼此联系也不好办。我们打电话找各部部长就困难了。所以说监督业务要有分寸，不然业务就不灵了。”

周恩来进一步指出：“夺权要走向革命领导干部、中层干部，革命群众代表相结合，互相制约，这是无产阶级的制约，民主集中制的运用，毛主席说过我们没有找到一个好的监督办法，现在解决了，中央监察委员会在上面，监督一、二件事还可以，但是监督日常政治生活不行。机关中采取上、中、下三结合，就实行了监督，这样就必须使部、司、局长、科长一级干部，要使他们

有职有权，但不是一概而论。”

周恩来举了张国焘和延安整风的例子，说明中国共产党对犯错误的领导都是允许其改正的。他又说到眼前全国各地对当权派一概打到的做法：“这次有两个月，我们对干部还这样下去，我们就不是毛主席的路线了，这样做下去，就犯了‘左’倾路线的错误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了。对干部批判有的地方还是这样，我看了很难过，不怪年青同志，我如果不把这件事告诉你们，你们再不断斗争，无休止检讨，这不行了。”“现在斗争方式已经发展到如此：打人、挂牌、游街，这不是毛主席的作风，这是‘左’倾路线的恶劣作风，如果不告诉同志们，这样发展下去，我就有罪了。我们对溥仪没有用刑，把他改造了，把末代皇帝改造了，这是毛泽东时代的奇迹，为什么对自己的同志用这种方法呢？这是不好的作风，不能让年青人也这样做。三座门有的把照片，漫画贴在街上，马上传到香港、东京、莫斯科，传到全世界，对国家有什么好处，三座门贴的低级的大字报，我不愿意看，我们无产阶级斗争是光明正大，是政治斗争，不能搞黄色低级的东西，街上标语是‘砸烂×××狗头’什么狗头？人头嘛！当然罗！总得搞的轰轰烈烈，机关干部水平应该高一些嘛。”

周恩来接着说：“对干部要区别对待，贵州文件上就有五种。例如梁膺庸是叛徒，把他抓起来了。对另外一种，如杜向光，暂时隔离反省，过了几天反省好，就不一定严格处分。有些临时采取一些措施，这是一类，这是极少数；第二要罢些官的，有的不

能做事的，很少，有的撤职留用，考察一段时间；第三停职留用，在工作中考察，这一般是少数；第四监督留用；第五留用，这是多数。还要提一批，提到处科级、司局长甚至领导岗位，这是革命需要，还不少，把新生力量提上来，这是运动后期要实现的，在夺权斗争中也可以适当进行。抓极少数，罢极少数，调一些，留多数，提一批。这对于三结合，改造领导，改造业务有好处。这是设想，还未形成文件，这是监督业务所发生的。这所以要说给你们听，一是使你们心里有数，想试试后再形成文件。这是监督业务所发生的问题。当然每个造反派可把你们对领导的意见提上来。领导参加造反问题，以群众为基础，逐步吸收‘长’字号，不一定发展很多。这对造反派组织有好处。”

三机部代表请示周恩来：“部的夺权三结合怎么体现？”

周恩来说：“部的领导三结合是革命领导干部、革命的中层干部、革命群众三结合。以革命造反派为基础。”

问：“夺部的权以部内为主体怎么解释？”

周恩来：“以部内本单位造反派为主，而不是本系统。外面来的要回去闹革命，京外不能参加。在京的要是直属单位，工厂要考虑。”

聂荣臻插话：“在京工厂参加了，那么天津工厂也要来参加了，部本是部内来夺权，三机部还有很多厂，这一个厂夺了那一部分不承认，再夺，那夺到什么时候呢？”

周恩来：“这个问题，你们考虑。”

三机部代表说："在京单位联合起来，到部内去点火，起了促进作用。"

周恩来："对，起了促进作用，以部内造反派为主，共同夺部的权。为主的是部内造反派，成立革命委员会呀，北京直属单位由少数人参加，但不是学校，如机关造反派欢迎。学校如有个别人参加，那就要离开学校了。"

## 第 516 回：毛泽东，深夜发□□之怒　调干□，充实中央专案组

2 月 18 日深夜至 19 日拂晓，毛泽东召集周恩来、康生、李富春、叶剑英、李先念、谢富治开会。林彪因病不能参加,派叶群作代表。据说，本来“毛办”来电话后，林彪是准备赴会的。因为叶群担心林彪去后万一没有转缓的余地，不好对付，就代替他去了。毛泽东在会议前与叶群单独谈话。

会上，毛泽东首先发言，他一反平时态度和蔼,谈笑风生的习惯,一上来,就面带怒容,语气严厉地说:

“我听说 2 月 16 日下午有人在怀仁堂上闹事，反对中央文革小组。反对中央文革小组就是反对我。反对我们这个党嘛。这半年多来，中央文革作了大量的工作，伯达、江青、康生等同志都作了大量的工作，你们看见了没有？谭震林、徐向前、陈毅向党发难，满口放屁，你们为什么不放一声。”

他转向周恩来说：“会议是你主持的吧？”

周恩来：“是我，我没有主持好会议，我有责任。”

毛泽东说：“终究不是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到底还是有人跳将出来，公开反对文化大革命了。什么话?说我们文化大革命不要党的领导?他要什么党的领导?要把王明请回来吗?号称革命几十年，到头来，害怕起学生运动了，谁个怕学生运动？北洋军阀，段祺瑞，他怕，就镇压，结果怎么样?镇压学生运动的没有好下场。天天喊群众路线，群众真起来了．就怕得要死，恨得要

命，怎么讲?延安整风运动错了吗?又扯出这个问题，是要翻历史的旧案吗?要翻案的人也绝没有好下场。”

“你们在怀仁堂会议上联合起来,搞突然袭击,向‘中央文革’发难,向中央发难,你们究竟想干什么？这无非是想搞宫廷政变，想让刘少奇重新上台。十一中全会你们都是举了手的。为什么执行起来有抵触呢？为什么没过几天，你们就反对十一中全会的决定？为什么阳奉阴违，出尔反尔呢？讨论进行‘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时,你们也是赞成的,我没看见你们谁投过反对票,可为什么‘文化大革命’真的发动起来之后,你们又反对它?”

周恩来：“主席，不要生气，注意保重身体，都怨我没把事情处理好，要批评就批评我!”

毛泽东：“你陈毅要翻延安整风的案，全党不答应！你谭震林也算是老党员，为什么站在资产阶级路线上说话呢？”

“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被冲垮了，那些人就惶惶然，稍定心神，就重整旗鼓，要复辟啊！要推翻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的决议吗!要对文化大革命发难!”

“中央文革小组执行十一中全会精神。错误是百分之一、二、三，百分之九十七都是正确的。谁反对中央文革，我就坚决反对谁！你们要否定文化大革命，办不到！大闹怀仁堂，就是要搞资本主义复辟。要对文化大革命发难。如果文化大革命失败了，我和林彪撤出北京，再上井冈山打游击。

毛泽东把目光转向代表林彪来参加会议的“林办”主任叶

群，说出令人吃惊的话："叶群同志，你回去告诉林彪，他的地位也不稳当啊，有人要夺他的权哩，让他做好思想准备。"

"要闹个什么结果?我马上走，林彪也走。我和林彪再上井冈山打游击!把北京留给他们!陈伯达、江青枪毙!康生充军!文革小组改组，让他们来搞，陈毅为组长，谭震林、徐向前当副组长，余秋里、薄一波为组员。陈伯达、江青枪毙！康生充军！力量还嫌不够，就把王明、张国焘请回来。力量还不够，请美国、苏联一块来！我也下台，你们把王明请回来当主席么！"

周恩来着急的劝道："主席，不要这样，不要这样，这样不好嘛。同志们的出发点绝不是这样的。在怀仁堂会议上几个老同志对文化大革命不理解，发了脾气。这主要责任在我。会后，他们认识到这样做不对，找我也作了检查，他们也感到说了些对不起主席的话，也想找个机会，当面向主席作检查。"

毛泽东："他们根本不认错嘛！恩来同志，我提议这件事要认真地开会讨论，一次不行就开两次，一个月不行就开两个月，政治局解决不了，就发动全体党员来解决。"说罢，毛泽东愤然离开会场。

毛泽东走后，周恩来说："今天我的心情很不好受，很难过，由于我自己没有主持好会，使怀仁堂会议发生了这样的偏差，让主席发火了，给主席的思想和心理造成了这么大的负担，我感到很内疚，很内疚啊！"

叶剑英说："我也得检讨，我们下去后都帮助谭震林、陈毅、

徐向前检讨，让他们赶紧向毛主席认错，请主席消消气，不要把这事挂在心上。”

康生说：“不那么简单。现在的情况充分证明，谭、陈、徐还有其他人在怀仁堂的活动是想搞政变嘛，完全是一场未遂的政变。”

李先念说：“总理，我们得研究一下如何落实毛主席的指示，开好帮助他们的会议，不然没法向全党交待呀。”

叶剑英说：“不管怎么样，我们得听毛主席的话，现在中央弄得乱轰轰的，不但下面的同志没法工作，我们都不知道如何是好了。”

谢富治说：“问题的关键是你们中的一些人不听毛主席的话，而是代表着被打倒的一小撮走资派和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的利益讲话，你们的屁股坐歪了，人民群众不答应，要求批判你们。这能把工作搞好吗？”

李富春说：“怀仁堂的会议总理没有多大责任。主要是我的责任。我是总理指定的几位副总理的小组长，主席批评伯达、江青的指示是我捅出去的，所以大部分责任应该由我来负。”

叶群说：“我看现在不是谁先负什么责任的问题，林副主席始终认为右倾是最大危险。不反右，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就不能保卫，所以主席刚才讲的非常明确，首先是批判谭、陈、徐，不把他们批倒批臭，什么也谈不上。”

康生说：“叶群同志说得对！”

周恩来说："我们很快就召开对他们三人的批评会。为了把会开好，我建议我们在座的同志都分别做他们的工作，帮助他们认识错误。陈毅同志由我来谈话。谭震林同志由李先念和谢富治同志来做。剑英、先念和富治你们三人再做徐向前同志的工作。批评他们要严厉，不能姑息迁就，要把主席对他们的批评原原本本传达给他们，使他们受到震动。一定要注意，防止他们出现对立情绪，不要把人民内部矛盾转化为对抗性的矛盾，这是格外要警惕的。"

会议决定："陈毅、谭震林、徐向前三人请假检讨，由周恩来主持政治局生活会批评陈毅、谭震林、徐向前三人。"

子夜，会议结束。康生回到钓鱼台已是 2 月 19 日凌晨。他先找到住同一幢楼里的王力，对他说："我知道你还不会睡，先告诉你：我刚从主席那里开会回来，出了大事了！我跟主席这么多年，从来没见主席发这么大的脾气！你立即把陈伯达、关锋、戚本禹找来， 我传达会议内容。江青不要喊她，等她起床后，我再单独去跟她谈。"

康生拿出笔记本，向陈伯达、王力、关锋作传达。陈伯达感到沮丧，如此重要的会议，怎么把他排斥在外。

康生说，毛泽东"发了无产阶级的震怒"!

康生过去对江青总是呼其名，有什么事，总是要江青上他那里去的。 这次，康生在向陈伯达、王力、关锋作了传达之后，康生就坐在那里等，不敢去睡，也不敢喊醒江青。他吩咐，江青

何时醒来，何时告诉他，他立即向她传达毛泽东的谈话！康生，人称“康老”，从未对江青如此“恭敬”！从此以后，康生见了江青，就改称“江青同志”了。

2 月 19 日，由周恩来、李富春同陈毅谈话，传达毛泽东的批评。由李富春、李先念、谢富治同谭震林谈话；由叶剑英、李先念、谢富治同徐向前谈话。陈毅得知毛泽东的看法后，深感问题严重，给毛泽东写了一信，请求见面说清，毛泽东回信说陈毅“历来犯错误”“改也难”等，暂不见。

一天晚上，王力把王广宇叫到他的办公室，在场的还有关锋。王力对王广宇交代说：“这是一份中央政治局碰头会议的记录稿，是我同春桥、姚文元回忆追记的，经伯达、总理修改后，现在准备印发有关同志。”

张春桥、姚文元已于 18 日回上海了，王力把记录稿和张春桥、姚文元留给他的信交给王广宇。张春桥给王力的信中说，看了王力执笔的这份记录稿，觉得大致就是这样，没有什么补充修改。并嘱王力把这个记录“送伯达、总理过目后再发。”

这份 2 月 16 日怀仁堂会议的发言记录是按发言次序记录谭震林、陈毅、李先念、叶剑英、徐向前、和谢富治等人的发言。原记录稿只在开头写有“会议由周恩来同志主持”的字样，但正文中没见有周恩来的发言。这份记录稿是经周恩来、陈伯达看过修改后的稿子，可以看到周恩来亲笔在记录稿上作了几处补充，字数不多，都是加在发言中间的插话，其中一处是：当谭震林气呼

呼地说："我不干了，叫你们干吧！"时，拿起衣服和帽子就要退出会场，这时，周恩来拍了桌子严厉地说："回来！坐下开会。"这段话王力的原稿未记，周恩来作了补充。

记录稿后边署名是："张春桥、王力和姚文元追记。"

王力交代王广宇把他亲笔记录的，经周恩来补充过的原稿重抄一遍后，把原稿还给他保存。然后用王广宇抄的稿子去打印。他再次强调：排字、校对、打印、发送全过程都由王广宇亲自办，印 15 份后，马上拆版。要排字工人严格保密，印好后按他给开的名单，由王广宇登记发送。

王广宇从中联部调来一位 50 多岁的党员老工人，向他交代这份绝密文件要他亲自排。

排印时，在排字车间只有王广宇和那位老工人两个人。

王广宇将排印好的《二月十六日怀仁堂政治局碰头会记录》15 份带回后，向王力作了汇报。当晚，王力给王广宇一份他亲自开列的发送名单，有毛泽东、林彪、周恩来和部分参加会的政治局委员、副总理，还有没参加那天怀仁堂会议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江青、戚本禹等人。

第二天，王力又补充了几个人的名单。

王广宇将排印好的《二月十六日怀仁堂政治局碰头会记录》发完后，还剩下一两份。王力说："剩下的文件和记录稿一律销毁。"

王广宇想："以后万一他再要这个文件就麻烦了。"他就没销

毁，把排印原稿和剩余几份文件以及发放的人名单一起装在一个保密袋中，放在他办公桌带锁的抽屉里。至此，2 月 16 日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记录和相关内容，办事组的工作人员除王广宇外，无一人知道。

为了配合中央专案组的工作，1967 年春中央决定成立以周恩来为组长的干部专案组，副组长是陈伯达，成员有江青、康生、谢富治、汪东兴等人。下属一个专案审查办公室，由谢富治任主任，汪东兴、戚本禹、严佑民、肖孟任副主任。办公室的日常工作则由严佑民、肖孟二人负责。

自 1967 年 2 月 19 日起，中央文革碰头会取代了原来的中央文革小组会议和中央碰头会。从此，中央专案组的成员同中央文革碰头会的成员相差无几

由于中央专案组的极度扩张，从部队抽调了一大批人员充实到专案组工作。专案组工作人员最多时多达数千人，其中一度有 789 位来自解放军的干部，126 位解放军干部担任专案委员会下属的专案小组正副组长一职。所有的抽调人员在北京集合后，由周恩来带领中央文革碰头会的成员召集开会，说明任务的重要性，并布置工作。周恩来每隔半个月就在人民大会堂的东大厅主持召开一次专案组全体工作人员会议，由每个专案组依次汇报工作。

对于中央专案组的工作，周恩来规定甚严。凡上送的文件、材料，一定要写上“已阅”、“请周总理批示”，签上自己的名字，

才予以发出。在中央专案组内部，对有关专案的材料，不论是下属各组上报的，还是中央专案小组成员及其办公室转来的，都要及时传递。至于怎么传送及传送范围，都有严格规定，不允许个人擅自处理、扣压。对于调查工作中需要查阅档案等事情，也要由周恩来最后决定是否可以。

## 第 517 回：二一八，南京军区大抓捕　同一天，武汉军区发声明

2 月 18 日下午，南京军区政治部主任王六生，在二楼小会议室召开座谈会，就贯彻军委《八条命令》的问题，听取群众组织的意见。与会人员有：宣传部艾汉美，文化部方泽浦，《人民前线报》社洪期钧，高丕忠及各战斗队的头头们全到场了。还有两位军区副司令员也参加了会议。会上，气氛平和，大家情绪活跃，相继发言，各抒己见。

座谈会开到下午 15 时 30 分左右，听到二楼走廊里人员来往频繁，急促的脚步声一阵接一阵。这时，王六生主任的眼神向与会人员扫视一下，再转向门外点头示意后，从座位上“唰”地一下站立起来，从口袋里掏出事先准备好的讲稿，提高嗓门大声宣布，“现在，我传达军区党委决定：”

“鉴于军区政治部的洪期钧、高丕忠、方泽浦、艾汉美等人，不听招呼，不守纪律，同社会上不法分子，串通一气，里外勾结，冲击军区领导机关，破坏部队稳定，破坏正常工作秩序，破坏文化大革命，妄图搞乱部队，乘机夺权。为执行‘军委八条命令’，加强部队纪律，现决定对洪期钧、高丕忠、方泽浦、艾汉美四人，采取断然措施，进行行政看管。”

会议室的气氛一下子紧张起来。大家听了王主任的宣布后，感到突然、意外、愤慨，简直是不可理喻。王六生的话音刚落，军区保卫部保卫队队长史书清，带着七、八名保卫队员，迅速走

到那些人身边，两个押一个，当即将这 4 人押着登上停在大楼后门的一辆军用大卡车上。

可能是事发突然，这 4 个人和在场的其他人一时没有任何反应。洪期钧、高丕忠、方泽浦、艾汉美他们 4 人被押上车后，仍然没有人吭声，各自站在卡车两边。押送他们的几名保卫队队员，紧靠在他们身旁。

汽车开动了。突然，高丕忠开腔了，他说："请大家掏出《毛主席语录》。"

大家赶紧把《毛主席语录》掏出来。他们 4 人一起，跟平常一样，翻开《语录》，一条一条，一字一句地朗读起来。

首先，学习《语录》的第一段："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主义。"

接着，有重点地选读几段：

"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千万注意。"

"我们要相信群众，相信党，这是两条最基本的道理。"

"我们的同志，在困难的时候，要看到成绩，要看到光明，要提高我们的勇气。"

……

"洪期钧、高丕忠、方泽浦、艾汉美四个头头被抓起来了！"这一爆炸性的新闻，把整个南京军区政治部大楼都震动起来了！

同时，这一新闻，也立刻传到军区各领导机关，传到军区家属大院，传到有关的亲人、朋友耳朵里……

军区政治部的各办公室，就像炸了锅一样，你一言我一语地议论开来。新闻科副科长李少白，山东人，豪爽性格，心直口快，肚子里憋不住话，他说："怎么能这样干？我们犯了什么法？是毛主席号召我们开展四大的，是许司令动员我们写大字报的，凭哪一条抓人？我想不通！我抗议！"

有些胆小的同志，听说"抓人"了，一下被吓蒙了，脸色都白了，沉默不语。

2 月 18 日下午，南京军区以军区党委的名义，用军内电文形式，给各野战军，各省军区的师以上党委，发出逮捕"洪、高、方、艾"四人的《通知》、《通报》，正式宣布："洪、高、方、艾"这几个"造反派头头"，就是"证据确凿的反革命分子"，"必将严惩不贷"。

紧接着，南京军区司令部发出各种各样的"公告"、"通告"、"公开信"、"揭发信"、"控告信"，对军区政治部以"洪、高、方、艾"为首的反革命分子猛烈开火；对他们的"反革命罪行"，展开声势浩大的揭露、批判、声讨。将"一·二四"大会，说成是"疯狂迫害军区首长，与地方上反动势力相勾结，冲击军区领导机关，制造混乱，是一起严重地反革命叛乱事件"。

从 2 月 18 日以后，南京军区几乎天天抓人。抓了一批又一批，一拨又一拨，像滚雪球似的，越抓越多；抓了一般干部，再抓科长；抓了科长，再抓部长，抓秘书长。

新闻科李少白副科长，因为说过"想不通"，不服气的话，

也被抓走了。许世友说："谁不服气，就把谁抓起来"。

接着，组织部副部长赵树湘，青年部副部长孟祥海,秘书处副秘书长孙海云……等等，一个又一个，统统都被抓起来了。

步南京军区政治部后尘,许世友下令军区司令部,后勤部及"三团两队"，部队医院、军事院校，同时大批抓人。

不仅是南京军区，武汉军区也开始行动了。

2 月 10 日，武汉军区副司令员李迎希、副政委张广才赴京。

2 月 11 日，武汉军区姚喆副司令员带着王任重的乔秘书来到武汉水院，说"周总理和中央文革指示，要接王任重去治病。"水院将王任重交给了姚喆，但是让他写了一个条子："接王任重到陆军总医院治病。"

临走时，负责看管王任重、张体学的水院学生余杰华对姚喆说："张体学也在这里。"

三天后，乔秘书又来到水院，说是"周总理指示，要接张体学到北京。"水院将张体学交给了乔秘书。

2 月 13 日，武汉军区送走支持武汉军区机关"古田"、"捍卫毛泽东思想"、"老三篇"等造反派群众组织的北航"红旗"学生，当天即在军区礼堂召开的会议上宣布恢复党委制，停止军区文化大革命，并在下午宣布王任重在军区保护下在总医院休养。武汉军区的"内部整顿"就此开始。

2 月 13 日，《湖北日报》以《打倒分裂主义，实现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为题发表了社论，首评《二八声明》。社论说：

“《二八声明》是一株反对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大毒草，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入大联合大争权阶段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猖狂反扑。”从此拉开了湖北省轰轰烈烈批判《二八声明》的序幕，把《二八声明》的论战公开。湖北广播电台广播了这篇社论，后来又播送了评论员文章。

当天，武汉“工总武昌分部”宣布退出“工总”，成立“二一三司令部”。同一天，国棉三厂 500 多名“工造总司”的群众宣布退出“工造总司”，申请加入“工总”。

从此，武汉以对《二八声明》的态度分成了两大派，拥护《二八声明》的，被称之为“香花派”，反对《二八声明》的，被称之为“毒草派”。

2 月 15 日，原“工总武昌分部”所属 31 个单位发表《严正声明》，接管原“工总武昌分部”，成立新的“工总武昌分部”。

当天下午，“工造总司”、“新华工”、“新湖大”、“三司”、“新华农”、“南下造反大队”、省委机关“革司”数万人在体育场举行批判《二八声明》的大会。

在武汉三镇为《二八声明》闹得沸沸扬扬之时，武汉军区也开始出击了，他们首先从军区内部开始。

2月15日前后，武汉市各军事机关都用石灰、油漆圈出了警戒线，凡超过警戒线者，就被认为是冲击军区。“工总”、“二司”等组织赶紧下发通知：“不准冲击军事机关！”

2 月 16 日，武汉军区独立师师长牛怀龙、政委蔡炳臣以师

党委名义给中央军委写信，由正在北京开会的陈再道司令、钟汉华政委转呈。信中说：武汉地区局势紧张，有一个地下黑省委，控制部分造反组织；军区情况复杂，唐副司令员、政治部吕副主任自杀身死，李迎希副司令等有接管两级军区的计划；张体学省长幕后指挥搞假夺权，造反派组织互相打砸抢。据说军区将 29 师（8199 部队）调市内，却未与独立师通气。信中说："社会上流传'血染武汉'的谣言，说有兵变的危险"。

牛怀龙、蔡炳臣还在部队中说：

"两级军区都有问题，不能信任，时刻有兵变的可能……"

"在两级军区瘫痪的情况下，我们师的担子很重，不能按常规走路，要提高警惕，加强战备，防止反革命暴乱和兵变。"

陈再道、钟汉华表扬牛怀龙、蔡炳臣阶级斗争观念强，警惕性高。

2 月 18 日，武汉军区终于开始对武汉的《二八声明》表态了。他们首先派军队重新接管《湖北日报》社的红旗大楼，并于当日发表《严正声明》，即《二一八声明》，严厉批判《二八声明》和"香花派"。

《二一八声明》指出："武汉军区派部队进驻红旗大楼意在维持秩序，防止武斗；军队内造反组织在《二八声明》上签字，不能代表武汉部队，更不能代表解放军；武汉军区不支持《二八声明》"。

《二一八声明》认为："《二八声明》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

当权派勾结社会上牛鬼蛇神泡制的反革命宣言书”;“这个所谓声明，是一小撮别有用心的人精心策划的，是制造分裂，挑动群众斗群众，转移斗争大方向的”。

《二一八声明》将“拥护或反对《二八声明》看作是革命与反革命的分水岭”，同时表示：武汉部队“坚决站在无产阶级革命派一边”,“对那些证据确凿的反革命组织和反革命分子坚决采取专政措施”。

这个《严正声明》是武汉军区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后的第一个表态性文件，起草于 2 月 11 日，经过武汉军区党委反复讨论，并交给军区司、政、后机关干部征求意见，然后请示军委文革小组：军区是否可以发表声明？

2 月 16 日，军委文革小组来电表示：武汉军区有权发表声明。

武汉军区又将《严正声明》原稿上报军委文革小组。经军委文革小组组长徐向前 2 月 18 日批准“同意!”后，又由在京开会的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政委钟汉华圈阅批示:“完全必要!”然后在武汉军区副司令员韩东山的批准下发出，刊登于当天的《湖北日报》。武汉军区当天出动了汽车和直升飞机广为散发《严正声明》，同时组织部队上街举行声势浩大的武装游行。

已于2月13日得知《严正声明》内容的武汉军区下属汉口高级步校内的“红旗”、“红色造反团”等5个群众组织当时即发表《对武汉部队〈严正声明〉的郑重声明》，指出《严正声明》是反毛泽东思想、对抗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大毒草，是挑动群众斗

群众和镇压军内外革命群众运动的反革命宣言书，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等。

2 月 18 日上午 10 时，武汉军区副司令员孔庆德遵照陈再道的指示,在武汉军区大礼堂召开了有文工团、体工队、军乐队参加的军区行政大会，宣布“古田”、“老三篇”、“捍卫毛泽东思想战斗团”3 个组织为“反革命组织”，并在会上逮捕了这些组织的负责人谭明，行政扣留王长庚、孟奇武等 6 人，其中两个是女兵。

这两个女兵不走，大声说：“我没罪，我不去!”

战士推她们、拉她们，她们一边挣扎，一边高呼：“毛主席万岁!”一边不断地回头望着台上的毛泽东画像大哭。台下那些文工团、体工队、军乐队的演员们和被捕的人都流着泪高呼：

“我们要见毛主席!我们要见毛主席!”一时悲壮的口号声震撼着礼堂，最后士兵用绳子将两个女学生绑起来拖走了……

留下的人含泪目送着她们，嘴里不断呼喊：“保护《八条》，不许打人!……”

会后这些人的家被抄。从这天起，武汉军区开始大规模抓人。“古田”、“老三篇”、“捍卫毛泽东思想”被强制解散。

2 月 19 日，武汉部队继续武装游行示威，“工总”有人开始冲击军区警戒线。武汉部队发布公告，指责“有人把斗争锋芒指向解放军和领导干部，这是反革命逆流。”

这一天，武汉“红武兵”、“造反大队”、“二一八红星军”、

“中学红卫兵”等 7 个组织，在汉口新华路体育场组织了有三万人参加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批斗王任重和武汉市委书记宋侃夫。

一时间，这些新的群众组织引起了人们的注意。他们和“三新”即“新华工”、“新华农”、“新湖大”和“工造总司”等组织，同属“毒草派”，反对《二八声明》，支持军队，认为军区《二一八声明》是正确的，认为湖北省副省长孟夫唐是修正主义分子是走资派，不能参加三结合。但是，在对待“工总”问题上，二者有明显的分歧。“工造总司”、“三新”认为：“工总”是革命群众组织，头头大多数是好的，虽然少数头头修了，只要换上头头，“工总”就有前途，可以继续革命。而“红武兵”等 7 个组织认为：“工总”是由坏人操纵的坏组织，是五类分子、牛、鬼、蛇、神占主要地位的“反动保守组织”，“保刘真、保张华（省委秘书长）、保他们的干爹朱鸿霞”，不是造反派，是历次运动批斗的对象，决不允许这个组织参加夺权。

## 第 518 回："红武兵"，"职工联合会"解散 牢房满，涪□城宣布戒严

"红武兵"是由各企业的基干民兵为骨干成立的群众组织。1967 年 1 月 28 日，武汉市武装部政委巴方廷拿了些文件找到武汉市机械工业局武装部副部长俞文斌，希望他能把民兵组织起来，成立一个群众组织，一是能够让民兵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同时也便于保管各单位武装部存放的武器弹药。于是，俞文斌将本单位的基干民兵组织起来，成立了这个叫"红武兵"组织，意思是"红色武装基干民兵"。这个组织成立后，发展很快，武钢、一冶、长航、铁路、中央在汉的大单位等许多单位的基干民兵都参加进来。而且他们手上都有枪。"红武兵"的成立，稳定了民兵组织，得到了省军区、市人武部及全市各级武装部领导的支持。

此时，武汉的江汉路再次回到去年 11 月封《湖北日报》时的场面，成千上万的人拥向江汉路、红旗大楼参加辩论，只不过那时是"造反派"对"保守派"，而此时是"造反派"对"造反派"。

2 月 19 日至月底，两派都各自组织了大规模的游行。一方喊"二八声明是大毒草"，另一方则呼"二八声明是大香花"。街上的大标语、大字报空前地多，晚上到处是辩论的人群，尤其是江汉路一带的辩论常持续到深夜两三点。"二司"和"工总"的广播站每天都在拼命播放《就义歌》、《坐牢算什么》、《红军战士想念毛泽东》等歌曲。

参加“全国职工联合会”的武汉“职工联合会”头头杨庭峰，从北京刚回到汉口就被关进了公安局，他在公安局里，以同意解散“革命职工联合会”为条件，被公安局放了出来。2 月 20 日，他在武汉体育馆召开大会，宣布解散“武汉地区革命职工联合总会”，亲自砸掉公章、旗帜，从此，“职工联合会”彻底消失，从成立到结束只存在了 50 天，在文革的大潮中昙花一现。

2 月 20 日，武汉“工总”提出调整战略：痛击敌人、善待解放军，卖好《长江日报》！这时，“拥军”还是“反军”也是革命与反革命的分水岭，一般人轻易不敢公开提出“反军”口号，否则，很容易被打成反革命。

但是，2 月 21 日,一些气愤难平的“工总”和“二司”的群众，仍有几万人之众到武汉军区示威,并冲击军区支左指挥部,骂他们是“保皇兵”。

2 月 21 日，陈再道发表强硬讲话：“谁敢反军就让他们有来无回！”

2月21日，“工造总司”、“新华工”、“三司”、“省直革司”等组织的数万人也在新华路体育场召开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誓师大会。会上通过了《告全省人民书》。会后举行了游行，高呼“坚决拥护武汉部队《严正声明》和《公告》”，“彻底批判《二八声明》”等口号。

2 月 21 日，武汉空军副司令员带领全副武装人员携带武器，突然包围雷达学校，宣布雷达学校“红总”为“反革命组织”，

对各级勤务员进行批斗，当场逮捕 18 人。

2 月 21 日夜晚，军区杨秀山副司令员、副政委叶明亲自率人来到高级步校，宣布这里的“红旗”、“红色造反团”等组织为反革命组织，宣布 25 名学员为“反动组织”骨干，逮捕 16 人，其余交群众监督。第一个被捕的人刚喊一声：“毛主席万岁!”就被人在嘴里塞进一条毛巾，然后，五花大绑。原“抗大职工造反团”、“反修”、“满江红”等战斗队都要求交待跟着“红旗”和“红色造反团”所干的坏事。

2月21日深夜，武汉部队支左办公室向《长江日报》编辑部递交了一分《通牒》。《通牒》说：《长江日报》(2月4日)登载了斗争某一个人(指王任重)的挂黑牌子的照片，被香港的报纸转登，造成了很坏的影响，丑化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长江日报》必须在2月24日以前做出检查，否则，将实行军事接管。

2 月 22 日，“工总”步步后退，解释《二八声明》产生的背景和原因。希望能得到武汉军区的理解。

2 月 23 日，武汉军区副司令员杨秀山针对有人怀疑军区的大逮捕行动是瞒着中央军委干的，特地在高级步校全校人员会议上说：

“军区采取这么大的行动，你们想军委能不知道吗?军区调动一个连的兵力都要经过军委批准!这次动用了那么多的连队，不报军委批准可能吗？”

当天，8201 部队，即武汉独立师一个加强连分乘四辆卡车，

枪上刺刀，车头架着机枪，长驱直入后字 248 部队学校，对学校实施军事管制，接管广播台，加派岗哨，校内外来往断绝，当时逮捕 9 人，宣布后字 248 部队“红司”组织为“反革命组织”。

这天，武汉部队还出动一个排的部队前往 202 部队，即武汉卫校，抓“反革命”。扑空后，2 月 24 日凌晨，武汉空军部队又出动一个营的全副武装人员，分乘 20 多辆军车，把护校围了个水泄不通，大门、小门、窗户都布满了带枪的岗哨。逮捕 10 余人，事后派进工作组，成立护校指挥部。3 月 10 日又召开了“愤怒声讨红色造反队大会”，会上把一些“首恶分子”拉上台示众，当场抓走 7 人，其中有 17、8 岁的女学员，都戴上了手铐。军区杨秀山副司令员说：“你们后勤不能搞温良主义呀!”“你们把军区搞得好苦啊，把这个拉出来斗，那个拉出来斗，跟你们说好话都不行，专搞打、砸、抢，抄我们的家，不是不报，时候未到，现在就是要报，不是秋后算账，而是春前算账!”

2 月 23 日，“工造总司”、“三新”等组织在《湖北日报》上发表声明，支持军区对《二八声明》的批判，坚决站在军区一方。在签发声明时，“红武兵”方面也派代表要求在声明上签字，遭到拒绝。因为有人反映，“红武兵”并不是纯民兵造反组织，头头是原“职工联合会”的，这个组织是“职工联合会”的变种。“工造总司”、“三新”本来就有点“保”的名声，戴有托派帽子，现在不愿再沾上“保皇派”的臭气，保皇派名声很臭，大家都说自己是造反派，不愿别人说自己是保皇派。所以“工造”、

“三新”拒绝了“红武兵”的要求，但同意他们在“三新”和“工造”控制的《湖北日报》上，单独以“红武兵”名义发表文章。

2 月 23 日下午，武汉部队出动 70 余辆军车，乘载全副武装的解放军游行，高呼“《二八声明》大毒草”等口号，同时，天上有飞机配合散发《二一八声 明》和《二二〇公告》等传单。武汉驻军十几人一队在武汉市的大街小巷宣传《二一八声明》和《二二〇公告》，特别是在红旗大楼周围，他们甚至参加与“香花派”的辩论。

这天晚上，许多“香花派”群众担心《长江日报》被军事接管，数万人云集在红旗大楼前，挤满了江汉路。汉剧院、话剧团等文艺团体的红艺军组织，轮流在红旗大楼前为这些群众作慰问演出，整整闹了个通宵，24 日晚上继续如此。

2 月 24 日，武汉军区通知部队系统的造反派到军区礼堂听报告，一个人也不准缺席。会场上气氛森严，一个连的战士负责警卫。军区副政委叶明、副司令员孔庆德、韩东山亲自主持大会。

会上孔庆德双手叉腰,将衣扣解开,宣布“丛中笑”、“铁军”、“105 红色造反团”等群众组织是“反革命组织”，里面的学生头头是“反革命小将”、“小牛鬼蛇神”，同时宣读立即解散 29 个军内造反组织的命令。

这时,台下一位女军人站起来高声喊道:

“打倒孔庆德!孔庆德镇压造反派绝没有好下场!”

这声音一下吸引了全场的视线，人们发现，喊口号的姑娘不

是别人,正是孔庆德的女儿,大眼睛闪闪发亮,绿军帽压着齐耳短发,帽上红星闪闪发光,她直视着父亲惊愕的目光，毫无畏惧。

人们一下呆在那里,整个礼堂死一般的寂静……突然，狂怒的孔庆德大声吼叫起来:

“抓起来,给我把她抓起来!”

战士们没有马上反应过来，他们知道这是孔副司令的女儿,也不是这次要抓捕的对象,不知应该如何执行孔庆德的命令。

孔庆德将拳头狠狠砸在桌上,指着持枪的战士吼道:

“我命令你们,把她抓起来!”

执行任务的战士这才反应过来,他们看见坐在主席台上的其他军区领导没有表示其它意见，立即冲上去，抓住孔庆德女儿的双手,“咔嚓”一声将手铐扣上,将她拉出了会场。

随后，叶明、韩东山发言，训斥造反派学生是“假左派、真右派”、“纸老虎”……立即就有十几个人被揪上台示众，斗后当场抓走了 3 人。其中有一人强烈要求公布被抓的罪状，一个保卫科长跑上来打了他两个耳光，按着脑袋带出了会场。会场上的造反派一时都惊呆了，有一些人还想到喊一两声：

“要按军委《八条》办事!”

但是，已与大局无碍。

会后在文工团开了 6 次控诉造反派罪行的大会，组织了多次的小会检讨、请罪等活动。文工团抓走 22 人，行政看管 2 人，警告 5 人。

这次行动逮捕175人，宣布行政管制45人，监督检查的2009名，提出警告的不计其数，自杀4人，其中2人被救未死，开除军籍1人，上台示众约有1025人。

每次逮捕人时，都要宣布通令：

我们请示军委，徐向前副主席批准，××组织为反动组织，立即解散。

徐副主席讲，陈、钟首长不是三反份子，如炮轰陈、钟首长就是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就是反革命，徐（向前）副主席说：李迎希、张广才是大野心家，大阴谋家，××组织与李迎希、张广才勾结阴谋篡军。

××组织是反动组织，所有成员是专政对象，在没有解放之前，不能叫同志，只许规规矩矩，不许乱说乱动。

立即交出反动纲领，反动传单，反动材料，交出一切文化大革命用品，否则查出严加处理。

任何人不得外出，外逃人员三天不回来，开除军籍，不能改头换面，成立组织，老老实实，低头认罪，反省交待，违者以纪律论处。

抓人的事情不仅发生在南京和武汉，我们再看四川。2 月 19 日中午，成都军区的直升飞机飞临涪陵上空，撒下了《军委八条》、《中央军委给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川大“826”战斗团的信》及《成都军区关于不准冲击军事机关的通告》等传单。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红贸总部”及其相同观点的组织，不

断的组织游行，游行的口号已然带有几分杀气：

“坚决拥护军委八条！”

“冲击军事机关就是反对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

“坚决要求镇压冲击军事机关的反革命行为！”

军分区的宣传车已经有端着刺刀、冲锋枪的军人护卫了；荷枪实弹的军人开始在大街上巡逻；在两派辩论的人群里已经有穿便衣的军人出现……

2 月 22 日晚上，在涪陵军分区傍边的涪陵灯光球场举行以涪陵一中的“红卫兵匕首战斗团”为骨干，由涪陵五中、涪陵师范学校、涪陵卫生学校、涪陵农校等几个学校的红卫兵组织联合成立的“毛主席的红卫兵涪陵革命造反司令部”。主要成员是外出串联回来的学生，其观点是支持解放军，支持“红贸”，反对涪陵冲砸“红贸总部”的“211”事件。

当时，涪陵的学生红卫兵主要集中在以涪陵各个中专学校为主的“涪陵红卫造反总部”，简称“红卫总部”和以涪陵各个普通中学和小学为主的“涪陵红卫兵造反总部”，简称“红卫兵总部”。这两个组织都是带头反对赵树金，反对“红贸”的。他们组织了力量准备去成立大会上造反。为防止成立大会被这两个红卫兵组织冲击，涪陵军分区派出两个连队武装保护会场和会后的游行。面对全副武装的部队保护，小将们造反不成。但是，北京“三司”的红卫兵仍然在游行的过程中，以结对的方式阻挠游行队伍，结果被解放军战士当场抓走。

涪陵的红卫兵当场对部队抓走北京学生一事表示抗议，也被抓走，其中就有“涪陵红卫兵总部”的“红卫兵长征战斗团”负责人石少云和“红卫总部”的杨柏林等人，他们全都扭送到地委大礼堂里由解放军看管。

涪陵军分区原决定于1967年2月25日才开始大逮捕因此次事件而提前了，涪陵的“二月镇反”从1967年2月22日正式开始了。

2 月 23 日，头天晚上被抓走的“首都三司”的几个同学放出来了，但限制行动，并被告知：中央已经下令停止串连，因此必须尽快离开涪陵。

“首都三司联络站”、重庆“815”和成都“红成”的人员被撵走了。场面很有些滑稽：被赶走的学生们手挽着手，神情悲壮地喊着口号，从大街通过，前后是成百上千的“红贸派”学生和干部工人，几乎每人手里拿着一根下部开着很多小叉的竹棍，敲在地上啪啪作响，口里发出啊啊的吆喝声，这是当地赶猪的工具，俗名叫“响篙”。这当然是严重侮辱人格的举动。“红卫总部”和“红卫兵总部”的许多人看了非常悲愤，纷纷到江边送行。

时近黄昏，全副武装的军人，踏着整齐的步伐，喊着雄壮的口号，刺刀亮闪闪的，在涪陵大街上武装游行，十分威武，产生了强烈的震撼效果。

大街上人心惶惶，“要大量抓人”、“军分区要大戒严”的传言在二月的寒风中飘飞。“红贸总部”和刚成立的“毛主席的

红卫兵”及“红贸派”的支持者非常振奋的满街游行，高喊着：

“坚决拥护中国人民解放军镇压反革命！”

“反对解放军决没好下场！”

“首都三司滚出涪陵！”

“首都三司”四个字被画上红叉。

2 月 23 日晚上 21 时，涪陵城的第一次大戒严开始了，满街都是荷枪实弹的士兵，十步一岗，五步一哨，伴随着警车刺耳的警笛声，由满载着全副武装军人的卡车开道，军分区宣传车上的高音喇叭在宣读涪陵城戒严令。

3 个端着刺刀的解放军战士在一名拿着手枪的干部带领下冲进涪陵“红卫兵总部”办公室，当时，涪陵一中的罗成胜正在里面写材料。

拿手枪的干部首先严声的喝道：“你就是罗成胜吗？”

罗成胜答：“我是。”

那位干部又大声的说道：“罗成胜，现在我宣布，你被捕了！”接着，他又大声命令道：“背转过去！”

罗成胜转过身，两个战士迅速的将他的双手反扭过来，然后用粗粗的麻绳将他五花大绑的捆了起来，押出“红卫兵总部”。当晚的 23 时左右，罗成胜被押解到紧靠原涪陵军分区独立营 926 部队的涪陵专区监狱。

涪陵公安处的公安人员向他宣读了逮捕令，并要他摁了手印。接着开始搜身，解下他身上的皮带、鞋带，将搜出的东西和

皮带等登记打包并告知这些东西要在出监狱时才退还。

在完成这些例行的入狱手续后，监狱负责人开始训话："罗成胜，要放规矩点，要晓得这里是监牢，监牢跟外面是两重天。什么是监牢？懂不懂？监牢，监牢，关死霸王！是虎要跟我趴倒，是龙要跟我盘倒！"

然后，一声："进去！"

接着是一个监狱看守的吼声："走！"

与此同时，陆续不断还有人被五花大绑的押解进来。那个晚上不断有开关牢房的声音和大声的吼叫、看守人员的呵斥……

没过两天，涪陵军分区便以违反军委《八条》、公安《六条》，搞打砸抢的现行反革命行为为由，解散与"红贸派"不同观点的组织"涪陵政法公社""涪陵工人总部"等组织，宣布他们为"反革命组织"。

当时的涪陵军分区在涪陵城可以直接动用的兵力有一个独立营，也叫警卫营，部队代号为926部队。还有一个涪陵县中队，并可直接管辖各县武装部、各县县中队及所属各县以下的区、乡武装部。"二月镇反"开始后，涪陵军分区专门成立了各级"镇压反革命办公室"，简称"镇反办"。而各级"镇反办"又成立了若干专案组、审讯组等，里面的成员中除了军人以外，就是"红贸派"观点的人。

在整个"二月镇反"中，涪陵全地区抓进监狱的多达 4000 多人，仅涪陵县就抓了 1000 多人。在被抓进监狱的人中有共产

党员、机关干部、有工人、农民、城市居民、教师、学生，甚至有十二三岁的学生。至于被批被斗被迫检讨认错的人更是不计其数。

压力是巨大而急迫的，也是一般人无力也无法承受的。与“红贸派”对立的群众组织迅即偃旗息鼓，如鸟兽散，恐怖感很快弥漫开来，每天都有听说某某头目被抓的消息。

县城还搞了几次游街示众，部队全副武装，街头戒备森严，被抓的人五花大绑，头发都被剃光，头上雪亮。自此，涪陵“二月镇反”被捕的人有一个特有的称呼——“光头”。

这边偃旗息鼓，那边“贸派”，即“红贸派”，趾高气扬，他们兴高采烈在街上集队游行，高呼“拥护解放军，镇压反革命”，刷大字报历数“反革命分子”的罪行，协助抓人，对他们认为错误行为严重、尚不够被抓进监狱的人，则组织批斗会。那期间，市中心文化馆前面高大的平台上，各单位的“贸派”组织轮番将人带到那去批斗，争相表现。批斗者横眉冷对，被斗者垂头丧气。也有极少“顽固”表现的。

涪陵的“红卫总部”被宣布解散，学生回校接受军训。

## 第 519 回：二二二，万县市枪声大作　夜半渡，谢英富□离宜宾

四川的镇反影响到川蜀大地的每个角落。

奉成都军区命令，54 军 134 师 402 团进驻万县市，执行三支两军任务，暂归万县军分区领导。

2 月 7 日， 402 团二营两个步兵连作为该团第一梯队，由副政委杨国令率领，到达万县市。

2 月 8 日上午，万县军分区司令员李明召集万县“赤旗派”各组织的负责人座谈时上表示：“赤旗派”是革命组织，“东方红派”是保字号。他的讲话，使“赤旗派”大为振奋，并迅速用《特大号外》公之于众。可是事隔一夜，2 月 9 日，李明又说：“那只是我个人的看法和他们交换意见，不能代表分区党委，分区部队，故无效”。于是激起了“赤旗派”的不满，接连数日到军分区门口质问、抗议，一直闹到 13 日。

2 月 14 日，万余农民携带粮食到万县东方红广场集会，中午 12 时，因借用广播器材，与“赤旗派”在会场发生武斗，造成双方伤亡 28 人。

2 月 15 日，在落凼地区，两派又发生连续两天的大规模的武斗，“主力军”抓了 116 名农民和 10 名干部，捆绑至船上进行审问。虽然经过部队和“主力军”协商，把人放了回去。但是军分区因此认为“主力军”是“反革命组织”，“赤旗派”的几个学生组织是“反革命组织”的“帮凶”、“打手”。曾经担任过叶剑

英的生活秘书的万县军分区政治部主任马忠庆叫秘书易希凡执笔列出了“主力军”十大罪状，上报成都军区和中央军委叶剑英，其中最主要的两条罪状，一是“主力军”要发动反革命武装暴动；二是要将 116 名工人、贫下中农沉入长江屠杀。

2 月 17 日，中央军委直接给万县军分区下达了“坚决镇压反革命组织‘主力军’，解救 116 名工人、贫下中农”的命令。

晚上 19 时，134 师副师长李富元由大竹到万县，同 402 团政委刘金廷去军分区。一到分区，就让他们参加了作战会议，说 18 日 4 时出动四个排的兵力镇压“主力军”军部。李富元提出：

“万县到底谁是敌人，谁是朋友？应该支持谁，团结谁，打击谁？时机是否成熟？”

他最后表示：“因不了解情况，很难表示具体态度，既然分区已经决定，我们就执行，但要把这个情况向上级报告。”

当晚，万县军分区决定取消这次行动。

会后，李富元将情况向 134 师作了报告。他在电报中认为：“万县分区执行着一条错误的路线，使我们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战士看到这种情况十分痛心。建议上级立即采取有效措施，不使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夭折下去”，“分区的作法是方向性的错误，是一种犯罪行为。”对“主力军指挥机构的围歼推迟为好，搞得不好要犯大错误。”

万县军分区也把情况向成都军区作了报告。

2 月 18 日，成都军区给万县军分区和 54 军来电：“望告诉

七七九九部队，要他们在分区党委领导下，坚决执行保卫文化大革命的任务，坚决镇压反革命。我们认为万县反映的情况比较可靠，七七九九部队要相信分区党委，有意见以后商量解决，在这关键时刻要团结一致，要加强纪律性，共同对敌。”

19 日，成都军区又电示：“在这阶级斗争异常激烈的关键时刻，要统一思想认识，要严格组织纪律，要坚决服从命令听指挥”。

2 月 20 日 19 时，402 团一、三营四个步兵连，由团长孟亚夫率领，到达万县市。

21 日上午，万县军分区布置镇压“反革命组织”“主力军”的任务。

22 日 4 时，402 团七连（两个排）按照军分区命令，到达“主力军”军部驻地真原堂，开始执行围捕“主力军”军部的行动。

当时天色很黑，大门紧闭，他们便按预定方案，组织六名战士和一名公安人员，翻墙跳入院内，惊动了在院内站岗的“主力军”。当跳入院内的公安人员开门时，站岗的一个“主力军”手持木凳向战士冲来，一排战士王正华当即开枪，将其击伤倒地。在楼上的“主力军”闻声从窗口往院内扔凳子还击。

大门打开，七连进入院内，又见一人拿着绳子从屋内向部队走来，三排长胡抗民、战士王正华等三人一起射击，当即将那人打死。接着，该连向室内搜捕。战士刁复明看到正面楼下有一人正向室内后门逃跑，随即开枪将其击毙。战士王正华在楼梯上发现楼梯下有一人影活动，以为要打他，便又开枪，当即将其打死。

王正华到楼上后，因情况不明，误入与真原堂相通连的市委招待所的二楼，看到走廊里有一人快步走动，他喊“不要动”，但该人没有理睬，继续行走，王即开枪击中其右手腕。随即进入一室内，见一人从床上坐起来，王喊“革命的举起手来”，该人起立举手时，因裤子脱落，忙放下右手去提裤子，王误为他是取武器，便开枪将其腰部打伤。从翻墙跳入院内到此时为止，大约只有三、四分钟的时间，即打死打伤 6 人。

在此期间，该连在真原堂巷口担任戒严的四名哨兵，见一辆消防车从右方大街上驶来，不知道是担任鸣笛宣布戒严的，误以为是“主力军”逃跑，故多次招手呼喊阻拦，令其停车。车不停，他们便用两挺机枪同时对车射击，打死打伤各 2 人。

天明时，群众陆续向真原堂巷内涌来。至 9 时左右，真原堂门前巷内，已挤得水泄不通。巷内的警戒被冲散，三排长胡抗民和战士潘光全、周崇文、郭俊利被群众抓走，广播筒被抢去砸烂，还有的人军帽、领章被抓走。在群众冲入真原堂院内的时，巷内群众也向真原堂院外侧翼警戒进行围攻，并有一人拿着铁锤向战士胡定科扑来，一手用铁锤要打，一手夺胡定科的枪。在这种情况下，胡定科又看到群众已冲入院内，便后退数步向人群开枪，连续发射 10 发子弹，打死 2 人，打伤 10 人。这时在真原堂院内的军分区组织科董科长、402 团三营营部医助和几名战士，也都向天鸣枪。由于院内外同时开枪，群众便争相后退，在拥挤中又踩死挤死 20 人，但在现场只看到一具尸体，其余尸体都被群众

抬走。

七连在执行这一任务中，共计伤亡群众 42 人，其中打死 7 人，打伤 15 人，踩死挤死 20 人。

从 2 月 23 日开始，以万县“红联站”下属的地市公安机关组织成员为主，以“红色工人兵团”各单位头头和骨干为辅，开始了全城大逮捕！万县市看守所人满为患，他们又将荒废的国民党“老法院”、北山路小学等处开辟为临时监狱，关押了数千人！

从 2 月 23 日开始，万县开始了全城大逮捕！“主力军”总部委员 18 人，只有牟维才一人逃出万县市。万县市看守所人满为患，又将已经荒废的国民党“老法院”、北山路小学等处开辟为临时监狱，关押了数千人。

2 月 18 日，正当四川宜宾的文革运动进入高潮之际，突然宜宾城内传言四起：什么“飞机要来宜宾撒传单”了，“‘方面军’要被宣布为反革命组织了”，“军队和公安机关要联合出动抓造反派的人了”等等。

飞机撒传单，这在宜宾只有抗日战争时期才有过。一时间，整个宜宾城笼罩在极度紧张和恐怖之中。

早在 1966 年 11 月，成都“八二六战斗团”到宜宾串联，在东街银行门口贴出大字报，限宜宾机关事业单位在几小时内要挂出毛主席像和张贴《毛主席语录》，并贴出“炮轰西南局，火烧省地市委”的标语。与之相呼应，宜宾也有人挂出“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标语，贴出“地市委执行了资产阶级的反动路线”、

“刘结挺、张西挺是受李井泉打击迫害的好干部”的大字报。

1966年底，宜宾的工、农、商、学、干的群众自发联合成立了宜宾“方面军”，他们和宜宾学生“主义兵”的口号一致：“炮轰西南局，火烧省、地、县委！”

到了1967年初，宜宾也形成了两大派群众组织。一派是要“炮轰西南局，火烧地市委”的造反派“红旗宜宾方面军”，简称“红旗派”；另一派则是被称为“保皇派”的“宜宾红色总指挥部”，简称“红色派”。

此时，宜宾“方面军”，即“红旗派”的群众听说他们是反革命组织，当然不甘心，也不服气：

“我们响应党中央、毛主席的号召起来造反会成反革命？”

“党仍然是共产党，怎么会出尔反尔了呢？这岂不是在愚弄人民么？”

“发动文化大革命是中央政治局作的决定，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一致通过了的，能说是老百姓在反对革命，反对共产党吗？”

许多人怀疑，这会不会又是走资派的阴谋？一时间，这成了街头巷尾人们争论最激烈的一个话题。

那些参加了群众组织的人们也被搞懵了，像热锅上的蚂蚁，乱哄哄的谋求对策。“方面军”的几个头头赶紧凑到一起研究，决定由宜宾的码头搬运工人、“八八团”头头之一的谢英富连夜渡过白沙湾，到799厂找“方面军”的“井冈山”兵团，请他们进城声援。当时宜宾的长短航运基本上都是“八八团”的人，因

此，调用轮船渡江是不成问题的。

2月19日子夜1时许，一艘轮渡船将谢英富送到白沙湾码头，他到799厂“井冈山”总部，找到了“井冈山兵团”的头头王景海、刘平测、陈元中等人。

王景海说：“情况我们早就知道了，现在军警还没动手，不要自己先乱了阵脚，若真开始抓人了，我们一定会组织进城声援的。”

有了“井冈山”的承诺，谢英富心里踏实了一些。天亮后，他回到宜宾城里，这时宜宾的气氛更加紧张了，特别是民主路人民电影院一带，人头攒动，混乱不堪。谢英富好不容易找到“八八团”的头头刘友源等人，他们几人就站在街边上研究该怎么办？

谢英富说：“既然文化大革命是党中央发动的，我建议刘友源带上傅文琪到北京找党中央和毛主席问个明白。”

傅文琪是宜宾市木运社工人、“八八”团负责宣传的笔杆子之一。

刘友源则坚持要谢英富带上傅文琪去北京，而且还得赶紧动身，晚了怕宜宾都出不去了，就算能走出宜宾，路上也会有哨卡拦截。

时间紧迫，不容他们过于争执。最终谢英富作了些简要的安排就同傅文琪渡江到了上纸厂。通过纸厂造反派头头江国辉、廖光明、王季英等人的帮助，乘上纸厂的吉普车，赶赴成都。

他们的车刚到自贡地界就被扣了。当他们被带到自贡市供电局后，方知是大水冲了龙王庙。原来扣他们的人是自贡市邮电局“红色电工兵团”的人。因为自贡市也听到了宜宾传去的抓人消息，于是设卡，防止宜宾的抓人风潮波及到自贡。当他们知道谢英富是上京告状的，立即安排二人登上了进京的列车，离开了四川。

谢英富二人怀着极度的伤感，在火车上摇晃了两天两夜，终于踏进了全国人民敬仰和向往的首都——北京。

凄凄的北风、纷飞的雪花，再加上扑面的灰尘，使这两位南方来的客人更增添了份心酸。尽管离开家乡才3日，可那里现在是个什么样的局面？几十万“战友”能否平安？他们的心情万分沉重。一下火车，没有找地方落脚，他们就一路打听，直奔“中央文革接待站”。

“中央文革接待站”人山人海，许多人都在谈论着“二月镇反”的话题。全国突然之间产生出了数以千万计的“反革命”，无怪乎会有那么多的人上京告状。

谢英富他们找到了西南片区接待室。当他们向接待员汇报完宜宾的情况后，并提出“镇反是不是中央的决定？”“我们参与了文化大革命算不算是反革命？”等问题后，接待员很圆滑地答说：

“你们反映的情况我们会如实地向中央首长汇报，是不是反革命你们自己最清楚。毛主席教导我们：要相信群众，相信党嘛。

今天就谈到这里，有什么遗漏的你们最好写成材料给我们送来，我们才好及时上报。”

出了文革接待站，谢英富的心情依然十分沉重。北京的夜晚比白天冷得多，寒风刺骨，冻得他们二人直打哆嗦。幸亏自贡市邮电局“红色电工兵团”的人想得周到，给他们开了证明，他们找到了水电部接待站住了下来。一床芦席，一张粗线毯，水泥地板为床，算是有了安身之地。好在大屋子里有暖气，不觉得冷。只是一、二十人挤在一间屋子里，又不通气，有股很难闻的气味。由于是免费住宿，再难闻的气味也只好克服了。他们几乎天天都是在地铺上不停地写材料。

一天，谢英富二人从“中央文革接待站”出来，在天安门观礼台下碰到宜宾的一群学生和几个宜宾水电安装队的工人，他们介绍说，宜宾现在抓人抓得很凶，不仅是头头被抓，就是一般群众被认为是“造”得凶的人都被抓，到处都关不下了，就连军分区里都关起了人。自从谢英富他们进京后，“八八”总团部、分团部甚至支队部统统都被砸了，所以音讯不通。谢英富听后心情更加沉重，他们一群人席地而坐，谈论宜宾的问题。其中有学生说宜宾造反派就是因为介入了原宜宾地委“刘结挺、张西挺”的问题，才会被打成“反革命”的。学生中还有人提出干脆找一些在京的宜宾人，将刘结挺、张西挺他们抓回宜宾交差，问题就可以解决了。

谢英富不同意，他说：“这种想法太幼稚了。现在的问题不

是宜宾一个地方在抓所谓的反革命，而是全国范围都在统一行动，难道刘、张他们能牵涉影响到全国的文化大革命？这不是明摆着的事实。我看其中定有很深的奥妙，不要把问题想得太天真了。”

大家认为他说的有道理。人群散后，宜宾一中的学生问谢英富想不想见一下刘结挺、张西挺？谢英富认为应该见一下，于是就随着几个中学生来到刘结挺、张西挺住的地方。

1966年10月17日、20日，王力接见了刘结挺夫妇后，给江青写了报告，建议党中央成立一个调查组调查此事。12月30日，江青在刘结挺、张西挺的材料上批示：“除张西挺留在北京继续写揭发李井泉的材料外，其余的人支持他们回去闹革命。”当天，王力又单独接见刘结挺、张西挺等人及和他们一起前来的“北航红旗红一连”的尹聚平、刘太来等人。

王茂聚问王力，能否查一下他们的案子是谁批的？

王力当即答道：“不用查，一定是那些坏家伙搞的。就是好人批的，也是根据那些坏家伙的假材料批的，也要翻案。”

王力说：“你们的案子是一个大案子，李井泉就是这一条就够了。”

“你们是被资产阶级当权派整的，不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翻案，就是要翻案嘛！”

他对北航“红旗红一连”的尹聚平、刘太来说：“你们调几个

人帮助一下，专搞这个案子，好不好？”

王力将江青的批示转告刘结挺、张西挺等人，对他们说：“四川情况很好，革命造反派起来了，你们可以回去了，住在工人和学生中间，和工人、学生一起闹革命。”

当晚，王力给江青写报告，汇报了接见刘结挺等人的情况。

12 月 31 日，王力又向江青报告：刘结挺、张西挺的案子是邓小平批的。

1967 年 1 月 1 日，江青将王力关于刘结挺、张西挺的报告批示给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此事应议一下。”并要陈伯达与她一起去林彪处讨论“刘、张”问题。

此时，成都“红成”已帮助宜宾的原地委组织部长郭林川在宜宾成立了“反修战斗团”，为刘结挺、张西挺他们翻案。

1 月 4 日，刘结挺、王茂聚、张西挺联名给李良和宜宾的“反修战斗团”全体成员写了一封长信，一开始就写到：“五年的斗争，王力同志 12 月 30 日和我们的讲话，已经作了肯定，真理在我们手里。”信里要求“组织左派队伍”，“集中优势兵力一举全歼‘黑材料组’，夺取‘黑材料’。”

1 月，刘结挺、王茂聚回到四川，张西挺继续留在北京。

刘结挺、王茂聚没有立即回宜宾，而是留在了成都，参与了炮轰成都军区的行动，并亲自写出“炮轰成都军区”的大字报贴在成都军区门口。

四川“二月镇反”开始后，刘结挺、王茂聚他们又写出“坚

决支持‘217’信件” 的大标语，贴在西南局门口，并去见甘渭汉，还动员“红成”和“地总”等成都的群众组织支持“217 信件”。这时，原宜宾地区江安县委书记郭一民主动提出回宜宾，做那里造反派的工作，支持“217 信件”。没想到他刚到宜宾就看到抓人，到处都喊要抓“反修战团”和“方面军”的后台“王、张、郭”。郭一民哪敢再留，马上跑回成都，对刘结挺、王茂聚说：“看样子靠甘政委没有希望了，我们要赶快离开成都，不然就有被抓的危险。”。

刘结挺、王茂聚再次跑回北京，不断的向中央文革小组送材料，反映宜宾的情况，还在中央文革接待站门前贴出《十二万紧急呼吁书》，说：“宜宾正在杀人……西南局第一书记李井泉要将我们抓回去，活祭原宜宾专员、右派分子李鹏”。四川派人一直追到北京抓他们，多亏北航“红旗”的保护，才没有被抓到。

谢英富他们在商业部招待所一个简单的屋子里见到了刘结挺、张西挺俩夫妇及宜宾地区的一些干部。宜宾一中的学生向他们介绍谢英富说：

“他们俩是宜宾‘八八团’勤务组的，‘八八团’是宜宾地区最大最早的工人造反组织，‘方面军’的发起者之一。他俩也是来北京告状的，顺便来看看你们，了解一下你们对当前时局的看法，特别是‘镇反’问题。”

刘结挺、张西挺他们听后亲切地和谢英富二人握手并作了自我介绍。

张西挺问起宜宾当前的情况，谢英富将宜宾文化大革命的概况作了介绍，同时谈了宜宾造反派很重视刘结挺、张西挺他们那个案件。这时，宜宾地委组织部干部丁祖涵说：

“刘、张的问题中央都知道了，也很关心，‘镇反’是个全国性的问题，相信党中央很快会解决这个问题的。现在需要的是如实向党中央汇报地方的情况，最好是书面报告。现在更需要在宜宾的同志们坚持斗争，用行动证明宜宾造反派是拥护党中央、拥护毛主席的，不是什么反革命。”

宜宾地委办公室副主任田禾也说：“党中央、毛主席对我们的态度是比较鲜明的，你们可能还不知道吧，宜宾派到北京来抓刘、张的公安潘光西、温国良、赵瑞同3人，都被北京市公安局奉中央之命抓起来了，刘、张也见过了他们3人，是中央文革安排见面的，你们可想而知宜宾问题之复杂、尖锐了。”

从刘结挺、张西挺那里出来，谢英富觉得他们应该尽快返回宜宾，告诉宜宾北京的这些情况。于是于2月底，他们离开北京返回宜宾，在壁山县给家里打了电话，才知道宜宾的情势仍然很乱，还在继续抓人，自发的群众组织几乎全被砸烂了。

谢英富刚从宜宾火车站出口处出站，就被对立派“宜红总”政法系统的组织“政治兵团”的一个头头王明截住了。他叫另一个公安干部将谢英富押送到宜宾市公安局，“军管会”主任裴家福亲自审讯后，就将他关在公安局楼上的屋子里。一间小小的屋子，大约10平方米左右，关了有10来个人，几间屋子都关得满满

的，可外面还在继续抓人。公安局楼上实在关不下了，就将公安局对面的一个幼儿园征用过来关人，就连军分区里也关了很多人。

宜宾地委 1966 年得知刘结挺、张西挺在北京上访时，就曾研究成立一个追捕组上北京抓捕“刘、张”二人回来，因种种原因没有实施。直到 1967 年四川“二月镇反”开始后，宜宾军分区才决定从军分区、地委、公安处抽调人员组成“追捕组”，到成都刘结挺、张西挺暂住的地质局和地质学院捕人，但发现刘结挺、张西挺等人已离开成都又去了北京。“追捕组”在成都只抓获了“红旗派”的几个骨干押回宜宾。

## 第 520 回：渝□反，川大“八二六”□会 接尚奎，桂“工总”开□整□

2 月 19 日，重庆“革联会”与驻军部队一起，在长江边珊瑚坝召开 60 万人大会，斗争从上海押解回来的李井泉和重庆市委书记鲁大东等“走资派”。会后由驻军开路举行示威游行，李井泉等被挂上黑牌武装押送游街示众。

与此同时，反“革联”派在重庆市体育场召开“反右倾”大会，拥护“革联会”一派的四川外语学院“826 战斗团”、六中“32111 战斗团”、二十九中“毛泽东主义战斗团”等冲击会场造反，两派发生武斗冲突。会后，反“革联”派举行示威游行，再次与“革联会”派发生冲突，多人受伤。

2 月 20 日，“首都三司驻渝联络总站”遭到“革联会”一派

抄砸，“三司”人员上街游行抗议。

这天，“革联会”一派的北碚公安分局“压不倒造反队”召开大会，宣布“工人造反军六号门纵队”为反动组织，予以取缔，当场逮捕 7 人，勒令登记自首 58 人。会后将拘捕人员五花大绑车载经北碚区、沙坪坝区、市中区游街示众。

在重庆江津军分区支左领导小组主持下，由永川专区公安处的群众组织出面，从这天开始了重庆的“镇反运动”，先后共逮捕 237 人，刑事拘留 746 人。

重庆“革联会”经 54 军同意，于 2 月 21 日在重庆市开始大规模镇压反对派行动。这天，“革联会专政委员会”与重庆市公检法联合发出《通令》，宣布“工人造反军（临江门街道）前哨支队”为反动组织，予以取缔，拘捕 13 人，勒令其余 80 余人到派出所登记自首。反对重庆“革联会”的全市性组织“联络站”被“八一五”派砸抄。

2 月 22 日上午，“革联会专政委员会”和市公安局在解放碑召开批斗处理“工人造反军前哨支队大会”，会后将被捕者田树堂、许洪烈等人五花大绑、戴手铐、挂黑牌游街示众 3 天。此外，该组织还被判处管制 2 人，劳教 1 人，勒令登记自首 72 人。

同日，重庆大学“八一五”及沙坪坝大专院校、中学生及工人，出动宣传车及卡车 20 多辆，满载人员搞“会战西师”的行动，到北碚区抄砸西南师范学院“八三一战斗纵队”。西师“八三一”人仰马翻，“八三一战斗纵队”被迫宣布“开门整风”。

那段时间，大街到处贴着标语：

“坚决镇压造反军，对他们不施仁政！”

“绞死黄廉！”落款“革联会”；

“对造反军必须斩尽杀绝！”落款“政法学院八一五”；

“坚决砸烂廉罗栈！（联络站）”

“廉罗栈，留下你们的遗书吧！”落款“重大八一五”；

“廉罗栈反军绝无好下场！”

“反对革联会就是反对解放军！”

“反对革联会绝无好下场！”

“中国人民解放军将用刺刀挑起革联会！”落款 54 军。

师专附中“八一五”等组织也在这天，以“一贯反对革命的八一五派”、“大反市革联会”等罪名，将重庆大学“红岩公社”头头徐光明扭送沙坪坝区公安分局关押。

徐光明就是重大“617 事件”中写大字报说郑思群是黑老头、重大“618 事件”中反工作组很活跃那位无线电系 68 届学生。

“815 事件”后，徐光明首先发表声明：“815”是革命行动！但他批判“八一五”头头右倾，不愿与“八一五”头头同流合污。

几乎在“赤卫军”、重大“八一五”成立的同时，徐光明也成立了群众造反组织“红岩公社”，自任公社社长。“红岩公社”人数不多，有几十个人，但这几十个人的活动能力惊人，人人能独立造反。他们认为：“八一五”是一窝蜂形成的，很长一段时间都有群哄成分。“赤卫军”是跟着“文革筹”的一帮人形成的。

只有“红岩公社”是正而八经造反的，他们的纲领和口号是：打倒“赤卫军”，支持“八一五”的革命行动，反对“八一五”头头的右倾机会主义。他们认为“八一五”要求市委承认他们“是革命行动”就是右倾。

“八一五”反过来戏弄“红岩公社”社长徐光明先生，说他是戴季陶，“举起右手打到‘赤卫军’，举起左手打到‘八一五’。”有趣的是，西南师范“八三一的《红岩战报》也曾批判过徐光明是戴季陶。徐光明的造反思想超前，思想独特。“八一五”说他“极左”，连黄廉都说他“极左”，可见他观点之激进。文化大革命运动方向有些确实被他预见到了。最先一本正经反工作组的是他，而不是“八一五；最先一本正经反省市委的也是他，也不是“八一五”;“815 事件”刚过，重大“八一五战斗团”还没成立，他就开始反“八一五”头头右倾。

解放军 242 部队，即后勤工程学院“红色造反者总团”2 月 22 日上街举行反“革联会”示威游行。

2 月 21 日，就在江海云率四川大学“8.26 战斗团”请罪这天，四川大学“8.26 战斗团”团长游寿星，穿一件不被人注意的深色衣服，鬼魂似地突然出现在中文系学生王恳寝室。他让王恳把寝室的同学请出去，说有要事相商。

陪同游寿星来的还有一个人，叫刘开文，川大中文系 62 级的学生。此人外号“刘跑四”，因为刘开文的女朋友住在川大四宿舍，刘开文往那里跑之甚勤，打开水、送饭送菜、汇报工作，

故得此雅号。

关上房门，游寿星十分严肃地对王恳说："文革形势急转直下，黑云压城。但前途是光明的。党中央、毛主席会来救四川。当前关键是要坚持斗争。8.26 一线勤务组不能公开活动了，要立即组织'二线勤务组'站出来斗争。"游寿星要王恳多负一点责。

王恳问"二线勤务组"还有哪些人，游寿星说是单线联络，不要彼此知道，避免一网打尽，刘安聪也在组织二线勤务组。

游寿星还交代说，要立即起草一个《紧急动员令》，表明"8.26"的态度。他要王恳起草，王恳让刘开文拿出纸笔作记录，口述了一个《紧急动员令》：

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亲自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雷霆万钧之势，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席卷全国，矛头直指党内走资派，包括军内走资派。反动派人还在，心不死，必作垂死挣扎。坚定的 8.26 派战士，以大无畏的无产阶级战斗精神，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誓死保卫林副主席，誓死保卫文化大革命。

8.26 战士，紧急行动起来！

誓与成都军区血战到底！

《紧急动员令》立即以大字报形式张贴出去，不久即被撕掉。撕了又贴，贴了又撕。

随后，王恳送游寿星逃亡北京。临别时，王恳对游寿星说：

“到北京，务必去林副统帅处看一看，‘2.17 信件’，毛主席、林副主席知道吗？”

王恳没跑，临危受命，责无旁贷。从 2 月 21 日到 2 月 26 日，他整天亢奋，革命热情奇高，不知疲劳，不怕危险，到处鼓动，到处串联，积极准备 2 月 26 日召开“8.26 成立半周年纪念大会”，这是一次向成都军区、向“二月镇反派”挑战的大会，是一次大胆而公开的负隅顽抗！

2 月 26 日，天阴阴的，雨未来而风至，雪未下而寒冷，黑云压城。“8.26”上千人，突然在川大礼堂集会。热情洋溢，歌声嘹亮。有人发表演说：“青松不老，8.26 不倒，誓与成都军区血战到底！”

对立面贴出了大字报：

《负隅顽抗，死路一条！》

困兽犹斗…“8.26” 中一小撮反坏分子，在垂死中拼命挣扎，拒不缴械投降。最近几天来，他们到处狂吠。值得注意的是，昨日之内，全校到处贴有纪念 8.26 半周年的大字报，叫喊“8.26 精神万岁！”要“发扬 8.26 精神”，等等。“8.26” 究竟是什么？8 月 26 日是人民公敌蒋介石的生日，这些反动分子以“8.26” 作为战斗团的名称，并且一而再，再而三地纪念“8.26” 两周月，半周年，疯狂地叫喊：“8.26 精神万岁！”可见少数反坏分子对蒋匪帮的无限怀念，为其招魂，复辟反革命的狼子野心。不仅如此，这批混蛋还恬不知耻地自称什么“铁杆

8.26”“ 钢杆8.26”“ 比钢杆还硬的8.26”“ 金刚石8.26”…气焰嚣张，反骨毕露，真是一群货真价实的反革命死硬派。……

无产阶级革命造反军川大纵队

《顶逆流》2月26日

工学院“红成”冲击会场，砸门敲窗。大门攻破了，“8.26”学生一哄而散，找不到谁是责任人。

王恳从主席台后门溜出来，跑回宿舍，推上一辆自行车，这才觉得肚子饿极了，这才想起来，今天既未吃早饭，又未吃午饭。时间已过下午15时，他骑车到九眼桥，想买两碗面吃。

刚下车，突然窜出两个人。一个人拍了他一下，友好地问：“你就是王恳？”

王恳答曰：“是呀。”

另一个人立即夺过他的自行车，同时又上来两人，一左一右，挟持着王恳。

这时，一辆面包车突然在他们身边停下，车门立即打开，王恳被推上了车后，面包车即疾驰而去。

王恳问：“为什么抓我，你们是哪个单位的？”

一个人答：“到了你就知道了。”

约过了半小时，车停了。天黑呼呼的，王恳被推进一间小房，几个人守着他。来了一个干部似的人，问了他的姓名年龄，核对了照片，宣布对他拘留，要他签字。

王恳拒绝签字，那个干部合上文件夹，说了一句“签不签都

一样”，走了。

王恳不相信自己是“反革命”，他想：“只要北京没有‘2.17信件’，四川的‘2.17信件’就坚持不了多久。游寿星、叶上威，这些在北京的‘826’战友，你们好吗？蒯大富、韩爱晶、谭厚兰、聂元梓……你们好吗？我们是一根藤上的瓜啊，他们若不是‘反革命’，凭什么说王恳是反革命呢？”

2 月 18 日，周恩来让秘书打电话给江西省有关方面，要求在 2 月 19 日将省委书记杨尚奎、书记处书记刘俊秀送到北京，届时，中央派飞机到南昌去接。

江西有关方面给造反派传达周恩来的指示后，造反派不愿意放人，打电话到总理值班室讨价还价：“我们 19 日准备在八一广场召开批斗走资派刘俊秀的大会，杨尚奎也要参加。我们要求推迟几天送他们来北京。”

总理值班室的回答没有商量的余地：“立即按时送到，不得推迟。”

2 月 19 日，中共江西省委书记杨尚奎和书记处书记刘俊秀在两名造反派“护送”下，乘飞机来到北京。

广西一月夺权后，中央没有表示。

2 月 2 日，借调到中央文革记者站工作的旅大警备区政治部保卫干事王荔，作为中央文革记者站记者从武汉来到南宁，当晚，韦国清就接见了他。

2 月 3 日，广西“赤卫队”和“盾牌”红卫兵联合在朝阳广

场召开大会，自称有 3 万人，宣布成立“广西无产阶级红色造反者联合司令部”，简称“红联”，并发表联合宣言。

2 月 4 日，中央文革记者站记者到“首都三司驻邕联络站”和自治区党委宣传部群众组织“翻江倒海”了解夺权情况后，对“三司驻邕联络站”负责人和“翻江倒海”头头秦朝泰、刘德胜、农烈、游建安等人说：“广西一月夺权没有成功，关键是没有结合领导干部，还需要组织第二次夺权。青岛市王效禹站出来，与群众一起夺权，中央很快就承认。”

之后，秦朝泰、刘德胜、农烈、游建安等 12 人组织了一个“尖刀班”，以串连领导干部起来造反，进行三结合为主要任务。

从 2 月 4 日至 8 日，“首都三司驻邕联络站”则散发《南宁文化大革命到了关键时刻》的传单，指责“广西工总”“不坚持文斗搞武斗”，“高度运动群众”，“总部头头高高在上”，认为“造反大军”不理解“夺权意义”，“夺权不掌权”等等，引起各群众组织的强烈反响。

2 月 5 日，韦国清在区党委院内第三次贴出大字报：《揭发王任重的几个问题》。

7 日，“广西工总”领导小组召开第一次会议，决定开门整风，并制定出整风方案。提出：1、开门整风；2、撤出在区、市机关的进驻小组；3、要求军区接管区党委、人委、公安厅；4、要区党委书记安平生出来抓生产。

2 月 8 日，王荔听取秦朝泰等人组织“尖刀班”等活动情况

汇报后，一方面对他们一系列的做法加以肯定，同时指出：“贺希明在区党委书记中的大字报较少，段远钟看问题较客观，头脑不那么顽固，谢王岗有造反精神、态度坚决，霍泛写了不少揭发区党委的大字报”。要他们做好这几个人的工作。

## 第 521 回：做工作，广西《二一九声明》 抓春耕，“新北大公社”成立

2 月 8 日晚上，广西“红卫兵总部”与“首都三司驻邕联络站”在市工人文化宫召开辩论会。会上，“三司”代表重申《南宁文化大革命到了关键时刻》一文的观点，广西“红总”代表曾春生则认为，“三司”在对待广西南宁文革的看法上犯了严重错误……

与此同时，南宁市各群众组织纷纷用大字报、传单讨论 2 月 1 日出现的关于“广西工总”搞打、砸、抢、抄、抓的大字报和传单，讨论“造反大军”的问题，并出现“砸烂工总”、“造反大军必须大乱”等大幅标语。部分大标语、大字报、传单则是反对首都“三司”的观点，指责“三司”搞“折中主义”。围绕“砸烂”与“不砸烂”“工总”问题，开始了群众组织间观点不同的派别争论。

2 月 9 日，王荔又与自治区党委宣传部“翻江倒海”组织的秦朝泰一起到自治区党委书记处书记贺希明家，动员他站出来和群众一起造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反，揭发区党委的问题，支持真正革命造反派。王荔说：“骑墙是不行的，中间道路是没有的。”

贺希明说自己任过伪职，能力差，资历浅，在几个书记中是最“矮”的一个，当个助手可以，领头不行。并向王荔详细地讲了自己的历史。王荔则说：“历史上的问题，组织已做了结论，

群众会理解的，你站出来领个头。”

2 月 10 日晚，“尖刀班”的秦朝泰等 4 人再次到贺希明家劝说。贺希明谈了自己对“文革”的看法，还向秦朝泰他们透露了区党委在研究处理文革初期桂林问题的分歧，说区党委在研究这一问题时，伍晋南提了不同意见，韦国清便对伍晋南说：“我还是第一书记嘛!不当书记了也不轮到你!”把伍晋南压下去。

贺希明还就韦国清、乔晓光是否可以打倒表了态。说：“乔晓光的三反言行很多，是可以打倒的。韦国清有不少错误，是否打倒拿不准。”

之后，“桂林老多”、“倒海翻江”的头头、骨干又多次做贺希明的工作，广西区党委宣传部副部长谢王岗也两次到贺希明家，动员他站出来和他们一起造韦国清、乔晓光的反。与此同时，秦朝泰等人也串连了伍晋南、李殷丹，段远钟等自治区领导干部。

2 月 11 日，广西“造反大军”负责人走访广西军区领导，宣布该组织进驻区直机关所属单位的代表全部撤出。

2 月 12 日，广西“无联”召开大会，批判区、市领导，勒令韦国清、乔晓光、肖寒、韦纯束到场接受批判。当天，韦国清等自治区党委主要负责人在乔晓光家里开会，讨论“亮相”批次，韦国清、乔晓光最后确定由贺希明牵头发表“亮相声明”。这个“声明”签字时，领导干部们争先恐后，唯恐落下。

2 月 14 日，为了加紧做领导干部的工作，经自治区党委机关“翻江倒海”的秦朝泰等人和桂林“老多”张欣烈商议，决定

把原来专做领导干部工作的“尖刀班”扩大为“尖刀队”，并推举张欣烈为负责人。

这天上午，广西军区召集军区机关处以上干部和全体“支左”人员开会，分析了南宁文化大革命的形势，肯定广西“造反大军”夺权后犯了方向、路线错误。下午，广西军区负责人在广西医学院召集“广西红总”、“南宁八三一”、医学院“造反兵团”、“首都三司驻邕联络站”4 个组织的负责人开会，向他们表示，广西军区承认这 4 个组织是“革命左派”，支持他们的革命行动。

第二天，广西军区负责人在支左办公室各组组长和部分干部会上继续明确指出：“‘造反大军’首先响应毛主席的号召，进行夺权斗争，大方向是正确的，军区做了原则上的支持，也是对的。但夺权准备不足，夺权后犯了方向、路线错误。”

16 日晚上，“广西红总”、“南宁八三一”、“医学院造反兵团”、“首都三司驻邕联络站”的主要负责人在医学院开会，着重交换对“造反大军”的看法，研究如何帮助“工总”整风问题。

2 月 16 日，中央文革记者王荔再次到贺希明家开展劝说工作。贺希明表示：“我也想造反，最近同谢王岗、段远钟等人接触，要揭发韦、乔，支持造反派。”

王荔也赞誉贺希明在区党委群众接待站召开的揭批韦、乔群众大会上的发言为“革命行动。”

在王荔、秦朝泰等人一再动员下，贺希明下了造反决心，亲自动手起草造反声明，在写了一半之后，他找自治区工交政治部

主任段远钟商量。段远钟同意他的观点，并由段远钟续写完声明草稿。

2 月 17 日下午，“桂林老多”的张欣烈和自治区党委机关“倒海翻江”的头头们在区党委宣传部二楼的小会议室召开领导干部座谈会。到会的有贺希明、李殷丹、段远钟，尚特、谢王岗、高信、孙立海、黄季权、段纯和、阎光彩、刘泮江、管世新 12 人，王荔也派文革记者站记者邹宗定参加。主持会议的张欣烈说：“据我们了解，大家想站出来支持造反派，今天请大家来就形势交换意见。”然后由贺希明主持，到会 12 名领导干部逐个发言，均表示要站出来支持“造反派”。贺希明提出：“是不是要发表一个声明?”对此大家一致同意。于是，贺希明即把写好的声明稿在会上宣讲。晚上继续开会，讨论声明内容，着重讨论关于砸烂区党委，打倒韦国清和表态支持的群众组织名单两个问题。阎光彩、段纯和、刘泮江等人认为说韦国清是“三反分子”还不充分，对“打倒”表示犹豫。谢王岗、段远钟、高信、尚持等认为说韦国清是三反分子的理由虽不充分，但可以提打倒韦国清。最后统一于“不够三反分子也够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顽固分子”，都同意“打倒”的提法……

2 月 18 日晚饭后，除尚特外，其余 11 名领导干部在覃应机的秘书韦英生办公室再次碰头。首先谢王岗转达“尖刀队”的意见。

管世新对“声明”中提出“砸烂区党委，打倒韦国清”的口

号有不同看法。谢王岗等人说："是口号嘛!有什么问题!"还有人说："砸烂也就是一分为二的意思嘛!"

于是不再讨论就基本定了下来。只是多数人对声明中罗列的表态支持的群众组织名单表示还要考虑，特别对"工总"认为更要慎重。对签名站出来造反的领导干部中，大家觉得没有农业口的干部是个很大缺陷。贺希明又提出要找一个壮族领导干部参加，最后确定吴洪宁，并派管世新去串连。还派段远钟、刘泮江深夜带声明稿到广西军区招待所给王荔看，问他："我们搞一个声明，你看行不行?韦、乔能不能打倒?支持这几个群众造反组织有没有把握?"

王荔看后，说没有什么意见，但让把稿子留下，再找"三司"驻邕联络站负责人一起研究。

之后王荔通知贺希明等人在刘泮江家碰头。到场的有贺希明、段远钟、刘泮江、谢王岗、黄季权、段纯和、阎光彩等。此外，还有南下串连队两个负责人。王荔对《声明》表示赞赏，支持这一革命行动，对支持"工总"建议改为"希望'工总'通过整风，成为一支更加坚强的无产阶级革命队伍"。大家采纳了王荔的意见，并肯定了"砸烂区党委，打倒韦国清"的口号。

2 月 19 日，由贺希明的秘书郑博然把《声明》抄成大字报。在韦英生办公室由：

区党委书记处书记、自治区副主席贺希明，

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副主席李殷丹，

区党委常委、区工交政治部主任段远钟，

区党委委员、区人民政府副秘书长阎光彩，

区党委委员、区财贸政治部主任段纯和，

区党委候补委员、宣传部副部长谢王岗，

区党委候补委员、公安厅厅长管世新，

区工交政治部副主任刘泮江，

区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吴洪宁，

区党委办公厅副主任孙立海，

区党委办公厅主任黄季权，

区党委宣传部秘书长高信等 12 人一一签名，并张贴于区党委大院。这份声明，后称《二一九声明》。

20 日，广西《新闻报道》第三版发表评论员文章：《坚决支持革命的领导干部起来造反》，对《二一九声明》表示支持。

2 月 21 日，广西自治区区党委机关内的“倒海翻江”组织在区党委宣传部二楼小会议室召集发表《二一九声明》的 12 名领导干部开会，研究成立自治区抓革命促生产领导班子问题，强调要由造反派掌权，以造反派为主，吸收领导干部参加抓革命促生产领导班子。

2 月 22 日凌晨 4 点多钟，广西“无联”出动 50 多部汽车和数千人，抄了“工总”总部和“财贸分部”，抢走“工总”大旗和招牌，打伤“工总”总指挥陈朝春，抓走熊一军等 9 名“工总”头目。

天亮以后，熊一军被“造反大军”抢回，其余人员也都放回。但“无联”此举，引起社会舆论反对。当天“工总”在朝阳广场召开大会，控诉“无联”抄家、打人、非法抓人。熊一军主持大会。“广西红总”、“南宁八三一”、“医学院造反兵团”、“首都三司驻邕联络站”四大组织的头头也参加了大会，但是由于他们不同意熊一军主持大会而当场退出主席团。由于中央文革记者站的表态和广西军区的工作，广西造反派在夺权后，也开始出现了分裂的端倪。

25 日，广西军区支左办公室召集派驻各部门的联络员开会，一致认为：应支持“工总”内部的革命群众起来造反，砸烂“工总”，清除坏人。

2 月 28 日，桂林“老多”集中市里各级领导干部在市人民礼堂开大会，“老多”头头杨福庭在大会上宣布：“夺权胜利完成它的历史任务，全市一切都稳定正常，发展态势很好，夺权行动委员至此撤出。”

我们再看北京。北京大学自1967年2月开始整风后，校文革中的矛盾日益明显。2月14日，北京大学《新北大》刊登校文革2月10日发出的《重要通告》，宣布2月7日校文革扩大会议改组校文革常委会的决定。《通告》说：孔繁、杨克明“操纵群众，造谣中伤”,“使以聂元梓为首的校文革处于内外夹攻的困难境地”。“对这样的坏家伙，我们就是要夺他们的权，罢他们的官，撤他们的职，从校文革里清除出去，”同时将牛占文、刘宗义、廖淑

明、聂孟民“赶出常委会”。

2月15日，北京大学支持聂元梓校文革的“红旗兵团”、“红教工兵团”、“东风兵团”等红卫兵造反组织率先联合成立了“新北大公社”，社长叫卢平。总部主要成员先后有：夏剑豸、卢平、刘冲、孙月才、李长啸等。在成立大会上，聂元梓代表校文革表示热烈祝贺。

“新北大公社”成立后，各系各单位纷纷相应成立了“新北大公社战斗团”。经过军训后的北大学生，革命性、科学性、纪律性似乎都有很大增长，学校一时间呈现出由乱而治的景象，校文革及支持校文革的师生沉浸在北大形势一片大好的喜悦中。

2月18日，北京大学和北京其他高校的军训团陆续撤走。

2月19日，毛泽东对北京卫戍区《关于五所高等学校短期军政训练试点的总结报告》和《关于两个中学军训试点工作总结》做出批示：

一、此两件立即转发全国；二、大学、中学和小学高年级每年训练一次，每次20天。在军训的20天中，军训时间每天不要超过4小时，同时学校原课程每天相应减少4小时；三、党、政、军机关，除老年外，中年、青年都要实行军训，每年20天。

2月19日，中央发布《中共中央关于夺权斗争宣传报导问题的通知》要求：“各省、市、自治区领导夺权斗争的临时权力机构，叫什么名称？是不是真正做到三结合？今后要先报告中央，经中央批准后，再在当地报纸上发表。”

这天，周恩来收到由“新北大公社”、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中国人民大学“红卫兵总部”、中国科学院“革命造反团”、北京政法学院“政法公社”等组成的“斗争彭、陆、罗、杨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西郊筹备处”写来的一封信，要求在2月26日、27日两天召开“斗争彭（真）、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大会”，会上要进行“上揪下扫”。“上揪”就是“把矛头直接指向刘、邓黑司令部，直接指向刘、邓、陶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下扫”就是“痛打及横扫其党羽喽啰”。准备把“彭、罗、陆、杨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的主要成员揪出来示众”。信中列出了两天准备揪出示众的近30人的名单：第一天揪出示众的有：彭真、刘仁、郑天翔、万里、吴晗、林枫、蒋南翔、陆平、彭佩云、张洁清，陆定一、周扬、吴冷西、林默涵、许立群、熊复、夏衍、严慰冰。

第二天揪出示众的是：罗瑞卿、肖向荣、梁必业、苏振华、徐子荣、郝治平，杨尚昆、安子文、曾三、李伯钊。

周恩来在这些人名的下面粗粗地画了横线。将信批给陈伯达、康生、江青，提出：“请研究他们所提出的口号‘下扫’是否合适？并请派人一询。这个筹备处要揪出这么多人出场，是否在斗、批上有利？”

2月20日，北京“夺委会”在北京工人体育馆召开了“首都革命造反派抓革命、促春耕誓师大会”。北京郊区县农民代表一万多人参加大会。北航方臣主持大会，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

干部代表丁国钰在大会上讲了话。会后，方臣又邀各县负责人去市委开会，研究大联合、三结合、促春耕等问题。

## 第 522 回：看贵州，“叫□命委员会好”　保穆欣，肯定山东省夺权

2 月 20 日，周恩来主持碰头会讨论《红旗》杂志社论稿《必须正确地对待干部》，陈毅长时间地握住王力的手说：“社论写得好极了！照这样做，大家没有意见了！”

第二天，陈伯达、关锋、王力将《红旗》杂志社论《必须正确地对待干部》修改稿送毛泽东审阅。

这次的送审稿上，在第二部分《革命干部和广大革命群众相结合》中加写了两段文字。一是：“经验证明，在需要夺权的省、市，必须建立‘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这种‘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由真正代表广大群众的革命群众组织的负责人、人民解放军当地驻军的代表和革命领导干部组成。在需要夺权的工矿企业，也必须建立由革命干部（领导干部、一般干部、技术人员）、工人代表（老工人、青年工人）和民兵代表组成的‘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在需要夺权的党政机关，则必须实行革命领导干部、革命的中级干部和革命群众相结合的原则。这样，才能形成一个有代表性的、有权威的领导班子，率领广大革命群众，胜利地完成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夺权的战斗任务。”二是：“建立‘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在当前必须着重解决正确对待革命干部的问题。”

陈伯达在这次送审稿上写道：“总理主持下开会提出一些修改意见。我们又做了一次修改。”

毛泽东批示："照发。"

这篇社论本应该发表在 3 月 1 日出版的《红旗》杂志第四期上，《人民日报》2 月 23 日提前转载。

贵州"125 夺权"后，造反派也很快陷入了分裂。事情的起因仍然是贵州文革最早发难的贵阳医学院。该校的"红卫兵. 红旗"组织是贵州最早的造反派红卫兵组织，其群众基础是文革初期最早给院党委贴出大字报，并受到院党委迫害的贵阳"六.六"事件受害者。后来，该校又成立了"工农红卫兵. 红色尖兵"组织，支持院党委，其成员多属"红五类"。但"工农红卫兵. 红色尖兵"造贵州省委的反,参加了"125"贵州夺权。因此，贵州省夺权时成立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总指挥部"，其中地化所的一些常委把贵阳医学院最早的造反派组织"红卫兵.红旗"视为保守派加以排斥。于是在 2 月 3 日，也就是 2 月 1 日《人民日报》以"西南的春雷"为题发表社论，祝贺贵州夺权胜利后仅 3 天，贵州师范学院庞守忠、贵州工学院田子明等人就成立了有"红卫兵.红旗"参加的"贵州省大专院校革命造反联络站"，也叫"八大院校联络站"。联络站组成人员是：师范学院庞守忠、李可仲，贵州大学王玉林，贵州工学院赵永康、田子明，贵州农学院李俊平，贵阳医学院郑黔源，中医学院朱为力等。"八大院校联络站"不承认贵医"工农红卫兵. 红色尖兵"是造反派，所以没有吸收他们参加。

2 月 9 日，贵州省"总指挥部"在《新贵州报》登出《二九

通令》，将四川大学学生领导的“西南毛泽东思想红卫兵贵州野战兵团”开除出“总指挥部”，并勒令该兵团主办的《主沉浮》小报停刊。原因是该小报上的一篇杂文《理水拾遗》影射了“总指挥部”某些人。“八大院校联络站”认为，这篇杂文有错误应予以批判，但不应开除该兵团。“八大院校联络站”同中科院贵阳地化所出现意见分歧。

第二天，2 月 10 日，贵州省革委筹备小组在省图书馆连续几次开会讨论省革委的组成人选。地化所徐英年在读《红旗》杂志社论“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时，将其中的“革命的领导干部”读成了“革命干部”，贵阳师范学院的孙世正立即发言，予以纠正，并感觉到徐英年是别有用心。在讨论结合哪位省领导干部进革委会班子时，会上同意由李再含任省革委主任。对于其他省委领导干部，省委组织部王章宪认为原省长李立“可考虑”，工交系统的王运荣推荐省物资局局长张明。对常委名单分歧意见较大，最后大家同意由李再含圈定。

2 月 13 日，李再含打电话给“八大院校联络站”成员，贵阳师范学院“六六战斗团”一位同学说：“对贵阳医学院两派该支持哪个组织要慎重”。

这天，“毛泽东思想贵州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在邮电大楼前广场召开成立大会。大会宣布，报经中央同意的省革委委员共 20 人，李再含担任省革命委员会主任，张明为副主任。次日成立大会发出了《给毛主席的致敬电》和《告全省人民书》。

2 月 14 日这天，贵州“夺权经验”见报。夺权时贵州“红卫军”总部已瓦解，夺权后“工纠”也在 2 月 2 日贴出“向毛主席请罪”的大字报，宣布解散。李再含总结的贵州夺权经验“上夺下扫，左右开弓”，其含义就是：上夺省委第一书记贾启允的权，下扫李铁乃等牛鬼蛇神，向左打击“红卫军”、“赤卫队”，向右打击“工纠”。

2 月 15 日，周恩来接见贵州造反派赴京代表。对贵州提出的区别对待干部的“抓、罢、提、留、调”五字方针，周恩来说：“提点个人看法,主要靠你们回去商量。你们提了五个办法，抓的是少数，罢的是少数，多数调、留、提。调的是有些错误，不能继续领导，调离领导岗位。留的是执行者，错误不大的。提的是少数。罢、留、提区别对待，主席对此很欣赏。主席看的前一个稿子，你们的文件 27 号送给我，我 28 号送给主席一份，他马上看了，他告诉我，你们区别对待是合乎党中央、毛主席的政策精神的，不要把所有的干部一棍子打死，不要把他们看得铁板一块。也有好的，不能一犯错误，就一棍子打死。除了两面派、阴谋家，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外，对犯错误的干部，得允许改正错误，对他们区别对待，这一点主席很欣赏，当时林副主席也在场，也同意。这是我转达的第一点。

第二点，现在写上提出人民公社，是否早了一点。巴黎公社精神，主要是直接选举，工农兵学商党政人民团体，达到 95%以上的群众选举。现在还是革命造反派夺权。革命造反派在政治上

是优势，但人数不超过半数。又不能等到人数过半数时再夺权，因为来不及了。夺权后，多数是要来的。要来，看怎么个来法，看你们怎么对待，不要猛扩大，要逐渐扩大。猛了容易把中间的、保守的吸收进来了，这样权容易被夺过去。这得有个相当时期的工作，现在不管叫什么委员会，革命委员会，夺权委员会，都是临时性的。领导权要掌握在坚定的左派手里，得经过一个时期，一段工作，真正成多数了，才能用巴黎公社原则选举公社。”

2 月 17 日，陈伯达向毛泽东报送的 4 份新闻稿，分别是：《贵州革命造反派举行盛会庆祝贵州省临时权力机构——毛泽东思想贵州省革命委员会成立》、《毛泽东思想贵州省革命委员会〈告全省人民书〉》、《毛泽东思想贵州省革命委员会成立誓师大会给毛主席的致敬电》和《贵州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夺权斗争的经验》。陈伯达在送审报告中写道：“贵州省材料四份，内容较丰富，关于三结合的经验也说得好。请主席审阅。如认为可以发表，名称是否简称为‘贵州省革命委员会’。请批示！”

2 月 20 日，毛泽东在陈伯达报送的第一篇新闻稿上批示：“伯达、王力同志：名称叫革命委员会好，请你们在四份材料一律改过来。”接着又写道：“可分两天发表。第一天发前三件，后一件在第二天发。”

2 月 22 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陈伯达送审的前三篇新闻稿。2 月 23 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陈伯达送审的第四篇新闻稿。这四份新闻稿中的“毛泽东思想贵州省革命委员会”一词，发表时

均改为“贵州省革命委员会”。

2 月 22 日，贵州省革委在贵阳市邮电大楼前广场举行 10 万人批斗大会，斗争李井泉，并押在卡车上游街，哄动全城。此后在全省掀起了揪斗各级领导干部的高潮。

2 月 24 日，已进入省革委领导班子和办事机构的中科院贵阳地化所孙昌德、徐英年、郭其弟等人贴出大字报，将“八大院校联络站”、“贵医红卫兵. 红旗”和《主沉浮》一起列为三股“反革命逆流”。次日，《新贵州报》开始批判《理水拾遗》。

2 月 25 日深夜，在李再含的支持下，贵医“工农红卫兵. 红色尖兵”，简称“工尖兵”，联合外单位 1000 余人，其中有三个连的部队，还有指挥车、宣传车和数十辆卡车，对贵医“红卫兵. 红旗”进行砸抄，同时在贵州医学院夺权。

2 月 26 日，在原“红卫兵. 红旗”的基础上，贵阳医学院“二. 二六战斗团”成立，并举办了“红卫兵. 红旗”被打砸的现场展览会，在社会上引起广泛同情。

3 月 1 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的好形式”，介绍贵阳棉纺织厂的群众组织在 2 月 20 日实现了从班组到车间到全厂的自下而上按行政部门的大联合的经验，即“贵棉经验”。这是毛泽东的指示，他对“贵棉经验”非常重视，亲自决定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国广播“贵棉经验”。

2 月 21 日，中央文革小组委派关锋、戚本禹到《光明日报》社接见群众，保穆欣过关。

在《光明日报》社职工大会上，关锋说："前几天，中央文革小组讨论过一次穆欣同志的问题，组长陈伯达同志，副组长江青同志，顾问康生同志，王力同志和我们两位都参加了。"关锋表示：他与戚本禹对穆欣的评价与讲话，不是他们个人的意见，是代表中央文革的。

关锋说："穆欣同志不是我们的敌人，是我们的同志。有缺点、错误，甚至某些错误是严重的，但有成绩，应一分为二。对他的错误进行批评，我们赞成，但批评应是同志式的，不是敌人。他回来时，中央文革小组的负责同志对他讲，回去，是自己的错误，要检讨，不是自己的错误，不要胡说八道。回来一个多月，你们的材料《十大罪状》、《大事记》都看过了，那些材料，有很多没经过查对，单就我知道的就有很多与事实不符。经过调查研究，得出正确结论不那么容易。"

戚本禹说："我们认为，穆欣同志的问题，是人民内部矛盾，不是敌我矛盾。我们认为，穆欣的问题，不是反革命，不是修正主义，不是两面派。"

戚本禹还说："你们应当提高警惕，防止敌人钻空子。比如有人搞康老。有没有？有的。住在这儿的学生组织也有这个问题。"

关锋、戚本禹讲话后，《光明日报》社历时近两个月的轰轰烈烈的炮打穆欣运动就偃旗息鼓了。财经学院的"孙大圣"支队撤回了学校。

2 月 21 日，北京大学的《动态报》62 期又转载了国民党江苏省反省院《半月刊》第二卷第 9 期的副刊上登载的卢树森（即卢正义的原名）的《转变》：

这个无耻的叛徒写道："监狱里囚徒常不感觉到周围空气的污浊和恶臭。这正如我们过去深入共党自己却不知做了民族的罪人，革命的叛徒，但一旦接触到伟大的三民主义，谁还甘愿自陷于万劫不拔的断脰决腹中，而不走上光明快乐的大道？除非他人'心'已死！"

山东省"23 夺权"后，王效禹曾派张子石、韩金海组成"山东省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委员会"赴京代表团到北京向中央汇报夺权情况，代表团依然是由张子石带队。康生、王力等文革小组的人接见了山东代表团，并肯定了王效禹的山东夺权，但认为山东代表团的汇报准备不足，让代表团回去再准备，并要求王效禹来京。

2 月 18 日晚，康生及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江青和成员王力、关锋、戚本禹等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山东省赴京代表团，听取了关于山东省夺权情况的汇报。

20 日下午，康生又接见了山东"红山指"代表，要求他们"主要关心学校的问题，又主要是政治、思想、组织问题"；指示他们"山东大学不是出了问题吗？你们要考虑怎样去团结、教育、帮助大多数同学"。

2 月 21 日 21 时 40 分，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王

力、关锋等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接见由王效禹和山东省军区司令员童国贵率领的山东“大联委”和随同到京的青岛造反委员会赴济代表团。中央负责人听取王效禹、童国贵等人汇报。然后陈伯达先讲话。他提了5条建议：

1、王效禹同志从青岛到济南工作。

2、山东省的临时权力机构必须是革命三结合，名称叫“革命委员会”好。

3、建议建立一个“中国共产党山东省核心领导小组”，临时代行省委职权，名单报中央批准。

4、请发一套新闻来，中央审查批准后发布。

5、山大主义兵和工人联合会的基层组织问题，要慎重处理，相信你们会处理的好的。

陈伯达强调：“这是中央文革小组的建议，周总理同意。”

周恩来讲话中提出“夺权要三结合”，“要不断扩大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大联合大夺权的队伍，逐步达到团结两个95%”，“抓革命，促生产”， 建议召开省、地、县三级干部会，省军区的各级地方部队要配合抓好春耕生产。“学生方面，山大主义兵在初期是有贡献的，还是要把多数争取过来的”等等。

周恩来要求：成立山东省革命委员会，人员在现有的基础上扩大一倍；做产业工人的工作，把大厂子的工人争取过来；农忙季节到了，一定要召开省、地、县三级干部会议，省军区、军分区、县武装部要配合一起开；不能成立全国性的组织，也不能搞

超单位的组织。他的结束语是："现在宣布各省夺权斗争胜利的消息，都由毛主席审定，今天不可能多谈。"

接见至 22 日凌晨 1 时 30 分，周恩来看表后说："我们还有个会，同志们，是不是就到这里。接见结束。"

## 第 523 回：□稳定，西安分“东”“西”两派　《群丑图》，众□导明确叫停

2 月 14 日上午 9 时，毛泽东在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 2 月 12 日编印登载陕西省军区副司令员王明坤关于西安两派分歧和工厂武斗的电话请示报告的《要事汇报》第八号上批示道：

“林彪、恩来同志：排斥交通大学一派，支持极左派的主张，值得研究。应当继续做调查工作，不必急于公开表态。破坏工厂，极左派是有嫌疑的，而交大不主张破坏工厂。以上请酌。并告文革小组。”

当天，周恩来在北京接见西安地区“红卫兵造反司令部”和西安地区大专院校“统指”的代表时批评道，你们西安提出“打、砸、抢的口号是错误的” 。同时,他又苦口婆心地给双方代表做思想工作，要求大家“求同存异”，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团结联合起来，尽快成立“革命委员会”。

对解决西安地区造反派内部分歧，周恩来提出两点意见：“（1）在未解决问题以前，停止辩论，停止一切攻击，宣传车不要上街。（2）任何人不得以任何借口冲击国防工厂。”

陕西各位代表向周恩来提出“四条保证”,“一定听周总理的话，按周总理的指示办事。”

2 月 15 日晚，西工大文革会主任孙福林即召开全校师生员工大会，如实传达了周恩来的指示精神，特别强调以后不许再提

“革命的打、砸、抢好得很！”“坚决按周总理的指示办事。”最后，他又传达校文革会研究出的“工作计划和安排”。提出要正确对待西交大，“每天都组织人到西交大串连，他们毕竟和我们风雨同舟过。要相信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是通情达理的，要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澄清事实，消除分歧，在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下团结起来，共同向党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夺权。”

当时，西工大许多同学对校文革会不满意，说孙福林主任太老实无能了，让西交大牵着鼻子走，挨打了还说没理，净受窝囊气。同学们要求重新派代表团到北京汇报西安的斗争情况。

此时，在西安的大街上，已经可以看到许多支持西交大的大标语：

“交大的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

“誓作交大革命师生的坚强后盾！”

“青松不老交大不倒！”

“反交大的人决没有好下场！”

“强烈抗议西工大、西军电、西大、773 部队等在革命造反报社的法西斯暴行！”

“打倒西工大、西电、西大！”

“造反司令部从西安滚出去！”

“工矿企业联合会是傀儡机构！”等等。

电车和汽车上也贴满了此类大标语。街道上随处都有一堆一堆的人群围着一个人在辩论……

但是，事情并没有因此而缓解。

2 月 18 日，“西安地区革命工人造反总司令部”在西安市体育场召开成立大会。会后，他们又游行示威，高呼“坚决支持西交大的革命行动！”“誓作西交大革命师生的坚强后盾！”“工人要说话！工人要掌权！”“坚决反对打、砸、抢”等。随后，又相继成立了“农总司”“文总司”、“机关总司”、“公安总司”、“中革会”等。这些新成立的组织出现后便立即公开支持西交大“文革总会”。

第二天，2 月 19 日，“统指”“工联”“农总会”等组织也在西安市体育场召开“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为成立西安革命委员会而奋斗动员大会”，会后也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

西安形成了以西安交大的“文革总会”和西安东郊工厂以“工总司”造反派为首的，包括铁路工人在内的“东派”，及以西北电讯工程学院“文化大革命临时委员会”、西北工业大学“西工大文革委员会”和西安西郊各工厂造反派，以“西安地区工矿企业联合会”，简称“工矿联”或“工联”为首，包括随后相继成立的“农总会”、“机关总指”、“红卫兵司令部”、“农民造反总部”、“文总指”、“财总指”等群众组织的“西派”。

这两派组织通过各自的串联，向全省发展，进而在全省范围内形成了两大派别，相互之间的斗争由辩论发展到武斗。西安的形势越来越乱。

2 月 21 日，陕西省军区奉命对《陕西日报》进行军事管制。

2 月 3 日，周恩来将中共中央转发中央军委《八条命令》的通知稿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阅后，于 2 月 20 日，在这个通知稿第四条开列的“不许由外单位人员接管”的机关名单中，加写了“各级银行”，同时批示：“总理：同意，照办。”

2 月 22 日，周恩来又将中共中央通知修改稿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阅后批示：“照办。”

中共中央通知下发时，标题是：《中共中央关于军委一月二十八日八条命令的说明》，中发［67］61 号文件，日期署为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一日。

通知指出：“中央认为，军委的八条命令很好。这个命令，除第七条关于军队的文化大革命部署外，其他各条都适用于地方。”为此，通知还作了五点具体说明，并要求各地将此通知连同中央军委的命令，在所有基层单位普遍张贴。

2 月 22 日，北京大专院校红卫兵代表大会，即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代表大会，简称“红代会”成立，聂元梓任核心领导小组组长，总部设在北大俄文楼。

周恩来、陈伯达、康生和江青等领导人出席成立大会。周恩来代表毛泽东和林彪，代表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热烈祝贺红卫兵的大联合、大团结、大会师。陈伯达、康生、江青等人也在大会上讲了话。

左起：清华大学蒯大富、北京航空学院韩爱晶、谢富治、北京轻工业学院李龙和

陈伯达说："今天的大会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个盛大的大会，是我们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所在地的红卫兵的盛大的大会。这个大会所表现的就说明了我们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定要胜利，一定会胜利，一定要胜利到底！谁想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破坏无产阶级革命，破坏无产阶级专政，我们就要同他拼到底！我们准备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为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付出代价。同志们：要一方面高呼我们的胜利，一方面要警惕敌人的反扑，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世界上第一次出现的这样的革命。是毛泽东同志引导我们革命同志发动起来的革命。我们可以信赖，可以相信，过去毛主席领导中国革命经过了一个漫长的道路，达到了最后的胜利。现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毛主席领导我们，同样的经过一个曲折的道路，一定能够达到最后的胜利。"

他说："我们取得胜利，夺取胜利的信心，是不可动摇的，在这个人类历史上空前未有的，大的革命洪流当中，在斗争方法上，

可能有一些不可避免的缺点。敌人想利用这些群众运动当中，群众自发出现的一些斗争方法上的缺点。这些缺点不是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提倡的，也不是党中央提倡的，更不是毛主席提倡的。这些缺点是可以很快的纠正的，并且已经开始在纠正了。比如在大街上有这样一些标语口号，也不一定是在这里的同志提的咯。什么砸烂谁的狗头啦！还有一些斗争大会上出现有戴高帽子啦！罚跪啦！什么搞喷气式飞机啦！这样一些斗争方式啦！在座同志们可以证明这样的方式是不是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提倡的呀！”

众答：“不是！”

陈伯达：“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群众没有很好的考虑不自觉的就这么搞了。还有一种情况是坏人把这样一种作法故意的扩大化啦！他们的目的是要丑化我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今天在这个会上向同志们建议要注意这个斗争方式斗争方法。（掌声）什么砸烂谁的狗头啦！什么喷气式飞机啦！什么戴高帽子啦！什么罚跪啦！这样一些斗争方式不要采用，还要注意不要什么都砸，破坏国家的物资，这样的一种斗争方式，‘联动’起来利用到处来砸，破坏了好多学校，破坏了好多国家资财。”

北航广播站的刘刚奇同学宣读《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代表大会给毛主席的致敬信》和《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代表大会宣言》。

首都红卫兵三个司令部的代表分别发言。首都工人、农民、中学红卫兵和北京卫戍区的解放军代表发言祝贺。山西省“革命造反总指挥部”的代表到会祝贺。大会宣读了由在京外国友人组

成的“毛泽东思想‘白求恩——延安’战斗队”的贺信。路易·艾黎、柯弗兰、爱德乐、柯如斯、阳早、寒春、马海德、李敦白等外国友人参加大会。

大会宣读了《告全国红卫兵书》，并且集体诵读了《红卫兵誓词》。会议结束的时候，陈良请周总理指挥高唱《大海航行靠舵手》。

就在周恩来面对一万多名红卫兵，打着拍子高唱《大海航行靠舵手》时，康生、陈伯达等中央文革成员起身离开了会场。

散会后，北航“红旗”的头头们讨论大会的讲话，特别是陈伯达的讲话，他们觉得中央出事了，中央有人在反对中央文革，反对文化大革命。在这个问题上他们觉得必须旗帜鲜明，坚决保卫文化大革命，保卫中央文革小组。同时，坚决保卫周恩来总理。当天晚上，北航“红旗”和其他一些院校红卫兵在长安街刷出了：

“用鲜血和生命来保卫毛主席和中央文革！”

“坚决和中央文革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

“决不允许把群众运动的缺点强加于中央文革！”

“用任何借口反对中央文革都是反革命！”等大标语。

北航“红旗”还和清华“井冈山”共同出了一期报纸，庆祝首都红代会的成立，刊登了周恩来、陈伯达讲话，同时发表评论员文章《用鲜血和生命保卫文化大革命》。

原来的首都一、二、三司红卫兵实现了名义上的“大联合”。从此，这三个红卫兵“司令部”不复存在。

这天，“首都二司”的机关报《东方红》出版了最后一期的“终刊号”，发表了《致读者》的“终刊启事”。

这份《东方红》“终刊号”的第 3 版，整版篇幅刊载了一幅题为《群丑图》的大型政治漫画。图中，注明供稿者为“斗争彭、罗、陆、杨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筹备处宣”。

“首都一司”的机关报纸《红卫兵》第 23 期，也在中间插页以对开整版配发了“群丑图”，版面是《东方红》报的 2 倍尺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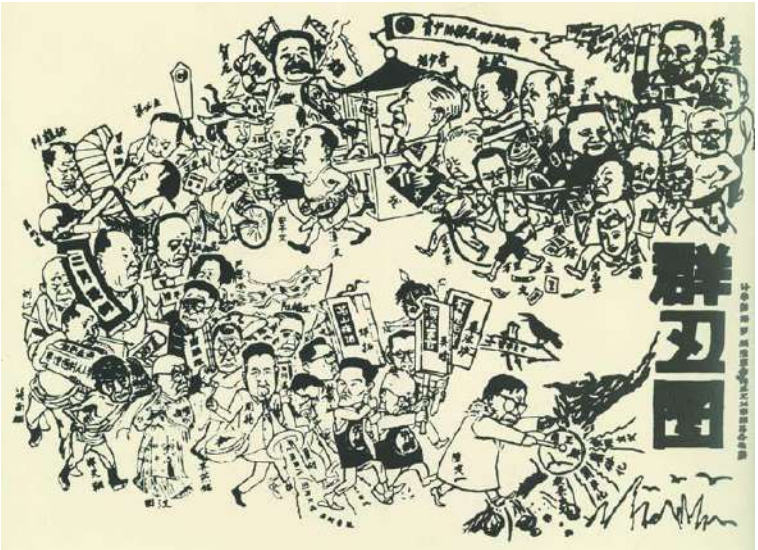
《群丑图》中有名有姓的人物 39 个，有：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彭德怀、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贺龙、万里、薄一波、王光美、李维汉、王任重、彭真、肖望东、钱信忠、刘澜涛、何长工、吕正操、刘志坚、李井泉、林枫、安子文、梁必业、陈鹤桥、肖向荣、陆平、刘仁、蒋南翔、郑天翔、田汉、齐燕铭、周扬、阳翰生、邓拓、夏衍、吴晗、廖沫沙、谢继环。

最先出场的是陆定一。我们可以看到：鸣锣开道的他，实际上已经一只脚踏空在断崖边了。而画面上的刘少奇，还安稳地坐在轿子里发号施令。此时，还轮不到他出场。但是，他的位置则当之无愧地处于舞台的中央。替彭真抬轿子的是刘仁，而万里那时候显然还是二线明星，按规矩就要比坐他轿子的邓小平小整整一圈。

后面还拖着六个组织的小旗帜。这种群体性政治漫画，至今仍不多见。他们用古代官员出巡招式，排列成 S 形队伍，向着“资

本主义”悬崖走去。队伍的排列很有讲究，从他们手中的“道具”，可以看出文化大革命从准备、发动，直至该画创作时的 1967 年 2 月份，运动进展情况，次序一点没搞错。画中每人的“道具”，都有根有据，形象地说明了该人所犯的“罪行”，反映了此时段的一连串事件，可以称为文革发动史的缩写。画中人物，运用漫画最基本的技法：大头小身体。尽管体态动作夸张，头部描绘却十分形似，显示了作者的专业水平。

此画一出，反响巨大。由于这张画符合当时运动的“大方向”，被各地竞相翻印、复制。随着运动的进展，被点名、批判、揪出的当权派人物越来越多，又出现了几种版本的《百丑图》。《百丑图》中人物硬凑成百人，都是头像，是群众大批判漫画头像的摹本。《百丑图》名声也很大，但从历史、艺术、技法而言，同《群丑图》不在同一档次。




《群丑图》，刊登在“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联络站（首都二司）”主办的小报《东方红》1967 年 2 月 22 日出版的第 21 期上。该漫画具名是“斗争彭、陆、罗、杨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筹备处宣”。

有一天，刘少奇的秘书刘振德收到一卷小报，其中就有刊登《群丑图》的《东方红》第 21 期，里面夹着一封信，信中除了说些同情刘少奇的话外，还说："我们还年轻，将来为您翻案！"刘振德将收到的信件都交给了王光美。这张"群丑图"在刘少奇的茶几上放了很长时间。

不过，就在发表此画的《东方红》报出版几天之后，中央领导人就陆续在讲话中明确提出了批评。2 月 27 日，陈伯达在接见原"首都三司"部分代表时的讲话中说："还有什么百丑图、群丑图，这都被香港……被坏人利用了，值得我们警惕，"次日，谢富治与傅崇碧一起在接见首都职工群众组织代表时的讲话中说："街上传单的东西不要搞互相攻击，不要搞喷气式，不搞群丑图或画漫画。这些东西，我们毛主席从来是反对的，不提倡的，中央文革向来反对的，不提倡的。"3 月 3 日，周恩来在总政治部机关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说："最近还有一些不应该的漫画，什么群丑图啦，罚跪啦，这样的照片，登在小报上，马上就传到了世界各国，丑化了我们的党和国家。这也是不应该，不允许的。"3 月 4 日，谢富治与戚本禹在对北京各红卫兵小报和印刷厂代表的讲话中说："什么'百丑图'、'群丑图'……他们本来一小撮，却被画成浩浩荡荡的队伍，这是替谁宣传？"

傅崇碧一次从钓鱼台出来去见毛泽东。毛泽东看见他拿着一大卷纸，就问："那是什么？"

傅崇碧说："来时，有人拦住我的车子，放进车里的，是什么

我还没看。”

毛泽东说：“打开我们看看。”

一打开，是一张彩印的大漫画《百丑图》。毛泽东生气地说：“这是丑化我们的党！这种东西不准搞！”

他马上叫秘书打电话给陈伯达，要他把这些图全部收起来，不准在社会上流传。”

《群丑图》的作者是翁如兰，女，1944 年生于北京，著名元史大家翁独健的女儿。1956 年考入中央美术学院附中，1962 年考入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画系，从师于著名戏曲人物画家叶浅予先生，主攻人物画。1966 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因作《群丑图》被认为是“丑化中央领导人”，而被捕入狱，后被“下放部队农场改造三年”。后入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画系研究生班，成为文革后的第一届研究生，1980 年毕业后留在中央美院任教。1981 年。翁如兰自费赴美留学、入读宾夕法尼亚大学艺术研究院。1984 年，翁如兰获取第二个艺术硕士学位。后侨居国外，从事绘画创作活动。

## 第 524 回：砸汽□，□春“公社派”瓦解　围报社，□海省形势紧张

1 月 23 日，吉林省军区、驻长春部队和吉林省其他地区驻军，根据中央《关于中国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开始介入当地文化大革命。长春“二总部”在“118 夺权”后，和全国一样，开始了造反派高歌猛进的时代。2 月 5 日，长春市五万人举行大联合誓师大会，以“二总部”为主体，联合机关造反派和工人造反派，成立了全省的造反组织：“红色造反者吉林省革命委员会”，简称“红革会”。会议发出《呼吁书》，主张全省造反派实行大联合，对全省全面夺权，成立“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通过了《给毛主席的致敬电》，并痛斥了苏联抢走中国驻苏使馆新闻橱窗，打伤中国使馆工作人员的暴行。之后，为尊重“二总部”在吉林造反“首义”之功，“红革会”始终与“二总部”并称，简称为“红二”。

长春市天天都有拥护“红二”的大游行。尤其市公安局“红色造反兵团”支持“二总部”的游行，场面甚为壮观。那时警察的服装跟解放军差不多，队伍是一色的草绿，人人都带白手套、红袖标，威风凛凛。看热闹的群众忍不住欢呼鼓掌，都说，“红二”这江山坐定了！“教大主义兵”已是臭不可闻，于是改名为“毛泽东主义教育大学红色造反兵团”。然而他们毕竟气数已尽，不足为虑了。

但是，造反派在夺权过程中也开始了新的分化。2 月 1 日至 5

日，长春市“二总部”在大专院校的几支骨干力量：地质学院“兵团”、工大“造大”、光机学院“8、15”、人民大学“红旗野战军”，先后宣布退出“二总部”。也是在 2 月 5 日这天，他们宣布另行成立“吉林省革命造反司令部”。这几个组织都是赫赫有名的造反派，为“二总部”的崛起立过大功。因为对“二总部”在夺权过程中的一些做法不满，认为是妥协和不彻底，于是分道扬镳。

2 月 8 日，地质学院“兵团”、工大“造大”、光机学院“8、15”等十几个更为激进的群众组织在工业大学礼堂召开会议，决定将他们在 2 月 5 日刚刚成立仅三天的“吉林省革命造反司令部”改为“长春人民公社筹委会”， 简称“长春公社”。

已江河日下的“教大主义兵”公开表示了对“长春公社”的支持，还于 2 月 20 日，以吉林毛泽东主义教育大学“红色造反兵团”的名义，和“长春市公安系统联合总部”等 20 个群众组织，联合发起成立“吉林省东方红公社”，并召开成立誓师大会。从此，长春市两大派 4 个组织，即“红革会”与“红卫兵二总部”为一派，简称“红二派”，“长春公社”与“东方红公社”为一派，简称“公社派”就此形成。

2 月 14 日，“长春公社”的地质学院“兵团”、工大“造大”、光机学院“8、15”等群众组织中的数千人围攻吉林省军区，高呼“军区有鬼”、“炮轰军区”等口号，要求与军区副司令员贺吉祥辩论。

2 月 22 日至 27 日，“长春公社”连续举行大规模游行，要

揪“红二派”的后台，矛头直指长春驻军。

2 月 22 日，“吉林财贸学院造大”，在校门前用桌椅等用品拦截长春汽车公司的 3 辆公共汽车，并用石块砸汽车，打伤司机，造成全市公共汽车停运两小时。

2 月 23 日，“公社派”的“长春市公安系统联合总部”、“教大主义兵”、“东北人大红旗野战军”等群众组织与“红二派”在东北人民大学八宿舍发生武斗。因为有公安局的警察穿制服参与了武斗冲突，支左的吉林省军区和长春驻军认为违反了中央关于《严禁出动警察镇压革命学生运动的规定》，将这次事件定为武装镇压学生的“二二三反革命事件”，“长春市公安系统联合总部”顷刻瓦解，为首的人被了抓起来。

“红二”趁势大造舆论。26 日，“红革会”在人民广场举行“控诉、声讨长春市公安系统联合总部反革命暴行，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大会”。“公安联总”的头头被军人押到主席台前，列成一排，帽徽领章全被撕掉，一个个彪形大汉捆的跟龙虾似的。会后举行游行。吉林省军区和驻长春部队 16 军、空一军的指战员全副武装参加了这次会议和游行。

这天，“东方红公社”、“长春公社”的负责人在地质学院开会，统一观点，试图坚持。但并没有维持多长时间。其后几天，“工大造大”、“教大主义兵” 不得不屈服于形势，由头头带队，在自由大路举行“向长春市人民请罪”大游行。

吉林驻军，包括省军区、16 军、空一军公开表态支持“二

总部”，而不承认“长春公社”。3 月 4 日，驻军对解放军兽医大学“红色造反团”出兵实行纪律制裁，抓了他们的头头。在驻军强大的压力下，“长春公社”等组织被迫打着白旗请罪。在地质学院“兵团”、工大“造大”、光机学院“8、15”整风时，驻军又提出了“三个彻底”，即彻底揭发、彻底批判、彻底改组，最终使这三大组织在整风中解体了。

青海“129 夺权”后，面对“捍卫队”和省委、省军区的指责，“八一八红卫战斗队”决定开门整风。他们将队伍中杨守礼等 9 名家庭出身不好的成员定为“反革命分子”，送交公安机关，要求严肃处理，以示自己的革命，不料却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2 月 2 日，总后青藏办事处主任张晓川在 205 部队，即总后青藏办事处，召开青海驻军负责人会议，决定正式逮捕“八一八红卫战斗队”交来的 9 名成员，派部队和“贫下中农红卫军”一起召开控诉反革命罪行大会。

2 月 3 日上午，控诉大会在南门外体育场、劳动人民文化宫、兴海路等地举行。12 时，队伍上街。205 部队抽调 250 辆军车，满载从各部队抽调的 4000 多名荷枪实弹战士，和贫下中农红卫军、捍卫队战士一起，在西宁街头联合举行了一次“镇压反革命、支持左派”的武装大游行。被逮捕的“反革命分子”杨守礼等人，脸上画着“八一八”，胳膊上带着“八一八”袖章，头上顶着写着“八一八”的高帽，游街示众。镇压的矛头显然是直指“八一八红卫战斗队”。

“八一八”这才意识到自己弄巧成拙，对青海驻军那叫一个恨呀。2 月 4 日，青海大学红卫兵开始反击，贴出大字报：《炮轰青海军区机关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表示“不把其中的小贺龙、小罗瑞卿揪出来示众，我们死不瞑目！”

软禁中的青海省军区司令员刘贤权深感问题严重，担心如此闹出大事无法向中央军委交代。他于 2 月 4 日亲自起草了一份给中央军委和兰州军区的电报，表明态度：“青海八·一八是真正的造反派，（红卫兵）总部、捍卫队是保守组织，界限非常明确，我们坚决支持八·一八。”

但是，机要员却把电报稿退回来，答复是：“赵副司令不同意发。”

这个“赵副司令”即此时已实际掌控青海省军区的副司令员赵永夫。

刘贤权急中生智，让妻子安绍杰把电报稿用纱布缠在腿上，然后请假到兰州看病。就这样，从兰州军区把电报发到中央军委，没有回音。

此时，中共青海省委内部也严重分裂，省委第一书记杨植霖几次召开会议，决定支持“八一八”夺权。但青海省军区起来造反，实际上夺了刘贤权的权。杨植霖看到省委难以控制局面，也借故离开西宁，省委工作完全处于瘫痪状态。

夺权后的《青海日报》天天发表不符合青海军区副司令员赵永夫等人口味的文章，令赵永夫愤愤不平，几次欲封闭《青海日

报》，未获兰州军区党委通过。2 月 8 日，赵永夫、张晓川准备对报社实行军管，但兰州军区党委两次开会都没通过。

2 月 11 日晚，青海省军区副政委张文英专程到兰州军区请示，兰州军区还是不同意军管。张文英让兰州军区请示中央军委，兰州军区请示后，答复依然是："需要请示"。

赵永夫等不及了，于是他决定由西宁卫戍区司令部宣布对《青海日报》实行军管。2 月 13 日，北小街、南小街、兴海路、仓门街等地的"八一八红卫战斗队"被定为反革命组织，明令取缔。

2 月 14 日，赵永夫召开青海省军区党委会议，通过了《军管青海日报社公告》，并立即组成军管小组进驻报社。

当军管小组在一个排全副武装的战士护送下来到报社，遭到"八一八"的抵制和轰赶。战士们坚决不走，"八一八"人多，最后几个人抓住一位战士的手脚抬着扔到马路上，有的人甚至被从墙上扔了出来，枪支弹药也被拆卸后扔在马路上。

上午 11 时，赵永夫派出部队，占领了报社周围的 5 个制高点。南面占领了西宁市北门城墙，东面占领了宾馆顶层的晒台，西面在民房屋顶上架起了机枪，北面湟水桥上站着从草原调来的荷枪实弹的士兵，封锁了通向报社印刷厂的主要道路和大桥。报社印刷厂地势较低，在周边被部队居高临下的控制中，处境十分危险。部队的汽车也把报社围得水泄不通，不许运送物资进去，但许可人员出入。

民族学院红卫兵闻讯，一马当先，冲进报社，要与报社“八一八”一起保卫《青海日报》。接着，一批又一批以工人为主要骨干的“八一八”队员也陆续赶到这里，他们打着“誓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誓死保卫新生青海日报”等横幅，沿着报社围墙，一层又一层围在印刷厂周围。他们有的脸上一副倦容，显得特别疲惫，显然是刚下班赶来；有的一面啃着干馍一面还在向周围的人群讲演。他们有站的，有席地而坐的。

《青海日报》的编辑部在省委大楼四楼，而报社印刷厂在离编辑部 500 米外的一个院子里，大家习惯叫它“老报社”。印刷厂原有 200 人左右,“八一八”组织派去守卫报社的人近 2000 人，报社内相当拥挤。几乎所有的屋子周围都有一簇簇人群，甚至车间里面外面也是，年纪大的在 50 岁以上，小的只有 10 来岁。

学生、机关干部、居民也参加进来了，原来只是白天上岗，后来是日夜坚守，干脆在报社周围搭起了帐篷，划区分片，昼夜轮班，吃睡都在其中。

青海的 2 月，地冻天寒，经常是零下一、二十度。军队只许人员进出，不许物资输送，吃喝、取暖都成问题。报社的编辑、记者和印刷厂的工人拿出家里的煤砖让住在帐篷里的人烤火，把刚出笼的蒸馍送到他们手中。成百人趟过刺骨的河水，给守报社的人送饭送水、送去棉衣。就这样，赤手空拳的老百姓在零下一、二十度的严寒中坚守了 9 天 9 夜。《青海日报》一直到 2 月 17 日还在出报。

2 月 14 日这天，省军区用大喇叭在报社外连续广播 6 个小时。

15 日，青海“工人造反司令部”、“捍卫队”等组织连日游行，支持对青海日报社军管。但兰州军区来电作了三点指示，不同意军管，要求部队撤出报社。兰州军区同时将“三条指示”用电话告知“首都三司联络站”。

赵永夫派副司令员刘斯起率 6081、205、8122 部队 12 名干部，连夜到兰州军区大楼前绝食静坐，要求收回成命。兰州军区一天之内开了 8 次常委会，研究《青海日报》问题。政委冼恒汉、司令员张达志态度坚决：批示不能改变，军队不能接管地方报社。刘贤权派人给报社送条子，告知兰州军区的指示，并写着“坚持到底，就是胜利”。“八一八”的决心更加坚定。

2 月 17 日夜，赵永夫、张晓川在青海驻军领导人会议上，提出成立“西宁地区部队支持地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联合办公室”，获通过。后来办公室改名“联合指挥部”，有 5 人领导小组。组长是国防科委核基地司令员、8122 部队的贾乾瑞少将，副组长赵永夫。成员有后字 205 部队，总后勤部青藏办事处副主任张晓川、55 师师长陈如意、独立师政委张震宇。

2 月 19 日，“八一八”组织示威游行，反对军管《青海日报》。当游行队伍经过报社大院门前，遭对立派“捍卫队”阻拦，双方发生冲突。混乱中，“捍卫队”一个女队员张桂兰被压死在“八一八”的车轮下。

当天，赵永夫和张晓川主持会议，拟将“八一八红卫战斗队”定为反革命组织。

第二天，“捍卫队”抬张桂兰尸体游行。

21 日，青海工“工人造反司令部”、“捍卫队”等组织调动 10 万人，再次抬张桂兰尸体环城游行，并沿途砸“八一八”等组织的办事机关。

部队的基层干部、战士对“八一八”派的行为越来越恼火，随着时间的推移，矛盾也越来越多，军人与造反派之间已经到了一触即发的程度。

在青海日报社对峙的 9 天中，赵永夫不断地给中央军委发电报。据林彪当时的秘书张云生后来回忆说：

“青海省军区在给中央军委的报告中说：在省会西宁，有个自称八·一八的造反组织，在北京来青海串联的一些红卫兵的支持下，藉口《青海日报》的一篇社论有问题，强行冲进报社。他们在里边大搞打砸抢，对报社的工作人员实行‘白色恐怖’，有的人已被活活打死。他们拥有从别处抢来的枪支弹药，对向他们宣传毛泽东思想的部队人员进行武装威胁。……因此，西宁驻军调集八个连队，对占据报社的闹事分子实行武装包围，命令他们撤出报社，交出手中的武器，揪出坏头头，否则一切后果由他们负责。

青海的告急电文不断来往北京，形势剑拔弩张。我及时将最新的情况报告林彪，他仍然不动声色，既不表态，也不着急。”

2 月 20 日左右，有些外地红卫兵陆续回到北京向中央文革反映青海的情况。

因撰写“六三社论”而被隔离审查的《青海日报》记者陈怡因报社未能安排适当工作，即应“八一八红卫兵”王中山之邀创办《八·一八红卫兵》报。后来又受“八一八红卫兵”总部委托，和《青海日报》编辑刘守和一起到北京建立“联络站”。承当时首都三司《东方红》报总编、北京地质学院学生聂树人热情安排，在北京地院 13 号楼设置了一个办公室。有趣的是，当时同他们一起在“联络站”工作的，竟然是原青海中学红卫兵的司令、第一个向“六三社论”开炮、带头送第一张大字报来报社的西宁实验中学女学生李春荣。她这时已成为坚定的“六三社论”支持者。

## 第 525 回：二二三，枪响在湟水河畔　现场惨，众群众血泊尸横

自 1966 年 11 月起，设在北京地院 13 号楼的青海“八一八”驻北京联络站几乎每天晚上 11 点后都要向中央文革办事组宋群电话汇报青海当天的文革动态。2 月 14 日后，陈怡向中央文革办事组汇报了青海当时的情况，并强调：如果事态“发展下去可能死人”……

2 月中旬以后，青海省委和《青海日报》多次派人进京追捕上访来京的陈怡和《青海日报》总编程光远回青海。因消息及时，陈怡被地院王大宾、聂树人转移至图书馆楼上。程光远当时住在左家庄国务院招待所，在地院红卫兵的帮助下，他也安然脱险。

2 月 21 日，赵永夫和张晓川再次召开“指挥部”会议，确定 23 日取缔“八一八红卫战斗队”，武装占领《青海日报》。参加武装占领的部队由青海所有驻军共同组成，每个团都抽建制中的最后那个连，即 9 连参加。

青海驻军有独立团、独立师、55 师、总后青藏办事处、二炮核基地等单位。其中，55 师有 3 个团；独立师是大师，有 7 个团；205 部队，即青藏办事处出了两个汽车连；核基地没有部队，就从司令部警卫连里抽了一个排去，表示支持。以后又让他们回去了。

会上确定：“如果‘八一八’用刀子、斧头、武器进行顽抗，就坚决予以镇压。”

对“指挥部”的这一决定，除刘贤权表示不同意外，青海省军区党委其他常委均表示赞同。

22 日，“指挥部”的决定传达到了每一个战士，甚至连省军区家属院也作了传达，特别强调：“八一八”手里可能有枪，大家要提高警惕。

傍晚时分，部队的宣传车开始在大街上广播西宁市卫戍区司令部通令：

一、从即日起，立即取缔青海省反革命组织“八•一八红卫战斗队总联络站”及其所属组织。如再非法活动，一定严加惩办。

二、对该反革命组织中罪大恶极的首要分子、幕后“军师”及其死党，立即逮捕法办。该反革命组织中的小头目和指挥部门一般成员，坦白者从宽，抗拒者从严，立功者将功折罪。

三、对受蒙蔽的群众一概不追究。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团结教育他们。使其擦亮眼睛，分清敌我，与那些反革命坏蛋彻底决裂，并坚决进行揭露和斗争。

四、立即交出一切凶器、武器、电台及其他军用物品。破坏或拒交者，严加惩办。

五、立即交出所有旗号、公章、证件、档案、材料、文件、信函、交通工具、广播器材、占用的房屋、积存的资金等。不准破坏国家财产，违者依法严惩。

六、自取缔之日起，不准更换名目，另建反动组织，有违者，罪上加罪。

七、“八•一八红卫战斗队总联络站”派驻外省外地的办事机构，接到本通令后必须立即撤销，所有人员应即刻返宁回卫戍司令部登记。如有违抗者，依法逮捕严办。

……

22 日午夜，赵永夫向参战部队下达任务时说：“部队开进时，八一八动刀，我们也动刀（指刺刀）；八一八动枪，我们也动枪；若遇阻拦，就强行开进。”

2 月 23 日凌晨，青海赵永夫再次召集武装接管《青海日报》动员会议，强调说：“一定要占领报社，用刺刀挑，也得挑进去。”

23日晨8时，西宁市全城戒严，截断了与外地的一切通讯联络系统，断绝了由西宁通向兰州、河西走廊的公路交通，不准一切车辆通行。西宁市卫戍区司令部发表《通令》，称：

“查青海省八•一八红卫战斗队总联络站及其所属组织，自成立以来，在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牛鬼蛇神的操纵下，打着‘红旗’反红旗，反对党中央，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破坏无产阶级专政。铁的事实证明，它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反革命组织。”

《通令》宣告：立即取缔青海省反革命组织“八•一八红卫战斗队总联络站”及其所属组织；对该反革命组织中罪大恶极的首要分子、幕后“军师”及其死党，立即逮捕法办；立即交出一切凶器、武器、电台及其他军用物品；立即交出所有旗号、公章、证件、档案、材料、文件、信函、交通工具、广播器材、占用的

房屋、积存的资金等。

与此同时，青海省军区调动独立师、独立团的部队，计 13 个连，团团围住《青海日报》社印刷厂。赵永夫亲临宾馆四楼指挥，后为安全，又到了二楼。

但“八一八”仍不屈服，而且情绪愈加狂热。北京红卫兵的广播车针锋相对，不断呼喊“革命不怕死，怕死不革命”。印刷厂内“八一八”的高音喇叭更是破口大骂，什么“把披着黄皮的保皇狗赶出去!”“砸烂省军区一小撮混蛋领导的狗头!”等等……这更激起了部队官兵的冲天怒气，上午 11 时，部队一枪打哑了报社外“八一八”的广播喇叭。接着，他们将外面能看到的喇叭全部打哑。

《青海日报》印刷厂周围出现了暂时的寂静。战士们握着弹已上膛的枪，紧张的等待着。

下午 14 时，宾馆附近两颗信号弹升空，这是开始行动的信号。按照计划，前面的战士开始向印刷厂运动，准备强行接管报社。

可能是过于紧张，突然一声枪响，不知谁的枪走火了，前面一位战士应声倒地。难道是“八一八”开枪了？只有几秒钟，又响了十几枪，紧接着，枪声大作，如同放鞭炮一般。早就窝了一肚子火的战士乒乒乓乓地放开了枪。

因为印刷厂周围的 5 个制高点都由部队占领，一处开枪，对面制高点的部队，误以为子弹是从报社大院里打出来的，当即还

击，部队从报社前面以及后面临河的桥头同时向报社院内密集射击，宾馆制高点上的重机枪也打了近百发子弹。四面枪声交叉齐鸣，局面无法控制。一场实力根本无法匹配的大屠杀就这样开始了。

守卫报社前院大门的是水利局的“八一八”成员，大门口的水文站 3 个人首先倒下，其中一位当场身亡。

报社西北角是湟水河大桥，守在桥头的是汽车三场、五场、六场的工人。不屈的工人手挽着手，高声朗读毛泽东语录：“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口号怎能抵挡射来的子弹？枪声中第一排工人倒下了，20 多人仅 3 人幸免。第二排依然不动，仍然高声朗读《毛主席语录》。第二排又倒在血泊中了，第三排仍然坚持……一瞬间，64 名手无寸铁的工人就这样死在枪口下。

不到 30 分钟，战斗结束，部队轻松地占领了 2000 多人守卫的报社印刷厂大院。只见雪地里到处是横七竖八的尸体，有的堆成了三层，皮帽子、棉帽子在风里滚动。火堆上也有尸体，有的大腿或是胳膊已经烧焦……

赵永夫、张晓川等人赶到现场，面对如此惨状，虽然是久经沙场的老将，心中也不由得紧张起来，因为他们面对的毕竟是一群手无寸铁的百姓。赵永夫立即布置下去，统一口径：

“是八一八首先开枪打死打伤我干部、战士 5 人，我们才开枪还击。”

“他们自己用机枪督战，打死 40 多名。”

这是因为，部队进攻时，水利局的“八一八”成员跑向过道躲避时，有几个人被设在临近科委大楼门口的一挺机枪从背后扫倒。所以，事后军队说他们“背上中枪，是八一八自己打的。”

周恩来处理青海事件时，有人汇报说：“一个小女孩身上中了 3 枪，解放军问谁打的。她说是解放军打的。那个人讲：‘你说是八一八打的，我就给你养伤治疗，你说是解放军打的就送你进监狱。’那个小女孩说：‘我看见是解放军打的。’于是被送进监狱。”

赵永夫立即命令部队开始搜缴“八一八”的枪支弹药。但是，将整个印刷厂翻了个底朝天，也没有找到一支枪，一颗子弹。总后青藏办事处政治部主任陈郁文非常焦急，在他的一再催问下，下面的人不知从何处搬来了一捆枪支交差。原来是各单位民兵的枪支。

军队也死了 4 人，是被参战的战士误伤的。由于印刷厂地势较低，前后仅百米见方，架在周围楼房和高地的机枪居高临下。部队从报社前面、旁边以及后面临河的桥头同时开枪，有战士被对面的火力击中是很正常的。据《青海日报》记者周衍庆目击：“有一个解放军战士背着另一个受伤的解放军战士，另一个解放军同志用手按成喇叭形呼喊：‘别打，是自己人。’这样对方才停止射击。”

部队进入报社后，先清理受伤人员，送去救治，再搬运尸体，

堆成若干堆，盖上帆布。

民族学院的学生损失也很惨重，有几十人死亡。除了民族学院和畜牧兽医学院外，“八一八红卫兵”死亡 12 人，其中最小的是 15 岁姓陈的女红卫兵。

“八一八”总联络站站长马集文也身中 5 弹，但他没死。

22 日晚，一个 7、8 岁的女孩给她守报社的爸爸送饭，由于天晚了，她爸爸不放心，没让她回去。第二天她爸爸中弹后，她扑在她爸爸身上痛哭不止。这时一梭子弹打过来，她就被当场打死。她爸爸至今尚在，谈起此事非常伤心。

后来周恩来接见青海代表时，清华大学学生许宝生汇报当时的情况时说：“一个解放军要我们举手，我们手挽手站成一排，他头一低，往后一退，用机枪扫射过来。当时我旁边的一个同志就打死了，另一个同学旁边的一个女同志的脑袋都打碎了。”

55 师还调去一个喷火器班。后来师政委知道此事，又通过师党委会，将喷火班调回师部。

2 月 23 日下午 14 时 30 分左右，报社内幸免于难者的人全部被押到操场，高举双手跪在地上。这时，“捍卫队”的人纷纷跑来，他们在被俘人群中走来走去，一遍又一遍地说：“是八一八先开了枪。”并且煞有介事地在一些俘虏堆中找机枪射手。

半小时后，解放军押着俘虏队伍由西向东，朝省委大院走去。只见这些人一个个灰头土脸，身穿蓝布羊皮大衣，大半是省公路局的工人，今天正巧轮着他们值班守卫报社。

最后落实死亡 169 人，伤 178 人。“俘虏”约 2000 人。

2 月 23 日下午，事态平息后，赵永夫给军委、周恩来、中央文革发了加急电报。

《青海日报》记者孙正荃在他的回忆文章《一个省报记者的生命档案》中写道：

这天上午，我正在总编室主任陈均家商量报纸版面事，突然，住在楼下的李家瑞慌慌张张地跑进来，气喘吁吁地说：今天情况有些异常，小桥（即报社北面湟水河上的桥）那边的部队硬是要往前逼过来，已经和守报社的群众发生冲突……话音未落，只听得外面已是枪声一片，我们不约而同跑到窗前，这里正面对操场，用现在一句时髦话说，真叫“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只见四面八方的人都朝我们这座楼房跑来，再一看，更使我们吓得面无人色：无数端着枪的解放军正在后面猛追，枪声过处，只见奔跑的人一个个扑面倒下……这时，老陈说，快，把门打开！同时嘱咐我俩只要听到门外有人喊“有人吗”、“出来”之类，就赶紧答应，举起手往外走。情节的发展恰如老陈安排设计的那样，几分钟后，我们就被解放军押到了操场上，那里已是黑压压的一片。从我现在珍藏的这张照片上看，地面是已有白花花的样子，我和另外五个人并排跪在一起（却没有老陈和老李），右侧是一位妇女，她怀里还抱着一个襁褓中的孩子；右上方远处就是我们刚才在的那座三层楼房，右边则是密密麻麻跪着的“反革命”，一眼望不到边。我前方的沙砾地上乱扔着几件棉袄和几顶帽子，周围

是端着枪的解放军，看得出来，他们在不停地走动。我们五个人中，三个没低头，而我的头则高高的抬着，我正是为此付出了代价：在监狱里，我才发现那棉衣上的斑斑血迹，好久好久之后，我一点一点地从头皮上剥落已经结了痂的血块，我记得，那是另一位解放军发现我没有低头而用枪托留给我的“教训”，完全不能责怪这些年轻人，他们是刚刚服从命令赶到西宁来“镇压反革命”的！

傍晚开始，雪越来越大了。大约到天擦黑的时候，我们一批人才被几个解放军带走，每个人都被捆绑着，然后用一根很粗的绳子“串”起来，出报社后门，沿着湟水岸边的小路，踏着嘎吱嘎吱的积雪，走走停停，只要停下来，马上命令“跪下”或“蹲下”。我们看到河对岸架着一挺又一挺机枪，心想，莫非我们这些人的生命已经走到头？半夜时分，我们才到了其实和报社在同一条马路上的仅有四五百米距离的省公安厅大院。（记得这时我问了问身边的人：“有表吗？几点了？”他艰难地拉开棉袄，说：“11 点多了。”）又不知跪了多长时间，终于，我们被先后推上或拉上了大卡车。车上，四周看看，朦朦胧胧中似乎没几个相识的，看模样，可能多是工人。在死寂的马路上“呜-呜-呜”地开了不久，便进了一个院子，接着再一拨一拨送进了黑乎乎的屋子。屋子不小，有上下两层联体木床，大家依次各就各位，后面还有站着的喊了一声“再挤进去点”，便又腾出了一点地方，最后各人都有了自己的三四十公分宽的一条安身之“床”。没想到半夜

里有一根梁断裂，上面的人连同木板都压在了下层人的身上，当场就有一个倒霉的家伙血流满面，“报告政府”后被抬了出去，是死是活，再没下文。

那夜，没有月亮。牢房里高高挂起的灯一直在晃动着，我想，屋外的雪一定已经很厚了，可是，这洁白的雪能掩埋得住那腥红的血吗……

我开始了平生第一次的牢狱体验。那时，我大学毕业不满十年，还不到三十足岁，怎么会想到，新中国的第一代大学生，共产党培养出来的“党的喉舌”一夜之间竟成了反革命？

## 第 526 回：西宁市，牢狱内人满为患 维系□，广东“省□联”解散

在赵永夫向中央报告西宁事件前，总参作战部已经首先得到了西宁部队开枪的消息，但不是从部队的作战系统汇报上来的，而是二机部西宁 221 厂上报的。

原来，二机部 9 院正在西宁的二机部下属 221 厂召开 1967 年科研生产计划会议，全国核武器的精英在这里参加会议。221 厂技校的一些学生卷入了“223 事件”，当在校的学生听到部队开枪的消息后，群情激奋。主持会议的负责人害怕引发其它事件，立即向总参作了汇报。当天下午 14 时，总参作战部打电话给兰州军区，询问青海西宁发生了什么事？为什么军队、地方电话都打不进去？

兰州军区并不知道西宁发生了什么事情，立即给青海省军区打电话，也是打不进去。最后，只好通过兰州军区空军系统的电话，这才迂回接通了青海省军区的电话。

接电话的是青海省军区副政委王文英，当时他还不太了解情况，经他与赵永夫联系后，回话说：“西宁市‘八一八’群众组织发生武装暴乱，首先开枪打死打伤干部战士，军队为了自卫，实行了还击，现已平息暴乱。”

当天 17 时许，负责二机部的国务院副总理聂荣臻办公室接到总参作战部的电话：“今天上午 8 时 17 分至 11 时 42 分，西宁发生了大规模武斗，出现了重大伤亡。”

晚20时许，叶剑英打电话向青海省军区副司令员赵永夫询问这一事件的发生过程，赵永夫报告说："占据报社的人开枪寻衅，军队反击，胜利地平定了反革命暴乱。"

叶剑英称赞说："你们打得对，打得好。""军委支持你"，并要他"彻底肃清残余的反革命"。

但不知为什么，消息到了西宁大街上，"叶副主席"变成了"林副主席"。 当晚，西宁大街上贴出标语："林副主席来电：你们打得对，打得好！"

林彪的秘书向林彪报告说："青海方面的报告，占据报社的那些歹徒向包围他们的部队开枪挑衅。部队被迫进行武力还击，一部分负隅顽抗的死硬分子已被击毙，其余的人已被驱除报社，一场反革命暴乱已被平息下去了……"

林彪听完，没有任何表示。秘书接着说："西宁传说'林副主席来电：你们打得对，打得好。'"

林彪听了，笑了笑，仍然没有说一句话。

21 时 30 分，聂荣臻叫二机部部长刘西尧过来，一起去向周恩来汇报，请示如何处理正在 221 厂召开的会议？

此时，周恩来在毛泽东处汇报，叫他们稍后再来，聂荣臻因为身体不好，就提出了自己的意见：

一、应该对 221 厂实施军管，防止西宁的武斗蔓延到该厂。

二、立即通知技术专家撤退到西宁军事基地加以保护。

三、221 厂各战斗组织、驻厂警卫团、某高炮师、某军事基

地各派两名代表，来京汇报工厂运动情况和商谈军管问题。

四、221 厂警卫团要保证酝酿中的厂区游行示威不出任何问题。

刘西尧表示完全同意聂荣臻的意见。

24 日凌晨 1 时，周恩来找刘西尧汇报西宁事件及 221 厂的问题。

周恩来听汇报后指示：

一、要把有关的情况弄确切。

二、同意军事接管 221 厂，请聂荣臻起草文稿报批。军管前先找各方代表谈一谈，听听他们的意见。

三、二机部党委要开次会，对有关的情况和问题，上报党委的看法。

听了周恩来的指示，聂荣臻命青海某军事基地司令贾乾瑞负责，就地把情况弄准确；同时要二机部按原定计划通知各方代表来京开会；正在 221 厂召开的技术工作座谈会，为了专家安全，移到北京来开。随后，他即起草了对 221 厂实施军管的报告，报林彪、周恩来，获得批准。

技术工作座谈会移北京开的通知下达后，当天，24 日，飞机将朱光亚等核专家接回北京。

2月24日，叶剑英向毛泽东报告了青海的开枪事件。

24日上午，冼恒汉和张达志电告青海省军区，要省军区领导立即赴兰州汇报，并派飞机将青海省军区副司令员赵永夫、副政

委王文英及55师师长陈如意接到兰州。

事后，冼恒汉和张达志为了证实军委是否支持此事，立即向军委发电报请示确认，但始终没有得到答复。

2 月 23 日当天，部队在“捍卫队”等组织的配合下，也包围了青海大学畜牧兽医学院“文革筹备处”、人民剧院“红宣兵”团部、党校“红色造反团”等“八一八”组织所在地。公安厅的群众组织“红色公安”按照名单，将这些单位的“八·一八”头目一一逮捕归案。青海大学畜牧兽医学院副院长达洛、“八一八”主要负责人刘明乾等 5 人被抓。

第二天，2 月 24 日半夜，枪声再次在青海民族学院响起。这天白天，1000 多“捍卫队”队员包围了青海民族学院，民族学院的“八一八”组织“十一战斗团”不让他们进去，双方对峙了一天。夜 24 时，两个连的部队开进青海民族学院，包围了西边四幢学生宿舍楼。一名排长带一个班进入楼房搜查，学生拒绝开门，战士鸣枪示警。楼外的部队以为红卫兵开枪了，遂向楼上开火，打死 3 人、打伤 9 人。当晚逮捕了 20 多名“十一战斗团”的负责人，把 800 多红卫兵赶出大楼，让他们在刺骨的寒风中，高举双手，跪了 5 个多小时，天亮后才予释放。

24 日，部队组织人们到报社参观“反革命尸体”。他们还押着刘贤权、青海省军区副司令张江霖及其家属到现场参观、认罪。死难者大都是青年工人和十几岁的学生，尸体堆积如山，院墙上、木桩上、树干上到处血迹斑斑，有的尸体还在燃烧，发出熏人的

恶臭。

面对如此残酷的镇压，“八一八”当然不服，许多没有被逮捕的“八一八”成员和北京红卫兵纷纷赴京告状控诉。此时火车站等一些进出西宁的要道已经被戒严，他们只得想办法绕道进京。

部队占领《青海日报》后，由“捍卫队”掌权。24 日报社没有报纸，25 日恢复出版。上面连篇累牍的登载批“八一八”的文章。

接下来的日子，青海从上到下，各单位清理“八一八”，抓捕其骨干及重要牵连人员。捕人的汽车在西宁街道往来奔驰，汽车站、火车站布满便衣警察，严防“反革命”外逃。前后共抓 10157 人。其中逮捕 4131 人，拘留 2522 人，看管 3504 人，另外 15 人自杀。

牢房爆满，一个牢房两层铺，原来最多住 24 人，此时已塞进了近 80 人，甚至有的塞进 100 多人。有一所监狱由于关人太

多，上层铺坍塌，压碎下面一人的脑袋，当即死亡。

为适应需要，监狱还在不断扩大……

在逮捕了第一批反革命后，剩下的“八一八”成员，就交给了“群众专政”。把誓不两立的两派中的一派群众，交给另一派群众去专政，其后果可想而知。大小单位都成立了类似“镇反指挥部”之类的专政机构，设立了“劳改队”、“临时拘留所”和“牢房”。他们要在“八一八”组织中“收集枪支”、查获“暴动计划”、寻找“杀人黑名单”。他们的口号是：“坚决镇压反革命，决不施仁政”。于是捆绑、吊打、大头皮鞋踢、跪雪地、跪三角铁、烟头烧、火烤、烙铁烫、针扎、过电、穿针、手指夹筷子、活人打夯……种种刑罚，都被花样翻新地施展出来。

西宁铁路局“八一八铁道造反团”共 3000 人，被斗的 1884 人，打成轻伤的 214 人，重伤 54 人，监督劳动 544 人，被捕入狱 114 人，抄家 114 户，逼死 1 人，被打流产 3 人。

青海氮肥厂只有 150 名“八一八”，逮捕的就达 60 人。

青海民族学院把 150 名师生排为四类，轮番批斗。一类拟送监狱的 37 人，二类戴上反革命帽子、开除公职回乡劳动的 47 人，三类批判斗争给予处分、留校监督改造的 39 人，四类经过批判斗争予以解放的 27 人。

在贵德县，武装部执行西宁卫戍区司令部命令，对全县“八一八”造反派组织头目及部份成员，逮捕入狱；连原副县长曹廷九也被扭送监狱。

为大造声势，3 月 8 日，西宁召开公判大会，其中枪毙两名 1966 年上半年最高法院核准的死刑犯，一个是杀人犯，另一个是组织反动教会组织。文革开始后顾不上俩人了，一直拖了下来。现在利用这个时机才执行死刑，以震慑“八一八”。

此时，广州军区与广东“省革联”的矛盾，已经处于白热化状态。军区将“八一战斗兵团”、中大“红旗”、珠影“东方红”、“省联站”排了队，并定了性质：

“八一战斗兵团”，名义上没有参加“省革联”，实际上是“省革联”的主要成员，是一个网罗了一批坚持反动立场的地主、富农和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反革命修正主义、美蒋特务和流氓、投机倒把分子作骨干，进行反革命活动的反革命组织。

“中大红旗”，在坏人幕后操纵下干了许多坏事，与湖南反革命组织“红旗军”的头目王××来往密切。

“珠影东方红”（已勒令解散），其多数成员政治历史非常复杂，有国民党特务、历史反革命分子、投机倒把分子等，据已知的 18 个领导成员中，政治历史复杂的就有 15 人。

省直属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其骨干成员多是政治历史不纯、右派分子、反党分子和运动初期挨过整的人。

2 月 19 日，“地总”在省体育场召开“坚决拥护中央军委八条命令和坚决反对把矛头指向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大会，会后举行了示威游行。群众中的反“省革联”的情绪高涨，齐声高喊“踢开省革联，彻底闹革命”。

这天，为响应中央“大联合”的号召，由广州“红旗工人”、“一司”、“三司”等组织发起的“广东省革命造反联合总指挥部”，简称“省联总”成立，有工人、农民、学生、机关干部、职工约30万人参加。

就在这天下午，在反“省革联”的高潮中，中科院中南分院“造反总部”突然宣布“火线加入省革联”。他们宣称“要像马克思对待巴黎公社那样对待省革联”。当晚，他们派了5名代表到“省革联”，申请加入。危难之中，“省革联”如获至宝，立即邀请他们参加当晚的常委扩大会议。会上决定：一、把工农群众分区组织起来，用农村包围城市的办法，发展巩固阵地。二、2月22日召开一个万人支持“省革联”大会。中科院中南分院“造反总部”随即到海珠区与珠影“东方红”共同筹组“河南区联络总部”，准备把这个总部变成“没有省革联的省革联”。

2月21日，是支持“省革联”大会前夜，“省革联”的各有关组织都搞了“支持省革联统一行动”，就是在全市到处贴标语，发传单。也就在这一天，广州军区联合办公室断然宣布，“省革联”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代表”。当“省革联”在大街上贴出“省革联就是好，气死大老保”的标语后，马上被人用“省革联就是坏，气死保皇派”的标语覆盖。

当天，“红旗工人赤卫队”、“广州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广州三司红旗工人总部”、“广州工交战线红旗革命造反总部”、“广州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合总部”、“广东省政法革命造反委员

会”、广州“一司”、“三司”等组织宣告成立“广东省革命造反联合总指挥部筹备委员会”，同时成立“广东省生产临时指挥部”。

接着，在 2 月 21 日和 22 日两个晚上，各群众组织在中山纪念堂和越秀山体育场集会。集会原定在中山纪念堂召开，但由于到会群众太多，容纳不下，临时决定改在越秀山体育场开。不多时，能容七、八万人的体育场已经全部坐满。开始的发言不甚激动人心。然后北师大“井冈山”联络站谭某上台了，自报北师大“井冈山”，引起一阵欢呼。他的发言慷慨激昂，条理鲜明，历数“省革联”的罪状，说“省革联”不是革命的夺权而是阶级调和，排斥大联合以及把数千造反派警察打成反革命等等。这位优秀演说家每数一条罪状的最后，都要安排一个煽动性的自问自答句：“这难道是大方向正确吗？不，一千个不正确，一万个不正确！”每问之后就是山摇地动般的欢呼和响应：“一千个不正确，一万个不正确！”下面的“1.22 警察”更是激动地把大旗舞得哗啦啦响。

高一学生王希哲一见不妙，立即上前站到话筒前面就要发言，不料一个面圆圆的小个子把他挤开说：“我是中大的，我先说几句，”他把双手插在一件敞开的旧棉袄里，傲然地自报家门：“我是中大红旗的张尔纲。”也引起一阵欢呼，但他似乎意识不到谭某刚才的犀利发言造成的反“省革联”派的压倒气势会带来的严重后果，没有针锋相对地予以反驳，却仍是自话自说地讲了一通“1.22 夺权”的过程和“省革联”不怕压迫的空话，结果

引起一阵又一阵的倒彩。他刚讲完，主持人便宣布散会。原定的“支持省革联大会”，变成了关于“省革联”问题的大辩论，从此，便一蹶不振。广州的大街小巷除了倒吊着写着“省革联”的稻草人外，再也听不到支持“省革联”的一点声音了。

四面楚歌的“省革联”已经腹背受敌，陷入穷途末路。下属各组织要么宣布退出“省革联”，要么与“省革联”断绝关系，要么急急忙忙向军区请罪。

2 月 21 日，“省革联”把办公地点，从区梦觉家迁到中山大学。属下的一些组织，开始纷纷转移，“由公开到秘密，由集中到分散”，甚至有人提议在河南建立“延安式”的根据地，在市郊发展力量，以农村包围城市。但这一切，不过是空谈快意，“省革联”的历史使命，实际上已经告终。

在舆论的巨大压力，2 月 23 日，赵紫阳不得不在省委大院贴了一张大字报，对省委夺权问题做出说明：

1 月 22 日，“省革联”向省委夺权，我当时的中心思想是：

一、认为夺权是大势所趋，是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号召，造反派起来夺权是革命行动，应当支持；

二、当时出面的是中山大学“八三一”和红旗公社，武汉大专院校驻穗联络站的红卫兵，还有哈军工和北航“红旗”驻穗联络站等，我一向认为这些单位是造反派，既然是造反派夺权，我认为只能支持，不能抗拒；

三、对当时广州地区造反派的大联合，我是不清楚的。听说

他们有很多单位参加。根据当时情况和我处的地位，不可能先问他们大联合的情况，然后再去决定对夺权是否接受；

四、在 1 月 22 日之前，《红旗》杂志和《人民日报》关于夺权的一些重要社论和一些省的经验，当时没有公布夺权是怎样夺法，我心中无底。

2 月 24 日，“八一战斗兵团”也发出通知，要求省内各地分部与总部脱离从属关系，希望在即将降临的打击中，保住各地的基层组织。2 月 27 日，他们又紧张地开会讨论改名，有人建议改为“工农战斗兵团”。但这一切不过是自欺欺人，殊无意义。为了保存实力，2 月 25 日，刚刚才火线加入“省革联”没几天的中科院中南分院“造反总部”，也宣布“踢开省革联，彻底闹革命”了。

2 月 24 日，毛泽东看了广州军区 2 月 23 日给中共中央军委的报告后批示：“总理：请告广州军区，查一查赵紫阳、区梦觉二人政治态度如何，其他省委书记、常委如何，是否可找赵、区二人来京和陈郁、黄永胜一道谈一次，加以开导。”

2 月 27 日，周恩来给毛泽东写报告说：“昨日与广东来京同志座谈了一天。广东方面同志有黄永胜、陈郁、赵紫阳、陈德、区梦觉等七人。

今晚，我们在文革碰头会上讨论了广东问题，一致建议：广东立即实行军管，准备筹建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目前以黄永胜为主、陈德为副，主持广东全省工作，帮助省委同志检讨，估计

有一些同志可得到群众通过。云南情况，与广东颇似，拟亦先行军管，准备三结合的条件。”

毛泽东阅后，批示：

总理：

同意这样做。

毛泽东

二月廿八日一时

次日，周恩来接见广州军区及广东省党、政、军负责人，宣布由广州军区和广东省军区组织对广东省实行军管，下设两个班子，一个抓文化大革命，一个抓生产。

2 月 28 日，广州警备司令部发布布告，对《广州日报》社实行军管。

2 月底，黄意坚和陈家吉等 6 人，到北京向中央汇报“省革联”问题。他们在北京呆了几天，没有一个人接见他们。开始他们还希望得到周恩来的接见，但最后这个愿望也落空了。

## 第 527 回：为春耕，周恩来写信检讨　海军乱，围报社“□楼事件”

春耕在即。2 月 20 日，周恩来征得毛泽东的同意，以中共中央名义发出《给全国农村人民公社贫下中农和各级干部的信》，号召广大贫下中农和各级干部要“认真抓革命、促生产，动员一切力量，立即为做好春耕生产而积极工作”，建议“人民解放军当地部队和各级军事机关，大力支持、帮助春耕生产”。

遵照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指示，中央军委于 2 月 23 日向各军区、各军兵种、各军事院校、各总部发出《关于军队大力支援地方抓好春耕生产的指示》，号召全军指战员“发扬既是战斗队，又是工作队、生产队的光荣传统，积极协助驻地农村人民公社和各级领导干部，抓好生产”；要求“各省军区、军分区、县武装部，把抓好春耕生产作为当前工作的重点，协助当地领导机关和人民公社，开好春耕生产会议，具体安排春耕生产落实”；要求“各级人民武装部门，动员全体民兵成为春耕生产的骨干，发挥民兵组织的生产突击队作用”；要求“各地驻军不失时机，以劳力、技术力量支持农业生产，并对破坏生产的各种活动，协助当地专政机关予以打击。”

2 月 23 日这天，周恩来把在京的各大军区、各省军区的负责人召集到京西宾馆，要求各军区立即行动起来，帮助地方抓好当地的春耕生产。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总政治部主任肖华参加了会议。

周恩来说:“军队的担子很重,不仅要处理好军队自己的问题,还要把地方的担子担起来，抓好工农业生产。当前比较紧急的工作是春耕生产问题，季节逼人。这个问题耽误了不得了，生产没人搞，没饭吃了，什么事情都办不成。当前的春耕生产由各大军区、省军区负责领导，要立即分两条线布置春耕生产。一是打电话传达布置；二是由省军区负责召开三级干部会议，军分区、县武装部来人参加。有的省、地、县已经瘫痪了，也要找几个人来。组织各级生产办公室,由军区领导同志汇总,吸收省的干部参加,最好是过去管农业的。也要吸收农林部门的同志参加，他们熟悉情况。”

会上有人提出:“现在省市领导干部大多被打倒,有的没有‘过关’，怎么办?”

周恩来说:“省、地领导干部有些没有过关的，也可以先出来工作，以后再过关。每个省总可以找出几个干部。今天是 23 号，要快一点，季节逼人。南方更要快一点，三级干部会议都要在 2 月底开完。会议不要开长，顶多两天，把中央的精神讲一讲，就说中央委托军区、省军区抓生产。对地、县都要抓，县一级是重点。省、地、县各级都以军事部门为主，党、政机关找几个领导参加，组成生产办公室。”

考虑到参加这次会议的仅仅是在京的大军区、省军区负责人，周恩来和与会的叶剑英、肖华商量，提议召开一个全军军以上政治干部会议，就军队帮助地方搞好春耕生产和“夺权”等问题再

强调和布置一下。

大家都同意周恩来的这一提议。叶剑英说："那就趁热打铁，25 日就报到，26 日开会。"

周恩来表示同意："可以，发通知来不及了，请示一下林彪同志后就以电话通知各军。"

2 月 22 日夜，刚刚由山西进驻陕西执行"三支两军"任务的 21 军突然接到国务院总理办公室打来的电话，要求军长胡炜于次日晨乘专机到北京领受任务。

23 日上午，胡炜乘坐国务院派去的专机抵达北京。下了飞机，便驱车前往京西宾馆。此时，京西宾馆正在召开在京的各大军区、各省军区的负责人支持地方春耕会议。胡炜由工作人员领进会场后，看到周恩来总理正在讲话。秘书走到周恩来的身边，低声向他作了报告，周恩来朝胡炜看了一眼，继续他的讲话。胡炜找了一个空座位坐了下来。

大约 11 点钟，周恩来讲完话，会议也就结束了。周恩来站起身，径直朝胡炜走来。胡炜双腿并立，腰杆挺直，以标准的军人姿态向周恩来敬了一个军礼。看样子，周恩来对于陕西省的局势比较焦虑，也没有另找一个场合与胡炜谈话，就直接给他布置了任务了。

周恩来说："西安现在很乱，大游行、大辩论、大喇叭。西安两派都是革命群众组织。你们部队到达西安以后，要尽力稳定形势。你们要做工作，促使两派群众组织联合起来。现在，西安

两派群众组织的负责人都在北京，你先和他们见见面，了解一下情况，做做工作。”

遵照周恩来的指示，第二天，24 日，胡炜先后前往教育部招待所和西藏自治区驻京办事处两地，分别与住在那里的西安地区进京的两派群众组织头头见面，和他们谈话，了解情况。

2 月 23 日下午，周恩来在怀仁堂召集中央碰头会，把召开军以上政治干部会议的打算和目的说了。叶群参加了碰头会。

晚上，周恩来将召开军以上干部会议的想法报告毛泽东。毛泽东表示同意，并指示每个军至少应该来两个人。

第二天下午，叶群从钓鱼台康生处给林彪的秘书张云生打电话说：

“我现在在钓鱼台，正在和 8 楼、11 楼商量一件大事。你快去向首长(指林彪)报告一下：最近，总理向主席建议召开军级干部会议，主席同意了。之后，总理才把这件事报告首长。这样做，就把首长架空了。首长是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副主席，又是国防部长，军内要召开这样大的会议，为什么不先经首长同意后再找主席呢?如果什么事都先报主席，后报首长，那还行吗?所以康老说，此例不可开。11 楼也同意康老的看法，认为这很危险。这个事，首长要有个态度。文革都在支持他，他不能老是不吭声，你快去报，我在康老这儿等着。”

“8 楼”和“11 楼”分别是康生和江青在钓鱼台的住处。康生住 8 楼，江青住 11 楼。

张云生立即把叶群的话报告给林彪。

林彪问张云生："叶群在什么地方来的电话?"

"钓鱼台，康老那里。"

林彪闷头来回踱了几步，吩咐说："告诉叶群，叫她马上回来。"

叶群被叫回到毛家湾，与林彪一番密商后，最后才与康生一起到毛泽东那里汇报此事，毛泽东表示："总理是应当先与林彪同志通通气。"但并不深究。话很快传到周恩来耳中，周恩来写信向林彪解释：

"林彪同志：

昨(23)日在京西宾馆邀集各军区同志会谈，请他们回本地后负责召开省、地、县三级以军区为主的会议，布置春耕工作，同时以电话通知来京的省军区照办。在讨论时，联系到无锡 31 军的要求，我与剑英、肖华两同志商量，提议召开各军政治首长会议，讨论帮助地方春耕和支持参加夺权斗争问题，当时大家都赞成。我说了请示林副主席后就以电话通知各地，剑英说 25 日报到，26 日开会。当日下午，我在怀仁堂碰头会上又提出此建议，夜间报告了主席，主席还指示每军应到两人，我并说要请文革小组参加指导。在这些报告中，我竟疏于检查剑英和我的秘书是否报告林副主席。下午，又未再向叶群同志在碰头会上打招呼，这是一大错误。"

秘书把周恩来这封信念给林彪听后，林彪颇为感动，当即口授一封回信："看到你的信，我深受感动。我应当向你的谦虚精

神学习……”林彪让秘书把信重念一遍后交代说:“叫叶群看看。”

当叶群看了林彪口授的复信后，立即去找林彪，大声的对他说：“这简直是开玩笑！写什么信？最多就打个电话就应付过去了。为什么给人家留下文字根据呢？”

在叶群的坚持下，林彪不得不把复信作废，另由叶群给周恩来打电话，以此“表示！表示！”

2 月，海军工程学院“红色造反团”联合其他院校造反派组织，以《人民海军报》在过去的几年中，刊登过不突出政治、不宣传毛泽东思想的文章，而登载了军事大比武等单纯军事观点的文章，是宣传资产阶级军事路线为名，要查封《人民海军报》。

事前，他们征求肖劲光的意见，肖劲光说：“必须得到海军党委的同意。”他们又去征求李作鹏的意见，李作鹏说：“如果你们掌握的材料充分、确实，就交给海军党委，经我们调查后，如《人民海军报》确有方向错误，由海军党委决定是否查封。”他又说：“你们应做贯彻执行军委《八条命令》的模范，不要做违反军委《八条命令》的事情。”“你们要相信海军机关的广大群众，你们应按军委《八条命令》的要求，停止在北京的串联，尽快返回原单位。”

2 月 16 日晚 22 时左右，这些院校的 100 多人，不顾警卫的阻拦，高呼“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口号，浩浩荡荡，旌旗招展的冲进海军领导机关办公大楼，直奔第五层楼，查封了人民海军报报社的编辑办公室，而且在楼道内

静坐示威，并在墙上刷写大标语。而其对立面组织“红流”则组织人马，把查封海军报社的院校学生重重围困在办公楼的楼道里，水泄不透。双方情绪激动，武斗一触即发。

因为海军机关办公大楼是黄颜色的，俗称“黄楼”，所以这件事情也又称“黄楼事件”。

作为海军领导机关办公地，海军主要领导人的办公室和作战指挥室、保密机要室等要害部门都在黄楼内。事发突然，李作鹏得知情况后，立即通知海军的主要领导到他家开党委紧急会议，因为当时已无法在办公室开会了。17 日凌晨，海军党委做出四条决定：第一、双方不允许武斗；二、双方立即撤离现场；三、双方有什么不同意见，提交海军党委处理；四、凡是报社的文件、材料一律就地查封，任何一方不准将材料带离现场。责成海军文革领导小组办公室到现场传达海军党委的决定。

这天，虽然现场没有发生武斗，但双方也无撤离现场的迹象。但是，外围的“红流”派不准给参加查封报社的院校学员们送饭送水。李作鹏亲自到各层楼道做说服工作，无效。

21 日，海军党委下达命令：“为了维护中央军委八条命令和军委 2 月 8 日通知的尊严，命令你们参加围困的战斗队组织立即撤离现场，否则海工‘红色造反团’等组织的同志不能按期和尽快返校的责任，由不执行命令的战斗队组织的负责人承担。”

与此同时，海军领导与院校造反派代表谈话，反复做工作，告诉他们：“你们冲击军队领导机关和要害部门，擅自查封海军

报社的行为是极端错误的，是违背军委《八条命令》的，如果你们不立即撤出办公大楼，后果自负。”

围困行为一直持续到 24 日。在海军党委强大压力下，冲击海军报社的院校造反派和围困他们的对立面组织，终于撤离了黄楼，

刚刚解决“黄楼事件”后不久，秘书转给李作鹏一封群众来信，信中说到：“齐勇被海洋局造反派抄了家，天天被挂着黑牌子、带着高帽子游街。造反派拳打脚踢的批判他，人都快被打死了。救救他吧！”

国家海洋局局长齐勇，原是南海舰队主管海防工程建设的副司令员，文革前调北京任国家海洋局局长，是参加过长征的老红军，与李作鹏关系很好。李作鹏一看这封信，火气上涌，“这么兢兢业业，埋头工作的好干部，调北京工作还不到两年，也被批斗？简直是岂有此理！”李作鹏立即让秘书将海军文革办的人找来，对他们说：“你们立即与海洋局联系，了解一下齐勇的情况，一定要找到齐勇的下落，立即向我报告。”并对秘书交待说：“你每天都要与文革办联系，一有齐勇消息立即报告。”

国家海洋局是国务院与海军双重管理，以国务院为主。过了几天，海军文革办的人向李作鹏报告，仍没有找到齐勇的下落。据他们了解，批斗齐勇的主要是海洋局中的地方造反派，但也有海军院校造反派参与。齐勇是什么时候开始被批斗、批斗的具体情况、造反派把齐勇抓到什么地方现在都不清楚。他们还说，据

了解，来信中反映，批斗中搞武斗的情况是属实的。

听了文革办的情况反映，李作鹏决定亲自与海洋局各造反组织的头头谈话，尽早将齐勇保护起来。

很快，海军文革办就将海洋局各造反组织的头头召集到黄楼会议室。会上，李作鹏说："齐勇有错误可以批判。但海军党委的态度非常明确，坚决反对在大批判中搞武斗。齐勇是海军干部，你们可以将齐勇的问题写成材料，交海军党委处理，海军党委处理不了，我呈交周总理。"他说："齐勇现在身体有病，需要尽快住院治疗，你们要先放人治病，不然是要出人命的。"

那些造反派首先要李作鹏承认他们批斗齐勇是"革命行动"，说齐勇"顽固坚持反动立场，是罪该万死"。

李作鹏拿出军委《八条命令》，要求他们说："今天必须交出齐勇，其他的问题以后再说。"

这可惹恼了这些造反派，他们指责李作鹏说："海军党委压制了海洋局的运动，保护走资派，是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我们不仅要造齐勇的反，也要造海军党委的反。"他们说："我们不执行军委命令，也不执行你的命令。"并高呼"造反有理，革命无罪"的口号，会议现场一片混乱。

李作鹏又气又急，当场犯了心脏病。门诊部的医护人员赶紧来到会场抢救。病情稍稍微缓和后，医护人员把他送回家。李作鹏一边躺在床上吸氧，一边告诉秘书："让海军文革办起草一份有关海洋局齐勇情况的报告，立即送周总理办公室和全军文革办

公室。”

几天后，齐勇跳楼自杀。

尔后，秘书转来齐勇爱人的一封信，上面写道：“齐勇是个勇敢的战士，他已经不在人间了……”

看到这里，李作鹏当着秘书的面，黯然泪下。

虽然海军领导机关文革形势有了变化，但海军某院校有个“镇虎口战斗队”和海军机关的“红流”、“红司”、“毛泽东思想战斗队”等造反组织联合在一起，对李、王、张的冲击围斗仍未停止。

2 月 3 日，他们 100 多人突然包围和占领了王宏坤的家，让王宏坤站在雪地里几个小时回答问题。李作鹏知道情况后，立即给林彪打电话请示，林彪指示先让王宏坤到京西宾馆避一避。李作鹏又把王宏坤的老婆孩子接到他家里避难。但造反派仍不撤离王宏坤家，称：“要与海军党委对话，不对话坚决不撤离”。李作鹏亲自动员“镇虎口战斗队”先撤出王宏坤住宅，再与党委对话，但他们根本不听。

2 月底，“镇虎口战斗队”占领王宏坤家 20 余天，李作鹏以海军党委名义，把“镇虎口战斗队”占领王宏坤住宅及其活动情况报告了全军文革，并建议将这伙人全部逮捕。全军文革很快就批准了逮捕的建议。李作鹏请肖劲光出面最后一次做工作，或下命令要他们撤出去，如果再不撤出，就布置捕人。经过肖劲光出面做工作，“镇虎口战斗队”第二天从王宏坤家撤走了。

## 第 528 回：几周折，上海□委会成立　生活会，□、谭、徐接受批评

2 月 8 日，上海有一个“上海市对外经济联络局革命造反委员会”的小组织，在这天发布了一个《砸烂“等级”、“职称”旧制度》的通令，后来称之为《二·八通令》。并“向总理、国务院、中央文革小组，伯达、江青同志，新华社”发了通令的电报。通令要求“统统取消‘长’字，统统取消级别，废除局、部、处、科各级行政领导职称”，“我们不要什么‘长’，大家一律平等”，“当权派一律靠边站，当权派没啥了不起，这副担子我们也能挑”等等。

张春桥收到国务院转来的《二·八通令》电报后，在 2 月 24 日上海召开的“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进一步开展三结合夺权斗争誓师大会”上 ，驳斥了《通令》的观点。他说：“一切带‘长 ’字的都是骑在党和人民头上，我说这句话是反动的，那么我们的国防部长林彪同志也骑在党和人民头上吗？”

大会结束后，上海“上海市市级机关革命造反联合委员会”专门发了一个“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彻底批判无政府主义反动思潮、彻底清算‘二·八’反动通令”的《大会特刊》。

革命导师毛主席
讨无政府主义

彻底批判无政府主义反动思潮

大会特刊

“上海市对外经济联络局革命造反委员会”在这张《大会特刊》上刊登了一篇“向毛主席请罪电”， 表示“欢迎革命组织批判我们错误”，从此再未见影踪。

1967年3月24日　　大　会

向毛主席請罪电

我們最最敬爱的偉大領袖毛主席：

二月八日，我們向总理、国务院、中央文革小組，伯达、江青同志，新华社，拍发了一份报其錯誤的电报，即«砸烂“等級”、“职称”旧制度»通令。这是一棵大毒草。

我們背离了您老人家关于阶級分析的教导，背离了以您老人家为代表的革命路綫。砸烂“等級”、“职称”，这是否定一切，粉斥一切，打倒一切的无政府主义反动思潮集中表現。

您教导我們：凡是錯誤的思想，凡是毒草，凡是牛鬼蛇神，都应該进行批判，决不能让它們自由泛濫。

現在，我們以万分沉痛的心情向您老人家請罪。

我們决心改正錯誤：

一、遵照您老人家的教导，按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級文化大革命决定，結合紅旗第三、四期社論等有关文件，挖掘我們錯誤思想的根源，达到肃清錯誤思想，认識錯誤。

二、向全局造反队战士、革命同志公开檢查錯誤。让群众严肃批判我們錯誤思想、錯誤观点。

三、向社会上广大革命群众公开承认錯誤，以肃清由于我們的錯誤所造成的恶劣影响。

四、开門整风，全面揭发、檢查、批判存在于我們思想、工作中的錯誤。

五、今后牢牢記住林副統帅的号召，讀您老人家的书，听您老人家的話，照您老人家的指示办事。

关心国家大事，把无产阶級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敬祝

您老人家万寿无疆！万寿无疆！！

請罪者：上海市对外經济联絡局革命造反委員会全体委員

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五日

最　高

2 月 23 日，上海市以革命委员会的名义公布了第一个决议草案：《当前上海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和任务》。

2月24日下午，上海在文化广场又一次召开了百万人集会，庆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成立！

大会由姚文元主持，张春桥在大会上传达了毛泽东对上海“一月革命风暴”的赞扬和支持，他说：

“同志们，战友们，你们好！

刚才姚文元同志说了，我们最近到北京去了。我们是 12 号去的，是毛主席要我们去的。”

全场响起雷鸣般的掌声和“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的欢呼声。

接着，张春桥又自问自答的说道：“有一张大字报问张春桥为什么又到北京了呢？那我现在可以答复：是毛主席要我们去北京的！”

掌声再次响起。

张春桥继续说：“我们到了北京以后，毛主席当天很快就接见了我们。后来，主席又召集了中央会议，讨论了上海的工作，还有其他的问题。在我们离开以前，毛主席又接见了我们。刚才姚文元同志说了，我们首先应该向同志们汇报的就是：主席的身体非常非常健康！”

群众高呼：“听毛主席的话，不折不扣执行毛主席的最新指示！”

张春桥：“我们每一次谈话的时间都是很长的，但是主席的精力非常旺盛，始终都很愉快。每一次谈话，他对上海的情况非常熟悉，好多上海的情况只要我们提一句，主席就知道了，他就可以讲一些地方的情况，非常关心上海的文化大革命。我们在北京一个星期，每天都感觉到这一点。我们知道，主席在短短的时间里面一再地接见我们，这不只是对我们两个人来说感到光荣，

我们知道我们是代表上海的革命造反派去的，我们代表在座的同志们去向毛主席汇报的。”

掌声、欢呼声四起：

“毛主席最坚决地支持上海革命造反派！”

“毛主席万岁！”

“毛主席万万岁！”

张春桥的讲话中，几乎每句话都提到了“毛主席”，他的讲话引起了全场强烈的反响。

徐景贤宣读了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决议，与会者一致举手通过。会后，一辆彩车到外滩，挂上了“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牌子，把“上海人民公社”的牌子又送进了博物馆。

1967 年 2 月 24 日改称上海革命委员会

这一回，《人民日报》终于刊登了“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成立的消息，并使用了颇为亲切的语言：“上海市革命委员会领导成员张春桥、姚文元以及其他领导同志出席了大会……”

新华总社也还向全国发了电讯。

2 月 25 日，上海“工总司”抓了“二兵团”的耿金章。

2 月 9 日下午，耿金章的“上海革命造反派大联合委员会”成立后，2 月 11 日，“工总司”就发表了《211 通告》，明确“本部不另设兵团”，“今后不准任何组织、任何成员盗用我部名义，扩充人马，组织兵团”。

2 月 12 日，耿金章组织了 110 辆卡车全市大游行，高呼：

“打倒王洪文！”

“打倒潘国平！”

“打倒黄金海！”

游行到 31 棉和 17 棉时，还特别在厂外转了两圈，声势很大。他们还在全市贴满大标语要和王洪文电视大辩论。

张春桥从北京回到上海后，王洪文找到黄金海，对他说：

“时间差不多了，可以把耿金章抓起来了。”

黄金海问王洪文：“这个事情到底张春桥同意不同意？不要弄得像上次一样。”

原来，“二兵团”曾在长寿路永福路搞了一个办公室，黄金海没同王洪文商量，就从闸北分部调了两卡车人，准备砸了这个办公室。结果被王洪文派的人拦住了。黄金海问为什么？来人说：

“是春桥同志的意见。”

黄金海没辙，只好把队伍解散了。所以这次黄金海有这么一问。对此，王洪文回答说：

“这是春桥同志的意见。”

黄金海说：“既然是春桥同志的意见，我来办。”

2 月 25 日，黄金海给耿金章打电话，约他到 31 棉来同王洪文商量电视辩论一事。上午 9 时，耿金章准时来到上棉 31 厂。一下车，黄金海就与他抬杠、辩论，耿金章要王洪文出来。但是约耿金章到上棉 31 厂一事是黄金海自己安排的，王洪文并不知道，也不在 31 棉。黄金海就骗耿金章说："我先和你辩，我辩不过你，再叫王洪文出来。"说着，将耿金章推上了事先准备好的卡车，送到了杨浦公安分局。王洪文给杨浦公安分局"人革会"的造反派写了张纸条，要他们收审耿金章和"二兵团"的另一个常委孙玉喜：

杨浦公安分局人革会：

李士贵同志：北上返沪二兵团的队员为了维护造反派大联合，回到工总司怀抱，故于今天早上造了负责人的反，二兵团负责人耿金章，孙玉喜系挑动群众反张春桥同志，反工总司的罪魁祸首。因为种种原因，我建议暂关杨浦公安分局。没有我的同意，任何人不得放出，材料来源，一方面见原来传单，我们再继续整理。

工总司王洪文 67.2.25

就在耿金章被捕的当天，"二兵团"所羁押的陈丕显、曹荻秋，也被"工总司"接管。

当晚，负责"工总司"总部日常工作的保温瓶二厂范佐栋也被抓。

这天晚上，"工总司"的整风会议在乌鲁木齐北路 456 号静安

区文化馆底楼举行，由范佐栋主持。会前，王洪文若无其事地给范佐栋递了支烟。开会了，王洪文发言，他说范佐栋三天前的那个决定，是分裂“工总司”的宫廷政变。话音一落，一群人一拥而入，将范佐栋抓起来，送进杨浦公安分局，就关在耿金章隔壁一间。

原来，由于王洪文身兼市革会的工作，所以不常去“工总司”总部，那里的日常工作由潘国平和范佐栋负责。但潘国平也整天在外。为此，范佐栋对王洪文和潘国平很有意见，曾对总部其他人员说，这两人老不来总部，再这样下去，要把他们开除出总部。范佐栋还曾对陈阿大表示：“只要你们支持我，我愿意撑大旗，出来干一场。干得好干下去，干不好，回厂劳动也没有什么了不起。”陈阿大将范佐栋的话告诉了王洪文。2 月中旬，范佐栋和 147 服装社徐美英等商量后，在 23 日的总部工作人员会议上宣布：所有“工总司”常委和负责人都必须回总部机关坐班，三天内不回来者除名。这个决定以总部全体工作人员名义作出，贴在办公大楼三楼的走廊上。戴立清和叶昌明连夜向王洪文汇报。第二天，王洪文通知总部各组负责人开整风会议，于是就有了 5 月 25 日晚上的一幕。

随后，黄金海在《造反报》上写了一篇《耿金章是何许人也》，“工总司”总部也发了通知，“二兵团”被撤消。“二兵团”基层队原来就是“工总司”所属，合并工作很顺利，没出现什么反复。

接着，黄金海又按照王洪文的吩咐，到“工三司”人员最多

的上海第七纺织机械厂，找到造反队负责人秦爱芝，劝说她造“工三司”的反，挂钩“工总司”。当晚，秦带人砸了“工三司”总部，声明只承认“工总司”，不承认“工三司”。“工总司”总部马上表示“支持他们的革命行动”。“工三司”负责人陈鸿康见大势已去，潜逃在外。几个月后，被“工总司”的岑麒麟发现，也关进杨浦公安分局。

“一兵团”负责人戴祖祥闻讯后东躲西藏。“战到底”负责人孙福样告诉他说，广州有很多人偷越香港，两人便打算一起南下广州，寻找逃港机会。孙福祥还特地卖了手表作路费。但是，他们俩的逃港计划没能实现。3 月 4 日，戴祖祥躲到“一兵团”的一个造反队员家里，这人报告了“工总司”总部。3 月 15 日，戴祖祥去厂里拿工资，被几个人架走，送去第一看守所，不过只关了一晚便被放了。孙福祥自知无法逃脱，给王洪文和潘国平写了一封信：

根据春桥同志的指示，各革命组织按行业归口，我们坚决响应。我部全体战士应作如何归口并入，望协商解决，今派我部王扣与同志前来你处联系，望予以接洽。敬礼孙福祥

王洪文早已通过黄金海，派人打入“战到底”内部，得知“战到底”将召开负责人会议，便于开会那天，派人将“战到底”负责人除孙福祥外一网打尽，训斥了一顿，勒令他们马上解散，然后将他们都放了。不久，孙福祥被抓，送进杨浦公安分局，罪名是“企图越境叛国”。

就这样，上海市实现了“大联合”。当然，这一切离开了张春桥的支持是不可能做到的。而张春桥的背后是中央的支持。但是全国再没有第二个省市像上海这样顺利了。山东的王效禹、贵州的李再含，也都有中央的支持，福建、武汉、南京、四川、重庆等地的军队也采取了专政的手段，逮捕了大批的造反派群众，结局却大不一样。

不过，对耿金章被抓，张春桥并不知道。后来他曾经对王秀珍说：“我要是当时知道，一定不同意抓的。”对此，我们后边还会提到。

上海市的革命委员会成立了，首都北京怎么办？陈伯达、康生和谢富治根据周恩来的指示找吴德谈话，研究北京市成立革命委员会的问题。陈伯达明确地告诉吴德：“中央文革小组和周总理的意见都是建议你担任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的副主任，协助谢富治做好北京市的工作。中央相信你能在这个岗位上继续做出成绩。”

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主任一职自然是非谢富治莫属了。

2 月 24 日晚，戚本禹把到人民大会堂开会的北师大“井冈山”负责人谭厚兰找到一边说：“你回去以后，派些人把人民大会堂周围农大‘红旗’贴出的‘谭震林是坚定的革命左派’这些大标语覆盖上。”

2 月 24 日，中共中央明确宣布，立即取缔“全红总”等非法组织。同日，北京市公安局军事管制委员会和北京市卫戍区逮

捕了在京的“全红总”及其他一些所谓非法组织的头头。

北京市军管会负责人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2·12号通知》第二条：对组织采取的办法明确表态说：有九个组织不是好组织，应该宣布取缔。他们是：

1、全国灭资军造反团总部。

2、全国国营农场红色造反兵团。

3、全国上山下乡知识青年捍卫真理革命造反团。

4、全国军垦战士革命造反团。

5、国际红卫军中国支队。

6、全国红色劳动者造反总团，简称“全红总”。

7、全国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红色革命造反团。

8、全国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红色第一线战斗队。

9、全国聋人革命造反联络总部。

他说：“有三个反动组织。不是好组织嘛，就是坏组织，反动的有三个。第一个，第二个，第六个，这是三个反动组织。从他们成立以来，在北京活动的共同特点有以下几点：

1、组织本身就是坏的，是坏人组成的，是社会渣滓组成的，地、富、反、坏、右；流氓、临时工、合同工中的一些渣滓。总的来说就是坏人。

2、破坏文化大革命，矛头指向中央文革，指向毛主席。

3、大搞经济主义。

4、挑动群众搞武斗。

5、抢劫、霸占。

6、伙同一些坏人冲中南海。

7、严重破坏国家财产。

8、乱搞男女关系、强奸、甚至轮奸。

三个反动组织的主要事情，一个一个地介绍如下：

1、全国灭资军造反团总部。

（1）是坏人组成的，地、富、反、坏、右。

（2）长期霸占国家房子。

（3）伙同坏人冲中南海。

（4）大搞经济主义。

2、全国国营农场红色造反兵团。

（1）公开集会反对《人民日报》“抓革命，促生产”的宣传。

（2）与劳改犯一起冲中南海。

（3）奸污妇女。

（4）大搞经济主义。

（5）严重破坏国家财产。

（6）挑动武斗。

3、“全红总”，头头是王振海。

（1）它的组成是临时工、合同工里面的坏人，它到处造谣撞骗，说中央承认自己了。

（2）煽动一些人到北京市胡闹，在全国各地招来一些人到北京取闹。

（3）大搞经济主义。

（4）冲国务院接待站，绑架工作人员。

（5）积极为五类分子翻案。

（6）以中央名义发通告，发到全国；私自与外国人开座谈会，大肆诬蔑社会主义制度。他们的后台据说是国民党少将。根据调查他们昨天晚上还在开会。”

从 2 月 25 日开始，一直到 3 月 18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怀仁堂先后开了 7 次扩大的政治局生活会，批评陈毅、谭震林、徐向前等人在 2 月 16 日怀仁堂碰头会上的表现。参加这次政治局生活批评会的，除了 2 月 16 日参加怀仁堂碰头会的陈伯达、康生、李富春、陈毅、谭震林、李先念、谢富治、余秋里、王力、叶剑英、徐向前等人外，还扩大了江青、叶群、关锋、戚本禹、谷牧、肖华、杨成武、汪东兴等人参加。为了帮助这些扩大进来的新人了解那天怀仁堂碰头会的情况，周恩来叫王力负责整理 2 月 16 日怀仁堂会议的记录。这份《记录》清样由周恩来、康生审定修改，张春桥、王力、姚文元署名整理。

会上印发了 1966 年 11 月份由谭震林等人提出的要把所有的干部都放到“火里烧一烧”的文件。这份文件是根据 1966 年 11 月份，由陶铸亲自抓，李富春亲自主持，谭震林等人参加的会议讨论内容整理的，主张将所有司局长以上的干部都要交群众“烧一烧”。

文件出来后，送中央文革小组，中央文革认为这样做打击面

太宽了。把文件退了回去。周恩来阅后，在上面批到："我看这个文件很好，请文革小组同志阅后送主席。"又送到中央文革。

那天中央文革值班的关锋认为："这个文件不好。"王力、张春桥、姚文元、戚本禹也同意关锋的意见。于是由这 5 人署名的文件，经过江青送到毛泽东那里，毛泽东没有批字，退给了文革小组。

会上还印发了徐向前等人提出的在连队搞"四大"的一些文件。

政治局生活会上，康生首先发言。他说："毛主席发怒了，是无产阶级之怒!是无产阶级的义愤!你们提意见，就是反对毛主席。否定延安整风，就是否定解放战争的胜利，就是否定全国革命的胜利。你们想叫王明回来，恢复王明的投降路线吗?能说文化大革命没有党的领导吗?毛主席的领导，就是党的领导，攻击没有党的领导，就是反对毛主席!"

康生敲打着桌面，指名点姓的批评说："徐向前呀，你说，'你们还要不要解放军?不要我就不干了'。军队不是你的。你有什么了不起呀!你要为刘少奇、邓小平翻案，想要反党吗?"

谢富治说："你们反党、反社会主义，就是反革命复辟！是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你们保护老干部，就是保护一小撮走资派、叛徒、内奸、特务!……"

江青接上："这是十一中全会以来，发生的最严重的一次反党事件，是一次政变的预演，是一种资本主义复辟的演习。是向

革命群众反攻倒算!但是，你们失败了，永远的失败了!”

陈伯达一反前几日寻死觅活的沮丧情绪，也神气起来了，中气十足的说道:“你们反对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是什么?就是炮打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你们就是一股自上而下的资本主义复辟的逆流，最终，要颠覆无产阶级专政!”

江青说：“你们保护什么老干部，是大叛徒、大特务、大走资派！你们就是要招降纳叛!你谭震林说我，‘比慈禧、武则天还厉害’，可惜我没她们那么大本事!”

康生插上来：“这是香港反动小报上的语言，你们用来诬蔑江青同志，十二分卑鄙，十二分可耻!”

代表林彪参加会议的叶群揭发叶剑英在批判谭震林时曾说过：“自从有革命战争以来，没有一个战士，在他受伤临死弥留时，自己诅咒自己所参加的战争。”

叶剑英承认：“我说过这样的话。”

叶群批评叶剑英：“这是你们把自己比作是受伤的，把群众比作敌人!”

叶群还揭发叶剑英、徐向前背着林彪处理“青海事件”、“四川事件”的问题。

徐向前意识到了自己的尴尬处境，再次称病不出。随后召开了军委扩大会议，调整了军委领导班子，恢复粟裕军委常委之职，并增补代总长杨成武、总政主任肖华、公安部长谢富治 3 人为军委常委，同时解除了贺龙的军委副主席职务。会议还做出了“三

支两军”的决定，即“支工、支农、支左、军管、军训”。

## 第 529 回：□便谈，欲了解云南情况　批剑英，晏章炎揭发贺□

云南各界赴京代表到北京后，中央只是组织他们学习。2 月 26 日凌晨 0 时 13 分至 3 点 55 分，陈伯达、康生、谢富治等人终于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他们。陈伯达说："跟大家交换意见。随便谈谈，关于云南的问题；关于大联合的问题，夺权的问题，请大家随便谈……"

云南的代表还是有些拘谨，都在思考问题，会场上一冷场，没人发言。

陈伯达说："请大家随便谈谈吧，不要拘束。我们是来当小学生的，是来向你们学习的。你们不说话，我们什么情况也不知道，我们也不好讲嘛，不要拘束。"

云南"大联合指挥部"的杨树先首先发言。紧接着王云仙、施志汝以及"新云造"的夏明富、陈志荣都相继发了言。他们分别谈到自己过去工作中由于没有学好毛泽东思想，出现了许多缺点和错误，进行了自我批评，以及来京后的学习情况。当施志汝谈到："我们的工作没做好，是来请罪"的时候，康生："你们'造反有理'，怎么会有罪呢？'革命无罪、造反有理'嘛！你们要是都来请罪了，那还不成了'革命有罪'了吗？"

大家都笑了，气氛也随之轻松了下来。

当陈志荣谈到"大联合、三结合是大方向，一定要大联合、三结合"时，康生插话问："你们搞三结合，你们要的是什么样

的三结合呀？是合二而一的三结合呢？还是要革命的三结合呢？”

陈志荣答：“要革命的三结合，大联合！”

康生：“对！要革命的，不能是大杂烩的，你们不要说请罪，你们这样说，我们听了很不舒服，你们没有罪，你们有理！你们来北京一趟，不要把革命干劲磨掉了，你们不要没有锐气了，我就担心这个！来北京了，而应当是干劲更大，搞得更好！”

当陈志荣谈到：“我们之间的分歧都是人民内部矛盾，是可以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解决的，因为首长们很忙，我们就不打算讲了，准备回去整风时再解决……”

康生再次插话说：“人民内部矛盾也是不容易解决的啊，夺权以后，分歧可大哩！特别是掌权以后，有的地方分歧就更多了。北京清华、北航等内部的分歧也很大嘛！内部吵得很凶，简直要打架、抄家哩。”

陈伯达：“要在斗争中联合，要在复杂的斗争中联合，光在旅馆中搞联合是不行的。”

康生：“对的，不要谩骂，不要武斗，要摆事实，讲道理，不要在北京打起架来啊！我们今天就是来看你们交锋的，你们若不交锋，我们就要走了！”

陈伯达：“我们主张你们思想交锋。看看你们究竟有哪些分歧?”

康生：“你们的分歧是否在冲击军区的问题上？”

“大联合指挥部”的代表说：“在进驻军区前就有了，明显的是从进军区后，他们提出‘革命造反派内部必须大乱！’这个口号开始的……”

杨树先：他们说我们大联合指挥部犯右倾，要反我们的右倾机会主义……。

涂晓雷把他们之间的几个所谓重大原则问题提出来。当谈到撤出军区的问题时，康生指着“南下造反兵团”说：“他们不对，你们对！不撤出军区这是个原则错误。革命不革命，首先看对待解放军的态度。是左的还是右的，是真革命还是假革命，首先看对待解放军的态度。这是个原则问题，在这个问题上不能有一点含糊。”

“南下造反兵团”高仰义马上发言说：“我来说。自井冈山‘823 战斗团’成立以来，我们是支持‘823’的，是支持黄兆琪的。但黄兆琪处理问题老是犯‘右倾’，黄兆琪的右倾是由来已久了，是老右倾了。”接着便举了八桩事例证明黄兆琪的右倾。

接着黄锦华发言，他谈到了“新云造”与“大联合”在几个原则问题上的分歧，有大方向方面、“革命造反派内部必须大乱”的问题、反右倾的问题、如何正确对待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126 夺权”问题、所谓走“上层路线”的问题、对“南下造反兵团”的看法问题。

陈伯达叫刘志宏发言，刘志宏谈到他们工厂工人怎样抓革命促生产，工人反对制造分裂，反对经济主义，反对所谓“反上层

路线”，反对“造反派内部必须大乱！”这个口号使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从中渔利时，康生赞扬道：“你们做得对！”

陈伯达说：“北京南下的学生，应采取当小学生的态度下去。因为是下去学习，不是去包办代替那个地方的革命，这一点，在你们南下的时候，也没有给你们南下同学谈过。我们现在有这样一个建议，请北京的同学都从各地撤回来。中央已经下过命令了，要南下的学生都回来。如果不撤回来，呆下去，还在那里做指挥官，一定会继续犯错误，现在撤还来得及。你们反映的一月份冲军区问题，提出‘革命造反派内部必须大乱’的问题，所谓反右倾的问题，这些口号都是错误的，我们正在根据中央的精神，根据毛主席的方针，提倡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大团结， 反对小团体主义、无政府主义，相反你们要搞‘大乱’。你们这样提，完全是错误的。冲军区也有你们一份，撤出军区你们又要讲条件，这些责任你们怎么能推掉呢？但是你们南下同学也不要因为我们批评了你们，群众批评了你们，就觉得翻不了身啦，抬不起头来啦，不要这样。你们做了许多工作。重要的是接受教训，你们应当把错误当作肥料，吸取营养，作为经验教训，转化为力量，可以帮助你们将来走上正确的道路。

刚才和云南的一些同志谈过这样一些问题，边疆地区，很乱的一些地方，要害的部门，可以实行军事管制。军事管制的目的，还是要发动群众，搞革命的三结合。“

康生最后说：“你们要抓生产，这是国计民生问题。”

有人问："民主党派的权夺不夺？"

康生笑了笑说："民主党派的权夺他干什么！还想当资产阶级？当国民党？"

2 月 26 日，是政治局生活会最紧张的一次。

康生说："2 月 16 日，谭震林、陈毅、徐向前等同志大闹怀仁堂，实际上代表着党内一小撮顽固不化的走资派和社会上不甘心灭亡的牛鬼蛇神的利益。是一股自上而下的复辟逆流。你们是疯狂反对文化大革命，矛头是指向毛主席。毛主席发怒了，这是资产阶级之怒，是资产阶级的义愤；你们反对文化大革命，进而又否定二十五年前的延安整风运动，否定延安整风就是否定解放战争的胜利。现在要翻这个案，矛头指向谁，不十分清楚吗？你们污蔑文化大革命不要党的领导，心目中还有伟大领袖毛主席吗？要想为刘少奇、邓小平翻案，想反毛主席吗？那绝对做不到，我要和你们奉陪到底！这是十一中全会以来发生的一个最严重的反党事件，是一种政变的预演，一种资本主义复辟的预演！"

江青说："说我是武则天，武则天怎的，她是中国历史上的杰出女政治家，我就是要学她。武则天使唐朝出现太平盛世的政治局面这有什么不好？你陈老总，仗着自己资格老，地位高，功劳大，疯狂地攻击文化大革命，那是痴心妄想。文化大革命是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顺者昌，逆者亡，谁想反对它，是不会有好下场的。要猛击你一掌，你再不悬崖勒马，顽固不化，那只能是死路一条。你们实行打击一大片干部的路线，甚至不惜把这些嫁

祸于中央文革，挑动军队和中央文革对立，制造混乱，瘫痪国家政府机关，你们安的什么心！你们藉口保护老干部，实际是死保一小撮叛徒、特务、走资派！你们藉口保护高干子弟，实质上否定红卫兵，为联动翻案。你陈老总还想否定毛主席领导的延安整风！”

陈毅辩解说：“江青同志，我没有否定延安整风！”

江青说：“陈老总，你别说话不算数！”

陈毅还在坚持：“不，我没有说过那个话！”

叶剑英说：“我不知道中央文革是怎样向主席汇报的，我认为向主席汇报我们的言论，应该经过核对材料，以防汇报错，甚至走了原样，歪曲了本来意思。”

陈毅说：“是应该核对一下，我要求核对材料。”

周恩来要王力念材料：“陈毅说：赫鲁晓夫那样的人大有人在。斯大林在世的时候，赫鲁晓夫还不是起劲地拥护斯大林，到后来赫鲁晓夫是什么人难道还不明显吗？刘少奇在延安时不是也大唱毛主席的赞歌吗？到后来又怎么样呢？你别看现在有人拥护毛主席，将来你们就知道他们是什么人了。”

陈毅要求：“这段话我不记得说过，请给我删掉吧，我好像没说。”

周恩来对他说：“不要改了，陈老总，你的确是这么说的，我们几个人听得明明白白的，不要改了。”

谢富治批评说：“怀仁堂的这场斗争不是孤立的。在京西宾

馆会议上，你们就跳出来，反对江青同志，阴谋夺军权。这次，你们又一次有组织、有计划、有目的的行动。那次只是军队几个，这次你们阵容扩大了，又把几位副总理也联合上了。你们的用心很狠毒，是想搞垮中央文革使毛主席亲自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夭折。讲过的话可以不认帐，这说明了他们心中有鬼嘛。你谭震林口口声声说你没反文化大革命，但在农林口，你亲自扶植保守势力，搞假联合，制造了 1.17 假夺权、真复辟的反革命事件。然后疯狂镇压造反派，大搞反攻倒算。这不正说明你们心中有鬼吗？”

陈伯达说：“同志们，有一个重要问题，应该引起注意，就是他们反对《红旗》第十三期社论。因为社论提出了路线斗争，提出了要打倒走资派，他们心虚害怕了。不是有人说不晓得什么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吗？现在我再一次告诉你们，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实质就是镇压群众，就是压制革命派起来向资产阶级造反。在青海，有个副司令员叫赵永夫，大搞反革命的夺权，他非法拘禁青海军区的主要负责同志，操纵保守势力，冲击已经被革命派夺了权的青海日报，对青海‘八一八’革命派实行残酷镇压和大规模逮捕，制造了 2 月 23 日的事件。这件事是谁支持的？”

叶剑英说：“是我。我支持赵永夫，称赞他们打得好！我是执行中央军委的命令的！”

江青追问：“什么命令？谁的命令？”

叶剑英说：“中央军委的《八条命令》嘛。这个命令是毛主

席批准照发的。授予了军队在遭到右派分子的冲击时，可以开枪。”

江青说：“你这是镇压革命派！现在四川李井泉的死党，出动飞机散发传单，制造所谓二月镇反运动，你也知道吗？”

叶剑英也认账：“是我批发了在四川散发的中央军委 2 月 16 日公开信，我主张镇压一切敢于冲击军队的反革命分子，不管他们打着什么旗号，统统取缔。”

江青说：“他们开枪打死的红卫兵中还有不满 18 的孩子！就凭这一点，说你们对抗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点儿也不委曲你们!”

周恩来说；“很快，我们再召集一次部队军以上的干部会，专门研究一下军队支左中的问题，解决各地发生的情况。”

关锋说：“在内蒙，乌兰夫的代理人王逸伦之流，打击革命干部，迫害革命群众的材料也很怵目惊心，当然，青海、四川的问题就更典型了。现在问题很清楚了，反对文化大革命的逆流不是偶然的，不是个别的，而是自上而下的，是有后台的，有背景的。总后台就在上头。有摇羽毛扇出谋划策的，有在前台冲锋陷阵的，军委一伙，国务院一伙，这次，这两类人都上阵了，是联合行动。”

谢富治说：“这次怀仁堂事件，是军委和国务院的两股势力的总合流，这两股势力中，还有挂帅人物。”

江青说：“叶剑英在京西宾馆气焰嚣张，又是拍桌子，又叫

着号，你这是发泄对文化大革命的不满！有什么话都摆在桌子上，不搞背后动作，这是我的脾气。”

叶剑英说：“发火，拍桌子，这都是事实，这是我的习惯，改不了啦！”

周恩来批评说：“难道你只是脾气、习惯吗？你的女儿已经向中央文革作了揭发。有人同她说过，你在京西拍桌子就是对着中央文革小组，对着江青同志的。当时叶群、春桥同志也在场。你为什么到现在还不认错呢？难道对毛主席的严厉批评，你们就都无动于衷吗？什么错都不认，对你们有什么好处？错了又有什么要紧，检讨了就好嘛！”

李富春说：“我是总理指定的国务院副总理小组的组长，毛主席批评陈伯达、江青二位同志的指示是我向其他副总理传达的，如果传达错了，一切罪名我来顶，其他同志没有责任。对中央文革的许多作法，大家不满意，有看法，许多议论都是在我家里说的。”

周恩来说：“你做的结果是发展到这一步，使主席非常生气。你们都没有吃透主席的思想，都是凭着自己的脑袋想当然，这样还能不犯错误吗？中央文革就那么几个人，管理全国这么多事，作了那么多好事，即使出一点偏差有什么大惊小怪？你们就兴灾乐祸？这就导致你们要犯错误。当然我也有错误，也应该检讨。对 2 月 16 日的会议我没有及时地引导好，这是不可原谅的。事后我也没有及时向主席汇报，没有把它当回事，只认为是发了发

牢骚。”

江青说：“这是动摇啊！”

周恩来说：“是迟钝，我在这场新的路线斗争中也迟钝了。但在原则问题上我是决不含糊的。反正有一条永远不会改变，那就是不管我周恩来也好，还是在座的每一位同志也好，我们都是绝对忠于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我们坚决听从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的号令，他们指向哪里我们就奔向哪里。这一点，在任何时候都不会动摇！”

2 月 26 日，全国军以上干部会议按原定计划正式拉开帷幕。与会者均为执掌兵符的野战军军长，或带一名军副政委。参加会议的有各大军区、各军兵种、各总部军以上干部 100 多人。会议主要是叶剑英和其他几位老帅主持。时任军委秘书长的叶剑英在会上讲的明白：“建国 17 年来，专门召开军级干部会这是第一次，也是个临时决定的短会，全国形势很紧张，主席决定解放军介入文革后，有的军提意见，你们抓紧反映情况，抓紧回去。”

叶剑英随之问了句：“青海的来了吗？”全场哑然，没人回答，叶剑英又甩出一句：“他们打了一仗。”

叶剑英在预备会议上动员说：希望大家打消顾虑，反映部队的真实情况，包括正面教育、军事训练、三支两军、与地方的关系问题，以及机关被冲击后和反冲击等各方面的问题，都可以谈谈。有些典型事例可以在会上讲，也可以写成书面材料。

接下来的几天是座谈会，大家提出老干部自杀是这怎么回

事？怎么识别左派？如何支持夺权？怎么训练红卫兵小将？工人都在闹革命，工业农业怎么支？以及造反派不讲理，其中很多是流氓搞打砸抢等等。

1967 年 2 月 14 日，武汉市第二十中学英语教员晏章炎写了材料，说贺龙在 1934 年向蒋介石乞降。信中说："1933 年，贺龙主动要求投降。蒋派熊贡卿去后，贺龙要求当军长，蒋介石只同意让他当师长，贺龙嫌官小没有谈成。怕事情暴露，为了灭口把熊贡卿杀了。"

晏章炎，男，生于 1923 年 9 月。其父晏勋甫，解放前曾任国民党陆军中将参谋长、南昌行营二厅厅长、汉口市市长等职，解放后任武汉市参事室主任、省人大代表、市民革主任，1957 年被划为右派，1961 年在上海病逝。

早在 1964 年下半年，晏章炎就找武汉市第二十中学党支部书记袁顺理谈话，说他父亲在 1958 年被划为右派后，曾告诉他一桩秘密：他父亲抗战前在国民党南昌行营二厅当厅长时，有一天收到一个报纸卷，拆开后发现一张字条，落款是一个龙字，他父亲当即向蒋介石作了汇报，派了一个姓黄的去苏区找贺龙接洽，回来后说贺龙同意投诚。

情况层层反映上去，后来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在有关材料上做出批示，予以否定。

到了 1966 年 7 月 23 日，晏章炎又写了一份材料，还是揭发贺龙的投敌问题。情况又层层反映上去，被武汉市委第一书记宋

侃夫予以驳回。

到了 1967 年 2 月 14 日，晏章炎写了《关于揭发贺龙在抗战前叛变的罪恶活动的材料》，由他所参加的群众组织的头头专程进京交给了中央文革接待站中南组负责人，这位负责人按规定程序送交中央文革办公室简报组。

2 月 20 日，简报组原文照抄了一份上送。

2 月 22 日，江青拿着抄件找到周恩来。

2 月 28 日，文革办公室将原件转交中央军委信访处。

2 月 28 日，谢富治、傅崇碧接见北京的工人代表。

傅崇碧说："现在是我们工人打架，每天最少七八起，少的几百人、多的几千人，最大的几万人。通县二万多人互相打。最近北京工人组织中，武斗相当严重；不仅打伤了人，而且损坏了国家财产，有好多电话、屋子、广播器材被砸坏。工人组织中有打人的，搞喷气式的，私设公堂的，现在农村中也有捆绑工人审讯的。昌平搞得很厉害。平谷县罗乃宽总站的人到那里去夺党、政、财权，什么全都一起夺，贫下中农很有意见，起来反对。现在全国性组织很多，在市委大楼有几十个，在市总工会也有几十个。我们工人同志应协助大力宣传取缔这些组织。这些组织到处搞电话，抢占公房，抢汽车，搞油印机，要经费。有的专门夜里活动，这样对北京社会治安很不利；有的组织一天要换几次袖章，有的乱搞"马路新闻"。

谢富治说："现在党中央毛主席开会总结了前段夺权的经验。

第一点，夺权要实行三结合，不三结合，是夺不好的，不三结合，夺了权也巩固不了。第二点，夺权要搞大联合，要搞革命的大联合，一个工厂、一个企业、一个部门都要实行大联合。不大联合，你夺过来，我夺过去，成了抢权了。第三点，夺权必须是革命造反派，真正左派夺权，不能是保皇派夺权，不能搞假夺权。第四点，夺权必须是本单位、本企业、本部门，由本单位、本部门左派，自己夺权。必要时外部与其有直接关系的单位可以配合，加以协助。

## 第 530 回：赵健民，见康生□说想法　武汉市，看“工总”纷纷请罪

2 月 28 日晚 23 时，周恩来、谢富治在人民大会堂东会议室接见了昆明地区“革命造反派大联合指挥部”、“新云南革命造反派大联合联络站”和中共云南省委“机关革命造反派联合总部”的赴京代表。

周恩来边念名单边询问云南的情况，当问到“《云南日报》谁来了？”

代表们答：“两方面都来了。”

周恩来说：“你们两派观点不同，《云南日报》怎么办？”

答：“现在合起来办，办报纸还是一致的。”

周恩来问：“你们对冲军区是怎样宣传的？登报没有？”

答：“没有在报上公开宣传。”

周恩来说：“这就好，回去检查一下，如果登了就承认错误，浙江冲了军区先是那样认识，现在他们觉悟了，承认了错误，都写了检查，你们时间长了回去再检查，检查报纸实事求是，有错误就承认，没有就算了。”

他接着说：“《云南日报》两派能合作，说明有团结的基础，报纸可以造舆论，你们要宣传大联合、三结合的大方向，看来大联合还是有基础的。”

有人说：“分歧还是有的。”

周恩来：“分歧回去解决，云南省委、省人委的事情，不能

长期瘫痪，云南是边疆，生产的问题，军队的边防、备战、援越抗美的问题，中央委托军区秦基伟负责，云南大军区省军区组织一个领导机构，来推动帮助你们三结合。不光是两个军区领导，省委、省人委的负责同志也要站出来参加工作，云南实际上是实行军事管制，但对外不公布，报上也不登。目的是推动你们工厂、机关、学校大联合、三结合。然后提出三结合的名单报中央，当然要征求你们的意见，中央同意了就登报、广播。红旗三、四期社论给了你们原则帮助，上海的文件更作了明确的规定，你们回去认真学习。大家在大方向一致的基础上团结起来，求大同，存小异，既然是革命造反派就要求大同，存小异。我有重要事情，你们不是要照相吗？走，照相去。”

周恩来和云南的代表们合完影就走了，谢富治继续与他们座谈。他说：“你们两家的同志，‘大联合’、‘新云南’，还有南下的同学，那天作了些批评，主要是有一些全国性的思潮，你们不要误会了。”

他强调“云南是边疆，是前线，又是国防重地，”希望“造反派的头头回去要做政治思想工作，多学习主席著作，多学习中央指示、社论。”

他说：“我这两个月天天给你们造反派打交道，今天上午我还在做工人的工作，他们一直闹。现在北京有 100 多万工人革命组织中混进了许多‘保’字派的，混进了坏人，天天打架，今天我砸你，明天你砸我，这回可暴露了。是革命造反派就得有个标

志，你是真革命派起码不能反对解放军，成天反对解放军算什么，你是真革命派就不能打人抢东西，破坏国家财产，中央三令五申还这样就不行了，一定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抓革命，同时要促生产，天天讲抓革命就是不促生产，你这个革命派就得打个问号。以前的事没有经验就不追究了，过去了的事情不算了，算老账是不行的，但经中央三令五申还要搞，军委《八条命令》公布后，还不能按中央的指示去做，你这个造反派就有问题了，有的时候就是有些人不能这样做，今天上午我接见 100 个人，会上就吵，有的还捉人，‘916’打架是有名的。‘916’、‘915’不像话，北京的事可以给你们讲三天也讲不完。”

谢富治说的“916”、“915”是七机部的两个群众组织，其中“916”的头头叶正光还是北伐名将叶挺的儿子。

最后，谢富治希望云南各群众组织能按行业实行大联合。

2 月下旬，面对当时云南省的情况，赵健民觉得自己是省里的主要领导，又是党的八届中央候补委员，有责任向中央反映情况。于是，也来到北京，要求同康生谈一谈。

2 月 28 日晚，与周恩来接见云南代表几乎同时，赵健民得到了康生接见的通知来到人民大会堂，一位秘书将他领到人民大会堂小会议室。接待的工作人员说，康生正在同西安市的群众代表谈话，于是，赵健民就坐在小会议室里等了几个小时，不由自主地靠在沙发上朦胧入睡了。

后来有人把他叫醒，匆忙告诉他，康生要来了。赵健民睡眼

惺忪，赶忙起身整理一下衣襟，看了一下表，时针指到了 3 月 1 日 1 时。

待康生坐定后，刚从睡梦中醒来的赵健民一边梳理着自己的思路，一边缓慢的将自己的想法一点点地说出来。他主要谈了 3 个问题：

一是党的干部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毛主席向来就指示干部的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他个人认识也是这样。解放以来，经过土改、镇反、抗美援朝、私营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合作化、整风反右等等一些大的运动，都证明了干部多数是好的。但从云南的情况看，党政机关，甚至公检法机关几乎普遍被夺权，领导干部多数被揪斗，这样做是和毛主席指示不相符合的，是违反中央干部政策的。现在既然在宣传毛主席的这一指示，可实际上又出现这种情况，这是理论脱离实际的问题呢？还是执行过程中的问题呢？他建议，这个问题中央应该从上面三令五申。

第二是省级以下多开党代会，使主要领导干部多接受党的监督。作为一个主要的领导干部，需要经常听到别人的意见，接受党的监督，开党代会可以发扬民主，使主要领导干部多接受监督。中央开党代会不容易，省和县应该多开。现在搞大民主，是不是要搞这样大的民主？用这样的方式来监督领导干部？

第三是中央接待站答红卫兵的问题时说：干部有错误，就批判，就反对；但对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好干部，就应当维护，等等。他认为这些回答很好，这种观点中央应该反复宣传，才能

较好地贯彻。

听了赵健民的想法后，康生问道："你知道什么叫文化大革命吗？"

赵健民张嘴就答："不是用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改革整个社会的精神面貌吗？"

康生"嗯"了一下说："那只是一方面，主要是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你知道吗？刘少奇在天津讲话，说中国资本主义是少了不是多了，他要走资本主义道路。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要解决走社会主义的道路的问题。"

他接着说："过去知道安子文、刘有光、王其梅等十几个人从敌人监狱里出来，办了一个简单的手续，现在查出来了，他们是发了反共宣言。这种问题，一般运动是搞不出来的。"

至于开党代会，康生说，主要问题在内容。对于中央接待站的回答，他认为也不错。

他们谈了一个多小时，近 3 点钟了，赵健民觉得康生年事已高，不便多打扰，就起身告辞了。

我们再说武汉。2 月 21 日深夜，武汉部队支左办公室通知《长江日报》编辑部，要求《长江日报》必须在 2 月 24 日以前作出检查，否则将对报社实行军事接管。

2 月 25 日下午，武汉近万名"二司"学生在武汉展览馆召开"用鲜血和生命保卫毛主席和中央文革誓师大会"，会后，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游行队伍高唱林彪语录歌《要敢于牺牲》，

高呼“用鲜血和生命保卫毛主席和中央文革”“头可断，血可流，毛泽东思想不可丢”“我们想念毛主席”等口号，也喊了“向忠于毛主席的解放军学习，向忠于毛主席的解放军致敬”的口号。部队则派直升机向游行队伍散发《二一八声明》传单。“工造总司”也向游行队伍散发《二一八声明》。

26 日，“工总”、“二司”又组织了十万人大游行。“工总”很多分部给红旗大楼送来红旗，红旗大楼几乎每个窗口都插着红旗。

2 月 27 日凌晨，中央文革小组工作人员、江青的秘书阎长贵给武汉“二司”驻京联络站打电话，指出他们的错误。他说：“建议好好学习《红旗》杂志第三期社论，把《二八声明》与社论对照。《二八声明》有错误，要改正，不要坚持错误，要停止内战。反托派是错误的，严禁把矛头指向解放军。”阎长贵一连四次讲到：“一定不要坚持错误。反托派是错误的。托派是反革命的，怎么能把这么多人都打成反革命？”

“二司”驻京联络站的武汉水利电力学院的张范炎同学立即打长途电话将阎长贵的电话内容告知水院总部和“二司”总部。“二司”马上召集各总部开会，传达了阎长贵的电话内容。传达后，与会人员迟迟不愿离开会场，有的沉默不语，有的对头头产生了怀疑，不知头头是否做了大家不知道的错事？会不会把“二司”带上绝路？要求总部向大家讲清楚。

“工总”、“九一三”、“二司”等组织在得知阎长贵的电话内

容后，立即承认错误，公开检讨，主动停止了历时 20 天的全市大辩论。“工总”得到《二一八声明》是经中央军委批准的确切消息后，更感回天无力。当天下午，“工总”部分头头前往武汉军区司令部请罪，承认《二八声明》的错误。第二天，“工总”头头朱鸿霞亲自签字请罪，低头认错。这天，《长江日报》“毛主席路线战斗兵团”和“工总”各分部负责人乃至一般战斗队员纷纷去武汉军区请罪，在以后的好几天时间里，“工总”请罪的队伍连绵不断。

但是下面的群众不服气，扬言：“让我们请罪？砍头都不干！”于是，武汉军区公开发出“‘香花派’靠边站！” 的指示。在工矿、企业、学校等各单位，“香花派”群众连听报告、被选举等政治权利都被剥夺。同时许多单位对“香花派”群众搞人人请罪，个个过关。他们还在汉口井冈山大楼举办了“工人总部罪行展览”，在武昌武汉水利电力学院搞了“二司地下黑司令部展览”。这大概就是陈再道与张春桥的区别，上海对反对张春桥的“红革会”和总想与张春桥分庭抗礼的“二兵团”、“一兵团”的基本群众不予追究，统统接受。而武汉则是全都予以歧视，这些活动大大激化了“香花派”组织的群众和武汉军区的矛盾。

28 日这天，周恩来与即将返回武汉的陈再道、钟汉华谈话，对他们说：“你们回去后，要集中精力抓好三件事：一是抓革命，促生产；二是抓好按行业、按系统的革命大联合；三是抓好大、中学校的复课闹革命。”最后，周恩来还满怀忧虑地说：“季节不

等人,不搞好生产,是没有饭吃的。”

陈再道、钟汉华回到武汉,立即召开了军区党委会,研究抓革命、促生产问题。 3 月 1 日，武汉军区召开三级干部会议。陈再道在会上说：“我们省委也要解放一批干部，为了搞好春耕生产，必须加强无产阶级专政。”“我们是镇压反革命，不许他们乱说乱动。”

军区支左办公室主任、副司令员孔庆德介绍了武汉的生产情况，他说:“有些人成天闹事，不好好上班，生产也没有人管。一个千把人的工厂，有 600 人脱产闹革命,如果再这样下去，恐怕不行吧。”

副政委叶明接着说:“前几天，我在一次会议上讲了一下生产问题，造反派批我，说我是以生产压革命。”

“什么造反派?都是一些乌合之众!”陈再道说,“孔副司令,明天开始,由你指挥,把那些打、砸、抢分子,尤其是那些血债累累的头目,统统给我抓起来!”

3 月 1 日早上，武汉军区对武钢广播台进行了军事管制，并派兵进驻了井冈山大楼。中午,武汉军区又对武汉市电信局及二、五、六、九等几个分局实行军事接管，发布《公告》说：电信局被单方面夺权后，少数坏分子利用窃据的职权，侵犯人民通信自由，窃听国家机密，盗走电报密码，非法动用战备物资，占用战备线路，任意扣压电报，使通讯联络受阻，国家机密遭到严重损失等。接管后，武汉军区逮捕“工人总部电信分部”4 人，拘留

12 人，强迫登记 100 多人。对“工人总部电信分部”宣布罪状后予以解散。

这天，武汉军区还出动大批宣传车，在武汉三镇高喊：“解散二司”，“解散工人总部”，“把杨道远揪出来游街示众”等口号。

后来，军管会还规定各组织向中央反映武汉文化革命情况的电报必须经军管会批准。《湖北日报》3 月 2 日报导了这一消息，并且还在同版上报导了在此以前硚口区人民法院判处阴谋暴乱集团劫抢杀人犯邓青松(六四年十一月作案)和杀人刑事犯崔清山(六六年八月一日作案)等死刑、无期徒刑宣判大会情况，还为此发表短评。

3月2日上午，几千名工人“三司”包围了《湖北日报》所在地红旗大楼，武汉军区得到消息，很快派出20多人的解放军迅速赶到现场，劝说驻红旗大楼“红色造反者”撤出大楼，“红色造反者”不同意，解放军只好撤离，“工三司”也相继撤走。

随后，很多“二司”学生，纷纷来红旗大楼对驻守在这里的“二司”学生和“红色造反者”作动员工作，劝说他们内部起义，并且向大楼指挥部的负责人施加压力，使得部分“二司”学生对自己过去坚持的观点发生了动摇，对大楼指挥部，对一些出头露面较多的人产生了怀疑，甚至互相猜疑起来。当晚，红旗大楼发生了内讧，有人提出请解放军来红旗大楼，这个意见以多数的优势成了定论，立时，大楼内部实行了戒严。《长江日报》被迫停

刊。

3月3日凌晨，全副武装的解放军进驻红旗大楼。对各个地方实行了戒严，将驻大楼的“红色造反者”集中到六楼训话，命令他们立即撤出红旗大楼。

早饭后，“红色造反者”集中在零楼，红旗大楼宣传队含泪向全体学生作临别演出。接着“红色造反者”又含着热泪高唱《红军想念毛泽东》，在毛泽东画像前宣誓，表示无论在任何艰难困苦的场合，只要还有一个人，这个人就要继续战斗下去；表示要用鲜血和生命誓死保卫毛主席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3 月 3 日，武汉军区发表《给革命群众组织的公开信》，谴责一小撮别有用心的人把矛头指向中国人民解放军，号召广大群众擦亮眼睛，分辨是非，同他们划清界线。

3月2日晚上，许多院校的“二司”学生纷纷到武汉军区支持武汉军区对电信局的军管，军区不许“二司”的分团以上干部进去。

当晚，武汉军区对前去请罪的“香花派”负责人发表三点口头指示：

1．对《严正声明》不准在公开场合发表反对意见；

2．不准挑动群众把矛头对准解放军；

3．不同意见可在内部辩论。

3月2日这天，王任重给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副司令员韩东山、湖北省委常委姜一写了一封信，建议他们迅速地把省一级、

市一级、地县一级的临时“三结合”的权力机构搞起来，并提议由武汉军区政委钟汉华出面挂帅，吸收原省委和军区的一些领导参加。军区由陈再道、韩东山考虑，省委、省人委建议由姜一、杨锐、韩宁夫、王海山、张旺午、阎钧、张起、陈扶生、邓祥、饶兴礼参加，群众组织由孔庆德、张竞决定。他还希望派出大批政治工作人员深入到若干大单位(武钢、重型、锅炉厂、肉联、一纱、国棉、武大、水院、华工、华师等)去进行政治工作，把群众争取过来，使他们拥护武汉军区的《严正声明》和《公告》，推动各个组织开门整风，有些组织的领导，凡坚持错误的，由群众自己撤换重选，这样才能比较快地实现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

## 第 531 回：说无□，许世友设宴压惊　生活会，中央支持□夺权

在中央召开的军级干部会议上，安排无锡驻军27军军长尤太忠第二个在会上介绍27军“三支二军”中的经验。

无锡27军按照中央军委的指示介入无锡的文化大革命，开始支左后，参加“支左”的27军政治部宣传处长王晏向27军领导汇报了无锡“主力军”，简称“红总”的情况。他说：“‘红总’队伍大，名气大，权威大，不仅称雄无锡，还称雄江南。‘红’”的主要头头有9人，总司令叫‘白水’，解放前没有固定职业，这个组织有个规定不接受共产党员入伙。自成立后的几个月里，他搞了几件大的活动，一是破四旧，二是打、砸、抢、抄、抓，三是游斗‘老保’和‘走资派’，四是刮经济主义妖风。”

“白水”是化名，其人的真实姓名是金坤泉。

王晏的汇报，在 27 军内部引起了争论：

以军长尤太忠、政委马杰、副军长王挺的意见是：现在无锡市的造反派，不是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这些人专搞打砸抢，是无政府主义者。他们的行为对社会秩序，对生产，对人民群众的危害极大。所以要当机立断来一个“大扫除”。

第二种意见是军政治部主作吴戈华，他一个人说：文化大革命是一场史无前例的政治思想大革命，首先，要端正路线，不能用民主革命时候那种阶级论的观点，来看待今天的路线问题……可以说，文化大革命是革过去“革”别人命的人的革命，不解决

这个根本问题，就不可能理解文化大革命，更不能搞好支左任务。

第三种意见是副军长涂学忠和军副参谋长雪国恒，他们认为还是等等再说。

经过激烈争论，最后尤太忠下决心，擒贼先擒王。搬掉“红总”这个司令部，由王晏起草公告。

2月8日，无锡“支左”部队首先以武力取缔了无线电厂“主力军”基层组织“1022兵团”，宣布其为反动组织，并逮捕该组织头头。接着，“支左”部队宣布湖光仪器厂、建材仪器厂的“主力军”为反动组织，予以取缔。逮捕“坏头头”。

“支左”部队的这一动态首先引起了无锡轻院学生组织“626兵团”的警觉，他们召开了“中心组会议”，认为必须对“支左”部队目前的行为做出反应。于是派联络员冷老师，向“红总”通报了他们学生方面的决定：在2月16日这一天举行全市红卫兵上街游行，以示抗议。

2月16日，以轻工业学院“626兵团”、二中“75兵团”等“6.26”为首的数万无锡学生组织在无锡大街小巷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他们在游行时高呼：“坚决支持工人造反派！”“誓死保卫毛主席革命路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决不允许枪指挥党！”“人民解放军要支持革命左派！”抗议无锡支左部队宣布“主力军”的一些基层组织为“反动组织”。

第二天，2月17日，“红总”方面集中了几千人的“主力军”

队伍，从学前街“红总”总部门口出发走中山路，崇宁路，经市公安局门口，绕道返回，游行队伍一路高呼“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用鲜血和生命保卫毛主席”“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

这天，驻无锡部队发表《公告》:“支持无锡市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大夺权的斗争；反对把矛头指向解放军”。

2月20日，无锡驻军部队出动了数十辆军用卡车游行，并配有高音喇叭的宣传车。高昂激烈的词语要坚决镇压“反革命”。

2 月 23 日，数万军民在体育场举行“彻底粉碎反革命逆流誓师大会”,表示拥护“三结合”夺权、拥护驻无锡部队取缔“1022兵团”。

2 月 27 日，无锡军管会发布《公告》，取缔无锡市“红总”。第二天中午，无锡军管会出动 10 辆卡车，两辆摩托车，1 个步兵连，将无锡市“红总”包围，宣布其为反动组织，当场逮捕金坤泉、江水根、周炳荣 3 人，其余头头全部集中公安局审查。并将“红总”向市委领用的经费撒桌上拍成照片，将“红总”的自行车推起来也拍成照片，作为“红总”抢劫财物的罪证。

2 月 26 日上午 8 时，南京军区后勤部的干部接到通知到后勤礼堂听传达文件,干部家属们也去。会场上的长条横幅上写着:“坚决贯彻执行中央军委八条命令”。后勤机关和直属队都来了。机关幼儿院、工程队、小卖部、食堂、浴室、理发店等员工也都到场。

9 时正，南京军区后勤部各位首长登上主席台，各业务部首长也登上了主席台在第二排就坐。大会由副部长钟贤文主持，张祥副部长宣读中央军委《八条命令》并讲话。他说："机关有少数人员，不听招呼，不守纪律，同社会上不法分子，串通一气，里外配合，冲击后勤机关，破坏部队稳定，破坏战备，破坏正常工作。企图把部队搞乱，乘机夺权。他们做了敌人想做而做不到的事情。他们的行为使亲者痛仇者快"。

张祥副部长的讲话，给大会定了调子，会场骤然紧张了起来。张祥继续讲到，"为了给文化大革命护航，必须保证军队稳定。根据军区党委的决定，对一小撮违反纪律的人员采取断然措施，对以下人员实行行政看管"。大会会场空气一下子凝结了，自发开展"四大"的人脸色苍白。

被看管人员的名单，由直工处处长宣布。后勤司令部被看管的有傅跃宗、张德隆，军械部被看管的有王家恩、薛桦、朱祖祚、陈登泉。运输部油料部被看管的有田从洵、于国城、周乃馨、赵玉祥。物资部被看管的有沈文琛、王树雨。除财务部、军需部没有人被看管外，各部、下属直属队都有人被看管，军区总医院、八一医院被看管的人更多。军区总医院的邵马龙、李居柯，胸外科著名专家医生沈威廉、龙启明均被看管。

60 军 181 师一部来南京军区机关执行看管任务。他们被告知，南京军区司政后机关发生了反革命暴乱。

被看管的人不断地被"提审"，接着就是写揭发材料，被看

管的人越来越多。后勤警卫连地方太小，人满为患，只好移到南京市上新河一所军队速成中学里。仅南京军区后勤部被行政看管的官兵、文职人员、职工就有 700 多人。南京军区司令部、政治部、后勤部三大部被逮捕的人员，统由军区政治部保卫部李树和部长主持审讯和管理。凡被捕入狱的人一律取下帽徽领章，手表钢笔、系裤子的皮带、鞋带一律收缴统一登记保管。

与此同时，各部队纷纷上书军区领导献忠心、表决心，对“洪、高、方、艾”等人进行口诛笔伐，就像当年全国揭批“吴晗、邓拓、廖沫沙”的“三家村”那样。一时间对“洪、高、方、艾”造反派头头的揭批会、声讨会，搞得沸沸扬扬，轰轰烈烈。

造反派头头抓的抓了，关的关了，办的办了，乱哄哄的局面似乎得到控制。一时间，好像“雨过天晴”了。

许世友很高兴，吩咐机关要请客，慰问挨整的军队院校当权派。

总参、总后、海军、空军驻南京的各类院校，加上军区下属的步兵学校和卫生学校，当权派人数不少，那天在 AB 大楼摆了八、九桌。

解放战争开始时，蒋介石为美国军事顾问团建造了两座楼，一座叫 A 楼，一座叫 B 楼，坐落在健康路和北京西路的交叉点上，面对着美国大使馆。楼高四层，钢筋水泥结构，里面的房间有双套的，有三大套的，是按军衔等级设计的，在南京是数得上很高级的公寓大楼。解放后开始给苏军顾问团住，再后改成军区高干

招待所，专门接待总部来人和军区重要会议。

这一次，许司令特意选在 AB 楼设宴，军区首长和部门领导出面作陪。来的人很多，凡是能动的都到了。俗话说，“一日不见如隔三秋”，这些院校领导几个月来被“四大”整苦了，有的腿被打瘸，有的瘦了一圈，如今大难不死，还能相聚一堂，莫不感慨万端，不管原来熟悉不熟悉，见了面都热烈握手，亲切问候。

入席后，许世友致祝酒词。他说：“大家吃苦了！我代表军区党委、领导向同志们表示慰问！你们吃点苦是坏事，也是好事，暴露了坏人，争取到一个《八条命令》。毛主席说要搞‘文化大革命’，他们不搞‘文化大革命’，而是发泄对党和老干部的不满。我们这些人哪个不是跟毛主席南征北战过来的？哪个人身上没有几个洞？说我们不跟毛主席革命路线，难道他们跟毛主席革命路线？！”

吐出了憋闷已久的愤懑，许世友把手一挥，当场宣布了叶剑英以军委名义给南京军区下达的关于军事院校“文化大革命”问题的四条指示：

军队院校暂停“四大”；暂停战斗组织活动；恢复党委领导，恢复行政领导；进行“三支”“两军”。

待掌声过去，许世友举起酒杯说：“今天主要是请大家喝酒，可以痛痛快快地喝，喝他个一醉方休。干杯！”

这顿酒喝了两个多小时才收场。

2 月 25 日，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编印的《快报》第 1332 号

上登载了题为《北京政法公社在天津小站公社支持了谁？》的材料。材料说："1 月 26 日，北京政法公社燎原长征队在天津小站公社坨子地大队，支持以四清运动中下台干部为背景的'燎原红色战斗队'抢走大队的大印，从此牛鬼蛇神纷纷出笼实行反攻倒算。"

2 月 27 日，陈伯达把这期《快报》报送毛泽东时写道："这是一个闹资本主义复辟的例子。革命群众要记者给主席反映情况。现在把材料送上，请顺便一阅。"

28 日，毛泽东在这份《快报》上写道："从上至下各级都有这种反革命复辟的现象，值得注意。"

王力、关锋起草了一篇《红旗》杂志社论，题目是《粉碎反革命复辟逆流》，送给毛泽东。毛泽东看了，不同意发表，要江青向文革小组传达，批评了他们。江青在传达时还说："文革小组的正副组长提议印发政治局生活会的材料，主席给扣了，没同意。"

江青说的"提议印发政治局生活会的材料"，是指政治局批评陈毅、谭震林的内容。

江青给周恩来写了一封亲笔信，大意是要求政治局李富春、谭震林、李先念、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等停职检查。并说"此意见康生已同意……"

周恩来看罢信，沉思良久，便给西山叶剑英处打电话，提了三点建议：一是要心安气静，不要住院；二是要坚守自己的岗位，

一定要抓工作；三是该检查的就检查。

几天后在中南海紫光阁,周恩来主持召开政治局生活会。会上，陈毅率先做了检查。

再说山东赴京代表团，2 月 21 日在北京受到中央领导接见后即返回济南。从 2 月 25 日开始，山东省“大联委”和山东省军区联合召开了全省三级干部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军队干部、造反派组织代表、革命领导干部代表，各占 35%、27%、38%。2 月 26 日，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得志到会讲话，开场白就说：“中央文革小组已经指定以王效禹同志为首组成领导核心”。会议批判了山东夺权中的“反夺权”观点。

由于陈伯达要求山东省“大联委”送去一套关于夺权的新闻报道资料，而山东送去的又不符合要求，结果返工重写了数次，最后形成了《给毛主席的致敬电》、《第一号通告》、胜利夺权消息报道这三份材料。关于夺权的经验，实际上就是《人民日报》发表的社论的主要内容，山东反复多次也没写成功，最后由中央文革小组撰稿、陈伯达定稿。上述 4 个文件，于 2 月 27 日 9 时 40 分送达毛泽东处，由毛泽东亲自审定。

2 月 27 日，“山东大联委”正式改名“山东省革命委员会”。

2 月 28 日，中央文革小组再次接见山东省赴京代表团，宣称“已由毛主席审定，正式批准山东省的夺权。”

3 月 1 日，山东三级干部会议结束，王效禹作了会议总结。他在做总结报告时，第一句话就是：“我先告诉同志们一个好消

息，今天晚上 8 点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我们山东夺权的消息。”

他说：“在整个夺权斗争中，解放军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在夺权斗争中，没有解放军，我们很难得到山东这样一个夺权的胜利”，“就是把权夺过来，恐怕也巩固不住”。他具体说，我们认为“解放军宣布‘工人联合会总部’是反革命组织，镇压了反革命，对打击反革命起了重要作用，好得很。如果没有这一着，那个反扑不会被打下去得那么快，功劳也应该是归于解放军”。

3 月 1 日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了新华社关于山东省夺权的消息。3 月 2 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这一消息，并发表了社论《革命的’三结合’是夺权斗争胜利的保证》，对山东省夺权的成功表示祝贺，并高度评价了在夺权斗争的关键时刻革命领导干部的重大作用。

这篇社论说：“山东的经验充分说明，只有革命的‘三结合’才能及时地识破阶级敌人的各种阴谋诡计，实现军民配合，粉碎他们的假夺权、反夺权的罪恶活动。”这里讲的“三结合”，就是社论中提到的：“广大的革命群众和革命组织，是夺权斗争的基础”，“革命领导干部，对于夺权斗争的胜利起了重大作用”，人民解放军“是无产阶级革命派最强大的靠山”。从此，“三结合”成为建立革命委员会的一条基本经验。社论特别提到：谭启龙、白如冰和山大“主义兵”、“山工联”，“他们进行秘密交易，搞什么‘君子协定’、‘和平让权’，以达到幕后操纵，保护自己，继

续把持权力的目的”，“演出了假夺权的丑剧”。

《人民日报》1 月 30 日曾就青岛夺权发表社论《关键在于大联合》表示了支持，这次又对山东省夺权予以肯定。党报因王效禹两次夺权两次发表社论给予支持，这在全国是唯一的。

3 月 2 日这一天，山东省城济南 30 万人在省体育场举行大规模集会，庆祝中央批准山东省“23 夺权”。王效禹作为山东省“革命委员会”负责人出席大会，他发表讲话，声称一定要把夺权斗争进行到底。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得志出席大会，并发表了讲话，重申对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支持。“山东革命工人造反指挥部”负责人韩金海、“红卫兵山东指挥部”负责人王竹泉等也分别讲话。会后举行了大规模游行。

山大“主义兵”与“山工联”的头头都已被捕，但其影响还在。不少人想不通，为什么“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毛主席指向哪里就打到哪里”，结果却成了“反革命”？一场“肃清主义兵流毒”的“肃清流毒”的运动在山东全省各地轰轰烈烈展开。

3 月 7 日，王效禹来到山东大学。他衣着朴素，身穿深灰布棉衣，戴顶黑色解放帽，站在学校大操场对大家讲话。一口地道的山东腔，直来直去：“有人问：山大主义兵前段运动的大方向是不是正确的？我说，是正确的。矛头对准成仿吾是正确的；矛头对准谭启龙更是正确的。但是，对于‘主义兵’流毒,还是要肃清的。因为，它在革命的进程中没有把握住大方向，反对‘二

三夺权’，干扰了毛主席的战略部署。”

3 月 24 日，山东大学将狱中的“主义兵”头头张发裕和被视为造反派后台之一的处级干部王公乾押到学校大操场批斗。

## 第 532 回：抓□西，周恩来语□心□　搞整□，西安似乎趋平稳

再看西安。2 月 26 日上午，西安“工总司”召开“加强工农联盟，抓革命促生产誓师大会”。会后游行时，西安市七中“火种战斗队”的一些中学生在路边冲着他们喊：

“工总司是大杂烩！”

游行队伍中，个个扭头怒目而视，几个工人冲着这些学生威胁道：

“你们这帮杂种娃，想找死啊！”

骂声未落，队伍中冲出一些人扑向那些学生。这些学生一看不好赶快逃跑。但是，有几个跑得慢的学生，被他们抓着便暴打起来。这几个学生被打得直喊爹叫娘。许多围观群众敢怒而不敢言。等他们的游行队伍过去后，人们便气愤地议论开了：“简直没人性，和娃们斗啥气”，“这像是工人阶级干的事吗？真给工人丢脸！”“他们和‘工农总部’有啥两样。”……

2 月 27 日晚，“工矿联”西郊二分会的工人们全体出动，高呼“反对‘大杂烩’！打倒‘工总司’！”的口号在大街上浩浩荡荡地游行。

就这样，西安市的大街上几乎天天有两派的游行队伍，而且街道上的群众也分两派。是自己支持的一派就在路边鼓掌叫好，不是自己支持的一派就反对，甚至寻机谩骂、侮辱、殴打。一些小孩子受大人影响，也参与到两派斗争中。特别是火车站前的解

放路，附近居民大部分是铁路系统的职工，他们中许多人加入了“工总司”组织。因此，该街道基本上是“工总司”的天下。

3 月 1 日，周恩来再次接见西安“统指”、“工总司”和西安交大的代表，他说：

各造反派组织“要抓整风、整组织来解决。夺权问题未解决要努力整风，准备夺权。整风要整掉风头主义、山头主义、无政府主义。学校以军训为主，工厂也可以由民兵军训。

“西安提出‘打、砸、抢’是反动的。各校又提出‘抓、揪、抄’，你们眼里没有党中央、毛主席。”

周恩来说到此时，很气愤，他让代表们一个个的回答：“怎么办？”

大家纷纷说到：“应受法律制裁。”

周恩来接着说：“毛主席对‘大联合，大夺权’的口号不同意。难道说没有一个单位是无产阶级当权派？建议把大夺权的‘大’字去掉，‘联合夺权’。今后斗争矛头应指向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不提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

有关“抓革命，促生产”问题，周恩来说：“今后不要再上街游行，也不要搞宣传车上街。有人说：‘我们厂休日游行，不影响生产。’我就不相信不影响生产。对待是否‘抓革命，促生产’的问题和爱护国家财产这是真革命、假革命的标志。”

对待解放军问题，周恩来说：“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只要大方向正确解放军坚决支持，如果只剩下一个人，也坚决支

持，如果大方不正确那怕有十万、八万人，也是不支持的，要反对他们的。是否尊重解放军这也是真假革命的标志。”

他还说：“对待领导干部不要揪来揪去，要给他们检查、赎罪的机会，要充分创造条件，给他们检查、揭发，让群众鉴定，是亮相的还是罢官的。斗争的矛头绝不能针对犯了错误的造反派。”

3 月 2 日，经兰州军区党委批准，“西安地区驻军支援左派统一指挥部”成立。“支左统一指挥部”由中国人民解放军陕西省军区、兰州军区空军、陆军 21 军共同组成。21 军军长胡炜、陕西省军区司令员黄经耀、兰州军区空军司令员杨焕民 3 人任指挥，成员有陕西省军区政委袁克服、陕西省军区副司令员孙光、21 军政委刘建功、兰州军区空军副司令员方升普等人。

3 月 2 日下午，周恩来在中南海国务院会议室接见了胡炜以及陕西省军区副司令员王明坤、兰州军区空军副政委刘镇和西安地区群众组织头头 40 余人。

会议一开始，周恩来就介绍说：“为了稳定形势，中央决定派 21 军到陕西省执行‘支左’任务。今天 21 军军长胡炜同志也到会了。”

胡炜站起身，向周恩来和大家敬了一个礼。

周恩来接着介绍道：“胡炜同志能打仗，能做思想政治工作，能文能武，是我军年轻的军长。21 军到陕西省以后，你们两派群众组织都要支持军队的工作。”

谈到陕西省的形势时，周恩来目光炯炯，扫视着在座的 40 多位群众组织头头。他虽然语气温和，娓娓而谈，但言语之中又透着几分严厉："你们把西安的形势搞得这么乱，光讲自己正确，光想压制别人，这算搞什么'文化大革命'嘛!两派群众组织要整风，大学要搞军训。两派群众组织都要克服自己的问题，要联合起来，抓革命，促生产，不能让生产停顿!"

接见结束以后，胡炜回到了京西宾馆住处。深夜 24 时，他正准备休息，电话铃响了，是国务院总理办公室打来的，要他马上去人民大会堂，说总理要再次接见他。胡炜不敢怠慢，立刻穿好军装，动身前往人民大会堂。

到了人民大会堂，胡炜看到，除了他，一道参加接见的还有陕西省军区副司令员王明坤、兰州军区空军副政委刘镇、中共陕西省委第一书记霍士廉、中共西安市委书记薛焰。

周恩来先是问了陕西省的情况，接着作了指示：现在地方党政机构已经瘫痪，军队的主要领导同志要组成统一的"支左"领导机构，暂时把全省的工作管起来。要稳定形势，促进联合，抓好生产。军队的负责干部要和群众组织协商，做好群众组织的工作。他让霍士廉、薛焰和其他一些省、市领导干部出来工作，一面接受批评，一面抓好生产。

说到霍士廉、薛焰等领导干部时，周恩来语重心长地说："你们不能陷到任何一派那里去，陷到那里，不好工作。"

3 月 4 日下午，西工大"文革会"召开全校师生大会，传达

中央领导接见西安造反派代表时的讲话，特别强调说："我们过去一直批判李世英的'三句半'右倾思潮，把斗争矛头指向了自己人，斗争大方向错了。从现在开始，我们要按中央领导的要求，认真坐下来整风，检查错误，吸取教训"等。

学生们对中央领导批评他们"方向不对头"很不服气，"难道西交大的斗争大方向对头？"许多人转不过弯，吵吵嚷嚷，忿忿不平，纷纷质问"文革会"的负责人。

后来，"文革会"的高志萍站出来解释一番。他说："我们之所以'方向不对头'，就是因为没有认识到'僧是愚民犹可训，妖为鬼蜮必成灾。'西交大是我们造反派的老大哥，是和我们一起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冲杀过来的战友。李世英是受打击迫害最早起来造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走资派反的学生领袖，是我们'统指'的发起人和负责人。他虽然说了一些错话，办了一些错事，那是他没有认清'工总司'等假造反组织的真面目。但是，他毕竟是我们的战友，我们不能采用'千刀当刮唐僧肉'的办法，用对付保皇派的方法，针锋相对，使矛盾扩大化。特别是，我们过于感情冲动，提出'革命的打、砸、抢好得很'的口号，给那些别有用心的人造成口实，并用来打击报复我们革命造反派、疯狂搞'打、砸、抢'。而我们置他们的疯狂反扑而不顾，一味地批判李世英和西交大的右倾思潮，这样做，只能使亲者痛仇者快，大方向对头吗？中央领导让我们坐下来整风，就是让我们好好学习毛主席著作，用毛泽东思想武装头脑，真正识别谁是

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不要揪住朋友的缺点和错误不放，把敌人放在一边不管。”

经过高志萍的这番解释，大家的情绪才稍有好转。

自此，西工大的不再外出搞活动，坐下来老老实实整风，闭门思过。

3 月 6 日，陕西省保卫工作会议召开，研究和布置“镇反”工作。全省自 1 月 20 日至 4 月 15 日，共逮捕 774 人，拘留 809 人。其中把一部分造反组织及其成员定为反革命。

3 月 6 日下午，西工大又召开全校师生大会，刚从北京回来的校革委会主任孙福林，全面传达中央首长接见西安代表时的讲话，特别是 3 月 1 日接见“统指”和西交大代表时提出的六条要求：

一、关于造反派内部分歧问题。要抓整风、整组织来解决。夺权问题未解决要努力整风，准备夺权。整风要整掉风头主义、山头主义、无政府主义。学校以军训为主，工厂也可以由民兵军训。

二、打、砸、抢的问题。西安提出“打、砸、抢”是反动的。各校又提出“抓、揪、抄”，你们眼里没有党中央、毛主席。（总理谈到此时很气愤，并一个个提名指出，问“怎么办？”大家回答：“应受法律制裁”。）

三、对“大联合，大夺权”的口号。总理传达了 2 月 27 日，毛主席对“大联合，大夺权”的口号不同意。难道说没有一个单

位是无产阶级当权派？建议把大夺权的“大”字去掉，“联合夺权”。今后斗争矛头应指向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不提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如×××司令员既是军区的政委，又是一省的常委，他当然要保省委了，这就不能说是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了。

四、有关“抓革命，促生产”问题。今后不要再上街游行也不要搞宣传车上街。有人说：“我们厂休日游行，不影响生产”。我就不相信不影响生产。对待是否“抓革命，促生产”的问题和是否爱护国家财产，这是真革命、假革命的标志。

五、对待解放军问题。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只要大方向正确解放军坚决支持，如果只剩下一个人，也坚决支持，如果大方不正确，那怕有十万、八万人，也是不支持的，要反对他们的。是否尊重解放军，这也是真假革命的标志。

六、对待领导干部问题。对待领导干部不要揪来揪去，要给他们检查、赎罪的机会，要充分创造条件，给他们检查、揭发，让群众鉴定，是亮相的还是罢官的。斗争矛头绝不能针对犯了错误的造反派。

最后，孙福林安慰道：“中央首长对我们还是给予很大希望的，关键问题在于‘打、砸、抢’问题上。中央首长的谈话主要是围绕这个‘打、砸、抢’问题而批评我们的，实际上也是对我们的爱护。我们中一些同学本来是出自义愤的感情说了‘革命的打、砸、抢好得很！’结果，使阶级敌人钻了空子。他们利用这

个口号，不仅对我们革命造反派疯狂进行报复,而且还打着我们西工大、西军电的牌子进行破坏活动，使人民群众的生命受到威胁，国家的财产受到严重破坏。因此，‘革命的打、砸、抢好得很！’已经成为一个极反动的口号，我们必须深刻揭露这个口号的破坏性和反动性,旗帜鲜明地反对这个口号的,把它批倒批臭,永远判处死刑。为了备战需要，我们西安的四大院校，西交大、西工大、西军电和西安冶金建筑学院在整风中还要进行军训。党中央将派人民解放军帮助我们整训。”

在随后的整风过程中，西工大校园里贴出许多自己安慰自己、自己鼓励自己的大标语和大字报。如：“鹰有时比鸡飞得还底，但鸡永远不会比鹰飞得高。”“我们向真理低头，向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请罪，但致死不向西交大支持的‘工总司’低头、请罪，大杂烩组织有什么资格在我们面前哼一声。”“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为了誓死保卫党中央毛主席，我们愿意在叫骂声中成长，不愿在鞭炮声中狂欢灭亡。”……

3 月 7 日，陕西省军区对西安铁路局实行军事管制。

3 月 9 日，陕西省又对省广播事业管理局、省电台、市电台、西安电视台、《西安晚报》社、东方红广播站实行军事管制。并奉命陆续对省公安厅、省人民法院、省检察院实行军事管制。

3 月 12 日，“西安驻军支援无产阶级革命派统一指挥部”决定：由 21 军派出 57 名干部和一个连队分别进驻省、市委办公厅、工交政治部及省、市各工业局等 31 个部门。并由 21 军副军长苏

锦章、参谋长马友里、西安军分区副司令员刘文华等和分管工业的省委书记肖纯、副省长惠世恭、西安市委书记薛焰、颜志敏及3名副市长分别建立了省、市工业领导小组，即日起开始办公。

至3月15日，陕西省全省实行军事管制的单位共89个，其中仓库45个，劳改（场、所）22个，银行10个，报社、电台8个及铁路、公安、邮电、煤炭等单位。不久又成立了“陕西省抓革命促生产第一线指挥部”，下设农林、财贸、工交、文卫等四个办公室。

3月15日至18日，“西安驻军支援无产阶级革命派统一指挥部”共抽调省军区、兰州军区、兰州军区空军、21军、总后勤部驻西安办事处等单位的干部、战士2059名，联合组成“西安大专院校革命师生训练指挥部”，进入西安交通大学、西北工业大学、西北电讯工程学院，简称“西军电”、西安冶金学院4所院校开展军训。

到3月23日，在部队进驻的31个厅(局)中，全部建立了由进驻的解放军指战员、原领导干部和造反派组织代表三部分人组成的“三结合”的生产领导小组，并在厅(局)下属的51个处(室)、公司中建立了相应的生产领导班子。西安的局势似乎也开始进入了正常。

## 第 533 回：周恩来，接见工交口代表　水电□，汇报夺权后工作

3 月 2 日，周恩来在国务院会议室接见水电部、冶金部、化工部、一机部、煤炭部、铁道部、石油部工交口 7 个部的群众组织代表。参加接见的还有：李富春、李先念、余秋里、谷牧。7 个部的部长也都去了。

周恩来看见曾与张霖之一同关押的煤炭部副部长钟子云时，不禁悲愤地说："今天我看见了钟子云，看不见张霖之了，他已经化成灰了，我很难过！他失掉人身自由 40 多天，这样的拘留是违法的。一个部长，一个中央候补委员，一个人大代表就这样死了，就是对一个同学也不能这样！矿院把张霖之同志揪去 40 多天，为什么不让回家？至少可以先回国务院嘛。"说到这里，周恩来声音有些哽咽，"现在，让我怎么向党中央、向毛主席交代？"在场的李富春、陈毅、谭震林、李先念、谷牧等看着周恩来那悲戚的面容，无不为之动容。

开会了，周恩来说："先由水电部谈吧。"

水电部计划司的干部岳兵说："总理，先向你汇报一下水电部夺权情况，1 月 17 日，为了防止经济主义，打退部党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部机关'井冈山战斗团'、'毛泽东思想红卫兵'联合 4 个在京单位，进行监督夺权，成立了水利电力部革命造反监督委员会。夺权后当时认为存在问题：

1、没有很好发动部机关革命群众；

2、联合不广泛，没有体现大联合；

3、认为夺权不彻底，没有进行全面夺权。”

周恩来说：“就是铁道部，初步认为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也只是业务监督嘛。”

岳兵继续汇报水电部 2 月 10 日进行全面夺权的情况，周恩来问夺权后成立的“水利电力部革命造反委员会”：

“‘委员会’29 人中有长字号的没有？”

岳兵回答：“没有。”

周恩来：“没有长字号，夺权后 20 多天，怎么抓生产工作的？”

岳兵：“由生产组和勤务组指定的勤务员抓生产的。”他检讨了夺权中存在的问题，他认为：一是没有体现以部机关为主；二是发动部机关群众不够。没有体现三结合原则，同时埋怨司局长都不揭发刘澜波、钱正瑛。他说：“司局长没有亮相，不知道和谁结合。”

周恩来反驳说：“你们不给他机会，他怎么亮相？”

水电部程企唐辩解道：“最近我们对部长、司局长召开了几次亮相会给了他们机会。”

岳兵似乎感觉到了周恩来的不满，赶紧弥补说：“我们看了总理 2 月 17 日讲话和红旗第四期社论，觉得夺权过了头，采取了措施。勤务组由部机关 3 人增加到 9 人，其中有 1 名处级干部。2 月 19 日决定撤消生产组，改为监督业务，由勤务组抽出两个

负责。”

周恩来还是不满意：“怎么两个人，太少了吧！”

程企唐：“准备增加 5 人。”

岳兵补充说：“2 月 23 日起草了第 2 号通令，发动群众讨论，修正第 1 号通令错误。2 月 25 日发出正式通知，明确了水利电力部文化大革命领导权归水电部革命造反派，由水电部‘革命造反委员会’行使职权，业务实行监督，改正了解散部党委和政治部的错误。”

周恩来问：“你们夺权送报告来没有？”

岳兵：“送了，有第一号通令。”

周恩来：“通令我们不管。”

岳兵：“还有正式的第一号通知文件，还有给毛主席的致敬信。后来我们去国务院报喜。”

周恩来：“国务院收了没有？”

岳兵：“收了。”

周恩来：“答复了没有？”

岳兵：“送完后没有答复。”

周恩来：“没有办法答复。”

对岳兵的汇报，周恩来显然不满意，他说：“你们部级还没有人，你们也不排个队？”

岳兵说：“我们下一步打算，第一抓革命促生产，抓革命矛头就是对准以刘澜波、钱正瑛为首的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

的当权派，进行揭发、斗争。”

周恩来：“这个斗争会怎么开法？”

岳兵：“开群众斗争会，以前没有斗他，刚准备斗他，你们把他叫走了。”

张霖之死后。周恩来让国务院的部长分别住进中南海，将他们保护起来。周恩来说：“揭发斗争总是没有完，要允许他们把材料看一看，允许答辩。”

程企唐：“以前没有斗他嘛！今天刘澜波、钱正瑛在场，他们根本没有好好作检查。”

程企唐指着刘澜波、钱正瑛说：“你们说说，你们检查过一次没有？你们可以出来对质嘛！ ”

周恩来说：“我们现在是和你们商量问题嘛！今天开会不是斗争会。我是问斗争会是怎么开法。”

岳兵：“先搞反动路线，然后检查十几年执行刘、邓修正主义路线。”

周恩来：“如果两个阶级都检查，如果各部都这样做，那不就等于重新审干了吗？是否把整个历史都来搞？”

岳兵：“水电部情况特殊。以刘澜波、钱正瑛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水电部搞得很厉害，到 2 月份才开始揭，以前很少有揭发刘、钱老问题的大字报。”

李先念：“你们怎么先给戴上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帽子？”

周恩来："十一中全会以后，开过群众会议没有？"

岳兵："开过，他们没有进行过一次很好的检查。"

周恩来："他参加会没有？"

岳兵："参加了会。"

周恩来："回答了问题没有？"

岳兵："没有很好回答问题。"

周恩来："你先不要说没有很好回答，首先是说回答了没有。"

岳兵："回答了一部分问题，群众很不满意。"

周恩来："你说话总要带个副词。不要说什么很好回答，部分问题，不要带上个副词。如果说今天这个会议没有很好的解决问题，也不能说没有开。会还是开了。事情不能都满意，客观一些，实事求是。红旗杂志第四期社论，写得很客观。"

岳兵还是不明白，仍然强调说："刘澜波、钱正瑛确实没有进行一次正式检查，部党委的李代耕检查了一半，很不象样，大家把他轰下去了，群众很不满意。这件事情，刘澜波、钱正瑛可以在这里对证。"

周恩来："你们对立情绪怎么这么大。你们能不能对他们提出一些问题，给他们一些时间，让他们冷静的想一想，检查，能不能给他们一些时间？"

他推荐说："《鲁迅兵团向何处去》的文章，你们读过没有？""要好好学习，包括我在内，至少学三遍也不多。《鲁迅兵团向何处去》是集体写的，是好文章。希望你们好好整风，各部门的

造反派对我们说得这么甜，对另一方面就那么苦，苦乐不均，这不是毛泽东思想。昨天我说了学院。我相信他们能整好风，会拿出很好的东西。今天我倒要说说机关内的造反派，也要好好学习，不然怎么搞好三结合，搞好生产？既斗争又团结，把业务搞好，允许他们冷静检查，给他们思考的时间。我们是无产阶级民主，不是派别斗争，是就是是，非就是非。毛主席说了，只要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而又坚持不改屡教不改的，都要给以人家改过自新的机会，与人为善。检讨主要放在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上，个别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一般是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有轻有重，应该检讨。主要检讨文化大革命中的错误，发觉个别有历史问题的，可以调查，不要普遍审干，人人过关是不对的。”

他批评了把揭发变成亮相，让司、处长层层揭发，层层过关的做法，说：“总有些人可以不检查的。有的人本来就很好，用不着检查嘛。有的人可表表态承认错误就行了。”

他说：“你们是当权的，只是半权，不可能把权都拿。南京大学来了两个同学和我说，现在懂得了，夺了权，不知道如何掌权？夺权容易，掌权难，有那么多问题要找他，要化肥，要农业机械，他们管不了，非三结合不行，他们要向毛主席请罪。他们说得很诚恳。我说，不要请罪嘛。有错误不要紧嘛，错误也是错误，不是严重的，经过一次以后就好办了，夺不能乱夺，中央各部只能搞监督，不能把部长都放在一边，要搞三结合。我看你们

有一个困难没有解决，如果你们对部长把口径放宽一些，群众就会攻你们，说你们右倾了，群众就不拥护你们，说你们弄错了，你们要实事求是，否则这种领导是不巩固的。”

周恩来感慨的说道：“我差一岁就 70 岁了，参加革命 47 年，也犯了许多错误，我总觉得自己不够，犯了错误就承认，知错必改。在斗争中学习，林彪同志对干部三个要求，第一就是革命性，斗志不能衰，紧学毛主席著作，紧学紧改紧跟，跟到断气为止。如果能留一点东西，能供你们参考，既要实行三结合，把业务抓起来。我对你们充满热情和希望，希望你们能接过来，我垂帘而言，趁主席健在，我们鞠躬尽瘁，想把你们培养成接班人。我们日以继夜的把希望放在你们年轻人身上，不放在你们年轻人身上，还能放在我们这些老年人身上吗？今天你们还不能全部担起来，我们不能挑剔你们，现在文化大革命的担子压在你们身上，业务的担子也压在你们身上，这么重的担子压在你们身上，必须三结合。我没有给那个部长有辩词，希望你们考虑考虑。二月份有那么多文件帮助你们，希望你们好好学习。”

岳兵接着汇报，他还是强调说：“水电部情况特殊，到一月份阶级斗争盖子还没有揭开，二月份开始揭，阶级斗争盖子没有揭开。”

周恩来不同意这种说法：“搞了半年还说阶级斗争盖子没有揭开，这等于否定了半年的战线果，也否定了你们自己，北大的第一张大字报，红卫兵上街，矿院去煤炭部点火，阶级斗争的盖

子就揭开了嘛。这就是说还得大搞，如果说阶级斗争盖子还没有揭开，你们这些造反派怎么出来的，你们跳出来，盖子就揭开了嘛！如果说盖子还未揭开，你们造反派就自己否定自己。非要揭出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揭出一批黑帮才叫揭开盖子？那有这种逻辑。昨天我听了就觉得不对头，今天你们又说。你们把半年的成绩又否定了。”

周恩来问石油学院大庆公社：“你们能说石油部的阶级斗争盖子没有揭开？”

石油学院赶紧回答：“石油部的反动路线盖子揭开了。”

周恩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就是阶级斗争嘛。就是两条路线斗争。你怎么能说水电部阶级斗争盖子没有揭开。把你们‘井冈山战斗团’置于何地，难道你们是搞阶级调和？”

岳兵有些慌了，吭吭哧哧的辩解说：“水电部反动路线盖子揭开了，有些司局盖子揭开了，还没有全面揭开。”

周恩来：“阶级斗争我们这一辈子搞不完，你们这一辈子也搞不完，全世界共产主义化了，还有阶级斗争残余。你们跳出来造反，就是阶级斗争的盖子揭开啦。非要打出一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各部都要有，那把中央置于何地，难道毛主席领导的影响就没有了吗？毛主席的影响还是很大嘛。你们的思想方法、分析方法不对头，也不符合形式逻辑嘛！”

岳兵接着提出造反派要整风，要学习，前一段造反派犯了不少错误，特别是夺权以后，陷入事务主义圈子，没有好好学习毛

主席著作和中央文件。

这条获得了周恩来的肯定："是嘛！你们让长字号都靠边站了。势必陷入事务主义。所有长字号的非要有揭发材料不行，才算过关，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不了解情况，不会乱说。"

岳兵："最后向总理请示几个问题。 第一，部党委工作要不要监督。"

周恩来："当然要监督，党委恢复没有恢复？"

岳兵："从 2 月 25 日已经恢复，我们已经和党委成员李代耕打过招呼了，叫他们进行正常工作。"

周恩来："党委还有那几个成员？"

程企唐："王英先、杜星垣、……"

周恩来："党委包括刘澜波、钱正瑛在内嘛，中央没有撤职嘛。"

岳兵："造反委员会监督党委工作，能不能列席党委的会议，我们的看法还未统一，我们认为至少应该让造反委员会的党员列席党委会，当然不一定所有的会都参加。"

周恩来："可以嘛。'大庆公社'，你们怎么办的？"

石油学院："有的不是党员也列席党委会。"

周恩来对李先念说："暂时可以这样作。确实是个问题，三结合没有搞起来，也无法监督党委。"

岳兵："今后与外单位如何联合，在京的学院等单位能否参加'革命造反委员会'？"

周恩来："2 月 21 日通知说了，以本单位为主，若必要外单位可以留下，看你们是不是需要，同时看外单位是否愿意。"

岳兵："我们认为在京单位愿意留在部机关，部机关群众也同意，对文化大革命有利。如北京水电学院和科研单位来部造反较早，有群众基础，可以留下吗？"

周恩来点头，表示同意。

岳兵继续请示："水利电力部'革命造反委员会'领导文化大革命权限范围多大，是领导水电系统，还是水电部机关，我们初步认为仅限于领导部机关文化大革命，但在实际工作中碰到一些问题，如东北电管局要罢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官，我们介绍给部党委处理，他们还要我们表态。"

周恩来："《鲁迅兵团向何处去》的文章上讲了，不要以罢官为目的，罢官不罢官，你们不管是对的。"他没有直接回答问题。

岳兵："党支部的权能不能夺？谁来夺？部党委属于中央领导，不能夺党权。司局的党支部是个基层组织，能不能夺？"

周恩来："首先排个队，那些人可以出来工作。"

岳兵："有的司局党支部书记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部党委已经作了处理。"

周恩来："烂掉是否作了结论？"

岳兵："部党委已经批了。"

周恩来："部党委批得对不对？

岳兵："部党委批得对。"

周恩来："怪了，党委这个事批对了，但本身又有问题。"

岳兵："刘澜波、钱正瑛是黑帮，党委不一定都坏了。"

周恩来："这个分析方法对。"

李先念："支部可以改选。"

周恩来："改选、补选可以，党支部本身还存在嘛。支部书记不好，支部不应当没有，5 人有 2 个人不好，还有 3 个人。"

接着，程企唐汇报生产业务问题，他说："去年 10 月份以后当权派就很少抓生产，留下了一个烂摊子，问题成堆，矛盾重重，当权派腰杆子挺不起来，处处被动。"

周恩来："你们说阶级斗争盖子没有揭开，他们腰杆子是挺不起来。"

程企唐："他们说话下面也不听，指挥不灵，渠道也不通，下面有些问题上来也不敢顶。电力生产基本维持正常的，主要原因是主席提出的抓革命促生产方针的威力，电力生产队伍比较整齐，广大电业职工的努力，同时电力生产反应比较灵敏，牵涉面比较广，但缺煤问题严重，影响发电。"

周恩来关心的问："哪些地方缺煤？"

程企唐："华东、东北、西北……基本建设问题多，必须迅速解决……计划的安排和指导思想都有问题，在水利电力建设方面，很多地方都执行修正主义路线。"

## 第 534 回：再听取，冶□、化工□情况　抓生产，责成军□要负责

周恩来："你们说阶级斗争盖子没有揭开，这个大帽子压在头上，他们就解放不了，你们还要把红旗杂志第四期社论学一学，要不要再给你们念一遍?不能说都是修正主义的，就像三门峡有很多问题是我们批的，没有经验嘛，不能都说是苏修的影响，不能总而言之，统而言之，都说成修正主义的，新安江是我国自己设计的，也还有些问题，例如木材过坝和鱼的问题也出了毛病。革命相信你们，你们从学校毕业二、三年，业务还不能全担起来，现在把水利电力业务全交给你们，你们也要犯错误，我们不能责怪你们，责任还是我们的。""你们已经取得很大成绩，业务要进行监督，全交给你们还不行。要紧跟中央精神，要说明，阶级斗争盖子没有揭开是不对的，帽子一戴，腰杆子一定不硬。"

程企唐："三线建设，战备电源等具体问题，下面有很多问题都找上来了。"

周恩来："下面来找，你们叫勤务员也好，服务员也好，反正是负责人，你们要顶住，下面要说你们右倾。现在正是要纳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正轨，不是纳入资产阶级的正轨，要整理出新秩序。清华井冈山报反托派不对，社会上反右倾也不对，既不是托派，也不是右倾，你们不要怕右，你们并没有右倾错误。"

对程企唐汇报的电力建设、水利抗旱、渡汛方面的问题，周恩来很关心。

程企唐又汇报了移民中的问题，他说："例如丹江口移民问题，张体学很不负责，单方面撕毁协议。我们表示了意见，保证丹江按期发电，协议不能单方面撤毁，移民工作积极进行，移民问题由湖北、河南双方协议，他们要找国务院，我们不同意，矛盾不要上交。"

周恩来："两省解决，矛盾不上交，原则是对的，我们也谢谢你们。但是矛盾还没有解决，问题还会反上来的，地方上吵来吵去，老百姓吃亏。水利上有些问题，不到现场不好解决。水利必须全面规划，去现场规划，宁肯时间长一点，不能孤立解决。从三门峡到岳城水库都还存在问题，不是对上不利，就是对下不利；不是上游吃亏，就是下游吃亏；还有左邻右舍问题，问题很复杂，不能一概怪当权派，这包括我在内，我也是当权派。你们当权时也会犯错误，我们希望我们不犯错误，也希望你们不犯错误，要少犯错误，不可能不犯错误。同志，就是无产阶级思想体系，无产阶级当政，也可能犯错误。只要不变质，不复辟，至于错误，一万年也会犯的，到共产主义社会，还有矛盾，没有矛盾也就没有社会，这是毛泽东思想的精华。同志，不能把一切错误都归之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要一分为二，那些是修正主义，那些是缺乏经验。"

周恩来再三强调："不要把一切错误都推给当权派，走资本主义道路。"

周恩来再次问道："业务监督有几个人。"

程企唐："我和史提。"

周恩来还是认为："业务监督只有俩人，这么少呀，要增加一些。希望你们排个队，部级司局级到底怎么使用，把你们的意见提出来，我们才好讨论。快点三结合。春汛快到了，水电部赶快把工作抓起来。"

水电部的汇报情况到此结束。周恩来接着说："冶金部谈吧？"

冶金部汇报夺权情况："吕东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我们夺了权。钢院要退出革命造反委员会，他说我们右倾了。"

周恩来："还右倾呀！不对嘛。他们学了红旗杂志第四期社论还这么样。"

看来，周恩来对冶金部夺权后的工作还是比较满意的，没有提更多的问题，只是强调："你们也要好好学习《鲁迅兵团向何处去》的文章。不要材料挂帅，不要把许多人的精力放在材料上。搞材料，抢材料，许多精力浪费在那里，其实只要把观点摆清楚了，就可以了。要发动群众，搞人民战争。"

"你们不要把一迭一迭材料送给我。老实讲，我也没有时间去看。给中央文革的，也没有时间看。抓住重要问题，把观点为摆出来，写个条子就够了。当然材料问题上有成绩，南开大学'八一八'整理的材料对党是有帮助的。搞材料应该节约一点，抓大的。"

冶金部："总理说夺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权，业务监督权，我

们没有很好领会。有人说我们夺业务领导权犯了方向错误。”

周恩来：“这不对，承认错误太多不对，这还是经验问题。我向主席谈了中央各部夺权情况，认为各部还是业务监督为好，主席同意了。从上海夺权后，我们估计到必然引起连锁反应，事情是逐步认识和发展的，经验还是要经过反复的，事情还要经过摸索。经验不经过反复也是不行的。”

他说：“各部改为革命委员会不要太快了。各部实行部的三结合要以革命造反派、革命群众为基础，革命的中级干部和革命的领导干部三结合。在这里讲一下，各部实行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要慎重一些，要和中央各口先打招呼，批准了之后，才能公布。你们革命造反派自己搞革命造反委员会是可以的。革命委员会拿出来要像个样子，现在还没有典型，你们要创个样板。”

冶金部问：“总理 2 月 17 日在财贸口的讲话是否适用于工交口？先念同志领导的是无产阶级司令部，工交口是薄一波领导的是资产阶级司令部。”

李先念：“财贸口也有薄一波的人。”

冶金部：“吕东是紧跟薄一波的人。”

周恩来：“薄一波是，不等于各部是，不能说他是，和他工作过的人都是。刘、邓是，我们也是？今天不谈个人问题了。”

接着，冶金部汇报生产中的问题，周恩来指示：“由秋里同志抓一下冶金部的工作。 ”

冶金部汇报大企业夺权情况，要求对大企业实行军管。周恩

来说："大企业统统军管也不好，夺权也是个考验，你们的心情我懂得，你们担心完不成任务，这心情我理解。夺了权你们懂得了一些问题，你们管了一半的权就好，就懂得了，不实践没法子认识的。经历了一番，好处就在此，一夺权就有了经验。"

冶金部请示："冶金系统在京单位在部里设个联络站行不行？"

周恩来同意："可以，由部机关抽 3 人，学校 1 人，科研单位 1 人，共 5 到 6 人。有一个房间，一个电话，一两人值班，保证房里有人就行。我的值班室才 5 个人嘛。大字报有份量的可以抄一下，现在小报很多，有些大字报和报屁股的消息不能登上去，报屁股的消息最不可靠，一大堆人名，什么砸烂狗头，人头嘛。军管也登出去了，我们的话不胜更正。小报把消息都走漏出去了。"

李先念："日本共同社把总理讲话都登了。"

周恩来："无产阶级的报纸，报屁股是资产阶级的。邓拓搞北京晚报，陶铸搞的羊城晚报，也没有搞成现在这样子。的确我们头脑中有许多资产阶级思想，一张报纸上就可以一分为二，小报问题要注意一下。 "

冶金部问："《冶金报》还办不办？"

周恩来："《冶金报》停下吧，不要忙着办了，现在还忙不过来。"

接着，周恩来让化工部汇报了他们的夺权情况。

南京的两大派群众组织代表自2月份在北京中央诸领导接见后，在一系列问题上依然是针锋相对，互不相让，根本无法实现大联合。3月2日夜至3月3日凌晨，在人大会堂西会议室，陈伯达、康生、王力、关锋、穆欣又一次接见江苏代表团。

康生首先谈到对待解放军的态度问题，他问："南京有冲军区的没有？"

代表回答："八一医院发生过。"

康生："你们要和他们斗争，要反对，到处贴他们的大字报。当前对待解放军的态度，是革命、不革命、反革命的分水岭，是一个标志。因为解放军是毛主席亲手缔造的部队，是林副主席在那里亲自领导的。解放军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支柱，是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有力工具。要夺好权、掌好权、主要靠你们，但更重要的是依靠人民解放军。一定要拥护解放军、支持解放军、依靠解放军。不管什么理由，在当前情况下，冲击解放军就是反革命行为。要坚决执行军委《八条命令》，这是主席批准的，主席签字的。"

军队支持群众的革命行动是正确的，但不能支持一派、打击另一派，要支持所有的革命派……不然的话，就会卷入他们的宗派斗争中去了。

对于领导干部的"亮相"，康生解释说："'亮相'就像化了妆出来唱戏，下了妆后还是原样，这不叫'亮相'。要有革命行动，要真正出来革命才行。态度要鲜明。提倡什么，拥护什么，

反对什么，赞成什么，必须鲜明，不能折衷。亮相不是为了保乌纱帽。”

关锋：“亮相就是公开站出来揭发问题。”

王力：“亮相必须有鲜明的旗帜，真正站出来和群众一道揭发他们是怎样搞阴谋的，怎样镇压群众的，并认真检查自己的错误，然后跟群众一起闹革命。”

谈到江渭清的问题时，康生说：“根据《红旗》四期社论，对老干部要全面的看，要从他们的整个历史，也从他们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的表现来全面的分析。在一定时期，对他们加以保护是一回事，把他们作为革命领导干部，搞三结合又是另一回事。因为三结合是指革命的三结合，是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三结合。叫江渭清来北京，是要开导他，承认错误，是很好的检查。中央并未对他说三结合。”

陈伯达：“你们可以考虑一下，哪些是无产阶级革命派，谁可以作为三结合的核心人物，这要从实际行动中考察。只要是无产阶级革命派，差一点（指能力）也可以。那么多干部总会有的。大致上是不错的，旗帜是鲜明的，是真正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的就可以。有的是要争取团结他们，但不能作为三结合的核心。”

关锋：“请他们挂帅，作领导核心，跟争取团结他们是两回事。”

王力：“江苏省委干了些什么事，要充分揭发。对于江渭清，

单凭江苏饭店‘一三事件’就应该打倒。江苏省委已经搞到顶点了，够严重的了，应该彻底揭露江苏省委。合二而一不能解决问题。江渭清好？还是高啸平好？你们要冷静考虑，不要感情用事。根本的界限是看他站在那一边。”

关锋：“李士英、陈光，你们不起来揭发江渭清、彭冲在过去干的那些坏事，凭什么搞三结合？！”

康生：“我有两句话。一句是杜方平说：‘至今还看不见省委有什么革命裂痕（裂痕是指路线上、原则上的分歧）’。另一句是张建山说的：‘直到现在还看不到省委有什么革命行动。’”

王力：“直到现在，他们对中央文革还是敌对的！”

康生：“建议你们省委听听他们的意见，拿这两句话，很好地检查自己的行动。以江渭清为首的省委，在文化大革命中干了些什么事？反对了什么？……我们还是希望他们挺身而出，坚定的站在主席一边，反对刘、邓路线，和革命同志一起将江苏省的文化大革命搞好。革命的组织打你们，不是为了把你们打成右派，而是要打成左派。自己要争作三结合的对象，成为毛泽东思想的坚定的成员。我们对这些同志寄予希望，但自己也要创造条件。李士英、包厚昌参加了生产委员会，你们不要以为有人支持，就有资本了，已经亮相了。参加生产委员会，并不等于在原则上（和错误路线）分裂。希望省委挺身而出，旗帜鲜明。”

康生还说：“马路新闻不要相信。你们在北京住了这么多天，好的东西要学，不好的东西不要带回去，比如有个‘百丑图’你

们不要搞那个，那是自己给自己抹黑。很快传到香港登了报，两三天就又到了莫斯科。大高帽子、持黑牌子……

昆明提出‘左派内部必须大乱’，西安提出‘革命的打、砸、抢万岁’，你们那里是‘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所有这些，都是以‘反对右倾机会主义思潮’为中心提出来的。中央的精神是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这是目前的大方向。你们提出这样的口号，内部互相打，放松了敌人，这才是真的形‘左’实右，要坚决反对！‘革命的打、砸、抢万岁’，哪有革命的？是反革命的行动。“

王力：“是流氓、土匪的行为！”

关锋：“‘江苏的天下是《红总》的天下’的口号，是宗派主义的口号。江苏是工人阶级、贫下中农的天下，是江苏人民的天下。”

康生：“你们到北京来，总理接见了几次，不要回去就写大字报说总理接见了我们几次，用来压对方。这样做是借人抬高自己，实际是不相信自己的力量。

赤卫队要充分揭露，要做大量的思想工作，坏人总是一小撮，多数人是可以争取的。”

关锋：“要把群众和核心领导人分开，多数人是可以争取、团结、教育的。”

3 月 2 日下午，“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组织组”公布了这样一个“意见”：

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组织组意见

根据谢副总理元月十七日接见洪涛等同志的讲话精神，和我们现有的调查材料，作如下决定：

（一） 坚决按中央文革、总理、谢副总理的指示精神办事。

（二） 民院红卫兵总部不予吸收。

六七年三月二日下午

1 月 31 日，辽宁 24 个群众组织发起成立的“辽宁省革命造反夺权指挥部”于凌晨 3 时宣布接管辽宁省委、省人委的一切权力。这次夺权没有得到中央承认。

2 月 20 日，辽宁省军区对辽宁省公安厅实行军管，沈阳军分区对沈阳市公、检、法和市邮电部门实行军管。

2 月 27 日至 3 月 1 日 ，辽宁省军区召开部队和地方三级干部会议，研究和布置了农村备耕和春耕生产工作。

3 月 2 日，沈阳军区给中央军委、全军文革小组并国务院、中央文革小组打报告说，沈阳军区领导机关及驻沈各军事机关，于 2 月下旬共抽调 780 名干部，组成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入沈阳市 122 个大、中型工厂和部分大专院校，运用有线广播、口头讲解等办法，反复宣传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的号召、十六条、工业十条、八项命令以及中央、军委的其他有关通知、指示，党的政策一经讲清后，部分工厂由于少数人闹事而产生的不正常现象，逐步得到纠正，生产普遍上升，武斗基本制止。

3 月 3 日，毛泽东阅后指示：“林彪、恩来同志：此件可印

发军级会议各同志。军队不但要协同地方管农业，对工业也要管。沈阳军区派遣大批人员进厂做宣传和做调查的办法是很好的。二十七军在无锡、五十四军在重庆、二十三军在伊春、苇河等处也有好的经验。总之，军队不能坐视工业生产下降而置之不理。”

## 第 535 回：说新疆，众人保肖华检查　苏军管，师大炮□谭□林

3 月 3 日，肖华在总政治部机关干部会议上做检查。陈伯达、康生、周恩来在会上都肯定了肖华的检查。周恩来说：

“同志们！我同意刚才陈伯达同志、康生同志对肖华同志的错误检讨的估计，确实肖华同志刚才的检讨是诚恳的，是实事求是的。”

他接着说：“刚才肖华同志所检查的错误，只是我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初期的运动中一小段时间的错误，可是为什么一小段时间错误，竟会引起这样轩然大波？几乎影响到我们解放军的许多方面，许多地方。对这个问题，我想我们在座的作政治工作的同志。好好的深刻的想一想。因为我们作的政治工作。一个领导同志在一小段时间内犯了一个错误，为什么要引起这样的轩然大波？ 据我看恐怕有三个方面的原因。

一方面有很多的人，并不完全清楚这个错误的真相，自己参加了文化大革命，听了一点传说，起来参加这个斗争，这个批判，这个揭露，有时候受一种说法蒙蔽，误听了一种传说，这样子参加进来的。

第二方面的原因，就是把这个问题，就是对肖华同志刚才检讨的这个错误，看得很大，用放大镜子看，没有用全面看一个领导同志的整个历史。而确实有很多的同志，并不知道肖华同志 30 来年，近 40，所走过的漫长的一条革命历史的过程，这样子

因小掉失大的，只看眼前的一点，没有看到全部的历史。据我想，恐怕这样的同志还不少。听说这样的人是很多的。

还有第三方面，可以说是最主要的方面，是有那么很少数的人别有用心，故意要利用这个问题，挑起一个大波浪，来把我们的解放军，首先把我们解放军的政治工作抹黑，你看看，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都这个样子么，那政治工作就受影响了么。这样就影响解放军。这样，这一小撮的人，实际上就把这一个错误挑起来，实际上是反对解放军，反对我们林副主席，反对毛主席的。所以，我们应该很好的加以分析。而这种人最少数。是极少数，现在大（多）数人心里是透亮的。”

周恩来从早晨 9 点一直讲到中午 12 点。

3 月 3 日，周恩来还参加了叶剑英主持的批判新疆军区副政委张仲瀚总结会。他在会上讲了自 1966 年 12 月 19 日新疆的绝食事件和后来生产兵团发生石河子事件、冲击新疆军区事件等事件后，中央为新疆问题下发的一系列文件。他说：

“1 月 23 日那个文件是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出的，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支持真正的革命左派。1 月 28 日　中央军委发的八项命令，2 月 11 日七项规定，然后中央军委关于军队夺权范围的四项规定，最后关于生产建设兵团的十二条规定，这五个文件一拿出去，新疆的问题就决定性的改变了，不管是冲军区，冲生产建设兵团的受蒙蔽的群众还是闹事的，马上都觉醒过来了。主席的声音，林副主席的威望，军委的命令，

党的影响在生产建设兵团，在各族人民中是得到无限信任的。”

“当时主要领导人除赛福鼎外都在北京，王恩茂同志、郭鹏同志、张希钦同志、熊晃同志，自治区还有林渤民同志在北京，生产建设兵团裴周玉、丁盛同志也在北京，赛福鼎同志势孤，把你一个人丢在那里，不过你还沉着。军区也在动摇，生产兵团就闹起来了，就这样子，只要中央，毛主席的声音一到，但广大群众还是沉得住气，马上响应，这不能不使张仲瀚今天上午低头认罪，不管你过去十七年的影响，只要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就什么都没有了。尽管今天还有些同志没有认识自己本质的错误，不管你怎么做，总是教育了新疆的广大干部，也教育了其它的干部。一切都是党给的，都是毛主席教育，毛主席领导的，离开了这个还有什么呢？”

“生产建设兵团不是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的，这是丁盛同志在京讲的，很激昂慷慨，有根有据。大庆是两论起家，学习毛著的，在这方面可以看出不政治挂帅，不艰苦朴素，又不是解放军的传统，没有响应林副主席的号召，我把这两个作个对照，大庆确实是好的，有点骄傲，摔了个跤，不是大跤，可是生产建设兵团在这方面现在就出了乱子。”

“主席在 20 多年前，在延安整风的时候就说，我们承认山头，然后消灭山头，这是辩证法。承认山头才能教育他，帮助他，然后消灭山头。如果在一个地方蹲久了，只是过去的一伙，没有新的血液进来，常常是久而不闻其臭。总有香有臭，是一分为二

的，一个人的思想也是一分为二的，林彪同志讲，我们既是革命的一分动力，也是革命的对象。常在一起，就只看到好的一面，互相欣赏，不看到缺点错误的方面。比如象霸道散漫，大家都如此，没有那个批评谁，去一个新的就感觉到了。裴周玉、丁盛同志到兵团就发现很多缺点，就敢于说，于是张仲瀚就利用派性，反对裴、丁、李三个同志，为什么能煽动一批人，就是因为有一批人气味相投，没有认识人家的批评是善意的。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只要受得住，我们就是要这样的。”

当天，中共中央办公厅通知，将在北京的张仲瀚留京监护，隔离审查。不久改由“中央专案审查小组”第一办公室进行监护审查。

3 月 3 日，根据中央指示，新疆驻军开始“三支两军”。新疆军区对《新疆日报》、新疆广播电台实施军管。驻疆空军 7335 部队也对一些要害部门实行军管。但是，新疆军区和空军 7335 部队在支左过程中，分别支持了乌鲁木齐观点对立的两派群众组织，结果更加助长了两派的对立和冲突。

3 月 3 日，北京大学哲学系教师郭罗基贴出大字报：《新北大要整风，聂元梓第一个要整风》，其中提到聂元梓 1966 年 11 月涂改录音磁带和其它一些问题，在北大校内引起轰动，当晚即召开辩论会，随后出现许多支持郭罗基的大字报，再次在北大掀起了一股反对聂元梓的风波。

郭罗基，哲学系左派教师。在 1965 年国际饭店二次会议期

间，曾立下悲壮誓言："杀了孙蓬一，还有郭罗基!"令一些人钦佩得五体投地。

起初，聂元梓不承认修改了录音带。校文革常委侯汉清找到"新北大"《动态报》负责人、物理系学生胡宗式和校大批判组的陶一飞，约他俩调查录音带的事。他们到广播台询问有关人员，其回答问题支支吾吾。胡宗式问他当时拿了几台录音机？他说："两台。"侯汉清他们听了录音，听到有摁键的卡卡声。那时的录音机在修改磁带时，必须两台一起用，所以会留下"卡卡"的声音痕迹。

调查后，侯汉清、胡宗式、陶一飞他们三人联名写了一份大字报，讲了聂元梓修改录音带的过程。大字报贴在大饭厅东面门的上方，引起不少人的关注。后来聂元梓在广播上承认修改了录音带。

3 月 5 日，北京大学数力系四年级的谢定国，用"扬子浪"的名字，贴出支持郭罗基的大字报。但也有些"新北大公社"的战斗队贴出大字报反对郭罗基，说他是"针对新生的红色政权"，是"逆流"。聂元梓没有制止这种压制批评的现象。群众的争论逐渐激烈。

北京大学校文革常委侯汉清对聂元梓修改录音带一事，认为聂元梓的政治品质有问题，于是和她分道扬镳。与侯汉清同时与聂元梓分手的还有校文革常委会副主任之一的徐运朴，俄语系研究生。胡宗式和陶一飞没有把这件事看得太重，继续在"新北大

公社”的相关部门工作。但是他们和《动态报》的大多数人还是支持郭罗基的大字报。在3月6日出版的《动态报》第73 期中有这样的报道：

动态报胡宗式等十二人贴出题为“新北大整风向何处去”的大字报，说：“校文革必须开门整风，聂元梓同志必须带头，某些常委的包袱必须卸掉，整掉私心杂念，整掉保守思想”“迅速把由郭罗基同志这张大字报引起的辩论引入正轨”“郭罗基同志的大字报是一张革命的大字报”“对这张大字报的围攻更是错误的”“希望聂元梓同志正视自己的缺点和错误，在夺私字权方面也不愧为一面旗帜”。

在这次风波中，“新北大公社”中化学系 0363 班“北京公社”的“0363 战斗队”贴出海报，倡议校文革开门整风，并在大饭厅多次召开大型串联会，设讲坛，批评校文革，给聂元梓、孙蓬一提意见。

3 月 4 日下午，戚本禹、谢富治与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谭厚兰、王大宾等人座谈，戚本禹说：“现在从中央到地方都有一股资本主义复辟逆流。听说谭震林镇压造反派很厉害，那里资本主义复辟严重，你们红代会应该表态呀！刘少奇、贺龙这些人现在虽然倒了，但是他们的老同事、老部下还在，如果这些人掌权，我戚本禹的脑袋保不住了，聂元梓，你们几个人的脑袋也保不住。”“什么聂元梓一派，什么师大派，什么地质王大宾，什么谭厚兰，统统杀头。”

第二天，3 月 5 日凌晨，戚本禹、谢富治在政协礼堂召集地院“东方红”内不同意见派别的代表开会，解决总部领导问题。北京市革委会筹备组的周景芳也参加了会议。会上，地院周永璋、蔡新平和朱成昭争吵的十分激烈。朱成昭坚持他只是想找中央文革谈一些想法，不是反中央文革。

戚本禹听取了各方意见后说：“陈伯达同志的批示是爱护性的，并没有把谁打成反革命。伯达同志的批示是规劝性的，是听说你们要反对我们，劝你们不要这样做。”

他说：“我们很忙，没有见你们，正在与一股反对文化大革命的逆流艰苦斗争中，你们内部却在搞两派斗争。我们太忙，顾不上和你们谈话。江青同志派阎长贵同志多次到地院帮助你们，‘东方红’大旗不能倒。阎长贵同志的讲话是代表中央文革的，代表江青同志的。希望你们是团结，而不是分裂。在当前两条路线斗争决战的时候，谁搞分裂，谁犯错误。搞小分裂犯小错误，搞大分裂犯罪。要搞好团结，搞革命的三结合，建立全院性的领导机构，是你们当前重要的要做好的大事。要尽快复课闹革命，搞好斗批改。”

他还说：“地质‘东方红’这面旗不能倒，要团结。朱成昭先不要当头，只当个战士，‘闭门思过’。地质‘东方红’由王大宾负责，把这面大旗扛起来。李贵同志，你是南征北战的老革命，要支持王大宾的工作，和他一起扛起这面大旗。”

会后，戚本禹派王广宇到地院朱成昭的宿舍找朱成昭，要他

好好反省作检讨。

当天，戚本禹在政协礼堂接见造反派代表时又说："江青同志说，地质'东方红'的红旗不能倒，还有北航'红旗'、'新北大公社'、清华'井冈山'、师大'井冈山'，江青同志说，红旗不能倒。"

3月5日，周恩来、康生等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侧厅会议室再次接见江苏省"赴京控告团"26人和"赴京代表团"33人，对双方都做了批评。谈到江苏的问题，周恩来说：

"因情况复杂，所以耽搁的时间长了一点，今天商量了一个共同的认识。江苏一月份形势确实很好，正在开展，但有个最大的弱点，就是省委领导人里没有站出来检讨批判，一直未站出来，这是对夺权斗争很不利的一个方面。"

周恩来回顾了江苏文革以来的过程，说："从南大八.二七开始，然后影响到其他学校。南大斗争更早了，以反匡亚明开始，北京、西安、南京是全国最早的，三大：北大、南大、西交大，我们一提起来就想起这三个学校。文化革命发展半年多了，工人起来了。今年1月3日，有一次斗争发生了武打，'一三'之前，11月份，比上海还有个有利条件，上海发生安亭事件，受上海影响，工人就起来了，受上海的影响嘛！……在工人中……成立组织是许可的。同意了上海，原则上就同意了全国。这时正好，南京工人起来了，我们同意了南京工人组织，工人组织也就起来了！跟着，江苏省委和上海市委一样，犯了错误，比上海更严重，用

‘赤卫队’对抗，‘一三’就交锋了。跟上海一样，保守派也来请愿了，实际上后面有人指使。我们打过多少次电话，阻止住了。后来发生了江苏饭店流血冲突，革命造反派取得胜利，这还是个好形势。”

周恩来肯定江苏的“‘一三’是保守派挑起的，革命工人与学生站在一起，取得了胜利，这个形势向好的发展。但是，到月底造成了分裂的形势。严格说来，排斥南京‘八.二七’，排挤一派，夺权派应负主要责任。我给文凤来、张建山讲，他们也承认了。最关键的是夺了权了，《新华日报》也在这派手里。准备在“一.三零”召开大会，30万人。南京八.二七这一派写了个声明，承认这个夺权，但认为有严重错误，还是当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这个态度很好。那是个关键，如果《新华日报》同意登了，就好了嘛，但夺权方面拒绝了。第二天南京‘八.二七’去了5万人参加大会，照顾团结，把夺权斗争推向前进。可是夺权派找了个反对南京‘八.二七’的中学生上台发言，批评了南京‘八.二七’，说他是站过来了，这样不仅不登声明，犯了严重错误。声明很好嘛！这个态度很好嘛！很合乎我们的要求。第二天还当场指责人家，这样越走越错，发展趋势是越来越错。夺了权，不是向好处发展。夺了权有严重错误，不是纠正错误，而是错上加错。关键是声明，是‘一.三零’大会。……你们行使了权，对方就受压制。你们提的口号是在压制人的，‘谁反对一.二六夺权就是反革命’。……这样向错处发展，错上加错！这是就几个

大的方面说的。”

周恩来接着说：“‘一.二六’之后打、砸、抢发生了，打、砸、抓不是少了，而是多了！这不仅不是革命的‘三结合’联合夺权，也不是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夺权。……‘三结合’暂时没搞起来，有了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也是允许的。但这样变成一派的权力机关，这样的权力机关，我们不能承认。我们必须考虑另外的办法，不能看这趋势发展了。这不仅我这样说，就是夺权的负责人，回去之后，回来，我找了张建山，葛忠龙。张建山一见我就说：认识到夺了权掌不了权要犯罪，不改正就成了犯罪。我很感动，这还是诚恳的。他说：各厅局都来问我这事，那事，我还是未毕业的大学生，怎么知道，不好回答。这个态度还是好的。”

周恩来说：“我们根据双方表示，觉得应在革命派联合之前，‘三结合’条件成熟之前，搞一个过渡，实质是军事管制，但不宣布，在边疆搞了也不宣布。我们现在抓生产也是请的军区。从28号到3月2号开了个农业生产会，3天，也是省军区主持的，有省、地、县三级参加。现在‘抓革命、促生产’也委托军区。用什么组织什么形式，将来大军区、省军区一道宣布。怎么行使还要军区同志说，由军区同志宣布。现在由军区行使临时权力，这是中央肯定的，已向毛主席报告了。你们回去不要忙于在报纸上宣布，一般不宣布，贴告示，回去要把意见说清。”

宣布江苏实行军管后，周恩来转向省委干部，对他们说：“你

们问了康老，问底，康老说了，我们的底是毛主席，毛主席的底是群众。今天跟省委干部也说了，任何人都要在群众面前接受考验。一个是认识自己的错误，当然主要责任是江渭清负了，既要划清界线，又要把自己的责任说清楚，军事权力机构帮助。另一方面抓生产，搞好工作。主要是军事机关负责，但你们也要抓，立功赎罪，将功补过，要有行动，要实践。否则，口说无凭。只有这样，才能成为真正的革命派。”

对南京的造反派组织，周恩来说：“各组织自己本身要有一个整顿，大联合本身要有整顿，这也是要临时军管权力机构推动。南京主要三个学校，南大、南工，这两个比较大，还有其他的。你们可以搞军事政治训练嘛！要开门整风。工人组织也需要整风，军事机关帮助。”“最近毛主席已经批了北京学校军训的经验。工厂怎样训练还是新问题，将来总结好经验，将来公布。这是帮助整顿组织的好办法。”

代表团提出要把江渭清带回去揭发批判。

周恩来说：“江渭清的问题，你们要继续揭发，并不因为他不在南京就不能揭，可以背靠背，更好地揭。”

3 月 6 日，中央文革打电话到北京师范大学，让谭厚兰去人民大会堂。谭厚兰叫上周耀文同学与她一起来到大会堂，但只让谭厚兰一个人进去谈。谭厚兰出来后，向周耀文谈了 2 月 16 日怀仁堂会议的一些情况，传达了戚本禹的意见，决定集中力量炮轰谭震林。于是，3 月 7 日上午，北京师范大学校内开始贴出批

判谭震林的大标语，师大“井冈山”发表关于炮轰谭震林的声明，向中央文革小组发出“最最紧急呼吁”：“我们要揪出谭震林！因为他是镇压农口文化大革命的罪魁祸首，是目前农口资产阶级反革命复辟逆流的头号干将！”

当天，北师大“井冈山”的宣传车来到北农大，贴传单说：“谭震林搞的农展馆反毛泽东思想。”

农大“东方红”对师大“井冈山”的观点，从内心是表示欢迎的。但是让他们此时就公开反对谭震林，他们还不敢。因为他们炮轰谭震林刚刚受挫，毕竟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但是总部的头头们不甘心，认为北师大二次反谭肯定有背景，因为谭厚兰和中央文革关系密切，于是欢迎和师大造反派座谈。

而支持谭震林的北农大“红旗”当然是发表严正抗议，坚决反对攻击谭震林。

## 第536回：剩一派，党言川河南被捕　命令下，定张、梁入主四川

根据周恩来2月17日的指示，要求河南两派的代表进京谈判，党言川等人在河南省军区的强势下，担心对方没有诚意，遂于2月22日中午向省军区递交有关谈判的《六条意见》，其中提出参加谈判的负责人是郑州大学的党言川和郑州国棉六厂“工人赤卫队”头头申茂功二人，其实他们已在19日就离郑赴京。

河南省军区作为河南谈判的召集人，于22日晚通知双方：谈判负责人在23日开会，商讨拟定选派代表名单。

由于党言川此时已在北京，23日上午，“郑大联委”等组织另派史文华、王月亭二人作为郑大“联委”的全权代表，参加协商名单的谈判。“河南造总”抓住这一问题，认为对方毫无诚意，当即提出强烈抗议。到了2月24日，党言川等人以“二七公社”的名义从北京给何运洪来电，说“二七公社”的代表已相继到京。河南省军区和“河南造总”闻讯，气愤难平。“河南造总”于2月25日给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周恩来发去电报，称“党言川之流对抗中央命令和总理指示破坏赴京谈判”，要求：“‘郑大联委’等组织一方必须在郑同我们协商拟定谈判代表名单，由召集人上报中央，待中央批准后，再赴京谈判。”“以党言川为首的非法代表团必须立即解散，党言川等人必须立即回郑，不得再继续对抗中央命令和总理指示，必须向毛主席和党中央请罪，向革命造反派和广大革命群众低头认罪。”

在中央文革的要求下，党言川二人从北京返回郑州。当他们到河南省军区参加协商会议时，何运洪首先要求党言川承认错误，写出检查。“河南造总”还提出，党言川的检查要印10万份在郑州、北京散发，而且，还要党言川开广播车上街请罪三天。对此，党言川当然不答应。

3月3日，在河南省军区主持的第四次赴京代表协商谈判时，何运洪宣布：“党言川不承认错误，无谈判诚意，谈判无法进行，待承认错误接受条件后，再继续谈判。”于是，河南两派赴京汇报一事被搁置下来。

3月6日，在郑州市体育场召开的由河南省驻军和“河南造总”、“十大总部”数万人参加的“省会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誓师大会”。会上，清华大学的唐伟说：“河南省市委内一小撮反革命两面派的丑恶面目已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他们操纵的政治扒手党言川之流煞费苦心拼凑起来的二七公社已迅速土崩瓦解”。

会上，河南省军区第二政委何运洪宣布“郑大联委”为“非法组织”，“必须立即解散，停止一切活动”，“‘郑大联委’中的一小撮头头，必须向河南人民低头认罪，必须交待他们的幕后策划人”。何运洪说：宣布“郑大联委”为非法组织是经过中央批准的。“不是贸然的”“是有根据的”。会后，省军区用飞机在全省散发宣布“郑大联委”为非法组织的《告全省人民书》，漫天飘洒的雪白纸片，像天女散花般地飘落在郑州的大街小巷；

地上、房顶上、树梢上布满了这些传单。一时间，连郑州的儿童在街头高喊的口号都是："飞机撒传单，气死党言川……"

3 月 12 日，《郑州晚报》登载有这样一首小诗，是 3 月 6 日在飞机上执行撒传单任务的一个战士写的。题目很美："春光无限好"。诗句也很美：

豫西的群山在欢呼

奔腾的黄河在欢笑

与坐在机舱里的战士

有同样的心情，同样的思潮……

是什么使我如此激动？

是什么使我今天的热情这样高？

是这堆满机舱的传单啊

把我的心与革命左派的心紧紧相交

《告全省人民书》是大夺权的进军号

我们要彻底把资产阶级当权派斗臭斗倒

《给毛主席的致敬电》是我们共同心声

表达了我们无限忠于毛主席的教导

……千万张传单飘下去了----像春天的花种

在革命左派的心窝里扎根长茂。

毋庸置疑，在战士的心中，响应毛主席的号召支持“左派”是光荣的，而承担“飞机撒传单”的任务更是神圣的。所以，诗中表现出来的真诚、自豪、激动、愉悦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至于支持的是否真正的“左派”，恐怕这位战士也不会真正明白。

郑州市体育场3月6日召开的 “省会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誓师大会”之后，何运洪又亲自打电话给北京，说：“关于河南日报社的谈判问题，报社已经军事接管了，河南的两派只剩了一派，我们不再派代表去北京谈判了。”随即，“郑大联委”及河南全省“二七派”遭到残酷镇压。

3月6日上午,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赴豫战斗队”的同学正在郑大“革联”与党言川交谈。党言川说：“过去有些作法不对，今后应尽力与军区搞好关系，然后搞革命的三结合，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中夺权！”就在这时，门外人声嘈杂，郑州大学“红卫兵战斗师”把郑大“革联”包围了！广播车高喊：“郑大革联是非法组织！”“要坚决取缔郑大革联！”并强行冲进郑大“革联”搜查。匆忙间，党言川写了封短信，并把郑大“革联”的印章交给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赴豫战斗队”的同学，托他们带出。此时，郑大“红卫兵战斗师”已蜂拥而入,“把我们的情况带给中央!”党言川仅来得及说出这么一句话，就被绑架走了！

当天，“二七公社”在粮食学院嵩山路和伊河路交岔口西南角的楼里召开扩大会议，主持“二七公社”工作的海军研究所技

术员杨锡淼提出主动开除“郑大联委”以保留“二七公社”。肉食厂的袁庾华和郑州铁路局的工人郑建国等人坚决反对，他们认为“二七公社”是以“郑大联委”为首，开除“郑大联委”就不存在“二七公社”了。双方正激烈争论时，武装游行的军队已经包围了他们，粮学院的学生赶紧带领他们跑出了包围圈。

3 月 8 日，郑州市公安局发出四条《通令》：

1、“郑大联委”这个非法组织，必须遵照军区决定立即解散，停止一切活动。这个组织中的一小撮头头，必须交代你们的幕后策划人，向河南人民低头认罪。

2、“郑大联委”中的一小撮头头，限于本月 15 日前来郑州市公安局进行登记。凡是属于“郑大联委”的一切文件、资料、物资等，必须全部交出，不准转移，不准销毁。

3、凡是为“郑大联委”保存文件、资料、物资的单位、群众组织和个人，必须立即向公安局报告。资料全部交出。

4、大多数受欺骗、受蒙蔽的群众，要迅速觉醒，揭发“郑大联委”中的一切罪恶事实，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

《通令》最后说：“本通令自公布之日起生效。若有违反本通令上述各条者，一律以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论处”。

同日，省公安厅群众组织“公安公社”和郑州市公安局派员进驻郑州大学。在郑州大学东生活区树起了“非法组织郑大联委骨干分子登记站”的大牌子，勒令200多名“联委”成员前往登记，投案自首，交待罪恶，48小时内写出像样的检查。在化学系，

“联委”成员必须填写“非法郑大联委成员罪恶登记表”。在历史系，50名“联委”成员中3人被捕，10人被公安局勒令登记，38人被斗，102人次被搜查，大字报点名40-50人，写检查113份，4340页。在斗争中，让这些学生低头、弯腰、翻戴帽，并对他们高喊“坚决镇压反革命分子”、“只许左派造反，不许右派翻天”等口号，40多名联委学生被投入监狱。

接着，开封师院“824”负责人陈红兵、郑棉六厂工人赤卫队负责人申茂功相继被捕。2月底，开封镇压“824”后，“公安公社”立即行动，开封市仅一天就逮捕了3000多人。

再看四川。

为了保证春耕和城市工业生产的进行，2 月 28 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指示：四川省各级公章停止使用，成立了由韦杰、中共四川省委书记处书记杨超主持的四川省生产委员会，后更名为四川省抓革命促生产委员会，下设生产办公室，组织领导全省工农业生产的日常工作。2 月底至 3 月初，成都军区先后召开全省农村三级干部会议和全省工业交通基本建设工作会议，动员抓革命、促生产。

也是在 2 月 28 日这天，在成都军区支左办公室帮助下，《四川省公安厅关于坚决镇压反革命活动的布告》颁布了。

3 月 1 日，在成都被捕的四川大学学生王恳被押送康定。一大早，牢门前来了一辆大客车，车上有康定军分区、康定公安局、保守派的代表，及被捕的造反派 6 人。其中有州汽车队的张金康、

州文工团的袁云夫妇。当王恳被推上车后，他们 6 人似乎都认识他，吃惊地叫了一声："王恳！"

车走雅安、过泸定、沿途未停息，直奔康定。康定大街小巷已是人山人海，喊着口号，背诵语录。红旗招展，群情激愤。

车到一个空坝处停下来。车门打开，车上公安局的人抓起张金康扔下车去。立即上来 3 人，其中有一个穿警服。劈头盖脸给张金康几耳光几拳头，脱下他的长大衣，立即绳捆索绑，像扎辫子似的。有人给张金康挂上一个大黑牌，上书"反革命份子张金康"，名字处划了一个大 X、鲜红。压着他跪下去，抓住头发，对着群众、照了几张相……车上的 5 个人，依次扔下车，如法炮制。

王恳是最后一个被扔下车的，只听见如雷的口号声和他的名字。他也挨了几拳几耳光，眼镜不知飞到何处。有人用膝盖顶他的腰，他一挺胸抬头，立即被捆了一个结实。挂了一个大黑牌，背上还插了旗子。开始还清楚，很快就麻木了。拳打脚踢吐口水，推着游街示众，转了一大圈，所到之处，革命群众热烈欢迎……

最后押上镇反台，镇反大会在这里召开。有人讲话，有人喊口号，王恳一句也听不见，耳朵里嗡嗡声越来越大，响个不停。他被从左边提口袋似的提到中间，再到右边，逐次亮相，让群众欣赏，免不了下跪，几个耳光……

不知过了多久，王恳被送到监牢。

牢房里有人问他是谁？他说："王恳。"有人说："寄希望于

王恳来救我们，看来是没指望了。”此时的王恳仍豪情满怀，说：“毛主席会来救我们！革命无罪，造反有理！”

提审王恳，问他：“你怎么把反革命修正主义份子天宝弄到康定来搞反革命活动呢？从前有什么关系？”

“我以前不认识天宝，只知道他参加过长征，是毛主席的马夫。我抓天宝来康定，原意是要批斗他。不曾想他坚决支持‘炮轰派’。不是我反革命串联他，是他反革命串联我！” 王恳回答。

“反革命修正主义份子天宝已被人民抓起来了，和你关在同一个监狱！”审讯者得意洋洋地说。

这时王恳才知道天宝也关在这里。他问：“天宝是中央候补委员，抓他恐怕得中央批准吧？”

“是人民抓的！是军队抓的！”审讯者用文革时惯用的思维回答他。

康定“炮轰团”总共不到 110 人，“二月镇反”中被捕的有北京清华大学研究生何子健，四川医学院研究生肖邦良，四川大学化学系研究生罗反修，四川大学本科生“826”的王恳、何天华……被捕的“炮轰派”不计其数，造反派组织分团级以上勤务组成员全都被捕。一时间，康定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似乎在刺刀下，在监狱中结束了。

3 月 2 日，四川省公安厅向四川省各市、专、州、县发出《取缔反革命组织和右派组织的意见》。到 3 月 4 日，公安机关在成都地区拘捕造反派头头和骨干分子 5000 余人。3 月 5 日，成都

市公安局发布《紧急通告》指出："造反兵团"、"八二六"等少数造反派头头,"打着造反派旗号,干了一系列反革命罪恶活动",要坚决予以取缔。此后，在四川全省取缔造反组织 1100 多个。在镇反中，四川全省共抓捕造反派头头及骨干分子 8 万余人，其中成都地区抓了 33000 余人。

抓捕反革命的行动常在夜间进行，警车、摩托车在风高月黑夜呼啸而入，在川大校园横冲直撞。到学生宿舍后宣布逮捕某某,戴上手铐，将床上的被子搭在颈上，因为要自带被盖。一出门,外面早已挤满人群，在上囚车前将享受夹道高呼:"打倒 8.26!镇压反革命!"

总共不过 3000 人左右的川大"8.26 战斗团"被专政机关以"现行反革命分子" 拘捕 200 多人。甚至于在街上看见一位戴"8.26"胸章的人,一位干部竟会不顾一切的大喊:"抓反革命!"

3 月 6 日,中央军委命令广州军区副司令员梁兴初任成都军区司令员。军委通知梁兴初第二天坐飞机到北京,周恩来亲自谈话。

周恩来对梁兴初说:"自古以来,'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治蜀未治'。现在四川很乱,成都军区也很乱,机关都瘫痪了。毛主席点将点到了你,叫你到成都军区当司令员。你到那儿一定要把工作抓好,要先把局势稳定下来,保证部队的指挥顺畅。军队绝对不能乱。"

接着,周恩来又问:"你认识张国华吗?"

梁兴初回答:“在江西的时候,我们是一个连队的,他是司号员,我是通信员,不仅熟悉,还是老朋友。”

周恩来说:“好啊,你到四川,给你派个政委,就让张国华去吧!”

时任西藏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的张国华准备回拉萨了,周恩来拉住他说:“要解决四川问题,你是西藏的书记,也是西南局书记之一,你留下听听吧。”

3 月 16 日，支持“8.26”的北京红代会“赴蓉造反团”宣传车开进四川大学，在学生宿舍五舍前停留，满怀深情地播送《告别蓉城革命派》。第二天，在团部头头基本被抓光的情况下，“8.26”自动集合 1000 余人,上街欢送北京红代会战友。在去火车站的路上，他们把“826”的胸章别在胸前，举着“8.26”的队旗,唱着用《远飞的大雁》原曲稍加改动的《八．二六战士想念亲人毛主席》歌曲。街道两旁挤满了围观的群众,纷纷议论：“8.26 又冲出来了!”“8.26 没有死!”人们奔走相告。

受迫害的一方总能获得人们更多的同情,虽然有几辆宣传车总在前后围追堵截，高音喇叭喊着:“打倒 8.26 一小撮反革命分子!”终究没有大的动作。

四川“二月镇反”时“826”的宣传画

这次送行游行把《八．二六战士想念亲人毛主席》唱响了成都，传播到了北京：

远飞的大雁，

请你快快飞，

捎个信儿到北京，

八．二六战士想念亲人毛主席。

当天晚上，西南局，省市委机关干部及部分大专院校师生几万人到四川大学进行示威游行。公安局的宣传车高呼“取缔反动组织！”“不准 8.26 再搞破坏活动！”等等。

3月18日，“红成” 各战斗团、“产业军”，各行各业10余万人到川大游行示威，高呼：“砸烂8.26！镇压反革命！”

他们冲入“8.26”团部，洗劫一空，抢走教学楼及食堂喇叭，闯入学生五舍、七舍，抄走宣传用品、物资，翻看检查私人信件日记。江海云的寝室被抄，各种谣言到处都是，如：“8.26里通外国，在中印边界和老挝都有联络站”，什么“川大8.26和工人

造反兵团准备在2月20日搞大暴动”等等。

四川农机校高斌自成都军区“211大逮捕”被赶出成都军区后，回到专县的学校，县委，公安局即把他看成“8.26”的头目，冲击军区的干将，派人监视。公安局讲要放长线钓大鱼，等猪儿长肥了再抓。高斌上街看大字报，散步，后面都跟着“警卫员”。高斌说了一句话，做了件什么事，都会被记下来，不到两小时就会汇报到上级机关。夜晚在寝室也不能安宁，只好到江边溜达，抬头望北斗，心中想念昔日的战友，他以“井野”《望北斗》的名义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反映四川的镇反情况及县城里大肆逮捕造反派，迫害革命群众的情况，他不知道这封信毛主席能否收到，但当时他也只能做这些了。

3月15日，形势越来越紧张，高斌回到寝室整理材料，准备处理一些材料，不让它落到保守派手中，但刚打开箱子，学校保守组织“风雷战斗团”的人就冲进来，抢走了高斌保存的照片、报纸、学习日记、笔记本，并将他扭送到公安局。高斌被认为是“8.26”的干将被抓，他给毛主席写的信被认为是恶毒攻击镇反运动，欺骗党中央、毛主席，是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高斌被宣布开除团籍，胸前的毛主席像章被抢走，他呼了一声“毛主席万岁！”立即遭到毒打，手铐把手卡得鲜血直流。

在狱中，高斌和历史上的老反革命分子关在一起，并让老反革命分子监视他。看守说什么：“你们新反革命，新罪犯，比老罪犯反动，越年青思想越反动。”高斌被剥夺了放风散步的权利。

狱中，水成了比金子还贵重的东西，一连20多天，除了给一点洗脸水之外，开水、汤都定量，有时还被老反革命抢了，新犯人连汤都喝不上。饭只有二到三两，豆腐渣拌老罗卜，没有盐巴，犯人风趣地给它取名为：钢精混泥土。平时还要从事挖井，修监牢等繁重的体力劳动。

在井下劳动时，高斌经多日折磨，哪里还干得动。看守在井上象吆喝牲口一样高声叫骂。看守对年青人做工作："你们是学生，以后你们的子孙都是反革命分子，子子孙孙都出不了头。人活着还不是为了吃好点，玩好点，你们闹什么嘛！"监狱里的黑暗，使高斌想起渣滓洞、白公馆。

3月22日，高斌作为罪大极恶的首犯，与其他50多名被抓的造反派在县城游街示众。他们被五花大绑，挂上黑牌，后面紧跟着是机关枪、刺刀、手枪。天空乌云滚滚，细雨像亲人的泪水淋淋下着，刺骨的寒风卷着水雾，无情地向高斌他们打来。高斌心中不由的默诵起当年革命先烈的诗句："带镣长街行，告别众乡亲……"

## 第 537 回："打□□"，□庆市抓抄"砸派"回山城，□廉下□即被抓

重庆的"镇反"也毫不逊色。2 月 23 日当晚，重庆市"革联会"出动公检法砸抄设于市总工会的"工人造反军"总部和"首都三司"、"一司"驻渝联络站，多人被抓捕、打伤。

第二天，"革联会"重庆公安局"革命造反临时委员会"按照四川省公安厅"革命造反委员会"紧急通知，部署镇反，决定由市"革联会"、市无产阶级专政委员会、驻军代表、"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和市公安局"临委会"联合组成"打击现行反革命指挥部"，随即自上而下，建立各级镇反领导小组及"打鬼队"，专事抓捕"破坏文化大革命"的现行反革命。自此，重庆市与四川省一同开始了"二月镇反"运动。

公检法镇反人手不够，"革联会"调重庆大学"八一五"支援。从 2 月 25 日开始，重大"八一五战斗团"紧急派出数十个"打鬼队"，由各班派出大学生，参加"革联会"镇反。

2 月 26 日，"革联会"布置各单位 "镇反领导小组"及"打鬼队"在全市开始对反"革联"派进行大规模的抓捕。"革联会"还组成警备司令部、公安局、红卫兵"三结合镇反小组"，到区县、工厂、街道地段指导"镇反"。并从二十九中"毛泽东主义战斗团"、四十一中"东方红"等中学红卫兵组织中，抽调 80 余名中学生，组成"打鬼队"，到市公安局进行擒拿格斗、捆绑等训练。

同日，“革联会”派的北碚公安分局“压不倒造反队”召开大会，宣布“工人造反军（北碚地区）六号门纵队”为反动组织，予以取缔，当场逮捕 7 人，勒令登记自首 58 人。会后，将拘捕人员五花大绑，用汽车载经北碚区、沙坪坝区、市中区游街示众。

这天，“革联会”还在解放碑冒雨召开全市中小学革命师生复课闹革命誓师大会。

重庆“革联会”不准“军工造反兵团”单独成立组织，勒令其解散，群众可以加入“8.1 兵团 65 团”。2 月 26 日，“8.1 兵团 65 团”将“军工造反兵团”总部砸了，接着，“革联会”组织上千人，围攻江陵机器厂“军工造反兵团”广播站，遭到该厂“军工造反兵团”的反击，双方发生大规模武斗流血冲突，伤数十人。这是“文革”以来重庆市第一次冲击军工厂事件。

2 月 27 日下午，重庆“革联会”在人民大礼堂召开斗争前市委负责人鲁大东大会，5 万人参加。安排准备“结合”的前市委书记处书记辛易之在揭发、批斗鲁大东时“火线亮相”。 为防止“砸派”冲击会场，54 军在会场周围地区上清寺一带实行戒严，将反“革联”派的西师“八三一”和交院“九一五”游行队伍拦截于嘉陵江大桥和上清寺一带两个小时动弹不得。

在会上重点发言的有市委办公厅“红旗”革命造反队、市委宣传部“红旗”革命造反队、市公安局“长缨”兵团、市委工交政治部“造反有理”战斗队、市委机关“红色工人造反团”、市委组织部革命造反派、市委办公厅“红旗”革命造反队等。但压

轴戏是让辛易之出面揭发鲁大东，“火线亮相”。

任白戈下台后，重庆的一、二把手实际上就是鲁大东和辛易之，二人还是儿女亲家。文革开始后，出头露面和群众打交道的一直就是辛易之，鲁大东一般在不出面。没想到在这次会上，亲家竟会站出来揭发自己。会毕，鲁大东被押回重庆大学学生七宿舍监护地，甫出汽车，他訇然坐地，作小儿哭天状，口中大呼冤枉，称：不是辛易之受他蒙蔽，而是他受辛易之蒙蔽云云。

反“革联”派的一些群众组织，相继被驻军、“革联会”或参加“革联会”的群众组织以“反对革联会”、“破坏文化大革命”等罪名，宣布为“反革命组织”、“右派组织”、“非法组织”，勒令解散。大批群众被逮捕、拘留、揪斗或“勒令”自首、请罪。其间，大量出现对被抓被斗人员捆绑、殴打、罚跪、游街，对反革联会的群众组织进行抄砸等武斗现象。高压下，反“革联会”派的一些组织和群众纷纷放弃自己的立场，一些组织乘机而出。2 月下旬，重师附中“中学生红卫兵”、石油校“八一五战斗团”、红岩二中“红卫兵团”等组织宣布造“中学生红卫兵总部”的反，成立“中学生红卫兵红色造反临时联合委员会”，发出《紧急联合声明》，宣布原“中学生红卫兵总部”退出“革联会”的所谓《严正声明》对他们无效，并申请加入“革联会”。重庆第一个全市性的造反派群众组织、一度在重庆“文革”舞台上叱咤风云的中学生“红卫兵总指挥部”就此解体。

3 月 2 日，“革联会”对綦江县松藻矿区“工人造反军打通

战斗团”实行戒严，捆绑斗争 577 人，拘押 120 多人，勒令登记自首、写认罪书上千人。

但是，还有一些组织依然在顽强抵抗。3 月 3 日，原首都“一司”、“三司”驻渝联络站，以“首都红代会驻渝联络站”名义，向周家喻、熊代富、黄顺义及辛易之、段大明等发出《挑战书》，要求在解放碑辩论重庆“革联会”问题。第二天，双方在市中心解放碑冒雨辩论，各执己见，最后辩论会在“八一五”派“革联会好得很”的口号声中，草草结束。

这天，四川“工农兵业余革命文艺造反兵团重庆团”、“重庆市文联革命职工”联合发出《通缉令》，通缉“以叛徒罗广斌为首的‘三家村’反革命集团成员”杨益言、刘德彬，称在文革中，“这个集团大肆招降纳叛，结党营私，在文联实行了反革命的篡政夺权，继而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串通一气，大搞分裂活动，拼凑反革命的小联合，破坏山城八一五革命造反派的大联合、大夺权，实属罪大恶极。”

3 月 7 日，西南师范学院“八三一”负责人周荣从北京返渝，见势不妙，正打算安排全纵队分散撤离回家暂避，旋即被“春雷”造反。继而北碚区驻军宣布西南师范学院“八三一战斗纵队”是“右派组织”，勒令解散。

当晚，“革联会”派的部分组织在市中心解放碑召开“肃清救世主流毒群众大会”，批判首都“三司驻渝联络总站”、“清华井冈山驻渝联络站”等反“革联会”的言行。

六中“32111”及“八一兵团”甚至成立“打鼠队”，监视“砸派”，在街上露面就打。

3 月 8 日，反“革联会”的 242 部队（解放军后勤工程学院）“红总”、西师“八三一”、“首都三司驻渝联络总站”等组织数千人上街游行，庆祝《十六条》发表 7 周月，欢送“首都三司战友”，抗议“革联会”镇压造反派。

他们在嘉陵江大桥遭到“革联会”派的六中“32111 战斗团”、“八一兵团打鼠队”等组织的冲击，双方发生冲突和武斗。242“红总”的 10 辆军车被包围扣留，直至深夜 24 时，在得知驻军将对 242“红总”采取行动的消息后，才将其放走。

3 月 8 日晚，北碚公检法“压不倒”造反队、西师“春雷”造反兵团、川外“星火燎原”战斗团、重大“八一五战斗团”等发布《联合公告》，在网球场宣布接管西师一切党、政、财、文大权。“八三一战斗纵队”勤务员周荣、羊衍海、周德英、岳朝亮、史焕凡，刘同记、黄子琼等 7 人被公安分局“压不倒造反队”拘捕，“八三一战斗纵队”勤务员杨向东逃脱。

3 月 9 日，重庆警备司令部对后字 242 部队实行戒严，取缔该学院反“革联会”的“红色造反者总团”，拘捕其头头及骨干 30 多人，同时抓捕流窜在此的其他反革命 29 人。宣布取缔该学院反“革联会”的“红色造反者总团”，先后拘捕其负责人及骨干 30 多人，同时抓走驻该学院的其他反“革联会”派的红卫兵 29 人。

驻军这天在西南师范学院校园主持对西师“八三一”首恶分子的批斗大会，会后逮捕了“首恶分子”。

受李铁乃牵连的重庆黄廉从北京卫戍区放出来的第二天，中国科学院的党委书记温白桦找到他，对他说：“重庆的‘革联会’已经夺权，‘造反军总部’已经被砸了，罗广斌从楼上坠下来不明不白地死了。你们叫做‘砸派’，要砸烂‘革联会’。”“重庆不知道你在北京的情况，现在两派还是要大联合夺权，必须三结合，你们要选出你们真正的代表，全国都是如此，干部代表要征求群众的意见，政权机构还是叫革委会好。”

他说：“黄廉，重庆的形势远比你能够想象的复杂，你要赶快回去，周总理要你早点回去搞大联合，我们给你买票。”

黄廉问：“这十几天我回去怎么交代？”

于是，北京卫戍区和公安局给他写了个证明，说是由于他们办别的事情，耽搁了黄廉 10 多天时间。

3 月 9 日，去北京告状归来的“工人造反军总部”头头黄廉回到重庆，下火车看到的第一条标语就是“坚决镇压造反军，对他们不施仁政！”落款是“革联会”。另外一条标语是“绞死黄廉！”

向阳路上写着“反对革联会绝无好下场！”“砸派，留下你们的遗书吧！”他走到总工会门口一看，秩序井然，不复从前的热闹场面。他想回家看看，走到牛角沱车站的时候，看到的标语是：

“中国人民解放军将用刺刀挑起革联会！”

“砸派反军绝无好下场！”

“反对革联会就是反对解放军！”

落款都是 54 军。

总算看到一条“砸派”写的标语：“我们坚决反对拉郎配的假联合！”落款是“造反军轻工兵团”。街上再也看不到戴“造反军”袖章的人了，“工总司”的也没有了。他感到问题很严重。

正在他准备等车回大坪的时候，“革联会”的执法大队，大概有 100 多名中学生蜂拥而上，说是来接黄廉，把他推进一辆嘎斯车。一个政法学院的人坐在他的旁边对他说：“你今天还跑得了吗？”

不一会就有学生动手打他，解放军制止不住。学生说：“你本身就是反革命，打了还用负什么责任吗？”

后来一个干部跟另外两个人商量了一下，给黄廉换了一辆华沙车，送到看守所关起来了。

黄廉一进看守所，就听到一片歌声，一片骂声。骂声是：“打倒法西斯保皇派！”“八一五是叛徒！”等等

唱的歌是：“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

隔了几天，黄廉要求见负责人。看守所的人把他带到审讯室，来了七、八个人，中间一个胖子自我介绍叫刘润泉，是 54 军政治部主任，还有曾辉平和李凡。他们笑嘻嘻地说：

“黄廉，你们搞文革无非是夺权吗，给你官当你不要，你们‘造反军’要砸烂‘革联会’，硬要反对，我们几个今天来找你，是告诉你，我们在‘革联会’还给你留着位子的。”

黄廉说："你们谈的我一点都不懂，我只要你们告诉我，我到底犯了哪一条王法？"

曾辉平说："黄廉刚刚下火车，就抓进来了，是不知道。黄廉，我们这是镇压反革命，你们反对'革联会'就是反革命。"

黄廉骂道："你们算啥子东西？毛主席说还是要建立革命委员会，你们的'革联会'是个什么东西？"

黄廉提出要改善伙食，晚上看守所就给他送来两份菜。

3 月 11 日，重庆"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发出《通告》，宣布开除反"革联会"的西师"八三一战斗纵队"、交院"九一五战斗团"，并对参与反"革联会"活动的河运学校"航锋战斗团"、十三中"九八战斗团"、四川美术学院"红色尖兵战斗团"给予严重警告处分。此后，后字 242 部队"红总"、西师"八三一"、交院"九一五"，就被重庆"八一五"派称为"三大右派组织"。

重大"八一五"去四川各地、专、县煽风点火的学生在这次"镇反"中也有十几个人被抓，在成都的"赴蓉联络站"也被抓了，关押在成都太慈寺。

随着重庆"砸派"的"联络站"所属各组织纷纷被取缔，大街小巷，到处一片请罪声。偌大山城，除了"革联会好得很"，已无戚戚杂音。街上已看不到大字报，也没有了铺天盖地的标语，天下似乎从此太平了。也有那么几个胆大者偷偷摸摸贴几张"革命无罪，造反有理！""镇压学生就是段祺瑞！"的标语，但已无

碍大局了。“革联会”说：“你造‘革联会’的反，有啥子理？有罪！我们说你不是人民，镇压的是反革命。”

3 月 15 日，重庆“革联会”召开全市造反派的宣传通讯会议，警备司令部作了形势报告。西师“八三一”垮台后，斗争缓和了，没有什么对立面，到处是升平景象，每天都有人来报喜报捷。

3月17日，是重庆难得的晴天，太阳暖洋洋的，“八一五”在北碚解放台露天广场开批斗西师“八三一”的7个主要勤务员的大会。会议一开始就气势汹汹地宣布把“反革命”某某、某某某揪出来示众。这些某某某一上台，同样站成一排，低头，恭恭顺顺作弯腰服罪状。不同的是，今天的某某某全都戴着手铐，因此更显得杀气腾腾。另外就是让人有一种特殊感觉：他们确确实实和大家不一样了，真成敌人、成阶下囚了，年纪轻轻的他们，这一下真的全完了！这情景让“八一五”的一些学生困惑了：就在几个月前，他们和台上的这些某某某还是一样的：造反、受气、威武不屈、叱咤风云，和“黑市委”浴血奋战。事情为什么一下子变成这样了呢？与会的一些同学当时就愤愤不平地问道：“这样对待革命小将，对吗？他们也是造反派啊！”

## 第 538 回：搞联合，天津军训团探索　抓军训，毛泽东“三七批示”

3 月 2 日，陈伯达将王力、关锋起草的《红旗》杂志社论稿《论革命的“三结合”》呈送毛泽东审阅，注明说：“革命三结合方针和正确对待干部问题，得到广大群众拥护。同时，有些人也在利用这个问题，搞复辟活动。针对这种情况，王力、关锋同志写了篇社论，阐说主席三结合方针，以便引起注意”。

3 月 7 日，毛泽东审阅后，给社论稿作了批示：“林彪同志阅后，退文革小组”；还给社论稿加写了一段话：“从上至下，凡要夺权的单位，都要有军队或民兵参加，组成‘三结合’。不论工厂、农村、财贸、文教（大、中、小学）、党政机关及民众团体都要这样做。县以上都派军队代表，公社以下都派民兵代表，这是非常之好的。军队代表不足，可以暂缺，将来再派”。

当天出版的《红旗》杂志第五期，发表了《论革命的“三结合”》的社论，其中引用了毛泽东的最新指示：“在需要夺权的那些地方和单位，必须实行革命的‘三结合’的方针，建立一个革命的、有代表性的、有无产阶级权威的临时权力机构。这个权力机构的名称，叫革命委员会好。”社论强调：“革命的‘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要由真正代表广大群众的革命群众组织的负责人、人民解放军当地驻军的代表、革命领导干部组成。三者缺一不可，忽视或者低估哪一方面的作用，都是错误的。”

3 月 7 日，毛泽东还对天津延安中学的大联合经验做出了《三

七批示》。

事情的由来是这样的：

1967 年 1 月 4 日，按照中央的指示，天津市军训联合指挥部成立，指挥部设在天津市和平区山东路 23 号 66 军招待所内，主要负责人为 66 军军长郑三生、副军长衣瑞伦、政治部副主任杨竹亭和 196 师参谋长毕建章。军训联合指挥部对天津市 100 多所中学和近 20 所大学全部进行了军训。

军训联合指挥部的政工组组长是鲍龙，35 岁，蒙古人。怎样对学生实施军训？学生的情况究竟如何？为了做到心中有数，鲍龙开始到各学校了解情况：女六中、药化中学、十六中、延安中学、铁路一小……一所所学校走下来，着实让鲍龙吃惊不小。每所学校的气氛几乎都是一样的：除了看门的老大爷外，其他什么也没有。窗户的玻璃没有一片完整的，桌椅板凳几乎没有腿全的。西北风从教室的一头吹到另一头，冷得要命。

鲍龙奇怪地问看门人："学生们去哪儿了？老师去哪儿了？"

"都到外面搞革命了，老师也不来了。"看门人说。

当然，也有的学校有学生。有一次，鲍龙刚到一所学校，突然，呼啦啦来了几百人。原来是两派群众组织在学校武斗。他们都说自己是造反派，对方是保守派。鲍龙拼命予以劝阻。

这天，他来到天津黄河道西头的延安中学。当时，这里还是郊区。鲍龙在延安中学 2 年级 9 班的教室里发现了一张小字报，题目是："我们希望联合起来"，署名：姜颉，张玉芬，陈桂芬，

张立明。

“这是孩子们写的，孩子们自己有联合的要求。”鲍龙很高兴，他回去后找到军训指挥部团政委乔喜增商量，是否能利用学生中的积极性，按照中央的要求，开展革命的大联合。

乔政委没有反对，这让鲍龙很兴奋，他继续说：“这事儿一推广不就起来了吗？各班行动起来，全校不就联合起来了吗？学校不就能复课了吗？”

乔喜增说：“研究研究吧。抓一下。”

几天后，军训指挥部团为此事专门开了会。机关的主要领导都来了，鲍龙介绍情况说：“我们军训队已经工作几个月了，有成效，但是总觉得工作没有根。”

他看看乔喜增，又接着说：“学校不开课，学生们精力没处使，他们得活动，不就搞武斗嘛，这样我们还是稳定不住，军训还是不好搞。”

有人开口问道：“怎么办？你说吧。”

鲍龙汇报了 2 年 9 班小字报的要求，说：“我们先把 209 班联合起来。”

“这可是大事，等于解散战斗队。毛主席说要搞文化大革命，造反有理。这不是逆潮流而动吗？”有个干部面露恐慌之情。是的，当时学生们“破四旧”，全国“大串联”，到处“大夺权”这都是“有理”的，几个军训指挥部的团级干部怎么敢与社会大潮流对抗呢。

鲍龙想了想说："学校大联合，复了课不是说就不闹革命了。我们可以复课闹革命嘛。到了周六、周日，他们还可以搞大批判，用红纸写大字报，开大会，搞斗私批修都可以。"

军训团的领导纷纷点头，觉得可行。于是，大家统一了思想，将一个军训团部设在了延安中学。

为了慎重起见，鲍龙又到 2 年 9 班的学生中征求意见。几天后，赞成回教学校进行联合的孩子占了绝对多数。鲍龙高兴起来，找到乔喜增："'乔老爷'，怎么样，该动一动了。

"怎么动？"

"我们首先要从大战斗队着手，大战斗队问题解决了，小战斗队就好办了。"

当时的战斗队各色各样，少的两三个人一队，多的有几十上百人。

"要抓出主动来就要从大战斗队着手。延安中学最大的战斗队是'红色造反队'，150 人。" 鲍龙建议。

"红色战斗队"的"司令员"叫孟庆林，是高三年级学生，挺有思想。

于是，鲍龙在学校动员大会上声情并貌的动员说："批判修正主义，搞游击战不行。'战斗队'是打游击的，学校里分成这么多的'战斗队'，互相打内战，把战斗力都消耗了，怎么批判修正主义？现在，文化大革命都讲究大兵团作战了，你们这样游击战怎么行呢？"

学生们听得认真，觉得鲍同志的话在理。

“看看你们学校现状。你们学校一块整玻璃没有，板凳腿儿全没了，这是学校吗？这是要干什么？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是这样建设的吗？你们是社会主义接班人，接什么班？怎么接？毛主席说，学生要以学为主，说你们是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你们不学，成天打架，我造反你保守？行吗？我说你们都是好学生，不要互相拆台，打架。”

“我访问过你们的父母，他们很担忧，要求解放军一定要把你们组织起来，让你们学文化。你们已经十几个月没学文化了，你们再不学，你们就什么都不是了。将来没有知识怎么建设祖国呀。”

鲍龙一口气讲了两个多小时，学生们热烈鼓掌 5 次。

看到同学们鼓掌，鲍龙看到了希望，大声说：“同学们鼓掌说明是支持我，同意我的观点。如果同意我的观点的话，我们就以教学班为基础联合，行不行？”

“行！”

“好不好？”

“好！”

“那么，小孟，”鲍龙指着“红色战斗队”的司令孟庆林，“现在，不叫你孟司令了，你是小孟了，你们是 150 人的大团，你们去给小战斗队做工作时最有说服力，由你带头，咱们回教学班，复课闹革命，行不行？”

小孟爽快地回答："行！"

学生们很单纯，只要是他们认为对的，就会完全彻底地执行。几天后，延安中学所有的战斗队全部解散了，学生们纷纷回到了教室。复课闹革命的工作水到渠成。

教室里没有完整的凳子，学生们从家里拿来小马扎，没有马扎的，拿两块砖头用报纸包着当凳子。

这一天，鲍龙又找到乔喜增商量："学生们回到了教学班，我们搞全校联合吧。"

乔喜增："好啊。得起个响亮的名字，叫什么好呢？"

"干脆就叫延安中学大联合成员。"

"好！"二人一拍即合。

鲍龙到学校里，鼓动学生们节约闹革命，拿掉以往战斗队的臂章，改成长方形的红色小布标，别在胸前，上面印着蓝字"延安中学大联合成员"。

有学生疑问："臂章不要了？"

鲍龙："这个好看，我们是学军，解放军都用这个。" 鲍龙后来回忆说，"节约闹革命"的主要目的是让战斗队成员们拿掉臂章。

于是，学生们自己用印小报的油印机，在红布上印上蓝字"延安中学大联合成员"，很自豪地别上胸前。同学们互相看看，笑着说："我们是延安中学大联合成员啦。"

延安中学实现了大联合，这时，精神松懈下来的鲍龙冷静了，

他的顾虑也来了：解散“战斗队”，符合形势要求吗？我一个小小政工组长，团级干部，没有人指示，如果逆潮流而动，把“战斗队”解散了，不让他们造反了，这个罪过多大呀。如果扣帽子，那可是反对毛主席思想，枪毙的罪都够了。

于是，鲍龙向军首长打招呼，要向上级首长们汇报延安中学的情况。这天，66 军衣瑞伦副军长，杨竹亭副政委和毕建章参谋长都来了。鲍龙抓住要害长话短说，汇报了 20 分钟，讲清了延安中学复课闹革命的情况。

鲍龙讲完了，3 个领导有的低头看地，有的抬头看天，谁也不说话。

鲍龙急了，心想：“坏了，弄不好出事了。”

闷了半天，毕建章开口了：“鲍龙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群众运动，群众运动，群众要自己解放自己，工作上走群众路线对不对呢？”

就这几句话，毕建章重复了好几遍。

鲍龙与毕建章熟悉，他大胆地将他的军：“毕参谋长，你是水平这么低，话说不清楚呢？还是故意让我听不懂呢？你这句话倒来倒去，放之四海而皆准。延安中学大联合，你是同意还是不同意？你说句话。行还是不行，就要一个字，或是两个字。”

又没人说话了，空气中一片死寂。大家心里显然都赞成复课闹革命，可是谁也不肯先表态。

终于，衣瑞伦打破了僵局：“鲍龙，你别逼老毕了。你写个

报告，送郑军长。”郑军长是天津市驻军三支两军总指挥郑三生，他此时驻在河北宾馆，即后来的天津宾馆。

向上级汇报，这表明几个领导都不反对，鲍龙心里有了底：“写报告？还没考虑呢，用什么形式呢？”

这时，毕建章说话不再吞吞吐吐了：“对，写报告，送郑军长。”

鲍龙回到办公室，找到同事李亚平，又找了一个文字功底好的女干事，由他执笔，草拟了一份报告。对于以什么结构写什么内容，举什么例子，学生的名字，鲍龙胸有成竹。

几个没有写报告经验的人照猫画虎，以郑三生军长对北京军区郑维山副司令员的形式写了一份 1200 余字的报告，第二天，交给毕建章参谋长。

毕建章看后，又递给衣瑞伦看，衣瑞伦说：“老毕看过就行了。”

3 月 6 号，鲍龙风风火火地来到河北宾馆，把誊抄工整的电报稿放在郑三生的案头。

鲍龙并不知道，在 3 月初向军领导汇报延安中学复课闹革命会议的当天，郑三生就听到了情况汇报。他立即电话向北京军区代司令员郑维山做了报告。郑维山表示支持，并利用当天在劳动人民文化宫开会的间隙，将事情上报了周恩来总理。周恩来当即要求郑维山马上就此事写个报告递上来。郑维山当着周恩来的面，向秘书交待立即与天津郑三生军长联系，将延安中学一事写

报告递交北京军区。可以说，3 月 6 号下午的郑三生，也在焦急地等待鲍龙的材料。当他拿过鲍龙递过来的电报稿时，笑容逐渐在脸上绽开："哈哈！鲍龙啊，这个材料不错啊！"这时，鲍龙心里的一块石头终于落了地，有军长支持，他鲍龙总算没有捅娄子。

郑三生拿过笔，将抬头改为 "郑维山代司令员并转军委工作小组"，落款加上衣瑞伦和杨竹亭，其他一个字未动，然后画圈，对鲍龙说："快，马上送到机要处去。"

晚上 21 时，电报发到了北京军区司令部。

郑维山收到电报，指示秘书，立即将延安中学文件报告全军文革小组，并转周恩来总理。郑维山知道毛泽东、周恩来的工作习惯，这些领导人都是彻夜工作的。

看到延安中学复课闹革命的报告后，周恩来立即将其转给了毛泽东。

3 月 7 日凌晨，毛泽东在延安中学的报告上写下批语：

林彪、恩来、中央文革小组各同志：

此件似可转发全国，参照执行。军队应分期分批对大学中学和小学高年级实行军训，并且参预关于开学、整顿、组织、建立三结合领导机关和实行斗、批、改的工作。先做试点，取得经验，逐步推广，还要说服学生，实行马克思所说的"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无产阶级自己的教导"，在军训时，不要排斥犯错误的教师和干部，除老年和生病的以外，要让这些人参加，以利改造，所有这些，只要认真去做，问题并不难解决。

毛泽东

这就是《三七批示》的由来。

3 月 7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还发出《关于大专院校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规定（草案）》，要求“下厂、下乡和外地串连的师生于 3 月 20 日前返校，分期分批地进行军政训练”。

规定还要求：各大专院校，除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反动的学术“权威”以外，对各级领导干部、教授、讲师、助教、职工，都应当采取团结、教育的方法，吸收他们参加文化大革命，并且安排他们的工作。对犯错误的人，要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只要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而又坚持不改和累教不改的，就要允许他们改过，鼓励他们将功赎罪。

大专院校必须由革命学生、革命教职员工和革命领导干部组成临时权力机构，领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行使本校的权力。已经由革命左派学生组织掌握领导权的，应着手吸收革命教职员工和革命领导干部参加。在条件成熟时，实行全面选举制，正式建立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和文化革命代表大会的组织形式，作为领导文化大革命的正式权力机构。

## 第 539 回：出经□，延安中学成焦点　反“□流”，北京冲击农展□

3 月 7 日下午 16 时，毛泽东亲笔批示的电文通过郑维山转到了天津 66 军。郑三生等人分外高兴，将批示转给军训部门，鲍龙心头一块石头彻底落了地，他欣喜若狂。66 军分管领导和鲍龙等人连夜开会，筹备落实毛泽东主席的批示。

毕建章劲头十足，指示大家：“3 月 10 号开大会。”

鲍龙一脸疑惑：“哪种会？”

毕建章：“现场会。整个军训团，经验推广，闻风而动。鲍龙，你写个经验报告材料。”

鲍龙：“毕参谋长，写多少字，什么内容。”

毕建章：“你就写吧。”

鲍龙：“晚饭前来的批示，让我 10 号早晨拿出来，怎么拿。来得及吗？”

毕建章：“怎么来不及，打夜班啊。”

鲍龙即高兴又忧虑地回办公室写稿子去了。很快，他的脑子里有了框架，把 1200 字电报稿中的五个部分扩充一下，加上生动的实例，就是生动的经验报告。3 月 7 日整整一个晚上，鲍龙在打腹稿。

第二天一大早，鲍龙把两个干事叫来，开始写稿子。

3 月 8 日，中央将天津延安中学的经验和毛泽东的批语一起转发给各军区党委、各级党委：

各军区党委、各级党委：

现将毛主席批转的《天津延安中学以教学班为基础实现全校大联合和整顿巩固发展红卫兵的体会》发给你们，望参照执行。毛主席所加的批语，对于学校的军训问题，作了极其重要的指示，请你们向所有参加军训工作的干部和全体师生传达，组织大家学习，坚决贯彻执行。

中共中央

一九六七年三月八日

当天，《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中小学复课闹革命》。

这天深夜，写了一整天稿子的鲍龙又去找毕建章："毕参谋长，能不能推迟一两天开大会？"

"怎么啦？"

"我们现在只写出了 4000 多字，离计划的一万字还远着呢，只有一天时间了，怕赶不完。"

毕建章："不行，快去写，要印成单行本，小册子，米黄色皮的，红标题的。"

看着鲍龙发愁的样子，毕建章拍着鲍龙的肩膀，语重心长地说："军长已经同意了，已经通知下去了，不能改了。10 号上午 8 点开大会。"

于是，鲍龙回到办公室，和两个干事加夜班继续赶稿子。3 月 9 日下午 15 时，天津军训指挥部内，12000 多字的报告总算写成了，鲍龙长舒了一口气。几个人把改动的地方分头重抄。晚

上 20 时，一份清晰完整的报告递到了毕建章参谋长的面前。

毕建章边翻边问："没有什么抵触语言吧。"

"没有。就是把 6 号的电报稿扩展了一下。" 鲍龙说。

"赶紧去印刷!" 毕建章说。

3 月 10 日，延安中学校园里洋溢着喜庆的气氛。操场上黑压压地坐满了人，10000 多人挤得满满的，天津大学、南开大学……连新华社、《人民日报》、《解放军》、《光明日报》的记者们都来了。军训指挥部下辖的五个师的干部战士都来到了这里，独立团的干部战士也都来了。市委刚刚恢复工作的干部们也来了。一时间，报纸广播里铺天盖地地宣传起延安中学经验，《人民画报》刊登了一张鲍龙宣读《三七批示》的大照片。新华社、《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等媒体，整天找鲍龙采访。一时间，南到海南岛，北到乌鲁木齐，除西藏之外，都有人到延安中学取过经。每天，延安中学要接待多则两万，少则五千人的参观者。

然而，延安中学，一个普通中学，接待这么多人，怎么吃怎么住？

鲍龙想出了办法："没处住，搭席棚。"

"没饭吃怎么办？"

"请军部拨粮，开灶。"66 军当即拨了一些粮食，于是，延安中学为参观者开起了伙。大米饭，煮白菜。

这时，春天的津门，延安中学校园中呈现一派热闹景象，学生们三五个一组，为参观者介绍经验，学生们喜出望外，都感到

非常荣耀。

为了让参观者看到延安中学学生的最佳精神面貌，鲍龙建议："你们每天早晨搞个分列式，搞军训吧。"

在延安中学的操场上，每天早晨 30 分钟的分列式时间，总会挤满了参观的方方面面人员，人多得摩肩接踵，挤不动。

学生们动作的整齐划一和饱满的精神头儿不亚于天安门广场上的升旗仪式，女孩子们头上的小抓髻一甩一甩，动作标准，喊起口号声音脆亮。

人群里有人悄声议论："瞧人家，走得多好啊。咱们什么时候能搞成这个样子啊？"

分列式之后，学生们秩序井然地回教学班上课。参观者也纷纷跟进教室。

课堂上，老师流着眼泪讲课，学生们也流泪听课。参观的人个个都被感动了。

闪光灯越是闪，镁光灯越是亮，学生们学习的积极性越高。这时，延安中学的到校到课率达到了 100%，此时，全国大多数学校的学生还没有复课。

参观者把延安中学的经验带到全国各地，北京的景山中学学习了延安中学经验，在北京首先搞起了全校大联合，上海控江中学学习了延安中学经验，在上海首先实现大联合……

但是，也不是没有反对的声音。天津"红革会"就不赞成延安中学的做法。这是一个中学跨校的组织，在延安中学经验在天

津乃至全国全面推开的过程中，天津和平路上贴出了大字报："延安中学经验是假的，他们欺骗了毛主席，3·10经验是大毒草，破坏天津市文化大革命罪魁祸首是鲍龙。天折中学文化大革命的罪魁祸首也是鲍龙……"

一天下午，天津"红革会"的4个中学生，两男两女，站在马路中间，拦住了鲍龙乘坐的汽车。

车一停，几个孩子立即围上来问道：

"你是鲍龙吗？"

"是。"

"你知道你有什么罪吗？"

"说有功可以，我没有什么罪。"

"你有没有罪，咱们谈判以后再说吧。"

"小朋友，你们是学生，我们是解放军，我们是一家人，谈判是外交辞令。何必说谈判呢，用不着。我们谈谈心可以吧？"

"谈谈心也行，我们到你机关谈心去。"

"不行。中央有指示，军事机关不能冲击。"鲍龙担心人去得太多。

"谈谈，我们不冲击不行吗？"

孩子们有的上了车，有的拦住车的去路，就是不让鲍龙离开。

没有办法，鲍龙说："可以，明天晚上，山东路23号，在66军招待所。只许去4个人去，多了不谈。"

"好！"学生们下车，走了。

第二天，几个中学生坐在天津驻军 66 军的山东路招待所里的小沙发上，和鲍龙谈心。

空气中充满了火药味。一个男孩子首先发话："我们首先要宣布你的罪行。"

鲍龙一愣。

"你欺骗了毛主席，搞假经验，欺骗了全市人民。你写的 310 经验是大毒草。你是夭折中学生文化大革命的罪魁祸首，你罪责难逃！"

中学生可以慷慨激昂，高声呵斥，鲍龙就不行了，他只能心平气和的说："我们是按毛主席指示办的，我怎么能错呢？你反对毛主席批示，是你错还是我错？"

谈着谈着，又来了许多人。小小的招待所，来了 20 多人。

一个小时后，又来了 50 人，人数继续增加，到 80 人。

21 点多钟，鲍龙联系，到机关食堂继续谈。人数最后达到了 150 人。

学生们还是那几句话来回说。鲍龙也有办法，就是领着学生们学习《毛主席语录》，学习《三七批示》。对于《三七批示》，这些学生一方面反对，一方面又不敢不念。因为这是毛主席的指示，大家都有。

念完后，一个学生喊："不要念了，先批判你再说吧。"

批判还是那几条，大家一齐喊："鲍龙破坏了天津市的文化大革命。你欺骗了毛主席，搞假经验，欺骗了全市人民。你写的

310 经验是大毒草。你是夭折中学生文化大革命的罪魁祸首!”

这时，有个小姑娘过来拧鲍龙的脖子，有人踢鲍龙的脚，还有人往鲍龙身上吐唾沫。

鲍龙也不火，他不能发火，只能平静地说：“小朋友们，我是解放军，你们是学生，你们怎么能这样做呢？”

就这样一直折腾到半夜 24 时，鲍龙的嗓子哑了，这些中学生依然不肯走。

军训指挥部的领导们都在三楼等着，密切关注着鲍龙这里的一举一动，可是又都不敢下去，因为他们知道，下去了也于事无补，谁也不可能说服这些中学生。如果哪句话说的不对，让这些孩子们抓住话把儿，那就更是自找麻烦了。

但是总这样拖下去也不是办法，几位领导想要稳一稳学生们的情绪，也打听一下鲍龙谈的情况，顺便让他喝点水。于是让一名干部来到食堂，大声说：“中央给鲍龙来电话，让鲍龙接电话。”

鲍龙一听就明白，中央怎么会给他来电话呢，这肯定是领导们替自己解围呢。于是赶紧跑到三楼。

大家一见他进来，都急不可待的问道：“怎么样啊？”

鲍龙：“没事儿。就几个孩子，不懂事。我 30 多岁的人了，能应付。”

“是不是下去几个人给你帮忙啊？”

“不用，谁也别去。”

“喝点水。少说话，多学语录。”

“我没什么把柄给他们，我该辩就辩他们，该批就批他们。”

不一会，鲍龙回到食堂。

辩论和批判继续进行。

……

一宿过去，窗外，太阳出来很高了。

有的学生开始往外走，看样子要回家。

鲍龙故意激将：“别走啊。我们要统一思想，我们还没有谈完呢。”

“走了走了。”这时，发泄够了的学生们纷纷走出食堂。

院子里，碰巧衣瑞伦、毕建章、杨竹亭几个人下楼去军部大院吃早餐。几个学生见到了高高胖胖的几个人，猜出这是军队的领导，马上拦住他们：“站住，站住！”

几个人笑眯眯地看着孩子们。

“是你们几个大，还是鲍龙大？”学生们问。

鲍龙的体重只有 111 斤，瘦瘦的不像个领导。

杨竹亭故意夸张地说：“鲍龙比我们大多了，他是大官，我们是小官。”

说完，几个人走了。学生们信以为真，陆续走了。

食堂里只剩下几个学生，他们是“红革会”的骨干。鲍龙问：“他们都走了，你们为什么还不走？”

“这事没完，将来还得谈。”

鲍龙说：“你们把笔记本拿出来，我说什么你们记什么。”

几个人毕竟是学生，听话地拿出了笔记本。

鲍龙开口了："你们今天晚上到这来说是谈判，实际上斗我，你们是错的。不是我反对毛主席，是你们反对毛主席指示，将来你们会后悔的。写上年月日。用不了半年，你们会发现，鲍同志所说的是对的。"

学生们写完，让鲍龙出乎意料地相视一笑。起身走了。

后来，鲍龙发现，在院子外面，延安中学也来了人。鲍龙问："你们来干什么？"

"我们要保护你！因为我们学校的事情你挨斗，这不行！"

"你们赶紧走！"鲍龙知道，绝对不能再乱了，乱了就将不好收拾。

"红革会"的学生们走了，再也没有来找过鲍龙。

慢慢地，鲍龙的工作又恢复了常态。后来，延安中学，这个曾经的兜底校成了全市重点中学，而最初写小字报要求全班联合起来的陈桂芳也成了延安中学的领导。

3 月中旬以后，全国大、中、小学军训工作全面展开。

在北京，军训团按照天津延安中学的经验，在所到学校解散了为数众多的跨班级、跨部门、师生混合的红卫兵组织，实行按教学班为基础的大联合。取消班级建制和班主任的制度，将全校师生统一按班、排、连、营的军事建制编队，设连队委员会、政治指导员等。兴起了"早请示、晚汇报"、"天天读"、"讲用会"等"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做法。

军训结束后，中小学校陆续复课，但进展缓慢。据山东省的材料统计，中小学复课情况，一般是农村快于城市，小学快于中学，全日制中学快于半工半读中学，公办学校快于民办学校。

其实在上海，从 2 月中旬起，各大中学校“复课闹革命”的活动就已经全面展开。3 月初，上海市万余名中学师生在文化革命广场召开了“坚决贯彻《中共中央关于中学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意见》——杀回学校去、复课闹革命誓师大会”。

上海回民中学原有“孙悟空战斗队”等十几个造反组织，在这期间联合成立了统一的“红色造反团”，并与学生、教职员工和领导干部一起成立了“复课闹革命筹备小组”，学校的复课工作逐渐展开。陆汇中学、控江中学、第六女中和金陵中学都先后在 3 月中旬和 4 月初组织了全校的红卫兵组织，开始复课。当时的报道有这样的描述：

“一些已经开学的学校，到处呈现出一片崭新的革命气象。校园内到处洋溢着毛主席语录歌和《大海航行靠舵手》等革命歌声。这些学校开学的第一课就是大立毛泽东思想。一、二、三、四年级学生，都是学习毛主席语录、兼学知识、高唱革命歌曲。”

尽管红卫兵实行了组织上的“大联合”，尽管开展了“复课闹革命”，但一年来由于政见不同而导致的思想分歧、精神隔膜与相互仇视的情绪，却不是口头上的“大联合”和简单地返回班级坐在一起就可以消弭的。各地各校的红卫兵们回到班级后，以前的矛盾使同学们坐在一个教室，却各占一方互不理睬。几个红

卫兵组织还起劲打“内战”，根本联合不起来。斗批改进行不了，复课闹革命也就无从谈起。

3月1日，“北京革命造反公社”和“红代会工农兵联络站”发表联合声明：

“……无产阶级革命派要夺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权，必须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实现‘三结合’，否则夺权就是一句空话。……‘北京革命造反公社’‘红代会工农兵联络站’从它成立的第一天起就明确指出它是革命派大联合的过渡组织。它适应北京革命派大联合的形势而产生，为实现全市的大联合做出自己的努力。根据当前形势的要求，我们自己在所属的单位积极进行按系统、按部门的联合，目前这项工作已基本告成，因此我们也就完成其历史使命，即将结束活动。”

3 月 7 日，“北京革命造反公社”在展览馆剧场举行“北京革命造反公社”分系统大联合誓师大会。姚进在会上说：“‘北京造反公社’的诞生目的是为了北京市革命造反派分系统的大联合，就是为了促进‘北京市工农兵学商革命造反派代表大会’的迅速召开，为从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里全面夺取北京市的领导权而贡献自己的力量。我们所要促成的是一个巴黎公社式的、自下而上的工农兵学商各基层单位革命造反派的大联合。‘北京革命造反公社’只是促成这种大联合以前的一种临时性的过渡组织形式……”

1967 年 3 月 7 日，贺龙写成《关于洪湖地区肃反扩大化的

报告》，请周思来送毛泽东。

3 月 8 日，北京城内到处都贴满了“炮轰谭震林!”“谭震林顽固执行资产阶级必须彻底批判”等大标语。当天，由师大“井冈山”、学部“联队”、“新人大公社”、石油学院的“北京公社”、钢铁学院的“九一九”、民族学院“东方红”等 6 个单位再次升级，率先贴出“打倒谭震林!”“坚决反击二月资本主义复辟逆流!”的大标语，将“炮轰”升为“打倒”，轰动了北京。

奇怪的是，这些单位中没有一个是农口单位。5 个高校单位，除师大“井冈山”外，其他 4 所高校组织，也都不是北京红代会单位。这天，师大“井冈山”还联合了十几个组织冲击在北京农业展览馆举办的“全国大寨式农业典型展览”，召开了“击退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誓师大会”，高呼“打倒谭震林，解放全农口”等口号，并批斗了农业部代部长江一真。

农大“东方红”的头头们不知所措，他们的动态员到北大的动态组了解情况，骂师大不够意思，说他们到师大要材料，师大却要求他们先表态，然后才能给材料。

没办法，3 月 8 日这天，北农大“东方红”连续开会，在当晚 23 时 30 分召开的紧急会议上，高亮提出谭震林和“二月逆流”有关系。第二天，“进军号”小组提出“炮轰谭震林!”

3 月 8 日这天，蒯大富也重整旗鼓，在北京发起召开“彻底击溃资本主义复辟逆流誓师大会”，首都各造反派组织联合发表关于全国局势和反击“二月逆流”的《严正声明》。

3 月 8 日，北京大学校文革应群众要求，开门整风，孙蓬一讲话。

3 月 9 日中午，数力系四年级的扬子浪再次贴出整风大字报《反老孙论——献给“反杜林论”的拙劣宣传者孙蓬一》，大字报对孙蓬一对待整风的态度，做了尖锐批评，劝告他“退一步，进二步”。从中午到夜晚，观看此大字报的人群络绎不绝。

校文革第二次开门整风，聂元梓、孙蓬一做了第二次自我批评，大部分人对他们的检查不满意，出现很多批评他们的大字报。

3 月 10 日，校文革常委徐运朴、侯汉青贴出大字报，对聂元梓、孙蓬一提出批评，批评他们整风不够虚心，缺乏诚意。

## 第 540 回：成“英□”，赵永夫介绍经□　分别见，内蒙古两派代表

军以上干部会议开始后，一直都是大组会发言，大家提问题，几天过去，又转成小组会。3 月 7 日，总政治部主任肖华在议上说：

昨晚军委、中央文革研究了一下会议如何开，时间还需要一周，解决三个方面的问题。中心是解决两条路线斗争问题，这个问题是解决一切问题的根本，伯达、康生负责。第二个问题是支工支农和军管问题，周总理负责。第三是对大专院校军训和军队本身的建设问题，叶帅负责。最后是林副主席讲话，毛主席接见。会议是座谈的方式，提问题回答问题。你们出来时间比较长了，有事可打电话回去，要安心开会、个别问题个别解决，如内蒙、青海、新疆问题，已调来北京解决。有重大问题也可以个别直接谈。从简报上看，消极方面的东西多，座谈时要实事求是。“文革”的收获，红卫兵的伟大功绩看得少，中央要交代这方面的情况，交代政策。昨晚决定大家再看几个文件，领会精神实质。

3 月 6 日，总政治部电话通知青海省军区刘贤权、赵永夫、张江霖 3 位司令都到北京参加军以上干部会议。3 月 8 日，他们到了北京，住在京西宾馆，这时，军以上干部会议已开了两个星期。会议安排赵永夫数次讲话，介绍如何“反击冲击部队的右派组织”，如何亲自组织 2 月 3 日的武装游行，如何“平定反革命暴乱”的经验。这一来赵永夫的房间热闹了，军长们有事没事

都过去，问个没完。赵永夫拿出毛主席纪念章和红卫兵袖章说："这都是革命群众赠送的，人民看到局势平稳可高兴了…… "赵永夫俨然成了平定"反革命暴乱"的英雄。

至 3 月 8 日，青海全省"仅逮捕、拘留、看管和软禁的即达 10157 人，其中逮捕 4131 人，拘留 2522 人，看管和软禁 3504 人。"

3 月 8 日凌晨 2 时 55 分，周恩来来到八一学校，参观了该校"毛泽东思想革命造反联合总部"举办的"联动"罪行展览，并听取了该校"毛泽东思想革命造反联合总部"汇报。该校"毛泽东思想革命造反联合总部"首先向周恩来汇报了他们 3 月 5 日为砸烂高干子女集中寄宿制而召开的家长座谈会的情况。

当谈到有的家长说"不给我的孩子安排好吃住我就不转学"时，周恩来说："这还是当官做老爷嘛！"

当谈到有的家长说该校"毛泽东思想革命造反联合总部"这样做是把斗争的矛头是对准学生，对准家长，对准解放军时，周恩来问："是穿军衣还是穿便衣？叫什么名字？"

学校汇报了情况，周恩来的秘书记下了他们的名字。

周恩来说："我倒想和他谈谈，看他是怎么想的！"

有人汇报说："这次家长会有的人乱吵乱嚷，不等我们宣布散会便一哄而散。"

周恩来笑着点头，然后问："参加家长会的有多少人？有女同志吗？你们有多少人？有学生吗？"

学校汇报了情况，周恩来说：“你们和他们辩论嘛！”

学校说：“我们思想上没有作好准备，把一些家长的政治觉悟估计过高了。”

周恩来频频点头。学校又汇报说：“也有些革命家长坚决支持我们，散会后找我们说这个会有些人情绪不对头，要写大字报支持我们。”

周恩来参观了将近两个小时，于清晨 4 时 30 分离开了八一学校。

3 月 8 日，中央批转渡口驻军关于“首要的是从政治上支持左派”的经验：“我们认为，部队只能在确实判明是反革命组织的反革命活动时，才能出动坚决镇压。如在两派激烈争辩时轻易出动，哪怕是少数部队，也危害很大：

（1）容易掩盖矛盾，使观点不能充分暴露，推迟左派大联合的进程。

（2）弄不好要被坏人利用，使部分群众认为部队镇压工人革命运动，挑起一些是非。

（3）还有可能长了保守派的威风，挫伤革命造反派的锐气。保守派往往自恃成份好，历史清楚，认不清大方向，把革命造反派的某些过激行动，统统说成是‘牛鬼蛇神出笼了’。保守派还最容易误认为部队是他们当然的后盾，在斗争激烈时，便强烈要求出兵支持。”

3 月 8 日，周恩来在军以上干部会上谈军队帮助地方抓工业

生产问题。

3 月 9 日，康生在军以上干部会议上传达了毛泽东 1966 年 5 月和 1967 年 2 月对外宾谢胡、卡博、巴卢库等谈话的主要内容。说明这两次谈话的主题都是：文化大革命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尖锐斗争，是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的斗争。

接着，陈伯达在军级干部会议上的讲话，系统的批判了刘少奇。他说：

“刚才康老介绍了毛主席 1966 年 5 月份同谢胡同志的谈话和今年 2 月份毛主席同卡博、巴卢库同志的讲话，从理论上告诉我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有什么必要，是在什么条件下发展起来的。”

然后，陈伯达引用了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写的那张大字报《炮打司令部》说：

“1962 年刮单干风，就是刘少奇为首，邓小平赞成的。他们的那一套，就是实行资本主义复辟。1964 年刘少奇在四清运动中搞的那一套，表面上‘左’，实际上右。现在揭发了很多材料，像王光美在桃园大队搞的四清，原来是假的，让坏人专了政。1964 年毛主席有意指出了这个问题，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刘少奇否认阶级斗争、两条道路斗争，说社教运动是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是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交叉。当时，毛主席就反对刘少奇的错误意见，说：什么四清四不清的矛盾，封建社会就有

清官赃官的矛盾，这种提法，不是阶级分析，没有指出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性质。刘少奇 1962 年提倡单干，分田到组，包产到户。毛主席提出社会主义社会存在阶级、阶级矛盾、阶级斗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作了新的重大发展。”

“1964 年刘少奇作了一个公开报告，反对毛主席。……这个报告讲毛主席提出的调查研究过时了。他对这个问题很强调，说从中央委员到支部书记，如不按他说的蹲点方法去做，按毛主席调查研究的方法去做，就不能当中央委员不能当支部书记，不能当干部。……刘少奇抓住蹲点这个问题，就是要否定一切，打倒一切。

刘少奇的这种观点，不是 1964 年开始的，也不是 1962 年开始的。大家知道，日本投降以后，他就提出有名的“理论”和平民主新阶段，提出共产党员要当“红色买办”，就是要当美帝国主义的买办，当美帝国主义的走狗，那时候刘少奇是完全悲观的，对中国革命是绝望的。对中国的前途是绝望的。他要投奔另一条充当美国买办的道路。刘少奇的这些东西被毛主席否定了，毛主席对他进行了教育，要他执行七大的路线，放手发动群众，夺取全中国。中国革命的胜利是完全违背刘少奇的意志的。

中国革命胜利后，1949 年他在天津王光美的哥哥王光英的家里，对资本家说，资本家要大胆剥削，工人欢迎你们剥削，他说现在必须提倡剥削、欢迎剥削，还说工人要求资本家剥削，不剥削不能生活。1952 年山西有一个合作化问题的文件，刘少奇

批了，认为合作化是不行的。最近发现了一个材料，1950 年 1 月他在东北提出了一个意见，说搞变工队不行，不能发展到集体经济。大家知道，毛主席在抗日时期，大大提倡变工队，变工队是发展合作集体经济的前身，是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形式。”

“七大以后，在中国就有这样一个问题，中国要不要胜利，敢不敢胜利，胜利后走到那里去。一条是要胜利，敢胜利，走社会主义道路；一条是不要胜利、不敢胜利，走资本主义道路。一条是毛主席的社会主义道路，一条是刘少奇的资本主义道路。”

周恩来 2 月 16 日第二次接见内蒙两派的代表时，要求他们从 2 月 18 日零点起停止相互攻击，宣传车、传单都停止；一切报纸都暂停几天，只登中央消息；停止武斗，双方抓的人都要放掉；暂时都不要开游行示威大会。周恩来特别强调：“如果 18 号再发生互打，我要查肇事者。”可是内蒙古事态仍不见好转。支持“呼三司”和支持军区的对立双方继续游行、武斗、捕人，军区宣布内蒙古党委的高锦明、权星垣等是“三反分子”，支持军区的群众组织抓了权星垣、康修民等人，严刑毒打，关押游斗。呼市两大派斗争更趋激烈，阵营愈加分明，“呼三司”这一派人数明显减少。3 月 7 日凌晨 1 时，呼市“红卫军”和“工农兵”两个组织约 3 万人，乘着夜色团团包围了内蒙古师范学院，一举捣毁了“呼三司”总部。

3月9日下午，周恩来在国务院秘书厅小会议室单独接见“呼三司”代表，参加谈话的还有：总理联络员赵刚、朱文明、总理

秘书张作文。“三司”代表有：郝广德、刘文研、张淑琴、刘树立、金世魁。后来，宁奎喜也赶到参加。

周恩来步入会议厅时边和代表们握手边说：“你们和军区关系没有搞好，那怎么能行呢？他们打电话说，你们还散发传单，继续闹对立，你们组织内部有没有人在挑动啊？”

郝广德答：“我们查了，没有什么挑动，我们从18日以后停止了一切宣传。”

周恩来问：“你们学生都回学校整风不好吗？”

郝广德说：“我们正在整风。我们总部被砸了，没有地方呆了。”

周恩来问：“什么时候砸的？”

郝广德答：“3月7日夜间1点。”

周恩来：“谁砸的？”

郝广德：“红卫军。”

周恩来：“打伤人了没有？”

郝广德：“抓走了8名，打了很多。”

周恩来：“谁带头？”

郝广德：“‘红卫军’、‘工农兵革命委员会’。同时还包围了师范学院，有20多辆军用汽车，10多辆军用摩托。”

周恩来：“包围师院什么理由？”

郝广德：“军区说我们藏了军区人，下通缉令抓陈树健。”

周恩来：“你们有没有？”

郝广德：“没有，保证没有。”

说着，郝广德拿出内蒙古军区给师院“东纵”的信及师院“东纵”给军区的回信交给周恩来。

周恩来看完后问：“敖特根……这不是抓了4个吗？”

郝广德：“那是从工学院抓走的！”

周恩来：“陈树健是干什么的？”

张淑琴：“《红色战士报》的编辑。”

周恩来：“军区的事，你们不要管，你们保护他们，对他们没有好处，反而害了他们。回去检查一下就算了！”

郝广德：“他们包围师院时，有剧烈爆炸声，外面有探照灯，人员匍匐前进，喊冲啊，冲……”

周恩来：“这是精神战嘛！师院有多少人？”

郝广德：“有1000多。”

周恩来：“下乡、下厂的学生都要回学校整风。清华的来了没有？”

众人答：“没有。”

周恩来：“清华在呼市‘三司’的同学回来了没有？”

郝广德：“回来了，被抓的还没有回来。”

周恩来：“押在什么地方？”

张淑琴：“在军区。”

周恩来：“谁？”

郝广德：“陈鼎。”

周恩来：“不是已经放了吗？”

郝广德：“军区还没有放，他家长写的信，您见到了没有？”

周恩来：“没有。”

周恩来问秘书：“你们见到了吗？”

秘书答：“没有。”

周恩来继续问：“‘首都三司’在呼市的其他人还有吗？”

郝广德：“等陈鼎的还有两名。”

周恩来：“陈鼎是怎么抓的？”

郝广德：“因为他路过静坐的地方，说他是头头。”

周恩来：“他多大岁数？”

郝广德：“16岁。”

周恩来：“中学生？”

郝广德：“是清华附中的。”

周恩来：“你们‘三司’总部在总工会？党委给你们拨过款，拨过汽车？”

郝广德：“在总工会。拨过。和‘一司’、‘二司’一样，拨过一辆汽车，一辆摩托。”

郝广德把逮捕医学院6名“现行反革命”公告递给周恩来看。

周恩来：“那33人什么时间被抓的？”

郝广德详细汇报了抓人经过及被捕人名单。

周恩来问：“什么理由？”

郝广德答："他们说'三司'是反革命组织。他们正在开整风会。被抓的人，有的是抢救韩桐同志的医生。戴上手铐，有的五花大绑，把衣服撕烂。田光同志是转业军人，身体有病，现在有生命危险。"

刘树立说："抢救韩桐同志的汽车司机小高，他们也要抓。"

周恩来问："一共抓了多少人？学生多少？工人多少？"说着，翻查看被捕人员名单。刘树立汇报了被捕总人数。

周恩来："学生多，还是工人多？"

郝广德："大部分是学生。"

周恩来："18号以前抓的吗？"

刘树立："大部分是18号以后抓的。"

周恩来："押在什么地方？"

刘树立："工人押在呼钢，有的押在军区、公安局。"

周恩来一边记被捕人所在的单位，一边问："抓人理由就是说'三司'是反革命吗？"

刘树立答："还有其它借口。"

周恩来又问了工人被抓的情况，接着问到铁路上的情况。

金世魁答："2月8日反夺权抓了我们20多名同志，还有12名同志至今未放，其中有铁路局副局长邢骏、政治部主任张泽民。"

周恩来："为什么抓的？"

金世魁："就是因为邢骏在炮打司令部时给党委成员贴了一

张大字报。”

周恩来：“这两人同情你们吗？”

金世魁：“对。”

周恩来：“现在押在什么地方？”

金世魁：“据说在军区。”

周恩来又问铁路局上班的情况，金世魁答：“2月8日反夺权以后，我们有500多人不能上班，经我们作思想工作，有80名调度生产人员上班，现在有400多名同志仍分组集训。”

周恩来：“现在有一半人没上班，机务运输怎么办？业务能正常进行吗？他转过头问联络员：“问一下徐彬，呼市的运输情况到底怎么样？”然后又对张淑琴说：“就你一个人在这里有什么消息没有？”

张淑琴：“把以前在这的16名同志都抓走了，五花大绑。有个女同志喊毛主席万岁，他们就用手帕把嘴堵上。”

周恩来问：“你怎么知道的？”

郝广德：“有我们代表亲眼看见了。他们还说奉军委和总理指示抓的。”

周恩来生气地说：“我怎么能指示抓人呢！”

张淑琴将“通缉令”交给周恩来看：“现在工资和粮票都不给我了。”

这时已是17时50分，宁奎喜进入会议厅。周恩来问他：“陈鼎还没放？”

宁奎喜："没有。"

周恩来继续问："谁叫你们静坐的？"

郝广德答："没有人。"接着讲述了1.22，1.25事件的过程。宁奎喜作了补充。

周恩来说："刘昌不出来做检查，你们可以写信么！不要登报么！你们一登报不就对立了么！"

郝广德检讨说："我们登报错了，我们应该作检查。我们登报是2月4日后才登的。"

周恩来："他们说你们以前就登过报！"

郝广德："没有。"

周恩来问秘书："《内蒙日报》收集全了没有？"

秘书将报纸拿来，周恩来翻看几张后问："你们有什么材料？"

郝广德："我们有。"说着将内蒙古军区散发的传单和反夺权后出的《内蒙古日报》交给周恩来，并说："他们在1月27日就把我们打成反革命了。"接着又掏出36个组织的传单给周恩来。

周恩来详细看了一遍，然后问："你们骂过肖华吗？"

郝广德："没有。骂肖华的那张传单是所谓'中华人民共和国红卫兵中央委员会'散发的。"

周恩来："你们骂过军区是罗瑞卿的部队？乌兰夫的部队、黄狗子？"

郝广德："我们没有。可能有个别人骂过，其他都是造谣。"

周恩来：“有一些根据，你们两家对骂么，当然要扩大事实了。高锦明是你们的后台吗？”

众答：“不是。”

宁奎喜：“说高锦明、李质是我们的后台，我们连样子都没有见过。”

周恩来：“你们为什么跑步进入军区？”

郝广德介绍“2·5事件”经过和二医大在招待所被围情况……

周恩来问清华学生宁奎喜：“你们清华的到军区宣传了？”

宁奎喜：“去了。我们没进军区，在外边宣传了。”

周恩来：“你们对军区乱叫，哎，那怎么能行呢？看你们把这事件闹的，越来越复杂，二医大到处捅，捅完就走了，把负担加在别人身上。”

郝广德解释说：“二医大被围攻，我们去援助。”

周恩来责备他们：“你们红卫兵就管得宽，什么都管。军区的事么，问题越搞越复杂，跟军区对立，使你们处于不利地位。”

宁奎喜站起来汇报：“总理，我提个问题，‘全红总’在内蒙很猖狂，要集合50万人到北京，怎么办？”

周恩来不相信，反问道：“能有50万？”

宁奎喜：“他们电报那样说的。”

刘文研：“‘国际红卫军内蒙支队’、‘中国红旗军第四纵队’、‘联动’，这些在呼市都没有取缔。”

周恩来：“有材料吗？这些头目都是谁？”

郝广德：“正在整理材料。”说着将递上一袋关于“工农兵委员会”的材料。

周恩来看了看说：“这些材料很有用嘛！”说着将材料袋封好，对代表们说：“你们学生回学校，工人回工厂，军区的回军区，进行整风，属于联合性的组织，暂停一切活动。”

众人答：“我们完全同意。”

张淑琴问：“总理，我们的人都被捕，怎么办？”

周恩来：“还是放出来教育么！不要捕。”

郝广德：“总理，现在有人给乌兰夫翻案。”

周恩来：“那怎么翻得了！”

张淑琴：“就剩我一个人怎么办？”

周恩来：“我让你当代表住到这儿，你懂吗？”

这次接见后，紧接着，周恩来又单独接见了“红卫军”代表。然而。呼市的局势仍不断恶化。内蒙古军区扣押了《红旗》杂志和《解放军报》驻呼市的两名记者于顺昌和宋学礼，没收了他们的笔记本，还派兵到北京，在甘家口大街上拘捕了上京告状的内蒙古军区干部。

3月11日，中央军委，国务院给内蒙军区的复电：

“三月七日电悉，同意对 X 院实行军事管制，该院系 XX 技术试验单位。军管后要坚决按照中央二月二十一日通知及军委二月一日、二月十六日两项规定贯彻执行。对八一八暂不急于宣布为反动组织，不忙取缔，先进行政治攻势，分化其组织，孤立其

为首的反革命分子，待进一步暴露后，再相继逮捕法办。”

## 第 541 回：谈意义，康生系统批《修养》再批□，章士□斡旋毛、刘

3 月 10 日，康生继陈伯达 3 月 9 日系统批判刘少奇之后，又在军以上干部会议上讲刘少奇的问题，批判了刘少奇的代表著作《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他说：

一、关于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问题。首先请同志们打开语录 204 页，把第二十四节标题“思想意识修养”改为“纠正错误思想”。同一节的 208 页，倒数第五行起“刘少奇……你的还是我的。（大笑）”这一段删去。为什么把标题改了？这是刘少奇的语言，是不通的，不科学的。在毛主席著作中，从来不用思想意识修养这个词。思想和意识有联系。但又是两个概念。讲思想是一回事，讲意识那就含意很广。意识是指人的头脑对客观世界的反映。在一定意义上讲，在生理学上讲，意识和知觉有相同的意义，失掉知觉，就失掉意识。意识，是包括感性知识和理性知识两个方面在内的。思想有独立的含意，它是指人在一定的经济条件下对社会现象的反映。与这相同的语言，有时又叫思维，主要是讲通过感性认识达到理性认识。看来刘少奇这个“马克思主义”是不通的。

毛主席讲过，刘少奇的这本书是欺人之谈。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在这本小册子里只谈个人修养，个人道德，根本不谈夺取政权问题。离开了政治，离开了阶级斗争，自然就会陷入唯心主义的泥坑。同志们有时间可以看看这本书。

刘少奇说，共产党员修养要有很好的共产主义道德，他的共产主义道德是能“爱”人，能“恶”人。又说，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完全是孔孟之道。

刘少奇说要有最大的勇敢，没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这是他说的共产党员的最大勇敢。

刘少奇在这本书中，说到要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时，说什么没有偶像的崇拜。可以看出，这是暗示攻击毛主席的。他在讲到忠诚坦白时说，要能“无事不可对人言。”照他这样说，党的机密也是可以告诉蒋介石的。

刘少奇还说，要“有最高尚的自尊心、自爱心。”请同志们注意，他的所谓自爱心是“保护自己的生命和健康，”这是赫鲁晓夫的活命哲学。这就可以理解，他为什么叫安子文、薄一波去自首。这就是他的所谓“修养” 。

从这本书里，可以看出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反动本质和丑恶灵魂。同志们提出，要对这本书进行批判，是很好的。这本书在国内外流毒甚广。毛主席说，要写文章批判。

二、昨天，我把毛主席同谢胡、卡博、巴卢库等同志的谈话向同志们传达了。我想同志们的问题原则上是可以解决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毛主席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国家，为什么还要夺权。毛主席领导下的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还会产生修正主义篡夺领导权的问题。我们的绝大多数干部是好的，为什么还会有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从这里可以看出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

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意义。

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有两种看法。一种是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天天写文章骂我们。《真理报》一月份就发表二百多篇文章，这些文章和帝国主义腔调一模一样，没有什么新的东西。无非是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是无产阶级的，不是革命的；说不是发展文化，是破坏文化。毛主席说："被敌人反对是好事而不是坏事。" "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一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革命人民的看法。这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阶级斗争的深入发展，是触及人们灵魂的一场大革命，是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的大革命，是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揭发黑暗面的大革命。因此，这场革命运动，是防止修正主义，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保证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的史无前例的伟大的革命运动。

康生说：

对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可避免的会有两种立场，两种看法。有的是党外的敌人，有的是混进党内的敌人，也有一些同志一时看不清楚，有怀疑。所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毛主席领导下，取得了相当胜利的时候，解放军同志必须吸取历史教训，看清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意义。这个运动像延安整风运动一样，年限越久，意义越大，时间越长越看得清楚。同志们要坚信毛主席。今天到会的同志，包括我在内，摆在面前的是像《湖南农民运动

考察报告》中讲的那种情况。毛主席说："一切革命的党派、革命的同志，都将在他们面前受他们的检验而决定弃取。站在他们的前头领导他们呢？还是站在他们的对面反对他们呢？每个中国人对于这三项都有选择的自由，不过时局将强迫你迅速地选择罢了。"

3 月 10 日，陈伯达在军以上干部会议上又批判了邓小平，他说："昨天讲了刘少奇的问题，下面再把邓小平的问题讲一下。邓小平每次开会，基本节目就是打牌，每次开会都要打。有人找他谈话，他没有时间，还要陪他打牌，成了很大负担。不陪不行，他是总书记，陪了又耽误时间。很多同志有议论，总书记带头打牌，每天都打，还打通宵。我想打牌这个风气传下去很不好。影响到小孩子也打牌，打扑克。下面地、县也打，各系统，各部门也打，形成了一个风气，在乡下不是一般地打牌，有的还赌钱，总书记打牌，下面不好说，就传开了，这决不是小事，作为总书记，有这样的作风，影响很不好。有时间为什么不找干部谈话，学习毛主席著作，接见群众。他找肖华谈话，不好好谈，谈几句就算了。"

肖华说："每次我去汇报情况，都是三言两语，卡住时间，所以我到他那里汇报最容易。"

陈伯达继续说："中央召开会议讨论《二十三条》时，毛主席批评刘少奇，不以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为纲，批评邓小平搞独立王国。"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他们俩人立场一致，路线一致。”

“为什么说刘、邓路线，就是他们站在一个立场上，站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立场上，镇压群众运动。”

“有的人，是一小撮人，还要为刘邓路线服务，阎红彦就是这样，是一个典型例子。事实上他并没有受谁的逼迫，有一天晚上，我们听说昆明有一批学生冲昆明军区，目的是找阎红彦辩论，这时我们出于好意，打了个电话，电话很快就接通了。我问他，你是阎红彦吗？他说是。因为我普通话说的不好，一边说，一边请汪东兴同志代讲，请他出来见一见群众，不用怕，没有什么问题。就是简单的几句话，他说是我们逼死他，给我们安了好大的罪名。这次简报上有的同志问，阎红彦是怎么死的？我说了这几句话，汪东兴同志还在，这怎么能说逼他去死。这是他顽固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立场，不愿向无产阶级屈服，不愿向毛主席革命路线屈服，事实就是这样。”

“有的同志问我，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这本书怎么样？毛主席认为，这本书脱离阶级斗争，脱离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斗争，空空洞洞地讲一点个人修养，是欺人之谈。书里也讲阶级斗争，但只是概念上的，没有把阶级斗争当作现实问题。这本书是在抗日时期写的，他不分析抗日战争中无产阶级应如何做。毛主席说：这本书是唯心论，是反马克思主义的。这本书尽管讲了那么多马列主义概念，阶级斗争概念，结果阶级斗争变成了个人修养，提倡资产阶级个人修养，毛主席说，不讲现实阶级

斗争，不讲夺取政权的斗争，只讲个人修养，蒋介石也可以接受，世界上的资产阶级也可以接受。什么个人，什么个人修养，每个人都是阶级的个人，没有孤立的个人，抽象的个人。他讲的孔孟之道，从封建地主到资产阶级都可以接受。”

军以上干部会开了十几天了，大家的问题大多也提完了，有了青海经验，他们觉得三支两军也有了谱。部队那头可乱了套，一天几封加急电报。可中央首长也不说结束会议的事，只是安排他们参观正在修的地铁，还到“八一”学校看“联动”展览。军头们开始焦急纳闷，有心人发觉前几期简报要送的人中有陈毅、谭震林，现在没了。

3 月 5 日，谢富治等给毛泽东等人写的关于成立北京市临时革命委员会报告说：“中央文革指示我们几个人负责筹备北京市的夺权工作。经过一个月的酝酿协商，准备在最近成立九十多人的临时权力机构——北京市临时革命委员会。如主席、中央同意，我们拟在本周召开会议，成立临时革命委员会。”

3 月 9 日，周恩来给毛泽东等人的报告上说：“天津市革命学生组织多已趋向联合，五日已开了红代会会议。工人革命组织已按口分系统组织，多已组成，达十七万人。中学生革命组织较差。在本周内，他们拟开各方协商会议，商定革委会及其常委会名单。群众大会预定十二日开，在会上宣布成立天津市临时权力机关——革命委员会，并发表宣言等。”

3 月 9 日，毛泽东在谢富治 3 月 5 日的报告上批道：“总理：

工人代表大会还没有开，中学和农民的代表大会还无消息。开全市代表大会并选举革委会，似以在三月下旬为宜，请与谢富治同志酌处。”

3 月 10 日，周恩来给毛泽东的报告中说：“昨夜得到主席关于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成立之前要先开工人、农民、中学生代表会或群众大会的指示，我已告谢富治并给常委和文革小组各同志传阅，他们都很赞成。今早，我照此方针，以电话告天津解学恭，要他考虑先开大学、中学、工人、农民、机关革命派代表会议，然后再开全市革命组织协商会议和群众大会，宣布成立革命委员会的程序。”

当天，毛泽东即在周恩来 3 月 10 的报告上批道：

各省、市亦宜照此办理。凡条件不成熟者，要等待条件成熟，然后举行。处于无政府状态者，则先实行军管。

毛泽东

三月十日

同时，毛泽东还在周恩来 3 月 9 日关于天津成立革委会的报告上批示：“以推迟到三月下旬成立，照总理 10 日意见办理为宜。”

面对国内对批判刘少奇的浪潮越来越高，毛泽东的故交，原段祺瑞政府的教育总长章士钊甚是着急，他分别给毛泽东和刘少奇写信，希望能斡旋他们之间的分歧。他在给刘少奇的信中写到：

少公主席座右：

缅维 64 年春节元日润（毛泽东字润之）开教育会议于上海（此处为作者误记，应为北京），公与钊均列席，时润公缕述北大积弊，心长语重，响彻殿廊。未意言者谆谆，听者藐藐，不三四年，教育体系全体鱼烂而亡，致有今日。回忆前尘，应共扼腕。

文化大革命爆发以来，时不过六七月，暴力所至，摧枯拉朽，几于无远不届，无高不达。驯（渐）至近日集中力量与公为难。顾（但是）细绎（理出事物的头绪，意即分析）润公历次工作会议谈话意旨，类（大都）无不予公优加顾惜，有增无已，如曰：少奇同志有责任，我亦有责任；又曰：对少奇同志不能一笔抹煞；又曰：错了，说明白，改过来就行，我无意推翻任何人。如此等等，都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之公心亮质，与人卜人以共见。尝论人之欲善，谁不如我（人们对善的追求，都与我一样）；宇宙之大，又何所不容。昔苏子瞻《与程正辅游香积寺》诗云："灵苗与毒草，疑似在毫发。"钊观近日广众宣布公之十大罪状，若而无产阶级路线，若而资本主义路线，疑似之间易滑而进者往往易滑而退，二者殆不难东西忽而换位，黑白骤而变色。尤可怪者，公所著《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书曾说到有人不懂马列主义而特装模作样，自封为领袖，以家长式在党内发号施令云云，此一望而知为指责陈独秀一流人，然读者谓是谩骂润公。夫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斯殆别有用心，应置不论不议之列。

窃以共产党起家不易，由草创以至统一全国，前后四十余年之久。两公铃始终其事，相与戮力拼命以底于成，此何等珍贵友

谊，岂可等闲视之。以钊揣知公于润公，微论（不用说）学术，即以里（同乡）与年事（年纪）论，风义原是师友相兼。

加以亲随有年，不断耳提面命，即自安部曲（即使自己安处于部下位置）而有所尊奉，亦属谊所当然。今外间之所崎龁（咬，啃。喻忌恨、倾轧）公者，姑不论是非虚实如何，而 公应执持百鸟不噪空窝（喻大凡世间诸事必有其因）之确信，取法廉颇向蔺相如肉袒负荆之诚意，亲诣润公之门，长跽（长跪，双膝着地，挺直上身，表示态度极其诚恳）谢罪，举一切谰言毁语自矢（犹自誓。箭射出去即不可收回，喻立志不移）。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向后在润公统一指挥之下共同施行无产阶级路线，期于一流而 无间（同一派别而毫无隔阂），倾怀自誓，毫无保留。

须知人非圣贤，孰不有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钊敢信润公乐于公之有此一举，立（即刻，马上）以公之诚恳转达群众，于是约期开一恳亲大会（原指学校召集学生家长交流学生在校情况的联络会，后来也指称拜见宗族长辈、交流亲友感情的聚会），两公同时出席，相与化豹狼于玉帛，易戟指（伸出食指指着人斥责，喻情感不睦）为交心；由是自公而下，层累蔓延之各项纠纷均相次而得到解决，岂不大快！岂不大快！虽曰今之无产与资产两条路线之剧争不比于赵国之两虎共斗，有妨国家之急，独美帝与各国反动派正悻悻同以中国为敌，而共产党解放世界之大任，复以各被压迫民族兴起缓慢，吾囿于以一服八（局限于用一国去说服教育八国。苏共二十大后，苏联及东欧七国在共产主义理论、

社会书义建设以及国际关系诸问题上先后与中共产生分歧，最终导致“社会主义阵营”解体）之艰苦形势，难于一鼓骤成，实不宜于国内延长动乱，阻吾进路。

囊（从前，以往）朱叔元《与彭宠书》：“凡事毋为亲者所痛而见仇者所快”，吾为此惧，深有感于斯言，窃惟润公之用心无过犯错误者皆得所改止，仍依岗位而各有贡于国，以符合于人口百分之九十五以上之大团结，以康而国（使国家强盛），以崇而民（使人民政治地位、经济生活水平提高）已耳。此由表面窥测似其难，由间道锲入则甚易。语云“解铃还须系铃人”，此一易于反掌之转移形象，两公实在握焉。惟公先图利之（您首先书动从事有利），国家幸甚。

专肃，顺致政绥　章士钊谨启

章士钊在写这封信的同时，还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虽然现在还未见到章士钊写给毛泽东的信，但从他给刘少奇的信和毛泽东给他的复信中，我们可以大体推知那封信的内容，自然是规劝毛泽东接受刘少奇的负荆清罪，严肃批评但也原谅他的错误，团结一致，共同领淤好国家的建设。

毛泽东的复信全文如下：

惠书敬悉。为大局计，彼此心同。个别人情况复杂，一时尚难肯定，尊计似宜缓行。敬问安吉。

毛泽东（1967 年）3 月10 日

3 月 2 日，陈伯达报送毛泽东王力、关锋起草的《红旗》杂

志社论稿：《论革命的“三结合”》。他在报送时写道：“革命的三结合方针和正确对待干部问题，得到广大群众拥护。同时，有些人也在利用这个问题，搞复辟活动。针对这种情况，王力、关锋同志拟了一篇社论，阐说主席的革命三结合方针，以便引起注意。”

3 月 7 日这天，毛泽东审阅《论革命的“三结合”》社论稿时批示：

“林彪同志阅后，退文革小组。”

同时，毛泽东在文中还加写了一段话：“从上至下，凡要夺权的单位，都要有军队或民兵参加，组成‘三结合’。不论工厂、农村、财贸、文教（大、中、小学）、党政机关及民众团体都要这样做。县以上都派军队代表，公社以下都派民兵代表，这是非常之好的。军队代表不足，可以暂缺，将来再派。”

这篇社论载于 3 月 30 日出版的《红旗》杂志 1967 第五期，《人民日报》3 月 10 日提前转载。这篇社论用黑体字引用了毛泽东的一段话：

“在需要夺权的那些地方和单位，必须实行革命的‘三结合’的方针，建立一个革命的、有代表性的、有无产阶级权威的临时权力机构。这个权力机构的名称，叫革命委员会好。”

从此就有了毛主席的最新指示：革命委员会好！

## 第 542 回：访北航，公开“打倒谭□林” “红中会”，中央查“□海事件”

3 月 10 日上午 9 时 15 分，正在中国访问的新西兰共产党总书记威尔科克斯和他的战友史密斯·凯西，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刘宁一等人陪同下来到北京航空学院，全校师生在大路两旁热烈欢迎。军乐队奏乐曲《我们走在大路上》。人们手举《毛主席语录》不断高呼：

“中国共产党和新西兰共产党的战斗友谊万岁！”

“战无不胜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万岁！”

他们在学校主楼前举行了欢迎大会，北航“红旗”负责人韩爱晶和威尔科克斯发表讲话，全场欢声雷动。

大会后，他们又进行了座谈。

韩爱晶给威尔科克斯戴北航“红旗”袖章

前排左起：侯玉山、郝秀琴、威尔科克斯、屠海鹰

威尔科克斯在欢迎大会上高呼“毛泽东主席万岁！”

刘宁一讲话

威尔科克斯、刘宁一等和北航“红旗”战士座谈

刘宁一对对北航很满意。此后，中联部安排到北航访问的外宾活动很频繁，时常见到不同肤色的国际友人在同学们陪同下在校园里看大字报、座谈。

3 月 10 日，北京农大“东方红”总部觉得局势已经明朗，于是也发表声明，公开提出“打倒谭震林！”

这天下午，谢富治、王力、关锋、戚本禹等亲临农展馆，参

观了《全国大寨式农业典型展览》，并接见了北师大“井冈山”学生 200 多人。北师大“井冈山”汇报了几天来批判谭震林的“战斗经过”，谢富治他们表示要把情况如实汇报给周恩来和中央文革，坚决支持“革命小将的革命行动”，谢富治在临走时还说了句“造反有理!”

这天，周恩来阅批中共中央就江苏问题复南京军区、江苏省军区及张春桥、姚文元的电报。电报指出：“鉴于江苏省的群众组织之争一时统一不起来，三结合条件还未成熟，中央决定由南京军区和江苏省军区负责建立军管会，对江苏省实行军管。军管会下设两个班子，一个抓革命，一个管生产，把工农业生产和财贸工作管起来。对重要工厂、轮渡、火车站、邮电等部门可派军代表。”

修改时，周恩来将原稿中“江苏的问题由张春桥、姚文元同志和许世友同志商量决定”改为：“江苏的一般问题，由许世友同志和江苏省军管会同张春桥、姚文元同志商量解决。”

3 月 11 日，以农口造反派为主成立了“首都批谭联络站”。北京大中专院校的红卫兵闻风而动，纷纷开着卡车,架着高音喇叭,举着红旗,像潮水一样涌进农林口各部机关安营扎寨，到处寻找反谭震林的炮弹。一时间，机关大院内人山人海，农林口机关局势大乱。

当天下午，在农业部召开了农口批判谭震林大会，北农大有 2000 多人参加。农林口所属单位的造反派组织纷纷发表“声明”

和“紧急呼吁”，四处串联，组成了一支数量可观的反对谭震林的队伍。

因为与北师大“井冈山”等组织存在种种矛盾，“新北大公社”在此问题上比其他组织慢了一拍。但是对炮打谭震林如此大的阵势不容漠视，北大动态组立即进行调查：一月份农大“东方红”反了一阵子谭震林，不久遭到中央的批评，又向谭震林请罪。《向谭震林同志请罪　农大东方红》的大标语就贴在北京大学海淀门的门外院墙上。从农口运动的本身，找不到值得这样大张旗鼓反谭震林的理由。说谭震林在农口扶持保守派，这样的解释也比较勉强。因为在 1967 年 3 月，社会上已没有保守组织，经过 9 个月的运动，各个组织都说自己是造反派。农口的主要单位农业大学、农机学院和农科院等，当时是反谭派掌权；农业部等，是保谭派掌权。此时，北京大学动态组只得到两个消息：一是传说在中央，“谭震林反中央文革”，这条消息全部就这么几个字；二是王力在广播事业局的一次讲话中提到：“有人要代表老干部来讲话”。北大动态组从北师大“井冈山”的内部了解到他们的部署是：“下一步是搞余秋里、谷牧、李先念、李富春，最后搞总理”。当时已贴出了“坚决揪出谭震林的后台！”的大标语。

面对这些情报如何表态？北大动态组感到很为难，总部的领导天天到动态组来，了解运动的进展，下面的“战斗团”又催问得比较紧，地球物理系在 3 月 9 日已经贴出了“打倒谭震林！”的大标语。到了 11 日，看到社会上一浪高过一浪的“反谭”热

潮，北大动态组感到有必要对谭震林问题表态了，便打电话给聂元梓。聂元梓叫文革办公室通知校文革会常委和“新北大公社”总部委员到《动态报》开会。会上，动态组介绍了调查的情况，并指出谭厚兰的反总理问题。聂元梓说：“如果他们反总理，我们就坚决反击。”会议决定继续调查，暂不表态。

当天晚上，戚本禹通过秘书乔玉山给农大“东方红”打电话：“我委托农大‘东方红’的红卫兵同志，到农口有关单位收回我元月八日在政协礼堂的讲话录音。这个录音不要放。这次讲话的记录稿也一律收回，不要翻印。”

于是，“新北大公社”决定对谭震林的问题表态。先是提出“炮轰谭震林！”，再升级为“打倒谭震林！”。

3 月 11 日，谢富治办公室给北京红代会来了一封信：

聂元梓、蒯大富、谭厚兰、韩爱晶并核心组各同志：

最近，中央民族学院红卫兵总部连续写信给谢副总理，反映他们学校二派之间的斗争情况，对他们没有被吸收参加红代会也有意见。我们把来信向谢副总理汇报了，谢副总理表示：他对民族学院的情况根本不了解。不能因为外边流传他讲过某一句话，就决定他们不能参加红代会。他还说，民族学院红卫兵总部是否应当参加红代会，请你们考虑。

敬礼

谢副总理办公室

（章）

3 月 11 日

信中所说“不能因为外边流传他讲过某一句话，就决定他们不能参加红代会”是指谢富治 1 月 17 日接见洪涛时曾经说过“民院红卫兵总部是保守派组织”这句话。

3 月 12 日，《北京日报》实行军事管制。

3 月 12 日，毛泽东会见新西兰共产党总书记威尔科克斯。参加会见的有周恩来、康生、刘宁一。毛泽东在谈话中说：

革命派在开始时都是受压迫的少数派。北大的聂元梓是这样，北航红旗也是这样。在这次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北航开始时多数派有几千人，少数派红旗只有两百人。各个学校都是这样。多数派是纸老虎。上海无论在学校还是在工厂，开始时真正革命的都是少数。有人说中国已经搞了十几年的社会主义革命，实际上并不是那么一回事。真正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从文化革命才开始的。……过去历次整风都是在干部中进行的，没有发动群众起来检查干部，这次是发动群众起来检查干部。干部大部分是好的，有一部分是坏的，可能办错事，整错人……解放以后，学校还是国民党的，教员大部分是国民党留下来的，大学教授、中学教员、小学教员都是如此。……共产党自己没有多少教师、演员和画家，有经验的办报人也很少。解放以后搞这些的还是旧社会的知识分子。文化大革命看来要一两年，这是从全国范围来说。

人民日报

1967年3月13日

毛主席语录

全世界各国人民的正义斗争，都是互相支持的。

毛主席会见威尔科克斯同志

会见时进行了极为亲切的谈话

新华社十二日讯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今天下午会见了新西兰共产党总书记维·乔·威尔科克斯同志。

毛泽东同志同威尔科克斯同志进行了极为亲切的谈话。

参加会见的，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周恩来同志和康生同志。中央书记处书记刘宁一同志。

在北京的新西兰共产党全国委员会委员丽塔·史密斯同志也参加了会见。

自中央文革的《二四批示》后，湖南省军区镇压了湖南省最大的、有百万之众的造反组织“湘江风雷”，长沙的其他造反组织一直不服。他们一方面设法通过北京的“首都三司”等红卫兵组织不断地向中央递送申诉材料，力争为“湘江风雷”问题翻案；一方面也在暗中不停地活动，反对省军区的镇压，重掀湖南的造反浪潮。

距 2 月 4 日仅 10 天，2 月 14 日，由省水电系统青年工人和青年技术员组成的“孙大圣挺进军”成立，负责人邹定国、叶财宝。该组织虽人数不多，影响不大，但表达了广大造反派对《二四批示》的不满和愤慨。2 月 25 日，“孙大圣挺进军”宣布加入反对“高司”与湖南省军区的阵营。

3 月 9 日，长沙市“井冈山红卫兵”一中的谢若冰、八中的刘建成、九中的李昆明等；“毛泽东思想红卫兵造反有理军（红

色造反团）”三中汤建平、吴正元；“红旗统战联盟” 十二中的谢麓山；一中“齐卫东”、“夺军权”、“共产主义红卫兵”申学崧、黄杏英、李筑银；五中“造反到底”吴春林等长沙市部分中学的红卫兵组织负责人，抱着为“湘江风雷”翻案的决心，在湖南省展览馆的一间平房内开会。

这些人，在“文化大革命”初期，都是“红卫兵造反有理军”的骨干，后来又成为“湖南井冈山红卫兵”的骨干。此时大家又聚在一起，商量成立新的红卫兵组织：“红卫兵长沙市中等学校革命委员会”，简称“红中会”，准备全力以赴地为“湘江风雷”等造反派组织翻案。

会上讨论组织简称时　原拟称“红革会”，但时值上海“红革会”因炮打张春桥正遭到批判，一中学生李筑银提出反对意见，遂定为“红中会”。

会上，与会成员形成了统一的认识，遂分头联络长沙市中学、中等专科学校、技工学校的红卫兵组织。

3月12日，这些人又在位于蔡锷路的《长沙晚报》原址对面的长沙市干部文化学校再次聚会，进一步研究了“红中会”成立后的有关工作及组织发展等，并就“红中会”的机构设置、各学校的红中会组织名称的确定，做出了决议，决定由5家发起单位各派一人组成“红中会”领导机构——总勤务站。他们是：“井冈山红卫兵”谢若冰，因谢若冰长期未到岗后改为李昆明；“红旗统战联盟”谢麓山；“造反有理军（红色造反团）”汤建平；

一中申学崧；五中吴春林。考虑到申学崧同学是共产党员，大家一致推举他作为“红中会”的主要负责人。他们在会上通过了对时局的宣言，毫不隐晦其反对湖南省军区和“高司”的政治态度。但出于策略考虑，并未亮出意在推翻《二四批示》的底牌，而是生拉硬扯地将其解读为“中央批示只讲了湘江风雷有反动头目、而并未将整个组织都定为反动组织”，公开了他们否定“湘江风雷”是反动组织的观点。

再说青海“223 事件”后，中央文革接到越来越多的关于青海“223 事件”的情况反映，有控诉信，有血书。上访的人群中，有从青海逃回来的红卫兵，也有北京的学生家长。有的家长哭诉孩子去青海串联生死不明。

戚本禹感到问题严重，就把中央文革小组《快报》组记者找来询问情况。记者开始还是按照青海省军区的报告内容汇报说：是“八一八”先开枪；“八一八”在报社杀人等等。

戚本禹追问他：“当时你在不在现场?这些都是你亲眼看到的吗?”

记者犹豫了，不敢回答。

戚本禹对他说：“这可是人命关天的事情，责任重大，要实话实说。”

记者闻听此言，两腿直颤，说：“我也是看到青海省军区的报告才知道此事，不是亲眼看到的。”

关锋也从红卫兵的来信中了解了青海“223 事件”，他和戚

本禹商量说：

“这事如果是林总表的态，主席会知道，因为这么大的事，林总一定会向主席报告。如果是叶帅表的态，林总不一定知道，主席也不会知道。但也许他们要报告总理。这事大了，文革小组解决不了，得请尚方宝剑。”

于是他们决定向毛泽东报告此事。报告由戚本禹起草，关锋补充了几句，内容很简单，大意是：青海西宁死了很多人，据了解，是解放军向赤手空拳的学生开枪，似乎不妥，这样做是否会引起连锁反应？他们想调查一下，“是否可以，请主席批示。”

报告由戚本禹和关锋署名。后来又找了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向他们通报了情况。他们听了戚本禹和关锋通报的情况，也觉得此事关系甚大，于是，都在戚本禹的报告上署了名。报告打印后，就交给了江青，由她转报毛泽东。

3 月 11 日，毛泽东在戚本禹等人的报告上批示：“可以调查一下。如果是学生先开枪，问题不大。如果不是这样，那就值得研究了。”

根据毛泽东的批示，3 月 13 日晚上，在政协礼堂，由戚本禹和关锋向逃回北京的红卫兵了解情况。参加会议的都是在青海日报社现场的红卫兵。首先由北京“三司”赴青海的代表王相喜叙述了他在 2 月 23 日前后在现场的亲身经历……在谈到“八一八”开枪问题时，王相喜说：“我可以保证‘八一八’没枪也没开枪……”

关锋问："你在报社吗？"

王相喜："我们 40 多个同学都在里面，我可以作证……咱们同学起先以为朝天放枪。后来看人死了，流血了，倒下了 70 多个，第二排又上去了，倒下了，第三排又上去了，又倒下了。"

戚本禹："为什么上？"

王相喜："因为他们不承认自己是反革命，要保卫报社……我们的刘凤池也被打伤。"

从青海回来的学生张金莱对关锋说："刘凤池你认得吧？"

关锋点点头。

张金莱接着说："当时你接见我们了……"

关锋点点头，对戚本禹说："他们是广播学院的。"

王相喜："他们讲这是林总来电……"

张金莱递上一份《林总来电》的传单说："您看。"

关锋："你们还有什么传单没有？"

王相喜又述说了"223 事件"后自己被抓进南滩监狱的经历："监狱的生活是很苦的，……夜间两碗稀饭……许多同学坚持不了……清华许宝生和我校的一个带了 8 天手拷，还带背拷……他们讲，你们不是坐牢，是集中审查……"

戚本禹问："'八一八'有机枪是怎么回事？"

王相喜说："纯属军区一小撮反革命分子出于反革命政治目的的需要……"

戚本禹又问："'八一八'在报社内打死不同意他们观点的人

是怎么回事？”

众人气愤不已，都说根本没有这回事。

学生张苗苗说：“我在 23 日上午 5 点还在报社，根本就没看见死人。”

众人也答：“我们都在现场。”

戚本禹问：“有没有把解放军从墙里扔出去？”

众人都说没有。

戚本禹拿出一迭材料问：“报社有电台？”

学生答：“原来就有”

再问：“报社有迫击炮、机关枪？”

答：“造谣!”

戚本禹问：“报社内‘八一八’混进了坏人没有？”

答：“当时严格地审查过。”

关锋问：“你们知道刘贤权这个同志怎样？”

戚本禹补充道：“你们认为他是好人还是坏人？”

众人答：“我们认为他是好人，刘贤权在三干会上揭王昭最厉害。”

王相喜:“23 日军区内还开会,据了解开枪问题还不能一致。”

金美云：“‘223 事件’和王昭有关系。”他接着详细谈了他的看法。

戚本禹：“你讲的‘223 事件’与王昭有关系根据是什么？”

金美云：“王先赞讲的。”

王先赞是青海省公安厅的工作人员。

这时，陈代海等几个同学又进来了，陈代海详细叙述了他在“223 事件”中的经历。

戚本禹再次问：“谁先开的枪？”

陈代海：“军区先开的。”

戚本禹：“报社有没有枪？”

陈代海：“没有。”

戚本禹：“没有迫击炮？”

“没有!”

“没有机关枪？”

“没有!”

“没有手榴弹!”

“没有”

陈代海说：“我们 5 个人，有 3 个没举起手来，当场被打死。”

关锋问：“青海日报社中有没有这回事，报社内不同意‘八一八’的人被打死，烧死，有没有？”

陈代海：“没有。”

戚本禹追问：“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

陈代海再次肯定的回答：“没有！我厂‘捍卫队’还讲：‘江青同志两次到西宁。’”

戚本禹：“关锋同志提的问题你能确切回答。”

陈代海：“没有，他们扬言叫我们去看尸体，至今未带去。”

戚本禹："你们支持'八一八'就是和'八一八'一个观点。你们打了人家没有？"

关锋："进来报社的有无年纪大的流氓？"

戚本禹："坏人。"

陈代海："我们厂的没有。"

陈代海等人曾响应陈伯达的号召下工厂劳动过。

学生冯国良说："他们现在在北京还抓人。"

戚本禹十分气愤地说："北京不许抓，中央有《通告》。"

关锋："最后我说两句，我们各种各样的意见都要听，作调查研究，不能发表任何意见，不能回答任何问题，这一点同学们是理解的。我们绝对相信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相信他们的英明，只要是革命的就要坚持，真理可以战胜一切，我们相信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能在复杂的事物中，洞察一切……。我着重讲一点。今天在这儿谈，同学们回去以后不要讲青海的问题，我们相信革命的同志会遵守革命的纪律。我们会想一想对哪个阶级有利。"

戚本禹："不要印传单，你们也可以听听反面意见。你们的要求我们转告伯达同志。"

座谈会的情况，关锋、戚本禹向中央文革作了汇报。

为落实"林副主席来电"一事，戚本禹特地打电话给叶群，询问是否确实，叶群郑重否认说："林总的秘书我管得很严，不通过我，谁也不敢表态，我们绝对没接到过赵永夫的电话。"她

甚至把电话记录本拿来给戚本禹看。

此时青海省委第二书记、省长王昭因批斗时胳膊摔伤，已从洛阳回到北京家中养病，青海“223 事件”时不在西宁。赵永夫到北京后找人捎信给王昭，希望与他面谈。王昭同意，提出不能在他家中，另找地方。

## 第 543 回：周恩来，说全国军管形势　大游行，北京反“二月□流”

3 月 12 日，毛泽东在同周恩来等人谈到文化大革命第二阶段，即“三结合”建立革命委员会的阶段什么时候结束时，说：

恐怕要二、三、四、五月了。到了五月份，“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也可能成熟，至少省一级可以成熟或接近成熟。这样，大概的眉目可以看出来。

3 月 13 日，李富春在军以上干部会议上的讲话，谈“三支”问题，主要讲生产方面的问题。

当天下午，周恩来在军以上干部会议上讲话，首先介绍了全国军管的情况。他说：“军事管制问题，到 2 月中旬，全国实行军事管制的单位 6900 多个，大都是公安、邮电、电台、报社、银行、仓库、监狱等单位。其中仓库、银行占很大数目，仓库 3100 多，约占一半；银行 1400 多，约占五分之一。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各级银行都要军事管制。”

“现在军事管制从地区上看，只达三分之一。全国 29 个省、市、自治区（包括天津市），已经实行军管或等于实行军管的加上已经批准准备实行军事管制的有 10 个：陕西、新疆、青海、西藏、云南、广东、广西、福建、浙江、江苏。已经实行‘三结合’夺权，成立革命委员会的 5 个：黑龙江、山西、贵州、上海、山东。”

“全国省、市、自治区，三分之一实行了军事管制，六分之

一建立了临时权力机构。剩下的 14 个，又分为两类：一类是准备实行革命的三结合夺权的，有 7 个：北京、辽宁、吉林、天津、湖南、河南、安徽；另一类，情况未定，到底是实行军事管制还是三结合，还需要摸一下，这一类也有 7 个：内蒙、河北、甘肃、宁夏、四川、江西、湖北。这 7 个省和自治区如何进行，正在考虑。不论是要通过军事管制，或者推动进行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实行三结合夺权斗争，都需要有一个筹备阶段。我考虑，要成立夺权筹备小组。按毛主席的思想，毫无疑问也要以解放军为主。总要有一个推动力量，光靠革命群众组织不行，革命干部没有出来亮相，站不出来，内部争论很多，甚至发现有的军区和地方党委完全处在对立的情况，所以要摸一下。”

“无论如何要在 3 月份解决领导机构的问题。因为抓革命、促生产如果没有省、市、自治区领导机构，怎么能搞好？如果没有领导机构，可以先成立生产指挥部，就是像报纸上介绍的怀柔县抓革命、促生产第一线指挥部，现在就抓，不能再晚了。”

他介绍说：“目前省市公安局 62 个，大部接管了。公安机构过去长期受彭、罗影响，里面有一小撮坏人。文化大革命第一阶段，冲击了一下，揭发出一批坏人。公安部曾经试行夺权，但最后还是实行军事管制。内部即使是真正的革命派夺了权，但力量小，压不住坏人。南京、杭州公安局也有这样的情况。北京公安局，由政法公社一个单位包下来，结果不行。他们年轻，革命热情有余，但经验不足，坏人不但没有被揭发，反而保起来了，反

而使他们被动。也有由内部坏人夺权的，他们拿权整好人，如天津公安局有一个时期，连交通警都不上岗了。这样的情况还是要实行军管，坏人才有所畏惧，广大革命群众欢欣鼓舞。”

“一个地区的军事管制（省、地、县三级），应当由当地最高军事机关和其他军事机关派人组成军事管制委员会，成为当地的最高领导机构，负责执行毛主席的抓革命、促生产的最高指示。在军事管制委员会下，一般组成两个班子，一个班子全面领导所属地区的文化大革命，特别要作好支持左派的工作，把左派联合起来，帮助干部亮相，与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划清界限，另一个班子，全面抓生产指挥工作，把工业，农业，交通，财贸，文教，卫生全部抓起来。这个班子叫生产指挥部。

现在春天到了，文教卫生工作也得抓起来。防疫工作非常紧迫，北京的卫生部还在吵，我看要派军事代表，一个人就行了。中、小学都开学了，地方事情很多，中央教育部还可以搞革命，省、市、地、县就不行了。三位一体的生产指挥部，要把这几方面抓起来，相互结合。组织形式上大体是这样的，但也要因地制宜。”

周恩来明确了各级军管会的隶属关系，他说：“各级军管会，受上级党委和军管会的领导，同时领导下级党委、人委和军管会。并代表本地区与其他地区党委、人委和军管会联系，军管会本身受当地最高军事机关党委的领导。

地委，军分区，如有军部驻在这个地区，应受军党委的领导。

师住在县，应由师来领导。组织问题再具体化一下。”

关于夺权阶段需要多长时间？周恩来说：“到底第二阶段什么时候完？主席说，2、3、4 月看出眉目来。昨天，见了主席，主席又说，恐怕要 2、3、4、5 月了。……到了 5 月份，‘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也可能成熟，至少省一级可以成熟或接近成熟。这样，大概的眉目可以看出来。”

“各级领导干部，在取得革命群众同意后，可以吸收到抓生产的领导班子里来，在工作中考验。

有的同志提出军管会中能不能吸收这些同志，我认为不宜马上吸收。因为参加军管会，将来就得参加三结合，在军管会中只是解放军。生产班子可以经过革命群众同意，吸收他们参加，一边检讨，一边考验。有些犯了严重错误的领导干部，一时群众不能谅解的，可以降级留用，这样，群众容易接受。调离只能是少数。像广东的赵紫阳同志，错误是严重的，但他已经作了检讨，我们叫他回去降级留用。现在第一书记都跑到北京，不是个好办法。他们对情况很熟，要就地监督留用，甚至撤职留用。铁道部的吕正操、武竟天已经撤职，但还留在那里工作，看他们是不是真正回心转意，以观后效。”

“有的同志怕军队成了工作组，这要看是什么工作组？……不要怕，看你站在什么立场上。为什么 7000 个军事管制单位，群众都欢迎？就是支持了他们，就是这个道理。”

“将来三结合，要转为代表会议。那时要实行巴黎公社的选

举。现在这种三结合，起监督作用。”

“企业事业的革命组织，应按行政单位归口编组。这些单位的群众组织可以允许串连，但不允许互设联络站，尤其不要学生到工厂设联络站。”

“有的同志问，今年的大串连搞不搞？不搞了，毛主席已经肯定今年不再搞大串连了。我们打算补发个通知。但在本地区还可以互相交流经验。总之，工人、学生要回去搞斗批改。国防工地、机要、要害部门、企业事业单位、仓库，实行军事管制，不进行夺权，不改组领导机构，革命群众对领导有意见，可以提出，也可以向上一级党委建议。如果条件成熟，可以进行有限的三结合，成立监督组织。革命组织必须归口，对本单位以外的，不进行相互串连。一切革命组织，都在业余时间，按归口的系统活动，开全单位大会，必须经过军管会批准。各单位的民兵组织，必须不受群众组织的影响。民兵不能属于那一派组织，不然不能在三结合中，起民兵代表的作用。”

“军队已经肯定，院校、文艺团体多了，要下放。企业事业单位也要向下放。把上头搞得短小精悍。不要头重脚轻。将来，党政机关是不是转向供给制?把资产阶级法权早点去掉一些，树立新的生活方式。”

“不论已经实行军管和尚未实行军管的，对反动组织、对严重违法乱纪和泄露国家机密的，军事机关应与公安部门配合，予以逮捕法办。

有的群众组织的头子是反动的，处置要慎重。可以将头子隔离起来，只要抓住他的罪状，就可以逮捕，可以不宣布解散，群众归各单位。因为宣布解散，对群众震动太大。这种方法比较有利。对抢国家文件的，要严肃处理。严重的要逮捕法办。遇到这种事件，要追究追回被抢的文件。”

3 月 13 日，聂元梓在矿业学院红代会办公处主持北京大专院校红代会核心组扩大会议，研究谭震林的问题。核心组成员除谭厚兰外都参加了会议。红代会作战部长和农大代表介绍了情况，但说的都是 1 月份以前的事。许多单位要北师大介绍情况，北师大代表拒绝。在农大代表快讲完时，谭厚兰来到会场。代表们让她讲话，她说：“我没有什么可讲的，我也没有什么材料，我们就是要反他！”

农大代表讲完之后，聂元梓说：“农大同志讲完了，大家看一看怎么办？”

北航韩爱晶提出红代会组织全市大游行，时间就在明天。各校都没有反对，责成聂元梓向中央文革请示。

聂元梓到套间去打电话，一会儿回来说：“可以。”

有人问：“是否中央批准了？”

聂元梓说：“没有，我把红代会的决定反映给办事组，讲了明天的行动和口号。办事组没有表示什么意见，这就是同意了我们的行动。”

当天，“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发出《通告》说：“正当轰轰

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即将取得决定性胜利的关键时刻，在社会上，从上到下出现了一股资本主义复辟的反革命逆流。在这股资本主义复辟的反革命逆流中，残酷镇压全农口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罪魁祸首谭震林，又赤膊上阵，兴风作浪，企图混水摸鱼，篡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果实，为了保卫毛主席，为了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代表大会委员会决定：猛轰谭震林，解放全农口！”“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代表大会委员会要求所属各单位立即行动起来，全力以赴，投入战斗，‘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坚决粉碎这股资本主义复辟的反革命逆流！不获全胜，决不收兵！”

这天，北京石油学院“北京公社”贴出大标语“炮轰余秋里”。当天，北师大“井冈山”表态坚决支持。北京石油学院“北京公社”与北师大“井冈山”、学部“红卫兵联队”还在这天联合召开“揭发余秋里，打退资产阶级复辟逆流大会”，并成立“揪余秋里联络站”。

这天中午，康生和他的妻子、中央文革联络员曹轶欧一同参观了农展馆的大寨展览，并接见了北师大“井冈山”、农大“东方红”、农科院“红旗”等组织代表。康生说：“由谭震林一手泡制的《全国大寨式农业典型展览》有很多是反毛泽东思想的。”

“新北大公社”3 月 13 日发表声明说：“新北大公社郑重声明，决心把谭震林揪出来，斗倒，斗垮……新北大公社号召全体社员和全校革命师生员工积极行动起来，与兄弟单位革命造反派

并肩战斗，把谭震林打倒，彻底粉碎资本主义复辟逆流。”

这天，北京还出现了关于李富春副总理的大字报、大标语。统战民委系统“红色联络站”负责人、民研所洪涛等人在统战部贴出大字报《就中央统战部运动中的几个根本问题与李富春同志展开大辩论》。其内容是批李富春关于统战系统的一个讲话。大字报说：“从运动开始以来，李富春同志对中央统战部文化大革命每个阶段所作的指示和谈话，从来不是站在革命造反派一边，支持革命造反派闹革命，摧毁以徐冰为首的中央统战部这个大阎王殿，而是打击革命造反派，支持保守派，竭力保护徐冰为首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司令部。”此后，许多大专院校发表声明，反对炮打李富春。

第二天，3月14日，北京石油学院“大庆公社”根据周恩来1月8日在接见造反派时说：“你们要揪的谭震林、陈毅、李富春、李先念、余秋里等同志，都是处在我们党和政府工作的第一线，都是在毛主席身边做实际工作的人”这一讲话精神，贴出了“余秋里是毛主席点的将，我们信得过”、“余秋里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等大标语，不同意打倒余秋里。而石油部大部分组织都未表态。

3月14日，北京街头出现了10万学生的游行队伍。这是北京红代会组织的大规模示威游行，声讨谭震林“镇压农林口文化大革命、实行反攻倒算的滔天罪行”。他们高喊反击“二月逆流”、“用鲜血保卫中央文革”等口号，要“炮轰、火烧二月逆流的黑

干将”，“揪出二月逆流的黑后台”。下午13时许，各路游行队伍汇集天安门广场，游行至下午14时结束。由此掀起了反击“二月逆流”的第一次高潮。

当天，周恩来的联络员董枫在财贸联络委员会讲话时说：“谭震林的问题同志们认为要搞就搞，由大家决定。”

3 月 16 日，在北农大的大操场召开了有 178 个单位参加的“声讨谭震林罪行大会”。会上，农大“东方红”、中央气象台“红旗”、农业部“红旗”、师大“井冈山”、清华“井冈山”和农林口许多单位的代表做了发言。会上提出“谭震林是二月逆流的黑干将”。

17 日，北京红代会“批谭联络站”、全国农展馆等造反派召开了有 134 个单位参加的“彻底揭发批判‘全国大寨式农业典型展览’誓师大会”，声势十分浩大。

矿院“东方红武工队”3 月 17 日发表声明，指出：“谁炮打周总理和中央文革，谁就是反革命”，同时指出：“任何人不准贴李富春同志、李先念同志的大字报”，并认为“余秋里同志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炮打余秋里同志是错误的”。最后强调“谭震林是资本主义复辟逆流中跳出来的急先锋，必须坚决打倒，彻底解放农林口”。

这天，“新北大公社”部分战斗队也上街贴大标语：

“周总理李富春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

“不许洪涛刘郢攻击李富春同志！”

## 第 544 回：□仁杰，“反□流”主政复旦　安徽省，夺权后也分两派

上海“反逆流”开始后，大学的造反派大部分都有些灰溜溜的。

一天晚上，张春桥把徐景贤和郭仁杰找到兴国路招待所五号楼的客厅，在场的还有张春桥的妻子文静。那天，张春桥看了几份“机联站”的简报和由郭仁杰、朱永嘉组织人编写的《“一二八”炮打逆流大事记》，认为这些材料把“红革会”和有关组织炮打张春桥、姚文元的日程和细节写得很详细：年、月、日，上午干什么，下午干什么，炮打经过，怎么组织反炮打，哪些人做了交待，怎么交待，写得明明白白。对此，张春桥很欣赏，并关心地问徐景贤和郭仁杰：“你们收集了很多材料，‘红革会’炮打的大体眉目出来了。最近的‘反逆流’情况怎么样？”

这项工作是郭仁杰抓的，他向张春桥汇报了各学校“反逆流”的情况，说还组织了一个“反逆流联络站”，便于查清“红革会”头头的情况。少数头头最后准备给予解脱，宣布回到群众中去。其他“红三司”、“炮司”等几个卷进炮打不深的组织仍很活跃，郭仁杰主张应该实行红卫兵的统一大联合，将来再建立一个全市的统一的红卫兵组织。

张春桥认为：红卫兵运动最终要实行按班级、按学校的大联合，归口闹革命，复课闹革命，决不能继续发展分散的跨学校的组织，山头林立，各行其是。等到各学校实行了红卫兵的大联合，

全市召开红卫兵代表大会的时机就成熟了。

张春桥对前一阶段“反逆流”的工作点头表示认可。但那天他脸色很严肃，很严峻，他说：“你们的材料我已经看过了，但我总怀疑‘红革会’有背景。比如说，他们‘红革会’究竟与原市委的那些人有没有联系？有没有人在幕后指使他们？又比如说，中央文革来了特急电报后，‘红革会’的一些头头居然跑到东海舰队机关里去，用舰队的红色保密机向中央文革打电话，究竟是什么人给他们提供这种条件的？有一些头头又赶到北京去找中央文革，在中央文革的接待站里又有什么人表态同情他们？我总怀疑还有长胡子的人在幕后策划，这些事情好像都没有查清楚。”

张春桥说话的时候，文静在一旁插话：“当时杨西光在复旦大学扫厕所，那两天也不去扫了，活跃得很。”

张春桥接着说：“这次炮打就算了，可是，我要告诉你们，上次我跟文元一起到北京去汇报‘上海人民公社’的成立，毛主席很关心上海炮打这件事，主席说：‘炮打张春桥、姚文元，还不是反革命啊？红革会这笔账还是要算的。’你们对这件事心中要有底。这次炮打，我认为至今有些事、有些人还没有查清。但是，毛主席的这些话，我只对你们讲，你们不要外传。”

张春桥当场决定：让郭仁杰返回复旦主持学校的工作，整顿“红革会”的组织，并查明这次炮打的幕后策划者。

徐景贤、郭仁杰回去后，感到这么重大的事情，只是他们两

人知道，操作起来有问题。所以徐景贤提议，是不是给联络站和写作班几个最核心的人传达一下？郭仁杰也同意了。于是，他们把程绮华、王承龙、吴瑞武、朱永嘉找来，在极小范围里给他们说了说，同时再三叮嘱："只给你们几个人传达，不得外传。"

3 月 3 日。郭仁杰在复旦作长篇讲话，中心话题怎样掀起"反逆流"的高潮。他的讲话中，把"红革会"炮打张春桥说成是"在革命的紧要关头，投敌背叛！投敌背叛！"他进一步解释说："这样的一个作用相当于 1927 年大革命时北伐革命军打到上海，相当于那个时候蒋介石和陈独秀所起的那种作用，我不是说这些头头就是蒋介石、陈独秀了，我说它起的作用，即在革命的紧急关头，调转枪口对准自己的同志。"他进一步发挥说："那个时候我们今天在这里的同志要想真造反和继续造反的同志只好跟着张春桥姚文元同志上山打游击去了。"

徐景贤、郭仁杰以红卫兵小将的战友身份参加大会，表示"是来支持'红革会'战士造反的""是来支持'红革会'战士和其它红卫兵组织的战士的反逆流斗争的。"

学生们起来，回校大造头头的反。全复旦各群众组织除了"东方红"以外都在万炮猛轰自己组织的头头，成立造反委员会，宣布头头靠边。整个上海大概只有胡守钧纹丝不乱，不承认自己有错。他的自信感染了"东方红"的战友们，在全上海一片造头头反的喧闹声中，唯有复旦"东方红"没有人造头头的反。

胡守钧托人带信给"炮司"的周谷声："我们看'炮司'一星

期内要取缔了，你们还是先解散吧！我们把责任拉在自己身上，断绝和‘炮司’的联系。”

“炮司”在 3 月 3 日成立的“炮司造反委员会”，简称“炮反会”。这天，“炮司”全体人员集中到华纺“反逆流”，斗争新黑帮——红鸥、周谷声、许云飞。

由于开斗争会时不允许他们 3 人申辩，一申辩就说立场没变。许云飞大声抗议：“你们不应用以前对待黑帮的那一套对我们，”话没说完，几个昔日战友走上前按住他的头要他低头认罪。

“机联站”对“炮反会”说：“你们现在揭出来的材料根本不能交账，我们把材料抛出来，你们就会吓一跳，你们后台是陈丕显、曹荻秋，你们的头头周谷声、红鸥是反革命！”

“炮反会”听了，便令红鸥和周谷声在食堂门口的毛泽东半身像前，向毛主席请罪，从早站到晚。晚饭开过，整个食堂空无一人，食堂门口的路灯发出幽幽的光，二人站在毛泽东画像前，泪眼相看，一切尽在无言中。每当想到昨天还是亲密无间的战友，今天却变得陌生冷酷，心里就说不出的委曲孤独，时间也觉得特别难捱。

几个月来的战斗，结局是如此的触目惊心！老造反一个个下台了，消失了：劳元一开除“红革会”，赵基会、马立新等等被罢官，上台挨了斗，安文江被开除“红三司”，潘啸龙自己不干了，胡守钧“负隅顽抗”，也被造反造掉了。三个组织的头头都“完”了，得力的人物又没有，组织能力太差，“红革会”、“红

三司”、“东方红”这三个组织瘫了，有些人不知如何是好，觉得“长期斗争，感觉疲劳”

3 月 4 日，“红革会”在文化广场召开“坚决击退炮打中央文革的反革命逆流大会”，徐景贤代表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宣布：派郭仁杰以市革会教卫组负责人的身份回复旦大学主持工作。

会上还将陈丕显和曹荻秋揪上台示众，说他们是“炮打中央文革的罪魁祸首”。因为炮打之前，陈丕显曾经被“红革会”看守在上海师院近一周，之后又被“红革会”关在长乐路红革会总部。劳元一等“红革会”头头与陈丕显有过多次交谈。但以后查了许久，没有查出陈丕显、曹荻秋与“红革会”炮打张春桥有什么关系，此事也就不了了之。

郭仁杰单枪匹马地来到复旦大学。此次他以钦差大臣的身份君临复旦，一言九鼎，威风凛凛，照例少不了许多捧场的。不但想做官的围着他转，就是那些不相干的家属在路上碰到他，也会说几句奉承的话。哲学系的“八一铁军”战斗组贴出了拍马的大字报：《郭仁杰同志是坚定的革命左派》，吹捧郭仁杰是“努力学习毛泽东思想、抵制周扬的教育黑线”的模范，是“与杨西光、陈传纲、刘振丰、胡曲园都进行斗争”的英雄。此后，这类捧场大字报还接连不断。

郭仁杰所主持的工作，当然是反“逆流”工作了。但这却是一件极其难办之事。上海的红卫兵虽因“炮打张春桥”而受挫，但在全国范围内，红卫兵运动还在蓬勃发展之中，刀势未老，锋

芒犹盛。

“红三司”头头安文江被要求在全校大会上作检查，用了 3 个小时。郭守仁指示将他的检查录音翻印成册由大家评点，结论是：“不是检查而是辩护词。”

清华“井冈山兵团”的小刘 3 月初来到上海复旦大学看安文江，他忿忿地说：“你还忙乎些啥呀！老子算看透了！红卫兵是啥玩意？抹桌布！打狗棍！我们傻不愣儿的造反呀夺权呀，到头来肥了谁？！中央文革一帮酸秀才呗！北京的老红卫兵除了蒯大富他们几个既得利益者还在闹腾，谁不是透心凉的!”

他还向安文江透露了不少消息：清华附中卜大华公开反江青，北京公安局一次就抓走了 120 多名；有 10 多个高干子弟窜到凭祥越过国境线到越南参加抗美斗争；有一个老红卫兵绝望得割动脉自杀……他凄苦地笑着说：“完啦！我们毁掉的东西太多，包括我们自己。”

他甚至毫不隐讳地批评“毛主席晚年糊涂了”，说“母鸡司晨天下必乱”等等。

3 月 4 日晚，交通大学“三司”总部开会，讨论“红三司向何处去?”的问题和开除安文江的问题。会上思想也不统一，但是整风的要求是一致的，希望“三司”能肃清机会主义，坚强起来。

郭仁杰通过“东方红”里一个叫王斯根的人，成立了造反委员会，宣布胡守钧靠边，开大会批斗。但是王斯根开了几次批斗

会，到会的人寥寥无几，“东方红”的人找出各种借口不参加批斗会，批斗会不了了之，郭仁杰恨得牙齿根发痒，又无可奈何，因为他说过，保证不包办红卫兵造头头的反。胡守钧在复旦园贴出大字报：《反逆流大方向错了》，再一次轰动复旦。

3 月 15 日，上海“反逆流联合指挥部”在文化广场召开反逆流大会，大会揪斗了“红革会”的负责人，宣布“红革会”总部解散。

3 月 22 日，复旦大学“新复旦红卫兵师”正式宣告成立。这是上海大专院校中第一个实现红卫兵大联合的学校，此时，上海交大、师大的内战还打得不可开交。

第二天，3 月 23 日上午，复旦开大会批判“孙悟空”和“反复辟”。下午和晚上，召开砸烂杨西光、王零的大会，各中层干部发言十分踊跃。

3 月 24 日下午，在文化广场召开“揭批复旦大学 1·28 炮打反革命事件大会”，是以复旦“文化大革命接待站”、“反逆流指挥部”、“红卫兵新复旦师”的名义举办的。“红革会”、“大队部造反派”的金应忠、“红三司”的安文江、“东方红”的胡守钧，还有劳元一、赵基会、吴正亮都被拉去“受审”、“示众”。“红革会”集体向毛主席“请罪”。上海师范学院“红革会”的李功佐也在会上表了态，要人们看她的行动。

会前，复旦大学举行了大游行，从四川路桥经南京路、西藏路、淮海路至文化广场，宣传复旦红卫兵大联合。会后，又进行

了文艺演出。

当天的《解放日报》、《文汇报》都发表了复旦红卫兵师成立的消息和评论，上海广播电台也作了广播。

对“反逆流”，有的同学认为是“运动群众”。也有人认为，在“反逆流”斗争，山头给铲平了不少，墙拆了，沟平了，这是不容抹杀的成绩。

3 月 26 日下午，姚文元代表市革委会到复旦大学作整风报告，张春桥也谈了形势及任务，解答一些问题。

我们再来看安徽，自“126 夺权”后，造反派内部因为意见分歧而分裂。2 月 7 日，就有一部分人宣布退出“合肥工人革命造反派联合委员会”，另外组成“安徽省合肥工人第一革命造反司令部”。

而安徽省军区自开展“四大”后，军区机关干部也开始造反，2 月份军区内后院“着火”，无暇顾及地方的夺权形势，省军区司令员严光直到 2 月 20 日，才在安徽省夺权后成立的权力机构“安徽省革命造反派总指挥部”南楼会议室，会见“总指挥部”的领导成员。他在听完造反派的汇报后鼓励他们说：“前段时间，军区内部有些问题，南京军区许司令也催过几次，要我尽快到‘总指挥部’支持你们的工作，现在军区内部问题解决了。我先来‘总指挥部’看看，前几天彭政委来看了一下，你们同他谈的情况我都知道了，你们应该有信心，不要怕人家反夺权，以后我要多到‘总指挥部’来支持你们。”

2 月 22 日晚，安徽省军区司令员严光、省军区第二政委宋文、省军区第三政委王文模，还有其他几位军区的领导，在省军区西小楼，接见了“八二七”和“工联会”的主要头头，“安徽省革命造反派总指挥部”的常委和各大学派往“总指挥部”的监督人员，也参加了接见。

由于反夺权的呼声越来越高，合肥造反派围绕夺权问题分成两大派，支持夺权的造反派就称“126 夺权”好极了，反夺权的造反派就喊“126 夺权”好个屁，于是有了安徽的“G”派和“P”派。在这种形势下，严光就反夺权的问题说：“形势大好，不能悲观，这点要肯定。暗礁不算什么，要没有人反对才是奇怪的，有人反对才不奇怪，中央点头了，还会有人找借口反对你们。自己胆量要大，理直气壮，方向正确，执行了毛主席的路线。右派大联合啦，‘六五’兵团不承认，这是周总理的指示，不能联合它。其他联合了，主力军是好的，不能含糊，不能动摇，推翻不了。‘八二七’站得早，工人是主力，大方向正确，没有错。省委的权该夺，早已瘫痪了，早垮台了。夺了是好的，尽管仓促，夺了比不夺好。夺权后长了左派的气势，总形势是好的，真是如此，他们攻不倒。”

“当前关键是‘三结合’，争取中央早日批准，不管问题怎样，只要不是‘三反’分子，就可以结合。从革命角度考虑，不要从个人利益出发。要团结大多数，大联合大团结嘛！你们没有吸收他们（指原来保守组织成员），他们就成立组织，你不承认

他就造反嘛。我们要团结他们，特别是学生，大学有九个、中学有三十几个。‘八二七’要发展，否则人家（指反夺权组织）就会把他们争取走。”

## 第 545 回："三一五"，合肥游行大冲突　浙江省，下文件决定军管

但是，中央对安徽的夺权迟迟没有表态，反夺权的呼声越来越高，参与的组织也越来越大。"八二七兵团"内部，对夺权持有不同意见的人，也成立了"八二七革命到底联络站"。认为"八二七"成了新老保，保"126 夺权"，保旧省委的老头子，革命没有进行到底。他们要将革命进行到底，所以，在"八二七"的名称下加了"到底"二字。"工联会"也开始分化，从中分出了"新一司"、"新三司"等。所以"安徽省革命造反派总指挥部"认为，当务之急是尽快搞好"三结合"，争取中央早日承认。同时决定由"总指挥部"组织代表团，向中央直接汇报夺权情况。经与省军区商量，这个代表团先由 4 人组成：省军区的政治部主任彭胜标、"总指挥部"的王中、曹再风、李胜利。王中和李胜利先行出发。因为"总指挥部"的保密电话已不能和中央办公厅直通，必须派人联络。王中在历史上曾与康生夫人曹轶殴共过事，与康生也比较熟。想通过这层关系与中央直接发生关系，并希望中央早日安排接见，承认安徽的夺权。

王中和李胜利于 2 月 24 日到北京。王中很快见到康生，并向他简单汇报了情况。康生告诉王中："由于事先没有通知中央，你们既然来了，等我们安排一下。"

接着，彭胜标二人也分别到了北京。

3 月 4 日，康生正式接见安徽彭胜标他们四人。康生在听取汇报后，表明他对安徽的问题过去没有直接过问，听说安徽的情况还是不

错的。要他们通知家里，即“总指挥部”，尽快搞个“三结合”的方案，再多来几个领导，最好严光也来一下，一起谈谈革命委员会领导班子人事安排问题，并表示安徽夺权问题不大。

3 月 6 日左右，安徽省军区司令员严光代表“总指挥部”，率省委书记处书记兼秘书长任质斌、省人委办公厅主任胡向农、省体委副主任张泰升和省直机关几个一般干部，又加派了群众代表李文安、刘光裕、蒋云章共 10 余人前往北京。

3 月 8 日，康生、王力、关锋接见了严光和彭胜标。康生等人再一次表示，中央很快批准安徽的夺权。但谈到革命委员会人事安排时，严光提到李葆华如果不是刘邓线上的人，是否可以考虑结合？这个问题引起康生等人的警觉，但康生等人依然认为安徽问题不大。

3 月 10 日，安徽赴京代表团催“总指挥部”上报“三结合”的名单，“总指挥部”在稻香楼小礼堂召开了由造反派头头和部分机关干部参加的座谈会。

在这次会议上，梁守福报告了准备上报中央的“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班子组成。“总指挥部”的意见是：严光任革委会主任；任质斌任革委会第一副主任；王中、黄岩、王光宇、张泰升为革委会副主任。常委会共 15 人。领导干部中重点介绍了王中、任质斌、张祚荫、黄岩、王光宇。

与会人员认为，结合的省级干部太多，梁守福解释说：“我们给中央多报两个，留有选择的余地。”

还有人提出，“八二七兵团”在副主任名单里一个没有不合适。

梁守福解释说："现在工人是主力军，学生以后都要参加分配，重要职务占多了，会给以后带来麻烦。反正中央作最后审查，比例不合适，代表团再作调整。"

有人提出："既然工人是主力军，为什么在给中央的报告中没有一个工人副主任？"

梁守福的解释是："工人是主力军，不等于工人都去当副主任，革命委员会是临时的权力机构，以后怎么搞，谁也不知道。再说，如果工人都脱产做领导，还有个政策问题。所以，在主要领导岗位上既无工人也无学生。在我们的报告中，总指挥部还是代表造反派联合组织，对革委会进行监督的机构，保留了群众对权力机关的直接监督权。"

最后，他还强调说："这是'总指挥部'上报中央的意见，我们事先也不知道中央是什么精神，不行再重来。我们现在两条腿走路，双管齐下。一面上报，因为中央要的急；一面让干部继续'亮相'。这次去北京的，还有胡向农和一般干部若干人，让中央挑选。"

3 月 11 日，周总理办公室的余庭杰前往代表团，通知严光等人要家里做好庆祝成立革委会的准备。《红旗》杂志社也派人约稿，并协商祝贺的文章。《人民日报》社也派了人。这时安徽的各夺权组织，都沉浸在一片欢乐之中；军队也准备庆祝游行；大、中、小学的"八二七"开始排练庆祝活动的各种队形和字形。

这天，安徽省军区对省公安厅实行军事管制，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安徽省公安厅军代表办公室"，行使省公安厅职权。

3 月 13 日，周恩来在军以上干部会上介绍全国形势时提到“准备实行革命的三结合夺权”的省市中就有安徽省。严光、彭胜标都参加了这次会议。回来高兴地告诉李胜利，要李胜利赶快通知家里，加快各种庆祝活动的准备工作。

历史的辩证法就是无情，俗话说，“乐极生悲”，正当安徽“G”派兴高采烈地准备庆祝活动时，安徽发生了“315 事件”。

3 月 14 日中午，“P”派反夺权组织“新一司”的造反派头头邵丙炎找到梁守福，说他们准备 15 日上午在市体育场召开“声讨反革命两面派陶铸”的大会。梁守福表示同意，并问他们邀请不邀请“八二七”的代表发言，邵丙炎说：“没安排。”

当“总指挥部”的其他成员知道这件事后，都有不同看法，特别是侯建新，他认为：“我们同意他们开会，就等于给他们搭台子让他们骂我们。他们批判陶铸是假，反夺权是真。”

梁守福说：“那怎么办？我已经答应过了，收也收不回来。”

侯建新坚持不同意让“P”派开这个大会。于是，下午 15 时左右，“总指挥部”在合肥的常委召开一个紧急会议，讨论怎样阻止“P”派 15 日会议问题。大家认为，以“总指挥部”的名义发个紧急通告，内容是要求各群众组织要“抓革命，促生产”，不得停产开大会，没有“总指挥部”的同意，不得举行大规模游行示威等内容。

梁守福根据大家发言归纳整理好了通告。怎样让全市都知道呢？梁守福提出：“是不是请合肥警备区出面，用宣传车直接在主要干道上广播？”大家觉得很好。于是，这个通告由时任合肥市武装部政委

的时吉欣站在广播车上直接在合肥的大街上巡回广播。

15 日凌晨 4 时，梁守福怎么也睡不着觉，他要调查组派几个人去合肥体育场察看看会场布置了没有。大约 5 点钟，调查组的人回来报告：没有布置会场，体育场连一个人也没有。梁守福一听，心中暗叫“不好！‘P’派可能会上大街游行抗议。”他赶紧通知侯建新，于早晨 6 点钟，在省军区召开“八二七”纵队长以上干部会议，要求各高校的“八二七”不准结队上街；不准与“P”派的队伍发生冲突。

6 点半左右，参加会议的人基本到齐，梁守福把上述要求作为“总指挥部”的命令发出，并要求会后，各高校立即用广播站发出通知。8 点钟之前，各高校务必做好工作。

但是，上午 9 时许，安徽医学院和工大的部分“八二七”在四牌楼还是与“P”派的游行队伍发生了大冲突，烧了对方的旗帜，还有很多人受伤。当天下午，《红旗》杂志社的记者童金朗拿着现场拍摄的照片找到梁守福。

第二天，3 月 16 日，康生、王力、关锋等人接见安徽代表，并紧急通知安徽“P”派的代表前来参加接见，其中包括程明远等人。在会上，康生等人对“315 事件”进行了严厉地批评。批评合肥市武装部政委时吉欣 2 月 24 日的一次讲话，说“时吉欣他有什么资格代表中国人民解放军？”时吉欣因康生的这一句话而在安徽声名远扬。

康生向安徽代表宣布说：

“一、向同志们宣布，从现在起任何地方，任何省份，任何地、县要到北京来捕人，一定要经中央公安部，中央文革小组的批准，任

何人，任何组织不得在北京擅自捕人，你们已经没有经过一定手续在北京捕人的过去就不咎了，以后不经过公安部、中央文革批准擅自捕人的要依法惩办。

二、取消对程明远的通缉令，如果他有错误，有罪过可以向中央报告，但你们自己不能擅自下通缉令，过去下的通缉令应当取消。

三、在合肥的现在夺权的一派的同志要求你们通知家里，通知合肥，不准再乱捕人，允许大家辩论，不许对持不同意见的实行镇压逮捕，已逮捕的一般应当立即释放。

四、任何一方不准武斗，赞成1.26也好，反对1.26也好，不准武斗，不准挑动武斗，不准用标语，报纸挑动武斗。

五、中央在调查安徽的问题，希望你们不管哪一派，不能随便去制造谣言，不然中央解决你们的问题将更慢、更迟缓。

15日你们就打伤了几十个人，中央正在解决你们的问题，你们夺了权的一方更应该允许不同的意见么，”

关锋：“可以到北京来谈么。”

康生：“在北京能谈，在合肥就不能谈么？不能开会解决么？是帮助中央解决你们问题还是制造困难呢？因此希望同志们冷静地从大的方向解决问题，不要宗派主义，不要违抗中央精神，不要违反毛泽东思想，要解决你们的问题，团结起来，把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里夺权搞得更好。把李葆华一小撮的问题揭开，掌握中央政策。

夺权正确的有两种夺权，一种是夺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

权，一种是夺自己头脑中的权，这一点谁都要做，要修正错误。”

安徽的“315事件”让中央对安徽的看法发生了变化。

鉴于浙江武斗不断，社会动乱的情况，3 月 15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发出关于成立浙江省军事管制委员会的决定，由驻浙江部队负责人组成。龙潜任主任，阮贤榜、曹思明、南萍、陈励耘任副主任。地方各级军管会相应由军分区、人民武装部负责人组成。《决定》指出：“各级军管会成立后，努力平息武斗，恢复生产，疏通运输渠道，安排人民生活，在动乱的环境下起到控制局面的作用。”

3 月 17 日下午，浙江省军区参谋长董毓湘、副参谋长李长生召集在支左联络站的司令部几位处长开会，确定抓捕人员名单，并由司令部部党委报告省军区党委审批。

省军区党委会由龙潜主持召开，司令员张秀龙，副司令员阮贤榜、刘亨云，参谋长董毓湘等人参加。浙江省军区党委集体研究确定后，副司令员刘亨云在名单上签了字，张秀龙点名要抓赵其华。抓人的报告经南京军区副司令员钱钧签字批准。

3 月 19 日晚上 21 时多，董毓湘、李长生召集机关处长 5 人，机关干部 7 人到司令部二号会议室开会。董毓湘说：“抓人的事到时候了！我们也要实行军管了。”“要抓的人要统一口径，对外说请人，不能说抓人，派武装说是为了安全。人抓来后放在金沙港，对外绝对保密。”先抓浙江大学的总指挥凌坚、王兆圣，再抓赵其华、方德泉，最后抓李菊麟、何保定。

会后，董毓湘、李长生亲自指挥，兵分两路于当晚 24 时前将方

德泉等 8 人抓到金沙港营房禁闭关押，进行审讯。主要了解有否参与冲军区？幕后策划人是否曹祥仁？对外统一说是帮助迅速揭开省委阶级斗争盖子。

审问搞了 4 天。然后将方德泉送省公安厅。

3 月 20 日，张永生、李长征等造反派头头听到省军区抓人的消息后，找到省军区当面责问为什么抓人？龙潜、阮贤榜矢口否认，说："不知道"。

抓人的事后来受到了南京军区的批评，省军区只好退回交待材料，向被抓的人赔礼道歉。

3 月 23 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浙江省军事管制委员会正式成立，省军区政委龙潜任主任，省军区副司令员阮贤榜、舟嵊要塞区政委曹思明、二十军政委南萍、空五军政委陈励耘任副主任。军管会内部在"支左"问题上一直存在两种不同意见。以南萍、陈励耘为首的二十军、空五军坚决支持"省联总"，而以龙潜为首的浙江省军区则比较支持"红暴派"。由于省军管会内部在"支左"的问题上意见相左，步调各异。南萍、陈励耘认为：省军管会主要领导和省军区在搞"二月逆流"。当天，一些群众到军管会驻地大院静坐示威，要军管会改变工作路线。

## 第546回：五羊城，也开始“三月□反”　下决心，广东省宣布军管

3月1 日，广州军区终于对“省革联”一派的“八一战斗兵团”下手了。凌晨4时，广州警备司令部的部队在公安机关和民兵配合下，以突然的行动，按预定计划，一举捣毁了“八一战斗兵团”广州地区总部及下属各分部，并宣布“八一战斗兵团”为反革命组织。原计划拘捕130名首要分子，实际拘捕243名，其中有些是其他组织抓来，或自动投案的。该组织7名常委中，有5人被捕。

取缔“八一战斗兵团”，除了因为它参与了一系列冲击军区的行动外，主要是依据去年12月3日军委转发毛泽东、林彪同意“南京军区党委12月1日紧急请示中的三条意见”，其中第一条指出：“一切转业、复员军人不准成立红卫军或其他名义的单独组织，只参加所在单位的文化革命组织。”而“八一战斗兵团”既违反了不准成立跨行业组织的规定，也违反了不准转业、复员军人成立组织的规定，加上内部还有假的转业、复员军人，三罪并罚，绝不留情。

取缔“八一战斗兵团”的方式，与建国初期的镇反运动相类似，按广州铁路公安处广州分处的一份文件规定：

凡大队正副队长、正副教导员、联络员以上骨干，罪恶民愤较大的，中央关于加强公安工作六条第四条里所列的各种分子，参加后又有破坏活动虽不是大队长以上骨干，但有严重罪恶的，

都要依法惩办。

凡中队正副队长、正副指导员、联络员及独立单位骨干，虽非骨干，但有一般罪恶行为的，中央关于加强公安工作六条第四条里所列各种人。这些人要向当地公安所或本单位保卫科履行登记手续，并公开检讨，声明退出反动组织，接受群众批判。

一般成员不履行登记手续，但要向所属单位或街道以大字报等形式，公开声明退出反动组织，即不予追究。

在取缔“八一战斗兵团”的同时，军区出动了大量的宣传车，沿街广播，并派直升飞机在广州市上空散发印有“八一战斗兵团”《十大罪状》的传单。

3 月初，作为广东“省革联”核心之一的“省联站”，亦宣布解散。 从此以后，“省革联”在广州的一切公开场合消失了。但“省革联”问题，却远远没有真正解决。

3月2日下午，广州19所中学的“主义兵”在八一中学开会，决定先砸反对广州军区的中山大学“红旗”、珠影“东方红”，再砸五中、六中的对立面组织。他们宣布了行动纪律：一切缴获要归公；不拿私人财物；讲文斗不讲武斗；作好打的准备。

广州军区指示：“想尽一切办法不要他们去。要现场劝解，要他们按《十六条》和《军委八条》办事。不能砸，要破私立公，搞大联合。万一去了，也只能是辩论，谁违犯纪律就制裁谁。”

但这些“主义兵”对前来劝阻的空军支左联络员说：“我们决心都下了，谁说也不能改变。我们已开过会了，人都通知啦。

珠影太坏了，我们抄这一次，珠影就垮台了，以后就不抄了。”

3月3日，“主义兵”还是砸了反对广州军区的珠影“东方红”。广州警备司令部前去他们集中的六中劝告，但是，未在六中集中的100多名“主义兵”仍然去了珠影，抄了家，抓了3个人，后放回。

当天，“主义兵”500来人还去了中大“红旗”，有100多人冲进院内，中大女学生手挽手，筑了几道人墙，还有400多人被堵在外面，未冲进去。已进去的，砸了中大“红旗”的牌子，并烧掉了，至中午散去。前去制止的部队等人群散去后才撤回。

此时广州市的经济情况已经相当的紧张，市库存粮食只有1.64亿斤，2月份要销售0.7亿至0.75亿斤，库存粮食至多可供应到3月底。1月至6月，粮食缺口达2.5亿斤，需要省粮食厅调拨。第一季度市粮食局向省粮食厅请调粮食2亿斤，只批给1亿斤。而广州市居民手中的粮票，多达0.6亿斤，一旦发生抢购，后果不堪设想。煤也是一个大问题，目前市民用煤存量只有25万吨，月用量4万吨，只能供应到7月底。1966年广州市每个月进煤3万吨，现在每月只能进煤1万吨，煤的来源和运输都成问题。由于缺煤，广钢第一道工序、广东轧钢厂、红旗轧钢厂均已停止生产。

3月2日、3日，负责广州市支左任务的广州市警备司令部主持召开广州市抓革命促生产三级干部会议，有150个群众组织和市、局、公司及部分工厂企业领导干部共400多人参加，正式成立了广州市生产临时指挥部。指挥部由警司代表、群众组织代表

和部分领导干部组成。这是领导全市生产的权力机构。

3月3日，广州市警备司令部宣布对广州市公安局实行军管。

市公安局宣布军管一小时后，“省革联”驻公安局监督小组即交出了小组的印章。几名“省革联”驻公安局监督小组成员向驻公安局军代表低头认错。军代表提出四点意见：一、你们自己来，我们抱着欢迎的态度；二、你们在公安局所作所为，要很好交代，要承认错误；三、在公安局拿走的东西要送回；四、军管小组随叫随到，不得违抗。

3 月 3 日至 6 日，广州军区还陆续对市电信局、航运局、黄埔港务局、中国远洋公司广州分公司、广州发电厂实行军管。

与此同时，广州军区的“毛泽东思想宣传员”，纷纷奔赴各单位，演说、宣讲、做报告，批判“省革联”是“右派夺权”、“假夺权，真保皇”。

3 月 4 日清晨 4 时，广州市警备司令部出动了一个排，公安派了 15 名干警，重型机器厂、麻袋厂、橡胶等几个厂的民兵 800 多人，包围了珠影“东方红”。据警司的报告：“行动迅速，没有发生事故，民兵动作好，天冷衣服少，也坚持二、三步一岗。”珠影“东方红”的 3 名头头当场被捕。上午 6 时开全厂大会，宣读布告：“一、勒令‘珠影东方红’及其所属组织立即解散，停止一切活动，不得改头换面，名亡实存。二、对一小撮首恶分子，逮捕法办。三、所抢劫的国家机密文件、档案材料，必须立即全部交给本司令部处理，不得销毁或转移。所劫的一切财物，必须

立即如数退还原单位。违者，从严处理。四、对受蒙蔽的一般成员，概不追究。”

散会后，广州市警备司令部把被捕的人带走，民兵、部队撤回，行动在 7 时 30 分结束。

3 月 4 日这天，广东省电台的高音喇叭不停地宣读布告：“勒令反动组织‘东方红’、‘红色广播兵’所有成员，下午三点到礼堂开会，不得有误，如有违抗，后果自负！”当天下午，全台召开了“揭发控诉反动组织东方红、红色广播兵及其首恶分子罪行大会”。这两个组织的 5 名成员被拘留。

与此同时，广州地区各大专院校群众组织，均奉命开展整顿思想、整顿作风、整顿组织的整风工作。截止到 3 月 4 日，广州“一司”、“三司”、华农“东方红公社”、外语学院“东方红红卫兵总部”、中山医“东方红公社”、华工“红旗公社”、中医学院“三〇一大队”、广东艺专学校“东方红公社”、中南林学院“东方红公社”、广医“红旗”、广工“红卫兵”、广州体院“革命造反总部”，先后开始整风。

整风的办法，通常是先用一周或半月时间，进行动员和学习文件，然后大鸣大放，揭发问题，检查整改步骤，进行整风。

3月5日，广医“红旗”召开全体队员会议，负责人公开检讨，承认反对军区的错误，“向毛主席请罪”。解放军联络员在会上发言。广医“红旗”无话可说，随即派代表到军区请罪。

3 月 5 日上午 9 时，中山大学武装部召开中大师生员工群众

2000 千多人大会。会上宣读警司对“中大红旗”、“八三一”实行打击的命令，广州市警备司令部派出两个连全副武装的部队，进驻中山大学，驻扎在教学大楼。

广州市警备司令部当天颁布命令，历数“中大红旗”“一再违抗中共中央的指示，转移斗争的大方向，把矛头指向无产阶级革命派，袭击革命群众组织，围攻革命群众，任意打人抄家，大搞非法武斗，实行白色恐怖；多次冲击军事机关和已经实行军事管制的广东、广州人民广播电台，恶毒地攻击人民解放军，狂妄地叫嚣‘要夺军权’……”等罪名。同时勒令“中大红旗”的 5 名头头，“自命令宣布之日起，限 5 天内，将本人和‘八三一战斗团’所窃取、窝藏的国家机密文件、档案材料和烈性毒药全部交还，不得抵赖拖延、转移、销毁。并全部退还所抢劫、占用的一切公共财物，不得有任何损坏，对所进行的非法活动，必须彻底坦白交代，以实际行动改正错误，争取将功赎罪。违者，从严处理。”

但“八三一”并没有解散。黄意坚、陈家吉在北京接到广州电话，得知军队开始取缔造反派组织了，在广州的“八三一”头头武传斌也做好坐监的准备了。“八三一”等不及黄意坚回来，便召开全体会议，决定由黄意坚担任“八三一”的勤务组组长，接替武传斌为总指挥。

黄意坚从北京赶回广州后，立即着手整顿组织。军队的镇压并没有扼制学生造反的势头，“八三一”在广州市警备司令部的

《三五命令》之前只有 60 多人，《三五命令》之后，“八三一”召集人员，重新登记，竟有 200 多人。很多以前只是参加“八三一”活动，但并没有正式参加“八三一”的，现在反而都正式加入了。

3 月 6 日，广州“一司”忽然宣布开除广医“红旗”，并在社会上散发传单。其公布的开除原因是：广医“红旗”在四大问题上“犯了严重错误”：

一、2 月 7 日广医“红旗”自己带队伍冲电台；

二、因为广医“红旗”本身是“省革联”主要成员，公安局 1 月 25 日因反夺权问题，引起武斗，广医“红旗”等把公安局一总部几千名民警打成反革命，把反夺权定为反革命暴动。

三、2 月 8 日广医“红旗”自己带队伍与“省革联”其他组织冲军区。

四、“省革联”的夺权没有实行三结合、大联合，只有几个学生组织参加，把广大革命群众排挤在外，同时夺权后把矛头向广大革命群众，广医“红旗”参与了这些行动，仍不承认错误。

“一司”召开下属各单位头头会议，有 23 个组织参加，21 个组织同意开除，艺专“东方红”和市一卫校两个组织反对。这件事又引起了轩然大波，成了广州“一司”分裂的先兆。

3月7日，广州“一司”、“三司”中学部等单位发起在中山纪念堂召开有5000人参加的大会，表示支持解放军。会上有12个群众组织代表发言，七中“红旗”等四个单位代表则“向毛主席请

罪”，并声明过去他们所攻击军队的传单、漫画、标语等，一律作废。大会通过对人民解放军的支持信，会后群众上街游行，队伍高呼口号：支持解放军的一切革命行动。大会通过对人民解放军的支持信，会后群众上街游行，队伍高呼口号：支持解放军的一切革命行动。

中学开展军训，准备开学。3 月 10 日，在省体育场召开有几万师生员工参加的“中学复课闹革命的誓师大会”。市十二中、二十二中、三十四中、省实验学校、铁中等校的学生，纷纷回校报到，参加军训。后来康生在接见广州军区负责人时说：“军训有四大成绩。第一是把学生集合起来了。军训以前，一个学校十几个人，二十几个人。军训以后，学生回校达到 95％。第二是组织学生学习了毛主席著作。第三是左派发展了。第四是在有的学校促成了大联合，成立了革命委员会。所以，军训的成绩是主要的。”但实施军训的困难仍然很大，经过近一年的动乱，许多创伤，不是马上能够愈合的。

4 月份广州要举行一年一度的春季出口商品交易会。中央指示一定要确保交易会如期正常地进行。交易会的准备工作，在 3 月中旬便开始了。3 月 10 日，军队代表进广交会馆作动员，要求在交易会内部，“暂停四大，坚持天天读（毛主席著作），搞阵地快报，表扬好人好事”，把政治气氛搞得浓浓的，让广大革命群众行动起来，“以战斗的姿态奋战 10 昼夜”，做好准备工作。

3 月 10 日，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给广州军区党委、广东军

区党委起草了一份电报稿，指出："中央决定，广东省军事管制委员会改为十五人，黄永胜任主任。军管会下，可设立两个班子，一个抓革命，可名为革命委员会或支左委员会，领导全省文化大革命；另一个促生产，可名为生产委员会，把农业、公交、财贸、卫生等都管起来。"

毛泽东当天即圈阅同意了这份电报，并于即日发出。

3 月 11 日，广州"一司"对他们曾在电台围攻军管小组，公开表示认错，声明称："对于受我们攻击过的电台新领导黄业同志及其他解放军同志，我们诚恳地表示向他们赔礼道歉。其外，驻电台小组在撤离电台时，为了掩饰我们一司参加电台'一二二'夺权所犯的方向、路线错误而印发的《一二二电台的夺权是革命行动》的传单，观点同样是不正确的，在此，也一并声明作废。"

作为广州地区最大的工人组织，"地总"也于 3 月 10 日发出"当务之急——开门整风"的号召。总部以及所属分区、分部，开展整顿思想、整顿作风、整顿组织的全面整风运动，"整掉队伍内不自觉地滋长出来的本位主义，小团体主义，分散主义，非组织观点，极端民主化，主观主义等不良思想作风，根据毛主席的'抓革命，促生产'的精神，对总部进行精简机构，调整人员，纯洁组织"。

"地总"是和军区关系较好的群众组织之一。由于"省革联"群众组织急剧分化，拥有 15 万工人和 1028 个分部的"地总"，幸灾乐祸地唱着"3 月东风浩荡"的高调，兴高采烈地把 3 月称

作“东风浩荡的三月，成绩辉煌的三月”。

3 月 12 日，《南方日报》转载了《新北大》广州版文章《把颠倒了的历史再颠倒过来》，对“省革联”发动口诛笔伐。两天后，《广州日报》也转载了这篇文章。

文章见报后，《南方日报》和《广州日报》继续推波助澜，掀起声讨“省革联”的高潮。“省革联”也不甘示弱，虽然在广州军区表态后，他们分化瓦解成一批小山头，但仍然同舟互济，竭力反击。双方又是张贴大字报，又是编印小报，又是散发传单，又是开宣传车上街，闹得不亦乐乎。广州市依然充满着剑拔弩张、一触即发的空气。

3月15日，广州军区按照中央的指示，正式宣布对广东全省实行军事管制。以广州军区司令员黄永胜为主任，广州军区第二政委刘兴元、广东省军区第二政委陈德为副主任的广东省军事管制委员会，自即日起，成为广东省最高权力机关。

当天下午15时，广州市隆重召开有部队、群众组织、干部代表5000多人参加的军事管制委员会成立大会。广州军区司令员黄永胜在大会上讲话，他公开批评“省革联”说：“省、市人委的领导机构陷于瘫痪，广东地区阶级斗争的盖子揭得较晚，革命左派还需要在斗争中成长和联合起来；革命的领导干部还没有真正站出来。在这种情况下，省委就把一个省的大权轻率地让给了‘省革联’的一小撮人，而‘省革联’在接权以后，又唯我独‘左’，排斥革命左派和人民解放军，抵制革命的‘三结合’的正确方针。

这不仅妨碍了文化大革命的胜利进行，而且也对生产带来了不利的影响。”

广州市也成立军管会，以广东省军区司令员黄荣海为主任，广东省军区副司令员江贤玉、广州警备区司令员阳震、广州警备区政委罗兴洲为副主任，接管中共广州市委。向各级党政机关、企业、事业单位，陆续派驻部队或军代表，执行支左、支农、支工、军训、军管任务。

全广州一片沸腾，“毛主席万岁！”“向解放军学习、致敬！”“热烈祝贺省、市军管会成立！”的口号声，响彻全城。拥护和支持省、市军管会成立的大幅标语，铺天盖地，贴满街头。各群众组织举行五花八门的庆祝活动，到军事机关、省、市军管会报喜的队伍，络绎不绝，仅当天晚上，就有21万人到省军管会报喜。

刚好在广州访问的新西兰共产党总书记威尔科克斯也兴致勃勃地出来接见报喜的群众。

当军管会的布告贴满大街小巷以后，曾搅得天翻地覆的广州夺权风暴逐渐平稳了下来。

## 第 547 回：有信心，毛泽东不怕混乱　戚本禹，动员范正美让位

3 月初，周恩来根据毛泽东关于革委会审批程序的批示，指示北京卫戍区起草了一个关于对厂矿企业实行军事管制的布告。布告草稿写道：北京卫戍司令部奉国务院、中央军委命令，对厂矿实行军事管制，以促进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筹备组成“三结合”的领导机构，搞好本单位的文化大革命和生产工作。“厂矿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生产和业务工作，在军事管制委员会的领导下进行。”“厂矿全体人员，必须坚守岗位，积极生产，努力工作，遵守劳动纪律，服从上级指挥。建立革命秩序，严格出入制度。”“各单位工人群众之间，工人群众组织之间，在本单位或本市内进行革命串连，交流文化革命经验，必须在业余时间进行。任何革命组织联合厂矿外革命组织召开大会，必须经过军事管制委员会批准。”“厂矿一切外出长期不归的人员，限一个月内回到本单位，如在规定时间内仍不回厂矿者，给予必要的纪律处分，直至开除。”

这一布告本来是只限于北京地区的厂矿企业，因为是北京卫戍司令部执行的。3 月 14 日，周恩来在审阅此布告时，将“奉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命令”改为“根据毛主席的指示”。

次日，周恩来将此布告送毛泽东批阅。并注明：“这一文件经北京卫戍区起草，并在今晚钓鱼台碰头会上修改通过。现送上请予审阅，并请主席批准。在批准后，并拟发全国参考。”

3 月 16 日，毛泽东在周恩来的送审报告上批示：“照办。”

当天，周恩来亲自草拟了以中共中央名义向全国转发这一布告的批语：“各级党委，各军区、军分区党委，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现将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卫戍司令部起草并经中央批准的对需要实行军事管制的厂矿的布告，转发你们参照执行。”

3 月 16 日，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印发《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人自首变节材料》及批示。材料由“彭真专案组”写成。中共中央的批示说：“薄一波等人自首叛变出狱是刘少奇策划和决定，张闻天同意，背着毛主席干的。”“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人本来就企图叛党保命，刘少奇的这个决定，就成为他们自首叛党的合法根据。”批示还引用了毛泽东 1 月 31 日在别处的一段批语：“党政军民学、工厂、农村、商业内部，都混入了少数反革命分子，右派分子，变节分子。此次运动中这些人大部自己跳出来，是大好事。应由革命群众认真查明，彻底批判，然后分别轻重，酌情处理。”

3月16日，康生同陈伯达、王力一起到毛泽东处请示《毛泽东选集》要不要修改问题，林彪也在。毛泽东说：

一、注释不要修改，名字一个不要去掉。彭德怀，过去名字印在上边，没有什么了不起。这些都是历史嘛。没有司马懿、司马师、司马昭，何以成为《晋史》？

注释要修改，要花费很多时间，还是照原来的印，还是原来

的版本。

二、《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写得不好，可以不收。

三、《整顿党的作风》中引用刘少奇的一段话，没有必要，可以删去。

四、新印《毛选》仍用原来日期。

五、《毛选》五六两卷一年以后再说，现在你们没有时间，我也没有时间。

六、《语录》第二百0八页引用刘少奇的一段也删去；另二百0四页标题“思想意识修养”改为“纠正错误思想”。

谈到军管会时，毛泽东说：“军管会，不同于 1949 年，那时什么都管，政权、工厂、学校。那时把国民党的人，都留下来了。现在，群众起来了。工厂干部百分之九十是好的，也有了一些管理工业的经验，坏的只有百分之几。工厂里留下的，混进的一些坏人，要整掉。解放后入党的，也混进一些坏人。”

谈到夺权问题时，毛泽东说：“大局还没有定哩！”“要写一个通知，各地夺权要事先同中央商量。否则，不能成立。”“大企业的工人最多，最重要，不要急于夺权。急于夺权的人有问题。别人要夺让他夺，好就支持，不好再夺回来。不好的，反正中央不承认。”

谈到对外宣传工作时，毛泽东说：“对外宣传是有问题，只注重形式，不注意内容。”

这天，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各省市自治区报纸宣传问题的几

项规定》，规定报社接受各省市自治区临时权力机构或军管会的领导，参照“两报一刊”的重要社论和评论进行宣传，一律不许刊载戴高帽子、挂黑牌子、罚跪、开斗争会等图片，不许使用谩骂语言，国际问题的发言权集中于中央，不能发表攻击人民解放军的文章和报道等。

3 月 17 日，中央再次发布通知：“各省、市、自治区一级的夺权，在采取行动之前，应事先取得中央同意派代表来京同中央商量。没有经过中央同意，不要成立临时权力机构（革命委员会），不要在地方报纸上报导和广播电台上广播夺权。”

当天，周恩来在给李富春、李先念、余秋里、谷牧并叶剑英的信中说：“主席指示，继国防工业军管之后可对工交财贸各部，凡瘫痪陷入无政府状况者，也可实行军管。”

尽管各地在夺权过程中都出现了混乱和分裂等种种问题，毛泽东对事态的整体发展仍然充满信心，他认为这些现象都是大革命过程中难免的，只要采取适当措施并不难解决。他对护士长吴旭君说：“你总说乱。你没有看到最根本的一条：这个运动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革命，不要怕。我考虑发动群众，我把批判的武器交给群众，让群众在运动中受到教育，锻炼他们的本领。我想用这个办法试一试，我也准备它失败。现在看来，群众是发动起来了，我很高兴，他们是同意我的做法的。”“跟随我南征北战的老同志，我没有忘记他们对党对人民的贡献。周总理跟我讲哪些人有困难，我都让周总理去保他们。”

自全国掀起反击“二月逆流”的风暴后，黑龙江的潘复生、汪家道等人认为，制造哈尔滨“131事件”的哈工大刘录等人就是“二月逆流”在哈尔滨的具体反映。

但是，范正美等造反派认为，哈工大刘录等人虽然反对黑龙江的“131 夺权”，但毕竟还是夺权斗争中对形势、对干部的看法不同而出现的意见分歧，应该通过造反派内部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加以解决。因此，在处理哈工大刘录等人的问题上，造反派范正美和老干部潘复生发生了分歧。

一天，在哈尔滨市北方大厦广场召开的“黑龙江省暨哈尔滨市反击‘二月逆流’大会”上，当工大“新曙光造反团”代表联系黑龙江省实际，把工大“造反团”刘录等人说成“二月逆流”黑干将，是地地道道的反革命时，有人呼喊口号，提出应该把刘录等人抓起来送进监狱，这时从台下便蹿出事先准备好的公安干警若干人，立即将刘录等人抓到会场进行批斗。会后，将刘录等十几人送进了监狱。潘复生还派人到哈工大宣布哈工大“造反团”是“右派组织”，“予以解散”。

潘复生几次在黑龙江革委会上谈到他接到周恩来总理的电话，说周总理对黑龙江省的革命生产十分关切。到 3 月初，潘复生在一次革委会上又郑重地说：“周总理非常关心我们黑龙江的工作，他昨天晚上给我打来电话，要求我们黑龙江省革委会组织汇报团到北京汇报工作。”

根据潘复生的传达，黑龙江省革委会马上组织汇报团，准备

向中央汇报的内容。

“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汇报团”由 26 人组成，工人代表 5 人，农民代表 3 人，解放军代表 4 人，学生代表 5 人，革命领导干部代表 2 人，商业服务系统代表 2 人，文教方面代表 2 人，机关干部代表 3 人。其中中共党员 17 人(包括预备党员 3 人)，非党员 1 名，其余为共青团员。

关于汇报的内容和分工，范正美作了这样的安排：全省夺权情况由哈尔滨石油配件厂业余教员刘雪峰负责；三结合与干部政策由在省接管委员会工作的哈军工学生郭海负责；抓革命促生产问题由原商业厅厅长燕文卿负责；大专院校是黑龙江工学院学生聂景民；镇反情况交省军区保卫处副处长张富。此外，他还安排了关于典型汇报问题。为了进一步发展省里的形势，范正美还归纳应该请示的七大方面问题。

3 月 9 日，黑龙江的潘复生、汪家道坐飞机到达北京，当晚，周恩来、陈伯达、康生、叶剑英、徐向前、李先念、肖华、王力、关锋等中央领导接见了他们，宋任穷和陈锡联陪同。潘复生作了全面汇报。

黑龙江汇报团其他成员是乘火车 3 月 11 日到达北京的。等了几天，3 月 16 日晚饭后，接到中央文革的通知，要代表团中的全体群众代表到人民大会堂小会议室接受中央文革领导接见。当晚 23 时，只有戚本禹一人出来接见了他们。戚本禹这样开始他的谈话：

“黑龙江省革命搞得很好，很早就想向你们学习，今天请你们来谈一下。”

接着，他对着汇报团名单，一一认了一遍之后，又说：

“先听听你们的意见，近几天有什么想法?”

范正美和刘雪峰互相对视了一下，感到很突然，想不出问者用意的真谛，于是范正美反问了一句：

“戚本禹同志，您想了解我们哪方面情况?”

戚本禹并没有直接回答他的问话，而是说：“你们的情况从报纸见到了，潘复生同志汇报我也看了，在这个基础上找你们再谈谈。”

于是，范正美开始汇报，谈了一些情况之后，戚本禹忽然问道：“你们核心经常开会谁主持?就是主席说的你们弹钢琴的班长是谁?”

大家指着范正美说：“范正美是班长，刘雪峰是副班长。”

戚本禹说：“我有个建议，你们应当让潘复生同志挂帅。他是省委书记中较好的。十一中全会上，我们在一个小组，他是坚定支持左派的，当时为左派说话的没有几个。像曹荻秋对左派就怕的要命，发牢骚。而且潘复生与刘邓路线斗争是比较坚决的。潘复生这样的人都不能当班长，不能挂帅，其他省就更成问题了。汪家道也有阶级斗争经验嘛，可以做副班长嘛。看干部不要看他是干什么的，要看他代表哪个阶级，代表什么路线，代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干部就一视同仁嘛。你们把正副班长交给他俩，我想

你们不会有意见吧？革命委员会是集体领导嘛。潘复生的意见正确就按着他的干，不能认为当班长就不是阿斗，其他委员就是阿斗，那么群众就更是阿斗了，这种说法不正确。游兴懋挑拨，你们没有上当，这很好。当班长是为人民服务的。谁来当班长，谁来弹钢琴呢?必须是有领导经验的。让潘复生来做班长，他是中央候补委员。你们可以提议给中央打报告，请中央做决定。你们说，这事他本人不好提。你们做个委员，把你们报为班长，而让潘复生做个委员，中央不好批啊。论权威，你们在群众中是有威信的，但是从全局看，特别是在干部中和军队中你们的威信是不如潘复生和汪家道。你们可以做个委员嘛。他们要向你们学习，但你们要向他们学习的恐怕就更多些。上海、山西、山东等地已经批了。上海是姚文元，山西是刘格平，山东是王效禹……这次你们来主要不是为了得到中央的正式批准和承认吗？过去中央知道黑龙江省有问题，才派潘复生去的，结果那里勾结得严严的。潘复生受到排挤。现在，潘复生和你们造了反，你们得让他真正当书记。要革命就彻底革命嘛。”说到这里，戚本禹问大家有什么意见和要求，

范正美首先表态：“完全拥护潘复生、汪家道当正副班长，我个人的安排完全听从组织和群众的安排，要我做什么就做什么，我没什么要求。”

接着，刘雪峰也作了同样的表示。既然是中央文革说话了，其他群众代表也没说什么，戚本禹就起身向大家告别了。

五人勤务组副班长游兴懋是哈军工“造反团”的负责人之一，接合到省革委之后，经常回哈军工，同军工个别人搞潘复生同27 人大字报的联系，并且秘密地整理了一份材料，将潘复生冠以炮打文革的黑后台，准备状告党中央。尽管他们自以为谋事极机密，终归还是被军工“造反团”的一名人员通过汪家道向潘复生告发，于是潘复生找到范正美和刘雪峰等，说哈军工要游兴懋回校。按照当时革委会的做法，群众代表可以由本单位随时调回，范正美和刘雪峰当然表示同意了。游兴懋回校后，就被多次批斗。随后，汪家道将游兴懋以“反革命”之名送进了监狱。

戚本禹接见后的第二天，3 月 17 日，范正美在住所召集了汇报团全体大会，汇报了昨晚戚本禹代表中央接见群众代表的情况，传达了戚本禹的讲话。潘复生和汪家道在会上表示，他们已经知道这个精神，并表示服从中央安排，要向小将学习。范正美问潘复生应该怎么办？潘复生让范正美给家里打个电话，征求一下家里的意见。范正美给在哈尔滨主持工作的张万春打电话说：

“根据中央文革戚本禹同志的意见，我省革命委员会班长、副班长应该由潘复生、汪家道同志担任，我们来京的同志和潘、汪一起研究，完全同意戚本禹同志的意见，决定由潘、汪分别担任班长、副班长，并改称主任、副主任。委员会设 51 人，常委19 人，具体人选回家一并研究定。现征求你们的意见，上报中央批准。如无异议，可以不来电话。如有不同意见请来电话通知，建议立即召开全体委员开会。”

过了两天，潘复生、汪家道派车将范正美从住地接到京西宾馆他们的住地，与他进行了亲切的谈话，让范正美以黑龙江省革委会的名义给中央写个报告，由他们二人任省革命委员会正副主任。范正美不知道如何写，就由潘复生口述，范正美执笔，报告用标有中共中央办公厅字样的白信笺这样写道：

中央：

经研究，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同意由潘复生同志任主任，汪家道同志任副主任，

请批示。

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

范正美

1967年3月18日

## 第 548 回：在军□，肖华布置批刘、□　周恩来，见国□科委代表

3 月 17 日下午，肖华在军以上干部会议上，具体布置了在全军开展批判刘少奇的工作安排。在讲话中，他还点名批判了刘少奇和邓小平。对邓小平作了这样的批判：

“关于邓小平的问题，我再补充几点：他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学习毛主席著作。他恶毒地污蔑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崇拜是‘把个人神化’。对林总组织军队学习毛主席著作，他攻击说：‘有人搞学习毛主席著作，好像是捞资本’。‘是形式主义’、‘实用主义’、‘庸俗化’。他长期以来支持刘少奇，并和刘少奇一起制定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搞‘三自一包’，在文化大革命中镇压群众。”

“他主管中共书记处工作时，把书记处变成了一个独立王国，对毛主席实行封锁，不请示，不报告。毛主席早就批评过他，他不仅不改，反而心怀不满，变本加厉。刘在许多部门，安置了许多坏人。旧中央组织部都是被叛徒控制了的，几任部长，如饶漱石、习仲勋、安子文，都是叛徒。”

“他包庇篡军反党的野心家罗瑞卿。一九六五年十一月，毛主席在上海召开紧急会议，揭发罗瑞卿的错误。上海会议以后，去年三月又在北京召开批判罗瑞卿的中央工作小组会议。在这两次会议上，邓小平一直是包庇罗瑞卿的。上海开会，他说：‘我不知道呀，怎么一下子到这里来？开什么会议呀？我们不清楚

呀！’他在会议上像个审判官一样。上海会议以后，邓小平的老婆跑到罗瑞卿的老婆那里，相抱大哭一场。在北京斗争罗瑞卿的会议，中央决定邓小平、彭真、叶剑英组成三人小组。我和谢富治、杨成武几个人叫作工作小组，主持这个会议。会议开始以后，邓小平跑到西北去了，彭真跑到成都去了，和李井泉挂钩，去部署什么。到了会议结束的时候，要写一个结论，我们是经过仔细核对的，凡是有一点不合乎事实的，凡是不过硬的，一件一件都勾掉了，剩下来的都是证据确凿，性质严重的。可是邓小平和彭真还在包庇他，许多问题不准写，不准写罗瑞卿对四个第一的污蔑和造谣，不准写罗瑞卿和杨尚昆、杨献珍等人的关系不正常，不准写罗瑞卿向地方伸手的问题，不准写罗瑞卿恶毒诽谤毛主席的具体实例，不准写罗瑞卿作了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的应声虫和代理人。罗瑞卿回家对地主祖坟三鞠躬，也不准写，因为彭真回家也给地主祖坟三鞠躬了。”

“邓小平还包庇黑帮分子吴晗。彭真所把持的旧北京市委的那些人，都是邓小平打牌的牌友。全国公开批判吴晗已经几个月了，他还要和吴晗在养蜂夹道打牌，有点阶级立场吗？”

“邓小平在历史上也不是光彩的。在第二次国内战争时期，红七军从广西转移到江西，只剩下一千七百人，到了崇义附近，正处于敌人前后夹击，非常危机的关头，身为政委的邓小平，却擅自离开部队，临阵逃跑。在抗日战争时期，彭德怀背着毛主席，搞百团大战，邓小平是支持彭德怀的。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批判

彭德怀时，邓小平很消极。”

“邓小平根本不是一个能打仗、有战功的人，但是他拼命争地位。在《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的注释中，名字最多的是邓小平、罗瑞卿。林彪同志看到注释的时候，再三强调要少写四野，少写他的名字，要把自己的名字勾掉。本来林彪的战功最大，可是他的态度最谦虚。邓小平却极力争这个功，要突出他个人。有些注释根本不需要写邓小平，他也硬要写上。其实他在抗日战争以前的很长时间里，是在总政宣传部当干事，以后在一军团当宣传部长，根本没有打过什么仗。抗日战争时期，他所在的部队，打仗主要是刘伯承同志指挥。至于解放战争的淮海战役，从方针到每一个具体部署，都是毛主席亲自确定，亲自指挥的。还有顺便提一下，刘少奇和邓小平根本不是什么国际上的反修英雄，国际反修的所有的重大方针、政策以至重要的发言稿，都是毛主席亲自制定或亲自主持起草的，决不能把功劳挂在刘的头上……”

张春桥看了那个发言稿后，觉得把邓小平说得有点过火，问道：“肖华同志，这样写邓小平是否有点过火？”

肖华说：“只有不足，没有过火。邓小平这个人就是有点小聪明，其实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地方。你别把他看得怎么样？”

肖华讲完后，徐向前接着说：

我见缝插针讲一讲，我没稿，讲点意见供参考。肖华讲得很系统，周总理作了指示，陈伯达、康生讲得很多很好。这个会比上次大军区级会议开得好，解决问题细透。文革不搞不行，刘、

邓不打倒不行，这是非常严重的问题。他们到处安插自己的人，组织自己的势力，中央组织部、北京市水泼不进，派去的人也被人家改造了。刘少奇说，党内有斗争你们军队不要干预。军队也有斗争，罗瑞卿攻击林总，最低要气死你。军队不要组织战斗组到处冲。当然冲一下也有好处。院校主要是教员队伍，过去光搞技术不抓毛泽东思想学习，文艺团体最厉害，解放军艺院 300 多人打架打遍全国，在福州总发作，到军区不管三七二十一就是抓住戴高帽子、斗一顿，引地方组织冲军队，军队两条路线斗争是激烈的。有人说，党内斗争你们军队别插手。因为林总主持军队工作识破了他们的阴谋，安子文想插手军队，进不来，历史上王明到中央苏区是篡军的，张国焘抓了军队，高岗也想抓。支左要调查不能急，不能随便表态。有坏人把头头拘留起来，不要乱抓人，不要靠逮人吃饭，逮头目是为了孤坏人解放群众，更不要随便给某群众组织戴反革命帽子，解散群众组织更要慎重。你们过去请示要解散某个组织，说它是反革命，我们只好置之不理，理了就要犯错误。只由你们调查研究根据情况搞。要教育子女，“联动”主要是高干子女，活动猖獗，你们在抗战开始结婚的老婆有文化，大部分家庭出身是大地主中地主，过去穷人念不了书，不要让老婆拉着走，和平共居。政治上要帮助。3 月份机关四大停下来是军委研究的，主席和林总批准了。院校团、师干部还搞武斗，有坐在某派一边寻求保护的蠢人。抽干部去支左，去前要整风、要学习。

3 月 19 日，杨成武在军级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他说："我准备讲一讲彻底批判以刘、邓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彭、罗、陆、杨反党集团的罪行，以及彻底肃清他们对我军恶劣影响的问题。同时，对我军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进入了革命派大联合，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夺权斗争的新阶段中，如何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保卫国防的问题，也讲一点意见。"他还特别提到了李井泉夫妇在 65 年 12 月上海会议期间给罗瑞卿送橘子一事。

杨成武讲完后，聂荣臻说：

我没想讲，还有时间，话别人都说了，我没稿子，你们也别记，可以减轻我的负担。

他说：

刘少奇问题不是我高明，当年分二线时征求我的意见，我说此人有偏爱，主席决定了，我服从。林彪同志做接班人有伟大政治历史意义，有世界意义。军队罗瑞卿也不是他一个人，有后台，要向你们打个招呼，后台是谁呢？是贺龙。他们一唱一和，此人根本没改造好，到党内还是那一套，凶得很，讲话即骂人。

军队的同志们要谨防被黑手抓住，不然你下不了台。刘、邓抓军队就是通过贺、罗。文化大革命军队要正面教育，不搞大字报，要民主整风这是过去的传统，要了解干部正确使用干部，入越作战的要重视，越南作战飞机比朝鲜还多。我是搞装备的，搞得不好。搞装备也是有斗争过程的，前期彭德怀、黄克诚为代表，

后来是贺龙为代表，还有过其他人干扰。1959 年前只是搞仿制、装配，有人说仿造几千架即可有制空权。仿制实际上是不前进的观点，再加苏修卡我们，海空军装备研制，耽误了 2 至 5 年。1956 年毛主席就说独立自主搞自己的，要搞原子弹。彭、黄却宣传说，你打你的原子弹，我吃我的山药蛋。工业部门不支持，不相信自己可以搞出来，有人说是好高骛远脱离实际。1959 年新科委成立，1964 年原子弹成功爆炸，毛主席说感谢赫鲁晓夫，给他发勋章。我们宁可少养军队，抓了基础条件，材料、仪器、精密技术，两万多种材料，九大设备，计算机我们现在达到 100 万次/秒，比苏修的先进。赫鲁晓夫撕合同好，把我们逼上梁山。主席说要努力奋斗，敌有我有，敌无我也要有。告诉你们氢弹我们很快就有了。林总指示：两弹第一，导弹第一。我们打算今后组织爆炸试验时，织你们军师干部去看看。

3 月初，主管国防工业的聂荣臻向周恩来反映：国防科研部门由于派性斗争，工作受到严重干扰。一些群众视国家尖端机密如儿戏，胡闯乱冲。

此时，国防科研部门正加速研制氢弹，已进入最后冲刺阶段。随着夺权的开展，国防工业许多部门中的两派也打得不可开交。周恩来对聂荣臻说："我现在正在考虑对一些部委逐步实行军管。你尽快向中央写出一个报告，我来把报告转送主席。"

3 月 11 日，写出了《关于军事接管和调整改组国防科研机构的请示报告》。报告说："据了解，现在国防工业各部的研究院

和中国科学院承担国防任务的各研究所，许多单位领导瘫痪，研究工作陷于停顿，三线建设也存在许多问题。这种情况必须迅速予以改变。建议对这些单位实行军事接管，接管工作由国防科委组织进行。按照抓革命、促战备、促工作、促生产的精神，迅速恢复科研和生产工作。接管后，将遇到文化大革命中群众强烈提出的改变现行领导体制的问题，建议一面恢复生产，一面即着手将国防工业部门及中国科学院的有关国防科研机构，结合批改，通盘考虑，进行一次全面的适当的调整和改组。”报告中还提出了调整改组的五条原则。

周恩来看了这个报告，表示同意，并提议对国防口所属 6 个工业部：二机部、三机部、四机部、五机部、六机部、七机部全部实行军管。

3 月 17 日，周恩来接见国防科委及国防工办各部所属院、所、校造反派及党委委员，传达毛泽东的指示：

“主席指示：‘林彪、恩来：军队不仅要支援农业，还要支援工业。’这是指各有关单位派军队代表成立三结合临时权力机构。”

周恩来说：“一月革命我们提出了夺权斗争，夺谁的权？当时我们估计会出现连锁反应，一开始报上提出要从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及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手里夺权，后来主席将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划掉了，只夺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为了缩小打击面，扩大改过自新将功赎罪

的面，只要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而又坚持不改屡教不改的，就允许他们改过。鼓励他们将功赎罪，吕正操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但是只要他改的话，我们还要用他。实际上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他和人民的矛盾就会发生变化，他也就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我们要求你们对当权派要排队，你们没有做，至今总结不出一个经验，夺权和批判要分开，国防工办要夺文化大革命的权，业务上的监督权，各单位有没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要发动群众来揭发。”

他对已在七机部实施夺权的“九一六”组织提出了批评：“‘九一六’已走到自己的反面的边缘了，这样新的‘九一五’就要产生。”

他说：“总的来说，文化大革命以来，国防生产受到了影响，‘九一五’、‘九一六’谁对？现在我还不准备表态。”

“你们夺权是中央研究过和允许的，一个月来，看出这样做是不行的，报主席，主席指示要实行军事管制。”

周恩来和李富春、聂荣臻、叶剑英及北京卫戍区副司令商量后说：“军管派军管小组 3 人组成。造反派搞文化大革命不变，业务由军管小组负责。开大会、揪人都要请示军管小组，军管小组报中央。造反派对业务可以批评，但不能监督。最近失密很严重。你们那么大的组织千万分之一的不纯，总是会有的。像二机部提出一些要害部门就不能让你们管，你们要进行整风，当然失密外报上是不会登的。我们有别的渠道可以得知。你们只能批评，

思想上批评，各部门在军管小组和上级党委领导下搞，不能将业务分开。”

当周恩来说到“不同派别应当开门整风，大方向一致就要联合”时，会上的两派代表当时就争论起来。周恩来说：“对领导干部排个队，给他们一个检查的机会。但不要人人过关，不许揪来揪去，否则就是排斥一切，怀疑一切。”

他指示说：“国防科委军事接管。”“国防工办各部军事管制，院所军事接管问题要研究。不能将过去对的，也否定了。要历史的看问题，‘九一五’、‘九一六’要开门整风。禁止打、砸、抢、抓、抄。”

“对待长字号的要一分为二，不能搞人人过关。人人过关就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不能再抓人了，王铮（四机部部长）前些日子我让他住中南海，保护起来，现在让他出来，今后你们再抓，我就不管了。由卫戍司令部管。”

“造反派要互相信任，现在不要争权夺利。过去讲业务监督。现在改过来，连监督都没有了。林彪同志说：朝令夕改。‘九一六’走到自己反面的边缘。我已警告过了。对他们还是要帮助。因为还有许多群众。但很不纯。我们领导要负责，‘九一五’也要整风。要看你们谁搞得好。军管是过渡，不是长期的。”

# 文革史话

## 之第三部 全面内战 第五卷

刘朝驹 著

# 文革史话

之

第三部

# 全面内战

第五卷

# 目 录

第 549 回：第三次，接见内蒙古代表　批军区，调查团□往呼市.....1
第 550 回：做工作，李天佑师□解围　政治局，生活会终告结束.....11
第 551 回：发《通告》，不许炮打周总理 见安徽，武汉市取缔“工总”.....20
第 552 回：三一九，山西□委会成立　作报告，林彪再语出惊人.....28
第 553 回：□□江，□委会正式成立　见财贸，周恩来再说夺权.....36
第 554 回：抓试点，天津五代会成立　毛泽东，接见军以上干部.....47
第 555 回：三二一鄂军区再发《通告》听汇报，□、交、邮准备军管.....55
第 556 回：见大庆，北京“工代会”成立　张建旗，公开反对周恩来.....67
第 557 回：第三次，接见□海诸代表　未曾歇，又与卫生部座谈.....78
第 558 回：辩论急，是否打倒余秋□　第四次，核实□海省□□.....89
第 559 回：梁守福，检讨未能挽局□　□海翻，北京中学红代会.....98
第 560 回：三二六，恩来见新疆代表　与安徽，共协商中央决定.....107
第 561 回：皖军管，广东□反还继续　津胡、江，毛泽东批示宜宾.....118
第 562 回：反逆流，武汉“二司”开会议 说服□，江城“□、新”再联手..126
第 563 回：三二八，恩来见工口代表　提《修养》，全军文□肖华管.....133
第 564 回：三三〇，接见内蒙古□导 悲□述，对《清宫秘史》批判.....141
第 565 回：批“工总”，邕分裂愈演愈烈　滇军管，众人送回邱会作.....154
第 566 回：放□廉，乘软卧来到北京　三三一，中央查□蜀□□.....164
第 567 回：□□反，众接见福建代表　反总理，□爱晶□□多多.....177
第 568 回：专□见，四川省宜宾代表　发社论，要正确对待学生.....188
第 569 回：三次见，为宜宾刘、张平反 见永胜，林彪口述定《十条》.....201
第 570 回：□□止，山西刘、张生矛盾 迷惘中，彷徨□庆“八一五”.....212
第 571 回：四月三，接见中学红代会 轰□奇，毛泽东修改《十条》.....219
第 572 回：四月四，中学生继续座谈 递条子，同意批斗王光美.....230
第 573 回：北京市，分裂“四三”“四四”派轰□毅，广州筹备“春交会”242
第 574 回：发《十条》，第四次接见内蒙 听汇报，与天津代表座谈.....250
第 575 回：山城乱，为“湘江□□”翻案 四月八，北京民族宫武斗.....263

第 576 回：形势变武汉“打倒武老谭”□树旗，绝□为“工总”翻案.....274
第 577 回：发通令，中南海再批少奇 通知到，清华园批斗光美.....286
第 578 回：低头□，王光美坚持己见 反复辩，小将逞口舌之争.....296
第 579 回：聂元梓，向江□等人汇报 周恩来，再接见天津代表.....308
第 580 回：天津市，“大联筹”封和平路 □北大，□止安徽斗严光.....317
第 581 回：第五次，接见内蒙代表团 军委会，接见军内造反派.....327
第 582 回：《立新功》，定五条保春交会 批北大，聂元梓潸然泪下.....339
第 583 回：第六次，接见内蒙古代表 发文件，中共中央做决定.....348
第 584 回：再接见，北京中学生代表 受嘲讽，蒯大富□为尴尬.....356
第 585 回：清华园，成立反蒯“四一四”批北大，周恩来□往五羊.....364
第 586 回：答“八□”，拨地□八万款□“乱”与“治”，贵州红代会被冲375
第 587 回：四一四，太原炮轰刘志兰 事有因，英□怎么成叛徒.....383
第 588 回：周恩来，广州谈少奇□□ 不停歇，五羊城接见各方.....394
第 589 回：四一六，□州市学生绝□ 去声援，看车□络绎不绝.....403
第 590 回：连续见，军内造反派组织 细删改，《要为人民立新功》.....412
第 591 回：□置信，牢狱宾□两□天 请进京，接见四川“反□命”.....423
第 592 回：周恩来，继续在广东座谈 “左”与“保”，一字之差天壤别....439
第 593 回：□城反，质疑《八条》怒冲天 大混战，数千军人进京来.....449
第 594 回：冲报社，□春、甘肃都武斗 摘喇叭，□州绝□在继续.....458
第 595 回：外交部，发声明“打倒□毅”□伯达，声声劝“要听、看、帮”467
第 596 回：四二〇，北京□委会成立 做汇报，中央接见□再道.....476
第 597 回：张春桥，开会批评“工总司” 上海市，“扫□纵□”被遣散....487
第 598 回：广西省，“支□”“支伍”大混战众□导，接见□外地记者.....495

## 第549回：第三次，接见内蒙古代表　批军区，调查团□往呼市

呼和浩特的局势依然混乱紧张，两派争斗十分激烈。此时，内蒙古师范学院成了呼市造反派的据点，许多单位的造反派头头为躲避反对派的捉拿，纷纷躲进师院的教学主楼，当时叫“东风楼”。坚守“东风楼”成了当时呼市造反派的一项重要工作。造反派师生为了防备势力强大的保守派袭击，把一楼封死，严格出进。每日的饭菜都是从楼上伸下绳子从外边吊上去。这些人聚守在这最后的营垒里坚持着。所有的教室办公室都被打开，地上放着床板，拥挤着相识不相识的战友。就连艺术系设在主楼中的美术资料室都被撬开了，地上的长木箱里尽是轴画，学生们打开一看，有郑板桥的、黄宾虹的，他们赶紧又卷好，锁好。驻守“东风楼”的造反派都觉的自己是忠诚的革命者，没有一个人把这些字画放在眼里。在一个月的混乱期间，这些文物居然没遭到损失和破坏。

到了夜晚，楼顶上的高音喇叭播放着“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的歌曲，表达着大革命进入低潮时期革命者的压抑之情和坚定不移的必胜信念。

3月18日凌晨3时20分至6时30分，周恩来、康生、肖华、李天佑、王力、关锋、戚本禹、徐立清等人在人民大会堂小会议室第三次接见内蒙古军区吴涛、肖应棠、刘昌、黄厚，内蒙古党委高锦明、李树德、李质、郭以青、张鲁、王铎、王逸伦，呼市“三司”代表郝广德等5人。“红卫军”代表张三林等5人。

周恩来、康生等中央负责人进入会议室坐好后，即问郝广德

最近回呼市亲自看到的情况。郝广德哭诉“红卫军”等组织同内蒙军区一些人镇压造反派的情况。当说到内蒙古军区派兵在北京抓内蒙军区造反派时，康生问：

“在哪里逮捕的？”

答：“在北京。”

康生：“逮捕的什么人？”

答：“内蒙古军区革命造反派的同志。”

接着，乔万宝、郝广德汇报了内蒙军区派人在北京政法干校和三机部招待所抓捕人的情况……

康生：“哪一部分解放军？查一下。”

肖华：“一个管理局长，带他老婆来北京，军区说失踪两个多月了，也派人抓走。”

周恩来问内蒙古军区的领导：“你们派多少人来北京？”

内蒙古军区副司令员肖应棠答：“一个班。”

周恩来又问：“经哪里批准的？”

肖应棠、黄厚一起说：“报军委了。”

周恩来：“你们派一个班进来，我们不知道，就是北京卫戍区同意就行吗？卫戍区是保卫毛主席的呀。”他告诉秘书：“请卫戍区傅崇碧同志来！”

周恩来接着说：“跑来一些人，劝说回去是可以的，怎么能抓呢？把人家夫妻两口子在西单大街上抓走？”

康生也说：“怎么能在毛主席，党中央所在地派兵抓人？”

这时，傅崇碧走了进来，康生向他查问了内蒙古军区派兵来京抓人的情况。

周恩来说："你们派武装来北京街上捕人，这也是特殊的哩！这件事情，是在发生之后我们才知道的呀！"

康生："你们把部队拿出来对付群众？"

周恩来："你们一方面在家亮了政治态度，一方面在北京商谈，这样，还谈什么？"他问内蒙古军区副政委刘昌："你们是怎么处理不要对群众组织宣布是什么性质的组织的问题的？"

刘昌辩解说："我们没有宣布'八一八'是反革命组织。"

"八一八"代表杨民众立即反驳说："不光宣布了，还抓起来不少人，打了不少人。"

戚本禹："在总理面前你都不讲事实，你怎么对待总理？"

刘昌根本不吃戚本禹这一套，争辩道："你不要吓唬人！我听总理的！"

关锋喝道："你们胆子太大了！真是胆大妄为。你们把我们的记者都抓起来。你们知道不知道《红旗》、《解放军报》记者是中央文革派的？如果他们有问题，该枪毙回来枪毙，可是你们就扣押了起来。直到肖主任打了电话才放了回来！"

康生念内蒙古军区副司令员刘华香的电话记录："'18号的大会暂时不开，什么时候开？以后再研究。'总理告诉你们不要开了，你们说什么时候开以后再研究。你们就是这么对待总理的电话。你们眼里还有没有中央？你们眼里还有没有毛主席？你们完全目无中央。关于省市自治区一级夺权问题，总理都得请示主席。你们说你们研究。师范学院不准围攻，也告诉你们了，有问题中央解决，你们不听。你们究竟愿不愿意中央来解决问题？还是你们自己解决问题？总理的电话，你们是怎么回答的？不让你

们开会，你们还说‘什么时候开再研究！’不回答中央的要求。‘三司’有无错误？有错误……”

王力接过来说：“还不一定，就从他今天的态度看，”接着指着刘昌说：“你是军阀？还是解放军？到底是哪个错误严重，就像你们所说的也好。他们（指三司）不敢反对中央。《红旗》杂志是党中央的刊物，你们竟敢扣押《红旗》的记者。你知道《解放军报》是谁领导的？”

刘昌依然不服的说：“解放军呗！”

王力：“是林副主席，我们毛主席是最高统帅，你们把《解放军报》记者也扣了起来，把笔记本没收，至今不还！”

周恩来问内蒙古军区副政委黄厚：“有没有这件事？你们为什么不报告？这件事我今天才听说。把那两个记者请来。”

戚本禹问刘昌：“到是你大？还是中央大？是你大？还是毛主席大？是你大？还是肖主任大？肖主任打了电话才放了两个记者！”

肖华说：“是派武装押送回来的。”

徐立清：“叶总办公室打过电话，我也给他们谈过。”

王力：“对我们都是这样，何况对群众？你们按主席思想、党的政策、人民解放军传统冷静地想一想。”

周恩来：“18号你们要开会，17号报告，还要飞机，这是先斩后奏，不让我们解决问题。‘八一八’可能打人，组织可能不纯，但是几千人的组织怎么能宣布为反革命？军事管制河西公司是你们要求的。中央的话实际上你们不听，我们不能不担心内蒙古军区站在什么立场？不让你们包围师范学院，你们不听。用这

种方法是把‘三司’瓦解不了的！”

肖华：“他们是独立王国，无组织无纪律。”

关锋：“他们是‘中央’。”

康生：“夺权得中央、毛主席批准才行的。‘三司’可能有错误，”

周恩来：“他们已经作了检讨。”

康生：“但比起你们所犯的错误究竟哪个大？他们不敢反中央。你们冷静地想一想，按照毛主席思想，党的原则，军队的光荣传统衡量一下，在具体问题上可能各有多少错误，但比起你们这种思想来，究竟怎么样？总理给你们讲的，究竟算数不算数？”

周恩来：“不算数。你们表面上似乎听中央的话，实际上你们不听。我们办事都得请示毛主席、林副主席，但你们不是这样。你们这种情况，我们不得不担心内蒙古军区究竟站在什么立场上。你们把那么多群众组织宣布为反革命，同群众搞得那样对立。内蒙地处边防，背靠苏、蒙修正主义，我们怎能不担心？吴涛同志，你是第一副政委，你应该两方面负责，派你去呼市看一下，你敢不敢？”

吴涛答：“总理决定了我可以回去。”

周恩来：“中央文革也去人，联络员也去一个。”

康生：“你们要开大会，是要把你们的意见强加于中央。你们要飞机，还要登报？你们眼里有无中央？总理要在北京亲自主持解决问题，你们就要按你们的意见办？你们都是老干部、负责干部，我们对你们就要严格要求，一定要按毛主席思想办事嘛。”

周恩来：“由于学生在军区门口静坐，发生了问题，调你们

来商谈解决问题，找你们几方面谈。2月17号定了四条，你们是同意了的。但一个月来你们并没有按这四条办事。找你们来商谈，是要把内蒙古的文化大革命搞得更好，搞大联合、夺权，但这一段你们不是按中央意见办事。

第一、你们竟然在军区门口把《红旗》和《解放军报》记者扣起来。四大自由嘛，记者没有这个自由？肖主任打了电话，你们还要押送回来。扣留了笔记本，在黄厚手上一个月不报告。记者报导如不符合实际，你们可向上反映嘛，怎么能扣留？这件事就是对抗中央，没遵守军委的命令。在军区门口发生学生静坐以前，刘华香就请示过要调兵的。“

徐立清：“叶总办公室曾告诉过他们不要调兵。”

周恩来接着说：“第二、刘华香开完会，本来想要留他商谈解决问题的，他不打招呼就走了。他回去后一个来月，办事是不合乎中央意图的，越走越远。

第三、河西公司的事，提醒过你们，不让你们宣布‘八一八’是反革命组织，表面上你们听中央命令，但你们在下面宣布，这是耍两面派么。

第四、宣布人家好多组织为反革命，怎么能这样压制？即使是保守的组织，也要教育提高，怎么能压制？完全不是对待群众组织应抱的态度。这是刘、邓路线。”

康生：“这是反毛主席思想的，是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周恩来：“第五、你们派部队来北京，就是你们要指挥中央，你们目无中央。北京卫戍区是保护中央，保护毛主席的。你们派兵来大街上抓人，是要为所欲为。

第六、还有这样的传单（指军区印的陈鼎写的材料），还加上了按语。清华附中的一个16岁的小孩子，即使是他写的，也要劝说他不要写。你们还加上了按语，印发传单？如果是你们写的。这样做不是破坏解放军信誉吗？怎么能这样对待红卫兵？何况对红卫兵，你们对中央文革的记者都那样对待，这是对抗中央！

第七、你们包围了师范学院，据这位同学（指郝广德）讲已经3天了。一个群众组织，怎么能那样对待？这是你们有指挥的，要把一个群众组织搞垮嘛。对这个问题，打电话你们没有回答，还要中央去调查！这一个月来你们进攻，不照中央的意图办事。清华附中同学的信，如调查属实是你们强迫写的话，你们就要犯更大的错误，你们欺骗中央。

第八、开大会夺权，说是搞呼市的庆祝，实际上是夺区党委的权。权星桓、康修民实际上是让你们掌握的群众组织抓起来了。对区党委书记，你们军区政治部就定了性？你们比中央还先把名字点了，不夺权也等于夺权了，你们有这么大的权吗？7、8号夺权（指呼市）根本没有报来，15号登报，明天要开大会，还要批准登报，都不是商议，是给我们下命令，统统是先斩后奏，你们犯了多大的错误！

这一系列的事情，我们不能再忍了。这些你们都没请示过中央。你们想过了没有？这么做对不对？“

郝广德：“他们把18号开会的事在广播电台广播了。”

周恩来：“噢！报纸、广播怎能有同中央不同的声音？你们掌握了报纸、广播，就登、就广播？广播问题的四点指示不生效了？”

郝广德、高树华一起揭发说："他们把《二十二问中央文革》，在京参与反中央文革活动的'抗大'，在报纸上、广播上称为'左派'，要大家学习。"

周恩来说："这是反动的！"他问《红旗》杂志、《解放军报》记者："你们认为'抗大'是什么组织？"

记者答："'抗大'炮轰中央文革，是反动组织！"

王力指着刘昌说："这同他的思想一样，他也炮轰中央文革嘛！"

周恩来问记者："你们的笔记本让他们没收几本？"

记者答："一个3本，一个5本。"

周恩来："把中央文革派的记者的笔记本都没收了！带来一个月不报不交！"

黄厚承认不对，说："这是我们的缺点。"

周恩来："什么缺点，这是反抗中央！"他又问记者："你们有勇气再去呼市一趟吗？"

记者答："有！"

周恩来："好，吴涛同志带队。联络员也去一个。"

肖华和徐立清说："军委文革也去一个。"

周恩来："把你们抓的人都放出来。"

周恩来念了权星垣、康修民、雷代夫及三个秘书的名单。接着对吴涛说："你去了要按党的原则，实事求是办事。""这是对你的一次考验。坐飞机去，可住在机场，调查方便。可找几方面的人谈，到现场去看，先到师范学院去看。"

他又对军区领导说："几派的人正在这里商谈解决问题，怎

么能把一派压的垮了？你们这样做，我们怎么能信任你们。军区领导人你们面临很大的危险！”

他对吴涛说：“你是第一副政委吗？肖主任说了，我们信任你，立即恢复第一副政委职务。”

王力：“你们到呼市后，愿意到哪里就哪里，愿意找谁谈就找谁谈！”

周恩来对军区领导说：“这说明你们的立场问题，是执行刘、邓反动路线。你们说群众大会不开了，还是要开向中央示威？是真不开了，还是搞什么？这都要看一看。对区党委的6位同志要立即恢复自由！”

肖华：“肖应棠你马上打电话，要保证中央调查团的安全，出了问题要由你负责。”

周恩来：“今天会上谈的不能向外传，四方面各负其责。”

戚本禹：“今天是内部调查会，内容严格不能向外传，一定要维护人民解放军的声誉，不能把矛头指向解放军。”

王力：“问题到了今天，不能不严肃指出，但要用适当方式宣布。你们认识了，改正还来得及。”

周恩来：“你们回到京西宾馆好好讨论检讨。回头，肖主任、李副总长还找你们谈。”

康生：“一般的解决这些问题是，首先要承认错误，而后再区分性质；把矛头和群众分开来。”

周恩来对李天佑说：“李副总长你去一下呼市，不能多呆，可呆三、两天。”

接见一结束，以李天佑为团长的中央调查团就于3月18日乘

飞机来到呼市，内蒙古军区副政委吴涛也随中央调查团一同返回。

## 第 550 回：做工作，李天佑师□解围　政治局，生活会终告结束

吴涛在内蒙古军区被打倒后，是总理办公室于 3 月 15 日，直接打电话给内蒙军区，指名要吴涛来北京，这才结束关押生活。结果，他在北京待了不到一个星期，又随李天佑回到了呼市。

李天佑一行于当天在呼市新城宾馆接见内蒙古师范学院“东纵”头头董玉华、郭是海、董文、戈志盛、杨永俊。参加这次接见的还有随同一起前往呼市的吴涛、总参作战部一位副部长、《红旗》杂志记者于顺昌、《解放军报》记者宋学礼、总理联络员赵刚及中央文革和全军文革的人。

李天佑说：“我们是受总理和中央文革委托来解决问题的。师院这里问题很紧张，我们到呼和浩特，特别是到内蒙师院来解决问题。听说你们被围困4天了，不能吃不能喝，总理很着急。总理和康生同志把我们叫去，开了一夜的会，今天早晨没有休息就坐飞机来了。我们到这儿，首先到‘八一八’门口站了一会，就直接到你们师院。结果进了一楼就进不了二楼了。我们一看你们院里院外都是人，有几万人，一看就知道气氛不对。《十六条》下来了，《八条命令》也下来了，不许武斗。可是你们这里武斗仍然很厉害，双方对立情绪很大。当然了，这不能怨哪一方，双方都有责任。我和军区的同志说了，要保证你们的安全。当然了，要按政策办事。过去你们在军区问题上有错误。有错误作个检讨就是了嘛！不会算旧帐。我相信军区不会把你们当反革命看待，我也相信其它组织也不会的。把群众组织打成反革命要犯很大错

误。所以你们之间要消除这种不必要的误会和隔阂，不要这样对骂。我们要采取紧急措施来解决问题。要你们自己解放自己，打开辕门，自己解放自己。”

吴涛：“李副总长要你们自己解放自己。”

李天佑：“你们有没有这种勇气？”

众人齐声说：“有！”

接着，内蒙古师范学院“东纵”杨永俊向李天佑汇报了双方执行周恩来四点指示的情况。

总理联络员赵刚问：“你们院里有多少人？”

董玉华答：“两千。”

赵刚说：“才两千人？”

众人纷纷说道：“还有其它造反派的战友。都被打成反革命，组织被砸坏了，家也被抄了，回不去，住在这里和我们一块战斗。”

李天佑：“你们打开大门嘛！我派一排人去徒手保护你们，保证你们的安全。看有没有人敢去冲你们。你们要解放自己，打开辕门。我明天去检查，看你们开放不开放。外单位的人，也要动员他们回去闹革命。”

吴涛：“谁也不能抓人、打人。”

李天佑：“各群众组织不要再那么对立，对骂，武斗。在共同原则的基础上，找到共同的语言，在大方向一致的基础上，求同存异。你们青年一代，比我们那时闹革命条件好多了。你们要更进一步。今晚你们就打开辕门。”他回头对随行的总参作战部副部长说：“告警卫营，再去师院的人就撵。”然后又对师院的人说：“要保证你们的安全。你们要有这种胆量。我们来就是支

持你们的。当然，这种支持是政治上的支持，政治上的关怀，我们带来总理四点指示，不许抓人，不许打人，以前下的通令，通缉令都统统作废，不管是谁下的。我昨天晚上接见四个军事院校的学生，我要他们开门整风，总结经验，你们呢？为了进一步提高，也要开门整风。”

师院杨永俊说：“我们今天下午看你们进院了，想接你们。有人看见里面有吴涛。我们以前听说吴涛被军区打成三反分子，不敢接他。”

师院董玉华接着说：“我们怕军区搞阴谋。我们把吴涛接上来，他们就有借口了，可能冲上我们楼梯。”

李天佑说：“吴涛不是三反分子，周总理、中央文革叫吴涛同志到你们这里来的。”

中央文革的人说:“总理昨天晚上亲自点名叫吴涛同志来的，这是对他的信任。”

师院郭是海说：“李副总长，周总理和中央文革派人来解放我们，这样关怀我们，我们非常感谢，我们代表1200名‘东方红’战士托你向毛主席问好。我们一定誓死保卫毛主席他老人家。我们运动初就被打成反革命，是毛主席他老人家解放我们的，现在我们造军区刘昌的反，又被打成反革命了。他们叫我们‘历史反革命’……”

李天佑对他说:“如果把你们打成反革命，那是最大的错误。群众有错误，可以批评改正嘛！”

董玉华：“在军区问题上我们有错误。我们还用对待内蒙党委的作法对待军区的错误，在运动发展的关键时刻没有很好地跟

上形势。特别是我们在报纸上点了刘昌的名，这是我们对毛主席犯下的罪过。但是，我们是有错无罪的。”

杨永俊：“军区内部也是有斗争的。看你们究竟是支持哪一派。这次全国性的大反复，是资本主义复辟性质的。内蒙军区确实是支持了保皇派，王良太就大肆造谣。”

大家都说：“我们就是有错无罪。”

总参作战部副部长说：“这次李副总长来就是支持大家的，给大家解围，按《十六条》闹革命。刚才给大家念了总理的四点的指示，以前下的通令、通缉令一律作废。现在总理正在研究你们的问题，最后一定会得到很好处理的。在总理没作决定之前，找出一个好的办法解决问题。我们给他们（指红卫军、无产者、工农兵）指出了四条，你们也要那样去作。

刚才李副总长的讲话作为内部讲话，不要广播，不要印传单。因为这是开诚布公谈的，传单搞出去就会把问题复杂化。刚才据他们说你们已经广播了，说中央支持你们，李天佑支持你们。他们对我们说：‘三司说，李副总长说三司是革命组织，抗大是反革命组织，要对他们专政。’”

众人说：“没有的事儿，我们根本就不知道李副总长来。”

作战部副部长：“对‘抗大’也不要采取那个作法，特别要按《十六条》办事。还说内大搞夺权，你们去人包围了他们。不管夺权、反夺权，都不要包围、反包围。这个情况反映得不一定对罗，不管有没有，都要注意。有了就改，没有就注意。特别要对下边作好这个工作。”

“内大”就是内蒙古大学。

李天佑："我有一个建议。一会儿我要马上打电话给北京汇报。今天总理打来两次电话了，问我。我们还有一个要求，去你们的楼上，看一看你们的同学，对同学们在精神上是个鼓舞和慰问。我和总理约定晚上十点汇报，十点以前去怎么样？"

众人都表示："我们全市革命造反派热烈欢迎，这是我们最迫切希望的。"

李天佑准备结束会见，他说："好吧！咱们吃饭去吧。"

师院的人说："我们还有些事情。"

郭是海："区党委领导干部权星桓，康修民，雷代夫被他们抓走毒打，我们要求立即释放他们。"

李天佑回答："我和'无产者'他们谈过了，已经解决了。"

郭是海："我们的战友还被关在狱中。"

李天佑："还有？"

众人说："还有很多呢？"

李天佑："把名单提出来，明天我们要派人去看。"

杨永俊："凡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因支持'三司'而被捕的，符合《公安六条》的除外，一律都应该放。"

郭是海："扣发工资的，冻结财经的，怎么办？"

李天佑："这是错误的，我们跟他们讲了，扣的工资要发，出去的人要欢迎他们回去。"

众人说："回去还抓，还打。"

于顺昌："先不要着急回去，过几天也行。"

李天佑点头。

郭是海："你让他发工资，他不发怎么办？"

李天佑："我要特别告诉自治区党委权星桓他们，给发。"

郭是海："权星桓说话没人听，不管事。"

大家纷纷说："他们有职无权。"

李天佑："他们解放了，有职有权嘛。"

戈志盛、董文："我们的交通工具全被他们抢走了。"

李天佑："这些具体问题，以后再解决。"

李天佑在呼市，同各方力量会谈，指示立刻解散围攻"东风楼"的人群。撤掉楼内防御工事，然后指名放出了内蒙古党委的权星垣、康修民等人。当晚，李天佑、吴涛同调查团全体成员和机场军代表一起乘车来到了师院。进院时，他又问师院的人："你们要把辕门打开，跟平常一样，用不用给你们派一个排来保护？"

杨永俊："我们一定马上把工事拆除，看明天的情况吧！"

至此，师院"东风楼"封闭了 7 天 7 夜的楼门，终于在第 8 天打开了。李天佑面无表情，在一些人的陪同下，从楼内欢迎他的人群中走过，并上了二楼。楼内的人有一种预感：他们"胜利"了。

李天佑临离开师院时，对师院的人说："时间来不及了，我要马上向总理汇报，请你们代向没接见的同志问好！"

3 月 16 日，周恩来送毛泽东审中央《给全国厂矿企业职工、干部公开信》稿。信中要求全国厂矿企业职工、干部应该巩固劳动纪律，坚持民主集中制，建立社会主义生产和文化大革命的良好秩序；坚持八小时工作制，在八小时工作以外的时间，坚持文化革命，不许在生产时间内，擅自离开生产和工作岗位，要同一些无故旷工、敷衍了事的不良现象作斗争；保证产品的质量，力

求产品的高质量，要同一些不顾质量、浪费国家资材的不良现象作斗争。信中指出，工人组织中的工作人员，一般都不要脱离生产。对破坏国家财产的人，必须按照国家的法律，严格惩办。

毛泽东批示："照办。"

3 月 18 日，中共中央发出《给全国工矿企业革命职工、革命干部的信》，要求在一切厂矿和基本建设单位中宣读和张贴。

"联动"多次冲击"摧毁'联动'展览会"。3 月 18 日，"联动"又贴出三张令人瞠目结舌的大字报，认为"文化大革命"时期如同"黑暗的旧社会"，质问"社会向何处去？""党向何处去？"并且表示，"跌倒了，就站起来"，"再继续干"。在北京 101 中学，100 余名"联动"成员降下国旗，升起"老红卫兵"的旗帜，而且降半旗。他们还在校园里到处张贴"联动万岁！联动永存！"的大标语。北京 31 中学出现了"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绝对如此"的对联。"永远压不倒联动"、"打倒谢富治"、"火烧江青"、"炮轰公安局"等标语在北京不少中学里到处可见。甚至还有人贴了"毛主席正确不正确，十年以后见"的标语。

3 月 18 日，周恩来给毛泽东、林彪等人写了一封信，连同聂荣臻《关于军事接管和调整改组国防科研机构的请示报告》一同送毛泽东。信中说：

"遵照主席指示精神，经与富春、荣臻、剑英三同志商量（肖华在作报告，未参加），已向国防工办和国防工业部门（二机、三机、四机、五机、六机、七机）宣布，准备实行军管。""对国防工业各部研究院、所和科学院所属承担国防任务的各研究所，

拟同意聂荣臻同志意见（见附件），交国防科委实行军事接管，并基本同意他所提出的调整改组原则。待方案商定后再报批。国务院工交、财贸、农林、卫生各部门正遵照毛主席指示，分别进行排队，拟在工作瘫痪部，亦实行军管，其办法如对国防工业各部。定后将分别报批。这些需要派出的军管代表，拟经由军委、总政从军事科学院、高等军事学院、政治学院德才兼备的老干部中选派。以上各项妥否，请主席批示。”

这天晚上，3 月 18 日，在中南海勤政殿，由周恩来主持的中央碰头会在这里召开“政治局生活会”最后一次会议。康生发言说：“刘、邓、陶被打倒了，还有人。‘二月逆流’就是刘邓陶的继承者，同志们看到了，‘二月逆流’的成员们不是国外派进来的敌人，而是民主革命时期同我们一起战斗的同志。不是一般的党员，而是政治局委员、副总理、军委副主席，就是这些所谓的老同志、老党员、老干部，进行了‘二月逆流’的罪恶活动，其危险性也就在这里。‘二月逆流’的性质是很严重的，是资本主义复辟的一次大预谋。‘二月逆流’的干将们，想象赫鲁晓夫那样达到复辟的目的，尽管他们现在发咒，愿意改正，写了检讨，可我也不敢保证，一旦时机来了他们不反扑。”

深夜，“政治局生活会”结束，陈毅拖着沉重的步子回到汽车里，他指着窗外一掠而过的新华门，心情悲愤地对秘书说：“真是巧合！40 年前的 3 月 18 日，我参加游行反对北洋军阀，差点被打死，今天又挨斗。鲁迅痛斥‘三一八事件’，说这天是‘最黑暗的一天’。”

3 月 18 日，还有两份报告几乎是同时送到了周恩来的案头。

一份是来自齐齐哈尔的报告：《齐齐哈尔铁路局运输状况严重混乱》。材料说，齐齐哈尔铁路局管辖线路阻塞现象严重，每天都接到全国各地发来大批请求运送物资的告急书。要满足这些需要，每天必须运出 5100 多个车皮，而目前他们每天只能装运 1700 至 1800 个。外地运来的物资，每天也有 200 多个车皮卸不下来。铁路局的事故大大增加。3 月 5 日，齐齐哈尔铁路局所属昂昂溪车站，因引导员、扳道员在工作时间辩论争执，忘扳道岔，盲目接车，造成 383 次旅客列车与 020 次货物列车侧面冲突的重大事故。机车大破一台，货车损坏八辆，正线中断行车 6 小时 10 分。到 3 月 15 日，已发生行车事故 326 起，比去年同期增加 50%，其中恶性事故 29 起。事故之多、损失之重，是该局历史上所罕见。造成这些问题的主要原因是：纪律涣散，不听指挥；派别多（全局 200 多个组织），不但增加了脱产人员，而且经常争论，影响工作；有些人强调破框框，而把一些必须执行的规章制度随便破除了；领导干部“怕”字当头，放弃领导。3 月 18 日，该局军代表介入文化大革命，成立了“三结合”的抓生产第一线指挥部，并计划在各分局也成立指挥部，代替长期瘫痪的领导机构。但全局军代表只有 40 多人，困难仍很大，迫切希望驻军派更多的干部去加强领导。

另一份是来自江苏省的报告，反映：江苏省委、南京市委的夺权没有搞好大联合、三结合。夺权之后，交通运输部门指挥不灵，车站港口、交通要道的物资堆积如山，运不出去。

周恩来立即将反映齐齐哈尔铁路局问题的报告报送毛泽东，并附上了自己的意见。

## 第 551 回：发《通告》，不许炮打周总理 见安徽，武汉市取缔“工总”

3 月 19 日，在北京红代会核心组会议上，北航韩爱晶提出：“在对待周总理的问题上，要明确表态。千万不能因为反逆流，让社会上人误解红代会，误以为我们反对周总理。”聂元梓、蒯大富和谭厚兰都赞成。于是，首都红代会发表《通告》：

1、周总理是毛主席的亲密战友，任何人不能对周总理有半点怀疑，绝对不能贴周总理的大字报，炮打周总理就是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就是反革命，必须彻底专政。

2、不要贴李富春同志的大字报。

3、李先念、余秋里的问题还不清楚，正在调查。

首都红代会还于当天发出电话通知。

3 月 19 日，周恩来、康生、王力、关锋接见安徽两派代表。会场上双方代表进行了激烈的辩论。“P”派紧紧抓住“总指挥部”不批斗李葆华，也不许别人批斗李葆华并百般保护李葆华这个问题不放，认为“126”是假夺权，是李葆华和平让权，“八二七”和李葆华有君子协定等等。

为了扭转被动局面，安徽省军区司令员严光 3 月 21 日去找他的老上级徐海东大将和时任代总长的杨成武，希望他们能出面为安徽说几句话，结果是事与愿违。

风云突变，严光和代表团其他成员希望“八二七”的头头梁守福到北京来一趟，在中央面前做个检讨，看能否挽回败局。

我们再看武汉。3 月 6 日，武汉市人民武装部“抓革命促生

产办公室”成立，宣布即日起开始办公。当天下午，湖北军区在洪山礼堂主持召开省直机关抓革命，促生产动员大会。陈再道等在会上讲了话。他说：“为了实现大联合，必须彻底批判《二八声明》，把《二八声明》的幕后策划者和炮制者揪出来。在《二八声明》上签名的组织，支持《二八声明》的组织，矛头指向无产阶级革命派，指向人民解放军的组织，必须作公开检查。”

在这个会上，钟汉华点名要湖北省副省长夏世厚、张旺午、韩宁夫、湖北省委书记处候补书记姜一等省委领导干部站出来抓工作。当点到夏世厚的时候，陈再道抢上前去说：“夏世厚同志过去抓农业抓得好，经验丰富，有问题，可以在抓生产中改正错误”。

由于夏世厚群众意见太大，当天就被省直机关的群众组织否决，姜一被任命为“抓革命，促生产”第一副总指挥，张旺午被任命为“抓革命促生产办公室”副主任。

8 日，武汉市召开郊区抓革命促生产三级干部会议。10 日，又发出紧急通知，号召全市人民立即行动起来，掀起生产建设新高潮，并提出全面贯彻执行“抓革命促生产” 的方针，各区、局和企、事业单位立即建立抓革命促生产的领导班子，坚持 8 小时工作制，坚守生产岗位和工作岗位，保证正常的生产秩序等项要求。

湖北省军区 3 月 8 日对井冈山大楼实行军事管制，9 日发布《公告》，宣布解散参与“强占”和“破坏”井冈山大楼的“毛泽东思想红色造反军机电局总部”，并停止其一切活动，该组织的主要负责人必须向革命群众低头认罪，坦白交待；取缔“反革

命组织”——“井冈山大楼指挥部”。该组织由 19 个组织组成，要求该组织的主要负责人员必须立即自行投案，否则予以逮捕法办。《布告》还说：军事管制后，凡有借此造谣惑众，破坏军管声誉者，一律以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论处。《布告》公布的同时，武汉军区还搞了一个“井冈山大楼联合指挥部罪行展览”。在数天的公开展出中，接纳观众 13 万余，来自全省、全国各地。就在《布告》公开不久，“井冈山大楼指挥部”的 8 人被逮捕。

3 月 9 日，武汉军区接管“工总”所在地——红楼。

3 月 10 日，武汉军区勒令所有造反派撤离《湖北日报》社——红旗大楼。

这天下午，“新湖大”的“红八月战斗队”到“二司”所在的武汉测绘学院和华中师范学院游行，高呼：“我们想念‘二司’战友!”“坚决支持‘二司’战友起来革命”等口号。当晚，武汉测绘学院“二司”1000 多人也到湖北大学游行，对“新湖大”表示感谢。

3月11日，“二司”整风办公室在中南民族学院召开整风动员会议。水运学院等“二司”总部消毒队上街，向群众检讨《二八声明》的错误，表示要坚决克服头脑中的“私”字，彻底革命。

这天，武汉军区发表声明说，支持原湖北省委支持成立的武汉地区“大专院校红卫兵司令部”，即“武汉一司”恢复基层组织，当即遭到武汉“南下造反大队”、“新华工”、“新湖大”等“毒草派”组织的坚决反对。

其实，在 3 月 8 日上午，武汉军区支左指挥部办公室主任、武汉军区动员部部长信俊杰和湖北省军区副政委张进，就已经召

集“新华工”、“新湖大”、“新华农”、“三司”、“政法尖兵”等七个组织的代表座谈，讨论已经垮台的武汉地区“大专院校红卫兵司令部”，即“武汉一司”的问题。

那天，湖北省军区副政委张进讲了五点：一是要贯彻大联合的方针。二是“大专院校红卫兵”的总部已经解体，其基层组织也很少活动了。第三表示组织不宜再恢复，更不能成立什么总部。第四是对“大专院校红卫兵”和中等学校红卫兵应有所区别。第五、由于过去了解情况不多，对“大专院校红卫兵”、“中学红卫兵”没有加以区别，接待组的答复没有划分清楚。因此今天宣布那个答复无效，予以撤销。

信部长也明确要求：“要对大专院校红卫兵做思想工作，把受蒙蔽的群众团结过来，分期分批地把他们接受过来。要和他们说明，如果闹下去对他们是没有好处的。”

但是，张进副政委讲的“五条”，在向武汉军区钟汉华政委和孔庆德副司令员汇报时被否定了。

3 月 13 日，武汉军区向华中工学院、湖北大学、武汉大学派出军训团。

3月14日上午，“二司”整风办公室在武汉测绘学院大操场召开会议，邀请天津大学“八一三”代表作报告。近万名“二司”学生参加。天津大学“八一三”赴汉代表介绍了他们在犯了炮打康生等严重错误后，经过整风，变成一个坚强的革命造反派的经验。当天下午，在商校操场召开“二司”司令部负责人交待、揭发大会。

在此期间，“二司”负责人杨道远因 2 月 28 日车祸人事不省

住进了湖北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一时间谣言四起：有人说他逃回了河南，有人说他进山准备打游击，还有人说是“工总”要杀人灭口，因为他知道太多的内情。总之是说什么的都有。连武汉军区政委钟汉华也说：“要是跑了，性质就变了。”

后来，武汉军区知道杨道远住院了，就派了两名干部天天守在医院，找他谈话，了解“二司”的情况。杨道远对他们说，他要见军区政委，只和军区政委谈。

3 月 16 日上午，武汉军区陈再道司令员、钟汉华政委将杨道远接到武汉军区。杨道远被带进一间会议室，只见里面坐满了人。武汉军区副司令员韩东山说：“杨司令啊，好难见呀！”

韩东山和孔庆德曾去过“二司”司令部所在地——红楼，但是没有见到杨道远。

接着，蹲在椅子上的陈再道问杨道远：“你们为什么反对我们？”

杨道远说：“有人说你们参与‘二月兵变’，为了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所以反对你们。你们如果是忠于毛主席的，应该感到高兴，为有这些忠于毛主席的红卫兵高兴。”

8199 部队副师长赵奋跳起来指责杨道远说：“毛主席相信陈、钟首长，你们怀疑！.....”

陈再道说：“我们不好，军区内有没有好的？”

杨道远说：“这个我没有做调查，你们的情况我不清楚。”

钟汉华说：“你们要夺军权，军权是不能夺的。”

杨道远说：“我们说的夺军权，不是我们个人要夺军权，我们的意思是要把资产阶级篡夺的那部分军权夺回到无产阶级手

里。”

陈再道说：“你们有个金字招牌。你们要整顿组织，通过整风把队伍带好。”

又谈了一会儿，陈再道带着众人到另一个房间开会去了，留下几个军人和杨道远继续交谈。午饭后，将杨道远又送回了医院。

3 月 16 日下午，“二司”整风办公室在湖大礼堂召开开门整风大会。

3 月 17 日，“二司”头头排队去武汉军区、支左办公室表示认错。“二司”司令部开始自我整风。这天，杨道远出院回到武汉测绘学院。

列宁说得好：真理再向前跨出一步就是谬误。就在 3 月 17 日，陈再道又向前迈出了一步。

这天凌晨，武汉军区和公安机关根据中央军委《八条命令》以及其他军区执行《八条命令》的做法，开始大规模抓人。他们根据军委《八条》的第一条：“必须坚决支持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争取和团结大多数，坚决反对右派，对那些证据确凿的反革命组织和反革命分子，坚决采取专政措施。”首先逮捕了武汉“工总”区分部以上头头朱鸿霞、夏邦银、胡厚民等共 485 人。各专区、县也是如此，武汉和湖北各地逮捕约上千人。

当晚，建乐街派出所户籍警察 3、4 个人来到胡厚民家里对胡厚民宣布：

“胡厚民，你阴谋颠覆政府，非法组织工人总部，成为帮派头目；冲击中南海；参与了一月夺权，现在正式逮捕你！”

胡厚民的妹妹胡茜，24 女中 68 届高中生、班团支部书记、

“二司”的红卫兵，她一听就急了，拦住警察说：“你们没有逮捕证，不许带人走！”

警察把她推开，过来用绳子捆绑胡厚民，胡茜一边往前冲，一边喊：

“深更半夜抓人，又没有带铐子，用绳子五花大绑地捆着，你们这样抓人是非法的！”

警察没有理他，推着胡厚民出了家门。

“你们镇压革命造反派，我要到毛主席那里去告你们！”胡茜追着警察一直骂到派出所。当然，她的行为无碍于她哥哥的被捕，胡厚民依然被抓了起来。

同一天，湖北军区副政委张竟被武汉军区停职反省，不准会客，不准与造反派联系。张竟在军队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后，一直作支左工作。他支持了武汉 “二司”等造反派组织，与武汉军区的方针明显对立。

当晚，武汉测绘学院“三司”和“一月风暴”组织砸了“二司”司令部，并扬言要把“二司”司令部赶出武汉测绘学院。“二司”整风办公室就此事连夜走访了军区支左办公室，未置可否。

3月18日，“工造总司”、“三司”等组织在武汉测绘学院操场召开控诉“工人总部”大会，参加大会近2万人，解放军派出巡逻队保护会场。发言者控诉“井冈山大楼指挥部”和“工总”武汉锅炉厂分部的“罪行”。

这天，支左指挥部分三批召集“大专兵”、“三司”、“三新”等组织开会，向他们介绍了“工总”的 “十大罪状”。

在武汉街上贴出这样的大标语：“大猪（指朱鸿霞）在坐牢，

小猪满街跑！”“二癞子（指二司），你莫喜，真正的保皇就是你。保刘真，保张华，保你的干爹朱鸿霞！”“踏平黑工总，镇压反革命！”等等。

就在同一天，“二司”的勤务员杨道远好像并不知道正在他们学校——武汉测绘学院召开控诉“工人总部”的大会，此时他在华中师范学院参加“二司”的大会，代表“二司”司令部和他个人，向全体与会者交代、澄清社会上流传的一些问题、“二司”群众有疑义的问题、“二司”司令部整风办公室提出的问题，并传达军区支左办公室对学生群众组织整风的意见。他的陈述和答辩并不流利，好像不令台下满意。

3 月 18 日下午，“二司”在华中师范学院开大会，杨道远传达 3 月 16 日上午与武汉军区领导交谈的情况。他说：陈再道说，“二司”犯了严重错误，希望通过整风把“二司”整好；军队还是会支持“二司”的。关于“武汉一司”，陈再道说：“对‘大专院校红卫兵’.....，我们不让他们成立总部了，只允许他们的基层活动。”“现在我们要注意联合，他们现在灰溜溜的，如果再压一下，那就不得了了。”

## 第 552 回：三一九，山西□委会成立　作报告，林彪再语出惊人

3 月 12 日，山西省革命组织代表会议在湖滨会堂召开。会议选举产生了山西省革命委员会。经中共中央批准，刘格平任山西省革命委员会主任，张日清、刘贯一、袁振、郭永彪、谢振华、焦国鼐、陈永贵任副主任。大会于 3 月 18 日结束。

第二天，3 月 19 日，在太原五一广场举行庆祝山西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刘格平在会上讲话，《山西日报》发表了题为《革命的三结合方针胜利万岁》的社论，祝贺山西省革命委员会诞生。

3 月 19 日，经毛泽东审阅同意，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停止全国大串连的通知》。通知指出，“中央决定：继续停止全国大串连，取消原定的今年春暖后进行大串连的计划”。

当天，中共中央军委作出《关于集中力量执行支左、支农、支工、军管、军训任务的决定》。

3 月 19 日夜，毛泽东对《齐齐哈尔铁路局运输状况严重混乱》材料做出批示：林彪、恩来同志：

此件请阅。一切秩序混乱的铁路局，都应实行军事管制，迅速恢复正常秩序。一切好的铁路局，也应派出军代表，吸取那里的好经验，以利推广。此外，汽车、轮船、港口装卸，也都要管起来。只管工业，不管交通运输，是不对的。此事请研究酌处为盼！

接到毛泽东的指示，周恩来立即让余秋里、谷牧草拟对铁路、

交通、邮电三个重要部门及其所属重点企业实行军管的决定稿。

3 月 20 日，毛泽东在周恩来 18 日报送的《关于军事接管和调整改组国防科研机构的请示报告》上批示："退总理照办。"批准了聂荣臻提出的对国防工业各部的研究院、所，以及科学院所属承担国防任务的各研究所，实行军事接管的意见。

随后，周恩来又写信给李富春、李先念、余秋里、谷牧并叶剑英：

主席指示，继国防工业军管之后可对工交财贸各部，凡瘫痪陷入无政府状况者，也可实行军管。请你们明日上午集体一议。

这天，毛泽东澳大利亚共产党推荐到西安外语学院担任教师的库普写的大字报《让我们"治病救人"》上批示："这个外国人很能看出问题，分析得很不错。总理阅后，送文革小组一阅。"

库普在这张大字报里分析了西安当时出现的两派对立，由群众大会开除党员党籍，打、砸、抢，游街等一系列情况，认为这是"左"倾机会主义的影响，并受坏分子的操纵。他提出，要把那些存心要把我们引上背离无产阶级革命道路的人清除出去，然后才能搞造反派、革命干部和解放军的"三结合"。

全军军以上干部会还在继续。谁也没有想到，叶剑英原来说的这个只是安排布置"春耕"任务的"短会"，竟一直开到 3 月 25 日。而且会议的主题也不再是"春耕"和"夺权"问题，而是在打倒刘少奇、认清"文化大革命"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分清"主流和支流"等重大问题上统一军队高级干部的思想。

由于军队在"支左"过程中普遍感到最困惑的问题是不知道谁是"左派"？究竟应该支持谁？在这次会议上，大家纷纷提出

这个问题，希望能有一个“左派”的标准，以便在“支左”工作中参照执行。在与会人员的强烈要求下，会议终于出台了一个衡量“左派”的标准：

（1）看大方向是否对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否对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对党和毛主席的态度。

（2）组织纯否，首先是领导成员，如果是地、富、反、坏就不行，是否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作后台。

（3）群众对这个组织的看法。

（4）衡量一个组织要用政治原则去衡量，不能带宗派情绪。……对没有群众基础的，没有经过整风成立的，不承认，被推翻的保皇组织及改头换面的反动组织一律取缔……对民族性的组织也要一律取缔。

会议期间，主持会议的叶剑英想请毛泽东和林彪到会上讲话。

毛泽东表示，他不讲了，让林彪去讲。

听到毛泽东的指示，林彪让秘书为他准备讲话提纲。当秘书请示从哪几个方面准备时，林彪说，主要是讲如何把部队的“支左”工作做好，把两个月来的“支左”经验总结一下，并要沈阳、济南、南京、广州、成都等几个军区提供点材料。同时，林彪还要秘书到会上去了解一些“活思想”，看看与会干部们希望他讲些什么。

“林办”秘书张云生到会上作了调查。他回来后向林彪作了汇报说，与会干部最关心的问题有两个：一个是对当前“文化大革命”的形势普遍感到忧虑，究竟应当怎样看?另一个是军队介入地方运动后，遇到了许多复杂的情况和问题，究竟应当怎么办?

希望首长讲讲这两个问题。

坐在旁边的叶群插话说："部队中有许多人对红卫兵造反看不惯，对一些老干部被打倒不理解。我看这是个思想问题得解决，需要好好讲讲。"她笑眯眯地转向儿子问："你说呢，老虎？你是红卫兵，你最有发言权。"

林立果歪着脑袋，用斜眼望着叶群说："我看这是个感情问题，态度问题。对老干部看成一切都好，对造反派看成一切都坏，这是什么问题？"

叶群接着说："这是没有阶级观点。"她望着林彪，"应当专门讲讲阶级观点问题。"林彪听了大家的议论，拍板定案："好！就讲这三个问题：第一，讲主流和支流，也就是形势；第二，讲讲阶级观点问题；第三，讲讲军队的支左。讲这三个题目，你们帮助拉个条子。"

叶群说："秘书忙不过来，时间紧……"她指了指林立果说："为什么不用用我们的老虎呢？他是红卫兵，对文化大革命有感情。叫他帮你想想怎样讲形势，不是更好？"

林彪高兴的说："那当然好！"

林立果得意洋洋地说："形势部分，我包了。"

叶群也满有把握地应承道："阶级观点这一部分，我负责了。剩下的第三部分就由秘书们负责了。"

林彪点头表示："可以。"

3 月 20 日上午，在京西宾馆的小礼堂召开的军以上干部会议上，林彪围绕"阶级、阶级斗争、阶级观点"、"主流和支流"、"军队支援地方"这三个问题作了长篇讲话。不过他没有按照老

婆、儿子以及秘书为他准备的讲话稿讲，而是依旧沿袭他的一贯做法，根据自己的思路泛泛而谈。

林彪说："整个的社会，几千年来都是处在阶级、阶级斗争中。阶级斗争通常采取三种形式来进行，一种是思想战线；一种是政治战线；一种是经济战线。可是这三样不是孤立的，而是互相渗透，互相影响，有的时候以这一个为主，有的时候以那一个为主。"

林彪要求用阶级斗争观点来观察、对待"文化大革命"中发生的所有事情，"不然，我们老是犯错误，老是跟不上。""我们要主动进攻"，"刮它 11 级、12 级的台风，来摧垮他们"。

"……从我们党内，毛主席和刘、邓，谁是谁非呢？那毛主席是正确的，是代表革命的，代表无产阶级的。而刘邓呢？是不革命的，代表资产阶级。一个要向社会主义前进，一个要向资本主义前进，所以又产生了激烈的斗争。……因此，文化革命是很重要的大事，关系国家命运、关系人类的大事，是阶级斗争，是一个阶级战胜另一个阶级还是被另一个阶级所战胜的问题。"

"第二点讲一讲主流和支流的问题。……现在我们来看，这次文化革命到底是主流是主要的，还是支流是主要的？我们可以说主流是主要的，我们说这场阶级斗争中间，我们打了大胜仗，大胜利，中国人民的大胜利，人类的大胜利，这个必须要有一个总的看法。……所受的损失，少数人觉得很大，但实际上比的时候，不但不及于一个解放战争，一个抗日战争，而且不及于一个战役。……毛主席从头到尾强调文斗，但是自发地用了武斗，死伤的总数还赶不上一个战役，甚至赶不上一场流行病，也赶不上一次天灾、水灾、旱灾，所以损失量最小、最小、最小，而得到

的成绩是最大、最大、最大。……我们看到，打倒这些大批的坏家伙，这是多么大的胜利！伟大的胜利！如果不打倒他们，将来大流血，还要实行白色恐怖来镇压，不晓得杀掉好多人，或者用战争来反抗他们，推翻他们，还要死好多人，所以这一主流和支流在这一点是很清楚的。”

“第三个问题是讲军队支援地方的问题……刘、邓他们是犯了错误了，搞了刘邓路线。现在我们军队出马，全国各地都有，现在有些地方已经实行军管或接管，已派去很多干部，十七年来还没有这么干过呢。这个事情，要看到有一种危险，有犯错误的可能。这个错误一犯那，比刘、邓还厉害，是带着枪杆子的刘、邓路线，比没有带枪杆子的刘、邓路线那还危险。”

“要站稳阶级立场。站稳革命的无产阶级的立场。这样子，支援就是好事，不然，不是支援，而是帮倒忙，而是去镇压群众，镇压干部，刮邪风，起逆流，那就危险啊！那就比刘、邓路线危险的多啊！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要有很清醒的头脑，出来不能有一点含糊。但是左派、中派、右派常常搞不清，本来想支持左派，结果支持了右派。”

“这个开枪，这个抓人，还有其它一些政策，都不可以随便搞的，不能随便抓人，的确查清楚了，是反动的头头，不得已才抓起来，一般的要少抓，我们固然要有专政的一面，但是我们已经是一个专政的政权。我们边要实行这个政权，实行这个政权的这种职能。但是多抓不如少抓好。但必须要抓的一定要断然抓起来。就开枪呢？恐怕一般的都不要开枪。军委签署的那个几条关于开枪不开枪的问题可以照那个办。但是总的精神就是不要开

枪。有什么了不得的情况呢！用不着开枪，很不得已的时候才开枪。就是开枪这个事情好些个同志要求要开枪。好些个同志心情急要开枪，可不能那样，要造成大血案。打倒顽抗的反动派可以，但是，也很可能打到了很大量被反动派欺骗的革命群众，那就糟了糕了。”

林彪说：“总的方面还是抓革命，促生产。不要只抓革命，不促生产了，把生产停顿下来。也不要只搞生产，把革命停顿下来。我们应该同时进行，而且应该以革命来带头，来挂帅，来促生产。”

和历次林彪的讲话一样，这次林彪依据工作人员提供的素材，靠自己拉的条子，对当时的文化的大革命做了一次极有辩证含义的讲话。

林彪讲话时，周恩来和老帅们都到了场。

毛泽东没有出席会议，但是很快就听了林彪讲话的录音。当天下午，毛泽东就此讲话写信给林彪：

“林彪同志：看了一遍，很好，请交文革小组加以斟酌，然后可印成小册子发给党、政、军、民的基层。我作少许几处修改，是否妥当，请酌定。”

后来，林彪的讲话再次受到毛泽东的高度评价，毛泽东说：

这是一个很好的报告。

一、依靠群众。这一条是主要的。我们都是从群众中来的嘛！群众就是工、农、兵、学、商。中央办公厅所属机关的干部都是群众嘛！工作主要是群众作的，靠少数领导人是不行的，也是不够的。哪一样也不能离开群众，要有群众观点。

二、依靠军队。我们的军队不仅会打仗，而且会做群众工作、宣传工作、生产工作等。军队内的很多干部，从小参加军队，很少读书，文化是在部队慢慢提高的，思想比较单纯。军队与地方不同，没有地权，没有财权，说走就走了。省里有地盘，军队没有地盘。军队还有一条，组织性纪律性强，动作快。如沈阳军区的支左、支工、支农经验，中央批转以后，全军二十一天内就行动起来了。如果是地方，传来传去，动作很慢。

三、要依靠干部。干部绝大多数是好的。很多事要让干部去办，政策靠他们去执行。有些省委书记要赶快解放出来，要他们好好检讨。有的省过去犯了错误，就是因为他们害怕群众，动员一些人去“保护”他们，结果害了自己。

他指示要把林彪的讲话录音大量复制，发给全国各地播放。

3 月 20 日下午，北京“批谭联络站”在北京工人体育馆召开了“彻底揭发谭震林资本主义复辟罪行大会”，80 多个单位，14000 多人参加。会上提出了“反击二月逆流”的口号。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等领导人出席了会议，周恩来代表毛泽东和林彪，代表党中央、中央军委和国务院讲话，表示最坚决地支持革命群众反击“二月逆流”的斗争。

## 第 553 回：□□江，□委会正式成立　见财贸，周恩来再说夺权

3 月 20 日晚，在人民大会堂小会议室，周恩来、康生、陈伯达、肖华、王力、关锋、穆欣等接见黑龙江全体汇报团。周恩来说：

“黑龙江省革委会成立后还没有见过。一个是领导问题，一个是要扩大的问题。我们提议，你们来信也同意我们的意见。我们同意以潘复生为主任，汪家道为副主任的革命委员会。”

周恩来这里说的“你们来信”是指 3 月 18 日由潘复生口述，范正美执笔写给中央的关于由潘复生人黑龙江省革委会主任的报告。

之后，周恩来就有关问题作了具体指示。

关于三结合问题，周恩来再次重复了干部政策，强调了军队的作用。

对革委会的组织问题，周恩来说：“哈尔滨的大中学生都尽了力，潘复生、解放军都支持了你们，夺权斗争胜利了，但在组织上没解决。有人原来打算让潘复生、汪家道作顾问，经宋任穷说服，才做委员了。我们很久就想解决这个问题。以前潘复生一再说条件不成熟，现在条件成熟了，解决了。革命委员会要扩大，17 个人太少了，根本不够，不能全面反映黑龙江省的情况。要有五、六十人差不多。别的地方，大庆、煤矿都要有名额。现在齐齐哈尔、富拉尔基都没有。工人造反派名额要增加。学生是文化大革命的主力，现在名额少一些。中学生也是一个方面。黑龙

江省是个重要农业生产的省份，很大数量是农民，要有他们的代表，至少大的农场要有一个代表。现在还没有搞起来，名额可以空着。现在反映的只是哈尔滨附近的县，革命委员会成员哈尔滨的多。要有工农商学、服务各行各业的人，军队相应也要扩大。领导干部比例太少些，只有两名。地专、厅局长以上干部总会有些人站出来的。你们过去对他们要求严，是好的，但过分严，就不符合毛泽东思想了。不是主要错误，可以帮助教育他们。一般干部都是文化大革命中的错误，彻底检查就行了，不必联系历史。现在不是审干，不要调查他们历史，如果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有历史问题，不仅要联系历史，而且可以调查他，搞他的专案。黑龙江省搞五、六十人才能反映全省情况。可以设常委，人数自己考虑。”

“在革命委员会里可以设党的核心领导小组。党政一元化，这是临时性的权力机构。核心小组要有新生力量，也要照顾各方面，自己研究。”

周恩来讲完之后，一个个征求其他领导人讲话。只有康生讲了几句。他说：“要写文章，文化大革命嘛。在这方面，你们黑龙江省还要加强。要向上海学习。我看你们黑龙江的文章太少。”周恩来又补充说：“对啊，你们还要多写些好文章，希望在报纸上，能看到你们的好文章。”

3 月 20 日，中共中央批准黑龙江省成立革命委员会，潘复生为主任，汪家道为副主任，范正美等为常委。3 月 23 日，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发出通知，从该日起，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改称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同时下属的政治

委员会、生产委员会、群众工作委员会、人民武装委员会、办公室，开始启用新印章。范正美被安排到政治委员会工作，任副主任，协助主任张多树工作。

3 月 20 日晚上，就在周恩来接见黑龙江汇报团的同时，国务院财贸系统群众组织代表和财贸各部党组成员也在国务院小礼堂等候周恩来接见。他们一直等到 21 日凌晨，周恩来、李先念才走进小礼堂。周恩来首先表示歉意说：

“同志们，很对不住大家，昨天晚上大家呆了半夜，昨晚搞了两个座谈会，搞了一个是黑龙江的，一个是安徽的，继续下去就不行了。财贸系统座谈会是最多的了，你们自己能解决的问题，还要找我。现在怎么谈法？你先谈还是我先谈。看来财金学院‘八八队’的大字报提了一些问题，我来解答，你们同意不同意？当然有些不是属于我答复的，财金学院‘八八队’，有一个批判分队的‘从来急’纵队、‘匕首纵队’、‘追穷寇’分队，转抄了一些东西，是 3 月 17 日的东西，时间比较晚了一点，问你们的意见，是我问你们问题呢？还是你们提问题我解答？”

大家纷纷说：“请总理讲！”

周恩来：“好！我讲，你们事情比我知道得多，有些问题，你们比我知道得多，我找谁去问问题呢？这 25 个问题，如果可以答复，要我讲，我讲也好，对形势有好处，这样也可以节省时间，街上有大字报、小报。”

周恩来首先肯定大家提出的，是否有“毛主席在接见张春桥同志时说，今年三、四月是决战时期”这句话。他说：“主席讲话登报了吗？没看见有，大概是传出来的。有这么回事……”接

着他回顾了文化大革命的历程，说：从“去年 6 月发表了聂元梓的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轰轰烈烈，运动本身就是思想革命，十六条讲的是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前 7 个月是思想准备，树立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揭露了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林彪同志的号召，展开两条路线的斗争，革命造反派从政治优势渐渐转入组织优势，保守势力逐步缩小，在斗争中造反派的旗帜举得更高了，不仅从思想上作了准备，而且从组织上作了准备，这是第一阶段。”

“一月革命风暴是从上海刮起的，开始了第二个阶段——夺权斗争。”“这个夺权斗争，并不是说一些地区，一些企业单位，机关，团体都要夺权，这样就不是一分为二，这就没有阶级分析了。夺权是夺应该夺权的地区，企业单位，机关，团体的权。但是这必然会有连锁反应，农村不该夺也连锁反应了，这些 1 月份给你们座谈了，2 月份也讲了连锁反应，所以势必带来连锁反应，必须要有精神准备，当时设想夺权斗争在 2、3、4 月份可能看出一些眉目，这是毛主席说的。现在看来，可能时间还要拖长了，到 2、3、4、5 月份。所谓决战，从某种意义上说，跟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斗争，跟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斗争就是决战，不是一切都解决了，所以主席讲，明年 2 月、3 月、4 月看出结果。”

“最近中共中央发了通知，大队，生产队春耕大忙，不进行夺权，2、3、4 月不能普遍铺开夺权。中央机关里夺权斗争已经进行两个月了，现在眉目还未看清楚、企、事业单位更慢了一些，为什么这样？因为是史无前例的运动，最高统帅提倡的由下而上

发动的，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保卫下，没有历史经验可学，自己摸索，对形势只能作一般的估计。主席当时说 2、3、4 月有个眉目，真正完成还是要看明年 2、3 月，一年才能看出来，不是由时间的长短来决定的。”“时间的长短有偶然性，看工作做得好，时间就短一点，工作差一点，时间就长一些。”

“同志们很着急，何必着急，急不行。现在同志们提出问题，觉得 3、4 月是决战，现在在房子里坐不住了，给我写信，今天是 3 月 21 日，等不及了。”

“应该夺权的地方都得三结合，我从 1 月份，就讲三结合，首先在财贸口讲，在外事口讲，直到现在还没树立起一个典型，不能责怪谁，不是这里出毛病就是那里出毛病，没有经验，我们两个月也在摸索，不断总结，不是这两个月过去了，决战的日子就没有了。全国 29 个省市，我现在给你们讲一讲，全国准备夺权的有 7 个，还有 7 个还不明朗，10 个军事接管，5 个夺权，共 29 个，这是全国的情形。到 5 月份时间就差不多了。现在已经实行‘三结合’有临时权力机构的，有上海、贵州、山西、黑龙江、山东 5 个单位，5 个单位建立了临时权力机构革命委员会，就这样，拿黑龙江讲，革命委员会，昨天晚上谈之前还没有正式成立，一个夺权组长不是领导干部，一个组长是哈尔滨师大的学生，两个副组长，一个是工人，一个是哈尔滨工大的学生，而不是革命的领导干部，虽然省委第一书记潘复生已经站出来了，军区负责人支持革命造反派负责夺权，原来夺权只请他们作顾问，我解释了，才参加三结合做委员，直到这时才通，因为革命的学

生说，如果让他们做组长，我们就变成阿斗了。怕做阿斗，就不要诸葛亮了。当然不是所有的领导干部都是诸葛亮。”

“北京也是准备夺权的单位之一。召开大专院校红代会，就准备夺权，在主席那里汇报，主席说为什么光开大专院校红代会，不开工人代表会，贫下中农代表会，中学生红代会，革命干部代表会呢？过去中学生批评我们只注意大专院校的工作，不注意中学生的工作，三个代表会最近准备召开，开农代会、工代会、中学生红代会，既然开了都是革命造反派大会，三个代表会先分别开，然后再合起来开全体会，成立革命委员会，再开个群众大会祝贺。上海来得快，工人提倡议，后来不叫上海公社，怕全国都照抄。国家名称也得改变，改成中华人民公社。这没有必要，后来改成革命委员会了，天津也筹备，也在开各种会议。”

“抓革命促生产，这是主席的号召，去年生产是好的，农业工业都超额完成了计划，粮食、棉花、油料作物，经济作物都超额完成计划。今年就应该继续增产。工业快过第一季度了，必须抓紧，生产必须抓，如果生产停顿了必须用军事接管来解决。但不同于解放初，1949 年是由农村到城市，但没有形成群众性的自觉的行动，现在是共产党、毛主席领导，群众自觉起来行动，夺权的基础是好的。如果条件不够，一个地区的工作瘫痪了，可以通过军管来促成三结合的领导机构，这是过渡的办法。”

谈到财贸口的夺权，周恩来说：“业务怎么办？一月中，我建议大家监督业务，中央各部直属中央，是中央的权，有许多机关是机密单位，如外交部，财政部，公安专政等更是中央的，外贸部一部分银行，金库大权，都不该夺，除去让大家监督业务。

一月中试验可以，现在还可以监督，二月中出了毛病。中央调查过，泄密很多，对外经委，对外援助项目，不该公开的公开了，再不限制要超过。财贸口表现在财政部，是不容忍的，上次有许多预算机密，预算分配，做什么事，实际上都极端机密的，监督的都看了。这些东西在党中央只能政治局常委同志才能看，政治局委员也不看，不要说中央委员。”

“我们没料到监督组都看了，原因是主管的长字号都靠边站，阻不住了，青年没重视，犯了这样的错误。外交也有，银行也有，极端机要的材料要弄走，弄走了我们要负责，为什么不抓呢？17 日不能再等了，如果不是杜向光他闯进来，他来抵抗，现在造反派的信，还在手里，让他们去反省检讨，还没有回答我。财政部杜向光和造反派走到那样极端，是我们不能容忍的，是党和国家不能容忍的，今天我还要讲，已经晚几天了，再晚了就要违背最高指示。许多同志不清楚后果，如不过问，过错太大了，不过问，我就辜负党和国家的委托，就要犯罪，我过问晚了几天因为忙开会了。因为这些事情超过了监督范围，为什么我对杜向光管得那样严呢？因为他是副部长，他知道嘛，财政预算要出去，他拒绝召开党组会议，就不能容忍，这就不能不引起我的警惕，那次取得造反派的支持，财政部当时超过了监督范围，今后对外贸口应规定个范围，整风中提出要求，自己整风提出办法来，夺权斗争的基础吗！你们要联合起来，事情发生后，财政部‘革命造反司令部’垮台了，但战斗组还存在呢！事先我不知道，先念同志也知道晚了，后来方知道。‘司令部’的问题，你们自己解决，可以搞联合机构，希望革命组织还是要联合起来，尽管战斗

组在行政单位，上面还是要搞联合组织。”

“夺权应本部为主，中共中央 2 月 21 日有通知，中央和地方一切需要夺权的机关、企业、事业单位都应以本机关单位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为主进入夺权斗争，外单位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在必要可以协助，不可包办代替。党中央各机关、国防工业各部，公安部、外交部、计委、经委、建委、科委、财政部，各地银行，《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新华社、广播事业局和各地广播电台，不许由外单位人接管。已经进入各机关的外单位人员要立即退去。”

“关于陈云批判问题。对中央常委陈云同志的批判，这次文化大革命他没有参加，过去的，我所知道的，财贸上没批判，只是吴波同志写了一个材料。”

周恩来问吴波：“写了吗？”

吴波回答：“写了。”

李先念插话：“姚依林也写了。”

周恩来：“吴波只能写他所知道的，中央的他不知道。中央常委内部的问题，由中央决定，我不能回答，不能把中央常委内的事说出来，你们可以结合本单位领导进行批判。如财政部，商业部，银行，粮食部，供销总社等 7 个单位不能所有的领导都接触，中央常委没有决定拿出批判陈云材料，我不能回答。你们问阻力，我不好回答，陈云这个人思想是右的，这许多人可能知道，有的人去陈云家抄文件，不是财经学院的。”

代表们说：“是哲学科学部的。”

周恩来：“当时我打电话都不灵，陈伯达同志就亲自出马，

去保护中央文件，把文件拿到中南海了。毛主席没决定，当然要负责保护。随便抄家，打、砸、抢、揪、抓是不允许的。”“什么‘革命的打、砸、抢万岁！’打、抢、砸还有革命的？”

工商管理局问：“请总理明确，许涤新到底算统战部的还是工商管理局的？”

周恩来反问：“许涤新不在统战部吗？”

工商局说：“运动中统战部搞的很厉害，他跑到了工商局。”

周恩来：“那你们工商局不成了防空洞了吗？许涤新这个人我认识，这个人资产阶级思想很严重，我看你们可以批一批。 ”

工商局：“我们人太少了。”

周恩来：“你们不说没事干吗？可批一批。财经学院不是说冷冷清清吗？可以去帮一帮忙。许涤新是我一个老朋友，很可以批判，这个人是老教条，是修正主义教条，研究了三十年代的经济学，他的东西我有一大堆。他写一本给我一本，最近他们夫妻还给我写了一封信，我还没看呢？ ”

“财经学院和《前进报》帮助他们批深。这个人是教条主义，但他比薛暮桥轻一点。薛暮桥的东西一看就使人发困，干巴巴的。许的文章我还喜欢看。你们写一本批判许涤新的书，我倒愿意看一看。”

“这次文化大革命红卫兵小将查出一批叛徒，这是小将们的功劳，这是很大的收获，我们向红卫兵小将学习。历史上犯了左倾、右倾的错误，这是一般的，也搞了一批叛徒，这是严重的，去年我在政治局会议说过，瞿秋白临死前写了《多余的话》，这是李秀成一样的东西，是叛徒的自白书。最近又发现他枪毙前给

反动当局写了一封求饶信。他是个叛徒，对这些人应重新做评价。我也是受戚本禹同志的启发。青年历史学家，戚本禹同志发现了李秀成的问题，年轻人启发了我们这些老头子。”

商学院代表说：“商业部党组恢复活动以后，就到处追查政治责任，我们对姚依林很有意见。”

周恩来：“姚依林我倒是有点意见。你们有什么错误？就是那个通缉令不好，当面谈谈算了。”

同学：“我们要炮轰姚依林，到商业部去闹一闹。”

周恩来：“我同意炮轰。”

同学：“我们要炮轰炮打。”

周恩来笑着说：“炮轰炮打是一回事嘛！到商业部去闹一闹也好，但要一分为二，业务时间不能闹，不要影响业务，一星期留两三天闹一下可以，业务时间外搞文化大革命。”

商业部造反派李尚平司长：“总理在 2 月 17 日讲话对我们的批评完全正确，给我们指出了方向，但先念同志在会上说了一些气话。你是国家副总理，应该对革命负责，不该对革命说气话，你讲了气话，我们造反派回去后，受了很大压力，希望先念同志今后不要对革命说气话。”

周恩来：“这个意见很好嘛！”

李先念：“我已经道歉。”

周恩来：“现在外边印小报，哪来的纸？二分钱一张，好多是道林纸，用那么好的道林纸印群丑图，这是丑化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党嘛！当然这些东西是坏的，但也不应这么搞嘛！这要追究一下责任。”

同学问："我们炮轰李先念的大标语是否可以上街？"

周恩来有些生气地说："我不能回答，你们叫我怎么回答呢？你如果非要问我，我是不主张大字报上街的，但我们不能限制你们，现在大民主嘛！现在街上的许多大标语，不都是我同意的。他是我的副总理，中央还信任他嘛！你们的问题我不能回答，我是中央常委嘛！你们提问题经常使我为难，你们要考虑我所处的地位。我们已经半年多了，得有个起码的信任。你们总说我和中央文革口径不一样，就是不一样嘛！你们要揪刘少奇出来斗，当时也不是我一个人保，我对他有什么好感？你们要考虑我的地位吗！"

同学们说："时间不早了。"

周恩来笑了笑说："我看还有什么账没还，今后贴我的大字报，正面反面我都不主张，一贴又好像我有什么问题似的，能够回答的我都回答，不能回答的我不回答。财贸口要召开大会，李先念同志做检讨，我要参加，早就答应了。我不去就不应该嘛！今后一些小事，就不要找我了。"

同学们强烈要求让周恩来休息，在掌声中周恩来、李先念离开会场。

## 第 554 回：抓试点，天津五代会成立　毛泽东，接见军以上干部

2 月 12 日，中共中央军委命令天津驻军 66 军军长郑三生兼任天津警备区司令员。13 日晚，天津警备区司令部接管天津市公安局，成立天津市公安局军事管制委员会，对市公安局各级机构派出军事代表，实行军事管制。同时把公安局“121 夺权”定为反革命夺权，把带头夺权的公安局“政法公社”定成反动组织，将支持“政法公社”的公安局领导、天津市委书记万晓塘的妻子张露等人抓了起来。参加公安局“121 夺权”的其他群众组织全部撤出，不再追究，予以解脱。2 月 15 日上午，在体育馆召开批斗“政法公社”大会。将“政法公社”称为“万张反党集团的复仇军”。

2月21日 天津市物资管理局向解学恭报送《关于我市工业用煤严重不足的特急报告》。内称：工业用煤国家不能按计划供应，库存急剧下降，势将出现全面停产的局面。建议全市机关、团体、企业等取暖用煤一律停烧；供应市民的大同、阳泉块煤暂时停供。

66 军开始支左以后，就按照中央的要求，酝酿全市的大联合。他们在河北宾馆召集天津市电业局所属发电设备检修大队电机中队实习技术员林启予，天津大学“八三一”的杨长俊和南开大学于泽光，反修锦纶厂张承明和“劳二半”的郭长年，河北大学“八一八”的张崇俭和新冶金的代表王洪章，“公安造总”的侯振江这几个天津著名的群众组织头头开会，另外还有“市联委”的巴木兰，作为机关干部的代表参加。3 个地方领导干部：解学

恭、江枫、胡昭衡；还有 3 个军队领导：郑三生、杨银生、肖思明和他们一起商量研究天津的大联合问题。

会上只有张承明和林启予两个人发言。张承明的观点是：主张跨地区、跨行业、跨部门的大联合，凡是造反派都要联合。林启予的观点比较倾向贵州的联合模式，主张按行业、按系统的联合，好操作。别的人都没有表态，会议也没有做最后的结论，只是成立了“大联合联络站”，在常德道2号继续办公。其他代表会后又回到各单位。

根据张承明的意见，由“支左联络站”出头组织，全市28个单位系统的群众组织参加，于2月26日在民园体育场召开5万人参加的“批判万晓塘、张淮三集团大会”，批斗“政法公社”及张露等人。解学恭、江枫、胡昭衡和原河北省军区政委、时任新疆军区政委的肖思明、天津驻军66军军长郑三生、政委杨银生等人也都出席。张承明是大会执行主席，林启予负责大会组织。这个大会名为批判“万张反党集团”，实为天津“三结合”亮相大会，解学恭、江枫、胡昭衡和部队干部肖思明、郑三生、杨银生等人的公开亮相，等于向社会公开了天津参加“三结合”的地方和军队领导干部名单。会上宣布全市的造反派大联合，会后在和平路举行游行，军队在前边开路，一时间搞得轰轰烈烈。

3 月 3 日，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天津“支左联络站”筹划成立“三结合”夺权筹备工作领导小组，又把 32 个单位的群众组织头头召集到河北宾馆，宣布成立天津“三结合”夺权筹备工作领导小组，华北局书记处书记解学恭任组长，新疆军区政委肖思明任副组长。筹备小组由 15 个人组成，军队领导 3 个名额，地

方领导 3 个名额，群众组织代表 9 个名额。“支左联络站”为了充分发扬民主，在酝酿名单时，组织了大小会交流。

就在分组酝酿具体名单时，天津大学和南开大学的学生突然揭发张承明保张淮三，理由是：张淮三押回天津以后，没有交给群众批斗，而是放在他们厂里好吃好喝好待遇。

张承明是工人，又是中共党员、复转军人，本来已经是亮相的人物了，最早起来造反，2 月 26 日民园“三结合”亮相大会的执行主席……本来进筹备组非他莫属。可是经天大、南大学生这么一闹腾，他的威信大打折扣。全员无记名投票结果：38 个代表，张承明只得了 17 票。结果，选举出来的 3 个工人名额，一个是技术员林启予，得了 26 票，名列第一。另两名实际上都是干部，一个孙长瑞，是二轻系统的政工干部，还有王洪章，是冶金系统的宣传干部。没有一个是纯粹的工人，而真正工人成分的代表张承明反而落选。

这时，根据周恩来的电话指示：天津市要做一个试点，成立五代会，即：工人代表大会、革命干部代表大会、贫下中农代表大会、大专院校红卫兵代会、中学红卫兵代会，简称工代会、农代会、干代会、大专院校红代会、中学红代会，也称“五代会”，并在此基础上形成大联合。

筹建工代会的任务交给林启予，他提议，把张承明请进筹备组当个副组长，支左的解放军批准后，张承明也来上任了。确定参加工代会的群众组织，所有的系统都顺利通过了，可在“641”大港油田的问题上出了问题。当时的“641”属于半军管单位，早就被部队保护起来，但是一样有两派，一派是“五一”，另一

派是“大联委”。“五一”这派复员军人多，得到部队的支持；“大联委”是老工人多。两派斗得很厉害，合不到一起。联合调查组的意见：同意部队支持的“五一”，林启予也同意。而张承明支持“大联委”。当然是多数人的意见占了上风，最后“五一兵团”被吸收为工代会成员。

市工代会成立大会于 3 月 15 日在体育馆召开，开会那天，华北局第一书记兼北京市委第一书记李雪峰到会参加，与会人员都感到突然。其实，早在 1966 年 12 月 29 日，毛泽东亲自批转了李雪峰在北京的检讨的同时，就决定派李雪峰到天津去解决一下天津的问题。但是李雪峰到天津的事并未对外公开，因此天津也很少有人知道。

工代会成立大会张承明没有参加。大会结束后，当与会人员走出体育馆时，一下都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只见体育馆周围贴满了大字报和大标语，大标语上赫然写着五个大字：“打到李雪峰！” 落款是：“反复辟”。

原来，这是张承明公开站出来另立山头，要和“五代会”分庭抗礼了。早在 3 月 14 日下午，北京的一些学生就和天津反修绵纶厂、天津机车车辆厂等单位的群众组织在天津和平区营口道开会，准备晚上搞联合行动，贴出“打倒李雪峰”的大字报。3 月 15 日凌晨 2 时许，和平路就已经开始行动。

但是，天津支左的解放军支持李雪峰。毫无疑问，这是中央的精神。

3月15日，天津市夺权筹备工作领导小组宣布：天津市工人、农民、大学红卫兵、中学红卫兵、干部等5个代表会议筹备小组

成立。

中学红代会筹备小组负责人是十八中任学明，他从北京回来后说，中央支持李雪峰。

17 日下午，一中学生王如、胡国镇、张阿平等人为中学红代会的问题，去中学红代会筹备组闹事，打了任学明一耳光，抄走了大印、书包和一些文件。第二天上午，一中在学校大操场开会，军训团长把 17 日下午王如为首捣乱红代会一事告诉广大师生，说红代会是解放军支持成立的，他们的所作所为就是对解放军冲击，是反动行为，要揪出后台，要他们向全市红卫兵检查，上纲上得很高。

这天上午 10 时，在体育馆召开大专院校红卫兵代表大会，肖思明、郑三生、解学恭、胡昭衡出席，受到热烈欢迎。但是，大专红代会没有天工“八二五”和原天津师范大学，此时更名叫东风大学的“东大造反兵”。

3 月 20 日，已经成立的工代会和大专院校红代会以“五代会”的名义在中心广场召开批判刘邓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大会。开会之前，天津市公安局长江枫把天津体育学院的许光黎叫过去交代了一番。结果大会一开始，原定的发言的次序变更了，南大“八一八”头头陈相文的发言被排到了最后，下边出现了一些躁动。后来在呼口号时，其中有条口号是：“1.21 政法公社夺权是反革命夺权”，结果把其中的“政法公社”四个关键字给丢了，变成了“1.21 夺权是反革命夺权”。因为当时参与公安局夺权的单位很多，其中包括天大“八一三”、南大“卫东”等组织。军管以后，已经把社会上的其他参与单位都解脱了。但解脱了并不

意味没参加，总是一个敏感的话题。因此，这个口号一喊，无疑触到了一些人的痛处，会场一下就炸了锅！学生可不听那一套，主要是天津大学的学生，呼啦就涌上了主席台，连喊带砸，把大会给搅了。

3 月 21 日，中学红代会于下午 13 时许召开。至 22 日，天津市 5 个代表会议全部召开完毕，天津的“五代会”由此产生。

“五代会”成立以后，天津一片欢喜，虽然也有一点小乱子，大字报、口头辩论不断，但问题不大，也无妨大局。但“五代会”内部依然是各种观点错综复杂，纠缠不清，还经常搞出一些摩擦。

暂放下天津，回头看看北京。

3 月 21 日，毛泽东、林彪接见全军军以上干部会议全体人员。 拍照之前还是按职务正军、副军、工作人员依次鱼贯而入。突然，不知是哪位副政委说了句：“这个时候不能学雷锋了……”大家一下就乱了，蜂拥而入，争抢前排位置。开是照相时发觉椅子不够，叶群站到林彪身后，吴法宪也站到了后排，工作人员劝他两人下来就坐，两人就是不下来。周恩来只得点名：“胖司令你就别谦虚了，当心把那架子压塌了。”

众军头尽力往中间挤，65 军军长成少甫见 67 军长李水清和副政委间尚有小空隙，硬挤了进来。这边，周恩来身后又冒出个脑袋。

这时林彪突然起身向东大厅北端的大屏风，军姿极好地敬了个相当标准的军礼。众将领还没明白这么回事，毛泽东从屏风后走出来。指挥队形的叶剑英也担心胖司令压塌了台，在喊：“吴司令快下来。”

毛泽东问："哪个司令？ "

有人回答："空军的吴司令。"

毛泽东说："下来嘛。"

叶剑英整好队，可他的位置被周恩来坐了，叶剑英岂敢造次，去拉周恩来，周恩来说："你坐吧，今天是军队的会议。"

叶剑英又劝了好一会，周恩来未动。

3 月，康生根据北京航空学院"红旗战斗队"等 6 个组织搜集的关于刘少奇历史上被捕的材料，给中共中央写了一份报告，建议对刘少奇进行专案审查。3 月 21 日 19 时 30 分，毛泽东、林彪等中央政治局常委接见军以上干部会议与会人员后，留下来议论一些问题。议论中有人提到"刘耀祖案中涉及刘少奇在 1927 年叛党嫌疑问题"，经研究，决定把这方面的材料交"丙组专案办公室"，即"王光美专案小组"的办事机构"调查研究"。据戚本禹回忆，这项工作当时指定由康生分管，议论时没有记录，后来也没有形成文件或会议记录。

事后，康生特地让工作人员手写了一份备案性质的"关于专案问题纪要"，其中说："汇报中涉及到有人控告××自首叛变和刘耀祖案中涉及刘少奇在 1927 年叛党嫌疑问题。共同研究之后，决定："*"关于刘少奇 1925 年在长沙被捕、1927 年叛党嫌疑及 1929

年在沈阳被捕等材料，交丙组专案办公室调查研究。”康生亲笔在这份材料的下面注了一行字：“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五日林彪、恩来、伯达、康生都看过。”

3 月 21 日晚，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召集会议，听取周恩来等人汇报为 2 月 16 日怀仁堂会议召开的七次“政治生活批评会”的情况。

## 第 555 回：三二一鄂军区再发《通告》听汇报，□、交、邮准备军管

武汉军区继 3 月 17 日逮捕武汉“工总”负责人后，又于 3 月 21 日发布《中国人民解放军武汉部队通告》，又称《321 通告》。该《通告》认定“工总”是反革命分子操纵的组织，诉说“工总”十大“罪状”，宣布将这个武汉最早、最大的工人造反组织及其所属组织全部解散。武汉军区要求武汉“二司”头头交出《二. 八声明》的炮制者，并布置各公安分局调查“二司”大小负责同学的家庭历史、社会关系。

紧接着，武汉“九一三”、“红工兵”、“红教工”、“817”等组织也被解散，湖北省黄石市、天门县等市、县数十个群众组织被宣布为反革命组织或被强迫解散，1300 多人被逮捕。与此同时，武汉军区向各厂矿企业派出大批的“军代表”。

3月21日当天，武汉“二司”司令部负责人排着队打着黑牌上街请罪。

3 月 21 日这天，武汉部队对武汉市公安局、检察院、法院实行军管。

与此同时，根据3月11日中共中央要求各省、市、自治区和地、县在农业、工业、财贸各方面成立“三结合”的“抓革命、促生产”指挥部的通知精神，湖北省成立了“抓革命促生产第一线指挥部”，指定原省委书记处书记张旺午为主要负责人，解放了一大批干部。同时宣布以前的夺权一律无效。各单位原来的领导、当权派纷纷官复原职，有些领导觉得这次终于翻身了，他们

对造反派说：

“你们整了我半年，现在该我来整你们了！”

还是在这天，武汉军区空军副司令员带人突然包围了空字006部队雷达学校，宣布有1100多人参加，占全校人数的93％以上的“红色造反总部”为反革命组织，当场逮捕18人，对各级勤务员进行了斗争。

当晚，武汉水利电力学院的丁家显等人，在学院六教学楼顶丁家显住处，谈论丁家显的检讨问题。这时，学院的宋志荣同学带着几个人上楼，向大家介绍其中一人说：

“这是中央文革赴汉调查组的。”

大家互相握手。

那人问：“你们这段在干什么？”

曾文立、余杰华抢着说：“我们的丁司令天天做不完的检查。”

丁家显说：“错了就检查嘛，也不丢人。”

那人问了武汉最近的情况，丁家显说：“军区发了《二一八声明》后，尤其是阎长贵同志的电话内容传出以后，我们的队伍基本上跨了。”

曾文立插话：“丁家显快成光杆司令了。”

丁家显又说：“军区勒令我作检讨，我检讨了几次还不行。军区又发了《三二一通告》，宣布‘工人总部’是反革命组织，抓了人，说我们‘二司’比‘工人总部’更坏……”

来人听后说：“我们也知道一些情况，这是一股逆流，我们这次就是来调查这股逆流情况的。其实你们并没错。”

大家听他这么一说，又惊又喜，忙问：“到底是怎么回事？

北京情况怎么样？”

那人说：“我们是中央文革派来调查情况的，还有北航‘红旗’徐鹏飞等。我们来武汉之前，王力同志在《红旗》杂志社接见了我们。王力说，现在运动出现了新的情况，出现了逆流，遇到了阻力。伯达同志说，现在第三势力抬头，他们反对毛主席，反对文化大革命，要为刘邓翻案。谭震林是自己跳了出来。”

“伯达同志说，这股逆流实际上从 2 月份就开始了，军队对运动不理解，我们军队的一部分领导权落到坏人手里了。王力还说，他们这股势力人不少，力量还很大，他们反对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决定，反对林副主席，反对江青。”

“陈毅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就跳出来反对林副主席，当时总理制止了他。陈毅也不买江青的账。叶剑英、徐向前、李先念都是反对文化大革命的，压制群众运动。”

“现在毛主席、中央文革还处于少数，文化大革命处于生死决战的关头，是两条路线、两个司令部的决战，有人说是新文革与旧政府的斗争，斗争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命运。我们要用鲜血和生命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革命路线、保卫中央文革。”

这真是一个惊人的消息，丁家显他们送走中央文革赴汉调查组的人后，都认为“现在文化大革命处在关键时刻，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命运，是毛主席他老人家、是中央文革再次解放了我们。我们一定要用鲜血和生命保卫毛主席，不怕坐牢杀头，生为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而生，死为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而死，活着跟着毛主席，死了去见马克思。”

丁家显明确了当前的任务，就是立即拉队伍，上反“二月逆流”，下揪武汉的谭震林，为“工总”翻案。

当夜，参加这次谈话的王文忠就在学院的行政大楼门口刷出了两条标语：

“反对二月逆流！”

“彻底为工人总部翻案！”

当王文忠拿着蘸满墨汁的大刷子问旁边的同学：“署名不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战斗队’或‘井冈山兵团’，那么起个什么名字好？”

有个同学随口应道：“生死决战！”于是就署名“生死决战战斗队”。

这两条标语当即被别人撕了，说是反动标语，一大群人围着王文忠等同学辩论。

此时，“首都南下造反大队”北京大学的学生李金春等人也找到“工造总司”吴焱金，谈到北京二月大闹怀仁堂和农林口反击谭震林的情况，说：“现在有一股逆流，矛头指向中央文革，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其目的就是要否定文化大革命，为走资派翻案……”

吴焱金介绍了武汉《二一八声明》后的情况，李金春说：“镇压造反派就是这股逆流的突出表现，他们反对文化大革命总是首先拿造反派开刀，我们必须奋起反击这股逆流。”

“怎么反？”

李金春说：“为避免把斗争的矛头直接指向解放军，我们可以提出反谭震林式的人物，也就是要揪出武汉的谭震林。”

吴焱金说："还不如叫'武老谭'简单些。"

李金春说："好，既简明，又结合武汉实际，就叫'武老谭'好了。"

3月22日，武汉水利电力学院学生邓子政贴出为刘少奇鸣冤叫屈的大字报，说刘少奇在历史上有伟大的功绩，是和毛主席一个司令部的等等，当即受到同学的自发批判，有个别的同学还打了他。本来自1966年10月开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以来，刘少奇、邓小平作为这条路线的代表被打倒，已经得到社会的普遍认同。水院"红旗兵团"的学生赖文德认为，邓子政的表现是阶级斗争的新动向，也是造反派批判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反击"二月逆流"的好机会。他到现场核实情况后，立即到水院"二司"总部向几位头头作了汇报。丁家显听后对他说："此事由你去办吧。"

赖文德马上跑到学院广播台，让他们通知全院"二司"群众带上各兵团的旗帜到行政楼前紧急集合，为反对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抗击"二月逆流"，举行示威游行！

自武汉军区《二一八声明》后压抑已久的"二司"群众早已按捺不住了，听到广播，如同遇到烈火的干柴，一下就迸发出熊熊的火焰。他们打起旗帜，带上袖章，高喊着"批判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为'工总'翻案！""'二司'是压不垮的！"等口号，在水院内游行一圈，聚集了大量的学生、工人、老师、干部、中学生参加。随后，这支队伍又浩浩荡荡的到武汉大学、武汉测绘学院、华中师范学院示威游行。

3月23日，"二司"所属的武汉测绘学院、武汉大学、华中

师范学院、武汉水运工程学院、红旗中学等学校也纷纷到水院游行，声讨邓子政。游行中，他们公开喊出了“彻底粉碎资本主义复辟反革命逆流”的口号。

晚20时，“新华工”电机系和动力系的一些人也自发地组织游行，声讨邓子政。开始只有几十个人，但很快就有不少人加入游行队伍，人愈来愈多，当游行队伍到达出版科附近时，已经扩大到3000多人。 其实，这次游行的真正原因是学生们对武汉军区在“工总”和“大专院校红卫兵司令部”问题上表示出来的强烈不满。虽然武汉“三新”和军区支左指挥部进行了多次沟通，但双方各自都坚持自己的立场，始终没有达成共识。也使“三新”对武汉军区的态度从支持、信任变成了怀疑和抵制。

3月24日，湖北省公安厅逮捕了邓子政。

这两天，北京围绕打倒余秋里和几位副总理也已经争得一塌糊涂。

3 月 20 日 北京石油学院“大庆公社”贴出“打倒薄一波，揪出其死党和爪牙！”“李富春、李先念、余秋里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余秋里是毛主席点的将，我们就是信得过！”“余秋里就是打不倒！”等大标语。

当天下午，“大庆公社”等群众 6 个组织又在石油部门前发起“打倒薄一波，粉碎资本主义复辟逆流誓师大会”，并对余秋里问题展开辩论。大庆工人代表就大庆问题、北京机械学院“东方红”就一机部情况、北京石油学院“大庆公社”就石油部问题、国家计委“红色革命造反委员会”就国家计委问题与北京师大“井冈山兵团学大庆战斗队”展开辩论。

3 月 21 日，余秋里和谷牧把对铁路、交通、邮电三个部门及其所属重点企业实行军管的决定稿送到了周恩来的手中。周恩来加写了一些内容：

“在军管会领导下，成立两个班子，一个是文化革命委员会，领导文化大革命，一个是业务领导小组，统一领导本部门的生产和业务工作。”

“要正确对待干部问题，对他们要进行调查研究，阶级分析，不要一概排斥、打倒，也不要一概复职，一概结合。”

当晚至 3 月 22 日凌晨，在中南海会议室，周恩来召集铁道部、交通部、邮电部有关负责人及群众组织代表共 60 多人开会，李富春、李先念、余秋里、谷牧等及各部的党委，除停职反省以外全都到会。

首先由各部汇报情况，周恩来对各单位的广播车谈了自己的看法：

“现在有很多广播车，不去搞积压物资，而去搞广播车。建议你们写一个倡议，以后不要用广播车了，宣传我们可以步行。”

然后周恩来说：“这次请大家来要迅速解决铁道、交通、邮电三个部的工作问题。经过路线斗争，夺权斗争，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应该联合起来，特别是铁道部夺权早，院校起了推动作用，都有很大成绩。”

“徒步串连头一个就是大连海运学院长征红卫队，我们接见了，怎么讲我们不重视呢？还登了报发了社论！孙大光把这个加在中央文革的头上是反动的。”

孙大光，时任国务院交通部部长、党组书记，是大连海运学

院的上级领导。

周恩来问李先念："孙的女儿抓起来了吗？"

李先念答："已经抓起来了。"

周恩来："这是受老子的影响。"

他接着说："邮电部起来较晚，北京邮电学院进去也较晚，刚才北邮也作了自我批评。铁道部也是学生先进去的，起了好作用，应该肯定外单位的帮助作用，外单位对铁道、交通、邮电都是有功的，这点应该肯定。铁道部比较复杂，尽管有争吵，也有缺点，主要成绩应该肯定。"

谈到国务院各部的夺权，周恩来说："机关大联合都没有搞好，三结合还没有条件，三个部都不成熟，铁、交、邮刚由部外转入部内，铁道部 33 个组织观点不一致，两大派还要谈判协商。交通部也有两派，还有其他，邮电部也有对立面。革命派大联合都没有搞好，三结合问题还没有亮相。"

"邮电部两派争论那么厉害，你们都没有自我批评的精神，你们互相攻击，在中央开会对骂起来，那还行！还是个党员呢！那还行？"

"号召大联合，不要单独夺权，单独夺权不好，把其他革命造反派排斥在外就不对了，工人中有这问题，学生中也有，学生年轻，缺乏经验和劳动锻炼，所以学生必须和工农结合，单是学生在夺权斗争中容易形成派别。"

"1 月 17、18 日在人民大会堂开了两天会，有学生和机关造反派，号召大家参加夺权斗争。""那时候有人说是否普遍接管了，不是的。群众的积极因素，我们不能阻止，堵不住，而应因

势利导，所以 18 日说过要因势利导，即使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群众要夺，也可以把文化大革命权夺过来，对业务实行监督。”

“地方夺权也得中央批准，否则就成闹独立性了。中央机关，有些部门即使有一小撮也不能夺，也只能要求中央撤换。其它中央各部只能业务监督，三结合后监督业务。革委会也得摸索经验，业务还得由上而下。企业事业单位，国防的不实行夺权，如果有问题应建议撤换，要加以具体分析。”

“再回到交通部门来说，交通系统大联合既然不成熟，观点有的激进，有的缓进，大方向相同，就应该求大同存小异，这是允许的，不要天天争吵不休，妨碍业务就不行了。铁道部 3 月份发生的事故就是这样多，齐齐哈尔铁路局派别很多，3 月 8 日军管，18 日写来报告，总结事故多的原因：一、纪律涣散，不听指挥；二、派别多，一个局有 200 多个组织，经常争论，影响生产；三、有人强调破框框，随意破坏规章制度，应该作业的也不作，比如应该紧轧的也不紧了，上月把一列国际列车进错站，险些造成国际列车碰撞，如果发生碰撞，国际影响有多大！苏修就是要找这个借口。这个不怪造反的，造反中的小缺点，这为什么不可以克服呢？争论不休，年轻人多些，不要头脑热。对敌对分子要那样，对内不要那样。四、领导干部怕字当头，都靠边站了，股长以上的人都罢官，新上任的不懂业务，这样下去怎么能行呢？现在已经到 3 月 22 日了，还是做得不好，只有交通部还推选了于眉抓生产，其它的都没有。铁道部的业务监督小组的权限已经超过了，这样下去不利，因此，主席决定军管。说了这些画

龙点睛，铁、交、邮三部实行军管，最后我宣布：3 月 20 日毛主席在齐齐哈尔铁路局机务段 3 月 12 日的报告上批示说：‘一切秩序混乱的铁路局都应该实行军事接管，以便尽快恢复正常秩序。一切秩序好的铁路局，也应该派出军事代表，吸取好的经验，以利推广。此外，汽车、轮船、港口装卸也都要管起来。只管工业，不管交通是不对的。此事请你们研究。’

经我们研究，铁路、交通、邮电要实行全面军管。主要物资设备、援外、国防、航空先军管。1 月底，我的意见民航局归军队管。那样集中，但到真正实行军管时，有部分人拒绝不干，闹了几天，军事院校和工厂还是说服了，最初闹的人多，一天天闹的人就少了，闹了四、五天没闹头了，最后不闹了。现在是 3 月份了，不能再耽搁了。原来 2 月份又等了一个月，刚才大家鼓掌，可能是不会有意见。总之不能再推迟，无论如何二季度的生产要搞好。铁路、轮船、码头、汽车、港口、运输公司先搞大的，邮政先搞省会、直辖市、大的港口，至于地方还可根据需要，实行军事管制。派军管小组或委员会，由谷牧同志负责。”

“把业务系统恢复起来，但恢复不是复辟。不能通通都留或原封不动，不搞革命的三结合也是资本主义复辟。司局内可搞两结合，部内是搞文革委员会还是监督，希望在交通部门树立一个榜样。”

“如果是搞原班人马不变，原秩序也不变，那就是资本主义复辟。反过来下面夺了权不给中央打个招呼那不行。财政部有个副部长就站在造反派一边来抵抗中央的命令，那也是极错误的，但允许改，毛主席说只要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而又屡教不改的，

造反派更允许改嘛！”

“明天你们还是照常上班，原来的业务监督小组应当商量好负起责任来，要以负责到底的精神干到底。干部排队统统报到国务院来，联络员要各部都联络一下，摸典型，长字号的都要排队。”

周恩来最后问：“大家还有什么事没有？”

交通部陈少友问：“总理，我想提一个问题，有人不承认革委会，提出来解散革委会，实行军管了，我们怎么办？”

周恩来：“你们要谦虚一些嘛！遇事要和他们商量商量。”

交通部叶汇说：“革命委员会，我们不承认，一开始，他们搞的所谓‘革命生产委员会’，后来又改革命委员会，他们根本就没有监督生产。”

周恩来问：“邢顺荣不是签字了吗？！”

叶汇：“签了字，可他们根本没有监督生产，以后是不是重新组织？”

周恩来：“那就不用了，维持现状嘛！”

叶汇：“以后还是让他们去领导他们 200 多人好啦，我们不承认。”

周恩来生气了，他说：“你非要逼我答复这个问题，为什么呢？今天我讲了这么多的话，你就不理解这个精神，一点自我批评的精神也没有，那怎么能行呢！我就有意见了，我就要发脾气了。”

王振球：“总理，我们斗争孙大光，已经写了两次报告给总理，要求撤销他在党内外一切职务，叫他老实检查交代。”

周恩来说：“你们的报告，我都收到了，我正在研究。”

铁道部有位代表问："外面大街上贴出了炮轰余秋里。打倒余秋里，炮轰谷牧的大标语，是怎么回事？请总理澄清。"

周恩来说："群众写大字报嘛，我怎么好下命令叫群众不要写呢？"

有代表问："有人说，李先念、谷牧、余秋里、李富春是刘邓司令部的人，也有人说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我们搞不清楚。"

周恩来回答说："他们如果不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我今天能带他们来吗？要实事求是，不要相信传闻。"

全场鼓掌。

3 月 22 日，北京民族学院"红卫兵总部"发表声明说："李先念副总理、余秋里同志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绝对不能打倒，也不能炮轰。"并号召全体战士"立即行动起来，坚决打退社会上一小撮人掀起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反革命逆流。"

而民族学院"东方红公社"则在当天午举行示威游行，高喊"打倒李先念!""打倒余秋里!"

## 第 556 回：见大庆，北京“工代会”成立　张建旗，公开反对周恩来

3 月 22 日，继北京贫下中农代表会议召开后的 3 天，北京市革命职工代表大会召开。周恩来、陈伯达、康生、叶剑英、谢富治、肖华、杨成武、江青、关锋、王力、戚本禹等出席成立大会祝贺。周恩来、陈伯达在大会上作了讲话。

散会后，周恩来对蒯大富个别说：“你们对干部不要绝对化，要么批判不得，要么就打倒，否定一切不好，肯定一切也不对，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也不是不可以批。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就不可批，一批就打倒，都不对。打倒余秋里为时太早，我看没有什么新材料，批评肯定有。余秋里和谭震林的性质不一样。不要以为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就不能批评，说明你们红代会领导人政治上还不成熟。《红旗》第四、五期社论是两条路线的作战。对群众和干部，否定一切是不对的。对干部来说，肯定一切是错误的。”

“对于谭震林同志还要揭露批判，他的性质以后再定。”

“毛主席对刘少奇看了 20 年，等了 20 年才写出第一张大字报。对谭震林批评要深刻，他才能服。不能光贴大标语搞声势，你们光贴大标语造声势，要是小学生可以，大学生就水平不高了。”

“工厂学毛选，不能占用生产的 8 个小时。在外地调查，必须通过谢副总理批准。让余秋里和谷牧在大会上检查才能触及灵魂。65 年毕业生要回去，不要留在学校里搞斗、批、改。对斗、批、改有什么意见可以留下来嘛。毕业的问题，两个月以后中央

才能出一个文件，毕业分配自己报，大家评。”

对大庆军管的问题，周恩来召集了几次会议讨论，最后决定派一个师的兵力对大庆实行军管，并做出《关于大庆油田实行军管的决定》稿。《决定》要求：“广大职工必须坚守生产岗位，遵守劳动纪律。尚在外地串联的职工，要迅速回到生产岗位。要迅速健全和改选各级领导班子，积极恢复各级生产指挥系统的正常工作，保证生产、建设、科研、设计工作的正常进行。驻大庆油田的外地师生和职工应立即回到本校本单位。”

周恩来用毛笔在《决定》文件首页的上方空白处写道：“特急件！即送林彪、伯达、康生、剑英、向前、江青、萧华各同志审阅，再送主席批示。对于这样一个带全国性的大企业的军管，并由一个师的兵力驻在大庆，我们认为应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发布这一决定。现送上请予审批。”

文件连夜速传，毛泽东阅后批：“照办。”

3 月 23 日凌晨 1 时 30 分，周恩来、李富春、余秋里在国务院会议室接见大庆赴京代表王进喜等 29 人，其中有石油部机关“联合总部”、“东方红总部”政治部“革命造反团”，北京石油学院“大庆公社”等组织的代表。

周恩来说：“现在一点半了，文件等了半个月，今天主席批出来了。最近中央给厂矿企业的信，改了一下。……昨天在这里谈了铁路运输军管了……”

周恩来所说的等了半个月的文件是指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关于大庆油田实行军事管制的决定《草案》。接着，周恩来询问了大庆和北京石油学院的情况。

当谈到街上出现“打倒 XXX”的大标语时，周恩来说：“太绝对化了，我向来就是反对绝对化的，两种意见我都不同意：一批就要打倒；保就不批，这都不是毛泽东思想。街上许多口号我都不同意。反对周恩来就打倒，还有什么罪责难逃啦。对我的缺点，就可以嘛，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部长有错误，可以批判，然后再定性质，业务工作一定要抓。铁道部吕正操，武竞天两个人问题很严重，我们还是撤职留用。要正确对待干部，进行调查研究，阶级分析，不能肯定一切，也不能否定一切。对各级犯错误的干部，包括司局长，处长，科长，应根据党的干部政策，也就是毛主席的干部政策，按情节轻重，分别对待。王进喜同志在大庆会战有功，也有错误。批判从严，处理要从宽，这是毛主席思想。《红旗》三、四期社论讲了，只要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而又坚持不改和屡教不改的，就要允许他们改过，鼓励他们将功赎罪，要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不是犯了错误就是三反分子。毛主席不同意。现在毛主席不提三反分子，这是主席谦虚。反毛泽东思想里面，不仅有立场问题，而且还有世界观的问题，有思想认识问题。一教不改，二教不改，三教改了，也不是屡教不改嘛！这是一句话，三教改了，还允许将功赎罪。要根据党的干部政策，区别对待；不要凡是领导干部不分青红皂白，一律靠边站，一概打倒。所有的都靠边站，这是不对的。这话是对群众讲的。另外，不管有什么情况，也不要不分青红皂白，一律结合，这也不对。这话是对干部讲的。一概复职，一概结合，这是肯定一切，这也不是辩证的。这是一种复辟的思想。现在讲自上而下的资本主义复辟的逆流，

复辟是指一律复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表现在经济主义。夺权斗争中有资本主义复辟。过去否定一切不对，现在肯定一切也不对。大庆工委不能一律复职。有这一条吗？要加上这一条。上次发到厂矿的没有这一条。不能全部复官，军代表你们看呢？”

军代表：“我们没有调查研究。”

周恩来：“噢，去不久。我看肯定不能统统复职。”“但是还有一种，我们准备通过军管，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然后再推进革命的三结合。有军代表，革命群众代表，领导干部，建立新的秩序，防止修正主义复辟。如果搞了十个月，还恢复原班人马，那就复辟了。都复职，不建立革命的三结合，这是一股资本主义复辟的逆流。不能没有停职的或撤职的，也不能说每一个单位都要搞出一个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来。现在敲警钟，是一股逆流嘛，不是到处都是。

昨天有人问：余秋里、谷牧是不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我说：不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我怎么带他们来见你们呢。不是说不能批判。那一边要打倒，有些口号我不能干涉，但是我是不同意的！我的观点是清楚的。有些口号都是绝对化。我和中央文革、毛主席都交换过意见。给我贴大字报，只要是善意的，有些过头也不要紧，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蒯大富也贴过我的大字报嘛！当时我是代表中央去解放他们的。这次红代会上，他向我道歉，我说不用道歉，这没有什么。不打不相识嘛！不过我没有‘打’过他，我是和他打过交道。如果是恶意的，可以不去管他，我们提倡大民主，我们就不怕，问的问题我不能全部回答，我讲的话也有不全的地方，我的话用录音机录下来，再放也总是能找出几句有错

误的。做事就免不了犯错误，我要不断紧跟毛主席，对毛泽东思想，要勤做勤学，做与学中不断犯错误，只要勤改，紧跟毛主席，紧改错误，这样才能前进，不然要掉队，党中央的同志是互勉的，而不是互短的，他们的短应该检讨的就检讨。

大庆是一面红旗，元月八日的讲话精神，现在看来‘大庆公社’是理解的。”

周恩来回忆了大庆大会战的过程后说：“要历史地看问题，发展地看问题，这两年，64 年、65 年有些骄傲。”“我们谈大庆这个问题，近几年来骄傲，铺张浪费，康世恩痛苦地流了泪，但他不像我们那样畅快，后来，群众批判了一下，好了一些。秋里到计委去毛主席点的，骄傲有，辜负于主席。但是这是发展中的错误，是可以改的。深深地认识，狠狠的改，对青年是有帮助的。”

“包括康世恩同志和唐克同志，唐克这个名字好记。给他们检查的机会，自我批评。改了就是好同志。但也不能肯定一切，也是有缺点的。”

大庆代表说：“现在师大‘井冈山’说：大庆是余秋里的野心，长期不宣传毛泽东思想，制造军火，白色恐怖，空投特务，把大庆说得一塌糊涂，我们大庆工人不答应。”

周恩来再次肯定说：“大庆是好的，有骄傲情绪我承认。62 年我去大庆，感到你们很艰苦。66 年我陪谢胡同志去看，有些铺张，比起新疆建设兵团来，那是小巫比大巫啰！张宗汉到大庆学习一下，讲得很好，回去没有干。”

大庆代表又提到北京师范大学“井冈山学大庆战斗队”批判他们。周恩来只是讲中央批准的关于大庆军管的文件：“这个文

件，很慎重的，我不是掉以轻心的。文件第一条说大庆是在毛泽东思想哺育下工业战线上的一面红旗。中央六个常委都看了，军委几位副主席也看了，伯达同志，江青同志也看了，主席亲自批的，白纸上黑字清清楚楚的。这句话关系到大庆全部政治生命问题。”

“大庆公社”代表再次提到北师大：“听说师大有内部消息，余秋里同志在二月会议黑东西。”

周恩来：“他们也没有参加中央会议，怎么知道？”

“大庆公社”代表：“有人要打倒，我们要保，保不是保他的错误。”

周恩来：“你们不要用这个‘保’字，别人不爱听。”

“大庆公社”代表：“听说王力对蒯大富讲过。”

周恩来：“我今天跟蒯大富谈话，他还问这事，可见他对这件事是无所知道，你们不要乱猜。”

“大庆公社”代表问：“他们明天要开万人大会，要不要冲？”

石油部机关“联合总部”代表也说：“我们要摆这个问题。”

周恩来没有正面回答，只是说：“好了，先谈大庆的吧！”

3 时 03 分，周恩来有事离开会场。3 时 08 分回到会场。又继续谈大庆的军管事宜。

在谈到大庆的一些具体工作时，有一小伙子说：“我们的家属还没解决！”

周恩来说：“小伙子的对象就在大庆找吧！晚婚嘛！”

他最后问：“大庆油田还有什么问题？ ”

大庆代表：“向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问好。我们有决心抓好

革命，促生产。有几个问题：（1）对大庆展览的评价问题。（2）大庆展览办不办下去？”

周恩来：“把文化革命的成果加进去，那才是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的展览。薄一波这个人出尔反尔，你们要把薄一波的黑话揭出来，康世恩有没有顾虑？ ”

康世恩：“我接触不多，是工交政治部陶鲁笳搞的。”

接见结束时，周恩来又说了一句：“我对大庆是有阶级感情的。”

当天，经毛泽东审阅同意，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作出《关于大庆油田实行军事管制的决定》。决定指出：军管会统一领导文化大革命和生产工作，以便最后实现革命的“三结合”。油田的广大职工必须坚守生产岗位，保证生产、建设、科研、设计工作的正常进行。对犯了错误的标兵、红旗手、劳动模范等，应教育、团结他们。

尽管周恩来在 22 日、23 日两次接见群众代表时，明确表示余秋里、谷牧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对他们二人和李先念都可以批判，但不同意打倒，但是就在他接见大庆代表的当天，3 月 23 日，北京师范大学“井冈山公社”作战部依然发表了“坚决打倒谭震林，坚决打倒余秋里，不打倒誓不罢休！”的《最严正声明》，称：“余秋里从来不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文化革命运动中跳出来破坏文化革命，反对毛泽东思想罪责难逃！”“现在是用鲜血生命保卫毛主席、林副主席、中央文革的时刻，一切真正革命的同志都应站出来。”

当天，北师大操场召开了《彻底粉碎余秋里资本主义复辟逆

流誓师大会》。师大“井冈山公社”作战部还贴出长篇大字报：“李先念在财贸口复辟资本主义罪责难逃”。

与此同时，北师大校内还贴出大量大标语：

“不打倒余秋里死不瞑目！”

“打倒反革命分子余秋里！”

“舍得一身剐，誓把余秋里拉下马！”

“师大井冈山誓与余秋里血战到底！”等。

北京农机学院“东方红公社”也在这天发表声明，说：“余秋里是毛主席司令部里的人，我们信得过。师大‘井冈山’某些人在当前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大联合夺权的关键时刻，在余秋里问题上无视红代会，运动群众，制造分裂，配合了自上而下的资本主义复辟逆流。”

矿业学院“东方红”曾发表声明炮轰余秋里，现在总部又有分歧，有两个“战斗”队倾向于保余秋里，群众中也是保余秋里的多。

北京地院“东方红”表示继续坚决炮轰余秋里，至于是哪个司令部的人还要继续观察，并有人说：“总理可以有总理的认识。”

北航“红旗”保持“炮轰余秋里，坚信周总理”，对师大“井冈山”提出要打倒余秋里表示不可理解，要继续观察动向。

中央财经学院“八.八战斗队”总部坚持“炮轰李先念、炮轰余秋里”，“支持师大井冈山、毛泽东思想哲学社会科学部红卫兵联队、北石北京公社”

清华大学“井冈山”坚持“炮轰余秋里”，对李先念不表态。

而且，在 3 月 22 日至 23 日，北京钢铁学院“革命造反公社”

连续两天召开“形势讨论会”，钢院学生、“革命造反公社红一团”头头张建旗在会上作了长篇发言。他说周恩来“是毛主席的同路人”、“是第三司令部的人”、“执行了一条右倾机会主义路线”、“运动以来和中央讲话口径不一致”、“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起了中央文革的灭火器作用，给中央文革开倒车”、“刘邓陶想复辟并不可怕，更阴险更可怕的是包庇刘邓陶复辟的人。”并说：：“在我开始考虑这个问题的第一分钟起就打算坐牢”等。这股炮打周恩来的潮流当即遭到一些群众组织的反对，张建旗当时就被他们钢院“九一九红旗战斗队”揪斗。揪斗中，张建旗拒不认错，大喊：“我没有错！”“三个月后再见！”随后发表公开声明，坚持炮打周恩来的立场。但是，在群众强烈的反对压力下，张建旗等人还是不得不转入地下。

3 月 22 日，戚本禹将他写的《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一文第五次稿报送毛泽东审阅，并说明：“这是去年看了《清宫秘史》影片以后写的，最近改了一下，送呈主席一阅。目前，可否联系这部电影开展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批判，请主席考虑。”

3 月 23 日，毛泽东在这篇文章的送审稿上写道：“戚本禹同志：看过，写得很好。有一些小的修改，不知是否妥当，请你和同志们商量处理。”

毛泽东在第二页删去了“毛主席”前面的四个定语“我们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此外，还有个别文字的修改。

戚本禹的文章送审稿有一处引用了义和团流传的一首歌谣：

“红灯照，义和团，亲兄妹，闹得欢，一个心，杀洋官。”在这旁边，毛泽东写道：“红灯照，又是当时北方许多地方女青年们的组织，她们很有纪律地自己组织起来，练习武术，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似可在这里增加几句。”

根据毛泽东的这条批语，戚本禹在这首歌谣的前后各加写了一段话：“在义和团运动中，青少年是一支最生动、最活跃的力量，他们在这次伟大的革命运动中，建立了不朽的功勋。震骇中外的‘红灯照’，就是当时北方许多地方女青年们的组织。她们很有纪律地自己组织起来，练习武艺，保卫祖国。她们着红衣，戴红帽，提红灯，拿红枪，前方作战，后方除奸，积极参加义和团的起义行列，坚决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表现了中国青年妇女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英雄气概！”“这首歌谣生动地反映了‘红灯照’反帝的坚强决心。‘红灯照’英勇斗争的事迹，一直在人民群众中广泛地流传着。他们说，‘红灯女儿，一入兵阵，视死如归，于枪林弹雨中，惟恐落后。’‘中国自道咸以来，沿海防夷水陆各战，望风奔溃’，‘得此番小儿女一振疲癃，不特寒众国之心，且壮中?　之气’。”

戚本禹的文章送审稿中有一处写道：“影片还把义和团诽谤为封建统治者的工具。它借大臣赵舒饶之口说：‘请老佛爷降旨，把义和团编为义军，扫灭洋人，立威天下，大清国运，就在此一举。’”

毛泽东在文中“赵舒饶”的“饶”字下划了一道后写道：“是翘还是饶，请查一下。”

经查证，赵舒饶，应为赵舒翘。

毛泽东最后在送审稿上写道："究竟是中国人民组织义和团跑到欧美、日本各帝国主义国家去造反，去'杀人放火'呢？还是各帝国主义国家跑到中国这块地方来侵略中国、压迫剥削中国人民，因而激起中国人民群众奋起反抗帝国主义及其在中国的走狗、贪官污吏？这是大是大非问题，不可以不辩论清楚。"

## 第 557 回：第三次，接见□海诸代表　未曾歇，又与卫生部座谈

3 月 21 日晚，陈伯达、康生、王力、关锋、戚本禹、肖华再次向从青海逃回北京的红卫兵调查《青海日报》社开枪一事，重点还是围绕着学生有没有枪，有没有开枪的问题进行。结果还是学生根本没有枪，更谈不上向部队开枪了。会后，戚本禹和关锋将调查的情况由向周恩来、江青作了详细汇报。他们听得非常仔细。

3 月 23 日晚至 24 日凌晨，周恩来、康生、江青、王力、关锋、戚本禹、肖华、杨成武、穆欣、曹轶欧等人在人民大会堂安徽厅接见青海省“八·一八”、“首都三司驻青海联络站”、北京地院“东方红”、北航“红旗”赴青海战斗队的代表。这是中央领导第三次接见青海代表。

周恩来首先按照被接见者的名单逐个点名，询问他们的年龄。参加接见的黄建强、张苗苗年龄都只有 15 岁。

周恩来又问：“刘贤权同志来了嘛？张江霖同志来了嘛？”

刘贤权、张江霖回答：“来了。”

周恩来说：“你们自由了！你们解放了！”

虽说刘贤权、张江霖是与赵永夫一起来到北京的，但他们二人当时是被全副武装押送来的。赵永夫到北京后在军以上干部会上介绍经验，俨然成了英雄。而刘贤权、张江霖二人则是在京西宾馆内揣测不安地度过了十几天。

周恩来接着询问了刘贤权和张江霖的年龄、籍贯。

江青说："我都没有听过你们的诉说，今天我们都来了，文革小组、军委的同志来听你们意见，你们讲吧，青海的同志讲，不要重复。"

戚本禹让张惠英首先叙述了青海"223 事件"的经历。

周恩来问张惠英："你们的同学有死了的没有？"

张慧英指着陈存秀说："他弟弟被打死了！"

周恩来问："你弟弟叫什么？"

陈存秀答："陈存宣。"

周恩来："你们哪一位知道得更详细一些，补充一下。"

于桂梅同学继续补充……

21 时 30 分，青海省委第一书记杨植霖进入厅内。

于桂梅继续叙述，当她谈到被押解到省委时，周恩来问："省委？"

于桂梅答："由省委干部审问，审问的全是平时造反精神最强的。……我们在雪地上冻了一夜，有的工人几天也没吃。我们看到省委干部审问，这完全是反扑，过去被斗的，起来斗造反的。保皇派斗争造反派，一些中间派都不敢讲话了。一些当权派纷纷倒向保皇派。那几天在大街上抓人、打人是很严重的。"

周恩来："事后你看到被打死多少人？"

于桂梅叙述北桥头汽车场工人成排倒下的情况……

周恩来问："北桥头在报社外面？"

关锋："那儿死人最多。"

张江霖："在报社西北角。"

周恩来："20 多所学校，有多少人死了？"

答："不清楚，消息都封锁了。"

周恩来："你们都是什么时候离开的？"

答："24 日。"

陈代海："我是 3 月 6 日离开的。"

周恩来："有人抓到军队监狱里没有？"

王相喜叙述抓到监狱的情况，说那个监狱很大……

周恩来问："那么大？国民党留下的，还是我们修的？"

张江霖、王相喜分别作了回答。

周恩来："你们和军区谈判的情况怎么样？"

张金莱详细叙述谈判的经过。

周恩来："张江霖同志，你们几号来的？"

"3 月 9 日。"

周恩来："刘贤权同志你是怎样被斗的？"

刘贤权汇报了军区党委讨论支持"八·一八"的情况。

周恩来："赵永夫同意了？"

刘贤权说明赵永夫当时是同意的。

周恩来问："赵永夫是第一副司令员吗？"

刘贤权回答"是"。

周恩来："军区有电报给军委吗？"

刘贤权答："有"，并介绍了以"八·一八"为主体的 38 个组织和人数。他又接着谈了青海省军区的情况……

调查会尚在进行，周恩来就开始给毛泽东写报告了：

主席：

看来开枪有问题，详细情况容后再报。

周恩来

写完，周恩来将字条推给坐在旁边的戚本禹看了一眼。

座谈会一直开到24日凌晨。周恩来最后说："同志们！今天不再继续开了，情况中央文革小组全了解了，北京'三司'同志派两个代表再讲一讲，青海也派代表谈。除了这里讲以外，不要再向外讲了。"

戚本禹："他们还是守纪律的。"

周恩来："你们回来的同志住在一起，外地的也是，住在一起。问题很快会解决了。你们一定会遵守革命的纪律。'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杨植霖同志也是同情你们的。这个问题快要处理了。"

散会后，周恩来将康生、江青、叶群和文革小组成员留下，商量如何向毛泽东、林彪汇报。周恩来说：

"经过几次调查会，'223 事件'的主要问题都弄清楚了。主席所提的谁先开枪的问题已是一目了然。工人、学生根本没有枪，就连赵永夫搜查了几天几夜也没搜出一支枪，工人、学生也没杀过人。开枪杀人的是赵永夫。事后又谎报军情，假造林总回电，欺骗大家。"

周恩来叹了一口气说："义和团还有几支鸟枪，可怜这些娃娃连义和团都不如，干嘛还要向他们开枪呢？！"

康生插话说："赵永夫在青海私自扣押司令员刘贤权，又擅自调动野战部队开枪杀人，简直无法无天。这才是篡党、篡军，他是个野心家！"

接着康生谈了赵永夫参加过国民党的问题。许多人听了都吃

了一惊。

这时，叶群说："林总没接到过赵永夫的电话，也没回过电，总理呀，你一定要向主席讲清楚。"

周恩来说："会的。下午主席起床后，向主席汇报一切。"

3 日 24 晨，刚刚进行完青海事件调查的周恩来，又赶紧接见卫生部"红色造反团"、"红旗战斗团"、"革联总部"、"东方红公社"4 个组织的代表和卫生部领导。李先念、汪东兴和北京医院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副主任等人参加接见。

周恩来首先按名单与每个人认识，接着了解卫生部的夺权情况，他问卫生部的夺权是哪一天进行的？

"红色造反团"，简称"红团"的负责人米志学回答："1 月 17 日。"

周恩来又问哪天成立的革委会？米志学答："2 月 28 日。"

周恩来接着问起"夺权委员会"的人员构成情况，都有哪些领导干部参加？

"红团"代表米志学回答，最初成立的"夺权委员会"的 14 人中，只有卫生部工业卫生局的科员袁宗信 1 人，其余都是外单位的。后来明确要以部里为主，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共有 21 人，其中部里 14 人，部一级领导 1 人，司局级干部 4 人。

周恩来："你们这个三结合跟哪个领导商量过？"

米志学答："打了报告了。"

周恩来说："没批嘛。"他问中央文教政治部副主任、国务院文教办公室副主任、卫生部临时党委书记孙正："孙正同志，你报告了吗？"

孙正答："没有，那个时候不知道要报告。"

周恩来："夺权问题我讲了好几次了。"

孙正："我不大清楚。"

周恩来："你可以打电话问一声嘛！就住在我的对面，问一下还不容易。这样的事我这个周恩来还不知道。"

米志学："我们后来还打了报告。"

周恩来："没批嘛，你们又没催。"

米志学说："您在财贸口 2 月 17 日讲话后，我们就把业务权交回去了，印章也交回去了。"

孙正："当时不知道应该先报告。"

周恩来："孙正同志，不能这样讲，你是高级干部，先念同志也讲过，开始没有经验，各部都不明确。你是高级干部，军一级吧？"

孙正答："是，我是 47 军政委。"

周恩来："你就因为跟陶铸一段，陶铸垮了以后，你来过一次要找我，我想开不得头。给中央提过几次，找不到人管。不能再管了，请先念同志抓，只能解决一件一件的事情。先念同志要管财贸口，抓不了那么多。卫生部门又是意识形态的，又是物质基础的。有上层建筑，有经济基础，很具体，想抓一个人管，不能成功。

首先，自我批评，陶铸垮了以后抓慢了一点，快三个月了，还未定，只好管起来。

革命委员会，三结合，本来得承认以后才算，你们没商量，各个单位准备搞，都要给中央报告。我们 29 个省、市、自治区，

每个地方要成立、筹备都要到中央谈谈。不止谈一次，没哪个部不谈的。教育部、文化部这么乱，还打个电话来。

这是头一次见孙正，有人说我见过孙正，说了什么话，我大吃一惊。

不能怪你们，孙正同志有责任，你是做政治工作的，党委任命你，你不向党汇报。要打个电话嘛，总可以找到一个人，还可以找伯达、富春同志嘛，副总理很多嘛！找秘书也行，还有个值班室。中央各部一个都没有搞三结合，这么大的事情，还应向主席报告。

你们犯一点错误是允许的。在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下，在党的领导下，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在解放军的捍卫下，开展自下而上的夺权，是史无前例的，伟大的领袖下这么大的决心，最高领袖号召广大群众向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夺权。三个月中犯点错误是免不了的。29 个省市，我们打回去好几个嘛。你们这个结合条件不成熟，部内结合太少了，只 124 人在卫生部只占四分之一多一点。即使你们是革命派，总还有组织可以联合三结合，首先一个条件革命派的大联合。”“不能只此一家，大方向对，前提对就行了，观点总有不同。不同的观点初期是允许的，即使将来团结在一起了，政治、组织还没占优势，允许合作，只要大方向一致，前提一致。”“4 个组织，不是哪个反对哪个，只是哪个激进一点。‘东方红’，你们反对吗？”

“东方红”代表徐毅说：“我们不反对！”

周恩来这里说的“124 人”是指参加“红团”的人数。“4 个组织”是指当时卫生部的 4 个群众组织“红色造反团”、“红旗战

斗团”、“革联总部”和“东方红公社”。

周恩来接着说：“不能反对，这是大前提。大方向，矛头指向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这个方向是不能违背的，群众斗群众方向就不对了。卫生部是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或是严重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或者两个兼有，这个问题要你们群众自己回答，我们不能替五位部长下结论。孙正同志当党委书记，那天是陶铸提的，中央同意的，常委批的。卫生部的反动路线和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反正两个问题未弄清。从 9 月到现在，刘邓直接领导不过两个月，8 月后，陶铸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有些地方来得更厉害。8、9、10、11、12 有 5 个月，时间更长，对文教口不能没有影响。7 个月的反动路线，在 3 个月一下肃清，站起来亮相，我不敢下结论，要 90%的群众回答。”

“东方红”代表徐毅：“他们结合时，孙正同志未检查过，2 月 24 日‘红’到处贴孙正同志是革命的领导干部的大标语，过了几天才贴一个大字报表态，只提到在某些方面执行了陶铸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周恩来：“我是一般地说。”“哪个组织更合格一点，要在斗争中实践中考验，不能由我们恩赐，不能由你们自封，最后要群众批准才行。卫生部要这样走向革命派的大联合。两派有不同意见，要摆事实、讲道理，充分讨论，不要打、砸、抢，孙正同志，有过吗？打的有没有？”

孙正答：“双方都有过。”

“东方红”代表郭仪：“有，他们夺权以后就打了我们几个

人。”

“红团”米志学：“你们砸了我们两次，还把我绑到中央文革。”

周恩来：“黄树则一个最机密的笔记本子被抢走了。”

米志学问卫生部副部长黄树则：“哪个抢的？”

黄树则说：“医大‘红旗公社’的，还有一个北京医院的引路，17 号夜 12 点到我家里去了。”

周恩来：“三结合以后还搞这个，早就不准搞这个了。这个笔记本，就是把李先念同志讲话记上了，非要不可，把精神说一下就行了。顶多找黄树则问一问。不仅黄树则，还有孙正嘛，他不是同你们结合了吗？问问他就知道了嘛，何必抢他的啦！确实是医大抢的吗？”

黄树则答：“6 个人，两个医大的，带红胳膊箍的。本子没被抢走。”

周恩来：“他管保健的，有些东西不能看，他抱在怀里被抢走了。这个行为完全违反中央的决定，很多机密，这里不能宣布。还有国际的影响。先念同志讲了，我们并不是说保健工作不能批评，保健制度是可以批评的，我们也批评过。也有很多改进，的确如此，主席两次批评。交给杨尚昆办的他不办，64 年我直接找崔义田、黄树则才改革了。废除了很多，一致要求彻底改革，我们还会为老爷式的保健制度辩护？北京医院说我很少钱的药也自己付钱，不要宣传，我的工资比人高，可以付款，我不许宣布，那种提法并不好，应该享受的还是应该享受。那样的东西抢走了。中央批评了很多打、砸、抢，这个事我知道，黄树则报告

了。这是不允许的。当然医大是青年人，已经退出了，是吗？”他对“红团”的代表说：“你们一道战斗的，去告诉他们，这是不对的，有错误。”

周恩来动员 4 个群众组织开门整风，首先自我批评。他说：“革命委员会存在，不要忙于解散。不能拿多数压少数，不能要人家解散。”“开门整风，达到组织上的联合，要做很多工作。”

其次周恩来强调要正确对待各级领导干部。他说：“去年 5 月 16 号以后，历史问题不搞人人过关，不全面审干。”

对当时各地开展的“反逆流”，周恩来说：“什么是自上而下的资本主义复辟呢？我的理解是：

一、夺权了，三结合了，把犯严重错误的，甚至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都结合。

二、革命的三结合变成了三凑合或原来的旧秩序，这样不等于运动半途而废了吗？

两条路线斗争的时候，要防止和打击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现在夺权斗争必须警惕资本主义复辟。这只是一小股逆流还是长江巨浪一泻千里，万马奔腾？不要到处找。目前主要是反资本主义复辟逆流。要说服群众，领导干部稍有私心杂念就容易助长复辟。”

他说：“领导干部自我批评亮相，群众同意以后才能结合。部一级的还要抓业务，部内的检讨大会，一个月可以搞几次，看是否可以检讨亮相过关。大家联合起来贴大字报亮相，如果错误少的可以，譬如山东省是这样搞的，200 多厅局级干部登报亮相支持造反派，声势大，但是，每个人具体情况不同，一个一个的排，

好一点，一个派搞，容易引起打击面过大。”

周恩来接着说：“卫生部搞了三结合。”

“东方红”代表：“是假三结合，只有一个司局长，其他都是孙正带来的。”

“红团”代表反驳：“司局长出来亮相都亮到他们那边去了，有 90%司局长参加战斗组，矛头一直指向我们，请示总理，这样做对不对？”

周恩来：“矛头指向群众不对。”

卫生部的这 4 个群众组织代表又为李先念的讲话和孙正的表现及夺权中的一些问题争得一塌糊涂。周恩来劝他们首先整风。

## 第 558 回：辩论急，是否打倒余秋□　第四次，核实□海省□□

3 月 24 日上午，北京师范大学“誓死保卫毛主席战斗队”贴出《给周总理贴张大字报》大字报，长达十几张，质问周恩来为什么一再保余秋里，强烈要求周恩来出来澄清“余秋里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是否真实？这张大字报不久即被师大“井冈山”盖掉。当天，师大“井冈山”作战部发表声明说：“《给总理贴大字报》是一株大毒草，目的是把水搅浑，来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混淆两个司令部，把谭震林、余秋里同总理混同，周总理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

当天下午，在计委大楼广场，召开了“打倒刘、邓、陶、薄、谭，彻底粉碎资本主义复辟逆流”誓师大会。

石油部机关“东方红造反总部”代表发言时明确指出：“打倒余秋里是绝对不允许的。在工交口，薄一波和死党已在活动，资本主义复辟逆流就表现在他们身上。”

大庆赴京报告团也说：“有人说从大庆看余秋里的野心，就是否定大庆，否定大庆道路，就是否定一切，打倒一切，这就是资本主义复辟逆流。”

北京石油学院“大庆公社”代表讲话时说：“要把矛头指向薄一波，不应该指向李先念、余秋里。目前薄一波的爪牙还在兴风作浪，妄图夺取革命的果实，这是大是大非问题，难道不应该警惕吗？”

北京师范大学“井冈山”广播车开到了会场，高呼“打倒余

秋里”等口号。会后，师大“井冈山”、化工“红旗公社”与机院“东方红”、石油“大庆公社”等进行了激烈的辩论。

这天下午，周恩来向毛泽东汇报了青海“223 事件”的调查情况。当晚 23 时 35 分到 25 日凌晨，周恩来又主持第四次青海问题调查会，江青、叶群、杨成武都来了。调查的范围除前三次的人外，还有刘贤权、张江霖、杨植霖、赵永夫、王昭、张晓川、青海省委副书记高克亭、青海独立师副师长张洪。周恩来在这次会上和赵永夫面对面地核实情况。

周恩来首先说：“今天开会，以前的情况基本上都弄清楚了，首先，要青海军区副司令员赵永夫回答这样一个问题，你凭什么权力撤销刘贤权同志的党内外一切职务？”

赵永夫回答说：“我们没有权叫他工作不工作。”

周恩来：“是他自己不工作吗？”

赵永夫开始流汗，结结巴巴说不上来。

周恩来接着说：“停止了刘贤权同志党内外一切职务 20 多天了，难道你不知道吗？……你不是党委委员嘛，你们成立了‘指挥部’，上报了兰州军区和中央军委没有？”

赵永夫回答：“没有。”

康生问：“你到‘指挥部’，代表你个人，还是代表军区？”

赵永夫答：“我代表军区。”

周恩来问：“你们没有得到军委批准，停止了刘贤权党内外一切职务，是合法的，还是非法的？”

赵永夫说：“我不知道。”

周恩来：“你代表军区嘛，怎么什么都不知道？！”

赵永夫又支支吾吾不知如何回复。

周恩来："兰州军区来的答复，你们认为怎样。"

赵永夫沉默……

周恩来愤怒的问："兰州军区三条指示，你们执行了吗？"

赵永夫辩解说："他们都不同意。"

周恩来质问："你同意吗？"

赵永夫答："我也不同意。"

周恩来继续："你为什么违抗上级军区？"

赵永夫提了几个人的名字说："他们都不同意。"

周恩来再问："围攻《青海日报》社谁下的命令？"

赵永夫说："大家研究的……"

周恩来十分严厉质问他："你是个军人，你怎么这样回答问题？"

赵永夫又是沉默。周恩来："赵永夫，你刚才没说清楚，刘贤权同志20多天都没有自由，你讲一讲，是怎么回事？"

赵永夫："刘贤权同志不敢工作，不敢负责任，有情绪。军区党委王文英负责，他在场。"

周恩来严厉的问："军区谁负责？"

赵永夫坚持："王文英副政委……"

周恩来："你没有责任吗？你们成立'联合指挥部'，你报了军委和兰州军区吗？"

赵永夫："报了，批没批不清楚。"

周恩来："在中央面前，你要老实说！"

赵永夫支支吾吾地说："我不清楚报没报。"

周恩来："军区的指挥权让给'指挥部'了！你是军区副司令员嘛！那就把军区的指挥权让给'联合指挥部'了？！"

赵永夫支支吾吾的分辩道："不是让给，不让给已研究好了，我给常委汇报了。"

康生："你是代表军区还是代表个人？"

赵永夫："代表军区。"

周恩来："16 号电报兰州军区没回电就这样干了？谁派刘斯起到兰州军区去的，你不知道？林副主席给你的电话呢？2 月 23 日对报社革命群众进行武装镇压，'指挥部'谁指挥？"

赵永夫说是另一个人指挥的。

杨成武再次质问赵永夫。

周恩来点名："独立师张洪回答。"

康生严厉的问："谁下的命令？"

独立师副师长张洪："领导小组决定……"

戚本禹生气的问："谁下的命令。

张洪支吾……

赵永夫："'指挥部'下的命令，我去执行。"

周恩来："你的镇压反革命组织报告，你给我的信，白纸黑字，你负责。写报告，打倒刘贤权，汇报中央文革都是你赵永夫。"

赵永夫支吾分辩："我不知道。"

康生："你什么都不知道！"

肖华："那天你还在楼上指挥。"

周恩来、杨成武、康生同声追问赵永夫……

赵永夫不敢正面回答，扯一些其他事情为自己辩护……

周恩来："你别谈了，别占时间。"然后问独立师副师长张洪："你和赵永夫谁指挥谁？"

张洪："不归他指挥。"

周恩来："那天你们行动谁指挥的？"

张洪："……我们派了两个排。"

周恩来："谁派的？"

张洪："共同研究的。"

周恩来："你是军人，你怎么这样回答问题！"

张洪举了当时参加研究的几个人的名字……

周恩来："你们都不老老实实的讲问题。刘贤权同志你简单的讲清楚。"

刘贤权："10 号上午开常委会，我们通知赵永夫开会，他单独行动不来。布置围攻报社的事，部队几乎全是军区的部队，主要是独立师、独立团的。主要是赵永夫调的。"

周恩来："对于军区党委停止你的一切职务，你表示怎样？"

刘贤权："我根本不知道，他们什么都不告诉我，刚听同学讲，才知道停止了我的职务。"

周恩来："张江霖同志，你还有什么要讲的？"

张江霖："'联合指挥部'名为造反指挥部，实际上是赵永夫指挥。1 月 31 日'机关造反派'叫我们答复问题，不答复就跪下。赵永夫在后边坐着。"

周恩来问："他是'造反派'的头子嘛！"

张江霖："……林山想提意见，王文英讲，提也不行了，部队已经调好，调了 200 多辆车。"

周恩来问二〇五部队张晓川说："谁调的车？"

张晓川答："赵永夫。"

周恩来问："你的任务是青藏公路，为什么调车？总共有多少辆车？占多大比例？"

张晓川开始从头说起："……接到中央关于支持左派的命令……"

周恩来："你把话说简要一点。"

康生："组织'指挥部'是你先找赵永夫，找独立师陈立英，怎么不讲这个问题呢？"

张晓川："是。我想讲的就是这个……"

众人笑。

……

周恩来："你们就是想找借口，下那么大的毒手。报社有枪，赵永夫你有什么证据？"

赵永夫："以前了解有枪。"

周恩来、康生、关锋："现场有没有？"

赵永夫又讲一些其他的事情……

康生："你就回答有枪没有？"

陈伯达："有，没有？"

赵永夫："当时没搜出来。"

戚本禹："为什么报告里说有枪？"

赵永夫语无伦次地说："不是在报社里有，其他地方开枪了……但没搜出来。"

周恩来："现场上怎样？"

赵永夫："有弹壳。"

王力、戚本禹拍着桌子生气的问："没枪，怎么汇报有枪？"

赵永夫："没搜出枪。"

周恩来："没枪，你开第一枪，打死这么多群众！"

……

叶群流着眼泪生气的说："放枪，对革命群众那么残酷，还造谣，伪造林总来电。"

周恩来愤怒地站了起来："除非你伪造假枪！谎报军情，欺骗中央！"

赵永夫分辨说："不叫打，但管不住。"

周恩来气得一拍桌子，叶群、关锋都站了起来……

叶群严厉地责问："你还说林总来电，还感动得满脸热泪，什么时候给你来的电？"

赵永夫："我接电话，问是不是林副主席，对方说是。"

叶群："林彪同志没有打电话！林彪同志三个秘书一个也没有接到电话。24 号听到此事，毛主席、林总非常气愤，下令调查此事。"

最后，周恩来宣布："现在结束调查，青海情况开始不清，消息逐步透露出来，真相慢慢弄清，得到毛主席指示，林副主席同意，经过调查，搞清实质，宣布：

（一）赵永夫，青海军区内部的问题是一个反革命政变。赵永夫玩弄了手段，欺骗了一些人，推倒了刘贤权同志，篡夺了无产阶级的党权、军权，就是他指挥的。

（二）赵永夫篡夺了党权、军权后，勾结了张晓川，二人从

一月二十三日到二月二十三日窜来窜去一个月，对西宁的革命组织八一八进行了残酷的法西斯镇压。死伤百余人，逮捕革命群众一万多人，拷打、酷刑，完全是法西斯手段。

（三）赵永夫谎报军情，欺骗中央，假说八·一八有枪，这是他自己说的。我们向革命群众调查，根本没有枪支，现在证明毫无根据，这件事他自己也说不出来。但他向中央汇报都说有，欺骗中央和群众。他说他也派人作调查，兰州军区派人调查，都没有找到枪。

（四）这件事把八·一八看成是反革命组织，和青海省委王昭是有关系的。

根据以上情况，报告了毛主席、林彪副统帅，处理办法如下：

（一）中央军委将发布命令，由刘贤权同志全权处理青海问题。因为刘贤权同志没有被罢免，这是反党的人做的事。兰州军区也没承认，总政根本没有批准。由刘贤权同志全权处理，由兰州军区派负责同志帮助调查。需要说明：林总根本没打过电话。”

戚本禹：“林总很少打电话。”

叶群：“林副主席三个秘书一个也没接到电话，24 日听到此事，死亡那么多，主席、林副主席非常生气，他们下令调查此事，林彪同志执行主席指示，下令好好调查这个事件。他们是反革命‘三结合’的经验。”

周恩来接着说：“（二）在青海的部队由刘贤权同志指挥独立师、独立团。八零六一部队、八一二二部队、二零五部队，在此问题上也统一由刘贤权同志指挥。

（三）向群众宣布，八·一八是革命群众组织。‘二·二三’

流血事件，由赵永夫一伙人，包括张晓川在内负责。要为死难的革命群众恢复名誉。抚恤烈士家属。受伤群众代为治疗。因为这一事件被捕、关押的群众一律释放，被打成反革命的一律平反。

（四）对受欺骗的群众概不追究，青海的同志要有无产阶级风格，要带着无产阶级气概团结他们，教育他们。采用整风的形式来解决。

（五）应该说明：我们的解放军是毛主席亲手缔造的，是光荣的，伟大的。应当相信解放军，这次受蒙蔽的十三个连包围了他们，这次事件中他们也流了泪，证明他们是好战士，革命的工友、同学、战士要团结在一起，揭露这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揭露这一小撮叛徒。

（六）刘贤权同志回去要成立军管会军管，筹备建立以刘贤权同志为首的军事管制委员会。全部实行军管，通过军管，帮助青海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为革命的三结合作好准备。

（七）赵永夫应隔离受审，张晓川、王昭隔离反省，听候处理。”

接着周恩来宣布：“解放军同志，把他们三个带走！”

卫戍区战士上来撕掉赵永夫、张晓川的领章、帽徽，将赵永夫、张晓川和王昭押解下去。王昭走到门口突然抓住门框不放，高声喊：“我和他们没有关系！”

没有人理他。

3 月 24 日，中央发出中发[67]110 号文件《关于青海问题的决定》。

## 第 559 回：梁守福，检讨未能挽局□　□海翻，北京中学红代会

处理完青海问题，已是 3 月 25 日凌晨，周恩来继续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安徽省代表。

为了说明安徽的“315 事件”,“安徽省革命造反派总指挥部”负责人梁守福按照安徽省司令员严光和代表团的意见，于 3 月 24 日赶到北京。

来京之前，3 月 23 日上午，“八·二七”合肥师范学院纵队长张来信问梁守福：“你对这次谈判前途估计如何？”

梁守福说：“看来承认‘一·二六’夺权不可能了，弄不好是程明远、刘秀山上台。”

张来信说：“他们上台，我们就准备成反革命，即使实行军管，我也不干了，军管也只是个缓兵之计。”

梁守福说：“军管我也不干了。”

接着，张来信说到全国夺权情况，提到山东的“毛泽东主义红卫兵”、重庆大学“八·一五”的情况，说他们现在很消极。张来信问：“你看这种思想不解决，十年、二十年，毛主席百年之后，会出现什么局面？”

梁守福说：“这些人的思想问题不解决，等主席去世后，会不会出现更大的震荡？特别是这些知识分子，他们活动能量大，将来一分配，全国各地都有，这些人就成了这次文化大革命埋下的定时炸弹。”

梁守福到了北京，但他不是代表团成员，又不是中央直接通

知来北京的，能否参加 25 日的接见是个问题。“总指挥部”的代表团成员李胜利想了个办法，他说：“这样吧，在接见时我们给总理写个条子，就说‘总指挥’的主要负责人梁守福同志到了，就等在外边。看总理怎么处理。”

次日凌晨，安徽代表团成员乘大客车来到人民大会堂北门，梁守福也一同前往。但他没有下车，而是坐在车里等消息。大约过了 20 分钟，李胜利出来了，告诉他说：“总理同意你进去。”

到了接见厅，梁守福不知道自己该坐在那里，就在最后一排坐下。这时，周恩来打手势要他往前去。梁守福走到了中间又想坐下来，屁股还没有挨到椅子，周恩来又打手势，让他还往前坐，指着前面的椅子，要他坐在最前排与他面对面。

梁守福刚坐好，周恩来讲话了：“梁守福同志你来迟啦，本来我们也要请你来的，现在我想听一听你的意见。”

这时有人拿一个话筒给他，梁守福对着话筒说道：“这次到北京来，主要是向中央检讨的。首先，我们在夺权前，没有请示中央，跟着大潮流就把省委的权夺了，这是无组织无纪律的行为。夺权后，也没有立即派人向中央汇报，这就更不应该了。我作为一个受党多年教育的党员，我愿意接受党给我的任何处分。”

这时，周恩来插话：“有这个态度就很好嘛。”

接着梁守福又说：“第二，夺权后，没有按照中央的精神搞好革命的大联合，并对持有不同意见的革命同志采取压制的态度。如果中央承认我们的夺权，我们一定搞好大联合，决不压制不同意见。”

他的话刚说到这里，“P”派一名姓丁的女代表站起来大声指

责说："梁守福！你不要再欺骗总理了，就在你来北京的那一天，'总指挥部'还组织了3万农民上街游行，口号是，'踏平红革会！打倒刘秀山'。"

梁守福对周恩来说："我不知道此事，我来北京那天，肯定没有农民上街游行。"

周恩来笑着对他说："梁守福同志啊，你们现在还压人家嘛。你再接着讲。"

梁守福接着检讨："第三、在干部的解放与结合上，我们犯了先左后右的错误，开始时对领导干部一概不信任。党中央提出三结合的方针后，我们急于要中央承认，结果又犯了右的错误，不管干部是否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否经过批判已经改正，统统准备结合。我很对不起那些较早站出来支持我们，后来又受到压制打击的革命领导干部。"

这时，安徽省林业厅厅长程明远慢条斯理地插话说："梁守福，你这个小家伙就是不够意思，你们受压时，我们冒着杀头危险支持你们，开始你还是不错的，为我的安全，把我送到工学院保护起来，你还去看过我。可是你们翻身以后呢？翻脸不认人，到处通缉我。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你在北京时，李葆华用小汽车接，用小汽车送，和他们住在一起，吃在一起。李葆华还给了你3万块钱，我看是李葆华把你收买了，搞修掉了。"

这时，周恩来也许太累了，用热毛巾擦擦脸，接着说："梁守福同志，你继续发言。"

梁守福说："第四点，我向中央表个态，不管中央最终做出什么样的决定，我都坚决服从，从自己的错误中吸取教训，向北

京的蒯大富学习，哪里跌倒，哪里爬起来。”

周恩来高兴地说：“梁守福同志这个态度就很好，值得大家学习，知错改了就好嘛。都应该多做自我批评。”

接着，他又戴上眼镜看材料，批文件，康生继续主持发言。

“总指挥部”的李文安一面做检查，一面进行申辩，康生很生气地拍着桌子说：“你不要再骗我们了，我们不许你发言，不接受你的检查。”

李文安也毫不退缩地说：“康老，你别生气，听我把话讲完。”

关锋大声地说：“我们不想听你们的假话。”

会场上的气氛很紧张，其他人也作了发言，大约凌晨 4 时左右，周恩来宣布散会。

回到代表团的驻地后，总结接见情况时，严光批评梁守福：“丁某发言造谣时，你怎么不敢说她是造谣？”

梁守福说：“24 日以后的情况我不知道，怎么就能当着中央首长的面就肯定她是造谣呢？”

严光说：“24 日的情况你不知道，你应该叫中央当时就打电话核实嘛！”

梁守福说：“当时没想到，中央领导难道也会听信造谣吗？”

严光说：“怎么不会？总理不就表态了吗？”

安徽的“G”派认为，中央是不会承认他们的夺权了，与其让中央主动地否定，不如自己主动提出军管，于其让权力落在对立面程明远他们的手里，不如交给同情他们的省军区手里。最后，

“G”派让李文安代表代表团上交要求军管的报告。

3 月 25 日下午，军委扩大会议通知开大会。15 时，大家集合在第一会议室，一边等着开会，一边交头接耳闲谈。不一会儿，周恩来和中央文革的陈伯达、江青、康生等人陆续来到会议室。与他们同时来的，还有青海省的群众代表和青海省军区司令员刘贤权、副司令员赵永夫。

周恩来首先宣布说：“在青海发生了大规模镇压革命群众的事件，青海省军区调动军队，围歼革命群众。根据毛主席、林副主席的指示，经向各方面进行了反复调查，青海省的问题已经基本清楚。”

接着，中央文革的成员一个一个讲话。然后宣读了中央《关于青海问题的决定》。《决定》宣读完，当场逮捕了赵永夫。之后，周恩来又讲话强调：“军委扩大会议应当很好地讨论这个《决定》，接受青海的教训。今后，解放军要坚决支持‘左派’，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派’，绝对不准开枪，更不准打死、打伤和逮捕革命群众。”

散会后，工作人员找到每个与会人员，将刚发下来的毛泽东接见的合影照片收回，那上面也有赵永夫，照片要经过处理后再发。

中央的《决定》传到青海，西宁市又一次开了锅。“八一八”成了坚定左派，“捍卫队”虽然没打成反革命，但也是刽子手的帮凶，“坏头头”们遭到残酷批斗。一个月前拷打“八一八”的种种残酷刑罚，如今轮到了“捍卫队”。

3 月 28 日，看守监狱的军人们满脸严肃的到监狱中巡视，

关在监狱里的犯人看到这阵势，不明白怎么回事？猜测可能要枪毙人。

中午，每人的碗中有不少的肉。这下更炸了锅，因为很多人听说过，枪毙犯人前，最后一顿都是好饭。看来肯定要拉出去枪毙了。

这顿饭一些人根本吃不下去，有张嘴大骂的，还有吓瘫了的。可也有人提出，全体犯人都吃肉，根本不可能枪毙这么多人，但实在想不通为啥给如此多的肉，那年月肉食品太紧张了。

下午，还真真切切的把监狱中的“八一八”都拉出去了，但不是拉到刑场，而是拉到礼堂听刘贤权宣布给他们平反的讲话。

原来当天监狱里的军人已经获知赵永夫等人被抓，关在监狱的“八一八”成员都成为革命派了，他们绝不能在监狱中出事。因为还没下达释放命令，众多军人为防止出现问题，于是加强了警卫。

“八一八”既然不再是犯人，监狱决定中午马上改善伙食，这就有了中午加肉的伙食。

3 月 28 日，“八一八”重新控制的《青海日报》大量刊登批判王昭、赵永夫、“捍卫队”的文章。

4 月 4 日，西宁召开群众大会，贯彻中央 110 号文件，刘贤权、程光远、刘明乾等人讲话。

4 月 9 日，又召开追悼大会，授予 223 事件死亡人员为革命烈士。大会上刘贤权主祭，张江霖致悼词。死亡的 169 人尸体被挖了出来，埋入烈士陵园。一次，近 200 个“坏头头”被带到“烈士”墓地，通通下跪，打得血肉横飞。

王昭、赵永夫等人在北京被抓，很快押回西宁。在西宁，赵永夫受罪不多，许多看守军人同情他，最后搞了个骨折给他打上石膏，赵永夫无法出席批斗会。可关在南滩的王昭受罪了，1970年2月12日冤死狱中。

10年后，“四人帮”倒台，埋入烈士陵园的169人又被挖出，迁移到其他地方，取消他们的烈士资格。原“八一八”的骨干等人又遭到审查。

北京大专院校红代会成立后，谢富治正式通知北京中学生的红卫兵组织《首都兵团》头头李东民：“大学组织了个红卫兵代表大会，然后你们中学呢，因为人多，再单独组织一个。”

以后，中央文革戚本禹牵线，中央文革的工作人员张根成负责具体和李东民联系、指导筹建北京中学红代会。从3月初开始，北京卫戍区派出15000多名指战员，对北京市的329所中学和9所大学的师生进行军政训练。于是，筹备北京中学红代会的具体组织工作，就由北京卫戍区负责军训的副司令员李钟奇负责了，具体办事的是卫戍区防化处处长刘丰。

筹备初期，中央文革提出了一些意见并推荐了几个人：首先，戚本禹建议把“三司”的中学中专部纳入红代会。其次，他确定清华附中要有人参加，让张根成推荐了刘刚，让李东民去联络。然后，戚本禹又推荐了朝阳区的一个姓杨的老师。最后，张根成又按照戚本禹的意见，推荐了101中学的任公伟，说这个人也可以作为一个代表。李东民又推荐了二中的刘龙江。在正式开筹备会之前，他们几个人集中在宣武师范学校住了10天左右，进行集训。中央文革派来几个北师大的学生，帮助他们工作。

接着又召集了各区县的人。人选最后的审定，是由卫戍区和下面的军训团负责。他们和李东民确定了中学红代会的核心成员。根据中央文革的推荐，内定的核心组成员 5 人：李东民、刘刚、任公伟、刘龙江、还有杨老师。

接着，军训团按照惯例开始政审外调，结果，中央文革点名推荐的 3 个人都有些问题。

首先，朝阳区的那个中学杨老师，一调查说他有男女关系问题，这肯定不行了。于是，中央文革又介绍了一个地院附中的老师，叫薛玉峰，30 多岁，也很有才。

101 中的任公伟呢？他在学校没有群众基础。很多人，包括和他一派的一些同学也不认可他。他爷爷曾在苏联见过列宁，是苏联红军的中国支队的成员，应该是老革命。但军训团外调的结果，他家的出身居然是伪官僚。于是在 3 月份要成立红代会之前，把他拿下了。任公伟得知这消息后，找李东民长谈，十分激动。李东民无奈，说自己也没办法改变。任公伟非常气愤地离开了，日后他成为李东民的对立面——一个铁杆的“四三派”。

刘刚这时已经是蒯大富的小秘书了。蒯大富去上海串联，她也跟着去了，为此，刘刚还背上了“蒯司令夫人”这个颇遭非议的头衔。从上海回来后，他们确定了恋爱关系，当然是秘密的，不敢公开。

因为刘刚总是泡在清华大学里，整天不在学校。清华附中军训团说她没有群众基础，要求换人。结果，刘刚也和李东民翻了脸，后来当然也成了“四三派”的干将。

最后，北京中学“红代会”由 37 个委员组成，核心组还是

5 个：101 的任公伟换成了师大附中的陈永康。清华附中军训团推荐的工人出身的程金香，替换了刘刚。教师代表是地院附中的薛玉峰。3 月 25 日，首都中等学校红卫兵代表大会的成立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大会的执行主席是中学红代会核心组的 5 人。17 名常委，除核心组的 5 人外，还有 25 中的秦喜昌、外语学院附中的杨海峰、师大附中的何方方、6 中的金坚、北京工业学院附中的吴琼华、清华附中的刘刚、4 中的许建康等人。周恩来、陈伯达、江青、康生、谢富治等人到会祝贺。江青、周恩来在大会上讲话，要求红卫兵听从号召，回校闹革命。边上课，边闹革命，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 第 560 回：三二六，恩来见新疆代表　与安徽，共协商中央决定

1967 年 3 月，新疆八一农学院保守派组织“红色军团”按当时新疆军区个别领导的指示，前去查封“红二司”的“八农红旗造反团”。他们围困“八农红旗造反团”所在的“红旗楼”，声言要冲进去，逼迫“八农红旗造反团”的勤务员苏尚峰交出印章、旗帜、人员名册及档案材料。苏尚峰情急之下，模仿中央的口气拟出四条“北京来电”：

1、红二司不是反动组织；

2、任何单位不得对红二司及所属“八农红旗”采用查封手段；

3、两派要讲团结、注意社会稳定，不可被坏人利用；

4、各派做好内部解释工作，不要激化矛盾。

然后，让播音员吴小群多次播送。“红色军团”勤务员听到广播后，信以为真，下达撤回的命令。“八农红旗”躲过一劫。

3 月 26 日下午，周恩来在中南海接见新疆“红工司”、新疆建设兵团、北航“红旗”和清华“井冈山”赴新疆的代表。他和代表们一一握手后问：“其他外地同学都回来了吗？”

北京同学说：“新疆军区把我们赶回来了，下令 3 月 10 日离开新疆，有隐瞒、窝藏的受纪律处分，把我们当反革命了。”

周恩来：“你们去了以后正碰上 1 月 26 日事件。你们刚去第一件事是碰到夺权，第二是石河子问题，第三是军区 2 月 11 日事件问题，复杂性就在这了。”

他看见同学桌上摆的东西，问："什么东西？"

同学们将新疆军区政治部印的传单和一些大标语的照片递给周恩来，其中的一张是写有"王恩茂万岁"的像片。周恩来看后说："你们这些传单很重要，我全要看，这些标语一看就是坏人写的，很显然是反动的。传单要追查，又是通过印刷厂印刷的，即使不是军区搞的也应把问题追查清楚。"

接着周恩来问他们对自治区党委书记处书记武光、吕剑人、祁果的看法。

代表们在谈武光的问题时，周恩来问："武光参加石河子事件你们知道吗？"

武光是新疆自治区党委书记处书记兼新疆自治区人民政府第一副主席，文革中最先出来"亮相"，表态支持"新疆自治区革命夺权总指挥部"夺权。1 月 24 日至 25 日"石河子事件"发生时，他正在石河子处理八一糖厂工人绝食问题。因此，自治区、军区和兵团派出的联合调查组，认定武广与石河子事件有关系，硬要建设兵团医专学生张秋英承认，武光在会上向他授意："夺权要有几支枪"，始终为张秋英拒绝。但新疆仍以此为证据，将武光打成"现行反革命"、"大叛徒"关押起来。

此时，代表听周恩来问到，便说："根据我们调查，看不出石河子事件和武光有什么联系。"

周恩来："噢？听说武光去石河子两次。"

代表们交上清华顾立德写的武光在石河子活动时间表，陈志写的时间表。周恩来详细地看了时间表，问："24 日上午去的？ "

代表答："武光是首都'三司'叫到石河子去的。"

周恩来："武光不是去过石河子两次？"

同学："我们知道就一次，21 日武光根本没有去，是三干会讲的，这有 19 至 26 日的时间表。"

周恩来："你们整的材料是客观的，我粗看你们的材料也可以抓住把了，武光说：'有的解放军支持保守派'，兵团医学院在石河子问题是站在哪一派？"

代表答："是站在造反派一边的。"

周恩来："那就更复杂了，武光支持了那儿的造反派，讲这话是有企图的，是说了一些煽风点火的话。"

北航"红旗"的代表说："根据当时情况看，武光在石河子不支持造反派是犯罪的……兵团'八野'是保守派组织。"

周恩来说："'八野'夺汽二团坏人权是对的。"

兵团同学解释道："汽二团夺权是造反派先夺权……"

周恩来："你们对石河子汽二团夺权问题也要推翻，那一下子全要推翻，让我站在中央地位怎么讲话，那就要进行全面重新调查。关于'八野'回去这样大吹大擂，我是反对的，这样是错误的，上一次我就讲应该解散，他们说已解散了，我一直追这个问题，这么搞还行？我叫张希钦发通令要解散。

三干会停止专搞武光是不对的，我们的意思，祁果、武光、吕剑人他们反对军区召开三干会，可以在开完后批评一下。"

代表们说："夺权指挥部和军区和武、吕、祁开会，武光说：是否由夺权指挥部和军区联合主持，夺权指挥部是最高权力机构……"

周恩来："我抓住你的这句话，武光这样说是有煽动的。可

以看出他没有努力去调解解放军和群众的关系。军区主持召开三干会，我们 23 日在京西宾馆传达主席的指示，……”

代表说：“武光事先是不知道的。”

周恩来：“不会不知道的。”

代表：“凡参加了三干会的全是三结合对象，又恢复了原状。”

周恩来：“我不同意这个话。这样的话就错了，关于武光一个书记讲那个话是不对的，应做工作，不能挑拨军区与造反派的关系。26 日武光从石河子回来到王金波那里去没有？你们有办法证明没有。”

北航“红旗同学”谈了武光去王金波处的前后经过。

周恩来问：“三干会你们谁参加了？情况怎样？”

同学：“三干会上只说郭鹏……”

周恩来十分关心生产会议讨论的事，都记了下来了。

周恩来：“还有一个问题，2 月 11 日事件。”

北京同学：“我们北航‘红旗’和清华‘井冈山’的同学是‘罪魁祸首’，写了两条通令……”

周恩来哈哈大笑，说：“你们‘二司’和北京‘三司’去的是革命派，这是我一向肯定的，现在也是这样的，你们夺权在初期没有三结合，初期没有经验，有些幼稚的行动，中央从来没有责备过你们，从来没有说你们的大方向错了，但提倡推广要慎重，上海第一个夺权，就一个名字就推到二月底才报导。因为没有三结合也掌不了权，主席一直抓夺权，有的一挑就夺。南京是如此，合肥是如此，要报导就要慎重了，夺权是不是肯定下来，中央各部里三结合的典型，也是一直没定下来，因为没有三结合就掌不

了权。”

代表说:“我们夺权是听说王金波要夺权,所以我们先夺了。”

周恩来:“你们总爱受人挑吗？青年的革命组织夺权，我们从来没有批评，但夺权后的作法有些行动偏了就要说一下，提起注意。区党委内部的人正在斗争。武光、祁果是什么问题引起了争论，现在还在进行，错误有多大我还不能说。你们要分开，不要牵扯到他们的问题上去，回去把两方面的争论都公布出来，你们客观地来看，不要与他们连在一起，一牵连进去，你们就容易上当。

还有 1 月 26 日事件。12 月 19 日事件和 1 月 26 日事件完全是两回事，是根本不同性质的，对 12 月 19 日事件我们的看法完全不变，责任完全在自治区党委，兵团党委上。现在自治区党委和兵团党委也承认错误。

1 月 26 日事件打了枪，打了枪是反革命事件，如果因为石河子事件是反革命事件也说12月19日事件是反革命事件是错误的，当然你们不这样看，保守派才这样看，其他还有一些糊涂人。是不是武光去挑动了兵医？关于石河子事件，你们回去好好弄清楚。

军区 2 月 11 日事件，1 月 23 日军队支持左派，28 日中央八条出来了，军区内部人这样搞是不对的。”

“军区事件你们是偶然参加了，支持了造反派，要说错就是个别的，你说矛头指错了，承认错误就行了，你们革命派嘛！再追就不对了，这件事要分开，不要再追究，不影响你们的革命性，不影响你们的大方向，你们要划清界限，客观调查可以进行，不

要牵进去。如果划不清就可能犯错误，你们‘二司’这样一个左派组织，应该赶紧回去了。‘八一野战军’这样气盛，我追了几次要解散，回去还这样搞走过了头，他们自己负责，你们不要根据这个压对方，犯错误。”

“王恩茂我说先不定性，回去他检查，你们揭发，根据他的检查和你们的揭发，最后才能定性，你们也不要定性，你们要定性我也不赞成，总要先检查揭发，最后再定性”

“抓进去的人，都要放出来。这是我要谈的第一个问题，对革命群众态度问题。

第二对各级干部要一分为二，不能老鸦一片黑。”

“对干部要有分析，这是正确的。排斥一切，肯定一切，谁都结合，恢复旧秩序，革命白废了，都是资本主义复辟的逆流。领导秩序要改变，要有人监督，要三结合，可以建立一个专门的权力机构。三结合要有群众监督，在临时权力机构中，群众代表占多数，是基础，革命干部是领导核心，是骨干，解放军是支柱。”

“支左问题是容易犯错误的，最大的是捕人要放，你们都是造反派嘛！闹了半年多了，同学们做错事，可以座谈解决嘛！抓错了要放，要承认错误，支持错了是有的，把保守派当左派，把左派当保守派，有问题要协商，要高姿态。”

“兵团同志回去要困难一些，四大还有，但不如过去方便了，是解放军系统嘛，‘八一野战军’写了公告命令他们解散，你们回去看看，我提了好几次了，他们不散是不对的。兵团的‘联总’要解散，兵团武装都要搞纠察队。”

当天，总理办公室传达周恩来同新疆造反派来京代表谈话要

点：

一、新疆红二司是革命造反派，但要与石河子事件、自治区党委内部斗争划清界限。

二、你们不要对王恩茂同志的问题先定性。他已经回到乌鲁木齐准备检讨，并且准备找你们谈谈。

三、军管单位除机要部门外，根据规定，有的可以串连，进行四大，但不进行大串连。除军队方面另有规定外，地方上，各造反组织，不应解散。

四、所逮捕的人，除现行反革命外，其它由于政治原因而被逮捕的，要全部释放。

五、对去年十二月十九日的事件，中央的看法不变，责任在兵团党委和自治区党委。

六、三月十二日的大会，不要二司及其他造反组织参加是错误的。听说三月十九日的大会开的不错嘛！

国务院总理办公室

3 月 28 日，新疆建设兵团临时文化革命委员会成立。裴周玉任主任，丁盛任第二主任。随即布置在兵团进行全面夺权。

3 月 30 日至 5 月 8 日 ，兵团临时文化革命委员会先后做出决定，呈报新疆军区，将兵团副司令员陶晋初、参谋长陈实、副参谋长曾继富、干部部副部长杨兆元、计财部部长毛乃舜、供销部代部长陈明池、石管处副政委汪培模、农一师师长林海清、工二师师长傅志华、农六师政委赵予征等 10 人停职反省。

3 月 27 日上午 9 时，在北京首都剧场，召开北京市干部亮相大会。参加会议的有市委、市政府工作人员及工厂院校代表一

千余人。干部亮相的顺序是：吴德、刘建勋、丁国钰、高扬文。北航的方臣主持大会，并做了总结发言。他说："上述干部亮相态度是诚恳的，认识是深刻的。我代表'夺权委员会'表示欢迎和一致通过。"

当天，康生出席"首都无产阶级革命派坚决粉碎'二月逆流'的新反扑，誓死保卫毛主席誓师大会"。他在会上说："二月逆流"是"公开向以毛主席为首、以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进攻"。

3 月 27 日夜至 28 日凌晨，周恩来又将安徽不同观点的两派代表请到人民大会堂厅。康生宣布并逐条解释了中央《关于安徽问题的决定》。他说：

"关于安徽问题，中央和中央文革和安徽的同志进行了多次接触，对'126夺权'赞成和有意见的代表都找回北京来了，把安徽军区的同志也找来了，把南京军区军管委员会钱钧同志也找来了，根据多方面的意见，经中央详细研究、讨论，并报告毛主席和林副主席做出决定。"

"对'126夺权'基本上有两种情况，一种是认为好得很，大方向是正确的，甚至讲反'126'就是反革命，谁反对'126夺权'就要镇压。另一种认为'126夺权'是假夺权。中央考虑各方面的意见，没认为这种夺权是假夺权，也没有认为这种夺权的大方向是正确的，比如北京夺权夺了几次，中央未做出结论，也没有说那一方是正确的，说反对'126夺权'是反革命有问题，说'126夺权'好得很也有问题，这两种意见中央文革都未提，只是指出了存在问题，没有实现'三结合'，没有把矛头指向走

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你们夺权是非常仓促的，开始认为省委的权不能夺，据讲是受山西消息的影响，另外还听到了不真实的情况，说程明远篡党篡军，军区也来不及看你们的文件。因此，必然大联合商讨来不及，据反映‘八·二七’内部也有不同意见，这种匆忙中,就将应该联合的革命群众组织没有联合。为什么说矛头没有指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难道我们夺权不是夺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吗？夺李葆华的权吗？夺权后矛头指向何处？对并肩作战的革命组织实行镇压，而不是彻底揭开省委阶级斗争的盖子，矛头指向革命群众组织，将其领导人逮捕了、通缉了，这些组织被解散了，这是大错误，在夺权后对革命组织进行镇压，这个矛头不是指向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是指向自己的战友，于得水同志已死了，该联合的没联合，而去镇压，没有集中力量去联合所有的革命组织，夺以李葆华为首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夺权，当然是夺党委的权，但夺权的打击对象是同‘八二七’并肩作战的‘红卫军’，‘省暨合肥市机关职工革命造反司令部’，这是在夺权前，夺权后没有实行革命的三结合，这一点从同志们告诉我们的，你们结合的干部（省委）不是真正的三结合，不要说任质斌、张祚荫、黄岩、王光宇，就是王中也是长期养病，过去也不是真正彻底揭发李葆华的，而且有些问题上自己也有责任，什么五条、七条，弄到现在五条也没有了，这怎么叫革命的三结合呢？‘指挥部’的个别领导同志，在夺权前和夺权后实行了一系列错误政策，主要是打击了一部分革命群众，把不赞成自己意见的人搞成反革命。压制了左派团体和革命干部，实际上情况是这样，

中央文件是根据实际情况做出的，我们应当说明这一点，安徽夺权没有报告中央，未经中央批准。”

他接着说：“我们对‘126夺权’是有一个认识过程的，第一次李胜利同志汇报，曹在凡同志补充时你们只有一个问题，是要中央承认，没有其他问题，使我们感到问题不大，但又觉得不放心。因此我们提议多来几个同志，多反映几点情况，把有不同意见的人也找来谈一下，应当说，第一次觉得有问题，思想是倾向于承认你们的。”“后来经过继续调查，所谓没有问题，实际存在很多问题，这一点是‘指挥部’的同志没有如实地向我们反映，后来通过记者及不赞成夺权的同志的反映和揭露，觉得问题很多。”“问题揭露后，总指挥部代表李文安、李胜利同志也觉得‘126夺权’没有成功，存在着问题，我们也考虑这个问题，同时南京军区也向我们建议安徽一时大联合、三结合不易解决，也建议实行军管。在3月21日，他们向中央提出军管，并且提出以南京军区副司令员钱钧同志为首组成军事管制委员会。这个军事管制委员会有安徽军区司令员严光同志、政委宗文同志、廖成美同志、杨广立、王文模同志、钟国楚同志、蒋开元同志、李士槐同志，这是他们提出来的军管会的名单，中央赞成实行军管，并且以钱钧同志为首。”

康生最后说：“刘秀山同志的问题，没有写进来，因为主要是谈夺权问题，刘秀山问题应该调查，你们供给材料，但与夺权无直接关系，不在这里布置了，这不是说不要调查这个问题了。”

这次接见没有发生辩论和争吵，似乎“G”、“P”两派的代表都感到了某种心理上的满足。会议结束前，周恩来说：“同志

们马上就要回去了，临走前我没有什么礼物送给大家，我向每个代表赠一枚毛主席像章。”他的话刚一落音，代表们立即起立报以热烈的掌声。

## 第 561 回：皖军管，广东□反还继续　津胡、江，毛泽东批示宜宾

3 月 28 日下午，安徽“八二七”的梁守福和李文安、李胜利，还有首都“三司驻皖联络站”的负责人胡昭复，一起到京西宾馆看严光等省军区负责人。严光鼓励他们说：“你们不要泄气，犯了错误就改嘛，谁对谁错，以后会弄清楚的。”但严光这些鼓励和安慰的话，并未点燃梁守福他们心中的激情。

3 月 30 日，周恩来给毛泽东送审《中共中央关于安徽问题的决定》稿。4 月 1 日，毛泽东审阅时，在决定稿第二条：“不得把群众打成‘反革命’，不准乱捕人。仅仅因为冲军区和对军区提意见，或对本地区、本单位的夺权有不同意见，而被打成‘反革命’的，应一律平反，被捕的，应一律释放，通缉令，应一律取消。”的末尾，加写一段话：

“许多外地学生冲入中南海，一些军事院校冲进国防部，中央和军委并没有斥责他们，更没有叫他们认罪、悔过或者写检讨，讲清问题，劝他们回去就行了。而各地把冲军事机关一事，却看得太严重了。”

4月1日当天，中共中央以中发［67］112号文件下发这个决定：《关于安徽问题的决定》及附件。决定要求：“立即成立以钱钧同志为首的军事管制委员会，把省的领导权掌握起来。”

当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安徽省军事管制委员会正式成立，南京军区副司令员钱钧任省军管会主任，严光、宋文、廖成美、杨广立任副主任。4 月 5 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安徽省军事管制委员

会重新派出 21 名军代表接管省公安厅，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安徽省军事管制委员会驻安徽省公安厅军代表办公室”。

广东省军管后，镇反仍在继续。3 月 16 日，广州警备司令部宣布广州军区战士歌舞团的“千钧棒”组织为反革命组织，逮捕了 5 个“首恶分子”。该组织只剩下的 6 个人，每天上午劳动 1 小时后，就是写检查，交代“首恶分子与自己的罪行”。

广东省公安厅二办开始对“省直站”下属 102 个群众组织展开全面调查。同时调查的还有暨南大学的“东方红”和“工人大队”、中南林学院“教工红卫队”、省中医学院“反迫害大队”、中南科学院、中大“红旗”和“八三一”等组织。

从 3 月 19 日开始，凡是有冲公安局、冲军区、冲电台，抢文件行为的组织头头，无论是幕后指挥的、为首的，还是转入地下的，都要严厉打击。对那些“反革命组织”、“右派组织”和“非法组织”也要实施打击。

3月19日凌晨1时，省公安厅和广州警备司令部来到广州远洋分公司，逮捕了“五湖四海红色造反兵团总司令部”的3名负责人。清晨5时，广州警备司令部在市公安局配合下，突袭“老红军总部”，拘捕了9名负责人。

此时，那些曾经闹得最欢的组织，现在落马的落马，摔跤的摔跤，在巨灵之掌打击下，化作野马尘埃。即使幸存的组织，对军队以雷霆万钧之势，介入文革，也感到惶惶然不知所措。广州军区花了九牛二虎之力，终于使广州市混乱的局面似乎出现了结束的迹象。3 月 25 日，广州铁路分局革命委员会成立。《广州日报》在翌日发表社论《广州的第一声春雷》表示祝贺，因为这是

广东省第一个实行了三结合、联合夺权的单位。 解放军对此表示支持。

此时的广州，除了个别与军区关系较好的群众组织，还在那儿欢呼雀跃，摇旗呐喊之外，其他组织普遍陷于迷茫之中。大家搞不清军队“接管”的含义，如首都“三司”有的人问：“接管是什么意思？”“夺权怎么办？”广州“三司”中学部有人认为“接管”就是“包下来”，因此感到自己今后“无事可干了！”

对于军区来说，其实他们自己连谁是无产阶级革命派也弄不清，遑论帮助无产阶级革命派弄清谁是无产阶级当权派？对于造反派来说，吃不到的葡萄，说它是酸的无所谓，但已经煮熟的鸭子，从碟子里飞走，又岂会善罢甘休？因此，他们更关心的是军管以前的夺权还算不算数？军队的回答是：“这要区别对待。”

3 月 28 日，广州市军管会就“镇反”问题召开会议，广东省军区副司令员江贤玉在会上说：“目前，对敌人打击不力，反革命气焰未打下去，与广州军区首长要求还差得很远。”还要进行镇压反革命的第二战役。会议初定 4 月 2 日为第二战役的日期。

3月30日，中山大学武装部以召集“红旗工人赤卫队”骨干会议为名，在驻中大部队和公安部门的配合下，拘捕了该组织的9名负责人。

天津市的形势似乎也看到了曙光。“五代会”已经成立，又于3月23日选举出了天津市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3月27日，报经中央同意，天津代表团解学恭、肖思明、郑三生、胡昭衡、江枫、赵树光和50名“五代会”代表及特约代表，赴北京向中央汇报成立天津市革命委员会准备工作情况。

第二天，3 月 28 日下午，夜幕已经不像冬日来得那么快了，一辆伏尔加牌轿车驶入钓鱼台国宾馆时，透过树梢仍能望见西边天上的最后一抹青辉，这辆车里坐着天津的江枫和胡昭衡。此时，他们二人已作为天津旧市委中的革命领导干部，参加了天津市新生政权----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的工作。今天，陈伯达要单独召见他俩。

虽是坐在汽车里，胡昭衡仍然可以感觉到春的气息。“陈伯达够朋友。”这一刻，他内心充满了感谢之情。从去年 5 月 23 日开始的华北局会议，他 20 天愁白了头发。7 月底回到天津后，又经受了批判和抄家。到了 10 月份，总理办公室的一个电话改变了一切，正在接受批判的胡昭衡被接到北京参加中央工作会议。随即穆欣来看望，转达陈伯达的问候，说天津市科技工业厅厅长李树夫给陈伯达写过信，反映胡昭衡蒙冤受屈的情况。陈伯达向该打招呼的人及时打了招呼。

送走穆欣时，胡昭衡感动地说：“伯达同志过去反复跟我说，他写作能力不强，最强的还是行政能力。我始终不理解。现在他已经成了中央主要领导者之一，看来我不会看人，他确实不只是夫子秀才呀……”

胡昭衡到天津任市长后，与陈伯达、康生、周扬等几个秀才有过很好的交往，当时陈伯达对胡昭衡的才干还是颇为欣赏的。

后来解学恭到天津后，也对胡昭衡说：“伯达同志跟我打过招呼，说天津市的工作，胡昭衡是可以依靠的。”

“伏尔加”停在 15 号楼前，胡昭衡下车便深深吸吮了一下钓鱼台的新鲜空气，与他同车而来的江枫，也深吸了一口气。陈

伯达在接见天津市革筹小组全体成员之前，先单独接见他们这两位原天津市负责人，在当时，不能不说是一种荣誉。

当然，陈伯达不会像过去那样迎候在半路，甚至也没有出楼迎新，但胡昭衡并不感觉有异。毕竟陈伯达的地位已经高高在上，不能还像过去那么随意……

“老相识了，找来随便谈谈。”这是见面时陈伯达讲的第一句话。他显得春风得意，兴高采烈，与胡昭衡的握手也还热情得“够朋友”。

相比之下，胡昭衡要拘谨些了，过去见面的那种亲热劲已经更多地被感激和尊重所替代。握手后，他们在主人指示的位置上坐下来。

变化很大，却都是自然而然。从头至尾是陈伯达主谈，胡昭衡和江枫只是偶尔插空汇报几句情况。陈伯达从来不曾这样健谈，4小时没停嘴。谈天津情况，小站情况，干部情况，对军队的态度……

“伯达同志”，胡昭衡在汇报天津情况时，因为谈话机会少，又不能多讲，所以匆匆提出最关心的问题“过去您对天津工作有许多好的指示和建议，比如技术改造，托拉斯，还有您督促过的‘一步炼钢’试验和治碱研究……”

他的话被陈伯达用手势打断：“当前压倒一切的任务是文化大革命。”陈伯达稍一犹豫，眉头皱了皱，还是讲出口，“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终。你呀——”陈伯达拖长了声音，摇摇头，“虽然当过兵，到底还是夫子。”

胡昭衡看一眼江枫，不再做声。

“你们看报了吗？林副主席是毛主席最亲密的战友。”陈伯达说到关键处，还是老习惯，认真点点头，“这个最字是重要的，这一最，就没有别人了。”

陈伯达讲这段话的语调神态，不能不使人想起当年他谈到“少奇同志”和“小平同志”时的语调神态，想起他讲的那句话：“一线抓什么，反映着二线想什么。”

在结束4个小时的长谈时，陈伯达用高高在上的训诫语气对胡昭衡说：“你记住我说的：胜利者会走向自己的反面。”

离开钓鱼台时，胡昭衡是一种复杂心情，既感谢陈伯达“够朋友”，不忘旧情，同时也明白，过去的“秀才人情”已经过去了，再也不可能复回。他在日记里含蓄地写了一句：“遇到一些情况触发了我对个人职务地位的一些不愉快想法……”

四川进京告状的越来越多。3 月 11 日上午，“首都大专院校西南联络组”在北京地质学院成立，办公地点设在北翼楼 401 室。这个联络组除了接待四川来京申诉、告状的人员外，还成立了资料组，收集成都军区甘渭汉、韦杰的“罪行材料”。资料组下设甘渭汉、韦杰、李文清等小组。

3 月中旬的一天，北京地院“东方红”总部通知经历过成都“二月镇反”的地院学生谭宝华到中南海北门等候。大约中午 13 时过后，工作人员将谭宝华引到一个小会议室。一会儿，周恩来从里屋出来，和他握手问好，问他怎样到的四川及四川“镇反”情况。他们谈了大约一个小时，周恩来用铅笔在一张纸上认真记录，没有作任何表态。临走时，周恩来将他用的铅笔送给谭宝华。这件事对地院“东方红”鼓舞很大。虽然周恩来没有对四

川“镇反”表态，但是四川“镇反”已经引起了中央的重视，听取被镇压一方的意见本身就说明问题。

3 月的一天，中央文革收到一封抬头写给“王力同志并转中央文革”的信，落款署名是“原宜宾地委办公室副主任田禾”，时间是“1967 年 3 月 16 日”。该信从 1959 年反右倾机会主义开始，分五个部分写至文化大革命，叙说四川省宜宾地区刘（结挺）、张（西挺）、王（茂聚，原宜宾地委副书记）、郭（林川，原宜宾地委组织部长）与西南局第一书记李井泉及宜宾地委第一书记牟海秀之间的所谓五次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纵观全文，“反复辟”是主调，也指责李井泉与牟海秀是“执行修正主义路线的党内走资派”。

王力看了田禾的这封信，用铅笔批示摘登简报的群众来信，并交“中央文革”记者站负责编辑西南地区内参稿件的编辑肖健卿处理。

这封群众来信有几千字，以谈问题为主，历史跨度较长。肖健卿仔细阅读后，按照王力的批示要求，反复推敲，摘编了田禾报告中有关文革中 “二月镇反”的问题《宜宾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对文化大革命猖狂反扑残酷镇压革命派》，以《四川宜宾革命派大批被关，斗争十分艰苦》为题，刊登在 1967 年 3 月 26 日的《文化革命简报》435 期上，分别呈送给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的领导成员以及有关中央领导部门。

毛泽东在当天子夜刚过，在这期《简报》上批示：

中央文革小组：

此事应加以处理。可找双方各十人左右来京商谈，成都军区

甘渭汉也应来。请商总理酌办为盼！

毛泽东

三月廿七日二时

当天，陈伯达、康生、江青致信毛泽东："宜宾问题，我们接触较早。二十天前，我们替中央起草了一个文件，并有几个附件，送给了总理。现在送上一份，供主席参考。"

当晚20时，毛泽东批示：

林彪同志：

此件一阅。此事不仅牵涉宜宾一处，而且涉及成都军区及若干军分区对群众组织所采取的政策。你阅后，请送聂荣臻同志一阅，然后还我。

江青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布置王力接见刘结挺、张西挺，了解他们夫妇二人开除党籍一事，对他说："主席要查，开除刘结挺党籍，最后是不是刘少奇、邓小平他们批的。"

王力按照江青的吩咐，到中央办公厅查了档案，第二天向江青报告说："开除刘结挺夫妇二人的党籍确实是邓小平、彭真、杨尚昆批的。"

江青将王力的两次报告转给周恩来。周恩来批示："同意王力同志的意见。"

3月28日，周恩来致信毛泽东："主席给中央文革小组的批示已看到。当由康生、王力、关锋三同志约刘结挺等同志商谈，决定双方各来十数人，包括军区甘渭汉、宜宾军分区司令员政委在内。"

毛泽东批示："已阅，退总理。"

## 第 562 回：反逆流，武汉“二司”开会议 说服□，江城“□”“新”再联手

3 月 24 日，武汉军区向各工厂企业单位派出大批军代表。

3月26日，武汉“二司”整风办公室召开各总部代表会，分析形势，一致认为武汉地区存在着严重的资本主义复辟反革命逆流，必须予以坚决反击。他们号召“二司”学生起来反资本主义复辟逆流。在反逆流的问题上，“钢”“新”两派学生组织取得了一致，他们又团结在一起，将斗争矛头共同指向了武汉军区。

这天，武汉军区副司令员韩东山在黄石8万人的群众大会上说：“什么‘革命无罪，造反有理’，到处乱搞乱喊，搞得乱七八糟。”“你造反，造个卵子，造到老子头上来了！”“你们革命，革个卵子的命，老子革命几十年还要老子坐喷气式飞机，还给老子戴高帽子……，我肏他娘，这次抓人用绳子捆，用枪押着走。”“叫你搞文斗，你要搞打砸抢，我肏他娘，连土匪都不如，不是反革命是什么？”“冲军区的来多少抓多少，来一个抓一个，来十个抓十个，军里装不下，抓不急了，就用机枪扫。”

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本来希望通过一系列强制措施稳定武汉的局势。然而，事与愿违。不仅武汉“工总”广大群众，面对武汉军区的突然打击，感到惶恐和不服，就是“毒草派”中的造反派也笑不起来，都有大难临头的预感。武汉一中的造反派主流是“毒草派”，同样受到“市抓办”派来的工作组的打压。随着武汉最早起来造反的头头纷纷被捕，武汉的造反势力顿时陷入低潮。陈再道觉得如此就能稳定湖北的政局，恢复生产，然后挑

选出他们满意的、听话的群众作为“三结合”代表参加夺权。他可能没有想过，如果是要一个稳定、听话的政府，刘少奇主持的政府不是做得很好吗？毛泽东还发动文化大革命干什么？文革前的政局不是很有秩序吗？哪一级代表不是领导挑选上来的？令陈再道等军区领导始料不及的是，他们的措施没有给武汉带来稳定，而是引发了更大的动荡和混乱。这些措施让那些曾经和武汉军区关系密切的“工造总司”、“三新”和除“三司”以外的几乎所有“新派”组织瞬间失语，陷入短暂的迷茫和沉默。

但他们很快从茫然中惊醒过来，并被武汉军区的做法深深地激怒了。他们认为武汉军区的做法是错误的，军区无权解散群众组织，无权逮捕群众组织的头头。军区的这种做法严重干预了文革运动，违反了《十六条》。《十六条》上明确规定了群众享有“四大自由”，即：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三新”和“工总”的是非、“钢派”与“新派”、“毒草派”与“香草派”的争论，这些都是人民内部矛盾，不是敌我矛盾，应该按照《十六条》规定的原则，通过大字报、大辩论去解决，而不能靠镇压、抓捕。今天武汉军区可以因为“工总”思想认识上的错误将他们抓起来，将来哪一天，“工造总司”或“三新”不听军区的话了，或者也犯了什么错误，军区不是也可以用什么借口把他们抓起来吗？这和文革初期“工作组”犯的“资反路线”错误有什么区别？随着北京“二月逆流”的消息传到武汉，3 月 27 日，“新华工”举行庆祝《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发表四十周年，《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四十一周年的纪念大会，会后，数千人到武汉测绘学院、武汉大学、武汉水利电力学院、湖北医学院、湖北大学

等院校及武昌游行，高呼：“一切权力归农会”，“痞子要掌权”，“向‘二司’的革命战友致敬”，“向‘二司’战友学习”。

面对武汉“三新”的疑问，3 月 28 日，陈再道、钟汉华和“新华工”、“新湖大”、武大“三司”的学生座谈，解释军区为什么要解散“工总”，希望能调和与“三新”的分歧。他说：“‘工人总部’号称 40 万，被反革命分子掌握了。解散‘工人总部’，对你们就是很大的支持，不然，他们可能把你们砸了。‘工人总部’的 9 个头头，7 个是政治严重不纯分子，干了很多坏事，破坏文化大革命。这样的组织，我们还没有宣布反动组织，只宣布解散。因为广大群众是好的，要打倒的只是一小撮反革命分子。

对‘二司’，同对‘工人总部’不同，‘二司’成员绝大部分是好的，只是‘二司’做了很多坏事，我们不是没有材料。让他们自己起来革命，自己教育自己，把坏人搞出来。我们是历史的看问题的。‘二司’以前在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斗争中，是有成绩的。但以后干了很多坏事。‘工人总部’干了的他干了，‘工人总部’没干的他也干了。”

“你们怀疑我们不依靠你们，不依靠你们依靠谁啊?什么事情不是同你们商量？你们说有人想把你们整垮，谁想把你们整垮，你们不同意，我们也不同意，我们要和你们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

“你们对‘二司’的看法很慎重，我们同意你们这种慎重。刘邓路线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个案是翻不了的。当然还有人企图翻，我们坚决反对。”

“军队内也有阶级斗争，也有坏人，罗瑞卿就是嘛！你们的

组织就那么好呀？人人都是左派？”

钟汉华插话说：“共产党是左派，但党内也有混进来的右派分子。”

陈再道：“你们也要警惕坏人。不要认为左派就永远是左派了，你们有成绩，但不能骄傲，不能吃老本，躺在成绩上。我们革命 40 年了，还不说革就革了，还要继续革，要成为坚定的真正的左派，要靠毛泽东思想。毛主席教导我们：‘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我们要永远记住这个真理。”

“对反革命逆流，你们得警惕，我们也要警惕。”

“你们几个组织之间也有分歧，这是正常的现象，不同观点要允许，谁对谁错，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实践会证明的。”

“你们说工厂的情况怎么样？据我了解，情况是好的，建立了抓革命促生产的指挥部，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正在实现，生产在上升。”

“现在省里出来几个人不是解放了，说我们保，我们不保。三反分子坚决不能用，有严重错误的，群众要求检讨，还是回去检讨。边工作边检讨。现在文化大革命进入了新的阶段，毛主席指示我们支左、支农、支工、军管、军训，这么大的任务，又没有经验，不可能工作中没有缺点错误，欢迎你们提出我们改。今天你们提了，很好。这个会以后还要开。在学校工作的军队同志，要满腔热情搞好，没有经验，要多听取群众的意见，同他们商量，依靠他们，他们做主。”

下午，陈再道、钟汉华继续召集湖北军训团与“新华工”、“新湖大”、武大“三司”的学生座谈，钟汉华说：

“你们是先锋，工农兵是主力，现在主力用上，学校里的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还没有揪出来，资产阶级反动权威还没有批判，要把学校办成真正的毛泽东思想大学校，任务还很繁重。军队到学校里来没有经验，我们去是帮助你们，也是帮助我们改造思想，先当学生后当先生，要互相学习、互相帮助，还要提高警惕，防止坏人制造事件。有个中学要复课，有的人不干，把桌子、椅子都破坏了。把灯也打坏了，矛盾是会转化的。”

对《二八声明》，他说：“《二八声明》必须彻底批判，这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这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结合起来搞的，你们要扛起批判《二八声明》的旗帜，要批深批透，《二八声明》远没有批倒。”

在谈到“二司”的问题时，他重复了上午陈再道的话：“‘工人总部’做的，‘二司’差不多都做了，工人总部没做的，二司他做了，二司广大群众不要人人过关……”

这时，军训团长插话说：“对‘二司’的问题，我们部队的态度是明确的，广大战士无罪，是受蒙蔽的；相信他们会起来革命，在批判揭发炮制者中受到教育。”

钟汉华说：“我们没有什么偏心，‘工人总部’有我们的家属，我们也抓了嘛！先革命的好，但躺在床上睡大觉就不好了，陈独秀共产主义小组就有他，后来他成了叛徒。不要吃老本，过去有功就骄傲，老子天下第一，我们老家伙不能吃老本、革命小将也是如此，革命者不怕犯错误，错了就改，左派队伍中也有左、中、右，真正掌握毛泽东思想的是少数，中间的是多数，保守的也可能有。”

陈再道接着讲："我们坚决站在革命左派一边，整个部队也是这样，有人说，我们不是支持左派，解散'工人总部'就是最大的支持嘛，'工人总部'是群众强烈要求解散的，没有宣传是反动组织，只解散，因为下面大多数是好的，只打击一小撮。"

"我们还是依靠你们嘛，不要怀疑。"

"'三字兵'这个组织是犯过错误的，确实保卫了省委，但当时的情况要考虑，那时很多干部认识不清，责任在省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个问题你们对我们起了很大的怀疑，甚至说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他们从 10 月份后就觉得错了，责任不在他们身上，要帮助他们掌握大方向。"

"大专院校红卫兵年纪也不大，也是青年人……"

这时，有学生说："他们搞我们的黑材料……"

陈再道说："你们怕什么，打不倒的，有材料收集一点也好吗！没有就收集不到嘛。"

学生代表认为，对'二司'的广大群众态度应慎重时，陈再道说："这是好的。左派中也有右派，共产党中也有右派，我们革命 40 年了，现在起来也很吃力，40 多年的老本也不能啃，要锻炼，要考验，上面讲的对不对，实践会证明。

为什么不搞全市性的活动呢？因为现在正在搞抓革命促生产，武汉地区，湖北省这段抓革命、促生产有很大收获，大活动牵涉面很广，影响大。要节约闹革命，'新华工'到新华路开会，跑去跑回这很好。现在有很多地方有很大浪费，有的把不能动用的战备物资也动用了，生产上去了，对国际名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支援国际革命都有巨大的影响。"

事情的发展证实，陈再道和钟汉华的解释没有得到“三新”学生的理解。武汉的形势让陈再道担忧。

3 月 29 日，“‘武汉地区工人总部’中反革命分子的滔天罪行”图片出笼，在武汉三镇的大街小巷广为张贴。武汉造反派，包括公安机关造反派，对此进行了大量的调查，证实了这些证据材料，都是捏造、栽赃、虚构而成的，都是莫须有的罪名。

3 月 30 日，《人民日报》转载了《红旗》杂志第五期刊登的山东省革委会主任王效禹的文章：《放手发动群众，粉碎反革命复辟阴谋》，文章明确指出当前出现了一股自上而下的资本主义复辟反革命逆流。

这天，武汉“三新”负责人在“新湖大”开会，研究了武汉的形势，一致认为武汉的资本主义复辟的表现，比王效禹所列举的山东的情况有过之而无不及。经讨论，决定 4 月 5 日举行全市“毒草派”大游行，8 日在武测召开批判刘、邓、陶的誓师大会。

## 第 563 回：三二八，恩来见工口代表　提《修养》，全军文□肖华管

3 月 28 日晚 21 时 07 分至 23 时 20 分，周恩来、李富春在国务院小礼堂接见国家机关 21 个单位的群众代表。

周恩来说："今天是工业系统 21 个单位的革命造反派，共 179 名，各部领导，主要是党委成员共 127 名，加在一起共 306 名，大致比例是 40%，一个是 60%。 交通部，我和李富春、先念，秋里同志已经接见过了。工业系统分开谈几次。从上次 1 月 26 日我和你们谈过之后已经过了两个月，需谈一谈了。今天光听我的，条子先不看。"

他说："这次夺权斗争可以说是 1949 年夺权的继续，但这次是最彻底的。49 年靠军队打天下，自上而下实行军事管制，除国民党一小撮上层人员外，其它都接受下来。党政部门是我们自己的，企业、事业、学校都包下来了。政府机构也用了不少人，当然不是原封不动的用。这就使企业、事业、党政领导总有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或是内部新生长出来蜕化变质的，或者是国民党资产阶级钻进来的，从 1949 年后不断进行这样的夺权斗争。农村清匪反霸后并不等于农村中的地富反坏右没有了，党内还会滋生新的。城市中的三、五反斗争十分激烈，先党内搞后党外搞，距离现在将近 15 年了。变化很大，有了新的还有死灰复燃的，钻进来的。57 年划了几十万右派，从党内到党外，有的已经摘了帽子又重新进入党内取得了领导地位。62 年党内产生了右倾思潮，三自一包，包产到户、三和一少都是修正主义

的东西，是一股逆流。经过毛主席在十中全会进一步阐明阶级、阶级矛盾、阶级斗争学说，作了形势分析，阶级斗争又提到纲上来了。本来从 1949 年七届二中全会上主席早就提出，现在又进一步阐明了。63 年开始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四清运动，搞了快三年，首先是农村，然后把企业内的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搞下来，当然出现了形左实右的机会主义右倾观点，这是刘少奇搞的。后来是文艺改革，一个一个地改革，64 年是戏剧、舞蹈、音乐的改革，出现了为工农兵服务的现代戏的新典型……这一系列都是夺权斗争。或在领导机关，或在某一方面为无产阶级思想革命做准备工作，这次由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自下而上的由无产阶级革命派夺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斗争，这是史无前例的，真正的，最广泛的群众革命运动。十月革命没有这样大的规模，中国也未曾有过如此广泛的群众运动。只有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我们才能进行这场无产阶级思想革命，进行夺权。”

周恩来说，经过 3 个月的夺权，真正实行了革命派大联合，有群众代表、解放军代表和已经亮相得到群众同意的领导干部三结合夺权的，并经中央同意的，只有上海、贵州、山西、黑龙江、山东 5 个省市。即将同意的还有北京和天津。其他地区的条件都还没有成熟。他再次强调：“每个省市的夺权，都要经过中央和中央文革弄清情况，看是否成熟才能同意批准。”

至于中央各部，周恩来说，自 1 月中旬号召夺权，造反派就首先把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权夺过来了，以前没有合法化，现在让它合法化。“业务可以监督。有的实现了，有的还没有实现，这

还是夺权初期的情况。”

周恩来谈了各部实行三结合的两种设想，一种是领导干部、中层干部和群众的代表的结合，还有一种是有军队代表参加。

他还提出了一个大概的时间表：“对中央直属的厂矿企业，2、3、4、5 月建立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1968 年临时权力机构就可以推广到县、公社和大队以及一切机关企业事业单位。学校比 2、3、4 月可能长些，因为他们才回来，可能要搞到暑假。”

怎样建立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周恩来提出三种形式：

第一种：本身革命造反派夺权夺得好，本身就有能力实现大联合的，同时各级领导干部有人错误不严重，可以工作，或犯过错误的干部通过亮相过关，再派军代表去就可以建立三结合权力机构。

周恩来说：“关于这一方面主席有过估计，2、3、4 月，现在看还不够，要到 5 月文化革命要看出个眉目，明年 2、3、4、5 月要看出结果。今年要看出个眉目。就是说，29 个省市都能实行三结合或准备好实行三结合，建立临时权力机构——革命委员会。或者通过军事管制的过渡方法，这是地区。中央国务院各部、党中央各部门绝大多数能实行三结合的权力机构不管需要夺权的还是不需要夺权的，条件怎么样，最后总要实行三结合权力机构。”

第二种形式：如果不具备第一种的条件，群众又有要求，可以派军代表帮造反派给当权派排队，建立三结合临时权力机构。

第三种：还有一些地方不需要夺权，领导已能进行工作也要搞三结合。这样的部门直接派军代表实行三结合。

周恩来说："必须坚持真正的革命造反派的大联合，如大联合搞得不好就采取第二种办法，军事管制。"

"现在面临的问题是对革命的领导干部，帮助他们一分为二。希望你们把各级领导干部排个队，要有个期限。今天 3 月 28 日，限期 7 到 10 天，造反派提个名单，掌权的，不掌权的都可以提，另一派也可以另提名单……不能再延迟了。"

周恩来讲了这次夺权，也是这次文化大革命的目的：

"去军事代表也好，军事管制也好只是过渡的办法，与解放初期军管不同，那时是军队打天下派人建立政权，从农村到城市由北方到南方，从军队到地方委任一批政治干部，再委任一批企业事业干部由上而下地军事接管，派的人还是抗战胜利后经过整风由根据地解放军派出的，是新当权派。这次不同是已经掌握了政权了，军事政治上领导权，企业事业的领导权，学校机关的领导权，农村的领导权，今天都在我们手中，有无产阶级专政，有人民解放军保护，17 年多次斗争都是由上而下，不能把根子拨掉，好像锄草似的没拔根，春风吹又生，已长出来了。修正主义又起来了，资产阶级分子又生长了。现在由下到上达到一个目的，无非是建立新的临时权力机构，以后当正式的权力机构。这里面没有三反分子，没有修正主义分子，没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至少要有这条保证才能真正保证有无产阶级的司令部。如果有资产阶级的又有无产阶级的，和平共处怎么行？就是要走向和平演变！这次要斩草除根！以后再生再锄！

这次还有个副产品，是文化革命初期还没意识到的问题，就是挖出不少叛徒。刘、邓，特别是刘少奇的建党想法是违反毛泽

东思想的。20 多年来隐藏在党内的叛徒始终没有清洗。文化大革命一搞，红卫兵冲击到社会。许多资料揭发的、叛党的、自首的、自己说没什么隐藏起来的都揭发出来，把它们从党政机关的当权派中肃清出来，这是一大收获。”

“怎么处理各级领导干部？有四种办法：

一种：留一批，数目要多一些。又分四种：较多的是一般的留用，没有什么大毛病监督留用，如铁道部的吕正操，武竞天问题严重接近反党了，他表示要改，业务上他有知识，撤职留用，没有职了，在实践中考验他看他改不改。

二种：撤一批。不能再继续工作了，这是少数。

三种：调一批。一个是调来，一个是调走。有从外边调进来的，也有在原岗位工作不适宜的。

四种：提一批。这要摆在三结合以后搞，在三结合过程中检验哪个好，经受住考验就提他提上来。

总之，第一，将来各级领导干部人数不能超过现在，只能少于现在。第二，机构现在可以的就改，层次多的减，能合的合，不一定放在后期。外交部有的单位就已经这样作了。”

周恩来要求防止两种倾向：一是排斥一切、否定一切、打倒一切，二是各级领导干部都想做结合对象，全部复职全部结合。他说“这是资本主义复辟！”并认为这种倾向在当时是比较严重的。

他说：“从红旗四期社论发表以后就冒了苗头，不仅如此，甚至把旧制度旧秩序都恢复，部长、司长、科处长都恢复原职，都照样行使权力，革命造反派没有一点权力。这样 10 个月的文

化大革命不是一场空了吗？毛泽东思想到那去了？这样不成！恢复原状照样的统治这是绝对不允许的，这是资本主义复辟的逆流，这是主要危险！”

3 月 28 日，王力、关锋把他们以《红旗》杂志编辑部调查员的名义写的《清华大学工作组在干部问题上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情况调查》一文报送毛泽东，该文的副标题是《一九六六年六、七两月清华大学工作组在干部问题上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情况调查》。他们在报送时写道：“‘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个组成部分。对此，我们过去调查不够，揭露不够，批判不够。似应在实现革命‘三结合’的过程中，对这个问题进行充分揭露和批判。一些典型材料，似可发给党内领导同志看看。”

3 月 29 日，毛泽东阅时将标题改为《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个组成部分（一九六六年六、七两月清华大学工作组在干部问题上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情况调查）》，并批道：

王力、关锋同志：

此件很好，可以公开发表，并予广播。还应调查一二个学校、一二个机关的情况。

毛泽东

三月廿九日

请先印发参加碰头会的同志们及其他同志看一看。

毛泽东还让王力、关锋再写的一篇《红旗》评论员文章，配合这份调查报告。于是，王力、关锋撰写了《在干部问题上的资

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批判》的《红旗》杂志评论员文章。毛泽东在看这篇文章清样时，当场口授一段："千万不要上《修养》那本书的当。《修养》这本书是欺人之谈，脱离现实的阶级斗争，脱离革命，脱离政治斗争，闭口不谈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闭口不谈无产阶级专政问题，宣传唯心主义的修养论，转弯抹角地提倡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提倡奴隶主义，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按照这本书去'修养'，只能是越养越'修'，越修养越成为修正主义。对这本书必须彻底批判，肃清它的恶劣影响。对这本书的批判，也是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重要内容。"王力立即作了记录。

毛泽东要求将这段话加在文章结尾处。王力整理打印好后又交给毛泽东看。毛泽东说："马上发。"

3 月 29 日晚，在中央文革的一次会议上，宣布徐向前不再管全军文革的事。全军文革的工作由肖华主持。

3 月 30 日，中共中央决定，增补谢富治、肖华、杨成武、粟裕为中央军委常委。

3 月 30 日，毛泽东审阅了林彪 3 月 20 日在部队军以上干部会议上的讲话记录稿，并在林彪送审的讲话稿上分别批道：

林彪同志：

看了一遍，很好，请交文革小组加以斟酌，然后印成小册发给党、政、军、民的基层。我作少许几处修改，是否妥当，请酌定。

毛泽东

三月卅日下午

林彪讲话稿的第二页讲到，列宁强调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还有阶级斗争，改变了形式，有的地方变得更加激烈”。，毛泽东在这句话后面写道：“此处应引几句列宁的原话。”

林彪讲话稿的第四页讲到：“如果人是一个孤立的个人，那人同狗、牛、马、天上飞的鸟、水里边游的鱼，就没有区别了。”毛泽东删去了这句话，并写道：“动物也不是孤立的个体，分为纲、目、属、种，故此句可删。”

另外，毛泽东还在第十六页，将“夺取政权很多国家都实现了，可是都保不住”一句中的“可是都保不住”，改为“可是大多数都保不住”。在第二十八页，林彪讲到：“我们要以毛主席的思想来统帅全国，来指导我们的一切工作，这样要传至万万世，指导我们现在的一切，而且是全世界人民永远的思想财富，全中国人民永远的思想财富。”毛泽东删去了其中的“这样要传至万万世”一句，并将两处“永远的思想财富”中的“永远”二字删去。此外，还有几处个别文字的修改和删节。

## 第564回：三三〇，接见内蒙古□导 悲□述，对《清宫秘史》批判

3月30日晚21时40分至次日凌晨1时，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接见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代表中支持“呼三司”的高锦明、权星桓、王再天、李树德、康修民、李质、郭以青、张鲁，和支持“红卫军”的王逸伦、王铎诸位领导。

接见一开始，周恩来首先询问了每一个自治区党委代表的姓名、民族等情况，接着问起最近呼市的情况，由29日刚从呼市返京的李质、张鲁作了汇报。当汇报到“无产者”、“军代表”采取集训、写自白书等方法对待群众时，康生说：“仅公安厅，公安局就集训109人。”

王力、关锋也说：“什么集训，就是集中营，思想犯训练班，学的国民党反省院那一套。”

当汇报到内蒙古独立二师有人说：“中央调查团有8个右派”时，周恩来说：“调查团一共有9个人，怎么有8个右派？”

汇报到呼市街上“三司”开始贴出“打退自上而下的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逆流”的标语，军区派人照相，说是“反动标语”，康生插话：“连提拥护毛主席、林副主席都说成是反动宣传。在3月9日军区给中央的电报上就是这样说的。”

汇报时谈到近日呼市许多地方在放王逸伦攻击高锦明的录音，周恩来将王逸伦3月6日的讲话录音稿传单要过去翻看。康生则指着王逸伦说：“你的讲话毫无检讨，顽固坚持刘、邓路线！

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根本问题是对待群众的态度问题。呼市这一时期发生那么多打人，抓人事件，你怎么看法？你表示过什么态度？向谁表示过态度？高锦明，权星桓同志的问题我们不做结论，你们辩论去，有他们的账在。我就问你对群众的态度问题。”

王逸伦答到：“康生同志，我不赞成这种说法。我向家里打过电话，向军区、‘无产者’都谈过。康生同志，这怎么能说是没有态度呢？”

陈伯达说：“‘无产者’实际代表有产者。”

江青：“现在是我们在问你！我看你一口一个康生同志，是质问的口气，很不尊重康老，很嚣张！”

王逸伦不服的问：“我怎么嚣张？”

江青坚持：“是你嚣张！”

王力帮腔：“你很嚣张！我看呼市资本主义复辟这一套，就是你指挥着干的，可恶！”

康生继续问：“王逸伦，我想问你几个问题：在你的讲话里对路线问题怎么不表示态度呢？学生冲军区是错误的，‘三司’已经承认了错误，做了检讨。但对柳青打死韩桐你怎么看？表示过态度没有？把《解放军报》社记者押起来你认为对不对？你和军区谁谈过这件事？军区派武装来北京，来毛主席住的地方捉人你认为对不对？你光相信军区的话，你相信不相信总理的话？你认为包围师范学院对不对？你为什么在18日早晨总理接见时不表示态度？”

王逸伦对这些问题作了回答，为自己分辩。这时，内蒙自治区党委有人揭发他，王逸伦反驳说：“造谣！”

江青："人家提出问题，你就是'造谣'二字。有的是三对面都对清楚了的，你怎么装糊涂！"

周恩来："是顽固的坚持刘、邓路线，又是乌兰夫的人。乌兰夫保过你。"

康生："是乌兰夫的暗藏分子。"

汇报提到王逸伦的二儿子在二中是打人凶手，曾被群众送公安局拘留，王逸伦的大儿子是"二司"的发起人，康生指着王逸伦说："你支持'无产者'看来是有血缘关系的。"

王力："内蒙古都像你这样的人，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那里能贯彻？"

王逸伦说他对各群众组织都是同等待遇，没有偏向时，康生问："那你对'抗大兵团'也是同等待遇的了？！"

周恩来："你不是说在2月6日以前你和区党委一致的吗？区党委支持'三司'明了以后你怎么样？"

王逸伦说"三司"打、砸、抢的问题。

康生反问："那么'无产者'他们就那样好吗？"

王力、关锋："近来'无产者'这么样的乱砸、乱打、乱抓时，你表示过什么态度？"

周恩来："在你的这么长的报告里，对此根本没说一句话。是不是因为你和他们三结合了？你这个报告是不是三结合的纲领？"

周恩来又问王铎："你怎么到北京一个多月后又倒过去？你的信上为什么对军区的错误一句未提？"

王铎答："我的认识有改变。"

康生："他就投降了。"

周恩来："是搞投机。"

王铎叙述他改变观点的三个理由：一、对学生冲军区的问题；二、对"三司"的看法；三、对高锦明的问题。当他谈到学生冲军区，高锦明、权星桓、李质等人没有坚定地做学生工作时，康生反问："你去做过工作没有？"

王铎答："我当时做别的群众的工作，以后也去做过工作。"

周恩来："你是要同他们三结合了。"

陈伯达："你做工作，你代表什么阶级去做工作？你俩是代表地、富、资产阶级，戴了顶'无产者'的帽子。"

王铎分辩道："我是坚决执行主席的革命路线……"

江青质问："哪个主席？是我们的毛主席还是你们那个刘主席？"

陈伯达："你们那个资产阶级立场不改变，其他都谈不上。"

康生："在全国，向群众打第一枪的是内蒙自治区！你们知道不知道？"

王铎回答："不知道。"

周恩来："你怎么不知道？你的信是3月15号写的嘛！你去做工作了没有？你是要同他们搞三结合的了。"

康生："像王逸伦你们这样的人要是成为三结合的对象，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在内蒙古就失败了。"

当谈到"无产者"现在正四面出击，声言要同"三司"搞大联合时，陈伯达对王铎、王逸伦说："你们要搞什么大联合？我们谈的是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你们搞的是地主、资产阶级

的反革命的大联合。”

周恩来：“原来想听听你们有什么检讨，你们这个地主、资产阶级立场不改变，怎么能检讨？”

康生：“你不是口口声声说内蒙没有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反扑吗？今天你们两个的表现就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反扑。”

周恩来：“是没有乌兰夫的乌兰夫反扑，是没有乌兰夫的乌兰夫复辟。”

康生：“你们一点群众感情，一点阶级感情都没有！是没落的阶级，还谈什么文化大革命。中华人民共和国不从当权派中把你们这些人清除出去，是很危险的。不清除出去，中国哪有社会主义？哪有共产主义前途？”

陈伯达：“你们俩是没落的、死亡的地主、资产阶级的代表。”

王逸伦坚持不承认内蒙现在情况仍处于恐怖状态，康生让中央文革的工作人员介绍中央调查团18日在呼市宣布了中央对内蒙古军区的批评后，遭到了军区一些干部和林蔚然等人的围攻情况。

康生说：“这么一个大事实你硬不承认。你们看看这些，这都是你们支持的。你们是支持白色恐怖，这完全是反动统治，你们两个就是代表。”

王力：“是法西斯统治！”

康生：“高锦明、权星桓同志有错误，有他们的账。我问你们：军区政治部宣布高锦明、权星桓同志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你们同意不？”

他指着王铎问：“你的信上提了没有？”

王铎说："我不同意，我给军区谈过。"

康生追问："我问你的信上提了没有？你们回答问题，一不讲中央，二不讲群众，你们对中央究竟是什么态度？你怎么对待中央？"

周恩来："原来还想你们有点自我批评，但一点也没有，看来得见见群众。"他指着王逸伦说："你不是说你们支持'三司'吗？要看看'三司'的同志们怎么说。"

接着，康生向王逸伦了解他的入党情况，是否被捕过？

当王逸伦回答自己没有被捕过时，高锦明问："你到苏联路过蒙古不是被扣过吗？"

王逸伦答："那是被扣留审查，是社会主义国家。"

康生继续问："到苏联后谁审查的？"

王逸伦答："我写过材料，好像记得是孔原审查的。"

康生："孔原？怎么审查的？"

王逸伦答："那我不清楚了。"

康生："你不清楚？那时凡是去苏联的中共党员都要逐个面对面的审查，但是你没有经过审查。我听说你到过莫斯科，我就负责审查工作，但是我没审查过你。你住什么学校？送到哪个学校，都是要经过我审查，经过中共代表团审查的，你和刘仁等在河套干什么我清楚。你是不是苏联情报机关送去的？你是有经验的了。怪不得你这样顽固。"

周恩来问王逸伦："你的党籍问题说清说不清？"

王逸伦："我认为说的清楚。"

康生："王逸伦，我问你哪一年从苏联回国的？"

王逸伦答："38年从新疆回国，39年4月到延安的。"

康生："谁送你回国的。"

王逸伦答："一个中国同志，名字忘了。孔原那时还在莫斯科。"

康生："孔原那时还在莫斯科？"

王逸伦答："噢，那是35年。"

康生："这就是说，在莫斯科时，我们没有承认你是中共党员。"

王逸伦："训练班承认是党员，一个叫墨尔曼的女同志，她是管训练班工作的。"

康生："那是一个外国人嘛。我问的是中国人。"

王逸伦答："我见过康生同志，我还到过莫斯科郊区。"

康生："你还到郊区去过？"

王逸伦答："不是人多的那个地方。"

康生："那就不是我们的地方了！"

周恩来："你到延安后在乌兰夫办的中央民族学院工作过没有？"

王逸伦答："没有，那是王铎。"

周恩来："今天就谈到这里。"

看来，周恩来等人在和他们谈话前已经仔细的审阅了他们的个人履历。

3 月 28 日，刘少奇从孩子们买回的小报上获悉，有人说他曾经吹捧电影《清宫秘史》，还自称"红色买办"。满腹悲戚的刘少奇当即给毛泽东写信，叙述了当时看这部电影的经过："我看

过《清宫秘史》这个影片，记得是在主席处开会回来，在春耦斋看的，看时已是下半夜，看完天已大亮，后半部看得不大清楚。一起同看的，有总理周恩来同志，似乎还有胡乔木等人。看完就散了，我们都没有讲什么。”

这封信发出后，刘少奇没有得到回音。

戚本禹关于批判电影《清宫秘史》的文章初稿于 3 月 20 日直接送毛泽东审阅后，江青也来和戚本禹说了几次，所以戚本禹也送给江青一份。其他人都没送。为此，陈伯达批评戚本禹：“怎么没有经过文革小组讨论就直接交给主席了。”王力，关锋也对戚本禹颇有微词，说怎么不和他们“讨论一下就送给主席了。”

毛泽东对戚本禹的文章修改了两次，不仅批示：“写得很好”，而且还亲自加写了关于义和团的一段话。

到第三次，毛泽东说：“可以了，你和大家去讨论一下，就可以发表了。”

于是，周恩来亲自主持中央文革碰头会，对戚本禹的这篇文章逐段进行讨论修改。

以前讨论文章，一般都是由王力把大家的意见记录下来后再作修改，但这次，是周恩来边主持会议，边亲自在稿纸上记录，一个字，乃至一个标点用得合适不合适，都要斟酌讨论。文章中点不点名，点哪些人的名，怎样点，都经过充分的讨论。其中，对刘少奇没有直接点名，而是用“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指代。对邓小平也没有直接点名，大家的意见，是用“另一个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指代。陆定一在《五一六通知》中早点名了，在这篇文章中明确点了周扬的名，因为

姚文元早已写文章中点名批判了。陈伯达主张点胡乔木的名，康生不同意，陈伯达很坚持，江青支持陈伯达，戚本禹听江青的，于是按照毛泽东的意见，只点姓不点名，在文章中写成“胡××”。

这篇文章前后讨论了几次。有一次下午从两点多钟，陈伯达、江青就来了，一直改到吃晚饭。

文章定稿以后，先呈送毛泽东。毛泽东交代，先交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国进行广播，然后一式几份，交给《红旗》杂志、《人民日报》、新华社。

这时王力问周恩来：“这篇文章如何署名，是用《红旗》杂志，还是《人民日报》或《解放军报》评论员，还是同时用几家名义？”

周恩来说：“这篇文章是第一篇不点名地批判刘少奇的文章，还是以个人署名为好，就用戚本禹的名义。”

戚本禹觉得这件事太大了，而且文章形成的过程又不同寻常，以个人的名义发稿是否合适？于是就说：“这个文章涉及的问题太大，而且是经主席和大家集体讨论修改的，是不是还是用社论或评论员的名义。”

周恩来说：“正因为这篇文章会引起全国以及全世界的注意，按照国际上通常的做法，社论或评论员文章是代表官方的，而个人署名文章，再怎么说，也是个人文章，这是有区别的。把刘少奇的问题突然一下子作为官方文件提出来不好。还是作为个人的文章为好。”

陈伯达、江青都没说话，康生点头称是。

戚本禹又提出是不是用个笔名？江青瞥了戚本禹一眼，戚本

禹又收回了这个意见。

最后决定由戚本禹署名。

接着，周恩来马上安排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著名的播音员夏青、葛兰向全国广播。在制作广播的过程中，新华社的负责人还向戚本禹提出，有些句子太长，朗读的时候不大容易读出气势来，让他改成短句子。

3 月 30 日，红旗杂志第五期发表了戚本禹的文章：《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

第二天，3 月 31 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了《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

第三天，4 月 1 日，在《人民日报》的头版上全文发表了这篇文章，新华社也发了通稿，全国各大报纸也都刊登了。

文章以姚文元《评反革命两面派周扬》文章中引用的毛泽东的一段话开头：

“被人称为爱国主义影片而实际是卖国主义影片的《清宫秘史》，在全国放映之后，至今没有被批判。

——毛主席：《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一封信》”

该文以“中国晓鲁晓夫”的代名，首次系统批判了刘少奇建国以后的一系列言行，虽未直接点出刘少奇的名字，但已经等于将刘少奇的问题向社会公开。

在文章结尾处，戚本禹一连提出了八个为什么，同时予以回答：

为什么你要在抗日战争爆发前夕，大肆宣扬活命哲学、投降哲学、叛徒哲学，指使别人自首变节，要他们投降国民党，叛变

共产党，公开发表“反共启事”、宣誓“坚决反共”？

为什么你要在抗日战争胜利之后，提出“和平民主新阶段”的投降主义路线？

为什么你要在解放以后极力反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反对农业合作化，大砍合作社？

为什么你要在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完成以后，竭力宣扬阶级斗争熄灭论，积极主张阶级合作，取消阶级斗争？

为什么你要在三年困难时期，与国内外牛鬼蛇神遥相呼应，恶毒攻击三面红旗，鼓吹“三自一包”、“三和一少”的修正主义路线？

为什么你要在 1962 年还重新出版过去那种不要革命，不要阶级斗争，不要夺取政权，不要无产阶级专政，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毛泽东思想，宣扬腐朽的资产阶级世界观，宣扬反动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哲学的、欺人之谈的大毒草《论修养》？

为什么你要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提出和推行形“左”实右的机会主义路线，破坏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为什么你要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勾结另一个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提出和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答案只有一个：你根本不是什么“老革命”！你是假革命、反革命，你就是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

这八个“为什么”是戚本禹在文章修改最后一稿时，同林杰和《红旗》杂志责任编辑等共同讨论后增加的。

从 4 月 2 日开始，各地群众开始上街游行示威，一连好几天，声讨刘少奇，而且规模越来越大，都是群众自己组织的。

而此时，悲愤之极的刘少奇把刊有这篇文章的《红旗》往桌上一摔，怒吼道："假话！造谣！我什么时候说过那个电影是爱国主义？什么时候说过要当'红色买办'？这不符合事实，是栽赃！党内斗争从来没有这么不严肃过。我不反革命，也不反毛主席，毛泽东思想是我在七大提出来的，我宣传毛泽东思想不比别人少！" 他越说越激愤，"我早在去年 8 月的会议上就讲过五不怕，如果这些人无所畏惧，光明正大，可以辩论嘛！在中央委员会中辩论，在人民群众中辩论嘛！我还要为这个国家、人民，为我们党和广大干部讲几句话！"

因为刘少奇否认他说过电影《清宫秘史》是爱国主义的话，胡乔木向毛泽东写了一个报告，证明刘少奇确实是说过这话的。

对于刘少奇否认他说过要当"红色买办"的话，此时因为"二月逆流"正在接受批判的谭震林也写出一份揭发材料，说："我当时就是听到刘少奇这么说的。"

谭震林的揭发材料是用很大的字写出来的，毛泽东让把它印出来，给大家看。并开玩笑的说："你们老批判人家，现在出来讲话的还是谭震林。谭震林可以参加文革小组了。"

戚本禹他们也曾问过陈毅，陈毅说他"也听到刘少奇这样说过，好像是主席重庆谈判回来以后，讨论与美国的关系的时候，刘少奇这样说过。"

后来江青告诉戚本禹：这篇文章发表后，"主席说，他提出批《清宫秘史》那么多年，没有一个人写出一篇像样的文章来，这次戚本禹写了，并且讲出道理，所以要奖励他。"

江青说她有两架蔡斯照相机，要分一部送戚本禹。

戚本禹说："那东西太娇贵，我又不会玩。"

江青问："那你要什么？"

戚本禹说："我很喜欢主席的字,希望能给一张主席的墨宝。"

于是，毛泽东把他写的"满江红"那首诗送给了戚本禹。而且江青让汪东兴当着中央文革碰头会所有的人的面以奖励戚本禹的名义送给他的。

不过，也有不同的声音。4 月 4 日中午，在复旦大学 9 号楼厕所里发现这样的标语："打倒毛主席!""谁反对刘主席就砸烂它的狗头!"复旦大学的师生气愤已极，纷纷声讨。接着在 4 月 11 日，复旦大学又接连发现了两起攻击毛泽东，有"刘主席万岁"字样的大标语。为此，复旦大学"红卫兵师"在校内举行了愤怒的游行示威。

3 月 30 日,《红旗》杂志第 5 期发表社论:《论革命的"三结合"》。社论转引了毛泽东的指示："在需要夺权的那些地方和单位，必须实行革命的'三结合'的方针，建立一个革命的、有代表性的、有无产阶级权威的临时权力机构。这个权力机构的名称，叫革命委员会好。"从此就有了"毛主席的最新指示'革命委员会好'。"

## 第 565 回：批“工总”，邕分裂愈演愈烈　滇军管，众人送回邱会作

3 月 1 日晚，在广西军区支持下，广西“工总”所属外贸、北角、西乡塘等分部和“首都三司驻邕联络站”、“广西红总”、“南宁 831”等组织约 6 万人，在朝阳广场集会，揭发控诉“工总”罪行，指责“工总”自一月夺权以来执行了没有工作队的“刘、邓路线”，重新把群众打成反革命，因而宣布起来造反，封闭了“工总”总部，并将“工总”主要负责人、总部宣传委员熊一军扭送公安局拘留。

3 月 3 日，广西军区负责人召集“工总”各分部负责人开会，建议组织联络站，为成立新“工总”做准备。

但是，第二天，3 月 4 日，桂林“老多”、“八八战斗团”、“华东工学院驻邕联络站”、上海同济大学“东方红”、“广西一司”等组织散发传单，不同意砸烂“工总”。

3 月 8 日，广西《二一九声明》的 12 个签名人在区工交政治部副主任刘泮江宿舍开会，自治区副主席贺希明主持，主要讨论成立领导干部“联络站”及把他们的队伍扩大到处级干部的问题。当时有人提出：“还是请示广西军区为好。”于是决定由区财贸政治部主任段纯和等人请示。

3 月 10 日，段纯和等人向广西军区副政委王希永、军区政治部主任孙磊请示。王希永、孙磊二人向段纯和等人谈了两点，其中一点说：“领导干部应到群众中去，与本单位群众一起闹革命，自己有错误就猛检讨”。

段纯和等感到这么搞法有问题，于是商定今后不再参加 12 人活动。当天在向贺希明汇报广西军区意见的同时，段纯和、刘泮江和区人民政府副秘书长阎光彩 3 人申明了他们的立场。3 月下旬他们三人还给广西军区领导递交了一份详述 12 人活动经过的材料。至此，《二一九声明》的签名者出现了分歧。

3 月 11、12 日，“广西一司”、“南宁 831”、广西大学“狂飙”等组织代表分别走访广西军区和空七军，也表示不同意砸烂“工总”。广西军区砸烂“工总”的行动没有得到他们肯定的南宁四大群众组织的完全支持。

3 月 13 日，广西“工总”的 23 个分部 100 多名负责人在南宁文化宫开会，准备成立“新工总”，并散发“工总砸不烂，越砸越坚强”的传单。会议决定：

1、不撤销联络站；

2、筹备成立“新工总”；

3、准备材料上京告状。

同日，广西中学生“八一八红卫兵”，简称“小八”，同“广西一司”就砸烂“工总”的问题在朝阳广场举行辩论会。“小八”认为“工总”应该砸烂，砸得好。

当天，周恩来打电话给韦国清，指示：广西地处援越抗美前线，要实行全面军管，让韦国清站出来当军管会主任。

14 日，韦国清飞赴广州军区，并于 17 日，在广州接到周恩来指示，从广州飞往北京。

3 月 18 日，广州军区接中央指示，由广州军区副政委陈发洪率领工作组到广西军区筹备成立广西军管会。

3 月 19 日，尚不明就里的桂林市“大中学校红卫兵总部”、《红卫兵》编辑部依然就南宁文化大革命局势发表《严正声明》，率先提出“打倒韦国清，解放全广西”的口号。

3 月 21 日，广西军区召开区直机关代表座谈会，征求意见，看自治区党委领导干部谁能站出来？参加座谈的有区直机关“天翻地覆”和区杂技团“愚公移山”、话剧团“一反到底”等组织的代表 17 人。广州军区副政委陈发洪传达了中央对韦国清看法，说“韦国清支援越南是有功的，是好同志，要支持他站出来。”

代表们一致认为：韦国清可以站出来亮相。会后，“愚公移山”、“一反到底”等组织连夜讨论，于次日凌晨贴出了第一张“坚决支持韦国清同志勇敢地站出来和革命群众一道闹革命，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的大幅标语。随之，不少群众组织也陆续贴出了同类内容的大标语。

23 日，广州军区派往广西的工作组召集广西大学、医学院、农学院、民族学院、教育学院、南宁医专等 6 个学校的红卫兵代表，依然是座谈区党委领导干部站出来的问题。结果是，除一人认为韦国清可以站出来外，其余几人都认为应该让伍晋南、贺希明二人站出来。

25 日，“南宁 831”负责人向广西军区提出：“韦国清是硬抬出来的。”他们认为，韦国清站出来他们同意，但现在不是时机，要广西军区慎重考虑。

当晚，“广西工总”、“广西一司”、“广西 831”等 8 个组织约 400 人在南宁市桂剧院门前联合召开“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革命复辟逆流誓师大会”。会上提出：

“打倒韦国清!”

“反对砸烂‘工总’!”

“坚决砸烂保皇组织‘无联’、‘老赤’、‘破盾’!”等口号。会后举行了游行。

26 日，广州军区工作组和广西军区负责人继续召集自治区直属机关 12 个组织的代表座谈，做韦国清“站出来”的工作。与会代表一致认为:“韦国清站出来是革命的需要,战备的需要。”

29 日，广州军区工作组又召集南宁市委“造反兵团”6 名机关干部座谈。会上也一致表示支持韦国清“站出来”，认为“工总”对当前南宁市文化大革命阻碍很大，应该采取相应措施。

当晚，原“工总”下属 6 个分部和广西大学“狂飙”、“广西 831”、“南宁 831”、“广西一司”、桂林“老多”等组织 5000 余人在朝阳广场召开“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誓师大会”，继续提出“坚决反对砸烂‘工总’”，“坚决打倒韦国清”等口号。

30 日凌晨 2 时，支持韦国清的“红色监察”、区党校“遵义兵团”等组织 3000 余人举行游行，口号是：

“坚决砸烂反革命组织‘工总’!”

“给反革命组织‘工总’翻案没有好下场!”

“欢迎韦国清站出来和革命群众一起闹革命!”

当天的《广西日报》第一版刊登广西大学数理系实现大联合的报道和评论员文章《团结大多数，实现大联合》， 引起广西大学强烈反响。很多群众和群众组织贴出大字报，指责这篇文章“抹煞路线斗争，提倡大凑合”。

这天晚上，“汽司”、“广西铁路工人革命造反司令部”、“建司”等工人组织在朝阳广场集会，内容是：欢迎韦国清“站出来”，坚决砸烂“工总”。

31 日，“广西一司”、“广西 831”、广西大学“狂飚”、南宁二中“井冈山”、“东方红”等 16 个组织共 400 多人，晚上在区首府南宁举行“粉碎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逆流”游行，两次到区党委大院示威，与机关一些群众组织发生冲突，双方大打出手。

为是否砸烂“工总”和如何落实中央的指示，支持韦国清站出来，广西的群众组织再次分裂，且愈演愈烈。

我们再看云南。

3 月，云南大学部分学生和昆明师范学院“炮兵团”一道，在翠湖边的云南省农业展览馆内举办“云南省委修正主义生活方式展览”，展出文革前省委领导人吃喝玩乐的部分实物和图片。

其中展出进口价格昂贵的名酒，每小杯价格即达几十元人民币，比一名普通工人一个月的工资还高。吃的许多东西更是老百姓们见所未见、闻所未闻。如送给罗瑞卿的“三七王”、一个足有拳头大、近一市斤重。

他们中有的人使用的钓鱼杆是 1000 多元一根的进口货，上边有指示灯可以显示鱼咬钩的情况，还有刺激性欲的高级针水……

省级机关贴出的大字报中，揭发的更是触目惊心：

省委书记处书记、副省长刘明辉经常到劳改农场的鱼塘钓

鱼，每次钓鱼少则 10 多斤多则几十斤。这么多鱼他家吃不了、亲友也吃不了，只有用于喂鸡。

也是这位刘明辉，到滇南元江县蹲点几天，嫌元江的猪肉不好吃，让小轿车每天专门从昆明往元江给他送鲜猪肉。由于天气热，当小车将两斤猪里脊肉带到元江时，已不太新鲜了，让刘明辉挺生气。于是第二天小轿车再到昆明取肉时，驾驶员开快车，结果汽车翻到山沟里。

省检察院副检察长经常到劳改农场钓鱼，有一次钓到一条 10 多斤重的大鱼，由于大鱼钻进水草丛中，鱼线太细不能硬拉，便让小车驾驶员下水为他把大鱼捉上来。当时这位驾驶员正患重感冒，且不大懂水性，为了首长的这条大鱼，下水后竟丢掉了自己的性命。

省委常委、昆明市委书记赵增益，每次到安宁温泉洗澡必定要和夫人一道洗鸳鸯池，根本不考虑在群众中造成的影响。

省委常委、副省长刘林元，决定种一块试验田，这块试验田从耕、种、薅锄到收割，一切都由下边的工作人员进行。他什么时候心血来潮要到试验田看看，必定要通知记者不停地给他拍照片以便见报。

原省委第一副书记利用主管文教之便，在接见剧组与某女演员握手时，竟把约会的字条塞到对方手里，还说他把春城饭店一位女招待员的肚子弄大了，只得另调任甘肃省委任书记处书记。

至于进城后即休了前妻当陈士美一类的干部，更是大有人在……

3 月，云南省军区政委张力雄出动武装，逮捕了呈贡县“大

联合指挥部”的 2 名负责人，逮捕了当地“ 1130”组织的 5 名负责人。

3 月 31 日，中央批准，云南省成立军事管制委员会，对云南全省实行军管。军管会由 15 人组成，主任是昆明军区第二政委李成芳；副主任为昆明军区副政委张子明、云南省军区司令员黎锡福。

康生在北京专门找李成芳、张子明谈话，告诉他们赵健民对文化大革命不满，要他们注意赵健民的动向。

与此同时，根据党中央决定，云南省军区奉命对昆明市实行“三支两军”，由武装部牵头成立“昆明市支左委员会”，对重点部门、企事业单位派驻军代表。昆明市所属县区，建立以当地人民武装部为领导的生产领导小组，实行军事管制，代行政府部分职权，维持社会治安，组织指挥生产，调解两派纠纷，禁止城乡串联，并采取种种措施保障人民基本生活。

我们再回到北京。

此时，总后勤部大院的混乱局面有所控制，邱会作的身体也有所恢复。3 月 31 日，周恩来率陈伯达、江青等人，领邱会作回总后工作。在当天召集的总后机关干部大会上，周恩来说：

“同志们！很久没有到你们这里来了。我想这个会是很难得的机会，跟我们全军总后勤部的负责同志见面，我想，首先，让我代表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林彪副主席，代表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向你们问好！

因为今天是你们的部长邱会作同志身体的健康在开始恢复的时候，回来工作，我们借这个机会讲几句话。”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场大风浪中，任何人，都是如同我们林彪同志所指示的，在这场大风浪中，要学会斗争。……有时我们这些负责同志，即使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也就是说是毛主席、林副主席司令部的人，也免不了要经过一些风浪。这也是考验我们。从这个意义上说，我觉得你们的部长，我们战友邱会作同志，是经住了这次考验的。”

“许多革命的小将，青年们，他们有闯劲，在中央和中央军委 10 月 5 号紧急通知的号召下，起来在解放军内部来闹革命，特别是军事院校，后勤工厂，医院，以至文艺队伍，实行大串连，这是根据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指示办的。……所以你们这里住满了人，就闹了一场大的风波，这是一场革命的风波。年青的人嘛，他要闯一闯，看一看，烧一烧，贴满了大字报，贴满了标语，当然在斗争中也有些激烈的行动啰！现在看起来，有的是可以避免的，有一些呢，也确实是年青人斗争的初期的发展，不完全是可以避免的。……这样子，当然你们后勤大院最高的负责同志——邱会作同志，他就要首先变成了一个斗争的目标了。……现在，许多院校回去了，医院的也回去了，文艺部队也回去了，工厂的也回去了。他们自己整风，就会把两类矛盾，一个人，一个领导整个全面地来观察，他们就会得出应该得出的结论。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先要把这个冷静地看一看，这种代价需要付出。因为这是对领导干部的考验，也是对我们每一个工作干部的考验。……我相信，邱会作同志健康开始恢复，重新来领导我们后勤工作，一定会做得更好，因为他有了经验嘛！”

接着，周恩来述说了邱会作的革命历史，肯定了邱会作主持

总后勤部工作后的成绩，他说："在这个地方，我简单回述一下子。我曾经说过，邱会作同志是个老同志，经过长征的，很小的时候就参加我们的红军，我还在江西的时候就跟他相识，差不多到现在来说三十六、七年了。长征的时候认识，特别到了陕北，那时红军被迫地离开了老根据地，转战北上，集聚在陕北。那时候，我们的领袖毛主席、林彪同志，都在前线作战，我在后方主持后方的工作，那个时候邱会作同志也就参加后方工作、后勤工作，我们差不多每天几乎要见面的，计划为前方筹运供应的事情。渡黄河东征的事情，转战到西边，所以那一阵子共事最密了，觉得他是一个很能够工作的同志，也是年轻的，那时青年有为，是个有希望的同志，跟着毛主席、林彪副主席走。这个看法到现在来说，已经超过了三十年了，觉得我的看法基本上还是没有看错。三十年中，他做了很多工作。先在后勤，然后又做政治工作，在抗日战争中，特别是解放战争，转到东北，然后南下，又做政治工作，最后在林彪同志主持军委的时候，他又来做总后的工作。接近四十年了，可以说，他是一个坚定的红军战士，老战士。这是他整个历史的主流嘛，好的方面嘛！但是不是没有缺点，有可能在某些方面还有严重的缺点。所以，毛主席的学生，林副主席的战友，不可能在我们一生不犯错误，我就是一个嘛，也犯过多次错误嘛！但是有决心，有了错误，敢于正视错误，而且决心改正错误。"

最后他说："所以，现在可以说，应该是我们后勤工作的新的一章的开始。我的话完了。"

接着，江青讲话，她说："邱会作同志我是不太熟悉的，大

概见过几次面。但是早一些我看过他写的自我批评，也听过他在这次运动中的一些态度，我对他那个书面检讨，我觉得是诚恳的，是比较实事求是的。此外，当他在群众面前，当群众运动在一个高潮的时候，出现了某一些偏激的时候，在这样关头的时候，最容易考验一个人了，考验一个共产党员，在这方面我听到邱会作同志是有良好的表现的，是值得我学习的，我相信也值得同志们学习。这是第一。他不承认他是三反份子，遭到了变相的体罚的斗争，这时他不是对抗的态度，他对群众采取了爱护的态度，这点我们不知道的，我听到我很感动的。他觉得很不安，群众为他在那儿挨饥受冻，他自己非常不安，他不能够休息，这样，后来主席派人要群众散去，他才安心休息。那么，在这样一个运动中间，有很多不同态度的人，我想邱会作同志这种态度既不是对抗，也不是委屈，而是爱护群众，而是拥护毛主席，拥护林彪同志。这样的态度是不是值得我们学习呢，同志们？”

大家热烈鼓掌。

陈伯达说：“我完全拥护刚才周恩来同志的讲话。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邱会作同志他不怕群众，站出来跟群众在一起，并且作了多次检讨。我觉得这样的态度是很好的。希望邱会作同志，出来做工作。像刚才周恩来同志所讲的，经过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运动，邱会作会工作得更好，我们希望他工作得更好。”

## 第 566 回：放□廉，乘软卧来到北京　三三一，中央查□蜀□□

这段时期，中央已经收到许多关于四川“镇反”的控诉材料。应该是根据毛泽东 3 月 27 日对《文化革命简报》435 期的批示精神，3 月 30 日，中央让派专机送四川的两派群众代表进京了解情况。

3 月底的一天，54 军支左干部曾辉平到看守所找到重庆“工人造反军”头头黄廉，对他说：“今天找你是准备放你出去，你出去之后不能再回文联那边了，罗广斌自杀了，你不了解，也不要过多介入。‘革联会’经过群众推选，也有市委干部，是革命的三结合，就是现在的权力机构，也为你们留了席位，你们不派人来。‘815’就比较听话，各组织都派了人。另外，你老婆在七军医大，‘105’那个组织比较被动，就像你们现在这个情况，受了些委屈，你要正确对待，还是要跟我们合作。我们是镇压文革中间的坏人，你们那个组织是反对‘革联会’的，都当作反革命镇压，要做解释，也算是道歉。省委写的信你为什么不交出来，这是你的不对。你从北京回来为什么不到 54 军来报到，所以才发生这种误会，你们‘砸派’的大小头目都被抓了的。”

黄廉自然不卖他的账，反驳说：“你们完全是强盗逻辑，你们就那个水平，喊中学生来接我，还要我不要直接回家，说‘5 点钟左右车子直接来接你’。”

公安局的人赶紧说：“黄廉，这可是 54 军和‘革联会’与你们的矛盾，不要怪我们咯。”

汽车直接将黄廉送到 54 军军部。在会客室门口，等候在那里的 54 军参谋长耿志刚一见黄廉，就向他伸出手来。

黄廉拒绝跟他握手。耿志刚只好解释说："你受苦了，对不起了，在大巴山张国焘搞肃反的时候……"

黄廉打断耿志刚的话说："你们到今天还是处在学习张国焘的水平？"

耿志刚很尴尬，不知说什么好。这时，54 军军长韦统泰进来了，见此情景，就为耿志刚打圆说："黄廉，这是个误会，学生把你捉起来，我们发现晚了，是我们的不对，看你还要点什么东西不？在我们招待所洗个澡，理个发，现在北方天气很冷。去北京，你穿的太少，这点衣服抗不了寒。"

黄廉问："我刚刚从北京回来，还去北京干啥？"

韦统泰说："是总理叫你去，还叫成都军区派飞机送，我们明天才能安排，今晚你好好休息，明天我们启程。"

这时，一位部队干部急急忙忙走进来对韦统泰说："军长，改坐火车了，马上要走。"

韦统泰一听，赶紧让黄廉写个条子给他妻子，看还需要什么东西，他们马上派人去取。

不到 20 分钟，黄廉在七医大工作的妻子就坐着 54 军的摩托车过来了，穿着军装的她很生气，一进来就骂 54 军的人说："你们给我们解放军丢人……"

韦统泰说："政治斗争嘛，要正确对待……"

黄廉的妻子对黄廉说："你回来之前，他们搞了一派夺权……二月镇反，四川一个晚上就抓了 12 万人。他们还把标语贴在我

们家的门上，抄了我们的家，‘砸派’起码有上万人去北京告状，全国的逆流四川最厉害。周总理晓得你回来之后被抓了，亲自指示他们要用飞机把你送到北京去。罗广斌也被他们害死了……”

这时，耿志刚喊黄廉赶快上车。黄廉来到汽车旁，看见成都军区后勤工程学院“红色造反者总团”的头头张龙宝也来了，胡子老长，他一见黄廉，抱着他就哭，说：“感谢周总理和中央文革的关心。”

张龙宝对黄廉说：“‘革联会’一成立我就被抓进军人监狱了，已经被关了很长时间。”

原来，重庆市“革联会”成立后，“红色造反者总团”是反对“革联会”的。3 月 9 日，54 军对后勤工程学院实行戒严，宣布取缔“红色造反者总团”，张龙宝及其骨干成员 30 多人被逮捕入狱。这次，也是周恩来亲自点名，让他到北京参加中央解决四川问题的会议。

过了一会，副市长段大明过来了。黄廉问他：“你来干什么？”

段大明说：“是部队喊我来的，准备解放我……”

54 军军长韦统泰对黄廉说：“你要和段大明搞好结合。”

黄廉坚持说段大明是走资派。

上火车之后，大家都是软卧，独把张龙宝放在硬坐车厢，黄廉不同意，坚持要给换过来，54 军最后同意了他的意见。54 军特意将副市长段大明和黄廉安排在一个车厢。段大明对黄廉说：“是军队喊我去结合的。我当过红军，待遇已经够了，也不想再有什么职务了，能去柑橘研究所当个所长，也就可以了。”

3 月 31 日，重庆的黄廉他们到了北京，住在西苑宾馆，给

黄廉安排了一个西二楼的大套间。黄廉有些蒙了，问耿志刚："住这么宽干什么？"

耿志刚说："这是按照市长的标准安排的三套间。"

黄廉没有想到，自己从监狱刚出来，就坐上了软卧，还跨进市长套间，他感觉就好像是做梦一样。

周恩来、康生、江青、吴法宪、叶群等中央首长当天就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他们。江青首先问："蔡文斌来了没有？黄廉来了没有？"

蔡文斌，成都电讯工程学院校学生会主席、学院"东方红造反兵团"负责人。成都电讯工程学院校"东方红"兵团与成都各大专院校红卫兵联合组成庞大的"红卫兵成都部队"后，担任"红卫兵成都部队"负责人。"

54 军韩怀志站起来回答说："来了。"

江青接着说："这次在二月逆流之间被抓的同志，对不起你们，你们受苦了，经历了这一次反扑也好，不要以为干革命会安然无事。四川一个晚上抓了十几万人，连李大章、天宝这样的老同志一夜之间都成了反革命，成什么话！"

有人说："我们到了北京，他们还派人来抓我们，用枪押着我们的同志。"

江青气愤的说："他们带的枪没收！"

告状的人又说："他们抓了我们好多人。"

康生说："谁抓人把谁抓起来！"

由于四川万县发生了 2 月 22 日的解放军开枪事件，曾经协助四川万县成立"主力军"的北京大学中文系老师石安、北大学

生张甦、中国科学院刘贤荣、谢毓华及清华、石油学院、北京农机学院、北京中医学院等院校的学生，于 3 月 26 日在中国科学院成立了“首都红代会、中国科学院万县问题联络站”，简称“万县问题联络站”，选出四个主要负责人：石安石、张甦、刘贤荣和谢毓华，推举 3 月 25 日刚从四川回到北京的张甦为主要负责人。他们也参加了 31 日的接见。当他们走进大会堂河北厅时，看见正前方一排长桌子，正中坐着康生，旁边坐着江青、吴法宪、叶群等中央首长，没有见到周恩来总理。宜宾代表正在讲他们那里的情况。

张甦见状，就从衣袋里掏出小笔记本，撕下一张纸，写了一张纸条：

敬爱的康老：

四川万县在 2 月 22 日发生了部队开枪镇压革命工人、学生的流血惨案。在座的就有从万县逃跑出来的中学生。我们请求，让我们先汇报万县的情况。

北大学生　张　甦

1967 年 3 月 31 日

然后急步上前，走到第一排，想将纸条直接送给康生。但是距离那排长桌子还有两三米距离，怎么也够不着。康生往旁边看了看，一位身着浅色中山装的中年工作人员马上走过来，接过字条，交给了康生。

康生看了张甦的纸条，用他那厚重的山东口音对全场说：“万县发生了开枪镇压群众的流血事件，现在我们让万县来的同志先说！”

于是，张甦汇报了万县地区的群众组织“主力军”和“赤旗”的情况，认为他们是革命造反派组织；介绍了 2 月 22 日万县发生的驻军开枪镇压群众，杀死了工人、农民和学生的事件；最后说：“今天来到会场的有亲身经历了 2 月 22 日镇压群众流血事件的万县中学生，请他们继续补充。”

这时，万县地区开县中学高中学生郑清伟来到前面坐下，正要汇报，只见工作人员对着康生耳语，康老高兴地说：“等一等，总理到了！”

全场安静，都盯着前方。一会儿，只见的周恩来走了进来。全场代表不约而同，热烈鼓起掌来！

周恩来在康老身旁那个空位子坐下，掌声也停了下来。康生把张甦写的那张纸条递给他看，并耳语了几句。

周恩来说：“现在请万县的同志继续发言！”

郑清伟同学开始汇报他 2 月 22 日那天在万县市亲眼目睹的情景。讲完万县市“2·22”事件，又把开县造反组织情况及 2 月 17 日如何镇压造反组织，抓了多少人，关了多少人，也讲得一清二楚。

全场分外安静，大家都静静地听着。

郑清伟汇报完，开县长沙中学初一学生何如愚立刻上前坐下。

周恩来问：“你叫什么名字，多大了？”

何若愚答：“我叫何如愚，满 13 岁了，是开县长沙中学初一年级学生。”然后，他便将开县二月镇反，他如何被抓，如何逃到万县市，碰上 2 月 22 日开枪事件的经过也讲了一遍。

接着，万县卫校女学生李达芬、胡良珍也轮流上前发言。她俩讲到伤心处，边哭边讲。

万县问题整整汇报了两个多小时。最后周恩来说："万县问题是很严重的，要迅速让革命群众组织的代表来京参加会议，解决四川问题。"

开县中学郑清伟立刻请求说："总理，我们开县问题也很严重，也要求派代表来开会解决开县问题。"

周恩来答应了："开县是一个特殊情况，单独派代表来京开会。"

这时，有人提到2月17日《中央军委给成都革命工人造反团和川大东方红826的信》及成都军区派飞机散传单一事，周恩来问：

"撒传单的飞机是谁派的？"

听到周恩来的发问，主持成都军区工作的成都军区第四政委甘渭汉、成都军区副司令员韦杰同时站起来，支支吾吾地回答，康生见他们含糊其辞的样子就发火了，一拍桌子上说："到底是谁派出的都不好说吗？"

韦杰、甘渭汉两人楞了半天才说："是林副主席叫派的。"

话音刚落，坐在江青侧面的叶群嗖的一下从座椅上站起来，将椅背上的军大衣一甩披在身上，眉宇间一股煞气伴着威严的神色，转身快步走出了会议厅背后的小门，会议仍然继续。江青让黄廉发言，黄廉说：

"我还没拢屋就被抓了，什么也不知道。"

江青说："你还不明白，这是个路线问题。"

不一会叶群返回来坐下，两眼紧盯着韦杰和甘渭汉说：

“刚才我问了林副主席，他说根本就不知道派飞机这件事……”说完她仍怒目望着韦杰、甘渭汉。他俩望着叶群那冷峻的目光，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

康生说：“2月17号所谓的中央军委的信，毛主席、林副主席完全是不晓得，我们也是昨天才知道的。”

叶群说：“为了证实这个信，我刚才坐车到林彪同志那儿去了，这个所谓中央军委的信，根本是造谣。林彪同志说：他根本没有看到这封信，他也根本不会写出这个信！我也亲自问过林彪同志办公室的同志，他们都说没有见到过这封信，这封信是违反毛泽东思想的。”

周恩来说：“好了，现在开会。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治蜀未治，现在该到了解决问题的时候了。这次请你们来议一议，商量一下，四川问题怎么解决。中央审查了刘、张的问题，看了他们的全部档案，他们确实是受李井泉迫害的好干部，准备参加省革筹的工作。四川一个晚上抓了十几万人，哪有那么多的反革命，那还是共产党的天下吗？凡是 2、3 月份被关押的同志，一律平反。”

接着是四川进京人员汇报。他们讲完后，周恩来说：“四川问题不是一个晚上能解决的，但是既然抓起来了，就要解决。北京的一些同学要打回去，当然需要你们去战斗，中央正在考虑，当然是我们陪着你们去。下面有几件事说一下……明天不要都来了，我们分头去解决，一个个地解决，同志们放心好了，我们就要追到底。”

康生说：“有这么几点请同志们注意。

1、是抓了人的，请同志们交上名单，凡交上名单的，我们会立刻办；立刻打电话，要他们放人，并且要禁止继续捕人。

2、我们不允许四川的任何人到北京来抓人，请同志们注意一下，如果有人来抓，你们要坚决拒绝。我们说清楚，如果没有中央文革小组的批准，一定不准抓，即使是公安部批准的也不行。

3、大家对接待站的意见，我们要转告。”

王力插话说：“以后开这样的会也叫他们来，受受教育。”

周恩来问：“是哪个接待站，是不是国务院那个接待站？”

康生接着说：“4、所有你们听说的、看到的所谓中央军委给四川的什么信和中央军委、中央文革批准的四川哪个组织是反革命组织统统是谣言。同志们要帮助辟谣。

5、请同志们注意，特别是‘三司’联络站的同志们注意。毛主席说：我们的文化大革命第一要相信群众，第二要相信解放军，第三要相信我们绝大多数干部是好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毛主席亲自建立的，毛主席、林副主席亲自领导的，是世界上从来没有的一支人民军队，有了这支军队，我们的文化大革命才能顺利地进行。我们的解放军在支左、支农、支工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他们的缺点是支流，不是主流。军队里头有坏人，但我们要相信人民解放军，我们的同志讲话中不要讲‘黑军队’、‘黑军区’，我们的部队绝大多数是好的。同志们不要到外面去谈这个问题，到外面去谈四川军队的问题。”

周恩来插话说：“更不要写大字报。”

康生：“不能在红卫兵报、《井冈山》报上登载这样的消息

报导，昨天清华《井冈山》报打电话请示我们，他们问有关军队的问题能不能登？我们回答：是不可以的！如果这样做，对我们解决四川问题是有阻碍的。今天谈的，也不要打电话、写信回去，打电话、写信也谈不清楚，也不要乱出去传。”

参加这次接见的清华大学史复有感到造反派真的又翻身了，扬眉吐气。他联想到空政“红旗”前一阵也受压，觉得现在也该翻身了。于是，他给江青写一纸条：

“尊敬的江青同志，我是清华学生，和蒯大富一个班一起造反的，今天会上反映的军队镇压造反派情况北京也有，空政文工团‘红旗造反团’就受到镇压，处境困难。”

条子递上去不久，就看见一位解放军干部沿着墙边来回走，边走边小声问：

“谁是史复有？”

史复有听到后说：“我是。”

那位解放军说：“你出来一下。”

史复有走到墙边，那位解放军又说：“你跟我来。”将史复有领到了一个小房间。

进房间后，史复有看到叶群和杨成武、关锋、北航“红旗”的韩爱晶。叶群主动说：

“你是史复有？你给江青写的条已经收到，江青叫我和杨成武、关锋给你们打一个招呼，北航韩爱晶也来了。”

史复有看了看韩爱晶，然后坐到他旁边，他以前只听说过北航韩爱晶，但是没见过。

叶群又说：“空政文工团你们不了解情况，弄错了。空政‘红

旗’不好，有坏人，刘素媛‘革造’造他们反很好，是真正造反派，你们要支持‘革造’。”

史复有说：“听空政‘红旗’的人讲，全军文革支持他们。”

叶群说：“全军文革支持他们是不对的，你们把全军文革支持空政‘红旗’的情况弄清楚写一个材料递上来。”

史复有又将当时盛传的徐向前、叶剑英搞“二月逆流”，反对文化大革命，反对中央文革的事说了几件，如叶剑英当着中央文革的面拍桌子，小姆指都拍断了，徐向前搞的四川渡口解放军支左经验是镇压造反派一个坏典型等。

叶群说：“徐向前、叶剑英不好，反对毛主席。”

最后杨成武说：“你们继续发扬革命小将造反精神！”

中央领导接见一直到次日凌晨两点才结束。之后，叶群从前面走下来，把清华和北航的学生叫到跟前说：林副主席有一个讲话录音，要组织同学们好好听，徐向前、叶剑英是带枪的刘邓路线。

接见后吃饭的时候，成都军区副司令员韦杰找到黄廉，把他拉到食堂的毛泽东像前，流着泪说：“在毛主席跟前给你道歉。”当众作了三鞠躬，这让黄廉十分感动。韦杰是少数民族出身，性情耿直。

虽然康生在接见结束前特别强调了不要将这次接见的内容传出去，但是，当天夜里重庆许多人还是知道了消息。特别是听说周恩来在 3 月 31 日讲话时说：“重大‘815’变了！”重庆的 54 军、“革联会”、重大“815”都认为是“砸派”造谣。但这时的重庆市已经闹得不可开交了！

重庆大学再度动荡不安。1966年8月15日，重庆大学“815”学生的压力很大，但他们心里非常清楚：自己是站在毛主席一边的，心里踏实。而这一回不同了，他们不清楚自己的位置。搞不好，他们很可能就会和刚刚被他们打垮的“思想兵”一样，主观上想保卫毛主席，实际上却走到事情的反面。这不能不使他们恐惧万分。

3 月 31 日晚，重庆大学的同学不顾总团一些人的阻拦，征集签名，准备次日大游行，声言要粉碎资本主义复辟逆流。总团连夜召开小组长会，被迫同意。

4月1日清晨6时，重庆大学广播里响起紧急集合的号声，很紧张，像是有外敌突然入侵。全校同学惊诧的翻身起床，从四面八方赶到风雨广场。周家喻上台讲话，希望阻止大家游行，结果被大伙儿哄下讲台。然后，数千人浩浩荡荡进城，进行了“反击资本主义复辟逆流”大游行，在山城引起很大的震动。重庆大学校园中也展开了对“革联会”是“砸”还是“保”的大辩论。两种针锋相对的见解在重大“815”内部进行着激烈的辩论。在总团的会议上，一次，没有结果，再开一次，也没有结果，再开，还是没有结果……人们一见面，第一句话就是：“你是砸还是轰？”

4 月 1 日这天，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报》22 期发表由首都“三司”、“一司”、北京地院“东方红”、清华“井冈山”等赴渝联络站和北大赴渝战斗队联合供稿的《妖雾弥漫嘉陵江，黑云滚滚压山城——向中央文革、首都人民汇报重庆的资本主义复辟》，称重庆的“815”派夺权是“和平过渡”、“改良主义”，重庆“革

联会”是“反革命的三结合”，“革联会”变本加厉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重庆笼罩着一片白色恐怖……

## 第 567 回：□□反，众接见福建代表　反总理，□爱晶□□多多

进入 3 月，福建省也开始了镇反，3 月 9 日，福州驻军在福建师范学院召开全院“声讨大会”，福建省军区副司令员林乃清亲自宣读公告，勒令解散福建师范学院“红九二”、“革委会师院分部”、“教工赤卫军师院分部”、“革命到底红卫兵”和附中“九一五兵团”等 5 个组织。“红九二”总部负责人王泉金、福建省“教工赤卫军”头头蔡肇基、吴邱陵等人在万人大会上被公开逮捕。并宣布要筹办“王泉金展览”。

3 月 17 日，周恩来给毛泽东报送福州军区《关于建立福建省革委会和夺权情况的请示报告》。周恩来在送审报告中提议：

一、福建还是经过军管来筹备“三结合”的革委会为好；

二、如各方面认为“三结合”（不是三凑合）条件确已成熟，可推出代表来中央一谈；

三、如果已经宣布十八日召开成立大会无法取消，可改为准备夺权大会。

毛泽东当天批示：“照办。”

福州军区司令员韩先楚即日来电话报告：“成立大会推迟，代表明日到京。”

3 月 19 日，韩先楚率领福建省临时革命委员会的部分成员乘专机飞往北京，向中央汇报福建省“三结合”的情况，福建省“八二九联司”和福建省委第二书记范式人、福建省省长魏金水等人和福州驻军领导都到机场欢送。

3 月 22 日，福建中医学院召开“声讨控诉反革命罪行大会”，当场逮捕张志耀等 8 人，拘留了林要火、吴梅英等 14 人。

3月26日，福州召开声讨大会，又在会上宣布取缔了一些群众组织。

据福建省军管会统计，“全省各地军队、人武部和军管部门出面逮捕和拘留两千多人，取缔和解散了 80 多个大小组织。对军内四大单位和军区机关中少数人违反军委八条命令问题的处理，逮捕 8 人，拘留 65 人，解散了几个组织。”

尽管“九·一五兵团和红九·二红卫兵团是反革命黑组织，勒令立即予以解散！”的大标语贴满校园，许多人在不同程度上也都认识了自己的错误，不敢喊“一二六好得很”了。但是，他们也不愿意承认“一二六”是“糟得很”，只认为自己不过跌了一跤，成绩与错误是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关系，是什么“8 个月的战绩，15 天的错误”。在“勒令”他们解散的强大高压下，他们又死死地抱成一团，表现出团结一致的姿态，公然刷出大幅标语：“谁敢勒令解散九·一五兵团就砸烂谁的狗头！”、“九·一五兵团大旗永不倒！”

各校园里依然充满着浓厚的火药味，大有剑拔弩张之势。

3 月 28 日，福州军区做出决议：把“一二六”事件看成是革命与反革命的分界线。同时要求：凡是在“一二六”中受蒙蔽和煽动而参加集会、游行和冲击军区的学生、职工、基层干部，不要再检查，更不能斗争他们。

这时，从北京传来越来越多的关于“二月逆流”的消息，听说北京 10 万学生上街游行，开始大规模反击“二月逆流”，福州

市沉寂多时的“一二六好的很”派再也按捺不住了，他们在校园里贴出“坚决反击二月逆流，誓死保卫中央文革”等大标语，掀起了福州市反击“二月逆流”的第一个浪潮。

韩先楚率领的福建省赴京代表团在北京等候了十几天，终于在3月31日，在人民大会堂受到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叶群、王力、张春桥、关锋、戚本禹、肖华、杨成武等人的接见。北京南下赴榕回校同学也参加了这次接见。

周恩来首先说：“收到你们一封信，你们很急，一直没有排上队，一方面想多些同志来谈谈，昨晚到了几位同志，所以今天见了大家，先请廖海光同志谈谈筹备情况。”

福州军区政治部主任廖海光说：“根据山西、贵州经验，准备夺权，当时最突出的是干部问题，一致同意的是金水、黄亚光、刘家生。经过调查，范式人等同志过去有的受过叶飞打击，与叶飞斗争是坚决的。当时革命群众对他们有怀疑，因为运动初期还很不理解，对红卫兵运动有抵触，和稀泥，与叶飞斗争不坚决，经过摆开来说，是解决了。群众组织经过运动，福州有些革命群众组织出了毛病。有的冲了一下军区，比较好的是‘229’以及小的单位。群众基础在‘一二六’以后这一段，只剩下‘229’，后来工人，机关，一部分学校又起来和一部分同志合起来，力量这还不够雄厚，特别是福州，经陈伯达同志建议又来了9位同志，现在检查起来，我们的做法有问题。对‘一二六’问题处理上，现在看来，‘一二六’冲击军区当然不好，不应该冲，当时毛著积极分子会时，当时部队未开展四大，冲是不对的。当时冲了以后，特别是陈伯达同志指示以后，很多群众团体表示要请罪。”

陈伯达："那个电报不可能关系到请罪的问题，为什么请罪呢？'一二六'找你们谈话，不要把群众找你们谈话都看作坏事，是件好事嘛！"

周恩来问："有勒令解散的吗？哪几个？"

廖海光回答："我们勒令解散了12个'红卫军'，交通系统'革命造反兵团'，'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没有解散。"

陈伯达问："有没有提黑组织？传单中有说过这话，为什么要提黑组织？不能叫黑组织，领导上要表示态度嘛。"

廖海光答："领导上没提过黑组织，也表示过不行，随便把一个组织打成黑组织。当时还有师院'红联师'，他们群众提出了解散这个组织，福建军区表示支持。这样就出了毛病，打击面过宽，下面再谈，当时，地富反坏右出来活动要打击，但掌握不好，……"

陈伯达问："不是开了很多声讨会，当场抓人示众？"

廖海光答："姜观问题开了一次会。"

姜观是《福建日报》农村版的编辑、记者。在福州"一二六"事件发生后，曾发表一篇《向解放军致敬，向韩先楚开炮》的文章。据说，文章出自姜观手笔。文章里面曾责问："韩先楚的老虎屁股为什么摸不得！"

陈伯达说："不要开这样的大会。"

王力问："福建从'一二六'以后抓了多少人？"

同学说："抓了300多人，泉州有逮捕证的是74人，福建中医学院400多人抓了11个，扣留了14个。3月26日召开声讨大会，大会上取缔了'革命职工造反团'……会上宣布以前造反派掌权

是篡政。‘联合总部’仅因为参加‘二七大会’也被解散。当时大会宣布20多个组织为黑组织，不许打旗号参加，我们‘211’请罪了，要求参加大会。”

陈伯达说：“为什么要请罪？”

王力：“不要请罪嘛，军区应出来讲话。”

康生说：“同志们到中央开会，第一召集了各方面意见的同志来开会，可能有的同志，特别是军区同志不习惯了，这恰恰是毛泽东思想。”

王力：“你们认为是左派，右派，反革命的，抓到监狱里来的，都要来。”

康生：“你们要学习这种方法，兼听则明，偏听则暗，这是第一条。第二条是到中央来，在我们这个会上，各种意见都可以讲，各种问题都可以批评，不存在打击、反对解放军的问题，都可以畅所欲言。第三条在外面不要传播。”

廖海光：“红卫兵小将犯错误了，我们采用不原谅的态度，这是不行的。冲击军区当然不是好事，本来中央给我们很大支持，但我们处理不当。本来应保卫革命锐气，保卫革命小将，革命小将有小错就严追……”

陈伯达说：“把抓的人都放掉，把关的人全放出来！”

王力：“还要写检讨，有什么检讨可写的？左派犯错误嘛！”

廖海光：“犯了这个大错，对保卫革命小将这一点思想认识不足，混淆了两类矛盾。”

周恩来：“左和右，革命和反革命，合法和犯法的界限要划清啰！”

仙游县的同学说到他们那里的抓人情况，周恩来问：“抓人这件事军区有关吧？朱跃华。”

福建省军区司令员朱跃华立即起来答道：“到！”

康生说：“抓人怎么会没有呢？是你们知道不告诉我们。”

周恩来：“这种情况不制止是很危险的。你们马上发电报。今天晚上就发。”

廖海光：“前几天已经发了。”

周恩来：“发了？那你把命令交给我，满足我的要求，按那四点：（1）取缔通缉令，（2）取消取缔黑组织，（3）停止抓人，抓了要释放，（4）写了检查的要全部交还本人。马上打电报给全省所有的县。‘一二六’被打成右派的统统放出来，写检查书的停止，检查一律交还本人烧掉，这一些都是工作组搞的，我们不要搞。”

叶群：“主席教导‘言者无罪’，这是主席思想，请罪是不对的。福州军区应该引起严重注意。”

康生：“错误是掩盖不住的，越掩盖，越严重。你们现在是掩盖错误，必须悬崖勒马，改正错误。”

廖海光答道：“是！”

北京“三司”的同学递上了《福建日报》上刊登的福建省军区政治部写的8篇文章。周恩来看了看很生气，敲着报对朱跃华说：“这是你们政治部写的，把‘一二六’作为标准，人家说你是有证据的。”他念了报纸上的一段话后说：“你们28日来的，26日还写这样的文章。”

最后，周恩来说：“今天不能再继续了，也不可能多方面全

听。军区可能有意见，这有几个人要来，可能要隔两三天，这时间可以准备材料。造反派被压制的，可以多写材料来。刚才四点再加二点：

（1）在‘一二六事件’及‘二七事件’上被停止工作，受歧视的要把他们统统立即取消，如周振祥，刚才递条子有两次提到周振祥，不同意见允许嘛。”

廖海光:“他现在没有具体工作，本来把他调到其他单位去。”

周恩来：“他不是福大工作组嘛！不同意调离，应该让在原单位工作嘛！不同意见可以发表嘛！不要歧视。”

有同学说：“还有军区文革办公室张宝炎。”

周恩来：“不仅军区的，任何机关都要这样。由大军区通知省、县、江西、福建军区。

（2）彼此之间不许武斗，不许打、砸、抄，俘虏还不搜腰包呢？何况同志。”

后来将周恩来这天讲的几条归纳为“周总理关于福建省的六点指示”下达。这六条是：

一、 因“一二六”和“二七”事件被打成“反革命”的应一律平反。

二、 因“一二六”和“二七”事件被抓的革命群众应立即释放。

三、 不要因“一二六”和“二七”事件再写检讨书、已写的应退还本人。

四、 因“一二六”和“二七”事件宣布取缔为反革命黑组织应宣布无效。

五、 因对“一二六”和“二七”事件提不同意见被停止工作受歧视的恢复工作，不许歧视。

六、 革命群众组织之间，不准武斗、不准打、砸、抢、抄、搜身，不要以一派革命群众组织宣布解散另一派革命群众组织。

4 月 1 日，福建“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福建省总部”准备派一个代表团上北京，这让阴郁、沉闷已久的“好得很”派一片沸腾。

列宁在《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一文中说：“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马克思这样说过。革命是被压迫者和被剥削者的盛大节日。”当时，在这些学生的眼中，这确实就是一个盛大的节日，为了庆祝这一胜利，他们临时决定下午上街游行。

下午 16 时，队伍集合起来。几乎被打成反革命黑组织的“九·一五兵团”和“红九·二红卫兵团”的队旗又第一次重新亮了出来。这些火红的战旗迎风飘扬，象征着这些红卫兵学生誓死保卫毛泽东、保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赤胆忠心，象征着他们誓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豪情壮志。

在队旗的后面是毛泽东的巨幅画像，然后，就是腰鼓队，那些腰鼓队的女同学上身一律穿着黄军装、戴着红袖章，下身是蓝裤子，一个个飒爽英姿、生气勃勃。再后面就是语录牌和标语牌，大队伍，在大队伍的中间还夹着一个锣鼓队。

腰鼓敲打起来了，锣鼓也敲打起来了，“咚咚咚，咚咚咚”，那富有强烈节奏感的腰鼓声响彻福州街头的上空，自从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福州市民还是第一次看见腰鼓队上街，他们争相挤着观看。1949 年解放军进城的时候，福州市民就是这样敲打着

腰鼓，唱着“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欢庆自己的解放。如今，“咚咚咚”的阵阵鼓声又敲打在这些学生的心坎上，他们觉得终于自己挣脱了锁链，赢得了自身的解放和组织的新生。这些日子，他们是多么苦闷烦恼，被沉重的“反革命”帽子压得喘也喘不过气来，他们殷红、火热、跳荡的赤子之心，仿佛被铁丝所捆缚，就像每天遭鹫鹰啄食肝脏的普罗密修斯一样的痛苦，天天盼星星、盼月亮，盼望北京城的毛主席能发出声音，把他们从厄境中拯救出来，这一天终于盼来了，他们又重新站起来了，恢复了政治名誉。这怎么不让他们欢呼雀跃呀？

他们振臂高呼：“热烈欢送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福建省总部代表团上北京！”“坚决击溃二月逆流，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党中央，誓死保卫中央文革！”

当游行队伍路过医学院时，想到医学院“东方红”是“一二六事件”的肇事者，自然他们在随后的批判“一二六事件”中更是首当其冲，所受到的压力更大，至今还是一潭死水，于是游行队伍涌进了医学院的大门，沿着大操场的跑道走了一圈。

震天动地的腰鼓声、锣鼓声和口号声惊动了医学院的大学生们，他们纷纷从一个个的窗户上探出身子和脑袋，看见了游行队伍里亮出的“九·一五”和“红九·二”队旗，这几乎让每一个人都欣喜若狂，忘形失骸，有人情不自禁地随手抓起脸盆和铁饭碗拼命敲打着，很快，更多的人也敲打起来，许多人激动万分地高呼着口号。山呼海啸，彼此相应，“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游行队伍浩浩荡荡，绵绵不断，沿着大操场的跑道整整走了一大圈，和医学院的人一起，如痴如狂如醉，沉浸在欢乐与激动的海

洋中。

医学院“东方红”又重新崛起了，福州市的“一二六好得很”派都重新崛起了，福州市的运动又开始了新的高涨。

3 月 31 日，北京钢铁学院张建旗写了一封《致总理的公开信》，于 4 月上旬，送林彪、周恩来和中央文革。同时，他还积极串连北师大苏东海、商学院程镇华以及北农大、北外、二外等有反周恩来思潮的人。

3 月 28 日，北航《红旗报》发表编辑部文章：《我们坚信敬爱的周总理》。

3 月 31 日晚，北航韩爱晶去人民大会堂开会，看到关锋，向他反映：“社会上议论，文革小组与周总理有分歧。”

关锋说：“这纯粹是挑拨，我们关系很密切，很一致嘛！”

韩爱晶之所以这样问，除了因为当时北京张建旗等人搞得反对周恩来的活动，更主要的是北航“红旗红一连”尹聚平、王以理等同学从北京中学生那里听到的一些议论。他们向韩爱晶汇报后，韩爱晶随手就记在他的笔记本上了：

总理与文革...总理与文革有分歧。生产、西纠、干部、军队等问题...总理对伯达？？不理解...总理-副总理有宗派色彩...斗他向左；

文革要夺总理的权，总理有几个部几个帅，总理在军队威望高。中央文革在砍柱子。夺总理的权，与总理的斗争要公开化了，他们反对几个副总理是在砍柱子。

联动对总理、康生、伯达有一定感情，对关锋、戚本禹恨得要命...总理不透明。

理工科斗批改问题...反王恩茂是反军区吗？走资派能不能自己承认走资派？有什么标准？

民航101厂...上次揪余秋里三天三夜,余到主席那里大哭一场，主席说副总理红旗是陈毅，部长红旗是余秋里...

31日晚上，李讷在人民大会堂看见韩爱晶，开玩笑的对他说："当了保皇派啦？"

韩爱晶说："北师大贴大标语'打倒谷牧!''打倒余秋里!'周总理说有错误可以批评，但是不能打倒。北师又贴大标语，非打倒余秋里不可。我认为谭厚兰对周总理态度有问题，她跟周总理对着干。"

李讷马上说："总理万万反不得!但也不能说人家是反对总理。总理、中央领导讲了要批判谭震林、余秋里的错误。群众是批判他们的错误。"

韩爱晶把关锋的回答以及李讷说的话都记在他的笔记本上了。

## 第 568 回：专□见，四川省宜宾代表　发社论，要正确对待学生

4 月 1 日，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谢富治、肖华、杨成武、李天佑、叶群专门接见四川宜宾地区代表。

陈伯达操着浓重的福建腔调告诉大家："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批示了一个反映宜宾问题的材料，提出要找宜宾地区的代表来北京商谈，着手解决宜宾问题，因而也就有了这次会议的召开。"

周恩来："现在开会，今天就根据前几天主席的指示，我们找你们来，关于宜宾问题，叫党政负责人，群众代表都来，四川军区，成都的都来在这里，刘结挺同志控诉、检查四川的工作，在这个过程中，已经有北京到四川各地串联的同学，回来反映了许多问题，到北京告状的也有好几百，宜宾、万县、涪陵、内江、古灵、成都、重庆都有。看来不单是宜宾了，原来也不认为单是宜宾，成都军区有个所谓'镇反'报告也牵连到各地区，先要解决一下宜宾的问题。宜宾问题是个突破口嘛！宜宾问题解决了，再解决四川问题。先请刘结挺同志扼要讲一下，不一定很详细。"

刘结挺开始发言。当他谈到"去年 9 月份，我们从成都罗家碾秘密关押所翻墙逃出，来北京向党中央汇报四川的情况。向中央机关来访接待室递交控诉材料，接待我们的那个组长说，材料送中央书记处看过了，小平非常关心这件事，要我们赶紧离开北京，回原单位闹革命，不然事情会闹大，对我们不利。"

康生问："谁讲的？"

周恩来问："几号讲的？"

刘结挺回答说：我只知道接待室的那位同志是中央办公厅的，去年 9 月 12 号上午告知我们的，口气很严肃……"

康生问："电话讲的吗？"

刘结挺说："是直接接见讲的。27 个被接见的人中有一个回宜宾说了这个事，接着就被宜宾军分区抓了，现在还在狱中。"

康生问："这个人叫什么名字？"

刘结挺："叫高玉文。"

周恩来问："高玉文是谁抓的？"

众人说："王富德。高玉文还在关着。"

周恩来："王富德同志，高玉文还抓着呢？"

宜宾军分区政委王富德答："高玉文是地方革命组织抓的，我还不知道呐。"

周恩来："你马上去叫把他放了，叫到北京来。"

刘结挺说："……郭林川没有来。"

周恩来："郭林川在哪里？"

众人说："在宜宾。王富德要抓他……"

王富德："接到电话，我们找了，没找到。"

康生说："怎么没找到？让王富德同志找他来，把他送来，保证他的安全。"

郭林川是原宜宾地委组织部长，是支持刘结挺夫妇的。

周恩来指示："甘渭汉同志，今天晚上你要保证高玉文同志、郭林川同志送到北京来。"

众人高呼："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

当众人谈到用四川用飞机散发传单和镇反抓人之事时，陈伯达问："甘渭汉同志，散传单是谁批准的？"

甘渭汉答："叶副主席。"

康生又追问一句："用飞机散发传单是谁同意的？"

甘渭汉依然是："叶副主席。"

康生问："飞机散发也是吗？"

甘渭汉："飞机散发没有说。"

这时，群众代表指责宜宾军分区镇压革命群众，镇压造反派。宜宾军分区军分区不服，进行辩解，双方发生激烈的争论。周恩来劝止说："同志们冷静一下，我们现在在这里把问题讲清楚，他们原来那样对你们，你们不要那样对待他们，摆事实，讲道理！"

他对甘渭汉说："甘渭汉同志，电报讲，在监狱的请负责放出来，在外地的请负责找来，以上人员，请甘渭汉同志在成都召集，北京 3 月 30 日派飞机来接，可你们，把底下这些人还看管着，当犯人，到了北京还这样。"

杨成武说："打电话给他们，昨天才知道，说这些人是犯人，不发出入证，他们是中央请来的客人。打电报时也打了电话，你们根本问题是没有执行主席的指示。"

宜宾的群众代表纷纷揭发："还有 4 个没有来……"

周恩来问："哪 4 个？是哪儿的？李良在哪里？"

众人说："李良和郭林川在一起……"

周恩来指示："甘渭汉同志，给你 4 个名字，加上高玉文。"

众人继续说："刘结挺的女儿也被抓了。"

周恩来："几个？"

众人答："3 个。"

周恩来："有人照顾吗？"

答："刘结挺的家被抄了 20 多次。"

周恩来："甘渭汉同志，要把这 5 个同志找回来，3 个孩子，告诉他们送回家。"

汪宗清说："3 个孩子没有抓。"

周恩来生气的说："你军管了嘛！你去查，限你两天。"

王茂聚接着控诉。

康生问宜宾地委第一书记牟海秀："牟海秀在这里吗？你晓得宜宾抓了多少人？"

牟海秀："我不晓得。"

康生："你不晓得，你在中央面前声明你一点不晓得？记下来。沈学理你对抓人的情况晓得不晓得？"

宜宾地委第二书记沈学理说："我 3 月 5 日才放出来……"

康生："你到处作报告，你成了三结合的对象，抓了人没有？"

沈学理："我在中央面前声明抓多少我不知道，听说是抓反革命。"

康生："好，记下来。"

周恩来对沈学理说："是讲你放出来以后嘛，出来 40 多天了嘛。"

沈学理解释说："宣布了几个反革命组织，'方面军'、'反修战斗团'、'前哨'、'觉醒'。现在地委没有工作。"

康生："不知道抓了多少人，是嘛？记下来！"

有人说："四川有人讲，李井泉还是李政委，牟海秀还是政委。"

康生肯定说："现在还是他们的政委嘛！"

谈到宜宾军分区到北京抓张西挺一事，王力说："军分区派的公安部的三个干部，来抓张西挺，他们以为刘结挺不在这里，我和关锋同志通知把这三个人抓起来，后来我们了解这三个干部原来是支持刘结挺、张西挺的，是带罪立功的，就放了他们，让肖华同志办公室通知宜宾专区：（1）刘、张、王、郭不是反革命。（2）抓人怎么样，后来回去就找到了。"

宜宾军分区王富德听王力这么一说，顿时紧张起来，赶紧分辩说："我没有派人，在中央面前敢负责，没派人，我抓工农业生产去了。"

会场上又发生激烈的争论。

王富德："我们都可以说话嘛，元月 25 日，'方面军'跑到我们那里要我们派军队，军队根据文件只能军管。1 月 28 日，一万多人包围军分区，把我拉出来打了一顿，打坏了，养了一个多月，有医生证明，后来省里让我管生产，我就抓生产去了。"

王力："你讲话要讲事实。"

王富德："在中央面前我不敢讲假话，抓人我不晓得。"

汪宗清："抓人的事是这样的，开始我不知道，在军区开会时，甘渭汉问我有 3 个人去北京抓人的事我才知道。"

周恩来："谁派去的？"

汪宗清："军管小组，参谋李勤然，他是市武装部的。政治部主任，他是组长。"

问："他自己决定的？没有上面命令？"

汪宗清："没有。"

周恩来："今天结束这个会，这个会还要继续开，军分区，地委的要申明他们的意见，控诉地委的同志也要回去，一个一个问题弄清，你们激动心情我们理解，你们回去，今晚，明天上午开个小组会，哪个同志谈哪个问题，不要谈细节，中央文革、中央常委事情很多，要集中，不要分散。

1 月 28 日、2 月 10 日到京抓人，刘、王、张、郭问题都清楚了，以前他们也有材料，毫无疑问要平反，不光是这个问题，还有四川全面开展斗争，3 月份的问题，刘结挺、张西挺、王茂聚 3 位同志帮助他们搞搞，把问题集中一下，四川镇反这个问题，集中在飞机散发传单以后。"

康生说："我们得到消息，甘渭汉同志说 19 日去的飞机，我们听说 18 日去的飞机，要搞清楚，另一方面我们知道，飞机散发所谓中央这封信，是有人假造的，散发这封信以后据说 20 分钟开始大逮捕。韦杰在不在？散发传单的事你晓得不晓得？"

成都军区副司令员韦杰答："军区决定的。"

康生："万县开枪打死人，你们报告没有？"

韦杰答："报告了。"

康生问："好久报告的？"

韦杰："隔几天我记不清楚，可能是 5 天。"

康生："5 天是不是？还没有报告，什么形式报告的？什么名义发出的？"

韦杰答："电报形式，以军区名义。"

康生："枪杀了人，你现在还没有向中央报告。这件事情比宜宾的事情要严重得多。"

周恩来："3 月 8 号你们有个镇反的报告，逮捕了多少人，并没有说清楚。万县你们报告说只捕了 600 多人，这和我们了解的差太远。"

康生："你们晓不晓得这是你们军区发生的大规模的枪杀？这是军区的问题。"

甘渭汉："别的地方没有抓。"

周恩来："四川的问题之所以被重视，是刘结挺同志提出，中央才检查四川的工作。军区颠倒黑白，说成是'镇反'工作，实际是镇压革命。从宜宾看，是镇压革命派。每个问题再讲的时候，不要讲那么多细节，从宜宾展开，检查全省的工作。7000 万人，是全国最大的省。万县、左灵、自贡、成都、重庆，通告包括地方很广了，要化一点时间，不是一、二天解决的。第一件事：成都军区要负全责。赶快把这个事停下来，2 号起，不准再捕任何一个人，狱中的人不准伤害一个，甘、韦负责。梁兴初同志监督，现在派梁兴初同志去做司令员，"

众人鼓掌。

周恩来继续："马上打电话去，不能抓，要放出来，也不要马上就放，不然会不知下落了，你们一个一个军分区打电话，军管电话给你们，一个个军分区传达到武装部，对革命群众不能再歧视了，对真正反革命组织要区别头头和群众，明后天要发通知。

第二，请在座的解决这个事，是局部问题，我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要看大形势，要记住毛主席的话，搞文化革命要相信什

么力量呢？第一相信群众，第二相信解放军，第三要相信好的和比较好的干部，搞革命的三结合嘛！

解放军起了保卫文化大革命，是无产阶级的柱石，解放军是毛主席亲手缔造，林副主席亲自领导的，解放军中个别人犯严重错误是个人责任，我们要相信广大指战员会听主席、林副统帅的命令，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第一条就是服从命令听指挥嘛，过去的情况揭发就可以解决，不要对解放军抱情绪。

未解决以前，回招待所，北京的回校，只能在本单位讲，在这里可以谈，把问题谈清楚，在外面不要谈，对联络员，记者不可以谈，更不要在报上，《井冈山》报，《红卫兵》报上都不要登，也不要写大字报。军区的电话，你们不要打，四川很紧张，你们打了，大字报就出来了，这样复杂紧张了。全国 7000 万人的一个省，李井泉是我们揭发的，对党内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要彻底解决。”

康生：“请同志们注意，我有几点说明：

1、昨天晚上有一同学说：成都有传说林副主席曾到成都，坐镇成都指导镇反，这完全是诬蔑，造谣。

2、2 月 17 日所谓中央军委的信，毛主席、林副主席完全不晓得，而且，林副主席是完全反对这封信的，林副主席昨天才看到这个传单。

3、听了这个情况，林副主席很生气，亲自拟了几个命令报中央：坚决禁止开枪杀人，坚决禁止乱抓人，坚决禁止任意宣布某组织是反革命组织，……等等。要经中央讨论，毛主席批准发下去，这是中央林副主席对解放军的最大支持，最大关怀。”

4 月 1 日，是四川大学学生于 1966 年 10 月 1 日在北京参加毛泽东检阅红卫兵半周年的日子。尽管前一天晚上，省公安厅、市公安局、法院等单位在成都的大街上贴满了“坚决镇压 8.26 和兵团一小撮反革命分子!”之类的标语，成都依然是一派肃杀之气。但是，包括中学生在内，有两万余名成都的“8.26”成员仍然高举着“826”旗帜和毛泽东的画像,用纸筒自制的纸喇叭宣传，举行了庆祝大会和游行。

我们再看武汉。4 月 1 日上午，武汉“二司”整风办公室在武昌体育场召开了 3 万余人参加的“庆祝毛主席决定广播聂元梓大字报十周月”大会，会后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游行队伍从中心会场出发，经过长江六桥、中山大道、江汉路等。游行队伍沿路高呼：

“高举造反有理大旗！”

“发扬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

“打倒谭震林！”

“打倒武汉的谭震林！”

“彻底粉碎资本主义复辟的反革命逆流！”等口号，高唱“把红旗举起来，把红旗举起来，战友们！战友们！战友们!跌倒了爬起来， 跌倒了爬起来，再干！我们永远跟着毛主席，大步向前迈，大步向前迈！”，、

这天，“新华工”、“新湖大”、“新华农”、“三司”等学生组织在湖北大学也举行了“庆祝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发表十周月”大会，大会收到了聂元梓发来的祝贺电。会后举行了游行。当“二司”和“三新”两支队伍在长江大桥头会师时，双方

热烈鼓掌，高呼相互勉励、相互鼓舞的口号，高唱“团结就是力量”，高呼“用鲜血和生命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群情激昂，进一步显示了“三新”对军区的不满及两派和好的意向。

当天，“新华工”张建华给院广播台写了一首《准备战斗》的诗：

准备战斗

——致革命造反派战友

是雄鹰，快展翅长空，

是海燕，快飞向海洋。

一场暴风雨就要来临了，

一场严峻的考验就要开始了。

阴沟里刮出了一股妖风，

江城已听不到造反的歌声，

资本主义复辟的逆流推波助澜，

文化大革命正处在紧要关头！

我们永远不会忘记自己的誓言：

我们的天职就是捍卫毛泽东思想，

生为毛泽东思想而奋斗，

死为毛泽东思想而献身，

艰难险阻何所惧，

万水千山只等闲。

解放全人类，

永远忠于党。

亲爱的战友们，

此时此刻，

你有何感想？

你有何打算？

是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还是放任资本主义复辟？

是前进还是后退？

是奋发还是消极？

是做奴隶还是要做主人？

事实是如此严峻，

历史是如此无情，

在此关键的时刻，

你千万不要迟疑！

亲爱的战友们，

请戴上你那金光闪耀的主席像章，

庄严地戴上那象征无畏的红卫兵袖章，

赶快振作起来，

战斗起来！

是雄鹰，快展翅长空，

是海燕，快飞向海洋，

一场暴风雨就要来临了，

一场严峻的考验就要开始了。

也是在4月1日，“工造总司”头头吴焱金写了一首打油诗，抄成大字报，贴在“工造总司”的门口，反映了他当时的心情：

造反大旗举到今，今朝为何脚步停！

且看老保嚣张样，忍让战友狱中吟？

反动逆流掀巨浪，这样才好考验人。

奋起反击莫彷徨，紧跟主席向前进。

大字报下面有很多留言，其中“工总”汉口火车站头头石楚铭和诗一首：

黑云红笔在交锋，江城又是烈火熊。

4 月 2 日早上 6 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人民日报》社论“正确对待革命小将”。社论指出：

“目前出现的一股自上而下的资本主义复辟逆流，利用革命小将中的一些缺点尽量夸大，把革命小将一棍子打死，企图扼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使文化大革命夭折。我们能答应吗？如何对待革命小将‘是站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边，还是站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边的阶级立场问题’，如果否定革命小将，便是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若打击革命小将就是打击文化大革命。”

社论说：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勾结社会上的牛鬼蛇神，抓住革命小将的某些缺点，错误不放，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全盘否定革命小将的大方向，甚至操纵已垮台的保守组织进行翻案活动，把一些革命小将重新打成‘反革命’。他们这样做，就是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就是否定前阶段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对于这股逆流，我们必须坚决回击，彻底粉碎！”

这篇社论是由首都红卫兵驻《人民日报》监督组组长吴介之写的。当时，北航“红旗”徐鹏飞同学在武汉，看到武汉情况严

重，从武汉赶回北京，利用中央首长接见的机会，给中央领导递材料，请求中央干预。同时，他到《人民日报》找到吴介之，把武汉发生的情况告诉他们。这篇社论于 2 月中旬起草，徐鹏飞参与，经王力修改后发表。据监督组成员后来回忆说，这篇社论的用意就是要批判和警告武汉、成都等地的军队领导不要压制造反派红卫兵。

4 月 2 日早上，武汉“二司”的学生听到广播后，立即自发组织起来到其他院校进行串连游行，高呼“打倒秋后算账派”，“打倒春季算账派”，“瓦解一切保守组织”等口号。

4 月 2 日，武汉军区三军部队与“三字兵”、“三司”等一起也举行了游行。当天，武汉军区派人请“工造”、“三新”到军区开会，研究组建省、市革委会，遭到拒绝。“工造”、“三新”的观点很明确，三结合必须有“工总”参加，军区必须为“工总”平反，释放“工总”没有问题的头头。陈再道的计划遇到了麻烦。

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四川。成都“826”学生听完《人民日报》社论“正确对待革命小将”后，一跃而起，找出他们的队旗，戴上袖套、胸章，自发地冲出寝室。四川大学“826 物理分团”一马当先，首先冲向广播站，宣布夺权。

成都军区驻川大宣调组随后对“826 物理分团”抢占广播站一事发表三点声明：“8.26 是袭击革命组织”；“8.26 必须退出抢劫的一切东西”；“8.26 必须退出所占地方”。

已然没有作用了，当天晚上，“8.26”在川大举行了有四、五万人参加的盛大晚会。

## 第 569 回：三次见，为宜宾刘、张平反 见永胜，林彪口述定《十条》

4 月 2 日这天，北京红代会、工代会几十万人涌向街头示威游行，声讨刘、邓、陶的“滔天罪行”。北京街头还出现“打倒叶剑英”的大标语，中央戏剧学院等院校的造反组织成立“揪叶联络站”。当天，戚本禹在中央音乐学院全体大会上说：“刘诗昆是藏在我们身边的定时炸弹，是赵燕霞式的人物。他是有后台的，你们要看清刘诗昆的后台，那个伸向文艺界的黑手！”

赵燕霞，著名京剧演员，第一位饰演现代京剧《沙家浜》主角阿庆嫂的演员，当时还叫《芦荡火种》。据说在排演《沙家浜》的过程中，总是与江青保持距离。文革开始后，受到批判和抄家。

戚本禹在中央音乐学院全体大会上讲话后，“斩断叶剑英伸向文艺界的黑手”的标语马上就上了街。这次大会结束以后，中央音乐学院各个群众组织联合贴出一个通告，限定刘诗昆在 4 月 5 日晚上 12 点回到学校接受群众专政。

刘诗昆黯然回到叶剑英家，经过再三考虑，他对叶向真说：“我已经被定性为反革命了，你还没有被点名，我们离婚吧，这样才不会牵连到你，也许还能保住你父亲。”。

因为当时公安局、法院、检察院都军管了，刘诗昆、叶向真就来到北京卫戍区，找到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要求办离婚。

傅崇碧问：“为什么要办离婚呀？”

他们说了原因，傅崇碧于是说：“那就办吧。”

就这样，由北京卫戍区政治部给盖了个大印，他们俩就离婚

了。

当时他们的孩子不到 3 岁。刘诗昆想，这一生他们也可能还见得到，也可能见不到了。当时就把身上所有的一点东西，钱、粮票等等全给了叶向真。

4 月 5 日晚上 23 时 45 分左右，刘诗昆从位于北京北长街的叶剑英家中出来，关上门，就看见几辆大卡车满载着音乐学院的学生等在那里，还有几个小车。刘诗昆就这样被押回了中央音乐学院，随即被隔离，关到房间里面，连窗户都钉了木条子，像监狱一样。随后每天背一个大筐劳动，全院所有男女厕所都由他一个人包了，同时还要接受群众批斗。

刘诗昆非常想他的儿子，他不知道叶向真的音讯，也不知道儿子有没有人管。有天晚上，他趁劳动的时候跳墙，跑回去看儿子。其实那时候叶向真已经带着儿子离开了叶剑英帅的住地，单独住在一个小四合院的平房里。刘诗昆看到他儿子。儿子很小，见了刘诗昆就问："爸爸你(被)斗了？"

刘诗昆回答说："斗了。"非常心酸。他觉得与儿子这次相见，也不知道下次什么时候才能再见。他未敢久留，赶紧又回到中央音乐学院。

不久，戚本禹在首都艺术院校的一次会上又提到叶向真，他说：

"我听叶剑英说，他女儿是左派，受围攻，受打击的。……所以我也同情她。而且他要求我支持艺术院校的少数派，所以我参加了叶向真组织的座谈会，听了她们的发言。"

戚本禹又说："在地质学院我们费了好大劲，才树了一面红

旗、首先是朱成昭的问题，朱成昭犯错误与她有关。反正她散布了不少错误的东西。她装成左派的样子，但办的都不是左派事。戏剧学院是会演戏的，她就演了一场戏。”

他说：“叶向真是个坏人！”

随即，叶向真也被戏校中自己一派的造反派与对立面的组织轮番批判。

4 月 2 日，王力来到“中央文革”记者站，对抽调回京集训的部分记者讲话。他从表扬记者站所做的工作出发，谈到毛泽东对四川宜宾问题的批示。他说：“伟大领袖毛主席看到反映宜宾问题的简报，批示要马上找宜宾地区的代表来北京商谈，着手解决宜宾问题。整个四川地区的问题，中央也计划从此突破来解决。”

这天，周恩来等中央领导继续接见宜宾代表。周恩来说：“同志们，我们继续控诉。昨天我们集中说以前的事，最近二、三月以来还有什么大事，特别是 2 月 17 号以后的，再谈一谈。然后由地委、军分区的谈谈。”

接着，刘结挺继续昨天的发言内容开始发言，一直讲到了次日凌晨。

4 月 3 日，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谢富治、张春桥、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杨成武、肖华、叶群等人第三次接见四川宜宾地区代表。

周恩来说：“现在开会，今天先由军分区、地委的同志讲一下。大家有什么意见，等他们讲完后再说。军分区哪个同志先讲？”

宜宾军分区司令员汪宗清、政委王富德、宜宾地委第二书记沈学理相继发言……

汪宗清发言中强调军分区做的这些工作，都是报告了四川省军区的。他最后说："同志们提的意见有出入，建议中央派调查团专门调查，调查清楚后听候中央处理。"

王富德发言说宜宾"方面军"有错误，也要求中央派调查团去，当场许多群众代表要求反驳，经劝阻，大家才让他先汇报完。

接着，宜宾地委第二书记沈学理手里拿着厚厚的材料，开始介绍刘结挺、张西挺、王茂聚、郭林川案件是怎么形成发展的，强调王茂聚、郭林川负责专案组时没有按正常工作进行，个人决定等等。

周恩来对他说："简短些，过去的事我们都很清楚了，不用讲了。"

沈学理不得要领，继续念材料。

康生说："过去的事情我们都清楚了，讲现在吧。"

沈学理说："现在的情况不清楚，我已 3 个月没工作了。"

姚文元说："你是三结合对象嘛。"

众人笑。

杨成武："不亮相怎么结合？"

姚文元："你在这里也可以亮一亮相嘛。"

众人大笑。

周恩来："你讲些什么？你对四川省委、李井泉有什么意见，你说嘛。"

沈学理答："我在家里写的有大字报。"

周恩来："没有说的就算了。"

然后宜宾地委第一书记牟海秀发言，他承认自己对文化大革命很不理解，说刘结挺、张西挺有严重错误，说宜宾"方面军"保他，没有把他斗倒斗臭，对他教育意义不大等等，因此也有严重错误。

康生问他："你对李井泉有什么看法?"

牟海秀说："不了解，过去接触的少……"

众人说："你是省委委员，咋个不了解？"

张春桥问："根据你几年的接触，你谈谈你的看法。"

牟海秀字斟句酌的回答："根本问题是没有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学毛著抓得不好，民主集中制贯彻得不好。"

宜宾军分区副司令员王志敏发言，他先说自己有罪，同时揭发几个问题。当他说到群众冲军分区，要求中央派人调查。

王力说："冲军区的问题我插一句。毛主席在最近一两天有一个指示：'许多外地学生几次冲进中南海，一些军事院校冲进国防部。中央和军区并没有斥责他们，更没有叫他们请罪、悔过，或者写检讨，讲清问题。劝他们回去就行了。而各地把冲军事机关一下看得太严重了。'"

康生对王志敏说："你讲了半天，而且要认罪，而且犯了严重错误，你犯了什么错误，你没有讲，要具体点，犯什么错误，抽象化。"

王志敏继续检查。

王力说："四川有一个同学递条子让把毛主席批示再说一下。"于是王力将毛泽东的批示又重复读了一遍。

康生说："我补充说明一下，这是中央向各地发的中央解决安徽问题的决定，中央的批语是毛主席批的，是中央批的第二条。第二条是不得整群众，不得把群众打成反革命，不准乱捕。反正是因为冲军分区或者对军区有不同的意见，或者对各地区，各单位，夺权有不同意见，而打成反革命的应一律平反，逮捕的应一律释放，通缉令应一律取消。下面是毛主席批示就是刚才王力念的。"康生又念了一遍。

等到宜宾的保守派组织代表郑兴华发言后，周恩来问："省委的同志还有什么讲的，韦杰同志还有讲的嘛？你讲几句。"

韦杰和储彬发言后，周恩来说："韦杰同志你要回答第一个问题。你在 1 月 29 日同时报总参、军委，同时派了一个团到宜宾军分区，说对劳改犯坚决镇压，实际上是先派后报，镇压革命群众，你根本忘记了，军人还不懂这些？"

周恩来接着说："宜宾的情况清楚了，先请陈伯达同志讲话。"

陈伯达操着浓重的福建腔调说："我代表中央文革讲几句话，这次会议是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指示召开的。毛主席看到了中央文化大革命小组送给他的关于宜宾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对宜宾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了猖狂的反扑，残酷斗争革命群众。这样一份材料毛主席指示应该加以处理，要找宜宾地区各方面的代表来北京商谈，着手解决宜宾问题，因而也就有了这次会议的召开。这几天听了大家的发言，问题大体上是清楚了。

王富德、汪宗清、牟海秀、沈学理，这些人的发言虽然是不老实的，在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阳光照耀下，一切牛鬼蛇神都会

暴露的，逃脱不了的。经过多年的斗争，刘结挺同志的案子，他和张西挺同志冤屈终于揭发出来了，揭出了宜宾这个阶级斗争的盖子，将是揭开整个四川省阶级斗争盖子的一个重要序幕，将是揭开以李井泉为首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一个重要序幕，我们认为同志们继续斗争，把伟大领袖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红旗插遍全四川，插遍全西南，彻底粉碎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我们要有充分信心，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刘少奇、邓小平为首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中，在两条路线的斗争中，胜利必然属于毛泽东思想，属于无产阶级，属于毛主席为代表的革命路线。刘、邓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他们一伙的资本主义复辟的阴谋是必败无疑的。”

接着，杨成武讲话，他说：“原成都军区的司令员贺炳炎 60 年死的，当时成都军区没有司令员，当时林彪副主席提出从广州军区、福州军区调一个拥护毛主席的好同志当司令员，当时受到李井泉这个人坚决反对，邓小平也反对，另找一个司令员，就是黄新廷，成都军区，所谓独立王国，水泼不进，针插不进，这个情况，材料反映很多，活动也很多。我们看了很多材料，有从北京到成都串联的，有成都到北京串联的，过去邓小平、彭真这些人都到四川去活动，刘邓、彭真、罗瑞卿都到那里去串联活动，中央把它们盖子揭开的，刚才有的同志批评军区是很需要的，刚才说调到宜宾一个团、飞机散发传单，都不报，空军司令都不知道。”

康生也作了讲话，他说：“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周总理和中央文革小组召集宜宾问题有关方面的人到北京，要彻底解决，这

个问题，说明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对宜宾问题是多么关心，同时，我们林副主席还研究了青海问题，以及其它军区的问题，也包括四川成都军区以及宜宾军分区的问题。我们大家一致坚持这个看法。”“毛主席一直说，我们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第二要相信解放军，依靠解放军，第三要相信绝大多数的干部是好的和比较好的。因此不管解放军某些少数人犯错误，或者是青海的赵永夫那样混入解放军的坏分子，无理制造镇压革命群众事件，但总是极少数。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国人民解放军广大指战员，绝大多数是好的，是可以信任的。”

他说：“宜宾地区是典型问题，是文化大革命两条路线斗争的一个突出问题，也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斗争的一个突出的例子。从刘结挺的报告看到这个斗争不是从文化大革命才开始的，是从七千人大会后，62年开始的，说早一点是 59 年庐山会议彭德怀反党开始的，所以这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同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斗争的尖锐。也反映四川斗争怎样复杂曲折，摆在前面很明显，我们不能说刘张没有缺点，问题，可是看到一个事实，坚决反对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反对刘少奇，反对邓小平的被打成反革命，这是一个原则问题，当然军分区、地委讲了几句，重点要我们派工作组，调查组，到宜宾调查，意见是这个问题还不清楚，加上不痛不痒的话，四、五个人一致提出这个问题，调查我们过去调查过，现在还在作调查，但有一点要承认，宜宾问题是两条路线斗争的问题，还要调查什么？军分区没有讲，地委也没有讲，省委一句话也不提。

我们希望军分区、地委、省委，首先要解决什么问题，首先要解决大方向问题，到底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还是坚持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很明显，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实行白色恐怖，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很清楚，今天不用再调查，可以做结论。当然，革命组织有没有错误，你们自己也要做检查，对解放军，骂解放军。你们不能因为他们犯错误，你们就这样。”

周恩来：“谢副总理讲一讲，解放四川才能最后解放大西南，讲一讲嘛。告诉同志们，全军增加他一个职务，中央军委文革小组副组长。”

全场热烈掌声。

周恩来：“四川宜宾地区的问题马上就要解决了。我们派有记者到宜宾，你们返回去以后，有什么问题还可及时向他们反映。

同志们，结束关于宜宾问题 3 天的会，当然不是全面结束，要从宜宾突破到整个四川。先把 4 月 1 日中共中央关于安徽问题的决定中的批语念给大家听。”

周恩来念完批语，继续说：“解决四川问题也按上述原则执行。军委还要根据林副主席的提议，宣布《十条命令》，从对的，错的经验中得出东西，加以总结。解放军中一部分人犯了错误，群众也有错误，比如：冲军区什么，把负责人拉出来弯腰跪着，这是不对的，对坏分子也不这样。比如说：《八条命令》中央 2 月 21 日附了五条，转发了。即使对三反分子也不搞体罚，要文斗，不要武斗，……讲解放军是‘保皇兵’、‘黑司令’是军区，不对！这中央文件给你们，要好好宣传，学习。你们大方向是对的，要改正错误，……还有根据中央那五条，许多事成都军区要

及时处理，不能再捕一个人了，不能再取缔一个群众组织了，违背的，被抓的人要保证健康，成都军区要保证，新的司令员已介绍过一次，梁兴初同志，请他监督办好，放出来，监督不好就更不好了。捕人的事确实数目很大，单在成都抓了两万多人，宜宾也有这样的情况，你们不是讲前门进后门出嘛！空军学校就抓了80 多人，这是不允许的，现在有的人说有问题，还再三要迫害的刘结挺、张西挺等同志坚持斗争是好的。”

“重庆问题要注意解决，你们在北京要留一个时候，抓几个典型，四川问题就可以解决了。”

“对刘结挺、张西挺平反问题，以后有正式文件，现在先口头通知：……可以在当地同志中宣读，以后有文件……今天会就到这里。”

4 月 4 日，中共中央中发［67］154 号《关于四川省宜宾地区刘结挺等同志平反的通知》下发。

4 月 4 日，四川大学“烽火战团”、“红旗公社”、“太阳升公社”等反对“826 战斗团”的群众组织自行宣布解散。

周恩来所说的军委《十条命令》是林彪上报毛泽东的，此时还没有下发。当时黄永胜来北京开会，专程到毛家湾拜访林彪。林彪听了黄永胜的汇报后，问坐在一旁的秘书张云生：“当前运动的主要问题是什么？”

张云生回答说：“部队与地方某些群众组织的关系紧张。”

林彪又问黄永胜：“你看怎么办？”

黄永胜说：“我看就是要重申军委《八条》，贯彻《八条》。”

“靠《八条》是不能解决问题喽！”林彪耷拉着脑袋，站起

来来回踱了几步，说："现在需要有个新的命令，重新规定几条，不然有些人又会犯赵永夫那样的错误。"

林彪一边思索一边说，黄永胜偶尔也插上一句半句，秘书张云生做了记录整理，共十条。林彪说："那次是八条，这次是十条。"然后对张云生说："把它整理一下誊清后给叶群，让她送文革去讨论一下。"

叶群把誊清稿让秘书送总政治部副主任关锋斟酌。关锋历来害怕江青说他背后为林彪办事，每次都要找上王力、戚本禹，或至少一人在一起。这次，他拉上王力、戚本禹一起商量、修改后，交中央文革讨论。这《十条》与前《八条》有很大的不同，其中心意思是要"正确对待群众"。并规定："部队遇到群众组织冲击时，要耐心作好送上门来的思想政治工作，做到骂不还口，打不还手，绝对不准开枪。要在各方面给革命左派群众组织以支持，不准和群众对立；不准随意捕人。要防止赵永夫那样的野心家篡夺军队领导权"等等。这《十条》，中央文革很快就通过了。

## 第 570 回：□□止，山西刘、张生矛盾 迷惘中，彷徨□庆“八一五”

山西省革委会成立后，3 月下旬，中央文革小组通知刘格平进京汇报工作，刘格平便带着张日清和陈永贵前往北京。

3 月 26 日，山西省党的核心小组副组长、山西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刘贯一在太原湖滨会堂召开了一次由各群众造反组织参加的大会，做了一个“重要报告”，号召全省展开革命大批判，向党的生日献礼，准备在 7 月 1 日结束山西的文化大革命。

但是，山西省革命组织代表会议没有“太工红旗”，一直让“首都赴晋造反大队”、“山西革命造反兵团”,以及社会上持“红联站”观点的大批群众组织不满。他们认为，“太工红旗”虽然反对夺权犯了错误，但他们毕竟是响当当的造反派，造旧省委的反功不可没，况且已经整风，又被军训，改正了错误，刘格平等作为革命领导干部，不应当把他们排除在革命组织之外。3 月 24 日，在晋祠农村参加春耕组训的“太工红旗”头头李青山和杨保明、杨进堂，向省军区组训团团部提出要求：他们要回太原，写材料，向中央文革汇报情况。组训团不同意，说：中央文革很忙，有材料写给他们就行了，不要麻烦中央文革了。组训团邸团长说：“你们要经受的起冤枉。一个革命者要经受的起冤枉。你们的问题是很复杂的。”

第二天，3 月 25 日，李青山和杨保明径自离开组训地，回到太原。遂后，他们天天找刘格平、张日清,要求接见。并且明确表示,要向中央文革去反映情况。

3 月 27 日,山西省军区副参谋长刘庆瑞、负责太原工学院组训任务的组训五师郑师长，在晋祠宾馆接见了李青山和杨保明,同意为他们创造条件,让他们写上访材料。

4 月 2 日《人民日报》“正确对待革命小将”的社论同样也影响到山西，太原市开始出现了炮轰组训五师的大标语，说组训五师的大方向错了。

4 月初，太原工学院的组训学生返回学校。从各点回校后的“红旗”队员，在晋祠路上汇合后,纷纷戴出了“红旗”袖章。他们听说刘格平，张日清去了北京，立即派贾诚、曹昌盛等人到北京了解情况。

4 月初的一天，刘格平派“太工永红战斗队”的头头高翔乘专车来到太原工学院，将李青山接到刘格平家谈话。整个谈话过程，几乎就是刘格平一人在说。他讲自己是如何在各个革命关头，紧跟毛主席干革命，又是如何在文化大革命中，既不能早，也不能迟地站了出来，与山西旧省委划清界限，领导山西夺权。他说完话，就结束接见，把李青山送回了学校。

这段时间，几份“红联站”一些群众组织揭发刘灏和杨成效出身有问题的材料送到了张日清办公室。

自山西省军区对原来的公、检、法机构实施军管后，成立了“无产阶级专政委员会”，行使原公、检、法的职权。这个“无产阶级专政委员会”是由身兼山西省军区第二政委、山西省党的核心小组副组长、山西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的张日清负责领导。根据“红联站”这些群众组织的揭发，张日清开始调查“山西革命造反兵团”司令刘灏和“112 夺权”的总指挥杨成效。

刘灏的家庭出身和政治背景，那真是代代红，说他是“狗崽子”，分明是诳言妄语。

杨成效就不同了，“红联站”的传单满大街飞，揭发这个杨成效在鞍钢上班时就经常旷工，打架斗殴是小事，还常常乱搞女人。更有材料说，杨成效的生父，竟然是国民党某警察署的一名反动警官！

这传单是省机关李辅领导的“七一公社”印制的。十三冶原来有一名姓李的工人，在公司的人事劳资部门工作过，后来到基层做了治安工作。看到杨成效造反，他想不通，明明是个坏人，怎么一下子成了英雄了？杨成效的家庭和个人情况他了如指掌，到哪里去揭发呢？他认为省委机关的革命造反组织最可靠，就到省委机关“七一公社”，找到李辅，送上了那份揭发材料。据说，此人在日后被杨成效活活打死。

没有不透风的墙，张日清调查刘灏和杨成效的事，还有李辅印传单的事，杨成效知道了，刘灏也知道了。刘灏毕竟是个中学生，他又跑到袁振那里诉苦，少不了受到袁振的好言安慰。

杨成效则不同了，他到刘格平和袁振那里就不仅仅是诉苦，而是告状了。在得到刘格平和袁振的安慰后，这个东北汉子也就气粗胆壮的对部下说：“刘格平和袁振都是支持我的，张日清这家伙支持‘红联站’那帮秀才们，暗中整咱们‘决死纵队’的革命造反派，人家刘格平和袁振两人也很不满意呐。有他们支持，我杨成效不怕他张日清！”

刘格平和张日清，这两位山西革命委员会的首脑人物，在红色政权刚刚建立不久，就坐不到一个板凳上了。刘格平在和造反

派组织的头头谈话时，时不时地用很不满意的口气说到张日清："他身兼十八职，还嫌权小，工作上也不懂得尊重领导。"

张日清也不满意刘格平，他对造反派组织的头头们说："不是我要大权独揽，是他（指刘格平）什么也不干嘛！就连每天的《山西日报》清样，都得我亲自过目，他就是懒得看嘛！"

说完山西，我们接着来看重庆。

根据中央领导3月31日接见四川代表的讲话精神，4月3日，重庆西南师范学院"831战斗纵队"被允许恢复活动，关在监狱里的"831"头头也被释放出狱。

这几个"831"头头并不知道外面的情况，通知他们出狱前还被告知："只要你说'815'好得很，'革联会'好得很，就放你出去。"

于是，有几个人出狱第一天就发表声明："重大'815'是坚强的革命左派，重大'815'的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坚决和重大'815'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

但他们出狱后，看到外面的形势已完全不是如此，此时的"815"，连自己都说不清自己是对还是错，又遑论"815"的大方向始终正确呢？于是，他们赶紧在第二天又发表声明称："我'831战斗团'原来发表的声明，凡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一律作废"。

出狱第三天，情况已经完全清楚，"831"郑重发表声明："重大'815'是最大的右倾机会主义集团！""坚决砸烂'革联会'！"

4月4日，"革联会"召开了一个全市的誓师大会，向刘少奇开火。会上，重庆大学打出大标语：

“警惕山城和平演变！”

“打击革命小将就是打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革联会必须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革联会”原拟定于4月4日举行重庆市的“工人代表大会”，重庆大学的学生在上清寺贴出了对4月4日大会质疑的大字报和不准“工人纠察队”挤进“工代会”的大标语，并表示，若要召开的话，就坚决造反。

人们纷纷议论：重庆大学“815”要反了。

这天，重庆市“革联会”常委会做出决议：

1、责成“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起草文件对西师“831”、交院“915”等问题表态；

2、对镇反中解散组织的错误查实纠正，立即恢复“81 兵团总部”；

3、责成重大“815”和政法学院重新进驻公安局；

4、责成“红卫兵司令部”重新派人到“革联会”组织委员会工作；

5、鉴于“反对工纠挤进工代会”呼声日高，决定无限期推迟原订在 4 日召开的工代会。

正如重庆大学学生周孜仁在他的4月5日的日记所写：“重庆乱了，一向称为铁板一块的重大815也乱了。向谁决战呢？重庆资本主义复辟的根子在什么地方？警备司令部有没有谭震林？该不该砸烂革联会把这个谭氏人物暴露出来？重大815是不是被利用了……一连串的问号，把勇敢的815战士的思想搅乱了……”

重庆砸“革联会”的声音一天比一天高，而重庆大学“815”不知所措，沉默了。这种沉默本身就意味着问题的严重性。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重庆大学校园几乎就是重庆的政治大本营。上面一有风吹草动，八区三县的“革命群众”都愿意到重庆大学来找“815”讨教。先是去“总团”信访组，又由“总团”信访组介绍到各系各班的“战斗组”接待。重大“815”的沉默对于徘徊歧路的整个重庆市“815”派无异于一场灾难。有一个工人在重庆大学校园贴了一张大字报，代表了重庆“815”派共同的焦躁与不安。这是一首叫《呐喊之声》的诗歌，当时被很多同学传抄，其中两段：

不要这样沉默，重大八一五

让雷霆喊出你胸中的愤怒

为什么万里之外对你缺席审判

为什么前后左右向你进攻

假如你胸中是一轮红日，

解开钮扣，把它托上解放碑峰

山城人民永远热爱你，重大八一五，

川江雄歌，决不做易水悲曲

谁个是红心赤胆照长空

谁个是沽名钓誉梦云楼

任它柳随风摆，帆听风说

还看今朝红岩，岂效渔家轻舟？

重庆大学的校园里已经出现了大标语："坚决砸烂伪革联！"署名："反到底"。标语竟是当初发起"815 事件"的主力：重庆大学业余文工团的几个激进分子所写。作为组织，一个叫"偏在寒中俏"的战斗队从"815"内部冲出来了，成员是最早的造反分子、电机系的邹世友和吴贵伦。

4月5日，建工学院"818"全团举行辩论会，率先统一了认识，确认"818"战旗永不倒！接着数千人浩浩荡荡来重庆大学声援游行。上一年的8月13日，重大造反派第一次冲出校门，就是到建工学院声援游行，那次行动成为了重庆文革爆发标志的"815"行动的预演。而现在，轮到对方来推动自己了。重庆大学的学生自发地一涌而出，和建院的队伍迅速汇集一起，又涌向师专。那是去年"815事件"的发源地。这次集合本身就有一种重新开始的意思。接着，三中、一中等校的"中学815"也涌向师专。顿时，夜晚的"815广场"变成了一片沸腾的海洋……

周孜仁找到54军政治部副主任、时任"革联会"主任的刘润泉，问他该怎样反击资本主义的复辟逆流？

刘润泉只是叹气，反问周孜仁："我们该怎么办呢？事情都是你们搞起来的。我们解放军只是对你们支持，你们也闹，我们怎么办？"

态度的真诚，本身足以让人感动。周孜仁无言以对。

## 第 571 回：四月三，接见中学红代会 轰□奇，毛泽东修改《十条》

4 月 3 日，北京地质学院革命委员会成立，聂元梓到会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这是北京第一个成立三结合革委会的高校。

北京卫戍区对北京市的大、中院校实施军政训练后，根据中共中央的精神，强调红卫兵要整风，加强组织纪律性，克服小团体主义、宗派主义、无政府主义，实现“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曾经风行一时的“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口号受到批判。为了解决中学里的“老红卫兵”与造反派红卫兵之间、各造反派红卫兵之间的矛盾和纠纷，实现大联合和“三结合”，一些中学的军训团采取解散红卫兵组织的做法，这引起了中学造反派红卫兵的强烈不满，一些学生逼着来军训的解放军表态支持他们。有的学校还把军训的小战士逼到屋顶上，不表态就不让下来。他们上访告状，将意见反映到了中央文革小组那里。

4 月 3 日，北京 25 中高三学生、“首都兵团”的组织部长、北京中学红代会的组织部长秦喜昌找到 28 中“八一八红卫兵”负责人王宇，对他说：“今天晚上首长接见一些中学生的代表，听听对军训的意见，你准备准备。”

晚上，中央文革小组在人民大会堂东门附近的一间小会议室内召开北京中学红代会座谈会。中学红代会的大多数委员，以及一些中学的群众组织负责人，都提前来到会场。

北京中学红代会核心组组长李冬民接到这次开会的通知也很突然。他在人民大会堂看见了蒯大富，就问他：“开什么会

啊？”

蒯大富卖着关子，颇感得意地说：“你听听就知道了嘛。”

李冬民进会场一看，觉得都是中学一些比较激进、不满意军训的人，其中有与蒯大富关系密切的清华附中的学生，也有 27 中、28 中、6 中、地安门中学等学校的一些同学。

20 时许，周恩来从开在左侧的房门进来，走在最前面，随后还有陈伯达、康生、江青、谢富治、吴德、郑维山、傅崇碧、丁国钰、黄作珍等人。

当周恩来走向他的座位时，看见坐在对面的北师大附中陈永康，立即伸出手来隔着两条细长的会议桌和他握手，不小心碰翻了一只装满水的茶杯，开水流了一桌。

两位人民大会堂的服务员慌忙跑过来，手持抹布要擦。周恩来连连摆手说：“没关系!没关系!我来，我来。”说着，便接过抹布自己擦了起来。

擦完桌子，周恩来见陈永康还站在那里没有坐下，便抬起他那微微弯曲的右臂，用手轻轻拍了拍陈永康的肩膀，和他一起坐下。

此时，北京大学的孙蓬一也坐在第一排，恰好在周恩来的对面。他想起几天前，3 月下旬，二机部有人来北大找聂元梓，她不在，孙蓬一接待了他。那人提出，他们在调查二机部部长刘杰时，发现三十年代北京有一起叛徒案，希望北大协助调查清楚。

孙蓬一当时回答说：“国家机关运动我们不介入。听说是由总理管，如果陈伯达请示总理，总理若同意，我们全力以赴，否则不便插手。”

二级部的人说："你们见中央首长的机会很多，若你们见到总理，是否可以请示一下？"

孙蓬一表示同意。恰好今天中央接见中学生代表，五大院校也有人参加。孙蓬一又正好坐在周恩来对面，于是他给周恩来写了个条子，请示上述事情。

周恩来阅后，随即用铅笔做了批示："同意。"并指出注意事项。

此件后来照片复制若干，作为北京大学调查叛徒的证明。原件存放在校文革保卫组。后来北大保卫组被砸，原件随着其他文件一起被盗走了，至今仍下落不明。

4 月 3 日晚上的这次座谈会，主要是了解北京中学军训中的有关问题。这时，有人给 28 中写了张条子，建议王宇上去发言。

给王宇递条子的是北京市革委会的一名干部，主管中学工作。但王宇不认识他。王宇本来就对他们学校军训团接近老红卫兵颇多意见，于是就上去讲了一通。接着又有人给他递条子说卫戍区副司令员李钟奇的事。结果那天的会上，王宇就成了主要的发言人。

他先说了李钟奇的问题。别人给了他一份李钟奇 3 月 27 日对部分学校老红卫兵的讲话材料，里面有他对"联动"干部子弟的一句话："你们是我们的子弟，将来的班，还得你们接。"

王宇说："你这不就是'血统论'嘛!"

周恩来叫李钟奇站起来，问有没有这么回事?李钟奇说："没有。"

王宇说："这不可能是假的，我这里有两份记录。我也不认

识你，但不止一个人给我说这件事，还有当时的会议记录。”

康生看了李钟奇 3 月 27 日的讲话后非常气愤。他说：“如果整理的讲话记录是准确的，不是有人造谣的话，李钟奇 3 月 27 日的讲话是完全错误的，他的这个讲话不谈阶级斗争、不谈两条路线的斗争，不谈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刘邓反动路线的斗争，完全是‘联动’的观点啊！什么‘你们在座的全是高干子弟、干部子弟（除了爸爸妈妈有问题的），你们的爸爸妈妈在红军时代、抗日战争、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有很大的贡献，你们要支持他们的精神’，通篇是在摆他们父母的功，完全是‘联动’的，什么竟说出‘联动’犯错误的根源是想不通，你站在哪个立场上？开玩笑。”

康生指着在座的“红代会”代表说：“你们要带头干，不管谁说你们，你们不要怕，解放军要多看造反派的长处，可是李钟奇却说‘造反派能革命一天，老红卫兵就不要瞧不起人家’，这是什么话！”“李钟奇同志你如果认为这讲话是假的，就应该公开登报辟谣，哪句话哪句话没有讲，要不然这句话是你讲的。这个讲话是‘联动’的代表作，现在‘联动’又活动起来了。为什么他们老不解散？就是党内军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支持他们。”

李钟奇、傅崇碧起身辩解，江青、陈伯达制止他们说：“不要辩护了，叫你们支持左派，”康生、周恩来接过话头说：“你却支持‘联动’，什么立场啊，好好听听大家的意见。”

周恩来又说：“李钟奇同志是东北军的，是在六盘山下起义的，排长，也没有多少文化。”

王宇说，他还收到一张条子，是说 101 中的学生被军训团关起来了。他说："这些都是学生，有什么大不了的问题，但军训团一来就把人关起来了。"

周恩来跟他的秘书说，赶紧派车把他们给接过来。

王宇又接到条子跟周恩来说，27 中的"铁军"头头正在人民大会堂外边的门口闹，要进来。周恩来说："那你去把他们叫进来吧。"王宇到大门口把他们叫进来了。

3 月，27 中的"铁军"被军训团宣布为反革命组织取缔了。"铁军"头头在"三司中学中专部"的时候认识王宇，就来求援。王宇便发动西城区 31 中、师大女附中、6 中他们认识的朋友跑去声援，开了一个声援大会，还骑自行车游行，到学校喊口号、贴标语，搞的声势很大。西城区军训指挥部的郭副司令员找到王宇说："你王宇是左派，我们承认你，也支持你，你不要到社会上管那些闲事去。"

"铁军"头头进来后，又指责参加军训的解放军"右"了，没有坚决支持"造反派"。说的比王宇说的过激得多。

有学生说解放军支持保守派，还说："有个首长说：首先是班级大联合……"

周恩来纠正道："什么首先是班级大联合？首先是革命的大联合，首先是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

江青很激动，问："是哪位首长啊？"

有学生说："是周依冰。"

当时北京各区军训有个联合指挥部。东城区负责军训的是 65 军的参谋长周衣冰。

江青情绪来了，用手一指，问："谁是周衣冰呀，站起来我看看。"

周衣冰站起来耷拉着脑袋，什么也没说，十分狼狈。其实，东城区军训团说的"班级大联合"是按照毛泽东"三七批示"的天津延安中学的经验说的。

江青很激动，她说："我们几天没有关注北京，北京就出了鬼啦，就闹了鬼啦！闹鬼，就是妖魔鬼怪的鬼！我这几天正在担忧，好多天不见你们了，最近和谢富治同志谈过一次还是不放心，才今天来找你，果然今天这种鬼事发生了，我们在这一时期没有了解中学情况是有责任的，没有开会，也没听取大家的意见，记者汇报了一些，有点感觉，但由于忙于别的事情，拖下来，没有准确地听你们的意见，北京卫戍区在基本问题上是跟中央文革的，但有些事情不理解，这是可以克服的，更大责任在中央文革，但是中央文革没有让他们支持'联动'。左派队伍和'首都兵团'、'红旗兵团'不能垮，垮了'联动'就起来了。北京卫戍区在许多地方是和中央文革配合的，但有许多作法是不妥当的，我们有责任，我们没有叫谁支持'联动'，我希望卫戍区同志虚心听听小将的意见，和小将不要搞崩了，要恢复壮大左派，以左派为核心，以'联动'为核心怎么行呀？"

"解放军要支持左派嘛，不是支持右派嘛，左派组织都让解放军解散了还支持谁？这样不支持右派也支持了中间派，各学校内如果有许许多多的组织，当然联合不起来，但有几个大的左派组织，那就不能解散，要依靠发展他们。军训的同志要明确地表示支持左派，现在事实证明，把左派搞掉了，首先左派组织不能

解散，解散了怎么支持左派呢？”

谢富治说：“后来发生许多事情，我告诉了卫戍区，没抓紧，我有很大错误，就是没有及时检查。中央文革没责任，我有错误。”

江青：“关于复课闹革命，你不复课，他不到学校，怎么革命，不到学校怎么斗批改，大家都到家里去，运动怎么搞？”

谢富治：“要把‘联动’搞垮，必要时军训停下来为左派服务。左派组织不能解散，这样干不行，这怎么叫支持左派？‘联动’这样嚣张，不像话了。” 他指着这些中学生说：“都不要解散。”

周恩来：“大学，中学红代会各出两人，中央文革出一人，解决这个问题。否则我就亲自出马了。左派红卫兵哪有选举的？！”说着，周恩来、陈伯达、江青都哈哈大笑。

陈伯达总结说：“我来说几句，征得李钟奇、傅崇碧同志同意，第一条，军训不能干涉，不能阻碍学生群众文化革命运动，大联合绝不能同解散等同起来，班级实现大联合必须是逐步的，要有条件的，这就是必须是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要逐步形成，太急了不行，联合只能自愿，不能强迫，搞联合更不能强迫解散革命群众组织，这是第一条。军训中搞三结合，大联合必须由左派为主体，”

江青补充说：“必须由左派领导，左派在一些地方是弱小的，单薄的，必须让他们领导，才能团结大多数孤立少数，抗战时期，我们的力量不是也很小吗？但是必须由我们来领导。”

康生插话：“学校里必须由左派掌权，然后运用权力搞全校的文化大革命运动，镇压打、砸、抢分子。”

陈伯达继续："第二条，学习毛主席著作，哪一篇都可以学，不能只限制在一个范围内，有人读《将革命进行到底》一文有什么不好呢？我看很好吗，高兴读多少就读多少，军训时间不可再多，主席一贯不主张太多，一般三小时，最多不可超过四小时，以利准备斗批改。第三条，在军训期间应该定期总结经验，可以从几个方面，从军队方面来总结，从学生方面来总结。"

江青："最近中央决定播送林彪同志最近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今天在座同志的问题，林副统帅都能够满意的答复。"

最后，江青说："我今天的话，是我们自己人关起门来说的话。今天的这个讲话不要传出去。你们不要弄成中央首长讲话，不要散布到街上去。李钟奇同志呢，还是个好同志，他已经承认错误了。"

这个会让李冬民很不舒服。他觉得，自己是中学红代会头头，"既然有红代会，你想了解情况也应该首先通过我了解呀，然后再开会才合适。"他觉得，这里面是中央文革在各大学的联络员和"三司"、蒯大富在起作用。快散会的时候，他找到戚本禹，说："今天你们首长谈话，听的都是一面之词，参加会的都是一派的人。"

戚本禹说："行，明天可以考虑再组织一次。"

但是，这次座谈会却使中学里一度受挫的那部分造反派大受鼓舞，并激起了他们对军训团自军训以来就存在的不满情绪。过去因为怕被别人扣上"反对解放军"的帽子，他们大多不敢公开对军训团和卫戍区进行对抗，现在有了"中央首长"讲话的尚方宝剑，他们便觉得可以理直气壮地进行抗争了。

散会后，王宇告诉 28 中“八一八红卫兵”另外一个负责人侯瑛，他那天负责会议记录，说：“你别走，你回家里等着，回来要整理这个讲话稿。”

那天夜里，有好多人在 28 中等着，都是附近各学校的。王宇和 6 中的几个同学说：“把‘四三’讲话连夜刷到长安街上去。”

于是，座谈会结束不久，批评军训团和卫戍区、“炮轰李钟奇”的大标语、大字报便很快就贴满了北京的大街小巷。

当时，西长安街从南长街开始，一直到中南海小门，两边莲花形路灯上边的喇叭都是 28 中自己安的 25 瓦高音喇叭，他们当晚就广播了中央领导“四三”接见的讲话，连中南海里都听得清清楚楚。

第二天下午，北京中学红代会秦喜昌又来了，他埋怨王宇说：“昨天首长说了不让传出去你们还传出去了。得了，今天晚上还得去一趟。”

4 月 3 日晚接见期间，北航“红旗”坐在前边的井岗山和朱芝慧向戚本禹问起外交部长陈毅的事情，戚本禹在一张纸条上写了几句话，让他们转交北航“红旗”的一把手韩爱晶。

散会后，井岗山和朱芝慧将纸条交给坐在后边的韩爱晶。韩爱晶看见纸条边角上有几个字：“井岗山朱芝慧转韩爱晶阅。”

纸条上是一首诗，署名：兆文。诗的标题是：“贺北京反逆流胜利”。一共八句，其中四句是：“……画皮白虎显原形，红日喷薄气萧森，大地自有飞龙起，跳梁小丑岂足论……”

韩爱晶猜想这应该是姚文元写的诗。回到学校，他和井岗山、田东等北航“红旗”的负责人赶紧研究戚本禹的纸条，把这张纸

条当作是中央首长的指示，认真领会，觉得：戚本禹抄这首诗，明显是针对资本主义复辟现象的，说陈毅是逆流，陈毅是画皮白虎？这让他们很吃惊！

第二天，4 月 4 日，北航《红旗》报刊登“红一连”的文章：《炮打陈毅，解放外事口》。文章说：

我们怀疑，陈毅不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而是刘黑司令部的一员干将。陈毅必须向毛主席和中央文革小组低头认罪！陈毅不投降就让他灭亡！就坚决打倒！炮打陈毅，解放外事口！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万岁！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万岁！万岁！万岁！

当天，北航“红旗”发表《打倒徐向前，炮轰叶剑英、陈毅的严正声明》。

这天，毛泽东在林彪 4 月 2 日送审的中央军委《十条命令》稿上批示：“林彪同志：此件很好。只有少数文字方面的修改，是否适当，请酌定。建议以草稿形式印发军区会议各同志，征求意见，修改后，即可发出。”

对《十条命令》稿的第一条：“对未向我开枪的群众，无论革命的、反动的或者情况不清楚的，都不准开枪，只能进行政治工作。”毛泽东修改为：“对群众组织，无论革命的、或者被反动分子所控制的，或者情况不清楚的，都不准开枪，只能进行政治工作。”

毛泽东还将第三条中“对于确实查明的反动组织”一句，改为“对于确实查明被反动分子控制的群众组织”。

毛泽东删去第四条“对于过去冲击过军事机关的群众，无论

左、中、右，一般的概不追究”一语中“一般的”三个字。把第四条中“不能根据是否冲击过军事机关来划分左、中、右”一句，改为“不能仅仅根据是否冲击过军事机关这一点来划分左、中、右”。

对第六条，毛泽东的修改是：“一概不要进行群众性的‘请罪’运动。也不要强迫群众写检讨。群众自动写的检讨书，退还其本人。有些长期不觉悟并且坚持错误观点的群众，不要急于要他们认错，而要给以时间，让他们在斗争中自己教育自己。不允许体罚和变相体罚。例如，戴高帽，挂黑牌，游街，罚跪，等等。”

毛泽东还删去第七条“在军队中要深入进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刘少奇、邓小平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两条路线斗争的教育”一句中“刘少奇、邓小平为代表的”这些字。

此外，还有个别文字的修改。

《十条》的清样送回毛家湾，林彪听了秘书念的修改稿后，大笔一挥：“即呈主席审批。”

## 第 572 回：四月四，中学生继续座谈 递条子，同意批斗王光美

4 月 4 日晚上，在人民大会堂南门附近的一间小会议室内，陈伯达、康生、张春桥、王力、关锋、戚本禹、谢富治、姚文元、傅崇碧、丁国钰等人再次与北京中学红代会 20 多个学校代表座谈，但这次包括大学红代会的代表。他们讲话的主旨还是说解放军应当坚决支持造反派，同时批评了给军训团和卫戍区贴大字报的做法。

陈伯达问："有没有什么新闻？"

众人答："炮轰陈毅、叶剑英。"

关锋说："北航'红旗'炮轰陈毅，解放外事口。"

戚本禹奇怪的问："北航'红旗'为什么轰？你们不是外事单位吧。"

有人说："街上有打倒傅崇碧、李钟奇的大标语。康老的讲话也上街了。"

戚本禹问 28 中的王宇："看过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现状》吗?"

王宇站起来说："看过。"

戚本禹继续问："你对最后一句话是怎么理解的?"

王宇说："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解放自己，在革命斗争当中解放的包括我们自己，改造我们自己。"

戚本禹："那些战士都是些孩子，跟你们岁数一样，个别的比你们还小。北京卫戍区是好部队，是毛主席司令部的嘛。傅崇

碧是跟毛主席走的，为什么要打倒呢？想办法弥补一下子嘛。”

康生也说：“是个好同志嘛。”

李冬民：“军训有群众路线差的同左派有矛盾……”

戚本禹问：“你负什么责任？大字报上街了，很早就说过不准上街，再这样我们就守口如瓶。傅崇碧是个好同志嘛，你看看，他来电话客气，是说贴李钟奇的了。”

李冬民答应说：“我们通过联络站制止。”

韩爱晶予以同情，说：“可以理解”

戚本禹反驳道：“不可以理解！”接着，戚本禹让王宇站起来，说：“28 中的王宇，昨天说好了会议讲话的内容不要传出去，结果还是上街了，听说是你干的事?”

关锋：“解放军是王牌，还能随随便便地行动啊？”

王力：“关于班级大联合问题，是毛主席的号召，这个号召是最高指示，是正确的，要执行，问题出在执行这一指示，有执行好的，也有执行不好的，要看主流，全局好的，当然也不是没有问题。也确有一些不太好的，主要是根据学校里左派处在什么地位，在什么条件下进行大联合。军队同志的缺点、错误，一定要采取适当方法，不要公开提。关于军训要总结经验，即使军队的同志支持错了也要给他们提供情况，让他们改，改了就行了。‘揪出李钟奇’这个口号不好，要改掉，要爱护卫戍区，卫戍区是保卫毛主席的，不能把他们搞臭。”

这时，周恩来走了进来，戚本禹对他说：“总理，有打倒傅崇碧的。”

周恩来说：“那还行？这个蒯司令，不行啊！”

关锋说："不要把大好形势搞坏了。"

蒯大富赶忙解释说："他们把康老的话印发了。"

康生笑着说："啊，那要搞我了，哈哈！我讲话不要老贴大字报，我不敢讲话了。"

陈伯达说："大字报上街马上新德里、华盛顿，全世界上报了。"他看着北航《红旗》报说："要顾全大局，不要感情用事，对国家要有责任感，你们登的有外国几千元、几万元买不到的。"

戚本禹："伯达同志，陈毅的事我们不要管好吗？"

陈伯达："批评一个人可以的，牵扯到解放军国家大事不要弄，不要动不动把我们的话贴到大街上去。我看了外国通讯报道还要回忆，我说过这样的话吗？刚才戚本禹批评我了。"

他指着报纸说："不是。国家机密。傅崇碧司令大字报贴上吧，他是和我们中央一起研究事的，什么上报纸，要审查，要有责任编辑。大学同志们讲一讲吧！"

戚本禹问韩爱晶："北航，陈毅是你们口的吗？为什么炮轰陈毅？讲一讲吧。"

江青进来了，陈伯达对她说："他们贴了傅崇碧的大字报。"

江青："不好哇，贴贴吧！主要我们负责嘛。"她指着李冬民说："还是不听话，出去贴了。"

戚本禹："他没有贴，他是稳健派。"

江青："他们还是可以理解的，把它贴掉，不要吵架。"

李冬民："下午丁国钰说，李钟奇不要上街，他们不听。"

戚本禹："包括李钟奇的，要贴掉。"

陈伯达、康生："对呀！"

江青："李冬民不要去了，他们吵架麻烦了。"

谢富治："大学帮助贴，以免他们吵架。"

江青："农大昨天打架了。"

周恩来问："为什么？说一说。"

财经学院的代表说："今天提出炮轰李先念，从总部到下面分成了两派，我们听了要搞军训，和李先念说了，他找叶剑英，叶剑英派了几百人来了，一班两人……叶剑英派来的支持保守派。我们开李先念的会，他们开别的会，抢时间、抢会场，说我们冲击了军训。"

周恩来："你这不能推到李先念身上，这是你们要求的，军训工作不好不能怨人家。我说炮轰不要紧，……炮轰我几炮也不要紧。"

财经代表："我们怀疑李先念同叶剑英有联系。"

周恩来："这不合逻辑，轰，我是支持的。"

聂元梓说："我认为集中时间解决问题，省首长时间，是否大家集中谈下运动概况，从路线斗争上谈。"

她说："现在有许多活思想，不安心在本单位，要走。应该全面系统地批判反动路线，政治上同时在思想上也要触灵魂，在这个群众基础上，大学的教育革命也要着手。有的同学对斗批不感兴趣，对改感兴趣，对批刘邓等少了。这几天搞了声势动员，好一些了。怎样把积极性引导下去，搞深搞透，这是个问题。现在有提出'斗批散'、'斗批走'的，留不住了。"

关锋问："走到哪儿？"

聂元梓："工厂农村嘛。他们忘了走到哪儿都要斗批改。总

之，怎样形成批刘邓、斗批改、教育革命的高潮？”

韩爱晶：“说的不要太具体。”

聂元梓：“毕业生活思想很多。文科的也不少，要散的，总之是高年级的毕业生、文科活思想多。批判刘邓上街热情高，但坐不下来。”

江青：“坐下来批也是苦差事嘛！”

清华：“戚本禹同志讲过，全国性冲击也过去了，可看起来全国、北京还是要有的，比较大和小规模冲击，要求拉回王光美斗一家伙，斗批改没有统一办法和计划。有人总辩论阶级路线问题，是否有人指使。是否阴谋要在《十六条》加上出身二字。”

农大“东方红”：“谭震林的爪子还在掌权，造反派有点翻不动。”

体院刘长信：“我院三结合搞了，有军队同志当参谋。现已按系科活动，‘兵团’支部建在班上。整风的中后期学了《三七指示》，振动很大，自己搞军训，已经或正在掀起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新高潮。怎样能在批判刘邓的反动干部路线同批《修养》结合起来，是个大矛盾。体委情况很复杂，庄则栋陪练总理是否知道？不知总理最近有否安排比赛？”

周恩来：“不，不，没有，没有比赛。”

刘长信：“有很多比赛，比往年这时期比赛还多，荣高棠倒台后，黄中对各种比赛和业务活动是非常关心的。是不是陈毅的问题，说是陈毅打电话告诉黄中要庄陪练的。”

周恩来：“不要这么讲嘛，怎么都是这个逻辑（指对叶剑英问题）？陈毅什么小事都向我请示，没有什么比赛。”

刘长信："是有的。"

江青对周恩来耳语了几句，周恩来说："那也好，我是不要有的，尽量不要有，具体问题我再调查，很快找你们谈。"

刘长信："他们这么多比赛怎能行呢？怎能搞文化大革命呢？"

江青："叫他们来吗！"

刘长信："据说他们在讨论吃 1.7 元和 1.8 元的问题。"

周恩来："有这回事，有吃这么多的吗？"

刘长信："还是物质第一的问题。我说你们这么吃，小心点食堂。"

江青笑了。

蒯大富："有不少人用各种名义总想出去，怎么办？请中央考虑，给我们个计划统筹安排，大家也能安下心来。希望中央给我们个社论指导，怎能安下心来，怎么批判《修养》。安不下心来是个严重问题，能发动 20%就不错，发动 50%到 70%太好了。要发动各院校，全国把刘邓搞臭了，希中央用报纸继续引导。"

江青："《修养》是不是每人都读了读啊？"

戚本禹："批判，有些人写的不错，改名字就可以送各报。"

蒯大富："普遍的都承认广大干部是好的，做起就不成。"

王力："在批判斗争中看干部就可以吗！否则同学们也搞不清楚。"

江青："学毛主席著作可以批判《修养》，从和平时期到文化大革命系统批判也就是系统学习毛主席著作，各系统都要批判，各种专业大学吗！"

邮电学院："斗批改条件成熟，组织占学校人数 80%左右，我们这儿有个培养局长的系。"

周恩来、江青："真修呀！"

红代会作战组汇报："联动有个'1016'。"

周恩来问："哪些学校为基础，哪些人？"

作战组："有几个头头。"

江青说："北航的，刘克夫很厉害，他的几个儿子。关于大学'联动'要深入调查一下。"

作战组请示："能否给我们作个形势报告？"

江青说："今天我们宣布纪律，不要上报啊，广播。"

康生："最后一次考验。"

农大"东方红"又问："总理，你不是说农林口还没摸清楚，正在调查吗？现在调查清楚了吗？"

周恩来："清楚了，刚才我和农大同学说了，过几天我要接见农口的。"

农大"东方红"："农口各部保守派要利用 2 月 20 日中央文件把我们赶出来，不给我们饭吃。"

周恩来问："有哪几个部？"

农大"东方红"："农政、农办、农垦部。"

周恩来问："农业部呢？"

农大"东方红"："也是的，现在农办都打昏了人送到医院，他们利用 2 月 20 日文件压我们。"

周恩来："你们可以例外嘛。"

农大"东方红"又问坐在旁边的关锋："农口保字号传出来

谭震林当选中央常委，他的检查中央通过了？”

关锋说：“没有，谁说的？”

农大“东方红”：“是农口的保守派。”

关锋肯定的说：“是谣言，是造谣。”

农大“东方红”：“刚才我们给您写过条子，谭震林把造反派抓到监狱后，没放出来，给群众压力很大。”

关锋：“我看见你们的条了。”

农大“东方红”继续说：“农垦部的没放出来。”

关锋说：“你们要注意，农口阶级斗争很复杂，反谭会混有坏人的。”

农大冯兴汪汇报了农大及农口情况后，周恩来看了农业部送来的材料。

江青问了农口左派组织的情况后表态说：“你们汇报了，我们要酝酿酝酿。现在运动的重点是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批，就是学习主席著作，每时期主席都有校正的文章，这样，同学有兴趣了。45 年日本投降开始都有他的路线同主席作战，两次入狱你们搞过啊？通过斗争，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取得胜利。要批判东西很多，特别是戚本禹的文章发表后，批判出现新高潮，最近还要出一篇更有力的文章，进一步深入下去。作战组可商量一下。从各个角度看来，你们处于第一线，了解情况比我们多，材料这样多，你们应集中锋芒，火力，批倒批臭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农口，如果他们走了就垮就不要走。刚才农大‘东方红’反映情况很重要，你们农大‘东方红’同学要坚定不移支持农口革命左派，别人赶你们走，你们不要走。要坚持。可以组织短小精悍小分队

去支持左派，其他各口也可以去支持。前段我们曾经出面保了谭震林，但并不是保他的错。我们那时候保是从另一个角度，现在他还在活动。把农口搞成这样，你们不应该退出来，应该跟上去。你们反映的情况，我们包括总理不知道。以前对他的东西掌握不多。他们要把左派压下去不行。现在斗争正在深入，我个人意见，农大‘东方红’，还有师大‘井冈山’呐，不用撤了。农大‘东方红’同学要担负主要责任，听说农机、劳大、师大有人在农口，很好。我劝你们不要搞武斗，要摆事实，讲道理，说服别人，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如果你们力量不够，红代会考虑轮流支援。总之不能使农口各部左派力量垮下去，因为他们现在力量还很弱。听说抓去了几个人没什么了不起，坐几天监狱，受点锻炼，目前你们有人在外被抓，你们不要着急，最近中央军委要发布《十条命令》。”

周恩来：“刚才江青同志讲了，农大‘东方红’汇报了情况，请大家注意。以前我没有很好地注意。政府各部我对农业抓的少，有个感觉，2 月中旬各口搞三结合夺权，财贸口我搞过，那么难。当时我很怀疑，为什么农林口那么容易？过去很落后，夺权却走在别人前面，问题很复杂。后来我想农大‘东方红’1 月 7 日去冲中南海为什么搞得那么紧张，把 5 个门围起来，我感到有点问题，但当时几个问题混杂在一起，所以把你们叫到人大会堂批评了你们。从你们坐着不走，我感到问题很严重，所以后来戚本禹在政协礼堂接见了你们，但过了不久，我召集农口各单位开会，有农大参加没有？”

答：“没有。”

周恩来继续说："1 月 17 号到 18 号我们讲过，部里夺文化革命权，业务监督。市委夺权我们也等嘛！我们先开了造反派代表会，大学好些，造反派基础好，工代会也是，中学差一些。美中有不足，不会十全十美。争取 95%群众和干部，文化革命后期才能实现。中央各部更费劲，他们造反比较后，发现有些反复，农口就是刚三结合，他们说他们夺权了，当时我想从各方面摸索经验，对他们的夺权我并没有表示批准，也没有表示反对，既然他们不是左派，而是保守派，并且干部亮相也不好，所以我并没明确表示态度，现在知道不是那么回事。我准备最近把农口部两派都找来，最近我准备找造反派和保守派一起谈，在会上要把造反派的气鼓起来，一定要使权落到革命派手中，农林口很好地弄一下有好处，要亲自抓农林口问题，农业部可能军事接管。今后我们上下结合共同把农林口搞清楚。"

江青："没有铁板一块，哪儿有不革命，反革命，哪儿就有革命。"

周恩来："部有些不能放，一般监督业务可以的。外交也是吗！中央准备快些。主席说看出个眉目，原认为 4 月，要到 5 月了。明年 4 至 5 月看结果。批判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刘邓，要很好对照主席的，每个方面都有。可叫他们（指戚本禹等）给介绍一下，各大学院，综合和专业的都可以批吗！因为批判必然要涉及些中央的人，可以嘛！不过不要先倒，要先批，所以批我一下也可以吗！对每个人都是，对有刘邓沾染的肃清一下也可以，最高的是对照主席红线批判。要统一部署分工合作，要分工。"

"有外面被捕的，通过红代会，交文革办公室，我给办。写

信，总要送我们办公室的。中央八条下去就解决了，呆一呆也锻炼一下。外边重点可去些地方，要少，不可大片，不要喧宾夺主。”

江青：“‘联动’不要看的太大，清明他们要去八宝山，你们不要出动，我们准备嘛！不要去了，他们总是跳梁小丑吗！”

陈伯达：“卫戍、公安可派少数人看看嘛！”

江青：那里不全是先烈，有叛徒的。

陈伯达：“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批判。资产阶级中心代表人物刘邓。”“戚本禹文章开头了，戚本禹文章是批判刘邓路线，特别是批判刘的。按他的方向中国革命不能胜利，他提出过当红色买办，当时主席在重庆，有红色无买办，有买办无红色。红色其名，买办其实。在土改中，四清中他都是原则错误的，土改不彻底，有‘和平土改’，是他的东西。四清中还有这个问题。‘和平土改’是刘少奇的路线，这样他反对合作社，就不奇怪了，许多奇怪东西以后可以看到。他说：‘每个农夫要三个马一个犁才能搞变革，搞合作社，不然是错误的。’”

周恩来：“刚开过十一中全会。对照党的历史就看出来了。”

陈伯达：“51 年他批判一个地方搞合作社，后来大砍合作社，都和他的路线有关系的。中国不能走资本主义，农民不同意。只能走社会主义。毛主席说过，按他的说法，只会走向半封建，半殖民地，不会向别的。只有无产阶级领导才能堵死这个路。毛主席写过《两个中国之命运》，就是说两种道路，有很丰富的材料。农村现在还有和平土改的余毒。什么农口，这些东西和他的路线都有关系。要批判，不批判也不能团结大多数。完了！”

康生：“今晚最后一次考验，不要贴大字报。”

在会上，蒯大富写了个条子递给周恩来：“总理，清华大学同学强烈要求批斗王光美。”

周恩来把他的条子拿给江青、康生传看后，对蒯大富点点头说：“行，你们订个计划，我同意你们批斗。”

## 第 573 回：北京市，分裂“四三”“四四”派 轰□毅，广州筹备“春交会”

中央领导 4 月 4 日再次接见北京大中专红代会代表，又给中学里支持军训团的那部分红卫兵以很大的鼓舞，他们更加坚定地认为支持军训团没错，搞以班级为基础的大联合没错。从此，北京中学红卫兵就以 4 月 3 日、4 月 4 日的两次接见，开始形成公开对峙的“四三”“四四”两派。两派对中央文革小组的讲话各取所需，互相指责。“四三派”以京工附中“红旗”刘钢为首。“四四派”基本是以“首都兵团”负责人、中学红代会一把手 25 中李冬民为首。他们的分歧主要是如何看待军训、如何看待“联动”和“老红卫兵”、如何看待中学“红代会”三个方面。“四三派”认为军训团没有坚决支持左派，在对待“联动”问题上有“右倾”，解散造反派组织的做法是错误的。而“四四派”则认为军训团已经坚决支持了左派，军训团在军训中的各种做法是正确的，军训好得很。“四三派”认为中学“红代会”中没有以左派为核心，在吸收各中学的红卫兵组织加入“红代会”的问题上排斥了大批造反派组织，因此中学“红代会”必须进行彻底改组。而“四四派”认为中学“红代会”是经过无产阶级司令部批准的，是全市中学红卫兵组织的代表，即使有缺点错误也只能补台不能拆台。

在 4 月 4 日晚上，中央领导与北京中学生座谈会结束后，还发生了一件事情。那天下午，北航“红旗”负责人韩爱晶在北航教学区找到北航“红旗”总勤务站常委侯玉山，对他说：

“晚上有个接见，你也去一下吧，最好找总理给咱们型号生产写几个字，现在和外部搞协作很困难，有首长题字，就好了，对大家也是一个鼓舞。”

韩爱晶说的“型号生产”是指北航正在研制的，中国地-空导弹训练用的高空高速无人靶机——“靶-六”。

北航“红旗”1 月 19 日在北京航空学院夺权后，就开始考虑复课、教改和启动科研项目的工作。

1965 年 11 月，为应对美国新一代高空高速侦察机“黑鸟”对中国的侵犯，北航曾参与国防科委六院负责设计研制“靶-六”的工作，组成了 213 研究所。这项工作在文革开始后暂时停止了。北航夺权后，北航 213 研究所的青年专家和教授们又酝酿重新开始“靶-六”的研制工作，但是，还需要上级的批准和支持。

于是，侯玉山在 4 月 4 日晚上也来到了大会堂。不过，他来的晚了，走进人民大会堂小会议室时，会议已经结束。他看见中央领导还坐在那里说话下边有 20 多人正在整理笔记。他没看到韩爱晶在哪里，就在那里等了一会儿，直到看见周恩来总理站起来休息的时候，赶紧迎上去，对他说：

“总理，我是北航的。有件事情想给您汇报一下。”

周恩来看着他问：“什么事？”

侯玉山说：“北航下一步要在院内搞斗批改，在搞好大批判的同时，解放干部，学生、教师、干部一起搞教学改革。最近，我们上了一个科研项目，是有翼导弹。”

这时，陈伯达、江青也走到了他们旁边。

周恩来很高兴的对侯玉山说：“好啊！你们北航有好传统。

1958 年，北航就搞出了几个型号，我看了展览。”

“那一年搞了五个型号，从‘北京一号’到‘北京五号’。”侯玉山回答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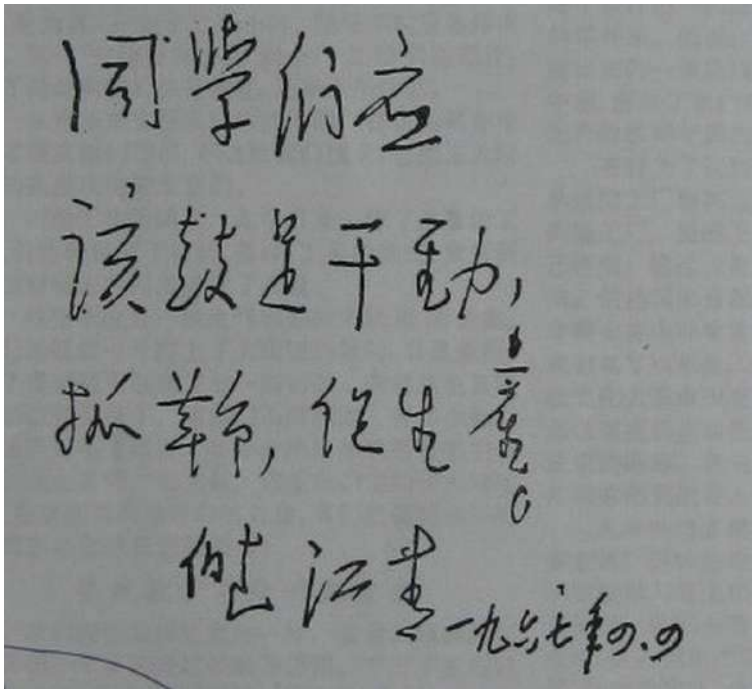
周恩来明确表示：“我支持你们搞。你们一定要发扬 1958 年的精神,克服困难。祝你们取得胜利!”

侯玉山赶忙拿出早已准备好的空白笔记本和钢笔说：“总理，您能不能给题几个字？”

周恩来笑了笑，指着自己的右臂说：“你看，我的手臂不行，小字写不好。”他回过头，指着陈伯达和江青：“让他们给你写吧。”

陈伯达接过侯玉山的钢笔和笔记本，和江青一起走到后面，在两张桌子旁坐下，商量了几句，陈伯达便在笔记本上写了起来。写好后，他递给了江青。江青也签上自己的名字和日期，就站起来交给了侯玉山。

侯玉山赶忙说：“谢谢首长。”




陈伯达、江青的签名题字

这时，侯玉山又看见康生坐在那里，就走过去，叫了一声："康老，"康生应该是听到和看到了侯玉山与周恩来他们之间的谈话，不等侯玉山说下去就站了起来，笑嘻嘻地将他领到刚才陈伯达、江青题字的桌子旁坐下。

侯玉山将对周恩来说过的话对又康生说了一遍。康生说："你们要把 58 年的干劲拿出来。你们这些同学比那些老教授还要好！"

侯玉山说："您也给我们题个字呗！"

康生站起来说："他们已经写了，我就不再写了。回去好好干！"

回到学校，侯玉山将这一切向北航"红旗"总勤务站做了传达。韩爱晶吩咐将陈伯达、江青的题字印出来，广泛宣传。

4 月 6 日，北航《红旗》报刊登"红一连"文章："陈毅是十二月黑风的急先锋"。4 月 8 日，北航《红旗》报又刊登《陈毅在资本主义复辟逆流中的言论》。

为迎接 1967 年广州春季交易会的召开，黄永胜在去北京开会前，于 3 月 24 日上午，召开广东省军管会开会，专题研究春交会问题。广州军区诸领导黄永胜、刘兴元、陈德、詹才芳、温玉成、邱国光、黄荣海全都参加了会议。时任国务院外贸部副部长卢绪章，广东省委还能勉强工作的林李明等人也都列席了会议。会议决定成立一个 20 人左右的"三结合"工作委员会，负责春交会的领导工作。委员会设核心小组，由陈德、卢绪章、林李明、胡广恩、罗培元、王润生、黄业、周杰 8 人组成，陈德任组长，卢绪章和林李明任副组长，胡广恩任秘书长。林李明兼交易会主任委员，负责对外联络。

核心小组下，成立政治部，由广州军区干部从司、政、后机关抽调 20 名政治干部组成，主要负责大会工作人员和各主要宾馆服务人员、司机人员的工作。会议决定：上述直接为大会服务的单位一律暂停“四大”。

为迎接春交会，按照惯例，广州市要整顿市容。会议决定，由广州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按原定计划和要求组织实施，务必在 4 月 10 日前把广州市主要街道整顿好。

往年广交会的市容整顿，是由中南财委按两个季度 50 万元拨款包干，今年情况虽然非常困难，但第一季度，仍拨了 20 万元给广州作市面清理工作。交易会货源由中央直接抓。

清理市面工作开始后，军队兴冲冲地上街打扫卫生，马路上许多大字报也被撕掉了，群众组织对此大兴问罪之师。4 月 1 日，广东省军区第二政委陈德指示：“整顿市容只将挂的草人等不雅观的东西清理掉，街上的大字报一般不要清理，广州市明天要停止搞掉大字报的做法。”

广东省人委外事办根据国务院外办和军管会的意见，制定了一系列关于对外宣传的口径材料，4 月 4 日，他们致函省军管会，转达了中央的指示：“关于我省实行军事管制和刘少奇、邓小平、陶铸等中央级报纸尚没有公开点名批判的人，如何对外表态问题，经 3 月 31 日请示国务院外办，郝德青副主任指示，以上两个问题不仅不主动宣传，如外宾问到，找个话题转过去，不要谈。特报。”

但群众根本不受这些指令的约束，想“找个话题转过去”，那只是一厢情愿，许多群众在和外宾交谈时，哪里是“找个话题

转过来”，而是主动介绍他们和刘、邓路线斗争的“辉煌成就”。因此，过没多久，省外办在一份更加详细的口径材料中，不得不做出比较灵活的规定：

“一、关于刘、邓问题，有的外宾与群众接触中，群众早已点名讲了，实际上不少外宾也都知道。今后外宾问到此问题时，群众怎样讲，我们可以不加限制；但揭露刘、邓的书面材料和大字报汇编，一律不要送给外宾。一般接待人员可以口头上正面回答，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提出者，就是指的刘少奇、邓小平，但不要以文字表现……问刘少奇是否是国家主席，可不答。”

“三、中央其他和各地、各部门被批判的人，凡是没有在《人民日报》和《红旗》上公开点名的，今后，外宾问到，仍不要向外宾讲。”

“关于军事管制问题，凡实行军事管制的省、市、自治区一律不向外宾谈论，但广东省、广州市实行军事管制的公告已在街上张贴，而且外宾已知道，则不必避讳。”

陈毅“大闹怀仁堂”的事，最终还是传到了“外交部革命造反联络站”的造反派耳中，“外交部革命造反联络站”也决定加入到“反逆流”的大潮中。

早在 3 月 6 日，周恩来办公室发下关于《抓革命促业务的几点初步意见》，叫外交部“联络站”和部党委讨论修改后报周恩来批。“联络站”核心组第一把手王中琪就说它是“资本主义复辟的黑纲领”。

3 月 21 日，外交部“联络站”召开第一次反逆流大会。

3 月 22 日，陈毅外长秘书杜易告“联络站”核心组，周恩来办公室发下关于《抓革命促业务的几点初步意见》“是总理的意思，不能当作逆流来反。”周恩来秘书钱嘉栋也告“联络站”核心组：“这是总理的思想，我的文字”。

4 月 1 日，为呼应社会上红卫兵揪批陈毅的新动向，外交部“联络站”再次召开“反逆流大会”。外交部研究室副主任邵宗汉、非洲司副司长谢丰登台亮相。

4 月 3 日，“联络站”召开“向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发起总攻击誓师大会”，提出“火烧陈毅”、“炮轰陈毅”等口号。

4 月 5 日，外交部“联络站”发表关于《炮打陈毅的声明》，称陈毅是外交部“资本主义复辟的反革命逆流的总根子。”他们成立批陈毅的“红一连”、批刘邓的“红二连”和批外交部党委的“红三连”，聘请在 4 月 1 日反逆流大会上亮相的非洲司副司长谢丰、研究室副主任邵宗汉和国际司副司长吴亮璞为这三个连的顾问。开创了领导干部参加群众组织的先例。

4 月 5 日这天，清华大学贴满了炮轰陈毅的大字报。同时也开始了对徐向前、李先念、叶剑英等人的炮轰。

北京大专院校红代会要求北京八大院校派人去中央办公厅，说汪东兴在那里执行了资产阶级发动路线，把文化革命搞得冷冷清清，死气沉沉。农业大学“东方红”接受了这一任务，“东方红”总部刘坚又把任务交给了农业大学植保系，植保系学生唐松官带着他们系的“齐心干战斗队”去了。那次共去了北京市的 8 个大专院校的学生，唐松官就这样当了这 8 大院校的“纵队司令”，但他直接受农业大学“东方红”总部刘坚的领导。这些人

冲进中央办公厅，抢了中央机要室的档案，交给刘坚处理。据说这些材料中有中南海平面图、8341 部队分布情况、毛泽东和林彪等中央领导的办公室和卧室的红机号码等等。

周恩来立即命令他们上缴，并数次催促。在上缴这些材料时，周恩来刚刚打开一份材料才看了一眼，就迅速合上说："你们连这样绝对机密材料都抢了，胆子也太大了。这份材料，我们国家只有毛主席能看，我都不能看。"

后来在毕业教育时，审查了刘坚，刘坚在批判他的大会上说："我的罪极大，最轻也应该判无期徒刑，因为我知道的国家机密太多了。"

4月5日清明节，上午有300余名"联动"老红卫兵来到八宝山烈士陵园祭奠先烈。下午又有些"联动"到颐和园抢游船，打游客，说是镇压流氓。颐和园的管理人员对他们也无可奈何。下午16时，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一声令下，"新北大公社红一团"、清华"井冈山"、体院"毛泽东主义兵团"、农大"东方红"、钢院"919"杀奔颐和园，与部分工人和解放军把颐和园围了个水泄不通，里里外外大搜查，抓捕"联动"数十名。这些"联动"拼命挣扎，大骂"红代会是黑代会，流氓代会"，还高喊："打倒联动！镇压流氓！"叫人哭笑不得。

## 第 574 回：发《十条》，第四次接见内蒙 听汇报，与天津代表座谈

4 月 6 日，毛泽东又对林彪 4 月 5 日送审的《十条命令》修改稿批示："林彪同志：已阅。请再送中央常委碰头会议讨论批准，即可发出。"

4 月 6 日，中央军委正式颁发《十条命令》，套红印上毛泽东的批语：

林彪同志：

此件很好。

4 月 6 日晚，在人民大会堂，周恩来对几位老帅说，由于"三支两军"仓促上阵，大家没有思想准备，没有经验，难免犯错误。准备开一次军委扩大会议，主要是总结前一段"三支两军"工作的经验教训，不要追究个人的责任，希望老帅们和大家一起把会议开好。

遂后，4月6日晚20时32分至7日凌晨2时12分，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肖华、张春桥、王力、戚本禹、叶群、徐立清、李天佑以及各大军区负责人共25人在人大会堂一楼西侧北会议厅第四次接见内蒙古军区、党委、造反派、"红卫军"四方面代表。其中"呼三司"等组织代表58人，"红卫军"代表9人。

造反派代表王建平首先发言。她一开始就非常激动地说："感谢党、感谢毛主席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周恩来劝慰道："冷静点，不要激动。"

王建平详细叙述"125"事件过程。

周恩来问："你们打过黄厚吗？"

王建平说："没有。"

周恩来问："有推推搡搡的现象吗？"

张淑琴说："那是2月3日晚上。"

王建平继续讲她和张淑琴被打、被斗的经过。周恩来问："你被剃了光头？"

王建平说："没有。那是军区造谣。"

周恩来："是你们说的嘛！"

张淑琴解释说："当时，就剩下我一个人有自由，在北京，听军区内部传出来的。他们随便打人、抓人，剃光头还算什么，我就相信了。"

周恩来问："你们那三、四位同志放出来没有？"

王建平答："分批放了，他们3月20日还抓人，韩文达还是从南京逮捕回来的。"

军区通讯总站副教导员于喜渊揭发军区个别领导人预谋枪杀韩桐事件，向战士灌输"三司"是反革命等情况，并叙述了军区军训部副部长柳青枪杀韩桐的经过。

于喜渊的爱人侯凤英哭诉自己被打成反革命和一家人受迫害的经过。她又谈了冒死传递韩桐事件3封信的情况。她说："军区有些人说，中央来的代表团有8个右派，李天佑是大右派；我们内蒙军区就是党，光听中央就是奴隶主义。王逸伦是左派书记"等等。

周恩来、康生、王力、戚本禹、张春桥听到这里都笑了，反问说："王逸伦是左派书记？"

周恩来点名："锡盟代表许名扬同志。"

许名扬站起来。

周恩来问："你是什么报的记者？"

许名扬答："《锡林郭勒日报》！"接着揭发说："一个小学生说乌兰夫是黑帮，盟委的一个书记用枪对准小孩说：'再说枪毙你！'贴'打倒刘少奇'大字报的学生也被捕了。"

昭盟代表、17岁的中学生于乐泉叙述自己被斗、被打、被捕入狱的情况。

巴盟代表陈振中揭发巴盟的情况，说那里已经资本主义复辟。

内蒙古军区《战士报》造反派代表陈树键揭露军区某些领导人对内部造反派派的迫害。

周恩来问他："你在军队工作几年？"

陈树键答："65年10月到内蒙军区。下连队当了一年兵，然后到《战士报》。1月23日正式参加运动，2月3日被打成反革命。"

内蒙古军区管理局局长，长征干部刘钧揭发柳青开枪杀韩桐，以及自己被打成反革命和在北京被逮捕经过，及自己被地方群众掩护来北京反映情况，军区某些领导人说他是逃跑投敌等情况。

河西"818"代表肖华山开始发言。周恩来问："你是前天来的？"

肖华山答："我是月底来的。"

周恩来："抓你们的人放了吗？"

肖华山报告："共逮捕125名，现在有两名未放，其他在4

月3日放了。他们还说：‘派调查团是总理派的，左中右都有，谁知道周总理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呢？’”

周恩来和在场的人都笑了。

周恩来继续问：“你们多少人？”

肖华山答:“2000人左右。河西公司军事接管以后,宣布‘818’是反革命组织，要采取政治攻势，要分化。”

周恩来：“分化，中央讲的是对反革命组织，不是指‘818’嘛！”

自治区公安厅张鸿喜揭发公安厅反夺权的情况,并揭发内蒙古二师宣传科科长、公安厅军代表赵金宝说：“北京商谈是‘重庆谈判’。”

周恩来对二师师长杨德松及尤亚民、华民3人说：“你们讲一下，站起来回答。”

杨德松、尤亚民、华民3人站了起来。

周恩来问：“你们把中央解决问题说成‘重庆谈判’，你们是国民党，我们是国民党啊？”

这时杨德松生气的又坐下了。

康生生气的站起来指着杨德松说：“那个，你叫什么？”

大家纷纷回答：“杨德松！”

康生说：“你就是那个师长？总理让你回答问题，怎么坐下啦？什么态度！”

杨德松站起来气愤的说：“这是造谣。”

众人纷纷说：“我们那里也有这样说法。”

张鸿喜说：“你抵赖！”

杨德松坚持说："不是抵赖！"

郝广德说："王良太部署的。"

张鸿喜则进一步揭发他们说这话的时间、地点和在场都有哪些人。

周恩来："从你们口里说出来的嘛！公安厅是谁管的？"

华民："我们。"

周恩来："工学院还有你们多少人？"

华民："44人。"

周恩来问："怎么还不撤？"

华民："其他是派去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

周恩来："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怎么住到学校去宣传啊！"

周恩来接着念了铁路的一份材料。中心意思是"你谈你的，我夺我的。"其中有一句"中央文革干涉了我们"。

江青："我们中央文革什么时候干涉了你们，我们派了两个记者还被你们捆起来！"

周恩来继续念："你谈完了，我也夺完了"

然后放下材料又说："实际上也是如此，你们还宣传，抄家……你们回去好好考虑向中央交代。"

侯凤英揭发说："王良太说：'你有你的少数，我有我的多数，多数没有了，还有警卫营'。"

周恩来："这是什么口吻！"

李雨楼："他们在审判我们时也说，不要把希望寄托在谈判上。"

康生摆手让华民3人坐下。

周恩来：“监狱还押多少人？”

众人答：“100多人。”

也有人说：“200多人。”

医学院学生周权、军区家属王海波、农牧学院黄宝玉纷纷揭发内蒙古军区对抗中央指示的情况。

张鸿喜要求：“杨德松在澡堂说中央代表团有8个右派。都是谁！”

众人怒吼：“指出名字来！站起来！”

周恩来劝说：“我们还是摆事实讲道理。”

杨德松生气的大声说：“这是造谣！”

众人怒斥他：“你抵赖！”

张鸿喜：“我就是在雪地被划地为牢的站了23个小时的。”

华民请求：“是不是让我讲？”

周恩来同意：“你回答吧！”

华民谈他们为什么支持“红革联”在公安厅夺权，并说没有宣布公安厅的造反派组织为反革命组织，只是说保守派。

有人揭发说：“我见到公安厅院里大字报中写的反革命组织。”

华民继续辩解。

周恩来对他说：“你说简单一点。”

华民答道：“是。”接着检查二师存在的错误。

呼钢代表叶永凯、二毛代表段建勋、内蒙医院代表郑建德芬，分别揭发内蒙古军区的问题……

侯凤英说：“我去医院看病，有伤只好说为家务事两口子打

架打的。只能说是爱人打的才能看病，不敢说是解放军打的。”

周恩来说：“不仅仅是为了看病，你还维护了解放军的荣誉，宁肯说是爱人打的。今天只一方面讲，‘无产’递了一个条子要发言，谁呀？连个名字都没有。”

话音刚落。一下站起来两个，他们手指张三林问道：“你不是过去说过吗？”

“红卫军”代表何贵控诉：“全区广播大会上宣布我被押。”

周恩来问：“高锦明同志，有这事吗？”

高锦明答：“全区广播大会上宣布的，一个被拘留，一个逮捕，后来放了。”

铁一中张继功反驳何贵的控诉，说：“他讲的不是那么回事，是他横冲直撞进会场，打了人。”

何贵：“请问你们，我要打人一拳坐10年劳改，踢人一脚判20年徒刑？”边说边出拳、踢脚。

康生问：“一句话，你打人没打人吧？”

这时高锦明将释放何贵等人的纠正信递给周恩来，周恩来看后说：“这件事已经解决了，不是平反了嘛！”

何贵：“全区广播大会上宣布的。”

周恩来：“工资都发了，已经解决了。我们不是断案的。在座的被打的比你们厉害的多，现在还没有解决，我们也不能一个一个解决。纠缠了大家很长时间，不继续说了。今天不能解决问题，今天不继续谈了。我们又听了第二、三批同志谈，还准备访问你们，节省一些时间，会后由联络员赵刚，记者找你们，也可提出材料。‘三司’的也好，不是‘三司’的也好，把情况用书

面写来。

第二件事，内蒙军区开始有一点认识，有了点检讨，顺着这条路要继续认识，深刻检讨，吴涛同志带头。还有独×师、独×团，现在你们只在呼市，在各盟也有，而是带全区性的，要很好地检查。如18号那天我约定放人，不要再捕人了，过去捕的要放，河西‘818’的也要释放。我说了有20天了，还有没放的。其它地方还有。你们一方面继续检讨，深刻认识错误，回到住处，马上打电话回去，都放出来。”

“你们支持一方，把另一方压下去宣布解散是错误的。你们应一方面深刻检讨，一方面很好的解决问题，但没有很好解决。回去的要给工作，工资要照发。时间到现在已经两个月了，先解决这部分问题。”“中央在谈判，你们下面夺权，你们说中央是‘重庆谈判’，这是反动思想，把中央放到哪里？把你们置于何地？要深刻的检查出来。”

“你们继续错误地支持一派夺权，把一派压下去，你们说夺了权，中央就承认？根本不可能。你们在全国放了第一枪，打死了革命群众，已经查清了！怎么能说中央同意呢？你们回到住地，要好好检讨，把责任负起来，要和各单位讲清。打枪的人法办，当然把这事登在报上也是不妥当的。解放军是毛主席亲手缔造的，是林副主席亲自领导的。是可以信赖的。毛主席最近说：我们敢于发动这场文化大革命有三个信任：一信任群众，二信任解放军，三信任大多数干部是好的或比较好的。要高度保持解放军荣誉。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的指示，只要传达下去，就可以解决问题。那位女同志，侯凤英同志，很懂得保护解放军的荣誉，值得

我们大家学习的。

在这个会场上可以这样讲，不在这个会场上就不要这样讲，平心静气把道理讲清楚。

解放军个别坏人是有的，开枪的人是犯法的，这是个别分子。解放军有个把坏人，但处理解放军的问题是内部的事情，不能对外宣传。

在这里是允许你们激烈地批评的，对外不要宣传，不要在内蒙以外的无关的人传达，不要宣传，不要打电话，不要出宣传车，不要广播，不要出传单，否则一搞，传到香港、外蒙、美国、日本都知道了，这是敌人喜欢的，让敌人高兴。革命组织的同志，要遵守纪律。

事情起来了，要慢慢解决。内蒙有民族团结问题，反修问题，有四千里长的反修前线，更应该注意。被打的同志是受了不该受的待遇，是为革命嘛！正义伸张就行了。今天就这样吧！“

郝广德提出经济封锁，被扣押的人问题，周恩来答应：“我马上下命令解决。”

郝广德继续说：“哲盟、通辽出现畏罪自杀。”

周恩来：“以后再谈，否则会就开不完了。军代表要完全撤出来，学校不要去嘛！推迟一下。”他对吴涛：“现在军区什么事都管了吧？继续管吧！现在散会。”

4月7日，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戚本禹、叶群等接见天津驻军及干部群众代表肖思明、郑三生、解学恭、胡昭衡、赵曙光、江枫和五个代表大会的全体代表49人，劳二半“八一八”、天工“八二五”、河大“井冈山”等为

特约代表。参加接见的还有华北局第一书记李雪峰、北京军区郑维山副司令员。

肖思明首先汇报了天津的情况。接着，郑维山说："天津的同志到北京已十几天了，十几天与同志接触很少，基本上没有什么接触，开会接见，我个人来讲应很好接触，表示抱歉。军队在天津作了许多工作，但也出现了一些缺点，我作为北京军区负责人，我应担负更大的责任。

对天津大联合的帮助很少，北京的大联合是总理、中央文革直接指导的。按北京大联合经验指导天津大联合，如果天津出现缺点错误，首先是我的责任。2月6日我到天津搞工作，按中央和总理的指示去天津，听郑三生同志、肖思明同志讲了'野战兵团'的问题。'野战兵团'是保守组织，我没有及时详细报告给总理和中央文革小组，直到'野战兵团'来京才报到中央军委。1号肖思明同志、郑三生同志亲自来抓，直到同志们这次来，肖思明同志、郑三生同志当面汇报给总理，才把这个问题处理下来，处理慢责任在我。天津驻军态度明朗。周总理接见我们，对天津有很多指示，我们要尽快照办。我相信在中央指示后，在今后大联合中，在毛主席、林副主席、中央文革的关怀下，工作会搞得更好。"

随后，各代表开始发言。发言中，工矿企业的李勇，劳二半"八一八"王德明，反修锦纶厂的张成明，还有天工"八二五"的帅关仁发表了与天津驻军和天津"五代会"不同的意见。

反修锦纶厂汇报很长时间，最后，周恩来不得不打断他的话说："江青同志要讲话。"

江青说："战友们，我对天津情况了解的不够，但对天津造反派印象很深刻，在去年，万、张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迫害你们的时候，你们两次徒步到北京，半路上，北京派车把你们接来的，值得我学习。我3月28日听了一次汇报，这方面的问题听了一些省分和个别专区的汇报以及群众组织的辩论，事物总是要有比较的，多方面比较一下，我对3月28日66军负责同志肖思明同志的汇报的印象很深刻的。人民解放军作群众工作满腔热忱，爱护革命左派，这个印象也是很深刻的，当时我的印象是66军作了大量工作，对没有团结进来的革命左派组织满腔热忱、爱护，就是不知怎么做好，有老好人的心情，这样好的军队，有的地方就不是这样，抓人很多，天津抓人很少，比北京少，有的地方抓几千、几万，甚至有惨案，这就不必细谈了。这么一比较，我觉得天津军队是较好的。我希望也算作建议吧，大联合外的左派组织也要想一想他们的苦衷。另一方面，对张淮三操纵的'野战兵团'的处理，不是他们故意搞晚的，因为涉及到十多万人的群众组织，采取慎重态度是对的。向中央报告了，他们的报告送来好多，给军委又给总理，又给中央文革。另外本来应该选进委员会的没有选上，他们认为是错误的，他们今晚还说是有错误的，我觉得应向没参加进来的左派组织说明这个情况，我有这个责任。我们的解放军是毛主席亲手缔造的，大多数是好的，支左不是那么容易的，如果我们一下子接近群众也会出现错误的，但是知错必改，犯错误的左派组织要帮助他。把我了解的情况讲出来，是不是没有参加进来的左派组织，心里应该平一些。我不认识他们（肖思明、郑三生）但是，今天我觉得有必要替他们说话，我不是保他

们的缺点和错误，我希望在这个座谈会上，通过辩论来解决。天津驻军是好的，军队不多，全市下去一万四千人做工作，抓人少，没开枪。天津由一个反革命大乱局面，到建立革命的新秩序，时间并不算太长，这和军队做工作分不开的。有的人可能说，江青同志今天和稀泥了，不是这样，我不是和稀泥，我觉得我应该这样说，我就要退席了，我就讲这些供同志们参考。”

会场上掌声雷动。

当反修锦纶厂说到天大“八一三”炮打康生时，康生说：“我说几句，有几个学校受高级党校个别的少数的人，彭真、林枫影响下，有些时间收集我的材料贴我的大字报，成立全国委员会，调查我，其中有的受了蒙蔽，这里面北京的也有，清华的也有，体院的也有，人大的也有，天大‘八一三’也有。以后问题揭穿了，是高级党校‘红战团’个别头头搞的，其他是受蒙蔽。我屡次声明受蒙蔽的，觉悟了，改正了就完了，不要争论这个问题，我在清华讲过，戚本禹同志在人大也讲过，对其他几个单位不要把这件事作为攻击他们的一件事情，有的人向我们请罪，我不赞成这样作，一时受蒙蔽的常有，列宁曾说过：上帝允许别人犯错误，我们共产党人比上帝强得多，为什么不允许别人犯错误呢？”

全场再次响起热烈掌声。

4 月上旬，叶剑英在西山同聂荣臻一起散步，偶然说起：“有人批评我，说我在 2 月怀仁堂会议上曾说过对高干子弟‘不教而诛’的话，我不记得说过，又是欲加之罪了。”

聂荣臻当即回答：“这话是我说的，怎么安到你的头上了呢？”

散步回来，聂荣臻给毛泽东、林彪写了封信，信上说：

“最近，剑英同志问我，据反映，他在中央碰头会上讲过‘不教而诛’的话，他自己没有这个印象了，问了汪东兴同志，记录上也没有。我当即答复说，这话是我讲的。”

这封信，聂荣臻署名的日期是 4 月 7 日。

毛泽东用铅笔在信的台头“主席”两字上画了个圈，写了“退荣臻同志”5 个字。

林彪在“林副主席”4 个字上用红铅笔画了个圈，原信又退给了聂荣臻。

## 第575回：山城乱，为“湘江□□”翻案 四月八，北京民族宫武斗

重庆“革联会”在4月6日发出为重庆“镇反”辩解的《关于目前重庆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几个问题的通告》，随《新重庆报》附送。在这份《通告》中，“革联会”承认在“镇反”中的一些错误做法，并于6日和7日，连续用两天时间召开了全市造反派组织负责人的联席会议。

4月7日、8日，“革联会”连续召开“炮轰大会”，欢迎各革命组织对“革联会”的错误进行“炮轰”。各造反派组织纷纷上台发言，申诉本单位资本主义复辟的情况，认为解放军有很大的责任。“815”派也有不少组织对“革联会”“镇压群众”、“复辟资本主义”作了控诉，会上辩论激烈，许多血和泪的控诉激荡着人们的思想和感情。“二轻兵团”的负责人夏祥贵跳上台去，大声说道：“同志们，‘革联会’是我们把它扶起来的，我们为它大喊大叫，为它鸣锣开道，可是现在它却成了资本主义复辟的工具，没有为我们干一件好事。我们不要它了！大家一道起来把他砸烂吧！”

一席话，把许多人激怒了，大家在下面乱嘘、起哄：“滚下去！”“滚下去！”

师专唐宗明走上台说：“同志们静一静，静一静，我说，‘革联会’是我们自己的，有错误，有缺点，我们炮轰它，帮助它改进，砸不是办法……”

外院余朝文冲上去：“同志们，刚才这个人发言是个大阴谋，

我代表川外‘八二六’表态，坚决砸烂‘革联会’！”

一群人冲上去，把余朝文推开，迅速在话筒前排成长队，要求发言：

“我代表‘2307无产阶级革命工人造反军’发言，我们坚决支持‘革联会’，‘革联会’是我们自己的，‘革联会’好得很！就是好得很！”

“我代表‘八一兵团’表态，我们坚决支持‘革联会’，‘革联’不能砸，只能炮轰，只能支持，‘革联会’就是好……”

“我说，我是‘二轻兵团’的，刚才那个人不能代表‘二轻兵团’，只能代表他自己，我们‘二轻兵团’的广大战士坚决支持‘革联会’，‘革联会’就是好，好得很！……”

发言，一个比一个激昂；情绪，一个比一个冲动。会场上，掌声雷动，口号起伏，支持派和砸派，在这个会场上迅速地分化、集结……

尽管吵得天翻地覆，但毕竟让多数代表对“革联会”达成了明确的共识，即认为：“革联会”是造反派长期浴血奋战的成果，“革联会”的大方向是正确的。决不能把“革联会”看得一团漆黑，一棍子打死。

8日上午，“革联会”副主任、财贸系统“815”的头头王绍川代表“革联会”常委表态，承认工作中有错误，但“镇反”大方向正确，有反必肃，有错必纠。这次会议的成功使得王绍川心满意足地代表“革联会”对大家的批评表示了“衷心感谢”。

“炮轰大会”开始时，“革联会”主任刘润泉的心是悬着的，他不知可能出现的是一个什么样的结局？会上的发言，多数人对

54军，即重庆警备司令部的支左成绩的充份肯定，让他悬着的心放下了。刘润泉作会议小结时，也十分满意的表示：“会开得很好。”并说：“镇反工作要规定三条，不管任何人假借镇反为名，镇压左派，调查清楚后要严加惩办；二，如果有人背着‘革联会’干坏事，调查清楚后要严加惩办；三，今后逮捕人要经过警备司令部党委批准。”

54军参谋长耿志刚也到会助兴，他代表警备司令部全体指战员表态说：“‘革联会’好得很！我们过去支持‘革联会’，现在支持‘革联会’，将来还要支持‘革联会’。我们坚决支持‘革联会’，我们坚决保卫‘革联会’，支持和保护左派广大革命群众。”

4 月 8 日下午，数辆军车又将重庆大学“815”的 200 余名战斗组长和建工学院“818”的数百名代表拉到了鹅岭公园下的警备司令部小礼堂开会。山城重庆的天色晦明不定。主席台上的一盏绿色台灯，让人感到柔曼而平和。54 军副军长白斌先传达了刚结束不久的中央军委召开的军以上干部会议精神，重点是林彪的讲话。接着副政委蓝亦农就“革联会”和“镇反”等诸问题发表演讲，说话轻声慢语，显得尤其亲切。质朴的工科大学生被军人的儒雅和真诚征服了。演讲人绝对也意识到了这一点，讲话结束时，蓝亦农已胜券在握，意味深长地对台下的年轻人说：“我们心中是有数的。正如俗话所说：任凭风浪起——”话犹未了，台下马上齐声接茬：“稳坐钓鱼台！”这一天是周末，54 军趁热打铁，当天晚上，马上又派刘润泉到重庆大学召开会议“交底”，对“815”表示坚决支持，这使多数“815”派骨干坚定了

支持“革联会”的信心。

4月8日下午和晚上54军与“815”的这两次会面，很快被重庆大学一些激进分子指责为“拉一派打一派的黑会”，“和当初李井泉和‘思想兵’的黑会没有什么两样”。毕竟保守派刚刚垮台不久，他们和所谓“走资派”之间发生的所有悲喜剧“815”都记忆犹新。学生们当然不愿意、甚至十分害怕自己一不小心便重蹈“保皇派”的覆辙。

“砸派”的气焰日盛一日，“革联会”和重大“815”已经被他们奚落得一文不值。他们用各种方式来刺激“815”派脆弱的神经，他们把“815”骂为“叛徒集团”、“资本主义复辟的工具”、“被黑帮收买了”，用漫画将他们画为丑陋的“癞格宝”，即重庆地土语：癞蛤蟆。这一切使重庆大学的学生们别无选择，只能将自己的命运紧紧捆在“革联会”的战车上。

4月9日，重庆“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在大田湾体育场召开“向中国赫鲁晓夫刘少奇猛烈开火誓师大会”。54军副政委蓝亦农到会讲话，但效果显然和前一天警备区小礼堂的效果大不相同。大会的主旋律虽然还是“‘革联会’好得很！”但杂音已经很多了。会间，工业学校“815”派不听招呼的学生们爬到主席台前，大写其标语：“革命无罪！言者无罪！大民主无罪！”中学“91纵队”干脆就多次冲击主席台。虽然造反未遂，但裂痕正式公开，“815”已经不再铁板一块。就在这个大会上，大家都不再迟疑地选定了自己的角色。该退场的，纷纷退场，要和“革联会”站在一起，因叛逆分子的胡闹而铁了心的，在会场上呆了下来，还把口号喊得震天响。

建院“818”的“迎春到”、“人未老”这天贴出标语：“万炮齐轰革联会，揪出山城谭震林！”

从这一天起，重庆的政治格局重新明朗了。保卫“革联会”营垒里，重庆大学“815”再度成为核心，也自然开始成为被攻击的对象。

原重庆市解放碑交电站大楼

原重庆市解放碑群林百货大楼

4 月 12 日，重庆“砸派”在解放碑地区举行“砸烂非法‘革联会’，否定二月镇反”的示威大游行。

4 月 13 日，重庆“革联会”召开各造反组织群众大会，对一些被打成“反革命”、“右派”的群众组织进行公开平反。此后被捕群众陆续获释。反“革联会”的“砸派”重新聚集队伍，与“革联会”的“815”派冲突未减。

这天，市公安局“砸派”砸了公安局革委会牌子，抄了部分“镇反”材料，斗争了原副局长、参与领导公安局内部“镇反”的“三结合干部”罗让。

4月15日，周末，重大“815”和师专“815”、重建“818”等沙坪坝区的造反派组织以纪念“815事件”8个月为名，举行串联游行，实际是向世人宣示“815”的统一意志。队伍由沙区出发，途经小龙坎、石桥铺、大坪、两路口直涌市中区，一路上，人越汇越多，到解放碑时，场面已蔚为壮观。

第二天，4月16日，“815”派又在尚未涨水淹没的长江珊瑚坝集会，会议题目是“向中国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刘少奇发动总攻”，实际目的当然谁都知道，是要炫耀“革联派”的实力。李井泉诸人又被拉到会场，他们是会议必不可少的道具，因为：只要狠狠地把他们揪到台上低头示众，就表示了自己的大方向始终正确。

同样的情形也出现在长沙。3月底4月初，湖南省一些群众组织提出用鲜血和生命推翻《二四批示》、为“湘江风雷”翻案。湖南“高司”则提出：“用鲜血和生命捍卫《二四批示》，谁为‘湘江风雷’翻案，谁就是炮打中央文革，谁就是反革命”的口

号。虽然3月29日，湖南“省红联”向中央上报了成立湖南省革委会的“三结合”的名单，但是，从3月下旬起，“高司”派往各厂“肃流毒”的宣传队陆续被逐出。到了4月1日，支持“湘江风雷”的“长沙工人联合革命委员会”，简称“长沙工人”成立。

随着“湘江风雷”喊冤、要求平反的呼声越来越高，陈伯达叫秘书把《二四批示》的原件从办事组调走，说再看看。与此同时，戚本禹也到办事组调《二四批示》，办事组的矫玉山告诉戚本禹，《二四批示》原件已被陈伯达取走。于是，矫玉山又打电话给陈伯达秘书要《二四批示》原件，秘书说一时找不到了，等找着再还。戚本禹不满地说：“什么找不到了！不愿拿出来了。算了，不要了。”

《湖南日报》是湖南省军区的喉舌。受4月2日《人民日报》“正确对待革命小将”的社论鼓舞，4月7日，湖南“红中会”和“井冈山红卫兵”为首的一些中学生红卫兵组织，在日益增长的造反派工人的支援和《湖南日报》报社内黄振东为首的“红色新闻兵”的策应下，一举将当时由省军区负责领导的《湖南日报》社给封闭了，不允许报纸出版。

随后，“高司”派出队伍前往解封，与封报一派形成对峙和拉锯局面。恰在此时，大批工人组织及其他造反派源源不断赶到，一时间，《湖南日报》的楼顶上旌旗猎猎，楼下人潮涌动，力不能支的“高司”学生被迫退出了报社。

也是在4月7日这天，湖南反“高司”的湘潭“红造联”成立，“红中会”汤建平、谢若冰前往祝贺，汤建平当场宣布了“红中会”、“井冈山”等组织再封《湖南日报》的“特大喜讯”。

而湖南省军区对此局面不敢贸然动作，无可奈何，只以“影响群众学习毛泽东思想”的名义上报。经过各派代表，几次赴京协商都没有结果，最后中央决定：“封报期间，只刊印《新华社电讯》。不出现《湖南日报》的报头，不刊登湖南自己采写、组稿的文章。”这样一来，《湖南日报》的报头变成了《新华社电讯》，也只刊登新华社的电讯，时间持续了好几个月。

“4·7”再封《湖南日报》后，省经委副主任梁春阳于煤炭厅办公楼内，约见“红中会”负责人申学崧、李昆明、汤建平，明确建议：要搞大动作，造成大影响。

《湖南日报》被封是形势的转折点：说明湖南省军区逐渐失去对长沙局势的掌控，“高司”的威望开始从顶峰向谷底加速坠落。

4月上旬，“高校风雷”，即“高等院校风雷挺进纵队”成立。该组织人员不多，全是大学生，但能量、影响很大，它一成立，就公开声明以为“湘江风雷”翻案为已任。

4 月 8 日，北京民族文化宫爆发了一场北京当时规模最大的武斗，双方几千人上场，数百人受伤，被称为“民族宫事件”。

事情还是从“夺权”引起的。1967 年 1 月，北京民族文化宫参加民委统战系统“红色联络站”的“东方红”组织夺了民族文化宫的权，其对立面“二七兵团”对自己被排斥在夺权之外，一直耿耿于怀。

4 月，北京民族学院准备在北京民族文化宫举办一个展览会。当时北京民族学院也分成两派：一派是民院“东方红”，是北京大专院校“东方红”系列的，北京地院“东方红”支持他们。另

一派是民院“抗大公社”，与北大“新北大公社”来往密切，当然“新北大公社”是支持民院“抗大公社”的。

4 月 4 日，民族文化宫“二七兵团”联合“新北大公社红一团”、北京石油学院“大庆公社”、北外“红旗大队”、中国人民大学“红卫兵”、“红卫队”、“红卫军”，即人大“三红”等 19 个单位成立了“批展联委会”，并于 4 月 5 日在民族文化宫召开“批判刘邓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大会”。大会遭到民族宫“东方红”的强烈抵制，大会横幅被剪掉，麦克风被抢走。

4 月 8 日上午，双方和警卫排一起商定，各自派人进入展览会场。“东方红”掌管钥匙。

9 时 30 分左右，“二七兵团”近 80 人来到会场，把门的人是“东方红”，不叫进入。协商不成，“二七兵团”强行进入。到了 11 时 30 分，民族宫“东方红”调来地质学院“东方红”、中央民族学院 “东方红”等 300 人，将“二七兵团”和“新北大公社红一团”、民族学院“抗大公社”等强行驱出民族宫。当天，民族学院“抗大公社”从学院“东方红”手中抢走了展览会的材料，转移到“新北大公社”。民族学院“东方红”向地院“东方红”求助。

接着，双方都向民族宫调人增援。支持民族宫“东方红”的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北京师范大学“井冈山”、北京石油学院“北京公社”、北外“红旗造反团”、教育部“延安公社”、学部“红卫兵联队”、农机“红旗”、人大“新人大公社”等来了约 3000 人。而支持民族宫“二七兵团”的民族学院“抗大公社”、北京石油学院“大庆公社”等也来了 1000 多人。双方混战一场，

数百人受轻伤，十余人受重伤。北京地院“东方红”和北师大“井冈山”这一边人多势众，武斗中占据优势。

当天下午，由“红代会”核心组组长聂元梓和副组长蒯大富签发了“经戚本禹同志同意的两项命令”：

“一、红代会所属单位之间发生矛盾，绝对不准武斗，目前双方离开民族宫、民委，不得接触（包括所有矛盾双方，而本机关除外）。”

“二、双方掌握的材料不准转移，不准销毁，暂时保留在材料持有者手中。有矛盾由红代会主持协商解决。”

尽管这两项命令冠有“经戚本禹同志同意”的字样，但还是没有什么权威性，况且聂元梓领导的“新北大公社”也是武斗事件的参与者。北京地院“东方红”当即发表《严正声明》：

“一、红代会委员聂元梓、蒯大富发表的两项命令根本没有经过全体常委的讨论，更没有经过全体委员的讨论，丝毫没有是非观点，没有两条路线斗争观念。此命令是完全错误的，也是完全非法的。二、我公社革命委员会研究决定，完全不承认此命令，也根本不执行这项命令。三、此命令所引起的一切严重后果，由聂元梓、蒯大富两人负责。”

晚 17 时，北京地院“东方红”封锁民委大院的大门。晚 22 时 30 分，在广播车指挥下开始对民委大楼发起全面冲击。至 4 月 8 日深夜，武斗尚未平息，事态继续扩大，民族宫警卫排的解放军战士向武斗双方宣读军委《八条命令》中关于“要文斗不要武斗”的条款，学生们则回以“解放军应该支持左派！”的口号

4 月 9 日凌晨 2 时 30 分，中央文革小组派戚本禹的秘书为

代表，和吴德、聂元梓到民族宫召集双方开会，传达中央文革小组的指示，要求双方“马上撤出民族宫、民委”。

4 月 9 日上午，双方陆续撤离民族宫，武斗这才平息。

事情发生后，北京地质学院革命委员会主任王大宾和教师唐咸正、张海涛，特地来到位于北京大学南校门外的聂元梓家里表示道歉。

## 第 576 回：形势变武汉“打倒武老谭”□树旗，绝□为“工总”翻案

武汉的形势也开始发生变化。

4月初，“首都南下造反大队”北京大学的学生李金春在武汉三镇巡回作反击“二月逆流”的动员报告。他在长办大礼堂的报告中特别指出，“二月逆流”在武汉的表现就是把革命群众组织打成反革命，并在会上高呼：“揪出‘武老谭’，为‘工总’广大战斗队员平反”的口号。他说：“我就是北京大学的李金春，‘武老谭’有种来抓我啊！”

“为‘工总’广大战斗队员平反”，潜台词是不为“工总”的坏头头翻案。这个观点为某些“毒草派”组织的主要头头所接受，却引起“二司”和“九一三”的强烈不满，提出要“坚决彻底为‘工总’翻案”。“新派”组织也迅速调整策略，公开提出“打倒武老谭，为工总翻案”的口号。

为“工总”翻案在“工造总司”内部引起分歧，“工造总司”勤务组成员、武汉市邮局工人胡重远不同意揪“武老谭”的口号，他把与他观点相同的原“职工联合会”参加到工造总司中的好几万人一下子拉了出去，成立了“新工造总司”，总部就设在汉口的景明大楼。

4 月 3 日，“三新”、“三司”的负责人和武汉军区支左指挥部的负责人在湖北大学 25 号楼开会，协调 4 月 4 日共同召开批判刘、邓大会，并举行全市大游行的问题。

会议开始进行得还顺利，很快就通过了“大会议程”、“开幕

词”及各组织分工。武汉军区负责用汽车将“三新”的同学接到洪山宾馆会场，“新华工”负责大会广播器材及音响效果，“新湖大”负责把守会场大门，维持秩序。

但接下来在讨论主席团成员、参加大会的组织、大会口号等问题时，“三新”和武汉军区出现了很大的分歧。武汉军区不同意“二司”进入主席团，而“三新”则认为“二司”是武汉主要的造反派组织之一，必须有代表进入主席团，而对“中学红卫兵”和“大专院校红卫兵”，即武汉“一司”、“三字兵”这些原保守派的组织，“三新”甚至不同意他们参加大会，或者，即使他们参加大会，也不能带着袖章，以群众组织的形式进场，也就是说，这些组织的成员只能以群众的名义入场。武汉军区则坚持“中学红卫兵”、“大专院校红卫兵”与“二司”同等待遇，要进场都进场，要不准进场都不准进场。

武汉军区军区支左指挥部办公室主任信俊杰部长说：“‘二司’的性质正在转化，‘二司’的问题还没有定案。他们的错误与‘大专院校红卫兵’、‘中学红卫兵’不同，‘二司’的错误更大。如果让‘二司’参加，那就必须也让‘大专院校红卫兵’和‘中学红卫兵’参加。”

在大会口号问题上，武汉军区不同意喊“打倒反攻倒算的急先锋谭震林”，而“三新”则认为武汉存在谭氏人物，大会应该喊这个口号。

武汉军区副司令员韩东山是中途进入会场的。他一进会场就大发雷霆，说：“为什么要‘二司’参加？为什么不让‘中学红卫兵’参加？喊口号就是要按中央文革的规定办。你们‘新华工’、

‘新湖大’为什么要把解放军撵出来？”

他接着说：“把中学十二、三岁的孩子当成保守派，他们保省委哪一小撮？他们现在保了谁？现在人家矛头是指向谁？现在人家的大方向对不对？就是应该让‘中学红卫兵’参加大会嘛，为什么要把多少万战士撇在一边？”

信俊杰部长也接着说：“‘二司’现还疯狂得很，他们和走资派一起搞反革命复辟。为什么‘大专院校红卫兵’就不能参加？让参加了就是和稀泥？都是左派，清一色还有什么左派不左派？‘大专院校红卫兵’是不是保守组织还需讨论，你们有什么理由不承认？武测‘一月风暴’这样的组织就是只允许自己革命，不允许别人革命。”

参加讨论的“三司”支持武汉军区，也与“三新”发生了激烈的争论。会议一直开到晚 23 时 30 分，最后同意“打倒谭震林”的口号在大会上不喊，由武汉军区支左干部在大会上说明情况。游行时喊不喊由各组织自行决定。其次，“大专院校红卫兵”、“中学红卫兵”不打旗号、不戴袖章可以进场，否则不准进场；“二司”不以司令部的名义参加，可打各总部的旗帜进场。另外，“二司”代表不参加大会主席团，联合发言以大会主席团的名义讲。双方各自做了让步。

4 月 4 日下午 13 时 40 分，大会开始。在大会主席发言时，武汉市“中学红卫兵”突然冲入会场，其中一些人还上了主席台，会场一时显得十分混乱。这时，解放军代表上了主席台，要求非主席团的人下去。

为什么“中学红卫兵”要冲进会场？原来他们是打着“中学

红卫兵”的旗子进场的，违反了 4 月 3 日“三新”与武汉军区达成的“‘专院校红卫兵’、‘中学红卫兵’不打旗号、不戴袖章可以进场”的协议，遭到负责维护秩序的“新湖大”阻止，并抢走了三面“中学红卫兵”的旗子。

解放军来了，把“新湖大”抢的一面旗子还给了“中学红卫兵”，其中一位解放军干部大声说：“红卫兵（中学红卫兵）你们进去！”“红卫兵你们进去！”于是，“中学红卫兵”大量涌入。而解放军则将现场维护秩序的几位“新湖大”学生带走。此时，会场外还有一万多人没有进来。“新湖大”为此宣布退出会场。接着，“新华工”、“新华农”、“红工”等组织也陆续退出了会场。

武汉军区军区支左指挥部办公室主任信俊杰见状，对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说：“看来我们是要重新组织阶级队伍了。”

“三司”负责人吴穷发言说：“为了维护解放军的声誉，会议不要给坏人破坏了。”

会议在“三司”和武汉军区的主持下继续进行，改由解放军负责守门，只准出不准进。

会后，部队、“三司”、“中学红卫兵”分别举行了游行。从这一天起，武汉“三司”与武汉“三新”正式决裂。

而武汉“三新”退出武昌体育场会场后，又到湖北大学重新集会，并在会上喊出了两个口号：“揪出武汉的谭震林！”“还我《湖北日报》！”会后，他们也进行了游行，游行队伍长达几公里。

4月6日，根据中央军委颁发的《十条命令》，武汉军区连忙放人，除朱鸿霞、胡厚民等少数人仍在押外，大部分被捕的造反派群众均获得释放。

4月6日当天，华中工学院船舶系65级学生鲁礼安组织一群造反派中学生，以“新华工敢死队”名义，贴出一篇《敢死队向武汉部队支左办公室一小撮混蛋挑战》的大字报，历数武汉军区“支保不支左”，“镇压革命造反派”的大量“事实”之后，指责武汉军区：“又想做婊子，又想立牌坊”、“打支左之名、行支保之实”、“为武汉谭震林张目”，语言尖锐，情绪激昂：“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今日雄文四卷在手，何日缚住武汉谭震林游街示众？！”将揪出“谭氏人物”的口号，首次公开到社会上，锋芒直指武汉军区。

在此之前，“新华工敢死队”也曾在支援黄石市造反派逼迫武汉军区韩东山副司令员检讨的行动中出现过，加上 4 月 6 日这天的大字报，极大的激怒了武汉军区。武汉军区当天就签发了对鲁礼安的《逮捕令》，但是没有动手。据说，是因为当天下发的《十条命令》的关系。

4 月 7 日，武汉华中工学院、湖北大学、武汉大学、武汉水利电力学院等院校开始出现“提着脑袋质问陈再道”、“武汉支左大方向全错了”、“炮轰陈再道”等大标语和大字报。接着，“二司”、“三新”等组织在武汉街头刷出大标语：

“工人总部是革命组织!”

“坚决彻底为工人总部翻案!”

并不是所有的群众组织都反对武汉军区，“红武兵”、“三字兵”、“三司”等组织则刷出：

“支左大方向全然没有错!”

“解散工总，镇压反革命!”

“谁为工总翻案，决没有好下场!” 等大标语。

围绕武汉军区支左方向的正确与否，一反一保，武汉地区再次分成两派，势同水火。4 月 8 日，为了庆祝《十六条》发表八周月，两派分别举行了大游行。

“二司”、“三新”的队伍呼的口号是：

“坚决执行《十六条》!”

“打倒谭震林!揪出武汉的谭震林!”

“凡是镇压群众运动的都没有好下场!”

而拥护武汉军区的“红武兵”、“三字兵”、“三司”队伍则呼喊：

“坚决拥护武汉部队公告!”

“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4月8日，武汉“二司”整风办公室正式宣布：根据调查的结果，确认“二司”的头头一个也没有修，决定全部复位。

“工人总部武汉锅炉厂分部”的300多名工人在如火如荼的学生运动鼓舞下，也在4月8日这天举行了游行。他们高举着用40多个“工总”的袖章拼成的大旗，经由武测、武大、水院、省委、新湖大等地，长驱30余里，在武昌引起极大的震动。

当晚，武汉柴油机厂数十名“工总”队员也重新戴上“工总”的袖章，举着火把参加汉口游行。

4 月 9 日，“工人总部武汉锅炉厂分部”500 多人召开重新树旗大会。这天，武汉部队撤出派往武大、华工、湖大等院校的军训团。

4 月 11 日，“二司专揪武老谭战斗队”成立。

当天，“工总”武重兵团也重新树旗，他们自己给“工总”翻案。虽然许多单位“工总”的头头被抓起来了，但是那些战斗队员还在，俗话说：人还在心不死，绝大多数人对军区不管三七二十一，强行解散“工总”是不服气的。于是，“二司”就让中学红卫兵在外面绣了几十面“钢工总”的旗帜，逐一送到各工厂的原“工总”工人的手里，每次去几百人主持会议，跟那里的原“工总”队员一起把旗帜一插，这些“工总”的队员们就又开始进行活动了。这成为当时“二司”的一项主要工作，他们称之为“为‘工总’重新树旗”。“二司”的学生非常活跃，“工总”重新树旗之后造反派的力量增长很快。当然，在重新树旗的过程中也经常与对立面组织发生摩擦，乃至武斗。

4 月 8 日，“新华工”“红司”司令部开会就决定炮轰武汉军区支左指挥部指挥长孔庆德，批判军区支左所犯方向路线错误。4 月 11 日这天，“新华工”的“九一五大队”有 15 名同学成立了一个“我们要见孔庆德战斗队”，到洪山宾馆要求见孔庆德。到了晚上，洪山宾馆已有几千人云集这里，强烈要求孔庆德出来回答问题。

为此，12 日凌晨 1 时左右，在北京参加军委扩大会的陈再道、钟汉华特地给“新华工”等组织打电话，陈再道说：

“要求你们少数人坐下来谈，我们有错误就改嘛！那么多人影响不好，无论怎么样，咱们都是一家人，我们有缺点，有错误就改嘛。你们要考虑影响，我们和你们站在一起是不动摇的，要求你们团结那些受蒙蔽的同志，希望你们正确的争取他们，团结他们，我们依靠你们‘新华工’、‘新湖大’、‘二司’战士，是不

会动摇的。我们一定会在今后跟你们站在一起，这个政治影响是会挽回的，解放军要和你们站在一起，你们要相信我们，解放军要和你们站在一起，我们的同志可能犯了一些错误，但不能因为少数人的错误而影响我们的关系，这样搞很不好，我们应该团结得更紧一些，你们是左派应紧紧地和我们团结在一起，重在表现嘛，你们要看我们的行动。

你们应该和我们商量，我们要站在毛主席的路线上来，有错误就改正，就转变，你们以后看我们的行动，要叫我们改嘛，要照顾影响。

这个问题（矛头指向解放军的问题）我们负责，不怪你们，要想办法弥补这个损失，你们要原谅两天。”

钟汉华说：“刚才陈司令员说你们是左派，我们坚决和你们站在一起，我们有缺点、错误就改正，《湖北日报》搞个报刊监督小组。‘新华工’、‘新湖大’、‘三司’、‘二司’各一人，你们协商一下，监督报纸办好一些。

希望你们能写一些比较好的文章，批判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写的文章在报纸上登，在政治上树立你们的威信，结合批判刘邓，要批判王任重，搞一个筹备小组，对刘少奇的问题要批深批透，要使广大革命群众知道刘的罪恶。

我们的错误在内部可以解决，我们的错误多，跟不上形势，我们很多没有经验，群众观点、群众路线不够，可能犯了错误，你们要原谅，我们可以作检查，我们回去后，再征求你们的意见，再跟信部长谈谈，有错误就改正，我们自己检查，工作上的缺点，你们帮助我们改正。”

陈再道的秘书："我们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在内部可以解决，明天有支左的首长听取你们的意见，我们支持你们左派是坚定不移的。你们要看行动是否改正，请你们看行动，报纸问题，你们几个左派组织要商量研究，成立一个监督小组，这是江青同志的指示，你们要批判刘少奇，登在《湖北日报》上，从政治上树立你们的威信，要抽出一些人来写批判刘少奇、王任重的文章，要高举批判的旗帜，和批判本地区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结合起来，我们那里王任重是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陈再道："我们的态度已经很明确了，你们要注意影响，不要叫人家认为和左派闹冲突，希望你们相信我们。我们是一家人的问题，我们的态度和立场是明确的，你们派代表明天来，有什么意见再提。"

陈再道的秘书说："明天派代表当面与孔副司令谈，他保证解决。"

果然，凌晨 1 时 40 分，孔庆德出来了，他回答了学生提出的有关问题。但是学生认为他的态度显然是不诚恳的，多数同学不满意，甚至感到非常气愤。于是同学们要求在洪山宾馆前召开炮轰孔庆德大会。由于事前没有准备，现场秩序很乱，大家七嘴八舌地提建议，根本没有办法使现场安静下来。而且，每提出一个方案，都会有人出来反对意见，根本无法统一。后来"新华工"王富山表了一个态：不同意开炮轰会。最后大会没有开成，大家不欢而散。

4 月 10 日，武汉市一中造反派成立的全校大联合组织"新一中革命造反司令部"，简称"革司"，向武汉市"抓革命促生产

办公室”提出：勒令支左小组撤离该校，交出整学生的黑材料等四项要求，遭到拒绝。

次日，11 日晚，数十名市一中“革司”学生来到武汉市“抓革命促生产办公室”驻地----武汉市委办公大楼前静坐示威，再次向武汉市“抓革命促生产办公室”提出撤走一中工作组、交出黑材料等四项要求，市“抓办”出来好言相劝，但对“四点要求”不作正面回答。这样一直僵持到第二天晚上 20 时，190 多名市一中学生宣布绝食，表示不达目的，绝不收兵。绝食行动得到了市里很多造反派组织的支持，当时就有 1000 多人前往参加。

4月13日凌晨，二中部分“三字兵”趁一中“革司”在市委绝食之机，闯进一中，破坏烧毁“解放区”的横联，并留下落款为“特别行动委员会”的大字报。

这天，“新华工”、“新湖大”等组织的代表在湖北大学开会，决定由“新华工”、“新湖大”等派代表到武汉军区，要求军区解决武汉一中的问题。如果军区到当晚24时仍拒绝，则在全市进行大游行，要求各造反组织做好行动准备。

当天，“新华工”20多名学生为了支持第二机床厂“八一七”和市一中“革司”的绝食斗争，再次去洪山宾馆要求支左指挥部孔庆德接见。“二司”和其他组织也在下午和晚上动员了上万人前往洪山宾馆支援“新华工”的这一行动。晚上，北京清华大学“井冈山”打来了声援电。

14日凌晨，孔庆德出来接见，在谈话中承认支左犯了错误，承认“二司”是造反派组织。

北京清华“井冈山”、北航“红旗”、北京地院“东方红”、

科技大“东方红”、北农机“东方红”、北林院“东方红”、上海“炮司”、哈军工“红色造反团”、西军电“临委”等赴汉代表团在这天联合到武汉“支左办”游行，递交《关于强烈要求释放朱洪霞、胡厚民等同志的联合声明》。

4月14日，武汉锅炉厂“工总”头头刘兴隆，长江航运管理局“工总”头头吴正斌，在湖北大学成立了“工总”联络站，为被武汉军区取缔的“工人总部”翻案。

这天，武汉 22 个组织，包括“二司”和“新”派组织，发表声援书，坚决支持市一中绝食学生的革命行动。

4 月 15 日凌晨两、三点钟，在一中学生绝食 54 个小时后，军区副司令孔庆德来到一中学生绝食现场，代表军区答应学生的四点要求，希望学生停止绝食。这时，有学生在现场呼喊“打倒陈再道”、“打倒孔庆德”的口号，孔庆德一气之下，当天下午就否认了已同意的四条协议。

当天，武汉“工人总部联络站”正式宣告成立，并发表了《严正声明》，指出：“当前武汉地区出现了一股自上而下的资本主义复辟的反革命逆流，必须坚决回击，彻底粉碎。”并要求必须立即释放无辜被捕的人，彻底平反。《声明》还呼吁广大战斗队员积极行动起来，组织起来，彻底粉碎资本主义复辟的反革命逆流。

这天，“新华工”敢死队冲进了《湖北日报》的红旗大楼，并决定第二天在这里召开“纪念封闭湖北日报五周月大会”。“新湖大”、一中“革司”、东方红中学“东方红兵团”及其他中学的“二司”学生也重新回到了红旗大楼。

第二天，4月16日，“二司”、“新华工”、“新湖大”等

组织在洪山礼堂召开批判孔庆德大会。孔庆德中途退场，拒绝接受批判。

## 第 577 回：发通令，中南海再批少奇 通知到，清华园批斗光美

中南海的群众组织“卫东战斗队”，于 4 月 6 日给刘少奇发了个“紧急通令”，要他回答戚本禹评《清宫秘史》文章中所提出的八个问题。

当晚，中南海的群众组织再一次闯进刘少奇的办公室，和那些与刘少奇朝夕相处，跟随多年的秘书、警卫、服务人员一起，喊着口号，大声勒令刘少奇从即日起，自己做饭、打扫卫生、洗衣服、改变作息时间，并呵斥刘少奇回答戚本禹文章中的“八个为什么”，要求刘少奇写出书面检查。

4 月 8 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高举无产阶级的革命的批判旗帜》，进一步在全国掀起对刘少奇大批判的高潮。

当天，《光明日报》也发表编辑部文章：《批倒中国的赫鲁晓夫》。

这天，中央军委召开批判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的专题会议，陈伯达、康生在会上传达了毛泽东对该书的批判：“这本书是唯心论，是反马列主义的。”“不讲现实的阶级斗争，不讲政权的斗争，只讲个人的修养，蒋介石也可以接受。”

4 月 8 日，外交部副部长罗贵波、常务副部长姬鹏飞、副部长乔冠华、韩念龙、徐以新、部长助理兼研究室主任宦乡、部长助理龚澎、部长助理兼办公厅主任董越千等 8 名部党委委员联名贴出一张大字报，表示“高举无产阶级革命批判的旗帜，彻底肃清刘邓反动路线在我部的流毒和影响”，“欢迎揭露和批判部党

委的缺点和错误，坚决支持和参加对陈毅同志错误的揭露和批判”。

这天，中央通知王光美，中央常委同意她去清华大学作检查。刘少奇和王光美预感到这是一个严重信号。当晚，刘少奇突发神经性昏厥，面色青灰，嘴唇发黑。孩子们急忙去叫大夫，经过中南海门诊部紧急处理，几个小时后，刘少奇才恢复过来。他躺在床上，双目紧闭，白发如雪，清瘦的面庞布满憔悴。

4 月 9 日中午吃饭的时候，刘平平、刘源、刘亭亭回来说：“外面到处传言清华大学组织了 30 万人大会，明天要批斗妈妈。”

刘少奇听了十分生气，大声说：“错误我自己担，为什么不让我去检讨？工作组是中央派的，你妈没有责任，为什么让她代我受过？”

王光美忙说：“清华大学的运动是我直接参加的，应该我去向群众作检查。”

刘少奇说：“你是执行者，决策的不是你嘛！”

他接着说：“我绝对没有反过党，没有反过毛主席。别人反对过毛主席，我一直是拥护主席的。在我主持中央工作的几十年里，违反毛泽东思想的错误有，但没反过。工作错误有，但都是严格遵守党的原则的。我没有搞过阴谋诡计。工作是大家一起做的，要我承担责任，可以!但错误得自己去改!”

说到这里，刘少奇把手中汤勺猛地往桌上一摔，手在微微颤抖的说：“别人就是一贯正确的吗?”

他继续说：“有人在逼我当反革命。我过去不是反革命，现

在不当反革命，永远不当反革命。去年 8 月，我就不再过问中央工作，从那以后，错误仍在继续。将来，群众斗群众的情况还会更厉害，不改，后果更严重。责任不能再推到我身上。”

刘少奇预感到情况严重，他郑重地对王光美和 3 个孩子说：“将来，我死了以后，你们要把我的骨灰撒在大海里，像恩格斯一样。大海连着五大洋，我要看着全世界实现共产主义。你们要记住，这就是我给你们的遗嘱。”

尽管刘少奇以前曾多次对他们说过“死后把骨灰撒在大海里”，但这时听到这个话，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王光美还是忍不住哭了。她说：“还不知道孩子们能不能看到你的骨灰呢？”

刘少奇望着几个孩子说：“会把骨灰给你们的。你们是我的儿子、女儿嘛。这一点无论什么人还是能够做到的。你们放心，我不会自杀的，除非把我枪毙或斗死。你们，也一定要活下去，一定要在群众中活下去，要在各种锻炼中成长。你们要记住：爸爸是个无产者，你们也一定要做个无产者。爸爸是人民的儿子，你们也一定要做人民的好儿女，永远跟着党，永远为人民。”

他站了起来，说：

“共产主义事业万岁！”

“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万岁！”

“共产党万岁！”

然后，在孩子们的注视下，离开饭厅，走向自己的办公室。

4 月 10 日，经中央文革批准，清华大学红卫兵召开了有 30 万人参加的批斗王光美大会，并有彭真、薄一波、陆定一、蒋南翔等人参加陪斗。

由于1963年王光美随刘少奇访问印度尼西亚时穿旗袍、带项链，这在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中还是首次，所以江青在一次接见清华“井冈山”代表后闲扯时曾说了一句：“王光美当时去印度尼西亚穿的衣服都哪去啦，丢尽了中国人民的脸。”蒯大富觉得这次批斗王光美，应该让她再穿上旗袍，戴上项链。

有人提出：“王光美访问印尼时戴的项链太小了，站在台上，台下根本看不见。”

有人提议：“那就用兵乓球做一串项链，那个大。”

此事传到了中央文革哪里。一天深夜，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刚刚开完，江青把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关锋叫到钓鱼台11楼她的住处。当王力和关锋回到16楼中央文革办事组住地后，把文革小组的工作人员王广宇叫到小会议室。关锋对他说：

“听说，最近几天，清华要召开批斗王光美的大会，清华的造反派学生要在批斗会上给王光美戴什么木制的一串项链，这样不太好，要讲政策嘛！你现在马上去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总部传达我们的意见：王光美前几年出国访问时，不是穿着漂亮服装吗？为什么不可以叫她穿上出国时穿的旗袍，戴上草帽和珍珠项链参加批斗会呢？这正好还她以本来面目！你去传达这个意见，尽量说服他们不要给她戴木头制的项链，叫王光美穿上出国时的那套行头参加批斗会。”

关锋又强调说：“跟他们传达这个意见时，不要说这是谁的意见，我们只是给他们提出建议，叫他们以自己的名义提出来。”

他想了想又说：“这件事不能叫蒯大富来办，他不大听招呼，办事也不牢靠。”

关锋征询王力的意见说："清华'井冈山'勤务组的小潘很注意掌握政策。办事又认真负责，通过她向'井冈山'总部提出来比较好。"

王力点点头。

关锋转过头对王广宇说："你马上就去清华找小潘，这件事要注意保密。"

小潘是清华"井冈山"总部办公室负责人潘剑宏，如王熙凤一般，长得好看，还将这新"大观园"管得上上下下都很服帖。

此时已是凌晨两点左右了，王广宇立即要车直奔清华园。

深夜的清华园一片寂静，空无一人，学生都在宿舍熟睡，去哪儿找小潘？王广宇又不知道宿舍在何处？为难时正好发现了一间亮着灯的屋子，他在这里找到几个学生，让他们把他带到"井冈山"总部办公室，又由办公室值班的同学到女生宿舍找来了小潘。

王广宇告诉小潘，有紧急事对她讲。小潘把他带到另一个小办公室。王广宇原原本本地向她传达了关锋的话，但没有说关锋的名字，屋里也没有别人在场。

小潘认识王广宇，知道他是中央文革小组的工作人员。她一再向王广宇解释："我们总部并没有主张给王光美戴木制项链，我们是把乒乓球串起来做成的'项链'，这并不重，不会伤着她。"

王广宇则再三叮嘱她向总部勤务组提出让王光美穿出国服装问题，千万不要说这是中央文革的意见，就以她个人的名义提出。小潘表示一定照办，并答应保密。

第二天上午，小潘给王广宇打来电话，说"井冈山兵团"总

部同意了她的提议，但王光美的衣服在她家里，怎么才能取出来呢？

王广宇去问关锋，关锋踱着步，低着头，边想边说："王光美家里的东西需要周总理批准才能取……"他抬起头对王广宇说："让小潘直接去请示周总理。"

当天晚上，周恩来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要在在人民大会堂安徽厅接见外省代表。会前，周恩来和部分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一般会在安徽厅旁边的休息室等候开会。王广宇与清华大学的小潘约好时间，叫她当晚到人民大会堂找周恩来总理。

小潘按时来到人民大会堂，王广宇叫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会务组的周占凯把小潘带到休息室。

小潘到休息室找到周恩来，提出群众有要求，要在清华大学开的批斗会上给王光美穿出国的服装和配饰，"还她本来面目"等等。

周恩来开始时不赞成这么做，认为用这种方式让她参加批斗会不好。小潘一再申明这是群众的要求，坚持要给王光美穿出国的衣服。在场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纷纷表示支持这个要求，周恩来无奈，只好说："你们一定要坚持给她穿，能给她穿上就穿吧！"

4月9日夜，清华大学就派人守住各校门，阻止人们拥进清华挤会场。4月10日清晨，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的"捉鬼队"开着一辆大轿车到中南海揪王光美。

此时的王光美，已经作好了被关起来的准备，她把毛巾、牙刷等生活用品都带上了。

"捉鬼队"到了刘少奇家就问王光美："你上印度尼西亚穿的

衣服哪去了？”

王光美说：“我也不知道哪里去了。”

说着，就把一把钥匙扔了过来。同学们很快就找到那个箱子，把那身衣服找出来了。

在押解王光美回清华的车上，坐在第一排的是潘剑宏，第二排右边是王光美。

大约早晨6时30分左右，学生们把她带到清华大学主楼七层的一间会议室里。那里早已坐满了人。王光美一进去，数十名红卫兵高声朗读《毛主席语录》，并伴以一阵阵高声质问：

“刘少奇为什么说《清宫秘史》是爱国主义的？”

王光美说：“我从来没有听少奇同志讲过这个片子是爱国主义的。少奇同志肯定没有讲过。我相信毛主席，毛主席总会调查清楚的。”

当学生强迫王光美穿上夏天穿的旗袍，王光美不干。

学生说：“这衣服你一定要穿上！”

王光美坚决不从：“就不穿！”

学生们告诉她：“在这件事上你没有选择！穿也得穿，不穿也得穿。”

王光美坚持：“反正我不穿。”

学生警告她：“告诉你，今天是斗你。不老实，小心点。”

王光美指着自己身上的衣服说：“这件衣服足可以见外宾。”

学生说：“还接见外宾？你今天在接受审判！”

王光美：“那件衣服我不穿。不合时宜。”

学生问：“那你为什么在印度尼西亚穿？”

王光美：“当时是夏天……”

是啊，此时正是北京的 4 月初春，怎么能穿夏天的衣服呢？

学生不管那一套，继续逼问：“你为什么在拉合尔穿？”

王光美依然态度坚决：“不管怎么说，我不穿。”

学生威胁道：“我再说一遍，你在接受审判。你要不老实，小心点儿！”

王光美："我们好好谈谈好不好？"

学生："谁跟你谈？告诉你，今天是斗争你。"

王光美："反正你们不能侵犯我的人身自由。"

学生们哄堂大笑："你是三反分子老婆、反动的资产阶级分子、阶级异己分子，别说大民主，小民主也不给，一点也不给，半点也不给。今天，是对你专政，没有你的自由。"

王光美软下来了，她强调说："这是绸子的，太冷了。"

学生们用直接用毛泽东的诗句干脆的回答道："冻死苍蝇未足奇。"

王光美也想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毛主席教导我们，要注意气候变化，随时更换衣服。"

学生们再次大笑："毛主席说的是政治气候。要是那样，你早冻死了，别看你穿着皮大衣。"

王光美借机表明态度："如果我反对老主席，我情愿冻死。"

学生们丝毫也不退让："你就是反对毛主席！"

王光美也不含糊："我现在没有反对他，将来也不会反对他……"

学生们不想与她纠缠："不行！都穿上。"

王光美："你们没有这种权利。"

学生："我们就有这个权利！今天是斗争你，我们要怎么斗就怎么斗，没有你的自由。你那套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臭理论收起来吧。我们是革命群众，你是反革命臭婆娘，你混淆不了阶级阵线。"

一个人在集体面前是如此的弱小。清华大学的捉鬼队员上来

强行给王光美穿旗袍。可那旗袍是夏天穿的，确实太瘦了，一个女红卫兵在旗袍上撕开一个口子给王光美套上。王光美一边反抗一边大声抗议："你们武斗。你们违反毛主席指示。"

学生们高喊："革命不是请客吃饭……"

王光美："谁反对毛主席指示就……"

被学生们用《毛主席语录》打断："顽固分子，实际上是顽而不固……"

王光美："你们用强制手段。"

学生："胡扯！是你侮辱我们。你穿上这套衣服去印尼与苏加诺吊膀子，丢尽了中国人民的脸，你侮辱了全中国人民。你还想倒打一耙？对你这个反动的资产阶级分子、清华园的头号大扒手，对你就是要强制。"

王光美："希望你们好好调查一下。"

## 第 578 回：低头□，王光美坚持己见 反复辩，小将逞口舌之争

同学们又和王光美进行了一番辩论，王光美说："事实总是事实，应该根据事实得出结论，这才是毛泽东思想。"

学生："不对。立场是主要的。你们站在反动的立场上就是看革命群众的阴暗面，反对文化大革命。我们看的事实，收集到的事实就是和你不同。"

王光美："现在有人推卸责任……如果是真正的革命左派应敢于承认事实。怀疑一切是错误的，是谁提出的？"

学生："你们怀疑一切，打倒一切革命群众干部。"

王光美："反正怀疑一切不是我的思想，更不是刘少奇的思想，我们是反对怀疑一切的。"

学生气急了，大骂王光美："大扒手、反动资产阶级分子，给中国人民丢脸！"他们还举了王光美给苏加诺点烟的事实。

王光美据理反驳说："我认为我没丢脸。那天是告别宴会，他坐在我旁边，我是女主人……应尊重印尼习惯。"

学生："你说，你把多少同学打成反革命。我们这里就有不少。"

王光美："我们只批过，没有打成反革命。"

学生："刘少奇做了什么指示？"

王光美："刘少奇对清华的指示很少。"

学生："那你卖菜是谁让干的？捞政治资本。"

王光美："那是毛主席对刘少奇说：'王光美为什么过去四清

时三同，现在不三同啦？’主席说：‘可以参加劳动，这样可以接受批评。’我听了很感动，就去劳动了。”

学生：“你对批判《修养》怎么看？”

王光美：“这本书是唯心的，不谈阶级斗争。我同意报上发表的《红旗》评论员文章的几句话。至于反毛泽东思想，主观上我是不同意，是世界观没有改造好。”

学生：“你对戚本禹同志批《清宫秘史》的文章怎么看？”

王光美：“这部片子是彻头彻尾的卖国主义的，戚本禹同志批得很深很对，这部片子刘少奇没有说是爱国主义的。我和他一起看的，当时只看了一半，以后天亮了看不清了，他什么也没说。这是肯定的，他没说过。我和他一起看的，我知道肯定没说过。”

学生：“照你这么说戚本禹同志在造谣了？”

王光美：“是不是另外有人假借刘少奇的名义说过这些话？”

学生：“你觉得这篇文章说得对不对？这是毛主席看过的！”

王光美：“是吗？毛主席看过的吗？我觉得还是从革命利益出发，从事实出发，如实向毛主席汇报情况。”

学生：“戚本禹同志文章针对的谁你清楚吗？”

王光美：“那他提的的确是刘少奇。”

学生：“你对戚本禹同志提出的问题怎么看？”

王光美：“有的是刘少奇的责任，有的不是刘少奇讲的。”

学生：“那么《红旗》上在造谣？刘少奇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

王光美：“相信毛主席，相信群众，过去就是相信不够才犯了错误。我在刘少奇身边工作了十几年，我觉得有出入，反正有

许多不是刘少奇的事。说他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我直接没感到这一点。”

学生质问：“那叫叛徒集团自首是怎么说的？”

王光美答：“这不是他指示的，是一个负责同志提议他同意过的。”

学生追问：“是谁？”

王光美：“我不说。”

学生：“你包庇！快说。”

王光美沉思一会：“是柯庆施建议的，刘少奇同意了的。”

学生气愤的说：“不许你污蔑柯老!”

王光美：“反正我说话你们不相信，你们可以去调查好了。”

学生：“王光美你说，你对刘少奇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怎么看？”

王光美：“我主观上还认识不到这个水平。反正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前主席许多事情委托刘少奇、书记处处理，发生的事他要负责，但现在他靠边站了，不负责了，不当权了。在反动路线时他是走过一段资本主义道路的。”

学生：“就是反动路线这一点？”

王光美：“当然不止。凡是犯路线错误都走资本主义一段道路。”

学生：“就按你的这种说法，你说说看，刘少奇走过那些资本主义道路？”

王光美：“山西老区互助组的批示，是错的，是他批的。合作社发展太快，他求稳，说要慢一点。1962年他对困难的估计过

分。‘三自一包’、‘四大自由’谬论他是不赞成的，单干也是不赞成的。他那时许多时刻还是坚持社会主义的。”

学生：“刘少奇宣扬‘红色资本家’，说剥削好，也是主观上走社会主义道路吗？”

王光美：“刘少奇是讲了很多错话，你们是指他1950年在天津的讲话，当时我也在，我知道的，有许多话是很错误的。当时天津有一种过‘左’情绪，不少人要消灭剥削阶级，是毛主席派他去纠偏的，他一些话是纠偏讲的。现在大字报上的话与他讲的有出入。”

学生：“这么讲，说‘工人就得剥削’是对吗？”

王光美：“有些是错的。有的这样讲是对的，有的这样讲不好。这不能脱离环境。比如一个资本家与他座谈，说剥削是罪恶，那开一个工厂就大罪，再开一个工厂罪就更大了。刘少奇说只要对国富民强有好处，开厂剥削，这样的剥削是需要的。工人也需要这样的剥削。这是在特定条件下讲的，现在有人砍头去尾地讲这句话。”

学生：“那鼓吹和平民主新阶段，散布对蒋介石的迷信是谁呢？”

王光美：“那不只他一个人。根据报纸上的报导，绝不是一个人的责任，停战协定上写‘和平、民主’很明显嘛。他现在把责任担起来，勇于承担责任。”

众人笑：“这么说他还是英雄了？就是勇于承担责任吗？”

学生继续问：“那你说，还有谁？”

王光美：“不用说了吧？”

学生："不行！迷信蒋介石的人要查出来。"

王光美："我是中央工作人员，要保密。你们可以去查查报纸，有公开文章的！"

学生："那刘少奇贪污金皮带圈、金鞋拔呢？"

王光美："金皮带圈、金鞋拔子是有这么回事。他做白区工作，随时有被逮捕危险，是应该身上带些东西的。"

学生："'红色资本家'是谁提的？"

王光美："不知道！反正不是刘少奇，他只说进步资本家。"

学生问："你是否说过王光英这个大资本家好，还要拉他入党？"

王光美回答道："王光英不是大资本家，最多是中产阶级，民族资本家。他剥削是剥削，可是……你们可以调查一下，他是否可以起进步资本家的作用。他不愿当资本家，说资本家名声太臭，要求入党，党给他任务，让他做资本家的工作。"

学生："你现在对刘少奇怎么看？"

王光美："说他一辈子反革命，不反资本主义，我没有充份材料。"

学生们要给她套上用乒乓球特制成的一串"项链"，并问她："你说！江青同志叫你出国不要戴项链，你为什么非要戴上？"

王光美答："江青同志是要我不要带别针，没说戴项链的事，但问题是一样的。"

学生："那你说《红旗》调查员的文章怎么样？"

王光美刚说到："红旗调查员的文章……"突然嘎然而止，不说了。学生们大声喊叫，逼问，王光美这才大声说道："有很

大的片面性！”

学生说：“好，记下来。”

王光美无所谓的说道：“记就记，我说的，怕什么！‘怀疑一切’肯定不是工作组搞的，更不是刘少奇搞的。清华，我们的问题肯定是右倾主义，是路线错误，我们是右倾不是形‘左’实右。反正这‘怀疑一切’不是工作组搞的，我没有这个思想，刘少奇也没有这个思想。”

学生：“那你说是谁？”

王光美：“反正有人。”

学生：“无耻！蒙骗人家还夸耀。现在谁都看透你这个反动的资产阶级分子的本质了。”

王光美：“我不是反动的资产阶级分子，我是毛主席的共产党员。真理就是真理，可能是有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影响。”

学生：“你敢否定革命小将？”

王光美：“真正的爱护小将，应该是什么就说什么，不能歪曲事实来爱护革命小将……”

众人打断她的话，高喊：“你放毒！”

王光美不屈服：“如果你们摆事实讲道理，就让我把话说完。毛主席说：坏话，好话，反对的话都要听，要让人把话说完，你们要不摆事实不讲道理，那我就不讲了，你们斗吧！”

学生：“我们就是要斗你这个反动的资产阶级分子，清华园的大扒手。”

王光美：“我不是。我是共产党员。”

学生：“你不要给我们的党脸上抹黑了。干的丑事不少啦！

桃园四清你干了些什么？”

王光美：“对四清材料你们了解多少？你们都找什么人了解？你们下去5天，我待上一年了，比你们了解，你们要认真调查。”

学生：“去你的。桃园经验臭透了。一会儿你听听。”

王光美：“桃园经验是好的，不是坏的。但有缺点有错误。”

学生们纷纷耻笑她说：“有功，有功。那么《后十条》看来也是好的，有缺点、有错误吧？”

王光美争辩说：“《后十条》是刘少奇改的，有些清规戒律，但精神是好的，是毛主席叫他改的。”

学生讥笑说：“这么说《后十条》棒极了？”

王光美：“《后十条》有好的部份，但有形而上学，繁琐哲学，一些政策界线强调得过多，成了清规戒律，束缚了群众运动。”

学生给装扮后的王光美照相。

王光美说：“谢谢你们。你们不应该侮辱我。”

学生：“刘少奇是镇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罪魁祸首，你认为怎么样？”

王光美坚持认为：“他是要负主要责任的。六、七月份是他干的，但以后就不能归他。”

学生：“归谁？你说！”

王光美：“他路线错误有影响，不能全归他，他有责任。”

学生：“蒯大富反革命案很久翻不过来，谁负责？”

王光美：“蒯大富反革命不是刘少奇定的，刘少奇没跟我说过蒯大富是反革命。”

学生问："他在《修养》中大骂有人要全党尊重他……是指谁？"

王光美："那是什么时候出版的？他不是骂主席，那是指洛甫。"

学生："那1962年再版时为什么不修改？反而把斯大林都删了？"

王光美："那不知道。他是坚决反修的。他改的地方有档案在，你们有条件就去查。毛主席说要出《刘选》，他不积极，后成立编辑委员会，要他修改出书，他看过一遍，有的是编辑委员会改的，他没注意，你们可以去查嘛。我知道，他是不反斯大林的，《九评》，《两论》，他都参加起草的。"

学生问："戚本禹同志的文章你怎么看？"

王光美："批这电影很对，该批。"

学生："不对，要害是揭开了'老革命'的画皮，暴露了假革命、反革命的本质。"

王光美："'言者无罪，闻者足戒。'"

学生呵斥道："胡说！你顽固到底死路一条。我们就是要把刘少奇拉下马！"

王光美："拉下马我同意，别人领导比他对党更有利。"

学生："王光美，你对戚本禹同志提出的几个问题怎么看？"

学生念戚本禹文章最后几个问题。

王光美答："一、没讲过。我不知道。二、我等待毛主席讲话，等毛主席讲最后一句话。刘少奇并不是梦寐以求资本主义，他想搞社会主义的，说猖狂复辟不是那样，愿意搞社会主义的。

他特别谈了防修、反修、反资本主义复辟的问题，他经常想，但想不出办法，无办法，没有水平，无魄力像毛主席那样搞文化大革命。他是考虑避免修正主义复辟的。我认为他最大的错误是没有提倡全党全民大学毛泽东思想，从他的地位、重要性、毛主席对他的信任来看，应很早就提出的，但他1966年才提出，这是他最大的错误。三、他没有反对毛主席，更没有什么猖狂。他有违反毛泽东思想的地方，有不少是世界观问题。四、他没有大肆宣扬。他是想保存革命有生力量。当时白区损失极大，日本人又要进攻，因为一些人不知名，影响又不大，就让他们自首了。北京61人，天津几十个人。至于自首书的措词，什么“坚决反共”，他不知道的。五、起草的文件，中央是看过的，当然他要检讨，但同一个文件他提出过积极练兵。当时这些是可能造成不好的影响。六、他反对资本主义改造？没有！在天津讲话是错误的，但改造资本家他是积极赞成的。合作社问题他是同意过一些同志的意见，主要是邓子恢干的。七、八大报告有缺点。但是这并不是他一个人的问题。八大决议好像也有错误。……主席没看过？…这是很匆忙的，刘少奇决议好像也看得很匆忙。不过文件出来很久了，毛主席、党中央未表态。八、这不是刘少奇说的。他只是对困难估计过分了。可能是会助长歪风滋长。九、《刘选》编委会叫他审查的，他对此不积极。十、他是过分强调了阶级斗争，过分强调了扎根串连。有些话使人感到农村漆黑一团。十一、对六、七月份之前我同意毛主席大字报的观点。六、七月份后他也要负责。是不是都要他负责，那我就不了解情况了。”

学生们准备将王光美押上台去批斗，临行前问她：“王光美，

你怕不怕？”

王光美此时已经十分坦然，她说：“我怕什么？我不怕。”

于是，学生们将穿着旗袍、带着乒乓球项链的王光美押上会场，人群哗然。从北京各处赶来参加大会的人争相拥看王光美。

1967年4月10日，清华大学红卫兵批斗刘少奇夫人王光美

批斗会场设在清华主楼前的广场，主楼的跑车台作为主席台。体育学院的学生先到，负责维持秩序，将会场围成几个区域。工化系学生和员工坐到最前排围住主席台，阻止人们拥上主席台。

主楼前广场东西约 300 米，此时早已是人山人海。往南延伸，超出了校院直到五道口都挤满了人，据说有 30 万人参加。王光美站在前面接受批斗。主席台东侧的前边，彭真、陆定一、薄一波、蒋南翔 4 人陪斗。批斗会开一段时间，将王光美带入主席台后的主楼内，休息一会儿，换个打扮再站出来。王光美不作反抗，任由批判者怎么讲。

“国际共产主义战士”李敦白代表外国专家造反派也在会上作了慷慨激昂的重点发言。两天前，1967 年 4 月 8 日的《人民日报》用大半个版的篇幅刊登了他的文章《中国文化大革命打开了通向共产主义的航道》。这个黄头发、高鼻子的美国人，以流利的汉语、高涨的革命精神、大义凛然的英雄风度、不同凡响的宣传激情，引起台下热血青年山呼海啸般的回响。他说：“7 年

前，中国的无产阶级把世界革命的大叛徒赫鲁晓夫揭露出来了，给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立了一大功，除了一大害。今天，中国人民，清华井冈山的战友们，揪出了一个王光美，揪出了一个刘少奇，揪出了另外一个世界革命的大叛徒，也是对世界共产主义运动除了一大害，立了一大功。我们感谢你们！”

这天一大早，已是《解放军报》负责人的肖力就出现在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总部，新闻电影制片厂也派人到现场拍摄批斗王光美等人的新闻记录片。

在场的中央文革记者站北京记者组拍了批斗王光美现场的照片，现场发回的稿件也立即上了《快报》。周恩来当天从《快报》上得知，清华大学的学生准备派开完批斗会后，还要用卡车载王光美游街，他立即做出批示，并马上传到清华大学，赶在批斗会结束前，制止了这一行动。

批斗会结束后，当天下午 13 时和 17 时 40 分，学生们在主楼 803 房间又先后两次审问了王光美，她仍然坚持原来的看法不变。

周恩来派了一位秘书与王光美一同去的清华大学，晚 19 时陪王光美一起回到中南海。造反派扣下了他们从王光美家里抄去的衣物。

回家后，王光美对刘少奇讲了批斗会的情况。刘少奇心里很不好受，晚饭一口也没吃。

## 第 579 回：聂元梓，向江□等人汇报 周恩来，再接见天津代表

北京高教部夺权事件发生后，北京大学驻高教部小分队的李士坤、赵建文就对事件进行了调查，写了调查报告。3 月中下旬，北大人事处的李玉英去《解放军报》找李讷，说聂元梓想见见她。约好时间后，在一天下午，李玉英、聂元梓、孙蓬一来到《解放军报》，见到李讷，着重向她谈了高教部事件中的有关王力、关锋、林杰的情况，并交给了她有关高教部事件的调查报告，和王力、关锋两次给孙蓬一打电话的追记稿。李讷当时对他们表示同情，并答应将材料代转到上边去。

4 月 8 日北京民族宫武斗事件后，北大孙蓬一主张公开反击，北大校文革的李清崑等人建议为稳妥起见，还是去找江青当面汇报一下，以取得支持。聂元梓同意，9 日写了一封求见信，10 日下午与孙蓬一去了钓鱼台。这天正好是清华大学批斗王光美。

聂元梓他们到了钓鱼台，在 16 号楼一层会议室见到了江青、陈伯达、戚本禹。江青先问了清华斗王光美的情况，然后问聂元梓和孙蓬一："是否找王力、关锋来一起听听"

聂元梓二人齐声表示拒绝。戚本禹说："我早就知道你们是不会同意的。"

聂元梓和孙蓬一坐在长形桌子的一面，对面依次坐着陈伯达、江青、戚本禹。聂元梓和孙蓬一向他们谈了高教部事件，谈了林杰、周景芳、潘梓年、吴传启及高教部的卢正义、徐非光。指出他们许多人都有历史问题。

谈话间，江青没有怎么反驳，而戚本禹则不断地为王力、关锋分辩。当谈到潘梓年、吴传启时，江青说："不是早就打过招呼不和他们联系吗?"

她对戚本禹说："你把吴传启的档案拿来给我看看。"

戚本禹回答："我明天就拿来。"

当说到周景芳时，孙蓬一说："他去市委，是说代表中央文革接管去的，以中央文革代表自居，地院的广播中，更说周景芳是中央文革的新成员。"

江青说："他是什么中央文革代表、成员？！他连中央文革来都没有来过!"

戚本禹插话说："可以说是中央文革委托的。"

陈伯达慢慢的说道："这样恐怕不好吧，不能这样说。"

戚本禹一下子激动起来，把手一拍说："这没有什么！我负责！这是经过了主席的么!"

"嗯……"江青爱抚地拍了一下戚本禹的手臂予以制止，戚本禹这才安静下来。

陈伯达十分难堪，从脖子一下子红到了脸，充满委屈、不解，却很平和地说："我从来还没有看见你发这么大的脾气呢？"

孙蓬一则坚持说："我们认为王力、关锋是在搞新的招降纳叛、结党营私。"

江青继续做着工作："我们没有那样的感觉，只是感到关锋的性子拗一些。"

……

接见快结束时，姚文元进来了,随后周恩来也来了，谈话于

是结束。江青送他们到 16 号楼的门口，对他们说："今天谈的事，出去不要讲，特别不要损害了王、关的威信。"

回校后，聂元梓和孙蓬一向校内一些人转达了这次接见的大致情况。

4月10日，清华大学组织批斗王光美的那天，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再次接见天津驻军及干部群众代表。

李雪峰首先在会上作了检查。周恩来给江枫写纸条，要他揭发万张集团的问题，时任公安部长的谢富治也在北京召见过江枫，动员他揭发万张集团的问题。江枫在会上做了揭发万张集团的发言。接着，陈伯达在讲话中充分肯定了天津在大联合和"三结合"方面做出的成绩，肯定了66军"在天津做了很好的、大量的工作。他们的工作促进了天津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秩序的建立，促进了各革命派的大联合，促进了城乡社会主义生产的稳定和发展。应该感谢人民解放军。"

他在讲话中说："刘邓路线在天津的忠实执行者，代表人是万、张反党集团。"万是指已故天津第一书记万晓塘，张就是已被拘捕的张淮三。

针对天津出现的"打倒李雪峰"的风潮，陈伯达说："刚才李雪峰同志在会上作了一些自我批评。看来，李雪峰同志在工作中有缺点或者错误。群众的批评有很多合理的东西。我认为李雪峰同志应该欢迎这些有益的意见。同时我们应该指出：天津的主要矛盾是革命群众同万张反党集团的矛盾，斗争的锋芒应该针对万，张反党集团，而不是针对李雪峰同志。"

张春桥在讲话中介绍了上海的经验，讲得很谦虚。

最后，周恩来讲话。他说：“正如伯达同志所估计的，我们的三次会开得很好，两方面的意见都听了。开始五个代表会议的代表来京，我们想应该有不同意见的代表也来。当时来得少一些。你们来了以后，我们通过不同的方式同大家接触。我们注意听取不同的意见。有的是直接接触，有的是派记者和联络员同志和大家接触，知道还有些单位存在着不同的意见。因此又增加了25个单位的18位同志和财贸系统的两位。第三批是今天发现的，人数很多，主要是塘沽的，今天也在会上发了言。给了你们充足的时间，主要内容都讲了。总起来说，有不同意见的代表比五个代表会议推选出来的代表还要多。如果军队和工作的同志不算的话，两方面比较起来，不同意见的代表数量多，发言的人数和时间也占得多。我们充分地听取了你们的意见。以后还要听取你们的意见。今后你们有不同的意见，可以同派到天津去的《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和《解放军报》的记者谈，或者来北京到国务院和中央文革接待站去谈，我们还可以听取你们的意见。但你们能在本地解决的就不要来了。你们也晓得，我们这儿很忙。来了以后，也影响工作，影响学习，影响生产。”

对李雪峰的问题，周恩来说：“李雪峰同志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对北京、对天津都有影响。雪峰同志在北京有文字检讨。刚才同雪峰同志说了，印出来给你们看看。我们认为检讨是诚恳的，是愿意改正错误的。但是，天津发生的问题，远远超过了雪峰同志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影响。

天津市的文化大革命，开始有两个系统领导：省委和市委。后来天津划为直辖市，省委不管了。开始省委管大学，市委管中

学、工矿企业、财贸。有这个复杂情况。从市委讲，今天你们清楚了，知道有个万张反党集团。开始很迷惑了一些人。我们发现是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万晓塘死了以后，几十万人悼念，搞什么名堂？我们很奇怪。当时仅仅是怀疑。天津的工作，伯达同志是长期关心的，蹲过点，农业在小站，工业在钢厂。我只是有时开会，去天津一下，没有直接蹲过点。万晓塘的死，那么多人悼念，我有怀疑。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我问赵武成、李颉伯，越问越觉得离奇。追出了8月底就有个三轮二社事件，坏人煽动红卫兵上了当，一个支部书记被冤枉打死了，也是市委鼓动几十万人去追悼，责怪红卫兵，实际上不是向坏人示威。当时正是中学红卫兵冲击全国的时候，使中学红卫兵在那一次受了很大压制。万晓塘死又是一次。9月18日上午，赵武成检讨有几千人；下午万晓塘检讨只有几百人。万晓塘的检讨根本没有压力，算不上检讨，不像样子，像谈话一样。这样的检讨怎么会逼得万晓塘死呢？这个问题还要再追查。两次受到压制，中学红卫兵受到很大压制，工厂、机关也受压制。这跟上海、北京不同。全国也少有这样的事。对当时天津的红卫兵运动，对天津的文化大革命运动，用群众示威施加压力，直接把刘邓的反动路线扩大，加深了。万晓塘死了，跟着出来个张淮三，不仅继续执行反动路线，而且还继续布置搞阴谋，在工交口安插了他的亲信。刚才江枫同志的揭发就说明了问题。首先揭露万张反党集团的是江枫同志。伯达同志看了他的信，注意了这件事，派解学恭同志去天津，把张淮三调到山西。他心里有鬼，没等找他谈话就自杀，没有死又调回来了。接着又搞公安局的反革命夺权，有些小将受了骗，承认了错误。在天津，

万张集团控制达七、八个月之久，执行和发展了刘邓路线。这是主要的。”

康生插话：“你们天津来的同志对张淮三的走狗和爪牙还注意得很不够。张淮三同前北京市委刘仁有很密切的联系。这是个很坏很坏的反革命分子。他们还埋藏了很多坏东西，塘沽也有，财贸、工交系统也不少。你们应该把矛头摆正！”

周恩来接着说：“后来经过讨论，告诉了解学恭同志。张淮三在公安局‘120’政法公社夺权以前，实际上早有布置，万晓塘老婆也参加了。江枫同志实际上早就没有权了。张淮三的布置是一通到底的。就像北京彭真、刘仁早被揭出来了，但他们的黑手还伸在北京公安局。”

康生说：“你们天津南开大学、天津大学，搞了很多叛徒集团的调查，做了很好的工作。我建议，你们对万、张、刘仁，也组织个调查团，很好地调查一下。”

周恩来：“天津市公安局内部夺权，也蒙蔽了一些小将。镇压‘政法公社’，是派郑维三同志亲自去的。‘120’公安局夺权以后，天津很乱，广大人民不满，比北京反映还大。军管以后，才扭转了局势。如果没有解放军，局势扭转不了这么快。”

“省委原来管大学，也插手了。比如天津工学院，两派都到北京来，是10月底中央工作会议闭幕那一天。一派扭着阎达开，一派扭着李颉伯。阎和李的问题，要经过检查才能下结论。从过去的工作和文化大革命中的精神面貌来看，阎达开比李颉伯好一些。当然并不是说阎达开没有错误。他正在检查。一个学校两个造反派，一个方面揪住一个，也有保的，也有反的，天工、南大

就是这样。其他天大、河大等接触过一些，但不多。为什么这样呢？就是因为省委领导瘫痪。有的同学在校内，有的在校外；有的到保定、到省委造反，后来又互相对打。打砸抢彼此都有一点，有多有少。这个情形怎么去领导？摆在中央面前是个问题。一月份请张春桥、姚文元同志去上海。工人运动发展了，学生运动也发展了，领导了上海以工人为首的各派革命组织的夺权斗争，以首创精神号召了全国，是全国工人阶级之冠。还有反对经济主义，反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这两件事有功，归于上海革命群众。是张春桥、姚文元同志领导的，影响了全国。这时，不得不考虑天津、北京怎么夺。在北京，成立了筹备小组，准备建立新的权力机构。开始有各种设想，设想了几个名称，主席确定叫革命委员会好。同样，李雪峰同志在北京多次检查以后，中央和毛主席认为检查是诚恳的，是好的，派他去天津推动这个工作，同解放军和解学恭同志接洽，帮助革命干部站出来，同胡昭衡同志，江枫同志一道推动工作，进行筹备。当时，就设想成立革命委员会。”

“北京自去年6月份就安定了，天津连交通警都没有了。2月正在筹备。原来，设想3月份成立革命委员会，后来，毛主席发现了开代表会议这个创议。北京大专院校红代会的代表不好产生，北大、清华、师大、北航就是合作不到一起。戚本禹同志很清楚。他们都是革命的，是经过斗争，受压迫的，但联合起来就不那么容易，要经过很大的推动。北京的好处是离中央近，可以直接帮助。谢富治同志说：‘你们不合作，我们就不开会。’果然有效。”

“主席说，大学开了，为什么中学、工人、农民不可以开呢？北京这样做了，天津为什么不可以这样做？我就给解学恭同志打了个电话。本来3月份就要夺权，这才推迟了一个月。到北京来汇报了一次，我们是同意了的，天津开了五个代表会，比北京多了一个干代会。但8天开了五个会，时间仓促，筹备得不那么好，有遗漏的，保守的多了一些，主要是协商不够。不能用选举的办法。反修绵纶厂，是想要你们当主席的，结果落选了。这不是雪峰同志的‘阴谋’。那时，他们没有来北京取经，我们也没有来得及通知他们。选掉了绝不是阴谋。你们那里把一切问题都说成是雪峰同志有鬼，他也不好争辩，雪峰同志还要回天津工作，你们可以谈谈心嘛！什么都可以说。但是要摆事实，讲道理，不能吵一顿、吼一顿。选举以前，反修绵纶厂对雪峰同志还是欢迎的。这个东西是不能搞选举的。”

康生同志插话：“不能迷信选举。在一定的情况下，选举不如协商民主。”

周恩来解释说：“为什么不能选举呢？因为革命委员会还是临时权力机构，还没有团结到百分之九十五。要以造反派为核心，进行协商。”

“雪峰同志，是中央和毛主席派去的，我们经常通电话。他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有缺点，你们要多方面同他接触。他有顾虑，常请示出不出面，怕出去揪住不能工作。华北局就有一派，经常来问我李雪峰何时回来，要造他的反。我说毛主席派他到天津工作去了，因此传到天津。犯了错误，要允许人家改嘛”

“反对五个代表会，反对李雪峰，不要说是反革命逆流，叫

反革命逆流不好。反过来，说五个代表会是资本主义复辟的逆流，互相对骂也不好。这样不能达到大联合、大团结。应该上纲的上纲，不应该上纲的不要上纲。要紧紧地掌握住斗争的大方向，把矛头对准刘邓和万张反党集团。对李雪峰同志批评过分了一些，也不要紧。”

“不要随便宣布是反革命组织。互相宣布也无效。军委《十条命令》说过了，反革命组织要经过中央批准。我们要进行严肃的政治斗争。”

“我们欢迎你们开门整风，但也不要过头，形成请罪风。”

“革命组织不要勒令什么解散。如五个代表会议，已经开了，就是结合得不够，除了很保守的，一般的要教育，不要勒令解散，结果无效，反而不好。除非特别事件，如对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勒令做什么事还可以，一般不要轻易用。”

最后，周恩来指挥大家齐唱《大海航行靠舵手》，长时间地热烈鼓掌。

## 第580回：天津市，“大联筹”封和平路 □北大，□止安徽斗严光

中央领导4月10日接见天津代表的会议内容一传回天津，没想到天津就乱套了。围绕着是否“打倒李雪峰”，天津“五代会”和“反复辟”这两派都跑到和平路宣传各自的观点。和平路，那里是当年天津最繁华的商贸街，相当于上海的南京路，北京的王府井大街。两派的宣传车、辩论车全都集中在这里，天上纷飞着各种传单，街头上到处是辩论的声音。天津“反复辟”这时已改称“大联合筹备委员会”，简称“大联筹”。他们在财贸系统势力比较大，于是，很快就控制了和平路，大标语一边倒，全是“打倒李雪峰”，东北角官银号鸵鸟墨水的霓虹灯广告也变成了李雪峰的脑袋，血红的舌头伸出来很长，与黑白无常一样。满街的高音喇叭不停地制造对立情绪，“五代会”的人也就进不去了。只要有小股的“五代会”游行队伍走进和平路，立即就会被手持棍棒的人追着打出和平路。

一天晚上，天津“工代会”常委姜卫东去《天津日报》送稿子，是乘坐天津驻军“支左联络站”的一辆罗马吉普去的，司机是解放军。当时《天津日报》位于鞍山道上，离和平路很近。办完了事，姜卫东就让司机拉着他到和平路转一圈。他以为自己坐的是军车，没人敢把他怎么样。谁知刚到少年宫，吉普车就被“大联筹”的“工矿造总铁血团”给扣下了，一看车里坐的是“工代会”的姜卫东，不由分说，就把他从车里揪出来，一顿乱打。逼他喊“打到李雪峰”，姜卫东就是不喊。于是他们将姜卫东当街

示众，然后扣押到少年宫里。司机因为是解放军，吉普车又是军车，“大联筹”没敢动。因为抓解放军那肯定是反革命无疑，在当时是可以立即逮捕的。所以，司机得以回去报告，说姜卫东被人打了，关押在少年宫。“工代会”赶紧找 66 军副军长、天津“支左联络站”主任刘政。刘政立即通过公安局的专线找到“大联筹”，对他们说：“限你们在 12 点以前必须把人放了，不放我就抓你们，把你们都逮走！”不到 12 点，“工代会”接到电话，说人已经放在花园路那边。“工代会”赶紧出车把姜卫东接回来，安排在宾馆里。姜卫东当时穿了一件短袖衫，身上都是血。刘政亲自到宾馆去慰问一番。姜卫东从此名声大噪。

一些中学生认为天津的“中学红代会”中绝大多数是保守组织。4 月 18 日晚上，这些学生开会，决定在“中学红代会”没有改组之前不承认“红代会”，把全部人员调回，重新组织“中学红代会革命委员会”，简称“红革会”。

4月24日，天津又发生20多个组织3000多人冲击天津驻军“支左联络站”的事件，直至28日方才停止。

4月27日，天津大学、南开大学、体育学院、河北大学等大专院校的学生组织蜂拥到南开大学，在南开大学发生万人卷入的武斗事件。

此时的天津，武斗严重，无政府主义泛滥。

5 月初，天津“工代会”负责人林启予下决心要解决和平路的问题。于是组织“工代会”在海河广场开大会，会后上和平路游行。电业、基建、化工等系统的工人都比较能打，他们人人头戴安全帽，身穿工作服，手持白蜡杆，在前边开路。上万人的游

行队伍，浩浩荡荡，沿和平路向东北角进发。一路上势如破竹，高呼“五代会必胜”的口号。白蜡杆撴在地上，齐唰唰发出洪亮的声响。对方有个高音喇叭突然喊起来，马上就有人冲上去给拔掉了。没有人出来闹事，也没有发生打架斗殴，游行队伍非常顺利地走到了东北角。这是天津“五代会”第一次闯和平路，获得圆满成功。

我们再回到北京。就在清华大学批斗王光美的当天，北京大学“新北大公社”展出了 4 月 8 日民族宫武斗中他们被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撕破的几件衣服，并斥责地院“东方红”的一小撮暴徒等等。结果第二天，4 月 11 日下午，北京地质学院、北京邮电学院、北京工业大学、北京农业大学、北京农业机械化学院、北京民族学院等 6 所大学“东方红”组织的学生，分别开着 6 辆宣传车来到北京大学校园游行，要求“新北大公社”交出民族学院“抗大”组织在“民族宫事件”中从展览会抢走的那部分材料，并要求和“新北大公社”就此事进行辩论。汽车上的大喇叭喊着口号：

“聂元梓无权进入市革委会！”

“聂元梓从红代会滚出去！”

“揪出聂元梓当红代会核心组长的后台！”

等等。

当他们的车队走到南校门时，北大学生涌出来把校门关上，不让他们出去。历史系学生王复兴心里直冒火：“他妈的，敢到北大来撒野！”于是一跃一攀，首先爬上了地院那辆车，二话不说，把连着大喇叭的电线扯了下来，宣传车顿时变哑吧了。北大

学生欢呼雷动，接着他们纷纷登上其他几辆车，拨掉电线，六辆车都哑吧了。

这时，北京大学校广播台广播："北大同学注意，不要动手打外校学生。欢迎外校学生给北大校文革提意见。外校同学这样来北大闹事是不对的。请外校学生离开北大。北大同学把校门打开，让他们出去！"

聂元梓闻讯也赶到现场，劝住了学生，让他们打开校门。晚18时左右，"新北大公社"动态组组长胡宗式带着许多人把6辆车推出了校门。

但是北京地质学院宣传车的广播员被打并被扣押。

当时，清华"井冈山"的一位委员跑到北大来看热闹。因为也跟着说了反对聂元梓的话，叫北大同学打了一顿。

地院革委会主任王大宾下午回到地院后，听说此事，立即和同学陈保堂同学一起赶到北京大学，想找到聂元梓请她调解放人，但未见到聂元梓，王大宾本人反被北大学生扣留。陈保堂逃回地院报告，在北大的记者对北大的学生说："你们快放了王大宾，不然会引发严重后果。"北大的学生这才放了王大宾。当王大宾脱身回到地院时，看见杨雨忠正在集合好的队伍前作出发动员讲话。王大宾要阻止已不可能，地院的队伍就这样出发前去北京大学营救被扣押的广播员了。

当晚，地质"东方红"、北邮"东方红"等学校又有数千人涌进北大校园，北大学校广播台以第二天4月12日北大要开批斗王光美的哥哥王光英的大会为理由，广播让他们回去，但是他们不走，双方进行了激烈辩论。到了晚上21时30分，北京大学

广播台发出号召："把他们赶出北大去！"这指令是孙蓬一下的。北大学生开始强行轰赶外校学生，于是，嘴上的激烈争辩变成了肢体的相互冲撞，双方在北大校园里发生了大规模武斗。到了 4 月 12 日凌晨 1 时，中央文革小组办公室听到消息后，立即打电话要求双方停止武斗，脱离接触，但未能奏效。其中有两名北大学生被抓到地质学院。接着北大学生在大饭厅开大会，孙蓬一作了激烈的讲话，群情激昂。

12 日下午，地质"东方红"又有一批人到北大刷标语，结果宣传车整个被北大学生占领，喇叭也被拆下，机器全部被搬走。北大学生还将"新北大三师八团"的大旗插在地院的汽车上。双方再次发生武斗。

这天，地质"东方红"、工大"东方红"、北邮"东方红"、北石"北京公社"、"新人大公社"、农大"东方红"等 15 个组织联合发表了"告革命造反派战友的公开信"，题为《愤怒控诉新北大公社一小撮所策划的法西斯暴行----记四、一一在北京大学发生的大规模武斗》。

北航"红旗"、清华"井冈山"、矿院"东方红"发表了关于北大、地质武斗的《联合声明》，说："我们坚决拥护谢富治同志、傅崇碧同志的指示，不折不扣地按中央文革指示办事。对目前新北大公社和地院东方红等革命组织之间的矛盾应从革命大局出发，在红代会的主持下解决"。

在北大发生武斗时，清华、北航都派人前去观看，并发生了人员在北大被打、被扣，宣传车被砸的情况。

同时，一些其他学校的造反派组织也发表了支持地质"东方

红”的声明。

晚上，北京大学召开全校誓师大会，孙蓬一发表了一通气壮山河的讲话，不断被暴风雨般的掌声、欢呼声打断。他说：

如果说，在昨天我们有些事情还看不清楚，那么到了今天，那一小撮人的心是路人皆知了。因为马路上都写了大字标语了，他们要干什么，他们的目的已经清清楚楚了！他们醉翁之意不在酒。所谓的民族宫事件本来是微不足道的，这只不过是一个借口而已。目的是他们背后的那些人要实现更大的政治野心、政治阴谋！……也有另外一些人，他们为了达到他们垄断、独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果实这一目的，便不择手段，只要是可以被他们利用、为他们服务的，只要是支持他们的，他们不管这些人是什么派，就一律给他们送上一顶最美丽的桂冠：“革命造反派”。而这样一种力量，采取一种非常不正当的手段，采取拉一伙，打一伙，拉拉扯扯，勾勾搭搭，招摇撞骗，把手伸得很长，真正是拉大旗作虎皮，包着自己去吓唬别人，当他们跟别人辩论，他们提不出充足证据的时候，便拿出所谓的王牌，说：某某支持我们。不管什么人，只要你违背了毛泽东思想，他支持了你，那么他也是错误的！无产阶级革命者，认为隐瞒自己的观点是可耻的，我有必要再一次阐明我的观点：在我看来，这一股势力的代表，这一股势力的核心不在学校，而是在一些机关，是真正的摘桃派，那是一些什么人？如学部以吴传启为首的一帮子人，如高教部的延安公社，中央统战部红色联络站。至于还有一些单位，他们人数虽然很多，但是，在我看来，那只不过充当了一个打手，充当了一个工具。

会场上红旗乱舞，群情激昂，空前壮观，一阵阵的欢呼声震撼着整个北大。

而此时的安徽，自 3 月 24 日中共中央《关于安徽问题的决定》公布后，安徽“P”派乘势宣传，气焰极盛。安徽代表团回到合肥后，安徽“八二七”头头梁守福便一头钻进工大无线电系学生宿舍楼，想就此引退。但那些“八二七”队员们成批成批地来找他问个究竟。

4 月 4 日，“八二七”兵团召开常委会，各纵队、支队、包括中学联队干部一并参加，由赴京代表团“八二七”的成员向大会汇报北京谈判的情况，也作为对“P”派宣传的一次回应。

大会在工大东操场公开举行，参加的人很多。首先由“八二七”的李胜利和李文安汇报中央接见情况，后来又让同学们用递条子的方式提问。

工学院有同学要梁守福回答：“李葆华给你 3 万块钱是不是事实？”

梁守福回答：“我可以用我的人格作担保，我没收到李葆华给我的一分钱。”他的话受到会场上长时间的热烈掌声，并伴随着口号声：

“我们相信你们！‘八二七’永生！”

4 月 4 日的会议之后，一股对中央《关于安徽问题的决定》九条，及对康生、王力、关锋的不满情绪悄悄地蔓延。

第二天，4 月 5 日，安徽省军事管制委员会重新派出 21 名军代表接管省公安厅，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安徽省军事管制委员会驻安徽省公安厅军代表办公室”。安徽“P”派也准备于 4 月

12 日下午在省体育场召开批斗安徽省军区司令员严光的大会。这件事惊动了周恩来。4 月 12 日，周恩来打电话召集安徽军管会负责人、“八二七革命到底联络站”、“红革会”、“工一司”、“工二司”及“机关职工造反司令部代表”等“P”派代表，召开电话会议。听电话的有：“红革会”王洪兴、“工一司”王启腾、“八二七”周道元、“机关职工造反司令部”陈明元、军管会主任钱钧、秘书王瑞根等。

周恩来首先问：“喂，你是钱司令吗？我是周恩来。人都到齐了吗？”

钱钧答：“来齐了。”

周恩来问：“来多少人？请一个代表和我讲话。”

钱钧答：“来了10个，每人有一个机子。”

周恩来：“10个人，推选一个代表讲话。”

“八二七”周道元说：“周总理，我是周道元，是‘八二七革命到底联络站’的。”

周恩来问：“你们今天一点钟要开会吗？开什么会？”

周道元答：“开万炮齐轰严光，砸开省委阶级斗争盖子誓师大会。”

周恩来说：“你们的主题和中央的意见不相同了。你们对安徽省军区有意见，要先和中央商量嘛！你们这样做，不是把矛头指向以李葆华为首的安徽省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了。你们想了没有？”

周道元说：“我们是群众自发的。”

周恩来批评说：“群众自发，要有领导的嘛！中央和中央文

革小组不同意你们这个主题，不同意你们这样做，这样会造成群众对立，对你们自己不利，军区和军管会不好派代表和军队参加你们的会议和出兵保护。你们是革命组织嘛！这样一件事怎么连和我们商量也不商量呢？同志啊！你们有不同意见，可以反映到中央来嘛！你们应该和军管会商量，取得协议。当前矛头要对准以李葆华为首的安徽省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怎么能把矛头对准严光呢？这是不对的，严光同志虽然有缺点错误，应该把矛头对准以李葆华为首的安徽省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周道元接受批评，同时解释说：“我们考虑不周。群众想到许多事情，是严光和李葆华一道干的。”

周恩来说：“我们已把这个问题在北京开会时与你们讲清楚了，就解释了嘛，当时，同志们都满意了。现在你们又把矛头对准解放军的负责同志，不是对准李葆华，这件事就不好办了。”

周道元：“我把情况向总理汇报一下好吗？”

周恩来：“电话上就不要汇报了。现在已经一点钟了，你们今天的会怎么办？”

周道元：“总理不同意就不开了。”

周恩来予以肯定说：“不开就好了。这个会不开为好，开了不好办，群众要开对你们自己也不利，对军管会的威信也不好。”

周道元问：“对严光的大字报能不能贴？”

周恩来：“大字报主要应该对准李葆华。对严光同志的大字报可以送到省军区和军管会，不要满街贴。你们有意见可派几个代表来北京，人要少，5到6个就可以，好不好？你们商量一下，

我等你们。”

经过在场的群众代表商议，最后还是由周道元回复周恩来说：“我和大家讲了，坚决按总理指示办事。”

周恩来说：“那就好嘛！第一步可以找严光同志谈谈，消除误会了就不一定来北京，如果不一致，可以少来一些人。重新说一遍：第一，今天的大会不要开了；第二，如果同志有意见，可以先来找军管会谈一下，彼此内部解决……”

周道元重复：“彼此内部解决。”

周恩来继续：“实在不能解决的话，派5、6个代表来北京谈谈。”

也就是从这天开始，合肥出现了炮轰安徽省军区、炮轰严光，炮轰“军管会”，甚至炮轰周恩来的思潮，这种思潮发展到全省炮轰派的大联合，也同时出现了保军区一派的大联合。从此，各派组织的矛头逐渐偏离了中央《九条》规定的方向，开始了相互之间的派性斗争。

## 第 581 回：第五次，接见内蒙代表团 军委会，接见军内造反派

4月12日晚上23时5分至13日凌晨1时45分，周恩来、陈伯达、康生、肖华、张春桥、王力、关锋、姚文元及总政，总参和各大军区负责人徐立清、李天佑、韩先楚、宋任穷、张国华、陈先瑞等又在人大会堂安徽厅第五次接见内蒙古四方代表。

这次参加接见的有区党委代表：高锦明、权星桓、康修民、李树德、李质、郭以清、张鲁。内蒙古军区代表：吴涛、刘华香、肖应棠、黄厚、刘昌、王良太、姜文启、诸方玉、敖长锁和独立二师杨德松、尤亚民、华民等。军区造反派代表：邵仲康等24人。“呼三司”一派代表：高树华、郝广德等57人。“红卫军”一派代表：张三林等9人。

周恩来说：“现在开会，内蒙古情况大致清楚了，已经两个多月了嘛！今天请后来的同志再谈谈。”

郝广德向周恩来介绍说：“这是张孝同志。”

周恩来边翻材料边问：“哪个学校的？”

郝广德答：“‘火车头’的。”

“火车头”的包长胜介绍张孝受迫害的经过。当他谈到张孝迫害致残时，周恩来说：“治不好了吗？快送到北京医院！”

张孝要求：“我说两句。”

周恩来对他说：“坐着说吧！”然后对赵刚说：“快点送医院去看看。”

张孝控诉自己被迫害的经过。

“红卫军”一派代表曹文生反驳并揭发说：“他讲的与事实不符，他们写过反动标语。”

周恩来问：“什么标语？”

曹文生说：“‘青松不怕火烧，火纵不怕狗咬’，攻击解放军。”

康生问曹文生：“就为这件事，应该不应该把人打成这个样子？”

曹文生说：“谁打的，我不清楚。要严惩凶手，我们要为受害者申诉。”

“火车头”包长胜又揭发曹文生等人破坏“抓革命，促生产”的活动。

周恩来问曹文生：“我问你，现在为什么不放人？这是不是事实？”

曹文生：“据说是放了。”

周恩来：“就因为这条标语就抓人？”

曹文生强调：“写的是反动标语。”

周恩来说：“这样的标语，在北京都有，怎么能是反动标语呢？怎么能是攻击解放军呢？”

康生也说：“没有说解放军嘛！解放军你们说拥护，中央指示你们拥护不拥护？”

曹文生回答说：“拥护！”

康生问：“拥护为什么到现在还不放人？”

周恩来也说：“拥护？早就说了，你们到现在还不放人。”

军区宣传部干事高利陶揭发“红卫军”的张三林。

张三林说："我不愿解释个人问题。"

周恩来问张三林："你是不是'三司'的？"

张三林说："不是，我是'红卫军'的，橡胶厂的。"

周恩来："先说这件事，你回答这个问题：为什么还不放人？"

曹文生说："下午曾打过加急长途电话。他们制造停车事件，他们是不符合《公安六条》的。"

周恩来问："哪一条？你们扣了几个人？"

曹文生："八、九个人。"

周恩来："什么时候扣的？"

曹文生："2月5日扣了两个，5个是2月8日扣的。"

周恩来："2月8日到现在已有两个多月了，为什么到现在不放？"

康生："中央命令在你们那里算数不算数？"

周恩来："四点指示有效没效？"

张三林："有效，今天又打电话回去了。"

周恩来："有效为什么还不放人？北京的同志来了没有？"

李天佑答："来了。"

北京军区副政委陈先瑞走到前面。

周恩来宣布："北京军区军事接管呼和铁路局。"

众人起立高呼："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周恩来对曹文生说："你还有什么辩护的？"

曹文生没再吭声，坐下了。包长胜继续揭发曹文生。

周恩来："铁路局问题知道了，现在由邮电局王连奎谈谈。"

王连奎揭发内蒙军区控制邮电、非法偷听电话等事情。

周恩来问：“邮电局驻有多少军队？”

王连奎答：“一个加强连。”

周恩来：“现在听听地方的。锡盟许名扬同志讲讲。”

许名扬说：“现在还有13人没放出来”

周恩来：“什么时候问的？”

许名扬：“中午问的。”

周恩来：“吴涛同志，这个事情交给你解决。”

吴涛：“马上打电话。”

接着乌盟代表玉宝、哲盟代表郭玉、黄宝玉、巴盟代表陈振中纷纷发言控诉内蒙古军区。

周恩来又问了《内蒙日报》社的情况。

内蒙军区后勤部梁音亭揭发“红卫军”：“他们游行时打着刘少奇的像。”

黄宝玉：“新华书店1000多张刘少奇的像都被他们拿出来了。”

其他人说：“还举起像高呼口号。”

“红卫军”张三林辩解说：“我们从新华书店拿出来烧的。”

康生问：“你们拿着刘少奇的像游行没有？”

张三林答：“不知道。”

高惠娟：“二中赵玉花说，苏修、蒙修支持‘三司’，周总理也支持‘三司’。”

周恩来：“捏造！”

韩文达说：“他们在火车上审问时说：王力是个大混蛋，是‘三司’的后台，要挖王力的根子。”

周恩来和王力等人都笑了。

内蒙军区“红色造反团”代表曹燕玲揭发：“军区文办正在整理王力同志的材料。”

军区包力陶说：“怀疑中央的根子，这是军区某些人，他们要挖王力同志的根子。”

周恩来问：“王逸伦的报告是不是都听了？”

众答：“听了。”

包力陶：“他们说造反派在‘122’、‘125’事件上是吃里扒外。”

几个人站起来指着内蒙军区领导王良太问：“说过没有？”

王良太承认说：“说过。”

康小春揭发呼市军分区副参谋长德山说：“德山曾念过一个特好消息说：‘中央叫各大军区学内蒙。’”

周恩来挥动着手里的一份传单说：“我这里也有一份，纯属造谣。”

周恩来让“八一八”王志有发言。王志有说：“他们说有两条黑线，一个黑根，要揪李富春、李雪峰、要揪黑根！”他回头质问王良太：“你说黑根是谁？”

众人喊：“王良太站起来！”

周恩来没让王良太说，他说：“不要问了，很显然黑根就是中央嘛！”

王志有继续说：“‘河西公司’反夺权后，报喜时，我们提出意见，说不要让外边的人到厂子里来。他们说是总理点头，林彪同志也在场。”

周恩来：“真是！造这种谣言。”

蔚洋：“他们说，林副主席说：‘你们打的不狠，手太软！不如青海，进度不快。’”

周恩来：“青海文件你们看到没有？”

众答：“没有。”

周恩来对于顺昌说：“你们记者有文件，明天给读一读。”

蔚洋：“他们造谣说：李天佑根本不支持‘三司’。”

李天佑说：“我白天去‘东纵’，晚上又从‘东纵’东门到楼上，他们纯属是造谣。”

周恩来问：“电台有多少军队？”

蔚洋：“由一个班增至一个排。”

周恩来又让周文孝把农村发枪情况谈谈。

周文孝说：“给桃花公社发17枝枪，30发子弹。”

周恩来：“今天会到此结束了。明天9点钟再开一次，内蒙问题就结束了。让肖华同志与军区同志谈一谈，还有记者和联络员同志同大家谈一谈，还有什么材料送上来，明天开会时间九点。不要再增加了，观点不要说了，已经很清楚了，已经两个多月了嘛！不然人越来越多。群众不要互相对立，不要着急。你们是按毛泽东思想办事的，要等待一下。内蒙古自治区地区大，分区多，还有各旗县，还有牧区，电话传达不到的可以派人嘛！

铁路局去的部队明天天亮就到了。铁路那位同志，明天送到医院，总是可以治好的。

明天晚上9点开会，有材料还可以送上来。要等待中央的布置。同志们受苦了，这是为革命嘛！我们一定要把边疆的问题解

决好。明天结束这个会，要靠革命造反派团结起来。散会。”

当晚，戚本禹在人民大会堂接见时，交给北航“红旗”韩爱晶和井岗山一封信。信是北京市中学两个红卫兵去甘肃大串连回来后，写给中央的。信里说，这两个中学生大串连见到一些当年失散的西路军红军老战士，揭发控诉徐向前等当年弃队脱逃的事。

北航韩爱晶和井岗山等看了信后很气愤，从人民大会堂回来后，已是后半夜。他们立即找到王以理、尹聚平、杨玲玲、朱芝慧等人，把这封信交给他们，要他们去调查。首先在北京找到了那两个给中央写信的中学生，然后去甘肃等地向反映情况的失散的老红军调查徐向前逃兵问题。

第二天，4 月 13 日，北航“红旗”总勤务站发表《声明》，说徐向前在最近自上而下的资本主义复辟逆流中，向无产阶级革命派反攻倒算，必须坚决打倒。《声明》还表示坚决炮轰叶剑英。清华“井冈山”、地院“东方红”等组织也贴出这样的大标语。

4 月 9 日至 23 日，中央召开军委扩大会议，首先由黑龙江省革委会主任潘复生在 4 月 9 日的军委扩大会议小组会上，介绍了黑龙江省的文化大革命的情况。

4 月 11 日下午，徐向前在军委扩大会上作检讨，说自己担任全军文革组长的近 3 个月里，思想上怕乱，跟不上形势，工作没有做好；对毛主席的三支两军指示，领会不深，贯彻不力，像青海、四川、内蒙、福建等地发生的事件，认为自己管不了，也不想去管；军内共抓了 700 多人，取消战斗组织 100 多个，打击

了造反派；积极争取中央文革的支持、帮助不够，有抵触情绪等。

徐向前检查后，陈伯达、康生、关锋先后发言，其中以陈伯达说徐向前是“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总代表”、“对抗中央文革”、“搞独立王国”等。

谢富治也说：“你徐向前的问题远不止这些。”

徐向前对谢富治说：“富治同志啊，错误路线我都承认了，你还要怎样啊！难道要把我打成叛徒、特务吗？”

到晚上，批判徐向前的广播车、小报、漫画就拥上街头。

4月中旬，林彪办公室收到了一份署名为“军事科学院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打印件，其内容全是揭发叶剑英所谓“三反”言行。秘书把这些材料讲给林彪听，他面无表情，没有说话。

不几天，毛泽东把一份揭发叶剑英所谓“叛徒”的证据材料批转给林彪。该材料称：30年代初期，国民党的报刊刊登了叶剑英的《反共启事》。毛泽东对此作了这样的批示：“这个《反共启事》是国民党特务们伪造的。我可以证明，登这个启事的时候，剑英同志已离开该地几个月，正和我在一起。”

军事科学院的造反派组织多次要求叶剑英参加批判他的大会。无奈，叶剑英只得向林彪打电话，说自己身体很不好，去参加那样的批判会确实吃不消，希望休息一下。如果真要他参加那样的批判会，得等他身体好了再说。林彪在听了秘书的报告后，爽快地说道：“告诉叶帅，可以休息一下。”随后，他又说了一句：“全面看来，叶帅还是功大于过。”

秘书问：“首长后边说的这句话，我可以传给叶帅吗？”

林彪摇了摇头说：“不要！”

4 月 11 日，部分军队院校、文艺团体的群众组织集会游行到全军文革，对全军文革提出意见。

4 月 13 日，全军文革小组成员李曼村接见重庆后勤工程学院、北京军区战友文工团等军队单位的群众组织代表，首先答复 4 月 11 日驻京部分院校、文艺团体的组织集会游行到三座门向全军文革提出的意见，说："这些意见我们已经迅速向上面作了反映，一定研究解决，接受同志们的批评意见。"

接着，各组织代表提出问题。

重庆后勤工程学院代表问："全军文革的命令中指出后工'红总'是右派组织，应该取缔！这是谁发的命令？"

李曼村说："不知道这事。"

后工代表接着说："我们因为不同意当时重庆市的夺权，警备司令部对此不满就要取缔我们，调动几万人围攻我们，砸抢了我们 10 多辆汽车，抓了我们 40 多人，他们扶植保皇派，成立了所谓文化革命委员会，右派成了'左'派，他们点名要抓谁，警备司令部就抓谁，逼着人写检讨书，请罪书，还有两个营的兵力常驻校内，直到 4 月 12 日才撤走。他们实行白色恐怖和法西斯专政，经常挑起武斗，保守势力集中住在一个楼，扬言要和我们血战到底，骂我们是右派，总后张池明和当地警备区有勾结。现在警备区又急忙赶我们下去支工，当时打电话告诉全军文革，你们有人说：'后工红总就是坏'，'全军文革不管，你们自己搞。'你看怎么办？"

李曼村表示："这些情况不知道，现在可以表态，把'红总'打成右派组织，抓了那么多人是严重突出的问题，我们坚决反对，

已派了调查组去了，有《十条》作武器，这些问题可以解决。”

后工代表说：“54 军副军长说：‘你们不是反革命，我就是反革命。’《十条》到现在还扣下不公布出来，造反派看不到。”

李曼村对全军文革工作人员说：“赶快打电话去追问，《十条》为什么还不发下去？”

后工代表继续说：“取缔我们，抓我们的指示都是叶剑英搞的，我们要你澄清。”

李曼村说：“我不知道，没法澄清，我可以反映。”

北京军区战友文工团代表提出：“北京军区 3 月 28 日抓了我们 6 个人，全是造反派，现在还在隔离反省，一再交涉不放，还说：‘4 月 1 日中共中央关于安徽问题的决定不符合你们情况。’‘这 6 个人是敌我矛盾。’有一个同志作了绝食斗争，他们便以对抗无产阶级专政的罪名押入监狱。负责看守的战士控告了这件事，北京军区追查控告的战士，我们要求保卫战士安全。”

他们拿出被抓人在监牢里写的血书给大家看。

李曼村表示：“我们要查办。”

随后，其他组织也作了汇报并提出许多问题。后勤学院“星火燎原”代表汇报时还谈到北京卫戍区关于在北京的高等军事学院，政治学院，后勤学院和军事科学院 4 个单位下去“三支”问题的答复一事。

李曼村说：“今天谈的情况有的听过，我们 3 月上旬派了几个联络组到西安、南京、重庆、大连、长春去了。4 月 6 日林副主席亲自起草，毛主席签发的《十条》，我认为可以说集中了全军革命造反派的声音。在军内同样有反复，这个反复各造反派程

度不同都受到了打击，这是个很严重的事情。听到消息的就派人去了，为什么产生这个严重情况？自 1 月 4 日，刘志坚虽被揭发，但刘邓在军队的流毒远远没有肃清，有些人继续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3 月 10 日发出各单位整风指示，各单位造反派进行了整风。革命造反派在这个斗争中立下了功劳，是对军内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次猛烈冲击，成绩是很大的。但在斗争中有缺点错误。革命派整风前后，有些人过分强调冲击机关这些支流问题，否定大方向，以至无根据宣布为‘反革命’组织、‘反动组织’加以取缔，形成反复、曲折，使许多人受委曲，这是件很不好的很严重的事情。但总是有反复的。现在《十条》已经下来了，我们有了这个强大武器。《八条》、《四条》也是正确的，不能因为这个反复否定《八条》、《四条》，要坚决贯彻，打退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逆流，把文化大革命向前大大推进。你们受了委曲，凡是抓了造反派的都应该放出来，革命组织被无理取缔的压制的都应该作严肃处理，立即恢复，有些要做调查，真正造反派是压不垮的，有人坚持斗争很好。同志们对全军文革有意见，要我们站在造反派一边，像个造反派的样子，说我们在你们受打击、压制时旗帜不够明，没勇敢站出来支持，说：‘全军文革向何处去？’我们接受同志们的批评，同志们今天提出了尖锐的诚恳的批评，我们热烈欢迎。

在这一个时期，我们确确实实有错误，没有勇敢地站出来支持造反派，有时支持了保守派，我们一定做检查，要承认自己的错误，没有旗帜鲜明，没有及时采取措施，有的已经派人去调查了，如通信兵、防化兵 105 等，有些问题没及时发觉，有时问题

没有及时处理，我们如果及时采取措施，同志们是可以不受委曲的，革命组织可以免遭解散，同志们的批评我诚恳接受。

中央军委的《十条命令》就是大的解决，什么命令都是有斗争的，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如《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就是有人不执行，靠同志们斗争嘛，我们是坚决执行《十条》的。

关于高等军事学院，政治学院，后勤学院和军事科学院四个单位‘三支’通知问题，如果说卫戍区司令部那样答复的，任务暂时下不来，我同意恢复活动，按战斗组织活动，还要搞斗批改嘛！我再请示肖华同志一下，告诉你们，到底‘三支’怎么下去还要考虑，如果有这样的单位，左派不占优势，保守势力还很猖狂，思想问题没有解决，下去怎么办？有问题，文化革命一定要进行到底。‘三支’和斗批改关系如何解决？正在研究，还要有新的指示，现在大部分都没有下去嘛！”

当外地院校和文艺团体问李曼村，他们到北京来合不合法？李曼村副组长说：“合法。”并当即答应给这些人安排食宿。

## 第 582 回：《立新功》，定五条保春交会 批北大，聂元梓潸然泪下

4 月 12 日，江青在军委扩大会议上讲话。这次讲话后来以《为人民立新功》为标题公开发表，轰动一时。

4 月 12 日，陈伯达在军委扩大会议上讲话，从历史上再次系统的批判刘少奇。在他讲话过程中，周恩来、江青、康生、王力等人都纷纷插话予以补充。

4 月 13 日，康生在军委扩大会议上讲话，重点讲了两条路线斗争的问题，他说：

“前次军级干部会议我讲过，去年 12 月毛主席同一个兄弟党的领导人谈话时，谈到了两条路线斗争的本质。当时毛主席指出，两条路线斗争的本质，就是中国走什么样道路的问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以刘、邓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坚持走资本主义道路。走社会主义道路，必须坚持进行阶级斗争，依靠群众，依靠无产阶级，依靠党的领导，依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走资本主义道路，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那就必然要依靠资产阶级、反对群众路线、反对阶级斗争，妄谈什么‘共产党员的修养’，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毛泽东思想。毛主席讲，这两条路线的斗争，是长期存在着的。中国革命几十年来，一直存在着这种斗争。过去存在，现在存在，将来也还会存在。就是说，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整个的过渡阶段，必然贯穿着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

他在讲话中，对刘少奇从历史到当前再次做了系统的批判。

4 月 14 日，张春桥在军委扩大会议上介绍了上海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回答了与会者提出的问题。他在讲话中说到："在上海一谈到工人运动，就会谈到安亭事件，去年十一月初，革命工人起来成立革命组织，上海市委不批准，两千多工人就上火车到北京告状，开车不久，铁道部命令，把他们甩在安亭、苏州、南京几个车站上，人数最多的在安亭，工人把这件事叫安亭事件。工人不干，造成上海、南京一线火车全部停开。 对待这件事，实际上有两条方针、两条路线。一条是镇压，一条是支持。 主张压下去的，代表人物就是陶铸和上海的陈丕显、曹荻秋。11 月 11 日，我去安亭处理这件事，陶铸给的方针，就是把工人赶回上海，对他们的组织，不支持，不承认。我赶到安亭，同工人代表谈话，劝他们回上海，理由无非是生产要紧啦！铁路不能断啦！等等。这些大道理当然是正确的。但是，没有用。我就平心静气的听，听他（们）讲，究竟是怎么回事。天亮以前，接着开群众大会，一直开到下午 4 点，干了 16 个钟头，工人才答应回上海。 从这个谈判中，我才了解到。工厂里面好多工人被打成'反革命' ，来的人大部分是被打成'反革命'的。他们为了造市委的反，就组织了一个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开成立大会请市委参加，市委不参加，开完了大会，要求市委接见一下他们的主席团也不接见。实在无可奈何了，才上火车到北京告状。而上火车之后，又把他们甩在这个小车站上，已经 3 天 3 夜了，市委一个人都不来。工人越来越愤怒。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按着陶铸那个方针做，工人根本不会

回上海。要赶回去就要镇压。这一批人，已经被打成‘反革命’，再加上这次‘破坏了交通’，实行白色恐怖，实行镇压，不是理由很充足吗？是工人群众教育了我，是毛主席的教导支持了我，使我在重要关头没有犯大错误。我答应认真负责地解决他们的问题，才说服了他们回上海。13 日回到上海，同他们的代表继续谈。把情况弄清楚了，交通事故是现象，是结果，工人起来闹革命才是本质，才是根源。决定承认他们的组织是革命的组织，合法的组织，只是劝他们，火车中断是不好的，以后不要采取这种手段，没有过多的责备他们。这样处理，市委坚决反对，说我没有坚持原则。曹荻秋气势汹汹地给陶铸打电话，陶铸立刻支持他，我也给陈伯达同志打电话，请中央指示。陈丕显有了陶铸的支持，也气势汹汹的给陈伯达同志打电话，提出质问，为什么这样做？说中央不是规定工厂里头不成立造反组织，也不成立全市性的造反组织，为什么现在又承认了？你们给张春桥多大的权力？非常凶，接连问了好几个为什么？

陶、陈、曹等等，对学生运动是镇压的，对工人运动又是镇压。他们站在资产阶级反动立场上，无法理解：工人运动要起来，这是不可避免的。光是学生运动起来，没有工人运动起来，没有农民运动起来，文化大革命的彻底胜利是不可能的。这是过去历次革命运动的规律。陶和陈、曹的方针当然没有得到中央的支持。中央文革、中央常委，最后向毛主席汇报，毛主席支持了上海的工人群众。

昨天看到一个材料，有一位副司令员同志，在当地谈话，破口大骂革命派，说革命派连土匪都不如。说：‘不管你有几万、

几十万，我一个命令就叫你完蛋。’我劝这位同志注意，在我们处理安亭事件的时候，工人革命造反派连几万人也没有，只有几千人，要镇压是可以镇压下去的。但是工人还会起来，把压他们的人打倒。我们决不能因为我们手里有权，就能压服群众。相反，我们共产党员，只能执行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支持革命群众的行动。今天上海的局面所以比较稳定，安亭事件处理得比较妥当有很大的关系。现在，从安亭等地回去的这批人，已经成了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派的主要骨干，主要领导人，就是这批人把上海的百万工人组织起来了。”

北京炮轰陈毅的消息也影响到广州。4 月 10 日，刚刚获得平反的广东中山大学“八三一”，聚集在中苏友好大厦，即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前，要砸掉展览会大门前的陈毅题词。解放军加以阻拦，双方僵持不下。交易会的前面一片混乱。广州军区急忙请示北京总理办公室，答复是：要劝说，不要砸，没有中央指示不要砸。但经劝说无效，“陈毅题”三个字，终于手起锤落，化为齑粉，其余的字用红纸封了起来。

与此同时，已进驻交易会展馆各贸易代表团中的一些群众组织头头，也不断提出一些造反的要求，使展出计划难以实施。此时正在北京的广东省军管会主任黄永胜得到报告后忧心忡忡，多次向周恩来反映情况。

一年一度的广州春交会就要在 4 月 15 日于广州开幕了，这在当时处在美国和欧洲月牙形封锁形态下的中国来说，是对外贸易的唯一窗口，关系到国家外汇的储备，事关重大。4 月 10 日，一些支持“省革联”的群众，冒着清明的毛毛细雨，包围了《广

州日报》，要求刊登批判《把颠倒了的历史再颠倒过来》的文章，并呼吁撤消军管小组。

4 月 11 日，中央文革致电广州军区，指出《广州日报》必须继续出版，并表示，3 月 12 日《南方日报》转载的《新北大》广州版文章《把颠倒了的历史再颠倒过来》一文是错误的。形势倏然扭转。支持“省革联”的群众，扬眉吐气，欢声动地；“东风浩荡”的地总，则哀叹“阶级敌人又蠢蠢欲动了。他们混水摸鱼，制造舆论，把矛头指向革命群众组织，一阵阵向中国赫鲁晓夫的冲杀声又被压下去了。”广州各个山头之间，勾心斗角，矛盾重重，大家都在积聚力量，酝酿着更加激烈的冲突。而各派之间的争斗直接影响到春交会能否正常开幕，而春交会能否正常开幕势必会影响国外对中国形势的评估，影响到外商与中国贸易的信心。为此，4 月 13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出《关于开好春季广州出口商品交易会的几项通知》，做出了 5 点指示：

一、在交易会期间，不组织交易会以外的人员进馆参观，不在交易会及其所属机构内进行夺权。

二、各省市自治区要积极组织交易会出口货源，除了派驻交易会的工作人员外，不要另外组织人员去交易会参观。

三、所有参加交易会工作的人员，有接待任务的宾馆、旅店、剧场和参加演出的文艺单位，在交易会期间，一律暂停“四大”。

四、在交易会期间，不要在出口商品陈列馆和接待外来商人的宾馆、旅店张贴大字报。

五、交易会安排演出的文艺节目，不要再作变动。

其中第一条中“不在交易会及其所属组织内进行夺权”一句，是周恩来在审改这份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就开好广州春季出口商品交易会给广东省军管会、中南财委并各军区、各省、市、自治区的通知稿时，特意增写的。

当天，周恩来又在北京约见了黄永胜，继续谈春交会的问题。

4 月 13 日，谢富治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北京大专红代会核心组，解决北大和地院的武斗问题。原来说是上午 10 时开会，可是一直等到下午 14 时 30 分才开。中午饭就在会议室，每人一份小豆沙包，很好吃，当然要交粮票和 3 角钱。

下午开会，谢富治首先说：“今天召集红代会核心组开会，解决北大和地质之间的矛盾。先听听别的院校的意见，北大和地质不要发言。”

邮电等学校相继发言，攻击北大。北航“红旗”韩爱晶发言各打五十大板。几个人发言之后，聂元梓请求说：“谢副总理，我讲两句。”

谢富治把手一挥说：“你不要讲，你们两家，我谁也不听。”

聂元梓坐在那里掉下了眼泪。这时，会议室的大门开了，一下进来 20 来人，是地质学院的。他们一看屋里有那么多人，就嚷着：“不是单独接见我们吗？”说着就要往外走，会议组织者一拦，他们又都回来坐在后排，嘴里还不停地说着。

会议没法开了，谢富治只好离开会场，到另外的房间接见地质学院的人。

过了一段时间，地质学院的人回来找聂元梓说：“谢副总理找你去解决问题。”

于是，聂元梓也去了那个房间。一会儿，聂元梓出来，地质学院的人又围上来要和她辩论。聂元梓对会议的召集人说："会议还开不开了？不开我们走。"

召集人说："不开了，可以走。"

汽车开动以后，同去的孙蓬一问聂元梓："怎么样？"

聂元梓答："说武斗是我们挑起的，……"

孙蓬一听了很生气。过了一会儿，他说："回去以后把接见的情况原原本本地对群众讲。"

聂元梓说："不能讲。"

汽车进了南校门，聂元梓和孙蓬一去参加学校组织的批判控诉刘少奇《修养》的大会。聂元梓和孙蓬一在会上讲了话，但有所节制。

当晚，石油学院"大庆公社"来到北京大学声援北大。在北大大饭厅，临时来了一些同学，"新北大公社"的负责人和"大庆公社"负责人分别讲话，会场气氛热烈。孙蓬一即席讲话时说："早上地院一小撮人及一些受蒙蔽的人，在我校肆意破坏以后，在我们学校开了一个所谓控诉会，斗争了我们的同学，用了比对黑帮、对敌人更加残忍、更加凶恶的手段对待我们的同学，大家可以从这些事实中进一步看看这场斗争的严重性、尖锐性。"

他话锋一转，讲了下午谢富治接见的情况和发生在年初的统战部"115 事件"等情况。他说：

"处理'115 事件'，把抢档案的说成英雄，是左派，而把保护档案的人关进监狱，这是什么逻辑？在名义上是解决北大和地质的矛盾的会议上，不叫我们说一句话，就下结论，说武斗是

我们挑起的，不是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吗？是他们打到我们家里来的，而不是我们打到他们那里的。是非是如此明显，却视而不见！我们多去了一个人，谢富治便问，地质多去了 20 多人，什么话都不讲。”

“吴传启之流安插自己的亲信到市革委会、《北京日报》等部门。他们是些什么人？国民党员、共产党的叛徒、一些投机家。说什么‘越是叛徒越是左派’‘30 年代的叛徒 60 年代的左派’这样一些混蛋逻辑！”

“他们是‘摘桃派’。周景芳自称是中央文革的代表，我给辟谣了。这次会议名义上是解决北大和地质的矛盾，在会上，不叫我们说一句话，就下结论，说武斗是我们挑起来的。不是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吗？ 是他们打到我们家里来的，而不是我们打到他们那里的。是非是如此明显，却视而不见？开会我们去了 3 个人，比通知多了 1 个，在门口我们就和会议组织者说明了，同意进去的。会议开始时，谢富治就问为什么多 1 人。可是地质一下来了 20 多人，他什么都不问，地质的人吵吵嚷嚷：‘不是单独接见我们吗？怎么这么多人？’我们不清楚，这是为什么？有的人说我们是老保，他们困难的时候我们支援了，如果说支援的不够，我们可以检查；如果说我们是老保，他们是太健忘了！”

孙蓬一所说的“摘桃派”是指学部周景方和《红旗》杂志社林杰的妻子王乃英、关锋的妻子等人。原来聂元梓在北京筹备成立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时，发现这些人都进入了北京市革委会的预选名单，她认为这不正常。于是，4 月 11 日，聂元梓在北大校文革的负责人开会时将她的看法说了。她说：“要揪他们的后台，

看他们的后台是谁？周景芳在市革委会里面，还组织特务小组织。”她让孙蓬一找几个可靠的人，在北大成立了“除隐患战斗队”，收集这方面的材料。结果，孙蓬一在全校大会上，把聂元梓讲的内容公开出来了。

孙蓬一在台上讲得慷慨激昂，大家在台下听得群情激愤，并不时报以一阵阵热烈的掌声。聂元梓闻讯赶到会场后，心里却急得是火烧火燎。她不能当众制止孙蓬一讲下去，只好给他递条子，连递了三次，孙蓬一都没有看。会后，“新北大公社”总部决定派人到公安部和谢富治辩论，队伍在马路上集合了，有些积极的人甚至已经跑到前面贴大标语了。聂元梓和李清昆急忙赶到现场，制止了他们的行动。与此同时，还派人分几路，把先走的人叫回来，并把已经贴出去的大标语盖上。因为聂元梓知道，谢富治是毛泽东亲自指定负责筹建北京市革委会的负责人，怎么能打倒呢？弄不好是要犯大错误的。但是肯定是盖不全的，第三天在天文馆的屋顶上，还可以看到“打倒谢富治！”的大标语。

聂元梓连夜口头向驻北大的中央文革记者承认错误，并写了书面检查连夜送到中央文革。

## 第 583 回：第六次，接见内蒙古代表 发文件，中共中央做决定

4月13日夜23时30分至14日凌晨2点25分，周恩来、陈伯达、康生、肖华、王力、李天佑等中央首长如约在人民大会堂西大厅第六次接见内蒙四方面代表。

西大厅内，气氛庄重，被接见的各方代表四面环坐，屏息静气，鸦雀无声。周恩来作了长篇讲话，他严厉批评了内蒙古军区的个别领导人，并口头宣布了中央关于处理内蒙古问题决定的主要内容，这就是著名的《413决定》。

他说："内蒙军区的个别领导人，不是所有的人，2月5日以来在支持左派工作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

"'二五'事件发生了，性质就变了。'二五'事件，一方面表明革命造反派，工人也好、学生也好、包括外地去的、北京'三司'去的、上海二医大的都是革命造反派，支左嘛，请愿也好，静坐也好、会见也好，无非还是要求军区首长接见，支持他们。他们相信军区不会对他们怎么样的嘛。1月28日，虽然军委有了不让冲击军事机关的《八条命令》，但静坐是在门口嘛，不外乎是等待。""可是军区不能控制自己，犯了方向错误。军区认为他们都是右派，不是革命的了，是反革命了，不可调和了。打了两发子弹，命中一发。韩桐同志他还不以为军区会开枪嘛，这完全出乎革命群众的意料之外。"

"2月5日以来，还不承认错误，继续犯下去，还说是反革命组织，是反革命活动。军区内部造反派也受压迫，严重打击了呼

市‘三司’、‘八一八’等革命群众组织，大批逮捕了革命群众。到现在我手里还收到材料，成百的人没有放。除四川以外，其他地方都是中央决定以后就改了。内蒙拖了两个月。军区支持了内蒙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乌兰夫的代理人王逸伦等人以及他们操纵的保守组织。”

“乌兰夫很早被拉下马来了，离开内蒙古，撤了第一书记，军区司令员，政委的职务，名义上留了内蒙古自治区的主席，留在北京反省。把他拉下来，不是问题就解决了。他下面有党羽，有他的代理人，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还在支持他。以王逸伦，王铎为首，确确实实就是他的代理人。在军区2月5日事件发生以来，他们很活跃。2月7日王逸伦就出来了，到军区和各处活动，本来生病嘛！不仅在内蒙，就是到北京来也是这样，还在继续指挥内蒙古。尤其王铎更加活跃，王铎的老婆在内蒙人委工作的喽，”

权星桓插话：“内蒙人事局局长。”

周恩来继续：“不断打电话，还到北京劝降。”

周恩来说：“内蒙军区党委某些领导同志，不经中央和中央军委批准，把吴涛同志打成三反分子，停止他的工作，在乌兰夫下去后，吴涛不仅是第一副政委，他还是军区党委书记，他还是第一负责人。你们说是群众把他打成的，军区党委没写成决议，实际上是军区党委决定的。你们支持一部分人，名义上叫造反派，实际不能叫造反派。因为吴涛同志和军区的认识不一致了，因此就把吴涛同志打成了三反分子，停止了他的工作，行动受到限制，电话撤销了，不能办公了，不能行使职权，军区没有正式报告中

央军委。青海司令员兼政委支持左派被免，形式上做了报告，内蒙军区还不如他们。”

“军区党委还完全能够控制局势，30多人被军区党委捕了，说是群众组织搞的，事实上是军区领导人搞的。直到现在不仅在内蒙，还到外省，到北京、南京捕人。军区党委的权力不仅在内蒙，还能到外省，有的同志问他们的手怎么伸得那么长，怪不得群众说有后台，肖主任，这要有规定，不然军区滥用有危险。解放军是光荣伟大的，应该珍惜伟大的荣誉，遵守党和国家的纪律。军区党委是错误的，是严重无组织无纪律，不能把责任推到群众身上，这笔帐要算在军区某些同志的身上，要由军区党委负责。不仅如此，另一方面同样性质的错误，还擅自逮捕已经站在革命群众方面的自治区党委书记高锦明、权星桓、康修民等同志，并宣布他们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他们是中央批准的自治区党委书记嘛！在组织上、在工作上某些方面，军区还得受自治区党委的领导，处理区党委这是中央的权利，军区既不向中央报告，也不经中央批准。怎么能宣布是三反分子，还逮捕他们。因为他们同革命造反派站在一起，保守派组织就赶他们、捉他们、打他们，他们只有找造反派。

这两件事是严重的政治错误，严重的无组织无纪律行为。军区在京的6位同志也承认这一点。”

周恩来继续说：“内蒙军区有些负责人，在中央指出他们的错误以后，两个月来仍继续采用两面态度进行对抗中央的活动。李天佑来了？忘了找曾山来。2月8日韩桐一死，曾山同志去了，去内蒙调查韩桐牺牲问题，已经查出来，是军区打的，弹头也拿

出来了，口径与军区子弹相同。人证物证都在了嘛。两方组织去调查了两天，检查时对四方都说清楚了。回来后，把帮助化验的女医生马上逮捕起来，他们说是家庭出身不好，社会关系不好，那位女同志来了吗？”

帮助化验的女医生田光站了起来。

周恩来问：“你身体好些吗？”

答：“好些！”

周恩来再问：“押了多少天？”

答：“30天。”

周恩来说：“看！化验一下就押了30天，这是内务部长叫她干的，你们就拘留审问。不是因为家庭关系不好，社会关系不好，就是让她说韩桐的死是学生打的，不是军区打的。这不是对抗中央吗？”

周恩来问田光：“是不是这样？”

田光答：“是这样的。”

周恩来继续：“就是这样子，面对中央、中央文革，就是这样，完全是搞两面派。这件事最突出了，逮捕的人还不放，到今天才放出来了吧？这就没法解释了。你看，这不是两面派？对这件事我们是很不满意的。拖了两个来月，远的地方扣人不讲，呼和呢？不能解释喽。铁路局还没放人嘛！直到今天我们部队人去才放出来，我们实行管制才行。这不是两面态度？我们对这个问题很不满意。我们解决各省问题，从来没遇到这么为难，用这么长时间。

无怪群众反映，证实了你们说的‘重庆谈判’。重庆谈判是

我们同国民党谈判，你们是什么，我们是什么？你们认为是重庆谈判，以为只要夺了实权中央就承认，那才不会呢！中央怎么能这样，只有国民党才能那样呢！你们把中央看成什么！把你们置于何地！我们是无产阶级政党，党领导枪杆子出政权。党的最高指示是符合人民最高利益的，党和人民的利益是一致的，是代表最大多数人民的最大利益的。”

周恩来接着说：“内蒙古事件，主要由王逸伦、王铎负责，其次由军区的某些领导人负责。为什么这么说呢？如果没有坏人煽风点火，不会把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开始是王逸伦，后来是王铎，王铎到北京还闹，王逸伦有些被中央看穿了。王逸伦、王铎要负主要责任。其次是军区某些领导人，在内部不完全点名，因为文件发表会到处传，我们要维护解放军整体的光荣，不都写出去好。我相信革命群众会理解的，我想这会得到革命群众的支持，这是第一部分问题。王逸伦是个坏人，我们和王逸伦谈过话，康生同志在一次谈话中识破了他。下面请康生同志谈谈。”

康生：“王逸伦是个坏人。军区某些负责同志认为他是革命左派。同时王逸伦也欺骗了一些群众和一些群众组织。同志们会想到，哪些群众组织被王逸伦所支持的，哪些组织的哪一些人支持王逸伦，要认识到是受了王逸伦这个坏东西的骗了。”

“我过去不认识王逸伦，一次在接见自治区党委会上，我见过他。一看，我见他根本不是一个共产党员，也不是一个普通人。他的一些表现，做法，神态，言行，我总觉得他像个特务。我问他：你到底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呢？他吞吞吐吐讲不清楚。我们这些人见共产党人多，接触国民党人也不少，”

周恩来：“味道不对！”

康生继续：“我问他：在哪入党？他吞吞吐吐的讲，日本占了赤峰，他不当小学教员，到北京就入了党。问他：什么组织？他说是特委会。内蒙有个特别委员会，那是工作组织，也不是党的组织。问他：你怎么入党的？介绍人是谁？他说叫李铁然、刘刚。李死了，刘在哪他不晓得。他入党又没有候补期，很奇怪。入党以后很快就到上海一个中央局训练班训练。为什么没有候补期？为什么一入党就要训练？入党的问题弄不清楚。这里也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他入党这个时候，正是国民党有一个中统局，国民党特务机构在北京负责人李铁钟，前两字和他介绍人的名字一样。此人是他的外甥，是他培养入党的，是一个叛徒，是国民党特务机关在北京的负责人。王逸伦是敌人，混进我们这里来，得审查，是历来怀疑的。

第二个问题，他去临河县委工作，曾经跑到北京来，那时北京机关被破坏了。他在这个机关住了几天没被逮捕，别人都被捕了，唯独他没有被捕，我们花费了时间了解。这是第二点。

第三、以后他自己与另外两个人一道从内蒙经外蒙跑到苏联莫斯科。我没见过他，很奇怪。我问他：你到苏联干什么？他说跑到苏联去学习了。我问他在哪里学习，他说在东方大学学习，更奇怪了。那时，我正在东方大学，当时有个制度，去苏联学习的，必须经过我审查。我不认识他，他说见过我，我们根本没承认他是中国共产党员，我看了他的履历表，根本不是在东方大学，而是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研究院。我不晓得这个组织。我问他是不是在苏联特务机关工作，否则，怎么能不知道呢？非党员去了，

如果没正式关系也是不可能的。”

康生详细介绍了王逸伦的历史。

周恩来接着说：“王逸伦是代表一种人。4月5日有个传单解剖了一下，现在，康老解剖的更清楚了。”

周恩来宣布了中央的决定：调原青海省军区司令员刘贤权同志任内蒙古军区司令员，吴涛任政委。在刘贤权上任前，由北京军区副司令员腾海清暂时代理内蒙古军区的工作。

周恩来还宣布中央的决定：“被打成反革命的革命群众组织，被打成反革命的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一律平反。被逮捕的一律释放，包括军队内被打击的干部和战士，包括地方和军队，包括各地区、各分区，统统按这个处理。对杀死韩桐的凶手，要依法处理。”

周恩来说：“枪杀韩桐的就是军区的柳青，内蒙军区一直不承认，有的人还想替他辩护，而且造谣说是学生自己打死的。吴涛，你打个电话要严加管制起来！”

吴涛答：“已经戴上手铐了。”

周恩来强调：“不准跑掉！跑掉你要负责任喽。这个在文字上就不要写了，你们知道，群众知道就行了。上次的电报你们登了小报，犯了错误。但是你们态度很好。提醒你们造反派注意，千万不要再加注解登出去了。对韩桐同志可以悼念，开个追悼会，但不要把这件事过分扩大。韩桐牺牲的有代价，内蒙古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了，夺权了嘛！新生了！他也是‘生的伟大，死的光荣’。”

周恩来号召：“现在公开批判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

权派，现在天安门也有大字报了，去年我还劝，现在我就不劝了。”

“王逸伦实行隔离反省，实际上今晚已逮捕了。”

“王铎停职检查，交给群众斗争批判。你们负责带回去，保证按政策办事。”

郝广德：“我们红卫兵带回去，保证安全。”

周恩来说：“夺权要一个部门一个部门的解决。铁路不是已经进行军事接管了，报社当然不能现在这样继续下去。”

接着，陈伯达、肖华讲话。

会后，中央以《中共中央关于处理内蒙古问题的决定》，作为中发（67）126 号文件下发。

## 第 584 回：再接见，北京中学生代表　受嘲讽，蒯大富□为尴尬

4 月 12 日这天，不仅大学生在北京大学发生了武斗，北京中学生也组织了著名的“四一二行动”。这天，“四三派”几万人在北京地处故宫东华门外的 27 中集会，“炮轰李钟奇”。整条东华门大街被挤得水泄不通。集会的高潮出现在中午，清华“井冈山兵团”的宣传车来到北京 27 中学的校门口，车上的高音喇叭反复广播“清华井冈山支持北京四三派”的声明。

事发突然，北京中学红代会和“四四派”措手不及，他们把“四三派”的这次行动称为“412 事件”，各个中学的军训团被当时的的局面搞得无所适从，已经成立的中学红代会则面临被“拆台”的局面，他们都对蒯大富及其清华“井冈山”支持中学“四三派”的“反军”、“拆台”的行动表示不满。这些不满的意见很快就反映到中央文革。4 月 13 日晚上，戚本禹、张春桥和刚刚接见完北京大专院校红代会的谢富治，又一起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北京中学生代表，部分大学生代表也参加了接见。

接见一开始，蒯大富就成了被嘲笑的对象。

戚本禹问：“蒯大富，听说你支持刘刚拆中学红代会的台的大字报？”

蒯大富马上予以否认说：“没有看这张大字报。”

李冬民讥讽说：“蒯大富很‘关心’中学文化大革命运动。”

众人大笑。

戚本禹对蒯大富说：“原来大家对你的态度很好，现在为什

么对你有这么大的意见？”

那些中学生起哄说：“蒯大富可以代表刘刚。”

戚本禹为蒯大富解围说：“不要这么说，蒯大富怎么可以代表刘刚？怎么样，你们双方各派一个代表把你们的观点简明的说一下，简单一些。中学生最近打得很厉害，今天中央文革小组派我们来讲讲意见。意见代表中央文革小组，指定由我来讲，谢富治同志是市革委会筹委会主要负责人，他有些看法和意见和我们一致，他也来讲讲。总的意见经过讨论，具体讲法没一块讨论过，仅供你们参考，有意见就不要在这儿讨论了，下去讨论。这并不是压制民主，对的接受，不对的可以不听。”

接着戚本禹讲了 3 个问题：一是如何对待解放军；二是阶级观点和阶级路线；三是中学红卫兵的光荣战斗任务。

他说：“如何对待我们伟大的人民解放军。这个问题一说大家都知道，要爱护解放军，……现在满街贴炮轰李钟奇的大字报，我们是不赞成这样做的，当然我们也不赞成说炮轰李钟奇的人是指向无产阶级司令部，但不赞成把矛头指向李钟奇。江青、康生、陈伯达等同志都不赞成……蒯大富也不赞成……。”

“蒯大富就曾经犯过很严重的错误，错误不小，你们的错误比他的小，谁还有不犯错误的？大风大浪里学游泳，谁还不喝几口水？……我就犯了很大错误，叶向真我曾经认为是左派，但看错了。你们为此就能说我就是刘邓司令部的人吗？你们不会这样说的，你们对我好。”

张春桥插话说：“上海蔡祖泉开始有些‘保’，后来自己改正了，我说了几句公正的话：‘既然人家改正了，就不要揪了。’人

家说我是蔡祖泉的后台。”

戚本禹：“什么东西不要乱上纲，否则就不好办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一小撮，不要看成一大片，这样就会打击群众。”

“我建议你们北航‘红旗’和清华‘井冈山’要正确对待解放军，不然就会重犯历史错误。你如果重新把矛头指向解放军，把和解放军的矛盾公开化，那就不错才怪？！那时就不好对你讲话了，因为已经有先例。”

“最近我发现中学生水平很高，但在对待解放军这个问题上，大学比中学高。”

那群中学生可不干了，纷纷嚷道：“蒯大富可不高！没有调查胡乱支持。”

戚本禹说：“蒯大富的问题你们可以帮助，人家改正错误，就允许人家改正嘛！”

中学生不依不饶的问道：“他怎么老错呀？！”

戚本禹：“刘刚给红代会贴的大字报不好，他只要收回就可以。”

中学生：“有人说李冬民是改良主义、右倾机会主义，亲‘联动’……”

戚本禹：“我不赞成说李冬民是改良主义，右倾机会主义，李冬民是反‘联动’的嘛，他怎么能亲‘联动’呢？但不能去反对刘刚，她也是好同志，大家通过讨论分清是非就算了。我建议你们两边不要再算这笔帐，不要再打了，好不好？你们对解放军和军训提了很好的意见，李钟奇支持你们，但贴李钟奇的大字报

不是有功，傅崇碧不要整他们，他也不会，他是好人。两派不要互相埋怨了，我看你们有些同志还不如五六百年前的好汉，那时候没有毛泽东思想，不打不成交，李逵和张顺打架，后来宋江来了，说别打了，都是弟兄，上山喝酒去。你们不要去喝酒，但你们一定要联合，你们不要一点毛病就算老账，否则太对不起毛泽东思想了。那时李逵没有读毛选，毛主席语录一条也不会背。”

“现在‘新北大公社’和地质‘东方红’打架，我特别不满，干架，你们都是一家人，你们内部有矛盾，可以和稀泥，内部矛盾分清是非，就要和稀泥，你们不要怕和稀泥，这不叫右倾投降主义，这不叫和稀泥，他叫，你就和吧，你别怕。”

“我们一定要正确对待解放军，解放军从在井冈山建立到现在都是正确的，……把矛头指向解放军是大的错误，就像攻击毛主席、林副主席、中央文革一样。”

“另外，我们希望同志们注意，中央文革不赞成大批同学出去，你们应该发一个通知，不应该再派人出去了。因为中央有明文规定，停止全国大串联，这是中央的指示，请遵照执行。可派几个红卫兵记者，但不要以中央文革的名义，了解一下情况就可以了。”

“我们知道，中学运动一直就围绕阶级路线在争论，开始是反动血统论，后来是反动的出身论。大家很关心这个问题，我仔细讲究了这个问题。这不是一个简单问题，也必须用阶级观点来对待成份。毛选 1279 页说得很清楚：‘在整党问题上，关于既反对忽视成份，又反对唯成份论的宣传……’这两边的倾向都是错误的。开始是反动对联的出现，唯出身论，伯达同志说，这是封

建的。”“有些人长期做官当老爷，影响了自己的子女，使他们自己认为血统高贵。人家不同意他，他就‘打、砸、抢’来压人，这是一个历史的悲剧。他们生活条件优越，忘记了劳动人民，走上了反动血统论的道路，所有的同志，红卫兵，特别是老红卫兵，更要特别注意，但这悲剧还没有结束，现在有许多人还不觉悟，还搞‘打、砸、抢’，有些人被关到公安部，有些人还没有放出来。”

“清华附中红卫兵写过‘三论’写得比较好，我对他们有感情，就到他们学校去了。找他们座谈。会后他们散发传单，说我没有汽车，坐王力的汽车，还不知从哪儿听说我是 17 级干部，说他们家趁俩。我没有汽车，我很高兴，他们分三、六、九等真可悲！八一学校的同学，连玻璃自己都不擦，出来见有人扣子没扣，就说是流氓，把人打一顿。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确实很可悲！还和他老子一块看帝王将相的影戏受影响很深。做了 20 世纪的堂吉诃德，他们还想翻案，说什么 10 年翻案，20 年掌权。我看他是掌不了权了！”

戚本禹接着又谈到遇罗克的《出身论》，他说：“我看《出身论》也不对，有很大错误，是大大错误的！它的错误就是否定阶级观点，否定阶级分析，否定阶级出身对人的影响。他是用客观主义伪装的资产阶级观点来反对血统论，结果同血统论走到一起，攻击社会主义制度，说在我国产生了种性制度。否定阶级分析，抹煞阶级观点，企图从根本上抹煞阶级出身。毛主席说：‘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它否定了阶级烙印，它完全否定了一个人

家庭出身对他本人的影响，否定阶级地位。我们不是唯成分论者，我们号召不同出身的人都要在大风大浪中改造思想。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要背叛他们本家庭所处的阶级地位。而《出身论》却号召人们不讲这些，它实际上就是彭真反党集团所歪曲的‘重在表现’，它煽动不要做外围，实际上用资产阶级观点来反对血统论，煽动部分青年对党不满，向党进攻。这是大毒草，我希望同志们不要上当！”

中学生说：“《中学文革报》已被取缔了。”

戚本禹：“光取缔不行，要批判它的反动思潮。”

中学生：“现在有些学校，一提出身就是血统论。”

戚本禹：“说明有些人在反对血统论时想混水摸鱼，进行煽动，我们要注意这些。我们要紧紧抓住毛主席的两点：既反对唯成份论，又反对忽视成份；首先要看出身，但不光看这点。他们出身不好，但欢迎他们造反。但不能否定出身，不能否定阶级分析，不能否定一个人在阶级社会生活中所受的影响。”

戚本禹又反过来批评蒯大富，他说：“在斗、批、改方面必须有经验。清华大学没有，你蒯大富太不高明，你们学校也在打内战，现在‘井冈山’某些战斗队又在批判《红旗》评论员文章。蒯大富没有领导好，你怪谁？怪你！本来‘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是不对的，你不应该批判《红旗》评论员文章，应该好好学习。《红旗》是代表党中央的，不是代表林杰或某一个人的。”

他说：“中学红代会不要学习大学红代会，他们那样不好，反刘邓路线没那么大劲儿，可打内战却那么带劲儿！放着整个刘邓路线不管，口号喊批判刘邓路线，可实际上不管。现在你们中学

内战还在扩大，‘联动’不管，却打内战。谢富治同志很生气。”

张春桥说：“我没有多少好讲的。我们商量过的戚本禹同志都讲了。我讲一点意见，全国红卫兵都在看着北京，……我们希望你们一定走在前面，随时给我们提供经验，成为我们的模范。我说几句心里话，这两天我真有些担心，大专院校那样打法是错误的。

有同志递条子说炮打李钟奇不是炮打解放军，刚才戚本禹讲了，李钟奇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李钟奇是好同志，但也说过一些错话，《十六条》已经讲过。要把讲过一些错话，做过一些错事的人与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严格区别开来，今后你我都会说错话，现在满街都有说李钟奇是‘联动’后台的大字报，‘联动’后台就是反革命，那你还不如说他是反革命。……我们的意见并不强加于你们，我们所谈的问题都是大问题，望你们考虑。现在一定不能离开大方向，离开一点，航向就错了！有些单独看来还是对的，但要和大方向联系起来看就不对了。我没有更多的话，我希望首都大中学生紧紧掌握斗争大方向，为全国做出榜样，全国都会跟你们走。你们一开红代会，全国都在准备开红代会。红代会的大方向应该肯定，你们要求改组，我不了解情况，……只要大方向对，不要怕有缺点，有错误，已经做了的就不能像文章一样改来改去，我们可以经过共同努力，搞好一些。现在天津也正在闹这件事，三个会，中学闹得最厉害，里边有缺点，我想这是难免的，不可能一下子就搞得那么好。我们也希望你们在这方面搞好。总之，我希望你们能成为全国的模范，全国的榜样！”

谢富治也表达了相同的意思，即“戚本禹同志和张春桥同志都代表中央文革讲了话。”

他还说：“有人递条子说炮轰了李钟奇应不应该检查，炮轰了李钟奇要以高姿态自我批评，我看不必了，轰一轰对解放军也有好处，今后不要再轰了，明天不轰就好了。解放军对你们是可以理解的，不要检查了。”

戚本禹插话：“愿意检查就检查，不强迫。江青同志最近坐汽车在北京转了一圈，看了炮轰李钟奇的大字报后很不满意。中学红代会应用大字报给糊上。”

谢富治：“我不同意检查，我不同意，不同意轰李钟奇的人压轰李钟奇的人。另外，别的同学也应高姿态，不要再提这些人贴大字报的事了！”

最后，傅崇碧表态说：“同学们，刚才戚本禹、张春桥同志和谢富治副总理讲了，我认为同学给卫戍区贴大字报是好事情，对我们是一个鞭策，我们认为很好。有些意见我们认为很对、很好。我们一定要改正错误。……我们欢迎大家提意见，批评一下没什么，有问题多联系，多帮助。”

14 日凌晨，接见结束。戚本禹、张春桥、谢富治的讲话旋即被张贴在大学、中学校园和大街上。传达中央指示不过夜是当年红卫兵和造反派的传统做法。

## 第 585 回：清华园，成立反蒯“四一四”批北大，周恩来□往五羊

北京中学生传达中央指示不过夜，清华园也闻风而动。

由于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成立后不久就出现了分歧，唐伟首先声明退出“井冈山”总部，而后形成了以“三纵队”为首的反对蒯大富的势力。他们在 1 月至 3 月，从“兵团总部能不能正确对待无产阶级司令部、能不能正确对待自己、能不能正确对待持有不同意见的战友、能不能正确对待运动初期受蒙蔽的群众、能不能正确对待广大的干部和教师”这五个方面对以蒯大富为首的“井冈山”兵团总部提出质疑。当 3 月 31 日《红旗》杂志发表了那篇经毛泽东亲自修改的评论员文章：《在干部问题上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批判》和调查员文章《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个组成部分（一九六六年六、七两月清华大学工作组在干部问题上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情况调查）》之后，清华大学“井冈山”下属的“井冈哨兵”和“金戈铁马战斗组”贴出了《红旗杂志调查员文章欺骗毛主席罪责难逃》的批判性大字报，认为《红旗》杂志的文章没有歌颂群众运动，为刘邓路线翻案埋下伏笔。蒯大富当天下午就以“井冈山兵团”总部名义表态，认为这张大字报是根本错误的。但是，中央文革的林杰和关锋还是打电话给蒯大富，指责他犯了政治错误。这就是 4 月 13 日晚上接见北京中学红卫兵时，戚本禹批评蒯大富，说清华“井冈山”批判《红旗》杂志的缘由。

而清华大学“井冈山”所属反对蒯大富的“东方红战团”，

则在 4 月 11 日，即清华大学批斗王光美后的第二天，北京六所高校“东方红”大闹北京大学的当天，他们就在颐和园后湖开会，决定成立“辩论干部问题的”的“串联会”。4 月 14 日，当听到蒯大富 4 月 13 日晚上受到中央文革批评的消息后，清华大学“井冈山”内的反对蒯大富的群众组织又立即于 4 月 14 日下午 15 时召开紧急会议，随后在会议结束的当晚，立即联合召开了“彻底批判干部问题上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实现革命三结合串联会”，成立了“414 革命串联会”。

“414 串联会”的组织成员主要是文革初期与“88 串联会”有深刻渊源的一些群众组织。其中的“东方红战团”，相当于蒯大富的“28 团”，可以说“东方红战团”一成立就是专门对付蒯大富及其嫡系部队“28 团”的。另外在“414 串联会”中的“三七战团”，主要是由“88 串联会”和“28 团”之外的那些对蒯大富不满的群众组织组成，也是“东方红战团”在 4 月 11 日颐和园会议后串联的。

会上，他们公布了《414 串连会第一次大会决议》，称：

“广大的兵团战士、革命群众、革命干部经过几个月的斗争实践，终于认识到：在兵团内、包括兵团总部内长期存在的两派斗争根本不是什么‘宗派斗争’，而是两条路线、两种思潮、两种世界观的斗争。”

会议一直开到晚间，选举了“414 串联会”核心组成员。大家公推的一把手是沈如槐。他是“东方红战团”成员。

二把手孙怒涛，文革初期的“蒯派”，很受蒯大富的器重。但最终成为“三七战团”的领军人物。

核心组里的陈楚三，也是“东方红战团”成员。他是中国共产党一大代表陈潭秋烈士的儿子，据说也是中央文革顾问康生的养子。江青在 1968 年 7 月 27 日毛泽东主席召见首都红卫兵五大领袖时，面对蒯大富等曾经明确表态：“清华那个陈楚三是个好孩子，要保护他”。

在“414 串联会”的核心组里，还有汲鹏、宿常忠、刘万章、张雪梅共七位成员。

这样，清华大学第三次形成了两派，两派都是造反派。

“414 串连会”成立后的第二天，就公开抢占校广播台。蒯大富闻讯勃然大怒，下令奋起反击。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房间争夺战，将“414”驱逐，重新占领广播台。此时在明斋楼前，双方又聚集了数百人，集体武斗大有一触即发之势。这时，蒯大富通过大喇叭传达中央文革指示：“停止武斗，爱护公物，通过协商解决不同意见。”

在“414”眼里，蒯大富既孤傲自负，又刚愎自用。广播台事件以后，他在大礼堂召开的“团派”干部会议上宣称：“‘八八派’越来越向它的反面发展，到今天具有反动作用。‘414’代表保守势力，是非法组织，是反革命复辟逆流的一部分。要揪出‘414’背后坚持不改而又屡教不改的走资派。”会上宣读《总部六点决议》，宣布“414”串连会“是非法组织，是反革命复辟逆流”。

由于戚本禹在 4 月 13 日晚接见北京中学生代表时批判了遇罗克的《出身论》，遇罗克不服，又上书毛泽东，明确表示：“戚本禹在 4 月 14 日的会上说我（一个最普通的学徒工）写的《出

身论》代表了反动的社会思潮，我不同意。”他汇报了《出身论》的主要论点，申明“家庭出身问题研究小组”就是自己，表示希望向中央系统汇报写这篇文章的大量依据和情况。

在此之前，为数不少的《出身论》支持者，包括遇罗克本人，都希望毛泽东能读到《出身论》。因为，据说毛泽东家庭出身也是富农，所以，他们认为，毛泽东一定会同情、理解他们这些出身不好的子女。基于这种希望，遇罗克曾给毛泽东写信，呈上洋洋万余言的《出身论》，并为自己的观点力争，希望给一个机会，让他向中央汇报《出身论》的写作依据，阐述《出身论》产生的社会背景。

然而奇迹始终都没有发生，却等来了 4 月 14 日的坏消息。他先后 5 次上书毛泽东，但是，5 封书信均无下文。遇罗克忧思万千，在 5 月 8 日给弟弟遇罗文的信中说：“只恐血统论根除旷日，革命前途受挫，多少青年不能发挥积极性，终成我国隐患！诚可痛矣！”

面对冷酷的现实，遇罗克无声地低下了头，他承认失败了。在给友人的一封信中遇罗克写道：“无论怎么讲，围绕《出身论》的斗争，我是失败的一方，也许是‘光荣’的失败，也许是‘暂时’的失败，但归根到底还是失败。”但是“这个问题终究是会解决的。把一部分人的尊严建筑在另一部分人的侮辱之上，是不合理的。这种尊严是维持不住的，这种手段也是不能奏效的。”在给另一位友人的信中他写道：“我们不是阴暗角落里的跳蚤，不过，并不是所有的事都那么脉络分明。整个一部历史，并非一册因果报应的善书，罚不当罪的决不是没有，即使将来真

相会大白于天下。”

他对伙伴们说：“把一切都放到我身上好了，你们不必去承担什么，因为那样也不会减轻我身上的罪名，反而只能给你们自己找麻烦。”

我们再看4月14日这天的北京。北京邮电学院“东方红”红卫兵揪斗胡乔木，彭真、陆定一、周扬、吴冷西等“陪斗”。邮电学院“东方红”还跑到已军管的北京邮电大楼，支持邮电大楼的“红革会”组织，与另一派在邮电大楼发生了武斗。

4 月 14 日，地质“东方红”、师大“井冈山”等组织以“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代表大会委员会”的名义，发表了一份《关于目前局势的严正声明》，批判“新北大公社”，称：“最近在新北大校园里出现了一股反对谢富治同志、影射中央文革、攻击兄弟组织的歪风”。

“新北大公社”寸步不让，当天就以“北京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新北大公社、新北大公社红卫兵总部” 的名义发出针锋相对的《严正声明》。说以“红代会”名义发出的声明“是在没有得到红代会核心组组长、我校驻红代会代表聂元梓同志最后同意之下做出的，因此我们郑重声明，这个所谓‘严正声明’对我校完全没有约束力。”“新北大公社”称地质“东方红”、师大“井冈山”等组织的声明“完全是混淆是非，颠倒黑白，造谣惑众”，并为此向对方提出“最强烈抗议。”

“新北大公社”的声明中有这样一段话：“谢富治同志如果有缺点错误，是完全可以讨论批评的，这并不等于反对谢富治同志，更不等于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一小撮别有用心的人别想

在这个问题上捞一根稻草。”

就这样，继北京中学“红代会”分裂为“四三”“四四”派后，北京大专院校“红代会”原有的矛盾也就此公开化，两大派初步形成,当时被称为北大派、师大派。

当天，中央文革小组再次接见北京红代会各院校代表，江青说：

“同志们，战友们，大概就是七、八天前，我们还在一起开会，还和和气气的，几天就吵起来了，还武斗，我心里感到很不安。

一、我首先讲一下，我们小组是一致的，我们今天全来了，就戚本禹去解决邮电大楼的武斗，过一会就来，和谢富治一起来。这个一致是表示在主流上的，不要想钻空子，你们要懂得，小心有人钻空子，挑拨离间。

二、想讲一下我个人对形势的一些看法。6 号《军委十条》下来以后，革命小将，革命战友心情都飞动起来了，这一点我们是可以理解的。有一条，这《十条》下来后，很容易，很可能犯错误，一定要牢记 1·28 军委《八条》还是有效的。我认为目前的苗头是放松了对敌斗争，对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斗争。上次座谈提出这个问题，我也讲过，批判应该上纲，这个纲应该上到对准党内最大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可是现在矛盾不集中，很分散，很难斗倒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走资派。第二个苗头是这几天指向军队。同志们，我们不依靠我们的军队依靠什么？有人贴谢富治同志的大字报，他是军委常委。最近几天，我围城转了一下，贴李钟奇的大标语超过了刘少奇的。

他我不了解，我调查了一下，他还是好同志，只是说错了话，要打倒他这对吗？一定要谨慎，有意见可以提，但不要上街，叫坏蛋，外国记者都搞去了。打倒李钟奇的大标语超过了打倒刘少奇的标语，这是反常的，有人钻空子，你们不知道，上了当，是我感觉到的。

三、有人使你们打内战，还不自觉。邮电大楼已经军管，北京邮电学院‘东方红公社’支持邮电大楼的‘红革会’，还发生了武斗，完全不维护解放军的荣誉，已经军管了，还去武斗。两三天前，我、伯达、戚本禹叫他们不要搞了，要树立解放军的威信。可是他们还在干，北邮‘东方红’就是支持，就是打。谢副总理告诉我，昨天搞了一天（指北大和地院），要一起谈，地院‘东方红’不干，要单独谈，单独谈也崩了。今天我们等了好久，你们还不来，我们不是战友了吗？”

这时有人澄清：不是地院“东方红”不来，是“红代会”给地院“东方红”的电话打晚了。

江青接着说：“炮打谢副总理是不妥当的，是错误的。但不能全赖在聂元梓同志身上。按她的斗争经验，生活经验应该给你们做出榜样。”

他对聂元梓说：“你应当做触及灵魂的检查。但打倒谢副总理，一切都归于聂元梓，我没有证据。你们开广播车去北大是不妥当的，有意见可以提。斗王光英是好事，王光英是什么人，你们知道吗？王是天津的大资本家。斗他是好事，应该斗。北大的事情很复杂。孔凡做过邓小平的秘书，他反对聂元梓，他难免做挑拨的事，使你们不团结。总而言之，现在是一片大好形势，你

们心里高兴，但放松了警惕，放松了对敌斗争，计较个人主义，小团体主义。我今天是批评你们的，特别是聂元梓同志，她斗争经验，生活经验比你们多，应该做出榜样。这次她应该负多的责任，但你们不能把大字报、大标语上街，使香港的报纸又登上了，干了亲者痛，仇者快的事。

‘新北大’到处出刊物，净闯祸。凡属军管，那个单位就是有错误，有缺点，要维护我们自己解放军的威信，有意见可以提，不能把解放军不放在眼里。广州对外贸易展览会被搞了。总理今天早晨乘飞机亲自去解决。”

康生：“明天要开会，今天给搞了，所以那里军管了。”

江青：“李钟奇也不要贴了，他就是说错了几句话，你们就打倒，搞错了方向，放走了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拿出革命者的气魄把北京搞好，我完全信赖你们，我们共患难，我可以坦率的提出意见，我不对也可以提。像这样我很焦虑，邮电大楼打，北大也打，这不对，乱贴标语，不能这样，矛头不能对准解放军。军委《十条》对左派是极大的支持，极大的鼓舞，不能忘了维护解放军的荣誉。你们打内战，外国人登了。现在北京红卫兵自己打自己，成不了大器，那糟了，我不希望看到这些。你们能答应我不把武斗搞出去吗？”

众：“能！”

江青：“那就好了，我就放心了。我先退席，有点感冒。”

陈伯达：“要叫李钟奇、谢副总理的大标语、大字报明天就看不到，要对准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请大家继续发言。”

随后，姚文元、康生、谢富治、陈伯达、王力都讲了话。

姚文元说："正如江青同志所讲的我们小组在政治上、主流上是一致的，我们紧紧团结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下面，为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而斗争，不容许任何人挑拨离间，不要上当。"

"有人提出摘桃子的问题，摘桃子只能阶级对阶级摘，对敌人是寸权必夺，夺回到毛主席手里，而不是为自己小团体夺权。"

康生说："谢副总理是全军文革小组副组长，这样一个党、政、军的领导同志，同志们随便写大字报传单上街，这是极大的错误。说谢副总理是邓小平的什么人，"

王力："谢副总理是最早的用文字揭邓小平的问题，斗争很坚决。"

康生："这种东西出现是罪恶，是我们的耻辱。"

"有人对中央文革这样推测，那样推测，还分几派。我们小组是一致的。"

陈伯达说："现在好像流行一种摘桃子的理论，这个理论是毛主席在日本投降以后提出来的，是指抗日胜利的桃子是落在人民的手中还是落在美帝走狗蒋介石手中。""这是阶级斗争，不是哪一小团体和一个小团体的斗争。什么叫摘桃子？不从无产阶级的观点看这个问题就完全错了。"

4 月 14 日，康生给聂元梓写条子，说："天津南开大学卫东组织了调查了彭真、刘仁等调查团，从初步调查结果，看到旧北京市委内隐藏了许多叛徒。我想新北大应当组织调查组，系统地调查彭真、刘仁等黑帮的具体材料"。

聂元梓依照康生的信，组织了“北京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揪叛徒兵团”，又称“新北大公社第二战斗队”。

4 月 14 日后，在中央首长的指示下，北京大学校文革开始进行第二次整风。

由于广州两派矛盾一触即发，为了保证广州春季交易会不出意外，4 月 14 日凌晨，周恩来刚刚结束对内蒙古代表的第六次接见，立即致信毛泽东、林彪，告知自己将亲赴广州，以确保春交会按时开幕。他在信中写道：

“对广州交易会虽有五点指示发出，但据黄永胜报告，情况较紧，而军管会又难于控制。因此，今晨在解决内蒙古问题之后，特约外贸部和外贸学院两造反派商谈，他们愿意派人去协助解决。考虑到目前各院校和机关造反派多忙于内争，因而影响了广州交易会各公司、各馆的内部领导，并与各地方造反派形成派别”，“如不立即劝阻，对明日开幕，极为不利。我现定今晨 7 时同黄永胜同志飞广州，亲往解决此事。”

4 月 14 日清晨，一架从北京飞来的专机，穿过薄薄的云层，在广州白云机场降落。舱门打开，周恩来和黄永胜一起步下舷梯。广州军区领导刘兴元、陈德、温玉成在机场迎接他们。

周恩来下榻广州军区大院留园 7 号后，立即和广东党、政、军负责人谈话，省委只有林李明一人出席。

经与军区和军管会研究后，周恩来决定，从 15 日晚上开始，连续三天召开群众组织座谈会，两派代表共约 200 人，由省军管会负责组织落实。会场在珠江宾馆大楼二楼会议室。

当天下午，周恩来在珠江宾馆大楼二楼会议室接见参加春交

会的各方面负责人和群众组织头头。他在讲解中央关于开好春交会的 5 点指示之后，向与会者指出：“明天开幕的交易会，应该看成是一个新的战役，要保证把这个会开好。对解放军这个集体要尊重、信任，不能把批评解放军的大字报贴到外面去。干部是党和国家的财富，他们的丰富经验也是我们需要的，要让他们站出来，不然，我们的工作就难以继续。”

当晚，周恩来出席广州地区各群众组织代表大会，有一万多人参加。中山纪念堂是主会场，市体育馆是分会场。他先到分会场与群众见面，然后在主会场发表长篇讲话，逐条讲解关于开好交易会的 5 点指示，并要求群众支持解放军的军管工作。

讲话之后,周恩来要求中央文革广州记者站记者次日上午向他汇报广东省和广州市文化大革命情况。

此时，已经过了午夜，周恩来又驱车赶往海珠广场，到交易会产品陈列现场视察。当时问题最多的是工艺品展厅。参展团中的一些群众说有些展品是“封、资、修”的东西，有损中国形象，不能展出，更不能出口“毒害”世界人民，甚至在一些展橱上贴了封条。经周恩来现场说服，这些群众才同意扯下封条。

## 第586回：答“八□”，拨地□八万款□ “乱”与“治”，贵州红代会被冲

4 月 13 日，中南海“南海卫东造反队”见刘少奇还没有写出书面交待，再次批斗了刘少奇。刘少奇在回答问题时争辩说：“我不反革命，也不反毛主席。毛泽东思想是我提出来的，我宣传毛泽东思想不比别人少。”“我现在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审判我，要经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撤职。”

有人质问：“刘少奇，为什么你要在抗日战争爆发前夕，大肆宣扬活命哲学、投降哲学、叛徒哲学，指使别人自首变节，要他们投降国民党，叛变共产党；公开发表‘反共启事’，宣誓‘坚决反共’？”

听这问话，刘少奇终于难以克制，修养颇佳的他，这次也愤怒地喊道：“这个问题简直是岂有此理!61 人出狱之事，是经过党中央批准的。在日寇就要进攻华北时，必须保护这批干部，不能再让日寇把他们杀了。当时王明路线使白区党组织大部分受到破坏，这些同志是极宝贵的。中央许多领导同志都知道，早有定论嘛!”

当被问到：“这事是中央谁批准的？”

刘少奇说：“是当时的总书记张闻天，毛主席也知道。”

4 月 14 日，刘少奇交出“向南海卫东革命造反队的检查”，他在检查中写道：

南海卫东革命造反队的同志们：

你们 1967 年 4 月 6 日给我的紧急通令中第二条，限刘少奇

于 4 月 10 日以前写出书面检查，具体回答戚本禹同志的文章中所提出的八个“为什么”的问题。现答复如下：

一、1936 年 3 月，我作为党中央代表，到达天津，当时北方局组织部长柯庆施同志向我提出一个问题，说：“北京监狱中有一批同志，他们的刑期，多数已经坐满，但不履行一个手续，就不能出狱。”柯问我：“是否能履行一个手续？”我当时反问柯：“……你的意思如何？”柯说：“可以让狱中同志履行一个手续。”我即将此种情况写信报告给陕北党中央，请中央决定。不久就得到中央的答复，交由柯庆施同志办理。当时党中央的日常工作是张闻天处理，据张闻天交代，他当时没有报告毛主席，也没有在会议上讨论，就由他擅自作了答复。当时我知道狱中有殷鉴同志，其余的人都不认识，也不知道有多少。以后如何办理的，我也不知道。殷鉴同志出狱后，已是 1937 年春，我在柯庆施同志家里见过一次。不久，殷鉴同志因病去世了。他们具体履行了什么手续，我没有过问。最近我看了造反报，才知道他们登了“反共启事”，对于这件事，我负有一定的责任。

二、抗日战争胜利后，1946 年 1 月，我党同国民党达成了停战协定，以后又召开了旧政协会议，通过了“和平建国纲领”，在 1 月 12 日，我党在停战命令上就提出了“和平民主新阶段”。2 月 1 日我根据中央讨论的意见，写了一个“关于和平民主新阶段”的指示，这个指示是有错误的。

三、在解放后，我极力主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没有反对。1951 年，我批了山西送来的有关农业合作社的几个文件，批是错误的。一次中央会议上，听过邓子恢关于合作社问

题的报告，没有批驳他的错误意见，他就大加发挥，砍掉了 20 万个合作社，以后毛主席批评邓子恢的错误，发表了关于农业合作化的很重要的文章，掀起了农业合作化的高潮。

四、1956 年党的八次代表大会，我代表党中央向大会作了政治报告，是讲了国内阶级斗争的重要形式，是反映国内主要阶级矛盾……进行“三反”、“五反”斗争，是因为有许多资产阶级分子进行有害于国计民生的非法活动，不能不坚决加以制止。但是在这个报告的另一个地方说“我国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解决了”，这句话是错误的。八大关于工作报告的决议也说：“现在这种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这是说明我国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矛盾已经基本解决，几千年来的阶级剥削制度的历史已经基本结束。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基本建立起来……我国国内主要矛盾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决议的这些说法毛主席当时就反对，但已经来不及修改。此外，在八大政治报告和决议中都没有提出毛泽东思想是全党的指导思想，是全党全国的指导方针，这是错误的，是同七大的立场退了一步。

五、三年困难时期我没有攻击三面红旗，在一次中央会议听见邓子恢说安徽“责任田”有许多好处的话，我没有批驳他，他就到处乱讲。“三和一少”是个别同志提出初稿，尚未提到中央会议上来，当时我尚不知此种意见出笼，事后是从那个同志保险柜里拿出来的。

六、1962 年，《修养》再版是有人推荐，有人替我修改的。我看过在《红旗》和《人民日报》上发表了，我应负主要责任。

七、1964 年夏，我在几个城市作过讲话，其中有形“左”实右的倾向。在去年 7 月 23 日我在检查中已作详细说明，不必重复。

八、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为什么提出和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我现在也还不知道为什么，也没有看到一篇能够完全说清楚为什么犯错误的文章。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批判了我的错误之后，又有人犯同样性质错误，可是他们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将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阅读毛主席指定我要读的其他书籍和报刊的有关文章，以便能够完全在思想上弄清楚这个问题，并且认真地在革命群众实践中加以检验。那时我才能答复我为什么在这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犯了路线错误，又如何改正这个错误。

工作人员将刘少奇的检查原件上送，并抄了一份大字报在中南海内的大字报棚里贴出。几个小时后，那张大字报被一群造反派群众当场撕成了碎片。同时传出上面的指示：“今后不要搞面对面的斗争”。

4 月 3 日，北京地院革委会成立后，许多老干部到地院避难，请求地院“东方红”帮助他们向中央申诉。其中有邓小平的弟弟、武汉市副市长邓垦，四川省副省长、藏族老红军天宝，四川宜宾的刘结挺、张西挺，《红岩》作者之一的杨益言。

地院还组织了一个调查组专门到重庆调查罗广斌之死，后来，在地院召开了一个为罗广斌伸冤的大会。

一天，中央领导接见时，江青批评王大宾说：“你把全国的一些叛徒、特务、走资派窝藏在地院。你晓不晓得，《红岩》小

说写的华蓥山游击队，许多人都是叛徒。”

王大宾不服，当场辩解。主席台上的周恩来、李先念、谢富治看着王大宾。

这时，康生说：“王大宾是个学生，许多事他不了解。但他们也保护了许多好干部。”

散会后，谢富治把王大宾留下，让他和自己一起坐车来到公安部谢富治的办公室，把王大宾狠狠批评了一顿，说他“今天在会上的表现不好。”

谢富治说：“你这个犟脾气。首长讲话，批评你时千万不能当面顶的。有什么不同意见，会下再讲。”谢富治让王大宾吸取教训，然后又用车把他送回大会堂门口。这时，地院与王大宾一同前来参加接见的李贵等人还在那里等他。一见面，他们就说：“我们还以为谢副总理把你弄走了，一下回不来了呢。”

4 月中旬左右，地院负责财务的干部找到李贵汇报说，地院现在接待了这么多外地干部，他们在这里吃、住、看病都要花钱。国家拨给地院的钱是死的，已经很紧张，不够开支了。这些干部自己带的钱也早已花光了，家属又不敢给他们寄钱。怎么办？是不是向中央反映，请求给我们拨些款帮助一下？

李贵找王大宾商量。这事找地质部肯定无望，只能找财政部。李贵让王大宾有机会向周恩来汇报一下。

王大宾先向北京市主管文教的丁国钰作了汇报，请求财政部拨款。丁国钰表示支持，并给王大宾出主意，让他先找谢富治，请谢富治向周总理汇报。

于是王大宾又来到公安部找谢富治，他听后满口答应。

不久，李先念亲自批示，批给地院 8 万元人民币。

4 月 11 日，贵州省召开红卫兵代表大会。在开幕式上，李再含代表省革委会致辞。他在向大会表示热烈祝贺之后说："红卫兵小将们，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战友们！北京有个金太阳，毛主席是金太阳。我是贵州的小月亮。有人说，要打倒李再含。我是不倒翁，打不倒……"话音未落，会场上吹响了冲锋号。随着冲锋号声，几个学生冲上主席台，要抢话筒发言。省体操队冲上主席台,扯下了主席台上方的会标。会场顿时混乱，代表们纷纷离场。主持人赶忙宣布散会。接着来自贵阳市和各地州市的 77 个单位共 5000 多人举行了游行集会，并通过致省革委、省军区的公开信，要求省红代会暂时休会，遭到拒绝。这就是当时贵州著名的"411 事件"。事情的起因还是在贵州夺权时留下的。

2 月 24 日，中科院贵阳地化所孙昌德、徐英年、郭其弟等人将贵州与夺权"总指挥部"有矛盾分歧的"八大院校联络站"、"贵医红卫兵．红旗"和《主沉浮》小报称之为三股"反革命逆流"后，3 月 5 日，省"总指挥部"又在的大会上宣布：《主沉浮》是"反夺权的舆论准备"，"八大院校联络站"是"反革命复辟的组织准备"，"贵医 2．26"是"反革命复辟的急先锋"。

3 月 7 日，"首都三司"驻黔联络站针对三股"反革命逆流"的说法，在贵阳市街头贴出两篇大字报：《大辩论，大联合----对贵阳大专院校学生运动的粗浅看法》、《点把火----大学生必须大乱》。清华"井冈山"一个战斗队也贴出《真正的反革命逆流来自何方》的大字报，在贵阳市大专学生中掀起了一场"乱"与"治"的大辩论。

这天，贵阳师范学院“六六”战斗团几个战斗队在“千钧棒”79 号寝室开会，决定就夺权以来发生的一系列问题“去找李再含”反映，结果戚休等人说他们是“去抓李再含”。

3 月 23 日，李再含到贵州大学，受到热烈欢迎。他认为贵州大学“九一五”等造反组织宣布解散组织，实现回系归班大联合是个好经验，随后《新贵州报》介绍推广了“贵大经验”。

3 月 26 日和 3 月 30 日，《新贵州报》先后发表两篇社论《评“大学生必须大乱”的口号》和《再评“大学生必须大乱”的口号》，参与辩论。

“乱”与“治”的大辩论尚未停息，省红卫兵代表大会随即召开，于是再次激发了贵州省一场新的斗争。

4 月 10 日，贵州省在贵阳市六广门体育馆举行省红代会预备会，遭到“贵医 2．26 兵团”所属“东方红战斗团”、“鹰击长空”等战斗队及贵阳六中“狙击兵”冲击。因为贵阳医学院被允许参加省红代会的只有“工尖兵”的代表，而另一派“红卫兵．红旗”被冲砸后成立的“2．26 兵团”则被排斥在省红代会之外。

会议被冲击，使会场内许多代表建议暂时休会，但是未予采纳。于是贵州工学院、贵阳师范学院等 7 大院校的代表向主席团提出抗议，并就如何开好省红代会的问题与省革委负责人先后协商 4 次无效。4 月 11 日，贵州红代会开幕式照常举行，于是贵阳师范学院、贵州工学院、贵州大学、贵州农学院、贵阳市六中等主张暂行休会的红卫兵，支持贵医“2．26”，再次组织了冲击会场的行动。

贵州省红代会很快成为贵阳市街头的舆论中心，并迅速传到

四面八方，传到贵州大学和贵州农学院，同学们议论纷纷，许多同学从花溪进城了解情况。4 月 12 日，《人民日报》刊载《解放军报》供稿的贵州省军区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的体会。但是，贵州反对“红代会”的呼声依然高涨。就在 4 月 12 日这天，要求休会的红卫兵和学生在贵阳市举行了大规模的示威游行，人数达一万多人，高呼口号：“红代会，大杂烩，不能开，快休会”。

当晚，省革委会也组织解放军、公检法、机关干部、工人、居民等几万人，举行了更大规模的示威游行，口号有：“红代会，好得很，坚决支持开下去！”“打倒无政府主义！”“誓死保卫红色政权！”

这天，红代会会场紧闭，暂停开会。4 月 13 日，红代会恢复开会，但第三次被冲。

这天，贵阳师范学院出现“支红串连会”，即支持红代会串联会，从而也引发了反对召开“红代会”的“四一一”观点的学生组织出现。4 月 13 日这天,贵阳师范学院“六六战斗团”率先成立“四一一六六战斗团”。随之贵州工学院、贵州大学、贵州农学院也成立四一一“九．一五兵团”。其他各大中专学校和企业单位也相继成立了“四一一”组织。

4 月 14 日，贵州省红代会再次暂停开会。

## 第 587 回：四一四，太原炮轰刘志兰　事有因，英□怎么成叛徒

4 月 14 日，在太原五一广场、迎泽大街、新建路、五一路、府东府西街等大街小巷突然出现了一批署名“兵团”的大标语，内容是炮轰太原市革委会主任陈守中的妻子、山西省革委核心小组成员、核心小组办公室主任、原山西省农村委员会主任刘志兰的，内容有：“打倒刘志兰”，“刘志兰是政治大扒手”，“刘志兰是山西谭震林式的人物”等等。同时，在太原市革命委员会和省革命委员会门口贴出了署名“兵团司令部”的题为《四一四决议》的大字报，揭发刘志兰对抗中央文革，派人到天津张贴炮轰李雪峰大字报的事情。

紧接着，太原机械学院“四野战斗队”、太工“永红战斗队”等组织也联合行动，说刘志兰是彭德怀线上的人，又说她是“太工红旗”的黑后台。太原百姓无不震惊，不知道发生了什么问题。

4 月 15 日晚上，“太工红旗”的李青山收到“太工红旗”单邦杰的电话说，刘格平 4 月 14 日下午从北京打来电话，指示要立即炮轰刘志兰；“太工红旗”是受刘志兰利用的右派组织，要在 3 天之内催垮“太工红旗”在内的右派组织；4 月 14 日出现的“兵团”炮轰刘志兰的情况，就是根据刘格平的电话，连夜开会决定参加这次行动的。

而刘格平的电话内容，是六中“32111”的一个负责人记在笔记本上后，被“兵团”的一人看见了。此人在 14 日晚上，将电话内容告诉了同班同学单邦俊。因为他知道，单邦俊是单邦杰

的弟弟，他让单邦俊告诉哥哥，小心跟“太工红旗”一起当了反革命，赶快退出“太工红旗”，迟了后果不堪设想。并让单邦俊的哥哥不要把此事告诉其他人。

另外，单邦杰妹妹的同学杨竹君也跑到单邦杰家里对他妈妈说，她亲耳听“红总站”头头郝庭云讲：炮轰刘志兰，3 天摧垮“太工红旗”。她说：“电话是刘格平从北京打到刘格平家的，当时老郝就在旁边。”她也是知道自己的同学单莹的哥哥单邦杰是“太工红旗”的，怕被当反革命给捉了，所以赶紧跑到同学家报告。

单邦杰的母亲问杨竹君：“电话可靠不可靠？”

杨竹君说：“老郝是什么人，一天在丁磊家里，这还会错。”

李青山相信单邦杰所告知的消息都是真实的，在当时的形势下，没有刘格平的授意，谁能在山西组织和发动如此大规模、如此统一的行动，特别是炮轰刚刚上台才几个月的“新生红色政权”的核心人物？李青山认为事态十分严重，立即召开“太工红旗”勤务员会议。许多队员也来旁听。李青山通报了情报的内容，大家研究了形势，决心迎接这一严重考验。他们做了最坏的打算，准备有 400 人退队，但即使如此，也决不屈服！

但李青山仍然不明白刘格平为什么要这样做，他百思不得其解。4 月 17 日，他写信给“太工红旗”派往北京的贾诚、曹昌盛，向他们通报这一新情况，让他们立即了解有什么背景。他在信上说：

14 日，突然间，兵团、永红、红心、太机四野等一齐动作，在全城贴出了数以万计的大标语”揪出山西的谭震林---刘志兰”，

“打倒刘志兰”，“刘志兰是政治大扒手”,“万炮齐轰刘志兰”，“刘志兰从核心小组滚出去”，“刘格平，张日清，刘贯一，袁振是坚定的革命左派”，声势之大,来头之猛，前所未有。而且兵团对太工红旗的态度一反常态,十分冷淡。这是什么原因,不清楚。有消息说,十三日晚，刘格平从北京打来电话,说太工红旗和省歌 11.28 是受刘志兰利用的,不能支持,要在最短时间内摧垮太工红旗。兵团可能已这样安排了。介入我院的解放军积极配合这一动作。十四日,大批红旗战士被找去谈话；丁政委告诉李宪林,杨进堂,声称:“现在是关键时刻,你们要揭发问题。”

……

令人不解的是,为什么正好在这样一个时刻,在批判 3.16 社论,矛头指向刘贯一的运动推向高潮的时刻,许多人把注意力指向军区的时刻,要突然抛出刘志兰？刘志兰究竟是一个什么人物?为什么要在最短时间内摧垮太工红旗?.....

局势空前的紧张。太工红旗的问题正在引起社会各界的极大注意。对于太工红旗,很快就有一场极大的战斗。山西的文化大革命,正面临着生死存亡的关头。

……

目前最重要的问题,你们一定要设法见一见张日清、刘格平,问一问他们对当前山西出现的斗争的态度,特别是张日清。有消息说,刘格平在北京见到了太工红旗的人了,不知确否。

一定要以最快的速度去见刘格平,张日清,特别是张日清。速来信或来电。

此致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敬礼

信封地址不要写北航，信可寄给何运昌

李青山

67.4.17

其实，此事的起因还在刘志兰身上。刘志兰对华北局书记李雪峰意见很大，她认为李雪峰是华北局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总代表。山西“112 夺权”后不久，刘志兰对太原六中“32111 战斗队”的主要领导人李金渭说：“李雪峰在华北局会议上把袁振打成伸手派野心家，把河北省委的林铁，内蒙古的乌兰夫打成黑帮。在北京市大搞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山西省委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都是李雪峰支持的，我们应该彻底打到李雪峰，清算他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32111 战斗队”的主要领导人李金渭、史纪礼、刘大康是在 1966 年 10 月，通过为袁振翻案认识了刘志兰和其丈夫陈守中。1966 年底社会形势紧张，刘志兰总希望他们经常去她家。1967 年 1 月 12 日山西夺权前后，他们和刘志兰接触就更多了。

1967 年春节后，刘志兰让六中“32111”收集李雪峰反对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材料。刘志兰是省委农工部负责人，对各县的情况熟悉，她说绛县县委书记周明山是李雪峰亲自抓的假的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周明山在华北局会议上跟着李雪峰和山西省委整袁振非常积极，是李雪峰和山西省委的打手。刘志兰认为，收集到周明山假学毛主席著作，真跟李雪峰反对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材料很重要。她告诉六中“32111”，绛县县委中哪些人支持，哪些人反对周明山和李雪峰。

根据刘志兰的指示和介绍，六中“32111”和“兵团”其他组织在 67 年春节后，派了好多人，多次去绛县收集周明山的材料。他们将收集到的材料都交给了刘志兰。

67 年 4 月上旬一天，刘志兰把“32111”的李金渭和刘大康叫到她办公室说：“李雪峰在北京市镇压学生运动被中央撤了职，现在李雪峰又到天津去了。你们到天津去同天津的造反派联合起来炮轰他，揭露他。”

刘志兰给了他们一捆子印好的传单，又给了 300 元钱做路费。临去天津前，李金渭为此事征求袁振的意见，袁振支支吾吾，未置可否。

其实山西的学生对炮轰李雪峰原本不太积极。他们支持的袁振、陈守中在省、市革命委员会中担任领导职务，他们也都翻了身，掌了权，已不受压了。但刘志兰是山西省党的核心小组副秘书长，又和他们很熟，学生们也很相信她，就接受了她交给的任务。他们回学校后，确定史纪礼和刘建才带人去天津炮轰李雪峰。

袁振听说“兵团”派人去天津揪李雪峰，就急忙找来刘灏和他的高参汤建中，让他们赶紧把去天津的“兵团”小将们叫回来，说“李雪峰去天津可是毛主席定下的人选，怎么能乱轰？”

史纪礼、刘建才到了天津后，迟迟没有行动。刘志兰在太原很着急，几次要李金渭催他们赶快行动。李金渭在太原也不知道天津的具体情况，不好向刘志兰交代。于是他和“兵团”司令部其他负责人商量后，刘灏、叶积凯、李改组、宋树训、刘大康等人又先后去了天津。但是，他们去了后仍然不见行动。后来，史纪礼和刘建才等竟然在天津贴出支持李雪峰的大字报。刘志兰知

道后非常生气，叫李金渭赶快把他们叫回来。

史纪礼、叶积凯、刘建才回来告诉李金渭，他们先到了北京，有的人北京一转车就去了天津，有的人则去了北京中央文革接待站，了解中央对李雪峰的态度。他们从中央文革接待站知道李雪峰去天津筹备天津市革命委员会是毛主席派去的，是毛主席的战略部署，于是对天津此行的目的有了不同的看法。大家在天津集合后，住在天津一个反李雪峰比较厉害的纺织厂，在那里进行了激烈的争论。

有的认为："就应该炮轰李雪峰，他是华北局的第一把手，华北各省市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厉害，责任是李雪峰的。"

有的说："中央文革小组的话我们应该听。"

这时，一个《红旗》杂志的记者找到了他们，一再提醒他们不要炮轰李雪峰，不要干扰毛主席的战略部署。于是，多数人的看法是："刘志兰叫我们炮轰李雪峰是不符合毛主席的战略部署的，我们不能听她的，不能给李雪峰贴大字报。"

就在他们还在为炮轰和不炮轰李雪峰争论不休时，天津的大街上却出现了落款山西兵团司令部"炮轰李雪峰"的大标语。这一情况促使史纪礼他们必须立即表态，于是就写了支持李雪峰的声明，落款是"山西革命造反兵团"，并抄成大字报。谁知，在他们向这家纺织厂索要浆糊准备将支持李雪峰的大字报贴出去时，却遭到工厂反对李雪峰群众的强烈反对，不仅不提供浆糊，还不许在他们这里再住下去。宋树训和刘建才等人就在天津市最热闹的地方劝业场买了浆糊，把声明贴在劝业场的大门上。

声明贴出去后立即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映。李雪峰知道后派

人对史纪礼、刘建才等人表示感谢。史纪礼等对感谢不以为然，认为自己只是按党中央和毛主席的路线办。

回到太原的史纪礼对李金渭说："刘大康听刘志兰的话主张炮轰李雪峰我不同意。刘大康一回来就去了刘志兰家汇报，我没有去，你和我一起去刘志兰家汇报吧。"

4 月 13 日晚，李金渭和史纪礼去了刘志兰办公室。刘志兰秘书让他俩在楼下会客室等，刘志兰正在楼上接待客人。可是他们等了两个小时刘志兰也没出来见他们。正当他俩等的有些不耐烦时，看到五中几个学生从楼上下来，他们就是在天津主张贴炮轰李雪峰大字报的人。这使李金渭和史纪礼非常生气，拔腿就走。刘志兰的秘书随即追了出来叫他俩回去，他俩不理，径直走出省革命委员会大门。

省革命委员会马路的对面是工农兵医院。楼上就有"兵团"的办公室，李金渭和史纪礼他俩上到楼上办公室，正好有"兵团"司令部的几个人在。他俩就把对刘志兰的不满向大家讲了。大家议论了一会儿，认为刘志兰派他们去天津是错误的，是破坏毛主席的战略部署，应该把这事情揭露出来进行批判。于是，他们当即就写了炮轰刘志兰的《4·14 决议》，并让"兵团"司令部的工作人员电话通知下属单位上街贴炮轰刘志兰的大标语。当他们把该决议抄成两张大字报时，天已快亮了，他们将一份贴在太原市革命委员会，一份就直接由李金渭和史纪礼贴在了省革命委员会门口。

此时，刘志兰和李金渭、史纪礼都不知道，4 月 13 日下午 17 时多，山西省革委会办公厅通知，叫各厅派一人去丁磊家开

会。到会的有 20 来人。丁磊讲话很简单，让到会的人回去马上组织人贴大标语，从晚上到明天上午 10 点前，每家都得刷够 10 条。内容就是一句话："万炮齐轰刘志兰。"

大多数人听丁磊说完就走了，还有几个人留下，其中劳动厅让机要秘书、厅文革小组成员宋守慧问丁磊："为啥要万炮齐轰刘志兰？"

丁磊大声反问他："你是那个部门的？"

"我是劳动厅的。"

丁磊声色俱厉地逼问："你知不知道左权是叛徒？"

"我不知道。我从小就会唱'左权将军家住在湖南醴陵县，他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

丁磊打断了他的话："你不知道刘志兰是左权的老婆？"

"这，我更不知道。"

丁磊不耐烦地说："左权是叛徒，刘志兰那时是他老婆，刘志兰还能在核心小组工作？好了，好了，你回去布置去吧。"

宋守慧回到劳动厅，却没有布置，而是在第二天，也就是 4 月 14 日早上，叫上厅里另一个干部李龙义，骑着自行车到西门外市委宿舍去找刘志兰。

两人都不认识刘志兰，好不容易才问到刘志兰的家，这是个平房院，门口还有站岗的警卫员。

刘志兰听说有人找她，从屋里出来，说："我就是刘志兰，你们有啥事？"

宋守慧说："我们就问你一句话，如果左权是叛徒，你就点点头，如果不是，你就摇摇头。"

刘志兰一听就急了："谁让你们来的？"

宋守慧就把昨天去丁磊家开会的事说了一遍，又说："我们来，就想弄清左权是不是叛徒？"

刘志兰当时就哭了，而且痛不欲生，瘫在地上，挥泪说："你们去问问毛主席，问问周总理呀，看看左权是不是叛徒……"

这时陈守中从里屋出来了，一边往起拉刘志兰，一边向两位年轻干部摆摆手说："你们走吧。"

刘志兰怎么也没有想到，当她组织人马要炮轰李雪峰时，自己也成了别人要炮轰的对象。

而就在宋守慧和李龙义去找刘志兰之前，省人委"东风兵团"炮轰刘志兰的大标语已经贴出来了。

出了刘志兰家的院门，宋守慧就对李龙义说："左权真要是叛徒，刘志兰绝不会那样失态；左权是在战场上牺牲的，肯定不是叛徒，再说，即使左权有问题，也不能连累老婆呀。"

两人达成共识，回到厅里，就组织机关干部刷出两条大标语，内容一样："东风兵团万炮齐轰刘志兰是个政治大阴谋！"署名是"劳动厅革命群众"。

这天中午，袁振的儿子袁南征叫李金渭和史纪礼去他家。一进门袁振就批评他们，说炮轰刘志兰是胡闹，要立即停止。

李金渭和史纪礼不同意袁振的意见，同他进行了争辩。当他们从袁振家出来，骑着自行车到街上转了一大圈，看到炮轰刘志兰的大标语已贴满了主要街道，心里很是惬意。唯一不愉快的是贴在市革命委员会门口的那张《4·14 决议》的落款："兵团司令部"，被人改成"野心司令部"。

没几天，支持刘志兰的大字报、大标语就贴出来了，有的大字报要求坚决揪出“414”炮轰刘志兰的黑手和黑后台。

很快，省核心小组成员和省革命委员会负责人张日清、刘贯一，太原市革委会主任陈守中都出来讲话支持刘志兰。

刘灏离开天津后就去了北京，他对炮轰李雪峰是持反对态度的。但根本没有想到，李金渭他们从天津回到太原后，会弄出一个兵团的《414 决议》来。

袁振本来是不让“兵团”反刘志兰的，现在也由不得他了，他已成了“红联站”炮轰的对象。

这时，刘格平、张日清、刘贯一 3 人正在北京开会。他们 3 人就在北京签名发电支持刘志兰。袁振接到 3 人的北京来电后，要求也在来电上签名，却被否定。于是袁振就起草了一个声明，内容同 3 人的来电一致，然后以刘格平、张日清、刘贯一、袁振 4 人的名义向社会公布。这就是当时有名的“三人来电，四人声明”。

刘志兰将自己珍藏了多年的文物拿出来给“七一公社”的李辅看，其中有朱德的赋诗和林彪悼念左权写的长诗，这使得李辅坚决站在“刘、陈、刘”一边，反对炮轰刘志兰。

不久，山西大学的学生在北京电话采访了叶群，叶群高度评价了刘志兰。

事情发展到这一步，“32111”的中学生们感到问题的严重了。当时炮轰刘志兰，只是认为她不执行中央文革的指示，坚持要炮轰李雪峰。没想到引起如今的局面，实出他们意料。刘志兰到底有哪些问题，有多少问题？学生们心中其实是没有数的。刘贯一

和张日清一次次表态和讲话支持刘志兰，使“红联站”一派支持刘志兰的劲头更大，调子越来越高，“袁振是 414 的黑后台，袁振是叛徒”的大标语、大字报越来越多。他们觉得必须把刘志兰的问题搞清楚，否则，原来炮轰刘志兰的目的是为了要和党中央保持一致，结果事态的发展却变成他们和党中央不一致了。

于是，“32111”派出几路人马到刘志兰过去工作过的地方进行调查。他们到了包头后才知道，刘志兰和陈守中在包钢工作时就和李雪峰有矛盾，李雪峰在四清运动中，在包钢整过刘志兰和陈守中，刘志兰反对李雪峰是有历史根源的。

有的同学还调查到刘志兰和彭德怀的关系。有的人也调查到刘志兰的家庭出身不好。他们以当时的观点把对刘志兰不利的材料统统整理和公布出来，并向中央文革小组上报。

## 第 588 回：周恩来，广州谈少奇□□ 不停歇，五羊城接见各方

王力、关锋起草了一篇《红旗》杂志社论，题目是《粉碎反革命复辟逆流》，送给毛泽东。毛泽东看了，不同意发表，要江青向文革小组传达，批评了他们。4 月 15 日，江青在传达时还说："文革小组的正副组长提议印发政治局生活会的材料，主席给扣了，没同意。"

4 月 15 日，广州交易会如期开幕。

这天上午 9 时左右,中央文革记者站记者张景发和姜宏周来到周恩来下榻的广州军区留园招待所,汇报了广州的两派群众组织情况、大批判情况、近期发生的夺权和冲军区等几件大事情,以及军区介入后的"支左"情况。

汇报结束时,周恩来对他们说:"我这次来广州，本来只是为解决交易会问题，毛主席说既然来了，就留几天解决一下'文化大革命'问题。我只带来一名外事秘书，没有带分管国内事务、特别是分管'文化大革命'的秘书。这几天，你们就和我一起工作。"

当天，周恩来接见广州驻军干部。在接见会上，周恩来首先讲了国际形势，重点谈了越南战争，突出提到了广州军区担负的支援越南战争的重要任务。他说："我们广州军区，从领导到指战员，到一切工作人员，都负有相当重大的责任。从这点来说，我们应该向你们表示敬意！"

随后，周恩来谈到了刘少奇的问题。他说："有人问：刘少

奇这么多错误，为什么不早批判？为什么到这个时候才批判？这种说法，表面上看起来似乎有一定道理，但是，这些同志看问题就是没有透过现象看本质，没有把我们党的整个历史串起来看。一个人犯了错误，如果不改，总是积少成多的。不会是一下子从犯错误那天起，就把他的错误定下性质。除非是现行犯，那当然又是另外一回事。现行杀人犯，一刀下去就定了性了。凡是犯政治错误的，都是逐渐发展的。如果改了他就好了，把错误变成反面教员了。”

他从“第一国际”开始谈起，讲了马克思、巴黎公社、列宁、十月革命，一直说到斯大林：“斯大林在苏联宪法公布以后，认为国内的阶级斗争熄灭了，社会主义社会建成了，一切党内的矛盾，就是敌我矛盾，而且都是来自国外，通通说成是人民公敌，这个当然不妥当，所以肃反就扩大化了。”

接着，周恩来又谈到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他说：“遵义会议以后到七大以前，10年之间，就用了3年功夫整风。当时整风是在战争的年月中进行的，只能在高级干部中进行。而且当时在高级干部中，能够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不算多，真正学习毛主席著作，贯彻毛泽东思想的也不多。所以就要通过这些领导同志自己认识错误，改正错误。只要能这样做，就是好同志了。当时看刘少奇、邓小平这些人，在历史上犯错误较少，甚至没有犯过路线错误。相反地，当时把刘少奇看是白区工作的代表，他也以白区工作模范自居。邓小平当时又成为江西执行左倾路线中受打击的人物，在名称上叫做邓、毛、谢、古，即邓小平、毛泽覃、谢维俊、古柏。后3位都牺牲了。唯有邓小平还在，又居首位，

结果他就变成了好像是个正确的了。因此在七大以后，对这两个人不得不给予信任，很自然地要给予信任。并且在七大的党章报告中，刘少奇提出要学习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就是毛泽东思想，全党要以毛泽东思想作为我们的工作的指导方针。所以在那个时候当然要给予信任。这就说明，对刘少奇、邓小平需要进行20多年的考察，这个问题我今天不能详细地讲了。这个问题以后还会有报告。我只是提醒一下，刘少奇的错误是逐步发展的。”

周恩来说：“戚本禹同志从《清宫秘史》这个电影说起，追溯到历史上所发生的一些重大问题。他只开了一个头，没有讲具体内容。如果我们简单地叙述一下，就是七大以后，日本投降那时间，原子弹出现，有许多人被原子弹吓倒了，当时连斯大林的思想也受到震动，生怕发生第三次世界大战。陆定一就是一个。陆定一在1947年1月写了那篇关于国际形势的文章，说一个时期不会有反苏战争的，反苏战争是一种借口，真正受美英帝国主义侵略的是中间地带。这个思想是毛主席的思想。那篇文章实际上是毛主席通篇改过了的，只是发表时还是用陆定一名字。编《毛选》四卷的时候，我们对陆定一说，最好你写个编者按语，说这篇文章是毛主席写的。他根本不吭声。因为这样一来，他的面貌不早就暴露了吗？毛主席一向不愿意强加别人，既然以陆定一的名义发表了，现在又把它收回不好。毛主席不赞成我们的意见。”

“日本投降以后，蒋介石在人民中的威望是有假象的。他是假抗战，你如果说他不是抗战的人物，有人会不信，所以需要这样一个暴露。但是刘少奇提出‘和平民主新阶段’，相信民主可以实现，和平也可以实现。当时蒋介石还不放弃军权。但是刘少

奇9月在党校作报告，然后第二年1月发表了一个正式报告，就讲这个问题。我参加了旧政协开会以后，回到延安向毛主席汇报，刘少奇也在场，毛主席说的很清楚。毛主席说：这个和平，我们是拖延时间，便于我们积蓄力量，便于我们训练军队。我们一方面要训练军队，一方面要搞好生产，第三方面要加紧土改，准备战争，准备战场。这个精神就把问题说穿了嘛。毛主席还指示，可以在政协会议上签字，表面上说这个政协决定不错。但是刘少奇对党校报告讲的那些东西完全是另一种说法。这是一个关键问题，我亲自可以证明的。刘少奇那个报告我没有听到，现在从文件堆里找出来了。你们听到过吗？后来刘少奇这个报告被高岗抓住了。”

“七届二中全会。在这个会议上，毛主席的报告论断我们解放全中国以后，中国的民主革命胜利了，我们进入了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今后国内的主要矛盾，就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就是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斗争，也就是两条道路的斗争。这是清清楚楚地提出来的，这个会是3月开的，4月我们进了北京，4月20号大军过江。5月初刘少奇到天津，也没有向毛主席请示，就和资本家（就是他的亲戚和其他资本家）谈话，大谈什么今天中国资本家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现在欢迎资本家来剥削，来开新工厂，这样就可以发展中国的经济，甚至说什么剥削的功绩是‘永垂不朽’的，你们听吧，这象话吗？有人说，你当时为什么没有注意他呢？那么一个负责同志出去讲演，我们到处派人跟着也不象话嘛，但是毛主席也听到一点。毛主席很快就回答了这个问题，一个是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回答了这个问题；另

一个就是提出过渡时期社会主义总路线，其中的一条是利用、限制和改造中国的私营工商业。你们看，对私营工商业是利用、限制和改造，毫无发展之意。更早一点提出的顶多是‘劳资两利’嘛。就是说资本家剥削得来的利润，只能是一部分改善工人生活，一部份给资本家，此外我们还有税收。这完全是针对刘少奇的。不过当时没有全面谈他那个演说。”

“我们进行土地改革以后，有些地方因为是老区，很快就搞合作社，这是好事。刘少奇不赞成农村搞合作社。他说，现在需要巩固新民主主义阶段，这完全是错误的。”

“‘八大’是刘少奇作的政治报告，邓小平作的组织报告。这两个报告，受了苏共二十大的影响，受了赫鲁晓夫反对个人迷信的影响。当时我国三大改造成功以后，刘少奇错误地认为，生产关系进步了，生产力落后了，这完全是反毛泽东思想的。因为我们的生产力要发展，旧的生产关系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所以要改革生产关系，所以私营工商业要变成公私合营，手工业要合作化，农业要合作化，三大改造要大大解放生产力，怎么能说生产力落后呢？他把这个作为国内的主要矛盾，忘掉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忘掉了走资本主义道路和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基本矛盾，主要矛盾。以后许多年的事实我就不说了。”

“刘少奇领导的四清运动，撇开广大群众，叫所有干部靠边站，不加以信任，靠人海战术，扎根串连，冷冷清清地搞四清运动。刘少奇推行王光美桃园大队的四清经验，要把它广为传播，一直到这次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也就埋藏了这一次文化大革命头两个月派工作组的错误。”

“现在我们就应该对刘少奇作总结了。总之，毛主席对刘少奇不是不批评的，中间有几次是书面的批评，最严厉的是1964年到1965年四清运动中间制定二十三条的那一次。那次毛主席已经对刘少奇接近失望了，经过20年的帮助，扶不起来。”

“这个时候我们的林副统帅林彪同志已经是众望所归了。经过几十年的培养、经过几十年的锻炼，经过几十年的领导经验的证明，林彪同志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第一人。最近几年，不管罗瑞卿怎么干扰，由林彪同志亲自领导的我们人民解放军学习毛主席著作的伟大成绩是不能抹煞的。许多英雄伟绩的创造可以证明，从雷锋、王杰、欧阳海一直到蔡永祥都可以证明，这些均出在林彪同志主持军委以后的英雄伟绩，说明和平时期和战争年代一样可以出英雄人物。精神可以变物质，如果人人学雷锋、王杰，人人学欧阳海、蔡永祥，我们人民解放军更举世无双、世界无敌了。一旦帝国主义敢来侵犯我们，解放军完全可以配合广大人民，依靠广大人民干净的消灭来犯的敌人。这是完全肯定的。像林副主席这样经过考验的领袖，事实上已经存在了。为什么我们不在法律上肯定下来呢？所以去年召开十一中全会解决了这个问题。一方面，犯错误的经过多次挽救已经不行了，另一方面，经过考验的全党全国全军所信任的毛主席的接班人当然就应该推选出来。”

4 月 15 日晚 23 时至次日清晨 7 时 30 分，周恩来在小岛和广州的群众组织代表举行第一次座谈。出席会议的主要是广东几个大学组织的负责人、学生代表和外地的红卫兵代表。

周恩来：“今天来开个座谈会。先认识一下；华工‘红旗’

来了没有？你们是造反派。”

华工“红旗”的代表介绍情况，周恩来问到华工共有多少班，华工代表答不上来，周恩来说：“进入斗批改了，还不知道全校有多少班？看来你们是毫无斗批改的诚意，学校的情况也不关心，斗批改也是大方向之一。”

华工“红旗”谈到各派之间、甚至一派内部之间都有对立，周恩来说：“这是自然的，尤其是青年。没有对立面，就不符合毛泽东思想——对立统一规律嘛。不能把所有的思潮对立都看成两条路线斗争，两个阶级斗争，太严重了。”

他问华工“红旗”：“你们的方针如何？今天来向你们学习，请教。”

华工“红旗”继续介绍情况。周恩来问：“在赵紫阳假让权的时候，你们怎么样？”

华工“红旗”答：“我们与‘东方红’是共同战斗的，没有参加。”

周恩来：“赵紫阳让权实际是逃避责任。你们没参加，很好。我们当时在北京听说你们‘夺印’，都很可笑，没有权，先夺印。听说后来只好把印送军区去了，谁也不要。”

他又问道：“3月份中央处理了这件事，纠正了，实行了军管，你们又是怎么看的？”

华工“红旗”：“在冲军区问题上我们犯了错误。”

周恩来：“他们（指黄永胜、陈德等）认为你们是左派，这是肯定的，这个我要替他们说话。”

华工“红旗”：“我们认为与‘八一八’之矛盾是两条路线

的斗争，必须斗争到底。”

周恩来：“是不是每个问题都能说是两条路线的斗争？”

华工“八一八”代表：“我要发言。”

周恩来：“好啊！我今天就是请两方面都来，不能只听一面的，毛主席的方针就是要听不同意见。……各种思想都允许发表，这是大民主。”

华工“八一八”开门见山：“我们认为‘红旗’不是造反派。”

周恩来：“哦！他们‘三面红旗’是攻守同盟，你们要攻破？”

华工“八一八”阐明自己观点，坚持说“红旗”是保省市委的，并举了一些事实。

周恩来：“就这一、二件事嘛，好了，你们不要再谈了，我还要接着问，‘三司’包括多少学校，多少人？”

广州“三司”作了介绍。

周恩来：“看来可以得到一个结论：你们‘三司’不可能包括全部的大学，也不可能只有‘三司’才是左派，必须搞大联合。”

“三司”：“对，我们正是在向大联合方向努力。”

周恩来：“好，这就是我们要从华工‘红旗’这个问题上所得到的结论。下一个，广医‘红旗’谈一谈，两派都上来。”

这时，有些代表开始纷纷指责广东军管，是支一派，压一派。

周恩来举起手把喧嚣之声压下去说：“军管是毛主席根据各方面的情况决定的，是我经手办的。你们这样说，就是把矛头直接指向党中央。对军区说的话，不要抓住一点就上纲，不要什么事情都上纲。把每一个小问题都看成是两条路线、两条道路的对立，那就不可终日了。”

遭到当头一顿斥责，这些代表们面面相觑，不敢吭声了。周恩来继续说："解放军介入文化大革命，有很多事情不习惯，要允许他们有一个摸索阶段。你们不要以为大方向对了就不会犯错误，大方向对，一样可以犯错误，可以失败。你们有再整风的必要。"

他把脸转向在座的外地红卫兵代表，"你们想和去年一样，再造成一个大串连的形势，是不能允许的。到广东来说话、提口号，都要慎重。"

中大"八三一"的负责人武传斌在会上反映军管会"镇压造反派"的情况，他说，仅在 3 月底的两天内就滥捕 3972 人，连省委党校前面的下水道都关满了人。

周恩来问："你有什么根据？"

武传斌说，是白云山农场职工蔡海鸣告诉他的，而蔡海鸣又是在北京听广东省公安厅副厅长郭曼果讲的。

周恩来转身对军区的代表说，马上把郭曼果找来。郭曼果很快来到会场，他说自己有两年没去北京了，也根本不认识蔡海鸣其人。

中山医学院"红旗"的负责人林昌文在发言时说，铁路军管后，生产非但没有上去，还发生了严重事故。

周恩来立即追问："什么事故？什么时候、在哪里发生的？"

林昌文一时语塞，答不上来。

周恩来又把负责铁路军管的军区军交部长李文清找来，李文清说："广州北郊郭塘车站发生过一起火车与汽车相撞事故，但那是军管之前 3 月 9 日发生的。"

## 第 589 回：四一六，□州市学生绝□ 去声援，看车□络绎不绝

4 月 6 日，中央军委《十条命令》下达后，锦州师范学院“红色造反团”等“糟字派”组织，要求市公安局给锦州师范学院“红色造反团”等群众组织平反，遭拒绝。

当时，北京部分大学的红卫兵正聚集锦州，在“糟字派”组织中进行串联和煽风点火。4 月 13 日和 14 日连续两天在锦州医学院教学楼召开了有市内部分“糟字派”头头和北京大专院校部分学生代表参加的会议。会议的中心议题就是分析锦州两派斗争形势，研究“糟字派”下一步怎么办的问题。在会上，锦州一高中“红司”提出了以撤销《三六通令》为突破口的静坐绝食主张，当即得到北京师范大学一位学生代表的赞扬，并批评锦州师范学院右倾。与会者十分清楚，市公安局之所以把三个群众组织打成反革命组织，是由于有驻锦部队的支持。但在当时的情况下，他们还不敢明目张胆地把矛头直接指向部队，因为没有足够的理由向部队发难。而市公安局制定的《三六通令》则是完全与 4 月 6 日发布的军委《十条命令》背道而驰的，因为《十条命令》中明确规定：“不准任意把群众组织宣布为反动组织，加以取缔”。至此，“糟字派”组织有恃无恐，为进一步的抗争找到了借口。

但是，在当时的形势下，单靠文斗迫使市公安局撤消《三六通令》是完全不可能。他们认为，只有采取引起社会极大震动的行动，才能形成对市公安局和驻锦部队的强大压力，达到撤销《三六通令》的目的。几经研究后，与会者一致认为：“革命不是请

客吃饭，虽然绝食风险很大，但我们是用生命来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大方向正确，胜利一定属于我们。”于是分头回去做绝食的准备。

第二天，4 月 15 日下午，锦州一高中“红司”在教学楼召开了全体成员大会，动员大家参加静坐绝食。绝大多数同学表示拥护静坐绝食，也有少数人反对绝食。北京大专院校的一个代表也参加了这次会议，并表示坚决支持静坐绝食。有北京红代会学生代表的支持，大家更坚定了信心，当即决定，于 4 月 16 日下午 15 时在师范学院操场集合，下午 16 时到市公安局门前静坐绝食。

会后，一高中“红司”头头安海岐和北京红代会的一个人到海校和锦州师范学院“糟字派”组织串联，锦州师范学院“造反团”的头头立刻表示要参加静坐绝食，并带一台广播车到现场，还负责联络锦州中学、二高中、二中的“糟字派”学生组织参加静坐绝食。

4 月 16 日下午 15 时，大约有 100 多名锦州一高中“红司”的同学陆续来到师院操场。他们列队后，打着“红司”大旗，迈着整齐的步伐，摆出一副视死如归的样子，高喊“ ‘二八’社论是大毒草！‘三六通令’是黑法令！”和“踏平公安局，解放全锦州！”的口号来到坐落在锦州解放路路南 3 号的锦州市公安局门前。锦州师范学院“红色造反团”和锦州陶瓷厂“战斗总队”参加静坐的队伍也来了，大约也有 100 来人。锦州市公安局面北的大门紧挨着人行道，200 多人参加静坐绝食的队伍，都聚集在门前 200 多平方米的人行道上。

下午 16 时，静坐绝食指挥部向市公安局发布了《第一号通告》，勒令市公安局在晚上 19 时 30 分之前撤销《三六通令》，否则采取绝食行动。同学们整整齐齐坐在人行道上高声朗读《毛主席语录》，高呼“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等口号。到晚上 19 时 30 分，锦州市公安局没有回音，于是宣布：绝食开始！

天渐渐黑下来，绝食现场灯火通明，人声鼎沸。不少“糟字派”组织前来助威，帮助维持现场秩序。这时绝食现场的歌声、口号声此起彼伏，直到夜间 1 点多钟，这里才渐渐平静下来。

4 月 17 日，绝食进入第二天。绝食的同学已不像昨天晚上那样情绪昂奋，但大家依然齐声朗诵《毛主席语录》。有一位同学赋诗一首：

饿死不要紧，

只要主义真，

保卫毛主席，

死了也甘心。

这首诗在同学中广为流传。从上午开始，前来看望的家长、群众越来越多，把绝食现场围得水泄不通。有不少家长默默地站在人群中，注视着绝食的孩子。一位男同学的父母，来到绝食现场劝他回家，他执意不肯。他在前面跑，父母在后面追，后来他叔叔强行将他拉回家，但他趁父母离开的时候又跑回现场。

晚上，天空下起了小雨，一些工人在绝食现场搭起了帐篷，给绝食学生送来了雨衣。

夜深了，一天没吃东西，大家肚子都咕咕直叫。这时有几个女同学唱起了“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的歌曲，大

家不由自主地也跟着唱起来。低沉的歌声在夜空中飘荡，抒发着同学们渴望得到中央文革支持的心情，许多同学泪流满面。

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市民来到绝食现场。“糟字派”在绝食现场周围设置了警戒线，主要由 413 步校的解放军学员担任外围的警卫。锦州地区各单位的“糟字派”都来声援和支持，并组织人员日夜不断的在绝食现场进行护卫。而“好字派”的人多次到绝食现场来捣乱和冲击。那几天，锦州市公安局的大楼前真是热闹非凡，经常是几百人到几千人的大辩论。当两派群众的大辩论进行到难解难分之时，就会有互相推搡和拳打脚踢了，双方总是有一些人被打得鼻青脸肿。

锦州学生和工人的静坐绝食在辽宁全省引起了极大的震动。驻锦州的外地各红卫兵联络站，也纷纷向自己的造反派组织发出呼吁，动员人马来锦州对“糟字派”进行声援，声讨和打退锦州驻军 40 军镇压造革命反派的“二月逆流”。从绝食第二天开始，北京几个大学的部分红卫兵，省城沈阳和鞍山、抚顺、本溪、丹东等各地相同观点的群众组织纷纷开着大卡车来到锦州进行声援。有北京“三司”，内蒙古的“呼三司”，沈阳的“八.三一”和“辽联”，大连的铁道学院“红色造反团” 等，共有几十个红卫兵组织和数千人。外地前来声援的各地红卫兵们，也有一些人参加了静坐绝食。公安局门前人山人海，一辆辆高呼支持锦州绝食的汽车从绝食现场前经过。解放路上站满了观望的人群，从高处望去黑压压的一片。锦州绝食成了当时辽宁地区关注的焦点。外地的声援就像给大家打了一针强心剂，同学们疲惫的脸上勉强挤出了一点笑容。

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关锋的女儿也亲自来到现场参加静坐绝食。

沈阳的“八三一”组织是个老牌的造反派，在辽宁省内赫赫有名，其主力就是辽宁大学的“八三一”红卫兵。在进行一月大夺权时，“八三一”炮轰东北局和辽宁省委，也受到了很大的压制和迫害。在三月镇压时，他们与锦州的老糟，都是在 3 月 5 日同一天被抓捕的。在锦州公布的是《三六通令》，而在沈阳公布的是《公安六条》，也都是在 3 月 6 日。

而沈阳的“辽联”组织原是个大保守派，因得到东北局和沈阳军区的双重支持，在沈阳地区拥有很大的实力。但因东北局发表了“三点意见”以后，东北局和沈阳军区闹翻了，“辽革站”从“辽联”里分裂出去了，“辽联”也因此跟沈阳军区翻了脸。因为“辽联”也认为锦州的新兴工业是一面红旗，所以对锦州的老糟是坚决表示支持的，何况“辽联”现在也遭到了军方的压制，这一方面他们也与锦州的老糟有着共同的观点和命运。因此，沈阳“八三一”与“辽联”这两个冤家，在本地区有着种种的不合与敌视，但在声援锦州“联合总部”老糟这一方面，他们却是有着共同的观点和相关的利益。

说来也巧，这两大派在沈阳互相对立的红卫兵组织，竟然在同一天向辽西的锦州进发。在沈阳通往锦州的沈山公路上，“八三一”和“辽联”的车队不期而遇，自然是免不了有些口舌之争，但因为都是去声援锦州的老糟，也就暂时放下了他们之间的派性斗争。沈阳这两大派红卫兵汇成的浩浩荡荡的大型车队，共约有 1500 多人和 70 来辆汽车，其中大部份是大型公共汽车，首尾相

连地沿着沈山公路向锦州而来。

刚刚进入锦州市区的东部边缘，走在整个车队前面的“辽联”宣传车，就开始了广播：“锦州新兴工业是一面红旗，《二.八社论》是株大毒草，《三.六通令》是个黑法令”。

在前面宣传车的引导之下，车队缓缓地从锦州纺织厂门前的大道上经过。“锦州新兴工业是一面黑旗，《二.八社论》好得很！”设在锦州纺织厂大院内的厂部大楼上，“锦联筹”好字派的广播站也开始广播，与从厂外通过的沈阳声援车队进行针锋相对的广播战。

锦州纺织厂位于锦州市东部，其南大门外就是锦州通往沈阳的公路。锦州纺织厂是锦州东部最大的一个工厂，拥有职工约4000 余人。自从锦州“三月镇压”之后，这个厂的工人和干部大多数是好字派，而且还掌权，而糟字派在厂内只有很少的人。

“辽联”声援锦州的红卫兵车队一边向前走，一边用车上的大喇叭进行着宣传。眼看车队的大多数汽车已经通过锦州纺织厂门前的大道，忽然从厂内涌出了好几百名好字派工人，手里拿着砖头向大道上的车队狠狠扔去。“辽联”车队的后面几辆汽车挨了砸，有人被砸伤。“辽联”前面的车队并不知道后面出了事，还在继续前进，而在后面挨打的几辆汽车也不敢停留，载着那些被砖头打伤头而流血的人，慌忙地跟着前面的车队离开这里。

从锦州纺织厂院内跑出来的这几百个好字派工人，由于偷袭得手都高兴的在大门外手舞足蹈。这时，沈阳“八三一”的车队从大道上开过来了，车队前面的宣传车也在广播着：“《二.八社论》糟得很”。锦州纺织厂南大门外面的老好们连忙说道：“又来

了一拨，咱们打他。”刚才吃到点甜头的老好们在地上到处找石头和砖头。

当毫无防备的沈阳“八三一”车队缓缓来到锦州纺织厂南大门前时，200 多名锦州纺织厂工人又向大道上的车队乱扔石头和砖头……

劈哩啪啦，一阵子暴雨般的砖石过后，宣传汽车上的玻璃和设在车棚上的高音喇叭都被砸坏了，整个“八三一”的车队被迫停在了大街上。

“出了什么事？”许多的红卫兵从车窗里探出头来问道。

“前面有人在拦路，并且用砖石来打我们”，站在汽车外面的学生回答说。

“为什么打我们？”车内的人问。

“不知道啊。”车外面的人回答。

亲自带领大队人马来锦州的“辽大八三一”司令张祥久从汽车里出来问明了情况，不由得大怒：“都给我下车，回击这伙锦州老保们，给我狠狠的打！”

大约 500 多名“八三一”红卫兵，在地上捡了一些砖头和石块向老好们打过去，并对这些工人发起了勇猛的冲击。锦州纺织大门前的那些工人见势不妙，慌忙往院子里跑。

“最最强烈的抗议！‘辽大八三一’的暴徒们挑起武斗，打伤我厂革命造反工人！”锦州纺织厂楼顶上的高音喇叭，高声的广播着。“全厂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战友们！请你们立即行动起来进行战斗，把‘辽大八三一’赶出去！”锦州纺织厂的高音喇叭又在大声号召。

“停产，快停产！”以李振明为首的一些好字派头头们跑进厂内的各生产车间高声喊道。

“出了什么事？”正在车间里劳动的工人们不解的问道。

“‘辽大八三一’打进来了，快出去和他们打！”这些好字派的头头们大声喊道，并且指挥工人们停止了生产和工作。

厂内的各生产车间顿时大乱，除了少数的工人没有动地方，大多数的人都跑了出来，也有许多的人是出去看热闹的。他们手里拿着木棒，三角皮带和织布机上的配件——打杆，一窝蜂的向厂大门口冲去，嘴里还在高声喊叫着。

“辽大八三一”的学生们，把纺织厂的工人打回厂内后，又纷纷上了汽车准备离开。忽然看见从工厂大院里涌出了黑压压的人群，冲到大街上对“八三一”的车队又打又砸，当即就有七、八辆汽车被砸坏。“八三一”的红卫兵情急之下，把大客车里的铁管子都拆了下来，在大街上和这些工人们打成了一团。双方势均力敌，都久战不退，有许多的工人和学生受了伤。

突然，从大街的西面传来了一片呐喊声，又有好几百人向这边冲杀了过来。锦州纺织厂老好们的阵脚立刻大乱起来，原来是沈阳“辽联”的大队人马杀了回来。

“辽联”的车队本来已经开进锦州师范学院大院了，当发现自己后面的几辆车被锦纺的老好们给砸了，这口气无论如何也无法咽下。这时又传来锦州纺织厂的老好与“辽大八三一”打起来的消息，“辽联”就以“东工思想兵”的大队人马为先锋，杀了一个回马枪。

锦州纺织厂的老好们在“辽联”和“八三一”的两面夹击之

下，被打得招架不住，又慌忙地逃回了锦州纺织厂大院。约有1000 多名“辽联”和“八三一”的红卫兵冲进了锦州纺织厂，把那些好字派工人追得到处躲藏。“辽联”和“八三一”终究都是外地人，虽然暂时得利，但也不敢恋战，出了一口恶气后就得胜收兵了。

锦州市二高中老糟红卫兵得知锦州纺织厂发生武斗的消息后，赶到了武斗现场，将沈阳“八三一”的车队带回了锦州二高中。

武斗发生之后，锦州纺织厂的老好们说“辽大八三一”和“辽联”首先挑起了武斗，对锦州纺织厂进行打、砸、抢，破坏了“抓革命，促生产”，造成了全厂的停产事件。他们要求把“辽大八三一”和“辽联”从锦州赶出去。他们在这次武斗后，成立了脱产的专业武斗队，后来叫“驱虎豹兵团”。大约有 300 多人，由李振明担任队长。

这个李队长身高一米八，高大健壮，浓眉大眼，当过兵使过枪，30 多岁，共产党员，还是个基层干部。

这支锦州第一支专业武斗队，头上戴着柳条帽，手里拿着大镐把，被锦州人称为“棒子队”。

这是锦州发生的第一场大规模的武斗，却是在锦州工人与沈阳学生之间爆发的。虽然锦州的老糟在武斗期间也有不少的人到了现场，但只是对来自沈阳的“辽联”和“八三一”进行了声援，并没有几个人直接参与。

## 第 590 回：连续见，军内造反派组织　细删改，《要为人民立新功》

1967 年 4 月 12 日深夜，杨成武办公室主任打电话，让总参政治部组织部任副部长陈虹马上去京西宾馆东休息室开会。

陈虹来到京西宾馆，看到军委办公厅警卫处赵宗和科长在那里等他，对他说："杨代总长在开会，会一完就来。"说完，给陈虹倒了一杯开水，放在沙发边的茶几上。

这时，屋子里还有一人坐着，是军委办公厅警卫处的副科长王成恩。随后又来了两位穿蓝裤子的空军干部。他们 4 人等了约半个小时，江青、叶群、戚本禹进来了，随即，杨成武也到了。一进门，江青就拿着手里的一张纸条点名：

"陈虹！"

"到！"

"王育民！"

"到！"

"王成恩！"

"到！"

"朱铁铮！"

"到！"

接着，江青宣布："由陈虹为组长，王育民任副组长，派你们去上海收集饶漱石、潘汉年、扬帆反革命集团的档案材料。这个案子过去有人包庇，没有搞透。最近我们中央文革小组，收到一个名叫王征明的写来的信，揭发有人通敌，给台湾发电报。信

中提到总参的张爱萍。这些电报底稿都在上海，种种迹象表明，底稿有被转移的危险。现在底稿放在什么地方，我们不知道，要靠你们去寻找。”

江青还说：“到上海你们可以找张春桥的秘书何秀文帮助，空军司令员吴法宪派了一架专机，送你们去上海。工作中发现什么情况，随时报告，任务完成后立即回京。”

戚本禹将去上海的介绍信交给陈虹他们，说：“你们拿上这个，上海会帮忙的。如果遇到王征明，就把他一起弄来。”

这时，江青也将张春桥写给他的秘书何秀文的一张便条交给陈虹。然后对杨成武说：“杨代总长，具体的事，你负责抓一抓。”

叶群说：“从现在起，你们不要回家，也不要给家里打电话了。”

有人提出：“洗漱用具都没带。”

叶群说：“这些东西，你们到上海买新的吧。”

说着，她和江青就起身走了。杨成武将她们送到门口后，又回来对陈虹交代说：“你们到上海，工作中遇到什么困难，发现什么情况，随时和我电话联系，可以用保密机打。”

接受了任务，陈虹他们 4 人坐上汽车，直奔沙河机场。空军 34 师女飞行员王云驾驶伊尔 14 专机已做好了准备。大家一登机，飞机就起飞了。陈虹看了看手表，已是 13 日凌晨 2 时。

这次任务来得突然、神秘，四个人互不认识，情况又不了解，到上海如何工作？大家在座舱中议论了一番。

经过三个半小时飞行，飞机降落在上海虹桥机场。驻上海的空四军政治部组织处翟处长在机场接机，将他们 4 人安排住在巨

鹿路空军招待所。

吃过早饭，陈虹请翟处长先把张春桥的秘书何秀文找来。

何秀文看到陈虹给他的介绍信后说："这封信是本禹同志写的!"这时，陈虹看到信的落款处有陈伯达和江青的签名。

何秀文说，要把警备区副政委李彬山请来，政法系统由他管。

李彬山很快就来了。他是个老红军，听完陈虹他们的情况介绍后说，上海市公安局的档案存在警备区的一个弹药仓库里，可以立即陪他们过去。

大家来到那个远离市区的弹药库，只见这里四面都是电网，警戒严密。

李彬山向公安局管理材料的朱品涛介绍了北京来人，陈虹他们也说明了来意。朱品涛说：

"这里存放好几百箱材料，你们要的档案需逐个箱子查找。"

朱品涛一个箱子一个箱子地打开，查找陈虹他们所需要的材料。一直查到第三天，朱品涛突然指着一个箱子对陈虹说：

"这是市公安局领导交给我保管的材料，说是'通天'的，放在这里不安全，请你们带回北京去吧。"

陈虹说："这件事现在决定不了，要请示领导。"

16 日中午，陈虹到兴国路找张春桥秘书何秀文，用他的保密机给杨成武打电话，报告了朱品涛的要求。杨成武答复说，要报告江青，才能决定是否带回，并要陈虹回北京前，再给他打一个电话。

下午，江青交代的任务，那个关于饶漱石的材料找到了。当晚，陈虹又给杨成武打电话，报告任务已经完成，准备夜航返京。

杨成武说：

“关于那一箱’通天’材料，下午已报告了周总理、江青同志，他们说，管他什么通天不通天的，把材料先拿回来再说。江青还特别交代，一个字也不能丢！”

陈虹他们接到指示后，又立即赶去上海公安局，办理了手续，将那箱材料一起带回北京。

17 日早晨，陈虹 4 人抵达北京。他们将带回的材料原封未动地存进办公室。20 日，向江青写了报告。

4 月 14 日，北京高等军事学院“井冈山”组织与“红联”组织发生武斗，“井冈山”的群众连夜来到三座门全军文革的驻地，要求接见和解决问题。

4 月 16 日、17 日，又发生徐向前的家两次被军事测绘学院群众组织抄家的事情。而且是翻墙破门而入，将徐向前的书、文件和私人保存的几十年的资料、信件、作战日记全都抄走。叶剑英事先得到抄徐向前家的消息，在抄家的人到达徐向前家的一个小时，给徐向前打电话，以开个会的名义，请徐向前上了西山。

4 月 16 日，部分军事院校人员接管了三座门全军文革接待站。王力、肖华、关锋、杨成武、李曼村出来接见军队院校文艺团体代表。关锋说：

“我们看了大家的决议，讲点意见和大家商量。我讲的可能旗帜不鲜明，态度暧昧，大家可以炮轰嘛！有些问题我可以答复，有些问题我不能答复，也无权答复，还有组织纪律的约束，我讲错了大家可以炮轰。

我在街上看到了‘炮轰全军文革小组’、‘改组全军文革小组’

的大标语，我不赞成。前一个时期肖华同志管别的事情，现在肖华同志是常务副组长，江青同志是顾问，大家可以完全信赖的吧！杨成武同志大家是可以信赖的吧！谢富治同志大家是可以信赖的吧！还有军委的领导。”

“现在斗争的大方向，是对刘邓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深批透，批倒批臭。要批倒批臭，必须先批深批透。这就要坐下来下点功夫，这不是像街上的大标语，把刘少奇的奇字倒过来划的像个狗字能解决问题的。这样不够，不能批臭。”

“前一段支左成绩是主要的，有的地方实现了革命的‘三结合’，有的地方为革命的‘三结合’创造了条件，大家也知道，许多地方出了岔子，主要是没有经验，也是难免的。个别的坏人也有，青海就是。在毛主席和林副主席领导下是可以解决的。听说大家要开一个控诉大会，我建议不开的好，中央正在解决，情况清楚了。四川的问题是好事还是坏事呀？察觉了就是好事。大家要注意爱护解放军，要爱护解放军的荣誉，特别是我们解放军自己。”

“军事院校我接触的很少，地方院校接触的多，现在有个苗头，《十条》下来以后，革命派扬眉吐气，队伍又发展壮大了，这是好事，另一方面又冒出来一点小资产阶级偏激情绪。”

“听说大家要成立粉碎军内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逆流筹备会，要开大会，揪军内带枪的刘邓路线，我看不这样搞好。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是要借此破坏生产。”

王力说：“听说同志们要开个会，四川来控诉成都军区，同志们掌握的材料可以交给我。如果有受打击的同志名单可以交给

我们，这样对中央和中央文革解决四川问题有帮助，开解决四川问题的会时好请同志们参加，至少可以派代表来参加。你们要开大会，反而不利于解决四川问题。可以说，四川的问题是严重的，成都的问题是严重的。同志们要相信中央，中央文革是能解决的，四川的问题已经解决大半了，宜宾的问题已经解决了，四川来的材料这么一大堆，各县的材料都有，材料我们都整理了。宜宾问题不是现在才发现的，去年就发现了，这次解决宜宾问题是我们毛主席亲自指示的，四川的问题很快解决，党中央正在处理青海问题，安徽问题，内蒙问题。中央对这些问题的处理和解决，这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胜利！是无产阶级革命派斗争的胜利！是革命群众斗争的胜利！也包括军队同志的贡献。这几个省的问题解决了，同志们可能还要提出别的省的问题，但不一定都要中央下命令解决，中央通过对这几个省的解决，又有《十条》和一些政策性的规定，大多数的问题是可以解决的。”

“毛主席说过，问题再大莫过于青海，但青海最近的情况最好。青海问题是反革命制造的，司令员被反革命抓起来了，是一个很好的同志，这是一次政变。”

“现在有人想把矛头对着解放军，要提醒大家不要把矛头指向解放军，我这样说，不是对解放军不可以提意见，有意见可以提，但要讲求方式，对违反毛泽东思想的要反对，要提不同意见和看法，但要采取适当方式。今天只能解决这一个问题。”

4 月 16 日这天，中央文革再次接见北京中学生代表，因为他们依然打得热火朝天。中央文革希望中学生们停止打架，集中力量批判刘少奇。

4 月 17 日，全军文革副组长徐立清接见高等军事学院“井冈山”等组织的群众。

这天，关锋又来到空军大院，与进驻这里的北航“红旗”、地质学院“东方红”、军队后勤学院、测绘学院的“井冈山”、七九六部队、空军通信学校“红纵”、工程兵学院、空军技术学院、海校、二医大、空政文工团“红旗”等单位群众座谈。

关锋说：“提请同志们注意一点，要注意了解事情的真相。说老实话，有一些话我也不好讲，有组织纪律性嘛。

北航‘红旗’、地质学院‘东方红’的同志，你们不要盲目支援。为了说明问题，我举一个例子。但是要举例子，又恐怕大家贴大字报，上街，以致损害了左派。能不能不贴啊？”

众答：“能！”

关锋：“比如清华的‘井冈山’，我们中央文革是支持他们的，从政治上支持。他们对空政文工团‘红旗’，就听了片面之词，人家一串联，就盲目支持，搞得不大好。前些日子我们和他们谈过。北航‘红旗’的韩爱晶也参加了嘛，你们可以去问他。

空政文工团的事情，空军做的没有错，是正确的，在路线上完全对。真正的坏人，反对毛主席、反对林副主席、反对中央文革的，要不要逮捕？有嫌疑的，要不要拘留？是要的。在《十条》以后，还是要的。《十条》和《八条》是一致的，不能用《十条》来破坏《八条》。革命左派要提高警惕。不要不了解情况就搞了一些片面性东西，受人利用。”

“你们由于对背景不了解，也许你们认为今天行动是正确的。但可能是相反的。你们昨天的行动，我们也是不赞成的，但

我们认为精神是好的。昨天肖主任、我和你们谈过，肖主任谈的比较深，肖主任是全军文革常务副组长嘛！对肖主任的评价大家都知道嘛，这不是我个人讲的。这些今天不想多谈了。”

关锋说的“昨天的行动”是指 4 月 16 日部分军事院校人员接管三座门接待站一事。他接着说：“昨天江青同志讲了话，你们去听了吧？”

有人答：“去了。”

关锋：“批评得很厉害，但那也不是她个人的意见。”

他问：“张家口工程技术学院的同志是不是和方凡在一起的？”

答：“是。”

关锋：“请你转告他一声，我和他见过几次面，去年处理《解放军报》问题时，他给了我一些帮助，请你转告他：要千万千万警惕，不要自己走向反面。

你们犯了严重错误，使得支持你们的人不得不批评你们。”

“吴法宪同志政治上是可以信任的。这不是我个人的意见。我过去不认识吴法宪同志，去年冬天才认识的。1 月 13 日，江青同志讲话时也讲了嘛！空军在支左工作是好的。当然，我不是说别的军种就不好的。你们北航的试点是空军搞的，空军在地方上没逮一个，方向是稳的。

文工团的事情你们就不要管了！文工团的事情就由全军文革和空军文革处理，群众组织就不要参与了，由全军文革和空军文革负责处理。

肖华同志主持全军文革，军队问题主席和林彪同志一定会采

取恰当的方法。”

北航“红旗”代表问：“应当怎样支持军队造反派？”

关锋：“军队问题复杂，你们年轻，这些让全军文革来解决吧！地方不要插手军队问题，要特别注意，要顾及到国际影响。”

4 月 15 日，江青将她于 4 月 12 日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记录整理稿送毛泽东审改。她在送审报告中说：“这是我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一次讲话，林彪同志说是要发。我改了几次，缺引证，不够典，因为没有发言稿。我希望得到你的批改。”

对于这次送审稿，毛泽东作了一些修改。主要是在第五页，对江青讲的历史上“触詟说赵太后”的故事作了一些内容上的补充。在第七页，江青讲到军队要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时说：“从前说是不介入，其实这个不介入，主席早就说过是假的，实际上早已经介入了。”在其中“主席早就说过是假的”一句前，毛泽东加了“就许多单位说”一语。在第九页，江青讲到文化大革命前 17 年“在教育方面，培养出一些完全脱离工农兵，脱离生产的知识分子”。毛泽东在其中的“脱离生产的知识分子”一句前，加写了“脱离无产阶级政治和”9 个字。此外，还有一些文字上的修改和增删。最后，毛泽东在江青的送审稿上批道：

退江青。

可以，照办。

毛泽东

四月十六日

4 月 17 日，江青再将她的讲话修改稿送毛泽东审改。毛泽东又做了一些修改。在“几个月来，全军有很多好经验。据哈尔

滨的同志说，那里的军队，在去年夏天，就从左的方面介入了”一句后，毛泽东加写和改写了“也有的从右的方面介入的，做错了一些事。”

将第四页上“目前在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号召下，同志们正在为人民建立新的功勋”一句改为：“目前在毛主席和中央的号召下，同志们正在为人民建立新的功勋。”

删去第六页上“学习主席的工作方法，再来搞调查研究，找到真正的左派”一句中“学习主席的工作方法”9 个字。

在第七页，送审稿讲到广州市的文化革命情况时说：“他们有一个很好的经验，就是说，对受坏人操纵的组织，轻易不要宣布为反动组织，而是把它的头头，确有证据的坏人，逮捕起来，分化瓦解它那个组织。”毛泽东把其中的“分化瓦解它那个组织”一句改为：“或者让那个组织的群众自己改换新的领导人”。

在第九页上，送审稿讲到文化大革命前 17 年文艺创作和教育情况时写道：“基本上是名、洋、古的东西，或者是被歪曲了的工农兵形象。至于教育，那完全是他们的那一套，又增加了苏修的一套。”毛泽东把其中的“基本上是”改为“大量的是”，将“那完全是”改为“那几乎全是”。

在同一页上，江青讲到她在建国初期辞去一些工作职务时说：“我自己思想上是解决了这个问题的。”毛泽东改为：“我自己思想上，只是就某一点说，是解决了这个问题的。”

在第十页，江青讲到文化大革命前“在舞台上、银幕上表现出来的东西，都是资产阶级、封建主义的东西，或者是被歪曲了

的工农兵形象”。毛泽东把其中的“都是”改为“大量的是”。

在第十三页，江青讲到：“我身体上慢性病是很多的，但是我的心脏是好的。前年冬天就被他们整出心脏病来了。”毛泽东删去了这些话。

在第十四页，江青讲道：“本来写评《海瑞罢官》、评‘三家村’这样的文章，是主席亲自在那里领导的嘛，是姚文元同志写的嘛。”毛泽东删去了其中的“是主席亲自在那里领导的嘛”，并在“姚文元同志”后面加括号写了“还有他组织的写作班子”10 个字。此外，对这个讲话稿，毛泽东还作了一些其他文字上的修改和内容上的增删。

## 第 591 回：□置信，牢狱宾□两□天　请进京，接见四川“反□命”

军委《十条命令》下达后，各地开始大批放人。

4 月 3 日，四川万县市公安局刑警队队长史宗和和任天正把万县“主力军”一把手熊道生从监狱里提出来，熊道生还以为是提审，当他来到监狱门口时，脚镣被人用铁榔头砸开了，手铐还戴着。一会儿，“主力军”二把手刘君瑞、“赤旗”一把手钟嘉钰、二把手应维忠也一个接一个地出来了，也只下了脚镣。史宗和对熊道生说：

“你们的问题大了，要弄到北京去审，路上给我老实点！”

他们上了面包车，另外一辆吉普车上坐着万县军分区副司令员王贵章、政治部主任马忠庆、市公安局局长王杰，一起前往重庆。到梁平时，又与开县县委机关女干部朱大舜、开县工人造反组织负责人汪忠孝、开县中学学生造反派组织负责人徐克忠会合，一起到了重庆，住在领事巷解放军总后招待所。这时才给他们 7 人打开手铐。这 7 人都是北京“万县问题联络站”向中央推荐的到中央开会的代表。

4 月 7 日，成都入狱的“8.26”群众全部释放，他们受到英雄般的欢迎。

4 月 6 日下午 16 点多，被抓进监狱的四川涪陵罗成胜和往常一样，与他的“同监犯人”正在以“学习看守所犯人规则”为名闲聊，突然，一个监狱管理人员打开牢门喊道：

“罗成胜，出来！”

罗成胜跟着管理人员来到监狱办公室，那里坐着两个军人，其中一个年纪稍小一些的军人首先问道：“你就是罗成胜？”

“我是罗成胜。”

“你先坐下。”另一个军人说。

“进来多久了？”等他坐下后，那个年纪稍小一些的军人又问道。

“一个多月了。”

“有什么认识？有错没错？”那人继续问道。

“我认识到有错，但我不认为我有罪，我不是反革命。”罗成胜回答。

“你……”那个年纪稍小一些的军人正想训斥，另一个年纪稍大一些的军人打断话头：“算了，现在先不谈这个。”

接着，他用严肃的语气说道：“现在我正式通知你，你马上回牢房去收拾东西，今天就可以回家。今天是 4 月 6 号，后天，4 月 8 号晚上 6 点钟之前到军分区集中，坐晚上的重庆班船到重庆，然后坐火车到北京。”

“真的吗？”罗成胜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不由自主的发问。

“是真的。但你出去后不要乱说，也不要乱来，特别是不能再反对解放军。”这个军人又说。

本来想争辩几句的罗成胜，想到要让他到北京，马上顺着军人的话回答道：“好的，我一定照办。”

当他怀着异常激动的心情走进到监房后，第一句话竟然是：“老子要到北京去告他们的状！”

同监犯人们都非常惊奇的问："什么时候？"

"他们放我出去，让我去北京！"他用最简洁的语言答道。

"不要讲话，罗成胜，你快点收拾出来！"押送他回来的监狱管理人员仍然很凶的喊道。

"报告，我要解手！"罗成胜知道牢房中只有放置马桶的屋角是管理人员看不见。

"快点！"管理人员同意了他的请求。

罗成胜来到放置马桶的屋角，立即用脸色和手势向他的同监犯人再次表明他将去北京告状信息，并用紧握的拳头鼓励他的同监犯人要坚持到底。

罗成胜出狱后，首先去看望他在涪陵唯一的亲人，70 多岁的爷爷，并在他的担心责备之中，在那不足 10 平米的破旧小屋里和另一个与他爷爷岁数差不多的退休老工人一起，三人度过了一个难眠的夜晚。

第二天上午 8 点多钟，罗成胜回到涪陵一中。受到学校师生的热情欢迎。学校内已经贴出了"坚决拥护《安徽五条》!""要正确对待革命小将！"等标语。他的学生告诉他，4 月 1 日中共中央发出的要求各地参照执行的《关于安徽问题的决定》中有这么一条：不得把群众打成"反革命"，不准乱捕人。仅仅因为冲军区和对军区提意见而被打成"反革命"的，应一律平反，被捕的，应一律释放，通缉令，应一律取消。接着，《人民日报》又根据这一精神发表了"正确对待革命小将"的社论。

4 月 8 号晚上，按照涪陵军分区的要求，罗成胜来到军分区大院。在这里他发现，与他一起去北京的还有和他一样才从监狱

里放出来的原涪陵公安处法医、“涪陵政法公社造反兵团”负责人马泽林；海陵厂工人、“涪陵工人造反总部”负责人李陵森；涪陵地区轮船公司工人、“涪陵二七工人造反总部”负责人吴大才；涪一中学生、“涪一中长征战斗团”负责人石少云。另外还有军分区副政委杨登基，地委副书记左世杰，一共 7 人。

接着，他们也来到重庆，住进在总后招待所。这时，大家都猜到了：“二月镇反”闹大了，要到北京解决。

他们离开总后招待所时，所里的负责人对他们说：“中央原本派飞机接你们到北京，看你们身体还可以，就让你们坐火车了。”

从重庆往成都，每到一站，几乎都有从监狱中释放的造反派上车。

4 月 12 日中午，四川代表的列车驶进北京站，一下火车，就看见站台上等待他们的四川代表和北京师生，不寻常的经历让他们异常的激动和兴奋，互相紧紧的握手和拥抱，人人热泪盈眶。大家忘情地高喊：

“你们是毛主席请来的客人！”

万县学生组织“赤旗”二把手应维忠右手用围巾吊在脖子上，因为在狱中他反抗激烈，双手被公安人员反铐在背后，铐齿深深扎进手腕肉中，致使右手手臂肌肉萎缩。

大家簇拥着代表们由专道来到站前广场，乘坐西苑大旅舍的大客车驶往代表住地西苑旅舍。车上的接待人员特别告诉他们：

“你们是党中央、国务院请来的客人，你们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英雄，欢迎你们来到首都北京，来到毛主席的身边。”

从一下火车到坐上国务院派来的专车，罗成胜的眼泪就一直不停的流，特别是当他们的车子经过天安门时，他们几个刚从监狱出来的“反革命”和首都“三司”的几个学生一起在车内望着天安门城楼上的毛泽东主席像，流着眼泪高呼：

“毛主席万岁！”

此时，他们从内心深处有一种置身于革命圣地的感觉，并暗自下定决心：“这辈子永远忠于毛主席！”

专车将他们送到北京西苑饭店。他们都是第一次享受如此高级的住宿条件，中央考虑到他们才从监狱出来，建议他们先在北京包括到各大专院校去了解一些当前的形势，准备好材料向中央汇报。

当罗成胜躺在有生以来第一次睡过的钢丝床上，回想从监狱“囚犯”到这次当“赴京代表”的惊人变化，不用说，又是一个难眠之夜。

代表们太兴奋了，大家聊啊，聊啊，一夜未睡。

4 月 13 日中午 11 时左右，总理联络员吴宾、温伯华来看望万县地区代表。他们特地看了应维忠的右手，叮嘱他一定要抓紧治疗。北京中医学院 65 级学生袁德群讲，中医用蜡疗和针灸治肌肉萎缩疗效明显。大家把万县军分区副司令员王贵章、政治部主任马忠庆、市公安局局长王杰叫来，让他们拿钱给应维忠治病，他们答应了。

下午，北京“万县问题联络站”的几个大学生担心万县市公安局局长王杰他们看见势头不妙会销毁材料，决定查抄王杰带的材料。吃完晚饭，他们几个人就把王杰叫到他们住的房间，果然

从王杰身上搜出许多材料。

这时钟嘉钰提出：万县军分区副司令员王贵章有一个公文包，上哪儿都带着，从不离身，非常可疑，里面一定藏有重要材料！于是他们一行人来到王贵章他们住的房间，要他们交出所带的材料。马忠庆说："我们带的材料都在王局长那里，你们都拿去了。我们没有材料了。"

张甦干脆把话挑明，让他们打开王贵章的公文包，把材料交出来。

王贵章说："我如实告诉你们，包里面的东西，比我生命还重要，我不能交给任何人！"他说得斩钉截铁！

张甦说："那么，明天总理联络员来了，我们当面交给他们。"

王贵章说："不行！我只能当面交给周总理。"

张甦说："那就这样办：我们来封，签上字，你们保管。总理接见时，你把它交上去。"他补充说："我们担心你们销毁材料。"

于是大家们找来一张牛皮纸，将皮包用牛皮纸封住，用胶水粘上，签上学生们的姓名，仍交王贵章保管。

当晚，学生们抓紧整理从王杰身上搜出的材料，重要的有这么几件：

1.由万县军分区和 7799 部队共同登记的"2·22 事件"死亡名单，共 43 人。另有两人是专区公安处消防民警，注明误杀。

2."主力军"三路军负责人黄家兴的狱中交待材料：《我所参与的策划占领军分区的"反革命暴动材料"》。

3.万县军分区和万县市公安局编写的《镇压反革命组织"主力军"展览简介》。

4.万县市公安局拍摄的116名工人、贫下中农合影照片。

4月14日上午，张甦三人将从王杰身上搜来的材料送到国务院文革接待站，交给了总理联络员吴宾、温伯华。

下午，吴宾又来到西苑旅社，要万县代表整理一份关于“落凼事件”中，“主力军”要将100多名工人、贫下中农集体沉江屠杀和“2·22事件”的材料。参与以上事件的“赤旗”主要负责人应维忠口述，张甦执笔，几乎熬了个通宵，整理出近100页的材料。4月15日中午，吴宾来一看，说：“太长了，总理哪有时间来看！”叫他们大删。于是张甦大砍大删，只剩下七八页纸。

4月16日上午，吴宾来看了，还是觉得长了。他说：“我拿去改，再请你们审查。”

4月14日，成都川大“826”头头江海云也从监狱放了出来。她在欢迎集会上即席发表了《坐牢杀头何所惧，誓死保卫毛主席》的演讲。

4月的一天上午，宜宾谢英富被关押的幼儿园囚室突然来了一个公安干警和一个解放军干部，他们叫谢英富收拾好自己的东西出来。全囚室的人议论纷纷，以为谢英富的问题“升级”了，要把他转移到其它地方去单独关押。于是，纷纷给他打气，鼓励他不用怕，并用《毛主席语录》上的“黑暗即将过去，曙光就在前头”为他告别送行。

出了幼儿园“监狱”，解放军将谢英富押到隔壁的军分区内，在花园旁叫他站好，随即向他宣布：

“谢英富，今天提你出来，是要押你到北京去与反革命刘、张一伙对质，只要你去表现得好，我们就既往不咎，若表现得不

好，回来你就会晓得是什么样的后果了。”

一会儿，又押来一个瘦弱矮小的中年人，叫高玉文，是市级机关造反的干部。他原来是宜宾地委根据四川省委指示，最早派往北京去抓刘结挺、张西挺的“抓人团”中的一员。从北京回来后，没抓回刘结挺、张西挺，自己反而起来造反了，结果当了“反革命”。这个中年人被叫站在花园的另一边，同样被训话。最后又带来两个小女孩，一个是刘结挺的女儿刘明英，另一个是原宜宾市委宣传部长李良的女儿李梅。别小看这两个小女孩小小年纪，她俩再加上李良的儿子李琪，早就是刘结挺、张西挺他们得力的联络、通讯员了。当这俩女孩来到后，军分区司令部大楼里出来一个年纪稍大的干部，问那个训话的解放军：

“张汇燕！准备好了没有？”

“一切准备完毕！”那个叫张汇燕的解放军干部赶紧将武装带和手枪整理了一下后立正回答。

这时开来了一部小吉普车，那位领导说：“把他们带上车立即出发”。

“是”张汇燕立正敬礼同时答道。

谢英富他们当天晚上赶到了成都军区，汽车在军区政治部楼前停下，楼里出来一名干部，张汇燕赶紧下车跑上前敬礼说：

“报告主任，奉命将谢英富、高玉文押到！”

那位主任听后愣了一下，看了张汇燕一眼，没有回答，而是朝谢英富和高玉文走过来，伸出手来和他们握手，并说：

“谢英富、高玉文同志……你们受苦了。”

哇！如此亲切和振奋的称呼，顿时让谢英富和高玉文感动得

不知怎样来形容当时的心情，泪水在眼眶里忍着，差点就要迸发出来。刚刚还是阶下囚，现在又成为同志？这样戏剧性的变化，真让他们不知如何说好。

一顿丰盛的晚餐后，谢英富和高玉文被安排到政治部楼上的小会议室里休息。同车来得两个小女孩不知被带到哪里去了。

晚上20时多，新华社记者王焕斗和《四川日报》、四川人民广播电台、《成都晚报》的几名记者来到会议室，使寂静的小会议室一下子热闹起来。大家纷纷谈起自己的经历，原来他们也都是刚从监狱里出来的。最后进来的是一个身着军服却没带帽徽领章的人，他一进屋，一脸茫然地看着会议室里众多陌生的面孔发呆。那个主任接待完记者后，转身才对这个不像军人的人说：

“诸平同志，你受委屈了。来，这是你的帽徽领章，针线也给你拿来了，你就自己把它钉上吧。”

诸平接过帽徽领章，双手发抖，两行热泪流个不停……

原来，他是成都市军分区的一名干部，也是“二月镇反”中被抓起来的“反革命”。等诸平把帽徽领章钉好后，那个主任才对大家说：

“大家受委屈了，也受苦了。今天请你们来主要是党中央、周恩来总理指示，派了专机来接你们到北京去参加会议，明天早晨动身，今天晚上就要安排你们在军区招待所休息，看大家还有什么要求没有，我们会尽量满足大家的要求。”

大家听了这番话，兴奋得难以言表，什么话也说不出来了，只想大声欢呼。

到了招待所住地，刘结挺和李良的女儿来找谢英富，说成都

军区一名干部问她们："郭林川和李良现在哪里？"

两个小姑娘都摇头说："不清楚。"于是那名干部就叫她们明天仍坐宜宾军分区的汽车回去，其它什么也没给她们说了。

谢英富怀疑其中另有文章。于是把成都军区政治部楼上开会的情况全部告诉了两个小姑娘，重点讲了党中央、周恩来要派飞机到成都来接他们，明天早晨就去北京。两个小姑娘听后很着急，要谢英富想办法让她们也去北京。谢英富能有什么办法？既然军区叫她们明天仍回宜宾，她们正好可以把这个重要消息传回去，这是个难得的机会！谢英富好言安慰，劝她们还是回宜宾为好，及时将这个重大的好消息带回宜宾，告诉宜宾的战友们，等待他们进京后的更好消息。她们被他说服了。

谢英富等人第二天飞抵北京。一下飞机就被国务院派的专车接到了西苑宾馆，受到了先期到达北京和原在北京的四川代表们的欢迎，宜宾江安县委书记郭一民安排他们住下后，随即领他们去见刘结挺、张西挺等人，宜宾地委的田禾向他们介绍说：

"这次是周总理亲自点名叫派专机接你们来北京，参加中央解决四川问题工作会议的。我们与李井泉长期不懈的斗争情况，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已讲清楚了。"并介绍了中央解决四川问题工作会前期的情况。

田禾最后讲："现在中央要进一步了解的就是四川以及宜宾文化大革命和二月逆流的情况了，所以要你们来参加中央解决四川问题的工作会议，你们要作好向中央汇报情况的准备，要抓住重点和突出的问题，详细地汇报清楚。"

吃过午饭大家都在休息，突然听见过道里闹哄哄的，出来一

看，走廊里人头攒动，雀跃非凡，欢声笑语不断。一问才知道中央办公厅通知，当天下午中央首长要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四川代表。大家没想到一到北京就受到中央首长的接见，高兴异常。

4 月 17 日晚，康生、江青、王力、关锋、肖华、杨成武、叶群、姚文元等人接见四川 20 个市、县被中央点名请来的被打成“反革命”群众组织的负责人、告状代表和市、县的党、政、军负责人及首都大专院校的部分人员。

会议前夕，王力特地将毛泽东3月27日批示的田禾那封原信从记者站要了回去，在上面再加批示：“全文编四川材料之一，并从此编下去。”

记者站按照王力的批示，又特地编印了一个左上角冠以《四川材料》的内部参阅刊物，呈送毛主席和中央政治局的领导同志。

22 时，当中央领导步入会场时，全体代表起立，热烈鼓掌，同时高呼：

“毛主席万岁！”

“毛主席万万岁！”

“誓死保卫毛主席！”

“誓死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北大学生张甦发自心扉不由自主地领呼了一句：“誓死保卫中央文革！”

康生说：“现在开会了，中央事情很多，时间紧张，各地来的人也很多。前几天解决了内蒙问题……四川的问题要用一定的时间来解决，我们中央工作也要用一些时间。由于工作忙，我们有好几天没有见面了，今天会议只能开到六点半，下面我们还有

会议要去参加。发言的不要重复，以前讲的现在不用讲了，下面准备发言，谁发言？”

自贡市的一个代表首先举手要求发言。他讲了自贡镇反的过程及自己的牢狱经历。接着，成都等地的代表也纷纷发言。

江青：“廖井舟同志来了没有？”

廖井舟是成都市委副书记，他站起来回答：“来了！”

康生问：“你今天能发言吧？不能发言休息两天再发言！”

江青接着问:“你身体怎么样？什么时候到的？住在哪里？”

廖井舟看上去身体不好，他用左手按住头说：“我住在西苑宾馆，今天不讲也行……”

江青：“你今天不能讲下次讲吗！你可以中途退场。肖华同志：请你安排医院，赶快让他住院去，找个好点的医院……”

接着，成都军区造反派和成都军区歌舞团代表发言，控诉城都军区在“二月镇反”中对他们的迫害……

周恩来请万县代表发言。北大学生张甦走到前排坐下，说：“在 2 月 22 日军事戒严中，万县军分区一共打死‘主力军’工人和农民及‘赤旗’学生共 43 人。我这里有一份名单，是万县军分区和 7799 部队统计整理的。”

周恩来说：“你把名单交上来。”

张甦：“我介绍完再交。”

周恩来：“我能看懂。”

张甦顿时非常后悔自己怎么讲出那样无知的话，于是赶紧把名单交给工作人员。他接着汇报了万县“222 事件”经过，讲万县军分区说，是奉中央军委命令镇压万县“主力军”。

周恩来说："我们过去只知道青海开枪事件，不知道万县也开了枪，而且比青海还早。"说完，他大声问道："成都军区甘渭汉来了没有？"

甘渭汉马上站起来说："我听说有这件事，但详细情况不清楚。"

周恩来："你吱吱唔唔的说不清楚，只说枝节，不说实质。"他又问："韦杰来了没有？"

韦杰站起来答："报告总理，关于万县问题，中央军委发了封电报，经由成都军区转发给了万县军分区，指示万县军分区'诱敌深入，政治攻势，分化瓦解，捕其首脑，全部歼灭！'"

"现在电报在什么地方？"

这时万县军分区副司令员王贵章站起来，他全身和双手都颤抖着，一边往前走，一边试图打开公文包，但由于手抖的厉害，越紧张越是拉不开皮包的拉链。

这时有人高喊一句："连皮包一起交上去！"全场也喊起来，周恩来示意工作人员上前从王贵章手中取走了公文包。

康生："万县专区来的14岁小将何如愚同学讲一讲。"

全场200余人的目光一瞬间都望着何如愚。

何如愚说："……我被他们吊起来打，三次昏迷过去。在昏迷中，我还看见毛主席他老人家就在我面前，对着我说：孩子，你一定很坚强！我又醒过来和凶手做斗争，后来又是一顿毒打就昏过去了，他们用凉水泼在我的头和身上。"

全场很多人流下了眼泪。

何如愚接着说："万县市公安局局长王杰，就是镇压我们的

刽子手！”

全场高喊：“王杰站起来！”

王杰惊慌地站起来，脸色苍白，两腿直抖，双眼直望着主席台上的中央领导。全场高喊：“打倒王杰！打倒甘渭汉！”等口号。

康生看着万县军分区和万县市公安局编印的《镇压反革命组织“主力军”展览简介》，与周恩来理耳语一阵，然后问道：“熊道生同志，他们说你在万县市十七码头要将116人装在船上准备沉水，就是把船弄去翻在江中……”

熊道生站起来，情绪非常激动的说：“放屁！”他气的一时说不出话来。

周恩来说：“莫激动，莫激动，慢慢讲。毛主席请你们来，就是要让你们讲。”

简斌兵见状，连忙用手捅了捅坐在前面的应维忠，说：“你快说！”

应维忠站起来，说道：“康老，这件事我直接参与了处理。当时发生了‘落凼事件’，2 月 15 日晚上万县市造反派到落凼公社救出了被围困的宣传队，也抓了打人的保守派的工人、农民一百多人，用汽车押回万县市，又怕农民来抢，就放在船上，想连夜查清幕后策划者和组织者。2 月 16 日下午，我去船上看了，光是供水和吃饭都非常麻烦，也问不出什么，我就下令全放了。他们全都活着。说‘主力军’要屠杀 116 个贫下中农，纯属造谣诬陷！”

应维忠讲完，熊道生情绪平稳了些，继续说：“总理，我补

充几点情况。我们抓人，是想弄清楚究竟是哪个组织、哪些人策划的‘落凼事件’。我们把农民放在驳船上，是害怕保守组织调农民进城来抢人，引起两派冲突。另外，我很清楚，在当时很混乱的情况下抓了人，难免有错，怎么可能不问青红皂白都拿去沉水呢？”

他说：“万县市公安局在二月镇反中对革命造反派残酷镇压，一抓进去，就上脚镣手铐，直到上北京，才下了脚镣手铐，铐了40 多天；还进行诱供、套供、骗供，说我们要搞反革命暴动，纯属编造！万县市公安局局长王杰也来了。王杰，你站起来！”

王杰脸色惨白，站起来，见没人理睬，又坐了下去。

熊道生说：“我们 4 月 3 日来的时候，监狱里还关着几百人。王杰，有没有这回事？”

王杰站起来说：“还有几百人没有放。”

周恩来：“开完会，马上打电话放人！”

王杰答声：“是！”坐下了。

当问及四川“二月镇反”问题时，宜宾谢英富站起来汇报说：

“2月19日，一架小飞机到宜宾上空撒传单，同时地面就开始大肆抓人，他们根本不把造反派当人看，打翻在地就捆，有的还用脚踩着人来捆，甚至有的绳子扯断一根又换一根来重新捆，比对有深仇大恨的阶级敌人还凶，同我一道来的高玉文同志的双手就是被他们捆烂了的。”

他用手指向高玉文，高玉文马上站起来卷起两只袖子，露出了道道被绳子捆过留下伤痕的两只胳膊。说到这里，谢英富已泣不成声。

最后，康生说：“今天会就开到这里，下面说三件事：

一、这次发言没有讲完的，下次再继续发言。

二、我们已经给军区说好了，在这次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把抓捕革命组织的革命群众一律释放。”

这时，全场起立欢呼“毛主席万岁”达3分钟之久。

欢呼过后，康生接着说：“三、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被冤枉和错打成反革命的要平反。”

全场再次高呼“毛主席万岁！”有的人举起双手跳了起来。大家在高唱《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的歌声中散会。

就在中央领导 4 月 17 日接见四川 20 个市、县被捕的“反革命”群众的当天，四川监狱大开，“二月镇反”抓的人基本上尽数释放，共有 10 万人之多。

4 月 18 日，关押在成都“市大监”的 2000 多“囚徒”集体出狱。监狱大门外，街道两边全是欢迎他们的人，从“市大监”的宁夏街一直到四川大学的望江路，绵延好几公里。

## 第 592 回：周恩来，继续在广东座谈　“左”与“保”，一字之差天壤别

4 月 17 日零时 35 分至清晨 8 时 30 分，周恩来在广州与群众组织代表第二次座谈。这次增加了工人组织代表。周恩来在接见时，批评中山大学“革造会”，以电影《清宫秘史》中有“天下为公”四个字为由，将广州中山纪念堂内，孙中山题的“天下为公”四个字遮盖起来的做法，说这是“政治性错误”，责令天亮前必须恢复这四个字。他说：“天下为公”虽然是康有为在《大同书》中提出来的，但可以古为今用。孙中山在文化大革命中还是要肯定的。去年把南京孙中山铜像搬掉了，是错误的。

中山大学“革造会”与中山大学“八三一”是对立的两派组织。当中山大学“八三一”砸了广交会陈毅题词以后，非但没有受责，反而大出风头，他们很不服气，为了表现自己的“革命性”，便把中山纪念堂上孙中山的题词“天下为公”也用纸遮盖起来了。不料却挨了周恩来一顿批评，只好连夜派人把匾额恢复原样。

4 月 18 日零时 30 分至上午 9 时，周恩来再次和广州地区的群众组织代表座谈。这次又增加了农民组织代表。

每次座谈，周恩来都要求发言者必须先递条子，他按递条顺序或话题需要听取汇报。当座谈结束时，周恩来就会说：“张景发同志请你站起来。”然后向大家介绍说：“这是我们北京来的记者，凡是递了条子没有机会发言的同志，散会后找他们汇报。他们会及时把你们的意见告诉我。”

于是，群众代表都汇集到张景发他们住的招待所，一一陈述

自己的意见。张景发他们听完汇报，再整理成“纪要”，每当晚上座谈前交给周恩来。

经过三次座谈，以及连日来听取军区、省军管会和中央文革小组驻广州记者的汇报，阅读由各方面提供的材料，包括群众组织的小报后，周恩来对广州的情况有了比较详细的了解。4 月 18 日傍晚 19 时 30 分，他作了一个很长的总结讲话，共分六个部分：

一、国际国内形势；

二、广东的地位和情况；

三、对广东实行军管的必要性及其任务；

四、广州的文化大革命如何掌握斗争大方向；

五、如何实行大批判、大联合和“三结合”；

六、若干具体问题。

在谈到广东的地位时，周恩来说，广东面临前线，作战和备战的任务很重，不仅仅有港澳，而且东边有台湾，南面和西南面有美帝国主义和他的仆从军队，东北还有个潜在的侵略力量日本军国主义。敌人随时可以侵犯海南岛和沿海，把战争扩大到中国。如果扩大战争，广东首当其冲。“我们要注意公开的和潜在的敌人，我们有备战和作战的任务，沿海民兵每天都要站岗放哨，我们解放军随时处在作战、备战的情况下，不可能拿全力来做支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工作。一旦如果电话中断了，交通失灵了，对我们非常不利嘛。这个是我们革命的工人、革命的农民、革命的学生、革命的机关干部都应关切的问题。”

周恩来说，广东已经实行军管了，要通过大批判促进大联合，实现三结合。“可是我这次到广东来了 5 天，看出这个形势还会

有反复，不是那么容易。”“你总不能老拖下去。大概我们同学们觉得这个倒好，最好再长一点，再放一年假。你们可以放一年假，工人同志、农民同志就不赞成呀，军队同志也不赞成，我们机关的同志也不赞成。我们抓革命还要促生产，促业务，促战备，促工作，我们不能放下来，而且你们也不能长期这样子。”“如果说生产要靠保守派搞得好，革命派参加进来反而搞不好，那么这个革命派也不能算真正的革命派了。抓革命，促生产，也不会压了革命。说谁要实行资本主义复辟，我看不能那样说。好像解放军或解放军某几个负责人这么做，我不这么看，你们要维护解放军的地位。说复课闹革命是压制了革命，我看这个逻辑不通。只有复课闹革命，才可以整理思想、整理组织、整理作风。有些地方还叫‘革命的打、砸、抢万岁’，这是错误的口号，打、砸、抢有什么革命的？这是不许可的。”

周恩来说：“广东的文化大革命，你们说发展慢了些，我看慢一些也许可能还好。因为快的经验不够，快了摔跤多一点。我不同意说广东好像落后了，冷冷清清了，恐怕事实并不如此。有些看来好像是冷冷清清，其实是在埋头苦干。最近几天北京还在打架，这个难道一定要学呀？那么说北京打了几场架，我们也一样子比赛，看谁比谁打得多，我看这大可不必。我们多打几架，敌人在旁边笑。”

他接着谈到了广州地区的运动情况：“一二二夺权当时就犯了错误了，成了一个秘密夺权，不公开的，参加夺权的只有两个学校的革命左派组织，一个工人联合的组织，一个机关的造反组织，加一个珠影，就是 5 个单位，加外地 4 个单位来支援，9 个单位。

夺权的形式成为一个不公开的谈判的方式，就是一个要印，一个让印，就是让权。这种形式是不足为训的，不可效法的，是错误的。夺权的方向是对的，但办法是不可取的。我们不愿意公开来指责，因为在南京也是用这样的方式谈判，安徽也是这种形式。所以对夺权的方向我们都没回答。你们这里我肯定地回答了，今天不回答你们不行了，不然说夺权都不对，那就不好了，那是对左派的打击了，大方向是对的，但是犯了严重的错误。”

周恩来不同意以支持或反对封《红卫报》来划分革命派和保守派，也不同意以四大事件作为划分革命与反革命的标准。周恩来还提到了广东军管以后，军区捕人的事情。虽然捕的人数多了一些，但不像别的地方多。经事后核实，连取缔的组织在内，总共捕了 450 人。“八一战斗兵团”捕得最多，其次是“老红军总部”、“千钧棒”、中山大学“红旗工人”等几个组织。现在已经放了 169 人，在押的还有 281 人，准备再放 100 多人。还有因交易会开幕，整顿社会秩序，从 3 月 22 日开始，一个星期内抓了 508 人，其中大部分是炒买炒卖、流氓分子，经教育后已放了 280 多人。交易会完了还会再放一批。“在我们全面看起来，广东很谨慎的”。

在座的两派组织代表，都急切地想听到周恩来对他们的评价。周恩来的任何一句话，都可能对他们组织的政治命运产生巨大影响。如果哪一个组织被宣布为保守派，那就不仅组织难以保全，甚至参加这一组织的成员人身安全也将失去保障。“地总”的头头莫超海坐在人群中，听着周恩来的讲话，脑子里闪动着五光十色的意象，抓着笔的手竟抖得那么厉害，为了高度集中精神，

他不知花了多少精力。他觉得自己有点像等待判决的人。其他人又何尝不是如此。

现在，周恩来开始谈到这个最敏感的话题了：

“还有一个问题，也是军管以后的事情，就是工人大联合。这个工人大联合，我们看起来也是还没有成熟的。”周恩来首先肯定了中大“红旗八三一”、华工“红旗”、广医“红旗”这“三面红旗”是革命的左派。在谈到广州的工人组织时，周恩来肯定了“工联”和“红旗工人”是革命左派。至于“地总”、“红总”，周恩来把他们称为“保守的群众组织”。

这就像投下了一颗重型炸弹。会场上的气氛出现急剧变化。“三面红旗”的代表兴高采烈，扬眉吐气；而“地总”、“红总”的代表则一个个心情沉重，面色难堪。

周恩来指出，各个组织都要开门整风，学生也要这么做，特别是工人组织，十几个组织，各自开门整风，首先自己批评自己，特别是在工厂，两个对立的组织，自己开门整风，这样比较好。批评自己，人家来批评也欢迎，但是对方不要忙于批评别人，还是先批评自己，双方自我批评。然后站稳了立场，站到毛主席为代表的革命路线这方面来，把矛头向上，共同斗争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全国的，广东的，结合本单位的斗批改，这样子，就慢慢找到共同点，慢慢就能大同小异，最后就能达到联合。

会间休息时，“地总”、“红总”的代表围住黄永胜，表示他们回去后没法向本组织的群众交代，并质疑军区和军管会是怎么向周恩来反映情况的，他们究竟“保”在哪里？保共产党、保解放军对不对？黄永胜无言以答，他也深感忧虑。

最后，周恩来说，机关的革命一定要指出个前途来，不能没完没了地闹下去。“比如中南局 800 多人，总得有个出路呀，就是这样闹革命？只是少数人做工作，多数人跟你们同学差不多，也是放假闹革命，这个情况不能再继续多久了，今天已经是 4 月 18 日，我要求这个月底，至少 5 月初要得出个结论，到底抽出多少人来做工作，造反派要给我回答。抽出一部分人来，包括处、科级，司、局级干部，能够站出来的部分。”

一批原广东省委的地方干部，趁周恩来在广州的机会，向他反映对五十年代“反地方主义”问题的看法。4 月 18 日，广东省委组织部副部长廖似光向周恩来递交了一份报告，提出两个疑问：“一、从土改到四清试点，赵（紫阳）都很强调‘扎根串连’，是否中央知道？我认为这种作法是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相对抗的。二、二次反地方（主义）是否经中央批准的？打击一大片，保护陶赵结党营私一小撮的情况，中央是否知道？”

周恩来在这天的讲话中，提到了反地方主义问题。他说：“还要严防地方主义的翻案……如果说地方主义要翻案，这就是一种资本主义复辟的阴谋。”

4 月 19 日凌晨 2 时，会议结束。散会之后，黄永胜向周恩来反映了“地总”、“红总”代表的意见和情绪，并谈到他自己对未来形势的担忧。天亮以后，周恩来飞返北京。

周恩来的讲话很快传遍了广州。“三面红旗”、“工联”、“红旗”工人一边，欢声雷动。而“地总”、“红总”一边，则神情沮丧。4 月 19 日，“地总”头头赵振业在向组织传达周恩来讲话时，下面反映强烈，立即围攻赵振业，他们说：“总部领导不得力，

要造总部的反。中大‘红旗’经常整我们，总部总是不许我们还手，总部为什么不向总理如实反映情况？”赵振业被责问得急火攻心，竟晕倒在地。

4 月 19 日晚 20 时 40 分，广东省军管会忽然接到周恩来办公室秘书周家鼎的电话，逐字逐句传达了周恩来关于广东“地总”、“红总”评价的修改意见：

“地总”、“红总”拥有大量工人群众，他们都是广州工人的革命组织，只是有些偏于保守。

这两个组织不能称为大老保，也不能笼统地称为保守派。这两个组织和其他工人造反派组织之间的争论，只能通过各自的整风，通过企业、事业单位中对党内、省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批判运动，在毛泽东思想的原则基础上求得解决，以促进革命的大联合，而绝不能以一派压倒另一派。

周恩来肯定了“地总”、“红总”是“革命组织”，虽然还拖着一条“偏于保”的尾巴，但对于广州军区来说，已经大大松了一口气了。革命组织与保守组织，寥寥二字，对广州形势的影响，可以说是天壤之别。

也就是从这时起，广州的群众组织，正式分化为“红旗派”和“东风派”两大对立派别。

“红旗派”的名称，来源于“三面红旗”，成员主要是学生和知识分子，也有“工联”、“红旗”工人等几个工人组织，后来简称为“旗派”。

而“东风派”的名称，则来源于他们常说的“三月东风浩荡”，

成员主要是“地总”、“红总”的工人组织，以及铁路分局的“春雷”，也包括“主义兵”等一些学生组织。

双方都坚称自己是左派组织，大联合只能以自己为中心。“新一司”的一篇文章说：“广州革命造反派工人的大联合，必须而且只能是以‘红旗工人’、‘工联’为核心的革命大联合。‘红旗工人’、‘工联’是广州工人运动的两面红旗。” 曾经一度好像近在咫尺的大联合，正远离人们而去，消失在昧色笼烟的前方。

为了表明自己并非一个保守组织，“地总”在周恩来离开广州的当天，4 月 19 日，便与“红总”联合召开大会，批斗省、市委领导。随后，“地总”各分部在省柴油机厂、市二宫、员村、越秀山等地，分别举行了十几场批斗会。“红旗派”也不甘落后，竞相召开批斗大会，这成了检验革命与否的指标。斗争的方式，也变得愈来愈激烈和残酷了。这样下去，毫无疑问，用不了多久，所有挨斗的干部，都会在精神上和肉体上，彻底垮下来。5 月 5 日，周恩来致电广州军区，指示“对广东省几个当权派实行监护”，并要求黄永胜把执行情况上报。

为了一洗“保守”形象，“地总”紧急动员，四面出击，简直到了发狂的地步。4 月的一天，“东风派”和“红旗派”群众，在中山医学院内相遇。在一片纷乱的、数不清的旗帜、标语包围下，在潮水一般的口号声中，所有人的神志都陷于错乱。几乎所有人都不顾一切地向前冲，迎风狂吼。他们冲上了教学大楼的阶梯，像肩负着历史使命的巨浪，席卷而来。每一个人都觉得自己变成了庞然大物，锐不可当。锲形队伍飞奔向前。人群挤进了干枯的草坪、狭窄的楼梯、弯曲的小道，在课室里挤成一团，喊声、

骂声、意义不明的尖叫声，玻璃的破碎声，从四面八方涌来。昏乱和盲目的人群，似乎出现短暂的清醒，有些人可能停下脚步，东张西望，激动地猜想，大规模冲突开始了。然后便是更加严重的昏乱和盲目。

双方的增援队伍，源源不绝，吆喝而来，多达一万余人，直把中山医学院外的马路，挤得水泄不通，后面的群众，根本无法了解前面发生什么，只看见有些手曳旗帜的人，惊慌失措地从前面往后逃，一片狼奔豕突的景象。他们猜想前面一定发生了激烈武斗，于是更加奋力向前，扬声助威。后来居上的人和前面退下来的人，在马路上绞成一团乱麻。

市军管会主任黄荣海，匆匆赶赴武斗现场，传召两派代表，在学院武装部进行谈判。

入夜，几百名解放军奉命开入医学院，守住学院大门，阻止外面的群众继续冲入校内，同时勒令武斗双方立即退出现场。

由于军管会的强硬干预，武斗没有进一步扩大。双方在深夜退出医学院。包围学院的群众，也陆续散去。但这是一个明显的先兆，两派群众都打算以武力争夺“左派”的桂冠。往后的局势，将更加凶险和混乱。

5 月 2 日晚，广州“地总”、“红总”的工人和一批红卫兵捣毁了中华全国总工会旧址，搜走大批关于刘少奇的历史材料。

周恩来在广州时，中央文革的记者张景发他们向他反映了广州军区政治部主任相炜和副主任江民风受到严重冲击,不仅被停止了工作,还撤掉了家里的电话、警卫和身边工作人员，每天被军区文体单位的群众组织揪去批斗，戴高帽子等情况。周恩来听

了很诧异，说：“有这事?黄司令员没有和我说这事呀？对部队高级干部这样处理，他应该报告一声。”

由于周恩来的过问，相炜和江民风的日子暂时好过了几天。但周恩来离开不久，他们还是被整得死去活来。

## 第 593 回：□城反，质疑《八条》怒冲天 大混战，数千军人进京来

广州的大联合正渐渐远去，拖延了两个多月的内蒙古事件也没有随着中央 4 月 13 日的《决定》而告一段落，而是掀起轩然大波，使正在平息下去的局势再一次急速恶化！

4 月 14 日，就在周恩来飞往广州的同时，“红八条”也传到了呼和浩特市。“呼三司”、“8•18”等造反组织欢呼雀跃，扬眉吐气。相反，内蒙古军区的干部战士和“红卫军”、“工农兵”、“无产者”等群众组织则心中不服，怨气冲天！一时间，“周恩来是两面派”、“打倒康生”、“砸烂高锦明的狗头”、“与呼三司决一死战”、“强烈要求中央撤销八条”、“重审内蒙问题”等标语陆续出现在呼和浩特的大街小巷。下午 16 时，“红卫军”、“工农兵”、“无产者”等组织的骨干在工人文化馆召开“誓师大会”，发表声明称：即使被打成反革命，即使只剩下一个人也要干到底。会议决定：

1、决不解散。

2、赴京告状。

3、就地示威。

当晚，200 余人拦车赴京。火车行至中途，铁道部来电命令列车工作人员动员他们下车，由于值班工作人员是“红铁战士”，“红卫军”观点的，该命令无人执行。

接着，从 4 月 15 日开始，连续几天，“红卫军”等组织在呼和浩特市内举行声势浩大的游行集会，他们高喊：“工农兵联合

起来！”“不忘阶级苦！”“不忘血泪仇!”等口号，称中央关于内蒙古的《413 决定》是“违背毛泽东思想”，“不符合内蒙地区的实际情况”。而且，支持军区的郊区农民，也赶着大车涌进城内。游行群众横穿内蒙古军区司令部大院，往日警备森严的军区大院此时大门洞开。

负责军区大院的守卫工作的警卫营，在“呼三司”等组织静坐示威的那些日子里，同红卫兵发生冲突，矛盾较深，此时，当然是任凭支持军区观点的示威队伍往来穿行。个别人甚至擅离职守，加入到群众的示威队伍中。

第一批进京告状的人在北京东大桥接待站建立起上访告状指挥部。在呼市方面则因为进京告状而发生严重拦车事件，44 次列车误点三个半小时。此后，内蒙古赴京告状的人蜂拥而至。工、农、学生、军人，各行各业都有。误点、殴斗、拦车，无日无止。内蒙古形势严峻

4 月 16 日清晨，北京沙河机场，一辆军用吉普车疾驰而来，在机场上一架银灰色专机前嘎然停住，北京军区副司令员滕海清一步跨下车来。北京军区司令部办公室的李德臣已在机场等候多时了。他昨天才接到命令，要他随滕副司令员前往内蒙古“支左”。同机返回呼市的还有参加北京会谈的四方代表。

滕海清，安徽金寨人，1930 年参加红军，从班长一直做到团政委。以后任八路军 385 旅教导大队大队长，新四军游击支队第二大队大队长兼政委。解放战争时期，担任三野 21 军军长。解放后，他先在南京军事学院，1955 年被授予中将军衔，后担任石家庄步兵学校校长，1961 年调任北京军区副司令员。

滕海清平素沉默寡言，性格倔强而又暴躁。

此时的内蒙古已经成了一个点燃的弹药库。中央 4 月 13 日关于内蒙问题的《八条决定》还未正式传达，造反派就被打伤了十几人。呼市街头还布满了杜撰出来的周恩来“三点指示”、“四点指示”。广播车在大声的广播着：周恩来发出指示——“八条是假的，已夺权的单位保持不动，个别错了的要纠正。”“对群众组织不能解散、不能取缔，不能采取分化、瓦解的办法。”

其实中央已经做了最坏的打算，事先指示北京军区准备了部队，必要时武力平息局势。

内蒙古军区领导人黄、王、刘、张回到呼市后，在向干部、战士们传达中央的《八条决定》时个个老泪纵横，将士们哭成一团。他们无法理解自己为什么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这些军区领导人对《八条决定》的看法极其一致。

黄厚的反应是：“不合乎实际，多数思想不通”。“我也糊里糊涂的，不知犯了什么错误”。

王良太的反应是：“八条是要修改的，现在要顶住。胜利一定是我们的。”

刘昌的反应是：“真是难受死了，还不如把我撤掉呢！”

张德贵的反应是：“同志们想不通是对的，如果想通了就坏了。想不通是有阶级感情。”“有些问题我也理解不了，解释不了”。“三司大方向始终正确？我闹不清楚，让历史作证吧。”

而那些指战员也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不能“镇压反革命”？

腾海清在呼和浩特市看到的是，上万名保守派举行昼夜游

行，军区战士数千人戴着“红色工人”、“红色战士”、“无产者”的袖章，高喊“坚决镇压反革命”，“把滕海清、吴涛从军区赶出去”的口号，大搞武装游行。

4月17日，中央文革小组、全军文革小组给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各群众组织和内蒙古军区干部战士写了一封信：

内蒙自治区呼和浩特市各群众组织和人民解放军的指战员同志们：

（一）中共中央四月十三日关于内蒙问题的决定，是经过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及其亲密战友林彪同志批准的。一切拥护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同志，一切拥护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革命同志，团结起来，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关于内蒙问题的决定。

（二）一切受蒙蔽的人，应当擦亮眼睛，不要再受坏人的挑动，要把斗争的矛头指向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指向内蒙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乌兰夫、王逸伦这一小撮人，要同个别煽动对抗中央决定的坏人划清界限，回到毛主席的无产阶级路线一边来。

（三）中央已经正确地处理了内蒙问题，内蒙各方面到北京来反映情况的人，都应当迅速返回内蒙。各方面都不要继续派人到北京来。更不得拦阻火车，妨碍交通，破坏生产。

中央文化革命小组

全军文化革命小组

一九六七年四月十七日

滕海青、吴涛抵达呼市后，没有按惯例住在内蒙古军区，而

是在新城宾馆下榻，宾馆的警卫工作由北京军区的部队负责。4月17日晚23时，几十辆满载“无产者”、“红卫军”的汽车包围了新城宾馆，北京军区驻宾馆的战士被打，人们高喊着“找滕海清、高锦明算账”的口号冲进宾馆，内蒙党委办公厅秘书张鲁被当作高锦明的秘书饱尝老拳，滕海清在造反派的保护下从后门逃出，跑到由北京军区部队接管的呼和浩特铁路局。

4月18日上午，华北地区晴空万里。呼市、包头、临河、赤峰、海拉尔等内蒙古的城市上空出现了军用飞机。飞机过处，雪花一般的传单纷纷扬扬，徐徐飘落。传单上印的是中央《4•13决定》和中央文革小组、全军文革小组写给内蒙古的信。

保守派对此嗤之以鼻，不但拦车赴京的人有增无减，而且在北京也是越闹越凶。他们到华北局索要纸张、笔墨、宣传材料和汽油。不给，就大骂“饭桶”、“官老爷”。华北局办公厅副主任赵璀卿成了他们的人质，从华北局押到中南海新华门前，又从中南海拉到劳动人民文化宫。

这天，又有六、七百人冲进新城宾馆搜寻滕海清、吴涛、高锦明。风闻高锦明躲进了呼市公安局，这些人马上将公安局包围起来，有人提着手枪寻找高锦明，幸亏高锦明不在这里，否则此后的“挖肃”运动就会减少很多有声有色的故事。

第三天，围攻者转向省公安厅，又包围了呼和浩特铁路局，如果不是北京军区军管部队的拼死保护，滕海清、吴涛这两位汉、蒙将军今后的亲密合作就可能被扼杀在摇篮之中。

五天后，滕海清在军区做报告时，遭到军人的围攻、辱骂，他高血压复发，住进了呼市部队的253医院。

内蒙古局势持续恶化。成群结队的群众拦阻火车，上京告状，其中还有军人。

滕海清无法控制局势，匆匆飞回北京请示。

这期间呼市街上，反中央的大字报更上一层楼，很多大字报众口一词："周总理为什么反不得？"公安厅贴出了《十三个想不通》，财贸"北斗星"质问中央《十五个为什么？》，军区"人民子弟兵"的疑问更多，他们要求中央回答《二十一个为什么？》，"红铁战士"提醒人们"用毛泽东思想想一想，为什么《八条》下达后，广大共产党员、贫下中农、工人阶级痛哭流涕，而被红卫兵查抄的地、富、反、坏、右全家吃饺子？"中山东路的墙上贴出《给滕代司令员的一封公开信》，信中责问滕海清："你是呼三司的司令员，还是内蒙军区的司令员？"

到了 4 月中下旬，武斗之风迅速蔓延。首都红代会赴呼宣传队在军区北大门外遭到 300 余人的围攻，司机被打昏，数十人受伤……无政府主义泛滥，工交瘫痪，纲纪废弛。烟厂锅炉房工人因派性斗气，擅离职守，致使锅炉烧坏。用周恩来 5 月 19 日接见内蒙军区警卫营代表时的话说，当时的"军区大院乱得像市场一样"，平民百姓出入如履闹市。内蒙古军区的干部、战士离呼赴京，持枪游行如入无人之境。3 个月后，内蒙古军区政委吴涛在部队整训汇报会议上披露了当时内蒙部队的"盛况"："4951 部队，中央决定下达之后，一个武装连上街游行，对抗中央，这是我军史上从未有过的政治事件。总政检查组检查他们的工作，他们竟敢撕毁检查组的材料、摔缸子。在紧要关头，军区调他们执行任务，他们拒绝执行，按兵不动。他们的政委在北京，我们

叫他回来，他不回来。看，他们目无组织，目无党纪军纪国法，问题是多么严重啊！4931 部队有一半的人出来，散兵游勇，上街游行，背叛中央。4754 部队某连有些战士，跑到北京组织地下连队，一个副排长任连长，一个卫生员任指导员，下设勤务组、宣传组、工厂组、农村组，组织得很严密。好像现在是天下大乱，到了‘司令赛牛毛’的时候了，拉出一股部队，他就是司令。工兵部原副主任把几个工兵部队脱离建制的战士，组织起来编成几个支队。警卫营警卫军区大院，《八条》下来对抗中央，对保守组织开的是绿灯，军区大院随便出入，成了‘东安市场’。他们的部队风气发展到了什么程度？一个连有时集中过 70 多个女的，站岗还有女的陪同。”“通讯营某连，他们本来在巴盟执行架线任务，可是，‘5•10 事件’发生后，他们擅自离开战斗岗位，返回呼市。七班长带领七班到工会大楼，保守组织顽固地死守工会大楼反抗中央时，我们有些领导人号召给予‘布施’，捐款献粮票支持。呼和浩特军分区，从蔬菜公司借了 20 多床盖冬菜的大棉被，说是给支左部队用，结果送到工会大楼给保守组织。”

面对这种混乱状况，4 月 20 日，内蒙古军区发布两条命令：

一、禁止上街游行，控制车辆，如有违反，按破坏军纪论处。

二、干部要旗帜鲜明，不得接见保守组织代表，不准向他们招手。

4 月 22 日上午，内蒙古军区造反派与地方保守派在军区南门发生冲突，打伤两人，毁车一辆。下午 15 时许，两派又在第二毛纺厂门前武斗。18 时许，保守派群众分乘 90 余辆汽车开到师院北门，高喊反《八条》的口号，里面的造反派照相，外面的

人遂往里冲并大扔砖头、石块，里面的人受伤者数十，但仍坚守大门。外面的人索性将院墙推倒，300 多军人和工人蜂拥而入，在砖头、木棒的攻击下，守门的学生星散逃逸，受伤者无数。晚 21 时，又有百余军人手持皮带闯进师院，见人便打，直至凌晨方去。

4 月 25 日中午，呼和浩特几千名保守派乘百辆汽车到农牧学院门口示威，下午 14 时许，500 多军人，4000 多工人以砖头、皮带、树枝为武器攻入大门，打伤 58 人，重伤 13 人。15 时许，这些人又高喊着“打倒大学生”、“还我战友”、“工农兵万岁”等口号，由军人开路，攻入农牧学院。闻讯赶来的造反派奋力抵抗。北京、上海、哈尔滨赴呼的造反者亦投入战斗。内蒙古革命造反派总指挥部向全市造反派发出命令：“全市造反派立即行动起来，坚决自卫反击。”一时间，高等学府成了血战的沙场，双方一直打到天黑才鸣金收兵。

有趣的是，尽管交手时双方都力图重创对方，可事后都竭力扩大对方的战果，宣传自己如何无辜受难，如何损兵折将、死伤惨重。在这方面内蒙古军区表现得格外出色。据军区统计，“东纵”的汽车压死了解放军 6 人，用刀子杀死了 3 人，送医院抢救的伤员 87 人。25 日晚，张德贵亲自赶到 253 医院，指示医方：“能收的都收，都免费。”然后，他泪眼婆娑地与 87 名伤员一一握手，并组织慰问团到医院参观。“包头、集宁、伊巴两盟成批来人，26 日那天院内就来了 4000 多人。”据军区总医院医务处后来说：“当时来一个收一个，两口子打架打坏了，也说是‘三司’打的，来了也收。当时收的人，多是游行过度疲劳，休息一

下就可以了，来了后以‘脑震荡’收下了。”“当时不管有伤没伤的都用车推或担架抬进来，该收的收，不该收的也收。”门诊部护士告诉人们：“来门诊的本来都可以走，可为了造声势非得要车子推，再不就是抬，到了病房，伤员能从车上跳下来。为了扩大事实，小伤口贴上一块很大的纱布，有的头上还给缠上很多纱布，不想住院，还动员人家住院。”

死人的事其实也与“东纵”无关。4931 部队的战士张之樑就是军区制造的“死者”之一。他后来回忆说：“4 月 25 日这天，‘东纵’正开斗争王铎的大会……到了农牧学院，我也往里冲，就在这个时候，我背后有人隔着我的头拿皮带打农牧学院的学生，误打在我的脑门子上了，当时，我只感觉到有人从后面抽了我一脑门，很疼，但不知已出血了。等他们往外拉我，我一回头，他们发现我脑袋上流血了，就大喊起来：‘三司’打解放军啦！给武斗火上浇油。我想起军区招待所布置的两个绝食参观现场，认为必要时伪装一下也可以打击敌人，所以我就在保守派大喊大叫的时候，把眼睛闭上了。他们就用雨衣蒙上我的头，把我送到 253 医院。当时流传说‘三司’打死了 6 个解放军，我大概就算其中一个吧。……我们一病房共 7 个人，没人来看的时候，我们说说笑笑，玩军棋、打扑克，一个个生龙活虎。参观的一来，我们马上鸦雀无声，一个个老老实实地躺在床上闭上眼睛装病……过了几天，我实在受不了这种衣来伸手、饭来张口、躺在床上装模做样的生活了，听说当时去北京的人很多，我的那件带血迹的血衣也送到了北京，我就从 253 医院逃出来，扒车上京告状去了。”

## 第 594 回：冲报社，□春、甘肃都武斗 摘喇叭，□州绝□在继续

3月初，吉林省“公社派”的三大主力，激进的“地院兵团”、“工大造大”、“光机八一五”在整风中解体。

3月12日，吉林省委书记处书记阮泊生等人赴沈阳参加中共中央东北局会议，研究“三结合”和干部“亮相”的问题。

3月23日，驻长春三军支左领导小组组长、16军政委王淮湘，代表吉林省“三结合筹委会”，在长春市春城剧场向吉林省“红革会”所属组织作关于“三结合”形势的报告。

3月28日，吉林卫戍区司令部宣布对吉林铁路实行军管。

长春的局势看上去正在按部就班的向前进行。然而，4 月 2 日《人民日报》的社论《正确地对待革命小将》，同样让已被压抑近一个多月的长春“公社派”兴奋异常。他们纷纷上街游行，打出“长春公社新生了”、“长春公社和中央心连心”的标语，人人欣喜若狂，大有再次解放的感觉，宣传车震耳欲聋地播放“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的歌曲。长春市的底层市民，可能是出于同情弱者的心态，也涌上街夹道欢呼。

4 月 17 日，长春“公社派”终于出手了，直冲《长春日报》社。

《长春日报》夺权很早，甚至先于长春“二总部”的“118 大夺权”。报社内倾向“二总部”的造反派掌权后，办了几天《新华电讯》，只登新华社消息，后又于 2 月初，恢复了《长春日报》，一、二版登新华社消息，三、四版发表关于“红二派”活动的消

息。这种做法，早就为“公社派”及其拥护者们不满。他们说，报纸是全民的报纸，凭什么只登一派的消息？更有人尖锐指出，老百姓花四分钱买报看，是为了了解国家大事，不是为了买一张“红二”机关报。

偏偏报社掌权的“红二派”业务能力也不行，报纸上错字连篇，以至于出现严重政治事故，诸如把“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排印成了 “革命修正主义集团”之类，且接二连三。在那个时期，这样的错误简直是要人命呀！于是，“长春公社”抓住了把柄，大造舆论，在报社的墙上贴满了声讨大字报，进而引发了舆论狂潮。

4 月 17 日这天，长春“公社派”不宣而战，冲进报社，要查封报纸，勒令报社停刊请罪。报社的“红二派”当然不肯，“公社派”就组织冲锋，往外撵人。

冲突爆发后，报社门前聚起了上万人围观，舆论几乎一边倒。“公社派”的宣传车每质问一句，围观群众就一片鼓噪，山呼海啸一般。

面对突然事变，“红二派”方面毫无应对，束手无策，采取了张学良式的不抵抗政策，没有组织声援。报社内的“红二派”仅靠自己的力量苦撑，哪里抗得住“公社派”人海的围困。

“公社派”将报社断电断水，切断报社与外界的联络。“红二派”的人在里面无法，只有凭窗高唱“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

第二天，“公社派”前来参加围困的人更多，志在必得，逐屋逐层地清理“红二派”的人。

“红二派”碍于《人民日报》社论的束缚，不敢组织人马去对抗。军队方面更不可能出动了，公安的“色团”也有所顾忌。再加上，报纸确有短处被人家抓住，所以只好任由宰割。

其时，“二总部”的中学指挥系统出于激愤，曾调集了一部分援兵，进入报社进行斯大林格勒保卫战，可是好虎架不住一群狼，报社最终还是失陷了。

“公社派”这一仗打得漂亮，占尽“天时、地利、人和”。

报社位于长春市最繁华的重庆路。那几天，长春市大概有50 万人到报社门前去看热闹，结果，此役成了“公社”号召群众、聚集力量的重要一役。在查封过程中，“二总部”人员也试图抵抗，桌椅板凳扔得满天飞，但“公社派”负伤一人，则围观群众愤怒增加十分；“红二派”负伤一人，则围观群众无不拍手称快。现场的人心所向，“红二派”完全被人民战争给制住了。

到 19 日，“公社派”完全控制了报社大楼，他们把战旗插上楼顶。这一无心之举，又成了他们制造声势的好办法，一些对“公社”表示支持的单位组织，也纷纷把战旗插上楼顶。现场无数面大小不同、字体不同的群众组织旗帜，在蓝天下猎猎拂动。甚至有一些原属“红二派”的组织也阵前倒戈，把自己的旗帜插了上去。

来自南关区、二道河子区这些“公社派”“解放区”的人员，聚集在报社门口不散，喜形于色。

查封报社之后，“公社派”趁热打铁，立即在报社大楼内举办了一个“查封有理展览”，将“红二派”夺权之后《长春日报》出的错误逐一展出，又一次轰动全城，连“红二派”的人也纷纷

去看。展出的内容触目惊心，此外还有印得缺鼻子少眼睛的领袖画像，更是让人无话可说。

展览的留言簿上，记录了不少“红二派”人员当场“醒悟”、要杀回马枪的心声。人心、舆论，明显向“公社”倾斜。

其实，这个展览中的许多证据是“公社派”冲进报社后，把一些作废的报纸校对稿样和图版拿出来，当成正式报纸予以展览，这才造成报纸天天都有重大错误的假象。

“红二派”很久才缓过神来，开始采取一些对策。4 月末，“红二派”财贸学院的“造大”也针锋相对地举办了一个“查封无理展览”，用理智的态度，介绍了报纸编印的基本程序，应该是有说服力的，但已经晚了，看的人不多。这个旨在“消毒”的展览，基本没有什么影响。

4 月 23 日，“长春公社”正式宣告成立。

4 月 18 日，《甘肃日报》社也发生了武斗事件。2 月 5 日，兰州 34 个造反派的群众组织，宣布夺取中共甘肃省委、甘肃省人民委员会的领导权后，全省各级党政领导机关和所属机构相继被“夺权”。

也是在 4 月 2 日《人民日报》社论《正确地对待革命小将》发表后，4 月 15 日，兰州的保守派组织“革联”开始在大街小巷张贴“新《甘肃日报》是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工具!”“新《甘肃日报》是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喉舌!”等大幅标语，和各种声讨新《甘肃日报》罪行的大字报，说“红联”派掌握的新《甘肃日报》，已变为“资产阶级专政的工具”，新《甘肃日报》是“造谣报”等等，提出要“坚决砸烂新《甘肃日报》!”

第二天，4 月 16 日，“革联”派组织了声讨新《甘肃日报》的游行大示威。同时，他们的头头还开会决定，要从“红联”派手中夺回《甘肃日报》。他们派出人员，侦察地形，拟定行动方案，调集人力。

4 月 18 日下午 17 时，“革联”集合了 1000 多人的队伍，开始冲击《甘肃日报》。因为报社大门有解放军守卫，“革联”的一些人就从大门两侧和西边越墙而入，另一些人从东边破墙而入，还有更多人从后门冲入。不到半小时，“革联”派的人马就冲进了报社。

当“革联”的人对报社发起冲击时，报社内“革联”派的“革命造反总部”一些人，也立即从广播室破窗而入，把广播室人员赶了出去，抢占了广播室。然后宣布：“革联”派“夺权胜利!”并贴出了“夺权胜利”的《特大号外》。

而冲进报社的“革联”人员立即分兵几路，在报社“革命造反总部”人员的带领下，很快就驱赶了“红联”派人员，占领了中间的办公大楼和西边的生产大楼。与此同时，“革联”派的许多人组成人墙，阻止报社内“红联”派人员对办公大楼和生产大楼的冲击，守住报社的大门和一切出入口，断绝交通，割断电话线，切断了报社与外界的联系。

“革联”派将报社“红联”派的“抓革命、促生产临时委员会”的 3 名常委拖到经理部小楼，拘留起来并进行围斗，令他们交代新《甘肃日报》的“滔天罪行”。3 位常委据理力争，并写大字报表示抗议。大字报当即被撕得粉碎。

“革联”派的行动，遭到驻报社军队的干涉。但他们拒绝解

放军哨兵的劝阻，将驻报社的军代表阻拦在门外。一名帮助工作的解放军则被关在房子里，不准外出。驻报社的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提出了“要文斗，不要武斗”等四条意见，要求广播，遭到拒绝。派去联系的解放军，也被推出门外。

下午 18 时，“革联”派为防止“红联”派的反攻，开始收集器械，并从外面抬进担架。

下午 18 时 30 分，“红联”调动所属的“火车头战斗兵团”，“二七兵团”、“兰医红鹰”、“铁院红习”、“工联”等组织的大批人马赶到报社，要求“革联”退出报社，以保证《甘肃日报》的正常出版为名，对占领报社的“革联”派，进行反击。双方发生了拳打脚踢和棍棒交加的武斗。

面对人多势众的“红联”派冲击，“革联”的头头立即命令紧锁大门，死守要害部门，占领制高点。他们准备了许多石头、瓦片和棍棒等器械。

当“红联”派的人员冲进报社时，“革联”派居高临下，用石头、瓦片进行袭击。“红联”的人也不示弱，同样用石头、瓦片、棍棒等进行还击。

由于“红联”派不断增兵，在多次进攻后，终于将“革联”派的人打得节节败退，首先夺回了办公大楼和广播室。

“革联”的人马退出办公大楼后，死守生产大楼。“红联”派又发起多次冲击，“革联”派从楼顶上往下扔土块、瓦片和石头。终因寡不敌众，被“红联”派冲进了生产大楼。

“革联”派退出生产大楼时，捣毁门窗玻璃，砸坏桌椅，推翻了 20 多部铅字架。

夜里 24 时后，“红联”派在报社基本上“肃清残敌”，控制了报社，将“革联”派赶出《甘肃日报》社。解放军的指战员进驻生产大楼。“红联”派的人马，手挽手在生产大楼外面进行守卫，以防“革联”派再次进攻。

“革联”派不甘心失败，又重新组织人力，在当天夜里，连续几次进攻报社。无果而回。

凌晨 2 时，“革联”派再次出动，冲击生产大楼。遭到“红联”派顽强反击，双方发生激烈武斗。

5 时，“革联”派武斗者冲击经理部小楼，同时，还出动大批人员冲击后门，与守卫后门的“民院总部”发生武斗。

19 日早晨 7 时，“革联”的头头见“再攻不克”，便集合队伍，从前门退出。

“革联”退出报社时，砸毁了报社对面民办大楼上省军区的三个高音喇叭，高呼“打倒甘肃军区×××”等口号。又直接冲向甘肃省军区。他们砸了军区围墙上的两幅标语牌，捣毁了房脊。以抗议省军区支持“红联”派，“镇压革命造反派的滔天罪行！”

这次武斗事件，双方出动人员数千人，造成“革联”派和“红联”派的数百人受伤。

我们再回到锦州。4 月 18 日，锦州绝食进入第三天，绝食现场已完全沉寂下来，没有了口号声。绝食的学生横七竖八地躺在水泥地上，脸色苍白，无精打采。他们这时才感到什么叫饥饿难挨，咬着牙受忍着饥肠辘辘的折磨。从 18 日上午开始，一部分体质较弱的同学已出现昏迷状态，被人抬上救护车送往医院抢救。这时，会有新的绝食人员进入现场，顶替他们的位置继续坚

持进行绝食斗争。当天，有 10 多位同学因昏迷送往医院。

晚上，正在现场指挥维持秩序的一高“红司”头头安海岐将一位突然昏倒的女同学抬到担架上后，自己也站立不稳，感到全身无力，出虚汗，一下子坐在地上。一位在场的医生叫护士给他打了两针葡萄糖注射液。快到半夜零点的时候，师院的头头突然来找他，说驻锦部队首长要接见他们几个头头，现在已经派车来接，问他去不去。安海岐说：“去，看看。”于是他们几个头头便坐着一辆吉普车来到了驻锦某部队院内。一个战士将他们带到一个大屋子里。几名部队干部的人隔着办公桌站在他们对面，其中一位对他们说：“你们进行绝食的做法是错误的，应该下令立即停止绝食。你们不要被坏人利用。”这几位绝食领导人当面进行反驳。接见不欢而散，他们徒步走回绝食现场。

4 月 19 日，绝食第四天。由于连续三天没有吃饭，绝食的学生已经筋疲力尽。海校医疗队的队长告诉一高“红司”头头安海岐，要通知大家多喝水，否则肠子粘连会出现生命危险。于是，几个头头分别通知大家要多饮水、少活动，保存体力，防止出现意外。晚上 21 时多，绝食现场传言四起，说对立派已经在京剧团院内集结了队伍，准备冲击绝食现场，引起大家一片骚动。

锦州市公安局的“公安公社”也在市公安局的大楼顶上安放了几个大喇叭，对绝食现场不断地进行广播，打破了这里的沉寂。

晚上 20 时，绝食现场的学生朝楼上喊话，要求停止广播，人们要休息。

公安局“公安公社”有人从楼上探出头来挑逗说：“你们有能耐把大喇叭摘了啊，我们就不广播了。”

楼下的学生被气得哇哇直叫，可是市公安局的大门是坚固的铁闸门，一楼的窗户也都有铁护栏，进不去。正在楼下的辽大“八三一”头头张祥久见状说：“来人啊，咱们爬楼上去，摘他们这些老保的大喇叭。”

经过了一番的布置，有人开始顺着下水管子往上爬，有的人甚至是抠着墙角往上爬。此时，市公安局大楼下的锦州老糟和围观的老百姓足有 2000 多人，都在瞪大眼睛看着他们，还有人在鼓掌助威。不大一会儿，就有十几个人爬上了大楼，然后踹开二楼的窗户进入楼内。

随即就在楼内传出喊叫声和厮打声，立刻又有几十个“辽大八三一”的人爬上楼进行增援。市公安局大楼里不断地传出打斗声……

“哗啦”锦州市公安局大楼的铁闸门被人从里面打开了，楼下的“八三一”红卫兵和老糟们都立刻冲了进去。楼顶上的高音喇叭就这样被“辽大八三一”摘下来了，锦州市公安局的楼下响起了一片掌声和欢呼声。

## 第 595 回：外交部，发声明“打倒□毅” □伯达，声声劝“要听、看、帮”

4 月 10 日，外事口成立了“外事系统无产阶级革命派联络委员会”。

此时，外交部只有“联络站”这一个群众组织一枝独秀。4 月 10 日，外交部非“联络站”的 200 多名群众，其中绝大多数是总务司交通科的司机、修车工人和办公厅文印处的排字印刷工人，少数为亚非司、国际司、礼宾司、总务司供应处、总务司财务处、机要局、干部司业余学校、干部司调干支部等单位的科员，组织成立了“外交部革命造反总部”，简称“总部”。他们在对待陈毅、夺权、干部亮相等问题上与“联络站”有原则上的分歧。“总部”认为：陈毅犯有严重错误，必须进行彻底的揭发和严肃的批判，但仍属于人民内部矛盾范畴，按照“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采取“一看二帮”的态度。他们主张批判以陈毅为首的部党委所执行的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口号是“炮轰部党委！火烧陈毅！”他们一方面提出了比“外交部革命造反联络站”更“造反”的口号，另一方面，实际是对外交部“联络站”左右外交部大权不满，因此，“总部”成立后的重点工作，其实就是监督“联络站”的工作，发现问题就揭发或上告。

4 月 11、12 两日，外交部连续召开“揭发批判陈毅大会”、“反逆流大会”。

4 月 13 日，外交部“联络站”与北京外国语学院“红旗革命造反团”、北航 “红旗”等 35 个单位的造反派组织成立外事

系统“批判陈毅联络站”，简称“批陈联络站”。他们坚持只有他们这一派有权批斗陈毅，反对 4 月 10 日成立的“外事系统无产阶级革命派联络委员会”批斗陈毅。

4 月 14 日，外交部举行“打倒刘、邓，炮轰陈毅大会”。

4 月 17 日，“外交部革命造反联络站”核心组全体人员大会，以 15 票赞成、1 票反对，通过了“打倒陈毅”的口号。

投反对票的是“外交部革命造反联络站”核心组负责人张殿清，他认为尚未发现陈毅有叛徒、特务方面的问题，对陈毅还是帮助范围性质，因此不同意“打倒陈毅！”的口号。

当天，北京“批陈联络站”数百人前去中南海揪斗陈毅。当晚 23 时，陈伯达和戚本禹接见了“批陈联络站”代表。

陈伯达在听取汇报时，针对代表们的一些提法，表示了质疑。他问：“火烧、炮轰是什么意思，开始用意是好的，后来用乱了，还是用批判好。什么叫炮轰？什么叫火烧？什么叫油炸？”

陈伯达在听取汇报后又说：“很抱歉，我现在不太了解外事口的情况，本来我不应该讲话，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今天到会是戚司令逼我的，戚本禹同志请我来帮忙的，我来帮不了什么忙，既然也请了，我就来了一下。”“听了大家讲话，我有一点小小感性知识。”

戚本禹说：“就喜欢小小的几个字，小小的老百姓，伯达同志不喜欢称首长，以后不要叫他首长了。”

陈伯达：“我写了几条，念念，要记就记，不要贴到大街上。”

他接着说：“外事口无产阶级革命派要联合起来，分几个步骤达到目的，太急了也联合不起来。要有步骤实现大联合。比如

先分别开一些联席会议，一些具体问题还可以开一些联席会议，不同团体，不同组织，开不同的联席会议。不同意见可以保留，不要勉强要他取消意见，……不要互相攻击，互相辱骂，不准武斗。

二、外交部有关的国家机密，在座的同志知道了不要到大街上去贴。因为你贴出去，帝国主义、修正主义、蒋匪帮花钱买不到的机密，你们就无代价地供给他们了，这样做不合适。请你们好好考虑一下。如果原来你们不知道嘛，就不要知道了，知道了干什么？

三、外交活动就不要冲击它，国际性活动不要去冲击，要按照协定进行，国家的外事活动你们不要去冲击，有意见可以提出来。

四、关于外交部长的问题，外交部长对外活动多，你们的活动最好不要去妨碍他的正常活动。他代表国家去进行的正常活动，不要去妨碍他，如果妨碍他正常活动，就不好了。”

有人要求把这句话解释一下。戚本禹说：“你们也可以活动，他也可以活动。这还不够清楚吗？”

陈伯达继续说：“妨碍他的正常活动，对国家不利，因为他是外交部长。

五、关于外事，关于陈毅的大字报，不要在街上贴，大字报最好去机关、去单位贴。”

戚本禹：“揭露性的，长篇的大字报不要马上上街，因为外国记者很注意这些，坐在汽车里照相。”

陈伯达：“不要给帝、修、蒋介石的情报机关利用。”

戚本禹："不要做义务情报员。"

陈伯达："最好在各机关、各学校贴。"

戚本禹："有些问题不适宜贴的，可以给毛主席、林副主席、伯达同志、中央文革写信。你们的信我们都有人认真研究。"

陈伯达："他是外交部长，不管外交部长职位多大，都是人民的勤务员。我们是国家主人，要有主人翁感，不是对陈毅个人负责，是对国家负责。

六、你们不要去揪陈毅同志，不要再到中南海去揪了，今天你们多少人去揪了？"

众答："700 多人。"

陈伯达说："不好，这影响不好，既往不咎，以后不要去。"

戚本禹："今天去也没有错，不然另外一派又要说你们错了，错了。"

陈伯达："对外文委要把很多人打成反革命，把我打成反革命后台，这是我最早知道工作组的问题，这点我要感谢张彦同志，可能大家听了同志二字不舒服，我是顺口说的。"

戚本禹："这是顺口说的。"

陈伯达："张彦说没有把人打成反革命，那么，哪里来的反革命后台？这么大的问题，荒唐的问题，我也没有去报复他。但是群众去批判是对的，再提出他这个问题去计较，没有意思。划不来。"

戚本禹："伯达同志的意思是藐视他。"

陈伯达："刚才大家提出要到外交部串联的问题，不要去，也没有必要。因为一串联人就多，机关的经常工作就困难。外交

部需要有正常工作，去年有一批学生到《人民日报》，占了五层会议室，说要与《人民日报》辩论，要打倒唐平铸，我是说服他们走，谈了很久，绝大部分同学当天都走了。我说《人民日报》天天要出版，你们几百人，住在办公室，《人民日报》就不能很好出版了，这算是一个大道理。要保证外交部日常工作。”

戚本禹：“不止是外事口的学校，‘批陈联络站’那么多学校，都是上千人的，你们北航、北师大就两万多人，学校的人太多了，你们都要去，怎么办？”

陈伯达：“不必要去了，大字报可以送给他们贴，可以在机关里贴，也可以送给本人。……这是我们的意见，你们有意见可以保留。

七、要让陈毅同志有改正自己观点的机会。”

众人说：“陈毅说上次检查是逼出来的。”

陈伯达：“上次的检查我们没有逼他，是他逼我们的。他一定要我们去，我出自一种好意，说了几句话，说了几句好话，今天他说不算了，我们可以让他再思考，可能他现在又在想检讨，就不让了，他可能又在写检讨，也可能还说你们逼他的，但他检讨时，我们也可以再听，听了再说，听听看看。”

戚本禹：“听其言，观其行。”

陈伯达：“要帮助他。对陈毅同志还是要采取帮助态度。他说过许多不适当的话。”

戚本禹：“哪里是不适当的话，是反动的话。”

陈伯达：“他还可以收回来，陈毅是个诗人，但诗写得不好，我也没有看过多少。现在文学家说话，有时可以不算数的。他是

浪漫主义文学家。”

戚本禹：“他说他的话是算数的。”

陈伯达：“我是客观地看他说的话，不一定算数。我这话，你们不能贴到街上去。别人要问外交部长说话怎么不算数？”

众人说：“陈毅说他自己直率。”

戚本禹：“直率有阶级性的。”

陈伯达：“还可以让他检讨，但要自愿，不要强迫，不要勉强，不一定采取揪的方法。揪这是个新发明。揪、砸我首先不赞成的。”

戚本禹：“揪，揪是揪陈毅的错误，用这个揪字还是可以的，也可以浪漫主义一点。”

陈伯达：“要科学的共产主义。毛主席是科学共产主义，是科学共产主义的继承人，伟大的导师。为什么一定要揪和砸呢？砸，干什么？砸了办公室也没有多大意思，人家在办公，一砸就没有对立面了，变成一言堂，辩论不起来了。砸机器，砸桌椅更不好。”

戚本禹：“反动的。”

陈伯达：“‘联动’就是这样，‘联动’是反动的，他们就是这样砸八一学校的。”

众人问：“‘联动’后台是谁？”

陈伯达：“我也不知道。”

戚本禹：“你们可以调查嘛，有材料可以揭发。”

陈伯达继续说：“八、要听看帮。要按毛主席政策办事，不要像赵太爷一样不让别人闹革命。这是阿Q正传里赵太爷不让阿

Q 革命。”

戚本禹：“他们以前要革命，赵太爷不让他们革命，被打成反革命。”

陈伯达：“也不要反过来当赵太爷。”

戚本禹：“先造反的不要不许后造反的起来革命。”

陈伯达：“这个不高明，不符合毛泽东思想。”

众人齐声说：“造反不分先后！”

陈伯达继续：“九、外事工作是总理直接管的，领导的。有些人说和我们文革小组有什么关系，同文革小组没有什么关系。”

戚本禹：“外事系统文化大革命是文化革命小组经常关心的。”

众人问：“陈伯达同志是不是在主持外事？”

陈伯达：“哪里，我这个人怎么能搞外事，说话都说不清楚。”

戚本禹：“中央文革同志还是经常在关心外事文化大革命的。”

陈伯达：“我今天关心了嘛。……可以要求陈毅到群众中去，不来可以等待。他要革命，总是要来的。剩下的问题让戚本禹回答。我说的话可能不对，你们可以批评。我不怕群众，所以来了。这些意见要你们很好考虑。”

戚本禹：“回去还有两篇文章要改，会议就开到这里。我没有话了，伯达同志已都讲了。”

陈伯达：“你们要好好学习《十六条》，最根本的是精神，是群众自己教育自己。无产阶级革命是思想革命，无产阶级思想革资产阶级思想的命。每个人的头脑要动起来，不能由别人代替。

你们要靠自己教育自己，这是毛主席的教导。如果要当毛主席的好学生，就一定要遵照毛主席的教导，自己教育自己。串连不可没有，也不可太多。现在已经串联相当多了，主要是本单位的斗、批、改，现在要用头脑，要坐下来，不要心里老是慌慌的。不要到处去串联，不要到处去冲。”“要革别人的命，同时也要革自己的命。革别人的命很痛快，革自己的命很痛苦。”

第二天，4 月 18 日，外交部“联络站”发表《打倒陈毅的声明》。接着，“联络站”核心组第一把手改换，由王中琪取代了反对“打倒陈毅”口号的张殿清。

4 月 19 日，外交部“联络站”定于当晚召开“干部亮相大会”，要求副部长们站出来揭发陈毅的问题。当天下午，周恩来秘书钱嘉栋传达总理的指示：“大会暂不要开，待总理接见‘联络站’核心组成员后再说。”

但是 4 月 21 日，外交部“联络站”还是召开了全外交部“揭发批判陈毅及部党委执行刘邓资反路线大会”，部党委成员、副部长们都一一被点名命令上台“揭发”陈毅。外交部副部长姬鹏飞等人只好支吾搪塞，陈家康、王炳南、董越千、徐以新等部党委成员在大会上发了言。在运动初期曾差点被打成“三反分子”的副部长陈家康揭发：陈毅曾在文革初的部党委学习会上，说过毛泽东发动文革是“乾纲独断”。这一下，轰动了。但是，事后，周恩来责骂陈家康此举是“跳梁小丑”，是“坏人”。陈家康也为他的这个“揭发”付出了沉重代价，从此他再没有出来工作了。

4 月 20 日，经毛泽东审阅同意，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

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出重申停止全国大串连决定的通知。

## 第 596 回：四二〇，北京□委会成立　做汇报，中央接见□再道

4 月 18 日，北航《红旗》报刊登北航红旗“黄河游击队”和“红一连”写的文章：《坚决打倒徐向前》。文章说：

“去年几个到兰州串联的红卫兵经过详细调查，得到了徐向前临逃跑之前向三十军余下指战人员的讲话则更进一步证明了这一点。徐向前说：‘兄弟姐妹们，我们粮食没有了！子弹没有了！大家各自逃生吧！以后，死了的有你的纪念碑，活着的有你的饭吃，十年以后再见！有我吃的饭，就有你吃的饭！’干部战士们听后不知所措。结果夜里，徐向前趁大家熟睡之时，带了两连精兵溜了。”

面对北京学生间仍不停息的争吵和不时发生的武斗，4月18日，谢富治召集北京市学校及工矿单位开紧急会议。他说：

“今天找大家开一个紧急会议。大家很关心当前阶级斗争形势。形势是好形势，开展了空前规模的，批判以刘少奇、邓小平为首的党内最大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挖出了修正主义的总根子。这个斗争是从戚本禹同志的文章发表以后开始的。刘邓在北京，彭罗陆杨也在北京。要批判打倒的对象大部分在北京。在批判刘少奇时，刘很不老实，说“你们没有批倒我”。要他回答问题，他还反驳。除了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以外，还有彭罗陆杨没有批判，还有大大小小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反动学术权威没有批判。

4月初到今天，共开了五、六次会，都是讲一个问题：掌握斗争大方向，不要把矛头指向解放军，不要打内战。就是这么一句话。

武斗现在已经发展到工人中了。城建公司几千人打架。伯达同志、王力同志、戚本禹同志……，几个同志最近的讲话，都是讲一个问题：把矛头对准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城建公司打架，中央文革小组讨论时，很怀疑有后台。……今天我临走时，伯达同志还要我讲大反特反无政府主义，这种大标语要上街。”

有人问：“无政府主义指哪些方面？”

谢富治：“无组织、无纪律，乱打乱砸算不算无政府主义？中央文革小组讲了六次都不执行，还是照老样子，算不算无政府主义？你们不是天天讲要做中央文革的拳头吗？这算什么拳头？无政府主义的问题，不听话，就是个人主义的问题。还有一个‘乱’。这是我的意见，说错了你们批评。‘乱’有阶级性。‘革命组织要大分化、大动荡、大改组’，这种口号是很错误的，反动的。只有资产阶级的东西才要乱。

我们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成立不起来，下面有各式各样的谣言，哈尔滨有传单，说我是个反革命头子。现在革命委员会还没有成立，下面就有很多谣言了。……红代会，各学校，好好把这几天讲话的精神学习一下，领会精神实质，贯彻执行。还要向社会宣传。北京市在这方面应该作模范。这是第一件事。”

谢富治这里说的“好好把这几天讲话的精神学习一下”，是指中央文革最近半月来六次接见北京代表的讲话。

谢富治接着说："第二件事：中央文革小组实际上早已说过了，今天正式决定：到外地串联的学生，除了去青海的'五一'以前撤回来以外，其余的都立即撤回来。小报记者可以留下。……北航'红旗'有一个专搞叛徒集团的，不要回来。撤回来的问题，红代会发通告，各高校也发通告。到外地去的同学和记者，决不能打中央文革的招牌。'我是文革小组派来的'招摇撞骗，已经抓了好几个了。"

这时，有很多人议论四川不能撤，那里造反派刚起来，很艰苦……谢富治说："回来嘛！情况我们都知道了。人抓来的，我负责。"

有人说："撤回来，当地可能有谣传，可能有反复。"

谢富治："不管他的，你们回来时发表一个声明。四川'产业军'很嚣张，你们要相信当地革命群众，红代会起草通知时，要注意一些。首先要肯定，他们做了许多好事，做得很好。也要留点余地，可能有个别不好的。"

对撤回来的问题，与会者还是议论纷纷……谢富治说："不要缠我了，我还要开会！

在工厂要宣传支持军管，那天我见了主席，主席对我说：'军管太少了。'那是很早的时候了。这种事情不要往外讲，更不要贴大字报。有人说军管是派工作组。那天主席跟我讲：'刘邓派工作组是压迫革命，反对革命。我们军管是支持革命的。'我们军管总的方面是支持革命的。到工厂的要撤回来。现在机关里也分好几派，各部都这样。凡是两派打架的，两派都撤回来。统统回来，不要找理由！就是江青同志讲的，不愿动脑筋，喜欢打一

打，跑一跑。散会！”

第二天，4 月 19 日，清华大学“井冈山”、北京航空学院“红旗”、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等八个高校的造反派组织发表了《关于目前首都中学运动的声明》，表示拥护中国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中学革命造反派小将。

4 月 20 日，在北京大专院校红代会、中学红代会、工代会、农代会的基础上，中央决定正式成立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由谢富治担任革命委员会主任，吴德、丁国钰、聂元梓为副主任，蒯大富、韩爱晶、谭厚兰、王大宾、李冬民等任常委。北京工人体育场隆重召开了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等领导人出席大会。已经成立了革命委员会的上海、山西、贵州、黑龙江、山东五个省市的革命委员会代表团专程前来北京出席大会，表示祝贺。代表团成员中，有山西的刘格平、张日清、陈永贵，贵州的李再含、李立、何光宇，黑龙江的潘复生、汪家道、张万春、山东的王效禹、陈雷、王文俗，上海的张春桥、陈琳瑚等人。

周恩来代表毛泽东和林彪，代表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对北京市革委会的成立表示热烈祝贺，江青代表中央文革小组在大会上作了引人注目的讲话，张春桥代表五省市革命委员会代表团讲话。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代表团向大会赠送了毛泽东 1950 年在黑龙江省视察时题词的复制品。

1967年4月22日首都各届群众向市革委会成立表示祝贺。图为总政治部代表在市府大楼前读贺信，市革委常委蒯大富（戴眼镜者）和李冬民（蒯的左侧）表示感谢。

会上，江青看到地院的王大宾，让他转告朱成昭："让他检讨归队"。

在此之前的一次北京市革委会筹备会议上，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王力、关锋、戚本禹及谢富治接见全体与会人员。江青说："当时抓'联动'是对的，现在毛主席指示叫放'联动'的这些学生，也是对的。王大宾，你要告诉朱成昭，我们还是希望他改正错误，继续革命，早日归队。他说，中央文革抓'联动'是错误的，现在毛主席批示，就全放了。"

戚本禹对王大宾说："这是江青同志的指示，你回去转告朱成昭，要他做个检讨。"

谢富治说："抓'联动'是我叫抓的，与主席无关。"

王大宾回地院后，即向地院革委会传达了江青与戚本禹的指示，并商量如何帮助朱成昭等人接受中央文革指示，写个检讨。朱成昭口头答应了，但一直没写。

4 月 21 日，新华社、《人民日报》对北京革委会的成立作了

报道。

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成立后，毛泽东在接见北京市革委会主任谢富治时说："我祝贺你，祝贺大会成功。请代向全北京市革命造反派祝贺。""青年人要参加你们的工作，使前辈人不脱离群众，使青年人得到锻炼。青年人不能脱离生产，这样不会造成脱离群众，要半官半民。"

3 月下旬，武汉军区接到中央军委电话通知,要陈再道、钟汉华到北京参加军委扩大会议。4 月 2 日《人民日报》发表的社论：《正确地对待革命小将》和中央军委 4 月 6 日下发的《十条命令》，让正在北京开会的陈再道感到十分困惑，他觉得这是朝令夕改，让他们在下面做工作的人无所适从。在小组会上，陈再道发言说:

"军队支左是主席的决策，我们表示完全拥护，而且尽心尽力把工作搞好。但是，从爱护军队的观点出发，为避免军队在支左中犯错误，我建议中央文革小组扩大一点，多吸收一些同志参加进去，以便让各地都有代表，直接领导'三支两军'工作，叫我们怎么干，我们就怎么干，免得给工作造成损失。如果这个方法不行，也可由各地派人到中央文革小组接受指示。总之,既要把支左工作搞好，也要避免军队犯错误。"

当秘书将他的发言记录整理出来后,问他："陈司令，您的发言要不要登简报?"

陈再道想了想说："登，提个建议嘛!"

而此时，被解散的武汉"工总"工人和"二司"学生陆续有人进京上访告状。他们 4 月 4 日与中央文革取得联系，4 月 8 日

向中央文革反映了武汉的情况。

4 月 16 日，陈再道的秘书将一份传单送给他说:“首长，这是我找来的一份传单,上面有江青同志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军内外造反派时的讲话，讲话中谈到我们武汉问题,您抽时间看一看吧!”

陈再道接过传单，戴上老花镜，认真地看了起来。其中有一段文字引起了他的注意：

“还有个武汉问题，你们知道吗?抓了不少人，都是最早起来造反的群众。成都、武汉，那是问题比较严重的地方，你们可以冲一冲!”

陈再道拿着传单去找钟汉华，对他说：“武汉的情况，与成都不同，她把武汉和成都相提并论，是不是听了一面之词，不了解武汉的真实情况。我们应该向中央作个汇报吧？”

钟汉华看了传单，同意陈再道的意见。于是，他们向周恩来讲了他们的想法,周恩来同意，并让他们作好汇报准备。

陈再道、钟汉华 4 月 19 日接到通知，到钓鱼台汇报武汉的情况。汇报会由周恩来主持，听取汇报的有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陈再道汇报了武汉的情况，其间，江青插话问了几个问题，其他人没有提出什么意见。最后，周恩来要求中央文革小组尽快安排一次接见武汉的造反派代表，帮助武汉军区做做造反派工作。江青当即表示同意,并让戚本禹代表中央文革小组安排在 21 日接见。江青还表示，这次接见她不参加了，因为她的身份不同，如果她参加接见，会抬高造反派的身价。大家一致赞成请文革小组出面让造反派支持军区的支左工作。

这次汇报会开的不错，没想到当天武汉就出了问题。起因是在周恩来和中央文革听取陈再道和钟汉华汇报后，钟汉华给武汉军区打电话谈了中央这次接见的情况，军区支左办公室迅速将钟汉华的电话内容作了传达：

“最近，周总理和江青同志接见了我们。总理说，我们解散‘工人总部’做得对，坏人不是抓多了，而是抓少了，以后还得注意‘工人总部’一些头头的活动。江青同志说，她受了新一中学生的骗了，绝食不是 3 万，而是 300 人。江青同志还作了自我批评。中央首长指出，武汉军区支左的大方向是正确的。”

当晚，武汉就盛传陈再道、钟汉华打回电话说，中央文革召开会议听取军区汇报情况，认为：保守派红卫兵不应解散，中央军委《十条》发布前解散的“工总”不应恢复，武汉阶级斗争复杂，坏人很多，不是抓多了，而是抓少了。江青说武汉军区没有犯方向路线错误，也不是带枪的刘邓路线，并向陈再道道歉，“听信了假情况，闯了大祸”。据说江青又指出武汉的“国民党渣滓”确实很多，撤退时有一两个师的人留在武汉，插在各个工厂里，情况很复杂等等。

中央文革小组派驻武汉的“解放军报记者”将这些消息通过《情况反映》连夜报到北京，询问这些指示是否属实。

第二天下午，江青派人把刊载这篇报道的《快报》送给陈再道，她在这篇《情况反映》上写道：

“陈再道、钟汉华：这是怎么回事？以势压人！我们不理解。阅后退江青处。”

陈再道、钟汉华看了江青的这个批示，万分震惊。钟汉华给

武汉军区的电话记录上是这样写的：

“今天总理、伯达、江青等首长接见了陈、钟，中央除戚本禹同志外，都到了。

我们向中央文革检讨了：‘工人总部’的材料全部上报了，但中央没有批下来，我们就宣布解散了，从组织观点讲是有错误的。

中央文革讲：这不算错，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这个规定，没有说等中央批了以后再宣布解散。现在有这个规定，以后按这个规定办。

‘工人总部’肯定不能恢复！

关于‘三字兵’问题，中等学校红卫兵不解散，昨天他们游行，口号是：打倒刘邓陶王！我们就是要革命！分化瓦解‘三字兵’是指大专院校红卫兵。

新一中问题向中央文革汇报了。江青同志说：我接到了一个假情况，说有三万人绝食。经军区调查只有 300 人绝食，连支持他们的在内只有 3000 多人绝食。

我和陈司令员讲：我们可能抓多了些。

江青同志说：人抓多了些，武汉地区情况复杂，我了解，真正的反革命不能放。

从整个来讲，我们武汉地区不存在方向、路线错误，也不是带枪的刘、邓路线。

‘三司’是左派，对解放军的态度没有错，大方向没有错。要给‘三司’谈一谈，叫他们积极准备斗争王任重。‘三司’派人到中央要揪陶铸回来斗，中央不同意，同意把赵辛初带回来斗。

把派到工厂、学校的干部抽回来学习一下，进行调整，中央同意。军管这一条线，一定要守住，不能叫冲。

河南问题，总理说：‘《河南日报》有两派，叫他们到北京来谈一谈，没有来，想把另一派打下去，现在已经打下去了，还没有来北京，分左、中、右，以反不反刘建勋，冲没有冲省军区作标准是错误的。’

要抓紧对刘邓的批判，开大会、作大报告。各单位负责人，要抓紧抓好，可以到街上写大标语，但不能乱写。

要教育干部站出来，正确对待革命小将，要耐心细心，不能搞对立，他们说了我们一些话，不要搞偏了。”

此刻的陈再道已经被造反派轰得晕头转向，迫切需要中央文革的表态和支持，紧跟中央文革还跟不上呢，岂敢得罪中央文革和江青，这不是给自己脖子上套绞索吗？陈再道和钟汉华忙打电话向武汉军区查问情况。原来是一位负责“支左”的干部在列席军区党委常委会后，回去向“支左”办公室的工作人员作了传达。于是，这个消息很快就在武汉传开了。

陈再道、钟汉华二人不敢怠慢，赶紧向江青写了书面报告，说明他们并没有用中央文革小组名义压制武汉地区造反派的意思。同时表示，这件事没有处理妥善，他们也有责任，愿意接受批评，坚决改正错误。

4 月 21 日凌晨两点，总政治部一名干部奉中央文革小组之命，前往陈再道、钟汉华住的京西宾馆，没收了他们 4 月 19 日参加汇报会时作的记录，同时传达了中央文革小组对造反派的接见已被取消，中央文革小组不再帮助武汉军区做工作了。自此以后，

对于武汉军区的请示报告，中央文革小组一律不予答复。

这天，武汉军区侯副政委与“新华工”赴京学生进行了一次心平气和的谈话，他承认军区支左有错，但大方向没错，承认“二司”是革命造反组织，但坚持解散“工总”是正确的。这一态度基本上就是钟汉华那天的电话精神，也表达了当时武汉军区领导的总体认识。

## 第 597 回：张春桥，开会批评“工总司”　上海市，“扫□纵□”被遣散

2 月 24 日上海人民公社更名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大会上，宣读了 2 月 23 日通过的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第一个决议草案：《当前上海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和任务》，其中提出：

按产业，按系统，按单位，按地区，实行条条与块块相结合的方式，建设无产阶级的阶级队伍。工人的革命组织，不要跨行跨业跨地区，不要发展学校师生。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医务工作者和文艺工作者等成员，已挂钩的要重新归口。学生的红卫兵组织，不要发展工人和贫下中农参加。

在 2 月 24 日的大会上，张春桥在讲话中进一步提出要“按照单位，按照产业，按照系统，按照地区”调整群众组织的机构，实现革命的大联合。

3 月 1 日，《人民日报》介绍贵阳棉纺厂的大联合经验，要求全国“自下而上地按部门把无产阶级革命派组织在统一的革命组织中”，按行政系统“归口”联合。

此时，王洪文正在华东医院住院，他听到贵阳棉纺厂大联合经验的广播后，马上将王秀珍、叶昌明、戴立清、王腓利、陈阿大等叫到医院，研究“工总司”应该怎么办？大家对此都十分困惑。据陈阿大回忆，王洪文在医院对大家说：“看来我们要解散了，你们要有准备。”

上海人民公社成立前，上海的运动基本在“工总司”的掌控之下。但公社成立之后，工作归口，机关干部因为对机关业务熟

悉，越来越多地回到各部门参加管理，工人造反派感到权都被徐景贤“机联站”的干部们抓走了。例如谢鹏飞所负责的“抓革命、促生产火线指挥部”，公社成立后很快就没事可干了，各局的工作都不再向他们汇报，他们感到失落。在“工总司”和其他公社发起组织召开的一次会上，大家对此发了很多牢骚。3 月初的一天，王明龙又向王洪文反映了大家的意见，王洪文让王明龙“下午开会向三军汇报。”

“三军”即驻沪海陆空三军。为什么要向三军汇报？因为张春桥曾经说过，上海市人民公社的工作主要由“三王”主持，即王洪文、王承龙和王明龙，如有重大事情，可向三军汇报。

当天下午，王明龙在上海警备区常德路礼堂召集驻沪三军领导开会，参加者有上海警备区副政委李彬山、东海舰队副司令高志荣，驻沪空军副政委姬应伍等六七人。正在住院的王洪文也前来参加。王明龙在会上说了对机关干部的看法。

参加会议的上海警备区副政委李彬山觉得此次会议是有所指的，会后即到兴国路招待所向张春桥作了汇报。张春桥第二天就将王洪文找去批评。王洪文下午回到在巨鹿路空四军招待所，只对王明龙说了两个字：“右倾”，就躺到床上睡觉了。王明龙摸不看头脑，不知道王洪文这个“右倾”是什么意思。

当晚，张春桥又将“机联站”的徐景贤、王承龙、朱永嘉、朱玉佩，“工总司”的潘国平、王明龙和谢鹏飞，还有驻沪三军派驻上海市革委会的军代表叫到兴国路招待所开会。王洪文因为正在住院没有参加。这次会议开了整整两天，是整风会议。

会议一开始，张春桥就说：“王明龙，你有那么大权力？！你

要调动三军干什么？你要搞的话，我和姚文元回北京，上海你去搞好了！”

王明龙被张春桥训得脑子一片空白，不知道张春桥为什么说他要调动三军？

张春桥训完王明龙，又转向谢鹏飞说：“谢鹏飞，你不是有很多话要讲吗？今天怎么不说了？”“你说说，你们为什么要开这样的三军会议？”

谢鹏飞与朱永嘉的妻子在一个厂工作，朱永嘉又曾在谢鹏飞负责的“抓革命、促生产火线指挥部”工作过，两人关系不错。事先，朱永嘉已经告诉谢鹏飞：“晚上张春桥开会，批评你，你就低头认错，不要辩护，这事与你不搭界。”所以谢鹏飞听到张春桥的批评，不敢多言，只支吾了几句，说自己“对老徐有点意见”。张春桥把谢鹏飞训得边哭边做检讨。只有潘国平与张春桥强辩，说上海市人民公社都快变成“机关联络站”的公社了，样样事情都要通过徐景贤。

张春桥说：“小潘，这事与你无关，你不要跳，王洪文自己都承认错误了。”他将王洪文写的检讨拿给潘国平看。

潘国平后来回忆说，张春桥平时说话喜怒不形于色，这次如此震怒，他还是第一次看到。

张春桥让坐在旁边参加三军座谈会的海军军代表发言。海军军代表说：“有件事不是很正常，王洪文和王明龙找我们开了次会，讲了些与徐景贤等机关干部的矛盾，以及对徐景贤工作方面的意见。”说着，他拿出了当时的会议记录，念了一遍。

张春桥又转向王明龙说：“你，王明龙，你在部队干过，你懂

得我们部队的这一套，你们是想去争取三军的支持！你们这是别有用心！”

事后，张春桥将缝纫社工人、“工总司”委员徐美英写给张春桥的一封信拿给徐景贤看了。信里提到王洪文在“工总司”打击别人、抬高自己的一些言行。张春桥对徐景贤说：

“对‘工总司’的这几个工人领袖，既要严格要求，又要慎重对待。这件事情看样子到此为止了。现在王洪文在医院里生病，你还是去看看他吧。”

徐景贤按照张春桥的指示，正准备去华东医院看王洪文，文艺口有人向他反映，王洪文在华东医院跟青年话剧团的刘贵琴吵起来了。

刘贵琴是青年话剧团的演员，也是老造反，天不怕，地不怕。当初造上海市委反时，她领着文艺口的造反派，曾和王洪文一起冲击上海市委，把曹荻秋等市里领导斗得稀里哗啦，那可是并肩战斗的战友。此时，她正好也在华东医院住院，是住在北楼的普通病房里，而王洪文则住在华东医院南楼高干病房里。她听说王洪文住在南楼的高干病房，而且是一个人住了一大间，很不满意：文化大革命就是批判城市老爷卫生部，而你王洪文身为造反派，刚刚打倒旧市委的老爷们，掌了权，怎么自己就当官做起老爷来了？这也太不像话了！于是，她跑到王洪文那里造反，被门口的警卫拦住不让她进。刘贵琴哪管这一套，陈丕显、曹荻秋那里她都敢冲，更何况你王洪文了。她二话不说，推开警卫，冲进王洪文的房间里，指着他的鼻子大骂，说王洪文变质、变修了，气得王洪文叫人把她架出去了。

徐景贤听到这些情况，赶紧骑了一辆凤凰牌自行车，来到华东医院。一进大门口，就看见上海录音器材厂工人蔡大炮，也是“工总司”的，他认识徐景贤，看到他推着自行车进门，很惊奇地说：“景贤同志，你……”

徐景贤把自行车锁好后，问他：“老王在不在？”

蔡大炮连忙说：“在，在，在，在病房里面。”然后对另一个青年工人说：“等着干什么？快去通报！”

徐景贤来到三楼的病房，进到王洪文的病房，看见王洪文躺在床上。大概刚刚通报过，衣服穿好了，是医院的病号服。

徐景贤过去和他握握手，问到：“身体怎么样？”

王洪文说：“有点感冒发烧。今天刚刚退烧。”

徐景贤说：“我来看看你。”

“嗷。”王洪文显得有点冷淡。

徐景贤继续说：“最近市革会正抓几件工作，其中一项是有关小学教育的，你生病这一段时间，没能来参加讨论。”

徐景贤说：“现在小学复课，是不是先让小学上起课来。你的孩子和我的孩子都在社会上‘放羊’了，没人管。学校里除五类分子和走资派外，其它的教师还是让他们上课。现在小学里的‘小教司’和‘工司教’打内战，复课复不起来了。所以我来找你，一方面看看你的病，另一方面也请你出马，怎么把这两派联合起来使学校复课。”

“工司教”是“工总司”的下属组织，徐景贤又说：“是不是过几天，等你身体好一点后，开一次市革命委员会全体委员的扩大会议，把小学教育系统的两派都请来，会议由你主持，主要

是促进两派的联合，然后发一个市革命委员会的公告，先让小学复课闹革命。你看怎么样？”

王洪文二话没说从床上坐起，说：“我没事，我没事，一点小毛病，算不了什么的。老徐，什么时候开会由你定吧。通知我。”

过了几天，这个会议就在“上体司”的体育俱乐部楼上的大厅召开，把小学教育界的两派头头都请来，由王洪文主持会议，会后草拟了一个通告，这个问题就解决了。

上海市革委会成立后，一切工作趋于正常。而游雪涛那个“扫雷纵队”四处收集情报的做法，自然也遭到诸多非议。写作班的朱永嘉提醒徐景贤，不要跟游雪涛搞在一起，会受到牵连。

徐景贤向张春桥汇报了游雪涛的情况，张春桥也对徐景贤说：“上海警备区也有反映过来，游雪涛派人打进去的事他们都知道。”

原来，游雪涛在上海警备区发展自己的眼线，还跟警备区办公室丘主任交上了朋友，然后从那里不断搞出警备区内部材料。就这样，有关上海警备区的一份份简报送到了张春桥手中：

《上海警备区材料摘编》；

《上海警备区大搞资反路线的情况》；

《上海警备区目前运动的情况点滴》；

《关于方某某追查邱某某与张、姚两位关系的情况》……

这个“方某某”是上海警备区方副政委。而这个“丘某某”就是上海警备区办公室主任。虽然张春桥也认为上海警备区有一股反对中央文革、反对张春桥的势力，但是他对游雪涛的做法也有点忧虑。

徐景贤问："这个组织是不是还要继续存在下去？"

张春桥说："我早就讲过了，他们还是不谨慎，当然，还是应该肯定他们前一时期做了不少工作的，只是他们的搞法有点像情报系统，这只有在非常时期才能用，他们搞苏联克格勃那一套，这是不行的。"

徐景贤建议："对游雪涛的工作是否做一下安排，把他的'扫雷纵队'解散，最近市革命委员会要建立一个群运组，是不是让他去担任个职务。"

徐景贤说的"群运组"，是专门负责上海市革委会与各单位群众组织的联络工作，同外界打交道比较多，对游雪涛来说比较合适。而群运组组长，已准备派市委写作班哲学组成员、原市委党校哲学研究室谢宗范担任。徐景贤向张春桥建议，让游雪涛去做副组长。至于"扫雷纵队"的其他人，徐景贤建议有的回原单位，有的也可以到群运组工作。张春桥同意了他的意见。

3 月 29 日，徐景贤找游雪涛谈话，婉转的对他说："'扫雷纵队'前一时期做了不少工作，得到春桥同志的肯定，你们的同志为保卫无产阶级司令部做出辛勤的劳动，但是你们的搞法有点像情报系统，做法上有点像苏联的克格勃，再办下去谁能来领导你们？对于你们这样的组织是不能领导的，如果给人家抓住了把柄，说张春桥在上海搞了一个特务组织，这问题就大了。"

游雪涛还想辩护，徐景贤索性明确告知："这不是我个人的意见，这是春桥同志的决定，正是考虑到你们前一时期的工作还是有成果的，所以现在安排你担任市革命委员会群运组副组长，其他人可以回原单位，也可以另外安排工作或去群运组。这样，

你们的组织从现在开始停止工作。”

游雪涛一听是张春桥做了这样的决定，就不说话了。

1967 年 4 月，游雪涛宣布撤销“扫雷纵队”。4 月 20 日，徐景贤把游雪涛安排到“市革委会”群运组当副组长，并对谢宗范和游雪涛两人的工作做了分工。

## 第 598 回：广西省，“支□”“支伍”大混战众□导，接见□外地记者

3 月 13 日，周恩来打电话让韦国清站出来任广西自治区军管会主任。随后韦国清飞往北京。从 4 月初开始，军管后的《广西日报》倾向韦国清，引起了广西反韦一派的不满。

4 月 11 日下午，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会见越南总理范文同等人时，谈到韦国清。毛泽东说：

“这个韦国清被红卫兵整得不得了，被包围了几个月，脱不得身，说是犯了错误。错误是犯了一点，但是这个人还是一个好人。他是一个斯文的人，并不是一个野蛮的人。他到过你们那里，我认识他就是因为跟你们的关系。”

就在 4 月 11 日，南宁市内开始出现关于广西军区支左问题的大标语。当天，一些造反组织又发出《最最紧急呼吁》，说军管后的《广西日报》充当了反革命复辟逆流的吹鼓手。

4 月 13 日晚上，广西“工总”和一些“反韦”派的学生、机关干部群众组织在朝阳广场召开大会，宣布“新工总临时指挥部”成立。第二天下午，“红卫兵联络站”在《广西日报》社门口贴了一张“勒令”，说军管的《广西日报》坚持反动立场，成为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的舆论工具，并提出四条要求，要军管的《广西日报》请罪，限在 48 小时内答复，否则就要采取“革命行动”。军管小组拒绝了这个勒令。

4 月 16 日上午，“反韦”派 70 多个组织 7000 余人在朝阳广场召开“声讨党内最大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大会”，会后游行。

游行队伍中的“工总”所属成员游行至文化宫时，自行启封被公安临委会封闭的原“工总”办公室，并挂上“新工总”的旗帜，开始办公。随后，1000 余人冲击《广西日报》社。到了 17 日晚上，600 多名群众在《广西日报》社向军管小组送“最后通牒”，限令军管小组 24 小时内撤离《广西日报》社，并在报社门前举行游行示威。

18 日，南宁很多群众纷纷到《广西日报》社声援，坚决支持军管的《广西日报》，报社内一些群众也发表声明支持军管。

19 日，广西自治区党委书记处书记伍晋南、贺希明、候补书记霍泛，在广西大学发表声明，又称《四一九声明》，支持红卫兵和一些造反组织的“革命行动”。

4 月 20 日晚上，“广西红总”、“南宁八·三一”、“红卫兵联络站”、“工总”等组织 1500 多人在南宁火车站集会，表示坚决支持伍晋南等人的《四一九声明》，砸烂《广西日报》。会后游行到《广西日报》社门前，提出三点要求：

1、撤销《广西日报》社领导班子；

2、撤销军管小组；

3、砸烂《广西日报》社的群众组织“58112”。

他们限令报社 36 小时内答复，否则静坐示威。

当天，“支韦”派 400 多个群众组织约 4 万人也在朝阳广场召开“彻底批判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反动路线大会”，斗争矛头指向《四一九声明》。

22 日晚，“广西红总”、“南宁小八”、“广西红联”“新工总”等组织万余人在南宁朝阳广场召开庆祝北京市革委会成立和支

持伍晋南等领导干部站出来闹革命的大会，外地来邕学生组织参加大会并发表《联合声明》表示支持“四、一六”冲击军管《广西日报》社、支持《四一九声明》等。伍晋南、贺希明、霍泛三人参加了大会，伍晋南讲了话，表示“坚决与群众斗争在一起……”等。会后进行了游行。

与此同时，“南宁红卫兵联络站”头头张俊秋，李朝杰等人，因不同意《广西日报》报导有关广西大学数理系革命大联合的消息，带着队伍来到《广西日报》门口，同报社军管小组交涉、辩论，并通知在朝阳广场开会的“广西红总”、“南宁八三一”等组织带队伍前来《广西日报》社，抗议军管《广西日报》社，还提出六点要求：

1、交出策划反革命逆流后台；

2、军管《广西日报》社必须向毛主席请罪，公开检讨、承认错误；

3、必须在报上刊登真正革命造反派文章；

4、不准刊登保字号组织的文章；

5、报社军管小组必须改组；

6、办报必须依靠报社内部革命造反派等等。

军管小组认为这些要求不合理，不予答复。“南宁红卫兵联络站”遂于 4 月 23 日凌晨 1 时宣布静坐示威，并宣布成立静坐示威“南宁‘四二二’火线指挥部”，后改为“广西四二二革命行动指挥部”，简称“广西四二二”。总指挥是广西医学院学生曾春生。广西大学学生何作然、谭乃禧、石怀宇、曹东峰先后任该指挥部的副总指挥和常委。

静坐期间，南宁市和广西自治区内各地的两派组织也分别召开大会和游行示威，声援静坐或声援军管《广西日报》。桂林等地的“支伍派”数百人也纷纷跑到南宁参加静坐。

4 月 24 日，南宁一中再次举行红代会会议，医学院“闯”、二中“井冈山”、“南宁八·三一”及部分机关干部 400 多人再次冲击，双方发生武斗。当天，“支韦派”400 多个组织约 4 万人在朝阳广场集会，批判《四一九声明》。自治区党委负责人和区党委组织部、办公厅和政法战线等 9 个单位的 54 名厅、处级干部参加大会。参加《二一九声明》的 7 名厅级干部在会上揭发批判《四一九声明》。

4 月 24 日在北京，王力到中央文革记者站对外地回京学习班的记者讲话。驻广西记者王荔和高世忠研究，写了一张纸条问王力：“对韦国清应该怎么看？”

王力在讲话中表示：“韦国清没有什么问题，是中央保的。”

但是王力在讲话中对各地军区的支左工作提出了批评。因而王荔认为广西军区的支左工作也存在问题。他后来对 55 军副军长孙凤章说，广西军区不支持桂林成立革筹小组，野战军好、军区、军分区不好，等等。

4 月 24 日，广西“四二二”派汇报团赴北京。广西大学雷激为团长，张振剑、秦尚群为副团长，陈镇西、马秀英、杨福庭、陈寿宣为委员。

4 月 25 日，伍晋南、贺希明、霍泛、谢王岗、袁家柯、黄其明、高仕克、梁宁、龙廷驹和北京学生赵郁民及广西师范学院学生苏庆科等人，开会研究坚持静坐和逐步升级的问题。会上，

广西大学党委副书记高仕克提出打持久战，引军区跳出来一整套办法，伍晋南表示完全同意。

26 日，《四一九声明》三书记之一的贺希明被广西军区撤销“抓革命促生产指挥部”副主任之职，并向群众公布。晚上，广西大学、广西医学院和广西劳动大学 1000 余人到广西军区门前示威、静坐，抗议军区撤销贺希明生产指挥部副主任职务，高呼“揪出军区一小撮走资派”的口号。

27 日上午，广西大学党委副书记高仕克召开“四二二”骨干会议，布置“目前火线工作”。伍晋南亲自指示：（1）斗争有困难，但必定完全胜利，这是一场决战。（2）采取持久战，斗久了，他们就跳出来，我们就抓住。目前冲击还不到时机，如果时机成熟了，就速战速决。（3）要宣传静坐的意义，调动社会力量，这是总的战略中的一个布置。

下午，“广西红总”、“南宁八·三一”、“红卫兵联络站”、“新工总”等组织的 500 余人冲入《广西日报》社，占领办公大楼。随后，“四二二火线指挥部”召开“声援《广西日报》社内革命造反派大会”。

28 日，《广西日报》军管小组发表第一号《严正声明》，指出：“4 月 27 日冲击军管《广西日报》事件严重违反了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批发的军委八条命令的尊严，破坏了军事管制的规定”，“严重地违反了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战略方针，破坏了广西日报社的正常革命秩序”，“冲击新生《广西日报》的一切组织和群众必须立即撤离军管的广西日报社。冲击军事管制的广西日报社和产生的一切后果，由冲击的操纵者负

责。”

4 月 29 日下午 16 时，南宁郊区农民 100 余人去广西大学揪伍晋南，要他参加第二天斗争乔晓光大会。伍晋南接见了他们。广西大学“革联”数百名学生将农民包围，抢走伍晋南。“汽司”、“铁司”、“小八”等支韦派集合 1000 多人前往广西大学声援农民。

29 日，广西“四二二”汇报团在北京第一次向中央文革代表汇报了韦国清的问题、广西军区问题、二月逆流、三月黑风以及砸“工总”等问题。汇报了四个小时，送材料 88 份。

4 月 30 日上午，广西军区收到中央 29 日关于广西群众组织派代表到北京汇报广西文革问题的电报。军区当即派人通知有关的群众组织。

当天，中央文革小组就《广西日报》事件，给广西军区及在《广西日报》社前静坐的学生发来电报：

广西军区并请转抄印给驻《广西日报》和在报社前静坐的“八•三一广西红卫兵”总部、北京驻邕的革命同志们：

（1）进驻报社的同学们，你们立即退出报社，在报社门前静坐的同学们，你们立即退出报社，保证报纸正常出版，否则对当前批判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不利。

（2）要维护军管小组、革命组织，要支持军队对报社军管工作，军管小组成员要做必要的调整。组织版面小组吸收革命组织代表参加，协助军管搞好报纸。

（3）有意见可以和军管小组商量解决，不要采取静坐，强拉军管小组辩论的方法，应保持军管小组正常工作。

（4）对某篇文章有意见，可以进行批判，也可以在报上讨论。

中央文革

一九六七年四月三十日

当天，“支韦派”组织3万人在朝阳广场召开“批判党内头号走资派‘三自一包’罪行大会”。会议勒令乔晓光、伍晋南到会接受批斗，但两人都未到会。

5月1日，广西军区接中央文革小组4月30日电报，指示进驻《广西日报》社及在报社门前静坐的学生立即撤离。下午，军区向静坐学生传达中央文革的电报。

当天，“支韦派”赴京代表14人及乔晓光、安平生乘坐6次特快赴京。“支伍派”12名代表及伍晋南、贺希明、霍泛尚未动身。他们说还需要准备，提出推迟两天赴京。

5月2日下午16时，进驻《广西日报》社和在报社门前静坐的学生撤离。撤离前，“四二二”指挥部发表声明，提出：军管小组必须立即改组；立即组织造反派参加的版面小组；并重申“四二二”、“四二七”都是革命行动。

5月2日晚上，“支伍派”组织万余人到南宁朝阳广场召开“庆祝击落敌机和红卫兵小将静坐斗争的初步胜利大会”，同时，“支韦派”9万余人在南宁火车站召开“庆祝空战胜利大会”，会后游行，双方队伍相遇，一场混战。

5月3日，伍晋南、贺希明、霍泛及“支伍派”代表12人乘车赴京。

至此，广西在支持韦国清还是支持武晋南的问题上阵线明

确，分为两派。斗争愈演愈烈。

4 月 21 日，周恩来、陈伯达、江青、肖华、王力接见《红旗》杂志、《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及新华社驻外地记者。

江青说："让我讲话也是突然袭击，我没有什么新的话讲了，同志们做的工作很不错，去内蒙的同志被人捉起来，打成右派记者，还是坚持了。武汉记者在不在？你们只有个缺点，没有再来一个报告，那个地区看来问题是不少的。总的说，同志们做了很多好的工作，今后更要戒骄戒躁，接触群众，听多方面意见，才能给党中央、毛主席、中央常委提供更正确的情况。

没有更多新鲜讲话了。最近讲了两篇：一篇在军委扩大会上，一篇就是今天人民日报上登的，在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这两篇合起来，大概可以看到我们对动态的一点看法。看出目前的动向。

从你们反映的材料上看，由于形势发展不平衡，反应逆流多些，反映好的地方少一些。王力给我看了同志们提出的一些问题，要我们解答，当中有一个要讲一讲，就是对军队的看法。同志们提的大概意思是军队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后，都是逆流了。恐怕不能得出这个结论。有的地方有逆流，有的地方好转了，好转不少，如四川、云南地区，我看好转了。这个地方，就是西南军队里也不一致，有两个野战军就比较好。不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好像军队带来了逆流，军队介入后都出现了逆流这不妥当。逆流在目前不是主要的。今后会不会成为主要的，要看局势发展，要诱导，靠大家少犯错误。这个问题不能那么提。军队在支工、支农、支左，军管、军训上做了大量工作，有很多好经验，丰富的经验。

这方面报导也有，如东北××煤矿，那很好，我倒赞成写个详细的报导。军训也要调查一下，也有好点的吧。军训也很不容易，特别在中学，几十个组织，军队一进去，很容易支错，这是难免的，问题是错了就赶快回来，看到某一个地方一时支错了，就说出现逆流，这是基本观点没有端正，这种观点要赶快改变过来。

军队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正好三个月，支工、支农特别显著，差些是支左，最容易出漏子。军训也有缺点，有些学校就起哄。军管基本上是好的，少数被赶，基本上坚持下来了，主流还是好的，同志们介入比我们多，情况了解得深一点，但我们比同志们的接触面广一点，目前是大好形势，不平衡，有反复是正常现象。”

“逆流在二月差不多是全国性的，三月好一些，现在大大好转了，我讲的好转，不等于说某一个地区不会出现严重的问题，要有精神准备，要准备把你们抓起来打一顿，要有精神准备，情况顺利时容易犯错误，要警惕。随意交谈几句，没有更多的话好说了。”

康生讲话说：“这个会是新建议开的，想听你们的情况，说我对你们的工作熟悉，情况相反，是很不熟悉。”

“我接触的地区较少，兰州、内蒙、安徽、青海，正在解决四川问题。应当说，除青海外，绝大多数报导是好的，工作是好的，有成绩的。受挫折是不可免的，对同志们的锻炼有好处，从我所接触到的看，对同志们的工作是满意的。青海记者差一点，他们观点受军区观点的影响，即使那样他也讲从报社没有搜出枪，13 具尸首开始没有看到，赵永夫叫他去看就有了，也没想想没分析。安徽开始认为没有多大问题。深入研究后问题不少。

四川一开始就是反映得比较好的，刚才江青同志讲了对解放军的看法，同志们本身绝大多数是解放军，地方同志很少。解放军是打仗的，一下子变成记者的确不容易，但比报馆同志反映还好，这是我们解放军质量问题，可能开始刚摸时不如现在熟悉。碰了钉子，受了曲折，看问题看错慢慢熟悉就上了轨道。通过你们本身反映了解放军如毛主席所说的，是可以信任的，是可以依赖的，是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支柱，这从你们本身也看出了。虽然内蒙有其他一些地方，遇到了一些问题，对个别军区个别人犯的错误，但对解放军的信心不能动摇。这样的那样的问题不能说逆流是解放军介入后发生的。同志们要具体分析。此外，如江青同志讲话，对有些问题，逆流反映多了一些，好的经验有，不够多，不但支工、支农、军管，就是支左这一方面我们也没有注意或者重视不够，采访不够。在这一方面，毛主席、林彪同志、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很重视这样材料，当然要实事求是，不要主观分析，以推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军队支左的好经验，如四川渡口问题，主席看了很重视，立即批发。东北鸡西的经验，主席也很重视。这一方面有一些，但还少，解放军支左主要积极作用是主流，个别错误缺点比起来是支流，要向中央报告进行解决，要注意一下。当然这个问题要实事求是，不要粉饰，不能只听一面。”

“3 月 20 日林副主席的讲话。第一讲阶级斗争和阶级观点问题，要有阶级立场、阶级观点，阶级分析，离开了阶级分析，就是主观主义的。第二讲主流和支流问题，哪个是主流，哪个是支流，各地区发展不平衡，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是经常变动的。第三讲解放军支左问题，这里有个问题，请同志们注意一下，报

告是在一个月以前作的，是对军一级领导干部的，那上边讲到解放军和群众关系，是完全必要的，那里提到带枪的刘邓路线，这对高级干部内部讲很必要，不过不要在报纸上去宣传，去提这样的字样，不要被坏人利用它来攻击解放军，搞敌我阵线。内部讲可以。”

“国际形势，王力同志以后单独和你们谈谈，你们很有兴趣，说起来也简单，两句话：马列主义者和一切革命人民说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好得很。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一切反动派说我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糟得很。也就是好得很和糟得很。”

周恩来讲话：“我提几条建议，供你们参考：

第一，《人民日报》、《红旗》、《解放军报》、新华社，还有抽调马列学院五个方面的记者，五位一体，要合作。”

“第二，目前形势，同意江青同志的意见，运动是不会平衡的，永远不会平衡的，此起彼伏波浪式前进，总是向一个方向走的，逆流和主流比起来只一小部分。”

“如青海，那是反革命行动，一发现就解决了，实行了军管。四川的确出现了资本主义复辟逆流，一反映上来，主席发现一抓，问题就暴露出来了。现在查出四川捉了三万多人，实际不止，现在放了两万七千人，放了百分之八十五。”

“第三关于军队，我们应该说，人民解放军介入地方文化革命运动，主要的还是成绩。”

“对街道上贴解放军的大字报，就劝他们送到司令部去，共同维护解放军的威信，防止敌人挑拨，特别是在福建、广东、广西、西藏、内蒙更要注意，把《八条》和《十条》合到一起就是

拥军爱民，这一点江青同志已经讲过两次了。”

# 文革史话

## 之第三部 全面内战 第六卷

刘朝驹 著

# 文革史话

之

第三部

# 全面内战

第六卷

# 目 录

第 599 回：谈“联动”，又接见北京学生　未曾想，突然再进大会堂.....1
第 600 回：声声□，终究是自己孩子　回家中，再调查“中央文□”.....11
第 601 回：撤《通令》，□州绝□告结束　山城斗，两派争抢李井泉.....22
第 602 回：冲报社，恩来见福建代表　毛泽东，批示川、豫、□□军.....29
第 603 回：促联合，□西省暂时稳定　批贯一，众□导座谈山西.....39
第 604 回：□痛击，“反□命复辟逆流”不期遇，谭启□□返山东.....49
第 605 回：态度明，中央赞成王效禹　说海军，再接见四川代表.....57
第 606 回：谈□庆，武汉营救夏邦□　□再道，与学生北京对质.....69
第 607 回：四二六，淮南、昆明大武斗 赣州乱，肖华见“星火燎原”.....80
第 608 回：围西□，恩来见内蒙群众 现场乱，几十年生涯罕见.....90
第 609 回：争是□武汉“秀才”找到“兵”在北京，怎奈当兵说不清.....101
第 610 回：□应对，□再道晕头转向 态度硬，贵州省再现两派.....112
第 611 回：说文□，春桥、文元到山东 下文件，福建的《十点意见》.....121
第 612 回：游泳池，再约见“三老四帅”天安□，毛泽东畅谈文□.....132
第 613 回：五一节，□袖与民众同庆 □“伟大”，全国各地□欢呼.....143
第 614 回：姚登山，毛泽东接见合影 北京市，劳动节中学武斗.....155
第 615 回：发号外，“工总司”遭人□议 □□坐□庆“八一五”进京.....167
第 616 回：反□否？湖南军区前绝□ 砸“七一”，山西炮轰刘格平.....178
第 617 回：大混战，太原市乱成一片 五羊城，又发生“□明事件”.....187
第 618 回：“揪广谭”，广州市绝□结束 扔砖头，□春市两派武斗.....196
第 619 回：□矛□，万人冷兵器大战 轰□□，工大土坦克出击.....204
第 620 回：清华园，建成毛泽东塑像 □绝□，郑州五四大武斗.....212
第 621 回：暴抗暴，“二七公社”不屈服 周恩来，接见财贸口代表.....223
第 622 回：再调查，派记者走访宜宾 五月四，川棉一厂大武斗.....231
第 623 回：众□导，接见北京□委会 勿脱产，别离开广大群众.....240
第 624 回：态度明，梁、张支持造反派　五月六，成都围一三二厂.....250
第 625 回：声势大，造反派冲进工厂　枪声响，成都市舆论哗然.....260

第 626 回：有计划，“产业军”撤向农村《红十条》，□伯达逐条宣讲.....272
第 627 回：座谈会，张、姚听部□意见 聚省委，济南市“五七大捷”.....283
第 628 回：毛泽东，对□、粤军□批示 五月八，新疆上千人武斗.....292
第 629 回：江西乱，处理京津冀蒙藏 又进京，胡昭衡见□伯达.....303
第 630 回：□军管，冼恒汉主政甘肃 半年庆，“工总司”□体罢工.....311
第 631 回：心焦急，清华成立□筹组 不服气，“四一四”□强抗争.....320
第 632 回：大游行，外事口要揪□毅 做工作，周恩来艰□劝说.....328
第 633 回：未曾歇，又接见另派代表 再动员，两派应联合行动.....341
第 634 回：五一三，展览□“三军”武斗 巧点拨，中南海□见主席.....351
第 635 回：坚持演，终爆发两派冲突 不撤离，□伯达赶赴现场.....362
第 636 回：谈□庆，周恩来见两派代表 外交部，谢富治连夜前往.....371
第 637 回：周恩来，急忙见“三军”代表 不服气，会场上又起争辩.....382
第 638 回：稍事歇，接见海军“红联总”看伤员，明确支持“老三军”.....391
第 639 回：发《通告》，毛泽东看甘粤湘渝“八条”，周恩来召见北外.....401
第 640 回：批肖华，中央文□见“三军”周恩来，亲解读□庆《五条》.....411
第 641 回：石头□，宜宾爆发大武斗 逐出城，两派矛盾□平息.....421
第 642 回：两边哄，五十四军做工作 武斗中，殉□者出现山城.....431
第 643 回：宗派起，安徽厅局□分裂 武汉市，公安局□前绝□.....441
第 644 回：抓组织，三□内“□师”崛起 不退让，武汉市矛盾升级.....453
第 645 回：五一六，接见内蒙古军人 说农口，北京再掀反周□.....464
第 646 回：发文章《伟大的历史文件》五一七，北大“东方红”□世.....472
第 647 回：刘少奇一九二五年被捕“五〇四”，“丙组”改为“刘王组”....484
第 648 回：五一九，接见内蒙警卫营 翻旧报，又□提“伍豪事件”.....494

## 第 599 回：谈“联动”，又接见北京学生　未曾想，突然再进大会堂

4 月 21 日，中央文革小组又接见了北京大学生、中学生代表。

陈伯达问：“现在我们来请教一下，‘联动’怎么处理啊？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向你们请教的。”

江青说：“你们集中地考虑考虑‘联动’问题，其他问题慢慢可以说，对于‘联动’的小头目怎么办啊？”

同学们汇报了斗“联动”的情况。陈伯达、戚本禹问有没有武斗？同学们说：“没有。”

江青说：“你们是受害者又是工作者，因此请你们来了，请你们直接提出一些方法来研究，当然要注意政策。今天我们特别来征求你们的意见，怎么样对待‘联动’？对那被抓的‘联动’的小头目怎么处理？大家知道吗？”

同学们汇报了一些做“联动”工作情况后，江青说：“我还想提一个问题，‘联动’成了一个秘密组织了，是不是能让他们公开如何？他们见不得人，只能在晚上干，白天不能干，你们能不能让他们公开？你们可以讨论。”

陈伯达：“是不是可以公开，给一个房子，给个电话呀？”

江青：“我们 4 月 3 日接见了一次，4 月 4 日接见了一次，就分成两派对立，那不好。”

这时，同学们抢着表白自己，现场一下乱了套。陈伯达赶紧维持秩序：“守秩序，守秩序，还没有说完呢。”

江青也劝道：“我们是来研究问题的，不是吵架的，中学造

反派怎么没解放啊？现在是开会不要吵架，要文明一些，不要两人讲话，两人讲话就听不清了。”

有的同学说:“他们乱扣帽子，扣反革命、反解放军帽子……”

江青：“把这些帽子全部摘掉，这些帽子不要戴，都是自己戴的，一律平反，不要吵，一律平反。”

陈伯达：“我讲几句吧，不要鼓掌了，我们不同意分四三派、四四派，从今晚上起我们要取消这个名字，我直到今晚上以前根本不知道四三、四四派，我不赞成分两派，无产阶级革命派只有一家。红代会有缺点错误可以提出来，可以补充，不能拆台，你们双方各作自我批评，你们双方都有所不正确吧！要作自我批评嘛，像这样就不能解决大联合与三大结合的问题了。你们就会走上邪路，双方作自我批评是不太容易的，你们大家相互批评。双方都相当够了，要作自我批评。现在回到我们原来开的会议中心上来，现在来讨论，如何对待‘联动’的政策问题。现在大家脑子要冷静一下来讨论对‘联动’政策问题。”

同学说要把“联动”后台公开出来。

陈伯达：“你们把问题看得太简单了，不是把后台揪出来就解决问题了。‘联动’代表一种反动思潮，要解决思潮问题，不是揪出后台就解决了。现在我建议江青同志给大家讲话。”

江青说：“我听了小将们的意见，我同意陈伯达同志意见，不要打内战了，打内战不解决问题，你们之间可能有是非问题，有些原则的问题不能打内战了，要相互多作自我批评，检查自己，比方我和陈伯达同志吧，多作自我批评，我批评我，陈伯达批评他，这样我们就团结好了嘛，有时我们也要吵了几句，但自我批

评就好了嘛，就解决问题了。陈伯达同志提出的自我批评是个好方法，很好，不要打内战，这样，‘联动’可高兴了，敌人可高兴了。刚才你们提出了老红卫兵，什么‘联动’分子，又是亲联分子，这样就把‘联动’说得那么多，本来不多，给你们这么一说就多了。不要叫老红卫兵，才几个月就老了？也不要说亲联分子，这样就扩大他们的队伍。我过去说过‘西纠’还是做过好事，是有所功勋的，后来做了坏事，打了你们，我们就帮助你们，对他们一小撮实行专政，他们后来就骂我，我不怕，骂我，怕骂我还是一个革命派吗？我现在精神不是很好吗？对‘联动’我提个建议，让他们公开吧，给他们一个房子，承认他们。他们没有多少，不要去冲他们，你们有没有这种气魄？”

众人答：“有！”

江青：“他们不敢公开活动，夜里活动白天不敢出来，喝酒，吃猫肉，白天睡觉，晚上出来，戴上个大口罩进行活动，干见不得人的事情，你们造反派要不要拉他们一把呀？”

众人说：“要！”

江青：“他们没有什么了不起，你们造反派不是劣势，只要你们不要打内战团结起来，你们就不是劣势，他们没有几个人，让他们出来，要拉他们一把，不要让他们颓废堕落。要让他们公开化，要多做思想工作。他们过去还装备挺强，摩托车、军大衣，这没有什么。什么纲领，那是吓人的，脱离群众的，没有什么用的。清华的老红卫兵，对老红卫兵我们还想接见他们，我们还想接见‘联动’，他们是青年人嘛，还是给他们出路的嘛！青年人我就不相信，他们不能改正？我没有接见过他们，陈伯达同志比

我强，陈伯达同志还接见了‘西纠’，比我强嘛。我没有你们批准我不敢去接见嘛，你们可能要说江青去接见‘联动’了，和我们不亲了啦！‘联动’不但北京有，其他地方也有，这不但和父母有关，有些父母不是黑帮照样还是‘联动’，这主要是等级，级别关系。我爸爸多少级我妈妈是多少级，这是主要的、反动的。我建议你们把他们放出来，现在他们很可怜，上坟去了，学封建主义一套，在天安门前集合到八宝山上坟，然后到颐和园去打人，八宝山那里不一定全是烈士，有的是叛徒。我建议你们让他们公开化，把那些小头目放出来，给他们房子，给他们电话，让他们把牌子挂出来，什么联合行动委员会。”

陈伯达：“这是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成立第一个措施，这是补台的第一个措施。对于你们被扣反革命、反解放军的帽子都摘掉，要平反。”

陈伯达接着说：“我来讲几句，第一对于‘联动’，我们中央文革小组要接见‘联动’，你们不要大吃一惊。”

江青：“他们反对不是没有理由的，我们接见他们，我们有责任嘛，尤其我有责任。”

陈伯达：“你们不要说我们中央文革小组向他们投降了，我们是考虑到这个问题的，对于‘联动’的头头要放出来，不要怕‘联动’，‘联动’是个软弱组织，是一个要死亡的组织，长不了，让他们公开出来不是活得更长了，而是活得更短了。你们批判，你们要批判，批判血统论把我们对毛泽东思想的领会提高一步，要把思想批判提高一步，你们说得对，我们相信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能胜利。你们要作思想工作，你们怕不怕做思想工作啊？”

众人答："不怕！"

江青："西城区把'四三派'开除了，真有这事嘛，不对嘛那就错了，这样吧，开除的，退出的，统统地回去，好不好啊？"

众人说："好！"

陈伯达："把头头放出来还有许多事情做的，好吧，讲完了，散会。"

中央文革小组这次接见北京大、中学生代表为什么会特别提到"联动"问题？原来，这是北大附中彭小蒙给毛泽东写的一封信引起的。

北京半步桥第一监狱，因为关押了"联动"的老红卫兵，当时被一些人称作"红卫兵监狱"。

狱中的生活是艰苦的。一日两餐，四个窝头，饭量大的一顿都不够。每天除去学习外，还要坚持"劳动改造"。对于熟读了《红岩》的这些老红卫兵来说，这些都算不了什么。想想许云峰、江姐这样的革命先烈，他们胸中回荡着一股浩然正气。在狱中，他们互相鼓励着，每当一个老红卫兵提审归来，就有许多战友围上去，询问提审的情况，安慰他或者她受伤的心灵。

夜里，他们望着窗口透出的一点星光，辗转难眠，痛苦地思索着。

学着革命先烈的斗争经验，老红卫兵在各个牢房之间建立起了秘密通道，相互联系，相互传递信息。孔丹后来回忆说：

"那些看守们没有想到，我可以通过与厕所之间墙上的这个孔，和监狱里其他 18 个号子保持密切的联系。我们用写检查的纸，写上交流的消息，再卷成细卷，从孔里穿过去。在各个号关

押的人上茅号时，我们就用这种方式传递消息。”

有人还编起了歌谣：

想起当年送沙果，

江青阿姨真爱我。

可怜今天送果人，

戴着手铐把牢坐。

为了有一只笔，他们想尽了办法。起初，只能用牙膏皮写字，后来一位老红卫兵的哥哥在送进来的牙膏皮中夹了几只圆珠笔芯，于是解决了笔的问题。

有了笔，老红卫兵之间便开始写信，互相传递信息。在当时那种氛围下，写得最多的当然是最能抒发情感的诗词了。有一首《忆秦娥》中这样写道：

莫悲伤，

何必惆怅，泪满眶，

应学青松挺胸膛，

断头不惧，

岂畏秋霜……

另一首《沁园春》的词中写道：

从心愿，

变耕牛一只，

踏雪驰骋。

笑颜仰啼戏春风，

岂料向谁吟。

在一首《七律》中，老红卫兵互相鼓励：

一见同志喜心狂，

欲言不能急断肠。

眼神能传千言语，

相视一笑友谊长。

在狱中，他们仍然关注高墙外边的形势。每当有新的“联动”成员被关进来，他们便乘着放风的时间打听消息。当听说老帅们在怀仁堂掀了桌子，他们感到振奋；可是过了不久，全国开始批判“二月逆流”，老帅们又被点名批判了。

在最苦闷的时候，他们唱起了《长征组歌》：

雪皑皑，

野茫茫，

高原寒，

炊断粮

……

女狱友则唱起了童年时的歌曲：

谁给我们金色的童年？

谁哺育我们成长？

少先队员都知道，

是毛主席和共产党

……

唱着唱着，泪水从眼角涌出，顺着脸颊，默默无声地往下流。

时间无情地流逝。春天了，高墙外探过来的树枝上，挑着一点嫩芽，报道春的消息。可是对于监狱里的这些老红卫兵来说，春天与他们无缘。每天，他们依然如旧，日复一日地“劳动改造”。

虽然，在口头上，他们一遍遍背诵革命先烈的诗句："我们愿——愿把这牢底坐穿！"可是在心底里，他们多么渴望能重新呼吸到外边自由的空气啊！

1967 年 4 月清明节后，北大附中的彭小蒙写信给毛泽东，为被捕的牛皖平申述冤状，毛泽东阅后下令放人，并说"人是我叫抓的"。毛泽东还说，弄得不好，这些高干子弟将来会给革命造成一场灾难。他跟江青讲了"触詹说赵太后"的典故。

就在中央文革小组接见北京大、中学生代表后的第二天，4 月 22 日，关押"联动"的北京半步桥第一监狱出现了一阵小小的骚动。监狱管理员走过来，拿着个小本本，挨着每个牢房点名。凡被点了名的，都被带到放风的灯光球场上，依次排队。

在惨白的灯光下，这些年青的囚犯们脸上布满了疑惑、困顿和不安。

有人在悄声打听："干什么？带我们去哪儿？"

被打听的人同样疑惑，摇摇头说："管它呢，大不了是一场批斗。"

"不会拉出去枪毙吧？"

"不会，最多是开批判会！"

又有人插进来悄声说："这回有戏看了，100 多个红卫兵往台上一站，看他们怎么批？"

循着话音，几个老红卫兵往球场上看去，灯光下，人影黑压压一片，尽是些熟悉的面孔。

几辆大轿车开过来了，100 多名"小政治犯"排队上车，在车上，他们仍在心里猜测未卜的前程……

没想到汽车直接开到了天安门广场，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前停下。老红卫兵又看见了他们熟悉的天安门、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眼前熟悉的这一切使他们想起了曾经的一幕幕生动情景。但是，昨日已成黄花，一种名为苍凉的东西悄然爬上了老红卫兵心头。

下车后，他们被依次带进灯火辉煌的人民大会堂，安排在东大厅的会议室等候。一分钟，两分钟……突然，大厅的门开了，老红卫兵们看见周恩来、江青、康生、陈伯达、戚本禹等人鱼贯走了进来。孩子们一下子愣住了，他们“哗”地一下全都站了起来，悔恨、愤怒、恐慌、内疚各种感情交织在一起，一时不知如何是好。他们曾经天天盼望同中央首长见面，可万没想到是在这种情形下，更没想到一下子见这么多。

“坐下，坐下。”周恩来做着手势，示意让孩子们坐下。

“哪个是孔丹啊？”江青问。

孔丹站了起来。江青看了看说：“坐下吧。”

“你们受委屈了”，江青话刚出口，下面立起波澜。就这么一句话，在场的老红卫兵都哭了。“委屈”二字，使他们想到了当初秘密组建红卫兵的一幕幕情景，也想到了“联动”被捣毁、他们一个个被捕入狱的景象……开头是两三个人小声抽泣，接着抽泣声转为呜咽声，越来越多的人心酸了，眼泪簌簌往下掉，几个月来的委屈，在这一刻找到了发泄口，会议室哭声大作，女孩子们凄厉的哭泣声中夹杂着男孩子们狼嚎般的哭叫，连成一片悲怆的交响曲。

台上，周恩来的表情很严肃，他向前走了两步，用低沉的声

音问道："有没有清华附中的？"

清华附中卜大华站起来，他想开口回答，可哭声不止，说不成一句完整的话。他的身前身后，几个清华附中的老红卫兵和他一样呆立着，像几尊雕塑。毛泽东曾经"表示热烈地支持"过的这些老红卫兵，衣衫褴褛，眼泡浮肿，头发乱蓬蓬像是刺猬一般……

"董良翮在不在？"周恩来继续问。

满面泪痕的董良翮站起来，大厅里一阵沉默。谁都知道，董良翮是董必武的儿子。

周恩来接着问："孔丹呢？"

孔丹站了起来。因为难过，也因为激动，他低着头，不知说什么好。

周恩来说："坐下，坐下，你们两个是我从小看着长大的，你们犯错误我也有责任！"

他对孔丹说："你父母的情况我都了解。你不要难过，你们是党和人民一手抚育大的，你们是党和人民的孩子，受了挫折不要灰心，要继续跟党走，跟着毛主席干革命。"

董良翮当时就哭出声来了。

孔丹抬起头，目光和周恩来的目光碰在一起。

康生与孔丹的父亲孔原私交甚好，对孔丹更熟悉。所以，当江青和周恩来两次叫孔丹起来时，他都看着他笑。

## 第 600 回：声声□，终究是自己孩子　回家中，再调查“中央文□”

在场的老红卫兵，周恩来认识不少，他们大多数人的父母亲是周恩来的老熟人、老部下。前排有的老红卫兵发现，周恩来眼角也闪着泪花。他努力克制内心中的感情，在台上说道：

“这次在这里见到大家，是毛主席的意思。我送外宾到广州，发现抓了许多人，都是些孩子，这怎么行呢？不能不教而诛嘛！回京后向毛主席作了汇报，毛主席说：‘不要抓嘛，放回去嘛。’……你们回去后，不要搞向毛主席请罪的活动，这样不好，这也是毛主席一贯反对的，应当以实际行动跟着党干革命。”

江青在一旁插话：“你们不要把自己划成小团体，会引起误会，你们自己考虑。”

顿了一下，江青问道：“谁是牛皖平？”

牛皖平站了起来。

江青笑了笑，说道：“啊，久闻大名，今天才见到。听说你们有些人骂我，说我这个人不好？”

牛皖平没有说话。台下很多人说：“没有！”

江青说：“骂吧，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是不怕骂的，也是骂不倒的。你们还小，还不懂得斗争是艰巨的，也是复杂的——”说到这儿，她停下来，意味深长地向全场打量着。

大厅里，一片沉默。

江青接着说：“我有点不好，就是见你们太少了，对你们帮助太少了。前一个时期我有病，没有见你们，我有责任。委曲了

你们。主席说立刻释放你们，……”

台下高呼：“毛主席万岁！”

江青接着说：“所以今天把一个会都打断了，请来了总理、陈伯达、康生、杨成武、谢富治、王力等同志，都来了，和你们见一见。”

台下鼓掌，有人唱起：“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

江青又说：“你们也不要写自我检查就可以出去。出去以后如果你们还要‘联动’，还可以把牌子挂出去，如果不要，再恢复你们原来的红卫兵组织，如北大附中‘红旗’，清华附中‘红卫兵’，回去恢复你们的组织搞革命。搞革命犯点错误不要紧，这个错误我们的责任大，有个同学叫彭小蒙写了两次信给我，说刘万平的问题，我也不清楚这个人，派了一个记者去了解一下。

还是我责任大，对你们帮助少，你们去八宝山上坟，搞颓废主义。八宝山也不都是烈士，还有瞿秋白嘛！你们还半夜里出来喝酒，吃猫肉。你们关了多久了？”

有人答：“100 多天了。”

有的答：“两个月！”

江青问：“允许你们学习主席著作吗？”

答：“允许。”

“虐待你们没有呀？”

答：“没有。”

江青：“责任我们负得多，教育的不够！你们写过一副对联‘为革命召之即来’，有点才气。你们回去以后，再恢复你们的

组织。如北大附中的‘红旗’，清华附中的‘红卫兵’。我不知道我把主席的意思传达的怎么样，总之，主席很关心你们。你们犯了一些错误，希望你们和刘邓路线划清界限，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

陈伯达：“江青同志讲的很清楚了。毛主席下命令把你们放出来。中央文革小组的工作没做好。”

江青插话：“昨天和其他同学讲时未讲主席的命令，我们的意思是怕强加给你们。”

陈伯达：“大家出去绝不能用主席的命令去压他们。你们犯的错误是很大的。在座的我和你们打过交道，也有‘西纠’的。”

江青插话：“我们对‘西纠’的评价开始是有贡献的，后来犯了错误，你们不要灰溜溜的，要振作起来，有错误改了就好了嘛。”

陈伯达：“犯了错误会使今后谨慎些，避免犯错误了。你们‘联动’是有思想基础的，就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什么‘血统论’，什么‘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那时你们说有 3 万人，有的说有 10 万人要我辩论，我去了又没有辩论，你们有没有这种说法？”

没有人回答。陈伯达接着说：“你们当时这种说法是反动的社会思潮，这就是反动的思潮，是与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思想有联系的，是从那里发出的？党内有部分干部长期在机关脱离群众，没有看到群众，有相当的人不了解群众。传说你们看见别人衣服破了，扣子未扣好就当流氓打，因为你们也未扣好。老百姓的扣子未扣的多得很。你们的父母在游击战争中，

经常穿破衣服，没有鞋穿，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代表了特权阶层，薪水高，在文化大革命中他们不是马列主义，是反毛泽东思想的，是反马列主义的，反社会主义的，反无产阶级思潮的，在文化大革命中暴露出来了。他们挑动群众斗群众，随便地把人打成‘反革命’，‘假左派，真右派’。毛主席回来很快就纠正了。不能包办代替嘛！毛主席从来提倡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就提倡包办代替，把自己当成诸葛亮，把群众当成‘阿斗’。他们把国民党的‘训政’搬出来了。国民党的‘训政’就是教训群众，结果使中国快亡了，这就是结果。中国共产党救了中国，其中有你们的父母做了一些工作，这主要的是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不能记在你的，他的父母帐上，要看到广大的工人农民群众，看到阶级，在毛主席的号召下武装起来了，打下了江山。江山是无产阶级、劳动人民的江山，不是个人的。老子革命儿子不一定革命，这点要充分警惕。刘少奇就是压制群众，把国民党的训政搬出来，把群众打成‘假左派真右派。’你们提倡高干子弟要掌权，这是从刘少奇那里来的，还有邓小平的女儿也说要高干子弟掌权。你们抄了刘邓的口号。江青说过这是封建的世袭制度。掌不掌权是看老百姓是否授给你权，看你能不能做工作，不能自己封的，所以这是一种思潮，是资产阶级反动思潮，害了你们。我们见面少，对你们帮助少。听说你们搞了颓废的生活，养了毛驴，养了狗，八一学校搞得乱七八糟，学校破坏的厉害，破坏得多的是干部子弟学校。你们不知道老百姓怎么劳动的，你们不知道桌椅板凳，穿的衣服，吃的窝窝头是那里来的。你们接近群众太少，只在干

部子弟中来来往往，要吃亏的。说了你们服气不服气？”

台下答：“服气。”

陈伯达：“不服气可以辩论。资产阶级反动思潮给你们带来损害。现在有剥削阶级，同时有高薪阶层。很多特殊的生活，特别是‘八一’，‘十一’等学校给你们很大害处，使你们脱离了群众，现在回过头来好，中国有句古话：‘浪子回头，金不换’，你们并不是浪子，将来可能成为宝贵的财富。现在回过头来很宝贵的，能不能成为宝贵的财富，要看你们对毛泽东思想的态度，对劳动人民的态度，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态度。将来没犯错误的人不一定如你们，看你们的态度，但不是你们就对了。

对劳动人民的子弟不能用那样残暴的手段，你们是从旧的最坏的小说里学来的吧？我们过去没用过什么揪砸，你们不是走一条正路。毛主席讲科学，讲实事求是。你们靠打砸抢怎样能搞好我们的事业，搞好文化大革命。毛泽东思想是科学。在座的有些是上当的，有些同学你们还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也成了‘联动’。

要好好的领会毛泽东思想，重新做人，这样是不是妥当，有没有污辱你们？”

答：“没有。”

陈伯达接着说：“你们的愿望是好的，但客观上起了不好的作用，‘联动’的名词不反动，但纲领是反动的，代表反动的思潮。”

江青插话：“如果你们还要挂‘联动’的牌子的话，我给你们交通，汽车，印刷等。父母革命儿女不一定革命，父母不革命儿女可以革命，因为有毛泽东思想。我相信你们能够革命。”

陈伯达接着说："父母有问题不要紧，国家可以培养你们，他们不革命，你们可以革命嘛！什么'老子反动儿混蛋'要给人家一个出路嘛！祖父母可能是大官僚、大军阀，父母可能就革命了嘛！要看实际行动，不能看父母的出身。不要把父母的功绩吃一辈子，他们做好事、做坏事是一回事，你们做好事、做坏事又是一回事。反动血统论是封建的思潮，文化大革命是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人的思想革命化是长期的。"

江青插话："你们过去犯的错误，应该我们负，不要搞请罪，写悔过书，主席最反对请罪，今后好好干革命就是了。"

陈伯达："大家都在搞整风，你们可以回到学校去搞整风，灌输毛泽东思想，进行自我批评，对你们来说，要加强批评与自我批评，对你们过去犯的错误一笔勾销。"

江青插话："什么手续都不要，今天晚上就出去，今天你们就可以回家去。"

众人长时间欢呼："毛主席万岁！"

康生："我没有更多的话讲，陈伯达同志、江青同志的讲话我同意。毛主席的宽大政策，使我想到生活在毛泽东时代，实在是幸福的。我经常这样想，年青要像你们这样，是真够幸福的，大家要珍惜爱惜这个幸福。在毛主席的领导之下要有雄心壮志。今天毛主席的决定，可以看出领袖是多么的伟大。"

大家呼口号："毛主席万岁！"

康生问："你们有没有革命的雄心壮志？"

众答："有！"

康生："我也相信你们有，既然有，那么有没有勇气，敢不

敢承认在过去短短的时间犯的错误？”

答：“敢！”

康生：“看一个人有没有勇气，其中有一条就是勇于承认错误。过去我看医生，看他是否承认三个字，承认就是好医生。看了病不懂就说不懂；看懂了，没有把握搞好，就说不能，治错了敢不敢说不对。敢于说三个不字是好医生，不敢说三个不字，就不是好医生。我们要敢于承认错误，我们生活在毛泽东时代要敢于承认。第二，就是要敢改正错误，回去以后，有的人会说句把闲话，你们回去别人不会放鞭炮欢迎你们的。这个说闲话，那个说闲话，有的人不敢沾你们的边，怕说亲‘联动’。有的时候还要打一打架。这些都阻碍你们改正错误，你们要做好准备，有勇敢精神。主席的政策是一看二帮。列宁在《左派幼稚病》一书中说：有本领的人，不是不犯错误的，犯了就改正。犯了错误也是一个锻炼，只要你们改正，相信你们会革命的，可以成为毛泽东时代的好青年。”

周恩来最后说：“江青、伯达、康生同志讲得很好。的确生长在毛泽东时代是很幸福的。毛主席很宽大，犯了错误，给你改正的机会。错误的原因有家庭的关系、社会的关系、学校的关系，在文化大革命中我们有责任，你们又没有政治斗争经验。清华附中是红卫兵发源地，写了三论‘造反有理’，毛主席都说是好文章，可是 3 个同学后来都有‘联动’思想。可以说，你们落伍了。除了家庭、社会的原因以外，我们见你们少了，对你们帮助不够。”

江青插话：“我们对‘西纠’的评价是：西纠初期还是有功绩的，但后来就不像话了。”

周恩来："后来对你们管得就少了。过去责任尽得不够，今后我们帮助你们，不但是你们，还有你们的家庭，还有社会，今后加强我们的责任。我是没有儿女的，我到八一学校参观后，才知道你们这样特殊。我有个侄女在八一学校，虽然不是'联动'，但有'联动'思想，在中南海北门骂解放军说：'就是你们把我们同学抓起来的'。解放军打电话告诉了我，我们全家批评了她，让她学习了一个星期毛主席著作，后来让她回八一学校，她参加了反'联动'，成了造反派。你们一定要改，我们已经是老头子了，有了错误还要改！

家庭这关要过好。家庭有两种，一种是有的父母不赞成你们，骂你们甚至打你们，当然我们不赞成打罗！但生起气来打几下也是有的，你们要受得住，做错了自己承担责任；另一种是疼爱你们，溺爱你们，你们回去后，大哭一场不见得好，不要一回家温暖了，就旧病复发。将来准备把你们的父母一起找来见一见，谈一谈。家庭这关要过好。

我到广州去了一趟，广州有个上万人的'主义兵'有'联动'思想，我不主张抓、捕，主要是教育，把几个头头抓起来就行了。回来以后和主席谈了谈，主席说：'根本不用抓'我们的思想跟不上主席的思想。

还有一类家庭，父母犯了错误，被斗。那不要紧，你们是国家的财富，可以到公安部说一下，国家管你们，总会让你们学习的。

到学校那就更困难了，他们知道你们被捕过、拘留过，甚至有的同学把你们扭送到公安部。当然我们要做工作，你们也要做

工作。不要因为过去他们扭送你们，回去后就报复；但也不要气馁。见了他们，既不自卑，也不要觉得了不起，好像我坐过监狱。要平心静气，叫别人感到诚恳，使同学们生不起气来。

不要请罪。请罪是封建主义的产物。错了改正就行了。要有自我批评，还要能听别人的批评。回去以后劝说有联动思想的孩子改过。这也是将功补过。你们受过拘留，自己改好了，还要说服他们改好。你们在学校里参加战斗组织，要成为表率，成为革命造反派。我和江青同志在 20 日讲过‘红卫兵’万岁！你们要把‘红卫兵’光荣的旗帜再举起来！要真正举得高，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红卫兵’。把自己过去的过失补上。”

有的同学递条子，提到破四旧的问题，周恩来接着说：“现在不忙破四旧。好好读点书，谈一谈，做一点批评自我批评，把家庭，学校关系搞好。再过十天半个月后把你们的父母一起找来谈谈。过去谈得少，今后多谈一点把经验总结一下。

我们相信你们的大多数是会改好的，毛主席说：‘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你们跌了跤是有代价的，最后希望你们听我们全党全国的副统帅林副主席的话：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学生。”

江青插话：“已发给红卫兵战士的文件，统统发给你们。你们不要把自己划成一个小团体，会引起误会。你们自己考虑。”

康生插话；“不要自封自己是老红卫兵，也不要有自卑感。才 10 个月，有什么老啊！”

午夜时分，100 多名“联动”成员走出人民大会堂时，月亮

在乌云中穿行，时隐时现，朦胧的月色中，人民英雄纪念碑上那几个镌金的大字显得格外清晰……老红卫兵从监狱里取回了衣物，回到家里，他们心中回荡着的不知是激动、是悲怆、还是别的什么？

“西纠”“司令”孔丹回到家里。一进门，把他弟弟孔栋吓了一跳，忙问：“你怎么半夜三更回来了？”

孔丹说：“放了啊。”然后就兴奋地描述晚上开会的情况。随后说：“别的不说了，家里有什么吃的东西赶紧拿出来。”

孔栋找了出些花生、饼干，孔丹嘁哩咔嚓吃起来。缓过点劲儿后，又赶紧问孔栋：“妈妈呢，怎么样了？”

孔栋说：“你不知道啊？”

孔丹问：“怎么啦？！”

孔栋说：“你进去的那天晚上，妈妈就走了。”

孔丹说：“我离开医院的时候，她那呼吸变强了一点，面色稍微有点恢复了啊。”

孔栋说：“人最后什么叫回光返照啊，就是那感觉。我也以为妈妈救过来了，其实也就是身体最后的努力挣扎吧，但一直再也没恢复知觉。就在你被抓的那天晚上走了。”

孔丹问：“后事怎么处理的？”

孔栋说：“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来个人，帮着一块处理一下，就拉到八宝山去了……”

孔丹又问：“机关有没有关心家属一下啊？”

孔栋说：“没有。”

孔丹心想，这是国务院机关把他母亲的自杀作为叛党行为来

对待了。

从那天以后，北京城里时而会看到一些“联动”成群结队地骑着自行车在天安门前狂奔，并高呼口号。但是，这一切不过是昙花一现，他们中的少部分人开始埋头读书，大部分人选择了逍遥。“联动”作为一个组织其实已经消亡了。

孔丹和四中的秦晓等人开始调查“文化大革命”，调查“中央文革小组”。他们认为中国是让“中央文革”搞糟了。后来他们办了个小报《解放全人类》，第一篇社论由孔丹主笔，标题是《从解放红五类到解放全人类》,《解放全人类》大概只出了三期。

## 第 601 回：撤《通令》，□州绝□告结束　山城斗，两派争抢李井泉

我们再回到辽宁锦州。4 月 20 日，锦州绝食进入第五天。上午，在二高中二楼会议室，召开了由北京部分大专院校红卫兵代表、辽宁大学“八·三一”、省内抚顺、鞍钢等地的代表以及锦州各大中专院校的头头参加的联席会议。会上，辽宁大学“八·三一”的头头张祥久首先发言，他说：“锦州的绝食打响了第二次辽沈战役第一仗，形势大好，我们要乘胜追击。”他主张冲砸公安局，逼迫军队表态。

一高中的安海岐立即站起来表示反对说：“冲砸公安局只能适得其反，把事情搞砸，而且后果不可相像。我校参加绝食的同学已经坚持了 5 天，再坚持下去就会死人。”

张祥久大声说：“不怕死人。只有死人，才能引起中央文革的重视。”

安海岐愤怒地回答说：“坚决不行！不能拿我们同学的生命当儿戏。”

安海岐的态度得到了大家的支持，一致否定了“八·三一”头头的提议。安海岐还提出绝食已经达到预期效果，一高中“红司”立即撤离绝食现场，因为继续下去对同学的身体将造成极大的伤害。他的这一意见遭到部分人的反对，认为结束绝食将会前功尽弃，应该坚持到底。后来大家建议，前期参加绝食的组织可以相机行事，但要补充参加绝食的新力量，采取轮番作战的方法，不断向公安局施加压力。

4 月 21 日，绝食第六天。这是最艰难的日子。绝食现场已不像开始那几天人员较多，只见为数不多的同学稀稀拉拉躺在地上，个个有气无力，闭目养神。傍晚，部队派许多战士背着挎包给绝食现场送馒头和葡萄糖水，半路被一些人阻挡，把馒头扔在马路上。由于连续几天不吃饭，参加绝食的同学身体已经极度虚弱，连大声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上厕所都要由维持秩序的同学搀扶前往。有些家长及同学怕参加绝食的同学出现生命危险，便偷偷地送来牛奶和白糖水。有的同学担心出现意外，悄悄地离开了绝食现场。此时，坚持绝食的同学都在寻思，中央文革怎么还不发话呢？开始对绝食能否达到最后的胜利产生了疑问。

4 月 22 日，绝食第七天。这是最难熬的日子，可以说同学们是在死亡线上挣扎。参加绝食的安海岐头脑已是一片空白。晚上，他一清点人数，连他自己，“红司”的同学只剩 13 个人。医生郑重地对他说：“你们不能再坚持了，身体已经到了极限，再坚持下去，就会有生命危险。”

听了医生的话，安海岐预感到死亡就在眼前，便通知有关人员做好撤离现场的准备。

4 月 23 日清晨，他们 13 个人被同学搀扶着登上了一辆大卡车，撤出了绝食现场，送到医院进行救治。

4 月 27 日，在强大压力下，锦州市公安局终于顶不住了，被迫同意撤消《三.六通令》。在静坐绝食进行到第 12 天，在锦州卫戍区司令部的代表李湖等人的陪同下，锦州市公安局的人在静坐绝食现场召开了平反大会，宣布撤销《三.六通令》，为在《三.六通令》中取缔的师范学院“红色造反团”等群众组织公开平反。

参加静坐绝食的学生和工人们，日夜护卫现场的海军 437 学校和沈字 413 步校的学员，前来声援的外地红卫兵们和围观的市民们，共有数万人参加了这次平反大会。轰动辽宁全省的“416 绝食”终于结束了。

一位女同学绝食的前一天才参加一高中“红司”组织。她出身不好，文化大革命开始一直渴望参加红卫兵组织，带上红袖标，直到现在才如愿以偿。她想以参加绝食来表现自己的革命意志，孤零零地一个人躺在广播车底下，坚持 7 天没吃一粒东西。文革结束后，在一片否定文革的舆论中，她回想这次的绝食行动，说：“那时候简直是太傻了，思想‘左’得要命。”

一位男同学家住绥中，回家时把参加绝食的想法告诉了病中的父亲。父亲坚决不同意他参加绝食，这名同学执意不听，气得父亲打了他一个耳光。他转身离开病中的父亲，准时参加了绝食。绝食当中父亲病故。他后来回忆说：“真是肠子都悔青了，当时鬼迷心窍，为什么就听不进父亲的话？”

锦州老糟取得静坐绝食斗争的胜利之后，锦州市公安局威信大减。市公安局除了一些逍遥派以外，大多数参加了好字派“公安公社”，而糟字派的“公安红司”仅有 3 个人。

从此以后，锦州“锦联筹”和“联合总部”之间的矛盾越来越激化了，两派之间的武斗也开始在市里逐步地进行升级。从刚开始时的双方拳打脚踢，发展到棍棒和匕首。

再说山城重庆，此时为“革联会”是砸是保的斗争愈加尖锐和激化。4 月 18 日上午，重庆医学院“重医兵团”、四川美术学院“红色尖兵团”、中学生红卫兵“91 纵队”、重庆河运学校“航

锋”等组织在大坪地区和市中区举行“砸烂革联会”示威游行。六中、二十九中、红岩三中等中学原“815”派中的反“革联会”学生下午在市中心解放碑召开“红一方面军”成立大会，加入“砸烂革联会”行列。

4 月 18 日这天，重庆市政协副主席、老红军胡伦及重庆市政协副主席郝振乙、重庆市财政局副局长关明臣等 13 人发表联合声明，宣布支持“砸烂革联会”。

4 月 20 日，鉴于“砸烂革联会”呼声日高，重庆师范专“815 战斗团”成立“誓死捍卫红色政权指挥部”，准备用武力保卫“红色政权”，即“革联会”。此后各地“815”派也陆续建立起“捍红指挥部”。

由于4月16日，重庆“815”派在长江珊瑚坝召开了批判李井泉的大会，以表示自己的大方向始终正确。作为对等的行动，“砸派”决定在4月23日，也开一个类似的大会，题目定为：“打倒刘邓陶，砸烂革联会”。为此，他们向他们认为的“伪革联”发出一份“勒令”，令其交出李井泉等诸道具供他们批斗时使用。“革联会”为此专门召开了各群众组织的会议商量对策，秦安全代表重庆大学在会上发言，说：

“首先，当前斗争的大方向是向刘少奇开火，砸派砸烂‘革联会’显然是在转移斗争大方向；其次，砸派砸烂‘革联会’，本质上是企图否定一月革命的伟大成果。”最后，秦安全提出了一个全新观点：“砸派”的行为实际上是在为萧、李、廖翻案。”

萧、李、廖是指早在1963年5月在重庆市委20次全委扩大会就被撤职的萧泽宽、李止舟、廖伯康。据说3人上书中央状告李

井泉在四川的种种问题，而状纸几经辗转，又回到了李井泉的手上。结果被当时大权在握的中央政治局委员“李政委”严令重庆市委对这3个犯上作乱的胆大妄为之徒严加整肃。3人原均为重庆政坛的年轻才俊，萧泽宽为市委组织部长、李止舟是副秘书长、廖伯康则是重庆市委办公厅副主任兼团市委书记，都是市委书记任白戈的心腹爱将。无奈李政委催逼太急，任白戈虽欲保挟过关已不可得。李井泉甚至威胁任白戈说，如不处理萧、李、廖，就得考虑他自己的问题了。于是，六十年代的共产党市委书记只好上演一场挥泪斩马谡的苦戏，3人被统统革职。3年后的1966年6月，重庆市委为保自己过关，又旧帐重算，仿效北京批判“三家村”，把肖、李、廖这三只“死老虎”拖出来作为重庆“三家村”的黑后台大批特批一通。谁知仅过数月，市委头头自己便纷纷落马，而且连气壮如虹的李井泉本人也摇摇欲坠。这时的萧、李、廖三人确实想和罗广斌一样乘机翻案。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早在1966年底就把李止舟、廖伯康秘密接到北京，住进地院，后又悄悄弄到成都，转入四川大学，要他们揭发李井泉问题，企图像刘结挺、张西挺一样，把他们作为中央解决重庆问题的秘密武器。

所以，当秦安全提出“砸派”的行为是在为萧、李、廖翻案时，其新鲜感和冲击力本身就让人耳目一新。秦安全指出：在这次运动中，市委的实力派受到了沉重的打击，而以肖、李、廖为代表的少壮派则并未受到多大打击，当前“砸派”的活动，实际上就是在为这些不甘于失败的少壮派翻案、反夺权！

“革联会”的这次会议最后做出决定：“砸派”如果不用“勒

令”一词，对“革联会”的称谓上不用“伪”字，可以考虑将道具交给他们使用。否则：坚决不给。

4月21日，重庆北碚地区“815”派在解放碑召开“向中国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刘少奇发动总攻誓师大会”。作为报复，西师“831”、西农“826”、川外“826”等组织对大会发起造反。“815”派“誓师大会”的地点正是“831”头目周荣等人3月17日被斗的耻辱地——北碚解放碑，所以西师“831”等组织造起反来怒不可挡。

这时，重庆大学“815”宣传车正在会上奏乐助兴，西师“831”一涌而上，顿时把宣传车、广播器材及铜管乐器全部砸个稀吧烂。

当时，全重庆的造反派都还很寒碜，从造反一开始就一直掌握在重庆大学业余文工团员手上的这批乐器自然就是最抬色的家伙什了，每次游行，都摆在队伍前面。一列队，一走步，一吹奏，确实为“815”大壮行色，感情很深了。如今这些宝贝被反目成仇的“831”公然砸烂，“815”的愤怒可想而知。正在重庆大学集会的师专附中、一中等“815”派中学生，立即和重庆大学的大学生一起，杀气腾腾，直奔北碚示威而去。重庆大学的示威学生一律身着民兵装，腰扎皮带，有点北京高干子女在“红八月”搞红色恐怖的劲头，很唬人。

次日，4月22日，不依不饶的重庆大学及沙区学生上万，继续盛怒游行。被砸坏的宣传车、广播器材、铜管乐器等等，全数随队展示，作为“砸派”挑起武斗的如山铁证，在市中区上、下半城杀气腾腾地绕行一天。

4月23日，“砸派”在大田湾体育场如期召开“打倒刘邓陶，

砸烂革联会”的大会，会后举行了游行。“815”继续以牙还牙，对本来就不甚庞大的游行队伍实施围堵、嘲弄、捣乱，弄得人数本来就不多的游行，整整折腾了四、五个小时方才了结。

这天，在北碚区、九龙坡区、大渡口区（重庆钢铁公司）等地相继发生“砸派”与“革联派”由辩论引起的斗殴、砸广播车等武斗事件。

4 月 24 日晚上，“815”出动 200 多辆汽车满载人员，冲击设在市中心民族路餐厅楼上的“首都红代会赴渝战斗兵团”广播站，结果被占满街道听广播的反“革联会”群众阻拦轰走。

## 第 602 回：冲报社，恩来见福建代表　毛泽东，批示川、豫、□□军

就在山城重庆两派为保、砸“革联会”闹得不可开交之时，福建省福州市随着“一二六好得很”派重新崛起，围绕“一二六事件”，揪“谭震林”的呼声也日益高涨。4 月 7 日前后，福州军区进驻各学校的军宣队陆续撤走。8 日下午，福州市省体育场召开“全市中学生革命造反派坚决击溃资本主义复辟逆流大会”，并纪念《十六条》发表八周月。会上，许多学生组织的代表在发言中都明确提出要揪出福建省的“谭震林”。会后，数千人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一阵阵“坚决揪出福建省的谭震林”等口号甚嚣尘上。

4 月 11 日，在福州的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部分院校发表了《关于福建省目前时局的联合声明》，认为“思想兵总部”、医学院“东方红”、福建师院“红九二”、师院附中“九一五兵团”等革命造反派组织，以及原“三司驻福州市联络站”、“新北大驻福州市联络站”、“南下革命造反联合委员会”等外地组织的“革命的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一二六，革命学生要求军区首长接见是合理的，也是无可非议的，一二六事件的大方向是正确的，一二六事件绝不是‘反革命’事件。‘二四’、‘二七’绝不是‘反革命’的大‘黑会’”。而“福州市工人赤卫队”、“前线红卫兵”及后来演变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红卫兵”、师院“红联总”、医学院“新生战斗团”等则是“地地道道的保皇组织”，“在当前这股资本主义复辟的反革命逆流中。充当向福建省革命造反派进

行全面反攻倒算的急先锋”,“又一次犯下了滔天罪行”。这份《声明》说：“坚决支持福建省新兴的农民运动，坚决打倒混入老区队伍的反革命集团，但绝不允许以抓扒手为名，行打击老区革命群众运动之实”;“坚决粉碎当前福建省自上而下的资本主义复辟的反革命逆流，坚决揪出谭震林式的叶飞代表人物，把他们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

闻风而动的福建“思想兵”、“红九二”、“九一五”、“海防兵”争先恐后地发表了异曲同工的《时局声明》，瞬间，“一二六决不是反革命逆流”、“一二六事件要重新评价”、“一二六大方向正确”、“坚决揪出福建省的谭震林”等口号声已震耳欲聋。就连一向拥军的“八二九联司”，包括头头在内的不少人也对目前的形势把握不定。这几期的《八二九战报》连篇累牍地不断发表《组织浩浩荡荡的革命大军，将反复辟斗争进行到底!》的社论，并用大幅版面报道全省各地“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情况。只有被许多人指控为保守组织的省“机联司”，于 4 月 13 日对当前形势发表声明说，“一二六事件”是违背最高统帅的命令，冲击军事机关是错误的，绝不能说什么“大方向是正确的”。

“阑风伏雨秋纷纷，四海八荒同一云。去马来牛不复辨，浊泾清渭何当分？” 杜甫这几句描写秋雨绵绵的诗句，却成了当时春风季节福州政治形势风雨飘摇的绝妙写照，一切都是如烟细雨般的迷茫，不甚分明。

4 月 19 日，一份署名“420 革命行动委员会”《公告》，指控《福建日报》在 2、3 月资本主义复辟逆流中充当了极不光彩的角色，成了资本主义复辟逆流的喉舌，成了福建省“谭王八”的

代言人，多次发表黑社论、黑文章，欲置广大革命造反派于死地。“鉴于上述种种罪行，420 革命行动委员会决定采取革命行动，宣布接管福建日报社，封闭福建日报社。”

果然，第二天，4 月 20 日，“九一五兵团”拉起队伍，喊着“驱逐三虫，还我报社”的口号冲进福建日报社，占领了报社大楼，当即获得了这一派人的热烈响应与支持。“红九·二”、“三司联络站”、“新北大联络站”、医学院“东方红”、“海防兵”等组织纷纷驰援，并加入了“420 革命行动委员会”，连“八二九”、省“工联司”等组织也卷入了这一旋涡。那些被打成反革命黑组织的《福建日报》“革命职工造反队”、“工人硬骨头战斗队”和“革命职工造反联队”，此时尚未得到正式的平反，还是一盘散沙。但是，被“420 行动”一冲击，立即起来响应，又公开打起了造反队的牌子，和学生们一道闹得热火朝天。

当晚上，报社门口的一辆省“工联司”的宣传车，高音喇叭大声广播着：“坚决支持 420 革命行动！420 革命行动好得很！省工联司誓做革命小将的坚强后盾！”

在报社门口的大墙上，贴着一张巨大的“420 革命行动委员会”的《公告》，下面聚围着好多群众在观看。

在报社的大院里，也挤满了人，即有参与者，也有围观者。

第二天，福州市到处都是“420 革命行动好得很”的大标语。

“420革命行动委员会”的学生们在报社呆了4天3夜，更改报头，致使《福建日报》停刊4天。4月23日，周恩来来电指示：“福建是前线，报纸不能封，报头不能改，不能出新的报纸，不能中断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声音，进报社的人要立即退出去。”当天中

午12时，“420革命行动委员会”所属的组织宣布退出报社。

4月23日当天，周恩来听取“首都三司福州联络站”等组织的代表汇报福建问题，接见时陈伯达在座。

周恩来让“首都三司福州联络站”南下同学重点谈两个问题：

1、对福州“一二六”、“二四”、“二六”、“二七”的看法。

2、周恩来3月31日的六点指示发出后执行的情况。

“首都三司福州联络站”、“新北大校文革福州联络站”、“哈军工鬼见愁战斗队”代表联合发言，坚决要求：

为“一二六”事件平反；

坚持“一二六”几十名学生要求首长接见，大方向是正确的；

姜观、王泉金绝不是现行反革命，如果摆不出证据，必须立即释放。

代表们列举了大量事实控诉：“目前福建根本没有认真贯彻执行总理的六点指示。”

只有科技大一同学发表了反对意见，认为“一二六”是逆流，认为“首都三司”、“新北大联络站”、福建“思想兵”等组织的所作所为是破坏大联合。

会上，代表们强烈要求给“一二六”定性。

周恩来一锤定音：“说‘一二六’是反革命逆流这是错误的。”

顿时，会场上爆发热烈的掌声，“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声响成一片。

周恩来接着说：“我不是已经发了六点指示吗？给革命组织平反，那就是下结论。就是定性了嘛！”

掌声再起。

最后，周恩来讲了六个问题：

“1、福建确实存在严重问题，首先我们要唤起福建，福建军区的注意，特别是福建军区。你们回头就打电话，要按《十六条》要求重新检查，一个县一个县的检查，对犯了错误的同志还要给人家革命的机会，下面县人武部，武装部那些人本来就和地方的当权派很熟悉，你们按自己的意志办事，不管什么上级指示不指示，这种事在北京，在毛主席身边还总发生，各省都有，特别是你们省军区不要光相信下面的报告，对《十六条》要求再一次检查。

2、老区问题：今天我们有意背靠背开了，广大群众是受骗的，少数坏人冒充头子，如林白就是冒充头子，搞经济主义，但是决不能把经济主义分子的帽子乱扣，搞群众，明天可以请联络员、记者听听你们的意见。

3、军区卫校革字派没机会发言了，明天请联络员、军报记者、中央文革工作人员听听你们的意见。

4、‘八二九’还是造反组织嘛！因为他们在外县还是做了好事嘛！

5、姜观之流什么都加补充，姜观这个人的问题我还没弄清楚，要重新审查。

6、《福建日报》问题，南下同学说退出来了，打来电话不久封报社还没退出，要赶快退出来，好实行军管，报社有两派意见，有争论，不要登本地的东西，还是要转载中央的精神。

你们还要特别注意，你们是前线，面临着敌人，刚才有同学

递条子，讲到这个问题，你们脑子要有一个最大的敌人是蒋匪，他们搞敌探，往我们这派人、空投，这些革命小将，一提醒就会注意。我们内部有敌我，是一小撮，大部分是人民内部矛盾。台、澎、金、马是最大的敌我矛盾。后天或大后天再接见。散会。”

会后，陈伯达又单独接见了惠安地区的学生。

4 月 20 日，新上任的成都军区司令员梁兴初给陈伯达等人写报告说：“遵照中央指示精神，四川地区截至 4 月 19 日止，已释放被逮捕、拘留、收容审查人员共 27，865 人，占总数的 85%。”

4 月 21 日，周恩来批示将梁兴初的报告“印发主席、林副主席及中央参加四川会议各同志”。

4 月 23 日，毛泽东看了《印发四川省释放被捕、拘留、收容审查人员情况报告》后，在上面批示：

加印发给军委扩大会议各同志。犯错误是难免的，只要认真改了，就好了。四川捉人太多，把大量群众组织宣布为反动组织，这些是错了，但他们改正也快，看此件就知道。现在另一种思潮又起来了，即有些人说，他们那里军队做的事都错了，弄得有些军队支左、军管、军训人员下不得台，灰溜溜的。遇到这种情况，要沉得住气，实事求是地公开向群众承认错误，并立即改正。另外，向军队和群众双方都进行正面教育，使他们走上正轨。我看现在这股风，不会有二月那样严重，因为军队和群众都有了经验。伟大的人民解放军一定会得到广大群众拥护的。

毛泽东

四月二十三日

林、周阅后办。

当天，毛泽东还在河南省军区党委 4 月 22 日关于河南各派组织准备近日派 4000 余名代表进京反映问题的报告上作了批示。

本来，河南省军区对“二七公社”的大搜捕，将“二七公社”逼上了绝路。坚持自己观点、不愿意请罪和悔过的“二七”工人、学生开始大批的逃亡。

河南农学院造反派组织叫“红卫兵总部”，简称“豫农红总”，负责人是二年级学生范念民，贫农出身，老实巴交，文革前在班上从不显山露水，但对共产党、毛泽东怀有深厚的感情。文革开始后，他对工作组整学生和老师深为不满，认为这与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本意是背道而驰的。于是，串联少数学生，举起了“造反有理”的大旗，成立组织。后来几经沧桑，逐渐演变成“红卫兵总部”，他自然也就成了该组织的负责人。

“豫农红总”的最大优势是在河南农学院占多数。所以，在河南省军区镇压“二七公社”期间，许多无处躲藏的“二七战士”和支持“二七公社”的干部纷纷跑到河南农学院避难，这里就成了“二七公社”的“解放区”。由于农学院有农场，有粮食，炊事班又是清一色的“二七”派，所以也有能力承担“解放区”的光荣任务。当然，由于省军区镇压，他们的处境也十分艰难。

同时还有大批的“二七”工人、学生跑到北京、西安等地避难。

流亡在北京的河南“二七公社”受到首都红卫兵的礼遇。在北京大学，在清华大学，在劳动工人文化宫，“二七战友”们和北京红卫兵欢聚一堂。郑州大学生们慷慨激昂的演讲，北京大专

院校红卫兵义正词严的声明，一次又一次地坚定了这些河南逃亡者的胜利信心。

有人来到西安空军工程学院，纪登奎的大儿子纪坡民正好是这里的学生。当他们听到河南的情况后，决定组织“中国人民解放军赴豫调查团”，声援河南“二七公社”。他们很快就串联了陕西、山西的部队院校，在西安召开了“声援河南、直捣中原誓师大会”，正式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赴豫调查团”，开赴郑州。他们创办为河南“二七公社”平反的报纸《直捣中原》。这份报纸，从郑州市的百货大楼、手工业大楼、新华书店大楼，从高高的二七纪念塔上，雪片似的飞向人群，如同在沉寂的郑州水中浇上了滚油，郑州再次沸腾了。因为这些部队学员也都穿着军装，不明就里的群众纷纷奔走相告：“解放军支持二七公社了！”“二七公社平反了！”

与此同时，3 月 28 日，清华“井冈山兵团”总部对河南问题的声明：

(1)河南二七公社是革命造反派组织,绝不是什么反动组织,他们的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我们坚决支持河南二七公社，坚决和二七公社战友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

(2) 刘建勋同志是好同志，好干部，是北京市革命三结合的对象，决不允许任何人别有用心的把刘建勋打成反革命。

(3)唐伟等人在河南犯下了罪行,必须向河南人民低头认罪。

(4) 清华井冈山总部对河南问题的态度以本声明为准。

清华井冈山（盖章）

1967 年 3 月

3 月 30 日至 4 月 3 日，北京红代会“特派河南战斗队”、清华“井冈山”、北矿“东方红”、北师大“井冈山”、北农机“东方红”、北京医学院等大专院校红代会组织对河南问题发表声明，表示坚决支持河南“二七公社”、开封“八二四”。

4 月 5 日晚，蒯大富给郑州“二七公社”来电，坚决支持“二七公社”。他说：“二七公社无罪，郑大联委无罪，战斗吧，最后胜利一定属于二七公社”。

4 月 6 日，北京红代会“特派河南战斗队”抵达郑州。8 日上午，他们在郑州举行游行，沿途造反派报以热烈的掌声，也遭到保守组织的围攻谩骂。当回到粮食学院时，保守派部分群众一拥而上，撕坏他们的红旗，并打伤数人。

4月12日，“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赴豫战斗队”给毛泽东发电，标题是：《毛主席：河南人民想念您——侧记河南的白色恐怖》。电报称：“目前，自上而下的反革命复辟逆流正在河南泛滥！河南告急！毛主席啊！毛主席！处在白色恐怖中的河南人民想念你！顽强奋斗的二·七公社的战友们想念你！河南五千万人民眼望着北京，盼望着听到您老人家的声音！”

“中国人民解放军赴豫调查团”和北京红卫兵的介入，使已经瓦解的“二七公社”又重新聚集在“二七”的大旗下。“中国人民解放军赴豫调查团”用郑州技校“826 造反司令部”唯一的一辆宣传车，在中州大街小巷散发传单，宣传他们的观点，要求给“郑大联委”平反，释放被关押的学生……

但是，在武汉军区的支持下，河南省军区拒绝释放被关押的学生。4 月 16 日，河南省军区副政委余嗣贵在大会上重申“‘郑

大联委’是非法组织”，“其中的一小撮坏头头是地地道道的现行反革命！”“军区说话是算数的。”

4 月 17 日，蒯大富给焦裕禄的女儿焦守风的信传到郑州，造反派转抄张贴。次日，焦守凤发表造反声明，表示支持“二七公社”和开封“八二四”等造反派组织，并声明退出保守组织“开封地委东风战斗团”。

4月20日，中央广播电台传来刘建勋参加北京市革委会“三结合”的消息后，河南“二七公社”派欢欣鼓舞，而其对立面“河南造总”和“十大总部”则由“省委造总”出面，主持召开省委部长以上的干部会，批斗文敏生、纪登奎，同时派人到北京去揪刘建勋。

4 月 23 日，毛泽东在河南省军区党委 4 月 22 日关于河南各派组织准备近日派 4000 余名代表进京反映问题的报告上批示：

林彪、恩来同志：

河南问题争得厉害，请商陈再道、钟汉华、刘建勋诸同志，是否将两派领导人调来谈一次，省军区只保一个赵文甫，将刘建勋、文敏生、纪登奎、戴苏理、杨蔚屏都不要，这种看法是否适当，值得研究。又湖北问题也很大，几乎省委大都是坏人，也应快点研究为宜。

毛泽东

四月二十三日

4 月 23 日，毛泽东还对陕西省驻军的材料作了批示。

## 第 603 回：促联合，□西省暂时稳定　批贯一，众□导座谈山西

21 军进驻陕西支左后，经过“三月镇反”和军训，西安局势似乎平静了下来。其实，树欲静而风不止，西交大与西工大的纠纷，“工总司”与“工企联”的矛盾，始终没有真正消除。

4 月 7 日，西交大和“工总司”“农总司”“机总司”“文总司”在新城广场召开批判刘、邓大会。“统指”“工企联”“农总会”等组织没有参加。事前，西工大的学生纷纷写造反声明，拒绝参加大会，认为这个大会不让“工企联”发言，就是否定“工企联”，就是替刘澜涛翻案，就是否定西安的文化大革命。他们说：“工总司”是大联合和夺权斗争时的分裂产物，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大杂烩组织。它从成立那天起就把斗争矛头指向了革命造反派和人民解放军，根本没有资格代表工人发言。

但是，这个大会得到了陕西省军区的批准，并把全市的广播借给他们使用。西工大的同学又被激怒了，几天时间，西工大校内就张贴出许多揭发陕西省军区领导人的大字报，怀疑军区的某些负责人是刘少奇、刘澜涛资产阶级司令部的人。

4 月 9 日，由西工大、“工企联”“农总会”“造反司令部”“统指”等 25 个单位也联合召开了一场批判刘、邓的大会，就是与 4 月 7 日西交大组织的那场批判刘、邓大会针锋相对。4 月 9 日西工大联合组织的这次大会，解放军也参加了。西交大和“工总司”“农总司”等组织也派代表参加了。大会上，由“工企联”代表工人、“农总会”代表农民做了发言。

4 月中旬以后，陕西省军区司令员黄经耀、政委袁克服、21 军军长胡炜，连续召集西工大和西大、西交大“文革总会”的代表座谈，听取他们对支左问题的意见和批评。这一做法很快就得到毛泽东的肯定。这就是 4 月 23 日，毛泽东看了中央文革办事组 4 月 21 日编印的《快报》第 1940 号刊载的《陕西驻军负责同志虚心听取群众意见改进工作》材料后，在《快报》的报头上作了如下批示：

林彪、恩来同志：

建议将此件印发军委扩大会各同志。军队这样做是很正确的。希望全军都采取此种做法。

材料中说，陕西省军区和驻陕部队负责人在与学生“座谈中，同学们批评了部队在前段支左工作中，旗帜不鲜明，调查研究不够，没有支持真正的革命造反派，有的还支持保守派组织，压制革命派。批评部队没有把训练内容和西安地区文化大革命联系起来，而是‘采取压制的与世隔绝的方法’，搞‘关门军训’，所以训练过程中几次出现贴军队大字报高潮，说部队‘在学校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等等”，毛泽东在这段话后面加括号写了一条注：“不要怕批评，全军在这种批评过程中，将会正确地认识世界，并改造世界。——毛注”

材料中说，“黄经耀、胡炜等同志欢迎和感谢同学们对部队的诚恳、善意、坦率的批评。随后黄经耀和胡炜等同志，因势利导转入讨论如何紧紧地掌握斗争的大方向，做好促进造反派大联合的准备工作。李世英同学对军区支左提出了八条意见，”在“李世英同学”5 个字后面，毛泽东加括号特别注明：“交通大学学

生领袖，曾经被打成反革命，并几乎被迫死亡，后被救活者。——毛注” 可见毛泽东对李世英印象之深。

对李世英所提八条意见中的第七条意见：“相信大多数干部和群众”。毛泽东在后面加括号写道：“这是最基本的一条。——毛注”

在第八条意见：“在做好各院校思想工作的基础上，采取互相串连的方法，广泛开展谈心活动，加强相互间的了解，增强团结，促进两大造反派之间的大联合”后面，毛泽东加括号写道：“开展谈心活动，这个方法很好。——毛注”

李世英的八条建议是：

1、军区支左必须旗帜鲜明，态度明朗。

2、对新成立的群众组织，要进行调查研究，区别对待；

3、对保守派组织要在承认错误和斗争大方向一致的基础上，主动争取团结；

4、部队要帮助工总司整顿，进行调查清理，为大联合扫清障碍；

5、切实做好各大组织头头的工作；

6、抓好活思想；

7、相信大多数干部和群众；（这是最基本的一条。——毛泽东注）

8、在做好各院校工作的基础上，采取互相串连的方法，广泛开展谈心活动，加强相互间了解，增强团结，促进两大造反派之间的大联合。（开展谈心活动，这个方法很好。——毛泽东注）

材料中说：“黄经耀、胡炜同志认为，李世英同学提出的意

见是对的，表示支持。并决定 4 月 21 日召集西工大、西电、冶院和交大四大院校的负责人，就如何紧紧地掌握斗争的大方向、促进造反派大联合，作进一步协商和讨论。”

之后，尽管双方的分歧和对立情绪并没有完全消除，但西安的局势还是趋于稳定。

4 月 25 日，陕西省支左统一指挥部召开办公会议，认为当前政法工作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捕人过多。其原因是办案不准，处理草率，手续马虎，任意宣布群众组织为反动组织。会议指出，要加强对政法工作的领导，军分区党委要切实把政法工作抓起来。会议还指出，哪一级批办错了的，由哪一级负责纠正。

4 月 20 日，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成立。山西省革委会派出以陈永贵为团长的代表团去北京参加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的成立大会。与会人员写了一张大字报，内容只有一句话“我们要见毛主席”。可能因为当时代表中，太原六中“32111 战斗队”的中学生李金渭年龄最小，大家让他将大字报递给参加大会的周恩来。周恩来的钱秘书接过大字报。旁边的江青让身边的人当场把大字报展开，会场立即响起一片“我们要见毛主席”的呼声。李金渭趁机对钱秘书说：“希望向总理再一次汇报袁振的问题。”

钱秘书说：“总理知道袁振，支持袁振，其他问题可以向中央文革小组讲，中央文革小组的关锋、戚本禹负责山西问题。”

4月23日，周恩来、康生等人参加山西问题座谈会。王力在会上批评了刘贯一3月26日的报告，说这次报告是“自吹自擂，骄傲自满，盲目乐观，脱离群众，急于求成，好大喜功。”

关锋也批评道：“学过去的省委，当前阶级斗争没有讲，对

当前的形势分析是空空洞洞的，抄了些社论，下边是自吹自擂，这就反映了对中央的态度，对主席的态度，对群众的态度。”

周恩来也说：“这个思想是资产阶级思想。”

康生说：“这是可笑，这是贯一的世界观上的问题，对待群众的态度也是非常严重。”

周恩来：“这反映了贯一没有具体和群众接触。他们事先也不讨论，这比卫恒过去还厉害了。”

关锋说：“袁振的大字报很多，袁振也可以说，你在搞鬼。与你们的4人声明有关。在大学中对袁振早就有两派；一派说袁振是坚定的革命左派，但忘记了袁振软弱的一面，另一派说袁振是叛徒，这个问题早已存在，昨天有人来问，我想这些问题反映了贯一同志思想上的好多问题。”

康生说：“日清同志对贯一的态度，不会对他有什么帮助。”“核心小组不团结，刘贯一同志责任多。昨天老陈（守中）不讲原则问题，讲了那么多乱七八糟问题。给刘志兰贴大字报，我看该贴。你们还追查谁是后台？我看谁是后台，贴贴总是有好处。你们刘志兰对李雪峰的问题，中央给你们打过几次招呼，就是不听，你们一而再，再而三的搞，住在京西宾馆，不报告中央，搞自己垮台声明。”

原来，当太原开始炮轰刘志兰后，刘贯一和陈守中先后向中央提出，不同意炮轰刘志兰。

周恩来接着说：“刘志兰思想水平差，她的行动就证明了她。像派人到天津去，中央已说了话，毛主席让李雪峰到天津去考验，把那儿的工作搞好再回来。据说张日清同志说：刘志兰说过‘不

打倒李雪峰，死不瞑目。’这究竟是搞革命，还是搞个人报复呢？像刘志兰这样的思想作风，作核心小组成员有点不够格。我同意王力同志说的，格平同志不表态比表态好一点，不然就卷进去了。他的缺点是没有坚决站出来，提出原则性问题。现在不作组织结论，现在先解决你们的问题。”

4 月 26 日,刘格平、张日清在北京西单民族饭店 10 楼大厅接见山西“红联站”、“太工永红”和“首都赴晋造反大队”部分代表 100 多人。在会上,曾鼎力支持刘格平“1.12 夺权”的“首都赴晋造反大队”邢晓光、赵景春等人对刘格平等在山西的所作所为提出了严厉的批评。山西军区军训问题、3 月 26 日《山西日报》社论问题、组训五师和对“太工红旗”的态度问题都遭到与会代表的猛烈攻击。有的人干脆就说，山西夺权以后指导思想错了，没有紧跟中央，造反派压力很大。他们还特别提到 4 月 14 日炮轰刘志兰事件。对此，刘格平如坐针毡， 张日清也始料不及。

4 月 27 日，在刘格平的夫人丁磊出面支持下，一支以山西电业系统“电力兵团”、省委机关“东风革命造反兵团”、“太工永红”、“太机四野”为骨干，包括杨成效“山西革命工人造反决死纵队”在内，联合山西全省 34 个群众组织的“山西省批判刘邓红色造反联络总站”，简称“红总站”宣告成立，总指挥是“电力兵团”头头郝庭云。“红总站”态度明确，坚决支持刘格平。由于郝庭云天天往丁磊家里跑，山西的“郝”和“哈”是谐音，因此，人们称郝庭云为“哈庭云”，“红总站”也被人们称为“哈”派。

本来，丁磊特别派人找过“山西革命造反兵团”刘灏，想把“兵团”也拉进“红总站”，但遭到了拒绝。刘灏说：

“中央文革小组都号召要归口闹革命了，现在成立跨行业的群众组织想干啥？”

当然，这其中还有其他原因。首先，有杨成效在里面，刘灏不舒服。而“电力兵团”，又是与刘灏的“兵团”唱对头戏的。还有那个由黄锐庵当司令的“东风革命造反兵团”，刘灏认为都是原来死保“黑省委”的省委机关干部。他对这 3 个人有看法，岂能与他们为伍？其次，在刘灏心中，也以为革命委员会成立了，山西的文革 7 月 1 日就该结束了。3 月 19 日，中央已经发了《关于停止全国大串联的通知》，接着不就是要复课了吗？一旦学校复课，推迟了的高考不就该进行了吗？

这样，在山西便形成了由“红总站”、“兵团”、“红联站”三足鼎立的新局面。这三个大组织虽说都是支持山西革委会新政权的，但“兵团”司令刘灏，那是绝对听袁振的。“红总站”是由刘格平的夫人丁磊支持成立的，总指挥郝庭云和骨干头头黄锐庵，都是绝对听刘格平和其夫人丁磊的。“红总站”的干将杨成效则是两边倒。一边成天往袁振家跑，同时还通过丁磊，紧紧地与刘格平保持联系。唯有“红联站”，在这三足鼎立中，还没有依靠山西新政权中任何一个革命领导干部，相对处于弱势。

在太原，炮轰刘志兰很快就变成了炮轰“刘(志兰)陈(守忠)刘(贯一)”。对此，“红联站”贴出大标语进行反击。大标语称：

“四一四是个大阴谋！”

“四一四企图分裂新生的红色政权！”

“红联站”下属的党校“东方红”还出动宣传车，宣读文章对“四一四炮轰”行动进行抨击。

“红总站”一经成立，马上表态，坚决支持“兵团”的《414决议》，将大标语刷满了太原城。早就对张日清憋了一肚子火的杨成效，率先以“决死纵队”和“红总站”的名义，贴出了“坚决揪出刘贯一、陈守中、刘志兰黑后台张日清”的大标语。

针锋相对，“红联站”的大标语也马上贴出来了，明确说出：

“414事件是妄图分裂山西省党的核心小组的一个大阴谋！”

“坚决揪出414反革命事件的黑后台袁振！”

山西大学“88红旗战斗队”则说：“一些危险人物‘策划于密室，点火于基层’，于4月14日一夜之间，把‘炮轰刘志兰’、‘打倒刘志兰’的巨幅标语刷遍了全城。行动如此突然，口径如此一致，来势如此凶猛，可以断定，幕后一定有人策划布置。这里需要声明，兵团小将出于对革命事业的负责态度，自觉起来炮轰刘志兰，完全是革命行动。他们的414决议是革命的文件，同阶级敌人策划的414事件是有着本质的区别。那些制造414事件的别有用心的人，绝不仅仅只要打倒一个刘志兰，而是从刘志兰身上开刀，打开进攻中共山西核心小组的缺口。他们表面上炮轰刘志兰，实质上把斗争的矛头指向了以刘格平、张日清同志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指向了坚定的革命左派组织。”

看看，“兵团”搞“414 炮轰”就是对的，而“红总站”跟上搞“414炮轰”就是大阴谋。“88红旗战斗队”的态度如此鲜明。

紧接着，种种断章取义各取所需的刘格平讲话和张日清讲

话，也被“红总站”和“红联站”分别贴到了太原的大街小巷。

一派的大字报上说，刘格平指出：“刘贯一、陈守中、刘志兰自‘112’夺权以来，执行的是一条没有卫、王、王的卫、王、王路线。”这是“红总站”披露的。

另一派的大字报上说，张日清指出：“红总站是牛鬼蛇神的大杂烩。”这口气来得更冲，自然是“红联站”披露的。送给杨日清的那些关于杨成效的材料，当然也以大字报形式张贴出来。

“兵团”一派中拥护《414 决议》的人马，和“红总站”的人马一道，又把张日清指为“刘、陈、刘”的“黑后台”，说他们夺权后执行的是“没有卫、王、王的卫、王、王路线”。“兵团”的《414 决议》，最终让“兵团”与“红总站”站在了同一个战壕里，“兵团”终于站到了支持刘格平的一边，“红总站”满街刷出了大标语：“红总站和兵团团结战斗胜利在一起，誓将 414 红色风暴进行到底！”

杨成效也兴冲冲让他那些不大会写字的部下，满大街去刷大标语：“我决死纵队誓与兵团战士团结、战斗、胜利在一起！谁反对刘格平，就是反对党中央、反对中央文革和反对毛主席！”

“兵团”司令刘灏恍惚了：“兵团”的观点怎么和“红总站”变的一样了？他是听袁振的，可“兵团”炮轰张日清，袁振并没有让他这么做呀！堂堂“山西革命造反兵团”的司令，已被上上下下簇拥着往前走，一点儿也由不了他了。

刘灏后来回忆说：“我那时就像被推上了赌场，不赌也得赌。至于是输还是赢，我当时也不知道是个什么结果。”

“兵团”的“汤高参”多次到太原工学院找“太工红旗”讨

论形势，讨论各种力量的后续发展和演变，以及中央对山西问题的态度等。

“汤高参”叫汤建中，是山西省人民广播电台机务科的副科长，出身知识分子家庭，懂技术，共产党员，还特别爱看书，爱思考，遇事也爱发表个与众不同的看法。因为对林彪提出的“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顶峰”的论述颇有微词，说毛泽东思想到了顶峰，是不是以后就不再发展了？这在当时可是大问题，邓小平当时的罪状里其中就有着一条，认为是反对毛泽东思想。所以文革初始，机关就有人给汤建中贴出大字报。他也就在运动初期，成了广播电台机关内，被革命群众揪出来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三反分子”。随着运动的发展，1966 年 10 月下旬，汤建中见没人管他了，便跑到社会上去看大字报。这天，他又来到太原市委大院看大字报，恰巧遇到刘灏带人到市委大院贴大字报，被一群反对袁振的人围住，与他辩论袁振的问题。对方人多口杂，把个刘灏连骂带批，难以招架，根本无法还嘴。这时，汤建中挤了进来，只听他操着满口上海腔，口若悬河，滔滔雄辩，竟然把那群反对袁振的人说的接不上话头，真可谓是“舌战群儒”。

刘灏在困境中遇到这样一个帮手，当然是喜出望外。此人的伶牙俐齿使刘灏反败为胜，直到辩得没有了对手，刘灏才问起这位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好汉姓甚名谁，在哪里上班？

汤建中当即将刘灏作为朋友，从此他们经常见面，汤建中也开始介入太原五中“井冈山革命造反兵团”的决策层，刘灏戏称其为“高参”。

## 第 604 回：□痛击，“反□命复辟逆流”不期遇，谭启□□返山东

再说山东，自“二三”夺权后，山东省军区立即指示各个地区、县的驻军和军分区、武装部参加夺权斗争。“二三”夺权前后，济南军区已经按照中央指示，派出部队执行“三支两军”任务。3 月 22 日，山东省革委会和山东省军区又联合发布通告，要求全省民兵作为军队方面的代表，积极参加公社以下“三结合”的夺权。

由于军队参加夺权，甚至以军队为主进行夺权，山东全省的夺权进展迅速，从 2 月 3 日至 2 月 25 日的 22 天中，全省 13 个专区和地级市，已有 7 个夺权；全省 112 个县和县级市，已有 62 个夺权，均超过一半。

由于王效禹“二三夺权”依靠的是以韩金海、王竹泉为代表的“山工指”、“红山指”和“山师串联兵”，这一派造反组织在全省影响力小、势力单薄。而相对影响力较大的“山工联”、“山红联”、“山大主义兵”又被镇压下去了。所以从全省范围看，参加夺权的群众组织有相当数量是那些具有保守色彩和中间色彩的群众组织。而作为支左夺权的军队代表和参加夺权的民兵代表，因为长期形成的观点和感情，也基本倾向于党团员多、出身成分好、行为稳健而具有保守和中间色彩的群众组织，认为他们才是革命左派，并支持这些群众组织夺权。有些地方的驻军，甚至和当地干部联合起来，借摧垮“山工联”、“山红联”的下属组织之际，搞垮了所有他们看不惯的造反组织。这样，在山东“二

三夺权”夺权之后，相当多数的新政权中，出现了与以王效禹为代表的省革委会和造反派的愿望相反的情况：一、没有造反派的位子。二、借造反派整风的机会，指责他们对各级领导的造反行动为错误和罪恶，甚至逮捕了部分人。同时，有的领导干部否认自己犯有走资本主义道路和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错误，甚至要求平反、恢复名义、赔礼道歉。三、依旧采用“文革”前的方式执政，这在省会济南市表现得尤为显著。山东省军区在执行三支两军的任务中，普遍不倾向造反派，与王效禹所依靠的韩金海、王竹泉等造反组织产生矛盾。无疑，这些与文化大革命的初衷及毛泽东号召夺权的目的是背道而驰的。

以王效禹为代表的省革委会和造反派很快觉察到问题的严重性，他们组织力量在济南市和全省进行调查。王效禹亲自到济南国棉第三厂调查，搜集新政权整垮造反派和走老路、向右转的材料。最后得出结论：中央出现的“二月逆流”反映到济南和全省来了，普遍出现了走资派和保守组织的反夺权，这是阶级斗争的新动向，是一股反革命逆流，要采取措施进行斗争，不然，已夺取的政权还有丧失的危险。

于是，以王效禹为代表的省革委会和造反派，在山东发动了“粉碎阶级敌人的反革命复辟阴谋的斗争”，亦称“反复辟逆流”。

3 月 25 日，《大众日报》发表社论《迎头痛击反革命复辟的逆流》。

3 月 29 日，新华社发表了载于《红旗》杂志第五期的王效禹的文章《放手发动群众，粉碎反革命复辟阴谋》。

4 月 2 日，山东省革委会第三次全委会通过了当前全省“文

革”的形势和任务的决议——《放手发动群众，彻底粉碎阶级敌人的反革命复辟阴谋》。

4 月 5 日，济南市粉碎资本主义复辟逆流誓师大会在八一广场举行。群情激奋，火药味浓。王效禹在讲话中指出，山东这次“资本主义复辟逆流”是“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有后台的，蓄谋已久的”。“后台”之说，很明显是含沙射影地指责军队。北航“红旗”驻济南的代表在发言呼喊口号时，竟在几个“誓死保卫”之后，又添了一个“保卫王效禹同志!”

接着，一场遍及济南市和山东全省的反复辟逆流迅速展开。

此时，山东各地区、各系统的造反派纷纷利用各种渠道来山东大学串联，宣传“造反派与造反派心连心”“犯了错误的造反派还是造反派，与老保不是一路人”。

山大“主义兵”本来就不是省油的灯，风向一变便立即挺起身来。中文系三年级造反派核心人物刘全复贴出大字报：《我的控诉》，历数对立面在“肃流毒”中对他及其家人的迫害。指出，“主义兵”流毒当肃，但应有限度，不可否定其前段运动的大方向，不可借“肃流毒”之机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翻案。他还特别提出，原山大“红卫兵”正以“肃清山大主义兵流毒”为名翻前段运动的案，这说明他们自己仍有严重的保守派流毒，也应同时肃清。否则他们算不上左派。由此，山东大学造反派一哄而起，大字报、大标语突然爆发，演讲会分外红火，纷纷控诉二、三月以来所受到的各种迫害、欺侮与打压，论证“前段运动大方向”的正确，痛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反扑”。

早在 3 月 28 日，原山大“主义兵”派就响应 3 月 25 日《大

众日报》社论《迎头痛击反革命复辟的逆流》的号召，召开了“反逆流”誓师大会，宣告成立“延安公社”。4 月 4 日，又成立了“延安公社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济南市很多造反组织前来为“老战友”祝贺。

组织名称由“主义”改为“思想”并非随意而为，而是因为“二三夺权”后，王效禹赴京汇报时，也选了两个“对立面”的代表，其中一个是山东大学外文系英语专业的学生。该同学在中央文革接见时，找机会鼓起勇气，向江青说了两句话：一是“祝毛主席万寿无疆”，二是“向毛主席请罪。”

江青问“为什么请罪？”

该同学诉说“主义兵”在“二三夺权”中的错误。

江青得知他是山东大学“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的代表后表示：“不用请什么罪，你们前段干得很艰苦。你们的组织别叫什么主义了，主义主义的，毛主席讨厌这么说，建议你们改为毛泽东思想红卫兵。”

4 月 4 日，到会祝贺“延安公社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成立的山东省革命委员会常委、山东省团校姜庆本在讲话时确认了这一传闻，还表示，“江青同志的声音，就是毛主席的声音。”

“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前面的“延安公社”帽子，很快就去掉了，只剩下“毛泽东思想红卫兵”。

“主义兵”濒临绝境之时，得益于“粉碎二月逆流”的大气候和王效禹、省革委的提携和扶持，方可东山再起，所以积极展开“拥护省革委”的活动，上街贴大字报、大标语：

“誓死捍卫红色新政权！”

“坚决拥护省革命委员会!”

“王效禹同志是坚定的革命左派!”

等等。

山东的反复辟逆流运动迅速引起山东驻军及其他们支持的各级革委会和群众组织的反应。山东省及济南市一些受到冲击的革委会和群众组织开始联合起来，已经垮台的“黑字兵”此时也拉起了队伍。4 月 22 日，他们组织了 10 多万人，在济南八一广场集会，要求恢复名誉。大会起草发出“给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致敬电”、“关于目前形势的严正声明”，他们一方面宣称拥护省革委会、拥护解放军，因为这是大前提，否则就犯了“方向性错误”，甚至会被打成反革命，再进监狱。另一方面，他们又表示，要对省革委会以反复辟逆流的名义，进行打击部分革委会和群众组织的行为进行坚决的斗争。会后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井然有序、群情激昂。济南军区参加和支持了这次大会。这次集会和游行，不论是阐明的观点，还是喊出的口号，都是讲究策略的；不论是集会的秩序，还是游行的秩序，都是组织严密的，显然与造反派的一哄而起有明显的区别，明显有“高人”指挥、组织。参加这次集会、游行的群众，后来被称为“422”派。

就这样，山东以王效禹为代表的省革委会、造反派同军队及其军队支持的各级革委会和群众组织之间的矛盾，由公开逐渐的走向了激化。同时，军队内部，在对待王效禹的态度上也出现了分歧。

王效禹这时正在北京参加军委扩大会议。4 月份召开军委扩大会议时，中央通知山东的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得志、政委袁升平

和此时在军队中并无职务的王效禹参加。王效禹的妻子刘崇玉也非要跟着坐飞机进京，在家中大吵大闹，王效禹无奈。刘崇玉硬是跟着王效禹上了飞机，一起来到北京，住在京西宾馆。

说来凑巧，王效禹在京西宾馆的电梯里偶然碰到了谭启龙的秘书江祥康，马上想到谭启龙也应该住在这里，于是向江祥康提出：要去看看谭启龙。

见到谭启龙，王效禹十分客气，问寒问暖。

而谭启龙心里则忐忑不安，不知又会生出什么事情。

果然，4 月 24 日下午 16 时多，谭启龙突然接到周恩来亲自打来的电话：

“是启龙同志吗？有件事要和你商量一下。王效禹说山东要开全省地市委书记及厅局长会议，提出要你参加会议，听听大家的意见，亮亮相，你看怎么样？能去吗？”

谭启龙当即表示说：“我回去没有什么问题，请总理、中央决定。”

周恩来说：“那好，你就去一下吧。明天早晨就走，同王效禹、杨得志同志一起乘飞机回去。你还有什么要求吗？”

谭启龙回答：“没有别的什么要求，只是希望在走以前，能够见见总理，那怕五分钟也好。”

周恩来说：“那可以。你晚上 12 点到西花厅来吧。”

4 月 24 日晚，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李富春、江青等接见上海、山西、贵州、黑龙江、山东、北京等省市革命委员会负责人，有：张春桥、姚文元、刘格平、张日清、李再含、潘复生、王效禹、谢富治。接见后，毛泽东和大家一起

观看了上海市舞蹈学校演出的革命现代芭蕾舞剧《白毛女》，并同演员们一起照了像。

子夜 24 时，谭启龙如约来到西花厅。周恩来开会还未回来，邓颖超在。她陪谭启龙坐了一个多钟头，周恩来还未回来。因时间太晚，谭启龙劝邓颖超先去休息，他自己一直等到凌晨 2 点钟，周恩来才从人民大会堂回来，看上去很疲劳。握手问候后，周恩来关切地问了谭启龙的身体状况和年龄，谭启龙回答说："53 岁，身体还好。"

周恩来说："那好啊，还可以工作 20 年。"

谈到当前的形势，周恩来说，原打算明年搞出个眉目，现在看情况比较复杂，很难说，要有长时间的精神准备。原来设想社会主义革命比民主革命能少花一点代价，现在看来不一定。接着，他又谈到干部问题，说全国干部问题还解决不了，站不出来。他对谭启龙说："据王效禹讲山东形势很好，你去听一听也有好处。这几年华东形势不错，工农业生产搞得比较好，对国家贡献大。原来设想华东干部出来工作好解决一点，现在看也不行。"

谭启龙问："总理还有什么指示，回去后怎么办？"

总理说："你回去以后，主要是听取意见，多做些自我批评，不要讲成绩，成绩让别人讲，不要随便表态。"他还举了一个例子，说有位领导做检查，摆了自己很多成绩，效果就不好。

他又对谭启龙说："我已向王效禹、杨得志讲清楚了，你回去，第一是听取意见；第二，不准围攻，不准武斗；第三，时间半个月。你只带点衣服，别的东西不用带，明天早晨同他们两位一起飞回济南。"

谈着谈着，两个小时过去了，时针已指向凌晨 4 时，窗外已微微泛白。谭启龙赶紧告辞。周恩来送他走出西花厅，当谭启龙依依不舍地向周恩来告别时，周恩来说："我在院里走走。"就这样，他们一起穿过院子，一直把走到大门口。据谭启龙后来回忆，上车前，周恩来握着谭启龙的手又交代了一句："回去后有什么困难，可以给杨得志同志写条子。"

## 第 605 回：态度明，中央赞成王效禹　说海军，再接见四川代表

军委扩大会议结束后，4 月 25 日 16 时至 22 时后，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西门大厅接见了山东王效禹、杨得志、袁升平以及王效禹的妻子刘崇玉和“红山指”负责人王竹泉、杜春胜。参加接见的有陈伯达、康生、江青、王力、关锋、谢富治、张春桥、肖华、杨成武等人。晚上，大家一起吃饭时，王效禹将山东的情况向中央作了汇报，其他人作了补充。

听了王效禹等人的汇报，周恩来要求军队坚决支持革命左派，他说：“不强调支持左派，只强调团结、争取保守派，实际上是支持了保守派。”

他指出：“山东省夺权的特点是，有了省革委，但集权没搞好，下面有了二重政权，名义上是由省革委领导，实际上是和省革委顶着，根本不听省革委的。”“全省下面夺权快，只是换了块牌子。”

他指示：“两级军区都要参加省革委，王效禹任主任，杨得志任第一副主任，把省革委的领导统一起来，军队的支左指挥部可以不要了，由省革委统一领导起来。”“军队转过来，问题就不难解决了，两级军区应该和省革委站在一起。”

他要求：“回去后部队要开会，要把思想问题解决一下，包括县人民武装部以上的都要参加，一周的时间差不多，中心研究支左工作问题，部队领导同志要作自我批评，王效禹同志也可以去讲讲话，给大家鼓鼓气，中央文革、中央军委也去几个人也讲

讲话，表示对大会的支持，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完全撤回整训。”

对山东的原公安二师部队，周恩来说：“要用野战军把他吃掉，并从原地撤离，改变性质。”“济南公安局的部队要撤出，要放手让革命造反派去把他冲散。”

对山东的“各地革命委员会，部队不能作第一把手，根据这个意思，回去起草个核心小组，报请中央。”

接着康生讲话，他赞扬了山东的造反派，说：“山东的左派队伍不错吗！”

王效禹说：“只要统一认识，左派队伍是听革命委员会的话的，叫干啥就干啥。”

康生：“这就好嘛！北京就不行，我们说了他们还不听，主席讲：无政府主义是对机会主义的惩罚。”

王竹泉插话：“人家都说山东的造反派太温和了。”

康生说：“这是你们的优点，不是你们的缺点。”

关于公安局的问题，省革命委员会汇报说：“造反派不敢动，一动就说反对解放军。”

康生：“这算什么解放军，这是公安纵队，他们和当权派混在一起，内蒙就有三个独立团反对毛主席嘛！市公安局的解放军是属于地方部队的，撤出去！”

对济南市武装部，康生说：“武装部就是穿着军衣的地方干部。公安纵队所以站在保守派中间，不但是山东的问题，是带全国性的，这有一个教训，就是反罗瑞卿反的不彻底，……”

张春桥插话问：“黑字红卫兵有多少人？黄字红卫兵有多少人？”

王竹泉答："黑字兵有五、六千人，黄字红卫兵有几万人。"

张春桥："差的太悬殊了，这么少人，还是保字派！怎么能支持他呢？ "

关锋插话说："你们对公安局，武装部太轻视了，他本来就是坏的，围攻公安厅是他们挑动的，你们安排一下，济南起火有人救，交通有人管，叫公安厅管起来就行了，公安局放手让造反派冲，冲垮了完了。我们不提倡武斗，如果他们非给我们顶牛不可，武斗就武斗，你们造反派要学会争取群众，杨毅犯了严重的错误，要批判，但主要应解决公安局，武装部的问题，高明智要撤职。"

肖华问："山东支左谁主持的？"

袁升平答："张仁初!"

肖华说："怎么能让张仁初主持工作呢？他是有名的张二疯子，袁升平你应当自己抓起来。"

周恩来："支左办公室要撤回，统一归省革命委员会办公室管。"

杨得志："我们怎么听到的反映和王效禹听的反映距离太大了。"

肖华说："这有什么奇怪的，就是嘛，你的屁股坐错了，高明智大家批判了他，怎么能叫他掌握公安局，武装部呢？怎么不让群众讨论呢？"

康生："有些不是调离，而是要撤职，像高明智。"

26 日早晨，山东一行人离京返鲁，谭启龙遵照总理的指示也来到了北京机场，看见王效禹他们已经先到了。随行人员说：

“杨得志同志因中央军委开会不能同走。”

王效禹见到谭启龙很客气，登机时让谭启龙先上。谭启龙也很客气的说：“你先上吧。”

上了飞机，谭启龙在机舱后面找了个地方坐下。坐在前面客舱里的王效禹一见，赶紧过来，要他坐到前面来。谭启龙说：“这里可以，一会儿就到了。”没有动。

到了济南机场，谭启龙一出舱门，就看到许多人打着标语旗帜，高喊“打倒谭启龙!”的口号。接着有 4 个人上来，架着谭启龙就出了飞机场。

机场外边，等候着 8 辆大卡车。谭启龙被押上第一辆卡车，站在上面，一路游街到南郊宾馆。下车后还未站稳，他就被按在地上跪着进行批斗。当晚，又在南郊宾馆俱乐部召开批斗大会。在一片“打倒”的口号声中，他被挂上“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牌子。

开完批斗大会，谭启龙在押回住处的路上，有几个人还不断对他拳打脚踢。

4 月 28 日，韩金海、王竹泉等人召集“山工总”、“红山指”等组织在济南八一广场召开 20 万人大会，发出《彻底粉碎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逆流的决议》，王效禹在大会上讲话。他传达了中央支持山东反复辟逆流的态度，以中央的名义宣布“山工指”、“红山指”、“红卫兵山东文艺革命造反司令部”三大造反组织为左派，并传达了中央对“黑字兵”和济南市公安局的态度。山东省军区派部队参加了大会。接下来，济南以前的几派力量，又迅速分化组合成为“422”和“428”两派。

4 月 29 日上午，韩金海、王竹泉等人组织“428”派数千学生包围济南驻军支左指挥部，认为他们支持了“422”保皇派，要求他们回答问题。从北京回到济南不久的王效禹、杨得志、袁升平等人赶到现场。袁升平首先说：“二三夺权时我们坚决支持了王效禹，我们一直是和左派站在一起的，但夺权后不久，由于我们没有经验，在支左工作中发生了一些缺点和错误”，“我们的问题，将来开个会是好解决的”等等。

接着王效禹对 422 大会表态：“这个会不能叫黑会，因为有几万群众嘛”，“不要认为所有参加这个会的都是保皇派”，“参加会的不能都算反革命”。

杨得志最后说：“我同意效禹同志的意见。422 大会是个什么会解决了，讲参加会议的都是保守的就增加了我们的对立面，这是个策略问题。”“山东夺权是个很大的胜利，中央给了我们鼓励，两级军区参加夺权，在全国这是第一个地方，周总理、康生同志也没讲我们都错了。”“我们自己要开个会，总结些经验教训”等等。

4 月 29 日出版的《大众日报》，全文刊登了王效禹等人在 4 月 28 日大会上的讲话以及大会决议，将 4 月 22 日的大会说成是“一个有计划、有组织地向无产阶级革命派、向省革命委员会、向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示威的保守组织的黑会”。

济南的矛盾非但没有降温、解决，反而更为激化，“422”和“428”两派围绕对省革委会的态度激烈争斗，轮番举办大型集会和游行。装有超高音大喇叭的宣传车穿行于闹市区，互相攻击谩骂的噪音不绝于耳，传单漫天飞舞。在近 10 天的时间内，

无论在工厂、在街道、在农村，两派一见面就打，解放军到处受到攻击。

我们暂且放下山东，再看看北京高等军事学院。由于 4 月 14 日北京高等军事学院发生了武斗，4 月 19 日，中央军委决定对高等军事学院实行军事管制。4 月 24 日，高等军事学院军管会召集该院两派代表开会，军管会副主任曹广化代表军管会对两个组织的代表说："中央军委对高等军事学院实行军事管制的决定，昨天晚上已经由军委副秘书长，副总长代表军委向你们宣读了。今天下午陈志带我们军管会的其他同志来到高等军事学院，履行我们的职责，我们坚决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决完成中央军委交给我们的任务。"

曹广化宣布了军管会的六条规定，要求双方立即停止武斗。他说："武斗是违犯毛主席亲自制定的《十六条》决定的，是违犯毛主席亲手批的《八条》、《七条》、《十条》命令的，是违犯毛主席亲自批的对高校军管的《五条》决定的。各个战斗组织无论如何要做到坚决不武斗，如果做不到只好执行纪律。要特别教育自己的子女、家属、保姆不能进行武斗，如果继续武斗，也要执行纪律。《八条命令》有明文规定，子女发生问题就要找干部（家长）负责。"

4 月 25 日，李曼村接见海军文工团军乐队"红色造反舰队"组织的代表。

"红色造反舰队"组织的代表首先说："今天欢迎李曼村同志来核对一些情况，解答一些问题。首先请你谈谈对海军直属机关文化大革命有什么看法。"

李曼村答："有一个总的印象，这是个人看法，我们没有专门讨论过海军的文化大革命。海军领导机关的文化大革命，阵营是比较清楚的。据我所了解，一边是以李、王、张为代表的正确路线，是无产阶级司令部；另一方面，是以三反分子苏振华和他一小撮狐群狗党为代表的黑司令部。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从海军党委处理报社'红流'这个问题，给我一个突出的印象，我认为海军党委是处理得很好的。耐心地做政治工作，三令五申，耐心说服，发动群众，最后把问题搞清楚了，绝大多数群众觉悟了。没有抓一个人，也没有宣布解散一个组织。这个问题处理得很成功的。处理得这样圆满是很少见的。海军党委支持造反派比较坚定，比较稳妥。"

代表问："文工团'毛泽东思想战斗队'说你讲，火烧李、王、张不是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你说过吗？"

李曼村解释说："那天接见很多单位，一个在我身后的人蓦然问我，火烧李、王、张是不是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我说，现在你们主要的矛头应该指向苏振华，为什么指向李、王、张？李、王、张是左派嘛！他们说，我们也承认李、王、张是左派，左派有缺点可不可以批评？我说如果有缺点，可以善意批评，善意的批评不能算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

代表又问："把斗争矛头指向李、王、张是不是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

李曼村答："矛头不对准苏振华，而对准李、王、张就是对错了方向，当然是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

这时，海直机关的群众代表介绍了海军大院的情况，李曼村

听后说："不管什么组织，如果在海军文化大革命中不把斗争矛头指向苏振华，而把矛头指向李、王，肯定是方向的错误。"

代表问："你知道海军有哪些革命造反派？"

李曼村答："我知道查封《海军报》的'海工红色造反团'和支持他们的一派是革命造反派。'海工红色造反团'在全军来说也是一个比较好的造反派。"

代表们介绍了查封《海军报》社的情况，问："《海军报》应不应该查封？"

李曼村答："应该查封。因为他有错误。查封是革命的行动。"

代表问："文工团有的战斗队到处散布，'全军文革有我们的人，''李曼村同志支持我们'，'到了全军文革就是我们的天下'，等等，你敢不敢辟谣？"

李曼村答："我没有表示过支持他们。如果他们是这样说的，那是歪曲。"

代表问："现在有人把坚定地信任、支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李、王、张说成是新的奴隶主义，对吗？"

李曼村答："那是错误的。那是可以批评的。"

代表说："文工团'毛泽东思想战斗队'不顾军委规定，不听海军党委劝阻，硬要上街游行示威，回来还说你支持他们的革命行动，请你谈谈这个问题。"

李曼村答："我们开始一再打招呼不要上街，因为军队上街这是个大事情，有的单位比较好，如政治学院，你们海军接到通知以后都没有上街，但是有的军事院校和少数文艺团体自己上了大街。这是不符合规定的，是不对的。"

代表们说："他们还和地方串联。"

李曼村答："这当然也不对，因为军委有规定不要串联。"

代表继续说："他们是借声讨刘邓为名，实际上在街上大反三个老帅，你怎么看？"

李曼村答："我不赞成上街贴三个老帅的标语、喊打倒三个老帅的口号。"

代表问："他们游行后，为什么对他们说这是革命行动？"

李曼村答："我说声讨刘邓是革命行动。上街是不符合规定的。事后他们的代表找我，我没有批评他们这是有缺点的。如果他们利用我的话对抗海军党委，海军文办，那是不对的，那是利用了我的缺点。我的责任是没有批评他们。"

4月25日下午，陈伯达、江青、王力、戚本禹、关锋、杨成武、谢富治再次接见四川代表。

陈伯达首先对大家说："周总理、康生有点事，等一会来，请大家发言。"

川大"8·26"的代表首先控诉四川的镇反、抓人情况……

王力说："同志们，四川的材料，各个县的我们都印出来了，交给中央首长去看了，是不是大家发言，各专区推选一个代表。"

重庆黄廉发言，说李井泉收买重庆"8·15"头头，镇压文化大革命，关押造反派。

后字242部队的代表问:"有没有军委命令撤销'红总'？楚平、韦杰回答！"

成都军区副司令员韦杰站起来，但不知如何回答。

江青明确表态说："中央没有过。"

会场上高呼："毛主席万岁！""打倒韦杰，打倒甘渭汉！"

王力说："刚才有同志提出，请韦杰副司令员答复，是不是中央军委有取缔后字242的命令？"

韦杰这时回答说："这个命令没有，工程学院这个事情是军区党委研究的。"

工程学院即后字242部队,全称是后勤工程学院，一般简称其为"重庆军工"或"后勤军工"。

问："为什么盗用中央军委命令？"

韦杰答："我们没有这样做，可能是军里没有听清。"

愤怒的代表们纷纷发言揭发成都军区盗用中央军委的名义镇压造反派。

王力问："天宝放出来没有？"

原来，4月17日，中央领导在人大会堂接见四川全体代表时，与会的成都"8.26"派群众组织代表，发现被当作是造反派的"黑后台"、"现行反革命分子"被抓进监狱的四川省副省长天宝未在座。他们知道天宝被监管在康定军分区，便从住地西苑旅社要了长途电话，由成都军区转康定军分区，询问天宝的下落，声明要找本人前来听话。对方突然接到从北京打来电话找天宝，甚觉诧异，经请示领导之后，只简短地作了回答："天宝尚被关押，不能前来听电话。"

"826"代表立刻找到新华社四川分社的王记者和孙记者，向他们讲述了与康定军分区通电话的详细经过。二位记者马上以《天宝目前关押在康定》为题，写了一篇内参稿，交给记者站驻西苑旅社的记者组。这一稿件连夜被送到编辑组交给中央文革派

驻四川的记者肖健卿。这篇内参稿件以电话记录一问一答的形式，详细地记述了北京的“8.26”代表与康定军分区通电话的全部原话，让人一目了然地看出，天宝还身陷囹圄。肖健卿在处理这篇稿件时，特地加写了天宝的藏名：桑吉悦希，并将文章刊登在《代表动态》上。周恩来看到后，当即做出批示：“请成都军区立即派人将天宝安全护送到北京。”

康定军分区在接到将天宝“护送进京”的通知后，猜测是要将天宝当作“要犯”押解进京。加之康定至成都，路途有300多公里，途中要跨越大渡河，翻越二郎山，经过雅安、天全等地，军分区担心在这长途跋涉中发生意外，便特意将天宝化装一番，要他戴一个大口罩和一副深色墨镜。为保证安全，派出一个武装警卫班随行，由两名身佩武器的干部带队，并始终不离天宝左右。从康定出发之前，康定军分区电告成都军区，订购好直达北京的飞机票。到达成都的第二天便立即同两名“护送”的干部，乘飞机直达北京。

当天宝被护送到北京西苑旅社时，会议的工作人员看到他衣服未换、头发未理、胡子未刮，真像一副“罪犯”的模样，便对两位身着军装的护送干部说：

“你们的任务已经完成了，可以走了！”

这两位干部闪着惊异的目光问道：“还要不要我们负责看护？能不能给我们写个证明之类的东西？”

中央工作人员对他们说：“不用了，你们的任务已经完成了。”

天宝安全抵达北京的消息，通过总理办公室派住西苑旅社的联络员，很快报告了周恩来。正在人大会堂的周恩来立即指示将

天宝送过去。在人大会堂，周恩来对天宝说："你是我们看着长大的，怎么能把你也打成反革命呢？"转而又以劝导的口吻说："不过，你一定要正确对待，要谅解群众，群众是受蒙蔽的。……赶快回到西苑旅社，换换衣服，洗洗澡，理理发。"又叮咛说："你被抓了，现在又到了北京，家里一定很不放心，快去给你爱人打个电话，告诉她平安无事。"

听到这些话，天宝心情久久难以平静。

## 第 606 回：谈□庆，武汉营救夏邦□　□再道，与学生北京对质

我们再回到人民大会堂接见四川代表的现场。当重庆代表听到王力询问天宝是否放出来的情况后，纷纷说："我们还有许多同志没有放出来，关在中美合作所监狱。"

江青指示："韦副司令，你听到没有？马上释放。"

众人又高呼："毛主席万岁！""打倒韦杰！打倒甘渭汉！"

重庆代表七嘴八舌的控诉重庆关押造反派，即重庆"砸派"的情况，王力说："请大家简单点，四川的情况中央已经清楚了，重庆也很清楚。"

江青说："请乐山代表发言。"

乐山代表开始发言。

晚上22时10分，周恩来、康生接见完山东王效禹、杨得志、袁升平等人后，走进了接见四川代表的会场，全场高呼"毛主席万岁！"

乐山代表接续发言，当他们说到"昨天还抓了5人……"

周恩来问："昨天还抓5个人吗？"

这时代表们又争相发言控诉。

康生说："大家心情激动是可以理解的，我们听不清，讲的慢一点，声音不要太大。"

乐山代表继续说道："有一个军分区支持的反动组织一面旗子上还有江青同志的私章。"

江青说："我没有私章。"

周恩来说："有个张家口军事学校的王行虎同志要求见中央军委，就这里谈吧！"

王行虎说："有人说，江青同志说：甘渭汉是好人，办了坏事，我决不相信江青同志能说这样的话。"

江青笑了。

周恩来提议："南充军分区司令员自己来揭发，好不好？"

众人鼓掌。

南充军分区司令谈了他们布置镇反的情况，南充代表谈到还有公安局和保守派的人来北京。

周恩来问："他们住在哪儿？"

答："住西直门，具体住哪儿，他们不告诉我们。"

周恩来："把名单开来。现在谈万县问题。"

万县代表说："军分区用机枪扫射学生，最小的才6岁，叫举手。有一个学生提裤子被打了一枪，肠子打出来了，这学生临死前用手指沾血写了'我是革命的人'几个字。"

新北大万县调查组发言说："韦杰在西苑旅社开黑会，四点指示：（一）原则坚持；（二）错误检查；（三）支左工作他们说错了，我们说对了；（四）总的由军区负责。

周恩来："请涪陵的发言。"

罗成胜作为涪陵发言的代表站了起来。

"你叫什么名字？"周恩来问道。

"我叫罗成胜。"

"你是教师？"周恩来看了看他面前的名单后又问道。

"是，我是涪陵一中的教师。"

“你多大啦？”大概周恩来看出罗成胜有些紧张，于是又问道。

“我在监狱里度过了 21 岁的生日。” 罗成胜答道。

“好，那你谈谈涪陵的情况。”周恩来说。

于是，罗成胜先汇报了涪陵从 2 月 22 日起开始抓人，到他们 4 月 8 日离开涪陵前为止，那里一共搞了三次大戒严，已经抓了 1000 多人，其中还有十三四岁的红卫兵等情况。

罗成胜汇报完，像学生回答完老师的问题一样看着周恩来，周恩来也望着他问：“汇报完了？”

“我汇报完了。”说完，他就按周恩来的手势坐了下来。

接着，广元和新华社四川分社的代表发言。

广元部队代表发言说：“我是总参三部派往广元的部队。”接着，他讲了4个问题：

（1）绵阳军分区一月份突然增加了六个科。

（2）2月21日军委（成都军区电报）说：这是绝密文件，内容：各部队修筑坚强工事准备一个月粮食设置指挥员。

（3）调一个营到绵阳镇压造反派，部队打电话询问中央，军分区对他们大不满。

（4）派人控制火车站，抓告状的，组织政法小组。

他说：“《十条》以后，军分区派人去控制7012部队一个营。”

最后，周恩来说：“今天开会到这儿，明天请梁兴初司令员开个小会，大家谈谈。”

新华社四川分社林跃东还要发言，控诉新华社四川分社受成都军区迫害的情况，陈伯达说：“今天开到这里，后天再开。”

我们再看武汉。4月18日上午，武汉“二司”第二届红卫兵代表大会在洪山礼堂开幕。出席大会代表千余名，应邀出席大会的有解放军代表、革命工人代表、“三新”、“三司”、“南下赴汉调查团”代表及干部代表等。杨道远在会上致开幕词后，工人代表、解放军代表、北航“红旗”、清华“井冈山”、哈军工“红色造反团”、“三新”及“首都南下造反大队”联合代表、省委干部代表等先后在会上发言，一致认为武汉“二司”是造反派组织，表示坚决支持“二司”的一切革命行动。北农机“东方红”的代表在会上发言说：“《二八声明》是大香花，《二一八声明》是大毒草。”

下午，武汉“二司”丁家显在会上作了《放开眼界看未来，坚定不移向前进——二司司令部工作总结报告》。

由“粉碎资本主义复辟反革命逆流总联络站”及“北航红旗赴汉调查组”组成的“为 ‘工人总部’翻案调查组”代表在会上作了关于《工人总部十大罪状的调查报告》，否定了武汉军区3月21日发布的《通告》中列举的“工人总部的十大罪状”，明确表示：“工人总部”绝不是反革命组织；朱洪霞不是反革命而是革命闯将。

19日上午，“二司”副司令员方保林在会上作了《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与会者一致认为，揪武老谭，坚决彻底为“工总”翻案是斗争的大方向。

这天上午，武汉还发生了武汉“三司”近万人脱离“三司”，在武汉大学召开“三司革联”成立大会的事情。武汉“三新”、“二司”等造反派组织都派代表出席了“三司革联”成立大会。

这天，湖北省副省长孟夫唐给武汉军区陈再道、钟汉华并军区党委写了一封信，指出军区对形势的认识是错误的，在支左工作中的一些重大问题上有严重错误，并提出了改进工作的三点建议。在此前后，刘真、张华、任爱生、薛朴若等湖北省的干部也公开指出武汉军区在支左工作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表示坚决站在“二司”、“三新”一边。

4月20日，“工人总部青山分部”重新树旗，“二司”、“新湖大”、北航“红旗”等代表参加了树旗大会。

20 日下午，“新华工”总部正在开会，他们驻汉阳联络站的一个同学突然闯了进来，向大家报告关于“工总”曾经掌权的汉阳轧钢厂的调查情况：

汉阳轧钢厂有职工 1460 人，该厂“工总”负责人是夏邦银，工人，中共党员，劳动模范。《321 通告》前，该厂革命、生产的各项工作都比较正常。3 月 17 日，夏帮银被汉阳区公安分局军管会逮捕。现全厂有 1100 名群众要求释放夏邦银，厂内绝大多数中层干部也都要求释放夏邦银。

“新华工”认为，汉阳轧钢厂的事情非常典型，决定将其作为反击资本主义复辟、为“工总”翻案的突破口。

于是，4 月 22 日，“新华工”的聂年生和“新湖大”的梅子惠来到武汉三中，找 “三中红岩”的头头谢保安商量，希望从被捕的“工总”负责人里找出一个政治条件及各方面都比较好的典型,作为营救“工总”头头的突破口。他们认为，被关押在汉阳区公安分局的夏邦银是合适的人选。他是劳模，又是党员，家庭出身及社会关系清楚，不是“工总”的一号勤务员，只是汉轧

厂战斗队的负责人,在“工总”内不是很突出，也没有任何问题。只要给军区施加压力，军区应该比较容易同意将他释放出来。他们认为,只要这个行动成功了,就可以极大的鼓舞造反派的士气，进一步逼迫军区承认在支左问题上犯了方向性错误,反过来也证明了造反派的正确。

说干就干，他们也来不及向“二司”的杨道远通报了，马上就由谢保安把“三中红岩”的 200 多人拉到汉阳公安分局门口静坐，架上大喇叭，设立营救夏邦银火线指挥部。

下午，“新华工”驻汉阳的联络站也派出 8 个代表到汉阳公安分局要求释放夏邦银，公安分局的人开始不出来，他们就用两个喇叭在公安分局外向群众宣传,很快,周围就聚集了不少群众。

汉阳的保守派组织得知“三中红岩”在汉阳公安分局静坐的消息后，也派了一些人赶过来和他们辩论。此时，公安分局出来了几个人，说“新华工”他们是来为“工总”翻案的。“新华工”和“三中红岩”指出公安分局逮捕夏邦银违反了中央《关于安徽问题的决定》和中央军委《十条命令》，对其进行逮捕是非法的。但汉阳公安分局对他们的要求不予理会，并说自己是专政机关，要“新华工”和“三中红岩”不要干涉。

很快，聂年生如约带着“新华工”的学生，从关山游行到汉阳来声援三中，梅子惠也带着湖大学生前来声援，水院的造反派头头、“二司”的二号人物丁家显也来了，还有许多市民也跑来慰问声援，这一下就引发了全市性的声援高潮。

这时，独立师开来了 4 辆宣传车向静坐现场的同学宣读武汉军区《321 通告》，广播说：陈再道、钟汉华、孔庆德是毛主席

司令部的人等。这样一来，静坐现场“三中红岩”的两个喇叭，被独立师三个高音喇叭压得就像没有声音一样了。

公安分局院内设置了警戒线，“新华工”有 3 个学生被挤到警戒线内，被警察抓了进去。23 日凌晨 1 时左右，物资学校的一个同学从水管爬到放置公安分局喇叭的平台上，把喇叭拆了。他自己也被两个公安人员从窗口拽进了屋里。

静坐的同学们见状，也不管什么警戒线不警戒线了，就往里冲。同时到处贴大字报，将事态扩大。他们还跑到省、市委静坐，要求给夏邦银平反。三中的学生还在市委搞了两天绝食。市委组织部长辛甫的联络员孙德华赶快出来接待，他在文革初期担任过三中的工作队队长，所以和谢保安他们都很熟悉。他一见谢保安就说：

“小谢呀，你怎么又来了？有什么事好好商量，别把同学们饿坏了。”他又让身边的工作人员把市委大院医务室的医生叫到现场，对医生说：

“你们赶快给同学们检查一下身体，一定要照看好同学们，千万不能让革命小将把身体搞坏了。小谢呀，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哪，劝劝同学们，有什么问题我们商量解决嘛。”

于是，绝食停止，但是，“二司”与武汉军区副司令员韩秀山关于释放夏邦银的谈判还在继续，持续了十天十夜，武汉军区韩秀山副司令被辩得疲惫不堪，终于“缴械”，同意释放夏邦银。但是，很快武汉军区党委又予以否认。

与此同时，4月23日这天，武汉“工人总部联络站”、“九一三战斗兵团”在新华路体育场召开 “彻底粉碎资本主义复辟

逆流誓师大会”。“工人总部”大旗就插在主席台前正中央。“工造总司”、“钢二司”、“南下赴汉调查组”等组织出席了大会。与会代表在会上发言中一致认为“工人总部”是坚定的革命造反派组织，要坚决为“工人总部”翻案。会后游行，“清华井冈山”的大旗走在最前面。游行队伍高呼：

“三·二一《通告》是大毒草！”

“彻底批判三·二一！”

“工总是革命造反派组织！”

“坚决彻底为工人总部翻案！”

“彻底粉碎资本主义复辟的反革命逆流！”

“打倒武老谭！”等口号。

“工人总部”的大旗重新飘扬在江城，游行队伍所到之处，群众惊讶之时，均报以热烈的掌声。

作为姿态，4 月 24 日，武汉部队第一次在武汉三镇写出大标语，内容有：“解放军坚决支持左派”，“武汉部队支左大方向完全正确”等。同时，各厂军代表召开紧急会议，秘密指示驱赶下工厂的学生。

第二天，4月25日，武汉部队出动两万人在新华路体育场集会，会后在武汉三镇举行了长达20公里的武装游行。武汉的“红武兵”、“红城公社”、“大专兵”、“三字兵”、“三司”等组织在各主要街道和路口夹道欢迎。有的“三字兵”还上到解放军的汽车上与解放军一起游行。但是，在中山大道和湖北大学，一些“二司”和“三新”的学生看到车上的“三字兵”，就从车上往下拉他们，车上的解放军制止，双方发生了冲突。

当天，武汉军区要求广播电台报导解放军集会、游行的消息，由于造反派的坚决抵制，未成。“二司”和“三新”还在这天贴出了“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决不容许枪指挥党”，“四二五游行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绝不容许向中央施加压力”等大标语。

4 月 24 日，在北京的武汉“二司”学生听说陈再道在北京开会，于是想和陈再道召开辩论会，辩论《二八声明》到底有没有黑手？

4 月 25 日上午，在北京的武汉“二司”等组织为了查实那个所谓的特大号外“北京来电”一事，特地到京西宾馆找陈再道当面对质。他们问陈再道：

“现在武汉到处流传着陈司令员 19 号的讲话，并且影响很大，‘三字兵’活动猖狂，我们希望证实澄清一下。”

然后念《特大号外（特大喜讯）“北京来电”》。

陈再道赶紧回答：“我根本没从北京打电话回去，是我们的政委给家里打的。”

同学问：“内容是什么？”

陈再道答：“内容是中学红卫兵与大专院校红卫兵有区别，要允许他们存在。不能解散，要允许他们起来革命，要帮助他们改正错误。”

同学问：“还有什么？”

陈再道答：“他们（指中学三字兵）18 号游行喊‘打倒刘、邓’这个大方向是对的，喊口号是要革命，不解散是对的。”

同学问：“电话是你授意打的吗？”

陈再道答："不是，是钟政委打的。"

同学说："反正武汉造成很大影响，希望你对传单上几条表态，不要含糊。"

接着学生们继续念号外，当念到"武汉'支左办'信部长向专揪王任重的红卫兵传达了陈司令与中央文革负责同志的电话"时，陈再道又辩解说：

"那是他（信部长）搞错了，我没有打。"

学生紧抓不放，说："我看还是把这个问题落实下来。"继续念号外。

陈再道着急地表白："没有，没有打这个电话。"

学生指着传单说："事实上这上面是这样讲的。"

陈再道再三说："不是江青讲的，是我们政委讲的，这样是不对的。确实江青没有讲过，我回去查查。"

下午，学生们又找到钟汉华谈话，继续追查电话问题。电话风波对陈再道来讲无疑于雪上加霜。

4月26日，武汉数万名"二司"学生在武昌体育场举行热烈庆祝"二司"司令部成立半周年大会。会上通过了《给毛主席的致敬电》。 会后也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浩浩荡荡跨过长江大桥，首次来到保守势力较大的汉阳。游行队伍高唱："下定决心，为工总翻案，工总起来，武老谭完蛋"的歌曲，高呼"坚决、彻底为工人总部翻案"，"彻底粉碎资本主义复辟反革命逆流"，"打倒武老谭，解放全武汉"，"打倒武老谭，解放全湖北"，"汉阳老保休想翻天"，"解散'红武兵'，瓦解一切保守组织"等口号。造反派工人沿途设茶水站热情招待游行队伍。游行队伍

也受到保守组织的谩骂和围攻。铁中“三字兵”从楼房上向游行队伍扔木棒、钢板，打伤数人。

晚上，“三司”武汉工学院总部与解放军开联欢晚会，激起“二司”的不满，冲击会场，与“三司”发生冲突。当天夜里，武汉三镇盛传：“武工‘二癞子’殴打解放军”，“‘二癞子’夺解放军的枪”等等。

## 第 607 回：四二六，淮南、昆明大武斗 赣州乱，肖华见“星火燎原”

4 月 26 日，安徽淮南爆发了文革以来第一次大规模的武斗。

话说淮南“1、27 夺权”几天后，以淮南市老造反——“电厂 125”为首的一些群众组织公开张贴对夺权行动有不同观点的大字报和大标语，反对淮南夺权后成立的“市临委”。从此，淮南造反派以对“127 夺权”和“市临委”的态度，也渐渐分裂成为两大派。一派是以“红司”为首的“支持派”，坚决支持“市临委”。还有一派是以从“红司”分化出来的“红司革命到底联络站”为首，联合“东方红”等组织，坚决炮轰“市临委”，称为“炮轰派”。两种观点相持不下，淮南市出现了广泛的群众性大辩论的场面，这种场面也展示了许多青年人的雄辩风采。

3 月 1 日，淮南“市临委”发布了《第一号通令》，取缔了淮南矿务局机关以处级干部为骨干的组织“一反到底”，进一步激化了“支持派”与“炮轰派”之间的斗争。从此，淮南“市临委”名存实亡。

3 月中旬，南京军区后勤部、总参五局、6464 部队、6375 部队先后到淮南市执行“三支两军”任务。3 月 27 日，中央关于解决安徽问题的《九条决定》下达后，安徽实行军管。4 月 8 日，淮南也实行了军管，由方仲林出任淮南军管会主任委员。

但是，军管并没有遏止两大派的尖锐对峙，“炮轰派”认为军管会偏颇“支持派”一方，认为军队不是支左而是支派。淮南两大派之间从文斗逐渐发展为武斗，而且一发不可收，且愈演愈

烈。拳头变成了棍棒，殴伤变成了流血，而这些转变几乎没有经历任何的过渡阶段。

4 月 26 日下午，淮南“支持派”的“总司”在五中体育场召开大会，会后举行了几万人的示威游行。游行队伍在谢一矿和矿机厂门口与淮南“炮轰派”的“炮总”发生了纠纷，大喇叭之间的对骂声、强烈抗议的口号声，喧嚣成一股一股的声浪。

矛盾好不容易的平息后，游行队伍继续游行到淮南瓷器厂门口时，厂里“炮轰派”高音喇叭的口号和“支持派”的口号尖锐对峙起来，由相争到对骂，道路两边的人与游行的队伍，也从对骂发展到互相推搡，从动口发展到了动手，终于，砖头、碗块如同燕子般漫空飞舞。由于游行队伍的密度大，飞来的砖石瓷碗几乎弹无虚发。最后，淮南瓷器厂里的“炮轰派”用一个个整碗飞砸过来，充分地利用了瓷厂产品物质的优势。人群中立时有许多人头破血流，一时间伤者累累……

血的鲜红色，如同斗牛场上的斗牛士用来激怒斗牛的大红布，游行的队伍由惊慌失措继而发展到头脑狂躁，也拿起了攻击的器物，一阵发喊，近万人的狂潮砸开了瓷厂大门，手执拆下标语架的木棒，一路怒吼着，直向正在飞掷砖石瓷碗的人们冲将过去。

瓷器厂的广播室被砸了，高音喇叭也哑声了，厂里人群霎时作鸟兽散，纷纷寻找逃匿的去处。厂区汇集了一片打斗的人群，狂暴的怒吼声响彻厂区上空……

受伤的人一批批抬了出来，挤满了整个土坝孜的市二院，许多伤员被分流到各个医院救治。这是淮南造反派第一次大分裂流

血武斗，也是淮南文革以来的第一次大规模的流血事件。

在“426 流血事件”中，淮南瓷器厂的一个老工人因伤重致死。第二天，“炮派”用汽车载着死者棺材举行了全市大游行，标语口号贴满了西部地区，声言要“以牙还牙，以血还血”。淮南的空气紧张得要燃烧，正如一张大字报所说：“现时的淮南如同一个炸药桶，一点火星即可燃爆。”

4 月 26 日，西南边陲云南昆明也发生了一场几万人的大武斗。起因是云南“炮派”这天在昆明市检阅台召开“打倒刘、邓、陶，万炮再轰省市委血战到底誓师大会”，并准备会后游行。“八派”认为，“炮派”的大会是收罗保守组织，公开制造分裂，是老保向造反派示威。于是决定冲击会场。据说，这个决定得到当时云南省军管会一位副主任和一个联络员的支持。

“八派”冲击会场，致使“炮派”大会中断。一场几万人的武斗混战场面就这样在昆明市当时的东风广场和东风路上展开了，混乱中许多人被打伤。

在此之前，还发生了一起云南省委常委兼省监委书记、云南省副省长刘林元离奇死亡的事件。

刘林元是参加了北京中央领导的接见后回到云南不久，突然于 4 月 21 日失踪的。当天，省委办公厅就接到电话，说是在西郊小虹山发现一具无名男尸，请立即去看一下。

省委办公厅的人马上赶到西郊小虹山。当他们气喘嘘嘘地爬上山坡，果然在半山腰的一条干涸的山沟里，发现刘林元靠坐在沟边，右手握着他的手枪，太阳穴处有一弹孔，头歪在一边，早已气绝身亡了。

刘林元资格很老，1927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但由于是云南地下党，建国后在云南省委内一直不受重用，因此他对阎红彦是有意见的。因此，对造反派炮轰省委、火烧市委内心也是支持的。据当时大字报揭露，刘林元在阎红彦死后的一次常委会上的发言看，他对阎红彦的指责语言激烈。因此，对他的死，很多人都怀疑不是自杀。

于是，“云南大学共产党宣言公社”专门组织专案组调查，据说也查到了几条很重要的线索，例如：刘林元死的那天晚上，接到了一个神秘的电话，就出门去了，后来再也没有回来，再后来就死在小虹山上了。

小虹山离省委十多公里，没有交通卫工具深更半夜的他怎么上山？

云南省军管会为此成立了专案组。但是由于军管会内的派性重重，专案组从成立的一天起，就举步维艰。就是“共产党宣言公社”专案组也同样是阻力重重，最后两个“专案组”，都先后草草收场，无疾而终。

4 月 27 日上午 9 时 45 分至下午 14 时 20 分，总政主任肖华在解放军艺术学院接见了全军著名的造反派组织、号称曾经在一周内横扫全国几个大军区，旗帜一度飘扬在几个大军区的办公楼顶上的解放军艺术学院“星火燎原革命造反队” 16 名代表，接见时在座的还有空军政委余立金、海军第二政委王宏坤。

肖华首先听取了“星火燎原”的汇报。在谈到“四方面军战史”时，肖华说：“过去的战史可能有问题。各方面都送战史，那么多，有些都没有经过审查。”

接着，肖华说："首先肯定艺术学院战斗革命组织'星火燎原'，你们大方向还是对的。你们要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文艺中的修正主义文艺黑钱，要贯彻毛主席的文艺路线；批斗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且你们的革命干劲不错。闯劲也不错。敢闯敢斗。你们对文艺团体的点火也起了一定的作用，点革命之火嘛！最近同志们通过小的整风，风格很高，自己洗澡，互相擦背，思想有了提高。保证了今后运动能健康地发展。使我们军委同志们听了很高兴。你们在运动中主流是对的，这不等于说，你们没缺点，没错误，缺点错误是有个时间冲击军区。"

"军委颁发了《十条命令》和最近三支两军，主要是支左，总的方面要肯定成绩，很伟大。特别是支工支农，对毛泽东思想的宣传，对推动全国学毛著，推动农村的生产起了很大的作用，总理前几天开会，还讲是有伟大的成绩的。当然在繁重的任务中也有一些缺点，个别地方还犯了错误。这么多人投入运动，过去住营房，没接触过这么多群众。支左支错了，改就可以嘛！但有的是立场错了，像四川、内蒙古；有的是反革命，赵永夫搞政变嘛！残酷镇压革命左派，杀死三百余人。他原来是个国民党，受过特务训练，后来混入军队没发现。现在坏事变成好事。有些人受毒很深，一时还转不过弯来。内蒙打死一个人，就是那个'韩桐事件'，凶手已经抓到。全国打第一抢的是内蒙，但过去（内蒙）宣传保守组织太厉害了，最近好几百人跑到北京，想一下子扭转过来很不容易。四川问题也是立场的问题，主要是阶级斗争盖子没揭开，没有斗倒、斗臭，他们在西南工作十几年，有相当基础，有批亲信搞复辟，主要是李井泉、廖志高掌握了保守组织。

军区有个别组织上了他们的当。大头子郭林祥、黄新亭。黄是李井泉的死走狗，郭也是李的亲信。甘渭汉去的时间不长，前一段批郭、黄，他是和他们有斗争的。后一段受韦杰方面影响，没调查研究立场不稳犯了错误。最近已派梁兴初去当司令员，准备再派一个政委。李文清假转真转还要看看，昨天还搜到李井泉藏在他家里的五个箱子。中央正在解决成都问题。其它地方或多或少有些缺点、错误，没经验；有对有错，或开始错，又改正过来了。但性质不一样，是错误和缺点的问题，军委也开了会，会后会很快的扭转过来。”

“9 个月了，艺术学院立了些什么东西，拿出什么新的创作来了没有，你们搞部队文艺的，要在舞台上和观众见面嘛！破是为了更好的立嘛。光有破不立那能行啊？开花要结果啊！部队文艺团体（包括艺术学院）如何很好地和战士，工农相结合，搞出新的创作，这很重要。《白毛女》改得很好，现在改得比歌剧都好，造反精神足了，武装斗争突出来了。《沙家浜》最近也改了。我们军队一个也没有，一个新的创作都没拿出来，歌子还有几个，好的不多。这点是受了批评的。是不是可以从艺术学院、总政文工团、驻京文工团先拿出点文化革命的新东西出来，体现毛泽东思想、体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体现无产阶级的东西，给那些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看看嘛！是不是你们腾出些力量，排出些新的节目来，这样子能看到成果。”

“军队武斗的风在滋长，你们这点还做的不错，没有发生过武斗。高等军事学院一个学生都没有，都是教员，都是四、五十岁的人了，打了 9 个月的架，高等军事院校在这点上说来是不高

的。老婆小孩都去斗，我们反对的。打本身就是违反《八条》。最近我们不得不对（高等军事学院）实施军管，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我很赞成你们批判文艺黑线的大会。可以批判，但仅限于军队范围之内，以开中型会议为主，大会开一、两次必要，主要是打掉他们的威风，教育群众，鼓舞士气。总这么开就成了老油条了。比如彭真在开第一次批斗大会时还吓得发抖呢，以后他就满不在乎了。总政治部这次批判刘志坚，200 多人开了 13 天会，把东西端出来，全斗臭了。开始他不承认，后来大家把他亲自写的，签过字的东西一一拿出来跟他对证，他就没有办法了，搞思想路线斗争，摆事实讲道理嘛！各个文艺团体可以轮流，要搞材料。把炮弹，子弹准备好，从总政这次批判会来看，效果好，教育人。外地方面不要来了，驻京部队主要是文艺团体，对罗瑞卿、刘志坚、陈其通可以分几次（批斗）嘛！你们一定要做好准备。”

“魏传统的问题你们自己去批判。”

“星火燎原”的代表说：“我们认为他是三反分子。”

肖华说：“现在我还不能定他是三反分子。我不能定调子，要先搞材料。你们搞的那些材料我再看看。”

4月27日，谢富治在北京市革委会常委会议上的讲话时，说出了当时面临的困难。他说：

“现在，我们处在第一线，700万人口的事情统统叫一个人来管怎么能管得了，常委也管不了，没有组织是管不了的，所以首先要迅速搞三结合，首先一步步的搞县、区、局一级的三结合，这样起码可以第二线挡住，否则千千万万事情都送到市革命委员

会来，没法解决，长此下去，革命委员会也就没有威信了。

三结合的关键是干部问题，现在有的干部站出来一个就打一个，这是不好的现象，有三种情况：一种站出来是应该打倒的，他本来就不应该站出来。另一种是保守势力在制造混乱；第三种是革命队伍中的山头主义、小团体主义在起作用。这三种情况，都要在大联合中解决。”

他特别强调了无政府主义的问题：“当造反派造反时，清规戒律的约束是不利于造反派的，目前无政府主义对造反派是不利的，因为大多数造反派夺了权，少部分没有掌权，只有保守派和不准三结合的干部才不受约束，大造其反。昨天《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反对无政府主义。不要把它当作普通的社论，我们的队伍要大反特反无政府主义，没有联合的要创造条件联合；已联合的要巩固，工代会，农代会，红代会要总结经验，不足的地方要补救，不仅一个机关，一个学校要反无政府主义、小团体主义、个人主义，大范围也要反……”

他还说：“我们要维护解放军的威信，不要到处去揪资本主义复辟逆流中谭震林的人物，不要再讲‘二月兵变’了。”“最近准备把大学关的人都放出来。”

谢富治所讲的这些问题，不仅北京存在，全国也如此。

4 月 16 日，江西赣州发生了一次为营救牵涉命案的造反派学生，有 5535 人参加的大绝食。

1967 年 2 月 4 日晚，赣州一中高三学生、原空军司令刘亚楼侄女邹军领头组织的赣州市第一个红卫兵组织“八一战斗队”的宣传委员舒北斗等 14 名学生，把该校地主出身的历史老师曾

广渊等 3 名“牛鬼蛇神”找来，强迫他们跪下，拷打逼问他们所谓的开黑会策划反攻倒算的问题。曾广渊哪敢承认，再三辩解他们没有开会，因此遭到毒打。曾广渊因被人用铁管敲打头部，当场昏迷。

当晚，舒北斗等人将 3 名教师押送市公安局处理，曾广渊因伤势过重，死在公安局接待室门口。因为涉及命案，3 月 14 日，赣州市公安局为此拘留舒北斗。

一个多月后的 4 月 16 日，江西冶金学院“东方红”战斗团、赣一中红卫兵等数千人来到市公安局，强烈要求释放舒北斗。公安局在军分区的支持下，以舒北斗打人致死为由拒绝放人。红卫兵则针锋相对的提出，舒北斗他们打死的是地主分子，何罪之有？于是，红卫兵开始冲击公安局，并于 4 月 22 日开始，赣州三大院校九所中学的数千名红卫兵在市公安局、军分区门口静坐，5535 人开始绝食。绝食期间，红卫兵多次冲击军分区未果，一位女青年在激愤、冲动之际，竟当众脱得只剩短裤冲击军分区战士手挽手组成的人墙。白花花的人体在南方初夏的阳光中格外耀眼，刹那间军分区门里门外的人们都目瞪口呆！

几百名悲愤的红卫兵紧随其后，呐喊着“下定决心，不怕牺牲”的口号冲向解放军，眼看着人墙即将被冲开，突然，军分区内警报声大作，几百名解放军战士同样高呼口号“下定决心，不怕牺牲”的口号，奋不顾身的从院内冲出堵住了浩浩荡荡的红卫兵。

原来，战争经验丰富的赣州军分区领导李胜、沈淦等早就预见到最危险的情况，做好了应急预案，独立营、军械库、教导队

大批官兵已经在军分区待命，终于在关键时刻发挥了作用！

4 月 27 日，周恩来联络员与绝食指挥部通电话，询问赣州红卫兵绝食情况，商谈解决方案。赣州的绝食持续了 7 天 7 夜。最后以舒北斗被释放，红卫兵撤离军分区而告结束。而舒北斗、张吉庆、赖愈梁、傅芳云、尹筑青、朱毅、汤其平、李九莲、曾昭银等等这些后来的学生、工人领袖在这次绝食斗争执开始崭露头角。

## 第 608 回：围西□，恩来见内蒙群众 现场乱，几十年生涯罕见

4 月 21 日下午，中南海西门外出现了 500 多人的“内蒙古赴京代表团”，他们宣布：“我们要在这门口静坐，周总理不接见，我们不离开。”同时还贴出了三条大标语：

“毛主席啊，内蒙古一千三百万人民想念您！”

“强烈要求重审内蒙问题！”

“强烈要求周总理接见，反映内蒙情况！”

一张题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高锦明六十大罪状”的大字报贴在标语的一侧。

静坐持续了 6 天 6 夜，毛泽东被惊动了。

4 月 27 日，北京，人民大会堂。周恩来受毛泽东和林彪委托，同陈伯达、康生、 谢富治、肖华、张春桥、王力、关锋、戚本禹以及内蒙古军区的吴涛、刘华香一道，在这里接见内蒙古群众组织“无产者革命造反联合总部”数千群众，被接见的还有“呼三司”数十人，还有为了维持秩序的北京“红代会”数千人。

会场上秩序混乱，口哨声、口号声、跺脚声、起哄声不断，许多人退场抗议。

周恩来宣布开会后说：“同志们！请坐好，退场的请回来，如果不愿意回来的嘛，你们就别回来。请坐好，凡是要回来的，把门打开，让他们回来。”

鼓掌声起。

周恩来：“把帘子拉开，不要挡住！同志们！现在开会。”

鼓掌。

周恩来：“现在学习最高指示，打开主席语录第219页。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说：……”

掌声又起。

周恩来：“最近这些天，因为内蒙古，特别是呼和浩特来了一些人，到北京来，一直到中南海门口去静坐。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叫我们来给你们开一个会。”

鼓掌，长时间呼口号。

待口号声停，周恩来继续说：“因为这个会不是简单的一个会，在北京发生这样的事情，可以说还是头一次。所以我们也邀了在北京的红代会的各方面的人来听一听。”

掌声、口号声再起……

周恩来：“这个问题是由于《中共中央关于处理内蒙问题的决定》发表以后发生的。我们首先请内蒙军区副司令员刘华香同志把他们内蒙古军区所作的检讨先讲一讲。”

内蒙古军区副司令员刘华香代表内蒙古军区的肖应棠、刘昌、黄厚、王良太做检讨。刘华香在检讨中承认：“我们所犯的错误是极端严重的，犯了带枪的刘、邓路线的错误，实际上是目无中央，目无军委，夺权不请示，事后不报告，对中央指示采取两面态度，这是严重的政治错误。思想上自以为是，骄傲自满，主观片面，绝对化，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得到改造。”“我们有罪于党，有罪于人民，我们向党中央请罪。”今后一定“帮助革命组织发展壮大，对保守组织进行分化、瓦解、教育。”

接着，周恩来继续讲话。但是，他刚说了一句“同志们！”

就被现场一阵掌声打断。待掌声稍停，他接着说：“我现在把今年4月13日《中共中央关于处理内蒙问题的决定》，今天在会场上也发给大家了，再作一点解释……”

又是一阵鼓掌，将他的话打断……

周恩来：“这个决定是经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共同商量起草，然后又经过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我们的副帅林彪同志批准的……”

周恩来话音未落，再次被台下一片鼓噪声、口号声、掌声、口哨声打断，甚至许多人噼啪站起退场。这种混乱的场面，是周恩来几十年革命生涯中都极少遇到的，但他仍保持了极大的冷静和克制，劝说大家：

“我们理解你们的心情，喂！静一静！”

台下继续呼口号……

周恩来：“同志们！同志们！我们理解你们的情绪，同志们！同志们！同志们！……”

台下继续鼓掌……

“同志们！同志们！同志们！同志们！不要再鼓掌了，同志们，我们理解你们的情绪，我们理解你们的情绪，你们听我讲嘛！同志们……

掌声仍然不停……

周恩来：“不要鼓掌，听我讲嘛！内蒙问题是在二月初两声枪声从内蒙古军区打出来以后，中央就过问了。从那时起，经过两个多月，我们经常把了解的情况都向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报告过。我们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

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的负责同志，也经常交换意见。你们来到北京的各方面代表，我们都接触过。所以，经过各方面接触，研究，调查以后，并派了两次调查组去。经过研究以后，最后我们才起草了这个决定，才经过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林彪副主席批准的。这个内容我把它讲清楚，你们可以冷静的听一听嘛！听清楚以后，你们再有什么话，你们再要求、再提嘛！”

周恩来结合内蒙古情况，开始逐行逐段详细解释4月13日《中共中央关于处理内蒙问题的决定》的内容，在谈到第一条第一段时，周恩来说：

“这一段我首先说清楚，就是什么人负这次事件的主要责任，这里就很清楚了。首先是乌兰夫和他的代理人王逸伦，他是操纵了这次事件的。你们大家都晓得，乌兰夫已经早就揪出来了，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也可以说在内蒙古是最大的资产阶级当权派。他揪出来以后，就没有回呼和浩特去了。但是它的代理人王逸伦，现在查明他是叛徒，是反党分子，他是什么时候加入党，经过调查以后也证明是假的，没有根据的，是混进党里来的，并且在日伪的时候，他就投降了日本，投降了伪满蒙，然后又成了苏修的情报员。当时日本投降以后，就是这样的货，就是这样的角色，混进党，窃踞了内蒙古负责的地位。在这次乌兰夫这个内蒙古最大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被揪出来以后，他就在内蒙古起了代理人的作用。还加上一个助手，叫王铎，和王逸伦是一伙。在这样人的操纵下……”

这时台下又有人长时间呼口号，还有人喊：“听不清！”

周恩来：“好了，好了，好了，同志们，你们弄清楚了，这

次事件的最大的操纵的头头是乌兰夫和他的代理人王逸伦，王铎之流。这是主要的。你们要相信党中央的揭发。

那么，仅仅是他们这几个人还不行啊，他们一定要有一个依靠啊！所以他就利用内蒙古军区某些领导人的一些错误的想法，错误的立场，来操纵，来挑拨。因此，我们指出来内蒙军区个别的领导人。为什么不点名呢？我们照顾我们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荣誉，而且我们要考察个别领导人究竟他们承认错误是真的，还是假的。有的比如说，这一次这个决定宣布以后，刚才刘华香同志宣读了他们五个同志的检讨，刘华香和吴涛同志留在这里开会，回去的肖应棠同志就站出来做了比较好的检讨，可是其他的还没有检讨。所以是考察考察，到底这些军区的个别领导人认识错误是诚恳的，还是不诚恳的，我们还要看一看。所以，当时不用点名的方法。这也是给群众通过斗争和运动来鉴别他们……”

台下又出现长时间口号，有人喊：“我们想念毛主席”！

周恩来：“同志们！同志们！同志们！同志们！现在……

台下连续呼口号，有些人还在喊。康生对台下喊道：“不要捣乱！”

周恩来：“同志们！同志们！……

台下的口号仍然不停……

周恩来：“喂！同志们！同志们！你们要听我讲，我们几个同志是受毛主席和林彪同志委托给你们讲的嘛。”

台下响起掌声……

周恩来：“如果你们不听我们的……

又被台下长时间口号声打断，还有口哨声……

周恩来："同志们！同志们！同志们！我再要求你们一次，你们是听话的吧！你们得听我讲完以后你们再喊口号嘛！"

台下再次响起掌声……

康生插话："你们要听党中央的话嘛！同志们，你们相信不相信我们是代表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的？相信不相信？"

台下群众答："相信！"

康生大声说："如果不相信的，立刻滚出去！我再说一遍，如果你们不相信，立刻滚出去！"

前几排坐着的群众听到康生说出"滚"字来，气愤地离座而起。周恩来继续说："同志们，冷静一点，冷静一点，我还继续讲。因为今天内蒙古军区部队个别领导人站在错误的立场和错误的认识上，就发生了一系列的错误。"

周恩来介绍了2月5日"韩桐事件"的调查情况，证明打死韩桐的就是军区训练部副部长柳青。他说："在支左工作上支错了，把本来的造反派，打击了，这不就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了吗！这不就和刘邓反动路线一样吗？军区的个别领导人不能推掉这个错误、推掉这个责任！刚才刘华香副司令员，他自己给中央的检讨，清清楚楚在这儿念了嘛，白纸黑字，我们收到的嘛，而且在中央的决定之后嘛！是4月16日他们开了会写的，念给你们听了嘛。所以，他们这种打击呼和浩特的，实际上不止呼和浩特一个地方，还有其他地方的'三司'等等的革命群众组织，这个事实在做错了的，不应该打击，不应该取缔的。比如，河西公司'八一八'就被取缔了，大批的逮捕了革命群众，这也是事实嘛！我们去人检查了。并且一直到4月份还有人被关着，命令他们才放

了的！我们见了不少这样代表在北京，把手捆起来，受了伤，这样的人不少嘛！我们亲自见了的！这种作法，甚至有的被打得神经错乱了。这都不对嘛。可能现在还有个别地方没有放完，还要清查。军区支持了内蒙古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乌兰夫的代理人王逸伦等人（就包括王铎了），这些都是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拿枪杆子执行反动路线，多危险嘛！全国第一个从军区里打出枪来的是内蒙古军区。中央看到，立刻打了电报去了。当然，电报提出的那个话，左派登在小报上，我们批评他们不要登报，左派很快地承认错误，没有再登了，可以讲道理的嘛！事情是实际，要查清，现在查清了。

至于这一段最后一件事，就是他们操纵了一些保守组织，军区也支持了。我要讲一讲，这个保守组织，可能你们对这个问题还没有看清楚。什么叫保守组织呢？就是本来一些组织，或者学生，或者工人，或者农民，或者机关里头的一些群众的组织，可能这里头大多数主观愿望还是要革命的，可是他的领导人，高级领导人，比如联合起来的组织，什么‘工农兵革命委员会’这样的组织，就是说上层领导人，他就跟王逸伦、王铎常常连在一起了，被他利用，被他操纵了。你们不晓得，他就操纵这些组织。号召这些组织去砸‘三司’，砸那个‘八一八’，把人家抓起来，说他们是反革命，实际上呢，变成了保王逸伦了，保王铎了，保军区的错误了，这不就是保守派吗？！我们不因为你们是保守组织，就认为不能教育了，我们要教育你们，所以你们到北京来，来这么多人，当然有人纵容你们来的，我们先不管，对你们这些人，我们要说清楚，只要你们愿意革命，我们是支持你们革命的

（鼓掌），但是有一条，你们必须跟这些反动的头子，蒙蔽你们的头子要划清界线，应当把你们的头子揪出来（鼓掌）。你们看吧，今天这个会场上，我们得到主席、林副主席命令来召集这样大会，要给你们讲清道理，就有人吹哨子把你们搞走了，欺骗你们么，要把你们和中央隔离起来嘛（鼓掌），你们日夜想念毛主席，我们现在向你们传达毛主席的声音，他都不让你们听（鼓掌），你们想想吹哨子的让你们走的对不对？”

群众答：“不对！”

周恩来：“是嘛，他们少数人就起哄，将来叫你们遭殃，他们在旁边看笑话。……至于保守的组织呢，那还是可以革命嘛，你们只要跟欺骗你们的头子划清界限，你们这个组织还会存在么，我们这个决定上没有说要取缔你们这个组织，只要是群众组织我们不采取取缔的办法（鼓掌），允许你们在行动中改正你们的错误么。”

接着，周恩来又解释第二段：“第二段，内蒙军区党委某些同志，不经中央和中央军委批准，把军区党委书记、副政委吴涛同志打成三反分子，停止他的工作，还擅自逮捕已经站在革命组织方面的自治区党委书记高锦明、权星桓、康修民等同志，并宣布他们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这是严重的政治错误，严重的无组织无纪律行为。”

“在乌兰夫离开自治区党委书记职务以后，我们因为乌兰夫的问题还要继续深入的揭发，所以自治区主席的名义还没有正式取消，当然他不能够做工作了，停止了他的工作，自治区党委就重新改组了，由高锦明同志来负责。这个时候王逸伦、王铎这些

人就把高锦明说成是乌兰夫分子，这也是捏造。因为事实证明在去年华北局揭发乌兰夫是修正主义分子，资产阶级当权派之前，高锦明同志是在内蒙古做工作的第一个揭发乌兰夫反党的。因为你们都不清楚，所以今天讲清一点，他第一个揭发的嘛。后来在华北局的会议上，他的立场是非常坚定的，跟乌兰夫公开的斗争，这怎么能说他是乌兰夫分子呢？是谁说的呢？就是刚才说的，王逸伦这个叛徒跟王铎这样的修正主义分子造谣诬蔑他的。在揭露乌兰夫的时候，王逸伦躲着就没有来，躲起来，说他病了。王铎跟刘景平两人在会议上跟乌兰夫哭了，兔死狐悲呀！……这次揭发内蒙古的乌兰夫这个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这个三反分子，这件事情是华北局，李雪峰同志一个很大的功劳，消除了我们对北方的边防，面对着苏修、蒙修的最大的隐患（鼓掌）。这一点，今天给在北京的革命同学来讲一讲有好处，因为你们也不懂得这件事（鼓掌）。

关于权星桓、康修民，他们的态度很明朗。他们开始也是承认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六、七月的时候，是跟着刘邓反动路线走的，但是，党的十一中全会以后，特别是十月工作会议以后，他们逐步认识了错误，他们就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决裂了，自己检讨自己的错误，就站到革命派三司方面。这种态度是好的嘛，我们允许人家改错革命嘛（鼓掌）！而这个时候内蒙古军区党委反而说他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逮捕他们，这是严重的错误。因为他们是自治区党委书记嘛，你这个军区怎么有权捉自治区党委书记，也不报告中央？所以，从军区犯的无组织无纪律行为，在全国来说，除去青海反革命的赵永夫那个特殊的情况以外，

可以说是很严重的错误。所以，刚才军区负责同志，他们承认了这个无组织、无纪律的错误。”

“北京军区派了一位副司令员腾海青同志赶到呼和浩特去，领导这个军区来处理这些事件。但是，情况如何呢？他到了呼和浩特以后，就向军区广大群众宣布了中央这个八条，当时响应他的有军区的肖应棠，也是副司令员吧？作了检讨。可是其他人的态度暧昧得很。因为这样使腾海青同志就很难行使职权，受到反中央八条决议的群众的围攻。……军区的门，过去你们不让人家进嘛，好，现在把军区的门四门大开，不仅军区的军事人员，就是非军事人员也可以出出进进、穿堂若市，根本不可能办公了，使腾海青无法执行职权。所以，现在腾海青同志他的工作地点只能在呼和浩特铁路局，因为那个地方军管了。所以这个情况就说明内蒙古军区的一部分领导人还采取两面的态度。不仅是到北京的人受他们蒙蔽，受他们欺骗，在内蒙古也有一小部分人，是这样的情况。所以我们必须把这个问题跟你们讲清楚，军区机关嘛，中央的命令嘛，等一下子由肖主任讲一讲。事实证明，处理这件事情在军区的领导人中是有些阻力。有些继续搞两面派的态度，我们必须揭穿。中央和军委这个决定必须执行！”

鼓掌声。

周恩来最后说：“这就是我今天要向大家解释的八条决定的精神。（鼓掌）这个决定发表以后，内蒙古就来问了，说这个决定是不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我们副帅林副主席决定的，批准的？后来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全军文化革命小组作了一个回答。我们现在请陈伯达同志讲一讲。”

接着，陈伯达、肖华、康生讲话。

翌日，4 月 28 日，总政治部发出指示，命令内蒙古军区坚决贯彻执行 4 月 13 日《中共中央关于处理内蒙问题的决定》。但是，内蒙古的武斗仍在不断升级。从 4 月下旬到 6 月中，规模越来越大，参加人数越来越多，双方越战越勇，其中不乏军人。

## 第 609 回：争是□武汉“秀才”找到“兵”在北京，怎奈当兵说不清

4 月 27 日，军委扩大会议结束，军委通知陈再道、钟汉华“可以回去了” ，但其他大军区领导全都留在北京参加五一庆祝活动。陈再道认为这是“电话事件”得罪了江青所致。实际上，军队领导五一节在京活动安排是由周恩来、杨成武和肖华议定的。

27 日下午，就是周恩来接见内蒙古代表的当天，他开始约陈再道等人谈话。

第二天，4 月 28 日，武汉“二司”的雷志茂、张范炎、林涛等七八个学生来到北京京西宾馆，要求陈再道接见。他们在接待室，每隔一刻钟打一次电话，问“陈再道同志有没有时间？”“陈再道同志回来了没有？”整整等了一天，直到半夜 24 时左右，参加武汉支左的武汉军区作训部副部长李良，才出来接见他们。李良提出：时间已晚，先把同学们送回住处，明日再来。

同学们不同意，明确表示：“明天上午 10 点，陈再道同志不准时出来接见我们，我们将采取革命行动，把陈再道的罪行用大字报在北京全城公布。”

4 月 29 日一早，雷志茂让另一个同学回去拿录音机，并通知在京的武汉“二司”和其他造反派组织的人都来京西宾馆。他对辩论会提出了三条原则：

1、要坚持录音。

2、要一个问题一个问题辩论清楚，由我主辩，你们其他人

递条子。

3、要把事情闹大，越大越好，让中央文革都知道。

这天上午，正在北京的武汉“二司”、“913”、“新华工”、“新湖大”、“新一冶”、“工总”等造反派头头彭勋、刘传福、王彩珠、雷志茂、曾繁运、曹承义等人突然听说有中央首长在京西宾馆接见他们。于是，他们30多人来到京西宾馆。

上午9时多，陈再道带着参加支左的武汉军区作训部副部长李良等十几个参谋和警卫人员来和武汉造反派见面。等在这里的武汉造反派并不认识陈再道，会议室的门一打开，他们便争先恐后的和陈再道这十几位军人一拥而入，正巧陈再道和雷志茂二人挤在了一起。陈再道抓着雷志茂的衣服，一拉一挤，将雷志茂的扣子拽下来了，俩人也同时进了门。

陈再道可能还没有这样被人挤进过门，很不高兴。但是当他看見雷志茂一脸的麻子，马上就平静了下来。谁都知道，陈再道在武汉被称之为“陈大麻子”，其实他脸上的麻子不细看还不容易看出来。

大家在长条会议桌旁依次坐下后，雷志茂说：

“我们是受武汉革命造反派和广大革命群众委托来北京的。从昨天上午八点钟到这里，等了二十多小时，目的是解决问题，搞好武汉文化大革命。请今天到会的军区同志自我介绍一下，认识认识，……”

这时，进场的军人纷纷说：

“我们都是解放军。”

“你们是战斗队，我们也是战斗队啊！”

……人声嘈杂，主持人赶紧说："好好好，你们不愿介绍算了，我们都是武汉'二司'的，各校都有，我们主要是想促进军民团结，互相了解，交心交底。"

这时，武汉军区有人说："我们下午要到中央军委开会，因此这个会也许只能开半个到一个小时。"

"那不行！……"

"不把问题谈清楚，不能走！"

武汉军区提出的这个要求，当即遭到学生和造反派的反对。

"我还有大问题吗？" 陈再道问。

"武汉地区文化大革命也不小嘛！" 学生回答说。

雷志茂对陈再道说："我们现在是要跟你辩论的。你把我们打成反革命我们都不怕，在北京毛主席身边辩论，你怕什么呢？"

陈再道说："我也不怕。"

雷志茂说："今天辩论的题目就是'到底《二八声明》背后有没有黑手？'"而且说，今天的辩论要录音。

陈再道不同意录音，但是拗不过这些小将，最后也只好同意了。

一个同学站起来："好了，不扯远了，我先谈：第一点，在你们的《严正声明》《公告》以及你们在广播电台、湖北日报上都正式宣布过：《二·八声明》是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精心策划，亲手炮制的。'现在请你们把炮制者交出来。"其潜台词是说：你说《二八声明》是走资派炮制的，那么这个走资派是谁？

会场又有些小的骚乱，有人催促说："快一点，陈再道你谈

一谈。”

陈再道说：“这个问题嘛……你们也找，我们也找嘛！”

学生们岂肯罢休：“你们不是已经下了结论？”

陈再道答：“我现在不讲，没有足够的材料！”

“二司”的一位学生马上反问道：“材料不够？你们当时在《湖北日报》上发表‘《二·八声明》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炮制’的言论时，开动那么多的宣传车，甚至用飞机撒传单，这是人所皆知的嘛，你没有材料就下结论呀？毛主席说过：‘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头。’你结论下了，再来调查，你们这样做不是违反毛泽东思想吗？”

陈再道连连说到：“我们正在核实材料，材料还不够。”

武汉水利电力学院学生、《二·八声明》的起草人雷志茂站起来揭发：“你们在各种宣传机器里下了结论，武汉军区还把我叫去了两次，我要把你们谈的都向中央军委、中央文革汇报，要向全市人民公布。你们的谈话卑鄙肮脏，你们的意图是什么？你们的结论就是下在调查的先头，而不是结尾！”

陈再道说：“我不回答。”

学生们不干，大声喊道：“让陈再道回答！”

陈再道：“炮制者我们将来要找，已经在找……慢慢在找。”他又指指雷志茂表示：“他不是炮制者。”

雷志茂：“我，一个普通学生，贫农出身，共青团员，不是共产党员，更谈不上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如果我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可以抓。”

学生：“毛主席说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

陈再道赶紧表白："我现在不是唯物主义者……"

他晕了，已经慌不择言。当然，这句话立即遭来一片指责之声，学生们纷纷责问陈再道为什么不是唯物主义者？陈再道无奈，只能耍赖："我现在北京开会，你们想怎么样就怎么样，我在首都嘛！"

学生们又将矛头指向支左办公室的李良和刘文治："在座的支左办的李良就说过，《二·八声明》是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炮制的。你们已掌握充分材料，准备拉出来公开斗。3 月 1 日支左办公室人员刘文治在接见我们的头头时也说过，《二·八声明》的炮制者已经抓到手里了，准备在武汉公开斗。3 月 9 日刘文治又讲过这番话。而且你们在各个公共场合都说过。你过去肯定，现在又不交，在玩弄什么手段？"

众人问："你们可以回答这个问题吗？"

一个学生大声说："李良有什么意见可以发表！"

李良："有什么意见可以发表，首长都来了嘛。"

雷志茂："我们认为《二·八声明》不是什么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炮制的，而是革命造反派内一种思潮的反映，而你们偏偏认为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炮制的。你们既然发了这个言，一定有理论根据，事实根据，现在已经过了两个多月了，相信你们一定有足够事实抓出来了吧！这是关系到支左方向问题，这个问题一定要追。现在，我们两个写文章的炮制者在这里。请你们回答！"

陈再道缓过神儿来了，他反问道："你们注意，《二·八声明》是不是符合当时中央社论大团结、大联合的精神？"

“那这是不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炮制的呢？”真是魔高一尺，道高一丈，这些学生真不好惹，他们比陈再道还厉害，不留丝毫的机会。

“王任重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你们可以调查一下，我们在调查、摸底。我们从来没有下过结论，什么时候下结论了？” 陈再道也会耍赖。

“刘文治亲自对我说过《二·八声明》的炮制者就是刘真。二月末还说过，过 3 天就把刘真拉出来斗。而今天你们说从来没这样讲，这不是前言不对后语。说的话，做的事不认账还行。”一个学生穷追不舍。

众声吵杂，学生们纷纷质问：“你们说的话还算不算数？！”

“你们还有人说《二·八声明》炮制者是王任重！究竟是不是？”

陈再道无可奈何，但仍很顽强的坚持着：“我已答复了嘛，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当权派，这个提法有没有错误？”

“这个话连三岁小孩也不会说错，现在问题的实质是，你们说《二·八声明》是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精心策划，亲手炮制的。这是问题的本质，离开这个前提空谈一小撮，离开两条路线的斗争，这就是臭《修养》的观点。其它几个军区到会的人，希望你们挺起腰杆来回答。你们不是说向革命小将学习吗？革命小将就有这种气概，自己说的话敢于负责，敢于承担责任。你们敢吗？”

真不得了，这帮小将不仅上纲上线，还当面搞策反。此地不宜久留，陈再道也想来个三十六计走为上，他说：“啊，时间不

早了，你们要去军委就去，反正你们已来北京了，我是在这里开会嘛！”

学生们看出他想溜，那怎么可能呢？又是一片嚷嚷声：

“想溜？没门！……”

“先回答问题！“

“回答问题！”

陈再道一看走不了了，赶紧说：“我回答，我回答，我没有说是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我是说省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话没有错。”

他又晕了，刚说完的话又推翻了，当然又引来一片抗议和批判之声。

“好！好！好！什么大帽子都行。我们来谈谈《人民日报》社论好吧！”真不亏是大将之才，在这种窘况下居然还能想出偷梁换柱，转移话题的办法。

“离开两条路线，两个阶级的斗争去空谈中央社论精神，这不正是黑《修养》的典型表现吗？”学生们没有上当。

陈再道：“这个是你说的。”

学生：“是，就是我说的，我不怕！”

陈再道：“那就还有什么说的，我还说什么！”

学生：“我们要摆事实、讲道理、靠毛泽东思想，现在不摆事实，不讲道理的恰恰是你陈再道。”

陈再道：“对！就是我。”

学生：“耍什么态度？”

陈再道：“我不是态度不好……”

学生："你敢不敢到中央文革小组见面！"

陈再道："可以嘛，我态度怎样，我又没有发脾气，我答复了，你们还要我讲，"

众人问："答复了什么！"

陈再道说："你逼我答，我答复不到。"

学生："我们再说一遍，武汉军区在你们一系列的正式文件、讲话、《湖北日报》上面，都肯定过《二·八声明》是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精心策划、亲手炮制的，现在我们就是要求你把这个炮制者交出来，我们要斗。"

陈再道："现在问题是有没有《二·八声明》？"

他被学生们缠晕了。许多人同声回答："怎么没有呢？"

陈再道又问："那有没有错误呢？"

众人回答："那怎么没有呢？"

一个学生站起来说："我们说有什么错误，应该教育帮助，使小将成长起来，而你们是要把他们打下去，说它是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炮制的，不容调解。这有本质的区别。两个月了，把炮制者交出来吧？"

陈再道问："要我交出来吗？"

众人答："怎么不要交呢？"

陈再道无可奈何的说："那么以后等我把材料掌握落实了再交给你们，作为一个思想问题，批评是可以的嘛！你们不要再问了。"他实在不想和这些小将再缠下去了。

又是一片吵闹声，有人喊："不要吵，让陈再道讲"

陈再道趁机说："我不讲了，我要开会去了。"

众人喊："不行！欠账是要还的！"

一片沉默。陈再道打破沉默说："我们错了负责嘛！"

学生："我们等了整整两个月了，我们对这个炮制者恨之入骨，坚决把他斗倒，斗臭！今天你们一定要交出这个炮制者，要是不交，就说明你们过去是搞政治迫害，你的大方向是对准革命群众，究竟什么人在搞鬼，到底是谁？"

又是沉默。

"李良同志，你们是否可以提示一下，你们支左的都在这里，陈再道讲不出来，你们给他提示一下嘛！你们讲嘛！你们认为如果不是一小撮，也可以讲嘛！表明自己的态度嘛！" 一个学生打破沉默。

陈再道："我们是根据中央打倒无政府主义，斗争最大的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在这个斗争的基础上，打倒刘少奇，邓小平，慢慢实现三结合，再夺权，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彻底胜利。"

其实，陈再道对中央的这一精神的理解是没有错误的，问题是如何把握和执行？太难了。

学生继续说："炮制者要是交不出来，这些问题就谈不上。党中央号召说大大小小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都要斗，我们是斗定了。现在有一小撮炮制《二·八声明》，那还不斗？"

陈再道："把炮制者斗倒斗臭我们是不主张的，作为思潮，批判一下是必要的，……"他又抓住了小将们的漏洞。

"那你交出来！"学生穷追不舍。

"我们说了我们的材料不够嘛！调查研究还不够嘛！"陈再

道接着回答。

学生："根据你们正式文件办事。李良同志，你说他这样有无诚意？"

李良不回答。学生接着说："回答问题，你不是很会说话的吗，'精心策划，亲手炮制'如何理解，怎么亲手，是谁？你们当时是把炮制者当作敌我矛盾来搞的，反革命宣言书嘛，你们正式文件不是提得很清楚吗？"

陈再道："我们没有说揪！"

学生："那你们的正式文件是怎么写的？"

陈再道："是根据这个思潮和当时中央文件精神来写的。"

众人问："那一小撮呢？"

"那一小撮当然是有的。"

"是不是炮制者？"

"我先声明一个问题……"陈再道边说边看表，学生们说："用不着看表，看表有什么用，耽误了时间你自己负责。这个问题一定要回答，要一直追下去。"

陈再道："我们来这里开会，你们这样态度！"

雷志茂："好！同志们，陈再道现在对我们提出的问题作了两个答复，一个：一小撮总是有的，没有错；一个是：材料未搞清楚，未掌握还要继续调查。但前两个月就下了结论，支左的刘文治两个月前就叫我去了的，还点了名的，你们玩了什么手法点了谁的名，怎样上纲，你们心里明白。你们当时一再要我上纲，罪名强加在革命小将头上，这是严重的政治陷害案。"

陈再道："作了结论就算了嘛！我们已经回答了。"

雷志茂：“你，武汉军区司令员在这里，我们、‘二司’两个《二·八声明》炮制者也在这里，而你偏要说是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炮制的，你有你们的炮制者，我们有我们的炮制者，你们的要交出来。”

## 第 610 回：□应对，□再道晕头转向 态度硬，贵州省再现两派

陈再道："我们有了错误一定改正。"

学生："你这是改正错误的态度吗？共产党员，每句话，每件事，都要向人民负责。你们说《二·八声明》是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精心策划，亲手炮制的，话讲了，文件发了，把我们当反革命打了，改正，就是要交出炮制者！交不出，就是要认错！这就是向人民负责。没有的东西硬要说有，怎么行？"真是得理不让人哪。

陈再道："我们认为《二·八声明》搞分裂，这种思潮要批判一下。"

学生："当时你们不是批判《二·八声明》，而是把矛头指向群众。"

陈再道："那是你们以为，我有错误，改正嘛。"

学生："你有罪！"

陈再道："犯罪？我有罪向中央文革检讨，我没认识这一点，"人们又嚷嚷起来。

李良："已 11 点多了，军委会议都有安排，一个一个活动，我们还接见。同志们来了，我们接见一下，"

众打断："不是接见。"

陈再道："好，好，是来谈问题！"

李良："你们有什么问题提出来，有些问题还要研究，你们调查，我们也要调查。"

学生："李良！从昨天到今天等了 20 多小时，你们没有诚意，昨晚你们说了，不是接见，是辩论。《二·八声明》是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炮制的，我们就要斗倒斗臭，这是大方向，你说是不是？你的大方向是矛头对准革命群众，把他们关进监狱。"

学生："你们的监狱关的谁？你们不关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关一些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小将，还戴上脚镣手铐，这是大方向？"

陈再道："我们有缺点改正。向你们学习。"

学生："你这个态度很好，我们也要向你们学习！毛主席教导我们：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我们揪炮制《二·八声明》当权派是揪定了的。希望你们也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掌握斗争大方向，把炮制者交出来，究竟是张三、李四？是王麻子？"

陈再道："你们到北京来干什么？"

学生："我们到北京来是向中央军委、中央文革汇报的，并配合中央军委会议，揪出武汉的谭震林，把《二·八声明》的炮制者斗倒斗臭，把武汉文化大革命搞得更好。这就是我们的目的。"

陈再道："你们不是要揪武汉谭震林吗？要揪就揪嘛。"

学生："现在不是揪不揪的问题，是交不交的问题。"

陈再道："当时思潮要批判一下嘛。"

学生："那时老保都纷纷说，陈司令员说的，《二·八声明》是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炮制的！"

陈再道笑了。学生马上质问："你笑什么？不要耍赖，你不说就靠边站，你耍赖干什么？"

学生："李良，你回答，隐瞒炮制者是谁?究竟拖延时间的是谁？急于揪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是谁？而要打倒党内走资本主义当权派又是谁？你在这个会上看得很清楚!"

陈再道："我们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多少万人一下子投入了这个战线，省委瘫痪了，我们抓支工支农支左军管军训五大任务，我们做了一些工作，发现也有一些缺点错误，你们提的意见都很好，我们接受你们的批评，我们也在改，我们在加强阶级教育，政策教育。"

学生："现在是问你，'《二·八声明》是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精心策划亲手炮制的'这句话错了没有？"

陈再道："有没有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

学生答："有，但《二·八声明》是不是他们炮制的？"

陈再道："我们掌握的材料还不充分，揪不揪以后再看嘛！也没有说揪出来交给你们嘛。"

学生："你们不是说要揪出'二司'头头中的反革命分子吗？这是你亲自对杨道远说的，你有些健忘吧？"

陈再道："我们有多方面工作，还有其它方面，已经答复了，三天三夜讲不完。"

学生："这第一个问题，钉子钉死了，一个一个问题来。"

陈再道无可奈何地说："你们再说我就要走了。"

众："你走？你走不了。"

陈再道："你们该怎么样就怎么样吧。"

会场沸腾。

陈再道："你们今天态度不是商量问题，你们不讲道理嘛！"

众："怎么不讲？问你炮制者是谁你不答复。"

陈再道无奈："是我是我，好不好？"

又是一片吵杂的声音……

陈再道："我们要抓革命促生产。我们有错误我们改，你们不满意，向我们的领导，向中央军委，中央文革讲，我们还有领导嘛！"

会场出现长时间的混乱，众人争相说话。一名学生站起来大声说：

"大家坐好！坐好！把会议开下去。"

学生："如果有确实证据《二·八声明》是刘真搞的，我们马上回去斗刘真，"

陈再道："我没有说嘛！"

学生："我们调查，是不是你陈司令员下的结论。请问，刘真是什么时候看过《二·八声明》的。是不是他炮制的？要说看过的就是炮制者，那看过的人多得很，连你陈再道也看过。"

陈再道："谁说你们不是左派，你们……哈哈"

学生："这个会是个很严肃的会，谁叫你们笑？"

陈再道："不笑，你们不叫笑。我哭。我哭你们又说态度不好，笑又不对……"

众人又嘈杂起来。此时陈再道又说要去开会，有人说："如果是中央军委点名要你去开会，保证让你走。"

有人提议："建议马上打电话和军委联系，证实此事。"

学生："你们专门抓革命小将去坐牢。这就是你们的大方向？"

陈再道："我们都是第一次搞文化大革命，都还要学习嘛。"

学生："现在就是要'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有，就抓出来，没有就承认错误。你是武汉的司令员，堂堂上将；你还有没有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气概？不承认自己的错误还笑。"

陈再道："好嘛！你们骂我我也听着嘛！你们怎么说我都可以。"

学生："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不揪，你对得起革命群众吗？以前革命现在不革命一样要打倒。"

陈再道："那你们就打倒嘛！"

学生："你穿解放军衣服就应干解放军应干的事，中央叫你支左，你干的什么？毛主席叫你实事求是，你怎样做的？"

陈再道："我是有缺点，有错误，抓革命促生产，支工、支农、搞军训、搞军管，一下子几万人上去了，文化大革命是新的，理解不够嘛！犯这样那样的缺点错误，和革命群众商量不够，有些地方有些包办代替，现在要改嘛！回武汉以后召回干部好好再搞，接受经验教训改正错误，学习毛著活学活用并衷心希望你们提意见，我们一定接受，并在实际工作中去改……《二·八声明》有错误，作为一种资产阶级思潮，批判一下，责任不在革命小将，在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是他们搞的，至于我们揪不揪，由我们决定，"

众人问："那么是谁呢？"

陈再道："对解放军有什么意见可以提，我们真正有错误我

们也改。”

众人说：“你的结论就下错了嘛！”

学生：“现在有一个紧急信，说明今天军委根本没有通知他去开会。简直胡说八道！我们可以念一下……”

学生念信，大意是：“武汉二司革命同学们。武汉军区陈再道参加中央军委召开的会议，现会议已结束，陈再道要立即回去传达贯彻林副统帅指示，即将离汉，你们对武汉支左工作有意见，可向中央文革、全军文革反映，也可回武汉地区向军区领导提出，商量解决。希在北京不要再找陈再道辩论。中央军委办公厅，四月二十八日”上面还盖着公章。

念完信，学生说：“我们从上午 10 点起开会，从昨天开始已等了 24 小时，陈再道说下午有会，实际上中央军委说会议已经结束，这封信充分揭露了他的谎言，他欺骗了革命小将，但是我们还是按上级指示办事，不再留他。”

陈再道：“我们响应毛主席伟大号召，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进入到大联合，三结合夺权的关键时刻介入了运动，支工、支农、支左、军训、军管，抓革命促生产，我们响应毛主席伟大号召，立即行动几万人上去了，到学校、到农村，作了些工作，因为对运动意义认识理解不够，工作中产生了问题，我们毛主席思想学的不够，铺开了，同志们到学校、工厂，犯了这样那样的错误是有的，民主作风不好，与革命群众商量不够，有的是当先生，而不是很好向革命群众学习，下面同志又有包办代替，甚至有的感情与革命群众有抵触情绪，不同群众商量，有些事情没有搞清楚，如这一派，那一派，有些派别，如像有的为老保组织说

了话，有的干部认为保守组织听话一些，于是模糊了一些界线，所以犯下了一些错误，现在要把干部的一半收回，好好训练半个月，再下去把作风改变，把运动伟大意义学一学，总结过去经验教训，对运动中缺点错误，你们提意见，批判、都可以，我们诚恳的听取接受而且在行动上改正……，犯错误，我们要负责，今天你们等久了，昨天我们确实找干部谈了话，还有河南问题，你们等久了……有什么问题，我负责任。”

雷志茂：“陈再道他们马上回武汉，应该按照毛主席林副主席指示办事，不许再两面三刀，从今天的会议看，你态度不好，回武汉后要按主席路线办事，武汉地区学生运动是瓦解不了的，谁想压制革命群众运动是压不下去的。”

会议至此基本结束。

就在陈再道、钟汉华在北京被武汉造反派缠得头昏脑胀的时候，4月28日那天，武汉又发生了“三司”与“二司”、“三新”争斗王任重的冲突。那天下午，“三司”、“省司”、“省人司”在武昌体育场召开批斗王任重大会，“新湖大”和“二司”冲了“三司”的会场，抢走王任重。由于那天是解放军负责保护“三司”的会场，因此，“二司”、“三新”与解放军也发生了冲突。

4 月 28 日，武汉“工人总部电信分部”的大旗重新插在武汉市电信大楼上。

4 月 28 日，《人民日报》提前转载将于 5 月 8 日出版的《红旗》杂志社论：《热烈响应拥军爱民的号召》。社论用黑体字引用毛泽东的一段话：“要相信和依靠群众，相信和依靠人民解放军，相信和依靠干部的大多数。”

4 月 29 日，中央军委常委粟裕在军事科学院对全体人员讲话时说：

“同志们要我回答条子上的问题，主要是外面贴的大字报问题。有些军区出了些问题，青海是反革命政变，性质不同；四川是下面搞的，下面提出镇反；其它军区如内蒙古、河南、湖北等军区都有镇压群众的事件，都是各军区自己搞的，没有请示军委。当然军委作为领导也有责任，我作为军委常委也有责任。”

这段讲话可以清楚地反映出当时各大军区支左后所面临的窘境和全国的形势，也是中央对武汉军区支左工作的一个评价，但是，陈再道和武汉军区及支左部队坚持不给“工总”翻案，不承认在支左问题上犯了方向性错误。他们说：“‘工总’翻案，除非公鸡下蛋！”

4 月 29 日，武汉武装部支持成立的“红武兵”，在武汉市硚口棉织厂贴标语时，覆盖了“二司”组织张贴的“支持广大战斗队员起来革命”和“揪出武汉谭震林”等称语，遭到工厂内造反派工人的反对和指责。那个时候，满街都是大字报，新的大字报盖在旧的大字报上本来是很正常的事情，但是由于两派的观点对立，也经常因此引起两派组织的摩擦。这次引发的激烈争吵终于演变成为武斗，双方大打出手。

棉织厂的“新派”赶紧向外求援。“二司”组织的头头闻讯紧急调动人马，就近联络本派其他造反组织的人员，赶到硚口棉织厂支援。“红武兵”因人少势弱而节节败退，最后退到棉织厂内楼房内据守。双方用玻璃瓶和砖头、石块，进行了长时间互斗。当场受伤 26 人，重伤 9 人。造成轰动武汉三镇的“4．29 武棉

流血事件”。事后，造反派还要“红武兵”请罪。

4 月 15 日，应邀参加北京革委会成立大会的贵州革委会主任李再含从北京打电话给贵州省革委在家常委，对贵州冲击红代会出现的“四一一”组织做出指示：“‘四一一’是以走资派为核心、牛鬼蛇神为基础、保守派为外围的，与‘四一一’斗争是路线斗争。目前这场斗争，是左右派的较量。冲红代会的头头，请调查清楚，提出一个逮捕名单。”

4 月 17 日，恢复开会的贵州省红代会第四次被冲。

4 月 18 日，贵州省公安厅“1.13”总队以“贵医 2．26 是冲红代会黑后台”的罪名，拘留了贵阳医学院教师李吉杰。

省红代会在 4 月 20 日宣布结束，产生了 45 名委员，成立了由 9 人组成的常设委员会，但都是从红代会的支持者中选出来的，要求暂时休会的代表被完全排斥在外。

从 4 月 24 日至 5 月上旬，红卫兵代表们多次冲击省公安厅，要求释放李吉杰。省公安厅指责来访者 “冲击机要室”、“抢走机密材料”等。

李再含 4 月 27 日在北京接见了“四一一”观点的赴京代表。听了汇报后，李再含表示回来要调查处理，并说“红代会看来分两步走比较好，先开贵阳市红代会、再开全省红代会比较合适，因为有些县夺权没有搞，情况难掌握。”

但是 28 日，贵阳地区“支红派”217 个组织联名发表“形势分析”，动员一切力量围剿“四一一”，并由省总指挥部出面召开群众大会，公开提出“‘四一一’是反革命逆流”。贵阳地区“支红派”形成并扩散到全省。

## 第 611 回：说文□，春桥、文元到山东 下文件，福建的《十点意见》

4月29日，毛泽东在中央常委、文革小组和政治局会议上说：

“（三结合）要有群众参加。我们一定不要脱离群众，不能脱离群众是一条；另外一条就是不能脱离马列主义。”

“18年了，我们脱离了群众。49年、50年、51年这三年当中，群众是拥护我们的，是尊重我们的，因为当时是艰苦朴素的，那个时候干部吃住很简单，吃小米，住帐篷。当时刚打完仗，还有饱满的革命热情，和群众有密切的联系。1952年以后情况就发生了一定的变化，我们干部在群众当中开始受冷落。当时，在干部当中实行了薪金制，军队住了营房，机关盖了高楼大厦。过去和群众在一起吃、穿、住，现在有些脱离群众了。为什么会这样？就是没有听我的话。刘少奇、高岗、彭德怀学习了苏联那一套。薪金制我是不赞成的。学苏联那一套我也是不赞成的。52年以后群众对我们冷淡了，过去党团员受到《修养》的影响脱离了群众，没有独立的意见，成了驯服工具。各地群众不赞成过早地恢复党团组织，过半年或一年以后再恢复。文化大革命不仅是对干部，而且也是对党团员的大审查。通过审查，大多数一定是好的。有的干部，群众意见较大，可过2、3年以后再说工作，有些干部可以立即恢复工作。52年以后我们党脱离了群众，群众不欢迎了，我们这次文化大革命要把它改变过来。搞薪金制，搞军衔我从来就反对。”

“我们现在要搞三结合，要使青年参加各方面的领导工作。

不要看不起青年人，二十几岁，三十几岁都可以接受他们做事情，不把新一代搞上来怎么使他们受到锻炼？这个三结合就是老、中、小，就是二十岁以上就行了。”

“我们提倡青年人上台，有人说青年人没有经验，上台就有经验了。过去也提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那是从形式上讲的，现在要落实在组织上。”

“三结合，老、中、小要三结合，不主张把老干部都打倒，老干部一天天见上帝了。对于犯错误的人，要给改正的机会。‘联动’要放出来，没有右派就没有左派。”

“国家机关的改革最根本的一条就是联系群众，机构改革要适合联系群众，不要搞官僚机构。”

这次会议，林彪也参加了。毛泽东还针对济南军区给中央的电报，要求中央能派人解决山东问题一事，提出派张春桥、姚文元去山东。

毛泽东说：“你们到济南后就住在部队，住在济南军区，主要的是要帮助一下部队同志。”

按照毛泽东的指示，4 月 30 日，张春桥、姚文元来到济南。他们传达毛泽东的指示：“相信王效禹不做蠢事。”并说：“要做各方面的工作”，“正确解决山东问题。”张春桥多次对王效禹说“你有力量我就支持你”。

在安排活动日程时，确定张春桥重点做支左解放军的工作，姚文元重点做两派群众的工作。

此时，济南驻军对王效禹的意见已很强烈。4 月 30 日，刘伯承请叶剑英向毛泽东、林彪转报一封写于 4 月 29 日，署名为“济

南军区机关全体革命群众、济南驻军全体支左工作人员”的来信。

刘伯承在请叶剑英等转报这封信时写道：“昨廿九日晚廿时，一自称是济南军区装甲兵政治部的来人说，此刻我们的部队正受到王效禹的红卫兵攻打，形势非常紧张，要我们迅速离开济南，同时要我给毛主席、林副主席转交一封信等情况。”

那封署名“济南军区机关全体革命群众、济南驻军全体支左工作人员”的来信中说：

“目前济南反对解放军的大风已经刮到 12 级了，我们天天挨骂，任人逮捕、扣压，干部家属也被殴打、辱骂，军区的干部子弟也天天挨打。我们支持的工厂、企业单位，都一个个被砸了。革命的群众已处在少见的白色恐怖之中。我们难以相信，这是左派夺权之后发生的事情。从他们夺权以来的一系列情况说明，他们不是在按毛主席指示办事，而是按什么‘王效禹思想’办事。也许是我们解放军未跟着他们那样做，他们就怀恨在心，欺骗中央，掀起了这股反对解放军的大风。我们不禁要问：他们还要不要解放军，要不要工人阶级，要不要贫下中农，要不要广大党团员？这到底是在对谁专政，是谁在专政？”

根据国务院、中央军委的批示，4月28日，福州军区对《福建日报》社和福建人民广播电台实行军事管制。

4月30日，周恩来、江青、陈伯达接见福建代表，福州军区司令员韩先楚参加接见。

周恩来首先请江青讲话。江青说：“你们留在北京过五一节，祝你们好！祝你们节日好！”

接着，周恩来宣布了中央关于福建问题的十点意见：

1、这次会议听取了福建群众代表的意见，解决了一系列问题。

2、福建处在反对美蒋的最前线，不要忘记海峡对面的敌人，这是福建军民面临的一个更迫切的任务。

3、福建的群众在文化大革命中揭露、批判了以叶飞为代表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现在福建的革命派应把矛头对准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大批判中实现革命的大联合，要民爱军，军爱民，为实现革命的三结合创造条件。中央肯定福建群众在揭批叶飞的斗争中取得的成绩。

4、“一二六”事件和“二七”事件不能作为划分革命，反革命的分水岭，也不能作为划分造反派和保守派的标准。把“一二六”、“二七”事件看得太严重是不对的，被逮捕的人应立即释放，其中确有个别反革命分子待查明后除外，被打成反革命的组织一律平反。最近韩先楚表示把“一二六”事件，“二七”事件当成唯一的标准是不妥当的，表示要采取措施，中央认为韩先楚同志这个态度是好的，革命群众应当拥护韩先楚同志这个行动，这个态度。

5、各革命组织间有不同意见是正常现象，中央认为应通过协商和联席会议来解决，解决不了可暂时留下来，先解决可能解决的问题，决不能采取粗暴的方法对不同意见的组织进行围攻，不许武斗。

6、各革命组织间不要只看别人的短处，不看自己的短处，只看自己的长处，不看别人的长处，要进行自我批评，克服私字，

要大反无政府主义，唯我独尊的错误思想，实现革命的大联合。

7、对解放军负责人有意见可提，送大字报，派代表都可以，但不要冲军区，冲是无益的，是不对的。但对“一二六”事件不要追究，这讲了过去也讲了未来。不要组织群众冲军区，开大会，什么万炮齐轰，并不是不可炮轰，而是要注意方法，这与北京不太一样，在北京轰我两下也没关系，反正是空炮嘛！福建对面就是台湾，消息很快就传过去，如果军队失去人民信任就不好了。

8、福建有个别干部如林白强调所谓老区人民，应把农民群众与林白分开，广大农民进城是受蒙蔽的，随进城的干部应向农民群众道歉，因此人武部逮捕大批人是不对的。林白是犯严重错误，煽动农民，经济主义进城。真正的老区是闽西，闽北这次来的大都是沿海的。真正老区来得很少。要用毛泽东思想方法来解决，人武部应主动消除与群众的对立。

9、赴京的群众组织代表，会议结束立即回本地，问题就地解决。

10、鉴于当前福建革命三结合条件不成熟，中央决定宣布在那里实行军管，并责成军管会解决“一二六”后发生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待条件成熟后成立革命的三结合临时权力机构。

周恩来特别指出：“以上十个问题，是经主席研究后作出的决定，做出的组织措施。”

他最后说：“1、姜观的问题是存在的，我们将继续研究，将来还派人去，再把意见提供给军管会。2、北京同学对福建的文化大革命起了很大的作用，我们肯定你们的成绩，但福建的文化大革命已进行了10个月了，福建的同学要有信心嘛！不要再进

行串连了，中央已三令五申了，首都红代会也发表了声明，所以希望你们赶快回去。”

周恩来请韩先楚讲几句。

韩先楚代表福州军区承认了错误，做了检讨。他说：“我们军区在前段时期处理支左问题上有缺点，有错误，使福建文化大革命一度受到影响，使一些造反派革命小将受到某些委曲。中央、中央文革的负责同志花了不少时间亲自处理，十分忙还要来做政治思想工作，这使我们十分不安，在这里我表示完全拥护总理的讲话，坚决贯彻执行中央的十条决定。”

他讲了错误的表现和原因，表示：“我们决心改正错误，跟着毛主席与广大革命群众，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陈伯达说：“我拥护总理代表中央对福建很明确的讲话，拥护韩先楚同志自我检讨的很诚恳的讲话。革命群众同解放军团结起来！抓革命，促生产！一致对敌！毛泽东思想在我们的故乡福建胜利万岁！”

周恩来：“最后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和林副主席委任韩先楚为福建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

周恩来亲自指挥大家唱《大海航行靠舵手》，接见在歌声中结束。

这天，中共中央下发了中发［67］142 号文件：《关于福建问题的决定》。

4 月 30 日，周恩来接见国务院所属各部门群众组织的代表，商量五一劳动节参加天安门广场观礼的名额分配一事。李富春参加了接见。周恩来首先向大家说明他来晚的原因：“五一前夕要

开宴会，来晚了，主要研究发票的问题。”

接着他谈了正在全国开展的夺权的意义及当前夺权的形势，并反复强调只有经过三结合的夺权才行，否则就先军管，作为过渡。他说：

“北京经过 100 天的斗争。向党内最大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斗争已经开始了。从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实行经济新反扑开始，上海就进入夺权斗争的新阶段，这是整个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夺权斗争的继续。因为斗争的深入，过去总是由上而下的多，如 51 年农村的清匪反霸、 52 年工厂的三反五反、 56 年的肃反、 57 年的反右、 59 年的反右倾、 63 年的社教运动都是自上而下，一级一级的调换都不彻底，老的资产阶级反掉了，新的资产阶级又上台了，自去年 5 月份开展起来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是彻底的，是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是由下而上的群众性运动，是举世无双的、无例可循，靠摸索有对有错，错了就改，地方省市领导绝大部分都瘫痪了，虽不都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但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不改，群众通不过。”

“从上海一月夺权到这个月 20 日北京革命委员会成立，只有 6 个省市带三结合的性质。曾经试图搞革命三结合，不行，有的发生了问题进行军管，开始有 10 个省市，新疆、云南、浙江、江苏、陕西，后来，发生问题的有青海、内蒙、广东、西藏、安徽，结果都实行军管。但军管是过渡性的，不同于 49 年的军管，那时群众没有发动起来，现在是发动起来了，只是三结合条件不成熟，军管帮助无产阶级革命派，使革命干部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决裂，通过亮相，得到群众同意，进行三结合。还有 12 个没

有解决，刚才听说福建也实行军管。12 个里面正在筹备的还有 5 个，只有天津筹备委员会，是夺权的指挥部，像内蒙一样，其余的 7 个是天津、四川、广西、河南、河北。在北京来说 100 天只有 6 个单位成立革委会，军管是多数，有革委会的下层还有在夺权的，有的经过帮助甚至还有反复，不平衡是难免的。因为没有经验，这是地方的情况。”

“机关、工厂、企业的性质不同一些，特别中央与省市不同，1 月 20 日号召夺权，造反派只领导革命，监督业务。监督业务的情况也不同，有反复。”

“农口子过去搞过三结合被现在的造反派否定了，不是真正的，我准备还找他们谈一次。过去三结合不是真正的，是凑合的。过去要抓业务，当时很需要，造反派监督。造反派如不管，官复原职，就恢复旧秩序了，是资产阶级复辟，非常危险，因此，还不能树立典型。有的出现另一种情形，一个造反派分为几个组织，有的确是保的，有的不是，都是矛头向上。但也争执不下，基本上成功的有外交部，铁道部。外交部联络站我们始终支持，不仅领导了革命，监督生产也有成绩，监督外交业务是不容易。铁道部整整 4 个月保证了铁道运输的稳定，最近发生点问题是特殊情况。”

“下一步怎么走，多数部门都要求军管，不然生产上不去，和下面通不了气，因此，红旗第四期，毛主席加了一段不管是不是需要夺权的单位都要军管。横的三结合，对机关也适用，就是革命群众、革命领导干部，军队三结合，部局处级总有几个可以站出来的，需要一个时间。既抓革命又促生产，革命群众组织参

加领导班子，准备根据这个设想去做，还没有形成文件，要通过对党内最大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批判，实现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革命的三结合。”

“造反派要领导革命，监督业务，要注意团结大多数，反对派也好，要听听不同意见。对外交部联络站一开始我就支持，他们监督业务有成绩，我现在还支持，他们已经百分之六十几了，不仅政治优势，而且是组织上优势。其他百分之三十到四十小组织总有不同意见，政治上要平等对待，也可能势均力敌要听听他们的意见，要允许他们活动，否则搞得不好就容易产生武斗，武斗我不主张。绝不能采取强制的态度要他们取消，要允许他们参加批判，他就会越搞越小，也可能有点波折，他们有所发展，这也好，正确的就吸取嘛！你们也就发展，但不是强制的，要争取他们，除非是很坏的，是右派，那是少数的，绝大多数是人民内部矛盾。”

“批判可用大中小会形式，不要老开大会，批判刘、邓、陶都是背靠背大会，对资产阶级煞威风，长革命派志气是有作用的。要大、中、小结合，各部负责人可在小会上表态，但你们要创造条件，给机会。”

“你们在大批判中如何实行大联合、三结合，有的部可能还要一两个月，总是要条件成熟，过去保守的，要允许人家革命，要欢迎他们站到造反派一边来，我们只能因势利导，要在批判中实现革命大联合，那些领导干部真正可以过关的才能实现革命的三结合。”

“今天去机场迎接由印尼胜利归来的同志，中央四个常委、

中央文革小组都去了，虽然观点不一致，但对敌是一致的，明天天安门又有很多人要上去，民主人士也让去，首先跟你们打个招呼，党内还有左、中、右，这是统战政策，列宁时候也有这种情况，布哈林也在政治局，你以为就中国党是这样啦！上观礼台不行啦。你们可能又要抗议我把保守组织都请来了。我也是讲给他们听的，对敌不能客气，对人民内部要客气，否则还有什么先进、落后，先进了也不要满足，还要再先进，螺旋式上升才是运动规律。要有原则性下的灵活性。”

“观礼台的票是 2000 张， 89 个单位，有少数不去的，我交给你们处理，我就主动了。我对两个部比较熟悉外交部 30 张，联络站只给 20 张， 10 张给办公厅，发给 180 人的其他组织，要是我，只要十几张，把 8 、 9 张分给自由战士，要有容让，你们政治上优势，组织也优势，让不同观点的一道去，这不更好吗！铁道部联络站占 70% ……”

铁道部另一派马上说：“没有……”

两派争起来了。

周恩来问：“卢天成来了吗？”

卢天成答：“来了！”

周恩来：“你说！”

卢天成：“联络站总的人数是多一点。”

周恩来：“好久没去了，情况有些变化了。”

另一派：“他们昨天晚上还在保吕正操。”

周恩来：“造反派取得了领导权的要宽容一点，这是争取多数的开端，要能够团结大多数，这话是主席讲的，我不能按主席

的原话讲，我慎重一点，如果讲错了，贴我的大字报。无产阶级心胸要开阔些，‘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每个造反派都要有这个心胸，夺权斗争才可能一块进行。”

“票的问题本来是国家事务管理局的事，也要我来分。我看，公字要多一点，私字少一些才能分好，夺私字的权嘛！势均力敌的，也要在非原则问题上妥协嘛！”

就这样一个名额分配的会议，一直开到次日深夜 12 时 30 分才散会。周恩来离开会场后又转回来，再三嘱咐说：“如果分不好，宁可都不去，也不能在那里去吵，因为明天有资本主义国家的，有修正主义国家的，要考虑影响，主席也要去。”

## 第 612 回：游泳池，再约见“三老四帅”天安□，毛泽东畅谈文□

4 月 30 日，民族学院“红卫兵总部”就“红代会组织组三月二日决定”发表严正声明，指出“中央民族学院原是首都大专院校一司的核心组成员，是红代会发起单位之一，是红代会的当然成员，从一月二十三日开始一直参加红代会筹备处工作，为实现首都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作出了应有的贡献。红代会筹备处曾两次调查（民院）红卫兵总部的情况，决定（民院）红卫兵总部为红代会正式成员。二月二十二日在红代会成立大会上（民院）红卫兵总部是大会主席团成员之一，……自二月二十二日开始，中央民族学院红卫兵总部就是红代会成员，这是谁也否认不了的。”

声明说：3 月 2 日红代会组织组是在某些人的操纵下，听信保字号组织“恶意捏造的谢副总理所谓‘民院红卫兵总部是保守派组织’的谣言，未经红代会核心组同意就做出‘民院红卫兵总部不予吸收’的决定”，“谢副总理根本没讲过‘民院红卫兵总部是保守组织’,3 月 11 日谢副总理办公室给红代会核心组聂元梓、蒯大富、谭厚兰、韩爱晶等同志的信中明确指出：‘谢副总理表示：他对民族学院的情况根本不了解’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红代会组织组 3 月 2 日……非法决定。”声明“坚信真正的革命造反派一定会支持恢复（民院）红卫兵总部在红代会的合法地位和参加红代会正常活动的权利。”并“强烈要求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依法严惩滥用谢副总理名义制造谣言，对（民院）红卫兵总部进行

政治迫害的罪魁祸首。”

4 月初，周恩来向毛泽东请示工作时，毛泽东曾问道：“几位老帅怎样？”

周恩来汇报说，政治局和中央文革联席会议，已经开过几次了。四位老帅和三位副总理，也都做了深刻的检讨。他们都认识到在怀仁堂的发言是错误的，感到对不起主席，是对这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不理解，认识不清楚，对主席的战略部署跟得不紧等等。

毛泽东表示：他们能认错就好嘛，并没有打倒他们的意思，只是想狠狠地批评他们一顿，让他们改变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不要成为文化大革命的绊脚石……”

4 月 30 日的夜间，毛泽东请周恩来、李富春、陈毅、叶剑英、聂荣臻、徐向前、谭震林、李先念、余秋里、谷牧等人到自己住的游泳池。

当“三老四帅”在周恩来的率领下，一起走进毛泽东书满四壁的会客室时，看见毛泽东微笑着站起来，主动跟他们一一握手。

当握到谭震林时，毛泽东说：“谭老板哪，你的气消了没有？我的气已经消了，你要还有气，今天就痛痛快快再冲我开一炮。咱们订个君子协议，不许骂娘。”

在场的人都轻松地笑了。

“你们身体都好吗?”毛泽东满脸笑容，关切地问道。

“还好!”大家不约而同地点点头说道。

“文武之道，一张一弛。”毛泽东逐个问了几位副总理、军委副主席的情况后说：“今天开个团结会。我们还是要搞团结嘛。”

毛泽东一边抽烟，一边和悦地说道："开始，我不知道什么是'大闹怀仁堂'。后来，我听了几次汇报，才搞清楚了。"

毛泽东说到这里，停顿了一下，接着说："一个大闹京西宾馆，一个大闹怀仁堂。各位会上的发言，是对运动的意见，是发牢骚嘛，这是党内生活许可的。"

这一说，在座的心情顿时轻松了许多。

毛泽东也说得更加轻松了："噢，这些话，是在党的会议上讲的，是阳谋，不是阴谋。"他笑了："以后，大家有意见，可以对我讲嘛！"

"主席啊，我们没办法跟你讲呀。"

陈毅、谭震林等几个直性子脸上露出了许久未有的笑容。他们说着，肚里仍然有不少冤屈。

毛泽东安慰他们："那些天，你们思想不通，过不了关，我心里也着急啊！你们仅仅是对文化大革命不理解，思想上想不通，这也不奇怪。想不通心里就憋着气，就犯了错误。承认错误，检讨了就好嘛！"

"2 月 16 日那次会议之后，"周恩来打圆场说，"他们的心情都很沉重，感到辜负了主席的期望，也想有机会向主席当面检讨。"

"你们不要背包袱哟！"毛泽东说，"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客厅里谈笑风生，一派欢乐的气氛。

周恩来拿出一份亲自拟定的参加"五一"庆祝活动的名单，请毛泽东批准。李富春、叶剑英、陈毅、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谭震林等人的名字都在名单上。而那时，各种节日是政治资

格的“检阅台”。谁能站在天安门城楼上，谁就意味着“没倒”。

毛泽东批了“同意”后，风趣地说，“你们不要背包袱哟，没有你们陪着我上天安门，我不成了光杆司令啦?!”

5月1日，按照惯例，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了盛大的庆祝活动，毛泽东等党和国家的领导都登上了天安门。

毛泽东接见了阿尔巴尼亚军事代表团。他在接见时详细叙述了文化大革命发起过程。他说：

“我在1962年七千人大会上曾讲过：马列主义与修正主义的斗争，胜利还没有分晓，很可能修正主义胜利，我们失败。我们用可能失败提醒人家，有利于促进大家对修正主义的警惕性，有利于防修反修。实际上共产党内的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始终是存在着的，任何人否认都否认不了的。我们是唯物主义者，我们当然不应该去否认它。自这次大会以后，两条路线、两个阶级在我们党内的斗争表现是形‘左’实右与反形‘左’实右；反对阶级斗争存在与强调阶级斗争存在；折衷主义与突出无产阶级政治等等。在这以前适当的文件中也有了论述。

今天，贵国是以军事代表团来了解我国文化大革命的，我首先就这个问题谈谈看法。

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应该从1965年冬姚文元同志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开始，那个时候，我们这个国家在某些部门、某些地方被修正主义把持了。真是水泼不进、针插不进。当时我建议江青组织一下文章批判《海瑞罢官》，但就在这个红色城市无能为力，无奈只好到上海去组织，最后文章写好了，我看了三遍，认为基本上可以让江青拿去发表，我建议再让一些中央领导同志看一下，但江青建议：‘文章就这样发表的好，我看不用叫恩来同志、康生同志看了。’”

这时，林彪插话说：“有人说毛泽东同志就是拉一派打一派，现在中央领导同志凡是在群众中有威信的，全是毛主席事先将文化大革命的底交给他们了，所以他们未犯错误。我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倒是一个不考试的考试，谁能紧跟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谁就是无产阶级革命派。所以我总说对毛泽东思想理解的要

执行，暂时不理解的也要执行。”

毛泽东继续说：“姚文元的文章发表以后，全国大多数的报纸都登载了，但就是北京湖南不登。后来我建议出小册子，也受到抵制，没有行得通。

姚文元的文章不过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信号。这个信号一出来后，遭到了彭真等坚决反对。因为敌人是特别敏感的，这里有一个信号，他那里就有行动。当然我们也必须行动。所以我在中央常委会主持制定了5月16日的通知。这个通知中央已明显的提出了路线问题，也提出了两条路线的问题。当时多数人不同意我的意见，有时只剩下我自己，说我的看法过时了。我只好将我的看法带到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去讨论。通过争论我才得了半数多一点的同意。当时有很多人仍然是不通的。李井泉就不通，刘澜涛也不通。伯达同志找他们谈，他们说：‘我在北京不通，回去仍然不通。’最后我只能让实践去进一步检查自己。”

接着，毛泽东又谈到了文化大革命的发展过程。他说：“八届十一中全会后，重点是在1966年10、11、12月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进行了批判，这是公开挑开了党内的矛盾。由对这一路线的批判，启发了许多革命派的革命激情。这里边革命的知识分子，青年学生起了先锋作用，这是符合革命发展规律的。这里顺便提起一个问题，就是广大工农党团骨干，在批判反动路线过程中受了蒙蔽。我们研究，对受蒙蔽的同志怎样看？我从来认为广大的工农兵是好的，绝大部分党团员是好的。无产阶级各个时期的革命他们全是主力军，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更不能例外。广大工农兵是具体劳动者，自然了解上层的情况少，加上广大党团骨干内

心对党、对党的干部无限热爱，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又都是打着红旗反红旗，所以他们受了蒙蔽，甚至较长一段时间内转不过来，这是有历史因素的。受了蒙蔽改了就好了嘛！随着运动深入发展，他们又成了主力军了。一月风暴就是上海工人搞起来的，随着全国工农兵起来了。广大工农一起来，才较彻底地冲垮了资产阶级那一套，革命的知识分子青年学生不得不退居到从属的地位，不是吗？工人一起来就冲垮了反革命经济主义，夺了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促进了革命的大联合、三结合。这是革命发展规律，民主革命是如此，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也是如此。五四运动是知识分子搞起来的，充分体现了知识分子先知先觉。但真正的北伐长征式的彻底革命就要依靠时代的主人做主力军去完成，靠工农兵完成。工农兵实际上只不过是工农，因为兵只不过是穿军装的工农。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知识分子，广大青年学生搞起来的，但一月风暴夺权，彻底革命就要依靠时代的主人广大工农兵做主力军去完成。知识分子从来就是转变、觉察问题快，但受到本能的限制，缺乏彻底革命性，往往带有投机性。”

毛泽东谈了文化大革命的四个阶段，他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从政策策略上讲，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从姚文元同志文章发表到八届十一中全会，这可算做第一阶段，这主要是发动阶段。八届十一中全会到一月风暴，这算做第二阶段，这主要是扭转方向阶段。自一月风暴夺权大联合三结合，这可算做第三阶段。自戚本禹的《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及《修养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以后，这可算做第四阶段。第三、第四阶段都是夺权问题。第四阶段是在思想上夺修正主义的权，夺资产阶级

的权。所以这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决战的关键阶段，是主题，是正题。本来在一月风暴以后，中央就一再着急大联合的问题。但未得奏效。后来发现这个主观愿望是不符合阶级斗争客观发展规律的，因为各个阶级、各派政治势力都还要顽强地表现自己，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没有任何阻力的泛滥出来了，因此破坏了大联合。大联合捏是捏不成一个大联合的，捏合了还是要分，所以中央现在的态度是只是促，不再捏了，拔苗助长的办法是不成的。这个阶级斗争的规律不以任何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在这个问题上是有很多例子说明的，××市的工代会、红代会，农代会，除了农代会彼此打得好一点外，工代会，红代会，彼此打得都热闹。”

接着，毛泽东谈到了知识分子、学生的问题，他说：“本来想在知识分子中培养一些接班人，现在看来很不理想。在我看来，知识分子包括仍在学校接受教育的青年知识分子，从党内到党外，世界观基本上还是资产阶级的。因为解放十七年来，文化教育是修正主义把持了，所谓资产阶级思想溶化在他们的血液中。所以要革命的知识分子，必须在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关键阶段，很好地改造世界观，否则就走向革命的反面。在这我问大家一个问题，你们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是什么？”

当场有人答道：“是斗争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

毛泽东说：“斗争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是主要任务，绝不是目的，目的是解决世界观问题，挖掉修正主义根子问题。”

他接着说："中央一再强调要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因为世界观是不能强加的，改造思想也必须是外因通过内因去起作用，内因是主要的。世界观不改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怎么能叫胜利呢？世界观不改造，这次出现了2000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下次可能出4000。这次文化大革命代价是很大的。虽然解决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问题，不是一、二次，三、四次文化大革命所能解决的，但这次文化大革命后，起码要巩固它10年。一个世纪内至多搞上它两、三次，所以必须从挖修正主义根子着眼，增强随时防修、反修的能力。在这里我问大家另外一个问题，你们说什么叫做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这次没有人回答了，都在听毛泽东的下文。毛泽东自己回答说："所谓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是这些当权派走了资本主义道路吧！就是说这些人在民主革命时期，对反对三座大山是积极参加的，但到全国解放后，反对资产阶级了，他们就不那么赞成了。打土豪分田地时，他们是积极赞成并参加的，但到全国解放后，农村要实行集体化时，他们就不那么赞成了。他不走社会主义道路，他现在又当权，那可不就叫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吗？就算是老干部遇到新问题吧！这都叫老干部遇到新问题，但具有无产阶级世界观的人，就坚定的走社会主义道路，具有资产阶级世界观的人，就要走资本主义道路。这就叫资产阶级要按照资产阶级世界观改造世界，无产阶级要按照无产阶级世界观改造世界。有人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时，也说这是老干部遇到新问题，但既然叫犯了错误，这就说明你这个老干部资产阶级世界观还未得到彻底改造。大家不是主张灭资兴无

吗？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有很多有利条件，所以资产阶级思想是能够被消灭的，所以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能够被打倒的，资产阶级世界观是能够被改造的，打倒有利于改造。今后老干部会遇到更多的新问题，要想保证坚决走社会主义，就必须在思想上来个彻底的无产阶级革命化。作为革命左派，更应灭资兴无。否则资产阶级思想长期不清理，也要走向事物的反面，你不信吗？我问大家，你们说究竟怎样具体的由社会主义走向共产主义？你仔细考虑过吗？这是一个国家的大事，也是世界的大事。所以今后要不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错误，真正关心国家大事，就要在世界观的改造上狠下功夫。”

毛泽东又谈到了学生，他说：“我说革命小将革命精神很强烈，这很好，但你们现在不能上台，你们现在上台，明天就会被人赶下台。但这话被一位副总理以自己的话说出来了，这很不对。对革命小将是一个培养问题，不应在他们犯有错误的时候，用这话给他们泼冷水。有人说选举很好，很民主，我看选举是个文明字句，我就不承认有真正的选举。我是北京区选我做人民代表的，北京市有几个真正了解我？我认为周恩来当总理，就是中央派的。也有人说中国是酷爱和平的，我看就不那么达到酷爱的程度，我看中国人民还是好斗的。”

他又谈到了干部问题：“对干部必须首先建立一个相信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是好的或比较好的信念，不能离开这个阶级观点。现在这个‘革命无罪，造反有理’就不能乱用。‘革’与‘保’全是有强烈的阶级性的，对革命的领导干部，就是要保，要理直气壮的保，要从错误中把他们解放出来。就是走了资本主义道路，

经过长期教育，改正了错误，还是允许他们革命的。宁左勿右，形左实右，从表面上看来，永远比实事求是更革命些，但永远是我们所不提倡的，这是资产阶级范畴的东西。真正的坏人并不多。在群众中最多百分之五。党团内部只是百分之一至百分之二，顽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只是一小撮。但这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我们必须做主要对象打，因为他们的影响及流毒是很深远巨大的，所以也是我们这次文化大革命的主要任务。群众中的坏人最多只是百分之五，但他们是分散的没有力量的。以百分之五、三千五百万算，如果他们组成一个军队有组织的反我们，那确实是值得我们考虑的问题。但他们分散在各地没有力量，所以不应作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主要对象，但要提高警惕，尤其在斗争的关键阶段，要防止坏人钻空子。所以大联合应有两个前提：一是破私立公，一是必须经过斗争，不经过斗争的大联合是不能奏效的。这次文化大革命的第四个阶段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关键阶段，所以安排大批判的时间应比较长。中央文革还在讨论，有人认为今年年底为宜，有人认为明年五月份为宜，但时间还得服从阶级斗争的规律。”

## 第 613 回：五一节，□袖与民众同庆 □“伟大”，全国各地□欢呼

在天安门城楼上，有人谈到要像写“九评”那样批判刘少奇的《修养》时，毛泽东说：“不要写长文章，两千字就够了，不要超过三千。”

他说：“我们今天是老、中、小相结合的大会。”说着，他将头转向朱德说：“我们都是七、八十岁的老人了，中年的四、五十岁了，广场上是小将。今天的大会是个大联合。”

他对董必武說：“检讨干部的時候，必須是全面的、历史的。今天除刘、邓、陶之外，其他的都来了。各省第一书记都要回去，还是要做工作。江华、江渭清、谭启龙不是三反分子。陈丕显思想上，作风上蜕化，应很好改造。廖承志过关了没有？应让他过关。王震不是三反分子，是个粗人，建议谭震林同志去拜访他。余秋里说了错話，谷牧 36 年被捕过，比较困难一些。”

“地质学院的一些红卫兵对老帅的一些历史一点也不懂。有人找我摸底，我说：‘所有老帅统统打倒怎么办？你们来做行吗？’打倒谭震林，今天还不是在这里开会吗？徐向前主持全军文革……”

徐向前说：“我身体不好，请肖华代替我工作。”

毛泽东：“还是你搞吧！”

“邓和刘有区别，邓历史上闹独立王国，不理我，在中央书记处还临阵脱逃，以后反王明路线是我一派的。”

“刘少奇25年被捕过，后来被人保出来了，住在北京。刘少

奇一条路线，一个理论，一个班子。6人小组，谣言很多，完全是造谣。”

“‘联动’大部分是好的，少数不好，有什么要紧啦！全都让他们承认错误就行了，他们不是承认了错误吗？不是改得很快吗？”

毛泽东从休息厅出来，老远看见王震，喊了一声：“王胡子！我很久没有见到你了！”

王震听到以后，迅速走上前去，毛泽东高兴地和他长时间握手，用乡音浓重的湖南话说：“王震，有人要打倒你。能打倒吗？是打不倒的吧。老干部也不能都打倒。对那些要打倒你的人要采取宽大态度，要宽大嘛！要实行宽大政策嘛！”

王震说：“我遵照主席的教导。”

王震在天安门城楼上和地院“东方红”的王大宾聊天，正好毛泽东和周恩来经过这里，毛泽东又说：“王震同志是好同志，打不倒的。”

王大宾回到地院，立即将毛泽东的话告诉了农口的农大、农机、林学院三所大学的战友。第二天，许多红卫兵小报都刊登了毛泽东关于王震“打不倒”的“最高指示”。王震的处境也因为毛泽东的这段话而有所好转。

在天安门城楼上，杨成武和许世友见到蒯大富和韩爱晶，杨成武对他二人介绍说：“这是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同志。”

许世友啪的一个立正，给蒯大富和韩爱晶敬礼。蒯大富和韩爱晶吓了一跳，蒯大富赶紧说：“许司令员，我们知道您。您可是身经百战、忠于毛主席的老将军了。”

许世友说："蒯司令，我是你们的士兵啊……"

这是 1967 年 5 月 1 日在天安门上，毛泽东与北京中学红代会几位代表在谈话。栏杆上右数第三人为李冬民。毛泽东对李冬民说："你的兵多得很哪!"李冬民赶紧诚惶诚恐地对他老人家说："我们都是您的兵!"

栏杆上右数第一人是蒯大富。周恩来手指蒯大富，对毛泽东笑着介绍："这就是蒯大富!"

在众人的热烈掌声中，毛泽东伸出右手，亲切地握住那个体态精瘦的大学生的手，微笑地说："你就是蒯大富呀!"

蒯大富一时激动得满眼热泪，手直发抖，竟至如痴如呆。

身为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常委的蒯大富把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的袖章献给了毛泽东。

5 月 1 日，时任解放军报社党委副书记、副总编、《人民日报》代理总编辑的唐平铸也在天安门城楼上。林彪看见他，对他说："陈医生的信我看到了。"

原来，唐平铸受《解放军报》"113 事件"的牵连，也在 1 月 17 日，被人民日报社的群众组织关押。唐平铸的妻子陈友孟分

别给周恩来、林彪、肖华、她早年认识的江青和中央办公厅写信，均无音讯。陈友孟曾在延安抗大学习，当时林彪是校长。陈友孟是医生，后来在延安女大任卫生科长，叶群是该校干部科长。于是，2 月中旬，唐平铸的儿子唐亚明搀扶着母亲陈友孟来到毛家湾找林彪，恰巧林彪出去“转车”，不在，叶群在家。她和陈友孟握手寒暄了几句，听了陈友孟述说的情况后，收下了她带来的信。

2 月 27 日，唐平铸被释放，恢复了在《人民日报》的工作。

这天，还组织群众到中山公园游园，在劳动人民文化宫参加联欢。毛泽东提出，要和群众一起游园。中午时分，他和林彪站在吉普车上，开进了中山公园。游园的群众兴奋异常，喊着：“毛主席来了！”“毛主席万岁！”

林彪挥动着《毛主席语录》，毛泽东挥手向群众致意。

北京吉普车出了中山公园，又驶向劳动人民文化宫。

劳动人民文化宫，一些临时搭建的舞台上，各单位正在演着

各种各样的节目。中午 12 时左右，毛泽东和林彪乘坐的北京吉普从劳动人民文化宫的旁门开了进来，顿时响起一片欢呼声。“啊，是毛主席乘着吉普车来到了联欢的人民群众中间了！”人们纷纷往甬道边上跑去。

这是 1967 年 5 月 1 日中央领导人参加中山公园游园会受阻后，到故宫警卫连连部休息时的合影，从左至右分别为江青秘书阎长贵、毛泽东警卫员王宇清、江青护士许春华、江青服务员张素兰、陈伯达秘书王保春、毛泽东护士长吴旭君、叶群、江青、林彪、毛泽东保健医生李志绥、毛泽东秘书徐业夫、江青警卫员孙占龙。

五一节的晚上，要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盛大的焰火晚会。下午 15 时，北京各学校参加焰火晚会的队伍就准时到达长安街南池子南口，一直等到晚上才陆续进入天安门广场的指定地点。几个解放军，两人一组，每人拿着一个探雷器像织布机的梭子在空旷无人的马路上南北来回地扫雷。

一会儿，路边的扩音器响起了热情优美的歌声，是张振富和耿莲凤演唱的男女声二重唱：

毛主席呀

您是灿烂的太阳 我们像葵花

在您的阳光下幸福地开放

您是光辉的北斗

我们是群星

紧紧地围绕在您的身旁

您的思想是春天的雨露

我们在您的哺育下茁壮地成长

您亲手点燃的文化大革命的烈火

把我们百炼成钢

我们千遍欢呼万遍歌唱

祝福毛主席万寿无疆

万寿无疆 万寿无疆

祝福毛主席万寿无疆

天渐渐地黑下来了，进入天安门广场的各个学校都拉个大大的圆圈，一个圈连一个圈把天安门广场占的满满当当的。随队带去的大鼓、小鼓、镲和号派不上用场了，堆放在大圈的中央，同学们随着广场广播的乐曲跳着拉圈舞，每个学校都是如此，天安门广场成了歌舞的海洋，人们跳着、唱着。

不知过了多长时间，突然，有序跳舞的人群一哄而散，一股人流冲向广场的西北、也就是人大会堂的东北角，人们不顾一切向那边跑去，有人踩踏着堆在地上的大鼓、小鼓……霎时间，周围的广场空了，只看着奔向西北方向的人群又向南移动，远远地可以看到在人民大会堂的东边有一辆移动的敞篷车上面站着一

个人，“是毛主席！”人群追随着涌上去了。

原来，毛泽东又来到了广场联欢的人群中。当时，广场戒严了，许多人聚集在人民大会堂西侧的路上观看礼花。突然人群骚动，还没明白怎么回事，有人就被推到在地。一队解放军正在开辟通道，只见一辆敞篷车开过来了。

“毛主席！”人们同时喊出来。毛泽东和林彪乘坐的车开过来了，只见站在汽车右侧的毛泽东正在挥手，他看见有人跌倒在地，回过头，弯下腰，用双手示意他们站起来。

乘坐在第二辆车上的周恩来正好过来，他也在示意摔倒的人起来。

此时一看广场的地上一片狼藉，遗弃了一些被踩掉的鞋、纸屑纸花、左一堆右一堆被踩坏的破鼓烂号，还有被挤掉的毛主席像章……

十几分钟后，人们逐渐回归到自己的位置，激动地议论着“毛主席出来了！”“毛主席来到天安门广场！”

当晚，毛泽东看见聂元梓，握着她的手连连说：“新北大，新北大！”

聂元梓激动地回答说：“是您的新北大！是您的新北大！”

此时，周围已是掌声雷动，欢呼雀跃。“毛主席万岁！万万岁！”“新北大是毛主席的新北大！”“新北大无产阶级永远忠于毛主席，永远跟毛主席干革命！”等口号声响彻夜空。

这天晚上，毛泽东对陈毅说：“我保你。”

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小组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了北京、上海和山西的革命委员会领导成员。

周恩来在与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成员座谈时，关切地向蒯大富问起："你们的革委会什么时候成立？"

蒯大富答道："大约在 5 月底成立。"

周恩来答应蒯大富说："等你们成立革委会时，我去参加。我们准备很快派军代表到你们学校去搞三结合试点。这件事我已经和肖华同志讲过了。"

蒯大富回清华后把上述消息传给大家，一时间"兵团"上下喜悦有加，出现了"毛主席关心咱井冈山人""毛主席给咱井冈山人撑腰，咱井冈山人为毛主席争气"等大标语。

毛泽东见了陈永贵，很高兴地伸出手去，握着陈永贵的手说："永贵好，永贵好。"

陈永贵回答说："大寨人问你老人家身体好！"

然后，大家又在一起照了像。

在天安门上，山西代表团的中学生李金渭看见一人长得很像袁振，就问他是哪里人，在哪里工作。那人说是山东人，是《大众日报》的记者。李金渭说："我们山西革命委员会副主任袁振长的很像你。"

没想到那人回答说："我就是袁振的弟弟。"

李金渭一下感到和他的距离近了许多，就拉上他先后找张春桥、姚文元、王力、关锋，向他们讲了山西省的情况，特别是袁振的问题。他们都认为袁振在华北局向山西省委做检查不能说是叛徒，尤其是王力和关锋，认为袁振年轻有为，懂工业，现在负责山西省的工农业生产，要支持他工作。当天晚上，李金渭把同中央文革小组张春桥、姚文元、王力、关锋讲话的情况电话告诉

了袁振。

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还接见了上海市革委会代表团成员，并一起合影留念。上海市代表团成员、上海市“工总司”代表王秀珍向毛泽东敬献“一月革命胜利万岁”纪念章。这是“工总司”为庆祝成立半周年，特制的一批长方形纪念章。

毛泽东接过纪念章，说：“给我这么多啊，谢谢，谢谢！”同王秀珍地握了手。

王秀珍激动地说：“祝毛主席万寿无疆！”

尔后，王秀珍又把“一月革命胜利万岁”纪念章献给林彪，林彪说：“这是‘一月革命’的纪念章啊！”

王秀珍答：“都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对我们的支持。”

林彪说：“谢谢！”并同王秀珍握手。

王秀珍同样激动的说“祝林副主席万寿无疆！”

林彪赶紧说：“不敢当，不敢当。”再次和王秀珍握手。

毛泽东等人在天安门城楼上分别和北京、上海、山西革命委员会全体成员合影留念。

5 月 1 日晚，在天安门城楼上，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与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全体成员合影。

这天晚上，北京的聂元梓、蒯大富、谭厚兰、韩爱晶、王大宾 5 人被安排与江青、关锋、戚本禹坐在一起。江青向他们介绍了与她同来的小说《欧阳海之歌》的作者金敬迈。见到王大宾，江青将自己戴的毛主席像章摘下来，亲自给王大宾戴上，还抓起桌上的大把糖果放进他们的口袋里。

江青和他们谈到文艺革命时，讲了八个样板戏创作的艰难过程。她说，她只起了一个引头的作用，全靠大家的心血和努力，才搞出了八个革命性、思想性、艺术性高度统一的样板戏。江青说："将来我们就是被打倒了，八个样板戏都是打不倒的。"

22 时 35 分，在天安门城楼上，江青向毛泽东、林彪引见了科委的张本，周恩来也在座。江青向毛泽东、林彪介绍说："这是国家科委张本同志，他们把韩光一伙打倒了，他们那里的运动搞的不错。"

张本激动地说："祝毛主席万寿无疆！"

毛泽东说："应该祝科委同志们万寿无疆！应该祝人民万寿无疆！"他又说："女同志也一样造反嘛！你们把反革命韩光打倒了，你们夺权夺得好。" 接着，又问："你现在担任什么工作？"

张本回答说："在国家科委革命委员会工作。"

毛泽东："是革命委员会主任吧。"

周恩来说："也就是了吧！"

毛泽东向林彪说："她原来是个局长，和群众一起造反！"

周恩来说："他们那里的运动搞得不错"

张本说:"这是毛主席英明领导的结果，是周总理、江青同志对我们关心和支持。"话刚说完，毛泽东点了点头微笑着再一

次和她握手。林彪、周恩来、江青先后和张本握了手后，张本退出了大厅。

当晚，毛泽东在“五一”节中南海晚会上听到江青介绍京剧一团有人被打的事后，问：“现在还打不打了？”

京剧团的人答：“现在我们都团结一致了。”

毛泽东说：“不打了，好！”

他还问了谭富英一些老演员的情况。

在演唱中，毛泽东问：“现在还有没有反二簧，反西皮？”

演员们问:“在革命现代戏中,反二簧,反西皮可不可以用？”

毛泽东说“我看可以用。”

5 月 1 日的《人民日报》刊登了林彪题写的“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万万岁！”为了庆贺这一题词,全国各地亿万群众争先涌向街头,结队游行,锣鼓喧天，鞭炮齐鸣，通宵达旦地欢呼、庆祝。

1967 年 5 月 1 日《人民日报》林彪四个伟大题词首次发表

东 方 红

大海航行靠舵手

万 岁 毛 主 席

国 际 歌

1967 年 5 月 1 日《人民日报》“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在一起”

5 月 2 日《人民日报》以头版头条的位置称：“我们的副统帅林彪同志为今年‘五一’国际劳动节的题词，最集中的表达出了亿万人民对毛主席无限热爱、无限忠诚、无限信仰、无限崇拜的感情，成为今天整个节日庆祝活动中最响亮的颂歌。”

## 第 614 回：姚登山，毛泽东接见合影 北京市，劳动节中学武斗

1967 年 5 月 1 日，毛泽东在天安门上还接见了中国驻印尼临时代办姚登山。

姚登山是在 1965 年印尼“930 事件”后，作为有武装斗争经验的骨干调到印尼大使馆任临时代办，可以说是临危受命。他到达雅加达后，中国和印尼的关系日益恶化。1966 年 4 月 7 日，中国召回驻印尼大使姚仲明。此时，坚守印尼大使馆的临时代办姚登山，带领全使馆人员，团结一致，与反华的印尼暴徒进行英勇顽强的斗争。

4 月 15 日上午，千余印尼暴徒在 100 多名荷枪实弹的军人和装甲车的协同配合下，用卡车撞开中国驻印尼使馆大门，蜂拥冲进院内，捣毁了门窗、家具和客厅的全部陈列物品，劫走、砸坏汽车。将掠去的所有文件档案和书籍付之一炬，并将贵重物品、私人衣物和部分家具用卡车公开劫走。当他们扯下大使馆的中国国旗，要升起印尼国旗时，大使馆的赵小寿英勇护旗，被暴徒开枪打成重伤。另外 4 名外交官和工作人员也被殴打致伤。

中国政府示向印尼政府提出“最紧急、最强烈”的抗议。

至 1967 年 4 月初，印尼东爪哇的爱国华侨黄健民和雅加达中华侨团总会理事宁祥雨先后被杀害。4 月 20 日，雅加达华侨为宁祥雨老人送葬，表示对印尼政府暴行的愤慨和抗议，遭到印尼大批武装军警袭击，制造了大规模的流血事件，侨胞十多人被打伤。事件发生后，姚登山电话通知印尼外交部长马利克，准备

就上述流血事件向他提出最严重最强烈抗议，但是，马利克避而不见。姚登山在往返途中，一再遭到印尼武装军警和暴徒的无礼拦截。第二天，中国大使馆周围，又出现了大批印尼军警和特务。4 月 22 日，中国驻印尼大使馆即受到印尼数百名军警和暴徒的包围、封锁和袭击。与此同时，印尼开始对雅加达华侨进行大搜捕、大抢劫、大破坏，甚至屠杀无辜华侨。

4 月 23 日，当中国驻雅加达总领事徐仁应印尼外交部亚洲太平洋司司长苏巴佐之约，在下午 17 时 40 分按约定时间乘车前往会见苏巴佐时，一出大使馆门口，竟然遭到印尼武装军人持枪强行登车，用枪口对准他，将他劫持到雅加达的一个军支区司令部。

中国驻印尼大使馆姚登山临时代办和徐仁总领事分别向印尼外交部和军支区头目一再提出抗议。

当天，中国外交部负责人紧急召见印度尼西亚驻华大使馆临时代办巴伦，强烈抗议印尼军警包围、封锁中国驻印尼大使馆，武装劫持中国驻雅加达总领事徐仁的严重事件。

4 月 24 日，徐仁在被印尼武装扣押达 8 小时之后，迫于外交压力，护送徐仁总领事返回了中国大使馆。当天，印尼政府即宣布他和姚登山为“不受欢迎的人”，限期勒令他们离境。

4 月 26 日，中国政府发表声明，最强烈抗议印尼政府粗暴践踏国际关系准则，悍然宣布我国驻印尼大使馆临时代办和驻雅加达总领事为“不受欢迎的人”，丧心病狂地迫害华侨的反华暴行。印尼驻中国代办巴伦和参赞苏玛尔诺也被中国外交部宣布为“不受欢迎的人”。4 月 26 日下午，北京各界群众集会，声讨

印尼政府的反华行径。

从 4 月 24 日起至 4 月 28 日止，北京各大中学校师生、工人、机关干部等各界群众连续前往印尼驻华大使馆进行抗议，示威游行，累计人数超过 60 万人。

中国政府于 4 月 29 日下令驱逐印尼驻中国代办巴伦和新闻参赞苏玛尔诺，以及他们的家属共 12 人。他们于 4 月 29 日当天飞抵广州，准备经香港返国。但他们一下飞机，就被 2500 多名愤怒的广州群众包围。人们挥舞拳头，狂呼“打倒美帝”、“打倒苏修”、“打倒印尼反动派”、“绞死苏哈托”、“绞死纳苏蒂安”等口号，声闻四野，惊天动地。有的群众还向印尼外交人员递交抗议书。

据广东省人委外事办报告当时的情形：

巴伦等离开停机坪后，愤怒的群众即把他们团团围住，最后把他们冲散围成四堆。苏玛尔诺夫妇及其孩子在人群的冲击下，曾跌倒数次，并高声叫喊，神情十分恐慌。另外，发现有个别中学生企图用拳头揍巴伦，但及时被人说服制止。他们被围困约达 40 分钟，始先后上车，但群众仍围住汽车高呼口号，并用标语牌、拳头敲击车身，经过十来分钟，汽车才得缓慢驶离机场。在前往宾馆途中，红卫兵的宣传车一直尾随着，并不断广播谴责印尼反动派的反华排华罪行。

载着印尼外交人员的汽车驶进了羊城宾馆，群众穷追不舍地尾随而至，红卫兵的宣传车把外交人员的车夹在中间，宾馆的汽车也驶过来助威，口号声震耳欲聋。当印尼外交人员拖着疲惫的步履，进入宾馆房间时，一个个筋疲力尽，又饥又渴。

参赞夫人说："是否有饭给我们吃？"翻译告诉她，可以到餐厅去吃。他们要求把饭打到房间里来吃，服务员不同意，他们表示不吃。双方坚持了十来分钟，最后他们还是到餐厅去了。但一进餐厅，又碰到 20 多个服务员和参加广交会的翻译向他们呼喊口号，他们只好狼狈地退回房间。

当晚 22 时 30 分左右，有几十名新归国侨生冲进宾馆，要求斗争巴伦。省人委外事办并没有拒绝，只是向他们交代政策，要求只能文斗，不能武斗。随即由他们派代表进入宾馆，把巴伦和苏玛尔诺揪到宾馆前广场，群情激昂，斗争气氛炽烈，巴伦和苏玛尔诺站在人群中低头不语。

当斗争会正在举行时，又有许多群众蜂拥而至。斗争会开到次日凌晨 2 时许，归侨学生在宣读抗议书后，把巴伦等人放了回去。

但是，在场群众依然不散，坚持要把巴伦等人揪出来继续斗争。外事办的人劝说无效，只好又派人上楼把巴伦从房间拖出来。这时广场上已经聚集了近 500 人，广播车也开进宾馆，不断高呼口号和朗读《毛主席语录》。夜空仿佛燃烧着烈焰，那个晚上，在宾馆内的其他客人，没有一个能够入睡。

最后，群众勒令巴伦低头认罪，绕场一周。巴伦不肯，群众的愤激情绪，再次达到高潮，大家一涌上前，把巴伦推来搡去，一直闹到清晨 6 时许，巴伦的家属下楼准备去火车站时，才放他上车。部分群众还涌上他们坐的大客车，和他们一起去火车站，一路上不断地高呼"打倒苏哈托"、"打倒纳苏蒂安"的口号。两辆宣传车一前一后，押送着这批外交人员和家眷来到火车站。

在火车站门口，巴伦和苏玛尔诺又受到 1000 多名学生的包围，大部分是暨南大学和华侨补习学校的华侨生，他们把巴伦和苏玛尔诺带到场中央，又斗了约一小时。7 时左右，群众才放他们进车站。由于人群拥挤，秩序较难维持。在混乱中，有人用拳头揍了巴伦两下，同时有人朝他脸上丢浆糊。他们上火车后，一些群众的代表还走上火车，要他们站在窗口，直到火车开后才准许他们坐下。为了预防不测事故的发生，广东省外事办临时调来了一些解放军协助维持秩序。

这几个印尼外交人员已经濒临崩溃了，即使在火车开动的一刹那，他们仍不知道自己能否安全逃回印尼。但不论生死，他们再也支持不住了，一个个倒头昏睡，带着歇斯底里的噩梦，向着深圳方向飞驰而去。

4 月 28 日，姚登山和徐仁回到广州，受到广州军区负责人陈德、广州警备区负责人阳震，各有关方面负责人以及各界群众、红卫兵、印尼归国华侨代表的热烈欢迎。姚登山在中国驻印尼大使馆最困难的时间里，不辱使命，因此被称为红色外交家。

30 日下午，新华社电讯称：“毛主席的红色外交战士、被印尼反动政府无理勒令离境的中国驻印度尼西亚大使馆临时代办姚登山和驻雅加达总领事徐仁，今天下午乘飞机回到祖国的首都北京，回到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身边，受到中央负责同志、首都各界革命群众、红卫兵小将、印尼归国华侨代表共七千人的热烈欢迎。”

姚登山、徐仁高举着毛泽东的画像走出机舱，高呼“毛主席万岁！”

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李富春等人和前来迎接的国际友人，到飞机旁，同姚登山、徐仁亲切握手，热烈拥抱。周恩来赞扬姚登山、徐仁说："你们斗争得很好。我们欢迎你们！"这时，机场上欢迎的群众激动地高呼："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

姚登山和徐仁来到欢迎群众面前，人们挥动着《毛主席语录》，不断高呼："热烈欢迎同印尼反动派作了英勇斗争的外交战士！""向英勇斗争的外交人员致敬！""毛主席万岁！万万岁！"等口号。欢迎的人群中，不时有人跑出行列把毛主席像章别在姚登山和徐仁的胸前。

这是姚登山下飞机时在机场举行的"欢迎毛主席的好学生、红色外交家姚登山从印尼凯旋归来"的照片

"五一"节，毛泽东在天安门接见了姚登山，对姚登山进行了高度称赞。

1967 年五一节毛泽东、林彪和周恩来在天安门城楼上同红色外交战士姚登山（左 3）、徐仁（右 2）合影

北京革委会虽然成立了，但各派之间的争吵并未消减，武斗时有发生。为解决北京“革命造反者”与工代会“财贸尖兵”之间发生的武斗，保证“五一节”期间不出事情，4月30日，傅崇碧接见北京“革命造反者”组织负责人，对他们说：“现在主要不能再发生武斗了。今天周景芳同志给‘财贸尖兵’打个电话，不能再调兵了，武斗是完全错误的，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革命造反者’、‘红色造反者’过去有很大贡献了，你们自己发表声明，自己撤销了，不是我们强迫的，主要你们适应了大联合的形势。关于北大的武斗，江青同志讲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我们应该听毛主席的话，听中央文革的话。假如说：一方要让，那怎么能打起来呢？如果用压力，是解决不了问题的，我们要求革命造反者、红色造反者，要发扬过去的造反精神，如果有人把你们打成反革命，我们给你们平反，一定在‘五一节’不能发生武斗，同志们能不能做到？”

到会者答：“能！”

有人问："财贸尖兵不听话，不按毛泽东思想办事，利用工代会的名誉再调人怎么办？"

傅崇碧："那是更错误的！"

谁知，第二天，5 月 1 日晚，在北京天安门西侧，与中南海仅一墙之隔的北京二十八中，又发生了一场武斗，起因很简单：

4 月底，北京二十八中"818 红卫兵"得到消息说，汪东兴要谢富治抓"818 红卫兵"的人，罪名是反对军训。"818 红卫兵"负责人王宇听说后，就去找军训团长，要求给个说法。后来军训团长把泄露这个消息的汪春平给训了一顿，还说要通过北京卫戍区告诉汪春平的父亲汪东兴。汪春平很恼火，迁怒于"818 红卫兵"负责人侯瑛，因为是侯瑛从他们那里听来后告诉王宇的。

5 月 1 日傍晚约 16 时 30 分左右，二十八中"红旗"组织的陈少楼、张亚军和学生汪春平在学校里找到侯瑛，问他是否曾说过：陈少楼讲汪春平的父亲说"818"是反动组织？

侯瑛同"红旗"陈少楼、张亚军等关系很密切，平时打闹惯了，对质时，他仍然嘻嘻哈哈，陈少楼用手扒了一下侯瑛，要他严肃一些，侯瑛回手一拳，打了陈少楼。张亚军抱着侯瑛，把侯瑛压在石阶上，侯瑛掏出刀子，将汪春平手划破，张亚军将刀子夺过来了。抢刀时手被刺破。这时，解放军军训团长闻讯跑了过来，制止他们继续打架。这时陈少楼见裤子上、地上有伤口流的血，急了，举手给侯瑛一嘴巴，张亚军也打了侯瑛一拳。再经阻止，双方才散开。

陈少楼、汪春平上完药后，心中不平，又带了"红旗"10 余人去"818"总部辩论。双方话不投机，"818"负责人王宇拿

起木枪朝“红旗”的人就捅了一枪，混战就这样开始了。

双方乱扔桌椅、棍棒、石头，玻璃窗也被砸坏。

解放军韩参谋闻讯跑来，高喊：“不要武斗，立即住手！”结果被“818”总部的人拥推到校门口。王宇等人说：“打我们的时候，你们到哪里去了，现在出来了，不要听他的，让他滚蛋。”

“红旗”红卫兵主动撤离。韩参谋受到“818”众人围攻。此时，解放军团长也赶到现场。

在这次武斗在中，伤了“818”3 人，王宇的头也被打伤。王宇打电话到其他学校调人。

“红旗”红卫兵撤到校内后院，解放军规定了界线，设置了岗哨，双方不得越过。

外校支持“818”的人员，以调查武斗为名，越过界线逼近“红旗”。21 时 45 分，“红旗”撤至后院房上。

22 时至 23 时，支持“818”的 20 多个学校集结在 28 中，很多人还带着木枪木棒。北航和清华也有人在场。听说，六中还为“红旗”准备了石灰和六六六粉。

23 时左右，军训团团长、政委和公安局分别向“红旗”和“818”了解情况并协商解决办法，提出三点建议：“一、立即停止武斗。二、外校撤出。三、进行协商解决。”

“818”却要求解放军：“一、坚决支持‘818’。二、五一武斗是反革命事件。三、严惩凶手。”对解放军三点建议他们不发表意见。

“红旗”则提出：“一、将侯瑛扭送公安局。二、尽快澄清事实表态。三、双方谈判解决。”

子夜 0 时，军训团师部派人到现场。北航带领各校代表到团部问他们的态度，师部来人基本还是坚持那三条建议，但这次是要求：

一、立即停止武斗，捍卫十六条，要文斗，不要武斗。

二、双方撤离现场，外校调离二十八中。

三、经调查，双方协商解决。

六中有人说："解放军是标准的折中。""现在是地主打贫农，你们什么态度？"

"818"的人说，"造反派的血就是比他们高贵。"

5 月 2 日 2 时左右，卫戍区来人主持召开外校与负责人组织会议，重申三点建议。"818"则强烈要求解放军表态支持"818"并要求交出凶手，双方僵持。三次会议不了了之。于是，"818"红卫兵与其他许多个学校组织下了"最后通牒"：

必须让红旗、红卫兵承认"五·一"事件是一小撮联动分子蓄谋已久的反革命事件，勒令红旗、红卫兵无条件缴械投降，必须在凌晨五点钟之前交出红旗的陈绍楼、张亚军二人，红卫兵的陈和忠、汪春平二人，否则产生的一切严重后果由红旗、红卫兵负完全责任。

二十八中的"红旗"、"红卫兵"在解放军再三动员下全部撤下房来。此时，"818"红卫兵对"红旗"、"红卫兵"发动政治攻势，利用在长安街的大喇叭几次朗读"最后通牒"。

清晨 4 时许，"818"红卫兵与其他学校组织开始有所行动。"红旗"、"红卫兵"41 人再次迅速上房防守，唯恐"818"红卫兵方面的人员进犯。5 时，最后通牒所限的时间已到，"818"

红卫兵方面没有动手，但武斗的气氛依然在。此时，“红旗”方面的负责人从房上递下书面声明给军训团部：（1）要文斗不要武斗，（2）外校撤出二十八中，“818”红卫兵要撤到原临时分界线，（3）三方面代表谈判。

7 时左右，解放军要求三方面谈判，“红卫兵”、“红旗”派出 3 名代表参加谈判。

8 时开始，三十一中的“弹弓队”向二十八中“红旗”、“红卫兵”发射弹弓，子弹射到几个“红卫兵”身上，“红卫兵”还击。

8 时 30 分，只听见一声哨响，砖头、瓦片伴随着一片叫喊声，一齐打向二十八中的“红旗”和“红卫兵”。接着，二十八中“818”方面的人一拥而上，把 30 多名“红旗”、“红卫兵”从房顶推了下来，横七竖八地摔在小夹道里。从武斗开始结束时间总共不到 3 分钟，这时，由解放军主持的谈判仍在继续进行着。

突然，六中有人竟将一整车的砖头从房顶倒了下来。顿时小夹道里有十几个人头部被打破，鲜血直流，有人昏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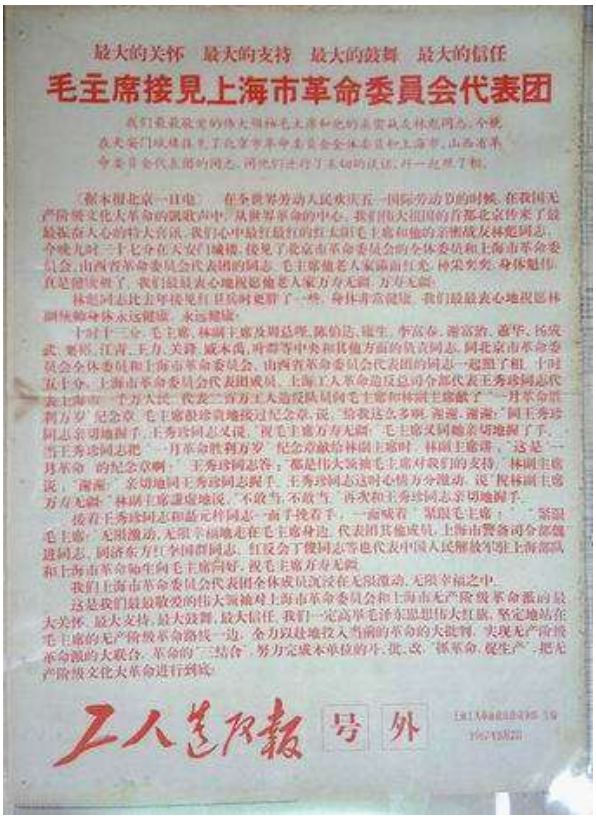
下面有人说：“让‘红卫兵’的狗血撒遍二十八中！”有的人还说：“你们 8 月份是怎么对待我们的，我们今天就怎么对你们！”有的幸灾乐祸地说：“想不到你们老红卫兵也有今天啊！”有的还说：“‘818’流一滴血，让老红卫兵流一盆血。”

二十八中“818 红卫兵”是北京中学红卫兵“四三派”形成初期的一支骨干队伍，是校内的几个组织中人数最多的。它还与附近一些学校的“四三派”组织联系密切，有一定的号召力。这次，他们联合其他几个学校的“四三派”组织强势出击，大获全

胜。但是，“四三派”的崛起未能持久，半年多以后，随着几个“四三派”的风云人物，如：二十八中“818 红卫兵”负责人王宇、侯瑛；六中“红旗”负责人康典、李锋被军训团打成“坏人”、“坏头头”以后，“四三派”组织的遭到很大的打击，从此风光不再。

## 第 615 回：发号外，“工总司”遭人□议 □□坐□庆“八一五”进京

5 月 2 日，上海“工总司”主办的《工人造反报》出了全红字号外，全文如下：



最大的关怀 最大的支持 最大的鼓舞 最大的信任

毛主席接見上海市革命委員会代表团

工人造反报 号外

最大的关怀 最大的支持 最大的鼓舞 最大的信任

毛主席接见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代表团

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今晚在天安门城楼接见了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全体委员和上海市、山西省革命委员会代表团的同志，同他们进行了亲切的谈话，并一起照了相。

[据本报北京一日电] 在全世界劳动人民欢庆五一国际劳动节的时候，在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凯歌声中，从世界革命的中心、我们伟大祖国的首都北京传来了最最振奋人心的特大喜

讯：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今晚九时三十七分在天安门城楼，接见了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全体委员和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山西省革命委员会代表团同志，毛主席他老人家满脸红光，神采奕奕，身体魁伟，真是健康极了。我们最最衷心地祝愿他老人家万寿无疆，万寿无疆！

林彪同志比去年接见红卫兵时更胖了一些，身体非常健康。我们最最衷心地祝愿林彪副统帅永远健康，永远健康！

十时十三分，毛主席、林副主席及周总理、陈伯达、康生、李富春、谢富治、萧华、杨成武、粟裕、江青、王力、关锋、戚本禹、叶群等中央和其他方面负责同志，同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全体委员和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山西省革命委员会代表团的同志一起照了相。十时五十分，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代表团成员、上海市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代表王秀珍同志代表上海市一千万人民，代表二百万工人造反队员向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献了“一月革命胜利万岁”纪念章。毛主席很珍贵地接过纪念章，说：“给我这么多啊，谢谢，谢谢！”同王秀珍同志亲切地握了手。王秀珍同志又说：“祝毛主席万寿无疆！”毛主席又同她亲切地握了手。当王秀珍同志把“一月革命胜利万岁”纪念章献给林副主席时，林副主席讲：“这是‘一月革命’的纪念章啊！”王秀珍同志答：“都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对我们的支持。”林副主席说：“谢谢！”亲切地同王秀珍同志握手。王秀珍同志这时心情万分激动，说“祝林副主席万寿无疆！”林副主席谦虚地说：“不敢当，不敢当。”再次和王秀珍同志亲切地握手。

接着王秀珍同志和聂元梓一面手挽着手，一面喊着“紧跟毛

主席！”“紧跟毛主席！”无限激动、无限幸福地走在毛主席身边。代表团其他成员，上海市警备司令部魏进同志、同济东方红李国群同志、红反会丁俊同志等也代表中国人民解放军驻上海部队和上海市革命师生向毛主席问好，祝毛主席万寿无疆。

我们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代表团全体成员沉浸在无限激动、无限幸福之中。

这是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对上海市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最大关怀、最大支持、最大鼓舞、最大信任。我们一定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定地站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边，全力以赴地投入当前的革命大批判，实现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革命的三结合，努力完成本单位的斗、批、改，“抓革命、促生产”。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当时的人们都练就了灵敏的政治嗅觉。号外一出，很多人感觉味道不太对头。果然，上海南京路有了针对号外的大字报，大意是：“工总司不代表上海市革会”、“王秀珍分裂无产阶级司令部”、“一月革命纪念章是大毒草”等等。又有传说：“王秀珍被张春桥吃排头（责骂），号外编辑是反革命”，传得纷纷扬扬，有的说“工总司这次要吃轧头”，即有麻烦。

其实这些大字报和传说，都是一些与“工总司”有矛盾的小组织放的风，真真假假，谁也说不清。尽管如此，这些对号外的指责，并非空穴来风，按当时的政治标准，有些是有道理的：

一、 喊“祝林副主席万寿无疆”。

当时的政治口号，是绝对不能乱喊的， “敬祝”类口号有不成文的规定，敬祝毛泽东是“万寿无疆”，敬祝林彪是“永远

健康”，周恩来是连健康都不能“敬祝”的。而王秀珍竟“祝林副主席万寿无疆!”这可是很另类了。

二、 献“一月革命胜利万岁”纪念章。

“工总司”为庆祝成立半周年，特制的那批“一月革命胜利万岁”纪念章，并以“上海一千万人民”的名义献给毛泽东和林彪，这自然引发了一些组织的不满：“一月革命”由上海和外地32 个组织共同发起，毛泽东接见的是上海市革委会代表团。你王秀珍凭什么代表上海 1000 万人民，献“工总司”的纪念章？这不是“工总司”不把其他组织放在眼里、派性发作的表现吗？

三、“一月革命胜利万岁”纪念章是大毒草。

“一月革命胜利万岁”纪念章，长方形，2CM×1.3CM，在当时是个小纪念章。纪念章下部有“一月革命造反胜利万岁”字样，左边是个大火炬，代表“一月革命”。右边下部有三面小红旗，只占画面的 1／6。这样的画面，也存在“原则性政治错误”。大家都知道“三面红旗”是指“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是毛泽东思想的一部分。有人说：火炬这么大，三面红旗这么小，表明“一月革命的光芒指引了毛泽东思想”，真是“狗胆包天、罪该万死!”

其他诸如“林彪胖了一些”、“王秀珍和聂元梓手挽手喊着‘紧跟毛主席’走在毛主席身边”、接见的时间，也有贬义说法。

很快，“工总司”组织人将那些大字报遮盖，传言也渐渐平息了。

5 月 2 日，上海“工总司”负责人王洪文对黄金海说：“耿金章可以放了。抓是你抓的，放还是你去放。”

上海“二兵团”的耿金章，自上海市革委会成立的第二天，2 月 25 日，被抓起来之后，过了两个多月的铁窗生活。

对耿金章被抓，张春桥曾经对王秀珍说：“我要是当时知道，一定不同意抓的。”

张春桥不仅对抓耿金章不赞成，对王洪文关押工总司另一个常委范佐栋也不赞成。就在范佐栋被抓的当天晚上，传来张春桥的意见：“工总司常委之间不要抓来抓去。张国焘当初曾经要抓毛主席，后来毛主席得势后也没有抓他，还给他安排了个中央委员。”3 月 10 日，张春桥在与上海“工总司”负责人的一次谈话中，讲到耿金章：

“二兵团的错误就是在那里死抱兵团不放，但是你们在处理这个问题时也不是没错误，只是抓，砸，不大会做思想工作。”

“你们对耿金章，内部造反，把他送到杨浦分局，当时我认为这样做不妥当，可没人听，所以你们处理内部和外部都不妥当。如果你们一直这样做下去，‘工总司’一定要垮台。”

五一劳动节期间，在北京的张春桥又对赴京参加五一观礼的王秀珍提起耿金章，再一次说：“耿金章要放出来。”

王秀珍马上打电话回上海。王洪文立即办理，亲笔写了张纸条：

杨浦公安分局：

根据市革命委员会决定：经我们找耿金章谈话情况，我们认为耿金章尚能认识自己的错误，有一定悔改表现。我们意见拟以教育释放回厂。请你们研究决定。

工总司王洪文 67.5.2

5 月 3 日，黄金海拿着王洪文的字条来到杨浦公安分局，问耿金章这两个月有什么收获？耿金章说：总部的决定是正确的，否则他还要犯更大的错误，等等。黄金海肯定了耿金章的进步，对分局负责人说："可以放人了。"

第二天，耿金章被释放回家，王洪文让他先在家休息。

5 月底，王洪连续四次去耿金章所在的工厂，将耿金章从家里叫去谈话，说安排他去"工总司"总部工作，还说这是张春桥的意见。

6 月 1 日，耿金章去"工总司"总部报到。那天正好张春桥从北京回来，接见"工总司"负责人他见到耿金章，对他说：

"你出来了，你受委屈了！我对你讲过多少次，不要拉山头，你那个山头越拉越大，最后搞分裂。我讲的话你都听不进。这次把你保护起来，是形势的需要，否则上海要大乱，不把你关起来，上海的新生政权有被摧毁的危险。你们各搞各的，成了一盘散沙，怎么能管得住呀！这次允许你出来活动，是我的意见，你准备怎么活动？"

耿金章回答："我什么都不搞了，回'工总司'后，你叫我干啥我就干啥。"

张春桥说："那好，你不拉山头了，上海就会更太平了，以后就看你们的了。你看，王洪文做事就比你稳。我希望你们要团结起来。"

张春桥以后多次提到耿金章，说：

"你们不要看不起'耿司令'，'耿司令'的二兵团还是有实力的。安亭事件以后，我单独找他谈过多次，我了解他，他是很

有造反精神的人。他能带队伍，能指挥打仗。安亭事件以后，工总司是靠二兵团撑市面，没有二兵团，工总司存在也很危险。耿金章是很不错的造反派负责人，耿司令还是很听我的话。”

“耿金章还是做了好事的，成立上海人民公社时，我们找他谈话，他总算听了。如果当时不听，就以他为头，几十个小组织的人一下闹起来，你又有什么办法？那还不是一直打内战，能有这样的形势？还不是和外地一样？这总算是耿金章的一功嘛！”

“耿金章当时没有闹起来，就是对上海工人运动的贡献。”

张春桥对耿金章始终没有忘记。1972 年，他提名耿金章担任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委员，当过上海市轻工业局基建组副组长。张春桥对耿金章评价是：

“耿金章这个人年纪大了，水平比较低，没有培养前途，只能到此为止了，不可能再负什么重大责任了，但他在文化大革命中是有影响的人物，只好让他在实际生活中随时间的消逝而逐渐消失。这一类人不是耿金章一个。”

4 月下旬，重庆形势的变化使重庆“815”派中一些群众分化出来，投向“砸派”一方，如西南政法学院“政法兵团”、西南农学院“826 战斗团”、四川外语学院“826 战斗团”等，几乎是“成建制”地转向“砸派”。也有少数人拉出队伍另打旗号留在“815”派中。

4月27日，西南政法学院“政法兵团”心血来潮，公然排着队伍直接来到“815”所在的重庆大学校园内示威游行，大骂“815”“右倾”、“叛徒”、发誓要“砸烂伪革联”。这一队区区人马，自然被重大学生轻而易举赶出了大门。离开重大的“政法兵团”，

径直开到市委大院，即“革联会”所在地静坐：强烈抗议“伪革联”挑动群众斗群众，要求“革联会”惩办凶手。其他“砸派”组织听说后，也纷纷前往支援，把个市委大院挤得满满的。

静坐的人情绪激昂，不断有来支援的战友跳到那市委大楼的台阶上发表演说，宣读决心书。

但是，这次静坐显得太随意、甚至还有点游戏成份，毫无悲壮可言。当户外太阳大了，静坐的学生就跑到办公楼的门厅里去吹电扇，躺沙发；天凉一些，又到地坝来坐着聊天、唱歌，喊喊口号。“战友”声援、慰问来了，大家彼此热闹热闹，口号便叫得更响些，而“声援”“慰问”者一走，办公楼前的大坝上就仍然稀稀拉拉坐些人在休闲。

到了晚上，很多人都回去了，留下的人不多，大家就唱歌，最爱唱的歌当然是“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和“远方的大雁你快快飞，捎个心儿到北京”。有一天晚上，电影公司的“砸派”还带来电影机，放了一场电影给静坐的人们看。

既然对方没有激烈行动，“革联会”也就不想理会，一切如常，好像什么事都没发生一般。整个过程只有“815”小股骚扰，其中，有人贴过几条标语：“白天晒太阳，晚上看月亮：好耍”、“电扇＋沙发＝静坐？”、“祝政法砸牌把地球坐穿”、“静坐只能触及屁股，不能触及灵魂”等等。

市委大院原名德安里，是上个世纪20年代修建的，抗战时期曾作过蒋介石的官邸。院里别墅成群，林荫蔽日。解放后，蒋介石曾经住过的那幢别墅成了市委书记兼市长任白戈的家。文革开始后，为揭露任白戈的腐败，在他住过的那幢别墅举办过展览。

这处林木蔽荫，种有花草，风景比当时的人民公园、枇杷山公园都还要好的院落，此时已被弄得乱麻麻一团。“政法兵团”长达5天的静坐，把这种混乱推向了高潮。

但是，这种长时间的不战不和终于让双方都觉得应该找台阶下了。

首先，静坐期间，“砸派”内部发生了分歧。有人说，既然说“革联会”是“伪革联”，那还找“伪革联”“平”什么“反”？可能是同意这种意见的人占了多数，于是准备撤退。

但是，5 月 1 日深夜，重庆大学突然传来消息，说“砸派”预谋，要在 5 月 2 日那天对“革联会”采取行动，冲击办公大楼。5 月 2 日凌晨 2 时，重庆大学校园里的广播喇叭突然呼啸而起，数千学生紧急集合，稍事动员后，便迅疾开赴城区，将“革联会”大门以及中山四路一带全部堵住，准备冲进市委大院。

在市委大院静坐的“政法兵团”等人眼看是出不去了，赶紧派人出去请求支援。“砸派”组织了大队人马赶到中山四路，不少人手中拿着棍棒、扁担，挥舞着驱散堵住大门的“815”，将院内“政法兵团”的人营救出来。

重庆警备司令部出动军车 5 辆赶到现场，制止武斗，将大街封锁起来。

这场武斗，伤上百人，混乱中踩死一女青年。

这时的大字报已经很少有揭露批判走资派的内容了，大多是哪儿发生了武斗，哪儿又打伤了多少人之类。虽然还没有开始动枪动炮，但让人感觉到战争似乎已经打响。但是老百姓并不恐慌，反而兴奋不已。如果哪儿真的发生了武斗，他们不但不躲避，反

而要围上去看热闹，有时候也有人因此被误伤。但只要有武斗，围观的人总是那么多，甚至比参加武斗的人还多，这成为当时重庆城的一大怪现象。

4月底，为了配合四川省和重庆问题的解决，重庆大学“815”派出以吴庆举领队的“百人赴京战斗队”开赴首都开展活动。其时，北京舆论几乎一边倒。清华《井冈山》报、北京地院《东方红》报等配合四川、重庆问题的解决大造舆论。《山城在浓雾中》、《妖雾迷漫嘉陵江，黑云滚滚压山城》之类耸人听闻的文章已累累登在那一段时间的显赫版面。仅仅读读标题就足以吓人一身冷汗。同样自命不凡的“815”决定披挂北上，对首都“三司”进行正面抗击。临行前，在815广场举行仪式，宣誓出发，威威乎激烈壮怀，很有点北上抗日的感觉。他们满以为威师所至，一定所向披靡。其实呢，这一次的遭遇并不比1966年9月那次好。

“815”到北京不过几天功夫，北京地院“东方红”就两次派人光顾他们的住地----东大桥接待站。他们冲进房内，把“815”从重庆带来的告状材料一抢而空，撕毁战旗，双方自然是要殴打冲突一番。

“首都三司”、北京地院“东方红”在重庆的办事处，曾多次被重大“815”砸抄，这次也算是一报还一报了。

“重庆崽儿”生性刚烈火暴，素多亡命之徒，住地被砸，百十号人立即开到中南海门口去宣誓，把胆儿壮足了，又开去北京地院找“东方红”抗议示威。结果是可想而知的：寡不敌众，自然少不了又被一顿好打。危难之时，突然一彪自行车队呼啸而来，一色黄军装、一色铜扣皮带、一律红色无字袖标。自行车队迅速

实施包围，继而皮带如长鞭上下，对准“东方红”便一阵乱打：重大“815”这才趁机溜了。

这只从天而降的“天兵天将”是何方神圣？谁人所遣？原来就是当时著名的“联动”份子。

重庆大学“815”在驻地的窗台上堆满了砖头、石块。墙上两条字体斗大的对联：“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横批：“坚决自卫”。但地院“东方红”却一直没再来找麻烦。

## 第 616 回：反□否？湖南军区前绝□ 砸“七一”，山西炮轰刘格平

4 月下旬的一天下午，经中央文革小组王力同意，韦国清在京西宾馆找中央文革广西记者站记者王荔谈话。他告诉王荔：“总理指示，广西地处边疆不能乱，要实行军管。”并说“总理要我当军管会主任。”

4 月 30 日和 5 月 5 日，王荔两次来到北京西交民巷中央农业银行接待站广西“422”汇报团住处，“422”汇报团的章英、刘德胜、梁琨、张欣然、王呈道、刘少平、史妙甫、李超林、陆成勋、都惠忠、谢家样、沈明轩、秦大宁等人汇报了广西情况。当桂林“老多”张欣然汇报，他们要与《广西日报》军管小组辩论，军管小组不与他们辩论时，王荔说：“广西文化大革命形势比起其他省差半年，广西红卫兵没有造反精神，文质彬彬的。人家说你们是文斗的模范，我看有点像。”

“422”汇报团的章英等人整了一份《广西军区负责人言论摘录》给王荔，王荔通宵修改后立即报送中央。

刘德胜，李日明等问王荔：“我们要坚决打倒韦国清，中央是不是要支持韦国清？”

王荔说：“中央支持韦国清，也要看造反派的态度，你们是群众组织，要打倒他是可以的，打不倒也可以整他的材料……”

5 月 6 日，王荔和另一名联络员一起来到北京西苑旅社伍晋南、贺希明的住处，征求他们对文化大革命的意见。伍晋南代表二人发言，重申“二、一九”、“四、一九”声明中的观点，并提

出要求中央领导接见。王荔表示可以反映，但是现在中央首长很忙，可写成书面材料，他负责转达。王荔向他们要了一份《四、一九声明》的传单。

贺希明等人后来又将《十几年来韦国清在广西执行了一系列什么路线》的材料和要求中央调离韦国清，另派人主持广西工作的报告，交给王荔转给中央。

5 月 8 日，广西“422”代表团在北京西苑旅社石怀宇住处，讨论如何向中央汇报的问题，王荔参加了会议。确定由农烈整理出广西军区的材料：（1）军区支左后，造反派整风受压情况；（2）军区首长一级材料；（3）军区支“保”压“造反派”材料；（4）收集军区以小见大问题的材料；（5）五次接见后“广西军区执行‘反动路线’材料；（6）周恩来单独接见“422”代表团时口头汇报整理的军区材料。

五一劳动节，韦国清上了天安门，广西“422”派大为震动，北京“422”代表团内部思想有些混乱。5 月 9 日，“422”汇报团的刘德胜向王荔汇报了这个情况，并说：“韦国清虽然上了天安门，我们还要继续打”。王荔要刘德胜把大家的思想动态写一份材料交给他，表示会将这份材料转交中央文革。

湖南支持“湘江风雷”的呼声日益高涨。4月15日，“长沙市革命造反派工人联合委员会”成立，简称“工联”。长沙各大厂矿的工人造反组织，都是“工联”的重要成员。“工联”的领导集团为5人核心小组：组长是长沙汽车电器厂工人胡勇。副组长是曙光电子管厂工人、中共党员唐忠富。总部及各下属组织的头头，不少人是曾在张平化“924”报告后被打成“右派”、“黑

鬼”，或因倾向“湘江风雷”遭到歧视和迫害的。后来，随着形势的发展，长沙市的主要产业工人与各系统的工人，包括很多原来属于“湘江风雷”组织的工人造反组织，都成建制加入了“工联”，使“工联”成为湖南统领20多万工人的第一号造反组织。湖南全省各地的工人造反派组织，如湘潭“红造联”、衡阳“工总”、邵阳“工联”、株洲“工联”、岳阳、常德“工联”等，均受长沙“工联”的影响和指挥。

4 月 22 日，湖南省委书记处候补书记、副省长章伯森发表对于形势的《公开声明》，不同意省军区领导人对当时一些问题的处理，认为湖南存在“二月逆流”问题的根子就在省军区。24日，他又与省经委副主任梁春阳等人联名贴出大字报，进一步把湖南“文革”中出现的问题归咎于省军区。这在湖南省级机关和全省产生了很大影响。成立于 4 月 15 日的“工联”，连日在长沙市五一广场举行群众大会，喊出“打倒湖南谭震林”的口号。

5月1日，长沙市以“工联”为首的支持“湘江风雷”的群众组织在河东举行大规模的游行示威，“红中会”在游行中公开喊出了为“湘江风雷”翻案的口号。

五一大游行后，以“工联”为首的造反派基本控制了长沙河东市区，“高司”放弃了除湖南医学院、长沙铁道学院之外的市区大部分据点，渐次退回河西高校区的大本营。

5 月 3 日，毛泽东看了中央文革办事组 4 月 20 日编印的两期《快报》上登载的《湖南军区领导干部对当前长沙形势的看法有严重分歧》、《黎原同志对长沙当前形势的看法》、《章伯森同志对湖南文化大革命形势的看法》等材料后，批示：

“看来，湖南可望好转，省军区政委谭文邦，四十七军军长黎原是好的。”“省委也有一批较好的干部。”

5 月上旬，湖南湘潭锰矿的造反派组织“红造联”在与对立组织发生冲突时死了一名成员。这是湖南文革两派第一次在冲突中打死人，原本就势成水火的长沙局势“蓬”的一下燃烧起来了，长沙的造反派展开了声势浩大的声援行动。他们把矛头指向了湖南省军区。

从5月9日起，“红中会”、“井冈山”、“红造会”、“高校风雷”等学生组织在省军区门前开始了绝食斗争。

为防止事态扩大，省军区派出政治部副主任崔林与绝食学生谈判，“红中会”的代表为19岁的汤建平。谈判时，崔林建议汤建平等人进食，遭汤建平拒绝，双方不欢而散。

随即，“工联”和各组织紧急磋商，汤建平代表“红中会”建议：若军区再不答应条件，便停水、停电、停交通。此议得到“工联”负责人唐忠富首肯。曙光电子管厂、红旗内燃机配件厂等厂的“工联”组织，也开始在五一广场静坐示威，声援绝食学生。

次日谈判，汤建平等人扬言：24小时内军区不做出满意答复，将实行三停，因此引起的一切严重后果，要由军区承担全部责任。省军区崔林回答：“你们也太高估自己的力量了吧！”

汤建平则说：“走着瞧！”

胡勇、唐忠富等“工联”负责人认真研究了实行“三停”可能造成的后果，采纳了市总工会“东方红观察哨”周国强的建议：砸了“省红联”，转移斗争目标。

到了中午，湖南省军区所在的八一路上人山人海，红旗飘飘，连韭菜园都塞满了人！整个马路早已是水泄不通。绝食的不光是学生，很多工人和各行业的人也都参与进来。人们或站或坐，还有躺在地上的。在军区大门口，横躺着四、五个人，其中一个盖着一块布，脸却露在外面，黑乎乎的，是个死人！脸色乌紫，脑袋肿胀，比正常人要大了一半，而且好像有液体从皮肤和五官里渗出来了，那模样十分恐怖。这个死者，就是湘潭锰矿“红造联”那个被打死的人，被长沙的造反派“抬尸问罪”来了。在他的身旁躺着的是“高校风雷”的大学生，以此明志，表示决心。

到下午 17 时左右，前面的人群骚动起来，听见有人喊起了口号。原来有几个军人在人群中慢慢移动，他们推着一个小车，车上是一个大箩筐，上面冒着热气。大箩筐里堆得高高的全是雪白的大馒头！军人们高声喊道：“革命小将们，毛主席教导我们说，身体是革命的本钱，革命不能不吃饭啊，身体饿垮了怎么革命啊……”

这时有人在喊：“同学们，我们不能上当，我们坚决要绝食到底，直到他们答应我们的条件！”

省军区依然关心这些向他们叫板的革命小将，晚上，横跨马路搭起了幕布，架设了放映机，给大家放映《毛主席三次接见红卫兵》的电影。

军区还是送大馒头，还是没人吃。但军区送来加了葡萄糖的白开水时，一个人，两个人，几乎所有的人都喝了，除了“高校风雷”的大学生！

省军区和“红中会”终于达成了部分协议。省军区领导表示

将以书面报告向中央文革小组汇报“湘江风雷”组织的情况。当日傍晚，省军区向绝食斗争指挥部转达了中央文革小组的来电：“革命小将们：吃饱饭，睡好觉，养足精神闹革命。”

忽然，绝食现场所有的人都站起来了，“我们胜利了！”的欢呼声此起彼伏。中央文革小组的来电，以“号外”形式向社会发表，顿时，同学们热泪盈眶，个个奔走相告。

有人用扩音器说：“毛主席批评了湖南军区，我们是正确的！”

“根据绝食斗争领导小组指示，请所有人到东风广场开大会，庆祝胜利！”

“请排好队，一路游行去噢……”

绝食指挥部宣告绝食结束，紧接着在市内举行了大游行。

我们再看山西。4 月 29 日，“红总站”的骨干组织“太机四野”，在丁磊的策划下，砸抢了省委机关的“七一公社”，抢走了大量批判材料。因为“七一公社”早在“112”夺权时，就揭发刘格平“生活作风”和“地方民族主义”问题。此时，他们又带头反对“炮轰刘志兰”。丁磊认为“七一公社”那里有刘格平的“黑材料”。

5 月 1 日，“太机四野”对“七一公社”进行了第二次砸抢。“红联站”十中“七一”闻讯前去支援“七一公社”，被“太机四野”的汽车碾伤了十中的中学生。刘格平在省委大院目睹了这场事件。当晚，“红联站”代表见到刘格平要求他发布制止武斗的通知，遭到拒绝。

5 月 2 日，太原五一广场，曾在“112”夺权中鼎力支持刘格平的“首都赴晋造反大队”的清华大学学生邢晓光，在这里召

集的群众集会上，以愤怒的语调，猛烈抨击刘格平分裂红色政权和深挖“黑二、三线”的所作所为。大会用扩音器将他的声音传向广场四周，很多人驻足收听。这是山西夺权以来头一次有人敢在这样的群众大会上，公然点名尖锐地批评省革委主任刘格平。邢晓光在刘格平夺权时立过汗马功劳,其演讲在太原引起的震动可想而知。

接着，太原六中“32111”以其头头史纪礼的名义在五一广场主席台前面的墙上贴出大字报《丁磊十六条》，实际是将刘格平的所作所为与中央的《十六条》相对照。大字报尖锐地指出：文化大革命的矛头，是指向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丁磊的矛头却是指向革命群众。

同一天，5 月 2 日，“红总站”的杨成效组织了百余辆大卡车，以他的十三冶“决死纵队”举旗挑头，“红总站”的其他一些组织也高举着战旗，浩浩荡荡，在太原街头开始了示威大游行。200 余辆大卡车上站满了人，“坚决支持刘格平同志！”的口号声响彻云霄。

天色将晚，由“红总站”太原机械学院的“太机四野”打头，十三冶“决死纵队”殿后，这百余辆大卡车直扑省委大院，众人哗啦啦下车后，与“七一公社辩论！”的喧嚣声响成一片。

“七一公社”的机关干部开始还出来进去的和大卡车上跳下来的人们辩论。说是大辩论，实际上与吵架无异。吵到后来，“决死纵队”的不耐烦了，开始推搡，动起了拳脚。“七一公社”的秀才哪里是工人老大哥的对手，顷刻间，只剩落荒而逃了。来不及逃走的，当然只能被打翻在地，弄了个鼻青眼肿，狼狈不堪。

而设在省委大院的“七一公社”总部，顿时被砸了个灰飞烟灭，惨不忍睹。

这时，省委大院的“东风革命造反兵团”首先表态：坚决支持“决死纵队”和“太机四野”的革命行动。

随后，“太机四野”将“七一公社”负责人李辅拉到大卡车上，从府东街、新建路、解放路，一路游街示众，最后，来到山西医学院，应“山医工学干造反兵团”之约，与“太工永红”一起，和山西医学院的“红联站”成员“红革联”发生冲突。

“太工红旗”闻讯后，立即出动了人员和宣传车前去山西医学院救援“山医红革联”，结果宣传车被围攻，又紧急向“红联站”求援。

太原十五中“红旗”正在举行成立大会，突然接到“太工红旗”的电话，说在山西医学院“太工红旗”的宣传车被“太工永红”、“太机四野”所抢，请求紧急支援。十五中“红旗”常理放下电话后，立即带领二、三百参会人员跑步赶到山西医学院。看见太机四野的人在与李辅争辩，双方人员在推搡。“太工红旗”的宣传车中挤满了人，似乎在争抢之中。他们立即冲了过去，从汽车上把李辅抢了下来。经山西省核心小组和部队的干预，这次冲突没有形成大规模武斗。李辅发表了即席演说，感谢同学们的援救，谴责“太机四野”、“太工永红”是野蛮行为。

5 月 3 日，“红联站”总勤务站经过几天的形势讨论，认为：1、 刘格平周围有坏人；2、当前保守势力死灰复燃，牛鬼蛇神蠢蠢欲动；3、“414 炮打刘志兰”背后有问题，要做社会调查，要捍卫红色政权，对刘志兰暂不表态。

邢晓光以及史纪礼这样的人物如此猛烈地向刘格平和丁磊开炮，使“红总站”一时间措手不及，不知如何应对。虽然“太机四野”5 月 2 日砸了省委机关的“七一公社”，但是他们炮轰刘志兰的行动也因此一时陷入低潮。

不过，这个低潮并没有持续几天。5 月 3 日、4 日、5 日连续三天召开省革委委员会议。会上“永红”、“四野”、“东风”等组织负责人提出“新型”保皇派，矛头直指“红联站”。

## 第 617 回：大混战，太原市乱成一片 五羊城，又发生“□明事件”

5 月 7 日，山西代表团从北京回到了太原，省革委在五一广场召开了迎接大会。在这次大会上传达了“永贵好”的最高指示，介绍了“毛主席身体健康”的大好喜讯，同时传达了中央文革小组张春桥、姚文元、关锋、王力的谈话，让“红总站”士气大振，他们刷出一批新的大标语，表示要“誓死捍卫新生的红色政权”，掀起又一轮炮轰刘志兰的高潮。

李金渭在山西代表团中年纪最小的。在北京时，给周恩来送大字报的事儿，大伙让他干。回到太原后，在五一广场上开大会，向全省人民传达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小组接见的事儿，大伙还是让他干。代表团从上到下都说听到毛泽东那句最高指示“永贵好”了，他就传达了这句自个并没有听到的最高指示。因为当时口号声很高，李金渭虽然就在陈永贵跟前，但是，当陈永贵和毛泽东握手时，李金渭只看到毛泽东的嘴在动，却没有听清他具体说的是什么。毛泽东和他握手时说了些什么，他也没有听清。怎么传达呢？

开会前，有同一派的战友给李金渭出主意说：“你除了传达‘永贵好’的最高指示外，还应该传达一下毛主席给你发布的最高指示，内容都替他拟好了：‘山西革命造反兵团是革命的造反组织，你们要把山西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好。’”

那位战友还说：“只要有了这条最高指示，谁还敢奈何咱们‘兵团’！反正毛主席和你握手了，跟你说话了，你说听见啥，

就是啥。”

当李金渭站到主席台的话筒前，开始传达山西代表团赴京的种种盛况时，最终还是没有听从这位战友的建议。他不能说谎话，毛泽东确实是跟他说了几句啥话，可他没有听清，让他给毛泽东编个最高指示，打死他也不敢。

虽然山西代表团赴京的盛况让“红总站”士气大振，但是“红联站”对新一轮的炮轰刘志兰高潮展开了猛烈的反击。太原五一广场上，出现了“红联站”宣传车。车上 4 个高音大喇叭冲着东西南北，慷慨悲歌，义愤填膺地高声说道：

“414 阴谋的真相，就是‘红总站’和‘兵团’要把斗争矛头对准张日清，进而对准解放军，从而毁我长城，以达到反对毛主席司令部的反革命罪恶目的。”

那几天，太原五一广场成了一个非常热烈的场所，聚集了大量的群众，从旭日东升，到华灯初放，宣传车 4 个大喇叭振聋发聩。围着“红联站”宣传车的群众，多则十来万人，少则两、三万人，人们各抒己见。

“红联站”下属组织也贴出大标语。中共中央不是针对苏修连续发表过《九评》吗？省党校“东方红”也连续来了个《九论》，从 5 月 6 日开始，一论接着一论，不断在大街上广播，指出炮轰行动是“企图分裂新生的红色政权”、“红总站”是“大杂烩”、在中央号召“归口闹革命”、实现“大联合”的时候成立这样的跨行跨业组织是“与中央唱反调”等等。

于是乎，太原市的老百姓编了这样的民谚：“‘红总站’的打砸抢，‘兵团’的大方向，‘红联站’的好文章。”

不久,北京外语学院一位叫李茵子的女同学乘山西省军区的小车到太原工学院找到李青山,将他带到省军区去见张日清。张日清的接见给了“太工红旗”很大的鼓舞。

如果说陈永贵此时在省级舞台上还搞不太清楚阵线，迟迟不肯表态，那么他在昔阳所属的晋中地区却旗帜鲜明。

当时晋中也分为两派。1 月 18 日，在山西一片夺权声中，昔阳县所在的晋中地区也进行了一次夺权。随后 1 月 31 日晚上，晋中成立了“晋中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晋中总司”。他们认为 1 月 18 日晋中的那次夺权是假夺权。以“首都赴晋造反大队晋中支队”的李玉昌和“晋中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为核心，在晋中军分区的支持下，他们再次夺权。参加这次夺权的群众组织有：地委和行署的干部造反队伍“卷巨澜”战斗队、榆次晋华纺织厂“东联”、山西轻工业学院“东方红兵团”、榆次一中“虎山行”、“决死纵队”、“杨家岭”等战斗队。这次夺权，由于没有革命干部参加，只有“晋中总司”与晋中军分区的“两结合”。于是，2 月 5 日，“晋中总司”迎接晋中地区在 1964 年“十月事件”中被打成“任王张反党集团”的原晋中地委副书记任井夫，原昔阳县委书记张怀英和原祁县的县委书记王振国等人返回晋中，他们是根据刘格平的指示回晋中建立党的核心小组，并相机建立晋中地区革委会的。

但任井夫、王振国、张怀英没有参加“晋中总司”工作。他们认为“晋中总司”中有许多组织是“黑地委”的保皇派，而且晋中军分区政委崔冰就是“黑地委”的常委。于是，他们另行组织了主要由晋中地区在“十月事件”中被整人员参加的“硬骨头

兵团”，要求为1964年的“十月事件”平反，

2 月下旬，69 军 107 师，即 4655 部队调防晋中后，也对“晋中总司”表示支持。

“晋中总司”认为任、王、张在“一月革命”中寸功未立，回来就是“摘桃子”的。4月16日，也就是在太原“414”炮轰刘志兰之后，“晋中总司”也开始炮轰晋中的任井夫和张怀英，后来又加上了王振国。不久，“晋中总司”发生了分裂，榆次一中“虎山行”等组织开始支持任、王、张。

受刘格平委托，已经担任“晋中总司”副总指挥的陈永贵在任井夫宿舍门前接见“晋中总司”一些群众组织代表时明确表示：

“我参加了‘总司’，但我没有得到‘总司’一个通知，一个指示。虽然我人是参加了‘总司’，但得不到指示，不知做什么，我也没有做什么。”“我从文化大革命一开始，自始至终是支持‘十月事件’受害者的，我是支持‘十月事件’受害者的急先锋。在黑省委、黑地委的统治下，只‘十月事件’中，就有700多名革命干部被打成了反革命。”“王、任、张回晋中来，他们对情况是了解的。但是王乡锦和他们的亲信对王、任、张也是了解的。王、任、张回来他们就不能活，没有他们的天下了。这样，他们是不是还要把王、任、张赶下去？”

陈永贵在太原介绍了五一受到毛主席接见的情况后回到晋中，晋中方面也专门组织了一个万人大会欢迎他，同时也请他讲讲见到伟大领袖的幸福情景。陈永贵答应下来，又加上了一个条件，“除了介绍这些以外，”陈永贵说，“我还要讲一讲‘十月事件’。”

晋中地区“总司”方面主持会议的头头听了，愣了一会，不太情愿地说：“那也可以哇。”陈永贵道：“我正式要主讲哩，怎么是也可以？”

陈永贵在“晋中总司”主持的会上开讲，讲他怎么和毛主席握手，照相，怎么和其他中央领导握手、照相，怎么和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握手、照相。又讲参观北京的一些学校和北京市革委会成立情况等等。陈永贵在台上讲，台下的两派组织就一块高呼口号，尤其是听到毛主席的身体非常健康时，万余人齐声高呼“万岁！万岁！万万岁！”声震天地，气氛很是热烈。

讲着讲着陈永贵就讲起了“十月事件”，会场顿时肃然，口号声也没了。陈永贵高声表态说：“我支持‘十月事件’的平反！”

没等陈永贵讲几句，会场外大街上的转播喇叭便没了声音。会场上也开始乱，支持平反派的人鼓掌，高呼口号，反对平反的“总司”派起哄。“总司”派的一位晋中文工团的相声演员一个箭步蹿上主席台，抓起陈永贵面前的麦克风便往地下摔。只听喀嚓一响，麦克风坏了。会场上顿时大乱，两派人马似乎就要动手开打。陈永贵冷冷地看了“总司”派的大会主持人一眼，不露声色地端坐不动。“我并不是怕群众，”陈永贵事后解释他端坐不动的原因时说，“我是怕打伤了革命群众。”果然，支持陈永贵的一派见陈永贵不动便也不动。那位大会支持人趁事情还没闹得不可收拾赶紧宣布散会。

4 月下旬，在广州军区为“中大红旗”等组织平反后，在 3 月上旬宣布解散的“省联络站”突然新活跃起来。4 月 22 日至 24 日，一连三天，“省联络站”与“中大红旗”、“中大八三一”、

“清华井冈山”、“哈军工造反团”等组织，联合组成代表小组，到省公安厅，声称当初抓“省联络站”的项明是“3 月黑风的产物”，要求“立即释放项明，宣布平反，恢复名誉，承认非法逮捕，揪出这次政治迫害事件的肇事者和幕后策划者”。

项明是省计委劳文处劳动科的普通科员，文革初期参加过文化工作队，在文联、音协搞过两个月的运动。后来他串连了一些群众组织，于 1966 年 11 月 26 日成立了“省联络站”，是“省联络站”的负责人之一。

3 月上旬，广州军区打击“省革联”时，“省联络站”宣布解散。3 月 23 日，项明从北京返回广州。第二天，省计委“红旗”、“大无畏兵团”邀集计委的干部与“省革联”常委开辩论会，市公安局一、二、五总部、建委等单位都派人参加。项明也在会场里。但辩论会刚开不久，有人要求项明退出会场，项明拒绝，于是爆发争吵，辩论会的焦点转到了项明身上。辩论内容主要围绕市公安局夺权问题，一直持续到 25 日凌晨两点，项明最后说：“我声明不再回答问题了！”然后坐在乒乓球桌上一言不发。

省计委“红旗”、“大无畏兵团”的人一怒之下，把他拖出门外，塞进一辆华沙牌轿车，送到省公安厅，27 日正式拘留审查。拘留审查的理由是：“一、项明是‘一二五’冲击市公安局，袭击革命群众，挑动武斗，造成严重流血事件的现场策划者和指挥者。二、项明冲击了军区和已实行军管的广播电台。三、项明被扭送到公安厅后，经过两天多的谈话教育，始终态度顽固，没有认罪悔改之意。由此，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第三条规定，结合项明

违法犯罪行为及其态度，依法对项明拘留审查。”

对“省联站”与“中大红旗”、“中大八三一”、“清华井冈山”、“哈军工造反团”等组织提出的释放项明的要求，广东省公安厅予以拒绝。4 月 26 日，“省联站”发出“严正声明”，称：“公安厅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强加在项明同志的一切犯罪事实完全是捏造， 扣留项明同志完全是非法”，“如果公安厅一意孤行，我们将采取必要的革命行动。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由公安厅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及这一迫害事件的幕后指挥者负责。”

4 月 26 日这天，原来从广州“一司”分裂出来的群众组织：“东方红革委会”、中南林“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总部”、广州中医院“三〇一”、广东艺专“东方红红卫兵”、仲恺农校等 20 个单位，成立了“广州大专院校红卫兵新一司”，简称“新一司”。在成立大会上，登台发言的人，无不提出要揪出广州谭震林，“不揪出广州谭震林死不瞑目”。他们还说：“《颠倒》就是大毒草，地总、红总、主义兵就是大老保，‘广州第一声春雷’是广州谭震林一手泡制出来的”。广州“三司”、“红司”宣称要和“新一司”“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三司”甚至表示：“我们虽然是两个司令部，实是一个司令部。” 从此，“揪广谭”的声浪愈加奔腾高涨。

5 月 2 日，“红旗派”就释放项明一事在公安厅闹了一整天。下午，聚集在公安厅的人愈来愈多，先后有 24 个组织的 400 多人到公安厅要求会见项明，并且说，在晚上 20 时之前，公安厅必须答应会见项明，否则，“5 月 3 日零时将采取一切必要的革

命行动”。

5 月 3 日零时。公安厅没有让步。包围着公安厅的群众，一部分继续与公安厅干部辩论，一部分则在公安厅门前静坐示威，发出《第一号绝食声明》。整个绝食行动由中山大学的学生、“中大红旗”头头武传斌指挥。

上午 9 时，公安厅释放了项明，希望平息事态。但静坐群众并不领情。天亮以后，公安厅门前的群众，转移到烈士陵园对面广场，继续静坐，人数达几百人，指责公安厅“偷偷摸摸单方面释放项明，其目的是想控制事态发展，达到扑灭革命烈火、麻痹革命斗志”。他们进而提出为项明彻底平反，公安厅公开检讨，赔礼道歉，当众烧毁项明“黑材料”等要求。

下午 14 时，“红旗派”召开千人大会，刚放出来的项明，立即赶到烈士陵园对面广场，和绝食的群众见面。他说：“他们抓我不是搞我一个人，而是通过搞我，把省直‘联络站’打下去，向省‘革联’开刀，把造反派压下去。”

下午 16 时，70 多个群众组织的 2000 多人，在烈士陵园对面广场集会。项明登坛演讲，讲他被关押和释放的过程，然后提出“九点声明、三点要求”，即：

一、对我拘留是非法的，我冲军区有错误，可以检讨；

二、对我拘留不是项明个人问题，而是严重的政治迫害事件，是“3 月黑风”，因为我处在重要地位，是重要人物，想从我身上捞到材料，然后一个个打掉。所以不是我项明一个人的问题，而是大家的问题；

三、他们利用专政工具，打击和他们观点不同的组织和群众；

四、他们审讯是唯心主义的，先肯定问题，然后提问，如肯定省革联是错误的，要我按这个检讨；

五、耍阴谋。昨晚（2 日）3 时把我拉出去审讯，你们（指革命群众）示威，他们就做贼心虚；

六、现在虽然把我放了，但我在政治上还未放，等我把问题向大家交代了，我还要去（坐牢）；

七、今天出来时，急急忙忙给我定罪，说我主要是一.二五事件；

八、我项明被抓，是广东 3 月黑风的具体表现。如果我们不起来揭露这些东西，我们造反派就起不来；

九、三点要求：

1、必须对我无罪释放，并公开宣布平反

2、我所写的检查和省直联络站的材料，一律交回当众烧毁；

3、揪出事件的幕后指挥者。

大会开到傍晚 18 时许才结束，群众随后涌到公安厅门前静坐，直到晚上 20 时 30 分左右，队伍又折回东较场。在整个过程中，一直有十几辆宣传车追随前后，用高音喇叭广播，散发传单，声称“项明放出来，仅仅答应了我们声明中的一点，我们还没有完全取得胜利，还要继续斗争。”现场气氛临近沸点。

## 第 618 回："揪广谭"，广州市绝□结束 扔砖头，□春市两派武斗

5 月 4 日上午，广州烈士陵园对面广场仍然有 200 多人，其中有几十人在讲台上静坐绝食，讲台下围了两重人圈，负责保卫工作。"工联"出动了 14000 人声援学生绝食，并在绝食场外警戒保卫。广船、广重分部的十几名工人，扛着"工联"的大旗，加入了绝食行列。

参加绝食单位的头头，先后开了两次会议。他们通过宣传车向群众提出三个为什么："为什么公安厅一小撮混蛋和军队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勾结，在 3 月 25 日拘留了项明？为什么公安厅到现在还拿不出一个像样的罪恶事实材料公布于众？为什么中央文件下达那么久，项明迟迟不释放，单方面释放了又不平反？"

入夜，烈士陵园对面广场已经聚集了五、六千人，一些群众组织的代表纷纷登台演讲。21 时 30 分，队伍开始向西游行，经中山四、五、六路、北京路，到海珠广场解散。一路上，人群不停地高喊着"打倒公安厅一小撮混蛋！""打倒公安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揪出广州的谭震林！""参加一月革命有功，支持省革联无罪！""地总、红总、主义兵是大老保，公安厅是军管会的桥头堡！"等口号。

5 月 5 日，参加绝食的群众达到 600 多人，事态变得更加严峻。上午 8 时许，"中大红旗"的 30 多人，用担架抬着一名绝食晕倒的女学生，到公安厅抗议，要求公安厅负责人接见。广东军

区独立二师及公安厅派出医护人员前往现场，为这个女学生诊病、检查，但女学生挥手拒绝。公安厅的简报称："事前广东军区独立二师及我厅已经派出医护人员前往现场，为这个女学生诊病、检查，但'病者'挥手拒绝，看来神智清醒，并无晕倒症状。"

与此同时，烈士陵园对面广场上，有 700 多人在开控诉会。会后，2000 多群众抬着 3 名绝食学生游行。当队伍经过北京路时，又有 5 名学生躺上了担架。在返回中山三路时，躺在担架上的学生已经达到 34 人。他们沿途高呼："血债要用血来还"、"要和公安厅一小撮混蛋宣战"等口号。

下午 15 时，由"红司"发起，在烈士陵园门前召开 6000 人大会，宣布迄今为止，有 50 多人绝食晕倒，10 人有生命危险。17 时，群众又开始游行，中大"八三一"宣读了一份"倡议书"，声称由于公安厅至今不答复他们的要求，"革命不怕死，怕死不革命。"他们决定绝水绝医，"死了算，死了也要斗争到底"。一串串水壶吊了起来，帽子也堆在舞台上，一条大标语触目惊心："绝食、绝水、绝医，断绝一切后路，直至最后胜利！"一位红卫兵慷慨激昂地说："我们死，也要面向北京，面向毛主席！"

下午 18 时，华侨补校的 18 个组织，向公安厅发出"最后通牒"，指责"公安厅一小撮混蛋，无视中央军委的指示和毛主席的尊严，无视 1000 多名绝食战士的生命安危，连最低一点人道主义都没有"，勒令公安厅在晚上 19 时必须答复他们的要求，否则，"将采取必要的迫不得已的暴烈行动"。晚上 20 时，公安厅派员出来接见代表，拒绝了他们的要求。

当晚 23 时 45 分，中央文革小组来电，对解决事件提出 3 点

意见：

广州静坐、绝食的各群众组织：

一、希望你们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话，不要采取绝食行为，要吃好饭，睡好觉，养足精神闹革命。

二、请你们推举代表，与军管会主要负责同志协商解决；集结的队伍，请你们回去。

三、为了弄清事实真相，由学生和其他有关单位，共同组织调查组，进行调查。

央文革小组

1967 年 5 月 5 日 23 时 45 分

中央文革表态后，军区便不能沉默了。5 月 6 日，黄永胜在军区接见“中大红旗”代表，表示公安厅二办扣留项明理由是站不住脚的，应立即解决项明问题，同时表示愿意接见绝食代表。形势出现了有利于造反派的转变。

5 月 7 日，“红旗派”在广医召开辩论会，讨论要不要结束绝食行动。最后决定服从中央文革的指示，结束行动，撤离烈士陵园广场。

5 月 7 日晚上，“红司”、“新一司”、“工联”等组织的 2000 多人，在烈士陵园门前，举行“揪广州谭震林动员大会”。

5 月 8 日，“地总”就烈士陵园广场的绝食事件及当前形势发表声明说：“种种迹象表明，一场更大的群众斗群众的武斗事件正在暗中策划进行。继‘四二二事件’后，广州地区连续发生武斗事件；有一小撮别有用心的人，煽动一些不明真相的人，每天到我总部门前破口大骂，恶意攻击，有意进行挑衅。5 月 6

日又有人暗刺我市建四公司队员。对此，省、市军管会必须采取有效措施，捉拿凶手，严惩后台，保障人身安全，保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顺利进行。”

“我们始终掌握斗争大方向，坚持文斗，反对武斗。但是，有人却一意孤行，把矛头对准我部，疯狂叫嚣要‘踏平地总’、‘血洗广州城’。有压迫，就有反抗，如果这一小撮混蛋，孤注一掷，由此而产生一切严重后果，由挑衅者和造事者承担全部责任。”

5 月 10 日，广东省军管会表态同意为项明平反。省公安厅连夜召开厅革委会、二办领导小组会议。会上传达了军区的意见。与会者感到事态严重，“认为军区态度已很坚决，如果军区甩开公安厅单独为项明平反，厅革委和总部就当了老保，就有可能受到群众围攻，厅革委和总部完了，总筹和省直大联合总部也保不住。在讨论中多数人分析形势后，认为与其垮台，不如争取主动，来一个高姿态”。会议做出几项决定：

一、同意为项明平反，11 日上午停止劳动，召开全厅干部大会宣布平反。

二、马上以公安厅名义出公告，第二天一早公告就上街，除项明外，其他有关案件也全部主动平反，决定第一批平反 5 名。

三、电告上京告状团别再冒险了，马上撤回来。

四、连夜通知总筹和省直大联合总部下属单位，如计委“大无畏”、市公安局“一二五总部”、“地总”、“红总”等，告诉他们不要行动，要“一二五总部”通知下属组织，借口对项明事件不够了解，不予表态。

因为在此之前，公安厅总部已将准备组织上京告状团，上街游行，印发郑重声明等事在省直大联合总部讨论通过，并布置下属单位待命行动。

5 月 11 日，省公安厅宣布为项明平反。因为在公告的文字上翻来覆去，第二天还未出公告。

我们再看吉林。《长春日报》被“长春公社”查封后，对两派人员都是个警示：没有自我保卫能力是不行的。各单位因此严阵以待，防备对方偷袭。于是，长春的武斗气氛甚浓，双方剑拔弩张，纷纷开始装备冷兵器。

一天晚上，工大“造大”的队伍从省实验中学门前过时，该校广播站的喇叭呼喊口号：

“分裂主义决没好下场!”

“打倒长春公社!”

等等。

工大“造大”的人咽不下鸟气，冲进了实验中学主楼的广播站。广播站里的人奋起反抗，但寡不敌众。三下五除二，就被对方拆了大喇叭，又把广播站的人俩架一个往楼下推。

因为是在晚上，学校里的人大多休息了，绝大多数人不知道主楼发生的情况。这些人被押上了对方的宣传车。

车开到工大校园里他们的据点，大学生们把这几个中学生推进一间办公室，开始教育他们：

“‘红二’这么不得人心，你们干嘛要为他们卖命？”

中学生挣扎着昂起头来，说：“我们生是‘红二’的人，死是‘红二’的鬼!”

工大的人就笑，说："你中毒太深了。"

一个小头头拿了水给中学生喝，说："好了，你也不用喊了，我们就是要给你们一个教训。为什么天天在广播里骂我们？我们就把你们得罪得那么苦吗？"

中学生说："骂分裂主义者无罪。"

头头就说："骂，解决不了问题。最后还是看真理在谁手中。'二总部'如果是对的，为什么这么不得人心？杀回马枪的有多少，你知道吗？"他又和颜悦色地做了一番思想工作，挥挥手说："好了，你们可以回去了，这喇叭，当然是不能还给你们了。咱们后会有期！"

广播站被砸，是省实验中学的奇耻大辱。第二天，他们联合工大的"红造大"，在工大校园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红造大"是工大造大中对"二总部"有感情的组织，当初没叛变，留下来组建了一支新队伍。他们绕着工大的几个教学楼游行。工大"造大"见来者不善，一个人也没出来。游行队伍走到一处大楼，"红造大"的人说："这就是工大'造大'的老巢。"

中学生们一听，火冒三丈，纷纷捡起砖头瓦块扔过去，只听得窗子玻璃哗啦啦碎成一片。

"红造大"的女生赶忙拦阻他们说："你们不要砸，他们又该捞稻草了！"

哪里阻止的住？中学生们不听，只是扔。一个高年级的中学生就喊："别扔了！"

大家说："扔又怎么样？革命造反嘛，管他那么多？"

那位同学质问道："那是不是国家财产？啊？造反就破坏国

家财产啊？”

他只是一个人的声音，竟然问得大家哑口无言。

5 月 2 日，为调查吉林省“三结合”情况，“长春公社”派出一个庞大的“三结合调查团”进驻省委大院，终于使“红二”忍无可忍，准备开始行动了，他们的目标，就是工大“造大”。

5 月 3 日，正是桃红柳绿时。工农广场花坛的灌木丛里，一声呼哨，跳出几个穿军装的大汉，一手拿着刺杀训练木枪，一手从花坛上往下掰砖头，往省实验中学的方向扔，动作凶猛而又怪异。行人一时纷纷走避。

这是省实验中学校对面“九航校”的学员。九航校有一支很善战的组织，叫“12、27 革命造反团”，是“长春公社”的基本力量之一。这几个扔砖的军人，就是“12、27”的武斗队员。

几个大汉扔了一阵儿，撤了。花坛里花木一片狼藉，路人惊魂未定，三三两两聚在一起议论。省实验中学气氛异常紧张，男生正在集合，手里拿了些棍棒、铁锹等顺手的家伙。头上都戴着建筑工人戴的柳条帽。一排壮汉，统一戴起柳条帽，也煞是壮观，他们是准备参加“红二”今天的统一行动。实验中学“造大”的二把手在做战前动员，他说：“今天是咱们‘红二’全市统一行动，要拿下工大‘造大’的武斗黑据点。进攻的任务，由别的单位负责，我们的任务，是牵制住对面九航校的‘12、27’，不要让他们去增援工大。刚才他们已经来挑衅了，再来，就坚决反击。大家注意，不要让砖头砸着。”

动员还没完，门外有女生探马跑了回来，花容失色：“不好了，来了，来了！”

省实验中学的学生们立即出动，“柳条帽”一律弯腰小跑，风驰电掣。两边女生就鼓掌，以无限信任和崇敬的目光目送勇士出征，还涨红了脸喊道：“加油！快，快呀！”

这喊声，美丽动人。让那些男生顿时热血上涌，将生死置之度外，黄继光、董存瑞的形象不断在脑海里闪现。杀敌报国，就在今日乎？狗日的“长春公社”，咱们拼了！

出了校门，就见在对面人行道上，“12、27”已经排好了散兵线。几百号壮汉，手持刺杀木枪，严阵以待。他们是军人，但为了考虑影响，都没戴军帽、没穿军上衣。一色的白衬衫、蓝军裤，杀气腾腾。省实验中学和九航校之间隔着的马路，是斯大林大街的南沿线。虽然不常有过路的汽车，但还是有行人和自行车通过。看到这个架势，路人不由胆战心惊，都停下来，不敢走了。有人干脆把自行车一支，看起了热闹。其间有人，还向他们鼓掌。

省实验中学这边，是几百号“柳条帽”，各个捡了些砖头瓦块在手里。两军的大喇叭，各喊各的，搅成一团。这时，省实验中学的大喇叭突然播放起《骑兵进行曲》，乐曲高亢、嘹亮、急促……

这就是攻击令了，只听“柳条帽”一声呐喊，排山倒海的向对方冲去，一时间，棍棒齐舞，砖石乱飞。

这是一次现代冷兵器作战。但要说明，现代人不同于古代人，文革后的人更是狡猾十倍，两军交手，决不会缠在一起玩命厮杀。只要一方冲锋，另一方就后撤，两边始终保持一定距离。一场武斗，不过就是一场没完没了的拉锯战。

## 第 619 回：□矛□，万人冷兵器大战 轰□□，工大土坦克出击

双方都是初次参加武斗实战，但没有几分钟，大家就都适应了。这种交战，跟着集团冲锋就是了，只要不是单兵突进，一般没有什么危险。对方虽然是空军，但也是练习过步兵基本功的，膂力强，有的砖头扔得特别远。有时远远地一大块就甩了过来，这边的人就惊呼："小心！小心！"大家纷纷躲避。好在砖头不是导弹，空中运行没有那么快。

省实验中学采取的是进攻态势，几次冲锋，砖如雨下，冲到了九航校的篱笆墙附近，几百个虎狼健儿上去一阵踩踏，他们的竹篱笆墙就荡然无存了。当然，他们也采取反冲锋，把省实验中学一直赶过马路。

交战中，忽然对方营垒里跳出一个怪物，穿得臃肿，酷似变形金刚，脑袋都看不清楚。这怪物又蹦又跳，狂扔石块儿。中学生很惊讶，定睛一看，原来是一个穿着刺杀防护服的人，脑袋上戴着面罩。这个不要命的！这边立刻万砖齐发，终于把他逼退。

兵临城下，九航校的大喇叭忽然放起了毛泽东诗词歌曲《西江月.井冈山》，一个浑厚的男声在唱："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

双方的拉锯战，有时也稍有停歇，过路的老百姓就赶快抱着头弯腰跑过，边跑还边喊："可别打啊，可别打啊！"

时过中午，大家都饿了，双方就不约而同收兵。

吃过午饭，风雨操场上开来大批卡车，一车一车的都是人。

原来“红二”大规模的调兵遣将开始了。担任攻坚任务的队伍，是来自几个技校的学生。他们跳下车来，就马上整队。卡车队掉头又开走去拉人。没多大一会儿，操场上已经集合了两千多人，清一色的柳条帽，手持长矛。这是当时最先进的装备。长矛由锄草的锄头改制而成。东北的锄头，木柄上是一个弯勾，弯勾上焊着一块菱形铁板。把这小铁板敲掉，把弯勾打直打尖，就是一支上好的长矛。技校的人还在上面缠了红布条，宛如红缨。

他们的队伍非常整齐，长矛如林，红缨飞飘。什么叫“虎贲”，什么叫“画角连营”，什么叫“可汗大点兵”，什么叫“四万义军同日死”？你不见眼前这种场面，就不可能想象。

省实验“造大”，也算是一支劲旅了，但仍被眼前的军容所震慑。大家都默默无言地看着。

卡车还在一车一车地拉来人。勇士们在分发武器，做战前热身。“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其中有一部分人，武器不够，省实验中学的校办工厂就抓紧时间，把一捆一捆刚买来的锄头打成长矛。

队伍终于出发了，黑压压的一队一队，有节奏地呼着口号：“下定决心，不怕牺牲……”

良人远征，灭此朝食。此时，远眺工大方向，已经是“尘埃不见咸阳桥”。工大“造大”的末日似乎就要到了！

长春“红二”的这场围剿战斗，组织得有板有眼。事前秘而不宣，突然袭击，然后铁壁合围。包括牵制、掩护、后勤保障、迷惑宣传等等，全市被动员起来的力量至少有 20 余万人。约有 5 万战斗兵力，直接投入了主战场。

5 月 3 日这天，“省红革会”在人民广场召开“打倒无政府主义思潮誓师大会”。“长春公社”完全不知道“红二”要干什么，指挥系统基本失灵。各单位的“公社派”组织紧张万状，只能自保。在战斗中，“公社派”的大约五、六十万基本群众，竟然没有组织起任何援救。直到后来，他们才察觉，总攻击的目标是工大“造大”，但各单位的公社派均被“红二”强势压住，不敢动弹，只能在大喇叭里狂呼口号。

一直到下午，省实验中学这边也不见对面九航校“12、27”有什么动静。他们的校园内，还是一片狼藉。在公社派里，有好几个这样的军校造反派，都持死硬态度。除了他们，还有兽医大学“色团”、防化学院“105”。当初，“二总部”夺权时，他们曾是坚定的盟友。因为穿军装，他们上街游行支持“二总部”时，特别具有鼓舞人心的力量。“长春公社”一分裂，他们就一下坐过去了，能文能武，尤其凶悍。2 月 23 日围攻人大八舍时，兽大“色团”也参与其中，冲锋陷阵，后来也遭到镇压，全副武装的卫戍区军人围住了他们的宿舍，迫令他们出来投降。出来一个，就上去俩士兵抓住，把领章帽徽扯掉，架到军车上去。看热闹的人，就鼓掌。“二总部”对这几个军校组织，真是恨得牙痒痒的。

工大通往斯大林大街的路口上，人山人海。工大“造大”的一支武斗队冲了出来，正在跟师大“造大”的队伍开战。工大“造大”在南，师大“造大”在北，两军对阵，各有 2000 多人，全副装备，只是长矛上没系红缨。除了这 5000 虎贲，阵后面，南北两方都有大批市民，约有 7、8 万人，把宽阔的马路塞得满满的，整个一段斯大林大街都成了战场。马路上，已是砖石满地。

他们两家的打法，跟省实验中学和九航校一样，都是一方呐喊、扔砖、冲锋，另一方就退，但是场面可大多了。

师大那边一冲锋，只见对面黑压压的柳条帽、亮闪闪的长矛排山倒海而来，杀声震天动地。这边就慌忙后撤，老百姓也跟着撤，一片鸡飞狗走，兵败如山倒的样子。对方冲一阵儿，就停下来。

工大稳住阵脚后，马上再反冲锋，后面的老百姓也跟着喊、跟着冲，又是排山倒海地压过去。这下，轮到那一边狼奔豕突地逃命了。看热闹的群众，两派观点的都有，但此时全乱了，站在哪支队伍后边，就为哪支队伍助威。

7、8 万人就这么冲来冲去，人声鼎沸。不过，倒也看不见伤亡。但是，万一谁摔个跟斗，跑不及，那立刻就会被无数的长矛扎成刺猬。

战斗间歇时，一个奇特的场景出现了。两军之间，忽然跑来一个排的徒手解放军战士，是省军区的。他们人人手拿《毛主席语录》，一边跑，一边喊："要文斗，不要武斗！"站定后，仍然挥动《毛主席语录》，高喊毛主席的指示。一个排长模样的军人，还向双方喊话。在两队虎狼之师中间，这一小队解放军，显得是那么弱小无助。所有的人都看呆了：他们怎么能挡得住那排山倒海的力量？但是，军人们个个神情庄重，虔诚地宣传着。

没有人为他们的这个行动所感化。工大的人继续往师大那边扔砖头。因为解放军靠师大的队伍近一些，开始工大方面还有所顾忌，后来就不管了，连解放军也一样砸。砖石接二连三扔过去，士兵们决不躲闪，仍然在喊口号。人群中有人忍不住喊："打着

解放军了！”但这善意的喊声，马上被工大重新冲锋的鼓噪所淹没。万牛奔腾般一样的人海，又冲了过去。那一小队穿草绿军装的军人，立刻被冲的无影无踪。

长春的斯大林大街，在当年，是全国仅次于北京长安街的美丽大街，有绿化带，有四排遮天蔽日的白杨。和平年代，这里是情侣散步最好的地方。但是，在 20 世纪的这个下午，在密密麻麻的长矛簇拥下，一个钢铁怪物，就这样缓缓地碾过了昔日的情人大道。

春天的白杨，树叶翠绿。在下午的阳光下，叶子都是透明的，美得像童话世界。这里的宁静，此时已离得是何其遥远啊！在这个金戈铁马的时代，整个中国，就像一锅沸水。任何一个水滴，掉在里面，都不可能无动于衷。就是圣人也不能免。

在斯大林大街轰轰隆隆地跑着的这 7、8 万人，构成了那个时代必不可少的背景。置身在这个人海里，你会感到，人世间，真的有一种不可控制的力量。

过了一会儿，人群中忽然起了骚动。大家回头一看，只见一辆奇形怪状的坦克车，从工大方向开过来。它的模样，很像是英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制造的第一批坦克。这是工大拖拉机系学生的杰作，用一辆履带式拖拉机改装的，黑色，有炮塔似的装置，但是没有火力设备。

坦克缓缓地移动，像天外来客。老百姓惊呼起来，工大“造大”欢声雷动。

很快，技校的人全撤下来了。实验中学的操场上，一队一队的人正在撤回。与中午出发时有天壤之别。队伍完全没有行列，

人们疲惫已极的样子。接应的卡车已经停在操场上，正在往上搬伤员。轻伤挂彩的无计其数，最惨的是三个重伤员，被长矛当胸贯透，要活不成的样子。沮丧笼罩着这支败军。

晚饭后，全市所有的广播站都响起来了，工大、师大、305所那边，广播声就像开了锅。春夜里，外面不是蛙鸣，而是一片沸腾的广播声。

这一晚真是非同寻常，“红二”数万人将工大“造大”的大本营，一座教学楼围住，但屡攻不下。那时候，没有炮，也没有攻城器具，单凭长矛步兵的匹夫之勇，如何能成？工大“造大”知道这是绝地一战，反抗得非常激烈，“红二”顿兵于坚城之下，放火烧了一些桌椅板凳，工大的上空，一片火红。工大“造大”的广播声已有无限悲愤的意味。“保卫苏维埃”，就在此夜！

到后半夜，“红二”全撤了。

这一战，“红二”在道义上和实际上，满盘皆输。既没有剿灭死敌，也没在舆论上占到什么好处。从第二天起，“长春公社”宣传机器开足马力，渲染包围战的惨烈。其声势，不亚于另一场战斗。老百姓都有同情弱者的心理，舆论顿时沸腾，“红二”成了人人皆曰可杀的残暴匪徒。

“红二”半夜撤围，大家甚不可解。资格老的老造反们，就发牢骚说：“红二自从吸收了那些省委干部进来，就完了。干部哪有什么造反精神，这也要考虑影响，那也要考虑政策。前怕狼，后怕虎的，还打什么仗？”

众人都很沮丧，确实啊，打又没打痛快，还落了一身骚。“红二”，真是越来越不行了。

然而，从这以后，“长春公社”也好，“东方红公社”也罢，再没有人敢组织一次类似查封《长春日报》那样的主动战。

5 月 11 日，吉林省委领导干部阮泊生、兰干亭、雷鸣玉、宋任远、周光 5 人贴出《对当前长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和一些问题的看法》的大字报。表态支持长春“红二”。这下，舆论立即炸了锅。“红二”笑逐颜开：“三结合”就等着他们这一结合呢。“长春公社”没料到会有这一手，简直气歪了鼻子。

“长春公社”在干部政策上失了一着，马上补救，他们看好了省委书记处的一位书记，叫郑季翘，算是他们的革命干部资源。郑书记是个全才，文章写得很棒，有一篇《论“形象思维”》曾上过《红旗》杂志，被毛泽东夸奖。他的口碑也不错，但“红二”方面，当然要起而反对，赶紧给郑季翘罗织罪名，痛批不已。

长春是个幽静的城市，那时候还不大，一条 7 公里长的斯大林大街，就纵贯了整个城市的南北。城里没有几座很高的楼，显得平和。到处都是绿树，沿街单位有小围墙或竹篱笆，竹篱是漆成深绿色的，入夏就有紫色的喇叭花攀援其上。阳光明媚的日子，篱笆内的野生荒草蓬蓬勃勃，有一种安宁气象。但是这一切，在那个 5 月，在那个 6 月，被彻底打破了。

长春市的群众组织分为两大派，势不两立。长春市的老百姓也分为两大派，各拥其主。为了捍卫本派的声誉，人人都很自觉。那时，大家可以拿粉笔在地上写标语口号，走上街，满地都是“二总部必胜！长春公社必败！”或者完全反过来的标语。从 4 月到 5 月，街头巷尾，经常能聚起一伙人来，自发的展开辩论。民间的铁嘴，现在可是露了脸。那时人们还是认真的，辩论是“文斗”，

一定要言之有据，逻辑性强，耍赖、耍蛮，那是要遭人嘘的。

“红二”掌了权，胆子小得多了，武的方面不大行了，总部觉得本派人才多，就积极鼓励街头大辩论。“公社派”是新生力量，无比自信，也要趁机搞舆论扩散，所以从容应战。两派辩论得不亦乐乎。有搭擂台的，有下战表的，有随机而发的，一到黄昏，斯大林大街上就人声鼎沸，到处是辩论中心和围观人群。人类历史上，自古希腊以来就没有过的、最壮观的全民政治辩论，出现在华夏。老幼妇孺，无不沉溺其中。口若悬河之士，被人们奉为时尚英雄。

长春市两派辩论最宏大的一次，是以 “宋任远是革命的领导干部还是三反分子”为辩题，于 5 月 28 日的一场搭台辩论。与会者约 5 万人，双方一对一的上场，辩论从上午 10 点开始，至深夜 12 点结束。共 14 个小时，唾沫不知道飞了多少。

## 第 620 回：清华园，建成毛泽东塑像 □绝□，郑州五四大武斗

5 月 3 日，中央军委根据军委扩大会议精神发出两个文件：《关于捕人权限的规定》《关于处理军内错拘捕和取缔、解散组织问题的通知》，着力解决前段运动中部队发生的错误拘捕群众、解散群众组织的问题。

5 月 2 日，由王力、关锋起草，经陈伯达修改的《〈修养〉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一文送毛泽东审阅。

5 月 4 日，毛泽东对该文批示：

有些意见，写在文内，请酌定。

毛泽东

五月四日

改后应送小组及常委碰头会讨论通过。又及

1967 年初，在一次开会时，清华大学建筑系美术教研组副主任程国英提出了一个建议："二校门"被拆后，那里显得空空荡荡，"是否可以在那里立一座毛主席塑像？"这一想法立刻得到了"井冈山兵团"的支持。

雕像筹备组很快成立，由美术教研组教研室主任、雕塑家宋泊和他的夫人徐沛贞，及青年教师郭德组成，"井冈山兵团"的高鲁冀担任负责人。

做塑像首先需要设计稿，年过半百的宋泊尽管在雕塑方面已经颇有经验，仍不敢贸然动手。他们很快在北京雕塑玉器工厂选定了叶毓璋做的一座九十多公分高的毛泽东全身像设计稿，并得

到了“井冈山兵团”负责人的同意。

设计稿拿回来后，用了 1 个多月的时间放大。北京工艺美术总公司的雕塑家张松鹤后来也加入进来。因为张松鹤是党员，给毛主席像塑脸的任务就交给他，宋泊和郭德负责做身体和衣纹。

1967 年 5 月 4 日，在清华大学“二校门”的原址上，全国第一座大型毛泽东塑像正式落成。5 月 6 日的《人民日报》记载了这一盛况：

“四日，在清华大学，万众欢呼，群情沸腾。

一座巨型的毛主席全身塑像，在清华园矗立起来了！

这座用钢筋水泥制作的毛主席塑像，加上底座，高达八点一米，像雄伟的泰山，巍然屹立在清华大学校园中心。毛主席身穿军大衣，神采奕奕，高举他老人家那雄劲的手臂，为无限忠于他的革命师生和亿万人民指出前进的方向。”

清华“井冈山”还专门在塑像旁装起了当时罕见的钠灯，四面照得通明。毛主席塑像成了清华大学新的景点。各地为造毛主席像，前来参观取经的络绎不绝。“团派”特地抽出专门人手，负责把雕像组从放大到浇注整个过程编成一套材料，以供来访者

索取。有的外省市干脆开汽车来到学校，请他们翻模好再用汽车拉回去制成成品。”

毛泽东塑像底座上，是刊登在 1967 年 5 月 1 日的《人民日报》上的林彪题词：“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其实，在清华大学的毛泽东塑像即将落成时，蒯大富就在一次中央首长接见时，向叶群提出：“想请林副主席给清华大学毛主席塑像题词。”叶群欣然同意。于是蒯大富就在一张纸上写到：“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他还在纸条上特别注明：“横写竖写都可以”，将这张纸条交给叶群，请她转呈林彪。

后来，蒯大富多次在清华大学和人提起：“林副主席答应给我们题词。”

4 月底的一天夜里，林彪的题词到了清华大学，“井冈山”在西大操场向同学展示，众人排成一排，一位同学举着林彪的题词来回走动让大家看。随后突击刻在毛泽东塑像的基座上。

谁知，林彪题词的手迹却在 1967 年 5 月 1 日《人民日报》第一版毛泽东像的下面正式发表了。

于是，清华大学有人议论说：“林副主席的题词不宜说是给一个组织提的，登到报上全国用。说是给一个学校题的不太好。”

工物系的孙维藩同学是“414 串联会”的，他在那天的日记中写道：

“1967/5/1 星期一晴

今天发表了林彪同志题词：‘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

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林彪六七年五一节’。这是为我校毛主席塑像题的，但报上没说，看来中央对老蒯是有了解的。”

在那个年月，人们对领袖的热爱之情难以抑制。北京大学、复旦大学、韶山火车站、海军大院……从南至北，毛泽东塑像在全国各地拔地而起。由于校内的群众组织派别互相对立，北京大学甚至先后在北大西门和图书馆处建起了两座毛泽东塑像。北京科技大学和马路对面的中国地质大学也分别建起两座毛泽东塑像，一模一样，相对挥手，隔街相望。

在上海，“工总司”、“同济东方红”、“上体司”、“红三司”、“外语学院革造部”、“新复旦师”、“新师大师”等 17 个群众组织听到清华大学塑毛主席像的消息后，提出了《关于铸造巨型毛主席立像的联合倡议》。尽管巨型立像没有造成，但各大学都纷纷建起了毛泽东塑像。

同济大学“东方红兵团”修建的毛泽东塑像高 7.1 米，加上底座 3 米，总高度达 10.1 米，且底座上和清华大学一样刻有林彪题词的“四个伟大”。

复旦大学 “新复旦师”则在修建毛泽东塑像时独创了一套完整的“三数模式”：像高 7.1 米，加上 5.16 米的底座，分别纪念中国共产党在 7 月 1 日诞生和由毛泽东主持起草的“五一六通知”。而 7.1 加上 5.16，正好是 12.26，又是毛泽东的诞生日。这套“三数模式”也被许多地方在修建毛主席像时仿效。

没有人能统计清楚，“文革”期间全国党政机关、学校、城市公共设施，包括村庄在内，到底曾立起了多少座毛泽东塑像。

4 月 24 日，首都红代会“特派河南战斗队”发表声明：根据谢富治的指示和首都红代会的命令，准备返京。4 月 25 日，河南“二七公社”在河南医学院大操场召开“热烈欢送首都红代会革命战友凯旋返京”大会。会上宣布“河南二七公社首都兵团”成立。会后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

4 月 30 日，开始抬起头来的“二七公社”在北京红卫兵和“解放军赴豫调查团”的共同组织下，在郑州市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愤怒的人群将郑州市公安局围了个水泄不通，谈判代表以中央军委《十条命令》和《人民日报》社论“正确对待革命小将”为依据，与公安局军代表辩论，要求放人。公安局死活就是不同意。近百名愤怒的示威者，就势在郑州市公安局对面的二七纪念堂前坐了下来，他们打着“强烈要求释放被捕学生！”“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横幅，开始了静坐抗议。

静坐延续了 3 天 3 夜，但河南省军区毫无放人的意向。于是，静坐变成了绝食，而且，有数百人参加。

但是，河南省军区还是不松口。激愤的北京红卫兵参加了绝食队伍，“解放军赴豫调查团”参加了绝食队伍，中学生参加了绝食队伍……绝食的人发展到近千名，躺满了二七纪念堂前的广场，躺满了公安局门前的二七南路……

参加绝食的人很多，去了之后就往那儿一躺，以节省体力。中学生不太老实，有时候弄一水壶牛奶，每人喝一口，或者用加了葡萄糖的水，大家相互传，每人喝一口。但是传给旁边的大学生时，他们气得咬牙切齿，不但不喝，还骂中学生，让他们别在这里捣乱。

对立面组织不断派人冲击绝食现场。绝食的人身体本来就虚弱，还要挨打。他们被要求像解放军那样，做到打不还手。

绝食持续了几天，绝食现场附近的第二人民医院，每天都有一个个的担架，抬着因绝食而休克被送进医院的青年，其中就有戴着帽徽、领章的军事院校的学员和佩戴着首都红卫兵袖章的北京学生。事态日益严重，绝食事件揪着各派人群的心。

这时，江青办公室打电话给“二七公社”驻北京联络站，劝他们做工作：不要绝食、要爱惜身体。

“十大总部”开始动作了，由河南“二七公社”、北京红卫兵、“中国人民解放军赴豫调查团”组成的“绝食斗争联合指挥部”得到消息：5 月 4 日，河南省“十大总部”在省军区的授意下，要召开万人大会，以庆祝五四青年节的名义，组织一次大规模的游行，游行的路线恰恰经过“二七公社”的绝食现场。冲击绝食现场、以暴力驱散绝食队伍！

绝食斗争已经进入了成败的关键时期，是避免冲突、主动撤离绝食现场？还是以武力抵抗，保证绝食斗争的最后胜利？两种意见，在指挥部内部发生了激烈的争执！

北京红卫兵代表力主撤离！他们认为：有中央军委的《十条命令》，河南军区最终也要释放被关押的学生，与其流血牺牲，不如暂时撤退，等待中央的命令。

河南“二七公社”的代表坚决不同意撤离，他们认为：河南省军区就是要借“十大总部”的游行，破坏绝食行动，如果撤离，正好上了何运洪的当，绝食只要再坚持一下，一定会取得最后的胜利！

两种意见争执不下，最后，绝食斗争的总指挥、“中国人民解放军赴豫调查团”团长一锤定音：“打！绝食的同学们已经饿了将近一周，同学们的苦、不能白受！监狱的同学们已经坐了两个月的大牢，他们的罪、不能再吃！何运洪想逼我们撤退，他的企图不能得逞！‘二七公社’翻身的第一战役，不能窝窝囊囊地不了了之！不能让他们觉得我们像柿子一样，想怎么捏就怎么捏！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坚决保卫绝食现场！不让一个绝食同学受到伤害，不释放被捕的学生，我们与他们血战到底！”

他的话让全体指挥部的成员血脉偾张，豪气冲天。原先主张撤离的北京红卫兵也放弃了撤离的观点，武力保卫绝食现场的决议就这样形成了！

郑州煤矿机械厂连夜制造栅栏，在二七纪念堂四周的各个路口设置了路障。并且成立了“五四战团”，准备再发生冲突的时候要还手了。“五四战团”的主要组成人员是豫剧团和评剧团的武生，大本营设在大石桥的露天剧场。

在路障的后面，由郑州国棉六厂“工人赤卫队”、郑州印染厂“八一战斗队”、技校“826”、纺织机电学校“1017 战斗队”和“五四战团”，排列了十余道防线。为防止对方从房顶进入绝食现场，在绝食现场周围的楼顶，房顶，安排了大量的中学生守在那里，命令他们：“只要有人上房，就揭了瓦砸！”

经过一夜紧张的准备，“二七公社”迎来了 5 月 4 日血红的太阳，她从东方冉冉升起，染红了天边的云彩、染红了二七纪念塔椎型的塔尖……

“十大总部”庆祝五四青年节的大会如期召开。大会结束后，几万人的游行队伍，浩浩荡荡，一路高喊着打倒“二七公社”的口号，直奔绝食现场而来。走在队伍最前面的，是郑州体校篮球队高大威猛的运动员和铁路司机学校“红军造反队”膀大腰圆的预备司机。紧跟着他们的，是各工厂精选的浑身精肉的锻工，他们的手中，高举着扯起小旗的木棒、棍子，直扑挽着臂膀，挡在路第一道防线的学生们。

第一个回合，第一道防线的学生就被运动员手中的木棒、棍子劈头盖脸地一顿挥舞冲垮了。

守卫在栅栏后面的工人与对方展开了一场最原始的搏斗！

混战距离绝食现场越来越近！“二七公社”从房顶居高临下的攻击，使不少“十大总部”的游行者受伤。这时，国棉六厂“工人赤卫队”冲了上去了！郑州印染厂“八一战斗队”冲上去了！纺织机电学校“1017”冲上去了！个个魁梧剽悍的“五四战团”冲上去了！一阵猛烈的反击，将接近绝食学生的“十大总部”的队伍赶出了绝食防卫区的头一道防线，煤矿机械厂的工人迅速将备用的栅栏推上，又一次封锁了通往绝食区的道路。

从上午到下午，“十大总部”一波又一波的攻击，被“二七公社”一次又一次地阻住。武斗现场，血流满面、瘸腿坏胳臂的伤员，被一个个抬到距武斗现场最近位于苑陵街中段的中州市第二人民医院，这里一下子全是双方的伤员，其中一个中年男子的肩头深深地扎着一把剪刀。来不及救治的伤员，从病房排到过道、从过道排到医院的院子里、从院子排到苑陵街上……满地坐着的、躺着的伤员们痛苦地呻吟着。

武斗的情况很快就上报到北京，中央文革电令河南省军区，立即释放被关押的学生。

武斗持续了将近 6 个小时，河南省军区派出 8202 卫戍部队来到现场，将武斗的双方搁开。

在武斗难以遏制的时刻，郑州市公安局释放了党言川、申茂功等被捕人员。“二七公社”绝食取得了最后的胜利。“绝食斗争联合指挥部”决定：“解救斗争取得胜利！绝食立即结束！由河医‘东方红’负责，将所有参加绝食的同学和武斗中受伤的同志转移到河南医学院休养治疗，距离绝食现场最近的 15 中‘红旗’负责清理现场，‘五四战团’和‘工人赤卫队’掩护撤退！”

所有绝食人员一夜之间，全部撤离了现场。

撤到农学院的“二七公社”人员，晚上就睡在大教室里，地上铺着稻草。一个男同学感慨的说：“就我自身的感受而言，这样的稻草一天也不想睡；如果革命需要，我是可以一直睡到底的。”很多的同学都受到他的感染。

第二天，5 月 5 日，河南“十大总部”再次组织 10 余万人游行，游行队伍直奔二七纪念堂的绝食现场。这一天，参加游行的人，每个人的手中拿的，不再是小旗、标语，而是高举着的木棒、在齐腰的木棒上面，横钉着一个一尺长的木版，木版上用血红的字写着“向二七公社讨还血债！”之类的标语，游行队伍的最前面，还是高举着大旗的体校的运动员，不同的是，挂着大旗的旗杆，不再是细细的竹竿，而是拳头粗、一人多高的长长的木棒！摆明了今天是打架来了。游行的路线依然是昨天的路线。但是到了二七广场，昨日还是人山人海的二七纪念堂已经空无一

人，绝食的近千名学生和守卫绝食现场的几千工人，此时已踪影全无。

无处发泄的游行者，迁怒于绝食现场周围支持、声援、为绝食服务过的群众，只要在路边认出一个“二七公社”的，揪过来，就是一阵暴打。从那天起，所有的单位都在搜寻“二七观点”的人，只要抓住，就会被打的鼻青脸肿。

声势浩大、杀气腾腾的游行队伍，一路威风八面，横扫“二七公社”的据点；无论是学校、商店、工矿、机关，只要是“二七公社”占据的地方，游行的人都要扑进去。

游行队伍冲进了河南医学院，不费吹灰之力，将河医“东方红”撵出了校园；被送到这里治病、疗伤的绝食的、受伤的“二七公社”的伤员、病号，被从病房一个个扔出去，医学院的操场，横七竖八躺满了旧伤上添上新伤的学生。

游行队伍冲进了郑州大学，将“郑大联委”总部赶出了中文系大楼。

“十大总部”如风卷残云，打砸席卷了“二七公社”的组织23个。“二七公社”被压缩在郑州粮食学院、河南农学院、国棉六厂、郑大附中、郑州技校等几个孤零零的据点。

“二七公社”驻京联络站动员，在京的“二七公社”人员立即回河南。但是他们一到郑州，大街上看不到一个人戴“二七”袖章，到处是手持棍棒杀气腾腾的武斗队，十分恐怖。

每一个单位都开始寻找“二七”观点的人，这一次，不再是登记、悔过，抓住就是一顿臭揍，只要被指证为“二七”的人都会遭到一顿毒打……

恐怖延续了半个多月，刚刚复苏的“二七公社”再次陷入困境。“二七”观点的群众有单位不敢上班、有家不能回，大规模的逃亡又一次开始了。郑州铁路北站，黑压压的人群，寻找着北去的火车，在闷罐或敞顶的货车里，尽是逃往北京的人群……

在郑州负责“二七公社”组织工作的农学院学生薛建生，为避免“二七”人员的更大损失，下发了一个《疏散通知》，让大家赶快离郑，投亲靠友。

## 第 621 回：暴抗暴，“二七公社”不屈服 周恩来，接见财贸口代表

刚刚出狱的“郑大联委”党言川、“豫农红总”的范念民、国棉六厂“工人赤卫队”的申茂功，郑州铁路局的唐歧山等 15 个“二七公社”首领，和“中国人民解放军赴豫调查团”头头在郑州粮食学院召开“二七公社”核心组紧急会，商议如何面对眼前的局势。一种意见是全部撤离据点，再一次转入地下斗争；另一种意见是以暴治暴、武装抵抗！

范念民说：“我坚决反对撤离的观点！我们‘二七公社’现在仅存的几个据点，是极其珍贵的，它们就像红军时期的红色根据地，是全省‘二七’战士的希望所在，这种希望、是革命的火种，有她、就有可能重新燃起燎原的大火，撤离、就是妥协！就是倒退！”

他接着说：“我们吃亏就吃在只会文绉绉地写文章，伸着头等对方的拳头！大家想一想，如果没有二七纪念堂的武力保卫战，今天、会是什么情景？我们在座的能出的了监狱的大门？绝食斗争能取得今天的胜利吗？历史的教训不能忘记，我们不能再软下去了，我的意见是坚守！坚决地防守！寸土必争地保卫现有的阵地！”

党言川不无担忧地问道：“守？怎么守？‘十大总部’一上就是几千人，上万人，我们守的住吗？”

范念民反驳到：“怎么就守不住？井冈山的红军几万人，不是照样打败国民党的几十万大军的围剿吗？问题是我们敢不敢

守！”

最后，还是“解放军赴豫调查团”一锤定音：“撤离？隐蔽？地下斗争？请问大家：我们撤到那里？我们藏到那里？那里是可以隐蔽的地下？中州不是井冈山、不是大别山，没有深山密林让我们藏身！”

“有同志说，避开对手的锋芒、等中央表态后，我们东山再起；我警告大家，这种思想更是极其危险的，中央看的，就是那一派占有民心，那一派能稳定河南的局势，我们撤了、躲了、退了，让何运洪控制了局面，不是明明白白地告诉中央、告诉大家：我们河南‘二七公社’是一个被粉碎了的组织，根本左右不了河南的局势，你们说：那一个领袖，会依靠这样一个一压就垮、一打就散的队伍呢？”

党言川第一个表态：“我同意，第一、首先解决想不想守的问题，其次、解决敢不敢守的问题，最后、才是怎么守的问题！想不想守，敢不敢守的问题，这是战略问题；如何才能守的住，怎样守，是战术问题！”

“二七公社”在党言川的带领下主动出击，冲上街头。改装后的宣传车，呼啸着穿行在郑州的主要街道；中心市区的大楼上，不停地飞落雪花似的传单；在夜色的掩护下，他们将“炮轰何运洪、打倒张树芝！“的巨幅标语刷在省委、市委的红墙上，刷在郑州所有的主干道上，甚至刷在河南省军区戒备森严的大门口……

从北京刚刚回到郑州的“二七”人员，联系了几千人，于 5 月 8 日走上街头，高喊：“只要打不死，还要干革命！”逐渐恢复

组织。在有些“二七”力量还占优势的学校、单位，逐渐建立了一些宣传阵地。但是依然不断遭到对方的袭击。

我们再回到北京。5 月 4 日晚，周恩来在国务院会议厅接见财贸口各单位群众组织代表。他首先问各地的联络委员会“还有作用吧？这个联络委员会是我提议的，现在看有点流产的味道。一没事干，你们就打内战。你们是从哪个战场回来的？中山公园打了，还有被打伤的。敖本立同学，你到公园去了，没受伤？”

敖本立答：“没有。”

周恩来说：“你们的夺权发展也不平衡。外贸部分成两派了，为什么要分？”

答：“有些原则问题。”

“什么原则问题？观点问题嘛，那也不能上纲到敌我矛盾。”“外贸分成两派，你们能那样严重，达到敌我问题？革命派不能联合起来？”周恩来又问：“财政部怎么样？”

答：“4 个司令部，两大派。”

周恩来：“4 个司令部观点不一致……”

代表答道：“一、三司令部一致，二、四司令部一致。”

周恩来接着说：“一定会有对立面的，不会一帆风顺的。有对立面，有好处，能锻炼你们。我们与红代会说了，除农贸口可以去外，其他不要去。但有些大学不听，还是去财政部不少人。你们年纪轻轻的，闹革命就会有人反对，总是要一分为二，赞成的说好一点，不赞成的说坏一点。后来先念同志承认了错误嘛。”

众人说：“没有向我们承认。”

周恩来：“没有机会嘛。12 月 31 日以后，形势发展了，出

现夺权斗争。现在还是财贸口要开大会嘛，先念同志去检查一次，然后个别再开小会。

现在北京的大字报都变成标语了，标语多了可就失灵了。今天天安门有一张大字报说伯达是北大校长。这是我说笑话嘛，今后连笑话都不能说了。那是在天安门上，蒯大富向我说，清华需派军事代表，我说可以试一试。聂元梓也提出来派军代表，我说北大还是校长制嘛，谁去当校长呢？我说伯达同志。我说伯达这是说笑话嘛。”

“财贸口还是开大会，先念同志去检查，请中央文革同志参加。然后各部开小会谈一谈，谈清楚，都是是非问题嘛，不是敌我矛盾。就是 2 月先念同志说了错话，做了错事，还是人民内部矛盾嘛，财政部的事还是人民内部矛盾。你们不是泄密很多吗？”

答：“泄密问题，是政治陷害，谁泄密，泄到哪里都是个谜，预算没有泄。”

周恩来：“这个事情，弄不清楚，你们到部里谈嘛，如吴波说错了，吴检查嘛。”

“现在是这样问题，一个部有两派，不要看成了不起。机关夺权斗争会有反复的，这是考验你们，吸取经验教训。如果造反精神不够，更要往前进；思想保守，要追上来；方向错了，要回到主席正确路线上来。总不能就是一个造反派。如清华‘井冈山’一万多人，没有保守思想？那保守思想哪去了？果然里边有分化，这是事物的发展规律。就是要摆观点，讲道理。你们为什么要打内战？就是观点不太清楚就打起来了。解放军去劝还不听，解放军还挨打。天津南大、天大打架，我们事先让解放军劝告，

他们不听，打伤了不算，还打死了人。他们自己要检讨，把凶手交出来。以力服人是不行的，要以理服人。不要怕有保守派。没有保守派，怎么能有造反派？没有右，怎能有左？不允许保守派存在是不对的。一切都有对立面，你们不允许有对立面，中央政治局常委都有对立面，怕什么？我们支持你们，不等于把保守派压下去。支持你们是帮助教育他们，争取分化他们。”“不要一见保守派就怕的了不得，就要打。你们说是保守派打的，你们不打嘛，你们劝嘛。首先要允许人家把不同观点摆出来，没什么可怕的，要意识这个问题，才能使你们的观点更加前进。”

“上次发票的会议上（指 4 月 30 日的会），我说了一下，现在夺权斗争，机关的三结合，有两种设想，都要有革命群众的代表。一种是有革命组织的代表、高级领导干部、中级干部，他们经过群众通过的，这样的三结合。前提要有革命派的大联合，大联合要经过大批判。集中批判党内最大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刘少奇、邓小平，联系到本单位斗批改，才能实现大联合；在这个考验下，才能形成三结合。这是一种老中少的三结合。另一种办法，是有的部门派军代表，由军代表、领导干部、革命群众组织的代表三结合，要创造这个条件，就要进行革命的大批判。我劝你们好好读读黑《修养》。我说老实话，我也没读，读也读不下去，现在硬起头皮来读，要写一篇批判文章，在《红旗》上发表。你们也要写嘛，不要靠刷几张标语，不能老是‘《红旗》××期社论好得很’，要写出东西来。

财贸口开个大会，会上先念同志作检查，我们讲讲话，不可能很多人都讲喽，大会后可以开小会嘛。你们财政部四个司令部

可以小范围开嘛，先念、吴波可以把十七年财政问题哪些是毛主席路线的，哪些是刘邓路线的讲一讲，联系自己的认识，然后你们可以批判。这也是对领导干部的考验，对你们也是学习。经过大批判，才能大结合，进入三结合。实现三结合，要和改革联系在一起。财政部有多少人？”

答：“有 700 人，真正办事有 100 多人就行了。”

周恩来：“可以减三分之二，这也是个大变动。真正的三结合，要通过斗批以后，这首先考验革命领导干部和考验左派。开大会长志气可以，总这样不行，时间已经快一年了。学校先参加这个大批判，还要参加学校的斗批改。所以，要认真地批判，譬如财政部也可以允许领导干部出来批判，吴雪之、王学明都让他参加批判，看他们到底有多大进步，看他们认识水平如何。

你们同意不同意开大会，先念同志给你们做检查？如果不同意，你们再开小会研究。”

他问：“开个大会，你们赞成不赞成？”

答：“赞成。”

一代表站起来说：“我们先批判一次。”

周恩来：“不行。我们一放出去，就根本不能工作了。姚依林放出去，就根本不能工作，这是 10 个月的经验。现在自由抓人之风，还未刹住，军委命令也不行。有个军事学校说，不许干的一定要干，不许去的一定要去，不许贴的一定要贴。这是什么口号？！如果你们同意，我委托联络委员会作点事。你们联络委员会 11 个人，回去听听意见，听听另一派的意见。今天就是要你们回去商量商量。先开大会，先念检查，我们参加，再回去参

加大批判运动。现在中央认为，没有改变对李的根本观点，你们回去商量一下，限于财贸系统，你们力量很够了。你们 11 个单位先开大会，再以各部为主来检查工作、批判。实际上，财贸工作不仅十七年，从主席讲财政方针就开始了，要以主席路线为纲，不符合的要批判，各部负责人去听，我们、先念同志也可参加听听。你们现在调查一大堆材料也不行，不是有人也给肖华搞了一大批材料吗，站不住嘛。如果你们不同意，还可商量。你们回去商量，如果另一派不同意，请他们列席会好了。你们商量好后，通知联络员，再召集你们开会。你们回去先讨论，然后各单位讨论，然后再召集你们开会。同意不同意？”

答：“同意。”

人民银行总行代表反映三大案件问题，周恩来问：“有两个人失踪了，人找到没有？”

一代表说：“卫戍区知道何伟在那里，说这是组织问题，不告诉我们。”

周恩来：“噢，卫戍区知道？傅崇碧没有向我讲过，等一会问问他。自由捉人，藏起来，此风不可长。这完全是绑票，彭真、罗瑞卿的作风，千万不要学这种东西。文化大革命是正大光明的，如坚持毛主席路线是打不倒的，背叛毛主席路线，你不打也要倒。你们不要搞这一套，这是苏修的做法。”

一代表说：“现在还有很多学校住在银行。”

周恩来：“这对业务不利了，你们要住在外边，白天去联络就行了。

不要先做结论，后搞材料。这不是毛泽东思想。对刘、邓也

是一步一步发展的，从十一中全会到现在也是一步一步提高的。主席在 65 年就与我谈了，如果主席那时早作结论，大家还不是服啦！经过文化革命，现在大家不是更服嘛！三大案件不要马上做结论，逐步认识，逐步提高。”

《前进报》一代表提出出版报纸问题，周恩来说：“报纸都要通过文革小组出版宣传组重新安排。”

有人提出要看中央会议记录，周恩来说：“中央会议记录、党组记录都不能看。”

## 第 622 回：再调查，派记者走访宜宾 五月四，川棉一厂大武斗

中央《关于四川宜宾地区刘结挺等平反的通知》的消息传到宜宾，引起了强烈的“地震”。紧接着，宜宾就发生了 “419”、“420”、“422”、“423”等武斗事件，“红色派”对平反通知有很大的抵触，组织群众进京上访，向中央文革接待站递交了揭露“刘、张”罪行的材料。

还在周恩来等中央领导 4 月 3 日再次接见宜宾代表的同时，中央文革记者站就已经通知宜宾附近的四川渡口市，即现在攀枝花市的王记者和杨记者迅速赶赴宜宾，对宜宾问题进行调查。

王、杨二位记者于 4 月初的一天晚上到达宜宾。他们一下火车，就看见站前竖立着一排排的大字报栏，被灯光照射得如同白昼一般。急迫了解宜宾情况的心情，驱使二人前去观看。一张署名“红旗派”群众组织的大字报清楚地写明：中央已派《红旗》杂志记者杨某某、《解放军报》记者王某某，前来宜宾调查了解情况，支持革命的“红旗派”。他俩的名字，其中一人有一个“焰”字，比较生僻，但大字报上却写得丝毫不差。

“红旗派”是支持刘结挺、张西挺一派的群众组织。

第二天，“红旗派”所属组织的人员，便蜂拥而来向他们反映情况：诉说他们如何受压制，遭到“走资派”和“红色派”的打击。这样的“包围”持续了好几天，王、杨着急了。最后，他们决定，一人“留守”，应付“包围”，另一人走出去，采访持有其他观点的群众组织。

他们主动召开地、市两级机关群众组织人员参加的座谈会，听当年刘结挺、张西挺身边的警卫、勤务人员介绍情况，到一些两派群众组织相对集中的学校、工厂进行采访，还特地约请外地来宜宾串连的红卫兵，介绍他们对当地情况的看法。

4 月 22 日的下午，一批老红军、老干部主动登门向王、杨二位记者反映情况。他们情绪激动地指着王、杨问："你们是不是解放军？是解放军就要实事求是地把真实情况报告给毛主席。"接着，这些老干部便声泪俱下地向记者述说刘结挺、张西挺的许多问题。有的控诉刘结挺、张西挺把宜宾地区专员李鹏打成"右派"，下放到五粮液酒厂劳动改造；有的揭发刘结挺是如何采取手段让张西挺当选为宜宾市委书记的；有的拿出刘结挺读过的《毛选》说："看看上面他的批语，他才是真正反对毛主席，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有几个女老红军甚至跪下说："你们是解放军就应该向毛主席反映这些情况！你们不反映，我们爬也要爬到北京去见毛主席！"还有的老红军激动地拍着胸脯说："我敢担保，如果让刘、张、王、郭来治理宜宾，不用一年，宜宾就会真正成为资本主义复辟的典型！"

这以后，王、杨除继续深入调查了解情况之外，还专门翻阅了有关刘、张、王、郭案件的材料，与当时能找到的知情人进行交谈。越深入了解越使他们对刘结挺、张西挺的问题产生怀疑，内心也渐渐地陷入极度的困惑之中：为刘、张平反是中央下发的"红头文件"，还能不能据实反映情况，唱反调？！他们考虑再三，认为自己是一名共产党员，身为中央派出的记者，背负着向毛主席、党中央反映基层真实情况的重任，应该义不容辞地能使

民情上达，不管后果将会怎样，都应该将了解到的情况，如实向上反映。经过反复商量，他们写出名为《刘、张何许人也？》的调查报告，迅速寄往北京。因担心在宜宾写此稿，会被群众组织发现产生意外，便由王记者一人返回成都撰写。王记者临行前，对杨记者说："写这个调查报告，可能会被扣上'反党'的帽子，你再考虑一下，如愿意署名，我们就共同署名，如不愿意，我就只署自己的名字。"杨记者听后，表示没有任何异议。

《刘、张何许人也？》的调查报告，于 4 月底寄到中央文革北京记者站编辑部，当时中央解决四川问题的会议还在进行之中。负责编辑西南地区内参稿件记者站记者肖健卿看到这一稿件时，猛然一惊，仔细读过，更感到问题的严重。他拿不准是否编发，立即请示编辑组和记者站的领导。领导反复研究，认为此调查报告还是不发为好，也不要向上呈送原件。不久前，王、杨记者曾发回题为《中央解决宜宾问题后宜宾两派的反应》的报导。稿件的标题虽为两派的反应，但从内容上看，反对刘、张、王、郭这一派的意见较为具体，措词也较为尖锐；而对拥护刘、张、王、郭这一派的意见，却写得较少，显得气势不足。这篇报导的清样交王力看后，王力口头指示："这个稿件根本不能登，记者的看法有问题。要告诉记者注意反映支持刘、张、王、郭这一派的情况。"

从呈送稿件审阅，王力似乎看出了记者站的编辑、记者对刘、张的问题是陌生的，便立即通过中央文革办事组，转送来一些有关刘、张、王、郭几个主要案件的摘要，还有张西挺在北京某红卫兵小报上登载的《狱中日记》等等。

此时，记者站的领导深感处于宜宾第一线的记者很有必要抽出一人返回北京了解有关情况，参加尚在北京召开的解决四川问题的会议。因此，决定通知驻宜宾的王记者返回北京，杨记者继续坚持在第一线工作。

王记者从宜宾第一线，风尘仆仆地赶回了北京，当他看到《刘、张何许人也？》的调查报告，既未刊登，又未呈送，双眉紧锁，欲言又止；看到毛泽东批示的刘、张、王、郭问题的《文化革命简报》，口瞪目呆，茫然难解；再听到王力的有关指示以及送来的诸多有关刘、张、王、郭问题的材料，唉声叹气，心底透凉了。他在屋子里来回踱步，无奈地摊开双手对肖健卿说："我们记者太无能为力了，今后，我也恐怕难以再到宜宾去采访了！"

1967 年 4 月底的成都有些沉寂。以川大"8. 26"、"红卫兵成都部队"、"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红卫东"为一方的造反派，和"产业工人战斗军"、"贫下中农战斗军"、"八一战斗兵团"、"成都电讯工程学院红旗战斗团"，简称"三军一旗"为一方的保守派，似乎在准备一场大决战。4 月 30 日，成都街上出现"8.26"贴出的大字报《成都就要爆炸》，结束语是这样写的：

成都，成都，暴风雨前的沉默。

决战前夜的静寂。

疯狂的野兽和沉着的猎人。

同志们高度地注意吧。

成都就要爆炸！

让我们组织起来，团结起来，严阵以待，迎接暴风雨的到来！

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

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败，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必胜！

随后，又有大字报《爆炸后的成都》唱和。大字报中宣布："历史做出了公正的结论：第一次世界大战打出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第二次世界大战打出了社会主义阵营，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打出了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将做出结论：成都的'爆炸' 必将'炸' 出一个毛泽东思想的天下，一个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天下。"

5 月 1 日，为应付突发事件，"826 战斗团"发出《东方红八.二六战斗团动员令》，成都的空气中充满了火药味，双方的一场大规模的较量似乎就要一触即发。

终于，川棉一厂点燃了导火线，成都爆炸了，从这里开始了一幕又一幕震撼人心的血的悲剧。

位于成都东郊麻石桥附近的四川棉纺织一厂，是成都市有数的国营大厂，有职工近万人。由于产业工人多，该厂又是当初成立"产业军"的发起单位之一，该厂的"产业军"组织是"川棉产业师"，系全市"产业军"的中坚力量。

厂内与"川棉师"对立的造反组织是"红旗战斗师"，人员及势力上，较前者相对处于劣势。早在 1966 年 12 月 31 日，"川棉师"和"红旗师"就曾发生过武斗，附近的"工人革命造反兵团"各分团前往增援，有上万人围聚川棉一厂，双方受伤数百人。这就是当时有名的"12.31"事件。

自从 4 月 17 日，中央要求放人，在"二月镇反"中被打压下去的四川造反派又重新崛起。一批川大"8·26"和属于"红卫兵成都部队"的成都地质学院、成都大学、成都电讯工程学院、

成都工学院的大学红卫兵，应邀以“学习队”、“联络站”名义进驻川棉一厂，倾全力支援“红旗战斗师”与“川棉师”作对，两派经常引发摩擦和小冲突。

鉴于外来红卫兵对自身构成的威胁和侵扰日益严重，4 月 30 日，“川棉师”发布“勒令”，要进驻川棉的红卫兵当即离厂，否则后果自负。

5 月 1 日清晨 6 时许，“川棉师”出动人员抄了“红旗战斗师”总部。同时被抄的还有“红卫兵成都部队”驻川棉学习队及川大“8·26”联络站驻地。下午，两派谈判未果，双方各自调集人马，暗作“决战”准备。

5 月 3 日下午，冲突再起，两派互有人员受伤或被抓走，其中，川棉“产业师”抓走了“红旗师”和前来支援“红旗师”的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北京红代会”和川大“826”等组织的 5 人，事态迅速扩大。成都军区闻讯，速派出 4 卡车解放军战士前往制止武斗，强令双方撤离现场。晚间，“红旗战斗师”及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人员退出“红旗战斗师”师部大楼，双方暂时休战。零点以后，自知处于劣势的“红旗师”派人向颇有势力的工人造反组织“红卫东”等告急求援。

5 月 4 日凌晨 4 时，制止武斗的解放军撤离该厂。4 时 50 分，川棉“产业师”重新包围“红旗师”所在的工厂生活区，并逐楼清剿“红旗师”人员，冲突再次爆发。“红旗师”据楼退守，顽强抵抗。一些大楼被攻占，相继有“红旗师”工人跳楼或被俘。一些“红旗”工人连夜跑到四川大学求援。

上午 8 时，以“69 纵队”和“82 纵队”为首的 2000 多“红

卫东”援兵首先抵达川棉一厂，立即向“川棉师”发起反冲击，救出被关押在“产业大楼”底楼的100多“红旗师”人员，并联合发起反攻。“川棉师”退守各楼，以石头、铁器、水泥块还击。闻讯进厂声援“川棉师”的“贫下中农战斗军”大批农民，纷纷持锄头、木棒、钉钯为“川棉师”助阵。双方反复冲杀，互有攻守，战况呈胶着状。

当天，川大“826”数千人倾巢出动，前往川棉一厂增援。沿途不断有中学“826”、“工人造反兵团”各下属分团加入，队伍声势浩大，拉了几里路长。“红卫兵成都部队”的地院支队、成都工学院支队、“成铁二七”的队伍也赶到川棉一厂与“826”回合，一起围攻“川棉师”。下午，陆续赶来的造反派已有上万之众云集川棉一厂，参战和观战群众达数万人之多，将川棉一厂围了个水泄不通。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的宣传车“红色堡垒”在现场呐喊助战。川棉一厂内的“川棉师”岂敢怠慢，立即组织数千人在厂内设置防线，严阵以待。

开始也是石头战，双方远距离投掷石块，如飞蝗般的石头在空中飞舞。解放军的队伍赶来，用广播命令停止武斗，然后将武斗双方隔开，在双方中间地带组成一段人墙。但是，空中密密麻麻呼啸而至的石块不时落到解放军战士头上，不一会儿，好几个战士就被打得头破血流。解放军的人墙很快就支持不住，被迫撤离。“826”和“红成”的造反派步步紧逼，人潮涌动，喊声震天。双方开始用棍棒，拳头展开近战肉搏，就像古战场的两军混战。

棉纺厂本来就女的多、男的少，战斗力有限，再加上人数处于劣势，虽然川棉的“产业军”也调来了132厂的“峨眉师”，

但当时外面围观的人很多，场面很混乱，根本开不过来。“产业军”支援“川棉师”的援兵，均被阻于各路口、桥头，抵达川棉厂参战的是少数。“川棉师”顿成孤军，被分割包围在生产区几幢大楼内。

士气大振的造反派，用宣传车向守楼者喊话劝降，被拒绝。于是，红卫兵的冲锋号吹响了，各路造反派在冲锋号激励下，呐喊着开始冲锋，分别向据守大楼的产业军发起总攻。

经过几个小时的逐楼攻坚，到天黑时分，人数占优势的造反派以轻重伤员不断增加，并开始有阵亡者出现的巨大代价，将“川棉师”据守的各幢大楼逐一攻占。最后，仅剩“产业大楼”及公路边一座防卫较坚固的大楼仍被顽强抵抗的“川棉师”拼死占据着。

造反派冲到“产业大楼”楼下，大门紧闭。

从楼顶飞下来如雨的石块、砖头、石灰、着火的汽油……

楼下聚集的人太多，不时有人受伤。

造反派从一楼的窗户翻进去，打开大门，大队人马蜂拥而入，只剩下三、四楼仍被“川棉师”固守。

东郊的群众也都行动起来。大街上，居民群众，小孩、老大娘，都自动组织起来筑街垒，查截“贫下中农战斗军”前来声援“川棉师”和运送武器的车辆。大批医务人员前来抢救伤员，不少群众到医院慰问伤员，送鸡蛋、水果，颇有点人民战争的味道。

5 月 5 日天明，造反派向“产业大楼”的三、四层守楼孤军再次发起总攻。攻楼者架起木梯向三、四楼强攻。“川棉师”在楼顶上将几十斤重的水泥大瓦砸向攻楼者，终于将木梯砸断，攻

楼再度受阻。

9 时许，造反派弄来大型吊车，再次强攻三、四楼。经多次冲杀，终于将“产业大楼”全部占领，困守大楼的“川棉师”全部被俘。一拥而上的各路造反派，纷纷将各自的旗帜插上楼顶，以示胜利。现场助战观战的造反派及围观者齐声欢呼，奔走相庆。战俘们满脸满身鲜血地被拖出大楼，沿途不断受到石块、棍棒、拳头的打击，不少人已经血肉模糊。

持续近两天的川棉武斗，以“川棉产业师”8 幢大楼被攻占，造反派大获全胜而告终。这次武斗，双方都有很多人被砖头、石头、棍棒打得头破血流。打死 2 人，打伤 260 多人，一幢楼房及大批布匹、毛毯等国家物资被付之一炬。

与此同时，“产业军”在市区的各个机构和驻地也先后被攻占。“三军一旗”的部分队伍被迫撤退到了成都市的南郊和西郊。

## 第 623 回：众□导，接见北京□委会 勿脱产，别离开广大群众

周恩来于 5 月 5 日约陈毅、谭震林、李先念、李富春等几位副总理和余秋里、谷牧谈话，后又致信陈毅、谭震林、李先念、余秋里、谷牧并告李富春，说："五一团结，不要又造成你们 5 位同志的错觉，否认'二月逆流'，再压造反派，支持保守派，实行打击报复，那就又要来一个新的反复。为了预防你们 5 位同志走入绝路，专此警告，勿谓言之不预。"

"五一团结"是指"五一"天安门焰火晚会。因"二月逆流"而受批判的李富春、陈毅、谭震林、李先念、余秋里、谷牧等与毛泽东一起，出席了焰火晚会。5 月 2 日，《人民日报》作了报道。

5 月 4 日，天安门广场贴出大标语，请陈伯达任北京大学校长。5 月 5 日，蒯大富写信给周恩来，请求周恩来当清华大学校长，周恩来 5 月 6 日回信辞绝。

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成立后，毛泽东接见了北京市革委会主任谢富治，他说："我祝贺你，祝贺大会成功。请代向全北京市革命造反派祝贺。""青年人要参加你们的工作，使前辈人不脱离群众，使青年人得到锻炼。青年人不能脱离生产，这样不会造成脱离群众，要半官半民。"

5 月 5 日，周恩来、陈伯达、江青、康生、谢富治、江青、肖华、杨成武、王力、关锋、戚本禹、吴德、傅崇碧、叶群等人在人民大会堂江西厅参加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全体会议。

谢富治首先说："今天是总理、中央文革小组全体同志到会。他们在百忙中来接见市革命委员会全体委员。这是中央文革小组同志对我们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无微不至的关怀。各方面有什么意见先谈谈，文革小组同志要先听听你们的意见，然后文革小组再讲。有什么意见，大大小小的事情都可以谈。"

革委会委员徐铠汇报说："全市性保守势力已经联合起来了。虽然人数不多，但是能量很大。他们什么都不干，还要给工资。"

江青不解的问道："他们什么都不管，为什么还要给他工资？"

徐铠说："有规定。"

陈伯达说："那是讲革命派闹革命的。保守派不工作，打架还能给工资？这扣工资是合理的、应当的。不劳动者不得食，这是社会主义的一条根本原则，不劳动者就不能给饭吃。你保守派既不抓革命，又不促生产，又打人，又破坏国家财产，又到处窜，还给工资，这成什么样子？"

江青："同志！你们对'抓革命、促生产的十条规定'大概没搞清楚，不能让他们利用。那是讲：'被打击而被迫离开工厂的革命工人，必须允许他们回厂参加生产，参加文化革命。革命工人被迫离厂时的工资，应该照发。'他哪里是为革命？哪里是被迫？他们到处游游荡荡、愿到哪儿跑就到哪儿跑，爱破坏生产就破坏生产。"

陈伯达："现在革命委员会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权力机构，它有权力禁止武斗，北京市革命委员会要行使权力，对组织武斗要做出决定，禁止武斗。要保护不同意见的人的人身安全。你刚才

说得很对，现在保守势力、幕后策划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们在搞什么？破坏革命群众的人身安全，破坏国家财产，所以必须保护群众的人身安全，保护国家财产。对煽动、策划武斗的少数头头要依法制裁。”

周恩来：“你们可以自己做出决定，做出动员令。”

江青：“有很多中央决定你们都没有好好用。许多武器你们没有用起来。1967 年 1 月 13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中就有这个问题：‘保护革命群众和革命群众组织，保护左派，严禁武斗。凡袭击革命群众组织，殴打和拘留革命群众的，都是违法行为。一般的，由党政领导和革命群众组织进行批评教育。对那些打死人民群众的首犯，情节严重的打手，以及幕后操纵者，要依法惩办。’这些东西，你们都没很好地用，你们没行使无产阶级专政的职权。”

有人说：“公安局抹稀泥。”

王力：“公安局听你们的嘛！”

委员说：“向公安局反映武斗情况时，他们问打死人了没有，没打死人，他们就不管。”

江青：“打死已晚了嘛！”

陈伯达：“公安机关对武斗现象麻木不仁，要揭露他。一定时候要改组。”

江青：“这是大规模的械斗。”

有人反映：“有的公安机关对政治案件不注意，光注意强奸、抢劫、盗窃案件。”

陈伯达：“这些公安机关在文化大革命中是很大的失职。”

周恩来："公安局不执行《六条》，本身就犯法，军管会的同志来了吧？你们要整训一下子，不要怕事，如果你们因执行任务被打，应该受到表扬。"

姜大千："北京市武装部有很多彭真、刘仁时的老武装部长了，希望解放军撤换他们。"

周恩来："你提得对。"

塑料总厂吴富博："砸工代会的人抓了，也没地方送。公安局不收。"

周恩来："公安局不接收是不对的，抓起来再说嘛！"

蒯大富："北京市保字号的运用《十条》来造造反派的反。"

江青："你为什么不拿出《八条》来？我在你们的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上讲的话嘛！报纸上登了嘛，你们为什么不拿那个武器？"

谢富治："好了，现在请伯达同志讲话。"

陈伯达在讲话中提出，按照巴黎公社的原则建立政权的问题；革委会委员如何在不脱离本单位工作的情况下作为革命委员会成员参加革委会的工作等等。他说：

"毛主席经常说，机构不要庞大，要粉碎旧的官僚机构。旧市委继承了官僚机构嘛！官僚机构容易被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利用，所以建立革命委员会很必要，要破坏旧北京市适合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利用的机构。"

他问革委会委员、北京第一机床厂工人吕嘉才："吕嘉才你现在参加没参加生产？"

吕嘉才答："没参加。"

陈伯达："不参加，你就脱离了你那单位，脱离了群众，你那代表权就成问题了。北航的韩爱晶同志，你现在脱离本单位没有？北师大谭厚兰同志，你又当学生，又当委员，如果你离开了学校，就脱离了群众。北大也是这样，聂元梓同志，你脱离了北大，代表权威就没有了。脱离工厂、学校、机关，到革命委员会做工作，这就不是代表了，那是工作人员了，当个委员就没意思了，因为你们要经常带来群众的意见到革命委员会来，革命委员会才有权威。如果仅开开会，说些和群众无关的话，就不能代表群众，就失掉了毛主席说的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的意义。所以，革命委员会建立以后，有重新总结经验的必要。第一条不要脱离生产，不要脱离原来单位。能不坐小汽车最好不坐。早点出来嘛！坐公共汽车。可以轮流参加会议，一个礼拜一次。谢富治同志，行不行啊？"

谢富治："有些会议可以。两种情况。"

陈伯达："毛主席在延安时老早就告诉我们：要精兵简政。现在，北京就有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修正主义分子搞的一套庞大的官僚机构，这套要重新检查，要破坏；要建立一个革命的和群众密切联系的无产阶级权力机构。"

"民兵队长都不能脱离生产，社长、公社书记都不能脱离生产，大家轮流地工作，轮流办公，这样，非生产开支就可以变得很少了，当然，个别的必要的补贴是可以的。""当了代表、革命委员会委员，他是人民的勤务员，不是一辈子就当代表了、委员了，要随时准备你们单位群众把你们撤回去，可不可以？"

众答："可以。"

陈伯达："我们国家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大家都可管理的国家，不是哪个代表才能管理，旁人就不能当代表，这是旧社会的东西。机构简化是必要的，但是不容易。看看这些问题：革命委员会——无产阶级权力机构怎么搞；怎么破坏旧的，建立新的，今天可以随便说说。"

韩爱晶："我建议把革命委员会的委员都吸收为党员，一个革命委员会的委员还不够一般党员条件，那这个委员也成问题了。"

戚本禹："不一定。"

陈伯达："国家机构、代表、委员应有党员、非党员。"

市委机关代表谈到机关革命化时说："农口要搬到农村去，革命委员会要带头把家属搬到农村去。不要城市化。要农村包围城市，消灭城乡差别。"

陈伯达："公社全部不应脱产。县里顶多十来个办事的就可以了。"

戚本禹："要研究一下，公社一个不脱产也不行。一个不脱产，那问题就多了。你说一句话传出去可不得了。"

康生对那位市委机关的代表说："你的意见是很好的。城乡不要集中那么多人，但这个问题同消灭三大差别不是一个问题。不要把消灭三大差别庸俗化了。"

陈伯达："我们的机构要来一个大革命化。现在没有比较可靠的成熟的经验，要群众讨论。比如人民公社，我说一个不脱产，戚本禹说不行。要通过实践，我们也是两派嘛！"

戚本禹："是一派。"

陈伯达："怎么样又不脱离群众，又不脱离劳动，要总结经验。各地方不平衡，有的搞得好些。"

有人插话："陈永贵他们搞得好。"

陈伯达接着说："有的差些。我们不仅要总结北京的经验，而且还要总结其他地区的经验。总之，要记住毛主席讲的：不脱离群众，不脱离劳动。这是毛主席反复讲的。究竟怎么参加，群众出智慧。"

康生："两个建议请同志们考虑：第一个建议是把毛主席和马、恩、列、斯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论述，请革命委员会选印出来，大家讨论、学习。第二，同志们谈到公安局、武装部的问题，当前机构如何工作的问题，所有这些问题，我看有一个区的夺权问题。区的权不夺，你们革命委员会底下没有手和腿，光靠你们这几个人不行。单单是有上层的革命委员会。下层不掌握在你们手里，什么参加劳动，不脱离群众都是空的。"

陈伯达提了几条建议：

"一、革命群众必须坚决执行毛主席、党中央关于抓革命、促生产，或促工作的指示。革命委员会成立了，要实现革命、生产双丰收。

二、无产阶级专政所有的机构的神圣任务是：保护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建立和稳定无产阶级革命的秩序；保护国家财产；保护革命群众中不同意见的人的人身安全。

三、不要武斗。禁止打、砸、抢（王力：抓、抄）。随便抓人、抄家不行。（周总理：最近抓的人找不到。北京市革命委员会要注意，这容易被坏人钻空子。）煽动武斗的坏人，应受到无

产阶级国家法律的处分或者制裁。但是，如果禁止不了武斗，他一定要武斗怎么办呢？斗斗也没有什么大坏处，谭厚兰同志和聂元梓同志就武斗过嘛，他们两人现在都是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的委员；如果坏人煽动武斗的话，坏人就会暴露出来。有人就在煽动破坏国家财产。

四、公安机关大家谈得很多，公安机关的坏人要撤职，有的要适当调整、改组。

五、最后一条，破坏劳动纪律，不参加生产，到处流荡，自由跑出跑入，扰乱革命和生产的秩序，对于这样的人，工厂一律不发工资，农村一律不记工分，机关也一样要扣工资。”

他最后说：“我们提这些意见给你们商量，希望你们革命委员会研究后拟个通告。我现在说的话不要上街。”

谢富治慌忙提醒他：“靠不住！靠不住！”

周恩来：“我们革命委员会的主任，你就不相信群众。我们要相信群众，我们要相信党嘛！”

陈伯达：“你们可以用自己的话说嘛，动员工人回工厂，动员学生回学校。”

一位委员说：“打人的人还要保护人身安全？”

陈伯达：“要告诉公安部门处理，公安部门要采取措施。”

这位委员继续说：“他不怕公安部、公安局，就怕革命群众。”

陈伯达：“所以群众是最重要的。依靠公安机关不依靠群众是不行的，依靠群众是最根本的。公安部门依靠群众才有权威。”

关锋：“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是个政府嘛，要好好研究出个通告。”

王力："北京有几个月没有政府了。现在建立了政府，要行使职权。你堂堂的北京市革命委员会连一个大队的问题就处理不了么？还有一个正确对待保守组织的问题。毛主席最近教导我们：不要轻易地把一个群众组织叫保守组织。连四川'产业军'这样的组织也不轻易叫保守组织。对于这样的组织要做政治思想工作。对'产业军'的提法改成：受少数保守分子蒙蔽的，与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所操纵的组织。这样一改，便于争取群众。"

关锋："群众组织之间有不同意见不要轻易上纲。"

周恩来："我同意伯达同志刚才提的六点（记录为五点）意见，提到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再讨论，形成一个正式文件。刚才王力、关锋同志说了，北京市机构瘫痪了很久了，现在革命委员会成立半个月了，应该依靠群众、依靠人民解放军、依靠干部大多数，一定要成为强有力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机构。你们也支持谢富治同志，今天我们来就是表示支持嘛！"

陈伯达："要把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变成为真正无产阶级的强有力的机构！"

当晚，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召开常委会，落实白天中央领导的指示。

开会期间，北航"红旗"韩爱晶问谢富治："河南问题怎么样了？"

谢富治说："你们红代会支持的'二七公社'是对的。军区的作法是错误的。"

韩爱晶："为什么还不解决？"

谢富治答：“不那么容易，中央文革现在把注意力都集中到外省了。中央正在着手解决河南问题。它牵涉到军区问题，不能一下解决，何运洪是错误的。”

## 第 624 回：态度明，梁、张支持造反派　五月六，成都围一三二厂

形势对成都保守派组织“产业工人战斗军”、“贫下中农战斗军”、“八一战斗兵团”和“成都电讯工程学院红旗战斗团”，简称“三军一旗”的不利，不仅表现在成都的地域控制上，更反映在北京的政治晴雨表上。梁兴初、张国华按照周恩来的指示，开始和四川在京的各群众组织代表接触，熟悉四川的情况。5 月 5 日上午 10 时 25 分至 13 时 30 分，他们在京西宾馆召集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川大“8·26”、川医“101 战斗团”、“红卫兵成都部队成铁二七”，新都机械制造公司“星火”组织的代表座谈，明确表示反对成都的“三军一旗”，对四川造反派坚决支持。

当张国华和江海云握手时，看她个子矮小，以为是中学生，亲切地拍着她的肩膀说，“小鬼，你好？”

梁兴初说：“现在武斗的现象在成都相当严重，我们今天找大家来，就是要商量一个解决问题的办法。当然喽，解放军要解决支持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川大‘826’和‘红卫兵成都部队’等革命造反派的问题。”

这时，江海云把 4 月 18 日署名为“成都军区广大指战员给产业军的信”拿给梁兴初看。

梁兴初明确表示说：“这些人代表解放军吗？他们只能代表他们自己几个极少数的人，他们能代表什么广大指战员？我就是支持‘兵团’和‘826’的，不支持‘产业军’。”

他指着张国华和新调往成都军区的一个部长说："他们也坚决反对'产业军'，坚决不支持他们。现在有少数人受了老'产'观点的影响，在脑子里还一时拐不过弯来，这中间需要一个教育过程，转变过程。我们希望和你们合作，共同工作，促使这些同志转变过来。总之我们的态度就是支持你们，毫不含糊地支持你们的一切革命行动。甘渭汉的秘书他一方面支持造反派，另一方面却又同情'产业军'。原来因为他老婆是'产业军'，被抓活该。"

大家纷纷鼓起掌来。

他接着说："我们是支持你们的，主要从政治上支持你们，另外还可以从军事上支持你们。如你们开会他们要捣乱，我们可以派军队来保护你们，对'产业军'上层的几个反动头头我们要打击，对'产业军'下层的分化瓦解工作主要靠你们来做。对产业军中受蒙蔽的群众，你们要团结和争取。他们最近在成都地区的武斗严重和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有很大的关系。他们欺骗和挑动大批不明真像的贫下中农进城，这些贫下中农大多数都是受蒙蔽的，你们商量一下，由军区、红代会、'工人革命造反兵团'、川大'826'、'红卫兵成都部队'联合组织一个庞大的几千人、几万人的宣传队伍，动员被欺骗到成都的贫下中农回农村回本地去抓革命、促生产，你们说好不好？"

大家鼓掌欢呼："好！好！好得很！"

梁兴初："那就打电话回去吧！我打电话给邓少车同志，叫他和你们在成都联系。"

邓少车是成都军区副司令员。

然后，张国华说："支持'产业军'的就是那么几个人。军

区有，地方有，这是阶级斗争的客观规律反映，成都地区的武斗那么严重，规模那么大，没有后台是不行的。这些后台就是要我们大家去揪。军队里的坏家伙我们去捉，地方上的由你们去搞，去揪去追。”

他也动员造反派做好“产业军”群众的团结工作，动员已进城的农民回乡生产。

他说：“我们坚决支持你们，希望你们帮助我们和我们很好的合作，这次希望你们打电话给你们家里的同志，叫他们去找邓少车副司令员联系。邓少车同志是个老同志，对党很忠诚，虽然由于脑子拐不过弯会犯错误，如这次支左工作中一度支持了‘产业军’，但是一经组织指出改正错误也非常快。邓少车同志是听中央的话的，听毛主席的话的。他过去受黄新庭的排斥和压制。邓是认识问题，他今后会在适当的时候公开的向大家认错，这样行不行？”

大家说：“行！”

这时，“兵团”李声金拿了一份“产业军”的传单给梁兴初看。梁兴初看了说：“这是谣言，你们要辟谣嘛！前天成重‘红旗’和‘产业军’两个人坐飞机到北京来告状，告你们革命派的状。要求见我，我根本不理他们。我希望你们不要再打内仗，再吵架，川大‘826’和‘红卫兵成都部队’应当联合嘛！”

他对“红成”代表薛文彬说：“你们要整风，犯了错误就要承认就改正嘛！”

梁兴初又问起曾希圣的情况，说：“昨天总理打电话，说曾希圣同志亮相后，被斗，现在下落不明，到底是怎么回事？”

薛文彬说："曾希圣同志在我们那里，昨天接到中央的电话后，已经交出了，我们是支持曾希圣同志的。"

梁兴初最后说："今天的会开得很好，是个团结的会，团结对敌的会"。

"兵团"代表李声全说："兵团的同志想和梁、张司令员见见面。"

张国华说："好吧！这两天我抽时间到北地（兵团到北京的人都住那儿）去看看大家，有人说我不支持他们，让他们看行动吧。好，现在一点过了，大家就谈到这里吧！"

会后张国华和"兵团"代表签名留念。

就在梁兴初、张国华在北京与四川造反派座谈的时候，5 月 5 日，成都西郊生产飞机的兵工厂 132 厂又发生武斗。而这场武斗最终演变为成都首次开枪，多人死亡的"56 事件"。

132 厂是生产军用飞机的大型军工企业，职工人数多，政治条件较好，党团员和复员军人占多数。此时，该厂由成都空军派来的军管会实施军管。132 厂厂长马诚斋，副厂长晋川、赵玉生和厂军管会副主任陈文瑛等领导，主要依靠和支持该厂"产业军"的下属组织"红联"，下辖"峨眉战斗师"和复员军人占优的"八一兵团"为主的"捍卫师"等组织。而该厂的造反派组织"11.19"，则已是"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下属分团，简称 "兵团 11.19 分团"。

1967 年 1 月，在外来红卫兵和造反派支持下，"11.19"派多次曾一举夺权成了"掌权派"。四川"二月镇反"时，"11.19"又被宣布为"反革命组织"，被逮捕拘留及受审查者达 400 多人。

4 月初，“11.19”派重新崛起，“二月镇反”时被迫离厂的成都及外地红卫兵又重新进驻该厂生活区。“红联”则针锋相对，寸步不让。相继写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有来犯者以十倍的还击!”、“我红联战士严阵以待准备大决战”等巨幅标语，张贴于厂区内外，并加紧自卫准备。一面强化“军训”为可能发生的武斗储备器械、物资，一面加强与厂外“产派”及观点相同的“贫下中农战斗军”的联系，以求一旦有事可互作支援。

4 月 20 日，“红联”发表措词强硬声明，以中发（67）128 号文件其中的“国防保密厂的军工单位不许串联等内容”为据，勒令北航“红旗”、成大“8.31”、川大“8.26”等红卫兵，24 小时之内离厂，否则将采取“必要行动”。当天，“红联”广播站将中发（67）128 号文件广播达 70 多次。而外来红卫兵则以进驻是通过成都军区批准同意，且中央文件没规定军工企业生活区不准串联为理由，不作退让。

132 厂厂长马诚斋、副厂长晋川、赵玉生、政治部主任王德、厂军管会副主任陈文英、厂武装部部长冯瑞庭等人在这天共同研究制定了“战斗计划行动图”和“火力布置图”，“红联”负责人参加了这次会议。

4 月 21 日凌晨 1 时，“红联”人员包围 108 幢宿舍等外来红卫兵驻地，与成大“8.31”发生冲突，多名成大“8.31”红卫兵被打。

下午 15 时，成大“8.31”一辆宣传车开进 132 厂生活区，抗议“红联”“毒打红卫兵罪行”。16 时 30 分，该厂“11.19”2000 多人在足球场集合示威，成都大学“8.31”宣传车也开到广场助

阵。双方开动宣传机器大打“宣传战”。“红联”广播站高音喇叭反复呼喊：“成大‘8.31’立即滚出红旗坝，否则一切后果自负”等威胁性口号。“8.31”宣传车和“11.19”广播台也针锋相对予以还击，互不相让。不久，“红联”设在百货大楼的广播开始播发紧急通知：“‘捍卫师’全体战士马上到师部门口集合！”、“67128的全体战士马上到总部集合！”做出调集人员的准备，局势明显紧张。

集聚后的“红联”人员，对足球场形成包围之势，并冲击会场和主席台，冲突不断升级，发展成石块、弹弓、鹅卵石、砖头、皮带，互相抓扯及拳打脚踢的武斗。不久，“红卫兵成都部队”下属的成电、川医、中医学院、成大、交校、水校、铁中等各学校红卫兵闻讯赶来支援，双方在广场一带混战。“红联”人数、体力上占优，外来红卫兵退至食堂。深夜，大队解放军奉命前来制止武斗，双方冲突暂时平息。

红卫兵学生和“11.19”声称：“革命小将的鲜血不会白流！”

“红联”也担心造反派报复，于是在当晚，调来大批“贫下中农战斗军”进厂支援。

因为132厂是保密单位，外单位人员没有介绍信是不能入内的，所以大门警卫开始没有放“贫下中农战斗军”进厂。这时，厂军管会副主任陈文瑛来到现场，示意放行，并对警卫说：“出了问题我负责！”

第二天，4月22日，困在食堂的外来红卫兵又遭“红联”冲击。10时许，才在“11.19”帮助解救下离开。下午15时后，“红联”开始在厂区戒严，并四处捕捉11.19派人员及外来红卫兵。

4 月 23 日，北航“红旗”和 132 厂“11.19”到成都军区告状，对 4 月 21 日、22 日发生在 132 厂的两派冲突向负责接待的军区胡参谋长提出 4 点要求：

1、工厂不准许非法戒严；

2、非本厂的“八一”、“农民战斗军”立即退出工厂；

3、向被打的小将赔礼并医治；

4、立即制止武斗。

这 4 点要求获胡参谋长原则同意后，北航“红旗”和“11.19”离去。

此后，弥漫在 132 厂上空的火药味更浓，厂内外盛传“11.19 派要血洗红旗坝”、“兵团和 8.26 从城外运大量木材，准备火烧全城”等消息。厂内两派也都防备对方有新动作，彼此防范森严。“红联”组织人员“军训”，在大楼内大量储备铁条铁棍，抢运石块、砖头、石灰以及粮食、食品等生活物资、急救药品、甚至铁锅炊具等等。同时，在厂生活区的百货大楼设了据点。

5 月 3 日川棉一厂大武斗发生后，132 厂“红联”于 4 日清晨 5 时，组织了 1000 多人赴川棉厂声援“川棉产业师”。中午，132 厂造反派“11.19 分团”游行示威，抗议 132 厂“红联”组织工人离厂，声称这是破坏“抓革命、促生产”。“红联”将“11.19 分团”的游行队伍强行冲散。

为了阻止“红联”调人前往川棉支援“川棉产业师”，“11.19”控制厂门，两派又生冲突，各有人员受伤。

5 日中午，132 厂的“产业军”派人包围 202 幢单身宿舍，再次冲击进驻 132 厂的外来红卫兵和造反派。以首都红代会为首的“驻厂五湖四海造反兵团”再次游行示威。

下午，郊区“贫下中农战斗军”欲进 132 厂声援“红联”。此时，厂长马诚斋不在厂内，“红联”负责人拿不准，忙向军管会副主任陈文瑛请示，陈文瑛回答：“都到这时候了，你们还请示什么？”

下午 16 时，“1119”派及外来红卫兵在厂内生活区“造反有理广场”集会示威，抗议放“农民军”进 132 厂是严重违犯厂规！“产业军”人员将广场三面包围。造反派退至另一个广场继续开会，又遭“红联”冲击，不得已只好到厂外跃进门外继续开会。会后大家各自分散回家，没想到此时厂内回家的路已被“红联”封锁了。没办法，2000 多“11·19”的工人知道“红联”早有准备，不敢回宿舍睡觉，坐在厂外通往成都市区方向的跃进门外铁路上淋雨过夜，部分人冒雨到几公里之外的成都中医学院避难，还有些人去了成都大学和四川大学。

第二天，5 月 6 日上午，四川华西医学院“红成 915 战斗团”，简称“川医 915”的 8 名红卫兵，7 女 1 男，开着一辆救护车来到 132 厂，说是接运被打伤的造反派伤员，被“红联”拒绝入厂，事端再起，双方各不相让，8 名“川医 915”学生当场被打后，“红联”将他们送到该厂生产区 39 楼关押，救护车被扣。消息传出，全市各造反派组织反应强烈。加之头天晚上该厂 2000 多造反派被迫离厂露宿通宵的情况，更引起成都各造反派的怒火与激愤。已经在“川棉事件”中大获全胜的造反派，纷纷坐车的坐

车，走路的走路，涌向 132 厂。“首都红代会”赴蓉学生也闻讯赶来增援。

当年画刊小报上关于成都“5·6 事件”的文革宣传画

“红联”设在厂区高处的瞭望哨看到大批造反派队伍前来，立即通知“红联”人员紧急集合，进入备战状态，将各入厂要道堵死。同时，厂区内“红联”广播台也立即发布紧急动员，并将“产业军”骨干力量，以及部分家属，安排到 29 号、38 号、39 号三栋防守准备比较充分的办公大楼和试验室大楼上据守。大门及厂区各要道均派人把守。

厂外聚集的人越来越多。有跃跃欲试者冲向厂区围墙，但是刚一接近围墙，便被里面扔出的石块砸得头破血流，冲过去一批，被砸一批，退下再冲，屡试不爽。冲在前头的大都是一批十五、六岁的中学生红卫兵。

伤者陆续被抬上赶來现场的救护车送往市内各医院。这些载着伤员的救护车在蓉城大街上飞跑，成了无声动员。一时间，成都市内盛传：“132 厂打起来了！”于是，人们见车就拦，通通奔往 132 厂，成千上万人向成都西郊蜂拥而去。10 时许，132 厂

各道大门，已被先后赶来的人团团围住。而更多的增援者，还在陆续赶来。132 厂区围墙外，人山人海。前边的人，爬在防空壕边，虎视眈眈。而更多的是看热闹的，站得远远的，一堆挨一堆。

驻 132 厂支持“红联”的空军 3745 部队在跃进门至 132 厂的马路上，列队宣传“要文斗不要武斗”。闻讯赶回 132 厂马诚斋厂长和政治部王德主任，由“红联”人员托扶着，翻墙进厂，坐阵应变。他们觉得 132 厂是军工保密单位，造反派可能不敢贸然攻进厂区，否则将承担“冲击国防工厂”的罪名。

但是，造反派弄来木板、桌子作“盾牌”，抵挡飞石，继续前赴后继的往厂门口步步推进。由此打来的石头更大，伤者更多，木板、桌面被大石头击中的巨大声响让人听得惊心动魄。但进攻者人多，前赴后继，渐渐逼至大门。而 132 厂门外的宽阔大道和操场上，集聚着数万人，不断摇旗呐喊助威。

## 第 625 回：声势大，造反派冲进工厂　枪声响，成都市舆论哗然

132 厂一号中门处，有手擎“首都红代会北邮东方红”、“成都大学 8.31 纵队”、“四川大学 8.26 战斗团”等数面战旗的旗手和敢死队员，奋不顾身舞旗在前，引领冲锋，终于冒着“石雨”成功爬上中大门两边门卫室的小屋顶，随即返身用石头向“产业军”回击。“产业军”几次组织反冲锋，试图重新夺回门卫室，均被造反派压制回去。

当年画刊小报上关于成都“5·6 事件”的文革宣传画

132 厂自己有一条铁路专用线，平时用铁门护卫。造反派对该厂形成包围之势时，“产业军”在此亦有人把守。红卫兵“敢死队”冒着“产业军”抛来的砖头、飞石，也对这道铁门拼死冲锋。经过几轮冲击，终于将“产业军”从铁门旁打退，占领了铁门。

然而铁门厚重牢固，一时无法打开。于是红卫兵又在正门与铁路之间的围墙寻找进攻点，轮番冲击。大约半小时左右，一些进攻者终于推进到围墙下面，开始用钢杵、铁棒，配合大圆木撞

击围墙，试图将围墙推倒或打穿。

“产业军”从围墙上，用大石条、石块往下乱砸，奋力阻止进攻者。但在造反派猛烈的反击下，围墙上呆不住，只好退进墙内。没多久，围墙终于被造反派打穿。墙内“产业军”情急之下，用油毡木头阻住，并浇上事先准备好的汽油用火引燃，阻挡造反派从缺口涌入。立时，缺口处火光熊熊，浓烟滚滚，进攻的红卫兵被阻于缺口之外。

外面的人一见浓烟，就有人大喊：

“他们要放火烧工厂了！”

这无异于发出总攻的号令，保卫国家财产责无旁贷！只见话声刚落，伏在防空壕里的众人一跃而起，扛着红旗，手持长矛，钢钎，高喊“下定决心，不怕牺牲”的口号，又从几处同时冲击围墙。

成千上万的人不顾一切潮水般的接近围墙。大家齐声一喊，同时发力，围墙被推倒了一大片。进攻者齐声发威，依旧红旗引路，呐喊着冲进围墙。“产业军”实施反冲击，试图阻住缺口。怎奈造反派人多势众，打退了“产业军”多次反扑，在墙内站稳了脚跟。

此时，铁路专线旁的铁门也被冲开，造反派潮水般涌入，“产业军”眼看招架不住，往飞机场方向且战且走。

从围墙突破口冲进来的人与冲入铁路专线的众人会师后，士气大振。现场临时指挥者简单商量计议后，又兵分两路。一路向正大门推进，接应声援大门处的进攻者。一路往机场方向，追击已撤向那里的“产业军”。

就在造反派往飞机场追击时，左边的道口突然驰出一辆大客车，高速向造反派队伍冲来，造反派人员纷纷跳入道旁草木中躲闪，没人被碾压。被激怒的进攻者开始围攻客车。大客车飞逃，至一墙边，大客车开不动了，于是将驾车者擒获。

大批人马追至飞机场边。机场内，集聚着大批“产业军”，持械拿棍，一副欲拼死而战的架势。

追击的造反派见状，又慑于机场乃保密重地，不敢轻易入内，遂退。“产业军”趁势从机场内发起反冲击。飞来的石块击倒数名进攻者。造反派不肯示弱，又回头再次发起冲锋，将反冲击的“产业军”压了回去。并乘势冲进飞机场内。

谁料，此时从东南方向高速冲出一部十轮大卡车，向进攻者迎面驶来。冲锋的造反派中一位红卫兵躲闪不及，被碾于车下。车轮从头部压过，整个身子被飞驰而来的大卡车带出 10 多米远，脑浆飞溅至几米外，前额骨被压碎，整个头部被压成一寸多厚的圆饼……

这台重型卡车又调转车头，开足马力，呈“S”型路线，继续朝造反派猛冲。此时，双方犹如战场上已经杀红眼的士兵，均将对方视作仇敌，欲置其于死地，拼个你死我活方才甘休。转眼，发了疯一样狂奔冲压的大卡车，又将一小红卫兵撞倒于车轮下丧生。

这两名死者，一位是 132 厂子弟学校 15 岁的学生杨正业，另一位是年仅 11 岁的李文君。

“产业军”又开来一辆大卡车，两车交错冲击，像发了疯一样，在平坦开阔的飞机场上，轰鸣着向一无遮挡的造反派人群轮

番冲击碾压，势不可挡。几分钟之后，另一位“红成”学生被轧断脚骨。“产业军”人马趁势猛压过来。造反派抵敌不住，只好退出飞机场。

一辆宣传车从外面开到 132 工厂中大门外，车上喇叭高喊：

“革命造反派的战友们，为了避免伤亡，你们不要冲了，为了避免伤亡，你们不要冲了！”

听到喊声，造反派暂停进攻，稍往后退。

趁此间隙，宣传车向厂内广播一天前中央文革关于解决成都“产业军”和造反派武斗问题的电话指示，之后，宣传车内的解放军战士宣读 132 厂军管会当天发布的停止武斗的《紧急通告》，如此反复宣读后，宣传车又播放首都红代会对“产业军”的《最后通牒》。

39 楼房顶上有数名“产业军”又将房瓦向墙外造反派掷来，双方战火重开。造反派终于冲进厂右侧大门，并乘势一举攻下了 38 号楼附近 29 号大楼顶楼。在冲锋号声中，“兵团”、“硬骨头战斗团”、“红成”、“东方红 826”等造反派团旗、队旗，在 29 号大楼楼顶平顶上反复挥舞，参加围攻及观战助威者一片欢呼，士气大振。造反派当即发起全面冲锋，132 厂左大门、中大门亦相继失守。造反派潮水般涌入厂生产区。“红联”支撑不住，大部分退至 70 车间及 50 车间。部分人员仍坚守 38、39 两幢大楼。而大楼东、西两侧马路上，少部分“红联”退逃无路，举手投降。

面对数万造反派层层包围和不怕死、不要命的轮番冲击，一批转业军人找到武装部，要求发枪，未批准。

副厂长晋川紧急召集核心层磋商，寻求应对之策，军管会副主任陈文瑛对“红联”头头说：“赶快运石头，准备把家属和小孩撤到安全地方去，到时候，我们用武器对付他们……”会议最终决定，立即给“红联”人员发枪。

副厂长赵玉生过来通知武装部长冯瑞庭开会。过了半小时，冯瑞庭匆匆回到武装部，对武装干事度朝明说：“开了会，晋厂长已同意发枪。”并交代凭工作证和“红联”袖套领取。随后他们二人开始发枪。当场发出机枪 10 挺、步枪 149 支、手枪几十支。其中步枪每支配子弹 5 发，机枪、手枪子弹无数。事后，他们清点了领取枪支人员的工作证，共 188 个。

突然，39 号楼窗户响起枪声！

实在太出人意料，没有任何人有思想准备，此时站在队伍前面的一个新华社记者事后说：“不晓得怎么心一震，脚一软，就坐在地上了。”

枪声令武斗现场所有的进攻者都感到意外和震惊。但是，拼死向前冲锋的血气方刚红卫兵，已被一种空前的狂热所支配，他们显然也意识不到近在咫尺的死亡之残酷。所以，当听到刺耳的枪声响起，进攻队伍中有人高喊：“‘产匪’开枪了！‘产匪’开枪了！”为数众多的进攻者只是略有犹豫，连进攻的脚步也没有稍加停息，即再次高呼着口号，拼命冲向前去。

38 号和 39 号楼前，“红联”已退进大楼，并用办公桌椅及其他障碍物阻塞了大门和楼口。有的“红联”武装人员，甚至顾不得关于保护国防机密和贵重设备的纪律和禁令，情急之下，退至安放高级精密仪器的处所，以其仪器设备作保卫屏障抵抗来势

凶猛的进攻者。

进攻 38 号大楼的红卫兵冒着滚滚落下的砖、石、木头冲进了大楼。只见楼内烟雾滚滚，石头、木块，如雨点般从楼梯处打下，根本无法上前。他们赶紧把一张乒乓球台顶在头上，前呼后拥，向二楼冲去。戴藤帽、铁帽的工人和学生紧随其后，再后面就是头上没戴帽子的人了。就这样，经过 20 分钟左右的前赴后继，他们终于冲上了二楼，遇到的是更密集的“石雨”。突然，呼隆一声响，三楼一个机器筒里冒出浓浓的石灰粉，楼梯内顿时一片烟雾，什么也看不清。学生们在乒乓球台上又加了两块木板，顶在头上，喊着口号继续往三楼冲。15 时左右，眼看已经冲上三楼了，看见上面的人正拿着枪瞄准攻上来的学生。刚开始，学生以为是空枪，或者只是吓唬人。当上面的人举枪瞄准他们，大家就把头埋下，以为这样就能躲避子弹。上面的人连举几次枪，进攻的人连埋几次头，僵持了很短时间，突然“砰！砰！”两声枪响，枪真的又响了。只见顶板的学生头上一个洞，鲜血突突的冒了出来，板子也就势翻了过去，当即有 6 人被雨点般的砖、石、木打的鲜血直流，进攻的学生纷纷后退。接着石灰粉又从机械筒中冒出来了，红卫兵奔命似的向楼下跑去。

没来得及撤走留在二楼的红卫兵，被冲下来的“红联”堵在屋内一顿毒打……

再次响起的枪声，在进攻的造反派中引起短暂的骚动：

“‘产匪’又开枪了！”

“‘产匪’又开枪了！”

进攻队伍中，许多人高喊着。但是，并不知道 38 楼内情况

的大多数人还认为，这不过是吓唬吓唬人罢了，谁敢真正开枪杀人？！

这时，一辆宣传车从厂正中大门开进武斗现场，停在 39 号楼楼前空地，向楼上“产业军”喊话，进攻者攻势稍减。

这辆宣传车由成都军区战士和红卫兵共同组成。车上共有解放军战士 6 人，其余分别为首都红代会下属的北京地院“东方红”、北航“红旗”、科大“东方红”、以及成都地院“解放大西南”、川大“8.26”等红卫兵组织的代表。

宣传车再次宣读军管会当天发布的关于停止武斗的《紧急通告》。车上一位名叫陈家铭的解放军战士刚刚念完《通告》，就看见 39 号大楼三楼东端窗口旁边，有 3 人举枪瞄准宣传车。情形危急，他当即对楼上高喊：

“把枪放下！把枪放下来!”

但是，随之而来的是数声枪响，同时射向宣传车。其中有苏式 79 步枪，也有冲锋枪。原来，有人觉得，这辆广播车就是 5 月 5 日指挥攻打川棉厂“产业军”和冲击成电“红旗”的那辆车。据守大楼的“红联”人员，也将这辆喊话的宣传车，当成了当天武斗现场的临时指挥车，所以集中火力对其射击。

这次开火不同于前两次枪响，是数枪密集射击。宣传车位置靠前，目标明显，车上人员又比较密集，且无任何掩护，完全暴露在火力之下。第一阵枪响过后，车上当即就有 6 人伤亡：

22 岁的北京地院“东方红”学生李全华，被一颗子弹击中喉部并从后颈穿出，当场身亡。成都 26 中女红卫兵程其逸，一位文静秀气，模样俊俏的花季少女，作为中学红卫兵的代表，也

在宣传车上。她不幸腹部中弹，亦当场身亡，年仅 16 岁。

……

密集的子弹朝车上飞来，宣传车猝不及防，慌忙倒车后退，同时高喊：“同志们！开枪了！快退！快退……”

宣传车后退时，仍不断遭到枪击。当宣传车退至 132 厂大门外时，成都军区参谋长茹夫一正在那里，就在宣传车附近，北地“东方红”的学生立即将茹夫一扑倒在地，用身体保护他。

宣传车一直退到厂外百货大楼处，楼顶上还对其开枪射击。宣传车再退，至安全区后，车上人员始得检查及抢救伤亡者。除两名死亡，还有一名女红卫兵腹部中一弹，一名男红卫兵肩部中一弹，两名解放军战士受伤，其中一人腹部中一弹，一人大腿中两弹。

宣传车遭枪击的同时，38 号、39 号楼各窗口和制高点，均有人向楼下进攻者射击。甚至有“红联”人员持枪下楼，冲到马路上向造反派开枪。一时，枪声密集，中弹者众。密集枪声过后，各处皆有人扑倒在血泊中。

当年画刊小报上关于成都“5·6 事件”的文革宣传画

被击中者有的头部脑浆迸裂，一个不谙时事、跑在头里的“红小兵”，脑袋被炸掉一半。有的胸部者被炸成一个碗口大的洞，击中腹部者则肝肠寸断……现场情景让人惨不忍睹。

为了拍摄枪击现场人员惨烈伤亡的真实情景，以便送到北京向中央汇报并向全国展示控诉，摄影师在现场抢拍镜头。枪响后，为保护这位“英雄的摄影师”，在场的“红卫东”、“圣火”等工人造反派，自动组成一道人墙，为他阻挡子弹。结果，摄影师拍下了镜头，而他们却有人倒在血泊之中。

文革以来，武斗引发的伤人、死亡事件时有发生。但真正开枪杀人，这是谁也不会想到的。所以，当天下午，枪声一响，消息传开，整个蓉城震惊了，整个成都沸腾了。而从那一刻起，整个省城的民心舆论，差不多以压倒的优势，倾斜向了红卫兵造反派一边。

第一个做出反应的是省城各医疗单位。消息传来，川医附院、中医学院、省医院、市三医院、二医院，100 多台救护车倾巢出动，往 132 厂进发。沿途又有无数客车、卡车加入到车流中。一时，通往西郊的主要公路上形成了一条尘烟滚滚的长龙。而更多的声援者和市民则是一路跑步前往。

在人们心目中，当时的 132 厂，已经成了“革命”的战场，上“战场”自然就可能流血，甚至可能“牺牲”。因此，许多前往救援的人，内心已经作好了“光荣献身”的准备。一些救援助威者，留下了遗言遗书，一副视死如归，而且是“死得其所”、“死得光荣”的气概。

省医院的一位中年女医生临出发前，异常肃穆地对自己的两

个小女儿说："孩子，妈妈去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去抢救阶级兄弟去了，如果牺牲了，不要难过，长大了要为妈妈报仇！"而在武斗现场，她表现得也的确十分勇敢，几次不顾个人安危，去抢救伤员。

陆续赶来的救护车抵达现场后，护士、医生抬着担架，冒着枪弹跑来跑去，会同造反派抢运、救治伤员及阵亡者遗体。

一位医生在武斗现场接连抢救了 6 名伤员后，遭到"红联"枪击，打断了他的双腿。

两名川医"915"的医务人员飞奔上前抢救一名中枪倒地的"826"红卫兵时，枪声又响，3 人的鲜血流在一起。

另一位白衣战士正飞奔抢救伤员，成都十八中的女学生赵宗纯看见有枪口正向这位医生瞄准，立即奋不顾身跑上去，边跑边喊："医生！医生！'产业军'在瞄准，卧倒！卧倒！……"话音未完，又是"砰"一击枪响，击中赵宗纯的头部，这位年仅 16 岁的女红卫兵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当年画刊小报上关于成都"5·6 事件"的文革宣传画

载着一个个血肉模糊的受伤者的救护车，返程往医院飞奔。车上，属于"红成"的川医"915 战斗团"等单位医务人员，对

伤情严重者，怕路途远，手术抢救不及，有的在车上即开展手术抢救。不时，一个医务人员失声痛哭着，将一顶被鲜血染红的帽子或血衣，举在手里，让塞满道路两旁的市民观看。一会儿，又脸上挂着泪水，大声告诉路边行人，已经“又有一个阶级弟兄为革命事业英勇献身了”。此举，自然又引来道旁围观群众的痛哭和悲愤之情。

1967 年 5 月 6 日的成都，上百万市民的情绪及整个社会舆论，就这样不断被一幕接一幕的场景、事件刺激着，强化着，诱导着，越来越对“产业军”不利。未及当天黄昏，起码是在市区范围，“产业军”在市民心理和人心向背上，已经失去了生存空间。包括部分以前对“产业军”暗存几分支持同情的军人在内，此刻心内天秤也已开始倾向红卫兵造反派一边了。

38 号楼的“红联”一边开枪，一边往外冲，撤离 38 号楼。17 时左右，“红联”基本撤出了 38 号楼。红卫兵眼看胜利在望，各造反组织的“敢死队”、“冲锋队”，于是都高举各自的战旗、队旗，冒着被枪击的危险，争先恐后往大楼顶上冲，试图当第一个“举红旗英雄”。17 时许，工人“硬骨头战斗团”的战旗首先在 38 号楼的三楼飘起。接着，如林般的各种队旗在 38 号大楼顶上呼啦啦地挥舞着。

占领 38 号楼的造反派，在楼顶上发现一门带有 12 枚炮弹的八二迫击炮，没有发射。

38 号楼的失守，不仅让 39 号楼成了“孤岛”，也促使“红联”头头和支持他们的厂领导成员最终做出了“大撤离”的决定。据守 39 号楼上的“红联”人员，在枪声掩护下，从楼顶一侧的

附楼梯或是用绳索吊下，陆续撤走。

枪声刚息，这边高擎红色战旗冲锋的造反派“敢死队”已冲上楼顶。放眼四望，已无人影，遂向楼下人群挥舞红旗，以示胜利。谁知对面一楼顶仍留有一“红联”枪手，即举枪向挥舞红旗者瞄准。枪声响过，舞旗者立倒。又有造反派“敢死队”冲上，继续举旗挥舞。

对方狙击手已爬上水塔，又开枪，舞旗者再倒。继者再舞旗，再开枪，如此前赴后继，多次反复。不多时，已先后有 10 余位“敢死队”倒在血泊中，非死即伤，而冒死舞旗者，仍是接连不断。用造反派当时的豪言说：“宁可自己牺牲，也不让造反红旗倒下！”

当年画刊小报上关于成都“5·6 事件”的文革宣传画

## 第 626 回：有计划，“产业军”撤向农村《红十条》，□伯达逐条宣讲

“红联”有计划地从厂区撤离。之前，“产业军”指挥部已预先拟订了详细撤离方案。按预案，将主要由转业军人组成的基干民兵，编成班、排、连的准军事建制，并各自携带部分枪支弹药和少量必需生活物资，随同部分干部和家属，向市区外的郊县撤退。撤离前，部分群众尚存疑虑，有家园顿失，从此离乡背井之感。同时对未来前途感到渺茫担忧。对此，为首的“红联”负责人向群众及家属鼓动说：

“枪杆子掌握在我们手里。我们和军区是有联系的，不会带错路……”

“红联”第一批撤离人员从厂区后门突围而出，沿飞机场往郊外小镇文家场方向撤退。谁知正和门外往里冲的一队造反派工人和红卫兵狭路相逢。后者打算拦截。

撤离队伍中，射出一排机枪子弹。靠机枪开道，撤离队伍方得以脱身。之后，又先后有数批“红联”人员及家属，趁夜色掩护撤离 132 厂。撤离的人员中包括早就进了 132 厂的“产派”农民，人数在 1000 人左右。大部分厂领导及中层干部都在撤离行列中。

从下午 17 时第一批人员开始撤离到晚上 20 时，厂内仍不断有枪声响起，直到 20 时 20 分，武斗现场的枪声才完全停止下来。

天完全黑下来了，进攻 132 厂的人开始往市里撤，能挤上车的，便坐车。大部分人没车坐，只能徒步。公路塞得满满的，车鸣人喊，行进的速度极慢。

川医附院太平间内摆满了死者遗体，所有病房，包括临时病房和过道，都挤满急待救治的伤员。造反派、红卫兵自发组织的“志愿献血队”集聚医院大门，排队等候献血。一时间，全城悲声，群情激愤。消息传出，全国哗然，高层震惊。这是文革以来成都地区最为严重的一次流血事件，也是四川省首次动用枪支进行的大规模武斗。

当天，周恩来同甘渭汉谈132厂武斗问题。

深夜 24 时左右，解放军野战军支左部队奉命进驻 132 厂并全面占领厂区。野战军进驻后即开始在生产区全面戒严，并在全厂范围大规模清查搜索“红联”人员及收缴武器。

当晚，发生在四川省成都的“56 事件”迅速传遍了北京各大院校，反应最激烈的是北京大学聂元梓的“新北大公社”，当天晚上就第一个发表《关于四川局势的声明》，强烈声讨“产业军”，表示坚决声援四川造反派。北京地院“东方红”，更是连夜组织万人集会示威，声讨成都“56 事件”。他们还和清华“井冈山”、中科院等 80 多个单位一起在北京地质学院连夜召开为地院学生李全华等“死难烈士”报仇誓师大会。清华“井冈山”、北航“红旗”等首都有影响的红卫兵造反派组织，也纷纷对成都“56 事件”表态，一边倒地声讨“产业军”及所谓后台，声援四川造反派。当晚，一些激进的红卫兵，还连夜采取行动，在赴京四川造反派人员的指认配合下，四处查抄打砸“产业军”一派

在京机构及人员驻地，搜捕其成员，当晚就抓获数十人。

不仅如此，群情激愤的首都红卫兵，甚至要发起组织红卫兵“敢死队”，开赴四川与“产业军”及其后台“李井泉一小撮同伙”，决一死战。此议被周恩来制止。

5 月 7 日,中共中央发出中发［67］147 号文件：《关于处理四川问题的决定》，共十条：

撤销李井泉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成都军区第一政委的职务。

宣布川大“826”、“工人造反兵团”为左派组织，而“产业军”等组织为保守组织。

调原西藏军区司令员张国华任成都军区第一政委，并以他为首组织四川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负责四川省的夺权事宜。

针对 5 月 6 日发生在 132 厂的流血事件，中央在决定中，加写了第十条，指出：“关于五月六日成都发生的流血事件，中央将作为重要的专门案件处理。对于枪杀群众的凶手，特别是事件的策划者，要依法处理。一切群众组织的枪枝弹药，都一律由成都军区负责收回封存。对各群众组织中受伤的人，都由成都军区负责安排治疗。对死者要进行抚恤。”

这就是著名的《红十条》。

5 月 7 日晚，周恩来同四川省省长李大章、中共中央西南局书记曾希圣、中共成都市委副书记廖井丹等人谈话后，在人民大会堂的西大厅，再次接见赴京参加解决四川问题的四川部分市县代表。参加接见的还有江青、陈伯达、康生、叶群、肖华、杨成武、王力、关锋等。张国华及梁兴初等新成都军区领导班子成员

亦在座。会上，陈伯达宣读中共中央《关于处理四川问题的决定》。

接着，肖华讲话。他说："成都军区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初期，批判党内一小撮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追随者黄新亭、郭林祥的斗争是正确的，军区在支援地方的斗争特别是支工、支农是有成绩的。但是从二月下旬以来，军区个别领导人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支持了为一些保守分子所蒙蔽、被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幕后操纵的保守组织，而把不少革命群众组织打成反革命组织，并且错误地搞镇反运动，逮捕了大批革命群众，镇压了革命组织和革命群众，尤其严重的是在万县发生了枪杀流血惨案。"

"主席在四川一个文件中批示说：'犯错误是难免的，只要认真改了就好了。四川捉人太多，把大量群众组织宣布为反动组织，这些是错了，但他们改正也快。'"

"这里，我还要提到，据说成都地区武斗严重，我们是坚决反对武斗的。武斗很容易被敌人利用，有的地方武斗就是敌人煽动的，敌人利用武斗把斗争大方向捣乱，我们决不能上当。5月6日流血事件极少数坏人开枪杀人，我们解放军坚决反对，对开枪杀死革命群众的凶手，特别是策划者，一定要依法处理。"

江青讲话说："我完全拥护《中共中央关于处理四川问题的决定》，同意肖华同志的讲话。我没有更多的话讲，我只讲一点。我们有这么好的军队，不要因为他们有错误，在一个地区一个问题上的错误，就一切都错了。要记住，要爱护我们的人民解放军，他们是人民的子弟兵，他们犯了错误会很快地改正，要原谅他们，欢迎他们改正错误，要与人为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这

是我要讲的第一点。

第二、革命派内部，听说内部也吵得很厉害。在组织内部分不清敌我，采取了甚至比对敌人还厉害，这就不好了。今后是不是就没有矛盾了，很难说。但是大敌当前，四川就是李井泉，我们不能松懈，要时刻记得批判斗争，斗倒斗臭，如果一松懈，内部就会吵起来。今天，总理、伯达、康生找川大和其他一些同志们解决这个问题，解决得很好嘛，大家都笑了。少打一些内战，把矛头对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忘记了这个大方向就要犯错误。我希望同志们记住这一点，把精力对准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样我们就不会迷失大方向。

第三、对保守组织，一个组织几十人，甭说几千几万，不要随便对他们的群众采取歧视的态度，这里有个群众问题。革命派要善于做群众工作，要做艰苦的思想工作。这一点，对你们可能有点恼火，他们对我们打、砸，我们还要给他们做思想工作，要作。除了个别的头头外，一般的应做群众工作、思想工作，才能把群众争取过来，这才能孤立头头，打胜仗。西南保守组织势力是不小的，对保守组织采取什么态度是一个重要的政策和策略。”

接着，新任成都军区第一政委张国华讲话，表示完全拥护、不折不扣地坚决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关于处理四川问题的决定》，“对于前一段被取缔的革命组织和被打成反革命的群众，根据中央关于四川问题的决定，我们回去立即处理，一律平反。”要在部队中普遍地，轰轰烈烈地开展一次爱民运动，搞好军民关系，与人民群众紧密地团结在一起。并欢迎同志们对我们工作中的缺点进行批评、帮助。

最后，周恩来讲话。他说：

“今天开的是结束会。伯达同志刚才已经把《中央关于处理四川问题的决定》讲了，解释了，大家都是支持的，拥护的。现在四川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组长张国华同志表示要坚决贯彻执行决定，领导大家一起把四川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好，这是很好的表示。肖主任，江青同志讲了，是很好，大家也支持。

韦杰、甘渭汉两位同志的检讨，有部分同志不满意，因为你们受了压抑可以理解。虽然我们看来态度是诚恳的，但不深刻，认识有个过程。你们要求再检讨，我同意，但不一定在北京。检讨要通过实践，听其言，观其行。没有现场的观察，在实践中去认识，不可能一次比一次深刻，你们听他们说，也要看行动。还是回去，在张国华的领导下，在新司令员的帮助下，给以改过的机会。毛主席历来主张对犯错误的同志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这对四川有特殊的意义。”

对5月6月的流血事件，他说：大家“激愤是可以理解的，把形势看得很乱。可是，冷静点看，还是大好形势，是好转形势。大家想：去年12月是什么形势，那个时候，你们喊‘打倒李井泉，解放大西南！’还只是喊，没有打倒，现在被你们揪下马来了嘛。4个多月取得了胜利，在西南开始解放，这样的好形势。成都军区所犯的严重的方向路线错误，就是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当作镇反运动，把革命派打成反革命，现在平反了嘛。伯达同志代表党中央宣读的关于处理四川问题的决定就讲了一律平反，恢复名誉。如像万县的‘主力军’，当然是革命组织，不是反革命组织。”

“5月6日在坏人操纵下，打了枪，造反派站在一起，川大

八·二六、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红卫兵成都部队、二七红卫东、零二八部队都是站在一条战线，证明是战友，是同志。过去的错误可以用自我批评解决。矛头对谁非常重要，不要分散目标，才能使开始的胜利继续下去，这是很重要的。”

“有的地方如德阳、江油、雅安，还有些人没放，《决定》宣布后，他们负责打电话。军分区、地委的同志在场嘛，命令他们一律打电话，他们错打错捕的人都要释放，立即执行。考验他们，如果他们拥护中央的决定，要以行动来表现。不要担心，即使有的人有点阳奉阴违，新的军区、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会解决，有了负责人，找他们解决。”

“关于对待解放军问题。江青同志讲了，个别领导人犯错误，应当允许改过，允许革命。毛主席对待犯错误的人总是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批判从严，处理从宽，让他们回到自己的原地，通过斗争实践来考验。新的司令员、政委都没有在四川工作过，情况不熟悉，犯错误的同志熟悉情况，要证明他们在中央、在群众面前表示改正，在斗争中、工作中去改正。要弄清楚军区内部司令部、政治部、后勤部关于17个军分区、170多个县武装部、多少独立师、团，总有些过去受李井泉、黄新亭一伙影响的，要通过他们熟悉的人研究，把其中最顽固的人孤立起来，允许军分区的个别领导人，给他们一个改的过程，不要希望一下全部改观，那是主观主义的，不是毛泽东思想。”

“‘五六’事件专案，责成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回去以后就组成专案小组调查，吸收造反派参加，什么都能查清。其他地方，万县、涪陵，已经听了汇报，看了材料，也责成革委会筹备小组

成都军区去解决。”

“重庆问题，作为专案，毛主席批示叫重庆的两方，军队方面、地方的‘八一五’，有两种看法，对革联会怎么算，都找来了，单独研究搞清楚，然后做出决定。其他地区有了问题，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去进行处理。”

“北京联络站，大专院校同学，新的不要再去了，已去的要逐步收回。四川造反派很多，一开始就起来造反，都来过北京，锻炼出来了，相信他们自己，七千万人等于一个大国，还不能相信自己能解放自己。”

“北京医学院的同学自告奋勇，组织了医疗队，同意派30个人去，代表党、政府、中央军委、中央文革慰问他们。”

“‘北地东方红’牺牲了两个同志，尸体运回来干什么？可以把家属带去，把尸体烧了运回来。”

这时，有人插话说：“产业军已经接管了火葬场。”

周恩来说：“请梁兴初、张国华同志，马上打电话请野战军接管火葬场，把骨灰运回来。

专门问题有联络员负责找人谈，广大群众就回去了。车费、旅费有困难的，联系解决。分住在外面各地的，把《决定》印发给他们，并把我们今天讲的这些转告他们。

大家回去轰轰烈烈闹革命，把西南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其后，成都及郊县各火葬场，均被军方奉命接管，以防止传说中的被产业军“偷偷毁尸灭迹”。

从此之后，号称有数十万之众，并一直受到以成都军区为代

表的军方公开支持的“产业军”，作为一股政治势力，虽然在农村又做了几次表演，但毕竟大势已去。

而 132 厂厂长马诚斋，在“56 事件”当天突围后，与政治部主任王德等人与大队伍失散，行至郊外一河沟边，喘息方定。再三叮嘱跟随左右的一位中层干部，也是“产业军”派“决战决胜”的负责人：“要保存实力，要保存实力！”两天后，他和王德两人在“红联”人员掩护帮助下，乘火车前往北京向中央反映情况，状告“造反派冲击攻打国防保密工厂”。途经郑州转车时，在街头看到传单抄出的《中共中央关于处理四川问题的决定》，尤其是最后第十条对“56 事件”的定性及追查幕后策划者的文字时，方知事态严重。马诚斋当即面色苍白，双手颤抖，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只好又返回成都市西郊土桥村，当时成都“产业军”的大本营。

再说 5 月 6 日晚 21 时许，成都工学院来了一位“工人硬骨头战斗团”勤务组老李。他对刚刚从 132 厂撤回来的“红旗”学生说：“‘老产’现在手中有枪，我们没枪不行。听说，成都机车厂‘老产’几乎撤了，厂内武器库中有枪，就看我们敢不敢去拿。”

正在悲愤交加的学生，忘记了白天惊恐，立即召集了十几个人，开着解放牌大卡车，直奔二仙桥机车厂。到厂大门，有两位看门的工人问他们是哪个组织的？这些学生应声回答：“‘成电红旗’！”

门开了，两位工人却被学生控制在收发室，他们还把收发室中电话听筒内的受话器扒出，然后在人带领下直奔武器库。到了武器库门前，用钢钎拗开铁门，进去一看，全都傻了眼。屋里摆

放着苏式步枪，50 冲锋枪，重机枪，驳壳枪，子弹若干。

管他三七二十一，大家赶紧往车上搬。事后清点：苏式步枪 95 支，50 式冲锋枪 2 支，驳壳枪 4 支，重机枪一挺。由于当时不懂枪，重机枪只拿走了枪身，枪座留在了武器库。

回到成都工学院，大家群情激奋。

第二天中午，来了许多解放军，其中一位干部，让他们把装有枪支的卡车开到学校足球场中央，任何人不得靠近。然后对大家说：

“红卫兵小将们，你们要相信林副统帅，相信中央军委，现在，中央军委已命令野战军进入 132 厂，会给“造反派”一个公道。你们的枪支必须上缴，请相信我们解放军。”

成都工学院“11 战斗团”勤务组的红卫兵也劝“红旗”学生缴枪。于是，“红旗”学生只好将那卡车的武器上交了。不过，那四支驳壳枪没在车上，被他们暂时留了下来。

5 月 8 日中午，在成都市中心人民南路广场，举行了空前盛大、隆重的追悼大会，追悼在“五四”、“五六”事件中死难者，共计 30 多万人参加。其规模之大、隆重壮观和沉痛严肃又壮烈的场面，是成都有史以来未曾有过的。与会造反派红卫兵，部队干部战士，及各界群众等，均戴白花、举红旗，抬着各式花圈，从各通道进入会场。中午 12 时，全场起立，齐唱《国际歌》。之后，在哀乐声中，载有 45 具死难者遗体的由大卡车做成的“灵车”，在川医“915”医务人员护送下，缓缓驶入会场，每具死难者遗体上，覆盖着各自团队的战旗、队旗。

此时，四川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张国华、梁兴初、刘结挺、

张西挺 4 人均在北京。因此，5 月 8 日的追悼会由 “成都地区革命造反派联合总部”的负责人主持，并致“悼词”。接下来，大会勤务组、川棉“红旗战斗师”、“红卫兵成都部队”、“省级机关革命造反派司部”，川大“8.26”等代表先后讲话。代表死难者家属在大会上讲话的是程其逸的母亲尹淑女，她在发言中说：“我大女儿在 132 厂的斗争中壮烈的牺牲了！她的死，我感到的不是悲哀，而是无限的光荣和自豪！”

追悼会后，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

## 第 627 回：座谈会，张、姚听部□意见 聚省委，济南市“五七大捷”

张春桥、姚文元 4 月 30 日到济南后，在济南军区开了 3 次座谈会，听取部队的意见。也与省革命委员会的 8 名常委、部队的干部、群众组织的负责人，三方面一起开了一次座谈会。这次三方座谈会从下午 14 时 30 分一直开到次日凌晨 1 时 30 分。

5 月 4 日，他们召开驻济南市驻军排以上干部大会。姚文元在会上说：“到这里来，是毛主席叫我们来的。”

当晚，济南发生“422”派群众冲击山东《大众日报》事件，济南钢铁厂、济南汽车制造总厂、济南机车工厂、济南机床第一和第二厂、济南国棉第一、第二、第三厂的工厂群众组织与“151”联合兵团等济南一些群众组织一起，组织了这次行动，指责大众日报社支持“428”派。《大众日报》的“革命造反联络部”则说“422”派群众的行动是“一伙法西斯暴徒袭击《大众日报》社的反革命事件”，并纠集部分红卫兵组织进行了反击。

5 月 5 日，张春桥、姚文元召集济南军区机关干部会。张春桥在会上介绍了他们到济南后召集几次座谈会的情况。他说：

“谈话都很激动，很多同志过去打仗的时候没有流泪，而谈起目前碰到的许多问题时就很伤心，哭了，后来慢慢地情绪也就平静了些，我们也就是在这个条件之下，才把军队、革命组织和革命领导干部这三方面的代表找到一决谈话的。如果第一天就把这三方面找到一起，那很难谈啊。到最后三方面在一块谈的时候，我们觉得整个会议的气氛还是很好的。造反派的许多小将们，谈

的也很好，他们有批评也有自我批评。部队的同志有批评也有自我批评。王效禹同志和其他同志也讲了话，也有批评也有自我批评。这样对调整我们的内部关系，总算有了一个比较好的开端。”

“到现在的止，我们和各小革命群众组织的代表见了面的也只有两、三个人，其他的人都没有谈话，对他们的意见我们听的还很少，听的很不够，再加上我们的水平很有限，经验很少，因此，今天来讲话感到有相当的困难，很可能讲不好，而且，可能讲的对你们没有什么帮助，或者还会讲一些错话，这都是可能的。”

“有的同志问现在形势究竟怎么样？我们整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形势不管是全国还是山东，以总的方面来看，都是好的，大好的。这一点我们应该有充分的估计。讲它好，并不是说我们总是爱讲好听的，而是说我们应该看到形势确实是大好的。形势大好的主要标志，就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更加深入人心，广大的革命群众进一步地发动起来了。因为这个革命是个伟大的群众运动，看这个运动的形势好不好，主要的是看群众是不是发动起来了，特别是《红旗》杂志发表了清华大学的关于‘保护一小撮、打击一大片’那一个调查材料后，那个调查中间提出来批判《论修养》这本书，接着戚本禹同志的文章《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发表以后，全国的形势就更好了，群众情绪很高，一个批判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斗争，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

“今天是我们来了第五天了。从总的趋势来看，形势是在缓和的，不是越来越对立。我们来的当天夜里，坐着车子出去到马

路上转了一圈，那个时候马路上还是相当紧张的，大标语很多很多。后来，第二天早上那些标语都没有了，你看这还不是个好事吗？！”

“现在有一个说法，说是我们革命委员会和部队之间如何、如何，我说这个提法本身不太妥当吧，大家考虑一下，这个省革命委员会，他是一个‘三结合’的权力机关嘛，我们军队算一方嘛，不能说革命委员会不包括我们军队。同样，我们军队谈问题的时候也不能说我们不算在革命委员会里。”

“济南军区党委定了三条，这三条我们认为是很及时的，很好的。因为这样就不至于使矛盾向更尖锐的方面发展。”

“据我们观察，济南军区的同志有参与夺权处理那样局势的经验，还没有学会处理这样的发生在人民内部这种矛盾的经验。这就要咱们在斗争中间，在实践中间学会它。以后还会碰到的，因为人民内部矛盾永远会存在的。”

“去年 11 月我到上海去，处理一些工人要上北京告状的问题。我下了飞机就赶到火车站找工人代表谈话。夜里 12 点到的，谈到天亮，毫无结果。我劝他们回上海，我们一块到上海去谈。不行，达不成协议。他非要上北京。我看到这些代表没法谈了，要他们把我的意见给群众谈谈，他们说不行。那好呀，我就直接和群众见面给群众谈。在车站广场上开万人大会，从天亮一直开到下午 4 点，才把他们说服了。就这样连着开了 16 个小时的会，中间也没吃饭，也没喝水。工人那个骂起来可是凶呀，他们有好多人，我只有一个人，来的工人我一个人也不认得，在场的究竟张三，李四，根本不知道。那时我就是听哪。因为我出发以前，

以陈伯达同志的名义发了个电报给他们，劝他们回上海，说我到上海去给他们谈话。他们就在那个万人大会上骂，说陈伯达这个电报是个大毒草，是修正主义，说我要把他们骗回上海，是个大阴谋，说我是和华东局、上海市委勾结好的，要骗他们回去。总而言之，整整在那里攻了我 16 小时就是了。我讲话顶多一个多钟头，那就是攻了我 15 个小时。你要恼火，那一下子就闹翻了。有的人，究竟是什么人，是革命的还是不革命的，还是反革命的，我脑子里也确实考虑过。有时也觉得不对头，怎么骂起陈伯达来那么凶，指着我的鼻子骂，我们又都是第一次见面，我是好心好意来的，而且我确实是中央派来的，为什么那样攻我。但是那一次我还是沉着，因为处理这样的问题，还有一点经验。我也没有发火，没有抓他们的人，也没有过多的责备他们。听了他们的意见，感觉他们讲的有道理，承认了他们有些讲的是有道理的，这些事情回上海可以解决。这样到了 4 点钟才回去了。现在上海工人运动的基本领导骨干和领导人，有很多的就是这些人。因为有那 16 个小时，我就跟他们成了好朋友了。现在我回到上海去工作，经常和这些人打交道。我到那个工厂里边，总有人见了我说，唉呀，你好呀，我们在安亭见过面的呀，那个车站叫安亭车站。这就建立了我们特殊友好关系。不打不成交嘛！”

“在济南我们看到杨得志、杨国夫的标语固然不少，不过我说你们两个的标语没有我的多，上海比济南大，标语贴的也是满城都是，而且贴了十几天，不是那么一天两天，又没有人去给他们说：你把它刷下来吧，你把它贴掉吧。没有。造反派当然反对这些标语，因为那是一个造反派犯错误的组织干的，其余的造反

派组织反对他们，就到处去贴，他贴了标语，给他再贴上，造反派也贴另外的标语，标语战斗了半个多月。那种日子我们过惯了，觉得没有什么，有什么了不起！”

“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成立的头两天，忽然一个晚上就大整谢富治，谢富治同志现在是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的主任。大概就是你要夺权了，或者是在夺权以后，这一场斗争是不可避免的。阶级斗争它是要在我们内部出一些事。遇到这种事，要沉着。谢富治同志他也有经验了。也是造反派贴他的，不是坏人贴他的。谢富治他是公安部长，他也不抓人。他说，嗨，让他贴吧。别的造反派说，我们把它撕掉，他说不要撕，让他贴在那里好嘛！他态度很开朗，也不紧张，还是找那些人谈话。谈一两次，彼此谈通了。贴他标语的人，我不讲他的名字，就是他们革命委员会的常委，是著名人物，那有什么关系呢？”

“对于党、团员问题，成分问题，同志们提了好多。我们对这个问题，态度向来是清楚的。成分好坏这个事是应该重视的，不重视成分是不对的。但是，也不能一去就先看他的成分怎么样？一看成分好，就认为是革命组织，一看里边有一部分人、或者个别人成分不好，就说是牛鬼蛇神。我们还要看在整个阶级斗争中间，在两条路线斗争中间的表现。……我们的党今天实际上并不是那么统一，不是铁板一块。刘少奇不是共产党员吗？邓小平不是共产党员吗？陶铸不是共产党员吗？你能说：一看他是党员，我们就要依靠他，这样那不就错了吗？而且我们有些党员团员、积极分子、劳动模范在这次文化大革命里面，当保守派的。特别是在运动初期，成了保守派的，数量不是很少的。这没有什

么奇怪。一个就是刘邓路线的流毒，毒害很深，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在我们党里面流传了那样久，20 多年了。多少共产党员看了那本书，按照那个去修养的，这不是越修越糟糕吗？……刘少奇这一些人就是这样，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的革命家，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所以，真的要搞社会主义了，他搞资本主义。有一些劳动模范，为什么变得保守了呢？除了那些原因以外，还有一个原因是他的地位变了。原来苦大仇深，阶级感情非常深厚，但是后来呢，他地位变了，生活也好了，有了权，不受压迫了，所以在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他不觉感到有革命的要求，别人感到受压迫，要起来革命，他不感到受压迫，反而觉得应该维持这个秩序，不要动。他就有一种保守倾向。”

这几天，济南也到处传着一个消息，说：“王效禹同志要接见‘422’派的群众代表，要‘428’派联合‘422’派一同进行文化大革命。”

“422”派高兴的奔走相告。但消息传出后却没有下文。“422”派等了几天后开始在省革委外围集合，要求王效禹出来接见。

本来，是定在 5 月 5 日在济南八一礼堂召开群众大会，由张春桥、姚文元作报告的。恰好 5 月 4 日晚发生了冲击《大众日报》的事件，于是王效禹等人以“422”派群众组织冲击大众日报社，要保护张春桥、姚文元安全为由，指示有关人员不得把大会入场券发给“422”派。部分“422”派群众组织因此来到省革委会索要入场券，遭到拒绝。随即，他们冲进省革委会大院，找省革委交涉，并占据了电话总机室和部分办公室，要求在礼堂外广场拉

线，组织收听广播，要求王效禹出面回答问题。就这样，5 月 5 日的报告会被迫取消。在此情况下，冲进省革委会大院的群众高喊："舍得一身剐，敢把王效禹拉下马！"

当晚，王效禹在经十一路济南军区第五招待所主持召开省革委常委会，专门研究 422 派的问题。

第二天，5 月 6 日凌晨约 2 时，"422 派"第二批人员来到省革委，约 4 时开始砸门，与省革委人员发生争吵和冲突。

这天上午，山东师范学院万志民等 20 多名学生到济南军区第 5 招待所找王效禹辩论，要求做出解释，并解决听报告问题。王效禹的妻子刘崇玉布置彭世杰和刚从青岛到济南的孙相银等人把学生轰走。

彭世杰打电话调来体育学院 50 多名学生，轰赶山东师范学院的学生。

山东师范学院的学生自然不是体魄健壮的体育学院学生的对手，被打的屁滚尿流，惹得在阳台上指挥的刘崇玉哈哈大笑。

这天，"422"群众在八一广场集结了近万人。傍晚，又传来王效禹、杨得志、袁升平等山东的党政军主要负责人要接见的消息。聚集在八一广场的"422"群众觉得不能再放弃这次机会，他们手挽着手走向省革委大门，边走边喊："我们要见王效禹，我们要见杨司令！"增援 5 月 5 日冲进省革委会索要入场券的"422"人员。省革委会的警卫象征性的拦了拦便放弃了。"422"派有秩序的进入到省革委会大院。王效禹指示省革委会机关人员全部撤出，人去楼空。

此时，济南市还流传"杨得志接管山东一切大权"的消息。

5 月 6 日下午，王效禹在济南军区第五招待所继续主持省革委常委会，决定驱赶占据省革委会大院的“422”派群众，解决“422”派问题。他问公安厅的花光隆：“你们那里有没有地方？”

花光隆回答：“我们那里早就准备好了，‘131’时门窗钉的板子还没拆，现在又增补了一些。效禹同志到我们那里去，我们表示欢迎，保险没有问题。”

“131”是指 1 月 31 日“山工联”等围攻省公安厅事件。

随即，“山工指”、“红山指”发出号召，以“保守派冲击省革命委员会”为口号，号召山东人民紧急行动起来，“誓死保卫山东省革命委员会”，同时调集二、三十万“428”群众，包围山东省革委会大院。至晚 19 时 30 分，陆续到达这里的“428”派人员将省革委会大院围的水泄不通，与被围者发生小规模冲突。

晚上 21 时 30 分，院内的电话总机和电线被切断，大院里漆黑一片。半小时后，晚 22 时，探照灯突然闪亮，将大院照得白昼一般。“红山指”和“山工总”约 5 万人，乘坐大卡车奔驶而来，几辆宣传车的高音喇叭不停地高喊着：“422 派的坏头头，纠集不明真相的群众，冲击省革委罪责难逃！受蒙蔽无罪，反戈一击有功！谁反对毛主席信赖的效禹同志就砸烂谁的狗头！”

包围大院的“428”派群众开始从四面八方向院内投石块、砖瓦，院内人群密集，许多人被砸伤，被围者也开始奋力反击。济南军区派出宣传车进行劝阻，遭到“山工指”、“红山指”人员的围攻，被迫撤回。

5 月 7 日一早，山东大学“毛泽东思想红卫兵”集合队伍，去保卫“毛主席亲自批准”的省革命委员会。

他们到达后发现，省革委会大院早已被围得水泄不通，大喇叭不断要求里面的人“悔过自新　”、“悬崖勒马”、“杀回马枪”，反复说明“受蒙蔽无罪，反戈一击有功”，只要出来，便“既往不咎”。

不断从省革委会大院里面走出人来，三三两两的多，成群结队的少。有人走出，外面的人即鼓掌欢迎，欢迎“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

## 第 628 回：毛泽东，对□、粤军□批示 五月八，新疆上千人武斗

7 日晨，王效禹派山东省军区副参谋长庄中一来到省革委会大院宣布："冲击省革委会是严重的反革命事件。"之后，大批人员在宣传车前导下拥进大院，沿着几条大道将被围人群分割在很小的范围内，双方棍棒、拳脚相对，打得十分激烈。里面的人吃不住劲了，开始从东门往外冲。有的人上房揭瓦、扒墙拆砖，一阵砖头瓦块如雨点般瓢泼出来。

眼看着瓦块像打水漂一般，从一个人的头上滚过，又连续在好几个人头上打着漂，一直飘到东墙根。

只见一块砖头飞来，嘭！头破血流者，哼也没哼，就倒地了。

被围人群毕竟人单势孤，两个多小时后即被全部制服。除了十几个头目被解放军带走外，其余万余名"422"派被迫将手抱头，接受"428"派的搜身检查。大院内许多"俘虏"衣冠不整、狼狈不堪地蹲在地上。有一名胜利者正在巡视俘虏队伍，查看有没有漏网的"大鱼"。只见此人歪戴着军帽，舞弄着手中的武装带，从俘虏面前踱来踱去，胜似闲庭信步。一会用皮带托起一个女黑字兵俘虏的下巴，令其抬起头来。不知是查看是不是老保头头，还是看看长得漂亮不漂亮。其情其景，颇似当年影片中的"国军"形象。

随即，这些"422"俘虏被强令手举稻草，反戴帽子，低头弯腰，从早已布置在大街两边长达两里多地的人群走廊中通过，遭受谩骂和推打。一时间，哭天喊地，狼狈不堪。从早上 6 时到

下午 14 时，这种场面，整整持续了 8 个小时。有近万人遭受殴打、侮辱，388 人被拘捕关押。

下午，王效禹以胜利者的姿态来到省革委大院，他吩咐："把现场保护起来，请济南军区的同志来看看，也请张春桥、姚文元同志来看看。机关干部不要急着上班，先展览一星期。"

与此同时，济南市《东方红广播站》早已通过沿街设立的有线广播将"'422'派在少数坏人操纵下，冲击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批准成立的山东省革命委员会，将矛头直接对准新生的革命委员会，是反革命事件的消息"传遍全城。虽然 422 派骨干立即上街张贴标语说自己是"豹子头误入白虎堂"，但已成不了主流。据山东木材厂一位参与此事的老者介绍，他逃出后不敢回家更不敢回单位，在街上走了一天，才悄悄敲开一个老同事的门想歇一歇，老同事竟然不敢收留。

事后，张春桥和姚文元向王效禹表示祝贺，说是这次"打了一个大胜仗"。王效禹则把这场武斗事件说成是"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向山东省革命委员会发动的疯狂反扑"，欲将其定为"反革命事件"，把冲击省革命委员会大院的一派组织定为"反革命组织"。由于济南军区的坚决反对，此论未能成立。

第二天，5 月 8 日，山东省革委会作战部召开了 8 万多人的大会，声讨"422"派。自此，济南市"422"派群众组织及以其为主建立的革委会几乎全部垮台，且迅速影响到全省各地。王效禹高兴的把这一天称作"五七大捷"。以王效禹为代表的省革委会和三大"左"派组织认为，"五七大捷"标志着反复辟逆流取

得了决定性胜利。

5 月 9 日，山东省革委会正式发文：根据中央决定，王效禹任山东省革命委员会主任，第一副主任杨得志，“山工指”负责人韩金海、“红山指”负责人王竹泉、山东省军区政治部副主任赵修德任副主任。

还在 5 月 4 日，山东省军区给济南军区并中央文革小组、全军文革小组发电报说，山东地区目前的斗争锋芒指向了解放军，越来越明显，已波及各地区。主要表现是：

一、到处张贴、散发攻击解放军的大字报、标语、传单，省军区、军分区和县市武装部参加“三结合”的领导干部，几乎都被公开点名，成为打倒的主要对象。

二、冲击军事机关，围攻、绑架部队人员。

三、侮辱、殴打和斗争解放军干部、战士。以上情况正在向基层发展，使许多军分区、县市武装部无法进行工作，严重影响了战备等工作的进行。各地“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已有不少处于瘫痪状态。这种事态如果继续发展下去，将会使工农业生产受到严重影响。

就在济南“五七大捷”的那天，5 月 7 日，毛泽东对山东省军区的电报批示：

林彪、恩来、文革小组各同志：

此件请阅。看来山东学生、工人出事地点（就全省说，占少数），省军区、军分区、县人武部，大都可能有些问题。

此事应如何解决，请你们研究出办法，告我为盼！

毛泽东

五月七日

山东及各省，正规军弄错的较少。重庆 54 军有电报说关于支持重大八·一五是否错误问题，宜找两方面人都来，和梁、张、甘、韦诸同志共同商处。

毛泽东又及

毛泽东批示中的“梁”，指成都军区司令员梁兴初；“张”，指成都军区第一政委张国华；“甘”，指成都军区第四政委甘渭汉；“韦”，指成都军区副司令员韦杰。

当天，毛泽东又在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 5 月 5 日的《文化革命简报》第 470 期上登载的《在北师大搞军训的部队是如何支持左派的？》材料上再次批示：

文革小组各同志：

请你们研究一下，此件是否可以公开发表。如准备发表，事前要找炮五师、谭厚兰、李庆林等同志核对属实，不妥处加以修改，然后发表。又，四川那个文件，关系重大，如何修改的，请告知为盼！

毛泽东

五月七日

《在北师大搞军训的部队是如何支持左派的？》的材料说，北京军区炮五师在北京师范大学搞军训期间，“坚决和革命派站在一起，对保守势力和中间派做了深入细致的政治思想工作，瓦解了保守组织，提高了中间派的阶级觉悟，壮大和巩固了左派队伍”。

批示中提到的“又，四川那个文件”就是指中共中央 5 月 7

日《关于处理四川问题的决定》，即《红十条》。

这天，毛泽东还对广东省军管会关于支左干部集训情况报告的批语：

林彪同志：

此件似可转发，供各地参考。

各地军队都应整训一个短时期，时间以十天至十四天为宜，方针和办法采用广州的较好。已经整训过的，一个月或两个月后再整训一次。全军三支两军人员，每一个月或两个月都应整训一次，发扬成绩。纠正错误，以利再战。以上，请酌定。

5 月 5 日，修改后的《〈修养〉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一文再送毛泽东审阅。

毛泽东在第七页加些了“这种对于共产主义社会的描绘，不是什么新的东西，是古已有之的。在中国，有《礼运·大同篇》，有陶潜的《桃花源记》，有康有为的《大同书》，在外国，有法国和英国空想社会主义者的大批著作，都是这一路货色。”

并加了这样一段话：“照作者的意见，共产主义社会里，一切都是美好的，一点黑暗也没有，一点矛盾也没有，一切都好了，没有对立物了。社会从此停止发展，不但社会的质永远不变化，连社会的量似乎也永远不变化了，社会的发展就此终结，永远一个样子。在这里，作者把马克思主义一个基本规律抛掉了——任何事物，任何一个人类社会，都是由对立斗争，由矛盾而推动发展的。作者在这里宣扬了形而上学，抛弃了伟大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

随后毛泽东批示：

退文革小组。在第7页，加了几句话，请研究，是否妥当。定稿后，请印正式清样送阅为盼！

毛泽东

五月六日

5 月 7 日，陈伯达将再次修改后的《〈修养〉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一文再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批示：

照此发表。

毛泽东

五月七日下午七时

5 月 8 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发表编辑部文章《〈修养〉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至此，对刘少奇、邓小平的批判公开化。

5 月 11 日，中共中央下发中发［67］153 号文件："关于批判刘少奇《修养》的通知"。

5月8日，新疆两大派组织"三新"派和"三促"派为争夺《新疆日报》发生大规模武斗流血事件，又称"五•八"事件。

这天，由"炮轰军字号新疆日报联络站"田永龙等人发起，联合乌鲁木齐市"三新"派组织，查封并占据了当时已被军管的新疆日报社。

乌鲁木齐市的"三促"派反对查封报社，发起反击，当日出动2000多人，与"三新"派进行辩论。两派人员面对面地站着或坐着，看双方的辩论。

后来，见口头争辩无效，"三促"派头头王子玉等人研究决定，要强行夺回报社。于是，双方的队伍拉开距离，互扔石头……

石头越来越密集，接着，双方参战人员除使用了石头、瓦片外，又动用棍棒等武斗工具，大打出手，“战况”一度极其险恶，最终造成多人受伤。

5月8日，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全军文革小组办公室给新疆军区和两派群众组织来电：

新疆军区党委、红二司、革命职工联合总部，并抄有关各群众组织：（均请新疆军区抄转）

一、要坚决贯彻毛主席关于“要文斗，不要武斗”的指示，参加武斗的双方，要立即停止武斗。

二、新疆日报社为军管单位，各群众组织都不要去冲，也不要查封，进入报社的外单位群众组织，要立即退出报社。

三、新疆日报的问题，由新疆军区组织双方代表通过协商解决。报纸出版如有缺点错误，可以提出批评。

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

全军文革小组办公室

一九六七年五月八日二十三时

收到中央文革的来电，武斗随告结束。这次武斗，是乌鲁木齐地区发生的第一次规模在千人以上的武斗事件。

5 月 10 日，毛泽东在刘伯承 4 月 30 日报送的信上批示：

此件送总理阅后，交文革小组一阅，退林彪同志存。

此件表现这一时期军队许多人的心情。遇到这种情况，应当沉着镇静，多做工作，发扬成绩，纠正错误，问题总是可以得到解决的。

毛泽东

五月十日

毛泽东还在刘伯承写的那段话旁加了着重号，并写了一个批语：

这是张春桥、姚文元同志未到济南时学生、工人们表现的情况。其实不是那样严重。

第二天，5 月 11 日，毛泽东又在中央办公厅秘书局信访处 5 月 9 日编印的《文化大革命信访简报》第 178 期上登载的《济南、山东两军区在支左工作中的一些问题》材料上批示：

林彪、恩来同志：

此件很值得一阅，是山东两军〔区〕的同志写的。

毛泽东

五月十一日

同样情况在全军内，在许多人身上都存在，当然不是多数。

《济南、山东两军区在支左工作中的一些问题》的材料中说：济南军区政治部、山东省军区司令部两位干部来信，反映济南军区、山东省军区在支左工作中“存在许多缺点和错误”：

（一）认为济南军区“在反击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逆流中”，“采取两面手法”，一方面承认围绕在省革委会周围的革命组织是革命派，另一方面又承认一些保守组织也是革命派，或明或暗地支持他们，打击革命派。

（二）说济南军区一些干部对山东省革委会主任王效禹有“错误议论”。

（三）说济南军区机关正在积极准备“打官司”，赴京告状。

（四）认为济南军区和山东省军区至今没有揭发谭启龙的问题。

（五）认为济南军区和山东省军区已由过去对造反派感情不深发展到目前的公开对立。

5 月 13 日，毛泽东又在参加济南军区支左工作的济南军区通信总站干部秦厚德的信上批示：

这位同志反映的问题，是个比较普遍的问题，很值得注意。济南空军于五月五日，济南军区于五月六日已公开声明支持省革命委员会。陆、空军均对中央来了报告，问题已经开始解决。但其他许多省、市有些解决了，有些则还未解决。

毛泽东

五月十三日

秦厚德的信是 4 月 21 日写给陈伯达、康生、江青并转毛泽东的。信中说：

“我于 3 月 4 日参加了军区的支左工作，根据一个多月的亲身体验和所了解的情况，感到驻济部队对济南市的支左工作，在 2 月 10 日以前是完全正确的，自 2 月 10 日以后进入工厂、院校至今，存在着不少问题。主要表现在：一、支持的不是左派，而是保守派，支持保守派打垮了革命派。解放军不是左派的后盾，而是成了保守派的后盾。二、搞‘合二而一’，以保守派组织为核心去联合革命群众组织，如革命群众组织不同意时，即认为是搞分裂主义，破坏大联合。三、在‘抓革命，促生产’问题上，有的单位没有把革命放在首位。四、有的宣传队对所谓的反革命组织采取简单粗暴的态度，使人见了害怕。五、省革委会与济南

军区保卫文革指挥部的意见有分歧，部队支左的同志对省革委会主任王效禹有意见，对省革委会其他成员的讲话更是对立，近来已发展到针锋相对的程度。六、部队的同志和‘红卫兵山东指挥部’、‘山东革命工人造反总指挥部’等革命组织十分对立，这种对立现已公开化，双方支持的群众组织不断游行示威，有时还发生武斗。七、济南军区保卫文革指挥部成了保守派告状的地方，省革委会成了革命派告状的地方。”

毛泽东指示中央文革小组将秦厚德的信刊登在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编印的《快报》上。

济南、山东两级军区与王效禹的矛盾，王效禹也挨了批，康生等人批评他搞“效禹思想”等问题。5 月 18 日，中央任命王效禹为济南军区第一政委兼党委第一书记和山东省军区第一政委兼党委第一书记。

济南军区和山东省军区，多次在肯定“三支两军”取得成绩的同时，检查所犯错误，承诺支持王效禹、省革委会、三大“左”派组织、革命的“三结合”，表示反对把斗争矛盾指向王效禹、省革委会、三大“左”派组织。5 月 28 日，山东省军区发表“五点声明”，支持“反逆流”斗争，支持“以王效禹同志为首的山东省革命委员会”。所谓“粉碎资本主义复辟反革命逆流”的斗争，在省城基本告终。6 月 7 日，济南军区党委发出的《给山东革命群众的一封信》。

“五七大捷”后，军队似乎转向了，但这是不得已而为之。实际上，他们与以王效禹为代表的省革委会和三大“左”派组织之间的分歧依然十分深刻。王效禹和三大“左”派组织在青年东

路山东省美术馆举办了一个《五七大捷摄影图片展览》，王效禹要杨得志、袁升平通知济南军区常委会成员前去参观，济南军区常委们付之一笑，无一人前往。王效禹得知后说："军区就是不支持我。"王效禹等企图将"五七"事件定为"反革命事件"，并拟好了文稿，要以省革委会和济南军区的名义联合下达通知，济南军区拒绝签署。

## 第 629 回：江西乱，处理京津冀蒙藏　又进京，胡昭衡见□伯达

1967年3月14日，江西省军区在省体育馆举行10万人大会，省军区副参谋长周子韬在会上作《关于南昌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报告》，针对江西省夺权后出现的一些问题，提出批评，要求对红卫兵组织进行坚决的整顿，将混进造反派中的坏人揪出来。报告之后，南昌军分区、南昌独立师即6797部队开始抓人，江西一些跨行业，跨地区成立的群众组织，如“保卫毛泽东思想战士”、“工人造反队”、“联合野战军”、“临时工司令部”等纷纷解散和收摊子。

一个月后，4月14日，江西省委书记处书记、江西省抓革命促生产临时领导小组成员、原江西省委书记处书记刘瑞森等人指责江西省军区犯了方向路线错误。

4月17日，洪都机械厂的工人诗人万里浪等人组织数百名群众在江西省军区司令部门口静坐示威，高呼“炮打林忠照！火烧周子韬！”等口号，每天不断有人打着红旗，放着鞭炮，送吃、送喝前去声援。

林忠照是江西省军区第二政治委员。

刘瑞森认为：“到军区静坐是革命行动，一定要坚持下去”。4月20日，万里浪等人又在人民广场召开的“彻底批判周子韬‘三.一四’黑报告大会”，要求省军区收回周子韬的报告，批斗周子韬。在会上，刘瑞森发言，批判江西省军区的错误。万里浪和江西拖拉机厂上过中央团校的工人涂烈等人在发言中说：驻南昌的

独立师，即6797部队“陈昌奉师长支持造反派，独立师驻在江西就是为了防止江西省军区政变。”

陈昌奉是长征时期毛泽东的警卫员，写过《跟随毛主席长征》的回忆录，在当时很有一些名气。

4月23日，万里浪等人冲进江西省军区办公室，抢走省军区党委会议记录本和大批文件。砸了省军区宣传车7辆，抢走宣传车两辆以及扩音机、录音机、电唱机、喇叭等5套广播设备。此后，省军区下属6个军分区、独立师师部和23个县、市人武部也分别受到冲击。《江西日报》、广播电台等14个军管单位的军代表被赶走。

4月24日，江西省“大中学校红卫兵司令部”封闭了由江西省军区军管的《江西日报》。一直到5月2日17时20分，中央文革小组给江西省“大中学校红卫兵司令部”指示，要求他们撤出报社。

5月7日，周恩来为《江西日报》问题发出第一次电报指示：

江西省军区党委转江西省大中学校红卫兵司令部：

5月2日17时20分中央文革小组给你们的指示是确实的，希望你们立即执行。

根据中央3月16日关于报纸问题的几项规定，《江西日报》已实行军管，它不是哪一派革命群众的报纸，不能只反映哪一派的观点和意见。暂时可只刊登新华社电讯和《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的社论、文章等，以便使江西全省人民能够保证听到最高统帅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声音。你们进了《江西日报》的同志，望能立即退出，以利报纸立即出版。至于《江西日报》

的报头问题，因这四个字是毛主席亲笔题写的，以不改为宜。

周恩来

1967 年 5 月 7 日

5 月 8 日凌晨，周恩来先后与有关人谈西藏、天津、北京、内蒙古问题。

周恩来对西藏自治区成立军事管制委员会事批示：

“同意西藏立即实行军管，目前还不忙邀各革命造反派来京会商，昨夜已在四川会上与张国华同志谈定。”

此时，在西藏已形成“大联指”和“造总”两大造反派组织。“大联指”主要是由自治区党、政机关的造反组织为核心组建而成的，下属组织多为各级党、政部门和企事业单位的群众组织，也有一部分藏族群众组建的组织加入。他们与上层和支左部队的关系密切，活动能量较大，但造反精神略显不足。而“造总”是以汽车运输公司等单位的工人造反组织为核心组建而成的，下属组织多为汽车运输、建筑行业的工人和街道藏族群众组建的群众组织。他们与广大汉、藏工人和基层藏族群众联系较广，有一定威望，普遍认为造反精神强于“大联指”。

对在拉萨涌现出的这两大派，社会各个方面通过对他们在运动中的表现，产生出一些截然不同的看法：有的认为他们一“革”一“保”，“造总”是造反派，而“大联指”是保守派。外地串连到拉萨的红卫兵，也多持此种看法，并由此与支左部队人员常发生争辩与冲突；有的又认为他们是一“革”一“坏”，“大联指”是名符其实的“革命派”，而“造总”则是混进有不少坏人的“不纯组织”，应该进行清理和整顿；两大派之间，则互相揭短，彼

此攻击，“造总”指责“大联指”是“典型的保皇派”，而“大联指”则指责“造总”是打着造反旗号的“坏组织”。面对如此众说纷纭的状况，部队介入支左以后，并未能及时站在公正的立场上，正确认识两大派各自的优长和不足，多从团结、联合上做工作，而占主导地位的多数，明显地倾向和支持“大联指”，而对“造总”则进行压制和疏远。由此，也使两大派群众组织对部队的支左工作，产生出有褒有贬的不同态度，“造总”还由此与支左部队之间发生过一些大小磨擦和冲突。

5 月 11 日，毛泽东圈阅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关于同意成立以张国华为主任的西藏自治区军管会给西藏军区的复电。

5 月 8 日这天，周恩来还就交通部机关造反派提出要派人去监督即将举行的中国交通部和阿尔巴尼亚轮船股份公司会谈事批：

“对外谈判，按中央方针办，不要进行监督。因为在外事系统中，还没有开这个先例。”

5月8日下午，胡昭衡奉天津市革筹小组指派，带着天津工学院“八二五”进京，为“八二五”的问题向陈伯达请示。

此时的陈伯达，与上次胡昭衡见到的陈伯达已判若两人，他就像看见陌生的干部一样，对胡昭衡毫无感情流露，既不寒暄也不问任何情况，坐下来就用官场上公事公办的语气宣布：“我很忙，不能多讲。材料我看过了，下面谈些意见，你们可以记录。”

胡昭衡掏出笔，和秘书崔广兴一道开始记录。他心里不舒服，觉得友情已全不存在，他认为原因是 3 天前，天津有人上京找陈

伯达，揭发胡昭衡历史上曾经被捕过。陈伯达向他们郑重声明："我过去和胡昭衡不认识。"

接见时的讲话当天便印成小报，散发于天津。

这时，陈伯达对天津工学院"八二五"说：

"你们开始走的路是对的，现在你们走错了路。有的人开始走对了，现在走错了；有的原来走错了，现在改过来了。原来走对的，不能半途而废。'行百里者半九十'，明明是走了一里，就说走了百里，就什么意见也都听不进去了，这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让自己走向反面。你们不但在天津，而且到了唐山，过错就更大了。

你们过去虽然做得对，一系列的错误可以把过去正确的东西一笔勾销，掉到泥坑中去。你们过去正确过，不要以为这样就可以随便干了。商量都不能商量了，过错也不让弥补了，非打倒不可。但打倒的不是我们。走错了路不回头，要变成被打倒的对象。想想嘛，把天津闹乱了，有什么好处。

天津的部署是中央决定的。

没进红代会，这是缺点，可以弥补嘛。无非有缺点，解放军再三说要弥补。你们这样搞就没有回旋的余地了。就你们少数人正确？你们的行动是得不到社会的同情的。你们这样跟解放军对抗是严重错误，是非常严重、非常严重、非常严重的错误。

解放军不能说一点缺点都没有，有缺点可以提意见。为什么非要这样闹翻不可呢？这样闹对你们有什么好处！难道天津三、四百万人，就由你们这很少的一部分人垄断？解放军并没有得罪你们嘛，工作有缺点可以弥补嘛。工作有缺点就不能弥补，毛泽

东思想哪里去了？！没有吸收你们进红代会是个很大的缺点，中央说要补嘛。你们是不是正确，还要经过实际考验。实际考验证明，你们是非常严重的错误，证明你们是不正确的。

这些意见请你们好好想一想。

你们绝大多数人是好的。一时弄不清楚问题是可以原谅的。这么长的时间，到了回头的时候了。一个人一辈子中有几天功夫方向是对的，就吃老本吃一辈子。把别的造反派否定了，也就否定了自己。

毛主席再三说过要读读《阿Q正传》。你们是不是赵太爷？别不许人家革命。要防止你们上别人的当，上少数几个人的当。回过头来还是好同志，有意见可以提。这样闹，对你们有什么好处！你们脱离了群众的想法，你们的行动是与群众的利益相反的。

你们的干劲要保护，看是什么干劲。干对的我们赞成，干错了的我们不赞成。

你们要革命，不许别人革命，‘只此一家，别无分店’，这是正确的吗？合乎毛泽东思想吗？没有你这一家，世界照常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照样进行。别把自己看得太高了。

希望你们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我们鼓掌欢迎你们。有意见，你们可以提。现在连党中央的决定、耐心的谈话、听你们的意见，你们完全不理，都抛到脑后。你们究竟到何处去？你们要不要无产阶级权威？以毛主席为代表的党中央就是无产阶级权威。你们要不要以毛主席为代表的党中央的权威？你们这行为不是无产阶级的行为，不代表无产阶级，是有很大破坏性的小资产阶级的无政府主义思潮占领了你们的脑子。无政府主义不管

变成什么形式，最后都是要失败的。

我们不是怕你们，是爱护你们。无产阶级怕什么！你们以为这么乱闹一通，我们就害怕了？

我们可以等待，但不能把大量时间只用在你们身上。你们按中央指示做，欢迎你们一块革命。我们等待这么久了，你们看不清我们的耐心，你们越走越远。这样下去后果怎样？为什么不可以想一想？为什么不反省一下？走错路是经常有的。走错了倒回来再走，这是合乎事物规律的。不是走回头路，而是走前进的路。走错了路，回到原来的出发点再走。

无产阶级革命大联合万岁！

大反特反无政府主义！

打倒无政府主义！”

陈伯达讲完意见，马上宣布：“我很忙，今天就到这里吧。”很显然，陈伯达对天工“八二五”的做法是不支持的。

“感谢伯达同志的指示，”胡昭衡明智地起身告辞，“我马上回去向革筹小组汇报。再见。”

5 月 8 日，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杨成武等参加军训干部座谈会。会上，军训干部反映蒯大富说军训的解放军“比工作组还工作组”。

5 月 10 日，周恩来召集扩大的中央政治局常委碰头会，讨论通过北京军区关于对河北省及石家庄、唐山、张家口、承德、衡水等五个专区实行军管的请示报告和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关于甘肃问题的几点意见》。

次日，周恩来将这两个文件送毛泽东批阅，并注明：“河北

问题已谈过几次，大家都认为在目前需要实行军管，作为过渡。河北是大省，以郑维山兼这个军管会主任为好。对河北省委领导同志和刘子厚、阎达开、李颉伯、林铁，现在都不忙作结论。在目前，甘肃以实行军管为好。”

## 第 630 回：□军管，冼恒汉主政甘肃　半年庆，“工总司”□体罢工

此时的甘肃，与全国的反逆流形势一样，也开始将斗争矛头指向了军队。4 月 22 日，甘肃兰州铁道学院一群众组织提出“打倒张、冼、杨，解放大西北”的口号。“张”即张达志，“冼”为冼恒汉，“杨”是杨嘉瑞，都是兰州军区负责人。5 月 6 日，兰州一些群众组织开始冲击兰州军区支左办公室，并围攻斗争办公室负责人。

毛泽东接见在北京开会的各大军区领导人时，周恩来曾把冼恒汉和张达志领到毛泽东身边，并介绍二人的经历、参加军区机关“四大”的情况。当时，毛泽东指着冼恒汉和张达志说：“张、冼是老实人！”

5 月，中央军委让冼恒汉回到兰州，参加地方“支左”。周恩来接见了冼恒汉和兰州军区司令员张达志，对他们表示慰问，并询问了他们的身体情况。

周恩来说：“你们都是好同志，老实人，过去都对革命做出过很大的贡献。这次军队机关‘四大’，受到冲击，受了些委屈，希望正确对待，群众运动嘛……党是信任你们的，毛主席是信任你们的，希望在‘支左’工作中再立新功。”

周恩来接着说：“经毛主席批准，由兰州军区负责组织陕、甘、宁、青的‘支左’工作。张达志同志分管军队的工作，冼恒汉同志分管地方的工作，要立即行动起来。现在国家有困难，各地武斗那么严重，工厂都不生产了，造反派不搞联合，需要人民

解放军出来做工作。你们要为党分忧，为毛主席分忧。西北是工业重镇，国家有许多大项目在那里，一点差错都不能出，全靠你们了……”

中央军委在听取了张达志、冼恒汉、詹大南、张忠关于甘肃省军区支援甘肃地方文化大革命情况的汇报后，对甘肃问题提出了四点意见：

第一，首先肯定了甘肃省军区在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中做了很多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

第二，明确指出甘肃省军区司令员詹大南，以军队代表身份参加“甘肃省红色造反派联合指挥部”的工作中，有严重错误。主要是在处理“七一战斗队”的问题上，轻率地开除了“七一战斗队”，造成了“甘肃省红色造反派联合指挥部”的分裂，使甘肃省大联合受到挫折。中央军委的意见中特别指出：“在处理这样重大问题上，詹大南同志严重无组织无纪律，不请示报告兰州军区，当兰州军区采取措施加以纠正时，还竟然错误地进行抵制。这是不能允许的。现在詹大南同志已经检讨了错误并决心改正，我们欢迎这种态度。甘肃省军区广大干部，战士执行‘三支、两军’任务，做了很多工作，甘肃省军区在支左工作中发生的错误，他们是没有责任的。”

第三，“军队的支左工作，在当地最高军事领导机关统一领导，统一安排下进行。甘肃省军区的支左工作要服从以张达志、冼恒汉同志为首的兰州军区党委的领导，重大问题必须请示报告。要严格组织纪律，不得自行其是。”

第四，鉴于当前甘肃省成立“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还不

成熟，中央决定对甘肃省实行军事管制，以冼恒汉为军管会主任，兰州军区副司令徐国珍和詹大南为副主任。

于是就有了《关于甘肃问题的几点意见》。周恩来 5 月 11 日在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全军文革小组名义联合上报的《关于甘肃问题的几点意见》上批道：

“即送林彪同志审阅后再送请主席批示。这个意见经五月十日扩大的碰头会议上通过，大家都认为在目前，甘肃以实行军管为好。张达志在这次军区会议上检讨较好，而冼恒汉从去年十月工作会议以来，态度总是明朗的，故以冼主持军管会，张主持大军区工作，妥否，请主席批示。”

5月11日　中共中央还做出对福建省实行军事管制的决定，由韩先楚等9人组成福建省军事管制委员会，简称省军管会，韩先楚为主任，廖海光为第一副主任，朱耀华、刘健挺、石一宸为副主任，熊兆仁、陈景三、颜红、刘维新任委员。

5月12日，福建省军管会即发布第一号通告，宣布即日起开始办公。5月17日，福建省军管会召开全省有线广播大会，韩先楚宣布军管命令。

军管会成立后，吸收原省委领导范式人、魏金水、伍洪祥、刘永生等人参加一些实际工作。全省各地各级军管会也相继成立。

4 月 15 日，上海同济“东方红”举行了成立半周年庆祝大会，市革会领导陈琳瑚、王少庸，以及警备区副司令等，应邀出席。4 月 18 日，上海交通大学“反到底”也举行成立半周年庆祝大会，市革会马天水、朱锡琪等应邀出席。这时，在“工总司”

工作的北京师范大学教师李卫民建议“工总司”也举行“工总司成立半周年纪念大会”。此建议一出，大家都说好。

5 月 9 日，“工总司”成立半周年纪念大会在人民广场召开，徐景贤、马天水、王少庸和驻沪三军领导都被邀请参加大会；“炮司”、交大“反到底”、同济“东方红”这些从“工总司”筹备成立时起，就一直站在“工总司”一边的红卫兵造反组织，也被邀请派代表出席大会。“工总司”已经很久没有召开全市性大会了。叶昌明会前特地关照，参加大会的各厂造反队一定要戴上“工总司”的工人造反队袖章，打出“工总司”某某厂的造反队大旗。整个大会场面，比“一月革命”时的大会还壮观，密密麻麻的人群和各式旗帜标语，将人民广场四周的道路挤得水泄不通。据王腓利回忆：王洪文是大会总指挥，工总司总部负责人都是大会主席团成员。一队又一队造反派们打着造反队大旗进入会场，将人民广场挤得满满。到后来，人实在太多，晚到的队伍进不去，只能站在人民广场外围。再后来，许多队伍更是堵在外滩无法进入。西藏路上的队伍直排到泥城桥，福州路上的队伍直排到外滩。主席台上放眼望去，眼睛能看到的地方，除了房子，就是造反队的红旗。“不得了多的队伍”。

大会由潘国平主持，王洪文讲话。王秀珍在会上发言，讲述她五一节去北京观礼，受到毛泽东接见的“幸福情景”。交大“反到底”和同济“东方红”在会上祝贺词，市革委会和驻沪部队也都有代表发言。包炮被特邀来上海。他没能赶上大会。但是会后，“工总司”总部特地赠送他一个编号为 001 的“工总司”袖章。

“工总司”搞半周年纪念活动，一些小组织也要跟着学，一

时间，上海各组织纷纷准备半周年纪念活动。有的群众组织造反早，还特地补办。徐景贤很不以为然，给正在南京的张春桥打了一个电话说："现在大家都在搞半周年的纪念活动，'工总司'先开的头，现在别的组织也在搞。"

张春桥在电话里头说："啊？他们这是什么意思嘛？连一周年都等不及了吗？这事情本身就是山头主义。"

第二天，5 月 10 日，在市革委会召开的文化广场万人大会上，徐景贤在讲话中批评了"半周年纪念风"，说："最近上海的革命组织纷纷搞半周年的纪念活动，为什么半周年就要纪念呢？我们夺权，夺了以后还要长期地把权掌下去的嘛，半周年要纪念，难道一周年都等不及了嘛？我们不赞成，这样搞法造成极大的铺张浪费，不符合节约闹革命的精神。"

徐景贤的讲话，当天被电视转播。尽管那时家庭电视机不普及，但是很多人还是在工作单位看到了。

第二天，《文汇报》又在第三版"答读者问"的栏目中，以《革命群众组织不要大搞"半周年"庆祝活动——如果离开革命的大联合去"重振"某一个组织的"军威"，就会助长山头主义，小团体主义》为标题，批评了群众组织搞这种庆祝活动的做法。《支部生活》也发表徐景贤在文化广场大会上讲话的整理稿。虽然没有点名，但谁都知道这是在批评"工总司"。

工人造反派非常恼火。"工总司"总部一些负责人，以及一些工厂基层造反队的造反派，一起去《文汇报》要求公开辩论。光是黄金海就动员了一卡车国棉 31 厂工人，打出"到文汇报辩论去"的标语，开到文汇报社。戴立清等还去徐景贤办公的康平

路办公处找徐景贤。他不知道徐景贤在哪间办公室，就一间一间敲："徐老三，出来，和我辩论！"王秀珍则带着叶昌明、王腓利、张宝林，加上"工总司"的军代表康宁一，一起去南京找张春桥告状。叶昌明在自己的笔记本中记下了准备汇报的要点：

1、形势大好(与全国相比)，但阶级斗争复杂，最近武斗风日益严重；2、工总司的情况；3、我们对目前形势的看法(和机联站的分歧)；4、我们的意见和建议。

但张春桥避而不见。事后张春桥说："我知道你们来找过我，但那时你们那种情绪，我怎么能见你们。"

接着，令徐景贤没有料到的是，王洪文等"工总司"负责人，都像罢工似的，接连许多天拒绝参加市革委会会议，王洪文也不来上班了，请他们也不去。

徐景贤急了，打电话向张春桥请示："怎么办？他们拒绝来参加活动。"

张春桥说："那有什么办法，只好你们自己出马，到他的国棉 17 厂去，请他出山。"

徐景贤只好约马天水一起去国棉 17 厂。马天水支支吾吾地不想去，他怕夹在他们两股力量的矛盾当中不好办。

徐景贤说："你一定要去，你是老干部，讲起来是'老中青'三结合，你和我一起去。"

他们给国棉 17 厂打电话，说晚上去看王洪文。王洪文称病，让人回答说他身体不好。不过当晚，王洪文还是在国棉 17 厂会议室接待了徐景贤和马天水。

徐景贤说"我和马老两个人来看看你，听说你身体不大好。"

王洪文说："没什么。"态度非常冷淡。

徐景贤说："假如身体不好嘛，可以休息一阵子。最近市里工作比较多，春桥同志和文元同志都不在，我们大家要商量一些比较重要的问题。"

王洪文说："王秀珍到南京去了。"

这时徐景贤才知道王秀珍到南京向张春桥和姚文元告状去了。

于是，徐景贤就谈了自己的看法："工总司"召开半周年的纪念大会，很多小组织都跟着学样，而且规模都很大，造成很大的浪费。徐景贤说："我们的意见，各种组织如要搞纪念活动，至少等到一周年。可能我在大会上的公开表态，会造成一些影响。"

王洪文一听，马上说："是啊，你这样一来，原来加入'赤卫队'的那些人会怎么想呢？"

马天水一看他们要接触到实质问题，马上就说："我要上厂里去了，我有急事。"就走了。

屋里只有徐景贤和王洪文两个人了，徐景贤谈到造反派整风，他说："我前一段坐了小汽车，一到马路上，人家就对我说：你不要'修掉'了。"因为当时认为，一些人官做大了，都要坐汽车，就要"修掉"了。于是，徐景贤就每天骑自行车上班，结果在路上，总要给人家拦下来好几次，有的不认识的人看见他，叫一声："哎，徐景贤问志。"他也要下来一下。那时候，从常熟路，淮海路的我家到康平路办公室，这么短的路程，就要耽误很久。他对王洪文说："我现在很大的困难是，每天上班在路上要

耽搁很长的时间，我思想上也有一些顾虑，想和你交换看法。”

王洪文说：“这个问题，你不应该有这种想法，为了有利于工作，还是应该坐车的。”

徐景贤也给王洪文提了点意见：“你今后不要老是在‘工总司’或者上棉 17 厂，我们找你很困难，以后你基本上到康平路来，大家随时可以商量问题。”

“工总司”当时有两派，各个区有区分部，又有联络站，区分部一派属于王洪文，联络站一派属于潘国平，他们两个头抓了两条线，彼此间矛盾非常大。这样一来，王洪文和潘国平他们一天到晚要到下边去“救火”，处理底下的矛盾，也没有时间坐下来讨论一些别的问题，所以徐景贤请他基本上坐到康平路，便于共同讨论问题，王洪文表示同意。

张春桥从江苏回到上海，徐景贤拿着《支部生活》整理的他在文化广场万人大会上的讲话记录向张春桥作了汇报，当然也谈了“工总司”这段时间闹腾的情况及他与马天水两人怎么到王洪文那里做工作的经过。张春桥说：“我们有时候讨论问题，内部议论的东西，与在外面大会上公开讲的，有的是很不一样的，这点你要注意”他最后说，“不过，王秀珍他们到南京来找我，要给我告状，我不是没有见他们吗？”

5 月 20 日，张春桥在一个会上提到“半周年大会”，对工人造反派的做法表示理解，也有批评。

5 月 22 日，王洪文在“工总司”的内部会议上检讨了半周年大会的事情。他说：

有几种思想：一、骄傲自大，自以为了不起。二、怀疑到张

春桥，想到北京去告状。三、眼下无人，自己高于一切。

从我们最近暴露出来的问题来看，文汇报是批评得对。我们应该自我检查。

5 月 26 日，徐景贤也在的一个会议上作了自我批评，说自己“有一些话是不应该讲的，没有考虑到群众的情绪，只有另一方面考虑。”“那次讲话是没有稿子的，不严肃的，不负责任的。”

经过这段曲折，徐景贤与“工总司”和王洪文之间没有再出现大的风波。

## 第 631 回：心焦急，清华成立□筹组　不服气，“四一四”□强抗争

4 月 27 日，清华大学“414”核心组发表《关于批判“红教联”某些头头所代表的否定一切、打倒一切的无政府主义反动思潮的号召书》，正式将“打击两小撮论”付诸行动。所谓“两小撮”，就是党内走资派一小撮和右派分子一小撮，其理论依据是《十六条》中“集中力量打击一小撮极端反动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这句话。

“红教联”负责人陶德坚在 1957 年曾因思想右倾受过警告处分。“414”核心组就抓住这个小辫子大做文章，力图将“红教联”打成“由右派分子操纵的坏组织”，进而扩大战果，直捣“井冈山”团部。因为“井冈山”团部第二办公室多由“红教联”人员参与。

4 月 29 日，清华大学团委书记谭浩强、党委宣传部副部长罗征启代表清华大学 147 名中、基层干部发表《致革命干部公开信》，认为清华大学的干部们受了 10 个月的迫害，要求平反，要求工作，指责“井冈山兵团”的干部政策有缺点、错误。

在公开信中，他们还指责蒯大富重用了陶德坚和“红教联”，要求蒯大富改弦易辙，将“陶德坚之流”清除出“井冈山兵团”。

其实“红教联”此时早已更名为“红教工”，它是蒯大富“团派”下属的众多群众组织中的一个。公开信之所以称“红教联”而不提“红教工”，足见谭浩强、卢征启这些政工干部的政治谋略：“红教工”里面有工人，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在知识分子

成堆的地方，你攻击工人，那是阶级立场问题，容易授人以柄。而“红教联”，都是老师，是知识分子，“神仙会”，牛鬼蛇神，攻击他们，不会出问题。

公开信发表前后，在清华园中，就已经贴出了一批攻击“红教联”和陶德坚的大字报，说“红教联”是国民党、托派、肃反对象、舞女、经济不清的人还有司徒雷登的座上客等等都参加的“黑教联”，陶德坚就是国民党残渣余孽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极右势力的总代表。

“红教工”中确实有位教授过去集体参加过国民党，也的确有人因家贫当过舞女。所谓司徒雷登的座上客，是指“红教工”中的一这位音乐教师曾为司徒雷登作过演奏，至于经济不清和所谓“托派”人物，则含糊其词，查无其人了。说到肃反对象，显然是指的建筑系教师林贤光，他的母亲信仰天主教，因此他也与一位天主教的神父相识。解放后，这位神父被抓进监狱，说他是间谍，林贤光也因而在肃清反革命的运动中受到审查，查的结果是没有问题。

一时间，清华大学内点名批判陶德坚和“红教联”的大字报铺天盖地，每三、五天换一批，即使没有新的批判内容，他们也会将旧的大字报重抄一遍贴出来，其规模之大，远远超出了当时对刘少奇、蒋南翔的批判。除了在阶级成分的问题上恶搞“红教联”外，大字报还把蒯大富“团派”的观点，及社会上所能搜集到的一些反动观点都作为陶德坚的反动言论拿过来大批特批。一时间，陶德坚和“红教联”被整得沸沸扬扬。一天，陶德坚去粮店买粮食，售货员见她的购粮本上的名字是陶德坚，就问：

“陶德坚是你爸爸吧。”

陶德坚说：“陶德坚就是我。”

粮店的人都不肯相信，大字报上的陶德坚是个老奸巨猾青面獠牙的人物，怎么能和面前这个柔弱的年轻女子联系起来呢？可见当时大字报所形成的舆论力量之大。

陶德坚并非蒯大富“井冈山”的主要人物，“414”为何要对她如此大加讨伐？其实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指导这次批判的是以罗征启为首的一批清华大学的中基层干部，其真正的锋芒所向并不是陶德坚和“红教联”，而是蒯大富和“团派”。他们不同意蒯大富和“团派”在清华大学干部路线上的观点，赞成唐伟“纵队派”的看法。可是蒯大富是得到中央支持的，在清华大学已拥有很雄厚的群众基础，正面进攻蒯大富，肯定会事与愿违，甚至是“出师未捷身先死”。于是他们将矛头对向看上去问题较多，又很弱小的“红教联”，陶德坚就这样成了罗征启他们的靶子。

不过，谭浩强、罗征启他们的手段还是没有瞒过蒯大富这些年轻学生。“井冈山兵团”没有清除“陶德坚之流”，反而由“井冈山兵团”组织部出面，发布了保护陶德坚的文告。“井冈山兵团”反驳说：清华大学团委书记谭浩强等不是中央文革肯定的干部，谭浩强、罗征启的《致革命干部公开信》是“复辟旧清华的宣言书”。

4 月 29 日，北京师范大学革命委员会成立，谭厚兰为主任。和北京的其他几所大学一样，谭厚兰也未能将学校内的其他红卫兵组织纳于旗下。北师大的“井冈山造反兵团”、“烽火战斗

队”、“红旗战斗队”和“东方红兵团”等红卫兵组织仍在积蓄力量和谭厚兰的“井冈山”红卫兵明争暗斗，以决高低。但是，革委会毕竟是成立了。

看到北京师范大学革委会已经成立，清华大学的蒯大富十分着急。4 月 30 日，“井冈山兵团”总部根据“新形势”召开扩大会议，做出了《关于建立清华大学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的决议》，宣布清华大学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简称“革筹小组”成立，由包括蒯大富在内的“革命群众代表、革命教职工代表、革命干部代表”共 11 人组成。

5 月 1 日，在天安门城楼的观礼活动上，毛泽东、林彪接见了新成立不久的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全体成员并合影留念。身为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常委的蒯大富将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的袖章献给了毛泽东。周恩来在与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成员座谈时，关切地问蒯大富，清华大学革命委员会何时成立？并答应派军代表来清华。

当天，蒯大富回到清华，立即把上述消息告诉大家。一时间，“兵团”上下喜悦非常，校园里立即出现了“毛主席关心咱井冈山人”“毛主席给咱井冈山人撑腰，咱井冈山人为毛主席争气”等大标语。

5 月 2 日，清华大学“革筹小组”与“兵团总部”一起具名行文，发出通知，准备于 5 月 3 日至 7 日集中召开全校批判大会，其中的一个内容就是批判无政府主义思潮，这显然是针对“414”的。

对于清华大学的“革筹小组”，“414 串联会”根本不予承

认，指出其中的所谓“革命教职工代表”和“革命干部代表”根本没有代表性，而“414 代表”只有“串联会”核心组成员之一的孙怒涛一人参加。名为“兵团”总部委员而实为“414”领导人之一的孙怒涛则贴出《孙怒涛严正声明》，道出了“414”的立场：

“所谓革筹是没有无产阶级权威的，是没有代表性的，是强加给群众的，因此它不是真正革命的，它不能筹备革委会。透过现象看本质，成立所谓‘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的目的就是为了给高举无产阶级革命批判旗帜的井冈山 414 及其他革命同志施加政治压力，为草草地成立一个三凑合的班子鸣锣开道。为此，我严正声明：在政治上不承认所谓的‘革筹’，在组织上不参加所谓‘革筹’。总部的某些同志，无视于井冈山 414 及其他革命同志的尖锐批评，在分裂的道路上迈出了极其危险的一步！总部的某些同志，必须悬崖勒马，否则，由此而引起的严重后果，将由你们负一切责任！”

继孙怒涛的“严正声明”之后，“414”一些战斗组也贴出了类似的声明。“从来急”在《关于所谓“校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严正声明》中写道：“坚决不承认‘革筹’，它对我们来说，不起任何的约束和限制作用。”这意味着公开蔑视和否定“井冈山兵团”总部的权威。

5 月 3 日，“414 串联会”召开第十一次大会，通过决议，不承认“革筹小组”，并在“414”小报上发表文章《彻底搞臭筹备小组》。“414”的“东方红 03 支队”贴出大字报《把现临筹小组一棍子打死》，抨击“兵团总部”搞“三凑合”“假批

判”“改良主义”。“筹备小组娘胎里的时候心眼就不正”，要把它“搞得臭臭的，而且要一棒子打死”。

“井冈山兵团”总部和“414 串联会”在革委会组建问题上针锋相对、互不相让，双方的大字报、广播台等一时间唇枪舌剑，而且双方领导人都不妥协。这一切，促使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直接出面调解。5 月 12 日，北京市革委会主任谢富治率丁国钰、周景芳到清华大学，亲自主持清华“井冈山兵团”总部负责人和“414 串联会”负责人开会，听取清华文革有关情况汇报，并做出有关指示。

他们首先单独接见了“团派”，然后又单独接见了“414”核心组全体成员。在单独接见“414”时，谢富治对他们汇报的“414”观点和对若干问题的看法不感兴趣，而是毫不客气地批评说：“414大方向是不对头的，你们的小道理有些是对的，但大道理错了。”“你们千条对，万条对，可你们的大方向不对。”

“414”负责人沈如槐个性强，他不服气，大声地与谢富治进行争辩。谢富治极为不满，他指着沈如槐说：“你只能当闯将，不能当统帅。”

随后谢富治将两派召集到一起作指示，他说：“‘414’要支持‘总部’，首先要大联合，然后再让革命干部出来。革筹小组增加一些人，增加不同意见的人，再增加干部。可以把‘兵团’总部与革筹小组分开，有个分工，具体问题你们自己讨论。革筹小组增加一些人就行了。”

但是，这一长达 7 个多小时的会议对清华文革局势并没有什么改观。谢富治离开清华后，有人就散布消息说：谢富治单独接

见“团派”时要蒯大富高姿态，不要讲“414”是保守势力，什么地方都有左中右，革命委员会也有左中右，让“414”一些人进革筹小组。“团派”造出的舆论是：谢富治要让“414”作为保守势力和右派代表参加革筹小组，而蒯大富还对此不满，认为谢富治对“414”太软，让步太大，不应该同意“414”代表参加革筹小组。

从“三纵队”与蒯大富论战以来，到“414”成立近一个月，这是第一次有中央领导专门来清华处理两派问题。而这第一次就否定了“414”的大方向，这对“414”来说无异于当头一棒！在“414”的核心组会上，他们仔细研究了谢富治的讲话和态度，认为他是蒯大富搬来的救兵，偏听偏信，有意打击“414”，为蒯大富撑腰；他不听“414”的申辩，轻易否定一个群众组织的大方向，是不妥的。在下午召开的“414”战斗组组长会议上，他们如实传达了谢富治接见时的讲话。他们认为中央文革和谢富治不了解清华的情况，于是有人提议组织部分“414”成员去中央文革反映情况。由于对中央文革心存畏惧，此议未获通过。不过，“414”对谢富治的不满是显而易见的。

第二天，5 月 13 日，在北京市革委会会议上，蒯大富又向谢富治告状说：“414”头头要对中央文革施加压力，挑动“414”群众向中央文革和谢副总理示威。谢富治锐：“我是受总理和中央文革的委托到清华去的，回来后向总理和中央文革汇报了我了解的情况和处理意见，总理和中央文革是同意我的处理意见的。”

蒯大富把谢富治的讲话公开传达后，“团派”再次兴高采烈，

在各种场合利用谢富治的讲话压“414”。特别是 5 月 15 晚，“团派”召开“促进革命派大联合”大会，对“414”进行了系统全面的攻击，甚至扬言要对“414”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就连当时颇有影响的中间派“五七串联会”都看不过去，发表声明予以谴责。

面对压力，“414”没有屈服，继续坚持“414 的大方向是正确的”，硬顶谢富治的批评。当然，他们也知道硬顶会造成什么后果。为了表示他们为真理而献身的决心，在 5 月 14 日纪念他们“414 串联会”成立一周月的大会决议中，他们引用了林彪语录：“在需要牺牲的时候要敢于牺牲，包括牺牲自己在内，完蛋就完蛋，上战场枪一响，老子下定决心，今天就死在战场上。”

## 第 632 回：大游行，外事口要揪□毅　做工作，周恩来艰□劝说

这段时间，外事口揪陈毅的呼声日高。5 月 10 日，外交部“联络站”召开“打倒陈（毅）、姬（鹏飞）、乔（冠华），彻底揭开外交部阶级斗争盖子的动员大会”。

当天，外交部“联络站”的李玉民和陈维德到北京外国语学院串联，说：“中央要把陈毅放下来批判，我们‘批陈联络站’要先组织游行，这样就可以先放给我们。”

作为“批陈联络站”成员之一的北京外国语学院“红旗革命造反团”负责人宋远利对此表示反对说：“不能相信小道消息。”

但“红旗革命造反团”核心组的刘于来等人同意游行。宋远利说：“你们一定要去，那我就不去了。”

第二天，11 日上午，“外交部革命造反联络站”与外事口“批陈联络站”其他 9 个单位的造反派，正准备到中南海游行示威，要求批斗陈毅。因为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大楼武斗而一夜未睡的周恩来得知了这一消息，立即给外交部的姚登山打电话，对他说：

“国家机关不能同学生一样，不能上街，无论如何不能采取这种行动，要考虑国际影响。”

姚登山说：“群众情绪很高，都发动起来了，正在礼堂开会，就准备出发了。”

周恩来在电话中一再指示姚登山劝阻“外交部革命造反联络站”的游行，姚登山为难的说：“‘联络站’的小将们造反精神很强，热情很高，我无能为力，不好劝啊！”他向周恩来转达“联

络站”的建议，要求“停止陈、姬、乔对外活动”，“撤销姬鹏飞常务副部长职务”。周恩来拒绝了这一要求。

当天上午，外交部“联络站”仍有部分群众到中南海前游行。

下午，北京外国语学院“红旗革命造反团”和“六·一六红卫兵团”，以及中侨委和归侨等机关的群众组织中的激进造反派又冲进东交民巷 30 号外交部内部办公大楼，抄写这里有关陈毅的大字报。

外交部“联络站”核心组听到姚登山传达的周恩来指示后，经长时间争论，于当晚 22 时多给周恩来回电话说：“同意暂不游行。”

周恩来说：“谢谢你们，现在我要去休息一下”。

但是，他还是不能休息。这天，呼和浩特市有数千名群众冲入内蒙古自治区党委机关大楼并发生武斗，周恩来紧急召集杨成武、肖华、郑维山、吴法宪和内蒙古军区司令员滕海清等人开会，商量研究解决此事。正在开会之际，听到外交部“联络站”的部分群众已来到中南海门外的报告，周恩来又不得不在国务院会议室紧急接见了外交部“联络站”和北京一外，即外国语学院“红旗革命造反团”、“六·一六红卫兵团”、“井冈山”、二外的红卫兵组织和驻外使领馆的“九·九兵团”等 10 个造反派组织的代表，与他们连续进行了 5 个多小时的谈话，直至次日凌晨。

周恩来首先问了各单位的人数后，让外交部“联络站”代表先发言。

外交部“联络站”代表说：“今天上午游行是我们‘联络站’发起的，他们其它 9 个组织单位支持我们。”

“我们发起游行主要是要求陈毅到群众中来。还有外交部其他两个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姬鹏飞、乔冠华。姬鹏飞不能再担任常务副部长的职务。另外，我们提出，陈毅、姬鹏飞、乔冠华不能参加对外活动。主要一点是陈毅必须马上到群众中来。根据揭发的材料，陈毅是外交部和外事口最大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我们根据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最高指示，必须要他到群众中来，让外交部广大革命群众进行批判。但是，从他 1 月 24 日大会检查之后，至今没有到群众中来，这是有意逃避群众的揭发批判。所以，我们要搞示威游行，‘批陈联络站’的其他单位响应支持。总起来，我们就是这个要求。今天我们来把外交部广大革命群众的要求告诉您，陈毅必须马上到群众中来。”

周恩来说：“我跟他们（指九九兵团）单独谈过这个问题，准备让陈毅去检讨。问题是忙，五一耽搁了一下，本来这礼拜排上，但刚把财贸口的问题处理完。刚才接见也是造反派，我谈了两个钟头。部里和学校不同，要抓业务，又要抓革命，革命统帅一切嘛。你们外交部带头来这样一个示威游行，把陈毅抓出来，我没法答复你们，没法担这个风险，你们去对你们不利。批判我赞成，我支持。上次我对业务监督小组谈了怎么大中小结合的问题，现在你们要搞示威游行，要抓陈毅，你们又给我提出了新的问题。你们外交部是夺了权的单位，是半掌权的单位，你们掌权我支持你们。每天监督小组的东西都发到主席、林副主席那里，都有你们的名子。这一点无论如何彼此打一个招呼。”

“联络站”代表说：“这一点我们在简报上登过。”

周恩来：“简报我看了。你简报登了，这不是必须服从的命

令，不能这样。”

“联络站”代表：“昨天上午我们开大会，给你打过电话，没有打通。”

周恩来：“我有多少事啊同志，我哪有那么多时间？昨天我在京西宾馆，天亮才回来。一回来就看到钱嘉栋的电话记录，叫钱嘉东给你们打个招呼。开始想让你们走一下，还是好的。后来想不行。外语学院、外交学院游行我不管。你们‘造反联络站’情况就不同，是半当权的。4个月来我一直采取这个态度。上次我想把少数派找来，谈谈要他们支持你们，你们不同意。我没有说服你们，你们也没有说服我。你们不同意，我就没有坚持，没有强加于你们，我就放弃了我的意见。从这以后，没有召集。我每次都这样尊重你们。难道在外交部的工作，这样的事也不能说？不能商量？一外、二外你们打倒陈毅我不管，外交部是外交部。”

学生开始吵吵嚷嚷，不同意周恩来的意见。周恩来说：“我就是这一点意见。外交部系统商量，学校也要商量，使、领馆也一起商量。外交部跟使、领馆是中央直属单位，不能强加于中央。这个问题这样搞，中央推下来，不可能赞成，对你们不好，早晨就说了。学生在马路上贴标语，谁也不管，不灵了。你们外交部也出来，你们就是一个组织吧？”

答：“是。”

周恩来：“半当权了，我们也承认你。有一次文件上没有写你们，我补上，有的文件没有抄你们的，我用毛笔写上了你们的名字。我一直表扬你们，尊重你们的进步，三结合举例子有这个

可能。使节出去旅行，我推荐你们，你们也答应，我马上批了，等你们名单来了，送中央。现在问题摆在面前（指陈毅），要中央表态不可能。中央顶回去，也不好。外电一分析，有什么好处？说我们内部矛盾又出来了，这有什么好处？外交学院，外语学院以及其他系统没有关系，标语仗打了好几个月了。唯一的外交部不能这样做。

我们要冷静地考虑一切问题。我看了你们的电话记录，钱嘉栋告诉我的。我在床上睡不着，我想了一下，讲了几句，我们要防止对党、对国家不利，所以我马上打了电话。如果我不照顾，我可以不管，我睡我的觉，你们去抓去，来了再说，那实际效果会怎么样，我不能那样做。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你们读了。明天要重新登。主席讲到一个动机和效果，我们马列主义者要看效果，看客观反应是最好的尺度。至于内部批判，我早就说过了，我们来研究一下大中小怎么结合起来，按照秩序，先搞财贸后搞外交，我把农林口放在最末位，最难办。”

北京外国语学院“六一六兵团”刘令凯说：“总理，刚才您说‘联络站’游行效果不好，我不大懂，请您讲清楚些。”

周恩来：“外交部揪陈毅的问题，中央不能同意。他现在没有被罢官。你们揪，不是个简单的问题，特别是外交部‘革命造反联络站’揪外交部长。他还要有外事活动。你们有权利提意见，中央也还要讨论。不能你们群众大会一通过，中央就要批准。”

刘令凯：“您不是主张陈毅到群众中来的吗？”

周恩来：“我们要制造环境。现在你们揪去，群众一起哄，‘喷气式飞机’一坐，这怎么行？！”

众人："总理应当相信群众，我们从来没搞过游街，现在外交部环境很好。"

一同学："对陈毅我们就是要批判。"

周恩来："这个道理我赞成，批判错误可以，但不能揪。要创造个条件。"

众问："什么条件？"

周恩来："大中小三结合，要研究具体的方式方法，商量好了，我陪他去。"

众人："好几个月了，他总也不露面。"

周恩来："是几个月了，但中间有反复嘛！我怎么知道他二月份又出了事？有反复，你也知道，何必问我。他像我这样就不会怕了，他自己心中有事嘛。"

一同学："陈毅不到群众中来，是心里有鬼。"

周恩来："是有鬼，可你们想用游行的办法把陈毅同志揪去，这又像什么样子！"

"六六"代表："5 月 4 日，我们就给陈毅去了'照会'，但他到现在也没有回答。"

周恩来："5 月 4 日他已经有肠炎了。"

众人："请总理把陈毅交给我们，我们不会搞游街、武斗，你要相信群众。"

周恩来有些生气地说："我说过，我们还要研究具体的方式方法，要创造条件。你们不要在这里给我施加压力。把外事口划成几个大部分，大中小会结合。外交部包括使、领馆是第一大单位，外交部打头阵。"

他对留学生说："你们主要对象是高教部。一外是个大单位；二外，对外文委是个大单位。二外和文委机密少些，可以结合搞。学校跟业务机关还是分开来好。"

这时，"批陈联络站"提出他们也要搞，周恩来说："'批陈联络站'是另外一个问题，你们只能派几个代表旁听，你们只能扮演这个角色。"

当周恩来问外院是否愿意跟"红旗大队"一块搞时，"六一六"、"井冈山"、"红旗造反团"都表示坚决不跟保皇派在一起搞。周恩来大笑起来。他说："你们怎么怕保皇派？你们还是有怕，我支持你们吗！"

他接着说："批判总要使学校大多数都能听到嘛！搞喇叭，会由造反派主持。外院由'红旗造反团'、'井冈山'、'六一六'主持大会，其他人都可以参加。"

众人拍手赞成，说："好，同意！"

"九九兵团"："总理，'九九兵团'还是同外交部一起搞较好。"

周恩来："对外经委、外专局、外办其它单位一个大单位。"

刘令凯突然说："总理，你刚才说把三反分子陈毅交给我们？"

周恩来："不能马上交给你们，首先是外交部。"

他突然意识到什么，立即责问到："什么？我没有讲'三反分子'！你这是强加于我，我要抗议！你们证明："他将头转向"联络站"的代表问："我说了'三反分子'啦？你们提打倒陈毅，不能强加于我。我听主席的话，我是主席学生，我不能讲，不能

轻易举手表示赞成，不能随便投票。就说揪陈毅吗，不要加形容词。”

众学生纷纷说：“我们不强加总理。”

接着，文委，二外报他们的人数，介绍他们的情况。

周恩来：“我给你们先排个次序，还是先开大会，分几次。一个外交部‘联络站’发起，他们是主人，如果同意，使馆参加，‘九九兵团’你们请不请对方参加？”

答：“请，但是我们主持。”

周恩来：“陈毅肠炎好了，我马上陪他去。”

外交学院一人说：“他肠炎好了。”

周恩来：“你们怎么知道？你消息到灵通。第二步就是一外的三个组织，第三步就是外交学校和留学生，第四步，二外和文委。这是大型的。中型的好办，外交部开外交部的，使、领馆开使、领馆的，留学生开留学生的。我们主张小型的，100 多人，例如‘六一六’人少，真正触及灵魂的座谈几次这有好处。五、六千人大会，场地都难找，还要跑到乒乓球馆。这样大的会只能开一两次，不能触及灵魂。你们外交部跟他们一起开一个大会，后可开中小会。”

刘令凯问：“总理，是不是把陈毅交给‘批陈联络站’？”

周恩来：“那不行，我不能这样做。陈毅不是商品，他是政治局委员。交‘批陈联络站’也不行。”

“批陈联络站”代表：“应交给我们先批判，然后再交‘联络站’。”

周恩来：“那你们满场贴的都是‘打倒’的口号。”

众人："我们就是要打倒陈毅。我们下定决心。"

周恩来激动地说："你们下定决心，也不能强加于我！我跟你们都安排好了的，你们随便哪个人就推翻了，还有没有民主啊？"

众人："我们是为了维护主席思想开这个大会。"

周恩来："正是主席思想，主席不同意这样做，不赞成这个方式。"

一同学："该打倒，就打倒！你可以保留你的观点。"

周恩来气极了："这样子就没有商量余地了！你开这样的大会不能做工作了。外交部第一个开，这是大型的，等问题弄清楚了，再开这个大会。我说了，现在条件不成熟，开这个大会没意思。我现在跟你们商量问题，可你们却用群众大会的方式来对付我。"

众人和缓下来："我们是对付陈毅，不是对总理，总理是支持我们的。"

周恩来："我跟你们建立这样的同志关系，你们用这样方法对付我，没法儿商量事情。"

众人："我们同意总理的安排。但是，在这之前，要先开一个外事系统大会。"

周恩来："我已经把底交给你们了嘛，中央不能同意。我没有反对最后再开。用 3 个月的功夫，要真正触及灵魂，小会多开。现在才 200 多人，我说两句话，你们就起哄，陈毅怎么来？！"

留学生代表问："开大会，陈毅来不来？"

周恩来："当然到会，这问题不安排好，怎么出面？对于陈

毅问题，我跟刘令凯等 11 人开了七、八次会，主要听你们讲。我只插一句，陈毅总不能比薄一波再坏吧？现在我讲几句冷静的话，你们就哄。我们先把时间安排一下，不能每天都有，总有几天，两天或三天搞一场。头一场我总要陪一下，打开局面，否则我怎么向主席交待。我哪次都支持你们。现在还有几个副总理，我要一个一个地保，我们还要做工作。中央文革还有几个人在北京，每次我们都全体出面，解决一个事情两个礼拜。中央直属机关就有 88 个。我这样的身体，这一年就成了这样，你总要我们为革命多做一些工作吧？我说几句话，就围攻，我仍然紧张。你们可以放假闹革命，机关三分之一做工作，我们哪有什么三分之一。我说一个机关就几个人来，结果你们都来了。我一讲话就施加压力。

我完全想在这里打开一个局面。我要在 6 年前，我没问题，现在身体不行了，现在我嘴里说了，我一直支持你们，一外你们问哪个出面，如果谁站在红代会，我就支持他们，我没有采取这个态度。你们揪陈毅比他们早，我支持，‘外交部联络站’我支持，使馆他们是少数，但我支持‘九九兵团’。你们这样压我，吵了一通，达到目的，你们高兴地走了。我还要受那一派压，他们也会来府佑街的，他们来，我又不能不接见。‘外交部联络站’好办些，是多数，那个少数不来听，关系不大。我们争取他们参加，最好由外交部发一起，使领馆也参加，留学生也参加，我也少费些唇舌，如果你们同意这个精神就好了，至于小会，使领馆，遵义兵团都可以搞。对你们一外的三个组织我支持。我在中央不知说了多少次，夸奖‘六一六’，我从心里对‘六一六’有感情，

尽管说打倒我，这个刘令凯知道。”

刘令凯：“我只贴了总理一张大字报。没说要打倒。”

周恩来：“没关系，我没倒嘛！坏人你不打他也要倒。”

“六一六”：“主席说，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

周恩来：“一外批判陈毅，我支持，你们三个组织发起，我不是支持你们吗？要说服他们参加。

二外，我相信你们的话，有几个月没到你们那里去，相信你们，他们能够参加就参加，不能就不能。文委二外搞一次，还有对外经委要搞一次。一外每个单位自己单独搞，二外也是。……我能够在外事口开一个口，我就能够转过去，到农林口去了。现在各单位派一个代表跟我秘书钱嘉栋把日程安排一下。本来想同外交部谈业务问题，现在这形势很不好谈。”

他对学生代表说：“凡是你们能看的大字报都贴到老部，我主张在那里看。进 30 号看大字报当然不行，留学生看大字报只能在老部。大字报只限于外事口，不能让所有学校都来看，那外交部就成了东安市场了。第二、使领馆的问题交给九九兵团。批判使领馆执行的反动路线，需要你们参加，你们就参加，你们需要和他们一起开会也可以邀请。”

“联络站”代表表态发言：“我代表外交部业务监督小组讲几句话，表示我们的态度。我们认为外交部是一个机密机关，30 号是办公地点，同志们看大字报我们支持，我们印发的材料给他们看了。另外，老部有办公厅所属的某某局，研究室等机关。进去看大字报也不合适。我们有些材料已经满足他们的要求，交‘批陈毅联络站’由他们散发。”

周恩来接着说："第三、刚才'九九兵团'表示一个态度，'联络站'与'九九兵团'业务系统是一个。搞文化大革命在一起，'遵义兵团'检查他们也有外交业务也很好，以他们的外交业务另开大会，用大中小结合。

我一年多没到老外交部去了，不知道还有机要局，那老部也不能进，大字报总有地方看。这个问题由联络站负责处理一下，另设大字报区。"

王中琪："陈毅到群众中来能同意了，姬鹏飞、乔冠华的问题……"

周恩来："刚才你们来以前，我把乔冠华的材料看了一下，姬鹏飞的我没有看。字太小，看一次我眼睛受损失。我看了以后才能下断语。"

"联络站"代表："那行，把姬的材料打印了交给您。"

"六一六"一同学问："总理为什么还称陈毅同志？"

周恩来："主席批判刘少奇也称'同志'呢，刘还是中央常委嘛！你怎么提出这样的问题？这是我们党内的事情，保密。你不能这样提问。难道中央必须跟你们走？不能这样，那还有没有领导了？"

王中琪："第三个问题，关于停止陈、姬、乔对外活动事。"

周恩来："现在不能答复，已经超过我的权力范围了，我刚刚说了不能进一步回答了，我把什么话都说出来，当然回答不好，我说留有余地不好吗？把中央所有的话谈出来不好，我赞成你们搞。把你们什么口号都接过来不行，那我违反常委纪律，这样你们可以搞你们的。你们领导我们？有一天你们会领导我们的，我

希望你领导我，但是，今天我稍微等一下。”

众人笑。

接见至 12 日清晨 4 时结束，大家要周恩来休息一下。

## 第 633 回：未曾歇，又接见另派代表　再动员，两派应联合行动

5 月 12 日清晨 4 时 25 分至 6 时 20 分，在国务院小礼堂，周恩来又接着接见了归国留学生“延安兵团”、“红勤总站”、北外“红旗大队”、二外“红卫兵”、“批判陈毅联络委员会”，即后来的外事系统“无产阶级革命派联络委员会”和外事、外政、外贸单位内的几派组织代表。他接着刚刚结束的对外交部“联络站”等 10 个组织的接见情况说：“刚刚那 200 多人搞得我心脏都跳。你们要安静一些。你们对陈毅的态度都一样吗？都要批吗？ ”

众人七嘴八舌答到：“一致！”“不一致！”

于是，周恩来详细的询问了各单位有几派，各有多少人。随后说：“这么多派呀，唉，叹气也没用。”他自己也无奈的笑了，然后说：“这个事件已经发生了。国际影响啊，你们一般是不考虑这个问题。……好吧，你们是发起‘联络站’的？”

北外“红旗”说：“对，我们这个组织，是以外事系统的组织参加的。我们与‘批陈联络站’不同，他们用红代会的名义，我们要参加，他们不允许。”

周恩来：“你们在批陈毅上是比他们落后些。”

众人：“没有他们那么‘左’。”

周恩来笑了，说：“你们是对的，就坚持嘛！在陈毅问题上有分歧，为什么不可在一个联络站呢？”

答：“主要是他们想借批陈毅，搞垮其他革命组织。”

周恩来：“他们这样子，如果他们召开批陈大会，你们就不

参加？”

答：“我们早就建议在陈毅、刘少奇问题上联合行动，自成立以来，我们作了许多努力。”

外交部“造反总部”的代表说：“陈毅到底是谁的后台？……陈毅把我们的发言记录交给‘联络站’，挑动群众斗群众。”

周恩来又笑了：“陈毅不大支持你们，这我是知道的。他是不是把记录交给他们了？可能是告诉他们的。”

“造反总部”说：“我们认为外交部运动有夭折危险。”

周恩来问：“为什么？为什么啊？”他又笑这问：“真有这个事？”

“造反总部”汇报说：“第一在干部亮相问题上。”

周恩来问：“你们对陈家康站出来有什么看法？”

“造反总部”：“陈家康站出来批判、揭露陈毅是正确的，是应该的，我们支持。但在自己触及灵魂以前不同意他加入主席团，欢迎姚登山、罗贵波入主席团。”

周恩来：“我不隐瞒我的观点，我对这个问题表一表态。我在这一点支持你的观点。他应指陈毅，但我就不相信，他自己就触及灵魂了。你回去可以告诉他的，在接见他们时‘联络站’没谈到陈家康问题。你说的夭折危险不只是这一方面吧？”

“造反总部”：“‘联络站’不仅对外飞扬跋扈，对内也压得别人透不过气来。”

周恩来：“‘联络站’还是做了一些事的。”

“造反总部”：“我们承认在批判反动路线，监督业务方面是做了些事，但对内不准别人革命，我们坚决反对。”

周恩来："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是支持他们的，他们召开批陈会议，如果不是给你们组织发票，而是给你们个人发票，你们去不去？"

答："去，问题是他不发。"

周恩来追问道："如果他们发票呢？"

答："如果他们以红代会名义我们就不去。"

周恩来："那他们用什么名义呢？"

答："'批陈联络站'。"

周恩来又问二外情况。二外的代表回答说："现在大专院校有一现象，极左派加老保，形成新的资产阶级复辟逆流，不知是不是谢副总理这样讲的。如果是这么讲的。那到很合我们的情况。总理你支持不支持我们在文委的夺权？听陈毅说，你是完全支持我们的。"

周恩来又笑了："完全支持？陈毅同志是跟我们讲过这件事情。我当时说要看一看，因为一个学校去夺一个部委的权要看一看再说。"

众："我们夺了权以后是准备交权的。"

周恩来："陈毅都好几个月没出来了，他怎么会是后台呢？'联络站'恐怕还是我关心得多一些。外办和外政两家联合召集会议，请两派参加，请得了还是请不了？ "

答："够呛！"大家都笑了。

外办："由外办来组织这次会议，请他们来参加。"

众："不同意，要两家联合召集。"

周恩来："两家联合嘛！两家观点没有什么差别。你们不敢

出面，我来出面请。把外事口单位分成四大组。（ 1 ）外交部、使领馆、留学生、外交学院；（ 2 ）外语学院；（ 3 ）二外、对外文委；（ 4 ）外办、外政、外专局、对外贸易。分成四大组试试看。大家不同观点都挖一挖，不要怕做多数派，也不要怕做少数派。只要是真理就坚持。”

下面有人说：“现在不是坚持不坚持真理的问题，而是讲理不讲理的问题。”

周恩来又对留学生参加使领馆运动作三点指示：“1、外交部30 号不好去冲，内部的大字报可由总部选出一批不太保密的、或有一点密也关系不大的，先要放在总部。后来又说有机要室，档案室地方还没找到，另外找个地方大家都可以看。（只限于外事系统）国际馆店不能开放，一开放，大家都随便进进出出，那不成了东安市场了吗？2、留学生跟他所属的使领馆对口。使领馆只是讨论到部党委、馆党委的反动路线，错误政策，错误作法。留学生可以参加。留学生所知道的对外政策上的错误，认为他们不执行中央路线，可以揭发批判，可以邀请参加。我建议他们开会不要在 30 号开。到老部去开。实在不行，另找地方。‘遵义兵团’想叫我把这事具体化，这怎么具体呢？这件事我还要与负责人具体商量。”

留学生“红勤”代表说：有人说我们去教育部是方向性错误，那怎么理解王力同志的指示？”

周恩来笑着说：“怎么会是方向性错误呢？我认为王力同志对‘遵义兵团’说他只代表个人，那我也只代表个人啊。留学生分三派，你们两派的意见比较接近吗？”

答："有些区别，相近。"

"红勤"："我们这个组织多是从较小国家回来的。"

周恩来："都是小民族。"

众笑。

留学生"延安兵团"说："现在使领馆有很多都说总理有保密指示……"

周恩来："不是我有指示，这是中央决定的嘛！有三点办法了嘛，不一定每次会都参加。你们不必和他们的业务发生直接关系，你们要搞斗批改。批到下半年，就出不成国了。"

北外"红旗"："强烈要求陈毅出来检讨。"

周恩来："现在去不行，这个揪，那个揪的。搞 3 次，人保险垮了。要创造条件，先开 4 次大会，然后开小会。你们说要他作检讨，原则上没错，策略上要注意。你一外揪到一外去，二外揪到二外去，不能触及灵魂，还不就是喊喊口号。我头两次被他们搞得心跳，满地都是人。他们召开会你们去，我也去，我也讲几句话，发表发表个人意见，个人有个人的见解嘛。我号召你们采取联合行动，在斗争中表明自己态度。你们有你们的看法，你们对，就说你们的看法。他们的对，就说说他们的看法。陈毅要到会，要回答问题，首先要把局面创造出来。从大会、中会、到小会。从 15 号开始，现在陈毅有肠炎，3 天开一次会。我看要安排到 5、6、7 月，才能搞一个循环。会上要允许他回答问题。大家一吼，就没法回答了。要看他一句话在什么情况下讲的，这样能触及灵魂。一定要大、中、小会结合，从外事口、财贸口试一试可能成功，也可能失败。刚才 200 多人在我这屋里，就吵得

已经快挥拳头了。每个单位都要陈毅到他那里去，但先开 4 次大会，再开小会。”

北外“红旗”:“红代会要我们肃清刘邓在外交部路线上流毒，我们一定尽力完成红代会交给的这一光荣任务，希望联络委员会革命造反派协助我们提供材料。”

周恩来：“联络委员会有的，可以要，外交部联络站有的，可以给一些公开的，只有比较全面的材料才能看出问题，例如亚非会议问题，我要推动乔冠华同志从头到尾做个检查，我是二线，他了解得多，这样做比什么都强，他比陈毅知道的还多。要材料，最好还是要几个典型报告，搞些记录，大字报等报告，总要先看看档案材料，那我就能看出问题来了，就能帮你们分析了，不应抓住一两句话……”

下面有人提出：”在一起开会不行，口号不一致。”

周恩来：“不要紧嘛，你喊你的嘛，我喊我的嘛。“

众：“够呛。“

周恩来：“我是说有可能成功的，也有可能失败。失败，我也输在里面，这一条我们也准备着呢？”

众：“有人在整你的黑材料。说你是北外‘红旗’的后台，是中国最大的卖国贼……”

周恩来：“‘六·一六’有些观点我还是同意的，他们很多人抓材料。他们的结论有些偏激，我不同意。青年人嘛，你们都受锻炼嘛！你们还记得吗？那时跟他谈了 4 个小时，当时我就插了一句话，他说陈毅是我们当时最坏的副总理。我当时说：难道陈毅比大叛徒薄一波还坏嘛。”

在讨论如何召开“批判陈毅”大会的问题时，周恩来：“因为他们是先闹起来的，所以由他们发起，因为你们是多数，有道理，所以让你们发言，他们邀请，你们去，他们搞乱会场，这不是他们的大暴露吗？（二外认为不可能开好，要举例说明）现在怕什么不一致，不要紧嘛，通过运动统一嘛，如果他们在会上骂你们，你们退场，这就是谈他们不对，我们也退出。你们在这个问题上试他一试。如果不成功，我们就另想办法，”

有人不同意，周恩来说：“你们回去再讨论讨论。”

“延安兵团”的代表说：“使馆的一般业务会议可以不可以参加，各馆机密我们不要知道。”

周恩来：“30 号不能进，我提出的三点，就是要纠正以前的一些作法，在老部开的就可以参加。反正你们打倒陈毅，我不能举手。‘联络站’要停止陈毅参加外事活动，我不能同意。我这次请你们来，主要是回答问题的。”

5 月 12 日，周恩来对《江西日报》问题再次发出第二次电报指示：

江西省大中学校红卫兵司令部并告江西省军区党委：

关于《江西日报》问题，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五月二日的电话和我五月七日的电报，军区党委均已向你们传达。据悉，进驻报社的红卫兵同志尚未完全撤出，报纸至今还没有启封出版，对此中央十分关心。为了使江西全省人民能够及时听到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声音，务望还留在报社的红卫兵同志立即撤出，以便《江西日报》启封出版。在目前，报纸可以出版新华社电讯和中央报刊上的文章。关于对《江西日报》前一时期的报道有不同意见，

可以协商解决。

周恩来

1967 年 5 月 12 日

接到周恩来的两次电报后，江西省“大中学校红卫兵司令部”撤出了《江西日报》社。但是，江西省造反派和江西省军区的矛盾并没有平息。

内蒙古问题，虽然经过 4 月份中央的全力解决，但是呼和浩特的混乱局面并没有得到缓解，进入 5 月，反而愈演愈烈，两派武斗推向高潮。

5 月 8 日凌晨，周恩来与有关人商谈内蒙古问题。

5 月 10 日，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大楼内又发生激烈的武斗。

这天清晨，呼和浩特市的保守派砸了外贸局土产公司。下午 14 时，他们又在赛马场开会，全市总动员，声称要抓高锦明、砸“红旗”总部、占领自治区党委大楼。会后，在曹文生、张三林的指挥下，数千“红铁战士”、“工农兵”、“无产者”、“红色工人”等群众组织，高喊着：“造内蒙党委的反！”“和高锦明血战到底！”等口号，先砸财经学校，再冲进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大楼。

自治区党委“三司”派组织“红旗”奋起抵抗，但终于寡不敌众，100 多人被打伤，一楼很快被占领，但通往二楼的三个楼梯都被造反派用木板钉死，易守难攻。攻方成立敢死队，以大锤、铁镐为武器，猛砸木板，不成；又以《毛主席语录》牌为掩护，用铁钩、绳索拽开木板。守方见状，砖石齐下，攻方改为水攻，又不成，旋即在木板上浇上汽油放火焚烧，实施火攻。一时间，自治区党委大院内浓烟滚滚。

与此同时，攻方还架起长梯向守方的背后二楼阳台发起强攻。并砸开党委车库，推出汽车将道路封锁，以阻止消防车救火。一部分外单位的“三司”组织闻讯赶来救援，也被一顿乱棍和砖头、石块击退。

攻方火攻了四次都被扑灭，阳台战斗亦失利。无奈，只得把矛头转向食堂、小卖部，将这里的米、面、油、糖、肉抢劫一空。医务室亦被扫荡，药品、器械席卷而去。同时断电断水、抢砸汽车……

消息传到北京，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等候内蒙的消息，一直坐到天明。

“呼三司”、“818”、“火车头”、“东方红”等造反派组织大约 3 万余人，闻讯赶来增援，将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团团包围。中央驰电慰问造反派，指令北京军区派兵救援。11 日凌晨 3 时，支左部队赶到现场，只见党委大院的大门已被“一司”封闭。院外，“三司”的宣传车正在播放“三司”的声明，不少“一司”的人员摄于压力翻墙出来投诚。

忽然，人群骚动起来，原来传来一个消息，河西公司的“818”兵团已经凿破城墙登上城楼，并插上了“818”的红旗。

上午 9 点多钟，一队满载头戴铝盔，手持消防钩的消防人员的消防车冲在前面。凄厉的警笛声起到了巨大的震慑作用，使人不禁想起当年苏联红军扫平柏林防线时所使用的上百台防空探照灯的做法。紧跟着是上千名带着安全帽的工人，每人手里一根镐把，高喊着“杀”声冲了进去。大约经过一个多小时激战，保守派终于败北、总指挥曹文生、副总指挥张三林等头目系数落网。

看热闹的人群涌进大院，但见到处是一派狼藉，大楼内的墙上，还留着保守派的恨恨之言：

“滕海清从内蒙滚出去！”

“油炸高锦明！”

“打倒红八条！”

广场上，上千的被俘人员蹲坐在地上，神情沮丧，眼光呆滞。

这次武斗，双方伤者无数。

期间有段插曲，那就是这么多人的吃饭问题如何解决？指挥部想出了一个主意：在呼市城西，有一个占地面积很大的名为四合兴的铁路小区，小区的住户大都是“三司”的观点，动员他们帮忙。听到这个消息后，小区内家家都兴高采烈的拿出珍藏的食油和白面烙饼，须知那时每月只有四两油和很少的白面啊！吃饭问题就这样轻而易举的解决了。

这天，周恩来召集杨成武、肖华、郑维山、吴法宪和滕海清等人开会商量解决内蒙古自治区委机关大楼武斗一事。

5 月 12 日，周恩来继续召集杨成武、肖华、郑维山、吴法宪和滕海清等人开会解决内蒙古自治区委机关大楼武斗一事。

5 月 12 日，毛泽东审阅北京军区关于对河北省及石家庄、唐山、张家口、承德、衡水等五个专区实行军管的请示报告，批示：“照办。”

这天，天津铁路分局总调度室被砸，致使津浦、京山线指挥中断23小时。13日，北京军区司令部发出布告，奉命对天津铁路分局及所属各站、段实行军事管制，建立军事管制委员会。

## 第 634 回：五一三，展览□“三军”武斗　巧点拨，中南海□见主席

1967年5月13日晚上，北京军队造反派在北京展览馆发生了一场十分热闹的武斗。

当时，以空军文工团“硬骨头革命造反团”、海军“红联总”、北京军区战友文工团“老燎原”为首的“三军联合演出委员会”，在北京展览馆举行“庆祝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25周年汇报演出”。演出尚未开始，解放军艺术学校的“星火燎原”即带人冲进剧场，反对演出。紧随其后的是蒯大富、韩爱晶带来的北大、清华、北航等院校的大学生红卫兵。一瞬间，剧场变成了战场，台上台下打得一塌糊涂，许多人被打得鼻青脸肿，头破血流。

原来，从 1966 年冬到 1967 年春，北京的空军机关、海军机关、总后勤部机关和他们所属的文体单位、院校也都分成了两派。空军中保吴法宪、余立金的，海军中保李作鹏的，总后勤部保邱会作的是一派，人数较少。而造反派人数较多，是一大派，称作“三军无产阶级造反派”。“三军造反派”受到中央文革江青等人的支持，因此，总政治部主任肖华、代总参谋长杨成武也在一定程度上支持这一大派。这一大派中有些群众组织，如后勤学院“星火燎原”、测绘学院“革命造反团”、高等军事学院“井冈山”，他们写的文章，还经常在《解放军报》发表。解放军艺术学院的“星火燎原”，那更是全国串联，到处点火，几乎全国各地冲击省委的现场、各大军区批斗领导干部的台上，都能看到他们的身

影，在社会上很有些影响。“斗罗（瑞卿）筹备处”就是这一大派联合组成的。

在这一形势下，空政文工团自然也分成两派：一派是“红旗革命造反团”，主张坚决打倒吴法宪、余立金；一派称之为“硬骨头革命造反团”，认为吴法宪、余立金是无产阶级司令部里的好干部，不能打倒。两大派，针锋相对，势不两立。“红旗”造反精神强，一举砸了“硬骨头”造反团的牌子，抢了他们的大印，并将他们赶出空政文工团，并将“硬骨头”称之为“臭骨头”。

“臭骨头”的小将们感到十分迷惘：“难道我们保吴法宪、余立金错了吗？为什么不允许我们革命？”

当事者迷，旁观者清。有一天，一位空军老干部把小将悄悄叫到一旁，对他们说：

“你们不是去过中南海，去过毛主席那儿吗？现在为什么不去？”

真是一语点醒梦中人，小将们顿时恍然大悟。

原来，文革前，中南海经常组织跳舞，几乎每周有一两次，一般安排在周三和周六。军队文工团，政治上比较可靠，所以经常派她们进中南海陪首长跳舞，当时叫“出任务”。空政歌舞团的一些舞蹈演员，也经常去中南海“出任务”，几乎每星期都和毛泽东等中央首长见面。

在“老将”的点拨下，空政文工团演员刘素媛等 4 个常去中南海跳舞的“硬骨头”小将，来到中南海西侧的府右街上，眼望红墙，犹豫不决。因为，自从 1966 年 8 月的红卫兵运动席卷全国后，她们已经很长时间没来中南海了。每周三、六的舞会，早

已停止，革命时期，哪能按部就班。“毛主席他老人家眼下日理万机，能见我们吗？可非常时期，特殊情况啊，试试看吧。”

她们终于下定决心，来到中南海西门，向警卫战士说：“我们要见毛主席。”

“要见毛主席？”警卫战士用疑惑的目光审视着这几个年轻又漂亮的女兵，感到十分新奇。

“我们有重要情况向毛主席汇报，毛主席认得我们。你不相信，往里打电话问问。”

文革期间，无奇不有。警卫战士被纠缠得没有办法，只好派人往里打电话请示，不到 10 分钟的工夫，里面传出话来：“主席同意见。”

刘素媛和几个伙伴，由警卫人员带领，来到游泳池，走进毛泽东的客厅。让她们没有想到，毛泽东真的已在等候她们了。

“主席，您好！”

“好久不见了嘛，你们都是空军的小同志吧。你是小板凳，你是田大头，你是小孟，我的半个小同乡，我没有说错吧？”毛泽东叫着她们的绰号，还都认识。

“主席，您的记性真好，您说得都对。”

“我们找您谈我们团里的文化大革命来了。”一个小将大胆地开了个头。

“噢，找我谈文化大革命，好啊，那就谈谈看。”

“我们团里阶级斗争太复杂了，我们那里有个反动组织，叫‘红旗造反团’，实际上是黑旗造反团，里面有不少地主资本家的狗崽子。”

“他们镇压革命派。”

“他们打着红旗反红旗。”

“他们把革命派打成反革命派！”

“我们那里的牛鬼蛇神太猖狂了！”

“革命派受压。”

小将们七嘴八舌，恨不得一口气把全部要说的话都说完。她们越说越激动，越说越兴奋，有人甚至流出了眼泪。

毛泽东静静地听着，不言不语，安之若素。他拿起一支烟，掰成两截，把半截插到烟嘴上，然后又拿起打火机，把香烟点燃。然后才慢慢地说：

“事物都是一分为二嘛，我看你们团里没有那么多的坏人，还是好人多。”

他说到这里，稍稍停了一下，然后接着说：

“你们看是不是这样呢，要团结大多数人嘛。”

小将们听了之后，并没有完全平息他们的激动之情：

“我们团里确实坏人不少，他们骂我们是保皇狗。我们就是要誓死保卫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我看你们这些小同志，很有革命热情。你们空军里的事情，可以去找叶群同志。”

毛泽东说着，顺手从茶几上的笔筒里，拿起一枝红杆铅笔，在一张白纸上写下了她们 5 个人的名字。他一边写一边嘴里还念叨着。写完之后，又数着人头，念了一遍。然后在几个名字的下边，又写下了三个字：“找叶群”。然后将笔放在一边，并没有署上自己的名字。

不久，4 月的一天，毛泽东的秘书徐业夫来到毛家湾找叶群……

徐业夫走后，叶群叫来秘书张云生，对他说："张秘书，我去接见空军文工团的几个演员，你跟我去作一下记录。不然，她们几个对我一个，事后她们说我对她们讲了什么什么，我空口无凭。"

接着，她又说："徐秘书来，传一组（毛泽东）的话，空军几位女演员为陪主席跳舞，经常出入中南海。她们在空军内部是受压的少数派，要向主席反映情况。主席说，让叶群找她们谈谈。"随后又神秘地悄悄对张秘书说："不要小看她们，那都是能通天的。"

就这样，叶群在东交民巷空军招待所，接见了空军政治部文工团的刘素媛、邵锦辉等 5 人。叶群好像认识刘素媛，一见面，她就主动拉着刘素媛的手，以异乎寻常地亲热口气说：

"小刘，你好！我在多少天前就想见见你，就是抽不开空。你长得比过去更丰满了！"

"叶主任好！"刘素媛显得很激动，她向叶群介绍与她同来的几位女演员，叶群一一同她们紧紧握手。

叶群让她们几位坐下来谈："有什么话，尽可以和我谈。我一定帮助你们。"

"叶主任，我们几个人现在的处境很困难哪！"小刘说着，两只有几分秀气的眼睛有些湿润。

"别着急，慢慢说。"叶群安慰道。

"叶主任，你知道，我们是保吴、余首长的，可是在空政文

工团里，和我观点相同的，就这几个人。”她用手指了指在座的几位：“运动一开始，有些人要打倒吴司令，我们不同意。吴法宪同志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怎么能被打倒呢？我们和他们辩论，他们仗着人多，骂我们是‘老保’、‘保皇派’，还骂……”

“我们现在都不敢回去，一回去就受围攻。他们处处与我们作对，攻击我们。”另一个女演员补充说。

“你们保吴、余并没有错。”叶群说：“我和你们同一观点。”

“就是听说林副主席和叶主任也保吴、余，我们才保的。”小刘这时才有些笑意。

“你们经常去中南海，没问一下‘最高’是什么态度吗？”叶群试探着问。

“毛主席说：‘我也是保吴法宪的。’”小刘回答说。

“那你们就放心保吴司令，没有错。”叶群接着说：“你们说的这些情况，我和林彪同志都知道。我和你们的观点是一致的，你们没有错。不要怕别人骂你们是‘老保’，只要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就应该大胆地保，要做革命的‘保皇派’嘛！”

她又说：“你们这些革命小将，都是左派嘛，我们都是为了一个革命目标，保卫毛主席，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你们空军，吴法宪，吴司令，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你们要相信他。你们空军的腿长，最有灵活性，林副主席都相信你们。你们有事找吴司令商量，我是支持你们的，林副主席是支持你们的，我代表林副主席向你们问好，并通过你们，向你们团里的无产阶级革命派问好。”

“我们一定要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将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小将们纷纷表示。

“你们回团之后，好好干革命。你们这些左派，也要注意团结大多数人一道干革命。不管是谁，凡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都要造反，造反有理！”

“文工团是演出单位，现在什么也不排练了。”小刘又说，“我们想排点节目，争取在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 25 周年时演出，叶主任支持吗？”

叶群马上说：“我支持，林彪同志也支持。你们搞演出，要热情歌颂毛主席，歌颂江青同志，江青同志是管文艺的，是文化大革命的旗手。”

“我们还要歌颂林副主席。”小将们补充说。

“还要歌颂文化大革命，歌颂中央文革。”叶群越说越有劲。“你们先排好，我争取先让江青同志看看。她会支持你们的。”

“我们就这几个人，怎么排练呢？”另一个演员问。

“你们人少，可以找海军、北京军区、总后等单位同一观点的串连一下，与他们联合演出。”叶群建议说。

几个小将非常高兴，她们向叶群表示说：“我们一定不辜负叶主任的教导，感谢叶主任的关怀。”

“你们以后有什么事情，可以直接找我。回去之后，对谁都不要讲你们来我这里了。这是机密，否则坏人会钻空子，懂吗？”

叶群又把她早已准备好的毛主席像章，拿出来送给几名小将，小将们能得到叶主任送的毛主席纪念章，高兴得连声道谢。

她们从叶群那里回来后，很快就和海军政治部文工团、北京

军区战友文工团等一些相同观点的人进行了串联，刘素媛还向吴法宪做了汇报。吴法宪、李作鹏得知她们的演出得到了林彪的支持，大为振奋，专门成立了“三军联合演出委员会”，简称“三军”，计划 5 月 13 日晚上在北京展览馆剧场演出。

其实，演员们都热爱演出，即使是在大革命的年代也不例外。早在 1967 年 3 月，北京军区战友文工团的老“燎原战斗队”的头头王文浩等数人就来到李作鹏家里请示，说他们准备串联北京陆海空三军文艺团体联合演出，宣传毛泽东思想，问他支持不支持，李作鹏立即答应：“完全支持！”不久，由北京军区文工团“燎原战斗队”牵头，海军、空军、工程兵、二炮等文工团的多数派群众组织，联合起来排练歌舞节目，并数次在北京军区礼堂组织演出。

五一劳动节，按照惯例，那天要组织各文艺单位在公共场所演出，以示庆祝。可在当时派性斗争剧烈的形势下，每个单位都分成几个观点不同的组织，互相见面不是吵嘴，就是打架，能够同台演出吗？4 月 20 日晚，周恩来在北京工人俱乐部接见北京军区战友文工团代表时，肖华、杨成武、吴法宪和海军、北京军区的负责人都在场。谈到五一演出的事情，周恩来指示：五一节各文艺单位到公园演出，要由各种不同观点的群众组织联合起来演出。他说：

“你们联合演出我就去看，不联合我就不看。五一演好了，纪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 25 周年时还可以继续演。”

周恩来是希望通过两大派的联合演出，借此消除派性。于是

总政文化部召开军队驻京各大单位文化部长会议，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布置文艺团体的演出工作。

4 月 21 日，肖华、杨成武接见军队院校的群众组织代表时，提示他们要抓大方向。解放军技术工程学院学员方凡问："什么是'大方向'呢？"

杨成武说："地方上不是正在批斗彭真、陆定一吗？彭、罗、陆、杨中的'罗'是我们部队的呀！"

方凡他们说："没有材料怎么办？"

肖华说："全军文革可以提供。"

于是，"三军造反派"决定以斗罗瑞卿的名义联合起来，成立了"中国人民解放军院校革命造反派斗罗大会筹备处"，简称"斗罗筹"。"斗罗筹"中心组一号成员就是解放军技术工程学院学员方凡。

北京军区战友文工团在 5 月 1 日按照周恩来的指示，联合组织了演出。周恩来看了演出，并且表扬他们联合起来演出好。

5 月 8 日，肖华在京西宾馆召开全军文革会议，接见军内各单位造反派，研究机关文化大革命的问题。那天开会，老帅中只有聂荣臻去了，他感到气氛不对，没有多呆，赶紧走了。叶剑英事先得到叶群的电话，干脆就不去。果然，会上"三军造反派"正在反映他们在各单位受压的情况时，海军"无产阶级革命派"冲了进来，双方大辩论，会场一度十分混乱，肖华无法，只好草草收场。从此，全军文革小组再也无法组织开会研究军内文革事宜。

5 月 8 日当晚，周恩来、叶群接见高等军事科学院群众组织

代表时，周恩来给叶剑英打保票说：“叶剑英是忠于毛主席的，大节是好的。在长征时他揭发张国涛成立伪中央，在反对彭罗陆杨的问题上他也是有贡献的。叶剑英在处理青海、四川问题上犯了错误，是轻信了下级的话。”

与空军不同的是，在海军机关大院里，由于林彪“813 指示”的传达，打倒李作鹏的“红流”派是少数派。对立面虽然在外面被他们称为“臭老保”，但在大院里则有来自上上下下，特别是“李、王、张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大力支持，在领导系统、后勤保障等方面比“红流”派这些毛头小子要占据很大的优势。

进入 5 月之后，海军两派的直接对立公开冲突暂时沉寂，反李作鹏的“红流”派借机组织了一个文艺演出队，到各个“造反派战友单位”去演出，对“战友”表示支持并借以扩大他们的影响。

与此同时，支持李作鹏的海政文工团“拼到底革命造反队”的头头郑季信，也在家里召集手下的几个队员开会，他说：“快到 5 月了，我们应该纪念毛主席《纪念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发表 25 周年，组织文艺演出。”大家都表示同意。郑季信的这个“战斗队”是保李作鹏的，当时只剩下 7 个人了，无法组织一台演出，于是决定去联系其他军、兵种文工团。

他们先去联系解放军艺术学院，结果被人家打了出来。又去工程兵文工团，又被打了出来。遂后他们去找北京军区战友文工团的“老燎原”和空军文工团的“臭骨头”，同意了。接着又联系了北京卫戍区和北京军区空军，他们也都同意联合演出。于是这 5 个北京军队系统的文工团决定联合演出——“纪念毛主席

的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发表 25 周年”，并选定肖华的《长征组歌》作为演出节目。

## 第 635 回：坚持演，终爆发两派冲突　不撤离，□伯达赶赴现场

1967 年 5 月 9 日，北京军区战友文工团“老燎原”的三个人找到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军委文革小组副组长、总政文化部长谢镗忠，反映另一派要冲他们 5 月 13 日的演出，请求支持。

谢镗忠说:“你们要按照总理关于联合起来的指示组织演出，否则，总政和军委文革小组都不会支持你们；至于是否有人要冲击你们的演出，我可以了解一下。”

当天，谢镗忠了解到他们反映的情况属实，立即报告了肖华和全军文革小组副组长徐立清。肖华、徐立清指示：“仍要按照总理的指示执行。”军委文革办公室随即转告海军、空军和北京军区文革办公室，要他们采取措施，执行周恩来的指示。

吴法宪、李作鹏闻讯后，给叶群打电话，报告了这一情况。叶群说：“不听他的，他算老几，你们按原计划演出，我看谁敢冲!”

白而强，海军军乐队队员，是海政“红流”派组织“东方红革命造反队”的头头。5 月 11 日上午，白而强得知“三军”要在北京展览馆演出的消息后，立即找到同为“红流”派的海政文工团“思想队”的郑邦炎商量对策。他们认为，一定要阻止“三军”的联合演出！一定要让中央知道，他们才是反对三军党委、反对三军保守派的“真正造反派”！于是他俩借了两辆自行车，马上去找总政歌剧团的群众组织头头，又分别给平时联系紧密的军内一些群众组织头头打电话，鼓动他们一起去组织冲击“三军”

演出的“革命活动”。

5 月 12 日下午，白而强他们开了一个冲击“三军”演出的预备会。到会的有海政文工团、北京军区战友文工团、空军体工队、高等军事学院、总政歌剧团、后勤学院和解放军艺术学院、军事测绘学院及海军护校等一些单位的代表。大家一致同意不惜用“冲击”来阻止“三军”的演出，决不能让“老保”借机突出自己的地位和影响，从而争取中央支持的阴谋得逞！他们计划了各单位出动人员数量、车辆安排、上车地点和时间，确定了第二天晚上在“三军”的演出地点北京展览馆集合的时间。

海政文工团“拼到底革命造反队”的头头郑季信听到“三军造反派”要来冲他们的演出消息后说：“好啊，他们敢来冲‘纪念毛主席的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发表 25 周年’的演出，我们就好反击了！”于是派海政文工团“拼到底革命造反队”的张云星和空军的一个人去找总政领导汇报此事。这二人找到了总政文化部副部长李伟，李伟又请示肖华。肖华的指示是：“你们也不要演，他们也不要冲”。

有叶群的支持，“三军联合演出委员会”当然是要坚持在 5 月 13 日举办演出活动了。于是，他们被称为“演出派”。

三军“演出派”认为，肖华的指示简直是胡说，“我们不演了他们冲什么？这不是明摆着压制我们吗？”

5 月 12 日下午，军队院校造反派召开斗争罗瑞卿大会，海军直属机关支持李作鹏的 147 个群众组织没有拿到参加大会的票，于是他们写了支持信，送了支持大会的大标语，并把海军政委苏振华押到会场陪斗。到会场时，他们看见他们的对立面，海

政文工团“毛泽东思想战斗队”和军乐队“东方红”等组织作为大会的主席团委员参加了大会，十分不满，冲上主席台，双方当即发生冲突。他们向在场的全军文革院校组的两个副组长提出抗议。当晚深夜，他们几百人又冲进三座门军委文革办公室，抢走了一些文件和谢镗忠与文艺口谈话的记录，找全军文革的院校组杨、王两位副组长辩论。

5 月 13 日，肖华打电话指示军委文革办：“通知空军、海军、北京军区主要负责人，请他们劝说一派演出的文艺团体不演出或者推迟演出，以免引起两派群众之间的武斗；同时通知解放军艺术学院等单位反对演出的群众组织，命令他们不准冲击演出会场。”

军委文革办当即执行了肖华的指示。

这天中午，海军“红流”派的白而强和郑邦炎一起到总后勤学院找“星火燎原”，落实晚上去北京展览馆由他们派车的事。因为“星火燎原”在总后勤学院里是多数派，后勤保障比海军“红流”派要好，能调动一批汽车。

下午 15 时，接到军委文革办通知的空军吴法宪，给肖华办公室打来电话，说空军方面准备不充分，不准备演出了。

是演还是不演？海军李作鹏也一直在思考中。此时，李作鹏自身尚且难保，如果坚持演出，对方真的来冲，引起武斗，责任谁负？但是，要是现在突然宣布不支持演出，或者取消演出，不是等于承认对方“胜利”了吗？李作鹏实难甘心。他觉得，此刻他们必须有旗帜鲜明的态度。于是，李作鹏紧急与海军的几位领导商量，谈了应坚决支持演出的意见后，肖劲光等领导同意他的

意见，很快就形成了海军党委支持演出的决定。

下午，也已经接到肖华通知的李作鹏，在他家里召集海军“演出派”和海军各大部“演出派”头头参加的会议。肖华的儿子肖云和海军政治部宣传部副部长范丕忠、干部部副部长刘光、海军司令部办公室李凯都参加了会议，王宏坤、张秀川也在座。

李作鹏首先说明肖华不同意一派演出的意见，接着分析了形势。他说：“如果我们坚持演出，对立面可能要冲，以至发生武斗；如果我们不演了，对立面就会骂我们是老保，看大家的意见到底演还是不演。”

“演出派”的头头一致认为还是要演，谁怕谁呀。

于是，李作鹏说：“今晚演出不变，但要作好两手准备：如果对立面来冲击，发生武斗，我们就上去支援，准备好人员、车辆，一部分人在现场，一部分人在海军大院待命；如果演出没有人看，那就把咱们的人员拉去看。”

也是在下午，肖华在军事博物馆二楼礼堂接见军内两派的人员，依然说：“演的不要演，冲的也不要冲。”谁知两派人员当场就争论起来，吵得一塌糊涂。肖华无法，让工作人员给代表们发了果子面包当晚饭。会后，众人就去了北京展览馆。

晚饭后，海军政治部宣传部副部长范丕忠和海军“演出派”的一些头头到北京展览馆作布置，李作鹏、肖云、刘光等人和“演出派”另一些头头都在李作鹏家里等候。

不久，现场指挥人员来电话说，礼堂人已坐满，演出已准备好，并说肖华主任和陈伯达已经到了现场，肖华劝大家不演，陈伯达则模棱两可，含含糊糊。

李作鹏的夫人董其采立即与肖华夫人王新兰通电话，王新兰说："肖华的意思，为防止发生问题，还是不演出为好。"

董其采又与叶群通话，叶群表示支持演出。不久，叶群又来电话说："江青同志打来电话，表示支持演出。"

后来，叶群又打来电话，传达了林彪的指示："不要听肖华的，你们演你们的，为什么不能宣传毛泽东思想？为什么不能唱毛主席诗词、语录歌？有什么可非难的呢！林彪还要卫戍区派部队保护演出。"

于是，李作鹏、肖劲光、王宏坤、张秀川分别前往北京展览馆，预定在展览馆剧场东侧一座房内集合。

就在这时，军艺"星火燎原"的一些人联合清华"井冈山"、北航"红旗"等造反派组织，分乘几十辆汽车，来到展览馆。李作鹏的汽车走错了路，开到展览馆西侧去了，正陷在这些人群中。只见他们排成四路纵队，一边跑步，一边高喊："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争取胜利！"包围了剧场。这些人发现展览馆的大门紧闭，就毫不客气的用砖块、石头劈里叭啦把窗户玻璃砸碎，然后从窗户上跳进去，打开大门。门外的人高喊着口号冲了进去。

带头冲进剧场的是解放军艺术学院的"星火燎原"，紧随其后的是蒯大富、韩爱晶带来的清华、北航等院校的大学红卫兵。北京的五大"学生领袖"，那天晚上来了两个。

顿时，两派人在台上台下扭成一团……

李作鹏的车子赶快退出来，转到剧场东侧小楼与肖劲光、王宏坤、张秀川他们会合，同时打电话报告请示中央文革怎么办？

已经回到大会堂的陈伯达答复说："他们武斗，你们不武斗，不就解决了吗？"肖劲光听此废话，气得摔帽子，拍桌子，骂陈伯达是"死官僚"。

李作鹏悄悄溜进演出现场，看见空军政委余立金和卫戍区司令傅崇碧已在那里。卫戍区部队也去了，但在一个屋子里没有出来。几方面的部队汇合混杂在一起，场面十分混乱。

海军白而强是在这天下午 17 时 30 分左右，带着三四辆卡车从总后勤学院出发的。当他们到了北京展览馆时，天色渐暗，但还是能看到偌大的北展广场上人头攒动，各色彩旗猎猎飘舞，车声、人声交织一起，广场旁边的通道、剧场前面的大广场、剧场外面通二楼的楼梯上，都挤满了来自各个单位的群众！全国闻名的北航"红旗"、清华"井冈山"等著名大学生造反派的大旗一面挨着一面，与军内文艺体育单位、各地军事院校造反派组织的大旗交集在一起。这大大出乎他的意料。这么多单位，来了这么多人，肯定不是他们前一天开的小会所能调动来的。

白而强走进展览馆，在剧场前厅看见一群人正在追打几个人，其中最容易辨认的是八一体工队的几个大个子。他径直往剧场里面走，一直挤到舞台前，看见舞台上已经是他们的人在挥舞大旗，高呼着口号。乐池里一空无一人，一些大型乐器胡乱丢弃在那里……

"演出派"的演员们和一些未走的观众三个一团、五个一伙的拥挤在舞台前乐池边，斜眼看着在舞台上疯狂呼喊的"冲派"，时而也回报以"坚决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宣传毛泽东思想无罪，革命造反有理"等口号……

“冲派”第一次冲击就以占领舞台、“演出派”的演出无法继续进行为标志而结束。

这时，“冲派”听说“演出”派已经调集大批人马将“冲派”反围困在剧场里面，如果不立即冲破包围圈，就出不去了。于是，“全面胜利”的“冲派”赶紧聚集人马，挥舞着各自队伍的大旗，冲出了剧场。

在停车广场上，白而强看见了解放军艺术学院“星火燎原”的一个头头，两人正在说话时，一个人过来向那位军艺“星火燎原”的头头报告说：“蒯大富让转告你：林副主席办公室来电话说，冲击纪念毛主席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宣传毛泽东思想的演出是错误的！林副主席是支持演出的！林办让我们撤走。现场的大专院校主要组织现在都要撤了。”

他们一听，第一个感觉就是“林副主席受骗了！我们必须让林副主席了解部队‘文革’的真实情况！”白而强还认为：“如果我们现在从这个对全北京公开的舞台上退出，回到军队里听从三军党委‘落实林副主席指示’，就等于自投罗网。我们必须留在这里继续战斗，争取得到中央首长的接见，直接向中央反映我们的声音！”

于是，他和那位军艺“星火燎原”的人立即鼓动身边的人：“杀回剧场，争取中央首长接见！”

当他们再上舞台时，看见的仍然是他们一派的人们占据着舞台中央的位置。这时，剧场的广播中传出了“林副主席办公室电话指示……”的声音，海军白而强和那位军艺“星火燎原”的头头站在舞台最高层合唱台中间，鼓动群众高呼“我们要见中央首

长”的口号。对立面的一些演员则仍然在舞台下面，不时向他们发出几声抗议。

21 时，李曼村在京西宾馆从军委文革办得知武斗消息，遵照肖华的指示，立即让全军文革办派人前往现场制止武斗。不料全军文革办张凤翠等 3 人赶到现场后，当即被海军文工团的一些人抓去两人，带到海军大院扣押起来，被审问了 4 天。

这时，从剧场后台传来消息：“周总理要在大会堂接见双方的代表。”台上“冲派”几个头头商议了一下，决定让海政话剧团的石静、军乐队的李希海等人去了大会堂，其余的人都在剧场坚持等候消息。

到了后半夜，大部人员逐渐散走了，各自尚有数百人在那里继续相持，互不示弱。这时，外面传来消息：“中央首长来了！”此时已是 5 月 14 日凌晨。正在舞台中央的海军白而强立即大声指挥现场的人群给中央首长让出一条路来。只见陈伯达、王力、肖华、谢富治等人走了进来，上到台上。白而强又赶紧指挥舞台中间的人在最高一排合唱架上给首长们腾出几个座位，安排他们坐下。他的这些活动被人拍了照片，后来发布在“三军”在全国各地张贴的大宣传海报头条。他也因此被指认为“现场总指挥”。

武斗停了下来。战斗结束时，双方有 50 多人被打伤。

到底是些演员，在被担架抬出的人员中，有些人是将红墨水洒在绷带上，缠在头上装成受伤的样子，手举着《毛主席语录》，以渲染场面，让人感到武斗场面的激烈。

陈伯达一到现场，就指责“演出派”不该坚持演出，以至引起武斗。

肖华也说："我叫你们不要演出，就是怕发生武斗，你们为什么不听我的话呢？"

"演出派"原本就对肖华不批准演出心中有气，认为是受到了压制。现在被冲、被打以后，反而又受到指责，就更加不满。他们纷纷责问陈伯达和肖华："我们搞演出是为了纪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 25 周年，难道是错了？他们联合地方学生冲击演出，搞打、砸、抢反而是对了？"

"演出派"本来是保肖华的，但肖华在这件事情上的表现，使得"演出派"对他的态度发生了根本的改变。

陈伯达开始讲话，依然是由王力逐句翻译。他说："你们两方面可以暂时不见面，感情很冲动。不见面也好，隔开一个时候，隔开半年、一年、两年、三年、四年、五年，或者十年再见面，那个时候的想法可能跟今天不一样。那时候，就会双方握起手来，就会互相抱头痛哭，说是做了一件很错的事。"

"你们两派暂时不要见面，天明后双方谁也不准抬着伤员上街游行。"

在他们讲话并退场以后，天色已亮，海军也退出剧场，乘车回到海军大院了……

## 第 636 回：谈□庆，周恩来见两派代表　外交部，谢富治连夜前往

14 日凌晨，陈伯达、肖华、王力他们是从人民大会堂西厅，周恩来主持召开的解决重庆问题的专门会议上直接赶到北京展览馆的。而谢富治应该是从外交部赶到北京展览馆的。

在5月7日宣读《中共中央关于处理四川问题的决定》会上，周恩来说："重庆问题，作为专案，毛主席批示叫重庆的两方，军队方面、地方的'815'，有两种看法，对革联会怎么算，都找来了，单独研究搞清楚，然后做出决定。"

接着又发出正式通知，指示重庆驻军、"革联派"和"砸派"三方派人进京开会。于是，重庆两派群众组织各派出代表35名。

重庆"革联派"的所有代表先在重庆大学党委办公室集中，统一做了交代，然后齐赴车站出发，乘坐5月9日晚22时的20次特快进京。而54军政委谢家祥、副军长白斌、参谋长耿志刚等军方代表是第二天，5月10日乘飞机抵京。

"革联派"的代表乘火车于 11 日晚抵达北京，在此之前已经赴京告状的重庆大学业余戏剧队的张田春和美术队的傅运政、彭支云等人到北京火车站去他们。那一晚，"革联派"的代表们就在东大桥接待站和重庆大学的同学们一起过了一夜。第二天一早，熊代富、秦安全等重庆大学"815"总团头头就去 54 军领导的驻地，面聆机宜去了。此时，乘飞机于 5 月 10 日先于他们抵达北京的军方代表已经向全军文革作过了长达 3 小时的汇报，并整理了书面材料上报周恩来和中央文革。

5 月 11 日，北京大学文革委员会、《新北大》校刊驻重庆地区特派记者受“新北大公社”总部委托发表声明：“坚决砸烂革联会！”

5 月 13 日这天，就在北京三军正为晚上演出一事闹得不可开交的时候，周恩来与四川的张国华等人商谈四川重庆问题。商谈后，即于当晚 22 时 30 分，和陈伯达、康生、肖华、杨成武、王力、关锋、戚本禹、梁兴初、张国华、刘结挺、张西挺等人在人大会堂西厅召开解决重庆问题的专门会议，并接见重庆两派代表。

会议开始，周恩来亲自指挥大家唱《大海航行靠舵手》。唱完歌曲，康生风趣地说：“听起来都是一致的嘛！”

周恩来说：“没有准备，听听两方面的意见，先听反‘革联会’方面同志的意见。”

“砸派”7 人代表首先发言，控诉“革联会”是怎样镇压他们的，当说到“革联会”是搞“三凑合”、“拉郎配”时，周恩来笑弯了腰……

接着，“革联会”代表周家喻开始发言。

周恩来问：“你是周家喻吗？听说你来了很久了吧？”

周家喻答：“4 月 25 日来的。”

周恩来说：“你们不要再来人啰。”

周家喻答：“我们已经回去人了。”

周恩来说：“回去是好事嘛。听说你们给‘八一兵团’发枪，发了的要收回来。”

周家喻开始汇报。

周恩来问："我对李井泉很感兴趣，你们把李井泉关在重大为什么不拉出来斗？说说抓到你们那里去的情况。"

重庆大学"815"介绍批斗李井泉的情况。

"砸派"代表递上纸条问："重庆近日盛传王力同志有一个对重庆表态的录音报告，有三个内容：（1）重庆革联会的大方向正确不能砸。（2）重庆的镇反与成都性质不同，成都犯了方向和路线的错误，重庆是一般的缺点。（3）重大 8·15 是左派组织不是保守集团。"

王力看后，立即在上面批了"没有这回事"，并传给周恩来和陈伯达。周恩来要他当众辟谣。王力说："重庆问题不是正在解决嘛！我没有什么录音报告。"

就在这时，外交部那边频频告急。5月13日当晚，北京外语学院的"红旗大队"几百人冲进外交部，要求周恩来接见。一直到5月14日凌晨1时，北京外国语学院"红旗大队"和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红卫兵代表还在外交部三号礼堂为周恩来接见一事大声的争吵。住在外交部旁边的谢富治从家里走到外交部，径直来到了礼堂。有人发现后要求他讲话。"红旗大队"的人也要求他讲话，并鼓掌。

谢富治说："我不了解情况怎么发言？我是偷偷跑来看看的。这样压迫人，总理永远不会接见。要我讲，只有一句话：统统回去！统统回去！将来这样当外交官真糟糕！"

他们被劝到了会议室里，谢富治对正准备给他录音的同学说："你要给我录音呀？我又不是讲演……这么多人，对我的威胁太大。你们是不是派个代表跟我说。隔壁就是我的家，每天喇

叭都响。我怕你们武斗。你们大学生来干什么？宋远利、刘令凯来了吗？你们看机密文件了吗？”

同学们说：“他们造谣！”

谢富治：“我这次来不是解决问题来的。三家都有理，都批评我。涉及总理的问题，我就没理，就都来斗我，就是我不对？”

谢富治说的是4月18日，他召集北京市学校及工矿单位开紧急会议，要求撤回北京在外地的学生，解决武斗问题。“三家”是说北京外国语学院的“六一六”、“造反团”、“红旗大队”三个群众组织。

同学纷纷解释说：“我们那次态度不好！我们向您检讨！”

谢富治：“就我一个人不对，大家都来斗争我。”

在场的学生和谢富治一起哈哈大笑起来。

同学问：“你对刘令凯太宽大了吧？宽大的无边。”

谢富治说：“他现在很好。没贴总理的大字报。”

同学说：“刘令凯说过，‘党内现在还有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就是说，除了刘少奇还有一个人。这个人是米高扬式的人物。是中国最大的两面派，是卖国主义者。”

谢富治没有回答，而是指着一位同学衣袖上的血迹问：“这是怎么搞的？”

同学答：“外交部的人打的！”

谢富治摆摆手说：“不要告人家的状，我不听。”

同学说：“他们告我们的状了！”

谢富治否认说：“没有！我没听见！”

“红旗大队”的人继续讲关于刘令凯对抗周恩来的事……

谢富治：“不要讲刘令凯了！”

同学说：“那你讲今天的吧。”

谢富治：“又是想问‘是不是革命行动？’”

同学说：“我们今天的行动就是革命行动，他们说我们是暴徒，是……”

谢富治打断他的话：“我想还是找两个头头了解一下情况。”

在场的同学不同意：“还是让我们大家听听。”

谢富治：“在天安门广场我看见过你们，想和你们辩论，可是你们的人太多。总理告诉我，你们抢了材料……”

同学否认：“根本就不对。”

谢富治说：“总理会说错话吗？他们到外交部待了多长时间？”

谢富治说的“他们”是指“红旗大队”的对立面，刘令凯的“六一六”。

同学答：“一天不到。”

谢富治继续问：“那你们今天这样做好不好？是不是革命行动？”

同学说：“第一次，我们听了总理的话回去了。”

谢富治再追问：“那为什么今天又来了？”

同学说：“那天我们听了总理的话回去了，可是‘造反团’、‘六一六’、‘井冈山’又都进来了。”

谢富治不解：“还有个‘井冈山’？”

同学说：“刚刚成立的。”

谢富治问了人数。

同学反映："他们说我们是保陈毅的，是新的保守派组织。"

谢富治说："他们是搞激将法。"

同学说："不是什么激将法，他们是想把造反派搞成保皇派……"

同学们议论纷纷。

谢富治："你们现在要讲团结，不要随便讲保皇。"

同学："我们很欣赏您的话：'极左派或保皇派与保守势力结合在一起'对付真正的革命造反团，很适用于我们学校的情况。"

谢富治否认："不要这样讲！我没讲过这个话。"

同学中有一人拿出了5月8日"关于当前北京市高等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若干问题的声明"。

谢富治说："我看过，我当时就问过，为什么没有地质'东方红'？"

同学插话："他们只去个代表，不同意我们的观点。"

谢富治又问："为什么没有宋远利他们？"

同学答："'造反团'不同意第二、第三条。"

谢富治："我不同意……"

同学问："如果这样，为何红代会41个单位都同意我们的观点？"

双方争论起来。

谢富治："我听总理说了，你们提意见可以到房子里去，为什么非到大街上？你们这样怎么能做外交官当大使？"

谢富治接着激动而又气愤，大声地说："千条万条要服从大

道理，大道理管小道理！我刚从办公室回来，怕你们武斗，出来散步来看看。大门那儿人很多，我从西门进来的，走走，看看，我根本没有接到总理的指示，我不能代表总理。我说，你们赶快回去吧！你们这样压总理行吗？”

同学：“总理说要接见我们。”

谢富治：“那打个电话。”

同学：“我们也去听一听。”

谢富治：“啊呀！是大学生了……我给总理打个电话，叫他派我接见你们，那你们就可以回去了。如他有空，来见你们，那就是他的事。我现在去打电话，如果不相信我，可以派人来听，来监督。昨天在天安门‘九一五’、‘九一六’闹起来了，问我：你是哪一派，我说我是‘九一七’的。我请你们不要闹了，要把矛头指向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你们这些大学生啊！总理今天没派我来。如果是总理派我来的，我会这样偷偷摸摸的来？总理如果派我，那我就可以代表总理。行吗？那我现在去打个电话。”

“九一五” “九一六”是七机部的两派群众组织。

同学说：“今天来的还有二外的。”

谢富治：“我以前没有和二外的打过交道。”

同学：“你今天来散步，到我们这来，我们感到很幸运！你从总理那里得到消息，说我们抢了材料。我们感到总理还没了解清楚，我们想这一定是‘总站’反映的，我们也应享有同等的权利，向总理汇报。”

谢富治：“那你就说吧！”

同学：“要说起来很长。”

谢富治：“你们大学生讲话就是那么长，讲得简短扼要点吗，你们今天来了很多人，你们二外里边也有两派？”

二外学生：“有一个组织就像你说的是‘极左派或改良派与保守势力结合在一起’。”

谢富治：“不要用这个话！”

接着那位二外的同学介绍了二外几个群众组织的情况。

同学：“我们想让总理听听我们的意见……我们听说派代表，我们就派了代表，可是‘造反团’等组织派去了三大卡车，还听说搞了游行。姚登山说：‘总理很累了。’我们于是就简单地汇报了一下情况。可是他们这是用总理指示来压我们……”

谢富治：“你们闹那么对立吗？他们两家都在一起活动吗？”

谢富治说的“你们”是指外院的“红旗大队”与“造反团”，“他们两家”是指“六一六”和“井冈山”。

同学说：“他们明里是两个组织，暗地里是一样的。”

谢富治：“明天我们要开会，对武斗要采取坚决的行动。”

“红旗大队”的同学说：“外院‘红旗革命造反团’冲了外交部，把陈毅办公室搜了，什么都干。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总理就接见了，总理对他们这种行为，深有体会。我们希望谢副总理把我们的情况向总理反映。他们还把总理逼的心发跳。”

同学：“他们还贴总理的大字报。”

谢富治：“这是反动的。”

同学：“他们贴总理的大字报，在总理的名字上还打‘X’。他们在‘欢迎总理到我们学院来’的大字报上的总理二字上画了

两只黑手。”

“红旗造反团”递了一份材料说：“过去是明的，现在是隐蔽的，是一贯反对总理的。”

谢富治：“不能把人家说成一贯就是反革命的。现在应该讲一讲外交部。你们讲这一派那一派，当着我面，老说别人的坏话，我反对。你们这么说，那我就走了！”

说着起身欲走……

同学：“这都是实话。”

谢富治：“我要反对，我不听！在外交部为什么不讲今天的事？宋远利是我的好朋友，你们在我面前说他的话，我不要听。”

“红旗大队”插话：“要用发展眼光看人，现在变了。”

谢富治：“我有几个月没见他了，上次只跟他说了几句话，你们不能批评我的老朋友。”

“红旗大队”插话：“现在他不是你的老朋友了。”

同学：“我们感到很有必要向总理汇报我们的情况。不过我们今天不是来压总理的，是揪陈毅的。”

谢富治：“可是你们到外交部，揪得出陈毅吗？他又不在这里。我不支持你们，你们先告人家的状，你们发了这么多言，都是告别人的状。”

同学：“这都是事实，可以调查。”

谢富治：“陈毅在国务院，可以调查。陈毅在国务院，你们都知道的嘛！”

同学：“他是外交部长，不在外交部揪，行吗？”

谢富治：“你们来了1000多人，我是为你们着想，我感到这

样不好，你们既然来了，我就打个电话给总理，看他有什么意见。”

同学：“希望你能把我们和说的事儿讲一下。”

谢富治给正在大会堂的周恩来打电话说：“我今天是散步到这里来的。听说这里要搞武斗，我赶来了，到处都是。看样子他们要台阶下，是不是给他们一个台阶，总理是不是给我一个指示？”

周恩来答：“要他们撤回，明天找他们几个代表接见。”

谢富治放下电话对同学们说：“我有事马上要走，总理的电话打通了。你们选几个代表，明天总理接见。但你们马上得出去。”

同学们问：“选多少个？”接着又吵吵起来。

谢富治：“我没来得及问，反正两三个吧！”

学生们乱吵吵的闹成一团：

“不成，五、六个……”

“七、八个……”

“十个，全部。”

谢富治：“七、八个吧！七亿人都要见总理呢。我要批评你们了，我看到血衣了，没看到人。你们还有人带刀子，带剪子。”

学生们又吵了起来：“造谣！他们还诬蔑我们有人带手枪呢！”

谢富治：“你们是打了架了嘛，反正打架是不对的。”

同学们否认：“没有，根本没有这回事。”

有同学说：“是他们打的。”

谢富治：“你们要响应总理的号召，马上撤！”

同学们终于答应：“好！”并鼓掌说：“相信总理。我们没打人。”

谢富治："你们要撤，要排好队，不要搞小动作！要突出政治，你们将来要当外交官……你们是不是打扫一下房子，大标语盖一盖。"

同学："我们没写，他们都把写我们的贴到大街上去了。"

谢富治："你们撤，收拾一下，我就管这一点儿，我是公安部的，不管外交部。"

留学生"遵义兵团"的学生说："我们支持'联络站'，'红旗大队'冲入保密室是错误的，保卫保密人人有责。"并诉说"红旗大队"砸外交部广播室的过程……

谢富治问："你们是哪儿的？"

同学答："我们是归国留学生'遵义兵团'。"

谢富治："你们做的对！就应该管！"他和留学生"遵义兵团"的学生握手。随后，谢富治又赶往北京展览馆和陈伯达、肖华一起解决那里发生的三军武斗。

## 第 637 回：周恩来，急忙见“三军”代表　不服气，会场上又起争辩

5 月 14 日凌晨 3 时 34 分，周恩来刚刚结束解决重庆问题的专门会议，又和杨成武一起在人民大会堂三楼小礼堂，接见北京三军“五一三事件”的各组织代表。此时，陈伯达和谢富治、肖华、王力等还在北京展览馆剧场现场接见那些未撤离的人员。

当周恩来与杨成武走进人民大会堂小礼堂时，等待接见的人们齐声高呼：

“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万岁！”

周恩来站在那里说：“我现在也搞不清你们是观众呀？是演员？还是冲会场的？你们这里边有观众，也有打架的。我们请不来，只好分分工，我和杨代总长在这，伯达、谢副总理和肖华、王力到那边去了，那边的人多嘛。

一个庆祝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 25 周年的演出，本来是很好的。不管是那一派演出，我们应该欢迎嘛。不能只自己演，别人一演就给扣上个什么帽子。为什么打架呢？都喊毛主席万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万岁！实际上却不一样。今天是 5 月 13 号啦，不是去年的 5 月 13 号啦，到 16 号就是一周年啦！夺权斗争进入了新阶段，还这样干啊？现在还打架，难道对毛主席就是这样的感情？！

刚才我给北京战友文工团的 5 位同志讲，我跟战友文工团打交道最多。他们最近一两年经常出国，到阿尔巴尼亚、罗马尼亚。

哪知道回来以后你们就分化啦，‘老燎原’里又出了‘新燎原’。”

代表们看见周恩来一直站着，就喊起来：“请总理坐下讲！”

周恩来说：“不要坐，站着后边能看到，站着讲好，坐下后边看不到，还是要站起来。”

他接着说：“到了五一节前，我费了好大的劲才说服了他们合起来演。《长征组歌》演出那一天，不知是哪一派来了电话，叫我到‘青艺’去看戏。我去了，忙坏了郑维山同志。那天我走了以后，你们就打起来了。马玉涛说：‘给总理演出我就演。’怎么能这样说，这不是给我演出，是宣传毛泽东思想嘛！是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嘛！你们演《长征组歌》，长征我们都参加了，可以看出你们真实的感情。你们唱歌、跳舞都在一起，为什么因为观点不同就干起来？我们纪念毛主席的《讲话》发表 25 周年，我们大方向是一致的嘛。为什么打成这样子，我们都是解放军嘛！”

地方院校的同学插话：“周总理，我们支持解放军的造反派。”

周恩来：“‘老燎原’和‘新燎原’都是造反的，你们学校的同学不了解情况。你们搞支持这一派，打击那一派。所以我认为你们学校的同学挺有嫌疑。同志，北京的情况现在同去年的情况不一样了。你们要把一个团体研究清楚。你们还是一年以前的看法，以为自己是造反的，人家不是。要研究清楚了再行动，不要一招呼就来了。今天展览馆、三座门、中南海就各闹一场。你们一两个观点不同就像死对头似的。

我有充分证据，我知道他们那里的事情（指战友文工团）。为什么因为观点不同就斗？你们再在中间加油添醋，使问题更复

杂了。陈伯达同志到那边去说明的也是这个道理。他们演《长征组歌》，是有革命感情的。我们现在要对准刘、邓，要矛头向上，在大批判当中考验对方，考验自己，不要有私字。我们活了 70 多岁，也还要去掉私字。你们这么年青看问题就那么准啊！一个电话一听，就去支持啦。难道没一点缺点错误，我看不可能。”

军艺代表说：“旧燎原和三军的老保…… ”

周恩来打断他的话问道：“你弄清楚了没有，哪个是保守的？双方都有革命感情，为什么联合不起来？你们这样做，不是一种革命感情，是一种非无产阶级的感情。你们好好去学习《古田会议决议》。”

这时，有人指责军艺代表说：“你们不了解情况的，不要在一旁添油加醋。”于是乎，下边各组织的代表纷纷争吵着要发言。

杨成武赶紧维持秩序，大声喊道：“大家静一静，听总理讲话！”

还是安静不下来……

周恩来生气了，他说：“是我请你们来的，还是你们到这来示威的？你们在这里都是这样，可想在那里是什么样子？！像今天的事情就无法调查。你们各党各派都有，实际上还不都是一大派？”

军艺“星火燎原”一人说：“我是反对这个会的。”

周恩来生气地一拍桌子说：“你反对，你就不对！人家演出，宣传毛泽东思想，你们为什么去冲？有问题演完了再辩论，再提意见嘛！演出是肖华和我们批准的。你们不应该造这次演出的反，演革命的戏，演《长征组歌》，难道不是宣传毛泽东思想？你们

为什么要冲？你们怎么能从这次演出判断人家是保守派？你们去打砸抢是否中央给你们的权力？是否中央文革，还是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给你们的权力？是否毛主席，林副主席给你们的权力？为什么要冲这样的会？”

二炮医校“红色造反队”一代表说：“我同意总理同志的讲话，但是对于今天的演出，我们认为不应单纯看成是演一场戏的问题，这是军内文化大革命两条路线斗争的缩影，希望中央首长重视这个问题。”

周恩来：“不要认为你们就是造反的，人家就是保的，我们现在正在考虑如何对待派别问题，在彻底大联合、大批判时，这样搞派别是不对的。”

这时，有一人插话说：“总理，空军党委调来了大批部队，在门口堵我们。”另一人说：“还有海军党委……他们说周总理支持他们演出。”

周恩来问：“你是观众，还是冲会场的？”

答：“冲会场的。”

周恩来：“去冲展览馆就是不对。”

有人热烈鼓掌。周恩来：“不管怎样，他们演出是肖主任批准的嘛。庆祝毛主席《讲话》发表 25 周年，你们为什么要冲？有什么好效果？我们听了难过。”

有人向周恩来请示发言。

周恩来问他：“你是哪个单位的？”

答：“我们是军艺‘星火燎原’的。”

周恩来又问：“你是演出的吗？”

答："不是。"

周恩来："是去干涉的吗？"

答："对。"

周恩来生气地说："那就不对！"

又是热烈的掌声。

军艺"星火燎原"这人又讲："我们找他们辩论。"

周恩来："人家演出，你去辩论什么？！"

一观众说："总理，他们要冲会，演出者就一再说，这个大会是林副主席支持的。周总理打电话说，热烈祝贺这次演出成功。谢副总理也打电话说，今天的大会是宣传毛泽东思想的大会，谁冲谁犯错误，坚决反对武斗。戚本禹也打电话支持这次演出。但是他们还是冲。"

另一观众说："他们是保皇派演出，就要造反。"

杨成武："'造反有理！'我看这个反造得无理。"

周恩来："你造的是演出的反，就不对，你怎么能说他们是保皇派呢？"

军艺"星火燎原"一人说："全军文革的指示怎么不一样？他们通知说这个戏不演了。"

军艺"星火燎原"又一人说："今天给虞棘打电话。虞棘说不同意他们演出。"

虞棘时任总政文化部副部长。

周恩来："啊？这就奇怪了！啊？有了个电话说是不同意他们演出，你们就打，凡是这样的大会全军文革、中央文革不知道的，你们就去冲？谁给你们的权力？ "

杨成武："国际友人看了后是什么样的影响，你们大部分是穿军装的解放军，林副主席听到你们打架，心里很难过。"

某单位群众组织代表："我们没有打架。"

杨成武："你们没有打架怎么到现场的？"

周恩来："人家演出，纪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 25 周年，这样的演出，有什么不好的效果？你们在这样的场合去冲，你们就这样热爱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吗？对毛主席是什么感情？你们对毛主席连这点感情都没有。你们这样做，我们都感到难过，你们不难过吗？你们不感到羞耻吗？你们造的是毛主席的反，你们也喊叫毛主席万岁！你们的行动却不符。林副主席都睡觉啦，起来打电话，叫你们别打啦，你们不听，你们这样热爱毛主席吗？我们心里非常难过，林副主席听了后非常难过。林副主席直接打电话支持这个会的。"

杨成武："你们这样作法就没道理。"

周恩来："这样的纪念毛主席《讲话》发表 25 周年的演出，不管哪派演出，我们都应该去看，看完以后，如果有意见，可以演完后再辩论嘛。你们这样，就不是一种革命的感情，这是一种错误的思想，你们回去好好学习古田会议的决议。

林副主席说，要有革命性、科学性嘛。可是你们呢？"

下面吵吵嚷嚷，周恩来问："你们是哪儿的？你们派别多，我搞不清，反正今天的演出，冲了就不对。既然已经演出了，7 点钟听说要武斗，我们正在议论这个事情，你们就打开了。本来想叫他们不要演了，后来他们坚持演出。林副主席知道了，非常着急，马上表示支持。肖华主任忙着这件事，可是，你们从派别

的利益出发，就这样干。毛主席的这篇著作从哲学到文艺，涉及范围广，是辉煌的著作，纪念不但在我国有意义，而且有世界意义。”

战友文工团“新燎原”一代表说：“‘老燎原’单方面的不搞联合演出。”

周恩来：“如果他们不联合演出，这是他们的不对。总之，今天这个演出，你们去冲，就是不对。林副主席支持他们的演出。所以你们不是根据全国人民的利益，全世界人民的利益。……为纪念这个辉煌著作的演出，不管哪一派都可以演。就算你们说是个保守分子，你也不能这样搞，不能把保守当成两条道路的斗争。你们演出，我们一样的支持你们嘛。

至于说，今天以前他们不跟你们合作，这是他们的错。如果‘老燎原’来，我还要给他们讲。不管怎么样，今天冲人家演出，在人家门口贴人家大字报是不对的。人家演的是革命戏嘛。斗争也要讲政策、方法，你们这样做是不对的，这样子能把人家斗垮呀？不一定，相反的，你们可能要被斗垮。”

杨成武：“我插一下话，读一读几个材料。”

杨成武念5月13日晚大会演出的节目单和军艺“星火燎原”、总政军乐团“革命造反总队”等几个单位5月13日晚在会场散发的要砸烂大会的传单，然后说：“从这两份传单就可以看出，两种不同的情况：一个是宣传毛泽东思想，隆重纪念毛主席《讲话》发表 25 周年；一个是宣战。”

下边有人讲：“他们反对真正的革命造反派，招摇撞骗，反对全军文革……”

杨成武："你们能说人家盗用军委和江青同志的名义招摇撞骗？怎么能这样说！我是军委文革的成员，经常参加全军文革的会嘛！我们是清楚的，这次演出是肖华主任批准的嘛，这怎么能说是招摇撞骗呢？！这就不符合实际情况。"

有人说："造谣可耻！"

杨成武："不要以为打架打得最厉害，就英勇。很简单的道理，就是要文斗，不要武斗。不要以为打架最厉害便最左派，弄不好要走到反面。不要以为自己永远是左派，是不是真正的左派，看是不是毛泽东思想红旗举得高。

我完全拥护总理的指示，今天总理的话说的语重心长，希望你们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把古田会议文件好好学一学，要整风，否则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便很难。要革两个命：一个是革客观世界的命；一个是革主观世界的命。要夺两个权：一个是夺资产阶级的权；再一个是夺自己头脑中私字的权。

总理说了，现在是 1967 年的 5 月份，不是 1966 年的 5 月份，现在的最主要形势是彻底批判党内一小撮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同时搞好本单位的斗、批、改。现在打、砸、抢不是大方向，总理和江青同志在庆祝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上讲的很清楚。"

一个中学红代会代表说："总理，今天晚上的大会，这是宣传毛泽东思想的大会。所谓的造反派他们打、砸、抢，他们把两个鼓打坏啦。许多人说：是两个定音鼓，据说值 4000 元。把玻璃砸烂了，许多演员被他们打伤了。我们有两个旗子，我们把旗子给他们，叫他们替我们讲一讲，要文斗，不要武斗。他们说，

什么要文斗不要武斗？……”

这时，军艺“星火燎原”、工程兵“傲霜雪”等起哄，周恩来：“让人家把话讲完嘛！你们压制不同意见，就不是毛主席的好学生。”

总政军乐团五队“革命造反总队”代表说：“他们今天晚上的演出都是保皇派，他们保当权派，保刘、邓、刘志坚，他们的演出和主席没有感情。”

周恩来问：“你怎么知道人家保刘、邓？你没有看节目，怎么知道他们和主席没有感情？”

军艺“星火燎原”的人说：“他们就是保字号的。”

周恩来：“打起来，互相没有好话。”

杨成武：“你们先搞了宣传品，说明你们有计划地冲会场，对不对？”

会场喧哗起来。

周恩来生气的说：“是我请你们来的，还是你们来示威的？”

杨成武：“这里是中央首长接见，你们这样，你们在展览馆还不打起来？”

周恩来：“军队保皇，保谁，保刘、邓的皇？”

杨成武：“解放军就不是保皇派。告诉你。”

周恩来：“现在我们请你们来，我就要讲话。军队分几派是存在的，说军队有保皇派，你怎么知道谁是保字派呢？不应凭感情下结论。”

## 第 638 回：稍事歇，接见海军“红联总”看伤员，明确支持“老三军”

总政军乐团“革命造反总队”一名用纱布蒙着一只眼的代表说：“他们今天晚上参加演出的，都是保皇派，他们保当权派…… ”

周恩来：“你受了伤，我同情你。但是，你口口声声说当权派，解放军的当权派是林副主席，你是什么看法？”

战友文工团“新燎原”一代表说：“刚才 301 医院来电话，说我们有一个同志死了。”

周恩来：“你看人家刚才来电话，”说着，他拿起一张纸念到：“重伤三个，轻伤两个，没有死亡。你们不信，等会开完了，我派人去调查。”

下边又嚷嚷起来，很乱，周恩来生气的说：“我不用你们讲，战友文工团的情况，我比你们清楚。你们打战友文工团，支持一派，反对一派的做法是不对的。对一些倾向性问题上应该从古田会议决议学习着手。我们要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保持造反精神，造反精神必须有科学性，是两条路线斗争，要分析，不能凭空办事。如果不是思想上真正过关，文化大革命就动不了‘私’字，一动上街贴大标语，一动出去串联。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了四次关于停止串联和 4 月 25 日的通知，可是就是不听。大专院校红代会，工代会到外面串联的都有，那怎么行？我可以先告诉你们，现在不是打、砸、抢，现在是大联合，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已经搞了个草案，就是不让打、砸、抢。”

下面依然很乱，争吵不休。

周恩来："像你们这样，非打架不可。"

测绘学院的代表说："现在这些保字号组织，又抬起头来了。"

周恩来："我再说一遍，我比你们清楚得多，你们讲他们保守，我们不这么看，中央文革不这么看，全军文革不这么看。"

杨成武："你们讲他们保守，他们还讲你们保守呢？"

周恩来："打起架的，不说好话，在座的都是红五星，红领章的，我们要无愧为解放军，大家要把红五月的文章好好学习，红五月将要发表很多文章，希望好好学习《＜修养＞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下次有机会遇到，我要问你们学习得怎么样？

你们现在根本无心读毛主席著作，这怎么叫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怎么能批倒、批臭黑《修养》？同志们，老实告诉你们，我们跟主席几十年，还觉得总是跟不上，不要说四卷，连这本语录都没有学好，我们一定要下功夫学习啊！

刚才说话的那个同志，你受伤我同情，但你说话有缺点就要批判啊！你口口声声当权派，解放军的当权派是林副主席，你是什么看法？"

杨成武："同志们，我们要爱护总理身体，总理已经有一个多月了都是这样整天整天的不能休息，现在周总理讲两个问题，讲讲就结束了。"

军艺一群众组织代表说："今天我们缴获了两个收发报电台。"

有人插话说："是两个半导体报话机。"

军艺："这个是在展览馆剧场二楼缴获的。海军在二楼设有

电台，我们缴获了两个。这是对待谁？搞到一级战备的程度。”

周恩来：“海军有没有带上电台，我不知道，你们不冲到二楼怎么知道人家二楼上有电台？这就证明你们冲了嘛，不要说了。”

二炮“星火造反团”代表说：“我们二炮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现在还很顽固，……当权派……”

周恩来：“看你的发言，当权派、当权派，不加分析，是无产阶级当权派还是资产阶级当权派，要分清楚嘛！

你们说，他们就是保当权派。同志们，什么当权派？对当权派要作阶级分析啊，你们知道吗？

如果说，你们刚才提到‘老燎原’的许多错误，如果是事实的，我当着他们的面也要批评他们。你们要执行《八条》。《八条》和《十条》并不矛盾，《八条》是拥军的，《十条》是爱民的，《八条》和《十条》要结合起来学，才能学好。首先来说，在派别斗争中，你们并没有掌握毛泽东思想。不要太自信了。应该有自信心，但要有民主的自信心。在反对我们的敌人时要有自信心，在派别斗争上，要有分析。派别斗争能否就说是两条路线的斗争？不能动不动就去支援，支援错了呢？年轻人，应该自负，过于自负便是骄傲、狂妄。你们现在就是坐不下来，来了个电话就出去啦。语录读的很熟，并不等于就学好了毛主席著作。你们造反精神我们支持你们，但是你们这样做法，就会起了偏差。你们都是解放军，不要损害解放军的光荣称号。

如果说，13 号晚上的演出，他们对那一派进行了攻击，那是他们的不对。如果你们被打的多，这个我们要了解，但是你们

冲会场是不对的。你们今天公开的宣战，这个情况我们事先也有了解，无怪乎他们是有准备的，你们不是冲到二楼，闹了他们两个报话机吗？

今天碰到的事并不意外，我们常想这个问题。北京如此，外地也一样。这样搞会把我们的阵线搞乱了，对斗争不利。在文化大革命已经进行一年的情况下，我们是应该正确对待派别斗争问题，不要认为你们就是造反的，人家就是保的。现在我们正在研究。大家在批判中，大联合中自己教育自己嘛。至于你们讲的好多细节，这里也说不清，反正是相骂无好言，相打无好手。今天你们有些受伤的，我表示同情，但你们作法是事有因果的，希望你们不要这样干啦。为了昨天的事，你们准备了一天多啦，这又是一宿，也够辛苦了，该休息啦，毛主席说：‘吃饱了肚子，养好了身体干革命。’当然了，更主要是学习毛主席著作。这是精神上的粮食。”

杨成武：“喂，同志们，我提个倡议，大家要爱护总理的身体，总理 24 小时没有休息了，像你们，没个完，一切不谈了。”

会见于 14 日早晨 5 时 15 分结束，但是周恩来还不能休息，围攻三座门的海军直属机关群众组织代表还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等着周恩来的接见。原来，海军支持李作鹏，围攻三座门的那几百人，从 12 日晚上 23 时到三座门，一直在那里呆到 14 日清晨 5 时。这期间，已经发生了“513 事件”，周恩来提出要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他们。于是他们撤出三座门，前往人民大会堂等待周恩来的接见。

5 月 14 日清晨 6 时，周恩来刚刚结束对三军造反派的艰苦

劝说，稍事休息，又举着《毛主席语录》，在杨成武陪同下，出现在人大会堂北大厅。正在等候的海直机关“红联总”的代表马上起立，不断高呼：

“毛泽东思想胜利万岁！”

“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周恩来对他们说：“听说你们在三座门搞了一天半？历史是不会倒转的。本来你们没有要求我接见你们，我来接见你们，我是支持你们的！

你们没有参加上斗罗大会，吃了点亏，这有什么委屈？革命还能没点委屈，革命是曲折的，受点委屈算不了什么，要向前看。各人有各人的委屈。你们比我们当年进步多了，因为你们生活在毛泽东时代。你们受一点小小的委屈这算什么，要向前看。你们解放军是革命的支柱。你们解放军走在马路上也是光荣的。你们应该相信和依靠解放军。你们自己就是解放军嘛！吃点亏算不了什么！你们受点委屈，吃点亏，就有进步，就有心得。这次未参加上斗罗大会，以后你们还可以开嘛！要相信大多数干部，有的人可能要犯错误，要跌跤子，摔倒了再起来嘛！一年多，我们是从斗争中起来的，总有些经验，不要停留在原来水平上。

你们这样的海军大院，必然会有各种思潮，各派斗争，当然比地方要好些。不可能铁板一块，否则那就是死水一潭。斗罗瑞卿大会，票未发给你们，那有什么，以后再说嘛！你们是被排斥的。事物总是一分为二的，他们参加了大会，你们就必然会被排斥。这种派别斗争，当然有争执，有时早晨的事情可能晚上就认为是错误的，有的事认识统一了，而另一件事可能又有分歧，但

这是人民内部矛盾。坏人是极少数，在我们解放军里和干部里，更是极少数。”

一位代表说：“参加斗争罗瑞卿大会的海政文工团‘毛泽东思想战斗队’是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急先锋，他们要把毛主席、林副主席、周总理肯定的左派李、王、张打倒，所以我们要同他们斗。”

杨成武说：“你们支持李、王、张，我们也支持李、王、张，我们比你们支持得更早。你们要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团结起来。不然就搞敌对了。”

周恩来：“你们的问题虽然是对立面，但是不外乎是人民内部的矛盾。内部也有派别。错了就改。你们对了，他们就不对；他们对了，你们就不对。在政治运动中，有派别不奇怪。有的正确，有的不正确，铁板一块今年不会有，明年不会有，一万年也不会有。我们党高级机关还有派别斗争，如果没有斗争，社会就停止了，就死亡了。”

“本来你们没有要求我接见，现在我来接见你们了。”

杨成武：“总理来接见，就是对你们最大的支持！比你们参加斗罗大会上主席台还好。”

大家欢呼：“毛主席革命路线胜利万岁！”“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周恩来：“在政治运动中，总是有派别斗争，总是分左中右。没有矛盾就没有发展。一件事不可能各方面都满意。不满意，怎么办？以后再说嘛！

上次斗争罗，你们的反对派上了主席台。你们就不高兴了，

这有什么？造反派能否经得起考验，要在实践中证明。不要到三座门去批准是不是造反派。”

杨成武：“总理从昨天到现在还没有休息。”

周恩来：“我 12 点钟还要去参加一个会。”

杨成武：“总理接见你们，是对你们的最大关怀，最大支持，这也不亚于比上主席台嘛！是不是比上主席台好？”

众答：“好！”

大家欢呼：“毛泽东思想万岁！”“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有人说：“他们颠倒是非，骂我们是保皇派。”

周恩来：“你是造反派，人家说你保皇派你就成了保皇派了吗？造反派不是别人封的。造反派主要是靠掌握毛泽东思想，主要靠自己，在斗争中经得起考验，很好锻炼。你们在三座门搞了一天半，我看你们的精神还是不坏的。”

有人向周恩来理谈海直机关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周恩来说：“我不可能了解你们的具体情况。不可能解答你们提出的具体问题，我只能讲些大道理。造反派要经得住考验，在革命实践中证实，主要靠你们自己。

昨天人家演出他们去打架干什么？人家演的，是为了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 25 周年。这是宣传毛泽东思想嘛，为什么要打？打是不对的，打是错误的。你不同意你可以不参加嘛！你为什么要打呀？不管什么派，只要是演这种戏，就得让他们演嘛！但是，你们要心平气和的同他们说服，不要同他们打架。他们不敢回大院去了，我说不要那样脆弱嘛！最后我

派人把他们送回去了，你们回去后不要和他们又搞起来。”

有人说：“他们到处造谣，制造舆论。”

周恩来：“他们造谣，你们要平心静气的和他们讲道理。”

杨成武：“毛主席的话一句顶一万句，要用毛主席的指示说服他们。”

当有人提到海直机关两派斗争的情况后，周恩来说：“你们3000 人，他们 100 来人，有一个对立面才好。有 100 多人的反对派，就能很好的锻炼自己。如果你们被他们分化了，就说明你们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举得不高；如果你们能比较好的掌握毛泽东思想，就能分化他们。”

有人说：“全军文革院校组一小撮人，支持他们反对李、王、张。”

杨成武：“你们相信不相信全军文革？”

有人答：“相信。”

杨成武：“院校组是全军文革的组成部分，这样你们不是不符合逻辑了吗？最早支持李、王、张的还是我们，而不是你们，开始海军方向搞错了嘛！”

周恩来：“你们受了点委屈，没有什么可气的。不要那么脆弱。你们现在真是幸福。你们是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干革命。我们过去在白色恐怖下闹革命。当然我们那时的水平没有你们现在这么高。你们不要那么脆弱。这正是打仗锻炼的好机会。要压制住自己的感情，不值得计较这些。

再过两天，我们文化大革命就是一周年了。现在是大批判，要通过大批判实现大联合。现在就看你们是否把矛头指向党内最

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联系本单位进行斗批改。

刚才，我接见那些打架的人，有些人就是不听你的。你们是机关干部，水平应该高一些。你们要好好学习毛主席著作，现在是红五月，好好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学习老三篇。文化大革命搞了一年了，应该前进，水平应该比去年更高些。打仗要有勇有谋，何况搞政治思想斗争呢？你们研究材料我不反对，掌握材料很重要。但是掌握材料也要符合毛泽东思想。不要片纸只字钻到字纸堆里去。你写一张纸的材料，我还可以看，写两张纸的材料，看的机会就少了，如果你写了很多，我根本无法看。你们要学毛主席写文章，你们当然达不到，但要从现在努力。”

杨成武：“像《为人民服务》就不长。”

周恩来：“你们在三座门没有白等。我支持你们。你们现在不要到三座门去了，马上回去休息，不然，我就陪你们去。”

大家答：“不去了！”

大家欢呼：“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周恩来在口号声中，离开北大厅，边走边向大家招手。

5 月 14 日，叶群带领空军、海军、二炮等单位的领导，到医院慰问三军“演出派”受伤人员，还代表林彪向他们赠送《毛主席语录》和毛主席像章。

同日，李曼村也根据周恩来的指示，派军委文革办王承化到医院慰问双方受伤人员。接着向周恩来写了报告，汇报了“513”事件的经过和慰问的情况。

当天，在海军直属机关群众大会上，被打伤的文工团员赵云卿进行了“控诉”，点了肖华的名。声讨肖华的大字报也立刻上

了街，有的直接贴到了天安门。总政内部也贴出肖华的大字报2000 多张，罗织罪名 500 多条。其声势按照当事人的说法，比打倒罗瑞卿的规模要大多了。

当林办秘书张云生把这则消息说给叶群听时，叶群说了“活该”两个字。此后，林彪的秘书张云生接到空军党办的电话：“请报告叶主任，我们根据她的命令把大字报贴到天安门去了，主任真高明，这些大字报贴出去以后，震动很大……”

接着，叶群对江青说，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对肖华意见很多，希望中央文革碰头会让他们 3 人谈一谈。

## 第 639 回：发《通告》，毛泽东看甘粤湘渝“八条”，周恩来召见北外

5 月 12 日，毛泽东在周恩来报送的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全军文革小组《关于甘肃问题的几点意见》上批示：“照办。”

《关于甘肃问题的几点意见》中说，“鉴于当前甘肃省成立‘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还不成熟，中央决定对甘肃省实行军事管制”。

但这时，甘肃的情况又出现了新的变化。5 月 13 日 12 时，兰州军区党委给中央军委和全军文革小组并中央文革小组发来，《关于请示表态支持甘肃“红色造反派联合第三司令部”（简称“红三司”）的报告》电报。报告说：

中央军委、全军文革并中央文革：

（转张达志、冼恒汉同志）

一、兰州地区文化大革命的形势：五月八日、九日，“红色长征团”、“工联”等真正的革命左派相继杀出“红联”后，当前已形成以“革联”保守派为一方，以“火车头”、“中南海”等革命群众组织为一方，以“工联”、“长征团”、“七·一”等革命左派组织为一方的三足鼎立的形势。我们认为，当前的形势仍是大好的形势。兰州文化大革命，由于以汪峰为首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破坏及“红联（指）”在二·五夺权后，没有掌握好斗争的大方向，把矛头指向革命群众，违背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虽然我们做了大量工作，但终因是属于两条路线斗争的

性质，难以成效。因而造成了“红联”的分裂，使兰州文化大革命出现了新的反复。在这种情况下，“工联”、“长征团”等革命左派组织杀出“红联”是两条路线斗争的必然结果，是革命的行动，是符合兰州文化大革命形势发展的规律的。

二、以“工联”、“长征团”、“七·一”、“兰铁红司”、“大专院校三司”、“省级机关遵义公社”、“市级机关三司”、“赴兰红卫兵联合战斗队”等为核心的革命组织，已组成“甘肃红色造反派联合第三司令部”。他们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高举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大旗，始终把斗争矛头指向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指向甘肃省以汪峰为首的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我们认为，他们的斗争大方向是完全正确的。

三，原甘肃省委代理第一书记胡继宗等革命领导干部已公开表态支持“红三司”，“红三司”决定结合他们。

四、“红三司”是甘肃无产阶级革命左派的联合，我们认为，应该以“红三司”为核心通过进一步对“火车头”、“中南海”、“红鹰”等革命群众组织及“革联”的广大革命群众进行工作，争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群众组织，实现革命的大联合，促进“三结合”，建立甘肃省革命委员会。

五、“红三司”定于五月十四日召开大会，发表宣言，革命领导干部讲话，举行盛大规模的游行。他们要求兰州军区表态支持。经军区党委讨论，一致认为应该明确表态支持。以上报告是否妥当，请速示。

兰州军区党委会

一九六七年五月十三日十二时

毛泽东对该电报批示：

林彪、恩来同志：

此件请阅。所见似有理由，请与张、冼、詹大南诸同志商处。胡继宗同志等既已站出来，所见与军区一致，积极支持三司，是否可不实行军管，而照军区意见，做一时期工作之后即可成立省革命委员会。以上请商酌。

毛泽东

五月十四日二时

5 月 14 日当天，周恩来看到毛泽东的批示后，给林彪写信说：

林彪同志：

本件已在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上传观过。张达志、冼恒汉、詹大南三同志已于十三日回兰州，拟与他们通电话后，如得他们同意，将甘肃军管会改为革委会筹备小组，吸收胡继宗同志参加。

本件另印发给碰头会各同志。

周恩来

五月十四日

5 月 14 日，毛泽东在周恩来 5 月 11 日送审的《北京市革命委员会重要通告》上批示："照办。"

《北京市革命委员会重要通告》的主要内容是：

一、必须坚决执行关于"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的指示。

二、坚决执行要文斗，不要武斗的指示。严禁打、砸、抢、抄、抓。煽动武斗的少数坏人和情节严重的打人凶手，应该受到无产阶级国家法律的制裁。人民解放军北京卫戍部队和军代表有

权处理武斗问题，有关方面必须听从，不得拒绝执行。

三、不准破坏国家财产，不准动用交通工具参加武斗，不准调动人员参加外单位的武斗。

四、不许破坏劳动纪律，不许无故旷工，坚决同一切扰乱革命和生产秩序的现象作斗争。

五、无产阶级专政机构应该按照毛主席的教导，坚决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派，担负起维护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革命秩序、保卫国家财产、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神圣职责。

六、坚决执行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四月二十日关于停止外出串连的通知。已经外出串连的北京学生和群众，除经中央特许的以外，应当立即全部返回北京，外地来京串连的学生和群众，同样也应立即全部返回本地。

北京市革委会在 5 月 14 日当天发出了这个《通告》。

5月9日在湖南省军区门前的绝食在中央文革的来电后终于结束了。5月11日晚，前往广州汇报的湖南省军区司令员龙书金从广州往长沙打回电话，传达了广州军区领导对湖南问题的指示，湖南省军区当即召集在家的党委委员和部门领导作了传达，12日上午进行了研究讨论后，向中央文革和广州军区上报了《关于贯彻广州军区首长指示给中央文革小组、全军文革小组、广州军区的报告》。报告中说：

“五月十一日晚，省军区司令员龙书金从广州来电话，传达了广州军区首长对湖南问题的指示，使我们清醒了头脑。”“本着有错必改的精神，认真作好对处理湘江风雷问题的善后工作，坚持高姿态，除了少数头头以外，宣布一律无罪，并立即印发公

告，广为宣传张贴。对于在押人犯，坚决按照广州军区党委4月25日指示，继续进行清理，该放的迅速释放。对于在打击湘江风雷之后被解散的其他群众组织，坚决予以平反，决不含糊。”

5 月 13 日，广东省军管会向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报告：《关于前段支左工作的教训和下一步的做法》。广东省军管会的报告说：

“最近常委对前段支左工作进行了检查，认为部队支左以来，虽然支持了一些真正的革命左派，取得了很大成绩，但也存在着许多严重的缺点和错误，受到一些革命小将一针见血的批评。对于所犯错误，觉悟迟，改进慢，有些领导干部思想不通，患得患失，不敢承担责任，修正错误。为此，常委研究了今后改进的办法。”

5 月 14 日，毛泽东以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全军文革的名义，亲自为转发湖南省军区和广东省军管会的报告写了批语：

各大军区，各省军区，各军分区，各人民武装部，各军各师各团，直属各军种、兵种：

（一）现将广州军区、湖南省军区报告两件发给你们，望参照执行。

（二）凡犯了错误的必须坚决改正。如不改正，越陷越深，到头来还得改正，威信损失就太大了。及早改正，威信只会比前更高。

（三）不要动动摇摇，游移不决。听信老婆孩子从保字号那里带来的错话，信以为真。

（四）要受得住工人、农民、学生、战士、干部的批评，加

以分析，好的接受，错的解释。解释不通，暂时搁下，将来再说。

（五）要坚决相信绝大多数群众是好的，坏人只是极少数，不过百分之一、二、三。这样一想，就什么都通了。

中共中央中央军委

中共中央文革小组

中央军委文革小组

一九六七年五月十四日

并批示："恩来、林彪、中央碰头会阅发。"

他在湖南省军区党委报告中"决定立即集训在基层支左的干部，机关干部与部队干部、战士，也相应集中五至七天时间"后面，加括号批注一句："时间太少，应有十至十四天。"

5月14日当天，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全军文革小组以中发［67］151号文件，批发了《广东省军管会关于前段支左工作的教训和下一步的做法》和《湖南省军区关于贯彻广州军区首长指示的情况报告》。

这天，"工联"派在长沙东风广场召开10万人大会，大批群众在省军区门前游行示威，一时间，湖南的"工联"派声势大增，湖南省军区及其支持的"高司"派逐渐转向被动。

5月1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保护文物图书的几点意见》。意见指出：对革命遗址和革命纪念建筑物，重要的有典型性的古建筑、石窟寺、石刻、雕塑壁画，古文化遗址、古墓葬，要加以保护；有毒的书籍不要随便烧掉，作为反面教材；把破四旧中查抄的文物图书收集起来，集中保管；各地博物馆、图书馆等处所藏文物图书都是国家财产，应当妥善

保存；各地应当尽快成立文物图书清理小组。

5 月 14 日，张国华、梁兴初、刘结挺、张西挺以四川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名义给中央上报《对处理重庆问题的意见》，共 8 条，主要是：

一、公开宣布撤销任白戈中共中央西南局书记处书记和中共重庆市委第一书记的职务，撤销任白戈兼任的重庆军分区第一政委的职务。

二、在肯定重庆警备区、重庆军分区和驻渝部队在支左工作中的成绩后，特别指出，“在二，三月份的支左工作中，由于没有完全顶住成都军区个别负责人的错误决定，还是出了一些差错。在处理持有不同意见的各革命组织的关系问题上，没有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慎重处理争端，而是错误地支持了一方，压制了另一方，加深了双方的对立情绪，支持了公安部门错捕革命群众，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

三、要求重庆部队，要做好各群众组织的政治思想工作，搞好他们之间的团结。

四、建议成立重庆市的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由当地驻军副政治委员蓝亦农、副军长白斌、重庆军分区司令员唐兴盛等负责组织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以蓝亦农为组长，白斌为副组长，吸收群众组织的主要负责人及其他适当的负责人参加。

五、被错误宣布成非法的组织或反动组织的革命群众组织要平反，对错捕的革命群众和革命群众组织的负责人要释放，并恢复名誉。

六、各革命组织都要整风；搞好“拥军爱民”工作；正确的

对待犯有错误的干部；实现大联合和“三结合”。

七、立即建立重庆市的工，农业生产领导班子，保证工、农业生产持续不断的发展。

八、不要对保守组织的群众打击报复。一切群众组织，都只准文斗，不准武斗，不准打，砸，抢，抄，抓。对煽动武斗的坏人，必须追究。

14日午后，54军参谋长耿志刚在北京西苑宾馆向重庆“革联派”代表就中央解决重庆问题的意图进行吹风，简单说就是：中央的意思，肯定重庆驻军而绕过“革联会”，以重庆驻军为核心重新组建革筹小组。

对于稳操胜算的重庆“815”代表，这一消息无异于噩耗惊雷。山城数月，两派群众诅咒发誓、闹得你死我活的，不就是围绕着“革联会”这个心肝宝贝吗？一个要“誓死保卫”而另一个要“坚决砸烂”。“815”巴心巴肝，喊了如此众多口号，写了如此众多文章、对口词、打油诗、甚至还有歌曲，什么“新山城嘿战鼓敲，一月革命卷风暴，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夺了权，滚滚长江拍手笑……‘革联会’就是好，革命红旗永不倒！”现在被中央一句话，“革联会”就像扔废纸团一样，轻轻松松扔一边了？！

耿志刚话犹未了，满屋已乱成捅开的马蜂窝，一片嗡嗡营营，好像要找谁而又不知道该找谁拼命似的。突然，大家开始发疯似地向楼下跑。耿志刚赶紧跑到楼口，大张双臂阻拦……其实，谁也不知道要干什么？要到哪儿去？只知道楼梯是唯一的通道，于是就死命往下挣脱。耿志刚个子不高，但壮硕结实，稳站如钟，确实将大家拦住了。但还是有几个人已先冲下楼去，正遇春风得

意的张西挺站在大楼门口等车。看见这帮凶汉涌来，她还不知为何？只见这些人冲上前去揪她。张西挺赶紧跳上汽车绝尘而去。

5月15日凌晨，周恩来召见5月13日冲入外交部的北京外国语学院“红旗大队”红卫兵代表，严厉批评他们为揪陈毅冲入外交部的行为。

周恩来说：“你们这件事是犯了一个大错误，冲到楼上，打伤了人，抢夺机密。不管你们有多少条理由，仅这一条就违反了中央的规定。”

“红旗”代表辩解说：“我们去外交部是为了揪陈毅，是为了见总理反映情况。”

周恩来：“揪陈毅到外交部去揪？那中南海你们也去冲吗？我在整个外事系统都讲过，外交部不能冲嘛！”

“红旗”代表说：“‘六·六’、‘造反团’的人就冲过。他们一冲，总理就接见”。

周恩来：“不是因为冲就接见，而是因为他们9个单位游行，在街上喊‘打倒陈毅！’我反对这种做法才接见的。你们不要拿‘六·六’的错误来抵消你们的错误。”

“红旗”代表说：“反正我们是下定了决心，要揪出陈毅。”

周恩来：“下定决心，走向了自己的反面嘛！反正我也把政策都交待了，你们不听，将来就要走到自己的反面。以为你们要打倒陈毅，陈毅同志就倒了？有这么简单？滑稽！如果你们执意要召开外事系统的批陈大会，我就要下命令让部队去外交部加强保卫，不管哪一派，谁冲就扣留谁。你们首先承认错误，不然就被动。从机要室抄走的机密材料、笔记本要追回。”

周恩来又说："拿我个人来说,你们对我搞全面材料也行，向我提抗议也行，刷大字报也行，我不怕打倒，干了几十年还怕这个？除非我自己摔跤，走向反面。"

5 月 16 日，周恩来命令解放军进驻外交部，加强门卫，以保证外交部工作秩序的正常进行。但是，陈毅实际也从此停止了对外交部的领导，而由周恩来直接管理外交部事务。

## 第 640 回：批肖华，中央文□见“三军”周恩来，亲解读□庆《五条》

5 月 16 日晚，中央文革开碰头会，让空军司令员吴法宪、海军司令员李作鹏、总后勤部部长邱会作参加。出席会议的有陈伯达、康生、江青、王力、关锋、戚本禹。周恩来和叶群均末到会。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在会上汇报了对肖华的意见。

听罢汇报，江青说：“支持你们批判肖华，肖华是一个绅士派头，中央文革要他来参加会，他不来。我们派关锋、戚本禹去接见演出的这一派，表示支持和慰问。”

当晚 24 时 30 分，叶群、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以及各军兵种负责人，陪同关锋、戚本禹二人来到西山八大处北京军区礼堂，接见军队参加演出这一派，代表中央文革对他们表示支持和慰问。从此，“演出派”，也称为“老三军”，被冠名为“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

据戚本禹后来回忆说：“中央文革开会讨论后，江青叫我去。说实话，我是不愿意去的，我在军队又没有职务。我想让关锋去讲话，关锋兼着总政治部副主任 。但是关锋比我有经验，他知道军队的事情不好弄。最后我还是拉着关锋一起去的，我让关锋讲话，可关锋硬推着我讲，我只好讲了。在我讲话的时候，关锋还老扯我的衣服来提醒我不要讲偏了。在去之前，叶群还不放心地跟我们说，‘冲派’的一些姑娘都很漂亮的，你们小心不要被她们拉过去啊。”“其实军队中两派的对立和地方上的两派对立的情况是很不一样的。他们的造反派，就是指反对黄吴李邱这些人

的。而保守派则是保这些人的。那些造反派，背后也是有人在支持他们的，也都是部队里面的政委或者副司令。”

5 月 20 日，在京西宾馆礼堂召开“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批判肖华大会”。此后，“老三军”派各文工团在京西宾馆批判肖华，批了一个星期。

5 月 16 日上午，重庆“革联会”和“815”在重庆街上贴出《中共中央关于重庆问题的意见》，共八条。

当晚子夜，也就是 5 月 17 日凌晨 1 时 30 分至 3 时 33 分，周恩来、康生、关锋、王力、杨成武及 54 军政委谢家祥、副军长白斌、副政委蓝亦农在人民大会堂西北厅再次召开解决重庆问题的会议。两派群众代表进场之前，中央领导已经先见过了 54 军领导谢家祥、白斌、蓝亦农、耿志刚和重庆军分区司令唐兴盛等人，代表们进场后，周恩来首先说：

“对不住，你们来了好久了，今天 5 月 16 日，你们记不记得是什么日子？今天是中央关于文化大革命通知发出一周年，大家都在庆祝。

四川的问题比较急。张国华、梁兴初、刘结挺、张西挺他们都先回成都去了。今天结束重庆问题。先听听‘815’观点的意见。请‘八一兵团’张益同志谈谈。

“八一兵团”张益发言后，江陵厂军工造反团“砸派”代表发言。他一说完，周恩来就说了：

“你们反‘革联会’的写来了 16 条意见，我们看了。你们写了不少材料，很多事情都弄清楚了，不要耽误久了。我来读一下《中央关于处理重庆问题的意见》，稍加解释。

中央同意四川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张国华、梁兴初、刘结挺、张西挺四同志回成都后写来的关于重庆问题的报告，中央同意他们的看法和意见，有五条意见，刚才毛主席亲自批准了。”

接着，周恩来逐条宣读解释《中央关于处理重庆问题的意见》。当他念完第一条，也就是四川省革筹小组给中央上报的《对处理重庆问题的意见》中的第一条后说：“我们看在座的两边组织一般都是革命组织，当然有的错误严重些，有的轻些。总还是革命组织，既然都是革命组织，斗争的主要矛头就应该对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促进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促进革命的三结合。你们都学了《红旗》的文章了。从全国来讲，斗争矛头应指向刘、邓。从四川来说，斗争矛头应指向李井泉及其一小撮同伙。从重庆来说，斗争矛头应指向任白戈及其一小撮同伙。这是大方向。斗争中要考验锻炼你们，要明确大方向。”

接着，周恩来宣读了第二条：“应当实事求是的估计和对待重庆警备司令部在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工作中的成绩和缺点错误。应该看到，他们在这些工作中，是有显著成绩的。他们支持的是革命群众组织。他们的缺点错误在于，在二、三月间，没有完全顶住成都军区个别负责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变成‘镇反运动’的方向、路线错误，在处理有不同意见的革命群众组织的关系问题上，错误的支持了一方，压制了另一方。支持了公安部门错捕了革命群众，把一批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他们已经开始认真地纠正自己的缺点错误。”

然后解释说：“驻川野战军曾参加抗美援朝，62 年参加中印边界反击战，是全国很好的野战军之一，是有红军传统的一支部

队。”“54 军一开始就支持了左派，但压制了另一派革命组织。这与成都军区性质不同，成都军区是方向性错误，支持了‘产业军’。……54 军却支持了左派，不是支持了保守派复辟，这是很不容易的。他们的主要错误是没有完全顶住成都军区个别领导人，把文化大革命搞成了镇反运动，重庆受了成都的影响。成都军区派公安厅长杨刚到重庆开片会，布置镇反，54 军没有完全顶住。捕人就捕多了。当然这不是多少问题，问题是不应捕不应该捕的人。文化大革命要搞四大，发动群众，对有过激行为的人，应帮助提高他，为什么要当成反革命？这是方向路线错误。这是成都军区犯的，重庆受了影响。重庆与成都要区分，重庆与成都不同。此外，在处理不同意见组织，重庆大学‘815’是参加了革联会的，交院‘915’、西师‘831’不赞成夺权，有不同意见，对‘革联会’有的赞成，有的不赞成，在当时军队应考虑，却支持了一方，而压制了另一方，支持了公安部门把部分群众打成反革命，犯了错误。

这种错误 54 军领导已开始认真的改正，毛主席看了他们的电报，重庆情况和成都不同。5 月 4 日，54 军电报提出：只要主席说我们支左支持错了，我们就立即改正。原来没有想到这点，没有想到支持了一方，而没有支持另一方。中央指出后，恍然大悟，正在认真地改。他们已经在宜宾问题之前开始改了，认真在改，坚决地改。成绩还是显著的，错误已指出了，应让解放军有改正的机会，错捕了就放。……解放军是具有伟大光荣传统的，最受群众信赖的，由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队伍，你们不要把矛头指向解放军。”

接着，周恩来念了第三条：“中央同意立即建立重庆市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由当地驻军副政治委员蓝亦农同志，副军长白斌同志、重庆市军分区司令员唐兴盛同志等负责组织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以蓝亦农同志为组长，白斌同志为副组长。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成员应当吸收有代表性的、持有不同意见的各主要革命群众组织的负责人及其他适当的负责人参加。中央同意重庆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迅速建立工、农业生产领导班子。”

他解释说：“在文件中避开‘革联会’，是不是和稀泥？不是的，如果涉及‘革联会’，争论就没有结果的。一月革命以来，夺权的大方向是正确的，可是必须要革命组织联合起来，才能夺得好。重庆大联合没有联合好，有一派同意，有一派反对。开始没有意识到‘三结合’，‘三结合’是后来才发展的。‘革联会’吸收几个人，也没有在群众中真正‘亮相’，所以有争论，条件还不成熟。但是，不能说这是资本主义复辟逆流，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摇身一变。尤其体现‘革联会’是野战军领导的。解放军是支持的革命造反派。夺权后有了权对另一派压制，形成对立，形成二、三月的紧张。说‘革联会’对了，但条件不成熟；说不对，那时又做什么？‘革联会’是军队领导的、支持的。解决安徽、江苏问题都是这样讲的，但是重庆不必这样作。江苏改为军管，安徽最后也军管，文件上没写。如果争论下去，就是吵架，如果再这样吵下去，三天三夜都吵不完。我们应向前看，在四川做出表率，就是由军队领导人出面组织临时筹备小组，向前进，促进其联合，把争论停止下来，再要争论就会不能前进，影响生产任务，广大劳动人民是不同意的。”

他接着说道："为什么没有提谢家祥同志？因为他不久要调动工作。筹备小组由蓝亦农同志任组长，白斌作副组长。吸收有代表性的组织主要负责人，不只一方。同时有其他适当干部。干部回去征求群众意见再定。同时，也要有适当负责人，我们了解多数人对辛易之有意见，我们是不能批的，回去商量，找适当的负责人参加。刘结挺、张西挺是被李井泉长期打击的，经过考验，我们把他们提到省的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重庆条件不成熟，我们没有提名。重庆筹备小组成立后，立即抓革命、促生产，把各组织的主要负责人组织起来。如象上海建立后就发紧急十条。"

随后，周恩来宣读了第四条："对被错误宣布为'非法组织'、'反动组织'、'右派组织'的革命群众组织要平反，对错捕的革命群众和革命组织的负责人要释放，并恢复名誉。各个革命组织都要进行整风，加强对毛主席著作的学习，加强政治思想工作，着重进行自我批评，整顿思想，整顿作风，整顿组织。双方的争论应通过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去正常地进行和解决，不准武斗，不准打、砸、抢、抄、抓。对煽动武斗的坏人，必须追究。"

周恩来进一步说道："凡被错打的要恢复名誉。对立现象要解除。受压制的一方，前次让他们先发言，先出出气。现在你们要反过来压他们，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会犯错误。"

他特别强调："夺权的一方要多负一些责任，重庆大学'815'的错误要大些，你们是当权派嘛！过去'815'压了'831'，不要反过来再压，那就永远没完了。这不是毛泽东思想的作风。另外的一方也要自我批评，错误只是小一些，只有通过大批判运动才会大联合，通过抓革命、促生产，促进大联合；通过整风，自

我批评，就可以眼睛向前，而不是向后，希望你们在大联合方面作个典型。”

周恩来还举了成都的例子：“川大‘826’和‘红卫兵成都部队’，去年见他们时是一致的，今年分歧很厉害，‘红卫兵成都部队’站在军区一边。我还个别找他们开过小会，5 月 6 日事件中，他们都在 132 厂前流了血，血都流在一起了，都是被‘产业军’打的，这可以在一起了吧，据说一回去吵得更厉害。

对你们，我们很担心，没和你们开过小会，所以再三叮咛，你们要做出模范。如重大‘815’，错误多些嘛，总有错误嘛。如李井泉关在你们学校，总给人有口实。这是过去的事，不深究了。李井泉已经接到北京来了。希望‘815’先做自我批评，另一方也要做自我批评，就好办了。至于不要武斗，重庆组织做出模范来。你们送给我的关于武斗情况的照片、材料都是指责对方的，我们看后心里不好过。14、15 日宜宾事件中，死了二、三十人，伤了几百，‘产业军’保守派向造反派进攻，后 54 军军队才隔开了。希望重庆山城不要出现。”

“不要搞打、砸、抢，要把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批透批臭，不仅要把威风打下，还要触及灵魂。当然，对煽动武斗的坏人要处理。”

接着，周恩来宣读了第五条，并解释说：“要热烈响应毛主席拥军爱民的伟大号召。要坚决执行中央军委的八条命令和十条命令。要坚决执行中共中央关于处理四川问题的决定。要牢记毛主席提出的三个相信和三个依靠，坚定不移地相信和依靠群众，相信和依靠人民解放军，相信和依靠干部的大多数。在毛泽东思

想伟大红旗下，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指引下，进一步加强军民团结，加强各个革命群众组织之间的团结，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实现革命的“三结合”，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完成斗，批，改的伟大任务，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江青同志在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成立和庆祝大会上，阐明了道理，《八条》讲的是拥军，《十条》讲的是爱民，结合在一起就全面了。”

周恩来最后说：“这个文件的日期是 1967 年 5 月 16 日。我们一直等到毛主席看了，才来向你们宣读和解释。”

一个“砸派”代表说：“重庆接到一个中央八条，现在还在游行。”

周恩来：“这是谣言，批件我刚拿到，还没印呢。”

遂后，康生讲话。他说：“完全拥护中央关于解决重庆问题的意见。同志们知道这个意见是经伟大领袖毛主席批准的，和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批准的。文件完全体现了毛泽东思想，体现了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我完全同意周总理的解释，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周恩来、康生讲完话，54 军的代表、重庆大学“815”的周家喻、“工人造反军”黄廉都表示坚决拥护中央的意见。周家喻还说：“要很快返回重庆，按照毛主席的教导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去进行工作，对不利于大联合的话不说，不利于大联合的事不做。前一段出现些缺点错误，愿意听取其他革命组织的意见，诚恳接受批评。”

康生："我有个问题问周家喻同志，你用毛主席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的话很好。'产业军'你敢去做工作吗？"

周家喻答："敢！"

康生："要靠说服，教育，分化。对保守派要有策略，艰苦耐心的工作。主席这段话在去年 8 月 31 日提出，今年 3 月 7 日又提出，到现在有些学生还不懂得，说解放军和稀泥。你讲得很好，要实践。你去做'产业军'工作，开始还有可能挨打，还会有人说你右倾呢！好多话都讲了。这种革命劲好，但却没有很好的理解'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今后要看你们的实践。"

周家喻表示："今后一定做到。"

康生："不要怕人说右倾。"

周恩来："我问周家喻同志第二个问题，你说愿意接受其他革命组织的批评，自我批评不容易，听取不同意见更不容易。你面对着'831'、'915'给你提意见，你有没有勇气听？"

周家喻答："有！"

周恩来："希望你带头做模范。不要一听就说'扯谎'，'造谣'。以后要有这样精神。今后，你们只要有这样的精神，重庆文化大革命问题就解决了一大半。"

康生对反"革联会"的"砸派"代表说："总理讲的不光是对重大'815'，对你们也适合。"

周恩来："我对重庆是很有感情的，在那里同反动派斗争了七、八年。过去重庆是雾重庆，现在重庆是光明的重庆，一字不

改地传回去，希望你们快快回去，杀回老家，就地闹革命！”

重庆大学“815”的吴庆举反映：“总理，今天发生了一件严重违背《十六条》的事件，今天下午首都红代会在火车站抢去了我们八箱揭发批判李井泉的材料，每集四册，共一万五千册，还有罗广斌的材料。这些材料被他们污蔑为‘黑材料’。请看，这是他们抢走材料的声明。”

周恩来：“红代会抢去的材料，由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主任谢副总理解决。”并将材料交个杨成武。

杨成武问吴庆举：“材料现在什么地方，你们有什么要求？”

吴庆举：“坚决要求追回，红代会抢我们的材料已不止一次了。”

最后，周恩来指挥大家唱《大海航行靠舵手》，大会在歌声中结束。

## 第 641 回：石头□，宜宾爆发大武斗　逐出城，两派矛盾□平息

就在周恩来等中央首长在大会堂接见重庆两派代表期间，人民大会堂门口，重庆两派都有人在那里焦急地等待，因为这是决定双方政治生命的最最关键的一步，结论会怎么样呢？站在这儿的造反派应该说都是重庆最自命不凡的人，而此刻，他们却成了最不自信的人。站在夜幕里沉默不语的大会堂巨型圆柱之下，就像惶恐的囚徒惴惴不安地等待终审判决。他们最终都无法忍受这种漫长等待的折磨，回驻地去了。

5 月 17 日上午，重庆“砸派”在大街上贴出另一版本的《中共中央关于重庆问题的意见》，共五条，只字未提“革联会”。经证实，这个版本是正式的，是真的。全重庆沸腾了！

周恩来在接见重庆代表，宣读中央解决重庆问题的五条决定时，提到的宜宾事件，是指 5 月 13 日宜宾发生的武斗。

由于四川“二月镇反”的缘故，宜宾的工人、农民、干部和学生们自发群众组织，基本都被镇压下去了，只有“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的部分学生还在继续活动。当谢英富他们从北京回到宜宾时，这里的文化大革命已经冷冷清清。尽管在党中央的干预下，被抓的群众陆续被放了出来，但都有点灰溜溜的样子，互相见面只有垂头丧气的叹息。唯有“主义兵”的学生，还二三人一伙，四五人一群的在大街小巷张贴大字报。而受宜宾军分区支持的“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则封盖撕毁“主义兵”的大字报，相互之间抓扯、推撞的事情时有发生。“主义兵”人少势单，只好不断

向北京发去告急电，以求支持。

谢英富回到宜宾，首先恢复“红旗派”“八八团”的基层组织。随着“八八团”的恢复，他们与“红色派”的工人组织“红工联”、“桥工联”的矛盾加剧。到了5月13日，“红旗派”有一、二百人到市中心“大观楼”旁聚会游行，因其中多数人是搞搬运的抬工，故临时取名为“抬工队”。他们集合好后，整队向西门进发，所经之处又有许多人加入其中。

当队伍行进到西门外铁路大桥下时，桥上“红色派”的“桥工联”有人朝游行队伍投扔道渣、鹅卵石。游行队伍中也有人喊：“‘桥工联’，算老几，抬工伯伯不怕你！”

当游行队伍行进到翠屏山底下时，又有人领头喊：“南瓜白菜算老几，抬工伯伯不怕你！”

“南瓜白菜”是宜宾“红旗派”给省建筑第四公司“红色派”组织“南征北战战斗队”起的外号。

当游行队伍刚过翠屏山转入人民路时，从杂技团和团结旅馆的楼上，大量的砖头、石块便雨点般的向游行队伍打来，队伍顿时大乱。与此同时，从杂技团和团结旅馆又冲出几百人，头带藤帽，手持木棒、钢钎冲向游行队伍。原来，修铁路的大桥队和省建四公司的“南征北战”就驻扎在“杂技团”，城区的“红色派”则集中在团结旅馆楼上。游行群众慌不择路，很快就从西门退下来，纷纷跑向军分区躲避。

刚刚到达宜宾的北京工业大学“东方红”的红卫兵看到如此大规模的武斗发生，赶紧跑到军分区要求解放军出面制止武斗，被门岗拦住不让进去。12 时左右，他们又整队来到军分区门前，

再次要求接见。但是军分区领导始终没有出来。

人群并没有散去，而是集中在军分区门口，声援北京学生，要求军分区领导接见。

下午 16 时 50 分左右，“红色派”的“桥工联”、“红工联”、“32111 野战兵团”上千人从翠屏山上冲下来，直冲到军分区门前，聚集在这里的游行群众边打边跑。北工大“东方红”的学生将队伍分成两组：一组站在军分区门前，一组举着“红代会北工大东方红”的大旗横在马路上，拦截和组织被打散的游行群众。

就在这个时候，一个人被打倒在武斗队伍前边，正举着“红代会北工大东方红”大旗的北工大学生张玄杰见状，立即把手中的大旗交给旁边的同学，冲向“红色派”的队伍，还有 3 名同学也跟了上去。双方一阵相争，都认为自己有理，话不投机，没说几句，对方一棍打在张玄杰的头上，接着又是几棍，张玄杰应声倒地。

在军分区门前，北工大的学生王俊英也被打倒在血泊中。

同学们赶紧将张玄杰、王俊英分别送往第一、第二医院，终因伤势过重抢救无效，死了。

这时，宜宾城西的麻线街、童子街、三倒拐；城北的北毫巷、鲁家圆；城东北的崇报寺、咸熙街等地，都成了双方武斗反复争夺的“战场”。这种冷兵器的武斗持续了一周左右。

学生们操起了孩童玩耍时用的弹弓朝屋顶发射，大人们从中得到启发，“红旗派”便用大的橡皮条将两端固定，中间夹上大鹅卵石来发射“炮弹”。“红色派”招架不住。

“红色派”将履带式推土机焊上钢板作护甲，做成“土坦

克”，抵挡“红旗牌”大弹弓的攻击，从西、北两个方面向“红旗派”冲杀过来，“红旗派”抵挡不住，被压到了宜宾城南边的一隅，几乎就被“红色派”赶下长江喂鱼。好在当时邮电局还在“红旗派”的“826”手中，他们的告急电报和电话源源不停地发往北京，发给党中央。

还在北京解决四川问题的刘结挺、张西挺对宜宾支持他们的“红旗派”在宜宾的处境也十分着急，郭林川、王茂聚亲自到北京电报大楼给党中央、周恩来发电报求援。

在党中央的干预下，驻重庆的 54 军紧急派 7791 部队赶赴宜宾支左，暂时制止住了武斗。

但部队只是在当时武斗激烈的城南一隅将双方暂时隔离开，而局部性的武斗仍然不断地在西、北、东三个方面进行。最为激烈的一次是东北方的崇报寺、咸熙街一带，数百名头带藤帽、手持钢钎的人，想冲到“红旗派”占据的南方来打杀。“红旗派”将冲在最前面的近 200 名由金坪、象鼻农村调来的农民大军全部俘虏。

5 月 20 日中午，一架从成都方向飞来的直升飞机隆隆盘旋在宜宾城市上空，雪花般飘落下红红绿绿的传单《中共中央关于处理四川问题的决定》，“红色派”的“毛泽东思想宜宾红色造反总指挥部”见大势已去，主动撤离市区，退缩到城北郊的翠屏山上。最终这场武斗以“红旗派”占了绝对上风而告终。

就在宜宾发生“513”大武斗的当天晚上，宜宾还发生了中央文革记者站记者在宜宾失踪的事情。

自从中央文革记者站的王记者从宜宾回北京汇报工作后，显

然已不能再回宜宾了，暂时留在北京，参加中央解决四川问题的有关会议。但宜宾只留杨记者一人也不行，便决定由成都记者组增派以《红旗》杂志记者名义采访的赵记者前往。谁料，赵记者出发后的第二天，北京却接到了他在赴宜宾途中的火车上失踪的消息。

赵记者是 5 月 12 日从成都赶赴宜宾的，本该是下午 16 时多到达宜宾，刚好那天宜宾两派发生了武斗，秩序混乱。赵记者乘坐的火车在途中一误再误，迟至晚上 20 时多才到。原驻宜宾的杨记者，第一次到火车站没有接到。第二次赶到火车站时，火车已经到达十几分钟，旅客正蜂拥走出火车站。杨记者在车站出口处等候，眼看旅客逐渐少了，直到最后一个走出，仍不见赵记者的踪影。

杨记者又多等了一会儿，还是不见赵记者的踪影。他着急了，立即返回宜宾军分区招待所住地，挂通长途电话向成都记者组询问，对方很明确地告诉他，赵记者乘坐的就是这趟火车。

杨记者从当天深夜等到第二天凌晨，仍然不见赵记者的踪影。他立即请成都记者组电话转告北京，报告赵记者在火车途中失踪的消息。当天，中央文革以办事组的名义，电话告之成都军区，请他们迅速指示宜宾军分区，马上派人找回赵记者，要求确保记者的人身安全。

根据当时宜宾地区的形势，宜宾军分区和杨记者分析，赵记者很可能在火车途中，被“红色派”挟持转移，因为他们急于想向记者倾诉意见，反映情况。为了以防意外，宜宾军分区迅速派出人员分赴两大派组织询问、寻找。

果然不出所料，赵记者刚到宜宾，在站台上就被“红色派”群众组织强行“请”走了。

原来，赵记者在乘火车赴宜宾途中，由于记者职业的习惯，显露出耐心倾听旅客的议论的神态，还不时询问一些问题，无意中透露出他是一名赴宜宾采访的记者。宜宾反对派群众组织，得知赵记者的情况后，便迅速做出决定：要将“总理派来的记者先请到我们这一边来，听听我们的‘呼声’，同时也向记者显示一下我们的‘势力’”。

那天，赵记者刚从车厢的踏板上走下来，就有人很礼貌地走上前来对他说：“同志，你是不是总理派来了解情况的记者？”

赵记者吃惊地回答：“我是《红旗》杂志的记者，到宜宾来采访的。”

听到这话，迎上来的人高兴了。他一招手，左右立刻拥上来几个人，抢过赵记者的提包，拉着他的手臂，拥着往前走。那位接他的人说：“请不要误会，我们是宜宾‘红色派’的，正想向记者反映我们的意见，请记者先到我们那里去一趟。”

赵记者一时摸不清底细，着急地解释：“我在成都出发时，已电话告诉宜宾军分区，有人到车站来接我，是否等我住下后再与你们约时间交谈？”

“不用担心，我们决不会伤害总理派来的记者，只是想向你反映一下我们的要求。”

他们不容赵记者再解释，架着他，走出车站，拥上了一辆面包车。

这时，夜幕已经降临。面包车却未驶向市区，而是经过市区，

拐向了市郊蜿蜒盘旋的登山道。赵记者忐忑不安地问道："这是什么地方？你们要把我拉到哪里去？"

对方语气和蔼地回答："这是翠屏山。我们的总部翻过山就到了。"

汽车约摸行驶了半个多小时，到达一个尚未完工的水库工地邻近的好像是一家工厂的地方，车停在一幢楼房前。车上的人对赵记者说："到了，到了，这里是我们控制的地区，你尽管放心，绝对保证安全。"

赵记者被带到二楼会议室。刚一坐下，就有人端来了洗脸水，沏上热气腾腾的香茶。赵记者松了一口气，他想，对方没有加害自己的意思，虽然他们的做法不妥当，但也仅仅是为了"反映意见"，于是，便温和地对他们说："既然已经到了这里，是不是我们马上就开始谈，谈完以后，还请你们将我送到宜宾军分区。"

室内围坐着几个人，为首的一个说："请你不要误会，也不要着急，我们出于无奈才采取这种办法。我们是所谓的'反红十条派'，对中央为刘、张、王、郭平反实在想不通。听说总理派来了记者，我们信得过，就想秘密地把你请到这里来谈一谈。"

听到此话，赵记者说："好。我们记者有义务和责任倾听各方面反映的意见。"

接着，在座的人，你一言我一语地向记者诉说刘、张、王、郭在宜宾地区名为反复辟，实为搞复辟的"罪行"。他们说："我们的意见，有的曾向原在宜宾采访的记者反映过，不知什么原因，中央信刘、张、王、郭的一面之词，做出了为他们平反的决定！"

听完他们的意见，赵记者对他们说："作为记者，倾听你们

的意见责无旁贷，但从目前情况看，我不得不向你们进一言，你们还应考虑中央做出决定的严肃性，有意见可以通过各种渠道反映。但反映的方式也应有所讲究，注意策略和分寸……”

他们交谈至深夜，赵记者只好留宿在这里。直到第二天下午，宜宾军分区的才闻讯找到他，将他接回军分区，结束了这场“失踪”虚惊。

而《红十条》颁布，也使宜宾“红色派”在北京的数百名上访人员惊慌失措。5 月 11 日上午，他们在北京天坛公园聚集了近百人，商讨怎样与“刘、张”斗争。到场人员中，有人透露说：“刘、张”的材料是被王力扣下了，没有送到毛主席、周总理那里。中央先后召开的几次解决四川问题的会议代表，都是王力指定的支持“刘、张”的人员参加的，中央没有听到广大群众的呼声。最后，他们在天坛公园形成了统一意见：向中央文革接待站提出以下要求：

第一，请求党中央召集宜宾上访群众代表开会，听取意见；

第二，要求党中央派人到宜宾调查“刘、张”等人的问题；

第三，要求“接待站”安排宜宾几百上访人员的食宿问题。

中央文革接待站在收到“红色派”提出这三条要求的当天，就有人答复：立即解决上访人员的食宿问题。并对上访代表说：有问题可以继续向党中央反映。

5 月 13 日，宜宾“红色派”在北京延安旅馆成立“宜宾红色总指挥部在京人员领导小组”，简称“领导组”，并安排刘结挺在宜宾时的警卫员胡绍钦首先控诉遭受“刘、张”迫害的情况。

这时，“领导组”又得到一个令他们十分兴奋的消息：在中央

政法干校学习的三个河南省公安干部看到了揭露“刘、张”的传单后说，张西挺原来叫简玉霞，是个叛徒。1946 年在淮滨县被捕后，同警察局的头子乱搞，被“资遣”出来后，改名张西挺。“领导组”决定：立即派一名同志回宜宾汇报这一重大发现，同时了解刘结挺 1931 年脱党的情况；派 3 名人员前往河南淮滨县调查，来往路费由大家资助。不久，在河南省公安厅的支持下，他们说查到淮滨县三个简玉霞中的其中一个就是张西挺，并且被捕叛变。

进入 6 月，宜宾不少人知道了中央解决四川问题的情况，纷纷退出“红色派”组织，宜宾的武斗趋于缓和。只有部分“红色派”撤退占踞在翠屏山、真武山上，并在翠屏山顶架设大功率的高音喇叭，在夜深人静之时广播，攻击刘结挺、张西挺等人及“红旗派”，说中央解决四川问题的《十条》是假的，宜宾武斗是“红旗派”挑起的等等。其音量之大，可以覆盖整个市区。

“红旗派”也不示弱，将一部货车改装成宣传车，开到当时两派停止武斗时的分界线——鲁家园与人民路交界处，广播“中央解决四川问题工作会议”的《十条》和为刘结挺、张西挺、王茂聚、郭川林、李良等干部平反的中共中央“平反通知”。又在东街宜宾县百货公司二楼上建了个固定广播站，从晚上19时到22时播音。

一天夜里，“红旗派”一些群众趁夜色将“红色派”在翠屏山顶的广播站捣毁，宜宾造纸厂的“红色派”用厂里的轮船从水路连夜将据守翠屏山的“红色派”接过江。从此，“红色派”退到江北一线。城区内全部成为“红旗派”的天下。这时，原宜宾

的驻军部队也公开表态，支持“红旗派”，支持刘结挺、张西挺回四川闹革命。

## 第 642 回：两边哄，五十四军做工作　武斗中，殉□者出现山城

我们再来看此时的重庆。5月17日那天上午，留在重庆大学主持工作的“815”负责人黄顺义，和同僚们一起异常紧张地守候在电话录音机旁，瞪大眼睛看着总团的女值班员将北京来电逐字逐句记录在纸上。四周如此安静，只有磁带机嘶嘶旋转。当最后一句话记录完毕，中央文件终究没有出现任何关于“革联会”的字样，留守重庆的“815”勤务员们顿时傻了眼：“啷楷会是恁楷（这样）呢？！”

由于他们对领袖毛泽东、对共产党、对共产主义理想的崇拜，几个月来，已经那么根深蒂固地物化成了对“革联会”的崇拜。对“革联会”的否定，不管是什么形式的否定，对他们来说，都无疑于整个世界的颠覆。天崩地裂，大家不知所措了。马上召开总团会议传达辩论。毫无疑问，会上是吵得一团糟！

接着在阶梯教室召开小组长会辩论----结果同样是一团糟！

干脆，下午在风雨球场召开全团大会辩论，情况更严重了。动力系四年级学生杨宪腾第一个跳上台，他的发言劈头盖脑第一句就是：“给老子啷个搞拾起的！”

接着柴天琪发言。他是学校专业辩论组的组长，其演说无疑更具煽动性。

“革联会”是“815”的圣殿，圣殿倒了，大崩溃似的惶乱势不可免。大家认为100多人到北京工作，做了这么久的工作，结果弄得中央还不了解真实情况：告状团的人首先就该打屁股。

至于中央呢？一贯英明伟大的党中央为什么也糊涂如此？无线电系学生怒而在六宿舍前写出标语：

“处理重庆问题的五条意见是资本主义复辟的进军号！”

最后，留下唯一的、天真烂漫的悬念就是：“这五条毛主席看没有看？林副主席看没有看？”

重大“815”在当天发表了一个《对当前时局的严正声明》，继续自以为是地宣布“重大815战斗团始终掌握了斗争的大方向。”继续毫无意义地为已不复存在的“革联会”招魂，同样自以为是地宣称“革联会”“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产物，是‘一月革命’的伟大成果，是山城数百万革命造反派同志浴血奋战的结晶。”

《声明》发誓要“坚决支持‘革联会’，誓死捍卫一月革命的伟大成果。一月革命万岁！革联会的革命精神万岁！”

《声明》还怒气冲冲地警告：“山城砸派从二月黑风以来，就一直犯了方向路线错误。你们必须改弦更张，悬崖勒马……否则，坚持下去，就必然会走向自己的反面，矛盾就会转化。”最后，他们高呼“革联会必胜！砸派必败！”

陡然降临的绝望使“815”丧失了起码的政治理性，洋洋洒洒数千字，通篇竟然没有半个字提到关于中央《五条》和拥护《五条》的字样。这个《严正声明》刊登在5月19日出版的《815战报》第二十一期。

与此相反，5 月 17 日成了重庆“砸派”的节日。他们同样没有搞清楚怎么回事，反正“伪革联”没有了，他们就算大获全胜，于是喜洋洋在市内举行拥护《中央五条》和“欢呼革联会寿

终正寝”的盛大集会游行，一边“热烈欢呼伪革联寿终正寝！”一边高喊：“抛出八条是对抗中央的严重反革命事件！”“揪出炮制伪八条的反革命分子！”满街都是他们欢呼《五条》的标语，满街都是庆祝“伪革联寿终正寝”的口号，文化宫的大门前扎起了两座纸做的“伪革联之墓”，倒吊着纸扎的象征“革联会”的“癞格宝”，不少顽童还用竹竿吊着真正的癞蛤蟆满街欢跑。

“砸派”的欢呼极大刺激了“815”脆弱的神经，“815”激动了，愤怒了！5 月 17 日晚上，“815”在风雨球场开会完全集中攻击、批判《五条》。有人甚至喊出：“林彪是奸臣！”“江青是慈禧！”

晚上，重庆“革联会”召开会议，讨论次日举行欢呼《红五条》游行事宜，到会的“815”派负责人普遍对《红五条》表示不满，最后决定将次日游行改为“拥护解放军，支持革联会，誓死捍卫一月革命伟大成果”游行。

“815”好像国破家亡，要救亡了！5 月 18 日，全市“815”举行的大规模“誓死保卫革联会”示威，气氛极其悲壮，严峻。走在队伍最前边的是重庆大学一群体工队员，人高马大，个个手握军用皮带，杀气腾腾地簇拥着一块“革联会”金字招牌，上面还扎着红绸，接下来是巨幅标语：

“誓死捍卫革联会！”

“谁要砸我革联会，先交遗书和脑袋！”

“强烈要求张国华、梁兴初到重庆答疑！”

整个游行队伍中仍无一条关于拥护中央《五条》的标语，反之，“革联精神万岁”之声震天动地：对中央的不满分明写在每

一张杀气腾腾的脸上。

重庆大学校内也出现大量对中央表示抗议的标语、大字报。

一贯以大方向正确自居的“815”气还没出完，神还没有缓过，“砸派”的大标语已经铺天盖地而来：

“重大815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罪该万死！”

“坚决揪出重大815炮打中央的一小撮反革命分子！”

……

5 月 20 日上午，已经回到重庆的 54 军副政委蓝亦农、副军长白斌、韩怀志、参谋长耿志刚一行人等，火速赶往重庆大学风雨操场，向正举行辩论大会的“815 战斗团”全体成员发表讲话。

上任伊始的革筹组长蓝亦农在讲话中首先对中央文件经“毛主席批了的、林副主席看了的”这个真实性作了确认。他说：“815总团的同志……要我们打包票，我们所有的军的负责同志，参加了（会议）的，一致打包票。”

他郑重其事的说：“五条是真的。”

接着，他又像幼儿园阿姨那样给大家讲了一个津津有味的故事，说54军参加1962年的中印之战，大胜对方，缴获枪械无数，他们在5000多米的喜马拉雅山上把敌人散落的武器收起来，擦好——上级却通知他们把这些战利品全数交还对方。“指挥部的同志有的哭，有的气……当时想不通，我是作政治工作的，很发愁。这时马上来了一个电报，说这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作政治工作的就很高兴了，就把这句话传下去，全体指战员没说二话。大家议论这是为什么？说不出道理，只晓得毛主席说的就是对的。”

这个故事顿时赢得满堂彩。他还在演讲中明确宣布：“（军

队）过去坚决支持你们，今后坚决支持你们、相信你们！”

全场高呼：“向解放军学习！向解放军致敬！”

他接着说：今后“如果不依靠你们，不相信你们，（我）就是光杆司令”。对已经笑逐颜开的大学生，他又面授机宜，说：“看问题要看得远，看一千里，‘革联会’是临时的，是一月革命的产物，不是资本主义复辟，五条字面上没有‘革联会’，实质上有，因为肯定了54军的支左，而54军支左就是支持的‘革联会’。市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的成立，是‘革联会’向前了，更上一层楼。”

接下来，白斌副军长的演说更从感情上对学生们进行了煽动。他说三中“抗大兵团”给54军军部打来电话，“他们一面打电话一面哭，心情很沉痛，说希望我们给重大‘815’作一些工作。重大‘815’是重庆‘815’的旗手，这个红旗不能倒。说我们三中‘抗大兵团’看着他们。我们思想上也想不通，但《五条》是毛主席、林副主席批准的，我们就要坚决照办。“

全场高呼：“向三中‘抗大兵团’小将学习！”“毛主席万岁！”

白斌副军长接着说：“……这是中学生将了大学生的军，这个军将得好！三娘教子，子教三娘，为什么中学生不能教育大学生呢？完全可以。”

全场高呼：“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打倒李井泉，解放大西南！”

蓝亦农他们还在重庆大学风雨操场万人群众大会上宣布参加“815战斗团”，他们当场戴上“815”胸卡。白斌说：“能作

为一个‘815’战士，我感到很光荣。”并明确宣布，他们是来“向同学们学习，趁这个机会给同志们作个汇报”的。

军人的态度如此真诚谦恭，学生们还有什么好说呢？于是不断高呼“毛主席万岁！”高呼“重大‘815’永远忠于毛主席！”高呼“向解放军学习！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万岁！”

经过 54 军领导苦心说服，“815”派认识到“方糖甜，圆糖甜，‘砸派’有个铲铲权!”“铲铲”为四川俚语，空空如也之意。

就在这一天，重大“815”发表了“再次严正声明”。除了继续重申“重大 815 战斗团始终掌握了斗争的大方向。”“革联会”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产物，是‘一月革命’的伟大成果，是山城数百万革命造反派同志浴血奋战的结晶。”除了抽象地继续表示要誓死捍卫一月革命的伟大成果，继续高呼一月革命万岁、革联会的革命精神万岁之外，已经不再具体地要誓死捍卫什么，这些条文的位置也在声明中往后挪了。第一条是：对中央五条“最最坚决拥护”“最最坚决执行”；第二条是坚决拥护由蓝、白、唐等人组成的市革筹组的正确领导。

5月20日下午，54军政委谢家祥在军通信营饭堂向“815公安总部”1000余人传达北京会议精神。蓝亦农、白斌、唐兴盛等在军部礼堂向“砸派”1000余骨干传达北京会议精神，检讨二、三月所犯错误。

第二天，重庆“815”大标语转调：“革联会开新宇，革筹组更上一层楼!”“拥护红五条，捍卫革联会!” 5月21日，“815” 在大田湾召开大会，会议主题是：“坚决拥护中央五条”、“革筹组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产物，是山城八一五派英勇奋斗的胜利。

革联会好，革筹小组更好。”白斌到会讲话。大会通过给毛泽东的致敬电。

5 月 21 日这天，“砸派”在解放碑、沙坪坝区、市中区体育馆、重庆医学院等地举行声讨“815”派“反对《红五条》”、“炮打中央”的“现行反革命罪行”大会。

下午，54 军领导分别接见重大“815”和西师“831”两派负责人。

凡是因砸烂“革联会”而遭镇压的群众组织又起来了。3 月底被“革联会”勒令解散的“军工造反兵团”也取得了合法地位，于 5 月 21 日在重庆医学院宣告恢复组织，改名“军工井冈山兵团”，主要负责人有江陵机器厂助理技术员、共青团员李木森，望江机器厂工人、共青团员邓长春，建设机床厂工人周应古，长安机器厂女工人李桂芝，长江电工厂助理技术员刘锡邦等人。

5 月 22 日，蓝亦农、白斌分别接见“工人造反军总部”黄廉和“红卫兵反到底司令部”代表。

这天，首都大、中学红代会赴渝战斗兵团 100 多人到重庆警备司令部递交《公函》，要求严惩“炮打中央的现行反革命”，其实就是针对重庆大学“815”5 月 16 日、17 日两天的表现。重庆警备司令部当然未予理睬，外地学生静坐示威至 23 日凌晨 1 时。

大坪一带，除袁家岗机械学校“815”占优势外，其他石油学校与虎头岩下化龙桥的工业学校都是“砸派”势力强大。5 月 23 日，机械学校“815”的人手持钢钎、铁棍、匕首冲进石油学校与这里的“砸派”发生武斗，“砸”派河运学校“航锋”赶来增援。到了 5 月 24 日凌晨，“815”派石油学校“大庆公社”邹茂

林在武斗中身中钢钎而亡，19 岁，成为重庆文革第一个殉难者。重庆的武斗也从拳脚上升到了动用冷兵器的阶段。

5 月 26 日，机械学校“815”搬来重大“815”，用钢钎、铁棒、匕首再次打进石油学校。“砸”派撤出石油学校，退到医学院。

5 月 26 日，驻重庆的 54 军致电成都军区并报中央文革小组、全军文革小组。电报说：“近几天，军的领导同志全力以赴，在重庆先后十多次约见了工人组织、学生组织和解放军后勤工程学院‘红总’等组织的负责人交谈，听取他们的批评和意见。此外，通过接待来访，对反对派的一般群众进行了工作，并同有的组织搞了军民联欢。通过这些工作和活动，消除了一些误解，对立情绪有所缓和，思想感情较前有所接近。反对派表示拥护中央处理重庆问题的‘五条’，愿意接受市革委会筹备小组的领导，原则上同意实现两派联合。但要真正实现两派联合，还需要进行大量艰苦细致的政治思想工作。”

5 月 27 日，毛泽东将 54 军这份电报批发给各军区、各军、各兵种，并以中央军委名义起草批示：

各军区、各军、各军种兵种：

五十四军在重庆的工作做得不错，可供你们参考。凡属两派革命群众组织互相对立很严重的，只要进行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问题总是可以解决的。对于有群众的保守组织，甚至反动组织，也要细致地进行思想政治工作。

中央军委

五月二十七日

并批示：林彪、恩来同志阅发。

“815”派将这一批示作为“最新最高指示”大加宣传，以此打击认为54军“拉一派打一派”的“砸派”。

5月28日，针对815“谁要砸我革联会，先交遗书和脑袋！”的标语，砸派“91纵队”在解放碑贴出慷慨激昂的《遗书》，表示“坚决砸烂革联会，誓与革联会血战到底！”

5月29日，“砸”派在市体育场召开“彻底粉碎炮打中央的反革命逆流”大会，会上高呼：“重大815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罪该万死！”“坚决揪出重大815炮打中央的一小撮反革命分子！”“谁反对红五条，就砸烂谁的狗头！”“重大815不投降，就叫它灭亡！”等口号。市革筹组白斌、唐兴盛到会作了呼吁团结的讲话。

5月30日下午，重大“815”在风雨球场召开全团辩论会。这时，4名重大“815”学生哭丧着脸来到会场。

原来，“815”攻打石油学校后，重庆医学院“815”派的“915战斗团”被“砸派”赶了出来，医学院成为大坪“砸派”学生的据点。为了寻找攻打医学院借口，重大“815”派了4名学生去医学院贴大字报。医学院女生多，但也不是好惹的，她们不能容忍“815”冲到自己的“家”里来吵闹，于是同这4名重大“815”的学生发生冲突。女生撒起野来，耳光、口水是常用的，稍有反抗免不了又抓又咬。那4个重大“815”男生招架不住，落慌而逃。回到重庆大学控诉医学院和石油学校“井麻儿”的暴行。辩论会场上疯狂的掌声把他们捧上台，他们背部涂了些红药水，沿半圆形主席台边来回展露。大家都深信不疑是鲜血淋淋，顿时激

起满场怒不可遏的仇恨旋风。

## 第 643 回：宗派起，安徽厅局□分裂　武汉市，公安局□前绝□

4 月 27 日，安徽省军管会召开厅局以上干部大会，要揭开安徽省委阶级斗争盖子。揭安徽省委的盖子从什么时候揭起？

1959 年 9 月 27 日，庐山会议后，安徽省委召开全委扩大会议，将省委书记处书记、副省长张恺帆和省委候补书记、副省长陆学斌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并分别给予开除党籍和留党察看两年以及撤销一切职务的处分。

1962 年 1 月 11 日至 2 月 7 日，中共中央召开扩大的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安徽与会人员对时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的曾希圣进行揭发、批评，曾希圣对自己的“错误”作了检查。2 月，在会议后期，中央根据曾希圣的请求将其调离安徽，李葆华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当年 6 月，安徽省委召开地市监委书记会议，要求对 1957 年以来所批判处理的党员和干部案件予以甄别。随后省委印发关于对李世农、张恺帆、陆学斌等人的甄别结论和中央监委的批复，撤销前省委做出的错误决议，恢复他们的名誉、党籍、级别和职务。

1967 年 3 月上旬，安徽“夺权总指挥部”也曾在合肥长江剧院，组织安徽省厅、局长以上干部的召开“揭盖子”会。会议由“827 兵团”常委、合肥工业大学纵队长刘兴路组织。造反派学生原打算通过这个会让这些干部“亮相”，揭发李葆华，表明态度，站出来革命。没想到事情远比这些单纯的学生想象的复杂，会上变相地批判张恺帆，“揭盖子”会变成宗派斗争会，张恺帆

的妻子一气之下，大闹会场，致使会议中断。

如果 4 月 27 日安徽省军管会召开的这次厅局长会，还是从 1962 年李葆华到安徽上任后开始揭起，很可能重复 3 月初揭盖子“亮相”会的老路，将揭盖子引入宗派斗争。也会使支持平反干部的群众转移斗争方向，将斗争的矛头指向军管会，指向省军区。

可是，如果从文化大革命的资产阶级路线揭起，一是没有更多的新内容；二是会搞得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人人有份，还会涉及许多保守组织的头头。

经过干部间的激烈争论，军管会还是决定，从 1962 年李葆华来安徽主持工作后，按时间顺序从前往后揭。结果，5 月 7 日，终于发生了书记处书记张恺帆发表《紧急呼吁》。在这个《紧急呼吁》上签名的安徽省厅局干部近百名。

5 月 9 日，又有近 200 名厅局干部签名反对张恺帆的《紧急呼吁》。

就这样，安徽省直机关的 400 多名厅局干部公开分裂了，后来居然发展到相互动手打人，致使这次会议无法正常进行下去。结果军管会主持召开的揭盖子会，又走了 3 月初“总指挥部”召开的揭盖子“亮相”会的老路。所不同的是，“亮相”会上只是一位女干部闹一下，这一次是男人之间，干部之间发生武斗。安徽文化大革命又出现了新的转折，群众组织不知不觉地卷入安徽干部的宗派斗争。

由于厅局长“揭盖子”会上打打闹闹，吵吵嚷嚷。在“首都三司联络站”胡昭复的建议下，“827 兵团”常委决定，梁守福

去北京找时任中央西南局第三书记曾希圣，一方面请他向周恩来总理转交安徽“827”对《九条》在贯彻中出现问题的看法材料；另一方面向他了解安徽干部的情况。

梁守福于 5 月 16 日下午，在京西宾馆楼下的接待室里见到曾希圣。个子不高，看上去十分精干的曾希圣握住梁守福的手说：“我早就听说过你的名字，你很能干。”

他们坐下后，曾希圣第一句话是：“感谢安徽‘827’派人到四川把我救出来。”其实，那是安徽造反派将时任西南局书记处书记的曾希圣揪回安徽批斗。这件事梁守福并不知道。

紧接着曾希圣说：“你的动员报告，我看了，讲得很好。安徽的问题，就是要从 62 年搞起，这样才能打中要害。”他一边说，一边掏出一张《安徽八二七》报，指着报告中“关于曾希圣同志错打了一批干部的”那一段话问梁守福：“你说我打错了一批干部，你谈谈看，我错打了哪些干部？”

梁守福被他问得一愣，没想到他会提出这样的问题，顺口说道：“杨效椿、赵凯等人。”

曾希圣当时就反驳道：“杨效椿、赵凯他们几个人在中央下达平反通知前，我就给他们平了反，而且恢复了他们的工作。”接着他又说：“像李世农，毛主席在成都会议上，说他是十个指头烂掉九个，我怎么能给他平反？小梁啊，你年轻，对许多问题不了解，我给你说一下，不是什么批评。”

接着，梁守福希望曾希圣给他们介绍几个好干部。曾希圣说：“真正的好干部，没有那么多，我只给你们推荐一个，他就是郑锐。郑锐这个人历史清白，有能力，又有一定的文化，年纪也不

大，身体无大病。其他的干部，不是年纪大就是身体不好，摆在重要位置上，他不能办事。所以，我不给你们推荐。郑锐这个人，你们尽管大胆用。”另外，他要梁守福对李甫和邢浩要保护好，他说：“他们是安徽的材料库，不要被别人杀害了。”

梁守福又问到三年困难时期，非正常死亡问题。曾希圣说：“安徽的问题本来没有那么严重，是周总理打电话给我，说中央很困难，本来想从江苏调点粮食，江渭清说，他也很困难，调不出来。这才打电话给我，周总理在电话里说‘老曾啊，你能不能调点粮食支援一下中央？’我问总理要多少？总理说‘最好是调五亿斤。’我说：调五亿斤有困难，先调三亿给中央。周总理同意先给三亿。”

这时曾希圣有些激动地对梁守福说：“小梁，你那时还在上中学吧？”

梁守福点点头说：“是”。

曾希圣接着说：“那时你们还是孩子，不懂中央和省里当时的困难，总理说话了，江渭清又不给，我能再说不给吗？都不给，中央怎么办？那三亿斤粮食确实把安徽的群众害苦了。”

听了曾希圣的一番解释，梁守福对他有些肃然起敬。接着他又问到“单干风”的事。曾解释说：“包产到户的事，我是先请示过主席，主席说：‘可先搞点试试。’没想到农民一试，积极性很高，很快就把面铺大了。其实，在毛主席批评单干风之前，我们省委也发现了问题，开始着手纠正。这个问题怎么能记在我一个人头上呢？‘七千人大会’上，把安徽的问题搞得那么严重，那是刘少奇想整我，我不能推，只好一个人都担起来。最后，还

是总理说了话。”

临别前，梁守福给他一小袋材料，告诉他，这些材料是“827”对《九条》决定的看法，以及《九条》下达后安徽出现的问题，并希望他有机会见到周恩来总理时转给他，“希望总理能多关心安徽的问题。”曾希圣收下材料，并答应有机会一定转交。

曾希圣给梁守福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他认为：“曾希圣精明干练，思维清晰，也很平易近人，不像自己以前想象中的那样，是一个不管老百姓死活的人，而是一个顾大局，站在毛主席一边的人。”

就在梁守福和曾希圣见面的第二天，5 月 17 日，安徽淮南两派对立的群众组织发生全市性的大规模武斗，数十人死亡，数百人受伤，致使淮南矿务局所属各煤矿停产数日，矿井设施、机关办公用品受到不同程度破坏，造成重大经济损失，震惊全国。

而安徽省直机关厅局干部“揭盖子”会议一直持续到 6 月 13 日，终因分歧严重而中止。

再说武汉。军委扩大会议 4 月 27 日结束后，陈再道、钟汉华又回到离开了一个多月的武汉。1 个月前，街道两旁贴的“彻底粉碎二月逆流!”“坚决回击三月黑风!”“揪出武汉地区的武老谭!”等标语,已经被一些指向更明确的标语、漫画、大字报所覆盖。“打倒陈再道!”“向陈再道讨还血债!”的口号随处可闻。如果说，一个多月前，武汉造反派还只是“质问陈再道”、“炮轰陈再道”，不敢公开喊出“打倒陈再道”的口号。那是因为，在当时，“打倒陈再道!”就意味着反军，而反军就是反革命。因此，他们只能隐晦的张贴“打倒陈广林!”的标语，“广林”是“麻”

字的分解，陈再道外号“陈大麻子”，“打倒陈广林！”即“打倒陈大麻子！”以此发泄心中对陈再道的不满，那么现在，武汉造反派已经公开提出了“打倒陈再道,解放全中原”的口号。

还在 4 月 24 日，武汉“二司”的“中学红卫兵联合指挥部”，简称“中学红联”成立。

5 月 1 日，武汉“三新”、“二司”、“工造总司”、“工人总部联络站”、“三司革联”、“中学红联”等 16 个组织组成的联合指挥部，组织了数十万人游行，庆祝国际劳动节，表示“誓死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游行队伍中同时出现“钢二司”、“钢工总”、“钢九一三”三面很大的旗帜，此后就有了武汉“三钢”的称谓。湖北省委农村工作部主任任爱生参加了这次游行。

5 月 5 日下午，各学校“二司”、“三新”、“三司革联”、“中学红联”等组织头头在湖北大学开会，讨论大联合的问题，决定成立“武汉地区大中学校革命造反联合指挥部”。“二司”的杨道远、“新华工”的聂年生、“新湖大”的张维荣等人组成了“联合指挥部”的领导核心。6 日，“联合指挥部”宣布成立。

5 月 6 日，湖北省副省长孟夫唐写出了大字报：《我们究竟应该怎样对待武汉地区工人运动》，同时还给陈伯达写了一封信，并转中央文革小组，向中央文革汇报武汉地区存在的严重的资本主义复辟问题。

5 月 8 日，武汉“工总联络站”、“工造总司”、“九一三”、“长办联司”等所有职工造反派组织，联合成立“武汉地区工矿企业革命造反联合指挥部”。

5 月 9 日，“武汉地区大中学校革命造反联合指挥部”负责

人与哈军工“红色造反团”、清华“井冈山”、西军电“临委”等驻汉联络站召开了联席会议，讨论为“工总”翻案，决定联合组成“‘工人总部’问题联合调查团”，对“工总”问题进行全面调查。

第二天，5 月 10 日，下午，“工人总部联络站”在新华路体育场召开了“工总”成立半周年庆祝大会。“工总”、“九一三”、“工造总司”、“二司”、“三新”、“三司革联”、“中学红联”等组织 6 万余人参加大会。会后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

5 月 10 日凌晨 2 时，湖北省柴油机厂、武汉柴油机厂、新华印刷厂的数百名“红武兵”，分乘 7 辆大卡车冲入“新华工”驻邮电器材厂联络站，与“新华工”发生武斗，多人受伤。

5 月 11 日,“二司”司令部公布了武汉邮电学院总部关于“工总电信局分部”的调查报告：《武汉的谭氏人物在把毛泽东思想战斗队武汉地区工人总部打成反革命的丑剧中扮演了什么角色？》

在 5 月 10 日这天，公安学校再次发生因为覆盖大字报引发的武斗。

当天，武汉市公安局江汉分局有近百名民警进入公安学校，与该校“三字兵”贴大字报、声援书时将该校“红司”刚贴出的大字报覆盖。“红司”学生前来争辩、阻拦，双方冲突，打伤 30 多人。于是，武汉公安学校“红司”前往市公安局军官小组和武汉军区支左办公室交涉，提出 7 点要求，未得答复，旋即于 5 月 13 日下午 18 时 30 分，在汉口一元路武汉市公安局宣布绝食。而在此之前，由于武汉市“抓革命促生产办公室”向武汉市一中

派出工作组一事，市一中成立了“革命造反司令部”，为此事到武汉市“抓革命促生产办公室”交涉，未得解决，于是在 5 月 12 日上午 10 时发动绝食斗争，以示抗议。

全市许多造反派和外地赴汉调查组前去绝食现场表示支持。“中学红联”负责人陈德胜带领新一中数十人前往市公安局，在市局楼外张贴大量大字报、大标语，宣布新一中参加绝食，同时号召全市的中学，技校和中专的红卫兵全部都去武汉军区参加绝食，声援武汉公安学校“红司”，并将绝食现场由市公安局楼内移到楼外。

14 日，“中学红联”总部决定：除继续派人协同新公校坚守市公安局现场，新一中在汉口中山大道民众乐园段、汉阳铁中在汉阳大道钟家村段、华师一附中在武昌武珞路阅马场段，阻断车辆通行，设置绝食场地。

随后，武汉“二司”号召“二司”成员投入绝食斗争。青山红钢城、解放大道武胜路口、洪山宾馆门前、武汉军区门前也设立了绝食现场，三镇交通要道为之断绝。

后来，绝食静坐的队伍从武汉军区大门口开始，经中南路，到付家坡、大东门，过首义路，至阅马场，绵延十余里。北大聂元梓、清华蒯大富、北航韩爱晶及首都红代会各学校也发来电报声援，就连巴中友协（马列）秘书长果索伊女士也带着十几人的代表团，亲临现场声援。一时间，武汉三镇支持并参加绝食静坐的人数以万计，汉口一元路以及六渡桥一带参加静坐绝食的群众人山人海。而带头组织绝食的“新公校”头头张兴旺等人则被公安机关军管会关了起来。张兴旺等在关押的铁栅栏内高唱《造反

有理》、《红军想念毛泽东》等歌曲。外面的静坐绝食的群众则一齐呐喊："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此时，武汉三中"红岩"和"二司"、"新华工"为营救"工总"的夏邦银的静坐示威也已进行了 20 多天。5 月 14 日晚 22 时，"工总"的夏邦银终于被汉阳公检法军管小组放出了汉阳公安局，武汉三中的静坐取得了完全的胜利，武汉造反派士气大振。

5 月 13 日，水院、武测、华师、湖医等院校的"二司"学生再次进驻井冈山大楼，建立了"井冈山大楼事件平反联络站"，并发表了《第一号通告》，指出：井冈山大楼"没有什么反革命勾当，指挥部的头头绝大部分是革命闯将，他们的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武汉军区发布的诬陷井冈山大楼内造反派的《3·9 布告》"是一株反毛泽东思想的大毒草，是继 2·18 声明以后，资本主义复辟的又一宣言书，所谓'井冈山大楼展览'完全是武汉谭氏人物一手炮制的黑货"。

5 月 15 日，"二司"司令部发出《为毛泽东思想战斗队武汉地区工人总部翻案紧急动员令》。

这天，汉桥区保守派也向全市发出《呼吁书》，说"新华工"、"钢二司"学生打了贫下中农。上午，汉桥区江堤、红光、井冈山、南泥湾等九个公社和四新农场一万多农民在区武装部一些人的带领下，扛着锄头、扁担到汉阳、汉口游行，高呼"不准为'工总'翻案!""坚决拥护武汉部队《3·21 通告》!""支持红卫兵的一切革命行动!""打倒工总，镇压反革命!"等口号，甚至喊出了"打倒大学生!""打倒新华工!"

当天，武汉市副市长、市"抓革命促生产办公室"副总指挥

薛朴若辞去副总指挥职务，公开表明态度站在“三新”等造反派一边。

5 月 15 日下午 3 时 30 分，戚本禹、王力在北京政协礼堂东池会议厅接见湖北“三新”、“二司”、“三司”、“工总”、“九一三”、“新一冶工人造反司令部”、黄石、天门、解放军文艺代表团、武汉军区卫校、“三司红色造反团”的代表。开会前，“新华工”、“新湖大”的人为了前面的座位和“三司”发生争吵，因为前面靠桌子的座位给每个单位留一个记录者的位置，可“三司”有四个人坐在前面，“新华工”、“新湖大”的人要他们退下来两个，让工人和解放军坐，“三司”不让，结果吵了起来。正在吵得很凶的时候，王力、戚本禹进来了。

戚本禹笑着说：“你们吵，吵我就不接见了。”

他边说边坐了下来，指着代表们带的袖章说：“噢！我见过你们一次，‘新华工’、‘新华农’……”

这时“新华工”、“新华农”、“新湖大”等群众组织的代表纷纷献上本组织的袖章，“新华工”代表还把“新华工”的胸章别在王力的军装胸前。

戚本禹说：“你们的给了我，你们就没有了。上次我说要见你们一次，一直没有时间。”

戚本禹指着王力介绍说：“王力同志来见你们。”

王力也指着戚本禹说：“这是戚本禹同志。”

大家鼓掌。

戚本禹说：“我们今天来不能解决任何问题，我们主要是来调查研究的，今天来的有没有两派？”

同学们说："有，有'三司'的!"

王力："刚才不是在吵架嘛。"

学生们介绍刚才吵架的情况。

戚本禹说："这点事你们就吵，吵得不可开交，你们的造反精神太大了。"

大家笑了起来。

戚本禹接着说："我五点半还有会，现在三点半，开到五点半。你们商量商量怎么开，……武汉的问题主要靠武汉的老百姓解决。我不讲了，你们谈。"

接着，武汉"三新"和"二司"、"九一三"的人开始向戚本禹、王力汇报武汉军区取缔"工总"等群众组织，抓了 200 多人等情况。然后，戚本禹又让对立面"三司"的代表发了言。

最后，戚本禹说："听了你们发言，我们有三个意见，不代表中央文革：

第一、湖北来京工人、学生，赶紧回去到群众中去，参加运动，中央对湖北问题正在调查研究，以后再解决。你们赶快回去，因为你们都是勤务员，中央对这个问题，正在研究。

第二、军区在支工、支农、支左中是有成绩的，但也有缺点错误，这主要是在支左上。现在他们正在改正这些缺点错误，我们和你们都需要再看一看，有缺点错误都要改正，不要越陷越深，改正了就好了。有意见可以说，方式要适当。

第三、应当坚决执行军委《十条命令》、中央对安徽问题《五条命令》、《五条指示》。凡是错误地打成反革命的组织，应一律平反。逮捕的，应立即释放。各群众组织应当整风，着重自我批

评，”

王力：“着重自我批评。”

戚本禹继续说：“整顿思想，整顿组织，整顿作风，”

王力：“要掌握斗争的大方向。”

戚本禹：“要掌握斗争的大方向，各群众组织之间的争论只许摆事实，讲道理，不许武斗，不许打砸抢。”

一名华工同学问：“陈再道大字报上街可以不可以？”

戚本禹：“可以采取其他方式，送上门。”

还有一个同学说：“‘打倒陈大麻子’是反动口号。”

王力：“以后不要这样喊就行了。我们的意见你们可能不满足，但我们只能讲这么一点，我们还要调查研究，以后解决湖北问题时再请你们来。”

## 第 644 回：抓组织，三□内“□师”崛起　不退让，武汉市矛盾升级

5 月 16 日，在武汉造反派纪念《五一六通知》发表一周年全市大游行的时候，陈再道被画成青面獠牙的“陈大麻子”，“钉”在武汉市的最高建筑物上，并配上一首打油诗：

陈再道，你算老几，

老子今天要揪你，

抽你的筋，扒你的皮，

看你还保不保刘少奇！

“新一冶”喊出的“吃了豹子胆，铁了秤砣心，为工总翻案！”的口号也迅速传遍武汉三镇。

武汉军区自《218 声明》后，得到武汉“工造”、“三新”等反对《二八声明》的武汉“毒草派”的大力支持，双方关系本来很好。没想到《312 通告》后，军区抓了“工人总部”头头，引起了“工造”、“三新”不满。武汉军区本想拉“工造”参加三结合夺权，遭到了拒绝，双方关系破裂。此时，焦头烂额的武汉军区能依靠的群众组织除“一司”、“三司”外，全市性的工人组织只有“专批刘邓联络站”了。

据“百万雄师”常委、联络部长章迪杰回忆：自武汉保守派组织“职工联合会”解散后，武汉“红武兵”、“中学红卫兵”、“造反大军”、“二一八红星军”、“体育无产者”等 7 个新成立的组织头头，不定期在新华路体育场东台开碰头会，共同组织过两次“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此后参加碰头会的组织

扩大到二三十个，碰头地点改到二七交通联社。4 月 6 日，他们实现了“比较松散的联合”，取名“专批刘邓联络站”。其一号头头是“红武兵”的申耿生，他是“红武兵”一号头头俞文斌派来的。其他常委还有武汉市仓储公司的保卫干部、“红色尖兵”组织的负责人李本富；二七区“造反大军”刘丰；硚口区“硬骨头战士”林正双；体委“无产者”余均才；江汉帆布厂的工人刘敬胜；“中学红卫兵”刘涛；及郭贤栋。

“专批刘邓联络站”后来发展到 33 个组织，不少原来“职工联合会”的群众也加入进来。4 月中下旬，“专批刘邓联络站”办公地点又迁至江汉区委党校。但是，各组织都是二、三号头头前来参加。没有一个有名望的人牵头，力量有限，人数也不过 7 万多人，没有统一的领导，远远比不上已有 37 万人的“工造总司”。于是，“中学红卫兵”、“大专院校红卫兵”、居民委员会的组织“红城公社”、“造反大军”、“贫下中农”，以及“硬骨头战士”等几个组织提出，最好成立一个统一名称的全市性组织，这样才能与“工造总司”这些造反派组织抗衡。他们当中，势力最大的是“红武兵”，江汉帆布厂的工人刘敬胜经常来找“红武兵”的头头俞文斌，希望他能出面把大家组织起来。

但是，这些组织的成员大部分是由各单位的干部、劳模和积极分子组成，习惯了大事、小事听上级的安排，没有上级的“红头文件”，一时无法统一起来。于是，在市武装部巴方亭的全力支持和撮合下，推荐俞文斌为头，经过大家讨论，一致通过。

接着，大家商定，总部常委由：

俞文斌；

武汉江052部队汽车修理厂的8级修理工、参加过抗美援朝的1级驾驶员、“革工三司”的头头杨道安；

汉桥区委永丰公社党委秘书孙运东；

武汉皮鞋材料厂副厂长、二七区“造反大军”的谢敏华；

江汉帆布厂的工人刘敬胜；

武汉市农业生产资料公司职工汤忠云；

汉口铁路医院职工、铁路“红铁军” 的负责人孙德州；

硚口房地产公司第五房管所工人、原“职工联合会”的头头章迪杰；

武汉列车电站基地工会主席、原“职工联合会”的头头、“红色造反军”的负责人蔡俊善；

武汉市仓储公司的保卫干事、转业军人、“红色尖兵”组织的负责人李本富；

硚口区汉水街团委书记、“野战军” 负责人纪登清；

街道居委会的组织“红城公社”代表陈德松；

武汉市水产公司业务员、“三字兵”的代表耿汉卿；

共13人组成。

组织名称，由“中学红卫兵”头头刘涛提出，建议像当年百万雄师进入南京城一样，就定为“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指挥部百万雄师联络站”。

其中：俞文斌代表民兵，是“一号头头”；杨道安是工人，为“二号头头”；孙运东代表贫下中农，为“百万雄师”的“贫下中农总部”部长，他是“三号头头”。一、二、三号头头分别代表工、农、兵的意思。

后面的常委没有排序，谢敏华为总部的作战部部长，刘敬胜、孙德洲为作战部副部长，章迪杰为联络部部长，纪登清任总站办公室主任，汤忠云是总站保卫队“雄师支队”队长，耿汉卿为组织部部长，李本富为宣传部部长，陈德松任后勤部部长，蔡俊善为政参部部长。他们在武汉市除洪山区外的七个区加上东西湖农管局都设立了分站，分别任命了分站长和政委。

参加“百万雄师”的组织有 40 多个，“百万雄师过大江，牛、鬼、蛇、神一扫光”是其宗旨。

5月16日，在汉口新华路体育场，“百万雄师”召开了有5万人参加的成立大会，武汉市武装部、中央所有驻武汉大单位的武装部长、武汉市各区、局的武装部长及中共武汉市委组织部长辛甫、市工交政治部副主任林立等人到会祝贺，武汉市委专门组成了由6名市里干部参加的“百万雄师顾问小组”，负责人就是辛甫，市武装部派专人到联络站指导工作。

为安全起见，市武装部派了两名军人到“百万雄师”总站协助工作，一个叫杨爱忠，河南人，是武装部干事；另一个人是科长，叫张有富。他们的任务，一是联络，负责“百万雄师”与市武装部、省军区、武汉军区的联系，将情况上传下达。二是保卫俞文斌的安全，有事随时调动部队增援。这两个人穿便衣，与俞文斌同吃同住，24小时形影不离。他们的来历只有俞文斌知道，“百万雄师”其他常委都不知道他们是干什么的。俞文斌也不告诉其他人。别人问俞文斌时，他就说：“你问这个干什么？” 这两个人直到“百万雄师”垮台时才离开。总站其他常委的保卫工作由“百万雄师”的“雄师支队”负责，负责人是“百万雄师”

常委、作战部副部长汤忠云。

“百万雄师”成立后，原来的松散组织变成了有严密组织机构的全市性统一组织，势力很大，人员众多，据说最多时有120万之众。大部分是共产党员，原各企业的厂长、书记、科长等基层领导干部直接成为组织头头，下面也按照文革前的干部级别形成严格的中下层组织体系，基本队伍由根正苗红，苦大仇深，对党有很深阶级感情的先进工作者，劳模等组成，拥有一大批老实忠厚的老工人，听从党组织安排，讨厌牛鬼蛇神等非正统革命队伍的造反派。可以说是：组织严密，纪律性强，步调一致，行动统一。到1967年7月，，根据他们自己写的报告，共有53个组织，122.91万人。其中，工人50多万，农民35万，红卫兵23万，红城公社的居委会干部、老太太10多万，还有一些机关干部，文教卫生工作者1万多。在这53个组织中，核心组织只有7个，他们是：以基干民兵为主体的“红武兵”、由四清工作队队员组成的“野战军”、“职工联合会”群众为主的“二一八红星军”、“硬骨头战士”、“中学红卫兵”、从“工造总司”分裂出去的“革工三司”、居委会干部的“红城公社”。

他们的观点是：武汉军区支“左”大方向是正确的,不能把斗争矛头指向军区,不能不加分析地打倒所有老干部。因此,“百万雄师”得到武汉军区许多部队的公开支持，也得到绝大多数领导干部的支持。

“百万雄师”一出现，就拥有极大的优势：在物资供应方面，“百万雄师”得到市一商局、二商局的全力支持，要什么给什么，满足供应。吃的、喝的、穿的、戴的，只要“百万雄师”需要，

就立即有人送来。“百万雄师”本身就有枪，另外还准备了长矛、匕首等武器，极个别的人还备有日本人的马刀。

按照军区的意见，当时的任务就是夺权。权本来就在支持“百万雄师”的当权派手里，但是害怕被造反派夺走了。因为，万一权被造反派夺走了，全市和各区、局的领导干部，都担心会被造反派整死。所以，他们希望“百万雄师”尽快配合武汉军区完成夺权任务。

“百万雄师”第一次全体工作人员会议在东湖宾馆召开，总站和各分站负责人都去了，有好几十人。会议开了整整一个晚上，研究形势、任务和对策。会议计划分三步走：第一步抢占全市的宣传阵地，按照武汉军区的要求，逐点清除造反派的宣传站，在舆论上压倒对方；第二步组织领导干部集体亮相，进行全省全市的夺权；第三步横扫“牛鬼蛇神”。经过一夜的争论，最后决定把第三阶段的任务提前，与第一阶段同时并举，即抢占宣传阵地，舆论压倒对方，也要横扫“牛鬼蛇神”，同时穿插着搞“集体亮相”，进行夺权。因为实际情况是：不横扫“牛鬼蛇神”你也根本无法占领宣传阵地，人家不让给你。具体安排是：先汉阳，后汉口，再武昌。一条街一条街地对造反派的宣传阵地进行驱逐。

就在“百万雄师”成立的 16 日当天夜里，“百万雄师”汉阳分站一号头头彭开发即向汉阳公安分局军管小组组长和武汉独立师参谋长郝文德请示，计划将正在进行绝食的造反派学生“连锅端”。郝文德说：

“你们要我们表态，你们的心情我们是理解的……如果我们公开支持你们，那‘三新’、‘二司’又说是武老谭搞的。”

当晚，独立师在汉阳的宣传车、宣传队、执勤部队全部撤出。

17 日凌晨一时左右，汉阳冷冻机厂、水泵厂“红武兵”突然冲击绝食现场，驱赶静坐学生，造成 200 多人被打，数十人受伤。但是，并没有阻止绝食的继续。为声援武汉公安学校的绝食斗争，武汉“二司”杨道远、“新华工”聂年生、“新湖大”张维荣和“工造总”吴焱金等人组成“5·10 火线指挥部”，与武汉部队领导人交涉。到 17 日，已有 4 万人参加绝食斗争。

由于静坐绝食旷日持久，现场不少人晕倒、病危，由“红医兵”组成的医疗队夜以继日地在绝食现场抢救晕倒的绝食学生。到 17 日，已有 100 多人昏倒，几十人休克。绝食现场“火线指挥部”不断地向中央发报告急。

武汉水院院长张如屏亲临武汉市公安局前的绝食现场，看望和慰问参加绝食斗争的水院学生，当场捐出粮票和 2000 元，相当于他当时半年的工资，而且亲自去找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请部队出面制止武斗、保护学生。

5 月 19 日“武汉地区高等院校革命干部造反联络站”，简称“高干联”成立，武汉市 17 所高校的干部参加，其中有武汉测绘学院党委第一书记毛远耀，任一号勤务员，另外还有武测党委副书记张肇翼、水院书记兼院长张如屏和副院长梁百朴、华工副书记熊小村、武大副校长刘宿贤、水运工程学院书记乔英怀、武医副书记尹传亭、华农徐志伟、外语专科学校书记刘昂等。“高干联”表示坚决支持革命学生，为“工总”翻案。

接着，武汉市“大中学校革命造反派联合指挥部”与武汉市“工矿企业革命造反联合指挥部”又联合成立了武汉市“反击资

本主义复辟逆流总指挥部”，湖北大学的张维荣任总指挥，“二司”杨道远和“工造总司”的吴焱金任副指挥。

武汉“一司”中，有一些学生分裂出来，成立了“红卫兵革命造反委员会”。

“红武兵”中也有人分裂出来，成立了“红武兵革命造反联络站”，他们都宣布坚决与“二司”、“三新”站在一起，为“工总”翻案。

“三司”中也有一部份人声明退出“三司”，成立“三司革联”。武汉军区不予承认，不给宣传经费。“三司革联”提出“反政治迫害，反经济封锁。”

这期间，湖北省“革命干部造反联络站”成立，湖北省副省长孟夫唐任一号勤务员，其成员有省委副秘书长刘真、张华，宜昌地委第一书记杨春亭，省委农村工作部主任任爱生等。武汉市“革命干部造反联络站”也成立，武汉市副市长薛朴若任一号勤务员，其成员有市文化局副局长屠公博、中原机械厂党委书记李长根等。这两个组织简称“革干联”。

5 月 19 日，武汉一中的“革命造反司令部”组织了“敢死队”，和湖北大学的学生一起冲进武汉军区。军区派副司令员杨秀山出来与学生商量解决新公校绝食问题，没有结果。钟汉华又亲自出面谈判。“新湖大”学生趁机将钟汉华扣留，随后强行带到湖北大学，逼着他代表军区作支持性表态。经过 8 小时讨价还价，钟汉华同意放人并答应新公校提出的条件。当时张维荣、彭勋坚决要求钟汉华写出书面文字，钟汉华不同意写，他说：“我以人格担保说话算话。”

吴焱金说："那你当面去跟群众说吧。"

于是，5 月 20 日，他们将钟汉华带到汉口一元路市公安局门口的绝食现场，由钟汉华当着群众的面，承诺将关押的新公校"红司"头头张兴旺等放出，答应新公校提出的全部条件。钟汉华有些紧张地讲完话后，台下群情激愤，不断有人大声质问，场面较乱。吴焱金大声宣布静坐绝食斗争胜利结束。呼吁大家保重身体，立即回家。绝食"火线指挥部"在武汉市公安局前召开了庆祝绝食胜利大会，"二司"负责人杨道远代表武汉市"大中学校联合指挥部"在会上讲话。会后，绝食人员胸前戴着大红花离开绝食现场，历时 150 多个小时的绝食斗争终于结束。

接着，学生们又把钟汉华弄到公安学校围攻、批斗，后又带回湖北大学。钟汉华患有高血压,由于过度紧张劳累,傍晚时分,他额流虚汗,躺倒在地。经医生现场诊断检查,血压高达 240/110。

陈再道将钟汉华的情况向周恩来作了报告，周恩来立即给武汉"新湖大"打电话，是"新湖大"梅子惠接的电话。周恩来指示他们迅速放人。于是梅子惠来到钟汉华休息的地方，私自将他放了。学生们知道后，自然是把他们的头头梅子惠痛打一顿。

5 月 20 日当天，陈再道在武汉军区的讲话，他说：

"这七条（指新公校绝食斗争要求的七条）的签字是在极不正常的情况下被迫签字的。现在问题是我们对待这七条采取什么态度。如果承认了他们，就脱离了广大人民群众，就实际上是保护了几万人压了几十万人的问题，而搞的这些东西是不正确，是错误的，是省委内一小撮策划'二司'内别有用心的人煽动的，把矛头指向解放军，把军队搞垮。'三新'、'二司'只准他们一

小撮讲话，不准人民讲话，这是什么大民主呢？这是完全违背中央文化大革命方针、路线、政策。现在他们这七条要产生严重后果，看来否认这七条比较有利，他们已经干了不好的事情，冲击军事机关和军管单位，围攻军代表，方向完全错了。这不是对缺点错误提意见嘛，他们冲击军区，打伤副司令员、参谋长，绑架钟政委，而且强逼签字，至于近来对其它群众性组织的态度，那就更多了。他们这些错误，我一再指出教育过，现在不仅我们讲不听，而且连毛主席、党中央讲的都不听。我们一再忍让，一再说服他们，仍然坚持错误做法，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不能不公开表示，就是公开表态以前，今天下午我们再找他们谈一次，但是对他们的做法，还是要宣传、要教育，不仅教育了他们，而且教育了广大群众，这是他们造成的。

签字是强迫的，同时也是单方的，这个签字无效，必须经过党委。现在的问题，是把内部思想统一起来，军区不是没有指出他们的错误，还只是内部跟他们提，现在不公开批评不行，要公开批判否则就不能挽救他们，要大搞舆论，利用一切宣传工具。

刘真、孟夫唐要公开点名，”

这时有人插话说：“刘真是否等一等呢？”

陈再道继续说道：“这是逆流，什么对解放军提意见？这是逆流，要公开批判，但要防止武斗。其他组织也要公开宣传，精神要振作起来，不要灰留留的，没什么了不起，我们的缺点和错误，再怎么讲，不过是那点。现在要大反无政府主义。”

21 日，武汉军区支左指挥部发表《关于当前武汉地区文化大革命中的几个问题》，指责“新湖大”冲击军区，打伤副司令

员杨秀山，绑架政委钟汉华。其中特别说道：

“孟夫唐之流赤膊上阵，幕前幕后煽阴风、点鬼火，进行一系列阴谋活动，拼命转移斗争大方向，极力把斗争矛头指向革命群众，指向解放军，妄图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达到保护自己，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目的。”

当天，钟汉华致信“武汉地区大中学校革命造反联合指挥部”张维荣，说自己不了解事实真相，不承认自己同意的七项条件。

## 第 645 回：五一六，接见内蒙古军人　说农口，北京再掀反周□

5 月初的一天，负责内蒙古工作的北京军区副司令员滕海清找到“呼三司”头头高树华，说集宁地区驻扎着一个骑兵五师，如果部队出现骚动，对整个局势不利。他对高淑华说：“该师师长和参谋长来了，他们说很难做部下的工作，请求派一个了解文革的人去讲一讲。”“滕办”的人问高树华：“去是有风险的，你敢不敢去?”

高树华说：“为啥不敢去?我随时待命。”

第二天，他带着两名红卫兵，简单准备一下就出发了。按照师部安排，高树华先给团以上干部讲。这些干部很不客气，提了很多问题。高树华预先有准备，耐心讲解，几次交谈后，态度趋于平和。接着，他们又给排以上干部和战士讲。

有一天，正在给战士讲课，从大门外突然冲进一辆汽车，车上是乌盟军分区警卫连的战士。他们在院里大吵大闹，说高树华他们是在做反动宣传，要把他们揪出去，高树华被迫停止宣讲。参谋长虎日乐巴根上台，命令警卫排战士出列，把军分区的人一个个扔回车上，逼他们离开会场。这件事反而教育了在场战士。他们说：“人家是来讲理的，你们还不让听，你们本来就没道理。”经过宣传，骑五师的情绪稳定下来。

5 月 13 日，内蒙古呼和浩特河西公司“818”向保守组织“红联”索要被抢走的广播器材，当时“红联”正在开会，他们认为“818”这是故意捣乱会场，遂将“818”代表扣押。“818”余众

急忙后撤，“红联”穷追不舍，各路造反派飞车增援。双方激战经时。军代表和警卫连面对如此“盛况”无计可施，只能在抢救伤员方面贡献绵薄。事后，“红联”成员逃遁外埠，长期不归。据“818”单方统计，此役伤 130 余人。其中重伤 30，急救 8 人，生命垂危者 2 人。

自 4 月 13 日至 5 月 13 日的一个月内，呼和浩特地区保守派，包括军人，上街游行示威者达 10 万人次，出动汽车 700 余辆，参加武斗 3 万余人，因武斗致伤者 1300 余人，重伤 300 人，致死者 10 余人。有 3000 多名内蒙古军区的军人不归营房，脱离建制。

5 月 16 日上午，毛泽东指示周恩来、中央文革和中央军委三方面给内蒙古军区赴京人员开个会，劝他们回去按照中央关于解决内蒙古问题的《413 决定》规定的八条办事。当晚 19 时 30 分，周恩来、康生、江青、徐向前、聂荣臻、谢富治、肖华、杨成武、叶群、王新亭、徐立清、粟裕、郑维山、陈先瑞、傅崇碧、陆杨等16位首长在人大会堂接见了内蒙古军区2700余名赴京战士。

接见之前，内蒙古军区参谋长王良太召集军区各方面的领导开会，研究了对待中央接见的三个方案：如果是多方面接见，就呼口号，退出会场。如果单方面接见，就向中央施加压力。如果毛泽东主席接见就控诉“呼三司”。王良太另外还有三条指示：

1、如有首都院校的人在场，就退出接见。

2、如果吴涛参加接见，就把他撵出去。

3、向中央递材料，说明真相。

因为这次接见是单方面的，所以军区方面就按第二方案进行。周恩来等人一出场，会场上立即响起一片呐喊声："我们要见毛主席！"

周恩来说："今天中央、国务院、军委、中央文革、军委文革接见你们。这个会是上午见到毛主席时，毛主席指示召开的。"

台下有人喊口号："我们想见毛主席！"会场出现混乱。

江青："解放军要遵守纪律对不对？"

众答："对！"

周恩来："我代表毛主席、林副主席、中央文革问候你们。"

台下又喊口号："我们要见毛主席，打倒刘、邓、陶！打倒乌兰夫！打倒王逸伦！打倒王铎！打倒高锦明！"

周恩来："我们很清楚你们想念毛主席，我今天上午报告了毛主席，今天才开这个会。"

周恩来在台上解释中央 4 月 13 日下发的关于解决内蒙古问题的八条决定，台下则以"打倒高锦明""打倒吴涛"等口号回答。当周恩来讲到内蒙古军区个别领导人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时，会场再次出现混乱……

周恩来说："人民解放军要遵守纪律，要听听中央的声音。"

无效。

江青先用好话哄劝："我非常体会会场的沸腾情绪。"

继而来硬的："你们要听总理讲吗！你们这样闹是不妥当的！"

无奈下面的人软硬不吃，会场更加混乱，情绪更加"沸腾"。聂荣臻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抬出林副统帅的金科玉律吓唬人："林副主席说：'立场错了，全盘都错了。''理解的要执行，不

理解也要执行！’” 可是这些无法无天的内蒙军人不但不理解的不执行，就连理解的也不执行了。不管台上如何强调内蒙古战略位置的重要性，如何解释毛泽东工作多么繁忙，台下的 2000 多条喉咙仍一个声音地喊：“我-们-要-见-毛-主-席！”

周恩来苦口婆心：“你们没有责任，是无罪的。”

江青好言相劝：“你们没有责任，中央不责怪你们。”

叶群随声附和：“中国有句老话，‘不知不罪’，广大指战员是无罪的。”

可惜，这些劝慰之言迅即淹没在混乱和愤怒的海洋之中。台上是声嘶力竭，好话说尽。台下是哄声四起，群情汹汹。向台上递条子，送材料的军人接踵挨肩。坐在主席台一侧的叶群成了接收材料的三等秘书。

周恩来只好说：“时间很晚了，明天大家分头座谈一下。中央文革、军委文革，总政分头下去听听，我有时间一定也要去听听。”

这次大会，除了得到了一大堆告“呼三司”、告高锦明、告吴涛的状子之外，中央什么也没有得到。会后，周恩来、江青、康生等人到总参招待所看望这些赴京军人，这些中央大员们竟在“周总理两面三刀！”“周总理是两面派！”的鼓噪声中被送回了汽车。

反“二月逆流”后，北京农业大学“东方红”东山再起，重抖精神，再次举起打到谭震林的大旗，进驻国务院农办、农政。他们到农业部后发现：当年创建“南京路上好八连”有功的原上海警备区政委、时任农林口政治部副主任的秦化龙，正在农林口

机关大院被作为反党分子遭受批斗；在农垦部，他们又发现王震也被作为反党黑帮批斗。于是，红卫兵们决定为秦化龙和王震等打抱不平，强烈请求周恩来为他们平反。

五一节后，周恩来在中南海接见国务院农办、农政及农垦部、农业部、水产部、林业部、中央气象局机关干部和院校红卫兵的代表，听取大家对秦化龙问题的意见。周恩来当场明确指示召开秦化龙问题辩论会，希望通过辩论，弄清是非，消除分歧。

5月初的一个深夜，周恩来联络员武博山约农林口政治部几位军队转业干部到中南海面谈。农林口各部及所属院校约100名支持秦化龙的代表，也同时来到中南海勤政殿会议厅等候周恩来接见。

“秦化龙问题”是主题。周恩来一开始就开门见山地说：“目前，农林口运动中有几个问题很突出，‘秦化龙问题’尤其突出，大家很关心。我决定绕过其他问题，首先抓‘秦化龙问题’。”

接着，转业干部吴文平详细汇报了“秦化龙问题”的由来。

秦化龙的秘书许人俊在会上宣读了南京军区政治部根据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的指示，写来的公函证明：

秦化龙同志在军队工作期间，忠实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立场坚定，作战勇敢，为人正派，作风民主，群众威信高，多次当选军区党委委员。

证明信是用毛笔写的，工工整整，极为规范，而且盖有南京军区政治部的红色大印。

许人俊读罢证明信，将其呈送周恩来过目。周恩来边看边点头说：“这么好啊！”

随后，许人俊补充汇报说："秦化龙主任的职务是中共中央红头文件正式任命的，但有人为了打倒他，竟然迫不及待违背干部管理程序，以国务院农办名义向全国发文，宣布撤销他的职务，手续和形式都不对头。"

他随手将国务院农办印发的文件呈送周恩来。周恩来边看边皱眉头，感到惊讶，并马上指示秘书孙岳去机要室查阅档案，看看有无请示报告和中央的批示。

不一会儿，孙岳回来汇报：国务院农办向中央常委写过报告，中央领导无人表态。周恩来当场表示："这种做法明显不妥。"

周恩来最后指示农办、农政对秦化龙问题持有不同意见的各派进行辩论，要求在 6 月搞完。并说："谭震林过去不民主，不许人家说话，听不进反面意见，我知道。你们要树立个新的作风。"

5 月初，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以张光武为首的几个人，公开发表了针对周恩来的《开炮声明》。北京商学院，也有人组成"火战纵队"，把矛头指向周恩来。与此同时，早在 3 月下旬就因为发表反对周恩来演讲而受到揪斗的北京钢院张建旗等人，也在北京大学开会，组织对周恩来进行"揭发批判"。

5 月中旬起，北京出现直接攻击周恩来的大字报和大标语，一些造反派还提出炮打周恩来的理由，说："总理是'老保'，保这个，保那个，结果保的都是坏人"；"国务院许多副总理都垮了，他们的错误不会和总理没有关系"；"总理的多次讲话与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讲话调子相差很远"；"周恩来是'二月逆流'的总根子"等等。

5 月 16 日，外事口一些单位的造反派组织先后贴出矛头对

准周恩来的大字报和大标语，如：

“周恩来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制定者和执行者之一，绝不是毛主席、林副主席的亲密战友，绝不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

“炮打周恩来绝不是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

“炮打周恩来是当前运动的大方向！”等等……

这天，北京外国语学院“六一六兵团”贴出大字报《戳穿李先念之流的一个大阴谋》，说周恩来是保护李先念之流的反革命两面派。

社会上流传“周总理快要被打倒了”的谣言。北京钢铁学院、北京外国语学院、农业大学等学校的少数造反派在学校内张贴大字报大标语，攻击周恩来，当即遭到本校广大师生的愤怒反击和声讨。

北京农业大学进驻进驻国务院农办、农政机关的“东方红”部分学生也在 5 月 16 日这天闻风而动，宣布成立“农业大学东方红公社五一六兵团”，并贴出《成立宣言》，声称要“高举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红旗，坚决反击‘二月逆流’，‘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批判那些混进党和政府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宣言》还要求“应旗帜鲜明地为秦化龙将军平反、翻案”。《宣言》虽然没有直接提及周恩来，但含沙射影攻击周恩来。

国务院农办、农政机关保秦化龙一派的群众对北京农业大学成立“五一六兵团”的《成立宣言》十分恼火，立即公开发表声明谴责、批判“农业大学东方红公社五一六兵团”的《宣言》，同时找组织“五一六兵团”的红卫兵头头谈话，严厉责备他们不

顾大局，无事生非，给国务院农办、农政机关运动添乱，制造麻烦。

好在这些学生人数极少，年纪轻，思想转变快。受批判谴责后，马上贴出大字报承认错误，解散“五一六兵团”，并停止一切活动。

但是，这短命的“农业大学东方红公社五一六兵团”，虽然只有一天的历史，却在后来给大家带来了无穷灾难。

## 第 646 回：发文章《伟大的历史文件》五一七，北大“东方红”□世

5 月 16 日中午，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 118 厅会见刚果（布）政府保安部门负责人宾迪率领的刚果（布）政府保安代表团。会见时，毛泽东谈起了中国当时的国内形势，他说：

“乱得很，红卫兵到处闹。”

“不是我创造的，是群众创造的。大字报，红卫兵，都是他们创造的。炮轰这个，炮轰那个，打倒这个，打倒那个。”

“我们的一些事，完全没办法。我们政府、中央、公安部毫无办法，红卫兵、群众一起来，就有办法了。几十年我们不清楚的事，红卫兵一闹就清楚了。”

“你不借红卫兵的力量，什么法子也没有，一万年也不行。”

“大概乱一两年就好了，现在已经乱了一年。乱是由于阶级斗争，两派斗争，左派同右派斗争。乱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天掉不下来。我曾经给别的外国朋友讲过：第一，天掉不下来；第二，山上的草木照样长，你不信到山上去看看；第三，河里的鱼照样游；第四，女人照样生孩子。”

“我们的政府是靠群众。没有群众，什么事也办不成。当然，我们也靠党和解放军。党从哪里来？还不是从群众中来的。解放军的干部和战士，还不是从群众中来的。没有群众，哪里有党？哪里有解放军？”

毛泽东在这次谈话中回顾了“文化大革命”开始到 1967 年 5 月以前的发展过程，也谈了他对当前运动的看法。他说：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从政策策略上讲，大致可分四个阶段：从姚文元文章发表到八届十一中全会，这可以算第一个阶段，主要是发动阶段。八届十一中全会到一月风暴，这可以算第二阶段，主要是扭转方向阶段。自一月风暴夺权到大联合、三结合，这可以算第三阶段。自戚本禹的《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及《修养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发表后，这可以算是第四阶段。第三、第四阶段，都是夺权问题。第四阶段是在思想上夺修正主义的权，夺资产阶级的权，所以这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是决战的关键阶段，是主题，是正题。”

“本来在一月风暴以后，中央就着重大联合的问题，但未得奏效。后来发现各个阶级、各派政治势力还在顽强地表现自己。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是没有任何力量的，捏成了还要分。所以现在中央的态度只是促，不再捏了。拔苗助长的办法是不成的。这个阶级斗争的规律，是不以任何人主观意志为转移的。”

“本来想在知识分子中培养一些接班人，现在看来很不理想。”

“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知识分子和广大青年学生搞起来的，但一月风暴夺权、彻底革命就要靠时代的主人，广大的工农兵做主人去完成。知识分子从来是转变、察觉问题快，但受到本能的限制，缺乏彻底革命性，往往带有投机性。”

谈到世界革命形势时，毛泽东说：

“你们的教员也是帝国主义，帝国主义不压迫你们，你们就不会起来革命。全世界革命的人总是多数，反革命的是极少数。不过，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控制了城市、工厂、广播、报纸，

就显得它有力量，如美国就是这样，过去中国也是这样。群众起来，他们就害怕了。他们不怕我们这些人，怕中国的老百姓。所以你们要注意团结人民。帝国主义不怕你们，怕你们的人民同你们团结起来。世界上的事，无非是这一派推翻那一派，那一派推翻这一派，归根到底，还是人民推翻压迫者。”

当宾迪谈到“毛主席不仅是中国人民的领袖，也是世界革命的领袖”时，毛泽东说：

“要声明一点，我不是什么世界革命领袖，中国的事还管不好，还管外国的事？中国的右派反对我，我也没办法，现在开始找到一些办法。给我的封号很多，我都不承认。”

5 月 16 日晚，陈伯达接到了毛泽东的电话。毛泽东在电话中说：“今天是《五一六通知》一周年的纪念日，明天全文发表《五一六通知》，再配发一篇社论。另外，把《二月提纲》作为附件一起发表。”“社论是来不及了，可以晚一天发表。”

5 月 17 日，《人民日报》公开发表《五一六通知》。当天，陈伯达给毛泽东送审《红旗》杂志、《人民日报》为公开发表的 1966 年 5 月 16 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通知》而写的编辑部文章：《伟大的历史文件》。

毛泽东作了一些修改，并在送审稿末尾加写了一段话：

现在的文化大革命，仅仅是第一次，以后还必然要进行多次，毛泽东同志近几年经常说，革命的谁胜谁负，要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才能解决。如果弄得不好，资本主义复辟将是随时可能的。全体党员，全国人民，不要以为有一二次、三四次文化大革命，就可以太平无事了。千万注意，决不可丧失警惕。

然后批示：

即退王力同志。

改了一点，请小组酌定。

毛泽东

五月十八日上午二时半

5 月 18 日，经过毛泽东亲自改定，由中央文革小组起草的《伟大的历史文件》一文在《红旗》杂志、《人民日报》发表。

我们再看看此时的北京大学。4 月 14 日后，在中央首长的指示下，北京大学校文革开始进行第二次整风，但是搞了两个星期后就结束了，再次引发群众的不满。

4 月下旬，北京大学化学系 63 级一些学生联合了数十个战斗队，在学校里公开发起串连会，讨论对聂元梓和校文革的看法。

北京大学化学系 63 级共有 3 个班，一班的班主席在 1966 年 8 月带领几个人率先成立了“星星之火战斗队”，班里剩下的近 30 人也赶紧组织起来，以林彪率领过的威名显赫的 115 师命名，成立了“115 师”战斗队。

后来，一班的“星星之火战斗队”与化学系 63 级的另外两个班战斗队合并，通称“0363 红旗”。因为北京大学化学系 63 级的代号是“0363”。而“0363”二班“被淘汰分子”由学生陈醒迈牵头，参加了 1966 年 10 月成立的“北京公社”，成为其中的一个战斗队。三班的剩男剩女们，则在学生樊能廷发起之下，成立了“慨而慷”战斗队。

1967 年 2 月 15 日“新北大公社”成立后，“0363”的“红旗战斗队”成了它的成员，在化学系成立了“红三团”。一夜之

间，他们戴上了“新北大”的红袖章，十分神气。而“115 师”等人，有种莫名其妙地被抛弃，踢出主流派之外的感觉。他们咽不下这口气。

二班学生陈醒迈和齐菊生等人，在 1966 年秋冬曾是聂元梓的支持者，反对北大“井”“红”组织的观点。但后来逐渐背离聂元梓，对聂元梓提出了批判的口号。4 月下旬发起串连会的化学系 63 级一些学生正是这批非主流派的学生。

4 月 27 日，北京大学大饭厅召开串连会，批评聂元梓。在北大“录音带风波”中初露头角的化学系“北京公社”陈醒迈，再次亮出反对聂元梓的牌子。

这次辩论还留下了哲学系左派教师郭罗基的一句名言：“聂元梓显得高大，是因为你们趴在她的脚下，跪着的人们，站起来吧！”

起草“第一张大字报”的聂元梓昔日战友孔繁、杨克明也打破了沉默，他们认为聂元梓是在镇压革命群众。孔繁当众声言：“我们不能赶走一个赫鲁晓夫，再让一个赫鲁晓夫上台；这种人，是不是一个大左派，要打个问号！”

第二天，4 月 28 日，由“新北大公社”主流派组织的 200 多个战斗队也发起串连会，与反聂派唱对台戏，试图制造声势，压倒反对派。

以陈醒迈为首的“0363 北京公社”在大饭厅入口处三饭厅东墙贴出了长篇大字报：《论我们与聂元梓的分歧与发展》。那是一块最好的大字报宝地，去两个食堂吃饭的人都能看得到，相当于《人民日报》的头版头条，每天都会围着里三层外三层的人。

为争那块宝地，还打过架，必须半夜三更去占领。抄大字报的是戴定国，他们战斗队的笔杆子，后来进了“井冈山兵团”广播台，许多反聂檄文出自他手。他字也写得漂亮，那天别出心裁，在署名“0363 北京公社”时，故意用红色把“0”写得特别大。后来他们又有几分重型文章，贴在此处，署名照此办理。“0363”一班和三班的另外两支战斗队“115 师”和“慨而康”跟着学，署名时把“0”写大。后来，扩大到 0 打头的其他系，甚至不是 0 打头的系，为了表示反对聂元梓的观点，在署名战斗队前也画一个“0”。于是，大字报里“0 字”满天飞，成了特色，他们这一派于是被称为“0”派。“0”派自称：“无产者一无所有从零做起，领袖批示文件划 0 照办”等等。“新北大公社”则说他们是大“0”蛋，前途是“0”。

“0”派的兴起，令北大的面貌再次发生变化，大字报重又琳琅满目，大多是批聂元梓的，极尽讽刺之能事。聂元梓被比作慈禧太后，“老佛爷”的绰号不胫而走。

5 月 17 日，北大大饭厅东墙，即聂元梓第一张大字报张贴的位置，贴出了《新北大东方红公社成立宣言》：

**新北大东方红公社**

**成 立 宣 言**

最高指示

“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在路线问题上没有调和的余地。”

“我们必须坚持真理，而真理必须旗帜鲜明。”

历史车轮，滚滚向前！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怒涛，汹涌澎湃！

……

但是，我们十分痛心的看到：北大校文革……把新北大搞成独立王国……在校内外顽固地执行了一条不折不扣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

就是这个校文革，竟然借镇反之机，对奋起批判他们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广大革命群众进行了令人难以设想的政治迫害和残酷镇压，并盗用中央名义把“井冈山”、“红联军”等革命群众组织打成反动组织，横加取缔。有多少革命群众被迫写了“检查”、“交代”、“请罪书”；有多少革命群众被抄了家，剥夺了自由和发言权；又有多少革命群众挨了打，挨了斗，被逼得走投无路，神经失常，甚至有的走上被迫自杀的绝路！

就是这个校文革，在干部问题上继续贯彻了“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此刻又倒打一耙，把这个罪名横加到革命小将头上！

就是这个校文革，在镇压了校内反聂组织之后，又拼凑起一个……大杂烩——所谓“新北大公社”，作为自己的御用工具，而把手伸向全市……妄图夺北京市的党政财文大权而独揽之，其野心可谓大矣！

这样的校文革，难道还不是顽固地执行资产阶级的反动路线吗？

……

在北大运动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我们向新北大的全体

革命师生员工和全市革命人民庄严宣告："新北大东方红公社"诞生了！……我们终于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重重包围中杀了出来！

……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不管前进的道路上有多少艰难险阻，波澜曲折……让大帽子铺天盖地地压过来吧！让大棒子劈头劈脑地打过来吧！让咒骂声没羞没脸地飞过来吧！我们将在阶级斗争的大风大浪中，考验出我们过得硬的革命队伍！

……

1967.5.17

《宣言》是写在大红纸上，楷书，既严正又流利，既端方又漂亮，十分醒目。

人们蜂拥而来，将大饭厅东墙前挤得水泄不通。有的男同学边看边流泪，似乎内心很激动，看样子是"井"、"红"成员。但也有不少的学生，一边看一边骂。

很快，谩骂、攻击的大字报几乎贴遍了饭厅南墙、小饭厅东墙、16 楼北墙和"三角地"席棚，甚至路边、未名湖畔假石上都有标语，说"东方红"是"反动组织"，成立"东方红"的家伙是"躲在阴暗角落里的反革命小丑"，"是阴沟里的苍蝇在嗡嗡叫"，是"井"、"红"的灵魂不散，是为"井"、"红"鸣冤叫屈的"反革命"，等等。

上午 10 时许，校文革在大饭厅召开全校大会，"新北大公社"作战部长、哲学系李老师在大会上动员"新北大公社"战士，要

查出“东方红公社”是些什么人组织成立的？号召大家一定要与这些“反革命分子”作坚决的斗争，保护革命左派聂元梓，保护校文革的“红色政权”!

是啊，这个“新北大东方红公社”是由什么人组成的？谁也不知道。

下午，哲学系通知老师到 24 楼教师宿舍开会，也通知了参加“红联军”的教师颜品忠参加。颜品忠自 2 月底被斗争 3 次后，一直未参加系里的任何活动。他来到 24 楼北面一个房间，才知道是讨论“新北大东方红公社”的问题，每人都发言。系里的罗曼老师原来也是“半个黑帮”，可能是刚被“解放”出来，她一开口即大骂“东方红”，说不知这些家伙是什么人，竟敢攻击“聂元梓同志”，攻击校文革，但又不敢公开跳出来，亮出自己的名字，“那算什么英雄？其实是躲在臭阴沟里嗡嗡叫的癞苍蝇!”

罗曼就坐在颜品忠对面，颜品忠心中暗暗发笑。最后，他们让颜品忠说说。颜品忠说：“我下午过来，大字报还未看到，谈不出什么来。”

晚饭后，颜品忠邻居生物系女教师到他家，也说“东方红”的事情，问颜品忠是否知道是些什么人搞的？颜品忠说不知道。如此来了三次，颜品忠都推不知。有一天晚上，这位女教师突然气呼呼地跑到颜品忠家，责问他说：

“今天我已打听到了，‘东方红’原来是樊立勤和你几个人组织的，我来问你几次，你都说自己不知道，你到底是什么意思？”

颜品忠说：“北大现在仍然是一片白色恐怖，我们都有纪律，

对外暂不公开。”

原来，北大生物系学生樊立勤由于参加了炮打康生受到北大校文革的打压，跑到了农业大学，该校“东方红”支持他。4 月下旬，清华“414”3 位同学来到北大找颜品忠，告诉他樊立勤现住在农大，他叫颜品忠约西语系刘帼贞、俞芷倩、哲学系韩琴英（何青）、赵习文 4 人第二天下午到农大×楼×室见面。

第二天，颜品忠 5 人各骑自行车如约来到中国农业大学与樊立勤见面。彼此略叙各自遭遇，最后决定：成立组织，发表宣言，重整旗鼓，再战老聂！

此后，北大部分教师、学生：樊立勤、冯德荣、谢佐平、韩琴英、赵习文、俞芷倩、刘帼贞、颜品忠等，经常去农大聚会，交流校内外动态，分析形势等。他们彼此之间保持秘密联系状态，避开“新北大公社”的监视，不敢公开往来。

关于成立组织的名称问题，樊立勤提出：“清华‘414’、地院‘东方红’、农大‘东方红’都支持我们，我们也叫‘东方红’好了。”

大家一听，连连叫“好”。于是便取名为“新北大东方红公社”。

《成立宣言》，大家颇费心思。经过多次讨论，反复修改，最后定稿约 4800 字。樊立勤把稿子交给了农大“东方红”的同学代劳抄写，他们非常用心，用工整的楷书抄写在大红纸上。

《宣言》写好后，什么时候去北大贴出？他们又颇费了一番心思：首先考虑近几日中央领导有什么讲话，据此来分析他们在这种形势下贴出《宣言》是否适当？其次是在北大当时的气氛下，

选择何时去贴才少点危险？

5 月 14 日晚，颜品忠、韩琴英、赵习文 3 人在农大与樊立勤、谢佐平、冯德荣一起议论、分析近日的形势，同时坐等清华“414”3 位同学和农大“东方红”几位的最新消息，结果，一直等到子夜 0 时。据清华、农大同学带回的情况分析，似乎《宣言》还要等到明日再说。

第二天，5 月 15 日，他们又等了一个晚上，还是不能贴出。

如此等了 3 天，5 月 16 日晚，仍在农大，他们决定第二天公布《宣言》，由农大同学负责去北大贴出。

5 月 17 日凌晨约 4 时，农大“东方红”几位同学，携带《宣言》大红纸一捆、浆糊一桶，各骑自行车来到北大的西南校门，正好有几个拉着三轮车来北大食堂掏泔水的农民也来叫开门。农大的同学趁门一开，便一起混了进去，到了大饭厅处，便把《宣言》贴上了东墙，也就是聂元梓七人大字报张贴的位置。

“新北大东方红公社”虽然在北大“问世”了，但樊立勤他们几个发起人仍不能回校“亮相”。由于农大路远不便，所以清华“414”学生在清华园内找到了一处平房 104 号，供“新北大东方红公社”作“总部”驻地，里面桌、椅、大字报纸、笔、墨等一应俱全。这里离北大仅一马路之隔：马路之东是清华的西墙，马路之西便是北大的燕东园。清华西墙里面是教职工住的公寓，为了出入方便，西墙开有一门，门外不远处则是北大教职员工住的 4、5、6、7 公寓。

北大“东方红”虽已迁清华，但农大“东方红”仍继续给予他们援助，不仅出资出力，还代劳与一家印刷厂交涉，用铅字排

版，将北大“东方红”已贴出的《成立宣言》印刷成传单，直接在北大校园里散发。

## 第 647 回：刘少奇一九二五年被捕“五〇四”，“丙组”改为“刘王组”

中央政治局常委 1967 年 3 月 21 日决定将“刘耀祖案中涉及刘少奇在 1927 年叛党嫌疑问题”的材料交“丙组专案办公室”，即“王光美专案小组”的办事机构调查后，对刘少奇的专案审查正式开始，5 月以后进展加速。湖南省公安厅、宁乡县公安局军管会转来《杨剑雄反省》的材料，讲述了刘少奇 1925 年被湖南省省长、军阀赵恒惕逮捕后，杨剑雄是如何营救刘少奇出狱的全过程。

杨剑雄和刘少奇是小学同学，也是当地地主。因为赵恒惕是杨剑雄的姨表姐夫，1925 年他在湖南省长署任会计。

1925 年，时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副委员长、上海总工会总务部主任的刘少奇，刚刚参与领导了“五卅运动”，于 9 月 19 日与李立三等人，遭淞沪戒严总司令部传讯。此时，刘少奇患肺结核病，于 11 月中旬，偕妻子何宝珍由上海回到长沙养病，借住在长沙潮宗街 56 号文化书社。书社是毛泽东等人于 1920 年 7 月创办的，是早期共产党人秘密联络的机关。文化书社与湘雅医院相距不远，看病很方便。

在刚刚过去的“五卅运动”中，长沙和湖南各地的数万名工人、学生、市民，参加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声援上海工人的斗争，给当时的湖南省省长、军阀赵恒惕极大的震撼。这时，他接到密报：刘少奇回到了长沙。赵恒惕担心这位著名工人领袖的到来，会引发更大规模的群众抗议示威活动，便派出密探查清了

刘少奇的行踪和落脚点。

1925 年 12 月 16 日中午，刘少奇外出返回书社时，被抓到了长沙戒严司令部。

赵恒惕在 6 月发布了“宣传过激者斩”、“煽惑军心者斩”、“造谣生事者斩”、“扰乱秩序者斩”的所谓“四斩”通令，10 月杀了湖南的工人运动领袖黄静原等人。刘少奇被捕后，经过审讯，赵恒惕亲批将刘少奇“斩决”。

长沙《大公报》得知此事，于 12 月 17 日，以“戒严司令部逮捕刘少奇”为题，将这一消息公之于众：

“上海总工会总务部主任刘少奇。近患肺痨。日前偕其妻室回湘养病。昨日下午一时。刘往贡院西街文化书社购书。入门不一刻。突来稽查二人。徒手兵一名。扭往戒严司令部至其被捕原因。尚不得知。闻刘系宁乡人。曾肄业于长沙明德学校。近年居沪。为各项群众运动中之领袖云。”

时任省长署会计股会计员的杨剑雄在参加赵恒惕和各处长办公会时，也听到这一消息，觉得好像是他的小学同学刘卫煌。后到监狱探看，果然是小学同学刘卫煌。他在《杨剑雄反省》中是这样叙述的：

我于民十三年在军阀赵恒惕所组织的伪省长署会计股当会计员。某月的一天。我出席赵恒惕和他的各伪处长合室办公的时候。听到伪军法处赵处长报告。“昨晚省长令我拿的共产党刘少奇我比派卫队营的兵于文化书店捕获来了请示如何处理”赵恒惕答“你提问一下速送陆军监狱署收押”并对陆军监狱署李伪署长写

了一个手令任何人不得接见。我听了之后。就想到这个人不是我从前同学后在育才中学毕业去过俄国的刘卫煌吗？一俟下办公。赵恒惕先走出时。我即在伪赵处长手中借案卷一看。注明系宁乡人。我更想到像他了。下了办公之后。我就去军法处去偷看提问。我在隔天井阶边看见一个着灰布长袍。手向后靠。拿了一顶博士帽。背对着我正在答问。果然是我想象的他。一刻军法处将他送至陆军监狱署。我回到我的办公室料理一切后。即喂车赶至陆军监狱署。去看慰他。但伪李署长以奉有任何人不能接见之令。不让我会他。这位李署长原与我有旧官场中的酒席应酬。并李也晓得我系赵恒惕的相信人员。我和李说了许多请求通融的话。并最后提出如赵恒惕责备你（李）归我负责。李终于允许了我去会他。在进入几层关锁的深狱中。隔栅与他相见。我的样当然比在读书时不同。并挂有伪省长署的特别证章。他似不认识我的样子。我报了名字给他。他脑子里静了一下。就连声答记得了。我问他“你为甚么来到这里。”他答“我也不晓得为甚么。”他讲时注意我的证章似有顾虑的样子。我就很忠实很庄严的对他说。“我现在某处做事。晓得你的事极严重。你有甚么事。甚么话。还不对我讲还不相信我。那就恐怕没再有人能进这里来会你了。”他听了我这番话。澄思了一下。就对我说。“我的内人何（忘甚名）住青山祠南门外某号。请你去问她就知道。在这里我不便讲”（旁有看守的）我又问他“你要钱用不。还要其他东西不”他答“我不要钱我只要一床被请你要我的内人送一床被来”我就安慰了他一番连忙跑到青山祠去会何夫人。何当时不在家。我留了一个名片写明住址要何速来我家。我回到家（住鸡公坡）没久。何即来我

家。悲泣撞伤不已。我安慰了她许久。她才咽哑平静下来。我问她卫煌为甚么被捕。我今天已在陆军监狱署会见了他。要我来会你。就知道的。”何答“这次他是回到湖南接他的儿子。那末他所做的事杨先生你也是晓得的。他在上海住不住。所以回到湖南。不料在这里被捕去了。”我将我和他的关系、及知道案情的严重。并愿竭力营救他的心情。告诉了她。她表示感意和付和说。我已着人回乡去叫他的老兄来省。他的老兄来了看如何进行。我又告诉她。他在狱里要一床被。她即将被送去。而伪陆军监狱署人员不予收转。我又写信给李署长连被着人送去才允收转。过两天他的老兄刘六公到省。商量营救方式。那时有芳储乡住的洪庚扬在某处做事。与他同里同学。闻讯参加营救。于是我和洪分途进行。请宁乡当日所谓首要人物叶开鑫贺耀祖谭润生次要人成苍林杨晋圭等共同具禀担保。保禀由刘六公写作好。再由刘六公和我及洪三人出名席请叶贺等到天乐居。将保禀一一加盖私章。他们并将保禀交付给我。要我当面送交赵恒惕。我踊跃承担这任务。并与叶贺相约如赵问你们时请你们切实担保。我比回到省长署。就持保禀迳至赵恒惕办公室外。连声报告要见省长。也不顾自己的人微职小。准我进入时。赵正在批阅公文。赵问了我一声。有甚么事。我即将保禀递交说，叶师长贺师长等要保刘少奇。赵将保禀看了一下。即置案旁。一面批阅文件。一面说道。这是要宰的人。你也来保。我呆立了好久。一身发抖。汗湿襟背。不敢动。候赵的公文批阅完毕。再来设法要达成我的人物。赵问我你与他有甚么关系。我答“系同乡同学。”叶竞秋会负责保他吗。我答“他们都能负责、如果省长不相信、可打电话问他们。”赵即叫

马弁摇电话与叶。我不俟马弁入。我即走去将电话摇好。要叶师长说话。叶晓得是我喊他。当然明白这回事。赵接了电话。只听得问了一句刘某你能负责吗。后应了几声。就挂了筒。赵回到座位上。想了一阵。对我说。你能负责？我答“能负责。看省长如何吩咐我就如何做。”赵说“你要他迅急离开湖南。不要在这里乱搞。要庶务股去买一册四书五经送给他。好好去读。”我答“这些事我都能负责办到。”赵即将保禀上批“交保开释”四字。我即将这案件送至伪军法处办理手续。空了两天。他就出险了。出险后。他和何夫人到了我家。道谢了我。何夫人并说我们这一生不会忘记你。他最后提出问我。说。你愿意入党不。我那时浑然一物。闷憧过日。没曾认识到这步。回答他我不入。过后我想这恐怕是他无以答谢我。以此来当作礼物罢。只怪我接受不了。别时，他告我他在长沙还有几天。耽过，就会去上海。

其时正值第一次国共合作，赵恒惕逮捕工人运动领袖，全国舆论一片哗然。最先做出反应的是中华全国总工会，12 月 25 日在《工人之路特号》发表通电，敦促赵恒惕释放刘少奇。1926 年 1 月 1 日，在广州召开的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决议，以大会的名义致电赵恒惕要求释放刘少奇。

与此同时，刘少奇少年时代的朋友，时任湖南省禁烟局局长洪赓飏，也参加了营救活动。

赵恒惕手下有 4 个师长，其中叶开鑫和贺耀祖两个师的军饷都是由禁烟局直接拨付，洪赓飏与他们的关系非同寻常。洪赓飏分别宴请叶开鑫和贺耀祖，开门见山地要求两人保释刘少奇出

狱。贺耀祖痛快地答应了，叶开鑫却拿腔拿势，不愿松口。

叶开鑫是关键人物，长沙戒严司令是他昔日的部属，他出不出面，关系极大。洪赓飏知道叶开鑫爱收集文物字画。为营救刘少奇，洪赓飏将自家视为传家宝的一幅乾隆皇帝的御笔条幅取来，连同一封言词恳切的信，送至叶开鑫公馆。叶终于答应帮忙。

刘少奇的胞兄刘云庭曾在湘军中任过相当于营级的军官，他也多方求助于所认识的上层人士，并搬动了宁乡籍的国民党元老周震麟、赵恒惕的 4 个师长之一鲁涤平等大批知名人士，他们给赵恒惕或写信或致电或登门说项。

终于，赵恒惕对叶开鑫说："抓了一个刘少奇，闹得满塘麻蝈（青蛙）叫。我懒得管这件事了，由你去处理。"

1926 年 1 月 26 日，刘少奇终于恢复了自由。于 2 月 19 日到达广州。

1927 年，湖南农民运动风起云涌，杨剑雄为逃避农民斗争，跑到武汉汉口找刘少奇，刘少奇保护了他。他在《杨剑雄反省》的结尾部份是这样写的：

又民十六年正月。我在乡间住不住。去上海过汉口。在全国总工会旁边一个巷内（他的家里）会见了他和何夫人。我告诉了我在乡的情形。他替我拍了一个电报。并写了一封信给宁乡县党部。我家得以无恙。

这里的"他"，就是刘少奇。

解放前夕，杨剑雄的胞弟杨章绶是湖南芷江飞机场的站长，在国民党撤退时，他考虑到杨剑雄的地位，在国民党政府中属中

下层，解放后难免受冲击。曾准备接杨剑雄去台湾，杨剑雄未去。

当杨剑雄得知刘少奇已任中央政府副主席后，于 1949 年 11 月 8 日给刘少奇写信，向他介绍了两个“国术专家”：

少奇吾兄副主席惠鉴

汉皋一别忽忽廿有二年地角天涯无时不神驰

左右数十年艰苦卓绝不断奋斗新国建立宇宙改观

吾兄之功伟矣全民庆幸故人庆幸弟于十七年就读大夏后与时不合遂而乡居从事教育又为所束后事生产小农场与乡人改进稻植培植森林悉心研究果蔬园艺以劳动生产十余年来未敢稍懈适与当代各公之主张全民劳动相吻合而乡人亦视弟为非堕落安享者此间主持党务为成治平县杨厚吾何逸先区诸兄间有接触妄谓弟为开明多所照顾差堪告慰耳倘得

吾兄一纸书为弟招呼则更幸矣顷阅报载

朱总司令出席全国体育会讲话对全国体育将大有改进国术各门均须普遍训练兹有友人郭起凤彭玉麟两君河南光山县人为国内最有名之剑击家郭曾任天津市武术会会长广州市国术馆馆长击败日本进藤中佐北部大佐德国库司顾问名藻一时彭曾任长沙国术馆馆长及湖南商专工专教师寄居舍间有年深知技术极精思想颇能与时俱进倘得

政府擢拔对人民服务必有极大贡献敬祈

吾兄为之推毂举国内之遴材罗致之公私两利不胜拜祷之至专此奉达敬（？）

钧安企候

赐示

弟杨剑雄谨启十一月八日通信宁乡太平桥转

王光美在信封左上角批注的“杨剑雄介绍二位国术专家”。

1951 年，全国土改轰轰烈烈，杨剑雄又跑到北京求见刘少奇，遭拒。他跑到外地，1952 年被当地政府抓捕。杨剑雄因属恶霸地主，当地政府判他死刑。杨剑雄为表示自己曾对革命有功，与刘少奇关系非同一般，在狱中写了《杨剑雄反省》的材料，希望能够保命。

1953 年 1 月 26 日，宁乡县公安局给刘少奇写信，转去杨剑雄的《反省》材料，请示处理意见。信的全文是：

刘副主席：

据我县恶犯杨剑雄供称有一九二四年当主席在长沙文化书店蒙难匪陆军监狱时杨犯以主席同学关系曾出力邀请贺耀祖及叶开鑫等出名向赵匪恒惕具保始得容救主席出狱一事，杨犯一贯横行乡里残害人命群众痛恨入骨业经我县呈奉湖南省人民政府批准死刑在我们为了慎重起见特备函请示上项荣救主席事是否确实以便处理迄赐批复是幸。

此致

尊高的敬礼

宁乡县人民政府公安局霍建国上

请在十日内电复我们，以便处决。

因为杨剑雄的材料中将刘少奇被捕时间写成了“民十三年”，即民国十三年，相应于 1924 年，所以宁乡县公安局的报告中也将刘少奇的被捕时间写为 1924 年。

信经公安部转到中南海，当时中南海负责处理北京地区信件戚本禹首先看到这封信，并按程序转给了秘书室负责处理中南地区信件的科长朱固。朱固把信送给了刘少奇。

刘少奇收到宁乡县公安局的信后，直接在信上写了批示：

湖南宁乡中共县委转公安局霍建国同志：

一月廿六日来函悉。杨剑雄和我在小学同过学，以后卅多年来未发生过任何关系，他所称一九二四年在长沙营救我出狱等语，并无其事。我一九二五年在长沙被捕，因有很多人营救，在狱两个月后得以出狱，但这与杨剑雄毫无关系。杨犯罪恶仍应按你们判决处理。

刘少奇一月廿九日

并于当天给将此批示电报发给宁乡县委转县公安局。

1953 年 2 月 8 日，杨剑雄被处决。

对此，杨剑雄的家人自然是愤愤不平。文革中，杨剑雄的姐姐杨莲娟说："杨剑雄叫赵恒惕姨父，杨剑雄得到赵恒惕的赏认和信用，所以刚 20 岁出头就当上了省政府的会计。因刘少奇和杨剑雄他们是县城玉潭小学时的同学，两家离的很近，也就七、八里。当年能直接见到赵恒惕的，只杨剑雄有这个方便条件和背景，杨剑雄营救刘少奇是完全出于帮助同学而为。"

杨剑雄的姐姐说："洪赓扬是赵恒惕手下的禁烟局长，贺耀祖、叶开鑫是赵恒惕的部下师长。他们与刘少奇无亲无故，互不相识。要是没有赵恒惕的侄子出头，以及赵恒惕改变了杀刘少奇的主意，他们不会主动出面的。在那个年代，他们都是有头有面的人，未得到赵恒惕的许可和授意，他们不可能为共产党要人的出狱，

去做担保人。”她这里说的赵恒惕的侄子就是杨剑雄。

文革开始后，这件事又被湖南省的造反派群众组织重新提了出来，刘少奇当年批的那封信也被找出来了。

1967 年 5 月中旬，谢富治向“丙组”人员宣布，丙组改为“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对外叫“五〇四组”。在专案组的文件中，也是几种名称混用，有时单独用“王光美专案组”或“刘少奇专案组”，有时用“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或“刘、王组”。

## 第 648 回：五一九，接见内蒙警卫营　翻旧报，又□提“伍豪事件”

周恩来、江青 5 月 16 日接见内蒙古军区进京军人没有任何效果。接着，他们又组织内蒙进京上访人员开了三天的大会。5 月 19 日凌晨，周恩来、肖华在人大会堂专门接见内蒙古军区警卫营的代表。本来接见前只指定 73 名代表参加，结果接见时挤进去 100 多人。

周恩来说：“内蒙为什么出现这样的问题，责任在王逸伦、王铎，他们挑拨是非，把军区也拉进去了，他们从中得到好处。这次是最大的收获，查明了王逸伦、王铎是什么人。过去军区也受蒙蔽了，上当了。这几个月中部队也受了蒙蔽，在支左工作上出现了问题，责任在王逸伦、王铎，其次是军区个别领导人。造反派有一些缺点可以原谅。比如红卫兵冲中南海，冲了8次，有时冲到第五道门了，还有用大卡车冲进去了，像这样的问题还不严重吗？还不是大事吗？是毛主席居住的地方么，但我们并没有责怪他们，没有扣帽子，劝他们出去，指出这样做是不对的，冲无非是见我们嘛！那我们就出来见他们。造反派冲军区，想要军区支持他们，还是相信他们，你们不要太紧张了。邰德胜的问题，要调查清楚，但不要去宣传扩大，要保卫解放军的荣誉。韩桐死了，‘三司’登在小报上，我们还说了他们。整个解放军是毛主席亲手缔造的，是世界上最好的部队，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是战无不胜的。林副主席指示我们，要提高革命性、科学性、组织纪律性。我们要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

旗。你们要逐步掌握政策，不要和红卫兵小将计较什么，中南海周围喇叭很多，我们这些人养成了个习惯，晚上办公，白天睡觉，办公办到天亮，准备休息，喇叭响了，但毛主席从来没讲一句话，有时我们说几句，中南海喇叭是否少安一点，但他们感情一来，就不管这些了，对这些问题，我们就要谅解嘛！军队要有组织纪律性。军队就不能和学生一样，要保持稳定。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支柱，所以机关院校要搞四大，武装部队搞正面教育，不能说走就走，要有组织纪律性。军队还有个备战任务。军队无论如何要巩固、要稳定。这次你们到北京来，除73位代表是我们请来的，还有自己来的十几位，起码这一点就不怎么讲纪律。你们在人大会堂也看到了，有2700多人嘛！有许多是自己跑来的嘛，这就涣散了，这就不讲纪律了。这么多部队自由到北京来，还是第一次，但是我们没有责备你们，因为你们还是革命战士。

解放军不要戴红袖章了，红卫兵给我们戴袖章，是送给我们的嘛，就保存起来嘛！领章帽徽，人民解放军是最光荣嘛！解放军不要和其他战斗组织串连了，不准串连。前一阵呼市军区大院乱得像市场一样，这就忘掉了还有战备任务啦。你们是自己乱了一些阵。犯了一些纪律，我提一下就算了，也不要回去写什么检讨了。

工厂的工人组织，农村的基层组织，学校里的学生组织，这些基层组织，都是要革命的，都是革命群众组织。我们所主张的，是跨行业的。因为他们什么都管，就像北京的革命委员会。那是以后要搞的三结合。要是一个联合组织都像革命委员会，那怎么能行呢？所以要解散。对上层的领导人，可以回到原单位参加基

层组织。至于基层组织，就不要解散了。解放军就不要和这些基层组织在一起搞串连，看看他们的传单，同意他们的观点，也是可以的，有思想自由嘛，但不能有行动。因为你们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是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你们到北京来了，我们就要做工作的。警卫营要做模范，过去你们领导上犯了错误，你们是受骗的，所以认为‘三司’是个反动组织。过去你们支持‘无产者’，所以现在感情一时扭不过来。你们要集中在一起，整顿一下，要做模范嘛！部队还是可以更好地完成任务嘛！还是相信你们的嘛！我要是到呼和浩特，就住到你们那里去。青年人要有革命性、科学性、组织纪律性，要下决心改正过去的缺点，成为更可靠的人民军队，成为呼市文化大革命的保卫者。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突出政治，坚持四个第一，发扬三八作风，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特别是要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要很好地学习中央公布的通知。一年以前，毛主席就有英明的论断，还要学习阶级、阶级斗争、政权等论述。要弄清这些，就会坚决执行党的政策，自觉执行八条，做到打不还手，骂不开口。骂一句打一下算什么呢？这样就不会憋一肚子气了。”

“过去的责任不在你们，”“你们要准备接受新的光荣任务，如果你们还愿意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你们就要做模范，我们寄予你们很大的希望。”“只要你们带头回去，提高革命性、科学性、组织纪律性，坚决贯彻八条，就会把内蒙的形势扭转过来。我就讲到这里。”

5 月 19 日这天，周恩来收到江青送来的关于“伍豪脱党”的材料。原来，5 月初，天津南开大学“卫东战斗队”派人到保

定查阅旧报纸，发现1932年2月18日上海的报纸上有一则《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伍豪即“五号”谐音，是周恩来学生时代从事革命活动时曾经用过的化名。南开大学的学生将内容抄录后返回天津，南开“卫东”委派国务院秘书长周荣鑫的女儿、南开大学外文系学生周少华和“卫东战斗队”的二把手、化学系学生张国忠，专程将这些材料送到北京中央文革小组。

5月12日，周少华写信给戚本禹报告说：“我爸爸说的，有件事只能跟江青或者戚本禹说，别的人一个也不能说。”

戚本禹请示江青，江青就叫他去听听。戚本禹说：“我一个人去不好，总要有个人一起去才好。”

江青说：“那叫关锋和你一起去吧。”

据戚本禹后来回忆，江青还特别关照他说：“你要注意啊，她是周荣鑫的女儿，你不要给她造成我们反对总理的印象啊。”

戚本禹后来回忆说：“其实我之前也听说过这个事，知道这是敌人的造谣。那时来反映情况的人很多，但有很多都是陷阱，是想挑起我们中央文革和总理的矛盾。”

5月13日，戚本禹和关锋一起与周少华、张国忠两人谈话。周少华把他们查到的旧报纸登载《伍豪启事》的抄件拿给戚本禹和关锋看,戚本禹当场就说：“这是国民党造谣。”

关锋讲得更具体，态度还坚决。他说：“你不要说了，这都是敌人的造谣。按照登报的日期，那时总理已经到苏区一年了，怎么会去登这样的启事？”关锋从周恩来是什么时候去的苏区说起，证明报纸登载《伍豪启事》时，周恩来早已离开上海，正在苏区呢。他还说：“如果总理叛变,那他还会领导红军长征?”

周少华听了很高兴，说“我也不相信总理会叛变。但我爸爸说，这是组织原则，这事不能去和总理讲。所以一定要找江青。”

戚本禹和关锋将抄件取走送与江青，并向江青作了汇报。江青说：“我知道这事,那是敌人造谣，主席也知道。”

江青带着戚本禹、关锋一起去向毛泽东汇报。毛泽东认为他们做得对，并说，这个材料他以前也听说过的，都是假的，是陷害周恩来，挑拨我们之间的关系的。他让江青他们把处理这个事情的经过去告诉周恩来，把那些材料也都交给他，让他安心。

5 月 18 日，江青把周少华送来的 1932 年一些报纸上登载的《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转送林彪、周恩来、康生，并附信说：“5 月 12 日夜，收到周荣鑫的女儿周少华（天津南开大学红卫兵）给中央文革来信，说他们查到一个反共启事，为首的是伍豪（周××），要求同我面谈。”

5 月 19 日，周恩来在江青的信上批道：“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纯属敌人伪造。只举出二百四十三人，无另一姓名一事，便知为伪造无疑。我当时已居中央苏区，在上海的康生、陈云等同志均知为敌人所为，故采取了措施。详情另报。”

周恩来把这件事告诉了夫人邓颖超。并决定停下手头的一切工作，专门抽出时间亲自查阅当时上海的各旧报纸。

邓颖超也把西花厅的工作人员都召集到一起，包括秘书、卫士、司机和厨师。她向大家简单讲了讲这件事，让秘书赵茂峰去北京图书馆借来 1931 年和 1932 年上海出版的几种报纸，请大家一起查找当时报纸上刊登的有关这方面的消息。

报纸太多，而且是竖排，找这样只有一、二百字的小消息挺

困难。大家耐着性子，一张一张地翻找。终于在 1932 年 2 月 16 日、17 日这两天的《时报》、18、19 日两天的《新闻报》、及 20 日、21 日当时中国最大的报纸《申报》上找到了这则启事。周恩来很认真地阅读了这几张报纸上刊登的这则启事，然后说："再查，还有一条消息是当时在上海的党中央反驳国民党的。"

于是大家又查，查了很多报纸，后来在 2 月 22 日的《申报》广告栏里查到了。那则只有 45 个字的启事是这样写的："伍豪先生鉴：承于本月十八日送来广告启事一则，因福昌床公司否认担保，手续不合，致未刊出。申报馆广告处启。"

见到这条消息，周恩来高兴地说："这就清楚了。"同一张报纸在三天之内就同一事件刊出两条不同的消息，很明显，第二条是对第一条的否定。

周恩来让请来新华社的摄影师钱嗣杰，把所有登载那则启事的旧报纸一一拍照。并于当天，提笔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

主席：

连日因忙于四川和内蒙问题，并同内蒙军区请愿战士分批谈话，直至今天才抽出一天工夫翻阅上海各报，江青同志也于昨日转来各件，现在弄清楚了所谓"伍豪等启事"，就是 1932 年 2 月 18 日的伪造启事，它是先在《新闻报》2 月 18 日登出的。登后，同天，上海临时中央方面就向申报馆设法，结果，《申报》20 日、21 日登出伪造的启事，22 日登了广告处给伍豪先生另一广告启事的拒登回答，大概这是当时所能做到的公开否认伪造启事的办法。我在记忆中，有通过申报馆设法否认的处置，但结果不明，16 日午间已向主席这样说了。不过我原来将伪造的伍豪启事记

在通缉杀人凶犯周恩来、赵容（康生）之前，现在证明是我记错了，查遍 1931 年顾顺章、向忠发相继叛变后的上海各报，并无另一个所谓伍豪启事，而红卫兵也未发现另一启事。可见在我记忆中的伪造启事和通过申报馆设法的处置，均在我到江西后发生的，所以我只能从电报和来信中知道，也就全了然了。现在，把四中全会后与此有关的编为大事记送阅，同时，送上报道最详的上海《时报》1931 年 11 月 12 日合订本一册，《申报》1932 年 1 月 2 日合订本两册，请翻阅。此事需否专写一报告，待主席、林彪、康生、江青各同志传阅送上各件后，请再约谈一次，好作定夺。

敬礼！

周恩来

5 月 19 日夜

他还将 1931 年至 1932 年的有关事件编为《大事记》，一并送毛泽东阅。

毛泽东看了周恩来的信和所附材料后，作了批示：

送林彪同志阅后，交文革小组各同志阅，存。

所谓的《伍豪等脱离共产党启事》，发生在 1932 年。1931 年 4 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顾顺章在汉口被捕、叛变。顾顺章是中共中央特科负责人之一，知道中共中央在上海的机关和主要领导人的住处，对中共威胁极大，由于国民党中统头子徐恩曾的秘书钱壮飞是中共地下党员，获知这一紧急情报飞速从南京赴沪，周恩来、瞿秋白等连夜转移，才使中共中央避免了一次全军覆没。

当时，除了顾顺章之外，顾顺章在上海的家属也知道许多中共中央领导人情况及中央机关地址。特别是在中共中央机关转移后，他们知道了新址，写信向顾顺章告密。为此，中共中央决定采取非常措施，中共中央特科在周恩来、赵容（康生）领导下，于 1931 年 5 月杀死顾顺章家属十余人。

1931 年 11 月，叫“老先生”的中共特科成员王世德（化名李龙章）被捕，供出了顾顺章家属被杀的情况。于是，11 月 21 日，国民党下令发掘被埋的顾顺章家属尸体，在上海法租界姚主教路爱棠村三十七号、三十二号，在胶州路，武定路修德坊六号，在新问路，麦特赫斯脱路陈家巷九十一号，经一周发掘，掘出男女尸身各 8 具，共 16 人。

一时间，上海报界轰动，《时报》、《申报》、《新闻报》、《时事新报》、《民国日报》竞载新闻，刊登照片，报道顾顺章家属被处死的详况。

紧接着，各报又纷载《顾顺章悬赏缉拿杀人凶手周恩来等紧要启事》，悬赏“洋三千元”，捉拿“共党首要周恩来、赵容”。周恩来在上海处境危急，中共中央决定他于 12 月上旬离沪，沿着广东汕头——闽西——赣南秘密交通线，进入江西瑞金中央苏区。

在周恩来离开上海两个多月后，国民党中央党部调查科得知周恩来进人中央苏区，已无法“缉拿”，便伪造《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在上海各报刊登，进行反间。

当时在上海中共临时中央工作的陈云看见启事，当即派人前往申报馆，送去《伍豪启事》，要求刊登，以驳斥那个伪造的《伍

豪等脱离共党启事》。申报馆不敢刊登。几经交涉，才于 2 月 22 日在《申报》上登一“曲笔”广告：伍豪先生鉴承于本月 18 日送来广告启事一则，因福昌床公司否认担保，手续不合，致未刊登。申报馆广告处启。

这表明“伍豪”已送来另一则“广告启事”，只是“手续不合”，而“致未刊登”，间接地否定了那则伪造的启事。

3 月 4 日，《申报》刊出“周少山”启事。那是中共临时中央借助于在上海开户营业的法国律师巴和，终于得以公开否定那个伪造的启事：

巴和律师代表周少山紧要启事

兹据周少山君来所声称：渠撰投文稿曾用别名伍豪二字：近日报载伍豪等二百四十三人脱离共党启事一则，辱劳国内外亲戚友好函电存问；惟渠伍豪之名除撰述文字外，绝未用作对外活动，是该伍豪君定系另有其人；所谓二百四十三人同时脱离共党之事，实与渠无关；事关个人名誉，易滋误会；更恐有不肖之徒颠倒是非藉端生事；用特委请贵律师代为声明，并答谢戚友之函电存问者云云前来。据此，合行代为登报如左。

事务所

法大马路四十号六楼五号

“周少山”，是周恩来在中共党内常用别名。这则启事“构思”颇为巧妙，声明那个发表“脱离共党启事”的“伍豪”，“系另有其人”，非我“周少山”，亦即周恩来！采用如此巧妙的行文，终于以“合法”的面目，在《申报》上登了出来，以正视听。与此同时，1932 年 2 月 27 日在上海秘密出版的中共中央党报《实

报》，刊登《伍豪启事》，指出："最近在各报上看到'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一则，说出许多国民党走狗常说的话，这当然又是国民党造谣污蔑的新把戏！"

"伍豪事件"有关消息，传入江西中央苏区。2月下旬，毛泽东以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主席的名义贴出布告，郑重声明：

事实上伍豪同志正在苏维埃中央政府担任军委会的职务，不但绝对没有脱离共产党的事实，而且更不会发表那个启事里的荒谬反动的言论，这显然是屠杀工农兵而出卖中国于帝国主义的国民党党徒的造谣污蔑。

因此，毛泽东本人，对此事的来龙去脉，是清清楚楚的。另外，当事人康生、陈云对此事也是清楚的。

"伍豪事件"本是国民党造谣，早已随风而逝，变成了历史，只是偶尔还提及一下：比如，国民党特务黄凯在1953年6月受审主导时供称，伪造伍豪启事，"丝豪未达预期的效果"，"好久并无人来向各机关秘密自首"。黄凯道出了伪造伍豪启事的本意，除了离间周恩来之外，还在于企望中共党员们来自首——怪不得那伪造的启事署"伍豪等二百四十三人"以壮气势！

此外，在1962年10月31日和1963年12月27日，康生曾在两个提到《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的材料上，写下这样的话：

"这完全是造谣污蔑……实际上，当时周恩来同志老早已到苏区去了，根本不存在这样的事。""当时在上海的同志都知道这样的事。"

不曾想，此事在文革中又被学生们从故纸堆中检出，旧事重提。

# 文革史话

## 之第三部 全面内战 第七卷

刘朝驹 著

# 文革史话

之

第三部

# 全面内战

第七卷

# 目 录

第 649 回：打三天，淮南矿务局武斗　五一九，成都“中和场事件”.....1
第 650 回：都不满，广东大联合瓦解　香港岛，劳资纠纷引工潮.....9
第 651 回：谈铁路，七级部揪王秉璋　周恩来，接见三军“演出派”.....23
第 652 回：“问总理”香港岛实施宵禁 定协议，清华园里闹翻天.....32
第 653 回：再接见，内蒙军区众领导　五二四，周恩来谈香港、陈毅.....44
第 654 回：独立师，战士上访进北京　会场上，吴涛被打成重伤.....54
第 655 回：命令下，内蒙古局面转变　“八二六”，与“红成”矛盾加剧.....65
第 656 回：反总理，中央说绝不同意　国务院，各部委陆续军管.....77
第 657 回：纪登奎，扮铁路工人进京　五二六，郑州发生大武斗.....85
第 658 回：袁庾华，极赞同“文攻武卫”　五二九，第一次见豫代表.....96
第 659 回：天安门，《红卫兵组歌》谢幕　清华园，“四一四”决定分裂.....108
第 660 回：终未成，清华革委会夭折　李再含半月摧垮“四一一”.....116
第 661 回：五三〇，郑棉六厂被攻陷　细回想，李先念怎成叛徒？.....126
第 662 回：形势变，福建释放王泉金　五三一，徐州“支”“踢”争斗急....138
第 663 回：大武斗，津浦、陇海线中断　下决定，铁路、交通全军管.....148
第 664 回：放涤西，饶漱石为少奇证明　说江西，“辽革站”夜袭东工.....159
第 665 回：武斗起，辽宁省三足鼎立　冲报社，广西两派泾渭明.....167
第 666 回：闹京西，“四二二”京西静坐　六月一，首次接见桂代表.....177
第 667 回：互不让，涪陵两派争斗急　聂元梓，正式向潘、吴开战.....186
第 668 回：揪谷牧，中南海外搭帐篷　西门外，又成立“揪刘火线”.....195
第 669 回：六月三，“五一六”活动猖狂　连夜见，外事口、大专代表.....205
第 670 回：康生说，叛徒不会到处有　七机部，两派代表争不休.....217
第 671 回：众首长，接见豫驻军领导　陈伯达，见北京大专代表.....228
第 672 回：燕园乱奏响反聂大合唱　有矛盾，“新文革和旧政府”.....239
第 673 回：看浙江，中央下《六六通令》 围“春雷”“八一五”雨夜驰援..249
第 674 回：撤回难，施家梁一场混战　从此后，专业武斗队成立.....260

第 675 回：长沙城，围攻中苏友好馆 突围难终发生“六六惨案”.....270
第 676 回：众领导，接见湖南章伯森　定计划，“百万雄师”扫江城.....280
第 677 回：武力赶，三镇干部亮相忙　福州城，七天七夜大绝食.....290
第 678 回：炮声起，冰城陷“炮”“捍”对立　见领导，静坐在省革委前....301
第 679 回：六月九，哈军工再演夺权　说河南，林彪看三军演出.....311
第 680 回：外交部，也上演“三国演义”　重庆打，成都“产业军”瓦解....322
第 681 回：港升级，淮南唐家山开枪　六一三，武汉汽配厂武斗.....333
第 682 回：说农口中央二次见河南　反总理，“首都五一六兵团”.....343
第 683 回：第三次，接见河南省代表　不停歇，再接见广西代表.....353
第 684 回：很明确，中央支持韦国清　搞“兵训”，南宁市武斗加剧.....365
第 685 回：第三次接见桂两派代表 淮南打，“猴子兵”过火焰山.....373
第 686 回：六一七，民众乐园大武斗　掷砖瓦，激战在财贸大楼.....384
第 687 回：难敌众，“百万雄师”终撤走　宁夏乱，群众组织分四派.....394
第 688 回：林彪信，李先念尘埃落定　乌江断，肖力又轰张秋桥.....405
第 689 回：冰城打，总理再议秦化龙　围党校，山西杨成效被抓.....416
第 690 回：立三死，康生见河南领导　攻八农，新疆“广场大会战”.....426
第 691 回：六二四，香港联合大罢工　动吊车，汉轧厂其景惨烈.....437
第 692 回：困四院烧水运一片狼藉　细安排，组织攻打“工造总”.....449
第 693 回：长办撤，中央文革电报至　看三镇，到处是血雨腥风.....461
第 694 回：说涪陵，反刘张“红成”北上　沈阳打，辽宁省军区静坐.....472
第 695 回：各支派，云南“八”“炮”争斗急 赴春城，谢富治与王力同行..481
第 696 回：六二七，无锡火烧铁甲车 刘张斗，郑维山见晋代表.....490
第 697 回：中央见，甘肃省部队领导　戚本禹，与豫“河造总”座谈.....501
第 698 回：继续见，河南省“二七公社”　不客气，再批评“十大总部”....509

## 第 649 回：打三天，淮南矿务局武斗　五一九，成都“中和场事件”

5 月 8 日，经国务院批准，安徽省淮南市正式实行军事管制，并同时成立军事管制委员会，方仲林任军管会主任。

此时，淮南以“总司”和“炮总”这两大“总部”为代表的两大派对立情绪已经面临失控，而 607 回提到的淮南“426 事件”，更使淮南的两大派产生了彻底的决裂。到了 5 月 17 日、18 日、19 日，淮南矿务局连续进行了 3 天武斗，淮南矿务局的“支派”组织“局直联络部”所在地----矿务局大楼，遭到“炮派”从全市调来的万余人围攻，相持了两天没有结果。市军管会作了大量工作未能平息这场攻守武斗。楼里的水电饮食已被切断，仍在坚守不作妥协。淮南的“两大总部”，淮南“总司”和淮南“炮总”的代表尚在与军管会共同举行三方谈判，“炮派”的西部地区谢一矿“云水怒公社”，在未请示总部同意的情况下发动了新的攻势，一位姓刘的武林高手徒手攀爬到苏式大楼三层的顶部房脊，接应后续队员登上到顶部，掀开脊瓦，用瓦片向下砸，后边被拉上去的人越来越多，揭去楼瓦，如天兵神降，终于攻破对方最后的防线，占领了矿务局大楼。

3 天的武斗告一段落，伤者有百来人住进了九龙岗矿工医院。一周后，“总司”组织的慰问团去医院探望伤员时，伤者均头裹臂缠地躺卧接受治疗，伤员们阵阵痛苦的呻吟与号叫直穿耳膜，令人震撼不已。

与此同时，在 8 月 18 日的深夜，驻在田家庵淮南师范学校内的“淮南红司”指挥部也遭到对方“淮南搬司”、“淮南贫司”、“电厂 125”等组织的围剿冲砸。深夜中，“红司”指挥部的人员被迫撤到小礼堂顶层坚守。“炮轰派”各组织使用了种种攻势手段，终于打了进去。驻守人员几乎全被打伤。淮南“红司”的总指挥、医学专科学校的李运亭身受重伤入院。而前来抄砸“红司”的这些组织，均是当年最早起来与“红司”并肩战斗，最先起来大造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反的亲密战友，如今却反目成仇视为大敌，并最终导致最后的决裂。

5 月 20 日　煤矿因武斗全部停产。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化大革命”领导小组给淮南市军管会并淮南煤矿全体职工一封指示信，要求立即恢复“抓革命、促生产”的秩序。

我们再看四川。《中共中央关于处理四川问题的决定》下达后，四川的“二月镇反”被全盘否定，“8.26”派终于翻身，随处可见到这样醒目的大标语：

“坚决拥护党中央解决四川问题的《红十条》!”

“谁反对《红十条》，谁就是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整个形势形成了有利于造反组织的局面，成都的造反派迅速在市区取得优势，“产业军”及其相同观点的组织派别“三军一旗”，普遍受到打压和围剿，在成都市区再无立足之地，先后退至成都郊区或其他县区活动。在郊县占绝对优势的“贫下中农战斗军”支持下，他们试图走当年毛泽东“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将根据地建在广大农村，与占据城市的造反派抗衡，再等待时机，

东山再起。

这时，四川大学“东方红 826 战斗团”和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等组织，提出要“吸取”巴黎公社的教训，趁热打铁，“向凡尔赛进攻。”川大“8·26”的学生领袖们决定在 5 月 19 日这天组织全校师生到成都市郊帮助贫下中农夏收，同时宣传“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宣传《红十条》，让逃到市郊的成都“产业军”的群众回原单位抓革命，促生产。

5 月 19 日一大早，四川大学和成都 19 中“826” 近 2000 师生，打着红旗，带着干粮，背着水壶，在川大操场集合后，便在他们的团长游寿星率领下，在校旗和“826”战旗的引导下，以宣传《红十条》为名，向被称为保守派组织的根据地----成都郊区琉璃场和双流县中和场出发了。也有些男生携带着木棍，说是做万一情况下防身之用。队伍浩浩荡荡拉了几里长。

刚下过雨，空气清新，路边野花小草鲜艳碧绿，地里成熟的小麦一片金黄。好久没有参加这种全校性的活动了，大家兴致很高，一路上有说有笑。

走了十几里路，天上下起了小雨。细雨霏霏，一会儿头发就淋湿了。他们决定不再往前走，就到附近一个叫中和场的乡镇进行宣传。中和场狭窄的街道两边是低矮的木板房，也有少数砖房。队伍一进场口，街道两边的店铺就关了门，并且有人出来骂他们，说他们是来搞武斗，要血洗中和场。学生们排好队，对居民进行宣传解释工作，然后继续前进。

快走出镇口时，他们就被一大群戴着红袖章，手持钢钎、钉耙、锄头、棍棒的农民拦住了去路。队伍中不知谁在喊：“同学

们排好队，手挽手，不要乱……”此话还未说完，只见空中飞来密集的石块，立即有人被击中而头破血流。顿时队伍大乱，学生们慌乱的向后退，向两边退。不少人被打得头破血流。只听见周围的农民在喊：“缴枪！只要交出武器就放你们出场。”

不少手中有棍棒的同学纷纷将手中的棍棒交给这些农民。于是农民们让出一条路，放这些学生出镇。

谁知没走多远，突然响起一阵锣声，只见四面八方又涌出无数手持钉耙、锄头、棍棒的农民，将学生们全都赶进了水田。农民们围住水田，开始捉人，把学生们一个个都捆了起来，还用一根绳子把几个人串在一起，以防逃跑。他们得意洋洋地押着这群学生俘虏沿乡间小路向前走，其中包括四川大学“东方红 826 战斗团”团长游寿星。

学生们被带到一个院坝，看见很多人围在那里。坝子中间的一辆板车上躺着一个人，浑身血迹，肚子上有一个大伤口，肠子都露在外面，显然已经死了。农民让学生们挨个过去参观，说这是造反派杀死贫下中农的罪证。每个经过死尸的俘虏都被抽了一记耳光，女同学也不例外。

午饭后，四川大学的广播忽然响起，要求全体在校同学到大礼堂紧急集合，听取“826”政委江海云的重要讲话。

此刻，江海云正站在台上，有力地挥动着胳膊，一边讲一边往上绾袖子，颇像《列宁在十月》中的列宁。她说：

“几百名‘8.26’战士，我们的战友，在中和场宣传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时，被‘产业军’残余分子煽动不明真相的农民包围起来拳打脚踢，全部抓起来。我们没有别的办法，只有动员忠于

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全体‘8.26’战士，去解救他们。”

她讲了一些注意事项，领着大家喊了几句口号后，一挥手，宣布出发。

江海云是个很好的演说家，同时还是杰出的组织者。当热血沸腾的人群涌出川大校门跑过九眼桥的时候，锦江两岸已有上万人向着去中和场的方向移动，包括大量的中学“826”和市民。

这时又开来不少大卡车，让川大学生上车去中和场。据说这些司机都是自愿来的。车在人流中艰难前行。离中和场不远，前面的车停住，无法再走。公路上全是人，大家下了车。

这时的公路上全是“826”的人。有人说右边那村里关有“826”，大家一起朝村里涌去，忽然从村里飞出密集的石头，大家隔着河沟对阵，双方互相投掷石块相持不下。但熟悉地形的农民们很快迂回包抄，从后面偷袭，使“826”腹背受敌，阵脚大乱，很快就兵败如山倒，落荒而逃。

“826”去的时候走的是田埂，往回跑时急不择路。刚收割后的稻田，很多地方还是稀泥，一脚踩下去，拔出来就不见了鞋。逃命要紧，不要鞋了。类似这样的事公路两边不断发生。据说第二天农民捡的鞋可以堆成小山，第二年农民犁地还能犁出鞋来。

在一大片收割了的稻田上，城里来的“826”群众和农民，双方各排开一字长蛇阵。“826”这边闪出一人手持大刀，农民那边闪出一壮汉，手持长约一丈的木棍，战约七八回合，木棍扫过，露出破绽，“武松”前跃一步挥刀划去，当时大概所有人心都提到嗓门眼上了！所幸壮汉机灵，侧腰一弯让过，不敢恋战，转身就跑。“826”们欢呼呐喊着向前冲去，乱石如雨向农民飞去。农

民阵脚大乱，溃退了几十米。由于“826”追击不及时，农民才得以稳住阵脚，于是双方再次对峙。“武松”再次闪出叫阵，对方无人敢应，“826”这次有了经验，呐喊而上猛追不舍，直追到中和场场口。

地形变了，两边是店铺。“长蛇”缩回公路，成了“长龙”；龙头伸进村内，试图寻找关押“826”的仓库。敌我相距约 20 米互相“射击”，“子弹”就是对方扔过来的河卵石。“826”一鼓作气推进了数十米，很快就将对方压进窄窄的街巷；“阵地战”变成了“巷战”。就在这时，后面传来“命令”，说被俘的“826”早已向仁寿方向转移，前面街口可能有机关枪，立即后撤。

没想到撤退比进攻艰难。你退敌进，“子弹”飞来打在背上不好受且不说，后队人马众多，想撤撤不动，只好边攻边退，进进退退，波浪式后撤。快要退到场口，他们惊喜地发现出现一队解放军，每人手中一本《毛主席语录》，不带武器，喊着“要文斗不要武斗”，隔到了城里来的“826”和农民“老产”之间。

这时已近黄昏，前来制止武斗的军队将电台设在村头打谷场上，周围围了很多看热闹的群众，一些战士在周围维持秩序，中间立一根天线，高约两丈。一名北京来的学生心想：“凭着这天线可以跟党中央、中央文革联系上了，川大同学们有救了！”他掏出怀中带的《毛主席语录》，撕下后面的空白页，写上“情势紧急，希望首长立即把这里的情况报告北京，报告毛主席”，请前边的人传递到了那个军队干部手里。

由于解放军及时赶到加以制止，事态很快得到了控制。

当天晚上，被俘的学生们被关进了一个粮仓，没有窗户，里

面漆黑一团。几十个人关在一起，只有人挤人在地板上躺下，身上的湿衣服经过一段时间也被体温烘干了，衣服上的稀泥也成了干泥巴壳壳。以前他们常在书里读到“腥风血雨”这几个字，现在终于体验到了。

事件发生后，四川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和成都军区立即向“产业军”和“贫下中农战斗军”施加压力。第二天，天上传来嗡嗡的飞机声，一架双翼飞机在低空飞行，接着撒下传单，在空中如雪片般飞舞，纷纷扬扬飘落在田野上。这是成都军区出动的飞机，传单上警告“产业工人战斗军”和“贫下中农战斗军”两个群众组织不准伤害学生，立即释放被俘学生。

接着，那些被俘虏的学生待遇有了改善，让他们洗了脸，吃了饭。然后由投靠“产业军”的学生来指认：哪些学生是“826”战斗团的，哪些不是。没有参加“826”的学生被分批释放。在来自“省革筹”和成都军区的压力下，5 月 21 日，被捉的中小学生首批被释放。而“826”的同学，都被转移到成都附近的双流，眉山，新津等县的农村，分散在农民家中，正好农忙，由农民们监督劳动，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直到一个多月后，6 月 7 日，最后 200 余名被捉人员才陆续释放。

此时，成都市内谣言四起：有传闻中和场的小河里飘着 36 具川大学生尸体。相当一段时间内，成都各街巷、茶馆酒肆，都流传着关于“产业军在××地方操练人马，耀武扬威，叫嚣要杀回成都”、“产业军月底要血洗成都”、“产业军从 132 厂撤走时，带走各种枪支 2000 多支，子弹 50 万发，最近要杀回来，血洗黄田坝”、“产业军核心已转入地下活动，扬言进成都易如反掌”等

等。于是有人提出“保卫成都”的口号，各单位纷纷准备武器，构建工事，一时人心惶惶，一片恐怖。

尤其令人不安的是，有传言说，“老产在城郊蠢蠢欲动，妄图血洗川医，劫走伤员。”对此，军区领导和省革筹小组负责人都不敢大意，当即派出野战军部队，全副武装进驻川医及其附属医院。在医院所有大门及通道均布置了岗哨，并派出巡逻队，在川医各要道，日夜巡逻，以防意外。

成都各造反组织，如“兵团”、“红卫东”、“硬骨头战斗团”等，亦有战士，手持木棒，自动前来川医协助守卫受治伤员。就连街道居民也组织起来，从 10 来岁的“红小兵”、“小闯将”到白发苍苍的老大爷、老大娘，也日夜站岗放哨，把守要道，设置路障，严防“老产偷袭”。

这种戒备森严，草木皆兵，日夜提防，“大打人民战争”的做法，持续了相当长一段时间。直到 6 月中旬，川医及其附院的一些要害地方仍由野战军部队驻守。

## 第 650 回：都不满，广东大联合瓦解　香港岛，劳资纠纷引工潮

5 月 15 日晚上，广东“红旗派”在越秀山体育场召开为项明平反大会。由省公安厅军管小组代表宣读“平反公告”。接着项明上台讲话：

“还有很多战友还未获得彻底的解放，”他神情激动地说，“3 月黑风的后台，还没有揪出来。希望造反派的战友们，‘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继续战斗，夺取胜利。”

当天，华南农学院“野战兵团”强行封闭了已被军管的《广州日报》。

广东“东风派”的组织对项明事件以及《广州日报》被封事件深感不满，对广东省军管会尤为失望。5 月 16 日，广州“地总”召开常委会议，决定：

一、退出并砸烂工人大筹委，踢开大筹委，彻底闹革命；

二、全面退出所有参加的生产临时指挥部；

三、省、市夺权指挥部只放个空名。

当晚 22 时，封闭《广州日报》的群众以“‘五一五’革命行动临时指挥部”名义，发表《严正声明》，称：

“《广州日报》长期来对抗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大量放毒，充当了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的喉舌，我们为了坚决执行中央文革与周总理关于《南方日报》、《广州日报》合并的指示，《广州日报》必须立即停刊。”

他们同时还提出三点声明：

一、强烈要求广东省军管会责成有关部门从 5 月 17 日起给《广州日报》原订户发放《南方日报》。否则，由此产生的一切严重后果，由有关当局负完全责任；

二、除此以外，在《南方日报》、《广州日报》合并问题尚未得到彻底解决之前，凡有重要新闻应由《南方日报》社扩大发行量加以解决；

三、呼吁一切革命同志们，提高革命警惕性，随时揭露和粉碎有人利用《广州日报》停刊问题挑动群众斗群众的阴谋。

5 月 17 日凌晨，广东省军管会宣传组对华南农学院“野战兵团”封闭《广州日报》，做出三点回答：

一、《广州日报》是军管报纸，任何群众组织都要维护，有意见可提出协商解决，不能强行封闭，或勒令停刊。

二、在两报合并筹备过程中《广州日报》继续出版新华社电讯稿，有利于及时传达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声音。

三、对目前《广州日报》订户不能继续看到报纸的问题，

将来我们要说明事实真相。

随即，广州“新一司”发表了一篇题为《看，“广谭”喉舌是什么货色》的文章，副标题是“《广州日报》、《南方日报》罪行录”。文章称：

“周总理到广州后，曾指出《广州日报》和《南方日报》要合刊，要为无产阶级革命派大喊大叫。但周总理离穗一个多月了，两家报纸仍无动于衷。5 月 1 日军管会决定两家报纸‘暂时不能合并……’‘5 月 1 日起《广州日报》不登本地方和本地消息报导’云云。据说这个军管会的决定事先没与出版社、版面小组造反派商量。

《广州日报》在广谭操纵下，百般刁难革命造反派的文章和小报的出版，在时间上、数量上，版面内容上……诸多为难。并企图以此来拉一批打一批，红司报纸才出三万份，新一司原来才给出 1.5 万份，经斗争才出三万份。种种事实说明，广谭正在利用《广州日报》、《南方日报》继续耍弄对革命造反派拉一批打一批的花招。

《广州日报》今日不封，更待何时！”

5 月 17 日，广州“地总”、“红总”执行 5 月 16 日“地总”常委会议决定，正式宣布退出省、市生产临时指挥部，并集合队伍到市军管会宣读《关于退出省市生产临时指挥部的严正声明》。当天下午，“地总”召开分部负责人会议，“地总”负责人莫超海在会上发言说：

“当前是两条路线斗争的关键时刻，谁革谁保不明，现在左派不香，老保不臭，左派内部也很矛盾。

大联合是军管会要搞的，3 月份召开了五次会，3 月 5 日成立，工代会也是这样急急忙忙搞。

省生产临时指挥部是在反‘省革联’和‘地总’平反的基础上搞的，当时军区说：‘凡是参加省革联的都不能参加，连会也不能参加。’当时我们认为是错误的，是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生产临时指挥部的班子是空架子，林李明、焦林义都是没有亮过相的干部，这样的班子怎么能起作用呢？”

5 月 18 日，“地总”、“春雷”在烈士陵园前举行“打倒无政府主义，坚持文斗，反对武斗大会”。他们选择这个地点开会，明显地含有向“旗派”示威的意义，因为几天前，这里还是项明事件的主战场。这天，“地总”、“红总”、“春雷”等群众组织，联名致电党中央、毛主席，“强烈要求将陶铸揪回广东进行批判斗争”。

5月19日，康生接见了正在北京的广州军区黄永胜、刘兴元、孔石泉、温玉成等人。他谈了对大中学校师生进行军政训练的问题，说毛主席对此非常重视。

他还说：“在文化大革命中，对工人的工作，除上海外，都做得不好。现在是学生领导工人，不是工人领导学生，这个问题很大，如果不解决，学生中的无政府主义不仅不能克服而且会影响工人。

主席要我们首先注意政权问题。五四运动好就好在提出了打倒卖国政府的口号。在文化大革命中，学生首先起来了，他们是先锋，但必须向工农兵学习。北京革命群众组织的四大领袖：聂元梓、蒯大富、谭厚兰、韩爱晶，都是学生。为什么没有工人的

领袖呢？肯定会有的，是因为我们没有发现。现在有一些问题发了指示，但研究贯彻这些指示不够，具体措施没有跟上。常常不能解决问题。结果发一个指示不行，又发一个，越发越疲。大字报越写越大，浆糊越用越多，农民很有意见说我们吃都吃不上，你们成桶成桶往墙上糊。”

5 月 21 日，中央文革办事组编印的《快报》上登载了军区司令员黄永胜、副司令员温玉成等人于 5 月 10 日与“广州工联”8 位代表座谈时的讲话摘要。黄永胜在讲话中检查了“前一段支左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表示彻底给被打击迫害的革命造反派平反，坚决站在革命造反派一边”。

5 月 23 日，毛泽东在这期《快报》上批示：

林彪、恩来同志，并告文革小组：

黄永胜同志讲话一篇，建议发给各大军区，各省军区，各军，各军种兵种作为参考。我觉得这种小型的谈心会很好。当地最高首长出面与小将平等地谈心，不摆架子，有错爽直承认，而不吞吞吐吐，并且立即改正，这些都很好。如同意，请酌处。

就在前一天，5 月 22 日，一批原参加过“省革联”的学生，在广医成立了“广州大专院校红色造反司令部”，简称“红司”，负责人武传斌、黄意坚。下辖大专院校组织 16 个，中专组织 17 个，中学组织 48 个。同一天，“工人造反团”宣布退出大联合。广东军管前后一度似乎就要实现的大联合，至此，全面瓦解了。

当天，“东风派”和“红旗派”群众，在中山医学院内发生大规模冲突。消息传开，双方的增援队伍源源不绝开来，多达一万余人，中山医学院外的马路，挤得水泄不通。

市军管会主任黄荣海赶赴武斗现场，传召两派代表，在学院武装部进行谈判。

入夜，几百名解放军奉命开入医学院，守住学院大门，阻止外面的群众继续冲入校内，同时勒令武斗双方立即退出现场。事态在深夜逐渐平息。双方群众退出医学院，校外群众也陆续散去。这是广州地区文革以来最大规模的一次武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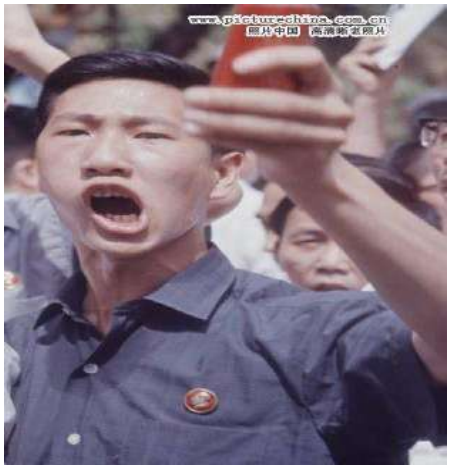
似乎是与国内的动荡相呼应，在此期间，与广东毗邻的香港也发生了暴动。1966 年 12 月 3 日，澳门发生一件警民冲突事件，引发澳门左派到澳督府示威，要求警方道歉下台。澳葡政府出动军警镇压，导致十多人死亡，百多人受伤。到了 1967 年 1 月初，澳门左派发动罢市，中国更断绝澳门食水供应。葡萄牙政府最后屈服，接受左派的要求，并一度提出即时将澳门交还中国。香港的左派到澳门祝贺，同时学习澳门左派的斗争经验。

1967 年 5 月，位于香港九龙新蒲岗的新浦岗造花厂发生劳资纠纷。5 月 5 日，纠纷开始恶化，部分工人罢工静坐，阻止工厂出货，局面紧张。

5 月 6 日下午，香港防暴警察到工厂戒备，但在厂外的工人不但没有散去，还包围厂房，与在场警察发生冲突，21 名工人被警方逮捕，多名工人受伤，审讯后更有 8 人被判入狱。工会代表前往警署交涉，亦被扣押。

翌日，在香港左派精心策划鼓动下，深受大陆红卫兵造反影响的香港居民和工人、“工联会”代表与其他支持者数百人，仿照大陆文化大革命的做法，挥舞《毛主席语录》，高呼革命口号，从香港中部的中国银行附近集合出发，步行或乘车前往政府大厦

举行示威活动。警方施放催泪弹及木弹驱散示威者，当场拘捕127 人。当晚港英政府宣布所有警员取消休假，九龙宵禁。



5 月 11 日，工人聚集在新蒲岗街道外，与警察对峙，并用石头和玻璃瓶袭击警察，警察开枪镇压。下午，香港英国当局再次出动大批武装警察，使用警棍、防暴枪、催泪弹，并开来军车和直升飞机，对工人进行更大规模的镇压，逮捕了一些工人。鉴于事态严重，港英当局当晚再次宣布东九龙实施宵禁，所有后备警员取消休假候命。这天有 100 多人被捕，两人受伤。

港英当局的这一暴力举措激怒了港九地区和大陆的群众。当天下午，中国外交部即向英国政府提出强烈抗议。抗议香港英国当局再次出动大批武装警察，多次使用警棍、防暴枪、催泪弹，并开来军车和直升飞机，对赤手空拳的工人进行更大规模的镇压，捕人。

5 月 12 日，事态进一步扩大。香港工人举行集会游行，抗议港英当局的武力镇压。《香港夜报》、《田丰日报》和《正午报》等三家香港非左派报纸报道了这场反英抗暴斗争，并刊登国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消息，鼓动香港民众起来造反，成为香港的主人。

这天，国务院主管港澳工作的外事办公室常务副主任廖承志，向周恩来提交了《关于香港爱国同胞反迫害斗争的初步意见》，提出准备用舆论、群众集会，向被捕者及受伤者进行慰问；有选择的派出代表到港督府向港英当局提出书面抗议；由工会出面组成各界代表会议向港英当局提出四项要求；由外交部向英代办提出抗议；新华社发新闻施加压力等项措施。周恩来批准了该报告，并于 5 月 15 日电告港澳工委等驻港机构和广东省军管会遵照执行。

5 月 13 日，九龙新蒲岗暴动蔓延至黄大仙东头村和土瓜湾，大批群众在街上聚集，一些人放火烧车，闯入新区办事处和学校。当局出动大批英军和防暴队镇压，又将宵禁时间提前至傍晚 18 时开始。

5 月 15 日，中国外交部召见英国驻华代办唐纳德•霍布森，面交中国外交部声明。最紧急最强烈抗议香港英国当面对香港中国工人和居民的暴行。外交部在抗议声明中说："这次血腥暴行，是英国政府勾结美帝反对中国的阴谋的一部分，妄图以高压手段抵制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影响。"声明要求英国政府和港英当局必须立即无条件地接受中国政府的要求，即：立即接受中国工人和居民的全部正当要求；立即停止一切法西斯措施；

立即释放全体被捕人员惩办凶手，赔偿损失；保证不再发生类似事件。

新华社全文播发了这份照会。

当天，周恩来批准在英国代办处门前举行示威。北京群众在英国驻华代办门外示威。部分群众更于当晚冲进代办的住所和办公室。至 17 日，首都百万群众到英国驻华代办处游行示威。

香港左派报纸不断报导北京支持香港民众“反英抗暴”的消息，由左派学生在街头向路人派发；位于维多利亚商业区的中国银行亦在中环总行大楼的屋顶装上高音喇叭，每天向市民进行革命宣传。

5 月 16 日，香港近千人包围南九龙裁判署声援受审示威者。当天，香港的亲大陆左派宣布成立“港九各界同胞反对港英迫害斗争委员会”，简称“斗委会”，由“工联会”理事长杨光出任主任。“斗委会”随即以“反英抗暴”为口号，联合各亲共团体数百人，胸戴毛主席像章，手持《毛主席语录》，前往港督府示威游行，并在港督府门外张贴大字报。港督府一度成为集体抗议示威的主要目标。

港府重申要维持法律秩序，限制到港督府请愿人数。抗议行动于是转到中环花园道和皇后像广场一带。之后，港九各地陆续有集会和示威，参加者除工人外，亦有学生及其他群众。

九龙地区的劳资纠纷引起香港有史以来最大的社会动荡。香港总督府外也贴满了大字报。

左派分子在港督府外示威和张贴反英大字报

5 月 19 日，北京举行 10 万人集会，声讨港英当局暴行，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外交部部长陈毅等出席大会。大会通过一项决议，内容有三点：

一、美国必须停止以香港作为军事基地；

二、香港国民党特务迫害亲共人士的罪行决不能宽恕；

三、传播毛泽东思想的工作决不能受到干扰。

5 月 16 日至 19 日，英方连续就北京、上海群众向英方示威、“捣毁”英国代办处在上海侨务办公室等提出“最严重抗议”。

## 第 651 回：谈铁路，七级部揪王秉璋　周恩来，接见三军“演出派”

5 月 19 日晚，周恩来接见铁道部 1 月 29 日成立的临时业务监督小组全体成员和部机关两派群众组织:“机关革命造反总部”和“联络总站”的代表。陪同周恩来接见的有：总参军务部部长苏静，拟任铁道部军管会主任；总参军事交通部副部长杨杰，拟任部军管会副主任。

针对铁道部“联络总站”提出要砸烂铁道部业务监督小组的言行，周恩来说：“你们上纲太快了，造业务监督小组的反是错误的。现在我宣布，将对铁道部实行军管。如果你们再来冲击，就按军管处理。”

第二天，5 月 20 日，杨杰在铁道部主持会议，传达将铁道部西南工程指挥部移交铁道兵问题。此后数日，拟派驻部军管会的多名军队干部，听取各群众组织关于铁道部部内文革情况的汇报。

5 月 10 日，聂荣臻办公室接到七机部“916”一位“勤务员”的电话：“5 月 6 日，批判王秉璋的时候，王的身体很好，态度很强硬，前天突然失踪，据王的警卫员说，‘王被上级接走’。不知是哪个上级接走的?我们问了周总理办公室，回答是不清楚，不知道聂总是否了解此事？希望火速予以答复。否则我们发动几万人到处搜，问题就大啦。现在是王秉璋立功赎罪的好机会。我们准备‘打倒王秉璋，解放七机部’，可他突然不见了，希望能

帮助我们弄清楚他的去向。”

聂荣臻在听秘书报告后说：“我不清楚此事。”

5 月 20 日，七机部“916”两万人在中南海外示威游行，要求揪出王秉璋。周恩来派秘书出来对他们说，王秉璋因为肝病厉害，“是林副统帅叫他养病休息的。”“916”这才撤离中南海。

5 月 21 日 0 时 48 分至 4 时，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接见陆海空三军联合演出单位代表。陪同接见的有肖华、总政文化部谢镗忠、李伟、虞棘等人。海军的代表由张秀川带队，“红联总”负责人谭安也去了。

接见时，周恩来说：“今天本来是找三个演出单位十几个人来谈谈，一来一大堆，很难谈，只有听我们的了，我见你们多少次了，今天是肖主任要我来的。”

接着，周恩来谈到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和《516 通知》都是发表在 5 月，他说：“《通知》针对反动的二月提纲谈了 10 个问题。它关系到整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对理论、路线、方针都谈到了，归结到结束语，主席已经意识到睡在旁边的赫鲁晓夫，不仅是彭真，有的已经揭露出来，有的还没有揭露出来，有的还正在培养作为我们的接班人，各级党委都应该提高警惕。这个话在中央来讲是刘少奇。那个时候不能说，是党内文件，你们没有传达。就是我们经常跟主席接近的人，有那么一点点感觉，但也不敢想，因为主席没有透露。我们稍微有一点点感觉，曾经跟主席议论过，拿林彪同志和刘少奇比，林彪同志的思想性高得多了。”

“我提的这两件事，是红五月的两件大事，都是关系全国，

全世界命运的大事。如果去年不把赫鲁晓夫式的人物揪出来，哪有我们这样轰轰烈烈的形势？纪念《讲话》发表 25 周年，哪有今天这样的文艺思潮、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哪有江青同志主持的座谈纪要重新唤起我们的记忆？还不是资产阶级文艺思潮弥漫着、统治着？尽管广大群众没有责任，但总要受其影响。这两个东西，今天我很有感触。”

周恩来接着说：“你们被围攻了，你们说，很激动。我看这是可以理解的。”

这时有人告状说：“肖华主任那天讲话态度很不明确。”

周恩来不客气的说：“我今天当着你们面批评你们，那天他们闯了乱子，我批评得比较凶。我在你们面前把他们再骂一通，有啥意思？我在这里声明，我绝不能这样做，我不稀罕你们鼓掌。我是来泼冷水的。你们要很冷静地想一想，你们是革命造反派，思想性要高一些，水平要高一些，不然怎么称得起是革命造反派？五一节以前，我曾经跟战友文工团的同志谈过联合演出。你们响应了我的要求。我们都去看了，我想，演革命的文艺，只要你们还要革命，不管是‘新燎原’还是‘老燎原’，不管是保字的还是激进的，在这个问题上大方向应该取得一致，共同演出。”

这时，北京军区战友文工团“老燎原”的代表插话介绍情况。周恩来说：“我知道战友文工团斗争发展的情况，我都参加了，所以一碰到‘燎原’的同志特别亲切。你们排演肖主任的《长征组歌》有真实感情，也许个别人思想有问题。我看了六七次，还是七八次。去年我曾经带着你们访问罗马尼亚和阿尔巴尼亚，为什么回来因为观点不同，就这样呢？大方向都承认，在北京军区

来说，杨勇、廖汉生都要批判。个别人也许受影响，但是绝大多数人员要革命的。为什么不能站在一起演《长征组歌》？我说了，只要你们演，我就去。5 月 2 日你们演出，中央文革要开会，我都请假了。比如一个纱厂因为观点不同，难道能按照观点不同组织生产？就是观点相同的，还有先革命，后革命的，你们应该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联合起来。最近的《红旗》杂志发表的评论员文章，就是解决这个问题。应该把大方向搞对，不然工厂只好停止生产。炼钢、炼铁都有这个问题。既然生产在一个单位，我们演革命戏剧为什么不能在一起？我把战友说服了，演了四场又分了。”

讲到这里，“老燎原”说“新燎原”拒绝联合演出，肖华说明了一些具体情况，与会代表纷纷指责肖华，有人说“513”武斗的罪魁祸首是肖华。肖华气得一拍桌子说：“有人说我是罪魁祸首，如果是，我这个政治部主任早就该罢官了，哪里还有共产党员的党性。”

这时，海军政治部保卫部干事董崇泉也拍了桌子，怒斥肖华。

周恩来很生气，问了董崇泉的姓名和所在单位，当即写条子要张秀川严肃处理。同时严肃地批评了董崇泉无组织无纪律。张秀川也批评了董崇泉。董崇泉不得不作了检讨。

肖华说：“我是支持你们演出的。我听说你们在天安门广场演出，马上派人去保护。我派人保护演出，这还是第一次。”

周恩来接着说：“中央很关心这件事。第二天演出，林副主席派叶群、戚本禹去转了两个圈子，就是怕发生武斗。

你们出了个‘四海翻腾’，印了我的讲话，他们拿给我看，

说你们歪曲了我的讲话，要我收回，我讲了，不管怎么整理，这我都不看。我讲了，支持了你们，现在还支持，我不收回。

最近英国香港当局对工人阶级欺凌，到处响应抗议。我们预料广州要比北京搞得还要好。结果开得稀稀拉拉，十万人一分为三。这样的宗派性。反帝是我们全国人民统一的任务。广州面对香港，这不是给帝国主义看笑话？我们很不愉快，你们是解放军，有红五星，红领章的光荣称号的文艺工作者，我从来没有见过。”

海军文工团“红舰队”一代表说：“海军文工团‘毛泽东思想战斗队’有人到处宣传说，肖主任在军艺讲：苏振华的问题还没有定性质。”

肖华回答说：“我不是这样讲的，我是说组织上还没有作最后结论。还没有罢他的官。批判苏振华首先是军委决定的。对李、王、张首先是我们支持的。他们到处散布这个东西，你能听他的？北京这么多大字报，都能信吗？”

周恩来：“苏振华是修正主义就是修正主义，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你们根据你们的材料批判。”

肖华：“而且前几天斗罗瑞卿，就是我要苏振华去陪斗的，这不很清楚吗？”

周恩来接着说：“在香港事情上。由于宗派观念影响了我们的运动。四月份我到广州去了，最近另外一个同志回来告诉我一些新的情况。有些学校都是革命群众组织，有几个保守一点，就是因为有的夺了权，就是不合作。以前还有个省港罢工，支持上海的“五卅”惨案，六月的“沙基惨案”，这个传统到了无产阶

级文化大革命，群众反而不如当年的国民革命阶段那个时候觉悟？42 年了，在毛泽东时代怎么出那样一个事？我们几个常委的同志听到很不好过。

那天晚上，展览馆的事，为什么林副主席那样不放心？林副主席非常不愉快。要在斗争中把自己的政治思想水平提高。解放军的军事院校、文艺团体、医院更应该在工厂、学生中起模范作用。现在不是，有的斗争是属于两条路线，但是有不少打内战，结果你们影响了地方，反过来你们又受了地方的影响。你们好好把《红旗》评论员文章读一读。当然都是一些原则性的回答，想进一步搞文件。我们计划 17 日到 22 日宣传去年的文化大革命通知，这是一个夺权问题。照你们现在的情况来看，大联合也不能，大批判也不能。”

“到现在除了《东方红》，《长征组歌》还没有创作一部能够算是像样子的。这样的先进就很难乎成为先进。你们纪念《讲话》25 周年能不能写出作品来？你们既然是左派，就要想法子在实践中把自己提高。你们海军批判苏振华，空军批判‘伸手派’，战友文工团批判杨、廖，你们应该批深一点。今天是 20 号，”

有人说：“21 号了。”

周恩来：“要求你们在 10 天内做三件事，考验你们是不是一个真左派。

第一件事：空军文工团、海军文工团、北京军区、北京空军文工团，同样要求总政文工团，要在解放军报至少发表一件作品。请肖主任转告报社一下。”

肖华说：“你们要交货啊！”

周恩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光明日报》，有一处发表也是好事。

第二件事：你们至少有一点小的作品。双方共同搞更好，现在也不能勉强。可以分开来写。海军、空军、战友，总政各搞一个短节目。不过不能太像活报、太简单。那样的 5 分钟就想出来了，半点钟一点钟就排出来了。要有一点影响，余音绕耳，艺术性高才能感人。当然，还是政治挂帅、思想领先。要求你们 10 天搞出来，能看演出就看演出，不能演出，就看你们的初稿。

第三件事，'要求你们同台演出。他们不干，你们再下战书'。他们不干，确实证明你们有这个勇气，以后慢慢引导，事不过三，他们三次不回答，证明他们输理，比你们落后，这样让他们暴露一下，证明他们确实不是造反派。你们可以说，就是我说的。三个要求，一篇文章，一个作品，一个同台演出。"

周恩来讲到这里，空军文工团"革命造反队"一代表说："我们一直是对肖主任很信任的。但是信任和尊重没有得到证实。有些情况是误会，但也确实听到一些情况，不知道是真的还是假的。据说，总政文工团'军艺'动员开会，说我们这次演出全军文办没有批准，是不合法的。"

肖华说："有些情况我不知道，有的是不是传错了话。但是，对于冲的问题，我们一直是不同意的。那天我们正在人民大会堂开会，我和杨代总长分别到处打电话，谁去冲谁就要犯错误。我怎么会鼓励他们去冲呢？你们都是我的战友，都是我的同志，都是我领导下的文工团员，我怎么会搞这样的东西，这样连一点共产主义的气味都没有了，能对得起党，对得起毛主席吗？"

空军一代表说："据我们了解，军艺'星火燎原'和很多大专院校的组织搞了一个庞大的调查团，要通过'513 事件'，调查陆海空三军党委的问题。"

周恩来："调查军队党委，军队党委是林副主席直接领导的，他来调查？把矛头指向谁？"

海军代表说："海政文工团'毛泽东思想战斗队'一活跃，苏振华及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喜笑颜开，对运动态度恶劣。"他们还提到苏振华倚重的海政宣传部副部长车文仪在笔记本里专门给文工团"毛泽东思想战斗队"立了一个战友式的户头，叫"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但是军委文委、总政文化部一些人却把他们封为造反派，在社会主义招摇撞骗……

肖华说："你们把车文仪揪出来，这是你们一个很大的胜利。"

各单位的代表反映，自己单位都有类似海军的情况。有人还反映了全军文革、总政文化部一些人的情况。周恩来看了海政文工团"毛泽东思想战斗队"等组织和地方造反派共同发的海报。他说：

"这两个意见很值得注意，他们和外面的联系竟这样复杂，外面的人搞不清楚，给人这样一个印象，好像在海军大院，空军大院，北京军区大院，你们按照中央指示，在本单位搞斗批改，反而变成保守的了，他们不参加本单位的斗批改，在外面搞打砸抢却是造反派了。这个事情需要好好向红代会做工作，你们遵守军委规定，不出去串联，老老实实搞自己单位的斗争，是对的，他们不按军委规定出去串联反而成了造反派。这个问题值得注意。而且这个队伍相当大，100 多个单位。当然，不是都支持，

红代会的派别也很多，总会有支持他们的，一个电话就调来几万人。这个问题是值得研究，值得中央文革，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研究一下。

另外，空军文革、总政文化部要好好把情况弄清楚，对的就肯定，错的就改正。

这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肖主任向中央文革、北京市革命委员会讲一讲，我也可以说一说。第二件事，全军文革院校组和总政文化部检查一下，有缺点错误就改正，是不是就谈到这里。”

全场高呼：“感谢周总理对我们的支持和关怀！”“坚决执行周总理的指示！”“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但是散会后，“老三军”，即“演出派”仍然把“513”事件归咎于肖华，再次掀起打倒肖华的浪潮。

5 月 23 日，三军 “演出派”再次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纪念演出，林彪派叶群前来观看，还派了北京卫戍区的部队进行保护。

## 第 652 回："问总理"香港岛实施宵禁 定协议，清华园里闹翻天

5 月 16 日，外交部"联络站"组织外交部人员上街游行，支持香港同胞抗暴斗争的途中，"联络站"广播车带领群众呼喊"打倒三反分子陈毅"、"打倒反革命分子陈毅"等口号。

5 月 21 日，北京外国语学院"红旗革命造反团"以英三武金生为首的几个老队员成立的"28 团"以"红 28 团红一连"的名义贴出《致周恩来同志的一封公开信》的大字报。

5 月 22 日，外交部归国"遵义兵团世界革命红旗红卫兵"也贴出《向总理提出问题》的大字报。接着，二外首都红卫兵"迎春到"又贴出《十问周总理》、《再问几个为什么》，北外"红旗革命造反团红 28 团《红一连》"又贴出《打倒奴隶主义，提倡独立思考》、《是哪一个阶级的代言人——从新编历史剧〈十五贯〉说起》等反对周恩来的大字报。

5 月 21 日，香港暴动蔓延至中环並進一步恶化，警方发射催泪弹镇压。

5 月 22 日，英国政府没有对中国政府 5 月 15 日声明提出的要求做出回答。这天，中国外交部罗贵波副外长召见英国驻华代办，强烈抗议英国外交大臣对我驻英代办的粗暴态度，并宣布取消英国驻华代办处向上海派驻人员的安排，限令英国驻沪侨务人员候德卫在 48 小时内离沪。

当天，英国外交大臣致电陈毅外长，称我方取消英国驻沪侨务人员是片面取消协议。

5 月 22 日，香港再次发生暴乱，街头贴满了醒目的反英标语。中区的骚乱更加严重，示威者与警察发生流血冲突，167 人被捕。暴动的工人及学生以左派报馆、银行、国货公司、学校等为据点，出动示威，袭击警察及仍然行驶的公共交通。防暴警察到场以催泪弹、警棍等驱散后，示威群众即迅速撤回据点，令警察疲于奔命。当局最后要在港岛北岸实施宵禁，这是香港岛在二战后首次宵禁。英国政府宣布支持港英当局。

就在英国政府宣布支持港英当局后不久，上海革命委员会发布命令，宣布立即关闭英国驻上海领事馆，并限令彼得•休伊特领事和他的助手在 24 小时内离境。

就在彼得•休伊特领事离开领事馆前往飞机场的途中，他遭到上海红卫兵的粗暴对待，被这些学生踢打胃部、腿部，还把贴大字报用的浆糊倒在他的身上。

几乎在同一个时间，葡属殖民地澳门的红卫兵也强迫英国驻澳门的领事在炎热的太阳下站立数小时，并不断地进行辱骂和围攻。

此后不久，为了报复，香港政府拘留一位涉嫌制造动乱的中国新闻记者，北京的红卫兵也关押了一名叫做安东尼•格雷的路透社记者。红卫兵吊死了格雷心爱的小猫咪，把事先准备好的标语贴在他的背上，然后请他享受“喷气式飞机”待遇。

5 月 20 日，北京航空学院、北京邮电学院、北京林学院 3 所学校的革命委员会同日成立，韩爱晶、孔祥山、王德祥分别为 3 所学校革命委员会主任。清华大学的蒯大富和北京市革委会主任谢富治更为着急。可是，无论他们怎样软硬兼施，清华大学

“414”坚持认为：“革筹小组不是通过合法程序产生的，不能作为清华的最高权力机构，只能作为工作机构，而且必须调整扩大；清华大学的大联合没有实现，干部没有得到解放，不具备成立三结合革委会的条件。”

5 月 21 日，谢富治在人民大会堂再次接见清华大学两派负责人，“414”参加接见的代表是沈如槐、孙怒涛、宿长忠、刘万璋、王良生和龙连坤 6 人。

这次接见，谢富治说：是“在批评 414 大方向的原则下，和稀泥，搞三结合。”他还说：“我跟中央文革、周总理讲了，他们同意我的处理意见。”

谢富治说：“听说‘414’要把‘总部’打倒，你们是不是想让蒋南翔回来？”

“414”坚持认为：“不存在推翻蒯大富的问题。”

谢富治说：“可现在你们就这样做了。”

谈到“414”提出的“蒯氏阶级路线”时，谢富治说：“是不是让蒋南翔回来，就什么事情都没有了？‘蒯氏阶级路线’背叛无产阶级专政，有那么严重？这么说罗征启比蒯大富还好了！”“罗征启是什么人？你们是要彭真出来，蒋南翔出来，刘、胡、何、艾出来吗？”

谈到干部问题时，谢富治说：“我们现在强调解放一大片，打击一小撮，不等于过去批判错了。批判错了只是一个半个。这里有两条，一条是毛主席对干部的大政策、第二条是干部自己原来站错了。就是有过火，责任也在一小撮。否则就是翻案，大方向完全错了。讲平‘保’平‘黑’，那是完全错了。”

谈到“两小撮”时，谢富治说：“只有一小撮，没有两小撮。”他警告参加接见的清华大学干部说：“你们干部站出来要为大联合做贡献，不要只为自己的利益，否则就是挑拨离间、破坏团结，就是继续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钱。”

他对“414”代表说：“你们表面听中央文革的话，实际上不是的，将来要走向反面的。”“你们要不听话，爱怎么搞就怎么搞，我不管了，让蒋南翔来管。”“你们再搞个总部，再搞个 414 学校？一条是一个总部、一个学校，第二条是让蒯大富下台。这第二条路走不通。”

之后，谢富治主持两派协商谈判，将谢富治讲的几条原则形成文字。这几条原则是：一、停止互相攻击；二、统一领导，不准扶植山头的权威；三、大联合就不允许对立面存在；四、革筹小组成立后“414”就解散，革筹小组实际上是有权力的。

经过讨论，双方达成 “四项协议”，全文如下：

一、双方停止一切“内战”，不许相互攻击。广播、大字报、标语等不准攻击对方。有不同看法希望协商解决，或通过正常辩论来解决，尤其不要把 “内战”打到社会上去。

二、双方要整风，主要是自我批评，总结经验，发扬优点，克服缺点，整风要达到大联合大团结的目的，逐步实现按班、系的大联合。

三、调整和扩大革筹小组和总部，要尽快实现清华大学革命三结合。

四、井冈山兵团总部、革筹小组做出的决议必须执行。

前三条双方都无争议，要害是第四条，这无疑意味着把“414”

的生杀大权交给团派。“414”代表强烈反对这一条，认为“团派”会利用这条来压“414”。

谢富治不解，他说：“协议还没执行，怎么知道他们会那么做？你们还有没有诚意？”

“414”代表王良生说：“现在矛盾的主要方面是‘28 团’。‘28 团’不改变态度‘414’不放心。”

谢富治说：“那不见得，你们要整风。”

这时沈如槐想起 1966 年 6 月 2 日，《人民日报》发表聂元梓等 7 人的大字报时，配发的评论员文章中有这样一段话“对于无产阶级革命派来说，我们遵守的是中国共产党的纪律，我们无条件接受的，是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在《红旗》杂志第 11 期发表的文章中改为“……我们无条件接受的，是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并且加了一句话：“对于一切危害革命的错误领导，不应当无条件接受，而应当坚决抵制。”于是，他说：“正确的决议才能执行，错误的决议必须坚决抵制，否则就是奴隶主义”。

谢富治坚持说：“奴隶主义是有阶级性的，革筹小组做出的决议要统统执行，现在无政府主义可厉害了。”

沈如槐仍不服，要求对第四条进行修改，提出在“决议”前加“正确”二字，即把协议的第四条改为“井冈山兵团总部、革筹小组做出的正确决议必须执行。”

谢富治强硬地说：“不行！这是原则问题，决不退让。”

在谢富治的强大压力下，“414”代表被迫在《四项协议》上签了字。当时还确定了革筹小组组成人员名单，其中学生 13，

干部 5 人，教职员工 3 人，共计 21 人。在学生中，团派为 9 人，414 为 4 人，这就是 9：4 的来历。“414”推荐孙怒涛、汲鹏、王良生和沈如槐为学生代表、龙连坤为干部代表、李振民为教职员工代表参加革筹小组。蒯大富任革筹小组组长，鲍长康、孙怒涛、韩银山、韩启明为副组长。

在讨论革筹小组名单时，“团派”只接受孙怒涛、汲鹏、王良生三人，坚决不同意沈如槐参加革筹小组。他们说沈如槐过去在反对蒯大富和“28 团”中最积极，没有资格参加革筹小组。“414”方面向“团派”说明沈如槐是“414”的一把手，经谢富治表态同意后，“团派”代表才勉强接受沈如槐参加革筹小组。

当晚，清华大学“兵团”总部召开其各系、处分部的大会，传达了《四项协议》，一时间，“兵团”上下欢呼雀跃，各分部纷纷发表响应、支持《四项协议》的“严正声明”。

相反，“414”这边则炸开了锅，6 位谈判代表回来后，顿时处于该派群众的包围之中，接受他们愤怒的声讨。群众指责这 6 位代表丧失立场，出卖原则，签署了一个让“414”任人宰割的协议。“414”紧急召开核心组会议，向大家汇报谈判的详细情况，听取意见，研究对策。会上大家都能体谅谈判代表当时的处境，对谢富治表示强烈不满。大家议来议去也想不出好的办法摆脱困境，但是，又不甘心就这样束手就擒，最后会议决定：由 20 名末参加谈判的勤务站成员发表声明，接受《四项协议》的前三条，反对《四项协议》的第四条。声明引用“危害革命的错误领导，不应该无条件接受，而应当坚决抵制”的《毛主席语录》，指出第四条协议是违背毛泽东思想的。这样既承认了《四项协议》，

又保留了抵制总部某些决议的权利，准备以一种进退自如的姿态应付未来。

然而，基层“414”群众反对《四项协议》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首先是“东方红战团”连夜发表发表“5·21 声明”，明确指出：“5·21 的四项协议是 414 革命串联会勤务站部分同志违背 414 广大战士的意愿，没有坚持原则，擅自达成的，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我战团坚决不予承认。”

“414”广播台一直广播到深夜，大加抨击《四项协议》。随后，反对《四项协议》的大字报铺天盖地而来。

5 月 22 日凌晨，“414 串联会”勤务站汲鹏等 20 名末参加谈判的勤务站成员发表声明，对《四项协议》，他们只“同意第 2、3 条协议”，“第 4 条议……严重违背毛泽东思想，我们坚决反对。”

到 22 日为止，“414”的“三七战团”和其他近 200 个战斗组发表声明，或完全反对《四项协议》，或反对《四项协议》的第四条，并指责“414”头头“出卖 414 战士，出卖无产阶级利益。”

当天深夜，谢富治的秘书分别给蒯大富和“414”的孙怒涛打电话说：“那天谢副总理与你们双方协商达成协议的几条，谢副总理已经报告了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中央文革的同志。谢副总理说，你们坚决执行《四项协议》，这样作对你们有好处。”

这里的潜台词是：谁反对《四项协议》谁就是反对中央文革，反对毛主席，谁就没有好下场。“414”核心组感到事态严重，不敢怠慢，决定对谢富治的电话指示做出反应。孙怒涛当即在 23 日凌晨 2 时 30 分，通过“414”广播台传达了谢富治的电话

指示。

5 月 23 日上午，蒯大富在“兵团”总部和“革筹小组”会议上传达了谢富治的电话指示，并再次宣读了《四项协议》和扩大后的“革筹小组”名单。这次“革筹小组”由原先的 11 人扩大到 22 人，增加了“414”派人员的人数。

随后，由“井冈山”总部召开全校大会，孙怒涛再次代表“414”核心组在会上表态：坚决拥护《四项协议》，并不折不扣贯彻执行。

当天上午，清华园内，两派情绪形成鲜明的对照：“团派”欢欣鼓舞，“414”万马齐喑。

这天，在北京举行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议上的讲话》发表 25 周年的大会主席台上，谢富治把他在 22 日见到毛泽东的有关情况向坐在旁边的蒯大富做了传达。他说：

“昨天，我见到了主席，我将《四项协议》向主席作了汇报，主席表示赞成。我又向主席讲了清华问题解决三种途径：第一条蒋南翔回来；第二条‘井冈山’总部和蒯大富下台，‘414’上台。”

毛泽东听后说：“这两条都不行。”

谢富治对蒯大富说：“我又说了第三条，还是两派联合起来。”

毛泽东笑着对谢富治说：“你又和稀泥。”

蒯大富听了谢富治的这一“转告”后喜悦不已，回校后，他多次逐句逐字、绘声绘色地传达了谢富治的“转告”。

但是，到了中午，“414”派的“东方红战团”发表“紧急声明”，重申“521 声明”，不承认《四项协议》，不承认清华大学的“革筹小组”，声明再次引用林彪语录：“在需要牺牲的时候

要敢于牺牲，包括牺牲自己在内，完蛋就完蛋，上战场枪一响，老子下定决心，今天就死在战场上。”表明了抗争到底的决心。

紧接着，“414”主要负责人陈楚三、张雪梅等 4 人发表“郑重声明”：支持“东方红战团”声明，表示“任何人违反毛泽东思想、背离毛主席革命路线，我们坚决造反，抛头颅、洒热血，在所不惜”。这两份声明的强硬立场给“414”群众极大的心理支撑。大家纷纷在大字报上签名表示支持。清华两派形成僵持局面。

5 月 24 日上午，蒯大富又在全校大会上传达谢富治 23 日对他的谈话。谢富治说：“我把我们那天协商的四条告诉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毛主席是赞成的”。他还说：“我把我们那天协商会上提出的解决问题的三条途径告诉毛主席。一条是让蒋南翔回来，第二条是让总部和蒯大富下台，414 上台。毛主席说‘这两条都不行。’我又说第三条就是双方都让几步，联合起来。毛主席笑着说‘你又和稀泥！’”

顿时会场上一片欢腾。“兵团”上上下下都认为毛泽东是支持“井冈山兵团”总部而批评“414”的，纷纷表示：“为伟大领袖毛主席争光，尽快尽早地成立清华大学革命委员会。”

全校大会结束后，“团派”马上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旌旗飘扬，锣鼓喧天，庆祝似乎已经到手的胜利。“毛主席为我们井冈山人撑腰，我们为毛主席争气！” “最高指示：414 上台，不行！”等口号响彻清华园。

随后，“团派”召开战斗组长会议，做出两项重要决定：一是向“414”发动强大的政治攻势，争取瓦解和摧毁“414”；二是立即成立革委会，从根本上巩固胜利成果。

一传成讹，清华园内贴出了“毛主席最新最高指示：414 上台不行”的大标语。一时间，昨日收到了谢富治的电话“指示”，今日传言的“毛主席的最新最高指示”，弄得“414”上上下下满头雾水、大惑不解，不少战斗组纷纷改口拥护兵团总部及《四项协议》，一些群众还声明退出“414”，只有少数领导人坚持原来的立场。

这天上午，井冈山“28 团”还发表“严正声明”，明确指出：“414 大方向始终是错误的”，“414 必须解散”，“414 东方红战团和陈楚三等的声明，是反革命的大字报，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攻击谢副总理，反对毛主席赞成的四项协议，罪责难逃”、“罗征启是挑动群众斗群众的罪魁祸首”

24 日中午，“团派”《611》战斗组发表“最最紧急声明”，他们确定的口号是“充分发动群众，以大跃进的步伐，争分夺秒，日夜奋战，全力以赴，排除万难，以只争朝夕的精神，尽快成立清华大学革命委员会。”

下午，“414 串联会”在化学馆三楼召开大会，讨论上午蒯大富传达的谢富治的“转告”和所谓毛主席关于清华问题的“最新最高指示”，商量对策，要求中央有关部门拿出关于毛主席“指示”的正式文件。

与此同时，蒯大富主持召开革筹小组会议，决定 5 月 30 日成立革命委员会，并提出 50 名革委会委员候选人名单，供全校师生员工进行辩论。“414 串联会”的一、二把手沈如槐和孙怒涛也参加了这个会议，并提出 13 名“414”派的代表，列入上述 50 名革委会委员候选人名单。

晚上，在“兵团”总部召开的整风大会上，蒯大富宣读了由“兵团”总部和“革筹小组”做出的关于在 5 月 30 日以前建立革命委员会的决议与紧急动员令，并宣布了革命委员会成员的提名名单。至此，“兵团”上下鼓足干劲，准备在 5 月 30 日之际建立清华大学文革的正式权力机构，即以“兵团”总部为核心的“革命委员会”。“兵团”总部的此番热切愿望和急切心情溢于言表：“动员起来！……克服一切阻力，踢开一切绊脚石，拿出十二分干劲，下定二十四分决心，运用四大武器，昼夜奋战，分秒必争，全力以赴，饭可以不吃，觉可以不睡，一定要在 5 月 30 日以前成立清华大学革命委员会。”“兵团”总部一位负责人还在 5 月 27 日的一个会议上说：“30 日不成立革委会就不算真正的井冈山人。”

当晚，鲍长康在全校大会上宣布了革筹小组的决定和总部关于成立革委会的紧急动员令。

“414 上台，不行！”的“最高指示”给“414”造成极其巨大的心理压力。他们在讨论时认为对于这段“最高指示”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但又不理解毛主席他老人家为什么会说出这样的话，心中很不服。起初他们还以为毛主席听信了谢富治的片面之词，但后来分析，毛主席对清华的情况了如指掌，也许他老人家确信清华“414”的主张实质上就是“蒯大富下台－414 上台－蒋南翔回来”。“414”感到很冤屈，他们并没有让蒋南翔复辟的想法。鉴于蒯大富有“贪污”和歪曲传达首长讲话的“前科”，“414”代表前去找蒯大富对证，蒯大富说没有上述“最新最高指示”，并且答应在有关会议上纠正一次，实际上却听之

任之。经“兵团”总部的《井冈山》报报道蒯大富的“传达”，毛泽东的所谓上述指示流传更广。

“414”的干部代表龙连坤、魏宏波、谭浩强、胡大忻、王学芳联合发表声明，动农系25名干部和数力系13名干部分别发表声明，坚持认为“414”的大方向是正确的，呼吁两派群众求同存异，共同对敌。

## 第 653 回：再接见，内蒙军区众领导　五二四，周恩来谈香港、陈毅

尽管周恩来等中央首长连续 3 天接见了内蒙古进京人员，并于 5 月 19 日晨单独接见了内蒙古军区警卫营的 100 多人，劝说他们离京返回内蒙。但是，滞留在京的内蒙军区上访军人仍然不走。5 月 21 日晚 20 时至 23 时，周恩来、康生、徐向前、肖华、谢富治、王力、关锋、粟裕、郑维山等人在人民大会堂江苏厅接见内蒙古军区腾海清、吴涛、刘昌、刘彬、黄厚、王良太、张德贵和内蒙古自治区党委高锦明、权星桓、康修民。

周恩来说："明天开一专车，你们都走，参谋长负责。又一次对你们考验。中央做了这样的忍耐，警卫营行为不能不使人想：口头上拥护《八条》，但是不回去。是受了外界影响。有人故意歪曲调查组，要重新审定《八条》。《八条》是中央决定，根本不能改嘛！根本不能重新审定嘛！还有的说要搞什么'新八条'，这简直就是捣乱，显然里面有坏人，就看你们来揭了。'无产者'、'工农兵'等跨行业上层组织要解散，中央《八条》明文规定不能改变。明天要开好一个专车等着，如果再不服从命令，以自由脱离解放军论处，北京军区，北京卫戍区要采取行动。"

关锋："你们这些司令员、政委还有点威信没有？这一点威信都没有了？部队就带不回去？我就不相信。"

周恩来："警卫营的干部那天我接见是一个一个让他们讲的，我讲了以后，下面的战士要发言，他们不让，我让他们说嘛！结

果就是侯凤英的问题嘛！刘彬、黄厚、王良太，你们能把部队带回去吗？”

刘彬、黄厚说：“大部分能带回去。”

王良太说：“坚决要带回去。”

周恩来：“矛盾不能上交，问题就是军区党委了。昨天晚上还要抓吴涛，会是怎么组织的？！”

关锋：“这是借口，什么时候都有借口。”

周恩来对刘彬、黄厚、刘昌、王良太、张德贵、郗端卿等人说：“腾海清、吴涛处在困难地位，中央坚决支持他们，不行的话，我就陪他们指挥去，所以责令你们，你们要绝对负责任。军队个别坏人在煽动，大多数人莫明其妙的反对腾海清、吴涛，说什么腾海清的车轧死一个人，当场就有人起来作证，没有这回事。我在一所也有人提出来，当场我就批驳了他们，他们就没话说了，显然是有人捣乱。中央坚决支持腾海清、吴涛同志。腾海清到内蒙以后，问题处理得很正确，我在毛主席那里说了，实在不行我送他们回去。哪有这么回事，部队这么多人自由到北京来，马上开个军委党委会，军委去人，你们7个人都去，一起说话。我从10号以后一直等待，我去接见看望他们，现在不听说了。”

关锋：“这样闹下去会有什么结论，你们老同志要好好想一想嘛！”

周恩来：“显然不是大多数了，而是个别人的问题，要执行纪律了。现在要你们去执行纪律，准备1500人的专列，生火待命。这是一个考验，看他们到底是不是解放军。他们往南走，所以鼓励他们啦！如果这样下去，怎么能行啊！要宣布几条命令，军队

哪有这样事嘛！做群众工作也不能这样嘛！他们提了那么多意见，还有书面的，我们要去研究嘛！新的问题要去调查嘛！还有什么意见啊？你们说能够去传达，等一会军委会议后，决定了报告毛主席、林副主席批准了以后，你们去传达，你们一起去讲。你们回去还能不能把军区大院整顿得像一个战备的军区大院？不能让带袖章的随便出出进进。部队要备战嘛！王良太，以后军区大院的秩序能不能维持？在呼市的部队你们军区首长能不能控制在营房？军事机关不能与外面串联，过去军区自由让群众出入，后果很不好，只要一串联各种思想都来了，就会使机关受影响。要重申中央军委的命令，不能去军队串联，军队也不要到地方去串联，你们有没有这个把握说服机关和部队？不然的话，确实腾海清、吴涛没法在机关里办公。王良太你是机关首长，能不能做到啊？”

谢富治：“你们看总理、中央文革下这么大精力，你们不要再犯错误了。”

关锋：“不要一错再错了。”

谢富治：“他们越闹，你们的错误越大，并不能给你们带来什么资本。”

周恩来：“我们相信你们，所以没调部队去。但是忍耐是有限度的。”

谢富治：“中央耐心是有限度的。”

周恩来：“串联必须停止。要搞几条，必须恢复秩序，现在这样绝对不允许。”

康生：“随便到外边去，随便把武器丢了，是什么军队！我

听到这情况以后，心里很难过。他们自己也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受害者，是中毒最深的，长期受蒙蔽，看了心里很难过。你们这些干部，如果还有良心，第一要看到乌兰夫，第二要看到王逸伦，王铎，第三要看到自己的罪过。从井冈山到现在，什么时候看到过这样的军队！我很激愤！这样怎么能对得起毛主席、党中央？对得起人民把军队带成这个样子，后果是多么严重啊！问题在哪里呢？就在你们这些干部下决心了。你们看这个部队怎么带的！那有这样的军队！你们还要不要解放军！你们要拿出一切力量，来解决这个问题。”

周恩来：“要规定几条，军队不要串联，不要上街，汽车不动，汽油不发，广播器材要严格控制。‘三司’我们去正面说服嘛！‘三司’是最听话的，只要军队稳定，三天就可以改观了嘛！‘无产者’、‘工农兵’要解散嘛！是上层组织嘛！下面的广大成员还是好的，就是有些坏人嘛！这些坏人，只要局势平定下来，就会查出来的。”

康生：“乌兰夫、王逸伦、王铎的结果，就是因为背叛中央，欺骗中央，一步一步的发展起来的。搞上骗中央，下压群众，‘重庆谈判’，造成既成事实，逼中央表态。你们要下决心去解决，向北向南，是革命不革命的问题，你们的行动背叛了中央嘛！”

王良太：“我们矛盾不上交。”

关锋：“王良太同志，不是矛盾上交不上交的问题，是个决心问题。矛盾一定要上交，中央就只好管了。”

总理：“这是考验，如果不划清界限，就会和坏人混在一起。”

康生：“那一天的大会上，看的很清楚吗！哪是腾海清的问

题啊？就是背叛中央嘛！中央的《八条》肯定了高锦明，他们当场就要打倒，像什么解放军呀！你们都是老干部嘛，还要不要共产党员的原则？”

周恩来：“群众组织还听话呢！军队怎么还不如群众啊？”

康生：“你们惭愧吗？”

谢富治：“你们越走越远，不好收场了。”

周恩来：“还可以收场的，只要下决心。在那样的大会上，喊背叛中央的口号，像什么军队嘛！你们犯了错误，要好好批评，坏人是个别的。”

关锋：“只要下决心，部队是可以带好的，带了大半辈子的军队嘛！”

康生：“相信你们是会带好部队的。”

周恩来：“你们现在去开个会，腾海清同志主持一下，一个小时以后再来谈。”

一个小时后，周恩来说：“这些人自由的离开部队是犯法的，再不听话，一犯再犯，就是散兵游勇，北京卫戍区就要执行纪律。战士这样做，只能使苏修、蒙修、乌兰夫、王逸伦、王铎之流高兴。解放军的战士，要拥护党中央，如果仍往南走，心向北，实际上就是帮助了蒙修。支持左派，这是个立场问题。还要教育争取被少数保守组织头头所蒙蔽的革命群众，否则就会打击一大片呀！而不是解放一大片呀！坚定的左派，包含两个意思，一个是坚决支持左派，一个是教育争取保守派，缺一不可。这是毛主席教导的，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解放无产阶级，才能解放自己。军区党委常委内部，要亮开思想，有什么话都说出来，不要两面

三刀。”

谈话后，周恩来参加中央军委常委扩大会。会议做出《中央军委关于解决内蒙古问题的五条决定》：

（一）内蒙古全体来京人员必须于 5 月 24 日前全部离京返回内蒙古。

（二）军区领导机关和部队一律进行正面教育，不搞“四大”；军队不许串连，不允许有战斗组织，不许随便参加游行和集会。

（三）对少数对抗中央指示的人，要视其情节轻重给予适当处分。

（四）军区指战员绝对不准参加武斗，要坚决反对打、砸、抢、抄、抓。

（五）支持左派群众组织，教育和团结保守组织群众。

5 月 22 日，周恩来将这五条命令和中央军委的批语审阅后送毛泽东批阅。毛泽东批：“照办。”

当晚，毛泽东召集周恩来等开会。

5月21日，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编印的《信电快报》第131期登载了广州军区司令员黄永胜、副司令员温玉成等人5月10日与“广州工联”8位造反派代表座谈时的讲话摘要。黄永胜在讲话中检查了“前一段支左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表示彻底给被打击迫害的革命造反派平反，坚决站在革命造反派一边”。

5 月 23 日，毛泽东在第 131 期《信电快报》登载的黄永胜讲话摘要上批示：

林彪、恩来同志，并告文革小组：

黄永胜同志讲话一篇，建议发给各大军区，各省军区，各军，

各军种兵种作为参考。我觉得这种小型的谈心会很好。当地最高首长出面与小将平等地谈心，不摆架子，有错爽直承认，而不吞吞吐吐，并且立即改正，这些都很好。

如同意，请酌处。

5 月 23 日，中央文革小组成立文艺组，江青任组长，戚本禹、姚文元任副组长。

5 月 23 日，港英警察向游行示威中的群众开枪，打死一名工人，数十人被捕。左派工会及学校陆续发动罢工罢課。从这天起，巴士、电车、煤气公司、天星小轮等公共机构亦开始出现定时罢工。香港社会出现了类似内地文革的骚动，群众涌上街头，散发传单，高呼口号，袭击警察和英资机构。罢工风暴从私人企业，席卷了交通、煤气等公共服务行业，甚至部分公务员也起而响应。

5 月 24 日，周恩来约见外办、外交部和港澳工委的负责人，强调在香港问题上要严格遵循中央规定的方针政策，坚持有理，有利，有节。严肃批评了有关部门在香港问题上提出的过“左”口号和采取极左的做法。对“要打死几个警察，以收杀一儆百之效”的说法，他提出严厉的批评，说：“这是无政府主义思潮。香港的工作照抄内地红卫兵的做法，行不通。”周恩来还批评了新华社、《人民日报》在报道香港问题上有意夸大的做法。当时，新华社报道港英警察打死打伤游行工人二、三百人，《人民日报》据此又冠以“血腥大屠杀”的标题刊登。周恩来指示新华社进行核实，结果发现实际上只死了 1 人。周恩来严厉批评说：“这是严重的失实。发这样大的消息报道，为什么事先不向我请示？”

5 月 24 日，周恩来与外交部“联络站”核心小组成员在中南海小会议室谈话。他问“联络站”：“批判陈毅同志的材料准备得怎么样了？”

“联络站”回答说，准备在下星期开始批判。

周恩来说：“你们可以先准备材料，批判内容先告诉我。最近一外又贴我的大字报，说我搞两面派，我怎么能这么搞呢？！‘红旗大队’向我承认了错误。不承认这点就是歪曲了我的话了嘛。那天我接见完‘红旗大队’就叫嘉栋打电话告诉你们。接见他们不是我要见的，我本来就是不管，我没有答应见他们。是谢副总理强加于我的嘛，他散步走到那里去，是他答应的。我历来的办法是一起谈，这样就不容易歪曲了。”

“他歪曲，你们怎么能怪我呢！你们不相信我，反倒相信他们。你们怕什么？你们就是相信谣言，街上谣言多的很，你们都相信？他坏，很好嘛，走向自己的反面。”

“联络站”说：“总理5月15日接见‘红旗大队’以后，他们公布的记录说总理这样讲：‘你们不要在这件事上纠缠，没意思。如果他们真这样，就会在批判陈毅同志问题上形左实右，走得很远，正好暴露自己……’”

周恩来：“我怎么能会这样说呢？！我历来主张在一起接见，什么话都在一起讲，不要分开来，那次你们不同意，我是被迫分开接见的。那天见他们主要谈了几点：

1、冲外交部是错误的，要他们承认错误。

2、我原来12号跟他们讲‘红旗造反团’等组织批判陈毅，要他们参加一起批，我说人家发票，你们去参加。开始他们同意，

后来又不同意了。我说，我对‘六·一六’、‘红旗造反团’讲，要他们请你们参加。他们说这等于不承认他们这个团体，我说团体可以保留嘛。他们后来不同意，要自己搞。我说那没有办法了，还是按原来的次序，你们排到后面。

3、他们说你们打了他们。我说外交部拿出很多证据，还有血衣。他们说你们把血衣抢走的。他们说大字报没拿走。‘红旗大队’还说他们进保密室时门口有人，不告诉他们是保密室，门锁不牢，一推就开了。说这是政治陷害。他们还说进去后两分钟就切断电源了。我说要他们回去检查，有大字报交回来。”

“联络站”的人说：“现在一个字也没交来，还抢走了三个工作证和一个照相机也没交还。”

周恩来：“现在我不去辩论这件事，一看就知道他们这件事错了。过去经常吵，在一个屋里谈话的，回去还各写各的，这是人的观点、立场不同嘛。”

“以后学校方面的问题，我不再管了。我原来是好心，对‘六·一六’人家那时反他们反得很凶。我两次去替他们讲话。我这说的是心里话，我对他们没有反感。我为什么要挑拨他们学生的关系？！我不喜欢哼哼哈哈打官腔。我不愿骗你们。向你们讲心里话。我是守信用的。你们反而不相信我了。”

“‘红旗大队’在我面前说他们也要打倒陈毅，我说既然你们也要打倒，就可以参加他们召开的会，何必搞两次？”

外交部“联络站”问周恩来，5月12日的讲话是否有改变？

周恩来强调说：“批陈的问题没有变嘛，我已经答应的事不会改变。问题是你们不要轻易相信那一方。‘红旗大队’冲外交

部是错误的。拿走的大字报要追回来。他们说没有写，但上了王府井。这就证明拿出了××，照相机，三个工作证，让钱嘉栋打个电话去调问一下。至于你们说‘红旗大队’是保守派，你们说你们的，我了解情况不够。还不能同意。他们现在还是红代会的。红代会现在也分两派，中央文革都不能表态。

关于批判陈毅同志的问题。你们批判前要把主要内容告诉我，有些事点个题目我就知道了，心中有个数。你们顺便把姬鹏飞、乔冠华的问题也谈一下。第一次会，一定要开好。如果搞得不好，下不了台，也不能批透。这样我就不好向主席交待了。”

“张闻天这一案还没了，档案还是交给专案组比较妥当。其中有哪些档案你们要看，可以找一下目录，开个单子给我。档案一般不能随便看，都跑去看势必要乱。我是给中央办公厅打过招呼的。你把四川调查情况的同志写个名字给我，我和军管会联系一下，那儿军管了。”

这天，5 月 24 日，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发表声明：“炮打周总理就是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就是反革命！谁要恶毒攻击我们敬爱的周总理，我们就打倒谁！”

## 第 654 回：独立师，战士上访进北京　会场上，吴涛被打成重伤

5 月 21 日上午，北京中央军委文革小组接待室接待的第一批上访人员是 9 名战士，这是不多见的。负责接待的干部一面接过这些战士递交上来的材料，一面静静地听着战士代表的慷慨叙述。等战士代表说完，接待干部询问他们是哪个部队的？

战士们说，他们是武汉军区“8201 部队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进京反映武汉两派群众组织的真实情况。

“8201 部队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是个什么单位？这些战士怎么会来北京上访呢？

原来，8201 部队即湖北省军区独立师。1967 年春节前夕，为活跃部队文化生活，武汉军区独立师政治部依照惯例，举行了新春文艺会演，由各团的文艺宣传队参演。这次会演受到部队指战员和前来观摩的武汉市地方代表的好评。在地方代表恳求下，全师以团为单位组成了 10 个演出队，以春节会演的节目为基础，在武汉市各大剧场及大学和大企业的礼堂进行巡回演出。

自武汉军区取缔武汉“工总”，反对《二八声明》后，这些演出队的节目也配合武汉军区，声讨《二八声明》。如数来宝节目《“二•八声明”大毒草》中就有如下台词：

“二•八”有声明，鼓吹一个“乱”；

要大乱，要特乱，——它满篇是胡言！

乱中他捣鬼，乱中民不安，

乱了机关乱部队，乱中(他)好夺权。

革命的同志们，快快擦亮眼，

肃清“二•八”的流毒，

让它“图穷匕首见”……

演出队带着这样的节目轮番在武汉剧院、湖北剧场、中南剧场、清芬剧场、黄鹤楼剧场以及机关、企业、学校的礼堂等场所演出，一方面会得到一部分群众组织的观众喝彩，当然也会受到“工总”“二司”等另一部分群众组织的反对。一天晚上，独立师一团所在的演出一队在湖北剧场演出时，就当场引起场内两派观众的激烈争吵，致使剧场内秩序大乱，一部分观众冲上舞台要与演出队辩论。晚会只好草草收场，演出队在一片“保皇队”的讥讽声中逃离湖北剧场。

鉴于演出队在演出过程中频频发生摩擦，独立师政治部只好结束了在武汉有组织的巡回演出。

5 月中旬，从北京传来中央要为“工总”翻案的消息，独立师一团演出队的一些人认为中央不了解武汉的情况，于是提议进京向军委文革小组、中央文革小组反映武汉的真实情况。演出队的邓指导员坚决反对他们进京告状。这些战士就挖苦他说：“你怕丢了官帽子，我们没帽子可丢。你不去我们去。”

邓指导员只好表示：自己不能去，但是“为演出队的行动保密”。

最后，演出队 14 名成员中，9 人自愿组成“进京上访队”。其中有：演出队队长、创作员余家进；手风琴演奏员张伟；胡琴演奏员刘殿荣；三弦演奏员林邦勇；笙演奏员朱学诗；说唱表演杨黎明、罗学柏等。

5 月 19 日下午，他们 9 人带着收集到的关于“工总”、“二司”、“武钢九一三”反军、搞武斗等一大包罪证材料，带着各自的乐器，瞒着部队领导、冒着受军纪处分的危险，偷偷溜出军营大门，进入汉口火车站，等待进京的列车。他们事前已经知道，本次进京列车上的乘务人员多属于“百万雄师”。所以当列车员听说他们进京告状，是为他们“百万雄师”说话，就很客气地让他们免票上车了。在等待发车时，突然发现月台上出现了邓指导员等几位干部的身影。队长余家进说：

“坏了，一定是我们的行动被团首长发觉，派人来阻拦了。”

于是他们立即分头躲进乘务员休息室。邓指导员他们艰难地在车厢里挤来挤去，始终未能发现这 9 名战士。列车启动的笛声拉响，他们一行只好怏怏下车。

下午 17 时许，火车驶离汉口站，上访队员们这才舒了一口气。为了答谢列车工作人员，也为庆贺自己的首战告捷，他们在列车播音室为全体乘客表演了《想念毛主席》、《军民鱼水情》、笙独奏《北京的金山上》等器乐节目。

第二天中午时分，他们到达北京。一出站便直奔中央军委文革小组。

中央军委文革小组接待室里，来自各军区的军人上访者很多，但大都是穿四个口袋军装的部队干部，穿两个口袋军装的战士极为罕见。等待上访的人太多了，他们在接待室排队等候，一直到下班都没轮上。晚饭没钱下馆子，每人买了块面包对付。当晚就睡在接待室后边的一个大礼堂舞台上。夜来冷风袭人，只好顺手放开身边的一卷写好未贴的大字报，一张张盖在身上。一夜

难眠，一阵阵生出悲凉。第二天一早，他们早早起“床”，来到接待室，果然第一批受到接待。

知道这些战士的所在单位后，负责接待的干部又问他们：“你们部队领导知道你们来北京吗？”

战士们回答：“部队领导不知道。”

接待干部说：“现在各地来京的军人不少，多半来自院校及文艺机构，像你们这样的部队战士来反映情况的还不多。”“你们要尽快返回部队坚守各自的战斗岗位。”“你们的离京时间确定后，我帮助你们解决返程火车票。”

接待人员和颜悦色的言语和关心，稍稍平复了战士们昨夜的悲情。但是接待人员的承诺显然也让战士们失望。心有不甘，队长余家进问：

“武汉的‘工人总部’、红卫兵‘二司’他们，明目张胆反对武汉军区，把矛头指向解放军，这能算革命派吗？”

接待干部微笑着反问：“毛主席不是指示军队要支持左派革命群众吗？如果有人不是支持左派呢？”

战士张伟接着问：“我们看到的是，‘百万雄师’他们不上街，不停产，不串联，始终坚持生产岗位，怎么就成了保守派组织呢？”

“毛主席教导我们说‘要抓革命，促生产’；促生产的前提是抓革命嘛！”接待干部说得很有底气，“你们是武汉独立师基层连队的战士，依你们的身份是不能介入地方群众组织之间的矛盾的，懂吧？”接待的干部继续劝说道。最后，他再次叮嘱：

“你们要尽快确定返程日期，记住来我这里取火车票，9 张

吧？”

这 9 名战士原准备还要去中央文革小组的，此时已打消了念头。他们恍惚着将剩余的材料装进黄挎包，走出了接待室。但是，去哪儿呢？

“介绍你们去八大处解放军后勤学院住可以吗？”一位年长些的接待干部似乎发觉了他们的无助，主动开口，“那里可以住宿，也有食堂，都免费。”

这些战士千恩万谢之后，带着一封便笺，坐很长时间的公共汽车，来到解放军后勤学院，在那里住了下来。

解放军后勤学院的师生都停课闹革命去了。他们住在学生宿舍里，每天早餐馒头、稀饭、咸菜，中晚餐米饭不限量，萝卜、白菜，周末加豆腐，比在部队食堂强不少。但是，回部队怎样面见首长？如何汇报进京上访取得的成果才不至于挨批评、受处分？这让大家很伤脑筋。经过几天的集体讨论、反复修改，队长余家进起草了一个汇报提纲：

一、我们进京上访的目的是为了维护解放军的权威，这一行动得到部队内外革命派的大力支持，比如铁路方面的百万雄师群众就协助我们免费乘火车顺利抵达北京。

二、我们一行严格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进京途中和在京期间从未出现违纪现象，还在列车上表演节目，向革命群众宣传文化大革命，密切军民关系。

三、我们向中央军委文革小组首长详细汇报了“百万雄师”等组织坚持抓革命促生产的革命行动，也揭发了“工人总部”等组织反军乱军的恶劣行径。

四、我们上访队的行动得到军委文革首长的肯定和鼓励，比如他们的热情接待，还周到地安排我们的食宿，并解决我们的返程车票。

有了这个汇报提纲，大家心里比较轻松了一些，于是去了八达岭长城，到天安门前照相留念。本来还准备多呆几天的，但是一场突如其来的变故打乱了他们的如意计划，让他们不得不提前打道回府。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5 月 24 日，住在解放军后勤学院的武汉军区独立师进京上访的 9 名战士宿舍里，又安排进来了一批来自内蒙古军区的战士，一问，也是进京告状的，说晚上他们到政协礼堂与中央领导见面。

原来，就在内蒙古军区领导按照中央计划准备带着内蒙古军区上访的军人离京的时候，意想不到的事情又发生了。这时，从呼和浩特传来内蒙军区一名战士在和造反派发生冲突时被活活打死的消息，顿时激怒了这些在北京上访的官兵们，5 月 23 日，20 余名赴京军人乘卡车冲进北京京西宾馆抓捕吴涛。幸亏吴涛不在，躲过一劫。但周恩来调拨专列运送内蒙军人回呼和浩特的计划落空。

5 月 24 日晚，总政治部在政协礼堂开会欢送内蒙赴京人员。副总参谋长李天佑、总政副主任徐立清、军委办公厅主任路扬都到会了。会上，上访人员宣读了他们提出的“五项要求”，仍然希望中央能够收回《413 决定》，摘掉他们“保守派”的帽子。他们长时间高呼口号，与总部首长大声辩论，还要吴涛在“五项

要求”上签字，吴涛拒绝。顿时，100 多名干部战士冲上主席台，揪住吴涛便打，会场秩序大乱。李天佑、徐立清厉声喝止，但根本弹压不住。总政办公厅主任路扬和几十名警卫、工作人员也被打。吴涛被打不起，会场成了战场，军人成了暴徒。酣战将歇之际，主持会议的王良太向大闹会场的将士们发问：“今天的会开得好不好？”众齐声欢呼：“好！”

中央闻讯，极为震怒，立即采取措施。周恩来 5 月 25 日凌晨下令逮捕在政协礼堂殴打吴涛等人的凶手，并到毛泽东处报告内蒙古问题。

5月25日，中央军委下达对内蒙古军区命令：

主席批示： 照办。

内蒙古军区五月二十五日的五条命令，很好。内蒙古军区全体干部和战士应该坚决贯彻执行。

内蒙古军区担负着保卫祖国边疆的光荣任务，应该坚决贯彻毛主席抓革命，促战备，促工作的伟大号召，机关，部队应该恢复正常的革命秩序，所有人员应该坚守工作岗位和战斗岗位。

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手缔造和领导的，林副主席亲自指挥的人民军队，应该听毛主席的话，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保持和发扬我军的光荣传统，坚决贯彻执行一九六七年四月十三日《中共中央关于处理内蒙问题的决定》，更好地完成伟大领袖毛主席交给我们的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的光荣任务，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中共中央军委

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五日

附：

《中国人民解放军内蒙古军区命令》

内蒙古军区部分干部，战士来京以后，中央军委首长两次接见，听取军区来京常委的汇报，对我们作了极为重要的指示，并派负责同志到驻地分别召开了座谈会，听取了大家的意见，这是对内蒙古军区的最大关怀，最大爱护，最大信任。中央军委首长的谆谆教导，使我们受到了极大的教育和鼓舞，为了切实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关于处理内蒙问题的决定>，为了认真实现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给予我们的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的光荣任务，为了响应毛主席关于抓革命，促战备，促工作的伟大号召，特发布以下五条命令：

第一，坚决响应中央军委的号召，军区各单位到呼市和其他各地串联的人员必须于五月底以前一律返回原单位，不得在其他地方停留，过期不归的以自由离开部队处理。

第二，坚决贯彻执行军委八条命令，十条命令和中央军委的其他有关命令规定：

1、除步校，卫校，文工团，体工队和军乐队一律进行正面教育。

2、不许军队内部相互串联，也不许军队到地方去串联，如地方群众到军队串联的应予劝阻。

3、进行正面教育的单位，不应有战斗组织，现有的战斗组织一律取消，以确保领导机关严密的完整的指挥体系，保证机关和部队的正常工作秩序。

4、军队未经军区批准不许随便参加游行和集会。

5、汽车，汽油的使用应由各级后勤部门严格控制，加强管理，各种宣传工作如有线广播，宣传车，印刷工具及其补充器材等应由领导机关严格控制使用。

第三，坚决支持和维护，忠实执行中央<关于处理内蒙问题决定>的单位和人员，对不满中央这些决定和言行不一，阳奉阴违的人，要进行教育和严格批评，对少数对抗中央<关于处理内蒙问题的决定>的屡教不改，坚持错误的人要给予纪律处分。

第四，全军区指战员一定要在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基础上进一步团结起来，努力提高革命性，科学性和组织纪律性，提高政策水平，坚决反对打，砸，抢，抄，抓，绝对不准参加武斗。对待不同观点的人，不应歧视，更不应打击报复。

第五，坚决支持呼市三司和内蒙各地左派群众组织，要努力教育和团结保守组织中受蒙蔽和认识不清的广大革命群众及其基层组织。

全军区各级党委，各地领导，应该勇敢地站出来身体力行模范地执行中央决定。我们决心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和全军区指战员一起，坚决支持左派，教育团结受蒙蔽的广大革命群众，把矛头指向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指向内蒙的乌兰夫，王逸伦，王铎等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把内蒙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决不辜负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林副主席对我们的希望。

代理司令员：滕海清

政治委员：吴涛

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五日

5月26日，周恩来约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杨成武、粟裕等商谈解决内蒙古问题。当天，中央军委发出（67）12号文件，即《关于处理内蒙古军区问题的决定》，命令副司令员黄厚、参谋长王良太隔离反省，副政委刘昌、政治部副主任张德贵停职反省，停止与各方一切联络；对24日捣乱会场，殴打吴涛，宣读五条反动要求的少数头子实行清查逮捕；对来京上访的788名内蒙古军区的干部、战士宣布禁止外出，集中到外地整训，暂不回蒙；同时调65军第578团，69军28师83团、84团、82团一个营及铁道兵52团移驻呼市，将内蒙古军区警卫营、通讯营部分人员和高炮营、测绘大队等调离呼市，分驻北京军区指定地区；宣布内蒙古军区降为省军区，划归北京军区建制。

同日，中央全部收回发给内蒙古军区赴京军人的返程车票。

军令如山。滕海清、吴涛和副司令员刘彬立即随北京军区69 军 28 师开进呼和浩特，稳定局势。

前门饭店会议后，内蒙古军区先揪出“孔、廷、塔、鲍反党集团”，现在又打倒了黄、王、刘、张，全军区同时被打倒、揪斗的干部多达 712 人。

那些进京上访的内蒙古军区官兵被集体押到高碑店进行“整训”，之后，除极小一部份分到其他部队外，大部分被遣返回乡。

5 月 25 日清晨，解放军后勤学院突然进来一卡车荷枪实弹的军人。他们重重地敲门：“内蒙的，起床，跟我走！”结果，昨晚在政协礼堂闹事的内蒙军人全被带上卡车，送出了校门。

住在这里的武汉军区这 9 名上访战士顿时全无睡意，一个个呆若木鸡。“回去吧。”很快大家就统一了认识。吃过早饭，他们

收拾好行装，赶往军委文革小组接待室，领到 9 张去武汉的火车票，下午 15 时许登上了南下的列车，于第二天上午，返回了团机关的集体宿舍。

独立师 1 团的领导不知道该怎样处置这 9 名擅自离队进京告状的战士，就让他们去师部汇报。

下午，余家进、张伟、杨黎明 3 人代表这 9 名战士前往武昌的独立师师部，按事前商定的那个提纲进行汇报，又随机增加了一些平时所见的生动材料。谁知师长牛怀龙、政委蔡炳臣等师领导听得很满意，还夸奖他们告状队是以实际行动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要关心国家大事”的伟大号召。

独立师 1 团领导获悉师首长对告状队北京之行的态度后，也对这 9 人刮目相看。不仅没有批评处分他们，还让他们继续保留宣传队建制，继续进行演出活动。

## 第655回：命令下，内蒙古局面转变　“八二六”，与“红成”矛盾加剧

5月26日22时50分至27日凌晨0时40分，周恩来、康生、王力在人大会堂一楼西大厅接见呼和浩特市造反派代表30人，军人代表26人。

周恩来问：“你们等了很长时间了，吴涛同志挨打你们知道不知道？”

大家说：“不知道。”

周恩来：“真不知道？区党委的人没去，去更得挨打。

从4月13日宣布八条以后，已经一个多月了！他们来了许多人到北京闹事，24号达到高潮，军委开的会，李天佑参加了，动手打人发展到高峰，有100多人冲上主席台，把吴涛打了半个多小时，让他签字，李天佑制止，他们不听，政治部副主任徐立清上来讲，他们也闹。刘昌掌握会场也不制止，王良太发言鼓掌很厉害，他发言很有煽动性，问：‘今天的会开得好不好？’众人说：‘好！’和中央唱反调，800多人等不急了，不择手段，估计形势不足，闹事把他们暴露了。接见警卫营时说了，给他们以后的考验机会，把军队秩序建立起来。昨天我们决定采取五项措施，不能再等待了，我们已经说了，等待到一定程度。五项决定是经过林副主席的，经毛主席批准的，是根据内蒙形势采取的。”

接着，周恩来宣布了《关于处理内蒙古军区的决定》，然后说：“军队的留一半，清查一下，除了集训的，还有没有散兵游

勇的，倾向你们的劝他们回去，中间的也要帮助他们回去，少数头头顽固的交卫戍司令部，‘三司’也可以留下三分之一，‘818’来了吧？”

“818”王志有站起来，递过去照片。周恩来接着说：“‘红联’、‘八大员’来了，你们不要赶，你们去说他们也不听，告诉中央接待站，叫他们去做工作。军区造反派回去要听吴涛政治委员的话，听腾司令员的话，他们先动手，我们后动手，这样才有理。毛主席对内蒙问题很关心，昨天还打电话问内蒙事态怎么样？‘三司’很听话，就是很听话嘛！工会大楼先不要进，要孤立。于顺昌挨过打吗？‘三司’要听筹备小组、军队的话，一步步走。发展的慢不要紧，容易巩固，否则左、中、右都进来了，就要打内战。下面的保守组织不要砸他们，他们开批判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可以派少数人参加，开的好可以鼓掌，他说的不对可以质问，政治上的优势不要马上想占组织上的优势，这样容易对立。”

“筹备小组不要齐了再成立，几个人先成立起来工作，四川筹备小组才4个人，这是司令部嘛！我就讲到这儿，下面由康生同志给大家讲一讲。”

康生：“刚才总理把中央的措施讲了，详细情况没讲之前同志们不知道，不可能一点不知道吧。”

周恩来说：“高树华同志很守纪律呀。”

康生：“内蒙之所以这样，是乌兰夫的罪过。通过这件事更加暴露乌兰夫十几年的叛国罪恶，要宣传揭发乌兰夫的罪过，希望‘三司’、‘东纵’、‘818’今后利用这点来批判乌兰夫，

‘三司’过去做了，但做得还不够，今后还要做，要指出乌兰夫是蒙族的叛徒，是中华民族的叛徒，‘三司’要加紧做这个工作，彻底的揭露，要把斗争的大方向针对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邓、内蒙就是乌兰夫、王逸伦、王铎，要彻底暴露，批深、斗臭、军区王良太、黄厚、张德贵从开始上抗中央，下压群众，最后把反革命面目暴露出来，革命群众也应得到教训，只要我们坚持主席的革命路线，不管受多少挫折，最后还是要胜利的，因为我们是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上的。我们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

“这一个阶段‘三司’是守纪律的，实行了毛主席的政策。我出一个问题，去年毛主席提出学习解放军有五点，哪五点？”

高树华站起来回答：“学军事、学政治、学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周恩来、康生听后点头，并补充说还有三八作风。

康生接着说：“保守派闹事，王良太他们有三个目的，（1）对中央施加压力；（2）推翻《八条》；（3）保护保守组织的活动。

昨天收了他们的车票，有糊涂的人还高兴呢，以为他们胜利了。过去他们犯了错误，现在轮到你们犯错误了，我们是不希望你们犯错误，胜利了，要特别警惕，不要重复他们的错误，千万要注意，斗争还没有完。各盟市还很紧张，毛主席说要戒骄戒躁。现在我就想这样一个问题，保乌兰夫的人会不会打到你们内部？我看你们要警惕，我看是有。内蒙的阶级斗争是十分复杂的。你们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把本单位的斗批改做好，

不要骄傲，不要麻痹，不要放松警惕。”

“毛主席提出三个依靠，三个相信。以前的经验证明，没有人民解放军，文化大革命就没有保证，不能只看到黄厚、王良太。你们要听腾司令员、吴政委的话，同他们配合好，向他们学习。有缺点可以给他们提出来。内蒙是个很活的例子。不管发生什么问题，要相信解放军，不能动摇解放军。从这个事件更证明了解放军的作用。工学院的来了没有？”

工学院的陈永华站起来。接着，郝广德将各学校代表向康生作了介绍。康生说：“我提一个问题，今后你们有打内战的危险，现在有没有苗头，我不知道，过去为什么没有打呢？因为外界有压力，现在中央支持了，外界压力小了，将来一天天你们的权就大了，就争权夺利了，北京有句话叫‘摘桃子’嘛！你们那里的‘桃子’也快熟了吧！”

众人笑了。康生接着说：“北京的经验教训，你们要吸取的，你们要大联合，有事情要商量，我要问你们打不打内战，你们都会说：不打。光嘴上说不行。”

“总理和王力同志讲了，你们筹备小组很久了还没有成立起来呢，希望你们商量一下，很快地搞起来，革命是需要的，所谓筹备小组，不是正式的革命委员会，有几个人就行，不用搞选举，人不要很多的，是筹备小组，以后群众有意见可以搞掉，人可以少些，快些搞起来。有的单位多了可以减少，有的单位要求增加，可以增加，增加一个师长，工学院没有，没有可以增加一个。”

工学院陈永华站起来说：“我们不是那个意思。”

康生：“行了，不要那么谦虚了吗？一想起这个东西就打内

战。”

**5月28日，中共中央关于同意公开批判乌兰夫等人的意见：**

**1967.05.28；中发［67］169号**

内蒙古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

同意你们关于在《内蒙古日报》上公开批判乌兰夫和王逸伦、王铎的意见。

1.对乌兰夫不直接点名，称为内蒙古自治区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2.王逸伦、王铎公开点名。

中共中央

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八日

滕海清和吴涛回到呼和浩特，乘着北京的东风，下令用军事手段，拿下工会大楼。随后，呼市造反派在北京军区部队的大力协助下，于5月底攻克保守派在呼市的最后堡垒——内蒙古工会大楼。将守在大楼内的少数人押到师院，逮捕了打死欧阳儒忱的凶手。一度拥有百万之众的保守派终于土崩瓦解。头头被捕，群众分化。经过一阵倒戈、揭发、相互攻击、幡然悔悟的整顿之后，有的人失去了政治热情，有的人找到了新的契机，有的人怀抱着满腔悲愤，伺机东山再起。

内蒙的事情暂告一段落，我们再来看四川。5月23日，四川宜宾王茂聚派到北京抓捕“红色派”的“追捕组”来了。原来准备到北京抓捕刘结挺、张西挺、王茂聚等人的“红色派”追捕组成员，现在又成了“红旗派”追捕的对象。“红旗派”追捕人员在清华大学、北京工业大学造反派的支持下，先后在中央文革接

待站抓捕了“红色派”数人，在北京大学又抓捕了几人，其他没有被抓的“红色派”人员立即转移到中央政法干校。6 月 7 日，自称是公安部的五名人员来到政法干校，要求四川上访人员回去抓革命、促生产，限三天内离开北京。已无钱、粮的“红色派”人员不得不回到宜宾，纷纷“落网”，关进“牛棚”。

张国华、梁兴初、刘结挺、张西挺，在上京告状代表的簇拥下，从北京飞到了成都。入川前，毛泽东找张国华和梁兴初谈话，对他们说，成都武侯祠门前有一副对联：

世外人法法无定法然后知非法法也

天下事了了犹未了何妨以不了了之

而刘结挺、张西挺夫妇，则以胜利者的姿态返回四川。一时间，他们与原西南局第一书记李井泉、宜宾地委第一书记牟海秀等人开展坚决斗争的“事迹”，在各种群众组织的小报上铅印成章，广为散发。宜宾地区甚至连日上演反映刘结挺、张西挺、王茂聚、郭林川路线斗争“事迹”的川剧《宜宾风云》、《金沙激浪》，还有连载小说《翠屏松》，对刘、张等人都分别加以劲松、青松等称号。刘、张夫妇面对四面八方拥来的赞扬，欣然领受，也接受邀请，大讲自己当年与李井泉、牟海秀等人开展两条路线斗争的“英雄”经历。宜宾地区支持刘、张、王、郭的“红旗派”在自己主办的小报上，醒目地刊登出《“突破口”上红旗飘》的报道，以显示他们的正确。在这以后，宜宾地区两大派发生激烈武斗。“红旗派”进而喊出“保卫宜宾‘突破口’”的口号。从此“宜宾突破口”的提法就不胫而走，迅速传遍全川。

贵州李再含也派出记者和连环画作者前往成都采访刘结挺、

张西挺二人，准备在《贵州日报》上进行宣传。刘、张夫妇热情款待，亲自介绍情况，张西挺还手捧着《狱中日记》，声泪俱下地述说着自己当年的斗争事迹。来访者返回贵州，以最快的速度写出长篇通讯《人间正道是沧桑》在报纸上登载。刘、张夫妇看到报道异常欣喜，专门派出三名“特使”，前往贵阳登门道谢。

张国华、梁兴初、刘结挺、张西挺回到成都后，立即着手筹备召开“8.26”与“红成”两大派联合参加的大型集会，庆祝中央关于四川问题的《十条》下达。但是，令刘结挺没有想到的是，在“8.26”与“红成”各以什么名义参加大会的问题上，“红成派”与刘结挺、张西挺发生了分歧。“红成派”坚持要以其“地区总部”的名义参加，号称有 100 多万人。他们说：地区总部是“红成派”的大联合名称。

而刘结挺要求他们以“红成”、“红卫东”等单个组织的名义参加，理由是“地区总部”为跨地区、跨行业的组织，与最近中央的精神不符。“红成”反驳说，“8.26”也是这种跨行业的组织，为什么就可以？

刘结挺解释说：“8.26”是历史形成的，而“红成”的“地区总部”是新搞起来的，中央不提倡。

负责大会筹备工作的郭一民、田禾和成都军区政治部副主任钱春华找“红成”和“8.26”两派协商，协商结果是让两派各自通知自己的所属组织前来开会。结果第二天“红成”就提出，大会不安排“地区总部”发言，该派所有下属组织拒绝参加大会。

尽管“红成”抵制，大会还是在 5 月 23 日如期召开，张、梁、刘、张等省革筹首长自然全体出席，群众组织几乎清一色的

“8.26”派。不过有个引人注目的例外，那就是“红成”派的“成铁二七”组织，由勤务组刘喜等人带着“成铁二七”的一部分人参加了大会。对此，“红成”大为恼怒。

第二天，成都又专门为“红成”派召开一个大会，张、梁、刘、张等省革筹首长也都出席，参加者均为“红成”派的群众。

但是，成都乃至整个四川很快就以拥护和反对刘结挺、张西挺，分裂成两大派。一派是反对刘、张的“红成部队”，一派是拥护刘、张的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和“川大826”。“8.26”与“红成”两派原有的矛盾和仇恨在新的形势下又开始翻番似的增长，由此开始了四川造反派之间的派性斗争。双方之间的斗争也渗进了谩骂的形式。“8.26”将“红卫兵成都部队”的“成都”谐音读作“蠢猪”，称其为“蠢猪部队”，将四川医学院“9.15”称为“狗跳舞”……他们在街头流传一首嘲笑“红成”为“蠢猪”的仿毛泽东“卜算子 咏梅”的词：

战歌送春归，喜迎十条到，已是革命浪潮涌，犹有蠢猪嚎。

嚎也不起用，回头才是槽，自吃自睡自长肥，以免他人笑。

“红成”则称“8.26”派为“扒儿驴”、“扒二流”，对川大那位个头矮小，据说只有1米4多高的“8.26”负责人江海云，则称“根号2”，意思只有2的开平方那么高……

在大字报的攻击中，“红成”的“成都部队”被演化成“蠢猪不对”，于是“蠢猪”就成了“红成”的代名词。“826”被演化成“趴耳驴”，于是“川驴”也成了“826”的代名词。“兵团”是工人的组织，“红成”沿袭“二月镇反”中的说法，认为“兵团”成份混杂，里面尽是一群贼，于是从“贼”的土语“撬杆”

又演变成“撬狗”，于是“撬狗”成了“兵团”的代名词。

从此，“红成”的大字报就被人用红笔画上一个猪头，“826”的大字报则被人用红笔画上一个驴头，“兵团”的大字报就被人用红笔画上一个狗头，满大街到处画着猪头、驴头、狗头，成为天府之国不可多得的一景。

这些画画的都是初中和小学的学生，他们在百无聊赖中，自己寻找到了这么点乐趣。一群男男女女的半截子幺妹，根本没有观点，没有派性，这边画完了猪头，又去那边画驴头，乐此不疲。大人们看着还起哄，指点他们“这里有个狗还没画呢”，大家一起找乐子。造反派对这帮半截子幺妹也无可奈何，真是豆腐掉在灰堆里——吹不得也打不得，不过看到他们两边都画，倒也算公平，只当是在贴商标，也就不了了之了。

5月30日，中央文革小组给成都军区的电报：

张国华、梁兴初、刘结挺，请转告首都红代会和外省去四川的同学：

中共中央已经作了处理四川问题的决定，四川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已经成立，他们正在采取一系列措施来解决四川问题，请同学们相信四川的广大群众，一定能够自己解放自己。根据中央四月二十日重申停止大串连的决定，所有首都红代会和外省去四川的同学们应当立即返回本地区、本校，参加本地区、本校的斗批改。希望同学们成为执行中央指示的模范。

中央文革小组

一九六七年五月三十日

蔡文彬、张国华和梁兴初 1967 年 7 月在成都市成华区沙河电影院

6 月初的成都，“红成”派的口号：“炮轰刘结挺，火烧张西挺！”、“砸烂伪筹办！”、“刘结挺搞分裂，支一派打一派”在街头上和广播里已有很多。

“8.26”派则宣布要坚决维护省革筹的革命权威，指责“红成”派拒不参加 5 月 22 日的大会，就是分裂，“炮打刘张就是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

两派的斗争，从会场上的口头辩论，发展到大字报公开辩论，又发展到拳头棍棒的打砸抢，最后到了动枪炮的武斗。那时大街上有个奇观：部队机关门口的警卫没有枪——怕抢；造反派手里拿着枪——没人敢惹；战士见年轻学生就捂脑袋躲——怕军帽丢了。

5 月 28 日，中央军委召集 50 军主要领导进京，宣布 50 军从沈阳军区辽宁丹东驻地调入成都军区四川成都地区换防入川支左的命令。因为 50 军曾泽生军长在北京休养，当时在 50 军主持工作的时任 50 军第一副军长郑志士。据郑志士的工作笔记本亲笔记录，5 月 28 日当天，杨成武在京西宾馆接见 50 军领导并讲话。

5 月 29 日，50 军主要领导由北京来到成都。当晚，成都军区政委张国华、司令员梁必成在成都军区机关接见了他们。

梁兴初对他们说："我们到此只十几天，"接着他介绍了四川的基本情况，然后说："由于军区在支左中犯了错误，支持了保守势力，51、132 厂发生了流血事件，现在情况较紧张。"他和张国华到四川后已经几个昼夜没有睡觉了。"某些分区、武装部也很乱，武斗较重，伤亡较大，双方都有。外地来的造反派多，仅成都就有三万余，大方向一致观点各不同。保守派受蒙蔽，中毒较深，对中《决定》说是毒草，不听。造反派也提出些错误的口号：'武装保卫成都'、'和产业军战斗到底'……"

他要求"以毛泽东思想去支持教育广大受蒙蔽的群众，绝对不准开枪。"

张国华说："这里保守组织的头头是大有问题的，不是一般的坏人。有纲领、宣言，武装起来了。""二月以来有发展。这是由于我们站错了，不是支左而支保。""制止武斗时一律不带武器。"

甘渭汉说："我去年二月来的。文化革命后，年底把黄、郭揪出来了，是个大胜利。1 月 29 日公安局问题上当了，二月份围攻军区，因此情绪很大，作为支左的标志，因而抓住造反派的小

毛病不放，支持了保守派，大批抓人。军内抓 120 多，成都抓 3000 多。”

## 第 656 回：反总理，中央说绝不同意　国务院，各部委陆续军管

5 月 25 日，外交部“五一六纵队”贴出“两点议论”的大字报，影射对周恩来也可以“动一动”，“烧一烧”。并贴出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戚本禹三月份的一段讲话：“除了毛主席、林副主席以外，不能说炮打 XXX 就是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

这张大字报引起了外交部广大干部和群众的反感，纷纷用大字报等方式进行反击和声讨。外交部办公厅综研究室干部刘华秋等几人商定，向毛泽东反映这个情况，刘华秋执笔整理了一份简要情况材料，通过外交部办公厅综合组干部王海容和办公厅翻译室英文翻译唐闻生送给毛泽东。

5 月 27 日，唐闻生、王海容致信毛泽东说：“最近社会上出现了一股攻击周总理的风气，同时也反映到外交部革命造反联络站及所属各战斗队内部，争论颇为激烈。”“我们认为对总理的错误和缺点可用小字报或书信的形式向中央文革或直接向总理本人提出，或直接上呈您和林副统帅。对总理的指示有不同理解或在某些问题上与总理持有不同意见，可以采取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的方法在群众中展开正常的充分的辩论。但不能借此炮打总理、攻击总理，把总理打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或其后台。”并说：“我们绝不能同意‘炮打总理是当前运动的大方向’这个提法，这种提法是错误的。”

她们将刘华秋执笔整理的材料一并转交毛泽东。

5 月 27 日，陈伯达、谢富治、关锋、戚本禹、叶群接见第一外语学院“616 红卫兵团”、“井冈山兵团”、“红 28 团”，第二

外语学院“红旗兵团”、“东方红战斗队”等，以及“留学生世界革命红旗兵团”。大专院校红代会核心组部分成员也参加了会议。

谢富治说：“北京因为是毛主席所在地，还有中央文革小组，所以北京市的文化大革命是一片大好形势，好情况。但是最近出现两件事情值得同志们很好地加以研究，很好地加以重视。一件是北京市左派组织队伍之间打内战，内部斗争很激烈，不是大联合，而是小联合，由学校发展到机关，由一个单位分裂引起很多单位分裂，甚至北京形成两大派、三大派。这件事目前还在发展。第二件事情，有少数单位，如今天来的第一外语学院、第二外语学院，还有农大、对外经委、留学生‘世界革命红旗兵团’、‘遵义兵团’，这几个单位最近听说给总理贴了大字报。这两件事情，我们今天主要谈第二件事情。这是两件事，不是一件事。

北京是毛主席所在地，中央文革小组所在地，也是文化大革命的发源地，北京的事情做得好，全国跟着学；做得不好，对全国坏的影响也就大。这两件事做得不好，很不好。左派慢慢地分裂，不是一个单位、一个学校的分裂，而是大分裂，对全国有影响。第二件事情，总理是在毛主席、林副主席的领导下工作，总理就是总理嘛。总管许多国家大事嘛。这两件事都对我们国家大事不利。按照毛主席的路线，毛主席的思想，我们当前主要斗争锋芒要对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是刘、邓，在北京来说，是以彭真、刘仁为首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是我们当前的主要斗争锋芒。在我们革命队伍来说，是革命的大联合，革命的大团结。按照毛泽东思想，就是要对准以上说的任务。这是我们的主要矛盾，也是大方向，我们不能干

扰这个大方向。如果我们用很大的精力打内战，就会干扰大方向。如果我们的大字报对准负相当领导责任的工作很忙的周总理，也会干扰大方向。这两件事情，一个是锋芒不对，一个是容易把我们的阵营搞乱。毛主席经常教导我们，小道理要服从大道理。不管这派有哪些道理，那派有哪些道理，这总是小道理，你们对总理提意见你们有你们的道理，但是总有大道理管小道理。这个大方向错了，北京一错，影响全国都错了。今天找同志们来，希望你们自觉改。我们也不赞成对贴了总理大字报的说他是什么、什么，又上纲上得很高。你们是错了……”

一外代表反驳说：“没错！总理他自己讲的贴他的大字报可以……”

谢富治大声批评道：“他自己说是他说嘛！你这样子就是不对嘛！”

一外代表不卖账，指责谢富治：“你发什么态度？”

谢富治毫不客气：“你这个小同志这么厉害！我们严厉地对你说：你们这样做不对！你们对总理有意见可以给总理写信，可以给毛主席、林副主席写信。”

陈伯达：“你们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都是小道理，不是大道理。你们说总理保张彦，张彦把我打成反革命的后台，总理委托康老调查这件事，后来决定撤销张彦的职务，你们说总理保张彦，事实都没有弄清楚。”

代表说：“我们不是说保张彦，是保陈毅。”

陈伯达：“保陈毅我是最大的保皇派嘛，是我说的嘛，怎么搞到总理头上了？出来保陈毅的是我，不过那天我没说什么保不

保的问题，但意思是保，不仅保，而且大保特保。你们不反对陈伯达、打倒陈伯达，搞到总理那里去了。这样子你们把关心国家大事是到反面了，搞错了。”

关锋：“要照顾国家大局。”

陈伯达：“不照顾国家大局就不算关心国家大事了。你们说我保了陈毅没有？”

众人答：“没有。”

陈伯达：“你们乱说一通。‘保张彦’，事实上总理撤张彦的职；保陈毅，是我保的，我今天就让你们批，要打倒首先打倒陈伯达，没打倒陈伯达就能打倒总理嘛？总理是国家的总理嘛！”

戚本禹：“总理保陈毅是可以的，你们反陈毅也是可以的。但是总理保了，你们反总理是错误的。陈毅有错误，中央等待他觉悟，不保他的错误，要他好好做工作。毛主席就是这个方针。

有人说我们讲毛主席、林副主席不能反，其他可以反，我们没有说过这样的话。总理是谦虚的，你们刚才急得带劲，总理说贴他的大字报可以，他说的话说明他谦虚。

你们不要干扰毛主席的革命航线。你们要研究毛主席的航线，船头往哪里摆，你们不研究。你们这样子去搞外交工作会打败仗的。你们被动，我们也被动，外国人就造谣说总理和陈伯达分裂了，你们就干着蠢事！

在这个大的严重的斗争里面，毛主席有他的严密的战略部署，千万不要干扰了毛主席的部署。毛主席的指示不能都理解，但是理解也要执行，不理解也要执行。对毛主席就是要无限崇拜，无限信仰。”

陈伯达："你们把事实完全搞得不对，是捕风捉影。说'总理跟刘邓一起制定反动路线'，完全是乱说，在怀仁堂与刘、邓作斗争的时候，总理不在家嘛！还说总理挑动武斗，不能乱编！凡是造谣的最后都要失败的。"

戚本禹："红代会，你们贴'凡是反对周总理就是反革命'的大字报，红代会通知一下，不要贴这样的大字报。你们心是好的，但是不要帮倒忙，这样一贴外国人就知道有人反总理。"

关锋："文化大革命进行了一年了，如果算舆论准备时间，快一年八个月了，主要的人物差不多了，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很清楚了。毛主席的中央工作班子要不要维护？要从大局来考虑一下。"

陈伯达："从前在延安的时候听毛主席说过，调查研究有些人调查了九十九件事，只有那一件关键的事没有调查，九十九件也不算。你们要找一个人的错，秋毫之末可以找到一些，当然小事集起来也可能是大事。无产阶级是讲道理的，不讲道理群众通不过。现在北京分成两派这对不对呀？"

众答："不对！"

陈伯达："对两派打内战坚决反对。"

关锋："不参加打内战不叫和稀泥，不叫折衷主义。"

戚本禹："现在外面说我们中央文革分成两派，这是胡说！你们不要听他们的。"

陈伯达："中学红代会把六中'红旗'开除了，不能随便开除嘛！各大专院校派到各地串连的，中央已有通知停止串连。还有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的《重要通告》也讲了，凡是到各地串连的

都要回来。你们红代会要带头执行，不肯回校的可以开除学籍。现在发现不好的情况，学生住到各机关里去，造成各派对立，为什么不让别人自己革命呢？只有你们革命，别人就不革命了吗？你们在那里包办代替，造成分裂，对革命不利，对生产不利。我们再讲不要搞喇叭车，，也不要在交通要道搞广播。你们总是相信你们是对的，只顾自己吵架，不顾四周的老百姓睡得着睡不着。大喇叭吵得很，影响第二天的工作，影响工人农民生产。红代会发个通知，不搞喇叭车，把交通工具，汽油控制起来。”

5 月 27 日，周恩来在北京听取驻港机构负责人汇报香港问题后作出 25 点指示，批评了一些极左做法，如称“既不和英打一仗，又不准备收回香港，那末，强调过头。”“《文汇》《大公》和国内差不多了。内外有别，在香港还是要的。”“‘把香港搞成红彤彤的’的形势，你们考虑吗？一切照国内做行吗？”同时表示：“目前不能低下来，不能示弱，避免群众情绪下降。”同意举行“警告性罢工”，表示，对“反英抗暴斗争”“士气可鼓不可泄，要因势利导”。

5 月 27 日，周恩来主持中央碰头会，讨论通过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对国务院××部（委）实行军事管制的决定（试行草案）》。次日，周恩来将该决定送毛泽东、林彪审阅，并附信说：“国务院各部（委）经过今年领导革命、监督业务的夺权斗争后，现在大多数单位的革命造反派均已分成两派，互相斗争，影响生产和业务甚大，势非实行军管不可。昨（廿七）日常委碰头会上通过这一决定（试行草案），现送上，请予审批。”

《决定（试行草案）》指出："为了坚决贯彻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彻底搞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认真执行'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保证革命生产双胜利，根据毛主席关于'军队不但要协同地方管农业，对工业也要管'以及'只管工业，不管交通运输，是不对的'等重要指示，特决定自即日起对××部（委）实行军事管制，成立军事管制委员会（以下简称军管会）或军管小组，任命×××为军管会主任或军管小组长，×××、×××为副主任或副组长。""军管会在国务院和中央军委的领导下，对部（委）的各项工作实行统一领导。""军管会下成立'抓革命，促生产'的两个班子，把革命放在首位，以阶级斗争为纲，以革命统帅生产，建立革命的新秩序，掀起生产的新高潮，争取完成和超额完成国家计划。"

毛泽东当天批准此《决定》，中共中央即日发出，对国务院一些部（委）陆续实行军事管制。

5 月 26 日，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编印的《要事汇报》上登载了云南省公安厅报告：《一些高干子弟抄了云南省副省长王少岩的家并抢走财物》，报告说：22 日晚，17 个自称红卫兵的人抄了云南省副省长王少岩的家，抄走手表、照相机等物和现款、存折，在取款时被抓获。参与者都是中学生，其中有 6 个是北京学生，其余 11 人，除两人外，都是高干子弟。

5 月 28 日，毛泽东在这期《要事汇报》登载的这篇报告旁边批到：

如不教育好，会成为将来反革命复辟的祸根之一。好在还不占干部子弟的多数，多数还是较好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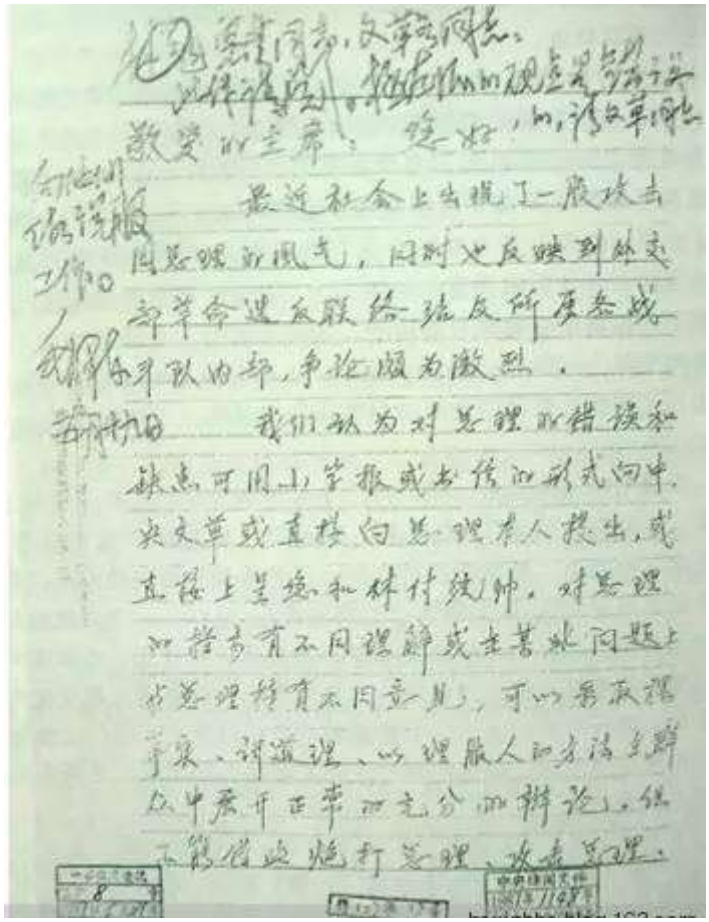
5 月 29 日，毛泽东将外交部唐闻生、王海容 5 月 27 日写给他的那封信批给林彪、周恩来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

林彪、恩来同志，文革各同志：

此件请阅。极左派的观点是错误的，请文革同志向他们做说服工作。

毛泽东

五月廿九日



## 第 657 回：纪登奎，扮铁路工人进京　五二六，郑州发生大武斗

5月11日，河南省委书记处书记戴苏理公开表态，支持“河南造总”，表示要“坚决和‘河造总’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并代表“河造总”一方去北京参加谈判。

其实，在中南局的第一书记陶铸和代理第一书记王任重被打倒后，因为文敏生是中南局调到河南的，社会上有些人便认为他是“陶、王黑线上的人”，要打倒他，文敏生思想压力很大，被折腾得病倒了，住进了医院。这时候，河南省委有些领导人的政治态度开始发生动摇，尤其是那些在“大跃进”时跟着原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的省委领导干部，对改组河南省委后，曾经批评和处理过他们的问题不服气，此时看到刘建勋调走了，文敏生也快不行了，就想乘机为他们过去的错误翻案。

戴苏理在“大跃进”的时候当过省委秘书长，这时他对纪登奎说：“老纪，你看这形势，省委搞得这么被动，要不，咱们俩也起来造反吧？”

纪登奎对他说，“老戴呀，你看，刘建勋调到北京了，现在形势这么困难，咱们省委应当团结；再说，人家文敏生当第一书记，一共才几个月时间，能有多少错误呢？”

到了 1967 年 5 月，在河南省军区的支持下，戴苏理终于向刘建勋、文敏生开炮了，表态支持“河造总”。

可是“二七公社”呢？河南省委的领导干部，无论“走资派”还是“革命领导干部”，他们都见不到。到北京向中央汇报，“河

造总”有“革命领导干部”进行“三结合”，“二七公社”的“革命领导干部”在哪里呢？“二七公社”觉得，没有“革命领导干部”似乎就不能“三结合”，就不符合中央的指示精神了。于是，一个筹划“抢”革命领导干部的行动开始了。

5 月 15 日，“豫农红总”得知省委副秘书长张耀东在省委大门口看大字报，于是，他们的头头范念民亲自带上一班人和一辆大卡车朝省委奔去。到了那里，汽车停在一旁，范念民先下来和张耀东站在一起，装作看大字报的样子，悄悄地对张耀东说：“到我们学校看看我们的大字报吧？”

张耀东说：“可不敢，我出门登了记，有人管着我哩！”

范念民看商量不通，就示意实行另一套方案。于是，有两个学生突然跑上前去抱住张耀东，把他推到汽车驾驶室里，张耀东一边挣扎，一边喊：“农学院抢人了！”

说时迟，那时快，只听大卡车“呜”地一声，就开走了，张耀东的喊声也被淹没了……

以李蔚、钟力生为首的“省委造总”闻讯，决定当晚封锁、围攻农学院。半夜有人反映说：有人在北站见到张耀东。李蔚当即通知“铁路总部”追查，“省委造总”也派出一汽车人到北站配合。后来“铁路总部”说：“当夜向北开走两列货车，可能乘货车去北京了。”于是李蔚与“铁路总部”头头坐阵省委五号楼，用铁路专线命令安阳车站，拦截货车检查。

张耀东到农学院后受到很好的接待，本来就跟着刘建勋支持造反派的张耀东，在两天后发表了支持“二七公社”的《我的声明》。

4月初，有一位《解放军报》记者找到被关押的纪登奎采访。当纪登奎听说省军区抓了很多人时，他对这位记者说："听说现在抓了很多人，这些青年学生，都还是些孩子嘛，他们有什么责任呢？我是省委文革小组成员，文化革命，是我们号召他们参加的，责任应当由我们省委这些领导人来负。如果说参加文化革命有什么错误、有什么罪的话，省军区要抓人，那就把我抓起来好了，应当我去坐班房。这些孩子们，他们没有罪，省军区不应该抓他们，应当把他们放出去。"

纪登奎的这番话，被这位《解放军报》记者传出去，并写成大字报贴在省委和省军区大院的围墙上，在社会上很轰动，到处传抄。"二七公社"的许多学生被纪登奎的谈话感动得哭了。他们在那种处境下，都认为纪登奎是个好干部，就这样，纪登奎成了"二七公社"拥护和支持的"革命领导干部"了。

郑州大学附中离河南农学院很近，这些"红旗"小将们经常到农学院"串联"，他们中多是省委干部子女，对省委大院和省委领导比较熟悉，所以，范念民曾向他们布置"任务"，让他们设法打听纪登奎的情况，及时通报。

5 月 17 日上午 11 时许，郑州大学附中"红旗"的一位同学气喘吁吁的跑到农学院对"豫农红总"负责人范念民说："纪登奎被批斗后，刚刚被送到省委北院西一字楼，因为大会还没有结束，现在也没有人看管……"

范念民一听，机会难得。事不宜迟，他迅速调集人和汽车。郑大附中"红旗"的几个学生也赶来了。他们根据报信同学的描述，简单画了草图，商量了方案，就出发了。

汽车到省委北院的北门附近，提前灭火，悄悄停在西一字楼后边墙根。范念民交待司机李师傅说："只要纪登奎上车，就马上开车，其它事你不要管"。

他将带来的几十名学生分成三组：第一组占领传达室，切断电话；第二组留守汽车等待接应老纪和后边的警卫工作；第三组精明能干，下车后直奔西一字楼。

西一字楼坐北朝南，北边靠马路。原定的方案是：纪登奎下楼后从临街的厕所窗户上跳墙出来。可是到实地一看，厕所的窗户上有钢筋，人根本出不来。

这时，有同学看到后墙边停放一辆架子车，大家把它往墙上一靠正好是一架木梯子。

来到楼上纪登奎住处的学生推门进去，刚刚坐罢"喷气式飞机"的纪登奎，看见学生们进来，以为又要批斗他，习惯地从枕头下去取眼镜和笔记本，忽然一侧身，认出了几个同学，吃惊地往后退了一步。

学生说："我们抢你去农学院，你去不去？"

纪登奎说"走!"

没容多说，几个人抬起纪登奎就往楼下跑……

来到墙边，纪登奎很配合，他疾步走到梯子旁边，几个学生从"梯子"上把他推过墙去，车上几个同学顺势接住，顷刻间，汽车声响，箭也似地飞驰而去。从进去到出来，总共不到 10 分钟！

纪登奎被秘密安排到农学院一号楼三楼一间屋子里，和张耀东一墙之隔，但彼此没有见面。

纪登奎在关押期间，对外面的情况，一点儿也不了解，既不知道有些省委领导成员已经“造反”，把他和刘建勋、文敏生捆在一起，要打倒；也不知道“二七公社”在北京已经提名他作为支持他们这一派的“领导干部”，连中央在军委《八条命令》之后又发布了军委《十条命令》也不知道。在关押中允许他看的，只有一本袖珍版的毛选四卷合订本。因此，当他听说“二七公社”要他去北京参加“三方会谈”，马上提出要看材料。同学给他们送来很多材料，如北京消息、各地支持“二七公社”的声明、中央的指示等等。

下午，“二七公社”决定立即送纪登奎去北京，参加北京“三方汇报”会，并且决定当天晚上就走。

“省造总”很快就发现纪登奎被抢，立即组织宣传车用高音喇叭在农学院周围高喊“愤怒声讨二七公社的滔天罪行！”“如不交出纪登奎，就要采取革命行动！”“二七公社不投降，就叫它灭亡！”等口号。河南省军区也急忙把领导干部转移到豫西山区。接着，火车站被封锁，要道设置拦截。新乡、安阳等地还设有“检查站”。

5 月 19 日晚上 22 时，灯光辉煌的农学院，所有路灯突然熄灭，院内顿时一片黑暗。这时，高音喇叭喊了起来：“电工李师傅，请赶快修理路灯！”

伴随着电灯的熄灭，从二七大楼前开过来两辆满载着人的卡车，鸣着喇叭开出了农学院，一辆朝北，一辆朝南。

汽车走后，突然又从二七大楼过来了 30 辆自行车，那自行车 10 辆一组，一前、一中、一后，各自相隔 30 米左右，相继出

了农学院。自行车的出动，使大家又议论起来：纪登奎到底是怎么走的？

半小时以后，两辆汽车分别返回学校，车上还是满载着人。大家就肯定纪登奎肯定是骑自行车走的。

再说 30 辆自行车从农学院出发后，沿小道驶向郑州机务北段，前 10 辆车是前卫组，后 10 辆车是后卫组，纪登奎坐在中间一组“红总”作战部负责同学车子的后坐上。他头戴鸭舌帽，身穿工作服，已是一个工人的打扮。当快接近机务北段的时候，前卫组打铃报警，原来有一队汽车开了过来。

“马上隐蔽，准备战斗！”随着一声令下，大家隐蔽在附近麦地。只见满载着手持长矛人的 3 辆卡车急驰而过。

前卫组走到车站，到了约定地点却找不到联络人。

原来，“二七公社”联络人正在车站焦急的等待，突然，从侧面过来一队警卫队，喝问到：“干什么？是不是想扒车？什么观点？”

“过路的，自行车坏了，修修车。”联络员赶紧回答。

过了片刻，联络员来了，迅速将纪登奎和几个护送的学生负责人带到机务北段“八一革联”处，研究赴京的具体事项。

很快，“八一革联”的负责人从屋里出来了，只见纪登奎跟在他后边，左手提灯右手拿锤，全然一副铁路工人模样。他们分别爬上已挂上车头的列车，几分钟后，一声汽笛长鸣划破了夜空，列车拖着浓浓的长烟，向着北京方向奔驰而去。

车到安阳，这里检查严格。一队队手持长矛、头戴安全帽的“河造总”组织正在等待。列车停住后，他们迫不及待地跳上各

个车厢，进行搜查盘问。这时纪登奎早已跳下了火车，在叮叮当当地敲打车轮。

就这样，纪登奎化妆成铁路工人被“二七公社”派人乘拉煤的火车送到北京参加三方谈判。接着,新乡地委第一书记耿其昌也被新乡师院“八一八”的学生护送到北京。

5月25日，郑州市委第一书记王黎之发表支持“二七公社”的声明。

河南“十大总部”那些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中印边界反击战的复员、退伍军人，以他们丰富的实战经验，率领着“工人纠察队”和“郑州铁军”两支队伍，乘坐100多辆卡车，南征北战，用武力狂风一样扫荡了郑州“二七公社”的大部分据点。他们占领了郑州市委，在这栋当时郑州最高的七层楼上，设立了前线指挥部。

郑大“革联”被赶出了校园，河南医学院“东方红”所在的大楼被攻克。郑州市的“二七公社”据点最后只剩下“解放军赴豫调查团”指挥防守的郑州粮食学院、“豫农红总”坚守的郑州农学院的大楼和申茂功指挥防守的国棉六厂3个据点。其中，国棉六厂“工人赤卫队”坚守的六厂大楼，就在“十大总部”省工总大楼的核心地带。从5月中旬开始，国棉六厂就被工人“纠察队”严密地封锁起来，各种路障封锁了大楼外所有的通道。被重兵围困的六厂大楼的楼顶，孤凄地飞扬着一面“工人赤卫队”的大旗……

国棉六厂“工人赤卫队”的头头申茂功，因为参加“二七公社”核心组会议，被隔在了外面。他一次次带领队伍试图冲进去，

但一次次损兵折将，大败而回。

“二七公社”召集核心组紧急会议，决定倾巢出动，举行全市的万人大游行，借游行的声势，冲破封锁，解救被围困在国棉六厂大楼里的工人。游行的时间，确定在 5 月 26 日下午 17 时，游行队伍接近六厂大楼的时间是天刚擦黑，可以借黄昏的掩护，冲破对方的包围圈，接出人就走。

5 月 26 日中午，郑州一中“红旗”等中学“二七”派学生抄了河南军区政委何运洪的家。在此前后，“二七”派的七中“8.16”等组织，还抓了省公安厅厅长王一鸣。

5 月 26 日下午，河南“二七公社”在“中国人民解放军赴豫调查团”、“全国各地造反派赴豫战团”及“首都红代会”特派河南联络员支持下，在河南省体育场举行“炮轰镇压河南文化革命的刽子手何运洪誓师大会”，参加大会的有“二七公社”派两万多人。

大会期间，再次接到“二七公社”负责人、海军研究所的技术员杨锡淼来电话求援，说他们在国棉六厂的“解放楼”被包围了，很吃紧。

大会结束后，“二•七公社”按计划举行了大规模游行示威活动。走在游行队伍的最前面的是“解放军赴豫调查团”空字 002 部队和 796 部队的学员，紧随其后的，是工人和大中专学生。他们走过河南省军区所在的金水大道，走在“河造总”据点林立的建设路上……游行队伍以广播体操的队型横向拉开，满满地占据了整个的街道，在《二七公社好》、《只要打不死还要干革命》的歌声中，缓慢地向国棉六厂挺进……

游行队伍行至棉纺路，已经可以看到飘舞在国棉六厂楼顶的“工人赤卫队”那面大旗。楼顶上站满了人，都光着上身或者穿着破烂不堪的背心，脸、手被熏得漆黑，有的头上还缠着纱布。每人都手持棍棒，活脱脱一群头顶插满翎毛的印第安土人木立在蛮山荒岭。被无数次击打的楼房，已经没有一扇完整的窗户、更没有一块完整的玻璃，大楼的四周，砖头、瓦块密密匝匝地环绕着。看到游行的队伍，楼上的人欢呼、雀跃……

突然，棉纺路四周棉纺厂里的汽笛响了起来，同时涌出许多手拿木棒、铁棍的人冲进游行队伍逢人便打，游行人群顿时被冲的七零八落，四处狂奔逃散。现场砖头、瓦片横飞。

原来，“十大总部”事先已得到消息，决定要对“二七公社”的这一“反革命行动进行坚决打击”。他们从国棉一厂、三厂、四厂、六厂、煤矿机械厂等单位，调动了该派 6000 多人，戴安全帽、拿铁棍、钢条、砖头等，以臂缠白布条为标识，预先集结在棉纺路的各棉纺厂内。“十大总部”的工人对学生还算手下留情，成年人被抓的没有一个不被打的头破血流。

“二七公社”郑州肉联加工厂工人袁庾华和郑州大学学生任延庆，本来一个在游行队伍前，一个在游行队伍后指挥，发现中埋伏后，赶紧指挥队伍掉头回撤。这时，杨锡淼也带着研究所十几个人骑车赶来，让袁庾华速带十几个人到省军区，要求他们来制止武斗。

袁庾华他们在省军区门口被对立派堵住围攻，一直到快天明了，他才翻墙突围出来。

而棉纺路这边的大规模浴血混战，已造成严重伤亡。双方伤

千余人，死亡人数一说 7 人，一说数十人。

至 5 月 27 日晨，有人看见独立二师师长带着战士从国棉三厂出来，士兵臂上都戴着白毛巾，他们被群众截住。大家当时都认为，这位师长就是“526 事件”的总指挥。

7 时，武斗被部队制止，双方开始陆续撤出武斗现场。

27 日早上，从河南医学院到郑州大学，各个房间连走廊上都是伤员。这就是有名的“郑州 526 事件”。到 28 日，在医学院的重伤员中，又死了 10 多人。

“二七公社”营救国棉六厂的行动功败垂成，逃回郑州粮食学院。“十大总部”挟新胜之威，挥兵追赶。27 日，近万头戴安全帽、手持木棍的“郑州工人纠察队”将郑州粮食学院和河南农学院团团包围。

在北京红卫兵和“中国人民解放军赴豫调查团”的帮助下，大学生们用桌子、自行车带改装了可发射半截砖的、杀伤力极大的大弹弓。农学院在自己坚守的楼上堆积了大量的农药，配备了数十台马力强劲的鼓风机。只要对方的人一接近大楼，每个窗口就会飞出几十块砖头；喷射出一团团呛人的农药。

高高矗立在“豫农红总”大楼楼顶的十个高音喇叭在广播：“十大总部的工人兄弟们，河南二七公社河南农学院红色造反总司令部正告你们：二七战士是不可欺的！你们已经看到了攻楼者的可耻下场，看在你们受蒙蔽的份上，我们只是使用了低浓度的药剂，没有使用致命的武器；只要你们撤出围墙，我们允许你们拉走大楼前的伤员；但是、在此、我代表红色造反总司令部严正地警告你们，大楼十米处的白线，是一条生死线，只要你们胆敢

再一次对大楼进行攻击、再一次进入白线，那就是你们的死期到了，我们为了生存、为了将中州的文化革命进行到底，豫红造总正告一切敢于玩火的人，我们将本着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原则，给来犯者以致命的打击！让他们在我们的工事面前，尸横遍野、血流成河！我再次警告你们！进入白线者、格杀勿论！希望你们好自为之，勿谓言之不预！……”

## 第 658 回：袁庾华，极赞同“文攻武卫”　五二九，第一次见豫代表

郑州“526” 武斗事件发生后，河南两派都开动各种宣传机器大造舆论，声称是对方蓄意制造了这场武斗，控诉对立派造成了本派“革命战友的死难”，声称“要为死难的革命烈士报仇”，“血债要用血来还”等等。“526”武斗事件，成为河南郑州市两派群众组织大规模武斗的开端。

27 日，郑州肉联加工厂“二七公社”的袁庾华和郑州大学学生李长杰商量，通知各个单位在二七广场人民银行前集合，来了几万人。他们从二七广场到河南省军区游行示威，在省军区门口砸了那里的大字报栏。然后，在七中大操场上，袁庾华领着大家宣誓：“要用鲜血和生命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

5 月 29 日，河南省委副秘书长苗化铭发表支持“二七公社”的声明。

5月29日21时至30日0时30分，人民大会堂西会议厅，周恩来、陈伯达、康生、谢富治、肖华、杨成武、关锋、王力、戚本禹等人第一次接见河南赴京汇报代表团“二七公社”22人，“河造总”10人，省委干部纪登奎等3人，河南省军区政委何运洪等3人。列席人员有：首都红代会4人，“中国人民解放军赴豫调查团”1人，哈军工“红色造反团”1人。

周恩来等人在“毛主席万岁！万万岁！”的欢呼声中进入会场。他问：“何运洪同志来了没有？”

何运洪回答：“来了。”

周恩来问：“你给郑州打电话了没有？”

答：“打了。”

周恩来：“那3位书记来了没有？”

何运洪：“还没有到。”

周恩来：“文敏生、杨蔚屏、戴苏理中央请他们来了，怎么把他们弄回去了？”

这次，何运洪没有回答。

“二七”代表喊道：“这是何运洪捣的鬼！”然后高呼口号：

“打倒何运洪！”

“砸烂河南独立王国！”

“用鲜血和生命保卫毛主席！”

周恩来用手向下压了压说：“同志们，不要激动，到了中央摆事实讲道理么。”

康生：“摆事实讲道理最有力么，一个一个讲，不要吵么。”

周恩来又问：“党言川同志来了吗？”

党言川站起来回答：“来了。”

周恩来：“纪登奎同志，来了吗？”

纪登奎站起来：“来了。”

周恩来：“3个书记明天也来，何运洪你负责。”

何运洪：“好。”

周恩来：“‘造总’来了吗？”

“河造总”代表回答：“来了。”

周恩来：“来了几个人？”

“河造总”：“10个。”

周恩来：“北京这么大，你们怎么不告而走啦？”

“河造总”代表：“我们有意见，他们把我们逼走的。”

“二七”代表：“造谣，是个大阴谋！”

双方又争吵起来……

周恩来：”别吵，别吵么！今天我们开3个钟头的会，9点至12点，‘二七公社’翻过来，一边一个讲。还有纪登奎么，军区么，党言川，你们谁先讲？”然后又问“河造总”：“你们的代表什么时间来？”

“河造总”：“明天来。”

康生：“不要激动，不要吵架，这是在中央开会，摆事实讲道理，问题好解决么。”

周恩来：“不要吵架，不要骂街，摆事实讲道理，‘二七公社’先讲？”

郑大“联委”寇学济发言说：“我控诉何运洪镇压河南文化大革命的滔天罪行！”

寇学济讲了一段，情绪激动……周恩来：“多摆些事实。”

王力：“这是中央开会，向你们作调查的。”

康生也劝道：“心情平静些。”

寇学济点名控诉何运洪，当讲到何运洪对纪登奎迫害时，谢富治站起来用目光寻视纪登奎，纪登奎起身向谢富治点了点头。当讲到在河南竟有人说：“何运洪他老人家说……”时，会场大笑，这时“河造总”起来为何运洪辩护。

周恩来予以制止说：“别吵！让别人讲完！”

康生对“河造总”代表说：“何运洪在场么，叫他们讲，你们干什么？”

寇学济继续讲，他说何运洪利用《河南日报》制造反革命舆论等等。接着河医“东方红”黄天亮控诉何运洪操纵“公安公社”制造“526惨案”。

周恩来：“我们从2月份起就着手一直解决河南问题，你们要摆些事实。‘造总’哪位同学讲？节约点时间。”

郑工“造总”孙孝先发言，指责“二七公社”5月22日在北京抢了他们的人。

周恩来对他说：“你们走了干啥？我们派武装警卫嘛。”

接着，“二七公社”与“河造总”就5月22日北航“红旗”在北京抢“河造总”材料一事互相指责。那天的冲突后，“河造总”代表籍口“人身安全没有保证”，愤而离京返郑。

康生说：“还是把河南文化大革命的问题谈谈吧，把河南的关键问题提出来，不要抓住这件事不放。”

“二七”代表纷纷说：“坚决拥护中央首长指示，谈大方向。”

康生：“何运洪，你负责他们来！中央老早就叫你们来，你们是不执行的，为什么河南问题一直拖到现在？2月份就在解决河南问题了，有很多问题你们是不执行，……”

何运洪站起来想说话，康生说：“你不要站起来，中央有材料，以后给你说。”

党言川控诉何运洪在河南搞大逮捕，王力问：“郑州市宣布非法组织多少？中央军委《十条命令》后是不是撤消了？”

党言川答：“4月16日军区副政委余嗣贵还在大会上重申‘郑

大联委是非法组织’，还说军区说话是算数的。”

王力：“这些重要材料，刚才你们都没有讲清楚。”

周恩来问党言川：“你什么时候被捕的？”

周恩来让纪登奎讲一讲。纪登奎站起来说：“抄‘造总’的材料是不对的，我的确不知道，后来在北航，韩爱晶同志告诉我的。他们说我是后台。我被关了4个月。”

“《十六条》以前，我执行了反动路线，压了‘郑大联委’，《十六条》以后，我也有些错误，我愿意检讨，今天时间少了，我暂不讲这个。河南军区介入文化大革命以后，在支左问题上搞错了。去年8月份杀出来的造反派组织除了一小部分，摧垮的面相当大，开封师院‘八二四’被摧垮了，信阳、商丘全部被摧垮了。现在当权的‘三月左派’整天喊着与‘公安公社’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公安公社’是什么人呢？是死保王一鸣（公安厅厅长）的人，军区搞‘三结合’结合他们，各县公安局都是这样。他们把四大民主变成了‘大镇压，大逮捕，大登记，大请罪’，把这场文化大革命变成了‘镇反运动’。省直机关、‘十大总部’是怎样起来的呢？就是原系统、原机构、原部门把真正造反派压下去以后，其余都成了‘造反派’。省直机关负责人李伟是省监委副书记丁石的秘书。省直机关不许有一张反面的大字报。丁石一贯支持多数派，在工学院也是支持多数派的。现在的郑工‘造总’原来确是造反派，郑工‘造总’也是清楚的。他们看到自己的阶级兄弟都压下去了，原组织100多人造了何运洪的反，质问何运洪为什么把造反派压下去。我曾问何运洪这矛盾是什么性质？他不听，很顽固，把所有大学的造反派

都说成是我的御用工具，本来这些造反派都是从对本单位的当权派的斗争中冲杀出来的，何运洪抓住了所谓‘冲军区’、‘打、砸、抢’，把造反派都说成是‘御用工具’。他们利用专政机关镇压革命造反派，谁冲公安机关就把谁打成‘反革命’，平顶山公安局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勾结在一起，搞便衣活动，镇压学生运动。安阳、商丘，开封都是这样，反把罪名加在学生头上，说是把矛头指向无产阶级专政。当时我认为是错误的，我写过一份检查中说：‘如果把冲军区作为革命和反革命的分水岭，那么我承认我错了。’我说：‘你们不要逮捕学生，逮捕我好了。’造反派被压得很惨，也有个别很好的人，据说洛阳344部队一部分人、硬骨头六连、林县武装部支持造反派。何运洪宣布郑大‘联委’非法后，下面乱宣布非法组织，中央《十条命令》下达以后，他不仅不改，还开大会重申郑大‘联委’是非法组织，说军区说话是算数的，就这样群众组织翻了个个儿。把好同志打成了‘反革命’。革命造反派成了‘反革命’，保守派成了‘造反派’。”

纪登奎又谈了省委领导赵文甫、杨蔚屏、李庆伟等人的问题。

这时，“二七”代表张保怀说：“敬爱的周总理、康生、伯达同志及参加会议的各位首长同志：根据今天会议的情况，我代表‘二七公社’特提出以下几条建议，报请总理考虑。”

周恩来：“可以。”

张保怀：“第一，何运洪幕后操纵破坏谈判，由此产生的后果由何运洪负责。第二，何运洪在河南残酷镇压革命造反派，大搞资本主义复辟，郑州市仅是一个小部分，河南除郑州以外的广大地区同样处在何运洪一手制造的白色恐怖之下，有些地方比郑

州更严重，为了全面地反映河南的情况，请敬爱的周总理批准以下几个地区各派一名正式代表参加谈判：开封‘八二四’、新乡‘八一八’，洛阳‘八一六’，偃师‘八二五’，焦作矿院‘八一八’，平顶山选煤‘224战团’、鹤壁、兰考造反派。”

康生：“派不派由中央考虑决定，我问一个问题，反对派可不可以派呢？”

“二七”代表答：“可以。”

张保怀继续说：“第三，首都红代会与二七战友一直浴血奋战，应该派代表参加谈判。”

肖华问何运洪：“你们怎么对待军事院校的同学？”

周恩来：“是不是军区打了军事院校的同学？”

何运洪：“没有打他们，没有围攻他们。”

“二七”代表纷纷指责他：“胡扯！造谣！”

西安空字002部队学员汇报了开封“5.12”、“5.14”、“5.25”事件。

周恩来：“首先命令军区对待军事院校的同学不要有什么歧视，一定要让250个人回来（指开封被扣学员），红代会同学站在‘二七公社’一边，在河南受压制，作了很多工作，了解了很多情况，我们了解了，明天派有关同志单独和你们谈谈，另外不要再派人去了，已经有1000多人，在北京汇报解决行了。”

张保怀接着说：“我们要求中央责成何运洪立即制止郑州的武斗，停止对‘二七公社’的继续镇压，并要求派医疗队到河南。”

周恩来：“何运洪，对武斗事件军区要负责，不要再发生武斗，压得很厉害么！要出去劝阻，要打电话，每天要向军委汇报。”

康生："何运洪、一军有医院，军区也有医院，不能只给一方治，不给另一方治，都是阶级兄弟么，对伤员要一视同仁，如果真的歧视的话，杨代总长在这里，军队是有军纪的，明天派医疗队去。"

周恩来："今天的会就到这儿结束，有些事可以马上解决，答复几个问题：1、'造总'代表明天赶到，你们负责让他们回来，材料北航归还，问题很清楚，不在材料多少，道理摆清楚，问题一清二楚。在毛主席身边，在北京安全没有保证，那么在河南有保障？靠谁？

2、增加代表，由我们的记者同两方面商量一下，对方也要来，对方没人，不来也可以，时间定了，以后通知军区。'八二四'比较有名，可以来两个至四个，谈判不等，继续进行。

3、革命干部王庭栋、耿其昌要他们来，何运洪负责打电话，把他们送来。文敏生、杨蔚屏、戴苏理你们说他们也在郑州，他们一块来。军区来人少，司令员张树芝身体不好，来么！来北京可以治病，好不好？付政委余嗣贵也来，政治部主任也来，一共4个人；'八二四'来了，一军支左负责人也来一个，可以一块谈。

4、郑州武斗很盛，军区可以制止，劝解一下就打不起来了，何运洪负责，你要打电话。军事院校赴豫调查团的人牺牲了两个，250人在开封被扣，一军要马上放，北京尚有学生与军区对立，可以劝说。马上放，给自由，不要把事情看得太严重了。文化大革命么！

5、红代会去做了许多工作，支持'二七公社'有材料，记

者站（红旗杂志）去找你们谈，弄清楚再处理，北京不要再派人去了，在北京汇报好了，事情总要转过来，不要扩大。

6、明天派医疗队去。何运洪也要负责，军区一军有医院，要好好的治，不能只给一方治，不给另一方治，那些都是阶级兄弟，拥军爱民嘛！

明天派一个医疗队去，一面医疗，一面调查，你们‘二七公社’不愿和他们住在一起，可以住在两个地方，你们受压抑了，你们在北京完全可以公开出来，不要让我们不好找。今天的事谈了马上就做，但不要回去打电话，出大字报，大标语。”

5月30日凌晨0时30分，接见结束。

为抗议“526 事件”， 郑州铁路局机务北段的“二七”派“八一革联”宣布罢工！

北航“红旗”的负责人韩爱晶，从成都返回北京的中途在郑州下车，了解河南的文化大革命。他们行走在郑州大街上，感觉这里与他刚刚去过的陕西、四川都不一样，大街上的气氛很紧张。他看见有群众在街上贴大字报，一支队伍过来了，他们头上戴着柳条帽，手上拿着棍子，到了跟前，就要贴大字报的把大字报撕下来，边说边动手，又是推，又是动棍子。韩爱晶从北京到西安，到成都再到郑州，像这种情况还真是见所未见。他想：“毛主席让搞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怎么可以拿着棍子不让人家贴大字报呢？”于是就问大街上的人：

“怎么大字报也不让贴呢？”

大街上的群众听他们是北京口音，就低声说：

“贴大字报的是‘二七公社’的，拿着棍子的是河南省军区

何运洪支持的。何运洪就是要压住‘二七公社’，不让他们翻身，怎么能让他们贴大字报呢？”

韩爱晶一听火冒三丈，气的直骂：

“真是国民党反动派，非把你何运洪给搬了不可！”

他们在附近转了转，看到有一个十来岁的小男孩偷偷在卖“二七公社”的报纸，就买了张报纸，悄悄地问他：

“小朋友，你们郑州这两派哪一派好啊？”

小男孩抬头看看问他话的韩爱晶，愤愤不平地说：“当然是‘二七公社’好了！”

韩爱晶对小男孩说：“你在这里等我一下。”他拿出笔和纸，站在那里起草了《北京航空学院红旗战斗队严正声明》。韩爱晶在声明中写到：

我们一行路过郑州，在郑州的大街上看到了令人不敢相信的白色恐怖，革命造反派二七公社在大街上贴大字报，这是行使自己的正当权力，是按照毛主席的指示采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四大的方式来搞文化大革命，可是光天化日之下何运洪竟然支持保守派，头戴柳条帽，手拿着棍棒，在大街上不允许二七战士贴大字报，当场撕毁人家的大字报，这是什么行为，这种国民党法西斯行为，我代表北航红旗严正声明：坚决打倒国民党反动派何运洪，坚决支持二七公社的革命行动，何运洪镇压革命群众绝没有好下场，何运洪不投降就让他灭亡！

韩爱晶签名以后，就把这个《声明》交给那个小男孩，对他说：“你把这个稿子交给二七公社的报纸，一定要安全送达，我支持他们。”

那个小男孩很严肃地对韩爱晶说："你放心，我肯定会把这件事情办好的。"

当天傍晚，"二七公社"办公室安排郑州肉联加工厂的袁庚华和韩爱晶他们联系上后，要带他们去郑州铁路局机务北段看望那里的"八一革联"。袁庚华找来三辆自行车。三个人骑车，三个人坐在后面。六个人沿着铁路线巅簸，来到机务北段，看到罢工的工人分散坐在铁路旁边。有几个从北京来的学生正在那里演讲鼓动，其中有北京林学院的。

当听到北京有个学生说要拦火车时，韩爱晶心里一惊，说："这样的事要极其慎重，不能轻易采取这种行动。"

北京的学生说："上海安亭事件就是这么做的。"

韩爱晶问："我不了解安亭事件的具体情况？"

北京的一个学生火了，他愤怒地高喊口号："我们不要保姆！我们不是阿斗！不要诸葛亮！反对机会主义！"

并说："你们北航在北京就是温和派，本来就不是我们'三司'的！"

在去郑州铁路局机务北段的路上，韩爱晶对袁庚华谈了他一路的许多见闻，其中提到他在西安一所中学曾看到的一个口号："文攻武卫"，这四个字给袁庚华留下深刻的印象。

第二天，袁庚华在"二七公社"开日常会议时，提到这个"文攻武卫"的口号，觉得很适合他们，建议作为自己的口号，武装保卫自己。

"二七公社"的杨锡淼当即表示："这是极左口号。"

这次争论传出去后，"二七公社"各个部门都在讨论，也有

人提出“文攻武守”。

## 第 659 回：天安门,《红卫兵组歌》谢幕　清华园,“四一四”决定分裂

5 月 29 日，在红卫兵诞生一周年之际，北京老红卫兵在天安门广场组织了一次大规模的纪念演出。

这次演出，原来准备在首都体育场进行，推出了几台大型节目，可是没批准，因为“四三”派也要在那里举行集会。为避免冲突，双方都改了地方。老红卫兵去天安门广场，“四三”在午门里。

这次天安门广场演出的有 101 中的《红卫兵组歌》，还有其他一些学校的节目。如北京师范大学附中的女声独唱、合唱，给人们留下了深刻印象。曲子借用样板戏《沙家浜》中“智斗”中刁德一的一段唱腔：“新四军久在沙家浜，这棵大树有荫凉。”换上新词：“ 红卫兵生来就造反， 得罪多少王八蛋……”

5 月 29 日下午是个阴天。广场上围满了人群，演出现场没有扩音设备，演员必须拼力使声音传得更远一些。

《红卫兵组歌》是老红卫兵的代表作，全部联唱曲套用《长征组歌》，将肖华原词改写，句式不变，共 14 首：诞生、造反、反工作组、见毛主席、八月风雷、串联、长征、爬起来再前进、反刘邓、望未来。

《红卫兵组歌》由北京 101 中学的老红卫兵组创、排演，前后不到两个月。作者是 101 中高二 10 班学生郭从军，学校公认的才子。郭从军 1969 年入伍后，仍然有诗歌创作。他在西藏军

中，曾写有旧体诗词，并通过校友内部渠道在东北建设兵团、贵州三线工厂等地流传。

在此之前，101 中也曾有过大型合唱的经验。101 中是 1949 年由解放区张家口迁入北京的干部子弟学校，有一段革命的校史。文革前，学校组织过“校史联唱”，并有一个管乐队。这次演出，所有参与者都非常投入。他们怀着神圣的情感走入排练场。参加过当年组歌演出，并担任女领唱的林仲后来回忆说：“当时排练场的气氛，就同我后来去加拿大的大教堂看到的唱诗班、作弥撒一样，所有人都怀着一种庄严、圣洁的感情，全身心的奉献给每一次排练。”

《红卫兵组歌》一公演，立即在各中学引起轰动。各校宣传队纷纷索取歌本、唱词。手抄、油印本也纷纷出现，并在北京各校排演。与此同时，《红卫兵组歌》迅速传到上海等大城市，并被搬上舞台，在全国范围造成了不大不小的影响。 林仲在回忆《红卫兵组歌》的演出时说：“每次演出，观众的情绪是热烈的，很快有不少学校去请我们演出。当时合唱队团结得像一个人，集体行动，纪律严明，记得一次去矿业学院附中演出，集体步行返校，仿佛军队一样。指挥一声令下，全体便齐唱起来：战鼓响，旌旗奋，红卫兵，向前进……”

以下是《红卫兵组歌》的部分内容：

一、诞生 朗诵：

战鼓响，

烈火熊，

杀声起，

军旗红。

冲天霹震泣鬼神，

杀出英雄红卫兵。

砸烂八股旧学制，

横扫黑帮立奇功。

党给一身造反骨，

唇枪舌剑杀气腾。

主席亲手授战旗，

小将高唱东方红。

齐诵：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杀!杀!杀!嘿!!

还有一部当时颇有影响的老红卫兵话剧《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其《后记》中写道："把历史的教训用艺术形式表现出来，是为了教育那些由于犯了错误而失去信心、希望、醉死梦生的老红卫兵，提醒他们，过去的战斗生活，是多么充满战斗激情和令人含泪的回顾呵！再看看你们今天的生活，你不羞愧吗？"

北京戏剧专科学校的尖子学生徐雅雅是该剧创作的核心。毛泽东八次接见红卫兵，徐雅雅有七次在场，并且在第二次接见时被指定领喊口号，属于最早起来造反的那一拨老红卫兵之一。运动初期，她编了不少红卫兵文艺节目，在老红卫兵中享有好名声。

1966 年国庆节，徐雅雅所在的戏剧专科学校与北京戏曲学院联合赶排了《红灯记》，徐雅雅在剧中饰李铁梅。剧本经过修改，采用了跨越时空的手法，当李玉和牺牲后，台上便出现了红卫兵，唱起了《造反歌》："拿起笔，作刀枪，集中火力打黑

帮……”在一阵紧锣密鼓的打击乐的伴奏声中，一名红卫兵扛着红卫兵战旗上场，作“龙摆尾”的“急急风”，在台上挥舞大旗。锣鼓猛地一停，红卫兵战旗收住，走上高台，在李玉和就义处，铁梅把红灯交给红卫兵，在磨刀人的指引下，用铁梅作诱饵引出鸠山，最后，红卫兵刀劈鸠山，谢幕。

这出《红灯记》的第一次演出是在人民大会堂三层楼的小礼堂里。康生、江青、陈毅等人到场观看。演出前，徐雅雅还作了即兴发言。

演出过程中，当李铁梅从李奶奶手中接过红灯时说道：“红灯呀，红灯，我现在明白了，这就叫老子革命儿接班！”这句台词念过，全场老红卫兵热烈鼓掌喝彩。

1966 年 12 月 26 日以后，“联动”组织被摧毁，骨干成员大多数被捕，徐雅雅所在的戏剧专科学校，老红卫兵的势力也土崩瓦解，几乎全军覆没，最后只剩下徐雅雅和另外两个男红卫兵，他们“苟延残喘”般地成立了一个“五敢纵队”。可是，“五敢纵队”在学校内外完全呈孤立之势。广播里经常喊道：“徐雅雅，到‘爱霜雪’战斗队来！”来干什么？接受战斗队的批判。这样的批判有时候一天就得经受七、八次之多。

当时的徐雅雅，诚心诚意觉得自己有错误。在“联动”被宣判为反革命组织的当天晚上，徐雅雅与一名烈士子弟以“党之子”的署名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毛主席呀，我们虽然喝了几口水，可我们不怕，我们要坚持革命……”

1967 年 4 月初，北京外语学院附中一位老红卫兵慕名而来，找到徐雅雅，请她为该校写一出歌颂红卫兵英雄业绩的话剧。几

天后，徐雅雅拿出了初稿。这就是后来颇有影响的老红卫兵话剧《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这出戏的导演是徐雅雅。在剧中，她还饰演了校党支部副书记。实际上，徐雅雅是集编、导、演为一身。

《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共分八场，从 1966 年清华附中高三·二班几名同学罢考，到校外荒郊圆明园遗址处秘密组建红卫兵，再到与工作组作斗争、挨整、毛泽东“八一八”接见。实际上集中了清华附中、北大附中、北航附中等几所中学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组织红卫兵的经历。

剧情以老红卫兵彭路生等人撕毁考卷罢考开始，以校长、工作组组织学生揭发围攻红卫兵、“上纲上线”整红卫兵，将戏推向高潮。最后，校党支部副书记洪松站出来，支持红卫兵，并揭发工作组组长刘加君实际上是出卖过彭路生母亲的叛徒，广大革命同学纷纷觉醒。各中学红卫兵前来支援，并带来毛泽东将在天安门接见红卫兵的特大喜讯。

这出话剧中，还真实记录了红卫兵诞生初期的一些生活片断。如第一场：彭路生等人参加红卫兵秘密会议，半夜从下水道钻回，被洞口带刺的铁丝挂伤，红卫兵念《毛主席语录》：“要奋斗就会有牺牲”；第二场《荒郊》：怒云蔽空，古柏耸立，20 多个红卫兵列队宣誓：“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宣誓声中，音乐伴奏，还伴有旁诵：“从 1927 年大革命被镇压到 1966 年文化大革命的兴起……”旁诵声接近尾声时，响起了悲壮的国际歌声：“英特奈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台上演出的红卫兵和台下观看的红卫兵一同加入到歌声之中，场面蔚为壮观。

整出话剧的演出从始到终，都充满革命的激情。演员们有时在台上边演边流泪。在《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的油印剧本后记中，徐雅雅饱含深情地写道：“这部不成熟的剧本，是几个还没有失掉希望、依然在摸索着前进的红卫兵战士历经了多少不眠之夜，苦心沥血，用血汗凝成的。”

这出话剧，原来计划在 1967 年 5 月 29 日红卫兵诞生一周年的日子里演出的，可是 5 月 29 日那天未能演成。剧组后来在北京长安剧院、天津宁园铁路工人俱乐部和石家庄剧场等处演出了几场，反响很好。

若干年后，徐雅雅回忆起当时的情景时，悲愤地说：“我们准备了一台诗歌朗诵和一台话剧，准备分别在 5 月 29 日和 8 月 18 日的纪念会上演出，可是后来 5 月 29 日的那个会没有开成就夭折了。大家觉得很丧气。这件事搞不成，就等于我们红卫兵已经死了。5 月 29 日这个会的夭折，等于又往棺材上再钉上了一颗钉子，钉得更加死了。”

5 月 29 日，老红卫兵以“联动”为核心，在天安门广场召开“红卫兵万岁”的红卫兵一周年纪念会后，作为有组织的“联动”从此结束了活动。而个别成员的活动则维持到了 1968 年春夏间。

在这段时间里，蒯大富准备在 5 月 30 日成立清华大学革委会的计划能否如愿以偿呢？

5 月 25 日，清华大学“414 串联会”决定停止选举清华革命委员会成员，宣布“414”不参加任何有关革命委员会成立的筹备活动，他们准备以从“兵团”分裂出去另立“山头”的事实，

来制止“团”记清华大学革命委员会的出世。“414”一位领导还宣称，要与“兵团”总部血战到底，一年以后看眉目。在当晚“414”下属的“东方红战团”举行的会议上，与会者们决定“阻止蒯大富成立革委会”。他们认为，“只要蒯大富成立革委会，有了法定权力，他就会下令解散‘414’，群众也就顶不住了。”“无论如何，要在革委会之前另外搞一个总部，否则（414）队伍也拉不出来了。中央一承认，谁也不敢分裂了。”“我们要用分裂来阻止革委会的成立。我们要拉出一支队伍。中央看到分裂，也许不会承认在一派基础上的革委会，这是一线希望，要争取”。有人还说：“在‘东方红战团’中挑出 50 个出身最好、没有任何问题的老造反派。这 50 个人不怕压，不怕中央打棍子，不怕牺牲，毫不动摇，死抱一团，长期对抗。中央打棍子，我们一起顶上去，要抓一起抓，要死一起死。”

第二天上午，“东方红战团”在圆明园遗址处开会，其领导人宣布了与清华“兵团”总部分裂的决定。针对有些成员担心中央批评闹分裂，该领导人说：“我们是蒯大富网中的鱼，现在网越收越紧，不是鱼死就是网破，只有冒死一拼了！”会议决定分裂下去，他们再次以林彪的那段话自励：

“在需要牺牲的时候，要敢于牺牲，包括牺牲自己在内。完蛋就完蛋，上战场，枪一响，老子下定决心，今天就死在战场上了。”

后来这段林彪语录被谱成曲，成了著名的《“414”战歌》。

“东方红战团”的一把手沈如槐在写给其父母的信中说：“儿子参加了清华的文化大革命，成了一个群众组织的负责人，

卷进了政治漩涡，恐怕很难全身而退，不能为父母尽孝，更不能照顾弟弟妹妹了。无论我在清华发生什么事情，都请父母不要过问，权当没有我这个儿子，恳请父母保重，希望弟弟妹妹健康成长。”他随信寄去 5 枚毛主席纪念章以示诀别。

当天下午，在清华主楼三区 3 楼召开“东方红战团”大会，讨论并通过了有关分裂的宣言。

27 日晚，在同一地点召开了“东方红总部”成立大会，以示与“兵团”总部分庭抗礼，绝不妥协。会上，依然有一些人不赞成决裂。这时，会议主持人传达了由一些相对中立或温和的群众组成的“三七战团”愿意加入从“兵团”分离出来的“414”队伍。会议遂决定成立一个正式总部。

## 第 660 回：终未成，清华革委会夭折　李再含半月摧垮“四一一”

5 月 28 日，清华大学“东方红战团”和“三七战团”先是在圆明园遗址处召开会议，讨论新总部成立宣言，后于清华校内新水楼 320 室开会讨论总部及有关文件。这次会议“东方红战团”出席的有沈如槐、陈楚三、宿常忠和周泉缨等；“三七战团”出席的有孙怒涛和汲鹏等。会上双方一致同意在清华成立新的红卫兵组织，与蒯大富领导的“团”派彻底决裂，并商定了一系列有关分裂的具体部署和策略，但是最后在拟定即将成立的清华新红卫兵组织的名称时，双方的谈判卡了壳。

“东方红战团”方面按照事先商定的意见，主张以“清华大学东方红兵团”命名新红卫兵组织。

而孙怒涛代表“三七战团”认为，应该将新红卫兵组织命名为“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 414 总部”，并列举了一系列理由，核心意思是认为“三七战团”所拟定的新红卫兵组织的名称，最有利于联合大量的中间群众，于是会议出现了一阵难堪的静默。

最后，“东方红战团”的周泉缨出乎与会代表意料，站出来支持“三七战团”提出的新组织名称。他说：孙怒涛讲的意见有道理，因为决定与“团”派决裂能否成功的关键，确实是清华多数中间群众的去向，而不是“414 派”内部铁杆反蒯分子们的意志和决心。

周泉缨的发言，一开始让“东方红战团”的其他代表感到突然，但很快被大家所理解。陈楚三首先公开表态支持周泉缨的看

法，宿常忠也点头表示同意，最后沈如槐一锤定音，决定采用“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 414 总部”为“414 派”即将成立的新组织的名称。

会议决定于 5 月 29 日晚 22 时成立“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 414 总部”。

与此同时，28 日晚，“井冈山兵团”总部举行了单方面的革委会选举，通过了所有“团”派人选，“414”方面仅有 3 名候选人勉强通过进入革委会。

仅过了几个小时，5 月 29 日凌晨，也就是蒯大富预定成立“清华大学革命委员会”的 5 月 30 日前一天深夜，“414”广播台广播了《“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 414 总部”成立宣言》，《给毛主席的致敬信》，《告全校师生、革命干部书》，《“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 414 总部”第一号决议》《“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 414 总部”第二号决议》，《关于井冈山兵团 414 串联会的决议》，《414 革命串联会紧急声明》，《三七战团声明》，《东方红战团声明》等文件，《宣言》指出：“兵团总部已不是无产阶级的代言人了。”

从这天开始，清华大学出现了两个正式对立的文革群众组织总部：“井冈山兵团总部”和“井冈山兵团 414 总部”，清华文革造反派内的两派彻底公开分裂。

同日于新水楼 320 室举行的“414”核心组会议上，与会者讨论周恩来可能来清华参加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一事，其主要领导人发言：“一切都搞好了，不能再变了！周总理来了，我们也得分裂，除了分裂没有出路！”多数与会者同意分裂。当日晚，

“414 总部”成立后的第一个声明就是否定由谢富治主持达成的清华两派《四项协议》，为自己的分裂寻找理由。

5 月 29 日上午，群情汹汹的“414”在大礼堂召开了“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414’总部”成立庆祝大会，沈槐如、孙怒涛、汲鹏、陈楚三、刘万章、王永县、周泉缨、宿长忠 8 人组成“414”总部委员会，他们宣布与“井冈山兵团”总部的《四项协议》作废，正式脱离其领导。

沈如槐在发言指出：“成立‘414’总部是我们同蒯大富斗争的必然阶段，是继三纵队、‘414’串连会之后的最高阶段。三纵队是一种分散斗争的阶段，具有同一思潮的人们自发地组织成纵队，批评、抵制蒯大富的错误；而当蒯大富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分散斗争不足以遏制蒯大富的错误时，各纵队联合起来，并团结一批干部群众，在‘兵团’内部成立‘414’串连会，形成反对派，这是一种党内有派的阶段；当蒯大富一意孤行，坚持错误时，我们只能与他彻底决裂，成立自己的组织，这是党外有党的阶段。我们与蒯大富斗争的三个阶段就是马列主义者与修正主义者斗争的三个阶段。我们所走过的道路就是中国今后反修防修斗争的必由之路。”

“兵团”总部的革委会筹备活动也在紧锣密鼓而有条不紊地进行着，种种致辞、场景、程序和仪式等都已按部就班。“团派”张灯结彩、披红挂绿，紧张地筹备革委会庆典。全国各地的造反派代表也应邀而至，陆续到来。他们准备在清华大学革委会诞生之日，向心仪已久的蒯司令致以最真诚、最热烈的祝贺。

5 月 29 日 19 时许，蒯大富等一行数人前往人民大会堂，邀

请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参加次日举行的清华大学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蒯大富等进入人民大会堂后得知周恩来正在进行接见和谈话，蒯大富写了一个便条，请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有关人员转交周恩来。便条是这样写的：

敬爱的总理，你好！

清华大学革命委员会将于 5 月 30 日成立！

您在 5 月 1 日和 5 月 23 日曾两次答应我们一定来参加我们的成立大会，我已经把这天大的好消息告诉全校革命师生员工，全校革命师生员工万分高兴，急切地等待这一天的到来！这一天终于来到了！我们敬爱的总理即将第三次参加我们学校的大会，也是第一次参加我们井冈山人掌权后的大会！

总理这一次无论如何要抽出一点时间参加我们的大会。总理参加我们的大会将对我校文化大革命和北京各学校的文化大革命产生巨大的影响！

总理如果不去，我们没有办法向群众交待，明天的大会将无法开下去！

急切盼总理回音!!

我们很想与您交谈几分钟，我们在门外等着！

等!! 一定要见!!!

蒯大富

5.29

一会儿，向周恩来转交蒯大富便条的工作人员回来，交给蒯大富一张周恩来的回条：

蒯大富同志：

清华大学革命委员会要在大联合的基础上召开，才合乎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原则。现在听说你们革命派还没有联合起来就宣布开会，我们就不好参加了。谢副总理正为另事约见红代会谈话，请就近解决。

周恩来

周恩来的答复对于蒯大富以及整个团派不啻为晴天霹雳。蒯大富等人赶紧寻找谢富治时，正在开会的谢富治抽出身来对蒯大富等人说："我给总理打电话了，总理说坚决不参加这个大会，叫我也不要参加。总理说，让他们联合好了，我们才参加。既然总理不参加，我也不参加。我给你们写封信，就说总理没空，推迟成立，给你们一个台阶下好不好？"

蒯大富执意要召开大会，坚持成立清华大学革命委员会。

谢富治对蒯大富说："你今天晚上决定，若清华明天成立革委会，我明天就出席你们的会议。如果'414'有不同意见，我们去说服他。"

谢富治一夜没睡，陪着蒯大富他们，等着蒯大富做决定。蒯大富矛盾极了。经过半个多小时的考虑，最后说："说不定缓一下更好一点。"

谢富治说："如果你这样子考虑的话，说明条件还不太成熟，我们要进一步做'414'的工作。"

谢富治让蒯大富自己起草一封"推迟信"，蒯大富写完后，谢富治看后让工作人员抄写一遍，并签了名，以便蒯大富回清华有个"交待"。该信如下：

蒯大富同志并转清华大学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

你们今天成立革命委员会，我请示了周总理，周总理对你们学校运动非常关心，他要参加你们的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但是总理近几天中央工作特别忙，今天不能参加你们的成立大会，总理建议你们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往后推迟几天，请考虑。

谢富治，1967 年 5 月 30 日

5 月 30 日凌晨 2 时许，蒯大富等返回清华后，他大哭一场，说："总理给我们当头一棒，又加盆冷水。"3 时许，"团派"广播台广播了谢富治致蒯大富和"革筹小组"的"信"，以及推迟召开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的"通知"。

谢富治的信连着广播了好几遍。清华园里接下来的反应，又是一次天壤之别。"414" 群众欣喜若狂，他们从床上爬起身来，敲打脸盆、搪瓷杯和一切能够发出声音的器具，欢呼"团派"革委会的破产和"414"的胜利，毫不掩饰内心的喜悦。而"团派"方面则像是泄了气的皮球，垂头丧气，一片死寂。

5 月 31 日，"团派"成立了其核心组织"624 战团"，以 1966 年 6 月 24 日蒯大富等人同工作组论战的日子来命名这支队伍，旨在专门与"四派"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这也标志着"团派"与"四派"的对峙和冲突已经不可调和。

31 日，北京以北航"红旗"为首的 28 个高等院校的造反派组织就清华大学局势发表联合声明："坚决支持以蒯大富为首的清华井冈山兵团总部，永远同他们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对于分裂主义的产物——'4·14'总部，我们坚决不予承认。"

以上 28 个组织中不包括地院"东方红"和师大"井冈山"

等“地派”组织。

4 月 18 日，贵州省公安厅“1.13 总队”以“贵医 2．26 冲红代会的黑后台”罪名，拘留了贵阳医学院教师李吉杰。从 4 月 24 日开始，贵州“411”派红卫兵代表们多次冲击省公安厅，要求释放李吉杰。省公安厅指责来访者 “冲击机要室”、“抢走机密材料”……

4 月 27 日，李再含在北京接见了贵州“411”的赴京代表。听了汇报后，李再含表示回来要调查处理，并说：“红代会看来分两步走比较好，先开贵阳市红代会、再开全省红代会比较合适，因为有些县夺权没有搞，情况难掌握。”

5 月 13 日，贵州市由 17 所院校组成的红卫兵代表 200 多人前往省公安厅，要求解决李吉杰问题，毫无结果。代表们便进入公安厅礼堂，开始了静坐示威。几位身强力壮的红卫兵和随队人员抬着大饭甑穿行大街给静坐示威者送水送饭，此举惊动了贵阳市群众，成为山城贵阳街谈巷语的中心。一时间公安厅里里外外，人山人海；街头巷尾，议论纷纷。

5 月 16 日，省革委开出宣传车发出通告：“对冲击无产阶级革命派掌权的专政机关的首恶分子，定要依法惩办”。李再含也先后发出两封公开信，指责静坐的学生“冲击无产阶级专政机关”，是在“为右派翻案”。省学校工作小组组长陈捷弟坐阵公安厅对面的独立师，对参加静坐的学生做分化瓦解工作。省公安厅“1.13 总队”也从省监狱、基建队、通用机械厂等单位调人围攻。

恰在此时，地化所朱梅年以“地化所一兵”的署名发表公开

信，指责贵州的夺权不是俄国的“十月革命”，而是俄国的“二月革命”。李再含认定这就是贵州“411”派的“黑纲领”。

5 月 19 日，李再含在贵阳市邮电大楼前广场的万人大会上发表讲话，宣布对“411”要刮“十二级台风”，要在半个月内，将“411”彻底摧垮。其主要措施包括大搞舆论攻势，在学生中重新划分左、中、右，组织“支红派”队伍，原来是“保守派”的只要“支红”就是左派，在各大院校组建“支红派”一派掌权的革委会，在省革委办事机构、省总指挥部办事机构和省文化革命展览馆中清除有“411”观点的工作人员，部队支左和军训工作必须旗帜鲜明地支持“支红派”等。

贵州工学院的革命委员会成立于 3 月 30 日，当时李再含亲自到会祝贺并宣布承认。不久，由于贵工革委会是“411”，李再含以省革委和省军区的名义支持贵州工学院“支红派”于 5 月 22 日成立了“新贵工九一五战斗团”。于是，贵工“411”于 5 月 24 日也恢复和重建了“贵工九一五兵团”。

5 月 24 日，贵州省军区的宣传车和“支红派”的宣传车开始在贵阳市的大街上一路传播“411 所谓好，牛鬼蛇神跟着跑”，并制造“走资派”贾启允、陈璞如申请参加“411”，省委书记苗春亭操纵“411”的舆论。

5 月 26 日，省红代会宣布开除“411”观点的贵州大学红代会和贵州工学院红代会。27 日，贵州大学成立“保卫红色政权联络站”。

这天，由“工尖兵”一派掌权的“新贵阳医学院革命委员会”成立，省革委调动公检法等外单位人员和部队一万多人保卫

成立大会会场，贵医“2.26”冲击会场，双方发生冲突， 200 多人挨打，其中 90 人受伤，3 人重伤。

5 月 27 日，在贵阳师范学院成立第二个一派掌权的革命委员会，布置了两个假会场作掩护，调动公检法等外单位人员 4 万多人保护成立大会，“411”群众在军号声中造反，双方又发生了冲突和武斗。

5 月 29 日，贵州大学“411”恢复重建“贵州大学九一五革命造反团”。

5 月 30 日，贵州农学院“411”恢复重建“贵州农学院九一五兵团”。

《四一一战报》在贵阳师范学院面世，开始时为油印版，共出版 3 期，每期 260-300 多份。报上还创作出了“411”火炬，很快广泛流行。5 月 16 日创办铅印《四一一战报》，石尚儒主编，至 8 月 5 日共出版 9 期，每期印发 2 万多份，总发行量 20 多万份。

贵州大学物理系王启杨等先后组织了“411”宣传车和“411”广播站。广播站先在贵阳市喷水池纺织品公司楼上，后转至大十字理发店楼上，每天进行宣传，师院附中数人合作。每天傍晚大十字广场听众云集，成千上万。贵州工学院的宣传车也持续进行街头宣传。

6月8日，“贵阳市大中专学校毛泽东思想红卫兵411兵团”和“贵阳地区支持‘411’工人联络站”同时宣告成立。当天在贵阳市主要大街上举行了示威大游行。游行队伍前头的军乐队，沿途一遍又一遍吹奏“411 战歌”。

李再含未能在半月内摧垮“411”，“411”反而越战越勇。

## 第 661 回：五三〇，郑棉六厂被攻陷　细回想，李先念怎成叛徒？

河南“十大总部”对郑州粮食学院和河南农学院围攻受挫，便将进攻的重点放在未能解困的国棉六厂“工人赤卫队”坚守的大楼上。

5 月 30 日，在省军区领导和省、市公安厅局的保守派头头的组织和直接指挥下，郑州市解放后第一次全城拉警报大戒严，“十大总部”、“河造总”集中全部力量，分别攻击“二七公社”的 6 个宣传广播站。

当天，郑州“十大总部”、“公安公社”组织西郊各大厂矿的武斗队，调动数万名工人群众，将围困在郑州国棉六厂一栋五层高的家属楼里的“工人赤卫队”断水断电，然后是宣传车反复劝降。在一次次的劝降无效后，开始对大楼实施猛烈的攻击。

六厂“工人赤卫队”在楼顶用一张张床板做成盾牌，遮挡着如蝗的飞石、钢球。隐藏在床板后面的工人赤卫队队员，头戴安全帽，时不时探出身来，用手中的石块砸向楼下进攻的人。

一层的窗户已经被全部封死，从二楼到五楼的每一个窗户上，都有一把巨型的弹弓，不断飞出的半截砖，使进攻者难以靠近。

攻击指挥部很快调来一辆经过改装的吊车，这辆吊车的驾驶室被钢板封闭，只留下一个一个小小的、用防弹玻璃遮挡的天窗。吊车吊了一个火车轮子，隆隆地开到了大楼下面。

楼上的守卫者无可奈何，只能用巨型弹弓不停地向吊车发

射，然而、砖头砸在吊车的钢板上，只能发出噼里啪啦清脆的声响，却无损吊车的一根汗毛。

吊车长长的悬臂，伸到了大楼的楼顶，悬臂吊着的火车轮子开始在楼顶的平台上来回地横扫。床板做成的盾牌，被火车轮子砸的粉碎，躲在床板后面的工人不得不放弃楼顶的工事，撤回到楼层的房间里。

吊车又将悬臂放下，吊着的火车轮子，一次次砸向大楼的窗户，大楼上的窗户和固定在窗户上的巨型弹弓，被一个个击打的粉碎。

坦克似的吊车，很快破坏了大楼的工事，“工人赤卫队”的反击能力被大大地削弱，进攻一方的总指挥命令拉响总攻的汽笛，几千名头戴安全帽的冲锋队员，手挥着大刀、长矛冲进了大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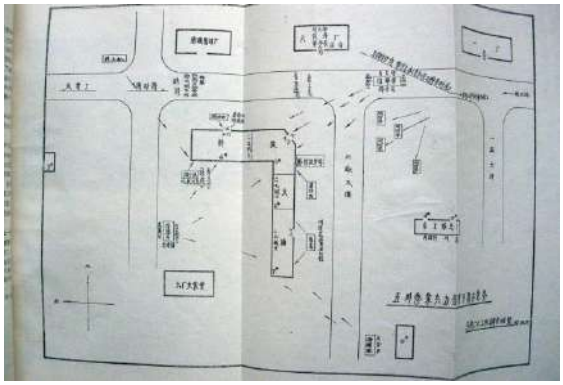
进攻的人流冲上二楼，遇到“工人赤卫队”顽强的抵抗。狭窄的过道，使双方的攻守成为一对一的较量，已经被死神逼到绝路的“工人赤卫队”，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俗话说：“楞的怕横的、横的怕不要命的！”在六厂“工人赤卫队”不要命的反击下，冲进大楼的“纠察队员”，再次被赶出了大楼。

攻楼指挥部下令将成包的棉花堆放在底楼，浇上汽油点燃，火舌、卷着刺鼻的浓烟从底楼翻卷着扑向二楼、三楼……守卫在那里的工人赤卫队员不得不向楼顶退缩，而在楼顶等待他们的，却是那个来回摇摆的火车轮子，100 多个青年不得不匍匐在楼顶，躲闪着火车轮子的撞击……

大楼、已经完全失去了抵抗能力，攻楼指挥部不失时机地用

消防车熄灭了大火，头戴安全帽、手持大棒的工人纠察队成群结队地冲上了楼顶，将筋疲力尽的守楼工人全部俘虏，押下了大楼。这些被俘的青年，被关押在六厂的地下室内，所有的人都被严刑拷打，更有 4 名工人被打断了四肢后致死，尸体被送到郑州肉联加工厂的冷库里冷冻，还有一具尸体是“十大总部”的吊车司机，也送到了这里。两个多月后，该厂冷库库长老孟报告了此事，当时已在该厂掌权的“二七公社”袁庚华去冷库里看了現場后，立即报省革委筹备组、省军区、郑州警备区负责人刘建勋、陈桂昌等人，他们也很快来到現場看了，指示郑州肉联加工厂保持好现場。接着消息迅速传出，各地小报纷纷报导，全国各地都来参观。很快，郑州肉联加工厂接到国务院急电，指出郑州肉联加工厂冷库是国家重点外贸冷库，要他们立即采取措施，把尸体移出冷库，并在该厂进驻了 8194 部队一个排，保护冷库。随后，这五首尸体被运到铁路文化宫。最后，被安葬在郑州大学中文系后面的花园里……

在郑棉六厂“530 武斗”中，还有 30 多人受重伤，200 多人被送到农村劳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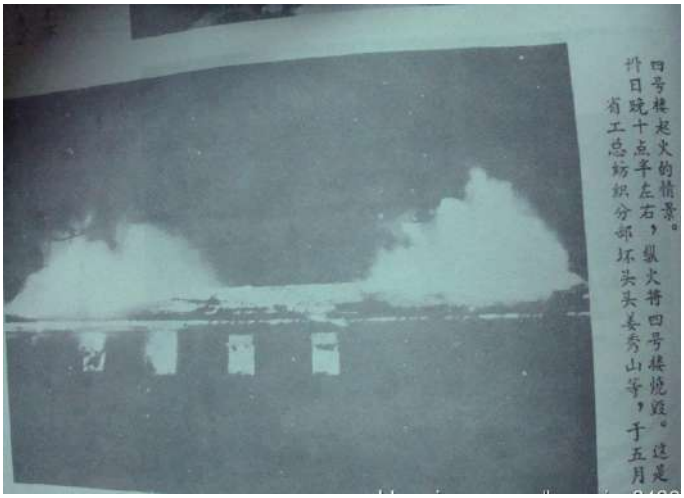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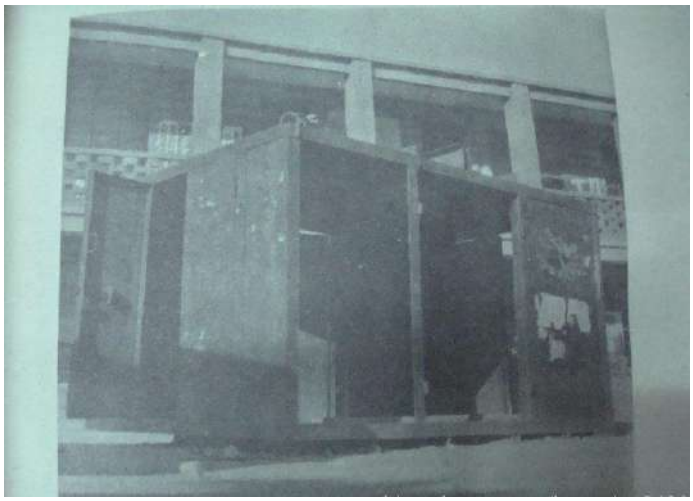
“二七公社”编印的郑州“五卅惨案”侧记中的攻楼兵力部署示意图

河南二七公社郑州棉六厂工人赤卫队所在的红色据点——解放大楼

"「五卅」惨案前夕，暴徒们用推土机推大煤用圆的林木桩倒的状况"

明杀害的罢反待工停产，给国家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
队的一小撮坏分子们为了破坏造反工人赤卫队夺，使使全厂工
「五卅」惨案前一星期，有工总的骨干组成郑棉六厂赤卫





照片显示的就是当时攻打大楼时使用的特制大铁箱，里面可以容纳 50 至 70 人

上面的照片旁白是“暴徒们攻上大楼平台后，将工人赤卫队的财务抢劫一空。”

5 月 31 日中午，在郑州大学文科楼西头阶梯大教室召开“二七公社”核心组扩大的紧急会议。由负责人杨锡淼做报告。大家对杨锡淼的工作不满，袁庚华和几个人发言，严词批评“公社”5 月份的工作首先是逃跑主义，搞疏散通知，然后是投降主义、右倾机会主义。袁庚华在发言中提出了“文攻武卫”的口号。接下来的发言，都否定 5 月份“二七公社”的领导工作，赞成“文攻武卫”这个口号。郑州印染厂一个姓詹的群众组织头头，点名

要袁庚华组建一个新的强有力的领导班子，得到与会人员的鼓掌通过。于是，袁庚华当场组建了“火线指挥部”，简称“火指”。由于“二七公社”第一届班子比较松散，大多人员都不脱离本单位组织。这个“火指”基本上是全职的，由“二七公社”的代表和外地来豫造反派的代表及“全国军事院校赴豫调查团”的代表组成，成员有：郑州大学任延庆、海军技术研究所杨锡淼、省体训班教练单长春、郑州肉联加工厂袁庚华、粮食学院学生邱玉洲、农学院学生任其芳、医学院学生李胜先、黄河水利委员会工人郑家声、机校女学生高和平、还有郑大附中姓李的中学生。外地和军校的代表不固定，有清华大学学生鲁梦铭、空军 002 部队的学员王翔等人。

“火指”成立的当天就决定：反击从郑州粮食学院开始，因为那里每天都被“十大总部”的人包围。

6 月 1 日，“二七公社”指挥部在郑州大学文科楼平台上和粮食学院用旗语进行了联系，双方准备完毕。中午 12 时整，粮院吹冲锋号，做出向外突围的姿态，吸引“十大总部”的注意。同时，“二七公社”以郑州评剧团、郑纺机的单位，联合社会上一些人组成的“54 战团”为主，打着“十大总部”的旗帜，提前从郑大和粮院之间的金水河河床潜伏过去。“十大总部”的人回头看看以为是交接班的，没有在乎。“54 战团”进入他们阵营后就棍子乱舞，大打一气。“十大总部”的队伍一下就乱套了：“他妈的，咋回事啊？怎么自己人打自己人啊！”

紧接着，“二七公社”的“二七近卫军”从南面打过来，由西部中专技校“二七”派组成的“430 战团”从西边打过来。郑

州大学文科楼里又冲出一支队伍从东边打过来，只有北边没人。“十大总部”的队伍溃散了，都往北边跑了出去。“二七公社”的人冲上去，将剩下的人包围起来，宣传车广播《敦促杜聿明投降书》，然后将这些人押到郑州大学，前后不到半小时结束。

押到郑州大学的“十大总部”的人被一一登记，由郑州大学的学生教育一通后，当天就都放了。这次武斗没有死一个人。

5月31日，河南省公安厅副厅长高大同发表了支持“二七公社”的声明。接着，省委书记处书记、副省长王维群、省委副秘书长王庭栋以及李剑波、董连池等厅局长以上的干部相继表态亮相支持“二七公社”。

从5月到7月，河南省有近400名地、市、县以上领导干部来到被称为“二七公社解放区”的河南农学院，探听北京消息，享受一条毯子、一领席、一个馍、一碗菜的待遇。

国棉六厂五卅血案后，郑州的武斗队伍装备迅速升级。“河造总”组成了武斗主力“郑州工人纠察队”和以郑州铁路司机学校为首的大中专学生组成了“郑州铁军”。这两支队伍，清一色的劳动布工作服、清一色的翻毛皮靴、清一色黑色的藤帽、清一色无缝钢管磨出铁尖的长矛。“郑州铁军”与“纠察队”不同的是藤帽下那一张还是孩子般的脸庞和腰中那一把锃亮的列检锤子，他们的长矛上还扎了红缨，成了名符其实的红缨枪。

“二七公社”也开始大规模地组建专业的武斗队伍。以体育、文艺工作者为主体的“五四战团”，以大刀著名，清一色的红绸大刀片在每次武斗中都飞舞在最前面。“五四战团”的三轮摩托经常在郑州街头呼啸而过。以技校学生为主组建的“二七近卫

军”则是郑州战斗力最强的一支近乎现代化的武斗队伍，几十辆解放牌卡车，车门两边站着四个背上斜插大刀的壮汉，车厢前排一行手持青龙偃月刀的大个子，后面是林立的铁杆长矛。所有的武斗队员清一色的劳动布工作服，清一色的用漆刷过的柳条帽，帽子正中清一色地印着一个骷髅。以西郊大中型企业为主的是“二七工人纠察队”。以初高中学生为主、以“中州铁军”为主要对手的是“中州钢军”。打起仗来，这些十几二十郎当岁的小青年不要命地往前冲，很让拖家带口的工人老大哥们心里发怵。

“二七公社”派出了精明能干的郑州大学的学生，在郑州很有名气的“冒牌驴”任延庆为武斗的总指挥。就是这个任延庆，曾经冒充首都红卫兵代表只身混入对立面的会场，被郑州大学的学生当场揪出来示众。“冒牌驴—任延庆”成了郑州家喻户晓的大人物。

郑州的大小街道，穿行着满载武装起来的工人、农民、学生的汽车，在每辆汽车的上面，都有一面鲜红的战旗，每一辆卡车的车门两边和车头上，都有护卫司机的、扛着虎头大刀的打手，在车厢里，则满满地站立着紧握着长矛的武斗队员，武装起来的双方，针锋相对地展开了一场又一场的搏杀……。

说罢河南，我们再来看云南。5 月 26 日，昆明机床厂持“炮派”的群众成立“五·一兵团”。他们在进行文艺演出时，与该厂“一·八兵团”发生冲突。军医学校的“八派”组织冲击会场并围困演出队。

5 月 27 日，双方陆续调集人员近万人聚集到昆明机床厂，准备武斗。这些人包括军区、机关、学校、工厂的干部、战士、

学生和工人。经省军管会做工作，双方撤离。

5 月 28 日，军医学校“炮派”组织开会声讨同校“八派”组织的罪行。“八派”组织冲击会场。地方“八派”、“炮派”组织均调集大批人员前去声援。

省军管会派执勤部队 300 人赶到现场，隔离双方。

5 月 29 日，“炮派”组织到昆明军区大门口静坐，要求军区严惩打人凶手。这次静坐一直持续到 6 月 3 日才结束。

5 月 30 日，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致电昆明军区党委，要求军区机关和部队的干部战士不要介入地方武斗，并规定：昆明军区的文化大革命暂缓进行。电报内容如下：

昆明军区党委：

中央和军委对昆明地区两大派“八·二三”和“炮兵团”发生严重武斗，军区机关、部队干部战士引起思想上动荡，极为关切，要求军区党委、军区机关、部队全体同志切实执行以下各点：

（一）对昆明地区两大派的武斗，军区机关、部队干部战士都不要介入，应该大力宣传毛泽东思想，制止武斗，劝说群众摆事实讲道理，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办法，逐步解决两派之间的问题，不要打击一方压制一方，使矛盾激化。

（二）昆明军区处在反帝斗争的第一线，担负着支援地方文化大革命，援越抗美，保卫国防等艰巨任务。军委一月二十八日关于重申军区文化大革命分期分批进行的指示中，规定昆明军区的文化大革命暂缓进行，望坚决执行这一规定，机关、部队一律不开展“四大”，任何人都不得揪斗领导干部，保持机关、部队的稳定，院校、文体单位不得同机关、部队串连，一律回到本单

位，搞好本单位的斗批改。

（三）中央军委信任以李成芳同志为首的军区党委，军区机关，部队全体同志要在李成芳同志为首的军区党委领导下，加强团结，坚守岗位，遵守纪律，努力工作，很好地完成中央、军委所赋予的“三支两军”，支援越南，保卫国防等一切任务。

（四）对军区副政委张子明，胡荣贵的历史问题，由军委总政治部进行调查，尔后在进行实事求是的处理。

中 央 军 委

中央文革小组

一九六七年五月三十日

5 月 31 日，康生看到毛泽东在王海容、唐闻生 5 月 27 日送去的材料上边的批示后，立即写信给陈伯达、江青提出：“我建议由文革小组来召集外交部的联络站及所属核心组开会，明确指出那些‘极左派’的观点是错误的……”

5 月 31 日这天，天安门广场召开了一次“打倒大叛徒李先念”的誓师大会。李先念参加革命后一直在部队里工作，从来没有被捕过，怎么也成了“大叛徒”了？

原来，1967 年 4 月 29 日，全国总工会的群众组织从全总副主席陈少敏保存的一些材料中发现，陈少敏、郑位三于 1957 年 5 月 29 日给中央组织部写的一个报告，内容是 1946 年中原突围时，允许党的干部向敌人自首的问题。李先念在审阅这份时批道：“当时忙于军队工作，这件事情我完全记不得了。”

允许向敌人自首？这不是叛徒吗？全总的造反派立即给中央写了一个报告。很快，财贸口的群众组织也知道了这个消息，

这在抓叛徒风行的当时，那可是爆炸性新闻，他们专门派人去揪斗陈少敏、郑位三二人，希望从他们那里追出自首是不是当时中原突围时最高领导人李先念批准的？如果是，那么，李先念就是叛徒头子，他们就是为党，为人民又挖出了一个定时炸弹。

与此同时，他们还先声夺人，出动人员，在北京到处张贴“李先念是叛徒”的大标语，还宣布成立“揪大叛徒联络站”，并于5 月 31 日在天安门广场召开了“打倒大叛徒李先念”的誓师大会。

事态到了如此严重的程度，周恩来把李先念找到他的办公室，共同回忆当时的情况。因为当年周恩来曾经和李先念一起同国民党谈判，他回忆起，当时李先念正忙于军队，根本没有顾及地方工作，这和李先念的回忆是一致的。为了更慎重些，周恩来还派人查阅了当时的报纸和档案，李先念也找到当时正在一起研究突围事宜的王震、王树声等老人一起回忆此事。经过回忆和查证后证实：中原突围时，李先念正忙于部队突围的准备工作，地方工作由陈少敏、郑位三二人负责，陈、郑二人出于保护革命力量的考虑，可能口头商量后，在小范围交待过：为使党的干部不被敌人杀害，当被俘时，在不暴露党员身份的前提下，以农会会员的面目向敌人自首，不以自首论。这个事情李先念根本不知道。

当这个历史问题搞清后，李先念明确表示：“虽然这件事情我不知道，但当时陈、郑二人这样做，目有是为了保存革命力量，不是错误。”

事情清楚后，几个老人又商量，由李先念出面给毛泽东、党中央写个报告，讲清此事。

## 第 662 回：形势变，福建释放王泉金　五三一，徐州“支”、“踢”争斗急

福建省军管后，在“思想兵”、“海防兵”、“工联总”等组织不断施加的压力下，也由于全国形势的变化，福建省军管会终于做出决定，释放 3 月 9 日在万人大会上被公开逮捕的福建省“红九二”总部负责人、福建师范学院“红九二”头头王泉金，并为其平反。5 月 30 日晚，在省体育场召开为王泉金翻案大会，10 余万名“思想兵”一派的群众参加了这一大会。“四二 0 革命行动委员会”、“红九二总部”、“九九野战兵团”、《福建日报》“工人硬骨头战斗队”、“革命职工造反队”等单位代表，以及清华“井冈山”的代表先后在会上做了慷慨激昂的发言，他们说：王泉金的出狱打响了革命造反派反复辟斗争的胜利的第一炮，宣告了叶飞死党福建省谭式王八阴谋的破产，敲响了“红联总”等保守组织彻底垮台的丧钟。它给以“左派”自居，其实是革命造反派叛徒的某些人一记响亮的耳光。他们还说：“王泉金不但不是现行反革命，而且是响当当的革命闯将，我们不但要为王泉金翻案，而且要为因‘一二六’而关在监牢里的所有生死与共的战友翻案，这个案我们造反派翻定了！”

当大会勤务组宣布：“现在让我们久别重逢的战友，响当当的革命闯将王泉金同志发言”时，大会刹那间掀起了狂涛巨浪，掌声如暴风骤雨，鞭炮声震耳欲聋，狂热的人们像潮水一样涌向主席台前，挤呀挤，几乎要挤成了一块块肉饼，一双双伸出的手

疯狂地在召唤着狱中出来的王泉金。

王泉金身穿长袖白衬衫，戴着“红九二”臂章，在雷鸣般的掌声中发言了，他激动得热泪盈眶地说：

“同志们，革命造反派的战友们：今天，我终于又和革命造反派的战友们重新见面了！我终于又获得了人身自由！我的心情无比激动，激动无比！我感谢毛主席、党中央、中央文革对我的亲切关怀，感谢同志们为我的自由做出艰苦的斗争，我一定不辜负同志们的期望，即使再来牢狱一百天也要将反复辟斗争进行到底！……”

9 时 30 分，省军管会副主任讲话。首先，他代表韩先楚司令员向大家问好，代表省军管会向王泉金赔礼道歉，并郑重宣布了三条决定：

一、为王泉金同志进行平反；

二、以前整理王泉金的材料，征得王泉金同志本人同意后一律销毁；

三、由于王泉金问题，他的家庭、同学、当地群众受到牵连的，通过当地部队进行挽回影响。

瞬间山呼海啸，掌声雷动。当军管会副主任讲话结束后，会场上鞭炮声齐鸣，许多造反派再也按捺不住那一颗颗狂跳之心，他们纷纷奔向主席台，向王泉金赠送毛主席像章、红卫兵袖章，头脑单纯的少先队员也给他戴上了红领巾。王泉金被这热烈的场面激动不已，他举手不断鼓掌，向大家致意。接着，疯狂的群众又把王泉金托举得高高的，他简直就成了一个神，神乎其神。会后，那些狂热的人们又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与其说是欢呼，

不如说是示威更恰切一点，接着，一股新的反军大浪潮在福建掀起。

6 月 1 日晚 19 时许，福建师院附中“红联会”的几个省军区部队干部子弟，在三楼的队部看见“红九二”的几个女同学正好从下面路过，便用石子和弹弓对她们射击。事情就是这么巧，他们的一粒石子正好击中了一个初中女生的眼睛，顿时鲜血淋漓，她的右眼被打瞎，从此成了一个残疾人。

同在这幢办公楼里，跟“红联会”队部遥遥相对的“九一五兵团东野一支队”一伙人闻讯后，冲进“红联会”队部，欲捉拿打人凶手，双方发生冲突，短兵相接打了起来。

接着，“九一五”、“红九二”的人得到消息后，纷纷赶来增援，那几个“红联会”的人见势不妙，便三十六计走为上，逃之夭夭，跑回了省军区大院的家中。“九一五”、“红九二”的学生也追到了省军区，但在省军区大门口被担任守卫的解放军战士阻拦住了，结果，双方争吵起来。

省军区支左接待站主任闻讯后立即赶到大门口企图进行调停。那些“九一五”、“红九二”的学生们对这位主任一向视为眼中钉、肉中刺，他们之间可是铜盆铁刷子----碰到就响，没说上三句半便争吵得不亦乐乎，一方指控这位主任包庇打人凶手，另一方则指控学生企图冲击军区。

当晚，“九一五兵团”和师院附中“红九二红卫兵团”便拉起队伍上街游行，强烈抗议“前线兵联动”行凶打人，并到省军管会提出四项“严正要求”：

一、强烈要求韩先楚同志接见我们并处理发生的事情。

二、强烈要求军管会罢免省军区支左接待站主任的官，要求省军区支左接待站向各造反派赔礼道歉，保证今后不重犯。

三、立即逮捕打人凶手，赔偿一切损失。

四、若伤员在福州 市无条件治疗，立即空运上海、北京等地治疗。

以上四项我们有权审查处理情况。

“九一五”、“红九二”的行动获得了他们一派人的全力支持。6 月 3 日下午，韩先楚出来接见了他们，同意撤销省军区支左接待站主任在支左工作中的一切职务，并同意他到师院附中向造反派作检查，这一事件才告一段落。

5月31日，津浦、陇海线的枢纽徐州爆发大武斗，两条铁路大动脉因此而中断。

徐州，著名的战略要地，东濒黄海，西接中原，北依齐鲁，南扼江淮，地处苏、鲁、豫、皖四省要冲，号称“五省通衢”，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其战略地位十分重要。进入近代以来，中国铁路的两条大动脉——津浦铁路和陇海铁路在徐州交汇，更显其地理位置的重要。徐州铁路分局隶属于济南铁路局，其管辖的范围分散在江苏、安徽、山东三省的接壤地区，是全国铁路的枢纽之一，在全国铁路系统中的地位也十分重要。

徐州和连云港市行政上属江苏省，军事上却是济南军区的防区。1955 年春，中共中央军委对全国军事防卫区划做出重大调整，分别在南京和济南设立南京军区和济南军区。南京军区下辖江苏、安徽、浙江、江西、福建五省军区和上海警备区。考虑到南京军区所辖江苏、浙江、福建等省海岸线较长，重要海口较多，

所以决定将苏北海港连云港至徐州一线的军事防务划归济南军区。因此，当时徐州驻有三支部队：一是68军军部在徐州，下属202师等部队在江苏的新沂等地，属济南军区管辖。二是徐州当地的徐州军分区和各级武装部，属江苏省军区，隶属于南京军区。三是空29师，属于空军。另外，驻徐州的坦克2师配属68军，连云港的独立守备18师同样为济南军区下属部队。

因为连云港历史上也叫做海州，所以徐州和连云港市统称为徐海地区。

在“一月革命”的风暴中，徐州市也实施了夺权。1 月 21 日晚，徐州市委部分领导干部与徐州市“毛泽东主义红卫兵总部”、“八一红卫兵总部”的部分头头，在市人民防空指挥部秘密召开夺权会议，通过了事先起草的夺权《通告》。到会人员逐个在《通告》上签了名。会上宣布：从即日起由“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和“八一红卫兵”两总部接管市委、市人委一切党、政、财、文大权。第二天，徐州市“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和“八一红卫兵”，联合徐州“红色工人造反总部”、“淮海工农”、“造反野战军”、“文艺界造反联合总部”共 6 个组织，成立了徐州接管委员会。

24 日，《徐州日报》刊登了“徐州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和“徐州八一红卫兵”于 21 日拟定的《关于夺取中共徐州市委和市人委一切权力的紧急通告》和《给毛主席的致敬电》。

中央要求军队“支左”的命令下达后，因为 68 军是徐海地区军事级别最高的机构，南京军区和济南军区一致同意徐州“支左”工作由 68 军负总责，其他几支部队均统一由其负责指挥协

调。1 月 28 日，以 68 军为首的徐州驻军奉命正式介入当地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他们希望尽快召集各大造反派群众组织头头会议，通过协商组成一个“革命造反派大联合筹备委员会”，为正式组建“革命委员会”创造条件。68 军司令部处长吕文俊等人受命具体负责此事。

接着，徐州接管委员会又联合“火车头红色工人造反兵团”等 10 个全市性群众造反组织，在徐州驻军 68 军的帮助下，于 2 月 2 日成立了“徐州市革命造反派大联合筹备委员会”，简称“筹委会”。

和全国一样，徐州“筹委会”成立以后，参与“筹委会”与未参与“筹委会”的群众组织很快就产生了矛盾，一股反“筹委会”的情绪在徐州蔓延。这种情绪被“筹委会”称之为“反动势力”和“流动逆流”。

军队介入地方支左不久，徐州驻军便认定徐州最早成立的群众组织“红总”有问题，2 月 10 日拘留了“红总”几个负责人：徐州农机厂工人李长荣、公共汽车公司工人王宜玺、重型机械厂工人栾昌善。接着又在 2 月 24 日宣布“红总”为“反革命组织”予以取缔。

以徐州医学院学生徐峰为主要头头的“徐州红卫兵三司”等群众组织试图替“红总”辩护，因此也遭到军队镇压。在随后不到20天的时间内，徐州相继取缔了“红总”、“淮海工农”、“市第一人民医院红色造反队”、“新红卫军郊区分部”、“红卫兵三司”等34个群众组织，并拘留了这些组织中146名骨干。另有数千人在本单位接受“群众专政”。 这就是当时称之为的“二月镇反”

和“三月黑风”。

不久，徐州“筹委会”又联合 26 个全市性的群众组织，解放一批干部，在徐州驻军的支持下，一个“三结合”的领导班子基本形成。

3 月 18 日，经南京军区和济南军区共同批准，在徐州体育场召开大会，正式成立徐州市革委会。革委会由 44 名委员组成，以军人为主。主任由驻徐部队 68 军副政委刘汝贤兼任，同时结合了一批“革命领导干部”，包括市长吴明政、市委副书记王铁民等人。革委会委员中的“群众代表”包括“红农会”头头朱成明、“火车头”头头杨正祥、《徐州日报》社造反派头头田超、“淮大八·三一”头头吴方新、“八一红卫兵”头头张晓阳等。5 名副主任中有 1 名群众组织负责人，是“红农会”头头朱成明。14 名常委中部队干部 6 人，地方干部 5 人，群众代表 3 人。而在 3 月 19 日成立的 11 人“核心小组”中，没有一个群众代表。

因为徐州革委会是在 3 月 18 日成立，史称“318 徐革会”。

“徐革会”成立后，北京“三司”学生来徐州串联。他们认为，“徐州革命委员会”不是真正“三结合”的班子，而是一个“三凑合”的班子，必须踢开。

于是，一些群众造反组织开始退出“3.18”徐革会。首先退出的是徐州铁路分局的“火车头红色造反兵团”，这是徐州“筹委会”发起组织之一，其头头杨正祥也参加了徐州革委会。但是到了 4 月初，在北京矿业学院等造反学生鼓动下，杨正祥他们认为徐州出现了“二月逆流”，徐州驻军支持老保，徐州革委会是老保掌权，另外杨正祥对自己在徐州革委会的位置也不满意。4

月 10 日，他第一个提出“踢开徐革会”的口号，发表《退出声明》，宣布退出徐州革委会，并马上乘车上街散发《声明》传单，当晚召开铁路分局“火车头”下属各造反团负责人会议，统一思想。

第二天，杨正祥召集全市相同观点的造反组织，连续几天召开会议，指责徐州革委会是“二月逆流的产物”，“比黑市委还黑”，“老保翻天”等等，决定建立全市性的组织。

徐州的局势原本已经稳定下来，突然有组织宣布从革委会退出，68 军党委于 4 月 11 日召开会议，发表声明，宣布“卫戍区和徐革会大方向是正确的”。同时 68 军领导出面，分别做“淮海八三一”、“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六二四兵团”等组织的工作，力保徐州不出现大问题。

但是，淮海大学、徐州医学院等一些参加徐州革委会的群众组织还是相继退出，一股踢开“3.18 徐革会”的力量开始形成。

中发[67]117 号文件，即中央《关于安徽问题的决定》下发后，全国支左部队开始放人，徐州被抓的“红总”等组织人员也陆续释放平反。4 月 29 日，由“火车头造反兵团”司令杨正祥主持，在“火车头”总部召开会议，正式成立“反到底联络总站”，并于 5 月 1 日在体育场召开成立大会，口号就是“踢开徐革会！”

徐州因对市革委的态度不一致而形成两派，支持“徐革会”的被称之为“支派”；主张“踢开徐革会”的，被称之为“踢派”。

“踢派”，在当地也称“驴派”，就像美国的共和党和民主党那样。“踢派”的头杨正祥，被“支派”戏称为“杨歪驴”。

而“支派”，“踢派”叫他们是“马屁派”，也称“狗派”。

两派开始是用大字报辩论，后来发展成派人撕对方的大字报，或改写对方的标语。例如一方写“徐州市革命委员会就是好！”另一方就在标语的结尾处加上“个屁”，变成了“徐州市革命委员会就是好个屁！”

于是，“支派”自称“好派”，把对方，即“踢派”称之为“屁派”。

当时徐州号称市内人口为 53 万，整个徐州地区八县，连带连云港有 800 万人，这些老百姓几乎全数卷入文革运动中，家家都分为“踢派”和“支派”，两派水火不容，针锋相对。

由于徐州位于四省交界，交通发达，文革中，它成了山东南部的枣庄、临沂、薛城，河南东部，安徽北部的宿县、淮北，江苏北部、连云港的政治中心，这一带的人都以徐州为中心，在武斗打败后，就往徐州跑。

再说铁路，当时徐州铁路分局隶属济南铁路局，干部由济南路局任命。文革前铁路是半军事化的单位，铁道部直接领导管理，各地诸侯不能乱插手。但文革中打乱了这一切，各个铁路局都受到当地的干涉。安徽蚌埠的造反派就曾自行编组了一列特快列车，强行从蚌埠开往北京，特快驶出安徽，其他省市的铁路不了解情况，突然冒出这列客车，把津浦线搅的更加混乱。

徐州由于其位置特殊，文革中与省会南京联系不多，倒是紧跟济南。解放前徐州就属于山东，徐州人的性格，生活习俗都接近山东人，和南方的南京、镇江、苏州人区别太大。

进入 5 月份，徐州的武斗愈演愈烈，城里武斗不断。

5 月上旬，“徐革会”在徐州卫戍区召开部分 16 级以上干部会议。会议由“徐革会”主任、68 军副政委刘汝贤亲自主持。会上告诫与会者，“徐州将有一场或几场大搏斗”，“要有准备”。

为了做好“准备”，5 月 11 日“徐革会”召开部分组织骨干分子会议。会上成立“批斗刘邓统一指挥部”，由“徐革会”委员、“造反野战军”田司令担任“统一指挥部”主任，肩负起徐州联防任务。

为了形成“农村包围城市的局面”，在徐州郊区也成立“批斗刘邓联络站”。要求“统一行动，分片联防”，从公社、大队到生产队逐级建立起“抓革命”的班子。并分一线和二线，对一线人员进行专门训练，配备柳条冒、棍棒等作为联防武器。

## 第 663 回：大武斗，津浦、陇海线中断　下决定，铁路、交通全军管

王效禹任济南军区第一政委后，于 5 月 14 日在济南，首次接见从北京告状回来后经过济南的徐州“火车头”司令杨正祥。5 月 15 日，王效禹等人又在济南华侨旅社就接见杨正祥等 20 余名“踢派”代表，对他们说：“你们是坚强的造反派，是经过‘二月逆流’考验的，你们的心情我是理解的，只要我们的电台在一天，我们就替你们发电报，替你们把材料转中央。”

而徐州这边，由于张春桥、姚文元在南京召见了在徐海地区支左的济南军区68军军长张鋞秀、副政委刘汝贤、副参谋长裴维增，以及徐州“支派”头头田超、吴方新、张晓阳，要求他们做好团结“踢派”的工作。徐州军管会于5月16日发出了《平反公告》，但是拒绝改组徐州的“三·一八”革委会，尤其反对将“红总”头头栾昌善、李长荣、王宜玺等人增补为常委。获得平反的“红总”和“徐州三司”随即加入“踢派”。

5 月 17 日，杨正祥从济南回到徐州后，在这天召开会议，传达他与王效禹见面的情况，并于 18 日，继续在铁路机务段主持召开大小负责人会议，文革前徐州已经有些名气的肖德宣在会上宣传：“‘踢派’的大方向是正确地，革委会镇压了造反派，革委会和警备区是一回事。你们要敢想、敢干、敢打、敢冲，打的过就打，打不过就跑。造反嘛，越闹的大越好”。会议决定“踢派”在徐州实施“一打二夺权”的方针。

肖德宣，1948 年 11 月的淮海战役中任黄伯韬第 7 兵团所辖 44 军 150 师 449 团上校团长。他软禁了 150 师师长赵璧光和 448 团团长何亚颜，逼迫他俩一同起义，为及时全歼黄伯韬兵团立了功。

5 月 24 日下午，徐州市革委会由“批斗刘邓统一指挥部”田主任主持，在徐州北关 6063 部队，即 68 军 203 师的一个修械所里召开会议。68 军和“徐革会”的部分委员到会。会议研究决定：划分地区，加强联防自卫。各造反总部保留，但要打破框框，以地区为主搞联防，分别划分为东、西、南、北、中五个区：东区，即黄河堰以东地区；西区，即矿山路一带；南区，即中山南路，南关一带；北区，即铜沛路、环城路一带；中区，即淮海路、青年路一带。同时成立了以“野战军”田司令为首的 7 人总指挥部，负责统一指挥各区力量。总指挥部设在 6105 工厂。参加会议的一名军队干部强调说：“打不还手是对部队讲的，你们可以自卫嘛！应加强联防，不能各顾各的，要相互支援……”

5 月 28 日，“统一指挥部”在市汽车运输公司召开有 32 个“支派”造反派总部负责人参加的会议，认为“踢派”可能要在 6 月 1 日全面夺权，大家要做好准备，立足在“打”字上。当夜，“统一指挥部”成员在徐州卫戍区召开秘密会议，决定次日还在 6063 部队修械所召开各“支派”头头会议，并强调不得缺席。

29 日早晨 6 时，各派头头准时到会。会上，具体讨论“作战方案”。先是提出两种作战方案：一是小打，即局部性武斗；二是大打，即全市性武斗。经研究讨论一致同意第二种方案。会上进一步明确：

总指挥部在徐州卫戍区接待站二楼。

前线总指挥：由原东区指挥担任，地点在 6105 工厂。

淮海路东段指挥：由原北区指挥担任，地点在第四监狱。

淮海路西段指挥：由原西区指挥担任，地点在工程机械厂。

淮海路机动部队指挥：由原中区指挥担任，地点在市政工程处。

主攻“火车头”总部的一线指挥部设在市火柴厂。

郊区“红农会”指挥部设在琵琶山营房。

5 月 30 日，郊区“红农会”指挥调集朱庄、下淀、狮子山、奎山等地 4000 余名农民准备进城，各路人马皆配备安全帽、棍棒等武斗器械。

当天下午，“红农会”、市搬运二社和铁路机务段的“支派”，因贴大字报与“踢派”发生冲突。“支派”联络人员遭到拘留。随后，“支派”以“火车头”压制“四大”和要求放出被拘留人员为由，调动郊区“红农会”进城。18 时 30 分，数百名“红农会”人员，配合市内“支派”人员，手持短刀、木棍、炸药、土枪等器械，向机务段“踢派”发起进攻。机务段“踢派”虽有准备，但因寡不敌众，许多“踢派”人员被打伤。同时，“支派”对机务段内的“踢派”人员进行大搜捕，当时被称作“血洗机务段”。“火车头”司令杨正祥下令拉响汽笛，向全市“踢派”呼救。当“踢派”各路人马赶到“火车头”总部时，“支派”人员已全部撤走。此时，负责铁路执勤部队也撤回徐州，机务段仍由“踢派”“火车头”总部控制。

由于“支派”联络人员在铁路机务段被拘留事发突然，就在

18 时 30 分，“红农会”农民向机务段发起进攻的同时，“支派”前线总指挥部也发出通知：“原定 6 月 1 日的全市性大行动，因事态发展需提前在 5 月 31 日进行。”

参加行动的人员都手缠白布条作为统一标志，规定统一口令，主攻目标为“火车头”总部。各路武斗队员具体分工是：

铁路“联委”、下淀“红农会”、九中“井冈山”等“支派”组织，首先攻下机务段，而后配合东区攻打“火车头”总部；

北区控制济众桥，向东逼近“火车头”总部，做到围而不攻；

西区在卫戍区以西和北区形成第二包围圈，阻击“踢派”的增援；

6414 工厂“支派”负责封锁黄河堤岸“火车头”总部以南地区；

朝阳路和青年路交叉口由交通二公司造反组织承担阻击任务；

天桥西建国路口由狮子山“红农会”承担阻击任务；

“东区”负责天桥上下的阻击任务；

“中区”为机动部队，随时听候总指挥部的调遣。

很快，“支派”各路武斗队员从四面八方对“火车头”总部形成了包围之势。

31 日凌晨 3 时 35 分，“支派”前线总指挥部下达进攻命令，6105 工厂、宝兴面粉厂、橡胶厂和市中心钟鼓楼等地顿时警笛齐鸣，长达 17 分钟，以此宣告“5.31”武斗正式开始。各区武斗队员头戴柳条帽，扛着棍子、铁锨、土枪等武斗工具，按指定地点迅速到位。

凌晨 4 时，他们开始向机务段发起猛攻。“踢派”武斗队员在里面死守，因修有坚固工事，“支派”一时攻不进去，双方武斗人员虽声势浩大，但并未短兵相接。

上午 9 时，“支派”改变进攻战术，找来雷管、炸药，组织爆破队进行爆破。爆破队分一、二、三梯队，如果一队爆破失败了，二梯队、三梯队前仆后继。9 时 30 分，机务段围墙被炸破，大批“支派”武斗队员潮水般涌进机务段，双方开始了短兵相接。由于实力差距，双发对打了一阵子，很快“踢派”就支持不住了，机务段随即失守。

遂后，城里“踢派”几次组织力量试图去增援“火车头”，但皆被北区和西区的“支派”人员打退。在机务段“踢派”遭到“支派”袭击的同时，城里五金公司大楼和新华书店大楼的“踢派”也同时遭到“支派”的袭击。致使城内“踢派”无力增援“火车头”。

此时，5 月 31 日，国务院联络员办公室转来的几份铁路运输简报摆到了西花厅周恩来宽大的办公桌上。简报上写道：

据铁道部业务监督小组报告，最近几天，各地由于两派武斗和纠纷，几条主要铁路干线连续发生行车中断情况。目前，京广、津浦、陇海、浙赣四条主要干线处于瘫痪状态，情况如下：

（一）徐州地区两派武斗，至 28 日早 6 时，徐州火车站的作业处于瘫痪状态，徐州分局管内陇海、津浦沿线滞留列车达 33 列，济南分局滞留 22 列。30 日，徐州火车站两派武斗，一台机车被炸毁，调度室被砸，从晚上 7 时起，车站完全停止作业，滞留货车 34 列，客车运行也停止了。到 31 日，武斗还在继续，

机务段内 20 多台机车被炸，一部分铁轨被扒掉，整个徐州机务段只剩下一个副段长和一个运转主任，津浦、陇海两干线运输中断。

截至 31 日早上 6 时，在津浦线上滞留货车 68 列，客车 16 列。津浦线济南至蚌埠、陇海线商丘至连云港的铁路交通全部瘫痪。

（二）驻浙江金华的南京军区的某军急电：金华地区两派武斗，铁路设备被破坏，金华火车站的大批工作人员被劫往杭州，车站工作完全处于瘫痪状态。自 28 日起，浙赣线交通完全中断。到 31 日，浙赣沿线滞留列车 100 余列，交通至今尚未恢复。

（三）郑州两派武斗，郑州北机务段被围，郑州火车站电源被切断，工作停止，严重影响了京广、陇海两线的运输。目前，事态还在发展，铁路运输很困难。

（四）京包线的宣化站，因地区两派纠纷，于 26 日停止作业，不接发列车，使运输陷于中断。

（五）武汉军区来电：汉口车站连续发生冲击铁路运输的事件。27 日，一些群众组织以抓“联动”为名，动员数千群众冲进车站，拦截 16 次快车，砸坏门窗，致使 16 次快车在汉口滞留 17 个小时。29 日，又有几千名学生和不明身份的群众闯进汉口车站，强行搜查 38 次快车，还将一女青年衣服剥光，进行搜身侮辱。30 日，又有一千多不明身份的人闯入车站，打伤车站职工和值勤战士，破坏铁路设备，严重影响铁路运输……

看罢简报，周恩来根据报告所附济南军区 68 军要求对有关铁路枢纽实行军管的意见，当即批示：“同意济南军区 68 军党委

常委关于要求对徐州铁路分局和火车站实行军管的急电。”

实施军管，必须得到毛泽东的批准。已是中午，按照毛泽东的作息时间，此时他该休息了。但是，周恩来深知这几条铁路枢纽对国计民生的影响，他顾不上打扰毛泽东的休息，拿着铁路运输简报，疾步来到毛泽东的住处。

看着简报，毛泽东若有所思的脸上也显得十分严峻。

“主席，铁路交通关系到全国的经济命脉，一旦中断，国民经济局势不可收拾。对铁路交通的军管，应立即实施，不可再拖。”周恩来说。

毛泽东思索片刻，当即表示同意。

从毛泽东那里出来后，周恩来立即紧急召集李富春、李先念、叶剑英、肖华、杨成武、谷牧、余秋里等人到国务院开紧急会议。会上，周恩来传达了他中午向毛泽东汇报的情况，并和大家商定了对铁路交通实行军管的具体细则：

（一）尽快公开发布关于不许中断铁路轮船交通运输的命令；

（二）将全国 18 个铁路局分给附近驻军实行军管包干，将沿海沿江轮船交给海军实行军管包干；

（三）参加军管的军队均与当地军分区、武装部分开；

（四）责成总参谋部负责拟定调动部队的计划，次日拿出方案。

会后，周恩来提笔给中央文革的陈伯达、江青、康生写了一封信：

伯达、康生、江青和文革各同志：

送上铁路中断情况电讯八份，请阅。今午在主席处，已说明

铁路轮船关系到全国交通命脉，绝不能中断。下午曾约集富春、先念、剑英、萧华、成武、谷牧、秋里各同志会商此事。除以报请批发不许中断铁路轮船交通命令外，并拟将全国 18 个铁路管理局分给附近驻军实行军管包干，将沿海沿江轮运交海军军管包干，均与当地军分区、武装部分开，不再介入地方支左工作，以便统一全国铁路轮船运输，免受干扰。这一计划正由总参草拟，明日当可订出送审。此外，拟为此事再发一告铁路轮船职工书，定稿后再送阅。

当天，经毛泽东批示“照办”的《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关于对铁道部实行军事管制的决定（试行草案）》正式发布。《决定》共八条，其中第一、四条称：

“一、为了坚决贯彻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彻底搞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认真执行’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保证革命生产双胜利，根据毛主席关于’军队不但要协同地方管农业，对工业也要管’以及’只管工业，不管交通运输，是不对的’等重要指示，特决定自即日起对铁道部实行军事管制，成立军事管制委员会（以下简称军管会），任命苏静为军管会主任，杨杰、朱互宁为副主任。”

“四、军管会在国务院和中央军委的领导下，对部的各项工作实行统一领导。部属单位无论是否实行军管的，均受部军管会的领导；分散在各地的单位，同时受所在地革命委员会或军区的领导，但有关生产运输调度业务，必须服从部军管会的集中指挥。”

与此同时，中央还联合发出《关于对交通部实行军事管制的

决定（试行草案）》。

31 日当天下午 15 时，遭到“支派”强烈攻击的徐州“火车头”总部已陷入“支派”的包围之中，而且包围圈越来越小。“支派”前线总指挥开始对“火车头”逼降，并用电话对“火车头”总部讲，如不投降就将“火车头”总部大楼炸平。

“火车头”总部表示决不投降，誓与“保皇派”血战到底。15 分钟后，“支派”武斗队员在炸药、土枪的掩护下一举攻占了“火车头”总部。

战争是残酷的，武斗同样是残酷的，尤其是失败者一方。胜利者像对待阶级敌人一样，把仇视的怒火发泄到被俘虏者身上。被俘虏者则无法拒绝这种发泄，他们别无选择地承受着各种暴力摧残。许多人的伤残不是在武斗战场，而是在武斗结束之后，有的被打得头破血流，有的被打断四肢。武斗过后的“火车头”总部一片狼藉，数百名“踢派”作为俘虏被押送到下淀、朱庄等地时称“训驴棚”里受训，去经受一种新的“考验”。

对此次武斗事件，徐州卫戍区、“徐革会”的态度始终是“坚定”的。他们认为：“支”、“踢”两派的斗争是阶级斗争，是夺权与反夺权的斗争，“支派”的自卫还击是完全正确的。

因此，武斗结束后，余波并未结束。当晚，徐州火车站按照中央的决定实行军管。接着，公安局、派出所在“支派”人员的配合下，对全市的“踢派”组织及家庭进行大清洗和大搜查。“红总”、“毛泽东主义红卫兵抗大公社”、淮大“反到底”、一中“反到底”、航校、徐州医学院、化工“抗大”、徐州“三司”、市立一院、机关“反到底”、教育局“反到底”、毛泽东主义战校、团

市委“32111战斗队”、6414工厂、空字008部队等“踢派”组织再次受到冲击。时达10天的大清查、大搜捕致使许多“踢派”人员有家不能归，有厂、校不能回。“火车头”司令杨正祥携部分“踢派”人员逃往济南和南京浦口。随后，杨正祥和其他“踢派”头头不得不率领数千“踢派”群众到上海找张春桥告状，到南京找江苏省军管会告状。在上海、南京两地交涉无果后，他们又转赴北京向“中央文革”告状。

“5.31”武斗事件造成的后果是严重的，受伤 1200 余人，亡 6 人，损失 28 台机车，造成客运停车 28 小时，货运停车 96 小时，停运客车 13 列，货车 175 列，积压物资 165000 吨，直接经济损失达数百万元。

与对铁道部军管决定同日发布的，还有同样是毛泽东批示“照办”的对交通部军管的决定。

6 月 1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联合署名的形式向全国发出了《关于坚决维护铁路、交通运输革命秩序的命令》。该《命令》第三条称：“煽动武斗、破坏铁路、交通运输革命秩序和砸毁铁路、交通设施、运输工具的少数坏人以及情节严重的肇事者，必须受到无产阶级国家法律的制裁。各地革命委员会、军事管制委员会和驻铁路、交通部门的人民解放军部队、军代表、公安值勤人员有权根据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三日公安六条规定负责处理上述问题，有关方面必须听从，不得拒绝执行。”

这份《关于坚决维护铁路、交通运输革命秩序的命令》即 5 月 31 日周恩来给陈伯达、康生、江青信中提到的《告铁路职工

书》。

同日，军管会正式进驻铁道部。原部临时业务监督小组改为军管会业务协助小组。

6 月 5 日，周恩来召集扩大的中央常委碰头会，讨论《对铁道部实行全面军事管制的部署（草稿）》等文件。

6 月 12 日，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对全国铁路实行全面军管。

## 第 664 回：放涤西，饶漱石为少奇证明　说江西，“辽革站”夜袭东工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北京医院的高干医疗保健机构被砸烂了。此后，不仅军队高级干部的医疗保健工作完全由 301 医院负责，中央党政机关的高级干部，也经过不同的渠道转到 301 医院。1967 年 5 月间，周恩来召集邱会作、汪东兴、吴阶平、301 医院副院长蒲荣钦、301 医院南楼医务主任李晋等在京西宾馆会议楼第三会议室开会，专门讨论高级干部得医疗保健工作。在会上，周恩来和大家一起商定了五条：

一、成立中央医疗小组。小组的主要任务是负责中央常委、中央文革的医疗保健工作。为了保证中央领导人保健工作的需要，在中央警卫局 305 医院内设立特别小型药房。周恩来还宣布：“中央医疗小组的工作，由周恩来、邱会作、汪东兴、吴阶平统一负责。”

二、军队所有高级干部的医疗保健工作，由周恩来、邱会作、汪东兴负责，以 301 医院为主，北京医院、协和医院量力而行，担负医疗任务。取消纯粹保健药品的供应，需要者可以代办，自己照价付款。中央举行会议时的医务工作，列入保健工作范围之内，统一领导管理。

三、对中央原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副总理以上的领导干部，正在受审查的人员，涉外事项的医疗保健工作，一律归周恩来批准，由 301 总医院，北京医院、首都医院、公安医院，按照周恩来批示执行任务。对上述人员的医疗保健. 没有周恩来的

批示各医院不得自行办理。

四、对外的医疗工作，由外交部承办，经总理批准，委托有关人员办。

五、从国外进口医疗器材和药品，一律经周恩来批准，交由外贸部承办。

1967 年 5 月，因为给林彪写《公开信》被抓进半步桥监狱的北农大附中的张立才，就是涤西，被放了出来。公安局的车直接把他送到学校，接着学校就组织大会批斗他。

张立才放出来后，伊林刘握中，还有北航的白晓宏他们都被转到北苑学习班去了。刘握中是第一期。白晓宏等人是第二期。里面还关押了一大批“黑帮子弟”。他们这些案子是绝对判不了刑的，因为毛泽东认为都是孩子，只是认识问题，不同意判刑。

张立才出来自由了几个月。但好景不长，学校又把他关了起来，不让他回家，限制自由，实施群众专政。白天强迫劳动，夜里有人看守，境况要比拘留所糟糕多了。因为在拘留所里不打人，在外面那些群众可就不管什么政策不政策了，谁过来都可以打他一顿。

刘握中在学习班里也只呆了一个半月。当他走出功德林监狱的大门时，管理监狱的士兵将入狱前搜去的物品归还他，其中，抓捕他之前，北航“向阳”、“红匕首”送给他的人民币和全国粮票，都在小包里边。

出来后，学校也对他实施群众专政，先把他跟那个瓦罗佳关在一起，说瓦罗佳是苏联特务。他们觉得学校的牛棚还不如监狱。监狱讲政策，可学校的牛棚就不同了，所谓群众专政，打人往死

里打呀。刘握中实在受不了了，傍晚在同学张若宏的掩护下，从牛棚逃了出来，跑去找北苑学习班的军代表，要求回学习班。军代表是中央警卫团 8341 部队的。他听了情况后，亲自开着一辆吉普车，带着两个干部，连夜找到北农大附中的军宣队马团长交涉，对他们说："无产阶级司令部已经把他放了，你怎么还关着他？"

马团长坚持不干，顶着不肯放了刘握中等人，双方僵持到天明。

没过几天，来了一个李营长，换掉了那个马团长。李营长对刘握中说："我是直接奉毛主席司令部的命令，专门为解决你们的问题来的。我已经把马团长请走了。"李营长是由 8341 部队派过来的。李营长在学校开个大会，让刘握中、张立才检查了没十分钟，照章念了几句，就没事了，他们就此自由了。

由于江西省委书记处书记刘瑞森于 4 月中旬提出江西省军区在支左中犯了方向、路线性错误，与江西省军区产生了矛盾。于是，江西在对待刘瑞森的问题上，分为"支刘派"和"反刘派"。5 月 16 日，"支刘派"在省总工会宣告成立"江西省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筹备委员会"，简称"大联筹"，由洪都机械厂的万里浪、江西拖拉机厂的涂烈、"江西省大中学校红卫兵司令部"，简称"大中红司"的周升炬和师范学院的"井冈山"为主组成。

江西"大联筹"的对立面是"省市无产阶级革命派联络总站"，简称"联络总站"。

5 月 24 日，毛泽东在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 5 月 20 日编印的《快报》第 2213 号登载的《江西军区和革命群众的对立情绪为

何愈演愈烈》上批示：

林彪、恩来同志，文革小组阅后，交汪东兴阅。江西军区某些同志对群众的态度是否正确，值得研究。此外，还有湖南、湖北、河南三省军区对群众的态度是否对，都值得研究。

5 月 28 日，赣南纸厂“前锋工人战斗队”与学生红卫兵发生冲突，当场打死红卫兵刘爱福，打伤 100 多人，红卫兵抬尸大游行。

5 月 30 日凌晨 2 时 10 分，周恩来给正在江西省军区与江西省军区司令员吴瑞山一同执行三支两军工作的福州军区第二政委刘培善打电话，转告了毛泽东的批语，同时指示：

1、江西军区在“三支”、“两军”中犯了一些缺点错误，革命群众认为犯了方向路线性错误。你们应该很好解决。

2、江西日报问题不要争论下去了，“江西日报”四个字可以暂时去掉，改出一个时期的新华电讯。

3、不要把刘瑞森的问题看得太严重了。

4、刘培善先作检查，军区哪个检查，你们（指军区）自己研究。

6月1日，受周恩来委派，刘培善在省人委三楼会议室向“大联筹”头头万里浪、陈全生、蔡方根等人传达毛泽东指示时，被连续围攻质问达7个多小时，直至周恩来亲自打电话才得以解脱。

6 月 7 日下午，在南昌人民广场召开的 5 万人大会上，吴瑞山与刘培善、林忠照一起向群众作检查。检查后，“大联筹”用船秘密将他们押到南京，再由南京坐火车押到北京，参加中央首长在北京的接见。到北京后，周恩来严历批评了“大联筹”的这

种做法。

6 月 1 日，《人民日报》发表任立新写的《要让孩子们经风雨、见世面》一文，其中用黑体字引用毛泽东的一段话："老干部过去有功劳，但是不能靠吃老本，要很好地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锻炼改造自己，要立新功，立新劳。"

饶漱石是中共党内最早知道刘少奇被捕和释放经过的人。1967 年 6 月 1 日，饶漱石为专案组写下了如下材料：

我是 1929 年到满洲（即东三省）担任共青团满洲省委书记之职的。当时刘少奇同志担任党的满洲省委书记。刘出狱不久即离开满洲。刘离开满洲后，我当代理党的满洲省委书记之职。关于刘少奇在滿洲被捕事件，因为时隔三十多年，详细情况无法回忆，我只记得他是因为到沈阳奉天纱厂等候工人党员谈话被敌人当作小偷而被捕的。因为敌人未得到刘的其他材料，故刘只在监狱住了十天左右即获释放。刘被释放后即到我家将上述情况告诉了我。当时我们对秘密工作都缺乏经验，故发生刘被捕后我仍未立即搬家和刘于被释放后即到我家的事情。当时我对刘被捕释放事件过分信任刘的报告，故未作详细研究，当时党内已有个别同志因刘被释放事件过于简单提出过意见的。现在，我认为我当时对刘过分信任的态度是有错误的，我认为今天把此事彻底审查清楚是完全必要的。

我们再看辽宁。3 月 19 日，沈阳军区、辽宁省军区进驻各地机关、报社、电台、学校、工厂、农村，执行"三支两军"任务。

4 月，辽宁的"东工红旗"、"革命造反团"和"辽大红卫兵"

等组织到东北局机关揭东北局阶级斗争盖子、揪东北局第三书记马明芳。4 月 21 日，东北局书记处发表“关于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三点意见”：

1、进驻或冲进东北局机关的“东工红旗造反团”、“革命造反团”和“辽大红卫兵”是保守组织；

2、他们进驻或冲进东北局机关是违反毛主席亲自指示的军委八条命令和中央 2 月 21 日的通知的，是非常错误的，希望他们按照中央军委八条命令和中央 2 月 21 日通知精神撤出；

3、我们坚定不移地站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边，坚决支持一切无产阶级革命派，坚决同他们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

东北局的“三点意见”引起冲击东北局学生组织的强烈不满。5 月 4 日，这一派学生在沈阳市政府广场召开大会，批判“三点意见”。会场上，他们与保东北局第一书记宋任穷的“辽联”派发生冲突，酿成流血事件。

“辽联”的全称是“辽宁革命造反派大联合委员会”，成立于 1967 年 2 月 16 日，由原“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沈阳总部”联合其他组织而成，以东北工学院“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等学生造反派为主体，得到相当大一部分机关中下层干部和已经“站出来”的领导干部的支持，其主要成员大多为院校师生和东北局、辽宁省委、省政府以及沈阳市委和市政府的机关干部，这些干部被冲击东北局一派的群众讥讽为“五大官团”，“辽联”也有部分工人和其他成份的人，对外号称 60 万大军，根据地是南湖一带。宋任穷参加了成立大会并在会上讲话以示支持。沈阳军区派一名负

责人参加了“辽联”常务工作。

“辽联”反对沈阳军区对军内造反派及 1967 年 1 月介入地方文革后对地方造反派的压制，因此要“炮轰延安里，火烧陈锡联”。

延安里即沈阳军区机关所在地。他们的观点是：“坚决支持宋任穷同志的一切革命行动！”“沈阳部队、辽宁军区在支左问题上犯了方向性、路线性错误！”“炮轰沈阳军区文办！打倒李伯秋、凌少农！”进而发展到“打倒陈、曾、曾”，即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沈阳军区第二政委曾绍山、沈阳军区副司令员曾思玉。

5 月 10 日，冲东北局一派在沈阳南站站前广场召开“辽宁无产阶级革命派联络站”成立誓师大会， 简称“辽革站”，其主体是产业工人，矛头直指东北局第一书记宋任穷、第三书记马明方、书记顾卓新、候补书记喻屏和辽宁省委书记处书记徐少甫，简称“宋、马、顾、喻、徐”。“辽革站”的观点是：打倒刘少奇、邓小平在东北地区的代理人、东北地区最大的走资派宋任穷以及马明芳、顾卓新、喻屏和辽宁地区最大的走资派徐少甫、黄欧东、周桓以及沈阳的莫文祥！现任各级领导一律打倒，因为他们一律都是走资派！“辽革站”攻击“辽联”为保皇派。

“辽革站”成立后，得到沈阳军区和辽宁省军区的坚决支持。在成立后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迅速发展壮大，成为一支号称有百万产业大军的群众组织。根据地是被国内外喻为“东方鲁尔”的铁西地区。

5 月，“辽革站”召开三次常委会，策划攻打东北工学院“辽联”总部。因为当时东北工学院将东北局、辽宁省、沈阳市的大

部分当权派都集中到了这里。“辽革站”每次开会时，军代表徐静成、战辛等人都来参加。为使这次行动师出有名，他们以到东北工学院揪“大叛徒”东北局第三书记马明方为名，得到沈阳军区的明确支持，战辛还在一次会上说：“你们抓住一个就是胜利”。在 5 月 31 日召开的最后一次会议上，“辽革站”详细制定了攻打东北工学院“辽联”总部的作战方案，确定了工商学机关各系统出车、出人数量，编好作战部队，分配了任务，谁打主攻，谁迂回包围，谁做预备队，等等。其具体部署是：

辽革站“三七联总”围攻东北工学院、省体校运动系；“黎明联总”主攻老干部住的大楼，抓老干部；“金铁”带武斗队去砸总电门， 灯灭为号；“化工联委”负责牵制辽宁大学；装具系统围攻二宿舍；铁路系统守南湖大桥。

行动时间是 6 月 1 日凌晨 3 时 30 分，暗号是“两方对数相加等于一百”。

5 月 31 日晚，“辽革站”总部头头向军代表徐静成汇报攻打“辽联”总部的准备情况，并问徐静成：“这样去行吗？”

徐静成说：“怎么不行。”

“辽革站”总部头头又问：“这些当权派是否真在东工？”

徐静成说：“这个你不要怀疑，今天中午还有人看见了喻屏，有变化一定告诉你们。”

## 第 665 回：武斗起，辽宁省三足鼎立　冲报社，广西两派泾渭明

5 月 31 日晚 21 时许，东北工学院“辽联”总部广播紧急通知，说当晚有情况，命令各战斗队做好战斗准备，轮流睡觉、值班。接着，中队部又来了通知，说“辽革站”今晚可能来攻打东工，让大家快做战斗准备。开始，有些学生不信说：“别听那一套，我才不信呢。好多天以前就一直说有情况，可直到现在也没情况，他们不敢打东工。没事儿，大家放心睡觉吧，不要怕，出了事情我负责。”

有人问是否布置了岗哨、流动哨、巡逻队？学生说：“有岗哨，但没有流动哨、巡逻队，用不着。四周都是‘辽联’派的，一有情况，不等他们到东工，电话就早打过来了。”

于是大家都倒头睡觉。

下半夜，突然听到喊声、打门声响成一片，大家都被惊醒了，才知道真的有了情况。

6 月 1 日凌晨，以产业工人为主体的“辽革站”5 万人，将东北工学院围得铁桶一般，非要“东工思想兵”交出宋任穷不可。

外面一片漆黑，只听见喊声，石头撞地声，玻璃破碎声，嘈杂一片。住在东北工学院的原旅大市市长宋黎对学生说：“不能这样打下去了。你们要加强宣传，要喊话，中国人不打中国人，要告诉他们，你们都有老婆孩子，都有子女在学校念书，怎么能忍心打自己的子女呢？万一被打死了，老婆孩子谁来养活？”屋里的老干部们也都说，要加强宣传和喊话工作，中国人不打中国

人，不要武斗。

东北工学院的学生程培兴觉得他们说得有道理，立即跑到隔壁广播室喊话。这时天色刚刚放亮，晨光曦微，只见窗下院子里约有 100 多人，猫着腰，拎着木棒子，贴着墙根向学院外面逃跑。接着，宿舍楼各屋的窗子都打开了，一楼的学生纷纷跳出窗子去追击。不一会儿，就看见三三两两的“俘虏”举着双手被押回来，还有人被从小树丛中搜出来，也都被押回来。当时楼门依然紧锁，这些被抓回来的“俘虏”和押解的人，都是从窗户连钻带爬地带进宿舍楼的。

从抓到的人身上搜出了刀具等，学生们说还缴获了军用汽车，他们将车牌摘了下来，准备作为证据打“官司”用。

因为院外的汽车停靠得太密，撤离时调不开头，别在了一起，乱成一团，最后扔下了 20 多辆。有两辆车已上满了人，因车辆堵塞，跑不了，被东工红卫兵一顿石头，把车上的人都打跑了。还有些汽车因对东北工学院的地形不熟，撞到大树上。冶金楼冲进去二、三百人，被堵在里面，全抓了“俘虏”。校门前停了两辆指挥车，跑掉了一辆，被截住一辆，指挥车上还插着警备旗。东北工学院俘虏了“辽革站”600 多人，缴获了 20 多辆汽车，里面还查出有厂长和党委书记，还有一名副指挥也被抓住了。

这次夜袭东北工学院，“辽革站”虽然做了准备，调动了 6 万人，每个人都配备了木棒子。但是在力量配置上，打援的多，进攻的少。“辽革站”当夜还同时打了体育学院和音乐学院。体育学院一楼失守，整个大楼玻璃都被打碎，很多人被打伤。音乐学院也吃了亏。在进攻东工的同时，“辽革站”把辽宁大学也包

围了，虽未进攻，但占用了一部分人力。由于一线指挥不得力，结果东北工学院的学生一反击，慌乱逃跑，结果几万人的“辽革站”，竟然被一群学生打得七零八落，“辽革站”两名前线总指挥当场被俘，一名工人兰继英成为辽沈地区因两派武斗致死的第一人。而且，宋任穷等当权派也没有被揪走。当时住在省体校运动系平房里的东北局马明芳、喻屏、徐少甫等人，在听到外面骚动后，钻进了天棚，逃过一劫。

6 月 1 日上午，“辽联”在东北工学院主楼举办了“辽革站六一血洗东工展览”，并在主楼前的广场上召开大会，展览缴获的武器、汽车，前来参观的群众约有几万人。一些被抓获的“俘虏”在会上登台道歉。一个老工人，50 多岁了，痛心地说：“我真是老糊涂了，竟然参加了武斗，打孩子们。”很多“俘虏”在会上控诉，说是被蒙蔽了，等等。

主楼上，巨幅大标语一直拖到楼下，上面写着：

向辽革站讨还血债！

血债要用血来还！

誓与辽革站血战到底！

在主楼楼面上，挂着思想兵缴获的各种冷兵器：长棒，短棍，防火斧，防火钩，铁锹，刀片，扎枪……足有上百件啊！最有意思的是，竟然还有一条七节鞭！

东北工学院的主楼里，有一个很大的东北工学院的沙盘。但是，此时它已经被砸烂了。

‘思想兵’愤怒地说：“这个沙盘造价三万元，‘辽革站’的暴徒们竟然连它也没有放过！”

下午，东工红卫兵把“俘虏”中一般群众都释放了，只留下个别的头目审查。放回去人的纷纷退出“辽革站”。沈阳军区见势不妙，赶紧把释放回去的人召集起来，开了个会，每人发了一套《毛泽东选集》，并说到东工揪马明芳是去揪大叛徒，革命的大方向是正确的。这样才算稳住了阵脚。

接着，“辽联”在市人委前的市府广场召开了声势浩大的声讨大会。

会后，“辽联”决定，所有参会汽车组成车队，直接开向‘辽革站’所在的铁西区进行游行示威。“六二四战团”的几辆武卫车在前头开道，百十多辆汽车跟随，又由几辆“六二四战团”的武卫车断后，再有几辆“六二四战团”的武卫车来回巡视。

车队由市府大路直奔南二洞桥，沿着建设大路，右拐新华街，顺北二马路，过北二洞桥回到和平区。一路上，气氛十分紧张，在经过众多厂区时，“辽革站”的人全都登上房顶，把在楼上的每个窗户旁，怒视“辽联”的示威行为，但没有冲出厂区，到处是一片宁静，只有“辽联”的口号声，随着汽车的轰鸣传进厂区……

“辽革站”的舆论反击是：“我们是去揪大叛徒马明芳，你们杀害了兰继英！”

“辽联”的舆论回击是：“你们是来打砸抢，兰继英是犯了心脏病，我们把他送到南湖医院，抢救无效死亡的！”

在血肉横飞的几天之后，沈阳全城贴满了“辽革站”的机印大开传单：“归国华侨兰继英被东工思想兵残酷杀害！”上面还有兰继英生前和死后的照片。生前的兰继英，英俊、沉静；死后的

兰继英，浑身血肿，惨不忍睹……

东北工学院主楼

鲁美的力作。

“六一东工事件”是辽沈地区第一次超大型武斗，是辽沈地区文革的重要转折点。从这一事件开始，辽沈文革进入了全面武斗的阶段。东北工学院开始加强了戒备，每天用汽车搬运石头、白灰，各宿舍楼屋内窗前、楼梯口、平台上都堆积了大量石头、白灰，一楼门窗大部分用铁床堵死，守卫也加强了。苏家屯工人组织“硬骨头战斗队”也纷纷派人增援，夜间值班的人明显多了。学生们的劲头很足，“六一”反夜袭的胜利使他们信心十足。学生说：

“我们什么也不怕，石头、白灰不够，我们还能做手榴弹、地雷、燃烧瓶，我们是学工的，组织起来什么都能做。”

新的大标语也贴出来了：

“生是毛泽东的红卫兵，死是毛泽东的红小鬼!”

“生为毛泽东生，死为毛泽东死!”

“是七尺男儿敢于献躯，真英雄战士死做雄鬼!”等等。

在通往鲁迅儿童公园的小路上，一棵棵乔木被在树干的中上部刮去一块树皮，裸露的黄白色树骨上，用红色油漆赫然写着：“小心地雷!!!”

6 月 5 日，“毛泽东思想八三一沈阳革命造反总部”成立。他们以辽宁大学“八三一”为主体，既打宋任穷，也打沈阳部队和辽宁军区，同时对立于“辽革站”和“辽联”，是沈阳的第三派组织：“831”派。它的一把手是当时在沈阳大名鼎鼎的辽宁大学的学生张祥久。对外号称 15 万人，根据地是辽宁大学一带。

三派当中，只有“831”没有后台支持。“831”说“辽联”是官办的，“辽革站”是军办的，唯有自己是民办的，是彻底的

革命造反派。1967 年的夏季，三足鼎立之势在沈阳形成。

我们再看广西。

由于对广西军区支左有意见，5 月 10 日，“广西红总”、“南宁 831”一起在“422”指挥部自己搞起了“兵训”。解放军组织学生训练叫“军训”，红卫兵学生自己组织训练，他们就叫“兵训”。广西搞的“兵训”，为期 3 天。有 43 所大、中学校的学生 1000 多人参加，编为 36 个连队，像模像样。集训期间主要讨论的问题是：

1、为什么要打倒韦国清，支持伍晋南；

2、军区支左犯了方向、路线错误；

3、“工总”问题；

4、总结静坐的成绩和教训；

5、如何摧毁保守组织；

6、如何下厂、下乡宣传，争取工人、农民的支持等问题。

5 月 10 日，广西大学“支韦派”组织“能闯万重关野战军”成立，简称西大“能闯”。5 月 11 日，“支韦派”工人、学生、机关干部主要造反组织的头头开会，决定成立“南宁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指挥部”，设常委 15 人，总指挥是“汽司”头头，副总指挥是广西大学“能闯”头头。

5 月 12 日，伍晋南、贺希明、霍泛自北京向广西南宁发来电报：《关于“工总”问题的声明》。电报说：“工总”是一支工人阶级的革命队伍。“他们和革命小将并肩作战，取得了伟大胜利”，“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砸烂‘工总’是他们恶毒阴谋的一个组成部分”，“我们欢呼‘工总’的诞生”等。

5 月 15 日，广西“支伍派”学生千余人又在《广西日报》门前召开“彻底清算《广西日报》的滔天罪行大会”，再次强行冲击报社。对此，报社军管小组发表第三号《严正声明》。

17 日，广西“422 汇报团”的章英、刘德胜在北京西苑旅社向中央文革广西记者站记者王荔汇报《广西日报》问题，并提出要夺《广西日报》的权，请王荔指导。

王荔说：“不要夺权背包袱，你让他军管会掌权，出了问题，当活靶子打，他们可以组织队伍送版面小组，七、八天冲一次，也可组织人写文章批判，这多主动。”

5月22、23日，广西大学“革联”、医学院“闯”等1200多名“支伍派”学生，连续两天晚上强行冲入广西军区院内贴大字报和标语，主要是：“打倒韦国清，揪出徐其海！”“与拿枪的刘、邓路线决一死战！”“军区支左犯了方向路线错误！”等。

5 月 25 日上午 10 时，“广西红总”、“南宁八·三一”、“红卫兵联络站”、“新工总”“区、市直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等“422”的“支伍派”组织万余人召开“抗议《广西日报》军管小组对抗中央文革指示罪行大会”，会后游行。

11 时 50 分，游行队伍将《广西日报》社重重包围，200 余人护送报社的版面小组强行冲入报社，占领办公大楼，并封锁报社前、后门，宣布对报社实行“兵管”。

12 时 25 分，冲进报社的人派出代表与军管小组谈判，提出：

1、军管小组负责人石勇、杨仲绪等必须滚蛋；

2、版面小组必须由我革命造反派组成，保守派靠边站；

3、报纸只准登造反派的文章，保守派文章一律不准登；

4、《广西日报》3 月 30 日评论员文章必须在报纸上开展批判。

5 月 25 日当天，“支韦派”群众组织声称要“维护军管，保卫《广西日报》”，在自治区人委大楼成立“五二五革命行动指挥部”，简称“525 指挥部”，后改为“广西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指挥部”，简称“广西联指”，与“422”相对抗。

下午 18 时左右，“525 指挥部”数百人冲进《广西日报》，与“422”派进行辩论，要求他们立即撤离。辩论时，“525”动手强拉“422”出去。于是，辩论发展为武斗，双方以石块、木棒为武器，展开激烈的战斗。晚上 20 时后，双方前来增援者已多达五、六千人，他们从报社大楼、大院一直打到院外，直到第二天凌晨，武斗才停息。在此期间，广西军区派出 7 辆宣传车，呼吁双方停止武斗，但无人理睬，最后只能派出救护车抢救伤员。

第二天早上 7 时，“525 指挥部”千余人高呼“坚决保卫军管的《广西日报》!”“必须保证报纸的正常出版!”等口号，从报社后门冲入报社，将包围在电台、印刷厂的“422”人员强行赶走。双方在争夺办公大楼时再次发生大规模武斗，一直打到下午 16 时，直到暴雨忽至才暂时休战。双方各有百余人受伤。

当晚 19 时，“525 指挥部”人员主动撤离，“422”再度开进报社，占领电台、印刷厂和办公大楼。

5 月 27 日上午 10 时，“422 火线指挥部”宣布对《广西日报》夺权。

下午，占领报社的“422”动员报社职工支持他们办报。“422”指挥部又从民印厂找来一些人修理印刷机器。

当晚，军管小组发表第四号《声明》。

晚上，伍晋南、贺希明、霍泛从北京发来支持“525”行动的电报，谢王岗到报社看了机器设备情况。报社分工何家松任总管，并由龙延驹、张俊秋、张靖邦三人组成报社管理小组。

28 日，“422”在当天出版的报纸上发表夺权《声明》、《给毛主席致敬电》及批判《广西日报》等文章。对此，《广西日报》军管小组发表第五号《声明》，宣布“422 火线指挥部”出版的报纸是非法的。

5 月 29 日，南宁警备区司令部、政治部发出《致“新工总”、“倒海翻江”某些负责人的忠告、警告书》。同日，“525 指挥部”发表第一号《通令》，勒令“422 火线指挥部”在 30 日凌晨 5 时撤离报社，否则采取“革命行动”。

5 月 30 日凌晨 5 时，支持“422”派的 70 名领导干部，为发表在《广西日报》上的南宁警备区司令部、政治部《致“新工总”、“倒海翻江”等负责人的忠告、警告书》给中央文革发电报，指责“党政军一小撮走资派”挑起武斗。

5 时 30 分左右，“525 指挥部”调集队伍，对《广西日报》社进行反夺权，大规模武斗再度爆发。

## 第 666 回：闹京西，“四二二”京西静坐　六月一，首次接见桂代表

就在南宁为《广西日报》打得不可开交的时候，正在北京的“422”代表也不闲着。5 月中旬，中央文革广西记者站记者王荔对广西“422”代表团的刘德胜说：“中央原来以为韦国清问题简单，准备保韦国清的，看了你们的材料后，感到他有蛮多问题，不一定保了，主要看造反派的态度了。”

刘德胜将王荔的意思告诉代表团后，大家认为“要给毛主席、林彪、中央文革写信，把韦国清的严重问题讲清楚，”并表示坚决打韦的态度。信写好后由刘德胜交给王荔。

5 月 23 日晚饭后，王荔来到北京西苑旅社二号楼对“422”代表团的刘德胜说：“去军管的京西宾馆揪韦国清，你们现在闲的没事干了，要找点事干，不要太规矩……韦国清对南宁西苑旅社每条标语都知道，他并不闲着，不要让他太舒服了。”

又说：“武汉‘二司’在 4 月到京西宾馆把陈再道揪了出来，当然，最好是找到宾馆内部的人配合，就更容易揪到了。”

晚上，刘德胜在“422”代表团会上说：“韦国清对我们每条标语都懂，还在管广西，应当去找他，我们可以组织上访人员到京西宾馆去静坐，要求韦国清出来接见，扩大影响，促使中央知道广西问题严重，早日接见，听取我们的汇报。”

代表团同意了刘德胜的意见。曾春生还说：“我们已派人去侦察韦国清的住处了。”

5 月 25 日中午，在北京西苑旅社二号楼前，王荔问刘德胜："去揪韦的事怎么样了？"

刘德胜说："上午，勤务组开了会，下午要开代表团会议。"

王荔说："抓紧点，戚本禹讲过，广西造反派打韦国清不要受什么约束。"王荔还告诉刘德胜，韦国清住在京西宾馆五楼。

下午，曾春生主持召开"422"代表团全体成员会议，讨论决定晚上行动，并成立了阵地勤务组，盛国福总负责，李日明、何作然，盛国福、白鉴平、李朝杰五人为勤务组员。

会议决定后，刘德胜到王荔房间向王荔汇报，王荔说："你们先去，我马上向中央反映，说你们去揪韦国清了，看看中央的态度怎样。你们去后，等一会我也去现场看看。你们可以在会议室接待站静坐，不要堵大门，在外面搞宣传，把锣鼓打响点，这样时间可搞得长，比较主动。韦国清如不出来，中央就好说话了。"他还说："这次行动应当取得北京红代会的支持。"

刘德胜将王荔的这些话向曾春生做了转达。

这天上午，广西"422"赴京汇报团的朱仁、曹东风也动员广西赴京汇报团成员说："这次冲击京西宾馆揪斗韦国清，是关系到'422'命运的问题，关系到第五个回合胜负的大问题，我们必须立即采取行动。"

会后决定，由秦向群担任冲击京西宾馆的队长，陈镇西、李仙严为副队长。下设四个冲击连：第一连是学生红卫兵，由他们打先锋，连长为李仙严；第二连由"工总"、"南宁市直革联"组成，连长李广；三、四连由各专、县人员组成。

当晚 20 时左右，广西"422"代表团、汇报团人员统一行动。

由秦尚群用广播和口哨进行指挥，与陈镇西、李仙严，李广等人带头冲击京西宾馆，并在京西宾馆楼下静坐。

中央文革记者站记者王荔、罗安民来到京西宾馆静坐现场，并指着韦国清住的房间窗户对“422”说：“那就是韦国清住的房间。”

静坐队伍又来到韦国清居住房间的窗口下喧闹。

26 日凌晨一、二点钟，两个解放军来到京西宾馆，向广西“422”代表团的何作然，盛国福传达中央文革两点指示：

1、韦国清同志是中央请来商量工作的，不能揪，你们有什么问题可找中央解决。

2、京西宾馆是军管单位，不能冲击，你们应当守纪律，把队伍撤回去。

何作然、盛国福说这两点指示是假的，顶了回去。刘德胜则赶回旅社问王荔，是否中央文革有这样的指示？

王荔说，可能是京西宾馆搞的，如是中央文革的指示，他为什么不知道等。这样，他们又继续静坐，直到 5 月 30 日晚上，中央文革两个解放军来同何作然、盛国富接洽说：“中央文革、中央首长马上要见你们。”并派汽车把静坐的人员接回西苑旅社，他们才撤回。广西“422”在京西宾馆共静坐四天五夜。

6 月 1 日晚，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第一次接见广西两派代表。当晚 20 时 55 分，韦国清身穿军装和广州军区陈发洪副政委以及广西军区李仕才、徐其海、王希永等人一起来到接见的会场。

22 时正，周恩来、陈伯达、康生、肖华、王力、汪东兴等人进入接见会场。

周恩来首先说："你们到北京很久了，因为我们工作很忙，没有及时的接见你们。今天在座的有区党委负责同志、广州军区负责同志、广西军区的负责同志以及你们两派代表。我们今天主要是听两派代表的意见，以后还听军区的意见。"

两派代表李日明、龙智铭及赵承先抢先站起来发言……

康生说："你们坐下，先听总理讲话。"

周恩来说："你们双方都谈一谈。"

"422"的水电厅设计院"火种"代表龙智铭说："我要向总理控诉……"

周恩来讲："今天不是控诉会，而是听听你们的意见，摆事实讲道理嘛！毛主席说：右派的话，我们也要听嘛！犯了严重错误的人，我们还让他参加会，四川就是这样，比你们广西严重得多，两方面的意见都要听，你们要平心静气地摆事实讲道理，你们写的材料有的已经看了。"

康生："今天开这个会，要摆事实，讲道理，大家都来到毛主席居住的地方，祖国的心脏首都北京，这是一。第二，你们不习惯到中央来开会，与在下面打内战不一样。中央是要调查各方面的意见，哪方面的意见都要听，光听单方面的还不好，然后中央再研究。总理说了要平心静气摆事实讲道理，不要口号式的。同志们要控诉，你们的心情我们是理解的。第三，一方讲话时，另一方不要喊口号，不要吵起来，不要打断讲话，以免拖延时间，按总理刚才讲的办，大家同意不同意？"

众人齐声说："同意！"

周恩来说："学生方面先讲吧。"

这时，桂林“老多”代表李日明说：“我们外面还有首都红代会的人，他们要求进来，请首长一起接见。”

周恩来：“我已同他们说过，不用来了，给他们写书面材料送来就可以了。你们广西文化革命已搞一年了，你们自己可以解决自己的问题，不要进来了嘛！”

李日明接着说：“南宁‘525 事件’是韦国清、徐其海之流一手操纵，利用保守组织挑起的……”

周恩来：“525 韦国清同志还在北京嘛！”

龙智铭：“他可以遥控。韦国清、徐其海以高工分煽动农民进城搞武斗，挑动群众围攻广西大学，围攻造反的领导干部伍晋南，希望首长密切注意南宁问题，最好派人去了解。”

接着，龙智铭谈了他们进驻《广西日报》静坐的原因，还说：“4 月 27 日，我们进报社，军管小组还诬蔑说我们降国旗，现在有照片，请首长看。”

他将大幅照片递给康生。

康生拿过照片问道：“是谁照的？”

龙智铭：“是我们照的。”

康生继续问：“是怎样照的？”

龙智铭：“我们进去照的。”

康生：“你们哪里来那么多钱？”

在此之前，桂林“老多”曾在汇报中说他们组织穷得没有钱买纸，只好把大字报写在地上。龙智铭不知其故，继续回答：“我们有好几部照相机……”然后，他将警备司令部给“工总”、“倒海翻江”的忠告、警告书和造反派出版的《广西日报》交给周恩

来说："我们要求中央注意广西武斗问题，要求命令徐其海制止武斗。"

接着，"红卫兵总部"、"一司"、"工总"的代表相继发言。

周恩来对"联指"代表说："现在你们谈一谈。"

"联指"代表赵承先发言说："三月黑风的后台就是伍、贺、霍……"并揭发伍晋南是个漏网大右派。他们送上伍晋南 1957 年 5 月在全省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给康生,并汇报贺希明历史有问题，霍泛是假党员，大叛徒。霍泛是 1936 年在北平监狱里参加的中国共产党，他听赵承先说自己是假党员、叛徒，莫名其妙，呆若木鸡。

在"联指"的几名代表发言后，柳州"职工总部"代表明在胜发言说："55 军副军长到处游说，说毛主席曾讲过韦国清是好同志，好党员，而且还说康生同志、江青同志都讲过，要求首长澄清……"

康生说："我插一句，这句话我是讲了的，我是讲了的。"

这时，周恩来翻阅代表名单，问："'八八总部'有个雷激是吗？来了没有？"

"八·八"红卫兵雷激站起来回答："来了。"

周恩来："'兵管'、'兵训'是不是你们搞的？有没有这回事？"

雷激连忙否认说："没有，没有。"

周恩来问："是谁搞的？"

"422"代表何作然说："是我们自己搞起来的，是红卫兵自己管自己，自己训练自己……"

“联指”代表廖伟雄：“他们撒谎。他们先在西大‘兵训’，而后到外单位去实行‘兵管’，区党委宣传部调查研究室、市委都去‘兵管’了。《广西日报》是军管单位，他们也去实行‘兵管’了。在调查研究室那里还贴上‘兵管单位，不许串连，不许冲击’的标语。”

“联指”代表冯东晓说：“他们派了 200 多人进驻市委，并要夺权……”

雷激：“我们没拿公章。”

陈伯达笑着说：“拿公章有什么用？”

“联指”代表冯东晓：“他们除住办公室外，还住走资派袁家柯家里，并说：谁反对‘兵管’就是反革命。我们反对他们‘兵管’，把他们的行李甩出去，把人也推出去。”

周恩来笑着问：“发生武斗啦？”

冯东晓：“我们把他们推出去，后来他们又来了，我们跟他们说理，他们硬赖着不走，现在还有几十人。”

周恩来问“422”代表：“有这回事吧？”

“422”代表未予否认。他们的代表李朝杰说：“‘兵管’是我们下面的战士提出来的，主要是红卫兵进驻，任务在于支持和发动造反派，因为造反派受压的厉害。”

周恩来问：“有没有‘兵管委员会’？”

答：“没有。”

雷激：“我谈一下‘兵管’的来源。‘兵管’是广西大学在 4 月 29 日被走资派挑动上万不明真相的农民和保守组织围攻时，‘革联’战士们为自卫防御而提出的，我们到别单位并不夺权，

除了住，我们什么权也没有夺，怎么能说是对抗‘军管’呢？”

“联指”刘谓隆：“他们在中央首长面前撒谎！”

“422”反击“联指”刘谓隆：“他不是代表！”

白舰平：“‘兵管’‘兵训’柳州也有，是和军管对顶的。因为他支保不支左。”

“联指”代表送给周恩来一份桂剧团“四·二七独立师”《兵管第一号通令》，周恩来边看边问“422”代表：“是你们这一派的吗？”

何作然：“我们没有这个组织。”

周恩来又转向“联指”代表：“是你们的吧？”

“联指”代表：“我们根本不搞这个。”

周恩来笑着说：“不管是那一派的，反正有这回事吧！”

柳州“职工总部”代表明在胜：“柳州分区、驻军支右不支左，因此我们也搞了个支左办公室。”

康生用拳头对一下，给周恩来做手势，表示是与军队对立的。

接见一直持续到 2 日凌晨 2 时 5 分，周恩来说：“你们双方的观点基本都讲了，送来的材料我们也看过了。今天先谈到这里，我们还要找军区的同志谈，散会。”

6 月 1 日至 12 日，广西两派在广西军区大院附近多次举行声讨和声援南宁警备司令部的集会。“422”组织大批人员，6 次冲击军区大院。在军区大院内贴大字报，涂写标语，提出改组《广西日报》军管小组，撤销南宁警备司令部的《警告书》，为“工总”平反等 7 点要求，并四次封闭军区支左办的群众接待站。他们在军区大门口和院内集会、游行、演讲，表演丑化解放军和韦

国清的节目等。

6 月 2 日这天，南宁警备区司令部、政治部又发出一份《致“四·二二”火线指挥部的通告书》。

6 月 4 日晚 12 时 30 分，广州军区司令员黄永胜对广西军区指示：“要稳住阵脚，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不开枪，要文斗。”

## 第 667 回：互不让，涪陵两派争斗急　聂元梓，正式向潘、吴开战

4 月下旬，四川涪陵在“二月镇反”中被抓进去的人也开始陆续放了出来。先放的是学生和教师，开始是要他们承认错误并做出保证。后来从北京传来有关“二月逆流”的消息，于是涪陵的大字报开始对“二月镇反”提出置疑，说镇反中有的人抓错了，打击了革命力量，使运动出现冷冷清清的局面，应该纠正。学生组织“红卫总部”和“红卫兵总部”宣布恢复，回到镇反前的地方。

形势开始对涪陵“贸派”不利，他们且战且退，承认对个别人可能不抓为好，但坚持镇反的大方向是正确的，坚持认为当时有一小撮反革命分子在兴风作浪，搞打砸抢，他们保卫的是文化大革命的大联合成果。

而被“镇反”这边则穷追不放，越斗越勇。当上面来的消息将“二月镇反”与“二月逆流”联系起来后，当释放的人更多时，当外地大城市提出“全盘否定‘二月镇反’”的口号，这边也紧跟着喊出这个口号，同时结合当地形势，提出“211 事件是正确的”，“211 红旗永飘扬”……

“贸派”自然全力反驳，两派斗争更趋激烈。

在形势的鼓舞下，涪陵的“红卫总部”和“红卫兵总部”决定联合组建为一个司令部，名字与对方针锋相对，“贸派”的学生红卫兵叫“毛主席的红卫兵”，这边加了 3 个字，叫“毛主席

最忠实的红卫兵”。

“毛主席最忠实的红卫兵”，名称委实太长了，于是这派自己简称为“忠实兵”，叫对方为“二月兵”、“复辟兵”。对方则反唇相讥，叫他们为“终死兵”、“该死兵”。相互谩骂开了，这边对“贸派”的大本营“红贸总部”，叫“麻贸”，其头目赵树金，被叫作：“赵鼠精”、“耗子精”……

仅仅对“二月兵”、“贸派”及赵树金发起进攻已经不够了，“忠实兵”要把矛头对着他们的后台，涪陵军分区司令员刘少堂，一位 20 年代后期就参加革命的老红军，说他一直支持赵树金的“红贸总部”，指挥了当地的“二月镇反”。大字报点了他的名，但有意避开他在部队的职务，不说他是军分区司令员，而说他是地委的常委，把“黑地委的黑常委”放在他身上，说是“黑地委的阴魂不散”，搞镇反，搞复辟，镇压群众。

这些都不是中学生想出来的策略，而是他们这派的机关干部想出来的，他们自然是比中学生们老谋深算得多。

5 月 7 日，中央关于四川问题的决定下达了，“忠实兵”用大纸抄了出来，贴在文化馆和五金公司外面大街上，并立即组织敲锣打鼓，上街游行，将中央文件印成传单，满街散发，热闹非凡。

涪陵赴京的 5 人于 5 月 14 日回到涪陵。他们在荔枝园长航码头上岸之后受到热烈欢迎，被戴上大红花，由“忠实兵”们和这派的群众组织的欢迎队伍夹道欢迎，然后被满怀激情的人们高呼口号簇拥着回到城里。

当天“贸派”也组织了“欢迎”，他们做的是花圈，拉了横

幅“欢迎死者归来”。

两派争斗逐次升级，大字报这种形式开始落伍，因为费了心力写出来的大字报，很快就被对方撕毁，或在上面胡乱涂写。

街头游行多了起来，宣传车已不够解气，双方各自安装了固定的高音喇叭，吵得不亦乐乎。

涪陵军分区转弯很难，他们不愿承认“二月镇反”的错误，司令员刘少堂在大会上公开说：“抓的对，放得也对；抓是按军委《八条》，放是按军委《十条》。”“贸派”称，抓去的人大多数是五类分子和打砸抢分子。他们还用了一个比喻，称：被抓的人不是没问题，而是问题很大却得到的宽大处理，是“肥猪不够秤”，因为肥猪如果够秤了，就该杀。

“忠实兵”则还以口号：“红十条就是好，敌人反对我们保！”，领呼口号的人喊“赵树金的狗头——”，大队伍就集体喊“砸烂！砸烂！坚决砸烂！”

5 月 27 日中午稍过，一拨又一拨的游行队伍在市中心的文化馆前来来往往，口号声此起彼伏。“忠实兵”数人在涪陵县文化馆其总部门前的露天舞台上教唱自编歌曲《活捉耗子精》。“耗子精”就是影射“贸派”头头赵树金。

文化馆台子的对面是涪陵县商业局，“红贸军涪陵县商业分部”就在里面。于是，在台上宣传的人和台子对面的人发生言语纠纷，“红贸军”一位常委向赵树金汇报说，“忠实兵”在打县分部，并请示他：“怎么办？”

赵树金当机立断：“调人去援救！”

于是“红贸军”近 600 人，包围并要冲进“忠实兵”司令部

所在的文化馆。两方的高音喇叭都在高声呼喊，一派说有人被打了，要严惩打人者；一派声称对方冲击总部，要搞打砸抢。文化馆前的人越聚越多。快到傍晚时，“忠实兵”决定转移一批人到旁边的土产公司去，于是约有 100 多人在院里集合好，然后拥挤着从对方人堆中挤出去。途中有的人鞋子挤掉了，也挨了一些口水和拳头，他们也顾不得这些，终于冲过去了。当他们来到土产公司与同伴会师时，激动得相互拥抱，大家将大门关上，用许多桌子挡在后面……

这时街上黑压压的全是“贸派”人员，“忠实兵”再也无法冲进冲出了，他们被分割在两边。“贸派”人员多次向文化馆和土产公司发起冲击，土产公司的大门内加了 10 多张桌子堵得很严实，“贸派”冲了几次无结果，就重点冲文化馆。

被围在文化馆的全都是学生。文化馆大门早已无法关闭，只见“忠实兵”的学生手挽着手，排成五六行“人墙”，横堵住大门。汹涌的人浪向“人墙”冲去，“人墙”弯曲又恢复，恢复又弯曲。双方都不停地喊口号，可谓声嘶力竭……就这样，从晚上 19 时到 22 时多，反复较量着。好在双方都有底线，未动用器具。

争斗中，两边又都唱起歌来，“忠实兵”唱：“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还有毛泽东的《西江月 井冈山》，其中“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自然激励斗志，大家的情感都融进歌曲中去，不少学生流下热泪。还有就是文革中广为流传的歌，各派都唱，凡受压时尤其喜欢的：“远飞的大雁，请你快快飞，捎个信儿到北京，忠实兵战士想念亲人毛主席！”后面那句的主语是因人而异的。

“贸派”也毫不示弱，他们唱得最多的是毛主席语录歌“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也唱“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双方歌声、喊声、口号声、鼓掌声……混成一片。

文化馆的高墙上，“忠实兵”不时拉出大标语：“我们想念毛主席！”、“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打倒赵树金，打倒黑联司”等等，对方几次搭起人墙想去扯它，终因墙高而无果。

22 点多钟，有人说赵树金到现场了，一时口号声更响了……

午夜后，双方都感到疲惫不堪，场面稍显平静，但隔段时间还会出现小的轰闹。

天放明了，双方又打起精神冲撞起来，不过均已成强弩之末，谁也压不倒谁。正在这时，从东边传来响亮的口号声，一支大队伍过来了，那是“忠实兵”这派的“二七兵团”、“工人造反兵团”声援来了，街道两边一片欢腾，“贸派”见状，也就缓缓退去，被困的“忠实兵”冲出来，与工人队伍会合，一时忘记了疲劳，跟着游行一圈。

涪陵“527”之后，对于“忠实派”来说，是最困难的时段。因为他们的屡战屡败，以至于在“忠实兵”内部有人提出要把“忠实兵”司令部“化整为零”，遭到罗成胜和农机校的“忠实兵”负责人王世君的坚决反对。为了打破困局，他们决定除了留下一些主要负责人在涪陵坚持战斗外，派出“忠实派”的相当部分的主要负责人和在武斗中受伤的人员到成都向军区和省革筹反映涪陵的情况以争取上级的支持，于是由“政法公社”负责人、赴

京参加解决四川问题会议的涪陵五人代表之一的马泽林，“海陵兵团”负责人、赴京参加解决四川问题会议的涪陵五人代表之一的李林森等领头赴蓉，罗成胜则留在涪陵坚守。

“忠实兵”到成都告状的路费都由自己承担。他们乘船到重庆后改乘火车。

他们没有想到重庆火车站是如此的混乱：到处是乘车的人，但没人售票，没人验票，他们挤进一列标有重庆—成都的火车，车厢内外全是人，但是，车却迟迟不开。憋了几个钟头后，听说是另一列车，又随人流挤上去，如此挤上挤下反复好几次，竟在车厢里过了两天两夜。

重庆的“砸派”用宣传车在车站发表声明，说是有人故意不发车，嫁祸造反派，不点名地指向重庆警备区。

第三天开始检票，部队协助铁路局将进站的人清理出站买票再进来，赶出去不少人，但许多人仍东躲西藏坚持不走，涪陵这些告状的坐在车上，很多都是在两派争执中被打伤的，推说受伤走不动，没有下车……

看来，要全部清理进了站的人难度太大，中午时分，终于将外面的人检票放进站并发车了，车厢内挤得水泄不通，充满了汗臭等怪味，厕所里都站有五、六个人，根本无法使用。其状况与大串联时无异。

成都车站上有人举着牌子迎接涪陵的人，将他们带到四川冶金招待所，那里是“忠实兵”在成都的大本营，对外称联络站。次日，他们和成都“红成”驻涪陵联络站的几个大学生座谈。这几个大学生与“忠实兵”的头头在“二月镇反”前后就是亲密战

友，曾与“首都三司”、重庆“815”联络站一起，支持涪陵的夺权。在随后的大联合中，他们又与赵树金的“红贸总部”反目，鼓动与“贸派”作对，导致 2 月 11 日砸“红贸总部”事件，最后一起被“贸派”当作猪一般用“响筒”撵出涪陵……

“红成”的人说，赵树金的确是机关干部中最早一批起来造反的，但在夺权后的大联合中，暴露了野心，作风太横蛮，自以为是，把其他的人当作阿斗，所以坚决要砸他的总部。但是，“红成”总部最近不大听取他们的意见，在涪陵问题上准备支持赵树金，理由是他是造反的，二月的事他支持军队，责任不大。“贸派”也在积极活动，拉拢“红成”和重庆 815 的总部，现在“红成”内部还有争论，所以要相互配合，再加努力……

6 月 3 日，涪陵以“红贸军总部”、涪陵县“工交总部”、涪陵专（区）“工交总部”为核心正式成立“红色造反者涪陵革命造反联合司令部”，简称“红联司”，率先将所有的“贸派”观点的组织联合在一起。

这时，北京大学开始调查学部潘梓年、吴传启的问题。

本来，在“4.8 民族宫事件”和“4.11”地院宣传车到北大示威的事件中，清华“井冈山”和北航“红旗”都是倾向或支持地院“东方红”的，当时蒯大富和聂元梓之间的关系很僵。后来蒯大富发现林杰支持清华“414”，便想向北大靠拢。在 1 月 19 日高教部夺权时，代表清华“井冈山”宣布中立，退出高教部夺权的清华学生工程化学系二年级胡宗华。他在民族学院 2 月 22 日的辩论会上曾发表讲话，说民院支持地院“东方红”的“红卫兵造反总部”和“大叛徒卢正义坐在一条板凳上，当你在人民烈

士纪念碑前，当你想到无数革命先烈时，你们不感到可耻吗！”当时即被民院“红卫兵造反总部”的韦青峰等人冲上台去按住胡宗华的头坐飞机被批斗，并要送往公安部。但是当汽车开出校门后，并没有向南去公安部，而是向北，走了不远，就把胡宗华放到马路上了。因此，胡宗华和民院“红卫兵造反总部”的对立面，“红卫兵总部抗大公社”的头头郑仲宾关系很好。于是，蒯大富托民族学院的郑仲宾向聂元梓捎话示好。

5 月中旬，清华“井冈山”、北航“红旗”、“新北大公社”等十几个组织在清华开会，分析北京高校两派斗争形势。北大提出北京大专院校两大派的主要分歧在学部，焦点在潘梓年、吴传启两人身上。“新北大”的“除隐患”战斗队先后整理了 45 份材料，除其中一份是讲高干子弟的问题外，其余都是关于王力、关锋、戚本禹和吴传启、林杰的。他们拿着周恩来 4 月 3 日给孙蓬一写的指示复印件，到武汉档案馆，秘密调查吴传启。档案馆的人员见到他们出示的周恩来亲笔指示复印件，没有马上表态，让北大人员先回旅馆。随后他们请示了总理办公室，得到肯定。第二天，在北大校文革的介绍信上加盖公章。“除隐患”战斗队在武汉档案馆经多日查找，找到吴传启的国民党党证号码，证实吴传启曾是国民党员，并把他的国民党党证号码拍照下来。1967 年 5 月，北京大学联合北京高校中的“北大派”，正式向“潘、吴”开战。他们先从潘梓年的问题开始，因为潘梓年是潘汉年的哥哥，好搞。

关于潘梓年的材料，由 1926 年入党的北大哲学系教授冯定证明，1926 年组织上曾通知潘梓年参加他们的小组生活，证明

潘梓年当时已是党员。但是 1927 年国民党“清共”后，对共产党人实施大屠杀，潘梓年却发表了大量吹捧蒋介石、辱骂共产党的文章，说明在政治上他已经叛党。这是第一批材料。

在 5 月份大批判中，批判刘少奇吹捧“武训传”时，又收到一封匿名信，说潘梓年在什么时候，在什么杂志上发表过吹捧武训的文章。北大“除隐患战斗队”从图书馆一查，果真如此。这是第二批材料。

第三批材料则是潘梓年在 1933 年组织上叛党。

吴传启的主要问题是说他“组成一个集团攻击周总理，到处夺权，控制北京市委，《北京日报》，抢劫档案。”

这几天，“新北大公社红旗兵团”也紧锣密鼓地进行活动，准备取消校文革，建立革委会。5 月 26 日下午，“新北大公社红旗兵团”与聂元梓座谈，晚上又谈至深夜。27 日上午他们又接着商量，中午再次与聂元梓、孙蓬一座谈。聂元梓的态度比较坚决，而孙蓬一却有些顾虑和畏惧。

5 月 27 日中午，聂元梓接到电话，要她在下午两点前到钓鱼台，陈伯达、关锋、戚本禹找她谈话。

## 第 668 回：揪谷牧，中南海外搭帐篷　西门外，又成立“揪刘火线”

5 月 27 日，聂元梓来到钓鱼台，陈伯达对她说：“我们是受江青委托和你谈话的。江青同志本来是要来的，她身体不好，还有别的事情，不能来了。你是有水平的。你是市革委会副主任，又是红代会的，北大文化革命委员会主任。以后有许多事情需要你和我们共同来做。我们非常希望和你合作。你写的大字报和你在北大校文革的行动，为文化大革命立下了汗马功劳，希望以后好好地合作。”陈伯达不赞成聂元梓他们反对吴传启，并且说：“更不要把我们和他联系起来。陶铸反关锋就是从反吴传启开始的。”

聂元梓说：“就是吴传启在搞两大派，到处伸手，制造分裂。清华、北航直到 5 月中旬才开串联会搞吴传启。”

关锋插话：“真的那么晚吗？”接着又说：“吴传启已经不在了。你知道吗？两大派你要负责。”“你要揪出一个大后台，要叫大家吓一跳。”

聂元梓说：“这都是谣言。”

关锋批评说：“你态度不好。”

聂元梓没再说话。

接着又谈到谭震林的问题。关锋说：“你们要揪出揪谭震林的后台，如果是那样，我们就奉陪。你们还要保余秋里，提醒你们，不要再犯错误，再犯大错误就可能爬不起来了。”

聂元梓辩解说："这些情况是别人谎报的，不是真的"

戚本禹："你也有问题，但我们计较了吗？你还说什么 6 月要血洗北京城。"

聂元梓登时急了，指着陈伯达的鼻子说："你们听了满耳的谣言，根本违背事实真相，今天你们说的这些，我要追查，看是谁给我造谣……"没等她说完，关锋、戚本禹就走开了，只留下陈伯达。聂元梓见状，也起身走了。

吴传启哪里去了？原来，自 1967 年初，吴传启、林聿时掌控的学部"联队"组织，将他们的对立面，学部"总队"打垮了，暂时实现了在学部的"一统天下"。紧接着，他们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和《红旗》杂志发表了大量批判刘少奇的文章，出尽了风头。

不过，"联队"中对吴传启、林聿时二人不满的人也越来越多。1967 年 4 月初，历史研究所的傅崇兰联合近代史研究所张德信、张海鹏，外国文学所吴元迈，经济所吴敬琏、黄范章，宗教所金易九、黄心川以及其他所对吴传启、林聿时不满的部分人，决心拉出队伍同吴传启、林聿时对着干。他们在正式向吴传启、林聿时发难前，利用与戚本禹的关系，给戚本禹写了一份报告，说明吴传启、林聿时的问题和他们不得已向吴传启、林聿时发难的苦衷，希望戚本禹能支持他们的行动。

报告送上去以后，他们立即给戚本禹的秘书李斌打电话，要他尽快将他们的报告让戚本禹看到并表态。李斌说他已经将他们的报告放在送阅文件报告的第一份，戚本禹第一眼就能看到。第二天，他们再打电话给李斌，李斌说："戚已经看到了，但脸色

很难看，没有在你们的报告上批一个字。”

对戚本禹的态度，傅崇兰他们认为，是因为戚本禹与关锋关系很好，而吴传启、林聿时又是关峰执意支持的。关峰也知道戚本禹一直支持傅崇兰他们。傅崇兰他们向吴传启、林聿时发难，关峰可能会怀疑是戚本禹背后支持的，他们的行动让戚本禹很为难。在这种情况下，戚本禹不明确表态反对，他们就可以干了。就这样，与吴传启、林聿时分裂而产生的另一个山头出现了。

被打垮的学部“总队”看到“联队”中有人起来反对吴传启、林聿时，也趁机再起，恢复活动。由于“总队”是一直反吴传启、林聿时的，傅崇兰他们与“总队”之间的斗争自然也就停止了。但两派并没有实现联合，原因一是“总队”此时对傅崇兰他们存有戒心，二是傅崇兰他们也觉得“总队”是“老保”，自己是响当当的造反派，羞于与他们为伍。至此，学部也分成了三派。

傅崇兰他们的突破口也选在潘梓年身上。一是因为他是学部的一号人物，在学部的副主任中，潘梓年级别最高，行政六级，一级研究员，排名仅在郭沫若之下。打倒潘梓年，影响大。二是因为潘梓年是吴传启、林聿时的牌位，打倒他，吴传启、林聿时就摆脱不了干系。三是潘梓年有叛徒的问题。他坐过国民党的监狱，据社会上传来的一些材料，他是叛徒的可能性很大。当时全国正形成一个抓叛徒的热潮，听说北京大学的聂元梓的“公社”派宣称他们有打倒潘梓年的过硬材料，还组织了一个“潘梓年专案组”。于是他们通过各种关系与北大沟通，终于把北大聂元梓他们掌握的材料弄到手了。接着就在学部召开了声势浩大的揭露批判潘梓年的大会，在会上详细介绍了潘梓年的叛变材料。

这次大会后，吴传启、林聿时并没有组织大规模的反击，只是在他们的骨干分子小范围内，由白钢介绍了潘梓年的有关情况，结论是：他不是叛徒。

不过，吴传启、林聿时在社会上的影响，还是引起中央高层的注意，关锋他们并没有大张旗鼓地为潘梓年辩护，也没有对傅崇兰他们的“反叛”进行猛烈反击。潘梓年、吴传启很快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了，他们是按照关锋的指示,跑到外地了。所以此时，关峰对聂元梓说：“吴传启已经不在了。”

5 月下旬的一天，聂元梓来到北京航空学院，北航“红旗”的一、二把手韩爱晶和井岗山听到后，赶紧出去，把聂元梓接到学校主南三楼学院革委会会议室。

聂元梓坐下后，向韩爱晶等人诉说在北京市革委会遭受排挤的事情。她说：“我们是虚设的，有名无实，办公室连把椅子都没有……”

韩爱晶似乎也动气了，说：“我的感觉是，有你没你，没人过问，你不去似乎人家更舒服。我负责组织组，底下的班子怎么确定的，我一点也不晓得，还不是空架子。”

聂元梓说：“我们不但是虚设，而且他们还收集我们的材料，整我们……”“学部来的人不怀好意，搞个动态组，整北大、清华、北航的材料。”

聂元梓很伤心，说着就流泪了。

聂元梓的哭诉，引起韩爱晶的同情和对周景芳等人的愤慨。他和井岗山安慰了聂元梓几句，要她不必在意，说：“我们拥护谢富治领导，但是如果有人在市革委会瞎搞我们也不怕。至于潘

梓年、吴传启这些人，如果确有历史问题，我们坚决和他们斗。”

在场众人也七嘴八舌，纷纷附和韩爱晶。

聂元梓还将北京市革委会工作人员给她的一份揭发北京市革委会整造反派、聂元梓黑材料的资料交给韩爱晶。

5 月 30 日，北航《红旗》报发表“红旗观察员”文章：《〈北京日报〉近来在为谁说话？》这篇文章中说：“我们要问：《北京日报》到底掌握在谁手里？是谁把黑手伸进了《北京日报》？是谁炮制了这一系列与毛主席和党中央相对抗的大毒草？为什么《北京日报》在这场文艺大批判中一反常态？为什么他们现在到处制造思想混乱？我们首都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革命人民，不可以不过问，不可以不深思。我们必须密切注视《北京日报》的动向。”

6 月 1 日，北大“除隐患战斗队”公布了关于吴传启历史问题的第一批材料。

这天，王力、关锋、戚本禹在接见中宣部工作人员时，戚本禹说：“北京市现在搞两大派。”

王力插话：“互相搞一些不知是哪里来的东西，根据那些东西来确定方针政策”

关锋说：“靠谣言确定自己的行动，就会迷失方向。”

戚本禹：“北京市现在两派斗争明显不是掌握大方向的斗争，不是搞大是大非。最近有两个动态值得注意，就是阶级敌人企图从两个方面来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来转移大方向，一种是从极左方面，一种是从极右方面。极左方面不是把矛头对准刘、邓、陶这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是企图用各种流言

蜚语打击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煽动一些人攻击总理，攻击文化革命小组成员。从右的方面就是制造混乱，说中央文革分两派，支持一派，打击一派。过去说文化革命小组分两派还可以，因为有陶铸、王任重。现在的成员都是一起战斗过来的，团结是坚强的、坚固的。”

6 月 2 日上午，北航“红旗”，清华“井冈山”、矿院“东方红”、北大“新北大公社”、国家体委“造反司令部”等 20 多个单位，在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召开批判潘梓年大会，发出关于通缉潘梓年的“通缉令”。

6 月 3 日，北航《红旗》报编辑部、清华《井冈山》报编辑部、体院《体育战线》编辑部、矿院《东方红》报编辑部，四家报纸办了一期联合版，在第二版发表了《关于揪斗潘梓年的声明》，有北航“红旗”、北京矿院“东方红”、体院“毛泽东思想兵团”、清华“井冈山”、北外“红旗”、北大“新北大公社”、人大“三红”、北医“八一八”、北京外贸学院“东方红”、中央财经学院“八八队总部核心组”、中央民族学院“抗大公社”、北京轻工学院“红鹰”、北京体院运动系“革命造反大队”、统战部“革命造反团”、国家经委“东方红公社”、国家体委“东方红革命造反司令部”共十六个单位署名。声明说：

“潘梓年是一个反共反人民的老手，是一个出卖革命利益的无耻叛徒，是一个鼓吹资产阶级学术的反动‘权威’，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文化大革命中，潘梓年之流在中国最大的保皇派、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陶铸怂恿包庇下，在学部顽固执行刘邓反动路线。潘梓年之流又招降纳叛，结党营

私，把黑手伸向一些机关学校，在那里扶植保守势力，分裂左派队伍，妄图篡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果实，实行资本主义复辟。”

该报第三版刊登了《潘梓年反革命言论摘录》和《潘梓年是大叛徒》文章。第四版转载《〈北京日报〉近来在为谁说话？》的文章。

在《关于揪斗潘梓年的声明》署名的单位，也就是后来所谓“天派”学校的主要成员。

北航《红旗》报编辑部、清华《井冈山》报编辑部、体院《体育战线》编辑部、矿院《东方红》报编辑部四家报纸联合版第一版

4 月下旬，北京建筑工程学院“新八一战斗团”等组织成立“揪刘联络站”。五一节后不久，“打倒大叛徒谷牧”的大标语、大字报出现在北京街头。当时正值“抓叛徒”的高潮，凡是有过白区地下工作经历，特别是被捕过的老干部，几乎都有可能被说成是“叛徒”，这似乎成了当时政治斗争中，攻击自己政敌的绝好武器。而谷牧 1936 年在北平左联工作时，曾被国民党军警督察处拘捕过，但在审讯中没有发现他是共产党的证据，关了十多天就交保释放了。这段历史，组织上早已有结论。但在此时，这段历史又被北京化工学院一些学生调查出来，国家建委的一些造反派组织听说后便要“深挖深查”，一时间闹的满城风雨。

6 月 3 日，建工学院“新八一战斗团”到中南海前游行示威，还组织了“揪谷兵团”，在中南海北门搭设帐篷，要求将谷牧交给他们批斗。

一天下午 17 时多，同谷牧一道工作的总理联络员对谷牧说：“我带你去看看揪你的队伍。”于是，他俩出了中南海北门。只见不远处有座帐篷，内有小桌一张，几把椅子和扩音器等。几个学生坐在那里。

他们二人走过去，问那几个学生：“人为什么这么少？”

学生回答说：“正在轮换吃饭。”

搭讪几句后，总理联络员给谷牧使了个眼色，让他先回去。然后问那几个学生：“你们要揪谷牧，认识他吗？”

那几个学生说：“不认识。”

总理联络员又问：“刚才进去那位是谁，知道吗？”

答：“不知道。”

总理联络员说“他就是谷牧。”

那几个学生一时愕然，不知所答。

还是在 6 月 3 日，就在建工学院在中南海北门设立“揪谷兵团”的当天上午，北京建工学院“新八一战斗团”、“井冈山”“前锋”、“革命造反联络站”等红卫兵组织还召开了红卫兵联席会议，主要议题是“肃清刘少奇在建工学院几次讲话的流毒”。会上，经各红卫兵组织共同协商，决定成立“揪斗刘少奇火线指挥部”。于是，他们在中南海“揪谷”的旗帜上又加了“揪刘”的字样。当天下午，他们的先遣部队开到了中南海西门外安营扎寨，表示要“坚决揪出刘少奇”。

所谓安营扎寨，就是在马路边上竖起旗帜，搭起帐篷，架上高音喇叭，再加上一些宣传板报，造反派学生轮班在那里值守，从早到晚用高音喇叭呼喊口号，进行“打倒刘少奇”的宣传。他们是要用这种不同寻常的形式引起人们的关注，显示自己揪斗刘少奇的决心。当时的报纸上作了这样的渲染：“揪刘战士，赤胆红心，在中南海西门摆开了与刘贼血战的战场。他们把大地当课桌，蹲着，半卧着，全神贯注地抄写那些直捣刘贼心脏的大字报。醒目的大标语，每天都像排炮一样向刘贼射过去……”

红卫兵在中南海西门前一住下，自然就是巨大的影响和压力。每天，都有一些红卫兵组织前来声援。到 6 月底，前来声援并住下“并肩战斗”的各种红卫兵学生组织已有 700 多个。全北京市所有高、中院校的红卫兵都组织人来到中南海西门扎下营寨，竞相亮出自己组织的旗号，架起高音喇叭，冲着中南海喊：“刘少奇，你这个坏东西……”后来他们又在中南海北门外也设

置了“揪刘火线”。

建工学院两派负责人曾到北航找过韩爱晶寻求支持。韩爱晶觉得有些莫名其妙，认为他们是想出风头，捞些政治资本，就客气了几句。

蒯大富对建工学院的做法态度更明确，他后来对韩爱晶说：“他们的行动我根本就不屑一顾，这是个闹剧。打倒刘少奇我们清华‘井冈山’肯定是第一功嘛。你抢什么抢？”

1967 年 6 月，刘少奇的厨师郝苗被公安部逮捕，因为江青在碰头会上对郝苗提出三条：一、郝苗给钱和粮食让王光美的女儿逃跑；二、郝在励志社给蒋介石做过饭；三、王光美在军调执行部时就认识郝，他是王光美调去做厨师的、因此郝有特嫌问题。

会上，负责王光美专案的汪东兴证明郝苗调到刘少奇处是经过组织上调的。江青不听，会上决定写报告先将郝苗抓起来审查。汪东兴起草了报告。后来刘少奇的女保姆戚妈也被抓起来了。最后查明，郝苗在励志社是给蒋介石送过一次饭，从励志社到东单，去了后被扣下不许马上回去，连蒋介石的面都未见过。以后，汪东兴让放了郝苗。

## 第 669 回：六月三，“五一六”活动猖狂　连夜见，外事口、大专代表

《人民日报》公开发表《五·一六通知》后，北京钢铁学院的一些学生打着贯彻这个《通知》的旗号，成立了“北京钢铁学院五·一六革命造反公社”。在 3 月即开始组织反对周恩来活动的北京钢铁学院学生、“革命造反公社红一团”头头张建旗，此时又提出“要掀起深入揭发高潮”和“抓新的一小撮”，并派钢院学生李连菊到北京外语学院“六·一六”串连。

5 月下旬，北外“六·一六”派张新民、戴达明等 5 人到钢院找张建旗等人。29 日，北京钢铁学院的张建旗、李连菊等人搬到北外活动，由北外给他们腾出几间房子住宿，只留曾先锋、李良弼、杨阳等在钢院，并明确曾先锋是钢院的负责人，担任“第一线指挥”，张建旗在北外担任“第二线指挥”。

对陈伯达、江青等中央文革 5 月 27 日在北京外语学院讲话时的警告，张建旗等人拒不理会。6 月 2 日，他们依然在北京外国语学院开会，准备公布炮打周恩来的材料。会上成立了“北京钢铁学院五·一六红卫兵团”，发表宣言，还把 4 月上旬寄给林彪、周恩来、中央文革的《致总理的公开信》抄成了大字报，公开张贴在钢院。并以钢院“五·一六兵团”的名义贴出《二十三个为什么？》，说毛泽东突然改变了作战部署，又要掀起一个“炮打司令部”的高潮，“还有一个活的赫鲁晓夫”。同时他们自己还写了一些欢呼的大字报，其中 101 中学生郭海燕，写了《为一张

反动大字报叫好》的大字报，署名“群众的呼声”。

“钢院五·一六兵团”成立后，给毛泽东、中央文革等写信，希望中央文革在6月4日前给以指示，如不给指示，就按自己的分析行动。

他们在夜深人静之时，张贴出各种攻击周恩来的大字报、大标语和传单，诸如《揪出二月黑风的总后台——周恩来!》、《周恩来之流的要害是背叛“五·一六通知”!》、《彻底捣毁资产阶级司令部!——质问周恩来》、《周恩来是毛泽东主义的可耻叛徒!》、《周恩来还我战友!》、《周恩来，你在农林口究竟要干什么？》等。在每张大字报、大标语和传单的最后，都署名“516”三个醒目的阿拉伯数字，其中的“1”字写成一个熊熊燃烧的火炬形状。

6月3日，在钢院、商院、体育场等地都出现了署名“北钢五·一六兵团”的传单《二十三个为什么》。

对“五·一六兵团”的反周行为，许多红卫兵组织表示愤怒。每当“五·一六兵团”的大字报、大标语和传单贴出来之后，不到一两天时间，就被另一批新的“迎头痛击反周逆流”的大字报所覆盖。

6月3日晚22时30分至4日晨2时，陈伯达、康生、江青、谢富治、肖华、杨成武、叶群、王力、关锋、戚本禹等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外事口代表和北京大专红代会核心组，再次批评了反对周恩来的大字报及反对周恩来的行为。

陈伯达问：“你们知道我们请你们来干什么吗？”

众答：“不知道。”

陈伯达说："同你们商量一个问题，对你们有意见和你们商量一下，我们不同意，听说你们有人最近把矛头对总理，对不对？"

众答："不对！"

陈伯达："改没改？"

众答不一，有的说："改了！"有的说："没有！"

陈伯达："如果没有改的话，我们今天就是同你们谈的就是这个问题，有的人想促使一部分群众，有的人想从右的方面，有的人想从左的方面，想动摇我们中央的领导，而把矛头针对总理就是这种倾向，懂了吗？问题的严重性就在这里，我们告诉大家，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是不能动摇的，是全世界最坚强的司令部，而周总理是这个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周总理一直是支持毛主席这个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周总理一直是支持毛主席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有人反对周总理是什么意思？这不是很危险的道路吗？

现在是一场非常尖锐的阶级斗争，资产阶级是不会自己退出历史舞台的，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他们意识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要碰得头破血流，所以他们拼命挣扎，他们不愿意退出历史舞台，就是说他们还要继续干下去。他们会利用青年中动摇不定的情绪，以不稳定的情绪，而有些人就被利用了。最近看了一些材料，有人竟然这样说：还要下决心干，垮了就垮了，不是我们垮，就是他们垮。说这种话的人不是无产阶级的人。这种说法和'联动'说：'活了干，死了算'有什么不一样？……现在有一些青年人拿着语录本，但没有用毛主席话来想想自己。总之，是

要用什么世界观来看当前的形势。如果我们要不很好地认真地掌握了无产阶级世界观，那么我们会用资产阶级世界观就会犯一连串的大错误，标语口号是可以贴的，但要很慎重，比如贴总理的大字报这是什么问题？把矛头指向总理这是什么问题？帝国主义的报纸就回答了这个问题。他们就高兴。这是替谁服务？不是替帝国主义反动派服务吗？难道我们要这种服务吗？过去是不自觉的，从今天起就应该自觉地对待这个问题，现在和你们打招呼，其实前一次已经打过招呼了，但有人还是要这样干的，他们没有想到这样干的后果是什么？逼得我们再开一次会，就是今天的会。

现在社会上流行着各种流言蜚语，比如说去年 5 月 16 日通知今天重新发表，他们对这个问题不是用阶级分析的方法，而且用资产阶级世界观，用主观主义唯心论的方法去推测这个问题。他们散布流传着这样一种论调，《5.16 通知》今年重新发表又要抓出一大撮，他们有这猜测，那样猜测，要抓谁、抓谁、抓谁、又要抓一大撮，他们不知道这个文件是毛主席亲自批准发表的，过去是在内部传达，今天公开发表了，这证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了伟大胜利，证明毛主席制定的伟大历史文件，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伟大而英明的论断得到了证明。有人不懂得这个阶级分析，他们不晓得要根据这个伟大的历史文件，向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乘胜追击。他们想抛掉原来的这个大方向，也就是毛主席所指出的大方向，而另外搞一个资产阶级的大方向。现在流传着念念不忘一个‘权’字，所以他们就要夺权，东夺权，西夺权。世界上

没有超阶级的权，不是无产阶级的权，就是资产阶级的权。我们要讲的夺权，是讲有那么一些地方和单位，被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篡夺，现在将权夺回来。现在流传着念念不忘一个‘权’字的，他们无产阶级的权要夺，资产阶级的权也要夺，实际上他们是要夺无产阶级的权，这是不行的。我们是无产阶级专政，要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谁要想夺无产阶级的权，就要碰得头破血流。那种念念不忘的权实质上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权，小团体主义的权，这是见不得人的，于是就搞武斗，搞不择手段的武斗，标榜拥护毛泽东思想，实际上是违背毛泽东思想。毛主席再三教导我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触及灵魂的大革命，要文斗，不要武斗。这些话说好久好久，已经一年了。有些武斗搞得很下流，破坏国家财产，不顾同志的生命，用这样的石头砸人。”说着陈伯达举起一块石头。

他继续说：“一天我到一个地方，看到武斗，打人者专打要害，还说打死他，让他一辈子不得翻身！你们赞成吗？”

众答：“不赞成！”

陈伯达：“不赞成就要起来反对！看到这种武斗的情况就要反对，要遵循中央军委《八条命令》、《十条命令》。北京市去年的重要公告和今年的重要通告，你们好好读一读这些军委命令，头脑冷静一下，想一想这些问题。本来我们是要用无产阶级世界观代替资产阶级世界观而不要变为相反。现在有些人走了邪路。我们如果不敲警钟，这些人就要陷下去了！过去做了就算了，以后就不说了，回到正确的路线，毛泽东思想的路线上来。现在没有第三条路线，不是走无产阶级道路就是走资产阶级道路，毛主

席的道路是唯一的道路，如果违背毛主席的道路就是死路一条。还是走正确的道路，还是走邪路，我们要选择。

今天想给你招呼一下，就是这个事情。”

接着，江青讲话说：“同志们，红卫兵战友们，我问你们好！我觉得你们有些不正确的动向。我们有责任，我首先要做自我批评，就是我和你们见面少，没有经常和你们交谈，听取意见，这是我的缺点，我相信同志们会谅解的。就是犯了错误，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不要对错误的同志采取不正确的态度。能吗？”

众答：“能！”

江青继续：“刚才陈伯达同志讲的，有少数人把斗争的锋芒搞错了，不是对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本单位的斗批改，而是对着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周总理。我全心全意地相信你们会改的。要提高警惕，不要上阶级敌人的当，阶级敌人是狡猾的。要好好学习毛主席著作，来对付敌人。我昨天和今天派人上街去看大标语，没有反对周总理的，都是拥护，都是拥护周总理。有些记者就从这些大标语中推测出一定会有人反对周总理。有位外国记者说：肯定有人反对总理。这帮了倒忙，这些主观是好的，但帮了倒忙。我建议你们今晚贴上，拥护的反对的都不要贴，免得敌人猜测。好多外国记者在大街小巷乱跑乱串，我们也没办法。以后看到外国记者照相，我们就要对他们不客气。我们对拥护的、反对的都不要贴，今天就干，统统都盖上。这是主席所讲的，不管主观动机好坏，但效果不好。

关于武斗问题有点补充，对自卫的武斗不能反对，坚决反对挑起武斗的坏人，特别是挑起武斗的幕后操纵者。最近我听说几

个文工团被打了，打的可惨了，这里头一定有坏人，要把坏人抓出来，要惩罚他们，你们都是毛主席的好学生，要好好学习毛主席著作，要看清大方向，要顾全大局，不要看到自己的小圈子，目前无政府主义都很危险，我建议你们整风，反对风头主义，反对无政府主义，你们同意吗？因为我关心你们，我患了感冒，还是来了，我先退场了。”

然后是康生讲话，他说：“同志们，我完全拥护陈伯达、江青同志的讲话。我完全同意街上贴出的大标语说：‘陈伯达同志的讲话好得很！’

把矛头指向周总理是错误的，这两同志的讲话要记住，有些人就是要摸中央的底，今天就把中央常委、中央文革的底交给你们了，有人还要这样做，那就干吧！当然啰，有人想对中央文革、对党中央、对毛主席施加压力，要党中央、毛主席承认反动组织，他们这样做，只是妄想，永远也办不到的！

今天外事口的同志都来了吗？过去我们感到我们做的是有缺点的，见你们太少了，外事口的同志我接触很少，你们要原谅。

外事口的同志们，毛主席亲自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仅防止中国资本主义复辟、变色，而且全世界上有伟大意义，在毛泽东思想上有光辉灿烂的发展的。党中央对你们看重是很大的，你们要身在天安门，望到全世界，你们不仅要向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邓及其他们的爪牙作斗争，你们还要同世界上一切阶级敌人作斗争，同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各国反动派作斗争，你们不仅要关心中国的国家大事，而且要关心国外阶级斗争，你们要负很大责任。今天，《人民日报》发表

了支援港九爱国同胞英勇斗争的社论，很多人一定看了，你们想了没有？当然北京也搞了抗议英帝的集会，上海的工人、红卫兵就搞得很好，我们在这方面，在国际阶级斗争方面，革命小将，革命组织不关心这件事，我有一个根据，就是你们关于这方面的大字报、大标语很少。不久以前，我离开北京，到一个城市，他们要开一个大会也达不成协议，结果各自开会，搞了三个会场，只开了一个五万人的大会，你们想一想，这究竟是为什么？是向英帝国主义示威还是示弱呢？我在那个地方替你们讲了些好话，因为在北京还能开会。可是回来一看，为什么你们一致对外也搞不起来呢？支援港九同胞抗暴斗争，你们为什么不出来反对帝国主义呢？但是由于打内战打得英帝又来钻我们的空子。

最近发生武斗，刚才江青同志讲了，武斗里面有坏人在扰乱，我想，不仅这里面有坏人，而且把矛头指向总理里面也有坏人。我带了一袋子材料，这里面都是外事口的报纸，可以给你们讲讲。

1、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的报纸电台，用各种手段，挑拨离间造谣说总理不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你们要提高警惕。

2、他们看到有总理的大字报，他们兴高采烈地说：我们的估计实现了（举例苏修）。

3、他们又说，可惜还没有人提打倒总理，这是应为遗憾的。

4、他们散布：下定决心，排除万难，打倒周总理。

5、他们又散布：你们要注意，有人反总理，可能主席不赞成。

另外一种手段，有的学校有这样的标语，对我们的伟大领袖要打倒，但有意不说周总理，使你们怀疑周总理。你们的大方向

搞错了，就会被敌人所利用，无意识地、不自觉的与敌人划不清界限。外事口的同志们，你们不但要反对国内的阶级敌人，而且要反对国际上的阶级敌人，像你们现在这样做，究竟符合不符合斗争的大方向？我们希望你们要放眼世界，提高警惕，与反对帝国主义、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与国际上的阶级斗争联合起来。

我告诉同志们一个消息，苏修搞中国文化大革命的情报，说什么毛主席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很快就要垮台了，天下就要成为苏修的天下了。这种反动的宣传动摇了一部分人对文化大革命的看法，甚至一部分左派也会动摇。比利时的格里巴同志前一段时期拿了一大堆资料，其中有不少反动的宣传，到中国来和我们谈判，谈到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不是党领导的，这是赫鲁晓夫的话啊！他们到中国来看了一下，结果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就抱了一大堆资料回去了。希望你们左派千万千万不要忘记国外的阶级敌人。

中共中央《516 通知》发表了，为什么发表？头脑里有资产阶级世界观观察问题，乱加猜测，又要刨出什么人了，这是错误的。毛主席亲自主持指定的通知这个文件，从 4 月 9 日到 5 月 16 日前后的十多天，开了三次会，毛主席前前后后修改了八次。这是一个伟大的历史文件，要好好学习。为什么不发表《二月提纲》？这个问题我们也曾经研究过，我们这样做，是替他们做了义务宣传员，帝国主义、特务、记者们是千方百计地搞到彭真的《二月提纲》，在红卫兵小报上登上了，我们说他们搞间谍活动，他们会说是在红卫兵报里搞到的，他们特别关心《二月提纲》的第一段，特别感兴趣。

你们要用无产阶级世界观去观察问题，要好好地去阅读《红旗》杂志和《人民日报》社论。有这样一种说法，念念不忘一个权字。你们想争权，是什么权？这里有好多读外语的吧？外语中有领导权、政权、个人权，不一样，你们要争人民大众的权，还是个人的私权？

我们的报纸上，如《北京日报》也还有这个词是不正确的。

最近发表了一些毛主席的文章，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非常重要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特别强调了对敌我友的三种态度，立场问题是非常重要的，对敌人要展开无情的揭露，坚决地打倒；对朋友要团结，要批评；对劳动人民对解放军要热烈赞扬拥护他们。

周总理是我们的人嘛，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为什么把矛头指向他？这是立场问题，是颠倒了敌我关系。犯了错误要改。

这几天报上连续发表了几篇毛主席的重要文章，你们要好好地把毛主席的这几个文件读一读，犯错误的同志也不要从此灰溜溜地。没有犯错误的要一看二帮，不是打击讥讽，要不但解放自己，也要解放全人类。去年 8 月 1 日毛主席讲过的。某些红卫兵没有做，变成了‘联动’。现在……就成不了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

要牢牢掌握毛泽东思想武器办事。一切问题的关键，是牢牢掌握毛泽东思想。”

接着是戚本禹讲话。他说：“我同意伯达同志、江青同志、康生等同志的讲话。

最有希望的人是最能想问题的人，而不是到处出风头，到处

搞山头的人。毛主席的思想体系，毛主席的伟大政策，中国向何方，世界的革命的前途都要我们很好地想一想，根据毛泽东思想去想一想，要好好地学习，康老有个愿望要在人大会堂召开万人大会讲学习毛选。”

康生：“我不能担当。我讲讲通知的八次修改，在毛主席在第一次增加了什么东西，第二次……”

戚本禹：“康老就算答应了。造反任务很大，国内要斗垮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国际上还有反帝，反修的前线，但必须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不然就会当叛徒，当变节分子，不要乱造反，总理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毛主席信任的人，要我们好好想一想，”

康生：“最近我们考虑三和一少的问题，不是三和一少是三降一灭，投降帝国主义、投降修正主义、投降反动派，扑灭革命烈火。”

戚本禹：“想一想，是多么大的任务，是多么重的任务。但是我们不能不把精力集中起来，而是把矛头指错，外事口文化革命要采取特殊方式。帝国主义、修正主义的特务就是往外事口派的。”

康生：“金日成访东德，宋任穷去访朝鲜，有人说这是阴谋，这样思考问题不行的。”

戚本禹：“街上大标语说：谭震林要毛主席下台，这是替敌人送情报，希望我们一起坐下来学习毛主席著作。”

康生：“有些人在国内神气的很，耀武扬威，在国外，在帝国主义、修正主义面前一句话也不敢讲，卑躬屈节。这个人是贺

龙，我当面问过他。”

戚本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外交战线是有希望的。外事口的造反派是站在中央文革毛主席一边的。有些同志由于学毛选不好，犯了错，我相信能改正错误。”

## 第 670 回：康生说，叛徒不会到处有　七机部，两派代表争不休

戚本禹讲完后，谢富治说："我完全拥护上述几个人的讲话，关于总理大字报的事情，大家要按照刚才几位同志的意见办事。对于贴总理大字报的人不要开几百人的斗争会，这种斗争会不要开。

反对无政府主义、反对风头主义，整风很重要。挑起武斗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保守势力挑起的，我们希望大家起来抓主要矛盾，同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进行斗争。斗争大方向就是大批判、大联合，斗争中实行革命的大联合、大团结，有了问题要摆事实讲道理，不要搞武斗。我们要牢牢把握住大方向，不要武斗，不要违背这个大方向。我们大家为这事要努力做好。

有的单位不是发扬成绩，克服缺点，而是发扬缺点，克服成绩，这不好。要总结光辉的成绩，提高斗争水平，提高毛泽东思想水平。毛泽东思想最伟大，这一点我看很重要，要坐下来，好好学习毛选以及有关报纸社论，根据江青同志的指示要整风，所有地方院校要停止武斗，三军的演出要支持不要反对。

还有两点意见：一、对军事院校的文化大革命不要介入。二、有关总理的大字报的事情都不要讲出去。"

陈伯达、康生都同意这个意见，说："这是很重要。"

康生再次讲话说："关于抓叛徒的问题，我不详细讲，以后中央要发文件。红卫兵和革命同志文化革命以来，做了大量的调

查研究工作，抓出了一批叛徒，对文化大革命作了很大的贡献。中央发了一个六十一个叛徒集团的材料……以后大家就警惕了，就开始作了一些调查工作，外事口也好，其他学校也好，但是最近发现存在一些偏向，就是到处都去抓叛徒，我希望你们进行深入调查研究工作，可以成立调查组，某某调查组，如果以揪叛徒的名义这不好。解释一下，一个人是不是叛徒，这是个严肃的政治问题，不是思想认识问题，是一个政治生命问题，必须作周密调查，不要根据不充实的材料，没有核实材料，就宣布某某是叛徒，必须采取严肃负责的态度，要负政治上的责任，要负法律上的责任，这不是一般的大字报，这不能出风头，用新闻记者抢镜头处理。我们的党是光荣伟大正确的党，你也抓，他也抓，这里是叛徒，那里也是叛徒，这不是否定了我们伟大的党了吗？另一方面，毛主席说了，我们的干部绝大多数是好的，如果这里也抓，那里也抓，这里是叛徒，那里也是叛徒，这不就把主席说的话否定了吗？

在这个问题提高警惕，要调查研究，有的组织搞得就很好，不是立即宣布，而是把调查的材料送到中央，这很好，但有的就不是这样。但不要麻痹，这事要调查，但是要谦虚，不是随便可贴大字报的，这是个严肃的政治问题。现在社会上有这么一股风，同志们要注意。

进监狱对共产党员来说是个很好的考验，也很光荣。不要一进监狱就怀疑人家是叛徒，不要随便贴大字报，有些群众组织做得比较好，得到材料交给中央，不立刻宣布结论，这是好的。你们革命组织要掌握方向。不要丧失警惕，也不要特务如麻。

历史上有政治问题的，做过结论的，凡属中央管理的干部，历史问题的决定权绝对在中央，必须由中央决定，这是中央的权，中央的权力不能扰乱的。

彭真是个什么人，他是一个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是个叛徒，去年成立彭真专案小组的时候，就怀疑过彭真是个叛徒，但我们没有宣布，没有贴大字报，我们进行了认真的调查，我们调查了一年。但今天我们可以宣布他是一个叛徒，是个特务，今天我可以向同志们讲，因为我们经过调查研究，连他自己也不能不承认。调查要结合本单位文化大革命，不要超越本单位，偏向的去搞叛徒，这样会把文化大革命的方向改变了。四川军区个别同志为什么会犯错误？就是因为把文化大革命变成镇反运动，因而犯了方向性、路线性错误。同志们，要清醒地估计这个问题。”

康生又说起当时闹得沸沸扬扬的关于李先念是“大叛徒头子”一事。他说：“关于李先念，总理讲，李先念不是叛徒。即使有这个问题，也只是个大错误，是个立场错误。”

他接着说：“为什么要将六十一人的叛徒集团材料那时发下去呢？那是为了证明，刘、邓不但有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而且还有一条招降纳叛的组织路线。现在同志们有了偏向，故向同志们交待一下。”

“在外事口和在军队中有一些人，在国内硬得很，在外国人面前却像绵羊一样。我说在军队中的贺龙，他在马利诺夫斯基攻击毛主席时一句话不敢说，在修正主义面前是小丑。”

陈伯达最后说：

“会议结束了，我讲讲话。

无产阶级的政治斗争是很严肃的斗争，不是儿戏，不是赌博，不是押宝，不要犯主观主义的错误，不要犯儿戏的错误，要学会毛主席的阶级分析方法对待这个问题。

听说今天在座的单位没有参加北京所谓两大派别，这很好。

刚才谢富治同志发言说：‘要发扬成绩，克服缺点’，你们不参加两派斗争，这就是成绩，但是我听说同志们自己内部在打内战，这不好。一方面发扬成绩，一方面克服缺点，自己打内战，这就是缺点。

最近街上有这样的一张标语，反对谢富治同志的标语，这就是‘打倒谢富治!’‘谢富治算老几!’‘解放军调查团滚出去!’这个标语贴在××处要把它盖上。现在谢富治是北京市的首长，我投他一票，你们也有一份。你们拥护不拥护他？”

众答：“拥护!”

陈伯达继续说：“这种标语是乱来，属于‘联动’一类。什么算老几？无产阶级算什么辈数？讲什么血统论？贴这种标语的可能堕落到联动一样。写这种标语的人算老大吗？老子天下第一，自己来当革委会主任？革委会主任不是自封的，是大家推的，是大家协议选出来的。

北京市大专院校和军事院校不要去串联，大专院校也不要到机关去串联，不要去军事院校串联，搞成两大派。31 号我到计委去，不要大专院校同志干涉计委，何必呢？不是自讨苦吃吗？不是有人贴我的大字报吗？我得罪了不少人呀！今天又得罪了你们，是不是呀？”

众答：“不是，不是!”

陈伯达："如果是真理，是可以公开的，我相信我讲的是真理，是可以公开讲的，有人可以反对我的话，可以写伯达的讲话是大毒草。"

康生插话："陈伯达的讲话好得很！"

陈伯达："念念不忘无产阶级斗争是严肃的斗争，不是儿戏，再见！"

6 月 3 日晚，谢富治和傅崇碧还前往北京红代会传达中央的两条指示：

一、红代会的人都不能利用北京名义，跑到各地自作主张，破坏无产阶级专政秩序。在徐州的都应该接到通知后，一天内应当立即回来。红代会要派人去说服。如还不听，可同军队、公安机关协同强制回来。

二、红代会和各大专院校，要坚决执行中央指示和市革命委员会的决定，立即将我市各院校派往各省、市和北京各单位的同学调回本校。

自 5 月 20 日，七机部"916"两万人在中南海外示威游行，要求揪出王秉璋后，从 5 月下旬起，七机部"916"也派人到国防部大院门口安营扎寨，装上高音喇叭，不断呼口号：

"火烧聂荣臻！"

"炮轰聂荣臻！"

"万炮齐轰聂荣臻！"

同时又出动大批人马，在北京的大街小巷张贴标语、大字报。其中最大的标语，要数刷在北京东郊热电厂烟囱上的那一幅"万炮齐轰聂荣臻"，每个字足有几米高。署名"916"的"1"字，

更是画成一支火箭，直指蓝天，十分醒目，成为当时轰动京城的一条最大的标语。

6 月 3 日 22 时 25 分到次日凌晨 4 时 10 分，就在陈伯达、康生、江青等人接见外事口和北京大专院校红代会核心组的同时，周恩来、聂荣臻、粟裕也在人民大会堂西大厅接见国防工业系统部直机关群众组织代表及军管会人员。当周恩来、聂荣臻和粟裕步入会场，全场代表起立，热烈鼓掌。周恩来挥手示意要大家坐下，并开始讲话。

他问："'915'、'916'来了吗？'915'、'916'一共 6 个人，今天解决整个国防工业的、国防工办的六个机械工业部、第二机械工业部、三机部、四机部、五机部、六机部、七机部，还有军管会和每个单位的革命派组织问题。首先要谈一个问题，就是七机部。七机部'916'你们在哪里？"

"916"代表答："在这儿！"

周恩来："讲一下，最近你们到国防部，一直在那里放起喇叭来，要万炮齐轰聂荣臻同志，我告诉你们这是错误的。因为你们没有根据。事情是从谁批准王秉璋休养引起的，我告诉你们，这是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并经主席同意的，根本与聂副总理没有关系。即使有关系也不应该这么做，何况毫无关系。你们要问是谁批准的，你们比中央领袖还高啊？"

"而且这个事情不是我提议的，而且更高的，当然要是主席，主席最高。你们完全可以打电话嘛，或者采取别的方式也好嘛。你们今天撤退了吗？"

"916"代表答："撤退了。"

周恩来："你们撤退了，我今天才能召集这个会议。这个事情是错误的啊！以后不要再这样搞了，你们接不接受啊？"

"916"代表说："王秉璋 5 月 6 日失踪，5 月 7 日、8 日、10 日、11 日我们连续向总理办公室、聂总办公室、工办、空军都打电话问到哪里去啦，回答说不清楚。"

周恩来："是不清楚啊，聂总是不清楚这一事情，接电话的人不晓得，我晓得的。"

"916"代表："我们认为王秉璋在这里搞鬼。"

周恩来："没有搞鬼。这个事情你们要问清楚，可是搞得北航也来了，不是不允许你们批判，让他把病养好嘛！中央领导关心他的健康嘛。赵尔陆搞得死掉了，还要搞一个吗？最高统帅、副统帅都很关心，不能看着这样倒下去嘛。"

这时，总理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对"916 代表说"："头天晚上你们打电话，说小小王秉璋为什么要经过 3 个单位批准呢？小小部长你们为什么 3 个单位决定？"

周恩来："你们'916'讲得够多了，已经出轨了。这是主席的命令，我是奉命的！你们干涉，这样党和军队、国家怎么能够工作呢？我今天决定你们离开，你们总得承认错误。"

"916"代表："我们相信中央、军委和国务院，但王秉璋屡次生病欺骗我们，他每次生病都搞大反复。"

周恩来："王秉璋岁数恐怕在五、六十岁以上吧，有一次因为紧张我都支持不了，一大堆人围住我，你们晓得我们做多少工作吗？同志们啊！"

"916"代表："如果他真是有病，我们'916'绝不会揪他。"

周恩来："我跟你们说嘛，已经证明了嘛，我为什么把地点告诉你们呢？"

"916"代表："我们向周恩来反映意见。"

周恩来："昨天我还看见你们的口号，我看还是你们自己把它盖上。"

"916"代表："炮轰聂副总理不光是王秉璋的问题。"

周恩来："你们连在一起的嘛。"

"916"代表："聂副总理对彭、罗、陆、杨作斗争，我们加以肯定，但他在文化大革命中支持保守派。"

周恩来："你们七机部'916'、'915'还要经过一段时间的考验嘛。"

"916"代表："聂总在中央工作会议上……"

周恩来："什么中央工作会议？再争论我宣布散会，我宣布你们退会，今天是各方面的会，因为你们一点儿不商量嘛，你们所说的有没有错误啊？"

"916"代表："我们没有商量，有错误。"

周恩来："还有第二件事，七机部除'916'、'915'以外，还有中间组织'516'。因为这个组织得到七机部军管会的批准了，是不是啊？七机部军管会在吧？你们批准啦？"

七机部军管会主任闫揆要答："是。"

周恩来："我让他们来'916'反对，这个没必要，这么怕啊？真理面前怕这个啊？"

"916"代表："我们反对。"

周恩来："最后决定权是你还是我？"

“916”代表：“当然是总理。不过七机部是两派，他本身是‘915’的，他退出‘915’耍几次花招，我们最清楚。《解放军报》明确指出，不管哪个单位实际上是两派。陈伯达同志也这样说过。我们根据主席思想分析，我们很了解他。”

周恩来：“多数派是有的。现在在座的还有三派的嘛，怎么能不让他们进来呢？”

为此又争论了一番。

周恩来：“我们六个国防工业部门，现在最突出的就是七机部了，而七机部又是‘916’。你们从一月份夺权，在 1 月 17 日、18 日，你们好像是 18 日，在三楼（人民大会堂）小礼堂在夺权问题上做动员，从那时候起‘916’、‘915’的问题就没有很好解决，到现在差不多快 5 个月了。这个问题弄得整个社会上都不满意嘛，难道你们两方面不想一想？

还有一个事情，就是说用大喇叭就在中南海周围轰，逼着我们见，这个办法常常是适得其反，反而被另一派比输了。因为你用大喇叭对中南海嘛，所以根本不出击嘛，时间长了，造成群众不满意了嘛。开始是支持的，以后打听打听打听走啦，结果越搞越没劲了。最后我是支持的，支持的办法是两派我都接见。两派没有大喇叭，没有这么搞的那一派占上风了，结果被比下去了。何必用这个办法呢？现在外贸中侨也是两派，也是这样，用这个方法适得其反，反而被另一派比输了。

现在国防工业部门全部军事接管了，现在问问国防工办今天来的是什么造反派？”

工办代表：“工办很明显的派没有，现在对赵尔陆有两种意

见……”

周恩来：“5 月 16 的《通知》是个伟大的历史文件，上边有几段是毛主席加的，马克思，恩格斯没有实现无产阶级专政，只是巴黎公社。列宁看出这个问题，但没有来得及解决。斯大林有一段犯错误，认为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消灭了，晚年，在他的《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上看出来有矛盾了。只有毛主席抓住这个问题，深入解决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如何进行革命的问题。这不是简单的事情。正因为这样，你们做每一件事情都要把毛主席著作、这一年来的许多文献文件，以及林彪同志的报告好好学，一点也不能放松。这样才能锻炼你们成为坚强的左派。这样也许两三个月以后，掀起一个新的生产高潮，就是今年不能全部完成，多数能完成计划。明年会大大超过计划，来个新的跃进。给我们时间就是这样一个时间，战备我们争取 3 年，五年计划争取 3 年，为什呢？因为越南战争，美国大选前战争扩大到中国的可能也有，但是较小一点。一种是认输，一种是全力来解决了，给我们的时间就是两年了。我们 65 年提出备战，现在过去了一半了，不能等待了。”

6 月 4 日 4 时 10 分，接见完毕，全场起立，以热烈掌声欢送周恩来、聂荣臻、粟裕离开会场。

6 月 4 日，中央文革的“六三”讲话传到钢院，引起了钢院“516”的混乱，一些人退出“516”。张建旗等 7 人在紫竹院讨论了两天，意见不一致。一种认为“反总理不符合毛主席战略部署，要搞只在业余时间搞”；另一种意见是坚持搞下去。之后，李良弼、曾先锋、杨阳回钢院，张建旗、李芳、陈力、李连菊和

郭海燕等 5 人继续到处收集攻击周恩来的材料。张建旗等人发表了一个《严正声明》，摆出一付偃旗息鼓的姿态，“516 兵团”从此转入到地下活动。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6 月 4 日，北京大专院校“红代会”中倾向北师大“井冈山”的部分组织，以“红代会组织组”的名义发布了一个关于吸收民族学院“东方红”、北京石油学院“北京公社”、人民大学“新人大公社”等 18 个组织加入“红代会”的公告，这 18 个组织都是倾向师大“井冈山”的，并且于当天下午在北京地质学院操场召开了庆祝大会。民院“东方红”、“新人大公社”等组织还示威性地到清华大学进行了游行。这些行动引起倾向北大的一批组织的不满和抗议，于是他们也以“红代会组织组”名义发表一个“严正声明”，称对立面“盗用组织组的名义，策划了所谓吸收 18 个组织加入红代会的阴谋，是完全非法的，立即宣布作废！”

北京外国语学院“红旗革命造反团”负责人宋远利回到北京后，认为“28 团”5 月 21 日贴出的给周恩来的公开信是涉及政治的大问题，立即亲自起草了开除“28 团”的声明，并在学校的教学楼内贴出“所谓红 28 团的教训”的大字报，认为“他们是从背后杀来的敌人”。

## 第 671 回：众首长，接见豫驻军领导　陈伯达，见北京大专代表

6月3日，汪东兴等人报告：中央警卫团，即8341部队准备分期分批参加支工。报告说：警卫团党委坚决执行毛主席关于警卫团“也要参加支工”的指示。

6月4日，毛泽东在汪东兴的这份报告上批示：“退汪东兴同志酌办。”

6月3日，郑州的“十大总部”又包围了粮食学院。“二七公社”再次反击，一直打到中原电管局的一个礼堂，这里是“十大总部”的指挥部，“二七公社”在这个礼堂的地下室里发现枪支弹药，认为是省军区已经作好了武斗升级的准备，因为文化革命开始后各单位民兵武器都冻结了嘛。于是他们照了相，第二天就到北京告状去了。

不过，郑州“二七公社”告状的人还未见到中央接待人员，6月4日下午16时，周恩来、陈伯达、康生、肖华、杨成武、王力、关锋等人已经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接见河南省军区和驻开封的一军领导。接见时，周恩来明确表示：

“河南武斗是你们压‘二七公社’的结果，主席说过福建、河南的问题就是对群众的态度问题。我们开门见山地说，主席2月有个批件，就是批河南问题的。当时冲军区，主席说这是对你们的信任的表示。省委瘫痪了，群众找你们是信任你们，相信你们不会开枪，他真要冲，让他冲进去，住够了就好了。郑州围报馆，主席说让他暴露几天，不要接管。以后我们叫你们来谈判，

你们说只有一派了。我们讲只有一派了还有啥谈的，就没有谈的了嘛！但是这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左、中、右总是存在的。以后你们抓人，宣布非法组织，把他们压下去，压力越大，反抗力越强，物极必反嘛！你压了他，他就要闹。”

康生说：“去年南大、交大、郑大运动起来得快，南京、西安是派工作组进去镇压，河南开始就支持学生造反，主席称赞过。”

周恩来：“现在翻过来了。”

康生：“赵文甫给你们的信收到没有？”

何运洪答：“收到过一封。”

康生：“这封信很坏，是挑战性的，搞不好，你们和内蒙一样。”

周恩来问：“你们谁谈谈？”

河南省军区政委何运洪代表河南省军区向周恩来和中央领导作检查，当检查到：“2月17日中央指示要派代表来京谈判，我们没有坚决执行，把‘郑大联委’当作右派”时，周恩来插话说：“毛主席当时就说，即使是右派也来，右派也不能压。”

周恩来又问：“你们是不是谈谈省委问题？”

何运洪说：“由李善亭同志谈。”

河南省军区政治部主任李善亭汇报省委的问题，当汇报文敏生反对学习毛主席著作、反对毛泽东思想问题时，河南省军区副政委余嗣贵插话说：“刘建勋也说过读毛主席著作也要一分为二。”

关锋：“看刘建勋同志说一分为二是咋说的，如果说毛主席

著作里有辩证法，讲对立统一，讲一分为二，这就不错，如果他是说主席著作有正确有错误，那就错了。”

康生说:“这是个复杂问题,看刘是怎么说的,是什么意思？”

杨成武说：“河南问题很清楚，现在是怎么检讨的问题了，你们要和‘二七公社’讲清楚，要检讨。”

关锋问：“刘建勋在北京三结合，郑州就出现了坚决打倒刘建勋，打倒刘建勋的后台谢富总理的标语，还有打倒江青同志和总理的标语，你们为什么不表态？”

康生说：“是不是符合你们的口味？！对你们有利，你们不吭气？”

杨成武说：“起码你们很欣赏。”

康生说：“你们还有要和赵文甫结合的电报。”

李善亭、余嗣贵、何运洪说：“我们没有这样的电报，我们可以再查一查。”

康生说：“二月叫你们谈判，你们不来，不管有意无意，是和主席思想对立的。”

关锋说：“你们想把人家拖垮，造成既成事实，再来谈判，这是很不对的。”

周恩来说：“当时你们拖，你们压了人家，所以人家反对最强。”

李善亭继续汇报，刚谈到纪登奎问题时，周恩来插话说：“对纪登奎的问题，主席同你们的看法不一样。”

关锋、王力插话说：“你们还继续谈，可以谈你们的看法。”

周恩来说：“对‘八大总部’，你们要想法让他们和‘二七

公社’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联合起来，当然现在距离很大了。河南不是军管，实际上军区说了他们还听，你们这次立场要站稳，谈判才能谈好，‘八大总部’要求要派代表来，可以和他们双方协商，”

王力插话说：“‘二七公社’不同意。”

周恩来：“可以和‘二七公社’商量，一个总部来一个。”

王力说：“军区的问题就是几个字，方向、路线错了，打击了革命造反派。”

周恩来：“钟生益不是支左办公室主任吗？你们也可以让钟来，和一军同志一起讨论，还可以找肖华、杨成武、关锋同志给你们帮一帮。”

康生：“你们糊涂，你们没看主席是怎么批的，你们说人家（郑大联委）是右派，主席批的即使是右派也来。”

王力说：“关键是你们路线错了，要到‘二七公社’那里去谈谈，他们说的不好听，这不要紧。”

杨成武：“你们干干脆脆承认路线错误就算了嘛！山东省军区有个报告，中央批了，批语有三条：一条是公开检讨比不公开检讨好，二条是承认路线错误比不承认路线错误好，三条是早检查比晚检查好，你们要好好学习这个批示。”

陈伯达说：“不要怕丢面子，怕丢面子，反而面子丢得更多。”

杨成武说：“二月叫你们来谈判，你们不来，别的地方都巴不得要来，你们不来，你们犯了路线错误，但不是刘邓路线，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犯了路线错误。

王力同志插话说：犯了路线错误也还是人民内部矛盾。”

周恩来："今天就谈到这里，一军同志没有谈，可以找全军文革，可以找肖华、杨成武、关锋同志谈谈。"

何运洪："向总理请示一个问题，家里没有什么人了，又很紧张，看钟生溢还来不来？"

周恩来："既然这样就不来了。"

北京大学自 5 月 17 日"东方红"贴出《成立宣言》后，5 月 22 日，又一支反聂组织"红旗飘"宣布成立，前身即原名"北京大学红卫兵红旗飘战斗队"，其核心组成员是北京大学红卫兵的首任司令、法律系学生牛辉林等 5 人，活动能力很强，对聂元梓颇多批判。

6 月 4 日，北京大学"新北大井冈山公社"成立，其前身是在反击"十二月黑风"中被查封的"井冈山红卫兵"，头头是哲学系四年级学生胡纯和。

6月5日晚，陈伯达和谢富治一起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北京大专院校红代会核心组成员、北京市革委会的15所高等院校的委员、红代会的工作人员，解决这两天发生在北京高校之间的武斗。

陈伯达一走进会场，大家热烈鼓掌。陈伯达摆摆手说："别鼓掌了，怎么又打起来了？怎么又打？你们是当无产阶级革命家，还是当流浪儿？我让你们打倒好了。我反对你们，得罪你们。我反对你们最近的行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要革你们资产阶级的灵魂，我替你们难过。刚才去参加亚非作家学习毛著的会。现在凡是有打架的地方我就去，我准备去挨打，我是不怕别人打的，你们尽是鼓掌我已经不喜欢了。记了有什么用？不听也不执行，老子天下第一，什么人的话也不听了，中央命令也不听，我

就造你们的反，谢富治副总理如果不执行毛主席的指示就造他的反。我批评谢富治同志，他太软弱了，对你们太宽容了。有人贴大标语：‘谢富治算老几？’什么算老几？这是什么意思？我是拥护谢富治的，我投他的票，对你们采取无产阶级的强硬政策，你们这样闹不行，我就是要批评。我什么都没有，我是小小的老百姓、无产阶级。有的同志说我：你最近批评的人太多了，我说，我还是要批评。”

谢富治：“你敢字当头。”

这时，有人反映红代会没有经过核心组讨论就吸收了 18 个组织一事。陈伯达说：“你们要经过正规的讨论、民主的讨论。不能随便开除，也不能随便地吸收。”

这时，同学把一个取缔《首都红卫兵报》的通告送给陈伯达看，陈伯达说：“这个通告很不好，老百姓给你们吃饭，你们不好好地学习，要干架。现在我反对你们，这个通告写的很糟糕，这样在街上贴出去很不好。我没有看《首都红卫兵报》，但是这个东西贴出去会是什么影响，你们想过没有？你们这样做我实在忍耐不住了，我们是老朋友了，我们的话也不听了。你们原来还比较朴素，现在骄傲了，也搞打砸抢，无产阶级会去抢人家的东西吗？打砸抢搞个人发财。你们的手表是抢来的吗？如果是就拿出来，要按照党中央毛主席的话办。”

“你们要有无产阶级政治家的风度。什么是无产阶级？什么是人民代表？什么是人民勤务员？你们要想一想，凡是你们打架的地方我都想去，让你们打死引起你们的警惕，引起你们的觉悟就好了。”

谢富治："我也准备被你们打死，如果你们能够觉悟，这也是我的一点贡献。"

陈伯达："我很难过，替你们难过，你们是拆革委会的台，要打倒谢富治。"

谢富治："只要把我打倒，市革委会能够巩固，北京市革命秩序能够恢复，那就是好的，我明天就倒。"

陈伯达："要好好学习毛主席著作，要考验一下，谢副总理，你找个时间把委员们都找来考。"

谢富治："这样不行，没有用，他们背得很熟，而且都会写。"

陈伯达："那不一定，听说傅崇碧主持会议你们都不听，傅崇碧同志保护过我，我对他很尊重。有些人翻脸不认人，根据他个人利益，小团体利益，这些都是剥削阶级丑恶的东西。你们受压制时我们的话是香的，现在不行了，你们现在站起来了，不仅要夺学校的权，也要夺市革委会的权，还要夺工厂、机关的权，现在最危险的是夺无产阶级的权。我们无产阶级也懂得，资产阶级也懂得你们，你们可能走到反面了，你们搞打砸抢，就是执行刘邓路线。"

陈伯达说："不管你们理由有多少，打架是不对的，市面上被你们的喇叭车吵得够了，老百姓都有意见。你们要走哪条路？你们要夺多少权？你们比我们小时候还糟糕，我们小的时候在群众中生活，你们没有与老百姓见面，世界的事你们了解的少。"

"有人可能反对我，他现在要接班，用打、砸、抢就变为资产阶级。这是受封建的帮会的影响，你们没有接班的条件，就想打倒谢富治，你们来当主任吗？主任不是自封的，是群众选的。

谢富治如果交班就是犯罪，不能交班。”

“不要用喇叭车，你们不要插手各省市、各机关的运动，你们不太了解，自惹麻烦。你们去帮助一派，反对一派，乱支持。”

谢富治：“通通回你们学校去。”

陈伯达：“中学生你们也不要去插手，中学生的分裂是由于你们大学生在里面插手，工厂的分裂也是由于你们大学生在里面插手，好像北洋军阀似地各占地盘。”

“我很严肃地指出，有人从右的方面，有人从极‘左’的方面来动摇党中央的领导。无产阶级的政治斗争是很严肃的，不是儿戏，不是赌博。我没说过什么好话，这两句话是对的。”

谢富治：“他们都各自拉一派，把自己观点相同的一派拉入红代会。”

陈伯达：“你们现在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想夺无产阶级的权。现在苗头就是这样。你们去煽动工人，也想夺无产阶级的权。加入红代会要民主讨论，由市革委会批准。”

红代会的工作人员说：“红代会的大印已经被抢走了。”

陈伯达：“印被抢走不要紧吗，我们不要印。中央文革就没有印。你们有帮有派，我们没有。没有印也可以照常办公。你们可以轮流参加红代会。一个学校分两派，轮流参加。”

有的同学问：“保守派参加行吗？”

陈伯达：“保守派参加也不要紧。有的保守派就不一定是保守派，可能是造反派。比如三军演出，他们就是革命派。但有些学校反对他们，说他们是保守派。”

有工作人员说：“保守派进来，那么红代会不成了大杂烩了

吗？”

陈伯达：“什么大杂烩，难道今天跟你们的谈话就不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我们是大杂烩，难道你们就是造反派了。你们就是百分之百的造反派，我大概就是保皇派了。因为我保谢富治。”

“你们知道黎元洪吧，曹锟是逼他让出总统的位置，把他驱逐走了。黎元洪的老婆偷偷地把印带走了，曹锟这时就着急了，派人去把印抢回来，其实这是多此一举，黎元洪的老婆偷走印，曹锟再刻一个，还不是照样当总统吗？我先讲这个故事，你们后交印，你们是不是想当曹锟的部下？把印交出来，由办公室的人使用，谁去值班谁就用，别抢。这些都是小孩子的动作，旧社会的恶劣作风，地主、资本家的作风，你们以为把印抢走了，总统就可以当了吗？南京也有一个故事，夺了一口袋印，什么办法也没有，工业不行，农业也不行，只好交出去。你们把所有的印都交出去，既往不咎。要容纳有不同意见的组织来参加，要扩大红代会，所有两派都参加，或轮流参加。一个学校没有别的派，就不能再搞成两派，特别是组织分裂，外单位到你们学校去制造派别，也是不对的，是错误的。”

“地质与新北大吵架，别再打了，北大是老大哥，别逞英雄，不要把地质打倒。地质也不要把北大打倒。北大地质各做自我批评。一个学校的事别的学校不要去包办代替。”

“我前天在小礼堂讲话就是批评新北大的。但是你们其他人回去也不要攻击新北大。我们是希望人家好。北大是一个很有名望的学校，又是出第一张大字报的，它成材不成材，是不是紧跟

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还是走别的路线，有这种可能性！这里要引起北大同学们的警惕。别用这些话去贴大字报，去攻击新北大，不准往街上贴新北大的大字报。”

“前两个月我就批评了孙蓬一，地质去攻击新北大是错误的，孙蓬一就发火做了个报告，说我们上上下下万众一心，这没阶级分析，不科学，你们北大就没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就没有一个小资产阶级？”

“吴传启算什么东西？吴传启你们说过就算了，提不上日程上。他这个人排不上我们社会的位置。我现在天天想，天天希望这样一件事能够实现，就是广播车都拆掉。吴传启我不认识他，谢富治同志也不认识他。有一种言论，说《北京日报》、《光明日报》、新华社、《红旗》杂志都是吴传启操纵的，这是活见鬼！有人扭住周景芳，他在学部工作。”

谢富治：“他是好人，是造反派的。”

陈伯达：“我刚刚认识他，他是戚本禹同志派他去帮助谢富治工作的，是戚本禹推荐的，关锋同志开始还不愿意呢，要把他调到《红旗》，当时我也同意了。这是一个老实人，别冤枉好人。吴传启不可能操纵我们的报纸，渺小的微不足道的人，你们硬把他抬上来，这不是见鬼吗？这不是上坏人的当吗？因为他，就要搞武斗，这是被人在挑拨呀，这是帮助渺小的微不足道的人来篡夺我们的权力。凡是搞垄断把持权的都是替自己造成垮台的条件。你们要用吴传启这个名字来做内战的口实，一定要垮台。”

“回去跟孙蓬一说一下，我不怕他进攻我，昨天我公开批评了聂元梓同志，我是不愿意点出名来的，对于聂元梓同志我们还

是要保护的，你们不要乱攻，不要利用我的讲话去攻聂元梓同志，还是让她当红代会核心组组长，我支持她，不能够开除她。谢富治是代表党代表工人阶级来领导革命委员会的，不能知识分子来领导无产阶级，你们这些知识分子究竟改造了多少？造革命委员会的反，是什么意思？值得考虑！我信任你们，所以才把心里的话都说出来，我这样严厉地批评你们，是因为我相信你们，你们也相信我们。我刚才发那么大的脾气，不是没有道理的，我是好意的来劝你们的，但一定不要利用我的讲话对某一个组织、某一个单位的批评，去攻击另一个组织，去攻击另一个人。不要去攻击新北大，不要去攻击聂元梓同志。北大同学回去告诉聂元梓同志，叫她不要生气，我这样正是为了她好。”

## 第 672 回：燕园乱奏响反聂大合唱　有矛盾，“新文革和旧政府”

陈伯达的“6.5 讲话”对北大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一霎时，燕园风云突变。6 月 6 日清晨，大街上就看到大标语：“聂元梓代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向无产阶级夺权罪责难逃！”“炮轰聂元梓！”“孙蓬一滚蛋！”……

这天，聂元梓贴出《掌握斗争大方向，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大字报，说要“抓主要矛盾，狠抓大方向，……彻底砸烂刘、邓黑司令部，彻底摧毁旧北京市委。”

中午，北大历史系“延安战斗队”靳枫毅将聂元梓5月26、27日两次与“新北大公社红旗兵团”座谈会的“纪要”公布出去。一时间，未名湖畔又是风生水起，“新北大公社”内人心惶惶，大家都在想：要不要紧跟陈伯达讲话？要不要脱离“公社”？应该如何确定自己的立场？

6 月 6 日晚上，历史系“红梅战斗队”的王复兴串联了 11 个系 20 个“战斗队”的队长在大操场围了一圈席地而坐，讨论形势。数力系谢定国建议“退出公社”，但大多数人主张仍留在“公社”，但要继续给校文革整风。尔后谢定国也赞成了大家的意见。

6 月 7 日，“新北大公社革命造反总部”成立，是以地球物理系王桂琴、物理系谢纪康、历史系靳枫毅为首的一批人公开从“新北大公社”中分裂出来成立的反对聂元梓的“革命造反总部”，或称“造反团”，即后简称为“团”派的一批人。

这天，历史系王复兴召集的串联会继续讨论了一天，基本有了一致的意见。当晚，由索世晖起草了他们的《声明》草稿，并在第二天，8 日，开会讨论《声明》草稿。经过逐句修改，最后由“红色清道夫”的张绍清起草了第二稿。。

6 月 8 日，陈醒迈领导的化学系“0363 战斗队”为骨干的“新北大北京公社”也揭竿而起。这支在北大被称为“0”派的队伍，自 4 月以后，通过串连会的方式滚雪球，势力不断壮大，在全校各个系都有了分支，名字是“北京公社”，人数较多，约有近 1000 人，核心力量依然是化学系 63 级反聂力量“0363”。他们参加组建了“新北大公社”，并参加了对“井”、“联”组织和樊立勤炮打康生行为的批判。此时他们从“新北大公社”分裂出来。

哲学系教师郭罗基参加“0”派的“北京公社”并在成立会上讲话，成了反聂的号召人。

于是，在北大出现了 5 路反聂大军：

1、5 月 17 日成立的“新北大东方红公社”，简称“红”，只有几人，头头是樊立勤。

2、“新北大红旗飘战斗队”，简称“飘”，有十几人，头头是法律系学生、原“北京大学红卫兵”负责人牛辉林。

3、“新北大井冈山公社”，简称“井”，其前身是在反击“十二月黑风”中被查封的“井冈山红卫兵”，头头是哲学系四年级学生胡纯和。

4、“新北大北京公社”，简称“0”，头头是化学系的陈醒迈。

5、“新北大公社革命造反总部”，简称“团”。

他们在各自的《宣言》中，都反对聂元梓、孙蓬一、校文革，都认为校文革是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但“提法”和对“反动路线”开始于何时有差异。

“东方红”直接继承“井”、“红”的立场和观点，认为“聂元梓校文革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从 67 年 7 月 28 日校文革筹委会成立后不久就开始了。

“井冈山公社”实际上是被镇压的“井冈山红卫兵”的复活和再生，它对聂元梓校文革执行的反动路线之提法和开始于何时的认识与“东方红”一样，仍是原“井”、“红”的立场和观点。但其头头胡纯和，由于领会过被镇压的味道，颇知安危，不冒风险，行动稳当，故原“井”、“红”的成员参加该组织的颇多。

“红旗飘”对“聂元梓校文革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提法，与“东方红公社”、“井冈山公社”接近，但何时开始执行，它认为是“从镇压‘井’、‘红’开始之时”开始。

“0”派“北京公社”认为聂元梓校文革在“解放”“犯错误干部”问题上“保护一小撮，打击一大片”，犯了方向性、路线性的错误，时间从 67 年 3 月开始。

“新北大公社革命造反总部”基本上同“北京公社”的立场和观点一致。

这五个组织中，“0”派势力最大，影响最大。其次是“团”派。但他们都比较温和，反聂不倒聂，只是对孙蓬一往死里打。而樊立勤发起的“东方红公社”人数不多，但对聂元梓的批判最为激烈。牛辉林率领的“红旗飘”敢说敢干，活动能力很强。还有胡纯和为首的“井冈山公社”，本身就是已经被聂元梓打压过

的组织。他们人数不多，百十人，都是老牌反聂队伍，观点激进，还有反对中央文革的“污点”或嫌疑，所以很多反对聂元梓的人还是与他们保持距离。

同样是在 6 月 8 日这天，拥护聂元梓的“新北大公社联合战斗团”也发表声明宣告成立，头头是卢平，人数有 1000 多人。

当天晚上，聂元梓发表讲话。但是，就连“新北大”的人都认为她的这番讲话是“空谈了一通，继续文过饰非。”两派马上表态：

“飘”“0”“井”“团”“红”当然是纷纷说：“糟透了！”“大毒草！”一时间，“聂元梓回头是岸，孙蓬一下台滚蛋”；“炮轰聂元梓，打倒孙蓬一”的喊声充满了燕园的上空。

而新成立的“联合战斗团”自然是说“好极了”。

面对北大掀起的反聂高潮，6 月 8 日这天，陈伯达赶紧发表讲话说：“对新北大个别同志的意见(指 5 日对聂元梓的批评)是同志式的，是好意，是帮助式的。”他还打电话给聂元梓说：“希望同志们活学活用主席著作，照常工作，把新北大办成毛泽东思想的伟大学校。”

谢富治也解释说：“伯达批评是善意的，为北大同志好。”

但是，这一切都已经很难扭转北大的态势，就是“新北大公社”内部的一些战斗队也纷纷造反，连广播台这样重要的部门都是如此。6 月 9 日，《动态报》编辑组负责人带领了近一半的人组成了“红暴队”，宣布造反，并占领了《动态报》办公地，还发表了《造反声明》，刊登在 1967 年 6 月 11 日“新北大革命造反总部作战组”编写的《动态报》第 1 期上：

造反声明

最高指示

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

一、我们坚决拥护陈伯达、谢富治同志六月五日对新北大的批评。这些批评击中了聂元梓孙蓬一的要害。我们坚持不折不扣地执行陈伯达、谢富治的指示。

二、聂元梓同志是革命红旗。但是校文革和新北大公社总部自今年三月以来，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对此聂元梓同志负有重大责任。必须作触及灵魂的检查，但聂元梓同志至今还站在革命群众的对立面死保孙蓬一，挑动群众斗群众。如不悬崖勒马，势必走向反面。

三、孙蓬一自上台以来，对内压制革命造反派，在外拉一派打一派，动摇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的领导，分裂中央文革，打乱毛主席的战略部署，犯了一系列严重的方向路线错误。孙蓬一必须无条件地接受革命群众的批判，孙蓬一必须靠边站。

四、长期以来，孙蓬一、新北大公社总部把动态组变成他们大搞宗派活动的工具。

同样也是在 6 月 9 日这天，清早，王复兴召集的串联会通过了张绍清的第二稿《首都红代会新北大公社“六．六”串联会声明》。随后，马上抄成大字报并在大饭厅南墙贴出。《声明》共有九点，说：“陈伯达同志对北大的批评非常及时，好极了！”“我们一定要根据中央文革的指示，大造聂元梓、孙蓬一同志错误的反！” “彻底批判聂元梓、孙蓬一的错误，并肃清其影响。”“边

整风，边战斗。” “彻底改组校文革”、“大力提拔革命小将”。同时指出：“死保孙蓬一的错误只能断送北大的文化大革命。”呼吁“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革命的主要对象，革命不共戴天的仇敌”并指责“‘东方红公社’、‘井冈山公社’的跳梁小丑兴风作浪决没有好下场。”

《声明》的最后落款是：“联络地点 38 楼 313、502”。313 室是“红梅战斗队”王复兴、王渊涛、俞政、徐森、张文虎 5 人的宿舍。502 室是“红色清道夫”刘庆柱、张绍清等人的宿舍。

此时，北大“东方红”觉得可以返回北大校园了，于是向校文革申请设立办事处。校文革因“东方红”的头头是炮打康生的樊立勤，就不承认其是“群众组织”，而认为是“反动组织”，不批给他们办事地点。

樊立勤在无可奈何之际，急中生智，去北京地质学院找人，要求支援。他搞来一顶帐篷，把它扎在大饭厅与哲学楼之间的空地上，在帐篷的布门口赫然写着“东方红公社办公室”。

大饭厅近旁原本就是人来人往的热闹地带，樊立勤想借此来出出聂元梓的丑！同时还相信毛主席在中南海很快就会知道这件事！

果然这里一下子就成了一个新闻景点，每天进帐篷参观办公室的人络绎不断，有好事者还用墨笔写了对联、标语等贴在帐篷上，五彩缤纷。

聂元梓跑去市革委会找谢富治告樊立勤的状。谢富治到底比聂元梓的脑子灵光，他一面通知地院来人把帐篷拆走，一面劝说聂元梓可给“东方红”划出一间教室作办公室。最终将第一教室

楼二楼 201 阶梯大教室一间划给“东方红”。

自从陈伯达 “65 讲话”后，“0”派“北京公社”就四处声称要捉拿孙蓬一，“新北大公社”的人没再看到孙蓬一的身影。

6 月 10 日，北大校文革安排孙蓬一在大饭厅传达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布的《66 通令》。当“新北大公社”的人看到孙蓬一挺胸抬头地步入会场，全场一齐拼命为他鼓掌，不少人高喊：“孙蓬一是坚定不移的革命左派！”一齐上去将他围住。当孙蓬一像英雄一样登上主席台时，全场更是欢声雷动。

孙蓬一站在台上，不停地挥动手中的《毛主席语录》。这时，“北京公社”的人突然冲上主席台，要揪孙蓬一去接受批斗。“新北大公社”的人一涌而上，从“北京公社”手中抢过孙蓬一。双方在台上扭打成一团，63 军闻讯赶来，将两派群众强行拉开。把孙蓬一救出来护送走了。

6 月 11 日，孙蓬一在办公楼礼堂传达《66 通令》，“北京公社”没有再冲。孙蓬一准备结束多少天来躲躲藏藏的生活，主动到“新北大公社”参加帮助孙蓬一整风召开的“66 串联会”，接受他们的帮助和批判。谁知，他刚从家里走出来，就在路上被“北京公社”发现了，他们蜂拥而上将孙蓬一团团围住，要扭他去批斗。孙蓬的眼镜和帽子被抓掉，人也被打翻在地，但是他仍然拼死反抗。“新北大公社”闻讯立刻报告驻北大的 63 军，解放军再次将孙蓬一救出来，孙蓬一终于来到串联会上。

6 月 11 日，“66 串联会”的“起风雷战斗队”在大饭厅东南角的南墙上贴出由“66 串联会”核心组成员、化学系陈双基起草的大字报：《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向无产阶级夺权》。这张大字

报是将陈伯达所说“聂元梓代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向无产阶级夺权”这句话，解释成因为世界观的问题而犯了一般性错误的问题，是知识分子必须走和工农相结合的道路问题。大字报说，“曾经起过先锋和桥梁作用的知识分子、青年学生，当革命运动深入发展后，必须和工农结合，否则就会犯错误，动摇无产阶级政权。”“文化大革命的主力军是广大的工农兵。”“北大运动一直是走在前面，当学生运动显示先进性时，我们打了第一炮。现在学生运动走入歧途的时候，由于我们的世界观没有改造好，也带头犯了错误。陈伯达同志的重要指示，给了我们当头一棒，使我们清醒。我们要高举革命批判的大旗，从错误中杀出来。”“这是我们的光荣使命，也是我们对聂元梓、孙蓬一的殷切希望。”“知识分子、青年学生是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彻底改造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因而有两面性。”“身上带有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改良主义等。”应当“对自己坏的一面引起高度注意。”“个别人，不认真改造自己，就必然被历史所抛弃。”“聂元梓、孙蓬一同志，猛醒吧！”

6 月 13 日，北大“66 串联会”用大字报公布了他们的第二号《声明》，共八点。署名“临时勤务组”。《二号声明》提出“在新阶段提出的问题是，背离斗争大方向，热衷于打内战，从右的，或从左的方面，动摇无产阶级专政，”“这种现象，在全市，在全国都普遍存在着。在北大尤为严重。”

6 月14 日下午，北大“66串联会”举行成立誓师大会。38 楼前，红旗林立、歌声嘹亮，“66串联会”的同学们个个斗志昂扬。谁知，大会进行到一半时，突然乌云密布，下起雨来。但同学们

依然在狂风暴雨中情绪高亢。大会结束后，他们冒雨举行了游行。队伍声势浩大，《毛主席语录》歌，革命口号声声不绝。接着，1400多名“66串联会”的同学在办公楼前的毛主席塑像前宣誓：“决心永远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此时，“北京公社”正在办公楼礼堂召开“彻底批判聂元梓、孙蓬一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他们将聂元梓、孙蓬一和“新北大公社”总部的头头卢平抓到办公楼礼堂批斗。“66 串联会”的学生宣誓回来，听到消息，立即赶到办公楼礼堂。63 军解放军也闻讯赶来，把聂元梓、孙蓬一和卢平接走了。

由于“北京公社”在批斗聂元梓、孙蓬一和卢平时，要求聂元梓、孙蓬一承认北大校文革自 1 月以来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而且还要表态承认今天的批判大会是革命的大会，承认“北京公社”是革命群众组织。聂元梓 3 人就是不答应他们的要求。为此，“北京公社”、“革造总部”、“红旗飘”晚上又开始在办公楼礼堂静坐示威。

6 月 14 日，《新北大》校刊发表哲学系“战斗团” 写的《校文革指导思想上的错误必须批判》的长文。文章说，校文革领导人“实际上插手组织北京市两大派斗争”，加深了“左派组织之间的分歧对立”；对两派分歧，“校文革如临大敌，向全校发出的紧急动员令，公然提出‘寸土不让、寸权必夺、寸土必争’这样的对敌斗争口号来鼓动群众。”

6 月中旬，北京大学动态组的刘志菊到北京机械学院“东方红”见北京机械学院学生许维刚，他也是湖南“湘江风雷”北京

支队队长，曾在 1967 年 3 月，将“湘江风雷”捡到的“007 密件”托“新北大公社”动态组组长、北大物理系学生胡宗式转交中央文革。

许维刚见到刘志菊，分析了当时北京的文革形势。北京大学动态组把它整理成《与许维刚谈话纪要》。《纪要》上写着：

“许维刚认为，当前北京文化革命主要矛盾是总理派和文革小组派之间的矛盾，即新文革和旧政府的矛盾。这一次你们北大站错了队，你们站在了总理的一边。你们被老三收买了（老三指总理）。他还说：地派的后台姓林。刘志菊问：是林杰吗？许答：比林杰大得多的林。”

这份《纪要》经北大校文革办公室上报，从此在北大又有了“新文革和旧政府的矛盾”的提法。

6月20日下午，谢富治在人大会堂接见北大校文革代表。接见时，聂元梓要求市革委会帮助解决北大的混乱局面。谢富治拿出一本毛泽东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念了几段，然后说，“北大的问题是人民内部矛盾。”“以造反手段对待校文革是错误的。”等等。当晚，聂元梓在燕南园63号传达了谢富治当天中午的讲话，“新北大公社”士气大振。聂元梓马上布置了校文革继续整风的事项。

## 第 673 回：看浙江，中央下《六六通令》　围“春雷”，“八一五”雨夜驰援

5 月上旬，浙江省“红暴派”为了抗议支持“省联总”的空 5 军军长陈励耘和 20 军军长南萍二人镇压他们，组成了万人“北上控告团”，行至上海被阻，住进上海交通大学。期间，“红暴派”所属的“学暴”下属“119 共联”成员，美院附中应届毕业生陈明昭、莫大林和杭州市公交公司驾驶员杜永生等，在上海交大附近拦截了对立派“省联总”头头张永生、杜英信及还有北京“首都三司”驻杭联络站的头头林岗 3 人乘坐的小汽车，在坐垫下发现了 3 人携带的两大包材料，立即上交“省暴临时总指挥部”，简称“临指”。“临指”的头头有：杭丝联工人翁森鹤、浙江省杭运段工人方剑文、杭运段售票员赵素珍、北京电影学院青年教师司徒兆敦、哈军工学生马康、浙大“红暴派”头头 67 届毕业生周信忠、“119 共联”头头浙大 67 届毕业生黄定宇、浙美附中 67 届毕业生陈明昭、赵建阳、周铁等人。

正在开会的“临指”立即停止会议，看了一整天的材料，晚上决定成立两个材料组来整理和复制从张永生汽车里截获的两大包材料。其中一个材料组对外对内都是保密的，整理绝大多数材料；另一个对内公开的称谓是“北上控告团材料组”，负责整理陈励耘、南萍镇压“红暴”的罪行向中央汇报。北京电影学院青年教师司徒兆敦，浙江大学“红暴”头头、“临指”常委周信忠，“119 共联”组织部长陈明昭，航运段工人、“临指”常委头

头方剑文负责材料组的工作。这些材料中，有清华大学学生林岗3人的笔记本三、四本，有被省公安厅开除的原公安人员写的有关省公安厅厅长吕剑光、丛鹭舟在毛主席住所汪庄、刘庄安装窃听器等揭发材料。

这时，听说张永生、林岗他们已向上海警备区司令部汇报了材料被“红暴”所抢之事，“临指”头头怕这些材料再被追回，于是开着大吉普车在市内小巷转悠大半夜。先在上海巨鹿路市委招待所和以翁森鹤、马康为首的另一伙人会合。不到10分钟，听说有军车向这里开来，于是又兵分两路，离开招待所，在市内转悠很长时间，于凌晨3点多才在杭州市公交一公司的驾驶员杜永生的婶娘家的阁楼里落脚。吃过点心休息一会儿，于4点多钟开始工作。浙江大学女学生余慧文也在其中，她后来成为上海市市长、市委书记、国务院副总理、中共政治局常委黄菊的夫人。

“北上控告团材料组”整理的控告材料一式四份：中共中央毛泽东、中央军委、国务院、中央文革各一份。这个材料组被“临指”任命为“北上控告团”，赴京送这些整理好的陈励耘、南萍武力镇压“红暴”的罪行材料。其余滞留上海的近万名“红暴”的“北上控告团”就此回杭。即便如此，“北上控告团”因为经费不够，也只能俩个人一张票，为了减少查票时的压力，大家分开车箱坐。

后来，给中央文革的那一份材料通过清华大学的蒯大富和陈伯达联系后，在陈伯达接见时，由司徒兆敦、马康、翁森鹤、方剑文、周信忠几个人一起将材料交给陈伯达的。同时面交的还有从林岗他们那里劫获的原材料。陈伯达还和“北上控告团”成员

及“临指”全体常委及各代表一起拍照留念。第二天，“北上控告团”返杭。

6 月 6 日，浙江“红暴”派与“省联总”在杭丝联厂发生武斗。

6 月 11 日，中央召集浙江驻军 209 军、空 5 军和浙江省军区三军代表和“省联总”、“红暴”两派代表到北京开会。

6 月 12 日下午 15 时，张春桥在上海虹桥机场接见浙江赴京人员时说：“中央对浙江局势很关心”，“本来二月份毛主席就要我和姚文元关心浙江问题，到了上海想安排一下，但又不成，马上又要到北京去了。这次来路线都划好了，从济南到南京、上海、杭州，因离开上海两个月，好多问题跟我商量。因此，又拖晚了。”“毛主席和党中央很关心杭州问题，我们认真考虑浙江和杭州的文化大革命，希望北京的会议开得好一些。如果有关方面采取正确态度，那会议开得好，得出来的结论，写成文件，回去执行有保证。”

6 月 13 日下午 16 时 20 分至 21 时 30 分，周恩来、陈伯达、康生、张春桥、姚文元在北京人民大会堂福建厅接见浙江赴京开会的解放军驻浙江三军代表 20 军政委南萍、空 5 军政委陈励耘、20 军 60 师政委董明儒和“省联总”代表以及浙江省军区政委龙潜、浙江省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阮贤榜和“红暴派”代表周信忠、方剑文等人。

接见时，周恩来说：“‘红暴会’采取突然袭击，从华侨饭店把 3 个当权派抢走，不好。违犯‘六条’。” “以后交军管会”，“谁要斗由军管会统一安排，排个次序。”

他对龙潜说："你们的报告不确实，如军区说翁森鹤被打死了，一查并没有死。"

张春桥说："一、军队问题分歧比较大。街上大字报有炮轰龙潜、打倒龙潜、还有枪毙龙潜。对军队这是一个比较重要的问题，这个问题搞清楚了就好办；二、'省联总'对'红暴会'的看法？究竟是什么组织、性质是什么？应该采取什么政策？同样的，'红暴会'对'省联总'的看法。根据这个问题，我们来考虑，对待两个组织采取什么态度；三、最近的武斗，双方都说是对方挑起的，为什么武斗？有无办法使武斗停止下来？对中央的《六•六》通令怎么执行？四、对揭省委阶级斗争盖子的分歧怎么样？还是有人保什么，打什么，还是矛头针对刘、邓和省委？""矛盾各式各样，哪个是主要的？不知双方对此怎样认识。"

周恩来对"红暴"方剑文说："你们抢一百多辆汽车到上海怎么行!这是国家财产，怎么能拿去做派别斗争？"

方剑文说："影响的生产，我们弥补。"

张春桥说："你弥补？!如果这样，铁路上也可以把火车都开到北京去，民航可以把飞机开着满天飞!还行？国家财产，任何人这样做，都不行!"

周恩来问"省联总"张永生："你们同'红暴会'不能联合了？!"

张永生答："军区问题解决了，斗争大方向解决了，和'红暴会'完全可以联合。"

康生说："现在两派都来中央开会，在家的不要再打了，这样中央好解决问题。"

周恩来："农民无论如何不要调，正是农忙。"

张春桥："各通知自己组织，农民不要进城。"

6 月 6 日下午，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 118 厅会见锡兰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桑穆加塔桑，康生、刘宁一在座。

谈到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时，毛泽东说：

中国现在起了变化。这个变化还没有结束，还在进行中。现在已经一年了，再一年差不多了。用两三年时间来完成这种变化，并不算太长。有武斗，大量的是用拳头、椅子、棍子、石头、砖头打。更大量的是口斗，利用报纸、刊物、广播、广播车、大字报、标语，还有很多小刊物。这些报纸何止几百种，我就收到两百多种，看不完。一个学校起码有两派。去年夏天，在北京，左派是少数，去冬今春变成了多数。但是少数派还存在。一个学校是如此，一个工厂也是如此。左派在今年春天掌权以后，又分裂了，两派都自称是左派。中联部也是两派。外交部有人要打倒陈毅，可是陈毅照样当外交部长。我们这个国家真有点怪。好几个副总理都有人要打倒，一个是陈毅，一个是谭震林，一个是李先念，但是他们还是在工作。参加文化大革命的不一定都是无产阶级，甚至混进来一些坏人。但是，主要的是工人、农民、革命的知识分子。总而言之，过去的领导方法不行了，那是官僚主义的，脱离群众的，机会主义的。现在包括外交部这些部门在内，都建立了群众组织来监督工作人员。

针对全国武斗加剧的状况，毛泽东严肃批评了群众组织随意抓人关人，私设公堂的作法。他要中央文革小组到各地去看看。"凡有这种地方，一律解散，一律把人放了！"他严厉地说："不管什么人，打人都要受刑事处分！"

遵照毛泽东的指示,6 月 6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联合发出［67］178 号《通令》，严禁武斗。《通令》指出：

一、除国家专政机关奉命依法执行必要的逮捕、拘留任务外,任何团体和个人,都不准抓人,都不准私设公堂和变相私设公堂。

二、各级党、政、军机关的档案文件和印章,任何团体和个人都不准抢夺、窃取和破坏。

三、社会主义的国家财产和集体财产,绝对不可侵犯,革命群众都有保护的责任,任何团体和个人都不准侵占,不准砸、抢,不准用任何借口进行破坏。

四、严禁武斗,严禁行凶打人,严禁在本单位和到外单位打群架,严禁抢夺个人所有的财物。

五、除国家专政机关奉命依法执行任务外,任何团体和个人,都不准对任何团体和个人进行搜查和抄家。

六、由各地卫戍部队和驻军负责,保证以上各条执行,自即日起,对违犯上述各条的,都要严加处理。对肇事者和背后挑动者,对于打死和打伤人的凶手,卫戍部队和当地驻军有权逮捕和拘留,依法惩处。对于破坏侵占和抢夺国家财产、集体财产和个人财产的,都必须追回,或按价赔偿。对于违犯上述各条的团体,分别视情节轻重,在一定范围内通报批判。

6 月，中央军委将铁道兵的 8711 部队移驻重庆，他们和四川省军区的独立二师都是支持重庆“砸派”，而 54 军仍然鼎力支持重庆“815”。

6 月 1 日，重庆解放军后字 242 部队两派武斗，武斗中越南

留学生被打。

这天，两派还在重庆发电厂、电力技工学校及杨家坪等地发生武斗。

“砸派”重庆大学“井冈山公社”6 月 1 日成立。

6 月 2 日，重大“815”数百人前往重庆医学院就 5 月 30 日 4 人在医学院挨打一事递交照会，提出抗议，结果被医学院及河运校“航锋”组织哄出来。重大“815”恼羞成怒，发誓要“踏平医学院，日烂臭婊子!”这天，两派在重庆医学院附属一院武斗，伤数十人。

当天，两派在重钢和大型国防企业建设机床厂、嘉陵机器厂、江陵机器厂等地武斗。“军工井冈山”赶走了“81兵团65团”，占领江陵厂。

6 月 3 日，重庆市第三中学（今南开中学）两派武斗，死 1 人。

刚成立两天的重庆大学“井冈山公社”这天被“815”派抄砸。

6 月 4 日，重庆市革委负责人布置对“钻进两派”的“国民党残渣余孽”进行清查。随后，市革委人民保卫组，即市公检法军管会布置对全市原国民党起义将领、民主党派成员和无党派民主人士进行摸底排查，列出逮捕、拘捕、集训、管训名单。

6 月 5 日至 8 日，西南师范学院“831 战斗纵队”与该院“815”派的“春雷造反兵团”进行了持续数日的“六·五”武斗，揭开了重庆大规模武斗的序幕。

西师“831”总部设在中文系大楼。离它不远的山头上，图书

馆大楼新建垂成，算是个制高点了。“831”的勤务员周荣事前曾主张占领那幢楼，尚未动作，却被“春雷”抢了先手，并立即着手修建工事。

工事既成，装于楼顶的高音广播便开始宣传，按“831”的说法，算是“挑衅”了。据说，“831”的人到食堂吃饭路过，也有被“春雷”掷石子击中者。于是周荣便有了充足理由，向勤务组坚决提出：“把楼抢过来！”

这样，经过一番策划，6月5日下午，“831”在西农“826”、川外“826”、十三中“九八”、河运“航峰”、重庆医学院等数百人支持下，向图书馆大楼发起了突然袭击。

图书馆大楼刚刚断水，由阅览楼（主楼）和藏书楼（副楼）两部份组成。主楼高四层，副楼高六层，主楼二楼有天桥和副楼相通。“831”从主楼底层和藏书楼同时攻入，将“春雷”完全困在主楼的三层以上，既后便将二、三楼之间的楼梯用炸药炸断，既后又用火烟炙烧熏烤，火中还加上些辣椒、六六粉之类辛辣刺鼻之物以加强熏烤效果，显然是想将“春雷”困死楼顶。事前，“春雷”已有所准备，他们用汽油铁皮桶装了好些凉水，还准备了饼干之类的干粮若干。前来劝架的解放军还用吊篮送去了一些食物。这样，“春雷”得以在艰难困苦下坚持下来。

6 月 6 日，重庆大学“815”向西南师范学院“春雷”派出增援武斗人员。到现场后，因解放军劝阻，于当天返回。

6月7日，西南师范的“春雷”已经被困第3天，重庆大学“815”决定支援西师被困的“春雷”战友。那天下着雨，重庆大学的大喇叭广播，动员大家到操场集合，支援西师“春雷”。大家冒雨

来到操场，那里已经停着几十辆卡车。车先开到三教学楼停下。三教学楼是采矿系大楼，该系同学下矿实习时都由学校配备劳保用品，藤帽极多，大家进去一人取一顶戴上，就出发了。

车开进距重庆大学不远的重庆师专，暮色迷茫的操场上已经停满卡车，也有好几十辆。车上挤满了人，手中全都举着棍棍、棒棒，多无顶戴护卫，装备不如重庆大学精良。满场气氛鼎沸，全不像是去冒死拼杀，而像是去观看世界杯足球大赛一样兴奋。其中一辆大客车是指挥车，重庆大学“815”熊代富是此次行动的总指挥。

由于西师“831”控制了西师和北碚地区的街道。“815”决定天黑以后开始行动。

天慢慢黑净，雨也越下越大，卡车开始编队出发。雨太大，路滑，车开不动，就让大家全都下去推车轮。马达轰隆隆嘶吼，推车人满身泥水，惊咋咋呐喊。汽车灯的光柱里，雨丝如麻，人车乱成一片，让人很容易想起历史巨片中大战将临的镜头。

终于，几十辆满载武斗人员的卡车在茫茫夜色和飒飒风雨中出发了。

西南师范所在的北碚位于重庆市区西北，离市区有四、五十公里，从沙坪坝开车到北碚，正常情况下只需要一个多小时，可那天晚上他们的车却走了整整一个通宵。

天黑如墨，行动又力图隐秘，车速就极慢。车队刚到双碑，突然停了下来，只见一辆吉普车在密密雨丝中逆向而来，车轮吱吱作响，车上人一路用手电筒直射天空。

这是约定的信号。车队立即用手电光回应。指挥车位居车队

中间。吉普车在指挥车前急停，负责侦察的学生跳出车报告，气喘嘘嘘说：前面山谷已被“砸派”用石条封锁，且两边山头疑有伏兵。

车队不敢前进了。总指挥熊代富立即开会商议，并做出决定：令后面的人全部下车，徒步前去包抄山头，打掉伏兵，占领隘口后抬开石条，然后齐喊杀声冲杀而过。等位居后面的空车开到，抢夺隘口的人员再行上车跟进。

战斗进行得比较顺利。不久便得侦察兵报告，说山头已经攻占，隘口已经疏通，指挥车于是下令所有车辆全速前进。那一刹那，恐怖万端的“杀”声在旷野里呼啸而起，真的是撕心裂肺，震天慑地。所有汽车顷刻之间提至全速，疯牛狂奔，猛冲而过。闪过隘口那一刻，可以看见两边站满手握棍棒的人，乱石已被扔向路边。有那么一刹那，山上好像有一根木头滚下，还有一个人跟着滚下来，没及站稳，被“815”发现，冲过去，一棒将其打翻在地。

出了峡谷，几乎凭借一种惯性，车队继续狂野奔突。周围黑不见指，如坠虚空，如临地狱，直向一片未知空间坠落。突然间，惊天动地的破碎声砰然炸响，让人顿然觉醒，很快发现客车两面的窗户被砸得粉碎，碎玻璃四溅，石块飞进。车厢里已有人被砸得尖声怪叫，头部血流如注。前后的车队中也叫声一片。原来还是中了伏击，于是急令停车，派人下去向道路两边的田野搜寻追击。俄倾，平静无事了，车队又缓缓启行。

雨已住，野地里云路俱黑，什么都看不见，害怕再遭伏击，车队只好边停边走，缓慢而行。时近凌晨，好容易快挨到北碚了，

突然又得报告，说前面隧洞里闪烁有光，疑有埋伏。车队只好又停下来，派人包抄山头，打通隧洞。当时已时近五更，年轻人都已困顿难支，昏昏欲睡，不知又过了几时几分，等到把山头占领，曙色已依稀放明。车队行过，隧洞里原来是红农“815”点着火把在那儿接应，算是闹了一场误会。

次第到达北碚，天已大亮，大战将临，大家顿时倦意全无。当地妇女老太箪食壶浆，送来稀饭、咸菜、点心和鸡蛋等物，大家一点都吃不下，急急开车奔现场而去。

## 第 674 回：撤回难，施家梁一场混战　从此后，专业武斗队成立

西南师范就在缙云山下，即使在搞武斗，那校园里依然大树参天、绿荫蔽日，随处都还可以看到花红草绿的景象。当重庆大学“815”赶到西南师范学院武斗现场，看到的完全是一幅典型的原始部落的械斗画面：废墟般的楼顶站满了人，都光着身子，或者穿着破烂不堪的背心，脸、手均被熏得漆黑，头上扎着棉花，白色，可能是没有头盔，所以用被子里的棉絮取而代之，人人手持棍棒，活脱一群头顶插满翎毛的印第安土人木立蛮山荒岭情景。楼间尚有烟火缭绕，其味刺鼻。山城六月，很热了，飘绕的烟火让人更觉酷热难耐。

重大“815”大队人马的突然出现，让西师“831”猝不及防，但“815”也暂时还不知道该如何动手。双方于是对峙，很沉寂，如暴风雨前的宁静。

“815”的指挥现场设在楼旁不远的几株树下。四周作了布防。地上摊开一张示意图。熊代富等人就在这里蹲成一圈商量攻略。接着叫来许多建筑工人，又运来木料若干。很快钉成云梯几把。随后，指挥人员用最古老的办法：射箭，与四楼楼顶上的西师“春雷”交换了信息，攻略便布置完成了。

一会儿，“春雷”从四楼扔下几根长绳，“815”拉过绳头将云梯捆好，冲锋号就凄厉响起：总攻开始了！顷刻之间，武斗人员潮水般从四面八方向大楼冲去，由云梯攀爬而上，多数是中学生，什么装备都没有，光着头，全不顾矢石如雨。很快，有人

被砸，被伤，被坠，血流横飞，喊声震天，但无人畏缩，一个个只是奋勇争先，前赴后继。

飞石是从二楼倾泻而下的，如瀑，如雨，刷拉拉掷地有声。三、四楼的“春雷”为掩护冲锋和登楼者，便奋力向二楼洒石灰，扔石头。云梯上偶有伤者坠落，但更多人已冒死上楼，爬进三楼窗口接应疲惫不堪的“春雷”。

主楼一楼的几个方面已快突破，唯正面大门堆满石条，又有厚厚的黑板阻挡，攻击人员甚显薄弱。先是，双方通过大门上方的天窗互扔石头，外面人多石头多，火力凶猛，很快把敌方压倒了，于是人员就冲上去搬石条，用棍棒砸黑板。

里面的敌人大约已无东西好扔，于是突然扔出许多点心和茶叶鸡蛋之类，攻方多为中学生和农民，一见掷物中有如此美味，马上停下进攻俯首拣拾，一边拣一边揣物入囊。突然里面一阵乱石抛出，当场砸得贪小利者惊呼呐喊，这才不敢懈怠，砸开大门，破门而入，冲进大厅。

其他几方大门早已洞开，“815”呼啸涌进，“831”惶惶作鸟兽溃散。

冲上二楼，见二、三之间的楼梯已经炸断，众人一边搭木板把“春雷”接下来，一边又顺天桥向藏书楼冲击。

藏书楼空间狭小，窄窄楼道更被胜利者挤得水泄不通。

“831”寡不敌众，且战且退，一层楼，一层楼地向上溃去。“815”人多势众，从楼梯通道用急雨狂飙般的石块开道，呼啦啦尾追而上。

“831”兵败如山倒，很快退到六楼：无处可退了。

“815”到达了制高点，如苏联电影之攻克柏林，红旗应当插上国会大厦了。只是空间太窄，也没有红旗好舞动，面前就一大群惊恐万状的战败者，“815”于是得意洋洋高呼：举起手来！缴枪不杀！

失败者举手还是举得很痛快的，而且一个举得比一个快。也有举得稍晚一点的，胜利一方正好就有了表现自己英勇无比的机会，于是便毫不客气地一棒打去，打着哪儿是哪儿：头部、肩部、胸部、臀部……只要打得出血打得叫唤，哪儿都成。可惜满屋子很快就连举得慢的人都没有了，只好就砸碗、砸水瓶、砸洗脸用具什么的，好像器皿也属“砸派”观点，都该挨砸。

满场一派狼籍。后来，对方又组织了几次反冲锋，都无功而返。

俘虏全部押下楼，一清点，多是北碚地区的中学崽儿。“战斗”结束，俘虏全关在大楼旁的平房里。后来通知家长逐个领走。大学生有十来个，全都被捆绑得十分结实，像箍桶一样，押回重大。路上怕他们喊叫，又从地上胡乱拣些破布、臭袜子往嘴里一堵。然后像木料一样塞到大客车的座位下面。担心路上遭到对方武装拦截，为了掩护，车前还挂了个“31路”公共汽车标牌。

事发第二天，重庆街头就出现惊人消息，说西师“831”在“六五血案”中有“三百壮士”跳楼，其悲壮程度丝毫不让于抗日战争著名的狼牙山五壮士。这当然是夸张，子虚乌有。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北碚是个小小城镇，蔚蓝的嘉陵江水静静地绕城而过，背后是郁郁葱葱的缙云山，山下则是有名的北温泉，很早之前就被称为“重庆的后花园”。就这么一个弹丸之地，

却摆布西南师范学院、四川外语学院和西南农学院三所高等院校，算是文化礼仪之邦了。本来人就少，低头不见抬头见，很富于人情味的。“六五”这么一打，双方杀红了眼，怨怨相报，很难再相处了。于是，重庆西师图书馆大楼被攻克之后，第二天，6月9日，重大“815”带着西师“春雷”撤出北碚。害怕被报复的北碚“815”观点居民也跟在后面撤退。熊代富走在最前，其后是疲惫之师和扶老携幼各色人等。车少，就先运老弱病残，运进城，再返回来。为加快速度，车来回接运，人则不停步行向前。速度很慢，一步一步挨。绵延数千人，让人想起《三国演义》中刘玄德携民渡江时的尴尬和混乱。

队伍刚刚离开北碚不远，出隧洞，行至一个叫施家梁的地方，突然有若干卡车呼啸驶来，与“815”的疲兵惫勇伤病老弱逆向而行，向北碚行去。“815”很快发现车上人员均头戴藤帽、手执棍棒，预感事情不妙，忙大叫中了埋伏！

为时已晚。这时，从市区前来增援西师“831”的“砸派”几十车人马从前后两个方面将“815”堵截在狭长山谷中。

原来，得知西南师范学院“831”吃了大亏的重庆“砸派”，由“机关司令部”和军工“井冈山总部”组成了支援队伍，于6月9日动用卡车几十辆，浩浩荡荡开往北碚。但是去了以后才知道，西师的武斗已经结束。重庆大学的支援队伍刚刚离开北碚返校。

“砸派”大军一鼓作气，回头追击重大“815”的队伍，在北碚出来不远的施家梁，终于追上了。

“砸派”人多势众，复仇心切，追上来就开打。“机关司令

部”去的有许多是体委的运动员，加上军工“井冈山总部”的都是工人，膀大腰圆，打得重大“815”漫山遍野，落荒而逃。

还好，那一路段正好是三叉路口，有一小桥，穿桥而过的一条小路可抵达嘉陵江边，“815”便踞桥狙击，掩护撤退。只是路太窄，不可能疏散出多少人，而且对于不会水性者也是一条绝路，更多的人便往旁边的山上跑。“815”连续作战3天，体力明显不支，其状可谓落花流水。

山坡陡峭，杂木乱生，重庆大学几个学生在山里走了 3 天，饿得不行了，突然发现半山上有个小店，遂强行把柜台上唯一的食品：玻璃罐里剩余不多的硬糖全倒出来吃了，并对小店的主人说是“借”，看他们蓬头垢面，满脸凶相，谁敢不借？借条倒是写了一张，事实上，哪有工夫去还？对方又怎敢来讨？逃命回校，幺店子在什么方位也不知道了！更何况兵慌马乱，还有什么信义好讲。

重庆大学还有一个长跑运动员，冲出重围就一刻不停地顺着渝碚公路向沙坪坝飞跑，一直跑到二机校，那已经是“815”势力范围了，中学生前去搀扶时，他只说了一句话：“我们遭伏击了！”就昏迷过去。醒来已是第二天，他发现自己躺在一张陌生的床上，是该校的学生宿舍。一个女孩子正在给他打扇。从施家梁到二机校距离有几十公里吧？所以大家就把他比作马拉松英雄。

最惨的是重庆大学“815”总团负责人、市革联会副主任熊代富，他在混战中被“砸”派俘虏，先是被打得昏迷不醒，继而被对方用铁丝和绳索反绑起来后扔进西南农学院的大棚泥地里，

醒来已经不知过了几日几夜。后来又被注射大量麻醉剂，给他披一件雨衣，由人以护送病人上京救治为名，在茄子溪或者离重庆更远的一个小站上了车，送上去北京的火车，准备作为进京告状的活证据押送北京“交中央文革处理”。

熊代富一上车就关进了一间软卧车厢，房门终日紧闭。绑架者鬼鬼祟祟的行动很快被一个叫徐登贵的乘警看出疑窦，他是“815”观点，也见过熊代富。他很快取得了车上同观点的人的配合，在列车到达前与北京站派出所的警察取得了联系，绑架者刚刚背着熊代富走下火车，立即就被警察截获了。

熊代富被民警截获，虽算是逃出“砸派”虎口，日子也并不好过。大约被公安部门是作为疑犯或者什么身份可疑者关进某接待站，也全然没有人身自由。在重庆，熊代富是个跺跺脚都能让地皮发颤的人物，可在天子脚下，他却一文不名。就那么关着，不管你是谁，就是不放。后来重庆大学的“815”急了，派出一个强大的营救行动小组，赴京营救。

熊代富被营救出来了，但是他的手由于长时间捆绑，血脉不畅，最后一个手肌肉坏死，整只手变形如鸟爪一般可怕，无法复原了。

熊代富回到重庆后就住进54军医院，从此淡出文革，没有再参加以后的重庆武斗，因祸得福。

施家梁一战让重庆大学参战者惊心动魄。逃回后，许多人从此就逍遥于运动之外了。

这次追击战重庆“砸派”取得了“重大胜利”，他们称之为“施家梁大捷”，“815”称之为“施家梁血案”。

6 月 9 日这天，西师“春雷兵团”撤到嘉陵江北岸天府煤矿。天府煤矿“砸”派撤出。

6 月 9 日，重庆“革联会”召开“815”派各大组织会议，总结西师“六五事件”教训。他们认为：不能老说自己怎么被动怎么受害，仅仅博取老百姓的同情已毫无意义。解决问题，归根结底得靠自己“跎儿”（拳头）大。基于这一点，重庆各区“815”派开始建立“捍红指挥部”。

“砸派”自然不甘落后，“北碚猛虎团”、“黄山警备区”等专业武斗组织也纷纷建立。重庆大学“815”著名的“野战部队”代号“301”和“卫戍司令部”代号“302”也在 6 月 10 日成立。“301 野战队”主要负责校外武斗，“302 部队”则是负责校内武斗及治安。“部队”成立后，重庆大学特地去搬装公司请来一位武林高手作教员，上千大学生每天在这位武星带领下练拳习武，偌大的重庆大学团结广场便杀声震天了，很有些全民皆兵的豪迈景象。

此后，重庆两派都开始紧张备战，准备木棒、钢钎，囤积砖头、石块，修筑工事、战壕，组建武斗队、敢死队。虽然驻军不断发通告，要制止武斗，但越制止武斗越厉害。大坪、石油路、袁家岗这三角地带，有河运校、石油校和机制校、五一技校等好几所技校，还有重庆医学院，两派势力相当，加上技校的学生有力气，本来就爱打架斗殴什么的，武斗也就特别厉害。

所谓钢钎，其实就是长矛，用直径 20 毫米左右的钢管做成。水管要不得，太重，挥舞起来不灵活。钢管的一头要锤扁，以增强杀伤力。这样的钢钎可以刺，可以打，但一般难以致人于死地。

后来，为了增加杀伤力，又在钢钎上面插一把刺刀。那时，建设厂大量生产半自动步枪，那枪上要装那种约两尺长的带血槽的三棱刺刀，于是便拿来装备钢钎。找不到这种三楞刺刀的，便用三角刮刀代替。连三角刮刀也找不到的，便找来钢条、钢带或废锉刀之类，在砂轮上磨成带尖带刃甚至带血槽的家什，固定在钢钎上。有的甚至还把那刺刀磨一两个倒钩，相似于古代的那种钩镰枪，一旦刺进人肉里再扯出来，就会带出一大块肉。与古时候赵云、岳飞之流使用的什么金枪银枪相比，那钢钎更加了得，也更加管用。雪亮雪亮的刀尖枪刺在阳光下闪着寒光，谁不虚他三分？

拼钢钎讲究人多势众。一排排人，穿着清一色的劳保服和劳保皮鞋，藤帽压得矮矮的，有的还戴上一个大口罩，一人握一根钢钎，在口哨声中一起进一起退。文革中，到处都是高音喇叭。武斗一开始，便放“骑兵进行曲”、“解放军进行曲”之类旋律激昂的音乐。也有的武斗队有自己的战歌，武斗时就放那战歌来助威。“反到底”派的河运校航锋战斗团，把“水兵进行曲”作为自己的战歌：“红旗飘舞随风扬，我们的歌声多么嘹亮。人民海军向前进，保卫祖国海洋信心强……”那旋律也很激昂。这样，在气势上便先胜一筹，那表面上的威风也足以吓倒胆小的人。

随着武斗升级，钢钎做得越来越长，有的竟达一丈余。拼钢钎的战术技术也日益改进，渐趋完善。那年月，“全国学解放军”，工厂学校都要进行军事训练，年轻人谁都会几手拼刺刀的动作，谁都知道“二百米内硬功夫”、“刺刀见红”等军事术语。

“突刺——刺！”

“杀——!”

“防左——刺!”

“杀——!”

“防右——刺!”

“杀——!”

各个学校的操场上，都可以见到演练的武斗人员。重庆的军校多，那时，军校的学生和教员也分成两派，他们主动到各个学校去当军事教官。教官耐心教，武斗队员认真学，哪怕他烈日当头，哪怕他满头大汗浑身湿透，也不喊苦不叫累。于是，战斗技术大长进，战斗力也逐日增强。

拼钢钎，双方面对面，关键在于不要虚，不要怕，要有敢拼敢打的气势，当然也要有力气。两军对垒，各吹各的口哨，一起进，一起退，不战上十来个回合，不会收兵。拼钢钎时，即使害怕，也不能丢掉钢钎转身逃跑。如果那样，屁股上肯定会被戳几个窟窿。而且，一人逃，便会影响整个战斗队，非吃败仗不可。因此，一般情况下，总是让身强力壮的、不怕死的大个子站第一排。只要这第一排亡命往前冲，把对方的队伍冲散冲乱，就能获胜。

在以后的 3 个月里，重庆到处都在进行钢钎大战，冒出好多“武斗之花”。特别是那些技校的，很是了得。钢技校的，一律白色劳保服，可能最威风。石油校的，则戴清一色的铝盔，可能最管用。为了减少伤亡，有人发明了盔甲，就是用一块铝板做的，吊在胸前，银光闪闪，足以抵挡那刺刀枪刃。其实，吊一块铝板，人不灵活了，反而容易被对方刺中。不过，那铝板铝盔的武装，

在气势上似乎又略胜一筹了。

## 第 675 回：长沙城，围攻中苏友好馆 突围难终发生“六六惨案”

湖南省军区自 616 回提到的 5 月 9 日“红中会”等群众组织的静坐事件后，虽然有毛泽东 5 月 14 日对湖南省军区 5 月 12 日检讨报告的转发批示，但是其被动局面并未改观。湖南省军区司令员龙书金回到长沙后，给广州军区副司令员詹才芳打电话，请求军区派一名首长到长沙，帮助他做好稳定军队的工作。詹才芳第二天向广州军区政委刘兴元汇报，刘兴元说：“广西告急，广东告急，你不是不知道，湖南还有谁去，你身体不好，能去吗？”

詹才芳说：“现在湖南问题是军内支左不统一，三驾马车各搞一套，龙书金统一不起来，这样下去，怎么得了，如果没有人，我去几天吧！”

刘兴元同意，5 月 22 日，詹才芳前往长沙，召开了有湖南省军区、47 军、长沙军政干校参加的领导会议，听取汇报，分析形势，针对支左中出现的问题，重新调整了湖南省支左领导小组，解决湖南省军区与军政干校的紧张关系。

这时，湖南两派群众组织的矛盾更加尖锐。进入 4 月下旬以后，湖南“工联”派已在长沙工人和市民中大得支持，“高司”派设在湘江河东市区的 16 个广播站连续被“工联”、“湘江风雷”派群众砸抄。

5 月 31 日，湖南“高司”财院设在湘绣大楼的宣传站被“工联”派砸了，在此的财院学生跑到中苏友好馆与这里的矿冶学生汇合，馆内持“高司”观点的学生有 200 余人。

6 月 3 日上午，“长沙市搬运公司六号门挺进纵队”向“高司”发出“武斗照会”，并提出相约武斗的三个条件：“（1）、时间在一星期内，由你们选择，但必须是白天。（2）、地点必须在你们老巢中苏友好馆。（3）双方如有伤亡，各自料理”。

“长沙市搬运公司六号门挺进纵队”，简称“六号门”，是借用五十年代一部讲述搬运工人抗暴故事的电影片名《六号门》。该组织声称是“刘邓路线下受压迫最苦大仇深”的搬运工人的造反组织。搬运工人孔武有力，性格粗豪，不怕打架，和“高司”派经常有点摩擦。

“高司”接到“六号门”的照会，也有几分“秀才遇到兵”的畏惧，但明确表示决不退让的立场。

6 月 4 日，围观中苏友好馆的人群慢慢增多，没有旗帜和标语，看不到有组织的行为，乱哄哄的。吆喝声不知在哪里一喧起，人群便会一阵骚动。

后来，双方开始进行石头、砖头战。“高司”退进大门内。

到了晚上 22 时，中苏友好馆外有人向院内投掷自制的燃烧瓶，还有人在正门纵火，中苏友好馆门前，烟火弥漫。院子外边的人群，从中苏友好馆门前一直拥挤至五一路解放碑。

终于，中苏友好馆前面的围墙被推倒，一帮年轻人捡起围墙砖块朝大楼内投去。每当击中窗户，哐当一响，被击碎的玻璃散落下来。此时楼上的喇叭会发出叫喊，指责围攻的人是破坏国家财产的暴徒。四楼的窗口架立了几个棕绷床，可防砖块打击。从黑呼呼的棕绷后面，可以看见一个身穿红色背心的男青年，他一边抽香烟，一边观察楼下的动静。

院子外边的人群中，已有近百人受伤。当晚，五一路马路两旁，不断有被石头打得头破血流的受伤者，匆匆赶往医院。

也有几个不要命的，背上扛着门板，弓着腰，像乌龟一样，冒着如雨点般落下的砖块，进入到一楼前厅。他们找来一堆家具和木版，堆放在楼梯口。然后点燃了火。浓烟顺着楼道往上冒。他们是想用浓烟熏楼上的学生，迫使他们离开大楼。但是这些努力作用不大。楼上有很多房子，空间较大，浓烟熏不到楼上的学生，没有一个学生从楼上下来。

第二天，6 月 5 日，中苏友好馆外的人越围越多，其中有各造反派的人散布在人群中，但更多的是一些街坊地痞、市井流氓，这些人成为打头阵的先锋，石头战一开始，这些人就顶着门板，将石头砸向“中苏友好馆”的门窗。停停打打，人群中不时有人被石头击中，愤怒在不断的增长，骂声、叫喊声此起彼伏。

下午，以“湖南井冈山总司令部”名义，“工联”派召开了一个有 30 多个造反组织参加的会议，决定支持“六号门”行动。

楼内被围困的学生和“真理军”已经多次派人向总部求援。面对中苏友好馆的危局，“高司”总部的头头心急火燎，于 5 日下午，再次召开紧急会议，讨论派出增援队伍援救中苏友好馆问题。

会议决定，于当晚派出最有战斗力的“红色怒火”敢死队，并以大队人马作掩护。“红色怒火”是当时声震长沙的专业武斗队伍，外号“土联动”，相当一部分人是湖南省军区的干部子弟，武斗中格外敢拼命。

当晚，“红色怒火”一行 50 多人的敢死队，大部分人是工人

和返城知青。他们头戴柳条帽，身穿紧身黑衣，手执木棍，在300多人的掩护下，乘着夜色，冒着雨点般的石块，驱散了聚集在中苏友好馆外面的人群，冲进了被围困的“中苏友好馆”大楼。

进到大楼才知道，情况远比想象的要糟糕。因为断水断电，楼内一片漆黑，里面的人有好多天没洗澡了，身上发出令人窒息的汗臭。吃的更莫讲，就是法饼和水塔里的陈水。法饼，系湖南传统特产，是湘式糕点品种中的一种方便食品，为湖南中式糕点中唯一发酵的产品。

湖南法饼

楼里的人已个个精疲力竭，人不人，鬼不鬼的。“红色怒火”给里面送去了法饼和黄瓜，劝“高司”撤离，但是里面的“高司”学生坚持继续坚守。

在“中苏友好馆”外墙门口挂着“高等院校造反司令部”的牌匾，已经被砖头石块砸得面目全非，一面“红色怒火”的红旗悬挂在二楼窗户阳台的位置。

夜已深了，外面的人又重新围了上来，外面喧闹声更甚，时不时听见石块砸碎窗玻璃的响声。

防守在馆内的“高司”学生、“真理军”和“红色怒火”敢死队试图突围，均遭围在馆外人员围攻追打。遂退守防御。不知是谁带了弹弓和钢珠，一射一个准，只听见外面大叫：

“不得了啦，保皇派拿小口径步枪打人啦！”

这还了得，居然还敢用真枪？！外面疯狂的群众拼命了，更加猛烈地轮番发起了冲击。

6 月 6 日凌晨 3、4 点钟，大门终于被撞倒，愤怒的人群如潮水般涌了进来。只听见大楼走廊里咚咚的脚步声和怒骂声，还有惨叫跌倒的声音，黑压压的人群奔过来了。部分学生从右边门逃了出去，顷刻间右边门也堵上了。没办法，只有往楼上撤，有几个人一直跑到三楼的一间空房，情急中将庞大的展览台座拼尽全力移至门上顶住。外面有人狠狠地擂门，台座吱吱的响，门缝越来越宽，依稀看得见一只只瞪得滚圆的眼睛，万分紧迫之下，屋内的人不约而同翻上了窗台。楼下是后院，十多米高的水泥地，平时望望脑壳都发晕，此刻可什么都顾不得了，只有一条可能的出路：跳楼。

窗外晨风嗖嗖，此刻他们脑海里不知为什么闪现出了狼牙山五壮士的画面，这难道就悲壮吗？他们几乎是同时跳下去的。只觉耳边呼呼生风，紧跟着双脚猛地一震，膝盖摁得两胁生痛。好在院墙不算太高，他们跳下后翻过了后院，才发现跑出来的只有 3 个人。

院墙外是一条死巷子，叫犁头巷。早起的居民看见不知从哪里跑过来面色青暗的几个活鬼，都吓得纷纷躲闪，关门不赢。他们急忙把柳条帽取下丢了继续狂奔。一口气跑回家里脸色还是青的，手脚发凉，就像大病了一场，脚拐也拖了十多天才消肿。

上午 9 时，馆内再次着火。只见中苏友好馆的窗口冒着余烟，楼层烫人，一些打赤脚的学生被烫得嗷嗷直叫，空气中弥漫着使

人窒息的气味。……

楼梯断了，进攻方一时无法上楼。

解放军赶来制止武斗，未成功。解放军的汽车被烧，烧汽车的照片还被登在香港报纸上。

天气炎热。楼上的人分为两组，留下一组掩护另一组突围。10 时左右，随着中苏友好馆里面突然爆出的口号声和呐喊声，150 名大学生手执刀、棍、钢叉从里面冲了出来，包围在外面的人群见状纷纷后退躲避。

从中苏友好馆突围出来的大学生们随即丢掉了手上的“武器”， 分散往河西方向和城北湖南医学院方向拼命逃窜，一下子就被刚刚后退的众人分头追打。马路中间花木围栏的木棒成了造反派手中的主要武器，打向了已经手无寸铁、突围出来的大学生们，只听到木棒打击在人身体上的“嘭、嘭”声，求饶声、哭声、叫骂声混成一遍，仅仅只有十几分钟，还来不及反应，已经倒下了 7、8 个头部和身上流着鲜血的人，也不知道是死还是活着，只听到救护车鸣着凄厉的叫声开来了，把倒在地上的大学生拖到车上迅速的开走了。

一个跑出包围圈的大学生头部流着血，跪在五一广场围栏的石戥上，哭求着不要再打他了，有十几位市民围着他，很同情的议论着，最后是在几位市民的保护下送去了河西高校安全区。

那边，一伙人正围住另外一个，用的是钢丝皮鞭，那人一脸的血，被打的人最后被人用半尺深的螺丝刀插入后胸，跑了几步，便一头栽倒。

旧新华书店门口，有两个人正询问一个讲普通话、戴眼镜的

人，当从戴眼镜人身上搜出高校饭堂票后，暴行立即开始，戴眼镜人奔逃，后面一群人紧追，那人一直逃到邮局内，跳越过营业台，哭着请求营业员保护，但当时的环境和气氛，哪有这种可能？随即被拖出，当场被打得奄奄一息，不知哪个好心人叫来救护车，被抬到车上，眼看就要开车离去，但匪夷所思的是，又被人残忍的拖下来，最后，一个几十斤重的路边垃圾桶水泥坐就重重的磕在他的头上。只见这个人上身赤裸，趴在五一路邮局对面的马路上，一动不动，边上围观的人不断地在说："好造孽啊，活活地被打死了"。

当人们沿着蔡锷路向北走去，突然听到后面"唰"的一声，回头一看，只见趴在地上的那个学生竟又站了起来，摇摇晃晃地向水风井方向走去，此刻马路中间除了这个学生，已空无一人。

从馆内冲出的大学生，被打死 2 人，伤 29 人，其中重伤 7 人。

中午 12 点以后，馆内剩余的 84 人陆续向外突围。又被打死 5 人，伤 33 人，其中重伤 19 人。大部分人从中苏友好馆后侧的两条小巷：南阳街和文运街，冲出重围，跑到兴汉门外，湖南医学院。在那儿他们得到医学院持相同观点的学生的接应，逃过劫难。

6 月 6 日下午 15 时 30 分左右，大楼外面围着的人越来越多，声浪越来越大。有小孩向里面掷砖头。

围在大楼外面的人们脸上充满了仇恨的戾气，嘴里吐出一句句恶意的言语，眼珠子鼓得像要蹦出来，浑身的肌肉绷紧，随时会爆发出可怕的力量。有一个极为壮硕的男子，黑黑的脸膛，身

穿短袖“海魂衫”，有一身腱子肌肉。他在人群中狂躁地走来走去，口中念念有词，狠狠地吐着口水。此刻若有人挡在前面，那他一定会遭殃。

已是下午 16 时左右，一个知识分子模样的年轻人，瘦高个，戴眼镜，头上一顶白色的太阳帽，身穿白色短袖衬衫和浅色短裤，着塑料凉鞋，他还背着一个挎包，看上去就像是个大学生，而且，这种穿戴显得与周围的人十分地不协调。

他可能是已经听了一会儿，然后做出一种不以为然的样子，说：“你们怎么可以这样呢？会出问题的。”

他的话还没落音，立即遭到身边人们的呵斥，“海魂衫”像发现了猎物的猛兽，转过身对着他，仔细看了几眼，然后压低嗓门问道：

“你是‘高司’的吧？”

完全没有意识到危险临近的他做出一付哂笑的表情，说：“我是不是‘高司’的又怎么样？”

“海魂衫”怒吼道：“你就是‘高司’的！打！”说着就扬起右拳，“嘭”地一下打在他的脸颊上。他的身体朝一侧趔趄几步，差点摔倒。他惊骇地瞪着眼，张开嘴正要说话，“海魂衫”的第二拳已经击打在他的前胸，他的身子往后倒去，帽子掉落在地，紧挨着他的四、五个男人喊叫着：“打‘高司’的啊！”伸手揪住他，拳头和脚嘭嘭嘭地落在他身上。他被他们提着打，不能躲闪。他的挎包带从肩上滑落，他试图弯腰捡起挎包，有人一脚踹在他的后腰上，他表情痛苦地倒在地上，口里发出了呻吟，鲜血不知道从哪里流出来，脸上和身上都沾染了，粘稠的，颜色

发乌。他挣扎着用手撑地想站起来，后背又挨了一拳，接着又是一拳，然后胸腹部“噗”地一声被踢中，终于扑到在地上。

“海魂衫”喊道：“今天老子就是要你的命！”转过身几步走到绿化带，拔起一根木桩。看到这个举动，人群“啊”地发出了一声惊呼。

“海魂衫”大步走过来，粗声喘着气，对倒在地上的他说：

“你这个‘高司’的狗杂种，看我不打死你。”

然后举起碗口粗的木桩打在他的胸脯上，只听见一下沉闷的声响。

“海魂衫”得意地笑起来，“你晓得老子的厉害了吧，”举起木桩，又是一下。

那个戴眼镜的年轻人毫无声息地躺着，最后一下打在他的头部，很清脆的响声。

“海魂衫”突然意识到了什么，周围所有的人都沉默地看着地上那个死了的人。

“你装死是吧，明天老子再来，打死你！”就像鲁智深打死镇关西以后一样，

“海魂衫”说完，丢下木桩，匆匆离去。

下午 16 时，院子外边的人群占领了中苏友好馆。

这次武斗事件中，共打死 10 人，即“高司”派 7 人，“工湘”派 2 人，无辜学生 1 人；伤 215 人。砸毁省军区大卡车 2 辆，吉普车 1 辆，摩托车 1 辆，市公安局吉普车 1 辆。拆毁围墙、房屋损失约 10 万余人民币。

这就是众说纷纭的“六·六”血案。长沙城内气氛极其紧

张。

## 第676回：众领导，接见湖南章伯森　定计划，“百万雄师”扫江城

中央文革小组得到长沙发生“六·六”血案的报告后，立即于当天，6月6日21时25分发出关于长沙武斗事件的急电：

长沙工联：

关于长沙武斗事件，中央文革小组有以下三点建议：

一、立即停止武斗，有分歧要用协商的办法解决。

二、请章伯森、梁春阳同志协助湖南军区，制止武斗，并同军区一起参加双方的协商。

三、严禁打、砸、抢、抄、抓，杀人、放火凶手要拘留法办。

中央文革小组

一九六七年六月六日

当晚22时，长沙市公安局掌权的“高司”派组织“长沙市公检法夺权委员会”，面临流血冲突态势，竟全部避难躲进省军区，使市公安局几成空城。次日，不明真相的群众蜂拥而入，使公安局大院如同任人出入的集市，很多市民深感不安。“红中会”知道后，迅速组织队伍进入公安局，把守住各进出口，初步控制了局面。

6月7日上午，在《湖南日报》召开造反派联席会议，各组织到会踊跃，气氛凝重，议题集中，意见统一，前所未有。会议在“工联”唐忠富和《湖南日报》“红色新闻兵”黄振东的主持下，一致通过决议：成立由各组织共同组成的“革命治安指挥部”，

设在省体委内，填补由于“高司”派的“长沙市公检法夺权委员会”弃职逃逸造成的治安真空。

入夜，成立不久的长沙警备区司令部派员接管市公安局，“红中会”办完移交事宜后即退出，文件档案、钱粮财物无一损毁遗失。

6 月 7 日凌晨，天安门金水桥上用两块砖头压住在桥栏杆上的一张大字报骇然展现在人们眼前，标题是几个红色的大字“惨！惨！惨！”用广告红刷下一片血迹，太抢眼了，使你不得不驻足细看：6 月 6 日长沙市中苏友好馆发生特大惨案，革命学生死伤无数……落款又是几个血红的大字“红色怒火”。这是正在北京上访，向中央文革“告章伯森”的湖南“高司”学生写的。6 月 6 日，他们接到长沙留守同学的电报，知道长沙中苏友好馆发生特大惨案，死了人。他们迅速写了几张大标语，贴在天安门、西单、北大等处。

6月8日，湖南省军区发布了《六八通令》，点名批评了“工联”等组织，宣布“工联”和“红色新闻兵”6月7日在《湖南日报》成立的“革命治安指挥部”为“非法组织”。随即，“革命治安指挥部”也颁发了一个与《六八通令》针锋相对的《重要通告》。

6月9日，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在北京听取广州军区温玉成汇报湖南问题。

几天以后，一列几百人、头戴柳藤帽、腰系军用皮带、手执长棒的的队伍，有男有女，有的表情阴沉，有的泪流满面，好像怀着赴死的决心，整整齐齐地从湘江边的五一渡口向“中苏友好

馆”走来，走近“中苏友好馆”时，高呼：“青松不老，‘高司’不倒！”当队伍走到中苏友好馆前，宣传车上的喇叭发出指令，指挥游行队伍停止前进，全体人员排成四横队，面对中苏友好馆大楼默哀 3 分钟。高音喇叭播放国际歌，气氛十分悲壮。他们是从河西过来的“高司”队伍，向“牺牲”的战友致哀，然后又整整齐齐地回到河西，无人敢阻拦。

湖南的局面惊动了北京的毛泽东，他要周恩来亲自解决湖南问题，并批示要省军区彻底“放人”，把关押的群众组织的骨干分子释放出来。

6 月 11 日，周恩来要湖南省省委候补书记、副省长章伯森，省纪委副主任梁春阳和在湖南省军区检查工作的广州军区副司令员詹才芳到北京汇报情况，协商解决矛盾。但打了几个电话也找不到章伯森。他打电话找到正在长沙的广州军区副司令员詹才芳。詹才芳立即与解放军军政干校刘顺文校长联系，刘顺文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打听到章伯森在黑石铺的农村，便带着詹才芳赶往黑石铺。途中遭一群手执大刀、木棒的群众捆绑，危急之时，幸亏舟桥 84 团一个排的官兵乘车赶到，解救了他们。

6月15日凌晨4时，周恩来亲自打电话给章伯森，要他马上随广州军区副司令詹才芳去北京汇报湖南文革情况。上午11时，章伯森与省委机关支持造反派的省计委副主任梁春阳等立即乘机赴京。

6月16日下午，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杨成武、戚本禹、姚文元等中央领导人接见詹才芳、章伯森等人。一坐下，周恩来、陈伯达、康生就热情地、以非常关怀的口吻问了章伯森、梁春阳

被斗被打的情况，章伯森、梁春阳简要如实地作了汇报。

周恩来听了，面带笑容地问道："怎么样？怕不怕？"

章伯森、梁春阳说："不怕，这对我们是一场考验。"

在谈及军区的情况时，周恩来面对章伯森说："你们湖南军区搞得好凶啊！"

章伯森没有完全明白问话的意思，便说："怎么个凶法？"

周恩来说：军区搞了四道防线，一道如何，二道如何，三道四道又是如何……

章伯森、梁春阳根本不知道这些情况，便回答道："不知道。"

周恩来笑了，说："你们不知道，反正我们知道了。"

周恩来把脸转向詹才芳，意味深长地说："湖南是主席的故乡，文化大革命搞得很不好啊！"

他接着问："听说部队战士练刺杀时，把章伯森、梁春阳当靶子，大喊杀杀杀，杀死章伯森、杀死梁春阳，有这回事吧？"

詹才芳说："有这样的事。"

中央首长听了气愤地说："你们这样做，让战士们站到什么立场上去了！"

当谈话涉及到"章、梁后台"时，康生对戚本禹笑呵呵地说："'高司'揪章伯森、梁春阳的后台，这个后台就是你，搞到你头上来啦！"

戚本禹笑着说道："揪就揪吧，斗就斗吧！"

谈话中，周恩来告诉章伯森、梁春阳，说湖南省军区的报告中说"工联"要搞掉章伯森和梁春阳。

会上，詹才芳汇报"'工联'要冲军区，夺军权。"梁春阳

立即向周恩来保证说："我们革命造反派绝不会冲军区，绝不会夺军权！"

周恩来听了，对章伯森、梁春阳、詹才芳3人说："造反派冲击一下军区，有什么了不起。"

詹才芳又汇报说："长沙军分区政治部副主任张宏强说：'军队不要支左了，让群众自己搞算了。'"

章伯森向周恩来解释道："情况不是这样。据我了解，老张的意见是那时军队没有支持真正的左派，而是支持保守派，应该把部队调回来整训一下，再去执行支左任务。"

周恩来听了说："情况是这样？那就把张宏强同志叫来。"

……

谈话中，周恩来请他们转告湖南两派：

（一）不要上街游行；

（二）不冲击别人；

（三）不搞武斗；

（四）不号召农民进城；

（五）学好文件，搞好生产。

他说：这五条谁执行好，谁就是毛泽东思想红旗举得高。

汇报时，章伯森说了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华国锋、万达的情况，希望中央能让华国锋、万达出来工作。

6 月 20 日，在北京的章伯森、梁春阳与"工联"头头胡勇一道，向总政治部主任肖华汇报湖南军区介入地方文革的情况，肖华向他们传达了周恩来的指示："找华国锋、万达来京。"

当晚，兴高采烈的章伯森从北京打电话给长沙方面，传达周

恩来指示："要华国锋、万达明天上午来北京。"

此时，华国锋、万达等省委领导已被"工联"秘密抓到"工联"掌权的长沙汽车电器厂内软禁。5 月 19 日，"工联"等组织还召开大会，批斗了省委第二书记王延春和省委书记处书记的华国锋。章伯森自 5 月 12 日"亮相"支持"工联"后，便建议"工联"做华国锋的工作，争取华国锋也能"站过来"支持"工联"。被章伯森说服的"工联"头头立即采取行动，胡勇亲自出马找华国锋谈话，希望他也能象章伯森等人一样，站出来公开支持"工联"。

华国锋对胡勇当时的劝说，虽然没敢取对抗方式，但却以种种不便的理由，哼哼哈哈地不表示明确态度。他口头上说应该支持造反派，但又说不能具体只支持"工联"等造反组织，还说自己得听从组织的安排，个人不好随便公开表态云云。

这次"工联"头头胡勇得到中央的明确表示后，当即于20日下午从北京飞回长沙，立刻到汽车电器厂找到华国锋，向他讲了周恩来的指示。这次，华国锋没有任何迟疑与哼哈，当即表态：支持"工联"造反派！并写了一个"亮相"声明：《改正错误，坚决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声明大意如下：

一、自己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愿意悔改，接受群众批判。

二、"长高司"、"红联"、公（安）检（察院）法（院）充当了二月反革命逆流的先锋。

三、"工联"始终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坚决支持。

四、章伯森、梁春阳同志是革命的好干部，要向他们学习。

五、表示了改正错误的决心。

6 月 21 日上午 11 时，在胡勇的陪同下，华国锋、万达从被软禁地汽车电器厂出发，乘汽车往长沙机场登机赴京。他们登机后，“工联”方面马上以大字报和传单的形式，将华国锋的《声明》公布于众。因此，后来湖南人常常戏言说，华国锋是在“空中亮相”，是“云里雾里（飞机上）亮的相”。

6 月 24 日，“高司”派方面贴出大字报，说：华国锋的“亮相”声明是被“工联”斗争一个多月后，由“工联”起草、硬逼着华国锋签的字。因此，当华国锋登上飞机后即宣布作废了。

对此传言，6 月 27 日，华国锋特地从北京来电说明：

“我是共产党员，是不能在什么所谓压力之下把不是自己的观点而说成是自己的观点去欺骗人民。所以肯定我的大字报是反映了我的思想实际的，不是什么逼出来的，请大家不要相信谣传。”

华国锋的这份来电，自然由“工联”方面又抄成大字报，贴满了长沙市全城。

6 月 20 日这天，湖南“红中会”一中“夺军权战斗兵团”发表“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再论夺军权”的文章。

说罢湖南说湖北。

武汉的“百万雄师”成立后，与造反派不同，他们没搞多少舆论宣传，只有行动，几乎是立即就采用武力手段横扫造反派，基本每天都有“百万雄师”冲击造反派组织、抢砸广播站的事件发生，每天都有人被打伤。

在 644 回中，我们叙述了“百万雄师”在东湖宾馆第一次全体工作人员会议上，确定了干部亮相、抢夺宣传阵地的三步走方案后，随后又在肉联、汽车二站连续开了几次常委会，进行分工。5 月 25 日，“百万雄师”区以上头头在六机部安装公司再次开会，研究对付“工总”和“二司”的计划。5 月 28 日，“百万雄师”头头俞文彬、申耿生、蔡俊善等又在东湖天长楼研究制订出对付“工总”、“二司”等造反派组织的具体计划：

1、认清形势，整顿组织。为了便于指挥，抽调各组织一号头头组成一个指挥机构。

2、今后任务：

1）集中全力扫平障碍；

2）横扫牛鬼蛇神后，搞大联合；

3）最后进行夺权。

时间计划：6 月 1 日至 15 日为第一阶段，16 日至 30 日为第二阶段，7 月 1 日至 15 日夺权完毕。

29 日，武汉“工总”数万人在中山公园门前集会，宣布恢复“毛泽东思想战斗队武汉地区工人总部”名称。30 日晚，“工总”多个分部在井冈山大楼前举行树旗大会。

5 月 23 日，湖北省军区政委周志刚对“省直联司”头头说：现在两个阵线比较明朗了，肯定地说‘三新’、‘二司’的大方向错了，现在是站在革命路线一边，还是站在王（任重）、孟（夫唐）一边，革命的干部要表示明朗的态度。于是，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罗明在“省直联司”头头的动员下，起草了带有“亮相”性质的《我们对于当前武汉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的几点看

法》，并于 5 月 30 日公开发表，上边有湖北省监委书记、省“抓办”成员纪辉、省委副秘书长吕汉荣、省贫协副主席饶兴礼等湖北省、武汉市的厅局级干部 44 人联名签字。《几点看法》提出：“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把矛头指向人民解放军”。

6 月 1 日，湖北省人委副秘书长麻佩三等 22 名干部也发表声明，第二批“亮相”。

省委农村工作部长任爱生亮相站到“二司”、“三新”一边后，被“三字兵”抄家，绑架拘留，最后被迫跳楼求救，摔成重伤。6 月 1 日，他给陈再道发出《公开信》，认为武汉军区支左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叙述自己被“三字兵”迫害的情况，要求陈再道承认错误，为“工总”平反，支持“三新”、“二司”、“三司革联”。

6 月 3 日，“百万雄师”的 52 个成员组织按照 5 月 28 日东湖会议的计划，整编成立统一的司令部，在各区组织分部、联络站，统一宣传和行动。

在中央压力下，6 月 4 日，武汉军区在征求“百万雄师”的意见后，发布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武汉部队公告》，时称《六四公告》，自我肯定“积极支持左派广大群众，认真执行党的方针、政策，掌握斗争的大方向”，“成绩是主要的”；重申批判《二八声明》“是必要的，正确的”，“工人总部不能恢复！”公告检查了在批判《二八声明》、解散“工总”过程中打击面过宽等问题，同意“工总”可以“重新建立基层组织”。对于群众普遍担忧的正在愈演愈烈的武斗问题，《公告》把它归结为“孟夫唐之流”的“挑动”：“孟夫唐之流把自己打扮成‘革命领导干部’，赤膊上阵，利用我们工作中的缺点错误，煽阴风、点鬼火，拼命夸大，

说我们‘犯了方向路线错误’，离间革命群众同人民解放军的关系，制造革命组织间的纠纷，挑动武斗，极力转移斗争大方向，公然把矛头指向革命群众，指向革命干部，指向人民解放军，破坏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破坏革命的‘三结合’，破坏无产阶级专政，妄图为他们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保权’。”

对《六四公告》，“百万雄师”认为：软弱无力，扶不了正，压不了邪，丧失了军队的尊严。6 月 4 日当天，湖北省军区独立师师长牛怀龙、政委蔡炳臣在师部作战室召集“百万雄师”头头开会时，“百万雄师”的蔡俊善、纪登清等人就批评武汉军区的《公告》力度还不够，要造反。武汉军区一位副政委解释说：“这个《公告》不出，将来军区要被动，其实你们想想，《公告》已经肯定了支左的大方向。焦点是个‘工总’问题，《公告》除了说‘工总’不能翻案外，还写着它的五条罪状嘛！有这五条他们就翻不了。”师长牛怀龙也说：“我是坚决支持你们的”。

而造反派组织认为：武汉军区是“假检讨，真反扑”，《公告》的实质是打击无产阶级革命派。他们把《六四公告》称为“牛屎公告”。

双方都不卖帐，武汉军区与年初的湖北省委一样，也陷入难堪境地。

陈再道在文革后的回忆中写道：“这个《公告》发表之后，并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造反派们认为，军区是‘假检讨，真反扑’，因而他们闹得更凶了。‘百万雄师’认为，军区这个《公告》太软弱了，扶不了正，压不了邪，也对军区不满意。”

## 第 677 回：武力赶，三镇干部亮相忙　福州城，七天七夜大绝食

6 月 4 日下午 15 时，十余辆公共汽车载着几百名“百万雄师”人员进入武汉市委大院，几天内进驻人数增加到 1800 余人。

当天，继 5 月 30 日和 6 月 1 日，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罗明和省委副秘书长吕汉荣等人的两次“亮相”后，湖北省直机关第三批 169 名干部集体签名“亮相”。第二天，5 月 5 日，又有 14 人在 169 名干部集体签名“亮相”上补签“亮相”。5 日，副省长王海山等 10 人，10 日副省长夏世厚等 10 人也相继分别“亮相”，支持武汉军区。

6 月 5 日下午，400 多名“百万雄师”围攻“武汉地区大中学校革命造反联合指挥部”驻武汉市委联络站，打伤 8 人、联络站被砸。

这天，“百万雄师”还围攻汉阳轧钢厂，稍带夺取了汉阳商场顶层的“三中红岩”广播站。　当“百万雄师”武斗人员端着长矛冲上汉阳商场的时候，武汉水利电利学院学生吕涛高举着“三中红岩”的大旗从七楼纵身跳下，震惊江城。后来‘二司’汉阳宣传队的黄道坤将吕涛的这件事编成了一个歌舞剧，歌词里唱到：

大海啸，

高山唱，

你的名字传遍四方

……

同一天，武汉军区首次邀请“百万雄师”众头头到军区二号楼二楼会议室开会，议题是“制止武斗、抓革命、促生产”。出席会议的有军区副政委叶明，副司令员孔庆德、杨秀山、姚哲以及夏奎、信俊杰部长，军训部副部长李良，动员部副部长马明、独立师政委蔡炳臣等人。军区希望“百万雄师”起带头、表率作用，选择有条件的单位或系统，能回去的，都回去“抓革命，促生产”。叶明说：

“现在有少数坏人要夺权，你们要提高警惕，要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要捍卫无产阶级的政权，维护社会治安，要加强军民团结，坚持文斗，坚决反对武斗，要遵照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号召，起带头作用。”

会议开到中午 12 时，叶明说：“独立师蔡政委要请大家吃饭。”当他们穿过马路，步入独立师师部食堂时，正在食堂就餐的独立师干部全体起立，热烈鼓掌，欢迎“百万雄师”的到来。这场面让“百万雄师”的头头们十分感动，他们深深地感到解放军对“百万雄师”的支持。

6 月 6 日，“百万雄师”在市“抓指”各办公室负责人会上宣布：站出来“亮相”的干部的安全，由“百万雄师”负责保护；同时宣布“参谋顾问组”成立，组长是市委组织部部长辛甫，副组长是市工交政治部副主任林立。辛甫组织 38 名市委宣传干部进入“百万雄师”宣传部，帮助起草文件、编报纸、写传单；组织 60 名市委干部成立调查团，分若干小组，为“百万雄师”准备上京汇报材料。“百万雄师”总站内还有一个由市委机关“革联”成员组成的参谋组，都是科处级干部，被称为“低参组”，

辛甫为组长的参谋顾问组则被称为“高参组”。

在辛甫、林立的指导下，“百万雄师”发出《反逆流紧急动员令》，配合武汉军区关于“撤销据点，工人回厂上班，学生回校上课，业余闹革命”的要求，在全市开始行动。《反逆流紧急动员令》宣称：

“从即日起，立即展开全面反击，狠狠打击来犯的阶级敌人，坚决、彻底、全部、干净消灭敌人！”

《动员令》要求“百万雄师”各级组织建立作战参谋部，把有作战经验的转业军人集中到指挥岗位上去。

文革后，武汉市内出现了许多广播站，是群众组织用来宣传自己观点的宣传场所。各组织之间也通过广播站互相辩论，漫骂。武汉军区发布《六四公告》后，“百万雄师”对这些广播站即不辩论，也不漫骂，只用武力驱赶，将强占的公共据点，如机关、宾馆、剧院、广播站的人赶走。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和“工造”及已解散的“工人总部”散兵游勇接连发生小型武斗。

“百万雄师”的口号是：

“百万雄师站起来，牛鬼蛇神全垮台！”

“百万雄师一声吼，牛鬼蛇神齐发抖！”

“百万雄师过大江，牛鬼蛇神一扫光！”

“踏平工总！镇压反革命！”

“围剿钢八司！踏平九一三！”

“百万雄师威震江城！”等。

6 月 6 日当天，汉阳再次发生血案。当天中午，“百万雄师”截断钟家村周边的交通，包围了设有“工总”、“二司”、“新华工”、

“三司革联”联络站的汉阳区委大楼，殴打这里的学生，致使数十人受伤，其中十余人重伤。围观群众上前保护学生，不少人被打得头破血流。一些学生被押进区手管局大楼拷打审讯。此后，汉阳区只剩下武汉三中和汉轧两处造反派两处仅存的据点，极为孤立，对造反派而言，这里就像恐怖海洋中的两叶孤舟，注定会倾覆。“三中红岩”开始从校园中撤离。至此，“百万雄师”基本完成了他们在汉阳区的初步计划。

6 月 7 日，肉联厂数百名“百万雄师”围攻武汉低压锅炉厂、汉口化工厂、江岸汽车改装厂，造反派轻伤数十人、重伤二十余人，被抓走多人。

当天下午，造反派在新华路体育场召开大会，欢呼中央《六六通令》发表。但是参会人员在路上遭到“百万雄师”袭击，多人受伤。下午 16 时，武汉机械学院“二司”学生在举行拥护《六六通令》的游行时，也遭到“百万雄师”的冲击，20 余人被打伤，重伤 9 人。

这天，武汉市委贴出 127 名区局级以上干部的“亮相”声明：《高举革命的批判大旗，坚决捍卫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对于当前武汉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几个主要问题的看法和态度》。这次“亮相”声明，是辛甫与“革联”和“百万雄师”头头 5 月下旬就开始商议，经武汉市人民武装部政委巴方廷和傅兆才审定的。

就在武汉“红武兵”等组织组建“百万雄师”时，武汉“工造总司”等造反派组织却响应党中央号召，按照武汉军区要求，搞归口大联合，按行业成立战斗队，将 37 万人的跨行业全市性

组织“工造总司”，分解成“武船联司”、“汉纸联司”、“三棉革司”、“汽标联司”、“铁机联司”等各行业的“革司”、“联司”。“工造总司”总部只剩下不到 8 万人。而此时，“百万雄师”已由 3 万人猛增到 47 万人，后来又加入 15 万农民，最多时达 62 万人，号称 120 万。

6 月 7 日，武汉“工造总司”及从“工造总司”分出去的“革司”、“联司”等几十个组织一道签名，以“文官政府”名义在《湖北日报》上发表《紧急公告》，号召全市工人努力生产，抓革命、促生产，加倍警惕阶级敌人的阴谋，防止武斗，并下达 7 条命令，禁止武斗。实质是与和武汉军区的《六.四通告》针锋相对的抗衡。以“文官政府”暗讽当时的武汉是被武汉军区掌控的“军政府”。

6 月 8 日，“红卫兵武汉地区中等学校司令部”在新华路体育场重新成立，会后游行有大量“百万雄师”人员参加，独立师上千人戴“红卫兵”袖章一起参加，从新华路到循礼门、江汉路，再从中山大道到武胜路、到汉阳、到武昌。一路上，游行队伍高喊“踏平‘工总’，镇压反革命!”口号声此起彼伏，持续不断，赢得同观点群众极其热烈的掌声，也受到“钢”“新”派的干扰。游行队伍用木棒驱打路边喊“打倒黑巫兵”，即“红武兵”的围观市民，跟随游行队伍的武汉军区独立师宣传车同时呼喊“打倒一切牛鬼蛇神”等口号。

游行队伍经过湖北大学校门时，校园里抛出雨点般的石头，差点儿把游行队伍搞乱。“百万雄师”随即向校园内回击石块，有人冲进了湖北大学，抢走广播喇叭，双方发生武斗。

此时恰逢湖北大学两百多名下乡支援夏收的学生乘车返校，“百万雄师”将卡车拦住攻击，“新湖大临委会”3 名常委被绑架。

游行队伍继续前行，看见有几辆“钢”“新”派的汽车，便冲上去把车窗砸碎，把逃得慢的人也打了一顿。

这天上午，数十辆卡车满载全副武装“百万雄师”人员围攻驻在汉口民众乐园的“工造总”、“九．一三”、“二司”、“新华工”等群众组织的联络站，多次冲击，由于这里的“钢八司”人多势众，没有成功。

武汉“工总”解散后，原“工总”的一部份人参加了“工造”，还有一部份人没有再参加任何组织，成散兵游勇，平时同“工造”、“三新”一道活动，协助“工造”、“三新”游行示威，这些人当时自称“钢八司”，也叫“钢八师”，即按时上下班，8小时工作后，下班自由参加运动的意思。他们不管哪里有集会、游行、武斗，都跑去参加。

8 日当天，还有 1000 多“百万雄师”围攻第二机床厂的造反派工人，打伤 40 多人，重伤 13 人，被逼跳楼 4 人，绑架 17 人。

这天上午 9 时，“百万雄师”下属“红城公社”老年妇女 300 多人，声称要在武昌区委开会，要求驻在这里的“新华工”、“新华农”联络站撤离，双方展开辩论。随后武昌公安分局曙光派出所十几名警察进入武昌区委大楼，控制各门，一卡车武昌造船厂的“百万雄师”驶来，用木棒打散马路两旁的市民，冲入区委大楼，殴打、驱赶联络站的学生。

上午 11 时，武昌公安分局“武汉公安”5 人到二机床厂，声称要与该厂“八一七”辩论。12 时，武船 1000 多“百万雄师”围攻二机床厂办公大楼，独立师护桥炮艇张排长、公安分局丁科长亲自指挥，打伤数十人。闻讯前往了解情况的“新湖大”临委会成员柴玉本也被绑架。

6 月 9 日，“百万雄师”为了清除设在居仁门中学，当时改名红锋中学的“新华工”广播站，从早上 5 时开始，包围并攻打这所中学。围攻至下午 16 时，断水断电，将该校的“新华工”中学部成员逼到顶楼。后由一军人和新华社一记者主持谈判，学生同意退出学校，“百万雄师”这才收兵。

武汉军区此日发布制止武斗的“通知”，没得到任何反响。

6 月 10 日，3000 多有组织的农民袭击华中农学院。陈伯达给陈再道电报：“陈再道同志要设法制止重新武斗。”

陈再道秘书接电，提出是否交军区常委讨论，陈再道很自信地嘲笑中央文革的书生说：“你陈伯达呀，在北京还不是没有制止武斗吗？”没有再研究这个问题。

当天，武钢“九一三战斗兵团”向武汉军区支左指挥部发出“最后通牒”，要求支左指挥部“老老实实、不折不扣地立即执行六六通令”，解除“百万雄师”的武装，“否则我们将武装自卫和反击”。

迫于北京的压力，武汉“百万雄师”发动了空前的“外交”活动，他们一方面和四川“产业军”、剽悍的河南“十大总部”讨论形势、切磋经验，同时派联络人员到北京找北京红代会、北大、清华的造反组织，要求这些有名的造反派理解并支持他们。

其间，清华“井冈山”撤走了“团派”驻汉人员。原来，周恩来和张春桥借会议机会对蒯大富说：韩先楚、许世友和陈再道中央都是要保的，要清华“井冈山”学生不要在外地支持揪谭式人物冲击军区。于是清华撤走了驻汉联络站最后一名工作人员张闯。

6 月，福建晋江地区又发生了一起大武斗，由于“思想兵”一派在该地区是少数派，打不过多数派，有 30 多人从那儿逃了出来，跑到省城福州市告状，他们向福建省军管会提出五项要求，未得到答复，便于 6 月 7 日宣布绝食。

“思想兵”一派开来了好几辆宣传车为绝食大造声势，绝食人数从 30 余人一下子激增为 300 人，占据了东方红路口的中央位置，交通为之阻塞。

绝食学生成立了“绝食斗争指挥部”，师院附中几个拥军派学生也针锋相对的搞了一个“反绝食斗争指挥部”，并编印了一个《反绝食战报》，在绝食现场秘密散发。还有几个“八二九新厦大公社”的大学生成立了“八二九铁军”，在东方红大街等市中心处贴标语和大字报，旗帜鲜明地反对福州的“420 行动”、反对释放王泉金、反对“揪福建省的谭震林”，反对把矛头指向人民解放军和韩先楚，名气较大。于是，不明就里的“思想兵”，把《反绝食战报》这笔账算到了“八二九铁军”的头上。绝食的第三天，东方红路口那几辆“思想兵”宣传车大骂“八二九铁军”在捣乱绝食现场，是叛徒云云。

这天，参加绝食的人数从 300 人增加到 500 人，师院“红九二”等组织也发表了绝食声明，王泉金也参加到绝食队伍中去，“红九二”总部宣传车上的高音喇叭在现场大声喊道：

“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中国不变色，饿死也甘心！生死与共的战友们！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为了晋江 50 万人民，我们愿把胃肠饿断，愿把东方红大街坐穿！决心，我们下定了；目的，我们一定要达到！

“为了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哪怕面对牢房和铁镣，哪怕胸对机枪和刺刀，

绝食战士迎着风暴笑！

“谭王八听着，我们就是要剥你的皮，抽你的筋，吃你的肉，喝你的血！再不投降，就让你彻底灭亡！

“头晕，忠于毛主席的神经不错乱！目眩，胜利的曙光看得清！喉干，《红军怀念毛主席》歌声更嘹亮！耳鸣，从中南海传来的伟大声音更清晰！”

师院“红九二”的大学生们买了好几箱的面包，给每个人分发。

绝食的第四天上午，有人在东方红大街的一间公共厕所看到好多人挤在里面偷吃面包。尽管那些人没戴袖章，但还是可以看出他们是师院“红九二”的大学生，其中就有赫赫有名的王泉金。

于是，师院附中那几个拥军派学生又画了幅漫画，以这个厕所为背景，画面中间画了一个戴眼镜的王泉金，只见他嘴巴里咬着半块面包，露出一副贪馋欲滴的样子，在他的手臂上还戴着“红九二”的袖章，并注上王泉金的名字。

绝食已经进入了第五天，省军管会派人送来了葡萄糖水、饼干等食物，绝食人员拒绝。宣传车的高音喇叭高声喊道：

“呸！谁要你们的饼干，葡萄糖水！我们不是随风偏倒的墙

头草，不是四脚爬行的叭儿狗！饥饿算得了什么？死亡也无法叫我低头！”

其中一首题为《一口饭》的诗这样说道：

一口饭

可以使苟命者出卖灵魂。

一口饭

可以使造反队伍更纯。

苟命者忧伤地说：

‘我死了不知世界是黑是黄，’

造反者自豪地说：

‘我死了世界一定更红！’

让苟命者打开他的饭罐吧，

战斗的欢乐他屁也不懂！

还有一首诗——《假如我先倒下……》：

假如我先倒下，

战友，你可别悲伤，

请拆下我的骨骸

做一架重型的机枪。

调好正义的准星吧，

再装上愤怒的子弹，

向着谭王八和叭儿狗，

开枪！开枪！开枪！……

这一天，又有好几个人晕倒昏迷过去了，福州军区卫校“革字派”派出了“支左”医疗队赶到绝食现场，进行抢救。这天，

参加绝食人数骤然增加到 8000 人，市“工联总”、“农联总”、省、市机关“联总”、“思想兵”、“八·二九”，还有清华“井冈山”、“新北大公社”、地质“东方红”、人大“三红”等南下学生纷纷倾巢出动，参加了绝食斗争。

到了第六天，绝食人数又增加到 1 万人。眼看着晕倒过去的人也成正比地不断增加，弄不好是要出人命的。6 月 13 日晚上，那万名“绝食战士”决定复食，他们齐声宣誓：“不能等待饿死，拧成一股绳，横下一条心，杀将过去，活着与谭王八拼！北上南下，全面开花，杀他谭王八片甲不留！”

宣传车的高音喇叭也大声喊着：“我们与谭王八就是誓不两立，不共戴天！要镇压么？来吧！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要头有一个；要跪下么，梦想！要坐牢么？请便！打开你的牢门，我们一起进去，坐上十年八年，将牢底坐穿，还要造反，造马为死党、谭王八的反！这支‘不要命’的敢死队，就是要为所欲为，无法无天！警告马为死党、谭王八，你逃得了今天，逃不了明天！谭王八不除，我省永无宁日，同志们！战斗吧！把仇恨凝结在刀尖上，向着马为死党、谭王八的黑心窝，杀！阎王八不倒不歇手，刺刀不红死不休！”

7 天 7 夜的“绝食行动”就这样结束了。

## 第 678 回：炮声起，冰城陷“炮”“捍”对立　见领导，静坐在省革委前

中央军委《十条命令》发布后，各地开始陆续释放前一段因冲击军事机关和在夺权斗争中出现不同意见而被抓的群众。根据这个文件的规定，因哈尔滨“131 事件”被抓的哈工大刘录等十几人，也应该立即释放并予以平反。但是，哈工大“新曙光造反团”有些人不同意。潘复生只好召集省革委开会，并吸收了哈工大的代表参加。在会上，大家主张按中央规定，对刘录等人予以立即释放并平反。可是哈工大的代表却提出：“给他们平反，不是说明我们错了？我们建议省革委会要拿出办法来，不要放了一些人，压了另一些人。”

许多人说：“不能说释放平反就是我们夺权搞错了，我们建立的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中央已经批准，这是推不倒的。问题是刘录等人，属于不同意见，不是反革命，我们处理重了，应该按照中央的精神予以纠正。”

但是工大的人却一再坚持要个说法才行。这时刚刚结合到省革委会的、原省委政法部长赵去非发言说：“当时是当时的政策，现在是现在的政策。”接着他讲了自己过去在土改、司法工作中的经验，然后说：对于刘录等人，这就叫做“抓的有理，放的应该，性质不变，宽大处理。”

这时一直专心听大家发言的潘复生郑重地做出结论说：“今天是今天的政策，不能用今天的政策否定过去的政策。也不能用

今天的政策压制过去的革命积极分子。过去这样的例子很多。我们在土改时期斗地主就搞错过，后来纠正了，不能允许他们搞反攻倒算。就按赵去非同志的意见办。”

一锤定音，刘录等人宣布无罪释放。但是他们对“抓的有理，放的应该，性质不变，宽大处理”的说法也不服，派出代表到省革委会上访，要求为“131 事件”平反。潘复生、汪家道研究决定，由范正美和宋振业这两个昔日的造反派战友出面接待。范正美按照潘复生的意见对哈工大的上访群众讲了五条：

第一、要正确对待军委的《十条》和中央的《五条》，不要用军委的《十条》去反对军委那个《八条》，不要错误地估计形势。

第二、要正确地对待省革命委员会，这是经过毛主席和党中央亲自批准的。必须把对待省革命委员会的态度和对待旧省委的态度严格地区别开来，否则，就要犯错误的。

第三、省革命委员会成立以后，夺权斗争并没有结束，而是夺权斗争的继续，在省革命委员会成立以后就刮起一股要推翻省革命委员会的妖风。

第四、谁破坏革命的三结合谁就是反革命。

第五、“131 事件”是地地道道的反革命事件，不存在平反的问题。

范正美原以为讲完后会有一场大辩论。没想到，哈工大的上访群众听完他的讲话之后，竟都回校了。

这时，北京邮政学院有几位学生来到哈尔滨。他们说是经过调查，发现哈尔滨有严重的情况，于是在哈尔滨街头抛出了《对

哈尔滨的八点声明》，中心意思是：“哈尔滨有问题”，“哈尔滨现在运动冷冷清清”，“哈尔滨必须大乱”。本来已按兵不动的刘录等人，此时似乎感觉来了救兵，一度麻木的神经和冷漠的心情又被激活了，于是对范正美的讲话发动了猛烈批判的排炮。

接着，黑龙江大学也响起了阵阵“炮”声。

黑龙江大学“红色造反团”在组建校革委会时，要结合原省政协副主席、副省长于天放进班子，并且让他担任学校革委会主任。于天放曾经被捕过，事后写过一本《牢门脱险记》，记述其牢狱脱险的故事，曾经引起当代青年为之景仰。但是，在他的干部档案里记载着中央的结论及其使用意见。因此，当黑大“红色造反团”派人到省委统战部“造反团”了解情况时，他们被告知于天放不宜做主要领导，省革委同意此认定。再说了，根据省革委会的规定，哈尔滨各大学的革委会一律由省革委会批准。但是黑大成立革委会并未用书面文件报告省革委会，而是突然派黑大“造反团”一名负责人，到省革委会机关，口头通知省革委会派人去参加黑大革委会成立庆祝大会。潘复生让范正美对黑龙江大学派来的人说：

“这样不行。我们对你们‘造反团’是相信的，但是你们应该把成立革委会的材料报上来，这是组织手续。”

这位黑大“造反团”领导人一听，就对范正美拍了桌子，说：“你们把我们黑大‘造反团’放在什么地方?你们眼睛里还有没有黑大‘造反团’？”

为了缓和对立情绪，范正美同潘复生商定，让省文革组的一名工作人员前去参加黑大革委会的成立庆祝大会，范正美对这人

交待："你不能在大会上讲一句话，说一个字。"

黑龙江大学革委会就是在这种情况下顶着省革委会的要求成立的，但是因为于天放问题，黑大报送的革委会请示件一直未批。

于是， 黑大"造反团"派人去河南调查潘复生，并搜集整理了几条黑龙江省委常委兼政法部长赵去非的问题，黑大"造反团"一部分人贴出了"炮轰赵去非"的大字报。黑龙江省的"炮轰派"就这样产生了。

在潘复生的支持下，黑大"造反团"中，以赵玉才为首的一批成员，成立"打倒于天放联络站"，简称"打于站"，对于天放发起了猛攻。黑大造反派分裂了。

"打于站"成立不久，潘复生召集他们座谈，说：

"你们是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是黑龙江大学的未来，也是黑龙江省的未来"，他说"炮轰派""不是真正的造反派，是小资产阶级无政府主义者。他们的后面有人支持，要揭露和批判。"

潘复生的讲话在黑大传达以后，激起"炮轰派"极大的愤怒。

与此同时，哈外专"造反团"也对黑龙江省军区副司令员张万春在全省红卫兵政治思想工作会议上的报告提出了批评，在校园内贴出了一批大字报。

哈军工"造反团"也不甘寂寞，针对黑大、工大、外专的大字报，于 4 月 22 日发表声明说：目前在哈市出现的问题是"二月逆流"在黑龙江省的反映，矛头直指"炮轰派"。

此时潘复生、汪家道正在北京开会，得知哈尔滨的上述报告后，急忙打电话给省革委会，一方面，明确表示支持哈军工"造

反团”针对黑大、工大、外专的大字报所发表的声明，并在电话中表示：哈军工“造反团”旗帜鲜明，不愧是一支革命劲旅；同时还指示省革委会，认定炮轰的性质是矛头指向省革委会的“反革命逆流”，在适当时候要组织反击。

哈军工的声明发表之后，各高校“造反团”也纷纷效法发表类似的声明，形成对黑大、工大、外专“炮轰派”的合围之势。潘复生、汪家道回到哈尔滨，立即召开了省革委会常委会，将炮轰活动定性为“反革命逆流”，认定其后台是于天放、李范五挑起来的，并于 4 月 27 日，在八区体育场举行声势浩大的反击资产阶级“二月逆流”誓师大会，揪斗于天放，斥责于天放是“二月逆流在黑龙江省的急先锋”，钻进我们革命队伍的阶级敌人，并在会上当众将于天放逮捕，投进看守所。

5 月 3 日，于天放在看守所自杀身亡。

根据潘复生的意见，黑龙江省革委会向周恩来和中央文革小组呈报《关于于天放畏罪自杀情况的简要报告》。

然而，黑大、工大、外专等院校的“红色造反团”顶着“反革命逆流”的帽子，毫不示弱。他们感到他们的革命人格受到莫大的侮辱，派人到处求声援，首先说动了哈军工、林学院、哈建工“造反团”的一部分人，并且把矛头集中在赵去非一人身上，正式成立“炮轰赵去非联络站”。于是，在这些院校的“造反团”内纷纷成立新的战斗队，打起“野战军”的旗号，逐步脱离总团领导，与黑大“炮轰派”互相配合。

5 月 23 日，潘复生动员范正美等群众代表出面成立“哈尔滨市捍卫革命‘三结合’联合总指挥部”，简称“捍联总”，并指

定范正美和聂士荣、宋振业等人负责。从此，黑龙江的红卫兵运动进入了了“捍”“炮”对立阶段。

此时，哈军工“造反团”也发生了分裂。在黑龙江夺权时被选为革命委员会五人勤务组副班长的游兴懋，是哈军工“造反团”的负责人之一。他结合到省革委之后，经常回哈军工，同哈军工个别人调查潘复生同反江青的 27 人大字报的联系，并且秘密地整理了一份材料，将潘复生冠以炮打中央文革的黑后台，准备状告党中央。尽管他们自以为谋事极密，终归百密一疏，被哈军工“造反团”有人通过汪家道向潘复生告发。于是，潘复生找到范正美和刘雪峰说，哈军工要游兴懋回校。按照当时革委会的做法，群众代表可以由本单位随时调回，范正美和刘雪峰就同意了。结果，游兴懋回校后，被多次批斗。随后，汪家道将游兴懋以“反革命”之名送进了监狱。

此后，哈军工“造反团”以杜美平为首，成立了“井冈山兵团”。但另一些人对“井冈山”持有不同意见，于是自称“山下派”。两部分人观点不同，意见针锋相对。潘复生、汪家道几次做双方工作，收效甚微。后来“井冈山兵团”成为“捍联总”骨干，“山下派”加入了“炮轰派”。

5 月 27 日，范正美在哈市工人文化宫，召开各单位“造反团”负责人会议，力图说服“炮轰派”。

6 月 5 日下午 4、5 点钟，省革委会办公室得到报告，哈军工“造反团”的“山下派”约 20 多人，要到省革委会驻地省委招待所“107”来，找潘复生、汪家道汇报鸡西问题。

当时，一些部队在“支左”问题上看法不一致，其中一个共

同特点，就是认定一派是左派，那么另一派就一定是右派。被定为右派的群众组织当然不服。以鸡西为例：

鸡西有个“红联总”即“红色造反团联合总部”，还有个“三司”，即“红色造反者第三司令部”。黑龙江省革委会派去的文革组以及省军区派去的支左部队支持“红联总”，哈军工“造反团”支持“三司”。两派相对，各仗着有人支持，对立十分严重。

5月1日，省革委会在潘复生主持下，做出决定：请示中央，宣布鸡西“三司”为非法组织，并同时派出由各大专院校造反派组成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赶赴鸡西。

这就是哈军工“造反团”的“山下派”要向潘复生、汪家道汇报的鸡西问题。

潘复生、汪家道担心被纠缠，导致省革委会办公瘫痪，遂让范正美出面接见他们，并相机处理。

在文革中直接接触群众，对很多干部来说总有顾虑，因为一句话甚至一个词没说好，或说错了，就可能全盘皆输，或弄得很被动，甚至声名狼藉，威信扫地。范正美知道潘复生、汪家道也是这个心态。不过，自己来自群众，所以顾虑就小多了。

大约过了一个来小时，哈军工“山下派”的代表排着队来到107，声言“要求潘复生、汪家道首长接见，并向他们汇报鸡西情况。”范正美叫收发室让哈军工代表进到院里。

这时，省革委会政研室的人已替范正美拟好了一个讲话稿。他浏览了一下，觉得这个稿不能用。因为通篇是斥责哈军工代表的话。于是他甩开稿子，对来人说：

“欢迎大家关心省革委会的工作，关心全省抓革命、促生产

的情况。”

接着又说：“大家有情况要向省革委会汇报，潘、汪首长委托我接待大家，大家有什么意见和要求可以跟我讲，我会如实地向潘、汪首长汇报。”

代表们七嘴八舌，反复坚持地对范正美说：“我们要汇报鸡西问题，必须找潘、汪首长。一定要请潘、汪首长亲自接见。”

范正美说：“关于鸡西问题，省革委会已经派出了宣传队和省文革组的同志去那里，他们搞了许多调查，情况潘、汪首长已经掌握了。”

代表中有人抬高声调，大声喊道：

“根本不是那么回事，情况完全相反！”

“革命委员会为什么这样怕见群众？”

“怕群众，这和旧省委有什么区别？”

范正美向他们解释，代表们就和他辩论。范正美只好说：“你们多数人回学院去，留下两、三位同志作代表，好吗？”

“不行，革委会还怕群众么?”代表们七嘴八舌地喊道。

范正美无法，只好同他们挥手作别，准备离开现场，回办公室向潘复生、汪家道汇报情况。他一转背，就有人高声喊道：“潘、汪不接见，我们就不走！静坐开始！”

这就是后来被称之为“炮轰派”“65 冲击省革委会事件”。

“哈军工炮轰派在 107 院内静坐了！”

“静坐已经半天了！”

……

消息不胫而走，很快传遍哈市，又由哈市传到外市县。当天，

苏联广播电台连夜作了广播。

“107”院外围观的人越聚越多，老百姓都来看热闹。第二天，6 月 6 日，省革委会常委在潘复生主持下召开紧急会议，商讨对策。根据大家的发言，潘复生总结为三大对策：

一是紧急调动动力、平房两个区的工人“捍联总”进驻院内，保卫 107，同时调抗大机械战校(原哈市机械中专)的“捍联总”进驻 107 四栋楼内，以阻止“炮轰派”突然进楼；

二是紧急加强省革委会的警卫部队，派一个加强连到 107、109，保卫省革委会机要部门；

三是在适当的时机，把静坐的“炮轰派”“起出”107 大院。

这时，107 院外面的“炮轰派”也派出联络员同院内静坐者保持联系，在市内宣传，声援静坐者。

一时间，省革委会驻地院内外聚集了数千人，数百平米的院落，里里外外、前前后后、左左右右，人山人海。静坐的“炮轰派”被围在核心，席地而坐，不吵不闹，秩序井然，一派义无反顾的悲壮气氛，非要和潘大人掰掰手腕子。和包围的人们比较起来，他们倒显得轻松得多。

双方都没有什么行动，互相对对方可能采取的对策保持高度的警惕。院子里只有包围的人群在悄声议论着什么，有一种可怕的战斗前的寂静。参加包围的是听指挥的国营企业产业工人，他们想的是保卫新政权，随时听命，要他们做什么就做什么；静坐者是一群青年学生，他们想的是正义、公道、民主，只不过要求潘、汪首长接见。对前者来说，青年学生革命太过火了；对后者来说，这是一种不可思议的包围。

哈军工“炮轰派”在“107”门前静坐

## 第 679 回：六月九，哈军工再演夺权　说河南，林彪看三军演出

6 月 7 日，哈军工革委会成员、“山上派”李九思、郑锡伍、穆栋材、吴世通等人，组织学院“捍联总”抢占学院的广播台和电话站，未成。又砸开了“炮轰派”总团的三个办公室，抢走了装有潘复生材料的保密柜。而此时，哈军工“造反团”的一把手偏偏去了北京，二把手又举棋不定，“炮轰派”中缺乏审时度势、驾驭全局之人。

6 月 7 日下午，潘复生再次召集“捍联总”在 109 一栋一楼会议室开会，全体常委出席。这是一次安排对静坐“炮轰派”动武的会议。

会议室的西北角架起一块小黑板，供指挥员讲解战术画图用。潘复生首先作了动员和部署，论述事态的严峻性、紧迫性和危害性。他强调，决不能让“炮轰派”继续呆在 107 大院，必须坚决将他们“起出去”。否则不但影响省革委会办公，而且还会影响全局，带来不堪设想的严重后果。他提出：要调动院内的“捍联总”，分片对静坐者实行分割，然后一小部分，一小部分同时动作，将他们一个一个架出 107 大院。同时警告大家要防止院外的“炮轰派”冲进革委会大院，同静坐的“炮轰派”内外结合，扩大事态。

潘复生让范正美按他的部署讲解一下具体的操作步骤。范正美赶紧上前，按着潘复生刚刚说的意见，在黑板上比比划划讲了一阵。

黑龙江省军区司令员汪家道觉得范正美没有说明白，便走到小黑板前，亲自一边画图，一边讲解具体的作战意图。

经过全体省革委会常委批准，这个以平房、动力“捍联总”工人队伍为先锋，以抗大机械战校，即原哈市机械中专的“捍联总”学生为后卫，在 107 四栋二楼用广播喇叭喊话指挥，动员几千工人参加，把“炮轰派”架走的方案就正式确定了。

范正美被指定到四栋二楼坐镇指挥广播。但是，在如此大的部署和战斗打响以后，范正美退缩了。他觉得“炮轰派”以静坐的方式强行要求省革委会主要领导接见，对待省革委会的态度固然不对，但他们是群众，省革委如此对他们大动干戈，大打出手，是在犯大错误。他不再向前了，借故走下了指挥台，擅自离开了指挥前线，哈工大的人代替了他。

行动顺利，“炮轰派”没有反抗地被“起”出了 107 大院，所有从平房调来的“捍联总”工人队伍也都撤走了。但是哈军工静坐者依然有 10 多人，端坐在 107 大院门外马路对面的台阶上，表示要求潘复生、汪家道接见的决心毫不动摇。

正在这余波未息的情势下，6 月 8 日，中共中央批准了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申报的常委名单，批件回到哈尔滨。潘复生认为这是天赐良机，是中央在关键时刻再一次对黑龙江省革委会表态，于是决定立即广播，以长省革委会的威风，鼓“捍联总”的雄心，挫“炮轰派”的锐气。

高音喇叭连续不停地广播新批准的省革委会 29 名常委名单。但是，广播放了一遍又一遍，静坐在 107 大院门外马路对面台阶上的“炮轰派”并没有因此卷旗撤退。

此时，哈军工革委会的实权掌握在“山下派”手里。于是，“山上派”领导想策动再夺权。6 月 8 日，哈军工革委会主任穆栋材和郑锡伍、李九思、吴世通等革委会成员来找潘复生、汪家道和范正美请示。潘复生、汪家道立即表示全力支持，范正美也没有表示反对。潘复生、汪家道认为，由哈军工“山上派”夺权是端“炮轰派”的老窝，可收“围魏救赵”之功。但是在做法上，范正美和潘复生的意见又不完全相同。范正美认为，这事应由哈军工造反派自己解决，省革委会不宜插手，特别是不能直接指挥调动“捍联总”的工人和学生去哈军工，这样有挑起群众斗群众之弊。而潘复生、汪家道则坚持调动平房等工人群众打援，帮助哈军工“山上派”夺权。由于范正美有不同意见，潘复生、汪家道便把这一任务交给了省革委会的另一个常委韩潮。

韩潮是省林业厅的一名管理员，父母先后被日寇杀害，14 岁参军，文化不高，在部队文化学习时读到高中，身高一米八有余，膀大腰圆，虎里虎气。复员后，长期同工人打交道，说话骂骂咧咧，说到要害处，常常不离他妈的几个脏字，给人一种粗俗之感。但是，他绝对忠于共产党，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党指到哪里，我就打到哪里。”在他看来，潘复生、汪家道把调动平房工人大军的任务交给他，这是党的信任、首长信任、省革委会的信任。

6 月 8 日晚 21 时，潘复生和汪家道再次召开紧急会议，省革委会的主要成员全都在座。哈军工革委会成员穆栋材、郑锡伍、李九思、吴世通等也参加了会议。

“不能再等待了！”潘复生疾言厉色，山东腔愈发浓重：“‘炮

轰派’闹得省革委会无法办公，破坏全省革命三结合，破坏稳定的形势，自己走向反面。我请示了中央，现在研究一下，今天晚上就行动，端掉‘炮轰派’的老窝，就是那个一号楼!”

会议决定由外单位调集 6000 名“捍联总”工人和学生，分作三路，由哈军工革委会正、副主任穆栋材、郑锡伍等分别带领指挥，到哈军工夺“炮轰派”总团的权，实施“围魏救赵”之策，用开辟“第二战场”的办法解省革委会之围。其中第一路为农学院 2000 人，由穆栋材带领指挥打先锋；第二路为哈工大的 2000 人，由哈工大革委会主任陈造反带领指挥；第三路由哈军工革委会副主任郑锡伍带新风加工厂的 2000 工人接应。

郑锡伍有点胆怯，他问：“不少‘炮轰派’的学生都住在一号楼里，要是学生硬不出来怎么办？发生了武斗怎么办？”

汪家道一听郑锡伍的话，有点光火，一拍桌子说：“学生有什么了不起！又不是打仗，不出来就跟他辩论，让他们出来。亏你郑锡伍还是个刚转业的军人!”

脸膛黝黑的郑锡伍被汪家道一阵训斥，脸红脖子粗的不再吭声。

午夜时分，兴奋了一天的哈军工“炮轰派”学员们大多入睡，院办公大楼里除了值班人员外，大小头头们也哈欠连天地回到各自办公室睡了，哈军工大院的夏夜暂时安静下来。

突然，数不清的大卡车满载着工人冲进了大院，其来势凶猛让警卫战士目瞪口呆。工人们直取院办公大楼。毫无思想准备的“炮轰派”仓促应战，广播喇叭里发出的呼救声，惊恐凄厉，划破夜空，惊醒了全院人员。

哈军工的学生们毕竟是当过兵的，他们边穿衣服边往楼下冲，四面八方的人流以最快的速度汇集到院办公大楼，把穆栋材带来的 2000 人团团围住，先是辩论，继而动手，“捍联总”没占到什么便宜。又因为是半夜偷袭，似乎不那么光明正大，大多数工人逐渐脱离人群，躲进树丛中，抽烟聊天看热闹，谁也没有兴趣参加武斗，图个什么呢？家里还有老婆孩子呢。穆栋材喊破了嗓子也压不住阵角，还挨了“炮轰派”学员几记老拳，他慌不择路，跑掉了鞋子，好歹堵到一台车，光着脚去省军区见潘、汪二位领导。

计划中的哈工大第二路人马也被“炮轰派”挡住，不得不后撤。

省革委会的群众代表、号称“铁杆老捍”的森林警察韩潮，带着郑锡伍到新风厂调人，集合起队伍时，已是 6 月 9 日凌晨 4 时，天已亮了。这 2000 工人来到哈军工，推倒哈军工的木板围墙，加入了包围一号楼的队伍。但新风厂的工人比较文明，始终不肯硬冲，在相互推推搡搡中，时间已临近上午 10 时了。

“他妈的!”韩潮满脸杀气，头上冒着汗。他指责郑锡伍太软弱，骂骂咧咧冲出队伍，又到市里去搬援军。

“东北新曙光”照耀下的哈军工成了惊心动魄的“大战场”，此时虽无枪炮声，却是人声鼎沸，群情激愤。哈军工师生同仇敌忾，以血肉之躯保卫一号楼，保卫哈军工的尊严。即使是持“捍联总”观点的师生，也不赞成院外工人来冲击哈军工，这是一所有无数国防机密的大学呀！

1967 年 6 月 9 日哈军工的文庙街上

韩潮又领着林业机械厂的 2000 工人过来了，只见他头顶一个抽屉，叫骂着带头冲锋。哈军工的学生们哪里是这些五大三粗、力大如牛的老大哥对手啊，工人们拳打脚踢，三下五除二，冲进了一号楼。哈军工的学生们被打得头破血流，四下逃散。这件事，也被苏联电台广播。

工人大军继续如潮水般地涌入哈军工，中午时分，已有一万多人。他们占领了一号楼、俱乐部、体育馆，并到各个系大楼搜查、抓人。工人们还运来电焊机，开始修工事，一号楼底楼窗户都焊上铁条或铁板。

除了武攻，潘复生又指挥文斗。哈尔滨各工矿企业和事业单位的职工分批进入哈军工大院游行示威，高呼“打倒‘炮轰派’，捍卫三结合”的口号，工人巡逻队则日夜在哈军工各处巡逻执勤。

这就是哈军工“文革”史上的“六九夺权”。

一不做，二不休，潘复生乘胜前进，又指挥“捍联总”于同一天，将在 107 院外街上静坐的哈军工“山下派”架上大卡车拉至远处。

在工人铁拳保护下重掌大权的哈军工“捍联总”的头头们，心中似乎并不踏实，说话也没那么理直气壮。在翌日全市“捍联总”召集的 20 万人誓师大会上，为了表示彻底粉碎了“资本主义复辟的反革命逆流”，宣判了一批“地富反坏”，但哈尔滨市民并不都认同这次剿灭“炮轰派”，占领哈军工的“革命行动”。

此时，哈军工的“炮轰派”二把手已逃到外县，昼伏夜行，前往北京。不久，在北京西苑大旅社五号楼，“炮轰派”建立了自己的“流亡政府”。潘复生企图一举剿灭“炮轰派”的计划落了空。

6 月 11 日上午，被夺了权的哈军工“造反团”山下派，排着整齐的 6 路纵队，冒着大雨，迈着沉重的步履，唱着国际歌，从校门出发，由东至西在大直街上游行，许多成员泪水和雨水，沿面颊而流。观看的市民见状，不觉潸然泪下。亲眼目睹这一切的哈师院副院长陆辉，后来对杨桂宾十分感叹地说：“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也没有这样对待学生啊。”

游行队伍走过哈工大门前时，哈工大“炮轰派”高呼支持的口号，鼓掌喝彩；“新曙光造反团”一方则对游行队伍推来搡去，或吐口水进行驱赶。这次游行又导致哈工大“炮轰派”和“新曙光”两派的冲突。

黑龙江的局势暂时先说到这里。

6月8日，张春桥传达毛泽东关于首先要把北京、上海、天津的文化革命运动搞好的谈话：

“中国革命的胜利，主要不是搞地下斗争，而是武装斗争。”

“就是全世界都黑了，只要中国是光明的，那世界就有希望，没什么问题。”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首先要把北京、上海、天津这几个地方搞好。上海就是工人这个队伍比较好，所以上海的局势中央也比较放心。”

6 月 9 日晚，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李富春、李先念、聂荣臻、谢富治、江青、杨成武、粟裕、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汪东兴、王新亭、邱会作、叶群等在人民大会堂观看了“老三军”的演出。陪同观看的有驻京陆海空三军负责人肖劲光、吴法宪、余立金、李作鹏、郑维山、李天焕、王宏坤、陈先瑞、张秀川等。新华社和《人民日报》都作了报道。此举大长了“老三军”的威风，大灭了“新三军”即“冲派”的志气。事后，叶群十分得意。她在工作人员面前说：“解决军队内部这么大的乱局，首长（指林彪）没讲一句话，只看了一场戏，就把那个‘冲派’压垮了。”从此，军队“新”“老”三军之争基本上算是画上了句号。

6月10日下午18时30分，肖华、杨成武、关锋、戚本禹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再次接见河南省军区和驻开封的一军的领导。

杨成武说：“总理指示，叫肖华、关锋、戚本禹同志和我，听听你们上次谈了以后，还有些什么意见，一军还没有汇报，也谈一谈，总理就不参加了。你们不是讨论了几天？把你们讨论的

情况谈一谈。”

何运洪开始汇报讨论的情况。当谈到刘建勋在北京三结合后，“河造总”和“八大总部”喊打倒刘建勋的口号时说：“我们有个错觉，以为群众喊不好制止，没有坚决提出不让他们喊。”

关锋插话说：“听说‘八大总部’过去名声不好。”

余嗣贵说：“还不是那样。”

何运洪汇报结束时说：“我们想，请能明确一下，如果我们支持错了，是‘八大总部’支持错了，还是‘造总’支持错了？我们好给家里说一说，通一通气，先做工作，这几天下面就造我们的反了。”

关锋说：“这个问题不是关键，关键问题是看我们领导同志怎么认识，能认识好，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就好了，山东就是这样。另外，我昨天看了份材料，不知确实不确实。据说，‘造总’在这里谈判，想在郑州把‘二七公社’搞垮，‘八大总部’以为自己名声不好，把希望寄托在‘造总’，如果‘造总’胜利了，他们也有希望。还说军区给他们发了枪。如果确实，这就是个问题。”

张树芝、余嗣贵马上予以否认：“民兵武器是按枪弹分开、分别保管的，我们没有给他们发过枪。”

接着，张树芝、余嗣贵分别发言。

最后，关锋说：“今天就谈到这里，我谈点意见，不一定对，我们说的不算数，这个问题是中央决定的，我讲的供同志们参考。军区的同志检查认识错误，把自己想不通的问题提出来，这是好的。现在是不是有这样两个问题：

一、是不是把‘二七公社’的问题看重了，把‘河造总’的问题看轻了，是不是一边听你们的话，一边不听话，甚至对你们很激烈，影响了你们对问题的考虑。

二、是不是你们支持那个、不支持那个，是以他们对刘建勋的态度去区分的。如对郑大‘联委’，你们的认识就是这样。刘建勋62年以前搞借地是有错误，去年调北京，表现还不错。”

戚本禹插话：“文化大革命中表现不错，主席称赞过他。”

关锋继续说：“你们对支持的或不支持的，是不是以对刘建勋的态度为转移？如果是这样，一系列的问题这样想下去就错了。”

戚本禹插话：“刘建勋在北京参加三结合了，你们还报要打倒刘，和中央对抗。”

关锋：“‘造总’提出打倒刘，还要打倒刘的后台谢富治同志，这是不对的。要不要从这方面去想一想。

提出这样两个问题来，供同志们考虑。”

杨成武：“‘二七公社’不能从纯不纯去考虑。主席说，天下没有清一色的东西。主席说坚定的左派只占百分之十五到二十，至多百分之三十。你们从纯不纯这个框框去看问题就错了。他们打砸抢可能有些过头，但他们是年青人，他们的行动是可以理解的。林副主席在全军军级以上干部会议上讲话的第二个问题说，要看主流，不能看支流。对‘二七公社’要用毛泽东思想去衡量，要很好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你们说‘二七公社’有好处，但又说他不好。是不是感情上搞不过来？”

戚本禹说：“错误肯定你们是有错误，但是怎么认识，你们

可以找‘二七公社’去谈一谈，多听他们几次。这次，我们想让军区自己认识错误，同各派协商解决，作一个自己解决问题的好典型。我接触过‘二七公社’，他们还是讲道理的。”

何运洪请示说：“我们是不是回去一趟，给家里通通气，给家里做做工作。”

肖华和杨成武说：“你们这里还没有搞通，中央还没有定，就回去，回去怎么说？还是先在这里搞通。”

杨成武：“你们要学山东。山东省军区、67军都转过来了。开始，大军区还转不过来。你们要学习山东的经验。那天，总理、康老讲了，你们犯了路线错误，和刘邓的不一样，你们要正确认识问题。”

当张树芝谈到“我们的工作不好作”时，戚本禹说：“关键在你们两位。”就是指张树芝、余嗣贵。

## 第 680 回：外交部，也上演“三国演义”　重庆打，成都“产业军”瓦解

自从 5 月 27 日和 6 月 3 日，中央文革两次接见外事口的红卫兵学生与工作人员，批评了反对周恩来的思潮后，“外交部革命造反联络站”也公开批评了社会上反周恩来的大字报，在内部则批评了“外交部革命造反联络站”负责人王中琪等人的反周思想与行动。为此，原本势力强大、几乎一统外交部天下的“外交部革命造反联络站”，在反周恩来问题上走错一步后，便开始遇到外交部内新的，逐渐强大的反对力量对它的挑战了。

6 月 10 日，外交部“联络站”召开“彻底砸烂以陈毅为首的外交部修正主义特权阶层誓师大会”。当天，“联络站”内的李燕姝、张显亭等人，由于不满“联络站”核心组推行的极左路线，认为“联络站”自夺权后犯了严重的方向性、路线性错误，从“联络站”内部杀出来，成立了外交部“革命造反联络站攀险峰野战兵团”，简称“攀险峰”。“攀险峰”虽说在名义仍属“联络站”，但实际上，他们是独立活动，并且，与“联络站”的政治方针不同。“攀险峰”不同意“打倒陈毅”，提出“对陈毅一批二保”。这是“联络站”在外交部遇到的第二个对立面。外交部的“总部”与“攀险峰”两个群众组织，同“联络站”分庭抗礼，发现他们的问题后即予以公开揭露或上报中央。外交部也开始迈入“三国演义”。

北京航空学院自开始复课、教改和启动科研项目的工作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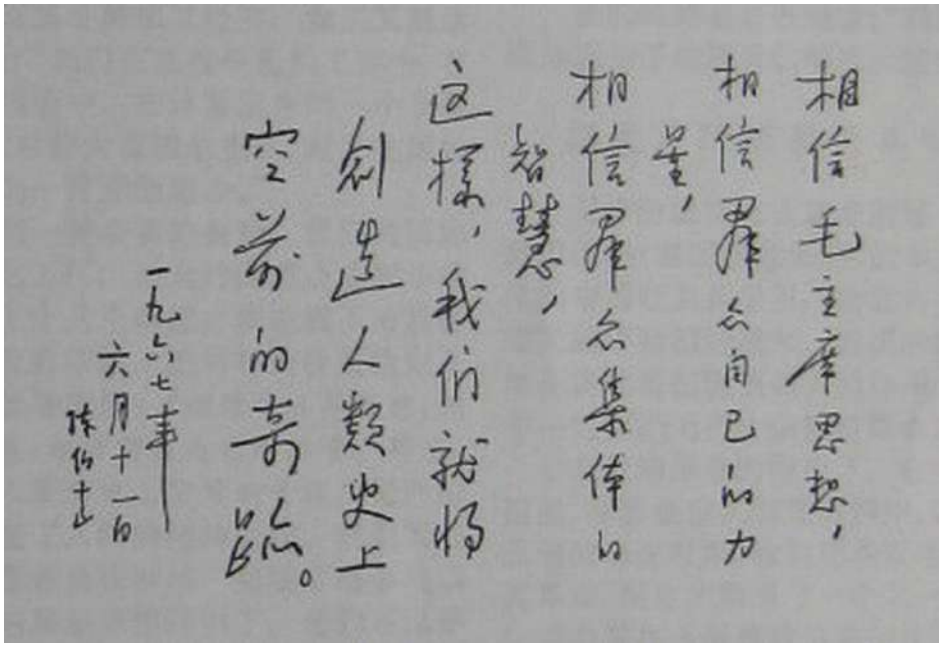
经请示汇报，国防工办、国防科委联合决定，正式把“靶-六”的设计、制造、总装和调试任务全部交给了北航负责。6 月 2 日，北航革委会正式组织了“红航兵团”，并把“靶-六”命名为“红航一号”，由多名革委会常委、委员和三结合的干部负责“红航”的工作，掀起了研制生产的热潮。

6 月 11 日，陈伯达来到北航，问起学校的斗批改和科研情况。韩爱晶作了汇报，并请他题词。陈伯达欣然答应，用钢笔写了：

相信毛主席思想，相信群众自己的力量，相信群众集体的智慧，这样，我们就将创造人类史上空前的奇迹。

一九六七年六月十一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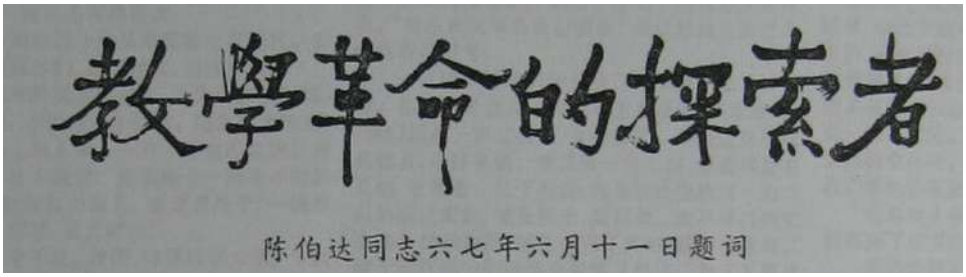
陈伯达




陈伯达要离开时，有同学拿来了毛笔、纸和墨汁，韩爱晶又请陈伯达题了一幅毛笔字：“教学革命的探索者”。

6 月 12 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宣传毛主席〈关于正确处

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通知》。19 日，《人民日报》重新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成都 132 厂自 5 月 6 日武斗开枪后，“产业军”虽然都撤到了农村，但位于郊区的 132 厂周边依然不平静，单个行动的 132 厂“1119 造反兵团”的人，离厂超过半里路，就有被“点水”的可能。起落架车间的洪国梁就是这样遇害的，该车间的造反组织也因此更名为“洪国梁战团”。132 厂各栋单身大楼开始了“备战”，大量的小石块，被运到楼上；通道的各个门洞，全装上了铁门；人手一根梭镖，枕戈待旦。

6 月 11 日凌晨，成都“产业军”和 132 厂附近的农民集合起来，在 132 厂附近吃过早饭，准备趁 132 厂“1119 造反兵团”的人还在睡梦中，围攻 132 工厂生活区，将对手一举歼灭。

千钧一发之际，工厂的广播站突然提前半小时播音，大声广播说：

“热烈欢迎 7848 部队入川支左！”

原来，7848 部队入川，借道 132 厂专用铁路，当日凌晨,火车专列开到成都南站不停，直接开到 132 厂，停车后，又继续朝西，往温江方向去了。这一插曲，打乱了“产业军”的部署，他们不明就里，不敢贸然行动，直等到上午 8 时过后，才把队伍开进 132 厂生活区，绕着圈子游行示威。正上班的“1119 造反兵

团”人员，一看来者不善，全部返身出厂，退到各单身大楼。

接下来一直到 6 月 13 日晚上，3 天时间，132 厂生活区发生了三次较大规模的武斗，动用了汽车、石块、梭镖，场面颇为惨烈。

13 日中午，成都军区下达《命令》：132 厂是重要国防工厂，除本厂外任何人一律不准入内。军区命令围攻 132 厂的一切外部人员必须立即撤离 132 厂，回原单位“抓革命，促生产队”。如果继续围攻 132 厂，性质就变了！

132 厂广播站反复播放成都军区的这道《命令》，直到下午三四点钟，围攻 132 厂的人员开始撤退，可能是已知大势已去，这些人员撤退后便各自散去，“611 事件”成为四川“产业军”的最后一跳。

之后，成都警备区到成都市西郊土桥村“产业军”总部，取缔了“产业军”，并将成都“56 事件”的主要指挥者和凶手，都抓到成都大慈寺由警备区关押。“产业军”从此在成都地区的文革舞台上彻底消亡了。

随着军区部队及造反派不断派出人员车辆组成宣传队下乡镇宣传中央处理四川问题的《红十条》,“产业军”在农村基层的势力也相继瓦解，大势已去。原支持同情者有的被打压，有的倒戈。到 6 月以后，作为一股政治势力的“产业军”，在成都地区及四川“文革”舞台上，基本上销声匿迹。流散附近农村的 132 厂“产业军”人员也陆续全部回厂。以存放在工厂武装部的《工作证》为准,对“5、6 事件”的持枪者进行了收审。这批人后来全放了，回原单位，不再做其他处分，此事也未进入个人档案。

自 6 月 5 日重庆西南师院攻打图书馆大楼的武斗后，山城两派也开始用武斗来解决问题了。整个 6 月，重庆几乎每天都有武斗和死人的事件发生：

6 月 10 日，重庆“革联会”发表声明，正式将所有权利移交“革筹小组”。

这天，建设机床厂与第二十中学两派武斗中死 1 人。

6 月 11 日，重庆警备区司令部以严厉措辞向“砸派”的“军工井冈山”发出《公函》，称 6 月 9 日解放军指战员陈干清等 4 人在制止西师武斗后被该组织抓走并被扣押、打伤，要求立即放人，赔礼道歉。

《公函》全文如下：

**中国人民解放军重庆警备司令部（公函）**

**（6 7）警司字第 2 2 号**

军工井冈山：

六月九日八时左右，重庆炮校侦察营一连连长陈干清率本连四十余名战士，和警司派出的部队（均系徒手）共同在西师执行调解武斗任务后，乘军车返回天府煤矿（归警司统一担任军管），在北碚渡口候船时，军工井冈山一千余人，手拿木棍，头戴安全帽，从北碚街上，吹着冲锋号，朝渡口冲来，先打、抓群众，后围住我侦察营的军车，不问青红皂白将连长陈干清、班长周长军、战士郑克俭、刘家荣等四同志，从车上拉下来，拳打脚踢，抢走帽徽，强行抓走。十四时左右，陈等被押至西农八二六，十七时左右又押至军工井冈山总部进行非法审讯，审讯前用木棒压在肩上，铁棒压在头上，逼着战士承认“打死了人”并说：“不老实，

就打死你”。审讯中，均遭毒打。二十三时左右，班长周长军等三同志被赶出门外。周长军、郑克俭重伤入院治疗，刘家荣轻伤归队。连长陈干清至今仍被扣押未放。

我们严正指出，军工井冈山必须立即释放连长陈干清，并对这一事件进行赔礼道歉。同时还必须指出，你们这种强行架走、扣押、殴打和侮辱我人民解放军人员的行为，是严重破坏了毛主席在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日亲自签发的军委八条命令和一九六七年六月六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的“七条通令”。在审讯我战士时提出所谓“解放军不是制止武斗，是专来打人，还说用刺刀挑死三个女战士”等一系列问题，纯属造谣。希望军工井冈山的革命同志，能够正视缺点，改正错误。否则，如对我们的劝告置若罔闻，一切后果，由你们完全负责。

附：炮校侦察营战士郑克俭等同志向警司谈“陈干清等四同志被抓的情况”

中国人民解放军重庆警备司令部

一九六七年六月十一日

主送：重庆军工井冈山

抄送：重庆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各革命群众组织

随后，“军工井冈山”总部向重庆警备区司令部回复《公函》并广为散发，指责警备区司令部偏袒“815”派。

6 月 12 日，重庆市革筹组正式办公，与解放军重庆警备区发出《联合通知》，提出制止武斗的《八条禁令》，并于 6 月 15 日刊载在《新重庆报》上。当天《新重庆报》在头版同时刊登了社论：《立即制止武斗》。

这天，市革筹组组长蓝亦农、副组长白斌到815派控制的市儿科医院看望在西师武斗中受伤的“815”派伤员和“815”派儿科医院的群众组织“915战斗团”。

6月13日，“815”派集会庆祝市革筹组办公第一天，革筹组负责人蓝亦农、白斌出席。“砸派”则在市体育馆集会，让归国留学生代表控诉遭到“815”派毒打的经过。

6月13日，“815”派抄砸了设于重庆市中心解放碑东侧工农兵餐厅，即著名的民族路皇后餐厅，将设在这里的“首都红代会赴渝战斗兵团”广播站打砸一番，重伤4人，餐厅停业。

这天，“砸派”的“军工井冈山”赶走了嘉陵机器厂“815派”的“81兵团2301团”，占领嘉陵厂。6月18日，嘉陵机器厂两派再次发生武斗，“815”被钢钎刺死一人。

6月13日，54军张处长打电话给“砸派”头头黄廉，要他去一趟54军军部，说是一、二号首长要见他，不让带随从警卫。当黄廉在体育馆准备上54军派来接他的车子时，几个老太太哭着拉住他，不让他上车，说“军队根本不支持我们，你去会被他们害死的。”

黄廉劝开了老太太，来到54军军部，54军耿参谋长对他说：“是你的一个老朋友要找你谈心，交流一下意见。”他还说：“制止武斗的事情，我们也在制止，还是要靠你们去做群众的工作。”

原来，是重庆大学“815”的一把手周家喻找黄廉，商量如何制止两派之间愈演愈烈的武斗。黄廉去的时候周家喻正在里面游泳。

坐下来吃午饭的时候，黄廉问周家喻：“学生的事情你管得

住不管得住？”

周家喻说：“虽然管不到，但是有些事情也在做。”

黄廉说：“第一是要保证我们的人回去安全，军队还是听你的话。”

周家喻说：“你们在施家梁把熊代富捉了。”

黄廉这才知道熊代富在“反到底”的人手里。

周家喻问黄廉手上有枪没有，黄廉说没有。周家喻说：“武斗升不得级，升级了大家都收不了场。”

他又问黄廉搞了枪没有？黄廉说没有，但也反过来问周家喻有枪没有？

周家喻说：“我们群众手上现在没有枪，要枪随时会有。”

黄廉说：“你这是威胁我。”

周家喻说：“你这个人自己不说话。我告诉你实情，你又说我威胁你。”他说：“我看到你们文联的楼上有机枪。”

回去后，黄廉找人询问，才知道是在文联的中学生，担心被进攻，把演戏的道具枪摆在那里，说是要吓唬吓唬那些老保，不是真枪。黄廉批评文联的中学生“完全不知道厉害，唯恐天下不乱”。他马上给 54 军支左办公室挂电话，说明那里不是真枪。

此时重庆的两派，已是草木皆兵了。

6 月 15 日，北碚地区因武斗而逃离原单位的一些“砸派”人员在西南农学院成立专业武斗组织“猛虎团”。

这天，位于市中心的第二十九中学和重庆新华印刷厂都发生了武斗武斗。重庆新华印刷厂的“砸派”因此被赶出厂，致使“砸派”的《山城红旗》报第 8、9 期无法出版。

6 月 18 日，二十九中再次发生两派武斗。

6 月 20 日，大型国防企业望江机器厂两派武斗，死 2 人。“军工井冈山”赶走“81 兵团 20 团”，占领望江厂。从这天开始，重大“815”为指挥武斗而私设的电台开始日夜值班，并进行定点定向联络。

6 月 21 日，按照重大“815”负责人周家喻 6 月 16 日提出的“一定要控制全市舆论”的要求，“815”派出动数十辆卡车，砸了解放碑周围闹市区的“砸派”广播站。

这天，“砸派”成立了全市性的统一组织：“重庆工人革命到底总司令部”，简称“工总司”。下设六大司令部：大专院校红卫兵、二七工人造反兵团、重庆反到底机关司令部、反到底中学生红卫兵总部、重庆反到底延安兵团、重庆反到底农民司令部。工总司的班长是“军工井冈山”总部负责人李木森。

针对“砸派”成立了全市性的统一组织，“815”派也成立了“重庆革命工人造反联合总指挥部”，简称“工总部”，主要负责人有：“81 兵团”负责人阳增泰、重庆“九八战斗团”负责人陈万明、二钢厂工人袁金梁等。另外还有“重庆农民革命造反联合委员会”，简称“农联会”，主要负责人巴县一品公社农民、红农“815”负责人赵行贵和“革命农民造反军”负责人艾启贵；“红卫兵重庆警备区”，简称“红警区”，主要负责人周家喻；“重庆机关革命造反联合总指挥部”，简称“机关总部”，等等。

但是，这些按工、农、学等界别划分的全市性大组织，往往只是个空架子，只能起到一些名义上的号召、宣传作用。它们与各系统、各部门其他组织之间并无明确的上下级关系。一些老资

格组织仍然是各行其是，自成体系。所以，当时由一些大组织代表签字达成的“停火协议”之类，往往是一纸空文，不起作用。

6 月 21 日，两派在化龙桥地区红岩橡胶厂、工业校、二中等地武斗。

6 月 23 日，设于重庆大坪五一技校内的“815”派武斗指挥部决定拔除“砸派”设于重庆医学院附属小学内的武斗据点。两派上午在重医附小展开武斗，重大“301 野战部队”以钢钎、大刀为武器进攻无效后，“815”派大坪地区武斗指挥部命令石油学校武斗队纵火将该小学烧毁，武斗中死 4 人，伤百余人，财产损失 3 万余元。重大“815”武斗队返校途经重庆医学院后门时，遭“砸派”武斗队拦截，重大“301”武斗队副政委被刺伤。

这天，两派在石油学校武斗，死 1 人。

6 月 24 日，重大“815”总团部署各分团为武斗“生产防御工具”，此后陆续私造了土喷火器、燃烧瓶、刀、矛、匕首、手榴弹、手枪、“八一五”式冲锋枪、烈性炸药等武斗军火。

望江机器厂 20 日被“砸派”占领后，6 月 24 日，重庆军分区参谋长到望江机器厂传达省革筹负责人成都军区政委张国华、司令员梁兴初给两派要求停止武斗的信，受到该厂“砸派”阻挠。54 军再次派赴制止武斗小分队赶赴望江机器厂，于 6 月 25 日凌晨 2 时 40 分乘船到达洛碛码头，亦被该厂“军工井冈山”的“东方红公社”拦阻，经 6 天半谈判后才得以上岸。

6 月 25 日，解放军重庆警备区司令部发出《布告》，宣布将派出武装巡逻队昼夜巡逻以制止武斗。“砸派”一些组织认为此举实为威胁该派，宣称亦将建立自己的武装巡逻队进行昼夜巡

逻。6 月 26 日，南岸区“砸派”即宣称组成南岸区武装巡逻队维护南岸区治安。

6 月 27 日，两派在中梁山地区武斗。

6 月 28 日，解放军建字 203 部队“砸派”“驱虎豹造反兵团”宣称将组成武装巡逻队在全市范围内昼夜巡逻，“望警司大力协助”。

6 月 29 日，“砸派”在市体育馆、“815”派在沙坪坝，分别以武斗中死者为“烈士”举行“追悼大会”并乘车载尸游行。“815”派游行车队在化龙桥与“砸派”发生武斗。

上半年，重庆四大煤矿因武斗严重减产，产煤量比上年同期下降 50%，从而导致全市用煤极度紧张。由于缺煤，全市冶金系统用煤的生产几乎全停，火车无法启动。近郊 221 个民用煤供应点，脱销 147 个，其余的也是时断时续供应。尤其是进入 6 月，由于武斗升级，重庆生产急剧下降，导致城乡市场极度混乱，商品供应日趋紧张，全市粮食库存供应量由 28 天下降为 13 天，不少地区煤炭、猪肉、蔬菜脱销。

## 第 681 回：港升级，淮南唐家山开枪　六一三，武汉汽配厂武斗

5 月 26 日，英国航空母舰“堡垒”号以参加军事演习为名开往香港。香港政府随即发布措辞强硬的紧急法令。

5 月 28 日，广州“地总”首先向广州市发出募捐倡议书，号召全体“地总”成员“发扬革命前辈的光荣传统，发扬共产主义爱国主义精神，全力支持港九爱国同胞反英抗暴斗争”。

6 月 3 日，英国伦敦有人到中国驻英代办处门前进行抗议。

这天，《人民日报》发表一篇题为“坚决反击英帝国主义的挑衅”的社论，对香港当局和英国政府进行严厉谴责之后，号召香港爱国者“从政治上、经济上和文化上采取一切可能的行动，向英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发动强大的反击。”“随时准备响应伟大祖国的号召，粉碎英帝国主义的反动统治！”

当天，广州“地总”和“红总”、“无产者”、“红卫队”等十几个群众组织集会，“愤怒声讨英帝国主义镇压港九爱国同胞的滔天罪行”。会上成立了“广州无产阶级革命派支持港九爱国同胞反迫害斗争筹备委员会”，通过了给港九同胞的致敬电。会后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与此同时，香港有 500 人被捕。

6 月 4 日，中央文革曾经就广州地区公安机关文革问题，电示省军管会：

广东面临港澳，对敌斗争任务繁重，公安机关文化大革命，在军管会领导下，主要依靠公安机关内部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进行。外部的革命群众组织、革命群众，可向军管会送大字报，揭

发问题，提供材料和线索，公安机关揭露出来的机密材料，不得在社会上公布。

6 月 6 日，周恩来召集有关部门负责人谈香港问题。之前，外交部起草了一份给英国的抗议照会，其中表示“中国政府将采取必要的措施”。会上，周恩来就这一措词提出批评：“我们采取必要的措施是什么？你们跟总参商量了没有？外交不和国防联系，照会就是放空炮，这不符合毛泽东思想。1950 年我们对美国侵略朝鲜发表声明说，中国不能置之不理。当时加这一句话时，我国已经在东北调动部队了。”

他对驻港机构负责人说：“香港的方案今天定了，配合国内的政治、群众工作。”“总的是一条原则，不搞总同盟罢工，不马上提出收回香港，一定要保留一手。群众运动的负责人要配合二、三线。香港合法斗争与非法斗争结合，不能在这次斗争中把力量全部都暴露了。都暴露了不符合党的原则。”“经济外贸要准备香港成为死港，不靠香港也能够在国际上活动。资金留一点，资金完全不留是不成的。把资金抽出，它可能跟我们捣乱。外贸、银行起码要准备半年的斗争。”“宣传，总社和分社两方面都配合，集中揭露，要有一百年来的资料。要有很好的宣传计划，揭露它一百多年来在政治上的迫害，经济上的剥削，文化上的腐蚀的各种罪恶，使香港居民激发爱国情绪和意志，敢于参加斗争，仇视、鄙视、蔑视英帝。不单揭露它侵占港九，还要整个揭露它侵占香港。资料应由分社发；《人民日报》用短评配合，作为一个大运动，使群众能随时响应祖国的号召，要作舆论动员。”

据当时参加会议的国务院外事办公室港澳组副组长吴荻舟

笔记记载，周恩来还说："考虑今年内，搞几高潮，有起有落，有主有从，有高有低，波浪前进，迫使他低头。"

6 月 7 日，英方就北京示威群众进入英国驻华代办处院子、前厅，打破窗户、扯下英国国旗等事，向中方提出"最强烈抗议"。中方予以驳回。

6 月 9 日，周恩来接见已召到北京的广州军区主管作战的副司令员温玉成、广州军区空军司令员吴富善、南海舰队司令员吴瑞林，对他们说："香港问题，考虑到中近东的形势不会发展那么快，阿联已接受停火，要防止美国在香港搞一下。群众运动还是按计划进行。部队移动的问题暂时停一下。"他还询问了边界上有多少兵力？有没有铁丝网？是不是平地？

代总参谋长杨成武插话说："按方案作点准备就行了。"

6 月 10 日，港英机构职工和英资企业的工人举行了万人联合大罢工，揭开了反英抗暴斗争新高潮的序幕。

这天，《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组成浩浩荡荡的反英抗暴大军"。

6 月 12 日，广州"地总"广船分部、珠江分部和"革命海员造反司令部"等群众组织 5000 多人，在大沙头举行支持香港爱国同胞反英抗暴大会，并再次上街游行。

6 月 13 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就港英当局镇压我国同胞的新罪行"发表谈话，指出："英帝如此残暴镇压我国同胞，中国人民有权给英帝以加倍惩罚。"

我们再看安徽。淮南市实行军事管制后，行政之事一出，"支持派"一概表示支持，"炮轰派"则坚决反对，依然是市无宁日。

“支持派”与“炮轰派”开始是用大字报相互攻讦、谩骂、侮辱。继而，是寻找目标揍人，逮住就打。拳脚相加不解恨，后来又发展用棍棒、大刀、长矛。在地方军队暗中介入后，群众组织又突然有了步枪、冲锋枪、机关枪、手榴弹，小钢炮，并且有了专门从事武斗的组织：“市贫司”、“十四兵团”、“115 司令部”、“猴子兵团”、“飞虎队”等等。如果说淮南 4、5 月份的武斗还只是用砖石的冷兵器时代，到了 6、7 月时，就发展到使用枪支、火炮、手榴弹等军事常规武器时代了，整个淮南的机关、学校、工人俱乐部、工人食堂、影剧院、街市要道口尽被武斗组织占据，拉上铁丝网，筑上沙包，架上机关枪，放上武装岗哨。淮南市相继发生了“火烧猴子兵”、“血战九龙岗”、“火烧高皇寺”、“炮击新庄孜矿影剧院”等大型千人武斗，伤者众多，死者惨烈。

6 月 8 日下午 15 时许，位于谢一矿原职工食堂的“支持派”的“长缨在手”、“联司”、“工总司八兵团三分团”群众组织的指挥部大门口忽然一片骚乱，紧接着是一阵砖石如雨点般砸将过来。门口有几十来人被砖石砸回门内，又跑向各办公室躲藏。只见门外一群人个个手持器械，由一个舞动三节棍的人前头开路，把食堂的大门封住，然后将密集的砖石砸向门厅内，没有跑回办公室的人们在溃逃时，忙乱中用桌柜顶住大门，抄起木棒自卫，大院里棍棒交击声、打斗的呐喊声、伤者的惨号声交织一片。原来，这是“炮轰派”的“云水怒公社”、“工农 827”等组织前来抄剿“支持派”的“联司”指挥部。

“支持派”的出路是全被封锁住了，一时间，伤亡惨重！

到了晚上，“支持派”的头头们都在夏郢孜派出所旁的“工司八兵团”团部开会，发誓报复。

到了夜间，一阵嘹亮的号声撕破了黑夜的寂静，“支持派”围住“炮轰派”设在淮南剧场大楼的“115”指挥部，并对其发起一阵阵潮水般的猛攻。但是，都被楼顶雨点般砸下的碎砖烂瓦所阻拦。“支持派”头顶方桌与床板，带着器械再冲上去，终于砸开了剧场的大门。他们发疯似的从楼梯一层层地攻了上去。人群似水，喊声动地。守者的精神防线崩溃了，防线也崩溃了，放弃了最后的反抗。

第二天，6 月 9 日，昔日喧闹的大街上没有了辩论的争吵，双方论战的高音大喇叭也沉寂了，人们感到纳闷：“今天到底怎么啦？”

原来淮南“总司”“支持派”的人马撤离了市区，占据了唐家山和八公山下的水泥支架厂为据点，实施了新的战略部署。淮南“炮总”“炮轰派”的人马则占据了闹市区的各个制高点，以森严壁垒进行对峙。两派已改文斗为武斗，各自拼命筹建武斗班子，四处搜集各种武斗器械，囤积各类枪枝弹药，其中手榴弹最抢手，多是新货。由此揭开了淮南惊天动地的武装大武斗的序幕。

唐家山是谢家集区的一个不大的山峰，也是淮南通向六安市及古城寿县的锁钥之地。山下不足一公里处便是繁闹的市区，山的西边是市郊唐山人民公社。附近乡村几乎全是“支持派”组织，“支派”占据它进可突击市区中心，退可依附乡村广大地区，他们说是遵循毛泽东“农村包围城市”的思想。

唐家山顶部航标架的顶尖处，树起了“支持派”西部地区指

挥部鲜红的大旗，旗帜随风猎猎飞舞空中，从山下市区远远望去煞有气势。山上搭起了一座座芦席茅庵，以供“支持派”栖居吃住，早晚轮流值宿，真正的大本营总部扎在唐山人民公社的九里大队。

“炮轰派”认为这是楔入自己前沿的一个钉子，一定要拔除它而后快。6 月 11 日午后 14 时，他们调集了各路人马，包括武斗力量较强的李一矿和新庄孜矿共数千人，分为三路，手持武斗器械，浩浩荡荡地杀奔唐家山。

唐家山虽地处紧要，但无险可守。山上的“支派”见“炮派”冲来，有序地避开锋芒，将大队从山上撤下来，退向唐家洼。山上只留下一座座空荡的庵棚和山顶航标塔架上仍在随风飘扬的大旗。

半小时后，“炮轰派”小心翼翼地对峙了一阵后，忽地发出高喊冲向山顶，只有一座空山。面对航标架顶上的猎猎飘舞的旗帜，李一矿“115”的一个勇武斗士第一个敏捷地登架搴旗。当他的手刚扬起接触大旗时，突然一阵清脆的轻机枪连发点射响了起来。随着枪响，那位拔旗的勇士在众目睽睽下翻落下来。

枪声是从山脚下的唐家洼生产队的麦垛上射来，这是淮南武斗响起的第一声枪响！淮南的武斗也随之升级，现代兵器用在了武斗，将原始的冷兵器取代……

特定的环境下必然会产生特定性格的人。第二个年青小伙子又不顾危险的爬了上去，随即轻机枪的点射声又清脆地响了起来，枪响人落，下面人的心提到了嗓眼上，万幸！身无伤处，只是裆间被穿了个洞，人们嘘了一口气：“我的娘哎！差点给这笨

鸟憨蛋作了个绝育手术。不死就好！你爹娘积了德了哇！”

眼望迎风飘舞的红旗，下面人的眼睛比旗帜的颜色还红上几分啊！真想把它扯下撕个粉碎方解心恨，可他妈的那轻机枪的点射真像长上了眼睛。射手肯定是曾经久经阵仗的老兵痞子，机枪可不是棍棒哪，点上了不仅咬肉，还真他妈要命啊！山巅航标塔架上的大旗，好像调笑着下面的人们，仍在不紧不慢地悠闲地飘舞着，傲的像企鹅似的……

第二天，6 月 12 日，大标语贴满了淮南市的街头巷尾，游行的队伍如过江之鲫，口号声响得动天彻地。无外乎就是一个意思，要向对方讨还血债，为伤亡者报仇。疯狂了的人们，肩扛着武器，喊着震天似的口号，又去进行武斗了。

我们再看此时的武汉。

武汉“百万雄师”经过数天的驱赶，汉阳全部、汉口大部都被“百万雄师”占领，只有汽配厂、武柴、国棉三厂、省新华印刷厂、武汉橡胶厂、中原无线电厂、长办、总工会纪念馆、民众乐园，这 9 个地方还在造反派手里。被“百万雄师”占领的地方，造反派工人不敢回去上班，而这 9 大据点中，“百万雄师”的工人也不敢回厂上班。

其实这 9 大据点有 7 个是群众组织的总部办公地，都是经武汉军区批准占用的。其中，总工会纪念馆就是“工造总司”的总部。

6 月 6 日，“百万雄师”攻占了武汉汽车配件厂侧邻的武汉棉纺三厂，建立了据点。

6 月 12 日凌晨三点多钟，“百万雄师”两百多人冲进硚口工

人文化宫，抢砸设在该处的“新华工”广播站，绑架 15 名学生。

当天，武汉“二司”、“九一三”、“三新”开会提出“文攻武守”的口号。

武汉汽车配件厂“联司”是硚口区一支主要的造反派力量。6月12日下午，“百万雄师”借口汽配厂“联司”绑架了3个军代表，包围了汽配厂，火线指挥部设在申新纱厂。

这天正好是工厂发工资，很多职工送工资回家了，当时在武汉汽车配件厂的工人不到200人，上夜班，其中有40多名是女职工。

晚上21时20分，“百万雄师”和近郊的农民，分别从汽车配件厂前后门准备夹攻汽车配件厂。

23时，他们用汽车将工厂的大门撞开，后面的人随即分成两个梯队冲了进来。第一梯队头戴钢盔，第二梯队头戴柳条帽，都穿蓝色工作服。“百万雄师”还配了3部消防车和1部吊车。消防车向工厂的楼内喷水，吊车则把人吊上楼顶，揭开屋顶进入3楼。

在3楼，有1个军代表和40多名女职工，军代表向“百万雄师”喊话说：“我们没有被绑架，你们上当了，我们都是阶级兄弟，不要打。”

没有任何作用，杀红眼的武斗队员不听军代表阻拦，对准女职工乱刺。

厂里有3个刚刚从南京来的学生，被打伤逼到平台上，3个学生没有退路，喊着“毛主席万岁！”的口号跳楼自杀。

共产党员、全国劳动模范、八级工人工程师杨正超也高声喊着：“我是共产党员，不是牛鬼蛇神，都是阶级兄弟。”仍然被

刺穿颈部，动脉出血死亡。

整个汽配厂到处是喷溅的血迹。

铁路两边站满了围观的群众，汽配厂的武斗惨状令许多人失声痛哭。

攻打至13日7时结束。当时造反派小报称，汽配厂200余人几乎都受了伤，重伤50多人，死10余人，20台精密车床被破坏。

“百万雄师”贴出标语:“用革命的武斗制止反革命的武斗!”

6 月 13 日，武汉军区发出《制止武斗的紧急呼吁书》。但是当天依然发生“百万雄师”和持械农民伏击华农“二司”学生，重伤 28 人的事件。22 岁的园艺系学生王体圣伤重不治，于次日死亡。

6 月 14 日，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政委钟汉华约见“新华工”聂年生，动员“新华工”主动制止械斗。

当晚 23 时左右，“百万雄师”进入湖北人民广播电台大楼，抓走“广播战士革命造反总部”负责人。湖北、武汉人民广播电台因此于 15 日起宣布停播地方新闻节目。

6 月 15 日晚，“百万雄师”700 人攻占了中山大道附近的制高点——水塔，直接威胁当时造反派在汉口最大的据点民众乐园。

22 时 30 分至 16 日凌晨，江汉路循礼门又发生流血事件。40 多辆满载“百万雄师”武斗人员的卡车从市委等地开往井冈山大楼方向，他们一路喊着“打倒‘工总’，镇压反革命”等口号。到达江汉路循礼门时，马路两旁小孩也起哄高喊“解散黑乌龟，镇压反革命!”汽车上的“百万雄师”恼羞成怒，下车用长矛往

人群中乱刺，一哄而散的群众群众退路被隔断，被“百万雄师”一通冲杀，当场被刺死 2 人，受伤很多。

16 日，武汉造反派分别在洪山宾馆门前和民众乐园前举行追悼会，追悼华农园艺系学生王体圣和循礼门死难者。

## 第 682 回：说农口中央二次见河南　反总理，“首都五一六兵团”

6 月 13 日下午 14 时左右，周恩来在国务院会议厅接见农大“东方红”、劳大“东方红”、农办农政“东方红”、林业部“东方红”、水产部“东方红”、农科院“红旗”、气象局“红旗”及首都农口“革命造反联络站”的负责人。农大“东方红”冯兴旺代表大家向周恩来提出，要把谭震林从中南海揪出来斗倒斗垮斗臭，支援全国革命造反派。周恩来指定他的联络员具体负责，争取在最短时间内召开批斗大会！

一天深夜，在国务院会议室，周恩来再次就秦化龙的问题召集农林口机关 3 个群众组织，农办农政机关“东方红”、中间派“新农林兵团”和“延安公社”的 9 个代表座谈，其中保秦化龙的 5 人，反秦化龙的 3 人，持中立态度的 1 人。

周恩来坐下后，摊开双手笑着说：“听说你们在‘秦化龙问题’上有三派。其实，我看只有两派，中间派任何时候都不可能存在。我建议你们联合起来开一个辩论会，定名‘秦化龙问题辩论会’。辩论双方也是你们，你们最了解情况，也最有发言权。辩论会的地点，同样在你们农办农政。农林口各部和院校红卫兵，可以派代表听会，但不参加辩论，他们不干预辩论。”

关于辩论会如何开，周恩来说：“秦化龙是当事人，实行回避，不要出席辩论会。辩论会围绕秦化龙执行的是什么路线，是否搞农业党，是否为彭德怀翻案等问题展开。辩论双方发言，应心平气和，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不要吵架。辩论会首先

由支持秦化龙的一方发言，反对方后发言，持中间立场者最后发言。”

为防止辩论会场出现混乱，周恩来指示辩论会要发票，凭票入场，保持会场秩序。他提醒大家：“支持秦化龙的是多数派，要有雅量，不能以强欺弱，不要搞小动作，大小组织一律平等。”

周恩来希望国务院农办农政的群众组织在“秦化龙问题”上带一个好头，通过辩论求同存异，统一思想，为中央机关消除矛盾开创一个好风气，树立一个好榜样。最后，他让大家回机关相互协商，积极筹备辩论会。

6 月 13 日晚 22 时 30 分至 14 日凌晨 1 时 30 分，在人民大会堂安徽厅，周恩来、陈伯达、康生、谢富治、王力、关锋、戚本禹人第二次接见河南赴京汇报代表团。河南省委纪登奎、王庭栋、耿其昌、文敏生、赵文甫、杨蔚屏、戴苏理和河南省军区：张树芝、何运洪、余嗣贵、李善亭等人、一军军长徐文礼、副军长李光善 2 人参加接见。北京红代会 6 人、“中国人民解放军赴豫调查团”6 人，军事院校“斗罗筹备处赴豫战斗队”1 人列席会议。

22时20分，首长进入会场。

大会堂外边，“二七公社”代表入场时，尚未进完，就被清华大学的唐伟和“河造总”的人将“二七公社”的其他人拦在大会堂门外，同时还将纪登奎和北京红代会的代表都拦在了大会堂的门外。

此时，周恩来等人已走进会场，不知道外面发生的事情。当他们坐下后，周恩来说：“今天还是来听听你们的，各地方代表

都来了吗？上次郑州的讲了……”

这时，康生插了一句：“还有一件事，先给大家说一下，下面还有一个节目呢，今天的会准备开两个小时。”

周恩来接着说：“听听开封的。”

“河造总”代表说：“报告总理，我们上次没有讲，这次我们要求首先发言。”

“二七”代表不同意，争相说道：“讲了，讲了……”

周恩来：“噢……噢……”然后问“河造总”代表说：“你们都来了吗？”他用手指着第一次接见时，“造总”参加会议的非正式代表说：“上次他们都替你们讲了……那你们就谈吧，谈短些。”

“河造总”的王宝生站起来说：“我今天汇报三个问题。”

他讲了刘建勋、文敏生、纪登奎为首的河南省委如何镇压河南文化大革命等三个问题，谈了约有10分钟左右，“二七”代表张保怀举手报告说：“报告周总理，我们的代表还没有到齐，在外边，他们不让进来。”

周恩来很奇怪，问：“谁不叫进来？”

“二七公社”的代表说：“‘河造总’不叫进来，”

“河造总”代表分辩道：“他们的代表够了。”

“二七代表”继续说：“还有纪登奎几个代表，他们也不让进。”

周恩来责问：“纪登奎上次就是代表嘛，怎么不让进来？！”

康生很生气地对“河造总”说：“你们为什么不守纪律？来中央要守纪律。在中央面前还能这样吗？上一次你们就没有守纪

律。要有科学性，组织性，还有纪律性。你们这样做，越搞越没有道理！这种现象是不允许的。在这儿说一下，到了北京，你们都不守纪律，‘二七’抢人家的东西……”

“二七公社”分辨：“不是我们抢的！”

王力笑着对周恩来说：“不是‘二七’，是北航。”

周恩来摆摆手，示意到外边叫纪登奎和“二七公社”的代表进来，一位军人过来俯首向王力汇报。王力说：“一个叫唐伟的，不叫‘二七’代表进来。”

周恩来批评说：“唐伟有什么权利？！这是中央开会，唐伟是清华的嘛，他们有什么权利不让进来？！”

纪登奎和“二七”代表入场，“河造总”代表王宝生继续发言，讲了几分钟后，“二七”代表又举手：“报告总理，受到阻拦，直到现在，红代会的代表还没能进来。”

周恩来问：“谁不让进来？”

“二七公社”代表说：“‘河造总’把着大门，不让进来。”

王力对周恩来说：“他们强调对等。”

周恩来：“什么对等？北京的红代会么！”

“河造总”代表嚷嚷起来，认为“二七公社”观点的代表太多，周恩来说：“这个事回去再调查，不会是这样的。”

警卫人员汇报说：“我讲了许多道理，还是不让进。”

周恩来生气了：“胡闹！把中央的大门！”

康生也气的摘掉眼镜说：“胡闹！你们还有没有中央？把中央的门，这叫闹革命吗？”

陈伯达气愤地站起来向门口走去。“河造总”的代表赶紧说：

“赶快出去个人看看，坚决按中央首长指示办事。”

王力说：“本来就没有道理，你们这个要求完全是没有道理的。代表么，谁多少，按中央决定办。

陈伯达来到大会堂门口，点了红代会的名字，北京红代会代表进入会场。唐伟等人安静地坐在门口。

会场上，王宝生继续发言，周恩来催促他说：“你讲快点吧，你一个人已经讲了一个小时啦。”

当王宝生讲到刘建勋《我的一张大字报》时，省委“总部”周洪运要站起来发言，周恩来制止说：“哎，哎，你们还讲？”

周洪运：“很短，主要是刘建勋的，最近揭发的。”

周恩来：“你叫什么名字？哪个单位的？”

周洪运：“周洪运，干事。”

康生：“什么干事？”

周洪运：“宣传部干事。”

周洪运讲到刘建勋《我的一张大字报》时，周恩来说：“你们说来说去，还是那几件事，你们交的材料我们都看过了，你们说别的。”

周洪运又讲刘建勋在河南的“三反”言行，康生：“你们不要在那儿念文章，有具体事可以讲点，材料我们这儿都有。”

周洪运：“都是新的。”

康生：“你们不是印一本一本给我们了嘛！”

周洪运：“这是新的。”

郑州大学“红卫兵战斗师”要求发言，周恩来：“不行，听我们安排，你们已经占了一个小时零一刻了。”

“战斗师”代表：“我们不是‘造总’的呀！我们是‘战斗师’的呀！我们要求发言！”

周恩来指着周洪运说：“时间都叫他给占去了，两面都是攻击郑大‘联委’的，他们还要回答嘛！”

周洪运继续讲。当提到赵文甫、文敏生时，周恩来又制止了他：“文敏生、赵文甫都在这里，你这些事情的材料交出来就可以了。”

“河造总”方面的代表抢着发言，周洪运说：“快了，快了。”又继续讲……

这时，周恩来、康生看了“河造总”转抄的郑大“战斗师”写的“北京谈判消息”的传单，周恩来说：“我提一件事，”他问“河造总”：“你们搞了个北京谈判的消息报导，你们知道不知道？郑大的谈判消息，这是哪个搞的？这简直是造谣！莫名其妙！你们把我和康老分开，说康老见你们，我见他们，这简直是造谣！大家都在这儿嘛！

康生非常生气的说：“请你们考虑，中央叫你们来汇报河南情况，不是谈判！你们以为你们一个党，我们一个党，你们一个国家，我们一个国家，你们那个党，那个国家和我们谈判了？”

“河造总”赶紧解释：“这不是我们的……”

康生：“如果你们‘河造总’说不是你们的，我们要彻底批判，追查什么人搞的。反革命！”他将双手篡成拳头，十分激动地说：“我们是和你们谈判，两党两国，你们赞成不赞成？！”

“河造总”代表不知所措。少数人说：“不赞成！”

康生又问：“反对不反对？”

“河造总”的代表们缓过神来，齐声答道：“反对！”

康生接着说：“反对就要有表示，必须彻底批判。”

“河造总”代表楞了一会，一位代表站起来说：“不是我们的，不是我们的。”

周恩来拿着那张传单说：“你们说不是你们的，那你们给我们写的东西可以作证明，你们是跟我们谈判的。你们中医学院给我们写的东西，下边就是谈判代表团。”

“二七”代表吕以尧站起来要求发言，他讲了5月29日第一次接见河南代表团后发生的国棉六厂“五卅”武斗事件。当周恩来看到“二七公社”交上的有关大楼被烧等武斗照片时，气得皱着眉头，手直发抖，说：“工人阶级都是阶级兄弟嘛，是怎么回事？怎么会打得这样惨呢？”

“二七”代表吕以尧：“总理指示何运洪他们徒手隔离，制止武斗，可是不执行总理指示，何运洪对抗总理指示。”他讲何运洪如何策划与挑起武斗……

六厂“赤卫队”代表反驳说：“造谣！没有解放军，解放军根本没有指挥，是军区的来制止武斗的，被他们抓起来了。”

北京红代会代表拿出传单、汽车牌照和照片等材料说：“这就是事实！这就是你们的车牌照，这就是你们的照片！”

六厂工人“赤卫队”代表说：“我是现场受害者，我要控诉……”他说“二七公社”26日游行时都是拿着铁棍，戴着安全帽打他们。

“二七”代表反驳：“造谣！我们根本没有拿铁棍，我们只拿语录本！”

河南支左办公室唯一支持造反派的刘生说："报告总理，我有个新问题，我是郑州支左办公室，六厂情况我最清楚。"

周恩来问："你什么时候来的？"

刘生："今天下午。"

周恩来指着"二七"代表问他："你们和他们住在一块吗？"

刘生说："对！"接着，他揭发何运洪支保不支左的情况和他自己思想认识转变的过程。当他谈到自己认为何运洪的作法是错误的，便于5月被调离河南省支左办公室。他曾给中央文革写过两封信，反映河南军区在支左中的几个实际问题。但是，这两封信均被扣压。他在发言中强调说："如果说何运洪在前段的错误还可以说是认识问题的话，那么，在中央军委《十条》下达以后，依然坚决不改，便是严重的立场问题了。"

周恩来："你把这些事情整理一下材料给我们。"

"二七"代表吕以尧继续说："最近在郑州、开封、洛阳等地，出现了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炮打中央文革、炮打谢副总理的反革命逆流，这类传单很多，仅郑工'造总'28、29两日就出了26种。"

"河造总"代表反驳说："造谣！"

"二七公社"代表陆续将有关传单、照片递给王力。

郑工"造总"代表说："我们一直认为谢副总理是无产阶级司令官。"

周恩来、康生看着谢富治笑。谢富治摇着头、摆着手，笑着说："还是谢富治，还是谢富治。"

吕以尧念洛阳"红师"6月4日贴的大标语"打倒刘建勋，揪

出谢富治，炮轰中央文革，江青靠边站！”和郑大“战斗师”、郑工“造总”的两张炮打谢富治的传单。

周恩来说：“这些内容你们都不要说了，你们有材料报给我们嘛！”

吕以尧：“他们这样做的目的就是给中央施加压力。迫使中央改变对河南问题的态度，为进一步制造反革命暴乱造舆论，他们已经把枪发给老保了，他们的家属已经转移了，他们准备中央一旦表态，支持‘二七公社’以后，和我们干，干不过我们，就拉到山里去。”

周恩来问：“一军的谁来了？”

一军的军长、副军长站起来，周恩来对他们：“陈红兵的问题，他们提出来要让放。”

开封“824”代表插话：“我们还有许多工人没有放。”

周恩来：“先解决陈红兵问题。”然后问一军：“你们说他写有反动标语……”“他”是指开封“824”头头陈红兵。

一军军长徐文礼：“材料已经报上去了。”

周恩来：“我们要叫记者联络站跟你们联系一下，看看是不是写了反动标语。”

开封“824”代表：“开封赵静生是支左的主要负责人，但也没有来，而叫徐文礼来了，这里面有文章，我们要求让赵静生来。”

周恩来宣布休会。第二次汇报结束。

北京建工学院“揪斗刘少奇火线指挥部”的宣传活动在中南海西门外持续了 10 多天，到 6 月 14 日，除留下少数人坚持外，

大队人马返回学校。此后，他们还不断派人到中南海提出揪斗刘少奇的要求。

6 月 14 日，北外“六·一六”头头刘令凯和钢院“五·一六”头目张建旗等人商议后，在北外“六·一六”成立了“首都 5·16 兵团”。在此期间，钢院、二外、商院等地不时出现攻击周恩来的大字报、大标语、传单，气焰十分嚣张。

## 第683回：第三次，接见河南省代表　不停歇，再接见广西代表

6月14日晚21时40分，在人民大会堂安徽厅，周恩来、陈伯达、康生、谢富治、杨成武、戚本禹第三次接见河南赴京汇报代表团，包括河南开封、新乡、洛阳、焦作、鹤壁地区两派群众组织的代表。省委干部纪登奎、耿其昌、王庭栋、文敏生、赵文甫、杨蔚屏、戴苏理与河南省军区领导何运洪、张树芝、余嗣贵、李善亭参加接见。这次主要是了解开封等地的情况。

周恩来说："我们把各地都请来了，有开封的、有新乡的、有焦作的、鹤壁的，信阳的、洛阳的、偃师的，兰考的也来了。郑州的听得多了，这次听听外地的。"

郑州大学"战斗师"代表首先提出："我们郑大'战斗师'还没发言。"

周恩来说："等一下。"

"河造总"代表也站起来要求发言，康生大声说："等一下嘛，我再三地讲你们要守纪律，听总理讲嘛！"

周恩来："开封'824'讲。"

"824"代表李福来站起来说："我，李福来。"

周恩来："好！李福来讲，不要太长，最多20多分钟。"

李福来："何运洪和赵静生都是一个腔调，要把8月的造反派都打成御用工具。"

对立面立即跳起来大声抗议说："造谣！"

周恩来、康生阻止了他的发言。康生批评说："你们这成习

惯了，一触即发这是要犯错误的，我给你们介绍经验，一触即跳必定要犯错误。”

李福来继续发言，谈了1军在什么时间将他们定为反动组织，1军8172部队的宣传车喊“贺龙万岁”，汇报了开封“28事件”、“211事件”、“218流血事件”打死两人……

康生问：“打死的叫什么名字？”

“824”代表黄泽生答：“杜聚明，化建公司木工，35岁。”

康生问：“哪里人？”

“824”答：“开封市人。”

康生问：“女的？”

“824”代表说：“孙爱英、开封青年农场女工，被‘赤卫队’掐死的。”

周恩来问：“那女的当时送家里了？”

“824”答：“是不是送家里的不清楚。”

周恩来问：“等了几天？”

“824”答：“8天。”

周恩来问：“怎么死的？”

“824”黄泽生：“掐死的。”

周恩来、戚本禹问：“谁运走的？”

“824”黄泽生答：“‘824’同学。”

戚本禹问：“谁开的枪？”

“824”李福来答：“一驻1军战士。”

戚本禹问：“弹头？”

“824”李福来答：“出来了。”

戚本禹问："没找到？"

"824"："没有。当时队伍打乱了，有医生诊断，有伤口分寸。"

戚本禹问："材料带来了？"

"824"："带来了，下边可交首长。"

李福来继续汇报："'824'被捕615人，占'824'的34%。"

康生："打死在2月19号？"

"824"："2月18日晚上。"

周恩来问："劳动改造多少？"

"824"代表答："57人。"

周恩来："放了没有？"

"824"："放了。"

戚本禹问："宣传车是你们砸的吗？有这事吗？"

"824"："没有。"

戚本禹："抢了枪了吗？"

"824"："没有。"

周恩来："六号门有枪吗？"

"824"黄泽生回答："'公安公社'逮捕'六号门'负责人秦俭时，群众气愤地把'公安公社'枪下了，当时交给电厂武装部了。"

"824"李福来继续说："从2月8日至3月中旬开封逮捕4000人。仅2月18日就抓了1000多人。"

周恩来提醒说："你讲快点，你讲的差不多了。你别把今晚的时间都讲了，要集中点，有材料把材料交上来。我们记者站的

同志明天还以座谈的形式找各地谈，把材料交上来，不然每个地方都要听，时间不允许，四川就是这样。”

康生问：“你对‘井冈山’有什么看法？”

“824”答：“地地道道的保皇派。”

开封师院“井冈山”反驳说：“造谣！”他们要求发言。

康生：“你讲快些。”

周恩来问：“兰考有人来吗？”

下面有人答：“有，总理，我要求发言。”

周恩来：“你等一等，还让他讲。”

开封师院“井冈山”否认他们是保皇派，与“824”再次发生争论。

周恩来对“824”说：“你不要接人家的话，你把东西拿出来嘛！”

“824”交给周恩来一份“井冈山”的成立声明。

周恩来说：“通知另一方面，清华、北航、北工有人支持‘造总’的，也让他们进来。”

北京红代会答：“支持是少数。”

周恩来：“不管多数少数，有支持的让他们进来。”

开封“井冈山”继续汇报，当讲到纪登奎、开封第一书记徐学龙收买“824”，给了70万元时，周恩来不满地问：“谁给的钱？什么钱？有什么证据？你要快一点，离题太远了！”然后出去接电话。

康生说：“听我讲，我们现在要听一下洛阳的情况，因为现在洛阳情况很严重。请洛阳拖拉机学校的常春波同志讲。”

洛阳“816”的常春波讲得很慢，主要汇报洛阳的武斗的情况。当谈到洛阳武斗影响了生产时，康生惊讶地问：“拖拉机厂停工了？”！

北京红代会尤红回答：“拖拉机厂筹委会去围攻的。”

康生问：“现在还围着吗？”

常春波答：“攻破了！”

公安厅“红色公安”强调：“这是发生在《六六通令》后。”

康生点头，接着问：“张捷是什么人？”

常春波答：“洛阳市武装部长，他参加了围攻。”

对立面喊道：“造谣！”

康生继续问：“逮捕了200多人放了没有？有没有再捕人？”

公安厅“红色公安”：“洛阳捕人了。”

对立面急得跳了起来，攻击公安厅“红色公安”的代表是投机倒把分子。这时，北京红代会的代表要求发言，场面乱了起来。

康生指着常春波对大家说：“慢慢地让他讲吗。你是红代会的，等一等，你有材料送上来好了。”

常春波：“有1000多人跑出来到八机部住着，还有的跑到其他地方。”

康生：“有没有捕人？”

常春波：“没有。”

康生：“火车停了？”

常春波：“6月9日全部停运，工人不敢上班，被毒打，被抓走！”

康生：“我想现在请洛阳的同志说明一点，现在还有没有武

斗？有武斗如何制止？这是我们当前的迫切任务。洛阳是重工业城市，在洛阳武斗，对国家不利。”

刘生：“制止武斗我有办法，只要解放军站在公正的立场就能制止。”

康生说：“对！军队应该徒手解围制止武斗。双方都要制止武斗。破坏了国家财产，损坏了身体，不好！有个叫刘峰的是哪一位？”

“河造总”刘峰站了起来。康生说：“你递了两个条子，说有要事告诉我们，你有什么事怎么不写出来呢？这事并没有什么好保密的！请新乡的讲吧！新乡已发出呼吁了。”

新乡“818”李德森汇报他们最近被围困、断粮断炊的情况，康生问：“新乡最近逮人没有？刚才那个同学讲8号捕人了……粮食站封锁了没有？”

周恩来回来后说：“焦作的谈吧！”

焦作矿院“818”刘文学汇报，很快，时间到了……

周恩来说：“今天谈到这儿，以后谈。郑大‘战斗师’不属于两派，可以写材料。下一次‘十大总部’各总部来两个人。”

康生说：“尤红把材料送上来。”

周恩来：“洛阳打群架很厉害，不符合《六六通令》。要百分之百地执行《六六通令》，军分区无论如何要劝阻，派不带武装的。军区除1军负责的地方要多负责任，把武斗劝阻。生产下降的尤其是洛阳，还有煤矿，平顶山，焦作，还有铁路全部军管，有权制止武斗。我刚才去接电话，广西那边，一国际列车94个小时停在柳州，复杂了。把农民调到车站打司机，司机受伤，把车

开到柳州停下来。要交打人凶手，不交出打人凶手不开车，这多不好！运往越南前线的，国际影响也不好。徐州也搞得不好。郑州是关键地方，不管怎样打架，不要打到铁路上来，一切为运输服务……军管会，大军区管，武汉军区管，不得支持一方打击一方。军管会是站在中央的立场上……散会。”

与会的双方还在争吵，周恩来很生气：“不要讲下去，算了。”

大家呼口号：“毛主席万岁！”第三次汇报结束。

周恩来等人未能稍歇，又匆匆忙忙赶到人民大会堂浙江厅接见广西两派代表。原来，6月11日，从越南驶进广西凭祥开往北京的六次特快列车经过南宁时，因为车上带了“422”出版的，准备运到柳州的《广西日报》，结果在驶到伶俐站时，被“联指”群众拦截，双方发生争吵，司机被打，然后说有伤不能开车。柳州铁路局“工机联”以此向柳铁军管会提出“交出打人凶手”等条件，不答应就不开车，致使列车在伶俐、黎塘停留18个小时。

6 月 12 日，列车到柳州站后，柳州“422”数百人以没有交出打人凶手为由，坐在铁轨上拦截列车，不让开出，并用机车堵死咽喉道岔，致使沿站所有列车不能运行。

6 月 14 日 23 时 45 分至次日凌晨 1 时 30 分，刚刚结束对河南代表接见的周恩来等人，在人民大会堂浙江厅第二次接见广西两派代表。

周恩来开门见山的说：“今晚接见，主要解决紧急问题。柳州国际列车停运。我等了你们 5 天，你们不听，你们不觉悟，把派别斗争搞到列车上去了。军区同志来了吗？”

广西军区副政委王希永站起来回答：“来了。”

周恩来问："柳州的火车开了没有？"

王希永答："不清楚。"

周恩来问："柳州铁路局是否也分两派？"

王希永："不了解。"

周恩来又问："徐其海同志知道吗？"

广西军区徐其海副司令员说："我不了解。"

周恩来又问："柳州的代表来了吗？"

柳州"职工总部"代表白鉴平回答："来了！"同时给周恩来递上关于停车的电报。

周恩来对白鉴平说："你念。"

柳州"职工总部"代表明在胜念电报："刚才接到电报说，11 日六次列车开到黎塘，'老保'说车上有《广西日报》，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农民去围攻，上车殴打司机。搜查司机仓和国际邮件，抢去《广西日报》。当时同铁路金局长和军管小组商量，提出三点要求：（一）交出凶手。（二）保证司机和列车的安全。（三）交出《广西日报》。当时他们答应到柳州解决，但到柳后，金局长等又出尔反尔。……"

周恩来问他："你看怎么办？"

明在胜说："我认为这三点正义要求是合法的……"

周恩来："我问你，不开车对不对？你回答！"

明在胜："是合法的。"

周恩来："铁路上都这样搞，怎么搞文化大革命呀？！要惩办凶手，没有调查怎么惩办？都只顾派别利益，不顾国家利益，不顾全大局，不顾国际影响！这件事不是那么简单，这不仅仅是

列车的问题，你们幕后有人指挥，有后台！伍晋南，你是支持这一派的，你知道不知道？”

伍晋南慌忙站起来说：“我不知道。”

周恩来又问贺希明：“贺希明你知道不？”

贺希明没有回答。

白鉴平说：“仅仅是因为司机带了 300 份《广西日报》……”

此时，“422”一代表说：“‘老保’抢报纸是不对的。”

周恩来：“他们抢报纸是不对的，你们是派别报纸……”他又对“联指”代表说：“你们上火车抢报纸，把国际列车邮件也检查了，这是不对的。《广西日报》是谁办的？”

白鉴平答：“是我们办的。”

周恩来说：“军管的报纸，你们怎么只有一派来办？”

白鉴平：“没有，他们没按中央指示办事……”

周恩来：“中央、铁道部给你们的电报收到没有？‘老多’也好，什么‘多’也好，广西‘革联’也好，什么都不听，是什么影响？”

桂林“老多”代表李日明马上说：“今天才收到，还是在桂林转来的。我就不明白，为什么电报要从桂林转来？”

周恩来说：“我只问你，不开车对不对？”

白鉴平答：“司机受伤了。”

周恩来问：“换一个行不行？”

桂林“老多”李日明表示：“不开车不对。”

“联指”代表封金丁：“11 日六次国际列车从凭祥开往黎塘，他们那一派的司机，就是他们保皇派吧，带有非法《广西日报》，

是司炉检举的。”

周恩来：“你先不讲这个，你保谁我还不知道。”

封金丁详细介绍事情的经过，讲到《广西日报》问题时，周恩来问：“在《广西日报》问题上，你们有什么分歧？”

封金丁：“他们夺《广西日报》的权，自己非法出报，我们坚决反对……”

“422”代表盛国高：“军管小组的权我们没有夺，只夺版面小组的权。”

周恩来看了《广西日报》后说：“这根本不是局部夺权，一看就很清楚，这是派别报纸，我一抓就抓对了，你们超过了军管的权。光登你们自己的观点，光登你们自己的消息。中央指示你们根本不执行。”

“联指”代表刘谓隆：“关于《广西日报》问题，我想讲一讲。这事，是伍晋南策划的。”

周恩来：“你不要讲了，我懂了。就是没有中央电报，都应该开车，受点伤算什么？开车这才是为人民服务，才算《老三篇》精神。”

“422”代表李跃增：“《广西日报》军管前就是一派的，只登一派文章，军管后分两派。”

周恩来：“只是一派声音呀！广西是前线，抗美援越第一线，越南一看就知道了。如果军管了，只登一派声音也是错误的。”

“422”代表李跃增：“军管后，军区一小撮走资派变本加厉的镇压革命造反派……”

周恩来：“不是让你们参加版面小组吗？”

“422”代表李跃增：“没有，所以我们夺了版面小组的权。”

“联指”代表：“你们不是夺版面小组的权，而是夺军管的权。”

周恩来：“你们夺到手了，为什么不讲公道一点，又造成你们一派的呢？”

“422”代表李跃增：“后来他们又调几千人来围攻造反派，打伤我们300多人……”

周恩来打断李跃增的话问他：“铁路你们赞成不赞成军管？”

“422”代表曾春生：“赞成。但他们只登保字号文章。”

周恩来：“我问的是铁路问题！”

曾春生：“也赞成。”

周恩来：“赞成就要马上打电话回去，叫开车。国际邮件抢了，首先失掉国际信用，这是另一派的错误。《广西日报》你们不同意，就抗议嘛！你们抢一次，又很凶，只登一派观点，国际消息就够你们登的了。他们抢你们的不对，报纸放在机车上，怎么会知道？两派嘛，肯定有人通消息的。伶俐在哪里”

“联指”代表封金丁答：“离南宁很近。”

周恩来：“很近嘛，一个电话通知就行了，抢，那就不对！这是第一次。第二次在黎塘，列车从南宁什么时候开出？”

封金丁答：“11日。”

周恩来：“抢邮件，你们总喜欢搞派系，不顾全大局嘛，不顾全局嘛。11日开出，上来又打，打伤几个人？”

柳州“职工总部”代表明在胜答：“还不清楚打伤几个人，主要是司机被打伤了。”

周恩来："本来是想用中央、中央军委名义解决的。后来，我们不想施加什么压力。车到柳州，要交凶手，你们的条件根本实现不了，我到哪里去也实现不了。打人是在黎塘打的，怎么到柳州来抓凶手呢？谁打的还不知道，上哪找去？北京搞武斗，人打死还不知谁打的。"

"422"代表龙智铭："金局长答应处理的，要求开车到柳州再处理。但到柳州后，他与军管小组商量，就不处理了。"

周恩来："凶手没带上，怎么处理？因凶手打了人就走了。如果受轻伤就涂点药，如果是重伤可以住军队医院，军队内这一点小事就管不了！？你们根本就不理。你们广西是援越抗美的前线，飞机经常到那里去，是一等战备区，为什么敌情观念这么弱，而'内战'情绪这么强，区党委一些负责同志，根本不管，不考虑国家，不考虑大局，个人利益第一。你们满脑子反毛泽东思想，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际就是考验你们学毛著怎么样。你们就不按毛主席思想办事，不顾整体利益，脑子已热到一百多度了。12 日凌晨到柳州，你们头一个要求，就是要交出凶手。如果我受伤，我就不这样，我还要劝同车的人开车，发扬爱国主义、国际主义精神。抢报都不对了，为什么还抢国际邮包，完全不顾国际影响，这叫两条路线斗争吗？哪一条符合呢？为了解决问题，柳州铁路军管会的、铁道部军管会的都到了现场。"

## 第 684 回：很明确，中央支持韦国清　搞“兵训”，南宁市武斗加剧

这时，铁道部军管会副主任等人进入会场。周恩来指着他们继续说：“他们亲自打电话了，说要先开车，如有不同意见可以派代表到北京谈，就是不听，到 12 日晚上，还不答应，这不叫为难呀？！”

“你们只听同伙的话，不听站在全局观点的同志的话。你们满脑子反毛泽东思想的东西，不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你们提的三条完全坚持，第一条就是交出凶手，根本不可能把凶手提交上来。抢了报纸不对，打了人也不对。一、三两条要求，根本没办法实现。报纸给他们抢了，就不知道弄到那里去了。你们这个问题是难题嘛！目的就是不开车，就是你们两派斗争的战术。”

柳州“职工总部”代表明在胜还在强调：“他们否认我们的一切要求，根本不管。”

周恩来：“军管会要求你们到北京来谈嘛！怎么不管？”

明在胜：“没有接到电话。”

铁道部军管代表：“怎么没接到，我亲自给工人司炉、值班打的电话，打了 3 次。”

周恩来：“你听听，他是军管副主任，相当于部长。”

明在胜：“打伤了人……”

铁道部军管代表：“我看了，没有打伤！”

周恩来：“就算打伤了吧！还开车到道叉上，阻拦别的车通

行，新的司机不受伤吧？为什么不开车？你们完全为了内战。车上有越南人，他们看得很清楚吧，如果有苏修挑拨就更危险了。今晚我把你们找来，开始有点生气，应不应该？”

“422”有三、四人回答：“应该。”

周恩来：“我也懂得你们对军区不满，对驻军也不满，他们是为谁呀，是为公的嘛！没有为私的？”

“422”龙智铭：“本来在黎塘就应查出来，……”

周恩来：“怎么查？你这个人好像没打过架似的，我叫卫戍司令部带你去看一看，你能够抓出凶手吗？有些人口里喊拥护解放军，一面从底下打；有些人一面喊‘要文斗，不要武斗’，脚就从底下踢过去。”周恩来在桌子底下坐着手势：“这是路线斗争呀！伍晋南，这叫路线斗争吗？”

伍晋南站起来回答说：“我同意总理的分析。”

周恩来：“对柳州的问题，我们在钓鱼台开会，听到这个消息很生气，便拟了一个电报，由广州军区转广西军区处理。按《公安六条》、《军委八条》、《六·一命令》、《六·六通令》，已经够抓了，估计到这样做可能开枪。这电报，中央负责同志签字了，但我还是把它压下来，想等一等，所以没有发。但是你们提那三条，还是要坚持，这个办法，是国民党作风！青年小将，保错了还可以改正，主席说相信群众，我对你们是推心置腹的，不相信你们还相信谁？我们教育你们不够，车已开出了吧？”

铁道部军管代表：“还有十几个旅客，坚持坐那个车到京作证。”

“422”代表、“红卫兵联络站”李朝杰：“我代表我们这个

组织，哦，我代表我们这个代表团……”

周恩来：“你还没有和他们商量，怎么能代表，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武断。”

柳州代表赶紧递了个纸条给李朝杰，同意他代表。于是，李朝杰拿着那个条子说：“可以代表，因为我们的观点是一致的。我们错了，没有顾全大局，但报纸……”

周恩来：“报纸以后再谈。”

柳州“职工总部”代表白鉴平也表态说：“我们错了。”

周恩来：“石祯祥是换班司机应开吧？打乘务员从 1 月就开始了，那也是你们这条路，从衡阳到岳阳，还有人鼓动呀！就是吕正操，弄得一班一班的人罢工，我们那时还动员红卫兵保护。广西是前线，一等战备区，为什么不想国际影响问题？报纸不报道国际的，只登派系的文章。你们打电话回去叫开车吧！同意不同意？”

“422”表示：“同意。”

“联指”封金丁：“同意。”

周恩来：“我希望你们考虑国家影响、整体利益问题。另外，军区要负责，并告诉野战军，不能让农民进城和到车站搞武斗，不要打群架，最主要是农民不要到城市去冲击车站。”

铁道部军管会代表插话：“凭祥也有农民到车站打架。”

周恩来：“首先保证列车通行，你们达成个协议，我想这条是可以达成的。”

铁道部军管代表：“香港市场脱销，我们还要安排运输。这是复杂的斗争。”

周恩来："这是复杂的斗争，国家的大事。要反美、反修、反英许多这样的事情，都要想。你们都是学生，关心国家大事嘛，完全为个人利益，我们是觉察得出来的。你们今晚两派各派出三个代表达成协议。第二，就是报纸问题，登北京消息完全可以嘛！"

这时，周恩来的秘书送来《广西日报》一份，是军管小组最后出的和"422"夺权后出的报纸，及有关材料，并说：伍晋南等还打了贺电。随后递上贺电。

周恩来问伍晋南："伍晋南打过吗？"

周恩来秘书说："是伍、贺、霍三人联名的。"

伍晋南站起来小声回答："发表过一个声明，支持过。"

周恩来秘书说："根据我们掌握的情况，伍晋南、贺希明、霍泛前天在东大桥和'工总'开过会。"

周恩来说："革命的小将们，你们要提高警惕，辨别是非，不要上当。你们说韦国清同志在北京遥控，我看真正遥控的是伍晋南。你们不要上当，不要中人家的计。"

"422"代表李跃增："人头要落地的呀！他们挑动农民搞武斗，宾阳事件，荔浦事件……"

"422"代表雷激："他们把我们红卫兵小将放进防空洞去，烧六六粉，还用鼓风机吹……"

柳州"职工总部"代表白鉴平："他们净是造谣。"同时送传单给周恩来看，内容是："毛主席在接见越南代表时，越南同志问到韦国清同志的问题时，主席说：韦国清同志是好同志、好党员，是我们司令部的人，请你们放心。"

周恩来："你们硬要逼我讲，我就讲了，主席是说过的，但

怎么传出去的，我不知道，我没有传。越南同志对韦国清同志是很尊重的，韦国清同志在越南是有功劳的。要看全部历史嘛！这点应该考虑，不考虑是不行的。你们上次逼着康老讲，康老讲了。现在你们又逼着我讲，我就讲。对韦国清站出来的问题中央是要支持。韦国清同志在越南有威望，有功，这是事实。你们把他斗来斗去，上了人家的当！他有错误是要检查的，韦国清同志也准备回去检查，我们要给他创造条件嘛！这次到北京来就是要创造条件嘛！

报纸问题。冲军管是不对的，今后再冲军管就要扣留，现在有《七条》了嘛。当前怎么办？你们已经夺了，我倒有个提议，在问题没有解决之前，不要办成派别报纸，不登本地消息，只登中央电讯，《人民日报》六版嘛，够你们登的了！”

“联指”代表赵顺先：“我们意见，还是给军管小组办，按中央指示办事。”

周恩来说：你们这么急干什么？先走一步再试试看嘛！

“联指”代表廖伟雄：“我们意见应交给军管。”

任树人：“我们按总理的意见办，但办报应由报社内部工人来办，不应依靠外部的人来办。你们要石勇滚蛋，办不到！”

这时双方又激烈的争论起来。

周恩来制止说：“不要争了。你们冲军管是不对的，广州还没有冲呀！慢慢商量嘛。为了及时传播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声音，先登北京消息，是个临时措施，这样他们就不会抢你们的报纸了，能制止一些武斗。”

盛国富：“我们完全按总理意见办，但要军区保证发行！”

周恩来："军区怎么保证？"

双方又争论起来。"422"龙智铭表态："我们坚决维护中央文革指示。"

周恩来更生气了："你们现在又逼我，你逼我就讲了，你们冲击军管就是不对，冲就是包括抢嘛，《七条通令》已经发下去了，谁冲军管单位就要抓人的。"

这时"联指"一名代表又提出："夺军管报社的权是非法的，要交回来。"

周恩来接着说："要一步一步来嘛，中央最后要作结论的。"

周恩来最后对"422"说："你们对军区有意见，我们也知道，军区支持韦国清同志过急了，个别同志工作方法有缺点毛病，你们可以提意见，进行批评。"

就在柳州国际列车停驶的第二天，中央领导接见广西代表的前一天，6 月 13 日，南宁一中还发生了两派武斗，致使南宁的武斗进一步升级。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1967 年 3 月，广西军区和广西"抓革命，促生产"办公室组织军训团进驻南宁一中。一中"422"派的学生组织"指点江山"，认为军训团支一派压一派，所以拒绝参加军训团指导成立的全校性群众组织"一中红卫兵团"。

4 月下旬，"指点江山"加入广西"422"，而"红卫兵团"则加入广西"联指"。两派在校内冲突不断。

6 月 13 日上午，长期在社会上活动的"指点江山"组织 34 人回校，宣布要在校内搞"兵训"，占据了学校军训团宿舍。

广西大学“革联”亦来了十多人，说是来指导“兵训”，要进驻一中，遭到一中“红卫兵团”的反对，要求广西大学“革联”学生撤离一中，并与“指点江山”派展开激烈的辩论。

当晚 20 时左右，“422”派在朝阳广场“造反楼”广播说，一中“指点江山”被 300 多人围攻，发生严重武斗，要求声援。“工总”和部分学生、街道群众 500 多人闻讯赶到一中，封住一中大门。

为避免事态扩大，军训团长孔竹出面劝解，遭到“工总”一些人的围攻，孔竹的军用吉普车也被群众掀翻在云亭街口。

紧接着瓦片、石块向一中打来，守卫大门的“红卫兵团”学生被打得头破血流，于是，“红卫兵团”也以石头还击。

不久，“422”派的数百人推倒围墙冲入院内，打灭路灯，割断电源，包围了教学大楼和一部分教室，向“红卫兵团”占据的学校仪器室投掷石头。“联指”派组织也前来支援。双方对打石头仗。参战双方的防护措施都是很到位，头顶藤编安全帽，手提木板小盾牌，背上还背着一个斗笠作龟壳……

14 日凌晨，一中“红卫兵团”的十几个人捣毁了一中“指点江山”总部。

14 日清晨 5 时，“422”派的武斗人员撤离，武斗告一段落。

上午 8 时，“422”派的大批人马又重新将一中包围，由一中“指点江山”、西大“革联”、桂林“老多”200 多人向一中大门冲击。9 时许，“新工总”、西大“革联”又派来几百人增援，控制了通往一中的交通要道。

“联指”派出动了铝厂、化工厂和橡胶厂约四、五百工人，

前来支持本派武斗。双方互扔石头、砖块。不久，双方大批后援者又不断赶来，其中有不少是手持棍棒和钢钎等武斗工具的工人。双方展开了持续不断的石头仗，武斗一直延续到 6 月 15 日上午结束。

这场武斗持续了 3 天，双方受伤者达 400 多人，其中重伤住院者 100 多人。一中校门前街道两旁的民房屋瓦，全都被揭下用来武斗，屋顶全部毁坏。学校的教学仪器室被打得破烂不堪。校内教室的阶砖大部分被撬烂，用于武斗，直接经济损失约 5 万元。

南宁市一中“613 事件”后，南宁两派对立情绪激烈。6 月 15 日，“422” 派听到“专政机关要放劳改犯出来参加武斗”的谣言，于是扬言要“血洗永宁公安分局”。遂于 6 月 16 日下午 15 时开始，围攻正常上班的永宁公安分局，将永宁分局副局长李义平打死。一群不明真相的人还放火烧分局。永宁公安分局的所有户口薄和档案文件被付之一炬。

随后，“航运工总”又组织围攻永宁派出所，所长何绍芬等 14 人被打伤，其中 8 名公安干警被打重伤。派出所指导员余雄为保护其他人突围，只身冲出来跑向邕江河边，吸引围攻人员到那里，结果被活活打死在河边。死时长裤被扯到膝下，在内裤的小袋里还有几角零钱，一个胆大的小孩还用小棍子去挑出来，然后拿了走人，尸体在河边搁置数天。

围攻人群至 16 日 18 时 30 分方才散去。

## 第 685 回：第三次接见桂两派代表 淮南打，“猴子兵”过火焰山

6 月 15 日 21 时 20 分至 16 日 0 时 10 分，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安徽厅第三次接见广西两派代表。他一进大厅就问六次特快列车的情况：

“今天车开出了吗？”

“联指”代表回答说：“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于今天上午 9 点 38 分开车了。”

周恩来又问：“达成协议没有？”

桂林“老多”代表李日明：“没有商量。”

周恩来：“今天接见三个钟头，因为还有别的事。”

“联指”代表廖伟雄对“422”说：“上次接见后，有些人说：你们说霍泛是叛徒，但没有足够的材料，我今天再来落实他的材料，看你们还保不保！

接着，他详细的谈起他们从敌伪档案查来的材料。当谈到霍泛在上诉书中说他参加了陈立夫、陶希圣组织的读书会时，廖伟雄质问霍泛：“你是否参加 CC，要老实交待！”

霍泛说：“根本没有！”

周恩来对廖伟雄说：“你不要问他，你说你的。”

廖伟雄继续说：“由伍、贺、霍组成反革命联盟后，走资派、牛鬼蛇神纷纷投靠……”他举例说明。当说到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副部长谢王岗时，康生问：“是不是在党校学习的那个？”

廖伟雄答：“是。”

康生说："据我知道，合浦地下特委被破坏，与杨虎有关系，杨虎通敌，谢王岗跟他有什么关系么？"

廖伟雄答："没调查。"

廖伟雄继续说："还有民主党派的 22 人参加了'422 火线指挥部'，成了'革命领导干部'。"

"422"代表反驳道："造谣！"

廖伟雄对"422"代表说："你们保错了，尽管我们过去分歧很大，我们还是欢迎你们反戈一击。"

"422"代表雷激："刚才区党委组织部廖科长把我们红卫兵自己搞的'422 火线指挥部'说的一塌糊涂，我们不能容忍。他们说支持我们的都是走资派，请首长调查。另外我要声明一点，我们的行动不受伍晋南支配。'422 指挥部'全是学生、红卫兵的行动，全是自己干的，我们靠自己独立思考，不受任何人的支配。一中军训团团长孔竹指挥一中受蒙蔽的红卫兵围攻'指点江山'，西大'革联'去支援，一中红卫兵以赶'革联'同学为名，挑起武斗，使用农药六六六粉、石灰，把我们受伤的红卫兵塞进防空洞，烧六六六粉，用鼓风机吹，不知死了多少人……

周恩来："有这样的事吗？军区同志，这里有军用电话，赶快打电话查有无此事，如有，马上放人出来，对受伤的要治疗。"

广西军区副政委王希永马上出去打电话。

雷激继续说："14 日他们从冻肉厂运来 40 多把杀猪刀，3 卡车石头，有铁钉木头，见人就打，有一个 14 岁的小将被挖了眼睛。"

康生怀疑地问："你们是从电话听来的？"

雷激说："是的，还打死 8 个人……"

周恩来："不管哪一派，不准动员农民进城搞武斗，这妨碍生产，妨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秩序。"

雷激："他们打伤了我们 357 人。"

周恩来："真有这回事么？你们要核对事实，可组织一个调查团去调查。材料要落实，如果真是这样，就很不对啦！现在整个南宁注意力都集中在一中，你们大会战啊。"

"422"代表龙智铭："这是从 6 个医院查来的数字。"

他接着念住进医院的人数。

周恩来："你们调查很快呀！"

雷激："还有从罗文农场调来 600 劳改犯搞武斗，打我们。"

"联指"代表说："罗文农场根本没有劳改犯。"

周恩来问："一中'指点江山'有多少人？"

雷激答："200 多人。"

周恩来说："伤的就不只这个数字呀？"

雷激答："我们有人去支援的，也被打伤。"

周恩来问："我们有个调查团，去调查，如果没有这些事怎么办？"

雷激说："我们有些红卫兵的行李被淋上汽油烧了。市公安局还用望远镜指挥武斗，他们说这是群众运动，我们管不了。有的群众跪在解放军面前，他们见死不救。我们到军区，他们不让进，我们手挽手冲进去，他们说我们打伤解放军战士，也不出来解决。"

"联指"代表胡立辉："我是一中红卫兵，我来揭发他们刚

才在总理面前的造谣。一中来电，我念一下，”他开始念来电，然后说：“军训团几十名战士已被打伤了。”

康生问：“是不是你们也在动员外面的人来支援？”

胡立辉说：“我们没有动员。”

康生又问：“是不是他们在家动员了你不知道？”

廖伟雄：“据了解双方都有，因为他们打上门来，我们不能见死不救。”

康生点头道：“这还差不多。”

李日明说：“我是桂林‘老多’的，宾阳事件……”

周恩来：“你们‘老多’打遍全广西喽！还到宾阳、南宁。你昨天承认不开车是不对的，我很欣赏这点。今天你应反对武斗。”

李日明：“他们造谣说粮食局被抢，调动农民进城搞武斗……钦州以召开学习‘毛著’积极分子会议为名，调农民进城，砸红卫兵一、二、三司令部。”

周恩来说他：“你又讲到钦州去啦！”

李日明继续说：“钦州红卫兵静坐斗争，已有 20 多天了，我们也知道这个办法不好，但……容县学生上课，写作文，都写‘老多’滚回老窝，唱歌也唱桂林‘老多’滚蛋！放幻灯也放‘老多’滚……

秘书送电报给周恩来，他看后生气地说：“火车于 9 点多钟开出，但中途又被截，到现在还开不出广西。昨天已呼吁了……”

戚本禹非常生气的说：“这是破坏，简直无法无天了，这是破坏文化大革命！无产阶级革命派绝对不是这样！”

康生也生气得说："你们这是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破坏文化大革命，不管你们那一派，在广西出现这种情况是奇耻大辱，你们双方代表不感到羞耻吗？你们这样搞实在不像样子，再这样搞，《人民日报》公布你们的材料，看你们垮台不垮台。"

戚本禹："我看按照康生的办法，公开批评，在《人民日报》上公布。"

桂林"老多"李日明急忙检讨："我们没照顾国家大局，我们错了，已打电话回去，要顾全大局，不再这样干了。"

"联指"代表廖伟雄趁势说："今天开车是我们的人开的，他们进一步反对总理的指示，拦车。"

周恩来："你们赶快达成协议，达成后，要在《广西日报》上刊登这个消息。"

李日明接着谈"荔浦事件"："在荔浦我们运了两千多张《广西日报》，他们煽动农民来抢，把我们的人也打伤了……"

周恩来："你们多少人在那里？"

李日明答："200 多。"

周恩来："你们回本地闹革命不好吗？你们开始革命造反精神好，现在各地起来了，还包打天下呀？！"

陈伯达严肃地说："不能包办代替，搞过头了，会走向反面的。"

桂林"老多"杨福庭说："我们原计划是派 100 多、200 人左右出去搞调查，不是串联，这对我们家里没影响，对全区文化大革命也有利。后来因被走资派煽动农民来围捕。有的去增援，现在可能增多了一些。"

李日明:“钦州只去了 7 个‘老多’,却调动 1 万多人来搜捕。”

杨福庭:“容县去进行调查的只两个‘老多’，也调动两三千人来围。”

周恩来:“于是，你们‘老多’就越去越多了！现在和你们商量商量，把‘老多’调回来，搞好本单位斗批改，也就是支援嘛！文化大革命搞一年了，相信那里的人能搞好。不然人家反感，到处围你们。”

他还说:“桂林‘老多’开始创业时不错嘛！现在你们回去搞好大中学校的文化革命不好吗？你不到处去，谁还会打你们？你们桂林‘老多’进《广西日报》报社后，搬走机器是否有这回事？”

李日明马上说:“没有！没有!”

周恩来又问:“一点都没有动吗？”

“联指”代表说:“运到荔浦有发电机。”

桂林“老多”杨福庭坚持说:“没有，是运《广西日报》和我们自己从桂林拿到南宁去的广播器材，一个发动机和一些喇叭。是我们宣传车上的。”

周恩来:“你们看社论了吗？不要再搞宣传车了。”

李日明:“我们没有，都赤脚走天下，是有名的，写标语用泥来糊。”

“联指”代表任树人:“‘老多’的宣传车还在南宁出现。”

周恩来:“你们广西老百姓，生活是艰苦的，要保持这一光荣传统，红七军赤脚走天下，是有名的，写标语用泥巴来糊一般还可以保持 5 天。”

广西军区王希永副政委与广西通完电话回来，将材料交周恩来。周恩来边看边念：军区调查，自 13 日起有武斗，西大“革联”、“工总”、二中“赤卫军”三、四千人围攻一中，支持一中的也来了三、四千人，军训团的解放军被打伤了几人，孔竹被斗争，军区宣传车被砸坏一辆……周恩来说：“我建议你们回去不要用宣传车，反正出去是被砸的，砸了汽车，是个损失，广西是前线、需要用车”。他又接着念：双方伤 300 多人、没有六六粉熏防空洞的事，现武斗已基本停止。《解放军报》记者王荔报告：13 日打起来，发生武斗，汽油烧被子的事，记者进不了现场，无法了解，挖眼睛的事没发现，确实被打 400 多人，伤 100 多。《红旗》杂志记者报告：武斗确是 13 日发生，情况与上差不多。念完后，周恩来又说：“不要调动农民进城搞武斗，你们在这里商量解决广西问题，不要在家搞武斗。”

“联指”代表冯东晓揭发伍晋南是广西文艺界右派的总后台的材料，揭发伍晋南收罗文艺界的牛鬼蛇神作为“422 指挥部”的干将……

“422”、桂林“老多”则反唇相讥军队支一派压一派……

周恩来说：“时间已经到了，有几件事弄清一下：第一，这边（指联指）你们劝说开了列车是对的，但一定要说是伍晋南策划还没有调查清楚，若调查清了，要处理的。但是，他们冲击报社，还打了贺电，这完全不对嘛！”

康生对伍晋南、贺希明、霍泛说：“你们在北京遥控，还搞这一套，是不可理解的。”

周恩来说：“你们说韦国清遥控，事实上，我问他很多广西

的事情，他都不知道。而伍晋南你们和他们住在一起，很了解，消息很灵通，是不是住在一起？”

“老多”代表插话说：“他们住在旁边”。

“联指”代表反驳：“住在中间，还经常一起开会。”

周恩来接着说：“再这样搞，我就隔离你们。第二，武斗问题，我们打电话给军区，要立即制止，广西是前线。你们（指联指）说得对，为什么到报社静坐，旁边就是越南领事馆，敌机又在空中侦察……，对军区有意见可以提，也可以批评，但不能采取那样的办法。”

周恩来对“422”代表说：“你们要独立思考想问题，革命靠自己。我建议你们双方对开车问题、不准动员农民进城搞武斗问题，达成个协议。达成了，说明你们是造反派。康生同志，还有话么？“

康生正在看李日明和杨福庭递上来的条子，边看边说：“李日明说桂林的三结合的条件很成熟，从你们对解放军来看，很难说三结合成熟。解放军是毛主席亲手缔造的。毛主席教导我们要三依靠，没有解放军，文化大革命就不能顺利进行，广西军区、军分区，我们不能说他们没有缺点、错误，但你们从来不讲一句解放军的好话，今天我不是考你们，中央关于军训头一句的五个学习是什么？”

“老多”代表李日明答不上，支支吾吾说：“康生，我想到一个问题.....”

周恩来笑：“你说啦！记得就记得，记不得就记不得。”

李日明回答说：“记不得。”

康生："你们不记得，怎么能说解放军不好呢？还有十五个文件是什么？这一点希望同志们好好总结一下，学习一下。"

李日明想解释："康老，康老.....”

康生对他说："你不要讲，听我的嘛！"然后康生很严肃地说："几次会，你们都攻击解放军，难道解放军就像你们说的那样不好，不可依靠、不可相信、不可学习吗？你们这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要好好端正态度。伍晋南，你这个老红军，我希望你考虑考虑这个问题。"

周恩来也说："伍晋南，我最后警告你，再插手铁路、插手军区问题，我就要隔离你们。"

6 月 18 日，广州军区在柳州铁路局及各分局成立军管会，任命葛冲等为军管会负责人。

此时，在安徽淮南有一支名闻遐迩的红卫兵组织，其全名为"淮南红司机械学校大闹天宫革命造反兵团"。这是一支出现在文革之初的造反派组织，在全市极有影响，被人们戏谑地称之为"猴子兵团"，是"支持派"的主力。"猴子兵"的司令张店海更是"支持派"中的干将！对方"炮轰派" 中的"飞虎队"早就想将其摧垮。

6 月 15 日上午 9 时许，只见"炮轰派"一队队头戴柳条帽的人群涌向机械学校所在的淮南矿机厂，一车车手持钢叉的人开向矿机厂，几千人汇成了重重的包围圈，将矿机厂"大闹天宫造反兵团"所在的一座二层楼指挥部围了个水泄不通。楼上 30 多个"猴子兵"被困。相隔几十米之处是一座高高的大车间厂房，上面还有几百名"矿机厂革联会"的成员也被"炮轰派"围住。

这一大一小两座楼房，如同两个孤岛一般隔空相望，互相无法联络。

“炮轰派”完成分割包围的部署后，首先对“猴子兵团”所在的二层小楼实施进攻。一阵啸喊，“飞虎队”几百人作为第一梯队潮水般冲了上去。二楼的各个窗口及楼顶上的木头石块雨点似的泼了下来，一些人被砸得头破血流，第一波浪潮如同退潮般撤了下来。

首战遭挫，楼下的人遥指楼上大声咒骂，楼上的人俯瞰楼下反唇笑讥。

“炮轰派”调整战法，从四处找来许多方桌，床板，还有食堂用的大锅盖，作为掩护的盾牌。

一声号令，举着、扛着、顶着各种“盾牌”的人潮又地攻了上去，砖石砸得“盾牌”咚咚山响。这种战法就连《三十六计》、《孙子兵法》中也无典例，可到底有所奏效了。

“攻进去了！攻进去了！”

“看这码‘猴子兵’该彻底完了！”

“抓住猴头头狠狠修理！”

围攻者和围观者庆贺着、咀咒着，认为锁定了胜局。

谁承想，“猴子兵”清一水的机械专业学生，其中不乏能人。而且，机械学校依附的是淮南煤矿机械厂，这是全国数得着的大厂，人们习惯称之为“中央机厂”，全淮南的人尖子几乎都汇集于此，他们的技术在全国也是一流的。人们都说，只要有原材料和设备，矿机厂机枪、大炮、坦克车都能造出来。“猴”哥们的指挥部原是机械学校的食堂，一层是宽敞的饭厅与伙房，上至二

楼要从仄仄的、弯了几弯向上的、只能容纳一个人单行的、全是粗铁料与钢板焊接的、而且陡度很大的楼梯方可上去。平时单人上去还得小心注意，真可谓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呀！对于自己老窝的防卫，“猴”哥们也曾缜密地费了偌大的心神。在仄梯的转弯地方，均有焊接牢固的钢板作为闸门吊桥，机械传动灵活自如。若想闯过这几道闸门，那真得跟诸葛亮同志好好儿地商磋商磋哩！

话说“炮轰派”的弟兄们虽然冲进一楼大厅，可是面对仄梯、吊桥、闸门钢板，霎那间一筹莫展。于是，又把武斗改为“文斗”，两派一上一下，上下对骂，互为呼应。真可谓一客荷樵，一客抚琴，虽是高山流水，今朝难为知音哇。

常言道：恨从胆边起，智从急中来。围攻者中也不乏打过战仗的有识之士，见小楼为砖木结构，脑中忽闪出一句《三国演义》中的名言，“欲破曹公，宜用火攻”。于是拢集木料点起火来，火借风势，熊熊腾起。霎时间小楼罩在腾腾烈焰之中将被吞噬，再牢固的闸门吊桥也将无济于事了。30 多个猴子兵，30 多条风华正茂的年青生命悬于一线……

岂知猴子兵已作最坏的打算，他们早用粗钢缆做成了连接对面几十米处的车间厂房顶部的空中索道，此时他们在烈火尚未熊腾之际，分批坐在链接钢缆索道系着的大吊篮中，凌空飞向对面高大的厂房平顶之上，快捷来回，安然无恙。

“炮轰派”恨得大骂“猴子兵过火焰山！”如此一出《三国演义》中的“火烧赤壁”，又接演了一出《西游记》中的“过火焰山”。这次的火烧“猴子兵”大战只好草草拉上了帷幕。

## 第 686 回：六一七，民众乐园大武斗　掷砖瓦，激战在财贸大楼

6月17日，武汉民众乐园再次发生大规模武斗，死伤数十人。

民众乐园位于汉口中山大道中心的闹市地区，上至民生路口，下至六渡桥路口，形成一个约一公里长的走廊，是武汉市最大的综合娱乐场所，在 1949 年前就与天津劝业场、上海大世界并称为全国三大娱乐场，建于 1918 年，最先名为汉口新市场，1926 年改名中央人民俱乐部，1945 年命名为民众乐园，是驰名中外的文化名园，有大小剧场 12 个，露天演出场地 4 处，可同时演出京剧、汉剧、楚剧、话剧、豫剧、越剧、评剧、杂技、曲艺等，以戏剧最为繁荣，是各种戏剧曲艺杂耍游艺的综合娱乐场所，最多时可容纳 3000 人。建在园内的“江夏剧院”，旧名“新市场大舞台”，以上演京剧为主。1949 年后为武汉市京剧团的专设演出场地。

民众乐园在文化大革命中虽改名为“人民文化园”，但很少有人叫新的名称。当时，这里被“钢八司”占据，没有头头。不管是谁，只要是造反派观点的人都可以去，每天都有很多人在这里聚集，交流消息。这里还住着不能回本单位或不能回家的造反派群众，也有来自北京、上海、河南等地的群众。

6 月 8 日上午，“百万雄师”已经派人前往民众乐园，试图驱赶那里的群众，由于“钢八司”人多势众，“百万雄师”被赶了回来。

“九一三”在这里设了一个宣传站。后来，各造反派组织在

民众乐园成立了抗暴指挥部，“九一三”汉口办事处头头、“九一三”汉口指挥部总指挥张鹏程任指挥长，“新华工”和“二司”各有一名学生任副指挥长。

6 月 11 日晚 18 时，很多造反派工人聚集在“新一冶”总部门前，要去声援民众乐园。“新一冶”头头曹承义表示同意，通知一冶总调度室调了 30 多辆大红头的“斯柯达”进口载重汽车，满载着“新一冶”、武钢“一冶红旗”、武钢“新焦化”等青山地区的群众组织从青山钢城向汉口进发，前往民众乐园，声援那里的几个造反派广播站。只见一辆装有高音喇叭的宣传指挥车在前面开道，后边每辆车上都有一面“新一冶”或其它几个组织的战旗。其中有一面旗帜中间赫然写着“敢死队”三个大字。旗帜上黑乎乎的，好像是刚从硝烟弥漫的战场上下来。这辆汽车上的年轻工人大多光着上半身，少数人穿着背心或将工作服搭在脱光上衣的肩膀上。这面旗帜和这辆车在游行时果然吸引了沿途群众的眼球，受到众多群众的鼓掌和欢呼。

浩浩荡荡的车队经过和平大道、大东门、长江大桥，中山大道，于晚上 19 时到达汉口水塔附近，距江汉路大约 200 米之处时，看见从江汉路方向跑来许多惊惶失措的群众，有人高声喊着：

“‘百万雄师’来了！”

接着看到约有 10 辆左右的“百万雄师”车队，开着雪亮的车灯，一辆接一辆的从北向南驶过中山大道。车上的人排列整齐、手握铁矛、戴着藤条帽、身穿清一色蓝色工作服，长矛一律指向天空。将“新一冶”游行车队行进的方向完全隔断。

“新一冶”的车队基本是赤手空拳，没有准备，曹承义见状，

赶紧叫宣传车调头，指挥车队后撤。此时，“百万雄师”的车队已经开到离他们几十米的距离，群众向西边跑边骂：

“打倒陈再道！打倒‘黑乌龟’！”

“黑乌龟”是武汉民众对“红武兵”带有贬意的称呼。

游行的车队调过头以后，从水塔经过民众乐园返回一冶。他们在经过民众乐园时，武冶机修厂“九一三”一个叫连传庆的工人站在路中间，像交通警一样指挥“新一冶”的八、九辆汽车开进了民众乐园。连传庆对开进民众乐园的曹承义说：

“你们来了正好，‘百万雄师’已经封锁了长江大桥，你们就不要再回去了。”

民众乐园指挥部的人将进入民众乐园的“新一冶”大队人马带到了南洋大楼。张鹏程对曹承义说：“我已将你们‘新一冶’分配驻守南洋大楼。我们这里人太少，你们来了，我们就安全了。”张鹏程还说：“这里有食堂，但一下增加了这么多人，需要有人帮忙，你们可以加派一名炊事员帮厨。”

张鹏程没有和曹承义商量就作了这些安排，曹承义也没有表示反对。

为了便于撤退，曹承义安排一冶机装公司及设备处造反派运来跳板、竹竿，在南洋大楼屋顶上搭建了天桥，使南洋大楼和民众乐园联成一体。他们还运来了广播器材，成立了南洋大楼“新一冶”毛泽东思想宣传站。这样，在民众乐园、南洋大楼、红太阳大楼（六渡桥百货大楼）、六渡桥路口的中南旅社，造反派就有了四个宣传站，他们互相呼应、互相支援，从早到晚，播放的都是“打到陈再道，为‘工总’翻案”的口号和批判文章，也播

送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中央文件、毛主席最新指示和激昂的革命歌曲。中山大道和三民路的马路上每天都挤满了支持造反派的群众。

这时的武汉市委、武汉各区区委都已经被“百万雄师”占领，武汉军区在各区区委设有支左办公室，“百万雄师” 在各区区委设立联络分站，于是便形成了实际上的“百万雄师”与各区“支左办”联合办公的局面。“百万雄师”和武汉军区在武汉都有一套完整的，按原中共武汉市委架构形成的市、区组织形式。

在离民众乐园只有一公里远的江汉区委、区政府旁边的江汉公园是“百万雄师”武斗人员、汽车、战备物资的储备、供应集中地。文革前，江汉区政府办公地点不够，将清芬路上一座四层大楼作为财政、贸易部门办公地点，所以叫“财贸大楼”，内有区财政局、商业局、手管局、饮食服务公司等单位办公，就在民众乐园附近。其中一楼是商店，二楼以上是办公室。

为响应武汉军区回单位抓革命、促生产的号召，6 月 15 日，8201 部队，即湖北省军区独立师和“百万雄师”总部研究决定，先将江汉区财贸系统的 200 多名“百万雄师”群众送回六渡桥清芬路上的财贸大楼。然后，以此作为宣传点，再派人员进驻对面的汉口工艺大楼，这样，在两方夹击下，挤走民众乐园的“牛鬼蛇神”。

“百万雄师”在 8201 部队的指点下，确定了行动方案，8201 部队副政委武方倜亲临“百万雄师”联络站进行部署。在 8201 部队的具体指导下，对财贸大楼的情况事先做了侦察和了解。

为防意外，“百万雄师”还准备派保卫人员在江汉区财贸系

统这 200 多名“百万雄师”群众后边护送他们返回财贸大楼，尽量不挑起事端。8201 部队五团参谋长，坐镇江汉区委，与“百万雄师”的史天玉一起指挥这次行动。但是，谁也未想到，这次行动最后会闹成一个大血案。据后来“百万雄师”作战部部长刘敬胜 2005 年回忆：

“按当时实力，武汉市那个点我要拿下，真不费吹灰之力，说实在的，只要中央给我两个军，我拿下台湾决无问题，当时（指 6 月 17 日），主要是军区胆子小，怕出问题，结果我们吃了大亏，死了两个队员。”

6 月 17 日，天气非常炎热，阵阵热浪扑面而来。

上午，成立于 5 月 5 日的武汉市“大中学校革命造反派联合指挥部”成员张维荣、聂年生、杨道远、董学精、余洁清等特意到民众乐园视察，民众乐园的“抗暴指挥部”总指挥、“九一三”的张鹏程和副总指挥、体育学院的学生、“二司”赵子强领着他们在民众乐园看了一遍。当他们从民众乐园走出来时，看到中山大道上一片大乱，人们纷纷从六渡桥方向争先恐后的向民众乐园这边跑来，边跑边喊：

“‘百万雄师’来啦！”

“‘百万雄师’来啦！”

9 点多钟，中南旅社的广播站发现“百万雄师”的武装车队向三民路方向开来，于是广播员大声疾呼：

“革命造反派的战友们，‘钢八师’的战友们，‘百万雄师’的武装车队现在向六渡桥方向开进，请尽快用一切办法，在各主要路口设置路障！请尽快用一切办法，在各主要路口设置路障！”

不一会儿，六渡桥十字路口就聚集了几百名群众，他们在中山大道的五马路、工艺大楼、前进一路口等东、西、北三个方向，用各种石块、木头、废铁等，设置了路障，阻止“百万雄师”的车队前行。街道两边的商店听到广播，也都赶紧关闭商店的大门。街上行人有的逃走，有的加入抗议的队伍。

中午，“百万雄师”的非武装人员已进入财贸大楼的大门。随后，从约一公里外的江汉公园又开出十来辆“百万雄师”的车队，230 余名手持长矛，头戴柳条帽的“百万雄师”保卫人员乘车来到财贸大楼所在的清芬路口。当时，“民众乐园”并不知道这边有武装人员进入，所以，“百万雄师”的车队未遇到抵抗，很顺利就到达了清芬路口。随后，没想到的事情发生了，两边楼房上的群众，其实都是些 17、8 岁的小青年，揭下房顶的瓦片，如雨点一般向“百万雄师”的车队砸了下来。很快，“百万雄师”就有人受伤。由于丢瓦片的都是些群众，“百万雄师”不好动手，只能下车持长矛驱赶。他们驱赶时，群众跑。“百万雄师”上车后，群众又丢石块挑衅，弄得“百万雄师”很不好办。

这时，不少混在群众中的“百万雄师”队员告诉保卫人员赶快撤，不然民众乐园内的“钢八师” 出来助阵就麻烦了。“百万雄师”立刻撤进了财贸大楼，并呼叫总部派人增援，要军队派人前来解围。

不一会儿，民众乐园里果然冲出不少手拿长矛、大刀的“钢八司”青年，他们围住财贸大厦，其中 20 多人冲上了二楼。“百万雄师”节节退守。楼下围观的群众几乎全是支持造反派的，他们在下边高呼：“打倒陈再道！”“打倒‘百万雄师’！”以此声援

“钢八司”敢死队。

“百万雄师”的人也揭起房顶的红瓦，将房间里的家具、锅碗瓢勺都砸向街心的群众，群众四散奔逃躲避，一时间，满街的都是碎砖瓦块。

突然，“百万雄师”7 辆大卡车的援兵冲开人群，疾驶而来。两旁人群纷纷向这 7 辆车扔去油桶、电线杆、石头，拦阻卡车。“百万雄师”人员立即下车，冲过去包围了财贸大楼，致使攻进大楼的“钢八司”那 20 多名青年又处于腹背受敌的不利局面。

民众乐园指挥中心闻讯，立即组织“敢死队”前往财贸大楼支援，驻守在中南旅社的“钢新派”也用砖石向财贸大楼外的“百万雄师”投掷，暂时驱赶走了这批“百万雄师”的援兵。随即，双方又在铜人像前展开了近身肉博。大家都打红了眼，武斗现场的状况空前惨烈。

军区用吉普车、大客车各一辆改装的宣传车也赶到了。宣传车的高音喇叭不断地呼喊：

“造反派回工厂抓革命，促生产！”

“造反派最听毛主席的话，要文斗，不要武斗！”

“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群众则围着宣传车起哄，高喊：

“打倒陈再道！”

石头、瓦片照样砸向宣传车。

中南旅社和红太阳广播站的高音喇叭不断声援“钢八司”，呼喊“打倒陈再道！打倒百万雄师！”的口号。

此刻，楼房上下，人山人海。参战者以瓦片、砖头、石块为

武器，猛烈投向对方，现场一片飞砖走石，冲杀声震耳欲聋。

民众乐园内的广播站则在大声地调度、指挥武斗现场。只听南洋大楼的广播传出“二司”胡双全同学的声音：“快！快！快！一冶的同志到下面集合。”

一冶的曹承义赶快跑下楼去了解情况。他跑到民众乐园门前，看见一辆解放牌汽车停在马路边，车头朝着六渡桥方向，车上仅有三五个人，其中一个还是少年。有一位中年妇女拦在车头前，连哭带叫，不让汽车开走，不许车上的人去和“百万雄师”拼命。她相信，这些人只要上了车，就等于白白去送死。曹承义去拉那位妇女的时候，旁边拥上来很多人抱住他，也拼命地劝他不要上车。曹承义知道，很可能是中南旅社方向造反派的宣传站遭到了“百万雄师”的攻击。但他不可能去增援那里。因为人数太少，又手无寸铁。拉拉扯扯了十几分钟，大家才冷静下来，决定不去六渡桥那边。那位妇女慢慢走进了民众乐园。曹承义也叫车上的人都回民众乐园去了。

下午 15 时过后，几辆军车驶来，车上满载解放军，个个手持《毛主席语录》，唱着《毛主席语录》歌：

“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分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

同时还高呼口号：

“团结起来，实现革命的大联合！”

大批民众从周围涌来，指着这些军人大喊：

“你们支持老保！”

“老保杀害无产阶级革命派，向老保讨还血债！”

“打倒武汉的谭震林！”

“用鲜血和生命保卫毛主席！保卫林副主席！保卫中央文革！”

“团结起来，为工总翻案；工总起来，老保完蛋！”

口号声、哭声阵阵。

猛听得，有人高喊：“让开！让开！”

只见一群人推来一辆板车，一边哭着，一边冲着军人叫骂：“你们还支持老保？那些狗日的在杀人呐！”

板车已经推到军车旁，上面有一个少年，大约 13 岁左右，仰面躺着，上穿大红翻领汗衫，下穿蓝色裤衩，一目紧闭，一目微睁，双手摊开，只见咽喉部位一个血洞，车上血迹一片，来路血迹一行。许多人围上来，放声大哭。军人们神情严肃，默然无语。司机端坐驾驶室，手扶方向盘，双眼直视前方，直如石雕一般。

大批解放军战士奉命赶到民众乐园现场制止武斗。军人们手挽手，组成人墙，挡在“百万雄师”与“敢死队”之间，要求双方立即派代表进行谈判。没有效果。

解放军的人墙是薄弱的，只要有一方人员一冲，人墙就会坍塌。不知是谁高喊一声：

“同志们，帮解放军制止武斗！”

“哗”的一声，许多人冲上去了，不分男女老幼，不分生人熟人，不问观点，不问派别，手挽着手，站在解放军前后。军民呼喊着口号：

“要文斗，不要武斗！”

口号声里充满焦虑，充满期望。这样的人墙有三层，是谁也推不倒冲不垮的。

双方武斗人员面对老百姓都不能不有所顾忌，但都敢粗暴地对待解放军，因为解放军骂不还口、打不还手，谁都可以欺负。

组成人墙的人和围观的人一边呼喊“要文斗，不要武斗”的口号，一边又互相辩论起来。有的为“钢新派”说话，大骂“百万雄师”是豺狼虎豹，要为挑起武斗负责；有的为“百万雄师”辩护，骂“工人总部”是反革命，骂“二司”“三新”也是反革命，要为挑起武斗负责。两边辩论起来，针锋相对，面红耳赤，有人说得泪水涟涟，竟至哽咽得说不出话来。但是谁也没松开手，而且随着双方武斗人员远远地面对面指责而挽得更紧了。

## 第 687 回：难敌众，“百万雄师”终撤走　宁夏乱，群众组织分四派

6 月 17 日下午 17 时左右，又有一辆“敢死队”卡车从民众乐园方向驶向财贸大楼，在六渡桥铜人像转弯处，冲破解放军人墙，开过去了。解放军的指战员们高喊着“要文斗，不要武斗”口号，又迅速将“人墙”缺口合拢，阻断了后续跟进的“钢八司”人群。

“百万雄师”见冲进来一辆车，立即从侧面开出一辆大卡车，截断“敢死队”汽车的去路。那辆车紧急刹车，被迫停下。“百万雄师”一拥而上，可怜那车上 38 名“敢死队员”未及下车，即被“百万雄师”武斗人员持长矛一阵乱戳，几乎全部死于非命。开车的司机在驾驶楼里当即被戳成重伤，扔在江汉区委地下室，过了几天他跑出来，伤口已经发绿。

与此同时，被围困在财贸大楼内的20多名“钢八司”，只有少数几人在楼外“钢八司”人员的接应下，带伤杀了出来。

现场的场面很惨烈，但也不凡感人：

“砖头缺乏!”不知谁喊了一声，很快，从民众乐园到财贸大楼旁的中南旅社几百米长的大街上立即站满了传递砖石的男女老少，一块一块砖石就这样迅速递到武斗前沿。

夜晚，“百万雄师”可能是为掩护撤退，在街口放起了浓烟，又有很多群众从家里给现场的“钢八司”人员送来口罩。

在争夺财贸大楼旁边的中南旅社战斗中，双方都高喊着革命

的口号：

“革命的同志们!为了保卫毛主席，保卫红色政权，拚着一死，死守阵地!”

“革命造反派和‘钢八司’的战友们!千百万的群众看着我们，全国造反派看着我们，中央文革看着我们，毛主席看着我们，我们要为毛主席争气!为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付出最大代价!”

广播里高声朗诵林彪在解放战争期间对“四野”的一段讲话：

“在需要牺牲的时候，要敢于牺牲，包括牺牲自己在内。上战场，枪一响，老子下定决心，今天就死在战场上了!”

武钢“九一三”总部发出最后通牒，如果“百万雄师”在6月18日早上8点之前还不撤离民众乐园,他们将赶到江北增援。

下午，就如何面对“百万雄师”越来越猛烈的暴力围攻，造反派在水院体育馆举行辩论会。绝大部分发言者反对撤退，认为那就是逃跑，造反派撤离几所大学这最后的“根据地”，造反组织在武汉就不存在了，武汉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会夭折。会上再次提出了“文攻武守”这一口号。

这天晚上，武汉独立师政委蔡炳臣彻夜未眠，连续两次给正在民众乐园武斗现场的“百万雄师”头头纪登清打电话，指示他说：

“你们在政治上要争取主动、斗争上要讲究策略，要提高警惕，不受损失，不失战机。”

蔡炳臣问：“你们情况怎么样？有什么问题没有？”

纪登清答：“很顺利，没有什么问题。”

蔡炳臣问，“你们周围情况怎样？指挥所安不安全？如果不

安全，就转移。”

纪登清答：“我们的安全没有问题。”

蔡炳臣还问：“财贸大楼的人都抢救出来了没有？”并说：“据了解，手工艺大楼上有武器，他们有一挺机枪，人民文化园有毒品。”

纪登清答：“知道了，他们还有炸药，我们已作好准备。”

18 日，武汉“九一三”、“新一冶”、“工总青山分部”等七个造反派组织向武汉市支左指挥部发出呼吁，要求“立即停止屠杀，否则青山地区革命造反派将采取火速行动，不惜一切牺牲，突破重重封锁，杀过大江，全力抢救革命战友!”

上午9时，“百万雄师”终因寡不敌众，撤出了财贸大楼。随后，蔡炳臣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与纪登清通电话说：

“我对你们安全胜利撤出来表示祝贺，并向你们的负伤人员表示慰问。”

同时，蔡炳臣通知“百万雄师”头头到8201部队师部开会，商量此次武斗后的宣传问题。

此时，民众乐园三民路上已是遍地砖瓦、石块、血迹，路两旁房瓦几乎全部揭去，不少民房、商店被破坏，六渡桥一带的商店停业。

“6.17”大武斗，造反派共死 17 人，重伤 60 余人，“百万雄师”死 2 人。

这天，“二司”政宣部发出《紧急动员令》，号召“二司”战士紧急行动起来，组织群众，发动群众，开展猛烈的政治攻势，坚决粉碎走资派武力消灭造反派的反革命阴谋。当天，“工总”

也发表《关于武汉目前局势的几点声明》，指出当前出现的打、砸、抢、绑架、暗杀及武斗是反革命暴乱，是成都“五六事件”在武汉重演，“工总”将用革命的两手坚决打击武老谭反革命的两手，迅速组织起来，杀回工厂去，就地闹革命。武重“战斗兵团”、“九一五兵团”等十几个群众组织向厂支左办公室发出紧急照会，呼吁“执行六六通令，立即制止武斗，解散百万雄师武斗集团，勒令参加武斗人员立即回厂”。“如若对一再照会、呼吁置如罔闻，武重四千多名造反派工人将武装自卫，杀向社会，展开全面反击”。

洪山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联防指挥部”所属新武重“革联”、武锅“联司”、“新华工”、“新湖大”、“二司”等六十五个群众组织也发表《严正声明》说：“武老谭当前所制造的大血案，完全是一种阶级报复，是反革命暴乱”，“强烈呼吁武汉部队支左指挥部立即制止武斗，解除百万雄师的武装，严惩杀人凶手及幕后指挥”。号召造反派“实行文攻武守，在实行积极防御，狠狠打击一切来犯者的同时，发动强大的政治攻势”。

6 月 19 日，武汉大雨，民众乐园抗暴指挥部数万人在民众乐园前冒雨集会，“愤怒控诉陈再道之流唆使百匪大屠杀，追悼 6．17 造反派死难人员”。“二司”学生喊出“打倒陈再道！”的口号。

武汉的血雨腥风我们暂时介绍到这里。接下来，我们再说说宁夏的情况。

1月27日宁夏发生的那次仓促夺权，并没有结束银川的混乱局面，相反，它面临着来自内部和外部的挑战。首先是内部分歧。

夺权后成立的宁夏“联委会”，准备为在1960年的“反地方民族主义运动”中受到组织处理的干部平反，并吸收他们进入新的权力机构，因为这些人一直暗地里支持着本单位的造反派。但是这些干部因受迫害的程度不同而对平反方式产生了不同要求，这些问题与群众组织之间对新政权的权力分配的矛盾交织在一起，导致了“联委会”的分裂。一些造反派退出“联委会”，成立了两个新组织：“宁夏总司”和“宁夏三司”。与此同时，原保守派组织和夺权前退出“联委会”的以北京红卫兵为首的造反派组织也组成了反“联委会”联盟。宁夏“联委会”在这种情况下根本无法行使其权力。

由于宁夏军区与自治区党委关系密切。“联委会”刚成立时，宁夏军区对“联委会”的支持纯粹是迫于当时政治气候不明。1月底，宁夏军区司令员朱声达和军区党委经过调查后，感到“联委会”的人员成分复杂，问题较多，这些人把矛头对准杨静仁等宁夏自治区领导，朱声达等人是绝不认同的。朱声达认为杨静仁等自治区领导不是什么走资派，不是该打倒的对象。恰在此时，《解放军报》一名记者到银川收集当地运动的情况，该记者的真实身份是中央文革小组的联络员。他在采访过程中因一些小事与“联委会”下属成员发生争执，盛怒中他来到宁夏军区表示宁夏夺权太乱，不应批准。宁夏军区就势改变了对“联委会”的态度。

2月5日，“联委会”游行，要求部队支持他们。参加“联委会”工作的宁夏省军区副司令员张怀礼表示同意，宁夏军区司令员朱声达则坚决反对。

2月6日，结合进“联委会”的区党委书记处书记甘春雷讲话，

引起很大争议。许多人提出，甘春雷和宁夏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杨静仁、自治区政府党组书记，副主席马玉槐关系很密切，没有划清界限，“127夺权”是假夺权。

2月6日，作为宁夏军区代表参加宁夏“联委会”工作的副司令员张怀礼回宁夏军区汇报工作，从此也就没有再回“联委会”。宁夏军区与“联委会”断绝了关系。

2月8日，北京“三司驻宁联络站”从银川郊区动员了一个由杭州下乡青年组成的群众组织来砸“联委会”。作为回敬，“联委会”把北京“三司”驻宁联络站头头赶回了北京。

“首都三司”当时可是全国著名的响当当的左派，“联委会”反对左派，那还了得？！宁夏军区有了镇压的口实。第二天，2月9日，军区司令朱声达召开军区党委常委会，讨论“127夺权”是否正确。会上，朱声达说“联委会”在夺权期间对其他群众组织执行了白色恐怖和排外政策，“28事件”驱赶“三司”驻宁联络站头头就充分暴露了“联委会”的右倾本质。会议做出了撤销对“联委会”支持的决定。

2 月 11 日，宁夏军区发表了《关于撤销对“宁夏革命造反派联合委员会”一切支持和援助的声明》，随即成立了“支左办公室”，对一些单位和学校实行了军管、军训。同日，在未报告上级批准的情况下，宁夏军区对《宁夏日报》社也实行了军管，将《宁夏日报》报头改名《红色电讯》，停发了宁夏地方稿件，只转发中央报刊的有关稿件。同时对宁夏人民广播电台、公检法机关都实行了军管。

2月12日，宁夏军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发表公开信，称“一 •二

七夺权”是“一小撮别有用心的人所操纵的临时拼凑的大杂烩夺权”。“联委会”方面立即反击，于13日发表声明谴责军区的表态，贴大字报制造舆论，并在体育馆召开大会，批判军区的声明。

2 月 19 日，宁夏军区发表《告全区人民书》，称“127 夺权”是“在资产阶级当权派甘春雷指导下的右派夺权”，号召群众向宁夏“联委会”开展坚决斗争。同时制定了针对“联委会”的《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进一步开展对敌斗争的作战方案》，提出“从政治上搞臭、从组织上搞垮‘联委会’”的方针，及“彻底摧毁‘联委会’反动阵线”，“敦促一小撮右派头目投降”等口号。军区两次出兵参加反夺权群众集会，并举行武装示威游行。

之后，军区以银川清洁大队的“毛泽东思想战斗队”和中医院的“革命造反联络站”内部有“坏份子”的名义，解散了这两个组织。军区主持的三干会、公交会、生产第一线指挥部等都以“127 夺权”为界，不准支持夺权的干部参加。“联委会”被攻击为“联委会大杂烩，牛鬼蛇神排成队”。

3月7日，“联委会”发表声明，要求与宁夏军区通过商讨解决分歧。朱声达称“37声明”为“一小撮右派头头的阴谋诡计”，断然拒绝，并且提出：“向毛主席请罪，向全区人民请罪，向军区指战员认罪，不能假投降，交出幕后人”等五个条件，要求“联委会”“交代罪行并交出他们的头子甘春雷”。社会上也开始到处揪斗“一小撮右派头目”，群众组织纷纷“请罪”的现象。

3 月 10 日，银川市反对“1.27”夺权的群众组织，联合成立了“银川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筹备处”，简称“大联筹”

或“筹备处”。

3 月 12 日，宁夏军区表态支持“筹备处。”

3 月 14 日，宁夏军区和自治区公安厅查封了宁夏大学“革命造反派联合指挥部”筹办的“银川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展览”。这个展览的相当多内容针对文革前开展的“批判地方民族主义”和“反对坏人坏事”两个运动予以揭露和批判。

3 月 18 日，宁夏自治区“抓革命促生产指挥部”成立。

此时，一批一直在幕后支持造反派的干部走到了前台，他们成立了以区交通局王志强为首的“翻江倒海战斗团”，大多数是在反地方民族主义运动中受打压的干部，他们公开表示支持“联委会”。

王志强原任自治区委常委、银川市委第一书记兼市长，在 1960 年反地方民族主义运动中被降级。

与此同时，宁夏军区内部也出现了副司令员张元礼和刘德夫支持“联委会”的声音。

但是，仍有许多人退出了“联委会”。

3 月 18 日，“联委会”“宁夏无产阶级革命派总指挥部”，简称“总指挥部”

3 月 18 日，支持“1·27 夺权”的 35 个组织，主要是“联委会”的成员，成立“宁夏无产阶级革命派总指挥部”，简称“总指挥部”或“指挥部”。全自治区对立的两大派组织“筹备处”和“指挥部”正式形成。

除“总指挥部”外，宁夏群众组织还出现了既不支持“筹备处”又反对“总指挥部”的“宁夏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总司令部”，

简称“宁总司”，和宁夏“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第三司令部”，简称“宁三司”这两个组织。四派群众组织的成立和某些领导干部的幕后支持，使宁夏地区的矛盾更加尖锐、复杂和混乱。各派群众组织斗争日趋激烈。

3 月 20 日，银川市公安局军管会以组织不纯为理由，宣布“联络站”系统的银川市中医院“革命造反联络站”为反动组织，予以取缔。24 日，又宣布取缔新城农场的“银川市工矿企业捍卫毛泽东思想联络站第六兵团”。这些被取缔组织的人员随即上京告状。

4 月 6 日，“总指挥部”召开大会，庆祝中央 4 月 1 日《关于安徽问题的决定》文件发布。“总指挥部”在宁夏街头贴出“打倒宁夏的赵永夫”、“打倒朱声达”等标语，开始把矛头直接指向宁夏军区司令员朱声达。

4 月以来，宁夏军区组织原自治区党委杨一木、马信等人，作为“筹备处”的参谋班子。

4月以来，兰州军区多次传达了中央和中央军委关于纠正宁夏军区错误的指示。宁夏军区内外部分人员上京告状，给中央施加压力，希望迫使中央改变对宁夏问题的态度。5月，兰州军区副司令员康健民来到宁夏，朱声达和宁夏军区副政委江波对康健民说：“如果中央决定说我们支持错了，我们组织服从，思想不通。”

5 月 2 日，为抗议 3 月 14 日宁夏军区和自治区公安厅查封并没收了宁夏大学“指挥部”组织筹办的银川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展览的展品一事，“总指挥部”学生组织举行示威游行，

要求收回宁夏大学的文革展览材料。之后，在自治区公安厅门前静坐示威历时 55 天。朱声达拒绝做出让步，与造反派针锋相对。

反对朱声达的大字报越来越多。朱声达召开贫农会，动员农民进城攻击造反派。5 月以来，陆续发生了农民进城围打造反派的事件，宁夏军区未采取有效措施予以制止。

5月30日，宁夏“筹备处”下属两个中学生组织“红卫兵”和“西北野战军”，砸抢了宁夏新华分社。中央文革小组于6月5日和6日向朱声达发了三个指示。其中6月6日的指示是：

宁夏自治区军区：

五月卅日在银川发生的捣毁宁夏新华分社、抢劫新华分社的机密文件和其他物资，并殴打新华社记者的事件，是一个严重的政治事件。宁夏自治区军区有责任保护新华分社的正常工作和记者的人身安全。为此，责成宁夏军区负责处理这一事件：

1. 把这次闹事的头头抓起来，审查处理。

2. 把抢走的全部文件和物资负责追回。

3. 由军区负责把这一事件调查清楚，依法论处。

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

一九六七年六月六日

朱声达未予理睬。

朱声达指示“筹备处”到石嘴山、吴忠等地串联，与当地武装部建立联系。6 月 18 日，吴忠县发生武装部鼓动农民进城围攻造反派“618”组织的武斗事件。

6 月 19 日，宁夏地区的第一次较大规模的群众武斗在石嘴山市发生。朱声达等认为是“反革命叛乱”，以宁夏军区党委名

义要求兰州军区派一个团进驻该市，未获批准。

## 第 688 回：林彪信，李先念尘埃落定　乌江断，肖力又轰张秋桥

6 月 16 日的晚上，毛泽东和林彪一同在人民大会堂小礼堂观看由上海京剧院演出的革命样板戏，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开演前，按照当时的习惯，报幕员先在台上带领大家高呼："祝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祝林副主席身体健康!永远健康!"当喊完"祝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的口号时，毛泽东转过头对林彪说："下边，该喊你啦!"林彪笑了笑。果然，报幕员接着高喊："祝林副主席身体健康！永远健康!"林彪显得很不自然。

演出结束后，林彪回到浙江厅，立即让内勤叫秘书过来。

秘书张益民过去了。林彪口述了一封给周恩来和中央文革的信。信中写道：

"近一个多月来，我看了三次演出，每次演出，都有'祝毛主席万寿无疆'和'祝林副主席永远健康'这两个口号并提的情况。我认为'祝毛主席万寿无疆'这个口号是完全正确的，非常必要的。为了在党内、党外、国内、国外突出毛主席的伟大作用，树立毛主席的绝对威信，不宜提'祝林副主席永远健康'的口号。只有突出伟大领袖毛主席，才符合于全国和全世界革命人民的需要和客观实际。今后一切演出、一切会议、一切文件、一切报刊以及其他各种宣传形式都应突出毛主席，不要把我和毛主席并提。盼总理和中央文革小组的同志们帮助注意这一点，并希望将我这封信转发到县团级，由他们传达到所有的基层组织和革命群

众组织。”

中央文革小组专门讨论了林彪的这封信，有人说：为什么不能宣传？这是对林彪的崇敬和尊重。关锋说：“我管宣传，我的意见是，既然林副主席这样讲了，恭敬不如从命！”此后，在报刊上基本没有这样的宣传了。如：新华社 1967 年 6 月 16 日讯：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今晚观看了上海市京剧院演出的革命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演出开始时，一位报幕的演员走到台前，激动地高声颂道：“首先，敬祝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敬祝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彪副统帅身体健康！永远健康！”

林彪写信后，6 月 22 日的报刊宣传则是：新华社 1967 年 6 月 22 日讯：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今晚观看了上海市京剧院演出的革命现代京剧《海港》。这次观看演出，其规格和 6 月 16 日完全一样，但是，这天的祝颂和欢呼见诸版面的报道则只有“敬祝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中央以“林彪同志给总理和中央文革小组的一封信”为标题下发中发［67］202 号的中共中央文件，转发了林彪的这封信，并注明：发至县、团级。

该文件最后注明：“已发：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军事管制委员会、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各大军区、省军区、军分区党委，各部委。共印 40，046 份。”“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局一九六七年六月三十日发出”。

6 月 16 日，针对国务院财贸系统两派的争斗，周恩来接见

财贸系统“革命造反联络委员会”的代表。他说：

“一定要分，我没有办法。你们自己都不能挽救，我有什么办法，我可不是提倡分裂的，你们可不要断章取义，现在是大批判、大联合。

革命小将要培养你们的信用，但是，使我非常难过，但是我不会失望，过去我对你们都是支持的。天安门前大会，我从来就没有支持。谢副总理已经把李先念的检查告诉你们了，你们改变了做法，我认为这很好。不一定什么事都要我出面，谢出面解决问题很好，但是后来你们又变了。你们的小报出了，也没有什么了不起，政治局并不因为你们一轰就垮了。但是，你们的作风很坏的，不是实事求是的。一个大会，一个报纸没有什么不得了的，因为中央将来会出来说话的。平原游击队用群众的面目是可以对付敌人的，这与叛变是有区别的。郑位三的问题，你们一定要给李先念加上这个帽子，郑位三是个中央委员，但是，是最落后的了，开会都不通知他了。他的和平过渡还在赫鲁晓夫之前，他说他是马恩列斯毛之后就是他了，多狂妄。他现在唯恐天下不乱。我们要乱刘邓的天下，不能乱毛主席的天下。

你们提打倒李先念。当然我不赞成，但是这种提法是你们的自由，但说成是叛徒就不是一个简单问题。定了以后，人家就不能翻身了。刘邓叛徒集团，南开小将搞的，经过中央多次审查才定的。叛徒就是敌我问题，既是叛徒和他一同办公就成了问题了，在一起照相也就成了问题了，政治上的问题你扩大一点，只是程度上的问题，不要紧，但一定叛徒，政治生活就完结啊，就把人家一棍子打死了。你们调查不问问我们，你们查出不合适，这不

是无产阶级的作风，今后你们还要革命，人家随便说你是个什么，你心里是个什么滋味？这是资产阶级自由主义，不能像资产阶级那样，竞选时把对方说的一无是处，竞选后又合手称好，叛徒哲学是北方局刘少奇的，是南开搞出来的。”

6 月 19 日，李先念在给毛泽东的报告中，详细讲明了中原突围时，有关自首问题的原委。隔了几天，毛泽东特意让秘书打电话，说是“毛主席请先念同志一起去看戏。”在剧院，毛泽东见到李先念，特意让他坐在自己身边，头一句话就说：“大叛徒头子来了，今天我要和大叛徒坐在一起看戏。”毛泽东的这句玩笑话，实际上表示了对李先念的信任。

几天后，周恩来在接见财贸口的群众组织代表时，对他们把李先念打成“大叛徒头子”进行了严肃的批评。周恩来说：“我现在就是要辟这个谣。这不是打倒、炮轰的问题，是关系到世界的大事。毛主席过雪山后见到李先念，一眼就看出这个同志有政治头脑，年轻优秀。你们不能到处抓叛徒，你抓一个，我抓一个，这是很危险的，不是毛主席的作风，不是实事求是的作风。”

6 月 18 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 118 厅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姚文元率红卫兵代表团出席阿尔巴尼亚劳动青年联盟第五次代表大会等事宜。谈到姚文元到阿尔巴尼亚的讲话稿时，毛泽东说：

我的话要少引。21 页太长，砍去一半。红卫兵专想吹出去。文化大革命以来，大吹特吹，外国人看不惯吹，自己吹，勿外吹。三个阶段、三个里程碑删掉。一些外国人对我们《北京周报》、新华社的对外宣传有意见。宣传毛泽东思想发展马克思主义，过

去不搞，文化大革命以后大搞特搞，吹得太厉害，人家也接受不了。有些话何必要自己来说，我们要谦逊，特别是对外，出去要谦逊一点，当然又不是失掉原则。昨天氢弹的公报，我就把“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统统勾掉了，把“光焰无际”也勾掉了。世界上的光芒哪里有无际的，都有际。“万分喜悦和激动的心情”，把“万分”也勾掉了，不是十分、百分、千分，而是万分，我就一分也不要，勾掉了。

毛泽东说的“三个阶段、三个里程碑”是指当时宣传的关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三个阶段、三个里程碑，即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

当谈到对斯大林的评价和苏联的情况时，毛泽东说：

对斯大林的估价要比过去高。当然，斯大林是有错误的。《联共党史》第四章讲生产关系完全适应生产力；一九三六年宪法中提国内不存在阶级了，只有工人、农民、教职员三种。实际上抓了很多人，称国民公敌。临死前一年在书上又讲社会主义社会有矛盾，搞不好会出乱子，搞成对抗性的。还是要解决思想问题，不发动群众不行。

谈到青年团等问题时，毛泽东说：

青年团未取消，未活动，红卫兵代替青年团未定。青年团中央犯了错误，地方团也有错误。

20 日，姚文元率代表团离京前往阿尔巴尼亚。

胡痴倒台后的《解放军报》，肖华任命一位原副总编为临时党委副书记，暂时主持军报日常工作，他就是张春桥的弟弟张秋桥。肖力进入临时党委。

后来，原在《解放军报》当过总编、又调到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任党委书记兼副院长的赵易亚被重新任命为《解放军报》总编。赵易亚在战争年代是新四军和三野的干部，1954 年参与创建《解放军报》，在马列研究院是陈伯达的副手，也算是一个“来头”。

应该是受父亲的影响，肖力生活十分朴素，在食堂吃饭常买“乙号”以下的菜，有时带来点辣椒酱之类，还主动邀人分享，毫不特殊，更不享乐。她的白衬衣领子上有个小补丁，一身从上到下也总是军衣军裤加解放鞋。报社里有几个人是家在农村的战士，家中不免有些困难，她知道后慷慨解囊，扶贫济困支援同志。她还能唱也爱唱京剧，时不时来段青衣花旦，在人们的印象中，既可亲可爱，又可敬可畏，像是一个双重甚至多元性格的复杂人物。

赵易亚调回报社，住在院内澡堂旁的几间破旧小平房，夏天天热，赵易亚就在房前的露天吃饭，去洗澡的人都能看到他，有时就会见到肖力和他一起吃着简单的饭菜。大家的感觉是赵总和肖力关系很好。

6 月 19 日，肖力贴出了第二张大字报，炮轰临时党委张秋桥，把前一段的报社运动称为“执行反动路线”，张副书记就此下台。

6 月 17 日，成都军区在听取了涪陵军分区领导的汇报后，做出《关于涪陵军分区当前支左工作的意见》，共五条。决定由涪陵军分区第二政委李畔负责领导涪陵军分区部队的支左工作；要求坚决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处理四川问题的决定》；对被打成

“反革命”的群众组织，如：“涪陵工人二.七战斗团”、“四川涪陵革命工人造反联合总部”、“毛主席最忠实的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政法公社造反兵团”等坚决平反、释放，帮助他们恢复和发展组织；要采取措施，坚决制止武斗。

在成都的涪陵“忠实兵”几百人，听到这一消息后，欢声雷动，有的人激动得热泪盈眶，不少人当场哭起来了。他们立即组织起队伍，在成都大街游行，成都“826”也组织了一支队伍对他们表示支持和祝贺。

涪陵城更是热闹非凡，“忠实兵”的群众欣喜若狂，无数支队伍上街游行，通宵达旦……这一天，成了他们这一派的盛大节日。

“贸派”的头头和群众受到沉重的一击，但很快就做出了强烈的反应，他们马上宣称《关于涪陵军分区当前支左工作的意见》是背着张国华、梁兴初两位首长搞的，叫它“黑五条”，喊出的口号是：“黑五条，黑又黑，张梁首长不晓得！”他们将李畔政委称作“李叛徒”，说《关于涪陵军分区当前支左工作的意见》中的五条意见是“李叛徒勾结刘张烂萝卜搞的”，以后还说李畔是富农出身，曾经当过贺龙的黑干将廖汉生的黑秘书，一贯反对毛泽东思想……等等。

军分区 10 多个干部以“涪陵军分区广大指战员”的名义写了一篇大字报，到处散发，全面否定“涪陵五条”，坚持说那是刘结挺、张西挺背着张国华、梁兴初搞的私货。

“忠实兵”这派喊出的口号是“红五条，就是好，敌人反对我们保”、“为红五条大喊大叫，为李政委鸣锣开道”等等。

“涪陵五条”下达后，涪陵的支左部队就不再是唯一的原涪陵军分区所属的各县武装部、县中队及涪陵军分区警卫营 929 部队，而新增加了工程兵 8342 部队，即工程兵第 54 师及其所属 8042 部队和成都军区独立团 7822 部队，在实力上远远超过原来的兵力。

工程兵 8342 部队是建造酒泉核试验基地的部队，直属中国人民解放军工程兵总部。这支支左部队在隶属关系上成都军区管不了。这支部队从 1967 年初至 1968 年底进驻涪陵，共计有两万多官兵，其任务是要在涪陵县白涛镇乌江边的崇山峻岭开凿山洞，修建神秘的“816 核洞”以建设原子能反应堆，该工程被中央军委视为三线建设的重中之重，处于高度保密状态。

由于该部队一进入涪陵恰逢涪陵文革的高潮，为了保护施工的安全环境，根据中央军委和工程兵总部的命令，部队参加涪陵地区的支左工作，并对要害部门实行军管，部队副政委黄鹤寿（后升任政委）担任涪陵地区支左领导小组组长。

由于这支部队基本上没有介入涪陵的“二月镇反”，所以该部队是按成都军区下达的“涪陵五条”的精神介入涪陵支左工作的，也就是说，他们从接受支左命令的那一天起就是被要求支持涪陵“忠实派”。

成都军区重新组建了涪陵支左领导小组，由 7 人组成：工程兵 8342 部队副政委黄鹤寿任涪陵支左领导小组组长；涪陵军分区政委李畔任涪陵支左领导小组副组长；涪陵军分区代司令员王永言、涪陵军分区副司令员任成宣、涪陵军分区副政委杨登基、工程兵 8342 部队所属 8042 部队政委李华禄、成都军区独立团

7822 部队政委薛春茂为涪陵支左领导小组成员。

6 月下旬的一天上午，成都军区的“涪陵五条”下达不久，在与涪陵军分区只是一墙之隔的涪陵地区体委灯光球场，涪陵军分区机关及所属独立营全体指战员的大会正在这里举行。

大会的中心议题是贯彻成都军区下达的“涪陵五条”，由于涪陵军分区机关及所属独立营的指战员中，绝大多数是支持“贸派”的，所以这次大会实质上也是一次“集体转弯”的大会。

大会开的很激烈，广大的指战员明显有非常大的抵触情绪；军分区的几位首长中也有分歧，只是因为“涪陵五条”是上级军区的命令，有意见也不便当着战士表露。

在大会进行的过程中，军分区任成宣副司令员到看台下面找办公室主任余肇森，要他到灯光球场的厕所那边去盯着，看党校方向，工程兵 8342 部队的动静，并告诉余肇森，只要看到党校有部队出动，马上就来告诉他。余肇森在厕所里守了一个多小时，党校方向没有任何动静。将近中午，他到大会主席台上悄悄告诉任副司令员，说党校那边没有任何动静。任副司令说：“好的，只要没有出来就好。”

灯光球场的“集体转弯”整体上是成功的，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涪陵军分区机关及所属独立营的大多数指战员转弯了。但涪陵军分区机关及所属独立营的少数军人仍然明里暗里支持“贸派”，特别是军分区的个别首长，暗地里仍然对赵树金表态要坚决支持“贸派”。

6 月 19 日上午，“贸派”的“毛主席的红卫兵”在大东门码头的涪陵轮船公司工人俱乐部内“忠实派”的“二七战斗团”总

部贴大字报，双方发生纠纷直至武斗。“红贸军总部”的二号头目杜炳全亲自拉响警报，叫所属各总部各战团到大东门集合。“贸派”组织了 400 多人前去支援。“忠实派”也调集人员增援，终因力量相差较大，只得退守总部。

县工交的“贸派”工人戴着藤帽拿着锄把向“二七战斗团”总部压过去，还有 60 多人爬上毗邻房屋及俱乐部的房顶向里进攻，双方都揭房上瓦片为武器互相投掷。最后终因寡不敌众，“忠实派”人员突围出来，撤离到乌江上的船上，其中很多人是从几米高的房上跳下脱身的。

“贸派”冲进了“二七战斗团”总部，很多“二.七”的人和“忠实兵”往河边撤，前来制止武斗的解放军抬着伤员出来，“二七战斗团”总部被砸的稀烂。

在这次武斗中，“忠实派”红卫兵、涪陵五中学生胡忠孝身受重伤，送专区医院门诊部抢救无效死亡，“贸派”马上广播说是被“二.七”打死的。

“忠实兵”许多人和胡忠孝的妈妈赶到专区医院，那里有很多戴着藤帽的“贸派”人。他们到了停尸房的门外。一会儿，那些戴藤帽的“贸派”人也围了过来，想把“忠实兵”撵开，“忠实兵”守着大门不走。突然“贸派”又冲到后面去了，“忠实兵”他们赶到后面一看，胡忠孝的遗体正从后门运上汽车。“忠实兵”几个人便去栏，胡忠孝的妈妈也哭着不让“贸派”的人将尸体拉走，“贸派”将“忠实兵”几个人推开，把胡忠孝的妈妈拉上车，将汽车开走。“忠实兵”的几人又跑到医院大门，看见汽车开来，周树林等人干脆躺在马路上拦车。汽车停下，冲下来十几个“贸

派”将周树林等人拖开，把车开到军分区。

“忠实兵”的头头罗成胜闻讯赶到现场时，听说胡忠孝的尸体在军分区，他又带了很多“忠实兵”赶到军分区，在他们和胡忠孝妈妈的强烈要求下，要回了胡忠孝的尸体，并抬着尸体举行了游行，

次日，留在成都的200名“忠实兵”集合到成都军区大门口。碰巧“贸派”也有一支队伍去那里，都是为了“6.19”事件，相互控诉对方制造了流血事件。大家面对面喊喊口号，没有发生肢体接触。

这次武斗失利，“忠实派”的“二七战斗团”被赶到船上。由于“二七战斗团”控制了涪陵大部分船只，特别是当时为数不多的几艘大马力铁壳船，他们便封锁了乌江江面，至此，乌江航运中断，至9月23日方复航，时间长达97天。

## 第 689 回：冰城打，总理再议秦化龙　围党校，山西杨成效被抓

黑龙江省会哈尔滨从 6 月 5 日发生省革委会静坐事件，发展到 6 月 9 日对哈军工的武力夺权，使这座冰城的舆论发生了重大的转变，造反派的分裂步伐加快。那些热血方刚的青年学生，满怀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反修防修、使五星红旗永不变色的豪情壮志，面对工作组的高压都不低头，高呼“钢气节，英雄胆，撒热血，捍江山”，表现出不怕鬼、不信邪的气概。如今，看到自己亲手建立起来的省革委会，竟也对学生大动干戈，极为不满。特别是那些见火就着的青年男女，更是表现得义愤填膺。于是，他们奔走于院校之间，诉诸于社会各界。省革委会机关干部原来似乎一致对外，此时也出现了不同看法，特别是来自造反派的学生们的意见和不同看法，终于由水底浮出了水面，由秘密地个别交谈，开始转向公开议论，寻求共识和同志了。

位于哈尔滨的中心地带，南岗大直街中段的哈尔滨建筑工程学院，其“造反团”原来也属于“捍联总”。因为 6.5 事件，6.7 清理，6.9 夺权和 6.9 遣散，该学院“造反团”的主要领导陈永万、孙铁东等人不同意潘复生的做法，举旗参加了“炮轰派”，只有一部分头头领着少数人继续留在“捍联总”。

“炮轰派”在哈建工主楼支起高音大喇叭，天天广播哈军工6.5事件、6.7清剿、6.9夺权真相以及发表群众的各种评论。这里离省革委107省委招待所并不远，只要绕过北方大厦，省革委会107大楼高耸的红旗便可以映入眼帘。“炮轰派”这样的每天广

播，岂不是天天给潘复生、汪家道抹黑脸？潘复生在省革委会常委会上说：“现在搜集到的情况表明，‘炮轰派’已经在哈建工土建大楼内装有电台，天天与苏修联络。必须把这个反革命据点拔掉。”

他们把这个情况报告了周恩来。

哈尔滨建筑工程学院是一所工科大学，它的主楼面对西大直街，毗邻哈尔滨工业大学。这里面有许多精密仪器仪表，而且许多是进口的。

6 月 21 日，哈尔滨全市 14 所大专院校“悍联总造反团”，以哈尔滨黑大、哈工大、哈军工、哈师院等学生为主，少数中学参加，浩浩荡荡的来到哈尔滨建筑工程学院所在的西大直街，人山人海，把整条街堵得水泄不通。他们在西大直街的各个路口设置路障，禁止一切车辆通行。

上午9时，曾在6月9日率众带头冲进哈军工的省革委群众代表韩潮，再次调动抗大机械战校和发电厂工人的“捍联总”，拿着大棒冲进哈建工土建大楼。韩潮又一次顶着抽屉，并抡着鞋片子一路“噼里啪啦”打了进去。

“炮轰派”拼命抵抗，他们用桌椅、黑板、教学设备垒起了防御墙，砖块、玻璃瓶不断往楼下砸来。木棍、铁棒的碰击声，砖块、啤酒瓶的碎裂声、惨烈的哭叫声、打骂声，鲜血淋漓、惨不忍睹，加上大楼里广播中凄惨的“抬头望见北斗星……”的乐曲，武斗现场的惊心动魄，至今回忆起来仍然让人不寒而栗。

进攻的“悍联总”们戴着柳条帽，顶着黑板、课桌拼命往上冲。不一会儿，陆续从楼里抬出一个、两个、三个……，满脸是

血的人，个个跟血葫芦一样。

哈工大“新曙光造反团”的“全无敌”兵团也是强攻建工院的主力军。他们的头头刘佐文在攻进哈建工楼后的当日中午，被砖块砸伤，头上缠着厚厚的白纱布，从楼里走出来，比划着诉说他在攻打建工楼时，如此这般地英勇顽强，冲锋陷阵，被打得头破血流的经过。

晚上 20 时多，“捍联总”给每人发下一份面包和红肠，学生们继续在大街上站着、堵着。只听见建工学院主楼最高点的高音喇叭向全市高喊：“誓死保卫党中央！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建工学院！”并悲壮的唱着“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

建工楼的电路被掐，自来水被停，整个大楼一片漆黑，但还能听他们自己在楼里用自备发电机发电带动广播大喇叭在不停地高声喊话。

“捍联总”架起了云梯。半夜 23 时左右，只听有人喊：“红旗插上楼顶尖了！”这是一个初中生“造反团”的小男孩儿把红旗插上去的。

“红旗插上去了！”立刻欢声雷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万岁！”“誓死保卫东北的新曙光！”口号声响彻云霄。由于主楼太高，那面红旗显得不太大，又因为没有风，它飘不起来，只能在那搭拉着，似乎在为这流血的场面悲戚。

被抓住的哈建工“炮轰派”的俘虏，同样也满脸是血，双手高举，被皮带抽打着从楼里牵出来。

哈尔滨建工学院被“悍联总”拿下来了，一片狼藉；不知有

多少国家一级、特级的精密仪器仪表遭殃、毁坏。人们开始渐渐地散去，一切都烟消云散了……

6 月 19 日，中央文革办事组编印的《信电快报》第 234 期上刊登了陕西师范大学文革筹委会景险峰等 4 人的来信。信中说："最近，西安有几个学校的造反派庆祝成立革命委员会，其规模之浩大，场面之豪华，实在令人惊讶。他们不是节约闹革命，而是大搞铺张浪费。西军电、西工大两校联合开庆祝大会，成立革委会，参加者达三十七万六千人，几乎是北京市革委会成立大会参加人数的四倍，筹办大会花了近万元。冶院成立革委会，在讲排场、讲阔气方面比前者更甚。一些中等专业学校也学起了'老大哥'的样子。这个问题不只是一个学校一个地区的问题，它带有普遍性的倾向，若不予以纠正，是很危险的。"

6 月 21 日，毛泽东在这份快报上批示：

文革小组各同志：

建议此件公开发表。是否妥当，请在常委碰头会上一议。发时宜写一按语。

6 月 29 日，中共中央下发了《关于节约闹革命、防止铺张浪费的通知》，将这封信转发到各军区，各级革委会、军管会和群众组织。通知中说，中央认为，各级革命委员会、各个群众组织的负责人，必须充分认识毛主席"要节约闹革命"的伟大号召，这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而且是一个重要的政治问题，每个同志都面临着新的严峻的考验。必须懂得，当权以后，地位发生了变化，自己头脑里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很容易滋长和发作，而社会上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灰尘也迎面扑来。在这种情

况下，应当高度自觉，不断地用毛主席交给我们的武器，改造自己的思想，坚决抵制一切剥削阶级的思想作风。

此时，刘少奇的专案又有了新的进展。6 月 22 日，杨剑雄的堂兄、省师范学院教员、当时已是右派的杨少岩给专案组写了这样的证言，证实 1927 年杨剑雄曾到汉口找过刘少奇：

1927 年刘少奇在汉口总工会工作，我当时在汉口二中教课。27 年三月间我的堂弟杨剑雄系官僚恶霸地主，其时乡中农民运动正进入高潮，成立了乡农会，乡农会要捉捕杨剑雄，杨剑雄便逃至汉口。想去会刘少奇，又怕去会，要我先去见刘一下。我便到友益街总工会去会刘少奇，会着了他。我把来意说明后，刘少奇对我说："杨剑雄以前帮过我的忙，现在他有事，我也要帮他的忙。"我说："那他就会感谢不尽，他本想亲来会你，恐有不便之处，所以没有来。是不是要他来亲自和你谈谈。"刘说好。次日杨剑雄亲自到总工会会晤了刘少奇。

1967 年 6 月 22 日杨少岩

6 月 24 日凌晨，又是一天的深夜，周恩来再次在中南海召见农办农政机关代表，询问关于秦化龙辩论会的筹备情况。他听说筹备顺利，很高兴，说：

"秦化龙问题是农林口的。因为完全是根据谭震林的报告搞的，许多单位要为秦化龙翻案，首先是农办农政。""秦化龙同志的案子是重要的，不光是农办农政的，影响整个农林口。"

他还说："现在是夏天了，天气很热，大家肝火旺，开起会来容易吵架。但上午还比较凉快，大家头脑冷静，适合开会。你们的辩论会，可以上午召开，下午休会，第二天上午继续辩论。"

他在会上还出人意料地表示："我要亲自到你们农办农政去出席辩论会，听你们辩论发言。"

与会者马上鼓掌欢迎。但他接着又谨慎地补充说："我的事情实在太多，往往身不由己。如果因故不能到会，我一定派秘书和联络员出席。"

他还嘱咐开会一定要搞好辩论录音，散会后将辩论录音交秘书和联络员带回中南海给他听。

会上，"延安公社"突然揭发说，他们发现秦化龙有利用写小说反党的罪行。

周恩来很诧异，问秦化龙的秘书许人俊："秦化龙还会写小说？"

许人俊解释说："过去，中央军委曾布置军队高级干部撰写革命回忆录，秦化龙写了一本《泉源滔滔》，回忆红军长征后湘鄂赣边区革命群众支持红军开展敌后游击战争的故事，回忆录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许人俊指责对方缺乏常识，胡言乱语，把回忆录错误当作小说，而且妄加罪名。周恩来听明白后，未再细问。

当农大"东方红"询问批斗谭震林的问题时，周恩来说：批谭震林的问题，"先组织 1000 人的大会，……地点由我们找，组织由'农口革命造反联络站'负责。"

关于秦化龙的辩论会，由于反对给秦化龙翻案平反的农办农政"延安公社"是保谭震林的，在当时的形势下，内部已人心惶惶，不愿出来辩论，致使后来关于秦化龙的辩论会迟迟开不起来。

6 月 20 日晚间，山西"红总站"和"兵团"六中"32111"

的人马，以揪省党校当权派、副校长葛莱为由，包围了山西“红联站”的大本营，即山西省党校“东方红”的总部。大批“红联站”下属组织闻讯后立即调集人马前去救援。“太工红旗”的张玉峰、贾诚，会计学校“井冈山”的头头张转贵等都亲率队伍赶到党校现场。

第二天的清晨，“红总站”和兵团六中“32111”对山西省党校“东方红”总部发起新一轮的进攻，“太工红旗”的张玉峰在一栋楼上大声呼喊，称自己是“总指挥”，吸引“32111”来攻，以减轻省党校“东方红”总部的压力。

上午，“红总站”的头头，省革委常委吴顺久、薛亦华驱车赶到党校武斗现场，闻讯从“东方红”总部出来的段立身见到他俩，劈头搧了二人两个耳光，愤怒责问为什么对他们进行打砸抢。

正在此时，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情。“太工红旗”的头头杨保明，闻知省党校被“红总站”包围的消息，也驱车赶到党校了解情况，却在党校附近被六中“32111”的人发现并抓走。

亲眼看到杨保明被抓的“太工红旗”附中支队中学生见状大惊，立即跑去报告“太工红旗”现场的负责人贾诚。这些中学生急得都快要哭了，说迟了杨保明的胳膊、腿就会被打断了。

贾诚闻讯十分震惊和气愤，情急之中他决定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突袭十三冶“决死纵队”在太原解放路副食品大楼的总部，抓住它的头头杨成效以换回杨保明。他立刻在现场向会计学校“井冈山”的头头张转贵等人求援，请他们紧急派人到副食大楼抓杨成效。谁也没有问为什么要抓杨成效，他们都认为，在省党校正在被打砸抢的情况下，抓杨成效解省党校之围似乎是顺理成

章的事。

此前，段立身也曾给省委机关的“七一公社”打电话，希望他们想办法“围魏救赵”，以解党校之围。“七一公社”头头李辅当即派出人员，四处找寻杨成效，还真就探到杨成效的行踪。

那天，杨成效刚进解放路副食商店大楼，早已等候在这里的太原十中的一伙“七一”学生猛扑上去，在众目睽睽之下，将杨成效抓走。杨成效大骂不止，但毕竟周围没有“决死纵队”的一个队员在场，只能被这几个中学生连推带拽，塞进汽车，成了“红联站”的囚徒。

由于事发突然，“太工红旗”的贾诚等人没来得及考虑下一步该怎么办，抓到的杨成效先被送到太原冶金学校，然后再考虑如何换回杨保明。但冶金学校担心离副食大楼太近，一旦走漏消息会引起“决死纵队”的报复，因此不同意让杨成效留在他们那里。协商的结果，决定转移到太谷山西农学院。山西农学院“火炬”驻“红联站”代表任荣庭打电话给山农“火炬”的负责人，告诉他：“有一位重要人物要送到那里，务必保证安全。”

杨成效刚被抓走，十三冶“决死纵队”的另一个头头王国太就调集人马，包围了副食大楼，把闻讯赶来尚未来得及离开的“太工红旗”队员李耕生抓住，装入麻袋扔在一辆卡拉车上，急速向北营、太谷方向开去，但是没有得到任何关于杨成效的消息，因为此时杨成效还没有到达太谷农学院。大约晚上 20 时，贾诚才由太原十中“七一”的和冶金学校各一位同学陪同，将杨成效送到了山西农学院“火炬战斗队”。而此时，山农“火炬”的也人才知道那位“重要人物”，原来是杨成效。贾诚他们也才知道，

白天被认为是到党校指挥武斗的“红总站”头头薛亦华也被党校“东方红”扣留送到了这里。

山农“火炬”也担心消息走漏会引起“决死纵队”报复，于是次日又将杨成效转移到平遥。贾诚特别关照不要虐待杨成效，还特地照了一张杨成效在住地和“红联站”的人打乒乓球的照片，和一张杨成效写的、抬头为“春娥我妻”字样的条子，大意是说他在这里很好，勿念云云留作证据。这些证据和照片在 7 月会议派上了用场。杨成效在中央解决山西问题的 7 月会议上，摆出一副不计前嫌、以德报怨的姿态，当着坐在主席台上的康生、关锋、刘格平等人的面，拿出一本贾诚抓他期间遗忘的笔记本说：“这个笔记本上写着‘太工红旗’贾诚的名字，贾诚同学在不在？现在把它还给你。”

擒贼先擒王，“决死纵队”杨司令被抓，还真起到了“围魏救赵”的目的，围困省委党校的“决死纵队”人马连夜草草收兵，抓走了曾提出著名的“一分为三”说法的党校副校长葛莱，并开始四处寻找他们的杨司令。“红总站”立即在太原刷出大标语：“活捉段立身，救回杨成效!”

22 日晚上，“红总站”在太原五一广场召开大会，声讨“红联站”抓省革委常委、省“革命造反总指挥部”总指挥杨成效的罪行。他们在会上说，杨成效已被拉到省会计学校，并被装入麻袋，投进了烟囱。

6 月 23 日清晨，山西“决死纵队”挥师会计学校，砸了省会计学校“红联站”下属组织“井冈山”，打伤多人，并将 5 名学生强行装进麻袋抓走。这就是著名的会计学校“6.23 武斗”。

“太工红旗”的杨保明被对方抓住之后立即被转移到北营某地，与刚刚落到“红总站”手中的党校副校长葛莱关在一起。

第二天清晨，杨保明以上厕所为名，趁看守人员不备逃离。凭着他多年练习长跑的功夫，摆脱了追击，安全返回。

“红联站”的头头段立身面临决死纵队“活捉”的威胁，也不得不立即离开太原暂避。

杨成效后来回到了太原。有人说是他趁人不备逃回来的，有人说是“红联站”的小将们教训了他一段后，主动放他出来的。不管是与不是，反正在日后山西进入全面武斗后，当时杨成效被囚的几处地方，都成了“决死纵队”扫荡的目标。

面对山西“红总站”与“红联站”、“太工红旗”打得不亦乐乎的局面，6 月 21 日，张日清、刘贯一、陈守中、山西省核心小组办公室干部李文亮分别给中央打电报反映山西问题。

6 月 22 日，郝庭云在“红总站”队长会议上讲话时说：“要树立刘格平同志的绝对权威。”“刘格平同志是最高的马列主义者。”“张日清是‘红联站’的后台，我们一定要把他揪出来。”于是第二天，6 月 23 日，在省革委门口就发生了“红总站”、“东风”、“四野”、“兵团 32111”围攻张日清的事情，被解放军制止。

6 月 24 日，张日清再次给中央打电报，反映山西问题的严重性，提出刘格平树立个人权威等六个问题。

当天，刘格平在接见“025 军团”时说：“张日清这个人在省革委会上受到严肃批评，不改正错误，违抗中央指示，专政委员会由军区控制，核心小组四分之三是他们的。”

## 第 690 回：立三死，康生见河南领导　攻八农，新疆“广场大会战”

6 月 22 日，中共中央华北局书记处书记李立三自杀，临死前留下遗书：“最最敬爱的领袖毛主席：我现在走上了自杀叛党的道路，没有任何办法去辩解自己的罪行。只有一点，就是我和我的全家没有做过任何里通外国的罪行。只有这一点请求中央切实调查和审查，并做出实事求是的结论。我还有写给你的信，放在家里床单下。没有写完。请派人找出送你审阅。致文化大革命的敬礼。李立三”

李立三是中国共产党 1930 年“立三路线”的组织制定和实施者。

6月22日至23日，保定市河北农业大学农机楼发生大规模武斗，两派近万人参加混战，虽然河北省军区和保定市驻军38军都派人到现场制止武斗，维护秩序，但由于两派意见难达成一致，未能奏效，造成7人死亡，近300人受伤。其中部队受伤数十人。

6月23日夜，中央领导在京西宾馆再次接见河南省军区和驻开封的1军的领导。康生首先询问了河南最近的武斗情况，何运洪汇报说：“武斗还有，没有完全停下来。现在由洛阳转到焦作了。焦作武装部长、政委都被抓走了，有的被打的很厉害。”

康生说：“想听听你们对解决河南问题的意见。最近做了点群众工作没有？两派的工作做了没有？”

何运洪答：“前一段做过一次。”

何运洪、余嗣贵、张树芝先后汇报了军区领导对所犯错误的认识，表示了改正错误的决心，准备先向军区党委传达中央首长的指示，接着开党委扩大会，请分区、各师的领导和军区机关副处长以上干部参加，传达中央首长指示，组织学习讨论，然后，再向群众公开检讨。

汇报后，他们提出了几个问题，请中央领导予以明确：

一、“河造总”的性质我们还不清楚，我们不好同他们讲。

二、对省委领导人还摸不到底，怕再搞错了，省委还有没有一小撮？

三、“八大总部”是什么性质的，将来怎么样做工作？它们现在攻我们攻得厉害。

四、“河造总”、“二七公社”都是跨行业的组织，不符合中央按系统大联合的精神，以后怎么解决？

五、我们怎么检查，是等中央决定了讲，还是我们先检讨？在部队内部，我们只是在党委常委里讲了，没有敢往下讲，怕讲错了。我们也想早检查、快检查，变被动为主动。

杨成武说：“济南军区给我们提供了经验，内蒙也给我们提供了经验。济南军区党委统一，杨司令、袁政委一站出来检查错误，表明态度，原来抵触较大的炮兵、工程兵也都转过来了。内蒙则是内部出了问题。只要你们司令员、政委、副司令员、副政委、参谋长、主任通了，你们真正转过来了，事情就好办了。对各师、分区要请他们来开会，不能让他们帮倒忙。”

康生说：“我看你们的意思是不是等中央表了态，你们才表态？如果你们等中央作了结论，你们再表态，那你们就又被动了。

2月叫你们来，你们不来，被动了一次。这次再不先表态，不就又被动一次？等中央作了结论，你们再表态，群众会说中央已经表了态，你们不表态也不行了，这不就是被动？我提出这个问题，请你们考虑。

开了几次大会，‘河造总’保你们，你们连一句话也不起来说，你们应该起来说，你们说：‘同志们，我们有错误’，不就好了吗！？

你们有错误，应该告诉‘河造总’，人家忠心耿耿地保你们，你们有错误为什么不告人家呢？要告人家。这些也请你们考虑。

我们等你们觉悟，把主动给你们，我们才好讲话，我们才好保你们。我看何运洪，你的思想这个弯子还没有转过来。

我告诉你一个经验，四川杨超我们几次让他讲，还给他写了信让他讲，他不讲，中央想保他，但保不起来了。”

戚本禹说：“你们还是姿态不高。“

康生：“你们应该主动检查，要不‘河造总’会怨你们有错误不告诉他，‘二七公社’认为是中央给他平反的，不是你们主动认错的。你们回去后，可召开群众大会检讨。

‘河造总’讲郑大‘联委’是省委的御用工具，值得注意。主要讲刘、文、纪，这三个人要分析，文的问题大，刘、纪当然有错误。

‘河造总’，你能说他不是革命群众组织？但他们的错误，你们是有责任的。‘河造总’，‘二七公社’也没说他是反动组织、非法组织，相反，‘河造总’说‘二七公社’是御用工具。

现在是公开向‘二七公社’和郑大‘联委’平反的问题，不

是想‘河造总’的问题。你们应对‘二七’说：我们错了，把你们搞错了。给‘河造总’说：你们支持解放军，支持我们是好的，但我们有错误，我们准备检讨。

‘二七’不能说是没有错误，但总比你们抓人好得多。”

戚本禹说：“康老讲的很清楚，这是方针。你们要争取主动，你们抓了人，把杀出来最早的造反派党言川抓了，还开斗争会，还让人家游街，中学生这些小孩带着牌子上街请罪，这你们都是知道的。

我们觉得很惊讶，就是你们说省委还有没有一小撮，运动搞了一年多，你们支左，把左派都抓起来了，却找不到一小撮啦，这是很严重的错误。你们要主动，要高姿态地检查错误。这些小将，你们不要把他们当作小孩子，他们很敏感，他们不简单。”

杨成武：“小将们比我们强。”

戚本禹说：“赵文甫的材料我看了，问题很严重。”

何运洪：“我们是把他当作已揪出来的。”

康生：“赵文甫给你们写信，很恶毒，你们没有反击，只是说被揪出。何运洪同志，你们的话不能说服人。”“1军对‘824’的四条还坚持，这就不好了。”

戚本禹对开封1军领导说：“康老已经提醒你们不要追了，你们还把四条当成宝贝，这就不对了。”

杨成武说：“1军还有个打死人的问题，错了就错了，不要掩盖，主席、林副主席、中央是保你们的。你们对反动组织也缺乏分析。”

戚本禹说：“对‘二七公社’要做工作，不要压‘造总’。

将来要以‘二七公社’为核心搞大联合。”

第二天，6月24日晚18时至23时30分，康生又接见了河南的纪登奎和耿其昌。

康生说：“主席让抓河南问题，有些情况我们还不太熟悉，再了解一下，你们汇报一下，河南的情况，河南的领导班子，军队问题。”

纪登奎、耿其昌向康生汇报，康生不时插问。他对文敏生、杨蔚屏的情况很注意，特别是杨蔚屏。说他进过高级党校，当过党校党支部书记，和杨献珍关系很密切，杨献珍经常找他看戏。又谈到山东大学，西安交大彭康，南京大学匡亚明，郑州大学王培育等。康生说：“彭康早就该打倒，王培育挑动群众斗群众。”

他还说：“运动初期，全国有3个大学有问题，即南京大学、兰州大学、郑州大学。中央对河南的处理很满意，对66年河南的情况也较满意。”

当谈到开封2月18日的开枪事件时，康生说：“作为野战军开枪打死群众，开封是全国第一家。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他们不是开了8枪吗？1军只承认开枪了，不承认打死人。”

谈到开封师院“824”的对立面，开封师院“井冈山”的情况时，康生问：“1军说‘井冈山’是最早反院党委的，是造反派？”

纪登奎说：“根本不是这样。‘井冈山’原是‘战斗师’，是保守派。”

康生又问：“曲乃生是‘824’的后台”？这是1军军长来讲的。”

纪登奎回答：“‘824’从来没有和曲乃生有什么联系。他们是反曲乃生的。”

康生又问：“‘824’为什么揪住赵静生不放？”

纪登奎答：“因为他是镇压‘824’的幕前指挥。”

康生问：“‘二七公社’组织纯不纯？”

纪登奎答：“现在发展全省了，我不敢保证。”

康生又问：“‘工人总部’和‘公安公社’能否一样看待？”

纪登奎答：“不能一样看待。”

康生：“‘公安公社’是谁主持的，操纵的？”

纪登奎答：“是河南军区。”

康生：“保守组织里有没有高干子弟？”

纪登奎答：“有。如‘郑工造总’有一个。新乡‘红卫兵总部’就有何运洪的女儿何泰廷在里边，与李玉坤乱搞。”

康生说：“李善亭做的坏事很多。”

纪登奎回答：“他是何运洪的参谋。”

康生又问：“余嗣贵怎么样？”

纪登奎答：“是镇压‘二七’的总指挥，出头露面的都是他。”

康生又问：“张树芝好像不太管事了吧？”

纪登奎说不清楚。

康生还问：“军队内部有没有不同意见？”

纪登奎答：“我知道的消息不可靠，据说有军区几个军官和一个参谋。”

最后康生说：“我们接到一些人民来信，反映你们‘二七’的事，你们还打、砸、抢，河南报馆是你们搞的吧？”

纪登奎答："是我们，他们在报纸上天天写我们是非法组织，是反革命，小将们急了，把他们砸了，我们保证今后不再搞了。"

康生："'二七'过去是受压制的，现在又活跃起来了，现在有一个规律，当他受压制时，他的大方向是对的，当他解放了，他自己又重复别人犯的错误，给他们平了反，他们就用别人压自己的办法压别人。'二七'对这个问题不觉悟，犯的错误就会更大些。如何对他们进行教育使他们懂得毛泽东思想，这是最重要的，有的革命组织，不当权的时候还好，一当权地位就不同了，被统治者变成了统治者，他就变了，各地的规律都是这样，发展宗派主义，小团体主义，风头主义……最近中央对两派发了六条，双方都要执行，望'二七'做工作，请他们办到。

1、不要上街游行，上街容易引起冲突，写标语要有所克制。

2、双方保证不搞打、砸、抢、抄、冲。

3、双方不要抓人，不要违犯十六条。

4、保证铁路、公路交通运输，军事工业，尖端科学部门正常生产。

5、不要动员农民进城。

6、不要抢夺武器，军队要坚守岗位。"

24 日这天，中共中央发出《通知》，要求浙江、江西、广西、湖南、河南、鞍钢、鞍山市来京会谈的代表团保证在各地实现："1、不上街游行。2、互不打架、互不冲击。3、不抓人、不扣人。4、不阻碍铁路、公路、轮船运输。5、不动员农民进城、拦路、拦车。6、不夺枪，不开枪。" 这个通知后来被称为《六二四通知》。康生 24 日晚对纪登奎他们说的，就是这个通知。

6月27日，河南省军区党委做出《关于支左工作中所犯错误的检查报告》。

3 月以后，新疆造反派开始批判“三月黑风”。4 月 8 日，新疆十月拖拉机厂车间主任、新疆“工总司”负责人杨立业和新疆大学数学系学生、新大“星火燎原”一号勤务员吴巨轮，当时改名胡乱闯，策划组织了乌鲁木齐“人民广场大会战”，主要是批判“二月逆流”、“三月黑风”，矛头指向了新疆军区。

4 月 18 日，新疆八一农学院张玉麒率领“红旗”组织进驻人民广场，并建立“八农红旗”驻市区联络站，刘松林任站长。

5月8日，由“炮轰军字号新疆日报联络站”田永龙等人发起，联合乌鲁木齐市“三新”派组织，查封并占据了当时已被军管的《新疆日报》。他们的对立面，新疆“三促”派发起反击，在报社与“三新”派进行“革命大辩论”。口头争辩无效，“三促”派头头王子玉等人研究决定，要强行夺回报社。

当天，“三促”派2000多人，冲击《新疆日报》，与这里的“三新”派发生武斗，双方使用了石头、瓦片、棍棒等工具，大打出手，“战况”一度极为激烈，最终造成多人受伤。

当天,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全军文革小组办公室就《新疆日报》事件发去电报：

新疆军区党委、红二司、革命职工联合总部，并抄有关各群众组织：（均请新疆军区抄转）

一、要坚决贯彻毛主席关于“要文斗，不要武斗”的指示，参加武斗的双方，要立即停止武斗。

二、新疆日报社为军管单位，各群众组织都不要去冲，也不

要查封，进入报社的外单位群众组织，要立即退出报社。

三、新疆日报的问题，由新疆军区组织双方代表通过协商解决。报纸出版如有缺点错误，可以提出批评。

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

全军文革小组办公室

一九六七年五月八日二十三时

电报到后，武斗也随告结束。

这次武斗，是乌鲁木齐地区发生的第一次规模在千人以上的武斗事件。接着从5月15日开始，“三促”派又开始围攻“三新”派的“广场大会战”。到5月18日，他们组织上万人趁夜“偷袭”人民广场，“八农红旗”等组织被赶出人民广场。

到了 6 月，新疆军区成立了“乌鲁木齐地区制止武斗指挥部”，简称“武指”。

由于“八农红旗”进驻人民广场后，将自治区党委书记处书记、区党委宣传部部长林勃民扣押在八一农学院“红旗楼”审查。这时，军区文革办、公安厅军管会给“八农红旗”送来《抗议信》，要求释放林勃民，并派 10 名战士在“八农红旗”楼前“静站”，手持《毛主席语录》呼喊口号，要求释放林勃民，“八农红旗”拒绝放人。于是，在“武指”的支持下，以马凤莲为总负责人的“新疆红卫兵总部”，联合交通系统“交通红旗”，筹划攻打八农、新工、新医等“三新”基地。他们联络军区制定攻打八农的“作战方案”，由交通厅孙杰副厅长、工农革命委员会派员视察围攻路线，并绘制作战图，在油运司设前沿指挥部，并于 6 月 23 日夜，由众多军人混在群众队伍中完成对了“八农”

的合围。

6 月 24 日拂晓，冲锋号响起，“八农八八火种”楼，即现在的畜牧学院首先遭到攻击。随后又攻打“八农伏虎”楼，即现在的农大农学院。最后是断电、断水，集中围攻“红旗楼”。“八农红旗”张玉麒组织“敢死队”，唱着“红二司战歌”，奋勇抵抗。由于事前“八农红旗”已挖了地道、修筑工事，封闭“红旗大楼”门窗、楼梯，并设立联络电台。后电台被查，又改用旗语、灯语联络，早已作了准备，致使对方的攻势受阻。

到了下午，各地“三新”组织前来支援，又将围攻“八农”的“新疆红卫兵总部”的人反包围，进攻“八农”的“新疆红卫兵总部”开始撤退。

撤退时，“新疆红卫兵总部”司令、新疆大学政教系学生马风莲已上车，但发现还有几名战友未到，就返回去找，恰巧在路上碰上认识她的“红旗战士”，将其抓获。“八农红旗”还将现场的新疆军区副参谋长马森、区党委副秘书长牛其义一并抓获。这次武斗让“八农红旗”威震新疆，乌鲁木齐从此有了“‘新大’政府，‘八农’军区”之说。

为了营救马风莲，“八农红色军团”一号勤务员李东辉为其说情、斡旋，一周后将马风莲转交“新疆大学星火燎原”，马风莲回到新疆大学被严刑拷打，后趁机逃出。

此次攻打“八农”，双方受伤近千人，被砸、烧的教学仪器和设备价值 40 多万元。

攻打八农的当天，消息就由自治区防汛总指挥部办公室（水利厅）传至水利部三门峡指挥部，再由三门峡中转至北航“红

旗”。当时，“八农红旗”勤务员苏尚锋正在北航，苏尚锋将这一消息报告中央文革和总理办公室，中央文革指示不能攻打学校。

## 第 691 回：六二四，香港联合大罢工　动吊车，汉轧厂其景惨烈

也是在围攻新疆“八农”的这一天，6 月 24 日，香港左派工会发动香港 20 个工会工人联合大罢工，约 6 万名工人响应。政府及公共运输工具公司强硬对付罢工，将旷工雇员即时解雇。

当天，周恩来在赞比亚总统卡翁达的答谢宴会上说：“香港的工人阶级、青年学生、农民、渔民以及其他爱国同胞正在进一步团结起来，组织起来，结成了浩浩荡荡的反帝抗暴大军。今天，他们开始了一场规模宏伟的反帝抗暴大罢工。我们表示坚决的支持。”

6 月 24 日这天，广州“地总”、“红总”、“郊贫联”、“一司”等组织，举行大型集会和游行，声援香港 20 个工会工人联合大罢工。“地总”向香港赠送的物品，源源不绝地运往香港，其中包括：《毛泽东选集》9542 套，《毛主席语录》21774 本，《毛主席诗词》及单行本 2601 本，毛主席像章和语录章 18275 个，毛主席像 7190 张及 310 套革命书籍，锦旗、袖章、慰问信等一大批。

6 月 24 日，中共中央给在京的浙江、江西、广西、湖南、河南五省和鞍钢、鞍山市代表发出《通知》，即《六二四通知》。《通知》说：

浙江、江西、广西、湖南、河南、鞍钢、鞍山市来京会谈的代表们并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军事管制委员会、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各大军区、省军区、各部委：

为了保证各地代表团在京会谈的顺利进行，有利于中央对各地问题的解决，中央要求各地代表团有争论意见的双方，能够达成协议，保证以下六条能在各地实现：

一、不上街游行。二、互不打架，互不冲击。三、不抓人、不扣人。四、不阻碍铁路、公路、轮船运输。五、不动员农民进城、拦路、拦车。六、不夺枪、不开枪。

达成协议后，双方应立即用电话通知回去，保证切实执行。

当天下午 14 时 30 分至 19 时 30 分，张春桥在北京政协礼堂会议室接见浙江“省联总”及所属地、县革命造反派代表。

谈到形势时，张春桥说：“现在这个意见是一致的：关键在军队，希望做他们的工作。”

针对浙江，他说：“‘红暴会’提‘砸烂省联总，枪毙张永生’这不对。但你们的传单提‘黑暴会’，那就会挑动大家的情结，就是‘红暴会’是一个坏组织，也不要这样提。你们提‘黑一司’，那就是一大批都是黑的了。‘一司’都是青少年，应该做耐心细致工作。好的政治口号，可以促使分化瓦解。”

张春桥说：“浙江的形势好，空 5 军、20 军态度明朗。省军区问题比较严重，正因为这样，在处理方法、步骤上谨慎一些。龙潜态度比较难办，不拒绝检讨，不拒绝承认错误，他对错误认识程度很差，能不能改，没有把握。浙江空 5 军、20 军在那里，这是很重要的条件。

宁波的革委会可以改组。宁波可以写一个通告，改组革委会。

龙潜对群众太怕了，有些同志去静坐，我叫龙潜去接见，我说群众不会吃人的。我打电话叫他去见，他不见。我以为我讲话

不灵，我和姚文元联名打电话给南京军区，叫军区党委通知他，但他只接见了 20 分钟就走了，怎么这样怕!他不接触群众，耳朵里灌的只是一种情况，思想就比较难办了。我们想尽量做工作，这样争取时间。

毛主席就是比我们高明不知多少倍，北京‘联动’，就是主席说放掉。我们说研究一下，推迟了三天，后来主席说，今晚就放掉，结果放了后，‘联动’反而瓦解了。主席给我们提供了多少丰富经验。浙江不搞好，主席很不安，我跟龙潜说，浙江不搞好，主席怎么去，主席休息的地方总要搞好。”

6月25日，周恩来陪赞比亚总统卡翁达及其夫人到上海参观，并送卡翁达总统离开上海回国。随后，他同上海市干部、群众代表座谈。他在座谈时说：

“我在上海睡不着觉，江西、广西、河南、湖南、浙江等六个省的问题要回去解决，马上要走。”

在谈到“三结合”问题时周恩来说：“主席说，省、市一级还是要干部挂帅，红卫兵小将往往是今天上台，明天打倒，政治上不成熟，还不能当省、市的革委会主任。”

6月25日，《人民日报》在转载《文汇报》6月21日社论《无产阶级革命性与小资产阶级摇摆性》时，在编者按中，用黑体字引用了毛泽东的话：“必须善于把我们队伍中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引导到无产阶级革命的轨道，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胜利的一个关键问题。”

26 日，中央警卫团 8341 部队组织支工部队分别进入北京针织总厂及其所属的两个分厂和北京市化工三厂。临行前，毛泽东

对他们提出三点要求：

一、下去后要做好宣传工作，要做深入的、细致的、艰苦的思想政治工作。厂子里女工多，要派些女同志下去，便于工作。

二、下去后不要匆匆忙忙急于表态，经过调查研究，如果两派都是革命的群众组织，就要逐步地把他们联合起来。就是两派严重对立的群众组织，群众也是愿意联合的，不愿意联合的只是少数的几个头头。

三、要向工人群众学习，不要怕犯错误，错了就改。要关心群众的生活，组织个医疗组，给他们看病。

香港左派工会大罢工的第四天，6 月 27 日，香港左派学校也罢课一天。

6 月 28 日，根据周恩来的指示，由广东省军管会主持举行了一次有 8 万人参加“广东省、广州市革命群众支持港九工人联合大罢工大会”。各群众组织和个人，纷纷写慰问信和拍慰问电报给港九工人。仅广州一司就投寄了 5000 多封慰问信。大街上到处是标语、传单、漫画。有的群众组织还出版了《反帝抗暴》小报，演出反英抗暴的文艺节目。

从 6 月下旬开始，陆续有 10 名在港九骚乱中负伤的的伤员回到内地治疗，其中有内地驻港贸易机构职工 5 人，国货公司职员 1 人，汽车公司工人 2 人，水泥厂工人 1 人，中学生 1 人。据说他们当中有 5 人曾被英警抓入监狱，多次遭到殴打，伤势较重。这些伤员回到广州后，获得战斗英雄一般的接待，在医疗和生活上都给予热情的安排，对一些从农村出来探望伤员的家属也协助解决住宿问题。医院医护人员对出入院的伤员组织迎送，认真给

他们治疗，有的还召开座谈会，请他们介绍斗争事迹和经验。

一群港澳学生组成的反英抗暴团，后来在广州报告他们参加香港暴动的经历：

在祖国波澜壮阔的文化大革命的推动下，一场反英抗暴斗争在香港爆发了，残酷的阶级斗争现实教育了港九青年学生，清醒了他们混沌的头脑。爱国学校的学生首先起来了，被关在港英“奴隶训练所”多年受苦最深的反动学校学生也起来了，他们互相串联纷纷组织了斗委会、战斗组、印传单、写大字报，上街游行，成立街头宣传队，勇敢地宣传毛泽东思想，以铁的事实揭露了港英奴化教育的反动实质。在斗争中，一大批青少年闯将涌现出来了，他们高举革命造反的旗，冲锋陷阵，锐不可挡；他们牢记毛主席的教导，坚决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革命道路，和广大的爱国工人、农民组成浩浩荡荡的革命军，向港英的反动统治发起了致命的总攻击！

6 月 29 日，香港左派发动联合大罢市，副食品价格一度上涨。罢市至 7 月 2 日停止。

6 月 22 日，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总指挥部”成立，它的前身是 5 月 16 日成立的“武汉市反击资本主义复辟逆流大联合总指挥部”，简称“大联指”，是由 5 月 5 日成立的“武汉地区大中学校革命造反联合指挥部”和 5 月 8 日成立的“武汉地区工矿企业革命造反联合指挥部”合并而成，总指挥部设在湖北大学，总指挥是“新湖大”的张维荣。

“无产阶级革命派总指挥部”，人们还是习惯称为“大联指”，它在“揪陈抗暴”中发挥了一定作用。作为各方认可的机构，它

在很大程度具有相互交流、消除分歧的功能，如民众乐园的“抗暴指挥部”就是由“大联指”直接领导。但是“大联指”一直没能统一指挥全市造反派，各组织基本还是各行其是。其原由有历史宿怨，也有现实的分歧，最大的现实分歧就是“工总”问题。“三钢”是主张彻底为“工总”翻案的；而“三新”组织中相当一部分人认为，“工总”的一些头头和过去的一些做法是有问题的，所以只提“为工总平反”或“为广大战斗队员平反”。还有如何看待当时普遍出现的造反派按系统、按单位联合成立“革司”“联司”的问题，也存在着分歧，只是因为武汉军区和“百万雄师”的压力太大，这些分歧一直存在而没有公开爆发。“大联指”决定的共同整理上京汇报材料也未能实现，“三钢”和“三新”还是分别组织了材料班子。

为应对武汉“百万雄师”的武力围剿，6 月初，由武汉“新湖大”头头张维荣、彭勋、龙铭鑫、谢帮柱等人发起，组成了“武汉揪陈抗暴总指挥部”，设在湖北大学内。参加总指挥部工作的人有武汉“工总”、“二司”、“九一三”、“工造总司”、“新一冶”、“新华工”、“新华农”及“革司”、“联司”等组织参加的头头，“中学红联”则派出新一中的陈德胜等人参加活动。总指挥是张维荣，副总指挥是夏邦银、杨道远、曹承义和吴焱金。夏邦银 1967 年 5 月被造反派从监狱里营救出来以后，就带着 50 多人一直住在湖北大学。

在基本被“百万雄师”一统的武汉 6 月，东湖边的水利电力学院依然是造反派学生的天下，这所大学和湖北大学、华中工学院成了全市造反派学生的最后堡垒，进水院看到醒目大标语是：

“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

来到这里的造反派，有一种从白区回到延安看到宝塔山的激动。大批被“百万雄师”赶出来的造反派中学生涌进大学，大学中保守派只做了微弱而无效的反抗，他们在水院贴出了“丁家显引清兵入关”的大标语，保守派的广播站也播放了“严正声明”，但无济于事。丁家显是水院造反派学生的一号头头、“二司”的二号头头。很快标语就被撕去，广播站也被捣毁，这些事情不是丁家显和大学生们干的，而是“清兵”干的，中学生要比大学生暴力许多，这似乎是文革中的普遍现象。破四旧、抄家、打人、戴高帽好像都是由中学生开始发起的。从各自学校中被迫撤离的中学生们正好把怒气发泄在文弱的大学生身上，在所谓的“以革命的暴力反对反革命的暴力”的口号下，中学生砸了保守派的广播站，保守派学生很快就退出了大学。水院、湖大、华工这些“解放区”都在长江以南的武昌，“百万雄师”公开了他们下一步的战略：“百万雄师过大江，牛鬼蛇神全扫光！”

“百万雄师”还没有过江，造反派的小分队已先过了江。6月 17 日，三中“红岩战斗队”最早的成员、也是“红岩”的头头之一、初三学生孙自元陪着丁家显和夏邦银来到水利电力学院中学生住的教室。丁家显和夏邦银都是中学生崇拜的偶像。夏邦银对中学生说：“现在汉阳只剩下汉轧一个红色据点，那里急需人支援，我们非常希望你们能去保卫汉轧。”

中学生们毫不犹豫地同意了。他们觉得汉阳需要他们，责无旁贷。

去的不仅有中学生，还有其他学校的大学生，其中也有女生。

这群学生好像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西班牙内战时，为保卫被佛朗哥长枪党围困的马德里，各国志愿者组成的“国际纵队”。 他们乘坐汽车来到汉轧，这里早就停产了，听不到机器轰鸣，几间巨大的厂房屋顶用沙包垒起了简易工事，堆了石块和钢锭，每间房顶都布置了一个班的“兵力”在防卫。汉轧的核心在四层办公大楼内，和它紧邻的是一栋三层的楼房，这两间楼房的每层楼梯都加焊了铁门，门边树立着一人多高坚固的铁栅栏，楼梯口和房间的窗户边准备了向下投掷的石块和钢锭，在有人守卫的情况下，只凭棍棒、短刀和长矛是很难从大门楼梯冲进来的，而当时武汉的武斗仍停留在头戴柳条编成的安全帽和冷兵器阶段。

汉轧指挥部设在四层楼里。指挥员中有武汉大学的雷志茂，就是武汉《二八声明》的执笔者，因为脸上有麻子，不论是工人还是学生，背后都称他为“雷麻子”。

“百万雄师”一步步的占据汉轧周边的企业和单位，慢慢缩小包围圈。6 月 23 日下午，“百万雄师”在市冶金工业公司政治部马主任、汉轧党委冯书记和董厂长参与指挥下，收紧了对汉轧的包围圈，厂内气氛骤然紧张起来。在 7 楼平台上可以看见一车车身穿工作服，头戴柳条帽，手执长矛的工人从远方驶来，在厂外集结、分散，迅速而有序。

汉轧厂大门很快就被“百万雄师”控制，紧接着，四周的围墙出现了一个个缺口，“百万雄师”开始进入了厂内，能守卫的只是那栋四层楼和相邻的几栋建筑。

“百万雄师”的劝降随之而至，他们在汉轧附近的高层建筑物上建立了广播站，高音喇叭中一遍遍地重复着《致上当受骗学

生书》，大意是在汉轧厂内的学生都是上当受骗者，只要学生与汉轧厂内一小撮坏分子划清界限，凡退出工厂的学生，保证不打不抓不杀，可以安全地各自回家。到了晚上，还有几个被围在厂内的学生家长在广播中念着自己孩子的名字，哀求儿女离开工厂和他们一起回家。

学生中没有一个走的。工厂里的人也没有流露出惊惶害怕的神情，很多人的脸上出现了少见的严峻和坚毅。是什么支撑着这些人的意志？似乎很难用野心、投机来解释。实事求是地讲，应该说，是为革命、为领袖、为共产主义献身的信念，是为真理和正义。革命、领袖与真理、正义在当时他们的心目中，包括在“百万雄师”那里，都是划等号的。

攻击前的夜，和平日一样的寂静，“百万雄师”停止了广播，回荡了许久的家长们凄测的哀告声也消失在夜空中。“百万雄师”悄无声息的为发动总攻扫除所有障碍，汉轧指挥部的人也在做最后的部署。

三层楼内没有电没有水，沙包封闭了楼门，楼内的人分散在每个窗口把守。

6 月 24 日清晨，天阴沉沉的，汉轧厂是喊声四起，能看见楼下密集的进攻队伍。

“全体从三楼撤到主楼！……”楼内有人在声嘶力竭地不断喊叫着。

在三楼的一个窗口用木板搭了条与主楼相连接的“天桥”，四、五米长，大家冲了过去，喘息未定，就听到有人在喊：“快烧，快烧！”

原来“天桥”的另一端已经出现了“百万雄师”的身影，拆除这条木制通道来不及了，有人把整桶汽油泼洒到“天桥”上，火焰腾空而起，从而暂时阻止了“百万雄师”的追击。

不久下起了小雨。汉轧只剩下这栋四层楼没有被“百万雄师”占领，只剩下不到 300 人在顽强的抵抗。从这里，可以看见汉江上的船只悠然行驶，龙灯堤码头上的轮渡和平日一样按时驶向桥口，汉轧外面的人们照常和平的生活着，没人理会这块小小区域内的铁血与火焰。

有人掏出弹弓，向楼下晃动的“百万雄师”射了几颗钢珠，　突然响起了爆裂声，几股淡蓝色的烟雾在那位射弹弓的人左右升起。

“硫酸瓶!”有人喊道。

是从哪扔上来的？大家抬头一看：天上。前面上方，一辆巨型行吊出现在四层楼的东侧，吊车的驾驶室高过四层楼顶，驾驶室内几个精壮的汉子正得意地朝他们笑。这台吊车是汉轧厂内的设备，硫酸瓶是从那里扔下来的。

随着吊车的启用，制空权到手，“百万雄师”发动了猛攻。

楼内每间房内都传出剧烈的撞击声，窗外飞进来的钢锭、石块和硫酸瓶与此起彼伏的惨叫声把造反派逼到了走廊……

在混乱失措的人群中传来喊叫：“指挥部命令，都退到顶层去!”

人群又涌向了楼梯，楼梯口设置的铁栅栏现在成了阻塞自己人行动的瓶颈，一群工人突然从三楼上涌了下来，他们举起手中的长矛猛地刺来，深深刺进了一个学生的肚子里。他凄厉的惨叫，

倒下……学生连续地倒下，鲜血混合着漂进来的雨水在地面流淌，冲下来的是“百万雄师”的人！

“　百万雄师”的进攻可以用摧枯拉朽来形容，他们最先突破了三楼几所房间的窗户，而“人员撤到楼顶”的命令下达时已经晚了一步。

楼顶暂时是安全的，唯一的楼梯口没有人把守，但堆放了泼了汽油的八个氧气瓶，氧气瓶旁站立着几个提着汽油桶手执打火机的工人。指挥部的人向“百万雄师”方面宣告，只要“百万雄师”往楼顶冲，就立刻引爆，八个氧气瓶爆炸的威力足以毁灭这栋四层楼和楼内所有人员，包括几百名守卫者和更多的进攻者。近千人的死亡和一座工厂夷为平地，如此严重的后果不能不让即将取得最后胜利的“百万雄师”停止进攻。

双方在僵持着……

东侧平台暴露在那座巨型吊车的火力下，残存的汉轧保卫者全呆在走廊和走廊两侧的房间里。刚刚目睹了同伴倒在杀戮的血泊中，悲愤刻在了大家的脸上，有人开始唱歌，“抬头看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很快，所有人都在唱，在没有任何退路的困境中，放声高唱，“北去的大雁请你快快飞”、“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枪一响上战场，老子今天就死在战场上了”，一首接一首，次数唱得最多的是《国际歌》，一遍又一遍.....此时，他们渴望北京，渴望歌声能传到北京。

指挥部在开会，在做是否引爆、何时引爆氧气瓶的艰难抉择。终于，传来了指挥部的最后通告，为了保存学生们的年青生命，

汉轧的工人们决定放弃引爆。这个抉择对工人来说很艰难，当时“百万雄师”对待造反派中的工人和学生有政策上的区别，以上当受骗定义，对学生比较宽容，对工人的惩办严酷无情。对那些铁了心的造反派工人来说，他们宁死也不愿意受精神和肉体上的无尽折磨。

最后一张王牌失效，抵抗者们放弃了抵抗，听凭对方摆布，难堪而屈辱。

冲入顶楼的武装工人将他们全部驱赶到西侧平台上，默默地站成了几排，有的人手上还拿着长矛，他们还麻木在惯性中。一群健硕的汉子进入了平台，为首的大吼一声：

“放下武器，举手投降！”

守卫者都沉默着，没有人出声，也没有人举手。

“举手投降！”

随着喊声，几个大汉挥动铁棍劈头盖脸地打来，被打中的人惨叫着倒在地上。铁棍击中一位女生的头部，呯的一声闷响，她黑黑的头发刹那间突然变成了一片白色，接着变成了一道裂口，然后是鲜红鲜红的血。残暴产生的恐惧震慑了所有人，“俘虏”们全部举起了手。

汉轧陷落了。汉阳全都是“百万雄师”的天下了。

## 第 692 回：困四院烧水运一片狼藉　细安排，组织攻打“工造总”

6 月 23 日凌晨，武汉“百万雄师”还从水上和陆上围攻位于武昌的铁道部第四设计院。晨 7 时许，“百万雄师”将铁四院 100 多造反派逼至险峰大楼四层办公楼的顶楼。

上午 10 时，“百万雄师”政参部长蔡俊善，二七区一号头头张文、《雄师报》编辑陈志华等 7 人乘吉普车到铁四院了解情况，回来时被武汉水运工程学院前去支援铁四院的群众组织“钢二司新水运”抓住，并被带到武汉水运工程学院。“百万雄师”总站立即向武汉军区支左指挥部汇报，要求水运工程学院放人。水运“二司”提出“百万雄师”撤除对险峰大楼和铁四院的围攻，他们就放人。

中午以后，“武汉公安”在水运工程学院后门的江面上停泊了 5 条船，分别是：“友谊”1、2、3 号，“水运”1、2 号，封锁了长江江面。陆上，“百万雄师”封锁了通往水运工程学院一切道路，包围了这所绿树成荫的大学校园。校外沿街一带站满了手持长矛、铁棍的“百万雄师”。

街边有人问他们：“为什么攻打学生?”

他们回答：“不是打学生，是打牛鬼蛇神。”

每个进出学校的人都要自报家门，亮出自己的观点：是什么派？面对长矛和厉声盘问，有的人慌得语不连贯忘记了普通话、指着学校的方向说：“我在伊面(上海话那面)，伊面工作，不是学校里的人。”好不容易过关。当然也有挨打的，往往是流露出

不满的男青年。

下午 14 时始，“百万雄师”总站数次发出通牒，要求水运工程学院下午 15 时 30 分前无条件放人，水运“二司”未予理采。

下午，在水运工程学院上班的工作人员，下午刚到单位就接到通知：“家住在院外的早点下班，家住在院里的和家属一起，晚饭后都集中到靠江边的单身宿舍过夜，带些水和食品。”

天气转阴，飘起零星牛毛细雨，落在身上湿漉漉似有未有。水运工程学院校园里一片秣马厉兵备战忙。学生们准备最后坚守的“8 栋”学生宿舍楼，已是戒备森严。近 100 米长的筒子楼，南北山墙上连通长长的走道的两个大门已用砖封死，楼梯口塞满课桌椅子，二楼、三楼的窗口可见堆起来作为武器的砖头石块。火红的战旗从正对着路口的北山墙三楼窗口伸出，高高飘扬。广播喇叭里在播放毛泽东诗词《西江月，井冈山》的歌声：

山下旌旗在望， 山头鼓角相闻， 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巍然不动

早已森严壁垒， 更加众志成城。 黄洋界上炮声隆， 报道敌军宵遁。

高年级的学生一脸忧国忧民的沧桑，低年级的学生刚退尽稚气的脸上写满超出年龄的凝重，他们同仇敌忾，为了心中的偶像毛泽东，报定上刀山下火海的决心，周身凝聚着悲壮。那种渴望经历真正的出生入死、渴望像白色恐怖下地下共产党人一样为信仰捐躯的悲剧人格精神，驱使他们不惜牺牲自己。

他们明知面对军队支持的“百万雄师”，他们是以卵抵石，这个据点将被踏平。他们仍然坚定相信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

敬爱的领袖毛主席，即使战死，也虽死犹生，他们必须战斗。

忽然，一曲低沉、荡气回肠的歌声传来：

戴镣长街走 ， 告别众乡亲

砍头不要紧， 只要主义真。

杀了我一个 ， 自有后来人。

歌声渲染着不屈服的挑战意志，溢满为心中的偶像毛泽东而战的革命英雄主义涅槃中升华起来的自我陶醉的激情，闪烁着悲剧精神。他们的失败是不言而喻的，但是可以看出，当时的人心是偏向他们一边的，尽管人们知道他们会失败，会倒下。

下午 17 时许，一辆消防车、一辆吊车开来参与“百万雄师”对铁四院的围攻。18 时，“百万雄师”攻占铁四院办公楼，并将这里的造反派 100 多人押至附近的船舶工业学校。

晚 22 时至 23 时，经过谈判，水运工程学院同意放人，条件是“百万雄师”要撤兵。

深夜，雨越来越大，玻璃窗上的雨珠，在江面上的灰色的军用船只扫过来的探照灯光照射下，滴滴圆滚剔透，一串串滚落。不远处墙外传来阵阵“冲呀！杀呀!”的喊声和砖头瓦块撞击声。“百万雄师”用改装的汽车撞开水运工程学院大门，使用汽油、硫酸瓶、在消防车配合下，冲进水运工程学院，冲进教工、学生宿舍和长航设计院，逼着看到的人举手投降，否则就用铁矛刺，当场杀死水运学院工人 2 人。

午夜 0 时，传来悲壮深沉的歌声：

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

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

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

要为真理而斗争！

……

突然全院一片黑暗，广播嘎然噤声，断电了。

6 月 24 日中午，双方谈判达成四点协议，“钢二司新水运”放了扣押的“百万雄师”政参部长蔡俊善等 7 人，但“百万雄师”对造反派聚集的“8 栋”楼的攻打仍不停止。学生从上面扔砖头、石块，他们近身不得，便几个人一组，顶着棕床慢慢靠近楼墙，挖开墙后，然后一个房间、一个房间挖通。把学生们的棉被书籍桌椅洒上汽油点着火。学生守不住了，把棉被扔到楼下后，跳楼下来，被楼下的“百万雄师”痛打一顿。其中一个学生头头伤很重，还坚持由人搀扶着在毛主席像前举手宣誓：

“跟着毛主席，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绝不屈服！”

学生们都被用长矛、铁棍押走了，军队有指示，不许杀学生。

武斗后，“8 栋”楼断壁残垣，一片狼籍。长长的筒子楼，每扇窗户都被烧得焦黑，像只只摘去眼球的眼窝。一楼几十间房间全部打通，每个房间的墙上都张开着疵牙列嘴的大洞。地上是烧焦的衣物、书籍、还有被水淋过没有烧透的还在冒着烟。

南山墙外树下，一个被长矛捅死的人躺在地上，直瞪瞪的眼睛，张得很大，很恐惧，显然是被杀死的，一滩血染红了地面。这是个好打不平的老工人，听毛主席的话参加造反。

汉口友益街 16 号，占地 1500 平米，院内有两栋楼房，右楼三层，左楼二层，1927 年 2 月 11 日，中华全国总工会苏兆征、李立三、刘少奇、邓中夏、项英等曾在此办公。1958 年，湖北

省全省总工会旧址和中华全国总工会旧址按原貌进行了修缮，董必武题字，“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华全国总工会暨湖北省全省总工会旧址”。自 1963 年开始，纪念馆对外开放。1966 年纪念馆关闭，12 月，经湖北省委批准，后来 1967 年军队支左后，又经武汉军区同意，这里成为“武汉工人造反总司令部”，简称“工造”或“工造总司”的办公大楼。

汉口友益街 16 号隔壁是“武汉市无线电天线厂”，驻有几十名军代表。后面是武汉军区后勤部营房处，周围都有部队。

6 月 23 日，“百万雄师”说：“工造总司”在武汉市无线电天线厂挑起武斗，打伤 23 人，捣毁价值 50 万元的仪器设备。“工造总司”马上用广播反击说“百万雄师”造谣。“百万雄师”立刻组织用砖头、瓦片投向“工造总司”。“工造总司”进行回击，围观的群众也拣起石头和磁铁，投向“百万雄师”。

很快，有 6 辆汽车载着“百万雄师”的武斗人员开进“工造总司”隔壁的武汉市无线电天线厂。

下午 17 时许，152 部队的马科长带着几个军人来这里与“工造总司”谈判，说：“‘百万雄师’打你们，你们不还手就行。你们还击就是错误的，你们要负责任。你们不要再揪陈再道了，再揪陈再道你们的大方向就错了。”

“工造总司”不吃这一套，回答说：“陈再道我们是揪定了的！”

一名军代表说：“那你们就等着瞧吧！”

蔡炳臣连夜在 8201 部队的作战室同“百万雄师”头头开会商量。“百万雄师”坚持要拿下“工造总司”。蔡炳臣无奈，只好

对“百万雄师”的纪登清说：“只准你们今天攻打这一次吧。”

会后，纪登清就用 8201 部队作战室的电话，指挥了攻占“工造总司”的武斗行动。

6 月 24 日凌晨 3 时，“百万雄师”头戴钢盔，手持长矛、钢叉，在汤忠云和江岸分站一号头头张文指挥下，乘坐几十辆卡车包围了“工造总司”。

其实，在 23 日之前，“百万雄师”曾在汉口 30 中学内 3 次开会研究攻占“工造总司”的方案，除驻“百万雄师”联络站的 127 部队军代表穿便服参加外，独立师也来了两名干部旁听。当时指导思想是对“工造总司”只驱赶，不占领，不到万一不动武器，能吓跑最好，为了万无一失，军代表说：“这次遵照毛主席的战术思想先用优势兵力，十倍于敌的气势、排山倒海的声势，让敌人缴械投降为上策。”为此，动用 1.6 万武斗人员，就是为了让所有参加围攻的工人和家属放心。

同时，“百万雄师”还在“工造”内部制造事端：一是绑架“工造”二号头头戴鹏。6 月 10 日晚，汤忠云指使其“雄师支队”的王明荣将人民仓库会计戴鹏从单位绑架至市委大院，关在市委办公楼地下室内，因怕他叫喊，将毛巾塞在戴鹏嘴里，两天后活活窒息而死。汤忠云让“百万雄师”的“雄师支队”副队长陈昌文等人，将尸体掩埋在市委大院树林里，用草袋和荒草伪装，毁尸灭迹。

戴鹏失踪以后，“工造总司”司令部及戴鹏当时已怀孕 8 个月的妻子陈景莲到处寻找，向武汉军区、省军区、武汉市公安局军管会都报了案，但如同石沉大海。

其实，“百万雄师”的绑架活动也不是只对“工造总司”一个组织，对其他造反派组织的头头，只要有条件，他们也会采取行动。例如，武汉“三中红岩”在营救夏邦银、“工总”重新竖旗等活动中风头太劲，名气很大，他们的头头谢保安，一个十几岁的中学生也引起了“百万雄师”的注意。他们通过居委会的组织“红城公社”找到谢保安的家庭住址。有一天晚上，谢保安刚刚回到家里，就有人敲门，他觉得情况不对，赶紧从后边的窗口跳出去，拼命的跑。果然是“百万雄师”来抓他，他们在后面玩命的追。谢保安沿着腰堤路往鹦鹉洲方向跑，因为那里的造反派势力比较大。结果在路上碰到锅厂的“百万雄师”，他们问他是什么人，谢保安说是三中“贫关”组织的人，他们把他抓到三中对质，查出他就是谢保安。于是，把他的眼睛一蒙，一顿暴打。然后关在汉阳铁中，时不时有人过去揍他一顿，最后实在是看着快不行了，才把他丢到五医院门口。谢保安在五医院经过治疗，输了液，才缓过来。第二天他觉得不安全，就一个人离开医院，走过长江大桥跑到他们的“解放区”——武汉水利电力学院。

“百万雄师”对付“工造总司”的第二个措施，是通过带着“工造总司”的“铁军”200 多人及全市几万名“工造总司”队员集体参加入“百万雄师”的“新工造总司”头头胡重远，了解“工总”情况。6 月 11 日，“百万雄师”作战部请来胡重远，让他介绍“工造总司”内部的情况。“百万雄师”作战部长汤忠云告诉胡重远：

“你离开‘工造’已近两个月，这两个月‘工造’内部情况肯定有变，你不一定都了解，你能不能想个办法搞个头头出来，

或者你抓，或者我们抓。”

那时候，两派的策反也是互相的，6 月下旬，原“三司”司令部驻汉口总指挥兼宣传部长袁军公开声明宣布退出“三司”，加入“三司革联”。“百万雄师”内部也造反了，一部分成立了“百万雄师革联”，声明坚决支持“二司”、“三新”，为“工总”翻案。

“红武兵”在公安局的头头汪仕奇，还通过他们掌管的市消防处，让消防人员以防火检查为名，进入“工造总司”大楼内部，了解“工造”的全部设防及动态。6 月 24 日前，独立师又以检查消防为名，派两名军人到“工造总司”司令部大楼侦察他们的防守情况，绘制了进攻图，向“百万雄师”作了详细具体的讲解和部署。

当时，武汉肉联厂的“百万雄师”提出要在消防车水柜内放六六六药粉，武汉橡胶厂“百万雄师”头头董际斗和汽运二站的人坚决不同意，双方争执不下，差点打起来，还是军代表调停，决定不放六六六药粉。

而此时的“工造总司”对这一切浑然不觉，对前来检查的独立师军人热情接待，任其参观、检查。他们的头头亲自带领两位军人到整个大楼详细查看，对解放军没有丝毫的怀疑。

“工造”头头始终认为，自己不是“反动组织”，为“工总”翻案是政治思想问题、观点问题，军方和“百万雄师”不可能因此对自己下手。而且，作为群众组织，军队支左也会保护自己。由于“工总”解散后，“工造”就成了全市最大的工人群众组织，全国每天都有人来访，新华社、《人民日报》、外地军事院校、北京大学等等，天天都有人访问，所以“工造总司”不设防，认为

自己若设防就是准备武斗，影响不好，至于“工造总司”下属的“铁军”，那是作保卫工作的，非武斗组织，也属正常。

6 月 24 日，“百万雄师”7800 余名武斗人员，汽车 500 多辆，消防车 7 辆开始了对“工造总司”的围攻，总指挥部设在汉口球场街武汉第 30 中学二楼教室内，机动汽车由汉口汽车二站负责。为防止万一，另有 3000 名机动武斗人员备用，为防止援救口突破，离“工造总司”200 米内的道口，全部用装有铁板、砖头的重型卡车横在路口，所有通往“工造总司”的道路全部被堵。市内交通，除铁路、火车外，全部阻断。并设有三道防线。还由各工厂医务室组成急救站，从市急救站调救护车两辆，救护受伤队员。总指挥由“百万雄师”作战部副队长汤忠云和江岸区二号头头陈文担任。

早上 6 时，“百万雄师”广播督促“工造总司”：

“放出窝藏的黑工总头头和反革命罪犯”；

“将五类份子，牛鬼蛇神抢占的人民群众财产全部交出”；

“将抓进去的‘百万雄师’群众放出来”；

“将关在里面的卖淫妇女以及被 ’工造铁军’抓进去强奸的少女放出来”：

……

“工造总司”的广播员朱庆芳等人则针锋相对的播放控诉“百万雄师”和陈再道“罪行”的文章和口号，放“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 等歌曲。

这天，“工造总司”楼内大概有 220 人左右，其中“铁军”保卫人员 50 多人，办公人员 30 多人，其余都是被“百万雄师”

打得不敢回家的人，还有些是外省、外县来访问的，或无家可归来避乱的。

8 时开始，几部消防车开过来，开始向“工造总司”大楼喷水，在狭长的老街上，几个水龙头的喷水场面，就如同电影里向游行队伍喷水的情景一样。

10 时后，“百万雄师”缩小包围，开始向“工造总司”大楼内扔石头，“工造”也用石块予以回击。

11 时，“百万雄师”用汽车撞开“工造”大门，向楼内扔烟幕弹和燃烧弹，大楼顿时一片火海。

12 时，“工造总司”仍未攻下，但是事情发生了突然的变化，“工造”旁边的无线电天线厂军代表突然将工厂大门打开，20 辆汽车载着全副武装的“百万雄师”武斗人员，从“工造”后面攻入。“工造铁军”队长魏东一看大势已去，寡不敌众，被逼到三楼左侧平台后，举着红旗高喊“毛主席万岁！”跳楼摔死。广播员朱庆芳，只有 15 岁，哪见过这个场面，连忙下跪求饶，举手投降，可怜才 15 岁小女孩仍被铁矛捅死。另一名小姐妹肠子被铁矛勾出，后来被送到武汉市二医院抢救过来，但已终身致残。两名广播员一死一伤。“工造”负责人联络部副部长王明杨也被当场杀死。“工造总司”4 号勤务员潘宏斌在最危险时，怀揣“工造总司”的公章跳墙冲出重围，跳墙时将脚崴伤。“工造总司”的保卫部长阎志斌身中数刀，倒在死人堆里，“百万雄师”把他同其他人的尸体送去火化，火葬场有个工人发现他还有一口气，对他进行了施救，阎志斌得以死里逃生。“工造总司”勤务组成员、宣传部长彭祖龙是现场总指挥，当时受了轻伤，后来被“百

万雄师”抓去，不久放了出来。

武斗期间，“百万雄师”全部撤出后，好奇群众涌进“工造”大楼，看到遍地尸首，鲜血淋漓。“百万雄师”的常委、原“职工联合会”的头头章迪杰第二天去看过现场，楼下并排有 6 具尸首，楼上气窗旁的平台有厚厚的碧血，可见当时之惨景。章迪杰事后回忆时说：“后来我才理解什么叫碧血丹心。”

从 24 日上午 8 时起，“工造”和全市其他群众组织、中央在汉单位都向武汉军区支左办公室求救，“工造总司”现场负责人彭祖龙分别与武汉军区、市人武部通过几次电话，对方答复马上派军队来解围，但却一直未见部队前来。最后一次电话，军区答复说：

“我们派的部队进不去，被他们阻止了，你们最好举上白旗撤出来，他们不会杀你们的，不要和他们发生武斗，以免出现流血事件。”

再以后，军区电话打通了，就一直无人接听了。

24 日中午，长办“联司”派出谢从勤和王叔善带领两卡车人，前往“工造总司”支援，车开到车站路口，被“百万雄师”阻挡，无法前进，只好撤回。此时，“工造总司”在武汉虽然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但全国电话都来了，包括北京、上海、郑州、成都、太原，纷纷来电了解武斗进展，安慰“工造总司”坚守到底，他们保证向中央反映，让党中央出面解围。消息是一些市民通过私人、单位或公用电话传出去的。当时，武汉电话局军管，“工造总司”电话全部被监控，长途电话、电报都发不出去，但是，武汉气象台电报畅通，武汉市气象台将全部武斗情况每小时

向北京传输一次，由北京有关单位向党中央、国务院、中央文革报告。

“工造总司”三楼装有市文化局委托保护的在“破四旧”时，由红卫兵在全市没收的古字画共 5700 余幅，在这次武斗中大部份被破坏、丢失。

“百万雄师”撤出后半小时，离武斗开始已 6 个小时，武汉军区宣传车才到。宣传车高喊“要文斗不要武斗”，开到汉口吉庆街口时，被愤怒的群众用石块砸打。最后人们烦了，干脆将汽车推翻，车上军人跑了，8201 部队驻江岸区公安局代表就在 8201 的宣传车上。蔡炳臣派师参谋长郝文德，带了两个连的兵力，赶往现场。郝文德走后，蔡炳臣不放心，又派师政治部梁主任坐中吉普赶去。

过了一会，“百万雄师”再次进入“工造”，将楼里面的群众全部赶出，抬走尸体 31 具。抬到街口时发现，其中有 3 人还有气，未死，于是丢下。进火葬场共 28 具尸体。另外，分出一部份持长矛的“百万雄师”去解救被群众围攻的部队宣传车。

## 第 693 回：长办撤，中央文革电报至　看三镇，到处是血雨腥风

攻打“工造总司”前，“工造总司”头头吴焱金被市机械局的工人周伟杰用载重汽车带到民众乐园抗暴指挥部参加紧急会议，躲过一劫。当他闻听“工造总司”被“百万雄师”攻占的消息后，悲愤难当，在民众乐园广播站，声泪俱下的控诉“百万雄师”的暴行，号召全市人民打倒“武老谭”，向“武老谭”讨还血债。新美校有个叫洪喆的老师，将吴焱金带到六渡桥中南旅社对面的初开堂中药店里的广播站，他在那里又作了一次演讲。当时中山大道站满了支持他们的听众，交通完全断绝。吴焱金正在演说时，有人高喊：“百万雄师来了，百万雄师来了！”满街上的群众立即一哄而散，四处躲藏。洪喆也拉着吴焱金，连夜逃向“新华工”。

24 日晚，陈伯达再次打电话给陈再道，敦促他制止发生在武汉的武斗。

25 日，高校学院区“二司”学生手持长矛举行武装游行，呼喊“抗暴无罪，自卫有理”。

是日上午，“新湖大”决定撤出湖北大学。下午 16 时，“百万雄师”武装人员围攻“新湖大”，一辆车冲进校园，用长矛挑坏宣传画和大字报，抢走探照灯、喇叭，抓走三名学生和一名教师，在湖大校园内外看大字报的市民也遭到殴打。

此时，民众乐园里的人越来越少，为了避免更大的损失，6 月 25 日 17 时左右，“揪陈抗暴总指挥部”要求民众乐园等处人

员全部撤到湖北大学、华中工学院、武汉大学、武汉水利电力学院、武汉测绘学院几所大专院校，另外派一部分骨干去北京告状。当天，“民众乐园”和其它九个据点的“三新”、“二司”、“工总”人员全部撤出汉口城区，武昌大部份也被“百万雄师”控制，造反派唯一能活动的范围只剩下武昌几所大学。他们在武昌各高校路口都设了路障，防止“百万雄师”的进攻。这几所大学被当时武汉造反派称之为“解放区”，一旦失守，武汉造反派就真的被“一扫光”了。

6 月中旬的一天，武汉军区政委钟汉华等人在军区约见武汉“二司”负责人杨道远等人。据杨道远后来回忆：

“我见到钟汉华第一句话就问他：‘你们准备什么时候停止武斗？’钟汉华感到突然，辩解说：‘是你们武斗，怎么说我们武斗？’我说：‘你们组织训练，操纵百万雄师，百万雄师是按照你们的旨意，踏平造反派，终日武斗、横扫。请看看，武斗发生的地点，都是在造反派的地盘上，哪一次不是百万雄师攻打造反派造成的？’钟汉华拿出武大、华工印发的‘新式武器’制造成功的《号外》，说：‘武器是不准制造的，私造武器是犯法的。’我说：‘我支持制造武器（实际上我什么也没参与），别人手里拿着刀，我们也要学着拿起刀来。我们制造武器，不是为了打别人，而是准备别人打到家门口，甚至打进家里来时，不被强盗打死，进行自卫。我们制造武器，是为了保命的，完全是防御的。’”“钟汉华还说：‘我们出个什么你们就批什么，难道我们就没有一条对的吗？难道我们就全是错的了？’……接见不欢而散了。”

钟汉华指责造反派学生“私造武器”是事实。当时，“新华

工”成功试制了手榴弹、炸药、无线遥控地雷，在院内各条道路上安放了无线遥控的地雷，在东西两个操场安放了地雷引爆的氧气瓶。他们还启用了学院武装部、特种仓库守卫连的枪支，用卡车改装了一辆装甲车，和重庆“815”一样，也架设了电台，监听“百万雄师”与部队的联系和紧急情况下与外界联络。

水院也试制了火焰喷射器，并计划用以封锁东湖近岸。他们还在学院入口道路设置路障，在教学大楼外架设高压水泵和高压电网，化学教研室制成了土地雷和燃烧弹。

当汉口的“工造总司”被“百万雄师”打下来以后，武汉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简称“长办”大楼，就成为汉口唯一孤立的造反派据点，汉口各个单位有几千名无法回家的造反派群众，全都集中到了这里。25 日，“百万雄师”包围了长办大院，用高音喇叭向院内广播《敦促顾建棠投降书》。

顾建棠是“长办联司”的一号勤务员。

“长办”存有一批民兵的武器。“长办”的造反派不愿沦为“汉轧”、“四院”、“工造”“水运学院”那样的下场，强烈要求发放单位民兵枪支自卫。按照学生们的想法，就要把民兵的武器拿出来和“百万雄师”一拼到底，就是要把机枪拿出来用。

“长办”是国务院直属单位，顾建棠想：“如果我们先开枪了，那‘百万雄师’背后的陈再道有多少枪啊？军区你怎么打得过他？如果先动枪的话，‘百万雄师’就真有借口血洗‘长办’啦！”

他想不出有什么办法去说服这些激动的学生和群众，只好对大家说：“我向中央请示一下再说。”

当时，武汉的邮电局已经被军管，“长办”给中央的电报发不出去。25 日深夜，“长办”通过湖北省气象局的电台，把电报发到周恩来那里。电报说：“‘长办’现在的形势危急，已经被四面包围，许多人要求启封武器，请总理指示武器能不能动。”

当晚一点多钟，“长办联司”收到周恩来办公室回电，只有 7 个字：“那个东西不能动！”

周恩来明确要求“长办联司”，这支周恩来自 1966 年以来一直支持的造反派组织，遵守纪律，不要动武器。

顾建棠拿着电报对大家说：“你们看，周总理说不能动。”

既然周总理说不能动，大家都听总理的话。不能动就想不能动的办法，于是决定化装撤出。

正是子夜一、两点钟，外面包围的“百万雄师”人很少，“长办”里的人分 4 路撤出，一路逃到上海，一路跑到长沙，一路来到北京。几千人到快天亮时才走完。“百万雄师”冲了进去，将顾建棠抓住。他被“百万雄师”打断了两根肋骨，打断了一条臂，最后要他签署投降书，被拒绝。

第二天，6 月 26 日，经周恩来、陈伯达同意，由杨成武和戚本禹共同草拟，以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和全军文革小组办公室名义，给武汉军区发了一份电报：

最近武汉市发生的大规模武斗，是极不正常的，希望武汉军区立即采取有效措施制止武斗。百万雄师一些人对若干院校和工厂的围攻应立即停止。杀害革命群众的凶手应该按中央《六•六通令》处理。不久以后，中央将请武汉军区和各革命群众组织的

代表来京汇报。

中央文革办事组

军委文革办公室

1967．6．26

这封电报被称之为《6．26 来电》，直接点了“百万雄师”的名。在电报未发出之前,中央文革小组的一个记者,把电报拿给武汉造反派驻京联络站的负责人看,以此向武汉造反派打招呼说:“这份电报是经康老亲自批准的,现在中央急需有关武汉军区的材料,希望你们注意收集,每天向中央汇报一次。”他还说:“从电报中,你们完全可以看出中央文革小组对武汉军区的态度,希望武汉造反派要大胆地干,大胆地杀向社会。”

中央文革的批评让“百万雄师”满腹委屈。他们认为，武汉的武斗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 1966 年 12 月到 1967 年元月，“职工联合会”只要上街游行，就被造反派冲击成几截，首尾不能相顾，是绝对被动挨打阶段。第二阶段是 1967 年 4 月底，“百万雄师”还没有成立，“红武兵”等组织也是被动挨打的，势力太小，无法和全市性的造反派组织抗衡。第三阶段是从“百万雄师”成立后，他们开始还击了，造反派先使用藤条帽和木棒，“百万雄师”也配备了藤条帽、木棒，双方都武装起来了。把不能回厂的人搞到一个地方住起来，形成了武斗据点。6 月初，武汉军区邀请“百万雄师”常委到军区开会。从此以后，“百万雄师”在武斗方面才开始占绝对上风的。中央文革把武斗的罪过完全归咎于“百万雄师”一方是良莠不分,黑白颠倒,他们在洪山礼堂前的墙上贴出大字报,质问:“中央文革究竟要干什么?”

收到中央《6．26来电》的当天，湖北省军区张才良处长动员“百万雄师”总站撤离市委大院。“百万雄师”头头表示想不通，张才良说：

“你们的心情我理解，我要不是穿黄衣服，早就棒子和你们一样拿了。”“撤了以后，不要解除武装，一样可以自卫。”“大集结不行，可以小分散。”

下午，“百万雄师”将总部搬到3506工厂，“作战部”也改为“抓革命促生产指挥部”和“斗批改办公室”。3506工厂的党委书记张启贵是个老红军，非常支持和欢迎“百万雄师”去。“百万雄师”总站就设在厂办，联络部设在五一俱乐部，常委们吃住都在厂里。

6月27日，武汉“工总”、“二司”等组织在武昌举行盛大游行，庆祝中央文革、中央军委《6．26来电》。下午17时，武汉工学院“二司”宣传车在汉口水塔附近宣传中央《6．26来电》时，100多名“百万雄师”两次冲击刺伤“二司”宣传人员。

6月28日，武汉军区也发出《通告》，表明其试图制止愈演愈烈的武斗的立场。为了稳定局势,他们根据中央《6．26来电》精神,在原来派出2000名指战员参加支左工作的基础上,又充实了一批新的力量,深入到各派组织,一方面做稳定工作,收缴武器,平息武斗事件,同时对少数顽固分子采取了拘捕措施;另一方面,组织各派选出赴京代表,作好汇报准备工作。军区经过研究,也确定了赴京汇报人员名单。

6月28日,“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总指挥部”也发出《通告》，检讨右倾、逃跑的错误，宣布回到“新湖大”，并于28日

上午 8 时起开始办公。

6 月 30 日上午 10 时，40 多名“百万雄师”来到湖北大学门口，在刚贴出的大字报上写大标语，受到在场市民斥责，引发冲突。市民抓住一名“百万雄师”送进湖北大学。“百万雄师”立即派人包围湖大，然后给中央文革打电话状告“新湖大”绑架“百万雄师”人员，挑起武斗。中央文革办事组两次来电，要求“百万雄师”撤离并要求“新湖大”释放抓去的“百万雄师”人员。

下午，“百万雄师”出动改焊的武斗装甲车 8 辆、卡车 20 多辆，再次围攻湖北大学，用装甲车撞倒围墙三处，冲进湖大校园。武斗持续到到晚 21 时，打死体育系统“红体兵”3 人，打伤“新湖大”等群众组织的数十人，直到 8199 部队赶到制止，“百万雄师”才撤离湖北大学。

这时的武汉，应该说是血雨腥风。很难想象，两派群众都是为了维护共产党的领导，为了共产主义的理想和目标，彼此之间却打得你死我活，甚至不惜自己的生命。他们准备在武斗中献身时，究竟是怎么想的？武汉“新华农东方红”学生吴克强的诗作《放开我，妈妈!》，较好的反映了那时造反派的心理：

面对着“百匪”的大规模屠杀，妈妈怕我到学校去被“百匪”杀害，拉住我。我说：

放开我，妈妈！

别为孩子担惊受怕。

到处都是我们的战友，

暴徒的长矛算得了啥！

我绝不做绕梁呢喃的乳燕，

终日徘徊在屋檐下；
我要到阶级斗争的大风大浪中学游泳，
 要作搏击长空的雄鹰，
去迎接疾风暴雨的冲刷！

 放开我，妈妈！
 你可还记得哥哥和爸爸，
 为了取得抗日斗争的胜利，
二十年前，英雄的爸爸，
牺牲在日本帝国主义的屠刀下，
 人民政权的奠基石呵，
 洒满了革命烈士晶莹的血花！
 而今天，在两个阶级生死决战的关键时刻，
哥哥高举工人战斗队的大旗，
却惨死在陈再道之流的长矛、匕首下，
 为了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他年轻的生命，
 迸发出万丈光华！

 想一想吧，
 妈妈！
 活着的人应该干些啥？
 难道父兄的鲜血能够白流？
 难道能够让武老谭把革命造反派任意屠杀？

难道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不要捍卫？
难道能让资产阶级重新统治我们的国家？
革命者从来不在困难面前低头；
陈再道之流的长矛、匕首和水龙，
又怎能使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惧怕！
造反派从来不会向阶级敌人低头
顶天立地的英雄从来不怕镇压和屠杀！

我走了，妈妈！
请您转告隔壁的苏蒙蔽和马大哈，
叫他们别再为陈再道卖命，
五元钱的贿赂就出卖了自己的灵魂，
叫他们转告“百万雄师“的操纵者，
人类的罪犯绝然逃不脱历史的惩罚！
刽子手的痉挛，
显示出病入膏肓的虚弱，
魔鬼的疯狂，
只是死神到来前的最后挣扎，
光辉的胜利一定属于我们，
革命造反派永远也杀不绝、压不垮！

再见吧，妈妈！
我们的最高统帅毛主席催令我整装速发，
阶级斗争的疆场，任我驰骋，

门庭梨院怎能横枪跃马？

等着我们胜利的捷报吧！

让我们欢聚在毛泽东思想的红旗下，

不夺取文化大革命的彻底胜利，

儿誓做千秋雄鬼永不还家！

《放开我，妈妈!》高度概括、浓缩了武汉以至全国，在运动冲击、武斗流血氛围中，众多人民群众、青年人的思想。无论是自觉投入，还是被迫卷入，文革运动已经无情地进入了每一个家庭和个人的生活。

反映同期武汉大规模流血冲突的诗歌，还有武汉吕凉的《请松一松手—— 献给抗暴斗争中英勇牺牲的战友》：

请松松手，

松一松手啊

亲爱的战友！

交给我吧

你手中的这本《毛主席语录》。

按着滴血的伤口

朝着北方，

你英勇地倒下了……

鲜艳的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的袖章

已被滚烫的热血浸透！

一把血淋淋的尖刀，插进了你的咽喉！

白色的花圈和挽联

已经摆满了你躺下的街头。

你亲爱的妈妈，一滴眼泪也没有

她咬着不屈的嘴唇

和我们一起游行示威

迎着朝霞，走在最前头……

……让革命的暴雨把我们淋个够！

纵然是火烧雷劈，

也要杀出一条血路！

……胸中自有雄文四卷，

横眉冷对大刀和匕首！

应该说，是历史责任感，以改变中国现状为己任的责任意识驱使那代人奋不顾身。他们都曾经认真地读过大量的著作和语录，包括马克思、列宁、毛泽东、鲁迅及西方启蒙主义和民主主义的著作，并与当时中国的现状进行过理性的比对和思维，他们是怀着为美好的中国而不惜献出生命的激情投身于这场革命。青年时代的毛泽东说过“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这也是当年最能激励青年的语录之一，在这段文字背后一定存在着某些超越时代的东西。

## 第694回：说涪陵，反刘张“红成”北上　沈阳打，辽宁省军区静坐

此时的四川首府成都，“红成”和“826”两派为反对和拥护刘结挺、张西挺二人，也闹得不可开交。

6月20日，成都军区为“成都兵团”、成都“826”、万县“主力军”，宜宾“方面军”等组织平反的公告发表。“红成”对公告的措辞有意见，上街游行，高喊口号：

“生作毛主席的红小兵，死作毛主席的红小鬼！”

成都地院的学生都把头都推得平平的，准备当“反革命”！大有背水一战的劲头。

“红成”派的工人则高喊：“‘红成’小将往前冲，后面有我‘红卫东’！”

“红卫东”是当时成都东郊片区“红成”派的工人群众组织。东郊片是成都有名的工业区，产业工人力量很强大。

为解决涪陵“619”武斗，6月24日，成都军区第一副政委、省革筹的副组长刘结挺，负责川东支左工作的成都军区副司令员邓少东，还有成都军区政治部主任，他们一起在成都军区接见了涪陵“忠实派”在成都的200多人。陪同接见的有涪陵军分区李畔政委。会场气氛热烈，领导讲话不时被热烈的掌声和口号声打断。

刘结挺首先对“6.19”事件表态说：“在《四川十条》和《涪陵五条》下达后，竟然发生这样严重的事件，要严肃处理，认真

追究。对牺牲的人员的家属要进行抚恤；对事件中受伤的人员，要进行很好的治疗，当地医疗条件不够，军区要帮助支持；对杀人打人凶手和制造事件幕后指挥，要查处。”

接着他很动情地说：“毛主席教导我们，要奋斗就会有牺牲。当前进行的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必然有流血牺牲，对已经牺牲的同志，我们应当永远纪念他们，他们的鲜血不会白流，将孕育着无产阶级的鲜花永远开放，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永远领导着我们，我们永远跟着毛主席走，闹一辈子革命！”

他谈到了涪陵地区形势，点了赵树金和军分区司令员刘少堂的名，说在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耀下，牛鬼蛇神现出了原形。形势是好的，困难是有的，有强大的解放军作后盾，有全川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支援，就一定能战胜前进道路上一个又一个困难。

他用调侃的语气说到“贸派”：“‘红贸’貌似强大，说‘贸’有点冒，冒充是红的。其实他们不红，是黑的或白的，没有什么了不起，因为他们违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必然失败。刘少奇不是很强大吗？李井泉倒台以前不是很强大吗？都貌似强大，最后还是倒台了。同志们回去后，对‘红贸’，要根据毛主席的教导，在战略上要藐视它，战术上要重视它，对他们的头头开展斗争，对大多数受蒙蔽的群众，要开展思想政治工作，使他们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

他赞扬涪陵革命造反派久经斗争考验和锻炼，鼓励大家继续努力奋斗，说“有《四川十条》，有解放军的坚决支持。根据《四川十条》，现在下达了《涪陵五条》，为你们创造了很好的条件。有这个《五条》与没有这个《五条》是大不相同的。”

讲话结束时，他讲到省革筹和成都军区是信赖李畔的，说："他就是你们的头，你们要信赖他。"

军区邓少东副司令员也讲了话，他说："看来问题还是比较严重的，涪陵军分区还有人不承认《五条》，还发生了'6.19'事件，是个严重的事件，要认真查究，对打死人的凶手，幕后策划者要揪出来。"

军分区李畔也作了简短的讲话，他代表涪陵部队向省革筹、成都军区表示感谢，对造反派表示感谢，说："涪陵的问题圆满解决了，表现在：真正的造反派得到肯定了，冒充的造反派被否定了，军分区的领导解决了，集中体现在《涪陵五条》上，《五条》是完全符合《十条》精神的。"然后表示了回去的决心。

会场群情激动，会议结束后宣布要合影，大家簇拥着各位首长，呼着口号，到外面一起合影照相……

会后，涪陵军分区司令员刘少堂被停职留住成都军区学习检查，其司令员的职务由原涪陵军分区副司令员王永言代理。

就在6月24日刘结挺接见涪陵代表的当天，"红成"成都地院"支队"和省技校"9·15支队"冲击并砸了省革筹办，据说抄出了大量诬告"红成"派的材料。1000多群情激愤的"红成"还不解恨，又于6月25日晚冲击成都军区、捉拿刘结挺，对质省革筹。由于刘结挺当时不在军区大院，"红成"捉人不成，也没有人出面回答他们的问题，这些学生就在军区操场上度过了风雨交加的一夜，撤离军区时，扬言要组织"万人赴京告状团"到北京去直接"找毛主席告状"。

6月26日，"红成"派先在人民南路广场，即现在的天府广

场，召开了数十万人的誓师大会，欢送“红成”小将北上京城，会后在成都市内举行示威游行。接着数千人进京队伍沿川陕公路步行出发北上，开始了成都又一次千人上京告状的大行动。其中还邀请支持“红成”派的年已 75 岁高龄的黄继光的母亲邓芳芝同行，场面极为悲壮。

周恩来得知“红成”千人上京告状的消息后，立即以中共中央的名义通知“红成”：中央不同意“红成”组织“万人赴京汇报团”去北京，有什么问题由省革筹负责解决，请已出发的人员返回成都。

“红成”不为所动，坚持北上，当晚步行到深夜，就地露营。尽管是初夏，很多人还是被冻醒了。第二天，有些学生扒上了火车。

再说刘结挺等人6月24日成都接见涪陵“忠实派”的讲话传回涪陵后，“贸派”反对的声浪更高，他们大讲赵树金一伙运动初期造反的历史，猛攻关于他们是保守组织的说法。他们与重庆“8.15”、成都“红成”更紧密连系在一起。不几天，成都“8.15”和“红成”就发表文章，攻击刘结挺“624”讲话。

6 月 26 日，四川省革筹通知涪陵“红联司”常委以上领导和涪陵军分区没有参加 6 月初成都军区转弯会议的领导及赵树金等人到成都开会。

此时的涪陵，局势已远比成都严重多了，两派分别占领了若干据点，在县城里一些单位的大楼或大院，用沙袋堆成“街垒”，大门口有人持械守卫，形成了“武装割据”的局面。

上街游行的已不再是大队伍，而是一支支几十人或百多人的

精干队伍；不再是赤手空拳，而是手执长短钢钎，大小刀具，头戴藤帽。

所谓钢钎，是将铁棒的上部制成锋利的刃，有的还在刃的下部加上一簇红缨，外形活像大革命时期的红缨枪，将它或拿或扛，十分神气。钢钎是当时最主要的武器。此外，出于保护身体的需要，都穿上粗帆布制的劳保服，再戴上藤帽，一副炼钢工人的打扮。

然而他们不是去炼钢的，这一支支“全副武装”的队伍，踏着整齐的步伐，喊着雄壮的口号，在大街上游行过市，那就是要与对立派去搏斗，去拼杀。

起初阶段，两派的武装游行若在街头相遇，尚能“大路朝天。各走一边”，还不愿在公众面前背上“挑起武斗”的名声，何况还常有部队在街上巡查。武装游行队伍都队列整齐，队形不乱，谁要主动滋事，一目了然。

这时双方相互都公开以“匪”称呼对方，这可能源于成都5月称保守组织“产业军”叫“产匪军”，但“产业军”已经垮台，成都已经没有再叫匪了，这儿却叫起来了。“贸派”叫“忠实兵”为“砸匪”、“忠匪”;“忠实兵”叫对方“贸匪”、“赵匪”、“麻匪”……中国历史上叫匪的传统和习惯此时得到了全部的体现。

呼喊“打倒……”的口号已经完全不足以解恨和发泄了，干脆直接叫起“杀”来，不但是“杀”，而且要“杀死”!

这派“武装游行”时，喊的口号是：“杀！杀！杀！杀死赵树金!”、“杀！杀！杀！杀死刘少堂!”

对方则叫喊：“杀！杀！杀！杀死李叛徒!”、“杀！杀！杀！

杀死黑五条!”、“把黑五条杀个粉碎，杀个稀烂!”

到处回荡着喊杀声，天地间弥漫着浓浓的杀气。

我们从天府之国再来到东北的黑土地上。6 月 18 日，沈阳医学院的“辽联”和“831”两派群众组织发生武斗。双方正式动用了步枪、手榴弹一类的军用武器。

到了 6 月 24 日，坐落于沈阳市三经街和十一纬路交汇处的辽宁省军区大楼，被沈阳市“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沈阳总部的几千名红卫兵团团包围，来自各大中院校的“思想兵”，以校为单位席地而坐，他们的面前是统一树立的各校的旗帜。一辆由大型客车改装而成的宣传车，停靠在省军区的大门前。车篷上面的两边，分别并排安装了几个高音喇叭在大声广播：

“我们是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沈阳总部，我们的战斗口号是：坚决支持宋任穷同志的一切革命行动！强烈要求军区凌少农接见我们！强烈要求凌少农回答我们的问题!”

席地而坐的红卫兵在广播车的带领下，有节奏地喊起了震天动地的口号：

“凌少农，快出来!”

“凌少农，快出来!”

但凌少农就是不出来，大楼里也没有一丝动静，没有一点反应。

日伪时期插着太阳旗的七节大楼

七节大楼简历：英国汇丰银行奉天支行、辽宁省军区、八大局驻地、交通银行辽宁省分行

凌少农曾任辽宁省军区副司令，此时主管沈阳的部队支左。

沈阳“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简称“思想兵”，是沈阳“辽联”的主力。他们组织的这次大型静坐，是要求辽宁省军区对“辽革站”6 月 1 日夜袭东北工学院一事做出表态。因为“六一东工事件”后，辽宁省军区没有任何表示，就像没有这件事一样，这激起“辽联”的异常愤怒。于是“思想兵沈阳总部”前去省军区，要求见凌少农，但遭到拒绝。接着，静坐开始了。

声势浩大的静坐并没有取得立竿见影的效果，省军区岿然不动，女播音员唱起新编楚歌：“凌少农，你快出来，快快来见我们红卫兵，革命小将等你有一天整……”这首具有独立的知识产权的歌曲在高音喇叭里反复播唱，很快，大家都会了，都跟着女播音员唱起来。一时间，北三经街和十一纬路一带，楚歌阵阵，哀声遍野……

但凌少农就是不出来。于是来自各校的稿件雪片似的飞向宣传车，广播稿一篇篇的开始播放……

夜幕降临，虽是夏季，东北的夜里还是有寒气的。广播停止了，歌声和口号也停止了。军区大门口的灯光和宣传车里的灯光交相辉映，更显出夜的寂静。静坐的人开始减少，两名女大学生抱膝望空，唱起了那首脍炙人口的“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

次日，各地的声援电陆续发来，“思想兵”受到了鼓舞，口号更响，但省军区依旧是稳如泰山，大门紧闭。

“凌少农，你快出来，快快来见我们红卫兵，革命小将等你有两天整……”只改一字的歌声又一次响起来。

“思想兵”代表又一次进入省军区，又一次没有结果。

群情激奋，口号声声：

“坚决把静坐的斗争进行到底！”

“凌少农不出来，我们决不收兵！”

“誓与辽革站血战到底！”

高音喇叭又开始响起来。饥渴，酷热，腰酸腿痛，更有愤懑和屈辱挥之不去，但“思想兵”始终固守静坐，绝不出格。

第三天，静坐的人数达到了峰值，辽宁省军区的七节大楼被围得严严实实。人们焦急地等待着大楼里的交涉结果。熬到下午，“思想兵”代表终于从军区大院走了出来，径直走进宣传车。15时左右，广播响起：“6·24静坐行动，胜利结束！”

没人知道交涉结果，也不知道具体内容是什么。“6·24 静坐”就这样以一声广播，结束了。如果说有成果的话，就是在这

次静坐中，“辽联”的武卫队成立了，它的名字就是：“624 战团”。

“624 战团”配有解放牌汽车，身着蓝色工作服，工作帽，解放黄胶鞋，每人配备近两米长红缨枪一只。当然，这是成立初期，很快，热兵器就开始配备，一场场同胞间互相残杀的武斗，在等待着他们。

## 第 695 回：各支派，云南“八”“炮”争斗急　赴春城，谢富治与王力同行

此时的云南，昆明军区政委李成芳和云南省军区政委张力雄各自支持一派。为了整倒对方，云南省军区政委张力雄把昆明军区政委李成芳的档案抛了出来，说李成芳参加过薄一波的决死队，是叛徒，在蒋介石那里受过训……

李成芳大怒，下令把张力雄等省军区的 5 个领导抓了起来。

事情反映到中央，王力提议找薄一波调查一下李成芳的历史问题，究竟是不是叛徒?薄一波写了材料，说李成芳的历史问题在整风中已调查清楚，没有问题。

4 月 18 日，属于“八派”的昆明市公安局“八八红旗战斗队”的负责人刘殷农贴出大字报：《昆明市公安局八八战斗队向混入军内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丁荣昌宣战》、《揪出丁荣昌的后台》。

丁荣昌，时任昆明军区司令部副参谋长、云南省军管会政法组组长。

“炮派”则反对将打倒丁荣昌的大字报张贴街头。

4 月 26 日晚，“炮派”在昆明市检阅台召开有近 10 万人号称有 20 万人参加的“打倒刘、邓、陶，万炮再轰省市委血战到底誓师大会”并准备会后游行。

“八派”决定冲击会场，致使昆明几万人的武斗场面在东风广场和东风路展开，混乱中许多人被打伤。

“426”大会后，一些群众对“八派”“唯我独革，唯我独左”的行为产生反感，特别是大批被“八派”无理批判斗争的干部，纷纷倾向“炮派”，重新组织团队投向“炮派”的单位日益增多，而“八派”头目认为这是不能容忍的分裂活动，对新成立的“炮派”团队进行指责和冲击，导致更多的武斗事件发生。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两派各组织了若干辆装有高音喇叭的宣传车每天晚上在昆明市中心近日公园、工人文化宫以及塘子巷、小西门等昆明市内比较热闹的地方开展辩论。特别在近日公园附近，两派的宣传车还未驶到，喷水池周围、百货大楼、民族商店、华侨商店门口及三市街口以及正义路口、南屏街口，早已有成千上万的听众在等候。这种辩论采用一问一答的方式，充分阐述自己的观点，大摆本派造反的光荣历史和紧跟毛泽东革命路线的“事实”，揭露对方这也错了，那也错了，只有悬崖勒马才是唯一出路。这种辩论，需要能言善辩、随机应变的口才，也需要口齿清楚、字正腔圆的普通话发音；要善于抓住对方的弱点和失误紧追不舍，又能巧妙地避开自己的弱点，使自己立于主动地位。每天晚上前来倾听这种辩论的人，仅近日公园一处，往往在数千人以上。其中有大中学生、国家干部、部队官兵、工人、农民，有的甚至从老远的郊区专程赶来。这众多的听众一边听一边结合自己的经历和经验进行分析和判断。听到对自己胃口的地方时，会情不自禁地鼓掌、喝彩、叫好。听到不对胃口的地方时会跺脚漫骂、喝倒彩。看到对方突然回答不上来的窘态，甚至会手舞足蹈起来。久而久之，形成一种两派宣传车的高音喇叭在大声辩论，而听众们则因观点不同而分成若干群体也在进行辩论的热

闹场面。

此时，两派的头头和群众都在有意无意地制造事端，干出许多增加对立情绪的事件。两派的广播和大字报中不时传来“告急，告急，十万火急”以及“严重抗议”一类的东西。这里那里，不是这派打了那派，就是那派打了这派，公说公有理，婆说理更多。

5 月 26 日，昆明机床厂持“炮派”的群众成立“五一兵团”。他们在进行文艺演出时，与该厂“八派”组织“一一八兵团”发生冲突。军医学校的“八派”组织去冲击“五一兵团”会场并围困“炮派”演出队。第二天，双方陆续调集学校、工厂人员近万人聚集到昆明机床厂，准备武斗，其中包括军区机关的干部、战士。后来经省军管会做工作，双方才撤离。

5 月 28 日，军医学校“炮派”组织开会声讨同校“八派”组织的罪行。“八派”组织冲击会场。地方上的两派组织也都调集了大批人员前往声援。省军管会派执勤部队 300 人赶到现场，隔离双方。

5 月 29 日，“炮派”组织到昆明军区大门口静坐，要求军区严惩打人凶手。静坐一直持续到 6 月 3 日才结束。

5 月 30 日，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致电昆明军区党委，要求军区机关和部队的干部战士不要介入地方武斗，并再次明确：“军委 1 月 28 日关于重申军区文化大革命分期分批进行的指示中，规定昆明军区的文化大革命暂缓进行，望坚决执行这一规定，机关、部队一律不开展‘四大’，任何人都不得揪斗领导干部，保持机关、部队的稳定，院校、文体单位不得同机关、部队串连，一律回到本单位，搞好本单位的斗批改。”

电报还表示："中央军委信任以李成芳同志为首的军区党委，军区机关，部队全体同志要在李成芳同志为首的军区党委领导下，加强团结，坚守岗位，遵守纪律，努力工作，很好地完成中央、军委所赋予的'三支两军'，支援越南，保卫国防等一切任务。"

这期间，云南省委书记处书记赵健民在省委大院贴出了他的第一张大字报《揭开云南省委内阶级斗争的盖子》。以后他又连续写出两张大字报，成为云南省委第一个站出来"造反"的书记。

6 月，"八派"黄兆其授意涂晓雷、刘浩等人以"三镜观察员"名义，写出《云南处在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警惕真正的赵永夫要夺取军权》和《触目惊心的五月兵变》等文章，说云南省军区政委张力雄、副司令员朱家壁等领导干部，"紧密配合蒋匪特务的三点(计划)""在 5 月 29 日晚 11 时后举行军事政变，夺军管会的权。

《触目惊心的"五月兵变"》一文煞有介事的说："蓄谋已久的 5 月兵变，正在云南军区 5 人小组的导演下按原计划进行，同时紧密地配合蒋匪特务的三项计划，向无产阶级专政进攻"。"凭着几十年的反革命经验，在云南军区的××号密室里，开始了他们 5 月兵变的罪恶活动"。提出要"高举起钢刀利剑，向党、政、军内走资派的心脏猛烈刺去"。

6 月 6 日，黄兆其指挥的"照妖镜战斗队"散发传单，指认赵健民是伸向昆明部队的魔手。

6 月 18、19 日，"八派"在检阅台召开万人大会，高呼打倒赵健民！

毛泽东看到全国一些省市武斗严重，形势稳定不下来，很着急，曾建议：有的省可以把党政军主要负责人和两派群众组织头头请到北京来谈话，解决问题。对十分混乱的云南、四川，毛泽东希望能就地解决问题，从昆明开始，逐次进行。6 月 23 日，毛泽东要王力和谢富治到云南、四川、贵州去。他特别提出要谢富治负责，因为他在那里当过第一书记。部队是他指挥过的，都是老关系。先去做李成芳的工作，赶紧把抓起来的省军区张力雄等 5 个主要领导人都放了，再做张力雄的工作，不要再整李成芳，也不准省军区再散发整李成芳的材料了。

谢富治向毛泽东建议增加空军政委余立金，毛泽东同意，同时又增加了已经实现了大联合、三结合的贵州省革委会主任李再含，他们组成了一个中央代表团。代表团工作人员中有中央文革办事组的张根成和《人民日报》、《文汇报》记者等人。

可能考虑到官多兵少，有许多事务工作、文秘工作、跑腿工作要做，人手不够。毛泽东提议：老、中、青三结合，找几个红卫兵也参加中央代表团的工作。毛泽东认为，聂元梓不算红卫兵，蒯大富的清华大学没有实现大联合，谭厚兰已和姚文元去过阿尔巴尼亚，从其他学校派人吧！

周恩来让王力、张根成从几个大学里挑红卫兵，政治上要绝对可靠，文革中表现好，有一定能力，身体要好，要严格保密。

张根成建议："若从几个学校里挑，因北京有天、地派，万一观点不一致，在中央代表团里打起来怎么办？不如从一个学校里挑。"

周恩来说："那就从北航选，让韩爱晶派人吧！"

张根成找到韩爱晶，经过研究，决定派北航“红旗”的井岗山、尹聚平、胡慧娟 3 人参加中央代表团工作。

井岗山是黑龙江人，父亲是东北抗日联军老战士，已去世。他长得人高马大，口齿伶俐，为人正直，政治可靠，当时是北航革委会副主任，北航“红旗”第二把手。

尹聚平，女。文革初代表北航“红旗”接待过四川许多上访人员，认识刘结廷、张西廷夫妇，因此，对四川情况较为熟悉，是合适的人选。

胡慧娟，女。是云南昆明人，熟悉云南的有关情况，也被选中。

当时 3 人都是 21 岁。

同时，北航“红旗”派驻《人民日报》的工作人员、研究生吴介之作为《人民日报》派往代表团的记者同行。

由于事情紧急，毛泽东让代表团准备一下材料，尽快动身。

6 月 26 日 17 时 15 分，康生、谢富治、王力在人民大会堂南会议厅接见云南昆明“八·二三”和“炮兵团”部分在京人员，接见时在座的还有总参作战部副部长成学俞，昆明军区副政委李再含，昆明军区副政委王砚泉。

康生明确表示，云南问题由谢富治、王力就地解决。

他在讲话中指出：“‘炮兵团’到底是不是保守组织，恐怕这个看法是不恰当的。中央历来都认为‘新云南’、‘大联合’或‘炮兵团’、‘八·二三’都是革命组织。”

“中央的意见希望你们在中央的方针下，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下实现大联合。有不同意见可以经过摆事实讲道理，平心静气

交换意见。黄兆琪同志，你们有一个‘评战犯求和’，我看了这篇文章，你们把‘炮团’说成‘战犯’，这是不对的，你们要有自我批评。”

黄兆琪站起来解释说：“这是一个战斗队写的。”

康生表示：“也可以是一个组织，一个人写的，但总是代表你们组织，我们应当勇于自我批评，‘炮团’的几评，有些提法也不妥当，‘炮兵团’也应该检查。两方有些口号都不要，你揪你的赵永夫，我揪我的赵永夫，哪有这么多赵永夫？不符合实际，妨碍革命大联合。我希望同志们好好学习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好好学习毛主席关于大联合的指示”

“回去要做保守派的，中间派的工作，这种叫做和稀泥、折中主义吗？不是，这是毛主席要求这样去做。‘炮兵团’作这样的工作，应该说不是一个错误。相反，‘八·二三’你们这方面做得少了。应该去做，应该向‘炮兵团’学习。”

“‘八·二三’有好的意见，‘炮兵团’要听取，要尊重解放军和军管会，不要因为解放军犯了错误，就动摇了。主席讲的三个依靠、三个相信，依靠群众、依靠解放军、依靠绝大部分革命干部。你们要学习去年 12 月 30 日中央对军队的一个通知。解放军是担负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重要支柱，不管那个同志犯多大错误，也不要动摇，要相信依靠，使我们解放军更巩固。尤其大家知道云南是边境，那边是敌人，据我知道，最近，瑞丽有蒋介石特务活动，云南的敌情观点，两方都要注意，美帝、蒋介石、修正主义都会进行破坏，特别要维护解放军的威信。我觉得你们两方面贴两个军区的大字报，揪赵永夫，在街上大贴特贴的。

我们建议不要整，对中央文革不利。希望双方有意见，送材料传单。我希望，你们双方达成几点协议，当然原则的问题也不能不讲清楚，不能马虎。”

康生提出 6 条意见：第一是大字报不上街，特别是个人的历史问题不要到街上轻易公布。他说：“这不是一般思想意识问题，是关于一个人的政治生命问题，你们想，一个人，一个干部没有搞清，就下叛徒的结论，就等于把他的政治生命取消，你们云南有没有南开大学调查的？‘卫东’、‘八·一八’，我们赞成你们调查，但告诉他们，要经过研究，核实。”

第二条，康生说：“不要打、砸、抢、冲、抄、抓，还加一个坐，就是静坐。”

第三条，康生要双方都保证，在云南边境，铁路、公路的交通无论如何不能断，更不能对桥梁、涵洞有所损害。同时重要工厂要保证生产。“具体地说，云南有些特殊工厂、原料，绝不要因为自己内部矛盾而影响。”

第四，双方达成协议，不要抓人，不要武斗。

第五，“双方保证不要组织农民进城。无论是昆明军区、云南军区以及两方革命群众组织，要严格保证这个问题。两个军区要保证各个军分区不要组织农民，这点同志们骗不了我们，大批农民没有组织是不会进城来，不管两级军区有什么矛盾，无论如何，保证农民不能进城。这个问题不处理好，必然要犯大错。”

第六，“两个组织无论如何不要抢夺枪支，特别是解放军、民兵、公安的枪，或者工厂里面的，千万不要动这个东西，动这些东西要犯很大错误。教育我们的革命小将、战友不要那样做。

同时，昆明军区，云南军区要说服战士们，坚守岗位，不要离开枪、连队组织，边疆更不能这样做。”

大家鼓掌赞成康生的 6 条意见。

6 月 27 日晚，中央代表团一行乘专机到达昆明。云南省党、政、军领导前往机场迎接。

谢富治、王力临行前一起到周恩来处报告和请示。到了那里，周恩来正同科委张本谈话，还有很多人等着要见。周恩来听说谢富治、王力来了，先见了他们。

## 第 696 回：六二七，无锡火烧铁甲车 刘张斗，郑维山见晋代表

就在谢富治他们前往云南的当天，江南无锡发生了火烧铁甲车的武斗事件，当场烧死6人。

无锡自“426绝食”结束后，5月7日，无锡轻工业学院的“626”和“主力军”群众组织，再次冲击公检法军管会，要求为2月27日被无锡军管会取缔的无锡市“红色工人造反总司令部”平反。

5月23日，无锡市军管会为无锡市“红色工人造反总司令部”平反，释放了该组织的负责人金坤泉、周炳荣二人。金坤泉等人出狱后，当即表态：“我不敢了，里面（监狱）日子不好过的。”

6月1日，无锡市体育场上召开十万人参加的“主力军重震军威大会”，无锡铸造一厂工人、“红色造反总司令部”，简称“红总”的中心组成员陆渭文主持大会。会上，“6.26”兵团负责人浦湘海发言，清华大学“又来了战斗队”代表外地学生代表致贺词。会后，无锡地区所有的造反派组织全部自动倒旗，都称“主力军”，“红总”内部也作了明确的调整，按系统划分为12个兵团。

6月19日晚，西门桥附近发生了自发性的武斗，现场人头攒动。有“主力军”群众来“红总”报告情况，并请求总部派队伍前去增援。当时值班的陆渭文、陈书刚等人因情况不明，决定第二天组织“主力军”游行示威，前往军管会请求制止武斗。

6 月 20 日中午，“主力军”数千队伍按计划集结游行，当游行队伍抵达军管会办公所在地无锡饭店时，那里已人去楼空。

下午 13 时左右，“主力军”的对立面，“九派”600 多人，捣毁了“主力军建筑兵团”指挥部，同时还包围了轻工业学院的“6.26”。正在人民路段组织请愿游行的陆渭文得到这些消息，一面派人赶奔“建筑兵团”救援，同时亲率 500 人前去轻院“解围”，逼退了“九二”队伍。

从这天开始，无锡市许多工厂停产，“主力军”也开始集中在轻院、市一中、绿阳饭店等地，并在当天晚上开始建立“五虎队”及各兵团的武斗队伍。其中有无锡市拳师许寿康和他的徒弟王明华，苏金坤，小铁功等二、三十人组成了“小猛虎”队；由徐才宝拳师的徒弟吴阿二，王波，王销，陈凡等二、三十名人员组成“游击兵团”负责指挥部的保卫工作；另外还有“小老虎”，“夜老虎”，“老虎警卫团”等组织，人称“五虎队”。

“6.20”事件的第二天，许多从农村赶来的无锡“六派”农民进入轻院。协助“主力军”武斗。

无锡的“六派”与“九派”各自建立了据点，犬牙交错。

“六派”的大本营在轻院内处在青山弯向左。向惠山方向延伸的市一中由“主力军”一兵团和一中的学生“红革会”驻守；再向前，由“主力军”四兵团占领绿阳点心店那座四层大楼；西门桥畔的机电大楼则由“主力军”锡柴“东方红”驻守；“主力军”六兵团驻大洋桥一带，七兵团一部驻守在湖光议器厂；市内东方红商厦，由“6.26”兵团等学生负责宣传广播等等。

而“九派”的大本营设立在与轻院相对的“抗大机校”，轻院右面相隔 200 多米的 742 厂和荣誉军人疗养院由“九派”驻守。在“主力军”四兵团对面则是“九派”的“二、八公社”相距最

近。

“主力军”召开全体总指挥部成员会议。参加会议的有“红总”主力军的一些兵团头头、“626”兵团头头、红代会（筹）负责人等数十人。在会上，他们提出“文攻武守”的口号。

6月21日起，双方武斗已开始用长矛、弹弓作武器，用面盆或者铝锅顶在头上作钢盔。这天发生在体育场桥的武斗已使用土制的燃烧瓶攻击。武斗中有一名“主力军”群众躲在树上，结果被对方的武斗人员将长矛从下向上从肛门口内刺入，死于非命。

6月22日，无锡市印染厂技校“六派”的“919”学生跑到无锡红星刀尖厂抢出一批向古巴出口砍甘蔗用的古巴刀。这批抢来的古巴刀当夜就武装了“六派”的武斗队伍。

6 月 23 日晚上，无锡市西门桥至“五爱广场”路段人山人海，大部分是在马路两旁看热闹。这里，一边是“主力军”占领的绿阳点心店，一边是“九二”的重要据点“二八公社”。有 70 多个自称“红小鬼”的 10 多岁小孩，此时正在“二八公社”门口放火，受到“二八公社”驱赶。这时正好有一支“六派”的“锡印 919”组织 100 多人经过。见此情景，即上前援助“红小鬼”。怎奈他们也是 20 岁左右的青年，细皮嫩骨，被“九二”武斗人员打得头破血流，败下阵来，逃回“主力军”指挥部报讯。

“主力军”的“三兵团”闻讯前来支援，被“九二”用长矛刺死两名纺织厂工人。又正好“小猛虎”队从市区返回指挥部途径这里，见状立即接替了学生。

“小猛虎”昨夜刚从“919”手中收到一批古巴刀，古巴刀对长矛，旗鼓相当。

“六派”轻院指挥部见到跑回来受伤的学生，又接到从市内手工业商场楼顶上，用红黄白三色灯光向指挥部发来的灯光讯号，报告市内发生了武斗，便先后派出了“一兵团”下属的“房管兵团”和“五兵团”一部约 500 人左右的队伍前去增援。“九派”和“六派”双方以四路纵队的队形，僵持在从西门桥下到“五爱广场”的路面上。

此时，“二八公社”进出的大门已被封住。“九二”百名左右的武斗队伍处在被人群的包围之中，正面是手执古巴刀的“小猛虎”队，周围是围观的群众，右前方是“绿阳点心店”的“主力军”据点，后方是机电大楼，那里有“主力军”的“锡柴东方红兵团”在摇旗呐喊助威，围观中的“六派”群众还不时地向“九二”投掷砖头瓦片。

正在“九二”处于劣势的时候，又有“主力军”数十人闻讯后从“锡师”出发向西门桥奔去，这批运输工人，有的上身赤膊，下身穿条短裤，有人甚至光着脚板，个个是五大六粗的壮汉，一阵风似的从西门桥上向“九二”的背后杀将过来，“九二”队伍在腹背受敌中慌乱溃退。兵败如山倒，他们向西门桥两侧散去，右边是棉花巷，左边是棚下街。旧城没有改造的棚下街是一级级的石阶，溃散的人群一冲，互相挤压，不少人跌翻在大地上，人轧人……无情的古巴刀在你死我活的搏斗中向下砍去……，一个又一个的“九二”战士倒在血泊之中。最后，“九二”留下了 9 条不能动弹的死尸，场面非常的血腥。事件后，有一部分“主力军”群众偷偷地离开了他们集中地，有的从此远走他乡，投亲靠友避难去了。

6月27日下午15时多，无锡化工学校的几个学生，在荣誉军人疗养院外边捡砖头往荣院里面投掷，引起双方的砖头、石块投掷战。后来，化工学校的学生被砸破了头，血流满面。下午16时多，“小猛虎”队赶到荣院增援，接着又从轻院内开出一辆红色的消防车向荣院方向开去。在这辆消防车内除驾驶员之外，车内还坐着一位年仅14岁的少年名叫杨树华，当这辆红色消防车经过荣院时，被对方拦截，“小猛虎”队的王明华见到车子被截，急忙上前一手执单刀，一手抱着驾驶员逃离现场，小杨与车子便成了“九二”方的俘虏。这个14岁的小杨在第二天早上被人发现敲掉了牙齿，抛尸荒野。

下午17时多钟，从荣院内开出两辆“铁甲车”，前面一辆是用五吨卡车改装而成，整卡车用钢板封闭起来，在驾驶室前方留着两个大饼大的园孔，园孔中间用5厘园的铁条一根根地焊好，似现代人家的防盗门上的条子，车下面只露出三分之一的轮胎。后面一辆是用公交车改装，在每个玻璃窗口封上铁板。两辆铁甲车在前面S形开路，车后面紧跟着几十名头戴钢盔，手执长矛的“九二”武斗人员，好似现代战争中在坦克掩护下的冲锋队伍，当第一辆“铁甲车”向轻院方向冲来，撞到了路旁二、三棵手臂粗小树之后，轮胎被卡住动弹不得，外面的人高喊：“缴抢不杀！”一名“九二”握着长矛冲了出来，结果被人一刀砍伤，又扔进车内，以后车里的人就抱成一团，死活不肯出来。“铁甲车”随后被点燃，立即起火，车身在烈火中熊熊燃烧。第二辆铁甲车见状逃之夭夭。待到第二天早上，火熄车冷以后，才从车内钩出了九具被烧枯的尸体。全车除驾驶员一人被救外，无一生还。

江南无锡两派武斗打得热闹，山西太原因“414 决议”引发的派仗，此时业已演变为刘格平和张日清这两个山西巨头之间的斗争。

以山西晋中为例，这里，以任井夫、王振国、张怀英为核心的地区党的核心小组，正和地区的军分区、人武部形成尖锐对立，势不两立。地区党的核心小组有全国劳动模范陈永贵这张王牌，认为自己是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支持刘格平，代表了山西文化大革命的大方向。而军分区和武装部的军人们呢？也有全国“支左一面旗”张日清的领导，还有毛主席“全国人民学习解放军”撑腰，他们也认为支持张日清就是代表了山西文化大革命的大方向，自己是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而在晋东南，地区党的核心小组内部，原地区副专员程首创和地区军分区司令员武天明，也分成了对立的两大派。支持地区副专员程首创的群众组织叫“红色造反兵团”，简称“红字号”，支持军分区司令员武天明的群众组织叫“联合造反兵团”，简称“联字号”。“红字号”说“我们支持刘格平，党要指挥枪而绝不能让枪来指挥党，你武天明必须老老实实站在刘格平和程首创一边才行”；“联字号”说：“全国学习解放军，我们就是要支持张日清，刘格平与张日清过不去，你程首创和武天明过不去，你们就是反对解放军”。

著名劳动模范李顺达出了西沟，和陈永贵一样，也积极响应党中央、毛主席的号召，参加到山西的文化大革命中，表态站在军人这一边。

于是，从山西全省看，陈永贵站到了支持刘格平的一边，而

李顺达站到了支持张日清的一边。山西两位最著名的全国劳动模范，于是成了观点对立的两大派群众组织各自都要极力抬出来的两大金字招牌。

6 月 27 日，刘格平赴京。

当天下午，在北京军区主楼三层会议室，郑维山副司令员接见山西“捍卫红色政权司令部”赴京代表团部分成员。

郑维山问大家：“你们说怎么接见呢?”

代表们说：“我们先把情况向首长汇报一下吧!”

郑维山说：“你们山西情况本来很好，是全国一个榜样，今年 4 月发现上面有分歧，就叫刘格平、张日清同志来北京解决。从现在看来，不但没有解决，反而更加严重了。我知道了这个情况以后就报告中央，所以中央文革、周总理、康生同志委托我首先找张日清同志谈。可能中央还要找他们谈。我星期五打电话找张日清，曹中南来，他们昨天来了。中央叫刘格平同志也来。山西的问题我们的态度很明确的，要支持刘格平同志，即使刘格平同志在这段工作中有缺点、错误，也应该支持刘格平同志。山西驻军，特别是张日清，应该同刘格平同志合作，不合作是不对的。山西军区、驻晋部队和刘格平同志三方面合作好的话，山西就没有大问题了。所以把张日清，曹中南都找来了，69 军问题不大，只要把问题给他们讲清楚，他们就会改变的。69 军支持刘格平同志不够，责任在我，而不在他们。69 军去山西我给他们交待，在支左问题上应该多听张日清的意见，尊重张日清意见，当时我不了解张日清、刘格平之间有这样大的分歧。69 军可能在这个角度上领会我的意见的，他们是野战军，和地方上没有什么瓜葛，

我对他们是很清楚的。69 军支持刘格平同志的问题是不难解决的。只要给他们讲清楚就行了。上午找张日清谈了，还没有谈完，我还没有表态。今天晚上再跟他谈，明天找 69 军谈。”

在代表们谈到张日清的问题时，郑维山说：“在这个问题上，不管怎么样，张日清主张起来支持左派还是对的，是应该支持的。但张日清在这个问题上做法是相当错误的，他应该把中央的精神告诉大家，发动大家起来干，大家起来干力量不就更大了吗?为什么要把其它常委撇在一起，他自己干呢?这是错误的。”

郑维山问：“你们认为刘贯一这个人怎么样?”

代表说：“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应该打倒!”

郑维山：“山西这样一个地方，搞成这么个样子，很可惜呀!你们说刘贯一是要打倒的。如果把他调了是否能解决问题?”

代表们说：“不行，必须在山西打倒。”

郑维山笑了。

这时，秘书进来对郑维山说：“中央文革叫你去开会。”

郑维山对大家说：“我要到中央文革去开会，咱们改日再谈。你们谈的问题是需要解决的。把刘格平、张日清、曹中南找来，就是要解决这些问题，中央是不了解张日清这个人的。我对张日清是比较了解的，我的态度是明朗的，山西夺权后，中央对他要帮助，弄得不好要出问题。他怎么去山西，去山西干了些什么，我都很了解。他支持山西夺权做了一件大的好事，我对中央反映了他的情况，你们还要继续反映给中央，这样对中央帮助他、了解他是有好处的。

对张日清的问题，当前尽可能争取从内部来解决，从帮助团

结的愿望出发。因为山西这一面旗帜是全国的样板，要保护它，爱护它。山西是主席讲了话的，中央讲了话的，我们爱护、保护这面旗帜，就是对中央的尊重，对毛主席的尊重。现在尽可能不要把这个矛盾扩大化了，公布到社会上。当然能不能内部解决那就是另一回事了。思想上解决不了，也要从组织上解决。

山西的问题应坚决支持刘格平同志，应该以刘格平同志为中心。张日清的问题能不能解决，就看他能不能支持刘格平同志。69 军的问题好解决，只要把问题讲清楚他们是一定会站过来的。从今天上午张日清谈的情况和你们谈的部分情况，分歧是很大的。中央文革可能听你们的意见，我和中央文革一起听，如果中央文革不能听，我也要听完你们的意见。四月份解决过一次，中央完全是耐心帮助的态度。但是，不但没有解决，还发展，问题还公开了。这就不好。对中央、毛主席、林副主席、中央文革的指示，理解了也要执行，理解不了也要执行，思想上不通，组织上也要服从，坚决执行。这一次中央是要下决心解决问题的。思想上解决不了，组织上也得解决。”

临走时，郑维山又说：“对刘贯一我们是有看法有考虑的。我们这次主要是解决部队的问题，张日清、69 军的问题，还是本着团结--批评--团结的愿望去解决这些问题的。”

6 月 28 日,山西省军区副司令赵冠英、李佐玉等在太原武宿机场接见“太工红旗”的李青山和部分“红联站”组织头头，他们对刘格平的所作所为很气愤，认为刘格平不是在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应该起来与他作斗争。

这天，太原市委机关“红旗战斗队”头头、太原市市革命委

员会副主任王承琚以中共山西核心小组办公室的名义给毛泽东主席、党中央，中央文革发电报，认为刘格平执行了刘邓的反动路线，背离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说“刘格平有什么贡献呢？只不过是跑了两次中央罢了！”“红总站不是刘格平给打气，早就垮了！打气也不行，打一次，小一次。”

当天，太原航校校长、025 部队部队长霍冰沉打电话给中央文革关锋，问：“张日清可不可以炮轰？”

关锋回答：“可以炮轰，四大嘛！”

当天中午，六中“32111”在山西省专政委员会门口再次围攻张日清。

当晚，太原市的大街小巷又贴满了炮轰张日清的大标语：

“万炮齐轰张日清！”

“张日清是山西复辟资本主义的总后台！”

“炮轰张日清，解放全山西！”

等等。

场面很像太原炮轰刘志兰的“414”之夜。

这次炮轰也提到了 69 军政委曹中南：

“曹中南不投降，就叫他灭亡！”

而且还有针对“红联站”的标语：

“山西的土联动——红联站必须解散！”等。

同时，“025 军团”还贴出歌颂刘格平的大标语：

“树立刘格平在山西的绝对权威！”等。

6 月 29 日，刘贯一、刘志兰分别以核心小组办公室名义给中央打电报，汇报太原的形势。

6 月 30 日，“红联站”、太原市工代会贴出了大量支持张日清和 69 军的大标语。

6 月底，中央文革小组把山西三大派群众组织的头头和山西省、太原市革命委员会的主要领导全部召到了北京。

7 月 2 日，省核心小组成员张日清、刘贯一、袁振、陈守中、刘志兰赴京，准备参加中央解决山西问题的会议。

## 第 697 回：中央见，甘肃省部队领导　戚本禹，与豫“河造总”座谈

6 月 27 日下午，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 118 厅会见秘鲁共产党（马）学习团、厄瓜多尔共产党（马列）学习团及玻利维亚共产党政治局委员古铁雷斯，康生、刘宁一等在座。在听了客人的谈话后，毛泽东说：

你们讲的内容都差不多，就是要打倒帝国主义，打倒修正主义和打倒各国反动派，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基本思想是一致的。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以前，要完成一个任务，就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在这项任务中，包括给农民分土地，但只是没收地主的封建所有制的土地，不能动农民的个体所有制。

在你们国家里，总有一部分资产阶级是与帝国主义有矛盾的。在革命的第一步，也不能触动这部分资产阶级，这样，打击面就小了。

要团结无产阶级、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以及民族资产阶级和他们的知识分子。反帝这个任务不是个小任务，你们的直接敌人就是美帝国主义，但如没有农民作为无产阶级的同盟军，反帝就没有力量，就不能取得革命的胜利。

你们回去后，我希望你们少讲中国的事情，最好忘掉，但不要忘了有用的东西，这就是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则同你们国家同你们国家具体条件结合起来，不和本国具体情况相结合，谁也没办法。不要完全搬用中国的经验，中国经验可供你们参考。你们

应创造自己的经验。例如，越南南方的战争有很多特点。完全搬用外国的经验，我们是吃过亏的。但我们不能忘记马列主义的基本原则，忘掉马列主义的基本原则就成修正主义了。

马列主义原则，一些人可这样解释，另一些人可那样解释。所有的机会主义都说自己是马列主义，如中国开始时的右倾机会主义和后来的“左”倾机会主义都说自己是马列主义。讲讲我们是怎样失败——胜利——又失败——又胜利的，不讲历史就讲不出道理。战争只有在战争中学，阶级斗争只有在阶级斗争中学。在马克思以前没有马克思主义。马克思创造了马克思主义，列宁以马克思主义为基础，创造了并实现了列宁主义。我们为什么不能？我们可以根据他们的基本原则，可以创造本国的经验。

就在 5 月 13 日 12 时，兰州军区党委给中央军委和全军文革小组并中央文革小组发出《关于请示表态支持甘肃“红色造反派联合第三司令部”（简称“红三司”）的报告》电报的当天，兰州地区一群众组织又冲击并占据了兰州军区支左办公室办公楼，并静坐至 23 日。

5 月 17 日，兰州地区两派群众组织又在七里河桥发生大规模武斗，约有 4 万多人参加。

当天，兰州一群众组织又开始冲击甘肃省军区办公大楼，一直到 5 月 30 日，并静坐绝食。

5 月 25 日，中央文革同意将原中共甘肃省委、兰州市委的书记处书记和省、市政府副省、市长以上领导人，统一由兰州军区管理，各群众组织若要批斗时，需同支左办公室联系，“协商安排”。

5 月 28 日，兰州军区发出《第 5 号通告》，要求各群众组织立即停止武斗。

为解决甘肃的问题，6 月 12 日，中央通知兰州军区负责人和甘肃省军区负责人及中共甘肃省委代理第一书记胡继宗到北京，参加“甘肃文革问题座谈会”。

此时，甘肃省军区不少人对中央 5 月给予甘肃省军区司令员詹大南的批评不服气，认为中央不了解情况，要向中央、中央文革、中央军委汇报情况。6 月中旬，甘肃军区的少数人和“红联”的一部分群众与詹大南一起，在中央没有通知詹大南进京的情况下来到北京，想要中央更改 5 月 14 日下发的中央军委对甘肃问题的四条意见。

6 月 28 日，中央首长接见甘肃领导。康生说：“根据好多地方的经验，大联合以后还会出现分裂。青海联合起来了，还会不会分裂呢？甘肃犯了错误，道理在什么地方呢？出现分裂，是在 100 天之后，他们从‘二·五’夺权到 5 月 14 日分裂，出现了‘红三司’，这是突然的吗？不是。是掌权以后发生了变化。很多地方掌权以后不一样了，变化相当大。甘肃 2 月 5 日到 10 日，5 天的形势是很好的。为什么会分裂呢？一个是夺权以后把原来的走资派当作死老虎不斗争，不批判汪锋了……”

周恩来插话说：“对！这是大方向问题。”

康生说：“这一点必须注意。”

周恩来：“山西是这样，没有斗争当权派，必然打‘内战’。广东也是这样，开个大会也开不起来，矛头不是对准陶铸、赵紫阳。”

康生："你们可要注意啊！不要丢了大方向，在斗争中巩固大联合。"

张春桥讲："干部'亮相'，也是批判斗争中'亮'。"

康生接着说："另一个唯我独尊，不尊重别的组织，对别的组织排挤。2 月 10 日，开除了肖泽民，18 日开除了'七·一战斗队'。"

关锋补充说："在 3 月又开除了一个'红战'。"

康生讲："有些原来反对'红联'观点的组织，向毛主席请罪，要求参加'红联'，也不要，这是脱离群众嘛！'红联'的核心组织还是很好，比如'长征团'。'长征团'的前身是'打倒汪锋委员会'嘛，主要中学生。汪锋压制的那么厉害，他们还是敢游行，还是到省委控诉。后来几百人长征，到北京以后，中央文革支持了他们。回兰州后发展很快，同工人串连，搞工人运动。10 月的时候，成立了'工联'，肖泽民在共青团市委中一部分人组织'七·一战斗队'，8 月的时间就反汪锋，这在全国、省、市的青年团里还是少见的。'火车头'开始还是革命的嘛！据了解十一中全会，薄一波插手甘肃，刘澜涛、吕正操作交易，吕正操把赵涛叫到北京来，说是不要得罪了人，说是裴、马已经撤职了，不叫他们再反汪锋了，这样的揭露将近有两个月，就不上街了。12 月就成立了'火车头'，'火车头'一成立，不斗汪锋，也不斗铁路局里边的当权派。'红联'夺权开始还好，以后领导核心转到了'火车头'，'红联'里边起了变化。军队支持'红联'，是对的。问题是詹大南同志支持了'火车头'那一派一系列的错误的政策，不斗汪锋，开除'七·一战斗队'，开除'红战'，压

制不同意见，把矛头对准军队，又结合了王世泰，犯了错误嘛！一不承认，二不改，结果这里边分裂了。”

6月28日当晚20时20分至21时15分，戚本禹来到北京西苑旅社与河南“河造总”代表座谈。他首先承认：

“‘河造总’大多数是革命造反派组织，都是杀出来的。”

随后又指出：“但你们有错误，后来你们在军区问题上盲目支持军区错误的东西，军区在支左是错误的。‘二七公社’是个造反派组织，有他的缺点和错误，成份不纯，方法不对，他们大多数组织是杀出来的，他们方法上不对，但他们对军区问题上，敢于斗争，何运洪有啥反不得？”

接着，戚本禹批评何运洪说：“主席二月份叫来京谈判，他就不来，谁敢对抗中央呢？内蒙那样独立王国，还不敢咧！他敢！军区抓那么多人，你们看得过去吗？军区的大方向是和毛主席革命路线相对抗的，你们总指挥部是三大部分：工人、学生、干部，干部在你们这边多吧！干部在你们这边很吃香。”

戚本禹继续说：“河南问题中央是很清楚的，中央在河南、湖北有一条线是专跑河南的。远的不说，潘复生、吴芝圃以来，就存在着两条路线的斗争。潘、刘、纪是一条线，吴、赵、杨是一条黑线。赵文甫很坏，杨蔚屏也很坏。刘、纪是一条线。陶铸调刘建勋是为了使文敏生掌实权，这中央是比同志们清楚的。”

针对“河造总”到北京揪刘建勋一事，戚本禹说：“北京叫刘建勋亮相，光谢富治他敢吗？这是中央决定的！可是刚见报，你们就来电报，以后又反谢富治，‘二七公社’大方向我支持，你们不是反‘二七公社’吗？可是，很多干部调查后站到‘二七’

一边了。中央大方向是支持‘二七公社’，他不反刘建勋，他反对军区错误路线。”

众人纷纷反映说：“他们挑起武斗打死人……”

戚本禹：“他们打死人，有缺点错误，这是革命群众搞的吗？主要责任在军区，他们有一个错误路线。2月份军区就不来谈判。我建议你们和‘二七公社’搞联合。”

有人说：“他们有些组织很坏。”

戚本禹：“他们的缺点和错误要整风，你们也要整风，你们说他们，他们也是一方群众嘛！你们对军区错误不要支持，军区介入地方后，大方向是错误的。在3月份还坚持。你们也看看‘二七公社’的材料，听听他们的意见，就是毒草也要看看，你们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统一起来。你们希望这样局面下去吗？河南朝哪里去？”

有人答：“跟毛主席走！”

戚本禹：“刘建勋是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方面的，他到处检查错误，就很好嘛！他在关键时刻是站在毛主席一边的，纪登奎也要支持的。”

朱道晏汇报了纪登奎的情况。戚本禹说：“这个我们回去考虑。你们盲目保军区……”

众人答：“我们没有保军区，我们准备下次就汇报军区支左工作。”

戚本禹表示怀疑，说：“不保他？我有很多记录，保的没法再保了，还说不保？有一篇文章是空司红尖兵写的，人家敢革敢保。”

众人说："我们要批判当权派。"

戚本禹："批省委的谁？"

答："刘、文、赵、纪。"

戚本禹问："刘建勋是主要的吗？"

朱道晏汇报文敏生情况和"二七公社"保文敏生的情况。戚本禹说："我告诉你们个实际情况，困难时文敏生是掌权的，对刘建勋问题中央早表过态了，你们还揪。中央十中全会以后，刘建勋就是个好同志，当时中央和河南最大的分歧就是刘建勋问题。"

"对省委要一分为二，不能一概都打倒，杨蔚屏怎么样呢？为啥河南当权派一个没有打倒呢？"

《河南日报》的代表说："都是'二七公社'保来保去，组织与组织干仗。"

戚本禹不同意，说："你的观点我不赞成，一切都是'二七公社'，这样说法是不对的。"

众人说："我们说是他们的头头。"

戚本禹："你们的服务员和'二七公社'的大部分服务员都是人民内部矛盾。"

众："他们所做的一切超过了人民内部矛盾了。"

戚本禹坚持说："我支持'二七公社'的大方向，陈伯达也支持'二七公社'的大方向。我支持错了，陈伯达同志也支持错了？你们过去造反我支持，今天保军区错误路线我不支持。"

众人又说："'二七公社'一直把矛头指向军区，挑起武斗。"

戚本禹："武斗主要负责人是何运洪。喊打倒何运洪就打嘛！

‘二七公社’挑起武斗，打人都是‘二七公社’？‘二七公社’是被抓的，他敢打人吗？”

众人坚持：“确实都是他们挑起的。”

戚本禹：“我有《红旗》杂志、《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的记者，都在河南，天天都给我们来电话，我们知道情况。”

这时，粮院“八·八团”一女代表哭诉她在武斗中被“二七公社”打的经过，戚本禹对她说：“你的这样哭诉，在‘二七公社’也听了很多。支持刘建勋，反对军区，我说是对的。”

李惠芳说：“‘二七公社’在社会上笼络的都是牛鬼蛇神。”

戚本禹反驳道：“你说这话我不赞成，他们组织领导有错误是不好的，但不是主流。你们也考虑一下我的不全面的意见。你们的立场要根本改变，不改变就要复辟，抓人只能抓坏分子，反革命分子，不能抓群众。”

粮院一同学说：“可能抓错一点。”

戚本禹：“一点？！百分之九十八都不对，你们和‘十大总部’搞统一战线吗？”

三厂一代表说：“我们根本不和他们搞统一战线，他们在下面镇压我们，他们和‘公安公社’是一个总部。”

## 第 698 回：继续见，河南省“二七公社”　不客气，再批评“十大总部”

戚本禹与河南“河造总”座谈完毕，稍事休息后，又于当晚21时30分至22时30分，继续在西苑旅社二号楼二楼会议室与河南“二七公社”代表座谈。他首先问：

“党言川来了吗？”

党言川答：“来了！”

戚本禹问：“‘河造总’人数比你们多吗？”

答：“多！”

戚本禹：“‘十大总部’和‘河造总’一样不一样？”

“二七”一个代表说：“一样！”

戚本禹说：“我不同意你的观点，‘十大总部’和‘河造总’是有区别的。我今天来是来得罪你们的，不准备给你们讲什么好听的。准备让你们把我赶走。”

大家笑了。

戚本禹问：“我在清华的讲话你们抄出来了吗？”

答：“抄了，抄了几句……”

戚本禹：“你们研究一下，怎么样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搞大联合，你们要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和‘河造总’搞大联合，否则，河南的问题不好解决，我今天讲的不做纪录，不要外传，对‘河造总’这个组织，我们了解一下，大部分还是杀出来的，他们的错误是打刘建勋、保军区的错误路线，你们怎么看？”

“二七”代表说：“他们还镇压造反派，炮打谢富治……”

戚本禹：“大部分还是好的，‘河造总’整个不能说成是保守组织，‘十大总部’可以说是保守派，你们那个看法我是不同意的，公、检、法我从来就是反对的。”

“二七”代表:“他们同样是站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上,……”

戚本禹：“我今天说出来是个人意见，但也不是个人意见。怎么办？距离这么大？没有调和的余地吗？”

“二七”代表:“我说一个情况,十三所‘造总’,粮院‘八•八团’，豫农‘造司’等……”

戚本禹说：“我不要具体的，我说大部分是造反杀出来的。有60％，总超过50％，你们要承认这一点，才好搞大联合。”

“二七”代表还要解释……戚本禹打断他们的话说：“你们要承认，你们是有错误的，汇报了几次，没有一点姿态，我是不赞成的，我们都是不太赞成的，你们有没有错误啊？”

“二七”陈新民讲：“有！对待军区，报纸问题……”

戚本禹：“你这个人好心帮倒忙，说话太尖锐了，我几次都不让你讲么！你们至少有三个缺点，第一，你们那个组织有不纯成份，也有不好的，个别组织有坏人，这不能全怪你们，抓的人放出来，全进了‘二七’，有坏人是不好的。你们要研究。第二，有小团体主义，不大善于团结不同意见的群众，甚至统一战线也不讲。我们无产阶级反对帝国主义，还搞统一战线，你们老子天下第一，唯我革命，什么都正确，说你们，你们一定不承认，或者口头上承认，心里不承认，还是私字作怪，所谓小团体主义那就多了，什么风头主义呀，山头呀……。第三，方法不对，所谓

方法不对，无非是打、砸、抢，你们说有没有？”

“二七”答：“有。”

戚本禹：“对，你们要说没有，我是不相信的，概括起来三个缺点，你们承认也罢，不承认也罢，这是我的认识。……如果不注意，会向反面方向发展，会向对立面转化，你们不知从那里听到消息，说中央支持你们，你们有些组织就非常骄傲。将来要站不住脚的。我看现在就有点站不住脚，我今天来是不讲你们一句好话的，这是我的领导交待我的，要是讲了是我自己的，都不算的，要你们和‘河造总’联合，看起来，你们抵触情绪很大。何运洪有错误，你们反他我们支持你们，保刘建勋我们也支持你们，但是你们不注意，就要走向反面，要犯错误，最后被人家打倒，这是个预言吧！可能实现，也可能不实现。第一：你们的组织有些不纯，又不注意情况，大发展，当然是要浩浩荡荡的了，但你们不注意让坏人钻进来了，还有小团体主义，老子天下第一，再搞点打砸抢，你们会不垮台！？不垮台才怪呢！依我看，你们面临着垮台危险，你们有没有办法不垮台呀！”

“二七”答：“有！”

戚本禹继续说：“你们胜利了，中央会很高兴的。”“今天‘造总’一个人，领我到这里来，你们也不欢迎，来了客人嘛！‘河造总’也有缺点，我去他们那里，他们正在学习《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今天也没有通知嘛！你们在干什么？”

“二七”：“我们刚刚开了一个会。”“我们去欢迎你了。”

戚本禹：“我到他们那里去，人家在学《毛选》，到你们这

里来，在乘凉。”

《红旗》杂志记者：“‘二七’也不错。”

戚本禹：“你也站在‘二七’立场上了，成了‘二七公社’的通讯员了。你们还有别的缺点没有？方向恐怕还有点问题，你们对文敏生怎样？我又揭你们短了。”

“二七”代表说：“我们元月份就起来提出打倒文敏生！”

戚本禹：“你们对文敏生就那么正确？！恐怕是认识不够吧！你们认识的那么清楚吗？那么说你们就没有错误了。”

“二七”代表说：“认识不够，12月份以前我们搞刘建勋，没有注意文敏生，他要两面派，没有彻底搞，元月份我们提出要打倒！”

纪登奎：“这个责任在我们，我们没有把盖子揭开，表现出来的，我们还认识不够！”

戚本禹：“你这个说法也不对，完全是‘二七’立场，怪不得‘二七’保你哩！你所说的那个所谓表现出来的认识不够，这可说不通，就是认识不够，相当时期的认识不够！”

耿其昌笑着说：“我到北京才认识到。”

戚本禹：“对！这才是个老实人！”

纪登奎：“我有个心理，想他刚当了3个月的第一书记，就拆他的台。”

戚本禹：“不！以前就是第一书记，刘建勋算什么，他听刘建勋的吗？他的后台硬，陶铸的人嘛！你们为什么不造反呢？你也认识不清吗？下不了决心，就没有揭开。”

纪登奎：“就是认识不清。”

戚本禹："你这才是老实话，'河造总'对这个问题认识怎样？比你们早，比你们晚？"

"二七"："他们喊打倒文敏生是假的，打倒刘、纪是真的。"

戚本禹："打倒刘建勋不对，打倒文敏生对了。"

"二七"："假的！"

戚本禹："我不管真的假的，那怕是乱搞也搞对了，你们不要认为你们对了，他们不对，你们不对的，他们也不对。'河造总'他们是把毛主席司令部的人刘邓司令部的人合到一起打倒了。"

"二七"代表："他们的口号喊对了，实际不是真心打，没打倒。"

戚本禹："口号上只对三分之一，刘、纪是打不倒的，文是要打倒的，口号只对三分之一，你们要承认他们对的一面，他们自己检查他们打倒没有打倒，你们怎么样他们心里有数，你们学毛著开始整风好不好？"

"二七"回答："好！好！"同时诉苦说："我们不能集中，一集中他们就围攻。"

戚本禹："问题不在于集中不集中，你们现在不就集中了吗？你们发表一个整风公告，不好好整风一定要失败的，造反到底就是胜利，这个'底'在那里？'底'就在自己，"戚本禹用手指指自己说："不革自己的命，失败无疑，上海不是有个"反到底"吗？反自己才能反到底，不反自己必定失败，我们去了郑州好多记者，他们回来都非常同情你们，他们生怕你们搞不好，但是，也不得不向我们汇报，有些事情也的确做得不好，小团体主义，

组织不纯，打砸抢，对参加保守组织的群众也不对，你们说是不是？“

“二七”代表说：“我们已经给家里写了意见，整顿组织、整顿思想、整顿纪律、整顿作风，学习五篇文件……”

戚本禹又谈到联合问题，问：“你们能不能用自己的行动促进联合呢？”

“二七”回答：“能！”

戚本禹：“河南问题恐怕要两派群众之间怎样解决的问题，何运洪好办，关键在群众，对军队你们有些组织，一部分组织，就是没有头脑，一见了军队就反，这是错误的，河南军队很多，你们都反，都搞成对立面了，军队里的战士也是群众嘛！军队的大多数是执行毛主席路线的，有一部分是受何影响的，这个你们要负责，战士对你们看不惯，关键在群众嘛！表态以后要敲锣打鼓的欢迎他们，青海‘八一八’风格很高，他们做出了榜样，他们做的很好，主动和军队联欢，战士们都很感动，青海‘八一八’的特点是以工人为主，你们‘二七公社’以谁为主？有多少工人？”

“二七”回答道:“现在站起来能干的至少有一两万人，……”

戚本禹：“真正有希望的是工人同志们起来，学生有小资产阶级风味，工人是不同的，在这里，我不隐晦，我是学生出身，我到工人中生活了一段，很有体会，学到了许多东西，在青海，在赵永夫开枪的时候，工人挺着胸膛抢上前去掩护学生，表现了英雄气概，高尚风格，我们要向工人学习，学生不要指挥工人，……”

“二七”代表又和戚本禹争论起“河造总”的问题，戚本禹明确的说：“‘十大总部’和‘河造总’是有原则区别的。”

“二七”代表说：“他们一起镇压了我们。”

戚本禹：“铁路看一段是直的，但从郑州到北京整个看是曲曲弯弯的，你们这里有没有铁路上的？”

“二七”答：“有，他就是，还是个司机！”

戚本禹笑着问：“对不对？”

那位铁路司机答：“对！”

戚本禹：“你们说‘河造总’和‘十大总部’一致不一致？”

“二七”答：“完全一致。”

戚本禹：“完全一致？世界上没有那么完全一致的东西。”

北京红代会石油“大庆公社”的说：“基本上一致！”

戚本禹：“基本上一致吗？那么不一致的有没有？”

“二七”答：“有！”

戚本禹：“你们现在应该坐下来仔细研究研究‘河造总’和‘十大总部’不一致的地方，从而制造一种使毛主席革命路线胜利的条件。你们怎么来研究这个东西，我今天来讲个人东西的，你们跟那么多工人对立，你们能站得住脚吗？”

“二七”代表坚持说：“‘河造总’和‘十大总部’是一回事……”

戚本禹：“那些东西我都知道，你们交出来那么多材料我都看过，这不是我个人意见，一般来讲，我是不愿表态的。”

“二七”代表说：“‘河造总’中大部分是老保：比如说，粮院‘八八’和‘联委’怎么合呢……”

戚本禹："具体问题具体处理，我在这里就不说了，你们应该研究研究，怎么能使'二七公社'站得住，这里干部来了几位呀？"

"二七"指着在场的几位干部说："纪登奎，那是王庭栋，耿其昌……"

戚本禹对纪登奎等干部说："你们这5位同志不要作群众的尾巴，你们的造反精神比小将差远了，要向小将们学习，但理解党的政策还强些，要帮助小将，"他转向"二七"代表问他们："你们赞成不赞成？"

"二七"代表答："赞成。"

戚本禹继续说："今天就到这里，下面你们回去好好研究研究，我11点还有个会，下面也要见见'十大总部'，让他们到这里来，我不到他们那里去。'十大总部'我不见，只见'九大总部'。"他对秘书说："公检法抓人的我不见，开封1军的态度要比何运洪好，对1军的态度要更好些，特别要注意区别对待。"

开封"八二四"："他们现在还不老实，还欺骗中央！"

戚本禹："你们要看到他们是有进步的，你们'八二四'的问题，错误厉害些，回来我再说。"

"二七"代表说："我们只有一个担心的问题，怕何运洪耍两面派，表面上改正了错误，我们欢迎了他，他又掌了权，暗地里害我们。"

戚本禹："我不叫欢迎何运洪，叫你欢迎军区。"

"二七"代表问："军区里有没有何运洪派？"

戚本禹："这叫我怎么回答呢？我不回答你这个问题。"

他对秘书说：“‘公安总部’的不要叫他，公、检、法抓人的我不见。‘二七’的你们走吧！‘十大总部’的你们欢迎吗？来了你们还要吵！”

晚上 22 时 30 分，“二七公社”离开后，“十大总部”的代表涌入西苑旅社，要求向戚本禹汇报问题。

座谈中，“财贸总部”代表诉苦说：“首长！你不知道我们在河南的情况，根本抬不起头来！”

戚本禹：“你们不是抬不起头来，是压倒一切！”“希望你们认真检查错误，起来造反。”

“十大总部”一代表说：“我们的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根本没有错误。”

戚本禹说：“我给‘二七公社’提的缺点，他们还听进去了，你们根本听不进去。”

“工交公社”石油公司的人说：“我们是起来造反最早的一个单位，给李先念写过报告。李先念亲自批了我们的报告！”

戚本禹说：“李先念批准你们的报告，我不知道。你们先起来造反，可能。但是后来还可以变坏！”

工交代表发脾气了，质问戚本禹：“你有什么根据说我们是保守组织？”

戚本禹一拍沙发站起来说：“不讲了！我今天来，就是宣布联络员领导你们学习，认真检查错误。下一次听你们汇报。”

“十大总部”一名女代表：“我们欢迎，我们就是要向中央汇报的。”

“十大总部”：“我们要汇报。”

戚本禹说："我要回去了，有什么事向我们联络员汇报，群众大部分是好的，总部的头头，比如'公安公社'到底是什么人，我怀疑！"

市委代表站起来说："我们是最早起来造市委反的。"

戚本禹："我看不见得。"

戚本禹起来离开了会场。

# 文革史话

## 之第三部 全面内战 第八卷

刘朝驹 著

# 文革史话

之

第三部

# 全面内战

第八卷

# 目 录

第 699 回：六二九，江西大规模抢枪　第一次，接见江西省代表.....1
第 700 回：第四次，接见广西省代表　贺希明，霍泛历史有问题.....12
第 701 回：不转弯，桂林“老多”还打韦　遍地尸，赣州武斗枪声密.....27
第 702 回：第二次，接见江西省代表　拟派兵，赴赣南制止武斗.....37
第 703 回：长春乱，吉林“六二九”武斗　哈尔滨，革委会内出分歧.....46
第 704 回：上柴厂，“联司”“东方红”争斗“支联站”，上海市再分两派..58
第 705 回：陈卜昌，“小热昏”侃侃而谈 六二九，“联司”赶走“东方红”69
第 706 回：抵昆明，谢富治立即工作　七月一，再接见兰州军区.....78
第 707 回：送像章，引发缅甸大反华　“五一六”，第四次见豫代表.....90
第 708 回：七月三，无锡“六派”大撤离　定协议，广西七天无战事.....105
第 709 回：做批示，“揪刘火线”先撤离　第五次，接见河南代表团.....113
第 710 回：签协议，河南三派作保证　宋任穷，说收回《三点意见》.....122
第 711 回：七月五，长春市终于开打　安徽乱，武斗风蔓延全省.....131
第 712 回：涪陵打，谢富治、王力赴蓉　陈伯达，告学生不要武斗.....141
第 713 回：七月七，“高司”支援肉联厂　沙头角，形势紧积极备战.....151
第 714 回：七月八，枪声酣中英交火　抓薛平，港九两地同宵禁.....162
第 715 回：交检查，再引发“揪刘”行动　陈伯达，凌晨奔北京大学.....171
第 716 回：刚离去，“飘”、“0”查封保卫组　戚本禹，见河南三派代表..184
第 717 回：周恩来，见湖南驻军领导　不休息，再接待赣控告团.....195
第 718 回：周恩来，见河南驻军领导　谢富治，与王力又奔山城.....206
第 719 回：到京城，召开晋“七月会议”　第一次，接见山西代表团.....218
第 720 回：说湖南，张春桥来到南京　第一次，接见湖南省代表.....234
第 721 回：“五一六”，又发动“第二战役”　涪陵分，拉萨争夺大昭寺....244
第 722 回：下通知，禁止农民搞武斗　“游泳去”，毛泽东准备南下.....255
第 723 回：周恩来，成立军委看守组　第二次，接见山西省代表.....266
第 724 回：专列动，听河北情况汇报　打前站，周恩来先飞武汉.....278
第 725 回：七一四，专列停靠武昌站　众欢呼，毛主席呀派人来.....290

第 726 回：山西会，明确批判刘、刘、陈　戚本禹，接见河南各代表.....299
第 727 回：七一五，江城又发生武斗　查水情，与武汉军区座谈.....308
第 728 回：七一五，河南、安徽战犹酣　第三次，接见山西省代表.....320
第 729 回：七一六，天津“大联筹”成立　谢富治，又来到“百万雄师”....333
第 730 回：武汉市，造反派封存长矛　毛泽东，继续听云、川汇报.....345
第 731 回：不服气，再道与恩来争执　上海打，淮南再发生惨案.....356
第 732 回：中南海，组织批斗刘、邓、陶　第六次，接见河南省代表.....366
第 733 回：鞍钢打，周恩来批评武汉　毛泽东，接见陈、钟二领导.....378
第 734 回：做工作，毛泽东保陈再道　要检讨，“尽快放掉朱鸿霞”.....387
第 735 回：松口气，周恩来连夜返京　谢富治，携王力水院讲话.....396
第 736 回：先传达，武汉独立师不满　侃侃谈，王力讲完出门难.....406
第 737 回：聚军区，“百万雄师”定方案　冲东湖，二十日凌晨巨变.....417
第 738 回：认错人，陈再道当场挨打　群情起，强架王力上卡车.....426
第 739 回：回北京，连续见湖南代表　接电话，周恩来手在颤抖.....434
第 740 回：劝说难，钟汉华磕头作揖　武汉狂，“牛鬼蛇神一扫光”.....446
第 741 回：大清查，三镇谣言满天飞　救王力，二十九师齐奋力.....455
第 742 回：大会堂，林彪处紧急会议　急安排，周恩来重回江城.....466
第 743 回：乘吉普，周恩来化妆进城　反复劝，毛泽东同意离开.....475
第 744 回：飞上天，不知道去往何处　恩来急，武汉市寻找王力.....485
第 745 回：巧安排，王力安全到机场　换军装，周恩来撤回山坡.....496
第 746 回：方知晓，昔人已乘黄鹤去　心惆怅，白云千载空悠悠.....506
第 747 回：数万人，北京机场迎王力　“救火去”，“陈毅是个好同志”....518
第 748 回：广播响，“武汉公鸡下蛋了”　揪刘、陈，北航批斗彭德怀.....529

## 第 699 回：六二九，江西大规模抢枪　第一次，接见江西省代表

6 月 29 日这天，在江西的南昌和赣州先后发生了有组织发枪、抢枪进行武斗的“629 事件”，赣州在武斗中死亡人数达 223 人之多，开全国之先河。

6 月 28 日，位于省城南昌市南郊的农学院“红卫兵”与紧挨南昌市的南昌县政府所在地莲塘镇的群众组织发生武斗。南昌县武装部根据上级指示向全县基干民兵发放武器，然后与上万名农民“赤卫军”一道将农学院团团包围。此前农学院“红卫兵”已抢得部分枪械，并早就在路口堆好沙包架起了机枪，双方剑拔弩张，大有一触即发之势。见农民人多势众，农学院“红卫兵”急电省城求援。

南昌市的“红卫兵”和“大联筹”立即组织人前往莲塘镇声援农学院“红卫兵”。6 月 29 日凌晨，当他们浩浩荡荡沿南莲公路向南昌县进发的时候，迎接他们的竟然是密如飞蝗的枪弹……

当时声援队伍刚出市区，在朱姑桥遇到了抵抗。

朱姑桥始建于唐代，清初八大山人朱耷之的妹妹随兄隐居在沥水两岸后，人们开始将这座桥称之为朱姑桥。

这次农民“赤卫军”兵围农学院，前敌总指挥就是县武装部的一个副部长。此人当过几年野战军的团参谋长，打仗很有一套。他估计到农学院被围的“红卫兵”必定会向省城求援，于是在通往南郊的必经之地朱姑桥以北构筑好工事，并且把最精锐的县直武装基干民兵营摆在这里。这个营多为县农机厂、粮食加工厂、

拖拉机站等单位的退伍军人，战斗力相当强。“大联筹”支援农学院的队伍刚到这里，就听到一片枪声和迎面而来的一阵弹雨，当即死亡10余人。

“大联筹”于当日凌晨立即组织了全面夺枪。省“大联筹”头头陈全生策划夺了工厂民兵的枪，夺了军分区哨兵的枪，夺了人武部的枪，夺了军区政治部的枪，夺了警卫团的枪，……遂后，组织6批武装人员赴莲塘参加武斗。南昌街头上贴出不少因武斗牺牲的遗像和简介，大都是不满20岁的中学生。

此时正在福州负责福州军区全面工作的福州军区副司令员皮定钧，立即得到江西省军区枪支被抢的报告，马上给中央文革办事组的值班室打电话，报告了这一紧急情况。电话中说：

“昨天夜里南昌一个红卫兵组织，砸坏了江西省军区的军械库，冲进去抢走了一、二百支步枪和部分子弹，守卫仓库的战士无法抵抗，眼看着把枪抢走了。还有一个可能，就是军队里一部分支持这个造反派的战士，配合抢枪的造反派，把仓库打开的。”

皮定钧说：“我们正在同抢枪的一派头头谈判，说服他们把枪交回来。”

中央文革办事组当夜值班的矫玉山作了电话记录。

与此同时，总理值班室也收到了内容相同的报告。周恩来决定马上在京西宾馆开会研究江西红卫兵抢枪问题，同时通知中央文革派人参加。中央文革办事组会务组周占凯通知中办和新华社作录音和速记记录。

6 月 29 日晨，新华社南昌记者站及时准确地报导了江西莲塘镇开枪镇压造反派的严重事件。

当天，中央文革编辑《要事汇报》的何天齐又收到一份江西记者站的报告，是“大联筹”发来的，说：“江西省军区支持保守派，打击压制造反派。江西省军区发给保守派上百支枪和一些弹药，用来对付造反派，造反派被迫才去军区军械库抢了枪和子弹”等等。

《要事汇报》将皮定均和“大联筹”这两个来自不同渠道的报告精炼成一、二百字同时刊登出来，送毛泽东、林彪、周恩来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

上午 9 时，周恩来推掉所有工作，亲自主持在京西宾馆召开的关于江西抢枪的汇报会。参加会议的有代总参谋长杨成武及总参的工作人员、福州军区司令员韩先楚、中央文革康生、张春桥、江西省军区的负责人，还有周恩来的联络员和秘书赵茂峰等人，以及几个新华记者、中央文革的记者，总共约 20 人左右。

江西省军区和驻江西记者先汇报了抢枪的过程，周恩来、张春桥、康生不时提问和插话。听完汇报，周恩来明确表示：

“人民解放军的枪支是绝不能抢的，公然抢枪是无政府主义的表现，是很错误的。”

他严肃地批评江西省军区没有处理好与不同派别红卫兵的关系，支持一派，压制一派，这也是导致抢枪事件发生的原因。造反派抢枪固然是错误的，但军区对重要军事设施疏于防范，红卫兵轻易地冲进军区军械库，责任也在军区。这些造反派怎么能冲进军区军械库呢？他们怎么会知道枪支放在什么地方呢？

会上有人说，军区内部也分成两派，是支持抢枪的军队造反组织提供了信息和方便。

周恩来肯定地说："不管红卫兵有千条万条理由，抢枪是绝不能允许的。必须责成抢枪的造反派马上把抢去的枪支如数交还军区，并叫造反派认识抢枪是严重的政治事件，是错误的。"

周恩来指示："用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的名义给江西红卫兵发一封电报，限令他们在接到电报后，立即如数地把抢去的枪支交还军区。此外，军区也要承担责任，做好抢枪造反派的思想工作，并同他们的头头谈判，红卫兵合理的要求要给以满足，有错误的军队干部该检查也要作检查。"

对周恩来的意见，与会人员一致同意，没有人提出异议。周恩来立即责成与会的联络员和部分记者当场起草一份电报稿。起草好以后，在会上立即讨论，然后迅速发到抢枪红卫兵手里，并向南昌社会和各派红卫兵公开电报内容。

毛泽东看了这期关于江西抢枪的《要事汇报》后，于当天下午在《要事汇报》上批示：江西省军区发枪支给保守派，造反派没有枪，为了自卫才被迫抢了军械库的枪。江西省军区压制造反派，支持保守派，给保守派发枪。我们为什么不可以给造反派发枪呢？

毛泽东在《要事汇报》的批示，在当晚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上传阅了。

这天下午，中央紧急召集江西在京的两派代表开会。江西"大联筹"代表于下午 16 时 05 分来到人民大会堂。过后约 20 多分钟，"联络总站"代表也进入会场。16 时 30 分，周恩来、康生、肖华、张春桥等人步入会场，这是中央首长第一次接见江西代表。全体代表起立鼓掌，高呼："毛主席万岁！"

周恩来等人挥动手中的《毛主席语录》，并示意代表们坐下。他问“大联筹”代表：“你们是大联合筹委会的吗？”

“大联筹”代表答：“是。”

周恩来严肃地对他们说：“你们冲了军事机关夺了枪知道不知道？”

“大联筹”代表答：“还不知道，只知道我们有很多人被打死了。”

周恩来说：“哦，现在双方都有死亡。”随后又问：“冲军事机关夺枪这个事如果有，对不对？”

“大联筹”代表纷纷起立回答：“不对！”

周恩来说：“好！这是好同志。现在把电报念给你们听，中央是信任你们和承认你们的，所以才会给你们读电报，也是出于对你们的爱护。”

周恩来念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 6 月 29 日给江西省军区转省“大联筹”的电报：

江西省军区转江西省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筹委会的革命同志们：

据报，你们 29 日冲入军事机关、夺取武器，这是违犯中央军委八条命令、十条命令，违反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 6 月 6 日通知的。不管你们有任何理由，这样做都是错误的。我们希望你们应该珍惜和保持你们的革命称号，立即停止夺枪的错误行动，退出军事机关，并将枪支、弹药退还军区，退回原驻地，听候中央派员处理。我们已命令江西军区不许采取任何报复行动。如果双方任何一方不这样做，不听中央的话，就

要犯极严重错误。我们等候筹委会同志的回答。

中共中央

国务院

中央军委

中央文革小组

一九六七年六月二十九日

他念完后说："本来是写上'否则会走向自己的反面'，这句话没有写上去。"

康生："还要说一句，这是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批准的。任何人都不准说这是造谣，再犯内蒙、四川的错误。"

"大联筹"代表带头鼓掌。

周恩来接着问："你们打算怎么办？"

"大联筹"代表："我们保证坚决贯彻执行。"

周恩来说："好！好！你们马上打电话回去。外面电话不好打，就在这里打好了。"

两派代表当即打电话回去传达中央的电报指示。

周恩来继续说："昨天莲塘农学院被围，你们派了人去，100多辆汽车，还有许多枪支护送。前两天是不是有武装游行？"

"大联筹"代表："有。"

周恩来批评说："两边对打，双方都是基本群众，都是阶级兄弟，打死打伤，军区没法说话，武装部也不行。我们打电话给向塘机场，那里有空军，要他们派干部到小兰劝他们停止开枪，但桥被切断过不去，又派人坐飞机到洪都。首先不要开枪，停止武装冲突，双方肯定会有死伤。今天凌晨发动全面夺枪，工厂拿

了一部分民兵的枪，军分区、武装部的枪也夺了，军区放哨的枪也夺了，政治部也夺了枪，最后向警卫团夺枪，冲进去了，还要放火烧，警卫团没开枪，为什么跑到军区夺枪？”

周恩来拿出一张南昌中学生办的《风雷》小报说：“社论说现在当务之急就是要掌握枪杆子，要夺权、夺枪。造了舆论，这个口号一起就夺枪，影响就大了。你们提的口号是错误的。”

“大联筹”代表：“他们打死了我们的同学，打死了还往汽车下丢，说是压死的。”

周恩来问：“在哪里？打死多少？”

大联筹代表：“在上高，打死一个叫李洪毅。”

周恩来：“不能因为一个人被打死就抢枪。”

“联络总站”代表：“他们造谣。”

周恩来制止道：“你不要说嘛！”

“联络总站”另一代表站起来要发言亦被周恩来制止。“大联筹”代表汇报了“六二九事件”的经过。

周恩来：“如果你说的都是事实，那也不能得出这个结论：普遍夺权、夺枪。四川、内蒙的问题中央都解决了，青海反革命分子赵永夫问题也解决了，江西问题就不能解决吗？中央请你们来，就是解决江西问题嘛！你们抢了军区的枪，你们能掌握吗？”

“大联筹”中学生代表悲愤、虔诚的说道：“我们是为了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被迫……”

康生打断他的话，严肃地说：“这恰恰不是毛主席路线的，现在要面对冲军区夺枪这个现实。”

周恩来对那位“大联筹”中学生说：“小同志，革命朝气是

好的，解决问题要把你们撤出来，要照着毛主席的思想去做，不要冲动，要冷静，你们不要走向反面了，这点本来想写上去，后来不写了，我们是爱护你们的，你们上次来了吗？”

周恩来是问 1966 年 12 月那次接见江西代表的事,“大联筹”一位代表起立说:“来了。”

周恩来继续说:“我们是支持你们的嘛,你们一开始就是造反的。”

接着，周恩来念江西省委书记处书记刘瑞森、南昌市委书记郭光州、江西省副省长黄先 3 人在北京打给“大联筹”的电报，然后说：“现在我们还不能承认他们是站出来的干部，你们不要和他们发生联系。你们要独立行动，他们不能代表‘大联筹’。他们的立场、观点、认识和历史情况我们要审查清楚。他们的任何错误都不会强加在你们身上，他们的问题，不要你们负责。”

周恩来又对“联络总站”代表说：“你们也不要因此来压他们。”

张春桥说：“你们不能把谈话记录公布出去。”

周恩来：“现在要解决昨天的问题，把武斗停下来。”

“联络总站”代表：“武斗是刘瑞森一手挑起来的，我念几段电报。我们不承认他们是造反派。”

周恩来：“刘瑞森的问题可以写材料来，谁是造反派谁是保守派，不用在这里争论，时间还长嘛！”

“联络总站”代表要求汇报莲塘武斗情况，周恩来说：“太长了，不听汇报了，军委《八条命令》还记得吗？”

答：“记得。”

周恩来："《六六通令》知道吗？"

答："知道。"

周恩来："第一条不要上街游行……"

"联络总站"代表站起来说："他们歪曲中央指示，说不要上街游行是指解放军讲的。"

周恩来生气地指着刚才发言的代表说："你又挑起斗争。"

康生微笑着说："他们提解放军不上街游行，很好嘛！我们就不同意军队游行。"

周恩来接着说："通知规定，不准抓人，你们把大军区的政委、军区司令员都揪到北京来了。当然啰，来了就交给了我们，我们把他们收下来了，你们回去了，这很好嘛，这个事情在旧社会能这样做吗？"

"大联筹"代表："不能。"

周恩来接着问："在文化大革命以前能有吗？"

"大联筹"代表："没有。"

周恩来说："他们就老老实实跟你们来了。刘培善、吴瑞山同志在这点上是值得你们学习的，他们几百万军队的头,我们做工作说服他们。"

"大联筹"代表："我们把他们请到中央来解决问题的。"

康生："要有革命性、科学性、组织纪律性嘛！"

周恩来："我们叫韩先楚同志上北京来都请示毛主席、林副主席。因为你们年轻，我们不责备你们，你们要想一想，吃一堑，长一智，你们搞了好多全国第一次，夺军区的枪，也是全国第一次。"

周恩来念中央《624 通知》第四条，然后对“联络总站”代表说：“这条你们要注意，你们把铁路搞中断了。”

“联络总站”代表：“他们搞了很多什么调查团下去，坐车不给钱。”

“大联筹”代表红卫兵：“我们按照毛主席的教导下去调查研究，你们为什么这么害怕。”

周恩来:“确实外县有些农民是进了城搞了些事情,‘大联筹’气愤，派人去调查。调查是可以的，坐车要买票，不能拦车，扒车，双方要保证铁路不中断。”

“大联筹”代表要求汇报“联络总站”破坏交通的情况，并拿出照片交给周恩来。“联络总站”代表反驳说：“这照片是捏造的。”双方为此争吵起来。

周恩来对全体代表说：“你们不要吵了，你们要向前看，革命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双方不是敌人，观点尽管有差别，但通过辩论，大方向可以一致起来，你们打内战，我们不感兴趣。”

“大联筹”代表汇报军区吴瑞山、林忠照等人两面三刀、欺上瞒下的情况，“联络总站”代表反驳说：“他们是造谣。”

周恩来、康生制止了他们的争吵。

周恩来说：“不要谈过去的了……现在莲塘双方开了枪，你们双方保证不再开枪，停止武斗，军区方面我们保证。现在有几件事情，你们（指大联筹代表）查一查，据反映，南昌军分区的枪也被抢了，1000 多人冲进去。军区的枪要交还，进了武器库的要退出。第二，据说今晚还要去抢枪。第三，军分区有一营人

守着，不要去冲。第四，进军区警卫团的人要退出，先把这些紧急事情制止下来，双方要不断保证检查，先把这六条保证（指《6.24 通知》）保证贯彻，再来解决根本问题，你们 100 多人都住在一起吗？”

“大联筹”代表：“没有，住得很分散。”

周恩来：“那么请联络员想办法把你们住在一起，好研究工作。以后不要再来人了。现有的还可以回去一些，现在请康老讲话。”

康生讲话后，周恩来通知大家：“刚才得到消息，我们已通知军区要阻止农民进城，你们也不要在城里戒严，军区无论如何是掌权的，不要因为军区一、两个同志犯了错误，就采取这样的态度，我们相信你们的革命精神，会按中央指示办事的，好，就这样，我们还有别的事。”

## 第 700 回：第四次，接见广西省代表　贺希明，霍泛历史有问题

此时，广西的武斗还在继续。6 月 24 日，广西“联指”调动工人及南宁市郊区农民包围南宁市自治区水电设计院“422”占据的“火种”大楼，清晨开始攻打。当晚，设计院工人蓝展在逃跑中，被“联指”人员用钢叉打死。

26 日清晨，“火种”大楼被攻下，“422”骨干 6 人被关押挨打，大楼上“火种”的广播器材、探照灯及有关文革的资料被抢走。“火种”成员龚华健被汽枪击瞎一只眼。

而在 6 月 25 日上午，“联指”还在区物资局二楼设立指挥部。下午 17 时许，“联指”从民主路、建政路、思贤路三面包围文化大院。与此同时，区邮电局“抓促指挥部”下令停止展览馆和文化大院与外界的电话联系。随即“联指”用推土机推倒部分围墙。19 时许，他们攻进了京剧、桂剧、木偶三团住地。住在该团的 20 多名学生负伤，这里的“422”和“全无敌”退守新礼堂及文联大楼。

第二天，26 日，“联指”从粮食厅方向攻入文联大楼，将“422”人全部压缩在新礼堂内。天明后武斗停止，“422”的 600 余人全部被俘，押解至区物资局院内，部分人被捆绑、蒙眼、审讯、毒打。文化大院许多门窗被砸坏，财物被盗。

当天，“联指”派打下文联大楼后，又向《广西日报》发起进攻，冲进报社大院，攻打印刷厂和办公楼。但是久攻不下，与“422”派的武斗人员形成僵持后撤离。

6 月 29 日 23 时 55 分至 30 日 3 时 30 分，周恩来、康生在下午接见完江西两派代表后，又来到人民大会堂安徽厅，第四次接见广西的两派代表。

周恩来一上来就说："双方好好商量，一个铁路上的事情，为什么这样闹？为人民服务，为国家争光，都要放在第一位，两派的观点摆在第二位。不是为了派别的利益，就不会发生停车这样的事了，你们这两派我以为可以放一下，因为已达成协议了嘛！本来想解决其他省的问题，但以后听说你们又闹得很凶。李日明来了没有？"

"422"答："回去了。"

周恩来："为什么不招呼一声？联络员知道吗？"

联络员答："不知道。"

有人说："红代会叫他回去的。"

"联指"说："李朝杰也回去了，他们是回去指挥武斗的。"

周恩来："啊，还是头头呢。周飞？"

答："回去了。"

周恩来："龙智铭？"

答："有！"

周恩来："白鉴平？"

答："有！"

周恩来："现在听听你们的看法。"

"422"区直"革联"、服务工读教师周志成站起来说："我要求发言。"

他接着哭起来，哽咽得说："南宁现在造反派活不下去了。"

“422”的其他代表也跟着哭。

周恩来：“没那么厉害吧，怎么会活不下去呢？两派都有死人，这是常有的事情。你不要这样激动，先换个人说吧。”

“422”的曾春生拍着桌子站起来说：“不！是这样！”

周恩来：“你这是怎么搞的？你为什么要拍桌子，对我拍桌子是什么意思？”

当时在场的解放军都站了起来。

康生：“你叫什么名字？你怎么拍桌子呢？”

曾春生脸色发白，急忙分辩说：“我不是对总理，我是对韦国清的……”

戚本禹向曾春生摇手，要他不要解释，示意他坐下。

康生说：“韦国清又不在，我们两个又不是韦国清，你这样不是对中央不满吗？”

曾春生狼狈地说：“这是我不对！”

周恩来对曾春生说：“行了，行了！”摆手叫他坐下，然后对“422”的周志成说：“你这样激动就先不讲吧？”

周志成说：“总理，南宁革命造反派确实活不下去了。现在我把事实向首长摆一摆。”

他先讲了 6 月 13 日发生在南宁一中的武斗，并说：“更残忍的是喊一句‘打倒韦国清！’就被挖掉眼睛。”

周恩来问：“这个被挖眼睛的同学叫什么名字？现在在什么地方？送医院没有？看到了没有？”

周志成说：“我没有看见。有个 16 岁的女孩，他们问她‘422’指挥部在那里？她不说，就被挖掉一个眼睛。11 岁的邓强中亲

眼看见，我们已经把他带来北京，要求总理能亲自听听他的控诉。”

周恩来不解的说：“‘422’不是公开的吗？为什么还要问？”接着又问：“一中‘指点江山’还有多少人？”

一中史妙甫答：“还有 210 人!”

周恩来说：“你清楚，你把一中事件讲完。”

史妙甫：“军训团压我们很厉害，我写了《论联合!》的大字报，就被军训团打成反革命传单，以后批判我们的《要武报》，把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大会变成批判群众的大会。军训团团长孔竹说打人是群众自己教育自己。为此，我们搞兵训，我们很困难，没有地方活动，我们请求要房子，军训团不给，叫我们去向‘红卫兵’要，企图挑起群众斗群众。6 月 13 日军训团宣布撤走一部分，我们就有希望找到一间房子，我们一上去，就被 200 多‘红卫兵团’的人包围。孔竹也赶来说，解放军不走了。党委书记又来说，房子问题可以商量。晚上 10 点多钟，广西大学‘革联’13 人来传经，介绍兵训经验，他们一样也没有带。他们一上楼，就被围。200 多名一中红卫兵冲上来，武斗开始了，……孔竹亲自打人，又照电筒，下半夜 4 点多钟，我们上楼休息，又遭围，我们从围墙缺口冲出，40 多人只有 20 多人冲出来，伤的人去红卫医院。第二天广西大学‘革联’200 多人和我们 60 多人重新回到一中内，挨打后又冲出来，在外面一直打到 15 日下午 4 时 30 分才接‘422’指挥部命令撤退。16 日早晨 5 点 30 分，‘422’调我到‘航运工总’。同样，‘航运工总’打的很厉害，……后来发现了劳改犯，是从粮食厅旁边冲出来的。”

龙智铭递上关于这批劳改犯的材料，周恩来接过来后递给康生看。

周恩来问："劳改犯是从粮食厅门冲进来的？"

石妙甫说："后来劳改犯跑到永宁分局躲起来，又发生了永宁分局事件。还有孔竹……"

康生问："孔竹为什么跑到'422'指挥部去呢？"

石妙甫："因为孔竹对武斗不负责任，是他自己去'422'指挥部的。我们只有两个据点：造反楼、百货大楼。"

周恩来："他们用武器，你们用武器没有？"

石妙甫："我们也用了。他们用军用卡车冲航运局的铁门，航运'工总'1000 多人都退到船上。他们派炮艇来，我们要谈判，他们不同意……"

周恩来："你叫他们反革命，他们怎么会同你们谈判？你们继续谈，还有一个什么惨案？"

周志成："我先谈谈劳改犯的材料。"

周恩来："还是先谈惨案吧！"

周志成："好。"他又讲了文艺干校惨案的情况。周志成说："我带来了一个 16 岁的小孩来，他可作证。……这次大屠杀到底是谁挑起的呢？6 月 13 日以前做了很多舆论工作，到处演讲：韦国清的光荣历史，伍晋南的丑恶历史，'422'是牛鬼蛇神窝。又作了组织准备，成立'五二五指挥部'，然后调兵到区党委、区人委，搞得我们造反派的人回不了单位，不发工资。"

周恩来："是哪些单位？你再说。是强占吗？"

答："是进驻。"

周志成："党校等地方还住了农民。"

周恩来："农民是常住吗？"

周志成："不是！住几天干完了又换一批。"

周恩来："他们住的地方有没有军队？"

周志成："不清楚。他们搞好战备后，为了抬韦国清，开始了对造反派的大屠杀。这是韦国清策划的。"

周恩来："韦国清在北京呀！"

周志成："军区还有韦国清的死党，如李士才……"

周恩来："李士才在北京，前两天才走吧？"

戚本禹："走了一个星期了。"

周志成："在家还有司令员欧致富。欧致富 6 月 7 日讲了话，是大屠杀动员令。"他念欧致富的讲话，然后说："6 月 9 日军区开会，内容我们不讲了。"他将材料递上后继续说："6 月 14 日至 19 日军区又开会，"念会议内容，递材料，"又连续发了 1 至 5 号通令，宣布先镇反。我们有一、二号通令……"

周恩来："给我看看。"

周志成递材料，念二号通令。

周恩来问"联指"："你们宣布镇反了吗？"

"联指"答："没有。"

周志成念二号通令其中几句，说："同时南宁有线广播站 26 日广播了先镇反后搞文化大革命。"

周恩来说："刚才打电话查了，确确实实没有这个事。"

周恩来问"联指"："你们进入广播站广播了没有？"

"联指"答："广播站是军管单位，我们没有进去。"

周志成："是军管的。不仅这样，而且用军车来运石头。攻'航运工总'有两个军官亲自指挥。"

周恩来记下，并问："在队伍的里面？"

周志成："在队伍后面，喊口号：中央通知，'工总'是反革命组织。而且在一中也广播了。"

周恩来问："你们谁听见中央发过这个通知？"

答："没有！"

周志成："这是伪造中央文件。《六•二四通知》发表后，'五•二五'广播站广播《六·二四通知》不适用于'422'指挥部。"

周恩来："我问你们，你们双方的矛盾是不是人民内部矛盾？"

众答："是。"

周恩来说："答得很好！"

周志成："'五·二五'指挥部是有人幕后指挥的。"

周恩来问："你说有人指挥，是什么人？"

周志成答："李殷丹、刘毅生、江平秋、阎光彩、史清盛、管世新，组成高级参谋部。"

周恩来问："你们认为他们都是不好的？"

周志成说："我们也没有这样认为。"

周恩问来："你们'422'指挥部伍晋南参与了吗？"

周志成说："没有。"

周恩来："不是给《广西日报》的电报吗？"

答："这是他们自己发的，代表都没有全部知道。"

周恩来问"422"："你们对伍晋南、贺希明、霍泛认为怎样

啦？”

曾春生答：“伍晋南是革命领导干部，贺希明、霍泛我们还要调查。”

周恩来说：“他们 3 人在西大很久嘛。”

“422”答：“我们没有受他们任何影响。”

周恩来：“前几天我们证实了他们打电报回去，这就起了挑拨作用嘛。以后你们不跟他们联系行不行？”

康生：“希望你们对贺希明、霍泛研究一下，为什么不把他们的历史调查调查？这是很容易的嘛。”

“422”说：“我们对霍泛已经组成调查组调查了。我们在广州发现贺希明一些线索。”

康生：“贺希明、霍泛的材料你们可以调查调查，中央今天正式告诉你们，贺是混入党内的高级特务，是李宗仁的红人，你们知道吗？贺希明起初参加学生运动，在上海劳大被捕后，投靠桂系，十多年同党没有联系。他是国民党军一级的政治部主任，是反共老手。后来我们把他们的兵力都消灭光了，他回去怕见李宗仁难以交差，就又投靠了我们。他混进来后，是得到刘少奇的重用，马上当上了解放区的一个县的县长。有人说是张云逸同志搞的，根本不是那回事。”

周恩来：“他们（指联指）揭发了很多材料，你们（指 422）应该看看。”

康生：“他是李宗仁的亲信，他是国民党的高级军官，你们（指 422）要清醒。你们要和他们严格分开，中央是爱护你们的，你们也不要背这个包袱。我们也给他们蒙过了，让他们当上了省

委书记，何况你们小将。不要因为他们不好，你们也有什么不好，你们（把联指）也不能因此攻击他们。”

戚本禹插话：“不能攻击一点，不及其余。”

康生：“革命群众要同坏分子分开。你们要把这个包袱放下。我今天可以告诉你们，他是桂系高级军官，是反共老手，他是混进我们党的。”

“422”分辨说：“我们是区别对待的。”

康生：“有这么一个人，混在我们队伍里，怎么行呢！在文化大革命里揪出这个人，是很大的胜利。霍泛到底是不是共产党员，没有一个人证明他是。如果你们要不相信的话，我可以把他们的档案给你们看看，你们青年人，要好好的想一想，中央对你们还是爱护的，你们也不要背包袱。造反派不能同敌人的军官、叛徒混在一起。”

周恩来：“你们要和贺希明、霍泛划清界线，他们混进西大，把事情搞混了。你们‘422’指挥部，我们一向认为是革命造反派，特别是‘桂林老多’，是闻名的造反派，几次讲话都提过嘛！现在正式告诉你们。你们要和他们（指贺、霍）划清界线。你们应当相信党中央，如果你们要和他们结合，那就危险啦。你们（指‘联指’）也不要因为他们接近了坏人就攻击他们。你们（指‘422’）没有政治经验。那边揭发，贺希明都不敢抬头。他是陶铸所赏识的，把他带到广东。你们要划清界线，这是对抗性的。你们过去保错了，要划清界线。你们‘422’，还是造反派组织嘛。你们（指‘联指’）不要责备他们。现在你们喊他们是牛鬼蛇神，他们也喊你们老保，你们分成支韦派，保伍派，没有意思嘛，你

们变成了什么革命组织，以后你们不要叫支韦，保伍了，支韦派、支伍派，取消好不好！”

众：“好！”

戚本禹：“保卫毛主席革命路线嘛，那有那么多派别？”

周恩来：“以后这种说法通通取消，你们‘422’，你们叫做‘联指’。”

康生：“我具体的告诉你们，贺希明是在‘劳动大学’参加戏剧社被捕，是共青团员，叛变了。10 年未和党发生关系，跑回广西，当了高级军官。后来我们把他们的队伍打散了，他不敢回广西才投靠过去。”

戚本禹：“现在他又投靠你们小将。”

康生：“霍泛是否是党员，现在还没有人能作证。你们可以去问贺，他到底干了什么？你们是受蒙蔽的。”

周恩来：“没有什么保韦派、保伍派之分，以后不要这样叫了。他们两个人嘛！谁站出来得好，就支持谁！”

戚本禹：“我们大家都保卫毛主席，只有一派。”

康生：“你们要学学政治经验。你们观察，那天晚上贺一直抱头不敢吭声。”

“422”石怀宇：“看见了。”

康生：“为什么贺、霍两人总是推伍晋南在前头，他们明知自己站不出来，所以推伍晋南打头阵，伍晋南是老革命，你们要动员伍晋南和贺、霍划清界线，继续闹革命。”

白鉴平说：“我们错了，上当了，回去要和他们划清界线。”

戚本禹：“这个表态很好！”

“联指”趁机说：“他们转变了，我们欢迎他们过我们这边来！”

周恩来批评“联指”这句话，说：“你别讲什么转变啦，他们也欢迎你们过来！我不能接受你这句话！”

“联指：“我们建议双方合作调查贺、霍。”

戚本禹：“这个态度也好。”

“422”曾春生：“我们同意共同调查。”

周恩来：“这就好了，当权派不来，问题就解决了。我们试了几次，江西也成功了，我们准备庆祝他们，他们那里还抢了枪，你们只是打死人。”

康生：“个别地方有个苗头，江西发生夺枪，两方都要注意，不要夺枪，一动这个就危险啦，医学院物理室的东西，有毒害的，也不要动用，你们现在有点苗头了，一定要赶快制止。”

周恩来：“你们晓得吗？南宁有许多战备物资，如炸药。我们说做越南的坚强后盾，是越南的大后方，但你们天天搞武斗，越南同志看见了不难过吗？

我不否认军区有错误。我今天全部听你们的了，很耐心的听下去了，你快点结束，让医生讲讲。”

周志成：“他们抓了我们的代表李朝杰！”

周恩来对“联指”说：“你们打电话回去，我另告诉军区，抓人一定要放，告诉军区让他们回来。”

“联指”表示：“我们可以查一查，照总理指示办。”

“422”多人说：“他们还抓了我们很多人。”“有 1000 多人。”

周恩来：“这个数字可调查。”

联指："'422'也抓有我们很多人。"

周恩来："韦国清是有错误的。但他不可能反毛主席。上十万大山，跑到越南，越南也不会留反毛主席的人。伍晋南也不可能嘛！这是有人挑动，我都不信。"

康生："你们在北京写的传单，帝国主义、修正主义知道了，他们高兴，他们如获至宝，他们抹杀我们的社会主义，他们最注意广西情况。你们的传单可以告诉中央，不要满街贴，要有敌情观念。"

周恩来："纽约、伦敦、东京、缅甸都在反华。现在世界革命在发展，反华逆流出现是不足为奇的。广东组织一个抗暴委员会都不成，我到广州跟他们谈了四天，他们认为大敌当前，应该团结起来，即答应开大会，他们还鼓掌通过呢？可是后来还是分开来开。你们是越南的后方，是援越抗美的前线，闹到这个地步，那怎么成呢？"

康生："缅甸 1000 多暴徒搞我们大使馆，把我们援助他们的专家都打死了。我这样想，在南宁能不能组织一个联合声讨缅甸的大会？"

史妙甫："现在居民都逃光了，哪还能开会？！"

周恩来："不可能嘛！"

戚不离："几条主要的街道是走得差不多了。"

康生："当然，现在一起开不行了。一开会一定会武斗。"

杨福庭："由于南宁的大屠杀，桂林已有 3000 人来避难，主要是南宁的，其他各县也有一些，他们有的无吃无穿，流落街头。我们革命造反派已尽力安排。但由于南宁形势继续恶化，逃来桂

林的人猛增，请问首长怎么办？”

周恩来：“来桂林就好办嘛！到桂林就好了。”

康生：“你们一讲就是别人不好，为什么不多做自我批评呢？”

周恩来：“我很欣赏李日明的态度。停车问题他一口就承认不对，结果车开来了。你谈快点。”

周志成：“我就谈到这里，让医生谈谈。”

周恩来：“好。”

医生刘显奇：“他们不让我进去救伤员。”

此时周恩来站起来，靠在椅子旁，继续作记录。

戚本禹：“一中问题我们已经清楚了，谁该负责任我也清楚了。刚才两位同志也已讲得很清楚了，你可以简单点，总理两天没休息，要休息了。”

刘显奇：“我再谈谈劳改犯的事。”

周恩来问：“这些劳改犯是监狱里放出来，还是劳改场的？在企业留用的，还是劳改期满释放的？”

刘显奇：“南建队的、罗文劳改场的。我被工人抢上船，……被打的工人惨得很！不能想象。”

戚本禹：“现在确有人打着保韦的旗帜来干坏事！”

刘显奇：“桂林《红卫兵报》记者周伟智被毒打，现在还关在一中粮食仓库里。”

周恩来对“联指”罗立辉说：“你打电话回去，放出来，军区负责送来北京。”

罗立辉问：“如果没有怎么办？”

周恩来有些生气："你怎么这样说呢！你问我要吗？！要我交出来吗？你要有勇气答应，人不在就查嘛！群众是知道的，如果家里连你也蒙住了，就是毁尸灭迹，我们还是查得出来的！有群众嘛。

你们把他们叫老保，你们叫他们是牛鬼蛇神，这一定有坏人操纵，你们两派要注意。军区来电说 24 日谈判你们双方对骂，谈不下。今天的情况不错，他们听下去，没有吵。"

"下面我还谈几点：第一，你们总会统一的。第二，不要互相攻击。第三，不要叫什么老保。"

他对"422"的代表说："这次你们牺牲多了些，领导有错，还有坏人挑拨，问题要解决，你们没有谈完的可以下次再谈。我再谈一次，要打电话回去把李朝杰、周伟智放出来送回北京。

你们回去先冷静两天，学习《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然后由联络员、记者，推动你们就'六·二四'通知的六点达成协议。"

"422"龙智铭："我们要求派医疗队到广西去。"

周恩来："可以。"

龙智铭："还有粮食问题！"

周恩来："这些问题我都记下来了，一定要解决的。"

接见后，周恩来宣布，成立中央文革广西联络组，王荔任组长，周丰任副组长。联络组办公室设在西苑饭店 1 号楼，"422"和"联指"代表团住 3 号楼。

"联指"代表团回到西苑饭店住地，就地批斗了贺希明、霍泛。

## 第 701 回：不转弯，桂林“老多”还打韦　遍地尸，赣州武斗枪声密

周恩来等中央首长在接见广西两派代表时关于韦国清的谈话，对在广西的支左部队，对“桂林老多”，都产生了极大震撼。从这时开始，桂林的支左部队全部转为“支持韦国清”，并且纷纷劝说“老多”放弃“打韦”立场，转为“支韦”。

在桂林支左的 6955 部队团政委张骥找到桂林“老多”赴京代表杨福庭，将他们准备发回广西部队的电报拿给他看。电报上说：“我们应该马上支韦并做好群众的工作。”

张骥对杨福庭说：“我们的电报就这样发了，大家最好达成统一意见。”

他问杨福庭：“你们要不要转？中央的态度已经很明确了。”

杨福庭说：“我们转，‘老多’转，那就出卖广西‘422’。广西‘422’还是受压的时候，‘老多’转，等于借‘老多’这个刀，去杀广西‘422’，‘老多’不能做这种事情。你们如果一定要我们这样做，就是借我们的手去杀‘422’，我们就犯罪了，就要成为历史罪人了。”

张骥对杨福庭说：“那你们就看着办嘛，你们搞你们的嘛。”

杨福庭说：“你们也搞你们的。你们那样做是支持中央，我们也不反对。”

与此同时，桂林军分区司令员景伯成、政委张耀青亲自劝说“教工井冈山”的主要头头。桂林支“左”办公室主任张体成，

也动员桂林“工总”一把手、桂林“造反大军”头头高桂英支持韦国清。驻桂林支左部队的最高首长、47 军军长黎原，则专程从湖南衡阳来到桂林，在广西师院坐镇 10 天，动员“老多”支韦。

部队的思想工作很起作用，“老多”数以万计的成员，尤其是产业工人，接受了“支韦”观点。6 月 29 日当天，在驻军支持下，由“工总”一把手、“工人红卫兵”主要负责人高桂英，以及市直机关干部公安局的杨德广、市经委李建华、贫协柴俭、郊区汤秋生等人发起“支持韦国清站出来闹革命”活动，组织“629 联委”，并在市体育场召开有 7 万人参加的成立大会，由高桂英主持，桂林“老多”头头、师院学生黄沃南，桂林驻军负责人，6955 部队副政委赵保立等在大会上讲话。“629 联委”就在体育场搭了个草棚作为办公室。

桂林“老多”的最高决策层，也发生了动摇。6 月 29 日晚上 24 时，桂林师院“造反大军”同意支韦的学生写好了大标语：“坚决支持韦国清同志出来闹革命！”准备连夜贴出去。有人说等一等，等北京来电话再贴。

桂林的“老多”头头黄沃南往北京打电话，向正在北京的杨福庭汇报，谈到桂林“老多”在“支韦”和“打韦”问题上发生的分歧和分裂，他边哭边问：“怎么办？”

杨福庭批评了黄沃南，叫他坚决顶住，坚持“打韦”。他说：“和 6955 商量了，他们支韦由他们去搞，随他去，我们也不要得罪部队，我们坚定不移打韦。‘老多’不管怎么样，也不要犯历史的错误。”

但黄沃南没有听他的，改变了立场“支韦”，原先的“老多三人团”分裂。

桂林高桂英、黄沃南的“629 联委”一成立，立即遭到桂林“造反大军”和“联指”的两面反对，“老多”的头头骂他们是叛徒。一天晚上，桂林地、市“造反大军”6 万余人，在市体育场联合召开“打倒韦国清”誓师大会。会上，市委副书记王同连、市长冯邦瑞、法院副院长阎进兴、市监委副书记许正义、监委委员邵永清、统战部科长任雁惠等 6 人发表了“打韦”声明。“造反大军”将“629 联委”在体育场搭的草棚办公室给砸了。高桂英见搞不下去，也就散了。“629 联委”成立不到一个星期就垮了。

就在周恩来、康生正在人民大会堂里接见江西两派代表，忙于处理29日南昌抢枪一事的当天晚上，江西赣州又发生了当时全国规模最大的武斗。由于赣州军分区和赣州市武装部直接给“联络总站”发了枪，在武斗中，“大联筹”派死伤惨重。事后查点，发现“大联筹”尸体竟有223具。

赣州的武斗是从 5 月下旬开始的。5 月 28 日，赣南纸厂“前锋”工人战斗队与学生红卫兵发生冲突，当场打死红卫兵刘爱福，打伤 100 多人，红卫兵抬尸大规模游行。

进入 6 月，赣州形成了这样的格局：赣州城内，是三大院校九所中学的红卫兵及同派别的工人。赣州城外，是军分区支持的各个兵工厂、机械厂的工人组织。凡是出赣州城的人员都要受到关卡上带柳条安全帽的工人仔仔细细的盘查，戴眼镜者、像学生模样者一律不准出城。

6 月 4 日，赣县南康万余农民杀进赣州城，围攻冶院，造反派伤亡惨重，各种流言蜚语在大街小巷不胫而走：军分区、武装部在暗暗发枪和子弹；支持、默许工厂武装部开军械仓库；兵工厂在生产、组装、试验各种枪支、爆破筒、炸药包……

深更半夜，时而几声枪响打破夜的寂静。汽车轰鸣，高音喇叭传来的口号声，让老百姓暗中叹息，无法入眠。

连赣州最没有文化的老百姓都看出来了：局势严重！大规模武斗即将爆发！

6 月 23 日，人民医院两派互殴，造反派失利。

6 月的最后几天，赣州格外的炎热，让人无法入眠，商店挤满了疯狂抢购的人们，各个供水站排起了担水的长龙。

曾经有传言：市委大院里面杀了人，马路上全是鲜血，从市委大院门口一直流淌到和平路、生佛坛……

市委大院门口聚集了上千名群情激奋的人群，高呼口号，要市委里面的人交出凶手和牺牲者。一排排的解放军面无表情地站在市委门口，阻拦人们进入。

有心人发现蹊跷：那么多的血迹，而且有距离排列？

原来是好事者把鳝鱼杀了一路滴过，意在挑起事端。

6 月 26 日，赣州市武装部收缴赣州铝厂、赣江纸厂造反派的枪支弹药。

从这天开始，赣州军分区支持的“专市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筹委会反复辟大军”连续召开常委，即各工厂群众组织的负责人及各片负责人会议，研究如何武装进入赣州市，占领被赣州学生控制的各个据点。

26 日这天，他们召开有 20 人参加常委会议，主要研究：

1、对做坏事的学生被抓后的有关问题。

2、对试制自卫武器的问题。

会议形成了初步意见：

1、对抓来的人一般不要打，分清头头与群众。

2、试制武器要注意安全，对爆炸物的使用一定要做到不管任何情况下不首先使用。

3、大造舆论，既要批判党内大大小小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也要揭露卫派的谬论。

4、做好文艺宣传工作问题。

5、扩大宣传阵地。

6 月 27 日，他们继续开会，商讨了四项工作：

第一个工作：搞好政治动员，做好宣传工作，造好舆论。主要是写标语和通牒，限冶院“东方红”24 小时内交出所有牛鬼蛇神。

第二个工作：组织工作。要求政治部、后勤部要做到部队打到哪就跟到哪。

明确宣传工作：（一）鼓励士气；（二）宣传党的方针政策。

后勤工作：吃饭、开水由哪里供应；担架、医生随着跟上，打起来战士不管倒下一个后面跟上，有人抬走，送人民医院或 801；救护车辆、宣传车还要由各单位负责跟着队伍走。

第三个工作：准备工作。

他们原准备将城里分成两个片，组织东、南、西、北、水东 5 个兵团。要求各个单位、各个片把自己队伍分成小队、中队、

大队、兵团，指定指挥员，训练好战斗员，准备好梭镖、安全帽、土制手榴弹、炸药包等。同时还要控制交通要道，管好牛鬼蛇神。组织好本队的侦查员、通讯联络和医护人员。

最后形成的初步意见是组织东、南、西、水东 4 个片，4 个兵团。要求各单位抽出一半的精悍人员参加行动，留下另一半护厂。

第四个工作：明确各片区任务：

要求全面进攻，重点歼灭，从外往里扫。暂时截断浮桥，控制水陆交通要道。

南门片攻下 908、供电局，部队从新开马路进。

东门片攻下印刷厂进攻一、六中后进攻四中。

南门片用两支部队控制冶金学院，一支部队在冶金学院大门能攻就进攻，另一支部队守在青年路。

预备队：储谭、茅店、一、二糖厂的队伍，提前通知。储谭、茅店（这两支队伍前进），一、二糖厂的部队住专建、纸厂，（住人民医院）、（住物资局吃饭由车站饭店解决）

供销社车队、801 车队调在停车场。

东河大桥以东由水车公社负责，赣于路由东门片负责。

西河大桥、浮桥由西门片负责。

南门浮桥由南桥负责。

每攻下一个地方预备队就推进。

会议确定了各片的指挥员。

6 月 28 日，他们又继续召开各片负责人会议，汇报各片组织准备的情况。

南门片汇报说，他们组织了六个大队，1800 人。已经在当天召开了各团、队负责人会议，统一了思想。他们建议：由他们攻 908 地质大楼，西门片攻冶金学院，同时展开。对 908 开始先轰几炮，再作政治攻势，如不投降就再轰，踏平大楼，还要准备 3、4 座长梯和几床棉被。攻下 908 后，直插供电局，拿下赣州饭店。

东门片汇报说：人还未定下来，初步定了 500 多人，分四个大队。各个单位昨天都开了会。

西门片说："昨天晚上开各团、队会议，研究了一下，由于片分散，路远，停厂都有决心，打起来就打。我们成立了炸破组（土枪、土炮、手榴弹）。那些搞后勤具体的还没有定下来。"

水东片反映：赣江纸厂卫派对精选厂威胁很大。他们组织了 1200 人。有鸟枪 200 支。

会议最后确定：水东茅店、储潭的 200 枝鸟枪，赶到人民医院。

南门指挥部设在专建。

机动部队在纸厂、人民医院。

南门片的任务：战斗一开始部队要集结到专建，首先用 100 至 200 人到红旗大道，配备火力阻击出红旗大道的队伍，大批队伍翻实验室的墙进去攻下 908，直插供电局，横扫饭店后返回新开马路夺下省建四处。

东门片：拿下印刷厂夺回重机枪。然后队伍往厚德路上，改打一中、六中。

西门片：首先派出队伍控制西河大桥，任何车辆、行人禁止

通行，派出队伍佯攻冶金学院，另一支队伍走青年路控制中学生“卫东彪”，能拿下几个算几个。

三个片：没拿下一个点就住在那，后勤跟到那。

战斗开始放信号，以纸厂汽笛为准。

从 6 月 27 日开始，赣州市的商店陆续关门。

6 月 28 日，工厂停工，商店关门，公共汽车停开，东河大桥、西河大桥被封锁，赣州与外界的通讯、交通被切断，街上的行人寥寥无几。

赣州城里的学生红卫兵和同派别的工人、干部开始用盐包、土包构筑防御工事。

“……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这首《红军想念毛泽东》是那些男女红卫兵小将在那个岌岌可危的日子中唱得最多的一首歌。

军分区那些老八路、老新四军都是经验丰富、老谋深算的打仗老手，打小日本、老蒋、美国佬跟玩似的，那些围点打援、声东击西、一点两面、四组一队、三三制等战略战术炉火纯青，早已烂熟于胸，对付赣州城里的这些学生实在是小菜一碟。

6 月 29 日，赣州成立了“专市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筹委会反复辟大军前线指挥部”。

这天，赣州胶合板厂、精选厂工人包围了赣州师范，将这里的“‘七一’野战军”包围后全部抓走。与此同时，赣州农校、地委党校、赣县中学也发生类似情况。

晚上，从各县通往赣州市的公路、土路上，一时间马达轰隆，黄尘蔽天，卡车、拖拉机，成串的车灯在黄尘里迷离扑朔……车

上的农民、工人，手里拿的已不仅是木棍、梭镖、大刀、土枪、土炮，有的还有半自动步枪、冲锋枪、三八大盖……他们的眼里溢满肃杀之气，同时还透露出几分压抑不住的兴奋……

深夜，城内第一枪在赣州印刷厂打响，只听赣州东河大桥上枪声大作，探照灯射向赣州印刷厂。在机枪扫射下，当场打死41 人。三中“卫东彪”一名中学生受重伤后，还在激昂地高呼：

“生为毛主席的红卫兵，死为毛主席的红小鬼！”

6 月 30 日凌晨，一声巨响震动了赣州，炸药包将赣州 908 地质大楼炸塌了一个大洞，工人、农民包围了地质 908 队的“紧跟毛主席造反团”。经过 8 小时激战，除三、四十名突围到供电局外，其余 100 多人被俘。冶院、医专、师专、三中、八中等单位也都四面被围，造反派退守市内。

大批的工人、农民进入城市，搜查与他们观点不同的人员。

这天，炒豆般的枪声告诉赣州城：昨天双方还慷慨激昂，你喊“保卫”、我嚷“誓死”的那一套，今天已成隔夜黄花。仅仅停留于口头上的精神批判，代替不了武器的批判，此刻武器的批判，已经蝗群般涌向了赣州城的四个进口！

一切都发生在猝然之中。

一切都仅仅是在战斗英雄的报告里听过。

疑惑，凄惶，茫然……

赣州在枪林弹雨中颤抖。

这一天，赣州城里丢下了 168 具尸体。

然而，小城很快便有了自己坚强的中枢神经系统。南方冶金学院的一幢楼里，几个红卫兵头头做出紧急决定：“人不犯我，

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

## 第 702 回：第二次，接见江西省代表　拟派兵，赴赣南制止武斗

6 月 30 日，“江西省大中学校红卫兵司令部”驻赣州地区联络站负责人朱毅，领着三中学生李九莲和其他几个学校的红卫兵头头，到街上认尸体，因为有名有姓才好向中央紧急电告呀。他们走在死尸堆里，扒开一个个倒卧的死尸面孔，那是一张张年轻，露珠般年轻，洁净的额头没有一丝皱褶，线条生动的鼻子恍如玉石雕成，或是下巴刚刚生出几根茸茸软须，让你想起原野上轻扬的芊芊春草，或是脸上几颗深紫色的青春痘，让你觉得里面深藏了多少青春躁动期的秘密……

几乎找不到一张脸上留有恐怖走过的痕迹。也许，他们刚刚还在对战友倒下的愤慨之中；也许，他们刚刚还在“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的悲壮之中；也许，他们刚刚还在能真的在枪林弹雨中考验自己的豪迈之中……然而，死神便骤然降临了，犹如万千条蜂拥而至的蚂蟥，在贪婪地吸血，留给他们的只是一片失血后的惨白。而留给生者的，则是一片无论你怎样联想也填补不了的广袤空白……

李九莲跌跌撞撞地走着，腿好似麦秸秆编的，愈走愈软。额头沁出的汗珠，将一绺头发冰凉地贴在皮肤上，她想用手抹开，可一提手，她看到了手上淋淋漓漓、欲滴未滴的血水。一股强烈的恶心，一阵恍惚。恍惚中，她觉得自己好像是来自一个屠宰房，又走向了炼狱。她停下不走了。朱毅回过头来看她，她像是喃喃自语：

“还可以这样打吗?还可以这样打吗?”她抬起失神的眼睛，又问朱毅：“我们能不能既不放弃原则，又不打?”

几天来，这个问题也一直在朱毅头脑里来回拉锯，他想得头都痛了。他是江西师院中文系二年级的学生，不会打仗，只会读书，也许是文学的熏陶，他性格外露，富有激情，这激情是拥抱五彩世界、创造美好生活的激情，同样与残忍无缘。

但是，他们面对如大潮般压过来的农民、工人，滚滚烽烟里，那一排排拨浪鼓般晃动的脸膛上所呈现的，不是昔日农忙季节，他们去农村支援时所领受的那份欢迎，不是他们去工厂接受阶级教育时所感到的殷殷期待，更不是童年时，光着腚从河里湿淋淋地爬上来，或是溜进果园捉知了、偷梨吃，被他们撞上时的那份对于童心的亲热和款待……此刻，那一排排被烟尘染得熏黑的脸膛上，眼珠充血，青筋暴绽。因为仇视，因为狂热，也许还因为击中目标时所窜上来的某种快意，他们的轮廓都有些变形，皮肉都遭扭曲了，恍如一截截被雷电击中，正在撕裂、燃烧的枯木……

这已经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了，红卫兵的正义感、豪迈感、悲壮感，绝不是装出来的，他们的年龄，还有 60 年代初期要求他们像雷锋叔叔一样纯洁的水晶瓶式的教育，决定了他们不是演员。

朱毅铁青着脸，回答了李九莲：“没有退却的余地!不打，革命原则丢了，赣州城里红卫兵的性命也难保……”

就这样，双方一直打到赣州城被攻克，红卫兵死的死、伤的伤、溃散的溃散，冶金学院的 4 个红卫兵头头，就死了 3 个。朱毅成了“最高司令官”，他清点了一下人数，只剩下七、八十人。

在一条小巷里，他下令把一挺机枪连子弹带丢到井里，另一挺机枪已被对方缴去了，为了夺回它，一下丢掉 3 条命……

巷子外的喊杀声，劝降声，犹如 7 月蝉雨一样鼓噪着耳膜。朱毅看了看大家，一个个蓬头墨面，衣衫褴褛，像是刚从上甘岭上下来。有的红卫兵眼里划过惊恐之光。在残兵前，他不是个败将，他仍拼凑起全部威严，发出了最后一道训诫："你们整好衣服，一起冲出去。我们已经坚持到了现在，做什么都可以，爬阴沟、钻狗洞都不是耻辱。只有一条，如果谁被抓住了，决不能出卖自己的战友!如果你的手沾上了战友的血，我朱毅死了就算了，我活了下来，就决不会饶过你!"

更多的红卫兵已经不再参战了，他们躲了起来。

枪声一直持续到 7 月 4 日。

7 月 1 日 0 时至 3 时，已经两天没有休息的周恩来，又和康生、张春桥、肖华、戚本禹等人一起，在人民大会堂南会议厅，单独接见江西省"大联筹"赴京代表 35 人。江西省"大联筹"代表团首先汇报了他们贯彻执行中央 6 月 29 日电报的情况，并将他们发给南昌"大联筹"的电报底稿和"联络总站"在南昌公布的大字报交给周恩来。接着，代表团汇报了南昌、赣州等地的武斗情况，并将南昌的几份来电交给周恩来。

周恩来、康生、戚本禹、肖华等边作纪录，边用放大镜，查看江西的地图，不断地询问莲塘、南钢、长头岭、共产主义大学等地方的情况。

周恩来问："莲塘周围 100 里以内保守组织掌握了多少枪？多少鸟铳？调查清楚了吗？"

当听到这天晚上 22 时可能还要继续围攻赣州三大院校时，周恩来立即指示秘书打电话给赣州军分区予以制止。

康生问："赣州哪个组织是左派？"

"大联筹"代表答："治院的'东方红'、医专、师专是代表左派的。"

康生又问："保守组织抢去的炸药当时是谁看守的？"

代表答："当时只有一个人看守，现在也失踪了。"

康生再问："赣州造纸厂保守组织叫什么名字？"

代表回答："叫'前锋造反队'。"

此时北京似乎还不清楚赣州发生武斗的严重事态。代表团接着汇报了南昌急电："《江西日报》警卫撤离以后，长头岭，新建县的农民占据了《江西日报》的电台，新华社电讯无法出刊。"

周恩来告诉秘书马上打电话给吴瑞山，命令吴瑞山马上派一连部队，通过八一桥到《江西日报》收回电台。他说："警卫排还是要警卫，你们造反派也要打电话回去给予协助，这个事件你们注意看一看，帮助办一办。帮助解放军同志把电台收回来，新华社电讯还要继续出刊。"

谈到交枪的问题，周恩来说："你们是造反派嘛，我们是爱护你们的，我们听说你们有两种意见，当然不能叫你们太为难。有困难嘛，要告诉我们，有些人一时想不通，我们做工作嘛，他们不愿意交出来，不能说他们没有道理，主要是不放心，交出武器生命没有保障，不要紧嘛，能把枪收集起来，现在暂时不交也可以，封存起来，现在暂时不交也可以，你们是造反派嘛，我们要帮助你们，有困难要给我们说。"

代表说："有的人不是不愿意交，因为交给军区不放心，他会再发给保守组织来打我们……

戚本禹同志插话说："这是一个问题呀！"。

代表说："我们要求中央派人来接，交给中央。"

周恩来答应说："是嘛，我们会派人去的。"

代表团最后一致表示坚决执行中央 6 月 29 日电报指示，并且汇报说："交通学校敲锣打鼓地把枪交回去了。"

周恩来表扬说："这很好嘛。"

代表们又汇报说："南昌的形势很紧张，市里面很乱，交通中断，关闭门户，人心惶惶的，造反派生命得不到保障，我们首先要求解决这个问题。"

周恩来："因为开了枪嘛，情况定是这样的。现在就是研究处理，现在可不可以采取这个办法：农民全部不进城，就是说除了卖菜、挑粪、探亲的以外，不准成队的进城，工人也不到农村去。枪支弹药全部收上来，封起来或交给军区，中央派人去监督。这个问题不仅是南昌，还包括宜春、抚州、吉安、赣州、上饶、九江，还有波阳、萍乡、丰城等地。你们造反派，你们方才讲的，态度是对的，他们表现得不好，你们造反派就要做模范，当然做模范不能让你们去吃亏，我们要保证你们的安全，这个问题由军区下个命令，当然这个命令也一定生效，事情已经搞起来了，军区可以承认错误，军分区、武装部也一定听，你们反映的问题，我们在查，死的人不但要抚恤，而且军区要负责任，军分区、武装部有很大的责任。"

戚本禹插话说："就是军分区、武装部搞起来的。"

周恩来："你们要想想嘛，莲塘的问题，我们已告诉空军，由他们出面解决。要住在南昌以南的农学院、车站的农民先退回去。据说空军跟你们造反派的关系还好嘛！这个问题中央是很重视的，两天接见你们两次，刚才没有到这是以前，我们又开会研究这个问题。"

周恩来问："你们跟军区负责人，哪几个人接触得比较多？你们认为哪几个比较好讲话一些？哪个比较坏？"

代表们说："陈昌奉比较好，因为林忠照 6 月 7 日检查的时候，有些战士不明真相，要去冲会场，陈昌奉拦着汽车，差一点碰伤了。"

周恩来点头说："我认得，长征时我们很熟。"

代表们继续说："还有罗元炘，他也是靠近造反派的，但他们现在已经没有实权了。"

周恩来："没有关系。"

代表们又汇报说："还有政治部一个田守本，田因为支持造反派，被抓起来了，最近才放出来，预备下放到农场劳动，被我们红卫兵截下来了，这一次也到北京来了，要求总理接见。"

康生同志讲："还有这么一个人？"

周恩来同意说："可以嘛！先找联络员跟他联系。"他继续问："你们对前省委书记的看法，简单谈一谈，一个人谈上几句就可以了，我们不表态。"

代表们说方志纯"长期隐瞒历史，大叛徒，一贯反对毛主席。"刚说到这里，康生、戚本禹打断了说："有了，有了，我们知道，有这句话就够了。"

康生、张春桥同时说："叛徒嘛！还有不反对毛主席的!"

代表团继续汇报："杨尚奎蜕化变质，几年来不干工作，带着老婆到处玩，搞单干风最积极，别人代他写了一本书，他自己得了 8000 元的稿费，只给作者一套衣服。"

"白栋材 1950 年以来，就开始反对毛主席，和薄一波的关系密切。"代表们还汇报了他攻击康生的问题。

康生说："当时中央党校给林枫带了高帽子游街，有人问我好不好？我说这不能算武斗，但也不是文斗。刘、白都打电话给我，折中主义帽子给我扣上了。"

代表们继续讲："白栋材怕死，怕得连钞票也不敢放在身上。"

他们还谈到黄知真："他跟方志纯是一条线，是一个重要的打手，干了很多坏事，这个人要打倒。刘俊秀犯了很多错误，是镇压文化大革命的罪魁祸首，如果检讨得好，还可以工作。"

周恩来说："刘俊秀最近神经不太好，有时控制不住"。

代表们又谈刘瑞森："刘瑞森的历史问题，派出 40 多个人，经过两个多月，调查了 300 多人，写出了 120 多份证明材料，还没有发现他是叛徒。把 17 年和文化大革命的表现作了介绍，要求中央能够表态，因为保守派借刘瑞森的问题来反对我们，攻击我们。"

周恩来说："你们把材料交来就可以了。"

戚本禹说："他支持你们好嘛，他无论有什么问题，与你们没有关系，你们还是左派嘛!"

周恩来又问了对郭光洲、黄先、黄霖的看法。

最后张春桥说："总理两天没有睡觉，还有一个会要等着开。"

周恩来最后说："今天就谈到这里，以后继续研究，继续与你们联系，你们来京的代表要住到一起，我们好与你们联系，也能和南昌经常通通情况，做做工作。"

7 月 2 日，赣州军管的邮电大楼、市公安局、章江餐厅、航运局等地方架起了机枪、60 炮。

7 月 3 日，周恩来致信毛泽东、林彪，汇报江西情况。提请批准调 26 军一个师进驻江西支左和加强军管会及未来的革命委员会或筹备小组。

7 月 4 日，毛泽东看了周恩来 7 月 3 日夜送来的关于处理江西问题并建议从山东调一个师进驻江西支左、加强军管会及未来的革委会或筹备小组的报告，批示："从山东调一个师问题，待江西会议开得有眉目后，再定为宜。"

这天，江西省军区发出《关于制止赣州武斗问题的命令》，责成赣州军分区和当地驻军采取有效措施，立即制止武斗。

当天，中央军委办公厅编印的《群众来信摘抄》第 55 号上，摘抄登载了江西赴京控告团、江西赣州赴京控告分团 7 月 4 日的电话汇报，反映赣州武斗情况严重，人员伤亡很大，断粮断水，交通全部堵塞，要求中央立即派部队前往制止武斗。

7 月 6 日，毛泽东看到中央军委办公厅 7 月 4 日编印的《群众来信摘抄》第 55 号后，批示：

林彪、恩来同志：

赣州问题严重，涉及整个赣南十多县，调一个师去，只能管南昌、吉安、宜春、抚州等处，对赣南鞭长莫及。是否可从广州军区调一个师，至少一个团进驻赣州，将事情办好后仍返广东。

此事请先考虑，待面商。

当天深夜，周恩来致信毛泽东：

已与黄永胜通了电话，他可以调两个团、一个师部驻赣州。

次日，毛泽东批示：

退总理。

## 第 703 回：长春乱，吉林“六二九”武斗　哈尔滨，革委会内出分歧

激烈的武斗何止在南方，此时的东北也打得不亦乐乎。尤其是在吉林省，吉林“公社派”把吉林省军区副司令员贺吉祥当成“吉林的赵永夫”，抓住吉林省的“223”镇压事件，强烈要求平反。

6 月 15 日，“长春公社”所属的群众组织以要求释放“公社派”社员为由，连夜包围了已军管的长春市公安局，指责公安局军管会支一派打一派，包庇、怂恿市公安局“红色造反兵团”逮捕、扣押、游斗与他们观点不同的工人、学生、干部及群众，酿成多起武斗事件，并打死重工业技校教师林默然。他们要求公安局军管会严惩肇事者和杀人凶手。

开始，他们是静坐示威。但是三句话没搞对，一彪人马就冲进市公安局办公楼，把公安“红色造反兵团”的办公室砸了个落花流水，于是双方在市公安局发生武斗，持续了十几个小时，办公楼门窗和桌、椅等办公用品被毁坏。这是两派分裂以来第一次较大的武斗事件，伤者近 1500 余人。

6 月 20 日，“东方红公社”和“公安联总”等群众组织在省军区门前召开“彻底砸烂吉林省的资产阶级专政誓师大会”要求为“223”事件平反。

6 月 23 日，工大“造大”召开“砸烂吉林省资产阶级专政誓师大会”。会上批斗了宋洁涵、李一平、李都等领导干部。

6 月 24 日，“长春公社”、“东方红公社”、“红革会革命造反联络部”、“公安联总”等群众组织在军区西南面广场召开“与贺吉祥血战到底誓师大会”。

6 月 26 日，“东方红公社”等组织在吉林省军区门前召开“砸乱吉林省的资产阶级专政”大会，还是要求为“223”事件平反。

28 日，驻吉林省的军队领导召开会议，提出四点意见：

（1）省体校“造大”不是反革命组织；

（2）释放张文海，让群众审查定性；

（3）“地、工、光、野”（即：“地院兵团、工大造大、光机八一五、人大红野四个群众组织的简称”）是犯错误的左派；

（4）“223 事件”不是反革命事件，要平反。

6 月 29 日，驻长春的 6 所军事院校和兵工厂的群众组织在地质宫广场联合召开“与贺吉祥所执行的拿枪的刘邓路线血战到底大会”，要求省军区为“223”事件和“兽大红色造反团”公开平反。会后，60 多辆汽车满载院校学生进行绕城游行。老百姓见之人心惶惶，都说：“这八成是要开仗了！”

不过，长春市还没有开打，吉林市先打起来了。6 月 29 日至 7 月 5 日，吉林市冶金电气化学校“造大派”的“红色造反团”与“造委会派”的“井冈山”、“红革联”发生大规模武斗。

6 月 29 日，两派在学校门口发生冲突，接着大家纷纷往教学楼里跑。由于楼内“造委会”派的学生所在班级主要住在西侧，而对立面的“造大派”的“红色造反团”学生主要是住在教学楼的东侧。双方在走廊里进行了激烈的冲突。“造委会”派学生头顶着铺床用的草垫子，顶着雨点般飞来的砖头，从对方的教室后

门攻入，从教室的前门冲出。很快就占领了 3 楼和 4 楼的全部。他们把守着大楼两端的楼梯。将“造大派”的 300 多人分割在 5 楼和 2 楼。

该校教学楼从正门上去直接到的是 2 楼。1 楼是图书馆，需要进楼后往下走，没有学生居住。5 楼是一个大会议室，也没有学生居住。因 6 月 4 日发生过一次武斗，搞得两派都很紧张，所以很多人从教学楼北面的学生宿舍搬到 3 楼和 4 楼的教室里住了，为的是人员集中，便于应付突发情况。

“造大派”的“红色造反团”觉得占领 2 楼无任何意义，所以就从 2 楼撤到楼外了。而他们在 5 楼的人此时被困在里面出不来了。

虽然“造委会”派的学生在楼内占主导地位，把对方紧紧地封锁在 5 楼。可是在楼外，却是对方的势力占优势，“造委会”派同样被困在楼内，也出不去了。

楼内水和电被楼外的“造大派”掐断了。而困在 5 楼的“造大派”有省二建“831”派的支援，扯上一根铁索向里面运送物品。

楼内的人把椅子劈开做柴火，把打浆糊的面也都煮了吃了。后来，他们将原来楼两侧洗手间里洗脸池内储存的水也喝的快没有了。

在学校楼外的警戒线外，很多焦急的学生家长在等候。开始“造大派”还对这些学生家长冷言冷语讽刺挖苦。后来他们觉得可以利用家长动摇楼内军心，所以就允许几个家长进楼内与孩子会面。楼内学生就给“井冈山总部”写了一封信，藏在家长的鞋

里带了出去。

位于火车站公共汽车停车场西侧的“井冈山总部”得知消息，于 30 日下午召集各组织头头开会，研究增援方案，决定火速给被困组织送食品。会后，市“造委会”组织 1000 余人连夜前往吉林冶金电气化学校送去了许多麻花和面包。因楼内学生都在熟睡，没有发生大的武斗。

双方僵持了几天，市委的大喇叭天天广播通报该校告急的战报。

吉林市“造委会”经过数天准备，组织万余人于 7 月 5 日早 7 时 30 分在吉林市火车站广场集合，手持木棒，再次以送食品为名，前往该校，与该校的“红色造反团”发生武斗，重伤 20 多人，轻伤 100 多人。

3、4 楼内“造委会”乘武斗混乱之机逃了出来。5 楼“831”的人也趁夜色通过钢丝绳溜走。至此，“629 武斗”结束。

说完吉林，我们再来看黑龙江。6 月下旬的一天上午，在黑龙江革委会主任潘复生的办公室里，革委会常委范正美对潘复生说：“我有一些想法，想跟您谈谈。”

“好啊！”潘复生很感兴趣地说。

“这是一些不太成熟的想法，不对的地方请潘政委指正。”范正美接着说，“炮轰派有错误，他们把矛头对着省革委会，这是方向性的错误。但是，特别是最近以来，群众对省革委会处理‘炮轰派’也有一些意见，我想，您一定也会有所耳闻。‘6.5’事件以后，接连发生的‘6.9’、‘6.21’这样的事情，我们这样对待‘炮轰派’，我总觉得不大妥当，请您考虑。”

接着，范正美又试着往深里说："毛主席说过，对待犯错误的同志，如果搞过了头，就要搞到自己头上。我觉得，我们对待'炮轰派'，也应该注意这个问题。我觉得，为什么'炮轰派'问题，长期不能解决，而他们越来越嚣张，是不是应该考虑我们的做法、我们的政策，是不是有些偏差。不过，我也有很大责任。我是群众代表，可以由我出面来做工作，省革委会对待'炮轰派'的问题可以由我出面来承担责任，我愿意把责任揽过来。"

潘复生听到这里，眉头紧皱，瞅了范正美一下，没吱声。

范正美又说了一句："这个问题，最近我反复想了又想，请您斟酌一下。"

潘复生还是不吱声。

范正美从潘复生那里出来后，又找到宋振业，正要开口，宋振业却先说了话：

"我知道你要说什么。我最近回了几趟农学院，下面造反派对省革委会很有意见，认为这么对待'炮轰派'，省革委会要犯大错误。他们还批评我们脱离群众，做官当老爷。告诫我们不要高高在上，要经常到下面走走。"

范正美给哈师院"造反团"写了一封信。他在信里写了这样几句话：

"目前全国全省文化大革命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每一个造反派都面临着严峻的考验，在这种情况下，要注意有人利用我们的无产阶级革命感情，要警惕有人把革命小将重新打成反革命。"

这些话传到潘复生那里，他打电话找师院革委会主任穆国兴，

原哈师院党委宣传部长，他在文革初期就和造反派站在一起。潘复生先是找师院革委会全体成员到省革委会座谈，批评师院革委会“动摇”，并暗示是受了范正美的影响。当师院革委会提出对省革委“6.7”、“6.9”、“6.21”的意见后，潘复生认为师院革委会是搞折中，对话未取得什么成果。

潘复生又找穆国兴个别谈话，要他做范正美的工作，叫范正美不要看错了形势，不要骄傲。穆国兴则提请潘复生注意听取小将意见，范正美的话是有道理的。潘复生认为省革委会没有过错，当然也可能在某些具体问题上有这样那样的缺点错误，但整体上没什么问题。他说：

“范正美还是年轻，在关键时候心慈手软。你要多做做他的工作。这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不要犯错误。”

6月27日，哈师院“造反团”根据范正美的谈话和穆国兴的意见，准备就目前形势发表第四号声明，其中提到：“‘炮轰派’被阶级敌人利用，但绝不能简单地毫无阶级分析地以一时的‘炮轰’或‘不炮轰’来区别革命组织和不革命组织，不分青红皂白地提出再夺权是极端错误的。”“特别要警惕坏人混水摸鱼，对革命小将进行打击报复。”

这个声明写成以后尚未正式发表，就遭到“捍联总”的全面围剿。他们认为，这个声明有利于“炮轰派”，不利于“捍联总”，是一次“新的反复的信号”。“他们是隐藏在‘捍联总’的定时炸弹，是一批‘暗炮’，他们以公允的面目出现，更具欺骗性。”

“要么站在‘炮轰派’一边，要么继续站在‘捍联总’一边，中间的道路走不通，因为潘复生不允许你走第三条道路。”这就

是当时人们得出的结论。胡云飞多次向范正美说明这一点。

不久，周恩来听说潘复生派工人大军冲击哈军工，想一举荡平“炮轰派”的情况后，十分惊讶，说：“这在全国的高校中还是第一次吧？怎么能这么干呢？”周恩来决定亲自处理黑龙江省的问题，要求尽快接见哈军工的两派代表。

从 7 月开始，在毛远新的参与下，哈军工以及哈尔滨市“捍”、“炮”两大派代表在北京开始了漫长的谈判。哈军工两派代表又恢复了“文革”初期“君子动口不动手”的风度。

7 月 12 日下午，范正美再次找潘复生谈心。潘复生说：“我们个人不用谈了，你好好准备一下，明天你向全体常委谈谈，再听听常委大家的意见。”

他们约定第二天召开省革委会常委会，听取范正美的意见。

范正美回到办公室，先找宋振业。宋振业建议他再找全体群众代表开个会，争取大家的支持。

当天晚上，范正美把当时在革委会中的所有群众代表：聂士荣、韩潮、孙宝生、刘雪峰、宋振业等，都找到他的办公室，把他的想法向大家谈了。群众代表都同意范正美的看法，并表示完全支持他。

第二天一上班，黑龙江省革委会全体常委一个不少地参加了会议。潘复生说明会议议程，要范正美发言。范正美说：

“省革命委员会成立以来，特别是在潘、汪首长的领导下，抓革命促生产，在各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成绩是主要的，对此必须充分肯定。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4 月份出现‘炮轰派’问题以来，我们在对待‘炮轰派’这个问题的处理上，实际上是我

们省革委会如何对待群众的问题。我觉得逐步发生了一些偏差。”

他首先承认“炮轰派”对待省革委会的根本态度是错误的，是政治性的，方向性的。同时又说：“我们毕竟应该承认，‘炮轰派’还是造反派、左派犯的错误，或者说是犯错误的群众。对于他们的缺点错误也应该相信他们会在运动中自己教育自己，逐步加以改正的。”

他批评了“6.5 事件”之后，省革委会支持“捍联总”对军工、建工的夺权，对他们采取高压政策，以至于矛盾激化，认为省革委会在对待群众问题上是有错误的，而且这个错误是带有方向性的。因此建议常委坐下来好好研究一下，调整对“炮轰派”的方针、政策。

范正美说完，宋振业马上表态，完全同意范正美的意见，说范正美的发言代表他们两人共同的看法。

他们俩发言后，潘复生说：“范正美同志讲完了他的意见，现在请常委们发表自己的意见，请常委们来帮助帮助他。”

首先是军队代表一个个发言，中间穿插着干部代表讲话，末尾是群众代表一一表态。大家的发言内容几乎是一样的：

一是范正美的意见是错误的，完全不能接受的，应该予以批判。

二是范正美的发言，指出省革委会犯的错误有一个明显的时间界限，那就是 4 月份以后。4 月份以后是什么概念？潘、汪当主任、副主任。那就是说，在此之前，因为范正美同志当班长，省革委会的工作都是对的，4 月份以后，虽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对待群众问题上又犯了方向性的错误。这是美化自己，打击潘、

汪，否定中央批准的省革委会的工作。

三是范正美迎合当前资产阶级的需要，是错误思想在省革委会内部的反映，应该揭露和批判。

四是范正美把自己的想法讲了出来，这很好，我们大家要帮助他认识错误，不要在错误道路上越滑越远，同时也希望范正美同志应该及早醒悟，以免犯大错误。

常委们发言以后，汪家道把问题上了纲，他说："我看不是我们犯了方向错误，而是范自己犯了方向错误。"他讲完，潘复生作总结。潘复生首先肯定各位常委的发言，然后把问题提到了哲学、政治学的高度。他说：

"范正美同志看问题的立场、观点、方法都有问题。毛主席说，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在当前阶级斗争尖锐复杂的形势下，一定要这样提出问题、看待问题、研究问题。谁反对省革委会这个新生事物呢?只有帝修反和走资派。当前炮轰派是迎合资产阶级二月逆流否定文化大革命的需要。这是第一。第二、范正美同志的发言，承认炮轰派有错误，省革委会也有错误，各打五十大板，这是折衷主义、二元论。是违背毛泽东思想的。毛主席说，事物的性质是由矛盾的主要方面决定的。这里范正美同志没有作阶级分析，这就混淆了大是大非。第三、范正美同志夸大了省革委会工作中的问题，把一个指头同九个指头的关系弄颠倒了。省革委会当然有缺点毛病，但那是一个指头的问题，炮轰派把矛头对准革委会，方向错了，这是根本错误，二者不能相提并论。"

潘复生讲完后，问范正美和宋振业的意见。范正美说："我们

的发言各位常委不能接受，各位常委的发言也是我们不能接受的。不过，事关大局，我们还是诚恳地希望大家很好地考虑我们两人的意见。”

会议一连开了 3 天。散会的那天晚饭后，范正美和宋振业在上楼时，遇见了《解放军报》驻哈尔滨记者站记者董学章和郑记者。董学章问范正美最近忙什么？范正美没好气地告诉他：“挨了 3 天批。”

董学章赶忙把范正美和宋振业让进屋里，细问其故。他只听范正美讲了几句，就感到很兴奋，便告诉他们，关于黑龙江省的情况他们早已通过内参报告了中央，群众对处理“炮轰派”意见很大，特别是“6.5 事件”之后，对“炮轰派”实行高压，激化矛盾，形势恶化。他对范正美和宋振业敢于挺身而出，指出省革委会这一段错误，表示由衷地高兴和支持。这使范正美和宋振业喜出望外。他们为自己意外地找到了向毛主席、党中央申达自己意见的渠道而击掌相庆，于是向董学章他们述说了对潘复生的一些看法，以及前 3 天找群众代表联合提出意见而遭批判的经过，并请他们尽快向中央反映我们的观点，请求中央采取适当措施。

“你们应该上北京，直接找周总理，找中央文革汇报！”不知是谁给范正美他们出了这个主意，于是，他们向两个院校“造反团”分别通报了他们的想法，也告诉了《解放军报》驻哈记者站，并且安排由哈师院“造反团”提供他们去北京的必要准备和帮助。

大概过了两天，范正美和宋振业起了个大早，由哈师院出一辆解放牌大卡车，以师院食堂买菜的名义，将他俩藏在车里，准

备绕道香坊，再折向双城，从那里坐火车去北京。不料在香坊被截，遭到“捍联总”的扣押。范正美和宋振业只得下车。“捍联总”的人把他们带到附近的一所中学，急忙与省革委会联系。这时，范正美鼓起勇气，主动从“捍联总”的人手里要回电话筒，给省革委会办公室打电话，告诉他和宋振业的所在地，要求来车接他们回去。潘复生立即派车把他们接回了省革委会驻地 107。

回来后，范正美和宋振业只在省革委会驻地呆了一天，就又回到师院。他俩同哈师院的杨桂宾、魏醒学，东北农学院的李振华、徐世权，哈军工冯昭逢、吴兆基等人在一起商量，大家预感到潘复生可能利用“捍联总”，以群众名义搞他们，还是另想办法抓紧时间上北京为妙。

这天，夜幕方降，华灯初上，范正美、宋振业、冯昭逢各骑一辆自行车离开师院。冯昭逢领路，与范正美和宋振业相隔 100 米左右，故意左拐右旋，飞车到达三棵树车站，在车站“炮轰派”的支持和配合下，范正美和宋振业将学生装换成铁路工作服，钻进了一列货车的铁罐守车。冯昭逢跳下车，对跟车人说：

“这是两位工程师，去北京永定门车站办事。”

为了防备万一，范正美化名张必胜，宋振业化名李国明，以对付跟车人的盘问。不知为什么，跟车人没有上守车。

这趟列车只在陶赖昭停一次，出了陶赖昭就算出了省。从哈尔滨三棵树到陶赖昭，走了两个多小时。好不容易离开陶赖昭，他们提着的心才算放了下来。

过了陶赖昭之后，车速加快。这几天的劳顿、疲惫和困意，此时一齐袭来。他们俩都沉沉入睡了。幸好，一路顺利，第二天

早上 7 点多钟就到了永定门车站，一路上没遇到任何不愉快的事情。

## 第 704 回：上柴厂，“联司”“东方红”争斗　“支联站”，上海市再分两派

我们暂且放下黑龙江，再来看看此时的上海，武斗同样也出现在这里。

地处上海东北角工业区军工路上的上海柴油机厂，是当时全国最大的柴油机厂，有 6000 多名职工。文革开始后，由于对已经调任贵州柴油机厂厂长的原上柴厂厂长朱文斌的评价分歧，厂里形成“反朱”和“保朱”两大派。

朱文斌早年参加共产党，后来曾两次与共产党组织失去联系。在脱党期间，经宋子文驻沪办公室的机要译员介绍，他曾在国民政府军用仓库工作过。四清时，上柴厂的上级机关，国务院第八机械工业部和中共上海市委曾专门对此调查，结论认为朱文斌没有叛变行为。但文革开始后，厂党委中有人说朱文斌是被包庇下来的，应该批判。于是，“反朱”派于 1966 年 9 月 15 日成立了“红色革命指挥部”；10 月 31 日，又与厂内相同观点的其他组织联合成立了“东方红革命造反总部”，简称“东方红”，头头叫侯彩琴，成员 1000 人左右，人员组成党员、中层干部、积极分子居多。11 月 22 日，“东方红”加入了“工总司”，成立“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上柴东方红总部”。

由于朱文斌平易近人，以身作则，工人、干部对他多有好感。所以，许多人不赞成批判他，认为他的历史问题“四清”时已有结论。这些基层群众也于 1966 年 9 月 22 日成立了“串连站”，

10 月 4 日更名为“文化大革命群众串联总站”，并于 12 月底也加入“工总司”，挂在“工总司杨浦区分部”下。

1967 年 1 月 10 日，“串连站”又与厂里另外两个观点相同的群众组织联合，成立了“革命造反联合总司令部”，简称“联司”，3000 人左右，人员组成基层群众多，其中的一个组织是 1966 年 12 月 3 日成立的“上柴工人赤卫队”，曾加入过上海“赤卫队”，还印发了《上海柴油机厂工人赤卫队宣言》。虽然这个组织在康平路事件前已退出“赤卫队”，但还是被“东方红”抓住把柄，说“联司”是老保组织。“联司”头头叫杨仲池，厂里的技术员，清华大学毕业。

上柴厂的“东方红”和“联司”，虽同属“工总司”，但在厂里却是势不两立，你骂我是“老保”，我指责你“大方向错了”。一场循环不已的标语战，在上柴厂进行着。刚刚由“东方红”刷出大标语：“‘东方红’必胜!：‘联司’必败!”马上有“联司”的“战士”前来“修改”，把“胜”字覆盖，改成“败”字，而把“败”字改成“胜”字，成了“‘东方红’必败!‘联司’必胜!”紧接着，“东方红”的“战士”又来颠倒那个“胜”字和“败”字。如此近乎文字游戏的标语战，“东方红”和“联司”却极其认真地进行着。这种标语战，甚至发展到厕所的墙上：有人刷了“联司”两字，再画一个箭头，箭头指向厕所后的粪坑。马上有人把“联司”两字覆盖，写上“东方红”，箭头依旧!

1967 年 1 月 10 日，“联司”成立当天，宣布接管上柴厂的党政权力，不久又成立上海柴油机厂革命委员会。但是“东方红”不承认这个夺权，发表声明说要“彻底粉碎这个反革命夺权”。

就在这天晚上，张春桥的秘书何秀文打紧急电话到武康路二号找徐景贤，说有两个人闯入他们住的兴国路招待所。何秀文让徐景贤以一个群众组织负责人的身份出面过去处理一下，劝说他们离开。

徐景贤急忙骑上自行车赶到那里。进了兴国路招待所的边门，就听见里面吵吵嚷嚷，只见张春桥的秘书和在这里担任警卫任务的上海警备区干部、值勤的解放军战士，正围着两个人与他们争论。徐景贤走上前去对那两个人说：

“我是市委机关造反联络站的。”

其中有个人还真认识他，当即就叫出他的名字：“你是徐景贤。”

随后此人自我介绍说：“是上海柴油机厂‘联司’的。”

徐景贤问：“你们到这里来干什么？”

那人说：“我们要见中央首长。”

徐景贤问：“你们怎么会找到这地方来的？”因为当时张春桥、姚文元住的地方是非常秘密的。

那两个人不肯讲，他们坚持说：“我们到这里要向中央首长汇报情况。”

正在这时，“工总司”二兵团的耿金章也来了，他也是张春桥的秘书打电话叫来的。

耿金章就不像徐景贤这样文质彬彬了，他大声说道：“这地方是禁区，你们怎么可以闯进来？”

通过问答，才知道他们是翻墙进来的，当时墙上筑有铁丝网。他们翻进大院后，见院里是一个大花园，分布着好多幢楼，不知

中央领导人住在哪里，就挨家挨户地找。

兴国路招待所是中央政治局委员来上海时住的地方，守卫得很严密。本地的来访者要见中央首长，都要从大门口先打电话进去，然后由里面派人出来接。那两个人在里面闯了半天，没有结果，最后被解放军战士带到门口传达室，他们说是要向中央首长反映上海柴油机厂两派的问题。

耿金章和徐景贤，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劝说了很久。那两人最后留下了单位、姓名，还是走了。

徐景贤等那两人和耿金章走了以后，就跟何秀文一起到里面看望张春桥。

1 月 21 日，上柴厂“东方红”向“上海市文化革命保卫委员会”，简称“文保会”控告“联司”，称自己一派有 200 人被打。第二天，“文保会”去上柴厂调查，并与两派代表协商，共同制定了不许私设公堂、扣人、打人等四项协定。但两派的冲突并没有就此停止。1 月 24 日清晨 5 时 30 分，“联司”抓走“东方红”的人。闻讯赶去调停的 200 名“文保会”和“上海市公安局革命造反委员会”的人，进厂后也遭扣留，带去的步话机和手铐被抢走，还被撕下公安帽徽和领章。于是，上柴“东方红”又到“工总司杨浦联络站”状告“联司”在厂里挑动武斗。“工总司杨浦联络站”负责人刘开宇、余益顺派第二机械厂的沈克祥作为他们的联络员，到上柴厂调查，结果被“联司”关在地下室。沈克祥从下水道逃回“工总司杨浦联络站”，刘开宇、余益顺火冒三丈，当即调了 1000 多人包围了上柴厂，要“联司”交出打人凶手。

“联司”关紧工厂大门，三次拉响防空警报，爬上房顶反击，

上柴厂全厂停产一天。

“工总司”黄金海闻讯赶到上柴厂，此时天色已晚，只见工厂的大铁门关着，“工总司杨浦联络站”的人正找东西准备撞开大门。就在这时，王洪文开着幸福牌摩托车，后面载着陈阿大也赶到了。

原来当晚，张春桥将王洪文叫去，要他去上柴厂调停，让两派坐下来商谈。王洪文就带着陈阿大赶了过来。谁知开到隆昌路时，王洪文太累了，竟打了瞌睡，结果摩托车翻了，将陈阿大摔了出去，幸好没大碍。

王洪文听了黄金海的汇报后，叫大家冷静，说“不要动，现在不是时候，他们要表演就让他们演。”

于是黄金海动员“工总司杨浦联络站”的 1000 多人撤离了上柴厂。

这以后，上柴厂大小武斗不断，而且越来越频繁。

1967 年 3 月，“工总司”清理整顿各区既有“联络站”又有“区分部”的组织重叠状况，“杨浦区分部”与“杨浦区联络站”准备合并，“联司”与“工总司杨浦区分部”从此不再联系，由此也与“工总司”总部断了关系。

1967 年 3 月，张春桥决定派解放军宣传队进驻上柴厂。但派哪只部队去？颇费考虑：原来驻厂的军代表是海军的，支持“东方红”，再派海军去会被“联司”认为有倾向性；陆军去也不容易展开工作，因为派陆军是由上海警备区派出的，上柴厂所在的杨浦区武装部支持“东方红”，而区武装部属上海警备区领导，所以也不妥；于是干脆陆、海、空三军都派。3 月 23 日，上海

市革命委员会派出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沪三军支左办公室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上柴机厂。

“东方红”用黑体字刷出了大标语：“热烈欢迎解放军宣传队来我厂支左！”

“联司”用新魏体刷出了大标语：“热烈欢迎解放军宣传队来我厂支左！”

双方的口号一模一样。

“三军宣传队”进厂后，便组织成立上柴厂“抓革命，促生产火线指挥部”。“联司”认为其中没有自己一方代表，指责说这是个亲王洪文的“王家铺子”。4 月 1 日，“军宣队”宣布“联司大方向有问题，不对头，错了”。

4 月 6 日，“三军宣传队”让市政法指挥部抓走了“联司”的两个人，理由是这二人“一贯打人”。

“联司”原本希望“三军宣传队”为自己说话，不想他们还是向着“东方红”。一气之下，在 4 月 22 日砸了上柴厂“抓革命、促生产火线指挥部”。

4 月 24 日下午，“军宣队”召开全厂广播大会，宣布“工总司上柴东方红总部是坚定的革命左派组织，革命的大方向是正确的，我们要坚决站在‘东方红’一边，支持他们的一切革命行动。”“‘联司’的大方向是错误的。我们希望‘联司’广大革命群众尽快站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

“东方红”马上热烈欢呼起来。

“联司”呢？当天晚上便把“三军宣传队”的“支左办公室”砸了。

“东方红”马上抓住“联司”的把柄，声称“‘联司’把攻击矛头指向中国人民解放军”，把大字标语刷到了外滩和南京路上。

“联司”迅即组成“赴京控告团”，由“联司”负责人杨仲池带队，于 4 月 26 日奔赴北京。

5 月 5 日，张春桥在济南军区机关排以上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也提到上柴厂。他说：“上海有个大厂子，六千多工人，分两派，一派四千，一派两千，两派都互相说对方是保皇派。又都说自己是左派，经常武斗。从文化大革命以来就分成两派，到现在已经十个月了，还是两派，还是武斗，一打就可以去几千人，从外面厂子调一些人，一方是两万人，一方是一万人地干。经常打。为了想识别一下究竟哪一个是左派，北京和外地在上海的三十几个左派学生组织和上海的所有左派组织，工人的，学生的，机关的，都介入了。结果，别的问题左派组织都很一致，就在这个问题上一分为二，两派弄得谁也做不了结论。我们收到关于这一工厂的材料就一大堆，我们现在也判断不清楚。”

张春桥说的这个工厂，就是上海柴油机厂。

“驻沪三支两军办公室”将上柴“联司”砸“军宣队支左办公室”的情况报告了上海市政法指挥部，政法指挥部让上海市公安局将“联司”冲砸“支左办公室”的两名带头人柏广生和卢伯平拘留，关进上海市公安局。

5 月 20 日，去北京告状的上柴“联司”负责人杨仲池回到上海，带着 20 多辆大卡车来到福州路，在上海市公安局大楼前停住，将并不宽敞的福州路交通阻断。卡车上跳下一批上柴“联

司”，就地静坐，强烈要求释放 4 月 6 日被拘留的两名“联司”人员。

上海全城又被轰动了，“‘联司’必胜！‘东方红’必败！”的口号声在福州路上震荡。

上海柴油机厂有的是柴油机。“联司”从厂里运来了柴油机，在福州路上，在不远处的人民广场上，柴油机隆隆运转，带动发电机发电，雪亮的电灯泡把黑夜照得如同白昼。“联司”在灯光下发表演说，撒传单。江南造船厂的“支联站”拉来了厚木板和三角铁，以几辆卡车为底座，焊接搭起了演讲台。每天晚上，“誓师大会”、“支联大会”、“声援大会”，一个接一个大会，在人民广场，在雪亮的灯光下举行。这边，福州路上一大群卡车、静坐者和围观者挤得水泄不通；那边，人民广场上演讲、聚会、呼口号，夜夜上万人聚拢，热闹非凡，每天到下半夜才散。

仅仅几天时间，几乎全上海所有的人都被吸引到这里。人们很快分为两派，有的人认为“东方红”比较有理，有人认为“联司”理直气壮。人们见面就要问：“你是‘支东’还是‘支联’？”

“支联”的碰到“支联”的，马上就是握手，就是同志。如果观点相反，马上就是仇敌，立刻反唇相讥；接着就是两个人的论战，马上就会吸引更多的人加入，就在马路上开展一场大论战。甚至有一对久别重逢的好朋友，见面时问对方，你是“支东”还是“支联”？回答的结果是一个“支东”，另一个却“支联”，于是两人就反目为仇，从此再也不去搭理对方。人们不但是口头上，而且还有行动，有些单位成立了“支东站”，也有的成立了“支联站”。当然也有在一个单位的门口，既挂着“支东站”、又挂着

“支联站”的牌子。

上海交通大学的“全向东”天天活跃在福州路和人民广场。人们可能以为“全向东”是某一个红卫兵组织的名称，因为当时的红卫兵们最喜欢取这类“卫东彪”、“永向东”、“红”等充满革命色彩的时髦名字。其实，“全向东”不过一介书生而已。细细的手臂仿佛无缚鸡之力，一副深度近视眼镜象征着他的“学历”不浅。他是上海交通大学 140 教研室的助教，真名汤福坤，又名汤东生。1957 年，他曾因对钱伟长这样的科学家被划为“右派”深表不满，成了一个“右派边缘分子”。1967 年 2 月 29 日，全向东到柴油机厂串联，与“联司”负责人杨仲池见面，相谈甚欢。全向东认为“联司”是真正的造反派，而“东方红”中层干部多，党团员多，是保守派，他表示支持“联司”。

全向东擅长演讲，他用富有煽动性的语言，斥责王洪文实行的是一条“老牌的、新型的、带铐的、带手枪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他说：

上柴‘联司’在福州路上的示威是革命行动，是向血腥的白色恐怖开火！

上海的权，不在无产阶级手里！

春桥同志文元同志对这些山大王估计太高，依靠太多，也是山大王为所欲为的促成条件之一。

安亭事件应该有个恰如其分的历史估价。既有初期推动运动好的一面，更有它带来破坏性的一面。

上海市在 1967 年以来，群雄突起，山头繁多，新式的行会

借着造反的名义纷纷建立，山头较大或较早的拉到虎皮者，就拉着虎皮作大旗去吓唬别人，发号施令，为所欲为，成为新形式的工作组和新型反动路线的执行者，“四大”得不到发扬，运动冷冷清清。……

(安亭事件)绝不应该成为某些野心家用之不绝，取之不尽政治资本的聚宝盆，应该把这些山头解散，把种种新型工作组解散。……

我认为这些靠所谓安亭事件起家的人，不能代表上海市广大革命造反派，从数月来运动的实践，他们中的很大部分是一些投机家和野心家，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必须重新改组，把这些人清洗出去。

在三月份王洪文集团掌握工总司大权以来，就在其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把上海的工人运动引入歧途。……

上海工总司的司令部和基层组织，基层群众是分离的，在广大革命工人的心里并不承认这个烂掉了的司令部是自己的领导。

上海夺权不彻底，不彻底的原因是用老干部比较多，不是造反派掌权，上海必须第二次大乱！

全国六个革命委员会五个已经垮台了，上海你们等着看好了，历史会证明，要把革委会中的著名人物一个个揪出来。……

上海某些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篡夺了政权！……

徐景贤、王洪文就是新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

此时，上海那些被“工总司”解散的“二兵团”、“一兵团”、“三兵团”、“工三司”，及在 1967 年 2 月，因反对张春桥、姚文元而先后分崩离析的“红革会”、“炮司”等组织的一些散兵游勇，

纷纷聚集到“支联站”的旗下，成为“支联站”的核心和幕后策划。上柴厂“联司”和“东方红”的争斗，演变成上海“执政派”和“在野派”的斗争。他们运用了文革以来的所有招术：发动群众、制造舆论、当街演说、开展大辩论、开群众大会、游行示威。他们明确提出要重新评价“安亭事件”、“上海市革委会必须改组”。

## 第 705 回：陈卜昌，“小热昏”侃侃而谈　六二九，“联司”赶走“东方红”

从 5 月 20 日至 6 月 5 日，上海上柴厂“联司”成员旷工人数已多达 6143 人次。

6 月 3 日，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在文化广场召开全市群众大会。张春桥在大会上说：“那些坐在公安局门口等着的人啊！你们要当心一点啊！你们要的人究竟是要对了还是要错了？你们要动动脑筋哪！不要以为都是抓错了，也不要以为都放对了。”

张春桥最后一句话“也不要以为都放对了”，是针对上海市虹口区革命委员会委员、上海汽车配件厂革命委员会主任陈卜昌而言。

陈卜昌，上海汽车配件厂的钳工，时年 24 岁，老造反，参加过安亭事件。曾领着人在虹口区公安分局门口静坐示威，要求释放两个因抢黑材料被关的工人。5 月 20 日，这两人被放，陈卜昌让那两个被释放的工人戴着大红花在虹口主要街道游行，以示庆祝。而 5 月 20 日这天，也就是杨仲池从北京告状后回到上海，带领“联司”到上海市公安局门前静坐示威，要求释放柏广生和卢伯平的那天。

6 月 3 日当天，上海市革会出通告，谴责“联司”：“一些负责人，组织一批职工离开生产岗位，妨碍公安机关正常行使职权，这种做法是错误的，他们应该立即返回本厂的生产岗位上去。”

“上体司”等群众组织则在这天，冲击了在福州路市公安局

大楼前静坐的上柴“联司”，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

陈卜昌被张春桥不点名批评，心里不服。当晚，他去市公安局门口，看见杨仲池和全向东等人正在开会，讨论要不要撤人。杨仲池觉得张春桥表态了，不撤会被动；全向东则主张坚决不撤。有人把陈卜昌介绍给杨仲池和全向东，这是他们第一次见面。陈卜昌问：

“你们觉得自己错了没有？错了，就缩回去；没错，就坚持下去。但是，这里公安局门口不待了，把人统统拉到人民广场去。我明天就动员我们厂的工人来支持你们。”

旁边一位人民无线电厂的工程师补充说：“这叫‘告天状’，古时候，告官状不得公正，就向老天告状呼吁。我们去人民广场呼吁，让全上海的老百姓来评评理。”

这个工程师还说：“我明天就让厂里来装广播喇叭。”

从 6 月 4 日开始，陈卜昌每天下午 18 时至 23 时，就开着一辆有四个高音喇叭的小宣传车，在市中心人流密集的敏感地区作“支联”宣传。许多群众就跟着车听，宣传车慢慢的前进，听广播的人也愈跟愈多……

陈卜昌貌不惊人但口才出众。他的鼓动演说非常吸引人，而且从来不打草稿，也不装腔作势，语言通俗贴近群众，一口非常流利而标准的上海话，既慢腾腾又笃悠悠的娓娓陈述，脸上毫无表情，但所讲的大道理通俗易懂。处于社会底层的普通老百姓，就喜欢听他的讲话，好像是听引人入胜的小故事。人们一边听陈卜昌的讲话，一边还不时地齐声高呼“‘联司’必胜”和“‘东方红’必败”的政治口号。就这样，陈卜昌在上海几乎成为家喻户

晓的人物。

6 月 14 日下午 16 时，他们在人民广场召开“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声援上柴联司誓师大会”。很多人都是冲着上海汽车配件厂陈卜昌的演说去的。人们喜欢听他演说，像是听故事，戏称他为“小热昏”，就是过去上海一种曲艺。用 4 辆大卡车搭起的临时主席台上，陈卜昌首先发言，一场演说听下来，大约只有 20 分钟的发言中，被听众热烈的掌声打断 20 余次，叫“对”11 次，叫“好”3 次，喊“支联”口号 9 次。然后“联司”的支持者们纷纷上台发言，并散发《宣言书》。会后，许多工厂支持“联司”观点的团体纷纷去人民广场表态、发言支持“联司”，或者为“联司”提供物质支援。

人民广场附近南京路上，上海最大百货公司----中百一店，自六楼楼顶向下，刷出每个字足有两平方米的两条巨幅标语：

联司必胜！

东方红必败！

在 6 月 14 日的大会上，全向东在发言中说：

“我已经派人去山东调查张春桥，看来他是个叛徒。”

此话一出，下面鸦雀无声。旁边的陈卜昌见状，赶紧打圆场，淡化全向东的这几句话。

会后，几个主要负责人讨论时，都认为没必要这样明显地反对张春桥；陈卜昌也认为不能给自己树立这样一个劲敌，虽然他对张春桥一直非常反感，认为他是“政客”。

王洪文开始注意“全向东”，下令搜集“全向东”的“反动言论”。后来，《工人造反报》曾以大半版篇幅刊载了《“全向东”

在文化大革命中部分罪行录》。这份《罪行录》中，详细摘录了“全向东”的“反动言论”，指责他“阴谋策划”上海第二次大乱。

《红卫战报》发表的《“支联站”必须立即解散》一文，“批驳”了“全向东”的“上海必须第二次大乱”。这篇以《红卫战报》编辑部名义发表的文章，已经把“联司”当作敌人了

王洪文在“支联站”安排了一个卧底，是与戴立清同厂的陶国正，他也参加过“工总司”的筹备会议，但从未在“工总司”总部工作过。他对“联司”负责人说自己受王洪文排挤，要加入“支联站”反对“工总司”。王洪文让陶国正只与自己和交大“反到底”的杨小兵单线联系。

6 月中旬的一天，王洪文将“工总司”主要负责人召到华山路 891 号的上海警备区支左办公室，原来陶国正送来消息，说“支联站”几次开会，都有人提出要绑架三王一陈，即市革会的王承龙、“工总司”的王洪文、王明龙以及陈阿大。王洪文将大家召在这里，商议对策。

为防止“工总司”办公室被砸或人被绑架，他们决定在“工总司”总部外再设两个点作为总部主要成员开会用：一处是华东物资局联络站，这里离“工总司”总部大楼近、方便，但是在“联司“们的活动范围内。另一处就是位于华山路的上海警备区支左办公室。这里远离“联司“活动范围，又有军人站岗。他们借用这里的一间办公室用。因为所借办公室电话号码是 370888，大家就将这个办公室简称为“888”。陈阿大、叶昌明、戴立清等就住在支左办的对面，旁边是部队食堂，生活很方便。

这边有风，那边就有声。6 月 23 日，“联司”大量印发了题为《警惕又一个血洗上柴厂的反革命阴谋计划!》的传单。传单写道：“现在还隐藏在专政机构中的一小撮坏人……他们正在酝酿一个更大规模的镇压‘联司’、‘血洗上柴厂’的反革命计划，可能今后半月之内出现血洗上柴。”

过了 3 天，6 月 26 日，“联司”又印发了传单《大规模洗劫上柴厂的计划在行动》和《血洗上柴厂前奏》，很具体地指出：“市革命委员会政法指挥部在上海青年宫开过秘密会议，决心 7 月 5 日以前踏平‘联司’”。

6 月 28 日，“联司”在上海柴油机厂集合部众，杨仲池大声疾呼：“我们要杀出去，杀向政法指挥部，杀向公安局，杀向社会!”

第二天，6 月 29 日，终于爆发了“六二九”事件，震动上海。

6 月 29 日当天，上柴厂再次爆发大规模武斗。当时的《工人造反报》以整版篇幅描述这次上柴厂的“六·二九”事件：

“十时左右，‘支联站’的人陆续调入厂里，在‘联司’成员陪同下察看了有关地形；十时半光景，‘联司’成员集结在各分部，有的排成队，在中央大道喊着口令作战前操练；十一时许，在‘联司’头头的指使下，弄了一批杨梅到武装部、武装民兵宿舍楼下叫卖，施展‘调虎离山’计，把一部分武装民兵诱出宿舍。同时，‘联司’成员吴信昌，奉命突然闯入电话总机房，借‘修理’为名，控制了电话总机……中午十二时之后……在一声声刺耳的哨子声中，一批批‘联司’和‘支联站’的成员，在指定的

地点集合，穿好厚帆布衣服或棉衣，戴上柳条编制的安全帽，手执铁棍、木棒、弹弓，或者肩扛大铁锤、粗钢钎、水龙带，或者抬着长竹梯，打着红旗反红旗，别有用心地唱着‘下定决心，不怕牺牲’等歌曲，急速地奔向早就分配好的目标……”

这场武斗，双方受伤人员达 200 多人，伤势较重的有 50 多人。武斗的结果是：上柴厂“东方红”被赶出了上柴厂，只能住到市革委会 33 号的上海大厦。

6 月 29 日当天，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发布《通告》，要“制止上柴厂武斗”。

6 月 29 日晚上，主持市革会工作的王少庸在外滩的市革会大楼底层会议室召开碰头会，专门讨论“联司”问题。会上，驻沪三军领导主张用武力取缔。王少庸不同意，让王承龙向在北京的张春桥打电话请示。电话接通后，王少庸征询张春桥意见，张春桥说：“不要急，乱透了，群众会起来的。”于是，会议决定暂不采取武力行动，先展开舆论攻势。

6 月 29 日子夜 24 时 30 分，“联司”和“支联站”又在位于市中心的大世界与那里的反“联司”群众发生冲突。起因是大世界的人要在自己楼外悬挂反对“联司”的标语，“支联站”的人便以“有人从青年宫楼上往下洒杀虫剂 666 粉”为由，冲进大世界，并将里面近百张尚未贴出的反对“联司”的大字报，拿到门口烧毁。火光惊动了沉睡中的上海市民。大世界的广播台高喊“要文斗，不要武斗”，一直到清晨 5 时 30 分才结束。

6月30日，《文汇报》、《解放日报》都全文刊登了“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六二九通告》。“联司”在舆论上顿时陷入

被动。

继之，“工总司”发表题为《坚决拥护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六二九”通告》的文章，称：“我们警告上柴‘联司’一小撮头头：你们必须悬崖勒马，不要一误再误了，否则是绝路一条。”“本部所属各基层组织，一定要站稳立场，不要偏听偏信，一定要坚决贯彻执行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六二九’通告……”

这时，又接到消息，一批群众在“支联站”鼓动下冲击学生组织“红三司”，冲砸西藏路的光明中学校门，火烧传达室，还连续三天冲击手工业局的一座楼房。双方大辩论的时候，有人将南京路上一辆同情上柴“东方红”观点的人驾驶的摩托车推翻，点火烧毁。此事恰巧被住在和平饭店楼上的外国人拍了照片，并在国外报刊上登了出来。徐景贤看到国外的报道和照片，非常生气，认为这样做就是要搞乱上海，当即下达指示，要《文汇报》和《解放日报》收集“全向东”和上柴“联司”的言论，编成几版报纸版面，加上批注，夹在《文汇报》、《解放日报》里发行，对“联司”发起凌厉的宣传攻势。

针对《解放日报》、《文汇报》的表现，“全向东”批评《解放日报》、《文汇报》是资产阶级喉舌，是资产阶级代理人，而且说上海政宣部门的权力掌握在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手里，并且提出：“徐景贤、王洪文是新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市革命委员会必须改组！徐景贤、王洪文必须从市革命委员会滚出去！”

他们从南京路市百货一店高楼上挂下来几条大标语，上面写着：“打倒陈、曹黑秀才！”一看就知道是指徐景贤。

6 月 30 日下午，王洪文以市革会领导人身份，与“工总司”

的潘国平、叶昌明、陈阿大等，还有驻沪三军支左办公室的刘政委，联合慰问上柴厂武斗中被打伤的“东方红”伤员。

7 月 1 日，“工总司”召集对上柴“联司”问题座谈会，王洪文在会上说：“……如果不对‘上柴’的事情采取措施，他们越来越嚣张。看看他们的矛头是对谁？是不是反对革命委员会，反对张春桥？”

当天，王洪文和徐景贤以“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名义，在人民广场举行大会，“愤怒声讨‘联司’和‘支联站’”。“联司必败”的口号声，从成千上万的喉咙里喊了出来，在上海上空久久回荡。

随后，上海市革委会邀集上柴“联司”和“东方红”两派的头头到衡山饭店谈判，市革命委员会领导全去了。但是会上“联司”和“东方红”双方争论不休，谈判没有结果。

接着，市革命委员会的几个领导商量，决定再登门去跟“联司”负责人杨仲池商谈，希望他们先让“东方红”的人回到厂里，然后在厂里开展文化大革命，同时双方要继续抓生产，不能把生产停下来。

于是，上海市革会的徐景贤、马天水、王少庸、王承龙 4 人，每人后面各带一个警卫员，直接来到“联司”总部。王洪文没去，因为“联司”对他意见很大，怕他去了会出事情。杨仲池接待了徐景贤他们。

此时，全市“支联站”已发展到 627 个。杨仲池完全没把徐景贤他们放在眼里。一个群众组织的负责人居然敢对市革命委员会持这种态度，徐景贤他们从没见到过，心里很生气，但都忍住

了。杨仲池坚持自己的观点，认为错在“东方红”这边，他们是正确的，并指责市革命委员会拉一派，打一派，支持一派，反对一派。但是最后他还是同意让“东方红”那一派回厂。

## 第 706 回：抵昆明，谢富治立即工作　七月一，再接见兰州军区

此时，已经飞抵昆明的谢富治、王力不敢懈怠，立即展开调查。6 月 29 日这天，他们参加昆明军区、云南省军区两级军区党委联席会议。

6 月 30 日下午 15 时 10 分，谢富治、总参作战部部长成学俞、贵州革命委员会主任李再含等人又在昆明接见了“823”26 名代表。谢富治首先明确告诉大家，他们“都是毛主席派来的。”并代表毛泽东、林彪、党中央、中央文革小组、全军文革小组，向云南的“823”派、“炮兵团”派以及云南造反派问好。

这时，黄兆琪心情激动地带领大家高呼：“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谢富治接着说：“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接受了‘823’、‘炮兵团’同志的问候。”

他说：“我们到了昆明，在军区开了几天座谈会，昨晚上很高兴看到了你们‘823’很好的一个决议。已经全文发到了北京，毛主席已经看到了。你们‘823’的同志要跟‘炮兵团’搞联合，搞团结，要进行整风，我们很高兴，这几条意见是很好的。”

“两级军区现在也是抱这个态度，批评和自我批评，在党中央及中央文革小组领导下，解决大联合问题，团结的问题。”

接着，“823”负责人杨树先开始汇报。当谈到部队院校的两派斗争时，谢富治说：“可不可以军队本身的文化大革命，你们不要去参预，军队在‘三支’上是肯定要参预的。但本身的文化

大革命不要去参预。军队院校也不要参预地方的文化大革命。你们‘11·8’、‘11·7’，两派都联合起来嘛，在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下联合起来。”

当杨树先检查自己组织工作做得不够时，谢富治说：“你们要多作自我批评。李成芳作了自我批评，张力雄也作了自我批评，批评很严格。老将作自我批评，你们小将也要作自我批评。”

“你们在北京时，我看有点骄傲，所以，我们对你们批评多一点。我们给‘炮兵团’说：你们也不要翘尾巴，不要以胜利者自居，否则犯错误，要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联合起来。毛主席在延安就说过：要多作自我批评。我们请北航‘红旗’的小将给‘炮兵团’做工作去了。”

当汇报到有关干部问题方面的情况时，谢富治说：“毛主席对干部一向很爱护，干部是我们的宝贵财富，对站出来的干部，只要敢站出来揭刘、邓、陶、李、阎的人，不管他们过去有多大的错误，不管他是什么人，都要支持。”

“我们临走时，毛主席指示，要爱护干部，要支持革命领导干部站出来，革命小将现在叫他们挂帅还不行的，有个过程，培养的过程，但小将是可爱的，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当汇报到联合问题时，谢富治说：“我有一个想法，下边每个单位，如工厂两派联合起来后，上面给谁挂勾呢？”

黄兆琪答：“上边也联合，上下一齐一起联合。”

李再含说：“先联合，有个过渡，后再成立革委会。”

谢富治说：“先由‘823’、‘炮兵团’联合，过渡一下。”“改变昆明的风气，掌握大方向。不仅不武斗、不打架，就是宣传车、

大字报、大标语的仗也不要打。”

6 月 30 日晚 21 时至 7 月 1 日凌晨 1 时 15 分，谢富治、李再含等人又接见云南“炮派”组织，原“新云南”代表。

谢富治照例是一番“代表”“问候”，接着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主席告诉我们：云南的事情依靠云南的广大革命群众解决，我们是来向你们学习。今天我们跟你们商量，怎么解决?是否这样?”

“炮派”头头李毅开始汇报情况，方向东还就 4．23 大会的情况作了补充。并对“六月提纲”做了自我批评。

谢富治：“我们今天在南屏街还看到下面是‘五月兵变’。上面是‘六月提纲’。”

方向东说：“我们有无政府主义。”

谢富治问：“上次到北京不是说‘新云南’的组织较好吗？”

答：“我们老老实实归口，‘新云南’解散了。”

李毅：“要解决云南问题，干部亮相问题很重要。刘林元死了。谢副总理曾说过刘是好同志、但叫他担任云南工作胜任不下。”

谢富治点点头。

李毅继续说：“赵健民贴了三张表态的大字报，就被严密监视集中火力打，三部电话机只剩下一部，还要拆，不能跟中央汇报。省委‘红光’是十足的保守派。周力原来是山西决死队的，李成芳的部下，李要他负责省委总部工作。现在是干部站出来一个打一个，即使是该打倒的，也允许他揭问题，给出路，但一个个被打成三反分子。”

谢富治问："是否有这种情况？另一派支持站出来的，你们要搞。"

李毅等："没有！我们只打倒周兴，他们'823'也喊要打倒了。"

李再含问："所有参加干部联络站的都斗吗？"

孙亮回答道："基本上是这样。"

谢富治："你们今天工厂来的很少，大都是学生。"

答："来了，7321 厂的。"

谢富治："同志们！我看武斗的问题，按康老的、实际是中央的六条。要两大派协商解决，看谁站得高，谁是毛主席的好战士。希望你们两家宣传中央六条通令，把武斗停下来。两派不武斗就无所谓制止武斗了。"

杨凯："准备明天传达中央指示。"

方向东："与'823'没有达成协议，北航的同志来说了一下，我们提出是否双方联合整风，未同意。"

谢富治："今天上午跟'823'讲了点意见，军队的事情，支工、支农、支左、军队内部的问题，他们自己去搞。不要参与你们，你们也不要参与别人。这个意见在北京，江青同志就提出过。军队回军队，学校回学校。"

众人说："我们赞成，我们就是老老实实地归口。"

李毅："我们希望尽快跟'823'达成协议，希望李政委大力协助，改变立场。"

谢富治："风格要高一点嘛！首先是大家联合起来，批判、彻底批判，彻底肃清，把他们肃清。""昨天是开了会，开到 3、

4 点钟，李成芳他们两级军区作了自我批评。他们（北航的）很受感动，说这个问题，我们要向老将学习。解决内部矛盾，像康生、江青所说，有意见可以送大字报、小字报。……今天找你们商量，相信云南两千万人民。三相信嘛！相信群众、相信人民解放军、相信干部的大多数。绝大多数是在北京解决。四川解决一个成都，还是解决一个重庆，希望把这个问题下面解决。按毛主席的意见，要由云南几十万人民解决。主席认为：云南存在着解决这个问题很好的条件。希望你们在全国做出一个很好的范例。我们是来向你们学习，帮不了多少忙。”

谢富治最后问：“今天的会是否继续开下去？”

李湘说：“关键在于如何监督贯彻执行。”

7 月 1 日，康生、关锋、杨成武在北京再次接见兰州军区和甘肃省军区两级军区的负责人，把中央批示的两个文件发给他们，向他们传达了毛泽东 5 月 14 日的批示，并一段一段地讲解文件，严厉批评了詹大南。

7 月 1 日后，参加“甘肃文革问题座谈会”的人开小会，帮助詹大南进行检查，写出纪要。并由康生和关锋提出修改意见。进行了修改，讨论。最后报到中央。

7 月 1 日、2 日，远在昆明的谢富治、王力，连续召开部队干部座谈会。谢富治说：“我们已经来了 6 天了。今天这个军队的会议不算，已经开了 7 次会议了。就是两级军区，两个军，还有个别师，开了 7 次座谈会。短的 3 个钟头，多的 6 小时，一共开了 7 次了，主要是听同志们的意见。两大派开了 3 次，每次大概也是少的 5、6 小时，多的 8、9 小时，主要是听取他们的意见。

今天，这个会已经开 12 个半小时了，除了一小时吃饭外，整整开了 11 个半小时，主要是听你们的意见。”

他依然是强调大联合，说：“为什么讲这次在两派问题上发生了严重的错误呢？因为这一个错误是支持了一派，压了一派，这就不利于左派队伍的联合，这就违背了当前主要的大方向，也违背了毛主席要我们团结大多数的教导。总之是不利于革命的大联合和团结多数的。”

对军管问题，谢富治说：“军管会就是为了不要军管会，军管就是为了不要军管。昨天我说了，凡是不重要的，不是关系国计民生的地方，一概不要军管。凡是左派占了优势的，不要军管。只有那个地方是几派对立，又是关系国计民生，天天打架，生产根本不能维持，要去管它几天，除了这些地方，你都不要管。那个不是关系国计民生的地方，天天在打架，你让他去打嘛！他反正又不生产大炮，又不生产机关枪，又不生产大米，又不生产什么，他高兴去乱你就让他乱嘛！那有什么坏处？何必要去军管呢！”

“我们要坚持大方向，每天千千万万的现实的事情多得很，我们要坚定地掌握大方向，不为那些各种各样的事物，那些现象来干扰。”“刚才我们看了你们报告电线厂多少人打架，打死人呐！我们就马上派了几个人去看，去一看，根本没有那回事，不是那么严重，根本就没有那么严重，讲得不得了啊！讲得不得了呀！不得了呀！根本没有那么严重。根本没有那回事！”

如何解决云南问题？谢富治说：“有两种可能，一种是就地解决，一种是解决不了。”

“昨天给‘823’和‘炮兵团’的同志们讲了，我们要马上返回北京。云南问题就地解决，要有个明确的态度。”“昨天会议开得比较好，大家都敞开思想作自我批评，都有一些解决问题的计划，一些方案，也还比较诚恳。当然，这些头头们，要想把各自的十万、八万人或二十几万人都代表了，也是比较困难的。但是，广大的人民，绝大多数的群众都愿意联合，不愿意打内战；吵吵闹闹，总是少数。所以从我们给他们开的三次会议来看，每次会议都有进步。看起来，他们都还有希望，我们要相信群众，相信广大的革命群众。”

“但是，关键目前是在军队。我们是三相信三依靠，群众是基础，但是目前解决问题关键是军队，军队的关键又是两个军区，昆明军区和云南军区。所以我们这次的力量主要是做军队的工作，了解情况比造反派那方面花得时间长。刚才讲已经谈了 7 次了，今天算是第 8 次了。昨天那个大会不算，要算是第 9 次了。”

“那次两级军区的党委会，很多同志都作了自我批评，张力雄同志作了自我批评。那个会议开得很好，主要是李成芳作了自我批评，主要的责任他都担负起来了。但是，第二天就出了传单，就把那个会议的内容传开了，本来那个会议是很好的气氛，可是一出来就糟了。又出得不好，当然也没有什么。今天李成芳又作了检讨，我同意刚才再含同志的估价，欢迎这个批评，欢迎这个自我批评。”

“我希望今天在座的两个军区、两个军、空军、铁道兵、炮兵、37 师的同志们，大家都要为就地解决云南问题做出贡献，做出努力。不管过去有多少错误，多少缺点，多少问题，都要为

当前毛主席交给我们的重大任务，就地解决云南问题做出贡献。”

“我现在看到军队机关还有点问题，我还有点关心，不大那么稳定。昨天开会那个会，给我的印象是很不好的，很不好的！啊呀，我看冲会简直有点生气，这是不行的！我们这个地方是西南国防重地，军队不能没有纪律，军队不能是无政府主义的。提建议开个会是可以的，有意见可以提，但你不能这样搞，不能这样搞，大家要重视，把军队稳定下来。国防这件事情中央都很关心，这个问题关键是干部，关键的关键又是在座的干部！要带头！军队不听招呼，可麻烦呐！一个内蒙古 2000 多人到北京，后来没有别的办法就动用武力。军队要进行教育。进行革命的教育，特别是两条路线斗争的教育，进行仇恨刘邓陶李阎的教育，进行阶级教育。同时要进行革命性、科学性和组织律性的教育，部队要听指挥。各级都要做思想政治工作，提意见可以提，但是要听指挥。我们外交部的造反派是很厉害的，那些翻译都是造反派，天天要打倒陈毅，但是接见外宾时，他还是老老实实的给陈毅当翻译。要守纪律，部队不能这样没有纪律，完全没有纪律不行。机关也是一样，机关不能去影响部队。有几个地方，一个是内蒙古，一个是四川，山东也有一个时期，别的地方也有苗头。内地还不要紧，云南就不能这样子。特别是云南的两个军，不能够马马虎虎的。军队要支持闹革命，支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支持造反派，这要明确坚定，但是军队要守纪律，不能随便没纪律。”

“前天我给造反派讲了，军队本身的文化大革命，地方不要参与，地方学校我们也不要参与，我给他们两派协商，他们两派赞成。”

“这是和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不一样的，是两回事，那个不参加还得了呀！那不就违背了毛主席的指示吗？这是讲军队搞文化大革命的单位，讲的是这一部分，文工团呀，体工队呀，什么学校呀，你们不要去参加人家。人家也不要去参加你们，自己搞就是了。当然接受人家一点经验也是可以的。就是不要去参加，两边都不要去参加。协商嘛，这样对军队有好处。我给‘823’、‘炮兵团’协商，他们赞成这个办法，而且他们已经做了。军队的同志也可以和他们协商，但是也不要下命令，下个命令不顶事，我讲的也不是命令，只是和你们商量，商量通就做，商量不通就拉倒，最好是商量通，这对军队有好处。”

“今天就没有别的事了，都讲完了。我觉得今天我和刚才几位同志讲的都不成熟，不要到外面去到处宣传。你去一传达，明天又不知出几张什么大字报，又是说某人讲的几点，各取所需，简直是毫无根据的，你没有那回事，他都可以给你贴几条。如果你讲十多二十分钟，他就可以给你贴十来八条，简直多得很的，恐怕越搞越搞成习惯了。”

7 月 3 日晚，昆明地区群众组织在昆明东风体育馆及其他分会场举行盛大集会，热烈欢迎谢富治、王力等人 。谢富治、王力、李再含在会上发表讲话。

7 月 4 日凌晨 4 时 15 分，谢富治在李成芳、陈康，刘懋功等陪同下来到昆明机床厂，该厂“118 兵团”群众组织和工厂群众在厂门口热烈欢迎。李成芳向谢富治介绍了“118 兵团”负责人唐国礼，谢富治与他握手，说：“我们看看大字报。”

谢富治在唐国礼等人陪同下观看他们厂的大字报。当看到署

名为“51 兵团”的大标语时，谢富治问唐国礼：“你们还有一个组织叫什么？”

唐国礼答：“叫‘51 兵团’。”

谢富治又问：“可不可以去看看？”

唐国礼答：“好。”随即陪同谢富治来到“51 兵团”。“51 兵团”的群众用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迎接谢富治。

谢富治问:“你们还武不武斗？”

唐国礼答：“我们没有武斗。”

“51 兵团”的人也说：“我们也没有武斗。”

谢富治说：“你们应当联合起来才好!”

群众高呼口号：“毛主席万岁!”

谢富治把“118 兵团”负责人唐国礼和“51 兵团”负责人胡希平拉在一起，紧握他们的手说：“你们要联合起来!”

谢富治离开“51 兵团”，在“热烈欢迎毛主席派来的亲人”的口号声中，又来到“118 兵团”团部。

谢富治一坐下便问道：“你们的生产搞得怎么样？”

众答：“搞得不好。”

谢:“你们这个厂是个很好的厂，我来过好几次。”接着又说：“你们厂发生过一次武斗吧？是五·二……”众答：“是五·二六。”

这时“118”负责人姜福志说:“那次我们有十几人被打伤了，有好些还住在医院里。”他指着在座的刘福海说：“这是我们兵团的负责人刘福海，被打伤了，还住在医院里。”

谢富治问：“‘51 兵团’有没有被打伤的？”

胡希平等未答，姜福志接着说："我们了解了，没有。"

谢富治说："你们要坚持文斗，反对武斗，要听毛主席的话。'118'和'51'兵团要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上联合起来。"

谢富治又问了工厂的生产情况，要求他们："应该把生产抓起来，有什么问题在业余时间来辩论。我们要好好读毛主席的光辉著作。'118'兵团和'51'兵团要联合起来。"

7 月 4 日上午 10 时许，谢富治等人离开昆明。在登机前，他们接见了到机场欢送的《云南日报》"全无敌战斗兵团"、"新闻兵造反团"的代表和驻报社军代表。谢富治问："报纸出了没有？"

军代表送上试版后的当天报纸大样说："报纸要套红，还没有印出来。"

谢富治接过大样，非常高兴地与代表一一握手，对代表说："报纸要检查一下，快，但不要出错。昨晚看到街上的大字报和标语，有关《云南日报》方面的很多，有的写'启封'了的，有的写'复刊'了的，有的写'新生'，有的写'诞生'，众说不一。也有写'出版'了的，这个好像是中间派的说法。报纸不要站在哪一派，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把报纸办好。"

他再一次和军管会的负责人一起与报社代表和军代表握手，热烈祝贺《云南日报》出版。

谢富治、王力走后，7 月 9 日，《云南日报》登载经中央文革批准的《打倒阎红彦，砸烂阎王殿》的社论，公开点名批判省委书记阎红彦，昆明大批判的火力在万炮重轰省委、市委内"一

小撮走资派”,“斩断党内最大走资派伸向云南的黑手”的口号下，层层上挂下联，揪斗各级领导干部。

7 月 12 日，昆明军区党委向中央上报《关于解决云南问题的意见》。《意见》承认：解决云南的问题，首先是解决昆明军区和云南省军区两级军区的问题。《意见》肯定：“823”和“炮兵团”都是左派组织，两派的分歧，是人民内部矛盾。《意见》建议：增补陈康、张力雄二人为省军管会副主任委员。《意见》支持原省委书记处书记赵健民站出来。

## 第 707 回：送像章，引发缅甸大反华　“五一六”，第四次见豫代表

“文革”开始后，中国许多驻外使馆人员、援外人员、留学生乃至有些华侨，不看对象，不考虑驻在国的法律规定，强行发放《毛主席语录》、毛主席像章及“文革”宣传品，甚至同外国人会谈时，也要先念《毛主席语录》。一天，周恩来在钓鱼台陪来访的巴基斯坦空军司令吃饭。刚一坐下，服务员就在旁边念起《毛主席语录》：

“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全世界人民要有勇气，敢于战斗，不怕困难，前赴后继，那末，全世界就一定是人民的。一切魔鬼通通都会被消灭。”

周恩来事后批评他们说：“毛主席语录不要乱用，不然就没有什么针对性了。巴基斯坦是我们的间接同盟军，这样做不对，你这样做就等于骂他，牛头不对马嘴。吃饭时也读语录不恰当。每个民族都有民族自尊心，强加于人，适得其反。”

周恩来多次批评对外宣传强加于人的极“左”做法：“中国专家挂毛主席像章是我们的权利。外国朋友要，我们不好不给。但是，驻在国政府不让他们本国人员挂毛主席像章，我们就不能因此说他们反华。我们热爱自己的领袖，也要尊重人家的领袖。”

他说：“对外宣传要见缝插针，见缝插针也得有缝才行，铁板一块就插不进去，硬插，针就断了。见缝插针插得进去，见缝插棍子就不行，不能倾盆大雨。”

1967 年 6 月 13 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判决印度驻华大使馆二等秘书鲁冠南间谍罪，驱逐出境，宣布印度大使馆三等秘书维杰为不受欢迎的人，限其 3 天内离开我国国境。6 月 17 日，中国外交部就印度政府策划的袭击中国驻印度大使馆的暴行，向印度政府提出严重警告和最强烈抗议。6 月 18 日，以北京大中学校红卫兵为主的群众也砸了印度驻华大使馆。

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时，在邻国缅甸的仰光，也在发生一场“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首先是仰光大学就读的华人学生们，在胸前佩带毛主席像章。进而，学生中也成立了“红卫兵”的组织，还开始了“革命的大辩论”。

过去，英国殖民者在缅甸曾搞了一个组织，向缅甸的年轻人发送徽章，要求参加该组织的成员都要佩戴这种徽章，目的是为了效忠英国女王。因此，缅甸方面对像章的事特别敏感和忌讳。缅甸政府曾制定了一条法令，不允许学生佩戴外国徽章。

从 1967 年 6 月起，缅甸多所华侨学校要求学生摘下毛主席像章，学生不答应，中缅双方民众多次发生冲突。

6 月 22 日，仰光原中国女中的缅甸学校当局强行夺取并污辱华侨学生佩戴的毛主席像章，激起华侨学生反抗。

6 月 23 日，缅甸当局封闭中国女中等两所华侨学校。当天，中国就上述事件向缅甸提出最强烈抗议

6 月 26 日，仰光市 2000 多民众袭击这两所华侨学校，打死华侨一人，打伤、逮捕数人。中国使馆人员赶赴现场后，也遭凌辱。当日，中国政府就此事又一次向缅甸政府提出最强烈抗议。

第二天，27 日，数百名缅甸人多次袭击中国大使馆、新华

分社、民航办事处等，并冲入院内大肆破坏。

6 月 28 日，缅甸 2000 余人再次袭击中国大使馆，尽管缅甸政府调军队到现场劝阻，但还是有一些人冲入了大使馆，中国援缅专家刘逸被暴徒打死。中国信使等 5 人被打伤。与此同时，中国驻缅甸其他机构、仰光华侨居住区、侨校、侨团等均遭到袭击。华侨被打死数十人，被打伤、逮捕数百人。缅方当局封闭 9 所侨校。

当天，韩念龙副外长召见缅甸驻华大使，强烈抗议缅甸政府唆使暴徒连续袭击中国使馆，杀害中国专家，迫害中国侨胞。

当晚，缅甸当局宣布对中国使馆地区、华侨居住区等地实行军管。

6 月 29 日，中方发表声明最强烈抗议缅甸政府的罪行，并指出，中方决定不再派大使，并将根据情况发展采取其他必要措施。

当天，《人民日报》头版头条以醒目标题：《缅甸政府唆使暴徒袭击我使馆杀害我专家迫害我侨胞，我国政府向缅甸政府提出最紧急最强烈抗议》，刊登了我外交部给缅甸驻华使馆的照会。

从 6 月 29 日起，北京几十万群众连续在缅甸驻华大使馆门前举行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使馆外的墙上和门前马路两旁，贴满了密密麻麻的声讨大字报和大标语。周恩来打电话给外交部和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群众只许在使馆外面示威，绝不能冲入使馆，更不能伤害使馆人员。

6 月 30 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继续刊登：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发表声明，最强烈最严重抗议缅甸政府的反华排华的法西

斯暴行。

6 月 30 日，北京各界群众 40 万人到缅甸驻华大使馆示威游行。

7 月 1 日，中国外交部向缅甸驻华大使馆转交中国政府备忘录，严正拒绝缅甸政府在 6 月 29 日备忘录中提出的要求中国政府阻止中国人民抗议缅甸反华暴行的示威游行的要求，并再次要求缅甸政府立即撤除缅甸军队对中国大使馆和华侨居住区的包围。

7 月 3 日，北京各界群众数千人在首都机场，迎接被缅甸暴徒刺杀而死的中援缅专家刘逸的骨灰，欢迎被缅甸暴徒打伤的中国外交信使曹达林和张瑞琏。周恩来、陈伯达、康生、陈毅、李先念、刘宁一、杨成武、张春桥、关锋、戚本禹等负责人前往机场迎接刘逸的骨灰。正在北京的缅甸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副主席、缅共中央代表团团长德钦巴登顶同志，缅甸作家叶贡，也到机场迎接。到机场迎接的还有各有关方面的负责人廖承志、方毅、傅作义、罗贵波、韩念龙、李一氓、李强、楚图南、王唯真、沈图、聂元梓等，以及中国原驻缅甸大使耿飚和从印度尼西亚和印度归来的中国外交干部的代表。

7 月 3 日下午，北京群众组织和文艺界群众在故宫午门召开了 10 万人的“首都红卫兵强烈抗议缅甸反动政府反华暴行大会”。出席大会的有：郭沫若、关锋、戚本禹、韩念龙、耿飚、张奚若、楚图南、王唯真、丁国钰、李四光、竺可桢、吴有训、于立群等和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负责人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及文艺界的：金敬迈、李英儒、舒世俊、陆公达、刘巨成、李劫

夫、杜近芳、钱浩梁、李丽芳、钟润良、刘景芳等。

郭沫若首先在大会上讲话。他说，奈温反动政府的疯狂反华，绝不是偶然的。那是出于内政外交上的需要。郭沫若指出，中国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像春雷滚动，震撼着全球。红卫兵小将“造反有理”的吼声响彻全世界全宇宙，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迅速地注入世界人民的心田，缅甸人民的革命烽火，在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东风鼓动下，越烧越旺，缅甸反动政府的丧钟敲响了！郭沫若说，我们坚决拥护我国政府和外交部的严正声明，并严正警告缅甸当局：伟大的中国人民是不可侮的，七亿中国人民的铜墙铁壁是坚不可摧的！他说，正在浴血奋战的缅甸共产党的光荣战友们！你们是响当当的革命造反派，你们为着祖国的解放，为着反帝、反修，为着共产主义事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我们和你们是休戚相关的阶级兄弟，我们要和你们紧密地团结在一起，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勇敢地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

在京工作的缅甸专家郭迎高，在极其热烈的掌声中讲话。

首都红卫兵代表魏阳在讲话中愤怒声讨缅甸反动政府的法西斯暴行。

缅甸归国华侨代表粟秀玉在大会上讲话。

大会在愤怒的口号声中通过了由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负责人韩爱晶宣读的《抗议书》。

会后，十多万首都红卫兵和文艺工作者，抬着毛泽东画像，高举红旗，高呼口号，涌到缅甸驻华使馆门前，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抗议示威。

当游行队伍来到缅甸驻华大使馆门前时，愤怒的情绪更加沸腾起来，千万只拳头一齐挥动，千万人同声高呼："打倒缅甸奈温反动政府！""为死难的烈士报仇！""血债要用血来还！

在卫戍区部队的严密控制和疏导下，示威群众未能冲进缅甸驻华使馆办公楼，但砸了大使馆的一些设施。

此时，北京的"首都 5·16 兵团"又开始了炮打周恩来的活动。6 月 20 日，财办粮食组组长、7 级干部何畏，与"首都 5·16 兵团"的张建旗、郭海燕谈话，表示"对总理一不是奴隶，二不畏惧。"

6 月 30 日至 7 月 1 日，在张建旗倡议下，"首都 5·16 兵团"在外语学院 5 楼开会两天，张建旗提出用整风方法在"516 兵团"内进行"两忆三查"，即忆"受迫害"、"受压迫"之苦，"查斗志"、"查动摇性"、"查工作"。这样，他们又鼓起了干劲，起草了一个"516 兵团"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决议》，正式宣布成立"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

他们在《决议》中说："代表大会一致认为，……周恩来是刘邓司令部的一员干将，是中国最大的反革命两面派，是中国最大的卖国主义者，修正主义者，右倾机会主义者之一。解放以来两次政治运动和文化大革命第一战略阶段，他都逃走了，他是十二月黑风的煽动主角，是全国自上而下的资本主义复辟逆流的总后台，是我国生产资料所有制和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党内出现的一股资本主义暗流的总后台之一，是最近全国发生一连串大规模屠杀的客观支持者，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企图把水搅混，篡党，篡军，篡政伸手来摘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果实的

中国第二个赫鲁晓夫式的个人野心家。我们‘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誓与以周恩来为首的反革命集团干将谭震林，李先念，陈毅，余秋里，谷牧等决一死战。”

“代表大会决议：《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成立政治部，作战部，组织部，资料政策研究部，并推选各部负责人，制定了各部阶段作战方案。”

此后，他们在国务院各部散发反对周恩来的传单，张贴反周标语。

自6月28日晚，戚本禹与河南三派代表座谈后，按照计划，7月2日晚21时40分至7月3日凌晨1时40分，在人大会堂安徽厅，周恩来、康生、肖华、戚本禹、叶群、刘建勋第四次接见河南赴京汇报代表团。汇报的单位有：河南“二七公社”、“河造总”、“十大总部”、开封“824”、河南军区及驻军师以上部分干部，首都红代会及军事院校部分代表。河南省委干部参加这次接见的有：纪登奎、耿其昌、王庭栋、文敏生、赵文甫、杨蔚屏、戴苏理。

开会前，8250等部队领导到纪登奎位前，与他热情握手。刘建勋进来后，军区司令员张树芝等人又都到刘建勋那里交谈。

接见开始后，周恩来首先请“十大总部”的代表发言。因为他们是最近才根据周恩来的指示来到北京，前几次接见都没有他们的代表发言。周恩来说：“我们刚才商量一下，先听‘八大总部’讲讲，后来的么！”

这时，郑州中学生组织“铁军”的十一中代表要求发言。

周恩来问：“你们准备了没有？你们‘铁军’什么时候成立

的？”

十一中代表答：“67 年 2 月 11 日。”

“你们有多少人？”

“7000 人。”

“这么多，都是郑州的吗？”

“都是中等学校的。”

“好，你讲吧，时间不要太长。一个同志发言，别的同志不要插话，不要喊口号、对吵，什么‘造谣’、‘阴谋’，便于弄清是非么！座谈么！”

当“铁军”讲到王黎之时，康生插话：“王黎之是什么人？”

“铁军”答：“是郑州市委第一书记，我们认为他是三反分子，要打倒他。”

当“铁军”讲到中学情况时，康生问：“你是几年级的学生？”

“铁军”答：“高三的。”

……

当“铁军”汇报“铁军”的历史，并攻击“二七公社”时，周恩来问：“你们对‘二七公社’这样对立啊？”

“铁军”代表说：“我们是两条路线斗争。”

周恩来：“什么路线斗争？”

“铁军”代表：“一个要革，一个要保，还不是路线斗争？他们保王黎之。”

周恩来：“省里的呢？”

“铁军”代表：“开始我们主张打倒刘建勋……”

康生：“对军区怎样啊？”

“铁军”代表：“支左大方向基本上是好的，但有严重错误。……我们‘铁军’是革命组织，军区不支持。”

康生：“你们既然是革命组织，军区不支持，军区大方向又是正确的，这不是矛盾吗？你们讲一下这是什么道理？”

“铁军”代表一时支吾，回答不上来。周恩来问：“你们认为‘造总’是什么组织？”

“铁军”代表说：“我们基本上认为‘造总’是个造反派组织。”

之后，“省直总部”的张治安又谈了他们“坚决打倒刘建勋”的情况。

周恩来问：“你们省直机关不大办事了？”

张治安答：“我们还办公，抓革命促生产，今年的公粮征购很好。”

当“省直造总”提到“二七公社”时，郑州大学“战斗师”要求发言。

周恩来问：“你是新来的吗？”

“战斗师”代表说：“从5月1号接到总理指示后就来了，一直没有发言。”

康生：“你等一等，听总理讲一讲。”

周恩来：“你们等等，‘十大总部’再找一个发言，让工人组织讲，三厂停工了吗？”

“省工总”代表说：“没有停，停了一个星期天。”

周恩来问：“7月1日游行是哪个方面的，是你们方面的还是‘二七’、‘造总’方面的？”

答：“我们‘十大总部’的。”

周恩来：“停产一天吗？”

答：“停了一天。”

周恩来批评说：“抓革命促生产，不能停产闹革命，不要把群众集中起来开大会，过节更应抓革命促生产，不要停工，这不是毛泽东思想，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

“省工总”代表说：“我们没有停产，我们是倒班。”

周恩来：“你这话是说服不了我的，纱厂三班倒么！”

“省工总”：“我们停产后又补上了。”

周恩来：“噢……”

“省工总”说：“……‘二七公社’的骨干组织都是右派势力，的确也有些造反组织。河南军区对工人阶级重视不够，一直不公开支持、不表态，对‘二七’广大革命群众区别对待不够……”

周恩来：“我想问一下铁路。河南铁路几处都中断了，你们三方面说好不好？”

大家齐答：“不好。”

周恩来：“既然你们三方面都说不好，能不能达成一个协议？使我们的铁路交通能够畅通。”

“十大总部”：“我们不知道，与我们无关。”

“河造总”：“这个事我们管不了，不是我们搞的。”

周恩来问：“豫北纱厂归哪派管？你们这里有没有豫北的？”

无人回答，全场暂静。最后，“二七”代表说：“鹤壁豫北纱厂不是‘二七’观点，是反‘二七’的，他们听说要宣布他们是保守组织，要到北京告状、要卧轨、扒车，解放军再三劝说，

他们不听。”

“十大总部”说：“总理，我要控诉‘二七公社’一小撮混蛋制造反革命停车事件……”

周恩来摆手制止：“我要知道的是当前的情况。”

“十大总部”：“我们只管郑州。”

周恩来：“你们‘八大总部’不管全省，‘河造总’呢？”

“河造总”：“我们只在郑州。”

“二七”代表说：“‘河造总’派人到豫北去，对我们‘二七’派的说：‘只要你们不打‘二七’旗号，我们就承认你们是造反派，就支持你们。’”

周恩来：“一点不往外发展，我不相信，‘二七’是全省的，那是观点相同么，你们观点不同，那你们为什么派人煽动啊？观点不同就要吵架，不行就要打架，打架以后先到郑州，郑州解决不了，就要到北京告状。”

“十大总部”的代表纷纷诉说原因，周恩来：“原因说不完，你们调查一下就知道这么一回事了，你说你们反对停车，那位也反对停车，你是‘造总’的，你说你更加反对，你们三方面都派人立即出发，铁道军管会帮助你们一起去调查。”

康生：“不光是调查，现在的情况是停车了呀！不要光说抓革命促生产，情况是车停了呀。运输不通，总理已讲了，五列，快车一列，客车一列、货车三列，主要是往北京方面来的，为什么停了，什么原因？是豫北纱厂300人，要到北京来告状，从今天下午起多次劝说无效，石家庄也是往北京的列车停下了。为什么堵塞？是河南1200多工人扒车不讲道理，进行工作无效。第三

种情况，洛阳和郑州车站军管会被扒车的人包围了，现在同志们面临着这种情况，车运关系到国计民生，整个国家的问题，面临着这种问题，这不仅是郑州的问题，河南的问题，更不是关系到哪一派的问题，是关系到我们中国的国家问题……总理说包括你们也在内到那里去，说服那里的工人，不能堵塞铁路，有的地方正在卧轨，这是很不好的，保证通车，这是第一个任务，然后再调查情况，发现情况，看是哪一方面的，这是第二个任务，如果光调查，车仍然停着，不如不去，你们要承担这个任务。”

周恩来：“要三方面一道去，康老把任务交待清了，我还说第三个情况，过去‘二七公社’在北京多了一些，因为过去受压迫么，‘二七’现在不要来了，因为中央对‘二七’有一定估价了，要动员在京的‘二七’的人回去，有这些代表就可以了，过去你们不知来了多少次，还有刘建勋在这里，一有问题就来了。”

康生：“你们想人多，跑到中央来几千人，压中央。一压就压垮了，那还像个样子吗？毛泽东思想是不怕压的。”

周恩来：“你们先去打电话，电话不通，你们还是要去的。第一要打电话，不要扒车，查查是哪个观点的，还是劝他们回去，吃的住的都很不方便，交通也停顿了，铁路关系到工厂，铁路不畅通工厂就窝工了，因为郑州四通八达，郑州这个关键不通，安阳不通，很不利了。现在请郑大后来的讲……”

郑州大学“战斗师”开始汇报。

周恩来动员“战斗师”和郑大“革联”联合起来。他说：“四川打架是不对的，青海是反革命政变了，内蒙犯了严重错误。前几天，江西冲军区夺枪了，我们劝他们，后来还了，是好的。中

央通令是有时间性的。犯了错误，不要抓住不放，不应该冲的就不要冲，随便冲不对，路口也堵了，领导机关不要看得太严重了，群众也不要来找事。”他要求：“三方面达成一个协议，不要写得太长，一、不要示威游行，二、不要互打互冲，再加一点，不要停工停产。现在许多厂在停产。还有一条，不要阻拦铁路公路运输，不要扒车卧轨，你们达成协议的文字打电报回去。”“给军区下命令， 不准动员农民带武器进城，民兵的枪支弹药，统统都封存起来，要建立互相信任，不要压倒一方，你们那样要求多了，就写这三条，军区，军分区要像江西一样，下命令责成军区人武装部、县城下命令，不准动员农民进城，河南军区行吗？”

何运洪答：“好！”

周恩来问康生：“是不是还开下去？”

各方代表还要求发言，周恩来：“你们发言一个钟头了，各讲10分钟吧，从10分钟就可以看出各派的倾向性了，各派的水平了。”

“二七”首先发言，讲了11分钟。

康生：“时间超过了1分钟，遵守总理的指示嘛，‘河造总’也只能超过1分钟。”然后将“二七”发言稿要去。

“十大总部”发言时，各总部互相争着发言。康生说：“刚才你们有个条子，不能把‘八大总部’看成一个总部，你们回去商量一下，今天时间到了，军区还要讲，省委干部还要讲，明天还要再搞一次，‘战斗师’明天发言。”

周恩来：“我有两个比较紧的事，今天，有一部分冲开封市革命委员会筹备委员会，对立起来了，我们希望‘824’打电话

回去。”

“824”回答说：“电话不通。”

周恩来：“我们给你们叫。”

康生对“824”说：“一定要按照总理指示去讲，不要添枝加叶的。”

周恩来：“‘十大总部’，实际是‘八大总部’，听说军区支持‘二七公社’，‘八大总部’就冲军区了，他们的办法是轮换班搞。”

“十大总部”各代表争相否认。

戚本禹：“不管哪个‘总部’，都要退出来。”

康生：“你们不能主观，说没有冲，我还听说不光冲了，还将一个刘副司令员搞走了。”

周恩来：“记者站、联络员回去把协议搞好，浙江的搞了一个很好嘛！拿给他们去看看。”

7月3日凌晨2时30分，周恩来在刚刚结束对河南代表的第四次接见后不到一个小时，又在人民大会堂安徽厅特别召见河南“二七公社”的王二杰、“河造总”王庆明、“八大总部”郑州铁路“造反总指挥部”的胡年运、蒋克敏，以及铁道部军管会杨杰、副主任王世范、业务协助小组娄铁成，针对河南近2000名铁路工人扒车进京告状一事作如下指示：

河南几派都是群众组织，中央都是承认你们的，在政治上是平等的。你们各派都派有代表在北京会谈协商，不需要再来了。来那么多人，成千上万来北京，妨碍抓革命、促生产，又影响三线建设，又妨碍备战、备荒、为人民，不符合最高指示。再具体

的说，这么多人怎么能向中央反映情况呢？你们应相信三方面的代表，应相信中央，相信毛主席，中央一定会商谈出很好的解决河南问题的办法来。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既能抓革命、促生产，又能把河南的革命群众组织都站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通过革命的大批判，实现革命的大联合，最后实现革命的“三结合”临时权力机构。这是河南人民，首先是工人阶级、革命农民、革命知识分子最光荣的任务。现在我派三方代表去，希望你们回到本单位闹革命。

王二杰、胡年运、蒋克敏、王庆明杨杰、王世范、娄铁成共同整理并签字

一九六七年七月三日于人民大会堂

## 第 708 回：七月三，无锡“六派”大撤离　定协议，广西七天无战事

7 月 4 日上午，宁静的南京街头上突然出现了一批身穿汗衫，短裤，拖着拖鞋的不伦不类人群，其中一些人手里还提着古巴刀，顿时引起了南京市民们的惊奇，交头接耳，指指点点，议论纷纷。原来，这是从无锡“六派”撤出来的“主力军”队伍，他们来到江苏省军管会，要求接见。

无锡的“6.27”事件，对无锡两派群众组织都震动很大。武斗的形势日趋严峻，并且还在不断地升级。如此下去，结果如何？

无锡轻院副院长何泄，是从军队转业到地方的师政治部主任，文革中表态站在“6.26”兵团一边，因此“6.26”的学生称他为“革命干部”。“6.27”事件发生后，他找到轻院“6.26”兵团中心组成员商量，建议将“6.26”兵团的学生撤出无锡，他的这一设想自然不会被血气方刚、执着纯真的学生接受。

6 月 28 日前后，无锡二中的匡建中发现国棉二厂已经停工，这里食堂、医院一应俱全，随即向总指挥部建议，派一队“主力军”占领国棉二厂，将此地作为“主力军”的后勤基地。当天，无锡“六派”就将他们的指挥部从轻院转移到位于周山浜的国棉二厂内。

6 月 29 日，无锡市两大派群众组织接到江苏省军管会通知，派代表赴南京谈判。在省军管会主持下，达成《关于制止武斗的五项协议》。

但是，7 月 3 日，以抗大一机校为首的一派群众组织又开始建立武斗据点，分设东、南、西、北、中 5 个片，企图控制市区。

这天傍晚，忙碌一天的“六派”总指挥陆渭文正在指挥部的沙发上休息，一个青年急匆匆进来将他推醒说：“我们‘六兵团’全体马上出发去上海‘休整’。”

陆渭文急忙翻身起来问：“是谁决定的？”

“我们头头通过何泄同意的。”

那人说完就匆匆离去。

陆渭文立即找来浦湘海，王明华等“兵团”负责人，召开了“指挥部”紧急会议，将“六兵团”私自撤出的消息告诉大家，然而分析说：

“‘六兵团’撤走上海，等于将我们目前防地的大门主动打开，火车站就暴露在对方面前，如果他们控制了火车站，我们指挥部就可能是‘瓮中之鳖’，情况是十分严重的。”为此，陆渭文建议：“立即将‘主力军’队伍撤出无锡。”

大家同意了他的建议。

但是，撤向何方？

有人说也去上海，陆渭文主张撤往南京：“理由两点，一、南京是省军管会所在地，我们可以名正言顺地去省军管会告状。二、南京的两派群众组织‘好派’与‘屁派’都是支持无锡‘主力军’的。”

陆渭文的撤离方案被大家接受，当即决定：22 时将撤离无锡的决定传达到兵团一级，23 时传达到群众。为了队伍的安全，不准提前走漏消息，并派周炳荣前往火车站，通知“铁道兵团”，

在今晚 23 时前为“主力军”撤离队伍准备一趟列车。因为“铁道兵团”头头陈志文、高汉卿、龚太泉 3 人都是车站调度室的，有能力调动列车。

22 时 30 分左右，周炳荣回报：“铁道兵团”已将一列有 20 多节车皮开往北方运煤的货车，停靠在“木专线”上候命出发。

一切准备就绪，在午夜 23 时 30 分左右，通知国棉二厂睡梦中的“主力军”群众转移。于是在国棉二厂内近 3000 之众的“主力军”男男女女，秩序井然的列队出发，登上了北去的列车。

当整个队伍撤离国棉二厂时，指挥部的警卫人员向陆渭文请示：“12 位常委怎么办？”

“全部带走。”

“还有几名俘虏怎么办？”

“就地释放。”

7 月的午夜天气闷热，在“主力军”队伍登上列车后，天空电闪雷鸣，大雨倾盆，列车在雷雨中启动，徐徐向北面方向开去。

7 月 4 日上午，从无锡撤出来的“主力军”队伍到达南京，他们要求江苏省军管会接见。中午，江苏省军管会梁辑卿、杜方平、吴大胜接见了无锡来的陆渭文、浦湘海等人。浦湘海向省军管会首长汇报了无锡发生的武斗，并请求省领导能给予支持。

梁辑卿、杜方平、吴大胜耐心地听完汇报，最后表示：“你们既然来到了南京，先把你们的人安排住下来，你们的问题由我们同无锡市军管会来商议解决。”

南京两派群众组织亦主动前来联系，拉无锡“主力军”这支队伍到他们单位去具体地落实吃、住等问题。南京军事院校的

“屁派”拉无锡的“革派联总”指挥部住进他们一处非军事区的大院内，主要队伍也集中在这里。其他学生等队伍，也被南京的“好”、“屁”两派群众拉进他们的单位。近千名学生被安排在中山路 307 号省委招待所内居住。

在“7.3”撤退中，还有一些距离国棉二厂较远的据点，如：市一中，湖光仪器厂等地，因为没有通讯设备，没有通知。当这些据点里的人第二天发现“突然寂静”的异常之后，立即打听消息。当得知“指挥部”已撤离的消息，他们也于 7 月 4 日凌晨之前，各自带上自己的队伍奔向了去上海的路。从 7 月 4 日清早开始，住在家中的“六派”群众听说他们的“指挥部”撤离的消息后，也纷纷逃往上海。

再说 7 月 3 日最先由李文庆带领的“六派”“六兵团”撤往上海。他们乘坐十多辆公交车，走常熟往上海方向而去，结果受到了常熟反对派群众的阻击，再转江阴，又遇困难，转辗路途，于 7 月 4 日上午艰难地进入上海。

从 7 月 4 日上午起，留在无锡各基层单位的“六派”群众纷纷被对立派组织所抓。无锡铸造一厂“主力军”头头鲍惠兴从“红总”平反后，特别在武斗期间，由于身体欠佳，基本上已退出了“是非”圈子，班不上，一直在家中打打扑克，消遣时光。谁知在“主力军”撤走之后，还是被本厂的对立面抓去一顿敲打还把他捆绑在电线杆上，身上绕满了绳子，直至他的颈部，鲍惠兴有气无力的瘫下去，结果被颈部的绳子勒死身亡，将尸体抛入太湖。这期间，太湖漂浮尸已不是一件新鲜事了。

不仅是无锡，常州“主力军”很快也被赶出常州，苏州的“踢

派”被打到城市的边沿，“踢派”群众不断地向外发出呼救。

7 月 3 日，广西军区按照周恩来 6 月 29 日夜晚第四次接见广西两派代表时的指示，召集“联指”头头和南宁市数名领导干部座谈，统一对“422”是造反派的认识，就如何贯彻执行中央《六二四通知》和如何制止武斗等问题进行研究。

同日，广西军区支左负责人还召集“联指”和“422”双方代表进行第六次谈判，继续讨论如何贯彻中央《六二四通知》和何制止武斗等问题。

7 月 4 日，广西赴京两派代表在北京达成《十条协议》，双方同意：

“不准抓人，不准私设公堂，毒打、逼供对方人员。已抓了的人应立即放出，不准扣留。”

“不准以任何借口动员农民进城，拦路、拦车，参加武斗。”

“坚决维护交通运输秩序，保证铁路、公路、轮船运输畅通无阻。任何个人，任何组织，任何单位不得破坏。”

“所有在外单位的人员在一星期内撤回原处（各群众组织原办公地点和工作人员除外）。”

“撤销武斗工事和囤集的木棍、瓦片、砖头、长矛、大刀等，取消高音喇叭和宣传车，消除武斗因素，保证″四大″和人身安全。”

“不准夺枪，不准开枪，各单位现有枪支由军区派员监督收回或封存起来，不准重新发枪。”

广西“422”赴京代表团曾春生、龙智铭、黄杰华和广西“联指”赴京代表团颜景堂、黄明发、廖伟雄及广西军区副政委王希

永分别在协议上签字。

周恩来指示将此协议："立即发给广西来京全体代表，并请两派和广西军区以明电和电话发回广西，转告全区照办。"

当天中午，南宁"联指"撤离在区人民医院、南宁市工农兵饭店和航运局等生产营业单位的据点。

此后一周内，双方按照协议各自从占据的据点撤出，广西进入短暂平静时期。

7 月 8 日，"联指"按照协议撤离集结在区文化大院、中华电影院、南宁市委、市一中、四中等据点人员。

7 月 10 日下午 15 时，"422"开始撤离朝阳百货大楼据点。17 时 30 分，"联指"全部撤离朝阳旅社据点人员。

但是，南宁的这次平静是如此的短暂，仅仅维持了 7 天。早在 7 月 7 日上午，广西军区召集广西大学"能闯"、广西医学院"星火燎原"、"南宁八三一独立兵团"等红卫兵组织头头座谈时，这些学生头头就提出：

1、武斗不是我们挑起的，我们是自卫还击；

2、从团结的愿望出发，说"422"是造反派还可以理解，但根据中央历次指示是不可理解的；

3、"422"受走资派操纵，勾结牛鬼蛇神，矛头指向解放军，大搞打、砸、抢，我们认为"422"是反动的；

4、"联指"单方面撤离据点是右倾情绪。

同日，广西军区派人同"422"和"联指"协商组成监督小组问题。"联指"方面提出：双方派出 3 至 9 人组成监督小组。"422"认为，"联指"的提议是非法的，双方应派出 20 人组成监督小组。

并说广西军区无权召集他们协商这个问题，应由南宁驻军来主持。

自 7 月 7 日开始，广西两派为落实 1967 年 7 月 4 日签订的《十条协议》中“双方代表共同组成监督小组监督本协议的执行”的条款，在军区的协调下进行了 7 次艰难的谈判。

7 月 10 日，广西军区三次召集“联指”、“422”代表举行监督小组筹备会，就监督小组名额、如何开展活动等问题进行讨论。后因“422”方面提出要桂林“老多”派代表参加而未达成协议。

7 月 10 日，“红色公安”和“南宁八三一独立兵团”在卫生厅大礼堂举办“永宁分局和永宁派出所惨案”展览。

7 月 11 日凌晨 1 时多，前往军区谈判监督停战事宜的“422”代表 5 人乘车从广西军区返回“422”指挥部的路上，在工人文化宫被“联指”绑架，蒙上眼睛坐车在市内兜数圈后放回。第二天，广西军区召开“422”、“联指”监督小组预备会时，“422”代表就此事提出抗议，发表第三号声明。“联指”代表当场承认错误，表示道歉。

7 月 12 日，北海市发生武斗。双方用石块、木棍对打，连打两天，共有 100 多人受伤，其中重伤 30 多人。

7 月 13 日，广西“联指”组织红卫兵到广西军区警卫连和区党校分部驻军 6984 部队抢走步枪、冲锋枪 300 多支、轻机枪 3 挺、60 钢炮一门和一批弹药。

14 至 16 日，军区召开多次会议，讨论支左工作问题、制止北海武斗问题和贯彻“禁止农民进城武斗”的中央指示问题。

7 月 16 日晚 9 时 30 分，广西军区支左办召集“422”、“联

指”就成立监督小组问题进行第六次谈判。

7 月 19 日上午，广西军区再次召集“422”、“联指”代表就成立监督小组问题举行第七次谈判。会上因“422”代表坚持要桂林“老多”参加监督小组，“联指”反对，引起争吵，未达成协议。双方要求军区提出意见。军区提出：先建立监督小组的筹备小组，任务是：

1、继续就“老多”参加监督小组问题进行讨论、协商；

2、解决、处理急需解决的问题。双方同意回去研究。

当晚 21 时至次日凌晨，军区召集双方就以上两点建议进行讨论。直到 7 月 24 日，还是由广西在北京的双方代表就组成南宁地区监督小组问题达成协议。双方同意各派 19 名代表，由广西军区召集组成监督小组。7 月 26 日，由军代表和两派组成的监督小组成立。在监督小组安排下，两派在南宁市人委门前交换武斗的被俘人员。

## 第 709 回：做批示，“揪刘火线”先撤离　第五次，接见河南代表团

我们的目光从西南边陲广西再回到首都北京。

7 月 3 日，北京航空学院宣布在全院开始复课闹革命。第二天，7 月 4 日，《人民日报》即向全国作了报道。一时间，北航大院里每天都有北京和外地学校的客人到访，取经学习。学院的教学和科研工作也全面铺开。

6 月 29 日，周恩来就北京建工学院学生轮班在中南海外要求揪斗刘少奇一事做出批示：“由汪东兴劝学生们回去，我们保证要他交出书面检讨。如劝后仍不走，请戚本禹出面处理。”

7 月 4 日，北京建工学院“新八一战斗团”对外散发《新八一号外》，称：

中央文革戚本禹同志七月四日凌晨四时许，亲临揪刘火线和“新八一”揪刘战士亲切交谈，并作指示。他说：“你们（新、老八一）要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团结起来。”十三时，又电话补充指示说：“新、老八一联合起来，共同把矛头对准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

当天，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通知刘少奇说，党中央的意见要刘少奇向北京建工学院“新八一战斗团”写一个检查。

当晚21时50分至7月5日凌晨2时，在人民大会堂安徽厅，周恩来、康生、戚本禹、叶群、曹轶欧、刘建勋第五次接见河南赴京汇报代表团。

康生、戚本禹等人进入会场后，康生说：“开会吧？总理事情很多，晚来一会儿，为使会议进行好，提一些意见，由戚本禹同志谈一下。”

此时周恩来正在解决广西问题。

戚本禹说：“据反映最近由各方代表纷纷往回打电报电话，传达首长讲话，内容互相矛盾，并以此互相攻击。对首长讲话精神有歪曲，这是不恰当的，中央决定公布以前不要传达。”

戚本禹谈了对河南问题的看法，他说：

“第一、军区的错误是犯了方向性、路线性的错误，打击了造反派，但不是刘邓路线错误，还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是人民内部矛盾。”具体讲，“有这样两个问题：（1）是把‘二七公社’错误看重了，把‘河造总’错误看轻了。一边听话，一边不听话，斗争很激烈影响了你们对问题的考虑。（2）是支持哪个是否与刘建勋态度区分，对郑大‘联委’态度是否这样，这样一系列的想下去，就错了。”“刘建勋在北京三结合了，郑州就坚决打倒，还要揪出后台谢富治。郑州还出现了反对周总理、江青的标语，你们对这个问题为什么不表态？十二条你们为什么不辟谣？看来对你们有利的，你们就不吭气，起码这些很对你们的口味。刘建勋在京三结合了，你们还要打倒，这就与中央对抗，赵文甫写的信很恶毒，你们不报告也不反击，我们看到很惊讶，这样的省委还有没有一小撮，你们支左把左派都揪出了也不到一小撮，这就是很严重的错误。”

“第二、省委负责人和各派组织，对刘、文、纪三人要作具体分析，文敏生问题最大，刘、纪当然也有错误，刘建勋搞借地

是错误的，调北京后表现不错，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也表现不错，这是毛主席称赞过的。如写大字报，欢迎南下的学生，炮打司令部，到群众中17个小时不休息等。对纪的问题，毛主席与你们看法不一致。赵文甫问题很严重，写的信很坏是挑拨性的，搞不好你们会与内蒙古一样。”“河南武斗是你们压‘二七公社’的结果，‘二七公社’不能说没有错误，但总比你们抓人好得多，这些小将跟小孩不一样，他们很敏感，比我们强，将来要以‘二七公社’为核心搞大联合。”

“‘河造总’不能说不是革命组织，他们的错误与你们有关。‘二七’没说他们不是革命的，相反‘河造总’说他们是右派。‘八大总部’对你们不满，但主要是对‘二七公社’，要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联合起来。”

康生对河南三方签订的停止武斗的协议很满意，当他念到若某一方面偶然违犯了协议应协商解决时，十分高兴地说：“若某一方偶然犯了错误，违犯了这个东西，应当协商解决，不应你违犯了我也违犯，为什么你能违犯我不能违犯。”

念完协议，康生问：“现在大家没有签字？大家同意吧？”

众答：“坚决执行。”

康生又问：“这不是两个记者商量的吧？”

众答：“双方协议的。”

康生说：“过去我们的记者，就犯过错误，协议定好后，双方都不执行，就是记者搞的，你们不要说是记者写的，我有这个经验啦，现在你们说不是，这就好啦。你们签字是怎么个签法？”

众答：“现在就签。”

康生又问："铁路问题怎么样？我现在关心一个事，郑州、洛阳是不是已经通车？"

"河造总"说："还没有得到消息。"

康生："应该问一下。这方面希望同志们努力搞一下。我不管外交，但我了解一些兄弟党来参观我国文化大革命情况。阿尔巴尼亚等一来，总想到各地看看，特别是武汉长江大桥，韶山毛主席旧居，广州革命遗迹，但车不通。满腔热情来看文化大革命，留下个印象是不愉快。这在国际共运中宣传文化大革命，红卫兵小将的英勇斗争，受到些损失。北京有一个语言学院，外国留学生有越南的、非洲的，他们没有调查清楚，要到井冈山，结果不通，他们向本国说了。"

铁道部一人谈了当时铁路中断的严重情况，康生说："从这个情况看，我们很欣赏你们达成的协议。这样我们看出毛主席提出的抓革命促生产的重要。另外我们的铁道部工作同志要搞秩序，需要进一步做工作，从政治思想上去做。据我们所知，尤其'八大总部'的同志要注意，其他当然也要注意，在河南流行一种谣传错误说法，意思是哪一派不顾大局，不顾生产，动员许多人到北京、中央、到毛主席领导的中央施加压力，以为中央就向那些人屈服了。这种想法完全错误。这里边据我们知道，有幕后指挥人，也可能有军区的人，公检法里边甚至有反革命，'工人总部'想不通还要走，这要栽筋斗，栽大筋斗，已经走到边缘。"

22时40分，周恩来走进会场。他说："铁路已经完全中断了。'十大总部'要特别注意，说'二七公社'是革命组织，'十大总部'也没有说解散，自己退的。本来是群众组织，这样一搞会

走到反面，对抗中央、压中央是不行的。”

康生：“这是很痛苦的教训，如果幕后有指挥人，更要犯严重的错误。群众组织千万要注意，我们是诚心爱护。”

“十大总部”王景安要求发言。他谈了列车停车原因，说是因为河南省军区支持“二七公社”，广大指战员和人民不满，哭着要把亲人要回去。

康生说：“军区自己报告的，跟你说的相反。”

周恩来说：“从洛阳开的车到郑州，‘十大总部’支持要改变238次列车方向，当时‘铁军’到军管会，叫往北开，说：如果238次不北开，别打算从郑州开出一列车。”

“十大总部”争辩，周恩来说：“铁道部有人吗？给郑州打个电话。”

“十大总部”又说：“‘二七’印发戚本禹讲话与停车有关。”并递交传单。

戚本禹笑着对“十大总部”说：“我给你们讲的，‘二七’怎么能听见？我看看。”他接过传单。

周恩来说：“黄河水涨，铁路堵塞，如果黄河决口，全民动员，你们各派还闹不闹？”

“河造总”回答：“不闹。”

周恩来：“这是对每个组织的最大的考验！”

“十大总部”念了呼吁书。康生：“要马上尽一切办法，保证铁路通行，抓革命促生产！可以写么！我帮助你的！你不要怕。”

“十大总部”财贸代表十分坚决地说：“‘二七公社’组织不纯。”并说：“要头有一个，说‘二七公社’是造反派，就是

资本主义复辟。”

周恩来拿着“郑大战斗师”的一张传单说：“你看，‘郑大战斗师’、‘六三赤卫队’说：‘周总理已说：以省工人总部为首的十大总部是真正的革命造反派。’我说过没有？”他指着传单问：“我什么时间说的？”

一工作人员进来向周恩来汇报后，周恩来对大家说：“报告大家一个好消息，238车通车了，好事是能做出来的。”

黄河委员会一女代表讲防汛问题，周恩来说：“黄河水利就你们两派观点，没有‘十大总部’，你们可以在防汛问题上达成协议吗？”

“二七”代表答：“可以。”

那位女代表又讲防汛器材被抢，周恩来说：“谁再抢就抓起来，以前抢的送回来，以后再抢抓起来。你们关于黄河水利达成协议，联合通告，为劳动人民广大利益，你这个女同志，也是这样，人家愿意达成协议，你就不承认人家是革命，就你一个革命派？”

康生：“不要你一个人革命，人家都不革命。”

“河造总”：“他们是好话说尽，坏事作绝。”

周恩来：“你这话不对，态度不好，是骂人的话。蒋介石才是这样，人家骂你蒋介石，你愿意吗？本来我不是批评你‘十大总部’的，你们这样的态度就要批评了，以后要好好说你一顿！”

康生：“人家达成协议，你在中间破坏。这是什么态度？这是革命的态度吗？”

周恩来：“代表就你们两个。达成协议，明天一早钱正英去，

军管问题我正在考虑，你们群众达成协议军管也好办。这牵涉到河北、山东、江苏、你们‘东方红’有多少人？”

“二七”黄委会“东方红”代表：“1450人。”

“河造总”反驳说：“500人，他们当面欺骗总理。”

康老：“他报多是他们的错误，你报少是你们的错误。”

周恩来：“人家（指二七）要达成协议就达么，就是要保证做到，考验考验你们么！”

康生：“你们签字我很高兴，这正像总理讲的，是个考验，在中央面前报告，签字，这是严肃的事，不是开玩笑，将要考验每一个同志品质的问题，每个组织的态度问题，这个事情不是儿戏。我相信同志们能执行自己的诺言，因为是革命群众，但又使我担心，从开会情况看，我有些担心，同志们需要注意的。做的时候，我们要坚决执行协议，要么不签字，签字就不能朝令夕改，这不是一个革命者做的。现在军区的同志们几次要求讲话，要听听他们的意见，检讨。何运洪来了没有？”

联络员下去找何运洪。

周恩来：“如果三方面代表，把石家庄、安阳、郑州铁路搞通了，这是一个好事么，防汛达成协议，你们三方面都要打电话，任何东西，人力不能挪动，挪用、抢走一个石头一个人、一个麻袋都不行，都要用在防汛上。这是最大考验之一，谁也不能在这个上面讲价钱，今天讲的如果打防汛的人，非抓起来，非严格处理不行，这是千百万人民的生命问题。”

23时45分，何运洪站起来检讨。周恩来让他坐下。

何运洪检讨自己“背离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执行了资产阶

级反动路线，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打击了‘郑大联委’、‘二七公社’等革命造反派，压制了革命群众运动，而且长期不承认，不觉悟，不改正，给河南文化大革命造成了严重损失。”他说：“军区犯错误的责任在我，是错误领导的结果。我是有罪的。”“二月份连续把斗争矛头指向领导干部，革命群众，没对准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二月中央指示各派赴京汇报……”

康生：“2月17日，主席第一个给河南军区下命令，几次命令他不来，他拒绝来。”

周恩来：“主席叫我们打电报，不管左的，右的都来，这件事河南军区犯了大错误。他们要把几派变成一派才来，结果也没变成一派，还是三派。”

何运洪继续检讨河南“三月镇反”，压制“二七公社”的错误，并表示：“现在我代表河南军区党委宣布给‘郑大联委’彻底平反，向革命造反派公开检讨，向受害的革命小将赔礼道歉，给他们恢复名誉。责任要由我负，我向毛主席、向党中央请罪，诚恳听取革命造反派革命群众批评，我诚恳地请求毛主席、党中央给我处分，今后我决心更高举起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改造世界观，坚决站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公开检讨，彻底改正。坚定不移地和革命造反派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以上只是初步检查请中央首长，总理、康老批评。”

周恩来对何运洪说：“你身体不太好，早一点休息。他作了书面检讨说明了对错误的认识，现在由一军徐文礼讲一讲。”

徐文礼首先表示对中央对河南问题的处理意见坚决拥护，并检讨了“对‘八·二四革命造反委员会’所犯的错误的性质是路线性的。”

对开枪问题，他说：“军队开了5枪，还有3枪没查出来，打死1人尚未查清。总之开枪的性质是严重的。一共抓了294人到现在还有15人未放。3月14日赵静生同志在师院宣布‘824’为反动组织是非常错误的，在这里我向毛主席承认错误，向‘824’承认错误，赔礼道歉。”

他表示：一定要“坚决执行中央关于开封问题的决定，一定向山东军区学习，向广大群众检讨，给‘824’平反，向他们承认错误，向他们道歉。对开枪打死人的问题，我们一定严肃处理，坚决支持开封市的一切革命造反派。”

## 第 710 回：签协议，河南三派作保证　宋任穷，说收回《三点意见》

徐文礼检讨后，周恩来对各派代表说："你们三方面有了一个协议，签了字，我们印刷出来，昨天说'八大总部'和其他地区发言，让他们发言。"

"河造总"洛阳地区代表发言，仍然认为军区支左大方向正确，坚决支持戴苏理站出来，同时认为纪登奎在文化大革命中顽固地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老实检查，开封'824'，洛阳'816'，新乡'818'是顽固的保守派，他们的大方向是错误的，但只要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依然愿意同他们组织中的群众结合。

周恩来问他："你是代表几大地区的？'八大总部'是不是还有一个人要讲？"

"工人总部"代表发言，也认为文敏生、赵文甫、纪登奎必须打倒，戴苏理是比较好的干部，关于刘建勋问题，中央已经表态，不再喊打倒。认为"二七公社"没有区别对待，对群众没有做思想工作，在革命派内部拉一派打一派。中央解决河南问题是从一个极端又走到另一个极端。

康生听完"工人总部"这位代表的发言后，质问他说："是不是你要求军区继续对抗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像过去那样对抗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不是？我听你这个话里似乎有这么一点意思。过去因为你们不了解军区，干了一些事情，这不是解放军的

问题，也不是战士问题，也不是军区党委问题，也不是其他干部的问题。主要的问题是什么呢？”他抬高声音说：“是何运洪。”

周恩来：“你们又提到‘二七公社’，下次答复你。”

康生：“你们‘十大总部’注意这个问题，‘河造总’，你们过去是受蒙蔽的，从2月17号起啊，你们受蒙蔽。你代表的‘工人总部’更要注意这个问题，你们不明白，这不是整个军区，更不是整个党委，更不是军区的所有干部，不是严重错误，而是他讲的，是方向路线错误。他现在要改正错误。”

“工人总部”的代表说：“我们一定要与何运洪做坚决斗争，反对他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中学“红总”李广连发言，强烈呼吁，称“二七公社”砸其锅，抢其粮……

周恩来问他：“你们家里来电话了？”然后对“二七公社”说：“这几件事，请你们查一查。”

李广连说：“他们去年就冲砸了总理办公室。”

周恩来笑着说：“我有什么办公室，我的办公室从来没有被冲过。……你讲你现在的，你们过去的材料交上来。”

周恩来问省直机关代表丰长录：“你代表不代表‘公安公社’？”

丰长录：“代表。”

周恩来：“那听听你的意见。你们公、检、法在军区的影响下逮了多少人？”

丰长录答：“不知道。”

周恩来问：“那你怎么代表？”

康生："我肯定你们公安系统里有坏人。同志，我做过公安工作，我懂得。你们逮了多少人，要老实告诉我，掩盖不住的。我告诉你，这个问题与丁石有关系的，丁石来了吗？"

戚本禹说："我看'公安公社'可算是保守组织。"

周恩来问河南省公安厅副厅长丁石："你不知道你干的什么事情？"

丁石从角落里站起来问："哪个事情与我有关系？"

戚本禹气愤地站起来，扇子摔在桌子上说："干的坏事与你有关系的！你干的坏事么！你怎么不知道？！"

康生："那你就好好想一想。我问你，过去你做过公安工作吗？"

丁石："做过十年，做副处长。"

康生："你以后做什么？"

丁石："副厅长。"

康生："是么，我没有错。"

周恩来对丰长录说："你这个发言怎么不弄清楚哇？连一点自我批评都没有。"

康生："你们有一点阶级感情吗？成千上万革命小将坐牢，你们无动于衷，你们一点也不检讨，摸摸胡子就算了，一点也不检讨！"

周恩来："郑州打群架，你们'八大总部'都没有参加？你这个人不老实！对丁石问题，你们今天晚上可以揭发。我们专意把他找来，他是怎么在幕后指挥的，他是公安厅副厅长，你们是受蒙蔽的。'战斗师'还讲吗？你昨天讲了很多，简单些！"

郑大“战斗师”发言后，周恩来问：“你们算‘八大总部’？还是‘河造总’的？”

郑大“战斗师”：“都不是。”

戚本禹对周恩来说：“独立师！”

周恩来笑：“独立师！我问你，你说埋头苦干、要联合，现在有一个埋头苦干的事情，就是铁路的问题，安阳、邯郸、石家庄这一线上，很多人都在步行北上。我要求你们再派3个组，郑大‘战斗师’派1个人，郑大‘联委’，你们派两个人，‘十大总部’派3个人，不要派‘公检法’，我不信任‘公检法’。你们好好地大联合。他们犯了错误（指战斗师）你们也有错误（对革联）。我希望你们郑大，好好在大联合上做出成绩。郑大是全国开始闹起来的四个闻名大学之一，北京大学、南京大学、西安交大、郑大。北京大学联合也不好么！南京大学两派分裂，交大内部还不错，和社会上闹，你们郑大要做出榜样。”

“郑州、洛阳工人很多，要好好向他们学习，铁道上再派一个小组，‘河造总’3个，‘十大总部’3个，郑大（联委）两个，‘战斗师’1个。铁路已经全线军管了，都分了区，郑州是武汉大军区管，石家庄是北京大军区管。要硬扒车就把头头抓起来，这样子向中央施加压力，不能再等待了。”

“现在就是解决那个省的问题，那个省的坏人，保字号头头，少数人带领群众起来都到这里来，内蒙搞过，四川搞过，河南也在搞，江西也想搞，全线都断了。东北那边向你们学习，马上成立三个小组，显示你们的力量，说服嘛！不回去，向中央、中央文革小组交待。我要对你们负责，你们要管不了，我就要告诉军

委了，抓几个头头。总有人在后面挑动，压中央。内蒙开始地方上动员，八、九千人到京说服回去了。又煽动军队来。最后几个军队的坏头头，已暴露出来了。王逸伦这个特务也暴露出来了。”

“今天就谈这些。你们先回去，关于何运洪、徐文礼检讨，你们讨论一下，何运洪承认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我们欢迎，但不要乱传，犯了错误允许改正嘛！”

戚本禹：“不要传达，起反作用。”

康生：“刚才何运洪、徐文礼作了检讨，检讨错误是欢迎的，这一点同志们有何看法，可以讨论。他们犯错误，但同志们，绝不能动摇对解放军的信赖和信任，毛主席讲过‘三相信、三依靠’嘛！”“我这里有一个建议，在你们还没有把这些问题了解清楚，没有好好把何运洪、徐文礼检讨研究好不要往下面乱传。有人乱传说解放军犯了错误，1军犯了错误。要像爱护眼睛一样，爱护解放军。第二，我讲了，何运洪自己也讲了，不是军区所有干部犯都犯了错误，有许多干部有正确观点，愿意执行毛主席的指示，不能笼统讲整个军区犯了错误，更不能讲解放军犯了错误。这个问题主要由何运洪负责，不能说都犯了错误，这一点要弄清楚。要爱护我们的解放军。至于1军，他们比何运洪的错误还要轻，赵静生宣布‘824’是反动组织是错误的，徐文礼能初步检查是很好了。1军是全国第1军，野战军，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有错误就改，1军有很多作法有缺点，但‘824’有个口号是错误的，‘彻底改善无产阶级专政’。”

周恩来：“哪一个组织将军区的话断章取义，或全文贴大字报，都不对。”

康生："说河南军区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也不对。"

戚本禹："过去冲军区，军区有错误，可以谅解。现在军区改正错误，你们冲军区，你们犯了过去'二七公社'、'824'犯过的错误。"

周恩来："你们还有什么问题要解决，我们还要再开一次会议解决问题，现在铁路问题，就是考验你们的时候，不要听到批评就垂头丧气，不要认为你们一受称赞就翘尾巴，这很不好。"

戚本禹："'二七公社'、'824'要特别注意。"

周恩来："你们的协议，我们印发给其它省份，刚才我来的晚，就是去解决广西问题。一个司机的脖子上打破了皮，一条腿打破了，裤子被撕拦，非要叫交出凶手不可，不然不开车，我接见了他们，我说，受伤了，衣服撕烂过去了吗？车停了凶手又找不到。在铁路上你受了伤，这我们政府有责任，我代表国务院给你们道歉，脖子上伤也好了，我说裤子破了从铁路工人补助金里给你搞新的！他听了说：我不要了。我要他们团结起来，保证了铁路的运输。我分别送给他们两册政策汇编，铁道上可以有两个组织吗？我们得出个经验，你们工作时间不要辩论，业余时间辩论不要打架，不要和外面联系，铁道本身不要与地方上串联，不然会出问题，要广西做出个样子，好了，今天就谈到这里。"

7月5日，河南省各方赴京汇报团签署《关于贯彻执行中央六·二四"通知"及总理指示的协议书》，各方代表团在协议中表示坚决做到：

"一、不上街游行；互不打架、互不冲击；三、不抓人、不扣人；四、不阻碍铁路、公路、轮船运输；五、不动员农民进城、

拦路、拦车；六、不夺枪、不开枪。坚决贯彻执行总理七月三日关于‘不停产、不停业、不爬车’的指示，以促进河南问题的顺利解决，保证河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顺利进行。”

7 月 3 日至 5 日深夜，北京“516”张建旗等人在财贸口贴出“打倒李先念”等大标语，开始所谓“第一次战役”。

7 月 5 日，商院学生程镇华透露李先念要在人大会堂做检查，他们把准备好的传单：“戳穿李先念之流的一个大阴谋”，印了 1000 份，在人民大会堂散会后散发。

由于中央在 6 月明确指出：中共中央东北局的《三点意见》“经过两个月的实践证明，效果是很不好的，以赞成或反对《三点意见》作为划分革命派与保守派的标准，更是错误的，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于是宋任穷于 7 月 4 日以个人名义收回了《三点意见》。

此时在沈阳，各群众组织为了揭开省委、东北局的阶级斗争盖子，开始“抓”干部，掌握知情人。“辽联”在东北工学院集中了一批东北局、省委、省政府和沈阳市委、市政府的领导，将这里称作是“红色干部根据地”。

1958 年，辽宁在整风运动中，将原省委书记处书记王铮、省长杜者蘅、副省长李涛、旅大市市长宋黎、省委秘书长吴铎等人打成“反党宗派小集团”，撤销王铮、杜者衡、吴铎的一切职务；撤销宋黎旅大市委书记、市长职务；撤销李涛省委书记处书记、省委常务委员、副省长职务。文革中，辽宁的大学生抓住了这一问题，希望能从中找到揭开辽宁省委阶级斗争盖子的突破口。他们先后将已下放到沈阳拖拉机厂任副厂长的原省长杜者

蘅，时任抚顺矿务局局长的原副省长李涛，时任阜新矿务局副局长的原省委秘书长吴铎，及王铮、宋黎接到了东北工学院，让他们写 1958 年辽宁省整风运动的材料。

1967 年 6 月底，东北工学院“红卫兵”和辽宁“省委联络站”联合召开了 1958 年问题小型辩论会。会上，省委干部为 58 年整风问题发生争论，十分激烈。

接着，又改为揭发批判会。原省长杜者蘅第一个发言，揭发批判东北局书记处书记、辽宁省省长黄欧东在农业合作化及农业生产方针上的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提出 1957 年反“右派”时，黄欧东应《光明日报》、《文汇报》记者的访问，准备发表文章，阐明东北局贯彻四中全会后，辽宁省干部的思想问题。这篇讲话被杜者蘅制止，没有发表，不然的话，黄欧东一定会放出一些“右派”言论，被抓“右派”。黄欧东不服，两人就在主席台前争吵起来。黄欧东气得大骂杜者蘅是恶霸地主儿子等等。当时会议主席未于制止。杜者蘅很生气，会后向会议主持方提出抗议，说：“黄欧东那样嚣张，公然在会上骂人，搞人身攻击，主席也不制止，这是什么态度？这样的会议，我不参加了。”

7 月 5 日，“辽联”召开为王铮、宋黎、杜者蘅平反大会，最后，由省委书记处书记徐少甫检讨。由于大会执行主席在徐少甫检讨前，首先称赞了徐少甫一番，说革命领导干部能够坚持真理，也能够修正错误。这又引起了吴铎和李涛、杜者蘅 3 人的不满。杜者蘅首先站了起来，接着吴铎也站了起来，随后李涛、王铮、宋黎 3 人也先后站了起来，一起退出会场，表示抗议。

这一事件引起“东工毛泽东思想红卫兵”、“辽联”以及

“省委革命造反联络总部”的极大不满。事后，东工院内贴出大字报，批评王铮、宋黎、杜者蘅是野心家，刚上台就要打倒一切，独霸辽宁领导大权；说王铮、宋黎、杜者蘅对“辽联”、“东工红卫兵”、“省委联络站”革命小将的支持连句感谢的话都没有，特别指出杜者蘅是复仇主义情绪严重，并威胁说：“不要以为我们树立你们为革命领导干部，就拿你们没有办法，我们可以树立你们，也可以收回作废。”

“省委联络站”也提出：“没有省委通过，既不能平反也不能树立。”

## 第 711 回：七月五，长春市终于开打　安徽乱，武斗风蔓延全省

7 月 5 日，毛泽东看了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局信访处 7 月 4 日编印的《文化大革命信访简报》第 280 期登载的《全国各地群众正在积极塑造毛主席巨像》一文后，批示：

林彪、恩来及文革小组各同志：

此类事劳民伤财，无益有害，如不制止，势必会刮起一股浮夸风。请在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讨论一次，发出指示，加以禁止。

同期一则简讯说，北京矿业学院一群众组织收集、编印毛泽东没有公开发表的讲话材料，毛泽东批示："此事也请制止。"

第二天，7 月 6 日，毛泽东审阅中央政治研究室 6 月编印的《毛主席论教育》和天津大学"八一三"红卫兵 5 月编印的《毛主席论教育》两本小册子，对前一本小册子批示：

退陈伯达同志：此件内容，错误很多，应大加砍削，至少去掉三分之一。

对后一本小册子批示：

陈伯达同志：这一本《论教育》，我未看，可能也收进一些坏东西，请你同文革小组几位同志，连同你们编的那一本，一起审查一下，把坏的一概删去，留下一半左右较正确的就行了。

7 月 5 日，长春人战战兢兢期待的武斗终于在长春市医院开打了。这天，"红二"总部设在市医院大楼的广播站惹恼了"长春公社"，5000 多"公社派"队员围住了市医院，逐层攻坚。"红

二”的第一、二层楼已经失守，不少人站在很高的楼顶，看样子都是文职人员，没带柳条帽，只是有节奏地挥动《毛主席语录》，极为悲壮。

与此同时，7 月 5 日至 6 日，长春市 793 厂、228 厂也都遭到围攻，工厂停产。

长春市医院的武斗进行了整 3 天，两派在舆论上都造足了势。数万群众，围在医院外面看热闹。公安“红色造反兵团”惺惺相怜，派了一架救火用的云梯车开赴现场，缓缓升起云梯，往下救人。救下来一人，周围的“红二”群众就是一片掌声。“公社”哪里肯让对手如此放肆，一把火把云梯车烧成了废铁。事后“红二”控诉，说云梯车乃东德进口，价值若干，“长春‘黑’社”拿国家财产不当回事。“长春公社”则反唇相讥，说动用救火设施来参加武斗，是慷国家之慨，又说是驾驶员操作不当，把发动机憋着了火。口水文章，你来我往。

因事起仓促，楼内的“红二”人员，没有吃的。“红二”的许肇昌总指挥居然能够指挥航空俱乐部派滑翔机出动，向市医院楼顶空投大饼。飞机飞临，下面的百姓哗然，“长春公社”乘机鼓噪说，这是“省军区派直升飞机营救‘红二’的武斗人员”。

长春市中心交通因这次武斗完全被阻断。大楼最后还是被“公社派”拿下，楼内剩余的“红二”人员全都做了俘虏。

7 月 10 日下午 17 时许，长春戏曲学校“八一八野战军”参加“红二”派的“红革会”、“二总部”组织的游行归来，当车队行驶到建设街与大兴路交叉口时，正巧与对立派“长春公社”的车队相遇，短兵相接，人群大乱，气氛紧张到了极点。突如其来

的混乱局面使双方的汽车都失去了控制，结果数辆汽车相撞，坐在汽车保险杠上的两名学生被撞断了腿骨，而一名 17 岁的戏校学生被撞碎头部，当场死亡。

血案发生后，武斗双方各执一词。

次日，长春市区有多家粮库和商店被抢，汽车厂 8 名工人被对立派抓去，遭到毒打。

7 月 12 日，“红二”派为那位撞碎头部死亡的戏校学生举行了隆重的治丧游行和葬礼。游行队伍以解放牌汽车为先导，由北向南，沿人民广场、斯大林大街、解放大路缓缓行进。行驶在最前面的，是乐队乘坐的汽车，反复吹奏的“哀乐”，惊天恸地，备极哀容。一身缟素的指挥手持一根电镀杆，一上一下机械地挥动着。紧随其后的，是用白布黑纱环绕的灵车。车头悬挂着那个学生的遗照，一张端庄、稚气的脸。遗体置放在灵车的顶部，上面覆盖着“八一八野战军”的红旗。灵车颠簸一下，那遗体就颤动一下。

灵车的后面，是一望无际的游行队伍，与其说是一场隆重的葬礼，不如说是炫耀武力的示威游行，“红二”派的各路“造反大军” 不断地呼喊着口号，声言要向“长春公社”讨还“血债”，山摇地动，杀气腾腾。大刀、长矛代替了《毛主席语录》，许多人把建筑工人的柳条帽戴在头上，甚至还披上了武士的铠甲。在游行队伍中间，一位戴着深度近视镜的女教师，患有严重的关节炎，走路都十分吃力，手里也攥着一把练功用的长剑。她曾对同学说过：“为了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必要时，我也会冲上去，捅他两下子。”

游行队伍行进到地质宫广场附近的路上时，即到了两派组织的“接合部”，形势立刻紧张起来。从道路两旁的建筑中，不断地飞来砖头石块。游行队伍立刻做出反应，砖石乱飞，击碎建筑物上的玻璃窗。结果遭到更猛烈的回击。“弹弓”齐射，弹石如雨。这绝对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弹弓”，是用铁床的两条腿，绑上两条自行车的内胎制成的。射下的往往是半块砖头，砸在地上，即拍得粉碎，如果打在人身上，其后果可想而知。人们纷纷躲藏到路旁的杨树后面，不敢露头；或者四散逃避，游行队伍大乱。而在解放大路至同志街路段，一辆参加游行后返回的汽车，将东北人民大学“公社派”的“红旗野战军”一人辗死在车轮之下。

仅 3 天的光景，就有两条鲜活的生命死掉了。

两派对立情绪进一步加深，一派群众组织的常委们在集会时宣称：“我们和他们的矛盾已经上升为敌我矛盾，我们的口号是‘以武斗制止武斗！’”

冤冤相报，恶性循环，长春大规模的武斗从此愈演愈烈。

7 月 13 日，长春机车厂两派群众组织在工厂三宿舍发生武斗，打死一人，工厂停产。

7 月 14 日，长春两派组织在长春火车站发生武斗，造成铁路停运 9 天的“七·一四”铁路停车事件。事件发生后，国务院打电报指示：立即恢复通车。23 日列车恢复运行。

7 月 17 日，吉林市 200 多铁路局员工离开生产岗位达 39 天，并扣留了哈尔滨铁路局支援的机车。

7 月 21 日，“红二”派和“公社”派在长春第二面粉厂发生大型武斗，粮食及其他物资遭受很大损失。

说完东北，我们再将目光转向安徽。

安徽的军管没有让安徽稳定多长时间，5 月 17 日，淮南两派对立的群众组织即发生全市性的大规模武斗，数十人死亡，数百人受伤，致使淮南矿务局所属各煤矿停产数日，矿井设施、机关办公用品受到不同程度破坏，造成重大经济损失，震惊全国。

5 月 20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给淮南市军管会并淮南矿务局全体革命职工发出指示信，希望淮南人民立即恢复抓革命促生产的秩序。

5 月 31 日，安徽省军管会发出制止武斗的通知。

6 月 7 日，安徽省军管会再次发出《关于坚决执行中央六•六通令的通知》，要求各群众组织和群众，立即制止武斗，刹住打、砸、抢、抄、抓的歪风。由于党委、政府、部门和公安、检察、法院等均被夺权，群众组织自行其是，武斗局势无法控制。

6 月中旬，有几百人组成的“淮南红卫军”，分乘十几辆大卡车，在汽车头上架着轻机枪，浩浩荡荡开进合肥。他们从东门进城，沿长江路西进，经过军管会门前时，高呼：“打倒军阀杜重山！”

杜重山是淮南市武装部部长。

合肥市民看到这般情景，个个毛骨悚然。许多人胆怯地看着全副武装的“淮南红卫军”缓缓西行，到了长江路的西端，折头向南，驶进了安徽医学院。

安徽医学院的学生，不管“G”派还是“P”派，早已纷纷离开学校，只有“827”少数同学仍然留下，保护学校。

“淮南红卫军”的头头要“827”安徽医学院“纵队”的丁云

胜带信给“827”兵团，说明他们的来意，只是为了向军管会告状，无意伤害“827”学生。在这种情况下，“827”头头梁守福约“淮南红卫军”的几个主要头头到长江饭店见面谈谈。双方的谈判结果不错，“淮南红卫军”说：井水不犯河水，只要省军管会答应他们的要求，他们立即返回淮南。

6 月 20 日，合肥发生了数百名工人冲击军管会的事件。接着，“工联会”和“827 兵团”分别发出《紧急呼吁》和《紧急通知》，都要求：“不许冲击军管会”。

6 月 21 日，安徽马鞍山钢铁公司南山矿因武斗停产。公司所属炼铁、炼钢、轧钢等厂也先后停产。

6 月 29 日至 30 日，安徽芜湖市发生大规模武斗。

7 月 1 日，中共安徽省军区党委发出《给全省革命群众的公开信》，检讨了他们在“三支两军”中的错误，并再次希望革命群众牢牢掌握革命大方向，以期扭转合肥武斗的局面。

武斗的局面没有扭转。7 月初，安徽“827 兵团”召开常委会议，经过一天的讨论做出如下决议：

1、兵团由安徽工学院迁往合肥工业大学主楼。因为工学院南面，已被驻守在省民政厅，由程明远指挥的“合肥红卫军”封锁；西门的安徽农学院已被外地来的“红卫军”强占；北面是高出工学院房顶的老城墙根基，此地易攻不易守，无险可依。

2、厅局长“揭盖子”会议因分歧严重，已于 6 月 13 日夭折，许多老干部感到武斗的威胁。“827”发出通知，凡愿到合肥工业大学躲避的老干部，都可到工大主楼住下；农学院被赶出来的同学也可到工大住下。因工大地广人多，高楼也多，更重要的是，

西面隔墙就是省军区大院。

3、“827”兵团要做好防御准备，提出到外地借枪的设想。

4、坚决支持军管会，支持省军区的思想不动摇。有事多向省军管会制止武斗办公室求救。

5、各高校留下少数人员护校，不愿留校的可以回家也可到外地去，学校要准备好路障，对通往高层的楼梯，要层层设障。

6、同意将省体委文革初期存放在独立二师六团的体育射击用枪支弹药，按当时的保管协议，由省体委“827”取回。并将取回的枪支弹药全部存放在工大主楼七楼的空房内。具体由李胜利和省体委革委会副主任、“827”兵团体委纵队长汪礼教共同负责实施，并请“工联会”派人沿途警戒。

就这样，安徽“827 兵团”于 7 月 6 日迁往工业大学主楼，随后一大批支持“827”观点的厅局以上干部，也陆续来到工大主楼，最多时有 200 余人。他们大部分住在学生宿舍，不分干部、工人还是学生，一律买饭菜票，在学生食堂吃饭。

由省直机关干部组织的“安徽省合肥革命造反司令部”也迁到工大。由于当时不少领导干部都希望“827”和“工联会”也能进入“安徽省合肥革命造反司令部”，成为这个组织的领导核心。于是在安徽省副省长彭宗珠、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张春汉、省劳动局副局长张泰升的建议下，“安徽省合肥革命造反司令部”迁入工大后做了重大改组。改称“安徽省合肥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不设常委会，不设总头头，由三个班子组成：

第一个班子是“文攻”班子。这个班子由“827”的梁守福牵头，以“827 兵团”为依托，又将张春汉、欧远方、黎洪、祁

超等一批老干部配进来，这些干部都是省委宣传部的班底，都是安徽的笔杆子。

第二个班子是“武守”班子。“武守”这个名称是老红军、1965年才从部队转业回来的劳动局副局长张泰升提出来的。这个班子由“工联会”曹再凤牵头，以“工联会”为依托，另外还有“安徽省合肥革命造反司令部”的原省成套局干部、转业军人江开平，和省艺术学校美术老师姚国荣等。在这个班子里配上省化工厅副厅长王璞，省建设厅副厅长李务本等部队转业的几个老干部。

第三个班子是老干部顾问团，人比较多，大约有 30 到 50 人，由副省长彭宗珠和劳动局副局长张泰升牵头。他们的任务就是向前面两个班子提供政策性建议。

“总司令部”改组后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从独立二师六团取回那批武器，拉回了几卡车的武器弹药。这批枪支弹药取回后，检查的结果令人失望，几乎都不能用。步枪没有枪栓，而且都是苏式步骑枪，真正能用的只有二十几支双筒猎枪和几百发子弹，还有大约两万发“五四式”手枪用的子弹，但没有手枪。他们只好将猎枪分给安徽大学、安徽医学院、安徽工学院。因为安徽农学院已被“淮南红卫军”和刘秀山他们占领，不需要“827”学生再护校，没有分枪。这样，工大作为大本营只有四支双筒猎枪来保卫。保卫人员是一批中学生。

后来，李胜利领着化工系和采矿系的几个同学，自制一套爆炸装置，就是用两个玻璃瓶子，分别装入 250 克 TNT 炸药，埋在一米深的地下，然后用电引爆。他们搞好后，一本正经地向梁

守福报告可不可以干？

梁守福说："你们把详细计划再说一下。"

李胜利回答说："我们准备在某日晚上零点爆炸。爆炸后，我们再学着我国原子弹爆炸那样，发表一份声明。这份声明强调：合肥工业大学是全国重点理工科大学，最近研制出一种新的爆炸'装置'，这种'装置'是完全为了防御的，我们决不首先使用。"

梁守福听了，感到很好笑，这样做，可能吓唬了"P"派，但也吓唬了合肥的老百姓，到底效果如何，心里没底。他们看梁守福有些犹豫。为了说服他，又举了北京、西安、哈尔滨等高校都有这样干的例子。听他们这样一说，梁守福想，工大不是首例，试一下也可以给守卫工大的人壮胆，就对李胜利说："试一下可以，但要注意自身安全，不要为了吓别人，炸到自己。"

李胜利说："你放心，他们都做过仔细计算。"

为了加强工大的防卫力量，"总司令部"、"工联会"和"827兵团工大纵队"召开联席会议，决定准备足够的粮食和燃料，对各教学大楼楼梯以沙袋设置路障，修复没有枪栓的枪支，调省交通系统的"搬运兵团"进驻工大东教学楼；再由顾问团提供一份合肥市区的防卫方案，征集各工厂民兵护厂枪支弹药；最后是支持军管会制止武斗办公室工作，要求军管会立即收缴两派武器。

会后，"搬运兵团"很快进驻东教学楼，还带来部分武器，主要是步枪和少数"五四式"冲锋枪，加起来可以武装一个排。

另外，"工联会"弄来两挺重机枪，摆在工大主楼的七楼顶上。没有弹药，只是摆样子吓唬人。转业军人、省化工厅副厅长王璞说：重机枪要有轻武器保护，没有轻武器保护，重武器很容

易受到对方攻击。因为没有轻武器保护，只好把重机枪又从七楼顶撤回藏起来。

7 月中旬，“武守”班子曹再凤报告说：“G”派所有武器加起来最多装备一个营。

7 月 12 日，安徽省马鞍山市实行军事管制。

7 月 15 日，淮南矿务局新庄孜煤矿发生武斗，矿影剧院、淮南市八公山区人民政府大院等建筑物被炸。

7 月 16 日，严光在安徽省军区召集“827 兵团”和“工联会”的头头开会，想听听他们的意见，做做他们的工作。就在这次会议上，梁守福不仅公开发泄对《九条》的不满，而且公开批评康生说：“我看康生就是没有被挖出来的刘邓，下次文化大革命第一炮就轰他。就是他弄个《九条》承认两派都是革命的，反革命搞个造反组织，杀人也是革命的。就是《九条》下达后，全国各地都搞成两大派，反正搞武斗也是革命的，哪个不敢搞？”

## 第 712 回：涪陵打，谢富治、王力赴蓉　陈伯达，告学生不要武斗

四川涪陵“619”事件后，“忠实派”即开始向其势力较集中的长江饭店以西撤离，7 月 3 日，“忠实派”赶走了《涪陵日报》编辑部及印刷厂内的“贸派”，长江饭店以西只剩下了“粮油总部”一个“贸派”据点。

7 月 5 日清晨，在“贸派”“粮油总部”后面的“东风”农民和“忠实派”打起来了。“贸派”杜炳全派人叫撤下来，“东风”农民来了 10 多人质问“总部”：

“谁叫撤的？冲都要冲上去了。”

杜炳全说：“那就不撤，调人去增援。”

于是，“贸派”总部的况道成、杜炳全、彭用吉亲自赶到现场。

粮油大楼位于专署大院斜对面 200 多米处，临街 5 层，在当时是很高大的一栋楼,很坚固。在它左方街的斜对面 500 多米是专署西门招待所，是“忠实派”据点。地区专署大院前临大街，背靠长江，街对面地势呈坡状上伸，半山腰有条环城公路。

此时天色微明，街上行人稀少，在这两个据点邻近的房顶上站有人，顺手揭屋顶的瓦片相互投掷攻击，其中有不少房屋是老百姓的房子，住在里面的居民扶老携幼逃了出来。站在屋顶的人都不攻击这些无辜者，双方只是静悄悄地互相投掷瓦片，嘴里即不叫骂也不喊口号，只听见哗哗的瓦块声。还不时可见，在屋顶

上的人被瓦块击中流血，他们或者自我包扎后继续坚持，或者撤下屋顶。

渐渐地，可看出已形成了两方的分界线。分界线附近所有单位和民居的屋顶都被占据。屋顶互有攻略，失而复得，得而复失。

战至 8 点多钟，双方逐渐停手，开始吃早饭。

吃完饭，现场的人越聚越多，都是闻讯赶来的，抬头望上去，只见“贸派”增援的人已到，在环城公路上下黑压压的一片，已经组织成队伍了。此时，“忠实派”的头儿也正商量办法。街头巷口，到处是看热闹的群众，大家一点也不惧怕危险。

“贸派”突然集中发出“冲啊！冲啊！”的呐喊，手拿钢钎，头戴藤帽，左手还拿着一块如同盾牌的遮挡板，从上而下冲了下来，冲到“忠实派”的据点下面时，“忠实派”的瓦块、砖头、石头砸下去。“贸派”停一会，退几步，又开始冲。

“忠实派”匆匆凑起的人马急忙上去增援，也高举钢钎、盾牌，双方非一线的“战斗”人员就如同啦啦队般的狂喊口号，屋顶上的瓦块、砖头不够，双方都将鹅卵石和砖块运上屋顶。屋顶上双方都有人被砸中，伤者不断增加。

看热闹的群众仍然在路口围观，有的还分别在喝彩，偶尔也有被砸伤的，但观者仍不见少。

部队已派人赤手空拳跑到现场制止武斗，他们都到最危险的两派结合地段去喊话，但毫无作用，反而有人受误伤。只要部队有人受伤，两边的人就相互喊叫，都说是对方打伤了解放军。

一种“新式武器”在两边很快用上了，就是将凳子反过来放，在两只凳子腿上绑上宽大的橡皮条，将拳头般大的石头弹

出去，射程较远，准确度不高，往对方阵中打去多少是个威胁，有时打伤人，其中更多的是围观的群众。

涪陵军分区王永言代司令员、任成宣副司令员亲自到现场制止武斗，他们找到“贸派”“红联司”主任委员、“贸派”名义上的第一负责人况道成，要他们撤下去，杜炳全同意了。快 12 点，“贸派”叫人回去送饭来。“忠实派”开始反击，“贸派”就势撤回粮油大楼。

下午 15 时多，“忠实派”决定占领粮油大楼，拔掉伸进来的一颗大钉子，这座楼比较庞大和坚固。在震天动地的喊声中，他们集体冲锋，打头的分头用大饭桌，上面再固定几张棉被，几个人在桌下顶着冲，楼上的砖头石块雨点般砸下来，有的桌子被砸垮了，换上又冲上去，这桌子就像战争中的坦克啦！后面的举起钢钎跟着冲，对方拼命抵抗，顽强不退，受伤的人很快增加……几经反复后，终于冲进了底楼。

“红联司”接到“忠实派”攻打粮油大楼的电话，“贸派”赵树金说要去增援，并调来“一兵团”三个连，“红贸军”一个连，杜炳全也拉响安装在“红贸”总部三楼的警报，各个总部的人纷纷赶到南门山来集合，这样集中了约有 600 到 800 多人，分四路前去增援“粮油大楼”……

“忠实派”对前来增援的“贸派”人员不断投掷砖瓦石块，同时经过逐个楼层的争夺，“贸派”终于全部从粮油大楼撤走，“忠实派”占领了粮油大楼，他们的旗帜在大楼顶上升起，他们的人自然也都欢声雀跃。

这时，在这次武斗中死亡的“忠实派”武斗人员，涪陵合作

理发店工人王忠生的尸体从大楼中抬了出来。

武斗过程中，有上百家民居的屋顶成为战场，上面的瓦几乎被揭光了，家里的人也躲到了外面，双方人员在这些家中进出，但没听说哪家有失盗的事。

“7.5 武斗”后，涪陵两派都安排运来大量砖瓦，很块就将被损坏的民居家修缮完毕。

但是，武斗毕竟危及旅客和船员的往来和人身安全，7 月 7 日，渝涪线班轮停航，至 9 月 16 日复航，共停航 71 天。渝宜、渝汉班轮也在此后不停涪陵，涪陵城与外界的水陆交通基本断绝。

涪陵“75 武斗事件”后，两派的武斗人员开始用大刀、长矛“武装”起来。

6 月 29 日，周恩来获知成都“红成”“万人赴京汇报团”部分人员已抵达四川绵阳时，再次指示：“革命群众要听毛主席的话，要遵照中央的决定，可以派 10 个代表到北京商谈。”

30 日，周恩来再指示四川省革筹小组：“红成”到京人数，10 人不行，力争 50 人，万一不行，无论如何不能超过 100 人。

7 月 1 日，当周恩来得知“万人赴京汇报团”仍继续北上时，又给在绵阳的张国华打电报并转告“红成”负责人，指出：“你们要动员 5 万余人赴京告状，这无论从哪一方面讲，对抓革命，促生产，支援三线建设，便利交通运输，节约闹革命，都会引起不良后果。更无法听取汇报，进行会议。希望你们以大局为重，保持你们的革命精神，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与张国华切实商量代表人数，以便通知铁路局接待你们早日来京。”

由谢富治、王力、余立金、李再含及中央文革工作人员张根成和北京航空学院“红旗战斗队”的四名大学生组成的中央代表团 7 月 4 日到达成都后，当晚即与省革筹领导开会，听取四川情况的汇报。

在张国华汇报时，刘结挺插话说：“‘红成’说筹办整群众组织的黑材料。”

王力说：“这是红材料，不是黑材料。”

刘结挺说：“军区支左办公室与筹办唱对台戏。”

王力:“这就是两个司令部吗。”并命令撤销军区支左办公室。

会后，刘结挺、张西挺抑制不住内心的高兴，不停的说：“真解决问题，简直太好了，真痛快。”他们交代田禾向“826”讲讲王力的讲话，田禾和郭一民即来到四川大学，召开座谈会，传达了王力在会上讲的十二条指示。很快，成都的大街小巷都贴上了王力的“十二点指示”。

“红成”立即致信王力，提出质问。王力写信辟谣，并公诸于世。当他见到张西挺和田禾时，生气的问他们：“是谁传出去的？”

张西挺没有说话。田禾见状说道：“是我传出去的。”后来，他分别和郭一民、冯德华说，王力确实有个“十二点指示”，并拿出他的记录给郭一民看。

7月8日，“红成”总部表示同意只派60名代表赴京，并尽力说服其他赴京人员人立即返回成都。

7月10日，周恩来和陈伯达联名致电“红成”总部并同时告四川省革筹小组，中央将派出代表团赴西南，希望你们把在赴京

途中的八九千人迅速劝回成都。

这天，“红成”北上代表乘坐的火车走到广远。陈伯达亲自打电话给广元军分区，要军区派一武装班护送“红成”100名代表上京。

就这样，7 月 11 日早上 5 时 21 分，“红成”100 名代表在解放军的护送下，乘 34 次车从广元赴京。

“红成”派上访代表到达北京后，被安排住宿在北京沙沟红卫兵接待站，他们强烈请求周恩来等中央领导接见。总理联络员办公室电话通知中央文革记者站派人，一同前去听取“红成”上访代表的意见。

记者站派肖健卿前往。肖健卿与周恩来联络员于 7 月 19 日和 20 日，连续两个半天，在“红成”派代表住地，听取他们的意见。他们情绪异常激烈，声言：

“成都要打仗了，快要爆炸了！我们‘红成’战士在流血牺牲，请求中央赶快救援!”

其中的主要意见，就是对刘结挺、张西挺支一派压一派的做法强烈不满，对支左部队不能“一视同仁”也颇有微词。他们强烈要求周恩来等中央领导接见。

北京卫戍区司令傅崇碧听说北京的“四三派”和“四四派”又在酝酿武斗，就让陈伯达出面做做工作。7 月 6 日，陈伯达在政协礼堂接见北京市中学生。他说：

“今天傅崇碧同志命令我来讲话，不晓得灵不灵。你们都是了不起的人啊，我只是一个普通、普通的小小的蹩脚的老百姓。看到你们这里有这么多人，我就有点害怕了，心就跳了，因为乡

下人看到人多总是有点害怕。”

看到学生们在忙着记录，他说：“听听就好了，不要作笔记，不要贴大字报，也不要广播，我是见了刀子就害怕，因为有许多学校的学生正在磨刀，准备大武斗。”

他指着桌子上摆着的一堆刀子、鞭子等凶器说：“你们都看看前面摆着的这些武器，都是要打死对方的。你们这样干有什么意思？人多、刀子多、力气大，那当然会打赢了。”

他说：“傅崇碧同志跟我讲，最近大学生好一点，中学生准备你死我活地斗一下，我听了以后，因为没有调查研究，不晓得究竟是不是这样，没有把握，刚才进来看到一大堆武器，这当然只是收集的一小部分，还有‘埋伏’的，我相信可能在准备干。”

他问：“你们都是两大派吧？‘四三’派、‘四四’派。我是不三不四派，合成一派就是毛泽东思想革命派。”“大家好好思考思考，究竟是不是分这么两大派？中央文革号召大家不要分成这么两大派，更不要两大派进行武斗。”

“你们读了毛主席纪念张思德同志的《为人民服务》那篇文章吧？那里面引用了中国的一句老话：‘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有的同志跟我说：‘现在武斗死了连鸿毛都不如！’我看连麻雀毛还不如，那为什么要这样武斗呢？我看不是在座的人都要搞，有的人唆动人去搞，不要上当了！”

“你们现在搞武斗这些队伍都要解散，什么‘敢死队’、‘飞虎队’，不晓得还有什么样‘队’。这些队都要不得，想一想毛主席的《为人民服务》这篇文章跟我们说的，这样斗死了，是不值得的。我们为什么不留着我们的生命来为祖国服务，为祖国而死！

有的究竟打死谁还闹不清楚，因为是群斗，还有，死的人为什么死，也闹不清楚。”

“不晓得是不是说服了你们，你们赞成武斗就武斗吧。一定非斗不行，那我有什么办法？但我想说服你们可以吧？”

众答：“可以！”

陈伯达：“这个意见也是广大群众的意见，广大群众的要求，是从群众中来的意见。斗争是需要的，但是要用头脑，用思想，不要靠刀子。”

“你们现在有几种情况吧：一个就是想出去逛，逛逛就要打人，好像不打人就没有什么意思了，英雄无用武之地，你们都是英雄嘛，力气总要使用一个地方嘛，这样想来想去，还是打人好，因此就准备打人了。现在我们在座的有‘联动’的同学没有？‘联动’的同学也是我的朋友，那一天我是见到福建的一些‘联动’，他们叫‘东海兵’，我知道他们的名字，人不认识。那天在政协礼堂这里开会，100 多人。我怕坐在后面的人听不见，我说后面的人都坐到前面来，结果，有的群众说他们是‘东海兵’的，我就懂得了。我说，让他们到前面来，并不等于我同意他们的政治意见。他们的头都是剃得光光的，他们的确不大行，说道理也说不过人家，只会吵架。那天我给他们提供了两点意见。第一点，我问他们：你们为什么把头都剃光了？他说，当时是破四旧。我说，破四旧怎么破到头发上来了，我们讲破四旧是破旧思想、旧风俗、旧习惯、旧文化，这跟头发关系不大吧？女同志留头发他们赞成。女同志没有剃光头，这一点，他们比较聪明。他们没有剃头发一样可以参加文化大革命。为什么要剃光头才能参加文化

大革命？这都是非常简单的。小孩子的脾气，没有什么道理可说的。将来他们留也可以，不留也可以，我没有固定的成见。我并没有说剃光头不好。你们在座的也有剃光头的。我在延安的时候，差不多也是剃光头。所以剃光头没有什么问题，你们愿意剃就剃，不愿意剃就留。第二点，我看‘东海兵’那些同学的确比较娇嫩，又讲不出道理。我就跟他们说，要学做老百姓。不晓得他们听得进听不进就是了。因为他们觉得自己是英雄好汉，把自己跟群众区别开来。我劝他们学当老百姓。”

“你们现在有一个好机会。刚才傅崇碧同志给我看了几张图片，小学、中学校破坏得很厉害，桌椅、板凳、窗户等破坏了。”

他将照片拿给大家看，哟接着说：“当然，不一定是在座的同志破坏了的。我看现在复课闹革命，首先用自己的双手把学校修理起来，不晓得可以不可以？”

众人鼓掌，表示同意。

陈伯达说：“由学生破坏的，由学生来修，不要再请工人了。这样你们也学一点本事嘛，又会修房子，又会修桌椅板凳，你们就变成多面手了。准备一个复课做条件，下半年上课了。一边上课，一边搞斗批改。你们大概都很想上课了吧。现在，首先把学生集中到学校去，一部分时间讨论文化大革命的问题，同时劳动，当泥水匠，当木匠，当修理工人，这不是有点职业了吗？我看你们当老百姓，可以当一个好好的老百姓，不会像我这样一个蹩脚的老百姓。因为你们现在年龄还轻，精力充沛，手也灵活，脑子也灵活嘛。”

陈伯达动员他们联合起来，他说：“教育部有两大派，一派

联系新北大，一派联系北师大。我说我既是新北大的好朋友，又是北师大的好朋友。你不能说我不是新北大的好朋友。”

聂元梓插话：“你是新北大的好朋友，是北大的好老师。”

陈伯达继续说：“如果联合不起来，把我劈成两半算了。”

“可以开联席会议，先作自我批评，然后搞大联合。三个步骤：第一先整风，自我批评。总有缺点，不会完美无缺，不管缺点有多少，提一提，谈一谈嘛，根据毛泽东思想进行整风，这样就可以开联席会议了，就可以开联席会议了，就有开联席会议的可能了，不然一碰就拍桌子，说话说不拢，没有商量的余地。开联席会议以后就可以搞大联合了。有时你们适合不适合，由你们考虑好了。”

7月7日，毛泽东说：“我个人觉得目前存在这样一个苗头，就是放弃对敌人斗争，对最大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斗争。上次在这儿座谈的时候，曾经提出这个问题，我也讲过应该上纲，这个纲针对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现在这个矛盾不集中，很分散，这样就难批臭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 第 713 回：七月七，“高司”支援肉联厂　沙头角，形势紧积极备战

长沙“六六惨案”，拉开了湖南两派武斗的大幕。从 6 月底至 7 月中旬，在长沙市南郊的长沙肉联厂、长沙铝厂、长沙赛璐珞厂，长沙机床厂等几座大工厂，先后爆发了时称“南郊武斗”的系列零星规模武斗。至 7 月 7 日，以在长沙赛璐珞厂，长沙机床厂的大规模武斗，标志着长沙的武斗，开始进入到真正是“你死我活”的阶段。

7 月 5 日，长沙的形势越来越严峻，高校学生宿舍的一楼窗户都已经用红砖砌石，一楼的房子已经不再住人。“高司”的同学们大部分都在学校，人人都做好了决一死战的准备。学校附属工厂的工人们正在按照化学系的师生们配备好的原料赶制手榴弹，体育系的学生们正在加紧训练，准备迎接新的战斗。

那时湘江上没有一座桥梁，平时河东河西就是靠轮渡来往。但是这时，江面上已没有一只船往来，因为湘江轮渡码头已经被封锁。码头分别被“工联”和“高司”两军各派人把守。两岸信件是靠邮政局派一只小船，上面插一面小小的绿色旗帜，由一个人每天来回一次，各自搬下搬上自己的邮包。

7 月 7 日，驻湖南 47 军军长黎原代表 47 军进京参加谈判。

这天，“高司”支援河东猴子石被“湘江风雷”包围了好几天的肉联厂，那个厂是“高司”派的，工人们说如果再不去支援他们，这块阵地就会失手。　“高司”在河东的地盘已经越来越

小，于是“高司”决定一定要去营救肉联厂，“解放”那里的工人。

天黑了，“高司”支援肉联厂的队伍来到湘江边集结。湘江河西的河岸边不时有强烈的探照灯光照过来。每当灯光扫过,“高司”的支援队伍就趴在河堤上一动不动，待灯光一过，马上爬起来，跑步前进，向肉联厂的方向靠拢。

河边坑坑洼洼很不好走，一路上有农民不断地给他们带路。大约晚上 23 时多,河西 4 所高校的同学们已经在大堤上集合完毕，等待指挥部的命令。整个“战斗”的总指挥是湖南师院的一个副院长和武装部长，他们手提步话机，指挥若定。河面上几艘大渡船，早已由农民准备完毕。

指挥部一声令下，大家登上大船。撑船的都是清一色的年轻力壮的农村小伙子，他们齐刷刷的一用力，船就向对岸移了过去。

一路顺利，8 日凌晨 1 点多钟，他们上了岸，穿过京广铁路，进了肉联厂。吃完饭，全体进入了战斗状态。有武器弹药的同学都是在铁路沿线埋伏，拿梭镖的第二梯队埋伏在厂背后的一个小山上，离前线大概有一里多路。

一个多小时过去了,突然，一道强烈的灯光在铁路上出现,随着就是一阵“嘟、嘟、嘟、嘟……”的机枪声划破了长沙的夜空，跟着来的就是步枪和手榴弹爆炸的声音，战斗打响了。

“高司”的支援没能挽救肉联厂的命运，战斗只有几十分钟就结束了,“高司”的队伍很快就撤离肉联厂，坐原来的船，又回到了河西。当他们又走在河堤上时,队伍里多了几付担架，担

架上躺着的是刚刚在战斗中被打死的同学的尸体。担架太小，摆不下他们魁梧的身体，他们手臂吊在担架的外面，垂着。担架一路走过来，“烈士”的手臂一一抚摸队伍中的每一个人们，向他们一一握手告别。

同学们默默地走着，他们似乎是在为死去的同学默哀，在为死去的战友送葬，他们似乎觉得：湘江也是在默哀，哀泣着缓缓流向北方。

“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想念毛泽东，困难时想您有力量，黑夜里想您方向明——”这是当年红卫兵最爱唱的一首歌，他们心里唱着唱着，不觉眼泪淋淋。

“高司”支援肉联厂的行动以失败告终，同学们抬回了 7 具尸体。

7 月 9 日，位于河西长沙船舶厂武装部的民兵训练枪支弹药，被“高司”派人员抢走，继而进一步引发了一轮两派分别抢夺各单位民兵武器的高潮，直至发展到抢夺解放军军用仓库物资。此后，五一路与蔡锷路交叉点垒起屏障，架起了机关枪。解放路、司门口武斗用上了机关炮，打得硝烟弥漫，弹痕累累。市委大门口常有载死尸的车停泊，走错了路都能遇到追悼会。长沙市民处在惊恐之中。

我们再说与湖南毗邻的广东。对当时香港正在进行的抗暴斗争，广东省军管会支港办公室认为，行之有效的支援方法是：“一、随着港九斗争形势的发展，适时的举行集会和示威游行，给港九同胞以有力的支援。二、赠送毛主席著作、语录和毛主席像章等。三、写慰问信，拍声援电，鼓舞港九同胞战斗士气。四、报纸、

电台发表有关社论、文章以示声援。五、做好港九同胞在穗家属工作，发动他们写信鼓励亲人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积极参加反英抗暴斗争。”

于是，从 5 月下旬至 7 月上旬，广州地区群众组织共举行了 14 次规模浩大的集会和示威游行，参加人数达 50 多万。

到 7 月 5 日止，广东省军管会支港办公室共收到广州地区给香港赠送的《毛泽东选集》26303 册，《毛主席语录》57756 册，“老三篇”25470 册，毛主席著作单行本 37659 册，毛主席像章 189478 枚，锦旗 104 面。

香港《大公报》来信反映，赠送宝书政治意义很大，但由于数量太多，积压现象严重，分发也有些困难。群众组织和个人赠送的“红宝书”，在香港《大公报》堆积成山，加上雨季空气闷热潮湿，有些已经开始霉烂了。香港方面不得不建议暂停送书。

随着中英关系和香港局势的紧张，在香港边界地区的大陆边境民众，也不断发起“反英援港抗暴”事件。6、7 月间，仅宝安县民众在罗湖、文锦渡等边界地区的集会、示威游行，向边界对面的英军、英警寻事和过境袭扰事件即达数百次。与此同时，深圳的罗湖、罗芳、莲塘等地的农民在通过境界线到位于九龙地界的土地耕作时，也常常被英警无故刁难或打骂。农民群众为此怒发冲冠，在英警打骂下亦不示弱。生产队挑选青壮年社员过界耕作，在遭到英警野蛮逞威时，就用锄头扁担打对方。有一天，在文锦渡从事过境搬运工作的工人还将两个巡视边境的英籍警官捉了过来。在这种双方互相敌视的气氛日益增加的情况下，香港英警防暴队和英军大量集结在边境线地区，从元朗落马洲至沙

头角一带都驻扎了大量英军。

对此，广东省军区守备部队长期驻守在这段边境第一线的守备团 7085 部队也做了相应的战备工作，他们立即抽调部分“三支两军”的干部归队，部署各营、连集结前沿。全团都做好了打仗的准备。除增加岗哨和巡逻以外，也做了最坏的打算：一旦战斗打响，团部干部的家属、孩子立即撤出深圳，到广东省北部的连平、和平等山区隐蔽。

6 月 26 日，时值盛夏，天气格外的热。这天，沙头角镇内几十个青年人追赶中英街的英警，把他们撵回炮楼后，仍向对方扔石头和玻璃瓶，造成英方人员受伤。英军开枪，一民兵被打死，当地群众无比激愤。守备团部领导接到报告，决定成立一个临时指挥部前往驻守在沙头角的六连。

临时指挥部由 6 个人组成：参谋长石长福和叶参谋、两个警卫员、两个通迅员。他们乘坐吉普车赶往沙头角。下车后，立即选房子、接通电话、布置作战地图、建立指挥系统。一切就绪后随即向上级报告，并连夜召集六连的干部开会，了解英军的新动态和基本情况，布置任务。

会刚开完，电话铃就响了，叶参谋拿起话筒一听，竟是中央军委直接打过来的。叶参谋顿时感到有些紧张，因为自从 1949 年入伍以来，打过交道的最高机关就是军区。作为多年的作战、侦察参谋，他深知上级领导对下级机关发问时，从来不准下级说些模棱两可的话。如什么也许、可能、或者、不太清楚等用语，而且数字也必须绝对准确无误。由于他们刚到不久，才开始工作，生怕军委首长提出什么难以回答的问题。

话筒里，军委首长问了叶参谋的姓名、职务后，接着问："你们现在有几部电话？"

"3 部。"叶参谋回答。

"那好，你把它们编上号，1 号直通中央军委，2 号通团部和军区，3 号是你们指挥部与所属战斗部队通话用的。3 部电话全都不用摇机，拿起话筒就能直接对话。"话筒里，军委首长不慌不忙的命令说。

军委首长接着又说："把你们的作战方案简要地说一下！"

叶参谋真的有些心慌意乱了，因为指挥部根本就没时间研究作战方案，但又不敢实说。他只好用眼睛瞟了一下参谋长，没料到这时候的石参谋长额头上已经冒出了冷汗。他接过话筒嘴唇动了一下，连话也说不清楚。在这种尴尬的情况下，叶参谋急中生智抢过话筒说：

"我们的作战方案主要有三点：

一、目前敌人还没有动作，双方正在对峙着，我方正在严密监视，及时掌握敌情动态并采取相应措施。同时，不主动挑起事端，不打第一枪，部队多带些机关枪在阵地前沿隐蔽好，防止敌人突然袭击；

二、若敌人首先发起进攻，我军不要急于堵回去，要放进来打，诱敌深入后，则命令部队从北面的伯公坳向西南方向直插敌境内的沙头角与联和圩交界处的石冲坳，切断敌人退路和阻击敌增援部队，要多捉俘虏；

三、我方群众越界惹事引起敌人开枪射击，并有向我发起进攻的迹象，对此我们有两个办法，一是我军换上便衣越界出击，

二是将部队的武器发放给民兵，让民兵越界战斗。”

听完叶参谋的这番话后，军委首长说：“很好！你们团指挥部想得很周到。但是，部队绝对不能换上便衣化装越界出击。”

站在一旁的参谋长听到这里，脸上顿时露出了笑容。通话完毕，他高兴地将叶参谋抱了起来。放下后，指着叶参谋的鼻子说：“我还不知道你小子有这两下子，快把你刚才说的写在作战日志上。”

当他们写完作战日志后，炊事班长端来了一大盆饺子，刚吃了几个，1 号电话铃响了。对方说：“军委同意你们的作战方案，但要定具体实施办法。外交部罗贵波副部长也同意你们的方案，他要求你们注意掌握分寸，掌握民兵的情绪，不要随便越境闹事，授人以柄。”

叶参谋记录好电话内容，参谋长对他说：“我在这里守电话，你抓紧时间吃晚饭。”

不料，刚端起碗，3 号电话又响了，是梧桐山观察哨报告英军炮兵调动情况，叶参谋只好放下饭碗，将情况做了详细记录，在作战地图上做好标记。然后，立即向上级汇报。为此，又忙碌了一个小时。这时已经是深夜 12 点了。

临时指挥部研究作战方案的细则并向上级汇报。上级批准了他们的方案。于是他们又连夜召集营、连、排干部开会部署作战方案细则。部署完毕后天已经亮了。他们刚想躺下合一下眼，又有连队干部进来报告：

“沙头角镇内有几十个青年人在追赶中英街的英警，把他们撵回炮楼后，还向对方扔石头和玻璃瓶……。”

听完报告后，叶参谋急忙与连队的干部前往现场。在现场，他们规劝民兵：“不要主动挑起事端，令自己有理变成无理，对方的暴行和挑衅行为，我们部队会处理的。”

“文革”期间，军人说话特别管用。民兵们听了他们的话之后便很快散去。可是，叶参谋他们离开之后，一些民兵和群众还是照样向对方扔石头和玻璃瓶，不分白天黑夜地扔。所幸没有造成伤亡。他们采取分散流动的打击方法，使对方的炮楼底下、街道和公路变成了垃圾堆，对方没有人敢出来清扫。

沙头角属于广东省惠阳地区宝安县的一个公社，毗邻香港九龙地区，虽说是弹丸之地，但当时却是名扬四海的世界上 4 个分裂地区（点）之一：朝鲜三八线将朝鲜半岛分裂成两个国家——朝鲜和韩国；越南北纬 17 度一线也曾将南北方分成两个政权——南越和北越；德国的柏林墙又曾将德国分成两个国家——联邦德国和民主德国；再就是中国的深圳沙头角中英街了。前 3 个分裂地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 1945 年形成的；而沙头角中英街则是清朝光绪年间所定。昔日清王朝将高 1 米宽 0.4 米的石碑立于中英街的分界线上，将一条长约 300 米、宽 5 米的街道分成两个世界。中方当时的行政区划上属于沙头角公社，是惠阳地区所属的宝安县境内地域范围最小、人口最少，约 1000 人左右、地理位置偏僻的一个公社，只有 7 个自然村：径口、田心、沙井头、沙拦下、庵上、官路下和沙头角镇村。沙头角镇村内只有 10 多间商店和 200 个居民。从内地进入沙头角镇后，从东向西经过一座长 10 米、宽 5 米的水泥桥便是中英街口，街口中间就立着那块分界碑。界线以南是中方，面积约 0．5 平方公里；北面为英

方辖区。来往的人们按照国际惯例，港英居民和军警靠北面走，中方居民和解放军值勤人员靠南走，两方来往人员几乎可以并肩行走。自东向西走到中英街的尽头转向南，为海旁路（双方同名），路中间有一条宽 5 米深 6 米的水泥结构水渠，长 400 多米，直通到海边。以渠道为界，西面为英方辖区，街两边全是店铺；东面为中方辖区，沿着水沟有一条行人道，人行道的下面分布着全都背向西面的住房。南面就是大鹏湾，在大鹏海岸上，7085 部队 1 营 6 连 1 排的营房就坐落在那里。按规定，凡是海水所到之处均属于英方。大鹏湾时常有英军舰和水上警察的巡逻舰艇四处游弋，我方仅限于渔船能在大鹏湾海面活动。英界香港范围内的沙头角仅有乡的建制。在香港境内有一条水泥公路从上水向东直达沙头角地区。公路两旁有很多商店，除了中英街有 30 余家商店外，从海旁街出沙头角往上水方向 1000 米处店铺林立，沙头角联乡办事处、警署和一些大商店就设在这里。在双方的商店里，除了吃用的日常消费品应有尽有外，还有金铺、钟表店等高档商品。在当时我方老百姓看来，黄金和钟表均属于奢侈用品。英界沙头角乡附近的村庄分布大致是：北部有山嘴、担水坑、盐寮下；南部有榕树坳、凤坑、鸡骨树下等。南北部的村庄皆与英界沙头角陆地相连，而与中方沙头角则由小海峡相隔。南北部的所有村庄与我方阵地相距很近，均在机枪和六零炮的射程之内。香港居民历史上从未屈服和认同过英军的占领，祖先曾因反抗英军暴行而遭到大屠杀。在抗日战争时期，日寇占领香港后在此肆意残杀老百姓。于是，这里的青年男女纷纷加入了抗日游击队，到内地参加抗日救国或在当地打击日寇。他们和自己的祖先一样，历来

都认为自己是中国人。英军、英警镇压香港左派工人和在边界制造事端的行径使他们怒不可竭，男女老少天天成群结队到当地英警的防暴队驻地——联乡会大楼抗议，并到中英街附近地区游行示威，只要英军英警有什么新的动向，就及时派人过来向中方报告。为了阻止双方老百姓的汇合示威，英警将处于中英街街口的一座高 30 多米的大炮楼楼下，用铁丝网封锁起来，阻挡管界两方的群众汇合聚集。可是，双方的群众经常派人去扒开铁丝网。对此，英警就施放催泪弹或从炮楼下来用警棍追打群众，这样的情形一直延续到 7 月 5 日。

7 月 5 日下午，英军在沙头角大量增兵，香港英警防暴队和英军大量集结在边境线地区，从元朗落马洲至沙头角一带都驻扎了大量英军。其武器装备大多是轻、重机枪和大炮。英警的防暴队也增加了 100 多人进驻联乡会，加上原有人马共有 200 多人，而且配备了几十挺机枪。

驻保安的守备团 7085 部队也进行了作战准备工作：第一线配置了 2、3 营和机炮连；沙头角镇所有高建筑物上都堆上沙包，架起轻、重机枪和高射机枪，并将部队的武器发放给民兵，一旦需要，民兵可以越界战斗。驻扎在横岗、盐田等地的野战部队则视情况变化，随时待命出发增援。

7 月 6 日傍晚，沙头角中方一侧有一个小孩子得了急病，沙头角公社卫生院的医疗设备简陋而无法医治。按当地人的习惯，要到英界内的香港医院医治。但是由于进出口处被英警严密封锁，无法通行。中方派出联络人员要求炮楼上的英警放行，未果。中方十多个被激怒的青年人便上前去拆障碍物，英警随即施放催

泪弹。民兵张天生从商店里取出一桶柴油浇湿棉被扔到炮楼底下，正准备点火时，炮楼英警用机枪射击，张天生倒在血泊里。对此，中方军民极为愤慨，但没有得到上级的命令，不能擅自开枪。晚上，团长李廷阁来到前线，师里的白政委等人也来了。

7 月 7 日，中方群众举行集会抗议，甚至连沙头角镇以外的村庄和盐田公社的群众都来参加集会游行，整个篮球场挤得满满的，群情激奋地声讨港英当局的罪行。当天，英界各村庄群众也自发地集合起来，数百人到联乡会前强烈抗议，他们不顾英警施放催泪弹，振臂高呼："打倒港英当局！血债要用血来还！"等口号。一直坚持到下午才散去。

此时，部队各级军事指挥员、地方负责后勤供应的地区、县、公社干部及《人民日报》记者，均聚集到沙头角。

## 第 714 回：七月八，枪声酣中英交火　抓薛平，港九两地同宵禁

7 月 8 日早晨，沙头角中方群众又集会游行。游行示威队伍从中心球场出发，经中英街到海旁路，之后转到海边，然后再回到中英街。游行人群摇旗呐喊直到中午。其间，几个民兵从英界中英街后面大菜园角，插到距联乡会大楼后 400 至 500 米处的稻田里，不料很快被联乡会里的英警防暴队发现。他们见荷枪实弹的民兵越界潜伏，立即用机枪扫射。民兵不懂得利用地形地物前进或后退，只能死死地卧在稻田里不敢动弹。幸好稻田里有稻草作隐蔽，不然的话很难生还。

英军机枪的枪声大作，守备团临时指挥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一来没有弹着点，二来不见敌人运动。用望远镜一看，联乡会大楼里人头攒动，他们知道那里是出事地点，于是命令距离联乡会大楼比较近的十多挺机枪分别各就各位、一挺机枪瞄准一个窗户，严密监视敌人的动静。不一会，民兵连长罗九气喘吁吁地跑来报告，说有几十个民兵越过边界，躲藏在稻田里现在撤不回来。

团长李经阁听了很生气，问是谁叫他们过界去的？

民兵连长罗九结巴了。遇到这种事情，真是棘手难办。进军肯定不行，100 多人的民兵出击也不行。叶参谋提议："最好的办法就是叫民兵们潜伏不动，待天黑后再偷偷地潜回来！"团长同意他的办法。

对方打了一阵子枪后，见民兵没有动静，也就不再打枪了。

几十个民兵在稻田里泡了几个小时，心里非常着急。

到下午 16 时，英方从联乡会大楼里出来数十人，分两路包抄民兵。与此同时，大楼窗户前站满了英军在观看。从大楼出来的英军向稻田里猛烈开火。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前线指挥部接到开火的命令。说时迟，那时快，几十挺机枪同时向联乡会大楼和正向民兵隐蔽地进发的两路英警开火。由于事先研究定下了战斗方案，每挺机枪对准一个窗口射击，命中率相当高。

机枪响后，深圳梧桐山解放军观察哨来电报告："英界沙头角几个村庄的炮兵阵地上大炮纷纷将炮口对准我方。"临时指挥部的通讯员和司机得知这个情况后，惊恐地问：

"叶参谋，仗打起来后我们往哪退？"

叶参谋对他们说："不能退，也没有路可退。我们全在敌人的炮火和机枪的射程之内，唯一的退路就是去见马克思。"

他接着说："你们放心，仗不会打起来的。英国人真要发动战争，就不会在这个弹丸之地开战。只要敌人的大炮一响，深圳正面就没有边界了。我军只需用一个军的兵力就能彻底地占领香港，到那时，你们说英军往哪里退？"

通讯员和司机听了这番话后，高兴地笑了。

中方的机枪足足打了 15 分钟，把对方打得鸦雀无声，在公路上遗留下 10 多具尸体。当天晚上获悉，共打死防暴警察和英军 42 人，绝大部分是胸部中弹。估计联乡会大楼窗户前的敌人一个不剩。后来，香港同胞逢人就说："解放军真是神枪手，个个都是打中胸部。"

稻田里的民兵撤回来了，没有任何损伤，只是有一个民兵摔

得像泥猴似的，连枪杆里也塞满了泥巴。

当天晚上，野战军机关领导不断来电话询问："要不要什么支援？如果需要支援可随时来电。"

这时，地方政府机关和群众送来了大量饼干和罐头，这在当时对军人来说，算得上是奢侈品了，因为当时的市场上，买饼干凭粮票、买罐头凭领导的批条。

第二天一大早，英方下半旗致哀。军警仪仗队站在中英街口的炮楼下，面向中方，打鼓吹喇叭和奏风笛，表示哀悼。英国伦敦的报纸发表文章：《中国老虎真地吃人》，港澳同胞为此扬眉吐气。

《人民日报》再次发表支持香港左派反英抗暴的言论。

7 月 9 日，中方就港英当局在沙头角打死打伤香港同胞 9 人，并在边界向中方进行武装挑衅事，向英方提出最紧急、最强烈抗议。英方则就中国"边境群众越界袭击警署"事提出口头抗议。

英方虽就此向中方提出抗议，但害怕事态进一步扩大，后果不可预测，于是采取了克制态度。7 月 8 日以后，中英双方都不愿扩大事态，相继约束自己的军事人员停止挑衅和开枪事件。英警也不敢上中英街巡逻了。

中英沙头角枪战后，香港出现传言，中共打算收回香港。之后，香港左派的行动进一步升级，开始以罐头罐制造土制炸弹和用珠江汽水的汽水瓶制造燃烧弹袭击警署，并以镪水从高处袭击经过的警车及公共交通，左派学校的实验室成为了炸弹的制作工场。"斗委会"通过左派报纸，号召"人民战争开始"，"抗暴斗争要越级"，"港英如再顽抗不低头，将会尝到菠萝"。左报还报

道“摆真假炸弹阵的活动迅猛开展”，“有一天，在港九市区出现的真假炸弹多至二百个左右”。据警方统计，67 年 5 至 10 月，市区被放置的真假炸弹逾 5000 枚，其中假弹逾 4000 枚。暴动及镇暴造成的伤亡：警员死 7 人，伤 179 人；军人死 1 人，伤 23 人；保安人员死 1 人，伤 4 人；市民死 24 人，伤 299 人；暴徒死 11 人，伤 185 人。被捕共 4050 人，罪名成立入狱者 1749 人。

我们再回头看国内的文革。7月9日晚，河南省军区司令员张树芝、政委何运洪和8172部队一军军长徐文礼、副军长赵静生向戚本禹汇报他们的工作计划和打算。

汇报完后，戚本禹说：“你们要做好部队工作，不需要层层作检查，主要是你们作检查。部队和‘二七公社’对立情绪这样大，主要是你们过去宣传灌输的结果。如果这个工作做不好，就会出现内蒙的情况，就会有像张杰这样的人鼓动群众来北京。内蒙有人鼓动，四川也有人鼓动嘛！对你们河南，中央是有准备的，准备你们来10万人，别的省也可能来一些人。昨天告诉傅崇碧同志，准备100万人的接待工作。希望你们学山东，做好这个工作。能不能做好靠你们，你们要承担责任，对部队对群众都要承担。”

“如果你们中的哪个人在后边出点坏主意，煽风点火那就更坏。内蒙王良太就是这样，原来做了多少工作都不行。他把部队弄来，总理、江青、叶群都做了工作，经过教育转过来才认识到他们受了蒙蔽，受蒙蔽只是暂时的，河南会不会有这个步骤，我们是有准备的。”

“‘十大总部’他这样搞说明他不顾大局，这就暴露了他，一边谈判，一边这样搞，与中央对抗。”“河南来这么多人，完

全是群众自发的是不可能的，不会是没有组织的。我估计中央批了以后，就告一段落，如果部队工作做得不好，就赶不上，所以你们赶快做好部队工作。”

“‘河造总’与‘二七公社’，以谁为核心，文字上不一定写，不过你们一定要注意。驻马店‘二七公社’力量比较大，要以‘二七公社’为核心。郑州怎么样提，你们考虑，你们在工作上，要依靠‘二七公社’。‘河造总’说他们（指二七）只有40％多的造反派，那就很了不起了。他们是首先造反的，你们那么大的压力，抓那么多人，连党言川这样的革命小将也被你们抓了，就这样他们也没有垮，你们说‘二七公社’不纯，‘河造总’纯么？他们正是在你们支持以后才犯了严重错误，你们抓人他们就不管，你们把你们的电报从头到尾都翻一翻，你们工作的落脚点应该是‘二七公社’，那怕是40％的造反派，他们敢于抵制你们的错误，疾风知劲草嘛！‘河造总’我说过大部分是造反派，这两个组织不能并提，这你们要考虑，要有一个中心。有一个中心就可避免混乱。你们要敢于依靠反对你们的人，不要有情绪。”

“关于刘建勋回河南的问题，给中央首长反映后再说。”

7 月初,陈再道给周恩来打电话,汇报武汉落实中央文革和全军文革小组 6 月 26 日电报的情况。他说:“近 20 天来,经过军区支左人员的艰苦工作,武汉没有发生什么事,两派之间的武斗已基本停止,武斗的器械也都上交了。”

周恩来很高兴，他说：“好，这样利于武汉问题的解决。”

陈再道继续说：“按照 6 月 26 日的电报精神，各派群众组织已经选出代表，军区也确定了赴京人员名单，做好了汇报的准备，

可以到北京解决问题了。”

周恩来说:“你们先不要急,等我们研究以后,再打电话告诉你们。”

放下电话,周恩来兴奋地对办公室的秘书们说:“好，陈、钟可以控制武汉局势了。解决武汉问题，依靠力量还是武汉军区。”

7 月 10 日，周恩来对他的秘书们说：“主席对我讲，走，到武汉去，保陈再道去!”

7 月 10 日，周恩来在北京听取广州军区司令员、广东省军管会主任黄永胜汇报。在谈到香港问题时，周恩来指出：“香港不同于澳门，在香港动武不符合我们现在的方针。澳门是唾手可得，一压就屈服。我们之所以不拿澳门，是保持一个口子在那里，市场是我们的，同时也不影响香港。收回香港，只有苏修才挑，赫鲁晓夫提这个问题完全是为了挑拨，替美帝效劳。香港问题，……主席昨天讲了，还是不动武。……现在香港有百分之十到五十的居民上了街，只是搞定期罢工，你要是长期罢工，他就会找台湾人来接替。过去省港大罢工，可以使香港成为死港，现在情况不同了，时代不同了。……香港百分之七十的日用品，百分之九十的副食品是我们供应，你一退出，日本就占领市场，台湾也会搞人进去，就更不利。香港斗争是长期的，我们不能急，搞急了，对我们不利。主席说过，把时间估计长一点比短一点好，把斗争估计困难一些比容易一些好。”

正如周恩来所说，7 月 11 日凌晨，香港警察逮捕了正在香港湾仔采访的新华社香港分社记者薛平。“新华社香港十一日电”是这样报道的事情经过：

新华社香港十一日电 香港法西斯当局，今天凌晨横蛮无理地绑架正在进行正常采访活动的新华社香港分社记者薛平。

昨天晚上至今天凌晨，港英“防暴队”不断在湾仔地区制造血腥暴行，镇压我爱国同胞，新华社香港分社记者薛平在现场进行正常的采访活动，但在今天凌晨一时四十分，港英武装警察竟在现场对他施行无理绑架。当时薛平立即表明新华社记者身份，并出示记者证，“防暴队”却不加理睬，并蛮横地抢走薛平的相机，将他强力挟持上警车，随后把他扣押在“东区警署”。

今天清晨三时半至四时半，新华社香港分社副总编辑潘德声两次同港英“警务处政治部”通电话，并前往“东区警署”，就此事提出最强烈的抗议，要它们马上放人。对方竟一再以“在调查中”为借口，横加拒绝。今天早上九时十五分，潘德声和新华社香港分社另一位副总编辑谭干前往“警务处政治部”抗议并要求立即放人。但该部负责人李择信竟借口“薛平不是由‘政治部’逮捕，而是由武装警察逮捕，如果犯了罪将按法律处理”。潘德声当即质问他：我社记者进行正常的采访活动，犯了什么罪？李择信理亏心虚，支支唔唔，无言答对。

今天早上六时整，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梁威林致电港英“代理总督”祁济时，就此事向他提出最紧急、最强烈的抗议。电文指出：“港英当局这种侵犯记者正常采访活动，无理扣押我国家通讯社记者，这是十分严重的”。“你必须立即释放我社记者薛平，并公开道歉。保证今后我社记者的采访自由。否则，一切严重后果应由港英当局负责”。

今天下午六时十五分，新华社香港分社工作人员代表五人前

往港英“总督府”，向祁济时提出最强烈、最紧急的抗议。祁济时龟缩在内，只有一名翻译出见。在代表们提抗议过程中，港英当局竟出动六部“防暴车”，满载荷枪实弹的警察，停在“总督府”门前，武装警察贴近代表，进行猖狂的武力威胁。代表们对警察的挑衅毫不理会，继续把抗议书宣读完，并高呼口号：“反对港英法西斯暴行！”“港英当局必须立即释放我社记者！”“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港英法西斯当局从五月六日开始，蓄意制造了一连串血腥镇压香港同胞的暴行，新华社香港分社进行了有力的揭露，港英当局对此十分害怕，极端仇视，一再对从事正常业务活动的新华社香港分社编辑、记者进行迫害，包括野蛮殴打记者，强行搜查采访汽车，武力威胁记者，并在六月二十五日公然围截并强行搜查副总编辑王磊乘坐的汽车，以及记者陈国荣、陈明珠等的采访汽车。港英当局以为用这种法西斯手段就可以使新华社不揭露它，不刺激它，这完全是痴心妄想。

第二天，7 月 12 日，北京新华社打电报向港英当局提出最强烈的抗议。当天新华社是这样报道的：

新华社十二日讯新华通讯社今天打电报给香港英国当局最紧急、最强烈地抗议港英法西斯当局无理逮捕新华社香港分社记者薛平的法西斯暴行，警告港英当局必须立即释放薛平，否则它必须承担一切严重后果。

新华社报道叙述了 11 日逮捕薛平的经过，并表示：

新华通讯社严正要求港英当局：

立即释放本社记者薛平，向受害者道歉，并赔偿一切损失；

保证新华社香港分社工作人员的正常采访活动和人身安全。保证不再发生类似事件。

港英当局如果一意孤行，那么，一切严重后果，必须由港英当局承担。

7 月 12 日，港英政府同时于港九两地同时实施宵禁，这是暴乱爆发两个多月来的第一次。

此后，香港左派暴力行动不断升级，港英政府开始对左派还击，出动英军搜查左派工会。之后陆续派军警搜查各左派据点，使用紧急法例的授权，拘捕及关押部份左派分子头目，将他们拘押在摩星岭白屋的政治部囚室，部分人之后被递解出境。

## 第 715 回：交检查，再引发“揪刘”行动　陈伯达，凌晨奔北京大学

6 月下旬，杨成武办公室的张忠庆秘书给总参政治部组织部副部长、饶漱石专案组组长陈虹打来电话，说：“首长要你和王育民来一下。”

陈虹和饶漱石专案组副组长王育民按时来到杨成武在总参翠微路五所南楼的办公室。杨成武对他们说：“那一箱‘通天’材料，江青叫你们看一下，别人不得插手，不许扩散，看后向中央报告。”

杨成武说的“通天”材料就是饶漱石专案组 4 月 17 日，应上海公安局要求，请示杨成武同意后，从上海带回北京的那箱材料，一直放在办公室里。陈虹、王育民二人回到办公室，关起门来，将箱子打开，一看，原来是一起关于江青匿名信案件的卷宗材料。此案发生在 1954 年，是关于有人给江青写匿名信的事情，由公安部立案，上海市公安局具体侦破。案件材料装在一个一尺四寸的小箱子里，共有 23 个卷宗，有的卷宗比较厚，有的卷宗只有几页纸。这些卷宗分为五个部分：

一、匿名信。卷宗里没有匿名信的原件，只有信的第一页和信封的两幅放大照片。从照片上看，信封左下印有“华东文委”字样。信的第一页内容，说党的七届四中全会已经开过，要开始审查干部了，你江青的历史是堕落的，已写了材料送中央组织部等等。

二、笔迹照片。为了破案，当时从文艺界、公安系统、党政部门收集了 800 多人的笔迹，包括一些知名人士和高级干部，公安局技术部门逐个进行了鉴定。

三、侦情简报。自立案侦查后工作进展情况、发现的线索，均及时向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陈丕显和公安部部长罗瑞卿及上海市公安的负责同志写了报告。侦查工作中形成的文书材料有五六个卷宗。从侦情简报上看，案子从 1954 年到 1962 年，侦察了八年，尚未有明确的结果。

四、侦查对象调查材料。将笔迹鉴定中发现与匿名信笔迹相似而又有作案条件的人，列为侦查对象，进行重点侦查。一些对象怀疑是作案人，进行调查，但搞了一段时间证明所侦查的对象不准确，予以否定。这样的人有好几个，如江青过去的女佣秦桂珍，她了解江青的历史，就被列为侦查对象；东海舰队司令员陶勇的夫人朱岚，也曾说过对江青不满的话，被列为怀疑对象，立案侦查过一段时间。侦查时间最长的，是曾任上海市文化局局长赖少其的妻子曾菲。因为曾菲的笔迹经公安部门鉴定认为与匿名信很相似，曾菲对贺子珍的生活处境深表同情。那时贺子珍住在上海哥哥处，曾菲有时去看望她，安慰她。对 1952 年毛泽东到上海没有与女儿李敏见面，曾菲觉得不合适。而赖少其在上海党代会上又提了一个议案，建议对贺子珍的生活给予照顾。侦破小组得知这些情况，认定曾菲有作案条件和思想基础。因而对她长期侦查，把对敌侦查那一套手段也用上了。后来赖少其调安徽省委宣传部工作，曾菲随之去合肥大学宣传部任职，但对她的侦查并没有放松，由此而形成的材料相当多，有五六个卷宗。

五、江青的卷宗。仅有一个，写着“若干历史材料”六个字。有文字和照片。文字共三篇。一篇是江青（蓝苹）30 年代在上海写给她当时的丈夫唐纳的公开信。破案人员是从那时的报纸上抄下来的。一篇是江青到延安和毛泽东结了婚，上海一小报的报道。还有一篇是 1945 年毛泽东去重庆，江青带着孩子到重庆看病后的新闻报道及怀抱孩子的新闻图片。照片共两帧：一帧系江青扮演电影《王老五》的剧照；另一帧是结婚集体照，即唐纳、赵丹和顾而已三对，中间坐着主婚人沈钧儒。

陈虹和王育民审阅了全部材料后，对这个案子是否已破搞不清楚。因为此事过去是公安系统管的，于是他们写了一个报告，建议仍由公安部专人负责处理。

报告送上去后，过了一个多星期，杨成武又将陈虹和王育民叫到他的办公室说：“报告送上去了，江青看了。她说案子已经破了，作案人林伯渠的妻子朱明自杀身亡，材料也没有必要保存了。你们重新写一份建议中央指定专人集体销毁材料的报告。”

陈虹他们问这个报告怎么写。杨成武说：“报告的内容，就根据我传达江青的意见，你们做的记录，在文字上做些整理。”

7 月 7 日，按杨成武口述的内容，陈虹和王育民署名写了一个报告，上报中央。

林彪在报告后用红铅笔批示：“由谢富治、杨成武、汪东兴、关锋四人负责集体销毁。”并将批件转给了周恩来。

周恩来阅后加批：“连同北京图书馆保存的材料和吴（法宪）、傅（崇碧）送来的一包材料一并销毁。”

此报告转呈毛泽东后，毛泽东说：烧它干什么，这是历史。

而此时，谢富治已经南下，不在北京。

7 月 9 日，刘少奇按照 7 月 4 日汪东兴转达的中央意见，写出一份“向北京建筑工程学院新八一战斗团及革命师生员工的检查”。此时的刘少奇已身心交瘁，检查是王光美代写的，洋洋 5000 字，分为三部分。检查中写道：“在去年 7 月 18 日以前的一段时间内，毛主席不在北京，党中央的日常工作，是由我主持进行的。”“在工作组派出的 50 多天中，我是一直支持工作组的，这样就增加了工作组犯错误的可能性和严重性。”“我对自己所犯的这次错误，直到去年 8 月 5 日毛主席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出来后，我才开始理解的。在此以前，我是不理解我犯了这样严重的错误。”“在建工学院文化大革命初期所犯的各种错误，主要应由我来负责……我要向受过以我为代表的错误路线压制和迫害的革命师生赔礼道歉。”

刘少奇在检查中写道：“1966 年 7 月底，毛主席号召中央所有负责同志及各地来北京的负责同志都去亲自参加北京各学校的文化大革命，我就是在毛主席的这个号召下，在去年 8 月 1 日到李雪峰同志处同北京新市委的同志一起研究，我到哪个学校去。经过研究后，一致确定，我到建筑工业学院去，李雪峰同志也决定一起去……”

刘少奇在检查中说：“8 月 5 日，毛主席《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出来了，我才知道我在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犯了严重的错误。这时候，我已经感到我再不能过问建工学院的事。当天下午，我用电话告诉李雪峰，我以后不再去建工学院，也不再过问建工学院的事了。”

刘少奇在检查中回顾了一年前毛泽东不在北京期间，他和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时向北京大学派工作组的情况。他说："毛主席不在北京时，是毛主席党中央委托我主持党中央日常工作的。由于我在去年八月五日以前还不理解我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犯了路线错误、方向错误，所以我到建工学院几次讲话中，都没有主动承担责任。……当时，我只是笼统地说，工作组在你们学校是犯了错误的。……在这里，没有说明我自己应负主要责任，也没有说明，当时党中央是毛主席不在北京，由我主持日常工作的党中央。这样，就模糊了当时所犯错误是谁应负主要责任……"

检查交出后，刘少奇又马上要回来，在第三部分的开头加了一句："在毛主席不在北京时，是毛主席党中央委托我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

刘少奇的检查，经汪东兴交给了北京建工学院。北京建工学院"新八一战斗团"当天就在他们的小报上公布了刘少奇的检查，随后传抄至全国各地。

刘少奇的检查交给建工学院"新八一战斗团"的消息，立即引起"新八一"的对立面——建工学院"八一战斗团"的严重抗议。"八一战斗团"成立于 1966 年 8 月 1 日，"新八一战斗团"是于 1967 年 4 月 20 日从"八一战斗团"中分裂出来的。"八一战斗团"认为刘少奇应该给他们写检查才对，因为刘少奇在建工学院蹲点的时候，还没有"新八一战斗团"这个组织。

7 月 9 日当天，"八一战斗团"发出把刘少奇揪出中南海的"紧急动员令"，并派人到中南海西门外架起帐篷，安装高音喇叭，声称"不把刘少奇揪出中南海斗倒斗臭誓不罢休"。

此时的北京大学也已经十分混乱。6月23日晚，校文革在大饭厅继续整风，期间，北大“东方红”樊立勤突然带着几个学生，挥动着红旗，高喊着“聂元梓、孙蓬一欺骗中央文革和谢副总理罪该万死！”“必须彻底批判聂元梓、孙蓬一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等口号，冲上主席台。樊立勤抢过麦克风发表了反对聂元梓的讲演，台下“北京公社”热烈鼓掌支持。见校文革已无法掌控会场，“新北大公社”只得退场，以示强烈抗议。

29 日，北大校文革孙蓬一作检查。

7 月 1 日，北京大学以副校长周培源为首的 134 名干部发表《致革命的和要革命的干部的公开信》，称：“3 月份以来，校文革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同时表示：“红旗飘、北京公社、新北大公社革命造反总部的大方向是正确的，我们支持他们的一切革命行动。”

7 月 3 日，北大“飘”、“0”、“团”，即“红旗飘”、“北京公社”、“新北大公社革命造反总部”发出《成立联合作战指挥部》的通告。

7 月 7 日，“飘”、“0”、“团”也联合召开了复课闹革命的誓师动员大会。此时，“0”派人数激增。一次举行游行，他们的队伍浩浩荡荡。有人开玩笑说：“老聂现在一定在伤脑筋，要派多少辆大卡车才能把这一小撮抓光。”

由于“0”派“北京公社”连续不断地冲击聂元梓和孙蓬一的检讨大会，聂元梓、孙蓬一只能改为在广播上作检讨。但是两次广播大会还是被“北京公社”冲了。7月10日，在校文革第二次召开广播大会时，“北京公社”和“红旗飘”再次冲击大会会

场，围攻聂元梓，在广播站与孙篷一扭打成一团，孙蓬一的眼镜被砸碎。这是北大两天以来第四次冲击校文革主持的大会。“北京公社”和“红旗飘”还于当天宣布为聂元梓在反对“12月黑风”时被打成“反革命”的“井冈山”、“红联军”的学生平反。

当晚子夜24时左右，聂元梓和北大驻军到中央文革找陈伯达汇报此事。陈伯达不在，他在电话里告诉聂元梓，他会直接去北京大学。

而此时，“新北大公社六六串联会”和“联战团”为表示对“北京公社”和“红旗飘”冲击聂元梓和孙蓬一检讨大会的愤怒，召开集会抗议。会后在校园内游行示威，并在毛泽东塑像前举行了宣誓仪式。

11 日凌晨 2 时许，陈伯达赶到北大，聂元梓已在南校门等候。

陈伯达见面就说：“聂元梓同志，很对不起，我来晚了。到过了北航、清华，今天才到你们这儿。我没想到‘6.5 讲话’被人利用了，你们也吃了不少苦头。本来是要整风，可是现在成了这个样子……”

聂元梓说：“伯达同志的批评对我们是莫大的关怀和爱护。今晚开会又冲了，孙蓬一挨打了。”

陈伯达当即表示：“我去看看他。”

这时，孙蓬一也来了。

陈伯达问：“孙蓬一你受伤了吗？”

孙蓬一回答说:“没有。”

陈伯达和聂元梓他们从南校门向大饭厅走去，边走，边谈，边看大字报。聂元梓反映了四次冲击校文革会场的情况。陈伯达说："不要紧，不要紧，要经得起风浪。"

这时，"红旗飘"、"联战"、"北京公社"等也都闻讯赶了过来。

聂元梓继续说："不仅是我们学校内部问题……有人支持。"

陈伯达反问道："哦！有人支持，你说是谁支持？"

聂元梓谈了她的看法。

陈伯达说："你是市革委会副主任，可以行使你的权力。"

聂元梓回答说："我这个副主任顶个屁，要个委员名单要了6次也不给。"

陈伯达说："这样不行。"

牛辉林告状说："孙蓬一挑起武斗。"

陈伯达："不要这样说嘛！"

"红旗飘"的学生反映说："北大没有民主！"

陈伯达似乎不同意，说："北大很有民主嘛，我看了你们的大字报，你们什么都可以提嘛，北大民主很多嘛。我批评聂元梓是支持她、爱护她，帮助她。聂元梓同志不要打倒，还要她当红代会核心组长，孙蓬一也不要打倒，对他要一看二帮。"

牛辉林说："我们对孙蓬一已看许多时候，从3月以来我们就向他提意见，他不听。"

陈伯达："不要打倒嘛，有错误，过去那套工作方法不行了，你们还是要一看二帮。你们的大字报就是要打倒，"他边走边讲，指着一条标语说："你看，要打倒。"

说话间，他们已走到大饭厅东墙，正好看到一张“警告聂元梓”和一张“匕首”的大字报，牛辉林等人大声念“匕首”的大字报，并大声说道：“这是校文革指使他们干的。孙蓬一要把我们打成一小撮反革命！”

陈伯达说：“我还认得字，我自己看吧。”

看完后，陈伯达说：“这样的大字报我不同意。”

随后，他们从北门走出大饭厅，走到毛主席塑像前，大家席地而坐，围成一圈。陈伯达说：“我是一个小小小小的老百姓，蹩脚的老百姓，”

有同学插话说：“是首长。”

陈伯达连连反对，显得很不高兴，接着说：“干工作是会犯错误的，搞革命就可能犯错误，我建议你们用 10 到 15 天的时间学习《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各派都作自我批评，不要批评人家，一派内部可以互相批评，难道你们就那么正确，没有错误、缺点？不要老子天下第一。人家作了自我批评了，揭了自己的疮疤，你们还是老揭人家……然后你们开联席会议……”

这时“红旗飘”的学生插嘴，陈伯达不高兴地说：“你看，打断我的讲话是不是缺点，是不是错误？你们还说自己没有错误！你看，我想不起来了，讲到那儿了？”

同学答：“讲到开联席会议。”

陈伯达接着说：“联席会议要有两个条件，一不要互相攻击，二不要算老账，能做到吗？”

没有人回答。

陈伯达追问："你们同意不同意？"

"66 串联会"和"联战"的同学答："同意！"

又有人问："旧账、新账从什么时候算起？"

陈伯达问："现在几点？"

有人答："3 点。"

陈伯达说："从 10 日晨 3 点起算新账，以前的旧账一律不算。要允许人家革命，自己有疮疤又怕别人揭。分三步做：第一步学习《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自我批评。第二步开联席会议，第三搞大联合。……是打倒还是帮助好？毛主席说要一看二帮，我看你们的大字报就是打倒。聂元梓、孙蓬一不能打倒，你们要打倒，我批评你们。"

这时，牛辉林挤到陈伯达对面坐下。

陈伯达继续说："聂元梓同志过去有些不民主，有过火的地方，我以前就知道了，不是你们贴大字报我才知道的，你们贴大字报前我就知道了。你们要看大的方面，还要看现在和将来，要给人家改正错误的机会。"

大家齐声说："对！"

"红旗飘"的学生此时喊："孙蓬一把我们打成一小撮！"

陈伯达："孙蓬一现在是防御的，你们是进攻的，我看你们大字报，你们是老账一起算，不给人家出路，不给人家改正错误的机会。大家要多做自我批评，年岁大一点，自我批评会好点。"

陈伯达问了两个同学的年龄，一个答 22 岁，另一个 21 岁，陈伯达对他说："我看你像很大了。"他又问孙蓬一，孙蓬一答：

“36。”陈伯达对他说：“你是老大哥了。”接着又对“红旗飘”的学生说：“我对你们也是一看二帮，已经两个多月了。”

陈伯达接着说：“你们学校是写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是有名的学校，你们一个很大的任务就是搞斗、批、改、教育革命。”

“红旗飘”说：“孙蓬一不干！”

陈伯达：“不要算老账嘛！我现在要记过了，要记过。我到北大我不怕你们打倒、你们踢开，踢开陈伯达有你们的自由。你们打倒陈伯达有自由，我不怕。就怕你们把我围得水泄不通，热得要命……”

有人来告状说，武斗时被打、受伤，陈伯达连连摆手：“我不看我不看，我看得很多了。什么流血事件……”

陈伯达：“第一条，校文革开会，商量工作，你们要支持，不要冲会场。”

“红旗飘”说：“由同学选出大家信任的来主持。”

陈伯达明确表示：“聂元梓主持。”

聂元梓说：“可以，我可以主持整风会议，我经常在外面工作，学校的事情，其它的会还是由孙蓬一来主持。”

“0763”的说：“还得要加上一条，就是要支持孙蓬一同志正常工作。”

陈伯达：“好！”

“红旗飘”、“北京公社”说：“还要提一个，给校文革提意见不能打成反革命。”

聂元梓问：“把谁打成反革命啊？”

“红旗飘”、“北京公社”喊：“聂元梓撒谎！”

陈伯达：“第二条，对校文革和某一位领导提意见，都不能随便打成反革命。”

“红旗飘”说：“徐运朴、侯汉青被排斥，剥夺了正常工作的权利。”

“新北大”的学生反驳说：“他们自己撒手不干！”

陈伯达：“保守派也可以参加校文革嘛！校文革中有一两个保守派不要紧，但不要占优势。”

“红旗飘”、“北京公社”说：“造反派要占优势！”

陈伯达：“左派要占优势！”

“红旗飘”、“北京公社”表示：“要公开辩论。”

孙蓬一说：“可以公开辩论。”

陈伯达说：“不要辩论，开联席会议协商。”

“新北大”同学：“要保证孙蓬一正常工作。”

陈伯达说：“孙蓬一和聂元梓合作了一段时间，你们现在要挖掉孙蓬一，实际上要挖掉聂元梓，你们‘炮轰聂元梓，打倒孙蓬一’，就是打倒聂元梓，你们打倒别人就等于打倒自己。应该让孙蓬一帮助聂元梓工作。

现在北航已经走到你们前面了，已经复课闹革命了，你们应该向北航同学学习。希望北航同志也不要骄傲了。”

“北航不是没有不同意见，但是没有像你们闹成这个样子，没法工作。开始的时候，他们是最少数，静坐 28 天我看了他们。但是我一个人也不认识，名字也不知道。韩爱晶同志的名字，是

在不久以前才知道。我们不是靠什么朋友亲戚关系。北航也有不同意见，但他们没有分派，没有采取这种方法。”

## 第 716 回：刚离去，“飘”、“0”查封保卫组　戚本禹，见河南三派代表

陈伯达对“红旗飘”、“北京公社”的学生说：“你们不要用我的话去攻击聂元梓同志，我是拥护他们工作的。”“听说你们有很多人搞动态？”

牛辉林说：“有 1000 多人在搞！”

孙蓬一讲：“6 月 24 日起已经取消了。”

陈伯达：“派许多人到全国各地去搞动态，以后不要搞了。这是两点建议。现在取消了就行了。各学校各组织之间都不要用特务的方法去搞工作。”

“红旗飘”说：“校文革思想动态整同学黑材料，二组特务机关，专整黑材料。”

陈伯达表示：“二组暂时停止工作。”

聂元梓说：“二组是搞保卫的。”

陈伯达：“保卫工作另外搞，聂元梓同志也是同意的嘛。”

“红旗飘”、“北京公社”热烈鼓掌！

陈伯达：“你们鼓掌是要执行还是要准备攻击别人？”

答：“要执行！”

陈伯达：“你们不能攻击聂元梓。我今天的讲话，一张大字报也不要上校园，不要广播，不要上街。”

大家问：“传达呢？”

陈伯达："也不要传达。你们用我的话来攻击聂元梓同志，那就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红旗飘"问："联席会议是不是每个组织都参加？"

陈伯达："你们协商，我不包办代替。我是小小小小老百姓，在你们大学生面前很寒碜。你们协商吧！"

这时。"红旗飘"递给陈伯达一张传单，说是陈伯达在北航的讲话。陈伯达没有看，叠起来说："现在外面流传很多陈伯达的讲话，很多都是假的，还有什么讲解主席的四篇哲学论文的，都是假的，"

"北京公社"喊："校文革印的！"

陈伯达："市里也印了，清华也印了，他们已经做了自我批评。改了就行了。"

"红旗飘"说："他们把我们说成一小撮。"

陈伯达："一小撮？不要怕人家说嘛！一小撮就是一小撮。不是一小撮就不是一小撮，我也不怕你们攻，怕就不来了，我欢迎人家贴大字报攻击陈伯达，希望你们说陈伯达 7 月 10 日讲话是大毒草，应该彻底批判，陈伯达应该打倒……"

这时，陈伯达的秘书问聂元梓："聂元梓同志，听说你们那儿有个谣言，说陈伯达'65'讲话受到了批评，这是怎么回事？"

一个同学说："这是'北京公社'广播台广播的。"

"北京公社"说："这是'66'的一个同学说的。"

陈伯达："用这种方法攻击聂元梓太没有马列主义水平了，太没有毛泽东思想水平了，太不高明了。我最近收到一张油印的大字报，说陈伯达的讲话为什么不能推翻？……这是对的……我

看了很好笑，我拿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我是小人，你们都是君子，这样做，就是达到一个目的，想逼我出来声明，‘65’讲话是有效的，这样就可以大举进攻聂元梓，目的就是这样。”

“红旗飘”、“北京公社”喊了起来：“我们没有！我们没有！”

接着，“66 串联会”、“联战”的学生和他们争吵起来。

陈伯达摆手制止说：“实际上这个大字报不是聂元梓、孙蓬一同志贴的。”

“北京公社”又起来争辩，陈伯达说：“不要查了，一律不追究，斗争不能采用这种政治流氓手段，逼陈伯达声明，说我讲话有效，这样攻击聂元梓同志就有武器了，我不计较，既往不咎，谁追究谁犯错误。”

“红旗飘”、“北京公社”说：“《北京日报》第二天就把你讲话精神全部写进去了，我们 0 派就是根据这杀出来的。”

陈伯达接着说：“我根本不知道这件事，今天我只谈北大范围内的问题，不谈人事问题。”“今天我也是向你们学习的，我看了你们许多大字报，受了启发，引起了一些感想，我有事要走了。”

“红旗飘”喊到：“逼死逼疯的人怎么办？人命关天哪！”

陈伯达说：“这些我不清楚。”

有同学问：“周培源是校长，和校文革是什么关系？”

陈伯达说：“周培源做校长是我建议的，中央还没有决定。”

陈伯达离开北京大学两个小时后，7 月 11 日天刚亮，“红旗飘”和“北京公社”大批学生涌进了燕南园 63 号校文革保卫

组，即“二组”，宣布：“根据伯达同志指示，保卫组停止工作，我们代表革命群众查封保卫组！”

此时北京大学的“保卫组”是1966年工作组进校时组建的，当时称“二组”， 由海军保卫部、军事法院、军事检察院、以及最高人民检察院的派来的人组成，专门负责学校安全保卫工作，即维护校内治安、配合公安机关侦查刑事案件、承担重点专家、要害部位及来校首长、外宾的警卫等工作。

工作组撤销后，工作组的“二组”因保卫工作的特殊需要被批准保留下来。组长谢甲林，原是最高检察院干部。1966年6月，由中组部派到北大工作组，任保卫组副组长。工作组撤走后，留在北大，任校文革、军宣队保卫组组长。1966年8月初，“二组”又从校内抽调3人参加“二组”的保卫工作，其中两名是原来的学校保卫干部，还有1人是法律系63级学生蓝绍江。

1966年底，北大保卫组的军队干部按照中央批示撤出北大，学校又陆续抽调了部分教师、干部充实保卫组，正式取消“二组”称谓。

保卫组名义上隶属学校“文化革命委员会”，即“校文革”，但实际上延续了原“二组”的工作性质和任务，接受市公安局和公安部的业务指导，独立工作，不参加校内群众运动。因此，保卫组也不隶属任何校内的群众组织，包括“新北大公社”。北大校文革二组是校文革保卫组，成立于工作组时期，后来一直延续了下来。

当“红旗飘”和“北京公社”大批学生涌进了保卫组时，保卫组只有学生蓝绍江和董希成等几个住校人员值班。面对众多学

生涌入，并要查封保卫组。保卫组值班人员只好向他们一再解释，保卫组不介入群众组织的活动，保卫工作的资料十分重要，需要保密等等，但是毫无效果。

保卫组组长谢甲林赶来了，但也毫无办法，所有保卫组人员全部被“净身”赶出保卫组，保卫工作业务档案、勘验与摄影器材及个人物品全部被扣留。

其实在凌晨 3 时左右，当天在保卫组值班的学生蓝绍江就听到保卫组所在的燕南园 63 号院外人声嘈杂，出去后又看到不少学生宿舍开着灯。他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出于保卫工作的职责，他就出来到校园巡查，顺着声音方向来到了学一食堂“大饭厅”，看到里面灯火通明，饭厅中间一大群人席地而坐，陈伯达就在中间。

蓝绍江扫视一圈，发现许多群众造反组织负责人们也在现场，七嘴八舌地争相向陈伯达汇报和互相争论。这时，他忽听在场的一人对陈伯达说：

“我们北大有个二组，专整群众黑材料！”

陈伯达立刻不假思索地回答：“那就让他们暂时停止工作！”

当场有人鼓掌。

蓝绍江为之一惊，因为在当时形势下，就是陈伯达这一句话，保卫组就可能被砸抄。他没在滞留，匆匆回到保卫组，叫醒值班的其他人，向他们简要通报了情况。大家都明白，马上就会有大批人蜂拥来封门、“抄家”。他们担心保卫组的档案资料被抢丢失，里面有文革开始以来校内发生的各种刑事案件案卷、文革开始以来校内自杀人员现场勘验资料、警卫工作记录、中央及北京市公

安局有关保卫工作的通报、文件、批示等重要材料；还有一部分为侦破校内刑事案件开展笔迹筛查、鉴定而从有关系部门借来的档案、大字报底稿等文字资料，是作为笔迹样本的。因为他们对最后这部分资料的具体内容不清楚，而且必须用后归还各部门，不能丢失、扩散的。

此时，他们估计到已经被包围或监视，资料可能没有时间妥善转移了。于是，蓝绍江和董希成两人商定，把这部分搞不清内容、又必须归还的文字样本资料包裹严实，暂藏到院内和卫生间等处，打算过了风头再起出归还。

与此同时，位于南阁的“新北大公社第二战斗队”也被“红旗飘”和“北京公社”学生查抄。

这些情况，聂元梓事发后向陈伯达作了报告，并提出自己的意见。陈伯达答复说：“同意。查封需经过谢富治同志批准。材料也不准抢走。我本来说，保卫工作是要有的，但你们保卫组是什么性质，我不了解。有些同学没有经过协商，就动手动足，我认为，这样做法并不能消除纠纷。”

事隔半个多月之后，北大突然有大字报贴出说：“在‘黑二组’查出被隐藏的大批‘黑材料’！”

北大保卫组的蓝绍江知道是他们暂时隐藏的借阅资料被发现了，遂向组长谢甲林作了汇报。因为保卫组当时的工作纪律是：每个人思想上可以有“观点”，但工作中不能有派性，保卫工作不能受 “运动”的影响。所以他们心里有底，那些材料都是原始的，不是“黑材料”，于是也贴出大字报，向全校告示：保卫组从来没有搞过构陷学生、教师的“黑材料”，并强烈要求有关

群众组织公布这些所谓“黑材料”的内容。这一告示发出后，铺天盖地的“黑材料”风波就此止住了。

6 月，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负责人王大宾先后两次见到关锋、戚本禹。戚本禹对王大宾说：“朱成昭的检讨怎么还未交上来？我们对他的问题不好表态。蒯大富反康生、反总理，这么大的事，他向康老，向总理请罪，康老、总理都原谅了他。你们地院这个朱成昭，要他写一个检查就那么难？你们要多做他们的思想工作。”

但朱成昭仍我行我素。6 月中旬，朱成昭等人策划成立“地质学院新东方红公社”，起草了宣言和公告，并在地院广播台强行播出，但马上被制止。朱成昭的计划没有得到地院师生的响应和支持，他很失望。

1967 年 7 月，梅建明南下广州。广州北京地院“东方红”联络站的人仍然认朱成昭的牌子，视梅建明为总部派来的人，任他调遣。梅建明向朱成昭汇报了广州的情况。于是，朱成昭、梅建明、张华清和张华府从北京经天津、上海、杭州，一路走走玩玩，南下广州。为避免目标过大，叶向真和蒋良朴已先走。

一天上午，一个和朱成昭关系密切的同学突然到地院革委会办公室报告，说朱成昭等人还有叶向真他们早有议论，说在国内不让他们革命，他们就要去越南支持胡志明主席抗美援越，说在越南已有不少中国的红卫兵在抗击美帝国主义了。还说，叶向真说她认识胡志明主席。他们现在已经走了。这个同学说，她原本也要准备和他们一起去的。后来一想，不对，就没走。他们是坐火车走的。

事态严重，地院革委会立即报告了北京市革委会主任谢富治。同时他们也赶紧查人，发现朱成昭、蒋良扑等人确实已经离校不知去向了。

第二天上午，地院革委会接到谢富治的指示，要地院派一个认识朱成昭的学生，并带上朱成昭的照片，到公安部找他，与公安部的人一起执行找回朱成昭等人的任务。地院革委会派宫保军同学前去。

7 月 5 日，宫保军到公安部见到谢富治，接受了任务。

此时，周恩来已给北京卫戍区、上海警备区和广州警备区都打了招呼，要他们一旦发现这几个人即刻送回北京。广州警备司令部立刻派出侦察人员，守在火车站口，守株待兔。

但是，朱成昭、梅建明等人在广州前一站就下了火车。到广州后，他们联系上叶向真和蒋良朴。一行人去广州西樵山、佛山玩了两天，打算回广州后在张华府的姑姑家落脚。但他们刚到张华府的姑姑家不到半小时，广州警备司令部的人就到了。张华府的姑父和姑姑都是中南局的干部，早就被打了招呼。

朱成昭他们几个人被很客气地送到从化疗养院，好吃好喝地款待，等待中央来人带他们回北京。

过了一天，公安部副部长于桑从北京赶来。

之前，于桑带着公安部两位处长和地院的宫保军已经直奔上海，未找到人。这时，公安部得到消息，说叶向真、朱成昭等人已在广州军区。于桑等人折回北京后，即赴广州。

见到朱成昭、叶向真后，于桑与二人单独谈话。朱、叶俩人一口咬定，来广州只是为躲避批斗，出来散心。于桑根据周恩来

的指示，坐飞机将二人带回北京，宫保军一路陪同。

梅建明由哥哥梅向明接回京。蒋良朴等 3 人由广州警备司令部送回北京。

朱成昭被带回北京后，就被送回地院。周恩来指示地院革委会：“你们要把朱成昭看好，不准他乱跑。对他的错误要批判。”

于是，朱成昭从“闭门思过”时住的有电话、卫生间的办公室，搬回水文系学生宿舍他原来住的房间，有人看守，也不允许其他学生去串门。

公安部为此设立了一个专案调查此事。地院革委会也成立了一个由李思田老师、雷泽云同学组成的调查小组配合公安部专案组，有事直接向专案组汇报。

朱成昭被隔离后，仍不认错，曾绝食抗议。学校组织了一次批判朱成昭的大会，朱成昭拒绝低头认错，只肯背对群众，向毛主席的画像低头。

7 月中旬，公安部将朱成昭等人关进了北京功德林监狱。他们的专案也被宣布为“叶朱反革命集团”案。

7月10日，中共中央下发中发［67］216号文件，转发河南军区党委《关于支左工作中所犯错误的检查报告》和河南省各方赴京汇报团签署的《关于贯彻执行中央六·二四“通知”及总理指示的协议书》并作了批示。

当天，戚本禹接见河南“二七公社”、“八大总部”、“河造总”三派的部分代表。出发前，“铁军”代表因为只让他们去两人，与中央文革办事组和总理联络员争吵，阻止开车，当即受到中央文革办事组人员的批评和其他代表的指责。

当晚24时，戚本禹来到人民大会堂小会议室，他说：“今天我来和你们三派商量一下，上次不是说总理指示你们三方达成协议吗？这很好，有个好的开端，今后对河南问题怎样解决，对河南各派怎样解决，你们三派能不能达成一个协议，拟定一个方案？你们对‘二七公社’怎样分析？是个什么组织，而对‘河造总’，‘十大总部’又该怎么办？能不能三派在一起商量，你们考虑一下怎么办？而不要像其他几个省份那样，由中央做出决定。如果这样能做好的话，你们写好，中央批准，这样给各省创造一条经验，四川、青海、内蒙等省，中央是下决定了，这里当然有斗争了，甚至是很尖锐的，你们能不能达成统一的那么几条，我们有那么个设想。‘二七公社’那天作了个检查，这很好，总理和我们都很满意，检查了自己的缺点，这很好。第一个是方法有些不对，有的组织搞打、砸、抢。第二个是‘二七公社’个别组织有不纯现象。第三个是什么？”

“二七”代表答：“小团体主义。”

戚本禹：“对，小团体主义，当然，‘二七公社’是个造反组织罗！‘河造总’那天也作了点检查，下来我们听首长议论，在打倒纪登奎问题上，我们还有些看法，我们不同意喊打倒，但是还有些进步了，‘河造总’部分组织是杀出来的，二月以来在军区问题上犯了错误，执行了军区的一套反动路线，矛头不对。对于‘十大总部’，我们是有分析的。‘公安公社’是坏的，不好的，抓了好多人，‘工人总部’，‘财贸总部’和‘省委机关总部’是有区别的。是不是你们共同商量一下，对刘建勋同志可以达成协议了吧！那些能够达成协议就先达成，不能达成的就放

一下，要报给联络员同志。‘公安公社’也能达成了吧？‘二七公社’、‘河造总’不都是反对的吗？当然这里说‘公安公社’是坏的，不是说公检法都不好了。在毛泽东思想旗帜下达成一个一致的意见，达不成的你们向联络员反映，我们再商量，能不能在中央首长同志关心下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实在不行，中央将来再定。上次你们三方达成的《六条协议》，中央对这个事件是肯定的，上次给毛主席汇报了这个事情，这是良好的开端，当然有个别人也作了不少坏事，个别的要处理，打死人了嘛！”

接着，戚本禹又讲了军区何运洪要向全省作检查，希望河南三方在军区检查后把他们商量的意见拿出来。

尽管戚本禹讲的口干舌燥，但是“铁军”仍然不愿意认同“二七公社”。

## 第 717 回：周恩来，见湖南驻军领导　不休息，再接待赣控告团

7月10日21时，周恩来、康生、杨成武、关锋、戚本禹、叶群等在京西宾馆第二会议室接见湖南省部队的领导：

湖南省军区司令员龙书金；

湖南省军区政委谭文邦；

47军军长黎原；

湖南省军区副司令员刘子云；

湖南省军区副政委林国兴；

湖南省军区政治部主任田云；

湖南省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崔琳；

湖南省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史健；

43军参谋长王恒一；

解放军政干校校长刘顺文；

长沙军分区副司令员张广弼

长沙军分区政治部副主任张宏强等。

周恩来首先从龙书金开始，逐个询问每个人的年龄、籍贯、参军时间。在问到龙书金时，周恩来对他说："你不是在广州发了个电报吗？"这是指5月12日湖南省军区给广州军区发的检讨。

龙书金回答说："我给家里打电话，家里发的。"

周恩来说："思想还比较开朗么，以后，你怎么变了？"

龙书金答："我没有变。"

周恩来说："你变了。"

接着周恩来又问湖南省军区政委谭文邦年龄、籍贯、参军时间后说："你是支持'工联'的？"

谭文邦正要回答问题时，戚本禹说："他比较支持'工联'。"

周恩来问黎原："你对'工联'、'湘江风雷'了解一些？"

黎原答："了解一些。"

周恩来又问："你对'湘江风雷'什么看法？"

黎原："'湘江风雷'起初都是青年学生、红卫兵小将组成的，他们在运动中有些过激行为，犯了一些错误，但就此定为反动组织，予以取缔是不合适的。应该加强引导和教育，领导的责任在于疏导，帮助他们分清敌友。"

周恩来对他的发言表示赞同。

周恩来问崔琳年龄、籍贯、参军时间后说："你是政治部副主任，你是'高司'观点吗？"

崔琳说："不是。"

周恩来："你怎么不是？"

当他问史健年龄、籍贯、参军时间后。指着史健和崔琳说："你俩都是政治部副主任！你俩的观点是不一致的吧？"

史健答："有的一致，有的不一致，基本上是一致的。"

周恩来问张广弼："你是反对'工联'，还是支持'工联'？"

张广弼答："我们意见差不多，我们支持'高司'，对'工联'是从下而上的支持的。"

周恩来问田云："你是'高司'观点？"

田云没有回答。

周恩来问王恒一："你们部队在那里？"

王恒一：“在韶关。”

周恩来问：“你们是支工到湖南的？”

广州军区副司令员詹才芳替他答道：“湖南部队少，从广东调去一些支左的。”

周恩来问解放军政干校校长刘顺文的年龄、籍贯、参军时间后说：“章伯森同志是请你找的，一找就找到了！”

刘顺文说：“我打了好几次电话才找到。”

周恩来：“我找他也打了好几次电话！”

周恩来问到长沙军分区政治部副主任张宏强得年龄、籍贯、参军时间后说：“才39岁，年青！”

接着，周恩来点到湖南省军区门诊部的护士孙素洁的名字，她是湖南省军区著名的造反派，丈夫曾佩章是省军区“丛中笑”组织的头头，持“工联”观点。

卢润鲁马上回答：“派人找去了。”

周恩来又问了工作人员年龄、籍贯后说：“你们是‘高司’观点吗？”

没人回答。

周恩来说：“这次打个招呼，上次托黄永胜同志传达，要省军区、独立师、军分区的同志把不同的观点摆出来。你们开了几天会了？”

詹才芳答：“两天。”

周恩来问：“摆出些观点没有？军队同志观点要明确，叫你们来就是把观点摆出来，对立观点也要摆，要求你们摆出自己的观点。

湖南的问题是比较大的，两大派的群众也比较多，有‘高司’，有‘工联’，还有‘湘江风雷’，又恢复组织了。

‘湘江风雷’你们当时是怎么处理的？你们承认抓人抓多了，宣布为反动组织没有？”

龙书金回答：“没有。”

史健说：“按中央《二四批示》，对头目采取专政措施，分化瓦解受蒙蔽的群众，实质上就是取缔了‘湘江风雷’，成了非法组织了。”

周恩来：“让你们放‘湘江风雷’头头，你们不同意。主席意见将叶卫东放出来，一起讨论‘湘江风雷’问题。几十万人你们没有压垮，现在又起来了。你们抓了多少人？你们报了五千人，恐怕有一万、两万、三万，绝非五千！而是上万！现在在押多少？”

史健：“46人。”

周恩来：“全省？”

史健：“是。”

周恩来：“据说还有些‘高司’的代表没来，经调查只有一个代表没来。”

史健：“其他是工作人员。”

周恩来：“代表都来了嘛！你们给他多挂一个车箱，不买票，这不合法，当然抛掉了。这是铁路局这么说的。”

田云：“是买了票的。”

周恩来秘书：“是买了票的，是军区帮助定的。”

周恩来：“代表只一个没来，其实可以开会了，今天排不上，明天排一排。今天见见军队代表。章伯森、梁春阳我见过了，华

国锋还未见。”

这时，孙素洁进来，周恩来问孙素洁年龄、籍贯、参军时间后说：“你是‘工联’观点吗？”

孙素洁：“我同情支持‘工联’，但不完全是‘工联’观点。”

周恩来：“支持‘工联’好嘛！你在军内是少数，在外面就是多数了，不要怕！

你们开会要讨论的深刻一些。龙书金开始还比较好，我们收到了你们的电报，感到还比较明朗，为什么回去以后又变了？你们已经开了两天会，要把观点摆出来，尖锐对立也不要紧，不同观点不要紧。能不能明天把意见写出来？”

广州军区副司令员詹才芳说：“写不出。”

周恩来：“写个大纲给我，两种观点对立都可以写出来。

有个团，支持‘高司’观点的，使工作困难了，与‘工联’、‘六号门’对立，要调动一下。”

黎原：“已经调换了！”

周恩来再次强调：“明天你们讨论，几种观点，几个问题写出来，写个大纲给我。”

接见结束后，孙素洁提出用自己佩戴的那枚写有毛体“为人民服务”的毛泽东像章，和周恩来佩戴的毛泽东像章交换，周恩来欣然同意。他们俩人的像章是一样的。

接见完湖南驻军的领导，周恩来、陈伯达、张春桥接着又于23 时 45 分至次日凌晨 2 时 08 分，在人民大会堂南侧会议室接见了江西赴京控告团代表和“联络总站”代表各 50 人，省委干部刘瑞森、黄先、郭光洲、黄霖、李杰庸和广州军区黄永胜，福

州军区韩先楚、刘培善、江西省军区吴瑞山、倪南山、周子韬、陈昌奉及各军分区负责人李胜、王世清、王景义等参加了接见。

周恩来招呼大家坐下后问："'大联合筹委会'来了多少人？"

答："来了 50 个人。"

又问："'联络总站'来了多少人？"

答："也是 50 个人。"

周恩来和陈伯达笑着说："双方都来了 50，对等嘛。"然后又问刘培善："你们都来了？省委领导干部也来了吗？刘瑞森同志来了吗？"

刘瑞森答："来了。"

周恩来又问："黄霖同志来了吗？"

答："来了。"

周恩来又问："首都红代会的也来了两个同志吗？"

答："来了。"

周恩来继续说："今天请你们几方面的代表来，是要研究双方那个协议的问题。那个协议是你们双方自己达成的，这是一件好事情。我看了。今天我就讲一讲这件事情。"

周恩来边念协议书的草稿边说："武斗就是要立即制止，否则双方还会有伤亡。""停止武斗是当前的大方向。""当前出现的严重武斗事件，军区要负更大的责任。我每天都在打电话督促他们去处理。"

"大联筹"代表汇报赣州当前的情况。周恩来说："最近赣州的情况还是严重的，损失很大，我都知道了。究竟损失多大？情况怎么样？这个中央决定从广州调部队的干部去查这个问题。

还准备从广州军区调武装到赣州去，这是主席亲自批示的。”

“大联筹”代表热烈鼓掌，高呼“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周恩来接着说：“从广州调部队到赣州去维持那个地方的秩序。你们受压制的这一方的同志一定很高兴啰！”

大家再一次鼓掌。

周恩来：“昨天听说修水也出了问题。你们要赶快达成协议，制止武斗。”“这个协议，是我们请你们互相协商达成的。达成以后，军区、军分区、武装部，要保证到处张贴，你们那边可以印发，要保证贯彻执行。”

接着，又谈到协议中的交枪问题，周恩来问了当时的交枪情况后说：“现在南昌情况是比较好的，问题是在外县，特别是外边农民把莲塘一些东西拿走了，莲塘农民开始撤了，但主要是撤到向塘附近，向塘附近公路上还站的有岗哨，对南昌的包围圈还没有解除。到飞机场还不能很好通行。从这些情况看，我的意见，夺的枪现在封存起来，中央派人清点。”

“南昌‘大联合筹委会’占优势，‘联络总站’有些人觉得在南昌吃了一点苦，就跑到乡下去，找农民来帮助你们，搞农村包围城市是错误的。据我们调查，军分区、军区是有责任的，军事机关要负很大的责任。现在是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搞文化大革命嘛，工厂、农村、学校都在一条战线上嘛，搞农村包围城市，是一个新的错误。”

会场上，江西两派发生了争吵。周恩来说：“今天找你们来是为了达成协议，达成协议我就很高兴，你们不要吵，今天主要解决协议问题。”

当谈到工农业生产问题时，“大联筹”代表说保守派下乡煽动农民进城，“联络总站”代表站起来说：“武斗是刘瑞森搞的。”

周恩来拍着桌子说：“农民进城不只是他们的责任（指联络总站），我可以老实告诉你们，挑动农民进城是军分区、武装部。我在这里直说了，不是军分区、武装部哪能挑动武斗？！调农民进城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光靠几个学生是不能把农民调进城的。”

“军区是犯了错误的。他们承认在捕人、解散革命群众组织方面犯了方向路线错误。现在还有新的错误，还要他们作检查，他们正在写，要比 6 月 7 日检查更深刻。双方签订协议制止武斗要靠大家，也要靠中央，中央决定立即从广州、福建调野战军到江西。我算了一下有 30 几个地方问题比较严重，要派人去，立即制止武斗。这次派的野战军一定要支左，帮助你们搞大联合，这是毛主席亲自决定的。”

陈伯达宣读了他和周恩来亲自修改的协定。

由于周恩来还有一个会等着，接见到 11 日凌晨 2 时 08 分结束。

第二天，7 月 12 日，江西省双方赴京汇报团签署了《关于贯彻执行“六·二四”通知及总理指示的协议书》。双方同意：在达成协议后，立即停止武斗；不再动员农民进城，已经进城的农民，立即撤回；撤销沿公路、铁路的岗哨，恢复正常交通运输和邮电的畅通；双方必须在签字后 10 天内交出所有武器；。不许抢夺交通运输工具；立即登记释放全部扣留的对方人员；撤销双方设立的集中营、劳改所和刑讯室；各组织的宣传广播车，10

天内全部拆除，用于生产。同时“要求中央迅速派出代表团并由双方派同等数量的代表参加，对江西问题进行调查处理，监督上述各项实施，并严惩流血事件的幕前幕后的策划者和指挥者。”

与此同时，7 月 12 日，广州军区 6810 部队，即 41 军 121 师由师长张序登、政委王喜才率领进入赣州，拯救赣州人民于水火之中，赣州武斗停止。

原来，周恩来根据毛泽东 7 月 6 日的批示，派专机把广州军区 41 军 121 师师长的张序登接到北京面授机宜，将“制止两派武斗，重建社会安定”的重任交给了他们师。

当 121 师开进赣州并稳定住局势之后，那些躲起来的红卫兵和“大联筹”的人才摆脱了鼹鼠似的生活，走到了阳光下……

街上，工事已经拆去，商店也开始营业。夜里，又有了乘凉的小桌竹椅和摇落一串串故事的蒲扇。百姓们，犹如刚啄破蛋壳将头伸出来的雏鸡，探了探，又一下缩了回去，照旧过起千百年来有着既定心态、既定行为的传统生活。

红卫兵、“大联筹”，一边迎来了自己盛大的节日，在鼓乐喧天、红旗招展之中，欢呼中央关于处理江西问题的《六条决定》的下达；另一边，又开始安排盛大的丧事。在低回、沉缓的哀乐声中，一副副写有“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国际悲歌歌一曲，狂飙为我从天落”的巨幅挽幛，牵来了长街上一辆辆素裹的卡车。车上是在武斗中死去的“烈士”灵柩，“英雄”的父亲、母亲，还有持枪肃立的红卫兵战士……

赣州一些人对 121 师师长张序登制造了车祸事件进行恐吓和伤害。但张序登不惧威胁、不顾车祸带来的伤痛，身上包着绷

带，拄着拐杖，继续做两派联合、解放干部、稳定当地局势、遏制和减轻武斗给社会带来的破坏等工作，在当地传为佳话，受到周恩来的好评。

7 月 12 日解放军 6810 部队进驻赣州的当天下午，一些红卫兵抓住了赣州运输局武装部长赵远庄，押至现在的西园大榕树下，当年是荒弃的护城河边进行批斗，追问他参与制定攻打赣州城计划、以及杀害造反派工人和红卫兵等事情。

赵远庄也是宁死不屈，为捍卫毛泽东思想与自己坚持的真理，不肯交待他的上级和组织。愤怒的红卫兵以及造反派工人对他进行了殴打……想起 6 月 29 日以来受到的种种迫害，想到那些死去的战友，红卫兵们红了眼，拔出手枪，对着跪在地上捆绑双手的赵远庄后脑勺连开数枪。

赵远庄后脑被打碎，白的脑浆和红的血液流了一地，当即毙命。

红卫兵及造反派工人还押着一些在武斗中杀了红卫兵工人的凶手去水西佛岭白塔、水东七里等荒郊野外，逼他们用手去挖掘死者坟墓，将那些已经腐烂发臭的尸骸一根根洗干净用红布包裹，再将洗过尸骸的水喝下。

每次批斗这些杀人凶手，那些死者亲属都哭声震天，死去活来。有的亲属专门穿了尖头皮鞋，恶狠狠踢那些跪在批斗台上不敢抬眼的凶手们的肋骨、肾脏、睾丸要害部位。

场面已经出现失控趋势，再次出现武斗不是不可能。6810 部队，即 121 师与地区军管会紧急决定：将赣州地区各单位的当权派，以及参加了 6.29 武斗的保皇派头头、中层干部等等共计

303 人集中关押在商业学校，交待问题，反省错误。这实际是一种保护措施，防止再发生死人等恶性事件。

7 月 16 日下午 18 时许，169 辆汽车满载全副武装的解放军，从红旗大道由东向南浩浩荡荡驶进城，接受赣州群众的夹道欢迎。

赣州 1967 年 6 月 29 日的“武斗”，经 6810 部队清理最终确认的死亡人数为 303 人。因此，追查此次事件的专案组被命名为“303 专案组”。陆续追查出的杀人犯关押在今江西理工大学西校区，该校区当时为赣州市商贸干部学校。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赣州人将商贸干校称为“303”。

由于在赣州三支两军的突出成绩，1968 年 5 月，年仅 42 岁的张序登被委任为 41 军副军长，同年 10 月晋升为军长。

## 第 718 回：周恩来，见河南驻军领导　谢富治，与王力又奔山城

面对陈伯达离开北大后那里发生的诸多事端，11日18时，陈伯达给聂元梓打电话，对她说："聂元梓同志：不要着急，慢慢地看情况，文化大革命是在大风大浪中前进的。懂了吗？"

当晚，陈伯达在北京市革委会接见了聂元梓、孙蓬一等人，对他们说："天塌不下来，大家回去睡觉，要学会睡觉。"并说这是阶级斗争的规律。他还说："几个人就是要跟你们北大一万多人作对，又有什么办法呢？""昨天的讲话，你们看不懂，人家看懂了，人家知道不跳就活不下去了。"

"昨天的讲话"是指11日凌晨2时他在北大时的讲话。

7 月 12 日，北大"井冈山"出版了他们的刊物:《新北大报》，用毛泽东的"新北大"三个字，加上一个从其他报头摘用的毛体"报"字。

《新北大报》1967年7月26日第三版，刊登《彻底砸烂北大的特务机构——黑"二组"——校文革执行反动路线铁证如山，造反派从黑"二组"抄出大批黑材料》。

7月12日，周恩来、戚本禹与赴京汇报的河南省军区和1军领导谈话。

周恩来说："中央批示上写了，河南省委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代理第一书记文敏生和书记处书记赵文甫。文、赵这两个人挑拨关系，你们过去没有看清，经过揭发，现在你们就看清楚了。"

“文敏生是新四军五师的。文在五师的时候，李先念同志就发现他是喜欢搞小名堂的，后来文调到中南，李先念同志也提醒过陶铸的。后来纠正河南吴芝圃的错误，把刘建勋同志和文敏生调到河南，两人的关系就搞不好。文在代理第一书记期间搞了很多花样。

赵文甫给你们的信，康生同志看了，是挑拨离间的。赵文甫也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刘建勋同志表现是不错的，结论是肯定的。过去有一些省委书记站不出来，就是当官做老爷，离群众太远。直到现在，还有一些省委书记站不出来。刘建勋同志在第一书记中是好的，他在河南是敢字当头。到北京后，被揪来揪去，表现也是好的。刘建勋同志，还有吴德同志，把这个彭真、刘仁搞的旧摊子搞起是不容易的。”

“河南省要成立以刘建勋为代表的有革命群众代表、军队代

表、革命领导干部的筹备小组，领导河南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工、农业生产。”

“现在洛阳问题很严重，要来5000人闹，不回去。洛阳闹得很紧张，他不同意‘二七公社’是造反派组织，他把交通中断。这个问题，军分区是否认识得很清楚了，群众组织的头头是否都认识清了。

开封是另外一个问题，我们认为‘824’是革命造反派组织，一军、军分区、市人武部是否都认识清了？如果认为错了，要给群众做工作。”

河南省军区司令员张树芝说：“我们现在正在召集分区、驻军领导同志开会，我们已经给同志们讲了。我们还搞了个向群众公开检讨的声明，已报请中央审批了。”

戚本禹：“中央已经批了你们的检查报告，不再批你们的声明了。”

张树芝：“我们和驻军同志研究了纠正错误的十条措施，很快就报请中央审批。”

周恩来：“你们搞好，我们可以看一下。”

河南省军区副政委余嗣贵：“我们建议刘建勋同志回河南工作。”

戚本禹：“中央已经决定刘回河南搞筹备小组。”

余嗣贵：“我们就在公开声明中写上一条支持刘建勋同志。”

周恩来：“可以增加上这一条。”

1军军长徐文礼汇报了释放“824”领导人陈红兵的情况，并提出对现在支持的这一派怎么办？

周恩来："群众组织嘛，是不会叫他们解散的。过去受你们压制的那一派，现在是造反派了，你们支持的那一派，因为军队支持他，必然要发展到跟军队一块压制对方，这样是左派的就比较少了。他们没有独立思考，你们把责任担起来就行了，他们比较接受教育，他们受了蒙蔽，转过来靠拢左派，站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在大方向一致的前提下，和左派联合起来。这要有个过程。这种反复今年就搞了几次了，去年还更多一些。经过这些反复，教育和锻炼了群众。在和平的日子里，经过这些阶级斗争，就教育了青年一代。

现在几派群众在一块签了字，大家都是平等相待。你们在部队中进行教育，不要说他们坏，主要是你们领导，错了就痛痛快快地认错，就改正。你们可不要动摇了，电话上给你们说几句就软了，这就麻烦了。"

河南省军区政委何运洪表示："坚决拥护中央的决定，坚决贯彻执行，坚决改正自己的错误。"

周恩来："你们明天讨论一天，可以回去几个人，真正认真地做工作，要召开一系列会议，要有一个工作过程，要把真实情况反映上来。主席说，把时间估计得长一点比估计得短了好，把困难估计得多一点比估计得少了好，把情况估计得坏一点比估计得好一点好。一定要立场坚定，旗帜鲜明，但还要实事求是。"

进入 7 月，重庆的武斗愈加激烈。"815"派在 6 月失利后，经过一段短期休整和武装后，卷土重来，于 7 月开始了在北碚地区争夺地盘的割据战。

7 月 1 日，"815"派在北碚街上向"砸派"控制的多处武斗

据点发起进攻。上午 11 时至下午 14 时，首先在北碚重庆纺织五厂武斗，“815”派西南师范学院“春雷”、西师附中“无产者”和北碚地区因武斗而逃离原单位的一些“砸派”人员于 6 月 15 日在西南农学院成立的专业武斗队“猛虎团”都入厂参战，双方使用钢钎、棍棒、石头、烧碱水等。这天，“815”派控制了重纺五厂、工人会堂、人民会堂、四十四中学、重庆市自然博物馆等地。

7 月 1 日，重庆医学院附属一院也发生武斗，使用钢钎、刺刀、自制燃烧瓶等，死 2 人，伤数十人，附属一院门诊部全天停诊。这次武斗中，重庆医学院 66 级毕业生、“反到底”派《东方欲晓》报主编于可被钢钎刺死。

7 月 1 日，重庆“815”派和“砸派”在建设机床厂发生武斗，死 1 人，伤数十人，“军工井冈山”赶走“81 兵团”的“6657 团”和“16 团”，同时占领了建设厂和长安厂。

7 月 2 日，重庆市革筹、重庆警备区再次发出《联合通知》，要求制止武斗。

这天，西南农学院“826”打开学校的军械库，拿出步枪 36 支、手枪 2 支、轻重机枪 3 挺、小口径步枪 28 支。

7 月 3 日，重庆两派在北碚重纺五厂再次武斗，“815”派动用了发射鹅卵石、石块的自制土炮和鸟枪。“砸派”的“猛虎团”被土炮打死 2 人，伤数十人。至此，“815”派控制了北碚区邮电、银行、轮渡、车渡、公交和大部分粮店、商店等部门，及嘉陵江以东的跃进公社、红星公社、东阳公社，嘉陵江以西的红旗公社、向阳公社、前进公社、火炬公社等广大农村。“砸派”人员被大

批赶出。从而使之与“815”派势力控制的合川地区连成一片。“砸派”在北碚地区的势力范围，仅剩下西南师范学院、四川外语学院和西南农学院三所大学。公路公共汽车停运。

“砸派”中学生红卫兵“九一纵队”这天出版的《九一纵队》报第二期发表《武装保卫毛主席的大民主》、《蓝亦农、白斌回头是岸》等文章，主张用武装保卫自己的权利。

7 月 4 日，“砸派”在市中心解放碑闹市区为 7 月 1 日武斗中被打死的于可等“烈士”举行了规模空前的“追悼大会”，“我失骄杨君失柳”的“毛主席诗词歌曲”歌声在山城上空回荡。“烈士”亲属作了悲愤的控诉发言，表示决心“化悲痛为力量”，“坚决跟着毛主席继续革命到底”。

这天，两派在中国人民银行重庆市分行武斗，“815”派攻占分行大楼。周恩来得到报告后，于 7 月 4 日当天派秘书传达指示：“重庆群众组织进驻银行，有抢金库的可能，驻重庆部队要直接出面控制起来，不能把两派斗争搞到银行。群众组织占领银行，不得干扰银行正常工作。”

“砸派”重庆印刷工人、二十九中“红一方面军”、六中指挥部主办的《小人物》报第 3 期发表文章：《用人民战争制止武斗》，实际是主张以暴易暴。

7 月 5 日，“815”派西南师范学院“春雷造反兵团”《春雷》报发表的评论员文章《打一场人民战争，粉碎反革命复辟逆流》，提出：“我们对敌人不能抱丝毫幻想，也不能单纯依赖专政机关”，“我们必须奋起自卫”，“只有这样，才足以制止反革命的武斗歪风”，“只有用这种人民战争的方法，才能捍卫斗争大方向”，声

称“七月血战的战鼓早已敲响”，号召“打一场漂漂亮亮的人民战争”。

当时，“砸派”的“二轻兵团”驻守在牛角沱嘉陵江大桥南桥头的二轻局大楼，这里是连结市中区与江北区的交通要道。7月7日那天，“二轻兵团”与过路的“815”派发生了磨擦，随后“815”派的六中“32111战斗团”和“27战斗团”从二轻局背后的人民小学高处向“二轻兵团”发起进攻。进攻者居高临下，石块、砖头如雨点般飞来，“二轻兵团”眼看守不住了，一边打电话向重庆市警备司令部报告，同时动用了二轻局保卫科的小口径步枪“自卫还击”，浓雾里的嘉陵江桥头有几声朦胧的小口径步枪声，正在翻越围墙的六中陈乐洲等两名进攻者应声落地身亡。

枪声惊动了各方。54军开来了4辆制止武斗的宣传车和一批全副武装的士兵，把二轻局大楼团团包围起来，要求交出杀人凶手。“二轻兵团”认为自己是“自卫还击有理”，拒绝交人。部队把“二轻兵团”包围，双方僵持。

当晚，“二轻兵团”夏祥贵司令打电话向“工总司”头头李木森告急，请他设法帮助他们撤出包围。

李木森通知“江北指挥部”调集了1000多人，于第二天，7月8日清早，亲自带人赶到大桥。现场只有54军的人在那里包围着，除了一些看热闹的群众在旁边围观，比较平静。李木森他们将宣传车包围。

“二轻兵团”见援兵到达，200多人集体行动，强行撤离二轻局大楼，包围他们的54军官兵也不好硬加阻拦，只得让出一

条通道。“二轻兵团”急急忙忙跑过大桥，转移到了江北的三钢厂。过了几天，夏祥贵带了几个人，乘火车上北京直接向中央文革告状去了。

7 月 7 日深夜，重庆两派还在北碚浦陵机器厂武斗，厂内设备遭到严重破坏，全厂停产。从次日起，“815”派武装包围该厂，切断了该厂的粮、菜、煤、水供应。北碚浦陵机器厂是一家从上海内迁到重庆的工厂，该厂上海援内职工被迫于 7 月 15 日全部返回上海。

7 月 8 日，“砸派”在北碚发起反击，“猛虎团”派出大批武斗人员前往“815”派控制的位于北碚歇马场的红岩机器厂，营救“砸派”被抓人员。两派展开大规模武斗，双方使用了小口径步枪、猎枪等武器。武斗中，双方死 9 人，变电所被炸毁，全厂停产。

重庆市革筹组这天在警备区司令部召开两派代表会议，共商制止武斗。7 月 9 日，两派代表，其中“815”派 20 个组织，“砸派”17 个组织，加上成都“红成赴渝纵队”和“八二六赴渝兵团”，共同达成《关于立即制止武斗的协议（草案）》。而就在这天的凌晨，“815”派的“悍红总部”出动大批武斗人员，对占据在北碚区澄江镇二十三中的“砸派”武斗据点发动进攻，“砸派”数十人被抓。占据缙云山园艺场“砸派”头头见势不好，撤离该场，“815”派控制了澄江镇地区。

重庆大学武斗队“301 纵队”得知“砸派”武斗队 7 月 10 日从煤校返回电机厂，便于黎明前安排自制土喷火器及土炮在中梁山路旁玉米地设伏，指挥者在房顶上用探照灯和号声指挥。

那天，“砸派”的“武斗之花”——河运学校“航锋战斗队”走在前边。小伙子们胜利凯旋，士气正旺，排成整整齐齐几路纵队，高呼“为毛主席而战，完蛋——就完蛋！完蛋就完蛋!”，雄赳赳气昂昂地挺矛前行，很像十九世纪欧洲神气活现的步兵方阵。那势不可挡的架势，神经稍有脆弱，谁见了谁害怕。听成都的人说：到成都支援“826”的重庆“砸派”崽儿，就是凭着这种赤膊方阵，就是这样高呼着“为毛主席而战，完蛋——就完蛋！完蛋就完蛋！”，一天之内，兵不血刃，便将“红成”派的几十个广播站端个精光。

且说1967年7月10日这一天，重庆大学“301纵队”看见“武斗之花”的拼命方阵神气活现挺矛而来，却不慌不忙排成横队，也挺直长矛拦住去路，只是个巍然不动。等到“敌军”方阵步步接近，突然，屋顶上一声哨响，横队忽地如门洞开，两个喷火手从人群中冲到正中，只见熊熊火焰从他们自制的火焰喷射器中喷射而出……古典兵器遇到“现代化”，结果不言而喻：“武斗之花”顿时被烧得阵脚大乱，溃不成军，漫山遍野地逃命，大学生乘胜追击。此次战斗烧死对方两人，烧成轻、重伤各2人，钢钎刺死1人，重大“815”武斗队被自己土炮喷出的火焰烧成重伤1人，活捉多人押回重庆大学。在这次武斗中，重大“815”使用了自设电台进行联络。

作为综合性工科大学的学生，重大“815”利用其他院校学生不可能有的知识和条件，很早就开始试制热兵器了。这些热兵器包括：815 式冲锋枪、手榴弹，还有土火焰喷射器等。严格讲，这些杀人凶器质量是很糟糕的，比如 815 式冲锋枪，一抠板机，

子弹没射出，弹簧倒先从枪膛里蹦了出来。更严重的是，手榴弹的引爆时间严重不准，根本无法掌握投弹时间。李盛品，机械系一年级学生，当时著名的“八一五烈士”，就因为这个白白送了命。他在辅导中学生使用自制土手榴弹时，试验的这一颗，引爆时间恰恰很短，未等他扔出手，就粉身碎骨了。

他在去给中学生演示前，给他的女友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无限深情地回忆了旧社会他家所受过的深重苦难，结论道：“如果没有祖国的前途，一切所谓个人的前途都是骗人的鬼话”，因此，“阶级敌人随时都在梦想变天，我们怎能睡大觉？……现在的问题是将文化革命进行到底还是夭折的问题。毛主席早已下了决心，要把文化大革命搞深搞透。现在是决战时刻，是关键，我们一定要努力奋斗，不怕牺牲”。

他告诉女友，“为了制止武斗，宣传群众，掌握斗争大方向”，他将到一个“比较危险的”地区去，他没有说是去辅导中学生使用自制土手榴弹。

在那封没来得及发出的信中，他这样写道：“我若有什么不幸，希不要把消息告诉家里人，如果我妈知道了我遇不幸，她肯定也不会再活下去了。你若有空，希到我家去玩，以免除家里人的怀疑。他们若问到我，你可编些话来回答，注意不要前言不搭后语，要先想好。

你得消息后，要说不难过那是假的，我只希你不要伤心过度就行了，不要影响身体健康，要想开些，我对得起党和毛主席对我的培养，没有辜负他老人家，我想，你只要想到这一点，可能心里就会开朗些。”

这个故事和抗美援朝时著名作家李准写的那个关于志愿军给妻子写信的小说几乎完全一样，让所有读者感动不已。在大家的一致要求下，“815”总团专门派车派人在连天炮火中把他母亲和女友从遥远山区接来学校参加了追悼会。一老一少两个不幸的女人来到学校，老母亲一直扑在学生宿舍的桌子上痛哭不止，整整一下午都没抬起过头。人们只能看见一部散乱的苍苍白发，那么耀眼而摄人心魄……

7 月 11 日，54 军副军长白冰找到“砸派”黄廉说：“张国华政委要我们送你去成都，由副军长韩怀志陪你一起去，汇报一下重庆的武斗情况。”

于是，黄廉和白冰他们一起坐铁路巡逻车去了成都。

铁路巡逻车是铁甲车，专门用来制止武斗的。

到了成都，黄廉在锦江宾馆先向刘结挺、张西挺做了汇报。他说：“《红十条》实际上已是一纸空文，军队的立场还是没有转变，每个单位都在发生问题，矛盾在逐步激化。群众组织无法解决这些实际问题，要害是军队的态度没有根本转变。”

晚上，张国华又打电话找黄廉去 50 军军部了解情况。他一见黄廉就说：“电话也找不到你……”

黄廉说：“重庆到处都在打架，‘砸派’都被从单位赶出来，许多人现在住在体育馆里……”

张国华说：“我们正在研究这些问题，你也找 54 军商量一下怎样解决。”

第二天，7 月 12 日，在西南局第四会议室，谢富治、王力等中央代表团接见了黄廉。谢富治问了重庆的情况，黄廉叙述了

重庆武斗从拳头、砖头到钢钎、枪支的全过程。

谢富治又问到红岩发电机厂的情况，黄廉说："详细的情况我也不知道。"

谢富治要黄廉务必出面去制止和劝阻武斗，说再升级对老百姓是不利的。他让黄廉立即回重庆，说："两派的头头都要出去把武斗劝阻下去。""我是周总理和中央文革派来的，也是执行毛主席的指示，中央文革的王力同志也来了。我们第二天就去重庆，协助你们做制止武斗的工作。"

谢富治让 54 军驻成都的那个师派一个连先送黄廉回重庆。当他们快到重庆的时候，已经到处可以看见头戴钢盔，手拿盾牌和钢钎的工人了。

从歇马场到红岩厂一线此时已被"砸"派控制，路过那里时，黄廉嘱咐"砸派"不要主动出击，工人同意了。随行的谢富治秘书对黄廉说："你还是挺有威信的。"

黄廉说："过了北碚就是'815'控制了，我的威信就不起作用了。"

护送的解放军说，那边的情况由他们解决。

中央代表团的到来让黄廉似乎感到了一线希望。

## 第 719 回：到京城，召开晋“七月会议”　第一次，接见山西代表团

为解决山西问题，从 1967 年 7 月 4 日到 8 月 5 日，在中央文革康生、关锋等人的主持下，中共山西省核心小组在北京召开扩大会议。与会的有军委文革的杨成武、郑维山等，山西的刘格平、张日清、刘贯一、陈守中、刘志兰等省核心小组和革委会领导，以及省城太原四大群众组织，也都派代表参加了会议。其中，“兵团”和“红总站”算一派，称为“红色造反总司令部”，简称“红总司”；“红联站”和“太工红旗”算一派；各有 60 多人参加。会议持续一个多月，分大、中、小会有几十次，其中中型会议约有 7 月 4 日、5 日、6 日、8 日、9 日、10 日、11 日、14 日共 11 次，大型会议有 7 月 12 日、13 日、15 日、23 日、8 月 5 日共 5 次。小会是中央文革有关人员与核心小组人员内部会议，中型会议是省革委常委扩大会议，大型会议有各群众组织的代表参加，在人民大会堂安徽厅举行。后来将这次解决山西问题的会议称之为“七月会议”。

“红联站”的头头们自恃举的是“支左一杆旗”张日清，对中央文革小组的圣裁充满了信心。“红总站”的头头们坚信刘格平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更是对中央文革充满了信心。

7 月 12 日，北京清华“井冈山”、地院“东方红”等 38 个北京红代会的群众组织对山西问题发表声明，坚决支持山西“红联站”进行的反资本主义复辟斗争。

当晚21时30分，中央解决山西问题扩大会议的第一次全体人员大会在人民大会堂安徽厅召开，康生主持，关锋、杨成武、吴法宪、郑维山、曹轶欧、中共山西核心小组全体成员和山西省其他有关领导、“红总站”和“红联站”赴京代表团等人出席。首都赴晋代表朱永根等5人列席会议。

当康生等人走进会场时，全体起立，热烈鼓掌，高呼“坚决拥护中央文革的正确领导！”“毛主席万岁！”等口号。

康生说：“请坐下。同志们好！同志们来了很久了，但不能及时接见你们。我们和山西核心小组的同志研究山西的问题。今天同志们来了，希望听听同志们的意见。”

“为了解决山西文化大革命中的问题，同志们到中央来开会。我们知道你们有各派的意见，不管哪一派，你们都可以说明。你们是来中央开会，不是来中央谈判。内蒙同志来解决问题时，有人说是来谈判。不是两个国家两个党，不能这样说。同志们是来中央汇报工作，不是来谈判。

为了更好地解决问题，你们各方面的意见，我们都听，不只是听一方面的意见。只听一方面的意见是不全面的。‘红总站’的意见，‘红联站’的意见，……”

关锋插话：“还有专政委员会的意见。”

康生：“对，专政委员会的意见，核心小组的，革命委员会的，军区的意见都能听，这样才全面，才能更好地解决问题。各方面意见都可以讲，但应该是摆事实，讲道理，不要互相吵架。武斗是不会发生的吧？但骂起来就不能解决问题，吵了半天还不知道说了些什么。

……

我们接到王庆英同志的一个材料，她要见江青同志。江青同志今天身体不太舒服，还有其他事情，今天不能来。王庆英同志来了没有？“

山西大学学生、“兵团”代表王庆英马上回答：“来了。”

康生：“王庆英同志先讲一讲，我们把她的意见转告江青同志。”

王庆英：“我首先有个要求，要求山西省军区政委张日清和专政委员会副主任兰敏在场！”

康生：“都在这里！”

接着，王庆英愤怒地控诉起“专政委员会”和张日清对她的政治迫害。她说，张日清先打电话支持他们，但背后又指使专政委员会逮捕她，从3月9日晚到6月30日晚，专政委员会审问她20多次，逼她供出和袁振是什么关系，和杨成效是什么关系，刘灏和袁振是什么关系？并给她戴上手铐，而且是背铐。

康生十分激动地说：“这个应向山西同志们说明白，‘专政委员会’用手铐背铐来对待革命同志，这是法西斯的东西！这种野蛮的手段是从哪里学来的！如果现在山西‘专政委员会’还采取这种残酷手段，应立即打电话回去，告诉立即停止。”

“红总站”的代表异常激动地呼口号：“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

康生继续说：“这种情况不仅是山西，全国其它地方也有。”

听了王庆英对山西“专政委员会”的控诉，康生说：“这样子，我们听了这个同志讲话后，且不说‘专政委员会’到底是什

么性质的，也不说王庆英是什么样的人，但我们要问一下，‘专政委员会’有没有这种刑法？！”

山西“专政委员会”负责人兰敏回答说：“对这个事情我们不清楚。”

康生生气地问：“什么？！你是‘专政委员会’的负责人，为什么不清楚呢？！我只是问有没有这种刑法？有没有反手铐？”

兰敏：“我对此事还不大清楚，还得查一查。”

康生：“你回答问题嘛！我是问有没有这种刑法？”

兰敏：“我们专政委员会还不清楚，我们回去查一查。”

康生：“你敢保证没有吗？！”

兰敏：“我不敢保证下边没有。”

康生：“你不敢保证，那你是赞成了？！”

兰敏：“我不赞成！”

康生：“你反对过吗？！”

兰敏：“反对过，有一次下边抓了一个反革命，用了这种刑法，我就不同意！”

康生：“你不要兜圈子嘛！你对我这个问题的回答是不敢说有，也不敢说没有。”

兰敏：“我们从来都教育下边……”

康生不容分辩的说：“都是下边？你对这个问题不敢保证，又不知道，那么就是瞎干！”

郑维山：“什么问题都是下边的，自己没有责任？！”

康生:“你这个专政委员会副主任是睡觉的？什么都不知道，

你是大官僚主义呢，还是骗我们呢？专政委员会是严肃的问题，关系到人的生命问题，你像话吗？我再问，王庆英同志是谁批准抓的？”

兰敏：“此案我知道是张日清批准的。”

康生：“呵，张日清批准的，好了，现在叫张日清讲讲。”

关锋对张日清说：“你的权力太大了！”

兰敏替张日清解释说：“当时拘留……”

立即让关锋抓住，驳斥道：“拘留？关了4个月怎么还说是拘留呢？我们知道的不比你们少。”

兰敏解释：“是拘留，我们很多情况从夺权后到现在都没有处理完。”

康生：“说拘留就能减轻你们的错误了？如果开始是拘留，关了4个月更增加你的错误了！拘留为什么要4个月？你想拿这个来辩护你的错误，这不是骗人？！张日清讲讲。”

张日清没有吭气。兰敏又站起来解释说：“此案与杨成效的案子有关系……”

关锋：“杨成效也成了案子了！是案子为什么不报告中央？”

兰敏：“‘决死队’的车成林他父亲是汉奸，他本人有反党言行，攻击刘格平下山摘桃子，攻击毛主席，他要血洗晋中，搞枪支……”

康生：“搞了多少？”

兰敏：“他们准备行动就把他们抓起来了。”

关锋：“格平同志，核心小组讨论过没有？”

刘格平：“没有，核心小组没有处理过。”

康生：“这是谁批准的？”

兰敏：“过去凡是属政法方面的都请示张日清。”

当兰敏说车成林和王庆英还偷听中央给刘格平的电话时，关锋问：“处理时为什么不和刘格平同志商量！你问刘格平同志没有？”

兰敏：“讲过。”

刘格平更正：“没说过，我不知道偷听我的电话。”

兰敏：“关于偷听电话的问题，我们是处理过的。”

关锋：“刘贯一你听着啊！”

康生：“关于王庆英问题谁报告的？”

兰敏：“晋中有个报告。”

关锋：“对了，你们就是相信晋中公安局的报告。”

兰敏：“我们还调查过。”

康生：“谁调查的？都核实了？确实有这么回事吗？”

兰敏：“核实了，我以为是比较符合事实的。”

康生：“怎么能说以为呢？你想怎样就怎样？车成林承认了吗？”

兰敏：“承认了。”

康生：“有口供吗？”

兰敏：“有。”

康生：“你把核实的材料拿给我们。”

关锋：“晋中军分区坚决支持左派我看不见得，对晋中核心小组为什么不支持不保护呢？任，王，张受到攻击，陈永贵受到围攻！”

康生让兰敏讲一讲杨成效的情况，兰敏汇报了杨成效的父亲曾在东北担任过伪警察所所长，警法司长，警卫队长……

关锋："杨成效是你们山西上报中央的，是革命委员会常委，中央批准的。你们对杨成效进行侦察，报中央了没有？"

刘格平说："对核心小组都不报告嘛！"

"兵团"一代表说："首长，我说几句。3月25日左右，兰敏亲自批准抓杨成效的。"

康生说："先别说杨成效的问题，要先问一下，专政委员会是在革命委员会之上，还是在革命委员会之下？"

兰敏："组织条例上规定得很清楚，是在下面。"

康生："别说组织条例，条例当然罗！我问的是实际。抓杨成效为什么不通过革委会？"

兰敏："按照一般惯例，都是和有关人员商量。我和谁有关系就和谁请示。"

康生："这是组织决定的，不能个人决定嘛，你是专委副主任，连这个常识都不懂吗？你告诉我们，专政委员会所用的旧职人员有多少？总共有多少人？委员会有多少人？"

兰敏答："公、检、法共有600多人，专政委员会有29个委员。……军队4个，公检法3个。还有北京赴晋大队各专政口的8个，还有开除的……共有7个常委。"

康生："7个常委中那么就是4个军队3个老公检法的。"

兰敏："对。"

康生："那么革命小将一个也没有了。3个老公检法的名字叫什么？"

兰敏："赵耀仁，检室副主任。崔人凤，公安处副处长，秦连生，检察院副处长。"

康生："这都是卫恒时代的人吗！"

兰敏："站出来的，是群众批准三结合的。"

康生："什么三结合？二结合么，就没有革命小将嘛。"

兰敏："原来第一次常委会决定，常委必须是党员。"

康生："噢，以党员为标准！那不是党员的革命小将就没有资格参加了。你就不管他是革命的不革命的，也不管执行不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只要党员就行。你是党员吗？你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吗？"

"红总站"一代表说："以前委员有党员的，兰敏也开除了！"

兰敏："名额我不知道是核心小组确定的还是谁确定的。我再谈杨成效的问题……"

康生打断他的话："你还是谈谈文化大革命的问题吧。查三代嘛，每个人都可以查。"

兰敏还是讲了杨成效的家庭历史情况，然后说，杨成效这种人作群众领袖，他想不通。

康生："这是政治问题，不是法律问题，你的权力有多大？"

兰敏："我只是考虑政权掌握在谁手里的问题了，考虑捍卫红色政权问题。"

康生："你说的是另外的政府，另外的政权了。"

关峰："山西的革命委员会成立以后，特别是4月份会议以后，更引起了我们的注意，感到里面有问题。"

康生："你们捕人都有证据吗？"

兰敏：“都请示过张日清。”

康生：“张日清签过字吗？”

兰敏：“都签过字。”

张日清：“没有。”

兰敏：“起码也是张日清口头同意的。”

康生：“拿出证据来，口说无凭嘛！口说怎么行呢？”

北京军区司令员郑维三：“你们这样搞下去是很危险的。”

康生问兰敏：“你是什么时候入伍的？”

兰敏答：“38年。”

康生：“什么时候入党的？”

兰敏：“39年。”

康生：“在什么地方入党的？”

兰敏：“在延安抗大。”

康生：“在抗大你参加什么生产工作？”

兰敏：“在煤矿。”

康生：“我看看你的手。”

兰敏只好把手伸出去。在场的人当时不免心中纳闷：“康老这是要干啥呢？是要看手相吗？”

康生问：“井下的？”

兰敏答：“井上。”

康生：“看你就在井上。矿工的手能有你这么白？一看你这双手，就知道你不是挖煤的。你那个专政委员会呀，我看不是无产阶级专政委员会，是专无产阶级政的委员会。”

康生这一句话，让支持张日清的头头们都耷拉下了脑袋。砸

烂公检法，成立了山西省无产阶级专政委员会，原先认定这是张日清的功绩呀，现在成了罪名。

“红总站”的头头们可高兴极了。当天就急电太原，以最快的速度，将这一喜讯告示省城人民。

太原的大街小巷立刻贴满了北京来电：“康生同志指示，山西省的无产阶级专政委员会，是专无产阶级政的委员会。”

紧接着就是革命大行动，虽然杨成效在北京，可他的“决死纵队”丝毫不减威风，他们与“太机四野”等组织一道出动，将设在省公安厅内的山西省无产阶级专政委员会砸了个稀巴烂。想想夺权时，北京政法学院“赴晋造反团政法公社”的造反小将们，已经砸过一次公检法了，夺权后，张日清继续砸烂公检法，成立了专政委员会，公检法又受劫难。这一回，又轮上张日清的专政委员会完蛋了。

我们再回到7月12日晚上的人民大会堂，接下来是“红联站”党校“东方红”负责人段立生发言。当他又说到要加强专政委员会，而不能削弱专政委员会时，康生当即问道：

“同志，你说的是要加强哪个无产阶级专政委员会？”

段立生一下愣在那里，接着马上辩解道：“我说的是要加强无产阶级专政。”

当段立生谈到“414 事件”以后，“红总站”和“兵团”炮打“革命的领导干部”时，关锋问：

“你讲的革命领导干部是指谁？”

段立生答：“刘格平、张日清同志，曹中南、陈永贵同志。”

关锋继续问：“还有谁？”

段立生没有直接回答，继续讲下去。当他谈到“红总站”和“兵团”要炮轰、打倒“革命的领导干部”，要“革命领导干部”“靠边站”时，关锋再次问道：

“你说说他们炮轰谁，打倒谁，要谁靠边站？”

段立生回答：“他们要打倒刘贯一、陈守中、刘志兰，说张日清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曹中南不投降，就叫他灭亡，陈永贵是大老粗，对文化大革命不理解……”

段立生开始谈刘格平的问题，康生说：

“内容要注意压缩一下，下边还有什么问题？还有很多同志要说话。”

接着，雷维林和“红总站”杜增录发言。他们之后，太原市委机关“红旗战斗队”、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王承琚发言。当他谈到革命委员会成立后，大家都归口闹革命，复课闹革命，“中小学都复课了，大家都回到学校了。从夺权后到3月底，山西的形势大好，没有辜负党中央，毛主席的期望”时，康生生气地反问道：

“刘贯一3月26日的报告也是大好形势吗？那是一株反毛泽东思想的大毒草！”

太原市委“红旗战斗队”负责人、太原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王承琚说：“我认为是前进中的问题，基本形势是好的。”

康生：“出了反毛泽东思想的报告还是好的形势？！”

康生说：“恐怕‘316社论’不能说是大好形势吧？‘326’的报告也是大好形势吗？那是反毛泽东思想！”

关峰：“山西不补这一课是不行的！”

康生问："4月份，中央会议精神传达了没有？"

众答："没有。"

康生说："那次会议主要是批判刘贯一的报告，那是彻头彻尾反毛泽东思想，反主席革命路线的。这个报告是资本主义复辟的东西，把群众当成阿斗，把自己当成救世主。林总讲过，看一个干部主要看三个方面：对群众，对领导，对自己。那个报告。把群众当成阿斗，把自己当成救世主，反对毛泽东思想。刘贯一是想搞资本主义复辟的。什么斗批改呀，什么七一献礼呀！那有这样的文化大革命！要分析，你把反毛泽东思想的东西也叫大好形势！你们是受蒙蔽的，你们不要受蒙蔽，受欺骗了！"

关峰："不要听陈守中、刘贯一、刘志兰那一套了。同志们，我们公开讲，这是中央爱护你们。那个电报是陈守中签发的。陈守中控制了市委大权嘛！"

康生对王承琚说："你不是革命小将了，你是个干部了，怎么能把反毛泽东思想的东西叫做你们的大好形势呢？我们认为'红联站'是革命组织，不要受刘贯一他们的欺骗。我们要把你们和刘贯一、刘志兰、陈守中分开的。"

王承琚表示接受，说："康老的指示我非常同意。"

康生："我看不一定你同意我的。这样的话不要讲了。那么一个反毛泽东思想的人，怎么能放在党校当校长？怎么能教好你们呢？这个核心小组是有责任的。"

王承琚："对刘贯一的报告，我们批判过，也很上纲，说是方向性错误，有纪录。"

康生："不对！你们打电话为什么不说呢？为什么有方向性

错误的东西你们不报告中央？”

王承琚分辨道：“那只是个报告。”

康生：“一个报告就代表了他的思想，一个报告要批判嘛！”

王承琚：“讲的不对，请首长批判。”

康生：“讲，尽管可以讲，不同观点都可以讲。但要讲老实话。不要说假话，不要又真又假，你是干部，和小将不同嘛！”

当王承琚讲到山西文化大革命一开始落后全国2个月时，关峰说：“我们看出来了。你们夺权有先天的弱点。不然就不会出现这些问题了。”

当王承琚谈到山西“414”后出现“反革命复辟逆流”，把矛头对准“站出来的革命领导干部”时，康生问：

“你指的革命干部，是些谁呀？”

王承琚答：“刘志兰、刘贯一、陈守中、张日清、曹中南。”

关锋：“刘志兰、刘贯一、陈守中他们亲自发的电报，张日清签的字，说刘贯一、刘志兰、陈守中是革命领导干部。”

当王承琚谈到“414”是在核心小组到北京开会时出现，使他们不得不怀疑时，康生问：

“同志，你说的是核心小组同志到中央开会以后出现的？”

王承琚肯定说是会议期间出现的。当他接着谈到 5 月 20 日核心小组的《四点决议》时，康生问：

“《四点决议》是什么？”

王承琚答：“要害问题是说刘志兰罢官。”

康生要求：“把《四条》念一下吧。”

“红联站”的代表念《四点决议》。

袁振说："这是核心小组集体通过的，通过没有，核心小组的同志可以说。"

69 军政委曹中南说："通过了。"

刘格平说："集体通过的没说罢官。"

袁振特别提出："张日清说嘛！通过没有！"

康生："刚才念的四条罢官呀？我现在请王承琚同志澄清一下，你认为念的《四条》是对的还是错的？"

王承琚："我觉得停职是错的。"

"红联站"一名代表说："如果核心小组有这决定，我们就服从。问题是有人说没有此事。"

康生说："有没有不是实质。"

"红联站"强调："还有《三人来电》，《四人声明》。"

康生回答："那两个传单我看过了！"

"红联站"代表："对，我们就是看了《声明》传单中，要我们群众帮助查清，才揪后台的。"

康生解释："同志，这事我们查过了，四月会议上已经谈清楚了。"

王承琚说："最近，7 月 6 号后出现封市委办公室，抢了市专政委员会的 5 辆汽车，7 辆摩托。"

康生问："什么时候砸的？"

王承琚："10日晚上，是'32111'等组织，这些组织和袁振关系密切，我们怀疑袁振与这件事有关。我们希望袁振能改正自己的错误……另外前几天核心小组开会，为什么作为一个群众的吴春久可以参加，'红联站'就不能参加？"

康生解释说："这是我们决定的，因为他是省革命委员会常委，是被抓的。"

王承琚："有人说他是党员就能参加。"

康生："不是因为党员，而是因为他是常委，被抓的。"

王承琚："要说被抓的，'红联站'被抓的也不少。"

康生："听清楚！有两个理由：是常委，被抓的！"

王承琚："吴春久是怎么当常委的，说起来就话长了，他是怎么被抓的，希望中央首长了解一下。"

康生："那是另外一回事罗，我再问一件事请你回答。6 月 28 日你和陈守中打给毛主席、党中央，中央文革一个电报，说刘格平执行了刘邓的反动路线，背离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你现在还是这个看法吗？"

王承琚肯定的回答："是的，现在还是这个看法。"

王承琚发言后，"红总站"朱生和发言揭发刘志兰对他的迫害。他讲完后，康生说："现在已经三点一刻了，明天继续开会，今晚'红总站'，'红联站'同志都很遵守纪律，摆事实，讲道理，告诉我们情况，有利于中央解决问题，希望坚持下去。这是一。

第二是，会议期间要遵守6月24日发布的《六条》和6月26日发布的《十条》。会议期间，在家里不许搞小动作，不要上街游行，不要打砸抢，不要捕人，不要破坏交通等。太原有很多重要工厂，要按照毛主席指示抓革命促生产，不要动员农民进城，不能夺枪，军队不要开枪，部队要坚守岗位，各组织要互相遵守。要相信中央能解决你们的问题。还有不要动员很多同志来北京，

现在已经很多了。人太多了，开成大会就无法详细讨论问题。有意见可写成材料，你们是代表嘛！不论农村、工厂要抓革命促生产，不要离开岗位，学校要复课闹革命。

第三，会议期间，不要给家里打电话，比如开什么会，什么人说什么话等，因为会还没有开完，打电话容易片面，容易传错，引起误解。最后有材料可以给联络员带来。”

会议到此结束，已是7月13日凌晨3时30分。

## 第 720 回：说湖南，张春桥来到南京　第一次，接见湖南省代表

7 月 12 日，毛泽东青年时代的同学、湖南省副省长周世钊从长沙专程到北京，向毛泽东汇报长沙的情况，两人进行了长达 3 个小时的谈话。毛泽东问周世钊："你到北京后到了什么地方，看了些什么东西啊？"

周世钊回答："我每天就是看书看报，有时也上街走走看看。我是住在北京饭店，北京饭店大门东侧就是王府井大街的南口，在那里每天有很多全国各地的各种小报，有时我也乐意买几张看看……那些小报大都是报道全国各地进行文革的情况，特别是以报道各地进行武斗情况的消息为多。他们报道武斗的消息大都采用战争年代打仗发急电的方法，就是'某某地告急、急急急、十万火急'。"

毛泽东听后笑了起来："让他们告急去，急不了好久，总会要想个法子解决问题的。"

周世钊向毛泽东汇报了长沙"六六"事件，没想到毛泽东对武斗的情况了解详细，将东塘是如何打的，河西又是如何打的，都一一道来。周世钊吃惊地问："主席，你怎么了解得比我们还清楚些啊！"

"我是党中央的主席嘛。"毛泽东说："他们会时常向我汇报情况的。再说你看我的办公桌上，不是放着一大堆小报吗，有些情况我是从小报上看到的。"

那一堆摊在毛泽东办公桌上的小报，有些是地方上送来的，

有些是毛泽东嘱咐工作人员从街上买来的，他看得都很仔细，而且不同派别办的小报他都要看。

我们再来说说江苏省军管后的情况。与全国“二月镇反”、“三月镇反”时的情况一样，自 3 月 5 日中央宣布江苏省军管后，3 月 9 日，江苏省军管会即宣布金陵造船厂“红纵” 等 5 个群众组织为“反革命组织”，予以取缔。3 月 13 日，又宣布“省红总”朝阳区总部、新华玻璃纤维厂“红色造反队”等为“反革命组织”，予以取缔。3 月 14 日，再宣布取缔“南京铁路工人革命造反总指挥部”下属的“铁道兵”及其所属南京机务段“革命造反总部”的“铁道兵”、南京和平门车站“革命造反总部”的“铁道兵”和南京铁道医学院“毛泽东思想战斗兵团”，又称“红卫军”，还有遵义区“工人红色造反总部”及其直属纠察队、南京市“工农学革命串联总部”及其所属“飞虎队”。此外，南京市统战系统“革命串联会”也被取缔。

这种高压政策虽然暂时遏制了南京“红总”的气焰，但是也加剧了“红总”对军方的抵触情绪。进入5月份，南京局势日渐混乱，5月7日，张春桥、姚文元从济南来到南京。5月14日，张春桥、姚文元和南京军区政委杜平接见了江苏和南京地区部分群众组织代表并讲话。此后，南京有了一段时间的平静。从5月14日至5月24日，10天内，南京地区仅发生武斗37起。但是很快，5月下旬到6月上旬，平均每天发生武斗就上升为18起。较为严重的是5月27日发生在南京林业学校的武斗，致该校学生、“827”负责人蔡应厚死亡。

6 月 19 日，“红总”组织 300 多人冲进已经军管的江苏省公

安厅，抢走档案资料 60 余件。6 月 24 日，数千名“红总”群众再次包围省公安厅大院，试图进入未果。

6 月 27 日，南京再次爆发武斗。中国国防科学研究院第 10 院 14 所“八一八红卫军”、长江机器厂“红旗、”南京电子管厂“红总”、南京 3503 厂“一二一红卫军”等群众组织，集中了 4000 人，围攻驻守在南京机器制造学校“东方红大楼”的“827”派“东方红公社”等组织。双方从争吵、谩骂发展到推打。继之以砖石和棍棒等“冷兵器”相交。机校“东方红公社”等组织的人渐渐支持不住，退守二楼固守。

凌晨 4 时 30 分后，区军管会两次派人前去现场劝阻。围攻大楼的一派不听劝阻，反把劝阻的军人扣押下来。

随后，在进攻失利的情况下，中国国防科学研究院 14 所的“八一八红卫军”和 3503 厂“一二一红卫军”的几个人点火烧楼。大楼 8 时起火。因大楼是木质结构，火势很快向楼上蔓延，楼上人员非常危险。

上午 9 时，消防队闻讯赶来救火，被围攻大楼的一派阻止，区军管会派出解放军 1 个排前去制止武斗，参加灭火。又被南京电子管厂“红总”拦阻半小时。无奈，区军管会只好向南京军区请示报告。南京军区立即打电话请示中央军委，林彪批准派军队救火。

上午 10 时，南京军区派出 1 个营的部队，强行冲开造反派的拦阻，进入机校灭火救人，制止武斗。围攻大楼的人见状，这才撤去。上午 11 时，大火被扑灭，楼上人员得救。

这场武斗，造成双方人员数十人受伤，机校大楼受到严重损

毁。

7月12日，张春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南厅接见南京地区三派赴京代表。他说：

“本来今天还要参加另外的接见，因为你们来的时间很长了，所以那个会我就请假不去了，来听听你们的意见。我离开南京两个月了，不知你们的进展怎样了！有的省比江苏还要紧张，不过无锡，徐州武斗已经相当严重了。5月又去过南京，我离开南京回到上海，不到半个月，杭州也没有去，就来到北京了。今天来听听你们的意见，主要是怎么解决问题，你们哪个谈谈吧？有些已经讲过的就不要再详细谈了，谁先讲？”

葛忠龙首先汇报，谈到无锡“主力军”被打出来，“铁道兵”将他们从无锡接到南京。

张春桥问：“有多少人？”

葛忠龙：“有两个火车约4000多人。”

张春桥：“没有上海多，上海有两万多人，革委会很头疼，对上海有些影响，他们背着大刀拿了铁棍，上海工人不信这一套，上海工人不欢迎。”

汪洵之接着汇报，当谈到张春桥“五一四”南京讲话以后，南京曾出现一段比较好的局面时，张春桥说：“顶多半个月吧！我有个经验，我的讲话只管半个月，我和姚文元同志在上海讲话也只管半个月啊！我现在离开上海已经一个月了，不知上海又怎样了，看来最近又得回上海了。”

接着又汇报有人说张春桥“五一四”南京讲话是大毒草，要和张春桥辩论，抵制、缩小张春桥讲话的影响。

张春桥说："我也知道这个情况，我在南京就收到不少反对的来信，回到上海又收到不少，有人反对我的讲话，这也难怪，我的讲话，不一定所有的人都能接受的呀！"

接着又汇报了南京最近武斗情况，以及杜方平的问题。

张春桥："你们南京这个样子，对无锡也很难表态。上海就好办了，他们到上海，人家就问他，你们拿武器来上海，看看上海形势，适合不适合？就劝他们回去了。"

南京"促联"代表汇报后，张春桥说："你们带来的材料我们都看了。材料带来不少了，现在看来不可能一件一件地解决这些问题。无锡、徐州打得很厉害，王效禹同志去制止武斗，也被包围了，住处的玻璃窗都被打碎了。江西武斗也很严重，江苏要发展到江西这种局势也不难，到那时，局势连你们自己也控制不住了。比如说，甲方先动了拳头，乙方就拿起棍子，那么，以后甲方就不再是拿棍子的问题了。江西的情况复杂一点，区人民武装部，县人民武装部，公社人民武装部，甚至军分区有挑动群众斗群众的情况，有的把枪发给农民了。这也很自然，是基干民兵嘛！结果开枪了，先是小口径步枪，接着是步枪、机关枪、60炮也用上了。我不是吓唬你们，枪开起来，双方就管不住了，中央下死命令，还是那么难。现在双方都有人到北京来了，军区也有人来了，但局势就是控制不住，枪收了很长时间还没有收上来。最近好些了，枪也不开了，但晚上还会朝天放的。这样大的革命，出现这样的事没有什么了不起，牺牲了一些人，革命是要付出一些代价的。现在中央已把军区负责人召到北京来开会了，两派都说，要听毛主席的话。你们不是也说要听毛主席的话吗？毛主席

是反对武斗的，毛主席什么时候叫开枪的？南京的问题，我看南京第一位工作是制止武斗。五月份武斗规模还小一点，当时我是希望你们联合起来，现在武斗规模慢慢大了，看来南京一搞起武斗，比‘一三事件’更大了。以前是两派一起对付‘赤卫队’，现在是两方面自己打了。是否双方面努力把武斗制止下来？过去是中央下命令，执行《六六通令》呀，六月二十四日《通知》呀！《六二四通知》是各人通知各人一方，但这几句话还不能解决全部问题，还得有个协议书。一般是搞执行《六二四通知》的协议书，双方协议，签字，传达，双方都要真正的组织执行机构，譬如说，武器，枪支集中封存，自己制造的武器，土枪、土炮、棍棒也要收起来，双方都不制造武斗舆论，高音喇叭，宣传车都撤掉，你们看这样好不好？我可以送些材料给你们，江西、河南的协议书可以送给你们参考。浙江的双方也签字了。这几个省对立情绪都比你们强，他们能达成协议，你们就不能吗？你们双方是否能派出代表，由军管会出面主持，就这个问题达成协议？这可以说是第一步吧。南京的工人、农民、学生就会拥护你们。现在群众中都有人厌战了，不愿意武斗，我们的革命是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革命，应该应用‘四大’武器嘛！现在有人提出以武斗制止武斗，这是错误的。还有人提出要用农村包围城市，毛主席说现在提出这个口号是反动的口号，历史条件不同了嘛。过去，是国民党统治，不可能解放城市，所以提出农村包围城市。现在历史条件变了，现在城市都是无产阶级专政机构，你们包围城市，实际上包围谁呢？”

张春桥在这里提到的“浙江的双方也签字了”，是指6月30

日，浙江“省联总”和“红暴派”双方代表对执行中央《六二四通知》达成协议。

对南京两派争论的“一二六夺权”问题，张春桥劝他们不要再争论下去了，说“可以作为历史教训吧！”他动员两派还是联合起来，说：“要是刘、邓上台，搞资本主义复辟，那时要一起杀，曾邦元、文凤来一起杀，你们在座各位也要杀，哪能这一派要杀，那一派不要杀？”

“当然他们上台，首先中央文革是要杀的，这一点是毫无疑义的。你们这两派呢？监狱在等着你们。我们就要使他们永远不能复辟，就是要想这个问题。他们还没有打倒呢！省委就打倒了吗？没有呢！有些同志有这样一个错误观点，觉得这些都是死老虎，他们还没有死呢！你们一边忙着打内战，你们忙得很哪！他们在那里吃得好好的，很多人都养胖了。”

“当然这次革命像上海‘鲁迅兵团’的小将讲的那样，不是罢官革命，而是要在政治上、思想上把他们批倒、批臭，使他们没有基础才行。可是我们有些同志就不想这些事。我们的同志，要分析江苏的形势，看看江苏的文化大革命进展到哪一步了？省委的权还没有夺下来，我这里讲的夺权，不是形式上的夺权，而是在政治思想上，把毛泽东思想的权威树立起来。还没有把毛泽东思想宣传深、宣传透。委员会还没有建立起来，还是军管嘛。江苏有个很好的条件，还有梁、吴等同志，有些同志对杜方平有意见，当然还没有从根本上否定他，对其他同志也有意见。如果有缺点，错误，你们可以说话嘛！我们还可以继续观察嘛！总之，你们还是有条件的，我估计你们要是不联合夺权的话，哪一方也

掌不了权，要不把保守派争取团结过来的话，也掌不了权。”

汪洵之提出：“我们有的同志被抓进去还没有放出来，要求对方立即放出来。”

张春桥说：“这些都写上，这可能都有，你抓他一个，他抓你一个，双方抓的人一律都放回。”

“公革会”的一个代表两次站起来要汇报“公安联总”的问题。张春桥说：“今天不谈那么多问题，就武斗一件事能不能达成协议？”

双方答：“能。”

P派代表提出“六二七”常州事件代表团等，要求中央首长接见，并简单汇报了常州情况。

张春桥表示：“武斗全部都要制止，这个问题不解决，其他问题都不好谈，很多东西都是由武斗所引起的，再发展下去你们就控制不住了，湖南‘湘江风雷’是很有名的，但也有缺点错误，以后大规模镇压就错了。”

P派代表谈到“六二七”机校纵火事件。张春桥说：“这件事中央都知道了，当时军管会处境也很困难，都不敢去，因为牵涉到两个群众组织的问题，后来杜平同志给林总挂了电话，林总亲自批准派军队去，因为是放火嘛！”“我对军管会也有意见，很多问题都抓得不紧，大方向也没有好好的抓。把双方都找来开会嘛！哪方不来就是他的事了。你们武斗的水平也差不多了，再提高就要动步枪，机关枪了，应该提高一些文斗的水平。我们觉得江苏差不多了，因为已经闹了半年了嘛！其他有的省闹一闹还可以，如果你们象上半年一样，再闹半年那也可以，那就迎接1968

年去吧！到时候就由群众自己去干，群众还是要革命的呀！他们看到生产搞不好，老是搞武斗，自己要起来干的。不要脱离群众，今天你们是负有领导责任的。现在不早了，今天就讲这些。能否双方在这里达成这个协议，并且打电话回去，先把武斗停止下来，其他问题再谈。”

全体代表起立，张春桥临走前，特地绕到后排和许世友的妻子、南京军区干部部部长田普亲切握手，并和其他代表一一握手，然后在代表们的掌声中离开。

7月12日晚21时30分至7月13日凌晨2时30分，在人民大会堂，周恩来、陈伯达、戚本禹等中央首长第一次接见湖南代表团三方代表，即“高司”派、“湘江风雷”和军方代表。

周恩来说：“中央找大家来，要解决湖南问题。”他很关心“湘江风雷”的负责人叶卫东，一再询问他的情况。陈伯达说：“久闻大名”。并且对省公检法的代表说：“叶卫东同志关了五个月不是造谣吧！”

周恩来叫叶卫东汇报湖南文化大革命情况。叶卫东讲了两个小时。

听完汇报，周恩来对陈伯达笑着说：“当时我们认为‘湘江风雷’闹得很凶，讲了半天并不重，一没死人，二损坏的东西也不过2000多元，比起现在这些武斗来，那就不算什么罗！因为这件事情才有那个‘二四’批示。当时弄得我们糊里糊涂，看来我们也受了蒙蔽！”

周恩来又说：“当务之急是军队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军队刚开始搞。军队早就介入了地方，有的从左介入，有

的从右介入，支左支得不准。湖南问题解决较晚一点。4月6日以后‘湘江风雷’又起来了，是很自然的，并不奇怪，7、8月要解决几个省的问题。要立即制止武斗。”

最后，周恩来指示：“每个地方来一两个人，各军分区也来一个人，要解决全省的问题。几件事：

1、双方达成一个临时协议，不夺枪，不动员农民进城，制止武斗。江西比你们先进。井冈山在江西，可主席是出身在湖南啰！不要忘记了湖南是主席的故乡。湖南，江西是两兄弟，要互相学习。总不能湖南比江西落后，明天把你们达成的协议给我看看。

2、各地区把人找来。

3、把情况调查清楚。

4、军区负责人打电话通知人，可不能再扣留人。军区要好好坐下来检查错误。

5、省委来的四个同志再找时间跟你们谈。”

## 第 721 回："五一六"，又发动"第二战役"　涪陵分，拉萨争夺大昭寺

6 月 28 日，林彪发出指示："建造大型的毛主席全身塑像，已经成为广大群众的自觉要求。我们部队也应当这样搞。""凡有代表性的大军事机关，其驻地有大院、有广场的地方，都可以搞。"7 月 1 日，解放军总参谋部、总政治部将林彪的以上指示引用在下发的《关于建造毛泽东大型全身塑像的通知》中，并报林彪审批。

7 月 4 日，中央办公厅秘书局信访处编印的《文化大革命信访简报》第 280 期上刊载《全国各地群众正在积极塑造毛主席巨像》的材料。

7 月 5 日，毛泽东在这份材料上批示：

林彪、恩来及文革小组各同志：

此类事劳民伤财，无益有害，如不制止，势必会刮起一阵浮夸风。请在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上讨论一次，发出指示，加以制止。

并对这期简报上刊登的一则简讯批道："此事也请制止。"

这则简讯说：北京矿业学院某群众组织过去曾在北京印售未经公开发表的毛主席讲话，受到有关方面的制止。但是，他们最近又收集了毛主席的许多没有公开发表的讲话材料，派人赴长沙编印。希望中央制止。

7 月 10 日，林彪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总政治部关于执行林副主席批示建造毛主席大型塑像的通知稿》送毛泽东审

阅。

总参谋部和总政治部的《通知》稿说：

林副主席六月二十八日指示：建造大型的毛主席全身塑像，已经成为广大群众的自觉要求。我们部队也应当这样搞。凡有代表性的大军事机关，其驻地有大院、有广场的地方，都可以搞。通知要求各总部、各军兵种、各大军区应立即按林彪的指示执行。

对各地兴建毛泽东塑像之风，毛泽东早已不悦。他曾对警卫战士抱怨说："你们到处挂像……有的还在大门口塑个像……你们在门口站岗，让我陪着你们站岗。你们两个小时一换回去了，我却仍站在那里没人换，倒成了我为你们站岗了……"

7 月 12 日，毛泽东在林彪所送《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总政治部关于执行林副主席批示建造毛主席大型塑像的通知稿》上批示：

退林彪同志。此件不发。中央已有指示。

毛泽东所说的"中央已有指示"应该是指他 7 月 5 日在《全国各地群众正在积极塑造毛主席巨像》材料上的批示。

7 月 13 日，周恩来送审中央《关于建造毛主席塑像问题的指示》稿。中央指示稿将毛泽东 7 月 5 日的批语转发各地，指示称："建造毛主席的塑像是一个严肃的政治问题，每一座塑像都应当保证政治上、艺术上的高质量，传之千秋万代。这只能由中央统一规划，在适当时机、适当地点建造，才可能做好。现在某些群众组织那种匆匆忙忙的做法，不仅会造成经济上的损失，而且会造成政治上的损失。""希望你们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加以制止"。"中央重申：毛主席没有公开发表过的讲话，文章、文

件、诗词，未经毛主席和中央批准，一律不得编印，不得出版发行。出现这种事情，也请你们加以制止。”当天，中共中央即下发了这个指示。

6 月 13 日，中央军委派人到武汉调查贺龙的问题。调查人员发现 1934 年 3 月 17 日湘鄂西中央分局就此事给党中央的专门报告。报告中说：“去年 12 月蒋介石曾派一代表熊贡卿来游说贺龙同志，企图收编，熊先派梁素佛来，贺龙同志首先发觉和揭露来人之阴谋，认为这是侮辱中央分局……我们为要得到蒋介石对中央苏区及四方面军之破坏工作的消息，遂允熊来，据熊说蒋已派四个人(有两个是浙江人)到四方面军去，中央苏区亦建立多年工作，此等人均做上层收买工作，我们乃将熊事公开，举行群众审判枪毙之。”

调查人员又让 2 月 14 日写信揭发贺龙的武汉市第二十中学英语教员晏章炎写了一份材料，内容与 2 月 14 日的揭发信一样。7 月 12 日，这份材料以贺龙“通敌未遂”上报中央。

7 月 11 日至 12 日，北京“516 兵团”的活动范围扩大到农口和八机部。他们在八机部门口刷大标语，与农大“东方红”配合，在水产部、农业部、林业部、农科院、八机部、气象局等地贴出“告农口革命战友书”等传单和标语，攻击周恩来“保李先念过关是个大阴谋”，开始了所谓的“第二次战役”。随后，这些传单大量出现在北京的大街上和农口各局、各院校。

7 月 13 日至 14 日，他们又到天安门附近、南池子等地贴出“吴克华是好同志”、“肖华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把三军打成打砸抢派没有好下场”等大标语。

7 月 15 日，由张建旗、刘令凯发起，在北外“六·一六”召开了一次秘密会议，主要研究是否要搞周恩来，以及如何搞法。参加者约 20 人左右。

我们回到四川涪陵。“75”事件后，虽然涪陵西部城区内的“贸派”势力已经基本肃清，但是，位于环城公路以上的涪陵工业局大楼仍为“贸派”控制，特别是工业局大楼后面的水塔居高临下之势，对“忠实派”构成很大威胁。7 月 13 日，“忠实派”组织大批人员，手持大刀长矛，向“贸派”工业局大楼据点发起了进攻，意在拔掉这颗“钉子”。

那天，烈日似火，酷热难耐。下午 14 点多钟，“贸派”在城七校成立“二兵团”，正在开会时，就听到水塔在打锣。按“贸派”的内部规定，发现情况即由在最高处的水塔打锣报告。况道成问守在城七校里的“贸派”下属战团“城郊工农”是怎么回事，回答说是“二七”的几十个人在偷包谷。他们又接着开会，又听见在打锣，并报告说“二七”冲过来了。他们出来一看，“忠实派”的人真的冲过来了，况道成赶紧往“红贸总部”跑，在途中碰上“红联司”姓黄的常委和杜炳全正带着一连人往工业局那边冲过去。况道成问情况怎么样？回答：水塔可能被“二七”占了。况道成对杜炳全说：“水塔丢了对我们威胁大。”

杜炳全说：“不要紧，‘一兵团’已经调了一个连从后面冲过去了。”

原来，赵树金也在“红贸总部”三楼看见水塔在燃烟火，又舞动白旗，“贸派”住在水塔下面的“东风农民总部”也打来电话报告说：“忠实兵”在攻打工业局大楼。赵树金立即让“红联

司”姓黄的常委带上“红贸总部”的一个连去增援。并通知“红联司”各总部。

两派人在半坡处环城公路上就打了起来。只见环城公路上，烟尘滚滚，双方队伍距离只有几步，打头的手拿钢钎、铁棒叫阵，稍后面的相互投掷石头、砖块。不一会儿，就直接对杀起来，钢钎捅，刀砍，棒打，两边的人搅成一团，不时看到有人被刺中倒下……

武斗人员除头戴藤帽外，不少人还用竹篾编的“鸳篼”（一种盛泥土的劳动工具）护住前胸后背，像土制的“防弹背心”。战线忽进忽退，时而搅杀在一起，时而又分开几步，形成拉锯状态，呐喊声、叫骂声、受伤的哭叫声……混成一片。

太阳把人们照得全身湿透，两眼发花。尘土沾上汗水，人人都是满面尘灰，衣衫脏破，有的还在流血，与影片中的战斗场面毫无二致。

环城公路位于城市后面的半山腰，双方在此战斗正酣，忽然，山头上自来水塔处传来一片喊杀声，只见几百名“贸派”队伍铺天盖地压了下来，冲下公路，“忠实派”仓促后退。兵败如山倒，随着人流前挤后推，“忠实派”几乎是连滚带爬地退下公路几十米，放眼望去，公路上已全是“贸派”的人马。“忠实派”有人大声叫喊“不能退！不要退！要顶住！”这才慢慢稳住了阵脚。

况道成看见“贸派”增援的“一兵团”冲上水塔了，很高兴，也爬上水塔，看见上面有“一兵团”的 100 多人和涪陵农校的“贸派”红卫兵组织“同心干”五、六十人，就嘱咐大家：“大家一定要守好水塔，这个地方很重要，再也不能丢。”

这时，退下公路的“忠实派”正在重新组织队伍，忽然有人在喊：“学生被包围了，快去救呵！”

原来涪高中一批学生被围在工业局楼里了！工业局在公路上方紧靠公路，四层高的楼房，临路边是较高的堡坎。“贸派”从山下压下来时，一下子将它团团围住，里面有 100 多号人，几乎全是学生。

人们发了疯似的狂喊：“冲上去啊！”“救学生啊！”呐喊着往上冲，冲到公路边就与对方发生了钢钎肉博战，一进一退，纠缠在一起，胜负难分。

许多“贸派”人员正围住工业局大楼，或架起梯子，或攀附窗沿向里面进攻，但几次被里面的学生击退。他们再冲，同时，里面还不时有人冲出来向外突围。

“忠实派”组织队伍一次又一次冲上去营救，在这种接应下，每次冲上公路接近工业局时，里面就突围冲出一批人，有从门内冲出的，也有不少从窗口跳下公路。每次冲击后“贸派”就会增援人来合围，于是这边聚集人再冲，再突围，再合围……如此反复进行。大家又激动又痛苦又焦急，嗓子都喊哑了，不停地看到受伤的人被抬走，不停地听说有人牺牲了……

突围和反突围的战斗进行了 1 个多小时，“忠实派”的“二七兵团”杀了过来，为首的还有京剧团和川剧团的武打小生，挥舞着长矛大刀，这时“忠实派”声势大振，“贸派”且战且退，退守山顶水塔，被围在工业局的学生们得救了。大家见面，相互问候，有的人激动得失声痛哭，听说牺牲了好些人，遗体在专署小礼堂。

小礼堂横放着五、六具尸体，周围哭喊声一片。原来，这些学生集中住在涪陵五中，那天闲来无事，都跑到长江里游泳。环城公路打起来后，他们匆匆集合起来跑到工业局增援，刚将“贸派”的人赶出去，即被从山上冲下来的大批“贸派”增援人马团团围住。

涪陵五中的学生被救后，“忠实派”的“二七兵团”又向水塔冲过去，“贸派”的人发生混乱，撤到了城郊区公所。这时，“贸派” 100 多人绕后面往水塔冲过去。赵树金带上他的通讯员李玉祥、陈正华到武斗现场督战指挥，陈正华背上冲锋枪，途中碰上前去制止武斗的涪陵军分区任成宣副司令员，任副司令劝他不要去，他没听劝。又过了 10 多分钟，他们冲上了水塔。

激烈战斗的过程中，部队也派人到现场欲加以制止，但没有武装，显得一筹莫展。部队事后将双方的头目叫去训导，结果两派相互指责对方先动手，不欢而散。部队要求双方分别放出抓去的人，也就是交换“俘虏”。两三天后，这个要求得到了执行。

“7.13”大流血，增加了涪陵两大派之间的仇恨。一派喊出“活捉赵匪，消灭贸匪军，为死难烈士复仇！”对方也喊叫“踏平砸匪，绞死李叛徒，砸烂黑五条！”，还有什么“活着干，死了算，不打倒刘张李畔非好汉！”……双方的高音喇叭彻夜不停，历数对方的“罪行”，声言皆是对方挑起武斗，自己一方是“文攻武卫”，进行的是“自卫反击”。此时中印边界战事争端停火没几年，“自卫反击”这个词在文革中被广泛借用。

两派都在加紧打制武器：将钢钎、铁矛加工得更加锋利，制作大弹弓，搞火药枪，储备火药，制土炮土枪土地雷土炸弹，储

备大量沙石和砖块，准备藤帽和盾牌……战斗队伍在进行训练，以提高搏斗能力。人们纷纷主动要求参加战斗队，连年纪稍大的人和女性也十分踊跃，场面还很感人。

很快，两大派的势力范围不再是据点，而是连成区域，并且设置起路障和街垒，甚至有的地方还安置了电网。“贸派”占据了城市绝大部分地方和所有的制高点。“忠实派”在部队的约束和劝说下，占据城西靠长江的一块弹丸之地，背水而居。从此，涪陵以长江饭店至夏家沟这个“中间地带”为界，划分了一条“三八线”，以东为“贸派”控制区，以西为“忠实派”控制区，双方在“前沿”“重兵布防”， 用沙袋条石或铁杆拦住，昼夜站岗，留有口子盘查路人，防备“奸细”混入，几乎可以肯定，双方都会派有侦察人员潜入的……总之，一切都仿照革命战争时期的方式，置身其中，有时真能触动心底里的革命斗志和情绪。两方都将自己所在区域叫“红区”、“解放区”，将对方控制的区域叫“沦陷区”或“匪占区”。

开始分界的时候，只要不是头头或知名人士，两派的一般人员还是可以通过岗哨，进进出出的，还可回到对方区域的自己家里吃饭睡觉，市民群众还可自由通行，岗哨只是盘查重点的可疑人物。

渐渐地，盘查愈来愈严，人们就再也不敢越过“雷池”了。

部队每天都派出赤手空拳的宣传小分队，在两派区域里到处宣传四川《十条和》涪陵《五条》，宣传中央制止武斗的精神。

随着形势的紧张，更多的部队进驻涪陵，也派出更多的小分队到各处去宣传，制止武斗，他们经常受到围攻。发展到后来，

频繁地发生打骂解放军战士，抢夺话筒、文件，撕毁军服、帽徽、领章，甚至反诬解放军打人，扣留指战员，激起部队很大的反感。

在世界屋脊的西藏，文化大革命也在如火如荼的开展。此时，西藏已形成“大联指”和“造总”两大群众组织。“大联指”主要是由自治区党、政机关的造反组织为核心组建而成的，下属组织多为各级党、政部门和企事业单位的群众组织，也有一部分藏族群众组建的组织加入。他们与上层和支左部队的关系密切，活动能量较大，但造反精神略显不足。而“造总”是以汽车运输公司等单位的工人造反组织为核心组建而成的，下属组织多为汽车运输、建筑行业的工人和街道藏族群众组建的群众组织。他们与广大汉、藏工人和基层藏族群众联系较广，有一定威望，普遍认为造反精神强于“大联指”。

对在拉萨涌现出的这两大派，社会各个方面通过对他们在运动中的表现，产生出一些截然不同的看法：有的认为他们一“革”一“保”，“造总”是造反派，而“大联指”是保守派。外地串连到拉萨的红卫兵，也多持此种看法，并由此与支左部队人员常发生争辩与冲突；有的又认为他们是一“革”一“坏”，“大联指”是名符其实的“革命派”，而“造总”则是混进有不少坏人的“不纯组织”，应该进行清理和整顿；两大派之间，则互相揭短，彼此攻击，“造总”指责“大联指”是“典型的保皇派”，而“大联指”则指责“造总”是打着造反旗号的“坏组织”。面对如此众说纷纭的状况，部队介入支左以后，并未能及时站在公正的立场上，正确认识两大派各自的优长和不足，多从团结、联合上做工作，部队的多数，明显地倾向和支持“大联

指”，而对“造总”则进行压制和疏远。由此，也使两大派群众组织对部队的支左工作，产生出有褒有贬的不同态度，“造总”还由此与支左部队之间发生过一些大小磨擦和冲突。

1967 年 6 月 15 日，“首都赴藏革命造反总部”代表陈风仪等人，与西藏军区负责人陈明义、洪流在军区第一招待所进行谈判。陈风仪提出，要重建在“二、三月镇反”中被取缔的“红色广播站”，其理由是对立派“大联指”已有 8 处广播站，而“造总”则一个没有。这个要求得到军区负责人的原则同意。

7 月 7 日，“造总”决定由下属团体“立新战斗队”负责在大昭寺楼顶上建立广播站。该队便于当晚将广播器材运入寺内。“大联指”所辖的“旭东战斗队”表示反对，要求“立新战斗队”立即将器材搬走。双方争执不下，出现斗殴现象，伤数人。

7 月 8 日，西藏军管会就此进行调解，决定：在未达成协议之前，双方的广播站一律撤出去。但双方互不相让，无法取得妥协，调解未能生效，武斗逐渐升级。

7 月 9 日，“大联指”调动“农奴戟红卫兵”等组织几百人，对“造总”红色广播站所在地大昭寺进行包围与袭击。“造总”则一面予以还击；一面向“大联指”设在市交际大楼的广播站调兵遣将，予以武力还击，要夺取交际大楼广播站。双方参加武斗人员近千人，双方动用的武斗器具有石头、砖块、棍棒、大刀、砍刀、梭镖等。据当时的有关材料和此后数日的“造总”有关战报称：当日，拉萨市陷入一片血腥之中。

7 月 9 日下午，军管会通令武斗双方停止武斗，一起撤出大昭寺和交际大楼，该武斗事件才暂告结束。但是，两派仍然争相

在第二招待所内各自占据的楼房屋顶装上高音喇叭，互相指责和漫骂，造成剑拔弩张之势。7 月 14 日下午，两派为争夺大昭寺内的拉萨市人委第二招待所的一栋楼房大动干戈。“造总”成员对抢先占据该大楼的“大联指”成员步步进逼，意在将其驱逐出该楼。而“大联指”派居高临下进行还击。双方以石头、木棒、钢钎等武斗工具开展攻防战斗。

武斗一直持续到 15 日下午，仍相持不下。在双方都无力消灭或战胜对方的条件下，经过军管会的协调，双方进行了“艰苦”的谈判，才宣告结束武斗，脱离“武力接触”。

“大联指”在该武斗事件中伤百余人，其中重伤住院 39 人，4 人当场休克；“造总”伤 180 余人，其中重伤 35 人，2 人生命垂危。拉萨市第二招待所的房屋及设施受到严重破坏。

## 第 722 回：下通知，禁止农民搞武斗　“游泳去”，毛泽东准备南下

6 月后，随着武汉形势的恶化，武汉“新华工”常委、动态组长赵延昌扩大了“新华工”的动态组，下设四个办公室：一办负责全国情报；二办负责武汉情报；三办负责军队情报；综合办负责综合三个办公室的情报呈报“新华工”司令部参考。

“新华工”动态组综合办的监听台监听到 8201 部队指挥“百万雄师”进行武斗的录音。

7 月 10 日，陈再道在驻汉部队师以上干部会议上讲形势和任务时说：“‘三新’‘二司’大方向错了，对他们不能糊里糊涂无原则的支持，如果坚持错误，垮了自己负责。‘百万雄师’是客观存在的，是革命的群众组织，我们支持这个组织。”“以前我们支持他们，现在天天搞我们部队，这算什么鸡巴革命派？”他这里说的“鸡巴革命派”是指“三新”和“二司”。

7 月 10 日左右，“新华工”动态组综合了动态组三办收集到的武汉军区部队的消息和二办收集到的“百万雄师”的情况，结合综合办监听到的电话录音，得出武汉可能发生大规模武斗的判断，由动态组长赵延昌在“新华工”司令部常委会上提出，未引起重视。因为动态组都是由原华中工学院的“红反团”人员组成，他们觉得必须重组“红反团”以应付可能的局面。于是由赵延昌发起，通过动态组向原“红反团”成员发出紧急会议通知，要求所有成员在 7 月 13 日早到华工附属工厂门口集合。

7 月 13 日早晨，原“红反团”成员陆续到来，签到人数 153 人，除在外地人员，在校成员全部到齐。“红反团”工厂头头周继荣提供三辆大卡车，将这些人全部拉到东湖门口。他们下车后分散进入东湖公园，然后到指定地点集合。这就是当时被“红反团”称之为的“713 东湖会议”。

“713 东湖会议”由赵延昌主持并主讲。他首先介绍了收集到的大量的消息，说明“武汉可能发生反革命军事暴乱”。接着他介绍了华中工学院已经做好的准备：首先是在华工的各条道路上均安放了无线控制的地雷；其次在东西两个操场安放了地雷引爆的氧气瓶，全部地雷都由南一楼指挥部进行无线控制。他们是这样预计的：“百万雄师”开始攻打华工时不会使用枪支。一进入华工，遭遇地雷爆炸后将会向两个操场集中，这时再无线引爆地雷和氧气瓶。这样，“百万雄师”残余人马必会退出华工，重新组织新的进攻。

赵延昌提出了事发后的应急策略，他要求所有“红反团”成员在“百万雄师”开始攻打华工时就向南一楼动态组集中，争取在“百万雄师”重新组织新的进攻的空隙时间中全部从南一楼向北边的喻家山转移。当时在南一楼的四个办公室的工作人员配备了几十枝美式卡宾枪。翻过喻家山后，迅速赶到东湖边，这儿将备有船只接应。乘船到汉口后将安排进入事先安排好的“工总”成员家中，和工人一起继续斗争。

会后，他们集体到餐馆就餐，在就餐时发现有不明身份的人跟踪，于是赵延昌通知分散离开，到公园门口的汽车处集中，注意不要被人跟踪。全部人员安全离开回到了华工。

“新华工”动态组监听到的录音被送往北京。

我们再说北京。经中央文革小组建议，7 月 13 日，北京建工学院新、老“八一战斗团”达成四项协议，决定联合取回刘少奇的检查，共同对刘少奇进行大批判。“新八一战斗团”还组织了巡回报告队，到北京各单位去宣传“揪刘”。并派人到上海、天津、西安、长春等地，大办“揪刘”小报，在全国大造舆论。

7 月 13 日，周恩来给毛泽东送审戚本禹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禁止挑动农民进城武斗的通知》稿，《通知》稿的开头有一段话，说到最近一个时期，江西等地“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特别是某些省市地县公社的地方武装部门的坏人，挑动一些不明真相的农民进城参加武斗”。毛泽东审阅时，将文中的“坏人”一词改为“少数思想没有改造好的同志”，并在旁边批道：“不宜称为坏人。”对这份《通知》稿，毛泽东批示：“照办。”当天，周恩来以中发［67］218 号文件批发了《中共中央关于禁止挑动农民进城武斗的通知》，发到各大军区、军分区党委，各级人民武装部，各省、市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各级军管会并转各群众组织，通知称：

最近一个时期，江西、四川、浙江、湖北、湖南、河南、安徽、宁夏、山西等地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特别是某些省市地县公社的地方武装部门少数思想没有改造好的同志，挑动一些不明真象的农民进城参加武斗，围攻厂矿、机关、学校的革命群众组织，有的地区还提出什么“以农村包围城市”等的反动口号，组织他们进城镇压革命造反派。中央认为，这种作法是十分错误的，广大革命群众应该识破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

权派的这一阴谋，同他们进行斗争。

为了保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顺利进行，现在决定：

一、任何人和任何组织都一律不准以任何借口，挑动农民进城武斗，更不能为了武斗，发动农民制造凶器，发给枪杆弹药。

二、不准以任何借口，挑动农民在铁路、公路、水路沿线设置关卡，拦阻车船，破坏交通运输。

三、已经进城参加武斗和破坏交通运输的社员立即返回农村“抓革命、促生产”，所发的武器一律收回。

四、对参加武斗的社员所作的各种所谓“优待”，例如工分补贴等等，一律无效，不准实行。因进城参加武斗而造成的伤亡事故、生产损失、误工补贴，一概由挑动者负责。

五、从《通知》下达之日起，犯有上述错误的人应立即改正错误，立功补过；如坚持错误不改，一再违犯上述各条的人，要严肃处理，其首恶应依法惩办。

这个《通知》应该在生产队向农民群众宣传。

7 月 13 日下午，毛泽东召集林彪、周恩来和在京的中央文革小碰头会的全体成员在人民大会堂 118 室开会。他坐在一个大沙发上，说：

“一年开张；二年看眉目，定下基础；三年收尾。这就叫文化大革命运动。”

接着毛泽东分析了各地的形势和干部的情况，同时对运动中存在的问题如何解决，作了些原则性的部署和指示。他问：

“山西还在乱？” 没等别人回答，他又说：“刘格平和张日清还在闹。要给山西 69 军和陈永贵等打招呼。他要闹就让他去

闹，我毫无办法的，让红卫兵搞，靠群众，我们治不了，我们不要去整他，让红卫兵去治。……”

“现在打死几个人，没有什么了不起，……”他指着林彪说：“你说的：这次运动损失最小，最小，最小，胜利最大，最大，最大。”然后又对到会的军人说：“你们都是中将，不能只看军龄，还要看政治水平。”

“吵两次也可以，你这个老爷吵不得？但没有张日清也不行，要罢刘格平等人的官，不要中央罢，让红卫兵去罢。再闹几个月不要紧。”

毛泽东赞扬西北的形势比较好。他说：“张（达志）、冼（恒汉）、杨几个地方看出来比较好的，张是西北的人。不管哪个地方的人，只要政治路线正确都要用。”

对于南方的混乱局面，毛泽东说：“现在江苏、安徽天下大乱，我看到后很高兴！……只有大乱，才能达到大治。我不赞成一派压一派，还是应该联合。南京越压越火，街上闹得很厉害，现在又出现了第三派，闹得三派那么多人。南京居民反对武斗，反对内战，这很好嘛！徐州也一样，刘邦没有庙，楚霸王到处有庙，所以造反。”他接着问：

“内蒙训练的军队都回去了吗？”

杨成武答：“多数已经回去。”

“军队还是听话的。军队和农民有什么不同呢？农民有工分，军队发津贴，每年吃穿外发 72 元，寄一半回家，哪有这样好的？”

毛泽东对湖南不让“湘江风雷”“六号门”等群众组织成员当民兵想不通，他问：“这是为什么？”并说：

“要 47 军多来几个人到长沙、湘潭、株洲。军长、副军长、副政委多来几个。”

“两派都来人，10 个军区各来 10 个才 100 个。两派群众来后很容易达成初步协议。”

谈到干部，毛泽东说：“胡继宗，华国锋都是好人，军区要收拢这些人吧！武汉的‘百万雄师’不能不要，‘红暴会’讲通了。”

毛泽东这里说的“红暴会”应该是指 2 月中旬在杭州成立的“浙江省红色暴动委员会”，简称“红暴会”，后称“红暴派”。

毛泽东提醒到会人员说：“你们太天真了，你们说外国人不拥护我，中国人也有不拥护我的，北京就有人不拥护我的。罗瑞卿就不拥护我嘛，他反对突出政治。”

他接着说：“彭（德怀）罗（瑞卿）黄（克诚）谭（政）都要拿出来斗，要见报。”

随后，这些人的名字，在中央的报纸上被点名批判了。

对于党的状况，毛泽东指出：

“很多的党员受了驯服工具论的影响，丧失了斗争性。要建党，在斗争中重新建党。现在我们的党还没有烂到这个程度……”

毛泽东分析了各地的形势，然后得出结论似的说：

“现在军队首当其冲，是当局了。”他看到了陈伯达，此时正目不转睛的看着他，似乎是在努力消化他刚才讲的话。于是他指指这位文革组长说：

“陈，书生气，要帮忙。”然后又说：

“7 月了，我要到外面走走。” 他侧望着周恩来那边的杨成

武,继续说：

“成武啊,到湖南、长沙、武汉去看看，游泳去。”

杨成武点了点头，用眼睛瞟了一下周恩来。周恩来明白杨成武的意思。前两天，他就听杨成武讲过，毛泽东几次说：“天下的水只有武汉的好哟!”他知道，毛泽东是想南巡，到武汉游泳，就地解决武汉问题。可现在“天下大乱”,尤其是武汉，情况更为复杂，毛泽东怎么能去呢？……

会场静有片刻，周恩来轻咳一声，说：“主席，长沙、武汉都比较乱,我们已经商定请武汉军区和各派群众组织的代表来京汇报，解决问题。”

林彪也劝道：“武汉的武斗严重，安全没有保障。北京现在事情很多，主席如果一走，只能总理主持工作，有些事情不好定决心哪。”

“是啊，主席这个时候不宜离开北京。”

“安全问题不能不考虑。”

“现在外边很乱，许多地方领导权并不在我们手里，不在无产阶级革命派手中……”

与会者几乎是全体一致地反对毛泽东南巡，七嘴八舌备陈己见。

周恩来又说：“主席想游泳，地方很多嘛。北京有的是好水。密云水库、十三陵水库。怀柔水库、官厅水库都可以游，这些水都不错。”

“我哪里都不去。”毛泽东再将大手一摆，“天下的水只有武汉好。”然后说：

“我不怕乱，三个小时后出发。”并指指杨成武说：“让杨成武跟我去。”

毛泽东这样坚持，谁也不好再说什么了。

周恩来不再劝阻，他轻拍杨成武的手背说：“成武同志，你的任务两个。一个任务，作为主席和我的联络员。传达主席的指示；凡是有我向主席的报告，由你转报主席。”

他转向全体与会者，重新宣布一遍：“杨成武为毛泽东与周恩来的联络员。”

他第二次轻拍杨成武的手背：“第二项任务，保证主席安全。过去你是挂先锋印的，这次任务也不轻。无论陆地、空中、海上、江上，要保证主席的绝对安全。”

“请总理放心。”杨成武答应道。

周恩来还指示飞机和舰艇都要到武汉，“以备主席使用。”

这时，汪东兴说他也要“跟主席去。”

江青说：“汪东兴一起去好。”

毛泽东问：“那你这里的事情怎么办啊？”

汪东兴说：“我可以安排。”

毛泽东说：“那就让戚本禹代理主任吧。”他转向林彪和周恩来，征求他们的意见，林彪、周恩来都表示同意。

考虑到谢富治是公安部长，周恩来又对毛泽东建议说：“主席，让谢富治也到武汉吧，安排一下保卫工作。”

毛泽东说：“可以，让谢富治去武汉，那里是他的老部队。”

武汉地区部分驻军，原为解放战争期间陈赓、谢富治兵团的老班底。陈、谢兵团的 9 纵，1949 年改编为第 15 军，也是中国

人民解放军的第一只空降部队，就驻扎在湖北、河南一带。

会后，周恩来将杨成武和汪东兴叫到怀仁堂西大厅，专门研究毛泽东外出视察的安全问题。他反复交代杨成武："武汉东湖很乱，开会时交待的两条任务，你一定要做好。"

"我已经组织好一套班子，带了电台、密码和保密电话，通讯联络没问题，随时可以和总理联系……中央机要局送来两名译电员，一个是广东人，还有一个是谢静宜，长春机要学校毕业的，江青同志说她不错。" 杨成武向周恩来汇报说。

"安全方面怎样？"周恩来问。

"做了全面准备。天上、地上、水上、飞机、列车、舰艇都已安排好了……调来四架'伊尔 18'，两架'子爵'，两架'伊尔 14'，还调了四架'米 8'直升机飞短途。地上准备了三列火车，前驱、后卫和主车，都反复检查过。水里已经和东海舰队联系好，调一艘护卫舰到武汉，还准备了几艘快艇。警卫部队已经作好一切动员和准备工作，随时可以行动……"杨成武回答。

一名工作人员来报告："主席那边来电话，找杨总长。"

周恩来向杨成武点点头，杨成武随工作人员去接电话。电话是毛泽东的秘书徐业夫打来的：

"杨总长，主席想找郑维山谈谈。"

"谈什么？我通知他。"

"主席想了解华北的情况，不知来不来得及？"

"来得及。我现在就通知郑维山到人大会堂集合，然后一道上火车。"

周恩来又对他的卫士高振普说："主席要去武汉看看，准备

再去长江游泳，会上决定让我先去一趟，你们也准备一下。”

随后，周恩来用电话通知陈再道：“武汉各派群众组织的代表，可以不到北京来了，我们要到武汉去，在武汉解决问题。”并特别嘱咐：“主席可能要在武汉游泳，你们要做好准备。”

接着，周恩来又打电话到重庆找谢富治。此时，中央代表谢富治、王力、余立金及贵州省革委会主任李再含，在四川省革筹组组长张国华、副组长刘结挺陪同下，刚刚到达重庆，周恩来的电话就追来了，要谢富治第二天赶到武汉，执行紧急任务。谢富治请示周恩来：王力、余立金和随行的红卫兵是否一起去？周恩来说：“一起过来吧。”

当谢富治把中央的决定告诉王力时，王力一怔，说：“我们西南的任务还没完成呀，为什么改变计划？”

谢富治回答：“不清楚。我们马上赶去执行任务就是了，不要再多问了。”

王力让随行的中央文革工作人员张根成给中央文革打个电话问问情况，关锋接的电话。他对张根成说：“去了就知道了，电话里不能说，听总理安排，没有讨价还价余地。”

这时，北航“红旗”的井岗山突然说：“快 7 月 16 号了，毛主席是不是要去武汉游泳？去年就是 7 月 16 号去的。”

众人恍然大悟，都夸井岗山聪明。

谢富治、王力、余立金利用下午和晚上时间，抓紧处理完重庆的事务，准备第二天奔赴武汉。

就在谢富治、王力他们抵达重庆的当天，重庆“砸派”军工的“井冈山望江东方红公社”和重庆“井冈山红卫兵”总部合办

的《井冈山》报这天发表长篇专论：《人民战争救山城》。文中以江青 6 月 3 日讲话提出的“对自卫的武斗不能反对”为依据，提出“我们必须拿起武器来，给予打人杀人的凶手以沉重的反击！”“用革命的武装力量和强大的政治攻势来制止武斗！”号召打一场“千千万万革命人民粉碎李任死党反革命围剿的自卫反击的人民战争”。

这篇文章是重庆市作家协会副主席、重庆市书评家协会会长、四川外语学院教授林亚光执笔而成。林亚光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曾被打成“漏网右派”、“反动学术权威”，受到批斗。后来在造反派的帮助下得到解放,参与组织成立四川外语学院“826 战斗团”，属“815”派。1967 年 1 月夺权后，四川外语学院“826 战斗团”与“815”派观点发生分歧。1967 年 4 月，四川外语学院“826 战斗团”加入到“砸派”行列。重庆“井冈山红卫兵”总部成立后，林亚光是主要成员之一，也《井冈山》报编辑。他的这篇文章被 54 军斥为“大毒草”，影响很大。

因重钢“反倒底”派拦截了建院“818”运送《八一八战报》的三轮车，7 月 13 日，“815”派攻打砸派占据的重钢公司文化室据点，两派武斗持续 16 小时，动用了消防车，近万人围观。伤数十人，“砸派”死 2 人。

## 第 723 回：周恩来，成立军委看守组　第二次，接见山西省代表

7 月 13 日晚，周恩来主持中央文革碰头会议。他在这个会议上宣布："经毛主席批准，由吴法宪、邱会作和张秀川三人组成中央军委临时看守小组，由吴法宪任组长。临时看守小组的任务是，接受中央文革碰头会议交代的任务，负责处理军委的日常工作。"

深夜，吴法宪打电话给邱会作说："总理让我通知你，经主席批准，成立一个军委看守小组，有你一个，要做好准备。"

邱会作问："谁牵头？还有谁呀？"

吴法宪说："让我牵头，可能因为杨代总长不在吧。还有张秀川同志。"

从此以后，吴法宪代表中央军委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议。凡是会议上通过的有关军队问题的决定，或者是毛泽东、林彪、周恩来对军队有什么指示，就由三人看守小组来传达和办理。看守小组的办公地点在京西宾馆，下面的具体工作机构是中央军委办公厅。这些都是杨成武临走之前安排的。

就在周恩来紧张布置毛泽东南下诸事之时，7月13日晚21时至次日凌晨3时，康生代表中央解决山西问题的扩大会议在人民大会堂安徽厅按计划继续召开。

康生首先说："北京列席的同志要求讲话。你们有讲话的机会，还是先让山西的同志讲，你们不是今天讲。下来关锋同志会介绍一下山西问题的解决情况。山西的问题中央解决过两次，'红

总站’的同志不知道，‘红联站’的同志也不知道，北京的同志更不知道。两次中央会议的情况都还没有传达下去。现在‘红联站’的同志先发言。”

“红联站”代表段立生站起来说：“现在轮到我们发言，我们不发言，让给北京邢晓光同志发言”。

关锋：“不是你让他发言，而是我们安排发言的。”

康生：“邢晓光的材料我们接到不少，他以后有机会发言。”

关峰：“不要说你们让他发言，是我们安排发言的。这个会不是今天就结束了，还要继续开，大家都有机会发言。”

接着，“太工红旗”杨保明发言。当他提中共山西核心小组向中央文革的汇报时，关峰问：“哪个汇报？中央文革没有收到这个汇报呀？”

“红联站”一代表说：“2月18日那个汇报。”

关峰问：“谁汇报的？”

“红联站”代表：“刘贯一同志代表核心小组向中央文革的汇报。”

康生：“噢，你是讲的刘贯一的汇报？那是在大军区会议上刘贯一介绍山西文化大革命夺权的经验，是他的个人的汇报。这是胡说八道，我连听也没有听完就走了。”

关峰：“实在听不下去了！”

康生：“是呀，我和关锋同志听不下去就走了。会议上，刘格平同志讲话很少。张日清的讲话登在《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上了。刘贯一的汇报还印成了小册子。不仅是我们，各大军区的同志也很不理解，对刘贯一的讲话很不满意，如吴法宪同志。

那次不是中央文革的会议，是大军区扩大会议，是军委召开的。刘贯一不是汇报工作，是介绍经验。”

当杨保明谈到“红总站”和“兵团”说党校“东方红”的后台是党校副校长葛莱时，关峰问：“党校‘东方红’的同志在场吗？”

段立生答道：“在。”

关峰表态：“党校‘东方红’的同志，你们结合了葛莱是不是？你们结合葛莱不够慎重。”

康生解释说：“他有个‘一分为三’嘛，‘一分为三’是什么问题？”

段立生：“我们知道，已经注意这个问题。”

关峰：“你们注意就好啰，但是你们不够慎重。1964年批判杨献珍的‘合二而一’时，他提出了‘一分为三’，这是反毛泽东思想的，反对主席的‘一分为二’，这是个大问题呀！”

段立生：“这篇文章我们知道。我们正在调查。”

康生：“没有比这个更大的问题了！这是反毛泽东思想的问题，党校同志要注意这个问题。”

关峰：“这和杨献珍是一样的。在批判杨献珍时，他否认事物斗争的同一性。毛主席领导下的革命派和杨献珍的斗争是长期的。当时，刘少奇、彭真包庇杨献珍，支持杨献珍。64年，批判杨献珍的‘合二而一’，这是一场很大的斗争。党校东方红的同志结合葛莱不够慎重，要注意这个问题。”

康生：“关锋同志说了，我就不多说了。关于党校问题，刘少奇、彭真、安子文、杨献珍、侯维煜、王从吾、林枫、刘仁等

人操纵的高级党校是个什么组织？那是个长期的、有系统的反毛泽东思想的顽固堡垒，这个反动堡垒，在各省的党校都有他们的直接的帮凶，直接的爪牙。包括58年刘志兰搞的那个北京市委党校在内。这是从48年以来，刘少奇一手抓的反毛泽东思想的顽固堡垒。他的这个堡垒在全国都有影响，在外地的中级党校都有他的爪牙，北京、西北、太原、新疆的党校，又是这个党校系统的反毛泽东思想的中坚。”

“山西批判刘邓不要空洞，要具体地搞。你们在这方面还要做很多工作。你们党校结合了葛莱，说明你们这方面工作做得很不够。但是不要紧，今后继续斗争嘛！党校的斗争不是文化革命才开始，已经斗争了十几年了。”

段立生：“我一定把首长的指示带回去……”

杨保明继续发言，当他念一个材料时，康生：“你不要念材料了，把那个材料给我们好不好？现在已经11点了，已经讲了快两个钟头了，简单一点好不好？”

杨保明：“再讲3分钟。‘红总站’大肆吹捧刘格平，说山西要树立刘格平同志的绝对权威……”

康生：“你说得简单点好不好？你说的两边都有。你们在北京就贴出大标语，向‘张日清同志学习，向张日清同志致敬’，还贴出‘山西告急’的大字报。我看不一定在北京搞。如果要算这些账就没完了。”

杨保明结束了他的发言，“红总站”郝庭云接着发言。他首先举几个例子说明“红联站”杨保明是在造谣，接着批判张日清。当郝庭云谈到刘卿瑞因为揭发张日清在去年12月安了与卫恒的

秘密直通电话，被张日清排挤到高平县时，康生问：“刘卿瑞是什么人？”

郝庭云：“是山西军区副参谋长。”

康生：“来了没有？”

郝庭云：“山西军区不让来。”

康生:“有人递来一个条子说关于发给中央的电报问题的事，他想发言。这个同志叫任远明，来了吗？”

任远明：“来啦！”

康生：“我看了那个电报非常吃惊，因任远明知道情况，所以把他叫来参加会议。那个6月28号以中共山西核心小组办公室的名义打给中央的电报，恶毒地攻击刘格平同志，也就是向中央控告刘格平同志。电报是由刘贯一、刘志兰、陈守中3人同意向中央发的，从电报内容看，他们是采取一种特务的手法，去观察刘格平同志。我们看了这样的电报非常惊异！怎么核心小组办公室会发出这样的电报？因此我们把任远明同志叫来，他参加过几次军区、核心组的中心会议，现在请他讲话。”

任远明：“我是团省委‘大无畏’的，观点倾向‘红联站’。”接着他谈了许多事情，说明刘贯一是埋在核心小组的定时炸弹，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康生：“有不同意见可以讨论，但有人采取卑鄙龌龊的特务手段来搞，而且毫不知羞耻地用堂堂皇皇的电报形式发到中央。山西文化革命中就是有很多不正常的现象。这个电报是很反动的，实在恶毒！不但反刘格平，而且是反中央的，说‘刘格平有什么贡献呢？只不过是跑了两次中央罢了！’好象是中央暗示他

夺权，把矛头对准中央。上抗中央，下压群众，说‘红总站不是刘格平给打气，早就垮了！打气也不行，打一次，小一次。’这是什么话！说刘格平是反夺权，比卫恒还厉害。还诬蔑说刘格平曾给康生写了个报告。写了个报告又怎么样？谁有问题也可向中央汇报么！写个报告给康生是反革命不是？写个报告的权利也没有？这么肮脏的东西，还以核心小组办公室的名义签发。这样大的问题核心小组讨论过吗？”

康生又说：“这个电报陈守中没有看，刘志兰替他划了圈！那说明他们是一起的罗！”

任远明：“我一定要把刘贯一的问题揭出来，一定要拥护刘格平同志，我要悔过自新。”

康生：“你也好好检讨一下，阶级斗争很复杂，不要受蒙蔽了。”

“红联站”代表马上表示：“他不是‘红联站’的。”

康生：“‘红联站’的同志，你们不要背包袱。‘红总站’同志也不要拿这个攻击‘红联站’，这样做是不对的。‘红总站’是支持他（指任远明）的革命行动，这个与‘红联站’无关。‘红联站’中有的同志受蒙蔽，但‘红联站’还是革命组织，我相信你们，中国出了刘少奇等一小撮修正主义分子，中国和中国共产党还是好的么。”

接着是杨成效发言。他谈到王庆英被折磨得神经失常，谈到兰敏肆意歪曲他的历史，说他出身大官僚家庭时，康生问：“这一点，我想问一问兰敏，你说的对杨成效同志的材料，你调查的十分清楚，而且有证据，说他出身于什么反动官僚家庭，但你晓

得不晓得杨成效是个极端贫苦的雇农的孩子，后来卖给人家的？你调查了吗？”

兰敏：“不，他是监狱里一个女犯人生的。”

康生：“你是专政委员会么，你对他的悲惨遭遇，你不调查，你反而把他说成是反动官僚家庭出身的，这是不公平的！他不是现在父亲的儿子，而是贫苦人的儿子，不管这个人好不好，你不公平么！你调查不能片面，应该两面都调查么。你说你调查的很清楚，你为什么不报告中央？你是个法官么！你作保卫工作，能这样做吗？这个专政机关在你手里，大家对你当然不放心了。随你个人的意志来判案子，那能这样子呢！”“你向我们反映情况，只反映一面，没有说杨成效同志有很悲惨的遭遇，反而说是反动官僚家庭，住过两年我们的监狱，你的材料可靠吗？”

兰敏：“是住过，少年所的班子。”

康生：“你的党性保证的材料可靠不可靠呢？”

兰敏：“我是否把材料拿来给首长看一看？”

陈永贵生气地说：“叫你说么，为什么拿材料！”

康生、关峰：“陈永贵同志也说话了。”

兰敏：“我可以汇报。”

陈永贵十分激动得说：“你有材料全可汇报，晋中问题的报告你全拿出来！你全拿出来！”

关峰：“你不是拿党性保证了么！那好了，你要保证！第一，材料你要全部保存，不许销毁。第二，山西的犯人是活档案，少了一个你要完全负责！自杀也好，被杀也好，死一个，就是你有意灭口！”

康生："还有被抓的要保证安全！"

关峰："对！不管有人上吊跳河，这些都是活材料，活档案，你都要全部负责，一个不能少！"

兰敏："他们都在监狱。"

关峰："不管在那里，你都得负责！不管人在那里，少了一个你全部负责！"

"红联站"代表说："现在专政委员会被封了，不能工作了。"

康生："那是另一回事。以后不许专委的人上班工作了！过去要你们取消不取消，4月份中央就对张日清讲了，你们不取消么！现在再重复一次：专政委员会不能要！有人要学山西，我们说山西专政委员会是错误的，你们为什么要学呢？"

关峰："要告诉你们，这不是康老的即席发言，这是经过中央讨论的，专政委员会不能要。"

康生："四月会议关锋同志就讲了，根据中央决定，取消这个专政委员会，专政委员会是错误的，但是你们就是不传达，回去还是照样做。"

接着，"红联站"观点的段建忠发言，他主要谈的是袁振的问题。他谈到"兵团"有份传单：《康生论袁振》，兵问"康老有无此事"？康生说：

"这个问题我讲几句。前几天在核心小组的会议上也谈过这个问题。在刘贯一、刘志兰所掌握的斗批改动态报上，说袁振是叛徒。我们认为袁振同志在华北局会议上的问题，不能说是叛徒。"

关锋说："当卫、王、王把袁振同志打成'野心家'、'伸手

派’后不久，我们就去调查了解这个情况。去年 8 月，我就从华北局把袁振同志的档案调来看了，当时，我还不认识袁振同志。《八年总结》、《反对折中主义十二条》，我都看过了。袁振同志在华北局会议上的问题，我们在去年就表了态，不能说是叛徒。当然他没顶住，是个缺点，是个错误。”

康生：“华北局会议上有压力，袁振同志没有顶住，这是错误的。在华北局会议上他给省委提的六条意见是对的。在文化大革命中，有这样的同志站出来反对卫恒是好的。这次会议上打击袁振同志是不对的。袁振同志是受害者，不能说是叛徒，没有顶住是个错误。刘贯一、刘志兰领导斗批改小组，它的动态报上说袁振同志是叛徒。文字的东西这样说很不好。‘叛徒’这两个字要注意，不要轻易用，这不是一般的意识形态问题，不是‘无政府主义’、‘冒险主义’等等，这是枪毙一个人的政治生命问题。这一点刘贯一完全懂得，上次会议上也完全说了。”

当段建忠说袁振是“拿中央首长讲话压群众”时，康生说：

“那是另外的问题了。我是讲叛徒这两字，革命小将不要随便用，这不是意识形态问题，是政治生命问题。彭真的问题，搞了一年多才搞清楚。一开始，我们认为他可能是叛徒，但还没有足够的证据，只是从履历表上怀疑。后来我们调查了这个问题。一个月以前，他自己供认了，说他被捕后，不仅自己叛变了，而且还带着特务去抓革命同志，还向敌人下跪，这是革命的叛徒。这样，证据确实了，我们才给他下了三反分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叛变投敌的大叛徒。这样讲了你们就清楚了，这不是‘保守’、‘打砸抢’等等，不是这样的问题。轻易在斗批改动态刊物

上用这两个字就不好了。天津‘818’、北航组织了抓叛徒的组织，得到我们的同意。我们也告诉他们，要调查材料，没有确实证据时，就不要在大街上公布。这样一公布，就有利于真正的叛徒。不要以为一调查到材料就有了政治资本，就公布材料想压倒对方。但真正的叛徒就会叫老婆孩子到街上看，他们就会想办法对付我们。”

关锋：“这样做政治影响也不好，材料一出来，就泄密了。”

康生：“你们也可以作这样的调查工作，你们调查到材料就交给我们，我们去研究，证据确实了才公布。我们跟天津‘818’和北航的同志谈过这个问题。关于这个问题，中央有个指示，你们看过了没有？”

关锋：“是《关于抓叛徒问题的通知》。”

康生：“关于叛徒的问题，是个很严肃的问题，有关一个人的政治生命问题。一方面我们不要麻痹大意，丧失警惕；另一方面也不要捕风捉影，草木皆兵。这就好象是刀尖上跳舞一样，稍一忽疏就会伤人的。革命小将在这方面做了很多工作，他们也到山西去调查太原陆军监狱的问题。这个问题牵连很广，案子很大。”

关锋：“死档案不能少，活档案也不能少！”

康生：“叛徒问题涉及到好几个监狱。实际上是刘少奇指示叛徒写反共启事出狱，安子文、薄一波就是根据刘少奇的指示出狱的。薄一波又根据刘少奇的指示，让太原陆军监狱的叛徒出狱，这里关系到乔明甫、龚子荣、王若飞等人。这件事希望你们革命组织也关心关心。这方面的材料收集得还不完备，这个案子还不

宣布，从敌伪档案查也比较难查，所有阎锡山的活档案，兰敏要好好保护！”

兰敏：“专政委员会已经给封了。”

关锋：“监狱可以保护起来嘛。告诉你们，山西的档案已经被烧了一大批。现有这些活反革命，活档案非常宝贵。”

康生：“我们自己警惕性不高，我们知道彭真、安子文是有计划地抓这个东西，烧了有关他们的东西，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吃了亏的。49 年，安子文一进城就搞这个东西。这个我们警惕性不高，他们注意了，安子文派人到全国各地，到太原、南京、上海、苏州、天津、北京、西安等地去调来档案销毁。太原陆军监狱的档案我们弄不到，就是安子文 49 年派人到太原销毁了的。”

说到“二月兵变”的话题时，康生说：“接到一个条子，问‘二月兵变’是怎么回事，上次在正式会议说过，这是没有的事，我简单地说说这个事：

去年二月，有两个团要驻人大和北大，并看了房子，这件事中央军委也知道，以后没有去住。因是学校，又有许多女同学，不太方便，生活不一样，当时可能是去军训的。倒是经过彭真批准的，后来到了五、六月，彭真的问题被揭露，因为彭真曾要做北京军区政委，当然他是要篡党，篡政，篡军了。北大同学提出这样的问题。贴过大字报，师大抄了这张大字报。当时是刘邓的白色恐怖，孙友渔工作组看了这张大字报，就利用这张大字报整造反派，在大会上说谭厚兰是挑动学生反对解放军。并制造流血事情，煽动一部分群众围攻，打了谭厚兰，实际上是孙友渔挑动群众斗群众，听到这个事情，我到师大支持谭厚兰，反对孙友渔

工作组，因为他们是少数嘛。我说：‘人家是反彭真嘛！为什么不可怀疑一下呢？这件事有的不是造谣，郭影秋你知道么！’这样一说，谭厚兰一派就贴大字报，说郭影秋是什么人，后来，人大揪郭影秋、邓小平、陶铸到人大，陶铸讲没有这个事情，实际上‘二月兵变’是邓小平提出说‘二月那有个兵变呀！’后来邓小平，陶铸揪出来后，群众引起了警惕，联系起北大陆平，北大有一部分学生在南口实行过军训，陆平又在那个地方打过游击，一连起来就传遍全国了，当然这个事情和张日清，山西军区无关，总之，没有这个东西，同志们不要再提，当然同学们警惕性很高，这是好的。”

段建忠发言后，康生说：“会议快开到3点了，通过今天会议，我有个建议，同志们发言事先计划一下，要讲主要的，时间有限，讲话要集中一下，首先讲当前山西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问题，讲今后怎么办，要向前看提出具体意见，关于历史问题可少讲或给我们送材料，就恐怕同志们没准备，关键问题讲不出来，希同志注意，顶多用10分钟、20分钟，把自己的观点讲清楚。

第二，要从大方向方面讲，从毛主席革命路线，从大问题上考虑发言，希望同志们，把自己的思想提高一些。

第三，我觉得昨天段立生同志有一句话，半句还是对的，记得他讲，山西文化大革命问题，群众问题好解决，关键是要解决核心小组的问题。当然，他说的核心小组问题是另一回事了，我只是欣赏他的关键问题在核心小组这个讲话，从两条路线的斗争大的方面讲，可以节约时间。现在散会。”

## 第 724 回：专列动，听河北情况汇报　打前站，周恩来先飞武汉

就在康生结束接见山西代表团之时，7 月 14 日凌晨 3 时，毛泽东的专列正徐徐驶离北京站，开始了他视察大江南北之行。

就在康生 13 日晚接见山西代表团开始后的两个小时，即 7 月 13 日晚 23 时 20 分，所有随毛泽东赴武汉人员就都赶到人民大会堂了。他们在这里吃了夜餐，准备出发，结果因为专列上也有派性，需要临时进行调整，结果出发时间推迟了几个小时。

过去毛泽东外出，他总嫌人多，每次都有极严格的限制，但这次，汪东兴特别提出多去一些人。

专列一出北京就不顺，火车上的空调坏了，车厢里热的要命。

毛泽东让秘书去叫北京军区司令员郑维山过来。郑维山立即从他的车厢来到毛泽东的车厢，在门口向毛泽东立正敬礼报告："主席！"

"噢。"毛泽东从沉思中缓过神来，将燃了很长一截烟灰的香烟朝烟缸里弹弹，向沙发缓缓一指，微笑着对郑维山和杨成武他们说："你们坐一坐，先吹一吹。"然后对郑维山说："叫你上车来谈谈华北。是不是天下大乱？"毛泽东望着这位北京军区司令员不再做声。

郑维山开始向毛泽东汇报河北省的情况。

当时河北省的省会在保定。自 1967 年 2 月 16 日，原保定驻军 69 军奉命移防山西大同后，38 军进驻保定，并于 2 月 24 日奉命与河北省军区一起担负保定地区的支左任务，先后对保定市

公安局、《河北日报》、邮局、各企事业单位进行军管，对学校继续进行军训，保定市的形势一度趋于平稳。

4 月 12 日，保定市一中 200 多名学生高举“造反有理”大旗再次冲向社会，趋于平静的保定又乱了起来。

接着，以“八一总部”平反与否为导火线，保定造反派组织重新洗牌，组合成“工总派”和“工筹派”两大派。“工筹派”得到省军区的支持，受省军区排斥的较为激进的“工总派”，主动对新来乍到的 38 军示好，寻求支持。38 军与河北委原领导无任何牵连，在感情上亦倾向于“工总派”，与“工总派”一拍即合，公开表态支持“工总派”。

38 军与河北省军区，当时称为保定“两军”，在支持谁的问题上各持己见，渐行渐远，裂痕加深，终致水火不相容。与河北省军区荣辱与共的北京军区，对 38 军颇有微词。保定两派也各恃有军队方面支持，冲突四起，磨擦增多，武斗不断发生。

5 月 26 日，保定市各行业 5 万多人，在市体育场举行“紧紧掌握斗争大方向，立即制止武斗群众大会”，河北省军区政委曾美、38 军副政委邢泽在会上讲话，要求各派造反组织立即制止武斗。

6 月 4 日，保定市群众组织拿着棍棒示威游行，在游行时发生武斗。

6 月 13 日，38 军和省军区在保定市派出部队执勤，维护社会秩序。

6 月 22 日至 23 日，河北农业大学农机楼发生大型武斗，省军区和 38 军都派人到现场制止武斗，维护秩序，但由于意见难

达成一致，双方死伤数人。其中打死 7 人，近 300 人受伤。

郑维山向毛泽东汇报了河北省的情况，他说："河北之所以至今没有形成大联合，主要是由于保定两派对立严重，联合不起来，拖住了河北。整个河北省除了保定，大多数地区都建立了革委会。但保定成为难中之难，我们的工作还不到家。"

毛泽东饶有兴趣地听着，他一边和蔼地望着郑维山，一边吸着烟。

"两派对立严重，都说自己是革命左派，都千方百计地削弱对方、吃掉对方，而现在的驻军和省军区各支一派，也都固执地认为自己支持的是革命左派，两派对垒，两军对立，都认为自己代表正确路线，势不两立，矛盾尖锐，争斗不止……"郑维山继续说着。

"哦？"毛泽东把往嘴边送来的香烟停在半空中，用眼神鼓励郑维山接着说下去。

郑维山说："解决保定问题实际上是解决驻军同河北省军区的关系问题。对于这个问题我们花费大量精力去解决，前后跑了多次保定，但是工作怎么也做不通。我们正苦于无计。"

"前不久，总理想了个办法，对河北实行军管，准备工作就绪，布告都印好了。但两军两派尖锐对立的问题不解决，恐怕军管也难奏效。"

毛泽东吐一口香烟，用手指了指自己的脑袋，说："就没有办法让两派联合起来？"

郑维山接着说："从今年二、三月间，我亲自去保定，同驻军和河北省军区的领导同志谈话、开会，还是谈不到一起……"

杨成武说："原来 69 军与河北省军区观点一致，38 军到保定接替 69 军后观点不一致了，闹起矛盾。"

毛泽东说："你是总长，你给两边做做工作。"

杨成武说："我找了河北省军区和 38 军的领导在京西宾馆开一次会，我说你们不要不一致。你们 38 军是 115 师的老底子，河北省军区也是 115 师的老底子，不要闹矛盾。我批评河北军区，说 38 军从东北来，你们有责任帮助 38 军了解情况。我请他们一起吃了饭，可他们回去观点还是不一致，还是闹。"

"解放军还是好的，总的来说是统一的。"毛泽东说："坐在一起开会好。河北省各县、地干部要搞集训；武的要训练，文的、党政群干部也要集训，红卫兵小将的头头也要集训。全国的县人武部和军分区的干部都要集中到北京轮流训练。小省来二、三百人，中省来四、五百人，大省来八、九百、千把人。训练时间不一定太长，每一次训练至多两个月，两个月一期。到北京集训，各大军区也集训，各省市也集训。"毛泽东边思考边说，边说边补充完善，"到北京训练以前和训练以后，各省市、各大区都可以办训练班。一个是北京训练不了这么多，各省市、各大区可以分工办。还有一种，在北京训练完了以后，再加以训练，以巩固思想。"

"河北要在军管前，大县来三四个人，小县来两三个人，开个会，交代政策。有错误就改，没有什么了不得。有错误主要是我负责。谁叫我 1 月 21 日发个指示，要解放军介入，要支左？那个时候党政都不行了，只有解放军出来担负这个任务。"

"军队介入后，因为情况不熟悉，调查研究不够，错误是难

免的。来了个《八条》，抓人抓多了，有些革命组织不应取缔的取缔了，起了压的作用。这样，林彪同志起草了《十条》。《十条》后，受压的又起来了，又恢复了，来了个反复。后来，又来了个《六六通令》。《六六通令》下来后，有的不听。”

“反复好，我看湖南，江西九江、南昌、庐山、赣州经过大武斗，形势大好，阵线也分明了。华北、东北、北京、上海比较平静，江西、湖南、湖北、河南比较乱，安徽也比较乱，还有山西。现在黑龙江还在乱。甘肃提出打倒张、冼、杨，解放大西北。我看张、冼两个人还好嘛，态度比较正确。不犯错误是不可能的。改正了错误，工作就更好了。”

毛泽东这里提到的”张、冼、杨”是指兰州军区司令员张达志、兰州军区政委冼恒汉、兰州军区副司令员杨嘉瑞。

毛泽东接着说：“我看解放军垮不了。垮了，还依靠什么？”

他似乎在征询意见，问道：“河北这么乱，没有领导干部站出来维持局面？”

郑维山回答说：“河北省的县、地、省的领导干部还是没什么人站出来的，在斗林铁时，打倒了一批，以后斗刘子厚又打倒了一批，打击面宽了，现在有些干部也不敢站出来。”

毛泽东说：“干部多数是好的，河北的干部将来要来个大翻案。我过去支持刘子厚。刘子厚站出来了，阎达开就好办了嘛！”

郑维山说：“群众反映他们有错误……”

毛泽东：“哦！那就要检讨喽！”

谈话间，列车缓缓进入石家庄站。

“主席，天快亮了，”杨成武建议，“您休息休息吧？”

“郑维山要在石家庄下车？”毛泽东向窗外望着石家庄，建筑物上贴满了完全对立的大标语：

“打倒闫同茂！”

“闫同茂是个好同志！”

闫同茂时任65军军长。

汪东兴弯下腰，轻声建议：“今天先谈到这儿，主席先休息吧！”

“好。我休息，你们也休息，明天再谈。”

毛泽东边说边用手撑住沙发扶手站起来，说：“如果没谈完，可以把郑维山带上，到武汉还可以继续谈。就这样吧。”他起身向卧室走去。

毛泽东曾谈过自己的体会：想不出办法，那就睡觉，睡起来再想，想不出来再睡，直到想出办法来。此时他毫无倦意，既没服安眠药，也没有睡，只是想躺躺，躺倒才能想出站立不倒的办法。

火车进入河南境内，毛泽东起来，再次召郑维山。

“我们要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他对郑维山说：“要采取教育的方针，不能不教而诛，当然也不是教而诛。”

想了想，他进一步明确道：“相信大多数干部和群众，这是最基本的一条。”

毛泽东问：“河南有个‘二七公社’，知道吧？”

郑维山和杨成武点点头。

毛泽东继续说：“一个工厂都是工人阶级，它本身没有阶级利益的根本矛盾、根本冲突，为什么要分成两派？我想不能。这是人为的……一个是走资派操纵，继续搞挑拨离间，煽风点火，混

水里好摸鱼。一个是少数坏人，即地富反坏、特务、反革命分子，钻进了革命群众组织里进行操纵、破坏。再一个情况是群众组织内部小资产阶级的思潮，怀疑一切、无政府主义、山头主义、小团体主义、宗派主义思潮的影响……”

古城郑州渐渐呈现在车窗外。大标语刷进了车站：

“大局已定，二七公社必胜！”

“二七公社必定灭亡。”

“你看，有二七公社！”毛泽东手指窗外的标语，眼里闪烁出一种孩子般活跃的目光，“二七公社就是好！”他脱口而出。这句随口而出的话后来被印了出来。

毛泽东吸着烟，看着大标语继续说：“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利害冲突，为什么不能联合起来呢？”

“你记。”毛泽东吩咐杨成武，看着他将记录纸翻到新一页，便一字一板地发出“最高指示”：

“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一个工厂，分成两派，主要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为了保自己，蒙蔽群众，挑动群众斗群众。群众组织里头，混进了坏人，这是极少数。有些群众组织受无政府主义的影响，也是一个原因。有些人当了保守派，犯了错误，是认识问题。有人说是立场问题，立场问题也可以变的嘛。站队站错了，站过来就是了。极少数人的立场是难变的，大多数人是可以变的。革命的红卫兵和革命的学生组织要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只要两派都是革命的群众组织，就要在革命的原则下实现革命的大联合。两派要互

相少讲别人的缺点、错误，别人的缺点、错误，让人家自己讲，各自多做自我批评，求大同，存小异。这样才有利于革命的大联合。”

在毛泽东的专列离开北京前，周恩来为了给他安排行程和住处，已于 7 月 14 日凌晨 2 时左右，坐空军的飞机，先于毛泽东飞往武汉。随机前往的还有海军政委李作鹏和海、空军的作战部部长。行前，周恩来致信国务院的几位副总理李富春、李先念、陈毅：

“我有任务离京两三日，大事请报中央文革，一般业务请你们商决。”

14 日凌晨，吴法宪用电话通知武汉空军副司令员刘丰：“有一架一级专机要在武汉机场降落，你要亲自做好迎接专机的工作。”

“吴司令，是哪位首长？”刘丰问。

“别问了，到时你就知道。”吴法宪说。

武汉空军司令员是傅传怍。文革开始后，有人说他“是贺龙的人”，过不了关，所以武汉空军的工作此时由副司令刘丰和政委萧前负责。刘丰放下电话，向武汉空军萧前政委通报了吴法宪的电话通知，布置了安全保卫工作后，便和萧前一起匆匆赶往机场。

4 时左右，东方已露出一片鱼肚白，一架伊尔—18 飞机在机场降落。机舱门一打开，周恩来走了出来舱。萧前、刘丰连忙来到舷梯前迎接。周恩来与他们握手后问：

“武汉军区怎么没有人来？”

刘丰不清楚，不知如何回答，周恩来没有再问，对刘丰说："你立即把陈再道、钟汉华同志找来。"便乘车随刘丰他们来到武汉空军司令部。此时天已大亮，营区的官兵还没起床。

武汉是个出名的火炉，虽说是早晨，几个人往会议室里一坐，几分钟后都已是汗流浃背。

周恩来向刘丰询问了武汉各派的情况，以及武汉的社会治安现状。

警卫见周恩来热得满头大汗，就向刘丰建议减少参加会议的人员，使房间空气流通一点。这时，工作人员送来了早点。

陈再道事先不知道周恩来等人要来武汉，看到由空军先行接了周恩来，心里十分纳闷，很不高兴。他和钟汉华赶到武空时，周恩来正在用早餐。他见陈再道、钟汉华他们进来，便站起身来，吩咐接待人员拿来餐具，让陈再道、钟汉华一起用餐。

"东湖那边怎么样?"周恩来边吃边问。

"东湖宾馆现在乱得很!服务人员分成两派，把房子搞得不像样子了。"陈再道带着情绪回答说。

周恩来从容大度地点了点头，像拉家常话一样说道："把它打扫出来。"

周恩来只吃了一个用盐水煮的鸡蛋，然后让陈再道和钟汉华先吃饭，自己和刘丰等人先去了东湖宾馆。

东湖是武昌市东面著名的风景区，碧波万顷，湖光荡漾，垂柳婆娑；大湖之外连小湖，小湖左右又连湖，远眺九女墩，湖光阁、磨山彼此相望，互为映衬；湖面静静映照着绿荫簇拥的是毛泽东居住过的"白云黄鹤"地方，乳白色的平房隐现在水杉马尾

松、棕榈广玉兰、桃梅竹丛中。东岸丛林飞翠，北岸荻芦含碧，湖西亭台楼阁，那是湖北省委、省政府的一片红砖灰粉建筑，以及党政军领导居住的茶港小区；湖南岸是珞珈山，武汉大学所在，山峦吐秀，珞珈、桂子，绿染岗峦起伏，金黄琉璃点翠，为参差不齐的高校房舍。

1961 年，周恩来曾和刘少奇、邓小平同住在宾馆的百花一号楼里，世事沧桑，如今另两位已经被打倒了。当周恩来来到这里，本是丛林飞翠、风景秀丽的的优雅胜地，看到的却是一片狼藉，脏乱不堪。繁茂的树木枝叶因没人修剪而疯长，庭院里杂草丛生，树叶和垃圾满地。走进房间，只见家具陈设东倒西歪，一股霉味扑面而来。工作人员或三三两两扎堆聊天，或臂上戴着红袖章在院子里闲逛。

室内闷热得厉害，清晨八、九点钟,室温已达 30 多摄氏度。

“房里的这些空调机能不能用？”周恩来问。

“空调机都可以用。”陪同的宾馆负责人答，“由于电厂的工人和我们不是一派的,说是电路故障,不给宾馆送电,空调机都不能转。”

周恩来一边察看,一边点着头。预计毛泽东是晚上 21 点多钟到，如果房内温度太高，就不能住这里，只能住在火车上。周恩来对驻军负责人说：

“你派人去电厂，了解一下停电的原因，告诉电厂，就说是我在武汉，请他们尽快排除故障，恢复向这个地区供电。”

陈再道、钟汉华吃完早饭也赶到东湖宾馆，看到周恩来已把两派服务人员召集到一起，正在讲话。他说：

“你们说，人一辈子跟谁拌嘴多？我看还是两口子。因为是一家人么。可是如果来了客人，两口子大都会一起迎客，共同维护这个家。你们吵得厉害，说是两派，我看首先因为是一家人，不是冤家不聚头。一家人就不要再说两家的话，不论哪一派，大家赶快行动，把房间打扫出来。”

周恩来说话并不多，但非常奏效，很快大家有说有笑，分头寻找工具，高高兴兴地打扫房子去了。

周恩来将陈再道、钟汉华、李作鹏、刘丰等人召集在百花一号楼会议室开会，宣布毛泽东即将来到武汉的消息，并详细布置了毛泽东到武汉后的住地及游长江的安全工作。

周恩来指定刘丰负责安全工作，没有让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负责此事。他又指示，把负责警卫东湖宾馆内，毛泽东准备居住的梅岭 1 号、2 号楼的湖北省军区独立师撤到外围，换成汪东兴带来的中央警卫团的人。这一举措属于规范惯例，毛泽东每到一地，都是由中央警卫团负责贴身警卫。但独立师政委蔡炳臣这次显得很不高兴，一连几天，都嘟嘟囔囔，认为把梅岭 1 号、2 号警卫换了，是不相信他们，这可能与以后几天武汉军区的汇报会议情况有关。

其实，东湖宾馆警卫虽然有所调整，但是整个宾馆大院仍由 8201 部队，即独立师负责保卫，大门警卫仍是独立师负责，并没有调换。中央警卫团的一个中队仅仅密切控制了毛泽东和中央警卫团驻扎的梅岭 1、2、3 号一片建筑和附近树林、要道。

第二天，武汉军区保卫科王振英科长和武汉军区孔庆德副司令安排好东湖宾馆的保卫工作后，向钟汉华提出建议，是否用

8199 部队，即陆军第 29 师来加强宾馆警卫，钟汉华政委没有同意，说：“8199 部队和 8201 部队有矛盾，还是不调 8199 好”。

## 第 725 回：七一四，专列停靠武昌站　众欢呼，毛主席呀派人来

就在周恩来飞往武汉的同时，7 月 14 日凌晨，中央代表谢富治、王力、余立金在重庆警备区司令部，即 54 军军部，接见了重庆两派代表。这次接见显得如此匆忙，黄廉在跟谢富治握手时问他："你们能够呆多久？"

谢富治说："我们马上就要走。"

黄廉拦住王力问："你们这一走我们这一摊子怎么办？"

王力回答说："有比你这里还紧急的事情。"

谢富治、王力听取了重庆两派的汇报，并作了讲话。他们在讲话中一再强调两派要各自多作自我批评，说"资本主义复辟逆流是二、三月份的事"，中央关于四川和重庆问题的《十条》和《五条》发出后，"四川问题，重庆问题，从原则上已经解决。"讲话还一再说重庆驻军 54 军"是毛主席的好部队，是可以信赖的。"

陪同中央代表到渝的四川省革筹组组长张国华、副组长刘结挺上午 9 时 15 分发布《关于立即制止武斗的命令》：

1、立即全面停止武斗，外单位人员必须撤离武斗现场；

2、立即收缴一切凶器，由各群众组织于 15 日 24 时前送缴警司；

3、双方立即释放所抓人员（包括伤员），在 15 日 16 时前送交警司（重伤员报告警司处理）；

4、各群众组织把非本单位车辆于 15 日 24 时前送交警司；

5、从 14 日 18 时起一律不准拦车、拦路、抓人；

6、以上五条责成重庆警司首长、市革筹组监督执行。

会议还没有结束，直升机就已经在靶场降落。因为重庆街头不安定，坐车去飞机场难以保证时间。为赶时间，54 军调来直升机。谢富治、王力匆匆离开，连午饭都没有吃就坐直升机直赴重庆白市驿机场，然后搭乘伊尔—16 回成都双流机场，在那里换乘中央代表团自己从北京带来的伊尔—18 飞机飞往武汉。

重庆《815 战报》载："会后，首长和全体代表合影留念，然后登上直升飞机，在一片毛主席万岁的欢呼声中离渝返京。"代表们压根儿不知道，这几位大员并非"离渝返京"，而是开始了一次未曾料到并永载史册的武汉之行。

14 日中午，谢富治一行到达武汉，李作鹏乘坐吉普车去机场，把他们接到了东湖宾馆，住在"百花二号"。住在"百花一号"的周恩来过来和他们见面，并同大家一一握手，特别询问了北航"红旗"4 个红卫兵的姓名、年龄、籍贯等。他说：

"主席今晚到武汉，他老人家一定要来游长江，叫你们来，主要是协助保卫主席安全。武汉驻军过去是你谢富治的部队嘛！"

谢富治听得一愣，有些迷迷糊糊地问道："是吗？我怎么不知道？"

周恩来见状，哈哈大笑说："还是主席的记忆力好，他说武汉的部队是谢富治指挥过的，我让秘书查了一下，果然武汉驻军有陈、谢兵团的老班底，你们的 9 纵，就是现在的 15 军吗。"周恩来简单询问了四川那边的情况。

房间里没有空调，热的要命，谢富治一边用大扇子扇风，一

边笑骂说："热死老子了，陈再道这家伙真不够朋友，一来就给我们一个下马威。"

下午 17 时，周恩来又到"梅岭一号"，亲自查看为毛泽东准备的房间。

"梅岭一号"的内部装潢和陈设，与毛泽东中南海居室和韶山滴水洞的风格一致，庄重、宽敞、简洁、实用。这座"回"字形单层建筑，中间为小天井，从车廊步入门厅，左边是兼作会客厅的会议室，穿越过厅，是毛泽东的办公室和卧室。右边依次为餐厅、秘书室、警卫室、江青卧室及办公室。会议室的外走廊有一条密闭式长廊，直通"梅岭三号"，那里有小礼堂、会议室、游泳池等设施。

周恩来看到守卫在门外的哨兵，军衣上透出了汗迹，便过去握着他的手说："你辛苦了。"

哨兵激动得一时说不出话来。

周恩来关照他："你可以站在阴凉处有风的地方。"

哨兵急忙回答："谢谢总理，我不热。"

周恩来走进房间，仔细查看。

房间内是按毛泽东的习惯布置的，很多东西都是毛泽东以前来时用过的。

周恩来又召集东湖警卫队队长、招待处处长和两派群众负责人开会，提出：

1、东湖宾馆两派群众组织要求同存异，要联合；

2、一律不得与外界来往，遵守纪律，保守秘密；

3、东湖招待处从现在起不准增加一个人，如果增加人，需

经周恩来批准。

同时，也将宾馆的工作人员做了调整，原来工作人员主要是“百万雄师”的，这时，全部换成“工总”的人。

周恩来又冒着暑热，带着有关负责人到长江岸边察看地形，对确定毛泽东下水的地点、游泳的路线、在什么地方上船及可能会出现的问题、应采取的应急措施等，都作了细致的安排。

之后，周恩来把陈再道和钟汉华叫到他的住地，向他们传达了毛泽东对于武汉情况的态度，要他们不要把屁股坐在“百万雄师”一边，做好向毛泽东汇报的准备。他特别关照说：

“要你们作检讨，不是要打倒你们，而是要保你们……”

陈再道和钟汉华两人低头不语。

周恩来进一步解释说：“我们临行前，主席对我说，‘走，到武汉去，保陈再道去’，你们放心吧，不要有顾虑。”

陈再道心情很复杂，搞不懂自己到底错在哪里？但他还是向周恩来表示，一定如实汇报情况，听从党中央做出的一切决定。

当晚，陈再道、钟汉华留宿东湖客舍乙所。

14 日晚 21 时 08 分，毛泽东的专列停靠在武昌车站，他看了看窗外，对随行的汪东兴和杨成武说：

“一路都听你们说乱，连个鬼也没有扒车！”他的意思是说，大家反对他南下，理由都是安全问题，说连火车也坐不稳，到处有学生、红卫兵拦车扒车，可他连一个也没遇上，是否觉得有些遗憾？

他们到达东湖宾馆，住进梅岭一号。这时，周恩来正与谢富治、王力一行及部队领导在百花一号开会。随毛泽东同行的汪东

兴、郑维山来到百花一号向周恩来报告。随谢富治南下的中央文革工作人员张根成走进会议室对周恩来说：

“汪东兴到了。”

周恩来忙走出来，看见汪东兴就问：“到了？”

汪东兴答：“到了。”

“路上怎么样？”周恩来问道。

“还顺利，我们只抓来了一个扒火车的……”汪东兴接着毛泽东在火车上的话题指着郑维山开玩笑说。因为原来毛泽东的南下计划人员中没有郑维山。郑维山笑着同谢富治、王力、余立金等人握手，并互相开了一阵玩笑。

周恩来立即宣布散会，然后随汪东兴来到毛泽东的住处梅岭。

周恩来去了毛泽东处，谢富治觉的晚上应该没什么事情，天气太热，不如出去转转，到街上看看大字报，了解一些情况。22时左右，他便带王力、余立金和工作人员步行上了大街。这时武汉的街上、学校里到处都是工事，各派手里都有武器。他们先来到湖北大学，正在湖北大学校门口进行守卫的学生樊斌，看见一行十几个陌生人来到学校，立即迎了上去，问他们是干什么的。

谢富治答道：“看看大字报。”

王力拍着樊斌头上戴着的钢盔问：“你们为什么戴这个守门哪?”

“为了自卫。”樊斌回答说。

“你们要这个干什么呢?”王力又指着学生们手中拿着的各种的武器笑着问。

“自卫，我们这样搞是逼出来的。”湖北大学“红八月”的一名学生插进来说。

这时，校门口已围满了人，把谢富治一行十余人团团围住，七嘴八舌的讲述着陈再道支持“百万雄师”镇压造反派……

谢富治、王力听后问：“你们为什么叫他‘百匪’？”

湖北大学“红八月”的同学说：“‘百匪’是群众给他取的名字，他们杀人、放火、放毒、无恶不作，群众恨死它啦!”

这时，周围的人也你一言我一语地说：

“他们比土匪还坏，硬是够得上喊‘百匪’。”

“真是‘百匪’过江，百姓遭殃。”

……

谢富治笑着说：“不要叫‘百匪’嘛!”

接着，王力指着湖北大学校门旁几处大的断壁缺口问：“这是怎么搞的？”

湖北大学的同学又讲了 6 月 30 日，“百万雄师”围攻湖北大学，用汽车冲垮围墙的经过。

人群中一个 7、8 岁的小孩子挤到了前面，随同谢富治一起来的一位工作人员和他攀谈起来。

“‘工总’、‘九一三’好不好?”

“好。”小孩很干脆的回答道。

“‘三司’好不好?”又问。

“‘三司革联’好，‘三司’不好。” 小孩毫不迟疑地脱口而出。

谢富治也插进来问：“是‘百万雄师’好，还是‘工总’、‘二

司’好?”

小孩说：“‘工总’、‘二司’好，‘百万雄师’坏。”

谢富治微笑着问：“你是小‘二司’的吧？”

小孩说：“我是红小鬼。”

谢富治看着面前这个孩子，稍停片刻，重复地说了一句：“呵！红小鬼。”

樊斌一直注视着王力，总觉得好像在哪里见过……猛然，他想起来了。那是去年 10 月，他和同学们一起到北京串连，10 月 17 日在北京政协礼堂里，中央文革的王力、戚本禹等人接见全国造反派代表会议的代表，他见过他，就是王力。他忍不住激动地高声喊道：“啊!他是王力同志!王力同志来了!”

这时，也有人认出了谢富治，大声喊道：“哎呀！谢富治副总理也来了!”

顿时，人群欢腾，掌声雷动，那股高兴喜悦劲儿呀，简直无法用言语形容!

之后，谢富治他们又于 23 时抵武汉测绘学院看大字报，与“二司”的群众进行了交谈。

见到北京来人，在场群众眼泪哗哗直流。立刻，湖北大学和武汉测绘学院的高音喇叭进行广播，消息迅速传开，各学校喇叭播放出歌曲《毛主席派人来》，满街敲锣打鼓放鞭炮，两派都贴了欢迎标语。武汉地区的造反派连夜组织了大规模的游行。敲锣打鼓放鞭炮,张贴标语呼口号:

“热烈欢迎毛主席派来的亲人!”

“热烈欢迎谢富治、王力解决武汉问题!”

7 月 15 日凌晨，水院宣传站突然广播："特大喜讯，特大喜讯！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中央派王力、谢富治来武汉了！"

水院的"二司"、"工总"群众激动得跳起来高呼"毛主席万岁！……"

刚过几分钟，广播里又响起重要更正：中央未派人来，消息有误。大家的心一下子凉透了。又过了一会，广播又响起悦耳的激动人心的女高音："中央领导真的来了！"

千真万确，大家又疯狂似的欢呼雀跃。总部通知："全武汉市无产阶级革命派 7 月 15 日全市大游行，欢迎王力，谢富治代表中央处理武汉问题。"

但是，这一切又让武汉军区感到非常突然。15 日一大早,武汉军区副司令韩东山气呼呼地闯进陈再道办公室，放开嗓门吼道:

"这是搞什么名堂!谢富治、王力到了武汉,我们都不知道，他们却一清二楚。难道我们这些干了几十年革命的人还不如那些毛头学生可靠？！"

"不要激动，"陈再道安慰他说，"谢富治、王力昨天到的，我还没来得及告诉你，你就来了。"陈再道拍了拍脑袋，好像想起什么似的说："对了，你要马上准备材料，他们可能要听我们的汇报。"

"这回他们的态度如何？不会是带着框框来的吧?"韩东山问。

"现在还很难说。"陈再道说，"'工总'、'二司'天天喊着中央文革支持他们。现在中央文革的人来了，我倒要看怎样个支

持法!”

韩东山把头上的军帽一摘，丢在桌子上，气鼓鼓地说：“他们天天说人家‘百万雄师’是保皇派，不就是替干部说了几句公道话吗？我看我们的支左方针不能变，而且要更加明朗些。”

陈再道苦笑地叹了一声：“事情恐怕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啰!”

隔壁机要室的三部电话几乎没有停，秘书有些应接不暇。电话全是下面支左部队报告造反派组织欢迎游行的情况，询问谢富治、王力是否真到了武汉？陈再道有些不耐烦了。他把电话记录本退给秘书，说:

“告诉各支左部队，消息可靠。没有接到军区命令，不要擅自表态和处置!”

周恩来听到武汉欢迎谢富治、王力、余立金到来的消息后说：“这也有好处，群众正在乱猜为什么东湖宾馆的灯亮了，现在就说谢、王、余来了，倒可以掩护主席。”

周恩来亲自布置陈再道，正式通知武汉军区支左办公室，请他们发出通知：“谢富治、王力的中央代表团已经到达武汉。”

## 第726回：山西会，明确批判刘、刘、陈　戚本禹，接见河南各代表

就在毛泽东到达武昌的那天晚上，1967年7月14日晚20时，康生、关锋、吴法宪、刘格平在人民大会堂安徽厅，召开解决山西问题中型会议，也是山西革委会的常委扩大会，会上明确批判刘贯一、刘志兰、陈守中，批评张日清。

7月14日晚22时10分，戚本禹、刘建勋在人大会堂南会议室接见河南“二七公社”、“河造总”、“十大总部”各5名代表和郑大“战斗师”的1名代表，督促他们签署大联合协议。

在戚本禹来之前，刘建勋在会议室与“二七”代表进行了交谈。“二七”代表向刘建勋汇报“河造总”火烧“二七公社”816大楼，三厂和五厂“省工总”赶他们的工人出厂，工人被打，被抓及河南省军区支持“二七公社”的陈桂昌副司令员从北京返回河南时，被“铁军”绑架等情况。刘建勋问他们：“是否报给了中央，戚本禹同志知道吗？”

这时，戚本禹进来，他先问大家：“你们三方协议达成了吗？谈得怎么样？张宝怀，你谈一下吧。”

“二七公社”的张宝怀说：“两天来我们谈了两次。第一次会谈，‘铁军’有意转移主题，谈郑州武斗。第二次‘河造总’又是如此，而且，某些组织一再拖延时间，因此，正式协议没达成一条。”

“河造总”辩解说：“不是那样，有几个方面达成了。‘二

七’冲我们批判文敏生的大会，今晚还调动几千人，围我省一技校‘红造联’。”

“二七”代表说“河造总”讲的这两个事都是造谣，是“河造总”所为。戚本禹询问了烧楼及武斗的伤亡情况，“二七公社”与“河造总”各执一词，相互指责对方。

戚本禹不相信“河造总”的说法，他说：“他们的楼，他们自己烧，我们的人民大会堂，自己烧。哪有这样的事？你这样说谎话不行啊！你们自己达成的协议，自己撕毁。”

“铁军”也说他们5天之内有两人被“二七”所杀，“二七”否认。

戚本禹又询问“铁军”绑架河南省军区陈副司令员一事，“铁军”代表说不知道，戚本禹不相信：“这么大的事情，你们都不知道？”

他问：“军区来人没有？”

河南省军区杨松峰答：“来了。”

戚本禹又问：“你听说没有？”

杨松峰回答：“这个人确实是死了。”

戚本禹及在场的人都大吃一惊，戚本禹忙问：“你说什么？！怎么死了？！”

杨松峰被戚本禹的表情吓得目瞪口呆，不知该如何回答，只是一个劲儿的摇头吭哧：“嗯……”

戚本禹提醒他说：“我问你陈副司令员的事情，你说的是什么？”

杨松峰恍然大悟，忙说：“啊，我说是刚才‘铁军’说的那

个事情。”

戚本禹继续追问：“我问你陈副司令员的事，你听说没有？”

杨松峰：“我来的时候还没听说，到这里才听说。”

戚本禹：“这么大的事情，你们的司令员你就不关心，你自己的司令员被绑架了你都不知道？！你是干什么的？！谁的秘书？”

杨松峰：“我是参谋。”

戚本禹：“谁的参谋。”

杨松峰：“动员处的参谋。”

戚本禹：“你是跟谁来的？跟何运洪吗？”

杨松峰：“嗯，是工作人员。”

戚本禹：“工作人员来几个？”

杨松峰：“来6个。”

戚本禹：“你回去跟何运洪讲一下，他要求让陈桂昌回郑州，我们同意，但他又不给他任何安全保证。”

“二七”代表说：“不但陈副司令员，所有支持‘二七’的军区首长，都没有安全保障。公安厅高大同也被绑架走了。”

戚本禹说：“陈桂昌是好同志，是军区中支左的好同志，陈桂昌你们说让回去，我们同意。回去了又不加保证，你们搞什么名堂？我很怀疑。”

他又问“铁军”代表：“你能代表‘铁军’吗？”

“铁军”代表说：“能，但这个事我不知道。”

戚本禹质问说：“你怎么只关心一方面的，怎么不关心另一方面的？”

“铁军”代表说：“如果是我们干的，保证马上放出，并作检查。”

戚本禹：“你们要保证陈副司令员的安全，要打电话回去。”他接着问：“你们中间有参加协商协议的吗？”

“十大总部”、“河造总”都回答道：“有。”

这时，“二七”代表把“河造总”铅印的河南省军区副司令员刘大坤7月10日的讲话传单拿给戚本禹说：“军区动员‘河造总’，7月10日在郑州市体育场，开了一个几万农民大会，还大搞经济主义，刘大坤代表河南军区发言，坚决支持‘河造总’。”

戚本禹很快看了一遍刘大坤讲话的传单后说：“这个讲话是错误的。嗯嗯，是错误的，是不符合中央精神的。”他对河南省军区的人说：“你回去和何运洪讲一下。这个是对抗中央指示的，这和你们军区的检讨精神完全相反。你们一方面在北京检讨，一方面副司令员在家作这个报告，这个报告倾向性是很清楚的，我要求你们对这个东西要做出说明，你们认为正确的还是错误的？另外，对怎么开的那个会，你们要写个说明。”

“二七”代表接着告状说：“我上次接总理指示，7月4日到郑州解决铁路停车问题，接触到钟政委，董参谋长，他们都说：我们现在、过去、将来都是坚决支持‘河造总’的，从来没说过支持‘二七’。”

“河造总”告状：“‘二七’在信阳、南阳地区搞了个九条，六条，说是中央文件。”

戚本禹看“河造总”递上来的“二七公社”的传单，说：“是不是根据传达搞的，是不是军区在中央的检讨搞的，河南‘军区

犯了方向性、路线性错误’，这也符合中央意思，不过不能公开地乱写传单。”

“省工总”代表立即起来说：“二七……”

戚本禹打断他的话：“你坐下，你是‘工人总部’的，你说人家，看看你们的。那天我和你们谈了一次，你们就发传单，你们说我承认你们是造反派。那天我批评你嘛，批评你们保军区的错误路线，没有谈及到你们组织问题。”

“省工总”否认说：“我们没有搞。”

戚本禹：“不是你吗？反正是那天来的嘛。你们这样做，是硬逼着我们说你们是什么性质的嘛！叫我们对你们的组织表态嘛！你们想想这对你们有什么好处！我对你们‘工人总部’是有希望的，你要说我们承认了你们是造反派，硬要逼着我们表态，你叫我们怎么办？对工人我还是不愿意说那样的话的。不太愿意说你们是老保希望你们改正错误的。对你们有希望但我们是有原则性的。

你们‘二七’也不要把‘工人总部’说成老保。工人嘛，只要起来造反，不分早晚，都可以嘛！我们要欢迎。‘十大总部’是不一样的，‘公安总部’是保守的，‘省直总部’有问题很复杂，有坏人操纵的。对待工人嘛，不要说人家保了军区的错误路线，就说人家老保。中央没有这样说嘛！你们这样很不利于团结。工人同志嘛，大多数是好的，受些黑《修养》的影响，有的也是一时弄不清楚，有的有私心杂念，犯些错误，但不要看太严重了。不要叫人家老保。如果他们坚持错误么可以斗争，但要讲究方式。只要人家不再支持军区的错误路线愿意起来革命，我们应该欢

迎，不应该叫人家老保。”

“省工总”的代表对刘建勋、何运洪、“公安总部”、“二七公社”等问题作了检查。

戚本禹问：“你和家里商量了没有？”

“省工总”代表说：“我们和家里说了，家里还作了修改。”

戚本禹对刘建勋说：“建勋同志，你听了没有，有些问题当然是他们认识问题。但总的态度还是比较好的，你们对‘二七公社’还要再提高一些。‘二七公社’是革命造反派嘛，有个别组织不纯，总是难免的，恐怕你们那个组织也不纯吧，你们就那么纯？我就不相信。康老说了嘛，‘二七公社’造反派。总理也说了嘛，‘二七公社’造反派。当时军区的错误路线谁在抵制？‘二七公社’，还有‘824’嘛。但是现在肯定他们了，他们又骄傲了，内部又闹分裂闹风头。”

这时服务员进来对戚本禹说：“叶群同志给你来电话。”

戚本禹：“你们等一下，我们出去一下。”

戚本禹接完电话回来问：“你们谈好了吗？”

“省工总”说：“最近我们有个希望，希望刘建勋同志去主持三结合。”

戚本禹对刘建勋说：“过去他们反你，现在要求你回去，这很好嘛！”又对“省工总”代表说说：“建勋有些缺点和错误，但能主动地迅速检查和改正这很好嘛！中央是信任的，你们呢？”

“省工总”：“坚决支持，坚决拥护。”

“战斗师”：“坚决支持。”

戚本禹又回到协议上来：“你们是不是尽快地搞个协议，不

要搞的太繁琐了。”“不要复杂，订上几条，比如军区是不是方向路线错误？这方面是不是可以达成协议，你们怎么看？另一条对省委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究竟谁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文敏生，赵文甫，还是刘建勋？第三，对刘建勋支持还是反对？”

“二七”代表说：“关于省委当权派问题，经过两次协商，第一次协商时，除‘河造总’刘介廷对杨蔚屏态度暧昧外，所有其他代表的发言都坚决打倒赵、文、杨，本来可以达成协议，但是有的人保……”

戚本禹摆摆手打断他的话说：“可以了，可以了，杨蔚屏达不成，可以写个文敏生，赵文甫等一小撮嘛！这一‘等’不就进去了。另外，”他又转向“河造总”和“十大总部”的代表说：“是‘二七公社’，过去你们抓人家的人，中央认为他是革命造反派，你们不同意。这次达成协议，是革命造反派，你们怎么看？同意就达成，不同意就算。”

“河造总”：“我们同意，‘二七公社’是革命造反派。”

新乡李玉坤：“我们同意‘二七公社’是革命造反派……”

戚本禹：“‘二七公社’有几个缺点，我们已经和他们讲了，为什么要肯定，如果不肯定，抵制军区的错误路线怎么体现？怎么叫方向路线错误呢？‘二七’抵制了军区的错误路线，军区镇压了群众，他们抓了‘二七’那么多人。”

新乡李玉坤：“耿其昌也抓了人。”

戚本禹：“耿的事慢慢来，能达成就达成，有几条写几条，不行回来再说，搞个补充协定，第三次补充协定都可以么。”

“铁总”代表也表示：“我们希望铁路三派坐在一起，搞个协议。”

戚本禹：“那好嘛！”

开封“824”：“是不是1军的我们也搞一下。”

戚本禹：“‘824’与‘井冈山’，你们是不是关于1军的问题，也协议一下？你们是否除几个协议外，也能关于1军的问题达成个协议？洛阳的来了没有？”

洛阳代表：“我是‘十一战团’的，观点和‘河造总’差不多。洛阳也有三派。”

戚本禹：“现在搞罢工、拦车的就是你们吗？”

洛阳代表：“不是。”

戚本禹问：“那是哪一派？”

洛阳“十大总部”说：“也不是我们。”

戚本禹问：“洛阳‘816’来了没有？”

“没有。”

戚本禹问办事组：“怎么没有让他们来？”

办事组说：“总理办公室打电话，只让通知那一派，没让通知‘816’。”

戚本禹：“我写了个条总理批示，让三方面都来。总理不是在那上面批示了吗？要‘816’来同样的代表。你没看总理的批示吗？”

办事组：“看见了。总理值班室打电话说没通知‘816’。”

戚本禹：“你按文字的东西，不要按电话嘛！要通知他们来。你看什么时候能来？”

办事组：“明天通知他们来。”

戚本禹：“这里的代表，加上新来的，组成洛阳代表团。怎么组好，你们看。我们要见他们一面。你看还有什么问题？建勋同志还有什么问题？你再和他们扯一扯。”他对工人说：“你们要尽快地达成协议，中央好批。你们来的时间不短了，你们要回去了。解决了一个问题就前进了一步。现在中央就等着你们的协议。”

## 第 727 回：七一五，江城又发生武斗　查水情，与武汉军区座谈

7 月 16 日是毛泽东横渡长江一周年之日，被“百万雄师”打压得十分被动的武汉高校学生，原计划借这一机会到武昌江边组织一次声势浩大的横渡长江活动，再造声势。估计这一理由陈再道和武汉军区不好拒绝，如果出现血案，也会引起北京毛泽东主席和中央文革的注意。于是他们作了准备，印制了标语、横幅。

这种造势的机会谁也不会放过。“百万雄师”也提出要组织横渡长江。军区一看，这可如何是好？联合渡江？不可能，两边都杀红了眼，碰到一起，肯定会发生武斗，到水里动刀子那就更不堪收拾了。中央“6.26”电报对军区压力很大，再发生流血事件，不好向中央交待。于是，派叶明副政委出面做“百万雄师”工作，认为你们已经是胜利者，学生 16 日来游泳你们不要同时搞了。谁知，已经在武汉取得优势的“百万雄师”此时也不那么听指挥了，坚持要 16 日搞。武汉军区副政委叶明再三劝说，晓以利害，建议“百万雄师”15 日提前搞，照样显示忠于毛主席。“百万雄师”还是给军区面子，最后同意了。

在那种严酷的形势下，狂热拥戴伟大统帅的人们一定要冒着风险渡江，反映了那个时期的人们对革命无比虔诚的效忠精神。当时有个对联这么写着：

为七尺男儿生能舍己

作千秋雄鬼死不还家

可见当时青年为革命事业献身的精神一斑。

按照协议，7 月 15 日，“百万雄师”在武昌中华路组织了“纪念毛主席横渡长江一周年”活动，约 800 人横渡长江。为了安全，他们将全市武装保卫人员全部集中到两个地点保卫安全，一是武昌中华路，这里是“百万雄师”横渡长江的下水处，还有就是汉口滨江公园，这是横渡长江的上岸处。当时“百万雄师”有 6 个比较大的武斗组织，分别是：刘天喜领导的“闪电兵”、彭汉洲的“翻江龙”、以及“霸王鞭”、“雷达兵”、“反到底”等。

“百万雄师”15 日组织渡江活动的消息传到高校，高校学生们决定乘 15 日“百万雄师”汉口空虚，游行到汉口，给坚守在那里的造反派鼓鼓气，标语口号是：

“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

“打倒陈再道！”

“工总翻案，老保完蛋！”

“造反派永立江城！”等口号。

造反派 15 日的游行本来是事前已经准备好的，游行的题目是“粉碎刘少奇新反扑”，并不是专门为欢迎中央代表团举行的。但是 14 日晚上恰巧得知谢富治、王力到武汉的消息，非常机敏的学生，“无中”都能生出“有”来，没有题目，他们能想办法找出题目，何况如此天大的喜讯，他们自然不会放过。于是，游行队伍里打出了“热烈欢迎毛主席派来的亲人谢、王、余首长”的标语，游行又多了一个更有意义的内容。

“新华工”司令部 7 月 14 日晚开会研究次日大游行之事。司令郭保安等人提出全部出动，头戴钢盔，实际是铝盔，手拿长矛，徒步游行，以显“新华工”的威风。而赵延昌则提出：要防

止“百万雄师”在中央代表到来时狗急跳墙，要出动所有汽车，能坐多少人就坐多少人。用自制的装甲车开路，在装甲车内放置枪支和手榴弹，一旦出现意外可以强行突围。但郭保安等人则认为：中央代表已到武汉，“百万雄师”不敢乱动，坚持在 7 月 15 日徒步大游行。

7 月 15 日凌晨 3 时，游行队伍开始集合。排在“二司”汉阳宣传队之后的就是“新华工”队伍。学生们一色军装，扎着腰带，手持长矛，十分威风。他们从 20 多公里之外的关山浩浩荡荡开了出来。数千名头戴铝盔的学生跟在自制的装甲车后面前进。前面开路的吉普车门口挂着一个五短身材、身着绿色军服、臂戴总指挥袖标的学生，他一手拉着车门框，一手摇着指挥旗，煞是威武雄壮，很有点巴顿将军当年在沙漠指挥美国大兵前进的味道。他就是和“新华工”一直有分歧的“钢二司”著名的二号人物、副司令丁家显。

7 月 15 日，是武汉最热的天气，人的脸被晒得通红。游行队伍全长三公里，是旗帜的海洋，标语的海洋。沿途群众茶水、鼓掌夹道欢迎，学生们真有点红军回来了的感觉，哪里还知道热和累！他们忘却了饥饿，忘却了酷暑骄阳，忘却了劳累……他们唱着革命歌曲，在烈日下前行。

“新华工”的游行队伍出发后，动态组赵延昌和动态组办公室的工作人员都来到南一楼五楼的综合组办公室，打开了监听电台，通过调节频率寻找 8201 部队对“百万雄师”的指挥信号。开始没有什么异常，当游行队伍到达汉水大桥时，监听电台里听到了这样的声音：“‘新华工’游行队伍已到汉水大桥，各单位做

好准备，迅速向武胜路口集中！”

接着听到了“XX 厂向 XX 路口集中”的具体命令。命令声和接受命令的声音在监听电台中此起彼伏。当游行部队快到武胜路口时，电台里听到了“游行队伍接近武胜路口，各单位做好战斗准备！”的声音。

此时已是中午 12 点时分，游行队伍经过武胜路电车公司，这里是“百万雄师”的据点，聚集了一些 20 多岁的青年人，是“百万雄师”的“闪电兵”总部。那天“闪电兵”大部份人都调到江边，守在电车公司的还有 50 多人。游行队伍呼喊的“解散百匪，镇压反革命！”等口号激怒了电车公司内的“百万雄师”，几个“闪电兵”青年人从电车公司冲了出来，指着游行队伍中一个 30 多岁的人说：

“这是黑‘工总’反革命份子，抓起来！”

实际上被指的这个“黑工总反革命份子”是华中工学院的校工王兴武，并不是市区工厂工人，但“闪电兵”硬要强行将他抓走，游行的同学当然不同意。于是，拉拉扯扯开始，“闪电兵”越来越多，游行学生更是有备而来。很快，学生中大个子、大块头组成的保卫人员在队长李长亮带领下，手持长矛赶到现场。由于游行学生人多，“闪电兵”占了下风，挨了打，跑回电车公司，电话向指挥部求援。同时，电车公司楼上砖头也像雨点一样砸了下来，学生们四散躲避。

电车公司内“闪电兵”又拿出长矛、大刀冲了出来，游行队伍顿时大乱，同学们吓的到处逃窜。电车公司对面就是宿舍区，学生纷纷逃进居民楼，要求避难。

“百万雄师”作战部部长刘敬胜和副部长汤忠云接到电车公司的报告，立刻在汉口滨江公园调人援救。很快，两车“霸王鞭”的小伙子赶到电车公司。半小时后，又有 45 辆“百万雄师”的卡车风驰电掣的从 3506 工厂开来。游行的人谁也想不到在中央首长来汉的日子里会发生这种事情，大家都猝不及防，游行队伍被“百万雄师”拦腰斩断，而丁家显率领的“新华工”主力此时被阻在长江大桥过不来。学生们四处逃散，汤忠云下令，追赶已逃散的学生。“百万雄师”的卡车追着前边的游行指挥车，游行指挥车边跑，边用喇叭大声喊：

“警告你们：立即停止追赶！再追，我们就要扔化学弹、遥控弹了，到时血染江城，后果完全由你们负责！”

“百万雄师”不知大学生们又研究出什么“新式武器”，停止了追赶，双方以武胜路为界，形成了对峙。

汤忠云又下令：将周围街道全部封锁，各街口设堵阻援，捉拿凶手。

他们挨家挨户搜查，抓“挑起武斗”、“打死、打伤电车公司女职工，侮辱路过妇女，又打伤正在上班的老工人的杀人凶手”。

搜查并不顺利，哪家没有儿女上学，同情学生的人比较多，此为一。第二是居民并非都是“百万雄师”观点的，有些中间派什么都不怕，不准进屋查，“百万雄师”不敢用刀对付这些人。另外还有些人本身是造反派，又不是头头，是群众，也不许进屋搜，有些屋根本不开门，除五类份子害怕不敢藏学生外，“百万雄师”观点的居民尽管自己不藏，但也不敢检举，所以搜查一直到晚上 11 点才结束，搜查出的学生 200 余人集中到电车公司，

大个子关进大会议室，块头小的关进食堂……区公安局出面审讯学生，要他们承认挑起武斗的责任，交待后台。当时，一冶一个叫黄继元的工人，手制了一把木手枪，平时用来吓唬人，这一次被区公安局邴局长抓住，以反革命持枪杀人犯被捕。

此时，毛泽东正在东湖。7 月 15 日晨，毛泽东找谢富治、王力了解西南情况，后来想起周恩来也在武汉，又将周恩来、杨成武、余立金、李作鹏、汪东兴叫来一起听取汇报。

周恩来原定 15 日回北京，汇报会快结束时，他请示毛泽东："主席，我准备今天回北京，这个月还有几次外事活动。"

王力一听，忙对毛泽东说："主席，总理是否先别走，中央讨论的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我们还不知道，帮助主席解决武汉问题没有把握。"

毛泽东转过头问周恩来："你的意见呢？"

周恩来说："那我就在武汉再呆几天。"

毛泽东说："好。"接着又说："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要先从部队解决。"

周恩来说："今天下午召开武汉军区党委扩大会，听取他们的汇报。我们中央来的同志，除主席外，如果没有特殊情况，都参加听一听。"

下午，周恩来、谢富治、王力正在听武汉军区汇报运动情况时，武胜路那边已经打得不可开交。武汉军区支左办公室对"7.15"武斗提出批评。为准备对中央来人汇报情况，"百万雄师"遂暂停武装冲突，双方冲突到下午终止。同时，"百万雄师"也决定不在 7 月 16 日组织渡江活动。

“百万雄师”和硚口区公安局连夜对抓住的学生进行审讯并照出的照片，7 月 17 日在汉口电车公司开照片展，说明“7.15”造反派杀人和破坏电车公司物品，阻碍公交秩序的事实。

据“百万雄师”硚口分站的童飞后来讲,这次武斗死了 3 个人,埋在东西湖东心农场桃树林中，那里是“百万雄师”农民总部所在地。

15 日当晚，“新华工”紧急行动，派出一支武装部队埋伏在鲁巷，误把前来支援的武钢中学生的汽车当成了“百万雄师”，开枪射击，导致两人死亡，多人负伤。

23 时左右，“新华工”将自制的“装甲车”开出了校门。刚一出校门，迎面就碰上一辆挂军用牌照的小汽车。双方停车后，从车上下来的正是前来华中工学院看大字报的谢富治和王力等人。

谢富治和王力里外查看了这辆“装甲车”，表情凝重，什么也没说。而“装甲车”上的人员得知是中央代表后，立即跑步到东三楼向司令部报告。可这时司令部的几个主要负责人都不在。

于是，他们打电话到院广播台找到张建华。

张建华听说中央代表来到华中工学院，十分兴奋。但主要负责人都不在，怎么办呢？他转念一想，何不让中央代表在电影场直接与全院师生员工见面呢？他立即叫广播台工作人员打开广播，通知全院师生员工到电影场接受中央代表的慰问，并决定由自已主持这次非同寻常的大会。

当张建华陪同谢富治、王力来到电影场时，电影场一万多个座位已是座无虚席。来参加大会的除华中工学院师生员工外，还

有数千名被“百万雄师”赶出来后在该院栖身的造反派。当人们看到谢富治和王力步入主席台时，全体人员都站了起来，满含热泪一遍又一遍地高呼“毛主席万岁！”“我们想念毛主席！”的口号。

谢富治说：“首先让我代表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彪副主席、党中央周恩来同志，中央文革小组陈伯达同志、康生同志、江青同志、张春桥同志、王力同志、关锋同志、戚本禹同志、姚文元同志、代表他们，首先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向在座的全体革命派同志们，以及武汉所有的革命派同志们，最热烈地问好！……

“同志们、战友们，我们临行的时候，我们见到了伟大领袖毛主席，毛主席身体健康，非常健康！毛主席非常关心武汉地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非常关心所有的革命小将。我们临行的时候，也见到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彪副主席，身体非常健康！”

接着，他介绍了王力、余立金和北航“红旗”井冈山、吴介之等人。

他说：“王力同志向你们领导人提了两个建议。第一个建议就是要文斗，不要武斗。……第二个建议，我们坐下来学习，学习毛主席和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最近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现阶段一系列政策，首先特别是学习毛主席在十年前的著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一篇伟大的光辉著作……”接着，王力也讲了话，他说：“我们的文化大革命的形势是很好的！我们总起来说，我们所损失的是很小很小很小，我们收获的

成绩是很大很大很大。这是林彪同志的一句著名的话，同志们记得吗？”

底下群众齐声回答：“记得！”

王力接着强调：“希望武汉地区现在的三派，同志们统统能够接受我们的建议。第一条立即停止武斗。根据中央的《六条》能够达成一个协议，武汉地区人民解放军应该保证执行这个《六条》。所有的群众组织都应该达成这个《六条》的协议，停止武斗，停止煽动人心的宣传，撤除所有的工事，消除所有的武器，保证四大民主能够正常地进行！使得我们武汉地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沿着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前进！”

7 月 16 日，武汉造反派按计划组织了大规模的渡江活动，纪念毛泽东横渡长江一周年。这天，没有发生两派的冲突，汉口中山大道水塔一带“百万雄师”宣传据点的喇叭甚至还向游行的造反派学生高呼：

“向‘二司’的革命小将学习、致敬！”

“向‘红水院’的革命小将致敬！”

以及“不许‘工总’翻案！”、“踏平‘工总’镇压反革命！”等口号。

15 日后，杨成武、李作鹏、余立金等人和武汉军区领导反复去长江边踏勘，策划游泳事宜。一天，杨成武与汪东兴、郑维山坐船查看了长江水情，杨成武的秘书张忠庆是白洋淀人，还特地下水游了一趟。他们上岸时，天快黑了，好多人围住船看热闹，其中有人认出了杨成武，大声喊：“杨成武！这个是杨成武！”

杨成武忙否认：“我不是。”

人群中喊声更高："你骗人！你就是杨成武，我们认识你。毛主席接见红卫兵，你在吉普车上陪毛主席一道检阅过我们！……"

杨成武没法解释，忙钻进汽车开车走了。

从 15 日开始，一直到 18 日，每天下午，周恩来和谢富治、王力、杨成武、余立金等人都在在百花一号开会，听取武汉军区的领导及驻武汉部队师以上"支左"部队负责人的汇报。

汇报前，钟汉华找到陈再道，问他："我们怎么汇报？"

陈再道说："还要坚决，不能动摇。"

"谁讲？"钟汉华又问，

"你去讲。"陈再道说。

汇报中，武汉军区的干部汇报了造反派"工人总部"的"十大罪状"，"百万雄师"的"十大好处"。周恩来等北京来人插话，希望部队同志要以两条路线斗争为纲，抓住事物的本质，提高路线觉悟。双方分歧很大。

当钟汉华汇报说："我们军区党委最早响应毛主席支持左派广大革命群众的号召，介入武汉的文化大革命。半年多来，我们各级支左办公室经受了考验，做出了巨大的成绩"时，王力问："把'工人总部'这样的革命组织打成反革命也是成绩吗?"

钟汉华说："根据调查摸底，我们发现'工人总部'的头头的确有很多问题。"

"有问题不等于不革命嘛!"谢富治说，"'工人总部'虽然有错误，但他们最早起来造王任重等党内一小撮走资派的反，这一点，你们能够否认吗?"

钟汉华忍不住站起来对周恩来说："我觉得我们介入文化大革命以来，还是支持左派广大群众的。"

"我问你，你说的左派是哪些组织?"王力问。

钟汉华回答说："当然指的是'百万雄师'啰！他们成份好，听话，生产骨干和积极份子多。"

"你坐下!"谢富治挥了挥手说，"你们不是支左,你们扶持的都是在文革初期死保湖北省委一小撮走资派的保守势力。"

"你这样的结论我们接受不了!"陈再道生气的答道。

"你们支保吃左，屁股坐歪了，大方向错了!" 对这个老乡，谢富治也用不着客气，他站起来用手比划着说，"现在，街上几岁的娃娃都知道'三钢'、'三新'好，'百万雄师'坏。"

"正因为我们不是几岁的娃娃，所以，我们不能轻易地说谁好、谁坏。"韩东山忍不住插了一句。

谢富治看了他一眼说："哟，韩东山，久闻大名啊。黄石市有 30 多个群众组织，都是被你勒令解散的吧？还有的被打成了反革命组织。你有句名言，叫'武汉有个屌工人总部，黄石有个屌联络总部，不管你几十万，我一个通令叫你完蛋'，是不是这回事？"

韩东山一愣，额头渗出了汗珠，说："我不记得!"

"你不记得，革命群众可都记得!"

"他们反军，要揪武老谭，违反了军委《八条命令》，性质当然变了!"

"造反派揪武老谭，把矛头指向当权派，大方向完全正确。"谢富治大声反驳道。

就这样，武汉军区汇报一条，谢富治、王力反驳一条，双方唇枪舌剑，争辩不休。

16 日，陈再道和钟汉华商量：“我看谢富治、王力他们一定是带着框框下来的，解决武汉问题的盘子早已经定好了，汇不汇报都是一个样。”

“我觉得也是，”钟汉华附和说：“还是准备检讨吧，反正早晚要用。”

“好吧，叫秘书准备。”陈再道表示同意。

## 第 728 回：七一五，河南、安徽战犹酣　第三次，接见山西省代表

河南三方代表在北京协商停止武斗，家里的几派群众依然是打得不可开交。

先说开封。6 月，“中国人民解放军赴豫调查团”及京、沪、津、汴等支持开封“824”的组织发表联合声明，紧急勒令开封“公安公社”立即无条件释放“824”主要负责人陈红兵。声明说：“开封市公安公社是个群众组织，它根本无权抓人、捕人！它自成立以来的所作所为，都是违反中央军委十条命令和公安六条的！　”

声明要求：“必须立即无条件释放陈红兵!”

开封“824”在外来势力的支持下，逐渐发展壮大。以开封化肥厂“左司”为首的“左派”组织虽然失去 2 月胜利后一统天下的威势，军心有些动摇，但有解放军的一如既往的支持，大多数成员仍在坚守。

7 月 15 日清晨，在开封师范学院和周边地区发生了一场激烈的武斗，据说有部分四川“产业军”，称“产匪”流窜到开封，被追打，终于在惠济河向师院转弯处有 5 名“产匪”被打死，躺在校门前的池塘里和大街马路边上，令人极其恐怖。但是死者中有 1 人是开封通用机械厂的工人姬年喜。其实受害者都是开封的老百姓。

这场武斗发生在 7 月 15 日凌晨，开封东郊化肥厂的“左司”

组织了开封市的一些“左派”组织夜袭开封师范学院“824”。

由于事先开封师范学院“824”当时的负责人段文德已经得到了消息，他立即召开各系负责人紧急会议，安排各系“824”学生集中休息，如果真的保守派来袭，立即组织大家撤离。所以，当 7 月 15 日凌晨，开封“左派”组织夜袭开封师范学院“824”时，段文德即与“824”部分学生撤离了开封师院。

15 日清晨，开封市内的造反派听到开封师院“824”被围攻的消息后，纷纷赶往师院，与前来围攻“824” 的“左派”组织交手。据当年师院“红卫兵第三造反司令部”头头刘光耀，在他的《回忆开封师范学院“文化大革命”——一个保守派的自述》中所述：“几百名八二四工人于 15 日早晨在师院西南墙外用铁锹、棍棒围打左司的干部、工人，有的被打死，有的被打伤。师院‘老保’闻讯，立即组织队伍，高喊‘冲啊!’去抢救重伤员、抢尸体。这就是引起中央重视的开封‘7.15’武斗事件。”

到了上午 10 时后，市内“左派”组织向师院增兵，抓捕了大批造反派，将他们押送到南关的开封机械厂，其中师范学院物理系学生、“824”派的翟贵祥在第二天被拉出来，将他的头侧按在气锤的操作台上，可能是想吓唬吓唬他，谁想操作失误，气锤直接落下，将翟贵祥的脑壳砸碎，脑浆四溅，旁边的人大惊失色，不少人当场呕吐起来。

16 日下午，开封“左派”组织，抬着本派的几具死尸，在开封市内游行，高呼“镇压 8.24!”“向 8.24 讨还血债!”等口号。开封市区气氛恐怖。

下午 16 时许，黄河水利学校“99 队”总勤务组在学校召集

紧急会议，觉得形势万分危急，“99 队”大楼已经不适宜继续坚守，决定立即放弃大楼，到郑州投奔“二七公社”黄委会的“东方红”。

郑州也是如此。郑州纺织机械厂是“二七公社”北部工厂区最大的一个据点，“十大总部”决心拔除这颗钉子。7 月 16 日，“十大总部”派出了“工人纠察队”和“郑州铁军”两支劲旅，以数千人的绝对优势重重围困了郑纺机的“二七”据点。

郑纺机的攻守战打的极其惨烈，“十大总部”一幢楼、一幢楼地攻打，“二七公社”一幢楼、一幢楼地防守、撤退，几乎每楼的攻守中都有上百人受伤。

郑大附中学生防守的一栋楼被“郑州铁军”攻上了楼顶，“附中红旗”一名年仅 17 岁的学生总编张鲁明，拿着一根长矛拼死阻挡着一群对手，掩护同学们从楼上跳下，自己则被 5 支长矛扎死在楼上。文革后期，郑大附中的校园里为他竖过一座雕像，他写的文章在文革中影响很大。

7 月 16 日是毛泽东畅游长江一周年。这天，郑州“二七公社”在市体育场召开庆祝毛泽东畅游长江一周年大会。下午，北郊各单位的游行队伍经南阳路回去，路过郑州纺织机械厂门口的时候，遭遇路西厂区的埋伏，“二七公社”游行队伍撤到路东，双方相持。

晚上，“二七公社火线指挥部”的任延庆、单长春、袁庾华在郑纺机医院召开作战会议，袁庾华主张撤，但群众包围了他们开会的小楼喊口号，坚决反对逃跑。

7 月 17 日早上，“二七公社”集中兵力，推倒围墙，孤注一

掷地向南面的露天舞台进攻，想打掉对方的指挥部。但是，几次冲锋都被打回来了，有的人被长矛刺中肚子，白哗哗的一大堆肠子都拉出来了！他们退回到马路东边，正准备撤退，对方全线进攻了。

冲锋号响起，震天动地。先是钢块配雷管铺天盖地打过来，然后是看不到边的人群排成整齐的队形，挺住长矛如潮水般涌来。袁庚华身边两个打旗吹号的，都趴在地上，雷管炸来炸去，钢块砸到头上，都是血。有的被砸昏了。“二七公社”全线溃退，往东边撤。经过东边奶牛厂时，把奶牛惊了，后边的几个人又被奶牛抵死了一个。

最后剩下袁庚华他们6个人冲出去的时候，在空旷的田野上已看到对方从两边包抄过来的几十个人。他们6个人互相看了一眼，知道都要死在这里了。袁庚华后来回忆说：“此时，我的心情很坦然，北京的谈判已经进行6次了，中央的态度越来越明确。也就是说已经见到胜利的曙光了，死了值了！我们唱起毛主席的语录歌：‘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但是我们想到人民的利益，想到大多数人民的痛苦，我们为人民的利益而死，就是死得其所！’当年武斗中还有另一首林彪的语录歌：‘在需要牺牲的时候，要敢于牺牲，包括牺牲自己在内，上战场，枪一响，老子下定决心，今天就死在战场上了！’”

接着，双方开始拼起了长矛。这时，肉联加工厂武装部的杨敬尧带着一、二百人来抢袁庚华的“尸体”。原来，袁庚华家里已经几次传来他的“噩耗”，袁庚华的母亲哭得昏死过去。杨敬尧对袁庚华的母亲说：“伯母，无论如何，我一定要把小袁的尸

体抢回来！”

此时，他们见袁庚华还没有死，肉联加工厂一个大块头搬运工小周，不由分说把他扛起来就走。他们退到了农学院，这里和粮院一样，也是造反派占优势。

“7.16 战役”，“二七公社”被对方绑架走 200 多人，伤了上千，死了 20 多人。“火线指挥部”的郑家声身上被捅了几十刀，居然没死！

后来，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专程来郑州拍“7.16”的记录片，袁庚华陪同。

此时，安徽淮南的武斗也打得不可开交。

7 月 5 日夜 23 时，淮南“炮轰派”百余人夜袭攻占“支持派”的九龙岗矿务局技校据点。

7 月 8 日下午 15 时许，“支持派”报复，集百余人强攻占领“炮轰派”大通园艺场据点。

双方是冲突不断，事件连连……

淮南矿务局毕家岗煤矿坐落于八公山区，“支持派”的力量占优势，从淮南“127”大夺权以后，“炮轰派”在这里就一直没能扬眉吐气过。进入 7 月，毕家岗煤矿“炮轰派”被驱赶到本派力量最强的新庄孜煤矿，整个毕家岗煤矿完全被“支持派”武斗组织所占据。

7 月 14 日，“炮轰派”集结千余人，浩浩荡荡围住了毕矿“支持派”的指挥部宿舍大楼。此时的武器已不是钢叉铁棒，而是以枪炮和炸药了。随着震慑人心的喊杀声，夹杂着清脆的枪声，双方进行了一场决死的攻守战。几番轮攻尚未得手的“炮轰派”，

在枪击的进攻中使用了炸药。“轰隆”声中，大楼被炸开了大口，人群冲了进去，对顽抗者远用枪击，近用铁叉，不少人倒在血泊之中。本来困兽犹斗的守方，在大势已去的境况下兵无斗志，纷纷作鸟兽散，有的倒在血泊中，有的放弃抵抗被俘，还有的冒死冲出合围，钻进附近的高粱地逃生……

“支持派”的“联司”主要头头老方等人被俘，被绳捆锁绑押解到新庄孜矿审讯。让派性以及平日的积怨而烧红了眼的对方，那平时的仇怨立时冲昏了个人的理智，叉搠刀砍，方某终于死在押解的途中。在战后清查武斗现场的时候，又在高粱地边发现两具尸体，均被钢叉搠死的。此次武斗，9 人死亡，4 人重伤，大楼被炸。

毕家岗血案激起了“支持派”的报复心。经过一夜的密谋策划，酝酿而形成了拿下对方在全市最大的据点新庄孜矿的计划。7 月 15 日，“支持派”集合了力量，携带着优于对方的枪炮武器，先扫清外围，一顿枪炮，把对方逼赶到新庄孜矿电影院内，四面铁壁合围，准备彻底的一鼓围歼。

守者占据着居高临下的地理优势，强硬不屈，决心背水一战。子弹伴着划空的尖锐啸声连连不断，喊杀声阵阵不绝，各种型号的枪支射击声连缀不息，武斗人员往返穿梭络绎不绝。

武斗的中心地段正处于八公山区的中心地带，老百姓恐惧异常，担心玉石俱焚。

攻方久攻不下，使出最后的杀手锏，调来八二迫击炮，对准影院大楼一阵猛轰。炮声的震慑威力，使守方军心溃散。在战场上，久经沙场的老兵也最怕炮哇！何况这几炮吊得那个准哪，全

炸在核心要害之处。于是，“炮轰派”打开影院的大门，企图仓惶突围。随即又遭到各种枪支的密集射击，冲在前边的立时倒卧在血泊之中，后面的被迫又退缩了回去。最后的总攻开始了，残酷的“七九”或“六五”型号的子弹无情地射向对方。前面开枪破路、后面手持钢叉冲刺上去……电影院内、门前篮球场上、过街的石桥上、银行的旁边、商场的门前，血泊中躺着一具具尸体，其情状目不忍睹！浓浓的血腥气息随着灼热的夏风笼罩了整个新庄孜上空。

血案！震惊全国的武斗惨案！39 条生命血祭在这“715”事件中。

本来，新庄孜电影院武斗中杀死的人约有 9 人。结束战斗后，正要离开，有人听见舞台下有声音，上去就打了一梭子弹，扔下两颗手雷！然后，大家看都没看，就走了。

7 月 15 日晚 21 时 30 分至 24 时 30 分，康生等人继续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安徽厅召开解决山西问题的会议，第三次接见山西代表。参加会议的依然是“红总司”、“兵团”代表 60 余人，“红联站”代表 60 多人，省核心小组成员、省革命委员会常委和部分委员、省军区部分负责人、69 军政委、空字 023 部队校长、空字 025 部队校长。此外，还有晋中核心小组成员等。

21 时 30 分，康老、关锋、吴法宪、刘格平一同进入会场，全体起立鼓掌。康生入座后即宣布开会：

“这几天有些同志身体不好，今晚的会议只开 3 个钟头。前两天一开就 5、6 个钟头，我们检讨，我们是习惯了。现在 9 点半，开到 12 点半，3 个钟头。晋中军分区的崔冰同志要求发言，

现在先让任井夫同志讲，然后崔冰同志讲。希望同志们讲话精简一点。”

任井夫讲了晋中 7 月 7 日、7 月 8 日刚发生的“晋中总司”揪斗晋中“联络站”的人的情况。他还讲了他来北京时在火车上接到通缉他的传单，并将传单交刘格平转给康生。

康生：“这传单也很值得注意啰，刊印的！刊印的！不是一般油印复写的，刊印的！”

关锋：“铅印的！”

康生：“题目叫做《警号》，是人家散发到火车上的，传单内容是：‘混进晋中核心小组政权里面的野心家，反革命资本主义复辟的总后台，大反解放军的老贼，陷害陈永贵同志的罪魁祸首，就是任井夫。’四条罪状哩！”康生继续念：“‘今晚乘 88 次快车赴北京某地招摇撞骗，希旅客们百倍注意。如有群众发现，先把他监视起来，到北京车站自有人接应。老贼任井夫的特征：胖子，个子大，年龄四十多岁，山西孝义县口音。署名是专揪任小分队。一九六七年七月十日晚。’这很明显，这不是一个一般群众搞的。”

关锋：“任井夫同志这次来是中央请来的，是我们通知他来的。任井夫同志是中央公开支持的，任、王、张，我们早就支持了，陈永贵也支持的，我们也支持，这传单是造谣嘛！陈永贵在场，怎么能说任井夫陷害他呢？”

康生：“人家说任井夫来招摇撞骗，大家看看，咱们这里是招摇撞骗吗？”

关锋：“这样的传单是对中央的态度问题，中央叫任井夫来开会，是中央通知山西军区，让军区转告军分区叫他来的。”

康生："这个传单只能是掌握情况的人才能发出，我们也要查一查，他们不是要追任、王、张吗？我们也要追这个小分队是谁，发这个传单的到底是谁！"

任井夫发言后，康生叫崔冰讲。晋中军分区政委崔冰说："关于任井夫说的传单的问题我不知道，任井夫要来中央我也不知道，我问了军区，军区同志也说不知道……"

关锋问："那是谁通知的？"

康生："省军区为什么不知道？省军区通知的嘛，怎么会不知道？你个人不知道还可能，怎么说省军区不知道，你能代表省军区吗？！"

关锋："那就是我们造谣的！是吗？"

康生："你能代表军分区吗？你到中央要实事求是的讲嘛！你不要讲了，另外的同志讲吧！想通了再讲，我们不听你这一套！"

康生讲完把眼镜放下，很生气。大家热烈鼓掌。

康生停了一回儿说："晋中区的同志还有哪些起来讲话，正面的反面的都可以讲，赞成任、王、张的也好，赞成崔冰的也好，都可以讲。"

五中"井冈山"女学生郭宏："晋中情况我知道，我讲一点。"

晋中一"晋中总司"观点的代表说："我是晋中的，我要求说说。"

康生："都可以讲嘛，等一下讲嘛，让她先讲。"

郭宏讲了她被抓进晋中军分区监狱的情况。她说，军区有人骂她是反对解放军，骂她是小王八蛋时，她哭了。她说："那些人完全不理解革命小将的心，也不可能理解革命小将的心。"她

讲了对解放军支左的一些看法。

康生对郭宏的讲话表示很满意，连连点头说："同志，你的那句话讲对了，就是通过解放军支左就把军队内的问题暴露在社会上了。毛主席就是这样地讲的。"

郭宏问："山西的权现在有没有彻底夺到无产阶级革命派手里，革命领导干部有没有掌握了实权？"

康生："我问你一个问题，你是哪月哪日被捕的？"

郭宏："3 月 4 日凌晨 3 点被抓，到 5 月 9 日下午 3 点多钟释放，共 50 多天，在军区警备营关了 10 多天。"

康生："谁抓你的呀？"

郭宏："当时黑夜，有好几个人，有两辆车，一个叫张检察长的，他眼睛挺大的，当时我想，他挺像个法官的。"

康生："兰敏同志，是不是你派人去抓的？那个抓人的是谁？"

兰敏："是我派的，那个就是她讲的张检察长。"

康生："派的是不是部队的？"

兰敏："是部队的，是张检察长。"

关锋："为什么抓人？为什么要逮捕她？"

兰敏："当时他是把她叫来问一问，因为车成林在晋中抢了材料，而她和车成林是协从关系，通过她可以了解车成林。时间是长了一点，两个多月。"

兰敏所说的车成林在晋中抢材料一事，是指 1 月 23 日，山西"决死纵队"和"兵团"的一些人在车成林、王清英、郭宏的带领下，到晋中行署公安处机要室抢"黑材料"的事情，当时被

晋中军分区阻止，并抓了车成林等人。

康生问兰敏："是谁批的？"

兰敏答："张日清同志批的。"

关锋说："无法无天，长了一点，这是长了点？到底专谁的政？"

康生："从你们几天来的表现看，车成林到底是不是反革命分子？我们怀疑，车成林材料要全部交我们看，看到底是不是反革命分子。"

兰敏："如果我们错了，就错在我们认为晋中'总司'夺权是对的，张日清和我都有这个思想，认为晋中'总司'夺权对，谁起来反对就是反夺权。"

康生："问题不在这里！"

关锋："这问题很严重吗？就是夺权对，他们也不能抓起来嘛！《公安六条》你们执行不执行？专政委员会到你们手里，你想抓谁抓谁？"

康生："兰敏同志，你好好听听，将你的政治水平跟小将们水平比一比，到底你那水平高，还是革命小将水平高，从这些小将同志发言很可以得到教育。你总认为自己是老资格，人家都不革命，反革命，就自己革命，这次可得到教育。革命小将在毛泽东思想照耀下，在实际斗争中的体会是比较深刻的，毛主席说，军队支左有很大好处，就是使军队本身受到教育，他们从实际斗争中体会到这个问题：支左不仅支革命群众，支左派组织，不但看到社会各方面存在两条路线的斗争，同时也能看到军队里存在两条路线的斗争，看到阶级斗争也反映到军队里边，军队通过支

左也同样把问题暴露在社会上，从而加上军队，提高我们军队的思想水平。这才是唯物主义辩证法。下面由晋中同志继续发言。”

宋志明：“我揭发一下关于山西省军区的问题……”

康生：“同志，你叫什么名字？”

宋志明首先介绍自己姓名，还说明自己原来是平遥县县长，现在是文水县县长。随后就讲四月份张日清怎样派人抓他，军区检察长张维宽、军区法院长李怀恩和兰敏怎么审问他。当宋志明讲到张维宽对他宣布说是代表军区、代表省专政委员会，奉刘格平、张日清的指示来抓他时，刘格平说：“那是冒充的！”

康生问坐在对面的山西省军区司令员陈金钰:“你好好听听，军区有保卫处吧？”

陈金钰司令员答：“有，有三大处。”

宋志明讲完后，康生说：“北京政法学院有两个被捕过的，几次要求 5 至 10 分钟的发言，现在可以发言，因为他们不是一般北京学生。”

关锋说：“也是被‘军管’了的！”

北京“政法公社”李承义同学讲了他被捕的经过。

晋中“总司”一人说：“我提个要求，根据今晚任井夫发言，有许多虚伪性，我要求发言。”

康生：“我刚才讲了，你们有时间发言，大家都有机会哩，下面还有会嘛！你们要好好学习毛主席著作，希望‘红总站’、‘红联站’的同志要好好想想山西的大方向，不要抓某个人讲了些什么，某一团体怎么样。这个特别是‘红联站’的这方面要注意。要多从山西的大方向方面想想。”

关锋："要从大局着眼！"

康生："要从大局出发，要告诉大家什么是大局。第一、现在有人在部队煽动，就是要部队拥护张日清、反对刘格平。第二、山西还存在什么问题？就是山西武装部调农民带枪进城。同志们想一想，农民带枪进城要干什么呢？会发生什么结果呢？这是什么问题？第三、山西专政委员会，无法无天，那样的对待革命群众，有些武装部，尤其是晋中武装部那样反对陈永贵啊！不是拥护陈永贵！如果不采取措施解决，有些要犯大错误，不仅晋中问题，太原也是这样。

这些都是大问题，大局，希望各方面同志要多想一想，是不是大问题。今天问题未发展到太严重，比其他一些地方好，但一定要注意。可是存在那样一个危险，同志们好好想一想。"

李金谓说："康老，我刚从太原来时，军区有人对我说，刘格平也可能是个叛徒，他们正在布置，要调查刘格平同志的材料。他们这样的，这问题比较严重。"

康生笑了："让他们把材料调查完了以后再说吧！"

这次接见结束。

## 第 729 回：七一六，天津“大联筹”成立　谢富治，又来到“百万雄师”

7 月 7 日，天津发生了围砸军工 3527 工厂的事件。起因是 3527 厂旁边的天津市第 55 中学，学校里的两派组织发生了矛盾，一派属天津“五代会”的“红代会”，一派属“大联筹”的“红革会”。3527 厂是天津“工代会”的成员，当然支持 55 中学的“红代会”组织。于是，“红革会”的学生就叫来了“大联筹”的工人支援他们，包括河北大学“井冈山”、天津市“工矿企业无产阶级造反总部”、“工农学革命造反野战兵团”等组织，一下来了 3000 多人，把 3527 厂包围了。告急电话打到市“工代会”，同时厂里也派专人赶到“工代会”，请示怎么办？当时工代会里有两种意见：一种是主张不正面冲突，派人把厂里的工人安全转移出来。另一种就是主张派兵和他们对打。“工代会”头头林启予觉得不能打，一旦打起来，很可能造成伤亡，后果难以预料。于是决定：“撤！不正面冲突。”他将这个决定请示了天津市“支左联络站”的领导，并派出电业和基建的队伍，从 3527 厂的后门将全厂职工转移出来。工厂空了，“大联筹”的人攻进去后，在厂里一通哄抢乱砸，还打电话给消防队，谎称工厂着火了。消防队派出两辆消防车到工厂灭火，被“大联筹”扣下，随后，将消防车也砸坏了。

7 月 8 日陈伯达在北京人民大会堂紧急召见天津驻军支左联络站负责人，并指示：

“工厂是国家的财产，社会主义的财产，人民创造的财产，怎么忍心破坏吗？请你们好好想一想。”

“工人是老百姓，是国家的主人翁，你们可以用对待敌人的办法对待劳动人民吗？”

“要把我的话贴到街上，贴到每一工厂。我上边的话是提醒受蒙蔽群众的。”

“现场不要动，要由五个代表会议组织人去参观，借机教育人民。”

根据陈伯达的指示，天津“五代会”组织各个单位到现场参观，“工代会”还安排了 800 人保卫这个现场展览会，以防“大联筹”的人再来。从那个时候开始，“工代会”在各厂成立了护厂队、文攻武卫队。

7 月 16 日，反对天津驻军和“五代会”的“天津市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筹备委员会”，简称“大联筹”正式成立。“天工八二五”是“大联筹”的总部。

7 月 16 日晚，北京地院“东方红”负责人王大宾因双脚麻木，抬不起来，被送到小汤山医院住院治疗。

一天下午，有人敲门。王大宾开门一看，是王震！他又惊又喜，忙将王震老将军请进屋，又请坐，又到水。

王震说：“好久不见了，听说你生病了，在这里住院，特来看看你。”

王大宾忙说：“不敢当，不敢当。您是我们尊重的革命老前辈，我这个晚辈怎能受得起。谢谢您的关心。”

王震与王大宾是五一节那天在天安门城楼上认识的，当时他

俩正在聊天，恰好毛泽东和周恩来走过来看见他们，毛泽东说："王震同志是好同志，打不倒的。"回去后，王大宾立即将毛泽东的这段话转告了北京农大、农机、林学院的战友。

这次相见，十分突然。寒暄过后，王震说："今天一来看看你生病住院了，二来是想和你聊聊天，谈谈农口文化大革命的事，交换交换看法。"

王大宾首先讲了地院的文革情况和 4 月发生的冲击北京大学的事。他对王震说：

"和北大冲突，这事想来都害怕，我们太不冷静了。当时要是在北大发生武斗，出了人命，我可能就成了罪人了。为此，我们都受到了中央领导的批评。""其实我和聂元梓个人并没有什么矛盾。当时还在筹备成立北京市革委会，我只是不同意她当一把手。'新北大公社'孙蓬一背后说谢富治是摘桃派。"

王震插话说："北京市的第一把手不是谁都能当的。你知不知道刚解放时是谁当的？是叶帅，后来才是彭真。聂是骄傲了，无自知之明。闹派性不对，什么事都应当商量解决，不要搞山头主义、宗派主义。否则是要犯错误的。"

听王大宾讲完后，王震说："我们商量一件事。我知道，你和农口的几个学校头头关系好，都是你们原来'三司'的。你是不是做做他们的工作，文化大革命要抓革命促生产。学校可以停课闹革命，工矿、农村就不能停产。工人要做工，农民要种地，军人要保卫国家。现在学校也要复课闹革命。民以食为天，7 亿人都要吃饭。农口是主管全国农业的，必须要确保农业丰收。农口必须要建立好正常运转的领导班子。主管农业的一些领导有缺

点错误，要批评说明，但也要大力支持他们的工作。”

接着王震说了王观澜等几个农口领导的名字和北京农大、林院、农机学院的几个领导的名字后说：“要在批评他们的错误后，尽快解放出来。不同意见要求大同存小异，搞好各院校的内部团结。千万不要搞派性斗争，打架，势不两立。国家需要大量的农业技术人才，学校是培养人才的，教育传授知识的地方，要赶快复课闹革命。要大胆解放干部，支持他们站出来工作。”

王大宾说：“请您放心，我一定会向他们转达您的指示。”

王震说：“用你的话去说吧，不要说是我的指示。”

王大宾说：“我明白，不会对他们说是您的指示。农大冯兴旺、农机潘朝东、林院王德祥，他们都是市革委会委员，和我一样都是农民的儿子，都是我的好朋友。他们的学校，运动搞的还是不错的，没有分裂成两大派，像清华、北大那样在校内斗。农大‘东方红公社’冯兴旺他们，1966 年曾保过农口的谭震林副总理。当时戚本禹讲过，谭震林是老红军，是革命干部。后来情况变化，反‘二月逆流’，又说要打倒谭震林，冯兴旺他们为此还做了多次检讨。”

谈话中，不觉到了吃饭时间。王震说：“今晚我请你。”

他们到了医院餐厅，餐厅负责人一看是王震来了，非常热情，作了丰盛的安排。吃完饭后，王震要付钱，餐厅坚持不收，相持不下。王震生气了，说：“你们是不是要我犯错误呀！”餐厅服务员这才勉强收下钱。

王震走后，王大宾马上用医院的电话和冯兴旺、潘朝东、王德祥联系，请他们第二天上午来医院，说有要事商量。

第二天上午，冯兴旺他们如约来到医院。就在王大宾的病房，王大宾向他们讲了王震来看他及同他的谈话内容。几个人交流了意见后，都表示同意。也都赞同对外不说是王震的意见。

王大宾对他们说："我们地院现在从不过问地质部机关内部的事。我们只发表了一个声明，坚决支持地质部新的领导班子的工作，表示一下态度。"

7 月 16 日晚，谢富治、王力来到武汉汉口区 3506 工厂"百万雄师"联络总站，"百万雄师"在场人员态度冷淡。谢富治看到"百万雄师"的态度不热情，也没有多说话，只是劝诫他们要好好学习文化革命的基本知识，弄清文革是怎么一回事；要求收缴武斗器械，立即停止武斗；停止煽动性宣传，撤销所有的工事，保证不同观点的人有"四大"的权利。

后来，一个女负责人向谢富治介绍了"百万雄师"负责人俞文斌、杨道安、刘敬胜等人。谢富治对俞文斌说：

"老俞呵，写个头头的名单吧。"

俞文斌开好名单交给谢富治，谢富治把名单装进了口袋后一句话也不说了。

这时，王力批评"百万雄师"说：

"你们在据点里，集中起来搞武斗是错误的！"

俞文斌解释说："我们有厂不能回，有家不能归，是被逼得这样的，一回去就挨打。现在中央代表团叫回去，'百万雄师'同意，但希望中央代表团和武汉军区召集两派组织谈谈，订几条规矩，由中央派人监督，大家一起回去……"。

王力摆摆手说："你提这个问题就是错误的！你们管你们自

己，不要管人家嘛！你们怎么管得了人家呢？”

俞文斌顶撞说:“那你的意思是叫我们单方面撤退,是不是？这不叫制止武斗,叫我们单方面回去，等于叫我们投降。举手投降的事我们不干！各群众组织是平等的，希望中央代表团也平等对待!”

“谁让你们投降？你们想一想，你们把对方当成了什么人！这是对敌人使用的语言，你们把自己的同志当作敌人对待，这是中央代表团绝对不同意的。”王力激动得满脸通红，继续说道：“过去，你们把人家当反革命看待，就凭这一点，你们就是错误的。”

“中央代表团不能偏袒一方，各群众组织都是平等的。希望中央代表团要平等对待，一碗水端平。”俞文斌心里有些毛，表明上还坚持着。

王力依然不客气地说：“现在，首先要制止武斗，我们要求你们必须做到几点：

1、立即停止武斗；

2、停止煽动性的宣传；

3、撤除所有的工事；

4、不准用交通生产工具；

5、不准挑动农民进城；

6、不准拦车，所有岗哨必须撤除；

7、保证不同观点有四大权利。”

话不投机半句多，双方前后谈了只有 20 多分钟，不欢而散。在场的“百万雄师”头头和骨干，对谢富治、王力的态度与话语

十分不满，消息在次日迅速传达到各级头头。在湖北省劳改局支左的独立师军管会代表说：

“王力是知识分子，是相信知识分子的，是执行臭知识分子路线。”

“这次王力这样搞下去，我看他回不回得去成问题，‘百万雄师’不把他搞死才怪呢。那时候部队才不管的。”

对于中央来人，“百万雄师”高层存在两种意见，一是按原来准备的材料汇报，希望扭转中央对于武汉形势的看法；另一种意见是对中央是否会倾向于“百万雄师”毫不乐观，失去信心，倾向于公开的反抗和斗争。尽管此时他们还不知道周恩来 15、16 日批评军区的讲话精神，但已经十分清楚：由谢富治、王力等中央文革要员代表中央处理问题，决不会倾向“百万雄师”的。

这天，武汉三镇大街上就开始出现“百万雄师”署名的大标语：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反对钦差大臣！”

“强烈要求谢富治、王力到工农中来！”

“强烈要求王、谢首长下连当兵！”

谢富治、王力从武汉 3506 工厂“百万雄师”联络总站出来时，已是 17 日凌晨 1 时 20 分，他们 6 人又乘车来到武汉测绘学院 2 号楼，这里是“二司”司令部所在地。

谢富治下车后，对“二司”的值班学生说：“我们是北京来的，来找‘钢二司’勤务组的。”

值班学生一下就认出是谢富治和王力，情不自禁地喊出来：

“谢副总理、王力同志来了!”

谢富治赶紧用手制止他说：“不要喊，不要叫喇叭！去找几个负责人来。”

于是，值班学生将谢富治、王力等人带到 1 号楼 201 室“二司”参谋部办公室。一会儿，“二司”司令部几位负责人方保林、鲁性祥、杨运年、王驳清、朱振铎、唐正国来到这里，谢富治、王力等人和他们一一握手后，谢富治问：

“你们有几个勤务员同志？”

“我们有 5 个勤务员同志。”

王力说：“把名字写出来，写大一些!”

“二司”同学将名字写好交给谢富治和王力。

谢富治问：“你们杨道远是哪里人？哪个学校？”

“是河南人，武测的。”

“啊！又是河南人，我昨天遇见的也是河南人。”谢富治说。

“前面三个勤务员都是河南人。”学生回答。

谢富治极为风趣地说：“河南人都来我们湖北当官，我们湖北成了空架子!”大家笑了起来。

学生们接着汇报说：“我们‘二司’是除了华工、湖大以外，所有的大专院校和中等学校 100 多个总部组成的，其中有 15 个常委学校。”

谢富治说：“常委，那好，就把常委学校名单给我。”

“二司”同学又将名单写好交给谢富治，并简单介绍了司令部的各级组织情况。

“你们‘二司’管工人吗？”谢富治问。

“除院校工人外，其他造反派工人都参加‘工总’、‘九一三’等革命造反派组织。”学生答。

谢富治：“啊！‘工总’、‘九一三’在哪儿？”

“二司”的人说：“他们被赶出来没有固定地方，现在可能在水电。”

谢富治问：“能找到他们吗？”

“二司”回答：“可能找得到。”

谢富治说：“好，把他们叫来，用电话找，不要说是我们来了。”

王力问：“你们这座楼都住的‘钢二司’吗？”

“二司”答：“有‘三司’的同志。”

王力：“哦！你们两个搞在一起，好！和平共处。”

谢富治：“你们能不能找两个‘三司’的来一起谈谈？”

“二司”：“这个地方可能没有住人，白天在这儿办公。”

王力指着 4 号楼说：“到司令部（指三司）去找两个来。”

谢富治对一起来的一个工作人员和一个“二司”学生说：“去，你们一同去找。”

“二司”的人说：“我们今天上午游泳的同志还没有回，有的还是 8 点钟才下水咧！现在回不来，被堵在新一中。”

谢富治：“听说新一中有 1000 多人，还准备搞游行！”

“二司”：“我们今天下午渡江，一只保护船都没有。”

谢富治问：“没有淹死人吧？”

“二司”答：“可能没有。”

两个“三司”的负责人随“二司”的学生走了进来，谢富治、

王力和他俩握手，并问了他俩的名字。

“我叫许谦，他叫李永金，我是总负责的，他是政宣部长。”

王力：“好，把名字写出来。”

“三司”许谦说：“首长来了很高兴，我们都在准备欢迎，同志们都希望见到首长。我们明天召开一个斗争刘少奇大会，请首长到会作指示。”

谢富治和王力沉默未答，许谦接着说：“我们非常希望听首长的指示，大家都恳切要求首长作指示。”

谢富治：“哦！开大会，我们不能去，我刚到武汉来，还不了解情况，现在是在学习的，大会最好不要开。”

王力：“你们开会要我们参加，他们开会也要我们参加，武汉的问题怎么解决？靠大家来解决。不要开什么大会，不要搞什么游行。我们到这儿来，就是要找大家解决问题。我们首先要求回原单位，所有的人都回原单位，原机关，都要响应毛主席的号召。要保证四大，哪怕只有一个人也行，要允许他们为一派。”

“二司”：“首长来汉，我们高兴，但是也很惭愧。我们很早就盼望首长来解决武汉的问题 。我们没有做好工作，没有完成好党和毛主席交给我们的任务。心里很难过。我们首先有一个要求，要求能回原单位，”

有学生插话说：“我们很多中学生战士被赶出来，无家可归。”

“二司”继续说：“现在不能回去怎么办？”

谢富治：“今天我们就是来解决这个问题，向你们学习，这个要求很合理，目前的迫切任务就是要制止武斗。”

“二司”：“武汉机床厂，有个战斗队员被赶出来，后来，他

妈妈送他回厂上班，结果还是被‘百万雄师’打伤了。”

谢富治：“这样的事天天都有，是违反毛泽东思想的。我们这一次要解决。”

他接着问道：“我们昨天到华工你们知道吗？”

“二司”答：“我们不知道。”

谢富治：“我们这一次来，是来向大家学习的，是毛主席、林副主席派我们来的。我们首先代表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亲密战友林副主席、党中央、周恩来同志、中央文革陈伯达同志、江青同志、关锋、戚本禹同志向你们表示亲切的问候。并希望你们转告全体战士及武汉地区、湖北省无产阶级革命派。我们希望你们在制止武斗方面做出贡献，采取措施。我们伟大的领袖在制订《十六条》时就提出‘要用文斗，不要武斗。’这是毛主席亲自写的，后来林副主席作了发挥，你们都是学生，是革命小将，是毛主席的红卫兵，你们最听毛主席的话。今天，我跟王力同志来，和你们商量两件事：

一、应该立即停止武斗，制造和平气氛，为解决武汉地区问题创造条件。你们‘二司’是有名的，我们是知道的。你们应该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导，坚持文斗，反对武斗，立即停止武斗。我们希望你们根据中央六条达成协议，能达成几条就达成几条，或者不能就单独发表声明。你们‘二司’是很有影响的革命造反派组织，要有风格，要站得高看得远，”

“三司”插话：“我们从来不搞武斗。”

谢富治：“可能少些吧！你们‘三司’不同意武斗，那也好。武斗停下来以后，造成和平气氛了，就请你们来谈问题，原则的

分歧，路线的问题，是可以解决的，你们‘二司’有很多好的意见嘛，‘三司’也有嘛！

二、希望你们坐下来学习，学习中央文件和社论，特别是学习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十周年重新发表，不是一个简单十周年的问题。而有更重要的现实意义。在文化革命运动中，有许多问题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你们要好好学习。学好了，就有了锐利武器。认清当前形势，掌握斗争的大方向，分清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

## 第 730 回：武汉市，造反派封存长矛　毛泽东，继续听云、川汇报

这时，“工总”、“九一三”的人赶来了，谢富治和王力与他们一一握手，王力说：“请签个名字吧。”

“工总”、“九一三”签名时见上面是“三司”的名字，不和他们签在一起，要和“二司”写在一起。谢富治笑了，问他们：“怎么，不愿和‘三司’在一起，……”

此时，随行工作人员对谢富治说：“外面还有 3 位同志。”

谢富治问：“是那个组织的？”

“工总” 沈复礼回答：“是送我们来的战斗队员。”

谢富治：“叫他们都进来。”

“二司”：“军区现在还不承认‘工总’。‘百万雄师’写大字报，说中央叫军区不通知‘工总’。”

王力：“我们没有说。我们到武汉来，各种意见都可谈。”

“二司”：“我们‘二司’是从白色恐怖中杀出来的，是一直受压制的。这次‘百万雄师’搞武斗，打死我们好多人，制造很多血案，我们一再和军区交涉，但是他们听不进我们的话。过去王任重把我们打成反革命，现在还把我们当牛鬼蛇神打。所以，‘百万雄师’杀我们就下得了手。”

谢富治：“这个作法是错误的，是牛鬼蛇神，毛主席和林副主席还向你们问好？但是你们要正确地分析形势，现在不要把这个问题上纲上得太高了。”

王力对“工总”、“九一三”来人说：“刚才你们未到，现在大家都来了，就再把谢副总理意见说一遍。昨天我们到‘新华工’，今天又到你们这里来。我重复一遍，我代表毛主席、林副主席、周总理、陈伯达同志、江青同志及中央文革、军委文革的其他同志，向武汉地区，湖北地区的革命造反派问好！并请你们转告全体同志，毛主席、林副主席很关心武汉地区文化大革命运动，希望武汉地区文化革命顺利前进。”

“向你们提出两条建议：

一、你们就中央六条达成协议。能达成几条就达成几条，不能就单独发表声明。我已到过‘百万雄师’那儿，和他们订了几条，要他们立即停止武斗，停止煽动性的宣传，拆除所有武斗工事，不能动用交通工具搞武斗，不许挑动农民进城，不许拦车检查，所有岗哨都要撤消，武器要销毁，保证不同观点的人有四大权利。

二、你们现在就开始坐下来学习，特别是学习《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按主席的思想、路线、方针办事，如何分析形式，掌握斗争的大方向，区别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然后检查一下你们的口号，斗争的策略，如叫‘百匪’就不利于做工作，也不会因你骂就会增加什么，不能因为你骂得到什么！”

大家笑了起来。

谢富治：“听说‘百万雄师’就要单方面发表声明，希望你们马上采取紧急行动，要积极主动。”

中央文革工作人员张根成说：“你们要主动。不能拦车，我们这几个人是打不跑的，打伤了我们不要紧，那时，你们可被动

了。”

“二司”学生指着王力放在桌子上的军帽说：“有了这，我们革命造反派是不会拦你们的。”

张根成说：“不一定吧，我们坐军车走路时，就有人喊：陈大麻子坏透了！”

“二司”学生说：“这个口号很有阶级性。”

谢富治笑了笑，站起来说：“把解放军战士说成是‘麻子’，是不行的，应该制止。”

“二司”说：“我们从来就没有把解放军战士说成是‘麻子兵’，我们是指‘三字兵’、‘大专兵’，是根据‘体学兵’，‘任重兵 ’来的，那种说法完全是挑拨我‘钢二司’和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血肉关系。”

谢富治：“‘任重兵’、‘体学兵’也是不对的，应该坚决制止”。

“二司”说：“在上次红代会上我们就提出制止这种问题。”

谢富治：“希望你们高姿态，否则低姿态就要输一着。不要附加条件，要首先采取行动。我们到汉四天时间来你们这儿两次了，我们可不是‘支保’啰；我们是为你们好嘛！上次我来你们这儿，和你们辩论过，为什么在‘三司’前面加个‘康’字，骂‘康三痞子’那就错了。”

“二司”插话：“还有骂‘二癞子’的。”

谢富治：“那更不对。”

他转向“三司”：“上次来，你们‘三司’喇叭太吵了，你们改掉没有？是司令部，还是学校的，应该拆掉一些，太吵人。”

“三司”：“只有 28 个。”

“二司”：“有 30 多个。”

谢富治：“现在你们整天在考虑如何防守，如何进攻，”

“二司”插话：“我们不进攻。”

谢富治：“你们不是有个‘文攻’吗？如何试‘氢弹’？你们谁管作战的？谁呀？”

一个同学站起来说：“我就是作战部长。”

谢富治：“你整天俯在地图上研究什么？是不是打仗？制造武器？”

那位同学答：“不，我主管斗争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大会，批判大会。”

谢富治：“这就对了。”

那位同学继续说：“不过，自卫性武斗也管一些。”

谢富治：“主要是这个问题，要集中精力解决这个问题。”

“二司”：“关于武斗的情况，我们多次与军区交换意见，但毫无效果，以前我们敢提，现在首长在这儿，我们更敢提，血债我们一定要讨还的。”

“九一三”代表说：“我们是工人，是个老粗，我只说直的。毛主席说：‘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在路线问题上没有调和的余地。’并不是我们工人好斗，而是为了自卫，为了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而斗争。我们认为现在不是一般的武斗，而是陈大麻子挑起的反革命武斗。铁道四院，武机，……都被砸。连八、九岁的孩子也不放过。如果我们不自卫，不行，我们武钢战士不少被赶出来，无家可归，现在，他们搞绑架、暗杀，‘711 事件’，我们损失很大。”

谢富治："你是什么工人？"

"九一三代表答"："钢厂工人。他们有长矛又有汽车，像汽运六站……"

谢富治："我知道，动用了 100 多辆，对吗？"

"二司"答："对！"

"九一三"："我们'三钢'是怎样来的呢？就是被他们骂的黑'工总'，黑'九一三'，黑'二司'。"

"工总"："现在他们搞'护厂队'，实际上是把他们的力量集中起来搞武斗。每次都是他们挑起的，他们守在门口不让我们进。"

谢富治："什么'护厂队'，以后要取消岗哨。武斗可能是一方面主要的，但是也不能都怪他们。我到过成都、重庆，云南等地，主要是靠大家解决。我们作了工作，关于'715 游行'，我们批评了军区，没有批评你们，以后武装游行、游行都不要搞了。"

"工总"："我们能回去的一定回去，现在我们有厂不能归，有家不能回，我们革命造反派从来就是抓革命促生产的模范。"

谢富治："你们能回去就回，不能回就暂时不回，等武斗停止了再回。"

"二司"："我们还有许多被抓了没有放，希望能放出来。"

谢富治："把名单全部交给我，在什么地方被抓的写上，我明天派人来拿。"

"二司"："谢副总理是不是到水运去看看。"

谢富治："我们已经派人去看过了。"

"二司"："还有很多地方，你们可以去看看，如红卫纱

厂……。”

谢富治问：“还有什么？”他对工作人员说：“记下来。”

“工总”：“江汉公园、新公校、汽运六站、汉阳铁中、桥口，……”

谢富治与王力说：“我们不怕，都去看。”

17 日凌晨 2 时 25 分，王力说：“今天就谈到这儿，以后再来找你们。”

送谢富治、王力等人下楼梯时，谢富治拍着“二司”一位学生的臂膀讲：“我这个老乡不像湖北人了，很久没有回家了。”

“二司”：“多少年没有回来了？”

谢富治：“40 多年了。”

“二司”：“武汉问题解决后，可以回去一次。

谢富治：“不行啦，太忙。”

最后谢富治和王力再一次和大家一一握手告别。大家以热烈掌声送别了他们。

回到东湖宾馆，谢富治为“百万雄师”武斗队集结在 3506 军工厂的事，批评了陈再道和钟汉华，要求通知他们搬出工厂去。

从 17 日开始，各大专院校造反派按谢富治的要求，开始陆续集中和封存自制长矛。

7 月 17 日上午 9 时 30 分，毛泽东在梅岭一号召集周恩来、谢富治、王力、杨成武、余立金、郑维山、汪东兴等开会，听取谢富治、王力关于四川、云南及湖北等地“文化大革命”的情况汇报。毛泽东接着头一天的话题问：

“你们在昆明给冲了会场？”他一边吸烟一边望着谢富治

问，“还讲了话？”

“我和王力同志都讲了。”谢富治回答。

“李成芳站得住站不住？”毛泽东还是首先关心部队和部队干部，连续询问西南各省的“军管”情况，各市有没有独立师？因为各省会和重要城市的独立师，其重要性就相当于北京的卫戍区，天津、上海的警备区。他关心得细，甚至连张国华等人有没有下过工厂车间也谈到了。

“军管就是难办，谁管谁要犯错误。着重做军队工作，”毛泽东开始表态，“给他们开脱好。对他们讲，四川问题，主要是李井泉、廖志高、黄新庭、郭林祥的事。其次是甘渭汉、韦杰。李文清还支了一下左，不能让军队干部和战士负责。”

有人插话：“群众组织抢枪是个严重问题，到处揪赵永夫式的人物。”

“不要那么紧张。让人家骂骂有什么要紧。什么赵永夫，什么谭式人物，什么匪首，都不能恼火。”毛泽东用手里的香烟指一指郑维山说：

“郑维山，你们也要准备挨骂。骂一下有什么要紧。有枪枝弹药也不要那么紧张。重庆，只有一万发子弹，打一会儿就光。打了那么多年仗，怕什么。”毛泽东将手轻轻一拂，继续说：“四川革筹小组补充了 12 个代表，里边有李大章。谁说李大章是刘结挺勾结的？那是我的事，我提过多次。不行，当个黎元洪也很好，总要有个把在四川有名的人。”

“周兴、赵健民，你们没谈？”毛泽东从四川又谈回云南。

“周兴病了，赵健民谈了一下。”谢富治回答，“他对《五一

六通知》认识不够。”

“发 5 月 16 日通知，我同总理临时决定的，发得那么快。引起好多猜测，还整到总理头上。北大、清华也有这种论调。”

谈到农民进城武斗的问题时，毛泽东说：

“现在搬农民已经是很虚弱的表现。过去农村包围城市是正确的，那时是帝国主义、蒋介石占城市。现在讲农村包围城市是错误的、反动的，现在是共产党的城市嘛！怎么能包围呢？”

当谢富治说到公、检、法都有问题时，毛泽东说：“不一定，有坏的，也有一些好的。”

当谢富治、王力汇报到云南要打倒李成芳、湖北要打倒陈再道时,毛泽东插话说:

“凡是有错误，不管是大错误、小错误，只要认识了错误，统统不打倒。人家承认错了，还要打倒，那就是他们的错误了。陈再道只要承认了错误，打倒也不行。陈再道、孟夫唐都不要打倒。”

“军队犯错误犯得快，改正也改正得快。”毛泽东燃起了一支香烟,继续不紧不慢地漫谈：

“真正要打倒陈再道,怎么行呢？错误改了,他们还要打倒,那就是他们的不对。陈再道就是不动脑子，少政治。”

说罢，毛泽东指了指周恩来说:

“我和总理在北京就说了，到武汉是来给陈再道保驾的。武汉军区要起草个稿子，发表公开声明：一是有功，二是有错嘛！支工支农有功，支‘左’就有错嘛!”

谢富治接过话说：

“武汉军区是支保吃‘左’，屁股坐歪了，大方向错了。我们上街看大字报，做了调查研究。街上几岁的娃娃都知道‘三钢’、‘三新’好，是造反派，揪‘武老谭’，‘百万雄师’坏，是保皇派。军区解散‘工总’，抓了人家的头头和那么多群众，不得人心。”

毛泽东坐起身，语气也加重：“‘三新’‘二司’，你压，越压越成钢。对‘工总’那么整，不商量，不报告，就是有问题吆。整工人革命派，是有意识搞的。”毛泽东皱着眉头点香烟，用力吸进一口说：

“‘工人总部’要平反，抓的‘工总’的几个头头没放的最好是今天明天就放了，刑事犯罪另案处理。”

他再吸两口烟，已经平静些，语气变宽宏：

“陈再道呀，政治上落后了，不用脑子。这下要动动脑筋。”

“他的错误很大。”王力急急抢一句。

“大错小错，只要检讨了，就没事。” 毛泽东又以征询的口气问大家：“要陈再道检讨，能转得过来吗？他的资格比谢富治老，能说得通吗？他能动脑筋想问题就好，我们保驾。”

说完，他又重复一句：“陈再道、孟夫唐都不要打倒。”

对军区如何处理好两派之间的事，采取什么方式？毛泽东想得很周到。他说：

“起草一个稿子，发表一个公开的声明。第一，有功；第二，有错。有功是支农支工。军训怎么样？”他问到会的人。

“军训全反过去了。”王力回答。

“反过去，还是反过来？”毛泽东又问：

“‘百万雄师’是个什么组织？”

“他们提出，全线反击……”谢富治回答。

“那是中央苏区的口号，结果是全线撤退，万里长征。不要相信。” 但是考虑到群众的心情，毛泽东还是指出：

“‘百万雄师’是群众组织，继续保持名称，要搞入正轨。它不像军队，下一道命令就行。谢富治、王力要派专人做他们的工作，进行教育，可以转过来。军区对两派都要支持，陈再道支持造反派，造反派是会拥护陈再道的。三派(指‘百万雄师’、‘二司’、‘三新’)要达成协议，搞一个协议书，发表个声明。”

“武汉三派都有报纸，‘百万雄师’的报纸没人看，广播没人听，一广播，老太婆、小孩子进了屋，‘三新’、‘二司’的报纸抢着看，一广播，老太婆、小孩子都搬凳子出来了。”

周恩来插话说：“有些老同志脑子一时转不过弯来。这次欢迎赞比亚总统时，我让陈老总去敬韩爱晶一杯酒。韩爱晶说，陈老总啊，我们要打倒你，不是真的要把你打倒，而是要把你打到毛主席的路线上来。我用手捅了捅陈老总，示意他表示一下态度，向革命小将学习，他未吭声。”

谢富治说:“湖北问题比较复杂,要解决有困难。”

毛泽东不以为然:“有那么严重吗？不见得，湖北的问题，我看也不难，比湖南、江西好一些。河南也不容易转哟，安徽闹得一塌糊涂，湖北有可能要先进些。对红卫兵不要太怕,不管哪一派,现在都要借用我的招牌。”他对谢富治、王力说：“对湖北，省市委的干部，也要找一些谈谈。”

毛泽东又问周恩来:“恩来什么时候回北京啊？明天回去吧，

去解决一下湖南问题。”

周恩来说:“郑维山同我一路回北京，这里留下成武、余立金同志，还有海军的李作鹏。”

毛泽东点了点头，同意周恩来的计划。

“主席，”周恩来摘下他的花镜，放茶几上，“武汉军区的汇报估计明天下午结束。晚上你是不是接见一下？”

“谈谈好嘛。”毛泽东朝杨成武扬起下巴，“你也听听，你是总参谋长。”

毛泽东最后说：“这次我到这里来，一路上基本是白天，到处庄稼很好，特别是湖北庄稼很好。”“这次出来是想休息一下，在北京一年了。13 日听说 100 万人游泳，才有这个念头，下午 4 点才下决心来。”

## 第 731 回：不服气，再道与恩来争执　上海打，淮南再发生惨案

武汉军区 7 月 17 日下午的汇报会上，陈再道等人和中央来人争辩更甚。围绕着武汉军区支左方向正确与否及如何对待武汉造反派和“百万雄师”，双方唇枪舌战，互不相让。

“你们武汉军区抓人，抓的都是些什么人？” 王力问。

“我也不知道是什么人，别人请示我说要抓 350 人，我说只抓 300 人就够了。”陈再道停顿了一下，又辩解道：“我们没有逮捕一个学生，没有公开打击造反派，造反派还有很大的力量，‘百万雄师’是对的，群众相信它，向着它。前几天他们搞了个十条，我看符合大方向，他们的方向对头，是好的。现在他们抓防汛又抓生产，‘百万雄师’是全国少有的组织。”

谢富治立即反驳道：“你们屁股坐歪了，大方向错了，完全是跟‘百万雄师’穿一条裤子！”

“我根本就没见过‘百万雄师’的人！”陈再道脸红脖子粗，“他们的头头我一个不认识，我知道他是张三李四王二麻子？”

“我们是响应毛主席的号召，执行三支两军的任务……” 钟汉华解释说。

“毛主席要求人民解放军要支持左派广大群众组织，可你们却把造反派组织‘工总’予以取缔，抓了他们的头头……你们打击造反派，我们等待你们两个月了，至今你们还不改正，不认错！”谢富治继续按照毛泽东确定的方针谈。

“我们是执行军委《八条命令》！”陈再道仍不服气，也瞪起

了眼睛强调，“他们冲击军区，搞打砸抢就要抓！《八条命令》是毛主席签发的，说‘所定八条，很好’！”

“你就讲‘八条’，你就不讲‘十条’，《十条命令》也是毛主席签发：‘此件很好’，你为什么不执行？”王力拍了一下桌子，“造反派揪‘武老谭’是把矛头对准当权派，大方向是对的，你们怎么能揪住一些缺点打击革命小将？”

“你算老几？要听你的……”陈再道没有把王力放在眼里。

“你们必须要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再不转弯，后果你们自己考虑！”谢富治严厉的指出。

陈再道质问说：“这是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你们要承认犯了错误。”谢富治提高嗓门说道。

“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余立金插了一句。

“不理解的也要执行？”韩东山摇摇头说，“这话不能简单地对下讲，要说出个道理来。”

谢富治听了，气得眼睛都瞪圆了，大声喊道：“你反对林副主席？” 全场顿时静下来。谁敢反对林副主席？吵红了眼，韩副司令竟忘了这话是林彪讲的……

17 日晚上，杨成武从周恩来那边过来，将几页纸交给毛泽东说：

“明天下午武汉军区汇报结束后，总理有个总结讲话，这是总理拟的讲话提纲，请主席审阅。”

毛泽东拿过来看了一遍，是周恩来的笔迹。为了让毛泽东看得方便，周恩来每次送给毛泽东的手写文件都是亲自用毛笔正楷书写，而且字写得比较大。毛泽东看后还给杨成武说：

“同意，他讲吧。史无前例嘛，没有经验，错了就检查，就改正，改了就好。”

得到毛泽东的认同后，这天晚上，周恩来按照事先计划，约陈再道和钟汉华单独谈话，希望他们能转变态度，跟上毛泽东的脚步。可是陈再道仍然不理解，十分抵触，就是不承认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周恩来苦口婆心劝说他：

“文化革命是史无前例的，没有经验犯了错误；错了改正就好；要你们承认错误，写检讨，是为了保护你们，不是要打倒你们。主席对此都已经表态了嘛！”

但陈再道就是不服，将支左办公室整理的“工人总部”的材料推给周恩来说：“‘工总’的头头打人，搞打、砸、抢，我这里有材料，你们可以调查嘛！”

周恩来问他：“你说‘工总’的头头打人，他叫什么名字？你到现场没有？”

陈再道一时语塞。周恩来拿出一叠材料对他说：“明明是‘百万雄师’调人搞武斗嘛，这里有这么多材料，你们为什么不看？”

陈再道不服气的问：“你说‘百万雄师’调人搞武斗，调人总要有个调令吧？”

周恩来从材料中抽出一张纸说：“是这个调令吧？”

陈再道一看，顿时语塞，但仍然不服，马上又说：“让我支持‘三钢’、‘三新’、‘三司革联’我就是想不通。”

周恩来拿出准备好的第二天讲话提纲对陈再道说：“这是主席亲自审阅的讲话提纲……”

谁知陈再道竟指着毛泽东审阅的，周恩来准备在 18 日总结

用的讲稿说:“如果真是毛主席在你的讲稿上签字,我们就执行。”他接着说:“毛主席自己说要相信干部的大多数、军队战士的大多数、群众的大多数，这三个大多数都是支持‘百万雄师’的，‘百万雄师’有一百多万人,怎么做工作？要给部队下面做工作你自己去做，我做不通”。

周恩来生气地对陈再道说:“你不要用‘百万雄师’来压我，不要说百万，你就是‘千万雄师’我也不怕。”

陈再道拍着桌子，大声嚷道:“你有什么了不起，你……我还不知道？”

周恩来气得也拍着桌子对陈再道说:“你不要以为我们拿你没有办法。”

7 月 17 日这天，安徽淮南又发生武斗惨案。

淮南“715”惨案以后，淮南“炮总”为避开淮南“总司”咄咄逼人的锋芒，集结淮南“炮轰派”的主要武装力量，全部撤至合肥长丰县的水家湖一带，同合肥 P 派集结。

水家湖是进出淮南的咽喉要道,淮南铁路线枢纽水家湖火车站就在这里。控制了水家湖火车站，就等于切断了淮南通往外地的铁路动脉,进出的人员、物品就全靠淮河水路乘船到蚌埠转车，费时费力。

淮南“炮轰派”占领了水家湖火车站铁路枢纽，秣兵厉马伺机再度打回淮南。“支派”则控制了淮南市区，形成了新的武斗割据态势。

合肥与淮南交界的舜耕山南，距李郢孜镇有 4、5 公里之距的杨公庙，虽是一个偏僻的乡村小集镇，却是通向淮南、合肥、

长丰、寿县，以及淮南铁路线枢纽水家湖火车站的交通咽喉之地，当时隶属合肥市长丰县。

7 月 17 日，天气更为酷热沉闷。杨公庙一带的公路上，灼热的熏风不时吹起沙土公路的灰尘，迷茫卷扬。正值全省两派大武斗之际，公路上远望而去，空荡清寂，几乎看不到昔日奔忙往返的车辆。路两旁密不透风的高粱秫秫，形成了一望无际的青纱帐。

下午 15 时许，两辆卡车由东而西急驶而来。车上载着头戴柳条帽，手持各种型号的步枪，枪上系扎着识别记号红布条的武装人员，虎视眈眈地注视着前方。首辆车驾驶室司机旁边坐是一位英姿飒爽的年轻指挥者，也是两车武装人员的负责人。他就是淮南“总司”西部八公山地区著名的造反派头头，“工总”第五兵团总指挥徐鹤。他们是乘车返回自己的驻地。

此时，杨公庙西段的公路远处，一条灰土扬尘卷起的巨龙，也正向东方滚滚卷来。这是由 20 多辆各种型号的卡车组成的车队，每辆车上都站满了头戴柳条帽，身穿工作服，手持各种各样的枪支与冷兵器的“炮派”武斗人员，他们正撤向长丰水家湖。他们的枪管上也系扎着红布条作为识别记号。每个人的眼睛也是虎视眈眈地盯着前方。

双方相对行驶的车队越来越接近，各自早注意到了对方，但是两方的武装人员穿戴相同，双方武器所作的记号也相同，各自的警觉都同样的松懈下来，不知对方就是我存你亡的殊死冤家。说时迟，那时快，双方车辆接近了、交会了、甚至擦车而过了，双方均误认为是自己人，有的人甚至鼓起掌来，意为向同一战壕

的战友致以自己最崇高的敬意。就在两方车辆交会至一大半时，只需短短的一两分钟，“支派”的车辆就会行驶过去，一场惨案就会神差鬼使地消弥了。可就在这时，一声尖叫呐喊：

“徐鹤！五兵团的徐鹤！他们是‘支持派’的人！”

于是揭开了“717”惨案的序幕。

也就是这声惊呼，把上帝已经缩回了的手又拉了回来！人们从短暂的迷愣思维中突然惊醒过来。霎时间枪声大作，子弹如刮风一般泼向对方。公路旁的庄稼叶子纷纷落下。

“炮轰派”人多枪众，又是从前后齐齐开火，两辆车上的“支派”人员早已在枪声、喊杀声中无意抵抗，亟欲夺路跳车亡命。

奔逃的速度岂能超过枪弹的飞速，“支派”的人员有的倒在车厢中，有的倒在车厢下，有的倒在公路庄稼地边，有的甚至未及跳车就倒在车里。仍有一部分人反应奇快、动作敏捷，跳车后边打边撤，蹿进路边的青纱帐内而逃得性命。

这场快速的枪战，致使“支派”几乎伤亡殆尽，徐鹤等人战死车旁。“炮轰派”得手后急速清点战场，有人还指着徐鹤的尸体恨恨地说“让你去阴间再当团长吧。”

当“支派”得到消息，援兵急速到达杨公庙时，路边只遗下7具尸体与滩滩血迹。

当天晚上，洞山军管会门前，一字排开7副躺着尸体的担架，上面蒙着罩单，黑漆漆的夜晚，再兼当晚停电，凄风声中，不时地传送着死者家人的痛哭悲戚声，整个矿务局军管会大院笼罩在瘆人的氛围中。

第二天，“支持派”内哄传谣言：“徐鹤等7人，竟然被‘炮

轰派’割鼻挖眼，开肠破肚！”至此“支持派”内无不咬牙切齿，声言报复！

上海在 7 月 10 日到 17 日，也发生了一场持续了八天八夜的武斗，南京路交通一度为之中断。

武斗的起因是 7 月 9 日，上海“上体司”与上海红卫兵汽车学校的学生在看电影时发生纠纷，进而发展成相互殴打，汽车学校 4 个学生被打伤。其中有一伤员的家长是上海“工总司”下属“交运联络站”的头头。“交运联络站”掌握着上海大量载重卡车、吊车和身强力壮的装卸工人。该头头见自己孩子被打，怒火中烧，于是“交运联络站”出动 50 多辆卡车和人，到“上体司”门前交涉，游行抗议。但谈判硬碰硬，不欢而散。

“上体司”全名是“上海市体育战线革命造反司令部”，成立于 1966 年 11 月 27 日，成员大多是各运动队的运动员和体校学生，下属有多个兵团，其主力有“鲁迅兵团”、“博斗兵团”、“钢筋铁骨兵团”、“风雷兵团”、“翻腾兵团”、“海陆空兵团”等，还有一支摩托车组成的“机械化部队”，经常在马路飞速而过。“上体司”主要头头叫胡永年，是个业余运动员，人们习惯用现代京剧《沙家浜》中的“胡司令”称之。这些由运动员组成的兵团，个个身穿运动服，身强力壮，膀子粗，肌肉发达。一些武术、举重、拳击、摔跤运动员更是武打好手。

“上体司”的司令部设在南京路西路 150 号的上海体育俱乐部，左边是著名的国际饭店，右办是华侨饭店，都是上海的标志性建筑，面对人民公园和人民广场。该大楼原为“西侨青年会”，1928 年由美国人菲奇.洛克菲勒等筹款 60 万两银子建造，1932

年建成。建筑立面具有西方古典建筑风格情调，外墙面砌不同深浅的棕色面砖，立面竖向和横向均采用欧洲古典主义建筑横三段和纵三段的构图手法，三层以上中间部分后退，留出空间，形成凹字形，增强了建筑的立体效果，又满足了旅馆部分采光通风等功能的要求。上细下粗的巨柱和穹形大长窗框装饰，使 1 至 3 层立面线条流畅气派。4 层以上墙面呈直线凸凹状，钢窗下的窗肚墙上饰浅色花饰。顶层钢窗外采用与 2 至 3 层相通风格的穹形窗框，使整个建筑上下呼应。大楼前幢 9 层，后幢 11 层。底层设有上海最早的滚球（保龄球）房和 200 平方米的室内游泳池，池水常年保持恒温，是上海市最早的温水游泳池；二层设健身房、弹子房、棋牌室和交谊大厅；三层为餐厅。

西侨青年会建成后，成为西侨青年的活动中心，各种演讲会、讨论会和社交活动都在这里举行，美国妇女俱乐部、美国体育联谊会、上海工部局美国连队在这里建立总部，还建立西侨学习华语学校。这里还经常举办中西青年运动员比赛。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这里被日军接管，改名为东亚体育馆，抗战胜利后又为美军活动的场所。

1950 年 8 月，上海人民政府接管了大楼，上海市文化局曾在此办公。1953 年 10 月，大楼划归上海市体委改为上海市体育俱乐部，1957 年 12 月 28 日正式对外开放。俱乐部通过开展游泳、水球、跳水、排球、篮球、体操、技巧、象棋和拳击等项目的业余训练，为中国体育事业输送了一批优秀运动员。里面的游泳池从 20 世纪 50 年代起就担负着每周两次为上海市局级以上干部开放温水游泳池的任务，毛泽东曾两次来这里游泳。

“上体司”成立后，占此为“司令部”。在当时上海所有“司令部”中，上体司的“司令部”最气派、最高级。

“上体司”打人之勇猛，上海是有名气的。上海的许多武斗，都有“上体司”踪影。1967 年 2 月 14 日，“上体司”以打击“流氓阿飞”为名，成立治安组。当时学生不上课，逍遥派谈恋爱成风。上体司“治安组”在“治安”过程中，也会在抓“流氓阿飞”时，也会将稍不入眼的群众抓入“司令部”，之后就会传出惨叫声，所以群众对他们很反感，经常传出“上体司”打死人的传闻。但这次，“上体司”却遇到了“工总司”下属的“交运联络站”，也是一支膀大腰圆的工人队伍，而且有“工总司”的后台。

但是“上体司”毕竟是学生众多，学生的红卫兵组织不服“工总司”的“老大”地位，有 28 个红卫兵组织为 7 月 9 日之事发表声明，支持“上体司”。而“交运联络站”不满“上体司”横行霸道，自恃得理在先，并得到“工总司”各系统的支持，一度开出 100 多辆卡车和吊车围堵在“上体司”门口，用吊车吊起大型钢筋水泥块挡住“上体司”司令部的大门，致使上海南京路为之中断。

当时“上体司”大楼正值外墙维修，搭有竹脚手架，“交运联络站”的工人围住一搂，爬上二、三楼，隔窗武斗。尽管未攻入楼内，双方均有人受伤。此时，“上体司”一些游兵散勇不时在路上拦卡车打司机。这样断断续续武斗，从 7 月 10 日到 7 月 17 日，持续了八天八夜。

7 月 18 日，王洪文亲自出马，介入两个组织的谈判。“上体

司”在道义和力量的压力下，不得已“承认错误”，最后双方一致认为：“上体司门口的八天八夜，是一小撮阶阶级敌人的猖狂活动，要团结起来，粉碎阶级敌人和流氓阿飞的阴谋活动”。在王洪文的撮合下，两个组织联合游行，高呼向对方学习，冲突结束。

为表示两个组织已团结一致，7 月 22 日，“上体司”的《体育战报》和“交运联络站”的《交通战报》，出了“联合版”，而且把《交通战报》名排在《体育战报》名之上。其中有“工总司交运联络站和上体司战士团结起来”，“ 掌握斗争大方向、正确处理内部矛盾”，“加强团结共同对敌”，“一场惊心动魄的阶级斗争——评述上体司门口一小撮阶级敌人猖狂活动的八天八夜”等文章。

7 月 24 日“工总司”的《工人造反报》第三十五期，也刊载了《团结一致共同战斗——上体司和交运联络站会谈纪要》。

## 第 732 回：中南海，组织批斗刘、邓、陶　第六次，接见河南省代表

7 月 14 日，在北京大中学红代会的组织下，大专院校 15 万人，中学 10 万人和大批工人、机关干部，在北京举行了规模巨大的示威游行，声讨刘少奇的“新反扑”和“新罪行”。此后，各种群众组织的示威游行持续不断。

7 月 14 日，也就是毛泽东、周恩来离开北京前往武汉那天，中南海机关的造反派在毛泽东、周恩来离开中南海之后，强迫刘少奇出来看大字报，并乘机对他进行了围斗。当晚，造反派把围斗刘少奇的情况向戚本禹做了专题报告，还递交了一封给汪东兴并周恩来的信，提出要开大会“批斗刘少奇”。

7 月 15 日，中央文革和北京市革委会在中宣部大礼堂召开《立即掀起对刘少奇一小撮大批判新高潮动员大会》。北京大专院校、中央各单位、国务院机关各单位的负责人都有参加。

7 月 15 日，中共中央办公厅王良恩打了一个报告：

戚本禹同志：

兹将秘书局全体革命同志给东兴、总理的报告，要求将刘少奇弄到他们批判刘少奇假检讨真反扑罪行大会听取批判，请你考虑，并上报请示决定。

戚本禹接此报告后，批示：“请伯达、江青、康生决定”，然后将此报告转给了这 3 个人。陈伯达、江青、康生分别对此报告进行了“圈阅”。

陈伯达将报告中前面的“刘少奇”3个字中“少奇”二字圈掉，在“刘”字的后面加了“邓（小平）陶（铸）夫妇”4个字。

7月15日，建工学院“新八一战斗团”针对刘少奇7月9日的检讨后，回敬了刘少奇一封“勒令信”，全文如下：

刘少奇：

你交上来的是他妈的什么“检查”！又臭又长的五千余字，无处不在攻击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无处不在攻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你妄想全盘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辉煌成果，为你翻案，真是猖狂之极，混蛋透顶！

你不甘心自己的灭亡，借检查之名，行反扑之实，妄图向无产阶级革命派反攻倒算。螳臂挡车，自不量力，飞蛾扑火，自取灭亡！刘少奇，你别白日做梦了！

你的所谓“检查”，是实行资本主义复辟的宣言书，是鼓动大大小小牛鬼蛇神向毛主席革命路线反扑的动员令，我们要迎头痛击，彻底粉碎，不把你这条老狗揪出中南海公审，我们决不收兵！……刘少奇，我们要正告你：毛主席的红小兵是不好惹的，你这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有什么资格在我们面前哼一声呢？！

毛主席教导我们，对于像你们这样的牛鬼蛇神，老反革命，就只许规规矩矩，不许乱说乱动，如若乱说乱动，立即取缔！

我们勒令：你必须老老实实向毛主席低头认罪，于本月25日零时交出你的第二份检查！不得有误！！

刘少奇实在忍无可忍，于7月16日致信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拒绝再作新的检查。信中说：“鉴于我上次交出的检查影响不好，说我是进行‘反扑’，‘挑动群众斗群众’，现在再向建

工学院进行第二次检查，也还会和上次检查差不多，也不会有好的影响，所以我不准备向建工学院再作第二次检查了。”

是的，在当时的情形下，刘少奇无论写出怎样诚恳的检查，也是难于过关的。

7 月 17 日，建工学院“八一战斗团”向刘少奇发出“最紧急最严正声明”，再次“勒令”刘少奇“于 7 月 22 日零时以前收拾铺盖，带着臭老婆滚出中南海，否则我们将采取最紧急、最坚决、最强硬的革命行动!”

建工学院“八一战斗团”为了表示他们的“坚强决心”，于 7 月 18 日 0 零时开始，有 30 人左右在中南海西门外宣布进行“揪刘绝食斗争”。他们躺在中南海西门北边，在“绝食誓词”中写道：

“刘贼是我们不共戴天的仇敌，最近他又乘检查之机，向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向无产阶级革命派进行猖狂的反扑。为了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保卫无产阶级专政，我们饭可以不吃，觉可以不睡，头可断，血可流，绝食到底，不把刘贼揪出中南海，让全世界人民斗倒斗臭，我们誓不罢休。”

江青听说此事后，对秘书阎长贵说：“叫戚本禹去处理这事，不要叫他们绝食了，叫他们回去，有什么意见可以反映。”

子夜，陈伯达、康生、江青等人在人民大会堂商量后，决定由戚本禹于 18 日凌晨 1 点多钟召集中南海机关造反派开会，布置成立“批斗刘、邓、陶战斗指挥部”，并决定：当晚先批斗刘少奇、王光美，在开批斗会的同时查抄刘少奇家里的文件，会后对刘少奇、王光美分别隔离“监护”。

查抄刘少奇家里的文件是江青提出来的，她说要乘这个机会，叫中央专案组的人去清查他们的文件，查找他们的反党证据。她具体安排道："这边一面开会，那边一面清查，等清查好了，去通知那边再散会，不要弄得清查没完，会就散了。"对江青的提议，陈伯达、康生都同意，并提出被批斗者的夫人也到会场参加陪斗。

7 月 17 日，中央再次接见参加"甘肃文革问题座谈会"的甘肃省领导。

康生说："西北这个地方，阶级斗争是比较复杂的，从彭德怀、高岗、习仲勋、刘澜涛、一直到汪锋，另外很明显的可以看到，刘少奇、邓小平、彭真、杨献珍，把西北、西南当作他们反革命政变的踞点，贺龙、李井泉进入西南，彭真、刘澜涛，进入西北，西北的确就是重点。解放以后，三次大的斗争，反高、饶的斗争，反彭、黄的斗争，反彭、罗、陆、杨的斗争，都扯到西北地区。因此，西北比较复杂。加之在过去干部中的地方主义相当严重的。这个地方比较复杂，彭、高、习的影响不能说在西北没有。所以，地区比较复杂。甘肃文化大革命以来，又插入了一个吕正操、薄一波，铁路局的问题。吕正操问题是严重的，他们的桃园三结义，这两个结义彭真，林枫检查起来了，吕正操还没检查，和吕正操的斗争很复杂，斗吕正操又牵涉到薄一波，薄一波的问题没有彻底揭开，汪锋也没有彻底揭开。我们孤立一个反革命分子汪锋也不能轻视，你们的任务很大，阶级斗争比较复杂。"

"汪锋从 1962 年中央就不信任他了，中央没有处理，当时

考虑到西北的工作方面震动的很大，那个时间，也考虑了汪锋的书记还当不当？还是想争取他多揭发习仲勋的问题。”

“对汪锋的问题，革命的群众组织要调查材料，从历史上调查，不知三司做过这方面的工作没有。汪锋有没有被捕过？我当时说，有两年的时间下落不明，这段历史没有查清。”

关锋讲：“汪锋不是死老虎，这些人再翻案，那就是千百万人头落地的问题。左派必须有这个觉悟，汪锋是很危险的，都不是死老虎。他们有阶级本能，不把他整倒整臭，他们是不会甘心的，一有风吹草动，他们就会干扰，就会捣乱，再搞就不是文化大革命以前的情况了，是残酷的法西斯统治。教育各组织、各派，要有这个觉悟。彭德怀吃饱了肚子还锻炼身体哪！他还不是准备再干！？不要认为一罢官，一点名，就没有搞头了。应该懂得，这个壁虎打死了，他还会装死，不注意就跑了，苍蝇也会装死，不注意就飞了，要把脑筋用在这个方面。”

康生讲：“军队的问题解决了，群众工作要做。群众是三方面的啰！‘三司’、‘红联’、‘革联’，要促进三方面大联合，还有很大的问题。你们提出坚决支持‘三司’，团结‘红联’，争取‘革联’，实现这个要求还不容易。”

“要充分的估计‘三司’会不会翘尾巴，翘尾巴就要犯错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这是个规律。有时候，头头也同意做团结工作，但群众一下子转不过来。内蒙是这样子，西安的问题最清楚了，开始西大、西工大压交大。西工大、西大曾经喊过：‘打、砸、抢万岁！’压交大比较严重。以后我们支持了一下交大，结果交大就翘尾巴了，走向了反对胡伟、黄经耀（这是军区

的人）。所以翘尾巴几乎是普遍规律，两个军区要很好注意这个问题。支持他们正确的方面，不支持他们错误的方面。”

7月18日凌晨1时至4时20分，在人民大会堂安徽厅，康生、戚本禹、刘建勋第六次接见河南赴京汇报代表团。首先由河南省军区司令员张树芝宣读河南省军区党委的检查报告，接着，康生逐段讲解了河南省军区的检查报告，又宣读了7月10日中央的批示，然后说：

“各群众组织赴京代表达成协议是好的。但是，希望各群众组织认真贯彻执行。”

“最近河南武斗还是相当发展的。这里面有个矛盾，我们代表达成的协议，在实际方面，还有些没有执行。在河南武斗还相当严重，我们听说郑州纺织机械厂几方面武斗，伤了许多人，而且还可能有死的。实行协议并不那么容易。”

“这一次河南军区党委所作的检查比较好，所以我们基本上批准它。我们相信，在省军区作了认真检讨以后，广大革命群众是会拥护解放军的，会欢迎并且支持军区改正错误的。过去群众不满意，不是对整个解放军不满意，而是对执行错误路线的几个同志不满意，当他们改正错误以后，革命群众是会拥护解放军的，是会欢迎和支持他们改正错误的。”

“河南省委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代理第一书记文敏生、赵文甫。原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刘建勋同志是革命领导干部。他过去犯有错误，但很快向中央作了检讨，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中央决定以刘建勋同志为首成立河南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

戚本禹："明天让刘建勋、纪登奎、戴苏理同志作检讨。他们有错误，但是犯的错误不一样，犯错误的时间不一样，性质也不一样。"

张树芝代表河南军区及与会的各组织代表纷纷表态："坚决拥护中共中央批示……"

开封"824"陈红兵说："我们'824'派坚决拥护中央对河南军区检查报告的批示。另外，我说一下开封白色恐怖的情况。7月14日：前哨广播站被砸，18人中3人被从楼上扔下。7月15日：老保调动大批农民、工人血洗'824'，死100多人。'十大总部'、'铁军'、四川'产业军'都参加了。"

"十大总部"、"铁军"代表纷纷喊道："造谣！"

康生对陈红兵说："好，叫1军调查一下。你坐下，我讲一讲。

我赞成同志们拥护中央指示。同志们这个态度是好的。我希望你们一条，希望你们成为真正的革命造反派，真正成为毛主席的革命战士。成为真正的革命造反派，成为真正的毛主席的革命战士，必须实行言行一致。说话，做事，一定要言行一致。"

"希望同志们客观的冷静的去看河南文化大革命的问题。虽然同志们在这里就河南文化大革命的问题达成了几条协议，但是，武斗现象现在没有停止，你们要客观冷静的看待这个问题。"

"听到人家说一个消息，不等人家说完，就马上说人家造谣，你又没有调查，这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当然说消息的人也要经过调查，要实事求是。"

"希望同志们继续努力，把已经达成的协议保证执行。现在

要搞共同的东西，搞大联合。武斗现象要制止，1军，野战军已经派人回去传达中央指示，现在的武斗1军的同志要打电话回去。但是，同志们要知道，这里的干部通了，下边的干部不一定通，要有个做工作的过程。1军的同志打电话回去，调查情况，重申中央的指示，也不要完全听军队自己的干部的话。另外，各方面打电话回去，重申六条协议，重申《六六通令》和《六二四通知》。在各方面采取坚决制止的办法。这一点‘工人总部’的同志要特别注意。据我们的消息讲，这方面的工作你们还没有完全做好。要特别注意。据说四川‘产业军’首先找到了你们，这是特别值得注意的。‘铁军’也要特别注意，‘联动’的人也找到了你们。只有各方面去检查自己，不是各方面去责备对方，各方面检查各方面的，各方面教育各方面的，这样才能解决问题。”

“河造总”工人代表：“我是工人代表，我们工人完全按照中央批示和康老讲的办事，但是有些组织挑起武斗，把我们去制止武斗的工人打伤了35个。”

康生：“我基本赞成。我有一点建议，就是有些同志的思想方法不好，第一坚决拥护你，第二来个‘但是’，一个‘但是’转过去了。刚才这个同志前段讲的很好，我老是担心他说那个‘但是’，可是最后他还是说出来了。好了，不说那个‘但是’了，散会。”

散会后，7 月 18 日凌晨 4 时多，戚本禹召集“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开会，安排查抄刘少奇家文件一事。他传达了陈伯达等人的有关指示，说：“中央文革召开会议，主要批判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

昆），几个老婆……中南海革命群众写了请战书，中央文革 12 点批准了这个请战书……现在做好准备，专案组全力以赴，投入这个战斗，配合这个行动，仗打起来就要打完。说是收他（刘少奇）的文件，实际上是抄家。”

接着，戚本禹召集中南海机关造反派开会。当时中南海的群众组织也分成两派，但两派在批刘邓的问题上都一致同意，一点分歧也没有。戚本禹说：

“前几天中南海围斗了刘少奇，规模小，有人围斗他总是好，但是火力不强。”

“对刘少奇、邓小平、陶铸要面对面斗争。”

“这是你们相当时期头等重要的任务。”

“要使他们威风扫地，要杀气腾腾，可以低头弯腰。”

戚本禹作了具体布置：“搞几个战斗组织，有的搞刘少奇，有的搞邓小平，有的搞陶铸。王光美、卓琳也要搞。”

由于有张霖之在群众批斗时被打死的教训，对中南海的这次批斗会，戚本禹丝毫不敢怠慢。因为面对面的批斗，就有可能发生非理性的情况。不要说打坏了刘少奇，就是打了一下，他病两天，戚本禹也担当不起责任。所以，他和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王良恩特别布置专人来控制会场秩序，让文革办公室负责人王道明、矫玉山都到会场。他还特别交代王道明组织几个身强力壮的人站在刘少奇他们的旁边，看到有人要接近，马上把他隔开。并布置好警卫人员，万一发生武斗，随时出动，加以制止，并且马上结束会议，由警卫局的负责人把他们送回家。而且规定，不准任何一个解放军战士带武器，也不准任何一个群众带棍棒。戚本禹布

置好以后，立刻向周恩来、陈伯达、江青都作了报告。他们都同意。王良恩为此还专门打长途电话，向身在武汉的汪东兴做了汇报。

戚本禹考虑陶铸夫人曾志和毛泽东是井冈山的老战友，而且她也没有参与陶铸的错误，一直是希望陶铸紧跟毛泽东的。所以特别对王道明他们交代说："陶铸的事和曾志没有关系，不能批判她，叫她坐着听就可以，你们要保护好她。还要跟她讲清楚，今天开这个会，是要陶铸出来答复群众提出的问题的，她的任务是保护陶铸。万一陶铸太激动了，可以去安慰他，或者突发什么病的话，就去护理他。"

7 月 18 日一早，刘少奇的几个孩子急急忙忙地跑来告诉爸爸、妈妈，听说今天晚上要在中南海里开批斗他们的大会。王光美预感到这次批斗非同一般，有可能是生离死别。她和刘少奇在一起，千言万语不知从何说起，只哽咽着说了一句"这回真要和你分别了"，便再也说不出话来……

离批斗会的时刻愈来愈近了。他们默默地做准备。刘少奇为王光美取出衣服用品，帮助她整理。这是刘少奇自与王光美结婚后唯一一次为她收拾东西……

然后，他们静静地坐着，等待来人带他们走。刘少奇平时不爱说笑，这回他说了一句："倒像是等着上花轿的样子。"王光美也不由得笑了。

不一会，造反派进来了，大声命令王光美先跟他们走。王光美连忙站起来，刘少奇也站起身，上来和她紧紧握手，轻轻地说："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

一会儿，刘少奇也被带走了。

当天晚上，中南海300余人批斗了刘少奇和王光美、邓小平和卓琳、陶铸和曾志，并先后抄了他们的家。

王光美被拉到西楼大厅接受批斗。批斗少奇是在西大灶食堂。那时正是盛夏季节，会场上又闷热又嘈杂。在长达两个多小时的批斗会上，刘少奇的每一次答辩，都被一阵阵口号声所打断。刘少奇掏出手绢，想擦一下汗，立刻被旁边的人狠狠一掌，手绢打落，汗水滴在了地上。一位青年女干部要用《毛主席语录》本敲打刘少奇，距离远，没拍到……

因为戚本禹事先安排了几个身强力壮的人在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周围，防止有过激的行为发生，整个批斗过程还算平和。而戚本禹自己则守在电话机旁边，王良恩每 15 分钟给他一个电话，报告情况。

批斗会的同时进行抄家。在刘少奇家中抄出刘少奇和王光美的笔记本共 188 本。其中刘少奇的 61 本，王光美的 127 本。另有秘书对刘、王活动情况的记录 8 本，刘平平 1965 年至 1966 年的日记本 1 本。

69 岁的刘少奇行走困难。鞋子不知什么时候被踩掉了，他穿着袜子，双腿像灌了铅似的一跛一跛走回了办公室。他叫机要秘书拿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怒气冲冲地抗议道："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席，你们怎样对待我个人，这无关紧要，但我要捍卫国家主席的尊严。你们这样做，是在侮辱我们的国家。我个人是一个公民，为什么不让我讲话？"

批斗会结束后，王光美被带到后院，刘少奇被带到前院。他俩从此失去自由，被分别关押，互相见不到面，只有他们的儿女依然住在原来的住所里，能看见前院里的父亲，也能看见后院里的母亲，但是咫尺天涯，虽能看见，却不准说话。前后院都有岗哨日夜监视。

## 第 733 回：鞍钢打，周恩来批评武汉　毛泽东，接见陈、钟二领导

武斗之风也刮到了“钢城”鞍山。在一次武斗中，鞍钢的一座高炉因停产而报废，损失巨大。鞍钢两派代表来到北京已经两个多月了，一定要求周恩来接见。7 月 18 日，李富春接见鞍山鞍钢两派代表，要求他们“必须立即制止武斗恢复生产。”李富春说：“如果不把制止武斗恢复生产这个问题达成协议，总理不接见你们。”

18 日下午，武汉军区的汇报全部结束，周恩来发表总结讲话。这份周恩来亲拟的讲话提纲就是事前送毛泽东审阅的那份提纲。周恩来说：

“这个会议接连召开四次，会议是由谢富治、王力、余立金主持，这是中央的决定，还没有来得及去群众那里走访，仅仅看大字报，走访几个组织，我首先谈谈个人意见。

“先谈湖北形势问题。湖北没有实行军管，但又军管了，又没有军管。形势表面稳定，群众对立情绪很大，这个乱的现象很好，邻近的省提出初步方案，要说问题解决了，又有反复，唯有湖北没有提，有意让在湖北多耽一些时间，看看对邻近省有什么影响，这次解决湖北问题，估计还会有反复。文化大革命是史无前例的，但不管有多少次反复，先要把军区领导问题解决，深刻地认识自己的错误，就可以更好地领导湖北地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可以走在二十多个省的前面。……中央推迟时间来解决

湖北问题，如解散‘工总’时就来解决。不过现在，特别‘百万雄师’成立以来问题暴露的更清楚了，你们是打过仗的人，懂得掌握大方向。如夺权夺得对不对？夺谁的权？夺权是从上海开始的，夺谁的权，当然是夺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夺了上海市委的权以后，上海造反派提出了各种措施，中央毛主席就发出号召，各地推广都这样做，北京的李冬民就夺了北京市委的权，中央始终是支持的。夺了几个月才成立革委会，初生儿不管怎样打扮总是毛手毛脚，我们是赞成的、支持的，不能说他的大方向走错的。‘一二六’夺权就夺权，《二八声明》出来，很多人支持的，《二八声明》尽管它观点有错误，但夺权方向是对的，虽然这里的错误是指责摘桃子（反托派）等都是北京发生过的，不管怎样，以自己想想过去，但想到别人就不该把《二八声明》看得那么严重，因此就出现了‘2.18’、‘3.21’，由于没有把夺权问题看成主流，而接连出的错误，‘工总’的图片是丑化‘工总’；‘1.26’、‘2.8’是积极因素，你们应该帮助的。‘二司’在‘3.21’以后日子是不好过的，这一‘工总’‘十大罪状’发到农村，农民就说‘工总’翻不了案，北京受冲都是慢慢做工作，不像你们看得那样严重，军委《八条》的拥军不能像逢年过节，为了维护社会秩序。老工人、党员仍有旧的习惯势力，保守旧的社会秩序。因而贵州、黑龙江、山西、山东都有反复，《八条》出来后有了问题，江青同志讲《八条》是拥军，《十条》是爱民。《八条》出来后大家情绪都很高，《十条》以后大家情绪不愉快，当时说了‘工总’解散就解散，这样无组织无纪律，可是我们当时想的是，这是一种思潮。”

“‘百万雄师’是 4.16 开始酝酿，5.16 成立，说明当时武汉军区的指导思想。当时我们没有指出完全有错误，而你们继续了错误思想。空军后勤政委提出的‘工总’保王任重我感到惊讶！如果刘少奇支持了北京市革委会，就能说明谢富治保了刘少奇吗？你们的指导思想不是纠正错误，而是发展。你们的《六四公告》出来就使‘百万雄师’得到合法发展。《六六通令》出来，6 月 7 日‘百万雄师’就有调整，所以‘百万雄师’是不是人武部的？在军区开过会，6 月 8 日发出紧急动员令，是开展全市大反击，几个武斗的出现造成群众的对立。军事院校‘斗罗筹备处’的声明有错误，但当中有几句话是说出了当时的几个问题，把这四个文件好好看看就够了。好的坏的，武汉形势的发展有几个问题处理不好，亏理，所以他们就要抓头头，打倒陈再道，抓谭氏人物，二、三月的批判不服气，加上河南问题的影响，‘二七公社’解决的方案有影响，这是坦白说的。你们人武部、独立师反映情况，不是第一手，是道听途说，这主要责任在武汉军区负责同志。”

“我们有几个建议：

第一、武汉军区首长要主动承认支左的方向路线的错误，尤其错误的是工人总部的解散。中央建议陈再道和钟汉华进行自我批评。出图片，是严重打击，压制了群众，要彻底平反，释放被关押的造反派头头。

第二、肯定‘工人总部’、‘二司’、‘九一三’、‘三新’是真正的革命群众组织、左派，大联合以他们为核心。

第三、凡是群众组织都不能取缔、解散、就是保守组织也不

能解散，要教育争取。你们解散‘工总’可能受我指名的影响。

第四、‘百万雄师’是保守组织，‘工总’起来可能进行报复，这个工作中央帮助来做。

第五、‘红三司’是倾向保守派一边的群众组织。

第六、军区要做农民的工作，不要进城来参加武斗。

第七、军区要承担责任以外，要做部队教育工作，教育下属单位支持造反派。长期的影响，不做这工作是不行的。

第八、所有群众组织要进行整风，好好学习，改变对解放军的看法，行为要澄清。”

周恩来表情严肃地说：

“武汉军区在支左工作中有错误，甚至错误是严重的。但是，责任由军区主要领导同志来承担。建议陈再道、钟汉华同志，主动承认支左工作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

周恩来还说：

“军区要给‘工总’平反，迅速放掉朱鸿霞，支持造反派。估计‘工总’起来之后，可能对‘百万雄师’进行报复，这个工作由中央来做。军区要对部队进行教育，各群众组织都要进行整风，好好学习，提高认识，认真执行中央的指示。”

周恩来在讲话中，还肯定了军区“抓革命，促生产”的成绩，并主动为武汉军区承担责任。他说军区决定解散“工总”是受了他一次讲话的影响。

最后，周恩来说：“军区错误改了就好了。对主席的话理解要执行，不理解也要执行。说实在话，我们这些高级干部对主席的话有时也不理解。有的（问题）中央要承担（责任）。钟汉华问

题的处理有点不果断，要勇于负责”。

会议结束前，周恩来宣布了一条纪律：“今天会议的内容，暂时保密，不要向下传达，不要上大字报。等武汉军区的领导表态后，先在部队做好广大干部战士的政治思想工作，然后再有计划的传达。”

武汉军区的汇报总结会议后，18 日的当天晚上，周恩来带陈再道和钟汉华来到了毛泽东的住地梅岭一号。毛泽东已在客厅里等候，谢富治、杨成武、王力、汪东兴、余立金、李作鹏、郑维山等人在一旁作陪。

毛泽东独自坐在一张单人沙发，他的对面两侧坐着谢富治、杨成武、王力、汪东兴、余立金、李作鹏、郑维山等人。

“主席，”周恩来侧让一步，将陈再道和钟汉华让到毛泽东面前，“陈再道和钟汉华同志来了。”

“嗯，你们好 ”毛泽东伸出手，并没站起来。他接见党政军领导干部很随意，不像接待民主人士注重礼节。

“主席！”陈再道、钟汉华见到毛泽东，一起向他立正敬礼，然后握住毛泽东伸过来的手，毛泽东和他俩一一握手，然后用手指了指身旁的空沙发招呼说：

“坐，坐这里。” 让他们坐在自己的旁边，问道：

“你们怎么样呀？”毛泽东边说边从烟盒里掏烟，点火吸燃后，才说第二句：“武汉的形势还不错嘛！”

陈再道嘴唇蠕动两下，忽然瓮声瓮气地冒出一句：“我们不承认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口气有些气呼呼的。

毛泽东哈哈笑了，说：

“方向路线错误怕什么？现在他们一提就是方向路线错误，都是方向路线错误嘛。”

“要这么说，主席，我马上开大会做检讨。”被毛泽东一说，陈再道心情顿时轻松许多，赶忙向他表态。

“那可不行，你可不能开大会，你一开大会，上得台就下不了台啦！你这老将还不得跟小将打起来。”毛泽东笑着给他们出主意，“你就写个东西，到处去发……嗯？”毛泽东发现陈再道一脸疑惑的表情变化，故而问道。

原来是坐在对面的谢富治向陈再道摆了摆手，陈再道不知是怎么回事，听到毛泽东问他，就说：

“主席，他跟我摆手，不知道什么意思？”陈再道手指着谢富治解释说。

谢富治苦笑道：“我是提醒他注意听，不要插话。”

“主席问我我不讲。主席保我我不该表个态呀？”陈再道为自己辩解。毛泽东笑了，继续说：

“文化大革命运动，自从我 1 月 21 日批的文件要军队介入，军队就下水了，就集中到军队身上。”

他看看坐在身旁的陈再道和钟汉华说：

“你们没有那么厉害，黄新廷的错误严重。你们武汉还有所不同，比湖南、江西好像没有那么严重。军队支左，有的支错了，有的人就冲，冲军区、军事机关。《八条》一出来，军队就有劲了：人民解放军还能冲呀?有尚方宝剑了，于是就抓人，解散组织。《十条》出来了，造反派又有劲了，你们的日子就不好过了。这些还不是中央下的命令，是军委下的。你们这里是中等的动武，

江西可不得了，双方都有枪。现在看到了筹委会的小报，他们有约束了，下了命令，不要乱放枪。河南还在打。”

黄新廷，原成都军区司令员。

“武汉问题怎么解决？”毛泽东问，然后指指陈再道和钟汉华说：“要做好工作，首先做好部队的工作，光你们两个人不行，有的人不听你们的话，要用开会的办法解决，要有一点时间，三方要开好会，‘三新’、‘二司’、‘三司’、‘百万雄师’，先要开好会，军区也要开好会，声明一发表就团结起来 要有一点时间，军政的人要来，好好教育这些人，不要那么忙，一方面说形势很好，一方面呢，又那么急躁。要同‘百万雄师’做工作，不然将来他要冲你的。市委的干部、人武部的干部要说通，犯错误不要紧。痛痛快快地改，不痛痛快快也不要紧，要求几天转过来，你们太急了。”

李作鹏插话：“‘百万雄师’对谢富治、王力、余立金有点冷淡。”

王力点头：“也有点慌的样子。’”

“告诉他不要慌。你是群众组织吧，”毛泽东望一眼王力，“不能说他都是坏的吧！”

谢富治汇报他们到了武汉群众组织总部时，毛泽东当即批评说：“你们到‘百万雄师’少，你们偏于一边。”

“我们都平衡了。”王力说。

毛泽东又说：“我来之前说得那么厉害，我来后太平无事。”

毛泽东接着说：“你们想一想，一个工厂，这派工人这么左，那派工人就那么右？招待所两派，我问他为什么要打倒陈再道。

我看他道理也不那么多。能不能合起来?将来总是要合起来的。你们不要忙，忙不得，北京成立革委会，原先就是急。”

周恩来解释：“后来推迟了三个月。”

“不必忙，世界上的事情，不忙可能好一些。”毛泽东以手指地，是讲东湖宾馆：“这里加入‘工总’的也只是说陈再道有错，”他再指陈再道说：“不是打倒的问题。‘三新’就那么厉害？有些话不能全信。什么打倒、枪毙了，绞死、油炸了，全线出击哟，逐步升级，讲讲而已。对有些话，不要那么认真。都打倒，我也不高兴。”

谈到湖北省的干部，说江毅影响好、赵修问题多、徐道齐可以、杨锐可以时，毛泽东明确指示：“都打倒，我不同意。过去湖北提的口号不太好，说什么‘张体学就是好’。王任重究竟是什么罪？王任重申辩他不是坏人，还有成绩。这话不要自己讲，别人讲……”

“中央文革里，王任重一直是保；反对红卫兵，反对革命大串联……”王力列举王任重“保皇”罪行一二三。

毛泽东皱眉头：“噢，他在北京搞的一些事，总是不好的，都是‘保’字号的……”

谢富治顺插一句：“贺龙儿子贺鹏飞、女儿贺晓明都搞到钓鱼台去了，搞了不少名堂。”

毛泽东：“这个人恐怕扶不起来，”

王力说：“他的读书笔记问题很多。他的读书笔记发到区以上干部去读去学习，而不学毛著。”

不知谁冒出一句：“他做诗称主席是兄长，以兄弟自居。”

毛泽东："最后结果。还要等一下。先让群众去批。"

又有人说："他死抱着说，万万不能承认三反分子，就是不检讨自己干了些什么！"

毛泽东将手轻轻一指说："王任重、张平化、赵紫阳三个，都是同陶铸关系很密切的。"

"如何解决武汉问题？"毛泽东重拾话头，第二次问。"你们主要还是要做军队的工作，做'百万雄师'的工作，责任在上面，在军区，下边当然也不是没有一点责任……"

沉默半天的陈再道突然又冒一句：

"中央文革有威信，解决武汉问题，要中央文革讲话才行。"

毛泽东摇摇手说："这要看什么人，我看'百万雄师'就不一定听中央文革的，'百万雄师'对中央文革的人去开会不那么的。"然后他又说："'百万雄师'有群众，没有一百万，至少有十万，要着重做'百万雄师'的工作。"

他指向谢富治和王力说："要设立一个接待站，专门接待群众组织来访，做好思想工作。"

"是，主席。"谢富治和王力同时点头。

## 第 734 回：做工作，毛泽东保陈再道　要检讨，“尽快放掉朱鸿霞”

毛泽东又说：“军队就有这个好处，讲直话。讲出来有好处，转过来，总有一个过程嘛！不能要求两三天就转过来 这是群众问题，军队也是群众问题，广大的干部战士。我问了招待所的小胡、小黄，他们说：‘军区第一有功绩，第二有错误，不是打倒。’”

他对陈再道和钟汉华说：“抓朱鸿霞不得人心。”

他接着说：“叶冬初有点水平，受一点压迫好。蒋介石压迫我们，就压出来几十万红军。一绝食就紧张起来，才不要呢！到现在绝食没有一个死的。有人问我，社会主义制度下为什么还有绝食的，我说因为社会主义不完全，还要革命，要部分推翻，不要全部推翻。1 月 21 日军队支左介入，以后搞了八条，对这个八条如获至宝。军队抓人多了，以后呢？搞了十条，正是夺权介入，八条的时候军队锻炼一下好！”他接着刚才的话题说：“要给‘工人总部’平反，把朱鸿霞放掉。”

毛泽东在这里提到的“叶冬初”即湖南“湘江风雷”负责人叶卫东。

这时，毛泽东又指着谢富治、王力等人说：

“要使他们能出去。不仅保证人身安全，还要保证拥护陈司令、钟政委。一个‘百万雄师’，军队机关，怕他们造反。告诉‘三新’‘二司’注意翘尾巴。他们内部也可能发生内战。”

谢富治、王力立即表示：“坚决按主席的指示办。”

毛泽东接着说："要宽恕'百万雄师'，正确对待'百万雄师'和军区，不要不让人家革命，告诉'三新'、'二司'，注意翘尾巴，注意内部可能发生内战。清华大学分出了一个'四·一四'同蒯司令对立。学生读了几句书，什么'康三司'、'袁二司'。声明发表后，问他们拥军是真还是假？先开万把人的干部会检讨。世界上的事情，这几个月来，一年来什么怪事都有了。"

有人说到"新华工"学生都是戒备森严、全副武装时，毛泽东感到有点惊奇，说：

"'新华工'还这么森严？江西为什么基干民兵可以有枪，红卫兵不可以有枪？"他有点为红卫兵鸣不平，说："如果刘培善有气魄，就把民兵的枪支收回来发给红卫兵。搞得最凶的是江西和湖南。"

他接着说道："为什么不能把工人学生武装起来？我看要把他们武装起来。听说'钢工总'在水院的工事修得不错，什么时间我要亲自去看一看。"

他又对陈再道、钟汉华说："万万不能承认是三反分子。我是讲了的，对于他们（指湖北被冲击的干部）的结论还要等一下，让群众先批。"

"张体学不能用了吗？他打了几十年仗，小孩时就当兵，就是不太懂政治。"

"现在主要做军队工作及'百万雄师'的工作，很快转过来，否则他们被动。第一，中央负责；第二，你们负责。军队支持'百万雄师'是公开的。军队的好处是讲直的，怎样做就怎么说。要人家转，总要有个过程，不能两三天就转过来了。这是军队的群

众问题。不能说‘百万雄师’是坏的，多数是好的，个别坏人也是有的。”

毛泽东对谢富治、王力、余立金说：“你们要多做工作，要各组织拥护军区，不要打倒。在声明发表之前，双方都要开会。一发表，就团结起来了。”

他又说：“都是工人，这一派就那么右，那一派就那么左？我们这个招待所分了两派，我看道理不那么多。能不能合起来？将来总是要合起来的。”

“枪要集中保管。四个方面要做工作，要召开干部会议，人民武装部也要参加。还是用开会的办法，一个县人武部来两个人，八十个县就来一百六十人，还有军队干部参加，要好好教育。你们要给‘百万雄师‘’做工作，不然他们又要反你们。要找市委、省委参加到里面的有关干部做工作。犯错误不要紧，犯了错误就永世不得翻身？痛痛快快改也可以，不那么痛痛快快改也可以，因为他不那么通嘛！”

“四个方面”是指当时武汉的“钢派”、“新派”、“百万雄师”和军队。

他对在座的其他人说：“要他们出去，不但得保证人身安全，而且要拥护他们。不要不让人家革命，只要你革命，也不要犯了错误就不准革命了。你们拥军是真拥还是假拥？有的干部先结合起来再说。”

毛泽东这里说的“他们”是指陈再道、钟汉华他们。

他接着又对陈再道开玩笑说：“你这个陈司令，真利害呀，抓了那么多的人，把‘工总’打成反动组织，我可是没有你这个

胆子。蒋介石在这里镇压过工人，你也要步人家的后尘呀？”

陈再道急忙检讨说：“主席，我错了，我要坚决改正。”

毛泽东哈哈大笑说：“这好，你比蒋介石进步，懂得改正错误。”

接着，他又说：“1967 年的 7、8、9 三个月，全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会有很大的发展，这是我们能否取得关键性胜利的时刻。这将表现在，从地区看，现在已有七个省市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北京、上海、黑龙江、山西、贵州、青海。已经基本上解决了问题的有八个省市，安徽的问题前一段也是阶级性斗争很激烈，中央决定一个省一个省地来北京，达成了一些协议或决议；还有内蒙古、四川、湖南、湖北、江西、浙江和甘肃。以上共十五个省市。今年还有差不多半年，经过努力，一个省一个省地解决，还能解决十个单位，那么今年二十五个单位的问题就可以基本上决定下来。困难问题基本解决，其他的问题就好办了嘛。我到了各地都喜欢问大家文化大革命的情况，看看群众是否真正地发动起来了嘛，这次革命是一次反复辟的大预演，很有好处。中国的地盘很大，就是乱也乱不大，天下大乱那是极而言之的话。但是这次运动，群众发动得很充分，在家庭里都展开辩论了。”

说到这时，毛泽东转向陈再道问：“你们家几派？你大概是一言堂吧？一言堂可是不好呀！”

他接着说：“群众发动得这样广泛，是历次运动都没有的。整个形势很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这次教育干部，我们发明了办学习班的方法，就是把干部们请到北京来，学习路线和政策，这个方法很好。军队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做出了很大的成绩，没

有人民解放军，文化大革命不可能取得我们刚才讲的那么好的形势。当然，由于没有经验，所以，在部分省军区、部分县市的人民武装部里面的部分同志犯了错误。这也不奇怪。我到一地，都要问一问他们究竟是怎么犯错误的，为什么犯错误？我看，最重要的一条是军队干部没有经验，没有教育，这是根本的一条。因为没有帮助，没有训练，所以要进行训练。像今天这样的会，各个省市都可以到北京来开。当然，就是开了会，也不一定完全思想通，回去还会有反复。所以，回去以后还可以继续训练。用这种开会学习的方法，对干部进行普遍的教育，这个方法是肯定了的。犯了错误的来学习，没有犯错误的也要来学习，一块讨论，总结经验，不只是军队干部这样，地方干部也应该这样。对红卫兵、工人造反派，也要办一些学习班，帮助提高，这样就可以使我们的干部和群众普遍地受到教育。我们应该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有些同志犯了错误，一时想不通，还是让他多想想。这些干部想通了，还是好同志。对那些喷气式、挂牌子、挨打、罚跪等等，我历来不赞成，我看林彪、中央文革小组的同志也是不赞成的。还是应该用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来解决内部的矛盾，使广大干部和群众的觉悟得到提高。”

讲到这里，他又给大家提了一个问题：

“为什么戴高帽子、挂牌子、挨打这样的事情，我们这样反对，群众还要这样干呢？你们想过了没有？这个问题需要研究一下，依我看，这里有个正确处理好上下级关系的问题。一个无非是我们的同志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惹得群众生气、愤怒，因为你整了他，他在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要出气。但更重要的值

得我们考虑的一个原因，就是这些年来，我们的干部严重地脱离群众。我们现在一些干部，官做大了，薪金高了，房子住好了，出入坐汽车。还有一点，就是摆架子。遇事情不是和群众商量，喜欢训人，喜欢骂人，不是平等地对待干部，对待群众。我们的连长、指导员碰到战士还是经常的，一当了营长就和战士距离远了。从一个老百姓看，当一个连长那就是很大的官了，这就是严重地脱离群众。为什么群众对干部那样地整？也有其他的原因，但是最大的原因就是严重地脱离群众，人民恨你！你老训他，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他找不到这样的机会，这回可找到了机会，他能不狠狠地整你一顿？所以我们要好好地注意解决这个问题。我们人民解放军的好传统要继承下来。现在我们的上下级关系，是严肃、紧张有余，团结、活泼不足，要注意。”

“中国历次革命，以我亲身经历来看，真正有希望的是肯想问题的人，不是出风头的人，现在大吵大闹的，一定要成为历史上昙花一现的人物。”

“章伯森、刘瑞林有些问题，不要怕，只要群众拥护就结合他，看群众的面子。将来呢，由群众去识别他。过去我结合过刘少奇、张闻天、高岗、彭德怀……”

这时，汪东兴进来报告:“主席,北京来电话,中南海召开了批判刘少奇的批斗会，有 200 多人参加。”

毛泽东听后表示异议：

“我不赞成对刘少奇、邓小平、陶铸进行面对面的斗争，对刘少奇不能这样搞法。200 人斗也不行，这样捞不到什么油水，没水平，仓促上阵，搞不好成为武斗。要他承认反党，死也不会

承认。我不是给刘少奇说话，是怕群众下不了台。”

王力问：“主席，是不是刘、邓还要区别对待？”

毛泽东点点头，接着说：

“冲军区，冲了就算了。 国防部、中南海、海军、空军、兵种都冲过。这会儿有点像辛亥革命，发动群众，但群众没有得到利益，士兵就抢。那时候，各派有新军。袁世凯先占领了安徽、江苏、江西、湖北。二次革命黄兴的参谋长就是章士钊，调合复国论。”他的右手拍在靠近陈再道一边的沙发扶手上，边说边立起身：“他们要打倒你们，我要他们做工作，要做到不仅不打倒你们，而且要做到拥护你们为止。”

毛泽东最后说：“武汉的形势还不错嘛！你们想一想，一个工厂，这一派是革命的，那一派就不革命，你们相信吗？”毛泽东停顿了一下，说了一段后来被广泛传播的话：

“为什么工人阶级分为两大派？我不相信一派那么左，一派那么右，不能联合起来。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厉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

大约 10 点来钟，陈再道和钟汉华从毛泽东住处出来，毛泽东一直把他们送到走廊上。这时正好有几位服务人员站在走廊里，毛泽东向他们招招手，几个服务员赶紧走了过来。毛泽东对他们说：

“认不认识？这就是你们的司令员。你们要打倒他，我是不要打倒的。你们握握手吧。”

服务员们一边同毛泽东及陈再道、钟汉华握手，一边纷纷说

道：

“不打倒…… ” “不打倒…… ” “听毛主席的话，不打倒陈司令。”

走廊里响起一阵开心大笑。

毛泽东笑着说：“再不能打倒你们的司令了吧？我是不打倒他的。”他转向陈再道，又说：“他们要打倒你，我要他们不打倒你。”

谢富治、王力等人和陈再道、钟汉华陆续走出梅岭一号。周恩来慢走一步，在走廊里同毛泽东话别。

“主席还有什么指示？”周恩来问。

“文革搞了一年了，明年的春天结束文革。接着我们开‘九大’。‘九大’，老同志、老党员都要当代表。邓小平要当中央委员。”

毛泽东接着说：“贺龙、乌兰夫都要当中央委员。”并说：“贺龙，在延安我就讲过，他是二方面军的一面旗帜。他现在在哪里？”

“在象鼻子沟。”周恩来回答，“安全问题，杨成武负责；生活问题由杨德中负责。”

毛泽东对站在旁边的杨成武交待说：“你们要保护好贺龙。还有乌兰夫，少数民族的代表。”

“乌兰夫也保护在象鼻子沟。”杨成武报告。

与毛泽东握别后，周恩来走到院子里，看到陈再道和钟汉华正在这里等着向他道别。周恩来再次叮嘱他们说：

“抓紧检讨，搞好大联合，要稳定局势。”

“是！”陈再道和钟汉华再次作了保证。

把周恩来送上车后，陈再道和钟汉华慢慢的走回东湖宾馆乙所。一进屋，陈再道就问钟汉华：“下一步怎么办？”

“检讨。”钟汉华只说两个字。

“马上通知所有常委，明天上午开常委会议，我跟钟政委做检查。”陈再道向秘书下令。

“告诉他们，做好各方面工作，尽快放掉朱鸿霞。”钟汉华补充。

“下午在礼堂开师以上干部会。”陈再道没好气地说，“叫那两位代表给大家做工作吧。”

“两位代表”是指谢富治、王力。周恩来已经回北京了，不能让毛泽东亲自去做工作，在武汉，中央来人职务最高的只有谢富治和王力了。

关于中南海斗刘、邓一事，周恩来让汪东兴直接打电话将毛泽东的指示告诉戚本禹，并说，中南海的事情由他负责。

至此，武汉问题的解决已基本就绪，周恩来也长长地吁了一口气。吃完饭，他在谢富治、王力、萧前、刘丰等人的陪同下驰往机场。杨成武与陈再道、钟汉华和总参作战部副部长李静谈如何落实毛泽东指示的具体事宜。陈再道、钟汉华让武汉军区按中央指示精神修改、印刷检查的公告。

## 第 735 回：松口气，周恩来连夜返京　谢富治，携王力水院讲话

7 月 18 日晚 23 时 30 分,周恩来离开武汉飞往北京，郑维山随行。临上飞机前，周恩来对前来送行的武汉空军副司令员刘丰和政委萧前再次强调，要绝对负责毛泽东的安全，具体事宜由他们两人负责。

挥手送别了周恩来的专机，谢富治对大家说：

“走，亮相去!”他建议：“毛主席说，武汉水院的工事修得不错，咱们去看看？”

“这么晚了，还去吗？”王力问。

“‘新华工’去过了，‘百万雄师’总部也去过了，就是這一派沒去，反正也睡不着，过去看看。”谢富治说。

“好吧。”王力表示赞成。于是，他们和刘丰、萧前一起，直接来到武汉水利电力学院。

此时的武汉水利电力学院为防止“百万雄师”的进攻，已设立了两道防线：

第一道防线是在进校的三个路口设障碍物，在通向省委的桥头停放了施工实验室里的那台大型平土机，以阻止“百万雄师”车队进校；在航海俱乐部方向，挖深沟让汽车过不来；从南面过来要经过武汉大学，首先会遭到武大的抵抗，同时他们还在武大与水院之间的附属小学附近设置障碍物，阻止车队进入。

第二道防线是以四教学楼、六教学楼为界，在进入教学区的路口设置由高压教研室设计高压电网和高压水泵，情况紧急时，

阻止任何车辆和人员的通过，确保教学区与学生生活区的安全。同时，为了阻止“百万雄师”从东湖水上袭击水院，由化学教研室研制了土地雷和燃烧弹，还研制了水中爆炸和水面燃烧的器具，制成了电控手榴弹。

水院总部与武大总部组建了联防指挥部，水院丁家显任总指挥，统一研究、协调、部署、指挥珞珈山至东湖南岸地区的防御。李德俊任警卫团团长，带领 200 多个同学，在珞珈山上巡逻守卫。同学们以班、年级为单位组织起来，守卫在航海俱乐部那个当时被学生称作“平型关”的隘口，守卫在通向省委的桥头，守卫在东湖岸边，守卫在行政大楼、守卫在教学大楼……

此时，水院的同学们没有人害怕和离开，许多家就在武汉的同学也都坚持守卫在水院，悲愤的气氛、悲壮的情怀笼罩着水院。

谢富治他们在通过省委去东湖湖滨的桥上，见到了堵塞公路的大型平土机。进入水院后，看到毛泽东赞扬过的据点、工事，以及设在教学大楼路口的高压电网、高压水泵。

他们来到水院总部，丁家显、张建成等人向他们汇报了“百万雄师”实施血腥大屠杀的情况。水院没有人被打死，但被打伤的学生和教师很多，现在还有严菊明、钟光超等 7 名重伤员在医院治疗。他们让谢富治等人看了重伤员留在总部的血衣。谢富治说：

“首先要制止武斗，这是不允许的。把工人集中起来搞武斗，更是不允许的。”

谢富治、王力等人同意接见群众并讲话。7 月 19 日凌晨 1 时左右，水院广播台突然播放歌曲：《毛主席派人来》，随后通知

大家到体育馆紧急集会。

水院也是工人和学生造反派“逃难”的集聚地，大家一听是“谢副总理、王力同志来到红水院接见大家”，已经睡觉的学生和教师，加上“工总”、“九一三”和“二司”其他学校撤到“水院”的工人和学生，潮水般涌向体育馆，将体育馆挤得满满的，还有很多人聚集在体育馆外的空地和大球场听广播。校园顿时就沸腾起来，欢声雷动。

造反派的热烈情绪深深地感染了谢富治、王力他们。他们戴上造反派的红袖章，在丁家显等造反派工人和学生簇拥下，来到水院体育馆。

望着人群如潮，泪眼纷纷的群众，谢富治激动地对在场的5000多名群众表达了对武汉造反派的支持和希望，他说：

“亲爱的同学们，同志们，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同志们！首先，让我代表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向所有武汉市的革命派同志们问好！”

一片“毛主席万岁！万万岁！”的欢呼声。

谢富治接着说：“让我代表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副统帅向同志们问好！”

又是一片高呼：“毛主席万岁！祝林副统帅身体健康！”的口号声。

“我代表党中央、周恩来总理向同志们问好！”谢富治继续说。

欢呼声和热烈掌声如浪潮般滚滚而来。

例行的问候和致敬过后，谢富治说：

“毛主席、党中央告诉了我们，武汉市、湖北省目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虽然一方面是一片大好形势，好的很，但是，也存在许多问题，这些问题，需要我们武汉市所有革命派的同志们和人民解放军同志们，你们自己来解放！（掌声）毛主席告诉我们，要三相信、三依靠。三相信就是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相信人民解放军，依靠人民解放军；相信干部的大多数，依靠干部的大多数，首先是相信武汉市的所有的革命派同志们！（热烈鼓掌）相信人民解放军的同志们，（热烈鼓掌，呼口号）相信所有革命派的同志们，我们支持所有革命派的同志们！（激动地长时间热烈鼓掌、呼口号）同志们，我们没有话讲了，但是我们可以给你们提两个建议：

第一个建议，我们在你们的总部，还有其他方面我们再三提过了，今天再一次向你们建议。

第一条：所有的革命派同志们，所有的群众组织，为了创造一个解决问题的良好气氛和良好条件，停止一切武斗。（鼓掌，呼口号）

第二条：我们好好坐下来学习。我们掌握解决问题的思想武器，就是学习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中央文革小组最近以来一些重要指示，和报纸上的社论，特别是要学习我们伟大领袖在十年前所著作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一部伟大的光辉著作。（呼口号）拿这一个伟大的著作，作为我们解决当前武汉所存在的种种问题和许多矛盾，作为一锐利的武器来武装我们的头脑。（呼口号）同志们，这样，我们就可以停止内战，我们就可以把一切精力集中到我们反对和进

攻那些主要的敌人。（鼓掌，呼口号）把主要的精力集中到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各方面去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打倒陶铸、打倒王任重。”

谢富治讲话后，雷鸣般的掌声经久不息。情绪是可以传染的，王力的声音紧接着又在体育馆里回荡：

“亲爱的同志们！战友们！……”口号和掌声四起，“刚才谢富治同志作了一篇很好的讲话，他已经代表了我们，把我们的话都说完了，你们赞成吗？同志们是不是赞成谢富治同志说的那些话？”

众答：“赞成！”

王力接着讲：“第一不是首长，第二没有指示，我们都是老百姓，我们是来……”群众大笑，大家高呼口号。王力接着说：

“毛主席派我们来是当小学生的，……” 掌声又起。王力接着说：

“在武汉地区就地解决武汉问题（掌声）。我们相信武汉的问题是一定能够解决的！（掌声）是一定能够很好的解决的！（掌声）中央解决武汉问题排队是排到最后了，但是解决一定会解决得最好！”欢呼声，口号声响成一片。

“为什么一定能够很好地解决呢？因为我们武汉地区有一支钢铁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这时候，会场上响起了长时间的欢呼声，掌声和口号声。

“我们坚定地相信武汉地区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同志们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同志们一定能够自己担负起解决武汉问题的责任。” 鼓掌声。

“同志们!”又是鼓掌声。

“同志们！毛主席、林副主席，党中央、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坚定不移地支持武汉地区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同志们。”掌声伴随着“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响彻会场内外。

“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同志受压抑、受打击的现象是不允许存在的!”更加热烈的掌声、欢呼声和“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声。

接着，王力做了一个有力的横扫手势说：

“这种现象叫它一去不复返了!”全场再次响起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毛主席万岁!”、“我们想念毛主席!”的口号声不断。

“同志们，毛主席、林副主席、党中央、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向同志们提出要求，就是要求同志们一定要懂得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根本道理，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

同志们，这不是策略问题，这不是一时的措施，这是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根本的保证。这也是同志们能够把毛主席这个无产阶级革命红旗永远高高举起的一个最重要的保证。我们必须得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我们受压制、受打击、受排斥，这种现象把它翻过来!”

热烈的掌声、欢呼声又起，全场有节奏的呼喊口号：

“下定决心、为工总翻案，工总起来，武老谭完蛋!”……王力接着说：

“但是，我们决不能够对别的同志，对别人，对别的阶级弟兄，对群众来采取压制，打击报复，我们决不能采取这样做法。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同志受一点压迫有好处。” 场内响起笑声和掌声。王力接着讲：

“我们不能够因为个人受打击，我们就动个人的情感，同志们，我们不能够动个人情感，我们要动阶级的情感！。只要同志们牢牢地记住毛主席这样的一个教导，我们武汉的问题就能解决得好！。为了创造解决武汉问题的有利的气氛和条件，刚才谢富治同志作了两条建议：第一停止武斗，第二坐下来学习！冷静下来好好想一想，把毛主席天才地创造发展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最新的发展，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最新的里程碑，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进行革命的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我们要用毛主席这些武器，把自己武装起来，想一想，这一年多来的斗争，总结一下，检查一下，正确的认识武汉的形势，正确地抓住武汉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面临的主要问题，紧紧地抓住主要矛盾，紧紧地掌握斗争的大方向，正确地认识和区别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检查一下我们在这段时间内我们所提出的口号，哪一些是正确的，哪一些是不怎么正确的，检查一下，我们处理两类矛盾的方法，特别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有没有什么不正确的地方，这叫做学习，学习就是斗争。学习就必须联系实际，就必须带着问题学，就必须找活思想，就必须解决我们武汉地区以及我们每一个团体当前正面临着的主要问题，同志们，正确的态度对待人民解放军。”掌声和口号声又起。

“同志们，我们要把主席在今年四月间强调地提出来的‘拥军爱民’的这个旗帜，这个口号举起来，好不好！”

众答：“好！”接着是一片掌声、口号声。

“同志们，毛主席提出来的‘拥军爱民’的口号不是在平时提的，不是每年春节那样的一般的‘拥军爱民’，而是作为在无

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军队介入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后，是作为一个重要战略口号提出来的！这个口号指导着我们正确地认识形势，正确地认识矛盾的性质，正确地提出口号，正确地处理矛盾的问题。特别是人民解放军和无产阶级革命派之间的关系问题。

这一方面，军队的同志犯了错误，只要他检讨，改正就好啦！检查了，改正了就不要打倒啦！”听到这里，大家笑了起来，接着报以热烈的掌声。王力接着说：

“我们相信，武汉地区的人民解放军是不会辜负毛主席对他们的信任的。至于武汉地区的问题究竟怎么解决，我们还要专门找同志们的代表，找各方面的代表，要听取同志们的意见，向同志们学习。” 掌声又起。

“今天，我们主要的是来向同志们问候问候。让我们高呼：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无产阶级专政万岁！

中国人民解放军万岁！

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万岁！

毛泽东思想万岁！

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全场雷鸣般的掌声经久不息。

接着，武汉空军的刘丰与萧前政委也在大会上诚恳表态，要正确对待文化革命，支持革命左派。刘丰在讲话中说：

“红卫兵小将们，同志们，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风大浪中，你们是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我是个小学生，来向你们

学习来了！”刘丰诚恳地表态，“过去我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理解不深，在‘支左’工作中犯了错误，我要向你们道歉！” 他向台下行了一个军礼。

刘丰对群众敬礼，赢来经久不息的暴风骤雨般的热烈掌声。他的胸脯开始起伏，情绪激动地说：

“希望造反派帮助我，今后我们一定要坚决站在造反派一边，做你们的坚强后盾！”

群众高呼：

“向解放军学习！”

“向解放军致敬！”

“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万岁！”

谢富治、王力等人还与造反派工人和学生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交谈。谈到“工总”问题时，谢富治说：“工人总部不是反革命组织，是革命群众组织。”

谢富治与《二八声明》起草者雷志茂亲切握手，并说：“《二八声明》大方向是正确的，主流是好的，但有缺点错误。”

欣喜若狂的造反派把大会录音拿到武汉三镇反复播放。省直造反派甚至用高音喇叭直接对着省委播放。谢富治他们回到东湖宾馆已经是 19 日凌晨快 4 点了。

到了 19 日上午 8、9 点钟，“百万雄师”似乎回过味儿来，开始回击。更多的高音喇叭以军歌为前奏：“说打就打，说干就干，练一练手中枪、刺刀、手榴弹”，“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东风吹，战鼓擂，现在世界上究竟谁怕谁”……

歌声过后，是慷慨悲昂的播音：“面对死亡放声大笑”，拼死

的呐喊呼号响彻云霄："这是最后的斗争！同志们，战友们，团结起来到明天，英特那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

尤其是一篇奇文，声压群雄。喇叭里，一个女高音在高声通知："下面有重要文章，注意收听！下面有重要文章，注意收听！"

接着，一个浑厚的男中音语出惊人："王力究竟是人还是鬼？"

喇叭里继续传出他的声音："王力自窃踞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以来，一贯以极左面貌出现，欺上压下，横蛮左右；摇笔舞文，指鹿为马；口若悬河，颠倒黑白。在他插手的四川、内蒙、江西、河南、湖北、浙江、云南等省，无一例外出现大武斗、大流血、大混乱、大停工、大破坏。这是为什么？他大喊"怀疑一切"以乱党；大抓"谭氏"人物以反军；大搞"反夺权"以祸国；大封"保皇派"以挑动群众斗群众；令革命派水深火热，反动派欢呼雀跃，又何其毒也！他就是埋在毛主席身边的一颗定时炸弹！

揪住王力的狐狸尾巴当老虎打！

把王力交给湖北三千二百万人民和各兄弟省市革命群众，进行彻底的批判斗争！

王力从中央文革滚出去！

打倒王力！"

## 第 736 回：先传达，武汉独立师不满　侃侃谈，王力讲完出门难

本来，周恩来规定，他 18 日在武汉部队师以上干部汇报会上的总结讲话内容“暂时保密，不要向下传达”。但是，当独立师政委蔡炳臣向武汉军区政委钟汉华请求，将周恩来的讲话在独立师传达时，钟汉华却同意了。

汇报会结束后的当晚，就在陈再道、钟汉华去见毛泽东的同时，回到独立师的蔡炳臣，立即召开师党委常委会，研究决定：19 日上午向各团团级干部传达周恩来对武汉运动的指示。接着，蔡炳臣又连夜将武汉部队师以上干部汇报会议精神向独立师机关的团以上干部做了传达。他在传达时说：

“中央首长来了四天，听了三天汇报，作了一天报告。我和师长本来是代表大家意见去向中央首长汇报的，但一看气氛不对，总理和王力根本不愿听取大家的汇报。钟政委在汇报时说一句，总理问一句，问得钟政委答不上来，只好把汇报提纲放在一边作检讨。军区后勤和其他单位观点都是一致的，在汇报时也被顶回去了。我们汇报对‘新华工’看法时，王力很反感，还说我们思想不通。总理和王力很注意我们两个。”

“王力讲，‘三新’、‘二司’打解放军是对解放军的最大爱护。王力把‘百万雄师’的优点都变成了缺点”。

召开完师机关团以上干部会，已是深夜。蔡炳臣又将师政治部副主任周忠叫到家里，决定扩大传达范围。

第二天一早，也就是 19 日早晨，独立师政治部副主任周忠

让管理员阎保国通知机关排以上干部、直属分队连以上干部，以及部分支左人员参加传达会议。在这次传达会上，大家议论纷纷，不满情绪明显。牛怀龙师长说：

“我和大家的心情是一样的，思想也是不通的，杨代总长还因此和我谈话，我表示思想不通，组织服从，个人意见保留……

我们不是不代表大家的意见，而是中央政策已定，首长们根本听不进去了！”

面对干部的不满，牛怀龙师长嘱咐大家说：“你们对外不要提总理说的。”

蔡炳臣不知是从哪里听来的消息，在会上还说：“王力的老婆是‘新华工’的副教授，难怪‘新华工’的消息那么灵通；她儿子就是‘二司’的头头，所以王力说‘二司’好。”

牛怀龙插话说：“王力是国民党员，还是从公安厅查到的，还来不及向中央报告。”

这些话在会场上引起更大的议论。

19 日上午，独立师部分单位已经将武汉部队师以上干部汇报会议的精神传达到战士，再由战士、军代表传播到“百万雄师”的群众中了。

传达的精神中，最不能让独立师官兵和“百万雄师”群众接受的就是讲话中的“四点指示”，即周恩来总结中八点建议的前四条，传达时简化、概括为以下四点：

一、武汉军区支左大方向错了；

二、要为被打成反革命的造反派组织“工总”平反；

三、“工总”等造反派是革命左派；

四、“百万雄师”是保守组织。

从决定在独立师团级干部传达，到武汉群众听说“四点指示”，总共没有超过 20 个小时。而此时，19 日上午，武汉军区党委常委会正在召开，钟汉华沙哑着嗓子宣布：

“现在开会。由陈再道同志宣读我们两人的检讨，请同志们讨论、补充。”

陈再道拿起检查稿，开始一字一句地读检查。没有人说话。检查读完了，会议室仍然十分的安静。

“总得说句意见吧？”钟汉华望望大家。

“同意。”副司令员韩东山首先打破了沉寂，紧接着，与会者纷纷表示了同样的意见。

19 日中午，陈再道将逮捕在押的“工总”头头朱鸿霞、胡厚民二人接到军区招待所吃了一顿饭，每人送了一套《毛泽东选集》，然后用吉普车将两人送到造反派的大本营武汉水利电力学院释放。

19 日下午，杨成武召集驻武汉的海、空军负责人开会，传达了 18 日晚上毛泽东接见陈再道、钟汉华时的会议精神。

下午 15 时，武汉军区师以上干部会议在军区礼堂召开。参加会议和旁听的有武汉部队师以上的干部和支左单位的负责人，也有少数群众组织的头头，还有部分省、市被群众解放出来的领导干部。由于会议内容是大家关心的热点问题，所以，与会人员早早就来到了会场。

会议由陈再道主持。他简要说了几句开场白，就宣布由谢富治传达中央领导关于解决武汉问题的指示。谢富治谨慎、缓慢地

传达了周恩来 7 月 18 日的总结报告。他在讲话中批评武汉军区解散“工总”是错误的,支“左”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还说“二司”、“三新”是革命派组织,军区应该支持他们,“百万雄师”是保守组织,不能依靠他们。谢富治说：

“1、武汉支左大方向错了，错在‘三·二一’、‘二·一八’、‘六·四’等通告都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八条》下来你们打击造反派，《十条》下来了，你们却不执行，我们等待你们两个月了。

2、‘百万雄师’人多，队伍要大到什么范围？你们连军工厂都设联络站，军工厂是保密单位，又是军管单位，你们还要搞，不是穿一条裤子，也是穿一条裤子。打到现在，造反派还是比你们人多，这点，我们不用调查就晓得。

3、‘三新’、‘二司’大方向没有错，揪‘武老谭’是把矛头对当权派，是对的，有缺点是不可避免的，你们怎能抓住一些缺点打击革命小将呢？”

谢富治很会审时度势，在人多势众的场合下从不张牙舞爪训斥别人，特别是在人们情绪不稳定的情况下，他善于用中央或集体的意志解脱大家对他的责难。他讲了一个多小时，尽管字字句句如同炸弹一样，强烈撞击着每一个与会者的心灵，大家似乎对他本人没有留下什么恶感。

原来商定，给军人讲话由谢富治出面，王力就不谈了。可是，行伍出身的谢富治觉得自己在语言表达方面稍逊一筹，又请王力再讲讲。王力说：

“同志们，中央对武汉问题的意见，已由富治同志讲过了，

我不再重复。在这里，我想给大家讲一讲文化大革命的理论问题。你们学过今年第 10 期《红旗》杂志社论吗？标题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武器》，这是专门为纪念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光辉著作发表 10 周年而写的重要文章。这篇文章第一次从理论上阐述了党的基本路线，系统地整理了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解放以来，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以来他老人家的重要思想，对指导今天的革命和建设有着重大意义。”

这篇文章就是王力亲自执笔写的，他在这篇文章中将毛泽东的有关论述整理、升华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整整影响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

王力接着说：“在座的都是师以上领导干部，看来，你们对文化大革命一点也不理解。因此，我只好像给小学生上课一样，从一年级的第一课讲起，从 ABC 讲起……”他从 1965 年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讲到 1967 年军队介入文化大革命；从毛泽东《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讲到“二月逆流”……

“武汉的‘工人联合会’，也就是‘百万雄师’的前身，一开始就是陶铸的官办组织，是用来破坏工人运动的。而‘工人总部’则高举造反有理的旗帜，点燃了武汉工矿企业文化大革命的烈火。因而，我们要大树特树‘工人总部’。”

王力结合武汉的情况，表明了态度。

“现在的主要矛盾，是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派，武汉军区看不到这一点，因此发表了《二一八声明》和《三二一通告》，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犯了方向路线错误……”

“谢副总理在北京讲话，小将们误会了，要揪他，在他房间里装了几个喇叭，他还是向革命小将赔礼。现在人家写了几张大字报，骂了陈大麻子，你就抓人家反革命，如果你们是谢副总理，还不把人家枪毙了？”

“孟夫唐是什么人，你们要打倒。他是退休了的人，又不是当权派，就是支持‘三新’‘二司’，你们就要打倒他，薛朴若你们也要打倒，这些人都是好干部。”

“‘工人总部’要彻底翻案，朱鸿霞没有什么错，为什么要打他反革命，把他以前的作品的一些错误搬到现在来。《二八声明》抓的人要放。”

“‘百万雄师’是个保守组织，你们起了很大作用，才发展到现在这么多。你们现在要做工作。最拥护解放军的是革命小将，不信你们调过头来，‘百万雄师’就要打你。”

“红卫兵在初期还是积极的。但是他利用了刘少奇的血统论，没有跟上毛主席，成为保守组织。‘红三司’是偏右的。”

会议在晚上 20 时休息一次，谢富治、王力走到礼堂平台上，接见了聚在那里的武汉军区机关干部和家属，以及负责在这里执行保卫任务的 29 师部队指战员，他们代表毛主席、党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向大家问好！一时掌声雷动，欢呼顿起。然后，谢富治觉得疲劳，就先回东湖宾馆休息了。王力继续在军区礼堂作报告。他一直讲到晚上 23 时多。期间，中央文革工作人员张根成提醒他：

“已有军人到军区来闹了。”

王力反问到：“我说错了吗？”

洞中方一日，世上已三年。当王力走下讲台时，军区大门已被独立师的干部、战士堵住，无法通行了。几位军区领导只好设法将他从何家垅那边的军区东门送出。谢富治、王力和陈再道他们原计划从 20 日开始，先接见“百万雄师”，再接见“三新”、“三钢”等群众组织。结果还没等这一计划实施，当天晚上，就出事了。

19 日下午 16 时左右，就在军区师以上干部会议正在进行时，独立师的几个战士冲进军区大院，跑到政治部值班室来造反，反对“四点指示”。但是军区机关的干部都还不知道王力有什么“四点指示”，无法解释。军区负责人一边做这些战士的工作，劝他们回去；一边派人找牛怀龙和蔡炳臣，要他们赶紧回去作战士的工作，不要到军区闹事。结果，在会场上没有找到二人。

原来，19 日下午，王力讲话时，独立师师长牛怀龙要求发言，被王力制止，蔡炳臣气冲冲离开军区会场。牛怀龙继而也回到独立师作战部，对部下大发怨气，摔桌子椅子，大叫“拼了”。

随即，独立师的副师长、副政委来到军区大院，劝战士们回去，战士们表示：

“说‘百万雄师’是保守组织，我们不通。”

“军区支左大方向明明没有错，陈再道、钟汉华为什么要承认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有人甚至把陈再道和钟汉华叫做“投降派”。这些独立师战士也确实是消息灵通，他们已经知道陈再道在内部承认犯了错误。独立师的副师长、副政委对战士说：

“你们不通，我们还不通呢，快回去！”

19 时，独立师又有 49 人冲进军区，强烈要求谢富治接见，

回答问题。并质问军区机关人员："王力凭什么把拥有 120 万人的群众组织打成'保守组织'？"

而在此时，独立师一团的宣传车，就是在 5 月 21 日跑到北京上访的独立师一团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那几个战士，已经上街游行了。这几天，独立师已经在纷纷传说"周总理将于 16 日来武汉，代表党中央毛主席对各派群众组进行表态。"大家既兴奋又担心。兴奋的是，武汉的群众组织，谁是革命派？谁是保守派？即将见出分晓了；担心的是，如果周总理表态把"百万雄师"作为保守派，而把"工总"作为造反派。

"走，去东湖，把我们知道的真相告诉总理！"曾在 5 月擅自进京告状的一团宣传队员们，这时又想着去东湖宾馆反映情况了。"位卑未敢忘忧国"，这在那个年代是一种很普通的群众都具有的想法。

然而，部队领导告诉他们，中央首长是不能随便见的。于是，宣传队的战士们又议论开了：

"正常渠道见不到总理，能不能采取非正常渠道传递普通战士的意见呢？"

有人提出上街游行。但是，这个念头一提出来，连他们自己都倒抽一口凉气，因为擅自组织游行，这在作战部队，那可是严重违反纪律的呀！

接着几天，从东湖传来的消息都是说"百万雄师"是群众性保守组织，"工总"、"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是革命组织，等等。这些战士们实在坐不住了，年轻的头脑渐渐的失去理智。

7 月 19 日晚饭时，宣传队的几个人围着水泥地上的一个菜

盆，边吃边议论那半信半疑的“总理指示”。说着说着，大家越来越不服气：

“总理怎么不听听部队的意见？”

“总理也应该听听我们战士的声音嘛！”

“朱学诗，你当过教员，把这些话写下来！”宣传队队长余家进说。

于是，广播员朱学诗用粉笔在饭堂门前的一块黑板上写下：“请求中央来汉首长听听战士们的心声！”

顷刻间，这几个字就被正在吃饭的团机关的干部、战士看到了，几乎所有的人都表示支持，甚至有人欢呼：“宣传队的同志说得好！”

一不做二不休，余家进干脆让人找来一个脸盆，倒进黑墨水，又找来一只大排笔，对朱学诗说：“把标语写到篮球场的地上，字写大些！”

朱学诗在篮球场的地上写下了：“强烈要求中央来汉首长下部队听取广大指战员的呼声！”

这时，刚才的“请求”已经变成了“要求”，有人还在“中央首长”几个字的旁边，加上了“周恩来”三个字。

一团团部沸腾了，情绪开始失控。

独立师在春节期间成立“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时，给各团的宣传队都配备了一辆嘎斯牌敞篷汽车和一面“中国人民解放军8201 部队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大红旗，车上还装了一架便携广播台，这辆车在当时被称之为“毛泽东思想宣传车”。这时，余家进让宣传车司机将车开过来，高喊：

“宣传队的同志上车！”

大家都心知肚明，这就要上街游行了。

“坚决支持宣传队的革命行动！”团机关的干部战士们一旁为他们壮胆助威。

宣传车轰鸣着，正要冲出营房大门，只见团长贠恩良、政委周德芳匆匆赶到，他们双双挺身站在车头前，苦苦相劝：

“同志们呀，这样做不得呀！有什么意见就告诉我们，我们负责往上面反映。”

战士们在车上议论：“他们谁敢去向中央领导讲真话，他们怕掉了官帽子，我们没有什么帽子，我们不怕。”

与此同时，营房里的一群群战士，也一个劲为车上的宣传队助威鼓劲。

政委见状，俯身趴在车盖上。

这样相持一阵后，有两名战士慢慢走到团长和政委后边，一下将他们抱起来，离开了车头。于是，“轰”的一声，载着全体宣传队员的卡车冲出了营房，驰向汉口利济大道。车上那面“8201部队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大旗，在明亮的路灯下猎猎飘扬。

“广播员，呼口号！”队长余家进发出指令。

“强烈要求中央来汉首长到连队听取广大指战员的呼声！”

“解放军战士坚决支持‘百万雄师’革命群众！”

“8201战士永远和革命群众在一起！”

高亢的口号声划破沉静的夜空，立即引起各方面的关注。

卡车从汉口到汉阳，再到武昌，每到一处，都有汽车紧随其后，形成了车队游行。

22 时，独立师除一团外的其他各团宣传车都集中到了师部，蔡炳臣和周忠在师部食堂对宣传人员传达周恩来的讲话，蔡炳臣还未讲完，院里就开始起哄了，大家嚷嚷着要去军区大院，要阻止军区领导公开检查，当面向谢富治、王力申述他们的意见。

23 时半，各团的宣传车准备上街，蔡炳臣看劝阻不住，就说："去就去吧，要守纪律。"

独立师的宣传车上街后，大声广播指责"四点指示"。宣传车很快就跑遍了武汉三镇……

这种状况，引起了独立师一些干部的担心。24 时许，六团翟团长当面向蔡炳臣提出："要采取措施，不能让部队上街。"

蔡炳臣气冲冲地说："什么上街不上街，不开枪就行"。

此时，独立师已有 200 多名干部、战士围着军区 2 号楼在大闹。

这天晚上，独立师师医院也听说武汉军区表态，要为"工总"翻案，连打三次电话问师部，是否确有此事？当师部回电确认后，医院大批工作人员冲向军区，要揪出王力和谢富治。湖北省军区后勤部于政委连夜带领 3 个人到独立师医院传达军区的指示，遭到一些病员和工作人员围攻和殴打。许多人叫着：

"老子死也和'百万雄师'死在一起，把'三新'、'二司'杀光，上山打游击……"等等。

## 第 737 回：聚军区，“百万雄师”定方案　冲东湖，二十日凌晨巨变

还是在 19 日这天晚上，武汉“省直联司”的头头杨以才开车将“百万雄师”负责人俞文斌接到武昌洪山宾馆，神秘地告诉他：“毛主席就在东湖，有什么问题，可以直接将自己的意见向中央反映。”

俞文斌也表示，他要找到毛泽东或者周恩来，亲自反映“百万雄师”对解决武汉问题的意见。

但是此时，8201 部队，即独立师的人已经在冲击武汉军区，杨以才对俞文斌说：“看来今天这事办不成了，你先回去吧。”

回到 3506 工厂后，俞文斌召开“百万雄师”的“勤务员”常委会，商量对策。会上商定：立即派“百万雄师”的二号头头杨道安、常委兼作战部长孙德洲、总站工作人员余均才 3 人去武汉军区大院落实王力的“四点指示”是否真实。

当杨道安、孙德洲、余均才他们到达军区大院时，那里已是人山人海，因为支左的军代表已经向“百万雄师”各分站传达了“四点指示”，各单位的人自发地涌到这里。据当时统计，“百万雄师”各分站到军区的车辆有 279 辆，1 万 3 千余人。他们和军区机关、独立师的部分干部、战士、家属一起，高呼“解散‘工总’，镇压反革命！”等口号。杨道安和孙德洲他们 3 人只好下车走到军区院内。

面对如此阵势，杨道安问：“怎么办？”

孙德洲说："军区是军事秘密机关，我们要维持秩序。"

这时，《红旗》杂志记者杨立功在军区值班室找到孙德洲，在出示证件后，杨立功他们问："你们来的目的是什么？"

孙德洲答："落实王力的'四点指示'。我们对王力信不过，没有其他的目的。"

杨道安和孙德洲立即在军区大院食堂召开会议，研究布置下一步的行动。大家一致认为：王力的"四点指示"不公正，不符合武汉的客观实际，不能代表党中央，要王力解释清楚。

会议决定：

1、由杨道安负责组织"百万雄师"各分站和武钢、一冶革命组织的负责人，成立一个代表团，负责与王力谈判。联合代表团由杨道安任团长，一冶的郭文祥任中心发言人，武钢周刚和另外两个人负责会议记录；

2、由孙德洲负责组织和指挥游行队伍；

3、由红卫兵司令部负责联系揪王力。

杨道安说："今晚中央来汉首长接见，我们与王力谈判。大家不负众望，把工作做好。已分了工的开始行动，还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未落实，谈判时要做好记录。"

随后，在军区 3 号楼二楼会议室，由独立师作战科孙科长召集的另一个会议也在进行。他们成立了"专揪王力指挥部"，准备组织揪斗王力。会议确定，"专揪王力指挥部"指挥长是"百万雄师"的谢敏华，副指挥长是"省直联司"的杨以才，指挥部地点就设在武汉军区对面的武汉铁路局大楼的 7 楼。要求封锁机场、码头、火车站。

随后，“百万雄师”宣布了“专揪王力指挥部”的计划：

一、派代表去军区谈判，其内容：

1、王力留在武汉解决问题，未解决问题之前，王力不能上交，谁交谁负责，“工总”不能翻案；

2、王力的安全由武汉军区负责；

3、不上北京，在武汉解决问题，要中央首长来武汉。

二、各交通要道，如飞机、轮船、火车……严加控制，以免王力开溜。

三、组织批斗王力指挥部。

四、发出通电：为什么要揪王力告全国人民书。

五、通告各革命组织暂不派队伍来军区，关于斗王力的问题，均由“专揪王力指挥部”负责……

现场指挥者对中央文革小组派驻武汉的记者说：“我们要当面向谢副总理、王力同志质问：‘百万雄师’是不是革命组织？武汉军区是不是犯了方向路线错误？等四个问题，如不答复上述问题，有可能明天全市罢工，我们要在军区呆一个月。”

会后，军区支左负责人答应调宣传车，并派一名副参谋长与“联合代表团”的人去电信大楼发“给毛主席的急电”。

与此同时，“百万雄师”以看戏名义集中了东湖地区和武汉重型机床厂的大批“百万雄师”群众。入夜时分，东湖四周直至五里以外的湖北医学院，都为“百万雄师”及省军区独立师所控制，通往东湖宾馆的道路，也被“百万雄师”层层封锁。他们调兵遣将，卡住长江沿线，汉水之滨，控制了飞机场、码头、车站以及交通要道，生怕王力等人插上翅膀逃跑。整个武汉三镇笼罩

着一片战争气氛，恍若当年抗日战争大武汉保卫战的前夕情景再现。

半夜约 23 时多，武昌造船厂的“百万雄师”开着自制的装甲车和大卡车闯进了湖北省艺术学院。“镇压反革命”的呐喊声，伴着稀稀拉拉的枪声，划破深夜的天空，恐怖吓人。

几个学生从楼上跑下来，往后院教师宿舍楼飞跑，跑得不快的男女学生被飞来的梭镖刺中倒在血泊中。

学生们跑到教师宿舍，而教师们被称为当时的“康派”，特怕事，不准他们进去。眼看“百万雄师”的人从车上下来追过来，学生们不顾一切冲上教师宿舍楼，藏到天花板里。

那是一个武汉最热的夏夜，几个学生只能蹲在不能站立的天花板和屋顶之间。一个水院的大学生说，大家把身上能够使用的武器拿出来准备拼命。结果只有那个大学生有一把水果刀。

学校里一片呐喊和哭闹声。躲在天花板里的一个湖艺女学生，其实她也是逍遥派，吓得直哭。那个水院大学生厉声吼道：“你不要命了么！”由于天花板空间狭窄，无法挪动，一个学生踩垮了天花板，泥块发着巨响滚下楼去。

时间已经进入公元 1967 年 7 月 20 日，历史会记住这一天。零时 30 分，武昌公安局 14 人，乘华沙小轿车和吉普、卡车来到东湖宾馆靠近毛泽东下榻的梅岭院落的北门，被哨兵拦住。

来人说：“我们要见谢部长。军管小组向我们传达了王力的‘四点指示’，‘工总’要翻案。‘工总’翻案我们就要人头落地；军管小组要我们明天就放人，‘工总’的案是我们办的，我们最了解情况，我们要问谢部长，要不要执行《公安六条》？”

他们说："谢部长是我们的顶头上司，见谢部长是合情合理的。告诉你们，谢副总理住哪个房子，我们都知道，这里面我们熟得很，你不传达，我们就冲！"并说："谢部长今天晚上不见，天亮武汉公安将有三、四千人来冲，暴露了这里的目标，或出了什么问题，我们概不负责。"

警卫对他们说："你们都是搞公安工作的，有的过去还在这里做过警卫工作，知道这个目标的重要性。"

来人却说："中南海都冲了，这里有什么了不起！"

来人冲进大门内 100 米处，在这里和警卫形成对峙。

军区保卫科科长王振英等人接到报告，赶到北门阻拦。武昌公安局的人拿出武昌区公安局军代表，独立师某团政治部王主任开的介绍信，口气十分强硬的说：

"我们这里有介绍信。今天晚上来了 14 个人。来，就是准备闯祸的。要是天明还不接见，就要来几千人！"

王振英哪敢怠慢，立刻报告中央警卫团。同时，赶紧给钟汉华打电话。

钟汉华已睡，王振英对钟汉华的秘书说："你一定要让钟政委立即采取措施，否则就要出大事了！"

因为始终没有等到钟汉华的电话，王振英又急忙给军区值班的首长报告，要他电告军区领导，立即调武汉军区直辖的陆军 29 师过来。

中央警卫团的汪东兴接到王振英的报告，立即通知百花二号的中央代表团，赶紧派人赶到北门协助劝阻。这时，代表团的工作人员还没有睡，正在听王力讲了毛泽东 18 日晚上的谈话内容。

王力对他离开武汉军区时的异常居然没有丝毫的感觉。他回到东湖宾馆后，继续帮军区修改检查。然后，和工作人员张根成、吴介之、井岗山、尹聚平、胡慧娟等人谈起了了毛泽东 18 日晚上的谈话。

王力说："陈再道说他们陷入了泥潭已不能自拔，这话言重了，他不知道毛主席和我们来武汉是为了帮他摆脱困境的。主席说我们是保陈再道来了。陈再道这人心眼太直，也太糊涂，他至今不理解中央的意图。"

正在这时，他们接到汪东兴电话，得知北门有人要冲东湖宾馆的消息，立即让张根成赶过去。王力将他们和武汉军区商定的工作日程告诉张根成，让张根成转告来访的群众，中央代表团第二天下午，实际上已经是当天了，就会接见他们。

张根成到了那里，向武昌公安局的人做工作说："你们的意见我们已经向首长反映了，明天下午就准备接见你们和其他群众组织的代表。你们先回去，明天下午再过来。"

但是，武昌公安局的人不同意，还是要往里冲。张根成跑回百花二号，报告王力。王力马上通知武汉军区值班领导，武汉军区叶明副政委答应派 40 名干部过来。

此时的汪东兴紧张坏了，他让中央警卫团的中队长把能组织起来的数十名 8341 部队的警卫战士进行战斗部署，重新编组，实施有效的火器配置，随时准备投入战斗。他隐藏在暗处密切观察。见北门没有增人，非常着急，打电话催促王力说：

"不行啊，怎么没有见增加人啊？"

王力忙去叫醒谢富治，报告了情况。

谢富治到底是军人，他边穿衣服边说：“赶快把宾馆造反派头头叫来，先将内部造反派稳定住，叫大家不要乱，免得群众发生冲突。”

这时已是凌晨 3 时左右，29 师接到军区“保护中央首长安全”的指示，师政委张昭剑亲率一个排的战士和秘书科科长、侦察参谋赶到东湖宾馆北门，手挽手拦住武昌公安局的人。

武昌公安局的人见状，对他们说：“你们不是 8201 部队，这里没有你们的事，你们这是武装镇压我们。是谁派的？交出幕后指挥！”并向 8201 部队，即独立师的卫兵说：“他们不相信你们，派另外的部队来了。”

就在东湖宾馆北门相持之时，20 日凌晨 1 时 20 分，武汉重型机床厂已经将武装的“百万雄师”集结，广播高喊：

“踏平‘工总’！镇压反革命！”

“强烈要求中央首长深入下层了解情况！”

凌晨 2 时，“百万雄师”两千多人头戴安全帽，手执长矛，来到武汉军区大院。

与此同时，“百万雄师”开始围攻武钢，百余辆卡车、10 多辆消防车，包围了 33 街坊的新一冶、业余大学、一冶一中和工人村，闯进工人宿舍和造反派办公室，抓捕 100 多人。

凌晨 4 时，武汉已经满街都是“百万雄师”的大卡车。疯狂的呐喊声响彻武汉上空。

天开始蒙蒙亮，“百万雄师”属下的“园艺军”按“专揪王力指挥部”的统一计划，受命控制了南山宾馆的水路和码头后，率先冲击东湖宾馆前门和后门。在统一调度下，“园艺军”东湖

分部的头头雷荣带着一车人从后门冲进了宾馆，众人随后直穿大路奔跑南下，在乙所没有找到谢富治。

雷荣和宾馆内属于“百万雄师”一派的服务人员 10 余人，向西越过第二道岗位，率先冲入百花院落，边跑边喊：“打到王力！叫王力滚出来！”

谢富治发现有人冲进宾馆后，立即打电话通知住在东湖宾馆乙所的陈再道、钟汉华过来解围，军区曾秘书接的电话。

很快陈再道、钟汉华来到百花二号，陈再道进门就说：“靠你们做工作啰，我是无能为力了！”说着，往床上一躺，闭上眼睛。

很快，“百万雄师”的头头朱兆强、班尔杰、罗得胜、夏菊花带人喊着：“我们要见谢富治、王力，叫他们出来！”冲进了百花二号楼。

住在一楼的代表团工作人员张根成、井岗山、吴介之、尹聚平、胡慧娟等人闻声跑出房间，堵在楼道，拦住他们。“百万雄师”的人说：“我们要找王力到军区大院去！”

张根成、井岗山等人指责来者的行为，不让他们过去。但他们几个人岂是众多“百万雄师”的对手。混乱中，几乎所有代表团的工作人员都挨了打，朱兆强、班尔杰带人冲上了二楼。

住在二楼的谢富治，听见外面震耳欲聋的“谢富治、王力滚出来！”的喊声和吵闹声，他让王力待在屋里，自己先走了出来，面对冲上楼来的人群大声呵斥道：

“我就是谢富治！你们是哪里的？”

来人高喊：“到军区大院去！”

谢富治说："干什么？要绑架吗？我们准备今天下午接见你们的代表，你们这种行为是非常错误的！"

他随即又对代表团的工作人员说："让他们上来！派代表上来！有什么意见可以谈。"

"百万雄师"的头头们被谢富治这几句话震住了，他们迟疑了一下，停止了吵闹和喊叫。

随后，谢富治同"百万雄师"的几个人一一握手，问了他们的名字。当谢富治同年轻漂亮的著名杂技演员、全国人大代表夏菊花握手时，认出了她，吃惊地问："你怎么也来了？"

夏菊花倔强地昂着漂亮的脑袋说："我怎么不能来？"

气氛缓和了下来，"百万雄师"的人说："我们不是来揪你的，是请首长给我们解决问题的。"

谢富治请他们进会议室说话，人群一下子挤满了会议室。陈再道建议到外面谈，大家同意。独立师张守本马上带领警卫将冲进来的群众组织好，坐在草坪上。

## 第 738 回：认错人，陈再道当场挨打　群情起，强架王力上卡车

谢富治穿好军装和陈再道走出大厅后门，来到屋子后面的草坪上坐了下来，“百万雄师”200 多人，站的站，坐的坐，围在他们周围，大家一起交谈，解答问题，气氛变得较为融洽。谢富治答应下午接见大家，“百万雄师”的人也答应先回去。

与此同时，王力让张根成快去通知住在百花一号的杨成武。张根成从后门跑到相距约 200 米百花一号，将情况报告了杨成武。杨成武着急的说：“那怎么办？那主席那边？……”原来商定，杨成武不能暴露身份。

张根成说：“主席那边汪东兴知道了，你不要暴露了。”

杨成武道：“那我们就不出去了。”

张根成利用这段时间赶紧将机密文件转移走，然后回到百花二号后面的草坪。

王力换上军装也向草坪走来，坐在谢富治身边。

但是，事情又发生突变。5 时 10 分左右，大家正坐在草坪上谈话，突然，独立师军车 21 辆，以五团五连两卡车人打头阵，车子架着轻机枪，步枪上着刺刀，随后是海军一车、空军一部分、307 医院、“武汉公安”的一部消防车，还有独立师师、团宣传车 6 辆，3 辆吉普，1 辆小轿，突然从前、后门冲进东湖宾馆。紧接着，5 时 40 分，集结在武重一带的“百万雄师”手持长矛、梭镖，腰插匕首，头戴安全帽，上身赤膊，下身短裤，有人还戴个大口罩，分乘 5 辆卡车而来。一辆同武昌公安分局的人汇合，

封锁北门，其余 4 辆冲进西大门。他们不听哨兵的警告，包围了哨兵，控制了电话机，然后冲入百花二号，包围了谢富治和王力的住房。29 师政委张昭剑率人前去阻拦，很快就被人群冲破。

由一个副营长带领的独立师军人及军事院校学员，端着冲锋枪和上着刺刀的步枪，有的提着手枪，一边喊着："把王力揪出来！"一边冲进谢富治、王力的房间，翻箱倒柜抢材料，然后又跑到草坪。这些激愤的军人和群众蜂拥着谢富治、王力，大声质问：

"请问谢副总理，王力的'四点指示'根据何在？凭什么说我们是'保守组织'？凭什么说武汉军区犯了方向路线错误？"

不等谢富治说话，人群中又喊叫了起来：

"你把王力交出来！"

"王力是破坏武汉文化大革命的罪魁祸首，我们要批斗他！"

"对！把王力交出来！打倒王力！绞死王力！"

王力站出来说："我就是王力。既然大家想解决问题，那就请大家冷静一点。我们欢迎大家提意见。'四点指示'不是我王力的，是中央的决定，我们是代表中央讲的。你们有意见可以提，但不准这样胡闹！"

这下惹火了在场的人们：

"什么他妈的中央决定？纯粹是你王力和'中央文革'放的屁！你少吓唬人。今天你必须跟我们走一趟，说不清问题不能回来！"

"对！把他拉到军区去，批斗这个'小爬虫'，让他尝尝革命群众的厉害！"说着有人要动手。

张根成和北航井岗山等人一看不好，马上围在王力周围，大声喊道：

“你们要干什么？你们要干什么？”

“同志们要警惕一小撮坏人乘机捣乱！”

“你们不许打人，这是反革命行动！”

这一下，井岗山等人头上、身上立即挨了许多拳头。那些独立师的战士，个个疯狂而愤怒，眼睛全是血红，露出了一张张暴怒而变形的脸。他们怒不可遏地抡起拳头教训这几名北京大学生，嘴里还骂道：

“打你又怎么样，这是革命造反行动！”

……

北航学生被打倒在地……

端着冲锋枪的独立师军人，枪口直对谢富治和王力。

面对一个个黑洞洞的枪口，王力严肃地说：“我希望我们的解放军同志把枪拿开，因为它是对付敌人的，它可能会走火，那样事情就会起变化，我们不愿意看到那样的局面。我再次告诉大家，我们明天在军区接见你们的代表，那时什么问题都可以谈。”

“不行！今天必须谈，你不要耍滑头！”

“对！让他马上回答问题，否则我们决不答应。”人们又乱了起来。

在场的陈再道一直一言不发。谢富治气坏了，指着陈再道大声吼道：

“我叫你来是看热闹的吗？我命令你下令让他们立即撤出去，马上撤，听见了没有？”

陈再道看到谢富治气得发抖的样子，又望望王力、余立金、张根成和北航“红旗”几个红卫兵着急的样子，不冷不热地说：“事情是你们引起来的，我管不了。这些人又不是我让他们来的，我管不了他们。这回要你们做工作了，我们这些老家伙们不中用了，无能为力了！”

陈再道的话引起在场的“百万雄师”和独立师战士的一阵大笑。

人们继续围攻王力、谢富治、余立金和中央代表团的人。这时，如果说中央代表团的人成了“过街老鼠，人人喊打”，那确实是事实。

由于东湖宾馆这边，双方一直在僵持。军区大院里等着批斗王力的军区官兵和“百万雄师”的人们不耐烦了，又有许多人开着卡车冲进了东湖宾馆。突然，一个人高马大的家伙冲了过来，对着陈再道就是一拳，把他打倒在地。接着，又是几拳头对着他的后背和前胸砸来，边打边骂道：“打死你这个小爬虫！”

这时有人喊：“别打别打，这是陈司令员。”

四脚朝天倒在地上的陈再道大喊：“混蛋！乱弹琴！我是陈再道。哎呀，打死我了！”

独立师的一名股长忙叫：“这是我们的陈司令员！不是王力，不要打了，抓错了！”

这个“百万雄师”的“拳王”赶紧把陈再道扶起来，不停地问：“陈司令员，对不起！打在哪儿了？疼不疼？”

陈再道被扶起来后，骂骂咧咧地说：“谁他妈的再搞武斗，我就枪毙了他！”说完，对赶来的张昭剑说：“我是无能为力了，现

在就要看你们的了。”说罢，他就跑到杨成武的房间里躺下了。后来才知道，这个“拳王”是“百万雄师”的头头罗得胜，他把陈再道当成了王力。

谢富治见陈再道被打，马上站出来说：“我是谢富治，是中央代表团的团长，是党中央、毛主席派我们来处理武汉问题的。大家有意见可以提，但不能搞武斗！谁搞武斗谁就是对抗毛主席！”

王力也接着说：“我是王力。我可以告诉大家，我的讲话和‘四点指示’，不单是代表我们个人的意见，也不单单是‘中央文革’的意见，而是党中央讨论决定的，是毛主席、林副主席和周总理批准的。我已经把话说清楚了，有什么问题明天派代表谈。今天这么晚了，我们不能跟你们到军区去，你们不能强迫我们。”

这时，因打错了人恼羞成怒的罗得胜一把揪住了王力，拳脚并用把王力打倒在地，许多人也吵吵嚷嚷地围了上来乱打一气，现场又乱了起来，“百万雄师”的总指挥朱兆强喊：“大家别跟他噜苏了，拉到军区大院再说。”

人群一下围了上来，北航的学生见状，又围在王力周围，张根成则抱住王力，和北航的学生一起往屋里拥。一进屋，从后面又跟进来一些人，张根成感到问题严重，就喊：

“王力是毛主席派来的，你们这样做是错误的，你们要犯大错误的！中央派的人你们这样对待，什么人才绑架中央派的人！”

这时，他后面过来一人，掐住张根成的脖子，他喊不出来了。4 个人把他架到旁边，又推又打。一伙身强力壮的人不顾王力的抗议、挣扎和代表团人员的阻拦，架起王力就往外走，把他推到一辆大卡车上。就这样，7 时 20 分，王力在谢富治、余立金等

人的众目睽睽下，被拉走了。

张根成冲出房间，追着车大喊：“你们不能这么做！”

车上有人问他：“你是干什么的？”

张根成回答说：“我是中央文革办事组派来的！”

不说还好，他这一说，车上的人一下子把他也架上了车。北航的 3 位同学，看见王力被架走了，张根成也被架上车了，拼了命的追过去，要往车上冲。张根成对他们喊：“你们快回去！”

北航学生说：“死也死到一块！你们走了，我们也不能留下！”

结果，北航学生尹聚平、胡慧娟也被“百万雄师”拽上了车。

军区保卫科王科长见一车车人从西门冲入，赶紧与张昭剑商量，留下 29 师秘书科滕科长带一排战士守北门，其余人直奔西门，半路上只见许多穿警服的人在院里乱窜，而一些独立师的宾馆内警卫在指指点点，还有骑自行车的前后指挥。他们赶到百花一号后草坪，看见“百万雄师”与独立师的人已经在打人。张昭剑等立即组织战士们阻拦和劝说：

“同志们，不要打人，有话慢慢讲！”结果也遭到拳打脚踢。张昭剑在战争年代负过 5 次伤，本来就瘦如排骨，怎经得住这番折腾，结果也被打伤，左肋骨被打断一根。

独立师负责东湖宾馆警卫的秦堂春、吕宗贵、蒋建隆见事态无法控制，赶紧打电话向牛怀龙、蔡炳臣报告，但却找不到牛怀龙、蔡炳臣，只好向司令部值勤室报告，并要求他们找牛怀龙、蔡炳臣到东湖处理问题。

王力被带走时，牛怀龙师长已经来到了西门，他说：“让王力上车吧，上了车还好些！”

然后对绑架王力的车上人说："不要搞得这么凶嘛！搞这么凶干什么？把机枪收起来！"

眼看着王力被抓走，作为代表团团长和国务院副总理、公安部长的谢富治羞辱、悲愤难当，他不顾别人阻拦，坚持由吴介之陪同乘车到武汉军区大院去找王力。

钟汉华见王力被群众绑架走了，也忙跑来和陈再道商量怎么办？陈再道因为身上有伤，又考虑到毛泽东的安全，便与钟汉华商量：他仍留在东湖宾馆，由钟汉华赶到军区大院，设法说服独立师的人把王力放回来。他们听说谢富治要去找王力，就准备去劝谢富治别去，由他们亲自去处理。这时，牛怀龙对陈再道和钟汉华说：

"你们别去了，我去找他讲。"牛怀龙还没到谢富治的住处，就听说谢富治已经去了军区，他也直奔军区大院。

钟汉华叫来 29 师的政委张昭剑和秘书，一起把刚印刷好的检讨，即武汉军区在支左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的布告，在澡盆里全部烧掉。然后赶往军区大院。

谢富治到达军区大院门口时，有几个军人认出了他，故意喝道："你是什么人？"

谢富治说："我是谢富治！让我进去！"

对方回答："你是谢富治？进来就把你宰了！"

这时又有几个人大喊："快拿刀子来！宰了这老东西！"有的军人故意拉动枪栓。吴介之一看不好，急忙把谢富治拖上汽车，开回了东湖宾馆。

回到东湖宾馆的谢富治，让北航的井岗山给武汉各造反派组

织打电话，嘱咐大家保持冷静沉着，不要冲击军区，不要上街和受蒙蔽的“百万雄师”群众发生冲突，相信中央和毛主席会妥善安排处理事情的。要求大家坚信党中央，不得启用已在 17 日封存的长矛、匕首。

谢富治看见陈再道还躺在那里不动，不禁大为恼火，指责他说：“你是军区司令员，军区抓走中央代表团的人，你不去救，不去做工作……”

“我有伤，”陈再道也一肚子火，他说：“我行动困难。”

“这能成为理由？”谢富治声色俱厉，“你马上回军区去做工作，保护王力，叫他们放人！”

“钟汉华已经去军区大院了，这里，毛主席还住在东湖宾馆，我不能走。”陈再道气哼哼的解释说。

“你就是不想把王力保回来。”谢富治盛怒未已。

空军政委余立金找到独立师政委蔡炳臣，对他说：“王力是中央派来的，现在被你们独立师的人抓走了，你们一定要想办法保证他的安全。”

蔡炳臣从东湖返回师部，在作战室给正在军区大院的师长牛怀龙打电话说：“余立金找我，要我们保证王力的安全。我想，人在军区大院，首先应由军区负责，我们没有兵力。”

## 第 739 回：回北京，连续见湖南代表　接电话，周恩来手在颤抖

再说北航的尹聚平在东湖宾馆为救王力被“百万雄师”推上卡车以后，见车上全是“百万雄师”的人，他们为抓到了王力兴高采烈，把尹聚平忘了，也可能把她当成了自己人。尹聚平将计就计，车上的人喊口号，她也跟着喊。到了一个十字路口，卡车停了一下，她趁车上的人未注意，迅速跳下了车，消失在人群中。

武汉大街上已是人山人海，到处都是“百万雄师”，听说抓到了王力，个个欣喜若狂。

尹聚平对刚刚发生的事情惊魂未定，她惦记着王力的安危，想混进军区大院寻找王力，但不知道军区大院在哪里？只好先混在人群中。由于她只会说标准的普通话，不会湖北腔，怕再次被抓，便跑到路边一户人家，要了一点水喝，并打听往水利学院怎么走。女主人听她一口北京腔，问她是干什么的。尹聚平说是北京来串联的学生，女主人很热情地给她画了到水院的路线。尹聚平感激地辞别了女主人，于上午 9 时左右到了水院“钢二司”总部，说自己是北京来串联的学生，借电话一用。“钢二司”的人便让她打电话。尹聚平给北航办公室打通了电话，对北航“红旗”负责人韩爱晶讲，武汉“百万雄师”和 8201 部队的人冲进东湖宾馆，抓走了王力，中央代表团的人失散了。她让韩爱晶赶紧向中央报告。

尹聚平的电话顿时让北航“红旗”炸了锅，许多学生要上街游行示威，声讨武汉反革命暴乱。

异常愤怒的韩爱晶立即接通钓鱼台中央文革的电话，向中央文革汇报。

此时，中央文革刚开完会，大家都回去休息了，值班的是中央文革办事组王广宇。他放下北航的电话后，立即就去找陈伯达。陈伯达吃了安眠药已经睡下，他的秘书听说王力在武汉被抓了，赶紧把陈伯达叫了起来。关锋住在陈伯达的楼下，于是把他也拉起来，和陈伯达俩人来到 16 号楼的文革会议室商量解决办法。

戚本禹就住在 16 号楼的楼上。王广宇问陈伯达："是不是把戚本禹也叫起来？"

陈伯达说："不用了，我们来处理。"

可是王广宇在外面等了半天，还不见陈伯达他们有什么行动，于是就上楼去找戚本禹。

戚本禹被叫起来后问："什么事？"

王广宇说："王力在武汉被人抓起来了。"

戚本禹一听就急了，"这不是王力的事情，毛主席也在武汉啊！"他赶紧下床跑到办公室，看到陈伯连和关锋正在起草一封给武汉地区造反派的信，准备在信中宣布武汉事件为"叛逆"。陈伯达在写，关锋在念，只写了一页纸都不到。戚本禹想："这么紧要的事情，靠陈伯达这么个书呆子不行，我得赶紧报告总理、康生和江青。"他先用电话通知江青的警卫去叫江青，可警卫说："首长睡了，我不敢进去叫。"

于是戚本禹决定自己去报告江青，他先让王广宇赶紧通知周恩来和康生的秘书。

周恩来回到北京后，一刻也没有停歇。

7 月中旬后，湖南接连发生开枪、抢枪事件。7 月 16 日，继 6 月 7 日湖南造反派在《湖南日报》召开的联席会议上成立的由各组织共同组成的“制止武斗指挥部”之后，“湘派”的“东方红总部”、“青年近卫军”、“红工会”、341 部队“红色硬骨头”等组织又成立了一个“制止武斗指挥部”。6 月 7 日成立的“制止武斗指挥部”开始时称为“革命治安指挥部”，后改为“省会无产阶级革命派制止武斗联合指挥部”。

7月18日下午，“高司武工队”的4部卡车在大街上高速度行驶，向湖南日报社打枪。13时多，“高司”派80余人冲入长沙火车北站（货站）的公安派出所，抢走了该所的一批枪支弹药，并与北站的“工联”派人员发生冲突，用手榴弹炸伤了“工联”方面的人员。火车北站的“工联”人员说是为保护铁路工人的人身安全，宣布暂停南北铁路运输。当晚，湖南省军区驻火车北站的人员为此与“工联”发生争执辩论，一些解放军被铁路工人围困在北站辩论，不让撤走。

长沙的武斗牵动着正在北京的湖南代表团的心。7月17、18两日，参加北京谈判的湖南谢若冰和“省直联”的孙君森未经中央批准，擅自返回长沙，连续两天在“井冈山”总部与部分“湘派”组织座谈，介绍赴京代表团内部的争论情况。孙君森认为：“第一代表团不是自下而上产生的，群众不知道，说它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产物，一点也不错。”他们准备组织“第二代表团”赴京。

7月19日凌晨，刚刚回到北京的周恩来和戚本禹等人在人民大会堂第二次接见湖南两派代表。这次接见主要谈铁路运输问

题。

周恩来建议："铁路军管，两派都退出。""你们都相信47军，我让47军黎原同志跑一趟行不行？"

众人答："行！"

周恩来对47军军长黎原说："他们都相信你，请你跑一趟，你把长沙秩序维持起来，不要搞武斗了。谁拥护就证明谁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边。""铁路是全国的命脉，停车损失就很大，特别是对国际有影响。""双方铁路组织不要介入地方，他们双方也就不互相斗。""铁路无论如何不能中断，要以全局为重。"

周恩来继续说："双方做好调查，到底谁夺了枪，我希望你们做毛主席的好学生，要实事求是，就是不要说假话。你们青年人，要光明磊落，错了就改，允许你们犯错误，也允许你们改正错误，我要求你们听毛主席的话，希望你们做毛主席的好学生。"

周恩来说："再不要武斗了，不要抢枪了，看哪派做得好，就证明你们愿做毛主席的好学生。马上恢复交通，不夺枪，不武斗，不挑动农民进城搞武斗。黎原同志的部队保护岳阳到衡阳的铁路，今后军管一律由47军派人，原来的军管单位有意见也可以派47军的人去补充或调换。"

7月19日，湖南"工联"占领了长沙邮电大楼。邮电局已经是"高司"派夺了权的，现在又被"工联"夺过去。抓走了7个人，电讯不通。

周恩来、戚本禹又于7月20日0时54分至1时35分在京西宾馆第二会议室，接见湖南军队代表和地方领导干部。周恩来问王恒一关于7月17日铁路夺枪情况，王恒一答："工联"派抓走了部

队11人，夺去12支枪。

这时，总理联络员李彩五进来汇报，“高司”因这次接见有叶冬初在，拒绝参加。

周恩来说：“毛主席司令部的人接见为何不来？叶卫东是毛主席请来的，看！你们把这个组织惯成什么样子了，如不来是对抗最高指示。”

周恩来让李彩五、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万达打电话批评教育，做工作。他继续谈铁路问题。当万达打完电话回来后，周恩来问：“‘高司’代表来不来？”

万达说：“学生年青，我给他们说，无论如何要来。”

周恩来：“就是那天我对‘公检法’批评了几句……他们(公检法)捣乱，可学生我一句也未批评啊！说我有倾向性，我是有倾向性，跟着毛主席干革命就是有倾向性。别的省，军队很快的明朗化了，为什么湖南这么久不明朗，詹才芳同志你来多久了？”

詹才芳答：“一个月了。”

黄永胜：“我们开了几次会统一认识。”

周恩来：“也要做做群众工作。”

黄永胜：“我们先把部队干部思想工作做好，再去做两方面的工作。”

王恒一继续汇报：“抓我们11人是否让他们放出来？”

周恩来：“这不是11个人的问题，是整个铁路问题，我们大家一起解决铁路问题。”“河南宣布取缔‘二七公社’，湖北取缔‘工总’是错误的。湖南‘湘江风雷’问题，你们大肆捕人，相当严重，比湖北对‘工总’抓人多。人民解放军要相信群众，

三八作风，错了就改嘛！”“军队有错就改，不会打成带枪刘、邓路线。这口号我不赞成。章伯森、梁春阳你们支持造反派我赞成，但一定要抓赵永夫式的人物，打倒这个，打倒那个我不同意，你们赞成吗？”

章伯森、梁春阳答：“赞成。”

黄永胜：“我们想帮中央做点工作。”

戚本禹：“黄永胜同志做了不少工作。”

黄永胜：“抢枪的事双方肯定都有。”

周恩来：“学习江西嘛！”

接见完湖南的军、地领导，7月20日凌晨2时10分至2时50分，周恩来、戚本禹、黄永胜等人第三次接见湖南代表团全体代表，主要解决铁路夺枪的问题。

“高司”负责人詹先礼首先发言，他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章伯森、梁春阳违反中央指示，在裕湘纱厂殴打农民；占领邮电大楼，中断通讯；‘工联’召开控诉军区大会，大搞游行；赶走河东高等学校学生。”

周恩来：“铁路夺枪问题你还没有回答。”

詹先礼：“因邮电大楼被‘工联’占领了，所以我们今天联系不上。”

“真理军”代表刘国辉：“我们听了交通这样中断非常痛心，我们情况不明，这应记在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章伯森、梁春阳的身上。”

周恩来：“不要戴帽子。”

刘国辉：“他们有个代表前几天回去了。”

周恩来：“叫什么名字？”

刘国辉答：“谢若冰，这几天长沙发生了一系列问题，与她有关系。”

戚本禹问：“代表回去为什么不经过我们？以后回去要经过联络员同意。”

“工联”胡勇说：“17号晚上‘高司武工队’、‘红色怒火’200余人到裕湘突然袭击；‘工联’派11人到农村贴中央通知，被抓走了，后来派3个代表去谈判也被抓去了，有一人当时用马刀砍死了。我们去追，农民架了机枪，打了1000多发子弹，打了一夜。南郊冻肉厂有8个工厂停工；18号下午，‘高司武工队’来4部卡车在大街上高速度行驶，投了手榴弹，并向湖南日报社打了枪。在北站抢走了两挺机枪，13支步枪。火车不通的问题，今天晚上9点钟我们才知道。”

周恩来问：“今天抢部队的枪，占领邮电大楼有没有这回事？”

“工联”答：“有这回事。”

詹先礼：“‘工联’占领了邮电大楼。邮电局已经是造反派夺了权的，现在又被他们夺过去了。抓走了7个人。”

周恩来问：“铁路上你们哪边人多？”

“工联”答：“南站、北站我们人多，东站、铁路局他们人多。”

周恩来：“双方对立起来很难解决问题。我问你，铁路是军管的，铁路上的群众都是阶级兄弟，双方都应该把矛头对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铁路是全国性的，你停了，国内国际运

输也断了。军管后，双方不介入行吗？”

答：“行。”

周恩来：“电讯大楼也要军管起来，不搞对立，行吗？”

“高司”表态：“坚决拥护总理指示。”

“工联”申述了他们占领邮电大楼的原因。

周恩来：“你们双方对47军好些，47军的同志跑一次赞不赞成？”

双方答：“赞成！”

周恩来把47军军长黎原叫到前面坐，双方代表鼓掌。周恩来说：“大家拥护你，支持你，你就代表人民利益跑一趟。你们长沙有多少部队？”

黎原回答后，周恩来说：“现在派个团把长沙秩序维持起来。现在是20日，搞一架飞机，送黎军长回去，双方各派一名代表。铁道部派一人。铁路是国家的命脉，不能中断。”

“一去马上就要恢复交通。我们中断交通，关系到国际影响嘛！”

“枪谁抢的？在什么地方抢的？放第二步解决，首先是不介入铁路。为人民利益，铁路不能再武斗了，不能再抢枪了。这是考验你们，看哪派做的好。”

“岳阳到衡阳、郴州这条线由部队管起来，邮电大楼，公用企业军管起来，军队绝对不介入你们两派武斗。”

“你们双方各派三人，今天去，搞好，后天就回来。把曾干农、谢若冰也带回来，行吗？”

黎原和群众代表同声答道：“行！”

周恩来："第二件事，请双方像河南、江西一样，也派代表协商，停止武斗，停止夺枪，停止农民进城，今天20号，下午会谈，希望有好消息。江西搞了'八条'，广西搞了'十条'，你们是主席故乡，不能落后，搞成协议就可以一起干革命了。"

"其它情况不谈了。下次再谈。"

接着，周恩来主持召开中央文革碰头会议，介绍了武汉的情况和毛泽东关于处理武汉问题的意见。会议决定，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以中共中央和中央文革的名义发一个文件，指出武汉军区在支左上犯了"方向路线错误"，主要责任应当由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政委钟汉华来负，但是中央并不追究责任，只是要求武汉军区转变立场。会议还决定，要陈再道、钟汉华立即支持"三钢"和"三新"，并且要军委各总部和各军、兵种驻武汉部队公开表态，支持武汉的造反派。同时，会议还要求解放军各总部和各军、兵种各自打电话给所辖的驻武汉部队，做好工作。

20 日上午，当周恩来的值班秘书接到钓鱼台打来的电话时说："总理已经劳累了两天两夜了，刚服了安眠药睡下。"

情况刻不容缓，钓鱼台这边戚本禹只好说："事情非常紧急，你一定得叫总理起来，我有特别重要的事要向他报告。你去找护士，让她给总理准备一些可以恢复神志的药。"

在秘书去叫醒周恩来的时候，戚本禹又给在武汉的汪东兴打了电话。汪东兴对他说："情况十分严重，好在我还有部队在向这边运动。"

戚本禹问："主席那里的情况怎样？"

汪东兴说："还没有去请示主席，不过我们警卫的力量是很

强的，能够应付。”

这时，中南海西花厅周恩来已被叫醒，他过来接电话，戚本禹赶紧对他说：“总理，不得了啦！他们冲击了东湖宾馆，王力、谢富治已经被他们抓了，现在就怕他们冲击主席那里。我刚跟汪东兴通了电话，他们警卫都在做准备了。”

周恩来一听：“啊？！这怎么得了！我马上过来。”

接着，周恩来又接到杨成武从武汉打来的急电，说王力被抓走，不知去向，武汉局面混乱，毛主席的安全没有保障。

周恩来握着话筒的手有点颤抖。他做梦也想不到，本来有希望解决的武汉问题，在他刚刚离开一天后竟如此糟糕透顶。他对杨成武说：“你一定要保证主席的安全。”然后又问：“陈再道在哪里？”

“他挨了打，撒手不管了，看样子也管不了，跑到我住的房间来睡觉。”

电话那边稍顷片刻，接着听到周恩来的指示：“你同汪东兴、谢富治他们研究一下，多研究几种情况和应急措施，要做好他们冲击梅岭和百花一号的准备，要说服。现在的情况，要尽一切努力做好说服工作……我尽快赶到武汉。你叫陈再道来接电话。”

杨成武把陈再道叫了过来，周恩来在电话中急令陈再道说：“你要把王力找回来。”

“我无能为力，我没有这个能力，他们不听我的。”陈再道回答，又跟了一句，“不要害怕群众嘛。”

周恩来厉声地警告他说：“你们武汉军区必须保证谢副总理和王力同志的安全。”

“现在这个局面要你们中央负责。你们中央派人来，搞得这么乱，我保证不了。”犟牛脾气的陈再道又顶撞说。

周恩来深知，王力一旦有个三长两短，事态就更严重了。他马上要通了武汉军区的电话，找到副司令孔庆德，对他说：“你立即通知‘百万雄师’派 100 名代表赴京谈判，军队也派出代表和他们乘飞机前往，具体时间，明天再定。让他们先作好准备。”

再说戚本禹这边，他放下周恩来的电话后，又赶紧去报告江青。江青住在 11 号楼，虽然距离 16 号楼只有 200 多米，可戚本禹还是坐了车过去。到了那里，他先将护士许春明叫起来，对她说：

“你赶紧进去把首长叫起来。你给她穿好衣服，扶她出来，就说是戚本禹有非常紧急的事要向她报告。”

护士许春明有些犹豫，问：“这行吗？首长刚吃了药入睡了，我不敢去。”

戚本禹说：“没关系，你就说，是我让你叫的。有特别重要事情报告，一切由我负责。”

江青吃了安眠药刚入睡。许春明叫她，她迷迷糊糊地问：“什么事？”

许春明说：“是戚本禹找你。”

江青穿上衣服走了出来，看见戚本禹就问：“什么事啊？”

戚本禹说：“东湖被包围了！”

江青一听就清醒了，说：“赶紧报告总理！”

戚本禹说：“都已经通知了。现在陈伯达他们正在起草文件。”

江青赶紧和戚本禹一起来到 16 号楼，陈伯达的文件还没起

草完。

江青听王广宇把情况一讲，认为十分严重，不是一份电报就能够解决的事情。这时大家都很紧张，不知该怎么办？

江青努力让自己镇静片刻，然后当机立断地说："这事得去找林总！他冷静、果断，能处大事。"

戚本禹立刻通知了叶群和周恩来，直接去林彪在人民大会堂的住处会合。然后又通知康生，接着调来车队，叫上文革小组的全体成员都上了车，跟着江青的车一起朝林彪居住的人民大会堂飞驰而去。

住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浙江厅的林彪听到武汉的消息，惊得目瞪口呆。他叫来秘书，对他说：

"我要写封信。"秘书立刻准备好了纸和笔。

林彪亲自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信写好后，按照他的习惯，没有马上发出，他在会客厅里慢慢的来回踱步，低头继续沉思……

大概是思考得比较成熟了，他把秘书叫进来，指示说："叫戚本禹来一下。"

## 第 740 回：劝说难，钟汉华磕头作揖　武汉狂，“牛鬼蛇神一扫光”

住在梅岭的毛泽东听到外面发生的这些事情，对汪东兴说：“叫武汉军区放人，陈再道和钟汉华要负责把王力找回来。”

20 日早晨，“新湖大”总部的工作人员小曹来到住在湖北大学的“新一冶”曹承义和“新湖大”张维荣、彭勋住的房间，紧张而又小声说：

“出事了！‘百万雄师’把中央文革的王力抓到武汉军区去，还打了王力和中央文革小组的人。现在他们有很多人冲进了武汉军区。”

张维荣等人立即起床，通知在湖北大学召开全市造反派头头会议，商量对策， 并用长途电话与在京的武汉造反派头头联系，希望他们尽快向党中央、毛主席汇报武汉发生的新情况。他们不知道毛泽东此刻就在武汉。

天亮以后，大批 8201 部队和“百万雄师”的车辆快速驶过湖北大学校门口，向武汉军区方向开去。许多军车上，穿着军装的 8201 战士拿着枪站在车顶和两边车门上示威游行。有些军人还不停地向天上放枪。“百万雄师”的车上也是举着铁矛，戴着安全帽，全副武装的人，高喊：

“打到王力，打倒谢富治！”

“解散‘工总’，镇压反革命！”

“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武汉军区大院早已失去控制，军人、群众、车辆随意进出。

在军区大门，一卫兵对旁人说“……我们的人打电话给‘百万雄师’，‘百万雄师’派了一千多人到东湖疗养院，包围了，捉到了王力，送到军区，现在在四栋三楼”。

有人与军人在军区大门外激愤议论：

“谢富治算老几？能代表党中央和毛主席吗？”

“揪出谢富治！”

在口腔医院门口，两个军队干部说：“谢富治想跑，老子海陆空都控制了，你跑得脱？”

武汉独立师以8201部队名义印制散发的《特急呼吁》，宣称：

“我们认为‘百万雄师’是真正的、不折不扣的、浩浩荡荡的、硬绑绑的、响当当的革命左派组织。他们是‘抓革命，促生产’的模范，‘拥军爱民’的模范，是制止武斗和打击牛鬼蛇神的英雄。谁敢妄动‘百万雄师’一根毫毛，我们就毫不留情杀他个片甲不留！我们再次重申，黑‘工总’是个地地道道的、被反革命分子操纵的组织，我们坚决踏平‘工总’，为民除害。‘三新’，‘二司’的大方向完全错了。”

《呼吁》上边用的《毛主席语录》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这份呼吁书是由“百万雄师”工人铅印的。

“百万雄师”也发出《紧急声明》：

“我百万雄师全体战士坚决与8201全体指战员同生死、共存亡。我百万雄师对黑工总中的一小撮反革命分子必须镇压。‘三新’、‘二司’大小知识分子是不是革命的，只能由我广大工农兵来鉴别决定，不能由‘钦差大臣’来封。我们已经作好牺牲一切

的准备，不彻底粉碎资本主义复辟逆流，死不瞑目！”

8 时许，独立师机关部分干部看到了所谓 8201 部队全体指战员的《特急呼吁》后，马上建议蔡炳臣发表声明辟谣，蔡炳臣却说：“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要一分为二嘛！”

早上 7 点多钟，载着王力的卡车开进武汉军区大院，在 4 号楼前停了下来。4 号楼前整齐的坐满了戴着柳条帽子，拿着长矛的“百万雄师”和全副武装独立师的人，他们高喊着：

“踏平‘工总’，镇压反革命！”

“下定决心，与‘工总’决战！”

“‘工总’起来，叫它完蛋！”

“‘百万雄师’好！”

“《二八声明》是大毒草！”

“把王力揪出来！”等口号。

王力被推下车后，穿过人行道，押往 4 号楼。此时，他还向周围的群众挥手说：“同志们好！”

4 个押解他的独立师战士把王力的手按下来，其中一个叫道：“好？！老子就不把你揪来了！”

王力被带进 4 号楼 3 楼 46 号房间。这是一间会议室，许多胸前佩有 “联合代表团”和“工作人员”字样红纸条的人纷纷涌入这个房间。很快，桌子上，窗台上、床上都密密麻麻地挤满了人，他们对王力群起而攻之。王力的军装被抓破，领章被扯掉。这些人中就有独立师师长牛怀龙。他们和王力展开拉锯式的谈判，军区支左指挥部派人过来参加旁听，还提供了录音机录制谈判实况。一个人拿起话筒和纸条，照着纸条问：

“王力，你到武汉也没有几天吧！你也没有到群众中去调查，就发出四点指示……我们提几个问题要你回答！第一，你们‘四点指示’到底有没有？要没有，就当面辟谣！第二，你到武汉这几天，到‘三新’‘二司’里干了些什么？要回答！第三，你们到武汉在黑‘二司’、‘新华工’干了些什么？”

王力回答说：

“我们是毛主席派来的，昨天晚上表态不是我个人意见，是集体商量了的，可以代表中央文革的，如果有错，大家可以批评嘛！”

对于王力的这番话，“百万雄师”和独立师的人当然不满意，现场又起了一阵骚乱，有的人动手扯王力的军衣，牛怀龙师长忙喊：“静一下，好录音！”

“王力，你说黑‘二司’、黑‘工总’、黑‘九一三’是不是专搞打、砸、抢？”一个“百万雄师”头头又问。

“不是打、砸、抢，就是有一点也是支流。”王力话音刚落，一个拳头就打在王力的脸上，王力被打过青紫发肿的脸上又增加一块新肿块，那个人口里还骂着：

“支流！让你也尝一尝支流的滋味！”

当‘百万雄师’不断地广播所谓中央来电时，王力要牛怀龙去制止，牛怀龙从外面回来却拿着一张写着“四点指示”的纸，要王力对“四点指示”或签字承认，或声明辟谣。

这时，一独立师干部拔出手枪，乌黑的枪口对准王力的胸膛，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一直跟随在王力身边的军区警卫营营长栾庆祥，他本来也是持“百万雄师”观点的，可是在这紧要时刻，却

用自己的胸膛挡住了枪口，同时卡住对方扣扳机的手喝道：

“不准开枪！你要开枪，性质就变了。”

此时，军区大院内人山人海，“打倒王力”的口号喊声震天。根据大家的要求，“百万雄师”的刘敬胜将王力带到四楼楼梯边的房间阳台上示众。王力是被众人反剪着双手推出来的。

独立师的战士和“百万雄师”群众逼迫王力对武汉问题重新表态。面对着愤怒的群众，王力极力显出平静的模样，再次代表党中央和中央文革向群众问好，说明“到武汉来，是按照毛主席的教导，来向武汉地区的革命造反派和革命群众学习，是来当小学生的。解决武汉问题要靠武汉的革命派和武汉驻军广大指战员共同努力。”

下面的人不断愤怒地高呼：

“打倒王力!”

“戴高帽子游街!”

几个比较冷静、理智的代表则大声说道：

“让他讲下去!”

稍为安静一点，王力又继续说：

“武汉的问题要靠几方面达成协议，我们相信群众……”

当群众要求王力回答“百万雄师”是什么组织，王力说：

“武汉‘百万雄师’是庞大的群众组织，湖北武汉的问题没有‘百万雄师’参加是办不成的。”

当问及：“你们为什么要为黑‘工总’翻案？”

王力说：“如果是革命派受了压制，那就是要翻案!”

钟汉华在宾馆销毁军区业已印刷好的检查公告后，赶到军区

大院，和叶明、孔庆德等军区领导一起做“百万雄师”和部队的工作，要他们放掉王力。“百万雄师”和独立师的战士根本不听。钟汉华、叶明急得哭了出来，钟汉华甚至作揖、下跪以至磕头劝阻说：“你们这是干什么的呀……你们绑我好了。王力同志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

但混乱中无人理睬他，“百万雄师”的人见钟汉华如此，鄙视的说他：“你也太不像话了。”

钟汉华抱头坐在角落里，捶着自己身子，哭喊着：“你们不能这样干哪，你们不能啊！”最后心脏病发作，被警卫人员背进办公室。

独立师的一位干部拿起话筒说：

“‘百万雄师’的战友们，现在让王力休息一下，他已经很累了。大家放心，他跑不掉的！”

“我们已经决定了，把王力交给 8201 部队首长处理，勒令王力明天上午 8 点以前重新表态，否则我们就造他的反！”

随后，两个战士将王力架进屋去。

20 日 10 时后，除少数人仍在军区围攻王力外，大游行开始。数百辆满载着手持大刀、长矛、头戴钢盔、藤帽的“百万雄师”和荷枪实弹、上着刺刀的独立师军人的汽车涌上大街，进行全市性的武装示威大游行。武汉三镇凡是能通车辆的街道都塞满了汽车，还有空军军车 15 辆，打 8201、8216 旗帜的汽车 83 辆，用载重卡车改焊的装甲车十几辆，车头架着轻重机枪，子弹带搭拉在车上。有人就站在车门边或坐在车顶上。消防车拉响警报，黄石、荆沙等地的消防车也拉着警报，风驰电掣地赶往武汉，凄厉

的警报声响彻三镇上空。驻扎在宝丰路的独立师一个团，有 20 余人来到 3506 工厂“百万雄师”总站，他们脱掉军装，戴上了“百万雄师”的袖箍，参加了游行队伍。还有三五成群的战士来到“百万雄师”总站，要求参加“百万雄师”。后来指战员越来越多，袖章一时缝制不及，“百万雄师”只好将印有“百万雄师”字样的袖章布整匹整匹地发给他们。

这天，武汉疯了，整个三镇就像开了的锅。“百万雄师”宣传车上的高音喇叭大声广播：

“王力的‘四点指示’是大毒草！”

“王力滚出中央文革小组！”

“打倒王力！”

“王力滚出武汉！”

“王力、谢富治从武汉滚出去！”

“打倒谢富治，绞死王力！”

等口号，并反复播放《人民解放军解放南京》的“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播放《造反有理》等毛主席语录歌曲。

这天，湖北大学的气氛非常紧张。载着全副武装的“百万雄师”武斗车辆驶来驶去。当时湖大的防御措施只是用砖头将许多教室的门窗砌了起来，防止武装攻击。上午 11 时，游行汽车开到湖北大学前，“百万雄师”包围了湖大校园。下午 15 时左右，一名独立师干部朝天连开数枪，几辆满载“百万雄师”呐喊着冲进学校，在湖北大学门口可以看到好多男女学生与“装甲车”战斗，实际上，无法阻止“装甲车”冲进校园。他们逐楼搜查造反

派师生，抓了 100 多人，关押在武昌火车南站旁边的汽运五站，其中包括“新湖大”几名头头：张维荣、彭勋、谢邦柱等人。他们是看到“百万雄师”打湖北大学的学生，谢邦柱站起来说：

“我是‘新湖大’的头头，有事情找我， 不要打我们的同学。”

彭勋说：“我是老师，有什么事情找我，你们不要打学生。”

张维荣则高喊：“毛主席万岁！”，被“百万雄师”毒打。

他们 3 个自我暴露身份的人被“百万雄师”找来湖北大学对立面学生指认身份后，在每个人背后贴了纸条。彭勋背后贴的纸条上写着“新湖大临委会宣传部长”，结果，他上厕所时挨了打。

与此同时，几乎全部大专院校被冲击，“百万雄师”所到之处，学生抱头鼠窜。很多大学的围墙被撞垮，学校广播站被枪弹击得千疮百孔。

唯一幸存的华中工学院，因为自制了一些“坦克”、“装甲车”、手雷、地雷、钢盔和电台，“百万雄师”还不敢轻举妄动。“新华工”电台向全市不断播放着《义勇军进行曲》和《国际歌》，成了造反派唯一的精神支柱。在“新华工”校园和校门口，备战繁忙，许多顶标有“新华工”字样的类似苏联红军那样的钢盔戴在了学生们的头上，自制装甲车开到了校门口。钢“二司”和“新派”以及其他造反组织空前团结，据说在通往华工的路面还铺设了“电子地雷”。

“百万雄师”封锁了通往华工的全部道路，不许其他院校学生逃亡这里，也堵死华工的逃生之路。

7 月 20 日那天，青山区以武汉市汽运六站为主的“百万雄

师”头戴安全帽，身穿崭新的工作服，脚登翻毛皮鞋，手持铁矛，队列整齐地站在一辆辆汽车上，他们首先冲击了“九一三”总团办公地点武钢业余大学和青山区委办公楼。这两座大楼的造反派大多数人已经撤走，“百万雄师”抢走了广播器材，砸毁了办公用品。接着，他们又冲击了离此一公里远的“新一冶”司令部办公楼，将办公用品和广播器材洗劫一空。

在震耳欲聋的消防车警报声和“百万雄师过大江，牛鬼蛇神一扫光”“踏平工总，镇压反革命”的巨大声浪下，在声势浩大的“百万雄师”和独立师的武装示威和扫荡下，武汉造反派几乎没有招架之力，集聚在东湖一带学校区的造反派，在夏邦银等人的领导下，纷纷商议落实中央代表团的指示和最后的防守抵抗，其他地方零散的工人、学生，就走为上策了。大批持造反派观点的人，乘车、船疏散离开武汉，人们同车同船，竟面面相觑，不敢言谈！

部分游行的“百万雄师”围攻和冲击一中、二十中、二十九中、华师一附中等十余单位。在游行的街道、马路边和单位里的普通群众，一旦被人指认为造反派，即被怒气冲冲的“百万雄师”蛮横抓走，怕事的人纷纷躲避。

## 第 741 回：大清查，三镇谣言满天飞　救王力，二十九师齐奋力

谣言在武汉满天飞，什么：“毛主席的四大天才发现：一、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二、红卫兵；三、上海的一月风暴；四、百万雄师。”

“毛主席对百万雄师的批示：‘大、好、纯，要爱护它’。”

那些编造出来的五花八门的“北京来电”，诸如：“好消息，中央同意斗王力”、“王力的四点指示中央文革不知道”、“王力不能代表中央文革”、“周总理、陈伯达下午将来武汉，王力靠边站”等等，还有所谓的中央军委来电：“一、武汉部队支左大方向是正确的；二、为了满足广大革命群众的要求，凡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就可以造反；三、百万雄师好，陈再道好”。

这些，使得那些群众和军人更加冲动。

宣传车喇叭高喊：

“谁为‘工总’翻案就叫他刺刀见红！”

“打倒谢富治，绞死王力，枪毙余立金！”

“王力和牛鬼蛇神穿一条裤子！”

“揪出中央文革中一小撮混蛋！”

“要陈再道，不要谢富治！”

“三司”有人贴出大字报“质问陈伯达”，说陈伯达是王力的后台，甚至有人说：

“不管周恩来资格有多老，职位有多高，也要把他拉下马。”

支左办公室门前守卫对看热闹的人说：

“过去压，压得服，现在就不行了。我们解放军的枪杆子是不好使唤的。”

有人喊：“揪出谢富治的后台！”

当有人对一个“百万雄师”群众说：“你们可不要再受蒙蔽呀……”

得到的回答是：“要说受蒙蔽就是毛主席受蒙蔽，派了两个反革命来汉支持反革命。”

一个军人说：“中央要解决武汉问题，没有我们武汉海陆空三军通过，就不成！”

武汉测绘学院贴出署名“三司”的标语，写着“毛主席不要受王力的蒙蔽”。

后来，“百万雄师”的章迪杰承认：

“‘百万雄师’的标语口号都是政参部蔡俊善等人草拟的，由各个基层组织照此去刷标语。编造毛主席指示和中央文革、中央军委来电的是武汉市公安局的汪士奇，他是机关的干部。当时‘6.26’中央文革、中央军委来电指责‘百万雄师’对若干院校的围攻，编造的目的是为了稳定军心。”在独立师里，参谋长郝文德又奉命在部队继续传达这些谣传，甚至翻印一些传单。

“百万雄师”和独立师，开始在全市清查造反派。武汉如大开杀戒，中国历史上的又一次“412”将会再现，造反派与保守派的内战将是又一次国共之争的重现。

29 师政委张昭剑处理完东湖宾馆的事情，乘车赶到军区大院。叶明、孔庆德让 29 师将王力设法从“百万雄师”手中解脱出来。张昭剑和 29 师赵奋副师长立即将已在军区大院的 29 师侦

察连、四连、六连和军区警卫营、保卫科人员组织在一起，经过张昭剑的简单动员后，直奔 4 号楼。

他们堵住了大门、侧门和楼梯。进到楼内，又把楼上楼下截断，对向楼上冲的“百万雄师”群众进行劝阻，不再放一个人上楼。然后，设法将“百万雄师”群众、独立师军人与王力隔开。

张昭剑奉叶明、孔庆德的指示，劝说“专揪指挥部”的头头说：

“有什么问题可以与军区商谈，……”

“专揪指挥部”的头头个个满腔义愤，以不向王力讨回公道决不罢休的怒气，不予接受。

面对如此混乱局势，气得孔庆德说：

“这样搞怎么行，反革命，给我抓起来。”当即引起群众一片口号：

“打倒孔庆德！”

20 日中午，叶明副政委指示张昭剑向揪斗王力的“百万雄师”头头传达周恩来的指示：

“每派均派 100 名代表，到北京商谈解决武汉问题”。

话刚说完，不料其中一个头头把桌子一拍，说：“武汉问题，就在武汉解决，毛主席就在武汉！”

这句话，把这个不知情的师政委张昭剑吓了一跳，赶紧跑去问躺在办公室的钟汉华是怎么回事？钟汉华闻得此言，急的说不出话来，只是流泪。

中午 12 点多，又有几辆穿军装的卡车呼喊着“打到王力”的口号驶进军区大院，车驾驶室顶上架着机枪，其余人端着冲锋

枪。随后，是头戴钢盔、手持长矛、腰插匕首的“百万雄师”大卡车开进来，军区卫校也来了人。

他们一下车，端着枪，举着长矛，叫喊着：“抓住王力！揪住王力!”冲进大门，直奔关押王力的 4 号楼，在一、二楼之间的楼梯处，遭到 29 师指战员的拦阻。楼上、楼下一片混乱。守在楼梯口的 29 师指战员劝阻他们说：

“同志们，楼上不能上去，请你们退出去。”

“你们快滚开，你们不要充当保皇兵，保皇狗，我们是来抓王力的!”

雨点般的拳头落到了守方人员的身上，张昭剑对守楼的 29 师指战员大声喊道：“同志们，一定要坚持住，要做到打不还手，坚决完成任务!”

29 师的官兵们听见他们政委的喊话，情绪激昂地手挽着手挡得更紧了。“百万雄师”故意用女的打头阵，把 29 师的官兵逼成一个弧形。他们用头顶 29 师指战员，七、八个对一个，用手去拖打那些守楼士兵，担任指挥的六连魏连长被打得鲜血直流，昏迷过去，许多士兵也负了伤。

下午 13 时 30 分左右，独立师和“百万雄师”的人爬窗子，沿着自来水管向上攀爬到关押王力的房间，有一个背着冲锋枪的战士爬到一个小窗户，用枪托把窗户上的玻璃打破了，指着王力破口大骂：

“王力，你给老子滚出来!”

接着，他又用枪托把窗户全捶烂了，跳了进去，并陆续跳进十几人，他们拼死把门打开了。门一打开，外面又冲进一大群人，

这下子，更是混乱不堪。在房间里正同“百万雄师”、独立师的代表进行谈判的军区副司令孔庆德对他们劝说道：“同志们：请你们让开一条道，让王力同志到另一房间去。”

谁知就在这时，一个大汉忽然把孔庆德不管三七二十一地背出门去，向右一拐就跑了。那些刚冲闯进来的人以为背出的人是王力，便惊叫起来：

“坏了，人跑了！”忽一下，屋里的人全都追了出去。

一个独立师的代表急忙嚷道：“那不是王力，是孔庆德！”

接着，七八个人将王力推推搡搡地拉出房间，王力走过来，后面的人便拥过去，有的破口大骂，有的挥拳向王力击去，王力的右眼被打肿，腰部被打伤，脚骨被踩折……

下午 15 时左右，孔庆德与揪斗王力的“百万雄师”头头刘敬胜、谢敏华达成临时协议，先让王力吃饭，休息一会儿再说。

刘敬胜、谢敏华等人退出去，那些楼上的“百万雄师”和独立师的人也饥肠辘辘，纷纷下楼吃饭或休息去了，楼上只剩下二、三十个人，真是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守楼的 29 师和军区警卫营故意提出六点意见，派代表与王力谈判，战士们用身体组成人墙，堵住了各个通道，搀扶着受伤的王力，从混乱的人中，沿着新楼向下走去。

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忽然，从楼下水管和窗户爬上来一个人，东张西望，要是他发现王力被转移了，喊起来，可就功亏一篑了。侦察连一排长灵机一动，抓住那个人说：“跟我走没错。”

那愣小子把这个一排长当成是独立师来抓王力的，便稀里糊涂地跟着人群拥下楼去。

张昭剑预先已在楼后停置了一辆小汽车，连汽车引擎都一直发动着，王力一坐上车，车子冲出军区侧面二号门。

那愣小子看见王力坐上车子跑了，他才惊醒过来，知道上当，边往后跑，边拼命大叫："王力跑了！王力跑了！"

这喊声惊动了那些"百万雄师"和独立师的人，他们纷纷往楼上冲，负责保卫的战士们也有意让道，让他们把这幢四层楼房都搜寻个遍，以拖延一些时间。

为了掩护王力，制造假象，29 师的邓连长还把上衣脱掉，故意急匆匆地从侧门那里走来，果然吸引了许多独立师和"百万雄师"的人，他们大喊：

"抓住他，他妈的，王力是他放走的！"

邓连长也急中生智地发起脾气说：

"放屁！你们是守门的，放跑了王力，老子是来抓王力的！"

那伙人被他这么一喝骂都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一时不知所措。

这时，29 师赵副师长在那边叫喊着："军区准备了饭，去吃饭吧！"

这些人也饿得肚皮贴在脊梁上了，便一窝蜂都去吃饭了。

另一群独立师、"百万雄师"的人还将张昭剑团团围住，逼问他：

"王力到哪里去了！你把王力交出来！不交出王力，就把你抓走！"

赵副师长赶紧走过去，劝解说："我们预备了菜饭，有问题吃了饭再谈。"

那些人看见他们的同伙纷纷都去吃饭了，也到食堂吃饭去了。

29 师张参谋趁机把张昭剑一拉，他们便脚底抹油，迅速地离开了军区大院，溜之大吉。剩下的 29 师部队以班为单位，悄悄撤离了 4 号楼。

叶明担心王力再次被抓走，他告诉张昭剑，万一情况紧急，先把王力带进军区指挥所藏起来。

王力乘车从军区大院逃脱之后，便来到 29 师师部，住进 6 号楼。6 号楼位于小洪山北侧，紧挨着军区指挥所。周围是部队的营区，比较安全。当晚，叶明、韩东山准备再次把王力转移到更安全的地方，却找不到王力了，谁也不知道王力在哪里，王力“失踪”了。

原来，独立师和“百万雄师”很快就知道了王力躲进 6 号楼。天黑后，几十辆车把 29 师师部 2 号楼和 6 号楼包围了，嚷嚷着要抓王力。情况紧急，张昭剑对王力说：“首长，不好了，公检法、‘百万雄师’、独立师在搞暴乱，现在已经包围了 29 师师部，外面的喊声就是要抓你的，我们必须马上转移，你先跟我们走吧。”

“去哪儿？”王力问。

“进军区指挥所吧，那里会安全一些。”张昭剑说。

“行,那就走吧。”

29 师师长张绪、政委张昭剑与军区保卫科王科长一起，带着两个连队与王力一起来到指挥所附近，发现指挥所洞口也有人活动。指挥所不能去了，张绪、张昭剑和王科长一商量，干脆先

上山躲躲再说。

考虑到人多太暴露，张师长先将两个连队带回师部，只留下张昭剑、王科长和王力三人躲在 6 号楼南侧的小洪山上的树木草丛中。

军区保卫科王科长与警卫营栾营长一样，原先都是持“百万雄师”观点的，可是在关键的时刻，他们恪守了自己的职责，不赞成“百万雄师”和独立师的做法，极尽职责保护王力。

当王力他们离开 6 号楼后两分钟，独立师一伙人就冲了进来，气势汹汹地对 29 师的战士们大声喊道：“你们把王力藏到哪儿去？立刻把王力交出来！”

“王力不在我们这儿，我们根本不知道王力到哪儿去了。”29 师的人矢口否认说。

“百万雄师”和独立师开始搜查，连指挥所的山洞也搜了，没找到王力，他们又开始搜山。

张师长回到师部，被“百万雄师”围住，出不去了。山上只有王力他们三人，情况非常紧张。他们想从山上转移到水利电力学院，那里是“解放区”，应该比军区安全。但是发现路口被卡车堵住，到处是“百万雄师”和独立师的人。他们只好在山上和搜山的人打游击，转山头。

20 日下午 15 时，王力还在军区大院挨斗，“百万雄师”又有几万人包围了东湖宾馆，毛泽东的安全还是没有保证。谢富治、余立金打电话给陈再道警告说：

“如果你们再这样搞，你要负完全责任！”

陈再道让秘书打电话给“百万雄师”说：“差不多了吧？现

在你们应该撤了。”

下午 17 时，“百万雄师”撤出了东湖宾馆。

中央文革的工作人员张根成 20 日上午 6 点被“百万雄师”拉走游街后，车上的独立师军人和“百万雄师”也没有太难为他们，还拿车上的酸梅汤让张根成解渴。不过张根成帽徽领章被扯掉，反背着手“坐飞机”在车上游街，他们还要给张根成戴“百万雄师”的袖章，张根成把手背得紧紧的，不让他们戴。他们没拉开张根成的手，也就算了。车上军人对他痛斥道：

“中央文革都干了些什么事？把 80 万人的‘产业军’打成反革命，在内蒙、河南干了些什么？把解放军打成‘保皇派’！”

下午 15 时左右，张根成被带进独立师师部，听到门口有人说：“听说总理和伯达要来？”

有人回道：“他妈的，两个人还不是一个调！”

蔡炳臣政委进来，对张根成说：“现在工作不好做，领导通了好办，下边不通，领导的话不听，我也没有办法。” 然后问：“你们那里还有文件吗？” 他是指周恩来的讲话稿和其它关于处理武汉问题的中央文件。

张根成答：“有啊。”

蔡炳臣“呵”了一下，让人把撕下的领章帽徽还给张根成。这时，师政治部主任进来问蔡炳臣：“那个人呢？怎么样了？”

蔡炳臣忙眨眼示意不要讲，那人不明蔡炳臣的意思，还追问：“那个人呢？”

蔡炳臣反问：“哪个人？”

“就是那个游泳的人，问那老头子那地方？”

蔡炳臣不想回答，说：“那谁知道呀。”

张根成一听，心里顿时咯噔一下：“这不是造反了吗？”

张根成让蔡炳臣把北航的 3 位同学找回来。

蔡炳臣说：“那怎么找啊？”

张根成对他说：“你必须要找到，非找到不可!”

蔡炳臣问：“那他们是在哪辆车上坐的？”

张根成对他讲过后，蔡炳臣说：“我打电话问问吧。”于是，他给“专揪王力指挥部”打电话查询此事。

这时，张根成又要求到王力那儿去，蔡炳臣对他说：“军区有几千人，进不去。”

张根成要求打电话，蔡炳臣说：“打不通。”

张根成问他：“王力在什么地方？”

“在宣传办公室。”

“我就要宣传办公室。”

蔡炳臣看不行，就要电话。一要，通了，就是王力在的地方。接电话的是保卫科王科长。张根成问保卫科长：“王力还好吗？”

王科长说：“还好。”

张根成说：“我要过去。”

王科长说：“你千万不要来。”

蔡炳臣对张根成说：“你去不了，就在这里吧。”说完，他就出去了。他一走，又进来两个人，一个是独立师的作战科长，一个是干部科长。他们问张根成：“听说王力的爱人在华工当教师，是吗？”

张根成说：“这简直是荒唐。”

他们又说："你们中央带着框框下来，不深入群众，不调查研究；来到武汉就到知识分子窝里钻。你们中央就是只要知识分子，不要工农兵……你们中央夺军权！"

张根成不再理他们。

20 日下午，谢富治、余立金知道张根成是被独立师的人带走的，就给独立师打电话说："如果你们不把人给送回来，一切后果由独立师负责!"军区保卫处找到独立师，要他们将张根成送回东湖宾馆，牛怀龙同意了。

张根成回到东湖宾馆，见到谢富治、杨成武、余立金他们后，将他在独立师听到的情况向谢富治作了汇报，并问谢富治：独立师的人为什么那样讲话？谢富治说："你不知道呀，那就是王明的警卫员！这个事就是他们搞的!"后来，查看了蔡炳臣的履历，似乎与王明没有关系，问王明的秘书，他也说不知道有这位警卫员。其实，谢富治在这里说的是市人武部政委巴方廷，他在延安时期曾任王明警卫员，张根成理解成指蔡炳臣政委了

张根成抓紧时间销毁所有机密文件，这时的东湖宾馆仍然不安全，他们把椅子、沙发都堆起来，布置了所谓的三道防线，准备应付再次被冲，再次被抓。

## 第 742 回：大会堂，林彪处紧急会议　急安排，周恩来重回江城

20 日中午，北京，江青和中央文革的一干人来到了人民大会堂浙江厅，十万火急要见林彪。平时见林彪之前，都要事先打招呼，因为林彪怕出汗，对于会客有种种“禁忌”，而这次，已全然不顾了。当他们看到林彪时，只见他穿着军装，坐在那里看地图，果然是大将风度。

林彪拿出他给毛泽东写的信对戚本禹说：

“这封信你帮助改改。”林彪含蓄道，“看怎么提妥当，怎么送给主席妥当。”

戚本禹看了信，感到事关重大,征得林彪同意，又叫来陈伯达、关锋和他一起修改。

这时，周恩来也到了。他们在人民大会堂浙江厅林彪住处召开紧急会议，商议对策。大家一致认为武汉事件是“反革命暴乱事件”，是兵谏，要求毛泽东立即转移。

面对大家的急切心情，林彪很平静地说：“不要紧，主席那么高的威望，他们翻不了天的。但我们还是做好各种的准备。现在最主要的是要摸清楚那里的情况。”

周恩来马上打电话找到了汪东兴。汪东兴说：“警卫已经布置好了几道防线。但毛主席说：即使人冲到这边来了，你们也绝不能开枪，无论如何不能开枪！你们要相信群众大多数，有人冲上来了也不要紧，我自有办法。”

周恩来说：“主席是有他的办法的，但是我们绝不能让主席

承受任何风险。”

林彪一边让人查，离东湖宾馆最近的是哪些部队，最快到达要多少时间，一边接通了武汉毛泽东处的电话。

江青在电话里要求毛泽东离开武汉。毛泽东说：“我不离开，我就不相信他们会是真的反对我。”

这时，林彪接过电话，用很坚决的语气说：“不行，主席必须马上离开武汉。这是中央的集体决定！”

在这次紧急的中央碰头会上，林彪决定派遣三军部队包围武汉，防止陈再道兵变；确定海军在武汉舰只水兵上岸行动，空15 军立即进城维持局势。他当场给李作鹏和吴法宪打了电话。这两个命令一下，大家紧张的情绪才安定下来。

会上，大家对林彪的那封信又润笔定稿，改由江青署名，决定让邱会作飞赴武汉给毛泽东送信；还决定周恩来再回武汉，保护毛泽东赶快向上海转移，同时接回谢富治、王力等人；并让张春桥飞赴上海安排迎接毛泽东。林彪又亲自给许世友打电话，说：

“主席要去上海，主席在那里的安全由你负责。如果出了问题，提脑袋来见。”

大约一小时左右，会议散了。

会后，周恩来亲自作了军事部署。

当天，武汉空军命令：空降兵第 15 军第 44 师 132 团，第45 师 133 团赴武汉执行警备任务。

当天，泊于长江的东海舰队几艘舰艇也接到李作鹏的命令：进入战备状态，“严阵以待”，随时准备参加“平暴”。

当戚本禹他们从大会堂出来时，看见北京的大街上已经刷上

了“砸烂陈再道的狗头”的大幅标语。

原来，北航的韩爱晶向中央文革办事组报告了尹聚平述说的武汉发生的事情后，又立即召集北航头头召开紧急会议，研究对策和行动方案。他们布置同学上街游行，贴大标语：“打倒陈再道!”韩爱晶还点名家在武汉的北航学生屠海鹰带人去武汉，任务是寻找井岗山等人的下落，并设法营救。

江青在回钓鱼台的路上对戚本禹他们说：“我说去找林彪，没错吧。”

周恩来也赶到钓鱼台 16 楼，亲自通知中央文革记者站派 5 名记者赶赴武汉调查情况，通知已在武汉的中央文革记者站记者张春亭等人立即赶赴武汉军区了解情况。

下午 15 时多，周恩来的卫士长张树迎给周恩来警卫高振普打电话，叫他赶快准备行装，再陪周恩来去趟武汉。邓颖超一听就问：“刚回来怎么又去？是毛主席在武汉有什么事？”

不一会，西花厅门前响起了汽车声。周恩来匆匆走进办公室，邓颖超跟了进去。周恩来简单地向她交代了几句，就带着秘书、警卫、医护人员乘车直奔西郊机场。

北京空军专机师 100 团团长王进忠也是突然接到的命令，让他率领两个机组，立即赶赴西郊机场执行任务，争取在 30 分钟内起飞。

在正常情况下，专机飞行仅准备飞行航线、飞行资料、机组协同、了解天气等项工作就不止两个小时，而这次从下达命令到起飞，却只给了 30 分钟。

王进忠一边赶往机场，一边派人通知他的部下李克修副大队

长。

专机师 100 团李克修副大队长此时正在洗澡，刚打上满身肥皂，就听外面连声音大喊："李副大队长！有紧急任务，马上起飞！"

李副大队长还没有穿好衣服，来人又说："航行资料包已经给你直接送到飞机上了，请你直接上机场！要求 30 分钟以内起飞。"

李克修冲出澡堂，头上还滴着水珠，就迅速上了汽车，直奔北京西郊机场。一进机场，他就看见 5 辆解放牌军用卡车停在两架伊尔-18 专机旁边，车后面用绿色帆布封闭得严严实实。只见地勤工作人员风风火火地正向飞机跑去。而他的直接领导、100 团王进忠团长也带着副驾驶李万福急急忙忙地赶到飞机停机坪。

当地勤人员刚把机舱门打开，就见卡车后面的帆布掀开一角，一个个头戴钢盔的武装士兵从车上跳下，在 1 名干部的带领下，秩序井然地迅速登上飞机。不同的是，这些军人的手里都提着一个非常精制的乐器盒子，原来他们的武器都放在这些盒子里。

这时，李克修他们才被告知：上级要求专机师派出两架伊尔-18 专机，带上 200 名全副武装的 8341 部队指战员，在最短的时间内飞向武汉。王进忠和副驾驶李万福，李克修和副驾驶张学连各带一个机组，拎着飞行图囊和简单的常备日用品，匆匆登上飞机。

与北京西郊机场隔城相望的东郊首都机场，18 日刚从汉口返回北京的周恩来乘坐的那架专机也从那里转场到西郊机场。15

时 30 分,北京西郊机场上，三架飞机昂首待飞。除了周恩来常坐的那架外，另外两架已经关上了舱门，机舱里坐满了中央警卫团的干部、战士。高振普跟着周恩来登上专机时，一看座机的前半部坐满了荷枪实弹的中央警卫团的战士，不由得一阵紧张，他还不知道武汉发生了什么事情。

15 时 54 分，3 架伊尔—18 飞机成纵队前后鱼贯起飞，周恩来的座机为前锋，王进忠居中，李克修断后。

飞机起飞后，周恩来的卫士长张树迎告诉高振普武汉发生的事情。

16 时 20 分，张春桥也带着两架专机赶往上海。

周恩来的专机编队大约飞行了 40 分钟，来到河南信阳上空，张瑞霭机长从驾驶舱走进客舱对周恩来说："接地面报告，武汉的大街已贴出了欢迎周总理亲临武汉解决问题的大标语"，同时说，王家墩机场跑道上，停放着好多辆满载红卫兵的卡车，飞机无法着陆，只有改降备用的山坡机场。

周恩来听了机长的报告，想了想说："到时看看再说吧。"

原来，听说周恩来要到武汉，陈再道对秘书说："周总理来了又怎么样？还不是与王力一样。"但是，他还是愿意让周恩来到武汉为他解困，便通知独立师组织到机场欢迎周恩来。

下午 16 时左右，有百余名独立师的战士和"百万雄师"乘卡车冲进王家墩机场。他们带着武器，喊着："我们要见周总理！要向周总理告状！" 直冲塔台。

机场的空军人员对他们说："总理不在这里。"

独立师的人说："我们知道，周总理下午要来，中央文革来

电说，3 点钟从北京起飞”。

空军的人问：“我们没有接到总理要来的预报……谁要你们来的？”

独立师的人回答：“我们蔡政委要我们来的，政委还在电话旁边等我们的情况呢！”

机场立即向武汉空军司令部报告，转告北京，通知总理的飞机转场降落。同时，做群众的工作，指出“冲击军用机场是错误的，要防止被阶级敌人利用。你们应该立即撤出去。”

空军司令吴法宪接到武汉空军的报告后,立即通知了周恩来的座机，说：

“王家墩机场不能降落,陈再道派部队包围了机场,要劫总理”，他请周恩来在离武汉 60 多公里的山坡机场降落。同时，吴法宪打电话向林彪办公室报告说:“武汉有几十辆汽车冲进机场。要劫总理。武汉军区有鬼。研究时军区有人参加，要不消息怎么传出去的？请向 101 报告一下。”

接着，吴法宪又给武汉空军副司令刘丰打电话说：“武汉军区问题大了。不是一个陈、钟的问题。武汉军区有鬼！林副主席已经派邱会作去了。现在总理要到，你马上派空降兵部队抢占山坡机场，要绝对保证总理安全，随时准备粉碎任何反革命暴乱！”

空降兵 15 军接到武空的命令后立即出动，占领并封锁了山坡机场。

周恩来的飞机飞抵王家墩机场上空，向下一看，跑道上果然人山人海，机场上黑压压的人群，红旗招展。张瑞霭机长走到周恩来身边请示后，飞机又拔高向山坡机场飞去。

山坡机场是一个军用机场，飞机着陆后，舱门一开，一股热浪扑面而来，再看乘坐中央警卫团战士的飞机里，荷枪实弹的战士衣服已被汗水湿透，但他们仍然整齐的坐在机舱里待命，纹丝不动。军用机场没有伊尔-18 客机适用的梯子，周恩来只好从飞机自带的小梯子上走下来。

紧随周恩来座机之后的专机师 100 团团长王进忠，在飞临河南信阳上空时，也突然接到北京的命令，令他们改降距汉口约 60 公里的山坡机场。当他们与汉口王家墩机场取得联系，告知将改飞山坡机场时，王家墩机场坚持要他们降落在王家墩机场。一边是北京军委命令他们去山坡机场，一边是王家墩机场坚持执行原计划，王进忠左右为难。最后决定采取折中办法，先飞到汉口王家墩机场上空，然后再改道去山坡机场降落。

当王团长、李副大队长的两架飞机在山坡机场落地后，看到周恩来已经在停机坪等候。他紧绷的嘴角，替代了往常熟悉的微笑。周恩来朝他们点点头，算是打了招呼，然后举手向机组其他人招了招，示意大家围在他的身边。他没有像平时那样与大家握手问候，脸上也没有笑容，气氛很紧张，使人有种透不过气来的感觉。

“你们就在飞机下面休息，等候命令，随时准备起飞！”周恩来说完话转身要离去，又回头补充道：“已经通知，晚饭送到飞机上来。”

机场负责人对周恩来说：“天气太热，总理先到休息室休息一下吧。”

周恩来没有回答，而是问道：“你们这儿有电话吗？”

“有。”

“领我去。”

周恩来随机场负责人走进一顶帐篷，里面有一部军用手摇电话机。他让那位负责人要通了武汉军区空军副司令员刘丰的电话，先询问了武汉军区和东湖宾馆情况，然后又问：“谢副总理、王力在哪里？他们现在安全怎样了？”

“谢副总理现在东湖宾馆。王力听说失踪了，不知在哪里。”刘丰回答。

“王家墩机场的群众离开了吗？”周恩来又问。

“还没有。”

一位工作人员为周恩来送来了一杯开水，周恩来接过杯子想喝，但太烫，不能喝。高振普赶忙接过杯子，又要了一个杯子来回倒，让水凉得快一点。周恩来指着同来的中央警卫团的战士，对那位机场负责人说：

“给战士们搞点水，要凉一些的。”

很快，有人给中央警卫团的战士们送去了汽水。

刘丰从王家墩机场赶到山坡机场，周恩来着急，一面摇扇子，一面与刘丰商量如何进城。他提议坐汽车或者直升机，刘丰都认为不安全。周恩来只好说先休息一下，等天黑下来再说。也许是着急，天好像变长了，而且越来越热，大家都像从水里捞上来似的，满身大汗。

到 17 时，王家墩机场的人群方才撤走。在山坡机场焦急等待的周恩来终于接到王家墩机场打来电话，说那里的群众已经离开，飞机可以过去了。他高兴地站起来说：“全体登机，返回王

家墩机场。”

两架伊尔—18 飞机立即飞至王家墩机场。另一架载有中央警卫团战士的伊尔—18 飞机已经提前在王家墩机场降落了。当然，机场的人没有在这架飞机上见到周恩来，此时周恩来已经降落在山坡机场。

周恩来的专机在王家墩机场着陆后，王进忠团长从飞机上慢慢踱下来，在宽阔的停机坪上茫然地徘徊。突然意外地发现，除了他们这 3 架伊尔—18 飞机之外，还停着另一架伊尔—18 飞机，仔细辨认机号，才知道是从云南蒙自机场回来的 100 团副团长潘景寅驾驶的 232 号专机。

原来，几天前，云南的蒙自空军基地飞机击落了 1 架美国 U-2 型无人驾驶高空侦察飞机，空军政委余立金乘 232 号飞机前往蒙自空军基地参加庆功表彰大会，刚刚飞回。专机师 100 团一共只有 7 架伊尔—18 飞机，现在就有 4 架集中在这里，这种现象是很少见的。王团长与潘副团长相见，没有什么客气话要说，大家共同关心的是武汉的局势与专机的任务。

很快，余立金的秘书到了机场，向他们传达余立金政委的指示：“机组原地休息待命。”所有的机组人员就在机场招待所和衣而眠，谁也不敢离开。

周恩来到达王家墩机场时，机场会客室里已坐满了人。他们向周恩来详细报告了从昨天到现在武汉发生的事情。

## 第 743 回：乘吉普，周恩来化妆进城　反复劝，毛泽东同意离开

周恩来不能停留在机场，他要尽快去见毛泽东。怎么去东湖宾馆呢？武汉市里秩序很乱，曾发生过一位军区负责人乘坐吉普车时，被长矛捅了一下。幸亏长矛从这人的腋下穿过，才没有伤着。大家为周恩来进城的安全担心，一时想不出好的办法。

周恩来最后决定："天黑下来后，坐吉普车进城。"

为了不引人注意，周恩来化了装：戴一顶普通军帽，茶色眼镜，口罩遮脸，身穿当时普通群众穿得最多的蓝制服。天黑后，他只带了卫士和医生、护士，分乘两辆吉普车，先行进城，其他人员半小时后再走。

夜幕降临，东湖宾馆一号楼前，只见一辆吉普车开了进来，从车上下来一个戴着黑眼镜的人，走近一看，大家才认出是周恩来。大家都抢着向他报告他们今天的经历。

周恩来立刻和杨成武、谢富治、李作鹏、汪东兴开会，了解情况。

"你们说，事态这样发展下去，最恶劣的结果是什么？"周恩来问。

几双眼睛你望着我，我望着你，谁也不敢断定，谁也无法断定。

杨成武说："群众绝大多数是好的，是热爱毛主席，拥护毛主席的，但也不排除有坏人混在里面。万一群众不明真相冲上梅岭，坏人再在其中活动，那就会出问题……"

谢富治说："群众受蒙蔽，情绪这么大，万一被坏人煽动，被坏人利用，酿成兵变的可能性也不是没有。打人、抓王力都是部队里的人干的。"

"为了万无一失，还是要劝主席离开武汉。"周恩来说。

然后，他们研究确定保证毛泽东安全离开武汉的详细办法。从毛泽东出发的时间，乘坐什么车辆，行车路线及由哪些人护送等等，都做了周密的布置。最后，周恩来说：

"走,我们一起去见主席。"

百花一号到梅岭一号有段距离，徒步容易被发现。周恩来、杨成武、谢富治、李作鹏、汪东兴五个人挤进一辆小吉普开了过去。

这一天，梅岭一号的 8341 部队警卫隐蔽在大门内小竹林里边，观察着外面的动静。上级的命令是："只要他们不冲进来，谁也不能动。"

紧张的气氛笼罩在梅岭一号内外，有传说已发现有人从东湖对岸，嘴衔小刀游过来。为了保密，汪东兴正式向机要员谢静宜和樊一民交代："手里时刻拿着火柴，万不得已时烧掉密码，把密码机从窗户上沉入湖底。"

领导让梅岭一号内的工作人员，包括新华社摄影师都手执一个小木棒，以防万一。

大家劝毛泽东快点离开武汉，而他照例办公、看文件、读书，毫不在意，并漫不经心地说："没事，他们不会伤害我们，没关系的。"

周恩来到了梅岭一号，首先报告了情况及北京的意见，请毛

泽东离开武汉。他说："主席啊，目前武汉的形势十分混乱，为了主席的安全起见，还是走为上策，先离开武汉再说。"

毛泽东摆手道："我哪里也不去。就在武汉。"

周恩来一个眼色，杨成武、谢富治、汪东兴便各呈理由劝说毛泽东尽快离汉。

谢富治说："主席教导我们，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现在阶级斗争已经白热化了。"

"主席，你多次讲过，当断不断，反受其乱。武汉问题不是一天两天能看清、能解决的。旁观者清，离开一下，可以从容调查解决。"

毛泽东摸出一支烟，放在嘴上，划着火柴点燃，猛吸了一口，缓缓地吐出了一半烟圈，叹道："唉，落荒而逃，恐怕不是好现象哟！"

"不能断定群众组织中没有坏人。如果一小撮阶级敌人乘机制造事端，铤而走险，后果很难设想。"大家又在劝说。

毛泽东坐在沙发上，一言不发。

"主席，中央的同志都主张你暂时离开武汉，这不是你一个人的事，为党负责，为国家负责，就这样决定吧！"周恩来见毛泽东沉默无语，相机劝说。

"那好吧。准备飞机，我们离开武汉。"毛泽东终于同意。"唉！"毛泽东感叹中充满了遗憾："想到长江游泳，现在也游不成了。"

杨成武问："是准备专机，还是坐空军的飞机？"

"都准备。"

毛泽东打破自 1957 年以来不乘飞机的惯例。

周恩来握住杨成武的手交待："主席一向是器重你的。几次关键时刻，他都点了你的将，相信你。你也没叫主席失望。这次又是主席点将，叫你陪他南巡，希望你发扬传统，不要叫主席失望，不要叫我失望。"

"请总理放心！"杨成武说："我会完成任务的。"

周恩来又具体交待说："你还要作先锋，走最前边。如果有人堵车，你就说：不许堵，我是总参谋长杨成武。如果他们不听，你第二步可以宣布：伟大领袖毛主席就在我这里，你们如果不听劝，我就不客气。这时如果有坏人敢动，你就可以采取非常措施，消灭危险，一定要保护好主席。"

"明白了。"杨成武向周恩来立正敬礼。

21 日凌晨 2 时许，毛泽东和刘丰，杨成武、李作鹏乘坐武汉空军的小车，按照周恩来的亲自布置，用武汉军区空军的车号，从紧靠省博物馆的东湖宾馆后门秘密离开。杨成武率警卫参谋乘大卡车在前面开路，毛泽东的车紧随其后，然后是高度戒备的警卫部队。武空警卫部队、空 15 军著名的黄继光英雄连，就是上甘岭特功八连，由 3 营的杜教导员率领也承担了当晚护送毛泽东去汉口机场的任务。武空副司令员刘丰、军区孔庆德副司令具体指挥和配合了转移行动。

车开得迅如疾风，警卫车几乎跟不上。幸亏夜深，街上已无游行队伍，没有发生意外情况，他们顺利抵达王家墩机场，毛泽东的专列静悄悄地停在机场旁。

杨成武跳下车快步奔向毛泽东的汽车，护送毛泽东登上专列。

20 日中午，吴法宪对邱会作说："武汉形势很紧张。""林副主席要派一个得力干部到武汉去一趟，""决定要你去一趟，各方面的条件都合适。"

下午 16 时，邱会作来到大会堂新疆厅，叶群对他说："汪东兴、张耀祠连连向北京告急说：'军区独立师警卫不力，20 号凌晨反革命分子已经冲进来了，快冲到主席住处。'上午总理来和林总商量决定，劝主席马上离开武汉，总理已经又回武汉了。"

叶群带邱会作去见林彪。林彪对邱会作说：

"你到武汉去一趟很好。我先说一下你的任务：一、向主席报告全国的形势；二、建议主席转移一下，地点由主席自己选定。主席的安全就是全党的安全，你就说这句话是我说的；三、武汉要是发生全市动乱，陈再道又不听指挥，围困了主席，就设法告诉总理就在武昌固守待援。"

接着林彪看了看武汉地区的军事地图后说："如你无法和总理靠拢就在王家墩机场建立指挥所，同北京保持密切联系。武汉附近的 29 师和空降军已经做了战斗准备。""你要告诉杨成武、余立金、李作鹏，要部队不惜一切代价绝对保证主席安全，避免流血事件。" 林彪还交代他带一个内、外科水平都比较高的小型医疗队去，以备急用。

临走时，叶群交给邱会作一个牛皮纸大信封，告诉他"这是林副主席给主席的信"，叮嘱一定要带好。

当晚 18 时左右，邱会作带着秘书吴瑞云、警卫员蒋平安从总后出发，路过 301 医院时带上了外科主任陆维善和一个有工作经验的护士，来到西郊机场。吴法宪也为他们派了空军门诊部主

任和两名护士。他们乘依尔-18 专机夜航，于当晚 23 时左右到达武汉王家墩机场。下了飞机，邱会作立即同周恩来通了电话，周恩来对他说："好！你在机场待命，过一会儿有人找你。"

21 日的凌晨 3 时多，邱会作正坐在房间的沙发上抽烟待命，杨成武进来了，第一句话就说："我们胜利了！跟我走。"

邱会作听到杨成武的话后，估计毛泽东已经安全转移出来了，心里也很高兴！他坐上杨成武的伏尔加车，开往毛泽东在机场的专列。

毛泽东在火车上见到邱会作，很平静，同以前一样，首先就说："兴国佬来了。你那个总后勤部的人现在听你的话吗？文革是个好办法，好人坏人都会自己去表演的。"

邱会作将林彪的信交给毛泽东，把林彪要他转告毛泽东的话做了简要汇报。毛泽东一边抽烟，一边听。待邱会作说完后，毛泽东说："我要先睡一会觉了，待一会给他们写几个字。"

邱会作回到机场宿舍休息。天刚蒙蒙亮，汪东兴来找邱会作，对他说："主席叫你去。"

邱会作来到毛泽东的专列，见毛泽东正在洗漱。他见到邱会作说："太疲劳了，又睡不着，我也没有写信，你回去向林彪同志说，我完全同意他对全国形势的看法。有一点他没有提到的就是对造反派也要加以分析，不是一切都是好的。"

毛泽东和邱会作谈完话，杨成武进来了，和毛泽东商量去哪里。邱会作见状，恐有不便，就给毛泽东敬了礼，回到机场住处，即向北京"林办"打电话汇报了情况，也给吴法宪打了一个电话。

毛泽东从梅岭一号安全撤离后，周恩来也返回百花一号，并

带回原驻在梅岭一号的 8341 部队一个小分队，加强了百花一号院的警戒。周恩来从北京带来的两个中队的 8341 部队留在机场专线备用。为防意外，北京来的人已全部集中在百花一号。他指挥大家把桌子，沙发堆在一起搭成街垒，准备应付“百万雄师”的冲击。

因为周恩来身边没有带助手，决定李作鹏留下来，协助他做点具体工作。为了周恩来的安全，原来和杨成武等军队领导住在百花一号二楼的李作鹏，秘密搬入一楼尽头原来周恩来住的大套间，并按照周恩来平时夜间办公的习惯，凌晨 3 时后熄灯，上午 9 时后拉开窗帘。而周恩来则搬到二楼李作鹏住的那套比较小的房间内，于晚上 23 时前就熄灯休息，上午 7 时拉开窗帘。

周恩来吃了点东西就躺下了。刚过一会儿，他又起来，问张根成，哪里有安静点的电话可以用，他要找孔庆德副司令。张根成说：“在楼下有电话。”

他带周恩来下楼找到电话。周恩来接通孔庆德后问：“到了没有？”

孔庆德答：“早就到了。”

周恩来生气的说：“我跟你交代什么啊！为什么不告诉我？！我这个人这时到这里干什么来了？！”

孔庆德忙作解释，向周恩来汇报了他们的安排。周恩来说：“算了！到了就好，到了就好!”放下电话，他一拍手说：“到了就好了，睡觉!” 拍手是周恩来轻松愉快时的习惯动作。周恩来一阵轻松，这样才真正安心的睡了。他从 19 日凌晨回到北京以来，两天两夜一直没有时间真正休息一下。

21 日凌晨 4 时，王家墩机场飞行员休息房间的房门“吱呀”一声被人推开，大家都警觉地一跃而起。

“准备马上起飞！”命令下达。

仅用了 20 来分钟，3 架飞机就全部准备就绪。停机坪上，除周恩来的座机外，3 架伊尔同时发动。

空军政委余立金来到王家墩机场，径直登上王进忠团长驾驶的那架飞机，当发现飞机上全是座位，没有包间也没有床位的时候，又急忙离开这架飞机，朝着副团长潘景寅驾驶的 232 号飞机跑去，因为他刚使用 232 号从云南回来，对该机的情况比较了解。

王进忠正在机翼下独自漫步，只见一个模糊的身影向他匆匆跑来。借着微弱的灯光，他认出是潘景寅。潘景寅大口地喘着粗气，向他报告：“主……主席……毛主席来了！”然后又匆忙跑回到 232 号飞机。

原来，毛泽东乘坐杨成武的伏尔加已经来到机场，他下车后和在场的邱会作及工作人员握手……

正在待命的潘景寅不知是毛泽东“驾到”，他一看毛泽东走下汽车，顿时感到手足无措，忙不迭地向王进忠团长那边跑去。

待潘景寅结结巴巴地说完那几个字，王进忠也怔住了。并非是第一次见到毛主席所产生的那种难以抑制的激动，而是消息太突然，又是在这黎明前的黑暗之中，在这纷乱的多事之时。他极力镇定自己的情绪，让头脑恢复平静。但有一条非常清楚，那就是毛主席的安全！这是他们这次特殊飞行的关键，绝不能出现任何闪失。

这时，毛泽东已经在余立金政委的陪同下，向潘景寅驾驶的

那架 232 号专机走了过来。杨成武迎上几步，指着潘景寅驾驶的 232 号飞机对毛泽东说：

“主席，我们就坐这架飞机，性能好，由两名大队长任正副驾驶员。”

“噢，那就上这架。”毛泽东站到飞机旁，等候安排。在这些问题上，他听工作人员的，怎么说就怎么做。

来不及调机场上民航使用的大梯子了，当然更是为了保密，只能用飞行员上下飞机的小梯子，这种梯子要手脚并用地往上爬。在机场地勤人员指引下，一名卫士先爬上去看看，然后请毛泽东登机。

毛泽东笑了笑，入乡随俗，随着另一名卫士，也手脚并用地爬上飞机。杨成武见到邱会作，激动的搂着他说：“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邱会作当时也很激动，对杨成武说：“你无限忠于毛主席，我要向你学习！”

杨成武紧随毛泽东爬上飞机，安排毛泽东坐好。

“这飞机是哪里产的？”毛泽东四下里张望着问。

“苏联。”杨成武回答。

“什么名字？”毛泽东掏出一枝烟，并不马上吸，拿在手里捏来捏去。他也有这种习惯：把烟丝捏捏松，吸着省力，还可借捏烟的时间，起到控制吸烟量的作用。

“伊尔 18。”杨成武继续回答。

“多少钱一架？”

“不知道。反正好贵。”

“什么时候我们国家可以制造出这种飞机？”

“我们正在研究，但还没搞出来。先仿制他的，但也不那么容易，材料不过关也不行。”

“噢，是个综合能力问题。”毛泽东点点头，吸燃了香烟。他下意识地朝机窗望一眼，忽然若有所失地皱起眉头，喃喃一声：

“想到长江里去游泳，现在也游不成。”

## 第 744 回：飞上天，不知道去往何处　恩来急，武汉市寻找王力

此时，王进忠也急忙奔向等待着的毛泽东座机。情况已不容再耽搁，他一边跑，一边想："早从 1959 年开始，毛主席根据中央做出的决定，外出已经不乘坐飞机了；这次怎么……自己作为 100 团的团长与 3 架伊尔—18 专机的直接负责人，责任重大呀！"面对突然出现的情况，必须当机立断。来不及请示报告，也来不及与机组其他人商量，王进忠马上对机组人员进行调整，他亲自驾驶 232 号专机，由潘景寅做他的副驾驶，同飞毛泽东的座机。他立即决定：

"我和副团长潘景寅的两个机组临时合并，我为机长，潘景寅为副驾驶，选出领航及通讯岗位中最好的人员，组成加强机组。"此刻，他在 1 分钟时间内做出的决定，等于平时在北京几天的工作。

朦胧的星光中，只见毛泽东乘坐的伏尔加小轿车已退到安全线之外，等待着飞机起飞。王进忠几乎是跪着登上驾驶舱。潘景寅本来已经坐在正驾驶的位置，并已经做好了起飞的准备，见王团长过来，忙让出正驾驶的位置。王进忠还来不及调匀急促的呼吸，便下达了起飞的命令。

随着"轰"的一声巨响，发动机旋转起来，很快就达到了额定转速。这下领航员可着了急。他猛地一拍王进忠的后背，高声质问："我们要飞到哪里去呀？"

这么一问，大家才如梦初醒。"是啊，我们将飞向何方？"

王进忠转过头望着潘景寅，满以为他接到命令，知道内情，起码知道航线。可是，潘景寅也只是呆呆地回望着王进忠。显然，他也同样是局外人。

这是一次非常规的飞行，232 飞机没有经过任何部门的批准，没有办理任何飞行手续，甚至也不知道飞行航线，完全是在紧急情况下的一次特殊飞行。

“往那里飞？”领航员去请示杨成武，杨成武还没有来得及回答，就听毛泽东操着他那湖南口音说：“先飞起来！”

王进忠松开刹车，飞机沿着滑行道向跑道滑去。飞机轰鸣着离开了大地，在武汉上空盘旋。

毛泽东问杨成武：“我们现在往哪个方向飞？”

杨成武说：“还在武汉上空。”

“去上海吧。”毛泽东说。

余立金政委推开前舱门走进驾驶舱说：“到虹桥机场！”

李克修副大队长的机组被告知：232 专机起飞 10 分钟之后，跟在 232 号飞机后面起飞，空中无线电联络时，只许听，不要主动讲话，只有在前边飞机问话时才能回答。他的飞机起飞前，只见一位衣着朴素的老人，用双手十分小心地捧着一个盆，走过来说：“毛主席走得太急，早饭做好了也没有来得及吃，这是为主席炖的鸡汤，放在你们的飞机上给主席带去吧。”

这位老人是毛泽东专列上的厨师。李克修马上找来一名机组人员，对他说：“从现在起你什么也不要干，就看好这盆鸡汤。”

232 飞机起飞后，机舱里一直是静悄悄的，各自都在聚精会神地埋头工作。突然，一声颤抖的声音轻轻呼叫：

“主席！”

尽管大家都知道后面坐着的是毛主席，但都还没有见到毛泽东本人，这一声无异于一道命令，几颗脑袋同时转了 180 度。只见毛泽东那高大的身躯就站在他们身边，是这样的近。他脸上一副慈祥的神情，使大家感到无比的亲切。

毛泽东见大家都转过头来，便抬起一只大手，非招非挥地向上扬了扬说：“同志们都好！”

“主席您好！”

“祝主席万寿无疆！”

“毛主席万岁！”

大家各自呼喊出自己的心愿和祝福。

“到上海需要多长时间呀？”毛泽东问。

“一个小时多一点就能到。”王进忠代表机组作了回答。

“那么，现在飞多大速度呢？”毛泽东又问。

“每小时 800 公里。”

“那很好。”

大概怕影响飞行员的工作，毛泽东不再说话。他把机组每个人都仔细看了一眼，好像要记住他们似的，然后又扬扬手退了出去。

飞机进入平稳飞行后，王进忠到余立金政委所在的中客舱，详细汇报了调换飞行员的动机和经过。余立金肯定了他的做法，说：“你做得很对，考虑得很周到，我还没有想到呢。”

余立金的中客舱，与毛泽东所在的前客舱相连，中间只用涂了淡绿色油漆的薄木板隔开，有一道门相通。门虚掩着，王进忠

从门缝里偷偷往里看，一心只想多看几眼毛泽东主席。他常听飞过毛泽东专机的人讲："毛主席在飞机上从不休息，总是没完没了地工作、学习。"然而，这次，他窥见的毛泽东却半躺半卧地侧身歪在床上，脸朝着墙壁，一动不动，似乎是睡着了。

当他回到驾驶舱时，机组服务员于淑珍很忧郁地跟着也进了驾驶舱。

"你不好好地在主席身边服务，跑到这里来干什么？" 王进忠问。

"主席什么也不愿吃，只喝了一杯水。"服务员回答说。

"他不是休息了吗？"王进忠说。

"没有，瞪着两眼想事呐，好像有很多心事的样子，真急人！"服务员于淑珍回答。

21 日上午 11 时，飞机到达上海虹桥机场。飞机在停机坪滑行，刹车和摆平尾轮的惯性将毛泽东从沉思默想中惊醒。他侧过头，望望窗外，很惊诧地问道："落地了么？"

"是，主席！"

杨成武从机舱门探头望时，偌大一个虹桥机场，空荡荡不见群众和往时排列的官员。航梯旁只有张春桥等几个人。

毛泽东刚从飞机上露面，舷梯下的张春桥便满脸堆笑地迎了上来。站在机舱门口的毛泽东一扫机上的倦意和烦闷，神采奕奕、步履矫健地走下舷梯，同张春桥带来的几个人握手。接着，他过身，用眼睛搜寻着机组人员。于是，大家快步上前，握住他那温暖的大手。毛泽东握着王进忠的手高兴地说："还是飞机快呀，比火车快多了嘛！什么时候火车也能有飞机的长腿就好啦。"他

再次向大家挥挥手，转身进入一辆黑色小轿车离去了。

毛泽东住进虹桥宾馆。这是一座两层小楼。毛泽东住楼下，有卧室、起居室和客厅。杨成武住楼下另一套房，那是以往江青住的地方，与毛泽东的住房走廊相通。

“成武啊，”毛泽东坐下来喝茶，定定神，说，“你给总理打个电话，我们安全到达。”

杨成武的电话刚打完，毛泽东扬起手臂：

“你再打一个电话，让总理早回北京。武汉的问题一天两天解决不了，我还要看看，想想。叫总理注意安全。”

杨成武第二次往武汉挂电话，电话打完，毛泽东指着杨成武又说：

“成武啊，你去，安排人飞回武汉，看看武汉现在的情况怎么样，群众舆论、社会情况、部队情况、各方面情况……”

杨成武忙去布置，指派空军政委余立金和作战部副部长李静飞返武汉，并要求他们：“有情况随时向我报告！”

30 多个小时未合眼的毛泽东毫无困意。喝茶、吸烟、想问题。他不时拿出邱会作送来的那两页信纸看看。

毛泽东走了，武汉的陈再道与钟汉华在灯光下面面相觑。上海的毛泽东困不了觉，他们更困不了，面对武汉的混乱局面，他们一筹莫展。陈再道不停的搓着手说：“搞错了，搞错了，全都搞错了。”

“明天总理召集开会，也许能想办法稳住局势。”钟汉华说。

“唉，”陈再道长叹，“听天由命吧……”

钟汉华曾跑到谢富治面前认错说：“我们错了！我们错了！”

“现在晚了!”谢富治淡淡地说了一句。

20 日当晚，就在周恩来与毛泽东在东湖梅岭见面的时候，武汉市抓革命促生产委员会副主任纪辉召集“百万雄师”的会议，拟定了一个十分具体的行动纲领：

1、“要揪住王力，千万不能放跑他。揪住王力我们就取得了主动，就逼得总理来武汉。那时候，由‘百万雄师’出面，和总理在武汉定盘子。军区不能出面，他们不方便。‘百万雄师’是群众组织，他们不能怎么样”。

2、“在未揪回王力之前，要保持紧张局势。‘百万雄师’必须保证每天有 20 万以上的人上街游行，迫使中央不能对武汉问题表态。与此同时，要封锁机场、车站、码头和长江航线，决不能让王力跑出武汉。”

21 日早晨，又有 40 多个“百万雄师”的人冲到东湖宾馆王力住处要揪王力，这时，陈再道给独立师打了个电话，独立师派人给“百万雄师”做工作，“百万雄师”汉阳分部便派人乘吉普车赶到现场，把人调走了。

上午，武汉“百万雄师”在 3506 工厂召开夺权动员会议，俞文斌说：“今天请大家来商量一个十分重要的事情。这个事情很秘密，在‘百万雄师’的勤务员中，也只有 4 个人知道。昨天王力一讲，使我们很被动。我们要变被动为主动。我们酝酿了一下，打算夺省市委的权……”

下午，“专揪王力联合指挥部”开会，订出计划：组织力量控制水陆交通，不准王力逃往北京，迫使中央就地解决武汉问题；王力问题由“专揪王力联合指挥部”负责批斗；坚决不准为“工

总”翻案，谁翻案谁负责；关于揪王力问题要通告、通电全国，争取外援。

当天，“百万雄师”举行了 20 万人集会,愤怒声讨谢富治、王力。会间,先后收到陕西、辽宁、四川、贵州一些群众组织和湖北 30 多个地、市的声援电。

黄冈地区“大别山红色司令部”给“百万雄师”的声援电说:

“欣闻反革命两面派谢富治、王力落入‘百万雄师’的汪洋大海之中，我们感到无比的兴奋。这是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胜利，是你们英勇战斗的结果。我们向你们致以崇高的无产阶级革命敬意!并向你们表示强烈的声援!

大别山是在伟大领袖毛主席人民战争思想指引下建立起来的无产阶级革命根据地，是陈再道司令员的故乡，大别山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是你们的钢铁同盟。我们誓死与你们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 “

会后，独立师、“百万雄师”继续武装游行。深夜，“百万雄师”电话不断打到水电学院总机和其他院校，威胁道：“二癞子，今天晚上血洗你们学校!”

“二癞子”是“百万雄师”对“二司”学生的卑称。

毛泽东走后，周恩来的当务之急是要先找回被抓走后不知去向的王力。王力是“中央文革”的主要成员。对周恩来而言，现在已不单单是王力个人的安危，而是关系到中共中央的权威性。到 21 日黎明前，仍无王力消息。当天上午，周恩来在别墅里再次接见陈再道，李作鹏在场。

周恩来要求陈再道把王力送回来，陈再道说：“我不知道王

力在什么地方。”

周恩来说：“你派人去找回来。”

陈再道说：“我找不回来。”

周恩来“啪”一声拍了桌子，站起来大声说：“你这是什么态度？！你不要以为你有‘百万雄师’撑腰，‘百万雄师’算得什么？！如果把你反对中央决定，威胁毛主席安全，揪走中央文革成员的事情通报全国，八亿人民就要起来反对你们。你看是八亿人民力量大，还是你‘百万雄师’力量大！你既然采取这种态度，你离开这里到北京去！”

陈再道低着头，说声：“我走了。”出去了。

周恩来在百花一号楼召集武汉军区叶明、孔庆德、刘丰以及李作鹏等人开会，他说：“抓走王力更会引起武汉两派的严重对立，把问题搞得更加复杂化，以后会围绕着抓王力的事件展开无休止的争论。军区的同志要尽快找到王力的下落，并说服群众把王力放回来。”

孔庆德表示已经救出王力，但天黑后却不见了踪影。周恩来几乎是怒吼地说：“不行！你们一定要设法把他找回来。”

是啊，王力不是已经被 29 师政委张昭剑救走了吗？怎么又不见踪影了呢？

原来，21 日凌晨 2 时左右，独立师、“百万雄师”一些人又第二次冲进 29 师机关驻地，包围并冲进了 2 号楼，同时封锁了其他各楼，再三威逼 29 师交出王力，并要搜查。29 师的解参谋长也不示弱，当面予以斥责。那些独立师、“百万雄师”的人到底不敢在人家的老窝里动手，最后，他们刷写出几条勒令交出王

力之类的标语后便走了。

而此时，王力和张昭剑、王科长三人正在小洪山攀爬，山上没有路，荆棘遍野，野草丛生，怪石嶙嶙。7 月 20 日是农历 6 月 13 日，圆圆的月亮高挂在中天上，投下了惨白的月光，覆盖着小洪山的山头。张昭剑那天穿这一件白汗衫，在皎洁的月光下格外的显眼。为了不暴露目标，他只好脱去白汗衫，赤着膊在前面探路。张昭剑在战争年代负过五次伤、右腿残废，走路一拐一拐，在夜色茫茫的荒山中，也不知道跌了多少跤。

他们穿过树林，如若受伤的野兽一般气喘嘘嘘地走到山的另一头，看见独立师的岗哨，又慌里慌张赶忙转回来，而另一头又被铁丝网围住，其狼狈惨相不亚于“西安事变”时躲在骊山山洞里的蒋介石。

就这样，他们在小洪山的山凹里躲了一整夜，山下广播正反复播放独立师的《特急呼吁》。王力听了说：“这是反革命宣言书。这回独立师可真是独立了，向毛主席独立，向解放军独立！”

他对张昭剑说：“冲东湖是有组织的，陆海空三军都有，东湖客舍的警卫队长就是‘百万雄师’。武汉的天不是毛主席的天，武汉的枪杆子不在毛主席手里。军区班子烂了，他们要变天！”

张昭剑想起，小洪山下有 29 师所属七连的两个排，地处偏僻，估计“百万雄师”和独立师的人不会到那里，比较安全。他和王力、王科长商量，到那里看看，如果没有情况，可以先到那里躲避、休息，比在荒山野外要好一些。王力他们觉得是个办法。21 日上午，张昭剑只身下山，找到七连在这里负责的钱副连长，说明了事件的经过。本来，七连许多人，包括钱副连长在内都是

支持“百万雄师”的，但是，经过如此巨变，加上师领导张昭剑政委的工作，钱副连长当即表示：“坚决站在毛主席这一边，保卫中央首长的安全。”

钱副连长把全体战士集合在一间小房子里，张昭剑热泪纵横地作了紧急战地动员：

“同志们，现在有一个光荣伟大的任务要交给你们，毛主席、党中央派来的一位首长，他的安全正受到严重威胁!我们是毛主席的革命战士，我们能够不挺身而出吗?革命战士头可断，血可流，决不能对不起伟大救星毛主席!”

下面的战士深受感染，一个个热泪滚滚。他们在张昭剑带领下，对着毛泽东的画像宣誓：

“有我们在，就有王力同志在!”

接着，党支部、各个班都召开不同的会，纷纷在毛泽东像前宣誓：

“要用鲜血和生命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派来的亲人!”

“为人民的利益而死，就是死得其所。”

七连是邱少云烈士生前所在营的一个连队，战士们纷纷向毛泽东主席写决心书，有的咬破指头写血书，有的还写了遗书。

为了保护王力安全，他们采取了种种防范措施，有的打篮球，有的在周围学习毛泽东著作，有的装作谈心，还有的搞农副业生产，就在王力下山的地方有个挑水处，他们也特意安排了人在洗衣服，以至于王力下山来到连队时，连附近的家属都蒙在鼓里。

王力下到七连后，战士们看到他被打得遍体鳞伤，右眼被打

肿了，左右手都被打青了，走起路来一拐一拐的，身上被刺划得一道道红口子，狼狈不堪，不禁动了侧隐之心。他们热泪盈眶，握住王力的手不放，而王力也动感情地说：

“我代表毛主席向同志们问好。”

钱副连长拿着全连人写给毛泽东主席的决心书，双手递给王力说：

“王力同志，这是我们全连同志写给毛主席的决心书，请您转呈给毛主席。”

王力接过决心书，他也激动地当即表示说：

“我一定把这决心书带回北京，转呈给伟大的领袖毛主席。”

王力安置到了七班，炊事员得知王力、张昭剑一天没吃东西了，又是打鸡蛋，又是煮面条。疲惫不堪的王力吃不下，七连又派人翻过洪山去买西瓜；王力的领章和钮扣被扯掉了，只剩下一颗钮扣，战士们争着拿出自己的新领章给缝上，还用红线缝纽扣，象征着战士们和领袖毛泽东主席心连心。在战士们的眼里，当时的王力是代表着毛泽东主席和党中央的，毛泽东是他们心中的红太阳。

张昭剑安置好王力，便回到 29 师师部。

## 第 745 回：巧安排，王力安全到机场　换军装，周恩来撤回山坡

再说陈再道 21 日上午从周恩来那里出来后，立即派人找到 29 师，师参谋长根据张昭剑的交代，只说王力在安全的地方，却不告诉具体的情况，来人扫兴而归。陈再道把这个情况向周恩来作了汇报。周恩来焦急地命令刘丰亲自去找到王力。刘丰带领空军司令部王惠民、叶锡洪开车前往 29 师。

刘丰来到 29 师师部，见了张昭剑就大骂武汉军区说："武汉军区这窝子是些什么人？你张昭剑不要奴隶主义！你是听毛主席的，还是听陈、钟的？"

张昭剑听到刘丰的态度，就说："我听空军的。"于是，便将掩护王力的经过向刘丰作了汇报。

根据当时的情况，王力继续留在 29 师太危险了。刘丰决定，将王力转移到武空司令部，张昭剑表示同意。刘丰派空降兵部队的两个班,把王力转移到了洪山一个雷达站，29 师七连安排一部分战士"打篮球"作掩护。

当王力他们刚离开七连 20 分钟左右，就有几个"百万雄师"的人来到这里探听情况。不一会儿，又来了 8 个手持长矛、匕首的"百万雄师"，问钱副连长：

"王力是你们把他放走的？"

"我没有见到王力，王力没有在这里，我们不知道。"副连长镇定地回答。

"百万雄师"一定要进屋里看看，此时，屋里的桌上还放着

王力来时为他准备的鸡蛋、面条和西瓜，王力穿过的一件破汗衫和写着“王力”名字的一顶军帽就放在床上。有两位班长机灵，一看情况不妙，一个在外面继续缠住“百万雄师”的人，一个赶紧到屋里收拾东西。等“百万雄师”的人进到屋里时，已经没有任何破绽。

王力来到雷达站，换上空军的蓝裤子，变成下山买菜的给养员，几个人撇开大路，踏着荆棘，潜行到山下。下午 15 点多钟，刘丰陪同王力登上小车，29 师七连两个排全副武装，在张绪师长、解立根参谋长的亲自率领下，分乘两辆大卡车，将王力、刘丰乘坐的吉普夹在中间，掩护他们前往空司。

小车刚一出发，附近就有人喊：

“抓王力！抓王力!”

刘丰很紧张，他命令小车司机猛的加速，超过前面的卡车，穿过科学院、武汉大学，经街道口，到达关山武汉空军司令部驻地。两辆大卡车仍按原路线行进，“百万雄师”和独立师怎么也想不到王力还敢坐小车在武汉大街上走，他们去追大卡车了。那两辆大卡车事先起了个战斗番号，叫“专救王力战斗队”，也是“专揪王力战斗队”的谐音，并统一口径说：

“我们首长带领我们造反了，我们要上北京，现在上飞机场。”

当车到六渡桥时，头戴柳藤帽，手执长矛、匕首的“百万雄师”，层层设防，桥上还设置了许多障碍物，中间只留一辆车子通过的通道。这两辆满载着 29 师官兵的车子很受“百万雄师”的注意，一直盯着不放。“百万雄师”喊口号，他们也跟着喊同样的口号；“百万雄师”唱《百万雄师好》的歌，他们也跟着唱；

“百万雄师”鼓掌，他们也鼓掌，弄得那些“百万雄师”也真以为他们是自己人。

王力到达空军司令部后，刘丰立即将情况报告周恩来，周恩来高兴地拍着手笑着说：“谢天谢地，谢天谢地！”

21 日 15 时 40 分，“百万雄师”汉阳分站近千人，乘 26 辆车冲击位于武昌县的山坡机场，要抓王力。负责机场大门警卫的也是独立师的部队，但这里担任警卫任务的战士却出来劝说闹事群众说：

“王力同志昨天被你们抓走，在什么地方我们不知道。你们昨天抓去王力同志，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今天又来冲就错上加错了。你们不是说‘三新’、‘二司’、‘工总’坏吗？可是文化革命搞了一年多，他们从来没有冲过机场。你们两天内冲了两次，这是什么问题？”

看来不是所有的独立师战士都赞同绑架王力。

得知机场消息，谢富治、余立金打电话警告陈再道说：“如果你们再这样搞，你要负完全责任！”

陈再道赶紧让秘书给“百万雄师”打电话，做工作。16 时多，包围机场的群众撤走。

21 日上午，8201 部队政委蔡炳臣向独立师机关干部探问对事件的看法，当有人提出：其性质会不会是兵变，很可能造成部队到指定地点集中的后果时，蔡炳臣当即回答说：“不要把问题看得太严重了，根据我几十年的斗争经验和我对党的干部政策的理解，党中央、毛主席不会那样处理。”

当晚，蔡炳臣又说：“这次我带了头，创造了谈判条件，以‘百

万雄师’和军队为一方，以‘三新’、‘二司’为另一方到北京去谈判。”

晚上，“百万雄师”总站头头纪登清给 8201 师部打电话说：“我要找蔡政委，商量’三结合’夺权问题。” 蔡炳臣来了后，关了灯在电话中谈了很长时间。次日，蔡炳臣与独立师政治部副主任周忠到 6 团，对该团张枫副政委说：“这次起了带头作用，这样，‘三结合’还是以我们 8201 为核心。”

深夜，独立师党委下发了六个决定，强调“要相信党中央、毛主席会正确处理武汉问题，要求部队有意见可用口头和书面逐级向上反映。”

王力找到了，为了防止再生事端，周恩来当即决定，东湖宾馆和武汉空军司令部里的北京来人，即王力，深夜分两个车队，在山坡机场汇合。

再说北航的胡慧娟被“百万雄师”拽上了张根成的车。张根成看车上的人都不注意她，就让她走，她不走，说：

“死也要死到一块，王力同志不知哪里去了，我不能自己走。”

单纯幼稚的她万万没有想到王力会被拉到军区大院，猜想一定是被拉到“百万雄师”总部去了。于是，素有“北航红旗侠女”之称的胡慧娟决定只身去闯“百万雄师”总部，舌战“群雄”，救出王力。结果走了半天，问了许多人，才知道王力被拉到军区大院去了，她心里松了一口气。当时的胡慧娟对人民解放军是非常崇拜的，觉得王力到了武汉军区就安全了。于是，她找地方打通了东湖宾馆的电话，北航井岗山告诉她，“总理已回武汉”，并说现在尹聚平可能在水院。

再说水院“钢二司”总部的人一听尹聚平是中央代表团的人，惊喜交加，也立即向他们驻北京联络站通报了武汉的情况。在会议室，尹聚平向水院学生讲述从昨晚起到 20 日早晨在东湖宾馆所发生的事情，不禁大哭，担心王力、张根成的安危。水院学生立即安慰她，把她保护起来。一个女同学把自己的衣服让尹聚平换上。当天晚上，尹聚平在水院望着东湖对岸的灯光，惦念着毛主席和中央代表团其他成员的安危，心急如焚。

胡慧娟听说尹聚平在水院，步行几十里路，于 21 日上午来到水院，见到尹聚平，告诉她：“周总理已经返回武汉，”两个人都感到松了一口气。当晚，二人在水院学生的护送下，赶回了东湖宾馆中央代表团驻地。尹聚平、胡慧娟一见到周恩来，拉着他的手就哭了起来。

晚上，周恩来与在东湖宾馆的北京来的全体人员在百花一号一起吃了饭，然后点名让北航“红旗”的井岗山陪他出去散散步。井岗山受宠若惊，很不好意思。他才 21 岁，没受过如此“恩宠”，于是把吴介之也拉着，两个人陪着总理围着东湖一边散步，一边聊天，一老二少在湖边谈了半个小时。

周恩来询问了北航的一些情况，谈到了原北航的院长武光。井岗山赶紧问武光有问题没有。周恩来说：“武光好像没有什么问题。我听康老讲，入党时间可能有点问题，记不清了。武光还在你们那里吗？”

“在，我们一直保护着他，不让新疆的人抓他。”

“噢，你们要保护好武光，有事情给我打电话。”

……

晚上，上海的毛泽东又叫来杨成武问：“王力有消息了？”

“有消息，下午接到电话，他是被 29 师的师政委张昭剑悄悄保护起来了。”

“武汉游行队伍还很多？”

“很多。”

毛泽东一边踱步，一边自言自语地说：“独立师全副武装，坐卡车、骑摩托，端刺刀……”他望住杨成武，“他们那个师长你熟悉？”

“牛怀龙，过去在北京卫戍区工作过。不过，全副武装、端刺刀还不清楚。”

毛泽东停住步若有所思地说：“你看出了吧？那天我见他们两个，钟汉华就坐不住，要走……”

“没看出来。”杨成武老实回答。

“为啥坐不住？”毛泽东又自言自语。他思想连贯，但说话跳跃，有时省略许多内容，不知内情的人会以为前言不搭后语，“陈是个蠢人，头脑简单，思想反动！”毛泽东作个手势后交待：“和北京武汉保持联系，随时向我报告。”

这一夜，毛泽东在上海依然没有睡觉，他与身边的人说：

“不是他们说的那样吧，如果陈再道搞兵变，我们走得出来吗？这都是他们搞的，我在那里，为什么不和我通气呢？看来，他们是想以王力为人质，迫使中央改变处理武汉问题的方针。”

武汉，周恩来他们要去机场，可就难了。此时，“百万雄师”在东湖宾馆的东门摆了 5 辆大卡车，大卡车上装满人，都拿着很长的长矛。要走的路，堵死了。武汉三镇已被“百万雄师”和独

立师控制得水泄不通，到处都是工事，到处都是路障。大街上，人山人海，驾着轻、重机枪，端着长矛刺刀的“雄师”们乘着大卡车跑来跑去。

怎么办呢?最后，周恩来他们想了一个办法，从 20 里外的机场调来 6、7 辆卡车，打着红旗，摆上标语牌、毛主席像，装作游行的样子，于 22 日凌晨 1 时 45 分左右，冲进东湖宾馆。然后，中央代表团的人都穿上空军军装，戴上“百万雄师”的袖标，把吉普车夹在大卡车中间，由武空司令部派出的官兵和空 15 军王银富科长带领的特功八连两个连护送，分乘 6 辆吉普车和几辆大卡车，浩浩荡荡冲了出来，直奔机场。

他们没敢过长江大桥，走的是小道，是空军事先侦察好的，从郊区绕着走的。一路上，卡车上的战士们打着“百万雄师”的大旗，不停地喊着“百万雄师必胜!”等口号，车身上贴着大标语：“百万雄师过大江，牛鬼蛇神一扫光”……这一招果然灵光。“百万雄师”的人见到车队，欢呼声、掌声不断，一路“绿灯”。

7 月 22 日凌晨 3 时，李作鹏、王力、刘丰率领全副武装的 4 辆军车也从武空司令部率先到达山坡机场。刘丰很快给吴法宪通了电话:

“吴司令吗？我是武空刘丰。王力同志已经安全转移出来了。”

“怎么转移出来的？”吴法宪问。

“我带人从 29 师接出来的。”

“王力同志现在在什么地方?”

“现在转移到了山坡机场。”

“为什么要到山坡机场呢？”吴法宪不解地问。

“现在武汉形势很紧张，游行队伍很多，呼喊着要毛主席、林副主席、周总理去武汉等口号。独立师全副武装，坐着卡车、摩托车，端着上刺刀的步枪。有些话电话里不敢讲……”

“我告诉你，王力同志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最好最好的学生，你们一定要保证他的绝对安全！”吴法宪严厉地对刘丰说。

放下电话，吴法宪立即向林彪作了汇报。

凌晨 4 时左右，中央代表团的车队也到达了山坡机场。机场问是哪个部队的，他们说是到郊区搞生产的。

进了机场，周恩来一下车就问：“王力呢？王力同志在哪里？王力同志在哪里？”

人们扶着 70 多岁的周恩来推开王力的房门，护士正在为王力换药，只见他身上多处被扭伤，一只脚腕肿得很粗。

见到周恩来，王力有些激动，叫了声：“总理！”挣扎着起身与周恩来握手。周恩来紧握住王力的手，一把抱住他，激动地说：

“支持王力同志，支持王力同志！”

两个人都热泪盈眶，周围的人们也都激动地流下了眼泪……

随后，周恩来用微微颤抖的声音对王力说：“你吃苦了，我们没有很好地保护好你，对不起你！”

“不，不不，只要伟大领袖毛主席没出任何意外，我就是死了，也心甘情愿。”王力说。

谢富治对周恩来说：“王力同志被抓走后，我和余立金同志几次试图去营救，都被暴徒驱赶出来了。”

“谢副总理也差点遇刺！”刚从上海赶回来的余立金补充说。

“总理，我向党中央郑重建议，刘丰同志和 29 师政委张昭剑同志在营救我和这起事件中都立了大功。希望中央能对他们的表现给予表彰。”王力建议说。

周恩来点了点头，对王力说：“现在事情都已解决，今天可以回北京了。”

周恩来找来空军的李副大队长，握了握他的手说：

“你们辛苦了，这次情况比较复杂，你们还得继续执行任务。飞机怎么样？你们加了多少油？”

李副大队长回答：“飞机很好，加了 10 吨油，飞北京、上海，都够。”然后，他又汇报了送毛泽东到达上海的情况。最后，周恩来让机组抓紧时间休息，随时准备出发。

空军干部听说周恩来已经几天没有进餐和洗脚了，十分心疼，干部和飞行员、医生、护士都忙着打水送饭。很快，周恩来又出去接见了护送两支车队的空军指战员。

李副大队长回去将周恩来的指示传达给机组，并临时将飞机上的部分座椅换成了 1 张床。十几分钟后，机组人员接到通知迅速来到机场。此时，周恩来和王力已等候在飞机旁边。当飞机已经滑行到跑道南头时，领航员还不知道总理到什么地方去，来到后舱才从总理的秘书那里得知飞向王家墩机场。山坡机场到王家墩仅一江之隔，只有 60 余公里。这又是一次没有经过任何部门批准、没有办理任何飞行手续的特殊飞行。12 分钟后当飞机越过长江按照王家墩机场导航台的指示已经对正跑道准备降落时，发现机场的夜间跑道灯还没有打开，幸好导航台是开着的，否则，根本找不到跑道降落。

## 第 746 回：方知晓，昔人已乘黄鹤去　心惆怅，白云千载空悠悠

7 月 22 日清晨，陈再道来到东湖宾馆百花一号，想看周恩来有什么事情需要他们办。可是，却扑了个空，周恩来住处负责接待工作的人告诉他说："主席已经走了，总理也离开了东湖。"

陈再道的心中一阵惆怅，他知道自己已经完全失去了信任，连毛泽东、周恩来什么时候走掉，他这个大军区司令都始终蒙在鼓里，这一切意味着什么呢？他明白自己闯了大祸，厄运和灾星将降临在他的头上，一切全完了。

7 月 22 日凌晨 5 时，周恩来率领中央代表团成员乘飞机从山坡机场又回到了王家墩机场。落地后，当工作人员通知机场要汽车时，周恩来很放松他说：

"不用了，这样遛达一下也很好。"他走了 100 多米，才乘坐小车离开。

周恩来在王家墩机场立即召集谢富治、李作鹏、刘丰和叶明、孔庆德等人开会，研究稳定武汉局势和其它重大问题。

走进会议室，周恩来没有像往常那样，和站起来的与会者一一握手，只是简单地打了个手势，便坐在会议室中央，亲切、慈祥、沉静地依次观望了每一个人后说：

"同志们，自从中央代表团到武汉以来，你们做了大量的工作，你们辛苦了！"

"关于 7 月 20 日绑架王力同志事件，是极少数人制造的反革命事件，性质是极其恶劣的。鉴于陈再道、钟汉华两位同志在

这次事件中负有重要责任，中央决定武汉军区工作暂时由叶明、孔庆德两同志主持。”

周恩来望了望叶明和孔庆德,接着说：

“由于军区内部秩序目前不够稳定，你们先住到 29 师师部去。同时，希望你们转告陈再道、钟汉华同志，要尽快表态，跟上中央的部署，争取主动。”

会上，针对“百万雄师”和独立师某些人可能采取的更加过激行动,包括纷传的对造反派实行大屠杀阴谋,周恩来亲自决定，立即派空 15 军进驻造反派集聚的武汉水利电力学院、武汉测绘学院、华中工学院、湖北大学、武汉大学等学校和武钢，保护红卫兵和造反派。最后，周恩来强调：

“武汉部队各兵种仍是双重领导,要听武汉军区的话。”

散会后，李作鹏在王家墩机场“三军指挥部”保密室里，以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党委的名义,用密码电报通知海军驻汉各单位：

7 月 20 日,陈再道、钟汉华等一小撮混进军内的走资派,发动了一场罕见的反革命兵变。他们策划百万雄师一小撮暴徒,绑架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同志,殴打国务院副总理谢富治同志和代表团其他成员,反革命气焰极为嚣张!时至今日,一小撮反革命分子还在张贴反革命标语,进行反革命串连和游行。事态在继续着,海军党委要求你们公开表态,旗帜鲜明地支持以三新、三钢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坚决打倒陈再道、钟汉华!

东海舰队在武汉的舰队，曾经保卫毛泽东横渡长江的舰船奉命发表《严正声明》说:

“保卫毛主席,保卫林副主席,保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保卫中央文革,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派,是我们最神圣的职责,是我们广大指战员从内心发出的钢铁誓言。谁反对毛主席,谁反对林副主席,谁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司令部,谁反对中央文革,谁镇压无产阶级革命派,谁就是我们不共戴天的死敌。不管他职位多高,资格多老,我们都要坚决地把他打倒!……”

《声明》，指出：

“一、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从中央军委到每一个战斗单位全体指战员组成的人民武装力量，一个军区、一个单位、一个部队决不是全军，只有中央军委国防部才能代表全军。

二、8201 部队是不开展四大的单位，昨天参与‘百万雄师’的武装游行是违反纪律的行为，特此提出强烈谴责和严正警告。

三、谢副总理是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之一，王力、余立金同志是中央负责同志，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不许任何人制造借口攻击和威胁他们。

四、8201 部队的所谓‘特急呼吁’是一小撮人盗用该部队名义公开宣扬高、饶反党集团的军党论……必须彻底识破和揭露并展开斗争。

五、我东海舰队严阵以待，随时准备粉碎任何反革命暴乱！……”

武汉市民眼见舰队海军指战员上街用摄像机拍下市内武装游行与混乱场面。

造反派开始在街头贴出大标语：“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决不容许枪指挥党！”

吴法宪、刘丰也说，武汉空军也要对“720 事件”发表声明，打倒陈再道。

吴法宪打电话告诉刘丰:“武汉军区的问题很大,不是一个简单的陈、钟问题。‘720’是林副主席派邱会作来处理的，你们要多向邱部长汇报请示，少与武汉军区接触。武汉军区有鬼!”

刘丰把吴法宪的电话内容透露给了张昭剑,张昭剑立即在师部操场召开了全师军人大会。

骄阳如火，整个操场像要燃烧似的。张昭剑站在台上，大汗淋漓地对全师指战员作动员，他说:

“同志们,我们人民解放军是伟大统帅毛主席亲自缔造和领导的、林彪副统帅直接指挥的人民军队。我们广大指战员无限热爱毛主席,无限忠于毛主席,无限信仰毛主席,无限崇拜毛主席。现在，以陈再道、钟汉华为首的一小撮军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明目张胆地反对我们伟大统帅毛主席，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反对毛主席的红色司令部，反对中央文革，公开煽动、操纵百万雄师进行反革命叛乱，我们能答应吗?”

“不能!”台下数千名军人齐声回答。那时候,“毛主席”这个最亲近的字眼最能激发人们的思想感情,只要说谁反对他老人家，马上就能激起众怒,“全党共诛之,全民共讨之”。

张昭剑擦了擦汗，继续说道:

“我们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谁热爱毛主席，我们就和谁亲；谁反对毛主席，我们就和谁拼!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 29 师广大指战员，决不能奴隶主义。我们要坚决与陈再道、钟汉华之流划清界限，彻底砸烂旧武汉军区这个‘贼窝’!”

张昭剑话音未落,台下就响起了一片口号声：

“打倒陈再道!”

“打倒钟汉华!”

“彻底砸烂旧武汉军区!”

接着,张昭剑宣布29师脱离武汉军区，并向全军发了通电。

散会后，几个军人义愤填膺地冲进办公大楼，把叶明、孔庆德赶出了29师师部。

23 日，武汉军区副政委叶明将张昭剑找去交待任务时，拿出笔记本，把周恩来对29师的评价念了一遍：

“张昭剑旗帜鲜明，立场坚定，29 师这个班子好，但部队不行，也上了街。”

7 月 22 日上午 8 点多，周恩来给在上海的杨成武打电话通知说：“我们都到了。”

周恩来讲得含蓄，杨成武能明白，“我们”自然包括王力。

“正同林总商量，”周恩来继续讲，讲得慢，便于杨成武记录：“天气许可要你回去一趟，夜航。商量部署，请示最高指示。什么时候动身先打个招呼。”

“对外的报道要含蓄，暂不点名。”

“准备召集武汉军区负责人及群众代表谈话，争取稳定局势。”

杨成武接到周恩来的电话后，立即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听了，沉默片刻后，慢慢地说道：“武汉问题，还是宜快？还是宜慢？”

他像是在思考自己提出的问题，直到那枝香烟吸完了，才说：

“各有利弊。快的好处是趁热打铁，都说陈再道不好，错了，就是快也总要准备一下，要进行动员。”

杨成武在纸上记录，因为林彪在北京等待“最高指示”。

“计划一个礼拜时间。”毛泽东一句一顿，边想边说：“慢一点准备，暂时不行动。”毛泽东望住杨成武：“决策有无向前、剑英参加。”

杨成武觉得，这一句不是问，而是等候他从北京回来报告，看处理武汉问题有没有徐向前和叶剑英参加决策。

“这类事情搞了几个军区——青海、内蒙、四川；同时还有许多军区处于湖北的状态——江西、湖南、河南。如果能在内部解决武汉问题是最好的了。”

杨成武说：“武汉还在游行，还得做大量思想工作。”

毛泽东点头：“如果先把湖南、河南、江西问题解决好一点后，再来解决湖北问题……”他没有肯定这个方式，仅仅提一个可能性，马上转向目的：“军队来一个分化，‘百万雄师’也要他分化。不然他们会调动农民，占领三个学校。”

“解决武汉问题，牵扯的问题相当大，影响到南京军区、福州军区。”毛泽东又说。

“李作鹏叫海军党委给海军驻武汉的单位发了电报。” 杨成武说。

“海军暂时不动。”毛泽东断然说，“派兵问题要谨慎。”

毛泽东问杨成武：“有什么办法做‘百万雄师’的工作？北京有两万多‘百万雄师’的人，要做好工作，让他们回去。它是个群众组织，数量很大，又同军区在一起，有没有办法搞个武汉的

方针？陈再道、钟汉华认错就算了……”

“主要还是做政治思想工作。”杨成武说。

“打政治仗，思想仗，不好办呢。”毛泽东说，“我同林彪同志讲过，各军区的会议隔一两个月就开一次。8 月上旬或中旬，江西、浙江、河南、湖南解决差不多了，开一次会。”

杨成武补充：“还有广西、甘肃、山西。”

毛泽东沉吟片刻，忽然用宽容的声音说：

“你记：武汉的问题，我看当作错误处理。如果他有什么决心，我、总理、王力也出不来。并没有下命令，无论谁也不准出进。可见徐、陈并没有下个死命令。”

作为“错误”处理，而不是“兵变”，这是毛泽东思考一夜的结果。

杨成武问：“我今夜飞北京，主席看时间怎么安排？”

“明天、后天不要动，再后天把意见带回来。总之，不先解决几个军区的问题，先解决武汉问题不利。现在我们已经出来了，就不要忙。”毛泽东终于肯定了“宜慢”。

杨成武直一直腰，开始请示汇报北京的事情：

“八一建军节就要到了，现在有种意见，说应该把 9 月 9 日秋收暴动纪念日作为建军节。”

“为什么要改为 9 月 9 日秋收起义？是因为我的关系？”毛泽东面露愠色，声音一下子提高上来，“你告诉总理，历史就是历史，篡改历史不是私心就是野心。‘八一’是 8 月 1 日，南昌暴动打国民党是第一枪。秋收起义是 9 月 9 日，哪个前哪个后还用考证？八一南昌起义是全国性的，意义重大；秋收起义是局部，

是地区性的。其他起义，包括你们闽西地区的起义，都是地区性的。”

杨成武感到事情重大，紧张记录。并且请毛泽东过目。毛泽东过目后，加一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向国民党打响的第一枪”。

记录完毕，杨成武继续请示：“八一招待会，几位老帅要不要请来出席？”

“统统请来。”毛泽东作个推出的手势，“都要出席。这个会一定要开好，所有老帅都要到，不许请假。”

杨成武犹豫道：“现在有人骂我们朱总司令。”

“怎么骂？”

“骂朱总司令是黑司令。”

“混！完全错误的。”毛泽东一脸厉色，“朱毛、朱毛，没有朱哪来的毛？骂朱是黑司令，我不就是黑政委了？谁讲的？”

杨成武张张嘴，没有回答。

毛泽东：“长征时，张国焘我们天天谈。张要南下，搞分裂，叶剑英把张国焘一个电报单人独马送给我和恩来看。我当时拿个纸烟盒，一边把主要内容抄了一下，一边问叶剑英：‘你怎么出来的？陈昌浩他知道吗？ ’他说：‘陈正在开会讲话。’我一边抄一边催他：‘你赶紧回去，赶紧回去。’”

毛泽东用手掌拍拍颈项，朝杨成武睁大了眼睛感叹：“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博（古）差点掉脑壳！”

杨成武也不胜感慨，频频点头。

“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毛泽东用他那湖南

腔，抑扬顿挫评价道，“叶剑英！”

杨成武又点点头，急忙记下来。

“叶剑英在张发奎部队当参谋长，汪精卫给张发奎发个电报，邀叶挺、贺龙到庐山，想在庐山把叶挺、贺龙扣留起来。这个事，又是叶剑英立功。他是参谋长，知道此事危害性，就邀叶挺、贺龙到周瑜练兵的烟波湖划船，把消息告诉了叶、贺：一定不能上庐山。叶、贺没上庐山，搞了南昌起义……”

杨成武回京后曾问叶剑英这两件事，叶剑英说有这个事。并感慨道：

“成武啊，我要是升官发财，我就不参加共产党。我是参谋长、师长，我把一个师的薪水放银行一个月就发大财了，不用贪污就可以发大财。我那个时候入党是革命低潮入党，我这一生也很难哪……”

讲过叶剑英两件功劳，毛泽东又回顾了一段私情：

“宁都会议，我下台，没到前线去。叶剑英陪我参加宁都会议，挨批后，又陪我回来，到大柏地。两个人还对了一首诗呢，我写了一首，他对了一首……”

“你参加红四军的九次代表大会没有？”毛泽东在回想中忽然问一句。

“没有。”杨成武摇头，“我那时还是个娃娃哩。”

“你怎么知道古田会议的？”

“政治委员传达的。”

“你们那个闽西啊，特别好！”毛泽东仍然沉浸在美妙的忆想中。

“为什么？”

“老百姓特别好。我下台后，在你们闽西活动，非常安全，从没发生过危险。老百姓每天早晨在我起来时，给我送一颗刚下的鸡蛋，说请毛委员吃鸡蛋。闽西也有两个缺点，跳蚤多。臭虫多……还长脚气！”

“哎呀，主席，”杨成武笑了，“你是先生，是穿袜子的，所以长脚气。我们闽西老百姓打赤脚，没袜子也不穿鞋，回来晚上冲凉，踩木拖拉板就回房睡觉了，打赤脚肯定不长脚气。”

“噢，你说的对，有道理。我就没分析这个问题。”毛泽东连连点头，说：“七次代表大会，毛泽东被选下来，这次会议毛泽东没参加，主要是朱德、陈毅搞的；八次代表大会，毛又下来。九次代表大会，古田会议，毛又选上。”

毛泽东不自称“我”，直呼“毛泽东”，表示谈历史的郑重。杨成武忙又记录。

“陈毅同志是个好同志！”毛泽东首先用肯定的语气讲，而后接着说：“红四军七次代表大会，毛下台。会后陈毅到中央汇报，他如实向中央报告了七大情况。八大陈毅没参加，九大陈毅回来，如实传达了中央对九大指示。他说真话，实事求是，所以陈毅同志是位好同志。”

杨成武记录之后说：“北京我们的老帅都非常紧张。”

“为什么？”毛泽东惊讶地睁大眼。

“人家要打倒这个老帅，打倒那个老帅……现在有主席的评价，他们就可以放心。”

“回去告诉他们，都不要紧张。”毛泽东掰着手指：“朱老总

是红司令，叶剑英的功劳不能忘，陈毅同志是个好同志。聂荣臻，聂荣臻同志是个厚道人。什么事都是出来承担责任。一军团有林彪，别人不出来承担责任，聂荣臻出来承担责任；功劳是别人的，责任是自己的。”

杨成武问了贺龙，毛泽东说：

“贺龙我过去讲了一些话，多次讲了，他是二方面军的一面旗帜嘛，‘九大’还要选他当中央委员。”

毛泽东连吸几口烟，又说：

“徐向前过去的事情主要是张国焘负责。你回去告诉总理，不要再追他的责任。徐向前失败以后，要饭回来，回到延安；陈昌浩要饭回来，回到他的老家湖北。这就是徐向前和陈昌浩的根本区别。”

毛泽东将大手一划：“建军四十周年，招待会老帅都要参加，致词由杨成武致词。”

杨成武吃一惊，忙说：“不行不行。主席，我怎么能祝酒词呢，应该是老帅。”

“哪个老帅？”毛泽东稍侧了头问。

“叶剑英。又是元帅，又是军委副主席……”

毛泽东把手一摆：“你回去如实把我的意思告诉总理，由总理定吧。”

杨成武看一眼腕上的表，已是 11 点 40 分，两个小时过去了，便请示：“主席还有什么补充？”

毛泽东略一沉吟，轻轻一挥手：“去把他们几个叫来……有些事回去不要对林彪讲。”

杨成武一怔，随即默默地点了点头，走了出去。

几分钟后，杨成武和张春桥、余立金、汪东兴一起回到客厅。

余立金汇报武汉情况，军民仍然“百万大游行”，带武器，口号激烈。周恩来准备召集武汉军区负责人及群众代表谈话，争取稳定局势……

毛泽东摆摆手说：“总理、富治、王力等同志在武汉没有什么谈头了，已经暴动。要谈去北京谈。三方面在一起谈，谈不成可能被包围。还是早点离开好。现在陈再道和‘百万雄师’头头未最后下决心以前，早点离开。走时把孔庆德、叶明同志带去北京，因为他们帮助做了工作，回去可能受害。”

“能不能谈谈试试？”有人建议。

“如何谈法？谈不拢，会提出什么条件？人扣在那里强迫签字让承认他是革命组织。”

“除了北京，就近另找个地方谈。”

“另一办法，是否可以转移到军舰上……”毛泽东略一沉吟，又摇摇头：“不必了，还是离开。这件事，现在不仅是武汉的问题，是全国的问题。”他最后说：“叫总理根据具体情况处理吧。”

“北京决定开百万人欢迎大会。”汪东兴汇报说。

“你们搞这么大场面，如果杨成武、汪东兴不在，人们马上会猜到毛泽东不在家。”毛泽东指汪东兴：“你给北京打电话，他们见报时，要写上杨成武和汪东兴出席。”

出来后，杨成武马上给周恩来挂通电话，将毛泽东两次谈话的主要内容作了传达。

## 第 747 回：数万人，北京机场迎王力　“救火去”，“陈毅是个好同志”

7 月 22 日，武汉王家墩机场，周恩来给在上海的杨成武打完电话后，又安排好紧迫的工作，大家稍事休息。下午 13 时 30 分左右，他接到杨成武打来的电话，知道了毛泽东的意见。下午 14 时，周恩来决定立即返京。他和随从人员乘一架飞机，中央代表团乘另一架飞机。他对谢富治说：“你和王力先走，我要把陈再道叫来，让他把抓走的两个记者放了就走。”

原来，被“百万雄师”拉走的《解放军报》、《红旗》杂志驻汉记者还未找到。周恩来临行前，特别督促武汉军区，落实释放被“百万雄师”和独立师抓走的中央文革记者站记者高天堂等 3 人。

临上飞机了，周恩来又回头对空 15 军军长方铭他们说：“小将们有难，快去保护他们！”

周恩来、谢富治、王力分乘两架飞机先后离开了武汉。当谢富治他们乘坐的专机飞到北京上空时，周恩来让他们暂缓降落，先在空中盘旋，等候周恩来的专机先降落。因为中央文革组织数万人到北京南苑机场欢迎谢富治和王力的中央代表胜利回到北京，欢迎仪式是要由周恩来主持的。

7 月 22 日下午，北京南苑机场。周恩来乘坐的专机降落后，前往机场迎接的中央领导和学生组织的头头纷纷上前和走出机舱的周恩来热烈握手，大家都非常激动。

随后，他们来到休息室。大概过了 20 分钟，谢富治、王力乘坐的那架专机在机场上空盘旋了一阵后也降落下来。周恩来带着大家走到悬梯下。

舱门打开，谢富治和穿着一身不太合体的空军干部服、被人扶着的王力走下飞机。

周恩来走上前去和谢富治、王力热烈拥抱，并用面颊贴着王力的面颊。此时的南苑机场，几万人组成的欢迎仪式已经翻腾起一片“红海洋”，场面十分热烈。

因为王力的脚被打伤，周恩来和江青在两侧搀扶着他，一瘸一拐地接受集聚在机场人群的热烈欢迎。谢富治、王力受到英雄凯旋式的欢迎。欢迎者高呼“欢迎王力回到北京毛主席身边!”等口号。

新华社的新闻照片和新闻电影里，周恩来在机场和其他中央领导人手挽手的镜头，给世人留下深刻的记忆。《人民日报》第一版以《谢富治王力同志光荣回到北京》的通栏标题，报道了这次欢迎仪式的盛况。报纸中间配发了两幅照片，一幅是谢富治、王力在机场与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等中央领导和中央文革小组负责人的合影；另一幅是谢富治、王力在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等中央领导和中央文革小组负责人的陪同下，同首都数万欢迎群众见面的镜头。

当晚，林彪在人民大会堂主持中央文革小组全体会议。他们听取了谢富治对武汉“720 事件”的汇报后，确定“720 事件”为“反革命暴乱”，陈再道、钟汉华是“主谋”。周恩来建议：“要用全国的力量来打击把矛头对准中央文革小组的反革命逆流，北

京要召开百万人的群众大会，给一小撮走资派迎头痛击。”

▼中央派到武汉处理当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问题的中央代表谢富治、王力等回到北京。

王力说：“不要这么多人迎接我，这样影响不好。”

江青反驳道：“这不是为了你，而是为了主席。”

会议决定，处理“720”事件分两个步骤：第一个步骤，以中央名义调陈再道、钟汉华进京，看他们敢不敢来。如果不敢来，就证明他们有问题。第二个步骤，起草关于处理武汉问题的文件，开一个百万人的欢迎大会，并通知各地举行集会和游行示威，声援武汉地区的造反派，声讨“百万雄师”和武汉地区军队的领导。

会后，林彪又给戚本禹打电话说：

“处理武汉问题的两个步骤，第一步和第二步要错开，以免打草惊蛇。但第二步应当马上着手准备，向武汉、郑州地区的群众进行宣传的传单和报刊宣传的材料，现在就应该开始起草，起草好之后，先经中央文革研究，然后再报请主席审查修改，主席批准之后再印发。因为这不是一般的、普通的情况，而是比较特殊的情况，应当报告主席。为了打击反动的头子，争取受蒙蔽的群众，提高左派的威信，在传单中需要点哪些人和哪些组织的名，也请你们考虑，报告主席。”

22 日下午 13 时 30 分和 14 时 40 分，上海的毛泽东又连续找杨成武、汪东兴，以及余立金、总参作战部副部长李静谈话。

“要把城市的独立师进行调整!”毛泽东说出了他的最新考虑结果。

“成武，一个部队驻一地太久不好。你们北京军区那个 66 军驻天津太久，越久越不好，有了瓜葛。武汉就是例子，独立师和群众组织拉在一起，和地方许多人拉在一起。还有好多独立师，各城市都有，每地都有。”毛泽东停下来想想，放慢声音：“三年一换，四年一换比较好。否则住久了，千丝万缕，关系太复杂，东西太多。不是毛驴能拖走的，汽车、火车也拖不动了，坛坛罐罐怎么打仗？要调换。”他用征询的目光望住杨成武：“杭州就可以开始吧？”

“部队就要令行禁止。”杨成武道。

“那就先从杭州开始。可能不满意，但要执行。”

后来，确如毛泽东预计的那样，驻杭州部队调离时，东西多得拉不了，拖不动。许多指战员情绪大，甚至朝天放枪，一片声喊：“再见了，杭州……”

22 日这天的武汉，依然是“百万雄师”的天下。他们继续游行，出动车辆约 1500 辆。

上午，独立师蔡炳臣政委接见省直“百万雄师”头头，要求准备材料到北京谈判，特别是“工总”“保王任重”的材料。同时，针对独立师干部中对 20 日事件的怀疑，蔡炳臣和政治部副主任周忠召集宣传车约 50 余人到师部开会，蔡炳臣作了新布置：

“1、这两天你们做了一个大好事，把群众发动起来了，火已

经点起来了，迫使武汉军区作检查的公告不能发表，创造了去北京谈判的条件。中央已经通知，军队和‘百万雄师’为一方，‘三新’‘二司’为另一方去北京谈判；

2、火已经点起来了，现在要求大家稳定下来，准备做第二件好事，就是坐下来整理材料。到北京谈判没有材料是不行的……

3、你们是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员，处处都要起好作用，今后大家搞什么事，最好先告诉我一下，我不会领着同志们去犯错误的，你们应当相信我的话。”

这天，武汉各高校仍然是在紧张中度过。不断有消息传来：8201 部队和“百万雄师”武装示威游行，消防车、改制的装甲车、军用卡车、战备卡车都开出来了。解放军都是刺刀上枪，头戴钢盔，车顶上架设机枪。“百万雄师”则头戴柳条帽、手持长矛。

当晚，武汉水利电力学院得到消息，说“今晚‘百万雄师’武装人员决心消灭红水院这块根据地，并且从武大方向攻入。”

“红水院”总部开会研究，为了避免过多的人员伤亡，决定立即疏散，除留下 200 名护校人员外，其他人员一律离开学校。无处可去的人，撤退到珞珈山上去。以前热闹、欢腾的校园顿时变得死一样的沉寂、恐怖，除几个人一组的巡逻队外，见不到其他人，所有的房子都是黑洞洞的，没有一点光亮。留守的护校人员，都有一种悲壮的情怀：为革命事业献身的时刻到了，大家都很镇定。

正在待命的空 15 军得到进城的命令后，立即向武汉市区开进。22 日晚上，空 15 军在武汉周围的部队，首先入城，抵达预

定位置，控制市内制高点。他们用卡车运送部队，人多车少，没能上车的部队跑步前进。卡车送达第一批人后再回头去接后续部队。部队全部要求轻装，战士只带水壶和轻武器。

7 月 23 日凌晨，武汉水利电力学院的同学带着几个解放军来到“红水院”总部，其中一位军人自我介绍说：

“我们是中国人民解放军 7252 部队团长岳禄佐，政委叶××，奉周总理命令率部队到红水院保护革命小将。”

在场的水院护校人员都哭了，他们紧紧地握着岳团长和叶政委的手，一边流着泪，一边诉说这些天的遭遇和感受，感谢亲人解放军来保护他们。广播台打开广播，报告喜讯，通知大家到行政大楼前欢迎解放军。岳团长说当务之急是要熟悉学校地形，控制制高点，并说“百万雄师”可能随时会来进攻。护校人员陪同岳团长到学校各处了解地形地貌以及建筑结构，决定在行政大楼顶、图书馆楼顶、六教学楼顶以及学生二舍房顶上架设机枪。

与此同时，空 15 军 7252 部队也进驻武汉大学、测绘学院、华中师范学院等院校，说是接受中央命令前来支持造反派，保护造反派。留守这些学校的学生、工人也都潸然泪下，热烈迎接解放军的到来。

23 日凌晨 3 时，周恩来和中央文革小组参加完林彪在人民大会堂召集的中央文革会议后，又赶赴钓鱼台继续召开中央文革碰头会，具体落实人民大会堂会议的精神，研究以中央名义召陈再道、钟汉华、武汉独立师师长、政委和市人武部政委进京的具体事宜。会议由周恩来主持，他代中央起草了给武汉军区的电报，用绝密电发出：

武汉军区党委并武汉军区空司党委：

周、谢、王、李四同志回京后面报一切。中央考虑到“百万雄师”派代表来京事，一时不易谈成，而武汉局面又急需稳定，拟先约军区和有关方面同志来京一商，请陈再道、钟汉华、傅传作、刘丰、吴世安、周志刚、赵兰田、温锡、张绪、牛怀龙、蔡炳臣、巴方廷 12 位同志于二十三或二十四日来京。中央已令空军派机往接，何时动身，望告。

23 日凌晨，中央文革向各地发出要求各地搞“三军联合行动”，即武装游行，声讨“720 事件”的《紧急通知》。

凌晨 2 时 30 分，杨成武从上海飞到北京，立即驱车来到钓鱼台，向正在主持中央文革碰头会的周恩来传达毛泽东指示。他对周恩来说：

“主席对我说：‘你去告诉总理，把陈再道、钟汉华、牛怀龙、蔡炳臣都接到京西宾馆去。你告诉陈再道三句话：一是有错误就检查，二是注意学习，三是注意安全。’”

周恩来叫来杨德中和傅崇碧,对他们讲：“陈再道、钟汉华等人来京后住京西宾馆。告诉宾馆工作人员，一定要遵守纪律，注意保密。宾馆警卫部队不足可以增派，要绝对保证陈、钟等人的安全。如果安全工作不周到，我就是对党没有负责。”

23 日上午，周恩来结束了钓鱼台中央文革碰头会，又拉着杨成武上了车，说：“救火去！”直奔人民大会堂。

在汽车里，周恩来对杨成武说：“外交学院正在人民大会堂批陈毅，我们过去看看。”

原来，6月28日，外交部“革命造反联络站”在周恩来接见

时，提出“打到陈毅”的问题。周恩来说：“对陈老总，我早就说过，你们可以提你们的意见，我可以听你们的意见，但是中央没有作结论，你们不能强加于我，你们讨论有不同的意见，还是按照主席的意见，先摆事实讲道理，深入批判，先批判后定性，你总要先定性，后打倒，你们一提出打倒陈毅的口号，我不好叫你们取消。会上有人提出不同的意见，也可以允许让他讲，我不会去插言，你们向我提出了很多问题，让我回答你们，不回答不好，回答了也不好，不独立思考了。”

7 月 8 日和以后几天，外交部办公厅综合组干部王海容和研究室刘华秋等 11 人连续贴出“对陈毅要‘一批二保’”和“再谈对陈毅要‘一批二保’”两张大字报。他们认为，陈毅犯了极其严重的错误，对他的错误要进行无情的揭露，彻底的批判，真正把他的错误批深、批透、批倒、批臭，并切实肃清他的影响和流毒。绝不能对他的错误采取包庇、姑息、手软的态度，绝不让批判陈毅错误的斗争半途而废。但全面地、历史地看，从现有材料看，总的说来他还不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也不是三反分子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他还是跟毛主席走的。对他的错误的批判，要遵循毛主席的教导：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团结—批评—团结，一看二帮。

此时，北京外国语学院“红旗革命造反团”也决定成立“揪陈大军”，到外交部门前安营扎寨，宋远利任总指挥。“红旗革命造反团”核心组分析：“让陈毅下来，一定是主席的意思，总理奉命行事。”他们还特意给周恩来发电报说：“陈毅问题不解决，我们得不到解放，您也得不到解放。”

7 月 15 日傍晚，北京外国语学院“红旗革命造反团”和“六一六造反兵团”200 余名学生组成“揪陈大军”，真的在东交民巷 30 号外交部办公楼对面的正义路的广场上“安营扎寨”，掀起了揪斗陈毅高潮。在此期间，“六一六造反兵团”等还曾一度冲进外交部。

7 月 16 日，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红卫兵团”派了数十名学生前来助阵。两校持过激观点的学生抄写、张贴所谓“陈毅罪行”的大字报、漫画，搞广播。他们还将大字报贴在北京最繁华地区王府井大街上。他们进行街头演出、街头演讲，声讨陈毅。

7 月 19 日，外交部“联络站”发表声明支持“揪陈大军”，宣称他们来外交部“安营扎寨”是“百分之百革命行动，好得很！”表示坚决支持，并表示将和他们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

连续数日，“揪陈大军”在正义路广场上召开“揪斗陈毅誓师大会”、“陈毅推行刘邓‘三降一灭’修正主义外交路线罪行报告会”、“陈毅问题答辩会”、“陈毅黑历史报告会”等。他们表示要“舍得一身剐，誓把陈毅拉下马。”他们决心“把陈毅从中南海揪出来斗倒斗垮斗臭！”，“誓死与陈毅血战到底！”

他们还组织宣传队在天安门、北京火车站等地发表演讲，散发传单，张贴大字报等，攻击陈毅。

通宵的批判会上，人声鼎沸，人们亢奋的难以平静，毫无疲惫衰竭的意思。

7 月 23 日，杨成武随周恩来走入蒸笼一般的会场，来到前排入座。正在听取批判的陈毅见杨成武跟周恩来进会场，忙拉住

杨成武咬耳朵问：

“有什么消息？”

“有。”杨成武笑笑说：“毛主席说，陈毅是个好同志。”

陈毅两眼放出光彩：“怎么讲的？你说说当时情况。”

“主席当时是坐在沙发上，边抽着烟边讲的，表情挺轻松也挺高兴。”

陈毅忽地站起身，满脸放光地对正在批判他的学生们高声宣布：“同学们，现在让我们共同学习毛主席的最高指示！”

会场陡然一静。杨成武怔住了，整个会场都怔住了，只听陈毅挺胸扬首大声说道:“请同学们打开《毛主席语录》271 页，……”

大家都习惯性的翻开《毛主席语录》，包括周恩来、杨成武在内，忽然有人提出：“语录只有 270 页……”

这时，只听陈毅的大嗓门儿已经钟鸣一般响出了：“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陈毅是个好同志。’”

《毛主席语录》只有 270 页，众人自然无法跟他一起诵读，片刻的惊诧、痴愣，一道怒吼声划破了沉寂：

“你造谣！”

顿时，现场的学生们炸锅了，一种受到戏弄的愤懑之情潮一般涌起：

“陈毅不老实就叫他灭亡！”

“陈毅伪造最高指示罪该万死！”

陈毅从容而立，开心地瞧着“娃娃们的热闹”，他换了严肃的神情，指指旁边的代总参谋长说：“杨成武同志传达，有周总理证明，伟大领袖毛主席说的：陈毅是个好同志。”

一贯严谨的周恩来也不禁为之灿然，频频点头证明："同学们，主席最近是这样讲的。"

"好，请同志们跟我一起念这条最高指示，"陈毅一字一板地大声念："陈毅是个好同志！"

会场再次轰然大哗。有人跟着念，有人开心大笑并助以掌声，也有人心有不甘地议论纷纷……

## 第 748 回：广播响，“武汉公鸡下蛋了”　揪刘、陈，北航批斗彭德怀

陈毅在人民大会堂里高声朗诵《毛主席语录》:“陈毅是个好同志”一事，很快就传遍了北京。5 个小时后，林彪的住地----毛家湾，林办的秘书和内勤们也无不为之捧腹：

“陈老总就是这么个性格，洒脱不羁。”

“嬉笑怒骂皆成文章，千古风流。”

“主席还能不了解陈老总？从井冈山到现在，开国元勋哪！”

大家正聊得热烈，叶群推门而入：“议论什么呀？高兴成这样。”

马秘书把陈毅领着红卫兵学习“最高指示”的故事一讲，叶群也忍俊不禁地笑了起来：“陈老总就是这样的性格，能逗人也能气人。”她煞有介事地吁口气，“唉，其实毛主席和这些老帅们是有感情的。首长对这些老帅们也是有感情的。”她喘口气，脸转向王秘书：“我要给杨总长通话，你给我挂通。”

王秘书回到会客室，在卫生间挂通了电话。对方听出了王秘书的声音，问道：

“你是林办吗？我是杨成武。”

王秘书听出是杨成武的声音，说:“杨总长，叶主任跟你通话。”

王秘书把听筒交给叶群，退回会客室。

叶群接过电话，非常客气和热情地说：

“喂，杨总长吗？你好吗？这样热的天，你往返奔波可够累

的……可要注意身体呀！林总对你很关心。你要多保重……主席在上海好吧？林总也很惦念他老人家。你再回上海时，代林总向主席问好。你有时间带着孩子们过来看电影……一定来呀！……八一建军节，林总的意见也是你致祝酒辞为好。他和主席的意见一样。在上海主席没有给林总捎什么话呀？他谈到林总了吗？噢！没有……没有就算了。”

总参谋长回京，首先应该向国防部长、军委第一副主席林彪汇报工作，可杨成武却直接去找周恩来汇报，甚至没有来见林彪。因为，毛泽东南巡期间，杨成武直接向周恩来汇报，这是周恩来在中央政治局、中央文革的碰头会上当众宣布的，林彪也在场，谁也没有反对，也无法反对。因为在当时的情况下，周恩来的意见让谁听了都觉得非常正常，无可挑剔。

那么，此时武汉又是什么情况呢？23 日凌晨，武汉军区收到中央召陈再道、钟汉华等进京开会的电报。陈再道等人闻令立刻起身准备飞往北京。他们明白，此刻稍有迟疑都会带来无法预料的后果。

清晨 5 时 20 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了谢富治、王力“胜利回到北京”的消息，而且是连续滚动播放了 3 遍。

武汉三镇爆炸了，全城舆论大哗，几天来四下躲避的造反派和普通民众奔走相告，纷纷从逃避处所回到单位。有的地方刷出了“工人总部翻案了！武汉公鸡下蛋了！”的大标语。

部分“百万雄师”的汽车游行还在持续，但不少群众已对他们的宣传产生怀疑，开始退出街头的“造反”行动。“百万雄师”与 8201 部队战士思想出现混乱。“百万雄师”各联络分站纷纷开

会，商讨局势和对策。

听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后，由 29 师师长、政委带领两卡车全副武装的战士，监护陈再道、钟汉华一行来到了王家墩机场。一路上，反对谢富治、王力的游行队伍还是连绵不断，“打倒谢富治!”“打倒王力!”的口号此起彼伏……游行队伍见战士们佩戴着“百万雄师”的袖章，也高喊着“打倒王力”的口号，未予阻拦。独立师师长牛怀龙、政委蔡炳臣、武汉市武装部政委巴方廷和其他进京开会的人也陆续到达。

王家墩机场，武汉空军副司令员刘丰把进京开会的人员分别安排到各房间，宣布了不准离开房间的规定，还采取了一些防止逃跑、自杀等事故的防范措施。

接着，刘丰在机场召开了进京开会人员的秘书和保卫干事会议，动员他们划清界限，“揭发陈再道、钟汉华之流的罪行”。

同日，武汉空军命令：空降兵第 15 军机关带直属队和空降兵第 44 师（欠炮团）赴武汉地区执行“三支两军”任务。军部驻武昌空军东湖疗养院。武汉地区原由独立师控制的要害部门、要害位置，转由空降兵第 15 军及陆军 29 师控制。空 15 军的部分部队和 29 师部队开始在城市主要交通要口，与 8201 部队换防。

当晚，29 师谢参谋长带领一个排的解放军、乘坐两辆军车，开到红卫纱厂，将 7 月 20 日被“百万雄师”抓走的“新湖大”谢邦柱、张维荣、彭勋等 4 人带了出来。

晚上，“专揪王力指挥部”有人针对中央广播王力等回到北京的消息，秘密制订计划，准备启用武装部掌管的枪支弹药，装备 60 万人抵抗，组织 10 万人徒步进京告状。但是，终因大势已

去，这个由个别人策划的行动没有实现。后来，只有零星“百万雄师”人员乘车北上，在河南境内被阻拦。

就在武汉发生“720 事件”的同时，全国各地也发生了不少事情。

先说北京。7 月 19 日，不仅北京正义路广场上的“揪陈大军”安营扎寨，热闹非凡，中南海外的“揪刘火线”更是如此。

就在 7 月 18 日中南海批斗刘少奇、邓小平、陶铸的第二天，7 月 19 日，曾经对北京建工学院新、老“八一战斗团”在中南海外组织“揪刘火线”不屑一顾的清华“井冈山”蒯大富也坐不住了，当天早上，清华“井冈山”的先遣队就来到中南海外。

这天，聂元梓也动员北京大学全校师生员工，组织了一支声势浩大的队伍到天安门广场召开誓师大会，聂元梓在会上讲话，表示“揪斗刘少奇的决心”。会后，一部分队伍到中南海西门，也参加了“揪刘火线”。

下午，清华大学“井冈山”的大队伍来到中南海西门外。晚 22 时，他们和北京建工学院“八一战斗团”及其他单位的十几个群众组织，在中南海西门外，也召开了一次“首都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揪斗刘少奇誓师大会”，蒯大富在大会发言。

19 日这天，江青再次向秘书阎长贵问起中南海外“揪刘绝食斗争”的情况：

“建工学院的人走没走？”

“他们还没走。”阎长贵回答说。

江青埋怨道：“戚本禹怎么还没去做工作呀！你跟戚本禹说，他要不去我就去了！”

深夜，在中南海西门外的清华“井冈山”的队伍又撤回了清华。

从 19 日这天开始，北京中南海外“揪刘火线”人数猛增，人群从四面八方涌向这里，包括北京的大中学校、工厂、机关团体，难以计数的群众组织争相在中南海墙外安营扎寨，不少外地在京的造反派也参加了这一活动，场面颇为壮观。府右街从南到北，席棚相连，车水马龙，锣鼓喧天，人声如潮。高音喇叭日夜不停地广播，口号声、歌声昼夜不断。这种状况后来扩展到中南海北门的文津街、南北长街，以至于新华门前。据当时不完全统计，在中南海墙外搭有 7000 多个棚子，安有 500 多个高音喇叭，竖有 3000 多面各种名目的旗子。红色旗标，红色横幅、标语如海如潮。贴在红墙上的大标语一张纸只写一个字。全市各个单位都前来支持。大卡车从郊区的大学校园运来食品、宣传品和广播器材。

几乎所有的红卫兵小报都以大量篇幅报导了中南海西门前的场景。有的引用毛泽东批判胡风的话，说刘少奇是“在忍受中求得重生”，因此，“必须加倍提高警惕，决不可中了他们假投降的诡计。”

那段时间，几乎每天都有大批的群众组织在北京市内的主要街道进行批判刘少奇的游行示威，尤其在东西长安街、府右街等处，更是人山人海，游行活动经常造成交通堵塞。

7 月 19 日，北航奉命批斗彭德怀。周恩来事前特别指示要“天、地派联合批彭”，并对批彭问题作了五点指示：不许搞“喷气式”，不许武斗，不许挂牌子，不许游斗，不许搞“逼供信”。

7 月 19 日下午，两个学生把彭德怀带进北航负责保卫工作的戴维堤办公室。

戴维堤让彭德怀在办公桌对面坐下，给他倒了杯水。彭德怀看了他一眼，说了声："谢谢!"

戴维堤吃惊的发现，彭德怀穿着一件黑色的无领囚衣。

戴维堤又问了一句："知道是谁让我们批判你的吗？"

彭德怀看着他，说了一句："小同志，有些事你们不懂。"就不讲话了。

这时来人通知送彭德怀去会场。这是一次小型批斗会，在北航六系楼一间教室里进行，由韩爱晶和北航原党委书记、革委会副主任王恒主持。

彭德怀一进去，有人开始喊："打倒彭德怀!"接着，审问开始：

"彭德怀，你为什么反毛主席？"

"我没有反毛主席。"彭德怀回答。

"那你说的小资产阶级狂热病，指的是谁？"

这时，一些人高喊："彭德怀老实交待！打倒彭德怀!"

"毛岸英是怎么死的?是不是你阴谋害死的？"

这是人们对彭德怀逼问的最多的问题。每当人们提出这一问题时，彭德怀都会陷入深深的痛苦之中……

学生们继续逼问彭德怀：

"你为什么写意见书?"

"我就不该写那封信?我有话就讲，憋不住。我是政治局委员，有权向毛主席反映情况，这符合党的组织原则。"彭德怀回

答。

“你万言书里骂毛主席，妄图篡党篡军!”

“我从来没有野心，我拥护毛主席，对毛主席是有很深的感情。”

“那为什么毛主席要打倒你?”

“我也不明白为什么打倒我。可能出于政治上的需要吧。”

全场响起了“打倒彭德怀”的口号声。

彭德怀随口说道：“彭德怀早就被打倒了。”

韩爱晶跳过桌子，指着彭德怀的鼻子吼道：“你反不反对毛主席?”

“我不反对毛主席，我只是对毛主席无话不谈。”

怒不可遏的韩爱晶冲上去，当胸就给了彭德怀一拳。随后，旁边的几个学生也一拥而上，拳打脚踢，先后 7 次将彭德怀打倒在地，前额出血。

下午 17 时 30 分，彭德怀被哨兵架回卫戍区的住处，抬到床上。

参谋进来问他：“怎么样?”

彭德怀说：“身体不太好。”他样子难受，不想说话，眼睛睁开一线又闭上去，呼吸里带有轻微哼哼声。

“你把今天去开会的体会写一写吧。”

“我不能写。”

“他们和你要怎么办?”

“不行，我说一下。”他仍闭着眼说话，每说一个字都很吃力。

“不行，得你自己写。”

“不行怎么办，把我杀掉算了！”彭德怀愤恨地挣扎一下，手揿在胸上咳嗽。

吃晚饭时，彭德怀问：“有稀粥没有？”

炊事员告诉他有面条。

彭德怀说：“你打在桌子上吧。”

饭一直放在桌上，他没有起来吃，两手捂着胸部，闭着眼，躺在床上，发出“哎哟、哎哟”的呻吟声。

晚上 22 时，他让哨兵将他拉起来，下了床，坐在椅子上，吃了医生给的药，喝了一口水，把水缸猛地放到桌子上，试着在地上走动，走了几步，又坐下，拿了一个桃子吃了。

又停了很长时间，他拿出材料纸，双手抱头。

20 分钟后，他开始写“认罪书”。到晚上 24 时，只写了几行字，又躺上床。但是，睁眼、闭眼、翻身，一夜未睡。

在此之前，彭德怀食宿正常，精神较好。自 19 日那次斗争会后，食欲大减，精神苦闷。

第二天早晨起来，彭德怀两手又抱头坐在桌旁，拿起笔，写了几行字。早饭吃了一个窝窝头，半碗汤，又写“认罪书”，不时的叫唤几声。

20 日上午，中央文革办公室给北京地院革委会电话指示：“你们地质学院要和北航联合批斗彭德怀。这也是天地两派的大联合。在揪彭回北京时，你们产生过矛盾，现在要联合起来批判彭德怀。这是中央首长的指示。批斗要注意政策，要文斗，不要武斗，不准戴高帽，不准坐飞机。批斗会不要邀请军事院校参加。

有关批判材料会给你们送来。开批判会时可向北京卫戍区傅司令员联系要人。”

20 日下午，中央文革派人给他们送来了批判彭德怀的材料。

21 日，彭德怀起不来床了，哨兵看见他难受的样子，没有理他，作了如下记录：“我看这个家伙有点装模作样，他说解手，在床上躺着，他说起不来，叫哨兵拉他，哨兵去了，叫声就更多了，哨兵不理他，也没事了，这小子很坏。”

下午，北京地院革委会副主任聂树人等人到小汤山医院看望住在这里的地院革委会主任王大宾，向他传达了中央文革 20 日的电话指示及送来的批判材料。

中央文革送来的批判材料里有朱成昭当时让人抄录的彭德怀的“万言书”，地院许多人都看过。聂树人对王大宾说起：“这个‘万言书’我们早就知道，许多人都看过的。革委会开会，常委、政治部和‘东方红’大批判小组的人都反映强烈，有人公开表示绝不参加和北航的联合批斗会。许多人认为彭有冤屈。地院上上下下有这么一股同情彭德怀的思潮和情绪。这和刘少奇不一样，大家对他的反动路线都有切身的体会。彭德怀的‘万言书’，大家都说看不出有什么大问题，我们不好批，革委会觉得真难办。这样，革委会要我来请示你。”

王大宾考虑了一下，对聂树人说：“地院有同情彭德怀的情绪，这事就不要查了，也别向中央文革汇报了。当时揪彭德怀时，王大来、钱新他们，包括我自己都提出了反对揪彭回京的意见，中央文革都知道，这是公开的，当时闹得很大，我也受过严厉的批评。现在还是要小心一点好。如果给人家抓住把柄，中央文革追

查下来，老账新账一起算，我们是有口难辩了。联合批彭，中央文革有指示，北航又在我们旁边，我们还是要去参加的。常委就不要去了。”

聂树人同意他的意见，说李贵、高元贵、王焕几位老干部也是这个意见。

21 日晚，彭德怀胸部疼痛面积很大，而且也重了些，从床上起来非常困难。

7 月 22 日，卫戍区向上反映，彭德怀被打后“胸部疼痛、呼吸困难，痰吐不出来，不吃饭，不起床。据医生初步检查(未透视)，可能有些内伤。”

这天，卫戍区将彭德怀送到 267 医院检查，经 X 光片透视检查，胸部左右两侧第五根和第十根肋骨折断，右胸角内积血，左肺下叶部分不张。脉搏和血压都有增加。

# 文革史话

## 之第三部 全面内战 第九卷

刘朝驹 著

# 文革史话

之

第三部

# 全面内战

第九卷

# 目 录

第 749 回：戚本禹，组织声讨“七二〇”　七二一，福州火烧交际处..... 1
第 750 回：第七次，接见河南省代表　莫天真，江青赞“文攻武卫”.....11
第 751 回：都同意，康生的五点建议　空降兵，保护开封“八二四”.....20
第 752 回：西山游，北航抓走张体学　“红联站”，太原冲击省军区.....29
第 753 回：第四次，接见山西省代表　关锋说，“四一四”革命行动.....38
第 754 回：促协议，浙江两派聚北京　判薛平，广州浴血中山堂.....52
第 755 回：大武斗，合肥市一触即发　七二四，徐州市又生冲突.....62
第 756 回：围京西，群众错认秦基伟　再示威，“三军”造反派游行.....71
第 757 回：毛泽东，还称陈再道“同志”　周恩来，接见豫驻军领导.....80
第 758 回：七二五，北京百万人集会　看武汉，空十五军进江城.....91
第 759 回：大游行，各地声讨“七二〇”　枪声响，山城武斗又升级.....100
第 760 回：议题变，重庆“井冈山”发枪　七二六，太原重机厂武斗.....110
第 761 回：戚本禹，又来到揪刘现场　急善后，“百万雄师”撤农村.....120
第 762 回：陈再道，受批判开会被打　斗德怀，张闻天一同陪榜.....131
第 763 回：形势糟，广东掀抢枪风潮　七二六，火烧新疆医学院.....140
第 764 回：难住手，郑州市武斗惨烈　长埫口，武汉百万雄师终结.....152
第 765 回：吴焱金，“工造总司”回旧地　第三次，接见湖南省代表.....161
第 766 回：太困难，按下葫芦浮起瓢　终于签，《制止武斗的协议》.....172
第 767 回：甘肃省，革筹小组刚成立　兰州市，长风厂武斗又起.....184
第 768 回：赣温圳，机枪扫射列车停　第四次，接见江西省代表.....196
第 769 回：查少奇，周恩来招李德生　长春打，秦化龙又成叛徒.....207
第 770 回：议港九，七三〇大连武斗　第八次，接见河南代表团.....216
第 771 回：说兰考，为焦裕禄的斗争　河南省，再签第三份协议.....225
第 772 回：枪声响，开封市武斗又起　战士闹，调六团紧急换防.....238
第 773 回：南京市，下关火车站武斗　战犹酣，金陵城终成割据.....251
第 774 回：分两派，温州抢枪大武斗　火冲天，百姓逃难似抗战.....262
第 775 回：难容忍，王洪文要搞联司　趁开会，支联站头头被抓.....271

第 776 回：触电网，解放军战士身亡　枪声响，泸州城狼烟四起 .....282
第 777 回：组船队，王茂聚首次支泸　邓长春，黄山警备司令部 .....292
第 778 回：重庆市，武器库接连遭劫　说贺龙，八一建军招待会 .....303
第 779 回：八月一，康生见甘肃领导　揪陈毅，银川市西塔之战 .....313
第 780 回：第四次，接见湖南省代表　一桩桩，周恩来逐个解决 .....323
第 781 回：韩爱晶，为张体学传信件　第五次，接见江西省代表 .....334
第 782 回：各执词，总理也无可奈何　说萍乡，不能武斗反武斗 .....345
第 783 回：天已明，只好先匆匆散会　许世友，情急跑进大别山 .....357
第 784 回：出坦克，杨家坪子弹横飞　物资紧，改炮艇长江劫船 .....367
第 785 回：毛泽东，在思考武装左派　谈文革，日本记者遭批斗 .....377
第 786 回：开大会，声讨香港英当局　戚本禹，接见湖南省代表 .....388
第 787 回：为名额，湖南湘工起纠纷　平遥打，山西会议告结束 .....399
第 788 回：无缘由，乱枪响尸横路上　八月四，重庆建设厂大战 .....408
第 789 回：出援手，井冈山组建舰队　上海市，革委会代表被扣 .....419
第 790 回：上柴厂，终引发激烈武斗　联司败，纪录片留下全景 .....426
第 791 回：毛泽东，黄浦江边缓缓行　全撤走，中南海再斗刘邓 .....435
第 792 回：八月五，开封宁夏伏击战　第六次，接见江西省代表 .....445
第 793 回：戚本禹，接见湘红联代表　八月五，涪陵武器库被抢 .....456
第 794 回：平遥县，陈永贵古城被围　急电令，谢振华飞车驰援 .....465
第 795 回：提抗议，火烧印尼大使馆　萍乡打，五次见湖南代表 .....473
第 796 回：上海市，先武装民兵十万　王八七，约见外交部讲话 .....482
第 797 回：十二军，摩托化开进合肥　八月八，工学院制止武斗 .....493
第 798 回：涪陵县，长江伏击运枪船　在城外，又截部队军火车 .....503

## 第 749 回：戚本禹，组织声讨“七二〇”　七二一，福州火烧交际处

再说北航，他们 7 月 20 日得到尹聚平电话报告后，于当天就将大标语贴到了天安门广场，并且组织了抗议游行。

当晚，由建工“新八一”和清华“414”发起，也在天安门广场组织了“首都无产阶级革命派揪斗刘少奇誓师大会”。

第二天，7 月 21 日，北航全院师生又冒着倾盆大雨，步行到天安门游行声援武汉革命派。院革委会派出屠海鹰、李明启等十余人前往武汉“营救战友”，调查情况。

当天，更多的群众冒雨在中南海外举行“揪刘”游行。

这天，戚本禹在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座谈。他问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今天你们为什么没有派人去拍片？”

戚本禹问的是为什么没有去拍中南海外的“揪刘”游行。

群众答：“我们正在请示军代表。”

戚本禹说：“革命还用请示？哪里有枪声，就到哪里去！文化革命你们拍了哪些片子？”

群众说：“《打响春耕第一炮》等。片子出得相当少，速度又慢。”

戚本禹：“你们春耕、夏收的片子到冬天才能出，那有什么用？你们如果不改变这种状况，我就关你们的门。生产就是宣传，就是政治斗争，摄影机就是武器，怎么能把武器放下？这么大的群众运动，这么大的雨，群众自发地走上大街游行，我从进城以后，还没看见过，这还是第一次。这么大的运动没人拍片？！这么大的群众运动，要揪刘少奇，保卫毛主席，你们却不拍，过了

就拍不上了。当然揪刘少奇要毛主席批准的。”

“要把武汉‘百万雄师’杀人、放火拍下来，这是刘邓的罪证。还有内蒙、四川。不管哪一派都要拍，先拍下来再说。”

“拿起文艺武器来斗争，支持革命派，打击保守派。可是在前方看不到你们的战士，我从游行的开头到结尾都看了一下，没有一个摄影师人员。”

群众：“现在厂里很乱，谁的话也不听。”

戚本禹：“你们首先要反对无政府主义！”“军代表这两人的话说了要算的，说了就要办。违抗者第一次警告，第二次处分，第三次开除。”“你们要有很高的责任感，把工作当成战斗任务，影片不能粗制滥造。”“两条路线斗争要报道，但不要参加组织。怎么能不介入呢？要用胶片揭露斗争的实质，哪有纯客观主义的？”“我再重复一遍，现在两条路线斗争，两个阶级斗争很激烈，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刘邓的斗争现在是一个决战时刻，你们应该坚守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岗位，做毛主席的铁拳头，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打击刘邓路线的铁拳头。”

这天下午，戚本禹把中央文革办事组负责人王广宇叫到他的办公室，对他说，“武汉事件”是一个有计划、有预谋、有组织的事件，这件事和徐海东、张体学都有关系，事件发生前，张体学曾经去过徐海东家七、八次。戚本禹让王广宇去北航找韩爱晶，叫他组织北航“红旗”的人去西山游行，说西山是军委负责人的驻地，贺龙就住在西山象鼻子沟。戚本禹觉得贺龙可能是“武汉事件”后台，他说，叫游行队伍在贺龙驻地门前，高喊“打倒陈再道”的口号，虚张声势，做出要冲进大门的姿态，但不要冲进

去，吓唬贺龙一下。

戚本禹还交代王广宇说，张体学现在住中直招待所，正在反省交代问题，叫韩爱晶派人把张体学揪到北航，叫他们交代："每次去徐海东家和徐海东都谈些什么问题，怎么策划武汉事件的？一次一次地交代，叫他写材料。"

王广宇立即赶往北航，向北航"红旗"的韩爱晶、田东他们交代了戚本禹的指示，让他们把湖北省省长张体学抓到北航，说是与"720 事件"有关，并告诉他们，张体学住在中直招待所。

"中直招待所在哪里？"韩爱晶问。

"你们自己找。"王广宇说。他走后，韩爱晶和田东等人立即商议怎么完成中央文革交办的任务。他们一方面组织人员第二天去西山游行，同时派人去找中直招待所在哪里？

对去西山游行，韩爱晶觉得有点不踏实，想拉上"地派"一起参加。于是又打电话给王广宇建议："让地质学院和我们一起去吧。人多一些。"

刚回到办事组的王广宇去请示戚本禹，戚本禹很不高兴的说："这个韩爱晶，不动脑子，他联合地质'东方红'干什么？算了！叫他们不要去西山了。"

王广宇马上把戚本禹的话在电话里向韩爱晶做了传达。

下午 15 时，戚本禹给北京市工代会、农代会、红代会打电话，说：

"从现在开始，工代会、农代会、红代会马上开始游行，声援（武汉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打倒百万雄师！'，'打倒陈再道！'自己编些类似的口号。大会、小会、声讨会，从今天开始马上搞。

今天下午，通知各院校，通知工代会到天安门活动，搞两至三天。”

戚本禹又给北航“红旗”电话指示：

一、打倒反革命刽子手陈再道！

二、打倒反动组织“百万雄师”！

三、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党中央！誓死保卫中央文革！

四、谁反对中央文革就打倒谁！

五、把8201部队中的一小撮反党叛乱分子揪出来示众！

六、以血还血，还我战友！以命抵命，血债要用血来还！

七、坚决打倒刘邓的猖狂反扑！

当天，清华蒯大富也接到戚本禹电话，让组织去天安门广场和西山游行。

就在7月21日这天，福建省福州市发生了火烧交际处的武斗事件。

7月19日晚23时多，福州市4名男女大学生来到福建省交际处“八·二九联司”和“省工联司”驻地附近，被担任警卫的“省工联司”的“飞虎大队”拦住盘问。这几个大学生没把这几个工人放在眼里，反唇相讥说：

“你们管我们是哪个学校、哪个组织。”

“你们这么晚了，来这里干什么？”

“不干什么，随便走走看看。”

“你们是‘革造会’的吧？来这里当奸细，是不是呀？”

“什么奸细？我们随便走走，难道不行吗？”

“你们肯定是‘革造会’的奸细，走，跟我们走一趟！”

“你们凭什么捉人？我们强烈抗议！”

这边提出抗议，那边一个大学生趁“飞虎大队”的人不注意，转身拔腿就跑。

“啊，你跑，追！”几个“飞虎大队”的工人在后面追赶起来。但终被那个学生逃脱，跑回到附近的师院“红旗”驻地报急。

午夜时分，师院“红旗”4 名学生闻讯赶往交际处要回那 3 位被扣学生，没想到他们自己也被“飞虎大队”的人扣住，让他们必须写出书面检讨，保证下回不再来侵犯“联司”的驻地，否则，就不能走。

“我们有什么错？凭什么要做检讨，你们必须立即放我们走，否则，由此产生的一切严重后果由你们负责！”大学生们出言相撞。

“妈的，你们还这么猖狂，不给一些颜色看看，就不知道老子的厉害！”工人哪管那么多，一拳打向这位个大学生，打得他趔趄倚倒在墙上。

“我抗议你们打人！”大学生心里害怕，，但嘴上仍很强硬。

“打你又怎样？一个反军小丑！”那个大汉又是一拳向他击去。

又有一个“红旗”大学生，乘“飞虎大队”的人看守不严，翻墙赶到隔壁的省军管会要求救援，省军管会立即派人来到“省工联司”，经过耐心说服后，“省工联司”终于释放了这批人。

20 日凌晨 3 时，省军会就此事召集双方代表协商。谁知就在这当儿，“厦大公社”头头率领 30 多名彪形大汉，乘坐一辆大卡车，气势汹汹地冲进了省军管会，抓走正在军管会谈判的 3 名“省工联司”代表。

“你们凭什么抓人，我们抗议!”这次轮到“省工联司”的工人代表抗议了。

“你们又凭什么抓我们的人？把他们带走!”“厦大公社”头头反问道。

“同志们，不要这样，有事双方坐下来协商，不要火气这么大。”军管会的解放军急忙劝解说。

这些人根本不买军管会的账，“厦大公社”还是要把人带走。就在他们将要把那 3 名“省工联司”代表押上汽车时，“八·二九联司”的学生 30 人闻讯赶到西湖饭店门口拦截汽车，将那 3 个“省工联司”代表抢回。

在抢夺“省工联司”代表时，一个“厦大公社”的学生动手打人，当场被“八·二九”学生拉下汽车，并高喊：“把打人凶手抓起来!”

军管会的解放军也赶到现场，劝他们说：“同学们，不要这样，还是把人放了吧。”

在军管会的解放军劝说下，“八·二九”学生把人放了。

清晨 7 时 30 分左右，“思想兵”总部心有不甘，又调集“革造会”约 800 人，手执铁棒、木棍、钢鞭等，高喊着：

“血洗交际处，踏平交际处!”

“赶走‘叭儿狗’!”

“打倒‘叭儿狗’，气死谭王八!”

围攻“八·二九联司”和“省工联司”所在的交际处。8 时许，他们用汽车撞开西湖饭店的铁门，随后逐楼逐屋搜查。

“八·二九联司”的大部分学生在 7 月 15 日以前都返回学

校“复课闹革命”了，在省交际处的学生和“省工联司”的人只有200余名，寡不敌众，被迫退守1号大楼。有些“八·二九”学生被石头、木棍打伤，脸上淌着血，依然高举着《毛主席语录》，争着要守在楼梯口的最前线，《大海航行靠舵手》的歌声响彻这幢灰砖大楼。

由于“八·二九”学生都躲在大楼里面，他们居高临下，“革造会”几次围攻都没有得手。他们把“八·二九联司”、“闽福控诉团”等组织的书箱以及衣物，搬到省交际处大礼堂前面的水泥场上纵火焚烧。

当天上午，省“革造会”头头在大众澡堂开会，决定成立“720指挥部”，设三套指挥班子。负责全面部署和总指挥的第三套指挥班子安排在一个职工家里，随带报话机等通讯设备，遥控现场。

武斗发生后，省军管会赶往现场制止武斗，提出三条要求：

（1）无条件的停止武斗、包围者要撤离现场；

（2）双方都不要再继续调动队伍扩大事态；

（3）一切问题由双方派出等量代表坐下来协商解决。

军管会派人上楼说服“八·二九”和“省工联司”与“革造会”的潘大昌等人进行协商，但“革造会”方面坚持要交出“联司”头头，赔偿一切损失，并要“八·二九”向全省人民检讨等，三次协商均未成功。

上午，省交际处附近人山人海，交通完全堵塞。除了看热闹的群众，就是“革造会”调集来的人马。从12时起，军管会派出少量部队到武斗现场对双方进行隔离、劝说。

下午，已把省交际处1号大楼里三层外三层围住“革造会”，

数十辆大卡车停靠在马路旁，宣传车上的高音喇叭广播“720 行动指挥部”给“八·二九联司”及“省工联司”的《照会》：

“一、你们必须马上交出 7.20 流血事件的幕后策划者黄朝晖、廖知天。二、交出 7.20 打人凶手，并且交出我毛泽东思想红卫兵，被你们抢去的自行车证件等物件。三、必须负责对我被打伤的战士进行医疗并向全省革命造反派作公开检查，向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总部赔礼道歉，并保证今后不再发生类似事件。以上三点你们必须立即答复，否则，我指挥部即将予坚决的回击，由此产生一切严重后果由八·二九联司及省工联司黄朝晖、廖知天等一小撮混蛋负完全责任。”

省交际处的大门已经关闭，外面站着一排排解放军战士，他们手挽着手，形成了一堵堵人墙。但是，在大门不远的砖墙处，“革造会”已扒开了一个大口子，在这里约莫也有一个班的解放军战士拦在那里，他们也手臂挽着手臂形成一道人墙。

停在交际处大院里面的一辆“九·二”宣传车兼指挥车的高音喇叭也在不断播放“下定决心”等语录歌，他们又吹起冲锋号，院里面传来一阵“乒乒乓乓”的掷物声，呐喊声、叫骂声也响成一片。接着，外面又有一大群穿背心短裤的人冲过来，要从那砖墙的破口子进去。执行任务的解放军战士劝阻他们，他们便高喊：

“保皇兵滚开！”

“解放军不要当支保兵！”

拳头落到了解放军战士的头上和身上，那几个解放军战士阻拦不住一次次猛烈冲击，还是被他们冲进了好些人。

大院里面都是“革造会”的人，1 号楼的一层已被他们占领。

7 月 20 日是农历 6 月 13 日。晚上，月亮高悬在深蓝色的夜幕上，就像一只擦得锃亮的铜盘，为省交际处的新一楼蒙上一层惨白的月光，省“革造会”的探照灯扫来扫去，手执钢叉、头戴藤帽的“革造会”小分队不停地往来巡逻……

21 日，进攻的冲锋号又吹起来了，新一轮进攻开始了。8 时 20 分左右，“革造会”60 多人，头戴“东南师院”标志的竹藤帽、普通安全帽和钢盔，手执三角铁、木棍等凶器，翻墙冲进省军管会，砸了停在军管会内向武斗现场宣传中共中央《六六通令》的福州卫戍司令部值勤车。

“革造会”的人冲到交际处 1 号楼大楼下，被守护在这里的解放军战士拦在楼梯口，越来越多的人涌进来，围住了楼梯口。高压水龙头、喷雾器，向解放军战士身上喷射过来了，接着，他们连推带搡，将战士们推了出去，有的抬着战士从窗口往外扔，有两名战士被推进池塘。

此时，省军管会接到福州军区第一副司令员皮定钧的电话：“我向你们转达韩司令的指示：为防止发生更大的流血惨案，部队可以夺下武斗的凶器，并可以拘捕行凶、纵火的人，但不准动手打人。”

21 日上午，“革造会”头头乘车亲临交际处现场指挥，召开火线会。师院“思想兵”有人提出火攻，他们便指派“原子兵团”、“红九·二工人”、上山下乡社会青年组织“山鹰部队”等组成敢死队执行火攻。

11 时左右，敢死队用扫把、铁丝绑上棉花，浇上汽油点着火往楼窗里扔，均被扑灭。以后，他们又用棉垫、蚊帐、木器、

热水瓶、墨水瓶、玻璃瓶等倒上汽油，被解放军一名副营长发现，上前制止，但却被倒了一身汽油打倒在地。

大楼开始起火，十几分钟后就烧到二楼、三楼、四楼，一个个窗口开始喷出火舌。

“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楼里传出口号声。

解放军不顾一切的冲入火海救人。

救火车来了，“革造会”挡在门口，不准救火车开进现场。

省军管会又派出一营部队前往救火救人，被“革造会”阻在9号楼和池塘之间的路上。

解放军战士挥动着《毛主席语录》，四人一排手挽着手走过来。“革造会”的人向他们投掷砖头，战士依然在坚定地前进。

……

火越烧越大，交际处大楼里的“八·二九”学生准备跳楼突围。这时，解放军战士冲上来了，他们帮助学生，把棉被从窗口扔到地下，用蚊帐、被单接成长绳，让学生们坠下楼去。

大火燃烧一个多小时之后终于被扑灭了，省交际处西湖饭店的房屋遭到严重破坏，1号楼被烧毁。这是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福州市发生的规模最大、损失最重的武斗、放火事件。

## 第 750 回：第七次，接见河南省代表　莫天真，江青赞“文攻武卫”

7月21日晚20时45分至22日凌晨0时40分，在人民大会堂安徽厅，陈伯达、康生、江青、戚本禹、姚文元、刘建勋等中央领导第七次接见河南赴京代表团。

陈伯达、江青、姚文元因事未到，康生主持，说：

“咱们好几天没有见面了，同志们看，现在北京热闹不热闹？全国都很热闹，上海、四川各地都很热闹。”

他讲了武汉“百万雄师”的问题，特别强调河南：“‘铁军’、‘十大总部’，特别要注意这个问题，你们应该仔细考虑，你们组织里，有没有同情‘百万雄师’的，这一点要注意。为什么？因为我们知道，‘百万雄师’是反对‘二七公社’的，是反对中央给‘二七公社’平反的，这在武汉有标语。不但‘百万雄师’，武汉军区也有人这样反对。因为河南军区何运洪与武汉军区有关系。何运洪为什么敢这样大胆呢？同志们，‘河造总’的同志们，‘十大总部’的同志们，你们应该很清醒的考虑。因为河南军区是受武汉军区直接领导的，1军也是受武汉军区领导的。我不说武汉军区整个不好。但武汉军区犯了方向路线错误，他们准备自己检查。他们里面有些组织，特别是独立师的一些干部，煽动‘百万雄师’反对中央。”

“今天不讨论这个问题，我请河南革命组织、群众组织考虑一下，河南有没有发生这个问题的危险，有没有按照这样的方法再来第二个武汉？每一个革命群众，每个组织，每一个真正要革

命的人，都应该在他的头脑里考虑考虑。”

“现在武汉街上贴满了标语，有些军区的宣传车也大肆宣传说：‘武汉军区支左的大方向是对的’。这完全是造谣。还造谣说，中央说，‘百万雄师’是革命左派。军区的宣传车假造中央、毛主席和中央军委、林副主席的谣言，欺骗群众。他们总是想采取内蒙古反革命分子的手段，造成既成事实压中央，他们完全想错了。毛主席领导的党中央，是不会被这些坏分子压倒的，他们动不了我们一根毫毛，让他们表演表演，谁愿表演就再表演一番。这样的阶级斗争，才能把文化革命搞到底。这看起来是坏事，实际上是好事。这样，文化大革命才能搞彻底的。同志们，今天从北京会上一大课，他代表全国的革命组织。这一点，我为什么讲呢？因为河南武斗不是停止了，而是一天天的在发展，有军区的某些人在我们面前玩弄两面派手腕，还在煽动群众。”

“从这个问题，也可以叫何运洪、李善亭等人看一看，他们实行这种路线，如果不改变，会得到一个什么样的结果。他们能代表解放军吗？现在全军陆海空都在游行反对他们。同志们，从今天可以得到一个深刻的教训，得到一个经验，我看对解决河南问题很有好处。当然，也可能有人错误地估计形势，比如你们的‘公安公社’吧，他们看看形势满好，又蹦了出来，我们准备他们蹦，刘大坤，还有一个钟什么东西，他们已经蹦了出来，谁跳出来都行！他们认为是一个大好时机嘛！我看大暴露一下，他们高兴一下，河南文化大革命的问题才能彻底解决。现在河南的武斗，不是停止，是发展了，是在酝酿一个武汉‘百万雄师’这样的反动行为，有这样一个危险。因此，我希望你们看到街上革命

群众游行的声势，得到一个教训。”

“二七公社”的代表在会上宣读《河南二七公社关于武汉目前局势的最紧急声明》。

“河造总”也表示：“为了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坚决和‘百万雄师’进行斗争”。

“八大总部”也表示要和“百万雄师”开展斗争。

康生说：“大家的意思我知道，大家要反对‘百万雄师’，把他印出来好。今天晚上，大家一方面赞成刘建勋同志回河南领导文化大革命，一方面有的同志说：刘建勋有错误。刘建勋同志的错误，已经检查了。他在中央的会议上检讨过多次。今天晚上又在我们的代表会上作一次检查，现在请他来讲一讲，同时，他自己也知道省委一些问题要揭露一下，除此以外，纪登奎同志、戴苏理同志，他们也要求作检查，有时间也请他们检查一下，现在请刘建勋同志讲。”

刘建勋首先“祝毛主席万寿无疆”，他没有提“林副主席”。康生说：“他没有提林副主席，可能有人要抓小辫子，我同你们说清楚，这是林副主席提议的，他有最大的谦虚，他首先禁止我们的干部祝林副主席身体健康，特别禁止我们中央讲这个话。”

接着刘建勋检查，特别提到文敏生的问题。

接着，纪登奎、戴苏理检讨。

“二七”代表发言：“刚才刘建勋、纪登奎、戴苏理等同志对错误的向群众组织作了检讨，我们表示欢迎。从今天的检查来看，刘建勋、纪登奎的检查是认真的，诚恳的，深刻的，我们坚信刘建勋、纪登奎同志一定能彻底改正自己的错误，更高的举起

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把河南办成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戴苏理的检讨，尽管不深刻，没有触及灵魂但我们表示欢迎，欢迎他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

“中学红卫兵总部”的代表说：“刚才我们听了刘建勋、纪登奎、戴苏理等同志的检查和对文敏生、赵文甫问题的揭发，表示热烈欢迎……”

23时50分，陈伯达、江青、姚文元走进会场，全场高呼：“向江青同志学习！向江青同志致敬！毛主席万岁！”

江青：“革命的同志们万岁！向革命的同志们致敬！”

姚文元带领大家高呼：“打倒刘、邓、陶！”“打倒王任重！”“打倒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毛主席革命路线胜利万岁！”“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中学红卫兵总部”继续说：“河南的武斗不但没有停止，而是大规模的爆发，很严重，很多老工人都哭了。全国第二砂轮厂也停产了。二砂‘造联’很坏，把铁皮搞成盔甲。”

康生：“你们关心制止武斗，不搞武器，这一点是好的。我希望你们两方面调查，如果‘二七’有，不对，‘十大总部’有，也不对，‘河造总’有，也不对。你们关心这个东西，要几方面调查，我们得到的材料，不仅是一个方面的东西，甚至工人拿起武器，拿起了枪，所以，希望全面注意这个问题，这样才能保证执行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

“中学红卫兵总部”：“工厂停工，扒铁路，把贵重法码当弹弓子打，这都是‘二七公社’黄委会‘东方红’干的。”

康生问：“你们学校是不是在铁路西边？”

“中学红卫兵总部”：“在铁路西边。”

康生：“听说新乡斗的很厉害。”

“中学红卫兵总部”：“大家要按照《六六通令》、《七五协议书》办事。”

康生：“你们都签字了吗？”

“中学红卫兵总部”：“康老说不签字不行，我们签字，不执行，辜负了中央首长的期望。”

康生：“在北京达成协议，在家里搞武斗，你们代表中，有没有想打倒戚本禹同志的？”

“河造总”、“十大总部”回答说：“没有。”

在热烈掌声中，江青开始讲话。她说：“应该是向同志们学习，向同志们致敬！

刚才有一位同志讲，要发动群众制止武斗，这个意见很好，要大力宣传。挑动武斗的人总是一小撮，如果广大的群众知道了他们的阴谋诡计，揭出了他们，他们就会像过街老鼠人人喊打。要发动群众，要向群众做深入的宣传工作，这样我们才能胜利。

我们不能太天真烂漫。当挑起武斗的一小撮人，他们拿起武器打你们的时候，革命群众可以拿起武器自卫，在双方达成停止武斗的协议以后，他们仍然不把武器收起来的话，你们自卫的武器不能放下！”

掌声响起，并高呼：“毛主席万岁！”

江青接着说：“我记得好像就是河南一个革命组织提出这样的口号，叫做‘文攻武卫’，这个口号是对的。”

再次响起热烈鼓掌声。

江青："我们坚持毛主席提出的文斗，坚决反对武斗，做深入的群众工作，这是第一条，同志们要向群众深入地宣传这一条，做比较艰苦的群众工作，要广大的群众识破一小撮人的阴谋，是要做一些工作的。但是，还要有第二条，不能天真烂漫。当他们不放下武器，拿着枪枝、长矛、大刀对着你们，你们就放下武器，这是不对的。你们要吃亏的，革命小将你们要吃亏的。现在在武汉就有这个情况。当然，武汉的革命小将也在采取自卫手段。同志们，当我们听到'百万雄师'以及他们的幕后一小撮操纵者拿着那样的武器对手无寸铁的革命群众行凶，甚至绑架、殴打我们的谢富治同志、王力同志，我们能允许吗？！

河南的情况现在已经达成了协议，我希望各方面都不要撕毁协议，谁撕毁协议谁就是蒋介石。蒋介石在1946年10月10号跟我们订了停战协议，他马上就撕毁了。

我今天看看同志们，就把这个道理讲一下，我们有理，真理在我们这边。就是说，毛泽东思想在革命小将、革命干部、革命工人、革命农民这边，不在他们一小撮那边。我们必胜，他们必败。如果他们挑起武斗，不肯放下武器，你们不要天真烂漫，放下武器。我支持这一点。

我就讲这么一点。"

热烈鼓掌，并高呼："毛主席万岁！""向江青同志学习，向江青同志致敬！"

康生："军区张树芝同志报告一个情况，就是说这几天还有人冲击军区。同志们不是反对打、砸、抢吗？不是达成的有协议嘛！为什么还发生这样的情况？刚才'工人总部'写了个条子给

我，这些事情我都知道了，为什么不讲讲这几天的事情？冲军区是一个大事，问题是过去也有人冲过，那时候没有协议嘛。我们达成了协议，大家签了字，就应该注意。”

当张树芝讲到有的地方开着吊车搞武斗时，康生说：“这个问题‘工人总部’要特别注意，你们要负主要的责任，别人没有吊车嘛，把生产工具变成了破坏工具。”

张树芝强调事态的严重：“吊车一开是件不得了的事情。”

康生：“新乡就开了吊车。”

“二七”：“他们提出3天内全部消灭‘二七’派，用吊车围攻‘二七’派……”

康生说：“用吊车毁坏大楼是反革命行动，要查一查。”

“二七公社”代表汇报“十大总部”、“河造总”与“百万雄师”的联系。

“河造总”、“十大总部”异口同声的反驳：“‘二七公社’善于造谣，完全是造谣。”

康生：“你们等人家把话讲完嘛！这是讲‘百万雄师’问题，你们为什么这样？你们要注意这个问题，注意‘百万雄师’！‘百万雄师’！！‘百万雄师’！！！”

“二七”代表继续说：“‘河造总’和‘十大总部’成立了‘河南省革命派联合总部’，明天开大会，规定农民4点钟进城。……”

戚本禹问“河造总”：“有没有这个事情？”

“河造总”回答：“没有！是造谣，我下午3点钟才挂过电话，是造谣！”

戚本禹："现在就马上往家打电话。"

"河造总"："有没有中央派人调查。"

康生："我们可以派联络员跟你们一块打电话。在别人发言的时候，你们不要讲，他们讲完，你们再讲嘛。"

"二七"代表继续说："统一行动指挥部在省工会，我们认为这一系列武斗行动不是偶然的，最近所以发生大规模武斗是河南军区和河南省委内一小撮搞反革命两面派的结果。"

康生："这一点你们刘大坤，还有钟什么东西（指钟生溢）实在做了反革命两面派。你们在这里搞的决议，他们在家里反对，说决议是假的，现在你们两方面都不要讲了。我提议由'河造总'起草达成一个协议，共同反对'百万雄师'，反对四川'产业军'，反对'产业军'你们赞成不赞成？你不是今天起草吗？你就起草嘛！"

"财贸总部"："'河造总'不起草，我们起草。"

康生："好！"

张树芝："今天，新乡'八一八'的大楼和河医的大楼，新乡'八一八'楼里面还有放射性元素，河医的大楼实验室里还有细菌，非常危险，我们责成新乡军分区负责让围新乡'八一八'的人撤退，郑州由军区负责让他们撤退，现在撤退没撤退还不知道。我们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有意见你们可以提，但是冲到我们办公楼我们不能办公，我们不能同意，昨天有三股人冲过军区，并且上去就喊。"

康生："你们的目的是给军区施加压力，使军区不承认错误。"

张树芝："我们由于在支左工作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大

家可以批评，使我们的工作做得更好。”

康生对张树芝说：“你在精神上要有准备，你们承认错误，你们部队中间一部分人，群众组织中的一部分人，一定要大大向你们施加压力，你必须有这样的思想准备。”

“二七”代表说：“‘河造总’、‘十大总部’昨天晚上12点钟冲进军区，围攻陈桂昌副司令，使他无法工作，完全没有保证。”

康生：“我们认为陈桂昌是对的，李善亭、钟生溢是错的。”

## 第 751 回：都同意，康生的五点建议　空降兵，保护开封“八二四”

接着，陈伯达讲话，他讲的内容和康生一样，也是武汉“百万雄师”与河南的联系问题。他说：

“河南现在有一个很大的可能，就是各省的保守派组织或反动组织利用何运洪在支左工作中所造成的罪恶和留下的空隙进行活动。我看到一个材料，武汉‘百万雄师’，一百条纸老虎都走到河南来了。”

康生插话：“就是行尸走肉，我看‘百万雄师’就是行尸走肉。我还叫他是‘白完行尸’，就是白色恐怖完蛋的行尸走肉。”

陈伯达：“‘百万雄师’是个狗屁！他起这个名字是吓人的，没有3天功夫，到现在还不到3天，政治上全部破产，臭名远扬，组织上土崩瓦解。你听到这个名字好像很凶，其实很怂，纸老虎。四川‘产业军’，武汉‘百万雄师’，北京的‘联动’，东北的‘荣复军’到了你们河南去了，到你们中州去了，利用过去河南军区何运洪所造成许多错误和所作的罪恶，开辟战场，他们为什么窜到河南去了？为什么不到北京来？这些保字派组织或反动组织都窜到河南这个目标，就是想把河南作为战场。所谓行尸走肉的‘百万雄师’，就是在河南造谣，有的同志把四川‘产业军’叫‘惨匪’，惨是惨无人道的惨，匪是罪恶深重的匪。”

“‘十大总部’，‘河造总’你们行动要特别注意，听其言观其行，你们在这里信心很大，说得怪漂亮的不行，要在行动上表现出来。你们在这里订协议，刚才张树芝同志说了，没有实行，

把协议撕毁了。江青同志刚才讲，什么人破坏协定？中国的蒋介石。这是值得深思的。”

康生：“不管他有多少人，‘百万雄师’不是号称100万人吗？绝大多数是受蒙蔽的，他们的头头是武汉市委组织部长、原大叛徒王明的勤务员。”

陈伯达：“有一个问题，‘十大总部’、‘河造总’在座的代表都要想一想，你们究竟是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走无产阶级的革命路线，走这一条唯一正确的路线，还是跟那‘行尸走肉’在一起？你们‘十大总部’、‘河造总’首先制造杀人武器，有没有这个事？”

答：“没有！”

“二七”代表：“在郑州、洛阳、许昌、开封、新乡都有‘百万雄师’、‘产业军’，并且制造武器，郑工实习工厂因制造武器，车刀飞了打死一工人，纺织机械厂制造弹簧枪等。”

“河造总”反驳道：“‘二七公社’造谣，他们最近开了政工会议……”

陈伯达：“用国家的财产、物资制造小团体杀人武器，这是什么？该当何罪？国家财产、物资都不能用来制造小团体杀人武器。叫做破坏国家财产。现在‘十大总部’、‘河造总’有些工厂把国家财产、物资用来制造小团体杀人武器。是有这个事情。”

“河造总”说：“是‘二七公社’制造武器、挑起武斗。”

戚本禹：“他们是少数，不会这样做。”

康生问：“今天晚上正在军区围攻陈副司令员的是不是‘河造总’、‘十大总部’？”

戚本禹："陈桂昌给我打电话，确实是这样，安全没有保证。张树芝同志，你们要保障陈桂昌同志的安全。"

康生："我有一个材料念一下，根据军区反映，昨天晚上，'河造总'的一些成员，军区士兵和干部造了陈副司令员的反，昨天'河造总'的100多人，夜12点围攻陈桂昌、赵复兴。刘大坤、钟生溢溜走，后来又把赵复兴放出，一致围攻陈副司令员。他们说：为什么把军区声明支持'河造总'一句话落掉，要是刘建勋搞鬼，就坚决打倒他。"

接着康生解释说："这个问题何运洪、张树芝他们回答，这是他们觉得为了促进各派大联合，提出'二七公社'、'河造总'都不写，开始还向中央作了报告，然后到总理开会的时候，他们告诉我河南军区那个稿子的事。这个问题和刘建勋没有关系，这不过是一个借口而已。今天晚上10点钟已经有500人冲进了军区，现在正在调人。他们造军区反的原因是军区内一部分人说：刘建勋同志到了军区，刘建勋不承认'河造总'是造反派，'十大总部'也说刘建勋歪曲中央精神，只支持'二七公社'。明天开大会要揪刘建勋。今天造军区的反，是内外配合。他们准备明天开大会。据省委机关'造总东风兵团'翻印了武汉'白完行尸'18号公布的一个材料。为什么'白完行尸'要到那里去？就是有人欢迎他们和翻印他们的材料嘛！这个传单捏造毛主席、林副主席关于'产业军'的批示，说毛主席、林副主席支持'产业军'，这完全是造谣。这样的东西竟有人翻印？！省委机关'造总'丁石、张治安你们听着，我预先请你们注意！"

接着康生又谈到挑动农民进城问题："我告诉同志们一个秘

密，农民不会无缘无故的进城，各地的规律就是军分区、人武部的动员。凡是动员农民进城，大体都是军分区、人武部搞的，大家对这一点不要怀疑。”

陈伯达：“给农民记工分，记多少钱，给多少粮食，不然农民怎么会进城来呢？有些农民就是糊里糊涂进来的。不给粮食，不给工分，不给钱，农民就是不给他干，还有戚本禹同志说的，在农民中间造谣，总是说造反派怎么破坏国家财产，要求农民进城支援，宜宾农民进城破坏生产才厉害哩！”

康生:“浙江保守派动员农民进城,就是军分区人武部搞的。”

陈伯达：“张树芝同志，你们的工作要认真。”

张树芝：“我们正在开三级干部会议，在郑州不成，搬到另一个地方去了。我们准备把中央首长指示、中央批示传达一下。经过教育,哪些不赞成中央指示,我们军队是毛主席亲自缔造的，是最有纪律的，对他们是要执行纪律的。”

康生：“张树芝同志，你们现在正在召开的三级干部会议开不成不错，我支持三级干部会议不开。开这样的会议，看什么人领导、什么路线领导，有的省军区也是这样。用第一个办法开三级干部会议，名义上是传达中央指示，实际上是动员他们反对中央批示，动员他们让农民进城。很多这样的经验，你们要注意，有的军分区，人武部常常以各种借口召开会议，什么好听起什么名字。比如有的用学习毛主席著作模范人物介绍经验会的名义开会，实际上是动员农民进城。有的以整顿过去支左工作为名，实际上动员部队反中央，动员他们同保守派组织或反动组织相结合。很多地方都有这个经验，你们也要注意。现在你们的三级干

部会议到底开好还是不开好，你们考虑。有没有人在三级干部会公开的或秘密搞何运洪以前那一套？”

康生最后建议：

“（一）双方达成协议，反对‘百万雄师’在武汉反对中央、中央文革的反革命行动。不仅在口头上，而且写出文件、传单在社会上散发。

（二）双方达成协议，坚决反对‘百万雄师’、‘产业军’、‘荣复军’、‘联动’到你们河南去破坏文化大革命，挑动群众斗群众，挑动分裂、挑动武斗。

（三）双方重申，保证实行已经达成协议的《七五协议书》，特别制止日益发展的武斗。

（四）双方达成协议，黄河防汛协议要坚决贯彻执行，材料、物资、计划不允许破坏。

（五）坚决拥护军区的检查报告，拥护中央的批示，欢迎、支持军区的同志改正错误，反对向军区施加压力，使他们不改正错误。”

与会人员同意康生提出的五点建议，并于会后在《河南省各方赴京代表团关于防止“武汉反革命事件”在河南重演的协议书》上签字。

7 月 21 日晚这次中央接见河南代表对开封的影响非常明显。

开封围攻师院的“715 事件”发生后，师院 100 多名“八二四”学生于 7 月 17 日陆续撤到了开封“工总司”在城区内的最后一个据点——东大寺。

7 月 21 日傍晚 18 时过后，东大寺临时勤务组派段文德、叶

雨青、高自友三名学生化装成赤臂卷裤腿的农民模样，到 1 军军部要求部队保护东大寺的安全。门岗警卫请示后出来答复："王副军长不接见。"

他们三人又转头向东来到 7249 部队空降兵 43 师，向门岗提出同样的要求，门岗请示后，回来也是同样的回答："不见。"

三人无奈，就在 7249 部队门岗外的马路边上躺下休息。

夜半时分，空降师警卫战士将三人推醒，对他们说："我们师李副政委准备见你们。"

三个人跟随着战士来到会议室，只见李维孝副政委迎过来，主动和他们一一握手，并亲切地说："让你们受惊了。"

然后，李维孝对他们说："党中央、中央军委和空军司令部已给部队发出指示，支持河南'二七公社'和开封'八二四'。"

段文德、叶雨青、高自友三人闻听此言，大喜过望，一时语塞。李维孝让战士领他们先去洗澡，然后给每人一身空军军装，安排到部队防化连暂时休息。

7 月 22 日上午，东大寺周围大喇叭播出开封"市筹委"周树凡的《告八·二四书》："八二四不投降，就血洗东大寺！"

此时，东大寺内有"八二四"130 人，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下定了拼死的决心，纷纷上房揭瓦，准备抵抗。

下午 15 时，师院"八二四"附中分会的李盛才气喘吁吁满头大汗地跑进东大寺，交给黄泽生一张段文德写的字条："速到 7249 部队来。"

黄泽生问："什么事？"

李盛才说："不知道。反正是大事，师长、政委、还有开封

师院的段文德三个人都在等着你呢。”

黄泽生立刻跟着这位附中的同学越墙穿户，避过东大寺周围的层层岗哨，来到 7249 部队，空降兵 43 师师部，看见身着空军军装的段文德、叶雨青、高自有正焦急地在等他。

7249 部队政委王敬春对黄泽生、段文德等人说：“我向你们传达中央首长的加急电报。”

王敬春给他们宣读了周恩来的电报指示：

空降 43 师师长靳钟、政委王敬春：

开封师院革命小将被包围在东大寺，请你们立即出兵保护东大寺，不能让他们受损失。并把事情处理结果报告中央。

读完周恩来的电报后，王敬春又向他们宣读了康生的电报：

空降 43 师师长靳钟、政委王敬春：

开封八·二四是革命左派。请你们立即派兵保护东大寺，绝不能让左派群众受损失！

周恩来和康生的电报使在场的每个人都激动万分，他们拥抱在一起，高呼：

“毛主席万岁！”

“毛主席万万岁！”

空降兵 43 师靳钟师长根据黄泽生介绍的东大寺及周边的情况，确定了部队布防位置后说：

“我们一个营战士已准备完毕，黄泽生、段文德、叶雨青、高自友，你们穿着军装，站在第一辆上为我们带路。出发！”

部署在东大寺周边的“市筹委”看到一大溜军车满载着全副武装的解放军战士疾驰而来，以为是支持他们的，纷纷热烈鼓掌。

车队就这样在一片掌声和震耳欲聋的欢呼声中，顺利驶进了东大寺。

而东大寺里的人突然听到外面广播声、汽车声响成一片，立即紧张起来，个个手持家伙准备做最后的拼搏。然而外面传来的广播声却是空降兵 43 师在传达周恩来的指示：

“你们坚决保护左派，把东大寺周围保护起来，绝不能让‘八二四’受损失。”

坚守东大寺的“八二四”和寺内的回民激动万分，尽情流泪、跳跃、歌唱，尽情呼喊：

“毛主席万岁！”

“毛主席革命路线万岁！”

“向解放军学习！向解放军致敬！”

进驻东大寺的解放军从车上卸下行军锅、馒头和蔬菜，为“八二四”烧火做饭，还把一个个伤员小心翼翼地抬上汽车，送往医院。

不一会儿，1 军慰问团也带着食物来到了东大寺。中央领导、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关心和支持，让“八二四”激动万分。

7 月 23 日下午，1 军支左办公室屈进参谋来到东大寺，传达 7 月 21 日中央接见河南各方赴京代表时的中央首长讲话，宣读了 8172 部队，即 1 军关于“武汉事件”的口号，承认“‘八二四’是革命造反派组织，执行的是毛主席革命路线，”但他接着又说：“至于我们原来支持的组织，中央还未表态，以后再说。”

当晚，开封“市筹委”组织到东大寺门前游行示威，呼喊“镇压八·二四！”、“向八·二四讨还血债！”等口号。

东大寺“八二四”临时勤务组把周恩来、康生指示 7249 部队保护东大寺的加急电报，抄写成大字报贴上了鼓楼。解放军驻汴各部队纷纷敲锣打鼓给坚守在东大寺的开封“八二四”送慰问信，东大寺里外锣鼓喧天，欢声笑语。

1 军党委发表《给开封市革命群众的一封公开信》，对在支左工作中所犯方向，路线错误进行公开检查，表示坚决给“八二四”无产阶级革命派平反，给错捕的陈红兵等和革命群众恢复名誉。

7 月 24 日，1 军军长徐文礼从北京给开封 1 军打电话，传达周恩来、谢富治等中央领导的指示：

“要保护革命左派，保护‘八二四’，保护东大寺，派兵到师院保护‘八二四’进校，要像打仗一样执行这个任务。”

徐文礼一再叮咛 1 军领导：“不能让八·二四一人受损失，否则，我们的性质就变了。”

徐文礼又交代说：“至于我们原来支持的组织，中央未表态，只要他们不反‘八二四’，仍可以支持他们。”

## 第 752 回：西山游，北航抓走张体学　“红联站”，太原冲击省军区

7 月 22 日上午，北航按照王广宇 21 日下午传达的中央文革的指示，出动几千人，由韩爱晶和田东带队，去西山游行。他们一路高喊“打倒陈再道!”的口号来到西山。但是这里除了树和草，根本看不到一个人影，也没有看见什么军事机关。他们只好在有汽车的大路上游行，喊口号，然后就回学校了。

这天，清华大学也组织人去西山游行，他们还到了高等军事学院门口。

22 日下午，韩爱晶按照中央通知，和几百名北航师生又赶到南苑机场，参加迎接谢富治、王力等人的欢迎仪式。

北航“红旗”还要去中直招待所抓张体学。负责侦察中直招待所位置的学生，先在电话薄上查找到了中直招待所，打电话过去，刚问一句话，对方就把电话放下了。但是，他们从电话簿上看到，中直招待所在平安里。派去那里侦察的同学回来报告说，那地方有个不高的围墙。于是他们认定，这就是中直招待所。北航院革委会主要负责人讨论决定，把这个任务交给九系完成。

7 月 23 日下午，田东和北航九系的杨瑞云带领九系部分师生坐卡车直奔平安里中直招待所。到了那里，少数人在正门与警卫交涉，多数人则翻墙而入，涌进招待所，看见里面有不少人，便大声喝问：

“谁是张体学？”

当时，中直招待所住着好几个省委书记和省长，他们突然看

见许多学生闯了进来，又喊又叫，招待所内顿时陷入混乱。慌乱中，有人竟“扑通”跪下，连声说自己不是张体学。

带队的杨瑞云是个女生，见此情景，又气又难受，心想：“不就是找张体学嘛，同学们能把你们怎么样嘛，怎么能跪下来呢？要是国民党来了怎么办？他们怎么变成这样了？！”

混乱中，学生们将张体学、叶飞、张平化 3 人抓走了。

这时，北航“红旗”的头头韩爱晶也坐着摩托车赶来了。此时，北航的大队伍已经抓了人撤回学校，中直招待所只剩下十几个同学还在那里和守卫招待所的 8341 部队一个副政委争吵。韩爱晶到了中直招待所大门口，看到招待所都是军人，十分惊讶：“招待所工作人员怎么都是穿军装的？”此时，他也不管三七二十一，进去就跟他们吵：

“你们以为我们想来你们这儿抓人啦？我们也是为了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没有中央指示我们会干这种事？要不，你跟我们去对质！”

韩爱晶他们回到北航。正巧，福建和湖南也有造反派住在北航，他们就势把抓来的叶飞、张平化分别拉到他们那里开批判会。

韩爱晶直接去审张体学，问他：“张体学，你是什么职务？”

张体学说：“湖北省省长。”

韩爱晶说：“你是湖北省省长。武汉现在发生这么大事情，你什么责任？”

张体学莫名其妙，说：“我已经被关了几个月了，跟我没关系。”

韩爱晶一想也是，就转移话题：“那咱们说别的，你是省长，

怎么不支持文化大革命？怎么反对毛主席呀？”

张体学哭了，说：“我怎么反对毛主席呢？我不反对主席呀！”接着讲了自己从小受苦，参加红军，参加长征的经历。

韩爱晶一听，忙问：“你还红小鬼呢？”

张体学说：“是啊。”

那一晚，他们谈到很晚。7 月底的北京，天气正热，韩爱晶就在教室地上铺个凉席睡。他让张体学挨在他身边睡，并对张体学说：“我白天要忙，我要睡觉呢，你晚上要出事怎么办？”

于是，韩爱晶找了个绳子，捆在张体学的手腕上，那一边连着电灯开关绳，然后对张体学说：“你要一动，电灯就亮了，我就知道了，你别给我惹事。”

躺下后，过了一会儿，张体学的眼泪又下来了。韩爱晶闻到他一身的香水味又批评他说：“像你这样领导干部一身香水味，真像是个修正主义者。”

张体学要求抽烟，韩爱晶同意。

第二天早上，韩爱晶带着张体学去学生食堂吃早饭，撕了两张早餐票，一人一份。饭后，他们在校园里走，来到学校草坪。韩爱晶问张体学和毛主席在一起的情况。张体学说：

“有一次，我问主席：‘怎么不写点新的文章给我们看’毛主席说：‘你真蠢，没有对立面，怎么写得出？要写出好文章，要有对立面。’”

后来，周恩来派秘书孙吉太到北航，让韩爱晶他们放了张体学 3 人。韩爱晶给周恩来写了一张纸条，大意是：“敬爱的周总理，您好！张平化、叶飞是错抓的，我让来人带回去。张体学在

我这儿再留几天，他说他是红小鬼，让我做做工作，看能不能让他写检查，出来工作。”

韩爱晶让同学把张平化、叶飞交给孙吉太带走了。

这时，井岗山也回校了，韩爱晶和井岗山经常跟张体学坐在草地上谈心。韩爱晶对张体学说：“你别怕，别以为造反派都是什么地富反坏右，造共产党的反，我们北航‘红旗’的主要负责人，要么是干部子弟，要么军人子弟，而且家长也有受冲击的。我们相信毛主席，相信当地群众。”

张体学听了又流眼泪了，他说：“我也是担心啊，现在到处造反，我也怕坏人造反，我要是知道你们都是革命后代，我就不怕了。如果全国的造反派都像你们北航‘红旗’一样，那还造什么反嘛，我们打天下又是为了什么嘛，我们交班也放心了。还用得着造反吗？”

韩爱晶说：“我也知道，好多干部对文革不满，社会上造反派有的可能比较杂。”

韩爱晶还拿着个本子，问张体学大军区和省级干部的情况。张体学说这个能打仗，那个很厉害，某某人很好。韩爱晶听后觉得：这个是好人，那个也是好人，没有坏人了，那文化革命怎么揪出这么多？当时韩爱晶提到的一些人有的早就被打倒了，张体学还是表示肯定，好像不知道这些人是反党分子。韩爱晶一边记，心里一边想：“这个张体学真糊涂。”

韩爱晶把他对张体学的看法告诉了其他同学，他说：“看来张体学没有什么问题，这样的干部应该保，我们不能把毛主席手下的老干部都打倒了，那样不就把毛主席架空孤立起来了吗？”

后来，韩爱晶对张体学说："既然你跟武汉'720 事件'没关系，又是红小鬼，你愿意跟着毛主席，我建议你给毛主席写个检讨，表示要跟着毛主席干革命，'八一'前后可能有活动，我给你把信带上去，你争取出来工作。"

张体学说："好！"

晚上，韩爱晶就让张体学与管保卫的同学住在一起。

再说山西。

康生在 7 月 13、14、15 日三天内连续三次接见山西各方代表，表明中央态度后，7 月 16 日晚 21 时至 21 时 30 分，刘格平在北京外贸部接待站礼堂接见"山西批判刘邓红色联络总站"、"山西革命造反兵团"、"太原市革命造反司令部"、"空字 025 军团"代表，再次申明对山西正在进行的批判刘贯一、刘志兰和陈守忠的态度。他说：

"山西这次斗争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是非常有意义的，补上了'112 夺权'的一课。"

"中央已经定了性，刘贯一、刘志兰主要是资产阶级世界观。"

"陈守忠精神面貌很不对头，不是无产阶级革命家，而是资产阶级革命家，也定性了。"

"陈守忠最大的问题是保老婆。还有保爸爸的嘛，他是保老婆。刘贯一保刘志兰，也是保自己，害怕火烧到自己。"

"但我们也有缺点，如'打倒刘志兰，气死保皇派。'打砸抢我们是少的，但不能说没有。我们要做工作，'红联站'的工人、干部、学生，他们受蒙蔽受欺骗。他们如果骂人，我们应该

高姿态，毛主席说的：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对张日清，他有严重错误，他和他们不同，可以批评，提意见，但应该团结起来。”“对张日清批判从严，处理从宽。”

北京的消息传到了太原，山西这边闻风而动。

7 月 18 日，党校“东方红”上街贴出了“炮轰刘格平”、“打倒袁振”的大标语，表示他们的不满。

7 月 19 日，从北京传来了毛泽东关于山西问题的“最新最高指示”，并刊登在“红总站”控制的《山西日报》的替代报刊《山西日报的斗争》上：

六十九军在山西文化大革命中地位很重要，要和六十九军同志们说一下，要站在刘格平同志一边，坚决支持刘格平同志。

这条最新最高指示的来源挺奇怪，传说是康生在“七月会议”的一次会议休息期间上厕所时，与同时上厕所的 69 军政委曹中南讲的，也有的说是和袁振讲的。有可能是康生向曹中南传达毛泽东的这一指示时，袁振从旁边听到后，传回太原的。

19 日当天，“红总站”山西大学“八一四”所属的“反逆流勇进兵团”和重院“新生力量兵团”砸了山西省委核心小组办事机构，抢走了印章。

还是在 19 日，“红总站”的“决死纵队”突然来到山西大学，用教学主楼上“814”一派的广播，与困守在图书馆楼内的“88”一派展开相互谩骂。同时，向图书馆的高楼上扔石头。图书馆内的“88”学生也向楼下的工人们抛扔石头和用纸包好的石灰。

7 月 21 日的上午，大批“决死纵队”的工人，挺着自制的

长矛开始进攻图书馆大楼。突然，从图书馆的大楼上抛下一颗颗闪光的东西，落地后随即炸开，顿时臭气熏天。正在图书馆楼下进攻的“决死纵队”，一个个吓得大喊：

“88 扔下毒气弹了！快跑！快跑！”

傍晚，围攻图书馆大楼的“决死纵队”撤离山西大学。

原来，山西大学“88”一派，早从河西一家化工厂的同派战友们那里，弄来了一大批溴水。此物洒开后臭气冲天，装入瓶中，形同毒气弹，不明就里的“决死纵队”不敢再贸然攻楼了。

另外，当“决死纵队”进攻“88 红旗”据守的图书馆时，“88 红旗”派人前去距离山西大学不远的 69 军军部求救。同时，负责宣传的“88”副大队长侯光天带人到教学主楼与“814”派的大队长朱永成面对面谈判。侯光天指出，一旦“决死纵队”攻入图书馆大楼，势必造成楼毁人亡的局面，希望朱永成从长远看问题，劝说他们的同盟军“决死纵队”撤兵。山西大学“814”派的学生中，也有不愿武斗的人。当时任“814”派宣传部长的王作柱同学和另一位学生头头，悄悄来到“决死纵队”围攻“88”派的前线指挥部，坦言攻打图书馆大楼，必然造成双方重大伤亡，等“决死纵队”一走，失去工人阶级支持的“814”派师生，必然要遭到“88”派的进一步报复，力劝“决死纵队”前线指挥部的头头：

“已经对 88 一派教训了两天时间，放弃攻楼算了。”

既然人家“814”派的头头是这个想法，“决死纵队”也就罢手歇兵，撤出了山西大学。王作柱二人事后怕被同派战友斥之为“叛徒”，在校期间对此行为一直守口如瓶。

对北京“七月会议”的情况已有所耳闻“红联站”在太原的头头和群众，这些天心急如焚，天天在“红联站”总部所在的太原冶金学校大楼开会，打听消息。在北京开会的“红联站”代表、“太工红旗”负责人之一赵日昌刚回到太原，就被叫到在冶金学校的“红联站”总部去介绍情况。他的介绍不啻是一把烈火。于是，“红联站”部分下属组织 200 多人冲击了山西省军区，围攻军区指战员，还贴出“打倒新军阀张日清”的大标语和大字报。这一事件，当夜即由在太原的“红联站”领导电话报告了在北京参加“七月会议”的“红联站”头头段立生。时值半夜，段立生只能在第二天早晨将消息告诉“太工红旗”在北京的代表李青山：

“你们‘太工红旗’昨天冲了军区……”

李青山闻之大吃一惊，当即就问：“为何不早告诉我？”他以为仅仅是“太工红旗”一家冲了山西省军区，认为当时如果及时告诉他，他是能够制止的。

李青山立即向太原打长途电话，要求派人来京汇报详情，并一同找山西省军区政委张日清说明真相。

“太工红旗”在太原的负责人白燕三知道闯了大祸，连夜乘火车赶赴北京向李青山他们报告。

第二天中午时分，山西省军区政委张日清来到李青山他们在北京驻地，就在附近一条小马路边与“太工红旗”在京参加会议的头头李青山、杨保明、于永革、贾诚，还有从太原专程赶来的白燕三相见。

张日清很生气，说：“你们‘太工红旗’怎么搞的？过去反对‘112 夺权’，现在又冲了军区！”

李青山歉意的报告说："我们怕出事，专门派人回去告诉家里，不要乱动，不知为什么就冲了军区……"

张日清随即说："既然你们主要头头都不在太原，不知道这件事情，你们赶快发表一个声明，表明冲军区与你们无关。不然中央追查下来，你们头头要负责的。"说完，又嘱咐了几句，就匆匆走了。

李青山知道张日清是为他们好，但是却不同意发表这样的声明。他认为："我们是战斗队的头头，出了这样的事，即使不是我们干的，我们也得承担责任，不能一推六二五。如果刘格平抓住不放，如果中央要追查，那就追查吧，我也认啦！"

白燕三等人也都同意他的意见，结果，这个声明没有发。

7 月 23 日，山西晋中组织成立了"晋中批刘邓联络总站"，简称："晋中总站"，与"晋中总司"相对抗。"晋中总站"主要群众组织有榆次一中"虎山行"、山西轻工业学院"八一八"、晋中农校"八二五"等。

## 第 753 回：第四次，接见山西省代表　关锋说，“四一四”革命行动

7 月 23 日晚 23 时至次日凌晨 5 时 20 分，康生、关锋、吴法宪、曹轶欧、刘格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安徽厅继续与中共山西核心小组全体成员以及山西有关方面的负责人及“红总站”、“红联站”的赴京代表团商谈解决山西问题。

康生说：“同志们！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太原‘红总站’和‘红联站’一起上街游行，反对‘百万雄师’事件，这很好！这在大方向上是一致的。在另一方面，也达成协议反对这个‘百万雄师’反动的罪行，你们在反对‘百万雄师’上有共同的意见，在太原也是这样做，军队召集了。从这里边坚定的相信群众，相信干部大多数是好的，从这方面也可以证明，另外大家不要丧失警惕，反对反革命逆流，不是炮轰刘志兰是逆流。我们听说‘百万雄师’有人到了山西，李井泉的‘产业军’也去了，北京的‘联动’有些反动子女也去了山西，他们要反对你们的文化大革命，挑动群众和解放军的关系，我们从武汉得到消息，山西已经有人去武汉支持‘百万雄师’，是什么人还不知道。我们不要睡觉，打内战，放跑了敌人。

前几天有人写信给我，要在这样的会上听听军区同志的意见。本来张日清同志已做过一些检查，大家还是不满意的。为了满足大家的要求，今天由张日清同志检讨，请同志们冷静地听，有什么意见当然可以提，等他讲完再提吧，现在请张日清到这来讲。”

张日清检讨。当他谈到 5 月份以来他反对刘格平，并提到来京给中央发的那份电报时，康生插话说：

“这是王承琚、陈守中、刘贯一签发的，刘志兰同意的电报，大伙集中起来攻击刘格平同志，同时实际上是攻击文革小组。这样的情况，在各省，各军区，大军区，我们没有见过。”“这个问题‘红联站’同志们不要蒙在鼓里了。为什么我们一次，两次召集你们开会？问题不是那么简单的。”

张日清谈到他站在刘贯一这边，并做了他们的防空洞时，康生插话：“这一点你要特别注意，你反对的是好人，如刘格平、陈永贵，你联合的是坏人，如刘贯一、陈守中、刘志兰、王承琚。”

当张日清讲到回去以后要清算“专政委员会”的错误时，康生说：“兰敏同志，你拿党性保证说杨成效的材料最可靠，可是你把人搞错了。你的材料不是一个人的，是两个杨成效。”

关锋进一步解释说：“差 6 岁，你材料上的杨成效是河北人，当时解放军判过刑。”

康生：“看看你们的党性到底怎么样？如果是别人的材料你还可以申辩，这是你自己调来的材料，用党性保证的材料。”

张日清检查完后，康生又问他对武汉“720 事件”的态度，是赞成还是反对？张日清作了回答。

康生问：“王承琚来了没有？”

“红联站”答：“回去了！”

关锋批评说：“怎么可以那么自由主义？”

“红联站”说：“他出去一会还回来。”

康生：“联络员叫他来，据说他带着枪参加会议，他过去是

不是个军人？他过去有没有枪？有人说张日清给他的枪，是不是？”

张日清答：“不是。”

康生又问：“陈守中在不在？王承琚是不是党员？什么时候入党的？”

陈守中答：“不知道”

康生：“你们成天混在一起怎么不知道？”

陈守中：“知道他是党员，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入党的？”

关锋问：“你知道他有枪没有？”

陈守中回答：“有枪。”

关锋：“在太原还是在这儿？”

陈守中：“在太原有枪，在这里我不知道。”

关锋：“谁给他的？”

陈守中答：“不知道。”

关锋问：“他是多少级干部？”

陈守中答：“十八级。”

“红联站”代表说：“不是十八级，是技术员。”

关锋：“文化大革命中按规定枪要收回。”

康生：“他写了一个信，也不给我，是给关锋，说他很荣幸，作为‘红联站’的代表，他只能做为列席。我看‘红联站’不能要这样的当代表。你们叫他当你们的代表？”

“红联站”否认说：“他不是‘红联站’的。”

康生问：“他多大年纪？”

陈守中答：“30 多了。”

群众代表："37。"

康生："他在解放前做什么？"

陈守中："不知道。"

关锋："你的老部下嘛。"

康生："这样的外交词句，荣幸地作为'红联站'的代表。"

关锋又问："他是不是'红联站'代表？"

"红联站"代表再次予以否认："不代表！他没有枪，他来北京没带枪。"

关锋追问："在太原有？"

"红联站"有人说："在太原有没有不了解。"

康生问："这个同志是哪个单位的？"

没人回答。

关锋："他在太原带不带枪？在太原带枪也是犯法的。"

康生继续追问："刚才证明的是哪个单位的？"

"红联站"刚才说"在太原有没有不了解"的代表回答："我叫李善良，'太工东方红'的。"

康生："枪是一定要收的。"

李善良："在北京，我没发现他带枪，我们好几天都睡在一个屋里，有枪早发现了。"

康生："他什么事都告诉你吗？"

关锋："你说的比较妥当，没有发现他有枪。"

康生："你没有发现他有枪，到底有没有你也不肯定，青年人不要这样。你是学什么的？"

李善良："学机械。"

康生："你还是学点辩证法好，头脑不要太机械了。"

杨成效："王承琚现在太原有枪。"

康生："军队同志来了几个？还有哪个军要发言？前几天写了条子，刘卿瑞要发言，刚才我接到两个条子，都是工学院的，一个说刘卿瑞是受张日清迫害的，一个说刘是三反分子。是为卫、王、王翻案的。不管是那一种，既然来了都可以发言。"

山西省军区独立师副参谋长刘卿瑞开始发言。发言期间，王承琚赶来了。

康生问王承琚："你怎么随便来，随便走呀？"

关锋也批评说："你就可以罢会了？"

王承琚解释，康生问："我想向你调查一个事情，你这次来北京带着枪没有？有没有这回事？"

王承琚："关于这个问题我可以向康老报告，我没带枪来。"

康生："你在太原有枪，谁给你的？"

王承琚："找人家借的。"

康生："借谁的？"

王承琚："借'专委会'的。"

康生："又是'专委会'，'专委会'谁给你的？"

王承琚："郭有富。"

康生："他是部队上的不是？"

关锋："他怎么有枪？"

康生："市'专委会'可以发枪？"

王承琚："当时我请示过袁振，因为夺权后太原市比较乱，有人要抓我。"

关锋："你带枪干什么？有人抓你就开枪？"

王承琚："袁振写信交给了'专政委员会'处理。我自己找一个'专委会'借的。"

康生："不管那个委员，就讲你！"

王承琚："找郭有富借的。"

康生继续问："你这次来北京带着枪没有？"

王承琚："没带，交给市核心小组驻军了。"

康生："交给驻军的什么人了？"

王承琚："我也叫不来什么名字。"

康生："叫不来名字是什么人吗？"

王承琚："警卫班。"

康生："什么时候交的？"

王承琚："交了很长时间，具体时间记不得。这次是来北京前十天，以前陆陆续续交过。"

康生："以前陆陆续续交过。那是你的保险库吗？保管库吗？那不叫交。你不是说有人要抓你嘛，你有枪陈守中知道不知道？"

王承琚："我没有正式告诉过他，是自己借的。"

康生："噢，是私自借的。你是党员，什么时候入党的？"

王承琚："1955 年。"

康生："在哪儿？"

王承琚："在太原工学院。"

康生："什么人介绍的？"

王承琚："孟凡联和×××"

康生："现在两个怎么样？在太工哪个组织？"

王承琚："在‘太工红旗’。"

刘卿瑞："孟凡联是坏分子。"

康生："解放前你做什么？"

王承琚："读书。"

康生："参加过什么组织？"

王承琚："从没有参加任何反动组织会道门。"

康生："在哪儿读书？"

王承琚："在北京上中学。"

康生："山西人怎么到北京上中学？"

王承琚："我不是山西人，是河北人。"

康生："河北什么地方？"

王承琚："定县。"

关锋："家庭什么成份？"

王承琚："中农。"

关锋："中农能上北京读书？"

王承琚："我们是十三岁跑到北京来的，要是讲讲家史的话……"

康生："不用讲家史。你高中毕业了没有？"

王承琚："高中毕业。解放后党一手培养又让我上了大学。"

康生："你开始在那里工作？"

王承琚："在石景山钢铁厂。"

关锋："做什么？"

王承琚："公安警卫部队。"

康生："罗瑞卿那个系统？"

关锋："解放前你工作了吗？"

王承琚："工作了。"

关锋："在哪儿？"

王承琚："就在石钢。"

关锋："做什么？"

王承琚："抄写。"

关锋："抄写什么材料？"

王承琚："就是一些汇报材料。"

康生："职务是什么？"

王承琚："算工人。"

康生："还有抄写工人？"

关锋："你当时多大？"

王承琚："17 岁。"

关锋："工资多少？"

王承琚："18 块。"

关锋："什么钱 18 块？"

王承琚："好像是十八万块。"

康生："是法币，还是日本钱？"

王承琚："法币。"

康生："我再问一下，你讲了一次话，你说你还坚持你那个电报的观点？你现在是什么看法？"

王承琚："我现在重新认识。"

康生："你给我一个信了。说以'32111'为首的'兵团'和'红总站'抄了你的家，说如果这次为了解决山西问题，荣幸的

作为‘红联站’方面的代表，你是‘红联站’的？”

王承琚：“不是，是‘红联站’方面的。”

康生：“‘红总站’一方面，‘红联站’一方面，你是‘红联站’的。”

王承琚：“我的观点和‘红联站’一样，我是‘红联站’观点的代表。”

康生：“观点的代表？代表谁？”

王承琚：“代表市委‘红旗战斗队’。”

康生：“选举你的？”

有群众代表说：“‘红旗战斗队’早把他开除了。”

关锋：“‘红旗战斗队’我们是了解的。去年冬天接触过。”

康生：“你说‘荣任’‘红联站’的代表，人家‘红联站’不承认你的代表。”

王承琚：“来的时候我们住在一起，因为观点一样，大家推选我当代表的。”

康生：“谁给你的荣幸？但是不幸的是你发了一次言，这个我记得，我很记得你的那个发言，给我的印象是很深刻的。因为你发了言就是个不幸了？你说你的观点变了，但是你的这个信没有变。”

王承琚解释他的信，说他的观点变了。有人说他和康生拍了桌子。

康生：“我倒不怕你拍桌子，我还准备你打倒我，写标语打倒了。你哪个方面打倒我了？你只讲人家，不讲你自己的错误啦，当然可以，但是你要知道你的那个发言，引起人的义愤，他们的

行动由他们负责，中央在下面是经常批评的，你的发言引起人的义愤，当你了解了中央的意图以后，还坚持陈守中的反动路线，你的观点还没有变，这封信还是这个观点。”

关锋：“你还可以坚持，你有你的观点。”

康生：“刚才我讲了一句话，不知你在不在？我说张日清反对的是好人，联合的都是不好的人。刘贯一、陈守中、刘志兰、王承琚。我讲了，我是负责的，我是准备你打倒我的，你自己不出面，让别人来打倒我。”

王承琚：“请康老相信我。”

康生：“我不能相信你。”

关锋：“现在不能相信，现在没有根据相信。”

王承琚：“我当时确实不了解情况。”

康生：“你已经用了正式电报给中央，你是做为‘红联站’代表讲话，希望你以后，愿意参加就参加了，不愿参加给我们打一个招呼吧。”

“红联站”代表：“他这些天不和我们在一起活动，我们对他不了解，他不能做为我们‘红联站’的代表。”

康生：“这就对了。”

关锋：“你们也有缺点就是，这份传单就是你们的，你们认识还有问题，等会儿我讲你们的传单。”

康生：“请坐下吧，请坐下吧。”

关锋：“回去独立师的同志把枪给他没收。”

康生：“刘卿瑞同志继续讲。”

刘卿瑞讲完后，康生说：“现在关锋同志讲。”

关锋说："江青同志很关心山西的文化大革命问题，山西情况都向她汇报了，她还看了很多材料。因为山西有一个谣言，还涉及今天参加会的同志。今天下午开会时间很长了，开了六、七个钟头。江青同志身体不太好，晚上不能来了，让我传达几句话……下边我先辟几个谣。

第一个谣言，说康生同志，主持解决山西问题的会议，已经受到了周恩来、江青同志的批评，康生在做检查，这是胡说八道，完全是谣言，我们文化革命小组是集体领导，大事不但是集体讨论，而且要报告主席，报告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报告总理。这是辟一个谣。

另一个谣言，刚才碰到一个条子，在榆次街头出现了以小灵通为名的传单，标题是'北京很可靠的消息'，他的形容词越多越成问题。这是晋中'联络总站'的代表写的条子，他是不同意这个传单的观点的，要我澄清。

第一个，7 月 16 日，首都红代会造了解决山西问题大会的反，你们都在，这是谣言。

第二个，山西赴京代表已回太原。在开会期间，只有郭永彪、王振国回过太原。他们回去报告过，其他代表哪回去了？你们都在场嘛！

第三，林副主席接见了张日清、曹中南。他俩在场吧？林副主席很忙，也许以后可能接见，现在还没有接见嘛，这个不多说，一句话，想引起群众的错觉。

第四，毛主席指示，山西问题由总理、陈伯达重新处理，这完全是谣言，这样的谣言很奇怪，是怪现象，妄图挑拨制造混乱，

煽动群众。”

接着，关锋说：“如果忘记了敌人，革命派自己打‘内战’，就上了当。要在革命的大批判中实现革命的大联合。”

他肯定山西的“414 炮轰刘志兰”是革命的行动，他说：“中央对刘贯一、陈守中、刘志兰有看法的。……张日清同志没有和他们划清界限，反而和他们搞在一起，在夺权的时候和夺权以后一个时期，张日清同志站出来支持夺权，这个成绩我们是不抹杀的。但是张日清犯了方向路线错误。两个航校校长讲的好，张日清你有点变了。夺权时方向对，现在错了。……还有‘专政委员会’，揭发了很多材料，那是专谁的政？创造的新名词，逮了人，上了手铐，既不叫逮捕，也不叫拘留，叫‘军管’，这样下去那是非常危险的，我们不能信任这样的‘专政委员会’。”

“‘红联站’、太工‘东方红’6 月 28 日发表了一个声明，这个声明错了。我们不怪革命小将，应该由张日清负责。陈守中、刘贯一、刘志兰我不说，用不着说了。我说由张日清负责就是对他寄以希望，批评他，帮助他。”

“刚才‘红联站’一个同志写信说，太原告急，告诉你一个消息，今天是山西‘工人决死纵队’、山西‘革命造反兵团’和‘红总站’一些组织，开所谓控告张日清大会，口号是‘打倒陈再道警告张日清’‘张日清是山西的陈再道’，署名‘山西爱武装联络站’。这用不着告急，我们认为第一口号很好，打倒陈再道，警告张日清。警告实在应该，我们警告过好几次，这是爱护张日清，赶快刹车。张日清是山西的陈再道，这个口号也是警告的意思吧。”

“张日清同志今天作了检讨，这个检讨还是很不够的，帽子不用戴那么多，主要把思想弄清，检讨我们是欢迎的，特别是核心小组，军区的同志，要对他进行帮助，能检讨到 60 分，70 分，也不要求 100 分，回去改，搞通 70 分也好。……”

“前天发生的一件事情，我们可以告诉大家，就是‘红联站’下属的一个组织 200 多人冲了军区，到张日清办公室打开了保险柜，抢走了材料，我们怀疑。这些材料必须归还，听候处理。冲军区的这 200 多人可能不了解情况，不论出于什么样的动机和想法，这样做都是错误的。抢走的材料必须交出来，我们很怀疑这件事。”

谈到“红总站”和“红联站”的矛盾，关锋说：“在座的同志对武汉的事情是一致的吧？”

康生问：“有什么文字的东西？”

“红总站”答：“我们游行了，有文字的东西。”

康生：“你们群众组织有协议没有？”

答：“没有。”

康生：“糟糕，怎么还没有，你们有好多东西可以达成协议的嘛！第一坚决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能不能达成？”

答：“能。”

康生：“第二，坚决反对“百万雄师”的叛乱行为，这个能达成协议吗？”

答：“能。”

康生：“第三，坚决执行《六·六通令》，不要打砸抢。能达成协议吗？”

“红联站”：“能能能！这条我们最能！他们还抓了我们的人呢！……”

“红总站”也马上表态说：“能！”并反驳“红联站”，双方嚷了起来。

康生：“无论如何也不能打砸抢！你们不是老头，是青年，我这个老头还往前看呢，你们怎么尽向后看呢？我当然不赞成打、砸、抢，你们没定个协议吗？定了就执行嘛。第四，保证铁路，公路运输，这个能达成协议吗？”

答：“能。”

“第五，坚决执行抓革命促生产的指示，这个能达成协议吗？”

“第六，不调动农民进城，这个能达成协议吗？”

最后，康生说：“我看你们应选几个代表达成个协议，回去做一个模范，说服双方群众也有个基础，达成协议。人家河南、浙江都达成了协议，还有江西、广西。你们赶快搞，你们更容易，你们的问题比他们小得多了。”

关锋：“刚才有人递上条子，说有的常委也有枪，如果带在身边，上交。如果没带上，回太原也都要交。”

康生：“好啦，散会！”

## 第 754 回：促协议，浙江两派聚北京　判薛平，广州浴血中山堂

再看浙江。

6 月 30 日，已在北京的浙江“省联总”、“红暴派”双方代表对执行中央《六·二四》通知达成协议后，7 月 1 日晚 21 时 20 分至 24 时 30 分，周恩来、康生、张春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安徽厅接见浙江的各方代表。

7 月 2 日下午 15 时至 21 时，张春桥在京西宾馆接见浙江省舟山、金华代表。20 军军长南萍、空 5 军政委陈励耘参加接见。

7 月 4 日，张春桥在北京政协礼堂接见浙江“省联总”赴京开会代表。他肯定 20 军、空 5 军在支左方面路线是正确的，大方向是正确的，但也有缺点错误，有的已经改正了，有的正在改正。困难是省军区、军分区、人武部他们在支左过程中错误是严重的，当然不能说他们一点好事也没有做。他说：

“能不能使农民进城问题解决，关键在于解决省军区、军分区、人武部。”

“主席问我：‘你看浙江半年怎么样？’主席很关心浙江问题，我希望大家共同努力，争取早一点把浙江搞好。”

7 月 13 日，“省联总”、“红暴派”在北京正式签署了“关于坚决执行《六·二四》通知的决议”。在协议上签字的有：“省联总”赴京代表张永生、孙宏兴、贺贤春、骆凤生、韩贯虹；“红暴派”赴京代表翁森鹤、周信忠、方剑文、王明远、张金木；省军管会赴京代表：龙潜、阮贤榜、曹思明、南萍、陈励耘。

7 月 13 日，温州数家工厂的民兵武器被抢。

7 月 19 日，中共中央以中发［67］223 号文件批转了浙江“省联总”、“红暴派”关于坚决执行《六·二四通知》的协议。批示说：

“浙江‘省联总’、‘红暴派’关于坚决执行‘六·二四’通知的协议，是好的。希望你们双方认真地贯彻执行，并责成浙江省军管会对双方认真执行这个协议给以必要的保障。”

7 月 21 日晚 21 时 32 分至 22 时 38 分，陈伯达、姚文元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南门小会议室接见浙江 20 军、空 5 军、省军区和“省联总”和“红暴派”代表。

7 月 23 日，浙江“省联总”和“红暴派”经过协商，在北京达成了《浙江“省联总”、“红暴派”关于浙江问题的几点协议》。当天，在北京开会的驻浙三军、“省联总”、“红暴派”代表返杭。

7 月 19 日，港英当局在“维多利亚地方法院”审讯新华社香港分社记者薛平。

薛平在法庭上控诉港英警察是在对他进行绑架，并在绑架时用警棍和枪托毒打他，使他手部、头部、胸部、腰部和脊骨等多处受伤。被绑架至“东区警署”时，又再次被毒打。

薛平指出：“港英当局企图用法西斯的高压手段来遏止爱国同胞学习和宣传毛泽东思想，连续在香港制造血案，并殴打、绑架和迫害新华社记者和爱国报纸记者。但是，港英当局妄想用这一切高压手段把香港爱国同胞热爱毛主席，积极学习和宣传毛泽东思想的高潮压下去，那是绝对办不到的！”

最后，薛平向港英当局提出四项要求：

一、立即无条件释放他；

二、港英当局要赔罪、认错和赔偿损失；

三、惩办凶手；

四、保证今后不再发生同样事件。

但是，港英法官依然宣布对薛平的指控“罪名成立”，判决薛平入狱两年。

当时，薛平站起来挺起胸膛，高声说：“我抗议！抗议你们绑架新华社记者！抗议你们非法审讯！如果你们继续与中国人民为敌，你们决没有好下场！”

20 日，港英当局又对新华社香港分社记者陈凤英、陈德穆和香港的 5 名记者进行了审讯。

为此，7 月 22 日，《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声称：“来而不往非礼也。对于英帝国主义的挑衅，中国人民必须给予相应的回击。我国外交部新闻司受权宣布，由于港英当局对新华社香港分社记者和其他爱国记者进行无理迫害，中国政府决定限制英国路透社驻京记者的行动自由，要他听候处理。这是对英帝国主义的一个严重警告。中国人民从来是说话算数的。英帝国主义这样猖狂挑衅，绝对逃脱不了伟大中国人民的严厉惩罚！”

7 月的广州，火药味日益浓厚，“旗”、“总”两派摩擦不断加剧。

7 月 19 日，广东“红旗”派的“市二轻局工联”人员和“一中红旗”的学生，在广州华侨糖厂内贴了一条“广糖红旗工人是革命左派”的标语。该厂“东风”派的“地总”群众，把“左”字涂改成“阻”字，并在落款的“工联”二字上打了两个×，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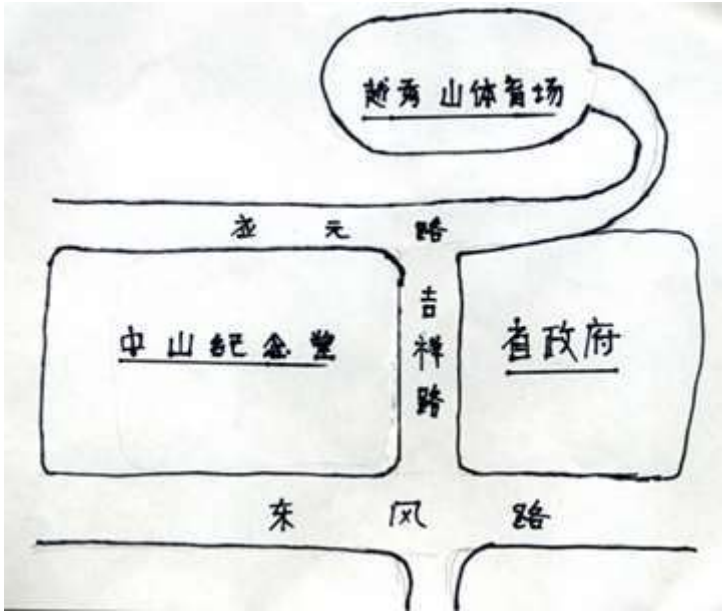
起双方对骂，继之互相推搡。在纠缠中，一个看热闹的农民小孩被撞伤。当晚，有 70 多名“东风”派的“郊贫联”农民围住糖厂，要求“工联”“交出凶手”。

7 月 20 日晚上，糖厂的工人正在厂内召开批斗厂长刘柏龄的大会，突然从外面冲进几个人来，拿着棒子，见人就打，并一棒打在正在被批斗的厂长头上，将他打死了。这是广州武斗中第一次出现死人。接着，“地总”、“郊贫联”、“主义兵”蜂拥而至，扛着长矛、锄头、扁担和浓氨水。从晚上 20 时开始，和正在厂里开会的“工联”、“支农青年”、“三司”、“红农友”、“红体兵”等爆发武斗。后来又有三批学生陆续加入，共约 1000 多人。

第二天早上，武斗从厂内蔓延到厂外，工人用木棍、气枪、大刀互相攻击。有一辆“旗派”的汽车在开往糖厂支援时，在德泥路立体交叉处翻车，造成 1 死 8 伤。

“旗派”声称，他们在糖厂被“东风派”打死了 7 人。一时间，“血债血偿”的喊声响彻全城。“旗派”愤慨，广发通知，召集各组织，准备于 23 日下午在越秀山体育场举行声势浩大的“7.21 殉难烈士追悼会”。

要上越秀山体育场，必须经过中山纪念堂两侧的马路——应元路和吉祥路。而此前，“总”派的中学生组织“红卫兵广州总部”已拟定于 23 日在中山纪念堂召开大会。因为 7 月 23 日是“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广州总部”成立一周年的日子。说起“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在广州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它以“革军革干”子弟为主体，论起“血统”，确实他们是最正宗的。




当时，两派要召开大型群众集会，均须事先向军管会申报。“主义兵”的大会原来是定在陵园西路的军区后勤礼堂；“旗派”的追悼会最初批准的是在东较场……后来“主义兵”得到通知：改去纪念堂；“旗派”也得到通知：不能到东较场，要去越秀山。

一个在纪念堂，一个在越秀山，应元路都是必经之路……

一家办喜事，一家办丧事，冤家路窄走在一起，注定要出大事情。危机再次逼近。

7 月 23 日，大暑，一个闷热难当的星期天。中午 12 时许，就在“毛泽东主义红卫兵”3000 多位“革命的红后代”，穿着旧军装，手捧红宝书，喜气洋洋，聚集在广州中山纪念堂周围，鱼贯入场之际，“红旗”派扛着花圈，也沿着中山纪念堂侧的马路奔越秀山体育场徐徐而上，看见旁边一队队“主义兵”列队等候进入纪念堂。双方狭路相逢，圆眼相视，气氛紧张。

可能是酷热难当，“红旗”派一些人在纪念堂外的树荫下徘徊观望，等待前行。这时，有人呼喊口号！

年轻气盛的“主义兵”当然不肯示弱，随即高声谩骂。

谩骂伴随着相互的推搡。在推推搡搡、挤来挤去、跌跌撞撞之间，人群像潮汐变化中的波涛，涌起，退去，再涌起……有人放声高歌起来：

跟着毛主席，

奋勇向前进。

文化革命勇当尖兵，

所向全无敌。

骨头硬斗志坚，

敢闯敢干敢革命！

“红旗”派中有好事者忽发奇想，把花圈送到“主义兵”队伍中，恭祝“主义兵”“万臭无香”，并口颂“主义兵罪该万死”。

“主义兵”当然勃然大怒，三下五除二把花圈砸个稀巴烂，并追打“红旗”派，一场武斗就此开始。

下午 15 时，武斗爆发。闻讯赶来的群众，愈聚愈多，密密麻麻，水泄不通，一直延伸到吉祥路，那儿完全被人潮堵塞着。各种各样的街谈巷议、谣言，无翼而飞。光芒万丈的夏日，就像烧红的巨石镶嵌在天空，大地反射出一片刺眼的苍白。双方群众都高举着毛主席的画像，都喊着“用鲜血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都指斥对方是黑省、市委的反动工具。“主义兵”捡起地上的石头投向对方，“旗派”的队伍则纷纷拔起附近工地上的脚手架竹竿作为武器。

“主义兵”封起纪念堂大门，直接从中山纪念堂的二楼上拆起瓦片，一块一块地飞下来。

这一场恶战，直打得飞砂走石，日月无光。对抗持续了两个小时，至下午 17 时左右，遍地砖瓦。“旗派”约有万人将“主义兵”约 2000 多人包围在纪念堂内。“主义兵”在纪念堂外面还有近千人。

事情发生后，广州警备司令部阳司令员和广东省军区黄司令员均到现场制止武斗，结果被“旗派”围攻，后被部队救出。

警司最先派了两个连去制止武斗，后来又增派到 6 个连队，还是控制不住局势，最后派了两个团的兵力，驰赴中山纪念堂，部队手挽手把双方隔开，在两派群众之间，筑起人墙。下午 18 时 40 分，总算把纪念堂的各个门口都占领了。但气氛仍然紧张，市军管会向省军管会频频告急：

“地总在海珠广场集结了 1000 多人向北走；西村地总有二、三百人向中山纪念堂移动，打伤了旗派 3 个人；地总总部有 10 多辆卡车准备拉人，还准备有 10 多辆汽车石灰，封锁了北京路；郊贫(联)在新村和沙河集中，人数不详。”

广东省军区司令员黄荣海满头大汗，力劝双方保持冷静。他讲啊讲啊，讲得声音都变嘶哑了，那些人还在那里喋喋不休，互相责骂，他真想大吼一声，给他们几个嘴巴，但他不得不克制着内心的怒火。这位 51 岁的江西人，参加过红军长征，1949 年他率领第一支解放军部队开入广州，后来又参加了海南岛战役。在战场上他是一员猛将，现在却成了消防队长，东奔西跑，忙于灭火。最使他烦恼的是，在他面前的不是国民党，也不是日本鬼子，而是工人、学生和农民。有时候他真怀念那种敌我分明的战斗。

武斗最后停火的时间是晚上 20 时左右。解放军从混乱的武

斗现场，抢救出 89 名伤员，其中 5 人送往医院后死亡。实际伤亡人数，难以统计。“旗派”称他们最少有 33 人死亡，400 多人受伤。“主义兵”则称他们有 9 人死亡，100 多人重伤。市军管会一名参谋承认：“武斗中，双方伤很多，无法统计。”入夜，“地总”把纪念堂内的“主义兵”接走。

7 月 23 日晚上，华南农学院“东方红公社”出动了 20 多人，把学院的几大箱硫酸、硝酸和盐酸取走，“作自卫之用”。24 日下午，中山大学“红旗”强占了学院的化学大楼，里面贮藏了大量的硫酸、硝酸和盐酸。中山医学院“东方红”也打烂了学院仓库大门，抢走了 500 多公斤硫酸、硝酸和盐酸。广州农药厂“工联”从 24 日开始全部生产刀叉等武器。同一天，“工联”接管了广州灯泡厂全部消防设备，并运了几麻袋匕首进厂。中大“红旗”、“湘江风雷”、“八一战斗兵团”等组织，在八中开会，研究包围广钢大楼的行动。

广州铁路南站从 7 月 24 日起，全部瘫痪，货物不能装卸；工业用煤来源断绝。“春雷”和“反春雷”两派，都在酝酿新的武斗。据公安厅反映：

7 月 24 日晚，广铁总司扬言要“砸烂南站家属宿舍”、“血洗西村”，同时反春雷派已堵住了广州铁路分局的大门。现在南站住的家属因害怕而撤离该站，有些民警也跑了，“春雷”派已全部撤出分局大楼。

春雷从下属七个总部中抽调 60 名人员，组织专门应付武斗的队伍，各总部配有汽车一部，春雷总部配有汽车三部，并计划武斗出击时，春雷打第一线，地总打第二线。

目前，两派的列车，机车乘务员因互不协作，都没有上车。他们说：出去之后不仅在家的同志挨打，自己也挨打受围攻，干脆就不上车工作，在家准备武斗。现在，列车无法开出，广深线的国际列车也停了，不少外宾上车后也被迫返回，影响很坏。

市内公共交通大部分停顿。“工联”就目前广州地区频频发生武斗流血事件，向全市发出《紧急呼吁》：

“我们全体工联战士立即在思想上、组织上行动起来。我们的态度是：一、是坚持文斗，反对武斗；二、是绝对不要被阶级敌人气势汹汹所吓倒，所屈服；三、是在阶级敌人未彻底放下屠刀前，我们在必要的时候有权利采取暴烈的自卫行动。‘有来犯者，只要好打，我党必定站在自卫立场上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消灭之’，我工联战士务必牢记毛主席这一教导。”

7 月 25 日，“旗派”在省体育场召开“‘七二一’、‘七二三’死难烈士追悼大会”。北京、武汉、哈军工等组织，也纷纷发表声明，坚决支持广州“红旗工人”、“工联”、“广铁总司”、“八一战斗兵团”、“机关红司”、“新一司”、“红司”、“三司”、“中学广州兵团”等组织。会后举行了游行示威。

“723 武斗”之后，广州的紧张气氛骤然升温，先是磨制打造棍棒刀具，接着抢夺部队武器弹药……劈劈啪啪、轰轰隆隆，钢盔柳条帽涌动，长矛机关枪挥舞……这边长枪短炮齐响，那边“革命造反派”抬着死尸武装游行……真真的是不亦乐乎。广州已经成了一座恐怖之城，“血洗广州”的叫嚣声，响遏行云。

广州形势危急，一触即发。从四面八方传来的消息都表明，武斗规模将愈来愈大。据省公安厅二办给军管会提供的情报称：

……

三、明天（7 月 28 日）武装暴动，全市夺权。

四、明天火烧越秀山会场。

五、华工红旗出海报，明天 8 时在中山纪念堂开会，每人带武器。

六、在市委党校（沙河），旗派开保姆会，动员明天带好小孩，不要怕。

七、明天冲击陆军医院。

八、明、后天对市一宫总攻击（据说市一宫也作了准备）。

九、对主义兵逐个抄家，干掉。

十、武汉来三人，能制炸弹，对付市一宫。

与此同时，从其他地方，也传来类似的消息。有人说，广州氮肥厂开始疏散家属，准备武斗凶器；华师的小工厂正在加班加点，制造武器；还有人说，省技工学校这几天都在赶制长矛、大刀；重型机器厂宣传组的一名军代表打电话给军管会报告：

他们的口号是：

红旗战士随时准备上山打游击。

红旗战士一定要走武汉造反派的路。

红旗战士这次参加武斗是真假革命的考验。

7 月 26 日，省军管会起草了一份《广州地区革命群众组织关于制止武斗的协议书》，向工厂、学校、机关各群众组织征求意见。但这份协议草案没有得到正准备大干一场的群众组织的积极回应，局势在继续恶化。

## 第 755 回：大武斗，合肥市一触即发　七二四，徐州市又生冲突

我们再看安徽。

7 月 20 日，也就是武汉发生“720 事件”的同一日，安徽合肥的“G 派”组织“工人革命造反联合委员会”，简称“工联会”下属的“飞虎队”、“青职司”、“职工红卫军”等千余人，分乘卡车，手执铁叉、木棍闯进安徽大学、安徽医学院、合肥师范学院等高校，并驻扎下来。上述学校 P 派学生撤了出来。当天夜里，“G 派”又调动数千人，在合肥市区戒严，封锁城市道路，同时攻打位于长江路上的合肥市“工三司”等“P 派”组织的办公处，打伤多人，抓走 20 多人，并火烧办公楼，时称“火烧工三司事件”。

第二天天一亮，“G 派”组织合肥“工联会”和安徽“八.二七”在合肥主干道长江路上组织武装游行，高呼“P 派造反假的，假的！”“一.二六万岁！”等口号。一时间形势混乱，当天合肥有多处发生打砸抢事件，“G 派”组织在市内外主要道口，设下路障，盘查行人，一时间大小商店关闭，工厂停产，市民则扶老携幼，成群结队向农村跑反，合肥进入文革以来最混乱的时期。

7 月 23 日左右，合肥师范学院老师汤志浩领导的“合肥职工红卫军”有 5 人被驻在农学院的“P 派”抓走了。汤志浩到“总司”求援，曹再风决定攻打农学院，救出被抓人员，他正在对“工联会”各纵队下达命令时，正好梁守福过来找他商量事情，只听到曹再风命令中的最后一句：“在拂晓之前，必须撤离农学院！”

梁守福问了一句："你们在拂晓前，撤离农学院干什么？"

曹再凤告诉他，准备攻打农学院。

梁守福一听他们要攻打农学院，大吃一惊，马上说："我在这里唱个反调，作为一种军事常识，我问你们几个问题：1、你们知道不知道农学院到底有多少武装力量？2、他们的轻重武器有多少？火力配备情况如何？3、他们的火力点在哪里？4、从何处突入？从何处撤退？打胜了怎么办？打败了怎么办？5、伤员如何救护？这些问题你们哪个弄清楚了？请说给我听听。"

会场鸦雀无声。

后来，"工联会"二纵队的纵队长说："老梁的话说得对，这些问题，我们一个也没弄清。"

接着，梁守福很生气地说："你们以为攻打农学院就能救出被抓的战友吗？只要进攻的枪声一响，他们必先死。你们不是去救他们，而是让他们死得快一点。最后，我们是把战友的尸体抛在农学院，还得背上挑起大规模武斗的罪名。因为是我们战士的尸体抛在农学院，而不是"红卫军"的尸体抛在工大。你们以为子弹能打到程明远、刘秀山吗？他们的子弹能轻易地打到我和曹再凤吗？打来打去，死的都是无辜的群众。我的意见是，立即向军管会制止武斗办公室报告，请他们出面交涉放人。"

这时李文安也赶到了，李文安说："我不同意老梁的意见。最近江青同志说，革命左派可以进行文攻武卫，我们打他们是因为他们抓了我们的人，这是武卫行为。"

梁守福说："江青讲的文攻武卫，恐怕是针对阶级敌人而言的，不会不分敌我谈文攻武卫。现在谁能说出，住在农学院里的

那些人中，哪个是敌人？”

就在梁守福和李文安争论时，安徽省副省长彭宗珠穿着拖鞋也赶到了。并且说：“我支持梁守福同志的意见，不能打。” 就这样，一场大规模的武斗避免了。经军管会交涉，被抓到农学院的人员当晚放出。

7 月 24 日 0 时，“G 派”在合肥工业大学校内试验爆炸烈性化学装置，引爆了埋在西操场的两个“装置”，巨大的爆炸声响遍合肥市，震动全城。接着工大广播站开足音量，向全市广播合肥工业大学“八二七”的《严正声明》。

当天，合肥市人武部枪支被抢，抢走各种武器 1000 余件，弹药 3 万余发。省体委训练用的武器也被抢。“P 派”组织纷纷撤向合肥西郊的安徽农学院，准备反击，一场大规模武斗一触即发。

7 月 24 日，徐州又爆发一场大武斗。

5 月 31 日，徐州发生武斗后，王力让山东的王效禹到徐州所在的江苏徐海地区了解那里的两派情况，做做工作。因为在徐州支左的驻军 68 军隶属济南军区，而徐州铁路局也隶属于济南铁路局，王效禹作为济南军区第一政委，过问下属部队的支左情况责无旁贷。

6 月29 日，徐州市革委会和徐州卫戍区联合发表声明，指出“踢派”和“支派”之间的矛盾是人民内部矛盾，同时指出“踢派”要求踢开市革委会是错误的。声明强调，“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和“八一红卫兵”等群众组织是坚定的革命左派组织，全市红卫兵应该以左派为中心实现大联合。

7 月 4 日，王效禹以济南军区第一政委的身份开始视察驻徐海地区 68 军。7 月 5 日，到达徐州。

对山东王效禹的到来，徐州“支派”没有理会。而“踢派”杨正祥马上大加宣传，甚至在徐州的“踢派”小报上登出“东方红，太阳升，王效禹来到徐州城”的文章，其热切心情可见一斑。

王效禹在徐州听了部队和革委会的汇报后，在“徐革会”的汇报会上说：“徐州市革命委员会是不是红色新政权？要经受起考验嘛！真正的无产阶级新政权，是踢不垮的。不是的，踢倒了也没有什么。”

7 月 11 日上午 8 时 40 分至 11 时 55 分，王效禹在徐州大郭庄机场食堂会议室接见徐州“踢派”代表。参加接见的还有：济南军区张仁初副司令员、江苏军管会侯仁溥副主任、“踢派”代表 30 多人、徐州卫戍区、徐州革委会 10 余人。

王效禹先要听听“踢派”的意见。杨正祥起身汇报说：“昨天我们接到通知后就组织了一套班子。”

杨正祥系统汇报了“徐革会”成立前后他们被镇压的情况。

同样是造反出来的王效禹，对中央精神的领会，自然要比部队干部深刻得多。他针对军方领导人提出的以“支派”为中心实现“大联合”的主张，指出：“要走第三条道路”——即放弃以“支派”或以“踢派”为中心的提法，看谁的革命性强，谁的革命旗帜举得高，就以谁为中心。

部队领导认为王效禹的“第三条道路”实际上是变相支持“踢派”，非常抵触。于是，王效禹分别召集当地驻军师以上干部、团以上干部、营以上干部会议，在中下级干部中争取支持。

王效禹批评 68 军“脚踩两只船”。他认为:“军队支左首先要具备左派的思想、左派的观点、左派的立场和左派的革命造反精神。一心为左派着想，急左派所急，爱左派所爱，恨左派所恨，帮左派所需。”

他要求对待武斗要作分析，“有好人打坏人，坏人打坏人；也有好人打好人，坏人打好人。武斗中打死人的账不能记在造反派头上，要记在走资派头上。群众是受蒙蔽的，受蒙蔽无罪，反戈一击有功。”

他肯定“踢派”是徐州的左派，因为“踢派”一直是向着党内走资派的营垒冲锋陷阵、穷追猛打，代表了文化大革命的正确方向，代表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军队永远要站在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最前列。

他说：“卫戍区在支左中犯有严重错误，究竟是什么性质，什么程度？由你们自己讲，如果自己不讲，到一定时候我就要讲了。”

王效禹的讲话给徐州部队带来很大冲击，空 29 师领导首先转弯，驻徐州的空军 29 师郭师长发表讲话，与王效禹的观点一致。空 29 师在《给徐州市革命群众的公开信》中，检查了他们在支左中所犯的错误。7 月 11 日，空 29 师给空 6 军、济南军区、空军党委和江苏省军管会送交报告：《我们在支左工作中所犯严重错误的初步检查》，承认在“支左”工作中“犯了方向路线性的错误”，并表示要坚决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认真贯彻执行王效禹的指示，坚决支持“踢派”的革命行动，同时做好“支派”的思想工作，动员他们一起把方向转过来。《检查》中说“如

果不是中央委托王效禹同志亲自来徐对我们进行耐心帮助教育，我们势必越陷越深，将会给党造成更大损失。”王效禹随即以济南军区党委的名义对空 29 师的检查做出肯定性批复，转发所属部队。

68 军内部分歧很大。7 月 11 日，徐州卫戍区发出支持“踢派”的通告，68 军基层指战员一时群情激愤，当晚营区内贴满了“打倒王效禹”、“徐革会就是好”等标语。驻徐州的 68 军下属各团的反应比军部有过之而无不及。有的团机关自发行动起来、签名给卫戍区写坚决支持“徐革会”、支持“支派”的公开信。很多指战员甚至自发组织起队伍，在营区内游行，呼喊反对“踢派”，支持“支派”的口号，直到深夜。

徐州军分区归南京军区管辖，更不听王效禹那一套。于是，徐州的驻军分成截然不同的两种观点、两个派别。

7 月 12 日，一些“支派”群众在“支派”头头李金山带领下来到空 29 师驻地，围住王效禹辩论，批王效禹到徐州搞分裂，并推打王效禹。空 29 师迅速派出部队保护王效禹，并派人当场逮捕“支派”头头李金山，这才将“支派”群众吓走。

在巨大政治压力之下，68 军党委于7 月13 日发表一封“公开检查信”。但是党委内部认识并不统一，大多数人依然思想不通。

7 月 17 日，王效禹在驻徐州地区部队团以上干部大会上表示：“革委会，是南京军管会批准的，南京、济南两大军区点头的，夺权是左派，这些我都知道”。并在接见“支派”代表时说：“革委会我是想保的”。

7 月 19 日，王效禹在淮海大学，即徐州师范学院接见“支派”、“淮大 8.31”负责人时说：“卫戍区、市革会本来就是一回事，市革会犯了严重方向路线性错误，照这样发展下去，势必造反派一个个地被压下去不可，保守组织又会起来，最后把革命势力吃掉。”

7 月 20 日，王效禹在接见坚决支持他的“踢派”代表时又说：“革委会踢不踢，不在于批不批，批了也可以踢”等等。

此时发生了“720 武汉事件”。7 月 22 日，中央军委和中央文革对徐州空军 29 师的“初步检查”做出批示，认为这个报告“很好”，肯定“当中央文革小组派去解决徐州问题的王效禹等同志受到威胁时，他们提出：绝对保证王效禹等同志的安全，有 29 师的部队在，就有王效禹等同志的安全”的做法，还表彰该师“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坚定立场和决心，是全军都应该学习的榜样”。当天，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在给空军的复电中指出：“空军 29 师所做的检查很好，……是全军学习的好榜样。”

消息传来，空 29 师干部战士和“踢派”群众欢心鼓舞，分别于 24 日和 25 日连续举行声势浩大的群众集会和军民武装大游行。

与此同时，在徐州的 68 军 203 师和坦克 2 师匆忙转变立场，支持王效禹和“踢派”只有 68 军党委中的一些人和隶属江苏省军区的徐州军分区继续保持僵硬立场。如此一来，68 军军部几乎被架空。

为了排除干扰，王效禹新设立一个“徐州支左指挥部”，任

命转变立场的68军政委李布德、副军长胡贤才、副参谋长祖岳嵘、空29师师长郭子谭、坦克2师师长邢同立、203师政委金波等人组成。同时成立一个新卫戍区党委，以李布德、郭子谭、祖岳嵘为核心。这两个新机构名义上在68军党委领导之下，实际上取代了68军党委。

7 月 23 日，王效禹分别接见徐州的华东煤管局“踢”、“支”两派。先接见“踢”派，听汇报并谈了 3 个多小时，王效禹当场指责煤管局的“东方红公社”和“红旗大队”等“支派”组织是“打着红旗反红旗”的“保守”组织。然后用 20 多分钟接见“支”派。

7月23日这天，一些“支派”成员伏击、殴打总字264部队，即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坦克学校的战士，抢走军车。

煤管局负责管理华东 6 省的煤矿系统，副经理夏际霞 50 年代任淮南市委第二书记兼淮南矿务局局长，1957 年反右时被打成右派，1962 年 3 月甄别，与王效禹有相似的经历和共同语言，他被任命为煤管局革委会主任。其后，王效禹在济南又多次接见这个不属于山东省领导管理的华东煤管局的人员，下达指示。于是人们说，华东煤管局似乎也成了山东省的下属。

王效禹于 7 月 24 日离开徐州。他认为此行很“完满”，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就在王效禹离开徐州当天，徐州便发生了“724”武斗事件。

24 日上午，“踢派”在徐州体育场集会，热烈庆祝中央军委、中央文革 22 日给空 29 师的复电。此时，王效禹刚刚离开徐州。“踢派”在会后，沿徐州主要街道进行游行，当游行队伍来到淮

海东路火车站一带时，与徐州“支派”“抓革命、促生产 3.18 战斗兵团”等组织发生冲突。先是相互推搡谩骂、接着是砖头、瓦片、棍棒大打出手。双方不断地增加武斗队员，众多的受伤者也陆续离开武斗现场。直至下午 18 时，驻徐部队出面制止，武斗才得以平息。

这场武斗伤 200 余人，亡 1 人。更令人无法容忍的是，“支派”的“娘子军”组织负责人在市交通局医院被“踢派”人员抓住痛打之后，剥光了衣服，与另一女青年在淮海路上强行裸体游街两华里。幸亏驻徐部队闻讯赶到，才将其抢救出来，并送到部队 88 医院治疗。此事火上加油，使徐州两派对立情绪陡增。事后许多人跑到 88 医院慰问被“踢派”侮辱的妇女。

第二天，25 日，徐州驻军武装游行，以 29 师为主，支持“踢派”。空军上报军委，把 29 师树为全军支左模范部队。

## 第 756 回：围京西，群众错认秦基伟　再示威，“三军”造反派游行

7 月 23 日，北京京西宾馆接到军委办事组传达的周恩来指示：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政治委员钟汉华、独立师师长牛怀龙、政治委员蔡炳臣、武汉市人武部长巴方亭等人住京西宾馆，要求宾馆“绝对保密”，加强安全保卫工作。

京西宾馆已经知道武汉发生了“720 事件”，因此，这一指示除主任、副主任、客房科长、警卫科长外，没有再向下传达，只是对客房、电梯服务员作了“绝对保密”教育。

24 日子夜时分，在武汉王家墩机场软禁了一天的进京开会人员陈再道等终于接到通知，要他们迅速离开房间，到指定的地点等候飞机。24 日凌晨，陈再道等人飞往北京。3 点多钟，飞抵北京。中央警卫局奉周恩来指示，直接派京西宾馆警卫科长李生去机场接机。为了保密，陈再道等人从机场乘大轿车到达京西宾馆后，直接从长期关闭，从来没有使用过的东门进入，然后，乘坐宾馆东部平时为客人送饭的电梯上到九楼东半部入住，九楼东头会议室作为他们的临时餐厅，这样他们就不用去餐厅用餐了。

当时北京正在修地铁一号线，采用掘开式施工，整个复兴路都成了一条又深又宽的大沟，进出宾馆只有一座临时搭建的木架桥可以南北通行。大约早饭前后，忽听北面桥上人声鼎沸，上万人高呼着“打倒陈再道！打倒钟汉华！”的口号，从桥北向京西宾馆冲过来，宾馆副主任赶紧出来问冲在前面的人：

“你们要干什么？”

游行的人回答说："我们要揪走反革命分子陈再道！"

宾馆副主任便故作镇静地说："笑话，陈再道在武汉，你们来京西宾馆抓什么陈再道？！"

那人反驳说："你别骗我们，首长说了，陈再道昨天晚上就到了北京，就住在京西宾馆。"

宾馆副主任一听，扭头就往大楼跑。他想的第一件事，就是把陈再道和钟汉华转移到哪里？苦无良策，电梯服务员出主意说："杨(副)主任，别着急，先上电梯，我开到两层之间，把信号关闭了，是不会被人发现的。"

也没有更好的办法了，他们就这样把陈再道和钟汉华藏在了电梯里。

已冲进京西宾馆的是中央和北京市文化系统的群众。戚本禹将陈再道到了北京，住在京西宾馆的消息告诉了中央文革小组文艺组的金敬迈，金敬迈当即表示说："我们去造他反去！"于是把文艺组和北京各艺术学校及样板剧团的人都动员来了。

叶群也动员了北京"三军"造反派上万人来到京西宾馆，都是穿军装的。另外还有闻讯而来的一些工厂、学校的群众，人多势众，高喊口号奋力往京西宾馆里冲。

由于宾馆和卫戍区预先作了准备，除了值班人员外，宾馆大部分职工也都赶到，和战士们一起拼命阻挡，一楼大厅的安全暂时无虞。

但是，冲击的人群很快就把地下室窗户玻璃打碎后进入地下室。警卫部队赶紧在大厅两侧通往地下室的东、西门，各派一个班防堵，死死抵住门，防止地下室的群众往上冲。但终因力量悬

殊，警卫部队的阻拦很快被冲破，群众进入了一楼大厅,几百人又拥到了楼上，就像当年布尔什维克的赤卫队攻克冬宫那样，流水般漫进了宾馆内的各个房间，四处搜寻。

这时，一个更惊人的情况发生了：群众上到了餐厅的屋顶，从那里可以跨入三楼客房 317、319 的阳台。虽然一楼大厅通往楼上各层的门已被关死，但是 2 楼以上通往各层楼的门都没有想到要锁，经过这两套客房穿堂而进，依然可以走向任何一层楼，进入任何一个客房。更严重的是，此时群众中互相传递着一个消息，说：陈再道中等个子，圆脸，长有麻子，外号“陈麻子”，只要是“麻子”就是陈再道。而 317 客房住的是昆明军区司令员秦基伟，他也有麻子，造反派一旦把秦基伟错当陈再道，那可就更热闹了。

果然，群众进到了 317 房间，好在秦基伟十分灵活，一见群众进来，马上就向他们主动亮明身份说：“我是秦基伟。”

正在召开中央文革碰头会的周恩来听到秘书来报：京西宾馆被北京文艺口的造反派数千人包围，要找陈再道辩论，警卫部队快要顶不住了。

周恩来拿起电话就找北京卫戍区司令傅崇碧，要他立即赶赴京西宾馆， 一定要保护好陈再道等人，无论如何不能被人抢走。

傅崇碧迅速调一个团开赴京西宾馆。但是，冲进京西宾馆的群众就是不走，已在京西宾馆的傅崇碧怎么劝也没用，陈再道他们又不能在电梯里呆得太久。没办法,他只好打电话再次向周恩来告急。

周恩来问：“陈再道现在那里？”

傅崇碧将陈再道的情况向周恩来作了汇报。周恩来不放心地问：

“这样保不保险，有没有办法叫群众退去？”

傅崇碧说：“他们不听我的，我没有办法了，看谢富治有没有办法？”

另外，傅崇碧看到群众中有好几个他认识的样板剧团的演员和“老三军”的人，也报告了周恩来。

周恩来立即让谢富治前去动员冲击京西宾馆的群众撤出。他又把戚本禹找来问：“是不是你动员人去揪陈再道的？”

看到周恩来很不高兴的样子，戚本禹老老实实地说：“是我给文艺组的人透露了一点消息。”

周恩来命令他：“你马上让他们走！这怎么行啊？我们中央让人家来开会，你弄了那么多的群众来包围，万一群众激动起来，把他打伤了、打死了，我们怎么跟毛主席交待？！”

戚本禹一听，也觉得紧张了，就赶紧通知金敬迈，让他把人撤走。

接着，周恩来又通知叶群撤人，并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决定，让金敬迈代表中央文革前去京西宾馆说服、劝阻群众不要冲京西宾馆，要他们撤走。

会上，周恩来批评戚本禹和叶群说：“怎么不经过中央同意，你们就找人去包围京西宾馆？”

戚本禹赶紧给周恩来再次认错。

叶群辩解说：“他们在武汉把毛主席都包围了，我们去包围他一下有什么不可以啊。我们也是为了保卫毛主席，表示我们的

忠心嘛！”

周恩来说：“你表示忠心当然可以，但也不能不经过中央同意，就冲进去抓人。要真出了事，我怎么跟主席交待？”

叶群说：“我们也没真抓他，我们只游行示威，吓唬吓唬他也不可以吗？”

周恩来说：“示威可以，但你们能控制得了局面吗？”

叶群说：“我们不进去抓人，就叫人在门口走走，喊喊口号，这总可以吧？他反对中央文革，反对毛主席，我们喊几句口号还不行吗？”

周恩来说：“那你们就去喊喊口号吧，但不准冲进宾馆，不准抓人。”

他又对中央文革小组的人说：“到时候，他们去示威，你们中央文革的人也都一起去看看，免得出事，万一有什么事，你们要负责的。”

谢富治他们赶往京西宾馆。经过劝说，文艺口造反派撤走了。撤走前，他们要傅崇碧承认他们冲击京西宾馆是“革命行动”，傅崇碧连连点头说：

“是革命行动！是革命行动！”

宾馆负责人有些想不通，他对傅崇碧说：“他们是进攻的，我们是防御的，如果他们的行动是‘革命行动’，我们奋力阻挡他们算什么？……”

傅崇碧没好气地反问他：“那你说我应该怎么说？”

中央文革碰头会结束后，叶群到京西宾馆找吴法宪、邱会作、张秀川，布置安排“三军”造反派到京西宾馆“插红旗、占位子，

静坐游行示威，连续搞它几天”，并要求张贴打倒陈再道、钟汉华，揪“黑后台”徐向前的标语口号。叶群还让林彪办公室的工作人员也都去参加“三军”的游行示威。

当天晚上，“三军”造反派又围着京西宾馆开始游行，中央军委各总部和军、兵种负责人也都来了。另外还有从北大、清华闻讯赶来的8000多名红卫兵。

按照周恩来的要求，江青、关锋、戚本禹等中央文革小组的人都乘小车陪着叶群来到京西宾馆。他们没有下车，只是在车里围着京西宾馆转悠。晚上的游行队伍很有秩序，只是围着京西宾馆游行，高呼“打倒陈再道！打倒钟汉华！打倒牛怀龙！打倒蔡炳臣！打倒巴方亭！”等口号。其中有个喇叭大的出奇，直径少说也得有三米，据说是专为厦门向金门广播设计制造的，发出的声音震耳欲聋，把窗户玻璃震得哗哗响。

“三军”造反派还在大街刷出反对徐向前的大标语。

不料，坐在车里江青、叶群被游行的群众认出来了，当即就将车围了起来。戚本禹急忙下车去找傅崇碧，让他派人来指挥疏散群众，为江青、叶群她们解了围。

傅崇碧和京西宾馆对“三军”造反派不担心，因为他们不会超过京西宾馆警戒线一步，更不敢冲击京西宾馆。但是对北大、清华的红卫兵就没有把握了。于是傅崇碧再次请示周恩来，建议：“可能还是要请‘中央文革’的人出面。”

周恩来立即给戚本禹打电话。

戚本禹出面劝走了北大、清华的红卫兵。

江青她们回到钓鱼台以后说：“上了总理的当，他叫我们去

看看，结果差点就出不来啦！”

7 月 24 日，王广宇也到北航找到韩爱晶说：“你们组织学生到京西宾馆去向陈再道示威，扎一些稻草人到那里去烧一烧，吓唬吓唬他，但不能往楼上冲。”

韩爱晶马上找田东商量后，也集合队伍赶往京西宾馆。几千人的队伍一边游行，一边喊口号，大概走了一个多小时，来到了京西宾馆。队伍刚停下来，就有一位工作人员迎出来，把群众队伍带进旁边空地小广场上。这位工作人员对韩爱晶说：

“傅崇碧同志要你到楼上去，他找你谈话。”

韩爱晶随这位工作人员来到楼上，在一个房间里见到了傅崇碧，他让韩爱晶坐下，对他说：

“周总理听说你们北航学生要到京西宾馆来，周总理让我在这里等你，周总理说你们北航组织性纪律性是最好的。总理要我转告你，一定不要让学生往楼上冲，游行一下就回去。”

韩爱晶心想：“中央领导真像导演一样，让我们演戏，看来王广宇这个安排，周总理和中央文革首长都是知道的。要不怎么周总理早就让傅崇碧等在这里。”他对傅崇碧说：

“傅司令员，你是了解我们北航的，我们要步行那么远的才能到这里，同学们是很辛苦的，我们肯定不会冲，但也麻烦你跟大家讲讲话，鼓励鼓励大家。你讲完话以后，我们喊喊口号，烧几个稻草人就回去了。”

傅崇碧表示赞成，随韩爱晶来到宾馆旁边的空地上，拿着一个手提扩音器，对大家说：

“北航的同学们，红卫兵小将们，你们声讨陈再道的行动是

革命的，我坚决支持你们的革命行动，你们在这么热的天从那么远的地方步行来，同学们辛苦了。我向大家表示慰问！”

接着，傅崇碧和大家一起鼓掌，并一起喊口号：

“打倒陈再道！”

“誓死保卫毛主席！”

“誓死保卫党中央！”

然后，北航的学生烧了几个稻草人，就回学校了。

武汉“720 事件”也让北京中南海门前的“揪刘”活动再掀高潮。7 月 24 日，中南海西门“揪刘火线”的“联络总站”在天安门广场召开“揪刘贼声援武汉革命造反派誓师大会”，30 多万人参加了集会和游行。

7 月 24 日下午 15 时，杨成武乘飞机离开北京回到上海，直接去见毛泽东，汇报北京、武汉的形势：

“昨天凌晨 3 点，中央文革向全国发出‘紧急通知’，要各地搞‘三军联合行动声讨 720 事件’，实际是武装游行。同时电召陈再道、钟汉华等人进京。今天凌晨 3 点，陈再道和钟汉华一行飞抵北京，刚住进京西宾馆就受到三军造反派的冲击。”

杨成武汇报了周恩来、谢富治、傅崇碧等人对京西宾馆所做的工作。

晚饭后，毛泽东又单独叫来杨成武谈话。

“这么一闹……是不是一大批人就会反对我？”

“不会的。”杨成武马上说，“没有主席就不会有今天。我们党和军队和人民，爱戴主席；两派三派，各派对立，但都是拥护主席的。武汉就是例子。”

“都打我的招牌。”毛泽东略带自嘲。

“都想跟主席干革命，只是跟上跟不上。”

“陈再道你过去认识 ”毛泽东问。

“原先不认识，建国以后才认识的。”

“噢。”毛泽东心有所想，漫应一声。走过一圈路，像自言自语，又像问杨成武：“他会反对我？”

“我看不会。军队的老同志都是跟你干革命的，反对你等于否定自己大半辈子的奋斗，不会那么傻。所有我们的老党员老干部都不会反对，都想保护毛主席的安全。”

“对，对，对。”毛泽东迈三步讲三个“对”，然后深吸一口气，痛快地吐出去说：“是的，我想，陈再道也不会反对我。他要反对我，我们就从武汉出不来了，他也不会到北京去。”

毛泽东停住脚步：“陈再道现在在哪里？”

“不知道。”

“钟汉华 ”

“也不知道。”

“你打电话问总理，找到他们，要他们回京西宾馆住起来，保护起来。你向陈再道传达我三句话：有错误就检查。注意学习。注意安全。”

毛泽东继续向前走去，他说：“明天你返北京，筹备建军四十周年。对总理讲，不要他们那么激烈，当作犯错误处理嘛。警惕有人做文章。”

## 第 757 回：毛泽东，还称陈再道“同志”　周恩来，接见豫驻军领导

就在杨成武在上海向毛泽东汇报的 24 日当天晚上，中央文革小组召开会议,专门研究“720 事件”的宣传口径问题。

会议决定：

一、各种报刊不点王任重、陈再道的名字，只提“武汉地区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二、对“百万雄师”中的一小撮“坏头头”要在报刊上公开点名。

会议还决定 7 月 25 日下午召开百万人的欢迎大会和出席大会的人员名单。其中，上天安门的名单里不要叶剑英和徐向前，只要聂荣臻。

会后，中央文革小组迅速向林彪作了书面报告。

25 日天安门的欢迎大会，考虑林彪的身体情况，原定没有他参加。接到中央文革小组的书面报告后，叶群给关锋打电话说：“听说天安门广场有个会，是不是？”

关锋回答：“是的。”并将会议的准备情况向她叙述了一遍。

“林彪同志想参加这个会，不知行不行？”叶群又问。

“那当然好啊!”关锋答。

“如果你们同意了，那我就正式请示江青同志了。”叶群说。

康生将 24 日晚中央文革小组会议情况向毛泽东请示报告后，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

一 、同意不点王任重、陈再道的名，用“武汉地区党内军

内一小撮走资派”的提法；

二、“百万雄师一小撮坏头头”前面要加几个字，成为“百万雄师中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小撮坏头头”。

三、同意出席大会的名单（即不要叶剑英、徐向前）另外再加上不在北京而在上海的张春桥、姚文元、杨成武、汪东兴、余立金、李作鹏。后来发表时没有加余立金，因为余立金是被欢迎的成员。

7 月 24 日晚，谢富治接见北京工代会、农代会、大中学红代会核心组，介绍了他在武汉的经历，说：

“我们这次出去，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是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中央文革派我们出去的，我们到了成都、重庆、昆明，后来到了武汉，我们到那里去是向革命造反派学习的，一路上比较顺利，得到王力同志和革命小将的帮助。我们到重庆情况比较复杂，分两派，看来两派都是革命造反派，有一派是犯错误多一些，一派是错误少一些。到武汉‘三钢’、‘三新’、‘工总’是革命造反派，在武汉军内一小撮走资派，他们把‘工总’打为反革命组织，逮捕 500 多人，但不久以后就放了，头头没有放，头头是我们叫他们放的。为什么武汉的革命组织叫钢，是因被压，才改名的。我们去的第四天，准备座谈，我们到了武汉‘工总’那里。我们和总理一块去，总理没有公开出面。第四天王力同志有一个讲话，我也讲了，开了一个扩大会，有‘独立师’、‘百万雄师’、‘三钢’和‘三新’，还有外地造反派，统统接见了，我们都讲了话，开了广播，全武汉都知道。‘百万雄师’知道了来砸，来了上千人，伙同军队中一小撮干的，和他们坐了汽车，车

上架了机关枪，‘百万雄师’戴了钢盔，拿着梭标、刀子，号称140 万。 他们矛头不是直对着我和王力的，我没有什么了不起，把矛头是对着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对着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中央文革的，他们对中央文革是无比仇恨的，因为中央文革对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坚决支持，对毛主席、对林副统帅无限热爱。中央文革小组的同志陈伯达、江青、王力、关锋、戚本禹同志都是很好的，我们对这样的同志要拥护。他们竟敢公开反对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对无产阶级司令部开刀，对我们开刀，他们也不敢公开干，只好一个一个开刀，他们提出要打倒谢富治，绞死王力。周总理有四点指示，第一是‘三钢’‘三新’是革命造反派组织；第二，武汉军区在支左工作中犯了方向性路线性错误；第三，‘工总’要翻案；第四，‘百万雄师’是保守组织，‘三司’有点偏保。周总理没有公开讲，我们讲了，都加在我们头上，他们到处造谣，说王力如何如何？武汉 1000 人包围了我们，中央警卫团十几个同志跟我们在一起。王力被抢走，被扣，我没有被怎么样。他们在门口喊打倒谢富治，他们拿刀子、枪都蹲在门口，我们没有下来。如果不出这件事，我们要到‘百万雄师’那里去，那就危险了。武汉这件事是王任重和陈再道独立师他们干的，武汉的消防队他们拿刀杀人。河南出了我的大字报，特别多。‘二七公社’是革命造反派组织，我们把‘二七公社’放了，他们对我们特别恨。昨天一行动，一广播，武汉就也较平静了，军队起来造反了，‘百万雄师’起来造反了，再发表几个声明，他们就分化了。谁反对中央文革都是站不住脚的，他们是纸老虎，靠欺骗宣传。 现在毛主席，林副主席、周总理、中央文革对武

汉形势特别关心，我们同志要紧跟中央文革，紧跟毛主席。我们北京大规模游行，是自发的，毛主席说‘很好!’中央文革也表示赞成。把这件事不能只能看到谢富治和王力的事，谢富治小得很，他们是对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对着武汉的革命造反派的。中央文革不能侵犯，我们矛头要对准陈再道，对准一小撮，明天下午要开百万人大会，工人、农民要讲话。 有一件事要告诉同志们，有坏人来北京。在京西宾馆，北航的去游行示威了，我们也可以去游行，我们要教育他们，帮助他们，注意一小撮。我们的矛头要对准一小撮，‘百万雄师’不能叫‘百匪’，只是一小撮坏人。我们北京还有一小撮‘百万雄师’，把他们集中起来，给他们做工作。大学红代会要做思想工作，不要太简单了，是政治斗争，三军要组织一个班， 做武汉来的一部分军队的工作，这件事我负责，我们同志要紧跟中央文革。”

24 日晚 20 时 10 分,武汉军区党委常委以电报形式，给毛泽东、林彪、周恩来并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全军文革小组，发了一份反戈一击的《通告》，揭发陈再道。

《通告》说，7 月 20 日，在武汉市发生了冲击毛主席派来武汉处理文化大革命问题的代表谢富治和王力住地的“严重政治事件”。这一事件，“是在部队内和‘百万雄师’内极少数别有用心的人的煽动下进行的”，陈再道等人“则是上述事件的罪魁祸首”。“我们军区领导在支左工作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

林彪看了武汉军区的《通告》后，指示中央文革小组以中央名义，迅速起草一份给武汉军区党委的复电，连同武汉军区《通告》，一并送毛泽东审阅。

25日，毛泽东在《给武汉市革命群众和广大指战员的一封信》稿中加了一段话："党中央号召：犯错误的人们觉醒过来，只要他们能够认真改正错误，取得革命群众谅解，这种人还是好的。"

这天，毛泽东就中共中央《关于武汉"720事件"给武汉军区党委的复电》一事批示：

林、周、文革小组及中央各同志：

代拟复电如下，请讨论酌定。

毛泽东代拟的复电称：

七月二十四日二十时十分来电并所附武汉部队公告全文已经收到。中央进行了讨论。认为（一）你们现在所采取的立场和政策是正确的。公告可以发表。（二）对于犯了严重错误的干部，包括你们和广大革命群众所要打倒的陈再道同志在内，只要他们不再坚持错误，认真改正，并为广大革命群众所谅解了之后，仍然可以站起来，参加革命行列。（三）要向思想不通的某些部队人员和'百万雄师'做工作，使他们转变过来。（四）要向左派做工作，不要乘机报复。（五）要警惕坏人捣乱，不许破坏社会秩序。

毛泽东在提到陈再道名字处，增加"同志"两字。

7月25日，周恩来为次日召开的中常委扩大会召集预备会，并于7月25日凌晨1时30分到2时40分，接见河南省军区、军分区和河南驻军师以上领导干部，讲述武汉情况和问题性质，表达了对于河南省军区正在召开的三级干部会，中央的担心。他说：

"同志们，我们叫大家来商量问题，听说你们在郑州开三级

干部会，我们想让你们领导同志到这里开，更好地了解中央的精神。山东、山西、河南、浙江、江西、湖南、福建等军区都来人了。现在最大的问题是武汉，震动全国。林副主席说，武汉的问题，值得全国各个军区学习。大家来了，听到了呼声，不仅是北京、上海，而且是全国。实际情况你们看到了，明天报纸就出来了。只有毛主席的威信，林副主席的威信，才能动员广大群众。有些地方出现另一种情况，相反的情况，听说在河南某一个分区，我不点名，支持保守派，开上吊车把楼都砸了，简直不像解放军。毛主席相信解放军，解放军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有崇高的威信，咱们能支持保守派下这样的毒手吗？保守派群众是受蒙蔽的，坏人只是一小撮，用吊车把房子都弄坏，打伤很多人，这样的事情比武汉更厉害。当然武汉是另一种形式，把矛头直接指向中央、中央文革，指向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

康生：“我一接触河南的问题，就知道武汉的问题不解决，河南的问题就很难解决，因为河南是听武汉的，不听我们的。”

周恩来：“河南‘二七公社’平反了，很快就影响到武汉‘工总’，我在武汉讲了四点，又讲了八点。四点、八点都是我讲的，我走了，事情就发生了，他们把‘罪名’加在王力同志身上，这完全是预谋的，矛头完全指向中央，这不是简单的事件，我提议武汉的问题正面的、反面的都要学习。河南是直接受武汉军区领导的，河南的部队又这么多，有陆军、有空军、有工程兵、有炮兵，还有几所军事院校，系统很多，省军区又有自己的系统，有两个独立师，军分区、县、市人武部，还有仓库，这次都把你们找来一道开会，支左半年了，应该总结经验教训，武汉的问题值

得学一学。

河南省军区党委有个检查报告，在北京起草，在郑州修改的，意见是否一致，也征求一下大家的意见。听陈桂昌同志讲，郑州连印的地方都找不到，‘河造总’、‘八大总部’不让印，当然不是广大群众，只是群众组织中的几个头头，也不是所有的头头。在武汉有些传单、海报纯粹是造谣，说要王力同志留武汉是让斗争的，有些保守组织的头头就是靠造谣吃饭的，这能吃几天？靠造谣是不会长的！我们解放军怎么能造谣呢？希特勒是靠造谣吃饭的，国民党是靠造谣吃饭的，要把歪风邪气造谣生事肃清，共产党员、劳动人民绝不能这样做。我们要树立毛泽东思想的作风，我们要为社会主义国家树立榜样，传给后代。”“有不同观点可以说，我们不强求一致。军队也允许争论，军队四大民主也给群众，过去打仗一年还讨论嘛，要摆事实讲道理，要独立思考，这样真理才能越讲越明。武汉的问题主要靠你们讨论，我们有联络员、记者参加，讨论3天，不同意见可以讨论，可以保留，但要服从大多数人的意见。21号武汉的问题就揭露了，下午就游行了，晚上就向河南的代表讲了，第二天达成了五条协议，但是有的就不签字，‘河造总’、‘十大总部’有的就不签字。”

周恩来请康生讲话。

康生说：“情况是这样，在北京开会是逐渐向好的方面发展，在河南总的形势是好的，因为矛盾揭露出来了。但是，另外一方面，它的发展与北京的会议是相反的，这就是说在会议上和河南运动的实践是不相符合的，请同志们注意这个问题。

好的方面，6月17日我们看到省军区党委给中央报了一个决

议，这个决议对错误有所认识，基本上是好的，因此我们很高兴啦，中央对这个决议有个批示，这是好的一方面。但事实的结果怎样呢？虽然这个决议报给中央了，但在军区内部有不同的意见，不同的解释，刚才总理讲了，这个决议在郑州就找不到一个印刷厂印，这不是群众的问题，这反映了军区内部有的人不同意印，你们不同意印可以另外搞个决议嘛。

从群众方面讲，军区党委对‘二七公社’一次、再次宣布它是非法组织。河南省军区发告全省五千万人民书。搞一个群众组织是不好的，没有一个省这样搞过，即使在武汉军区也没有搞，但是河南军区为了摧垮‘二七公社’，竟发表了告全省人民书，迟迟不平反。最近虽然平反了，但‘二七公社’在各方还受到严重摧残。‘河造总’过去是不赞成‘十大总部’的，现在联合起来搞‘二七公社’。”

周恩来插话：“对‘二七公社’、郑大‘联委’、新乡‘八•一八’、洛阳‘八•一六’、开封‘八•二四’这些左派，你们每一个部队首长同志有权利支持它，保护它，要派部队去，我们一定支持你，这是正义的革命的行动，即使省军区不赞成，你们也要坚决干，这是革命的行动。”

康生：“现在的武斗比开始时还严重，一直发展到像新乡那样情况。新乡军分区请你们注意一下，李国秀同志到底怎么样？李国秀同志说他们支左大方向是对的，你们考虑究竟怎么样？

‘河造总’是革命群众组织，过去军区支持它，现在如果不注意，就会走到它的反面。

应当看到河南目前的情况，武汉王任重的‘百万雄师’，四

川李井泉的‘产业军’，都到你们那里去了，并且在开封已经杀人，东北的‘荣复军’，北京的‘联动’，也到你们河南去了。为什么这些反动组织都到你们那里去，在中州会师？大概你们那里有油水，有人同情它，它们在河南找到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所以21号我们向几个组织提出这个问题，武汉的问题有没有在河南重演的危险？”

“所以在21号的会议上，我们向军区的同志、‘河造总’、‘十大总部’、‘二七公社’的同志提出这个问题，问他们能不能达成协议。大家表示赞成，后来达成了五条协议。这五条协议我记得是这样：

（1）反对百万雄师的叛乱罪行；

（2）反对百万雄师、产业军、荣复军、联动到河南破坏文化大革命；

（3）制止河南武斗。有的是一种罪行，用社会主义的生产工具，破坏社会主义的生产建设和财产，这是反革命的行动；

（4）黄河水汛上涨，大家要齐心协力防汛，凡防汛材料物资，那一派都不准抢；

（5）按中央批示要拥护解放军，支持和欢迎军区改正错误。”

“那天晚上武汉事件发生，毛主席、林副主席讲，这件事对全国、特别是对解放军有很大教育意义。我们本来很希望省军区表示态度，你们赞成还是反对？但没有得到省军区的反映。那一天晚上何运洪同志装病没有去。那么紧急的事情，何运洪不到会，我很不满意。我事后检查，何运洪没有病。对武汉的问题，到现在我们没有见到你们的正式决定和声明。21、22、23、24，4天

了，没有见到你们表态，到底为什么？不表态也可以，但是我觉得应该表一表。你们军区直属武汉军区，你们过去的支左工作，支左方针，实际上是执行武汉军区那一套。”

“河南军区的错误最严重的是对中央指示长期地、顽固地对抗。2月17日主席对河南有个批示，对我们中央文革教育很深。主席对各省的批示很多了，但对河南问题的批示是第一个，就是要你们组织各派代表来中央汇报，而河南军区拒绝主席、中央的指示，到今天已经5个多月，将近半年。你们为什么不来？就是想把‘二七公社’拖垮，造成既成事实。事情并不是这样，实际上没有压垮拖垮。当然河南问题的性质和武汉的问题不一样，‘百万雄师’是搞叛乱的。”

接着，康生列举了“武汉事件”的几个主要表现：

“一个是部队的少数人拿他们的错误路线去煽动欺骗干部战士，8201部队的少数人表现很不好。这能怪战士吗？战士是好的。这一点河南军区要检查一下你们做得怎么样。最近‘十大总部’、‘河造总’开会有军队参加。四、五十人穿便衣，郑州市人武部的干部穿便衣指挥，这是玩火，玩火要烧到自己的。

第二个是利用公检法。从全国各省看，有的利用公检法干了许多坏事。武汉利用公检法镇压造反派，河南这一条从省里一直贯彻到下边，我们不能不研究这个教训。这次会议上，我们批评了公检法，他的代表就回去了。武汉问题发生后，公检法又翻了，可能要打倒我和戚本禹同志。何运洪同志恰恰在这个时候不参加会议，公检法恰恰在这个时候翻这个案。何运洪利用公检法，丁石、赵文甫是搞公检法的。你们捉多少人，你们没有实际数字，

连党言川也捉了。

第三个教训是利用人武部。省军区支持军分区犯错误，分区有没有支持县人武部？人武部有没有动员农民进城的？武汉少数犯错误的同志利用‘百万雄师’把‘三新’、‘三司’、‘二司’、‘三钢’、‘工总’等造反派压垮，河南利用‘十大总部’、‘河造总’把‘二七公社’全部压垮。

第四个教训是利用地方机关的保守派。河南非常突出。河南省委‘省直总部’实际上是保守组织。刘建勋、纪登奎有错误，但还是好同志，你们去搞。最坏的是赵文甫，你们支持他，他支持军区。利用这个组织去打垮那个组织，河南和武汉是一样的。”

康生最后总结说：“因此，河南有武汉事件重演的可能。”“在这里两个月，河南问题实际没有解决，所以经过这次会议望能得到很好解决。”

## 第 758 回：七二五，北京百万人集会　看武汉，空十五军进江城

北京，7 月 25 日上午 9 时，周恩来在钓鱼台主持召开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对下午召开百万人欢迎谢富治、王力回到北京大会的议程、口号、发言次序和领导人站的位置进行最后审定。

下午 15 时，离天安门的欢迎大会开始只剩下两个小时了，林彪给中央文革小组打电话说：

“我经过仔细考虑，认为今天下午的大会，我以参加为好。目的在于增加左派的威力，打击右派的气焰。这个欢迎大会，实质上要开成一个示威性质的会，向右派示威，加速右派的瓦解。所以，我觉得参加利多。”

江青高兴的说:“林副主席的意见十分英明,一定要请林副主席参加。”

关锋还建议:“为了壮大声势，我建议请在京汇报的黄永胜、冼恒汉也参加大会。”

林彪得知后，夸奖说:“关锋同志的意见很好，应当壮大声势，并使这个声势扩大到全国去!”

7 月 25 日下午的天安门广场，人山人海。两排警戒线上每相隔一米就站着一名卫兵，沿着天安门前的金水河，一直站到长安街中山公园和劳动人民文化宫门前。碧绿成带的金水河上，横跨七座洁白的汉白玉石桥，桥上站满了新闻记者和摄影师。河岸两侧那精雕的石狮上，贴着大字标语。城门前那两对汉白玉雕成的蟠龙华表上，吊起了四个大气球，气球下悬挂着巨幅大字标语:

“誓死保卫中央文革小组！”

“誓死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热烈欢迎谢富治、王力同志光荣回到北京！”

“坚决支持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

下午 16 时多，参加欢迎会的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和中央文革领导小组的领导成员在天安门城楼上济济一堂。臂上戴着各种袖章的群众组织负责人占了整个城楼人数的一半多。最引人注目的是坐在轮椅上的王力，由工作人员最先安排在天安门城楼大厅的沙发上，北航的井岗山、尹聚平、胡慧娟等在旁边陪着，北航“红旗”一把手韩爱晶和北京大专院校的一些红卫兵负责人，也拥到大厅里，在王力周围坐下，非常尊敬地和他交谈。

武汉“二司”代表问候王力伤势，王力说：“不要紧。这一次他们暴露了真面目，暴露的更彻底了，这样好嘛，他们的反动面目暴露的越彻底越好。革命造反派一定要加强团结，不要闹意见，不要闹矛盾，敌人还没有彻底垮台，任务还很重。千万要搞好团结，造反派之间不能再搞分裂。”

王力不时微笑着和每一个走过来向他问候的人握手，以至林彪、周恩来、江青、陈伯达、康生等中央领导走上城楼时，许多人还没有发觉。

毛泽东的女儿肖力，即李讷，在上天安门时见到前来参加大会的林彪，便把随她一同前来的《解放军报》社“造反突击队”成员一一介绍给林彪。

林彪问肖力：“你们的组织叫什么名字？”

肖力说：“叫‘造反突击队’。”

林彪赞扬说："对，要造反，要突击，要彻底砸烂总政阎王殿！"

林彪走进大厅时，韩爱晶一眼看到了。他立即从沙发上站起来，走到大厅门口去迎接林彪，并和林彪握手，说："林副主席，我们北航的师生希望能够把北航转为军校。"

林彪说："好，好！"

"林副主席来啦！"不知是谁喊了一句，几个学生领袖立即拥到林彪身边。蒯大富将清华"井冈山"的袖章戴到了林彪的左臂上。刹那间，天安门上清华大学的人迅速传告："林副主席成了我们'井冈山'的人喽！"

林彪显得很激动，他紧紧握着蒯大富的手，高兴地说："小将们在文化大革命中建立了丰功伟绩，你们是文化大革命的主力军。"他接着说，"我很喜欢'井冈山'。这次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场内战。搞得不好，我和你们都要重上井冈山打游击去。"

蒯大富见林彪神情严肃，心往下一沉，问道："林副主席，目前形势果真这样严重吗？"

林彪笑了笑，对蒯大富、韩爱晶说："物极必反，坏事坏透了，脓包出了，事情发展到坏的顶点，就要向好的方向转化。这一行动一定会使右派很快分化，从前我们要做文章，但没有题目，现在他们给我们出了题目，我们要抓住大做文章，把坏事变成好事。"

学生们将林彪迎到王力旁边沙发上坐下，林彪很亲切地对王力表示慰问。大家都围过来和林彪握手，听林彪谈对"720 事件"的看法。林彪说：

“凡事要从最坏的地方想。现在要夺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军权，是最后的决战。是学生领袖，要好好锻炼自己，有许多事情等着你们去做。”

蒯大富、韩爱晶等几位学生领袖不住地点头。

林彪对武汉“二司”一位女学生说：“好，你们干得好。”

叶群说：“你们干得好，很坚决。希望你们保重身体。”

武汉“二司”代表向江青倾诉武汉造反派日夜想念毛主席的心情时十分激动，热泪盈框。江青劝道：“好，好，不哭，你们战斗得很好！”

周恩来对武汉赴京代表说：“你们在京的武汉造反派要杀回去，回去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对待保守组织，要分化瓦解他们，不要采取报复态度。”

谢富治特别对准备发言的武汉“二司”代表说：“你今天的发言是要代表整个武汉地区革命造反派的。”

于是“二司”代表在发言稿里加上“我代表武汉‘三钢’、‘三新’、‘革联’”字样后交给谢富治看。谢富治说：“你们要和‘三新’搞好团结呀！”

王大宾建议说：“你就把‘三新’放在前面吧！”

谢富治拍着王大宾的肩膀说：“还是王大宾有风格。”然后又关心地问“二司”的负责人杨道远为什么没有来？他说：“应该通知他来，这是大会的缺点。”并说：“在‘二司’司令部召集‘三钢’开会，为了想把‘三司’从陈再道那边拉过来，我找了两个‘三司’代表来，结果他们对总理的四点指示很生气，但又不敢反对总理，却把四点指示说成是王力的黑指示，要打倒王力，还

发表声明 要打倒我，这是他们硬要往陈再道那边倒。你们回去一定要和‘三新’搞好团结，过去你们的观点，虽然不大一样，但现在已经一致了嘛，他们也在坚决彻底为‘工总’翻案，回去以后，要紧密地团结在一起，共同战斗。”

刘建勋说：“陈再道是个恶霸，他已经走向反面了。”

那天，毛泽东的女儿李讷、林彪的女儿林豆豆、杨成武的女儿、谢富治的女儿谢小沁都在天安门上，各群众组织负责人和她们热情握手，互相问候。

大会于下午 17 时开始。谢富治、王力乘坐敞篷小卧车，接受了百万群众的欢迎。然后，一起登上天安门。北航的井岗山在天安门上代表北京学生讲话。他们 4 位随谢富治、王力南下的北航“红旗”同学和林彪等人在天安门城楼上合影。

在天安门城楼上，林彪对江青说:“武汉问题不单是武汉问题,而是全国问题。各个地方都有像陈再道一样的人物。”

江青认真地望着林彪，钦佩的点着头。

林彪接着说:“估计最近一个月，将是全国矛盾激化的一个时期。”

江青扶了扶眼镜架,答道:“对,林副主席就是比我们站得高,看得远，分析得十分透彻!”

由于林彪的出席，大大地提高了天安门广场欢迎会的规格。

戚本禹在天安门上对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等说：“你们红代会几个组长揪刘少奇有没有决心要坚持，要有胆量才行呀!聂元梓同志，你是组长，应该好好抓一下，别人不好管。一定要统一领导起来，这是当前的大方向，你们一定要负起责任来。红

代会开个会研究一下，安排部署好。”

后来，北京红代会核心组根据戚本禹的指示，开会研究了如何把刘少奇揪出中南海的问题，决定要大造舆论，发“勒令书”，限刘少奇在 8 月 5 日以前滚出中南海。他们还具体策划了一个冲进中南海抓刘少奇的计划。

叶群在天安门城楼上也把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的负责人和“三军无革派”的负责人叫到一起，要他们团结一致。

在天安门城楼，周恩来看见《湖北日报》驻京记者小刘。交谈中，小刘问及武汉局势，周恩来说：“你们放心。我们已经从外面调了许多部队，把武汉包围住了，陈再道他们想翻也翻不了浪。武汉是安全的，是万无一失的。”

农林口两派为谭震林和秦化龙的问题争得不可开交，周恩来原希望通过两派辩论解决秦化龙的问题。7 月 25 日这天，在天安门城楼上，周恩来听了北京农业大学革委会主任冯兴旺汇报的农林口情况后说：“我很关心农林口的问题，秦化龙的问题辩论很久了，但另一派不服气，我准备亲自参加一次辩论会，我已将秦的问题提交中央了，根据中央讨论结果，我准备把这个问题结束了。关于批谭，还是按前次提的方案，开个 1000 多人的会，会场我负责找，我说过了一定算数。”

大会进行中，蒯大富问王力：“王力同志，我想请教两个问题，全国‘老保’行动如此一致，中央有没有黑手？”

王力说：“至少，武汉事件与徐向前是有联系的。”他想了想，补充道，“徐向前与陈再道，还有南京的许世友、福州的韩先楚，他们都是原四方面军的。”

“原四方面军的将领,是不是都听毛主席的话?”蒯大富又问。

“有的听,有的不听。”王力答道。

“现在,是不是到了解决军内问题的时候了?”蒯大富接着问。

“应该是水到渠成,瓜熟蒂落了。”王力回答说。

大会结束时,全场响起了震耳欲聋的口号:

“打倒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打倒陈再道!”

“打倒钟汉华!”

大会在《国际歌》和《大海航行靠舵手》的歌声中结束。随后，百万群众举行示威游行。

大会刚结束，杨成武从上海飞抵北京，向周恩来传达毛泽东的指示：将陈再道“保护起来”，还请周恩来向陈再道转达毛泽东的那三句话：“你告诉陈再道三句话：一是有错误就检查,二是注意学习,三是注意安全。”杨成武拿出毛泽东亲笔所批电文，其中在提到陈再道名字后边，有毛泽东写的“同志”二字。

而此时的武汉，24 日黄昏，武汉“百万雄师”又进行了最后一跳，发起对体育学院和测绘学院的攻击。攻打体院的“百万雄师”18 车人马包围体院大楼，进驻测绘学院和新华工的空军前去制止武斗。

25 日凌晨 5 时,“百万雄师”再出动 38 辆卡车、3 辆消防车、一辆装甲车攻打体院，并刺伤制止武斗的解放军。一名参加围攻体院的学生负责人被小口径步枪击毙。

与此同时，还有数十辆“百万雄师”的汽车包围测绘学院，直到 25 日上午 11 时周恩来亲自来电制止，车辆才散去。

连续两天，一支又一支的空 15 军的队伍开进武汉市，宣布支持革命造反派，谴责 8201 部队的行为，并接管他们所控制的战略要地。8201 部队接受换防，离开市区集中整训。

驻守东湖宾馆的 8201 部队的战士，痛哭失声。他们按命令于 8 月 1 日将防务移交空 15 军部队，留下了枪支，离开武汉市。所有的部队交接、换防都井然有序，没有发生任何冲突。

25 日全天，武汉部队三军指战员佩带造反派袖章，分别乘坐数百辆军车在武汉三镇举行游行，战士高举《毛主席语录》向热情欢迎的群众招手致意，高呼：

“向三钢、三新、三联学习！”

“向三钢、三新、三联致敬”!

“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

“打倒陈再道！”

游行群众看见蛇山下孔明灯处有 8201 战士横枪低头“向毛主席革命路线请罪”，也感到这些战士受委屈了。联想起前些日游行的指战员丢解放军脸的举止，都说这些镜头是在电影里演反派才见过的，把解放军糟蹋了。市直造反派“人民勤务员”的头头魏绳武说：

“看到 8201 部队的人在那里请罪，低头弯腰，把枪横着拿在腰下，像是打败仗的兵，我们看了心里也不好过，把解放军弄成这样，其实都是当官的在背后操纵的结果，他们没有什么过错”。

晚上，武汉“三钢”、“三司革联”和外地来汉造反派群众和解放军指战员 3 万余人，在武汉测绘学院操场集会，愤怒声讨陈再道和“720 事件”。

## 第 759 回：大游行，各地声讨“七二〇”　枪声响，山城武斗又升级

由于鞍钢武斗停产，两派代表跑到北京要求周恩来接见。7 月 25 日晚，在中南海小礼堂，周恩来接见鞍钢两派赴京代表，李富春、李先念参加。

周恩来说：“我们就不相信鞍钢工人不愿意生产，毁了一个焦炉，要一两年恢复。我就不相信鞍钢工人不先进，我就不相信鞍钢十几万工人不愿生产，一天只炼几百吨铁。但代表在这里开会几个月，而对生产搞得这个样子不痛心，看看这么大一个企业搞成这个样子不痛心。鞍钢都停产，我们是不怕的。问题是你们这样搞完全是违背毛泽东思想的。完全是违反文化大革命的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的。你们派别的利益，小集团的利益超过了国家的利益吗？个人争面子，不为国家，不为劳动人民的利益。”

“希望你们鞍钢生产这面红旗不要倒下去，当然也倒不了，倒了也有人扶起来。焦炉停了，还会有人恢复，也没有什么了不起，但奇怪的是为什么生产停了，没有人说话，不痛心，听不见工人的声音？

彼此都是阶级兄弟，有的思想激进一些，有的保守一些，但是都是阶级兄弟，为什么不抓住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联系鞍山的王、赵、罗、钟来批判？把相互之间的小不和要放在次要地位！”

周恩来责成鞍钢副经理林云侠保证执行《鞍钢赴京代表关于〈制止武斗、恢复生产〉的协议书》，并且要派李富春、李先念

去检查执行情况。

连日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等报刊和新华社及各种媒介，集中报道全国军民，以声讨武汉“720 事件”为主要内容的消息、社论、评论、文章、照片，并对全国的群众组织，作了革命或保守的倾向性表态。

中央文革小组向新闻电影制片厂下达任务，要求在半个月内，把反映武汉“720 事件”的新闻纪录片《北京支持你》搞出来。陈伯达指示：“要用最快的速度，最好的拷贝，最高的质量。”

江青说：“关键是要用对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感情最深的人员！”

中央文革如此重视，新闻电影制片厂自然不敢怠慢。他们日以继夜，加班加点，仅用 10 天时间，就把这部片子赶制出来，用专机送到武汉进行了首映。

据《人民日报》报道,各地闻风而动,行动迅速：

北京。三军的造反派组织和解放军各总部、国防科委、各军兵种、部队，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游行队伍走到哪里，哪里就响起了震耳欲聋的口号声:

“愤怒声讨武汉‘720 事件’！”

“坚决支持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

“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胜利万岁！”

……

上海。驻沪部队和群众 20 万人举行集会和示威游行，一路高呼口号，散发传单……

呼和浩特。驻呼部队和“无产阶级革命派”25 万人，举行

了声援武汉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誓师大会，宣读了呼和浩特市 63 个群众组织给《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支持电》。会后，举行了武装示威游行。

南昌。驻赣海陆空三军指战员和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师生、红卫兵小将 15 万人举行集会，声讨武汉“720 事件”。会后，解放军乘坐架着机枪的卡车，与抬着毛主席巨幅画像和语录牌的群众一道游行示威，一直到深夜。

哈尔滨、太原、乌鲁木齐、西宁、天津、青岛、兰州、福州、南京、郑州、长春、长沙等地和北京、成都、福州、南京、济南、广州、昆明、兰州部队以及内蒙古、新疆、西藏军区，黑龙江、贵州、陕西、广西、湖南等省驻军，都分别举行了盛大集会和示威游行。许多地方和部队还向毛主席发了致敬电，向谢富治、王力发了慰问电，向武汉无产阶级革命派发了声援电。

7月25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了新华社提供的关于全国各地对武汉“720”事件反映的综合报道，在这篇报道中，首次使用了“二七公社是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字眼。当天的《人民日报》也在头版头条的位置刊登了这条消息。这就是在河南被称为的中央“七二五”表态。

就在谢富治和王力离开重庆的当天，7 月 14 日，重庆“军工井冈山长安兵团”包围该厂“81 兵团”，“81 兵团”抓走“长安兵团”3 人，其中包括“军工井冈山”总部勤务员李桂芝。

还是在这天，山城两派在北碚区邻接西师、西农的前进公社武斗，动用了民兵枪支，有死伤。

而此时，谢富治和王力已无暇顾及重庆了，这些只能由四川

省革筹组组长、成都军区政委张国华、副组长刘结挺和中央代表、贵州省革委会主任李再含处理了。

7 月 15 日，张国华、刘结挺、李再含一起到重庆武斗严重的北碚区西南师范学院、西南农学院、重纺五厂等单位视察。16 日晚上，他们在重庆人民大礼堂接见驻渝部队排以上干部并讲话。

7 月 17 日，张国华、刘结挺等在北碚区分别接见两派群众。要求两派停战，上交武器。当天，西师“831”、西农“826”到北碚街上向驻军上缴武器时，与“815”派发生武斗，双方发生枪战。

张国华、刘结挺、李再含于当天午后 13 时至晚上 22 时 30 分，在重庆警备区小礼堂接见“砸派”代表，作停战交枪工作。

接见时，刘结挺向黄廉问起“砸派”的组织，黄廉汇报説：“我們在重庆市经委设立了‘重庆工人反到底总司令部’，底下有几大司令部：‘造反军’、‘工总司’、‘軍工井冈山’、‘二七工人造反兵团’、‘重庆反到底延安兵团’、‘重庆反到底机关司令部’，还有‘大专院校红卫兵’、‘红中司’（红卫兵中学生司令部）、‘重庆农民反到底司令部’等。‘造反军’的负责人是我兼、‘工总司’头是李木森、‘军工井冈山头’是邓长春。”

刘结挺説：“那就叫‘反到底’吧，以后不要叫‘砸派’，称‘反到底派’，‘815’还是称‘815’。”

此后，重庆的“砸派”就改称“反到底派”。

7 月 18 日凌晨 2 时，张国华、刘结挺、李再含又接见了重庆“815 派”代表。

7 月 19 日至 20 日，张国华、刘结挺、李再含到望江机器厂给两派做工作，要求停止武斗。20 日返回 54 军军部。

就在他们离开望江机器厂的当天，也是武汉发生“720 事件”的当天，7 月 20 日至 21 日，重庆大型国防企业长江电工厂再次发生武斗，激战 8 个小时后，“反倒底派”因人数和装备差距主动撤退，“815”派攻占全厂，打开成品库运走大批枪弹。

重庆空气压缩机厂是生产坦克等武器的大型国营军工企业，也是“81 兵团”的发迹地，“81 兵团”头头方文正就是空压厂的。7 月 21 号，空压厂已经发了枪，机械学校的“815”也已经有枪了。

此时的重庆已经处于两派的割据和胶着状态，大家都没有安全感，都找不到出路。由于武斗，大批群众外逃。全市 7 月份计划调入粮食 8900 万斤仅完成 28%，粮食供应明显紧张。

7 月 22 日上午，李再含离渝返贵阳。此时的贵州，反对李再含的势力日渐壮大。

这天中午，张国华、刘结挺接见驻渝部队领导。

鉴于 7 月里发生的大规模武斗好几次都在国防工厂进行或与国防工厂有关，市革筹组召集了重庆国防系统两大派：“81 兵团总部”和“军工井冈山总部”的主要勤务员在 54 军军部谈判。军工“井冈山”总部人员在周应古带领下参加了谈判。双方于 7 月 23 日达成了《关于立即停止武斗，抓革命促生产的协议》，其中提出两派都要“上交凶器”，即棍棒、钢钎、匕首之类。两派代表 3000 余人下午在人民大礼堂召开了“团结大会”。张国华、刘结挺出席并讲了话。

7 月 23 日当天，以西师“831”为首的“反到底派”，组织上千人的队伍，到“815 派”控制的北碚街上游行示威，拥护中央对武汉“720”事件的处理决定。“捍红总部”立即出动几大组织数千人的武斗队伍，两派发生武斗。在双方混战中，“反到底派”因准备不足，受创严重。据他们称：在这次武斗中，他们有百余人受伤。当晚，“815 派”向西南师范学院发动进攻。西师“831”于次日凌晨撤离学校，“815 派”控制了北碚城区和大部分农村。

7 月 24 日上午，西师附中两派在北碚中山路发生流血冲突，晚上两派再次在西师发生武斗，“反到底派”西师附中“布尔什维克”撤到 424 部队。

7 月 25 日上午，张国华、刘结挺给 54 军领导作指示后，于下午乘飞机返回成都。就在他们离开重庆的当天，重庆发生“化龙桥”一声枪响，重大“815”学生命陨当场。

化龙桥地区的工业校是“反到底派”的据点，这里的“红岩兵团”原来名叫“八一五战斗团”，也是一支老牌的造反派队伍。因为反对“革联会”，他们于 1967 年 4 月上旬正式倒戈，加入到“砸派”行列，并更名为“红岩兵团”。工业校坚持保“革联会”的人数不多，早已撤离该校，学校便成了“砸派”的一个重要武斗据点。化龙桥地区的二中、幼儿师范学校、汽车二十二队等单位的“砸派”在本单位呆不住的，也都来到工业校，平时据点里或多或少都有两三百人。

“红岩兵团”得名于红岩村。工业校就在红岩村附近，离红岩村纪念馆那幢大楼不远。红岩村地处沙坪坝到市中区的交通要

道边，每次“815 派”的队伍路过这里，“红岩兵团”都要出来挑衅、拦截，所以，早就被“815 派”视为眼中钉、肉中刺。

“725”枪响的起因是 7 月 24 日，嘉陵厂“81 兵团”乘车路经化龙桥时，与扼守路边制高点的工业校“红岩兵团”发生武斗。下午，“红岩兵团”又拦截了一辆路过的“815 派”车辆，并扣押了随车人员和一位生产高射机枪子弹的嘉陵机器厂的军代表，说是要交“警司”处理。随车人员后来放了，但军代表因为时间晚了，当天没走成，继续被扣押。

下午 17 时，沙坪坝区“815 派”声讨武汉“720”事件大会后游行路经化龙桥，再次与“红岩兵团”发生武斗。

晚上，“红岩兵团”得到情报：重庆大学“815 派”抢了武装部，得到了许多军用装备，并且准备攻打化龙桥这边的学校。

7 月 25 日凌晨 3 时左右，夜空升起了 3 枚红色信号弹，“815 派”进攻开始了。大约 4 时，枪声响起，划破夜空，惊醒了化龙桥四周以及嘉陵江对岸从猫儿石到大石坝的沉睡居民。向窗外看去，只见夜空中划过一道道火光，让人惊恐不已。

“红岩兵团”的人被枪声从睡梦中惊醒。一个崽儿趁着夜色，爬到大楼房顶上去观察。他的脑壳刚刚冒出屋脊，一颗子弹飞来，正好打中，顿时脑浆四溅，当场毙命。跟在后面的人只听得一声惨叫，吓得连滚带爬，急忙退了回去。

自从大规模武斗开始以来，工业校多次遭受过“815 派”的攻击。但是，“红岩兵团”依仗着学校地形和武斗队人多和亡命，每次都能“岿然不动”。所以这次虽然有人被打死，却没有人感到害怕，反而激起了办公大楼里那些武斗人员更大的战斗激情。

广播里吼着：

“保麻儿，来啊，冲啊！小心地雷哟……”

从全市各个单位调来的“815 派”武斗人员，从前后两个方向包围着工业校。可能是真的害怕踩响地雷，或者是因为其他什么原因，他们并没有发起冲锋，只是躲得远远地，不时放上几枪。到后来，枪声也渐渐稀疏下来。

天亮以后，几名解放军进入“红岩兵团”坚守的办公大楼，要求带回被扣押的军代表。“红岩兵团”见来的是军人，只好释放。军人也对大楼里的情况进行了观察，没有看见有枪支弹药，也没有发现地雷。

此时，重庆大学的专业武斗队“301”和沙坪坝区的武斗队也赶来了，进攻的队伍陡然增加到上千人。他们开始了第二轮攻击。两挺机枪，一轻一重，开始扫射。这一次，冲锋的人相当大胆，呐喊着向大楼进攻。他们大多手持钢钎，也有的手持七九步枪，枪上着刺刀。还有的手持 1950 年苏式冲锋枪，俗称“格蚤龙”，大多没有子弹。楼上的人用石头砖块还击，但无法阻挡得住进攻的浪潮。于是有人大喊：

“快把枪拿出来!”

几天前，便有人向市里的“反到底”头头们建议，要求将建设厂生产的枪“提”出来，发给大家，以备无患。“反到底”的头头们商量来商量去，终于胆怯，不敢下决心。此刻，工业校据点里只有 4 支小口径步枪，其中 3 支不能用。但是，就是这一支可以用的小口径步枪，将重庆大学采矿系三年级学生张全兴击中，据说射手是市体委一名专业射击运动员，枪法非常准。

尸体运回重庆大学，举校哗然。机械系三年级学生唐世轩当即宣布："我马上去把现场拍下来！我要用镜头揭露砸派开枪杀人的罪行！"他去了武斗现场。由于当时重庆武斗基本还处于冷兵器时代，对方意外出现的热兵器使进攻方一时不知所措，全都停住冲击，躲进了四面的安全地带等候命令。

唐世轩到了，看见主楼前面了无人影，心中好不欢喜：偌大空地，完全足够选择一个最佳的拍摄位置呢！于是他大摇大摆走上前。

躲在旁边的同伙们吓坏了，大喊大叫要他赶快躲开。可唐世轩不管这些，镇定自若，旁若无人。他今天来，就是要抓拍这样的好镜头呢！这才是过得硬的历史罪证呢！他聚精会神地对镜头，调焦聚，拨光圈……但是，他还没有来得及摁下快门，枪又响了，就一枪。不错，就一枪：正正击中唐世轩额心，他死了。

唐世轩和张全兴的尸体同时放在图书馆供同学们凭吊。二人的遗体都穿着军装。这些军装当然是赝品，总团不知从哪个纺织厂搞了些黄布来加工的，做工极其粗陋。给他们的尸体穿上，算是安慰一下殉道者和苟活者焦虑难平的心吧。

8 月 2 日出版的第三十四期《八一五战报》上用整整三个版面刊登了纪念文章，第三版几乎还用一个整版刊登了张全兴的日记摘抄，并用他日记中的一句话作了标题："我要做一个雷锋、王杰似的人"。唐世轩没有留下日记，仅由"唐世轩烈士生前所在战斗组 2111 纵队"写了一篇文章作为纪念，题目是"怒向刀丛觅小诗"。

重庆大学死了两人，"815"又停止了进攻。双方对峙，又是

几个钟头。

终于，进攻者发怒了，一声令下，机枪、步枪子弹一齐朝防守者扼守的大楼射击。一发土制炮弹打中了教学楼三楼的一个窗台，当场炸死幼师的一名女生。

枪声越来越密，冲锋的呐喊声一浪高过一浪。据点里的“红岩兵团”垮了。戴着“八一五”袖章的武斗人员端着枪，端着钢钎冲进了大楼，“红岩兵团”的人只有举手投降，每个人背上都免不了挨枪托，挨铁棒，挨拳头，连女生也不能幸免。骂声、哭声、叫喊声此起彼伏。接着，200 多人便被押出大楼，押上卡车 ，押回“815”的根据地沙坪坝。重庆大学的“卫戍部队”将其中少数“首恶份子”扣押待审外，其余人等全部用翻斗车运去沙区门户小龙坎，稀里哗啦倒在街上了事。

这一仗，“反到底”被当场打死 9 人，后来还有 1 人被俘虏后因伤势过重而死，“815”大获全胜。

## 第 760 回：议题变，重庆“井冈山”发枪　七二六，太原重机厂武斗

7 月 25 日，重庆“反到底”按照预定的计划，准备在大田垮体育场召开声讨“720”事件、声援武汉造反派大会。因为天气热，这一天的大会提前在 8 点钟开始，开会的人像潮水一样涌到大田垮。

大田垮离化龙桥不远，直线距离不到 5 公里。7 月 25 日清晨化龙桥工业校的枪声，也传到了体育馆，住在这里的“反到底”头头们得知工业校被包围的消息，马上临时开会商量怎么办？有人提出取消当天的大会，但开会的队伍已经陆陆续续来到。于是他们临时决定，大会改在体育馆前的广场举行。因为大田湾体育场的出口小，万一“815”打来，几个门一堵，就麻烦了。

大会按时召开，突围出来的工业校“红岩兵团”头头在大会上控诉了“815”攻打工业校的罪行，激起与会人员更大的仇恨。黄廉在发言中号召反击，并连续三次将“敌人不投降，就叫它灭亡”，错呼为“敌人不灭亡，就叫它投降”，可见其激昂之情。化龙桥的枪声没有吓倒开会的人，反而激起全场数万人更大的战斗热情。大会草草结束，“反到底”立即行动，投入到紧张的扩军备战之中。

而当天上午，并不知道化龙桥武斗消息的“反到底”派“军工井冈山”总部，正在重庆医学院的阶梯教室召开总部扩大会议，落实 7 月 23 日重庆国防系统两大派在 54 军军部达成的《关于立即停止武斗，抓革命促生产的协议》和重庆市革筹要求两派尽快

开会贯彻执行的要求。其下属各兵团主要勤务员已于 7 月 24 日都来报到了。这次会议的安排是：上午望江机器厂的邓长春代表总部作形势报告，之后由周应古汇报两大总部谈判情况，并传达双方达成的《关于立即停止武斗，抓革命促生产的协议》。下午分组讨论。

李木森作为“井冈山”总部的一号勤务员，主持上午会议。他宣布了当天会议安排后，就请邓长春作形势报告。邓长春急步走上讲台，神情严肃，语调沉重地告诉大家：“文化大革命已经进入十分关键的阶段，山城的形势十分严峻……”

他用粉笔在黑板上画出了一幅简图，像军事指挥员一样向大家讲解说：

“‘815’派攻打‘建设’、‘长安’兵团，虽然没有捞到好处，两个厂反而被军工‘井冈山’占领，但是，‘建设兵团’和‘长安兵团’仍处在‘815’派的包围中，特别是‘长安兵团’，一面临水，三面被包围，形势十分紧张。‘江陵兵团’应帮助‘长安兵团’尽快摆脱困难处境，‘建设兵团’也应设法变被动为主动。望江‘东方红’虽然在厂里是一统天下，形势比较好，但望江厂地处峡口地带，是水上交通的咽喉要冲，是兵家必争之地，肯定会成为‘815’攻打的重点。如果望江失守，‘反到底’的退路都没有了。因此，望江‘东方红’一定要死守望江，保住望江……”

就在邓长春讲得起劲之时，阶梯教室的门外突然冲进一群人来，是江陵厂的军工“91 纵队”的胡光全、刘学书、庞长康等年轻人，为首的是他们的队长李朝兵。他们一个个满脸杀气，李朝兵边走边喊：“哪个是军工总部负责人？”

李木森立即站起来回答："我就是。"

他们认识江陵厂的李木森，一把将他推开说："你是'工总司'的，你走开!"继续往前走。

望江厂"东方红"的一个勤务员走过去阻拦，指责他们说："你们干啥子？我们这是在开兵团以上勤务员会议……"话没说完，就挨了一耳光。几个军工"91"的年轻人涨红了脸嚷着："工业校的革命小将在流血，你们还在这里安安逸逸坐起开会!……"

邓长春异常冷静，虽然他们厂里的勤务员挨了打，他也没发火，边迎过去边说："'91'的战友们，别激动，坐下来给大家讲讲情况……"

几个年轻人坐下来，你一言我一语地讲了刚刚发生的一件大事：就是化龙桥的工业学校被"815"派攻占了！而且，"815派"这次动了枪!

"我们从红岩嘴下山，打算去救工业校'红岩兵团'，走了一阵，被一挺机枪封锁了路口。我们只有手榴弹和几把孬手枪，过不去……我们要求总部赶快把枪发给我们，我们一定可以把'红岩兵团'的小将救出来!"

一向好激动的邓长春，这次却十分冷静。听"91"的年轻人讲完后，他十分客气地请他们到另外的教室去休息，说总部马上研究他们提出的问题。

接下来的会上，邓长春不讲形势了，也没有和会议主持人李木森商量，自己就改变了会议原定的议题，说：

"我们现在要讨论一下发枪问题。"

因为这是个原来没有纳入议程的新问题，一时有些冷场。但

是邓长春结合刚才得到的工业校被攻占的新情况，一启发，一引导，大家情绪很快就调动起来了，不到 10 分钟，会场气氛就热闹非凡，有的说应该马上发枪，不发保不住阵地；有的说发枪之前应该先研究好怎样发，先发哪些组织，后发哪些组织，发出后如何收回……

毕竟发枪是个太大的新情况，他们也是“老造反遇到新问题”。当天的讨论没有作出一致的决定。

第二天，7 月 26 日，军工“井冈山”继续开会讨论，不过，有了“725”工业校事件，赞成发枪的意见占了大多数。

邓长春拿了一页 16 行的草稿纸，提笔写了几行文字后，递给李木森看。那上面写的大意是：“李任死党”挑起武斗，已经开始用枪屠杀革命小将了，山城文化大革命处于危急关头，为了保卫毛主席，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军工“井冈山”总部决定立即发枪自卫，发枪决定由军工“井冈山”总部常委签字负责……

纸上已经有了邓长春签的第一个名字。

李木森看完后，二话没说，也签上了他的名字。

邓长春拿起李木森签字后的文稿，依次找其他常委签字：“建设兵团”周应古、“长江兵团”刘锡邦……

军工“井冈山”总部 9 个常委中，只有“双溪兵团”的董源河没有签字。他不签字的理由是，总部还没有研究好如何发枪，更没有研究好今后如何收回枪，仓促发下去会造成不良后果。邓长春跟他争执说：“等什么都研究好了，不晓得到了哪一天了，可能我们‘反到底’派早已被打垮了……”

但是，邓长春依然说不服他，只好骂了他一声“老右倾”。

重庆军工“井冈山”总部的发枪决定做出之后，邓长春招呼李木森和周应古过去，他们 3 人开了个小会。也是军工“井冈山”总部三位核心成员的秘密碰头会，这个“三巨头”秘密会议，做出了深刻影响到重庆未来“文革”形势的重大决定：

第一，由邓长春和周应古二人，以军工“井冈山”总部的名义，到建设厂去宣讲总部的发枪决定，给“建设兵团”承担发枪责任，要求“建设兵团”将该厂生产的半自动步枪及子弹送到军工“井冈山”总部发放；

第二，发枪步骤是第一步先发军工总部所属兵团，特别是望江、长安、江陵，当然建设厂也在其中，第二步酌情发到“反到底”派各归口总部及军工总部在四川南线和北线的厂矿；

第三，邓长春、周应古、李木森 3 人，绝不能都在重庆医学院总部，万一总部失守，3 人遭遇不测，后果就会极其严重。因此，3 人立即分工，邓长春回望江，负责守住重庆水路外出要道峡口，同时组织人马立即抢占南岸的制高点黄山，最后拿下南岸区；李木森回江陵厂，负责组织解救长安，再以江陵、长安两兵团联合作战，拿下江北区，打通嘉陵江大桥，与市中区两路口、上清寺一带连成一片；周应古留守总部，同时负责大坪、杨家坪地区，巩固建设厂阵地，尽快解救空压兵团，尽早拿下大坪、杨家坪一带。

这时，李木森还未满 29 岁，周应古 27 岁，邓长春 22 岁。

本来是研究立即制止武斗的会议，结果却做出了立即发枪的决定。历史往往就是如此的戏剧。

7 月 26 日，山西太原重机厂发生了“七二六”大规模武斗。

太原重机厂全称为太原重型机器厂，是国家在“一五”时期，在苏联专家援建下的全国第一个重型机器厂，在太原市也是排在太钢、西山矿务局之后的第三大企业，有一万多职工。1965 年，原属南京军区的一支侦察兵部队集体复员转业到该厂，约有 200 余人，随同他们转业的还有一名部队首长，师副政委李久生，转业后任太重党委副书记。这批复转军人大都是广东人，其中不少人还是 1964 年全军大比武中的尖子，传说他们擒拿格斗、飞檐走壁，武艺非同一般。他们初到山西，不习惯北方生活，在住房、找配偶等问题上遇到不少困难，不少人对分配的工种也不满意，大有英雄无用武之地之感。

“文革”开始后，重机厂分成两派，一派是“太重红旗”，拥护厂长罗枫奇；另一派是“太重东野”，全称“东风野战军”，拥护党委副书记李久生。

罗枫奇是晋冀鲁豫干部。1944 年，袁振担任冀鲁豫军区水东军分区政委时，罗枫奇在其手下任第二大队政委，两人关系应该不错。在袁振、罗枫奇的影响下，太重“红旗”在“工人兵团”解体后，选择了支持刘格平。

李久生与“太重东野”一直持反对刘格平的态度，一月夺权后，李久生曾被抓过，“太重东野”与“红联站”持相同观点。

为保老首长，那批集体复员的侦察兵也于 1966 年 9 月 9 日成立了 “九九支队”，后来挂靠在本厂观点相近的工人组织“东野”麾下。

67 年 7 月，太原重机厂两派在厂内发生大规模武斗。几番较

量之后，拥有“革命的左派”称号的“太重红旗”，就是打不垮“太重东野”。究其原因，就是因为“东野”组织中有一只曾经在军营中摸爬滚打，又脱下军装穿上工装的“九九支队”。

内部解决不了问题，就得靠社会上的支援。“红总站”和“兵团”不能坐视自己麾下的“太重红旗”不管。7 月 26 日，刘格平直接领导下的山西省革委会制止武斗办公室，出面制止太原重机厂的武斗。时任制止武斗办公室的副主任、“决死纵队”的司令杨成效，制止武斗办公室的副主任、“红总站”的总指挥郝庭云，还有制止武斗办公室的副主任、“山西革命造反兵团”司令刘灏，一道奉命出击。杨成效亲自带着嫡系部队“决死纵队”，和郝庭云的“红总站”下属人马，加上“兵团”司令刘灏带着的其他兵团盟军，浩浩荡荡开到了太原重机厂，在“太重红旗”的配合下，将太重东野“九九支队”占据的大楼围了个水泄不通。先是喊话，发动政治攻势，明白告诉“太重东野”：

“你们的大方向错了，你们只有向革命的群众组织缴械投降，才是唯一的出路。”

接着是念《毛主席语录》，喊革命口号，最后一句话：“敌人不投降，就叫他彻底灭亡！”

“太重东野”据点里安装着的大喇叭也开始了反宣传广播，自然也是喊话，也是念《毛主席语录》，喊革命口号，一句话，“我们太重东野九九支队全体战士无限忠于毛主席和林副主席，你们撼山易，撼‘太重东野’难！”

杨成效火了，下令停止文斗，要用武斗来解决问题，“决死纵队”冲在前边，这可是在冶金工地上砸过钢铁的一群工人啊，

他们自组建成以来，在杨司令的带领下造反，哪一回不是所向披靡，势如破竹？

突然，“九九支队”占据的楼门大开，一队头戴柳条帽，手执长矛的“九九支队”的队员们，也喊着保卫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口号冲了出来。这些转业的前解放军战士们，个个怀着保卫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的一腔热血，参加了文化大革命。他们不能后退，因为他们知道，承认了失败，就是承认自己是“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群众组织的成员了。那结果，也就是自动将自己送进了被无产阶级专政的行列。曾经在军营中炼就的忠心和赤胆，怎么能让他们承认失败，并且自动走入被无产阶级专政的行列呢？

面对“红总站”大军压境，“九九支队”没有像其他地方的武斗人员，依靠房屋进行据守，而是迎敌而上。只见他们手持铁矛，分两列犹如蛇行，以拼刺刀的正规格斗方式跳动着，不可阻挡地冲向“决死纵队”。

正喊着口号冲向大楼的“决死纵队”队员们，没想到会突然从楼里冲出一群手持长矛的人来，纷纷向两边躲闪，一下就让对方冲进了自己队伍的腹部。这一回，“决死纵队”碰上了从未见过的对手，只听得一声呐喊，那两列蛇行的队伍蓦然分开，变化成仨一群、五一伙儿、背靠背的阵势……

又是一个从未见过的阵势和场面，还没等在场的人们反应过来，只见“九九支队”一声呐喊，每个人手中的铁矛连抡带戳，个个以一当十，以十当百。不一会儿，那些吼叫着最先冲杀过去的人一个个惨叫着倒在地上。而那些后冲上去的人顿时傻眼了，待反应过来，纷纷夺路而逃，溃不成军。“决死纵队”终于开创

了自成立以来出征的第一次败绩。

亲眼目睹了这生死场面的“兵团”司令刘灏，胆战心惊，不等杨司令下令撤退，就先带着自己司令部的一些亲信撤出了现场。其他盟军一见这种阵势，也没有人敢往上冲锋了。

而夺得胜利的“九九支队”，则又集合成一列长队，迅速退回了他们的据点——那座被工事保护着的楼房。

事后，当讲述起“七二六事件”，一个参战的攻方人员还心有余悸地向人描述说：“‘东野’的‘九九支队’好厉害，你还不知道咋回事，他们就把你撂倒了，丈把高的院墙，他们一手拿长矛，一手扶墙，嗖地一下就越过去了。你空手跑还没人家拿家伙跑的速度快，没办法，我们只得往附近的高粱地里窜……”

“九九支队”武卫结果，攻方死亡 10 余人，伤 100 余人。

太原的“726 事件”的结局，很快便上报至山西省革委会，刘格平大为震惊。第二天，在报纸上发表文章：《坚决支持太重红旗》。

刘格平不能容忍他的制止武斗办公室制止不了武斗，他很快就召开了紧急会议，研究决定：由杨成效继续组织并调遣“红总站”的人，进攻太重“东野”的“九九支队”，时间定在一个月之后，即 8 月 26 日。

杨成效也总结了失利的教训，指令“红总站”下属组织，效仿“九九支队”，招募复转军人，组织专业武斗队。并连夜打造铁矛、搜罗柳条帽等武器装备，有条件的还准备了枪支。

到了 8 月 26 日那天下午，太原重机厂“东野九九支队”占据的大楼前，再次大军云集。“决死纵队”依然是打头阵，其他

盟军紧随其后。只听杨成效一声令下，“决死纵队”开始进攻，太重“东野九九支队”的据点里却不见丝毫动静……

“决死纵队”冲上去了。”东野九九支队”的据点里依旧不见动静……

“决死纵队”终于冲进了“东野九九支队”的据点，那栋楼里还是没有任何动静……

等待捷报的杨成效，最后等到的准确消息是：太重“东野九九支队”的据点，已是一座空楼！

原来是“兵团”刘灏悄悄派人给“九九支队”通了消息。“东野”和“九九支队”大部撤至社会主义学院的“永红总司令部”，并加入了该组织。而“九九支队”为了避免被出卖的可能，则乘火车去了南京，直到两年后才重返太原。

## 第 761 回：戚本禹，又来到揪刘现场　急善后，“百万雄师”撤农村

7 月 26 日凌晨 3 时 30 分，戚本禹来到中南海外“揪刘绝食”现场。他问一名在场的群众：

“你是绝食的吗？”

答：“是。”

戚本禹：“你们绝食几天了？”

答：“7 天。”

戚本禹问：“贾健来了吗？”

北京建院“八一团”头头贾健过来和戚本禹握手。戚本禹问她：

“你绝食没有？团部有人绝食吗？”

“八一团”团部的林传明站起来说：“我绝食了。”

戚本禹又问：“张玉晋来了吗？”

张玉晋过来和戚本禹握手。

戚本禹问：“这里有没有‘新八一’的？”

答：“‘新八一’没有到这里绝食。”

戚本禹：“‘新八一’也可以来嘛。”

于是有人去叫“新八一”的人来。

戚本禹说：“在抓‘游鱼’的时候，范和贾都是受压的嘛，现在为什么要分开呢？！我是不同意这样。”

他在这里说的“范”是范兴慧，北京建工学院“新八一”的头头。“贾”就是贾健，“老八一”的头头。

戚本禹又问："你们为什么要绝食？"

学生答："刘少奇是中国的赫鲁晓夫，是毛主席身边的定时炸弹，他再也不能在中南海多呆一分一秒钟，我们一天不把他揪出中南海斗倒斗臭！我们就觉睡不好，饭吃不下。"

戚本禹微笑着说："我吃得下饭，吃饱了饭搞大批判。"他继续问道："你们这次绝食是谁领导的？"

在场的北京建院"八一团"学生狡猾的回答说："我们群众自发的。"

戚本禹："我不信。历来的群众运动都是有领导的。"

学生："这是毛泽东思想领导的。"

戚本禹明确说道："毛主席没有提倡这种做法，你们这种方式是不大好嘛。我看这样吧，你们先复食，写一些批判刘文章在报上发表。"

学生："我们写了。"

戚本禹："我怎么没看见过。"

学生："在《人民日报》7 月 22 日第二版上，"有人用手比了一个小框，"约 1000 字。"

戚本禹："那不是一篇小小的文章吗？我建议你们以'八一团'的名义写一篇比较系统比较长的批判文章，但也不要太长。""我看你们先吃饭，我们已经给你们准备饭了。"

这时戚本禹问中央文革办事组的王道明："饭准备好了吗？"

王道明答："准备了。"

据戚本禹后来回忆，他说："这样吧，不管怎么样，你们先吃饭。你们吃了饭，我们再商量别的问题。你们不吃饭，我就不接

待，我也要回去了。”

学生看戚本禹要走，就说：“好吧，那我们就吃。”

于是，每人吃了一碗面。

戚本禹：“我看这样吧，咱们是不是改一下地方？”

4 时 10 分，戚本禹将代表们领进中南海继续接见。他问：

“你们多少人进了医院？”

代表说：“有三十几人。”

学生：“戚本禹同志，有人说我们被刘少奇收买了。”“‘新八一’的。”

戚本禹：“我不信。”

学生递上一份“新八一”关于对“八一团“”揪刘绝食声明的传单，戚本禹看后说：

“‘新八一’反对你们绝食，说你们大方向不正确，我认为你们大方向是正确的，是革命行动。以后还要你们想更好的办法。”

“新八一”的代表进来后，戚本禹对他们说：“你们领导都来了吗？”他指着“新八一”的声明说：“你们写的不好。他们是你们的战友，揪刘绝食是革命行动，你们应同情他们，支持他们，他们是你们的阶级兄弟，你们过去都是被打成‘游鱼’的，我到过你们学院，我是知道的，现在为什么两派打的这样了。你们印的东西文法还可以，但写的像我们给缅甸反动派的照会一样，这是不对的。……这些同志揪刘绝食方式不太好，但是革命行动，大方向是对的，他们绝食指向刘少奇，就是为了大批判，怎么能说是背离大方向呢？这不利于团结嘛！”

“新八一”说：“《文汇报》上说从极‘左’极右的方面干扰毛主席的战略步署应怎么理解？我们认为绝食是用极‘左’的方式来扰乱毛主席的战略步署。”

戚本禹：“不能说以极‘左’，这个说法不好。这个大方向是对的，我不认为是极‘左’，我认为是革命行动，但我不赞成这种作法，看是怎么引导，你们不能泼冷水。”

“最艰苦的东西是搞他要害东西。绝食也是艰苦的，但更艰苦的东西是深入地批刘，要查很多资料，必须把他批得比托洛斯基还臭，让他永远翻不了案，也没有人敢给他翻案，如果绝食能把刘少奇批倒，我也来绝食。”

“新八一”的声明起草人主动承认了错误，承担了责任：“我写的，负责人有不同看法，我们还有一万多份没有发，搞了第二个声明，责任在我。”

戚本禹：“这同志态度好，其他的不要发。”

范兴慧：“我也有责任，我们核心组也有责任。”

“八一团”的马维真说：“这次揪刘绝食斗争是群众自发组织的。”

戚本禹：“你叫什么名字？这个倡议是不太好，自从你们第一天绝食开始，我工作都做不好，我每天都问你们吃饭了吗？有人说揪刘绝食干扰了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战略步署我认为不能说干扰党中央、毛主席，但对我是有那么一点干扰。还有我们办事处的同志。”

戚本禹问他们为什么不能联合起来？“八一团”的人指着“新八一”说：

“他们说贾健是刘邓司令部的人，是 1016 的。”

“1016”是一个“联动”组织。

戚本禹：“我给她证明她不是。”

“八一团”：“他们最近出了一本小册子《机会主义者的一面镜子——剖析贾健之流》，秘密发行。”

“新八一”：“他们把范兴慧打成赫鲁晓夫式的野心家。”

双方又开始争吵不休。

戚本禹：“别吵了！别吵了！对于过去的错误，你们都要既往不咎，在受压的时候，你们都团结在一起，翻身了，贾、张对她是有点压，不够尊重，就有点疙瘩。当权派打倒了，内部矛盾出来了，双方搞大批判，主流是好的，但双方都有 1%或 0.1%用大批判压对方，表示我比你革命，这点不好，应该去掉，一点都不要、大批判是解决中国的道路和不出修正主义的问题，绝食同志百分之百是真心揪刘，不包括百分之一或零点一以内。领导成员有的有想法，你们检查有没有？你们‘八一’、‘新八一’能否联合？”

“八一团”负责人张玉晋说：“今天就联合。”

戚本禹：“可组织一个班子，是否更改个名？八一是秋收起义的序幕，他的名字表达不了伟大的革命行动，从历史上看，八一起义有两条路线斗争的，一条是贺龙派，依靠外国，搞城市暴动，另一条是林彪路线，那时是连长，只有 20 岁，学了毛主席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他要和工农结合。《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这篇文章是光辉著作，是很了不起的，毛主席第一次提出一切权力归农会，政权问题，和专政问题，刘少奇恰恰相反。

林彪同志后来带队伍上了井冈山，成为毛主席的主力军，28 团。”

他问“八一团”：“你们是属于那条路线的呢？”

“八一团”：“是属毛主席的，林彪同志这一派的。”

戚本禹：“你们是毛主席路线这一边的，但不应分两派，你们打内战行，我不爱听。你们成立个领导班子，你们有革命委员会吗？”

“八一团”：“没有。”

戚本禹：“应成立革委会，搞个领导班子，贾健、范兴惠、张玉晋都可参加，你们两派都选些人，破除两派意见，联合起来，好！你们都先整风，火线整风，不谈别人，只谈自己缺点后，各写声明，给对方，对方有意见也不要提了。然后搞联合，建立联合班子，照顾一下，如果组长是‘八一’的，两个副组长就是‘新八一’的，关键是领导。‘八一’现在在全国出名了，你们要保持荣誉。”

学生们开始讨论叫什么新的名字好，戚本禹问警卫：“你们还没有搞来饭！”

张玉晋：“戚本禹同志，你给我们取个名吧！”

戚本禹：“叫‘毛泽东八一兵团’好不好？”

众人：“好！”鼓掌。

“八一团”有人拿出“新八一”的一篇文章：《爱团主义还是卖团主义》，交给戚本禹。戚本禹：

“你们不要吵了嘛！你们以后搞个 15 人或 13 人都可的领导班子，一半由‘八一’、‘新八一’领导中选出，其中另一半要由下面选出革命的，热心于革命的大联合的战士到领导班子里来有

好处。”

“新八一”：“刘少奇建院之行，一定要批倒批臭，这个问题要搞清，要狠批。”

戚本禹：“批刘不能局限于建院之行，要批多年以来的，从安源煤矿开始，与毛主席对抗，不要把刘少奇局限在建工学院这个问题上。他到建工学院这我是知道的。毛主席回北京后听了汇报，第二天开会，我参加了，毛主席批评了他，压制学生运动，说：‘历史上凡是镇压学生运动的，都没有好下场。北洋军阀……’刘少奇已知自己错了，受了批评，他 8 月 2 日去你们学校，过去是不让中央文革插手的，如他蹲点师大附中自己从团中央找联络员，那时他是副主席，很厉害啊。我们和他的观点完全不一样。他去建工学院通知中央文革去人，去是想掩盖自己反动面貌，装好人，表示他改正错误，因此他不得不拉中央文革来。其实他以前从来不通知我们。这样他想抬高他自己，是故作姿态，作个样子，也表示他有诚心，所以他去时就没有干好事。”

“他在《认罪书》里说不知道自己错了，8 月 5 日后才知道，这完全是假的，这是要批判的要害，其实当时他已挨批评了。但 7 月 29 日讲话，他说：‘运动你们不知怎么搞，我也不知道。’这句话很恶毒的，你们要批。要把他 7 月 29 日的讲话和在你们学院的讲话结合起来批。去建院是恐慌，想捞稻草。请中央文革去也是恐慌表现。

伯达同志叫我去的，一去就是两派，‘八一’，‘革命团’。你们在坐的有没有参加过‘革命团’的？”

有两人举手。戚本禹：“‘革命团’有许多好同志，他们是受

蒙蔽的，我一去他们就把我围起来了，我印象很深，名字记不得了，人见了还认识，我去建院之前，事先先看了双方材料，吃饭的时候，我也和‘革命团’的交谈过，在饭厅上看到贴着抓‘游鱼’的大字报，我就清楚了。我去得早，刘少奇是你们排好队才来到的，老爷架式。”

戚本禹回顾了 1966 年与刘少奇建工学院之行，最后说：

“同志们，天也亮了，下午还有会，我不想讲了，你们要搞左派大联合 ，要在火线上整风，你们先各自写个检查交给我，在这个基础上联合起来。”

“你们什么时候联合起来，我再来看你们。揪刘你们在这儿呆着就挺好，每天开会、游行、发通牒、搞勒令搞大批判。电影都拍了。”

贾健问：“我们揪斗、批刘的方案送上去了，戚本禹同志，看了没有？怎么样？”

戚本禹：“”什么方案？方案要主席订。”

“八一团”:“我们是否可以到中南海里面配合里面的造反派搞面对面斗争，‘新八一’也参加。”

戚本禹：“你们可以在这儿批，别进中南海，解放军现在在保护他，我没有权利把他交出来，毛主席作决定，也要看全国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情况，解放军现在在保护他，你们去解放军怎么办？你们可以喊叫他出来，发通牒，一下子出来后面就没有高潮了，引而不发是最厉害的战略战术。”

“八一团”一名工人说：“这几位小将都是好同志，小将在游泳中学习游泳免不了犯一点小错误和缺点。分开时我劝了不

少，有分歧可以好好说，分出去，总上纲，我认为上不上去，希望两个团好好检查，好好联合对准刘少奇……”

戚本禹：“好，对！你说得很好吗？你说的很有水平，你是党员吗？”

那位工人说：“不是，我是群众，我的儿子是党员，我不如他们，我落后了。”

戚本禹：“你说的有水平，向他们学习，你们吃好饭去战斗，搞大联合，你们会游泳吗？”

大家说：“会！上次去颐和园游了。”

戚本禹：“你们联合好了，我陪你们去玉渊潭游泳。”

众人：“你一定啊！”

戚本禹：“一定！”

5 时 30 分，接见结束。

中央文革小组专门指示，由几所解放军医院派出医疗队，到“揪刘火线”巡回医疗。

当天，由北航关育才带人来到中南海外参加“揪刘火线”活动。7 月 30 日，北航也在中南海外安营扎寨。

7 月 26 日,经中共中央批准,武汉军区发表《公告》,说“720 事件”是“明目张胆地反对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反对党中央、反对中央军委、反对中央文革小组的叛变行动。”“是在部队内和‘百万雄师’内极少数别有用心的人的煽动下进行的。而王任重和陈再道则是上述事件的罪魁祸首。”“陈再道罪责难逃，我们坚决同陈再道划清界限，坚决把他打倒。”

武汉造反派连日游行声讨陈再道、独立师与“百万雄师”。大幅标语与漫画上写着：

“武汉的天亮了，公鸡下蛋了，工总翻案了！”

游行人们高唱：“下定决心，为工总翻案；工总起来，武老谭完蛋！”

面对如此态势，7 月 26 日下午，武汉“百万雄师”常委召开紧急会，商量应该怎么办？他们觉得，中央已经表态，一些头头可能要被打倒，于是决定：组建第二套临时领导班子，将原来出头露面的人物作为一线，其他的作为二线隐蔽起来，伺机活动。他们确定今后的任务主要有三条：

（1）派人到毛主席、林副主席家乡去发动贫下中农闹事，向北京递告状材料；

（2）派人立即去北京告状；

（3）如果上两条不能实现，就采取农村包围城市。

“百万雄师”总站将所有工作人员及物资装了 6 辆大客车，由一辆吉普车带路，直奔东西湖额头湾，准备将总站转移到东西湖。

他们刚到东西湖，就听到那里的大喇叭广播，谴责“百万雄师”。于是赶紧调头，又跑到肉联。肉联也在广播，痛斥“百万雄师”。看来这里也不行了，只好转往古田三路公安学校和姑嫂树黄家大小湾一带的东风中学。到了那里，他们又商量决定：一线的几位头头仍回 3506 工厂观察了解情况，组建第二套临时领导班子在此留守等待头头的消息。

7 月 26 日当晚，俞文斌等 5 名“百万雄师”头头即开车返

回 3506 厂，留在东风中学的“百万雄师”第二套临时领导班子王少荣等人，立刻将从 3506 工厂拉来的物资作了处理。他们把 19 部电话机、上百斤一捆的袖章都堆在教室里，把长矛、枪支等武器全部丢进了一个大水塘。接着，他们又连夜转移到姑嫂树一个大湖中央的养鸡场，由那里的生产队长为他们送饭送水。当然，也在那里忍受着蚊虫的叮咬和难闻的鸡粪。

7 月 26 日深夜，回到 3506 工厂的“百万雄师”头头举行了最后一次常委会议。会议决定：俞文斌、杨道安、孙德洲、章迪杰、李本富与武汉军区领导交涉处理善后事宜。其余常委帮忙指导群众疏散，能回家的回家，不能回家的投亲靠友，尽量避免遭受重大打击。

## 第 762 回：陈再道，受批判开会被打　斗德怀，张闻天一同陪榜

就在武汉的“百万雄师”研究他们的善后之时，北京的中共中央也在讨论着同样的话题。7 月 26 日下午 15 时，周恩来根据毛泽东在“召开扩大的中央常委碰头会通知”的批示，在京西宾馆第一会议室主持召开扩大的中央政治局常委碰头会，讨论中央给武汉军区常委复电，批判陈再道和钟汉华。

那天上午，武汉赴京开会人员也接到书面通知，下午列席中央常委扩大会，讨论中央给武汉军区党委常委的复电。这让陈再道感到有些蹊跷。从造反派冲击京西宾馆和召开百万人欢迎大会的势头看，他是非被打倒不可的。打倒就意味着成了敌我矛盾。可是，在这个书面通知上，为什么又称他为同志呢？他仔细阅读了通知后面附的毛泽东批示和中央复电的原文，似乎感到还有希望。

参加下午京西宾馆扩大的中央常委碰头会议的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文革小组成员，解放军各总部、各军、兵种负责人，以及各大军区、省军区在京的负责人。偌大的会议室，挤得满满当当的。

主席台上，坐着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姚文元、谢富治等 10 余人。

武汉赴京开会人员的座位分成三排，面向会场，斜向主席台。陈再道、钟汉华、牛怀龙、蔡炳臣、巴方廷五人被指定为第一排。他们走进会议室，刚想在指定的位置坐下，便听到一声厉喝：

“不准坐，你们站着，站着听!”

陈再道、钟汉华赶紧站了起来。

会上，谢富治首先发言，他说：“‘720 事件’是陈再道一伙操纵独立师、公检法、人武部和‘百万雄师’搞的反革命叛乱，矛头是对准毛主席、林副主席和中央文革小组的……”

周恩来也斥责此次事件是一个“叛逆行为”，陈再道和钟汉华听到周恩来的严词，几乎当场瘫倒在地。

参加会议的人，一个嗓门比一个高，骂人的声音很大，而且粗话不断。叶剑英、徐向前坐在主席台上，但没有发言。陈毅和谭震林也被通知出席会议，没有上主席台，他们两人也都没有讲话。王力因负伤坐着轮椅在主席台边上。

陈再道极力否认是他指挥军区独立师、“百万雄师”去包围东湖宾馆。他说：“我只是对王力有意见，但绝对不会去反对毛主席。”“我们保卫毛主席还来不及呢，哪敢去反对毛主席？给我一百个胆，我也不敢反毛主席。我要是反对毛主席，那老百姓还不一人一口把我咬死啊!”

这天早上4时多，叶群打电话给吴法宪，要他在下午开会之前和张秀川串连一下，发言时一定要“涉及”徐向前，同徐向前划清界限，让徐向前对“720事件”表态，把揪徐向前的“旗帜”抢到手，不要为“三军”造反派抹黑。会上，吴法宪发言说：

“陈再道是武汉反革命暴乱的罪魁祸首，是镇压革命、屠杀革命群众的刽子手，是刘、邓的打手、干将和帮凶，是刘、邓复辟资本主义的急先锋!”

他接着说:“陈再道同贺龙、陶铸、刘志坚有密切关系，是

中国的苏哈托，是现代的张国焘，是钻进革命队伍里的蒋介石，是解放军的败类！蒋介石办不到的事情，陈再道办到了。陈再道盘踞的武汉军区是一个奸贼窝！”

吴法宪又揭发陈再道的老领导徐向前，他说：“徐向前早在二月份，就给陈再道打保票，说陈再道不是三反分子，有错误也打不倒。听听，有错误都不倒，是打不倒还是不许倒？武汉问题，徐向前是要负责任的。这个责任应当追究！”

陈再道出事后，本来就很紧张的徐向前听到吴法揭发他，气得浑身发抖，他站起来说：“这个话我讲过，是根据当时的情况讲的。如果有出入，可以调查了解嘛！”

随后，徐向前写了个条子，说他身体不好，递给周恩来后便愤然离开会场。

吴法宪鼓着嘴，怔了怔，突然醒过神来，眼睛一瞪，盯住了陈再道，猛冲过去：“你反革命！反革命！你逼得毛主席半夜离开武汉，总理的飞机都不得落地！和我们不共戴天！深仇大恨！”说着，他左右开弓，扇了陈再道两个大耳光。

会场哗然，陈再道急得不知说什么好，只是一再讲：“错了，搞错了，我也不知道是怎么搞错的。”

批斗的调子一个比一个高。渐渐地，有人推，有人吐唾沫。

陈再道申辩说：“说我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我承认，说我搞兵变，我总不能没有几个人，总不能不开个会吧？你们可以找人对证嘛！”

吴法宪没等陈再道说完，就和刘丰等人冲了过来，撕掉了陈再道的帽徽、领章，大声喝斥说：“不许你狡辩！”

在场的陈毅、谭震林起身离开了会场。

江青有些坐不住了。

会议休息。周恩来慢慢走到吴法宪身边，小声地批评他说："你怎么动起手来了？又不是小孩！"

开会时，一直站在会议室外的秘书、警卫人员和宾馆工作人员，利用会议休息时间，也涌入会场，对陈再道推过来，搡过去，继续批斗。周恩来的秘书周家鼎害怕出事，迅速将这一情况报告了在休息室里的周恩来。

"真是荒唐！"得到报告的周恩来一边生气地说道，一边快步赶过去制止。当他赶到第一会议室时，那些服务人员已经走了。

夜幕降临，斗争会吃完晚饭接着开。

会，已经开了六、七个小时，陈再道他们低头弯腰也站了六、七个小时。陈再道实在支持不住了，抬头看见康生正襟危坐在主席台上，一声不响，不由得心想："康生年岁大，又是中央文革小组顾问，如果他能讲一句话，也许能让我坐下。"

于是，陈再道可怜兮兮的对康生恳求说："康老，康老，我是放牛娃出身，快 60 岁的人了，念我革命 40 年……"

谁知，话还没说完，康生便大声对他说道："人可以变！你陈再道不要摆老资格，不要看毛主席称你'同志'，你就不是反革命了。30 年前，张国焘在武汉叛变中央，现在，你又在武汉发动反革命叛乱，这是张国焘事件的重演！"

接着，康生又逐条解释了中央 5 条复电的内容：

"你先不要自己解放自己，注意这一句，'并为广大革命群众所谅解之后'，懂了吗?有的人直到死都没有得到群众的谅解。

你现在就高兴起来了，不是早了点吗?”

陈再道一阵晕眩。经康生这么一解释，他明白了，要想成为人民内部矛盾，还必须得到的“革命群众所谅解”，这要等到什么时候啊？

会后，周恩来等人到林彪处开会，陈再道被押送回房间。他躺在床上，辗转反侧，难以入眠。

翌日清晨，陈再道刚起床，忽闻一阵急促嘈杂的脚步声由远而近，他还未来得及做出判断，门被“砰”地一脚踢开了。一群佩带红袖章自称是“三军造反派”的军人闯了进来，一个大个子来到陈再道的面前，指着他说：“陈再道,你罪大恶极，知道不知道?”

“我工作中有缺点，错误……”

还没等他说完，另一个人吼道:“少跟他废话，把他揪上去!”

“走，跟我们走!”在一片厉声的喝斥声中，他被连揪带扯，你推我搡，带到了 11 楼会议室，这里已坐满了戴着红袖章的军人，一双双怒火燃烧的眼睛，放射着灼人的光芒。陈再道一进去，所有人都自发站了起来，跟着领呼口号的人高喊：

“打倒陈大麻子!”

“陈大麻子搞兵变罪责难逃!”……

钟汉华、牛怀龙、蔡炳臣、巴方廷也被推了进来。那领呼口号的人，又根据揪进来的不同对象改变着口号的内容:

“打倒陈钟牛蔡巴!”

“陈钟牛蔡巴,大家一起抓!”

“陈钟牛蔡巴必须老实交待罪行!”

……

随着主持人一声喝令,陈再道被推到台前低头弯腰地站着。趁会场振臂高呼之机,他向台下瞟了一眼,只见黄永胜、邱会作坐在前排位置,一边跟着高呼口号,一边盯着台上。

一阵雷鸣电闪,狂风暴雨之后,黄永胜大声说:“陈再道,你老实交待你们搞兵变的计划!”

“对,你说,是谁指使你搞兵变的?”

“交出你搞兵变的黑后台!”

陈再道说他无论如何也交待不出来搞兵变的黑后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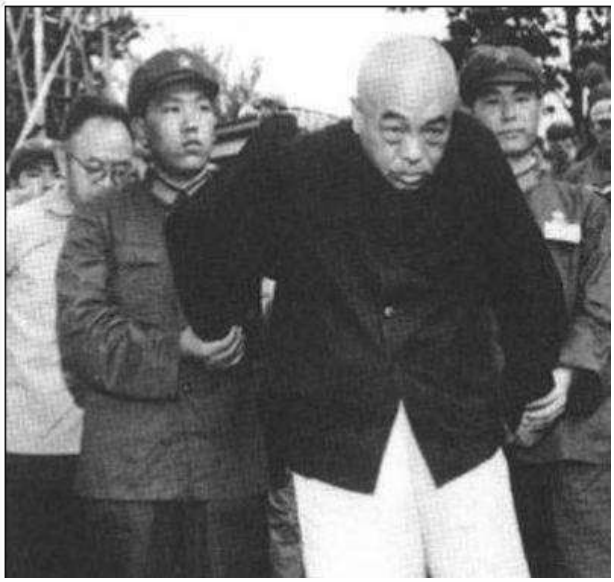
“不老实!”“反动透顶!”几个人冲上来，按着他的头，扭着他的手臂，让他做了“喷气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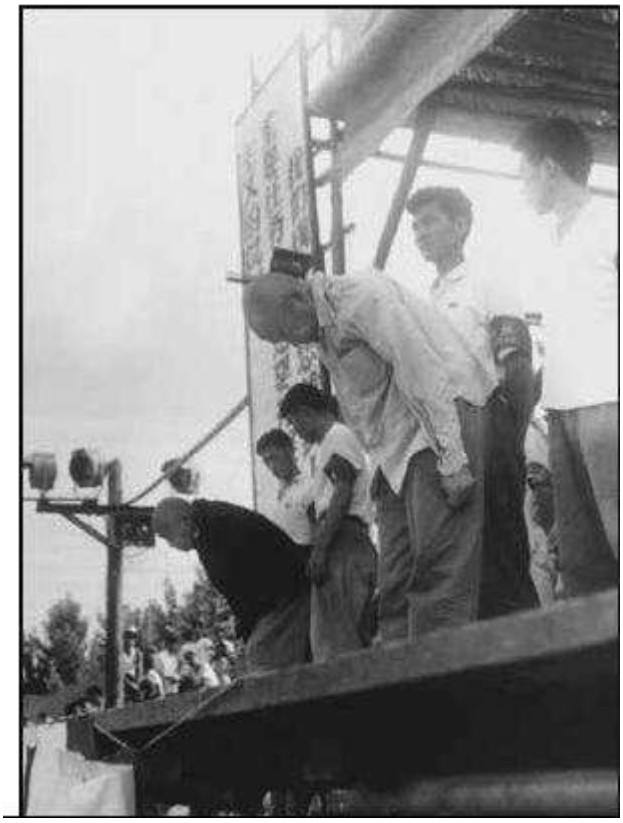
7 月 27 日,林彪亲自主持会议,宣布改组武汉军区领导班子,撤消陈再道司令员、钟汉华政委职务；调沈阳军区副司令员曾思玉任武汉军区司令员；刘丰连升三级,任武汉军区政委。

这天，《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给武汉市革命群众和广大指战员的一封信》正式发出。

就在 7 月 26 日下午，京西宾馆召开中央常委扩大会批判陈再道等人的时候，北京航空学院“红旗”和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按照事先的安排，共同在北京航空学院操场上主持了约 10 万人参加的批斗彭德怀大会，张闻天等人也被拉来陪斗。

会前，周恩来指示卫戍区解放军战士保护彭德怀，一不能打人，二不能弯腰，三不能侮辱。但实际上是难以完全做到的。批斗会上，彭德怀和张闻天一起低头弯腰，不能申辩。





批斗会结束后，他们又被强制从由两人相对、平举双手筑成的人群中低头穿过。有人朝他们拳打脚踢，有人向他们吐痰，这又使他们满头满脸都是青包紫块和唾液口水，走不到一半，他们就瘫倒了，要求喝水。

接着，彭德怀又被拉上卡车在市里游斗。

经过两个多小时的折腾，游斗回来后，69 岁的彭德怀已不能走路，由两个人把他架到屋里，躺在床上一动不动，直到 21 时多才起来，喝了一碗稀饭，走动时东倒西歪。22 时，他自言自语地说“怎么得了啊，今天打得太重了，手扭得太重太痛了，手和胳膊都拧坏了，现在不能动”。

直到 7 月 30 日，彭德怀经常坐在凳子上趴着箱子，问他为什么总是坐着，他说：“我睡下腰痛得很，坐着好一点”。

## 第 763 回：形势糟，广东掀抢枪风潮　七二六，火烧新疆医学院

广东，随着武斗的升级，在 7、8 月间也形成了一股抢枪风潮。“旗派”的第一次抢枪，是抢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里陈列的展品枪支。他们最初的计划是抢烈士陵园内革命历史博物馆的枪支展品。他们为自己找了一个“合理的理由”：那地方以前是国民党的党部，抢国民党党部的枪是革命行动。但他们派人侦察后，没有找到枪支。于是改变计划，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翻墙进入农讲所，抢走了里面所有的枪支，包括农讲所保卫人员的两支驳壳枪。由于农讲所内部的“旗派”事先给他们画好了地图，所以整个行动非常顺利。

7 月 19 日，广州铁路局武装部和驻军枪支被抢，这是广州发生的第一次向驻军抢武器的事件。从此以后，抢枪风开始蔓延，在 7 月下旬，形成了一股狂潮：

7 月 25 日，体工“红旗”几百人包围该校武装部，抢走了 87 支步枪、20 支小口径步枪、三挺重机枪和三挺轻机枪。

26 日，中山医学院“东方红”接管了学院武装部，抢走两支左轮手枪、两支驳壳枪、一支五四式手枪和几百发子弹。

员村的“地总”工人缴了一车解放军的带红外线瞄准器的冲锋枪。广州船厂“地总”在厂区埋设地雷，布岗放哨，把工厂变成戒备森严的兵营，对不上暗号的人，一律不准进入厂区，否则格杀勿论。

黄埔岛由 427 工厂的“地总”和 4801 工厂的人所控制，抢

了两艘炮艇、几门双管三七炮和多挺 12.5 高射机枪，每个山头都架起了机枪。长洲的兵械修理厂、海军的大批装备，都在“地总”的控制之下。他们甚至扬言要把一艘导弹驱逐舰驶入白鹅潭，谁敢乱动就开炮打谁。

据广州警备司令部民兵组织处 7 月 26 日的反映：“15 间大专院校中，5 所已收枪弹（中大、广医、艺专、暨大、外语），7 所的子弹、枪机已收，枪筒未收。另 3 所的枪拿不出来（中南林的枪被‘东方红’7.23 晚抢走，要自卫，不给我们。老保有枪，按江青同志讲为了自卫，我们只好留这些枪），共抢了步枪 10 支，小口径 43 支，刺刀两把，系 7.23 半夜从武装部抢走。华农，内有一专职干部把收枪问题先告了‘东方红’，枪就不给拿出来。昨晚半夜组织几百人围攻武装部要枪，枪机未拿出，因司机是‘三〇一’的，不让拿枪。（要广州军区命令才行）。以上 3 个单位共有枪支 220 支，至今未取去。

华工的枪（113 支，含轻、重机六挺）枪机取出，但枪身全部被抢。我们派武装部两同志去交涉，被扣，至今未放回。要枪机送回后再放人……”

“省直武装部今晨到省科委取枪（步枪九，冲锋枪二），科委‘红司’阻碍不让拿枪，至今 200 多人围攻，要军委规定，并要经过群众，我宣传员也在现场说要经群众才能解决，请告宣传员帮我们做工作，速解围，把枪取回。”

7 月 28 日，从广州开往北方的 50 次列车，因沿途发生武斗，被迫停开，列车退回到铁路大厦门口。车上的乘客发生鼓噪，在广铁“总司”的鼓动下，围攻军管值班人员，甚至冲击了军管会。

军管会认为这是广铁“总司”搞的阴谋，是“总司”先放出风声，说铁路交通已经恢复，然后再制造停开事件，把责任推向军管会。列车在铁路大厦前刚停下，无数标语、大字报立即贴满了车厢，甚至贴满全市，可见这些标语和大字报都是事先准备好的。

一股蓄势待发的杀气，飒飒逼来，令人心胆俱寒。各群众组织纷纷制造长矛、大刀等武器。混乱在继续扩大和升级，如果再爆发武斗，那就不再是用棍棒、石头的打群架，而是一场真正的战争了。

7 月 29 日，广州“红司”发出《告广州军区三军革命指战员同志书》，声称在广州军区司令部里，有一小撮走资派，“他们是镇压湖南、广西、广东文化革命的后台，他们是带枪的刘邓，他们是比陶铸更危险的人物！他们虽是一小撮，但他们却操纵着实权，他们掌握着枪杆子，印把子。他们就是人们常说的广谭主要构成者和总代表。”这份公开信甚至号召：“我们深信你们——人民的子弟兵，毛主席的红战士会同我们广大革命造反派一道，为揪出军内一小撮‘走资派’和广谭做出贡献。我们也深信，当军内一小撮胆敢背叛毛主席，背叛党和人民，走陈大麻子的老路的时候，你们一定会调转枪口，对准他们!!!”

同一天，“八一战斗兵团”总部发表《关于敦促广州军区、广东军区迅速改正错误的强硬声明》。声明警告：“军区必须马上、毫无保留地交回非法没收我们的队旗、袖章及其他一切物品，彻底交出一切所谓‘自首’‘交代’的黑材料。 公开承认错误。形势迫人，军区某些人必须放聪明些，决不可看着较为积极主动的

路不走，而重蹈武汉、湖南问题的覆辙。”

7 月 29 日和 30 日，广东省军管会连续两天召开会议，讨论广州地区的文革形势。会议弥漫着军队内部的忧虑情绪：

“由于武汉和湖南问题的影响，揪‘广谭’的温度更高了，比原来揪的更厉害，原来不揪的，也担心当受蒙蔽者，跟我们犯错误而提出猛揪军内一小撮‘走资派’。”

会议沮丧地认为，“我们在实际工作中犯了不少错误，有的还比较严重。在军管前，压了中大‘红旗’、‘八三一’，压了‘省革联’，错定了一些群众组织，压抑了革命左派的革命积极性。军管后，仍犯有不同程度的严重缺点错误，主要是支持左派不甚得力，帮助教育偏保组织也很不够，客观上加深了革命群众组织之间的对立情绪，而对这些缺点错误又改的不痛快，处于被动、招架应付挤牙膏的状态，与革命造反派的距离没有缩短，关系没有改善。”

军队支左人员对于武斗，既怀着强烈的厌恶和恐惧，又感到无可奈何。会议同时指出：“少数支左人员对武斗很恐惧。院校组有个片长，对武斗很害怕。有的说，当兵几十年了，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都没有被打死，这次要是打死了太不值得。有的对中央有关制止武斗的指示持怀疑态度，对规定解放军骂不还口，打不还手，特别是对打死不开枪有抵触，认为解放军也应‘文攻武卫’。371 团副团长陈七亭认为‘文攻武卫’这个口号是大毒草。他说：我这样说，可能干部当不成了，但我还是要提：一、这个口号对制止武斗不利，只会扩大武斗；二、是不相信群众的表现；三、武卫起来，挨打的是群众；四、宣传员不好做工作。”

会议普遍反映出对“文攻武卫”这个口号的反感。会议最后决定：“通过各种宣传，把武斗搞臭，特别是要做好基层工作，努力促使不同观点的各方达成协议。只要有影响的工厂、学校、机关不参加武斗，农民不进城，大型武斗是可以减少甚至避免的。对江青同志代表中央文革作的‘文攻武卫’的指示，理解要执行，不理解也要执行。这是进一步维护要用文斗不用武斗的措施。”

7 月 31 日，公安厅联合总部“星火燎原战斗队”突然宣告封闭省军管会无产阶级专政小组。“星火燎原战斗队”在公告上说：

“广东省军事管制委员会无产阶级专政小组，是由未亮相的当权派为核心组成的。组长寇庆延，副组长郭曼果、马芳。经我厅革命造反派查实，郭曼果是三反分子，马芳是走资派，寇庆延是彭、罗反革命集团在广东政法战线的黑头目。这个专政小组成立 5 个多月来，没有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没有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不仅没有起到无产阶级专政的作用，而且犯了极其严重的错误。为此，我队决定，从 1967 年 7 月 31 日 22 时起对该小组予以封闭，并提出如下三点要求：

一、立即改组无产阶级专政小组。

二、立即把三反分子郭曼果拉下马，让他靠边站。

三、专政小组必须检查前段工作，接受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揭发批判。强烈要求省军管会，在三天内明确答复我们的三点要求。何时答复，何时启封。否则，将进一步采取革命行动。”

由群众组织封闭军管会下属机构，这在广东军管以后还是头一回，不啻向军管会下了一道战书。消息一传开，另外一些群众

组织也纷纷一哄而起。就在联合总部“星火燎原战斗队”封闭了无产阶级专政小组 40 分钟后，省公安厅“东方红公社”也赶来再封一次。他们的封闭声明称：

“一、我东方红公社决定从今晚 10 时 40 分封闭省军管会无产阶级专政小组。

二、强烈要求省军管会立即改组省军管会无产阶级专政小组，寇庆延、郭曼果等党内一小撮“走资派”立即从专政小组滚出去。

三、在新的无产阶级领导班子未组成之前， 厅军管小组负责无产阶级专政小组的一切工作。

四、强烈要求厅军管小组和省军管会支持我们这一革命行动，并立即答复我们的这一正当要求。”

中山纪念堂武斗后，中大“红旗”便成立了“文攻武卫指挥部”。7 月底，中大“红旗”主要负责人在旧化学楼召开化学系红旗勤务组、教工勤务组、各年级负责人会议，研究试验和生产化学弹，一种准备运用于武斗的化学武器，并聘请化学专家龙教授为顾问。

8 月 1 日，中大“红旗”正式试验了化学弹，并印发了公告：

“我们欣喜地向全校革命师生员工，向全广州人民庄严宣布：今天，1967 年 8 月 1 日 23 时正，中山大学红旗公社第一颗化学弹在中山大学东南地区爆炸成功了。我们欢呼，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辉煌成果。”

在 8 月 27 日研制炸药和化学弹过程中，因为有人违反了操作规程引起发热而爆炸，造成一死一伤，化学楼前被炸得一片狼

藉。死者是中大学生陈秋泉，伤者叫高生亮。

当时制造“化学弹”的，不仅有中大化学系，还有中科院中南分院的化学研究所。后来，中大“红旗”还把数量不等的自制“化学弹”送给了广重、广钢、鱼轮厂、文冲造船厂、二十二中“东方红”等单位的“旗派”组织。

8 月 1 日，广州《红色暴动》等小报上发表了《论夺军权》等文章。

“东风派”也在向军管会施加压力，要求他们立即表明立场。“主义兵”组成了调查 7 月 23 日“中山纪念堂事件”的“七二三武斗事件”调查组，并在 8 月 3 日早上 8 时向军管会发出通令：

一、立刻公布七二三事件的调查报告，明确表明自己的态度。

二、保证我七二三调查组的一切方便（包括提供情况，答复问题……等等）。

三、坚决执行六六通令，将七二三事件的幕后指挥和有确凿证据的杀人凶手依法处理和马上找出被绑架人员和失踪战友。

四、保证我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的人生安全和四大自由，马上解决我被迫离校、离家的主义兵战友的衣、食、住等实际困难问题。强烈要求军管会 48 小时内答复，否则我们将采取必要的革命行动！

8 月初，广州群众抢武器达到了高潮。8 月 3 日，绢麻厂“地总”分部“红筹总部”和麻袋厂“地总”分部的 80 多人，跑到工交武装部，声言要造工交武装部的反。闹了两个多小时后，他们封了武装部办公室和文件柜的门，抢走了政工科一只装有机密文件的柜子，还抢了训练科 180 发小口径子弹和 40 发半自动步

枪子弹。

酷热的天气突然结束了，一场猛烈的台风吹袭广州，造成大树折断，房屋倒塌，为这个变幻莫测的夏天，增添了几分悲惨的色彩。8 月 5 日，台风刚刚过去，雨下个不停，中大“红旗”、“八三一”、“八一战斗兵团”、中南林学院“红色造反者”、公安“红司”、华工“红旗”、“八一八”、暨大“东方红”、军区“千钧棒”、“陆海军卫校”、“湘江风雷猛虎造反队”等组织数百群众冒雨冲击广州警备司令部办公楼。从下午 17 时 30 分开始，先冲作战大楼，再冲政治部大楼。在混乱之中，5 人重伤，89 人轻伤，打字机、电话机各砸坏一部。韩滔副参谋长和一名保密员被群众绑走了，还张贴了 23 个群众组织联名发出的封闭广州市军管会无产阶级专政小组通告。

中大“红旗”提出释放韩滔副参谋长和另一名保密员的 3 个条件：

一、交出八一战斗兵团的全部材料；

二、要黄永胜、温玉成、陈德和中大“红旗”进行一次大辩论；

三、把“八一战斗兵团”的情况如实向中央报告。

8 月 5 日深夜，1000 多人冲进市公安局，将两名值勤解放军战士击昏后，捆绑哨兵，打昏查哨的连长，砸开武器仓库大门。至 8 月 6 日，抢走各类枪支 1850 枝，子弹数万发。

8 月 6 日一天，广州全市发生了 44 宗抢武器事件，不仅是市公安局仓库，还有航运公安局及各区公安分局。抢走的武器包括轻重机枪、步枪、手枪、卡宾枪、冲锋枪、子弹、手榴弹、短

剑、刀。广州警备司令部紧急通知：对还没有抢去的分局及派出所要尽快采取措施，将枪机拿掉。

8 月 7 日，一派群众组织抢走远洋公司黄埔仓库的枪支弹药。

8 月 8 日晚，一派群众组织近百人乘车到郊区新市附近的金鸡岭枪械库抢枪，并用于第二天在中南林学院的武斗。白云机场附近的农民也携枪炮参与中南林学院的武斗，汽车撞坏了白云机场飞机跑道灯 5 个。致使 8 月 10 日的飞机航运计划被打乱。

8 月 9 日，群众组织开着架有机枪的卡车冲进广州市军管会大院，劫去一批枪支弹药。

8 月 10 日至 12 日，群众组织 8 次冲击广州警备区机关，抢去一批枪支弹药和其他装备。

8 月 10 日晚，长堤广州市人民银行保卫金库的一个连解放军的武器被抢。

7 月，新疆武斗也在升级。虽然新疆空军支持以八农“红旗”为首的新疆造反派，但是空军影响有限，而新疆军区支持保守派更加明显。因此，整个形势对八农“红旗”极为不利，他们的头头张玉麒决定发展武装，于是“红旗”到处抢枪，甚至连赛福鼎警卫的枪都下了。

此时，八农农机系的实习工厂也改成八农“红旗”的兵工厂，大量制造枪炮弹药，后来又制造“土火箭炮”、铁甲车。他们利用实习用的东方红-54 拖拉机改装“装甲车”，外部用厚钢板围起防弹，车身周围焊接“铁触角”。此物看上去“坚硬庞大”，但机动性能差，启动要用绳拉，中看不中用。石油学院造反派要借用，张文成不同意，张玉麒执意要借出，后来由“红旗战士”驾

驶从老满城行至明圆，因驾驶员向外观察受限，“装甲车”转向时“触角”插入树干，“装甲车”熄火，工学院保守派用汽油烧，将八农技校学生鞠哲烧死，农机系学生郭学仁、郝海成、何武昌严重烧伤。

由于保守派封锁八农，日常供给困难，只好在校园南边过境公路上以“借”的名义抢劫物资维持生存。

7月26日至27日，乌鲁木齐市“三促”派和“三新”派在新疆医学院进行的大规模武斗。

新疆医学院地处乌鲁木齐市三角地，是“三新”派占领的重要据点，他们在校门区和附近街道设卡，检查过往人员、车辆，拦截“三促”派的人员、车辆。因此经常发生截车、抓人、打人事件，成为“三促”派的心病。

7月24日，“三促”派头头胡良才、戴甲弟、栾景灵、王子玉、王自强等人，在乌鲁木齐市人民饭店二楼召开会议，讨论攻打新疆医学院的问题。第二天，“工农革委会新市区联防指挥部”的韩风和又召集何镛、罗九海、李起等人开会，研究确定攻打新疆医学院，决定由韩风和、朱佐兴等人任武斗指挥，指挥部设在供电公司二楼。

7月26日，“三促”派调动数千人的武斗大军，对新疆医学院的“三新”派武斗据点发动攻击，遭到“三新”派的猛烈抵抗。于是“三促”派不断增兵，实行“攻点打援”，拦阻“三新”派的三路援兵，继续进攻新疆医学院。

周恩来从中央文革驻疆人员和新疆造反派组织那里得到关于新疆医学院武斗的报告，立即急电新疆军区领导，做出明确指

示：“新医等四大院校不能打，谁打，谁犯错误。”

军区领导人闻讯召见“三促”派头头胡良才，催促他前去制止武斗，不要继续攻打。

胡良才回到“三促”派武斗指挥部后，立即召开会议，对“三促”派头头们传达周恩来指示和新疆军区负责人意见时，断章取义。“三促”派头头们经过讨论，认为“革命的胜利果实唾手可得”，不如先打下新疆医学院再说。

于是，他们急速调动各路大军赶赴武斗现场，最终近万人参加了武斗。进攻的“三促”派武斗大军，遭到据守大楼的“三新”派武斗人员以石头、砖头、石灰、棍棒、钢钎等冷兵器的顽强抵抗，受伤者急剧增加。

久攻不下，“三促”派头头心急如焚，遂下令：对于新疆医学院内坚守大楼，据不投降的“三新”派各武斗据点，先以广播进行“最后通牒”，然后使用炸药炸、浇汽油放火烧等手段，将两座楼房炸毁。

新疆医学院那些有着黄墙绿瓦，给人们带来无限美好想象的苏式建筑，霎那间浓烟滚滚。“三促”最终攻占了“三新”派抵抗最猛烈的这两座大楼，当然已被烧的乌黑。

这场武斗，不仅烧毁和炸坏了两座楼房，还打死5人，伤数十人，有400多个“三新”派武斗人员及群众被抓，有的在其后的关押中被打死，有的被打成残废。

7 月 28 日，新疆畜牧厅又发生大武斗。当天，周恩来再次指示新疆军区：

一、立即制止乌鲁木齐武斗，由军队戒严，如果红二司再死

一个人，要拿你们是问！

二、给南梁地区送面粉。

当夜，新疆军区给“红二司”打去电话，称：

（1）从晚十时至凌晨六时全市戒严；

（2）给新疆大学“星火燎原”送面粉；

（3）恢复两派关于制止武斗的谈判，等等。

7 月 31 日，中央军委又为新疆奎屯农校武斗事件发来电报：新疆军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并转奎屯驻军：

据报告，农七师农校发生严重武斗，红战团于今日攻占了红旗兵团三百余人所固守的大楼，人员下落、伤亡情况不明，请你立即指定专人，对此事进行妥善处理。

1、绝对保证红旗兵团三百多人的人身安全，不准以任何借口对他们进行迫害，不准逮捕同情和支持他们的群众。

2、对伤员要妥善治疗。

3、对双方要做好政治工作，坚决执行中央《六·六》通令。各群众组织之间，如有不同意见通过协商解决，要坚决制止武斗。

4、上述处理结果和双方伤亡的数字迅速上报。

新疆的 7 月，就这样在武斗中度过。

## 第 764 回：难住手，郑州市武斗惨烈　长埫口，武汉百万雄师终结

此时，北京协商解决河南问题的会议还没有结束，郑州又不断传来武斗的消息。

坐落在郑州二七塔西边的手工业大楼有五层之高，是当时郑州市中心的高点，“二七公社”的中心广播站就设置在这里，每天向汇集在二七广场的人们进行宣传。

“河造总”也不示弱，首先占领了与手工业大楼紧邻的新华书店大楼，在这幢楼上也安置了高音喇叭，企图压倒“二七广播站”的声音。于是，两幢大楼开始了音量的较量，今天你压倒我，明天我压倒你，互不相让，这种音量的争斗迅速发展到武力的争斗。

开始，两幢高度相差不多的楼顶相互投掷石块。接着是相互用弹弓发射钢球，露在外面的喇叭被弹子打的完全失去了形状，两幢大楼相对的窗户玻璃也全被对方击碎。

于是，拔掉“新华书店”这根插在“二七中心广播站”眼皮底下的钉子，终于列上了“二七文攻武卫指挥部”的议事日程。

攻击开始了，手工业大楼上，弹弓打出的钢球、用布条卷着甩出的石块，雨点似地砸在新华书店的房顶，压的对方抬不起头来。只见背上插着大刀的冲锋队员，扒着雨水管道向楼顶攀登，对方的石头砸在冲锋队员的柳条帽上，发出咚咚的响声，但这些年轻人全然不顾，埋着头只管向上爬。一个青年首先攀到了楼顶，就在他要翻上平台的一刹那，三枝长矛一齐对准了他，只见他一

手抽出背上的大刀，一手拉着下水管和手持长矛的守楼者谈了起来，不大一会，三枝长矛收了回去，攻楼的青年翻身上了房顶。不大一会，几十个青年都爬上了楼顶，又一会、上百名守楼者抱着脑袋被押了出来。

楼下围观的人群轰的一下围了上去，找到第一个爬上楼的青年把他围了个里三层、外三层，只听攻楼的指挥员问他："那 3 个家伙怎么没扎你？你们说了些什么。"

这个小伙子说："我告诉他们，我上来就没想活着下去，扎死我，你们守楼的一个也别想活，今天这个楼是非攻下来不可，我们只要楼不要命，别逼我们杀人，要活命就把枪放下，不想活就扎吧，这几个货还不想死，就把枪放下了。"

这场武斗只有攻楼的几个人受了点轻伤，他们到守信义，放下武器的人下了楼被训了几句话就全部放了。"二七公社"基本上兵不血刃，攻占了二七纪念塔旁仅存的一处"河造总"据点。

不久，在粮食学校大楼一次十分偶然极具戏剧性的事件引发了一场武斗。一天，"二七公社"核心组的几乎所有领导坐着汽车到省会计学校开会，万没想到，糊里糊涂的司机竟然认错了门，一下子把汽车开进了对立面的据点——郑州粮食学校。一下子抓了这么多自投罗网的"二七"大员，使对方喜出望外。

对立面高兴了，"二七公社"可炸了窝，这还了得，"二七公社"岂肯善罢甘休。很快，粮食学校大楼外面的所有路口，全部被杀气腾腾的"二七近卫军"和"五四战团"封锁了。粮食学校的门口，党言川、申茂功、任延庆等人被放了出来。可能由于受到羞辱，一脸怒气的任延庆说："你们先走，我来收拾这帮杂种。"

只见大楼所有的灯光一下子熄灭，电源被切断了。接着，大楼的西角迅速燃起了大火，手持大刀长矛的“近卫军”队员，兵分几路杀进浓烟大火中的大楼，手电光迅速地从一楼闪到二楼，从二楼闪到三楼，不到半个小时，大楼里的学生全部被赶到了平台，整个楼顶一片鬼哭狼嚎似的悲惨哭叫。

就在千钧一发之际，几十辆军车冲破封锁，制止武斗的解放军来到现场。任延庆下达了停止攻击的命令，只见手电光从三楼闪到二楼，从二楼闪到一楼，不大一会，数千名“二七近卫军”人员就全部撤离了现场，旁观者也被赶了出去。

第二天一大早，粮食学校大楼的火已被熄灭，余烟仍在缭绕，满院子的女生都在嚎啕大哭，医护人员正在为受伤者包扎伤口，粮食学校的学生无论如何没有想到，意外捕获“二七公社”的首脑，带给他们的竟然会是如此迅速和猛烈的打击。

“二七公社”在东郊组织了一个联防区，一个单位受到攻击，四面八方前往支援。一天，“十大总部”几千人围攻皮鞋厂附近的几个“二七”据点，二里岗大道所有的路口都被手持长矛、大刀的“工人纠察队”封锁了！一字排开足足二十多辆卡车，几个小厂被围的水泄不通。

几千人围攻几个小厂，面对只有二百几十号人的对手，硬是无可奈何。大路上，东边“二七公社”十几个小伙子头戴柳条帽、手持长矛，在路中央一字排开，西边是几百人的攻击人群，用布条卷着石头向十几个小伙子猛砸，企图把他们打散，但是，这十几个年青工人对飞来的石头理都不理，横枪屹立，石头砸在身上，身子晃晃依旧站稳，砸到了，后边的人将他抱下去再补上来一个。

双方僵持了近一个小时，硬是没有吓跑一人。“十大总部”的指挥员急了，吹起了冲锋号，几百名手持长枪的人向挺立在路中央的十几个工人冲去，然而冲到相距十步远左右就停住了，谁也不愿意和对面的这十几个小伙子们拼命，而这些青年工人们即不进也不退，只是横着枪，不让对手冲进工厂。

在“二七公社”坚守的工厂一个高高的厂房上面，只见“二七”一方的总指挥，膀大腰圆、浓眉大眼，背上斜插着一把飘着红绸的大刀，手里端着一个军用的望远镜，左右两边一边一个年轻英武的女工，一个持着一面鲜红的大旗，一个拄着青龙偃月刀，几个端着鬼头刀的青年工人虎视眈眈地守卫在厂房下面，这些人都挎着一个小包，手里攥着铮亮的钢珠。

很快，“二七公社”的大批援军迅速向东郊集中，“十大总部”不得不撤出了战场，东郊大战终没有形成很惨的结局。

7 月 26 日，郑州“二七公社”决定铲除“十大总部”在东郊最重要的据点——郑州烟厂。他们命令“东郊联防”，围攻烟厂“十大总部”占领的大楼。

郑州市委的“十大总部”指挥中心立即调集了西郊所有的兵力，将“二七公社”围攻烟厂的“东郊联防”，又团团围住。

就在“东郊联防“被内外夹攻的危急关头，“二七公社”的文攻武卫指挥部将全市所有的武斗队伍“二七近卫军”、“五四战团”、“工人赤卫队”数万人，迅速地调到武斗现场，又将“十大总部”的兵力围住，双方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陇海马路沿线展开了一场殊死的大战。

在郑州执行三支两军任务的 8215 部队赶到现场，将武斗的双

方强行驱散；在解放军战士的护卫下，从烟厂大楼撤下的人被送到安全地点。由于外围的战事激烈，烟厂大楼并没有被攻破，从楼上下来的人似乎都安然无恙。

在陇海马路上，却躺着 6 具尸体，这些都是战败了的“十大总部”留下的，而“二七公社”死的人都拉走了。这几具死尸身上，最少的一具还扎着 3 根长矛，看来、凶手将长矛扎在这些人身上后也怕的不轻，枪都顾不上拔出来。其中一具尸体背倚着一棵大树，手里还端着一根长矛，眼瞪的很大，之所以没倒，是被五枝长矛钉在了树上。这几具尸体胸前都戴着铁皮做的护胸，一看就是专业的武斗队员。

这次武斗双方共死了 10 人，受伤者难以统计。

7 月 26 日，毛泽东听取从北京返回上海的杨成武汇报。谈到八一建军节招待会的问题时，听说有人提出把 9 月 9 日秋收起义纪念日作为建军节，毛泽东明确反对，说：

“这是错误的。南昌起义是 8 月 1 日，秋收起义是 9 月 9 日嘛。我们是历史唯物主义者。八一建军节是 1933 年中央苏维埃政府做过决定的，这件事不能变。南昌起义是全国性的，是大政治，但政策错了，失败了。秋收起义是地区性的，不能因为我参加了，就吹上天。还有许多起义都是地方性的，与‘八一’不一样。你去报告总理，他都知道。南昌起义是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向国民党打响的第一枪。今年是建军四十周年，建军节招待会要搞好，规模要大些，请各位老帅都参加，由你致祝酒词。”

当时海军李作鹏在武汉，空军余立金在上海，不能回北京参

加八一招待会，但新华社报导参加招待会的名单中，仍有他们的名字，因为当时谁不露面，报上无名，就可能引起一场风波。

7 月 27 日，周恩来给还在武汉的李作鹏打电话，要他立即回到上海毛泽东那里去，说现在长江水温正好，如果游泳的话，由李作鹏负责选择水域，组织海军舰艇，绝对保证安全。

当天下午，李作鹏飞到上海。

7 月 27 日上午，武汉“百万雄师”俞文斌等一行 5 人按照计划，乘坐一辆苏式吉普，由杨道安开车，跟着造反派庆祝胜利大游行的车队，从汉口 3506 工厂到达武昌洪山宾馆的武汉军区支左指挥部。当晚，叶明副政委、杜宪章、夏奎部长等领导在洪山宾馆接见了他们。俞文斌提出，请武汉军区帮助他们印发一个声明，“百万雄师”的责任由全体常委承担，他们愿意听候处理。但是，要求对“百万雄师”的广大成员不要打击报复，应该让他们回原单位“抓革命，促生产”。当夜，他们就住在洪山宾馆。次日，没有听到武汉军区答复，他们决定留下孙德洲、李本富继续等待军区的决定，其他 3 人开车直奔“新华工”，希望“新华工”的一号头头郭保安等人能帮助起调停的作用，同时也希望“新华工”能帮他们将声明印发出去。

到达“新华工”后，他们被安排在一栋楼房的 3 楼，吃饭、洗澡都有人跟着。

27 日，“百万雄师”最后解体。在最后关头，总部告诫各分部头头及活动分子：一旦造反派得势，他们必定会对“百万雄师”进行报复，因此，“百万雄师”成员有必要暂时离开武汉。“百万雄师”许多人跑回老家的亲朋好友家避难。其他一般人员即回单

位，向得胜回来的造反派认错“投降”。

7 月 27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和中央文革小组，发表了《给武汉市革命群众和广大指战员的一封信》，信中说：

“武汉军区个别负责人在支左工作中，犯了严重的方向、路线错误。他们解散‘工总’这个革命组织，并且把它打成‘反革命’；他们逮捕很多革命组织的群众，也把他们打成‘反革命’。这些都是绝对不容许的，应当坚决平反，一律释放。

武汉军区个别负责人，他们利用“百万雄师”的一些受蒙蔽的群众，用造谣欺骗的手段，颠倒黑白，把他们引入迷路。

武汉军区个别负责人，公然反抗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反抗中央军委的正确指示，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反对中央、反对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竟然采用法西斯的野蛮手段，围攻、绑架、殴打中央代表。

这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造成的严重政治事件，激起了武汉市的广大革命群众和驻军广大指战员的无比愤慨，受到了全国人民的严正谴责，遭到了全国陆海空三军的强烈反对。他们已经陷入亿万军民愤怒声讨的汪洋大海之中。

对于策划这一严重政治事件的一小撮坏人和打人凶手，必须立即追查，依法严办……”

27 日这天，8201 部队的千多名指战员乘坐 40 多辆卡车在武汉三镇和大专院校举行游行，高音喇叭真诚喊出“8201 部队坚决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等口号。

7 月 29 日，坚守在姑嫂树的“百万雄师”第二套班子一直没有听到总站的消息，二套班子的领导李清绍与陈秀华判断总站

那几位头头可能被抓了，于是他们决定去找总站常委、政参部长蔡俊善。蔡俊善在“百万雄师”常委中是反对武斗的，对当时总站的蛮干有看法，主张讲究策略。此时此刻，“百万雄师”二套班子的领导觉得他是最有水平的头了，只有他才能带领“百万雄师”应付目前的局势。

当天下午，王少荣、李清绍与陈秀华走了十几个小时赶到额头湾，没有找到蔡俊善，听说他已经带人在柏泉农场安营扎寨，他们又赶到柏泉农场，和蔡俊善等上百名“百万雄师”的人会合。李清绍带来了“百万雄师”总站的公章，王少荣带来了 800 余元的活期存折。

7 月 31 日凌晨 2 时，武汉“新华工”领着武汉“公安联司”一号头头田学群等人来到“百万雄师”俞文斌等人在“新华工”的住地，向他们宣布：

“你们是‘720’反革命暴乱集团的首犯，现在对你们实行无产阶级专政。”说完就将俞文斌、杨道安、章迪杰 3 人押送到汉口市公安局 13 处的看守所牢房。在此处关押一个星期后，8 月 6 日晚，他们被戴上手铐，转往宝丰路湖北省第二监狱。几天后，“百万雄师”的 13 名主要头负责人先后入狱，集中关押在宝丰路监狱，其中 8 人直到 1972 年 3 月才解除监禁，被关押的时间长达 4 年零 8 个月，一人死于狱中。

“百万雄师”从成立到结束只有 57 天。在此期间，共发动了大大小小的武斗 29 场，平均每两天一场武斗。到“720”这天，先是全市武装大游行，散发《告全市人民书》；接着是发动成千上万人包围军区大院，劫持了中央大员。导演了一场震惊世界的

特大事件。与此相映成趣的是：这个组织自从成立以来，文章没有一篇，标语没有一条，面对全市人民的会议没有一次，与其它不同观点的组织面对面的辩论没有开展过一回。但却左右了湖北文化大革命的走势，几乎就夺了湖北的大权。

8 月上旬，躲在柏泉农场的“百万雄师”政参部长蔡俊善又带领他们极少数人转移到沔阳县长埔口，即现在的仙桃市，打算以这里为根据地。他们将“百万雄师”的汤忠云等一大批骨干接来，举办学习班，研究形势，决心组织武装斗争，上山打游击。8 月 14 日，由于他们中出了叛徒，朱长春等人带领“公安联司”开着大卡车来到长埔口，将“百万雄师”最后的据点一锅端了。

后来，“百万雄师”的作战部长汤忠云又在汉阳十里铺秘密活动，计划成立“江城飞虎队”，准备搞枪打持久战。他们的计划很快被发现，武汉市公安局请示武汉警备区同意，公安局 9 处彭海如处长下令把汤忠云缉拿归案，铁路刑警队长刘祖清，9 处的警察王正友带人去抓捕汤忠云，汤忠云逃跑过程曾经鸣枪示警，在快追上的时候，汤忠云回身夺王正友的枪，王正友和刘祖清都开了枪，汤忠云身中 4 弹，受重伤，送到武汉市一医院，抢救无效死亡。

## 第 765 回：吴焱金，“工造总司”回旧地　第三次，接见湖南省代表

6 月 24 日“百万雄师”血洗“工造总司”时，他们的一号头头吴焱金恰巧不在。事件发生后，7 月初，吴焱金和“公安联司”一号头头田学群、省直“红司”二号勤务员，省燃料总公司科长王志良去北京告状。为防止赴京途中遭到“百万雄师”拦截，他们坐吉普车先到黄石市，然后从黄石市再搭乘轮船到上海，住在锦江饭店，准备从这里转道去北京。他们找到上海交大的造反派学生，向他们介绍了武汉武斗的形势，没有得到太大的回应，上海人对武汉的情况似乎不是很关心。他们又从上海坐火车去了北京。到北京后，吴焱金重点将“六二四血洗武汉工造总司”的材料写出来，送到北京劳动人民文化宫里的国务院接待站。他们先后去了两次，接待人员没有任何表态和答复。就这样，他们住在海淀区的白石桥接待站住了约半个月，期间还到北京大学，聂元梓召集了一个大会，让他们在大会上介绍了武汉文革的情况。

7 月 20 日这天，吴焱金和田学群、“工造总司”江汉区司令部二号头头周德刚、武汉医学院三司“革联”一位姓甘的女生从北京乘火车返回武汉。7 月 21 日上午 10 时左右，火车快到广水车站时，列车广播响了：“吴焱金同志请注意，吴焱金同志请注意，武汉发生了重大事件，请你返回北京、返回北京！”

车上挤满了人，无法去问广播员，田学群说：“我们赶快下车，下车再说。”

他们几个人身上都没钱了，再回北京又要买车票。田学群说：

“我们跟车站上的人商量一下，能否搭一辆便车回武汉，我们先到江岸车站下车，了解一下情况，再商量怎么办。”

于是，他们找到广水车站管客运的人，车站上的人说：“现在没有客车经过，等一下有一辆运煤的货车经过，要停广水，你们如果不怕脏，我就把你们带到煤车上去，可以到达江岸车站。”

此刻他们归心似箭，吴焱金说：“管它什么车，只要能回武汉就行。”

不一会，果然来了一辆运煤的货车，广水车站的人跟火车司机打了招呼，火车司机就叫他们 4 个人坐在煤粉堆上。车一开动，风把煤粉吹到我们 4 人的脸上、身上全是煤粉，都成了“非洲人”。姓甘的女生说，她有位亲戚住在丹水池，可以到丹水池下车。

汉口丹水池地处武汉北郊，离市区很远。他们 4 人在丹水池下了车，到了姓甘的女生姨妈家里。大家洗了澡，换上借来的衣服，将自己的衣服洗净晒干，向小甘的姨妈问起武汉发生了什么重大事情？

小甘的姨妈说：“只看到满街都是‘百万雄师’的人，估计是出了什么大事。”

这时他们已经看到街上贴的标语：

“打倒小爬虫王力，揪出谢富治！”

“周总理来武汉，王力靠边站！”

“百万雄师大好纯，百万雄师好，百万雄师就是好！”

“百万雄师是革命群众组织！”

7 月 22 日下午，吴焱金乘车到中南路武汉军区大院门口，看到解放军都戴着“百万雄师”的袖章，大院里面乱哄哄的。他

不敢久待，赶快步行十几公里，来到华中工学院。一到华工，他就倒在一张课桌上睡着了。第二天一早醒来，听到“新华工”的学生说：“中央表态了，武老谭垮台了，‘百万雄师’完蛋了，造反派解放了！”

7 月 27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给武汉市革命群众和广大指战员的一封信》发表以后，武汉“工造总司”组织了四五十辆卡车，打着“工造总司”的旗子，一路高呼口号，从武昌关山的华中工学院返回汉口友益街“工造总司”司令部办公地。

他们回到“工造总司”后的第一件事，就是组织人员调查一个多月前“六二四”死难人员和受伤者的情况。随后，吴焱金带着“工造总司”勤务组的几个头头来到每一个死难者家里，向死难者家属表示慰问和沉痛哀悼，还到医院和伤病员家里，一一看望、慰问“六二四”受伤人员。

7 月 30 日上午，驻武汉市无线电厂的 3 名军代表主动到“工造总司”司令部赔礼道歉。“工造总司”的人大都不服气，死了这么多人，就行三个军礼？！此时，有个胆子大的人，上前两耳光打到那个为首的解放军脸上，这个军代表马上脱下军帽，两脚并齐，两手垂下，低下头来，一句话也不说，接着又被打了两耳光，“工造总司”头头们见状连忙上前扯开、制止。

四个多小时后，三辆高级轿车停在“工造总司”大楼门口，车上下来三位气度不凡的解放军干部，每人的旁边都有警卫。门卫通知“工造总司”办公室：“武汉军区首长要求见‘工造总司’负责人。”

“工造总司”一阵骚动，以为有人打了“亲人解放军”，一定闯了大祸，有人上门问罪来了。不料三位首长满脸笑容地走进办公室同大家一一握手，说明来意，武汉军区因支左犯了方向路线错误，他们是来向工造总司和“六二四血案”受害家属道歉的。

“工造总司”的头头和在场群众滔滔不绝地向他们控诉军队支持“百万雄师”、造成惊天血案的事实，三位军区首长满怀同情，静静地倾听多时，最后，“工造总司”头头们劝慰阻止了群众继续控诉下去。道别时，三位军人向大家行军礼。

“工造总司”将千辛万苦查明的23名死者照片和生平在《工造总司》报上登出。但是，当他们准备在报上刊登第二批照片时，8199 部队副师长赵奋派人到“工造总司”传话，不让他们再刊登这些死者照片。部队首长说，中央有令，不准刊登有关武斗杀人的照片，因为这些只会给文化大革命抹黑，要防止阶级敌人将这些照片传到国外，污蔑文化大革命。另一个危害是容易挑起两派仇恨，不利于做好“百万雄师”群众的转化工作。因此，除已经印出一期报纸外，第二期刊登死者照片资料的报纸没有印出。

后来，“工造总司”要求省、市革委会将“六二四”死难者追认为革命烈士，武汉警备区的领导没有答复。他们退而求其次，要求给家属发抚恤费，警司也不同意解决。吴焱金 1968 年 1 月 20 日担任了武汉市革命委员会的副主任以后，这些死者家属来找过他，吴焱金想为他们解决问题，但无力办到。尽管他一直为此奔走呼吁，但始终没有能力解决死伤者家属们提出的惩办杀人凶手、还死难者一个清白、按规定给予抚恤和治伤医疗费用这些要求。

在武汉“720事件”的前一天，7月19日，周恩来连续接见了湖南代表。接见结束后，按照周恩来的意见，47军军长黎原于7月20日当天，在周恩来的具体安排下，率“工联派”和“红联派”各5名代表和铁道部的代表乘专机赶回长沙，立即在长沙市工人文化宫与有关群众组织和铁路部门的负责人开会，传达周恩来的指示，要求迅速恢复铁路交通。

当时，湖南“工联”胡勇和长沙铁路群众组织头头均在会上保证，在当天18时前恢复铁路运输。

黎原在讲话中表示了对“工联”的支持。他说：“你们‘工联’在文化大革命当中，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是始终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的。我代表我们47军全军同志向你们学习！”

“昨天总理亲自交给我们的任务，首先恢复铁路运输，然后停止武斗。关于铁路恢复交通运输问题，刚才胡勇同志讲，铁路造反派负责的同志讲，在今天下午6点钟以前，可以恢复铁路运输。确实有许多困难，比如说，安全问题，有人打了我们的同志，抢了我们同志的枪。我们解放军一定能够，一定保证安全。”

“今天关于铁路恢复运输，只是一个开始。现在根据总理指示，中央谈判的精神，首先要停止武斗。当前急务之需，就是要停止武斗。我们47军也是责无旁贷的，也是应该挺身而出的。”“昨天总理交给我们这个任务，两团今天的谈判，也是这个问题，谈停止武斗，要达成协议。总理今天要听两个消息，第一个消息是听火车复车，开出第一列车；”与会人员热烈鼓掌。

黎原接着说：“第二个消息是我们长沙‘工联’与‘红联’

达成停止武斗的协议。”

但是，就在这天，武汉事件爆发，部队再次受到冲击，长沙可能达成的一些平衡再次打破。

7月26日下午，黎原军长带着谢若冰等人去机场，经过大托公社冻肉厂附近，谢若冰等5人被“红联”抓走。下午18时，又有5000多人冲进湖南省军区司令部，占领所有楼层，包括保密楼 ，军事档案和一组密码被拿走。

同一天，湖南47军415团6连驻地被群众组织冲击，军火被抢，士兵受伤，副连长刘美展在队前试图劝说，派性群众向部队开枪射击，刘美展指挥部队干部战士卧倒，不准开枪还击，自己被击中右胸牺牲。

当晚23时多，又有200多人冲进去湖南马坡岭国家军火仓库，拉走3卡车军火。事件发生后不到3个小时，7月27日凌晨2时15分至5时10分，周恩来、戚本禹、杨成武、黄永胜、吴法宪第三次接见湖南代表。当他们进入会场时，全体代表高呼：“毛主席万岁！祝毛主席万寿无疆！祝林副主席永远健康！祝总理及其他中央首长身体健康！”

周恩来说:“祝你们健康!黎原同志来了没有？请坐前面来!”

黎原走过来，在周恩来左边坐下。

周恩来：“现在，先问一个问题，47军黎军长这次回去处理问题，又顺利又不顺利。有些事情办了，有些事情没有办好。马坡岭有个军火仓库被抢了枪。是哪一派去抢的？当然，我们对你们‘工联’是很相信的！你们‘工联’知道不知道？”

“工联”代表回答道：“不知道。”

周恩来："军区认为是'工联'搞得。我们接到总参作战部转广州军区的报告，26号晚11点多200多人冲进去，已经拿走3卡车东西。你们打个电话回去问一问，是不是有'工联'所属的组织参加了？"

"工联"代表黄振东："我们根本不能去人，因为那里是'高司'、'红联'的天下。我们到不了城外，设的有卡子。'工联'不会这样做。"

周恩来继续询问调查马坡岭军火仓库被抢一事，"红联"、"工联"的代表均不知道此事，也不承认是自己的组织所为。

"工联"代表提出："马坡岭附近有个农学院。"

周恩来："程元公同志，要农学院电话。如果两派都不承认，我们派军用直升飞机去，如果和两派都没有关系，那就是乌合之众，假借你们的名义。我们派军队去，不能开枪就捉他几个，好不好？"

众人回答："可以！"

周恩来接着说："你们不是有了协议吗？写了协议又去破坏。你们不能这样搞法，臂章也没有，番号也没有。你们应该光明磊落，如果抢枪真是为了自卫，提出来可以考虑嘛！你们这样搞乱了。军队又不能开枪，你们不是欺侮军队吗？你们还承认最高司令部吗？你们看看，尽管武汉这样，独立师的参加了'百万雄师'，'百万雄师'就是'百万雄师'，'三新'就是'三新'，'三钢'就是'三钢'。现在搞的长沙连武汉都赶不上，连臂章都没有。为什么长沙搞成这个样子呢？中苏大厦问题就是化装的'六号门'，现在又化装夺枪，这完全不是堂堂正正地搞革命。'百

万雄师’犯了错误，但他也有臂章。长沙到底是哪里搞的？这么多枪都被谁抢去了？黎军长也搞不清。你们愿意这样继续下去吗！不是你们的人，你们要发表声明。‘红联’代表哪些组织？”

“高司”占先礼站起来回答：“‘红联’有‘高司’……。”

周恩来：“你是占先礼？你能负全责吗？你是‘高司’的，你代表‘红联’就要作数，可要代表到底！‘公检法’多少人？”

吴菊聪答：“500多人。”

周恩来询问了省、市“公检法”和“高司”有多少人？又问与“高司”红卫兵有相同观点的有多少人？有没有袖章？接着，他又了解“红联”派的农民组织“贫下中农造反军”的情况，该组织负责人鲁庆祥回答说：“我们成立了长沙地区农代会筹备委员会，有69万4千多人。”

周恩来：“那么多？我问你，你能对长沙市农代会负责吗？如果农民进城搞武斗你能负责吗？”

鲁庆祥答道：“我能负责。”

周恩来：“好，我就是要你负责。”

“工联”派农民代表揭发：“农代会我了解，是武装部的御用组织，到处对‘工联’造谣！”

周恩来：“我正是因为它是通过武装部组织的，所以才让他负责。”他指着“红联”派鲁庆祥再次强调说：“你说了话要算数！”然后问：“广播电台的情况呢？”

电台“红联”派回答：“我们电台是军管单位，有300多人，今天‘工联’他们又冲了电台。”

“工联”代表胡宜民说：“报告总理，省电台军管是陶铸一

手批的。现在电台的负责人，也就是军管人员，是九·二四抓黑鬼的！对于这样反革命假夺权机构，我们就是可以冲。”

周恩来：“夺权的问题，如果错了，可以改变，但是你们不应该冲。夺枪，就会发生连锁反映，造成无政府状态，对长沙有什么好处？军区瘫痪了，湖南军区没信用了，你们能把长沙治安维持好？”

“红联”派说：“‘工联’无视湖南军区和长沙警备司令部，成立所谓‘革命治安指挥部’。”

“工联”的符子如分辩道：“‘公检法’的人都逃跑了，流氓阿飞放出来了，我们抓了凶手，军区不收，警备司令部不收，‘公检法’也不收。我们就成立‘治安指挥部’，这是革命行动。”

周恩来问：“你们能维持治安吗？”

“工联”黄振东答：“过去我们能够维持。‘公检法’放出了500多流氓阿飞，现在比较难维持了。”

另一位“工联”派代表补充道：“与47军合在一起能维持治安。”

周恩来：“是啊！没有军队你们怎么能维持！你们能制止已经发展起来的武斗？你们的制止武斗指挥部也管不了！”

周恩来接着问冲击广播电台的事。

广播电台的代表汇报说：“昨天他们冲了电台，抢了枪！”

周恩来：“打个电话问一问，广播电台冲进去了没有？你们冲进去想接管武器吧？”

“工联”代表朱顺祥：“不是，我们是冲击电台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周恩来："你们要去冲击，就要把那个警卫连交械，不解除军队武装能冲进去吗？"

"工联"派分辨说："我们没冲，我们不会夺枪，可以通过合法手续。"

周恩来："不要辩论，这件事好办，叫中央广播电台打电话查一下。联络员同志打个电话。现在到处抢枪，这是当前要解决的。"

接着，周恩来又询问"红联"派的"真理军"、"革命工人造反军"和"红流"组织的人数及情况。当他问到"红色怒火"是否有人来时，"高司"占先礼说："'红色怒火'与我们没关系。"

"工联"派叶财宝说："他们有联系，有证明人。'红色怒火'特务连连长在北京，住在西苑旅社，叫王克俭。"

周恩来："啊！特务连连长！联络员同志，派车把他接来。"

叶财宝立即随车去找被他们抓住后策反过来的"红色怒火"特务连副连长王克俭。

周恩来接着询问"红色怒火"的情况，"工联"派黄振东说："我汇报一下'红色怒火'的问题。'红色怒火'就是'长保军'、'八一兵团'的变种。"

周恩来奇怪："是'红色政权保卫军'的？我们不是取缔了吗？是谁组织的？有高干子弟吗？是不是和'联动'差不多？"

占先礼："报告总理，这个情况我给你说……"

周恩来反问他："你不是不晓得吗？这个人怪得很！我一调查，你又来插嘴，你这不是怪事！"

周恩来指着黄振东说：“你继续讲。”

## 第 766 回：太困难，按下葫芦浮起瓢　终于签，《制止武斗的协议》

黄振东说“红色怒火”里面都是“红色政权保卫军”的“坚定分子”。

作为“红联”代表进场的刘秀英解释说：“‘红色怒火’肯定是和‘高司’有联系的。我原来是支持‘工联’的，‘六·六惨案’后，我看见打死了很多‘高司’的，我又不支持了。现在的‘红色怒火’大部分是18岁到25岁的年青人，没什么政治目的，是打抱不平的，是专打‘青年近卫军’的，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蒙蔽。他们有些是原‘红色政权保卫军’的，要正确引导。”

“工联”朱顺祥反驳她：“她刚才的发言是脱离两条路线的斗争来谈的。”

黄振东继续说：“‘红色怒火’在警备司令部备了案，造了名册。”“‘红色怒火’是李副司令的儿子李政、刘子云的女儿最初建立的。他们因为‘红色政权保卫军’被解散，有满腔的怒火，所以才叫‘红色怒火’！他们有四条纲领：1、不参加夺权；2、不掌握斗争的大方向；3、专门对付造反派；4、运动后期背着背包去坐牢。”

周恩来有些清楚了，他说：“这可能是他们说怪话吧！”接着问“工联”的情况。当问到“长沙工人”这一群众组织的情况时，“工联”唐忠富答：“他们是区级工厂组织的。‘长沙工人’没来人！”

周恩来问：“‘长沙工人’为什么不来？”

唐忠富借机汇报了谢若冰等人被“红联”抓走一事。

周恩来问“红联”：“你们为什么抓他们？是黎军长带去的。刚才说黎军长顺利又不顺利，这个就是不顺利，你们拆他的台！这不好，为什么要这样做？”

“红联”赶紧说：“我们已经打了三次电话，要他们一定放人。”

戚本禹问：“谢若冰被打死了没有？”

当时就在现场的黄振东说：“我是从虎口里面逃出来的，昨天下午3时，我们去机场时，经过大托公社冻肉厂附近，我们被抓走5人，谢若冰当场被打伤，头破了，血流满身，上衣撕烂了。张楚梗和其他同志也当场挨了打。”

周恩来对“红联”代表说：“‘洪流’的？是你们的？你们说不搞武斗，怎么拦了汽车？要劝他们放人。”

“红联”解释说：“‘77事件’我们有一个人被人用枪打死了，所以我们很气愤，于是就拦路，抓了他们5个人。现在，我们一定要他们放人。但是谢若冰回去后，军区、电台、公检法抢的净光净光的。”

周恩来：“谢若冰回去没给我们打个招呼。这个女学生是很能干的。”

“红联”说：“武斗是‘工联’挑起的。”

周恩来：“她不是‘工联’的，她是学校的，年青能干。她回去是想把组织发展一下，年青人总是想搞出点成绩来。”

黄振东：“不是，回去是解决一些问题。”

周恩来：“不管怎样，代表被扣被打总不对吧！我委托你们

把谢若冰、张楚梗5人放出来。你们既然听中央的，听总理的，我委托你们两位打电话回去，把这5个人立即放出来，这也是对你们的考验！”

周恩来又为7月7日“红联”一车人被扣一事给他们双方进行了一番调解。接着，他又继续问“工联”派组织的情况。周恩来追问：“‘长沙工人’拿了枪没有？”

黄振东答：“‘长沙工人’拿了枪，但他们事后打了个借条！”

周恩来：“总算还打了个借条，但拿枪不对！”

周恩来又问了省委机关“永向东”和“红色新闻兵”、“八•一九造反有理军”、“省直红勤站”等“工联”组织的情况。

然后，周恩来问叶卫东“湘江风雷”恢复后的情况。“红联”代表指责“湘江风雷”在区、县都恢复了组织。周恩来说：“‘湘江风雷’是群众组织呀，恢复起来有什么大惊小怪的？中央的批示措词不当。坏头头要抓几个，不能把整个组织看成不好的。中央也没说取消他们组织呀。你们看，现在就是对武汉‘百万雄师’，我们也没有说要取消它的组织。他们炮打中央代表团，中央文革，炮打毛主席司令部，直接把矛头对准毛主席、林副主席，我们现在都没有宣布解散他们嘛！”

戚本禹：“两个组织性质不一样。”

周恩来：“那当然，我只是说一下。”然后对叶卫东说：“他们过去压制你，你们是造反组织，我刚才只是举一个例子。就是犯了那样大的错误的‘百万雄师’还要分别对待，我们对群众和坏头头是分开的，何况你们‘湘江风雷’！你们现在和‘工联’行动一致，还是不完全一致？”

叶卫东：“基本观点一致，有些具体作法不一样。”

周恩来：“不完全一致！你们是造反派，应该说清这一点，‘工联’的同志就跟黎原同志讲过，他们都是不赞成夺枪的。但是，有些组织认为，你们军队有枪也不用。军队有‘几不’嘛。不动气，很难做到了，不动口，不动手，不开枪，后两条就得保证了。他认为军队不动手，不开枪，拿着枪也没有用，借给我们保卫保卫吧。这当然也有一点道理。但是，也不好。有了枪，就要开枪死人，所以都不能抢枪。这是群众组织，如果有人冒充‘湘江风雷’，冒充‘高司’派，这样把枪落在谁手里？武汉这样乱，也没放枪，武汉各组织做了什么事还承认，长沙就难辨别了！现在长沙抢枪的事到底谁干的也搞不清。这不好。章伯森同志，你们在那里时有这个风吗？”

章伯森：“没有，我们6月就来了。”

周恩来:“这个风恐怕是从江西传去的。现在请章伯森谈谈。”

章伯森：“最近，各县市召开了各级贫下中农干部会，‘高司’都派了人去搞什么控诉，煽动农民对‘工联’的仇恨，围攻革命造反派，在常德、益阳、湘潭都把造反派压下去了。现在约有一万多造反派被赶到长沙。”

占先礼：“章伯森说‘高司’下乡，我们没有。当着总理的面撒谎！‘66’以后，我们被逼有的跑到湘潭，有的跑到广州。”

刘友桂：“他们派人到我们郊区煽动贫下中农进城，我们把他们赶跑的。”

岳阳代表：“报告总理，还有1000多人被保守派和农民围困在洞庭湖中，已经4天4晚了。他们还架起了机枪！”

常德代表："我们常德地区，'红色怒火'去了300多人，带头的是'高司'矿冶的张福喜，在常德挑起武斗，结果打死了许多造反派组织的负责人，还打伤了许多人。萧士昌就是一个，他的头被打了5个洞，现在已来到了北京。"

周恩来："不要详细谈了！你们有几个组织是不是把军区司令部占了？"

叶卫东声明："不是我们，是不明身份的人去的。"

周恩来："龙书金同志，你们的消息是什么人进去的？"

龙书金回答："我们有个报告，冲军区的有'工联'、'永向东'、'湘江风雷'的'挺进纵队'、'六号门'、'青年近卫军'、'孙大圣'、'韶山公社'、'红工会'、'长沙工人'……以及外地来长沙的。"

周恩来对湖南省军区被群众占领，密码本被抢十分不满意，他问龙书金："所有的地方都进去人了吗？"

龙书金答："都进去了，宿舍都冲进去了。"

周恩来："你们没武装？"

龙书金答："有，统统被夺走了"。

周恩来："你们不能守一下？"

龙书金答："不能还手。"

周恩来："江西也没开枪，守住了。"

龙书金："他们有些是从后墙来的。"

周恩来："你们军区大院有多少人？"

龙书金："1000人，连家属小孩。"

湖南省军区门诊部护士、造反派孙素洁很愤怒地站起来说：

“不是的，我来时，我就看见我们那里就驻了5个连在里面。绝不止1000多人。”

周恩来：“是独立师的？”

孙素洁：“是。我们是有布置的，战士都分片保卫那些房间。我们军区大院绝不止1000人。”

龙书金：“我说的是机关。那样的话就1000多了。”

周恩来：“人呢？”

龙书金：“人没走。”

周恩来：“有5个连？”

龙书金：“没有，只有两个连。”

周恩来：“那么没用！两个连连密码都保不住！”

龙书金：“把我们的人打伤了。”

周恩来：“家里没有负责的？”

龙书金：“有好几个副司令员。”

周恩来：“没有管事啰！”

叶卫东：“抢枪的不是我们,这是龙书金的阴谋。军区那么多人,我们每次游行在门口都有四、五十人，这次冲为什么那么容易？这是变相的发枪。两个连保卫，什么东西都保不住！‘公检法’最近放出几百劳改犯，在社会上捣乱。现在‘红联’还把我当成反动头目，还说‘湘江风雷’是反动组织。我现在在总理面前，我看你抓！”

‘工联’派众人：“他们‘红联’现在还说，叶冬初是反动头目，不能当代表，还发了许多宣传品，写了许多大标语。”

周恩来：“你们把它涂掉啰！”

戚本禹：不管他那一套！

叶财宝：“龙书金很毒辣！刚才把造反派的名都点了。现在长沙街上有很多小孩子背着枪，这是哪个组织的？！我们没有抢枪。我们‘孙大圣’就没有一个人去冲军区。”

孙素洁：“军区21天以前的情况我知道，警卫是森严的。‘66’以前就准备了石头、木棒、铁棍……我们门诊部就有这些东西。这不是对待群众运动的态度，我已向中央写了信。我们的一个宿舍，不到200人，派了60多个战士。在我们办公楼前还砌了围墙，准备了吃的。球场、俱乐部、大礼堂驻的都有部队。5个连分三片，统一指挥是刘子云和芦副政委。这样的布置，进来几千人是可以努力守住的。我们军区的东西早就转移了。龙书金刚才说军区没有一点准备，这不对！”

周恩来：“龙书金同志，你们军区的东西转移了？”

龙书金：“没有。”

周恩来：“你这个司令员！我看不像个司令员！”

龙书金：“他们带着木棒子……”

周恩来：“现在在里边的人能劝走吗？”

龙书金：“我们打电话回去。”

周恩来：“是不是你们有点像张平化、王延春的逃跑主义？”

龙书金：“没跑！”

周恩来：“你怎么知道？”

龙书金：“来电话说的。”

周恩来：“电话上也可以骗你嘛！”

龙书金：“有的保密柜被砸开了。”

周恩来：“密码拿到哪去了？”

龙书金：“不清楚！”

周恩来：“黎军长你到军区没有？听到一点情况没有？”

黎原：“没有。这是在我们离开长沙后发生的。”

“工联”派：“刚才给家里打了电话，很奇怪，军区防守很周密，怎么一下子丢了？军区过去有准备，为什么突然变了，军区守卫不带枪，25号冲进去了，里边有很多孩子。附近的造反派用喇叭广播，说明这里有阴谋，不能进。马坡岭，我们哪个组织也没去，据了解是‘红色怒火’和‘高司武工队’的。现在形势很紧张。”

王家根：“军区里面是准备好了的，忽然间一下子把军区丢了，这样做是陷害47军。我刚打了电话，家里反映，是下午5点多，有些不明身份的人冲进了军区的。‘工联’的宣传车和在军区对门的省气象局《红旗》兵团的宣传站在喊：‘造反派不要进去，这是龙、刘、崔之流设的圈套。’群众反映，抢走军区东西的大卡车都是往榔梨市那边去了，那边本是‘红联’、‘高司’的天下。至于马坡岭军火库的问题，根据总理的指示，我打了电话，问了各造反派组织，没有人看到有造反派的车子和队伍往那边去！”

周恩来问“红联”派代表：“到底是军区引进的，还是你们进的？”

“红联”派：“不是我们。”

“工联”的代表继续说这次军区问题是刘子云回湖南一趟搞的鬼，是放长线钓大鱼。

周恩来："如果说是军区自己搞的，你们要拿出证明。现在还有二、三百人是什么人？在里边干什么？"

"工联"派说是湖南省军区副司令员刘子云的鬼。"红联"派坚决否认是他们的人。

周恩来问湖南省军区副政委林国兴："这二、三百人到底是什么人？林国兴同志你知道这个问题吗？"

林国兴："我不清楚！"

周恩来："你没接电话，谭文邦同志你怎么看法？"

湖南省军区政委谭文邦答："今天开了一天会，不了解。"

周恩来："就是龙书金一个人接电话了。詹才芳同志知道吗？"

詹才芳："不知道。"

周恩来气的没办法："你们丢了个司令部都不知道，真奇怪！"

唐俊光："长沙形势很严重，请中央去调查。"

周恩来："'红色怒火'的找来了吗？"

"红色怒火"王克俭站了起来，周恩来："你是'红色怒火'的？"接着问了"红色怒火"的一般情况及成立和发展情况，并问了与"高司"有没有联系等等。然后又问"工联"的"抗暴制止武斗指挥部"的情况。

"工联"回答："我们开始成立的是治安指挥部，有30多个组织，后来有62个组织。'工联'是其中的一个。"

周恩来问："医学院一直围在那里，你们是不是有权劝阻？"

"工联"派："制止武斗指挥部不是权力机关。医学院的事情发生后，我们才知道。……"

周恩来：“现在包围的情况怎样，是不是‘工联’包围的？”

“工联”派：“有一部分人参加了，以后劝退了。”

周恩来：“现在是那些组织？”

“工联”派：“是其他的一些组织。”

周恩来：“已经6天了，断了水、电，你们不劝他们退出，里面的就要铤而走险。你们怎么不打电话？”

“工联”：“不但打了电话，而且与47军一块去做了工作。对他们说不通。”

周恩来：“我看解决的办法，就是在北京的组织达成协议，双方代表签字，大家共同保证，你们能不能达成协议？”

“工联”派：“我们完全有诚意，但‘高司’不是这样。‘高司’现在万炮齐轰戚本禹，发出什么中矿中央通知，公开与中央对抗。还有‘专揪戚本禹战斗队’……”

周恩来惊讶：“专揪戚本禹？！”

“工联”派代表念传单。

周恩来：“把传单给我。”接过传单看。

周恩来指着传单说：“确实是他们干的，是反动的！你们能不能达成协议？”

“工联”派：“我们一定根据中央首长指示精神办事。但是《六·八通令》直接对抗中央，把‘工联’、‘永向东’……这些组织说成是非法组织，河西有自卫警备区司令部，他们完全不管。如果《六·八通令》不取消，协议达不成。”

周恩来：“《六·八通令》是什么内容？把它拿来。他说你们非法，我们中央说你合法嘛！协议前什么怪事情都有的，如果

协议前和协议后都一样，还要协议干什么？不要再说了。”

“工联”：“我们坚决贯彻。”

周恩来：“那我就问他们。”

“高司”：“医学院还被包围住。”

周恩来：“外边多少人？什么人？”

“高司”：“有‘工联’，有‘红旗军’。现在只剩五楼，已经断水……”

周恩来：“‘工联’造反组织别搞这个名堂，是不是控制不了了？”

“红联”派：“他们说‘红旗军’是造反派，要翻案！”

“工联”派：“‘红旗军’就是造反派，就是要翻案！我们要恢复他本来的面目。”

周恩来：“你们不要恢复那么多，不要把过去的每一件事都翻案，想把对方统统压倒是不可能的。‘湘江风雷’要恢复，但总有少数几个头头是坏的，有的组织不大纯，当然说整个组织不好是不对的。将来究竟怎么搞法？是不是要继续下去？跨行业的。‘工联’已经很响亮了嘛！很有影响，应该把这面旗子举得高高的。别搞那么多，每个事都翻案，把对方都压下去，不可能。”

周恩来问“红联”：“我现在问你们，对协议是什么态度？”

众答：“坚决拥护！”

周恩来：“你们现在还有争论的，就是第五条：‘已建立的群众性武斗组织和制止武斗组织一律撤消’这一句，你们要把‘制止’二字打上括号。已经建立的武斗组织要取消，双方进行协议，把对方名字打上括号干什么？”

“红联”派：“‘制止武斗指挥部’是指挥武斗的。”

周恩来：“你管那个干什么？！名称就是个名称嘛！”

“红联”派：“制止武斗是好事情，是不能取消的。所以要打括号。”

周恩来：“制止就有参加的意思，不要咬文嚼字啦。”

## 第 767 回：甘肃省，革筹小组刚成立　兰州市，长风厂武斗又起

“工联”派想发言谈岳阳问题，周恩来：“又是这样，我解决这个问题。不光是你们省的，还有别的省，哪有那么多时间！这个字别搞了，没意思了，以后不取消再说嘛！

你们同意了，联络员作证，章伯森同志，华国锋同志，万达同志，47军同志做工作。你们签个字好不好？你们双方既然信任他们，他们也签个字。今天下午就搞这个。

你们19号晚上达成了协议，双方派代表与黎原同志、铁道部的同志去解决铁路问题，交通解决了，又出现新的问题了。为什么黎原同志的汽车在你们(指“红联”)的地区也通不过了？这就不对嘛！这就输了理了嘛！你们现在承认打电话回去，无论如何要放人，不然不好说话嘛！

我现在再委托47军副军长郑波同志出面，你们‘工联’、‘红联’各推10个人，把主要组织都包括进去，搞调查。到军区院内看看，二、三百人是怎么回事？医学院是怎么回事？”

刘秀英：“总理，我要求回去。同时我希望协议上再加一条，要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开展整风。”

周恩来：“整风当然好了，再加的话以后说。你们加好了，不加也不勉强。

首先到医学院看看，到底外面包围的是那个组织，是那方面的人那方面劝他们撤走；如果两方都不是，大家都劝好不好？”

众答：“好！”

周恩来接着说："第二件，到医学院后，再到军区大院看看，二、三百人到底是什么人？如果是'工联'方面的，'工联'劝他们走，'红联'的，'红联'劝他们走，如果双方都不是，共同劝说。密码到那去了？要找到，总能找到个线索的。也可能你们到了，他们走了，走了也好。人撤走后，军区要自己负责，你们军区司令部不能随便再丢了！黎原同志马上通知郑波同志，你们也马上打电话告诉家里，马上把代表派出来。

第三件，对武器，许多地方都夺了武器，有些承认，有些不承认。我们现在来个号召，不管是哪方面的武器，都要封存起来。现在不要马上交回，马上交回他不干，他说我要自卫。双方封存起来，不能乱用，乱放枪。

47军调部队来维持长沙的秩序。你俩要尊重中央、中央军委的信任，这是最高统帅批准的。现在由47军来负担整个湖南文化大革命的责任，你们信任不信任？"

众答："信任！"

周恩来："章伯森同志，你信任不信任？"

章伯森答："信任！"

"梁春阳同志，信任不信任？"

梁答："信任！"

"华国锋同志？"

华国锋答："信任！"

"万达同志？"

万达答："信任！"

"龙书金同志，军区接不接受？"

龙书金答：“接受。”

周恩来：“47军办事机关设在政干学校，刘顺文同志！47军办事在你们学校，你们怎样？应该给予方便！”

刘顺文：“我们保证。”

周恩来：“47军马上调部队到长沙、株洲、岳阳、衡阳，保证铁路畅通。你们两派都要打回电话去，凡是47军的汽车。保证畅通无阻，不许扣留，扣了就是撕毁协议，谁扣留了就批评谁。

你们愿湖南乱下去吗？这种无政府主义倾向，拿枪乱放！你们把解放军的枪拿去行吗？马上到马坡岭去看看，到底是哪里来的？

你们群众组织都要带臂章或胸章。把协议签订以后，你们打回电话去，任何组织都要带臂章、胸章。凡是没有臂章、胸章的都是冒充。”

“你们要保证执行《十条协议》，拿这一条来考验你们。你们应当执行中央军委《八条》、《十条》、《六·六通令》，现在又加上你们的协议，我们在这方面来考验你们。

你们首先要签定协议。要信任郑副军长，他在政干校办起公来，10人代表住在那里，不称职的可以撤，按巴黎公社原则办事。双方各要10个人摆在那里，解决这么几件事：一件到医学院，劝他们解围；二是到军区大院看看到底是什么人；三是到马坡岭；四件，把枪支封存；五件，47军的军车完全可以通行无阻，再不能扣人。以47军为首来解决湖南问题。

医学院、军区、马坡岭要去看看。邮电、电台，47军要派部队去，轮渡也是这样。

47军办公地方在政干学校，军区有事到47军办公地点去接洽。

今天又比19号进了一步了，有了这个基础，就准备考虑怎么成立湖南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要搞大联合，不能这样长期无政府主义。

现在军区瘫痪了。今天下午军区再讨论一下，把错误检讨一下。军委研究准备改组湖南军区，加强军区。你们赞成不赞成？”

众：“赞成！”

周恩来站起来要走，叶卫东又一次指责“红联”派抓了人，周恩来：“叶卫东同志！恢复了你们的名誉，气量要大一点，刚有一点胜利，就骄傲起来，我很不放心！刚胜利一点，就把另一派压下去，他们就更要反抗！造反派么，就要像个造反派的样子！”

“红联”派代表说“工联”方面造了很多谣，要求周恩来单独接见。周恩来：“你们两方面的意见，我们都听了。你们是群众组织，就得像个群众组织的样子，我们承认你是群众组织嘛！第一次接见后，你们说我有倾向性，军区犯了路线错误，你们是受蒙蔽的，也是受害者。”

当日下午，湖南赴京汇报代表团的两派群众组织代表在《关于立即坚决彻底制止武斗的协议》上签了字。参加签字的群众组织共 62 个，签字者 82 人。47 军军长黎原和湖南省军区政委谭文邦一起，也在协议上签了字。

根据周恩来在接见时宣布的“以 47 军为首来解决湖南问题”，“47 军调部队来维持长沙的秩序”决定，黎原当即给湖南衡阳的 47 军军部打电话，向军里的其他领导传达中央的决定。

军党委立即召开会议，确定由副军长郑波带一部分干部、战士先到长沙开展工作，调查处理抢马坡岭军火仓库、冲击省军区等问题。同时留下政治部副主任赵川等在衡阳支左的干部与 139 师继续执行衡阳的支左任务，140 师移驻湘潭，141 师抽调部队到长沙，127 师抽调一部分干部到株洲执行支左任务。47 军军部由衡阳移驻长沙。此计划报中央军委批准。

8 月 1 日，长沙火车站到处张贴标语，欢迎 47 军进驻长沙。47 军先头部队乘火车分四批到达长沙火车站，受到长沙群众的热烈欢迎。在长沙东风路省体育局门前的东风广场举行了十多万人参加的、庆祝建军 40 周年的拥军爱民大会， 47 军副军长郑波在会上讲话，表示“坚决依靠以 ‘工联’等革命左派组织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派”。

这段时间，长沙警备区司令部、市公安局又先后被抢。这些抢枪行动有些是有组织的，有些是自发性的，有些甚至是少数个别人的随意性的行为。那段时期，你只要见到军人手上的枪支，都可以抢过来拿走，军人不会有任何的抗拒。在冲击长沙市公安局的晚上，市公安局早就没人了，进去的人流窜到各个房间“洗劫”，已经很难找到枪支了。在市公安局的大礼堂中间，整齐的坐着上百名部队战士，他们目睹着来来往往如潮水般的人流，齐声朗诵着《毛主席语录》，但都没有带枪。

7 月 20 日，甘肃文革问题座谈会形成了《关于甘肃问题座谈纪要》。

《纪要》说：“兰州军区、甘肃省军区两级军区在支左问题上的分歧已基本解决。”

《纪要》肯定："红联"二·五夺权大方向是正确的。兰州军区，甘肃省军区支持"红联"和二·五夺权也是正确的。但是，詹大南在"红联指挥部"工作期间，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开除了"七一战斗队"、"红战"，排斥"工联"，"红色长征团"，"赴兰红卫兵联合战斗队"；错误地结合了王世泰，打击胡继宗，开除了已结合的领导干部，造成"红联"的分裂，破坏了大联合和"三结合"。詹大南事前不请示报告兰州军区，事后不接受兰州军区批评。

座谈中，詹大南认识了错误，进行了检讨，并表示决心改正。《纪要》要求：詹大南应向机关、部队和群众，做公开检讨。

《纪要》同时指出："甘肃省军区在支左工作中发生的错误，广大干部、战士是没有责任的。"

《纪要》认为："鉴于'红三司'成立和胡继宗等同志已站出来，兰州文化大革命的形势越来越好。大家认为甘肃省可不实行军事管制，成立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建议由冼恒汉同志任组长，徐国珍、张忠、胡继宗同志任副组长。"

7月22日，甘肃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成立，中央6月12日召集的甘肃文革问题座谈会，历时月余后结束。

7 月 29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以中发［67］229 号文件批转《关于甘肃问题座谈纪要》的通知和纪要。中央认为《关于甘肃问题座谈纪要》是正确的；同意《纪要》中的六条意见；坚决反对省市机关和甘肃省军区内个别人抵制中央指示的一切行为；要求将 229 号文件连同《纪要》发至连队和人武部干事。

林彪于当天将该件呈毛泽东批示。

7 月 30 日，毛泽东对中央转发甘肃纪要批示：

退林彪同志：

此件已阅，很好，照办。

毛泽东

七月三十

就在中央准备转发《关于甘肃问题座谈纪要》期间，7 月 25 日，兰州市“红三司”派和“红联”派两派又发生了大规模武斗流血事件。

事件发生后，“红三司”的“五•一四红战团”为了“讨还血债”，于 7 月 26 日上午，派“红一团”包围了“红联”派“长风司令部”武装占据的长风机器厂大楼，并发表“严正声明”，宣布要“捉拿凶手的幕后策划者”。兰州军区也勒令“长风司令部”立即交出杀人凶手。

“五•一四红战团”以产业工人为主，下属三个团，即长风机器厂的“红一团”，新兰厂的“红二团”和万里厂的“红三团”。

在强大的攻势下，“长风司令部”许多人退出大楼。

面对“红三司”的围攻，“红联”指挥部在兰州铁道学院组成了“前线指挥部”。经头头们开会讨论，决定要“武装抗战”。一连几天，他们用卡车调集“火车头”、“八•一总部”、“反修总部”、“工联红委会”等所属组织的上万人，集结在铁道学院，每人发给长矛、马刀等武器，准备对占据长风机器厂的“五•一四红战团”发起进攻。

7 月 28 日凌晨 2 时，“红联派”出动约 5000 人，在复员军

人策划下，对长风机器厂的“五•一四红战团”，实行“包围分割，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他们以部分兵力，牵制和包围了“五•一四红战团”下属的“红二团”、“红三团”，然后以约 1000 多人身强力壮、敢打敢拼的主力军，进攻“红一团”。

长风机器厂内，“红一团”的十几个“战士”奉命组成伏击队，手持木棍，担任正面阻击。这些人熟悉长风厂环境，利用天黑条件，占领有利地形，打“伏击战”。

当“红联”派大队人马一进伏击圈，“红一团”头头一声令下，顿时“杀声震天”，双方立即展开肉搏战。

“红联”派不熟悉长风厂地形，也不了解“红一团”兵力的虚实情况，被打了个措手不及。撤退途中，又遭到“红二团”的攻击，腹背“受敌”。

双方激战 3 个多小时。黎明时分，“五•一四红战团”开始全面反击，“红联”败退，溃不成军，匆匆败逃。

“五•一四红战团”也付出一定代价，特别是担任阻击的“红一团”十几人大部分受伤。

28 日下午 16 时许，“红联”指挥部动员了全部力量，对“五•一四红战团”再次发动了大规模的进攻。他们兵分三路，先佯攻“红三团”和“红二团”，然后集中优势兵力，猛攻“红一团”。

“五•一四红战团”接连两天连续作战，人员疲困万分，战斗力下降，只好节节败退。

“红联” 派的武斗大军 2000 多人长驱直入，一直冲到长风机器厂福利区，把“红一团”十几人围困在一幢大楼上，欲将其“活捉”。遭到“红一团” 武斗人员坚决抵抗后，便放火烧楼。

“红一团”武斗人员知道被俘虏的后果将不堪设想，于是不顾一切开始反击，男女老少，一齐上阵，勇猛冲杀。石头、砖头和石灰乱飞，钢棍木棍横扫乱抡，“红联” 派的进攻者被纷纷击倒。有的躺在水沟里，有的躺在马路上，有的躺在树林里，有的倒在瓜地里。

“红三团”和“红二团”也先后出击，“红联”又被打得溃不成军，终于撤出长风机器厂。败逃时带走了武斗中抓获的长风厂的“凶手”。

这一仗，“五一四红战团”有 200 多人受伤，其中重伤 12 人，被“绑架”的职工家属 9，解放军 3 人。

“红联”指挥部的头头们对长风机器厂的大败，声称“决不罢休，要誓死复仇”。经过再次策划，提出“铲平五•一四，占领安宁后，武力征服红三司”的计划，是以铁院为基地，步步为营，先吃掉“红三团”，占领万里厂，然后向前推进吃掉“红二团”，占领新兰厂，最后吃掉“红一团”，占领长风厂。

7 月 30 日凌晨 4 时，“红联”指挥部又调集了“八•一总部”、“铁院红司”、“火车头”等组织及河北 3 厂的“红联”人员共万余人，再次向“红三团”发动进攻，很快占领了万里厂职工医院，然后冲击万里厂机要单位。

“红三团”的武斗人员奋起还击，双方展开了大厮杀。

武斗中，“红三团”有一人被用刀杀死，数人腿被打断。双方激战约 5 个小时。

“红三司”总部派出了“长征团”、“红五十一团”和“文攻武卫兵团”共 1000 多人，从西固渡董前河前往助战。“红三团”

在“红二团”、“红一团”和“援军”的配合下，击退了“红联”派的进攻，抓了“红联” 派100多人为俘虏。

这次武斗规模大，人数多，时间长，双方人员伤亡大,进一步加剧了两派组织间的对立情绪。

与此同时，7月31日下午16时，兰州一中“革联总部”出动大批人马，闯入对立派“长征团二十五团”占据的兰州二中，抢占大楼。接着抬砖、搬石，堵门窗、修筑工事，准备战斗。他们还砸开了贵重仪器室、化学药品室。双方发生武斗。

武斗事件之后，“长征团二十五团”发表声明，要求“一中革联总部”立刻搬出二中教学大楼。“一中革联总部”拒绝了“长征团二十五团”的通牒，积极备战。

随即，“长征团二十五团”的武斗人员开始对二中教学大楼实行包围。“一中革联总部”将其武斗人员集中在楼顶，双方再次发生武斗。遭到“长征团二十五团”的进攻后，据守楼顶的“一中革联总部” 武斗人员开始还击，往下扔石头。

“长征团二十五团”进攻失利后，再次提出声明，坚决要求兰州“一中革联总部”的人立即搬出二中。

武斗一直持续到晚上，“一中革联总部”一中总部的人马失利后被迫撤出二中。

8月1日早晨，“革联”派又有200多人来到二中，“二中革联总部”人员陪同察看“长征团二十五团” 的各楼防守情况，准备新的进攻计划。

下午 4时，“革联”派大批武斗人员集聚在二中校门口，在做好战斗准备后，很快逼近“二十五团”驻守的大楼前，二中校

内残存的“二中革联总部”的人员也开始往校外搬运行李。

“二十五团”头头认为情况非常紧急，决定马上撤出大楼内，武斗人员全部上新大楼顶部据守。

晚上 21 时，二中总部向“二十五团”打弹弓，并大声叫骂。9 时 40 分，校门口涌进一伙头戴安全帽、手持木棒的武斗人员，一进校就破坏了总闸，旋即向“二十五团”原驻守的大楼发起攻击。同时向新大楼扔石块。“二十五团”下楼进行还击，返回占据新楼。一场大战，重起战火。

晚上 23 时，二中总部袭击新大楼，“二十五团”予以攻击。“长征团”“四十团”的武斗人员，一起投入战斗。

“革联”派武斗人员越聚越多，二中东方红广场，南关中学等处全是“革联”派的武斗人员。“二十五团”决定撤退。8 月 2 日凌晨 1 时，二中总部的人趁“二十五团” 往新大楼撤退之机，打开新大楼楼梯北口，潜进 3 人。这 3 人往楼板上泼汽油，放火烧楼。

“二十五团”撤至新楼，只听楼梯南口轰然一声，大火冲天。有人将烧着的椅子用长杆挑进天花板，将天花板点燃。熊熊大火，使得被困的“二十五团”陷入困境。

“二十五团”撤至新楼后，决定向总团求救。“长征团”总团立即派人前往灭火。

“长征团”大批人马刚一出动，“革联”派的 3000 余人就出现在中央广场，包围“长征团”。“长征团”派出人员突围返回总部。“革联” 派几千人团团围住火场，防止“二十五团”武斗人员突围。

这次武斗事件，造成数十人受伤，烧毁大楼 1 座，直接经济损失达几十万元。整个兰州市为之震动。

## 第 768 回：赣温圳，机枪扫射列车停　第四次，接见江西省代表

虽然广州军区 41 军 121 师 7 月 12 日进入赣州后，那里的武斗得到了遏制，但是江西其他地区的形势，并没有因为 7 月 11 日江西各方代表在周恩来、陈伯达直接督促下签订的《停止武斗协议》而有所缓和。

7 月，萍乡市反对刘瑞森的“萍乡市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联合指挥部”，简称“市联”，组织农民进城，围攻萍乡煤炭工业学校学生组织“韶山兵团”，并占据市人委机关，成立“萍乡市贫下中农造反总指挥部”。7 月 13 日下午 17 时，“市联”下属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萍矿总司令部”，简称“萍总”的人员与守护在萍乡煤校教学大楼的“韶山兵团”学生发生武斗。

当时，由于武斗的升级，萍乡煤校的学生面对校外矿工、农民的围攻，人心惶惶，很多学生都离开学校回家去了，只有山东、江苏、福建等外省藉和萍乡本地的几十个学生还坚持在校。他们将教学大楼里的课桌课凳收集起来，堵塞了所有上楼的通道，每个楼梯口都有学生把守，还在教学大楼屋顶的四周都装上了高音喇叭，有两个喇叭正对着相距不过几百米远的萍乡矿务局。

由于煤校所处地势较高，煤校教学楼一播音，几乎大半个萍乡城都能听到，萍乡矿务局这边更是听得清清楚楚，于是成了“萍总”的眼中钉。“萍总”首先切断了教学楼的电源，但是学生又在晚上将发电机运了上去，还将体育组的拔河绳挂在教学楼较隐蔽的东北角，作为爬上二楼的出入通道，并利用绳索运送食物。

6 月 18 日，“萍总”组织了近千矿工围攻煤校造反派，学生退到了教学大楼的三楼，死守楼梯口。

后来又有大批农民围攻煤校。

7 月 13 日，“萍总”再次组织大批工人围攻煤校，久攻不下。当晚 20 时许，占地 1800 平方米的煤校教学大楼被人纵火焚烧。当时正值炎炎夏日，风干物燥，塞满过道的课桌椅一直通到三楼，一着火，火苗就往上窜，烧着塞满楼梯的桌椅，很快就烧到了三楼。楼顶是木架结构，火苗引着了屋顶，顿时烈火熊熊，红透了半边天，吓坏了萍乡市民。

由于“市联”人多势众，很快控制了萍乡局势。“市大联筹”及其在安源、高坑、青山、湘东等地的下属组织及人员在当地不能立足，也都纷纷撤往萍乡铁路机务段。

1967 年 7 月 13 日，教学楼被焚烧现场

被焚烧后的教学大楼

但是火烧萍乡煤校一事惊动了中央，很快就派调查组下来调查。

7 月 15 日，江西温圳发生机枪扫射 58 次快车事件，列车本来往东走，上饶通知他后退，车轨上有枕木，列车停下来就遭到机枪扫射，打死 5 人，打伤 7 人。

驻山东莱阳的济南军区 26 军接到中央紧急通知，调全军首批 10 个战备值班师之一的 26 军 76 师和坦克团紧急赶往江西制止武斗。

所谓战备值班师，就是一旦发生危急情况，一个星期之内，能够到达全国范围内的任何一个指定位置的部队。作为北方甲种师，76 师有 18000 兵员，师部及下属三个团对外的番号分别是 6011、6012、6013、6014 部队。

7 月 17 日，26 军 76 师的一个团 6013 部队，奉命进驻萍乡，执行三支两军任务。然而，局势并未稳定。从萍乡铁路机务段出来张贴欢迎解放军标语的“市大联筹”下属组织“萍矿联合司令部青山总部”人员仇浩先被“萍总”武斗队杀死。“萍矿总司令部青山司令部”人员铁正坤亦被暗杀至死。紧接着，又发生了抢

夺解放军枪支、殴打解放军指战员等一系列严重事件。26 军 6013 部队参谋长杨万明亦被打伤。

7 月 28 日凌晨 1 时 06 分至 4 点 07 分，周恩来与姚文元在人民大会堂第四次接见江西代表。其中：江西“大联筹”50 人；“联络总站”50 人；首都红代会 4 人；省委干部刘瑞森、黄先、郭光洲、黄霖、李杰庸及 26 军副军长杨栋梁和江西省军区的刘培善、吴瑞山、倪南山、徐鹏、李胜、陈昌奉参加了这次接见。

周恩来首先询问：“自从你们协议签订之后，7 月 12 日起已经半个多月了，革命派大联合筹委会方面的情况怎么样？”

这时，“大联筹”代表汇报“联络总站”与武汉“百万雄师”的联系情况，周恩来说：“讲简单一点，我一天很多会，脑子受不了。”

“大联筹”代表继续汇报，周恩来又讲：“讲直截了当一点，主要讲协议签订以后情况怎样？”

“大联筹”代表接着汇报，当他说到“‘联保总站’与武汉‘百匪’、四川‘惨匪’、河南保守派有联系，在庐山开过会”时，周恩来打断他的话说：“你们就讲‘百万雄师’嘛！不要骂！我们共产党人光明磊落。骂人是国民党作风。”

接着，“大联筹”和“联络总站”互相指责对方破坏“协议”的情况。当“大联筹”代表谈到萍乡煤校的武斗，及进驻萍乡 26 军 76 师被打伤的情况时，周恩来插话说：

“煤校房子烧了，现场有毁尸的迹象，没有找到尸首，伤的有 50 人，送鸡冠山，这个事我知道。”

接着，周恩来说到 15 日机枪扫射 58 次快车一事：“包围火

车这件事，我亲自处理的，我知道这件事，这是预谋的。上海铁路局不知道，军区也承认‘联络总站’搞的。派到温家圳的张勇布置的，动员农民用机关枪。火车本来往东去，上饶通知他后退，往西走，车轨上有枕木，停下来，农民围上车，于是，就被打了，死伤……”

“大联筹”代表接过话说：“死了 5 个，伤了 7 个。”

周恩来说：“电报说死了 2 个，伤了 10 个，可能是先前的消息。煤校的事 13 号，打列车 15 号，这两事都是协议以后的事。你们‘联络总站’在这些地方力量大，在南昌、九江小一些。”

接着，周恩来很生气的说：“你们既然达成协议，就应该遵守这些协议嘛！不能动员农民进城嘛！县武装部和你们配合，烧房子、攻打，有没有这么一回事呀？听说你们还走 3 人，5 个核心组的走了 3 个，这就不对嘛！不想谈了？汪明远是否回去了呀？”

周恩来是问“联络总站”汇报团核心人物汪明远，甘炳文、钟舜生偷偷溜回南昌一事。对他的询问，“联络总站”的代表如实回答说：“回去了。”

周恩来：“甘炳文是否回去了呀？”

“联络总站”讲：“回去了。”

周恩来：“钟舜生是否回去了 ？”

“联络总站”也说：“回去了。”

周恩来：“汪明远代表什么组织呀？”

“大联筹”回答说：“‘南柴铁保团’的。”

周恩来：“甘炳文代表什么组织呀？”

答："省委'长缨'、'燎原'的。"

周恩来："钟舜生代表什么组织？"

答："江西'保卫毛泽东思想战斗组总部'。"

周恩来接着讲："三个都去了，徐友明还在吗？"

"联络总站"代表、师院"东方红"的徐友明答："在。"

周恩来说："你是'东方红'的。"又问："陈耀辉还在吗？"

陈耀辉答："在。"

周恩来说："你是洪都机械厂的。"接着又问道："你们是不是有新的负责人产生呢？"

徐友明回答："现在还没有产生。汪明远、钟舜生都走了，代表团已经撤消，我们宣布退出'联络总站'，听候总理指示。"

陈耀辉也接着讲："我们也宣布退出'联络总站'。"

周恩来说："你们的组织都改组了，那么协议呢？"

这时候，"大联筹"代表起来发言说："他们解散是个阴谋，要破坏协议。"

周恩来："你们这样说也不对，现在的问题关键在于军区。军区必须通知军分区、武装部把民兵的枪收起来，武斗才能停止……要研究这个问题。你们接到电报，那里打了人，在北京打了人，我也相信，他们气势正盛嘛！"

这时，周恩来站起来对"大联筹"讲："你们过去是受压制的，特别是在外线，赣州死了那么多人，吉安、抚州、宜春也是一样，因为你们是造反派，先把目前情况稳定下来。"

然后他又对"联络总站"说："你们这边偏保，保守一些，还是群众组织，只要你们站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还可以存

在，还可以发展。就是被个别头头掌握了。也可以脱离他。我们从来不赞成解散组织。你们隔壁的湖南‘湘江风雷’有个别坏人，《通知》没有说清楚，军区就把它扩大化了，把它取消了。还抓了好几千人，实际上是上万人。”接着周恩来对“大联筹”说：“你们也被抓了一些人，也被取缔了一些革命群众组织，现在你们平反过来了，要采取高姿态。你们两个月在北京学习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关于纠正党内错误思想的问题》，尤其是十年前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你们双方基本上是人民内部矛盾问题，还有一些问题是少数人、个别人的问题，不要怒目相视，大方向总会走到一起来的。”

他又对“大联筹”讲：“你们原来是造反的，今后希望你们成为真正、红彤彤的、响当当的造反派。现在你们不要想压垮他们，他们犯了错误，要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按毛主席指示办事。革命不分先后嘛！不要一个造反，一个偏保就得意忘形了，今天气势就有点这样。年轻人要继续往前看，你们是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我们七、八十岁的老年人还要往前看呢！”

他又对“联络总站”的代表说：“因为说你们偏保，造反精神不旺，对我的话就不满意，其实你们过去就是受军区影响嘛！就是偏保嘛！你们要改过来，要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我欢迎、支持你们，但可不要起来打砸抢呀！如果搞打砸抢就更错了。过去军区的错误，就是对军分区、武装部发枪给农民，动员农民进城搞武斗。我的看法，”周恩来面向刘培善说：“刘培善同志就是策划、放纵的。军区要负这个责任，”然后面向“大联筹”说：“你们说对不对呀！”

“大联筹”的代表说：“对。”

周恩来：“军区要下决心，把枪收回，但是否有效，我怀疑。刘培善同志说 42 个县收回了。”

刘培善起来讲：“32 个县”。

这时候倪南山站起来说：“收回了 65 个县。”

周恩来问：“你是谁？”

倪南山回答：“我叫倪南山。”

刘培善说：“他是军区副司令员。”

周恩来：“你那么相信你们军分区、武装部呀？我就不相信，我就怀疑你们派独立营到抚州去能不能把抚州的武斗制止下来。刚才讲的都是抚州的事情嘛！军分区、武装部确实不听话。放松了几个月，已成了习惯，要很好的做工作。”

他接着说：“江西地方武装相当多，如果不把军分区、武装部发的枪封存起来，有时就不好办，枪支分开了有了事也不好办，还是先把子弹封存起来，没有子弹就好办了。”

他又对“大联筹”说：“你们夺的枪也封存起来，我是说要你们封存起来，也不要求你们马上交。这样，就把夺枪的事停止了，就把武斗停止。情形就可改观，其他问题就好搞了。”

周恩来对“联络总站”代表说：“赣州部队一去你们就欢迎，单独开大会，部队说情况不明不好参加，你们对部队就不高兴了，散布流言蜚语。赣州学生方面犯了一点错误，军分区原来支持他，就是后来转过来丢开他，支持‘联络站’。在赣州叫筹委会，名称不统一，动员农民进城，到处找头头、抓人、大砍、大杀，也不是统统赶走了！有的禁闭了，搞得造反派鸡飞狗跳，你们部队，

你们是多数嘛。不管是保，是造反的，都要敢于革命，严于自己，宽于别人，不是像你今天这样，一点小事争吵个不休，要抓主要环节，帮你们解决你们要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就要有伟大气魄，与另一派联合。已经革命的要更革命，彻底革命。走错了路，也要革命，保守的要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野战军是按毛主席指示办事的。军队去了，你们双方都支持，表态要郑重。造反没有固定，造反过了火，可能走向反面。保守的也可以后来者居上，所以要戒骄戒躁，不要对自己的错误放松。现在就是要使江西形势怎么样走到比湖南、湖北快一些”

他说：“《协议》是你们达成的，我们是对你们组织的客观表现加以评论。对中央的评论不满那是不对的，如果回去气不过，越搞越凶，那就要转到人民内部矛盾的边缘，走向绝路的是少数。”“对江西的问题，我们正设想一个方案，最好能促成成立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不要再搞军管了。”

“批判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你们那里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是谁呀？可以不点名，要点名只能点一个方志纯，你们首先把矛头对准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名字暂时不点，方志纯总是一个，单点一个太少，保留到将来再点更好，太快了不好。”

接着，“大联筹”的 3 个安源老工人汇报萍乡武装部挑动血洗萍乡煤校的事情。他们是目睹者，周恩来听得非常仔细，3 位老工人讲得痛哭起来，周恩来听得也很难过，他将萍乡市武装部张锦才叫到前头，又对济南部队 26 军副军长杨栋梁说：“你打一个电话给你们的师长，在两天之内把这个事情弄个一清二楚。”

他又对萍乡武装部张锦才讲："你们武装部也报一个情况来，看对不对？不准对口径！"

张锦才回答："是！"

周恩来连叫两句吴瑞山："吴瑞山！吴瑞山！你们军分区武装部又干这些事情，你们听吧！"

吴瑞山站起来讲，"我们查清楚要严肃处理。"

周恩来："处理！就是你们策划、放纵这些问题，你们的检讨到现在还是忸忸怩怩，还说客观的、思想影响的、军区武装部都是一样，抚州、宜春、莲塘、萍乡、赣州、吉安没有一个不是这样的！"

肖华说："要把策划的祸手抓起来，严肃处理。"

周恩来接着对张锦才说："你知道吗？王世清，他亲自策划的。"

然后又对吴瑞山讲："吴瑞山，要不是你们亲自策划指挥，他们怎么敢这样做呀？"

周恩来问安源三个老工人："你们做了多少年工啊？"

一个老工人说："我 29 岁到安源，现在 74 岁。"

周恩来："你一口长沙话吗？是长沙人吗？"

周恩来又继续问萍乡煤校的一些情况，他要双方都派出几个人，一起到萍乡煤校去调查，把事情调查清楚。他接着说："现在西面的事情已调查清楚，东面火车上的事情也已调查清楚了，这些案子破了以后，一定要捉拿凶手，抚州来人了吗？要 76 师派人去侦察，肖华同志，你把电报给他们。这两个案子查一查，军分区、武装部怎么动员农民进城破坏《八条协议》，根子就找

到了。”

这时北京红卫兵递了一个条子，要求到江西去调查。周恩来说：“你们不要去插手那些事嘛。你们在那里立下了功勋，但历史是向前发展，我们江西野战部队能够解决问题，你就在这里提供意见，解决问题。”

周恩来最后说：“今天把《八条》再谈一下，两个事情证实一下，我们要处理的，组织上也要采取一些办法，以后再见你们一次，然后好回去闹革命。”

## 第 769 回：查少奇，周恩来招李德生　长春打，秦化龙又成叛徒

中央文革小组得到辽宁一个群众组织的报告，说刘少奇 1929 年曾在奉天纱厂被捕过，是否也应该查一查？7 月 28 日，戚本禹给江青写报告说："建议迅速派专人赴沈阳组织 300 红卫兵(3 人一组，分 100 组共同作业)，查找敌伪档案，把刘的'自白书'找到后，即可在适当时机公布。"

江青当天就批示："立即物色 1 至 3 名同志去沈阳，照你的意见办。"

这天，中央五〇四专案组，即王光美专案组，副组长巫中等二人在沈阳驻军军政委陪同下飞临沈阳。

巫中等人抵沈的当天，就成立了一个 7 人领导小组，下设 15 人的彻查办公室，简称"彻查办"，负责此事。在以后 50 天的时间里，"彻查办"发动东北三省，查了 1929 年前后的 245 万卷档案和报刊资料，没有查到刘少奇叛变的任何证据。于是，"彻查办"又把 1929 年前后中共满洲省委工作人员和张学良时期奉天军警宪特的名单，以及奉天纱厂职工的花名册印发全东北，逐一查找名单上的人，要求"活着的查到人头，死了的查到坟头"。

7 月 28 日这天，驻守江苏淮阴的 12 军军长的李德生突然接到南京军区电话通知：要求他第二天中午赶赴盐城空军机场，那里有北京专机接他直飞北京，周恩来总理要亲自召见，直接向他交待"三支两军"的新任务。

李德生当了 12 年军长、军党委书记，一般情况下，有重要

任务，就是军区机关打个电话，再重要一点，也是军区分管的领导打来电话。军委、总部很少向军级机关直接部署任务。而现在，中央直接要他到北京受领任务，而且是总理直接下达任务。他听说过，抗美援朝时，毛泽东曾经找一些即将入朝作战的军长当面交代任务。文化大革命以来，似乎还没有这种情况出现。究竟是什么任务呢？是军事的，还是政治的？中央规定，可以带一名工作人员，是带司令部的参谋，还是带政治部的干事？从当前形势来看，与文化大革命关系很大。他要求政治部派一位干部随他一起到北京去。

7 月 29 日上午，李德生带了政治部秘书处长，赶到盐城空军机场。在那里，他看见安徽省军区司令员严光也在，寒暄后得知，都是同机去北京领命。

他们登上了等候在停机坪上的苏制伊尔-14 型小飞机，机上只有 4 位乘客。严光在飞机上和李德生谈起了安徽的情况。

飞了近 3 个小时，他们在北京南苑机场降落。中央办公厅已经派人在此迎候，将他们接到京西宾馆。

到了那里，他们看见还有喊着“打倒陈再道”的大卡车，围着宾馆转圈，高音喇叭里传出的口号声震天动地。李德生在淮阴虽然也看到造反派游行，也组织过群众集会声援武汉造反派，但北京毕竟是首都，这里的混乱状况，仍然让他震惊。

他和严光在京西宾馆各自住下。晚饭后，专车又将他们接到人民大会堂。他们随工作人员走进北大厅，只见周恩来正在里面和一些人谈话，见他们进来，立即走过来与二人握手说：“你们赶来了，很好，很好。我们到福建厅谈吧。”

李德生和严光跟随周恩来来到福建厅，只见李富春副总理、杨成武代总参谋长、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姚文元已在那里等候。

李德生认识李富春和杨成武，他和严光走过去向他们敬礼、握手。周恩来又介绍姚文元说："中央文革的姚文元同志。"他们又和姚文元相互握手。

周恩来招呼大家坐下后，开门见山地介绍了安徽形势。然后说："近来安徽的武斗越演越烈，在合肥、淮南、安庆、芜湖等地区，两派正酝酿一场一触即发的大规模武斗，中央的指示贯彻不下去，军管会指挥不灵，难以控制局面。中央对安徽的形势非常担心，非常着急。党中央决定，12 军立即开赴安徽，执行'三支两军'任务。在这紧急时刻，派 12 军到安徽，是毛主席亲自决定的。"

周恩来对李德生说："你回去紧急动员一下，立即带部队去安徽。去了以后不要陷到派性里去，要广泛听取意见，深入调查研究，把情况搞准确，最重要的是要做好群众工作，总起来说就是制止武斗，消除派性，促进联合，稳定局势，抓革命，促生产。"

接下来，周恩来请李富春讲话。李富春说："安徽省有 3000 多万人口，是农业大省，工业比重也很大。淮南的煤，是华东，特别是上海工业生产和电力的命脉。合肥、马鞍山产钢铁，铜陵产铜，都是工业原料的重要生产基地。现在武斗升级，工厂停产，工人离开工作岗位去打派仗，搞武斗，直接影响到国家的经济建设。12 军到安徽以后，一定要想办法制止武斗，让工人回到生产第一线，尽快恢复生产。"

周恩来又请杨成武讲讲。杨成武是从上海毛泽东那里过来

的，他向李德生交待了 12 军到安徽的兵力部署要求，部队开进的顺序和方式，并规定：只带轻武器，重型武器装备暂留在苏北，还要组织留守处看管营房和武器装备，继续抓好农副业生产和管理好家属子女。同时明确：将安徽省军区独立第一师，独立第二师划归 12 军指挥。所有驻皖部队的“三支两军”工作由 12 军统管，安徽的“三支两军”由党中央、中央军委直接领导，有关“三支两军”的问题，直接向党中央、中央军委请示报告。

杨成武最后强调：“你们一定要处理好军政、军民关系，搞好军内军外团结。”

“我一定照办。”李德生回答。

周恩来再次重复说：“李德生同志，12 军的‘三支两军’情况，今后不必经过南京军区转，可以直接向党中央、中央军委请示报告。你们遇到什么重大问题，自己没有把握的，可以直接给我打电话。你还有什么问题吗？”

李德生回答说：“我们坚决完成党中央、毛主席交给的任务，坚决按照总理的指示去办。用一周时间，完成准备工作。”

接着，他又请示道：“我们 12 军入安徽后，是否还继续担负苏北的海防任务，万一遇到海上敌情怎么办？”

“仗，恐怕 10 年内打不起来。苏北的防务，请杨成武同志同南京军区商量一下，可以由别的部队来担负，有的可以交给民兵去管。”周恩来回答说。

李德生默默地点点头。

回到京西宾馆，李德生又请严光详细介绍安徽情况。严光说：驻安徽的部队在“三支两军”中，有的遇到挫折，有的犯了错误，

最大的问题是刚介入时，对群众组织多少有了倾向性。在群众中形成印象后，很难改变，以至于现在很难做群众工作。

他还说："从军队来说，关键是怎样按周总理的指示，把驻皖的陆军、海军、空军、二炮和一些总部所属部队，统统团结起来，思想认识一致，共同搞好'三支两军'。"

这一晚，李德生彻夜难眠，翻来覆去的思考。他已经感到，解决安徽文化大革命中的问题，要比带领部队打仗复杂得多，12 军在江苏淮阴、盐城地区虽然搞了一段"三支两军"，但与安徽相比，无论在地域范围上，还是解决问题的难度上，那都不是同日而语的。安徽的武斗，在全国都有名气，党中央 5 天之内，连续两次发出决定，也是全国仅有。12 军到安徽"三支两军"，究竟应该从何下手？会不会再次陷入两派纷争之中？他左思右想，反复阅读周恩来的谈话记录，突然发现，周恩来在交代任务时，一是没有提要揪"走资派"，二是没有提要支哪一派，只讲要坚决制止武斗。如果紧紧抓住坚决制止武斗，稳定局势这一条，是否能走出一条解决安徽问题的路子来？

第二天清早，中央派专机将李德生和严光送回部队。经过一夜的思考，李德生已经考虑好了解决安徽问题的基本设想。回到淮阴，他与政委张文碧商量后，立即召开 12 军党委常委会，传达讨论周恩来的指示精神，提出了到安徽的工作基本思路；然后召开了团以上主要领导参加的军党委扩大会议，传达任务，统一思想，部署行动计划。

会后，李德生将 12 军炮兵室副主任王灿章和司令部作战训练处参谋刘亨容叫到办公室，命令他们立即带一个小分队作为尖兵

先去合肥，摸清实际情况，要将沿途的所见所闻和武斗迹象，随时向他报告。王灿章、刘亨容两人领命而去。

7 月 29 日这天，周恩来不仅当面向 12 军军长李德生交代了安徽三支两军的工作，还接见了国务院农林口的代表，专门解决农林政治部代主任秦化龙的问题。

本来 7 月 25 日天安门城楼上，周恩来已同意为农林口召集秦化龙问题的辩论会，谁知情况又发生了变化。南开大学“卫东”组织在 1967 年 5 月抄家时，发现一张包括时任四川省政协副主席李宗林在内的解放前从新疆国民党监狱获释回来的 130 名中共人员及其家属子女的合影照片，继之顺藤摸瓜，通过调查档案又发现一份当年在新疆被国民党逮捕入狱的中共人员名单，以及三机部和民航总局等单位向他们介绍的有关陈潭秋、毛泽民等 3 人在新疆被捕、牺牲的情况。于是，这些抓叛徒的小将们做出了如此“推理”：李宗林与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一起被捕，惟陈、毛、林被害，而李宗林等人却被释放，那么他就极有可能在狱中变节，出卖了陈、毛、林。而与李宗林合影的那 100 多名中共党员也就很可能都有叛变问题。

材料上报到康生手里，对此事从头到尾本来都很清楚的康生，亲自点名和批准对其中的 20 位高级干部由中央立案收审。其中有东北局书记马明方，中宣部常务副部长张子意，江西省委书记方志纯，中央农林政治部代主任秦化龙，中央监委常委杨之华，国务院副秘书长高登榜，军科院外军部副部长吉合、军委炮兵副司令谢良等。

于是，秦化龙这段历史又成了问题。7 月 29 日周恩来在接

见农办、农政双方代表时说：

“秦化龙问题的辩论会不要再开了，不要因为秦化龙问题影响批判谭震林。”他还说：“最近要把谭震林交给农林口革命造反派批斗。”

7 月 29 日这天，长春爆发大武斗。

陈再道的倒台，迫使吉林省军区对“红二”的支持不能太公开化。“长春公社”则有恃无恐，加紧了他们的“洛东江战役”。而“红二”深知“成王败寇”的道理，为避免“百万雄师”的下场，必须与“公社”来个“徐埠会战”，打烂它再说。

两派都拉出了大厮杀的架势，“气吞万里如虎”。广播喇叭里，“红二”怒骂“长春匪社”，公社回敬“黑二匪徒”，究竟孰为匪，只有刀下见高低了。

果然，到 29 日，长春市三处同时爆发大型武斗。

这天，“红二”调集大批人员围攻 305 所公社派“五四兵团”据守 305 所黄楼，声势很大。

305 所黄楼扼守于工业大学通往斯大林大街的路口，是名副其实的“桥头堡”。“五四兵团”是公社方面的舆论重镇，搞出来的东西极富激情，向来是“红二”的眼中钉。

工大“造大”紧急出动援救，开来 100 多辆汽车，把土坦克又开来了。“五四兵团”的大喇叭高亢的女声，把拼死的口号喊得震天动地。

攻楼战打了一整天，晚上旁边的附属技校又开打，攻打 305 所技校“红楼”，一把火起，烧了三楼。那夜，火光冲天。

这一夜，“红二”还是没有得手。攻到半途，被大队解放军赶

来强行制止了。这场武斗，死 4 人，其中淹死 1 人，伤 10 人，烧毁汽车 7 辆。

除了 305 所的两处武斗，29 日这天，长春市两派群众组织在机车厂也发生武斗，打死 1 人，伤数人。

为追查“武汉事件”的后台，7 月 29 日夜里，在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作战部长带领下，清华大学“井冈山”40 多人跑到徐向前家里，抄了徐向前的住所和办公室，抢走文件保密柜。徐向前的秘书，立即将情况报告周恩来值班室。周恩来指示：

（一）所进人员全部撤走；

（二）保证徐向前同志及其家属子女和工作人员的安全；

（三）东西一律不准拿走，已抢走的文件柜和材料，责成卫戍区到清华大学全部追回。

“武汉事件”后，“首都516红卫兵团”又开始活动，将矛头指向周恩来。7月29日，他们散发传单《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大家都来关心国家大事》。

传单说：

“武汉事件”已经引起“全国同时出现相同类型、相同战术、相同策略的反革命暴乱”，要人们思索：从“武汉事件”联系到“全国大规模武斗”，“是否向我们证明：‘武汉事件’是全国大规模反革命暴乱的信号？”

大家知道，谁是那些“一个个跳出来”的总代表？这种人是不是刘邓代理人？一年多来无数血淋淋的事实，是否说明他们时刻企图用武力颠覆毛主席的政权？

这些是否向我们说明：武汉事件是全国大规模反革命暴乱的

信号弹？！而正是那些至今还隐藏在国家首脑机关掌握大权的刘邓代理人在统一指挥着这场全国性的反革命政变？

“另一个司令部”是什么司令部，“司令官”是谁？

目前大规模的流血事件和初露锋芒的匈牙利式的反革命暴乱事件不正是刘邓司令部及其代理人反革命政治的继续吗？而这个反革命政治的最高阶段难道不是用暴力来推翻我们的红色政权吗？

当天，“首都516红卫兵团”成员，北京101中郭海燕和长沙一中唐亦安等4人在劳动人民文化宫散发传单“20个为什么”，被群众当作反革命当场扭送到公安机关。“516兵团”立刻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在24小时内把被抓的4人放出”。

7 月 30 日夜，“首都 516 红卫兵团”下属的北京商院“决战纵队”在阜成门贴出《首都五·一六兵团政治部、作战部严正声明》，要周恩来公开检查。

## 第 770 回：议港九，七三〇大连武斗　第八次，接见河南代表团

7 月 30 日，毛泽东同意宣布任命沈阳军区副司令员曾思玉为武汉军区司令员、刘丰为武汉军区政委，同时指示：对陈再道、钟汉华的撤职宣布可以晚一点；独立师分编到 44 师、45 师、29 师，不离湖北，集中整训。陈再道可在武汉报纸点名，王任重可在全国点名。中央办公厅批准武汉军区的公告。这份公告可在全国张贴，但不登大报，中央复电发到县团级。

周恩来接到毛泽东的指示后，于 30 日清晨，立即电告曾思玉："我已经派飞机去接你，你立即来北京，3 日你去武汉军区工作"。

如此急迫，出乎所有人意料。曾思玉只能给人在北京的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打了个电话，与在家的副司令员江拥辉、唐子安，副政委李伯秋，参谋长杨迪集体短暂告别。

上午 9 时，周恩来在钓鱼台 5 号楼召集中央文革碰头会，传达毛泽东关于武汉问题的指示。

上午 10 时，曾思玉到达北京西郊机场，周恩来早已派车在机场等候。曾思玉直接来到钓鱼台。

周恩来、谢富治、刘丰、王力已在会议室里。曾思玉一到，周恩来立即宣布命令："沈阳军区副司令员曾思玉同志任武汉军区司令员，武汉空军副司令员刘丰任武汉军区政治委员。"

接着，周恩来说："当前的任务是掌握军队，调整部署，稳定武汉局势，做好大联合的工作。军委空军政委余立金同志和总参作战部副部长李真同志正在武汉王家墩机场等你们，马上起飞

去武汉。”

7 月 30 日，由广州军区晏福生副政委主持，在广州召开了一个关于当前港九对敌斗争问题的座谈会，外交部副部长罗贵波、广州军区司令部副参谋长胡继成、广东省军区副司令员王道全和深圳地区对敌斗争领导小组组长王文德等人，参加了会议。

罗贵波副部长认为：港英当局在香港的镇压可能会进一步升级，但究竟要升到多高？还很难说，估计最大的可能是把大陆在港九所有的机构搞掉，进行大规模屠杀，不过这种可能性不大。因为，要搞到这个程度，英国就必须准备中英关系彻底破裂，英国最终放弃香港；同时必须实行美英联防。而当时英国还不敢这样做。

罗贵波按最坏的情况打算，根据座谈会上大家的意见，在军事上做了三种设想，作为回去向中央提出的建议方案：

一、中印边境式的；

二、沙头角式的；

三、武工队式的。

他说：“中印边境式的，规模就比较大，准备把新界的敌人主力吃掉，这样做，对敌人及在世界上震动太大，逼迫敌人太紧，这不符合我们当前的斗争方针。

沙头角式的，就是在沙头角地区出击，把沙头角地区的敌人吃掉。这比中印边境式的规模小一点，很容易组织，不那么费劲，打得痛，但在世界上震动不大，使他哑子吃黄莲，有苦说不出。上次我们说边防部队哨兵打了，他就不敢承认嘛！如敌人再升级就迫使我们这样做。我主张以这种形式给敌人以打击。回北京请

示总理和军委，但建议军区应拟定方案和做必要的准备，否则就会错过机会。

关于搞武工队的问题，原则上目前不大合适，主要是进去后不易控制，在斗争形式发展后也有可能。沙头角过来的 122 人中，有 60 个人要求训练，请领导小组帮助一下，至于他们什么时候回去，发不发装备，待请示中央再定。现在可先搞些训练，主要做好思想工作，搞射击、投弹两大技术及学点简单的战术。”

广州的支港运动，始终是雷声大，雨点小，群众组织没有兴趣，广东省军管会指望以“兄弟阋墙，外御其侮”的道理，促使群众组织联合起来，最终还是一场空。到 8 月份，虽然中英关系愈来愈紧张，但支港运动，在广州已经基本上偃旗息鼓了。

7 月 30 日上午，大连海军工程学院的“红色造反团”和“革命造反总部”这两个红卫兵组织发生武斗。

“红色造反团”自诩是造反派，有海军党委“李（李作鹏）、王（王宏坤）、张（张秀川）”支持，后台硬。

“革命造反总部”党团员多，在运动中行动迟缓，造反劲头差些，被对方冠以“保皇派”。

这天上午，大连海军工程学院的西门，昔日警卫战士站岗的身影不见了，大门敞开着，地方上的老百姓蜂拥而至、鱼贯而入，其中多是年轻人和半大小子。

进入操场后，首先看到的是学院北楼外的操场边上聚集着很多人，外圈的是地方老百姓，他们是在看热闹。内圈是几十名手持棍棒的“红色造反团”武斗人员，他们是在向“革命造反总部”扼守的北楼据点发起进攻。只见外面的“红色造反团”人忽

而攻进去，忽而又被里面“革命造反总部”的人赶出来，就这样几进几出，双方相持不下。“红色造反团”据点的大喇叭呐喊助阵，“革命造反总部”据点的大喇叭此时悄无声息。

半个多小时过去，一彪人马的赶到打破了僵局，他们是“旅大工总司”武斗人员，前来驰援一个战壕同观点的战友“红色造反团”。

“旅大工总司”全称是“旅大市工人造反总司令部”，简称“工总司”，7 月刚刚成立，是由“主义兵”观点的“旅大市红色工人造反团”和“旅大市革命职工造反团”这两支工人群众组织，与学生组织“大中院校总指挥部”联合组成。7 月 30 日，正好是旅大“工总司”的“中山（区）司令部”成立之日，大会在火车站广场结束后，队伍沿着“占领区”的繁华街道游行示威时，接到“红色造反团”求援口信，当即派出为游行队伍保驾护航的武斗人员前来支援。

武斗队的这些人个个彪悍凶狠，他们手握大刀片，端着扎枪头，在围观群众的起哄助威下，嗷嗷叫着冲向楼里。有着书生气的“革命造反总部”守卫者们哪里是亡命徒们的对手，他们招架不住，从一楼撤往二楼，又从二楼平台搭梯子退守到三楼房顶，揭下房瓦居高临下抛向进攻者，这才使进攻暂时被阻。

但是，很快新一轮的强大攻势又开始了，这次是在几只鸟枪的助攻下，守卫者们终于放弃了抵抗，束手就擒。

武斗结束后，大连海军工程学院陷入一片混乱，社会上的不法之徒将教学楼、学员宿舍、食堂洗劫一空，整麻袋的拳击套子从教学楼上抛下，海军灰服装等被大包小卷裹走，学院食堂准备

八一建军节会餐用的鱼、肉、蛋、禽荡然无存。

此后，大连市面上出现了头戴灰色海军帽，身着海军灰军服，脚穿“小白鞋”的年轻人，这在老百姓眼里就是惹不起的“社会痞子”形象，海军的“行头”一夜之间成了年轻人追捧的炙手货。随之，抢军帽、偷军装成风。扎眼的“海帽”现象在大连风靡了十几年。

“7·30”事件是大连地区武斗的开端，也是开创了大连地区武斗射出第一枪的先河。

7月30日22时21分至31日凌晨3时20分，人民大会堂安徽厅，周恩来等中央首长第八次接见河南赴京代表团。

康生首先介绍说：“现在由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是空降军政委王新同志，中央决定调他到河南帮助刘建勋同志作军区的工作。王新同志在反革命分子陈再道发动叛乱的时候，保卫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保卫了谢富治和王力同志，很有功劳。”

接着，康生让河南省军区司令员张树芝和支持“二七公社”的副司令员陈桂昌坐到前边来。

他说：“同志们，解决问题的会议已经开了多次，今天是最后一次会议。会议完了以后，你们回到河南去，要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把河南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康生说：“解决河南问题的各方会议开得很好。因为，此时河南各方准备签署《关于解决河南问题》的协议书，对中央关于河南军区检查报告的批示也表示赞成和拥护。”

说完，康生第一个在协议书上签了字，然后将协议书递给“二七”代表。

说起来，河南代表来到北京近两个月了，7月5日，各方签署了制止武斗的协议；7月23日，又共同签署了反对武汉“百万雄师的协议。应该说是有成果的。

康生再次提到在河南的一些“河造总”组织曾到武汉支持“百万雄师”的问题，并在6月17日发表了一个声明，希望“河造总”注意。

他说：“现在河南的问题还要同志们去努力解决。”“更重要的是河南的武斗还没有制止。”

对7月23日达成的反对“百万雄师”的协议，康生说：“本来，那天晚上一方面你们群众方面对武汉事件政治上表示态度，另一方面，我想省军区也应该立刻表示态度。因为河南军区属于武汉大军区直接管。可是那天晚上没有达到这个目的，因为那天晚上何运洪不来参加我们这个会议。当然，他说他有病，也许有病，但是最近我们在军队干部会议上对他作了严厉的批评。在那样的关键时刻，在会上讨论那样的问题，他不参加我们的会议完全是错误的，打了陈再道他心里有点痛。”

“二七”代表说：“他同陈再道勾结特别密切，武汉军区支左办公室介绍‘百万雄师’的人到河南活动，河南军区支左办公室给他们积极介绍很多地方，很多单位，一个介绍信上盖了十几个章子，这次我们在烟厂抓住‘百万雄师’300多人.”

康生问：“郑州烟厂吗？”

答：“郑州烟厂，还搜出53枝枪，100发子弹，还有省‘工人总部’印发支持‘百万雄师’的传单。”

“中学红卫兵”总部也揭发说：“河南军区的确和武汉军区

有联系。”

“河造总”表示：“我们要求作检讨。”并念了他们的检讨。

“河造总”：“向‘二七公社’学习，向‘二七公社’致敬！”

“省工总”：“我们要求作第二次检查。”

“河造总”：“我们揭发河南军区的问题：镇压‘二七公社’、郑大‘联委’，然后压‘河造总’，支持‘十大总部’，还造谣说刘建勋把军区声明支持‘河造总’的话抹掉了。”

康生：“根本不是刘建勋同志的事，是何运洪开会时告诉我们要去掉的。”

张树芝：“你们不要相信这些造谣的话。”

陈桂昌：“不是军区说支持‘二七公社’，而是中央支持‘二七公社’。”

“河造总”代表：“我们50多人是刚从家里新来的，我们揭发何运洪的问题。‘河造总’代表团是何运洪精心挑选的，条件是反对‘二七公社’铁杆，打倒刘建勋铁杆，刚才念那份检讨很早就送来了，他们代表团不交上来。”

康生问：“你叫什么名字？”

“河造总”于文华回答说：“叫于文华。代表团一直欺骗我们，给我们传达说，中央说‘河造总’和‘二七公社’是造反派，没问题，他们对上对抗中央，对下欺骗群众。”

省“工总”李通说：“我们现在再次作检查，……”

康生：“李通同志，你们‘工人总部’责任很大，你们代表的责任是回去作艰苦细致的说服教育工作。我们希望你们坚决贯彻执行在这里达成的协议，履行在会上表态时所说的诺言。我们

对你们这个态度是支持的，但是要知道，你们的工作是很艰苦的。我们知道有这样一回事，刘建勋同志亲自看到陈再道手里有一个名单，这个名单上列了‘二七公社’、‘河造总’、‘十大总部’，下面还列了一些组织，他们总的是这样讲的，第一，‘十大总部’是最坚决的革命造反派；第二，‘河造总’是中间状态的组织；第三，‘二七公社’是反动组织。这是陈再道、也是何运洪反映的，是他们定的，你们想想好了，这个事情刘建勋同志说一说。”

刘建勋：“4月23日主席批示请河南两派来北京汇报，并叫陈再道、钟汉华和我商量谈判问题。批示下来以后，总理办公室通知我找陈再道、钟汉华。我到京西以后，陈再道说河南的事情，他们根本不知道，是河南军区直接向中央反映的，他当时提出让文敏生代表我。我说我自己代表我自己。他当时戴着眼镜看一个很长的东西，就是刚才康老讲的那个左中右组织名单。他不想叫我看，我就从他手里拿过来了。他那个名单上写的左派是‘十大总部’，中间派是‘郑工’，因为那时我不知道有‘河造总’，右派是‘二七公社’。‘二七公社’下边列了120多个组织，包括郑大‘革联’、开封‘824’。后来我问过军区许多同志，他们都说不知道，张树芝同志、陈桂昌同志也不知道，完全是何运洪少数人报告的。”

康生：“这一件事情要引起‘十大总部’特别是‘工人总部’的警惕，陈再道、钟汉华，在河南是军区里边何运洪、李善亭等人，他们主要是依靠‘十大总部’。这一点，‘十大总部’的人，特别是省‘工人总部’的人，要告诉他们提高警惕，这是第一。

第二，你们‘十大总部’、‘工人总部’同‘百万雄师’有

关系，不是所有人，但是也不要否认有些人有联系，这一点也要使下边的人引起警惕。”

“第三，我知道在郑州有些‘工人总部’的人向农村撤退，这个方向不大妙，现在已经有些厂子停产了，这一点应该向他们解释，他们没有责任，受蒙蔽无罪，反戈一击有理。要给他们开脱，不是他们的责任，希望他们坚决执行毛主席的路线，抓革命，促生产。否则一散布到农村，就可能走错了路，同时，长期在外边，对生产不利，对自己的家庭也不利，很多家庭也劝他们回来。这一点‘二七公社’要保证不报复。他们有错误，要帮助他们改正。李通同志代表省‘工人总部’，你们的责任很重大。我们相信你能完成这个工作。在你检讨以后，我特别提醒你注意，‘产业军’、‘百万雄师’在向你们方面伸手。这一点要特别注意。”

省“工总”李通：“我们一定要遵循你的教导，认真做艰苦细致的工作，你上次指示以后，我给总部打了电话，可是在‘省直机关造总普通一兵’22日的造谣传单的影响下，贴了支持‘百万雄师’的大字标语，上了他们的当。晚行动一天。23日我们发了反对‘百万雄师’的声明。”

康生又嘱咐“二七公社”不要歧视“河造总”和“十大总部”，不要骄傲，翘尾巴。

李通：“我们有个请求，我们的代表沙发来回去做工作，被‘二七公社’抓了。”

“二七”：“他参加武斗，在粮院被抓。即便这样，我们也不应当抓他，我们发现以后就把他放了。”

康生:“再复查一下,看放了没有？所有代表都不能随便抓。”

## 第 771 回：说兰考，为焦裕禄的斗争　河南省，再签第三份协议

接着，康生向大家介绍兰考的张钦礼："今天还来了一个同焦裕禄同志一起工作的同志，叫张钦礼。哪个是焦裕禄同志的战友张钦礼同志？"

张钦礼站起来。

张钦礼，河南兰考南彰乡张庄人。他的父亲在大革命时期曾参加过由吴芝圃领导的著名的濉（县）、杞（县）、太（康）农民起义，和吴芝圃相识。受家庭影响，张钦礼 1943 年参加革命。1945 年入党。由于年轻有为，能说会道，22 岁就当了考城县县长。1954 年兰封、考城合为兰考县，任县长。

1962 年，焦裕禄调任兰考县县委书记， 1964 年 5 月 14 日逝世。1965 年底，新华社穆青、冯健、周原到兰考采访焦裕禄的事迹，张钦礼向他们生动详细的介绍了焦裕禄的事迹，感动了穆青，他说："我参加工作 28 年了也没有哭，这次被焦书记的精神感动得流下了眼泪，这是咱的宝贵财富，我们要重新报道焦裕禄。"1966 年 2 月 7 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大通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在全国引起极大地反响。通讯上把张钦礼称为焦裕禄的亲密战友。

文革开始后，1966年7月20日，张钦礼贴出了《秦一飞反对焦裕禄同志十大问题》的大字报。

秦一飞何许人也？他时任开封地委宣传部长。焦裕禄去世后的两个月，四清运动开始。地委派秦一飞任团长、周化民为副团

长，带着 2000 多人的四清工作队来到兰考。1965 年 5 月，周化民任兰考县委书记。文革开始后，四清工作队就地领导兰考的文革运动。

对大通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中，把张钦礼称为“焦裕禄的亲密战友”，这让与焦裕禄共事多年的周化民等人颇不以为然。加之，大通讯中有个别细节与事实有些出入。文革初期，兰考县委、组织部、宣传部、统战部贴出大字报，批判《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这篇大通讯，还派出“纠穆青战斗队”到北京抓穆青。

对否定《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这篇大通讯，兰考许多群众不满意。焦裕禄亲自树立起来的4个红旗大队首先起来串连，到县委造秦一飞、周化民的反，支持张钦礼，并在张钦礼的支持下，成立了“贫下中农保卫焦裕禄造反司令部”。而支持秦一飞、周化民的机关干部也成立了“卫东林司令部”，表示要“誓死捍卫毛泽东林彪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后来，红卫兵慕名到兰考串连，当他们听说《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这篇文章有假，甚为震惊。一些北京学生于9月16日贴出紧急呼吁《“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一文是修正主义的大毒草》，说新华社关于焦裕禄事迹的通讯是“污蔑毛主席好学生的大毒草”，张钦礼介绍宣传焦裕禄是政治扒手。兰考县委机关连夜印发《热烈响应》的传单。并由县里出资将《“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一文是修正主义的大毒草》一文铅印发至全国。一批红卫兵还到新华社河南分社揪斗记者周原，拉着周原游街示众，强制他举起断指的手，向围观的群众大声说：“老

右派周原就用这只手写出大毒草焦裕禄。”

这事惊动了中央，国务院办公厅看到这张大字报后，让河南省委限期调查解决。

河南省委把这个任务交给开封师范学院，学校又交给学生杨捍东，由他带队调查：

第一、焦裕禄的事迹是不是真的？

第二、张钦礼是不是焦裕禄的亲密战友？

第三、周化民到底如何？

副省长王维群在向杨捍东交代任务时再三强调：“调查时不要带框框，不要先入为主，要客观再客观，详实再详实。如果出了问题，严惩不贷。”

当时只有 23 岁的杨捍东带着 3 名共青团员在兰考调查一个多月，给中央写了一个报告，回答了三条：

一、焦裕禄的事迹详实无误，完全是真的，且由于新华社通讯篇幅所限，好多事迹还没报道出来。

二、张钦礼与焦裕禄肝胆相照，共同协作，焦裕禄去世后，由他完成焦裕禄的遗愿，是焦裕禄的亲密战友之一。

三、周化民同志身为家乡干部，却始终对报道焦裕禄的事迹有意见，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前，他不同意，在《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后他仍取消极态度，仍不认真学习，这是对党的态度问题，应该予以批评。

报告写成后，先向派他们下去调查的河南省副省长王维群汇报，再进京汇报，在中南海将报告交给国务院办公厅。

9月25日，兰考群众散发“决不允许诬蔑焦裕禄”的传单。

11月25日，支持张钦礼的兰考群众成立了“兰考贫下中农卫焦革命造反司令部”。

1967年1月23日，兰考66个群众组织联合夺权。

1月25日，县武装部说造反派“夺权”是“反革命暴动”。

开封军分区和 1 军介入文化大革命后，在兰考支持秦一飞、周化民和他们支持的“卫东林司令部”。1 月 28 日晚，开封来了 3 个连队的部队把兰考县城包围。1 月 29 日，县广播站宣布张钦礼为“现行反革命分子”，播放张钦礼的“八大罪状”，并开始逮捕以张钦礼为首的“反革命集团”。

韩村、秦寨、赵垛楼和双杨树4个焦裕禄树起的红旗大队，被打成“修正主义大队”和“顽固大队”，支部书记都被逮捕，全县搞起了请罪运动。

2月20日，全县又来了一次大逮捕，前后捕了1200多人。28名县委委员有13名被打成“反革命分子”，逮捕法办，“卫焦”派的群众组织的大小头头几乎都逮捕了，火车站、汽车站到处都是通辑令，还贴有像片。

2月27日，张钦礼等几个人骑自行车跑到杞县。刚到不久，住地就被包围。于是，他们又兵分两路，一路几个人假装向东北方向的大沟冲，大喊大叫，把人吸引过去。其他人往西南冲。冲出后，跑不动了，边喘气，边说话，结果被附近的一个兰考县副县长听出是张钦礼在说话，又将他们包围，全都被捕，捆了起来，押上汽车，开回兰考。一路有三卡车全付武装的解放军护送，还有一辆吉普车、两辆摩托车开道。但不敢走兰考县境，怕群众抢。绕道转了一夜，直到天明才进了县城。

他们被关进监狱。此时的兰考监狱已人满为患。至6月2日，张轶礼被游斗了100多次。

但是，为焦裕禄、张钦礼申诉的信件却雪片般地飞向北京。秦寨大队的老贫农李占荣还跑到天安门前长跪不起、嚎啕大哭，为张钦礼鸣冤叫屈，惊动了中南海。6 月下旬，焦裕禄的女儿焦守凤到北京反映情况。周恩来派记者到兰考暗访后，向毛泽东汇报。毛泽东说："河南的兰考、林县这两个先进典型，要保护，不能打倒！"

于是，周恩来指示河南省军区司令员张树芝，要他保证将张钦礼安全地送到北京。

7月28日凌晨3时，张钦礼牢房的门锁响了，看守监狱的解放军指导员进来对张钦礼说："为了你的安全要你出去。"

张钦礼出了牢房，一个小车飞快地开到面前，车门一开，两个人把他一架，塞进汽车就跑。车开得很快，到了县里，张钦礼说了："车子别开了。我知道你们要杀我，我死，也要死在兰考。"

那两名解放军对他说："我们是有任务的，老同志，我们一怕老保害你，我们交不了差，二怕造反派不放你走，才这样做的。中央限令我们在24小时内护送你到北京。"他们又说："你可别跳车，你跳了车，我们就没有脑袋了。"

7 月 29 日，张钦礼到了北京，首先见到纪登奎。因为是夏天，张钦礼从狱中匆忙出来，只穿了一条又脏又破的短裤。纪登奎一见，立即命人拿来一套军装给他穿上。

就这样，张钦礼参加了7月30日晚中央首长的接见。

康生亲切地问他："张钦礼同志，你是什么时候放出来的？"

张钦礼："7月28日。"

康生问："在什么地方？谁抓的？"

周恩来也问："是人武部还是军分区？"

张钦礼答："兰考，开封军分区政委陈久安，副司令员李地山带部队抓我的。"

康生气愤地问："陈久安、李地山来了没有？站起来叫大家看看你们是什么样子。"

陈久安十分狼狈地站起来，李地山未来京。

张钦礼质问陈久安："你不是说逮捕我是中央批准的吗？"

陈久安吞吞吐吐的说："是，是，是省军区批的。"

康生大声说："何运洪站起来！"

何运洪慌忙站起来。

康生严厉地问道："是你们批过的吗？"

何运洪十分紧张的回答说："是，是武汉军区陈再道批的。"

"二七公社"代表高呼："打倒刘、邓、陶！""打倒陈再道！""打倒王任重！""打倒钟汉华！""打倒何运洪！""打倒李善亭！""打倒陈久安！""打倒李地山！"

接着，张钦礼要陈久安回答兰考的张赖兴、张孔照等人是怎么死的，陈久安哪能说的清楚，吞吞吐吐，张口结舌。"二七公社"代表再次高呼："血债要用血来还！"

张钦礼："现在兰考监狱还有凤鸣同志没有放，陈久安，你说怎么办？"

陈久安："今晚我打电话就放她。"

康生："根据张钦礼同志说的情况，陈久安在兰考搞的白色

恐怖，这不是孤立的，各军分区要很好检查，文化革命中逮捕的人应该统统放出来！”

周恩来站起来将康生的话又重复了一遍。

康生：“你们开封要特别注意，抓了很多‘八·二四’的学生。”

周恩来：“康老已经说了，今天晚上请张树芝、陈桂昌同志负责召集会议，今天一定查清楚，抓人没有放的，一定在明天12点前放了，并且把名字报来！”

康生：“徐文礼你要把开封检查一下，打电话回去问一下，看‘八·二四’还有没有人被押？有，要放了。”

周恩来要求省军区、军分区，包括野战军、人武部，都要查一下。凡是因为文化革命而被逮捕的人都应该放出来。其次，对军区、军分区、野战军给支持军区的保守组织发的枪，名义是发给基干民兵的，由军区、军分区、野战军负责收回来，封存起来。第三，要求各派群众回到生产、业务和交通运输岗位上去，不停产，不停业，不停交通。要求“二七公社”、“八·二四”造反组织欢迎他们回来。他说：

“现在有些坏组织中极少数人甚至一些军事方面的人，煽动工人离开生产、业务和交通运输岗位，到农村中去到处流浪，制造事件，这是错上加错。我们发现在‘百万雄师’中就有这种情形，把工人搞散，‘十大总部’也有这种现象。”“对于武汉‘百万雄师’，不要叫他们‘百匪’。他还是一个组织，作为一个群众组织，还要争取教育这个组织中的群众，启发他们觉悟，揭露他们的坏头头。”“军区要有集体领导。对他们有意见，可以通

过组织交给他们，不要满地贴大字报。”

郑大“战斗师”揭发：“省直机关‘造总’和军区、郑州卫戍区司令部策划建立一个河南省革命造反派联合司令部。”

康生：“对，有这回事。”

“战斗师”：“联合起来反对‘二七公社’。”

康生：“是这样，这个问题比较严重，目的是在中央会议没有开完以前，把‘二七公社’打垮。另外压迫军区，不让他改正错误，这个联合司令部有‘十大总部’参加，也有‘河造总’一部分组织参加。”

“河造总”：“我们没有组织参加。”

康生问：“丁石在不在？有人告诉我与你有关系。”

丁石马上说：“与我没有关系。”

“战斗师”继续揭发：“省直机关‘造总’在北京表现不好，公开对抗中央。戚本禹同志6月28日接见三方代表以后，表现更坏”。

康生问：“有没有那个张治安？”

“战斗师”：“有。”

康生：“那个人我一看就像个地主。”

由于张钦礼几次想发言都被郑大“战斗师”、“中学红卫兵总部”的代表抢了话题，他只好坐下。周恩来离座走到张钦礼面前和他握手，随即拉着张钦礼的手走到外边会客室，让他和自己同坐在一张沙发上。室内还有戚本禹、杨成武等人。这时，刘建勋将焦守凤带进来，向大家介绍说：“这是焦裕禄同志的女儿焦守凤。”

周恩来站起来和焦守凤握手，并让她在张钦礼旁边坐下。

周恩来十分关心的了解了张钦礼的情况，随后问道："兰考逮捕了多少人？都是什么人？你在那个监狱押着？"

张钦礼回答说："我在兰考监狱押着，兰考监狱押了200多人；听说杞县、开封、东明等地也押有兰考的人；兰考大概逮捕1000多人，这个数字我不太清楚。因为我被捕和外界隔绝了。"

周恩来："他们抓的都是什么人？"

张钦礼："有工人、贫下中农、机关干部、红卫兵小将和革命学生。"

周恩来："在监狱里他们怎样对待你？"

张钦礼："脚上带脚镣，手上带手铐，胳膊上绑绳子，绳子捆得很紧，捆得胳膊都出血了。最毒辣的是制造内伤，用折骨残刑。"说着，他伸出两个被折断的手指。

周恩来抚摸着张钦礼被打断的手指，对旁边一个工作人员："你对联络员说，找个医生给他检查治疗。"

周恩来继续问："是谁抓你的？你在监狱里押了多少时间？"

张钦礼："在监狱押了156天。逮捕我时是开封军分区政委陈久安，副司令员李地山带部队抓的。"

周恩来记下李地山的姓名后，接着问："开封军分区有人支持你们吗？"

张钦礼："在提审我时看来，开封军（分）区的杨司令员和徐副司令员是同情我们的，兰考中队中一部分战士是同情我们的。"

周恩来："对他们，你们要区别对待。回去，你们要艰苦奋

战。”

戚本禹问焦守凤：“你妈妈来了没有？你还和她吵架吗？”

焦守凤：“她回去了，我没跟她吵架。”

周恩来:“好好做你妈妈和妹妹的工作,她们会明白过来的。”

焦守凤：“我一定照总理指示去做。”

周恩来和张钦礼、焦守凤二人握手告别，张钦礼、焦守凤又回到河南代表团汇报大厅。

张钦礼发言说：“陈久安、李地山说逮捕林场100人是经过谢副总理批准的。”

刘建勋：“陈久安，到底是什么人批准的？就是你们这些人搞的，为什么不说实话？”

陈久安：“他们说是经过批准的。”

康生：“是不是造谣说经过中央批准的？”

陈久安：“我不在那里。是公安局搞的。”

刘建勋：“什么公安局搞的，公安局是受你操纵的。”

康生：“同志们，各军分区的问题很多，开封‘824’、新乡‘818’，以及洛阳‘816’等，有很多同志，有很多意见，对那里军分区的支左有很多意见，认为他们有很多错误。这些问题我已经在军队干部会议上都讲过了。比如象新乡军分区的李国秀，在支左工作中有许多错误，开封、洛阳军分区也存在很多问题，同志们有很多意见。我讲两点建议，第一，各分区、各县的问题，中央批准刘建勋同志回去，由刘建勋同志一个分区、一个分区，一个问题、一个问题的解决。第二，军队干部正在开会，军分区的负责人都在，我建议各个分区由各地造反派留下一、二

个同志，作为代表，参加军队干部会议，开封、新乡、洛阳、兰考的问题，在会议上可以尽量的实事求是讲出来，尽量揭发，帮助各个分区的同志们检讨错误。其他代表同志没有意见就可以回去抓革命促生产了。有意见可以留下，这样可以使问题解决得更好一点。大家赞成不赞成？”

众答：“赞成。”

康生：“因此，开封、新乡、洛阳的问题今天就不讲了。”

接着，康生警告戴苏理，不要指挥“河造总”犯错误。他说：“对待群众组织要积极帮助他们，如果你支持他们，就更要注意他的缺点，帮助他改正错误，带他向好的方向走，必须是这样。”

他说：“本来张树芝、徐文礼也要检查，因为时间关系，他们都写了检讨不讲了，将来把检查印出来，交给大家看。”

“中央在批示中讲，河南省委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代理第一书记文敏生、书记处书记赵文甫。河南军区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支农、支工工作中，做出了一定的成绩。但是，在支左问题上，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造成了部队同群众、群众同群众之间的对立。这个错误主要应由军区第二政委何运洪同志负责。因此，中央除了派刘建勋同志回去以外，军区干部要加以改组，这一点同志们放心好了。中央已经决定调王新同志去帮助刘建勋同志作军区工作。有的同志问何运洪怎么样？同志们，我可以告诉你们，何运洪没有资格领导文化大革命。因此，中央决定着手成立以刘建勋同志为首的有革命群众组织代表、军队代表、革命领导干部参加的河南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领导全省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工农业生产。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的名单你

们通过后报告中央。对刘建勋同志，中央批示中也讲到了，刘建勋同志过去在河南的工作中虽然犯有某些严重错误，但是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认真地作了检查，回到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上来，是革命的领导干部。中央这个批示，是经过毛主席、林副主席批准的。”

对这次河南几个组织达成的三个协议，康生再次表示满意，同时又一次告诫“二七公社”不要骄傲了，翘尾巴，特别是要注意掌握政策，决不搞报复。他表扬了浙江“红暴会”的翁仙鹤，说：“省‘联总’把‘红暴会’打了，翁仙鹤同志也挨了打，但他坚持大方向，坚持团结，批评‘红暴会’的缺点。他是‘红暴会’的赴京代表，因为这样一个观点，‘红暴会’认为他右倾，把他从代表团开除了。开除后他还是坚持大方向。我同‘红暴会’的同志讲，不应该开除他。应该向这些同志学习。遭到打击还坚持大方向，得到平反更要掌握政策。在这方面，二七公社要兢兢业业，才能把革命的大联合搞起来，才能团结好。”

他还针对有些人说：“他们反对文化大革命，反对毛主席，反对林副主席，反对中央文革小组，说文化革命中央文革小组专门整老干部，不要老干部了。实际上恰恰是主席、林副主席、中央文革小组最关心老干部。老干部是宝贵的财富，要保护他们，但是，离开马列主义、离开毛泽东思想、离开阶级路线，笼笼统统地讲要不要老干部，那不行。刘少奇算不算老干部？邓小平算不算老干部？陈再道算不算老干部？钟汉华算不算老干部？他们不能代表我们的老干部，是老反革命。说那样话的人，就是要那些人在我们党内当权，这样恰恰是他们不要老干部，是对老干

部的污蔑。老干部应该是坚决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干部，如果像他们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干部，是相反的。这一点同志们应该注意，应该引起我们的警惕，所以我们说武汉问题使我们取得了教训。”

最后，康生说：“再见吧！同志们，将来我到河南去，不要把我抓起来。”

## 第 772 回：枪声响，开封市武斗又起　战士闹，调六团紧急换防

关于解决河南问题的各方协议墨迹未干，7 月 31 日，河南开封再响枪声。

自 7 月 25 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了新华社关于全国各地对武汉“7·20”事件反映的综合报道后，特别是报道中首次使用了“二七公社是无产阶级革命派”，河南即将之称为中央“7·25 表态”。于是，滞留在外地的开封市“824”群众便以胜利者的姿态，开始从四面八方赶回开封，分别集聚在开封师院、东大寺、化建公司和黄河水利学校。“824”总指挥部此时还在东大寺。

武汉军区改组后，开封驻军的领导也进行了调整，部队进行了调动，原驻汴 1 军 5 团 8185 部队奉命由开封撤回商丘。开封支左工作由当时还在山东省微山湖执行生产任务的 1 军 6 团 8186 部队负责。6 团表示全力支持“824”。

7 月 29 日上午，开封军民 5 万余人在市中心鼓楼广场召开“愤怒声讨反革命分子陈再道，声援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大会”，会后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

但是在 7 月 31 日，开封人民会场再次发生了震惊国内的大规模武斗流血事件。

这天 11 时许，郑州邮电局“二七公社”20 余人乘坐一辆汽车到开封市邮电局慰问这里的“824”，并在墙上张贴“拥护中央关于河南问题决定”、“坚决和‘开封八二四’战友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等大标语，与开封邮电局的“左司”

派组织“邮电兵团”发生冲突，在人民会场周围发生武斗。

开封“左司”负责人周树凡得到消息后，立即调集开封化肥厂的“左司”火速赶往邮电局支援“邮电兵团”。

下午，黄河水利学校“9.9 队” 作战部的郑生突然接到“824”总指挥部的电话说:“郑州‘二七公社’来了两卡车声援开封‘824’的战友，进入开封市南关区后被老保围堵追打，现在被围困在自由路西北头儿的邮电局大院里，打电话向‘824’总指挥部求救。总指挥部要求‘9.9 队’立即组织力量，前去营救。”

郑生放下电话，立即调集人马，手持钢管长矛，分别乘几辆大卡车，急如星火地赶往邮电局大院。

正在围攻邮电局大院的“左司”见一下子来了这么多人，自觉不敌，放弃了攻打邮电局，沿自由路向东跑去。不料从东面又突然出现了举着“824”旗子的大队人马，呼喊着冲杀过来。原来，又有“824”千余人乘大卡车前来增援。

一时间，通往位于自由路西段邮电局的主要大街上车水马龙，人流涌动。截至 13 时，双方赶来参加武斗的人员和围观的市民群众已达近万人。

“左司”在如此东西夹击下，只得跑进路北的人民会场大楼。

开封人民会场是 1928 年冯玉祥任河南省主席时建的，当时名为“国民大戏园”。其建筑为长方形木质结构，上下三层，四面开有 8 门。新中国成立后改更名为“人民会场”。上世纪五十年代，人民会场重修，临街主楼改建为砖混结构的四层楼。

上图为民国时的“国民大戏园”

重修后的人民会场

下午 13 时 30 分左右，1 军 2 师 5 团接到“开封邮电革命造反兵团”一名邮电工人打来的电话，说开封“824”和河南“二七公社”包围了邮电局，正准备用汽油火烧他们，请求 5 团派兵救援。

当时，5团已经接到军部撤离开封返回商丘驻地的命令，所以团里没有行动。但该团九连的一个排长不服，拨出手枪高呼:“不怕死的跟我走!”配合5团撤离开封行动的军部汽车连一个战士，马上开来一辆解放牌大卡车，一下上去了几十人。团长吕兴旺、

政委刘华知道这些战士此去必犯错误，哭着请求他们不要蛮干。但战士也都是年轻人，与造反派一样血气方刚。他们这时已红了眼，谁的话也听不进，开着车就往开封邮电局大楼奔去。

再说人民会场这边，“824”几路援军汇合在一起后，开始攻打人民会场大楼。只听得人民会场内外，呐喊声震耳欲聋。

只见人民会场的石棉瓦房顶上，有人从里面向外砸了一个洞。一架长梯竖出来，一会儿，拱出一个人员，头戴笆斗帽，手持红缨枪，嘴里衔一把匕首，另一手拿一条棉被，可能是当盾牌，防砖头的。接着，又出来六七个。突然，一阵急促的哨声。南头平台上冲出一帮人，挥舞大刀长矛，呼喊着冲杀过来。这边，第一个上来的高个很沉着的扔掉棉被，紧握长枪，准备迎战。哪想到后面的几个人，却向洞口跑去，前边的人回头一看，也连三赶四退回来，最后两个几乎是直接跳进洞中，险被俘虏。冲过来的人围着洞口，狠狠地用长矛往下乱扎。这时房顶上已有五六十人，他们舞刀挥枪，欢呼胜利。又是一阵哨声，房顶上的人又迅速撤回平台。

紧挨人民会场东邻的尹家煎包铺门前，来了一帮人，搬梯子上到房顶，在老虎嘴窗口用椅子和一块黑板搭个掩体。一个身手敏捷的中年人在那里架起一支小口径步枪。其他人迅速下来了。

老虎窗

一会儿，人民会场房顶那个刚才砸开的石棉瓦洞口又往外钻人。刚拱出七八个，阵脚未稳，一声哨响，对方几十个人又气势汹汹杀将过来。这边几个人见势不妙，立马撤回洞里。反攻方还未收手，一声清脆枪响，有人中弹倒下，几十个人不再欢呼，急忙搀扶着伤员，迅速撤回。这一声枪响是武斗第一枪。下一回合，这个中年人又开一枪，房顶上又一人中弹，伤及肺胸。

见对方有枪，放映室内的人撤回后不再出来反击。房顶上从洞里上来的人越来越多，全部向南面小平台的放映室冲去，瞬间攻陷，一大帮武斗人员也很快消失了，但只有短暂平静。接着，只见放映室小平台那儿冲出几个人，惊恐万状，从人民会场房顶，噗噗腾腾跳下来。现场看客一片尖叫。此情此景令目睹者毛骨悚然。苍天！相煎何急！

退守人民会场大楼的“左司”，在人数和气势上明显处于劣势，虽然奋力抵抗了一阵子，最终还是溃不成军，放下武器，停止抵抗，走出来投降。下午 14 时 30 分左右，“824”攻占了人民会场的一楼、二楼和楼顶。这时，人民会场外响起“哒，哒哒哒！”的枪声。原来是 1 军 2 师 5 团九连的那辆军车在赶到开封邮电局

大楼时“朝天鸣枪示警”。包围邮电局的“824”见到部队军车冲到眼前并开枪，顷刻间如潮水般退去，围观的市民群众被吓得四散奔逃!

扫清了包围市邮电局的造反派之后，军车继续向邮电局东侧的人民会场开行。军车上呼喊着“打倒‘824’!”、“打倒‘二七公社’!”的解放军战士又连连向人民会场方向开枪。

在激烈的枪声和“部队开枪了!”的惊叫声中，人民会场外的人群如潮水般的顺着自由路向东面的奔跑。

此时，躲在人民会场大楼二楼电影放映室内的“左司”、“邮电兵团”人员趁势重新占领了二楼，并关闭了三楼的楼梯口，将占领三楼的“824”百余人全部困在了上面。

这时，部队营房不时传来耸人听闻的消息：什么满载砖头的汽车开进武斗中，砖头像雨点在空中飞；血流成河，死了好多人；一个女学生，被“824”用红缨枪捅的浑身是窟隆，无人敢救等等。

到了傍晚，又传来一个爆炸性的消息：说是“824”四五千人，把对方上千人团团围困在人民会场的二楼上，双方僵持着。“824”已放出话，如再不投降，就用火攻，全部把他们烧死在楼上。整个军营里，群情激愤，纷纷表示要上街营救他们一直支持的“左司”。

18 时 30 分左右，离人民会场两条街之隔的省府西街路北 1 军 8172 部队通讯营的几十名战士，端着半自动步枪，在一位拿着五四手枪的军人的带领下，高呼着“打倒‘824’!”、“镇压‘824’!”从营房里冲了出来。他们一路沿着省府西街、省府前

街朝东到行宫角十字路口向南，沿着中山路到大纸坊街十字路口朝东，进入自由路上的邮电局和人民会场武斗现场。

当他们走到黄河水利学校“9.9 队”郑生面前时，有位战士问他是哪一派的？郑生答道“824 的。”谁知那战士一听，喊了声“杀——”，冲着郑生的头顶上方就是一枪。

在场的“824”见状，丢下俘虏和伤员，一哄而散。“9.9 队”的郑生赶紧跑到东大寺，向“824”总指挥部报告情况。

19 时 30 分左右，开封八中 16 岁的学生刘大勇在中山路西侧的马路边上被一辆由北向南的军车上射出的子弹击中，当场死亡。

20 时过后，这些战士又在开封市公安局附近当场打死了一名公开表态支持开封“824”的空军 15 军 7249 部队的战士。

1 军军部听到通讯营战士开枪打死了“824”的消息，还听说战士被围住了出不来等等，总之是流言四起，一片紧张。炊事班的炊事员，也个个摩拳擦掌，跑到小车班来借枪，说是要去救战友。

当晚，1 军军长徐文礼听到通讯营上街开枪的消息后，对他们说：“‘824’说你们是叛匪，明天‘二七公社’来 100 辆汽车，一定要抓你们，你们赶快跑吧！现在谁也救不了你们，只有自己救自己。”通讯营的战士听了这番话，更加不能自己，他们撕掉自己的领章帽徽，哄抢了枪支弹药，开着两辆宣传车，跑到空军 15 军 7249 部队营房，高声广播说：“我们紧急呼吁！我们紧急呼吁！‘824’杀死了我们的战友！要与‘824’血战到底的同志们，革命的同志们，赶快拿起武器，赶快到大礼堂集合，坚决镇

压‘824’！为牺牲的战友报仇！”

一时间，7249 部队营房里风云突变，一部分战士真的拿起武器，跑了出来，高喊着“镇压‘824’！消灭‘824’！”聚集到了大礼堂前。

在这个紧要关头，7249 部队政治部申主任亲自带着一辆宣传车来到现场，在营房大院里反复对那些携带武器的战士喊话：

“同志们！你们上当了，受骗了！一小撮坏蛋欺骗你们，要你们武装起来去镇压造反派。你们应当相信党中央对河南、对开封问题处理是正确的，我们要相信群众。现在，一些坏蛋已经包围了我们的大院，你们要赶紧回去，不要上当！”

听了申主任的喊话，聚集的战士慢慢散去，8271 部队的宣传车也离开了 7249 部队大院。

很快，开封公安局“左司”派的“公安公社”也包围了 7249 部队营房的大院，一直到第二天的凌晨 1 时多。

晚上 21 时左右，又有两辆满载着军人的大卡车从中山路向北疾驶，并向大街两旁扫射，中山路 109 号的一名孕妇被子弹当场打死，中山路 111 号的一个小孩被子弹打伤。

这天，正在山东省微山湖师部农场收割麦子的 1 军 2 师 6 团政委寇山接到师长、政委签署的《紧急命令》：“开封发生了严重的流血武装事件，军部暨第 5 团均遭遇危急。现令寇山率农场的第 2 营全副武装坐已有的军车立即奔袭开封，堵塞正赶往开封的武斗群众。第 1 营、第 3 营全副武装由师部派车驰援。其他部署将在寇山随部队行动中由师部下达。”

6 团政委寇山拽上正在汇报工作的团政治处新闻组长梁立真

和电台译电员老徐冲进团部唯一的苏式 69 吉普车内，与 2 营一起奔赴开封。行进途中，政委寇山口述向师部汇报部队开进的电报，和给驻在商邱的 1 营、微山湖中心区的 3 营电报，召唤他们随后驰援团部和 2 营。4 小时后，2 营先头部队已到达开封市交际处外的人民大道上。这里已一片狼籍：到处是刀枪棍棒、各类碎纸与传单宣传品……

吉普车停下后，看见正在商邱师部开会的 6 团参谋长姜兴荣早已赶到这里，他拽过新闻组长梁立真命令说："快！设置'军事禁区'！"

梁立真立即挥手指挥团部赶来的勤杂人员约 20 余人，放下背包、行军锅、步枪和冲锋枪，下掉枪栓枪机退出子弹，装入军用挎包内。然后，每人手中挥动随身带的《毛主席语录》冲了过去，在现场临时找到的可利用的纸、竹牌子、木板子或杂布条子，铺在梁立真面前，他大笔迅速疾书："军事禁区！"每写好一行，其他人就迅速在街头的树上、电线杆上、墙壁上、屋角内等处张贴，或挂靠起来。同时，大家把军帽当指挥旗，挥动着，阻止正在奔往人民会堂大楼的工人、农民和学生们。现场暂时获得了片刻的静息。

人民会堂大楼内已是非常的恐怖。楼道处，石阶上，楼层的大小房间内，血迹斑斑，一滩滩，一滴滴，血色已在灰尘和物体的搅拌中，变得污紫和黑褐色了。从进大门处数起，直到楼顶的宽敞顶台，共有 48 具尸体。一个青年尸体，手中还紧握着一杆竹制的长矛，矛尖有一丛用红颜色染料浸过的麻棕线，左臂套有"红卫兵"袖章、右臂系着"开封八·二四"的标志，而前胸偏

左处被钢铁的长尖管刺中了一个大洞，鲜血就从这里的心脏内流尽了。姜参谋长是参加过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的一级战斗英雄，他习惯性地脱下了军帽：尽管这些武斗牺牲者，是死得不明不白，但他们的火热心，仍然为了祖国和伟大领袖毛泽东。

姜参谋长猛一昂头，命令警卫排长华正国："快！此处设立'军事禁区'！"接着，又对政治处新闻组长梁立真："你同小杜迅速去市委机关，要他们来收拾残局！天暴热，不快点来，尸体会很快腐烂了的，要求他们认真办理丧事！"

这时，机要股送来了总参谋部直接发给 6 团的电报，姜参谋长大声读着，总参电报的意思是不能浪费时间，并命令 6 团首长马上去驻开封的空军 7249 部队的军用机场，接受中央军委新任命的 1 军军长、原信阳步校校长杨力勇指挥，并用全力保卫杨力勇的安全和解决开封目前的问题。电文命令 6 团兼任开封警备区，团长成喜臣为开封警备区司令员、寇山为开封警备区政治委员，立即控制开封市的要害机关处所，防止武斗升级，恢复革命和生产秩序。

听了电文，6 团政委寇山让姜参谋长率人在开封市委大院、开封人民广播电台、《开封日报》、开封市水厂、开封火车站、开封市长途公共汽车站、开封市政公安局、开封市检察院等要害处，各安排一个连队警戒，并设置"军事禁区"。自己带上小电台驰奔空军 7249 部队的军用机场，并向总参电台汇报："收到命令，正在紧急部署和执行，请转告杨力勇军长，能主动指示我寇山，好得到他的联络和命令。"

在机场，新上任的 1 军军长杨力勇立即指示："大力宣扬新

部队进驻，让人民相信我们能力挽狂澜！要用生命和热血阻止更大规模的武斗，迅速恢复开封人民的生活秩序。”

这时，就在机场贵客室，杨力勇他们又得到消息：两派群众又在向人民会场大楼集结，扩展非常快。

此时，开封市交际处的门口，全是人与大卡车，把当时开封最宽敞的大道挤得水泄不通！姜参谋长带着团部临时组织的勤杂人员战士在现场指挥，他对那些战士大声说：

“大家都看到了：养兵千日用兵一时，此时是千钧一发的严峻关头，忠于毛主席就要实干实做！”

大家手挽手，挤着身子，隔开纠缠在一起的工人、农民和学生，拼命从两派群众中间挤插进去，然后，再分成两队，相背而立在两派队伍中间，再向各人面前对视的工人、农民和学生们，劝说和请他们向后退，使交际处外的人民大道的街道的空间扩大化，使两派群众不容易发生纠缠与武斗。

就在他们已在两派纠缠的空间撕开了一道约 250 米的“裂口”时，一条侧道内又鱼贯地驶来 10 多辆大卡车！每一辆车上都满载着头带柳条帽、手握长矛大刀的男女工人。

正在现场指挥的政治处新闻组长梁立真立即迎上前去，挥动手中的《毛主席语录》，向第一辆仍在缓慢行驶的卡车大喊：“工人大哥大姐们！我们是从山东省微山湖新来开封市制止武斗的部队，不是过去在开封的驻军！请你们相信我们，请你们按毛主席老人家的教导办事：不能武斗，要抓革命促生产，稳定工厂和市容秩序……”

卡车司机停了车，但车上第一排的一个高大的青年妇女，没

容梁立真把话说完，就大吼一声："别听他的，就是他……"说时迟那时快，她已把自己中那柄来不及抽鞘的宝剑居高临下地一戮，直向梁立真胸口杵来。

梁立真毫无防备，被这柄宝剑重重一击，立即全身向后倒去。好在他身后恰是一株小树，梁立真倒在树干上。剑鞘刚好刺在他军衣上的纽扣上，纽扣后面的铜环刺进了他胸口上的锁骨肌肉内。梁立真随政委从微山湖远道奔袭至开封至此已长达 12 小时中，除只在路上吃了半块西瓜外，几乎肚子粒米未进，人太疲劳了，这宝剑又劲道力足，他当即休克过去，全身软瘫在树干上后，歪倒于交际处外的水泥地上……

战士们见状，怒吼着围拢过来，一部分人抢救梁立真，还有一部分人则跳上那辆大卡车，3 个特务连的战士，将那位刺倒梁立真的开封纺织厂女工五花大绑起来。那一大卡车上的工人，见前来制止武斗的解放军被莫明其妙打倒后，这些本来是来参加武斗的工人，也包括已被分隔开的"工人军"、"农民军"、"学生军"，一时都暂时停止了行动。姜参谋长哭着奔过来，指挥战士们将梁立真抬上吉普车，送 155 军部医院抢救，同时，立即在隔开的 300 米区域设立"军事禁区"，哪一派人马也不得越过这里！

一辆大卡车向 300 米"特别隔离线"冲来，6 团 3 营 8 连的炊事班班长沈世金，身背着笨重的铝制行军锅疾步上前劝阻。可是，卡车司机竟毫不听劝，打轮前行，想逼沈世金让路！

沈世金没有后退半步，手举《毛主席语录》，仍然拦在车前。大卡车继续向他冲来，沈世金急中生智，想脱掉那个大大厚厚的行军锅，把行军锅塞到车底下，迫使这辆大卡车停下来。但是，

车速很快，沈世金没来得及脱掉身上背的行军锅，人已完全被车辆的惯性带进了车下……

大卡车终于因沈世金的人与行军锅障碍而停了下来，然而，沈世金也倒在血泊中……

## 第 773 回：南京市，下关火车站武斗　战犹酣，金陵城终成割据

开封人民会场“731”大武斗在 1 军 2 师 6 团的血肉阻止下平息了，但是故事还远没有结束。听说“824”扬言要发动全市造反派，血洗通讯营。深夜，原 1 军军长徐文礼给通讯营营长打电话，命令通讯营连夜撤出营区，到市西郊的农村暂时驻扎，待事情平静后再回营房。徐文礼在电话里严厉批评了营长，最后说：“以后再找你算账。”

通讯营连夜撤往开封西郊的一片小树林里。据通讯营的战士事后回忆说：

当晚真是狼狈不堪。过去是老百姓逃兵荒，如今我们逃避老百姓。那时开封郊区试种水稻，到处是水田。由于撤离十分仓促，背包也来不及打，一卷一扎就上路。深夜里四周漆黑一片，人多路窄，不少人滑到水田里，鞋陷在泥里，也顾不上找，只好光着脚板走；黑夜里慌不择路，有人掉在茅坑里，浑身发出难闻的臭味，也顾不了那么多。一路下来宛如残兵败将，要多难堪就有多难堪。

当年 1 军小车班的一位司机，2013 年 1 月 5 日在搜狐博客“骡子无用的空间”发表博文《“7.31”事件和“8.1”枪声》，回忆他在“7.31”当晚的经历:

听说事态更为严重，造反派扬言，要发动全市造反派，血洗通讯营。为了避免事态进一步扩大，军长已命令通讯营连夜撤出营区，到市西郊的农村暂时驻扎，待事情平静后再回营房。据后

来官兵们说，军长命令他们撤离时，在电话里严厉批评了营长，末尾，加了一句，“以后再找你算账。”就是这句话，第二天，就要了这位营长的命。

这篇博文接下来写道:

第二天，是“8.1” 建军节。早饭后，我拉上军直工处处长到西郊通讯营作安抚工作。离开市区，大约走了不到一个小时，远远可以看到通讯营官兵集合在村边的一个小树林里。离他们约五百米处，有条小水沟，汽车行进到那儿，不慎陷在水沟里，我进退捣鼓了一阵，还是没出来。就在这时，从通讯营驻地方向，传来“呯、呯”两声枪响。处长一惊，说:“不好!”慌不迭地跳下车，向通讯营驻地奔去。直工处长走后，我用工兵锹把汽车前面的沟沿挖了挖，不久就把汽车开出了水沟，也向通讯营驻地开去。到了跟前，停下车一看，眼前的景象确实吓了我一大跳。几百人的队伍，围了一个大圆圈，中间场地上躺着一个军人，头上鲜血还未干。四围的战士，有的把手榴弹举过头顶，有的平端着半自动步枪，一个个圆目瞪视着场上的直工处处长。直工处长，就像玩杂耍的卖艺艺人，抱着拳，在圈内转圈向着战士们作着打躬作揖状，嘴里喃喃地说道:“同志们那，你们再不能做错事啊，军首长担着天大的干系，如果再发生什么事，我们军可就完了。”

看着这剑拔弩张的场面，我低声问了身边的战士，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战士告诉我说，看见你们的汽车来了，营长以为是军首长派人来抓他的，他就开枪自杀了。处长来后，见营长自杀，不问情由，当即宣布，营长“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战士们感到，营长是因他们而死的，一听如此宣布，群情激愤。

这篇博文最后写道:

不知过了多少时间，也不知处长是怎样做的工作，官兵的情绪似乎稳定了下来。处长命令我一人赶回部队去，向军部汇报这里的情况，并嘱咐我让军部买口棺材。我驱车往回赶，一路上像战时越过敌占区封锁线一样，连闯造反派几处检查站，回到了班里。

开封市“731 事件”后， “左派”等组织纷纷退到了东郊开封化肥厂、开封仪表厂和开封高压阀门厂等地。

8 月 3 日，郑州的“河南二七公社”和郑州驻军 5 万余人在郑州举行了声讨开封“731 事件”的大会。会后，数万余人乘坐大卡车前往开封声援开封“824”。当传来先头车队已抵达开封市人大会堂的消息时，援汴的后续车队还在郑州大石桥上未出郑州，可见此次援汴行动组织动员的车辆之多。从郑州至开封 70 公里的绵延公路上，都是郑州援汴车队，浩浩荡荡，总有千辆以上。

8 月 3 日下午，空军司令员吴法宪给开封空降 43 师来电指示：

7249 部队负责同志：

支持二七公社、八·二四旗帜要鲜明。要加强郑州和开封的联系。一军问题中央会处理的。

就在开封发生“731”武斗的当天，南京下关也发生了历时 3 天的大武斗。

7 月 30 日下午，南京大学教学大楼前的马路上，停放着 10 辆卡车，多数是运矿石的自卸车，每辆车旁都站着几十位武斗队

成员，他们身着蓝色工作服，头戴柳条安全帽，每人手里握着一只长矛，约两米长，矛杆用钢管制成，这比当时普遍使用的用角铁制作的矛杆手握舒服多了，矛杆头部加工有内螺纹，尖尖的矛头底面加工成外螺纹旋在矛杆上。有的长矛在矛头部位扎了红布须，成了红缨枪。

队伍中还有南师附中的同学，其中一位漂亮女生，同样是蓝工作服、柳条帽，更显得英姿飒爽。一个女生站在全是男人的武斗队伍里显得特别抢眼。他们是派到“八．二七”总部参与宣传工作的，这次随着跃进钢铁厂“八．二七”和梅山钢矿“八．二七”的武斗队伍一道行动。昨天晚上，他们刚参加了与“红总铁道兵”的一场武斗，早上才开进南京大学进行休整，现在正集合待命。倒挂在文革楼，即教学楼五楼窗口的一面标着“铁道兵”的红旗，就是武斗队昨天晚上的缴获的战利品。当晚，这支武斗队前往下关火车站，参加“铁联司”攻打“铁道兵总部”的武斗。

半夜 24 时，中山路上的“红总”广播站在夜深人静之际突然发出震耳的广播声：“紧急声明，紧急声明：全市的革命群众们，‘红总’的战士们，‘八．二七’的一小撮混蛋纠集了大批的武斗人员，正在围攻我们英雄的下关‘铁道兵总部’，‘铁道兵’战士们处在万分危机之中，请各单位‘红总’战士紧急集合，马上增援！马上增援！”随后播放了几段战斗歌曲，又再次播放了“紧急声明”，一直反复播音到凌晨两、三点才结束。

第二天早上，古楼到下关的中山北路已不通汽车。南京电子管厂“红总”在山西路的厂门口，3503 厂“红总”的“一二一”在三牌楼厂门口都设立了路障。几十名“红总”武斗队员手持长

矛站在路障通道口虎视眈眈地注视着行人，认为可疑的人员就进行盘问。路上，不少人正赶去下关。在经过挹江门城楼时，看见马路当中横着几根木棍当成路障，南京十二中的“八．二七”在城楼上把守着，并不时探头向下张望。热河路广场旁下关百货公司大楼上，飘扬着“八．二七”的旗帜。几十辆“红总”的运兵卡车沿着热河路向火车站方向走，每辆卡车上坐着司机和一名拿长矛的武斗成员。挹江门被“八．二七”扼守，“红总”的运兵车是从新民门进入下关的。再往前，就看到一队队排成方阵的“红总”武斗队伍，每支队伍前都举着一面战斗队的旗帜：晨光厂的“红总”、长江厂“红旗”、电子管厂“红总”、十四所“八一八”、3503 厂“一二一”、宏光厂“红总”、南京体育学院“一一四”、炮兵工程学院“革反团”、南京无线电工业学校“八一二”等“红总”组织悉数出动，武斗人员有 4000 人之多。

下关客运站前的广场，一个连的解放军士兵，排成三列挡在武斗队伍及客运大楼的之间，力图阻止武斗的发生。而在解放军士兵与武斗队伍中间，省军管会副主任吴大胜、杜方平与南京大学学生、“红总”的副司令、“红总”武斗指挥部总司令张建山及“红总”的“工总”司令、晨光厂工人朱开弟等头头正面对面站着，进行最后的谈判。张建山戴着眼镜，身材削瘦，说话音调很高。朱开弟个矮体胖，很少说话。

军管会说：“希望你们保持克制，撤走武斗队伍，不要扩大事态。”

张建山中气十足地回答：“不行，‘八．二七’欺人太甚，我们已不能忍耐。”

军管会又说："如果大规模武斗带来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你们要承担责任！"

张建山说："现在的局面只能武力解决，我们敢于承担一切责任。请你们不要阻拦。"

军管会见劝说无效，只得坐军用吉普车离开现场。后面的近百名战士也登上 3 辆卡车离开，他们走时听到了"红总"武斗队伍中发出的一片喝倒彩的嘘声。此时，广场上已有数千的群众围观，"红总"武斗队将人群赶到更远的地方，一场武斗开始了。

下关火车站有两座大楼，一座是四层楼的客运大楼，原先是"八．二七"方面的"铁联司"占据，但此楼两侧连着三层楼房，三层楼房连着两层楼房，二层楼房连着平房，使进攻者可以一层一层向上进攻，攻占的难度较小，于是成了"红总"攻击的目标。此时守卫在这里的武斗人员主要是芜湖铁路局被打出来的一批人，他们来到下关，受到南京"铁联司"的接待，给吃给住。所以，当"铁联司总部"被攻打时，他们自然是挺身而出。

下关火车站的另外一座楼是南京铁路分局大楼，有六层，原是"铁道兵总部"所在地，在昨晚的武斗中已被"八．二七"方面占领，现由"铁联司"的武斗队防守。

下关火车站得这两座大楼上现在都飘扬着"八．二七"和"铁联司"的战旗。

上午 10 时左右，解放军刚撤离，"红总"各战斗队的头目聚集到张建山、朱开弟的身边开始战前布置。一会儿，各"红总"武斗队喊着口号包围了下关客运站大楼。一部分武斗队员进到客运大楼内部寻找上楼的通道。一部分武斗队员进入车站月台，还

有武斗人员试着启动停在广场上的消防车上的水笼头。

广场上停着三、四辆消防车，是消防局“八．二七”派的“公安联总”昨晚协助进攻“红总”“铁道兵总部”而派出的，今天早晨还没撤走。一部分“红总”武斗人员拿起了消防车上的消防水龙头，开启水柱向客运大楼楼顶上的守卫者喷去。一些水流喷射到守卫者的身上，他们就高声嘲讽地说：“天气热，洗个冷水澡真凉快。”并用屋顶上的瓦片和石块向下回击。本来掌控消防水笼头要有很大的握力，“红总”武斗队员不会操作，现在又要提防楼上砸下的石块，应接不暇，有几支水笼头脱手了，水带在地上跳舞，猛烈的水柱喷向周围的“红总”成员，惹来围观群众的一片哄堂大笑。

这时，车站内已经打起来了，在二楼屋顶上有六、七名守卫者，他们用屋顶上的瓦片砸向进攻者。而 100 多名“红总”的进攻者有的站在房顶上，有的站在附近的月台顶棚上，也用瓦片和石块向守卫者扔去。守卫者虽然居高临下，但他们人数很少，四面八方的石块、瓦片密集地飞来，总有些应接不暇。应战了一刻钟后，退守到三层楼顶，这样可以减轻从月台顶棚上“红总”队员攻击的压力。但站在二楼屋顶的“红总”队员人数众多，扔出的石块、砖瓦仍然很密集，经过长时间的对峙之后，防守者退到了客运大楼四层楼顶。三层与四层只有一个楼角相接，只能利用客运大楼三层处有一个伸出墙面半米宽的平台，从平台架梯子可以上到四楼，但梯子几乎是直立，稍不注意就会跌到近二十米的地面，那基本上就小命呜乎了。

四楼是镀锌铁皮做房顶，没有可做武器的瓦片，守卫者砸完

石块后，一面拾起进攻者扔来的瓦片进行回击，一面手握一根长6米的搭脚手架的钢管，横在屋顶，可以顶扫敢于爬上屋顶的进攻者。部分“红总”武斗队员在三楼屋顶用石块、瓦片发起攻击，以分散防守者的注意力，另一部分“红总”武斗队员在两侧平台上架起了两、三把梯子，试图爬上四楼屋顶，但爬上梯子的进攻者，看见头顶上横扫来的铁管，不敢造次，只得退回到三楼的平台上，双方僵持了很长时间。

突然，西侧的三层平台的楼梯上，爬上了一位敢死队员，他头戴击剑面罩，身穿击剑用的厚棉衣，一手拿着日本战刀，一手举着钢质盾牌，一跃身从楼梯登上了房顶，而几名守卫者经过两个小时的战斗，心力俱疲，更是心软而不敢用钢管将进攻者顶下地面，自动放弃抵抗而跑开，这样在四层屋顶两侧坚守的最后七、八名防守者都当了俘虏，被押下屋顶。此时全体进攻的“红总”武斗队员发出了长时间的欢呼声。更有近百个“红总”武斗队员爬上四楼屋顶，用长矛在镀锌铁皮的屋顶上捣出了十几个大洞，然后跳到天花板上，又在天花板上砸出大洞，向大楼内部发起了从上而下的进攻。

这时大楼内传来嘈杂的叫喊声，不久听到响起了一声巨大的爆炸声，“红总”成员炸开了攻不下的防御工事。又听到几声枪响。紧接着一阵惊人的呼叫声，防守大楼的铁路中学一名男学生不愿被俘，从三楼纵身跃向窗外的大树，想顺树而下逃走，却没抱住树干直接摔到地面，跌断了腿，还是被抓住。

大楼内的战斗声逐渐平息，广场上的“红总”队员站成两列人墙，一直排到客运大楼门口。一会儿，只见“八．二七”的俘

虏从大楼门口在两列人墙中间被押了出来，直接上了押运他们的卡车。每个俘虏都高举双手，低着头，沿途受到“红总”武斗队员的嘲笑和辱骂。还有好几位女俘虏，也被押过来，都是披头散发，看不清面容。

这场武斗有一人死亡，是南京体育学院学生，“红总”南体“一一四”的沈维洲，江苏省铁饼冠军，国家特级运动员。他是在冲进铁道客运站大楼后，被躲在门后的一位“八．二七”铁路中学女学生用长矛从背后捅到颈后脊椎处而死亡。“红总”方面高调地宣传了沈维洲的“英勇事迹”，还为他举办了隆重的葬礼。

当天傍晚，武斗事件发生了出人意料的变化。此时“红总”的大队伍已撤离，留下了少量人员防守客运站大楼，又派了宏光机械厂近百名武斗队员分乘两辆卡车来前来增援。宏光机械厂武斗队到达车站广场后，派出联络人员到客运站进行联系，其余人员留在车上待命。此时从广场旁的小巷内又走出一队排列整齐的打着“红总”旗帜、带着“红总”胸章的武斗队伍。宏光机械厂武斗队员见到这么多战友前来增援，很高兴地向他们打起招呼，可这队武斗人员走到近处，立即包围了卡车，只听到一声喊“打”，所有武斗人员同时扔出手上的石块，雨点般地砸向车上的“红总”武斗人员，在车上的武斗人员低头趴倒躲避砖雨之时，车下人的长矛已指到车上的“红总”战士身上，几个想反抗的被刺伤，其他“红总”战士知道已无法反抗，在长矛的威逼下举手投降。而这些突然杀出来的人员，就是长江大桥建设工地上的“大桥八.二七”、“东方红”的武斗队员，号称是“八．二七”武斗队中最能战斗的武斗队。他们都是湖北人，基本上都是三、四十岁的人，

刻着皱纹的古铜色的脸上没有笑容，好像都是执行命令的机器人，没有带家小，武斗中是不要命的敢拼。

长江大桥建设工地就在下关，令人奇怪的是，当天上午，下关火车站武斗正酣时，在下关月台上就可以清楚地听见从南京长江大桥传来的广播声："南京长江大桥二处、四处全体'八．二七'、'东方红'的战士们请注意，立刻紧急集合，作好战斗准备。"这条通知反复广播了几遍，他们却一直没有出动增援。此时，武斗已结束，"红总"主力已撤离，他们却在对方松懈时突然发动袭击，在俘虏了宏光机械厂武斗队员的同时，冲进了客运站大楼，在对方猝不及防时迅速占领了整座大楼，被"红总"攻占的下关客运大楼仅几个小时后得而复失，并俘虏了几百名"红总"武斗队员。

南京两大派在下关客运站发生的武斗酣战历时 3 天，从 7 月 29 日晚开始到 7 月 31 日晚结束，"八．二七"方面俘虏了"红总"300 名武斗人员，"红总"俘虏了"八．二七"近 100 名成员。双方头头在省军管会主持下进行了谈判，同意释放被俘人员。4 天后，大多数被俘人员被释放。

到了 8 月初，南京两派的武斗达到了高峰，发动大规模武斗已无需任何理由，"红总"方面逐步攻占了市区内的多数"八．二七"据点，特别是 8 月 4 日，南京市分属"红总"和"827"的两派群众组织在城北迈皋桥附近的南京砖瓦厂发生大规模武斗，造成 9 人死亡，130 多人受伤的"八．四南京砖瓦厂惨案"，还有 8 月 5 日攻打五中，造成了较大的人员伤亡。"八．二七"方面在占领了下关火车站后，乘势夺取了中山码头、金陵船厂、肉

联加工厂等下关和浦口的所有“红总”据点，在下关形成了“解放区”。8 月 8 日，“八．二七”主动撤出市区坚守下关，最终形成“红总”占据城区，“八．二七”占据下关及郊区的局面。

## 第 774 回：分两派，温州抢枪大武斗　火冲天，百姓逃难似抗战

此时，浙江温州的枪枪、武斗也愈演愈烈。

温州文革运动走势与全国其他边远地区一样，先是本地籍在京读书的红卫兵回家乡点火，再是造反派揪斗当权派。

1967 年 1 月 16 日，温州市数万人集会游行，高呼“夺权”口号，进驻地、市委机关，揪斗大批领导干部，地、市委机关瘫痪了。

3 月起，温州地委代理书记王芳被安排到温州一中居住，温州市委副书记、市长英宜之也住在这里。他们由红卫兵管理，王芳的大女儿克美赶去，帮助倒水送饭。

3 月 31 日，温州军分区军管会成立，军分区政委张序昭为主任，温州水警区政委廖云台、温州军分区副司令汪国璋为副主任。

5 月 1 日，温州地委代理书记王芳因为曾任省公安厅厅长，被造反派押送到杭州接受批斗。

这天，温州市“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成立，

此时，温州市区的两派群众组织已是泾渭分明：

一派是 5 月 1 日成立的“温州工人造反派总司令部”，简称“工总司”，中坚力量为温州冶金厂和温州造船工人，文革初期通过温州籍的北京红卫兵鼓动起来造反，头头是黄国光、陈进春、陈时松、陈春林等。“工总司”在市郊区的农民组织叫“贫联总”，头头有永强的张少波、茶山的李文良等。茶山的“硬骨头”组织

是“贫联总”的中间力量。另外，永嘉的“反逆流”、瑞安的“联总”等也是“工总司”一派。

另一派是“温联总”，全称是“温州革命造反派联合总司令部”，主要组成部分为温州市政府各直属单位的基层干部，中坚力量为温州港务局和温州化工厂工人。头头是姚国麟、陈桃熏、叶少华、戴光荣等。“温联总”司令姚国麟退伍军人出身，深受军分区和人武部信任。“温联总”外围群众基本是共产党的基层干部和群众。“温联总”在市郊区的农民组织叫“贫总司”，头头之一是藤桥的叶则楷。永嘉的“炮联”、瑞安的“联站”等，也是“温联总”一派。

温州地区两派的小规模冲突首先是在瑞安的“联总”和“联站”之间发生的。不久，温州市区的武斗越演越烈。到了 6 月，几周内武斗就迅速从藤帽、铁棍升级到热兵器。

6 月下旬，浙江“省联总”宣布吸收温州“工总司”为其下属组织。

7 月 6 日下午，温州“工总司”一派的“红总司”到军管会谈判，要求温州军管会立即释放被“新温医”拘留的皮革厂工人叶经国和被“温联总”下属“贫总司”绑架到娄桥的“炮司军团”负责人杨传美，没有结果，晚上在军管会门口静坐，要求军管会主任表态。

当晚，“炮司军团”负责人杨传美逃回，在军管会门口控诉自己被绑架的经过。

军管会主任张序昭来到军管会门口回答“红总司”的问题。当被问到：“如果杨传美同志说的绑架经过属实，这是什么性质

问题？”时，他说：“未调查不能随便讲……”

此时，静坐队伍里高声宣读和省军管会吴精国的通话记录：

吴同志说：“你们温州军管会和军分区在支左工作上是有问题的，而且是非常严重的，这一点是确定的，毫无怀疑的，我们省军管会讲话是有根据的，不会乱讲的。”

“省军管会的话他们不听，他们不仅对抗省军管会，还对抗了中央的指示……。”

“你们现在叫他公开表态是完全正当的。”

通话读完后，群众振臂高呼：

“毛主席万岁！”

“中国人民解放军万岁！”

“坚决拥护省军管会的正确领导！”

“谁反对党中央就砸烂谁的狗头。”

当时温州军分区司令是王福堂，红四军出身，一直在许世友的手下作战。一次，王福堂在军分区门口回答静坐群众问题时，愤愤的说：“骑马的还是骑马，抬轿的还得抬轿。”在他的授意下，温州军分区统管下的人武部发放民兵武器武装“温联总”。于是，“工总司”也从各工厂搜集民兵武器。这样，以青年工人，复转军人为骨干，以中学生为先锋，两派又迅即组织成立了各自的“火线指挥部”。

就在中央努力促使浙江在京的“省联总”、“红暴派”代表签署“关于坚决执行《六·二四》通知的决议”的时候，温州抢枪和武斗再次升级。

7 月 10 日下午，温州军管会静坐现场爆发武斗。

7 月 11 日，“温联总”叶少华、姚国麟等人组织了一个 8 人小组，在军分区的帮助下，制定了一举歼灭“工总司”的作战计划。

7 月 12 日凌晨，“温联总”按照计划，有组织的抢劫了温州市最大的黄龙山武器库，抢走 TNT 炸药 5700 斤，赤磷 1471 公斤，还有许多枪支弹药。

当天，“温联总”在市区四顾桥拉响炸药包，温州市的大规模武斗爆发。两派开始占领市区各制高点，控制主要交通要道。

7 月 13 日晨 2 时 50 分，50 余人手持木棍突然偷袭西山造纸厂，闯入武器室抢走步枪 30 支，“五四式”冲锋枪 6 支，机枪 6 挺等，子弹袋若干。

与此同时，7 月 13 日凌晨 3 时 30 分，近百人突然越墙强行闯入冶金厂警卫室，把两名警卫人员蒙住眼睛关押起来，并对他们威胁说：“不许你动，动一动敲碎你的脑袋。”他们切断了电话线，然后闯进档案室，撬开档案室和武器室的隔栅，劫走步枪 30 支，冲锋枪 6 支和轻机枪 6 挺。

13 日晚 20 时，日用陶瓷厂被抢去步枪 50 支，自动步枪 8 支，机枪四挺。

21 时，高压电瓷厂枪枝被抢。

就在这天，浙江“省联总”、“红暴派”在北京正式签署了“关于坚决执行《六·二四》通知的决议”。但是这一切，丝毫没有影响温州抢枪和武斗的升级。

14 日凌晨，温州拖拉机厂被抢去机枪 2 挺，步枪 20 支，小马枪 2 支，刺刀 22 把。

19 日凌晨 2 时 25 分，五马街大厅巷小商品公司文化用品批发部仓库的窗门被“温联总”投掷一个炸药包。因有铁丝窗，没投进去，炸药包在窗外爆炸，附近民房的玻璃被炸碎。

晚上 21 时整，“温联总”向“工总司”发起进攻。他们在几十分钟内便占领了市内的制高点：积谷山和华盖山。同时向温州医学院附属医院靠近。“工总司”张艮松身中 6 弹死亡，还有 3 人重伤。

7 月 20 日上午 10 时，数百名“温联总”武斗人员冲进了温州医学院附属医院。他们用机枪封锁了附医大门及附近的街道。接着前后夹攻，立即控制了医院的外科三楼。

“工总司”、“红总司”赶来增援，遭到“温联总”的机枪截击，当场打死温五中 17 岁的学生刘美蓝和“文卫总司”的蔡鼎武。围观者亦被打伤多人。附医“工总司”一派的医院“革联站”的医务人员全部被“温联总”抓走，押至第五中学。

7 月 21 日上午 7 时，温州军管会、温州卫戍区发出《坚决禁止使用民兵武器进行武斗的紧急通令》。

下午 13 时 30 分，“温联总”一队人拿木棍从剪刀厂出来拦住蒋家巷口。约一个小时后，来了一队头戴藤帽的人，在三叉路口，架起三挺机枪，封锁交通要道，禁止通行。直至 15 时过后，行政干校里突然吹响哨子声，守卫在外面的“温联总”立即撤退。从行政干校里出来一支戴“新秋收”臂章的队伍，除了一人拿木棍外，其余人员全都拿枪。这批武器是从行政干校的警卫部队那里“拿”来的。

这天，温州军分区所属 6515 部队 6 分队、防化连及军械库

部分武器遭两大派组织抢夺。被抢武器中，除步枪、冲锋枪外，还有轻、重机枪，火焰喷射器和 60 炮、82 炮、122 榴弹炮等重武器。

当天夜里，“温联总”与“工总司”在市区全面开战。“温联总”从小南门和南站两个方向进攻。此时“工总司”占据着五马街的温州酒家，人民广场前的钟楼，消防中队，地委大院，邮电大楼等处。

7 月 22 日凌晨 2 时许，中山桥下部队驻地开来三辆空卡车。有人朝路灯打了一枪，把灯打灭。谁知枪声一响，周围居民十分惊慌，纷纷起来观察动向，只见这三辆卡车装满从部队搬出来的枪支弹药开走了。

下午 14 时左右，“温联总”所属的“港司”整队进入温州应道观巷公安总队驻地，“抢”去步枪近百支，火焰喷射器 5 只及手榴弹、子弹等。“工总司”闻讯，其“火线指挥部”立即电告中央。

本来温州两派是势均力敌的。但“温联总”在军分区的支持下，很快在军事上取得了优势，占据了市区大部分地盘。而“工总司”则退守五马街、新河街一带，主要据点是位于信河街邮政局的市区最高点邮电大楼和位于五马街和解放路交叉点，扼守市区东南西北十字路口的温州酒家。

虽然 7 月 23 日，浙江“省联总”和“红暴派”在北京达成了关于浙江问题的几点协议后回到了杭州。但是，仅过了两天，7 月 25 日 0 时，温州又发生了武斗，一个接一个红绿信号弹划破了漆黑的温州夜空。接着，轻重机枪从四面八方一齐响起。“温

联总”从温州市的信河街、松台山、打锣桥口、公园路和解放南路等 5 个方向对市中心和邮电大楼的温州“工总司”发起全面进攻，很快就占领了伊斯兰牛肉店、小天津等处。由于进攻时“温联总”使用了火焰喷射器，6 时 30 分左右，服装公司 6 层大楼引发大火，从解放南路口一直烧到县前头。下午 15 时左右，火烧到对面，五马街一带居民的生命财产受到严重威胁，消防队前来救火。

第二天，26 日清晨，四顾桥居民住房被烧，四顾桥华大利餐馆焚毁。位于广场路和府前街的交叉点的钟楼为“温联总”占据。

7 月 26 日凌晨，浙江省军区政委龙潜派浙江省军区副司令员、军管会副主任阮贤榜和“省联总”两名代表乘飞机前往温州解决问题。

27 日凌晨 3 时，“温联总”在钟楼偷袭“工总司”阵地。

上午 7 时，“工总司”向钟楼发起攻击。“工总司”一名武斗人员学着电影《小兵张嘎》里的镜头，在同伴的掩护下，披着棉被冲到钟楼下，在钟楼底层的西面墙上炸开一个洞，放火烧了钟楼的楼梯，楼上的“温联总”纷纷跳楼而逃。“工总司”打死钟楼内“温联总”多人。

后来钟楼被拆除，从此温州的钟鼓楼只剩下鼓楼了。

27 日下午 13 时，解放南路新华书店，印刷业务门市部一带被纵火焚烧。消防汽车前去救火，被武斗阻隔，消防汽车无法进入火场。

下午 15 时，火势已造成大灾。从五马街口到晏公殿巷口一

带解放北路东边的高楼，大片房子成了焦土。烧毁房屋 24495 平方米，受灾居民 295 户，一些重要单位、商场被焚，损失惨重。被烧的包括服装公司、邮局分局、新华书店、新华厂业务部门、温州钟表店、金龙药房、三余堂药店、食品公司办公大楼、美术公司等。

28 日凌晨 1 时 20 分，“温联总”打了两颗信号弹。2 时 15 分开始向钟楼方向“工总司”阵地发起进攻。

温州大火烧了几天，最热闹的解放南路、公园路、五马街等处烟火漫天，海风又猛，居民扶老携幼，背着包袱，到处奔窜逃难，纷纷跑到乡下亲戚家躲难，就像抗日期间温州沦陷时一样。

城里胆子大的则留在市区，乡下胆子大的就挑些粉干之类吃的东西到城里卖。一天，有 3 人挑着担子到沙帽河一带叫卖，他们成一条直线向前走，不想前方一颗子弹过来，穿过了第一人的胸膛，当场毙命，又擦伤了第二人的侧胸肉皮，因为他挑着担，侧着腰，最后进入第三人的腹腔。未死二人吓得连滚带爬躲进了民房，子弹留在腹腔的被“温联总”送到战地医院疗伤几天后才回家。

“温联总”用火攻终于拿下了温州酒家，但最繁华的市中区却被烧成一片废墟。温州历史名人谢灵运故居，如今只剩下墨池巷一个空名。至此，“工总司”仅孤守电报大楼，“温联总”全胜指日可待。

就在这关键时刻，“工总司”在邮电大楼的意义显示出来，他们经过无数次求援，中央终于得知了温州武斗的消息。8 月 1 日，20 军 6517 部队毕庶璞团奉命进驻温州。他们从金华下火车，

征用了当地几十辆汽车，浩浩荡荡通过丽水直奔温州。

“温联总”闻讯，一面猛攻电报大楼，一面在温州军分区军事顾问帮助下组织阻击，企图延缓 20 军的到来。战场选在离温州 15 公里的温金公路的梅岙渡口，温州军分区一些基层干部穿便衣参与其中。

8 月 1 日深夜，毕庶璞团在梅岙渡口遇阻，一时被挡在瓯江北面过不来。据说盛怒之下的毕庶璞要组织重武器强攻渡江，这才得已过江，于 8 月 2 日抵达温州。

温州军分区司令员王福堂在 8 月 1 日前给中央写信问：“‘温联总’到底是群众组织还是土匪？如果是土匪，在我的辖区内我负责剿匪,如果是群众组织我就要保护。请党中央毛主席给予定性。”

8 月 4 日，进驻温州的 20 军 6517 部队发出公开信，表示坚决支持“工总司”。

## 第 775 回：难容忍，王洪文要搞联司　趁开会，支联站头头被抓

7 月 17 日，上海发生的“上体司”与“工总司”下属“交运联络站”那场武斗，或者说是纠纷，在持续了八天八夜后终于结束。谁知第二天，位于上海东北郊的上海柴油机厂再次爆发武斗。

本来，7 月 13 日，上海市革委会还传达过张春桥对上海柴油机厂的电话指示，据叶昌明 1967 年 7 月 13 日的工作笔记记录：

春桥指示，文元来电：

关于联司的问题，希望大家头脑要冷静，还是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我们掌握斗争大方向，不要被干扰、转移了大方向，革委会对两方面都要听他们的意见，对群众还是要促进大联合，头脑要冷静，要做细致思想工作，闹一顿也不要怕，闹不到哪里去。还是依照过去电话意见，双方意见都要听，把情况缓和下来。

然而，7 月 18 日上柴厂的武斗，“东方红”派的解福喜被打死。这场武斗的起因竟是“联司”在厂里刷的一条大标语。

标语是 7 月 13 日上午 8 时刷的，注明“保留五天”。到了 7 月 18 日上午 8 时 02 分，“东方红”覆盖了“联司”的大标语，写上一条针对“联司”的大标语。

于是“联司”不干了，与“东方红”发生了争执。

“东方红”以为，从 13 日上午 8 时至 18 日上午 8 时，整整 5 天。因此，他们在 18 日上午 8 时 02 分开始覆盖，是符合“保留五天”的。

“联司”则以为，“五天”指 13 日至 18 日，保留期应当是到 18 日夜 12 时为止。因此，“东方红”在上午 8 时 02 分覆盖，是违反“保留五天”的声明。

双方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吵着吵着，就动起手来。你往我的身上泼墨汁，我用糨糊“还击”。

双方的人员闻声赶来支援。武斗的级别迅速提高。瓦片、砖头以至铁块，代替了墨汁和糨糊。武斗的规模不断扩大，参战者 1000 多人，伤员激增，达 300 多人。在混战之中，出了人命：工段车间党支部书记、“东方红”成员解福喜在劝阻时，被“联司”的人拖走，第二天死亡，之后被称之为“解福喜事件”。

“东方红”指责“联司”打死了解福喜，因为他身上有伤痕。上海市人民检察院法医研究所、上海市公安局有关法医和东方红医院、延安医院、上海市胸科医院、长海医院、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上海市第一医学院、肿瘤医院、华山医院等方面的外科医师、骨科医师、病理科医师、内科医师联合签名的《解剖检验鉴定书及解剖照片》证明，死者“头面部、两上肢、颈部、胸部、肩背部、腹部、腰部、臂部、两下肢有散在大小损伤 55 处，心包腔积血，心外膜积血，软脑膜及脑实体积血……鉴于受伤部位较为集中，尤其臂部为著，说明死者处于无抵抗状态……”

“东方红”抬着解福喜尸体到市革委会游行、静坐，要求惩办凶手，并认为他们在厂里生命安全没有保障，又一次全部撤出工厂。

上海市革会王少庸、徐景贤、王承龙以及三军代表与“联司”负责人坐下谈判。但是，没有成效。“联司”不接受市革会要他

们交出打人凶手的要求。

就在此时，武汉发生了“720事件”。

7月21日晚，王洪文在上海人民广场主持召开 “用鲜血和生命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解福喜同志追悼大会”，他在大会上讲话说：

“解福喜是被‘联司’一小撮暴徒私设公堂，酷刑拷打致死的，全身打得皮开肉绽，体无完肤，尸身遍体鳞伤，惨不忍睹。”“解福喜为保卫革命路线，保卫我们上海无产阶级新生政权——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献出了生命。解福喜不会白死，也不能白死。上海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誓以鲜血和生命保卫毛主席革命路线。”“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人民的犯罪。”

会上宣读了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政法指挥部当天发出的《通令》，称：

“7月18日，在上海柴油机厂‘联司’总部，有人私设公堂，严刑拷打上柴‘东方红’战士解福喜，以致惨死，手段十分残酷。我们对死者表示沉痛的哀悼，对家属致以深切的慰问。根据中央‘六六’通令，我们政法指挥部特令以杨仲池为首的上柴‘联司’负责人立即交代打人致死的过程，交出杀人凶犯名单，听候审讯……”

追悼大会结束后，与会者分乘上百辆卡车举行全市卡车大游行，在第一辆大卡车的前面挂了一幅解福喜的大照片。

当天，上柴“联司”发出致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备忘录》，全文如下：

备忘录

现在上柴黑党委内一小撮走资派和背后支持他们的人，日益加剧对我“联司”进行迫害，现在他们更是抓住解福喜的死来达到其目的。为此，我们提请市革会政法指挥部、工总司的一些负责人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一）上柴厂群众之间的对立、斗争和武斗现象不断发生，是上柴黑党委内一小撮走资派和背后支持他们的人一手策划和由上柴“东战部”挑起的，是有计划、在步骤的对“联司”的政治迫害，我“联司”战士五月份以来，尤其在“六·二九”、“七·一八”大惨案中严重流血，这笔帐我们一定要算的，我们坚决要求惩办打人凶手，揪出其幕后策划者。

（二）对解福喜死的问题。根据我们所了解的情况以及入院病历，确实证明解福喜的死因，根本不是什么“被打死”的，而主要是急病或中暑。

经我“联司”代表赴法医所观验，发现解福喜的尸体已遭破坏，已不足为证。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为此，我们要求由全市革命造反派组成调查团，就这事进行调查，并要求中央迅速派人，一起对解的尸体进行解剖分析，在此之前尸体不得毁证灭迹，否则，那就是一个严重的政治阴谋。

（三）由某些人组织的江湾体育馆会议（七·二〇）、“七·二一”人民广场会议是挑动群众斗群众，陷害“联司”，扩大事态的极不光彩的活动。由此而产生的一切后果，由会议策划者负完全责任。

（四）近日《解放日报》散发了大量的颠倒黑白混淆是非的传单，我们保留在必要时对“传单”泡制者及其幕后策划者采取

必要革命行动的权利！

此致上海市革命委员会

上海柴油机厂革命造反联合司令部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一日

此时，“工总司”和上柴“联司”他们都不知道，毛泽东已于当日上午来到了上海。

7月23日，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召开几十万人参加的“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上海无产阶级革命派誓死保卫中央文革大会”，王洪文主持大会。大会愤怒声讨了武汉“720”事件，发出《给谢富治、王力同志的慰问电》，及《给武汉地区革命造反派的声援信》：“龟蛇两山在震荡，万里长江在咆哮，武汉三镇在沸腾！无产阶级革命派难道能容忍阶级敌人和它们的爪牙如此横行不法吗？不！不能！一千个不能！一万个不能！！万万个不能！！！千百万人发出了同一个愤怒的吼声：打倒陈再道，砸烂’百万雄师’！坚决镇压反革命！无产阶级专政万岁！”

“联司”认为，市革会在大会上《给武汉地区革命造反派的声援信》骂的是“百万雄师”，字字句句却针对着“联司”和“支联站”。此时，“工总司”的老对手们几乎都站到“联司”的大旗之下。就连“工总司”的反对派们的子女，也组织起一个个“小支联站”，都是些十几岁的孩子，号称人数 500 多人，领头的是一个小学教师。他们的任务五花八门。据一位 17 岁的“小支联站”成员说，他们的任务是：

一、贴标语，发传单；

二、看见“东方红”或“公革会”（即“公安局革命造反委

员会”）的汽车停在那里，就把轮胎的气放掉；

三、扰乱批判“联司”的大会会场，起哄或撒传单；

四、救护“联司”伤员，送进医院；

五、看管好“联司”的汽车。

这帮孩子在“支东派”的会场中捣乱起哄，穿梭于人群中散发支持“联司”油印传单、护卫“支联站”宣传设备和人员不受侵害，熟练地拔掉“东方红派”汽车轮胎气门，一时间也成为上海滩人们茶余饭后的笑谈。

有一支名为“压勿煞战斗队”成为“支联站”中的生力军。王洪文派人暗中查访，大吃一惊：原来，这支“压勿煞战斗队”的队长非别人，乃是“一兵团”的“司令”戴祖祥之弟戴祖大！

“压勿煞”，上海土语，“压不倒”之意。怪不得“支联站”层出不穷，原来都是这些几经较量而“压勿煞”的人物。戴祖大也被王洪文抓起来了，被迫写了“自白”。这份“自白”被“工总司”印成传单，曾广为流传，题为《我为什么要“支联”，反工总司？——原北上返沪第一兵团戴祖大的自白》。

7 月 29 日和 7 月 31 日，市革会政法指挥部为解福喜事件传讯以杨仲池为首的“联司”负责人，“联司”拒绝听命，将前来执行的上海市公安局民警戴的帽子扔了，强迫他们站在桌子上，挂上“我是镇压群众刽子手”的牌子拍照，批斗。

7 月 29 日，上柴“东方红”的队伍全部撤出了工厂。

7 月底的一天，王洪文得到打入“支联站”卧底陶国正送来的情报：全市各“支联站”正在联合筹备成立全市性的统一组织——“上海市支持联司联络总部”，简称“支联总部”。他们将于

7 月 31 日晚上，在泰安路一栋房子里召开各区和大厂的“支联站”头头近 25 人参加的会议，讨论落实成立“市支联总部”大会的准备工作，并准备在第二天，8 月 1 日，召开成立大会。此时陶国正已被任命为即将成立的“上海市支持联司联络总部”组织部长。

王洪文当即于 7 月 31 日下午在“888”召集“工总司”总部主要负责人会议。根据叶昌明的工作笔记本上记录的那天会议情况：

王洪文：

最近社会上有几件事

发现了一张反动的大字报：坚决打倒两面派江青。主要是攻击样板戏问题，攻击江青的生活。

攻击市革会的大字报也不断出现。支联站不断拉队伍，好多已联合的也被拉开，反说是工总司拉的。同时大反解放军，要大肆抓人(据知在八月初几天要对头头下手)。

这几天敌人已经达到猖狂的地步，我们一些人的地址他们都摸熟了。

张宝林：专政机关决定在 8 月 1 日上午在南市第一看守所传讯杨仲池。

王洪文准备在“支联站”头头开会时会时派人去冲会场，将他们一网打尽。

王洪文的讲话立刻得到了与会者的赞同，大家一致认为，决不能让“市支联总部”成立，否则必将造成上海的大分裂，后患无穷！

王洪文安排陈阿大和戴立清两人为现场指挥，戴立清坐阵指挥部负责电话联络，陈阿大从上海硅钢片厂和上海耐火材料厂等冶金系统工厂的造反队调 100 人，负责包围现场外围，其中 50 人在衡山路 1 号总后华东物资局大院里待命，作为二线力量备用；请“上体司”胡永年调 50 人，负责冲进会场抓人；为了缩小影响，王明龙负责调冷藏车，停在华山路泰安路口，等“上体司”胡永年派的队伍抓到人后，就用此车装被抓的人。因为冷藏车密封，外面看不到车里的情况，保密性能好。为防止被抓者反抗引起冲突，王洪文要打入“支联站”的卧底陶国正在“支联站”头头开会前，将房间里凡是能抵抗的工具全部清除。为防止混战，王洪文要行动人员都在左臂扎白布带作为记号。王洪文还规定，“上体司”的人只负责抓屋里的人，若有人从窗口或阳台跳下，则由外围人员抓。

王洪文将这次行动称之为“G 号行动”。叶昌明的工作笔记本上记录的“G 号行动”如下：

G 号行动计划

今天支联站(上海联司)开会(经常开的)有三十多人，要抓几个人。

昨天他们写了一份宣言，矛头直指市革会，里面有一批亡命之徒的。

这几天他们要动手捉我们几个人了，所以我们也要动手捉(泰安路 120 弄 31 号)

进去的地点：华山路、泰安路，把弄堂堵塞就走不掉。

方案：

1. 埋伏捉人。

2. 袭击，围攻捉人。

人员：

1. 体司抽五十人。

2. 抽一百人袭击。

时间：晚上七点。

记号：左手绑白布。

指挥部：戴立清、王洪文。

整个行动的具体时间等待内线陶国正的指令，在行动中注意“自己人”的标记，晚上 18 时调集队伍在徐汇工人体育场集合，19 时前，各方面人员到达指定地点待命。各个地点的消息由专人不断的汇总到指挥部，戴立清在指挥部设置三部电话统一指挥。其他人都等待行动事态的发展。

队伍很快在乌鲁木齐路衡山路口的徐汇工人体育场集合，引起过路群众围观，人越聚越多。现场指挥陈阿大见状，赶紧将队伍带到对面的总后华东物资供应局，对外叫做“05 单位”的院内。

“上体司”胡永年向王洪文报到。王洪文告诉他，这次行动陈阿大也参加。因 5 月 30 日“上体司”与“工总司”所属“工体司”的武斗积下怨，许多队员不服陈阿大。胡永年担心陈阿大指挥不动“上体司”的人，亲赴现场指挥。他赶回体委，立刻调“上体司搏斗兵团”及举重、摔跤、游泳队 50 人，找到前线指挥陈阿大，接受了袭击、抓人的任务。

18 时多，本来定在三线的王洪文还是有些不放心，于是带着

戴立清等人赶到 05 单位，对集结在这里的人员、车辆、标志等逐一检查，并配备了简单的药物。

晚上，各区、大厂的“支联站”负责人纷纷来到开会地点，50 个身强力壮的“上体司”运动员见状，没有等到行动指令的情况就一拥而入，冲进屋内，将 26 个与会者，包括内线陶国正在内全部抓获，有人跳上阳台企图跳楼也未逃脱，屋内的“上海支联总部”的牌子和旗子当场被砸烂和撕毁。

由于是提前行动，冷藏车还没有到，只好将这些被抓的人全都塞进一辆大客车，正要起动，有两名被逮的人大喊冤枉，说是抓错了人，他们是过路的，只是过来看热闹的。但此时也管不了那么多了，车子先在路上不断兜圈子，确定无人跟踪后，开进了杨浦公安分局。王洪文吩咐绝对保密，决不能让“联司”知道，甚至也没有报告市革会，说反正胡永年会告诉徐景贤的。

数天以后，除两名过路者被释放外，有 9 人在这里被关押了一个多月，有 14 人被移送到市第一看守所，关押达七、八年之久。

这次行动，全市“支联站”的负责人几乎被一网打尽。但是没有抓到“联司”负责人杨仲池和“支联站”的全向东、陈卜昌。

全向东因为听到有人要抓他，已于 7 月 18 日就将妻子和三个孩子托付给陈卜昌，让陈卜昌为他们找个安全的地方藏起来，他自己从 7 月 29 日以后就再没有露面。

而陈卜昌不赞成建立全市性“支联”组织，认为没有必要搞得这么正式，还选出常委，等于给对手送上骨干名单，一旦失败将被一锅端。因此和这些人也就没有来往。

尽管“工总司”的这次行动十分保密，但人员失踪，还是使“联司”和“支联站”马上察觉。8 月 1 日，“支联站”在江湾附近的大柏树开会，陈卜昌说：“根据各区汇报，我们的人已失踪 48 人，其中确定被抓的有 30 多人。”

## 第 776 回：触电网，解放军战士身亡　枪声响，泸州城狼烟四起

四川宜宾的“红色派”自 6 月被“红旗派”赶出城后，退到江北，宜宾城内就全都是“红旗派”的天下了。这时，原宜宾的驻军部队也公开表态，支持“红旗派”，支持刘结挺、张西挺回四川闹革命。到 7 月初，由宜宾城建系统、交通系统的“八八团”，加上江北片区的宜宾“红旗派”联合，有组织地进行“江北反击”，又将宜宾“红色派”从宜宾造纸厂撵出江北，退到金坪、象鼻以外，并且在金坪从“红色派”手中缴获到几支小口径步枪。宜宾这边武斗暂时停息，但是，泸州那边干戈又起。

泸州原是一个单独的行政区，辖 7 个县市，后与宜宾行署合并为宜宾地区，辖 18 个县市。

早在 6 月份，泸州两派就摩擦不断，伤人事件时有发生。6 月 29 日，宜宾地革筹王茂聚打电话叫“红联站”的核心组织“红闯将”和“泸州红旗”的核心组织医专“912”，让他们各派代表 5 名去宜宾解决泸州问题。接到通知后，“红闯将”按《通知》要求去了 5 名代表，于 7 月 2 日上午 8 时到达宜宾。

7 月 3 日，王茂聚召集双方代表正式开会，此时“红闯将”发现“泸州红旗”除了“912”5 名代表进入会场外，还有其他组织的人也随他们一起进入会场，当即提出抗议，要求只能是“912”和“红闯将”各 5 名代表开会。

王茂聚说：“我在通知里说了你们也可以来其他组织的人，像‘红卫红火炬’、‘狂千赤’都可以派一些代表来。”

“红闯将”听到此话，感到被戏弄。因为当时双方协商派代表到宜宾谈判时，及后来地革筹的通知中，都是要求双方各派5名代表参加，怎么到开会时就变了？心里大为不快。开会期间，双方代表又摩擦不断。一次到宜宾饭馆吃饭时，双方不期而遇，一见面也是大吵大闹，相互辩论，甚至大打出手，衣服都被扯烂。“泸州红旗”甚至说：“宜宾不是泸州，把昏闯棒（红闯将）赶出宜宾城。”

7月4日，“泸州红旗”建筑公司“红工912”趁“红联站”下属建筑公司的“红建”组织都去上班，“红建”团部无人之机，抢占了“红建”团部，控制了市建司大楼。而“红联站”大量市郊农民则以听领导作报告和抗洪名义也开始陆续进城。与此同时，“红联站”又得到消息说，“宜宾方面军”和“川大826”已进驻泸州，接着在兰田又发生了“红旗石油造反总部”打死“川南石油造反联络站”工人一名，多人受伤事件。此时泸州的空气一下紧张起来，双方剑拔弩张。

7月5日晚上，20多个三中的红卫兵声称是遵照“红联站”《6.22声明》采取行动，进驻大什字治平路化工门市部。

6日早上8时许，大什字化工门市部两名女职工到门市部，对“红联站”说“不准进驻，我们要上班。”

就在门市屋内吵闹之机，门外聚集了不少人，有的人把门打开冲进去并要上楼，屋里的学生退到楼上，不准上楼。双方争执不休，发生推搡，进而发展到楼上楼下都互用弹弓射击，双方打了起来。

就在屋里的人打得难解难分时，在周围房顶上也出现了了

人。“红联站”的人登上了东风百货店、百货公司青年门市部、食品公司、百货大楼、豆花馆、保健所等房顶，“泸州红旗”则登上了花纱布公司、搬运公司、港务局、大什字文具商店等地的房子上边。双方开始用砖头，石子，瓦块，弹弓射击。

11 时左右，在化工门市，“红旗”一路从正门冲进，将屋内的人赶出屋外，一路从抢占的门市周围制高点不断地用砖、瓦向守卫在化工门市楼顶上的“红联站”投掷，这样上下夹击，迫使“红联站”退却，化工门市被“红旗”拿下，10 多名“红联站”人被俘。

接着“红旗”又声东击西，一边从左前方的地上和房上用弹弓，瓦块等向“红联站”抢占的百货批发站楼顶上射击，一边又悄悄地从轮船公司东门口售票口处一带房上下来。“红联站”有腹背受敌之感，慌忙撤退，最终，除了百货公司，和“红联站”老巢外，其它“阵地”均被“红旗”控制。

武斗一直持续到下午 19 时左右，天渐渐黑下来，又下起了大雨，大家都感觉累了才住手。此时，大什字，鱼市街等地的交通完全中断，周围商店的东西也被一些人洗劫一空。

陆上吃了亏，水上不可大意，当天下午 16 时许，“红联站”封锁了宝来桥，19 时又封锁了沙湾渡。次日一早，号称“红联站”主力军的泸州天然气化工厂“泸化兵团”上百人乘 601 汽船从高坝进城，同时 100 多农民从二道溪坐船向城里奔来。这些武斗人员头戴藤帽，手拿钢钎，有的腰间插着匕首。登陆后，吹着冲锋号，向“红旗”阵地发起进攻。武斗双方抱着各自的信念和理想，英勇无畏奔赴战场，使用钢钎、木棒、石块、砖头展开面

对面的战斗。

这时，驻泸部队也派出一班战士来制止武斗，无济于事。“红联站”一鼓作气重新占领了大什字、小什字、自来水公司。下午13时，他们又向京剧院对面的水果店进行偷袭。也就从即日起，泸州武斗开始升级，双方都开始使用“化学武器”---硫酸，硝酸，石灰等。在南城，“红联站”300 多人袭击泸州师范“穷追猛打”组织的驻地，迫使该组织于晚上撤走，“红联站”占领泸州师范。

为制止双方武斗，防止事态进一步扩大，驻泸部队于7月8日召集两派代表到驻泸部队驻地进行谈判。“红旗”派4人前往，并由部队保护返程。这是双方开战以来第一次面对面地坐下来谈。

泸州的告急电和专门赴宜宾求援的人群不断。7月9日晨，刚成立不久的宜宾地区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给泸州“红联站”和驻泸州的7804部队发了两个指示电文：

1、“红联站：你们应当立即停止对红旗派的进攻，并将你们所调参加武斗的贫下中农和工人，让他们马上回本单位。否则，后果由你们负责。”

2、“宋团长、张政委：泸州情况十分紧急。在这紧要关头，7804部队应站在红旗派的一边，要坚决支持红旗派,制止武斗，妥否，请考虑。”

午后，由部队主持，双方经过谈判，达成了第一号《停止武斗协议》。其主要内容是：“双方立即停止武斗，互不冲击。”

虽达成协议，并且当天地革筹还派出了5个人到泸州视察，

但双方都没有因此而善罢甘休。当天，由“红联站”火线指挥部含创办的火线办刊物《战地黄花》创刊号上发出了“红联站火线指挥部第一号令。”命令要求“红联站”人要敢于痛歼一切敢于来犯的匪徒；严格执行“受蒙蔽的群众和俘虏政策”。同时，“红联站”以每人 3 斤粮，2 元钱，一双新胶鞋，一件工作服的待遇，调集了高坝、沙湾的农民进城参战。晚上，双方在东门口、三星街又展开了一场激战。

7 月 10 日，为进一步控制水上交通，“红联站”正式成立了“水上舰队”，控制了泸州地区的机动船 12 艘。

13 日，“红联站火线指挥部”又下达了第二道命令：

命令“红联站”全体将士坚决执行《四川十条》，执行刘结挺关于制止武斗的指示；坚决执行毛主席制定的俘虏政策；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并把“红联站”人与一般老百姓的关系喻为“军民”关系。此时，“红联站”正式启用“54 军 7804”部队番号，只不过在 54 军的前面加的不是“中国人民解放军”而是“红卫兵”。

同日，双方又进行谈判，就划定警戒线的问题达成第二号《协议》。为防万一，“红联站”在主要警戒线的隔离区上安上了探照灯，“泸州红旗”则安上了电网。双方仍在积极备战，“红联站”将五金厂做的钢钎大量运往长庚宫，又将防穿刺的铁背心用船运往城里。“泸州红旗”也在大量地造钢钎，大量地装硫酸瓶……

7 月 14 日，双方继续谈判，达成第三号《协议》，除重申以前协议的精神外，还要求双方靠街道两侧房顶上的人一律下房顶，现在无人占领的楼房一律不准进驻。同时，解放军也在隔离

区内监视双方的行动。

7 月 15 日，一场悲剧发生了，负责执勤的解放军战士安崇坤在东门执勤时触电网倒地身亡。“泸州红旗”称这是“红联站”所为，是“红联站”在电网上又私自搭了根线，将闸合上通电而造成，“红旗”根本就没有合闸通电。这是“红联站”阴谋陷害“红旗”。“红联站”则称“红旗”惨无人道的用电网“电”死解放军，犯下滔天罪行，并在泸县开追悼大会，高呼要为“触电身亡的解放军战士报仇！”“向黑匪讨还血债！”

“解放军战士触电身亡”的消息传到成都，省革筹大为震惊，当即，成都军区梁兴初司令员就发出指示：“立即停止武斗，双方都不准进攻，要拆除电网。”

“红旗”无奈只好照章办事，撤除了所有电网。此间，“红联站”又从兰田运来了几百名石油工人从澄溪口上岸，进住市财贸校，并在二中开会，布置攻打医专事宜，准备直捣“红旗”老巢。

18 日，“红联站”经过一番周密部署后，乘“红旗”将电网撤除之机，突然进攻。凌晨 4 时，“红联站水上舰队”在江面上汽笛长鸣，广播呐喊造势。同时头戴藤帽、铝盔，手持钢钎的“泸化兵团”“石油联络站”“红色社员”等组织的大军在 5 时许，突然推倒医专砖墙，从风雨球场，教工宿舍，食堂一带杀进实验楼，行政楼。”泸州红旗“见状慌忙调集人马及消防车进行阻击。双方就在实验楼、行政楼一带展开撕杀。你掷硫瓶将我身上烧伤，我投石灰将你眼睛烧瞎，趁对方烧得不堪忍受的一刹那，再用手中的钢钎或大刀将其撩倒，或用高压水龙头将其冲倒。因“泸州

红旗”进行了顽强的抵抗，“红联站”最终未达到目的，撤回了原地。

这次战斗，“红旗”7 人死亡，重伤 130 多人。轻伤不计其数。消防车遭破坏一辆。“红联站”也死伤多名。就在“红联站”重点进攻医专的同时，他们还在沱江大桥曲酒厂，桂花街，珠子街一带向“泸州红旗”发起了进攻，与进攻医专的战斗遥相呼应。在这次被“红联站”称为“正义反击战”中，曲酒厂的职工一人，“泸化兵团”二人阵亡。“红联站”大为悲痛，其后，还专门开了追悼会。

为配合城区的形势，在泸县“泸联站”“泸县红卫兵团”发出“十万火急”传单，公开表示与“红联站”同生死，共患难。

在兰田，“红联站”兰田分站发表了《红联站兰田分站武装接管兰田镇严正声明》，并声称“我红联站兰田分站已于 1967 年 7 月 18，9 时零分武装接管兰田镇”。“武装接管后兰田镇是革命人民的红色政权”。眼看一场更大，更残酷的武斗即将爆发。

19 日上午 10 时，双方再次进行谈判，签订第六号《停止武斗协议》。其主要内容为：坚决贯彻梁司令员的指示，双方立即停止进攻，限 7 月 19 日 12 时退回原来划定的隔离线。第四、五号协议继续有效。今后双方都不能以任何借口向对方发起进攻。

晚上，“红联站”召开紧急电话会议，决定：将“泸联站”改名为《红卫兵 54 军 7804 部队贫下中农指挥部》。紧接着第二天又命令下属组织人马堵塞泸宜、泸永、泸荣等公路，并组织人马把守交通要道，阻止外来支援“红旗”的车辆。同时又向“红旗”发出 6 条通令。勒令“红旗”21 日中午 12 时前，必须交出

小市，否则将采取必要行动。

消息一传出，小市顿时人心惶惶，民心动摇，特别是“红旗”家属，纷纷搬家，四处逃离。

7 月 21 日这天，对“泸州红旗”来说，可谓是最难忘记的一天，也是自双方开战以来“红旗”伤亡最惨重的一天，而相对“红联站”来说，是取得重大胜利的一天。上午 10 时许，一架军用直升机盘旋在泸州市区上空，飞机飞得很底，高度大约比钟鼓楼稍高一点，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机上的人不断地往下撒着一摞摞传单。这是由成都派往泸州的直升机在散发《红十条》和有关两派立即停止武斗的中央文件。但对这双方都毫不理会，在各前沿阵地仍是我行我素。

同往常一样，双方要么开展拉锯战，你进我退，你退我进；要么相互对峙着，到大约 11 时 50 分左右，“红联站”用火药枪击伤两名“红旗”人员，同伴见状，怒火满胸，“冲啊！”“红旗”冒着石块，砖头，硫酸瓶向“红联站”阵地冲去。当身高只有 1.5 米，17 岁的“826”学生冲上楼房，拔下了“红联站”的旗帜，“红联站”似乎开始撤退……。

突然，枪声大作，接着，冲上房顶和楼房上的“红旗”应声倒下。同时又传来一阵阵的爆炸声，楼上有人向下扔爆炸物，紧接着，一个个身穿绿色雨衣，端着枪的人出现在不同的位置向“红旗”逼来。与此同时，在珠子街，花园路，迎晖路等地“红联站”也展开了进攻。此时“红旗”开始反应过来，一个个冒着凄沥的枪声开始夺路逃命；有的将钢钎一扔，藤帽一甩转身就跑，未跑出两步，扑通一声倒在地上，动弹不得；有的边跑边扔死劲地往

有民房的角角钻或往钟鼓楼医专方向跑；更有甚者，连自己的衣服裤子都没脱就扑通一下跳进沱江向对岸的小市方向游。跑的快的幸运，跑的慢的自然当了俘虏或成了“枪”下鬼。

在文化宫背面 3 楼上，一个脑袋伸出窗外左看右看，然后用一根绳在窗上打个结，接着就顺着绳往下吊，刚着地，撒腿就往官井坎跑了。

在医专附医大门口，有的脸色苍白，喘着大气，瘫痪似的靠着墙，坐在地上；有的不停地，发疯似的往山上跑；有的则手握大刀或钢钎，怒目圆睁，一幅随时准备与“红联站”血战到与医专共存亡的架势。

此时，喊声、叫骂声、哭声、枪声伴随着悲壮，凄凉地从高音喇叭传出的歌声交织在一起，乱成一团……

下午 13 时刚过，仍不解恨的“红联站”又从六中方偷袭了医专，夺得战旗一面，气枪一支。下午 14 时，“仇恨满胸的红旗战士”部分人冲入市广播站，不顾军管会的执勤的卫兵阻拦，到处“翻箱倒柜”企图抢枪，但一无所获。同时另一部分人又闯入市武装部抢枪，但哪知抢的都是一些没有枪栓的老套筒，子弹也是一些被破坏变形的，根本不能用。最后，不知从什么地方搞到几支小口径步枪。这时“泸州红旗”已是军心动摇，人心惶惶。他们纷纷找机会离开泸州，有的就在晚上从沱江上游百子图一带，头顶衣裤，悄悄地游向小市，然后向隆昌方向逃离。

这次战斗，“红旗”死伤 400 多人，被俘的大约 200 至 300 人。仅在沱江河边抓获的想游过河的人就 100 多名。“红联站”在其战报《枪林逼》上称这天的武斗是“自卫反击”，是“正义

与非正义”“侵略与反侵略”的较量，将与“黑匪”奉陪到底。这一仗，“红联站”占领了50%以上的泸州城和80%以上的郊区，并控制了整个泸州的水陆交通要道。“泸州红旗”却被困在方圆不到两平方公里主要是医专附院的区域内。

## 第 777 回：组船队，王茂聚首次支泸　邓长春，黄山警备司令部

7 月 21 日发生在泸州的武斗，再次震惊了成都。当天下午，成都军区司令员梁兴初给泸州发去电报：

一、停止武斗。

二、革命造反派最听毛主席的话，要做制止武斗的模范。

晚上 23 时 50 分，梁兴初又给泸州驻军发来三点指示：

一、告诉‘红联站’把前沿几个点守起来。

二、兵力不要分散，双方再进攻，要向他们提出警告，一切后果，要由进攻者负责。

三、明天继续找他们谈判，收缴一切武器，一枪一弹不能少。

“红联站”得知这一消息，前线指挥部立即召开紧急会议，下令：“前线部队严守前沿阵地，不容‘黑匪’（指“红旗”派）再度进攻。”

“721”泸州武斗的消息传到宜宾，当晚宜宾地革筹即在市灯光球场召开了“声讨红联站，支援泸州红旗的誓师大会”，表示要与泸州“红旗”共存亡。

“泸州红旗”的粮食，医药，蔬菜等生活用品来源早已困难，他们已多次向宜宾方面求救。

此时，陆路交通已中断，支援泸州的物资只能由宜宾造纸厂、宜宾长航社、大渡河木材调运处等选派的轮船，加上码头的“八八团”和城建系统、交通系统派出人员，组成“支泸”船队，通过水路前往支援。

7 月 21 日这天，“红旗宜宾方面军”就已派出了以宜宾市江北二航司“红旗司令部”为主的武斗人员，满载粮食、药品分乘 8 艘轮船，顺长江而下,开始了“第一次武装支泸”。

7 月 22 日中午 12 时 30 分，从宜宾开来的满载粮食，医药等物的船队排成品字形出现在泸州长江江面上，船头站着头戴藤帽，手持钢枪，大刀，身穿救生衣的武斗人员。船队边行驶，110 号指挥船上的高音喇叭边不断地进行宣传鼓动，高呼：“血债要用血来还”的口号。

此时，泸州“红联站”已得到消息，急忙派出“水上舰队”11 艘，排成一字形进行阻截。宜宾船队见状，在 110 号指挥船指挥下，各船丢下驳船立即排成两行向泸州“红联站”的“水上舰队”驶来。双方在澄溪口江面上展开激战。宜宾船队向泸州“舰队”喷射液体，泸州“舰队”也向宜宾船队投掷爆炸物。12 时 50 分，宜宾 110 号指挥船向“舰队”601 号开枪射击，一颗子弹从 601 船窗口下距甲板 77 厘米射入，打中“泸化兵团”一人，至其重伤。还有一颗子弹自驾驶室左弦窗口下距甲板 87 厘米高处射入，打中 601 号船长，弹头从他的左臂部穿入，右小腹穿出，造成大出血，肠管外流死亡。

泸州“红联站舰队”见事不妙，慌忙下令撤退，宜宾船队追至二道溪返回，将船在泸州码头泊好，抓紧时间搬运粮食和药品，泸州“红司”的人见状欢腾不已。接着“红旗”300 多人又乘宜宾船队的“川森”111、107、201 号，“工农”16 号等四只船前往小市抢劫了泸县武装部。

正当泸州“红司”兴高采烈之际，“红联”船厂广播传出了

骇人听闻的消息:“今夜血洗泸州城!”人们欢庆的场面顿时消失，人心惶惶。

“泸州联合会”、“成都工人造反兵团”的下属“泸州总部”相继打来电话，通报这一紧急情况，宜宾支泸船队决定火速返航。可是，住在船上的人很快得到返航消息，却苦于无法及时找到上岸的人员。时间紧迫，船队没有等到住在城里的人员来齐，就启航返宜了。当船队进入纳溪县境“3 号信箱”附近时，还是被当时宜宾地区马力最大的泸州天然气化工厂的拖轮“泸天化”轮追上了。

原来，在“血债要用血来还”的口号声中，“泸州红联站舰队”撤到泸化厂。他们立即组织人马抢了该厂试验室的护厂枪支并立即装备于船上，同时用钢板焊装护甲装置，然后于下午 17 时左右返回泸州码头，准备向宜宾支泸船队进行报复。但为时已晚。这时宜宾船队已向纳溪方向驶去，在泸州码头已看不见他们的踪影。“泸州红联站舰队”自然不肯就此罢手，于是开足马力向宜宾船队追去。大约在 18 时 30 分左右，宜宾船队刚到水中坝，就与追上来的“泸州红联站舰队”的拖轮“泸天化”接上火。瞬即，机枪声、步枪声不断，手榴弹爆炸声震天，打得宜宾船队的人东躲西藏。

擒贼先擒王。“泸州红联站舰队”因有了“硬火”，在接近宜宾船队时，首先对着 110 号指挥船射击，接着又随着一阵密集的枪声和剧烈的爆炸声，110 号指挥船冒着黑烟向水中坝岸边移去，随后又慢慢地往下沉。此时，船上有人开始跳入水中……

又是一阵密急的枪响，船上又有 10 余人应声倒下。与此同

时，其它船只也遭到不同程度的射击。见此情形，有的船只不知所措，止步不前；有的则慌忙择“路”而逃。这次水战，宜宾船队伤亡10余人，重伤4人，100余人被俘。“红联站”缴获机枪1挺，步枪4支，手枪1支及一些弹药。此外，船被击沉1艘（110号），“川森111号”、“宜宾2号”、“工农16号”等4艘被俘，其余3艘向宜宾方向逃去。

第二天，23 日，宜宾又有几艘船下来支援泸州，结果在邻玉场一带遭到“红联站舰队”迎头痛击，负伤逃回宜宾。

7月24日8点30分，在解放军驻泸部队和宜宾地革筹小组代表的主持下，“红旗”、“红联站”双方再一次地签订了第7号《停战协议》，主要内容是：

双方不准以任何借口向另一方发起进攻，谁开枪，交出凶手，追究战区负责人，严加处理；双方各派一名代表同部队一起组成观察组，在7 月26日12时之前双方将余下的武器送回原单位，其余的送交7804部队封存，双方代表同部队组成的监察小组负责验收；要保证双方派出的观察员，验收成员的人身安全；不经部队同意，观察组，验收员不得随便撤走，否则将按破坏协议论处。

27 日，成都军区张国华，梁兴初，刘结挺又发布了《关于立即制止泸州武斗的命令》：

一、立即停止武斗，解散一切搞武斗的指挥机构。

二、双方无条件地交出所有枪支，弹药等所有凶器，限7月31日12时全部送7804部队收存。

三、双方在7月31日12时前必须拆除所有工事，障碍，恢

复水陆交通。

四、双方抓的人，应无条件地立即释放，今后一律不抓人，双方伤员一律送医院治疗，都不得歧视。

五、双方进城参加武斗的农民必须立即返回农村，今后不准调农民进城参加武斗，按中央7月13日的通知严加处理。

上述各条由7804部队和宜革筹小组观察组监督执行，各群众组织必须听从，认真执行，任何一方不得违抗。

张国华 梁兴国 刘结挺

1967.7.27

第二天，双方遵照上述命令要求都释放了一些俘虏，此外，“红联站”交了27支枪，“红旗”交出了20支，其中各交了机枪一挺。

7月29日，双方又根据军区梁兴初司令员的指示，各派10至15名代表由7804部队派车护送去成都开会。

7月31日，泸州武斗双方在驻泸部队强有力的制止下，基本上停止了大规模的武斗，形成了对峙的局面，只是偶尔有些小摩擦。

再看重庆，就在“军工井冈山”总部做出发枪决定的7月26日下午13时30分，重庆国防系统“81兵团”和军工“井冈山”总部代表依然就7月23日达成的《关于立即停止武斗，抓革命促生产的协议》中的第六条，又签署了《制止武斗监督小组协议》。

这天，“军工井冈山”的“建设兵团”武斗队“红大刀”扛着半自动步枪举行声讨武汉“720”事件游行。“军工井冈山”的

“长安造反兵团”抬着高射机枪在厂区内举行声讨游行。

重庆自抗日战争爆发以来就成为中国兵工企业的重要基地。解放后，8 家大型军工厂建在重庆，分别承担从枪支弹药到水陆两用坦克、四联高射机枪等一应俱全的生产任务。在杨家坪地区，就有国营建设机床厂、国营空气压缩机厂等数家兵工厂。建设机床厂大量生产半自动步枪及四联高射机枪。空气压缩机厂生产水陆两用坦克及装甲运兵车。江陵厂生产三七炮和炮弹，长安厂生产三七炮引信，解放前是生产冲锋枪的。通用机器厂生产装甲车。朝阳厂生产导弹，武斗时已经拿出来了，没有敢用。位于铜元局的长江电工厂，生产步枪和冲锋枪子弹。生产枪支的技术很简单，江陵厂改装自己的机器生产枪支，“815”在井口农药机械厂，生产命名为“八一五”的冲锋枪。

从 7 月 27 日至 28 日，重庆大型国防企业嘉陵机器厂、建设机床厂、望江机器厂等兵工厂的两派争相抢夺军械库和成品车间武器弹药，并向外扩散。

7 月 27 日，空气压缩机厂将坦克开出厂到杨家坪街上示威。

7 月 28 日，重庆大学“815”的“301 武斗队”派出 33、34、35 纵队到空气压缩机厂协助“81 兵团”守厂，得到该厂“81 兵团”为其配置的坦克、机枪等武器。

这天下午和晚上，重大“301”武斗队两次抢夺沙坪坝区武装部各类枪械 30 余枝，弹药一批。南岸“815”派抢走九龙坡区武装部步枪 7 支、小口径步枪 9 支、手榴弹 10 枚及子弹若干。北碚“815”派抢走区武装部步枪 26 支、手枪 20 支、轻重机枪 27 挺。此后重庆八区三县均出现武装部及军管会等武器弹药被

抢夺事件。

受武斗影响，重庆铁路分局九龙坡火车站货场货运到了 7 月 28 日这天，全部停顿，积压物资 12.5 万吨，积压车皮 400 个。

7 月 28 日，重庆“砸派”在滩子口电影公司影片库里开会，讨论重庆的局势。这个地方原来是一个防空洞，“砸派”六大总部的负责人都参加了。会上的争论非常激烈，重庆大学的徐光明争论得昏了过去。

以徐光明为代表的“人民战争救山城”的观点，认为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红十条》、《红五条》贯彻不下来，全盘否定“二月镇反”只停留在口头上，所以武斗不断。在这样的严重局势面前，绝对不能右倾，要全面反击，以武斗对待武斗。持这种观点的是多数。

以黄廉为代表的观点是：目前“反到底”，即“砸派”，没有全面反击的力量，工厂里已有的原材料固然能够生产一些武器，但是后续的供应从哪里来？群众组织没有严密的控制，武器流失到社会上怎么办？伤病员怎么处理？群众和群众打起来，死者算什么，是歹徒还是烈士？这个本身是要由政府来认定的。至于后勤给养，就更加不要提起了。武斗升级最后无非是两种前途：一是一派消灭另一派，二是两败俱伤。他的意见是：实在不行就撤退，别人拿起枪来了，不跑是不行的。持这种观点的人是少数。

军工代表坚决反对黄廉的“撤退”一说，认为他们可以固守住工厂的地盘。徐光明和邓长春都说黄廉是右倾机会主义，两种意见争持不下，最后也没有形成统一的意见。

当晚 23 时，重庆“反到底”派 200 余人趁天黑，摸到了“815”

派占领的嘉陵机械厂，潜入厂房，偷走 3 挺机枪，30 多支步枪、冲锋枪和一批弹药。在回撤时，被哨楼里护厂的红卫兵发觉，当即以猛烈的高射机枪火力扫射。“反到底”红卫兵也组织还击。一名红卫兵被高射机枪的数发子弹拦腰打成两截，另一名红卫兵的脑袋也被高射机枪威力巨大的子弹打掉。数名学生倒在了血泊中。

也是在 7 月 28 日这天，望江厂“军工井冈山”的武斗队“金猴”约 500 人，在 22 岁的头头邓长春带领下，按照重庆“军工井冈山”7 月 26 日三巨头秘密会议的议定，进驻位于长江南岸黄桷垭的重庆市第四女子中学，现为重庆第二外国语学校，在那里建立了“望江井冈山”的武斗指挥部——“黄山警备司令部”。

此时的“金猴”在重庆已经有名气了，7 月 19 日至 20 日，四川“省革筹”负责人张国华、刘结挺与中央代表李再含到望江机器厂给两派做工作时，刘结挺佩戴“金猴”袖章与“金猴”队员们合影。

在邓长春来到黄山之前，柴油机厂的一些“反到底”已于 7 月 25 日“反到底”在体育馆的大会结束后，就从汪山来到了黄山。

邓长春的“黄山警备司令部”设在第四女子中学实验大楼，外面戒备森严。学校的甲栋教室，被改作了宿舍。邓长春带来的望江武斗队，开始称为“军工红一连”、“军工红二连”，后来因为有很多学生和农民加入，遂改称为“黄山红一连”、“黄山红二连”。柴油机厂这拨人组建为“黄山炮兵排”，邓长春让他们到望江机器厂去拉炮。

望江机器厂位于重庆下游的长江隘口铜锣峡口。从重庆朝天门沿长江东去 30 里，迎面一座大山挡住去路，江水拐一个 90 度的弯，再拐一个 90 度的弯，才从那大山缝隙中钻过去，那缝隙就是铜锣峡。被铜锣峡截断的大山就是铜锣山脉，北为铁山坪，南为南山。峡里是唐家沱，有东风船厂；峡外是郭家沱，望江厂就在峡外。那十里峡区，山壁陡峭，怪石狰狞，林木苍翠，清风徐徐。若是涨水季节，那江水嘶嘶，泡旋如火山喷发，波涛似岩浆喧嚣，漩涡像恶魔巨口，激流若万马奔腾。浪打岩石，水珠飞溅千堆雪。汽笛声响，浪遏飞舟走蛟龙。江南岸的紫山沟里，一条瀑布从山缝中泻下，银练闪耀，雾气蒸腾。

铜锣峡自古以来都是重庆的东大门，历史上发生过多次战争。明朝末年，张献忠溯长江西上攻打重庆，被铜锣峡挡住，久攻不下，遇阻数日，脑瓜子一转，留下大部队继续佯攻，自己却带着少数轻骑，抄小路疾驰 150 里，奇袭江津，然后顺流而下，攻下重庆城，铜锣峡的明军才不战而溃。

说到第四女子中学所在的黄山，那是重庆南山山脉的一部分。重庆市区内分布着几条东北----西南向的山脉，自东向西分别是铜锣山脉、歌乐山脉、缙云山脉，而且均发源于华蓥山脉。铜锣山脉被长江截断，江北是铁山坪，江南称为南山。汪山、黄山、涂山、真武山以及南泉那边的建文峰都是南山山脉的一部分。

黄山并不是因为“黄”而得名，它和汪山一样，是因为其原主人的姓而得名的。汪山原主人叫汪代玺，姓汪所以叫汪山。同样，黄山也是因其原主人黄云陔姓黄而叫黄山。

这黄云陔是民国初年重庆有名的富商，有了钱，就在南山上

买了几座无名山头，修别墅，建弹子房，筑网球场，并对外开放，成了那个时候重庆富人游玩度假的好地方。然后以其姓名之，遂称黄山。而黄山也成了重庆著名的风景区，山峦重叠，溪流叮咚。远望，气势磅礴；入山，秀丽异常。春来百花争艳，夏日浓阴蔽日，秋时丹桂飘香，冬季腊梅傲雪。

抗战时期，黄云陔将黄山献出，送给国民政府。蒋介石便将山中的云岫楼作为自己的别墅和官邸。宋美龄、孔氏家族、何应钦等则分别占据了松厅、孔公馆、云籍阁等。后来美国派马歇尔将军来华调停国共两党内战，就住在黄山的草亭。至今犹存的莲宵楼，是美军顾问团的旧址。当时，黄山是禁区，山上到处都修有工事，蜿蜒的战壕将那些工事连接起来。

解放后，黄山改成了重庆市政府的干部疗养院。

与黄山相邻的汪山东面下山就是望江机器厂。其前身是广东军阀陈济棠创办的广东第二兵器制造厂，后来被国民政府接收，抗战初期从广东迁来，更名为五十兵工厂，主要生产迫击炮、无后座力炮之类，号称“模范兵工厂”。解放后，在苏联的帮助下，望江厂成为小口径高射炮的科研和生产基地。当年生产的三七高炮，大批量援助越南。

“黄山炮兵排”开着一辆武斗时抢来的卡车，从望江厂库房里拉了一门双管三七高炮和一车炮弹回到黄山。过了一两天，他们又从望江厂拉来一门双管三七高炮和一门五七高炮。

由于那五七高炮太大，炮弹太重，不适用，在黄山疗养院大门外放了两天，又被拉回望江厂去了。

两门三七高炮，其中一门被拆卸开来，让驻在黄山鸡冠石的

“反到底”派的农民抬到炮台山上，重新装好。1967 年离抗战时期虽已有二十多年，但是蒋介石修的那些工事、战壕都还残留着。炮台山上光秃秃的，几根马尾松只有一两米高，三七高炮就安放在当年留下的一个炮兵阵地上。

另一门则安放在黄山疗养院大门外，作为机动。望江厂还派来一位外号叫“黄金棍”的老工人，是总装车间的，负责三七高炮的拆卸和装配，并教“黄山炮兵排”怎样打炮。“黄山炮兵排”就用安放在炮台山那门双管三七高炮练习打炮，他们往山下打，往朝天门打，往长江嘉陵江里的轮船打。

炮台山前面的山顶上有三块耸立的石笋，称为三块石。山下是大石坝，是弹子石，然后是长江嘉陵江交汇处，然后才是朝天门。因为距离太远，朝天门已经超出三七高炮的有效射程。他们打的都是砂包弹，不爆炸。

就这样，“黄山警备司令部”这些年轻人每天都在学校操场操练，个个朝气蓬勃、英姿飒爽。尤其是司令部的一些文艺女兵，本来就很漂亮，再穿着一身海魂衫、白衬衫等服装，腰别一把小手枪，看起来特别精神。而邓长春身高不到 1 米 7，体形偏瘦，常穿军装，扎着腰带，配一把左轮手枪，显得也很威武。

## 第 778 回：重庆市，武器库接连遭劫　说贺龙，八一建军招待会

邓长春处事沉着、干练。他们来到黄山的第二天，7 月 29 日上午 9 时左右，邓长春正在组织大家开会，突然听到甲栋教室“砰”的一声枪响，人们一下慌乱起来。邓长春很镇静，他说：“大家不要乱！马上戒严！”

情况很快查明，原来是两名队员擦枪走火，其中一人被当场打死。

邓长春召开了一个隆重的追悼会，搞来一口大棺材，把死去的那个年轻人，埋在了学校一棵雪松下面。送葬时，他指挥大家高唱《毛主席语录》歌：“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结果，这起意外事件，不仅没有在司令部造成负面影响，反而还激发了那群年轻人的斗志。

邓长春继续开会。他在会上说：“昨天下午，在电影公司杨家坪滩子口片库里开会时，长航‘红一方面军’司令李鲁沂送来情报：革筹组财贸口派出长江 2014 号轮拖挂货 8—126 铁驳从上海起运一批国家分配给重庆的百货、西药等物资 370 余吨，近日抵达重庆。我们又得到情报，‘815’正密谋抢夺。‘815’是啥子都干得出来的，用真枪打工业学校，他开了抢枪的先河，又要开始抢夺物资了。”

李鲁沂的情报是“反到底”下属组织，长航“红一方面军”总部头头邓松涛、王三恒送来的，他们得到“长江 2014 号”轮上的长航“红一方面军”头头朱星德、刘志华、刘文荣等人报告，

“长江 2014 号”正满载着重庆急需的物资驶往重庆。

李鲁沂在会上说：“‘815’利用革筹组，控制物资，卡‘反到底’。”

邓长春说：“船到重庆，就是又送给了‘815’。”

李鲁沂说：“把货船在重庆长江下游俘虏。”

邓长春问：“有把握？”

李鲁沂说：“给‘815’抢不如我抢，不抢也得抢，要巧取，要豪夺。重大‘井冈山公社’的‘不争春’副社长已经在船上。”

邓长春：“就恁楷（这样）决定了，‘金猴’保护，长航‘红一方面军’去执行。胜利属于‘反到底’!”

7 月 30 日，重庆市中区、北碚区、九龙坡区、沙坪坝区、巴县武装部民兵武器再次被“815”派抢劫。长寿县武装部民兵武器被“反到底”派抢劫。

7 月 30 日，重庆望江机器厂“反到底”以改装的炮艇与长江电工厂“815”对战，长江电工厂油库中弹，漏油 5 吨，伤亡各 1 人。“军工井冈山”的“江陵兵团”以三七炮炮击江陵厂“81 兵团 65 团”的据点反修中学，“81 兵团”被迫撤走。不过几天的时间，重庆的武斗已经迅速的从枪战升级为炮战了。

7 月 31 日，空气压缩机厂“815”派武斗队从厂内向鹤高路居民区发射燃烧弹，烧毁区劳动调配站、废品收购站及民房 18 户。当日，两派在北碚区武斗，死 3 人，伤 13 人，“815”派北碚区“捍红总部”下令将北碚青木关至歇马场的小湾公路桥炸毁。

这天，嘉陵厂“81 兵团”因人数劣势，撤离该厂。

当天，242 部队“红总”打开校教研室控制的武器库，抢走

教学用轻、重机枪 34 挺等武器。

与此同时，重庆两派还分别在杨家坪、大坪、重庆医学院、242 部队、五一技术学校发生大规模武斗，上述地区民房、单位建筑、器材设备遭重创，两路口至杨家坪无轨电车网被打烂，全线停运 1 年多。

7 月 30 日，市中区、北碚区、九龙坡区、沙坪坝区、巴县武装部民兵武器再次被“815”派抢劫。长寿县武装部民兵武器被“反到底”派抢劫。

8月1日，重庆“反到底”派占领了生产三七高炮的江陵机器厂，遂后就用该厂生产的产品：三七高炮，炮击江对岸的重庆大学，只不过是作平射而已。所幸的是：“反到底”掌握着高炮厂，也掌握着炮弹厂，但生产引爆炮弹引信的长安厂偏偏在“815”派手上，这就救了重庆大学的命。炮弹没有引信当然不会引爆。不会引爆的炮弹就等于一个会飞的铁丸子。重庆大学高达六层的六教学楼是全沙坪坝最高的建筑物，理所当然成了最佳攻击目标。几天之内，这栋教学楼被打得千疮百孔，犹如蜂窝一般。也就是像蜂窝一般而已，无非戳了些直径37厘米的窟窿，房子巍然不动，没死伤一人。同学们每天早上把四面八方散落的炮弹头收集起来，装进竹萝，放在二宿舍和三宿舍间的马路上展览，这自然又成了战火孤城的一道风景线。还有同学索性搭起梯子，用斗大字体在“蜂窝”上写了一首毛泽东的战地诗：

昨夜鏖战急，

弹洞前村壁。

装点此关山，

今朝更好看。

8 月 1 日，重庆警备区司令部派到杨家坪地区制止武斗和进行救护的人员遭到枪击，死 2 人，伤 10 人。

这天，重大“301”的“38 纵队”从“815”派的“81 兵团”占领的长江电工厂运回 8 万余发半自动步枪子弹。运送途中使用电台进行联络。

当天，建设机床厂 45 车间工人何心贵，在去车间为同事领取工资的路上，被三十五中学一武斗人员当做活靶子练枪法打死。

7 月 31 日下午 16 时 30 分，北京，周恩来召集中央文革碰头会，讨论几个老帅出席八一建军节招待会的问题。周恩来打电话请示在外地的毛泽东。毛泽东明确表示：八一招待会，朱德、徐向前及其他老帅都要出席，韩先楚也要出席。

周恩来返回会场宣布了毛泽东的指示。

下午 17 时 30 分，周恩来召集刘宁一、杨成武、王新亭等最后确定了出席“八一”招待会的名单。周恩来亲自把电话挂到了西山的叶剑英处。叶剑英不在，秘书说到徐向前处去了。

原来，在此之前，周恩来曾打电话给叶剑英，要他转告徐向前：出席八一招待会的名单，争论不休。准备请示毛主席作最后的决定。要徐向前作好出席招待会的准备。

周恩来又把电话打到了徐向前处，徐向前正在理发，电话是叶剑英接的。　　周恩来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后，又特意交代说：“我已经布置了徐帅的行车路线和警卫问题，徐帅在路上注意安全。”

接着，他又亲自找到北京卫戍司令傅崇碧，说："徐向前同志必须参加八一招待会，你们一定要保证他在路上不出事。"接着，他就徐向前参加招待会的沿线警卫和行车路线向傅崇碧作了具体的布置。

徐向前刚乘车离开住处，周恩来的电话又打过来了。电话是徐向前的夫人黄杰接的。

"徐帅走了没有？"

"总理，徐帅已经走了……"黄杰激动得有点哽咽，说不下去了。

"你和徐帅要保重啊!"周恩来安慰说。

估计徐向前差不多应该到了，周恩来特意来到大会堂门口，亲自迎接徐向前。

招待会结束后，细心的周恩来又找到傅崇碧，交代说："你们安全地把徐帅送来了，一定要安全地把徐帅送回家去。不要因为来的路上没出事就大意。回去的路上更要注意。"

傅崇碧不敢大意。他调派了 3 辆警卫车护送徐向前，并在城里兜了个大圈子后，将徐向前安全地送回了家。

就在这天晚上，徐海东大将的家被北航"红旗"抄了。

原来，31 日前，戚本禹把王广宇叫去，催问他说："韩爱晶怎么还不去抄徐海东家，徐海东家有很多黑资料，他再不去，我就叫别人干了。"

王广宇问："徐海东家在什么地方？"

戚本禹说："这个你不用操心，他们会知道，肯定能找到。"

王广宇马上来到北航，找到"红旗"的一二把手韩爱晶和井

岗山。天已黑了，而且很热。他们三人从办公室走出来，在校园的一个小花园树丛中的林荫道上，边走边谈。

王广宇说："徐海东家有黑资料，和武汉事件有关，你们去把他家黑资料抄回来，查一查武汉'720 事件'跟徐海东的关系。张体学到徐海东家好几次。"

井岗山说："听说徐海东病着，每天都输氧。"

王广宇说："那你们去抄家可要小心，千万不要碰徐海东，你们把黑资料抄回来就行了。"

井岗山说："我们不会碰他。他这是老病，死不了。"

韩爱晶他们问王广宇："徐海东在哪里？"

王广宇说："张体学知道。从徐海东家传达室的登记簿上，查到张体学去过徐海东家。"

韩爱晶他们听了说："好。"

王广宇走了以后，韩爱晶对井岗山说："武汉出事以后我在学校累坏了，我和田东真是很辛苦，你回来了，该你去忙一忙了，让我喘口气。"

井岗山说："行。"

7 月 31 日，韩爱晶和井岗山来找张体学，对他说："现在有个事情要你立功，你是不是到徐海东家里去过啊？"

张体学说："是。"

韩爱晶他们说："中央文革要查一查徐海东和武汉'720 事件'有没有关系，你带着去吧！"

张体学答应了。当晚，井岗山就带着张体学和学生去了徐海东家里。

几十年后，韩爱晶在深圳听同学吴玉珍说起那晚抄家的情况："我们是夜里边到徐海东家的，井岗山带队去的。两个系好几百人参与，许海东家是个四合院，我们有人敲门，门一按，有个小窗口，问你们是哪的？忽拉大家就冲进去了，把我都冲倒了。宋任穷的亲家，藏在许海东家。我们也没抄到什么东西，在那里第一次看到外国毛线，不像我们国家的毛线，一支一支的，还绕成卖的时候就一团一团的，整齐的毛线。也没什么资料可抄，他们也不是第一次被抄，问那个人是谁？说是宋任穷的亲家。"

8 月 1 日凌晨，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西大厅接见"批斗三反分子贺龙联络站"的代表和国家体委的一些人，谈贺龙问题。周恩来说：

主席说贺龙的问题要背靠背。你们写过信，主席不批准怎么办？我不能拿主席的话压你们。文化大革命搞了一年多了，你们知道我的处境、我的难处：把他搞出来怎么办？你们知道了就不要去了。不能宣传。宣传也进不去。

你们还是讲理的，退出来了。我事很多，每天什么事都要管。我是为革命的，毫无怨言。为革命鞠躬尽瘁。

如果你们（把贺龙）搞出来，别的造反派一定会抢，会给我们增加麻烦。

贺龙他制造材料，说他一直跟毛主席走，是一贯正确的，这当然是不对的。你们要攻他的要害。研究问题要研究点历史。南昌起义是贺龙参加的，总算参加了，反对国民党反动派打了第一枪，虽然不是党员，我们还是欢迎他。他当时在二军，叶挺在十三军，南昌暴动的大方向是对的，但没有就地发动农民，没有建

立革命根据地，在大方向对的前提下犯了政治错误。一是城市观点，还想回广东，攻打大城市，先打广州，后打汕头；另外依靠外援，请苏联帮助，这两点是反毛泽东思想的，犯了严重错误。不建立革命根据地，打两个胜仗马上要打败仗，最后失败了，贺龙的军队全垮了，因为他们是旧军队，主要力量受损失。

洪湖赤卫队写贺龙，实际头子不是贺龙，为什么洪湖赤卫队得到农民拥护，因为头子不是贺龙。贺龙在湘西桑植建立根据地。八一武装起义以后，开了八七会议，搞秋收起义，毛主席参加了八七会议后，领导了秋收起义。派了两、三个人到洪湖，派的是和林彪同志在一起学习的段德昌同志，段德昌同志把它搞起来了。贺龙二七年回到湘西也搞起来了。二八年底他们就会合了。这次我到武汉听说两股部队完全不同，洪湖是农民武装，湘西有土匪，两股部队在政治发展上就有差别。

三零年发展到立三路线，第一次打了长沙，由于偶然性没有失败，不但没有吸取教训，反认为执行了立三路线取得了胜利。第二次进攻长沙，彭德怀主张攻打长沙，毛主席不同意，二军团贺龙赞成，段德昌不赞成，主张保持洪湖根据地。贺龙带部队攻打长沙，失败后逃跑了，从长沙一退退到湖北的角上。实际上执行了立三路线，先是冒险主义，后是逃跑主义。段德昌同志两次都不赞成，不赞成冒险，也不赞成逃跑，坚持洪湖根据地，三一年连续三次反围剿胜利，活捉了张辉瓒，证明了毛主席的正确路线取得了胜利，错误路线的失败。

三二年还是三三年“肃反”，第一个就把段德昌同志杀了，说他是“改组派”，实际上他是一个很好的同志，是洪湖地区的

创始人。解放后讲起这个事才平反了。贺龙说这个问题他不负责任，把责任推给夏曦，肃反时的负责人是贺龙、夏曦、关向应，贺龙是头子。我曾找他谈过话，说肃反应该是贺负责，贺一直认为由夏曦负责，这次他才承认错误。这次我到武汉，部队一同志说：打死段德昌起决定作用的一票是贺龙。我（总理）说这句话很公道。

两个结论：贺龙不是一贯正确的，（一）在湘西执行了立三路线，（二）肃反扩大化。

当天，周恩来得到报告，说北航“红旗”昨晚抄了徐海东家，抄走了许多秘密文件，还顺手抄走了徐家的生活用品尼龙袜子等。周恩来立即批示，让北航“红旗”把抄徐海东家的文件和其它物品全部退还给徐海东家。而且还特别派孙吉太找到北航的韩爱晶，对他说：

“听说你们抄了徐海东的家？我来要你们抄回来的东西。”

于是，北航井岗山带着孙吉太去拿走了一些东西。没完全给。

这天在北京市革委会开会，韩爱晶对谢富治说：“我们昨天抄了徐海东的家！”

谢富治说：“我不管！”

8 月 1 日，戚本禹果然如他在 7 月 26 日晨接见北京建工学院“揪刘绝食火线”代表时所说，带着建工“八一”两派头头去八一湖游泳。

这天，《红旗》杂志第 12 期发表社论：《无产阶级必须牢牢掌握枪杆子——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 40 周年》。社论说：“我们必须进一步地开展革命的大批判，把党内和军内一小撮走资本

主义道路当权派，彻底干净地扫进垃圾堆里去，只有这样，才能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目前，全国正在掀起一个对党内、军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大批判运动，这是斗争的大方向。”这篇社论是由王力、关锋、林杰起草，陈伯达签发。

当天，彭德怀、罗瑞卿又在清华大学“井冈山”接受批斗。在这次批斗会上，清华“井冈山”点名抨击徐向前、叶剑英、朱德等人。8 月 3 日，清华大学《井冈山》报编辑部发表社论：“打倒带枪的刘邓”。社论说：“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和军内一小撮走资派勾结在一起，串通一气，篡夺无产阶级对军队的领导权。一旦他们阴谋得逞，就不会停留在‘软刀子割头’，而是重走‘四·一二’反革命大屠杀的老路，枪杀革命的人们。”社论号召：“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打倒带枪的刘邓！”

1967 年 7 月至 9 月，清华“井冈山”派出许多军事动态小组，分赴各大军事单位或战略要地，收集有关部队番号、军队动向及部队领导人的状况等极密情报，绘制有关图表。

## 第 779 回：八月一，康生见甘肃领导　揪陈毅，银川市西塔之战

8 月 1 日，康生等人接见甘肃会议人员。关锋把中央 229 号文件的中央批语念给大家听。随后康生说："刚才关锋同志把纪要的中央批语念给大家听了。批语的第一段是批准了纪要，因为纪要是正确的，可行的，同意六条意见，就是批准了。这就说明这次会议做出了成绩。会议最后，两级军区达成了六条意见，这是正确的，中央同意了。六条说明会议开的是有成绩的，有结果的。

这个批语的第二段，要求两级军区广大指战员，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团结，这就是说过去在支左工作上，两级军区不够团结。因为省军区向中央发过电报，在下边也散布过反对兰州军区的意见，下边喊'打倒张达志，冼恒汉！'的口号是错误的。甚至错误地喊：'打倒张、冼、杨，解放大西北！'在军队里下级提出这样的口号是错误地，也是严重的。"

关锋插话说："主席几次讲，兰州大区在支左上大方向是正确的。"

康生继续说："对这种恶劣的现象，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很关心，把两方面找到中央来，本来中央早就知道，四条就解决了这个问题了，可惜四条被军区一部分同志没贯彻执行，遭到了公开的、不公开的抵抗。这次没有找群众组织的代表来，有的来了也没有见，因为在群众面前解决两级军区的问题不合适。看来，首先是两级军区的团结，这次在北京基本上达到了团结的目的，

说明会议是积极的、有成绩的。因此，批语中要求两级军区广大指战员，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团结，特别是在实际工作中要加强团结。”

康生再次批评了詹大南。同时说：“同志们知道‘武汉事件’了，也知道河南了，武汉从 5 月 12 号是抗拒中央、毛主席指示，很不好，陈再道同志走上了叛乱，性质就变了。甘肃也发生了问题，应引以为戒，希望不要发生抵制中央的一切行为。如果有，要坚决反对。当然，我们有经验，没有公开反中央、反毛主席的，常常是对中央，主席的东西加以曲解，甚至是随便造谣言，说什么中央文革蒙蔽了主席了。当然，也有反革命分子公开反对中央了，希望同志们警惕这一点。”

关锋讲：“中央批准了在《甘肃日报》上点名批判彭德怀、高岗、习仲勋、薄一波、吕正操、刘澜涛，汪锋。中央所以批准点这些人的名，因为他们都向甘肃伸了黑手。由彭、高、习这条黑线，吕正操、薄一波也插了手，特别是在甘肃要批判吕正操。吕正操是桃园三结义之一，反林副主席，反毛主席，是三反分子毫无问题。”

关锋讲了吕正操与甘肃问题的联系，然后说到：“最近有这样的情况，确实不确实再查，兰州军区部队游行，保卫毛主席，保卫林副主席，保卫党中央，打倒反革命分子陈再道，‘红联’冲击游行部队。现在‘红联’的大方向越来越不对头。解放军游行，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打倒陈再道，你们也冲？！‘红联’你们也知道有这四条。他们想在北京会议没有结束之前，把‘三司’打垮。这样做，危险的是他们自己。”

康生讲："武汉事件发生后，全国纷纷声讨陈再道，不同观点的，不同派别的，可以一起开会、游行，从来没有听说冲击游行部队的，唯独是兰州发生了这样问题。《人民日报》登载声讨陈再道的情况唯独没有兰州，请同志们很严肃的注意这一问题。对待这样一个反革命事件，怎么能够这样子呢？难道广大群众他们拥护刘邓？！拥护陈再道的？！这个不是群众罪过，这是一小撮人别有用心。这件事要引起同志们严肃注意。"

他又说："尤其最近武斗恶化，我们得到的消息，'红联'联合'革联'，他们说中央对甘肃问题还没有解决，趁机把'三司'打垮。这是不能不注意的。河南也是这样的，想把'二七公社'打垮。兰州为什么武斗严重呢？他们知道，批评了詹大南，詹大南检讨了，对他们不利。他们也知道'三司'，还是个造反派组织。因此，把'三司'彻底打垮。各地的规律是一样的，一个作法。"

"要搞好宣传陈再道、钟汉华一小撮反革命分子，对他们操纵计划的叛乱行为要好好地向干部向地方干部宣传，取得经验教训。第一，在社会主义社会有没有阶级、阶级斗争？人民解放军有没有阶级、阶级斗争？通过宣传大大提高觉悟。第二，有的人反对文化大革命，反对中央文革小组，造谣中央文革小组只要学生、知识分子，不要工人，不要解放军。甚至有人恶毒地讲，不要解放军，我就当农民去。从陈再道可以看出，谁要解放军，谁不要解放军。陈再道、钟汉华是解放军的败类，真正相信解放军、拥护解放军的正是毛主席，林副主席，党中央，中央文革。不要解放军的正是解放军的败类。第三，反对文化大革命，反对中央

文革小组，反对毛主席的人说，还要不要党的领导，说文化大革命不要党的领导了。这是对文化大革命极大的诬蔑。有的人甚至说中央文革小组不能代表中央，说这个算老几，那个算老几，都是些臭知识分子。我们要什么党的领导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亲自发动的，亲自领导的，怎么没有党的领导呢？文化大革命正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领导的。他们那样说是反对毛主席领导，他们要的是刘邓党的领导，陈再道是武汉军区的书记嘛！钟汉华是第二书记，能不能要他们那样党的领导？我们说要党的领导。他们说要党的领导，是不要毛主席这个党的领导，是要刘少奇那样党的领导。第四，他们反对毛主席，反对党中央，还说是文化大革命就是要整老干部，不要老干部了。要什么样的老干部？不要阶级了吗？离开了阶级要什么样的老干部？刘邓是老干部，陈再道说他自己四十多年了，也是老干部。钟汉华不到四十年，也三十多年了，他们能不能代表老干部？他们诬蔑老干部。他们说不要老干部，恰恰是要刘邓、陈再道那样的败类。陈再道还说，自己是老粗、不识字。言下之意，自己是工人，不是知识分子。他不能代表工人，他是败类，他已经离开了工人阶级。要教育干部、战士不能受欺骗，他们认为能够欺骗‘百万雄师’，我们叫他们‘白完行尸’，我们说他白色恐怖完了，是行走的尸体。另外，通过武汉事件取得教训。甘肃要特别注意，他们煽动的第一是独立师，第二是利用人武部，第三是公检法，第四利用省市机关的保守组织。一句话，就是怎样能够识别这些问题，就要坚决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坚决执行主席批示的文件，这是保证我们文化大革命胜利的武器。”

8 月 3 日，中共中央批转毛泽东批准关于兰州军区党委请示表态支持甘肃“红色造反派联合第三司令部”，简称“红三司”一事的通知及附件。

8 月 4 日，中共中央转发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军委文革小组《关于甘肃问题的几点意见》。

8 月 5 日，冼恒汉等人回到兰州，立即召开军区常委会传达中央的精神，成立了“支左”办公室，并决定：

甘肃省的“支左”工作由军区副司令员杨嘉瑞负责；

宁夏自治区由军区副司令员康建民负责；

陕西省由 21 军军长胡炜负责；

青海省由刘贤权负责。

对中央关于解决甘肃问题的三个文件，各派群众意见不统一，尤其是“革联”，抵触情绪相当大。当时，街上出现了不少大幅标语，有拥护三个文件的，有反对三个文件的，持反对意见的大标语直接点名说三个文件是张达志、冼恒汉欺骗中央搞的，要：“打倒张、冼，解放大西北”等。具体地说就是反对结合胡继宗，提出结合裴孟飞。以及各派在革委会中占有席位名额上的意见不一致。

与甘肃毗邻的宁夏，此时也已经是武斗频繁。

宁夏军区原副司令员、宁夏政协副主席马思义，1960 年在“反地方民族运动”中被撤销党内外职务，离职在家。7 月初，吴忠县“总指挥部”将马思义接到他们的“红色革命根据地”巴浪湖农场，帮助该派训练武斗队伍。

马思义身经百战，作战和指挥经验丰富。他与吴忠地区“总

指挥部”头头杨金贵一起组织训练队伍，制造武斗凶器。经过20多天准备，7月24日，马思义、杨金贵等人率400多名武斗人员，手持钢筋、长矛、棍棒等武斗凶器，乘汽车冲进“大联合筹备处”派占据的吴忠县城。

一场武斗下来，“总指挥部”派大获全胜，打伤“大联合筹备处”派数十人，夺取了吴忠县城，赶跑了“大联合筹备处”派的队伍和群众，抢占了吴忠仪表厂大楼为武斗据点。同时，组建了以马思义为“总指挥”的“战地指挥部”，3 天内集结了近2000人的武斗大军，组成了10个“战团”。并抢占了9座楼房为武斗据点，构筑武斗工事，制造水雷300多枚，为防止“大联合筹备处”派反攻，他们抢劫了大量国家粮油食品和医药用品。

7月底，宁夏回族自治区“总指挥部”总指挥安建国从固原地区视察回来，路过中宁，住进了县招待所。一帮隶属于“总指挥部”的中学生们前去招待所看这位大名鼎鼎的青年。

安建国出身于根正苗红的红五类家庭，是宁夏大学学生会主席。“四清”后期因与工作组的矛盾，由积极分子发展为对立派，处境岌岌可危。聂元梓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贴出后，安建国由逆境转为顺境，联合了宁夏大学另一个颇有声望的革命干部子弟冯贤，抗起了造反大旗，逐渐赢得了校园内外大多数师生的支持。冲出校园后，因1967年1月风暴以后的宁夏“127”夺权而声名大振，成为号令四方的“总指挥部”头头。当时，整个自治区，人人闻其名，都有如雷贯耳的感觉。

此时的他胸有成竹，自信地向先期到达，此时正坐在他身边的县政府秘书李树杰等人宣称：“同志们，武汉‘720’事件以

后，军内带枪的刘邓路线已明显成为文化大革命的最大的阻力。而造反与保守的界限已日渐分明。这以后，随着‘文攻武卫’使时局加剧恶化，影响了‘抓革命、促生产’的大局。为着稳定社会秩序，中央会由放到收，着手恢复政权建设。到那时，就是我们扬眉吐气的时候了！”

“中央对朱声达到底是啥态度？”李树杰问。

“中央会考虑解决朱声达的问题的。你们不看看，驻宁野战部队到现在并不表态嘛！”

他话锋一转：“但是，筹备处决不会甘心失败，未来的斗争将会更尖锐、更激烈，必要时，我们也得拿起枪杆子！”

这时的宁夏军区机关也出现了几种不同观点，分别支持地方不同派别的造反派组织，并连续冲击军区党委。有两位军区领导背着军区常委暗中与各自支持的群众组织头头联系，致使军区机关出现混乱局面。军区独立师和各军分区人武部的情况也类似。机关、部队随时有失控的危险。

因传闻说西塔是宁夏“筹备处”的总部，7 月 31 日下午，宁夏“总指挥部”头头开会研究决定：立即发起对“大联合筹备处”派的全面反攻，拔掉“大联合筹备处”在西塔的武斗据点。

他们从石嘴山调动本派武斗力量。由安建国、华方佐出面，以银川市和石嘴山“总指挥部”合兵援救吴忠本派受困人员为名，派银川市“反修兵团”头头马生录率 100 多人，押 40 辆汽车，到石嘴山接运武斗人员。

当晚，“总指挥部”派两个工人头头陈字儒、刘青山率银川市“红 12”为主力的武斗人员，攻打西塔“大联合筹备处”派

的武斗据点。

午夜 24 时，陈字儒、刘青山率武斗队伍乘汽车到达西塔，先行包围“大联合筹备处”派的武斗据点后，用汽车撞倒西塔东边的围墙，冲入院内。

“大联合筹备处”驻守在西塔的主力是“筹备处”中号称“西野”的中学生，他们立即进行反击。双方经激烈交火，驻守西塔的“大联合筹备处”武斗人员装备精良，火力强大，决死作战，多次打退“总指挥部” 派的进攻，大获全胜，还抓获了“总指挥部” 派几十人的俘虏。

“总指挥部” 派的现场指挥陈字儒、刘青山见势不妙，赶紧指挥队伍撤退。

8 月 1 日上午，“总指挥部”的“反修兵团”头头马生录等人，接来了石嘴山市“总指挥部”派出的 1200 多名前来增援的武斗人员。这些武斗人员头戴柳条帽，手持钢叉、长矛等武器，乘 40 辆汽车开进银川市，一时产生了强烈的社会影响。

下午 15 时，在“总指挥部”头头李富荣、孙尚武的指挥下，2000 多名武斗人员再次对西塔发起进攻。防守西塔的“大联合筹备处”武斗人员寡不敌众，“总指挥部”派获胜，攻下西塔。“筹备处”5 人死亡，打伤多人，重伤致残者 6 人，并抓获 300 多人的俘虏。

随后，为庆祝胜利，“总指挥部” 派将这些俘虏游街示众。押解的“总指挥部” 派人员，对这些“大联合筹备处”的被俘人员边走边打，逼他们高喊“打倒朱声达！”“一二七大方向绝对正确”等口号。游街结束，把被抓获人员关押在体育馆内。

此次武斗结束，“大联合筹备处”在银川市基本上失去优势，其武斗工事和据点被迅速扫荡，其组织的许多人员和持同情其观点的干部、群众被赶出银川市，银川市的工厂大部分停工停产。

我们再回到北京。虽有“陈毅是个好同志”的最高指示，但仍未遏制外交口的“揪陈”浪潮。8 月 1 日上午，北京外国语学院“六一六造反兵团”头头刘令凯等 10 余人强行冲入东交民巷 15 号外交部，在外交部院内张贴“打倒陈毅”大标语、漫画、传单，树立仿制陈毅的稻草人。他们还张贴“外交部里有大鬼”、“周总理要实现自己的诺言！”“周总理说话要兑现”等大标语。外交部工作人员让他们离开，被他们说是“洋奴”，还说外交部为“卖国部”，并写了“外交部是卖国部，都是洋奴才”的大标语，贴在外宾接待室。外交部原准备当天在外宾接待室召见蒙古驻华大使，由于这一事件，召见不能进行，蒙古大使反向中国提出抗议。

学生们还闯入姬鹏飞、乔冠华、徐以新等 3 位副部长办公室不让他们办公。

8 月 1 日晚，北京“揪刘联络站”也在天安门广场召开“揪斗刘少奇誓师大会”，共有 1000 多个单位约 30 万人参加了大会。

此时的北京，“揪刘火线”越搞越大，不仅中南海的西面、北面围满了群众，而且还有向南面的长安街扩展的趋势，使整个长安街上的交通都受到了影响。

8 月 2 日凌晨，中央文革小组派戚本禹接见各路揪刘群众，先称赞他们“揪刘是革命行动”，表示支持他们与刘少奇斗争到底，然后传达两点指示：(1)南门不能设点；(2)不能冲中南海。

并授意他们写一个撤离南门的决议。群众当场表示坚决照办。

## 第 780 回：第四次，接见湖南省代表　一桩桩，周恩来逐个解决

8月2日0时50分到4时30分，周恩来、戚本禹、黄永胜在人民大会堂安徽厅接见了湖南“工联”、“红联高司”和军方三方代表。

周恩来首先问：“黎军长哪？到前面来坐。胡勇还没有回来吧？”

“工联”代表答：“没有回来，被‘红联’抓去打伤了……”

周恩来：“我知道。郑波副军长也被扣，独立师不管。”他问谢若冰：“你是从广州转来的？”

谢若冰答：“是。”

黎军长：“他们是从广州、上海转过来的，没走长沙。”

周恩来：“好嘛！到上海看一看。”

与谢若冰一起到来的水电厅支持“工联”的副厅长贾镛说：“他们把我俩抓到湘潭，打我们，好恶毒。”

周恩来问：“你叫贾镛，是水电厅的，是代表吗？”

贾镛：“是。”

周恩来说：“22号打倒陈再道的口号就出来了，24号还打，看来有些人就得多得几次教训。”他指着被“高司”抓走的谢若冰5人问：“你们几位都是被扣的吗？”

谢若冰等5人站起来，周恩来问其中的“青年近卫军”负责人熊玉林：“你是学生还是工人？”

熊玉林答：“长沙拖拉机配件厂的工人。”

周恩来：“啊！是‘青年近卫军’的副司令。”

周恩来了解了“青年近卫军”的情况后，又问5人中的陈勇：“你是代表？”

陈勇：“是。”

周恩来：“你和佘定成是一起的？”

佘定成：“我们都是少数派。”

谢若冰：“原来我们是一起的，后来分开的。”

周恩来对他们5人说：“你们挨打了，磨练了。李采五同志帮助他们到医院检查检查。”

李采五是周恩来联络员。

他又问“红联”代表：“你们哪几位回去了？”

“红联”代表说：“曾干农没有来，电台的黄启贤回去了。”

黎原军长说：“曾干农我们请他3次都不来。”

“工联”也告状说：“胡少奇也没有来。”

戚本禹补充：“就是抓谢若冰他们的。”

“工联”继续状告：“胡少奇抓了人以后说：‘就是毛主席叫放也不放。’”

周恩来：“啊！胡少奇这样讲话？！”他接着问：“医学院怎么样了？”

占先礼：“27日接见后，‘湘江风雷’、‘青年近卫军’向河西进攻，广大师生被迫撤离，一部分到湘潭，一部分到农村。今天来电话说矿冶办公楼二楼烧了。”

周恩来:“你们走了,怎么烧的？一楼没烧,怎么烧二楼了？”

占先礼：“联系很困难，具体情况不清楚。河西的学生不能

回来。”

周恩来：“我问河东，上次回去不是处理马坡岭抢枪和医学院被围两件事吗？河西我知道了。”

占先礼：“河东的情况我不知道。”

周恩来：“不知道让别人谈。”

“工联”：“医学院的问题已经解决了好几天了。他们回去的代表到长沙就不见了，10人代表(指各派10名代表到47军郑副军长处协商解决马坡岭抢枪和医学院被围问题)没组成。”

周恩来：“唉，没组成……”

占先礼：“我们29号派人回去，因28号河西被迫撤离，现在没消息。”

周恩来：“我问一问，湘潭是你们的根据地？”

占先礼：“我们是没有办法才撤去的。”

周恩来：“湘潭军分区赵仁山同志到了吗？”

赵仁山：“到了。”

周恩来：“你讲讲发枪的问题。”

赵仁山：“过去我不了解，最近谭政委告诉我的。”

周恩来：“谭文邦讲的，你一点也不晓得？！你估计形势可不可能这样做？你们支持保守派，压制造反派。”

赵仁山：“估计可能。”

周恩来问“高司”代表：“你们跑到湘潭，他们(指湘潭军分区)发枪给你们，是吗？”

“高司”：“我们不知道。”

周恩来：“一点也不知道吗？”

湘潭“工联”：“他们知道，19号开会专门布置的。”

周恩来：“不止19号，以后还有。”他问那位湘潭“工联”代表：“你是代表？”

湘潭“工联”答：“我不是正式代表，正式代表还在坐牢。”

周恩来指着那位湘潭“工联”代表对湘潭军分区赵仁山说：“赵仁山同志，你听听。”他又问那位湘潭“工联”代表：“你是工人还是干部？”

湘潭“工联”：“我是干部。”

周恩来：“哪个单位的？”

湘潭“工联”：“市百货公司的一般干部。我知道他们13号就发枪，以赵仁山为首干的。”

周恩来：“他(指赵仁山)已经来北京了，还有谁？”

湘潭“工联”：“还有郭副司令、杨副司令，我们报了材料。湘钢武装部长来就是为了揭发此事，写了个材料给戚本禹同志的。看见没有？”

戚本禹：“没有看见。”

湘潭“工联”：“他们13号就做了计划，19号执行，20几号还在发，发了500多支枪了。”

周恩来：“不是500多支，700多支还要多。你们达成了协议的，照协议办。”

湘潭“工联”：“湘潭的夺权是资本主义复辟，资本主义夺权了，造成了白色恐怖。”

周恩来：“赵仁山同志，你是主任委员知道不知道？”

赵仁山：“知道，24号打电话告诉我的。”

周恩来：“你同意了吗？”

赵仁山：“我打电话说，中央文革不同意夺权，我们要听中央文革的。”

周恩来：“除‘革造联’以外，有学生吗？有长沙去的吗？”

湘潭“工联”：“有，有红代会去的。”

周恩来：“有没有长沙去的？”

“工联”代表答：“有。有‘高司’的，‘百万雄师’的，‘红色怒火’的。”

周恩来：“‘百万雄师’有多少？”

“工联”答：“几百人。”

湘潭“革造联”代表要求发言，周恩来：“你等等。”

“工联”代表继续说：“‘高司’都向湘潭靠拢，在湘潭提了一些反动口号：要揪出毛主席身边的定时炸弹周恩来……一片白色恐怖，‘百万雄师’、‘红色怒火’、‘高司武工队’都在那里，我们分析最后要上山。”

周恩来：“搞不成，湘潭是毛主席的故乡，上不了山，上了山，他们也站不住脚。”

“革造联”代表要求发言，周恩来问他：“你是湘潭的？叫什么名字？”

“革造联”代表说：“彭德明。说‘百万雄师’到湘潭是造谣。”

周恩来：“什么造谣？我们有消息。”

“革造联”：“我们没有阻止‘红造联’回去，我们劝他们回去，并保证他们的安全，可以调查。‘高司’去湘潭是因为河

西被攻破，我们正在动员他们回去。发枪的问题说原来开了会的。我不了解。打伤‘红造联’3个人的问题是我们错了，我们不对。说我们夺权是资本主义复辟，不对。我们夺权是以造反派为主夺的。”

周恩来：“既然中央不同意，为什么还在北京正在商谈的时候夺权呢？”

“革造联”：“我们认这样做是不完善，但大方向没有错，不是资本主义复辟。”

“工联”：“大方向错了。‘革造联’杀出来的两个同志，就是救谢若冰他们的那两个同志也来了。”

周恩来问那人：“你是‘革造联’的？叫什么名字？做什么工作？”

“革造联”杀出来的周志奇回答说：“我叫周志奇，湘潭电机厂学徒。我们还有一个在门外没进来。”

周恩来：“让他们进来！是救他们的吧？”

周志奇：“他们把这5个人带到我们厂以后，规定谁放了就杀谁，我们看到这样做不对，我们想自己再也不能犯错误了，所以把他们放了。”

“红联”派的农民：“我们向谢若冰等同志表示慰问，以后不这样做了。但是我们97个人还没有放出来……，我们这里有个家属在，他是通过汽电一个老大娘帮助看到她爱人的，头上砍了几刀。”

周恩来：“那个家属来了吗？”

“红联”代表说：“来了，没在这里。”

周恩来：“你是‘洪流’的？”

“红联”派农民：“我是‘贫下中农造反军’的。现在双抢很紧张，今年可能大幅度增产，我们准备向中央报喜。”

周恩来：“既然这样，你们就不要叫农民进城了。”

“红联”派农民：“我们没有叫农民进城。”

周恩来：“你们把交通要道卡住了，城乡不能交流，长沙没吃的，食盐也不够了，有些人不愿意在家，这个情况有没有？连郑副军长调查问题到马坡岭，都叫你们‘洪流’拦住了，带到朗梨市，晚上才放回来。这不是受蒙蔽？！这不是农村包围城市？！”

“红联”派农民：“截交通的到底是谁，我们不理解。”

“高司”代表说：“我们‘高司’到湘潭……”

周恩来问：“你是哪里的？”

“高司”代表答：“师院的。28号‘湘江风雷’要血洗河西。”

“工联”：“又要制造矿冶事件啦？！”

周恩来：“有没有？”

“湘江风雷”：“没有！”

周恩来：“有就不好了！”

“高司”：“听我讲完。‘湘江风雷’、‘青年近卫军’分三路进攻河西，中路就有机枪，打死我们8个人，我们被迫撤离，东西没带。逃跑情景很惨。刚才说攻击总理的口号，我们打电话问了，说没有，如果有，一定揪出来进行斗争。”

周恩来：“不要再说了，一件一件的来。”

周恩来：“赵仁山同志，反正这个问题(指夺权)军分区要负责任，你打电话回去，我们在开会，不应该这样做，假使是真正

的革命派夺权也要等一等，不等中央同意就这样做，就是违犯纪律。你是解放军，军队有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你忘了。

还有发枪，我们号召封存枪，第一次开会就是这样，《六六通令》是这样，《七一三通知》也是这样，你们军分区就不听，你们13号、19号、20号、21号、22号还在发，公然对抗中央。你们军分区与过去的错误有关，你要负责。会后打电话回去，要他们把枪收回，如果抓了‘湘江风雷’的人要放。”“这件事(指发枪)群众知道，军事系统知道，证明确有其事。”

周恩来问：“常德分区的汪复三同志在不在？”

汪复三站起来回答：“我。”

周恩来：“听黄司令员说，你们那里有12个人写信？”

黄永胜：“说《七一三通知》是错误的，公开对抗中央。写信的是些什么人？”

汪复三：“是机关的？”

黄永胜：“是你们派出的。”

周恩来：“是你们派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回去一定要查清楚。”

常德“工联”派与常德“红联”派为抢枪事发生争执，互相指责。

“红联”派刘秀英说：“常德还是保守派占上风，军分区有错误，把造反派压下去了。打击‘湘江风雷’以后，我去过常德，分区的人听说我是‘红讯兵’的，就问我与‘湘江风雷’有什么关系，说明他们对与‘湘江风雷’有联系的都有看法。现在我知道犯了错误，我向周恩来承认错误。周恩来上次表态支持‘工联’

以后，我曾经怀疑周恩来不了解情况，想给王海蓉写信，通过王海蓉问问是怎么回事。后来通过学毛著，通过自己检查，发现‘高司’确实犯很大的错误，确实错了，我自己也做了一些错事。周恩来支持‘工联’是对的。现在我想通了，我要求周恩来允许我、占先礼等同志回长沙去做工作，说明情况，帮助大家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

周恩来：“你叫刘秀英吗？你认识王海蓉？”

刘秀英：“是的，我认识王海蓉，镇压‘湘江风雷’时，她到过我们那儿……。我们做了一些错事，压制革命造反派，但是必须看到，我们邮电局有几个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是趁着革命造反派起来造反的机会，钻进造反派队伍里来了。”

常德“红联”：“刘秀英的发言我同意一部分，不能说军分区都支持错了，我们的矛头一直对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4月‘工联’对我们打、砸、抢，我们没还击，6月开始自卫，没有冲击别人。我们受的压比别人厉害。”

周恩来：“你说的什么时候？”

常德“红联”：“4月底以后。过去有四大，从这以后，一直受压。”

周恩来：“你们‘红联’占多数还是‘工联’占多数？”

常德“工联”：“他们占优势。”

常德“红联”：“先是‘红联’，后来被压到农村去了。”

常德“工联”要求发言，周恩来：“你等一等。”

常德“红联”：“他们抢武装部的枪，要抓我们的大小头头，说我们占优势不是事实。”

常德“工联”：“军分区元月25日宣布‘红色暴动’是左派，他们的大方向错了。我们与‘湘江风雷’同观点被取缔，我被抓进监狱。他们搞造反派比搞刘少奇还厉害10倍。5月以后，他们说逆流来自群众。汪复三说来自××号文件，‘公检法’说来自戚本禹的文章。他们说《七一三通知》是大毒草，是埋在主席身边的定时炸弹搞的。我们不占优势。”

常德“红联”一代表：“我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我作检讨……”

周恩来：“把常德问题解决一下，汪复三打电话调查一下，如果还是和湘潭一样发枪，责任就大了。开门让人家拿枪，问题更大了。拿这两个分区来看，问题很大，如果10个分区都这样，问题就更大了。明天准备单独开军队的会，明天再说了，你们先打个电话回去做工作。

郑波同志和我们去的联络员报告，马坡岭的枪确实被抢了，‘工联’在保护，力量小。各军分区人武部乱发枪，很严重，枪乱发乱抢，枪弄到流动人员手里，小孩子手里，问题就大了。长沙每天都听到枪声。武汉那样都没有开枪，只不过是一小撮叛乱，公告一发表，问题就解决了。

军区、军分区的同志们要负责，打开门乱发枪，你们要负责。这样会搞乱的。你们达成了协议要保证实现，首先是军区、军分区，你们发出去的枪要收回。”

周恩来又对“工联”“红联”两派代表说：“你们两个组织，随便去抢枪，会有后果的，‘红联’也好，‘工联’也好……”

戚本禹：“‘工联’也有抢的。”

周恩来：“不管哪边，发展快了，成份慢慢复杂起来。叶冬

初同志你们发展快了，正赶上一月风暴夺权，夺权多数是对的。那时我们发现哈尔滨的‘荣复军’利用哈军工‘八八团’搞夺权的，我们宣布他解散了。你们那里的‘红色政权保卫军’是官办的，解散了。‘湘江风雷’也确实有不符合要求的行动，到京告状抢了几次车子。个别事件造反派可以劝说的。铁路要罢工，我们劝说了。军区的报告，多方面的反映，后来还有从其他方面的反映，我们中央几个同志决定的，把几个头头抓起来。军区确有错误，军区在执行《二四批示》时扩大了，抓人抓多了，后来肃流毒把相同观点的也搞了，问题更大。从《二四批示》到现在，这么长时间，我们察觉是逐步的，到6月份我们比较明确了，确实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先察觉的。我表了态，刘秀英同志有怀疑。我是根据主席的指示表态的，我那么容易表态？不知王海蓉怎么和你说的？”

刘秀英：“后来我想通了，没写信。”

## 第 781 回：韩爱晶，为张体学传信件　第五次，接见江西省代表

周恩来：“我们对军区的指示有错误，对军区我们要负一部分责任，我们应该负一部分责任，不能完全怪军区。当然形成这个局面军区有责任。北京宣布‘红旗军’是反动组织，抓的头头都放了，‘联动’的也放了，与他们相同观点的没搞。我们的批示影响了军区，军区本身也有责任。龙书金同志到广州也承认有错误，写了检讨，比较好，主席批了五条，将来印给你们参考。”

“工联”：“假检讨。”

周恩来：“思想不通会有些怪议论的，连我们都犯了错误，不允许犯错误吗？改了就算了。在广州检讨的比较好，回到湖南是另一个空气，武装部、军分区影响很大，很多改的机会都失掉了。军区的错误与刘、邓路线不一样，刘、邓是有意的反毛泽东思想，提出反动路线的与执行反动路线的有差别。军区不同，军区的三支两军的任务很重，又没有经验。军区认错了，改了就算了，从爱护解放军出发，改了就行了。湖南军区的问题，黄司令员领导着开了好长时间的会，明天让你们看看湖北的检讨，挖的深些有好处，对教育有好处。允许他们好好检讨，再开两次会，写的更深刻些。把中央的精神告诉你们，我们不隐讳。主席就经常说，我们让他们支左的嘛！错了改了就算了。他们按《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支的。当然要相信群众，相信党。部队也或多或少的受黑《修养》的一些影响，所以到工厂、学校找老工人、党团员、模范，认为这些最忠实了，不知道文化大革命敢于向错误东

西作斗争是好的。”

“夺枪还有发展的趋势，说穿了也不是了不起的，湘潭能上山打游击？反动的游击管保垮台。武汉，中央站出来说话，不是垮了吗？‘百万雄师’不是垮了？承认受蒙蔽了，好么！允许存在么！什么认罪啊！什么都不要搞。”

“枪拿走了，小孩子也拿去乱放。‘工联’怀疑‘红联’，‘红联’怀疑‘工联’，互相怀疑，增加对立条件。农村包围城市是‘洪流’搞的，郑波副军长被扣，向联络员的车开了枪，幸好没打伤人。秩序很坏，军区、军分区要负责。两方都去抢枪，就发生武斗，当然总有一方为主。”

“一些跨行业的过去取缔错了。跨行业，你想想恢复的后果。我没有仔细考虑，随便说说，你不一定说是什么指示，反正我不承认。就‘湘江风雷’的恢复，工人就是工人、学生就是学生、农村就是农村。不过贫下中农的问题，章伯森告诉我一个材料，《六·六》以后，军区下通知开贫下中农会，‘高司’到各地作报告，你们应该注意。如果有这个事你们不要气愤，有错承认就是了。贫下中农这个组织是很好的，别的不要插进去了，贫下中农很好了嘛！‘湘江风雷’要这样组织，不然坏人要钻进去了。比方三人一组、五人一组参加你们的组织，他也是一票，派别多了争权，他说他是一派。为什么北京组织大中学校红代会、工人红代会、农民红代会，机关的还没有。有的几个人也成立战斗组，跑到社会上战斗一番，回去老老实实生产就不满。学校要复课闹革命，搞大批判。”

“解放军有47军作文化大革命的支柱，力量不夠，再增加一

些，反正以47军武装保证文化大革命搞好，你们赞成不赞成？”

众答：“赞成。”

周恩来：“你们赞成，郑波副军长一出去就被扣，我们联络员的车子也被扣，还放枪。枪不要乱放，真正造反派，真正保卫厂子就发枪，学校也一样，发枪不能乱放枪。这是对群众的考验，不仅对保守派的考验，也是对造反派的考验，不能作乌合之众。”

“双方捕的人都放出来。造反派也不是百分之百的都是对的，90多人不是有一部分没放？放在厂子里，造反派占优势的厂子，不让和家属见面。他们(指高司)承认扣人(扣5名代表)错了，你们回去也要把他们的人放了。”

“湖南不能按现在这样发展，要按毛主席的文化大革命的方向发展。在你们没有回去以前，领导机构怎么实现，成立一个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主席的故乡么，湘潭还出现反对中央……”

湘潭“红联”：“没有。”

湘潭“工联”：“我们有传单。占才芳还有几条指示。”

周恩来：“占才芳同志来了吗？说过吗？”

随占才芳来的卢科长：“占才芳副司令员住院，他早已声明没有说过这样的话。”

谢若冰：“‘红旗军’为什么打成反动组织啊？我们不理解。”

周恩来：“当时确实哈尔滨也搞，他们有联系。我知道的浙江有几个头头与北京的有联系，其它还是好的。”

戚本禹：“成立筹备小组后专门研究。”

谢若冰：“湖南打击造反派就是从打击‘红旗军’开始的，中央专门对湖南有个批示。”

周恩来：“北京镇压了‘红旗军’，浙江我知道，湖南的不清楚。你把本子给我们吧！(写有镇压红旗军批示的本子)。龙书金同志你记得这件事吗？”

军区代表：“病了没来。”

周恩来：“谭文邦同志你记得这件事吗？”

谭文邦：“是有个电报。”

谢若冰：“据说是电话。”

周恩来：“我们查一查。”

谢若冰站了起来，周恩来：“不要再说了，我们查一查就是了”。

衡阳“工联”代表又反映他们的代表李瑞林7月9日放出来后，在邵阳又被农民抓走，至今下落不明的情况。

周恩来指示47军和衡阳军分区查一查。

自治州、黔阳、邵阳的代表纷纷发言。周恩来问湖南省军区政委谭文邦：“你们有多少分区？”

谭文邦：“11个。”

周恩来：“都是差不多的事情，希望你们各分区好好听听，明天开会好好检查检查。”

岳阳“红联”：“我是岳阳机务段的，我们贴标语，他们就打我们。”

周恩来问：“贴什么？”

岳阳“红联”：“打倒‘工联’一小撮，打倒一小撮坏头头。”

周恩来：“你为什么打倒？你那样不就武斗起来了。”

岳阳“红联”：“他们搞武斗，我们生命没保证，现在停车

了。”

周恩来：“停多久了？”

岳阳“红联”：“10多天了。”

周恩来：“为什么停？是机务段的原因，是什么？停了多少车？”

岳阳“红联”：“停车的原因是生命没保证，停了多少车不了解。”

周恩来：“工人么！对铁路不关心。要铁路马上通怎么解决？你说说。如果有军队保证你们能不能立即通车？”

岳阳“红联”：“能。”

周恩来：“军分区的同志，岳阳车站的情况你了解吗？铁路有军队保护没有？”

岳阳军分区：“不了解。铁路没有军队保护。”

周恩来：“这样大的事，你们怎么不关心？我明天让铁道部的人去解决，47军派部队去保护。无论如何你们不能冲车站，所有铁路都实行军管，你们不要向里串连，他们也不要向外串连，完全隔开，保证铁路畅通。47军派一个连到岳阳，由铁道部派几个人，你们如果爱护铁路的话也派人去做工作，恢复交通。”

周恩来问岳阳两派发言人：“你们都是司机，司机和司机打起来了？”

岳阳“红联”：“是阶级斗争。”

周恩来：“那就不对了，阶级兄弟也是阶级斗争？你的气是盛！我派人解决就是了。”

邵阳“红联”：“《十条协议》贯彻不下去。”

周恩来："我们准备搞个文件，支持《十条协议》。"

邵阳两派又争吵起来，周恩来："不要吵了，在双方互不信任的情况下，贯彻不下去是可能的，军队做工作，你们做工作兑现就是了。你们是人民内部矛盾，如果反映上边的东西是路线斗争了。如果那样上纲就打起来了，群众斗群众了。"

黔阳"红联"一代表揭发军区在军区招待所组织各分区"红联"派学习湘潭"革造联"武装反击的经验，周恩来问："黔阳分区的同志来了吗？你们了解吗？"

黔阳军分区："来了，这个事是军区搞的，我们不了解情况。"

唐俊光建议造反派、军分区动员农民插晚稻。周恩来："这个建议很好，很重要。明天大家打电话回去做工作。不准乱放枪，抓的人要放，动员两派支援双抢。这是个考验，特别是受蒙蔽压制造反派的更是个考验。今天不谈了。"

衡阳"造总"："……不能以对待'湘江风雷'的态度作为区分左、中、右的唯一标准。"

"工联"："建议用飞机散发文件。"

周恩来："可以，具体由47军负责。"

接见终于可以结束了。

8 月 2 日，姚文元在人民大会堂作关于访问阿尔巴尼亚的报告。

北航"红旗"韩爱晶接到参加这次大会的通知后，准备在开会时将张体学的信交给到会的中央首长。韩爱晶问被北航抓来的湖北省省长张体学："检讨写好了没有？写好了我给带去。"

张体学拿出一封信给韩爱晶，字老大一个，好像有两页。

开会时，韩爱晶坐在主席台第二排。他看见中央文革的关锋正好坐在他前面，就对关锋说：

“关锋同志，我这儿有一封信是张体学的，是我让他写给毛主席的，麻烦你转一下。”

关锋说：“好。”

过了一会儿，韩爱晶心里又犯嘀咕，觉得还是“必须找周总理”。

大会一结束，韩爱晶就跑到前头拦住周恩来说：“总理，上次我跟你说的张体学的事我已经做工作了，我认为这个人还可以工作。”

周恩来说：“你写给我的话我看到了，我明白你的意思。”

韩爱晶又说：“我让他给毛主席写的检讨带来了。”

周恩来问：“信在哪儿？”

韩爱晶说：“我递到前面关锋那里。”

周恩来说：“好，好，我去查一下。”

韩爱晶说：“您派人来把张体学接走吧！”

这时，正在主席台上的杨成武看见韩爱晶，便问他：“听说你们抄了徐海东的家？”

韩爱晶说：“不是我去的，是井岗山带人去的。”

杨成武说：“听说抄了军史等东西？”

韩爱晶说：“我没详细问井岗山，还搞不清。”他看杨成武态度和蔼，便问：“杨总长，张体学这个人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杨成武说：“哎呀，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嘛。”

会后，关锋找到北大聂元梓，又找来了陈伯达和谢富治，作

了一次短暂的谈话。其中，谢富治对聂元梓说："好好把北大的工作抓一抓，对北京的事不要管，6 月 5 日陈伯达的批评还是有效的，解决了北大的问题，整个北京的问题就好办了。全市全国的问题，你不要插手，工代会、农代会的事，不要管。"

虽然周恩来和姚文元于 7 月 28 日第四次接见了江西代表，但是江西的局势依然不稳定。8 月初，萍乡市反对刘瑞森的"市联"下属市委机关群众组织冲进市人民武装部，夺走步枪 100 余支。尽管市人民武装部部长刘禄为防不测，早已命令下属将所有步枪的枪机卸下埋藏起来，但在知情人的指供下，很快找到了这批枪械。"市联"有了武器，气焰更加嚣张。"市大联筹"也毫不退缩，针锋相对。流血事件频频发生。萍乡局势处于剑拔弩张、一触即发的状态。

8 月 3 日凌晨 3 时至 6 时 22 分，周恩来、姚文元第五次接见江西"大联筹"、"联络总站"、 刘瑞森等地方干部及刘培善、吴瑞山等江西省军区领导四方面代表，重点了解 7 月 13 日火烧萍乡煤校一事。被接见的有"大联筹"61 名；江西军区、步校造反派代表 5 人，海字 414 红革会代表 5 人，首都红代会代表 4 人；"联络总站"代表 50 人。

3 时，周恩来、王力、姚文元，还有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得志，26 军政委程世清，副军长杨栋梁走进会场，全场高呼："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

周恩来叫大家坐下，然后说："萍乡的事情现在已经调查回来了，刚才听了两个多小时的调查汇报，时间推迟了。"

周恩来让参加萍乡煤校调查组的两派代表汇报调查结论，他

说："汇报简单一点，情况我都知道了，讲结论的意见。"

"大联筹"的代表首先说："一、这个不是一般的刑事案件，是政治案件，这是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的产物；二、从现场来看，现场已经被破坏了；"

这时周恩来插了一句话："就是破坏了，也还可以看出来的。"

"大联筹"的代表继续说："三、起火原因可能有四个：（1）上面还有发电机；（2）学生在三楼煮过稀饭；（3）萍乡市公安局认为，是学生自己点火烧的；（4）是外面进来的人，在下面点火。有这四种可能性。第一个原因可以否定，根据现有的调查情况，群众的反映，因为……"

这时，周恩来打断他的话说："你就不要解释了，不要解释了。"

"大联筹"的代表接着讲："第二个原因也可以否定，第三个原因不可靠，根据介绍的情况和收集的情况不太可能。第四个原因是从现场来看二个地方起火：中间的楼梯口开始起火，西边楼梯口也开始起火，所以我认为第四个可能性比较大。"

这时，周恩来问他："死伤情况怎么样？"

代表回答："两方面反映都没有看见尸首，有汽车是去过，拖过东西。"

这时，"萍总"说："那是拉活人的。"

"大联筹"的代表说："现在调查组没有搞清楚，因为在那里调查很困难，萍乡市的公检法、消防队，萍总都在那里对调查组进行围攻。"

周恩来又问："萍乡市消防队有个叫余华的，你们没有见到

吗？他知道一些情况呀！”

“大联筹”的代表回答：“我们没有去找，因为有困难。”

周恩来：“有一个重伤的嘛！在医院你们没有看到吗？他是煤校的一个教员。”

姚文元：“他叫吕振杨。”

“大联筹”的代表回答：“这个人现在还在医院。他们不让我们去找。”

周恩来问：“医院是‘萍总’的吗？矿务局有人在这里吗？”

“联络总站”的代表站起来回答：“有。”

“你叫什么？”

“叫邓显文。”

周恩来问：“你没有回去吗？”

邓显文说：“我是 7 月 22 日来的。”

周恩来翻着名册问：“王纪明来了没有？”

王纪明回答：“来了。”

周恩来问：“你们来了多少人？”

王纪明回答：“11 个。”

“你们到会的代表来了多少？”

“只来了两个。”

周恩来说：“矿务局有个医院你们知道吗？这个医院离矿务局有多远？”

“联络总站”代表说：“30 里。”

“那么远呀！”

“有公共汽车直接去。”

周恩来说："那为什么我们派人去那里调查，你们要拦阻呢？"

"联络总站"代表讲："他们不愿意去。"

周恩来指示："他们就是去搞调查的嘛！怎么会不愿意去哩？煤校教员吕振杨要让部队团副参谋长去看一下。"

"联络总站"的代表答应说："那好嘛！"

周恩来："你们在这里说得容易，家里的事情就不太好办了。你们几千人的大组织，你们想包办一切吗？包办是办不到的，也是包办不了的。现在萍矿已经停产了，你们知道吗？"

"联络总站"代表指责"萍联"说："他们早就脱离生产了。我们是坚持抓革命促生产的。"

周恩来问："怎么生产为什么又会停下来了哩！"

"联络总站"的代表说："没有停，就是产量少了。"

周恩来问："和你们对立的组织叫什么？"

"联络总站"代表说："叫'萍联'。"

## 第 782 回：各执词，总理也无可奈何　说萍乡，不能武斗反武斗

周恩来接着问："他们有多少人？"

"大联筹"的"萍联"代表说："我们原来有万把人，三月翻案黑风以后，只有五、六千人了。"

周恩来问："你们的人，都离开了生产岗位吗？"

"联络总站"代表站起来说："我们担保他们都离开了。"

周恩来对"联络总站"讲："你们人数占了三分之二还要强，为什么生产这样低呀！他们到底是被你们压跑的还是被你们赶跑的？"

接着又问"大联筹"的代表："那个姓吕的老师是否找到了？"

答："没有，现在还在他们医院。"

周恩来转过来对"联络总站"的人讲："你们打个电话回去，讲我们要派军队把他接出来。"

"联络总站"的代表说："我们保证送回去。"

周恩来："不要送了，还是部队去接吧？送丢了就不好搞了。小陈（萍中红卫兵）来了没有？"

"大联筹"的代表回答："没有来。"

周恩来："怎么没有来呢？"

"联络总站"的代表："他不敢来见总理！"

周恩来："笑话！你这个话没有根据，你不能这么说。我等一会就揭穿你们。你们不能这样回答问题。"

他从座位上站起来，对"大联筹"代表说："你们也是，怎

么不把他接来？我就是等他到天亮也要等着。”

说完马上派小汽车去接小陈，接着又对“联络总站”代表讲：“你们‘萍总’有这么多人，为什么生产还这么低呀？”“你们不能回答这个问题，现在我来问军队。萍乡武装部的人来了吗？”

萍乡武装部的人回答说：“来了。”

姚文元问他：“你叫什么名字？”

答：“我叫张锦才。”

周恩来：“你是萍乡武装部的政委吗？”

答：“是！”

周恩来又问了萍乡武装部部长、副部长的姓名，然后说：“萍乡煤校失火是 13 号，医生没有请来吗？应该把他请来。”“那天火烧以后，武装部、公安局、矿务局，把楼上 100 多人绑起来，严刑拷打，说他们是放火的。而对另一方面却全不过问，且不说这是谁策划的，一般都要两方面问一问啦。这样单方面拷打，这不是逼供信吗？这不是阴谋吗？29 个人在武装部被拷打，56 个人一直送到矿务局，然后转到鸡冠山，那里有个垦殖场，也在那里拷打，还把 14 个人搞到公安局。29 个到武装部，56 个在鸡冠山，到一起是 85 个。”

他问“萍总”：“对不对呀！加上 14 个就 99 个了，再加上市委还有 18 个，一共 117 个，煤校一共有 230 多个人在楼上，已经过了半数，这些人被打了被绑了。失火以后，‘萍总’夹道拷打，要青年同学投降，不举手就打。把他们当敌人一样看待，从 13 号起每天对他们拷问，逼他们写口供，不写就代写，并且逼他们签字。我拿了公安局的审问记录，”他用手比划一下说：“有

那么厚厚的一迭，他们的口供：（1）证实煤校有枪，有迫击炮，如果不答应就打。现在没有拿出证据来，拿出物证。（2）要学生承认是自己放火烧死自己的。你们想一想天下有这样的怪事吗？放火自焚，不要说是造反派，就是保守派也不会这样。外面包围了，开始是四、五百人，后来一千多人，包围放火，你不去追问一千多人，而去拷打被包围的学生，有这个道理吗？”

周恩来又问：“鸡冠山有人在吗？”

总理联络员刘宝明回答：“他们都回去了。”

周恩来不高兴的说：“你们怎么不重视呀？我就要把这个问题追到底呀！而你们怎么都把人搞回去了呢？”

“大联筹”代表起来解释：“最近我们动员大家杀回老家去，就地闹革命。”

周恩来：“要通过他们把问题搞清楚嘛！我们学习毛主席的方法，解剖一个麻雀，要说服他们（指联络总站），也是为了给军区的同志看，也是给支左的军队同志看。刚才我听了两个半钟头的汇报，已经来晚了，你们把他们放回去了，好容易才请得来。”

这时，姚文元提醒周恩来说：“还有一个刘瑞森的问题。”

周恩来：“这个问题等下谈。”他指着“大联筹”那个到萍乡调查过的最先发言的代表说：“那个同志说话很冷静，是‘大联筹’的吗？造反派是比较讲理嘛，他讲得很好，他提出四种可能性，把对自己最不利的都谈了。当然我不是叫你们去打架，起火总是外面起的，把桌子和藤圈都全烧掉了，萍乡市武装部副部长贾天成他都承认火是从底下起的嘛！”

这时，“联络总站”一个萍乡女代表站起来讲：“放火的问题，

我找了一个原萍乡煤校的老师，叫做陈佩杰……。”

周恩来问她：“你在现场吗？”

她说：“我在。”

周恩来：“你包围了他们吗？”

答：“我没有，我在 100 米以外。”

周恩来:“这几个老工人也是在 100 米以外嘛？我是问，放火是谁放的？”

“联络总站”的那个女代表说：“我讲的那个人已经交待了……”

周恩来拿起 107 个人的口供材料打断了她的话：“交代了，这 107 个人都是这样交代的。”

“联络总站”的女代表：“你要相信工人阶级都是有阶级感情的！我们不会干这种事情。”

周恩来非常生气地说：“你所说的‘交待’就是市武装部、市公安局，就是矿务局武装部逼出来的。你不是讲工人吗？我这里有 107 人的口供嘛!”

“联络总站”那个女代表仍很不服气的讲：“事情还会搞清楚的。”

这时姚文元非常气愤的说：“总理还没有讲完嘛！你根本没有到现场。”

周恩来说：“是嘛！听我说嘛！连我都为这件事鸣不平。”

这时“联络总站”的另一个代表说：“报告总理，我还有问题搞不清楚。他们烧死 180 多个人，电报是几时打的。”

周恩来：“我现在还没有谈到那里去嘛！你扯到那里去干什

么呢？”

这个“联络总站”代表不服气的问：“为什么放火之前就发了电报？自己放火还嫁祸于人。”

姚文元说：“这时人家都被包围了，怎么能去打电报？”

“联络总站”代表讲：“火是 8 点 35 分烧的，5 点半就广播了。”

“大联筹”的代表站起来说：“我们是 10 点 15 分接到萍乡打来的电话。”

周恩来：“是嘛！人家都讲是 10 点多钟接到的（电报）。你们听我讲嘛！为什么武装部、公安局抓了 100 多人？而对‘萍总’一个都不过问呀！”

“联络总站”的代表站起来说：“我们没有抓他们的人，我们把他们 100 多个人都救出来了。”

姚文元生气地说：“你们还把他们救出来了？！50 多个人搞到了鸡冠山，在 100 多里路以外的地方关了 5 天，这是真的吗？”

“联络总站”代表：“他们欺骗中央，两个老工人谎报军情。”

周恩来：“什么叫欺骗中央，你们讲的都百分之百的准确吗？正是因为这样我们才派人去调查嘛！”

“联络总站”又一代表站起来要发言，周恩来问：“你是不是萍乡的呀？”

他说：“我不是萍乡的。”

周恩来：“你没有调查，你不要发言。”

姚文元：“你让总理把话讲完嘛！我们在这里是平等嘛！”

周恩来：“你要允许人家把话讲完嘛！我没有把 3 位老工人

的话都肯定下来，还是派人去调查了。”

这时，“大联筹”代表站起来说：“我们相信党中央。”

“联络总站”的代表也站起来指责对方：“你们造谣！”

双方又当着周恩来的面争论起来。周恩来非常生气，又无可奈何，干脆对“联络总站”的代表讲：“你们还有什么话，全说出来。让你们说一刻钟吧！不要说我们中央压制你们，不听你们这一派的话。”

“联络总站”的代表马上站起来：“你刚才讲武装部抓了人，张锦才还在这里，他为什么不发言？”

萍乡武装部政委张锦才说：“我 7 月 3 号就离开家了。”

“联络总站”的代表质问他：“这么大的案子为什么不向你汇报呀？”

张锦才没有回答。这时，“联络总站”代表继续说：“这个是陈佩杰交代的……”他对周恩来说：“你说是逼供信可以，难道他一点立场都没有吗？稍微有一点脑子就要考虑，他的口供里讲了……”

这位代表对周恩来的态度引起“大联筹”代表的愤慨。这时，周恩来打断了他的话问：“什么口供呀？你们审问了他们吗？在审问的时候才有口供的嘛！”

“联络总站”被周恩来问得一时无话可答，支吾半天才说：“他（指陈佩杰）交代的，煤校早就商量好了，一旦‘萍总’来，就要放火烧掉三楼，才有出路。”又说：“大楼是工字形的，火是从三楼起的。”

这时“联络总站”又有人站起来说：“‘大联筹’的也搞口供，

罗才根的口供都登到《火线战报》上去了。”

周恩来问“大联筹”代表：“那个报带来了没有？”

“大联筹”代表说：“没有带来”，我们都交给中央了，这是以前的事情。”

“联络总站”代表接着说：“他们萍乡煤校楼上都用砖堵起来了，根本上不去。”

周恩来问：“你讲的这话，是陈佩杰说的吗？”

“联络总站”代表说：“是我从现场看的，因为三楼出口可以冲上去，至于‘萍总’为什么要围他们，要从‘五•九’事件说起，中央军委有负责同志在这里。”

周恩来奇怪，随口问他：“一个军委负责同志？”

“联络总站”代表指着座后，这时一个解放军站了起来。

周恩来问那位军人：“你叫什么呀？”

答：“我叫李谦和。”

周恩来翻名单，一看，是江西省军区的。便说：“你说清楚呀，他不是军委的，是江西军区的，军区参谋嘛！哪里是军委的呀？！”

“联络总站”那个代表又没有话说了，只得说：“报告总理，我说错了。”

接着，他讲起了“五•九”事件：5 月 9 日，“萍联”用刀子杀人，“萍总”抓到了凶手，杀伤了他们两、三个人，而且在外面打了 100 多把匕首，因为“萍联”有了武器，所以“萍总”才来围他们，等等。

周恩来问：“他们刺伤了你们多少人呀？”

“联络总站”代表说：“刺伤了十多个人。”

周恩来又问：“有打死的没有？”

“联络总站”的讲：“没有，我们不像他们一样说谎的”

周恩来：“他们有哪些武器？”

“联络总站”：“有梭镖、刀子等，最愤怒时我们也用拳头揍过他们，我们打了他们的人，都把他们送到医院去了，他们到医院都逃跑了，我们没有抓他们。他们还讲‘不把这个反革命复辟窝子砸烂，萍乡的文化大革命就有夭折的危险。’竟把萍乡的‘革命造反派’说成是反革命窝子。”

周恩来：“你们不能用武斗来制止武斗嘛！”

“联络总站”：“我这是文攻武卫。”

周恩来：“你包围人家还是‘武卫’呀！”

姚文元也说；“你们 1000 多人包围人家，这还讲是‘武卫’呀？！”

“联络总站”又把话题转到安源批判刘少奇的问题上，说：“安源是毛主席亲手领导的，毛主席怎样领导安源革命，刘少奇怎样当哈巴狗，树立个人权威等……”

又说：“武斗是‘萍联’挑起来的，‘萍联’中有个叫陈中奇的，他自己买了 100 多把匕首。”

周恩来问：“你说的陈中奇是什么人啊？”

“联络总站”的说：“是萍矿‘燎原大队’的后台，他现在还在北京。”

周恩来：“陈中奇是什么职务？”

“联络总站”代表说：“团委副书记，保卫科副科长。”

“大联筹”代表站起来要发言，周恩来说：“还要等一下，等他说完。”

“联络总站”代表最后说：“萍乡一系列武斗都是刘瑞森一手挑起来了的，就是大叛徒刘瑞森挑起来的，军区是犯了严重错误，甚至是犯了方向路线性错误。我们也可以杀回马枪嘛！但是我们相信解放军，决不会像他们那样打解放军。挑起武斗要有根有据的分析，听话不能断章取义，我们要求中央派代表团去调查。”

这时，“联络总站”又一个代表站起来发言，继续讲煤校的事情，说：“煤校红卫兵在楼上做了工事，筑了墙，楼梯都很窄，胖一点的人都进不去。”

周恩来说：“这种情况至少可以说明是防御的嘛！不是进攻的嘛！

“联络总站”代表又讲：“火不是我们放的，如果总理不相信，可以把我扣下来，再不然的话，可以枪毙我。”

周恩来严肃的讲：“你说这话本身就不对头，我什么时候说过这样的话呀？”

“联络总站”的代表又说：“《解放军报》记者也调查过这个事情。”

周恩来没等他讲完就打断说：“我们是派了人去调查嘛！在另外一次会议上我会宣布的。”

“联络总站”代表：“要求中央严惩凶手，造假情况的要严肃处理。”

周恩来：“你们这个意思，就是对我们派去调查的人不满意。

我还没有说完嘛！你们一开始就听不下去了，我几次讲话都被你们打断了。现在把你们的话听完，你们还有没有呀？”

“联络总站”代表说：“报告总理，暂时没有。”

周恩来：“现在‘大联筹’的讲一讲，我们听一听他们的意见。”

“联络总站”代表站起来说：“我们听总理讲。”

周恩来：“我不讲，我一讲就被你们挡住了嘛！你们又要讲我压制你们了，又要贴我的大字报。”

“联络总站”代表：“我们又没有贴大字报。”

“大联筹”代表站起来说：“现在是向总理汇报，你把矛头指向谁啊？”

“联络总站”的说：“你们不要扣帽子，我们不是对总理，而是对那两个老头子。”

周恩来说：“这我知道，你们已经提出了抗议了嘛！你们刚才对我气势汹汹，一年来我在这样的场合下，不下几百次。”

他转过身来对姚文元说：“有时一天 3 次都有过。”

“大联筹”代表就“联络总站”代表提出的问题逐条驳斥，当汇报到他们编印《红色曙光》小报时，周恩来问：“上面有批刘的文章吗？”

答：“有，主要是批刘的。”

周恩来：“我供给你们一个材料，刘少奇这几年经常在主席的面前吹嘘安源的历史，主席总是不吭声。主席总是容量最大，主席是一直领导安源运动的，萍乡的煤，大冶的铁，汉冶萍公司，当时安源的运动是湖南省委所领导的，主席对全部历史都清楚。

主席讲刘少奇是第三代，李立三是第二代，第一代是什么人跑了。刘少奇总是吹嘘，他跟我讲了几次。”

他又回过头来跟姚文元讲：“你也好像听过几次，所以我就觉得很有问题。中国科学院革命历史研究所，决定从二十年代开始研究刘少奇，实际上是有道理的，刘少奇跑到苏联去还不到一年，回来就到安源搞了一下，二十年代还不仅仅是安源，还有上海、广州，刘少奇 1925 年在长沙被捕，广州省港大罢工他也插了一手，其他的我就不提了。”

姚文元说：“这就是所谓‘资本’，这一点要揭穿他。”

周恩来：“我听到刘少奇讲了，不下 5 次，我很奇怪，一定有什么名堂。当时还不会想到 8 月份以后的情况，批刘的根子要从二十年代找起，真正批刘的话，二十年代很多可以批呀！”

姚文元插话：“反动的历史要彻底搞清楚。”

这时，刘培善打起瞌睡，“大联筹”的代表马上站起来说：“刘培善你不要打瞌睡。”

周恩来予以制止说：“你不要干涉嘛！有的精神支持不住嘛！这是讲理的地方，摆事实，讲道理嘛！”

接着，“大联筹”代表又把萍乡“五•二六”事件做了汇报。并讲到“七•二五”事件中，“萍联”一工人被打死，叫仇浩坚。身上被梭镖戳了 13 个洞。他们还说“联络总站”从萍乡市武装部拿走了两挺机枪。高坑、青山、安源等地的派出所，全部都被他们接管等等。

周恩来问：“萍乡市武装部的枪的性能你们知道么？”

张锦才回答：“我们武装部只有 4 挺机枪，而且枪栓都拿掉

了的，夺了也没有用。”

周恩来说：“你打个电话回去问一问。”

## 第 783 回：天已明，只好先匆匆散会　许世友，情急跑进大别山

江西“大联筹”代表揭发“联络总站”造谣济南支左部队是刘少奇派来的。周恩来说：“今天我把济南部队司令员杨得志同志请来了。”

这时“大联筹”代表站起来鼓掌，并高呼：“向解放军学习，向解放军致敬！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

杨得志也站起来向大家招手。周恩来说：“这支部队是从第一个成立革命委员会的地方调来的，是毛主席亲自派出的部队。”

接着周恩来又介绍说：“我再给你们介绍这个部队的军政委程世清同志、副军长杨栋梁同志。”

又是一片“向解放军学习！向解放军致敬！”的口号声。

周恩来继续说：“这支部队是毛主席、林副主席亲自派出的，谁要说是刘少奇派来的就是诬蔑，谁说的要把他揪出来，”

周恩来要找的萍乡红卫兵陈松林赶到了，周恩来说：“萍乡煤校起火的事情，你能不能谈一谈呀？”

陈松林根据自己调查的情况谈了煤校起火的情况。周恩来问他：“陈松林同学，你见到煤校的同学没有？”

答：“见到了。”

“130 人是从楼上救出来的吗？是否能够写出一个名单来？有没有外面的人躲到里面去了？”

答：“那肯定有。”

周恩来：“240 多个人只是个大体数字，只有 9 个人知道名

字，知道下落，其他人有没有下落？有的人到机务段去了，有的人回了家。”

小陈说：“还有几个人没有回来。”

周恩来：“是吕振杨嘛！其他人都回来了，关在市委的 18 个人也回来了，其实就 9 个人的姓名查出来了。”

这时师院“东方红”的代表站起来要求发言，当时天已亮了。周恩来：“重复的你就不要讲了，你是‘联络总站’的吗？”

“东方红”的代表说：“我原是‘联络总站’的，现在退出来了。”

他接着说：“起火的原因，消防队的说三楼没有汽油，是在二、三楼走廊中间起火的，可能有坏人钻到里面去，有人钻到二楼放火烧着了物资，我并不改变消防队自己的说法。9 个人的下落死伤问题，其中 6 个是学生，3 个是工人。6 个学生都是赣南，有据可查。3 个工人，据对 10 个工人的调查，其中看见有 1 人买了车票回去了。

我认为火是有人放的，而且是两个到三个以上的人放的，楼都堵死了嘛，挖了个洞，不可能是一个人挖的。死人的问题我怀疑有人撒谎，8 个人失踪都不知到那里去了，而且有外地的同学在楼上没有被抓，现场也没有发现尸体。现场已经被破坏了，我们去调查的时候，他们已经不太相信我了。”

周恩来说：“现在已经相当晚了。要结束今天的会议了，还有几件工作没有做，很急迫的，关于萍乡的问题两方都讲到了，有关的也都讲了。‘联络总站’中站起来革命的也讲了，‘联络总站’也站在自己的立场上说了，调查组如实地反映了情况，材料

一大堆，我想把它看一看。现在情况基本明白了，麻雀可以解剖了，不是你们说还要事实求是吗？我再讲讲也好，你们要多留几天就多留几天吧，多讨论讨论。北京地质学院的同学来了没有？”

首都红卫兵说：“我们没有去，没有搞。”

周恩来：“不是在北京加入这个调查吗？你们要多留几天，这个麻雀一定要解剖的，你们要讨论讨论，不要太激动，实情总会弄出个水落石出、还他本来面目。不许多说，也不许打折扣，我们学习毛主席的工作方法，调查一番，我愿意再做些工作，这是一点意思；第二，就是今天白天刘培善和江西军区同志要把几件事传达下：一、不能再随便发枪，凡是会议期间发的枪一定要收回。萍乡市武装部如果收了‘萍总’的枪，‘萍总’又抢回去了。萍乡市‘萍总’捉刘禄出来游街，31 号‘萍总’给刘禄挂黑牌游了街。”

刘禄是萍乡武装部部长。

周恩来接着说：“当然了，如果受蒙蔽现在反戈一击，仍然是好的，我们是欢迎的，但是武装部的责担还是要往上推，不只是武装部的问题，还有军分区，军区嘛。还要揪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方向路线错误在上面，不要过分的责怪下面，这样打击面太大不好。还有一件事给你们讲，‘大联筹’在工厂斗军代表、毛泽东思想宣传员、人武干事。本厂的人武干事，批评是可以的，上面派来的叫他们回去，回去集训。过去你们同军区作斗争，责任在上面，你们在南昌开会，不是也批评军区的方向路线错误吗？刚才‘联络总站’的人也说了嘛！证实是方向路线错误，军区也承认在支左工作中某些方面犯了方向路线错误，

这次提出来了，军分区应该严格执行，不要再乱发枪了，更不能打开仓库来发枪。上次夺枪，‘大联筹’的很快承认错误了，封存了，或者交回了，现在这股风还没有刹住，还有发枪、夺枪。严重的还有动员农民进城。有些军分区、县市武装部要负责任，即使那方责怪你们，这个口子要堵住。八条已经达成了协议，就要保证实施。萍乡事情据 3 个老人家讲就要调查清楚嘛，现在听你们的听了 3 个钟头，我只讲了半个小时。总之军区、军分区、武装部应该负起责任，不要引导群众斗群众，过去受蒙蔽是在上面。”

这时“大联筹”代表站起来说：“报告总理，刚刚收到弋阳的加急电报。”

周恩来打断了他的说话：“我不能听了，还有更急的事情要办，这么多年老的同志在这里也支持不住。双方的群众组织你们打电话回去，停止武斗，停止夺枪，停止动员农民进城，这都是《八条》上有的”

周恩来转过来对“大联筹”代表说：“对江西军区你们不信任，为了把江西文化大革命搞好，我们从早建立革命委员会的地方调部队到你们那里去，你们要按照最高统帅的话，要相信解放军，不仅从北京调了部队、南方广州也调了部队，也是支左有成就的部队，这说明中央重视你们江西的问题，江西是前线的近后方，你们是三个后方，我已经说过了嘛，福建是对台湾，广东是对港九，又对美帝。所以调部队作你们的支柱，为了文化大革命搞得更好你们要相信他们，要给他们便利，不要将他们的军。他们（指济南支左部队）要推动双方执行协议。过去上面造成你们

的对立，现在部队就要保证执行这个协议，现在要从《八条协议》入手，保证有个良好的开始，彼此还有意见，对中央的态度好，我们就多开几次会，我还可以争几个晚上，既然来了，就是为你们服务嘛，现在散会。”

7月22日，空军政委余立金跟随毛泽东从武汉到上海。第二天南京空军政治部副主任高浩平飞往上海。3天后，南京空军副政委王绍渊也飞往上海。他们都是前去看望随毛泽东来到上海的原南京军区空军政委余立金。

7 月 27 日，南京军区召开“声援武汉无产阶级革命派大会”。大会期间，南空副政委王绍渊就军区主要负责人安排南空司令员聂凤智上主席台一事，先后三次向南京军区政委杜平发出责问。8 月初，南空政治部副主任高浩平在空军 454 医院集会上，针对“八二七”指责“红总”的打砸抢问题发表讲话说：“打砸抢不是本质问题，本质问题是‘红总’反许世友、杜平，大方向是正确的。”

8 月 1 日，南京“红总”方面在南京街头贴出了《告全省人民书》，指责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阴谋在南京搞兵变。

8 月 2 日，南京出现了“一手拿枪，一手拿笔，口诛笔伐许世友”的大字报及“打倒许世友，炮轰杜平”的大标语。“红总”和南京军区造反派把火力集中在军区主要负责人许世友和杜平的身上。

“红总”下通令，要求许世友见群众。秘书把《通令》交给许世友，他瞄一眼就丢进纸篓子，对秘书说：“你告诉他们，不见面他们闹闹还安全点，见了面我怕他们一个也活不了。不信，

叫他们来 100 个代表，我一个人去见 100 个，叫他们试试!”

秘书将许世友的话原原本本转告了“红总”。第二天，只见满大街的标语：

“打倒许和尚!”

“许世友不投降就叫他灭亡!”

情况汇报到许世友那里，他只说一句：“妈了 X 的，不见面闹闹还安全点。”

这天，在“红总”的动员下，许多“红总”组织共同向三牌楼南京军区所在地发起冲击，占领了南京军区政治部大楼，要求南京军区政委、江苏省军管会负责人杜平交出许世友。

许世友正在南京军区 AB 楼开会，听到“红总”冲军区大院的消息，急得团团转。他是个粗中有细的人，别看他骂得欢，真的见势不妙，来者不善，三十六计，走为上招，当即宣布：“主席讲，要退避三舍。先让他们一让。”

说着，就带人爬上了楼后的桃山。那里，许世友早就让人停了几辆吉普车，以防不测。

许世友上车后骂道：“桃山、桃山，妈了个 X，逃娘的山里去!走!”

“去哪？”司机问。

许世友想了想说：“往西，大别山。”

汽车驶入大别山，许世友问：“主席讲的三舍是多少？”

车上人愣了愣。有人犹豫说：“90 里吧？”

“妈了个 X 的，退过了!”

许世友跳下车，看一下地形，下令：“封锁!把机枪给我都架

起来，敢登这个坡的，格杀勿论！”

南京“红总”后来还是浩浩荡荡追来了，看见一排黑洞洞的机枪口和一行大字：“军事禁区，不得靠近。”队伍停下来，万众踟蹰。最后，喊一番“打倒许世友”，“活捉许和尚”的口号，便退潮一般缩回去了。

许世友给中央军委发了电报，说到大别山检查战备工作。

接着，他又给中央军委发了第二封电报，说他神经性呕吐，顺便到医院住院治疗，住进了南京军区的后方医院——126 医院。

到了 126 医院，许世友又登山头，看地形，拟订防御方案，在医院内外布置部队，时刻准备战斗。

许世友真的病了。

126 医院有四栋大楼，每栋楼之间有地道连通。许世友住第四栋楼的三层，他女儿正好在这所医院当兵，院领导就让他女儿给许世友做护理员。

许世友生病了却不肯休息，集合他的警卫班，亲自教练少林拳。战士们练功发力的“呀—嘿！”声打破了医院的清幽宁静。每天二楼，医生护士们在跳忠字舞。可是头上的楼板一个劲震响，许世友警卫班战士练武的发力声和跺脚振聋发聩，搅得舞蹈始终跳不整齐。

第三天晚上，许世友的女儿去看望她父亲，三楼大厅里，警卫班战士正在习武。她一进门，许世友的秘书悄悄对她说：“中央文革来电话了，小声点，司令正在接电话。”

许世友的女儿只听见许世友拿着话筒说：

“我有错误，在历次召开的军区党委会议上做过检查。”他的声音带着哭腔，还有几分委屈和愤懑，“但我是忠于毛主席的，烧成灰也是毛主席的人！”

“……”许世友的女儿听不见北京那边说些什么，只听许世友又说：

“我是司令员，都做过检查，跟他们没关系，我已经做了检查。如果中央认为不行，我可以继续检查。”

“……”

“我的错误可以由组织上审查，不允许他们搞人身攻击！”许世友声音陡地强硬起来，两眼火爆爆地扫向门口。门外大厅里响起吼声，警卫班操练又让楼板发出地动山摇般的震颤。

许世友的两道黑眉像两条粗大的毛毛虫一样在额上蠕动，爬成一团，阴沉着脸听了几十秒钟对方的讲话。突然，他冲着话筒喊道：

“我不去！组织上审查可以，去接受人格污辱不行！我许世友要命有一条，受辱不答应！”

“……”

“没什么，我的卫兵要操练！”

“……”

“没什么意思，他们天天操练，组织上可以审查，一天没断过，军人就要常备不懈！”

“……”

“审查可以，谁对我进行人格污辱也不行！国民党不行，造反派也不行！污辱我人格这个矛盾就要转化！”

“……”

“就是要转化！敢污辱我，我就打死他！没什么冷静不冷静，我参加过七次敢死队，我怕什么？敢来就打死？”

“……”

“我造反还是他们造反？”

“……”

“我这是军事重地，保密机关，谁也休想来！我这儿就是有部队，他们是听我命令的。”许世友将话筒拿开一些，警卫战士演练的吼声雷一般传入。他又对话筒叫喊一声：“我不同意，谁也休想来！”

许世友把电话掼下，从牙缝里骂一声：“妈了个 X 的！”然后要去看看习武的警卫战士，刚走近门口，身子忽然一晃，忙去扶墙。

“爸爸！”他女儿见状，赶紧冲上前扶住了他。许世友脸色苍白，身体软软地靠在女儿身上。他女儿和工作人员忙将他扶到床上。经医生检查，血压高，心脏也不好，还得了感冒。

南京军区空军聂凤智司令员本来是跟许世友一道进入大别山的，北京那边也给他打来电话。他考虑再三决定回去接受群众批斗。

“不能回呀！”许世友劝说他：“那些人是什么事都干得出来的。”

“我已经考虑再三，情况不同，我还是回去的好。”

聂凤智回去了，受尽各种污辱，被打掉 8 颗牙齿，甚至被装进麻袋，扔在火车厕所里……

狡兔三窟，大别山深处有三个军队单位。几天后，许世友搬到五局，晚上又突然搬到军区工程兵工区。许世友对工区主任柴树林说："什么造反派?土匪流氓!一旦被他们捉住，只有死路一条。你们工区人人都要拿枪，一旦他们来了，咱们打一个小规模的淮海战役。"

柴树林说："首长，上边再三强调，开枪……行吗?"

许世友一愣，转口说："当然，上边的规定还要执行，真要开枪还要经中央军委批准。这样，过几天你派人到六安向军管会打招呼，要他们说服群众，不要随便冲击工区和医院，不然碰到我老许的枪口下，叫他们站着进来躺着回去!"

## 第 784 回：出坦克，杨家坪子弹横飞　物资紧，改炮艇长江劫船

8 月 2 日，重庆“815”的“文攻武卫指挥部”统一策划，还是要攻占 7 月 1 日被“军工井冈山”占领的生产枪支的建设机床厂，以获取武器。

凌晨，天还没亮，队伍都开来了，支援的坦克也来了，就要开打了，该厂的内应人员却说他们不知道对方的火力点布置在什么地方？

反正人都来了，既然建设厂的情况不明，那就去攻打相邻的空压厂，那里武器也不少，反正有坦克掩护，不攻白不攻，这回胜仗是打定了。

于是，“815”兵分三路向空压厂进发。正行进间，冶金系统的纵队方向突然传来一声：“口令！”还没等这边回答，那边就开了火。

对方有工事，大家急忙卧倒，紧接着从后面响起了炮声，炮弹呼呼地从“815”头上飞过去。他们扑下身子回望，原来是支援他们的空压厂坦克在掩护他们进攻。

对方工事很快被摧毁了。坦克一开过，“815”喊着杀声向山头冲去。上去后，发现对方战壕里还留着一挺 12．7 毫米重机枪的架子，枪管已经给扛走了，地下是一大滩血，估计枪手受伤撤退了。旁边还留了很多枪弹。同学们一看，便高兴得蹦起来。就在这时，一排子弹扫来，重庆大学学生刘文举大腿中弹，翻身倒地，血如泉涌。

“815”马上组织还击，把残敌打跑，这才急急把刘文举背下山去，到空压厂医务室找人紧急处理。一个医生给他静脉注射右旋糖疳，据说是扩容的药剂。不知什么原因，竟注射成了酒精，原来是用装右旋糖疳的空瓶装的酒精！当刘文举被拉回重大的时候，血管已经完全僵硬了。

空压厂这边，“815”继续向水塔方向冲锋，路上，重庆大学学生董继平的钢盔被子弹击落，接着子弹便从他的颅脑斜穿而出。他没有死，甚至没有成为植物人，经过相当时间的治疗，他活了下来！会吃饭、会发音，开始是一些简单的元音：“啊”“哦”之类的，后来，同学们去看他，故意在病床前高呼“毛主席万岁！”他麻木的脸会微微一抖，接着会伸大拇指表示赞同；当同学们故意又说“刘少奇！王光美！“他又换成了小拇指。第四十二期《815战报》发表的专访文章无比感慨地赞叹：董继平同志“爱憎是何等鲜明！”正因为这，大家把他称之为身边的“麦贤得式的英雄”。再后来，董继平可以在同学的搀扶下蹒跚学步。开始还好，同学们还在学校，还能随时给他喂食，帮助他解便和洗澡，不久毕业分配了，人去校空，这位“麦贤得式的英雄”境况就说不完的凄凉了。尤其“糟糕”的是，他竟开始恢复了记忆！分配外地的同学回校看他，这位“英雄”便会傻傻地说：家里还有老母亲啊！还等我毕业寄钱啊！说着还会流泪！开始，学校每月还支付他10 来元的生活费，后来，干脆把他遣送回乡了事。同学们都在天南地北为自己的命运奔忙，他也就被慢慢忘却了。最后，不知什么时间，他终于倒在了岷江支流那片冷冰冰的河滩地上。这是后话。

还说 8 月 2 日这天，“815”军工系统的“81 兵团”头头方文正，见空气压缩机厂久攻不克，于是下令将“反到底”派占据的厂俱乐部烧毁。

到了晚上，空压厂依然是枪炮声不断，火光冲天。旁边的建设厂岂敢懈怠，枕戈达旦……在厂变电站里隐藏着威力无比的 14.5 四联机枪,一分钟可发射 800 发子弹，在 600 米范围内能击穿 20 毫米厚的坦克车甲板。另外还有一挺 12.7 高射机枪。这两件利器放在这里是防止空压厂的坦克从杨家坪方向冲过来。

由于得到的情报是“815”要攻打建设厂,“反到底”以为“815”攻打空气压缩机厂是声东击西，所以建设厂这边按兵不动，没有出兵支援空压厂，而是固守在自己的阵地上。

空压厂的激战到后半夜渐渐平静下来。8 月 3 凌晨，“815”终于攻占空压厂。

在这次武斗中，重大“301”武斗队纵队长谢宗正等 4 人身亡，重伤致残 1 人。“815”派占领空压机全厂后，途中发现有枪伤后未死者，师专附中武斗队即补枪打死。

随即，8 月 3 日清晨，建设厂“反到底”派的“军工井冈山”对该厂“815”派“八一兵团”占据工厂东面的弯弯大楼以及大楼对面的一个军库发起进攻。

弯弯大楼是建设厂的办公大楼,位于谢家湾,有七八层楼高,靠近两（路口）杨（家坪）公路，因将就那里的地势，大楼建成一个弧形，因而被称为弯弯大楼。当年，像这样的高楼，重庆还少见，那大楼就成了建设厂的标志建筑。作为制高点，其屋顶可以俯视整个厂区。建设厂背靠长江，长江对岸就是生产子弹的长

江厂，那是“815”派占据的地盘。建设厂正面是机制校和重庆工业学院，也是“815”的据点；西面是生产坦克的空压厂，此时已被“815”占领，此时建设厂的“军工井冈山”实际上处在四面包围之中。弯弯大楼和军库各据一面，对来往建设厂的两杨公路构成了封锁，使“反到底”到厂区内“提”枪，也构成了困难和危险。于是，“反到底”派制定了周密的计划，坚决要攻下弯弯大楼。

8 月 3 日清晨，建设厂的“军工井冈山”首先用四联高射机枪向弯弯大楼猛烈扫射，弯弯大楼立即燃起熊熊大火，驻守在里面的“八一兵团”见势不对，只好撤退，眼看那弯弯大楼被烧得精光。

天刚微明，建设厂的“军工井冈山”又向军库进攻。当他们冲进军库大门时，守军突然一阵猛烈射击，立即打倒好几个，中学红卫兵“九一纵队”负责人、“红一连”指导员、九中学生王木全等多人身亡。虽然如此，“红一连”仗着人多、枪好，顺着那坡往上爬，一阵猛冲猛打，“八一兵团”守不住，只好撤退。

当天，望江机器厂“金猴”到建设机床厂领取武器后返回时，在储奇门路口遭到凯旋路中学“815”派设卡拦阻，发生冲突。

“反到底”派“南岸城建兵团武斗队”从建设机床厂领枪归来，在黄葛垭新市场附近也遭到“815”派伏击，死 10 人，伤多人，十几支半自动步枪被抢走。

两派在市中心 29 中学和相邻的大同路小学武斗，“815”派 29 中学“毛泽东主义战斗团”负责人张光耀徒手前去双方交火地带救护中弹同学身亡。

8 月 2 日，就在“815”攻打建设厂、空压厂时，重庆还发生轮船被劫事件。

李鲁沂参加了邓长春 7 月 29 日在重庆黄山召集的会议后，立即和长航“红一方面军”总部勤务员王三恒秘密赶赴长寿，安排“反到底”长寿总部潜伏在码头附近江面上，设法与长航“红一方面军”在“长江 2014 号”轮船上的负责人朱星德、刘志华、刘文荣等人秘密取得联系，命令他们在 8 月 1 日晚务必将“长江 2014 号”停靠长寿。

8 月 1 日，驶往重庆的“长江 2014 号”轮拖挂“货 8—126”铁驳，载着运往重庆的百货、药品等物资 370 多吨，驶到长江涪陵李渡，红港革筹组指示其在深沱码头“停船待令!”涪陵蔺市区镇安公社深沱大队江段水很深，建有深沱码头，但是涪陵有“红贸”和“忠实”两派。“2014”轮与涪陵“忠实”派取得联系，在深沱码头挂出无泊位信号，“2014 号”轮船不得不继续向前行驶，晚上停在深沱以上 30 里外重庆地界的长寿江南镇的川维码头。

船到了长寿，这里“815”势力大，船上的“815”也就不急了。谁知就在这里，“2014 号”轮船被劫。

图中 A 点是长寿江南镇川维码头

8 月 2 日凌晨 4 点多钟，东方的启明星尚未落下，一艘大木船划过夏夜的深沉，划破长江的微波，静悄悄地向“2014 号”船靠了上来，船上几十名头戴藤帽的当地男子登上“2014 号”。他们手里拿着钢钎、大刀、杀猪刀、匕首、炸药、雷管等凶器，左手手腕上都缠着红布，自称是“815”派的。船上“反到底”派船员刘长炳闻听，吓得跳江逃跑。

船上“815”派的人积极配合。船被完全控制后，立即起锚重又向下游开去，这引起了船上“815”的怀疑。原来这是“反到底”派的“长寿指挥部”和长航“红一方面军”联合劫船行动。为防备“815”派反夺轮船，“反到底”警告说：“轮船上已安装了炸药，如果‘815’来抢，我们就同归于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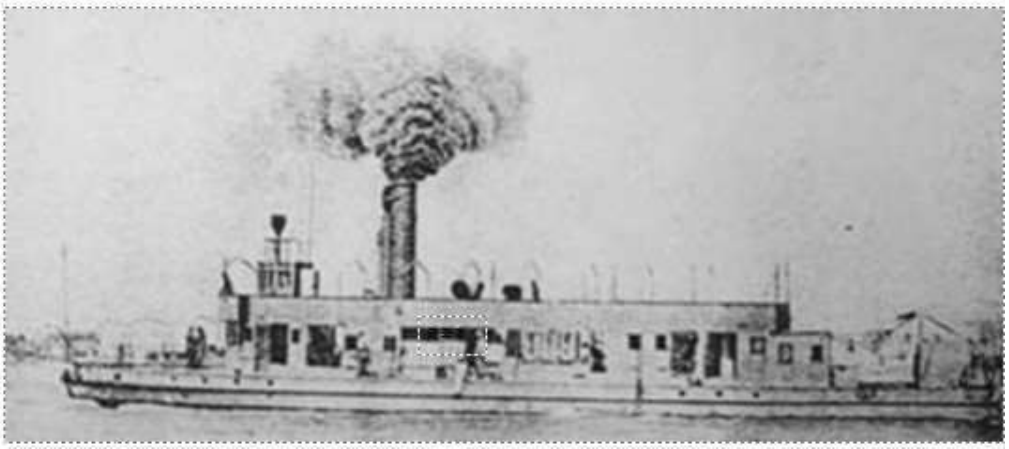
船开到涪陵倾向重庆“反到底”派的“忠实”派控制区停了下来。

很快，重庆军分区得到“2014”轮船于 8 月 2 日早上被“反到底”派劫持的消息。

此时，重庆军分区已得到望江“金猴”在黄山设立了武斗据点的消息，立即派军分区参谋长张廷勤带领一干人来到望江机器厂附近的郭家沱中学驻扎下来，监视在黄山的望江“金猴”。第二天早上，张廷勤戴着军分区的战士又占领了望江码头。原来停靠在望江码头的嘉陵厂“反到底”派的“嘉陵 1 号”艇见状，只好驶入嘉陵江躲避。

而黄山望江“金猴”的邓长春这时也正在开会研究，怎样才能将“长江 2014 号”安全送到望江厂而不被“815”阻拦截获？他提出利用望江机器厂的优势组建“武装舰队”护送“长江 2014 号”的建议，得到大家的赞成。于是，正在嘉陵江的“嘉陵 1 号”艇又开进望江机器厂，在那里改装成炮艇。

8 月 3 日，被“反到底”劫持的“2014 号”轮船从涪陵驶回长寿深沱。此时，正在望江机器厂改装炮艇的“嘉陵 1 号”接到“望江军工井冈山指挥部”命令：让它改装后，和望江机器厂的交通艇“望江 101”统一行动。在望江机器厂内码头加好油后，从那里出发，到深沱将停靠在那里的“2014 号”轮船护送到望江。



## 望江 101

“望江 101”是望江厂的运输船，原是川军刘湘的兵舰，叫“嵯峨”号，马力大，铁甲厚。1935 年蒋介石入川，下令解散四川的海军。刘湘卖掉了所有的军舰，但舍不得卖掉“嵯峨”。1937 年 8 月 7 日，刘湘到南京国防部讨论抗战问题，从成都乘坐飞机到重庆，然后乘坐“嵯峨”舰前往南京。到了南京码头，“嵯峨”号汽笛长鸣，请出刘帅。抗战期间，“嵯峨”归属国民政府兵工署名下，改名“建中 101”，由二十兵工厂使用。1950 年 12 月，“建中号”由二十兵工厂调拨给五十兵工厂使用，解放后被望江厂改做运输船，取名“望江 101”。7 月 25 日，“815”攻占工业校事件发生后，“金猴”又将“望江 101”重新改装为军舰，在前后甲板上各装了一门 61 式 37 毫米双联海三七高炮，还在前段另装有海四联 14.5 毫米高射机枪一座，后段有海二联高射机枪一座，其火力配置与 62 型护卫艇基本相当。

“嘉陵 1 号”改装后，也安装了两门 37 毫米高炮，另有 14.5 毫米双联、四联高射机枪多挺。火力强大。

8 月 3 日这天，重庆军分区参谋长张廷勤见“反倒底”的“嘉陵 1 号”和“望江 101”两船向下游驶去，判断与“2014 号”轮船有关，遂即命令正在长江上游弋的重庆军分区“667 号”交通艇前去阻截。

已经封锁了长江航道的望江“金猴”，见重庆军分区的“667 号”交通艇追向“望江 101”舰，便鸣枪示警。“667 号”交通艇没把“金猴”放在眼里，他们用机枪掩护，强行冲击“军工井冈

山”的高射炮火力封锁线，结果被检查哨上的高射炮击中爆炸，很快沉入长江。舰上 3 名解放军战士全部牺牲。

重庆军分区怒不可遏，立即出动独立团，包围了黄山“反到底”的武斗指挥部——“黄山警备司令部”，准备攻山。

重庆市支左负责人一面向成都军区报告，一面给重庆军分区打电话告诫：

“告诉同志们，越是在复杂的情况下，越要冷静，千万不要做出蠢事来。为避免政治上被动，通知独立团，原地待命。”

8 月 3 日下午 18 时多，“望江 101”、“嘉陵 1 号”一路未再受到阻拦，顺利驶抵深沱。在那里，他们搂草打兔子，顺手牵羊，又把停泊在深沱的运输船“人民 5 号”货轮一并俘获。

“人民 5 号”是一条美国军用登陆舰，二战结束，美国裁减军需，作为剩余物资赠送给国民党，内战中是蒋军的后勤运输舰，简称为华字艇，解放后作民用运输船。“金猴”俘获“人民 5 号”时，船舱里满载 1000 多头生猪。

就这样，“望江 101”和“嘉陵 1 号”一前一后，将“人民 5 号”夹在中间，开到长寿。晚上 20 时多，3 艘轮船及“长江 2014 号”轮，一起往上游驶去。船队由“嘉陵 1 号”领航，“人民 5 号”、“长江 2014 号”轮及其拖挂的货船居中，“望江 101”押后。

8 月 4 日凌晨 2 时左右，4 艘轮船航行到长寿蒋家沱时，遇到正往上游去的客运班轮“昆仑号”和“东方红 102 号”也在这里停靠，听说两艘客轮中混有“815”武装，又传前方可能“815”有埋伏，于是，“金猴”又将这两艘客轮挟持一同航行，是想依靠客船掩护，“815”不敢妄动。

“昆仑号”和“东方红 102 号”为了乘客安全，也不愿在船上发生枪战，表示愿随舰队一道上行。

凌晨 3 时 30 分，船队顺利抵到达望江机器厂所在地郭家沱，一路安全，并没遭遇攻击，船队就停靠在那里。不久，“昆仑号”和“东方红 102 号”客轮意外地得到了起锚准许，离开船队开往重庆。原因是这两艘轮船不在“金猴”的劫船计划中，而且两艘客轮都载有外地旅客，“反到底”担心他们的夺船行动过早暴露。而且，他们利用“昆仑号”和“东方红 102 号”轮作人质的目的业已达到，两条客轮要吃，要消耗，是个拖累，不如放行。

邓长春在黄山获悉又顺利俘获“人民 5 号”舰和一船生猪的消息后，情不自禁的说：“这么多猪，天天吃红烧肉也吃不完啊！而且猪会死的。”

太阳下山后，他将队员们集合在学校操场上，不紧不慢地讲道：“同志们，报告大家一个消息：昨天，我们在长江上截获了 5 艘补给船，缴获了大批猪。今天，大家打牙祭。”邓长春话音一落，全场就“哗哗哗”地鼓起了掌，“让‘815’封锁‘反到底’的阴谋见鬼去吧！但是敌人决不会甘心失败的，要警惕‘815’反扑，我们必须加速消灭‘815’的有生力量，砸碎其战争机器。”

全都是学毛泽东对待国民党的语言。

## 第 785 回：毛泽东，在思考武装左派　谈文革，日本记者遭批斗

凭借处理武汉事件的东风，新华社在新闻报道中顺便点了全国各地一系列造反派的大名，以事件为“试金石”，全国“革与保”两大阵线顿时泾渭分明。从中央的宣传上，人们似乎看到湖北周边地区革命造反势力的高歌猛进，实际上许多地方根本权力与利益的冲突和“革与保”的冲突反而被激化，持不同见解的部队甚至公开冲突，分别支持不同的群众组织，乃至发枪，有的地方则是造反组织内部急剧分化，持械武斗。在这个全民全军多方位按照自己的需要和理解积极参与下，除湖北、河南、湖南和后来 12 军进驻的安徽外，一些省，局部形势顿时失控，全国掀起乱揪“军内一小撮”和抢枪恶风。江西有的地方和组织，公开抵制中央处理江西问题的决定，认为是“挑动群众斗群众”，以至出现严重武斗和新成立的省革筹认为的“军事叛乱”。别的不说，就武汉刚刚翻身的“三钢”造反派，居然前后出动数万人次，到湖北专县乃至全国“武装支左”，遭到周恩来的严厉批评和一些中央领导的臭骂。

由于对情况的认识不一，周恩来要求全军文革小组将南京、广州、沈阳三个军区受到冲击的详细情况立即上报，并约三军负责人和南京、沈阳军区领导谈话。7 月下旬，当“林办”秘书张云生把各地武斗情况向林彪汇报时，林彪划了根火柴，自言自语地说：“文化大革命，变成武化大革命喽！”他根据各地发生的抢枪事件，口述了一封给毛泽东的信，大意是：武汉事件后，亟待

处理的一些问题正在处理。对于陈再道等人的问题，已按主席指示的方针办。……当前的问题仍然是两派对立，武斗升级；特别是少数群众组织抢夺部队枪支的事，已在南方五省发生，情况比较严重，因此急需采取一些严厉措施，……

他还让人起草了一份制止夺枪的指示，一并送毛泽东批示。

“八一”建军节过后，奉命参加“八一”纪念活动的杨成武，将林彪、周恩来、中央文革小组要向毛泽东报告的问题综合整理后，于8月3日上午飞往上海。

当天下午17时45分至20时50分，杨成武在上海虹桥宾馆向毛泽东汇报林彪、周恩来、和中央文革小组需要请示的一些问题。谈了河南省军区和一军的领导班子调整的打算，及开封市还存在的问题；谈了江西省军区领导班子配备的意见，毛泽东的意见是：

“只要过得去，就留在那里搞，龙书金可以做工作，争取留在那里，如果继续犯错误就不能留。王良太我们原来留下他的，以后他继续犯错误，那就不能留啦。”

当杨成武汇报到湖南长沙准备武装一万工人左派的请示时，毛泽东表示同意，他还还详尽地向杨成武介绍了上海准备武装10 万工人的做法：

“张春桥写了一个报告，准备武装上海 10 万左派工人，分三步走：第一步组织起来，第二步发一部分枪，第三步全部发枪。他们有 100 多万工人，武装起 10 万就好了，不脱产的。”

他让杨成武好好看看张春桥的报告，然后自问自答道：“枪在右派手里好呢？还是在左派手里好呢？人武部当然不是全坏的。”

毛泽东主张：正规军的枪夺了不要紧，以后再发嘛！他说："听说 47 军有个团长枪被夺走了大哭起来。这是个好团长。右派抢去了哭是对的，左派抢去了就不要哭。"

他接着说："武装左派问题，把农村的枪统统收起来，以后发到左派手里。发枪主要是城市，首先是城市，一定要在左派占了绝对优势，才算条件成熟。但将来呢，左派还会有分化。左派占优势，不能发；左右派势均力敌的，也不能算条件成熟，还是不能发。"

接着，杨成武又汇报了关于加强武汉军区司政领导的配备，和东北鞍钢的问题。毛泽东同意派人去鞍钢调查解决问题，但他当时认为重点是安徽，先解决大江南北的问题，因而同意 12 军调 16 个团进安徽的意见。在他看来，大江南北地区问题的解决，就有可能把其他地区带动起来了……

杨成武汇报了林彪对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文革情况的看法。他说："林副主席认为：军队文化大革命，凡是乱透了的就好，他举了总参、总后、海军、空军、二炮等单位的例证；没有乱透的就不好，他举了总政、一炮、铁道兵、装甲兵等作例子，并说：'总政的脓泡没有穿透。'"

毛泽东说："同意林彪同志的看法，乱了就好。乱是个好机会，昨天出了乱子，可以派人进去，坏人可调出来，好人看清了。"

他说："文化大革命有好处，认识干部、熟悉干部，干部总是好的多。一揪三打倒不合理。公检法里头也有好人。由总参、总后、海军、空军抽干部组织几个调查组，分别到湖南、江西、安徽去调查。每省去七八个人。安徽现在是重点，请他们到北京

开会解决很好。先解决好大江南北地区。”

8 月 3 日下午，林彪在北京接见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得志，他说：“一是要相信中央文革小组是毛主席亲自领导的。二是你们早检讨早转过来是好的。”这两点是针对杨得志、袁升平说的。8 月 6 日，济南军区党委将林彪讲话记录要点下发团以上党委。

8 月 3 日，湖北省军区独立师划归空降兵第 15 军。而后，独立师撤出武汉地区，移驻应山、黄陂、洪湖等地，接受“政治整训”。 事后，武汉军区调查落实参加“720 事件”的干部战士共计 2000 余人，当时独立师全师共有官兵 9000 余人，在武汉市驻有师直机关和 4 个团。

武汉政局基本已定，中央决定招武汉的各群众组织和武汉军区领导进京解决武汉问题。周恩来亲自安排空军飞机接武汉群众代表进京。

8 月 3 日晚，陈伯达和谢富治等接见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钢二司”负责人杨道远、“新华工”的“红色造反团”负责人聂年生，测绘学院第一书记、“高等院校革命干部联络站”毛远耀参加接见。

中国的文革开始后，日本的电视台、电台、报纸经常会有关于中国文革运动的报道。这些报道一再激起那些 20 岁左右，冲动而热情，又富于牺牲精神的日本青年的革命激情。在日本大量印刷发行的《毛泽东选集》、《最高指示》以及其它文革文献，使这些处于亢奋中的青年也梦想在日本复制中国的文革运动。

自 1966 年 3 月，日本共产党与中国共产党因批评苏联修正主义的问题存在争议，关系开始破裂。“文革”开始后，日共已

经与中共对立。

1966 年 9 月，日本山口县革命委员会的左派力量公然表明支持中国批判日本共产党的态度，并相继出版了《长周新闻》、《人民之友》、《革命战士》等机关报刊。另外，地方剧团“羽车座”还通过演剧的方式进行毛泽东思想的宣传活动。1966 年 10 月，因倾向中国被日共除名的西泽隆二、军事评论家林克也、日中友好协会大阪府联合会的大塚三章 3 人发起成立了毛泽东思想研究会，并发行刊物《毛泽东思想研究》。

日本左翼出版物《毛泽东思想研究》

1967 年 1 月 27 日，在北京的日本共产党左派发表了同宫本显治领导的日本共产党的决裂声明。日本共产党迅速做出反应，在他们的机关刊物《赤旗报》上刊发了对这些造反派成员开除出党的决定。

7 月 18 日，日共的西泽富夫在东京召开记者招待会，抨击中国共产党，说中国方面对日共驻华代表砂间和日本共产党《赤旗报》驻北京记者绀野纯一“施加压力”和进行“迫害”。为此，中国共产党对外联络部和《人民日报》的负责人分别召见砂间和

绀野，提出谴责，并且指出：中日两党关系的恶化，完全应由坚持推行修正主义路线的宫本集团负责。

7 月 20 日，日本共产党驻中国代表砂间一良和日本共产党《赤旗报》驻北京记者绀野纯一被中国政府命令限期离境。

8 月，《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把日共定性为“现代修正主义”。日共决定将在北京的党代表砂间良一和《赤旗报》特派员绀野纯一调回日本。二人预定于 8 月 4 日乘朝鲜航班离京经平壤回国，中方在前一天安排绀野在北京机场住了一宿。但 8 月 3 日晚，北京方面突然决定批判绀野。绀野本人毫不示弱，拒绝参加，结果批斗会无果而终。

翌日，以“人大三红”为核心的各大学红卫兵组织在首都机场再次召开批斗大会，规模很大。当砂间从北京“十八处”带到机场时，与正往这边赶来的日本共产党“山口左派”一干人遭遇，砂间被抢走，押到机场候机厅开始批判。

中国红卫兵和日本各左派成员从砂间的口袋里掏出翡翠，搁在他的头上，反复批判砂间和日本共产党。最初计划是批判大会进行 1 小时左右，之后让砂间等乘飞机去朝鲜。但是朝鲜的飞行员对中国的野蛮批判方式表示抗议，拒绝起飞。结果，批判大会竟持续了 3 小时以上。砂间不断被人们推推搡搡，时间一长，批判的方式开始升级，从推搡进而发展为拳打脚踢。中联部日本处的人一看着了急，周恩来对事态也很忧虑，严厉指示：“开大会可以，但时间要短，不能用暴力。”

中联部的人要求保护绀野和砂间不要受伤，不能出人命。于是，日共在华的左派川口等人设法靠近砂间，将他围在中间。然

而这样一来，他们就必须忍受周围红卫兵的推挤和敲打。

批判大会终于快到了尾声，绀野和砂间好不容易开始向飞机舷梯移动，接着又是一阵骚动。当砂间从机场大厅出来时，就被两旁排列的红卫兵一路拳打脚踢，朝他们身上吐痰倒墨汁，满头满脸都是。挪向飞机舷梯时，连老太太都在敲打他，小孩子们骂道："你是狗，爬着走！"绀野和砂间被孩子们敲打着，被逼得最终在地上爬行……

尽管朝鲜机组人员在现场一再抗议，他俩的肋骨还是都被打伤，最后是爬着上飞机的。据说，他们到平壤后，朝鲜方面请他俩洗澡换衣服休养，他俩抱头痛哭、坚持不肯下飞机，就要这样回日本，让大家看看。在朝方人员再三请求下，才在朝鲜养伤50多天。

8月3日，北外"六一六"50多人再次将外交部门口堵死，工作人员不得出入，文件、电报都发不出去，外交部的业务工作中断，外交部党委瘫痪。

这些人的目的是要求中央文革小组接见并支持他们的行动，他们说："只有中央文革说话我们才听，中央文革不说话就表示支持我们的行动。"

在北京的"揪刘"活动中，产生了两个相互对立的全市性组织，一个是由清华"井冈山"、北航"红旗"、"新北大公社"等组织联合工交系统一些群众组织，于5月上旬成立的"首都各界无产阶级革命派揪斗刘少奇联络站"，简称"联络站"。到8月初，"联络站"共有700多个单位参加。另一个是由地院"东方红"和师大"井冈山"等组织串联工交、财贸系统一些群众组织，于

7 月下旬成立的“首都无产阶级革命派揪斗批判刘少奇联络总站”，简称“联络总站”，共有 1500 多个单位参加。“联络站”和“联络总站”在“揪刘火线”各自设有“火线指挥部”。两大派组织都把“揪刘”活动当作相互竞争的一个重要内容，看谁人多势众，看谁声势浩大。两大派都想借此显示自己这一派更革命，对“无产阶级司令部”跟得更紧。也就是在这个时期，北京高校造反派红卫兵组织分为“天派”和“地派”的说法逐渐开始流行。“天派”自然是北航，上天的；“地派”自然是地院，搞地质的。

由于包围中南海的学生一直没走，8 月 3 日晚至 4 日，中央文革小组又开会商量办法。周恩来提出一个方案，他说：“8 月 5 号是毛主席《炮打司令部》大字报发表一周年，是否那天在天安门广场开个大会，声讨刘少奇、邓小平，还有陶铸。同时也在中南海开个批斗会，由警卫局、秘书局的群众参加。”他说：“中南海里的人守纪律、好掌握，让他们开会斗争刘、邓、陶。外面的人不许进来。与此同时，把中南海里开的批斗会往天安门广场上拉线转播，满足群众的愿望。”大家都表示赞成，形成决定，并由康生、周恩来报告毛泽东。

周恩来责成谢富治和戚本禹去向群众传达这个决定，并说服群众开完大会撤离对中南海的包围。

8 月 4 日，谢富治来到外交部分别劝说堵住外交部大门的“揪陈大军”和北外学生。他先到外交部门口接见北京外国语学院的“六一六兵团”，指出他们冲击外交部是错误的。然后又到北京外国语学院“红旗革命造反团”这边，说“你们挨着公安部，我一睡觉，你们大喇叭就开始战斗。”

谢富治代表中央对学生们说："陈毅将出席批判会。"还允诺："10 天之内准备好，10 天之内执行。"

当晚，北京外国语学院的学生全部撤离外交部。

全国各地的武斗之风也影响到了北京。8月4日，北京长安街上发生武斗流血事件。这天北京市召开批斗彭真、薄一波大会，各区县都来人参加大会。会后，房山良乡送变电公司的"东方红公社"、良乡技校"八一八"等在北京电报大楼附近，将良乡送变电公司"井冈山革命造反总部"的人团团围住，进行殴打，"井冈山"的人被打伤30余人，重伤9人，一人被当场打死在长安街上。

8月4日，在上海的毛泽东审阅了《中共中央关于湖南问题的若干决定》稿，批示："改了一点，其余都好。"将决定稿的"中央文革小组对湖南省军区二月三日关于'湘江风雷'报告所发的'二四批示'是有毛病的，在这个问题上中央是有责任的"一句中的"是有毛病的"，改为"是有错误的"，并在第一条中间加了一段话："从这里接受教训，未经调查清楚，何必那样匆匆忙忙地根据一面之词发出'二四'批示呢？因此中央要负主要责任"。

武汉"720 事件"后，余立金、李静受毛泽东委托离开上海，重返武汉等地了解"720 事件"后群众的情绪、部队的反映、独立师调出整训的态度及两派抢夺枪支等问题，并考察毛主席对武汉问题处理指示的落实情况。

8 月 4 日中午 12 时 30 分至下午 14 时，毛泽东在上海虹桥宾馆召集杨成武、张春桥、汪东兴开会，听取从武汉返回上海的余立金、李静汇报武汉"720 事件"后的情况。

毛泽东听到武汉形势已经平稳，再有个把星期就可以恢复正常，不久长江就可以通航了，高兴地问：

“长江轮船为什么不卖票呢？”

“一年来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虽然有点乱，这里乱，那里乱，没有什么关系。像武汉就是很好的事，矛盾暴露出来，就好解决。”

他决定：“武汉由 15 军或 29 师各抽一个营去接梅岭、百花的任务，原警卫队、部队全部调出来整训。

独立师可以考虑调出整训，过去已有这个计划。

原梅龄、百花的原工作人员态度不好，没有转变的一律调出来（包括园林工等）。飞机场到梅龄的通道要 15 军部队或 29 师担任，通道警卫控制起来。

码头上的人要清理，如果‘百万雄师’的人态度没有转变，态度不好的调出来，调换。

游泳船由海军调，木船由空军调，人员不好的调换。”

他对独立师只用了 3 天时间进行说服动员工作后，顺利地开拔出去，甚为高兴，赞扬说：“很不错。”并指出：“我看部队在一个地方不要住得太久了。”

毛泽东又说起王力在武汉时的情况：“在我同你们谈话时，王力当时态度好凶嘛！对待一个群众组织不能这样嘛！还有今年 2 月 4 日批复取缔‘湘江风雷’那个批示，说批复有毛病的。这样说不行，不是有毛病，是错误的。中央要负主要责任，不然，说二四批复有毛病，人家军区就不服嘛！把军区推到第一线了嘛！若我在军区工作的话，我就不服。解散‘湘江风雷’，是中央文

革、中央碰头会，我又不晓得，林彪同志又不晓得，但我仍要承担责任。既不请示报告，又不调查研究，人家又没有那么紧迫的要求答复，你就匆匆忙忙批了，大笔一挥可了不得！大祸临头，几十万群众组织，要人家解散。总而言之怕乱。”

余立金谈到：“由于两派之间的斗争加剧，都有在抢夺武器，应该设法制止。”

毛泽东对此不以为然，他说：“凡是打了大仗的就好，烂透了就可以迅速好转。不痛不痒的就会拖下去，全国夺的枪，只有两、三万支嘛！”

这天，毛泽东看了中共中央宣传部原副部长张际春 7 月 27 日寄来的关于美术院校进行人体素描使用模特儿问题的来信，批示：“画画是科学，就画人体这问题说，应走徐悲鸿素描的道路，而不应走齐白石的道路。中央文革小组传阅，存办公厅秘书局。”

这天，毛泽东还看了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秘书长张香山 7 月 25 日关于翻译《毛泽东选集》有关问题的请示报告。报告说：

“最近，随着文化大革命的深入发展，各翻译组又再一次提出，是否应删去刘少奇等十二人的名字，或把他们名字后面的‘同志’两字删去。由于这个问题极为重大，而且涉及到要修改正文，故请中央批示。”

毛泽东批示：“这是历史材料，后来变动甚多，不胜其改，似以不改为宜。有些注解似可删去，正文不改。”

8 月 4 日，毛泽东以“润之”的署名写信给江青。

## 第 786 回：开大会，声讨香港英当局　戚本禹，接见湖南省代表

8 月 4 日下午，北京市新闻界和电影界的造反派在劳动人民文化宫举行“首都电影、新闻界支援港九同胞斗争大会”，声讨港英当局。关锋和戚本禹出席会议。外交部代表“红色外交战士”姚登山也参加了大会。

姚登山自 5 月 1 日在天安门城楼上受到毛泽东主席的接见后，即奉周恩来之命，从 5 月起到 8 月，经常到北京大专院校做外事报告，以英雄的形象出现在北京的政治舞台上。很快，他被任命为外交部总务司代理司长，并且参加外交部的文革运动，被外交部群众组织“联络站”核心组负责人聘为顾问。

会前，戚本禹、关锋和姚登山进行了短暂的交谈，表示支持姚登山“站出来革命”。

当他们谈到对缅甸的新闻报道时，关锋对姚登山说：“关于缅甸问题，《人民日报》写了一篇社论送外交部，然后外交部又另写了一篇。外交部这篇社论旗帜不鲜明，战斗力不强。最后总理还是决定用《人民日报》写的。外交部打电话质问《人民日报》，为什么发表这样一篇社论。紧接着，《人民日报》在新闻报道中提到了‘打倒奈温反动政府’的口号。外交部又打电话质问《人民日报》，为什么报道这样的口号。这样看来，外交部十多年来受刘少奇投降主义路线流毒是很深的。外交部领导思想上不是毛主席的针锋相对、敢于斗争的指导思想，而是怕。怕什么呢？怕影响两国的友好关系。”

谈到北京外国语学院的“揪陈大军”在东交民巷外交部楼前安营扎寨、游行示威、冲击外交部、坚决打倒陈毅外长等问题时，戚本禹对姚登山说：“革命小将不怕困难，艰苦奋斗来揪陈毅，这种革命行动，总的讲，这个大方向对得很。”戚本禹接着解释说：“陈毅，2 月份是保了他的，但是他翻了案。如果他不翻案，他就过了关，也就没事了，可是他翻案，我们的保也就收回了。这是 2 月的事了，现在 3、4、5 月过去了。为什么到现在几个月了不让下去。我看了陈毅的材料，陈毅的问题是严重的。他应该下去，到群众中去检讨和接受批判。为什么不下来？外交部所有造反派都有意见。”

最后，戚本禹说：“外交部领导思想上就是顾虑重重，害怕这个，害怕那个，甚至在挨骂的时候，自己还在那里说两国友好关系。看来，今后外交战线上的希望寄托在这些革命小将们身上。”

关锋向姚登山表明，陈毅不下来同中央文革无关。姚登山问：“那么是不是总理一个人不同意？”关锋未作回答。

此时，批判陈毅的造反派，已不仅仅是“外交部革命造反联络站”与外事系统“批判陈毅联络站”等老造反派，还有集合在“外事系统无产阶级革命派联络委员会”下的新造反派，而他们中很多原来是保守组织观点的成员。

鉴于外交部和外事系统两派在批判陈毅的方式、口号、批判的目的、两家联合批，还是分开批等问题上意见不统一，6 月至 8 月初期间，周恩来多次召集外事口“批陈派”和“倒陈派”两大派代表和外交部三个群众组织代表开会，磋商如何批陈。8 月

4 日这天，周恩来终于说服外交部的“联络站”和“革命造反总部”、“攀险峰野战兵团”三个群众组织的代表，达成三派协议：8 月 6 日由外交部先召开批判陈毅小会，外交部两大派三组织的 200 名代表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第一次联合批陈小会，之后再召开几次小会；最后外事口两大派“批判陈毅联络站”和“外事系统无产阶级革命派联络委员会”再在人民大会堂分别召开万人批陈大会；外交部和外事口两大派通过批陈，实现革命大联合，然后进行斗批改。

周恩来规定，开批陈大小会议时，会场不得悬挂“打倒陈毅”的标语，会议期间不呼喊“打倒陈毅”的口号，不准对陈毅采取侮辱人格的动作等。造反派答应完全照办。周恩来还嘱咐陈毅：在会上只听取批判，不要回答问题，以免矛盾激化，事倍功半。

8 月 4 日晚，阿尔巴尼亚驻华大使纳塔奈利在大使馆举行晚宴，答谢姚文元率领中国红卫兵代表团访问阿尔巴尼亚。首都工代会、农代会、大专院校红代会、中学红代会的负责成员都收到了请柬。

当时，北京的学生中纷纷传言：“总理说现在是第三次大串联”，北京航空学院也在传说：外校不少人都离校了，北航也有人准备离校。韩爱晶急忙召集北航“红旗”常委开会，分析形势，并且研究院内下一步的运动。

开会时，韩爱晶把当晚宴会的请柬交给北航“红旗”常委侯玉山，让他替自己去参加，并嘱咐他参加宴会时，当面向周恩来总理核实一下，是否有“第三次大串联”的说法。

侯玉山来到阿尔巴尼亚大使馆，看见周恩来和中央文革成员

全到了，还有谢富治、吴法宪，聂元梓、蒯大富、谭厚兰、王大宾，就连中学“红代会”的李冬民等人也都悉数参加，大学“红代会”就缺韩爱晶一个。

主宾席上，红卫兵只有谭厚兰，因为她是中国红卫兵访问阿尔巴尼亚代表团的成员。

为完成韩爱晶交给的任务，侯玉山没等上菜就去找周恩来。他来到主宾席所在的大厅，看到席上大家正在交谈，便在外边等待，直到周恩来有空时，才向他走去。

周恩来一见侯玉山过来，知道有事，就站起来离开宴席，到旁边问侯玉山有什么事情。

侯玉山讲了外边的传言，周恩来很诧异，立即说没有这回事。并回头对使馆的中方服务人员讲：“把来的学校代表都叫来。”

服务人员叫来了聂元梓、蒯大富、王大宾、李冬民。陈伯达、江青看见周恩来叫人，也走了过来。这时，周恩来讲，不要外出串联，不要插手外地的运动，要集中精力搞好学校的斗批改，这是当前运动的中心任务，并嘱咐他们回去要给师生们做工作。

这时，陈伯达走到侯玉山跟前对他说，革委会可以派少量的人到外地，了解情况。

侯玉山和吴法宪在一个桌。当他回到自己的座位时，吴法宪已经吃完了。他很关心的对侯玉山说：

“身体是革命的本钱，不能光工作，不吃饭。”

吴法宪招手叫来服务员说：“菜都凉了，弄碗热面来。”

面上来了，吴法宪一直看着侯玉山吃完。

侯玉山回校后，立即向北航“红旗”的常委们做了汇报。韩

爱晶让他连夜到广播站向全院广播传达。

阿尔巴尼亚驻中国大使纳塔奈利为由姚文元同志率领的中国红卫兵代表团访问阿尔巴尼亚胜利归来，八月四日举行宴会。图为纳塔奈利大使和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李先念、江青、姚文元同志在宴会上。　新华社记者　齐铁砚摄

当晚，戚本禹在人民大会堂接见湖南“工联”代表。他一上来就问：“上次把龙书金拉去斗，‘坐飞机’，是你们哪个单位？”

有人答：“我们去了。”

戚本禹批评说：“你们为什么不给我们打个招呼？据我们了解，龙书金不是主要的，主要的是刘子云、崔琳，结果你们把一个愿意站过来的人斗了一通。你们把这样的人斗了，你们的水平怎么这样低？你们这样做会失去军区同志的同情。龙书金过去打仗很勇敢，是很有名的，他是经过长征的，你们对这样的人斗争方法要掌握宽一些。你们为什么不斗坏的要斗好的？”

答：“没有抓住刘子云、崔琳。”

军区门诊部孙素洁：“我们也知道龙书金不是主要对象，但是他把湖南的问题都揽到他自己头上。”

戚本禹：“这说明这个人是敢于承担责任的。”

孙素洁：“这是好事情，但他不揭别人，他周围有一帮鬼，他不自觉。”

戚本禹："对他的错误可以批判，只要适可而止，不能过分。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广州军区是拥护毛主席、拥护林总、拥护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在所有大军区中是比较好的。你们对广州军区要有所分析。为什么湖南军区来了并不服气，是广州军区黄永胜司令员硬说服的。你们对广州军区要尊重。造反派要讲政策，不讲政策不是好的造反派。广州军区也是毛主席司令部的，有意见要在内部提，有些事不要抓着不放，要掌握大局。"

梁春阳："龙书金原来表态很好，为什么过了两天突然来了个一百八十度，我想不通。"

戚本禹："两派斗争要受影响的，他听了你的受你的影响，听了他的受他的影响。47军是相当好的军队，黎原同志是很好的同志，还很不简单。我跟你们透露个消息：我们准备让黎原同志当湖南省革命委员会主任。47军是很好的军队，黎原同志是很好的同志，要考虑大局，不要打乱毛主席的部署。为什么武汉事件以后，陈再道不敢动手？你们可以想一想，不能要求黎原同志说话和你们一样，他作为领导不能跟你们讲话一样，有些事情他要保一保，你们要允许他，不要强迫他表态。你们将来也许会分裂，当然我们不希望分裂，但分裂了你们要允许他对问题采取他的立场。对47军要支持，要拥护，不能乱轰。"

孙素洁："湘潭夺权时，他对下面卡的很紧，勒令下面不参加。"

戚本禹："不简单！中央没表态的时候他表了态支持你们，这不简单！

你们不要忘记过去你们是'反革命'，湖南给中央的报告说

的很严重，给中央文革有个报告，中央看了就批了，这个批示有毛病，中央有责任，总理已经说过了。你们要感谢‘北航红旗’同志为你们送来材料，你们一个没头发的女同志，就是你(指谢若冰)，也送来一批材料，江青同志看到这么点年纪的小将，要跪着请罪，很难过，提出怀疑，告诉了毛主席。你们不要以为翻身很容易，不是很容易的！你们要珍惜你们的战斗过程，不要一下做过头了。”

一位代表要求了解湖南军区报中央的材料，戚本禹：“你们不要追这个材料了，中央已经承担责任了。中央有批示，他当然要坚决执行嘛。”

一位代表说：“他们篡改中央批示，说‘湘江风雷’是反动组织。”

另一代表：“3月18号向全军介绍湖南军区的经验。”

戚本禹：“这个事我不清楚，查一下。这个批示有问题，中央承担责任了，将来在新的批示里，这一点也要写进去的。你们不要追究这个批示是哪个人写的，没有必要，我也不能告诉你。中央文革批示的有个材料，就张平化穿着军装坐在主席台上，江青同志一听就火了。这是第一次会上。第二次是‘北航’汇报调查天津的问题，提出些问题，江青同志说要研究，我只好说要研究。他们说要抓，我说那就抓吧。因为有这个批示，那有什么办法？后来江青同志看了材料，看到小将受委屈，她很同情。中央文革很多同志是同情你们的，很多小将跪着请罪，当时情况不很清楚，只知道抓人太多了。后来毛主席看见这些材料，毛主席告诉中央文革，毛主席批评中央文革小组说：你们要批什么东西，

要把人家找来了解情况，要调查研究。他没有正式说这个批示，说了这个意思，我们就懂得了。后来我们研究了材料，把档案都调来了。叶卫东，就是叶冬初，他是‘湘江风雷’的大头目，是‘最坏’的，我们就找‘最坏’的看。”

这时有人递条子说：“湖南‘红旗军’要求接见。”

戚本禹：“‘红旗军’问题，中央正在研究，我不能见他们，以后我们单独见。我不能自已决定，我有我的组织约束。‘红旗军’复杂一些，有全国性的组织，已查明与敌特有关系，各地‘红旗军’不一定一样，有的是名称一样。我们研究‘湘江风雷’问题一直研究到你们来之前。我们研究了叶冬初的问题，认为他不是反革命，是个好同志。但他不是没有缺点错误的，有些骄傲，有不少毛病，但不是反革命，基本上是好同志。我们仔细研究叶冬初的材料，比如说‘毛泽东思想要一分为二’，如果说毛泽东思想有好的，有坏的，这是反毛泽东思想。但他说的意思是毛泽东思想是不断发展的，这是正确地阐述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是不断发展的，不断发展就是一分为二。我那天问主席：我这样理解行不行？主席说：我同意这样理解，我的思想为什么不能一分为二呢？这样，你这条罪状就平掉了。当然不是说你完全符合毛泽东思想，不是把你的缺点错误也平掉了。再比如‘湘江风雷’组织不纯，你们的确有些组织有不纯的成份，有的是假冒你们‘湘江风雷’，挂个名牌，你们也管不着。同时你们也有打砸抢，我希望你们不要打砸抢，但有些材料说明你们的确有打砸抢，你们有些做法不对，做得过分。这不是我的看法，也不是中央文革的看法，是谁的看法，你们去想。无产阶级司令部有这个看法：有

些过分的做法。这是原话。所谓‘过分做法’，‘湘江风雷’多一些，‘长沙工人’多一些，‘工联’也有。有些中肯的批评，话不要多，这一句就够了，这一句话包括很多意思。”

“长沙工人”代表：“打砸抢我们从来没搞过一次。”

谢若冰：“有些材料不真实。”

戚本禹问谢若冰：“你是支持‘长沙工人’的？”

谢若冰答：“是的。”

戚本禹：“你们不要闹分裂。”

谢若冰：“我不是闹分裂。”

戚本禹：“你们要考虑别人的意见好不好？难道别人的材料都不真实？我希望你们不分裂，但是分裂是不是一定不可避免？”

谢若冰：“是不可避免。”

戚本禹：“你说不分裂，又说分裂不可避免，这不是自相矛盾？你说一次打砸抢都没有，我才不信。真的一件打砸抢没有，那就不是革命派，是非常温和的非常稳重的中间派。当然我不是鼓励打砸抢啊！”

戚本禹与谢若冰的此番对话是有所指的。7 月左右，湖南尚未获得正式平反的“湘江风雷”已经自行恢复了“湘江风雷”总部，而且逐渐形成了一个聚集在“湘江风雷”旗下的“湘派”。而极力推动一批造反组织聚集到“湘江风雷”旗下的始作俑者，主要是成立于 4 月上旬的大学红卫兵的“高校风雷”，及中学红卫兵的“红中会”和“井冈山”。其中，“高校风雷”为表示铁心要为“湘江风雷”问题翻案，在其组织名称上，公开套用了“湘

江风雷”组织的全称：“湘江风雷挺进纵队”，自称“高校风雷挺进纵队”。其主要负责人为最先指责“望江楼协议”的湖南大学学生周国辉、中南矿冶学院学生刘荣华和金胜利、湖南医学院学生红斗等。该组织人员不多，全是大学生，但能量、影响很大，在长沙市造反派群众中，名声也很大。

但是，在为“湘江风雷”翻案的策略上，“工联”与“高校风雷”、“红中会”等学生组织却产生了分歧。

以大、中学生造反派红卫兵为主体的“高校风雷”、“井冈山”、“红中会”等组织，极力主张立即公开为“湘江风雷”翻案，并要将为“湘江风雷”翻案这一目标，作为当时的第一行动纲领。

而以“工联”为代表的“工派”造反组织，虽然也肯定应该为“湘江风雷”翻案，但因为考虑到镇压“湘江风雷”的《二四批示》是由中央文革签署的，这斗争矛头，弄不好会指向中央文革，担心会由此带来难以预料的严重后果。因此，他们主张先批判省军区的其它批压造反派的作法，待时机成熟后，再公开提出为“湘江风雷”翻案的问题。

另外，当“湘江风雷”被省军区镇压时，在指控“湘江风雷”的罪名中，有一条就是说它“组织成员复杂”，因此，以长沙市8家大工厂的造反组织为核心、拥有近20万工人成员的“工联”，对社会上那些形形色色的造反组织，便心存疑虑与戒心，故而对与这些组织的合作，并不热心，甚至取回避的态度。当时，“工联”主要负责人胡勇，在参加一次在省体委内举行的全市造反组织头头的联席会议后，便曾说：“发一个什么声明，开一个什么大会，署名的有七、八十个组织，而之中很多组织，不过十几个、

几十个人，表决也算一票，我们‘工联’有十多万人，我们的意见在其中也只占一票，这有什么公平？而将来出了问题，我们都会不知怎么闹出来的，到时事情搞砸了，还不晓得是哪粒老鼠屎，搅坏了这锅汤！因此，今后，这类活动，我再不参加了，我们‘工联’也要少参加。”

于是，长沙市的“湘派”与“工派”之间的矛盾日益扩大。

## 第 787 回：为名额，湖南湘工起纠纷　平遥打，山西会议告结束

这时，有一个代表谈到抢枪的问题，戚本禹说："我们由47军组织武装工人，武装'工联'，你们抢枪干什么？"

学生代表们也纷纷要求，学生也要武装起来。戚本禹说："也可以，按连排组织起来，武装造反派。是我们的天下，为什么要抢呢？先从长沙、株洲试点。"

代表们欢声雀跃，热烈鼓掌，并要求武装湖南各地造反派。

戚本禹说："慢慢来。

一名代表说："慢慢来就死光了。"

戚本禹："你这个说法太悲观，造反派是杀不光的！先从长沙、株洲试点，看你们争气不争气，如果你们互相开起枪来，那就收回。最大的问题是你们造反派内部的团结问题，不要认为你们胜利了。你们有了初步的胜利，同时你们面临着失败的危险。有的学校，有的工厂，造反派就失败了。开始起来造反的人，由于没有很好用毛泽东思想团结群众、处理问题和对待自己，敌人利用造反派内部的矛盾，制造分裂，就失败了。你们湖南'湘江风雷'、'长沙工人'，可能历史证明你们不是无产阶级革命家，而是小资产阶级革命家，可能出现这个悲剧。有些小资产阶级革命家的悲剧在于他自己以为他是革命的。我支持过一个学校的造反派，他们被斗被压被关，他们7、8个人准备上山去维护毛主席革命路线，去重新斗争，后来我发现了这个造反派，就去支持，但后来他们变成极左的，打倒一切，否定一切，脱离了群众，是

很可悲的。还有地质学院朱成昭，也是有名的，后来发展了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用各种卑鄙手段拉拢他，他发展到和中央文革对立，后来要逃跑，一个造反派变成了可悲的人物。我希望湖南不要演成悲剧：最后证明中央文革支持的都是小资产阶级革命家。”

接着戚本禹讲了毛泽东提出的接班人5个条件，他说：“湖南是毛主席的故乡，毛主席很关心，经常看湖南的材料，我希望不要让毛主席看到悲剧的材料，出现的都是小资产阶级的革命家，不会吧？”

众答：“不会！”

戚本禹接着说：“为什么我今天要讲这么多呢？就是因为我们要你们提5个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的代表，你们吵得一塌糊涂，提不出来，是这样吧？”

一位代表答：“是的。造反派内部小团体主义、山头主义确实很严重，要开门整风。”

戚本禹：“如果你们提不出来的话，我们不要群众代表了，就搞‘两结合’算了，或者让‘红联’作代表，那又不符合毛泽东思想。”

原来，在确定的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成员中的群众组织代表名单中，虽然考虑了将“工派”与“湘派”这两方面的头面人物均予纳入，但是，还是将几个原来较有影响的造反组织的代表，如“东方红总部”、“高校风雷”、“红中会”、“青年近卫军”都排除在外了。

当时省革筹小组的群众代表全部成员共计 6 人，其中“工联”

有 2 人，即胡勇与唐忠富；“湘江风雷”1 人：叶卫东。另外还有“长沙工人”的张楚梗，“井冈山红卫兵”的谢若冰，“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的朱顺祥。

“湘派”组织对这个名单非常愤慨，因为在这个名单中，“工联”有 2 人，而受尽磨难的最早的造反组织“湘江风雷”却只有 1 人。另外，“长沙工人”与“井冈山红卫兵”原本是“湘派”阵营的组织，但他们在赴北京参加解决湖南文革问题的代表团后，当着周恩来总理的面明确表态：“我们既不做‘工派’，也不做‘湘派’，而是做大联合派。”为此，受到周恩来的赞赏。虽然现在这两个组织的头头都进了省革筹小组，但“湘江风雷”认为，他们已不是“湘派”的代表了。他们还认为，“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虽是湖南高校中成立较早的造反组织，但人数很少、影响不大，而且是属于支持“工联”的阵营。对此，“高校风雷”尤为愤慨，认为湖南高校造反派红卫兵的首要代表，应非他莫属，但现在，其地位却被一个作用与影响都远比他小的“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替换，这显然使“高校风雷”组织的上上下下都不能服气。

于是，不满的矛头从指向“工联”头头，直至指向进入省革筹的原省委书记即华国锋、章伯森等人，怀疑是这两个原省委领导在拉一派压一派，进而也发展到指向了他们认为是决定了这个名单中人员配置的周恩来。

因而，当这份名单公布后，“湘派”中的“高校风雷”、“红中会”、“省直联络站”等“文攻”力量，便立即在大街上张贴了反对这个省革筹小组成员名单的大字报，称这个名单是“中国赫

鲁晓夫第二搞的”，是“二月镇反黑主帅一手炮制的黑货”，并攻击省革筹小组“是中间派与投机分子联合夺权，是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的新形式”、“华国锋滚他妈的蛋！”等等。

这时，就在戚本禹接见他们的会上，“工”“湘”两派又各说各理，吵得不亦乐乎。

面对如此状况，戚本禹说：“我刚才讲不要出现悲剧，现在正出现悲剧。”他念电报：“‘造反派两派在马坡岭打架，互相开枪射击，‘工联’伤七人。’这个事还要查。”

“湘派”代表马上回应说：“我们刚接到电话：‘湘江风雷’伤一女同志，‘长沙工人’死了两个。”

戚本禹：“如果两派打内战，那就不给枪。”

他又说：“你们这两派还没有胜利就分裂，互相开枪了，”接着转向“北航红旗”的代表问他们：“你们北京的支持不支持他们打内战？”

“北航红旗”同学答：“不支持！”

戚本禹：“‘高司’四五千人游行反对总理，反对我们，我是小人物，不在话下，总理日夜操心，调查研究，为你们平反，他们反对总理，你们不管，只顾打内战。有相当多人受蒙蔽，你们要做争取工作，团结他们，分化他们。高校都是小将，犯错误可以原谅。对‘高司’现在不宣布是保守组织，还是群众组织，少数头头是保守的，无非是蒙蔽了些群众。‘高司’也不能说完全错了，一点好事没干，尽管他反对我，我不能说他一点好事没干。它是群众组织，你们能消灭吗？”

他又说：“你们‘工联’派出现了无政府主义的苗头，现在

一定要有政府，就是以黎源同志为首的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中央有这个意见，就是让章伯森、华国锋都站出来。华国锋同志我过去看过他一些报告，我对他印象很深，我看他可以出来做工作。章伯森、梁春阳同志很早就出来做工作了。筹委会干部代表由中央来考虑，因为中央对这些干部的了解比你们多得多，你们可以提意见，供中央考虑。群众代表由你们考虑。”

他又提到代表问题：“你们看看你们的群众代表能不能产生？‘工联’总要产生代表吧，谁呀？”

有人答：“胡勇。”

戚本禹又问：“‘湘江风雷’总要有一个代表吧，叶冬初可以吧？你们先选5个，你们两派，‘工联’派3个，另一派两个，这是你们自己分的两派，不是我分的。‘工联’两个，大学生中找一个比较有威信的、有影响的、能做大学生工作、立场坚定的。‘长沙工人’一个，‘湘江风雷’一个。”

有人提议“农联”参加一个。戚本禹说：“贫下中农代表是不是将来在委员会中当委员，这是筹备组织，十几个人做筹备工作的，将来还要吸收很多委员的。农村今冬要大搞，定了会有变动的。中学生可以参加一个，机关干部就不要了，由他们(指章伯森等)作代表。这就是6个了，加了一个，还要请示一下。至于哪些人当代表，‘湘江风雷’还不是叶冬初？中学生还不是谢若冰？这是不言而喻的。军队代表另外再说。”

8 月 4 日，山西“红总站”山西机床厂的“永红烈火”等组织，成立了“山西机床厂揪斗军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赵冠英联络站”，当天即绑架了山西省军区副司令员赵冠英，扣押了 56

天，多次揪斗。

这天夜24时至次日清晨5时30分，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安徽厅，康生、关锋、吴法宪、郑维山、曹轶欧及刘格平、山西方面有关领导，与“红总站”、“兵团”、“太原市造反司令部”、“红联站”等组织的赴京代表等继续开会，解决山西问题。

会议开始，刘格平首先发言，接着是谢振华、袁振、李佐玉发言，然后关锋作了总结性发言，他首先肯定山西核心小组内刘格平、袁振、陈永贵等人支持“414”炮轰刘、陈、刘，大方向是正确的，是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并且指出，张日清在夺权时，站出来支持左派夺权，是做出了很大成绩的，是不能抹杀的。但在夺权后，犯了方向路线错误，专了革命小将的政，不但不支持炮轰刘、陈、刘，相反支持刘、陈、刘。在晋中不支持陈永贵、任、王、张，而支持军分区等等。批评《山西日报》突出张日清。

他同时说：“这里要说清楚的，张日清同志和刘陈刘是有质的区别的，张日清同志在一个时期内犯有方向路线错误，改了就好了。”

接着，关锋谈到山西的几派群众组织。他首先对“红总站”、“兵团”炮轰刘志兰表示坚决支持，同时对将“红联站”说成是反动保皇组织提出批评。希望他们三派团结起来。

对刘格平的爱人丁磊，关锋说：“丁磊同志我曾经建议刘格平同志把丁磊同志调出来，到北京或者到其他地方，他接受了调了出来，但有人抓辫子，后来我们接到一些信，说不能调走丁磊同志，如果调走了，就等于承认‘红总站’‘东风兵团’犯了错

误。这个意见是对的，还是叫她回去。我曾经说过，丁磊同志是有毛病的，但是她和‘东风兵团’、‘红总站’一块战斗，大方向是正确的。同志们对丁磊同志严格要求，格平同志对丁磊同志严格要求，对他进行教育是应该的。”

对晋中问题，关锋再次明确表示支持陈永贵，指出晋中军分区是错误的。就在开会的当天，中央接到来电说，平遥调 4000 农民进城武斗。关锋说：

“调农民进城，调民兵进城，调 4000 农民进城还是第一次吧？没有军分区、人武部支持，不可能调动的，进城谁给他工分，谁给他钱？没有一定权利的人是不可能调动的。”

对“红总站”、“兵团”之间武斗的说法，关锋说：“听说‘红总站’、‘兵团’有打内战的苗头，这就不好了，不要受人挑拨，这样弄不好会出现更大的曲折，敌人就高兴了。你们不要打内战。要团结起来共同对敌。跟‘红联站’，大家要按协议书办事，俗语说，大水冲了龙王庙。自己人认不得自己人。”

接着，吴法宪、郑维三做了表态性发言。

最后，康生讲话。他说：“同志们，会议开了很久了。有人说开会时间比较长，但我认为会开得比较好，有很大收获。”“我们是根据中央制订的方针开会的，不是只靠我一人，或关锋同志个人独断专行搞的。这点张日清同志要注意，不能独断专行，不能不报中央，不通过集体，搞个人活动。我们没有一件事不经过中央批准和文革小组讨论就独断专行。”“过去我们也有做不够的，登张日清文章是应该的，但登张日清的照片是错误的。”

关锋说：“《人民日报》登的。”

康生："我们批评了《人民日报》，登那张照片没有请示过。"

"告诉大家，今晚周总理、姚文元同志解决江西问题，陈伯达、王力同志解决河南问题，江青、戚本禹同志解决北京群众揪刘少奇问题。我们凡事都是集体讨论，分工负责的。不能说个人负责。"

"这次会议纪要林副主席、总理都看了，又经过讨论，批下来了。"

"我们这个会还得到一个成果，群众团体达成了一个协议。你们共同签的字，这是良好的开端。"

在这次会上，康生提到了7月26日发生在太原重型机器厂的那次武斗，他说："最近重机发生了严重武斗事件，要坚决阻止"。

至8月5日晨，解决山西问题的北京"七月会议"结束。

随后，山西境内开始宣传据说是康生在人民大会堂上厕所时传出的一条最高指示：

特大喜讯

伟大领袖毛主席发出最新最高指示："要给69军的同志们讲一下，要站在刘格平同志一边，支持刘格平同志。"

而此时，平遥的局势也已岌岌可危。

"八一"前夕，平遥"总司"决定在8月1日召开庆祝"八一"大会，平遥县武装部表示支持。庆祝建军节本是当地的传统，"八一"在晋中一带几乎是仅次于春节的第二大节日。但是由于派性的关系，"总司"的这次活动似乎就有了向与军区关系不睦的平遥"联络站"挑衅的味道。陈永贵支持的平遥"联络站"针锋相对，决定在这一天召开学大寨大会与之抗衡。

双方当面鼓对面锣一响，对台戏就唱开了。

大会开过，两派上街游行。平遥是一个古色古香的小城，街

道又窄。游行中两派队伍相遇，始而对骂，继而开打，拳脚交加，棍棒挥舞，砖瓦横飞。如此一发而不可收拾，你打我砸，你攻我守，又加上大喇叭里整日对骂，平遥一片混乱。战至天黑，双方收兵。

8 月 3 日，两派经过充分准备，组成武斗队伍，手持钢钎、棍棒、砖瓦等，在县城南门再次开战。武斗中，“总司”的一个武斗队员从屋顶掉下摔成重伤，次日死亡。这进一步加深了两派进行“你死我活斗争”的决心。

8 月 4 日，“总司”为报“杀死我革命战友”之仇，再次挑起武斗，并调动农民进城参战。在大规模武斗中，“联络站”派不敌，有两个参战学生被打，从城墙上掉下来，一死，一重伤。“联络站”派的武斗据点多处失守。城内只剩下城隍庙和与之相连的平遥一中。“联络站”派人火速赶赴北京，控告“总司”反大寨，挑起武斗。

## 第 788 回：无缘由，乱枪响尸横路上　八月四，重庆建设厂大战

而此时的重庆，武斗更加频繁。8 月 4 日，重庆市中心财贸工人俱乐部的“财贸 815 战斗团”总部搬家。搬家是为了防备遭到武斗袭击，因财贸俱乐部房屋矮小，无险可守，该组织决定搬到临江门外贸大楼。那里对面就是“815”派学生控制的 29 中学，周围还有“815”派控制的重庆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重庆市公安局、重庆市曲艺团、东方红电影院等。为了防止在搬家时遭到袭击，财贸“815”总部负责人王绍川还特别提出要趁午饭时迅速行动，一下子搬完。

然而，事情往往发生在意料之外。第一趟车把东西搬到外贸大楼后，有人认为不会有什么危险，就再次返回去搬第二次，又叫上了 29 中“毛泽东主义战斗团”的学生去帮忙。

惨剧就在瞬间发生了。正当 29 中的学生们吃着冰棍，嘻嘻哈哈地在财贸俱乐部门前帮着往车上装运东西时，一支“反到底”派的武斗队突然奔袭而来，乱枪齐发……当场打死 29 中学生 6 人，其中年龄最小的是个 14 岁的初中一年级女生。

突袭的人跑走后，震惊的路人跑过去一看：只见财贸工人俱乐部门口街边上，一辆解放牌大卡车横着，车厢后板打开着，正搬了一半的文件柜歪斜倒地，车厢上下，几个学生模样的人横七竖八俯着、仰着。……驾驶室一侧的门开着，驾驶员双腿还卡在车内，上身却倒吊着仰在车外，后颈窝正好枕在上车的踏板上。男孩子 18 岁刚刚开始发育的喉结因此显得格外突出，颈子上，

比一分钱硬币还小的一个洞，像娃娃们吹泡泡糖一般吹出泡泡来，是血泡，吹到极大，就爆了，紧接着又吹下一个。倒挂着的脸上，那双本来就又圆又大的眼睛因为倒挂显得更圆更大，极圆极大……

事前没有任何冲突起因，没有任何摩擦或争执，“反到底”派武斗队为什么要进行这次袭击？为什么要对那些手无寸铁的中学生大开杀戒？此事后来连“反到底”派的一些负责人也说不清楚，弄不明白。

这一事件使重庆市民大为震惊，事发当天，人心惶惶中，位于解放碑旁边的重庆市三八百货商店，当时为全国十大百货商店之一，停止营业。市中区除个别营业点坚持半天或一两小时营业外，各大小商店大部分都停止了营业……

这一事件，激起了“815”派的29中“毛泽东主义战斗团”对“反到底”派的深仇大恨。一周后，“815”派攻打交电大楼“反到底”派“完蛋就完蛋”广播站，这次袭击是重要原因。因为那支突袭财贸俱乐部的“反到底”派武斗队，就是从“完蛋就完蛋”广播站里出来的。

8月4日，“反到底”派占领大型国防企业长安机器厂。

这天，在北碚845厂也发生武斗，该厂生产的炸药、雷管大量被抢走，全厂停产。“815”派西南师范学院附属中学“无产者”负责人胡明富在武斗中身亡。

建设厂弯弯大楼和军库8月3日的失守，对“815”派是一个很大的打击。经过一天的准备，他们组织了上千人，动用了坦克，从正面发动了对建设厂的大规模进攻。

8 月 4 日晚上，上半夜，重庆杨家坪方向不时向建设厂开枪，建设厂这边不断地还击，子弹在夜空飞行的弧光来回交叉，热闹非凡。

8 月 5 日清晨，战斗在建设厂正面的制高点清水池打响。号称“815”派总司令的周家喻乘坐一辆坦克开到前沿，亲自督阵指挥。坦克里还坐着南山中学高三学生练长友，外号“练鼻子”，也是学校最早的造反派之一，也是南山中学“八一五战斗团”的头头，与周家喻很熟。本来，他的观点偏向于“反到底”，与南山中学“八一五战斗团”一号头头郑望生，对重庆两派采取了不偏不倚不表态的策略，结果被学校两派抛弃。学校两派分裂后，他和郑望生一起在学校看守学校财产。8 月 4 日，听到到处都枪声紧密、炮声轰鸣，他只好离开学校回家。因为武斗交通中断，走到袁家岗时，被守在三岔路口的机制校“815”抓住。他急中生智，说：

“老子就是你们的头，不信你去问周家喻。”

正好周家喻在机制校策划第二天对建设厂的进攻，见到他，就说：“‘练鼻子’，不要忙着回家了，明天跟我一起去看热闹。”于是，他就坐进了周家喻的坦克，来到了进攻建设厂的前沿。

正是重庆最热的盛夏三伏天，不穿衣服都大汗淋漓，不少武斗人员干脆脱个精光。但是，衣服脱光了，就不便于识别，万一发生自己人打自己人的情况就糟糕了。于是，“815”前线指挥部给上前线的人每人发一件蓝色背心。周家喻穿一件白色的无领汗衫，外面再套一件蓝色背心，拿着一把蒲扇不停地摇着。

空压厂生产坦克，却不生产坦克炮。因此，厂里没有供试验

的坦克炮弹。周家喻坐在坦克里，只能耀武扬威，不能向“反到底”的阵地开火。由于那坦克是轻型的，装甲不厚，还不敢开到离“反到底”派阵地太近的地方，只好躲在后面看热闹。

清水池是建设厂的水源地，在一个山头上，水池周围有围墙，围墙里有一两间砖房，清水池正面坡下是重庆工业学院的一幢教学大楼，那大楼第三层楼与清水池正好齐平。“815”把几挺轻重机枪布置那大楼里，向山头猛烈扫射，打得“反到底”抬不起头来。然后“815”开始进攻。

冲在前面的，拿的都是冲锋枪，只是太陈旧，有加拿大式，有汤姆式，也有志愿军在朝鲜战场上用的苏式“格蚤龙”。

“反到底”没有估计到“815”会大规模进攻，守清水池的人不多，但却顽强地抵抗。半自动步枪一打就是十发子弹，只见冲锋的人在眼前一个个倒下去。

“反到底”司令部得知清水池吃紧，马上向清水池派出增援部队，其中有南岸区的中学生组建的“九一纵队红二连”。他们几乎都是头天晚上才分头赶到建设厂的，晚上 11 点多钟才领到枪。这是他们平生第一次拿到真枪，一个个兴奋异常，不停地摆弄，又相互学习，很快就掌握了射击要领。

大家才各自找了一个地方躺下，刚打了一个盹就被叫醒，天才蒙蒙亮就被派到战场上。但是，没有一个人畏缩。

清水池长约 30 米，宽约 15 米，用条石砌有一两尺高的围坎。“815”人多势众，用炸药将正面的围墙炸垮，终于冲上顶来。于是，两派又隔着水池猛烈射击。进攻的一方端着冲锋枪，一个接一个冲上去，伏在那围坎下，向对面扫射。防守的一方则提着

半自动步枪，也是一个接一个冲上那围坎，向对面射去。阵地上，枪声呼啸，子弹乱飞。子弹打在墙上、地上、石头上，溅起的石块、泥沙和浓浓的硝烟混合在一起，弥漫在阵地上，甚至挡住了人们的视线。南山中学高一同学周大齐，从围墙的一个缺口跳进去，一颗从石头上跳起的弹头就击中了他的头部，立即鲜血直流。但他好像没有感觉到，竟然继续射击，直到后面跳进缺口的战友把他按住，给他包扎好，不顾他反对，硬把他抬下阵地。幸好那弹头只是擦伤了他的后脑勺，给他留下一条小小的伤疤，没有造成后遗症。

后来，“反到底”坚持不住了，退出了那清水池。听见围墙里有“815”的欢呼声，一个“反到底”学生气坏了，摸出一个手榴弹投到围墙里。只听见“轰隆”一声响，便见一些断手断脚从那围墙里飞起来。他投的不是一般的手榴弹，是那三七高炮炮弹弹头改装的，威力大。

当时，生产三七高炮炮弹的江陵厂用高爆炮弹的弹头改装了大批的手榴弹，供全市“反到底”使用。那弹头手榴弹成圆锥体，约 20 公分长，顶部有一个导环反扣着，只要将那导环扳过来，如果不按住，那保险栓就会被弹出来，3 秒钟内就会爆炸，而一般手榴弹是 7 秒钟或 10 秒钟才爆炸。使用那弹头手榴弹，都是用大拇指按住那保险栓，猛地摔出去，有时甚至还未落地就炸开了，比一般手榴弹厉害得多。

清水池是制高点，又是水源地，如果丢了，建设厂就很难守住，那还了得？于是，“反到底”立即组织人员进行反攻。毕竟是本厂地盘，道路地形都熟悉，趁“815”立足未稳，一阵猛打，

阵地又回到“反到底”手中。

就这样，你打过来，我打过去，反复争夺，数易其手，从清晨一直打到太阳偏西。不断有伤员被抬下来，到处是死尸，到处是鲜血。打仗的人忘了那当头的烈日，忘了肚皮的叽咕，除了喝水，什么也不想。从来没打过仗的人，头一次参战便那样勇敢，那样熟练，那样投入，也只有“毛泽东思想哺育下的红卫兵造反派”才能办到。

“815”的机枪太厉害了，对守军构成严重威胁。于是有人建议，把四联高射机枪弄上去对付那机枪。那四联高射机枪是装在专门的炮车上的，上清水池的路又陡又窄，且在树林中。 一两吨重的铁家伙，居然弄上去了。弄上去才发现忘了子弹，于是又派人下去扛子弹。南山中学一个叫杨永福的高三同学竟然扛一箱，提一箱，一口气跑上了山顶。那是 14.5 毫米的高射机枪子弹，一箱少说也有四五十斤重，后来他扛一箱到山顶都要歇好多次，也不知他当时的力气是从哪儿来的！

四联高射机枪一开火，“815”机枪哑了。四联高射机枪又向坦克一阵猛扫，坦克也受不了，急忙退到山背后去了。

“815”又发动了几次冲锋，却已经是强弩之末，难以奏效了。到下午太阳偏西时，“815”撤退了。周家喻坐在坦克里，只是叹气。

武斗打死 25 人，伤数十人。当时有报道此次武斗的小报文章用了“尸横遍野，血肉横飞”的语句。

杨家坪激战正酣，重庆市内人心惶惶，重庆大学“815风暴”剧组的十几个同学对眼前发生如此惨烈的武斗实在想不通，断然

退出剧组，回家“逍遥”去了。“815风暴”是模仿著名的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照葫芦画瓢搞的一台综艺节目。类似做法当时全国各地都有，如成都搞了个“四川很有希望”、云南搞了个“823风暴”等等。但是，当天传回的消息，这十几位同学刚到火车站即被“反到底”武装人员抓获。下午，在学校坚持的“815风暴”剧组演员们只能愤愤然的绕舞台游行数周，宣誓将演出进行到底。

这天，302 次列车驶经九龙坡建设机床厂附近时也遭到枪击，机车水箱被打坏。

当天晚上，建设厂“反到底”派的司令和那些支持“反到底”的干部召开会议，研究对策。有人提出放弃建设厂，撤退到南岸去，也有主张坚持的人。双方争论不下，最后决定派人到南岸黄山去找邓长春，让他来决定。他们派“九一纵队红二连”通讯班班长、南山中学高三学生苏祖斌，带着建设厂派的联络人员，于第二天，8 月 6 日赶去黄山。

此时的重庆已经被各派力量割据：市中区基本由“815”控制。“反到底”势力主要在嘉陵江对岸的江北区。但“反到底”的大本营，“工人造反总司令部”却在市中区的体育馆，“工人造反军”总部也在市体育馆附近。为了减少磨擦，市“革筹组”和 54 军，都建议“工人造反总司令部”撤到江北去。“反到底”就不撤出。

体育馆三面的交通都被断绝了，西边是重庆大学“815”控制的沙坪坝地区；而在嘉陵江大桥南岸，是“815”占据的六中和印刷厂，以火力封锁了嘉陵江大桥，断绝了体育馆北面的通道；

东南面是长江，朝天门码头被“815”占据，码头不能用。

重庆市委上清寺一带在“反到底”手里；“反到底”在军工企业大占优势，因此江北华新街到三钢、长安厂一线基本上为其控制，江陵厂也占了一片，并以其在望江厂的实力，控制南岸和铜锣峡，翻过山去就与望江厂接壤。而铜元局又控制在“815”手里。于是重庆市就形成了犬牙交错的武装割据局面，整个城市被分割成为一片一片的割据区，全市交通瘫痪、阻隔，不仅两派人员和车辆无法通行，除军车外，其他车辆一律不得通行。日用百货、粮食蔬菜匮乏，市中区的近百万民众生活陷入困境。

此外，两派为了“纯洁红色根据地”，都在自己的区域内实行了清理“阶级队伍”的措施，即将对立派组织成员甚至家属清除出其控制的单位和住宅。为避免战火烧身，或沦为“战俘”，两派组织的数十万群众，流亡到川内各地和全国，或投亲靠友，或流离失所。

“反到底”能够撤出来的人大都集中在体育馆，很多是拖家带口前来避难的妇孺。人太多，里面住不下，“工人造反总司令部”头头黄廉尽量劝他们出去投亲靠友。他们在体育馆被困将近半个月之久，粮食、蔬菜几近断绝，生活困窘。

于是，“反到底”开会决定：打通嘉陵江大桥。这样，能使市中区的“反到底”与江北本派据点及与大足、达县相联系，得到其支援，郊县的粮食、蔬菜也可以运进来。而且，从嘉陵江大桥一路过去，“815”只有几个孤立的据点。

黄廉他们认为，封锁大桥的“815”只有几百人，是少数人。而困在体育馆的人多，是多数人，被困在市中区的老百姓更是多

数，不能让上百万的老百姓饿死困死。所以，发起打通嘉陵江大桥的武斗是合理的。这不是没有为自己寻找一个借口，以求心里安慰的意思。当然，也不排除他们当时就是这样想的。

被困在体育馆的“反到底”武斗人员只有些钢钎，而周围各派都有了枪支，如果一旦打起来，他们肯定会吃亏。中午时分，黄廉集合了 170 个拿钢钎的武斗人员，叫他们不要声张，对他们说：“我们去建设厂要枪，听说他们已经发了枪。”然后就带着他们出发了。

他们不敢走正道，听说那里的重庆机制校的“机麻子”已经有枪了，可以封锁大路，便沿着江边的铁路慢慢爬过去。

好不容易到了建设厂，结果“军工井冈山”的人根本不买黄廉账，对他说：“你搞上层路线，对现状不管，也不批准发枪，大家对你有意见。”居然不肯发枪给“反到底”总部。

黄廉分辩说：“我给中央发了许多电报，中央也不表态，谢富治、王力来了也不表态，刘结挺不表态，我有什么权力批准发枪。现在总部设在体育馆，只有那么大的地方，都是一些被本单位武斗打出来避难的，万一被人家攻下来，拖娃带崽的多，怎么办？要给我们一点警卫的枪支，我们只要求 300 条枪。”

“军工井冈山”的陈代富说：“我要和周应古、韩庆昌他们几个头研究一下，总部是应该有武器，但是你思想右倾。周应古到重医去了，建设厂‘军工井冈山’的头都在那里。”

于是，黄廉他们又来到重庆医学院找周应古，结果看到中学生、大学生都在领枪。两个工人挎着枪，居然把黄廉押到楼梯底下关起来，说是不要干扰他们发枪。

过了一会儿，重钢和杨家坪地区的“造反军”过来找周应古质问说：“你们扣下黄老总，你周应古能够当好这个头？”

周应古赶紧又让把黄廉放出来。正在这个时候，54 军的李处长来了，邓长春的参谋，小名周三，拔枪顶住李处长，黄廉让周三不要对李处长无礼，结果又有两个“造反军”的人，拿枪顶住周三。

有几个工人指责黄廉不签字发枪，黄廉对他们说：“你们当工人出身，不懂政治，你手上已经有枪了，为什么还非要我老黄来签字？这不明摆着是一个圈套吗？”

重钢的几个人荷枪实弹站在黄廉边上，说：“你们对老总如此无礼也不见得走得脱。”

周应古解释说：“枪还没有组装出来，这些枪都是已经有主了。”

到晚饭的时候，黄廉等人等的不耐烦了，周应古说：“枪可以发给你，但是今晚发起总攻消灭‘机麻子’，你们的人必须参加战斗，把天鹅宝蛋打下来。”

黄廉他们答应后，建设厂给了他们 154 支枪，每个人 10 匣子弹。

建设机床厂因为在“815”的围困中，此时物资上陷入了困境，许多人家连煮稀饭的米都没有了。当他们听到 8 月 2 日中午，“815”在杨家坪的高音喇叭声讨：“邓长春、李鲁沂、王三恒等一小撮‘砸派’反革命 8 月 2 日在长江上劫持长江 2014 号和人民 5 号轮船到望江厂，抢劫医药、百货等物资 370 吨，生猪近千头。犯下滔天罪行！”的广播后，欣喜若狂。他们看到黄廉带着

“造反军”前来要枪，便派了“红大刀”3 人随他们一道离开杨家坪，到望江厂去请求支援。

## 第 789 回：出援手，井冈山组建舰队　上海市，革委会代表被扣

黄廉等人在返回途中，仍然沿着江边的铁路回去，30 个人一组，前面的走过去了没事，后面一组才跟上，经菜园坝回到体育馆。黄廉保护建设厂“红大刀”3 人从牛角沱渡过嘉陵江到达江北，然后从长安厂找到一部十轮卡车，把他们送到童家院子。为避开军分区的人，他们下车步行翻山到铁山坪，再到铜锣峡口望江厂，已经是 8 月 6 日天亮了。

正在望江厂的李鲁沂看见建设厂“红大刀”的人，非常高兴，摇通了“军工井冈山”邓长春的电话。上午 10 点多钟，邓长春从黄山赶回望江，详细了解了杨家坪的严峻形势，并看了建设厂“红大刀”给他的信。

邓长春问：“黄屁巴啷楷说？”军工瞧不起“造反军”，称黄廉为“黄屁巴”。

“他说对蓝亦农制止武斗已经失去了信心。”

邓长春说：“他个屁眼虫是趴在女人肚皮上打瞌睡——不是做事的人，现在认识到蓝亦农支派的本质也算有点进步。蓝亦农制止武斗个屁，他是在帮‘815’消灭我们。”

然后对李鲁沂说，“‘反到底’是一家，一方有难，八方支援。我们跟到（马上）就开个会，把连（大家）一起研究下啷楷搞法嘛。”

怎么援助建设厂呢？陆路已经不可能，全部被“815”封锁，唯一是冲长江水路。正好“人民 5 号”登陆艇容量大，可以装得

下炮，反正猪也吃不完。而且建设厂和望江厂都在长江边，大约只有二三十公里水路。不过，那水路也并不通畅，要经过唐家沱、朝天门、铜元局等“815”占据的地方，没有武力作后盾，当然不行。于是，邓长春决定组建一支舰队，打通去建设厂的水路。

按邓长春的安排，连夜让望江厂工人加班加点改装了“人民5 号”：在驾驶台和船舷两边烧焊了钢板，加固防御；船头和驾驶台左右两侧，各安装了一门三七高炮；在驾驶台前，装重机枪一挺；驾驶台后面，装高射机关炮一门；船尾，装海三七高炮一门，主炮火力差不多赶上主力舰“101”了。不仅如此，大兴场粮库的 50 多吨小麦共 800 多包，也被搬运到三艘轮船上，当作沙包筑成了防御工事。

再说建设厂“反到底”8 月 6 日派到黄山找邓长春征求意见的“九一纵队红二连”通讯班班长、南山中学高三学生苏祖斌二人，因为路上不好走，直到当天晚上才赶到黄山，找到邓长春，向他报告了建设厂的情况。邓长春当即表态：建设厂绝不能放弃，必须坚决守住，马上派人去支援，给建设厂送三七高炮去，送粮食送猪肉去。邓长春还说，哪个敢丢了建设厂逃跑，他绝不轻饶，坚决枪毙！于是，第二天，8 月 7 日一大早，两个传信的家伙带着邓长春的口信，又赶回建设厂。

杨家坪战事吃紧。8 月 6 日这天，不知从哪儿来了一帮武装“815”，直接闯进重庆大学“815”总团，敦促“301”马上出兵驰援，否则立即交出弹药。重大“815”断然拒绝了他们的要挟，双方僵持不下，于是拔刀相向，在重大校园内摆开战场，打了一整夜的枪。枪好像都向天上打的，因为事后就没听说死人。

“301”一帮枪手气急败坏地夜闯《815 战报》报社，把机枪直接架到战报编辑部窗口上，实施保卫。

8 月 6 日，重庆大学“815”及第十八冶金建筑公司、二钢厂等单位“815”派武斗队到巴县抢夺武装部枪支弹药扑空后，抢走解放军 153 炮兵学校 122 榴弹炮一门，120 迫击炮两门，炮弹一批，拉到重庆大学校内组成炮班，该炮班参加武斗 5 次，发射炮弹 41 发，造成多人死伤，部分建筑被毁。

“反到底”要打通嘉陵江大桥，此时他们也有枪了。8 月 6 日，两派在嘉陵江大桥两端展开枪炮战，致使江北枣儿坡上的市副食品干果战备物资甲级仓库被击中起火焚毁，直接经济损失 84 万余元。九龙坡区、南桐矿区长途电话线被打断，全市 120 多条长途电话线路仅剩 10 余条可通话。

当天，重庆两派在筹备组协调下再开谈判，各派 3 名代表：

“815”派是师专“815”叶蓁荣、军工“八一兵团”冯国琏、财贸“815”杨正中；

“反到底”派是军工“井冈山”周应古、“工总司”黄廉、交院“915”王兴国。

谈判于零时 40 分达成《关于立即全面停止武斗的协议》，决定于本日 12 时无条件停火。但该协议转眼即遭破坏，没有任何效力。

长江上游的重庆打得不可开交，长江下游的上海也在 8 月 4 日爆发了上海柴油机厂大武斗。

8 月 2 日，上海市革委会发布了《市革命委员会给上柴联司革命群众的一封公开信》。在这封《公开信》中，尚认为“上海

柴油机厂‘联司’是个群众组织，‘联司’群众是革命的”。

8 月 3 日，上海市革委会决定以市革委会和市政法指挥部名义向上柴厂送达这封《公开信》。当天下午 17 时，3 辆“毛泽东思想宣传车”载着市革委会代表、驻沪陆海空三军代表，以及《文汇报》、《解放日报》、《支部生活》记者，还有上海电视台记者和东方红电影制片厂新闻电影拍摄人员，共有 100 多人，乘坐三辆宣传车和一辆吉普去上柴厂，送这封公开信。不料，当车辆驶进上柴厂大门口时，被“联司”的人拦下。他们关了厂门，把派去的代表分割成多处围攻，宣传车上高音喇叭被砸，摄影记者的摄影机、照相机全部被没收，东方红电影制片厂的吉普车被扣下，市革委会《公开信》被当众烧毁，市革委会代表及记者共 20 多人被殴打，并都被关进地下室扣留，准备将这些人作为人质，向市革会提出交换条件。去的代表中，只有三军支左人员没敢动，直到当天很晚才被陆续放回来。

上海市革委会得到报告后，决定立即于当晚在人民广场召开声讨“联司”大会，逼迫“联司”释放被扣押的人质。会上做了分工：由王洪文以“市革会”的名义出面，邀请全市 24 个群众组织的头头开会，统一认识和行动，“工总司”紧急通知各区、局联络站，迅速调集队伍到人民广场集中，陈阿大、戴立清负责调集队伍，王明龙、王腓利负责调集车辆，运送各区、局的人员，陈阿大负责后勤，王秀珍负责联络值班。大家按照分工立即分头行动。

王洪文来到工业展览馆，在这里召开全市 24 个群众组织会议，确定当夜在人民广场召开声讨“联司”大会。这些组织的负

责人有的当场举手同意，也有的表示要回去商量，但很快又改口表示支持这次行动。与会人员一致同意在人民广场召开揭发控诉“联司”罪行大会。

市革会决定于 8 月 4 日 0 时在人民广场召开大会，由王洪文主持，徐景贤等造反派组织代表和老干部、部队代表发言。

这时，参会的学生委员提出，半夜去人民广场开大会太晚，希望有车送他们去。王洪文从“康办”打电话到“888”，通知正在那里待命的“工总司”总部的叶昌明等人按各自的分工立即通知、组织参加晚上大会的队伍和车辆。

“市机联站”头头、市革会办公室负责人王承龙来到“888”，说调动车辆一事要由市革会办公室负责，为此与正在调动车辆的“工总司”王明龙发生争吵。王明龙一气之下，说：“我不管了，让你王承龙去管吧。”

在场的张宝林、戴立清、叶昌明、陈阿大和王腓利也和王承龙吵起来。王明龙赌气离开“888”，让司机送他去西郊公园。戴立清、叶昌明和陈阿大见王明龙生气出走，也都驱车跟了过去。他们在公园门口发了一通牢骚，被紧跟而来的上海警备区支左小分队负责人、上海驻军的师政治部副主任潘学安和随来的王秀珍一再劝说，要大家以大局为重，这才又都回到“888”。此时，已是晚上 20 时左右，王洪文也来到了“888”，看见王明龙他们进来，批評了他们。王承龙也赶紧过来和他们打招呼，道歉似地连声说道：“大局为重！大局为重！”

王明龙和王腓利从交运局和工交二场调了近 500 辆卡车和公交车，接送半夜去人民广场开会的群众。

8 月 4 日凌晨 1 时左右，全市群众组织在人民广场召开数万人的“控诉‘联司’罪行大会”，市革会领导们：王少庸、王洪文、徐景贤、王承龙出席大会，徐景贤、王洪文、王承龙讲话。被打死的上柴厂工人解福喜的妻子、被抢了摄影器材的摄影记者，都上台控诉。“同济东方红”的陈敢峰代表红卫兵发表讲话。大会开得很短，半小时不到就结束。与会群众已经非常气愤，强烈要求严惩“联司”坏头头的口号声此起彼伏。大会一结束，市革会的领导人和各造反派组织的头头们都各自回去了，参加大会的群众队伍也由各自的组织带回。

不料凌晨 5 时左右，睡在“888”的戴立清、王腓利等人从梦中被叫醒，说以冶金系统为主的造反派组织，已经包围了上柴厂。“工总司”杨浦区联络站来电话汇报：上柴厂外的马路上停满了汽车，各单位的队伍包围了工厂大门，工厂的大门紧闭，“联司”占领着所有的大楼，厂内不断传出高音喇叭喊叫。

经询问才知道，原来“工总司”冶金系统联络站在杨浦区的几个工厂队伍在人民广场大会后回厂时，自发地组织了游行。当他们行进到到南京路外滩时，冶金局所属耐火材料厂的工人造反队员 3 人，被一辆突然从外白渡桥方向开过来的卡车撞倒，其中一人头破血流，被撞成重伤。肇事卡车撞人后，马上混入车群飞快逃逸。在场的“工总司”冶金系统联络站都认为卡车是“联司”或“支联站”的，是故意撞人。3 天前，“工总司”与“联司”曾经在“大世界”发生过一场武斗冲突，一人死亡，死者金乃林正是冶金系统上海冶炼厂的工人，冶金局造反队负责人曹可祥早就恨死“联司”了，这下更是新仇旧恨。他当即决定，队伍开往

上柴厂，一定要“联司”交出肇事者。就这样，他带领冶金系统的造反队立即开往军工路，将上柴厂团团包围，但没能冲进去。之后其他单位知道了也都派队伍去支援，上柴厂外的人和车就越来越多了。

戴立清和王腓利等立即赶往康平路，睡在那里的王洪文已被人叫起。接着，市革会其他负责人王少庸等也都陆续赶到。王少庸、徐景贤、王洪文和王承龙、戴立清、王腓利等人在康平路小礼堂紧急会商，讨论在这种情况下，市革会该怎么办？王少庸坚持要王洪文等待张春桥的回音。但是，电话打了半天，没有找到张春桥。张春桥其实就在上海，据张春桥的秘书回忆，8 月 4 日那天：

主席此时在上海，我知道张春桥在主席那里。但我不能随便打电话去，我不能透露主席的行踪。我只能说张春桥不在上海，我无法联系到张春桥。直到晚上张春桥回到兴国路，我才向张春桥汇报了王少庸他们的担忧。张春桥没有说什么。

王少庸担心武斗将造成大规模伤亡，着急地催促众人赶快去现场，他要王洪文去说服冶金局联络站撤包围。最后决定徐景贤、王少庸、马天水守候在市委康平路小礼堂，王洪文、王承龙、戴立清、王腓利等一行人去上柴厂现场。王洪文等人车队刚进军工路，就无法再往里开了。从军工路口到上柴厂，数不清的车辆将马路堵得水泄不通，大都是冶金局所属工厂的。王洪文等人只能下车，在车辆间穿来穿去，步行来到上柴厂大门口。

## 第 790 回：上柴厂，终引发激烈武斗　联司败，纪录片留下全景

上柴厂“联司”早有准备，在厂办公大楼和一些车间的屋顶上堆满石头、铁块和铁螺帽，筑起防御工事。为了应对被长期围困的可能，他们还准备了半个月的粮食，并给每幢大楼都配备了小型发电机。8 月 4 日凌晨，“联司”不断接到报告：大批人员、车辆正在逼近。“联司”立即紧急集合，人员上房顶准备应战，还将工厂大门用装箱机器堵塞；让妇女们撤走，但一些女工还是选择了留下。上柴厂内，办公大楼和车间厂房的楼顶上，到处是“联司”的人群。

王洪文见这阵势，像是对旁边人，又像是对自己说：“看这个架势，劝他们是劝不回去了。今天这次要死人啊，争取不能够死 10 个人啊。”王腓利当时就在王洪文身边，这句话给他印象很深。

这时，得到消息的各单位造反派队伍也纷纷向上海柴油机厂进发，浩浩荡荡。

王洪文、戴立清、张宝林等人又来到上柴厂北面军工路上的 2856 号一幢平房，那里是铁路殷行洗罐站道班房。8 时左右，众人在道班平房内开会，商量如何解决处理上柴厂的局面。戴立清拿了张纸条，记下在场者名字，第一个是王承龙，第二个是王洪文，还有张宝林、王腓利、戴立清，以及“工总司”的一些区指挥部或联络站。指挥名单内中还有潘国平，不过他开完会就马上找地方睡觉去了，以后再没见他身影。闻讯赶来的还有耿金章。

因为没有上柴厂的平面图，他们对上柴厂的建筑物分布不了解，后来还是赶来的“消革会”人员给他们一张上柴厂的消防地图。“消革会”的人还拿来对讲机，这是“工总司”的人第一次见到对讲机。

大家都认为，尽量不要强攻。先采取宣传攻势，劝“联司”的人从房顶上下来，尽可能不激化矛盾。王洪文分析现场形势后提出，若强攻硬打，会造成大的伤亡。他建议围而不打，以切断厂区水源、电源的办法使“联司”自己瓦解，这样可以避免双方冲突，避免伤亡。这个建议大家都同意。

开往上柴厂的车辆越来越多，都是闻讯赶来或被电话调来的工厂造反队。整个上午，两军对垒，剑拔弩张。有人拿着手提喇叭，对守候在房顶上的“联司”人员喊话，“联司”则用厂区大门口的高音喇叭反宣传。有人被“联司”用强力弹弓发射的螺丝帽击伤，王洪文当即提出，将厂门口“联司”的大喇叭拆下来。人群一拥而上，向紧关着的工厂大门逼近。房顶上，“联司”射下的铁螺帽，让许多人受伤。强力弹弓的皮筋以医疗橡胶管做成，弹性大。而弹弓的弓架是直接焊在楼顶墙沿的铁条，射出的铁螺帽射程可达几十米，使不少人受伤。戴立清上衣口袋里的两支钢笔被射断，墨水染蓝了衣服前襟；王腓利左腹和耿金章锁骨也被射伤。宣传车更是只要一喊话，立即招来雨点般的螺帽，车上的喇叭被打瘪。戴立清后来回忆说：“我们因为是仓促上阵，连‘武器’和安全帽都没有，还是上柴厂的人拿来了柳条编的安全帽。”后来闻讯赶去者，很多都被吩咐带上铁榔头、铁棍或木棍，还有安全帽。

到中午 11 时左右，王洪文也认为再不强攻，拖到晚上天黑会很麻烦。他对身边的谢鹏飞等铁路局的造反派交待说：你们“可以助威，但不要参与。因为周总理有指示：铁路和地方运动必须脱钩。”

于是，谢鹏飞通知上柴厂边上的那家作为“火线指挥部”的殷行洗罐站不要参与砸“联司”的行动。

对上柴“联司”的进攻开始了，“敢死队员”刚冲向大门，即遭到防守厂内“联司”人员用大威力弹弓、石头、砖块的迎击。

同时，已经感到大势已去的“联司”，派人在总部大楼的高音喇叭中高喊：

“天下工人是一家！”

“工人不打工人！”

“工总司”的敢死队员先砸喇叭，几百人先后几次冲击大门，均因大门前后的障碍，和“联司”防守人员的石头、砖块和弹弓射出的螺帽火力太猛，而告失利。

城市建筑公司的造反队调来一辆推土机，将大门旁的围墙推倒；冶金系统的造反派从上钢一厂调来 25 吨履带式起重吊车，吊走堵在大门口的装箱机器；另一些人则拆毁厂区南面的围墙。众人借着推土机的掩护，用铁板在前防护，冒着铁弹和燃烧瓶的攻击，从三面冲进厂区。随后，冶金系统的造反队临时在现场组成突击队，前面用大铁板掩护，从侧面厂房屋顶进攻，很快，全线发起进攻，大批造反队、红卫兵和各组织人马潮水般涌进工厂，喊杀声惊天动地。人们用木板顶在头上当盾牌，挡住射来的螺帽，冲上了屋顶。与此同时，耿金章带人攻入厂区，首先占领了食堂

等处。水管部门的“工总司”将厂内的供水切断，随后又切断了电话线和电源，接着包围了一号楼和二号楼的锻造和气煅两个车间。

“联司”用弹弓、螺帽、石头、砖块、长矛、铁棍和自制的汽油燃烧瓶奋力抵抗，逐楼防守，几十个人步步退守到气煅车间房顶上。在铸工车间屋顶上，“联司”的武斗人员从高空抛下砖块，进攻者几经攻击失效。

一幢幢大楼争夺、占领……

“联司”残余人员逐步收缩，向主楼撤退，并把能上楼的梯台全部封闭，进行固守，不时从大楼上向邻楼和下面攻击。

8 月正是大热天，围攻的人群都是衣着单薄，不少人被弹伤和汽油烧伤。一开始没估计到这一点，没有作救护医疗的准备，现场大批人员也要喝水吃饭等。“工总司”办公室同各方面联系后，市卫生系统派来了医疗队、救护车，食品厂送来了饼干、面包等。现场指挥部要求上柴“东方红”组织接管工厂食堂，烧水做饭，做好后勤保障，并对占领的大楼做好安全保卫，防止破坏。指挥部决定并公开宣传，对主动放弃抵抗、走出大楼的“联司”队员不追究，让其回家，受伤的予以治疗包扎。

上柴厂刚被包围，在厂内的杨仲池就给陈卜昌打电话，要求各“支联站”急速调人增援。陈卜昌打了 20 多个电话，根本找不到人，各“支联站”的头头已被“工总司”抓起来了，陈卜昌只好让人开着宣传车去人民广场紧急呼吁，但是只有零星队伍或人员。他们四次从铁道隘路向上柴厂冲击，欲支援“联司”，都被阻拦。

此时，上柴厂只剩下“联司”总部的大楼还没有攻下，“工总司”本打算给他们一点时间，望其能内部分化放弃抵抗，减少双方损失。但上边“联司”根本不放弃抵抗。王洪文要求在天黑之前务必攻下“联司”总部大楼。下午 14 时，他要“消革会”调消防车攻打“联司”总部大楼。最初只开来两辆，廖祖康忍不住发牢骚：“你们‘消革会’与‘公革会’武斗时，将全市的消防车都调去了，今天支援我们却只来两辆。”后来又调来了 8 辆消防车。消防人员在高耸的云梯上，居高临下地用高压水枪射向楼顶的“联司”人员，但因水压不高，作用不大。后来还是使用消防云梯以及绳梯才攻上大楼。另一些人则在王腓利带领下，爬上车间里的起重行车轨道，翻出天窗，与外面爬上楼顶的进攻者两路汇合。虽然“联司”用长矛猛戳攻上屋顶的人员，但顶不住人多势众，大楼终于被攻下。大楼旁边的水塔顶上尚有 7 人，看到大楼被攻克，他们便自己下来了。至此，“联司”的全部制高点都被攻克。

聚集在大楼里面的人一个个举手出来，外面的进攻者气愤的指责谩骂，有的还拳打脚踢，从楼上下来的不少人头被打破。现场“工总司”的指挥人员戴立清、胡斌、杨小兵等人立即组织起隔离人墙，不允许打人。然而还是有人从人墙背后几次冲过来打里面出来的“联司”成员。

“联司”头头杨仲池躲藏在地下室，当场被抓，被打得鼻青脸肿。

“联司”大楼上有个剪短发的女的，30 来岁，弹弓打得又准又狠，下面许多人被她弹伤。大家情绪非常激动，大叫：“这

个小娘捉牢伊非刮刹伊！”

这是宁波腔上海话，意思是：“抓住这女的后要打死她！”

当杨仲池和那个女的被押出大楼时，许多人拥上去要揍他们，黄金海急忙组织了20多人，手挽手将杨仲池和那个女的围在中间，一直护着他们被押上车开走，戴立清的肩上和背上也为此挨了不少揍。

下午18时，“工总司”占领了整个上柴厂，“联司”1000多人全部被俘。为了辨别谁是“联司”成员，“工总司”命令男俘虏们一律被强迫脱光上衣，赤膊；女俘虏们则一律被撕下所穿衣服的一只袖子，有些女俘虏衣服被撕裂得露出身体。他们都被强迫高举双手作投降状，还被迫不断念着：

“‘联司’必败，‘联司’必败！”

“我有罪，罪该万死！”

他们几乎个个被打，人人受伤，许多人被打得浑身是血。在场的同济、交大的红卫兵们，手挽手组成人墙，拦着不让打，但还是拦不住。一个年轻的“联司”队员表示决不投降，当场被乱棍打倒在地。

被打伤的“联司”队员或被送到大楼对面的医疗站包扎，或被横七竖八地扔上卡车或救护车，送往医院。其余人员全部被押上停在厂门外排成长龙的公共汽车，被分别送往公安局以及附近的上海体育学院和同济大学。军工路上，车流滚滚，尘土飞扬。沿路挤满了看热闹的市民。

上柴厂对面就是工农新村，上柴厂职工的住宅区。道路两旁和房顶上都是人群，除了看热闹的，许多是“联司”的家属。他

们惊恐地目睹了这场大武斗的全过程。而在工厂大门口，聚集着更多担惊受怕的家属们，眼见自己的亲人被打，有人甚至跪下求情。

押送“联司”俘虏的车辆在路上也遇到了石块袭击。袭击者是上柴厂的职工家属和周边群众。消防车参加上柴武斗回来时，也受到一些不明群众的围攻。

整个武斗过程，被闻讯赶去的天马电影制片厂与上海科学教育电影制片厂拍摄人员拍下纪录片。为历史留下了记忆。

为防止上柴厂外流的“联司”人员反扑，破坏生产，王洪文叫黄金海和戴立清留 2000 人护厂。市革会办公室负责人王承龙跟戴立清商量，召开各组织负责人会议，安排善后工作。会议决定戴立清留下负责处理后事，各组织配合协助，当务之急是要迅速恢复厂里的正常秩序。“联司”残留人员由同济大学“东方红”组织配合厂里的“东方红”审查处理；为了做好安全防范，通往厂里的道路全部封闭，夜间行人、车辆通行必须有现场指挥部的通行证，道路管理由复旦大学和同济大学负责；厂区安全和后勤保障由厂里“东方红”组织安排，需要支持的由“工总司”组织力量，整个厂区和厂四周夜间巡逻队，由机动力量完成。为了防止意外，现场指挥部撤到隔壁的一个厂里工作。

因为上柴厂就在江边，王腓利到对面的中华造船厂调了一艘待修的登陆艇在江面上巡逻，防止“联司”从江面上反扑。

徐景贤非常关心这次武斗到底伤亡如何？死了几个人？他让戴立清一个人一个人清点，包括从屋顶平台上跌下来的，受伤送到医院去的。戴立清清点完后给徐景贤打电话说没死人。徐景贤

不相信，戴立清说：

“我已经点了两遍了。我现在吃力得连路也走不动了，就是一个也没有死。受伤是有的，还不少。”

徐景贤还是不放心，特地赶到受伤人员所在地查看，又多方打听，证实确实没有死人，他终于舒了一口气。

等一切布置妥当已是夜晚 23 时多了，大家累坏了，在指挥部板凳上倒下就睡着了。黄金海骑着一辆三轮摩托车出去巡逻。

凌晨 2 时，有人报告厂外路上有一滩血，但找不到死伤的人。大家顿时紧张起来，不知是否“联司”有人回来搞暗杀活动，赶紧将血样送市公安局化验，结果说不是人血，是狗猫或别的动物血，算是一场虚惊。

5 日下午，外来的队伍全部撤出上柴厂，厂里全由“东方红”负责，要求一个星期恢复生产，“联司”除少数头头之外，其他人员回厂报到。对上柴厂的问题，由市里专门成立一个专案组进行处理。

1967 年 8 月 4 日上海“工总司”攻打上柴厂的“联司”

第二天，8 月 5 日，陈卜昌在上海汽车配件厂内被抓。全向东在“联司”被砸后，有 6 人找到他，乘着东方红电影制片厂的黑色吉普车，就是 8 月 3 日市革会派去上柴厂宣传时扣下的那辆，一路向东出逃。8 月 6 日，上海市公安局“公革会”的小分队，追到九江，没有抓到他们。为了“在他们之前赶到武汉，不使他们与武汉的百万雄师联系上”，上海警备区和市革会政法指挥部立即通过上海民航局，经在北京的民航总局批准，调了一架双引擎飞机。全向东果然逃往武汉，在那里大发舆论为“联司”鸣冤叫屈。8 月 14 日，在武汉“钢二司”的协助下，全向东在武汉被抓获，并于 8 月 18 日用专机押回上海。

## 第 791 回：毛泽东，黄浦江边缓缓行　全撤走，中南海再斗刘邓

8 月 4 日晚上，毛泽东听说了上海柴油机厂刚发生的大规模武斗事件，便提出要到外面看看。于是他从虹桥路的“414”招待所，坐上那辆苏联斯大林送的吉斯轿车，由上海市委车队队长老刘开车，向闹市区驶去。据张春桥事后告诉徐景贤：“毛主席的车子开到外滩时，曾被人家发现过。当时在主席的轿车前、后各有几辆北京吉普负责保卫和开道，车队开到一个路口，不知怎么搞的，旁边路上有一辆卡车突然插进北京吉普和主席的轿车之间。主席坐在轿车后座，可以看到前边插进来的一辆卡车的后部，坐着几个装卸工人，他们居高临下朝后张望，有一个工人发现后边一辆轿车上坐的好像是毛主席，赶紧同旁边的人说了，还向轿车里指指点点。同车的中央警卫局警卫人员紧张起来，马上递给毛主席一张报纸，假意读报把脸部遮起来。那几个人万万没有想到车上真会是毛主席，隔着保险玻璃也看得不很清楚，有点吃不准，事后才没有把毛主席到上海的消息传开去。”张春桥连连说：“好险，好险。”

毛泽东的车在外滩黄浦江边缓缓行进，当天参加武斗的人还没完全散尽，马路上的车辆和行人很多。外滩市革命委员会大门口三步一岗，五步一哨，都是手拿钢钎、头戴柳条帽、身穿工作服的工人造反派，而在市革会大门口站岗的解放军战士反而不显眼了。

第二天，张春桥通知徐景贤：“你赶快在电视台里面播放昨

天拍的片子。”

那天上柴厂武斗的纪录片拍出来以后，电影厂已经连夜洗印、剪辑好了。徐景贤赶到电影厂去先审查一遍。影片长度为50分钟左右，完全是现场实录：武斗双方门口对峙、弹弓射击、铲车撞墙、逐屋争夺、喷射硫酸、失火救火、云梯进攻、半空开战、屋顶互殴……直至杨仲池被抓、殴打俘虏等等，全部过程历历在目，看得人惊心动魄。徐景贤布置上海电视台当天晚上播出这部片子，把播出的时间告诉了张春桥。后来，张春桥又通知徐景贤让电视台再播放两次，一共放了三次。

张春桥后来对徐景贤说：“毛主席通过电视观看了这部影片，还称赞云梯上的那些人真勇敢。”“毛主席看得非常有兴趣。”

以后，徐景贤又安排电视台实况转播了几场批判原中共上海市委负责人的电视批斗会，批斗会会场放在上海杂技场和文化广场，全市各单位都可以收看。张春桥陪同毛泽东在招待所收看电视，看到王洪文在批斗会上作总结发言，张春桥向毛泽东介绍了王洪文的情况，这个指挥几十万工人踏平上海柴油机厂的“工总司”司令，在电视里侃侃而谈，给毛泽东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8月5日，上柴厂武斗后的第二天，张春桥在上海公开露面了。他面对着电视摄像机镜头说：

“许多人问我，‘八四’行动好不好？昨天晚上，我坐车到上海街头转了转。我看到老老少少、一摊一摊在路边乘凉。他们的脸上挂着笑容。我想，这就清楚地表明，老百姓对‘八四’行动是满意的，高兴的。他们的笑容，已经很明确地答复了‘八四’行动好不好。”

在 8 月 4 日以后的连续几天，上海人看见，被打得鼻青眼肿的“联司”头头杨仲池，用粗麻绳反绑双手，押在敞篷汽车上游街，胸前还挂着一块牌子，上面非常醒目地写着：“斩！上柴联司坏头头杨仲池。”在杨仲池三个字的上面，打了一个鲜红色的大叉叉。

本来，在此之前，由于“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政法指挥部”发布了对杨仲池的“传讯令”，“联司”总部头头们劝他和全向东暂避风头。于是二人在 7 月 29 日离开上海，前往浙江湖州。可是，杨仲池还是放心不下，又于 8 月 2 日回到上海柴油机厂，终于在 8 月 4 日的武斗中被抓。

以后几天，上海许多工厂的造反派组织也纷纷以砸“支联站”为名冲砸对立面。8 月 6 日，“工总司普陀区分部”以砸“支联站”为名，帮助 101 厂挂钩于“工总司普陀区分部”的造反队攻打另一派挂钩于“工总司普陀区联络总站”造反组织。武斗从凌晨 2 时开始，到上午 10 时结束，打死 2 人，打伤 550 人左右，101 厂因此停产 49 天，经济损失 60 多万元。

8 月 8 日，“工总司电业总部”以砸“支联站”为名，攻打电力修造总厂另一派造反组织“电业战士”，造成 3 人死亡，160 余人受伤，全厂停产 20 多天，经济损失 53 万元。

为制止这样的状况，“工总司”于 8 月 7 日、8 月 8 日，连续两天发出通告：《关于处理支联站的通告》、《关于紧紧掌握斗争大方向，坚决制止武斗的通告》，要求所属组织“不得借解散支联站为名，冲砸不同意见的革命群众组织”，对“联司”和“支联站”的群众“不要轻易扭送专政机关，不要拉出来游街，也不

要进行人身侮辱”。但是，还是有不少组织借口砸“支联站”攻打对立面。

我们再回到北京。8月4日晚，北京“天派”的“联络站”在天安门广场召开号称有2500多个群众组织共73万人参加的“纪念毛主席《炮打司令部》大字报一周年大会”。大会进行当中，出现了“地派”的一些组织前去冲击会场，进而双方发生武斗的现象。

为了调解北京在“揪刘”问题上出现的矛盾，谢富治、关锋、戚本禹等于8月5日凌晨在人大会堂召集北京“揪刘”火线上“联络站”和“联络总站”的代表开会，商定8月5日下午在天安门广场，两派联合召开声讨刘少奇大会。谢富治传达中央指示：“今天大会后，各单位的队伍都撤回去，不要再留在中南海周围了。”

谢富治和戚本禹来到中南海西门接见“揪刘火线的”群众。他们从部队调来两部大卡车，在车上架上大喇叭，两人就站到了卡车上，用喇叭向包围中南海的群众讲话。戚本禹说：

戚本禹同志首先讲话，他说：

“同志们，今天是 8 月 5 号，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发表《炮打司令部》一周年有意义的时刻。一年前的今天，毛主席向我们发出总动员，向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开火！我们红卫兵战士，革命工人不愧是毛主席的好学生，你们响应毛主席号召，揪出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铲除总祸根，刘少奇、邓小平、陶铸一小撮揪出来了！刘少奇、邓小平、陶铸他们都不敢出来了，他们躲在阴暗的角落里，不敢见太阳，怎么办？”

众答："把他们揪出来！"

戚本禹继续说："同志们，躲在洞内不出来我们就没有办法吗？谢富治同志和我考虑把你们战场扩大。同志们，把揪刘少奇的战场搬到天安门广场，我们建议今天下午 4 点举行纪念毛主席大字报大会，声讨刘、邓、陶。

第二点，刘、邓、陶躲在洞内怎么办？中南海里造反派斗争，听会议实况录音，中南海同志到他家里放大会录音，监督他听，新闻记者去他家拍照片，向红卫兵同志们放。开辟两个战场，一个是天安门，一个是在中南海。中南海战场监督他听，建议新闻记者拍电影，给你们看。

第三点，声讨会开完后，百万人大会开完后，学校、工厂继续开，对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大批判和本单位斗批改结合起来，掀起一个更大的大批判高潮。因此你们安营扎寨到本单位，把到中南海揪刘、邓转到本单位。安营扎寨在中南海，毛主席住在这里，每天吵，毛主席不好办公。揪刘、邓、陶先锋战士们要发动群众，把刘、邓、陶淹没在人民战争汪洋大海里去。"

谢富治说："同志们，我完全同意戚本禹同志的讲话。今天开一个百万人大会，批判刘、邓、陶，掀起一个更大的批判高潮，好不好？"

众喊："好！"

谢富治问："同志们，同学们，无产阶级要实现大联合，好不好？"

众答："好！"

谢富治："同志们，同学们，无产阶级革命派，不要这一派、那一派，所有革命派统统地联合起来！同志们联合起来向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刘、邓、陶猛烈开火！""广大揪刘战士，要自始至终地牢牢掌握斗争的大方向，不搞武斗。"

戚本禹："绝食斗争是革命行动，但是我不赞成。别的话我没讲。今天谢副总理主持天安门的大会，我主持里面的会。"

众人高呼："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随后，戚本禹和谢富治就分头落实，谢富治去布置天安门大会，戚本禹布置中南海内部的批斗会。

"要刘少奇、邓小平、陶铸收听大会的实况广播，接受大会批判"。戚本禹在中南海布置时说："不要文质彬彬，一定要有气氛，""要是开不好，拍成电影，群众看了是不会答应的。"

拍电影是因为江青在中央文革小组会上曾提议：批斗会要"拍电影，拍成纪录片，好放给全国人民看。"大家同意。

8 月 5 日下午 16 时，天安门广场召开百万人参加的纪念毛泽东《炮打司令部》发表一周年大会，党中央主要领导人，都参加了大会。

北航韩爱晶提前来到天安门，见到关锋，他问："关锋同志，我请教您一个问题，党内有没有阶级？"

关锋一边走，一边说："这个问题我还没有考虑过，让我想想。"说着，关锋就匆匆走进大厅，韩爱晶也跟着走了进去。

一会儿，周恩来来了，学生们都迎上去跟他握手。韩爱晶跟周恩来握手后，又把笔记本拿出来问道："总理，请问能不能说党内有阶级？"

这时，蒯大富等几个北京大学红代会的学生都站在周恩来旁边。

周恩来说："不能说党内有阶级。"

韩爱晶又说："在北航的学生里，也有反对毛主席，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反革命，有些人真是顽固，死不改悔！"

周恩来问："他们多大？"

韩爱晶说："也是二十几岁啊！"

周恩来说："这么小的年纪，就说人家是反革命，还是死不改悔！以后日子长着呢，都是年轻人，今天这么想，明天那么想，是会改变的，你回去把他们都放了，还是要教育，还是要给出路。"

蒯大富问："现在是不是要搞第三次大串连？'720 事件'以后，学校有几千学生到外地去了。"

周恩来指出，这种形势估计是错误的，中央没有这样的安排。现在要搞大批判、大联合。

韩爱晶又说："像我们北航，同学们出生好，队伍整齐，没分为两大派，是不是给我们发枪，保卫毛主席、保卫首都。"

周恩来当即点头说："好！"

大会发言时，有工作人员把韩爱晶叫进大厅，带到周恩来身边。周恩来很认真，很和蔼地说："韩爱晶，你把想问的问题问完。"

韩爱晶又拿出笔记本和笔，一个问题、一个问题的请教。

他问："现在全国的斗争很激烈，外地造反派分为激进一些的和讲政策些的，我们学校的一些同学在外地有的支持了这一派，有的支持了那一派，我们北航在北京也支持了一些干部、党

员、工人多的，在运动中表现比较温和的群众组织，有人说我们支持变相老保，我们是不是应当改变态度跟另一派来往？北京有人说我们北航温和，变修了。”

周恩来说：“怎么能这么说呢？不能说自己变修了嘛！怎么能那么悲观呢？怎么能认为自己就变修了呢？”

韩爱晶又问：“那我们是不是应该支持激进的那一派，就是左的和革命的呢？”

周恩来很不高兴地说：“王明、李立三不比你左吗？他们给革命造成了多大的损失？不能说越左越好。”

韩爱晶说：“我平常自己想到的和别人问我的常常有很多问题搞不明白，虽然见到总理和中央首长的机会很多，但是真正能仔细向总理请教的机会也很难找到。”

周恩来把工作人员叫过来说：“韩爱晶要是有事情找我，我可以抽出时间见他嘛。你们要及时报告我。”

在天安门广场召开百万人大会的同时，中南海刘少奇、邓小平、陶铸 3 人的院子里，也分别组织了对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夫妇的批斗。

会毕，刘少奇、王光美被押到会场一角，被强按着头，向两幅巨型漫画上的红卫兵鞠躬。

8 月 5 日这一天，刘少奇和王光美在批斗会上见了最后一面。批斗会结束后，还和原来一样，将他俩分别关押，看管比以前更加严密。

会后，围困中南海的各路“揪刘”队伍陆续撤回，但“揪刘”活动并未马上停止，又持续了一段时间，可以算作是“围困中南

海事件”的余波了。

8 月 5 日，外交部门前的“揪陈大军”也全都撤离了。

这天上午，外交部姚登山向“联络站”所属战斗队队长传达了戚本禹 8 月 4 日下午在“首都电影、新闻界支援港九同胞斗争大会”上，与姚登山短暂的谈话内容后，“联络站”核心组决定，反对周恩来先开小会的决定，要求周恩来同意先开批陈大会，并以群众要求为由上报。周恩来对此表示不予支持。

下午，外交部“联络站”召开全体大会，由姚登山传达戚本禹 8 月 4 日的讲话。传达过程中，持过激观点人的狂热情绪急剧升温，长时间无数次地高呼“打倒刘邓陈”、“打倒陈毅”等口号，表示拥护戚本禹。

会后，“外交部革命造反总部”认为，戚本禹关于陈毅问题的讲话与周恩来总理对陈毅问题的指示精神不符，影响恶劣。当晚，该组织即致函周恩来和中央文革汇报实情：

总理、伯达、康生、江青及中央文革小组：

我部姚登山同志八月四日在一次活动中和戚本禹同志作了个人接触，曾谈到批判陈毅问题。姚不顾八月四日总理关于批陈会议的指示，竟把戚本禹同志的讲话作为正式指示向我部全体工作人员传达，在传达过程中，群情激昂，高呼“打倒刘邓陈”的口号。北外六一六及红旗革命造反团听了姚的传达后也纷纷贴出“号外”，以各取所需的手法为自己冲外交部的错误行动打掩护。

我们认为，姚这样做的结果，给人造成总理与中央文革在批陈问题上有矛盾的错误印象。在我部全体工作人员会上传达后，联络站某些战斗队的代表上台表态，只提戚本禹同志八月四

日的讲话，而不提总理八月四日的指示。现寄上姚的传达全文和有关传单、号外供参考。

此致

敬礼

外交部革命造反总部

一九六七年八月五日

8 月 5 日，林彪主持的常委扩大会上，江青拿出毛泽东 8 月 4 日给她的信在会上传阅的。信头的称呼是“江青”，开头就说：“你所送的材料，我已收阅。”

毛泽东同意林彪的看法，当前的形势很好。对林彪信中提到的夺枪问题，即群众夺解放军的枪，毛泽东在信上说：“夺枪问题并不严重……”所谓群众抢枪，有些地方实际上是部队向他们所支持的一派发枪。他认为百分之七十五以上的部队干部是支持右派的。因此当前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个主要问题就是武装左派。又说另一个主要问题是群众专政，说北京过去大体上就是这样做的。“如此左派声威大振，右派气焰就压下去了。”因此，对此事的处理似可不急，待时机成熟后再去从容解决。

## 第 792 回：八月五，开封宁夏伏击战　第六次，接见江西省代表

8 月 5 日，开封又发生一起惨案。

7 月 25 日中央接见河南代表后，开封地委书记张申接到纪登奎的电话，让他到郑州听取中央对河南问题的指示精神。8 月 5 日，刘建勋和纪登奎在郑州对听完传达的张申说："现在你马上赶回去，把中央对河南问题的重要指示精神与我和纪登奎的意见传达给开封的造反派。"随后将张申送出大门。

张申的汽车行驶到离开封约 10 公里左右的开封精神病医院门口时，突然看到有个老农民站在马路中间，双臂高举交叉挥舞着，让车停下。

看到这种情况，张申说，"绕过去！"

司机刚一往右打方向盘，老农民便大声喊："不能过！前面有埋伏！"

他们只好把车停在路边。这个老农告诉他们说：

"前面搪瓷厂，有人把耙子耙齿朝上放在路中间，人趴在马路两旁，说是要截从郑州回来的大领导，你们不能过！"

这时，从他们后面驶过来一辆伏尔加牌小轿车，开车的是个年轻人，这个老农又去拦截那辆车，但伏尔加没有听老农劝说，从旁边嗖的一下开过去了。

大概不到 10 分钟的时间，前面就响起了一阵枪声。

原来，上午 10 时多，赴汴支援开封"824"的河南"二七公社"许昌分社的汽车返回许昌，途经开封南关搪瓷厂时，遭到砖

头瓦块的袭击。7 辆卡车没有停留，开足马力冲了过去，朝尉氏县方向驶去。但两辆负责指挥的小轿车未能逃脱，2 人被打死，7 人被绑架。

几分钟后，同一地点，又从郑州方向开来的一辆伏尔加小轿车，就是那个老农民拦阻但没有劝住的小轿车，里面坐着河南省第一技工学校 5 名学生。车行至此，司机被当场打死，小轿车被拦截，围在汽车四周的人用长矛和梭镖向汽车的车窗猛刺。副驾驶位置上的齐扎根，被梭镖从右眼刺进，横穿头部，从后脑穿出一尺余，致使梭镖拔不出来。接着，一个梭镖又穿过他的头部。齐扎根就这样惨死在梭镖之下。

坐在轿车后排的葛金茹和张腊月，子弹从她们的后胸入前胸出，死在后排座位上。小轿车内的 5 人，4 名当场惨死，1 名生命垂危。

正在开封精神病医院门口的张申听到枪响，说："可能出事了！"让司机开车过去看看。

司机忙说："前面啥情况咱不清楚，咱人又少，不能盲动。"硬把张申拉到路旁的深沟里躲了起来。

半小时后，有几辆大卡车朝开封搪瓷厂方向奔去。约一个小时后，开封"824"财贸总部的负责人连富森端着一支冲锋枪，带着一卡车全副武装的"824"赶到张申这里，把他们的车护送到了开封地委招待所。

开封"824"将载有 4 名河南省第一技工学校学生尸体的小轿车抬上一辆大卡车运回了开封师院。

开封师院大礼堂前，师院"824"负责人陈红兵站在卡车上

愤怒控诉保守派截杀“二七公社”队员的暴行，“向反革命暴徒讨还血债”、“为二七公社战友报仇”、“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的口号声响彻校园上空，并立即派石宏等人带着照片连夜赶赴北京向中央汇报。

8 月 5 日，宁夏永宁县也发生了一场伏击战。

虽然在宁夏首府银川，缺少工人和大学生支持的“筹备处”没有占到上风，但在南去银川 40 里的永宁县，“筹备处”却风光无限。有永宁武装部陆部长的鼎力支持，永宁“筹备处”一天天坐大，终于控制了整个县城，挤兑得永宁“指挥部”无以立足，只好把告急信像雪片一样送往银川。

为了确保银川南大门的安全，确保银南公路的畅通，稳定银川的局势，宁夏“指挥部”下令动员万余工人、学生、群众，百辆卡车，以“指挥部”成员、宁夏大学中文系学生杨长春为总指挥，南下声援永宁。

杨长春是中宁县东华人，典型的贫下中农的子弟。1960 年参军，参加了骑一师赴甘肃南部剿匪。1964 年复员时，正赶上大学文科专招有实践经验的工农兵及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他以初中文化顺利进入宁夏大学中文系。这个个子高挑的大块头青年，宽广而明亮的额头上梳着大背头，一张略显清瘦的脸，棱角分明，在有些冷酷的脸颊中央，隆起的山峰似的弓背鼻。讲起话来，眉飞色舞，大手频频挥动者，善于天南地北，神吹海侃。加之学了中文，有些新名词和典故，谈吐之间，更是翰墨淋漓，机锋暗藏。

他是宁夏造反派中赫赫有名的人物。是“指挥部”最负盛名

的演说家和笔杆子：

“天是蓝的，太阳是圆的，江山是属于人民的。人民的江山，造反派不坐，谁坐？”

“试看今日之山河，竟是谁人之天下？天下是毛泽东的，天下是共产党的，天下是属于革命造反派的！”

这是杨长春贴在自治区党委门口大字报中的两段经典论断。在自治区首府久传不衰。他因此而声名大振，人气如日中天。

永宁，这是方圆数百里的沃野。膏腴之地相连，沟渠纵横。从北到南，只有一条公路横跨沟沟坎坎，把银川与城南地区连成一片。除了望远桥、大观桥、王洪堡有村寨外，公路上的一切便全部暴露在视野之中。轻敌冒进的“指挥部”，在敌情不明的情况下，由此南进，事实上犯了兵家大忌。

8 月 5 日晨，“指挥部”由杨长春率领的 2000 余人，乘 97 辆汽车声援永宁，行至银川 10 里外的望远桥，遭遇零星枪弹的阻击。对方在桥上设置了路障。凭着一股誓死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豪气，杨长春指挥前卫队伍用推土机冲开了桥头路障，率领大军，势如破竹向南开去，轻易地冲出了望远桥，夺下了永宁的北大门。“指挥部”的头头们高兴异常，以为永宁城唾手可得，弹冠相庆。

但是，骑兵出身的杨长春遇到了真正的对手。永宁武装部陆部长调集了永宁县武装部干部与基干民兵，用真正的中正式、三八式、苏式七二六、六二骑枪和捷克式轻机枪、歪把子机枪、转盘机枪，马克辛重机枪在永宁大观桥渠岸上构筑了一道真正的防线。当“指挥部”人马行至大观桥头遭遇路障，前卫汽车受阻停

滞，而后续车辆继续前拥，与前卫挤成一堆时，陆部长下达了攻击命令。刹那间枪炮齐鸣，弹雨像刮风似地扫向公路上拥挤的车队，坐在前卫车上的杨长春身中两弹，在纠察队护卫下狼狈撤出战场。而失去指挥的混乱的队伍，丢弃了前卫的车辆，前锋践踏后卫，旌旗倒曳，丢盔撂甲，连滚带爬，在鬼哭狼嚎中作鸟兽散。

哪里还有队伍，哪里还有指挥？人们纷纷从动弹不了的汽车上跳下来，哭爹喊妈，躲避枪弹，沿公路没命地撒起鸭子，各自逃命。

跌入沟渠者不计其数。只见到处是狼狈不堪的人群，腰扭了的，脚崴了的，家人、同事跑散了的，人人惊恐万分，懊丧不已，此刻才知道，真正打起仗来，可不是看电影那么简单热闹。那炒豆子似的枪声，都是催命符，听得人心里只发毛，恨爹妈少长了两条腿！溃退的人群，从大观桥一直散落到 20 里之外的望远桥。

与杨长春率队声援永宁的同时，“总指挥部”还派另一支队伍援助吴忠。他们从银川出发不久，就发现有一架安 2 飞机低空侦察，后来很快在永宁县西边的宁化桥遭到伏击。两辆车冲过去以后，在黄羊滩发现道路被截断，遭到“筹备处”的机枪扫射和伏击，被迫撤回。

“指挥部”的檄文与告急文书数日之内上达北京，下送宁夏城乡各处。刹时流言四起，亲历者绘声绘色描绘大观桥遇伏的惨状，使听众无不动容唏嘘。随后，声讨永宁县武装部陆部长及银川警备区司令的大字报、标语遍布宁夏城乡。

由于意外遭遇武装伏击，亲人流血，愤怒的银川市民、工人、学生冲进了银川警备区司令部。众怒难犯，刘司令与各位领导纷

纷躲避起来。被大观桥的血烧红了眼睛的宁夏大学学生与 801 厂的工人们撬开了警备区的武器库，自己武装起来了。

武器库警卫的战士接不到任何明确命令，也挡不住愤怒的群众洪流，只能束手无策，眼看一箱箱黄油封存的五四式手枪被学生和工人们抬出武器库。

8 月 6 日，“筹备处”哄抢了永宁县武装部 216 支步枪、数千发子弹，控制了整个永宁城。

8 月 5 日 22 时 50 分至 6 日 4 时 15 分，尚不清楚宁夏惨案的周恩来、肖华、姚文元等中央首长，按照计划在人民大会堂安徽厅第六次接见江西四方代表。

22 时 05 分，周恩来先找刘瑞森、黄先、郭光洲 3 位省领导干部谈话，到 22 时 50 分，周恩来和他们一起走进会场。

周恩来说：“情况有变化，萍乡上次两位怎么都走了？为什么走？李俊同志来了没有？”

李俊答：“来了。”

周恩来询问了“萍总”两位代表回江西一事。

“大联筹”代表汇报济南 6013 部队一股长到萍乡武装部接洽事情时被“萍总”打伤，武装部长当时在场却没有制止。

周恩来问：“萍乡武装部长是哪一位？人武部政委张锦才同志在吗？济南 6013 部队一个股长郑洪斌同志到人武部接洽事情，被‘萍总’毒打了一顿，你在这儿搞清楚一下。你们那位部长在场，视而不见，这样的事情都出在你们萍乡，而且在武装部！我说了，你们就是策划放纵的嘛！”

“大联筹”代表继续汇报：“‘萍总’造谣说济南部队写反动

标语，并以此为借口冲 6013 部队驻地，抓走济南部队 4 人。”

周恩来问杨副军长：“抓了 4 个吗？”

杨副军长说：“抓了 4 个。”

周恩来：“济南部队不会写这样的反动标语，若有也是栽赃，武装部长视而不见，还把部队 4 个人，一个副营长、一个副指导员、一个副连长、一个战士抓走了，还打伤了一个妇女，……这也叫拥护解放军吗？”

“大联筹”代表汇报进驻吉安的广州 6182 部队战士到军分区参加会议，军分区头头指使 20 多名战士打野战军战士等情况。接着宜春代表汇报了宜春“6•7 事件”，莲塘“6•28”、“6•29”事件。“大联筹”赣州代表、死者家属控诉赣州军分区司令员李胜操纵“反复辟大军”杀“大联筹”。

周恩来问：“‘反复辟大军’和‘筹委会’是不是一个组织？”

答：“是一个组织。”

周恩来问：“‘反复辟大军’和李胜有什么关系？有什么材料证明？

“大联筹”说：“有。”

周恩来问：“李胜来了吗？”

李胜：“来了。”

周恩来站起来问：“你什么时候来的？”

李胜答：“7 月 14 号来的。”

周恩来、姚文元询问了李胜家庭历史和个人经历。当李胜说到皖南事变被俘一事时，周恩来问了李胜的证明人及他以后如何回部队和恢复组织关系等情况。问了 30 多分钟。此时李胜的老

上级刘培善也站起来，默默地望着李胜。

赣州代表继续汇报，说到对立面准备上翠微峰打游击时，周恩来说："这是吓人的，不会的，现在毛主席领导下，还要上山打游击？李胜，你发给城里的枪有多少枝？"

李胜："我不清楚。"

姚文元："怎么不清楚？"

李胜："是市武装部发的。"

"大联筹"代表："7 月 13 日还在发枪。"

周恩来对"大联筹"代表说："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知道赣州事件后，亲自派广州部队去的，要不然，你们的生命还保得住吗？"

"大联筹"代表高呼："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周恩来："现在活了，就要坚强地战斗下去！"

当"大联筹"代表汇报到赣州的伤亡数字时，周恩来说："我们查过了，确实有 223 具尸体，两方面（指广州部队和"大联筹"）数字一样。"

周恩来说："现在面临的问题，江西军区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所以要有一个新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支柱。

当然，不是没有成绩，支工支农还是有成绩的。要一分为二。同样军分区，人武部也要一分为二，有成绩的一面，又有严重错误的一面。例如刚才赣州谈的就是有策划怂恿的。不只是赣州，萍乡、宜春、抚州、许多军分区、人武部都犯了。如果没有武装部的策划怂恿不可能发展到如此严重地步，死伤这么多人！最多打伤一点，不可能有成批的死。"

他对“联络总站”说：“你们不能这样气盛，而对对方这样气盛，对中央主持会议的也是一样气盛，我是感觉得到的，你们都是群众嘛，不管是造反精神旺的还是偏保守的，需要你站在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比长短。刚才张同志（即“大联筹”南昌四中被打死的“井冈山”红卫兵吴大为的妈妈）说得对，把仇恨集中到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派’身上。当然，下面有他们的人，有那么几个、一个、两个、三个，江西也有，军区也有，但只是一小撮，不然就是打击一大片。双方要摆事实，讲道理。你们不能用出气的语言，不仅对对方，对中央也是这样。通过一年多的群众工作，我懂得这个态度，我感觉得出来。但是我们不以这一点来定问题，而是以是非来定问题。

我有一个要求，军区、军分区、独立师、独立营、人武部，其他地方部队，应当采取这个态度，对野战军应该抱欢迎的态度，搞好工作。对新去的解放军的态度是个考验，给你们一次最好的机会，也是最大的考验。关键在于实际。军区、军分区、县武装部，到底是欢迎还是不欢迎新去的部队，这是一个重要问题，这是最高统帅派的部队，另外，群众组织，到底对待解放军的态度，是支持他们还是包围他们，甚至夺枪，抓人。”

“军队一不还口，二不动手，也不开枪，大家知道的。不要认为这是可欺，就欺负他们，包围他们，打人，捉人，夺他们的枪，那就犯严重错误。造反派夺军区的枪是受了迫害，我们已指示，交掉的算了，没有交的暂时封存不交。如果夺新去的解放军的枪，打人，捉人，那就犯严重错误，大错特错。”

这时，26 军杨副军长向周恩来汇报：“刚才接到萍乡来的电

话，济南部队被打伤 57 名指战员，重伤 7 人。”

周恩来：“你们听听！……”

姚文元说：“事态还在恶化！”

周恩来：“我听了两位萍乡同志的话，他们还没有听完我的话，我没有说完，四点讲了一点半。现在马上就回去了，回去以后，发生了这样的问题。人武部长看新去的解放军挨打不管，视而不见，反过来，‘萍总’的人冲到部队捉了 4 个人，又打伤了几十个，这样的情况怎么许可呀？如果夺新去的解放军的枪，打新去解放军的人，那么可以判断你们（指“联络总站”）是反对解放军的。现在赣州、萍乡、宜春、南昌、波阳、抚州、九江、上饶、景德镇都派了部队去，……”

“大联筹”代表：“抚州还没有去。”

周恩来：“也要去的，有军区的独立营在，以后还是要去解放军的，每一个地方都要去人，都要受考验，首先是对解放军的态度。如果把矛头指向新去的解放军，就是直接指向最高统帅，林副统帅，如果妨碍新去的解放军执行任务，就是把矛头指向无产阶级司令部。”

姚文元高声地说：“这一点总理讲得很清楚了，是毛主席、林副主席派去的嘛！”

周恩来对“联络总站”的代表说：“还有一点要说清楚，你们不能说来就来，说走就走，你们要走至少对联络员说一声，打个招呼嘛！萍乡的问题现在就比较困难，比较负责的走了。你们到底还相信不相信毛主席司令部的人？达成协议没有几天就撕毁了。当然，不怪你们，你们还是早些打电话回去，萍乡、南昌、

赣州、吉安、抚州等都打电话回去说一说，如果再这样，你们就会把自己摆到最不利的地位，那界限分明了，谁拥护解放军，谁反对解放军。解放军又没有动手还口动枪，人被打伤了。以前，方向不定，要看新的，这一步走得更远了。当然，不是怪你们群众，特别是吉安、萍乡、丰城这些地方，这是一个很好的表态嘛，这是一个新的考验。这是第一点。

第二，无论如何，既然达成协议了，首先在北京要执行，不要互相谩骂，互相打人，捉人，抢东西。有事同联络员商量。你们都签了字了，尤其在北京，无论对那一方，即使错误多一点也不能这样，要摆事实讲道理，否则会使群众丧失信心，会造成你们的反的。你们造反精神旺，要让点。另一方也要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打、抓解放军是不行的，我们要出个公告，你们要办到，这也表现你们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协议首先要在北京实现，不要破坏。

第三，江西问题快到临近解决了，做代表的不能随便走，要告诉一下，要走要经过了我们同意才行，临近解决，随便走不好。至于这几个事情，赣州的查得很清楚了，查到了 223 个尸首，当然还要调查。莲塘事件也是要调查嘛，要派调查团去，但不影响解决江西问题。军区党委要改组。现在有条件成立筹备小组了，现在不说，下次再说。”

## 第 793 回：戚本禹，接见湘红联代表　八月五，涪陵武器库被抢

8月6日0时46分至3时30分，戚本禹接见湖南省在北京的“红联”代表全体成员。他拿着名册一一点名，当点到胡少奇时，戚本禹说：“你叫胡少奇，这次你回去干了一件坏事。”

胡少奇答道：“报告戚本禹同志，我正要同你汇报。”

戚本禹说：“好！等一下再说。”

点完名后，胡少奇站起来说：“这次我和代表团回北京时，车子开到冻肉厂门前，车子被挡，当地工人和贫下中农发觉车上穿有便装的，非要留下不可，我去解释又解释不清，这样谢若冰等5人身份被暴露，在实在无法的情况下，我主张双方就地谈判……”

戚本禹说：“黎正海同志你是当事人，把当时情况说一下。”

黎正海：“胡少奇讲的，全是假的，完全颠倒是非。7月24日下午，你从五连打电话给我，我说明天上午就飞回北京。黎原军长问我：‘你告诉胡少奇什么时候走？’我说：‘明天上午7点。’黎军长说：‘你马上回一个电话，说代表到不齐，时间定不下来。’我后来打了电话。25日下午1时，郑波副军长叫我起来上汽车到飞机场，刚坐上汽车，你也来了。我们车子到冻肉厂前被拦住了。你下车去农民中煽动，最后你站在嘎斯六九车顶上公开煽动，提出三个谈判条件，不答应就把‘工联’方面的代表扣下来。当时我坚决反对你这种违反周总理当面指示的行为，你不听，把人抓到冻肉厂毒打一顿，后又转到大托公社，我要求把

谢若冰等5人莫抓到河西去，被一个矮麻子农民模样的人骂了一顿，问我代表谁。47军保卫处长王鹤然同志把我叫出来陪‘新闻兵’代表黄振东同志和铁道部军管代表2人，去47军大托铺驻军处住下来。你又赶出来，要我监视黄振东同志。我们到那里，驻军刚吃完饭，你领着谢若冰等5同志和农民赶到这里。警卫发觉后，我们把黄振东同志转走了。你进来见我们就问黄振东到那里去了。我不高兴地说：‘不知道。’你对我发脾气，说为什么不把他看住。晚上你和王鹤然处长谈判，要把黎原军长和黄振东同志交出来一起谈判，否则就不谈。你们一直谈到晚上3点多，这时我早睡了。次日早晨6点多，我醒来时发现谢若冰等5同志不见，你也不见，我以为到其他地方去睡了。正在这时，王鹤然处长匆匆忙忙跑进来对我说：‘你这小鬼，还在睡大觉，胡少奇早就打电话过河西去了，说你叛变了，今天早晨准备把你骗过河去干掉你。’这下把我急坏了，马上化装坐上汽车同王处长通过警戒线逃往机场。到机场后不久，黎军长也来了。不久外围岗哨打来电话，大托已戒严，到处抓逃走的2人。我们早饭也没有吃，就坐飞机起飞。”

胡少奇站起来反驳说：“这是欺骗中央和戚本禹同志！”

戚本禹肯定了黎正海的话：“他说的完全是事实，与黎原同志反映的是一样的，你干了坏事还不承认，这是什么态度？”

“高司”龙彪站起来说：“现在我们学习几段语录：‘共产党员决不可自以为是，盛气凌人，以为自己是什么都好，别人是什么都不好；决不可自己关在小房子里，自吹自擂，称王称霸。’”

戚本禹站起来针锋相对的说：“你这条语录是对我说的，我

就不接受。我们有调查，有证明。你干了坏事，还想倒打一耙！”

胡少奇说：“你这种态度我不接受，你要让我讲清。”

戚本禹同志说：“你干了坏事，不承认错误，有什么可讲。”

这时，胡少奇、龙彪都站起来辩驳。戚本禹对他们说：“你们坐下。”

总理联络员也要胡少奇、龙彪2人坐下。

戚本禹说：“根据你干的坏事和这种恶劣态度，我可以撤销你的代表资格。”

胡少奇：“你就撤吧，我还怕什么？”

戚本禹:“你这样恶劣的作风,我还可以对你采取专政措施。”

胡少奇逼着戚本禹立即采取专政措施。代表团有些成员指责胡少奇的恶劣态度。

戚本禹问：“‘高司’几个代表？”

占先礼答：“我们有个代表。”

戚本禹问：“哪一个代表比较开朗一些？”

全场都没有做声。

戚本禹问黎正海：“你说哪一个开朗一些？”

黎正海说：“他们4个人都是铁板一块。”

戚本禹：“好吧，今天我找你们谈一个问题，就是要求你们不要走‘百万雄师’的道路。从很多迹象表明，你们越来越危险，湘潭地区，‘高司’炮轰周总理和我，而且游行示威！这是极端错误的。炮轰我没有什么问题，为什么要炮轰周总理呢？！轰周总理是极端错误的。这个消息是广州军区打来了电话。‘高司’很多同学是好的，现在认识了错误。《二·四批示》我们有责任，

军区有责任，‘高司’广大同学是好的。现在责任中央担、军区担，如果你们坚持，那就有错误，因为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发动起来造反，反还没有造好，就抓了那么多人，这是什么错误呢？军区犯了错误，你们有意见就提吗。你胡少奇的态度那么恶劣，革命小将犯了错误是允许的，只要改正。谢若冰、叶东初你们认为是反动头目是站不住脚的。这个组织中有没有呢？那到说不定。你们要反，反戚本禹吧，为什么要反总理呢？总理是国家领导人，应该保护。你们应该检讨自己的错误，站回来，起来造反，这才是对的。你们既是代表应该回去做工作，把群众带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上次有黎正海同志和另一个同志发言很好，这就是好态度。”“湖南死了这么多人，就是军区错误路线。军区错了，中央有一定责任。‘高司’跟着犯错误，现在要赶快改正错误。我们有错误，反正对不起你们，你们要造反造我的反，千万不要造总理的反，总理代表中央。现在研究怎样转变。‘湘江风雷’不纯让他们自己清理，绝对纯是不行的，你们这派也不纯，反总理就是最大的不纯，如果继续下去，就要犯极大的错误。”

“现在湖南要马上成立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由黎原同志担任主任。我们马上建立革命武装维持秩序。‘红色怒火’应由你们宣布是非法的，因为他们观点与你们相同。胡少奇不承认错误，我们还可以采取措施。”

接见结束。

这天，四川涪陵又传来令人震惊的消息：涪陵军分区易家坝军械库有组织的被抢，共计抢走各种军用枪支 5000 余支，轻重机枪 400 余挺，迫击炮 100 多门，炮弹和子弹 500 多万发。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随着涪陵“三八线”的出现，武斗的发展，涪陵“贸派”7月16日就开会决定建立四个兵团。另外，还从焦石区调农民400多人，住在涪师校，组成“红联司”的 “江东部队”；清溪区调100 多人住在专区生资公司，组成“红联司”的“清溪部队”；马武区调100多人，住在靖黔公社完校；涪陵旅社还驻有100多人。

7月23日，1000多“贸派”人员，在其二号人物杜炳全带领下，围攻部队宣传人员达 3 个多小时，55 名指战员被围打，打伤8人，其中重伤3人，抓走6人。在另一个地方，用土枪开了4枪，击伤数人，抓走排长1人，战士6人……

部队将这天的情况称为“7.23”事件，支左领导小组发表严正声明，提出严重警告。支左小组组长黄鹤寿政委发表公开讲话，措词严厉，点了杜炳全的名。对部下被打受辱，他愤怒之情溢于言表。

黄鹤寿政委亲自出面，召集两派负责人，严厉命令撤除涪陵路障街垒，于8月1日取消“三八线”，恢复街道畅通。将日子定在在建军节那天，也是对双方标榜“拥军”的检验，并由军队事先广泛告之。

8月1日那天上午，人们提前来到位于“长江饭店”的“三八线”旁边，时间一到，在军队的监督下，双方将路障拖开，街上人群熙熙攘攘，都出来看热闹，没有了钢钎藤帽，没有杀气腾腾的口号，不时有军人在巡逻，显出一派和平的气氛……

谁知还未到中午，街头上高音喇叭就响起了凄厉的警报声，

人们纷纷狼狈地边跑边喊："打起来了！打起来了！"双方都急忙将推到一边的障碍物拖回来……

路障恢复了，"三八线"又出现了，据说，那天在街上不知是哪方的人员，首开衅端，很快星星之火顿成燎原之势，乱成一团，幸好没用武器，部队想制止也莫奈何之。

一线和平的曙光，犹如昙花一现，不到半天就熄灭了。涪陵在狂热躁动和不安中，走向了现代化的"内战"……

8 月 3 日，驻涪陵部队支左领导小组办公室向"贸派""红联司"提出第三次严重警告，从中当可感受到当时的紧张形势：

红联司负责人：

你们违抗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的七条"通令"和四川省革筹、中国人民解放军成都军区张、梁、刘、张首长的"六项命令"，今天明目张胆地大量抓人打人；并再次围攻我部队，折磨我干部战士，还将已发臭的尸体抬到我 XXXX 部队 X 连，无理取闹。

为此，特提出第三次严重警告，勒令你们不得再围攻支左部队，无论过去和今天抓去的人，都必须保证人身安全，立即释放，并保证今后不再发生类似事件……望勿执迷不悟，勿谓言之不预也。

驻涪陵地区部队支左办公室。

1967 年 8 月 3 日

8 月初，"红联司"专门开了一次常委会，讨论夺枪一事，决定从涪陵军分区易家坝军械库下手。8 月 5 日下午，"红联司"彭用吉对赵树金说："赵主任，马上开个常委紧急会，人员分分

工，今晚要搞就搞得了。”

赵树金说：“可以，马上召开常委研究一下。”

会上，常委们做了分工，有负责搞钥匙开仓库的，有负责在易家坝警戒，防止 8042 部队的，还有负责两边马路警戒的，计划周密。

然后赵树金征求军分区王参谋的意见：“怎样？”

王参谋说：“问题不大。”

赵树金又问：“军械库的门怎么开？有没有口令？”

王参谋说：“没有口令，凭声音熟。”

赵树金又问：“怎么搞到邵科长的钥匙？”

王参谋说：“先用电话叫他来军分区开会，再把军械仓库电话线剪了，搞他出来就把钥匙拖过来。”

最后决定晚上 22 时，以放广播为号，开始行动。

当晚，他们将负责军械库的科长带到军分区高干招待所，拿走了他身上的钥匙，直接到易家坝军械库，“贸派”组织了 1000 多人前去搬抢。搬放和发放武器弹药都是事先安排好的。等到军械库后来向部队报警时，早已搬抢完毕。

8 月 6 日凌晨 4 时左右，“忠实派”的几个主要头头被紧急叫到支左领导小组办公室，并被告知：“在几个小时前，‘贸派’抢劫了军分区的武器库。”

原本还有些睡眼惺忪的罗成胜闻听此话，一下子连打了几个寒战，接着全身一阵又一阵的冷颤持续了好几分钟。从未经历过真枪真炮的他，在那一时刻最先的感受是那种第一次面对射来的枪弹并将要被射中的害怕和恐惧；直到过了好一阵才在支左部队

首长的安抚中缓过神来，继而升起的是无比的愤怒和憎恨。

接着，黄鹤寿政委说："对于赵树金的这一犯罪行为，我们已经向成都军区报告，而且成都军区也明确的指示我们为了保护革命的左派，可以武装左派，让你们自卫；根据这个指示，支左领导小组决定，为了应付万一，先从现在的支左部队的战士手中抽出一些武器武装你们。"

同时，黄鹤寿政委又对武装"忠实派"的事情作了详细的指示。按照他的要求，"忠实派"只能先组织两个连队，一个连队由原地委、专署以及公安的干部组成，另一个连队由工人组成，武装人员政治上要可靠，最好是复员军人，要有使用武器的经验。"忠实兵"学生红卫兵这次不武装。他还特别强调，一定要造好名册，发枪时要做好登记，谁领了枪，领的是什么枪，都要登记。支左领导小组的首长要求"忠实派"头头赶快回去组织，越快越好，保证在当天上午完成这项工作。

支左领导小组的其他首长，特别是 8042 部队的李华禄政委和 7822 部队的薛春茂政委在讲话时态度也非常坚决，要"忠实派"放心，不要惊慌，不要怕，部队一定会保护好他们。

开完会，天已大亮。

8 月 6 日上午，街上巡逻的部队都带上了枪支，后山上断断续续的枪声可闻。

"忠实兵"司令部通知开会。会上部队首长对学生们讲，当晚部队即将抢军火库之事件报告了成都军区和中央，震惊了上边，将其视为严重事件，作了重要指示，其中最重要的是要保护好人民群众，尽力避免大的流血伤亡……

一位部队干部还为学生介绍防备知识，要求多准备沙袋，不要到靠后山的房间和窗户去，路过街巷口时要猫腰快速通过等，要将多数女同学、小同学和体质较差的同学集中起来，准备疏散。他代表部队首长特地关照学生说：首长要求，青年学生是祖国的未来，一定要注意安全，不能再发生“7.13”那么惨重的牺牲……

参加会的是各学校分部负责人，他们神态严肃，散会后很快就回去作安排了。

街上行人顿时稀少，在两边分界的“三八线”上，部队增加了巡逻和宣传队伍。

当晚夜幕降临后，长江边成了繁忙的工地，近 2000 人在搬运河沙，装沙袋，抬预制板，附近的灯光尽行关闭，借着夜色江水的反光，偶尔用用手电筒，人们压低嗓音说话，担心对方发现后开枪，半坡上和城东的对方区域，不时有零星的枪声。此时情景，让人们想起抗日战争电影片中，军民夜色中在敌人鼻子底下静悄悄地挖运东西的场面……

## 第 794 回：平遥县，陈永贵古城被围　急电令，谢振华飞车驰援

8 月 6 日，刚刚参见完北京解决山西问题会议的陈永贵，奉中央文革小组指示，立即同解放军、中共晋中地区核心小组、群众组织成立了“三结合”小组，前往平遥处理武斗问题。

当陈永贵等人于 8 月 7 日上午到达平遥时，县武装部、县革委会的一些人以及“总司”头头，不让陈永贵等人进城，因为他们是反陈派。而“联络站”则派人出城迎接陈永贵，亦被阻。

但陈永贵毕竟是山西省革委会副主任，又是中央派来解决平遥武斗的，坚持不让陈永贵等人进城，显然没有道理，“总司”最终只能放行。

陈永贵进城后，径直来到“联络站”所在的平遥一中。“联络站”大喜，立即在大喇叭里广播，说陈永贵来到了平遥一中，是对“联络站”的最大支持，号召平遥人民不要受欺骗，要分清是非，实现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

“总司”广播也马上反击，说陈永贵不在平遥，“联络站”造谣可耻。

正在平遥一中的陈永贵一听，“总司”这不是睁着眼睛说瞎话吗？于是，亲自在大喇叭里讲话，旗帜鲜明的表态支持“联络站”，还说：“我们要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

陈永贵的声音当地人都熟悉，“总司” 方面的群众被激怒了，对立情绪暴涨，大批人马将平遥一中团团围住，架起高音喇叭大喊：“叫你们死亡在一起，埋葬在一起，腐烂在一起！”

当天，平遥县武装部部长连一民通知各村民兵进城，进城者一天两毛钱补助，同时村里给记满分。

民兵进城后，连一民又发放枪支。尽管他没敢发子弹，但是武装部的那挺马克沁重机枪一架，明晃晃的刺刀一上，其阵势也是够唬人的。

民兵们围着平遥一中叫喊说，陈永贵是武斗的罪魁祸首，要拉出来杀掉！

性格倔强的陈永贵怒不可遏，不管不顾地冲了出来，夺过喇叭就喊起来："你们来吧，革命不怕死，怕死不革命。死了我一人，还有后来人！"

"总司"方面的人一下都愣住了。叫喊了半天，真有机会可以抓住陈永贵打死了，又没人敢下手。愣神之间，"联络站"方面已经将陈永贵拉了回去。

此时中午已过，陈永贵被困在平遥一中已逾半日，午饭还没有吃上，晚饭也没有着落。眼下冲又冲不出去，食物又送不进来，真是"内无粮草、外无救兵"，一时间似乎陷入困境。

陈永贵被围的消息迅速传出，昔阳大惊，火速商议对策。商量来商量去，除了派人前去探望慰问之外也拿不出什么妙策。

下午 17 时许，"总司"派对平遥一中发起总攻，"联络站"派人将陈永贵转移至城隍庙隐藏。

当晚21时55分，陈永贵派人通过祁县驻军，向中央和省核心小组发出急电称：陈永贵等"下午6点到平遥城，进城10分钟，'总司'开枪打伤6人，把六道城门封锁，通信联络中断。经了解完全是由人武部和公安局的一些人操纵的。请采取措施。"

8月8日凌晨0时刚过，追踪报道的新华社记者冯东书等3人，在平遥火车站借用调度电话把陈永贵被困的消息传到太原的山西分社，山西分社又立即把消息传到北京。陈永贵被围困和平遥如此严峻的局势令中央震惊，周恩来立即电令69军军长谢振华，要“谢振华军长想办法将陈永贵营救出来，并要保证他的生命安全。”

谢振华迅速命令驻祁县的319团马上安排兵力，先行赶往相距50里的平遥，自己又亲率1个营的全副武装的战士从太原乘车，奔赴300里外的平遥。

清晨时分，谢振华率部赶到。祁县 319 团已先行到达。谢振华立即让那个武装营在几辆军用卡车上架起机枪，围着平遥城转圈。同时又让一连人徒手站在 3 辆卡车上，手拿《毛主席语录》，有节奏的喊着“毛主席万岁”的口号，从城门洞里直接开进平遥城。新华社同行的一位记者范银怀也穿上军装混在解放军战士中间进了城。

见到这些正牌野战军到来，本来就与军队关系不错的“总司”并没有阻拦，当然也没有胆量阻拦。

军车一直开进平遥一中。解放军干部立即找到陈永贵，激动万分的陈永贵紧紧握着解放军的手说：“感谢解放军！感谢解放军！”

解放军将谢振华的解救意见告诉陈永贵，陈永贵表示同意。于是，按照事先的安排，解放军拿出一套军装让陈永贵穿上，并让他上了汽车，蹲在战士中间。在此过程中，车上的战士一直有节奏的高呼“毛主席万岁！”

过了一会儿，这3辆卡车又拉着原来的解放军战士开出城来。他们仍是手摇语录，高呼口号，虽未带枪，但气势壮观。陈永贵就穿着军装蹲在解放军战士中间混出了城。当时，城门上还站着许多“总司”的人，但有周恩来的指示，又有这么多解放军，他们谁敢动手？

谢振华没费一枪一弹，便将处于重围中的陈永贵解救了出来。陈永贵感激不已，他紧紧握住谢振华的手说：“谢军长，你真是我的救命恩人哪！”

当天，谢振华率部并带着陈永贵撤到祁县，在319团住下。当夜，昔阳方面派出的李韩锁、郭凤莲赶到祁县探问，知道老陈安然无恙，这才放下心来。

与此同时，陈永贵被困平遥的消息传到太原，太原震惊！陈永贵是毛主席在全国农业战线树立的一面旗帜，山西省革命委员的成员，山西各派革命群众拥护的偶像。听说陈永贵被扣押，山西的三大革命造反组织“兵团”、“红联站”和“红总站”，在誓死保卫毛主席的好学生陈永贵的口号下，各自紧急调兵谴将开赴平遥解救陈永贵。

当晚 22 时多，各造反组织开赴平遥的汽车好几百台从太原出发，每台车上都坐满了头戴柳条帽，手持长矛的武斗人员，一辆接一辆汽车的灯光把夜色里的公路照成一条亮带，车队前不见头后不见尾，连绵不绝，浩浩荡荡，大有踏平平遥城的架势。“红总站”头头杨成效亲自率领十三冶的“决死队”，乘坐 20 辆 10 轮大卡车前往支援。太原和平遥附近各县的武斗队伍，也纷纷到达平遥。

天蒙蒙亮时，陆续从太原到达的长矛队伍已经把平遥城团团包围。平遥“总司”的守城人员在城门和城墙上或隐或现。

8 月 9 日晨，谢振华率部陪陈永贵重返平遥，制止武斗，解决两派冲突。

大约 8 时多，攻城的主力队伍“红总站”十三冶“决死纵队”的上百名队员，头戴钢盔和消防队员的铜盔，手里端着长矛，在嘹亮的冲锋号声中从西门向城里发起冲击，马路两旁的水果摊被掀翻，路面上到处是滚动的苹果和西瓜，老百姓四下躲避……

攻城队伍遭到了平遥“总司”守城队伍用石头瓦块的阻击，太原的队伍也用石块进行还击。怎奈攻城队伍人多势众，守城人员抵挡不住，且战且退撤入城内。太原的大部队也随着攻进城里。平遥“总司”的守城人员有学生、工人，还有花钱雇佣的农民，这些人面对几十倍于自己的对手毫无畏惧，纷纷上了沿街四合院的房上，他们身上披着花花绿绿的棉被当盾牌，揭起瓦片和青砖当武器顽强地抵抗着。攻城的队伍也上了房顶与守城人员展开始了近距离的砖头瓦片战，逐房、逐院的争夺。不时有人受伤，头破血流从房上掉下来，属于攻城“勇士”则被抬走抢救，被俘获的守城伤员则还要受到拳打脚踢。

将近中午时分，守城的平遥“总司”已经被压缩到县城的中心地带，太原的大部队大模大样尾随在后，进入城里的大街小巷。这时，突然有人大喊一声：房上有人，人群顿时像炸了窝的蜂一样，个个抱头鼠窜。刚才目睹了守城人员砖头的厉害，大家心有余悸，真怕砖头砸在自己头上。大街上老百姓也出来看热闹了，不时有被俘虏的“总司”参战人员，高举双手被端着长矛的胜利

者押解到城门下，沿途还要遭到太原人的棍棒教训，发出鬼哭狼嚎般的痛苦叫声。

战事进行到下午 4、5 点的时候，县城中心一座炮楼一样的高层建筑里伸出了白旗，平遥“总司”的守城人员抵挡不住，无条件投降了。顿时城里西大街上人山人海，被俘虏的平遥“总司”的人排着长队，有男有女，高举双手，被胜利者用长矛和刺刀从城里押解出来，承受着人们的拳打脚踢和吐沫辱骂，然后全部集中到城墙上看押起来。还有大批平遥“总司”的人纷纷从城墙上跳出城外，避免了当俘虏的命运。

太原来的大队人马当天晚上就撤回太原。

支持“总司”的平遥县武装部领导人被抄家，平遥县人武部部长连一民被捕，枪支收回，重机枪血衣等摆出来展览。武装部全体人员进“学习班”，另外成立“八二五”战斗队，接替武装部工作。全县对各公社“总司”派进行大清洗，各公社、机关、厂矿还对部分“总司”派人员实行开除、抄家、游斗，办“学习班”。

8 月 9 日，杨成效在平遥大干一场后返回太原。在路过太谷时，又顺便把太谷农学院砸了个稀巴烂。他们将太谷县山西农学院 “红联站”下属组织“火炬”战斗队的 200 余名学生围困在楼内，进行“火攻”，惨叫声响彻校园，打伤学生 200 多人，其中 4 人终身致残，……这是因为，两个月前，杨成效被抓，就曾被关在这里。

路过山西省会计学校，杨成效进去砸了学校“井冈山”，路过山西省冶金专科学校，进去砸冶校“红旗”，最后又冲进省委

大院，再次对“七一公社”总部一顿打、砸、抢……

10 日，陈永贵等人回到太原。这天，山西省革命委员会发表《告全省人民书》。太原的各大组织的报纸把这次平遥的武斗赞扬为山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报纸上还刊登了战斗的总指挥杨成效指挥平遥武斗的照片。

次日晚，山西“兵团”、“红联站”、太原“革命造反派司令部”及解放军驻晋部队，在太原市五一广场召开 15 万人参加的“声讨平遥反革命叛乱大会”，隆重欢迎陈永贵的“英雄凯旋”。省革委会主任刘格平、副主任袁振等出席了大会。陈永贵穿着解放军救他时给的军装，站在刘格平为他安排好的敞篷车上检阅众多拥护者，并在会上“汇报了”解决平遥问题的经过。各造反派组织也纷纷在大会上表态，支持以刘格平为首的省革委会，谴责平遥流血事件的制造者。

8 月 13 日下午，昔阳两万多群众敲锣打鼓欢迎陈永贵处理平遥事件归来。县委核心组组长王贵科陪着陈永贵以检阅的姿态穿过欢迎队伍，来到十一广场。王贵科宣布欢迎陈永贵同志胜利归来大会开始，然后郑重其事地致了欢迎词。

次日，昔阳将原晋中地委的负责人揪来，在两万人大会上狠斗一场，抹黑脸挂牌子，痛痛快快地出了一口恶气。陈永贵在这次批斗大会上做了动员报告。

8月13日，张日清飞回山西。

8月14日，山西省“揪军内走资派联络站”批斗了刚从北京回来的张日清，绑架了负责山西工交系统生产的省军区副司令员赵冠英达56天。

“红联站”的人接受不了“七月会议”的结果,一部分人坚持反对刘格平,在太原贴出了“炮轰刘格平”的大标语，直接和“七月会议”唱反调。

此后，山西开始进入大规模真枪实弹武斗阶段。

## 第 795 回：提抗议，火烧印尼大使馆　萍乡打，五次见湖南代表

8月6日，周恩来接见外交部“联络站”夏义善和北京外国语学院代表宋远利及二外的学生代表，就外事口召开批判陈毅会议问题同造反派“约法三章”：批判会要以小会为主；会上不许喊“打倒”口号，挂“打倒”标语，不许有任何侮辱人格的举动，如搞变相武斗、揪人等。据宋远利回忆，周恩来希望北京外国语学院三派联合，并说，“造反团”是真正的造反派，“六一六”是过激派，“红旗大队”是温和派。

8 月 6 日，印尼武装部队纠集 1000 多人到中国驻印尼使馆进行疯狂破坏，纵火焚烧中国使馆馆舍，并打伤中国使馆 4 名工作人员。当天，中国外交部照会印尼驻华大使馆，最紧急、最强烈抗议印尼军警和暴徒又一次袭击中国驻印尼大使馆。中方宣布，限制印尼驻华使馆人员的行动自由。

当天下午，北京约万名民众到印尼大使馆前示威。一些激进分子强行冲进印尼驻华使馆，砸坏馆内设施和八辆汽车，放火烧毁办公楼，并揪斗了数名印尼使馆人员。

晚 20 时，部分民众不听劝阻，再次强行冲入大使馆，放火烧毁南院大楼内部建筑，焚烧文件。周恩来得到报告后，指示决不能伤人。卫戍区加派兵力，在印尼大使馆周围布满了警卫战士。21 时许，消防队将火扑灭。

8 月 7 日，北京在印尼大使馆前示威民众骤增至 40 余万人。

8月7日凌晨0点30分至2点30分，周恩来、戚本禹、黄永胜在

人民大会堂安徽厅第五次接见湖南代表团。

周恩来首先谈了湖南各军分区发枪的事。他说："上次讨论了湘潭问题，证明我们的看法是正确的。湘潭军分区犯了严重错误，他们发枪了。不仅'高司'、'红色怒火'去了人，而且四川的'产业军'，武汉的'百万雄师'都去了一些。有600多人在湘潭，湘潭军分区承认了，司令员赵仁山写了坦白书。上次我当面问，他没说，黄司令员又问一次，也没说。他的坦白书，准备印出来，给大家看看。各军分区有这种事的，要向黄司令员，向党中央交代。解放军同志要忠于毛主席。犯了错误要改，改得越快越好。龙书金同志5月12日在广州开会时，给家里打电话，写了检讨。主席有五点批示，用中央、中央文革、军委文革名义转发到全国。"

周恩来念了毛泽东的五条批语，然后说："从5月14日，主席批湖南省军区党委检讨，到现在70多天了。赵仁山尽管当面说谎，现在坦白了，还是好事。他正在负责收枪，已经收回了一部分，还要继续收。当然，光靠他一个还不行，在家的其他领导同志都要负责收。现在湘潭发出900多支枪，从湘潭、长沙以南到韶山，变成'高司'、'百万雄师'、'产业军'的集中地，这里不只是主席的故乡、主席的旧居，而是主席的出生地，怎能搞成这样呢？

黔阳、常德、衡阳等地也有类似发枪的情况，这些地方的军分区也要像赵仁山一样，向黄永胜同志，向广州军区，向党中央交待这个错误。希望其他军分区，衡阳、郴州、零陵、黔阳、常德，都要检查一下。各分区是一样，在京认识更深，回去才能改

正。自己先检查，再打电话做工作，把思想搞通，把事情搞清楚。“

周恩来要求：“省军区继续检讨，书面检讨可能明天定稿。”

他说：“解放军支左从今年起，湖南驻军支左从处理‘湘江风雷’问题起。中央批件有错误。无论如何，各军分区、武装部不要再继续犯过去的错误。发的枪自己收回。有的地方所谓抢，实际上是发的。湘潭承认啦！是错误的。

群众组织方面，发现有这个趋势，特别是军分区可以发枪，我们为什么不能抢呢？ 这是从江西开始的，影响到湖南，刚才听说又影响到广州，这个问题就严重了。保守派围攻造反派，加至派人挑动农民进城包围造反派，真正的左派要求武装是可以理解的，是必然的。造反派要求武装是正当的。

‘造反派当然要求武装’，这是最高统帅的指示！今后按规定有组织的武装基干力量，毛主席有指示，这还要跟同志们商量，但总不能因为要武装就抢枪， ‘抢’总是不合法的。江西的例子就是军区，分区怂恿，允许策划发枪给保守派，开枪打人，并且与农村结合包围城市，发生了莲塘、赣州最大的‘7·10’流血惨案，赣州造反派死伤很多人，是长江流域最大的流血事件。因此，造反派觉得赤手空拳，处于挨打地位，他就要夺枪，首先夺警卫部队的枪。军区犯了严重错误，但一直没有开枪，让抢去了。后来，让两派来北京协商，达成了协议，最后不抢了。造反派最听中央的话，坚决执行协议，很快把武器集中封存起来，情况好转了。但我知道，保守派尚未交，我们建议就地封存。我们对造反派给予信任，保守派不敢动了。

然而，新的问题又来了，军区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失去了威信，就另调野战军，全省各地都要求派部队去。如从山东、广西调到江西，那么多军分区，野战军不可能分到每一区，部队一分散，保守派又来夺野战军的枪，先出在萍乡，南昌城外青云铺师部的枪也夺了。我们严厉的说，这种枪你不能夺。这些部队支左有成绩，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我们宣布：野战军的枪不能夺，人不能捉，更不能打，机关不能冲。真正造反派一定要坚定执行中央决定，在这个问题上考验坚定的左派。

国内调动野战军，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我们最高统帅的命令，林副主席同意去的。这样你还夺权，还要抓人，就无政府状态了，如果是真正的革命造反派，是不允许的。我今天举的江西这个例子，由于军分区，武装部发枪给保守派，造反派抢枪是有理由的，像其它地区造反派少，去抢还可以，长沙地区造反派那么多，还抢枪这不应该。

长沙秩序很乱，有点无政府倾向，不要说的太严重了。郑波副军长坐车出去都被抢了。”

众笑。周恩来接着问：“能不能允许？”

大家同声回答：“不能。”

“工联”代表：“长沙过去就有几个人一个组织到处抢，有的是流氓阿飞。”

“长沙工人”代表要求：“派军队镇压这些组织。”

周恩来：“你的意见对。调军队去，可是，听说抢枪，只能将调去的一团全部徒手，84团的枪也被抢了，徒手开入长沙，我们很难过，这是从来没有的事。你们想想，为什么把形势造成这

样？当然，我们有责任，我们工作没做好，对不住伟大统帅和副统帅。造反派自己，如何自卫，你们研究个办法。”

一代表说：“长沙大街上，一个小孩都背着两只枪。”

周恩来：“你叫什么名字？你说得很好。一个小孩子挂两支枪，谁也不能管。外宾要求去韶山参观，只好暂时劝阻。韶山是主席旧居、世界革命的圣地，不让参观啦！你们不感到难受吗？”

“工联”代表：“韶山已住上‘红色怒火’和‘高司武工队’。”

周恩来：“首先是长沙要安定，一定要建立革命的新秩序。还打算多派一点野战军部队去，由广州军区黄司令员筹划。乱抢枪、乱抢车，怎能建立革命的新秩序？要相信和依靠他们，你们把军队的枪、车都抢了，你们还能比军队有威信？无组织的，成为乌合之众，有组织，就好办了。一定要懂得革命的进程，要有步骤、有计划。不能听其自然，听其自然不符合毛主席提倡的大民主，不符合毛泽东思想。必须说清楚，凡是过去乱抢的，要加以整顿。

马坡岭、红山庙都去抢。‘工联’挺身而出，组织人保护马坡岭。精神是好的，他们声明：你要抢，我就开枪，不抢，我不动，是好的。是无产阶级精神。是无产阶级风格。需要这样，是毛泽东思想武装的战士。值得学习，要提倡，群众组织会来学习。过去自由夺枪是错误的、是非法的。你们打电话回去，停止抢枪。这对所有群众组织都是个考验。”

“其它问题还要研究一下。运动要向前发展，正在商量能在北京谈判中，把湖南的领导机构、组织形式确定下来，整个面貌才能焕然一新。”

周恩来说："正在起草关于湖南问题的指示。"然后问："大家还有什么问题？"

孙素洁要求军区开展四大。周恩来回答说："军委有规定，要商量。真正的造反派当军区受到冲击时。是否应该更好的把内部秩序维持住？"

"工联"代表："黔阳告急，丁健司令员支'保'，发了700多支枪，王副司令员带800人退到邵阳，打死的已查出20具尸体，几百人被关。旧社会土匪头子张平等的子弟又起来了，欢迎47军进驻湘西第二次剿匪。"

周恩来："请联络员散会后谈谈。"

"工联"代表又说："常德造反派300人从长沙杀回去，受到市武装部刘部长和关政委带领'红联'和大批农民围攻，已死4人。"

周恩来："应有组织的前进嘛！并不是拿着枪就能打仗。左派武装要好好研究，有计划有领导的进行。"

"工联"代表汇报衡阳以学毛著训练班为名，培养武工队。里应外合，抢军分区的枪。周恩来要衡阳分区周兴林注意，采取湘潭态度。

"工联"代表又汇报岳阳交通阻塞情况。周恩来要岳阳分区魏司令员注意，并说："铁路由野战军护路，在抓革命、促生产的号召下一致起来，不要和外面串连，各派都要想想整体利益、全局利益。要用实际行动证明自己是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

他再次强调说："收枪、劝阻农民进城武斗是军分区的主要责任。"

当“工联”汇报湘潭炮打周恩来和戚本禹等中央领导的情况时，周恩来大笑，对戚本禹说：“我是定时炸弹，你是黑后台？”

“红联”代表辩解，戚本禹对他们说：“不要光相信给你们打的电话。”

“红联”代表刘秀英说：“贫下中农热爱毛主席，但对文化革命不理解。简单地说农民是保守派，是受挑动的，大家想不通。为什么会受挑动呢？希望中央做思想工作。”

周恩来：“谁说是保守派。”

虽经中央在北京做工作，但是长沙那边还是鞭长莫及。就在中央第五次接见湖南代表团结束的当天，湖南马坡岭和工程兵学院又发生了“工联”和“湘江风雷”武斗。双方都有受伤。

当时，“湘派”20多个组织在工程兵学院，对外称341部队的“红色硬骨头战斗兵团”开会，研究关于“文攻武卫指挥部”的问题。因彭德怀问题离职休息的原山西省军区副司令员蔡爱卿也参加了会议。

下午，由于“工联”的汽电厂人员与“青年近卫军”为汽车的归属问题在341大院内发生了武斗，会议中断。

8月7日，47军军部全部移驻湖南省会长沙。军部设在黄土岭的解放军政治干部学校大院内。

8月8日，“湘江风雷”的叶卫东、“高校风雷”的陈勇共同从北京给长沙回电，称：省革筹的名单是中央定的，要求尊重47军、省革筹的权威。这一回电在长沙的“湘江风雷”中引起极大的不满，张家政称其为“大毒草”。

而在8月8日这天，湖南“高司”在北京的代表给中央文革交

上书面检讨。湖南省军区也上报了《关于支左工作中所犯错误的检查报告》。

8 月 8 日，为了庆祝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颁布一周年，江西省萍乡市两派群众组织，“市联”和“市大联筹”，都分别组织大批人员上街游行，均出动高音喇叭宣传车，呼口号，撒传单。当“市联”的游行队伍行至十字路口时，前方传来了“市大联筹”高音喇叭发出的一阵阵呼喊：

“‘市联’受蒙蔽的群众，请你们立即停止前进，迅速解散队伍，尽快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

“受蒙蔽无罪，反戈一击有功！”

但是，“市联”的游行队伍不为所动，继续朝人民公园方向前进。

“啪！”不知从何处射来一颗子弹。游行队伍开始出现混乱。手持土枪土炮、走在队伍前列的“市联”人员立即靠近“东方红”照相馆的后山，用土炮开了一炮；然后开始攀登山上的一座消防瞭望塔。

突然一声巨响，对方投来一枚手榴弹，炸得攀登者人仰马翻。两派激战的枪声响起。

当晚 20 时许，“市大联筹”武装人员开始向“市联”驻地萍乡饭店发起攻击。“市联”武装人员则在窗口和楼顶上顽强抵抗。密集的子弹打在萍乡饭店的水泥墙上，发出“嗖嗖”的声音。平日喧哗的十字路口早已空无一人。“市大联筹”武装人员使用的是由 26 军提供的新式半自动步枪和冲锋枪；“市联”武装人员使用的是从市人武部抢夺的七九、三八式步枪和少量老式冲锋

枪和机关枪。由于武器装备悬殊，战斗持续到 9 日凌晨，萍乡饭店被攻克。占据市人委机关的“市联”人员闻讯，纷纷向上埠、山口岩方向逃散。占据矿务局机关大楼的“萍总”人员亦向上栗、鸡冠山方向逃散。此次流血冲突打死 5 人，打伤 51 人。

## 第 796 回：上海市，先武装民兵十万　王八七，约见外交部讲话

毛泽东觉得上海的形势和武汉的形势大相径庭。当张春桥向他请示重建上海民兵时，毛泽东同意“武装十万工人。”

张春桥问：“要不要发枪？”

毛泽东说：“每人发一根棍子！”

8 月 7 日，姚文元从北京打电话给上海的王洪文，告诉他：“春桥同志和我共同表示一个明确的态度，支持成立上海民兵指挥部，建议先组织武装民兵 10 万人左右。”

8 月 7 日，北京民族学院“东方红”与“抗大”发生大规模武斗，有不少外校人员参与其中。“抗大”损失惨重，据说被打伤者达 200 多人，其中重伤者 56 人。

8 月 7 日下午，外交部在东交民巷 30 号办公楼一层小礼堂召开第一次批陈小会。陈毅到会，各单位派代表参加，与会者总共不到 200 人。造反派违背周恩来指示，在会场内悬挂“打倒陈毅”的大标语。午后 13 时，周恩来亲临外交部准备出席小型批陈会。当他走进外交部院内，卫士长成元功报告说，会场内悬挂有“打倒三反分子陈毅”的大标语！已经踏上楼前石阶的周恩来立刻止步，当即严厉质问前来迎接他的会议主持人：“昨天说的好好的，已经达成‘协议’了嘛，你们还这样干！”说罢，他站在台阶上不走了，要求会议主持人撤下标语，否则绝不参加会议。

经过一小时的僵持，会议主持方还是无奈地摘下会场内的横幅大标语。

会议进行期间，两派多回合地大打“口号战”。偏激派呼喊“打倒陈毅!”，稳健派立即回应喊“批判陈毅!”；偏激派狂喊“坚决打倒陈毅!”，稳健派立即回敬喊“彻底批判陈毅!”此时，发言人的批判内容已不再能引起与会者的关注了。

下午 17 时许，会议结束时，周恩来高呼“外交部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万岁!”。

19时，中央文革办公室电话找外交部姚登山，说：“王力今晚9时在他的钓鱼台2 号楼住所接见你和造反派的代表。”

姚登山和“联络站”一把手王中琪等7人于当晚21时按时来到钓鱼台。正好那天晚上有文艺演出，中央文革的人全都看节目去了，钓鱼台只有王力在家养伤。他拖着那条打着石膏绷带的伤腿，靠在躺椅上，和大家一一握手。

姚登山和“联络站”代表向王力表示了亲切的问候和敬意，并询问王力的伤情。王力说：“不要紧，快好了。”

姚登山问：“武汉问题解决了吧？”

王力说：“解决了。武汉问题证明一个道理，凡是烂透了的，可以很快、彻底、痛快地解决，凡是不痛不痒的，要拖些时候。武汉这次事件后，军区立即改组，司令部在这次事件中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8201部队调出去改编，公检法彻底改组，武装部彻底改组，对革命造反派坚决支持。对‘百万雄师’本来想慢慢诱导，现在问题一清楚，下面起来造反，问题就解决得快。”

他接着说：“今天晚上请你们来谈一谈外交部文化大革命的情况。我们看到外交部一份材料，我们小组的同志议论了一下。晚上他们有事都出去了。我有点空，找你们闲聊一下，什么都可

以谈。”

“联络站”代表首先汇报了外交部的运动情况，谈到“打倒陈毅”的口号时，他们纷纷诉说委屈：“我们开批判陈毅的大会，挂出了’打倒三反分子陈毅’的大标语。但总理不同意这样做。”

代表说：“我们认为，陈毅是外事口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根据其三反言行，属于敌我矛盾。至于将来对陈毅的处理，那是中央决定的事，我们最后坚决服从中央的决定。我们‘联络站’也有同志提出‘要与陈毅血战到底’的口号。”

王力问：“这个道理你们跟总理谈过没有？”

“联络站”代表：“有关对陈毅问题的看法，我们多次与总理谈过，但现在外交部运动阻力仍很大。”

王力马上说：“外交部运动阻力大？外交唬人嘛，别人不能干，了不起，把它神秘化，只有少数专家才能干。你这外交就这么难？我看处理红卫兵内部的问题比这复杂多了。红卫兵就不能干外交？”

王力问了外交部“革命造反总部”的情况，询问该组织有多少人？“联络站”代表作了回答，认为这是保守组织。王力又问外交部“攀险峰”组织的情况，“联络站”代表介绍了“攀险峰”的主要观点，提到在7月17日“粉碎刘少奇新反扑誓师大会”上，“攀险峰”攻击“联络站”提出“打倒陈毅”的口号是方向路线错误，是矛头指向无产阶级司令部，上了刘少奇的当。

王力说：“他们说你们方向路线错了，那陈毅的方向、路线倒对了？”

“联络站”代表说：“攀险峰”和“总部”、“驻外革联”

等组织的观点实际上是一致的，他们是搞统一行动的，就是大字报、标语等也都是联名写的。

王力：“那外交部基本上还是两大派嘛！”

“联络站”代表：“运动搞了这么长时间，外交部走资派没有真正打倒。领导干部没有敢于站出来亮相的，业务还是原来的班子抓。”

王力突然就激动了，问道：“你们1月份夺权，夺了多少权？‘业务监督’权有多少？能监督得了吗?部党委班子没有动吧？革命不动班子？这么大的革命，班子不动还行？！为什么不能动一动班子？戚本禹那天对姚登山同志讲的话是对的。总理不是讲过‘三结合’吗？老、中、少‘三结合’，为什么外交部班子不可以搞‘三结合’？”

“联络站”代表谈到有些司长、部长只划圈，举了个例子：有个案子徐以新看后写上“怎么办”，让其他副部长传阅，最后传一圈回来，部长们都划了圈，案子上仍然是“怎么办”。

王力：“这是官僚机构，不管事，何必还要个人在那儿？”

外交部监督小组代表在谈到部党委对抗中央文革时，王力问在场的中央文革宣传组负责人之一朱庭光：“他们现在是不是威风小点了？”

朱庭光答：“他们不管了。”

“联络站”代表插话：“中央文革批评后他们采取撒手不干，消极抵制。”

王力对部监督小组的人讲：“他们不干我们要找你们了，你们现在监督。监督不了嘛！？”

监督小组代表："中央许多精神下不到我们这里，如：主席7月1日对缅甸问题的指示我们不知道。关锋同志对新华社的讲话也是我们自己从新华社那里搞来的，也不知道部党委知道不知道，我们1月份夺权后有些不称职的司、处长、副部长让他们靠边站，那时候业务上我们搞的还可以。"

王力问："那为什么又退了？原来冲了一下，后来又缩回来，现在停止不动，下阶段怎么办？没有很好考虑吧？"

"联络站"代表答："整风时有人批评外交部夺权过头，说业务大权是中央的，不能夺。"

王力异常激动地说："这话不对！外交业务权指路线方针政策这个权集中于中央，集中于主席。革命和业务不能分开嘛！如果你们夺了权另搞一套路线、方针那就不对。按照中央的方针政策，具体执行和贯彻，谁执行和采用什么方式是另一个问题。干部司掌握人事大权不能动，那么照这样说来中央组织部要恢复咯？它掌握最大的人事权嘛！

你们要充分运用监督权，人事也要监督，干部路线是政治路线的保证。挑干部就是要挑革命派，不能挑保守派。不合理的挑选干部，你们监督就要把他监督掉。挑干部出国也好，干什么都好，第一条看他是不是革命，是不是拥护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没有这一条什么都不行，不看这一条，只看什么级别，什么资历，什么长，这个统统打倒。"

说到这里，王力坐了起来，用手挥了一下，很激动地说："二十几岁可以当中央部长，毛主席说的为什么不可以？二十几岁可以出来做领导工作。我们小组戚本禹同志、姚文元同志三十几岁。

没有这首要的一条，不管什么‘长’，多少级，出去代表谁？代表毛主席，还是代表刘少奇、邓小平？我看你们现在权没有掌握，有点权才有威风。出国首先提出要什么‘长’，多少级，不管是拥护毛主席的还是拥护刘少奇的，这不行，这是原则分歧。要是这样，革命就不要革了，以后出去要革命派来挑选，来审查。我们革命派，首先看你站在哪一边？你不革命，什么长，多老的资格都不行，当然我们也要负责全面审查，保证不出乱子。

看来现在外交部还是原班人马，原封未动。造反派也不是所有老年人都不要嘛！路线方针、政策中央主席决定，至于怎么样贯彻、执行，还是三结合班子好，以革命造反派为主体，什么形式大家创造。因为要办外交，要几个‘长’，当然这几个‘长’不一定是原来的‘长’，谁站出来革命谁合适就谁干。组成的新班子坚决批判‘三降一灭’，贯彻毛主席的外交路线。你们要记住一个最根本的分界线，是拥护还是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不是以此为分界的条条框框多打倒一些好。”

“联络站”代表：“英勇护卫我国国旗的赵小寿同志回国后，分配工作时竟有两个单位都不要，部党委一次会议上还说赵小寿不能作为外交战线上的英雄人物典型来学习。”

王力：“这是专政！”

“联络站”的代表说：“有些干部不称职，但是不能让他们靠边站，说是还没定性，不能撤职，要到运动后期才能处理。”

王力：“那么文明啊！这是干革命！有人不做工作还让他看文件干什么？造反派为什么不能看文件？只要工作需要就可以看。反毛主席的倒可以看，这是笑话！

今天请你们来要和你们谈一件事。8 月 5 日姚登山同志向全部同志传达了关锋、戚本禹同志和他的谈话。现在我们知道有人反对，现在竟有人告状告到我们这里，告到总理、伯达、康老、江青、中央文革小组，这件事证明文化大革命搞了一年了，本来是正常的常识，而外交部竟有人还告状。名义上攻击姚登山，实际上攻击戚本禹，这不正常。这不是革命势力，这是保守势力。我反对外交部‘革命造反总部’的做法，鲜明地反对！姚登山同志传达后群情激昂，竟成了罪状，说什么‘居然喊出打倒刘、邓、陈’的口号，对他们来说这成了罪过。为什么不能喊？文化大革命革了一年了，竟在外交部出现这种怪现象，令人深思。所以我今天晚上找你们来谈谈。”

王力念了那封信的全文，继续说：“我反对‘革命造反总部’这种做法，这是错误的。关锋、戚本禹同志的讲话是正确的，姚登山同志传达是对的，群众高兴是好事，是革命表现，长了革命派的志气，做得完全对，我们支持你。为什么竟成了罪状呢？陈毅应该到群众中来接受批判，这是总理和中央文革的一致主张，他们不要想在这中间找什么裂痕，挑拨离间。我这样说并不是对你们偏听偏信，我们本来对‘总部’不了解，现在它自我介绍了。我们经常是从这些告状的人中看出问题的。不对头，相当不对头。我们不赞成这封信，集中攻戚本禹。这种作法不对，这种看法是错误的。戚本禹看了，他说那些是他讲的，他负责任。我们从信中看出这不是个别现象，我们从中看出问题是严重的这是一种思潮。”

“联络站”的人谈到整风，检查了他们对总理问题上的错误。

也谈到有些人现在觉得就受压抑。

王力说："整风应长革命派的志气，把毛病去掉，不要磨掉锐气。"

"联络站"代表："我们'联络站'成立才半年多，整风就花了3个月，做了3次检查。"

王力说："你们有多少好检查的？他们问题那么严重，他们检查了多少？你们以后有什么材料寄给我们。老早就说要找你们，排不上队，没有办法，有些省的事更紧迫。毛主席和总理要我过问外交部，在主席那里说的。但是一直没有时间，排不上，各省的问题排在前面。每天还要抓报纸、广播，我分工管这个。文革小组对革命派总是支持的。你们有什么过火？我没有看到有多少过火的地方。当然不是叫你们过火，去搞打、砸、抢。打、砸、抢我们是坚决反对的。要你们搞彻底革命，彻底贯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彻底搞掉'三降一灭'。监督小组不能成为花瓶、点缀品。要真实地监督，在一切重大原则问题上要提出看法，意见可能对，也可能不对，凡是重大的原则性争论问题，应提到党中央，要坚持原则。

别的方面我们没有调查研究。'总部'给我们来信，我们看出问题的严重性。我们可以明确表态：不赞成这个'总部'。他们的意见是不对的，错误的。姚登山同志在印尼造了帝国主义、反动派的反，回国后也要造修正主义的反，修正主义就是走资派，你旗帜要鲜明，态度要明朗，支持革命派，我们坚决支持你。"

"戚本禹对'总部'来信和传达记录都看了，他说姚登山传达的没有出入，是他讲的话，他负责任。"

“揪陈毅大方向当然对，为什么不可以揪？！他犯了错误又不到群众中来接受批判，做检查，就可以揪。一月份他检查了，后来他自己又翻了，翻了后他不到群众中来，揪他有什么不对？不是革命行动，是反革命行动？堵了外交部大门。这当然是方法问题，是次要的，不要把人家方法上的问题夸大上纲。说得那么严重。‘六·一六’对总理的态度是不对的，要改。原则性问题不对，中央文革小组都指出了，6 月 3 日我们小组的同志差不多都去了。都讲了话。支持革命派同时教育革命派，我们向来是这样的。‘红旗造反团’、‘六·一六’揪陈到外交部门口安营扎寨大方向有什么错？！一点也不错。”

“监督不能做点缀品，重大的方针政策上不能让步。当然，看不出问题是另一回事，夺权夺了半天没有多少权，挂了这个招牌。以后监督小组不只监督业务，整个负责发动广大无产阶级革命派起来监督，凡是一切不合理的事都要监督。什么机密神秘化，对革命不利，不合理的要监督掉，等级森严，该批的就批，该改的就改掉。”

外交部监督小组问：“以后业务上的事是否也可以和中央文革联系？”

王力：“有原则性争论就打电话给我们。”

“联络站”代表把“联络站”17个战斗队写的“关于联络站某些负责人再次对抗总理的联合声明”递给王力看。王力仔细阅后说：“也是挑拨中央文革和总理的关系，跟‘总部’一样。”

“联络站”代表最后表示：“我们下定决心要把外交部的文化大革命搞彻底，决不能让它半途夭折，我们准备着有大反复，

革命造反派要准备重新被打下去，但即使这样也要坚持到底！”

王力：“那不会的，你们干吧。”

深夜 23 时 45 分，会谈结束。因为这天是 8 月 7 日，于是，以后就有了著名的“王八七讲话”。

后来散发的关于“王八七讲话”的传单上有这样一段按语：

按：陈毅这个庞然大物，其三反罪行累累，早在今年二月，周总理、中央文革根据群众的强烈要求，就已命令他必须滚到群众中作检查，接受批斗。但是，他一直负隅顽抗，拒不到群众中来。因此，北外红旗革命造反团等革命组织于七月十七日派出了几百名战士，到外交部门前安营、扎寨，掀起揪斗陈毅高潮。北外六一六红卫兵团等曾一度冲进外交部。外事口文化大革命形势一片大好。然而，一小撮保陈小丑却歇斯底里大发作，制造了一连串非议和谩骂，恶毒攻击造反派，恶意挑拨总理和中央文革的关系。八月四日戚本禹同志在一次会上和红色外交战士姚登山同志交谈时说：革命小将揪陈毅的行动是革命的，大方向完全是对的，冲外交部是方法问题，次要问题。又说：陈毅的问题是很严重的，应该到群众中去好好检查。戚本禹同志的这一席话，大长了革命造反派的志气，大灭了保陈派的威风。这一小撮小丑竟恼羞成怒，到处造谣惑众，说什么姚登山同志“捏造”戚本禹同志讲话，说什么“戚本禹算老几”，“戚本禹不能代表中央文革”等等。同时，他们还写信给中央文革搞什么“控告”，掀起了喧嚣一时的反中央文革的反革命逆流。就在这一形势下，王力同志八月七日晚接见了外交部革命造反联络站的代表姚登山等同志，并同他们进行了亲切的谈话，对外事口文化大革命作了重要的指

示。现将外交部革命造反联络站整理的谈话记录转发于下。

## 第 797 回：十二军，摩托化开进合肥　八月八，工学院制止武斗

8 月 3 日，12 军赴皖先行的炮兵室副主任王灿章他们按照军长李德生的命令先行来到合肥市，住进了安徽省军区招待所。很快，李德生就接到王灿章的第一次汇报：

“去往合肥的路况很差，我的头部因颠簸而撞在吉普车前遮阳板上，被戳了一个大口子。我已经就近找乡村卫生院进行了简单处理，现在头上缠满纱布。刚进入合肥市区，就遇到荷枪实弹的一派群众组织。他们将我们车拦住，一看有个负伤的解放军，赶紧问是不是被另一派打的。我说明了情况，他们就让我们的车通过了，没有为难。

合肥的主要街道两旁的大楼上，窗户都用木板、沙袋堵塞，对立双方不断地相互抛掷石块，还不时地打冷枪。大街上，除了两大派组织的高音喇叭在高声广播外，几乎看不见行人，市民都不敢上街。

车行到省军管会大门口时，那里聚集了好几百人，各式各样的花圈，层层叠叠，从平地一直堆放到省军管会大门的门框上，高音喇叭放着哀乐，原来是有一派群众组织在开追悼会。只听高音喇叭里放着哀乐，播音员控诉‘战友被害’经过。我看合肥两派对立的确很严重。”

李德生听完汇报， 让王灿章一行继续观察周围事态，有新情况随时报告。

从 8 月 6 日开始，12 军分别采取铁路和摩托输送的方式，

日夜兼程向安徽各主要地、市以及武斗最严重的地区开进。李德生率军部轻便指挥所提前向合肥开进。为了减小目标，他特意乘坐了一辆旧吉普车。

8 月 7 日，军部指挥所的车队刚进入合肥南郊第 104 医院附近，就被一派群众组织的岗哨拦住："前面正要进行武斗，解放军不要开过去，免得误伤。"

李德生下车，看见武斗人员为了区分"敌我"，还在手腕上系了红布条。双方都构筑了武斗据点，有的据点还拉上了铁丝网。他们的武器也是形形色色，有木棍、砍刀、步枪、手枪，有的还把机枪架在楼顶上。双方乒乒乓乓打了一阵，互相没有伤亡。

李德生命令作战参谋：通知大部队全体下车，按原计划徒步前进，要以整齐、威武的分列式队形，插到两派武斗群众中间；同时要人人开口，宣传"要文斗、不要武斗"，以正确的宣传和严肃的军威，形成一种气势，坚决制止武斗。如果遭到群众的辱骂殴打，也必须做到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绝不能开枪。如果群众要求评理，也不表态，不带倾向性，不纠缠两派的具体是非。

部队接到命令，迅速跳下卡车，排着整齐的队伍，喊着"要文斗，不要武斗"的口号，直插武斗的两派组织之间，将两派人员分开。正在对骂的两派群众，还从来没有见过野战部队这副气势，他们看见中间隔着解放军，怕伤了解放军而让对方抓住把柄，也只好住手。霎时间，部队隔断了剑拔弩张的两派武斗群众，迫使双方偃旗息鼓。

随后，12 军的部队乘坐 100 多辆卡车，浩浩荡荡开进合肥市。

后来才知道，这是因为 12 军奉调入皖的消息，已由北京迅速传到安徽，造反派们想在部队还没有进城之前，就给 12 军来一次考验，看看这个 6408 部队，即 12 军，是真支左还是假支左，试试这个 6408 部队对武斗的感觉怎么样。当合肥市民们听说 12 军没有被武斗挡在城外，顺利开入城内，并且制止了在南郊的一场武斗时，非常高兴，十几万群众自发地涌到大街两旁，热烈鼓掌欢迎 12 军的到来，他们喊口号，放鞭炮。大街上贴出了许多大标语：

“欢迎 6408 部队来安徽支左！”

“拥护 6408 部队对我们的支持！”

因为这些善良的群众，包括一些参加武斗组织的人员，对那种无休止的打派仗，搞武斗，早已十分厌恶，在一起酝酿已久的大武斗即将爆发的时刻，看到这么多解放军进城，都感到有救了。只见长江路上的热闹地段，鞭炮炸的纸花铺了一地。这种动人的场面，极大地鼓舞了 12 军搞好“三支两军”的决心，对坚决制止武斗也充满了信心。

很快，部队按预定计划部署完毕，第 31 师驻蚌埠、淮北和宿县；第 34 师驻淮南、六安；第 35 师驻芜湖、安庆、马鞍山；独立第一师驻阜阳；军区后勤第十四分部驻铜陵；12 军军部率 91 团、工程建筑第 114 团进驻合肥市。同时新成立了安徽省“三支两军”办公室，由 12 军参谋长林有声担任办公室主任。

李德生在军部进驻合肥市的第二天，召开了 12 军与驻皖的二炮、60 军、68 军等有关领导人联席会议，传达了中央对安徽“三支两军”工作的指示，强调首先要制止武斗。

会后，李德生立即向周恩来作了电话报告。周恩来在电话里对李德生说："12 军的部队执行任务坚决，行动迅速，采取的制止武斗的措施有力，我表示满意。安徽的驻军很多，海、陆、空都有，搞好兄弟部队之间，部队内部上下之间团结，非常重要，只有思想统一、行动一致，才能有力地制止武斗，稳定局势。"

李德生表示："坚决贯彻总理的指示，搞好团结，通力合作。"

8 月 8 日一大早，在合肥市六安路小学和安徽工学院附近。合肥市两派又开始互相放枪对射，子弹在大街上横飞。

当天下午 16 时左右，12 军军部的顾旭东到工业大学和"827"见面谈关于制止武斗问题，"827"头头梁守福和胡玉才、副省长彭宗珠等人向顾旭东汇报。这时，安徽工学院纵队长张乐寿打来来电话，告诉梁守福，工学院已被围得水泄不通。

原来，下午 16 时左右，以"淮南红卫军"等武斗组织对安徽工学院"827"发动了大规模的进攻。

"还有没有撤退的通道了？" 梁守福问。

"没有啦。"张乐寿回答说。

梁守福指示："将工学院所有人员撤至五号楼，护校的武装人员（大约一个班，十来条步枪）也全部撤至五号楼，集中防守。没有集中的人员，全部就地隐蔽，不得乱跑乱动。保护电话总机和广播，随时同我联系。切断校内所有照明电源，天黑后他们不敢贸然进攻。"

接完电话，梁守福立即向省军管会制止武斗办公室打电话找钟国楚，钟国楚说："我们已经听说了，手里没有兵力，只好动用六安路看守所的一点兵力。我们正在同 12 军商量如何解救工

学院的学生问题。”

梁守福又回到汇报现场找到顾旭东，将工学院被围的情况报告给他，决定中止汇报。

安徽工学院学生被围的消息在工业大学迅速传开，李文安和李汝治等找到梁守福，要他尽快拿主意。梁守福安排他们两个带几个人从环城路东头，向工学院靠近，看看那边的情况。

大约 18 时左右，“搬运兵团”二、三十个工人冲进梁守福正在打电话的无线电系办公室，只见这些人全副武装，冲锋枪、手榴弹全在身上。他们对梁守福说：

“我们的任务就是要保护革命领导干部和‘827’小将的，你就看着工学院几十名学生倒在敌人的枪口下吗？”

他们是来请命的，要求到工学院支援那里的“827”。梁守福对他们说：“李文安、李汝治已经带几个人到前线了解情况去了，他们还没有消息，你们怎么去？从哪里能接近工学院？情况不明，你们去了也是送死。”

这时，不知谁大喊一声：“梁守福，你是叛徒，你要不下命令，我们就先打死你。”

说着他们便将枪口对准了梁守福的头，将他逼到了墙角。

梁守福依然平静地说：“你们打死我很容易，但解决不了安工的问题。你们手里不是有武器吗？要我下命令干什么？自己可以去，要我下什么命令？我劝你们不要乱动，多死几个人没有意义。”

就在这时，省军区“三支两军”办公室的茼自泽处长到了，他在门口看到这种紧张的场面，赶紧大喝一声：

“都把枪收起来，你们知不知道五四式冲锋枪容易走火？”

梁守福问蔺处长知不知道工学院的情况，蔺自泽处长说：

“我们都知道了，能派去的人都派去了。钟司令要我来，看看你们这里的情况怎么样？你们不要动，一切由军队来处理。”

说着，蔺自泽已走到窗口，用右手拉着自己的领章激动的说：“我就不相信，这个东西没有用！”

蔺自泽将工人劝走后，把梁守福从墙角处拉出来，要他赶快吃点饭，相信解放军能处理好这件事。还说：

“刚才，我真替你吓出一身汗，场面那么乱，不管谁的枪走了火，都会立即打死你。”

他临走时，握着梁守福的手说：“你们不动，我就放心了，你自己也要注意安全。”

我们再看工学院的武斗现场。到了傍晚，合肥上空已是硝烟弥漫，大楼也好，街道也好，甚至是居民的住宅，都成了枪战的工事。沙包垒成的掩体，铁丝网缠成的鹿砦，废旧车辆堵成的障碍，遍布在众多的路口街旁。成群的大楼楼口，枪眼更是密布如蜂窝。连日来已经发生多次流血事件，两派群众没有因为死亡、流血而放弃敌对情绪，相反，敌对情绪犹如箭在弦上一触即发。个个红了眼， 大有不决一死战誓不罢休的架势。

他们把几个大油桶灌满汽油，推到武斗现场的大楼下面，准备随时点燃，一次楼毁人亡的灾难即将发生。李德生得知消息后，立即调派几十名机关干部，带领 3 个连队赶到武斗现场。他特意交代：

“告诉干部，不要以为有枪声就是打仗。这不是打仗，这是

做群众工作，是在枪炮声中做群众工作！”

12 军政治部宣传处的宣传车即刻出动，政治部和司令部值班人员两人跟车，广播中不停地发出呼喊：

“我们是 6408 部队，是毛主席派来的，坚决反对武斗！”

广播车朝着枪响方向开到肥河大堤，流弹不停地从他们头顶上嗤嗤掠过。

司令部的刘参谋指挥宣传车开到六安路中央，战士们举着《毛主席语录》高呼制止武斗的口号，并用高音喇叭宣传政策，劝阻参加武斗的人员，收起武器，停止斗殴和开枪。

这一果敢行动迫使双方的枪声稀落了下来，他们都没有想到解放军会如此勇敢。大家都明白，现在开枪打伤了解放军战士，被对方抓住，就输了理。

解放军跳下车，来到路南的机关大院。院落很大，挤满了人，地上坐着一些被反绑的学生，一见解放军军人，都放声哭喊起来：

“解放军啊，快救我们，他们要杀人啊！”

12 军宣传处干事刘家驹问一个持枪的看守：“他们是哪一派的？”

答：“P 派的。”

“你们抓了多少人？”

“100 多吧。”

“怎么处理？”

“带回总部。”

“总部在哪里？”

“合工大。”

即合肥工业大学，是 G 派的大本营。

这时，一个头头站在场地中央发话："马上撤走，各班看好自己的俘虏，缴的枪都让他们扛上。"

在这人的指挥下，看守从地上拾起散乱的枪支，退下了弹仓的子弹，把枪支挂在俘虏的脖子上，俘虏排着队，在吆喝声中被押出南院门。

楼上 G 派的战斗人员，正被解放军上去的人三三两两地往下赶，一个小青年扛着挺轻机枪来到 12 军宣传处刘家驹跟前，对他说："有人被打死了。"他带刘家驹来到大院的东北角，这里有个石灰坑，坑里浸泡着一具蜷曲的尸体。

刘家驹让小青年放下枪和他一起各拽一只脚，把死者从坑里拉到坑沿。尸体浑身是石灰浆，白糊糊的，在夜暗中，还能辨出是个学生模样。

小青年说："我们 G 派攻进这座大院，他是被俘后给处决的。"

围观的人告诉刘家驹：死者是 P 派的敢死队员，外号叫小福子。

此时路北枪声又响起，刘家驹顾不上处理尸体，领着 12 军宣传处放映队的两个战士奔出大院，穿过马路，跑到了枪响的学校教学楼跟前，屋顶上的枪声骤然停了，有人向下喊话："解放军同志哟，快救我们!"

这是一幢三层楼房，两头的楼梯间堆的都是课桌、椅子，正在熊熊燃着大火，刘家驹找来根木杆一件件往外拨拉，两个战士把燃烧的桌椅用脚往楼前的草地上踢，终于掏开了一个通道。他们不顾余烬的高温冲上了二楼，二楼没人，又上到三楼，也未见

到人影。刘家驹仰头向屋顶高喊："解放军来了，你们都下来！"

稍停，顶层的天窗洞开，探出个脑袋来，说："我们下不来，还有负伤的。"

刘家驹和两个战士拉来几张书桌叠在一起，爬上天窗，到了屋顶的平台。许多人一下子拥过来紧紧搂住他，感激的话变成了一片呜咽。

刘家驹安抚了一阵，清点人数，一共 15 人，其中 3 人的腿和胳膊负伤了。

刘家驹问他们中的一个小头头："你们守楼的有多少人？"

头头说："100 多。"

"怎么还剩下你们十几个？"

"他们刚撤走了。"

刘家驹这才注意到，有一根长长的木头搭在楼后一棵杨树杈上，刚才枪响，可能是退路被 G 派切断，这十几个人才给截留下来的。刘家驹马上站到平顶的边沿向楼下喊话："门诊部的医生护士快上来，这里有伤员。"

刘家驹和两个战士把能走动的人从天窗一一送了下去，留下一个小青年照顾伤员，便和他聊起来。

这是六中高二学生。他告诉刘家驹："参加战斗的都是成份好，在毛主席像前宣过誓的。"

刘家驹问："为什么都挑成份好的？"

小青年答："亲不亲，阶级分，成份好的是保卫毛主席的铁骨红心。"

"誓言有些什么内容？"

“誓死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抛头颅，洒热血，生是毛主席的红卫兵，死是毛主席的红小鬼……”

医生护士上来包扎了伤员，并将他们送到楼下。这时已过晚上 21 时。

接着，解放军对武斗双方做工作，宣传了整整一夜，直到第二天凌晨，彻底平息了这场武斗。周围的群众得知这一消息，感激之情难以言表。他们纷纷说：“如果不是部队及时赶到，这些年轻娃娃和我们会有多大的伤亡就难说了。真是感谢解放军！”

这场武斗制止后，合肥市民争相传颂，赞扬 12 军是毛主席派来的好部队，真正是为人民利益着想，不顾自身安危的人民子弟兵！12 军名气大振。

制止武斗初次成功后，12 军党委再次要求已进驻安徽各地的部队，采取一切手段，不惜流血牺牲，坚决迅速制止各地武斗。

## 第 798 回：涪陵县，长江伏击运枪船　在城外，又截部队军火车

四川涪陵“贸派”于 8 月 6 日搬抢易家坝军械库后，8 月 7 日，驻涪陵地区部队支左领导小组、涪陵军分区、涪陵县武装部联合发表严正声明，指责“以赵树金、杜炳全为首的一小撮坏头头，指使红联司中不明真相的部分群众，切断军用电话，绑架我守库人员，抢劫涪陵军分区武器仓库里的武器弹药，企图以武装镇压涪陵地区的革命造反派。这是极其严重的罪恶行为。”

就在同一天，驻涪陵地区部队支左领导小组和涪陵军分区党委还向全区复员、退伍、转业军人发出一封公开信，重申 7 月 13 日中共中央关于禁止挑动农民进城武斗的通知中所说：“任何人和任何组织都不准以任何借口挑动农民进城武斗；更不能为了武斗，发动农民制造凶器，发给枪支弹药。”要求“每一个复员、退伍、转业军人都必须听毛主席的话，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

就在 8 月 7 日上午，一支部队的宣传队奉命在自来水厂旁边宣传关于制止武斗的精神时，“贸派”中有人向军队宣传队开枪，一位战士当场中弹牺牲，一位副连长重伤。

驻军支左领导小组就“87”开枪打死打伤解放军指战员事件发出“第五次严重警告”，指出赵树金、杜炳全一小撮坏头头，指使受其蒙蔽的群众，以步枪、机枪点射部队，造成一死一重伤，部队为了顾全大局，一枪未还。警告的措辞更加严厉。

涪陵军分区武器库被抢后，涪陵军分区经成都军区批准：可以发枪武装“革命造反派”，但涪陵县境内已经没有枪支可以用

来武装“革命造反派”，情急之下，只好从涪陵军分区下属的石柱县、丰都县、彭水县等县武装部调运武器到涪陵。

8 月 7 日上午，“贸派”得到这一情报，杜炳全对赵树金说：“‘二七’昨晚下去几只船，估计是到丰都、高镇运枪，不然就是装人，怎么办？船转来打不打？”

“贸派”的几个常委都在场，大家都说打，赵树金也同意打。他看了看地图说：“把火力组织好，珍溪、清溪、黄角嘴、新光纸厂作为滩头阵地。你们要把情况掌握准。”

杜炳全打电话让清溪那边注意观察，“贸派”的常委王付国亲自去“贸派”下属的“红航”总部，将无后坐力炮安在新光纸厂。

这时，杨淮从黄角嘴万油仓库带 20 多人来“联司”拿枪，杜炳全说没有了，赵树金说：“给他们一挺重机枪、步枪 7 枝。”

杨淮提议：“‘二七’船转来，我们用一只小木船装上汽油，把火点起烧他的船。”

赵树金说：“这是个好办法，烧不到也可以减少他的速度，那就好打些。”

他又说：“我们的人不要安排得太靠岸了，因为对方的船如被我们打得停下来后，对方的人上岸来我们好全部消灭。”

杨淮说：“要得。”就去领武器了。

8 月 8 日下午，涪陵轮船公司的 5 艘轮船从丰都启锚，执行向涪陵的武器运输任务，一批部队指战员奉命随船护航。

丰都城，就是闻名的“鬼城”，属涪陵地区管辖，在涪陵长江下游不足 100 公里的江畔。由于发生了 8 月 5 日的抢枪和 8 月

7 日的开枪事件，参加此次航行的人都明白，这是一次充满危险的航行，很可能是一场出生入死的战斗。从丰都出发前，船上用沙袋垒起防御工事，加厚了钢板……

5 艘轮船编成一列队形，溯江而行，船头拍起轻快的浪花，船上的人们心情紧张，一点也不轻快……

果然，船队进入涪陵县境内不久，在第一个河道狭窄处，突然从两岸发出砰！砰！砰！的巨响，震动了宁静的河谷，“贸派”向船队开炮了！紧接着，机枪声、步枪声响成一片，震耳欲聋，子弹在护船的沙袋和钢板上跳跃，船周围江面溅起大大小小的水柱……

船队加快马力，在火网中向前冲……

冲过火力网后，船队到了清溪镇，这里距涪陵城还有 30 华里，这里江面更窄，水流更急，船行必然减缓，江边有许多巨石，是良好的阻击阵地。

船队一接近狭窄的滩口，轻重机枪一齐响，哒哒哒地横扫而来，弹丸在船舱来回飞串，打得钢板当当当作响，几十发迫击炮弹落在船的周围，其中还发射了燃烧弹，炮弹溅起高高的水柱，船舱到处是水。

很快船上的人们发现，这次集中火力重点射击的是驾驶室和轮机舱——轮船的要害部位，也是薄弱的部位，领航员、舵手、轮机员处于最危险的地方，又必须坚守岗位。船队在急剧的颠簸中前行，船上进行了还击，压制最近的火力，掩护驾驶舱和轮机舱的安全，终于冲过清溪的火网。

冲过清溪的火网，马上就是韩家沱和黄桷嘴两岸夹击的火网

区，“贸派”将一只载满七八个汽油桶的木船推到江中，该船接近涪陵轮船公司的船队时，“贸派”用机枪将木船击燃，着了火的汽油漂浮在水中，江面成了火海，映红了山川，灼烤着船上的人们……

万幸！驾驶船队的都是经验丰富的川江船员，他们临危不惧，很快选择火势较小的南岸边，队形未乱，硬冲了过去，又闯过艰险的一关……

黄桷嘴，这里离涪陵城只有 10 华里多，长江在这里转个弯，涪陵城视线可及，人们纷纷从远处目睹了这场惊心动魄的“海战”。江面的枪炮声大作，涪陵全城都能听见。

船队驶过黄桷嘴，涪陵城已经在望，但危险远未结束，还有一个浪大水急的大滩——群渚！任何船只到这里都必须放慢船速，紧沿着江岸，小心航行，生命悬于一线，是死是活都要闯过这一关！

就在这个滩头，“贸派”的枪炮更密，直射驾驶舱和轮机舱，每条船都有几百上千个弹孔……

冲在最前面那只船，驾驶舱内，舵手胸部中弹牺牲，两名解放军战士重伤，驾船的重担落在船长身上，他的左背中了枪伤，鲜血染透衣衫，咬紧牙关掌舵指挥前行……

第二只船驾驶台的 3 层钢板和 8 层棉被，都被重机枪子弹打穿，舵手连中 3 弹，第一枪击中腿部，仍在掌舵，紧接着两发子弹击穿胸部，牺牲倒下，临死前对船长断断续续说了几个字……面部中弹的船长接过舵盘，继续前进……其他部位同样扣人心弦：轮机舱 1 人牺牲，3 人重伤；甲板上两人牺牲……右舷又被

击中起火，危及全船，紧急时刻在船上火力掩护下，人们用水泼，用身子滚，终于扑灭大火……

1 名解放军战士中弹牺牲在最后一只船上……

就在这个滩头，枪弹夺去船上一批人的生命，造成重大伤亡……

群渚滩头距涪陵城只有几华里，船队颠簸航行到这里进行的最惨烈的战斗，城里看得更清楚了，大白天都能看到枪炮的火光，几只船在浪里歪歪斜斜，逆水缓慢前行，它们走的那么的慢啊！那么的慢！岸上的人心里砰砰直跳，许多人急得大声哭叫起来……

船队终于冲过滩头，进入城区，但先要经过的是“贸派”控制的城区，枪炮声仍然不断，有只船起火冒起黑烟，这时“忠实派”支援的船只顺水冲下去。支援的船只安装钢板棉被，安装武器，花费了不少时间，船上机枪开火压制对方火力，接应这支千疮百孔的船队，带着硝烟，带着流血和牺牲，蹒跚地驶进“忠实派”区域的江边，在“忠实派”“工人总部”武斗连队营地涪陵五中的江边靠岸……

大家已提前冲向江边，担架和白布已准备好了。船只陆续靠岸，先是未受伤的及轻伤员下船，他们个个硝烟满面，衣衫褴褛，血迹斑斑。接着抬下重伤员，鲜血淋漓。最后抬下牺牲者，身上裹了白布，鲜血浸透了出来……周围哭声一片，惨不忍睹。

“八八”事件是涪陵武斗第一次枪战，这一战，遭受伏击的“忠实派”伤亡惨重，死亡 11 人，其中部队战士 1 人，一名在麻柳嘴看热闹的市民被流弹击中死亡，这是第一个在武斗中丧命

的无辜百姓。

船队是下午 14 时从丰都启航，在涪陵区域 60 多华里长的航程经历生死搏斗的海战达两个多小时，下午 17 时多才脱离火海。

涪陵轮船公司属四川省轮船公司，文革前是全省先进单位，该公司的群众组织“二七战斗团”以产业工人为主，各方面的素质都较高。那天该公司损失了一批优秀员工。

8 月 9 日下午 15 时多，“贸派”常委在赵树金寝室开会，研究马武区“贸派”组织的请求，希望“联司”总部派人赶走马武区所属堡子乡、惠民乡的“忠实派”，打通涪陵、马武、龙潭一线。同时，他们还根据军分区电台台长提供的情报，8 月 10 日将有 10 辆军车从彭水运送武器到涪陵，研究拦劫的问题。

赵树金在会上说：“把堡子、惠民打完以后退回马武，看情况拦劫运军火的汽车。如果从彭水出来的汽车朝武隆鸭江方向来，我们就在酒店、靖黔这边拦劫；如果从彭水出来的汽车朝南川方向来，我们就在龙潭拦劫。”

赵树金在会上指定了前线 1 号指挥员况道成、2 号指挥员彭用吉、3 号指挥员王付国，另外还有 4、5 号指挥员。参加伏击的是人员由“红联司”的“一兵团”“三兵团”各派出一个连队，加上“红联司”的“江东部队” 派出一个连队，共计 3 个连队，310 多人。

这支队伍 8 月 9 日晚上 22 时从涪陵出发，8 月 10 日白天驻马武。因堡子、惠民的“忠实派”本来就不多，早已撤往网下蔺市，故此行的第一个任务已经完成。

8 月 10 日下午，先于况道成、彭用吉出发的王付国将他在

龙潭得到的情况告诉况道成、彭用吉："8 月 9 日早晨有 5 辆车从南川来经过龙潭往新妙方向去涪陵了。"

因为会有 10 辆军车过来，已经过了 5 辆，应该还有 5 辆，于是决定立即到龙潭去拦劫后面的 5 辆车。

伏击队伍 11 日凌晨 4 时出发，天亮时到达龙潭。他们先用冲锋枪扫射，将当地的"砸派"吓走后，控制了龙潭的电话总机。几个指挥到现场选择伏击位置。

伏击地点选在龙潭镇外 2 公里处的涪（陵）南（川）公路上，那是一片浅丘地，蜿蜒的公路两旁有一些坡度不大的小山头，距涪陵城 64 公里。"贸派"前线 1 号总指挥况道成看后说："地形选得好，是打伏击的好地方……"

中午 12 时后，4 辆军车进入伏击圈，成都军区独立团政治处主任成照雄坐在第一辆卡车的驾驶室里。公路上出现了障碍物，驾驶员刹车，正打开车门准备排除时，机枪、步枪响起，驾驶员当即中弹牺牲……

团政治处主任成照雄立即喊话："我们是解放军，不要开枪，有事商量……"话音未落，一梭子机枪子弹应声而来，主任胸部中弹牺牲……

参加伏击的人看到打的是解放军时，感到害怕，有的人甚至怕得发抖，停下来问："还打不打？"

山头上有人喊叫："管他解放军不解放军，狠狠的打……"机枪、步枪、冲锋枪、手榴弹一齐打来，轻重机枪、手榴弹、步枪等武器，组成交叉火力点从四周相距 40 公尺处，最远的也没超过 100 公尺，近的有 10 多公尺的山头上，居高临下猛烈射击。

4 辆车都被打中，每辆车都有人被打死在车厢和驾驶室，血肉横飞，跳下车的人，在车旁和公路上，又有不少人被居高临下的子弹和手榴弹击中……

营长宫润武发现不远的半山坡，有家农民的碉楼，有三、四层，有枪眼，是过去农民防土匪用的，就带领剩下的 16 个军人和群众，在枪林弹雨中硬冲了上去，占领了碉楼，随即他们即被团团围住……

“贸派”向碉楼进行了 3 次冲锋，均被击退。他们又改用火攻，将稻草门板柴火点上火后推向碉楼，所幸碉楼是石材和墙泥筑成，否则结果不堪设想……

在围攻碉楼时，“贸派”向他们喊话：“营长，你们没有几个人了，赶快出来投降，不投降就把你们捶平！……”知道有营长在部队中，可见其情报之准确。

在围攻碉楼的同时，“贸派”武装人员在公路上清理战场，对负伤人员填枪补弹，或用刺刀杀……

第三辆和第四辆车的还有 10 个左右的解放军战士和群众，在一个班长的带领下，从车上冲下来，在路边一处坡坎上顽强地守了下来，“贸派”集中攻击碉楼，“忽略”了他们。

整整半天，将近黄昏时，他们担心解放军的增援会来，况道成下令打 3 发白色信号弹，伏击队伍撤出来，回到涪陵。

赵树金亲自到涪陵南门迎接伏击队伍，当况道成说到下面有人对打解放军感到害怕时，赵树金说，有些人很迷信解放军，我恨不得把 7822 部队那些人打死，又说，写消息报道时，只写消灭了多少砸匪，不要写解放军，不然下面又怕了……

赵树金又问："有没有打扫战场？"

况道成、彭用吉说："是当兵的，不敢打扫战场，就跑了。"

赵树金又问："到底打的是'二七'还是解放军？"

他们两个说："搞不清楚是'二七'还是解放军？"

赵树金说："龙潭一仗打得很漂亮。再有像这样的两三仗，涪陵就可以改变形势了。"

第二天中午，从南川县赶来的部队救援队伍到达距涪陵 64 公里，距南川 41 公里出的伏击现场，将牺牲者遗体和伤员运到南川。

现场惨不忍睹：车厢里，车底下，公路上，路沟里，纵横躺着遗体，随处可见内脏、脑髓、碎肉、血块……，地上一滩滩凝血，有的足 1 寸多厚……见之莫不心惊肉跳，恐惧不已……

牺牲的 23 位军人，有团政治处主任，排长、班长、战士。牺牲的群众多是秀山县群众，还有涪陵军分区李畔政委的妻子、他在延安抗大时的同学、涪陵党校教员周若华。她带着小儿子，她死在枪口下，小儿子在解放军保护下，奇迹般的活下来了。

秀山县的死难者运回该县安葬，部队牺牲的 23 位指战员，很快由总政治部颁发烈士证书，全部葬在南川县城的公园里。

# 文革史话

## 之第三部 全面内战 第十卷

刘朝驹 著

# 文革史话

之

第三部

# 全面内战

第十卷

# 目 录

第 799 回：八月八，山城演绎大“海战” 不愿战，船员们纷纷逃离..... 1
第 800 回：八月九，五一六再掀战役 说形势，牛辉林发表演讲 .....10
第 801 回：进北京，林彪见武汉代表 说文革，讲“成绩最大最大” .....19
第 802 回：奔各地，武汉造反派“支左” 下煤井，二十七军转弯难.....30
第 803 回：抢武器，南京无锡均发生 对湘赣中共中央作《决定》.....42
第 804 回：下命令，铁路线全面军管 韦国清，在京西宾馆被打 .....50
第 805 回：陈伯达，通宵只为闽事态 难分身，见湖南“湘”派代表.....60
第 806 回：批陈会，周恩来发表讲话 斗德怀，外交事件频发生 .....81
第 807 回：看长沙，河西高司大逃亡 易家湾，解放湘潭枪声响 .....92
第 808 回：八一一，中宁武装部借枪 见学生，北京反对搞武斗 .....103
第 809 回：获批准，浙江军区搞四大 毛泽东，批李世英是蛮子 .....114
第 810 回：第七次，接见江西省代表 周恩来，明确打倒方志纯 .....126
第 811 回：西单打，外交部又搞夺权 亲宣读，中央对湘、赣决定.....136
第 812 回：对江西，研究成立筹备组 风声传，宁夏中宁有危险 .....145
第 813 回：马思义，吴忠仪表厂身亡 朱声达，派飞机接进北京 .....155
第 814 回：八一二，长沙反周大字报 八一三，周恩来见湘“工联” .....166
第 815 回：天津市，政校、六〇九武斗 上海市，郭仁杰受到批判.....175
第 816 回：八一四，陈伯达见闽代表 看开封，康生再见豫驻军 .....188
第 817 回：毛泽东，痛批军内一小撮 部队到，温联总被迫撤离 .....197
第 818 回：南京市，倒许风愈演愈烈 炮声响，忠实派占领涪陵 .....208
第 819 回：大火燃，山城内武装割据 大炮战，嘉陵江桥硝烟起 .....220
第 820 回：邓长春，黄山警备司令部 弹雨飞，重大庆祝八一五 .....232
第 821 回：广州市，到处在“打劳改犯” 莫超海，被困总工会大楼.....243
第 822 回：陈伯达，两次见天津代表 签协议，要求双方都放人 .....255
第 823 回：周恩来，再次见湖南代表 夺军权，继续发反周传单 .....265
第 824 回：连续见，湖南工湘派代表 总政瘫，军委四人组成立 .....272
第 825 回：说叛党，毛泽东谈刘少奇 八一六，见宁夏军区领导 .....282

第 826 回：造炸弹，吉林省到处武斗　授枪支，党中央武装北航 .....294
第 827 回：发声明，周培源倒戈上山　再武装，北京师大井冈山 .....305
第 828 回：第三次，接见天津市代表　毛泽东，上海召见许世友 .....313
第 829 回：细筹划，“锦联筹”召开会议　八一八，步校武器库被抢.....324
第 830 回：动荡中，李再含返回贵阳　战端起，贵州踏平四一一 .....333
第 831 回：八一八，重庆杨家坪血战　潘家坪，王家大山枪炮酣 .....341
第 832 回：炮声息，死尸遍地情惨烈　夜偷袭，巾帼竟不让须眉 .....353
第 833 回：在山城，中央调查组遇袭　一腔血，自告奋勇赴淮南 .....364
第 834 回：为抢枪，炉桥边惊险一仗　接见皖，七个地区代表团 .....374
第 835 回：第四次，接见天津市代表　看湖南，工湘派大战长沙 .....384
第 836 回：八一九，川“红成”闯中南海　卖小报，外交部二次夺权.....393
第 837 回：广州打，陈伯达见厦“促联”　周恩来，再动员下井下矿.....403
第 838 回：宋任穷，京西宾馆险被劫　哈尔滨，炮捍两派武斗急 .....414
第 839 回：陈伯达，再见厦门市促联　周恩来，连续会哈、穗代表.....424
第 840 回：八二二，声讨英帝开大会　群情愤，火烧英国代办处 .....434
第 841 回：手发抖，急见外事口代表　再易主，《解放军报》又生变.....443
第 842 回：共命运，“赴临战团”奔沂蒙　撒传单，形势出现大逆转.....454
第 843 回：赴汤头，激战一通是误会　白沙埠，大芦湖“三大战役”.....464
第 844 回：遇埋伏，部队被部队袭击　性质定，抚州是“军事叛乱”.....477
第 845 回：为武斗，常德到处在抢枪　惊中央，湖南道县大屠杀 .....487
第 846 回：朱逸死，杀人风席卷全县　法院是，贫下中农做裁决 .....496
第 847 回：大学生，避难踏上不归路　太残忍，用炸药血肉横飞 .....505

## 第 799 回：八月八，山城演绎大“海战” 不愿战，船员们纷纷逃离

8 月 8 日，重庆空气压缩机厂“军工井冈山”的武斗队将坦克开出厂区，经沙坪坝到市中心解放碑，沿途开枪开炮示威。同日，重大“815”的“301”武斗队负责人联合空气压缩机厂、中梁山煤矿“815”派武斗队将中梁山煤矿军管会 9 枝枪械及弹药全部抢走，“301”武斗队负责人独得 6 枝枪。

这天上午，重大“815 总团”开会，商议庆祝《十六条》公布一周年。但是，对于连连的武斗，许多人开始困惑，怀疑……当天，重大“815”无线电分团的勤务员们写了一个《严正声明》称，对文化大革命不理解，越来越不理解，因此，“从 8 月 8 日起暂不介入文化大革命，”署名是“ X 井冈 X 延安， X 韶山”。

8 月 8 日，中共中央批示“同意”重庆警备区司令部《我们的检查》，以中发（67）236 号文件发出。

8 月 8 日，在宋代就命名的重庆朝天门码头，当时已改称“红港”，发生了一场震惊全国的“重庆红港八八大海战”，严格讲，应该说是“重庆八八江战”。因为重庆没有海，只有长江。

这天中午，“军工井冈山”改装的“人民 5 号”船在望江厂武装完毕，“金猴”宣布成立“军工井冈山第一舰队”，邓长春任舰队司令，李鲁沂任副司令，王三恒任总指挥，朱星德任指挥。邓长春坐镇“人民 5 号”，挂上了“反到底 1 号”的帅旗。各个炮位，还用粉笔写着：“一长一短（两声）表示准备开炮，二短一长（3 声）表示开炮，一长声表示停止射击。”

然后，望江“金猴”在“人民 5 号”舱里装了支援建设厂的

37 高炮 3 门；炮弹 1000 余箱，每箱 20 发。虽然都是填沙教练弹，出膛后只相当于同速度铅球杀伤力，但绝对有威力。另外，还装了半船猪，大批罐头、日用品等。下午 16 时，舰队起航驶出郭家沱往上游开去，驶往重庆城区。舰队序列为：望江 101、人民 5 号、嘉陵 1 号。他们此行的目的，就是要运送几门炮到九龙坡，支援建设厂“红大刀”，并换回自己所需的半自动步枪，同时以此显示本派力量，打通与建设厂的联系通道。

“长江 2014 号”轮作为指挥船，在船上设立了作战指挥部、水上检查站、后勤指挥部，还设立了两部电台，与邮电兵团、交通学院、黄山警备司令部、“反到底”1 号等其它电台联系，并向他们下达命令，也和沙坪坝重庆大学的“井岗山”017 电台联络。

重庆大学“815”迅速获悉“反倒底”“军工井冈山第一舰队”向建设厂运送物资的情报，迅速布置沿途拦截，调“长江 207 号”、“人民 28 号”和“人民 30 号”等几条船把守朝天门长江江面，堵截“反到底”舰队。朝天门码头上的“815”也堆好了沙包，仓促做了简易工事，架好机枪。

从望江厂到建设厂这一段长江航道，基本上掌握在“815”手里，舰队从郭家沱沿长江而上，穿越铜锣峡，一出峡口，就遭到埋伏在这里的“815”不很强烈的攻击，对于有装甲的舰队来说，机枪步枪射击连挠痒痒都不够，只能算是捣乱。舰队各船乱七八糟的开火还击，但也逮不住开枪的小步兵。

穿过铜锣峡，正对着就是唐家沱的东风船厂。

沱是重庆方言，指回水河湾，重庆话中读作入声，又称为回

水沱。唐家沱是长江上游最著名的回水沱，其水面达 25 万平方米，是一个大回水湾，上游淹死人，都得到这里来捞。清初“湖广填四川”，一姓唐的人家在此落户，开荒种地，于是有了唐家沱之名。

东风船厂属于长航公司，既修船，也造船，是西南最大的造船基地，“815”派人多，但与“反到底”派相处较为平安，未发生过大规模武斗。但是，“金猴”在对江的山上曾架炮轰击过东风船厂。这次“金猴”舰队开上来，用高音喇叭得意地喊道：

“劣绅，你还认得我么！”

本来，东风厂“815”并不知道这支舰队要去做什么，也未组织拦截。但是，听船上的喇叭这么一喊，于是，那船坞上，那待修的轮船上，那坡上的车间里，就有机枪、步枪的子弹朝舰队射来。

“金猴”的舰队都装了装甲，唐家沱江面又那样宽，那子弹打过来基本上起不到什么作用。本来，舰队的主要任务是给建设厂运送武器和补给品，是去支援建设厂，并不想在沿途打仗。但是，东风船厂的“815”这样一打，就把舰队上的人惹毛了。那舰队上的武斗人员本来也是手脚痒痒的，现在正好有了借口，于是，随着邓长春一声令下，“两短一长”的射击信号即刻发出，“人民 5 号”上的 4 门炮，随即对准东风造船厂方向和停泊在唐家沱的船只示威性开了几炮，当即打中停在那里的“人民 6 号”轮，打翻了西南最大的修船浮坞，打死长航职工 2 人，打伤 6 人。那船坞、船台、车间就再没有了回音。

“莫耽误时间，目的地九龙坡！”邓长春命令道，“全速前进！”

舰队小小泄愤后，继续溯江而上，一路上都被冷枪骚扰，但又逮不住目标，很是恼火。舰队到达弹子石窍角沱，按计划进行了队列变换，望江 101 在右，因“815”火力会集中在舰队的右侧；嘉陵 1 号在左，人民 5 号在中后，呈三角形继续上行，离“815”控制的重庆市区的长江要塞朝天门越来越近。

如今还留下遗址的重庆城，是明朝初年重庆卫指挥使戴鼎所筑，有城门 17 座，九开八闭，朝天门是其中最大的一座。明初建都南京，朝天门面向东方，正是南京方向，故名朝天。当重庆还是“重庆府”的时候，天子的诏书从下游传上来，那时的大小官吏们就穿好袍服，打开城门，屁颠屁颠地跑到码头上摆上香案，跪接圣旨，于是就有了“朝天门，大码头，迎官接圣”的谚语。

站在朝天门码头上，顺河谷东望，能看见嘉陵江和长江的汇合，青蓝的嘉陵江带着从甘肃嘉陵谷携来的清冽，汇入唐古拉山上融化的雪水与泥浆，泾渭分明。一条细长的融汇线一直伸展到长江的拐弯处。长江岸边“玄坛庙”，“野猫溪”，“弹子石”，年轻人戏称它“玄吊吊”，“野麻”，“站起驯”。玄坛庙是刘湘请来上海的工程师设计重建的，说是“庙”，却又有道教的“玄”，不过和尚们被赶走了，千年流碧涛声里，只留下青山中暮鼓晨钟的回响。南岸的文峰塔，朽坏得只剩下壳，呆呆地望着亘古不变的茫茫陵谷。

公元 1646 年冬，张献忠在川北抗清前线战死，大西农民军余部数千人由李定国、刘文秀等统率，沿嘉陵江南下，驰抵重庆。那时，明将曾英拥兵十万，盘踞重庆。刘文秀亲率勇士，手执弓矢，口衔利刃，不怕隆冬寒流，从江北跃入嘉陵江，劈波斩浪直

奔朝天门。朝天门一带，明军战船密集，却疏于防备，刘文秀等突然溺入水中，砍断铁缆，闯入敌船，杀得明军措手不及。大西军乘机冲杀，从朝天门杀入城内，占领了重庆。没想到，过了300 多年，那朝天门江面上又再次发生“海战”，而且比过去打得更加激烈。

此时，朝天门“815”的“长航兵团”和“港口兵团”已作了准备，他们的“长江 207”拖轮早已先期到达朝天门，并向下游滑了一段，在木关沱与上行的“金猴”舰队相遇，“长江 207”拦在长江中央，用机枪、步枪对从下游驶上来的三条炮艇实施突击。几百米外的红港港务大楼和码头上的机枪，也一齐向舰队猛烈射击，打得甲板嘭嘭响。“人民 5 号”打开广播喊：

“‘港口兵团’、‘长航兵团’，你们不要打，我们是到九龙坡卸货的。”

“815”以为舰队招架不住了，求他们不要打了，火力越来越欢。

“人民 5 号”拉响了汽笛，一长一短，紧接着，两短一长，这是开炮的信号。 “望江 101”和“嘉陵 1 号”的炮手们，手忙脚乱的朝着“815”的“长江 207 号”轮开炮还击。

虽然“望江 101”舰 37 毫米的高炮炮弹不会爆炸，但对于没有装甲的民用拖轮“长江 207”来说，也是足够致命的了。更何况“望江 101”舰上的这个炮手是望江厂的总成质量检验员，打炮是他的专业，射击的准确性之高是可想而知的。很快，“815”前去阻截的“长江 207 号”被打起火，火势借助江面风力，浓烟滚滚，船员纷纷弃船跳河逃命，“长江 207”随后失去控制，往

长江下游飘去。

一群小孩正在江边洗澡，突然被隆隆的炮声和江中溅起的冲天水柱吓得不知所措，挣扎着爬上岸，浑身发抖，脸变成了猪肝色，衣裤也来不及穿，光着腚藏到岸边一个卷扬机的水泥柱后面。

“打中了，打中了！”两岸围观的孩子们看到“长江 207”起火，兴奋得直舔自己的舌头，踮高了脚尖看难得的稀奇。一群中小学生从临江门追到千斯门观看，他们欢呼：

“要打那边那艘了，看打不打得沉？打沉了才安逸惨了！”

偶尔有一、两发炮弹飞来，观战的人齐刷刷的趴下一片，胆大的去摸摸弹头烫不烫？有人蹲下屙了一堆屎，破坏了观战环境，几个小儿愤怒地喊着：“打枪的，莫打我，打对门那个屙屎狗。”

“望江 101 舰”主机停车，停在江面上用机枪扫射“长江 207”跳水的船员。见一个打一个，他们把一路上的火气都发泄到这些倒霉鬼身上。

此时，“815”的“人民 28 号”和“人民 30 号”从沙坪坝嘉陵江河道里加足马力紧急赶来！当“金猴舰队”到达嘉陵江与长江交汇处江面时，“人民 28 号”已驶出嘉陵江口，横向停在江面，用轻武器向“人民 5 号”射击，实施拦截。

3 只舰艇调转炮口向“人民 28 号”猛轰，顷刻之间，“人民 28 号”就大幅度倾斜，完全失去动力，漂流到下游数百米的野猫溪岸边沉没。

这时，“815”的“人民 30 号”也出现在嘉陵江口。“金猴”的“人民 5 号”和“嘉陵 1 号”集中火力攻击“人民 30 号”，很

快，“人民 30 号”船艉部受伤，被迫退回嘉陵江。

混浊的长江水面上一片火海，被击沉击伤的船只漏出的油污在水面上燃烧，生成厚厚的黑烟，沉船的残骸翻覆在江中，尸体的污血在江水中浮沉飘逸。

南岸的轮渡公司修理厂“815”躲在江边鹅卵石沙堆里，胡乱用半自动步枪向舰队打冷枪。“金猴”中有不少人原来在王家沱的轮渡修造船厂当过学工，对该厂熟悉。李鲁沂在“人民 5 号”上开着高音喇叭喊道：“王麻二，你娃不要打哟；不然我们打过来，你娃吃不消哈！”

这时，长江江面上再也没有战船能和这支舰队抗衡，只有红港码头上的“815”在沙包筑成的工事里打着机关枪，3 艘战舰又集中火力一齐向红港码头开炮，码头上顿时浓烟滚滚，客运大楼被炸开几个大洞，许多炮弹准确地落在工事里，不少人当场被砸死，肢体分离，血肉横飞。其中一炮击中红港“815”总部，几个在总部开会的勤务员顿时被砸得血肉横飞，全部陨命。文革后期，红港“815”在朝天门街心花园起了一个大墓。埋的就是被炮击打死的几位勤务员，墓志铭记述了事情始末。

当炮声传到红港码头附近的街巷时，整条陋巷的街坊邻居都吓昏了，纷纷躲进城墙下的防空洞里。没能躲进防空洞的，则趴在地上，不敢动弹。

“金猴”舰队上行已快过东水门了，“人民 5 号”还将炮转回头来，向港口大楼打炮。那炮弹从附近的一幢楼房墙角擦过，把那砖柱打出一个好大的破洞，差点就把那幢楼房打垮。

这时，“815”的“水运 204”、“104”两艘小火轮才敢开出嘉

陵江口，舰队发现其企图施救，不准，后炮发出威胁性警告，击中顶篷。但 204、104 仍然冒死靠上“长江 207”用水龙灭火。“长江 207”的火势得到控制后才有人从江中爬上船，只见“长江 207”船上有的人脑浆迸裂，有的肠子都流出来了，已无活人。

“金猴”舰队冲破“815”封锁继续航行，到望龙门河心，护航任务完成，“望江 101”追上“人民 5 号”，邓长春上了“101”，“101”掉头返航，在回望江厂经过唐家沱东风厂时，又向该厂打去几十炮。同时，铜锣峡山顶大炮也向东风厂炮击 60 发，警告其：“老实点！”

在“望江 101”掉头回去后，“人民 5 号”、“嘉陵 1 号”由李鲁沂率领继续往上游开，“815”两岸火力对它们夹击，由于加装了厚厚钢板，“815”的轻武器打上去只是几个印痕。

“金猴”舰队经过铜元局黄沙溪附近江面，又遭到长江电工厂“815”堵截。长江电工厂即国民党时的第二十兵工厂，抗战和内战中生产了大量步枪机枪子弹。他们想把舰队击沉，“人民 5 号”和“嘉陵 1 号”遭到了猛烈攻击，以致“人民 5 号”上出现了多起伤亡。愤怒的“金猴”向长江电工厂猛烈开炮，当即打燃了岸上油库，击沉了江边一艘拖轮“长江 1 号”。

“人民 5 号”、“嘉陵 1 号”很快就通过了铜元局段江面，于 8 月 8 日下午 19 时 45 分到达建设厂，结束了从郭家沱到九龙坡共 40 里的行程。此役，双方死亡 24 人，打伤 129 人，打沉“人民 28”等船只 3 艘，打坏 12 艘，长江为之中断，封航 40 天。

当晚，“人民 5 号”和“嘉陵 1 号”泊在黄桷坪 9 渡口，李鲁沂等驻扎重庆电力技校，赠送电校“东方红”20 头生猪和一挺

海二联高射机关炮。

军工“金猴”和建设“红大刀”把“人民 5 号”装载的大炮和炮弹卸上岸，然后又在“人民 5 号”轮船身加装两层 8 公分厚的钢板，准备装些半自动步枪、子弹回望江。然而，邓长春、王三恒等“金猴”、长航“红一方面军”头头没想到，经过刚刚结束的惨烈战斗后，两艘轮船上的大部分船员，都无心再战。尽管他们采取了威逼利诱等手段，甚至在当时物资紧缺的情况下，每天兑现两个水果罐头、一个牛肉罐头，但船员仍最终逃离了轮船。邓长春、王三恒等头头准备再打回望江的想法，也就落空了。

## 第 800 回：八月九，五一六再掀战役　说形势，牛辉林发表演讲

北京的“516 兵团”继续活动，张建旗等人在 8 月 3 日至 4 日开了两个晚上秘密会议，决定：一、积极准备写、印攻击周恩来的大字报和传单，公开贴出和散发。二、扩大组织，统一行动，成立“八个方面军”。一方面军：农林口。二方面军：财贸口。三方面军：文教口。四方面军：工交口。五方面军：军事口。六方面军：中学口。七方面军：外事口。八方面军：全国通信联络。

7月29日因散发攻击周恩来的传单被群众扭送到派出所的北京“516兵团”唐亦安、郭海燕等4人，经教育后于8月8日被公安机关释放。但这4人声称“观点不变，还要干！”

8 月 8 日，正在北京钢铁学院采访的中央文革记者站的一位通讯员来到“516 兵团”。他对北京钢铁学院各派别和他们的头头都比较熟悉，因此各派头头的观点和运动中的行动计划也都不避讳他。

此时，“516 兵团”正在开会策划“八九战役”，准备在 8 月 9 日大规模张贴攻击周恩来的大字报和大标语。就在“516 兵团”开会现场的这位中央文革记者站通讯员，在第一时间得到了“516 兵团”的行动计划，包括贴大字报的时间、地点、行动步骤，大字报的标题等，他立即将情况及时准确地报告了中央文革记者站。当晚上 21 时左右，中央文革记者站北京记者组负责人袁光强，给中央文革办事组王广宇打了一个紧急电话，说有重要情况报告。他在电话中说：“北京钢铁学院有个叫‘516 兵团’的群

众组织，策划了一起攻击周总理的活动。他们决定今晚 0 时在北京的新街口、西单、东单等闹市区大街上，张贴攻击周总理的大字报。大字报已经写好，只等到夜深人静的时候出去张贴。”

袁光强还说了几张攻击周恩来大字报的标题。他强调这个情况是准确的，“‘516 兵团’策划这个行动，我们的通讯员就在现场，希望马上向中央文革小组汇报。”

此时，中央文革小组正在钓鱼台十六楼大会议室开会。王广宇把袁光强报告的内容整理成电话记录，到会场直接找主管办事组的戚本禹，把电话记录送给他看。戚本禹看后说：“请谢富治同志处理！”就把电话记录递给王广宇。

王广宇考虑戚本禹的话空口无凭，他找谢富治不好说，于是就在电话记录纸的批示栏写上：“戚本禹同志说，此事请谢富治同志处理。”然后放在正在列席中央文革小组会的谢富治面前，就退出会场。

后来，参加会议的小组成员和列席人员都在会场传看了这个电话记录。当晚 24 时后，中央文革小组会议散会，办事组值班室一直等待处理这件事情的批示，没有得到答复。

“516 兵团”经过一番准备，写了 7 种传单，约印了 4000 份，并抄写了 13 份大字报，开始了他们的“八九战役”。他们派出一大批人员到北京动物园、甘家口商场、西四丁字街、平安里、商学院等处大量散发、张贴反对周恩来的传单，涂写反周标语，甚至将攻击周恩来的大字报公开贴在北海公园前后门、王府井大街北头一个胡同里。这些传单和标语的题目是：《揪出二月黑凤的总后台》、《周恩来的要害是背叛 516 通知》、《周恩来是毛泽东

主义的可耻叛徒》、《将革命进行到底——纪念十六条发表一周年》等。这些传单和标语的均署名“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他们还向北京大专院校和湖南、湖北、广东、新疆等地邮寄传单，甚至在北京城里挨家挨户塞传单。

8 月 9 日 0 时过后，王广宇打电话问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的秘书邵崇勇，是否掌握了“516 兵团”贴周恩来大字报的情况？邵崇勇告诉王广宇说：“已经掌握了，‘516 兵团’贴出大字报后，马上就有人用其它内容的大字报覆盖上了。”

为了证实邵崇勇所说的情况，第二天早晨，中央文革办事组的矫玉山和姜材熙乘车去“516 兵团”贴大字报的地方转了一圈，确实没有发现攻击周恩来的大字报。

但是 9 日晨，仍有不少群众用电话向国务院值班室报告了这个情况及家中发现的“516”传单。

8 月 9 日，中央文革小组的内部《增刊》刊出：“北京出现一股反周总理的逆流”。报导说：“8 月 8 日深夜，‘首都 516 红卫兵团’分别在北海公园前后门、王府井大街北头一个胡同里、西四、平安里、动物园、商学院等处贴出了 6 种恶毒攻击周总理的反动大字报。他们同时还在师大等处散发了同样内容的传单。所谓‘首都 516 红卫兵团’，是 7 月中旬出现的，跨行业的秘密组织，其宗旨是‘打倒周恩来，砸烂旧政府（指国务院）’。”

这两天，北京大学也一再发生武斗。

8 月 5 日下午 16 时在天安门召开纪念《炮打司令部》发表一周年大会时，参加大会的北京大学“新北大公社”发现北大“北京公社”、“东方红”、“井冈山”的三面旗子与他们的旗子插在一

起，于是发生纠纷，“新北大”撕了“北京公社”、“东方红”、“井冈山”的旗子。

第二天晚上，北京大学“北京公社”在38楼前集会抗议“新北大”8月5日撕他们的旗，并于会后从“新北大”总部也抢走26 面旗子，还在墙上写下“孙蓬一之流决没有好下场!”“孙月才之流决无好下场!”等标语，围攻聂元梓。

当时“新北大”的头头孙月才主张不予理睬，明天说明事情真相，发表声明提出抗议。

但是“新北大”总部绝大多数人要求召集队伍，进行反击！后来在大多数人的要求下，“新北大”冲了“北京公社”的广播台，结果很多人被打伤，铩羽而归。

8月7日晚，“新北大公社”和“北京公社”又在38楼打了起来，楼道里到处是互相扔的板凳、木板和砖头，甚至打开了消防水龙头……

天亮时，“新北大公社”和“北京公社”的广播都响了，都在严重抗议对方挑起武斗，都要求严惩挑起武斗的凶手，都在血泪控诉对方的反革命法西斯暴行，都表示要“不惜用生命和鲜血来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誓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8 月 9 日，北京大学牛辉林在北大 38 楼前发表讲话。他首先讲了国际形势：

“昨天我们与新华社‘誓联’谈了以后，我们了解了全世界的形势：主要是美国黑人斗争，充分证明了我们主席预见的伟大。美国黑人拿起了武器，美国用两万军警来镇压。美国黑人的斗争

可以看出毛主席的英明："……东南亚战场：南越战场是毛主席人民战争胜利的战场，指挥南越战场是阮士清同志，对阮的逝世我们很哀悼。……印度人民也拿起了武装斗争的大旗。17 年来我国由一穷二白的半殖民地国家，变成了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社会主义强国，而印度越来越穷，形成了鲜明的对照，……缅甸原有一国民党残匪攻打仰光，后我在他方要求之下攻打残匪，缅甸的反华与国内军内走资派有联系，是在谢副总理到昆明支持左派以后发现的。主席说：'缅甸公开反华也好，这样我们有权支持缅甸左派。'非洲也燃起了武装斗争的烈火，毛主席'造反有理'的声音燃遍了全世界。现在，对毛泽东思想是什么态度是真假革命的分水岭。……"

接着他又讲了全国形势：

"国内的党内外、军内外走资派与国民党特务也有勾结。现在有三要三抓，三要：'要造反，要串连，要夺权'，三抓：'抓报社，抓电台，抓学校'。""阶级敌人要阴谋蒙蔽群众，他们不是直接把矛头对准毛主席，而是对准毛主席司令部的人。长高司（长沙高等院校红卫兵司令部）攻击谢富治、王力同志非常恶毒，长高司有些联络站，成立攻击中央文革戚本禹的联络站。

全国出现了大规模武斗，大屠杀，这是党内、军内走资派有组织有计划的反扑。8 月 5 日在天安门上林副主席谈到武汉问题时对蒯大富说：'我以前正愁没题目做文章，现在有了。'蒯大富问王力同志，王力同志说：'在中央军区大部分听中央的话，但还有听徐向前的话的。'

66 年二月兵变确有其事，李井泉警卫员揭发。他们曾经决

定将兵变转到 67 年 2 月，所以有二月资本主义复辟逆流，在他们控制的各个地方都对造反派实行镇压。如对四川‘八二六’、对湖南‘湘江风雷’。石家庄河北也如此，在北京也有。农林口谭震林逆流，公交口和其他机关也都有，借结合，搞资本主义复辟。事实证明了毛主席让军队介入运动的伟大和英明。二月的确发生了全国的资本主义复辟逆流，二月黑风时都是把革命造反派打成反革命的。军内走资派是二月黑风的制造者，这些原班人马又是 5 月份大屠杀的支持者与指挥者。湖南军区的‘007’密令是决定镇压造反派的；凉山公安局长估计今年 7 月在全国有反革命暴乱。”

他还煞有介事的说：“徐向前、叶剑英、陈毅在颐和园开秘密会议，是陈毅秘书揭发的，说：‘7.15 全国大乱。’成都军区参谋长李世敏也揭发 7 月暴乱。从此可以看出这是有党内军内一小撮在密谋策划。通过武汉事件，暴露了军内的走资派。7 月 20 日前徐向前去过武汉，把两个支左的副司令员李因、张广才给调走了，由此可以看出 7 月 20 日是预谋的。7 月 20 号前徐向前给陈再道去信，有两点：（1）武汉军区支左大方向是正确的。（2）百万雄师是造反派。后来搞王力，在王力被扣押之后，他说中央批准斗王力。

在渡口有人讲 8 月兵变有大暴乱，四川渡口是三线重要地方。在四川重庆成都、宜宾被造反派控制后，保守派受攻击。最近全国保守势力搞反革命大串连，如四川老产、武汉百万雄师、湖南湘江风雷这是有人在幕后搞的。他们开了三个秘密会议：郑州会议、庐山会议、成都会议。现在形势很清楚，他们在中南地

区占了大别山、大巴山、伏牛山等三个山，形成一个三角鼎立的局面，把川都地区联系起来，并控制了风陵、潼关。这蒙不过中央眼睛，中央已派济南军区到江西、井冈山控制局面。这说明在全国出现大的资本主义复辟逆流，这个逆流是有人指挥的。

另外在 8 月 5 日至 8 月 15 日有个全国性的大暴乱。重庆已干起来了，福建天天有枪声。北京也有联动口号：‘八月要血洗北京城’。‘7.20’在武汉搞王力、谢富治，东北就出现‘打倒王力、打倒谢富治!’的大标语。在这之前还发现武汉一个军官给东北一个军人一封信，信中讲到武汉、东北的结合问题。

在广西、四川、云南等地黑电台出现很多，他们把矛头指向中央文革煽动群众，恶毒攻击中央文革小组。从此看到，中央文革是过得硬的。现在问题是大家对中央文革什么态度？对中央文革小组的态度是区分革命不革命的分水岭。”

然后他又说了全国各地情况：从“新疆乌鲁木齐在镇压造反派”，到“湖南军区变相发枪”，全国各地都在搞“进京告状，占交通要道，破坏生产”，并说“现在对各个地区进行包围。”

他说：“上海周围，南京、杭州、江阴、苏州、马鞍山、镇江、无锡，都在搞大规模的武斗。对上海形成一个包围圈。他们要切断京浦线，淮河大桥被炸毁。在六安、安庆两地切断交通，想上大别山上跑。武汉百匪广大受蒙蔽群众起义，在北京百万人大会后，对他们的瓦解很快对全国形势震动也非常大。

长沙是造反派的据点，用长阳、常德、迁阳来包围长沙，长沙的几个县被保守派包围，是在湖南农村包围城市。广西‘公安公社’、‘红色公安’叫嚣：‘打起来林彪的军队只有我们的五分

之一。’重庆打得很厉害。在成都、达县、宜宾、南充、渡口、庐山打得很厉害，向支左部队进行封锁，发生武装冲突。云南：谢富治、王力走时形势很好，但是在保守势力控制下破坏协议。

北京周围打得很厉害，石家庄、邯郸、邢台、天津、唐山、秦皇岛保守势力非常猖狂地活动，在党内、军内一小撮的操纵下在全国对造反派进行镇压。贵州、山东、北京、内蒙、青海比较稳定。我们无产阶级司令部在做工作，通过几个月的支左运动完全暴露了军内走资派。一月份军委文革被徐向前控制，借支左而支右，二月赤膊上阵，四月开秘密会议，给陈再道去信，七月武汉问题，陈再道打王力，公开对抗中央文革。军队内的问题解决之后会出现一个大转变。可以锻炼出一支坚强的造反派队伍。”

“现在三线破坏，损失很大，泄密严重。……鞍山武斗破坏生产非常严重，有的炉已冻结了，煤矿武斗。苏修、朝修在包围，日本也在包围，……主席对东北很关心，派关锋去解决。”

他接着说：“和本单位联系起来，讲一讲北京、新北大公社。

现在谁是保是越来越明显，新北大公社在外面支左还是去支保？”

台下“团”、“0”、“飘”、“井”、“红”的听众们答：“支保！”

牛辉林分别举出四川、湖南、湖北、东北、大连、安徽、广东、河北等地的例子说明聂元梓和北大校文革是在支保，又细数了北大校文革和“新北大公社”挑动武斗、炮打谢富治等种种不是，最后说：“在北京市，我们 5 个组织在造反派中影响是很大的，有很多的重要情况、场合都请我们参加。现在有很多外地组织想在我们这里建立联络站，因为孙蓬一太臭了。自然我们就要

香一些了，我们肩上的重担是很重的。北大的每一行动对全国影响是很大的，我们所担负的责任和我们的现状是不相称的。”

他说的这 5 个组织就是北大的“飘”、“0”、“井”、“团”、“红”。

他说：“我们 4000 人已走了 1300 了，我们在各个城市基本上有人了，最近我们还要继续地有计划地派些人出去，在家的同学要看到浴血奋战的全国人民。”

牛辉林说的“我们 4000 人”，是说北大此时反聂的队伍已发展到了 4000 多人了。

## 第 801 回：进北京，林彪见武汉代表　说文革，讲“成绩最大最大”

武汉政局基本已定，中央决定召武汉的各群众组织和武汉军区领导进京解决武汉问题。周恩来亲自安排空军飞机接武汉群众代表进京，将“三钢”、“三新”、“三司革联”的主要负责人朱洪霞、夏帮银、丁家显、方保林、李想玉、但功荣、张立国、郭保安、谢帮柱、彭勋、高玉泽、魏梅森、雪湘明接来北京商讨大团结、大联合、拥军爱民、建立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及抓革命促生产等问题。

8 月 8 日上午,汉口王家墩机场,人头攒动,燥热如灼。数万人打着各式各色的红旗、标语牌,手拿《毛主席语录》,站在广场的草坪上,翘首眺望着被骄阳灼烧得惨白的苍穹。10 时许,一阵飞机的引擎声由远而近,人群开始躁动。渐渐地,飞机棱角清晰,有人挥手,有人舞旗,有人领呼口号。

飞机落地后，刚刚放下舷梯,新任武汉军区负责人和武汉各大群众组织的头头们已经从休息室内鱼贯而出。广场上一片喧腾。武汉军区负责人和武汉各大群众组织的头头们一边向欢送的人群招手致意,一边走向机舱。

飞机到北京后,陈伯达、康生、谢富治、王力和黄永胜、吴法宪分别驱车赶到住地,进行接见。

陈伯达接见时说:“你们在文化大革命的大风大浪中,经受了一场严峻的考验,我向你们表示亲切的慰问!向你们学习!向你们致敬!”

康生说:“主席教导我们,要解决矛盾,首先要揭露矛盾。这次武汉出现反革命叛乱,矛盾得到了充分暴露。使武汉军区和专政机构的问题,在这场大风暴中彻底解决了。”

谢富治说:“中央对武汉军区、人民武装部,都是采取彻底解决的方针。武汉的‘720 事件’是分水岭,它检验一切组织、一切人的政治态度。”

吴法宪也跟着说:“要把革命群众武装起来,武汉要建立一支人民武装力量,由左派掌握,把枪支发给左派!”

9 日凌晨 3 时 25 分至 6 时 30 分，谢富治、王力在人大会堂甘肃厅接见了武汉进京的各群众组织代表和武汉军区领导。参加接见的还有随谢富治、王力一起在武汉的中央文革办事组张根成，北航“红旗”的井岗山、吴介之。这应该是他们武汉之别后的重逢。

8 月 9 日，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周恩来和康生宣布了中央的分工决定：周恩来管中南和西北，陈伯达管华北，康生管东北，江青管华东和西南。周恩来在会上说：“作这样的分工，是落实毛主席的最新指示，推动形势发展，实现毛主席争取明年春天或稍晚些时候结束文化大革命的战略部署。”

当天下午，人民大会堂北京厅飘荡着激动人心的欢快气氛，深红色的地毯，在耀眼灯光的映照下，十分醒目、庄严。新任武汉军区负责人和武汉各大造反组织头头们站在巨幅彩绘山水画下，脸上溢满了幸福的光彩。

15 时，林彪在陈伯达、康生、江青、谢富治和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的陪同下，脸上挂着人们熟悉的那种固定

笑容，右手机械地摆动着秘书为他准备的那本《毛主席语录》，缓缓走进大厅。大厅里立刻掌声如雷，不知谁领头高呼了一句，众人马上齐声响应：

“敬祝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

“敬祝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副统帅身体健康！”

林彪不断地向大家挥动着手。声浪稍息，他来到队列前面，与前排人员一一握手。接着，激动的人们按照排列的位置对号入座，参加中央文革小组举行的座谈会。

大家首先听取曾思玉、刘丰和武汉各大造反组织代表发言，当汇报到“百万雄师”分化瓦解情况时，林彪说：“毛主席指示，向坏人专政问题，专政机关和左派都不要捉人，发动右派组织的群众自己处理。例如北京，大体是这样做的，专政是群众的专政，靠政府捉人不是好办法，政府只宜根据群众的要求和协助捉极少数的人。”林彪具体讲述了“以毒攻毒，间接利用力量”的办法，“在保守组织中的坏头头和坏人，我们专政机关不要抓，解放军不要抓，让右派内部群众发动起来去抓，这样能促进内部分化。”

当刘丰谈到武汉部队现在同学生关系亲密，请些造反派来连队作报告效果很好时，林彪说：“部队两条路线斗争的教育应该请地方左派来当教员，要借这个东风。我们过去就是请贫下中农来做报告嘛。内蒙请保守派做报告，所以把部队引到邪路上去了。”

郑维山说，内蒙部队中收到女的来信很多，一个连有 70 多个战士同女人有关系，有信件来往，有的一个人收到几个女人来信……

林彪说："这是有计划地腐蚀部队……"

康生："这是乌兰夫搞的。"

林彪问沈阳、广州、福州有没有这个情况，陈锡联、黄永胜、刘培善均答：没有发现。林彪说："可见是个别现象。乌兰夫、王铎、陈再道支持反动组织积极打击左派，他们的观点是很明确的。我们要遵照毛主席的指示，武装左派，要发枪给左派群众。"

众人汇报后，林彪接过秘书递过的杯子，喝了口水，清了清嗓子说：

"你们讲了很多情况，我没有你们熟悉。各地区的问题由总理、中央文革根据毛主席的指示来解决。不同的情况有不同的方法。武汉问题已经请示过主席。坚决按毛主席的指示办。"

"各地区的同志有的犯错误，现在出了陈再道。不要再出陈再道、李再道，能挽救的还要挽救，现在没有垮台的，都不希望他垮下去。有的干部犯错误，只要能挽救的，就尽量使他不要垮。但是自己应该下决心改正错误。如果自己不下决心改正错误，硬要往垮的路上走，就没有办法。"

从当时的情况看，全国各地的党政军领导中，没有犯错误的几乎是没有了。怎样才能不"垮"呢？这可是当时各级领导极想知道的。林彪说："要不垮，办法有三条：

第一、 紧紧掌握底下的情况，对左派、右派和各群众组织都要进行调查研究，了解情况。毛主席说：调查研究是基本功。只有掌握了真实情况，才能提出问题和解决的办法。

第二、 紧跟中央。向毛主席、中央、中央文革小组请示报告，不要以为自己了解了就不报告中央，不要以为是小事就自己

处理，不要以为自己聪明就不请示报告，也不要怕麻烦中央。无论大事小事都要请示报告。总理、中央文革小组同志都是日日夜夜工作的。可以发电报、打电话。打电话看到的人少，又传得慢，打电报大家都可以看到，还可以自己坐飞机来嘛，一两个小时就可到，不要自己想当然，自作聪明，自作主张。这是我反复要讲的，是三条当中最重要的一条。

第三、 现在经过一年文化大革命，左派右派阵线分明，你们绝不能以是否冲军区来划分左派右派，要以拥护还是反对毛主席亲自发动的这场文化大革命、要以拥护毛主席还是反对毛主席作为划分左右派的根据。要坚决站在毛主席一边，站在左派一边，站在群众一边。不要单纯从成分纯不纯，党员多不多，干部多不多来分左右派，来看问题。成分是需要的，但不能唯成分论，主要要看站在什么路线上。对待保守派要进行充分的政治思想工作，要进行分化争取工作，不要使他们长期对立，要争取广大受蒙蔽群众过来，使他们站到革命派一边。对保守派的头头，要按照主席指示的精神，发动群众把他们抓出来。要坚决支持左派，把受蒙蔽的群众争取过来。左派本身有问题应该强调联合，说服他们不要打内战，不要搞本位主义、风头主义、小团体主义。这些主义不利于左派，而有利于右派。不要镇压群众，出了问题，出了事情，要报告请示中央，不要急，要慢慢地有步骤地解决，‘四快一慢’，把情况弄清楚了，报告请示中央批准了再办，这是毛主席一贯的工作作风。”

林彪不无担忧的说：“现在老实讲，担心我们同志担负这样重的任务犯错误，对文化大革命不利。现在依靠军队，军队不犯

错误就好。要不犯错误就要依靠左派，依靠群众，最重要的是请示中央、中央文革小组。犯了错误就要高姿态，早认错早检讨，改正的越快越好，群众就会满意，就会谅解。有错误不认错，遮遮盖盖，拖拖拉拉是不好的，坚持不改错误是危险的，抗拒的办法是不行的。部队介入文化大革命都是仓促上阵的，情况不了解，难免犯错误，错了不认错，就被抓住辫子，错了改了，就会得到群众的谅解。共产党人要有这个风格。”

“现在的革命是革我们原来革过的命的命！这种革命，许多同志没有准备，没有认识。只有我们毛主席理论水平最高。在理论上，路线上，思想上，方针政策上高瞻远瞩，胸有成竹，早有准备，或者思想理理水平高的同志有准备，其他一般的同志都没有思想准备。”

“全国各大军区过去有两个不放心，一个是北京，一个是武汉，拿他们没有办法。文化大革命解决了这个问题。事物的规律是坏到了顶点，就要向好的方面转。革命的力量总是要前进的，反动的力量总是要失败的。某些人不管怎么反动，总是顶不住革命洪流。隐藏不如暴露，坏人坏事，暴露出来就是好事，与其包着脓包，不如让它穿头。毛主席指示，烂透了的就可能迅速好转，不痛不痒的就会拖下去。坏人不完全暴露，就没有理由把它打下去。……”

“这次文化大革命胜利很大。真是代价最小最小最小，胜利最大最大最大。表面看来很乱，乱，把反动路线搞乱了，把反动阶级搞乱了，把他们都暴露出来，把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搞倒了。”

武汉各大造反组织的头头们不停地记录着林彪的讲话内容，眸子里溢出了激动的泪花。

林彪继续说："现在不少地区党、政机关都瘫痪了，表面上看来很乱。这个乱是必要的、正常的，不乱，反动的东西就不能暴露。我们敢于这样做,正是因为有毛主席的最高威信和解放军的力量。有这样的条件，不让他们暴露什么时候暴露呢？乱，在毛主席领导下是不怕的。"

接着,林彪总结说:"乱有四种情况:(一)好人斗坏人，应该。(二)坏人斗坏人，这是'以毒攻毒'，是我们可以间接利用的力量。(三)坏人斗好人，像北京军区、海军、空军、总参、总后就有过这样的情形，好人挨整，暴露了坏人，锻炼了自己，好人吃点苦头，但尝到很大的甜头。(四)好人斗好人，这当然不好，有误伤，有损失，但可以从中得到教训。这四种情况，前三种都有利，只是第四种差些，但这是人民内部矛盾，容易解决。"

"只有第三种情况，坏人斗好人，好人挨了整，邱会作同志被总后当权派中的一小撮坏人搞了一个多月，几乎被整死。海军的李作鹏、王宏坤、张秀川也是被整。吴法宪同志也是这样。过去你们吃了苦头,现在尝到了甜头。如果是坏人整好人就不要怕，顶多就是邱会作、李、王、张、吴法宪那样，要顶住，要沉住气。要看到形势对我们很有利，这是个百年大计，千年大计。有伟大领袖毛主席健在,只要有毛主席的崇高威信和解放军的力量这两个条件，就不怕，坏人一定会受到批判，受到惩罚。就是踢翻了天，也能够拧过来。"

"军区、省军区、军分区、人武部的干部,要按照毛主席指

示分期调来集训,重新学习毛主席著作,听取革命造反派的意见。”林彪似乎讲得很累,他喝了一口水,缓慢地说,“要把错误当教材,来接受经验教训。保守组织中的坏头头也可以调来集训。过去的党政人员思想不通的,也要进行教育。”

“就是暂时被打倒的人，教育过来也是好嘛。大多数干部是可以争取过来的,思想不通的也可以争取过来,使他们改头换面。错误改了还可以工作。还有思想不通的可以换下来，能不打倒就不打倒，打倒的还可以重新教育过来。领导班子是国家机器，必须是合乎毛泽东思想的，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上的，否则就要撤换，但不能不教而诛。”

周恩来说：“集训由邱会作、王新亭、王宏坤同志负责，抽出政治学院、后勤学院、空军学院、高等军事学院、军事科学院负责接收学员，把文化大革命材料编成教材。”

“我们一定要按照毛主席的教导，要用文斗，不要武斗。不要动手打人。斗争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斗争那些地，富，反，坏，右分子，也是这样。武斗只能触及皮肉，文斗才能触及灵魂。”

“刚才讲了，我对情况没有同志们熟悉，我说的话供参考。许多问题，总理、中央文革都解决了。

一再告诉你们：三个条件，特别是第二条。怕你们犯错误，事情宁可慢些，凡是要多考虑，不要急，拖几天，天塌不下来。总理，伯达，康生，江青同志和文革小组其他同志日夜干，希望上上下下都要注意请示报告。”

下午 17 时,林彪讲话在一阵海啸般的欢呼声中结束。

康生说："林副主席指示太重要了，上上下下要大讲特讲，根据林副主席的指示要搞个教育纲目。"

陈伯达讲："林总指示很重要，对我们也是个最大的教育。过去，我们请示报告不够。"

8 月 9 日晚，陈伯达、谢富治在人民大会堂接见蒯大富、韩爱晶等人。陈伯达说：

"现在存在的问题是不深入地探讨问题，对周围的事没有很好地考虑，心总在飞。"

韩爱晶说："聂元梓、蒯大富，我们这几个人是小资产阶级，都快成修正主义了，应该到外地工农中去锻炼。"

陈伯达说："你们的毛病很多，你们还不是修正主义，你们要接近群众，学习主席著作，要有群众感情。"

蒯大富说："我们这几个人出风头太多。"

陈伯达说："你们风头是出了不少，风头主义是腐蚀人啊！"

韩爱晶说："要防止产生修正主义！"

陈伯达写了几个字："战斗，学习！战斗，学习！战斗，学习！"

散会时，陈伯达对韩爱晶和蒯大富说："你们跟我一起到中南海西门去看看，好不好？"

蒯大富和韩爱晶欣然接受。

出了人民大会堂，坐进陈伯达的轿车，几分钟就到了府右街，在离中南海西门还有一二百米的地方，他们跟着陈伯达下车。

8 月 5 日百万人大会之后，中南海周围"揪刘"群众绝大部分撤回单位了，只有零零星星，极个别单位帐篷还在，还有三三

两两的留守人员。

陈伯达不紧不慢地走到一个帐篷前，看到几个年轻人正在帐篷口打扑克，便靠近问道："你们在做什么呀？"

打牌的人抬头看看他，只是笑笑，他们没有认出陈伯达。

陈伯达又说："你们该撤回去了，不要在这里了。"

他说完又往前走，又凑近另一个帐篷，又伸着头看一看，说两句。

陈伯达的福建话北京人听不懂，韩爱晶和蒯大富紧随其后，每次他说完，他们就明确地对留守的人讲："大会已经开了，中央要求大家撤离中南海，你们赶快抓紧撤离回到原单位去，不要在这里呆了。"

走着走着，快到中南海西门的时候，陈伯达又在一个帐篷面前站下来说话，被人认出来了，群众热情地围过来。这种场面刚出现几分钟，不知从哪里一下子来了七八个警卫战士，马上把群众给隔开，车随即开到跟前，警卫战士开车门让陈伯达上了车。陈伯达问韩爱晶和蒯大富：

"你们怎么回去？"

蒯大富说："我的车早回学校了。"

陈伯达说："那我送你们回去吧！"

汽车向清华大学开去。韩爱晶又重复问起曾向周恩来问过的话："现在全国的斗争很激烈，外地造反派分成激进一些的和讲政策些的，我们学校的一些同学在外地有的支持了这一派，有的支持了那一派，我们北航在北京也支持了一些干部、党员、工人多的，在运动中表现比较温和的群众组织，有人说我们支持变相

老保，我们是不是应当改变态度跟另一派来往？北京有人说我们北航温和，变修了。”

陈伯达不像周恩来那么干脆，他在思考，一边说话，一边把手伸到膝盖前，握着一个把手摇起来。只见一面玻璃慢慢地摇起来，把他们和前边的司机隔开。韩爱晶看着心里有点不安：“这不是对人家司机不信任吗？”

这是他头一次见到这种情况，原来他并不知道汽车里面还有这样得装置。

陈伯达没有回答韩爱晶的问题，只是说了一句：“拿破仑讲，先投入真正的战斗，然后再见分晓!”

车到了清华大学的西门，蒯大富说：“伯达同志，我们到清华了。”

陈伯达说：“那韩爱晶呢？”

韩爱晶赶紧说：“我今晚就住在蒯大富这里了，你回去吧。”

他们两人下了车，陈伯达也下来了。天空已经露出鱼肚白，陈伯达双手抬起，做了一个作揖的姿势说：“无限的光明，无限的希望，无限的前途！行百里者半九十，你们还只走了半里啊”

韩爱晶很有点陶醉，他和蒯大富从西门走进清华，感到陈伯达很可亲。

## 第 802 回：奔各地，武汉造反派“支左”　下煤井，二十七军转弯难

王力在 8 月 7 日晚上约见外交部姚登山等人谈话后，又于 8 月 8 日上午，专门写信给姚登山，以文字的形式阐述了他的观点：

姚登山同志：

我们接到外交部革命造反总部八月五日的一封信，并附了你讲话的一个摘要。这封信和材料，关锋、戚本禹同志和我都看了。我们认为，革命造反总部这封信的精神是不好的，不对头。戚本禹同志讲的几句话，是正确的。你讲的话，也是对的。这些话引起群情激昂，高呼口号，是好事，是革命的景象。这些，为什么一定要加以反对呢？斗争的矛头究竟要指向谁呢？在要陈毅到群众中去检查的问题上，总理同文革小组的同志是一致的，企图从中寻找什么裂痕是徒劳的。现将外交部革命造反总部的信和附件送去。

敬　　礼！

王　　力（签名）

一九六七年八月八日

8 月 8 日上班时间一到，“联络站”一把手王中琪急如星火地召集其所属战斗队队长开会，传达“王八七讲话”和王力 8 月 8 日来信。王中琪宣称，王力讲话是正式指示，决心要坚决打倒陈毅，要彻底砸烂外交部的“三降一灭”。会议决定要借王力讲话的“东风”，整顿思想，整顿组织队伍，采取行动。

当天，周恩来看到王力“八七”讲话的传单后，批给康生、王力，提议 3 人一谈。

8 月 8 日，印尼驻华大使馆托中国雇员向中国外交部递交抗议照会，被拒收。事后周恩来批评说：“印尼大使馆是在无产阶级专政下面的国家里，我们要保护它。如果在战场上是可以消灭的，这样做外国报纸一登，对主席威信、对毛泽东思想不利，主席不主张这样做的”。

8 月 9 日下午，姚登山在外交部全体大会上宣读王力来信。接着，“联络站”核心组传达“王八七讲话”。会场气氛达到高潮，很多人说“外交部革命造反总部”和“攀险峰野战兵团”是“保皇狗”，呼喊“打倒保皇派”等口号，决定对“外交部革命造反

总部”和“攀险峰野战兵团”开展强大“政治攻势”，压垮他们。“联络站”印发“王八七讲话”，人手一册，并将“王八七讲话”传到中国驻外使领馆。说它“吹响了外事口文化大革命新的进军号”，是“毛泽东思想的凯歌”，是“外事口文化大革命的新十六条”等等。凭借“王八七讲话”所造成的声势，“联络站”再度对外交部进行“机构改革”，大批干部彻底靠边站。他们贴出大标语：

“彻底改组外交部党委！”

“打倒三反分子陈毅！”

他们决心彻底砸烂以陈毅为首的外交部“修正主义特权阶层”。

9 日晚 23 时 35 分至 10 日凌晨 4 时，周恩来、陈伯达、康生、谢富治、王力再次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接见了武汉的群众组织代表。这次参加接见的除有上次到会的人员外，还增加了“三司革联”的一位代表曾庆元。武汉军区曾思玉、刘丰，15 军赵军长、方副军长、29 师政委张昭剑及空军和北京、沈阳、广州、福建军区的主要领导吴法宪、郑维山、陈锡联、黄永胜、刘培善等也参加了这次接见。大家进一步听取了武汉情况的汇报，并作了指示。

会后，武汉军区领导曾思玉和刘丰与参加接见的武汉各群众组织代表一起将中央领导两次接见的讲话精神整理为《中央首长在武汉革命派组织的座谈会上的谈话纪要》。同时，中央如此高的礼遇，也使武汉各大造反组织的头头们激动万分，受宠若惊。“工人总部”一个头头在日记中写道：

“来北京后，多次受到中央首长的亲切接见和鼓舞，我的心情一直处于极度兴奋之中。特别是听了林副统帅的重要讲话以后，使我心更明，眼更亮，进一步认清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重要性、必要性和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反动性、疯狂性。我决心不辜负中央首长的殷切期望，在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激烈斗争中，不断提高自己的觉悟，为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献出自己的青春热血，直至自己的生命。”

“新华工”、“新华农”、“新湖大”几名头头咬破手指，在一张白纸上，联名书写了一篇《誓与陈再道之流决战到底》的血书，张贴在住所大门旁的醒目处。

为了把武汉之火燃向全国，中央文革小组向武汉学生造反派头头杨道远布置了一项特殊任务，要武汉组织一批造反派力量，到全国各地介绍、推广经验。杨道远接受任务后，连夜飞回武汉，召集十几个学生造反组织头头开会。

“战友们!”杨道远激动地说，“武汉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了决定性胜利，以王任重、陈再道为头子的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已经被我们打得落花流水。江青同志和中央文革小组，让我转达对大家的问候!”

“向江青同志学习!向江青同志致敬!”会议室内，人数不多，但声音如雷一般响亮。

“毛主席教导我们，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现在，全国许多地方党内、军内的走资派还十分猖狂，我们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难道能坐视不管吗?”杨道远环顾了一下大家的表情，神情庄重，语调深沉地说，“中央文

革小组指示我们，要抽调骨干力量，组成专班，奔赴全国各地支左。这是中央首长对我们武汉无产阶级革命派的肯定和信任！”

在坐的一些造反派头头血气方刚，正为深得中央文革小组的信任而热血沸腾，他们激动得摩拳擦掌，纷纷要求分派任务。会后，武汉造反组织向全国 24 个省(市)派出了上万人的小分队，前后出动数万人次，到湖北各专区、县城乃至全国“武装支左”，仅沈阳一地就派去了 300 多人。一时间，到处都在揪“李再道”、“王再道”。特别是军队系统，许多领导干部被打成“陈再道式的人物”，戴上“军内一小撮走资派”的帽子。此事后来受到周恩来的严厉批评，当然也遭到了当地部队和一些组织的臭骂。

全国各地连续的武斗和动荡，使煤炭生产接连滑坡，至 8 月，连全年产量的一半都没有完成。8 月 10 日凌晨 4 时 40 分至 5 时 50 分，周恩来在接见完武汉代表后，又来到人民大会堂南会议厅，接见等候在这里的煤炭部和煤炭系统在京单位各群众组织代表。同时参加接见的有李富春、李先念副总理，中央文革小组戚本禹及余秋里。

周恩来说：“戚本禹同志昨天到煤炭部，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响应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的号召，了解了情况，提出了革命措施。现在，煤炭产量下降到这种情形，不管煤炭部的或矿院的，都是搞煤的，看到这种情形，都会难过的。煤炭计划产量比大跃进时低得多，本来完成计划是很有潜力的。这一年来的文化大革命，煤炭部领导涣散，不抓业务。当然，我们领导也有关系，没抓你们，产量一直下降。7 月份下降，8 月份更低了，连完成计划的一半都不到了。这样，只够动力运输用煤，甚至影

响发电，其他都不能做到。不管在学校，机关，总有个岗位，不抓革命，促生产，把煤炭生产搞上去，怎能行呢？首先，铁路运输，公路运输是交通命脉，没有这个，就要影响生产，影响战备和援外。第二就是煤炭。煤炭是动力嘛！当然，石油也是动力，但还是煤炭使用面最广。第三是钢铁，有了钢铁，就有了物质基础。有了以上三个就好了，其他即使停了一下，少了一些，以后也可以补上。唯有这三个没有办法补上。当然，现在减产，还有另一个原因，运输也有问题。即使产出来，运不出去也不行，也不好再生产。或者，运了卸不下，也不行。铁路运输本身要煤，大多数是蒸汽机车，因此，运输和煤炭生产有相互关系的。当然，煤炭生产主要还是本身的问题，钢铁和煤，材料有了，就好办了，因此，这三种，总要有一定量才好，其他好追上去。现在已经到8月中期了，今天已经8月10日 ，我们希望第四季度要赶上去。

文化大革命一年多了，抓业务的部门总要管生产。今天戚本禹同志发现了这个问题。戚本禹同志建议很好，这也是他的创造，让你们两派勤务组都下去考验。勤务组下去有好处。两派勤务员都要下去。你们下去，两派不在一个矿，不要把观点带下去，下去要带他们抓革命、促生产。”

接着，周恩来问了各群众组织人数和勤务组人数，他要求：部机关两派群众组织的头头、“勤务员”都要下去，一人到一个矿。他还根据各群众组织头头的人数明确规定：部机关“东方红”组织去 11 个矿；部机关“井冈山”去 10 个矿，第一批先搞 21 个大矿。同时，周恩来还叫各单位大致安排了下矿的人数，并同意文工团，设计院也下去。同时还强调：“两派不要在一个矿，

不要把派别斗争带下去，这样才能表现你们的革命精神。凡是生产下降的地方，矿里就分两大派。现在各矿区和地方都有联系，我们要通过地方，通过军管委员会推动他们抓革命，促生产。你们下去要以身作则，既要宣传，又要劳动。不要把矿上的斗争和社会上联系起来。联系起来就有连锁反应了。”

他举了京西矿和唐山矿的例子，并明确指出：“不要相互串联，不要相互冲击，不要夺部队的枪。部队是国家的支柱嘛！是保卫矿区生产的嘛！”

他说：“最近，由国务院富春同志起草两个文件，你们带下去。8 月，雨季即将过去了，9 月要狠抓。冬季用煤多，你们下去，预计半年。你们勤务组下去，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推动两派抓革命、促生产，要把这件事做成功。你们都是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只是观点不同嘛！让你们下去考验，通过考验，看你们是否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你们下去，各显神通。9 月看成绩，看谁毛泽东思想用得好，谁的说服力大。”

“一、二月份铁路搞得很紧张，我们曾经把铁道学院等派去搞铁路运输，成绩很大。你们下去抓好了，部里革委会就有希望了。在部里，先成立革委会筹备小组，派矿院红卫兵小将参加两人，派空军工程部王素同志为军代表，和空军司令员吴法宪同志商量了。我们得到双方同意，让煤炭部副部长范文彩同志抓业务，还是站得出来嘛！现在抓到了这个窍门了，看你们的前途，还得大联合。”

周恩来接着宣布：“王素同志任筹备小组组长，范文彩同志任副组长。另外，京西煤矿工程师赵金岐同志也参加筹备小组。

部‘东方红’参加筹备小组 5 人，有肖声远、朱克勤、杜古冷、詹坦、陈学斌。部‘井冈山’参加筹备小组 4 人，有张学信、张俊恒、韩春田、许志恩。另外，还有矿院两位红卫兵孙殿华，石明辉两同志也参加筹备小组。这样，筹备小组共由 14 人组成。筹备小组要很好地抓革命，促生产。”

他最后说：“现在有一种呼声，什么第三次大串联，这个提法是错误的。我们反对自由外流。点一点火还不够吗？又把自己的派别观点带下去，制造紧张局势，很不好。自由外出的，一律不算下矿人员。全国形势很好，不能乱搞。这次就谈到这里。”

8 月 16 日，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出《给煤炭工业战线职工的信》，号召煤炭工业战线的革命派，坚持抓革命促生产，正在武斗和停产的煤矿，应当立即停止武斗。

7月下旬，南京军区通知驻无锡27军军长尤太忠、政委马杰、政治部主任吴戈华3人到南京A、B大楼，解决27军支左的问题。

尤太忠，马杰决定带27军参加无锡“支左”的政治部宣传处处长王晏参加……当南京军区的一位秘书带他们4人走进B楼二楼会议室时，里面已有十几个人等在那里。

南京军区领导说：“今天请你们27军的人来，不是开什么会，是由我代表军区领导和江苏省军管会给你们谈几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关于你们写的镇压造反派那个错误检讨问题。那个检讨我们都看了，觉得根本不像个检讨，不痛不痒，不像个样子。你们一点也没有放下架子，你们把人家一个几万人的一个组织给镇压了，把头头打成反革命，关进监狱几个月。你们还说

这是因为对文化大革命不理解。不理解怎么知道他们是反革命？这个检讨是谁写的？”

吴主任指着王晏说：“这是王处长写的。”

那位领导瞪了王晏一眼说：“你这个处长有点乱弹琴，把你打成反革命，关进监狱里，我说这是不理解，你愿意吗？还有什么不理解呢，你们本来就是出来镇压的嘛。不是你们交待所有人布置的吗？你们要好好地写，写不好就要被动，现在你们27军够被动的啦，把这么多人赶到外面来，听说你们还使用坦克打他们。同志哥，这太不像话啦！你们看现在全军，全国都说话啦。同志哥，你们争取主动吧！等着中央说话就晚啦。”

尤太忠有点忍不住了，插话问：“你听哪个说的我们开坦克车打造反派的？”

领导说：“还用听说吗？火车上，汽车上，大街上，大字报，小字报到处都写着，还问个啥卵球！不管用没用坦克打，反正坦克是有的，反正他们是被你们打出来的，反正你们的检查要重新好好写。”

他接着说：“第二个问题，就是要加强、充实无锡军管会组织的问题。我们考虑，无锡驻军单位很多，他们应该参加军管会。空15师，炮9师，无锡人武部，工程兵，还有海军航空兵，他们都应当参加，这样有了事大家商量着办就好了。只有你们27军一个单位包办，这样不好，你们回去做个准备，过几天他们的人就到了。”

“第三个问题，是民主作风的问题，听说在取缔‘红总’的时候，吴主任就不赞成，你们硬是不接受他的意见，结果搞到这

个样子。你们还不接受教训，听说吴主任坚决主张‘转屁股’，全部支持‘红总’，解散‘老保’，你们还是不听，反而把‘红总’打跑出来，同志哥，不行啦！军管会里搞那些没有路线觉悟的人，不是坏了事吗？应该把他们请出去。”说到这里他停了一下，把手一挥说：“完了，老尤，你看还有啥格说话。”

尤太忠说：“马政委，你先说吧。”

马杰说：“1、关于检讨的问题，我们可以再写。2、关于‘红总’是打跑出来的，还是有人指使他们撤出来的，是会搞清楚的。3、关于坦克的事，请领导上打个电话问一问装甲兵部，不就清楚了吗？4、关于吴主任提出‘转屁股’的问题，我们军党委讨论过多次，觉得屁股绝对不能转，若是军区党委认为一定要‘转屁股’，就请下个文件，我们照着执行；如果哪个领导个人意见，我们是不会执行的。5、关于驻锡单位都参加军管会的问题，请军区与他们联系好，他们提出名单，什么时候到，我们都欢迎。”

尤太忠说：“我完全同意马政委的意见。”然后转身问王晏：“今天谈的都记下了吗？”

王晏答：“记好了。”

尤太忠又问那位领导：“你还有什么指示？若是没有了，我们马上就走。”说完站起身来，走出会议室，下楼走了。

尤太忠他们回到无锡，召开军党委常委会。参加会议的有马杰，尤太忠，王铤，徐学忠，吴主任，秘书蔡惠然，因为工作需要吸收王晏、王明清二人参加会议，会议马杰主持，他宣布会议议程：

1、 讨论军党委的检查。

2、 讨论要不要“转屁股”。

3、 讨论要不要撤换军管会的人员。

他接着说：“前几天，军区主持工作的领导，受军区党委和江苏省军管会的委托，召见我和尤太忠，吴主任同到南京，向我们传达了以上三个问题的意见，他指示（1）我们党委取缔‘红总’的检讨写得不像话，要重新写。（2）他说我们党委应该接受吴主任的意见，彻底‘转屁股’支持‘红总’，解散‘九、二’。（3）他要把我们军管会里没有路线觉悟的人请出去，（4）他决定驻锡的各个部队和南京步校，都要派干部参加军管会。这几个问题，我和军长在南京都表了态，我们俩的态度是不同意他的意见，若是一定要我们执行，就请军区党委正式下个文件，今天，我们军党委的常委都在，大家讨论我们在南京的表态，常委若是认为我们表的态不对，可以否定，按常委多数人的意见办，下面先讨论第一个问题，就是检讨要不要重新写，怎么写？

王铤说：“你们在南京的情况，王晏昨晚已对我说了，我同意你们俩的全部意见，也没有补充。

徐学忠说：“那么我看问题很明白了，屁股是不可以随便转的，好转老早就转了。要派人到军管会来的问题，那么要是军区相信27军，我们就自己干，不相信，我们就不干，叫别人来干，军管会是个军事机关，不是个大杂烩！”

雪国衡说：“我完全同意大家的意见。”

尤太忠说：“马政委咱们把意见再明白地说一下，检讨不再写，屁股不能转，军管会的人不需要清理，不要外单位来掺沙子。

马杰说：“为了郑重起见，常委对上面的意见进行表决，赞

成尤太忠意见的人请举手。”

尤太忠，徐学忠，马杰，王铤，雪国衡都举起手来。

马杰又说：“反对的请举手。”

吴主任举起了手。

马杰说：“常委5个人，4个赞成，1个反对，多数通过。

马杰对蔡秘书说：“按照今天会议讨论的结果，正式给南京军区党委写报告。”

## 第 803 回：抢武器，南京无锡均发生　对湘赣中共中央作《决定》

无锡“主力军”从无锡败退到南京后，住在小营里。8月9日上午，南京军事校院内的“屁派”军人和镇江后字252部队，即解放军镇江汽车学校的李德康二人来到他们的指挥部。无锡“主力军”陆渭文、浦湘海将他们迎进办公室，当时在屋里的还有常州“主力军”头头梁炳生。

李德康询问了无锡、常州“主力军”情况后说：“你们无锡、常州‘主力军’总不能老是蹲在南京，要想办法逐步向本地靠拢才是。我们镇江‘三代会’欢迎你们到镇江去，并愿意帮助你们杀回本地。”

陆渭文、浦湘海和梁炳生3人对李德康表示了感谢。

李德康又说：“我们同这里的负责人已商量好了，你们可以在今天下午把这里军事学院的枪抢了，带走。”

陆渭文、浦湘海问：“枪支的仓库在什么地方？”

军事学院的人详细介绍了仓库的位置，并告诉他们：仓库保管员，都是自己人。

商议结束，李德康从小挎包里拿出两支“五四”式手枪送给了陆渭文、浦湘海。

他们走后，陆渭文、浦湘海二人立即召开紧急会议，由陆渭文布置抢枪任务。

午饭后，12时30分，两个穿着旧黄军装戴着红袖章的无锡“游击兵团”的人走到军事学院炮标仓库大院门口站岗的哨兵跟前，

先向哨兵敬了个礼，然后佯装问路，一个人在前，一个在后。突然，在后面的那个人将哨兵拦腰抱住，前面的一个迅速的将哨兵的枪强行抢下。然后，躲在大门外的无锡“主力军”和几个军事军院的人立即将大门打开，“主力军”冲了进去，将传达室的电话线用大刀砍断，把传达室值班的一名干部绑了起来，然后沿着到炮标的路上都安排了岗哨。

随后，几辆军事学院的十轮大卡车和镇江“后字252”部队的嘎斯汽车满载着无锡“主力军”冲了进来，直向炮标驶去。

千人左右的队伍，冲进了存放武器的大院，由内线带路，直奔武器仓库。大家七手八脚地将仓库里的武器尽数搬了出来。

由于这里的武器主要是军事教育所用，品种从 18 世纪的木柄手枪开始，一直到现代的火焰喷射器，还有日本的水桶机关枪，苏联的各式轻重机枪，应有尽有，就是没有弹药。

这次“抢枪”一直到下午 16 时左右结束。只见炮标仓库一片狼藉，玻璃窗全被长矛捅碎，“喀秋莎”的轮胎、车窗、管路等尽数破坏，加农炮的炮膛里塞进去了大木桩，火焰喷射器拆的是七零八落，还有很多的枪枝还没拆封，上面涂满了黄油，许多人拿着各种各样的枪耀武扬威。仓库里面一座很先进的电动教学沙盘及许多教学的用品也给破坏了。

第二天，无锡“主力军”又冲到孝陵卫坦克连去抢坦克。但坦克连已有准备，他们的行动没有成功。

无锡“主力军”抢了枪后，常州“主力军”、安徽“炮轰派”也都纷纷来抢，除了抢枪，还抢被服，抢一切能抢的东西。他们到服务社买东西不给钱，把冲锋枪往柜台上一放说：“老子是造

反派，没有钱，你们看着办!”与土匪无异。

这次抢枪事件，也使军事学院声名狼藉。军区和外界，包括北京的军委办事组都认为是军事学院的人唆使无锡“主力军”抢枪。从此，军事学院的哨兵再没有拿枪站岗了，他们只拿着一本毛主席语录，号称拿着“精神原子弹”在站岗。

8 月 10 日以后，无锡“主力军”由浦湘海带队又从镇江出发去扬州，打开了一个抗日战争时期留下的弹药库。

这时，252 部队的李德康提出了改变在南京本地整顿队伍的方案，通知镇江 252 部队派出数十辆军用卡车，将在南京的“主力军”于当夜系数运回镇江，住进了镇江金山寺。陆渭文最后到达镇江金山寺，252 部队前来通知他和浦湘海二人，说江苏省军区赵俊司令员要接见他们。同时参加接见的还有常州“主力”军头头梁炳生。宾主坐定，主人热情接待，中华牌香烟招待几位客人。但是江苏省军区司令员赵俊除了表示关心的话题外，连明确的“坚决支持”都没有讲，随后招待几位客人在省军区午餐。这次接见之后，252 部队开始帮助无锡、常州“主力军”在金山寺等地进行军事训练。

无锡“92”派很快知道了“主力军”抢南京军事学院武器库的消息。这天，“92”派的周锡林和邹海根从无锡市人武部一位外号叫‘豆腐部长’的副部长那里得知，无锡市的民兵武器和弹药，都放在 27 军二号坑道，离市区 20 公里。这条坑道有两个出入口，一个通向武器库，一个通向弹药库。坑道口在一个大山沟里，大小汽车可以通行。看守坑道的是陆军 80 师的一个步兵排。

第二天上午7时，“92”派邹海根带领女一中“红革风雷”

造反兵团和二女中“云水怒”兵团300多人，分乘10辆卡车向坑道驶来。周锡林则带着无锡柴油机校“1018兵团”和动力技校“小延兵团”共500人，分乘15辆汽车，随后跟进。半小时后，邹海根的车队到达坑道口，哨兵放下栏杆，表示不准进入。

邹海根跳下车，走到哨兵面前说：“我是‘92’中心组的邹海根，是到这里来搬运民兵武器的。”

哨兵拿起电话向值班室报告，不一会仓库主任手里拿着一串钥匙走到哨位口，问邹海根：“你们是哪个单位的？”

邹海根笑嘻嘻的样子向主任招手，仓库主任走了过去，邹海根递给仓库主任一支香烟，主任挥挥手说：“这里不可以吸烟。”

邹海根收回香烟，又把嘴巴贴在主任耳边，低声地说：“我是‘92’总部的邹海根，现在‘红总’要来进攻无锡，他们在南京抢了军事学院的枪，装备了自己。现在他们各种武器都有，还有飞机配合。我们‘92’什么都没有，我们向人武部说好了，他们同意把民兵武器借给我们用，现在我就是带着人来搬的。”

主任问：“有批示吗？”

邹海根说：“没有。”

主任说：“没有批文不能搬。”

邹海根说：“情况太紧张了，你先让他们搬，我陪着你一块到人武部去办批文。”

主任说：“不行，那不行！武器不好开玩笑，我担待不起这个责任，要不我请示一下我们团长，你看好不好。”

邹海根说：“来不及了，让我们先搬吧。”

主任一再说：“不行，不行。我担不起。”

两人正说着，争着，三、四个身材高大的女学生来到主任面前，行了个军礼，说："解放军叔叔，实在对不起，再晚了，'红总'就要来啦！我们无锡人民就没命啦！"说着，几个人前后包围，把主任抱住了。主任一动也不敢动，只是嘴里喊："太不礼貌了！太不礼貌了！"一个女学生把主任手中的钥匙夺到手里，朝汽车上的人一挥手，几百个人蜂拥而上，哨兵见势不好，拉响了警报。接着一个排30多人荷枪而出。

300个女学生毫不犹豫把战士们团团围住，战士手里虽然有枪，但一点都没有用处，因为一来早就有命令不准开枪，二来他们枪里根本没有子弹。开始只是后退，后来退到坑道口，再也没有地方退了，嘴里叫着我们开枪啦！实际上毫无办法，七、八个学生包围一个战士，使他们不能反抗，也跑不掉。不多一会，连他们手里的枪也被夺走了，这时周锡林带领"1018兵团"也到了，这些小伙子冲上去拿钥匙就去开库门，开不开，就用斧头砸，主任急着喊：

"不要砸锁，我给你们开。"

坑道门开了，只一个多小时的时间，武器弹药全被搬走了。

8 月 10 日，中央下发了中发［67］243 号文件：《关于处理江西问题的若干决定》。毛泽东在《关于处理江西问题的若干决定》上批示：

此件看过，照办。

毛泽东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日

《决定》明确指出"江西省军区及部分军分区的某些领导人，

在支左工作中，违背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犯了严重的方向、路线错误，支持了保守派，镇压了革命派，并挑动农民进城参加武斗，切断交通。例如：在南昌，军分区某些人大发枪弹给保守派（联络总站），打死打伤大批革命造反派（大联合筹委会）。在赣州，军分区个别领导人支持了保守派，对革命造反派和红卫兵小将进行了武装镇压。为此，中央决定改组江西军区，任命程世清同志为福州军区副政治委员兼江西省军区政治委员，杨栋梁同志为江西军区司令员，并调温道宏同志为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原江西军区吴瑞山等同志，应对所犯错误向革命群众作认真的检讨。”

文件号召江西省各群众组织和广大群众坚决支持进驻江西的支左部队，坚决揭露和制止保守组织中个别头头煽动攻击、殴打、绑架我支左部队指战员的错误行为。要求江西省军区及军分区广大指战员，“主动地同进驻江西的兄弟部队紧密合作。”“要高度警惕一小撮坏人挑动宗派情绪，挑动部队之间的斗争、制造事件的阴谋。”

“中央决定着手成立以程世清同志为主要负责人的‘三结合’的江西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并提出“杨栋梁、温道宏、鲁鸣、罗元烬，陈昌奉等同志，以及黄先、刘瑞森、郭光洲等同志，可先参加筹备小组，并开始工作。筹备小组统一领导全省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工农业生产，依靠广大革命群众，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并为成立革命委员会准备条件。”

文件要求江西两派“应坚决执行制止武斗的协议。”

文件提出“在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的领导下，在条件成熟的

地区，要把革命群众武装起来。目前首先在南昌、赣州两地，准备研究实行。”并再次强调：“今后，军分区、人武部，决不准以任何借口把枪支弹药发给或变相发给保守派；各派都不准以任何借口夺取解放军枪支、抢劫军火仓库和各种军用物质。”

同一天，中央还下发了中发［67］244号文件：《中共中央关于湖南问题的若干决定》。

对《中共中央关于湖南问题的若干决定》，毛泽东批示：

已阅，同意。

毛泽东

八月七日下午六时

这个《决定》曾两次报送毛泽东审阅。第一次是8月4日，已在784回中详述。第二次就是在8月7日。

这份《决定》首先肯定湖南省军区党委常委《关于支左工作中所犯错误的检查报告》中，对湖南省军区前段支左工作中所犯的方向路线错误进行的自我批评，“态度是好的，认识是比较深刻的。”同时明确：军区打击“湘江风雷”革命群众组织，压制“工联”等造反派的错误，由军区党委常委刘子云、政治部副主任崔琳等人负重要责任。并再次指出：这一错误的责任“除了军区负责之外，中央文革小组对湖南省军区二月三日关于‘湘江风雷’报告所发的‘二·四批示’是错误的，‘湘江风雷’是一个群众人数较多的革命组织，在大发展中混入了极少数的坏人，造成内部成份不纯，出现了一些缺点错误，但是不应该因此否定这个组织，在这个问题上，中央是有责任的。从这里得到教训，未经调查清楚，何必那样匆匆忙忙地根据一面之词发出‘二·四批

示’呢？因此，中央要负责主要的责任。”

《决定》说：“中央已经决定改组省军区，并将着手成立以黎原、华国锋、章伯森等同志为首的有革命群众组织代表、军队代表，革命领导干部参加的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领导全省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工农业生产。”

《决定》要求：“对于受蒙蔽的群众，决不能打击报复。”

《决定》重申：“湖南省赴京汇报代表团双方签订的《关于立即坚决制止武斗的协议》很好。各群众组织必须认真执行，坚决制止武斗，反对挑动农民进城和工人、学生下乡搞打、砸、抢、抄，抓等活动，严防地、富、反、坏、流氓分子捣乱破坏。各革命群众组织应在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的领导下，建立群众性的革命武装，保护国家财产，协助解放军维护社会的革命秩序。不管哪一派，今后都不准以任何借口夺取解放军的枪枝、抢劫军火仓库和各种军用物资。”

## 第 804 回：下命令，铁路线全面军管　韦国清，在京西宾馆被打

虽然 6 月 12 日国务院、中央军委已做出决定，对全国铁路实行全面军管，但由于铁路系统是由站点及线路构成，派出军管人员数量所限，所谓“全面军管”也只能管到“点” 上，包括铁道部机关、铁路局、分局机关、主要枢纽和火车站，而对铁路“线”上的问题，哪怕是主要铁路干线沿线，就不可能顾及了。而即便在“点”上实施的“全面军管”，也不可能阻止那里两派的争斗。7 月，京广、宝成、浙赣、湘桂、沪宁、长大等铁路干线，都曾因为当地两派群众组织的冲突而发生中断运输的情况。在这种情势下，毛泽东明确指出，破坏铁路、切断交通运输的派别组织是坏组织，应由解放军采取武力解决办法，恢复铁路正常运输。“720 事件”后，他在上海，甚至指示用他乘坐的专列火车，由中央办公厅派人负责，由上海出发，经南京、徐州、开封、郑州、武汉、长沙、南昌、杭州再回到上海，视察铁路沿线的通车情况。这列专列有特殊标记，铁路各站均知道是毛泽东的专列。

根据毛泽东的谈话精神，周恩来建议派野战军到铁道两侧实施护路。7 月 25 日，他亲自拟定了护路方案，对京广、陇海、津浦、沪宁、浙赣等主要铁路干线，分别指定有关部队包下来。其中：

38 军和 1 军从涿州到武胜关，空降兵第 15 军从武胜关（不含）经衡阳分到广州、凭祥（以上为京广线）。

68 军(202 师)从连云港到潼关(不含)，21 军和 55 军从潼关

到星星峡(以上为陇海线)。

12 军从浦口(不含)到徐州(不含)，兼及淮南芜湖支线；27 军从南京经上海到杭州(不含)(以上为津浦、沪宁线)。

20 军从杭州到鹰潭(含)，67 师从鹰潭到杭州(不含)(以上为浙赣线)。

当天，周恩来将这个护路方案和报告交由代总参谋长杨成武转送上海的毛泽东。毛泽东同意这个方案后，周恩来立即主持起草《关于派国防军维护铁路交通的命令》，经毛泽东批准，于 8 月 10 日，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名义，联合发布了中发（67）241 号文件：《关于派国防军维护铁路交通的命令》，用明码电报方式发给各大军区、各省、市、自治区革委会（筹备小组）、军管会“并 8172 部队、7250 部队”，其中特别注明：8172 部队，即陆军第 1 军。7250 部队，即空降兵第 15 军。

《命令》涉及 30 个军级单位，7 个师级单位。至 9 月中旬，全军共派出了两个师部、6 个团、28 个营、190 个连，分别配置在 191 个主要车站和 110 对旅客列车上，执行维护铁路交通秩序的任务。

命令要求各站段铁路公安人员统归所在站段护路部队指挥。

8 月 10 日，还发生了韦国清在北京京西宾馆被打事件。

8 月 1 日，广西“联指”在京代表将贺希明、霍泛 2 人押回南宁批斗。但是他们是在贺希明、霍泛二人上飞机后，才将此事向周恩来报告。贺希明、霍泛所乘飞机一到广州，周恩来立即电告，要求将他们二人送回北京。“联指”不听，仍把贺希明、霍

泛二人押回南宁。

8 月 2 日，“联指”出动 70 辆汽车在南宁游斗贺希明、霍泛二人。直至 8 月 11 日才在周恩来的严令下将二人送回北京。

8 月 2 日这天，北海市还发生“82”大规模武斗事件。

这天，北海市“联指”总指挥、北海市公安局治保股长石维雄，北海市“联指”总指挥部总参谋长、北海市公安局干部温世雄，北海市公安局局长、“联指”指挥部参谋、前线总指挥陈清熙和北海市市长、市抓革命促生产指挥部副指挥徐坤，调 1000 多农民，进攻北海市“422”派“六八”指挥部据点。在石维雄等人的指挥下，他们于早上 7 时 30 分，开始向电影院等“六八”据点发射催泪弹，并用土坦克、推土机摧毁围墙，用消防车喷氨水、氯化钴，随后用机、步枪向“六八”据点扫射。“六八”指挥部先后派人和打电话向市武装部、北海驻军和海军 4405 部队联系，要求制止“联指”武装进攻，无果。于是，“六八”的电影院、手工业大楼、海珠楼等据点先后于 2 日、5 日被“联指”攻占。

这次武斗，打死 36 人，被俘的“六八”人员，据说先后被枪杀 67 人，其中一次是 15 人被集体枪杀。

8 月 4 日，广西南宁“联指”调集上万人围攻仍被“422”占领的《广西日报》，同时还围攻文化大院、展览馆等“422”据点，遭到猛烈反击。双方使用了钢叉、高压水管、硫酸、推土机等，伤亡惨重。

8 月 7 日，“联指”发出通缉令，通缉区党委宣传部副部长谢王岗，说他是“国民党特务”。

9 日，《广西日报》社印刷厂被“联指”夺取。并于 10 日自行出版《广西日报》。

8 月初，根据周恩来要伍晋南转变态度，与韦国清合作，搞好关系，以便解决广西问题的指示，中央文革广西联络组组长王荔和伍晋南一起去京西宾馆找韦国清。伍晋南和韦国清谈话回来后，对广西“422”代表团成员说：“对韦国清不要抱希望了，变不好了。”并向代表团表示：他就是丢了官也要坚决打倒韦国清。

8 日，在王力“王八七讲话”的第二天，王荔到北京西苑旅社 324 号房间，这里是广西“422”赴京代表团处，对广西“422”代表团的刘德胜、杨福庭、李日明等人说：“戚本禹讲了，王力在外交口讲话精神，就是中央放手让造反派搞斗争。广西造反派应当走在中央解决广西问题的前面。”

8 月 10 日上午，在北京的广西“422”赴京代表曾春生、石怀宇、李跃增、雷激、何作然等人去京西宾馆找广西军区副政委王希永，以“联指”围攻《广西日报》为由，要王希永把韦国清找出来解决广西武斗问题。王希永同意了。

下午 16 时左右，广西师范学院中文系青年教师、广西“422”代表团团长杨福庭在西苑旅社 324 号房主持“422”代表团开碰头会，决定由曾春生、石怀宇、何作然、李耀增、雷激 5 人去找王希永，要求韦国清签字支持“422”，让“联指”撤出《广西日报》。如韦国清不签字，就把他拉上“422”事先准备好的汽车，揪到北京地质学院广西“422”联络站去，一定要他签字才行。

大家七嘴八舌，将人员作了分工，把南宁在北京的“422”代表分成几组，曾春生 5 人作为第一批，其他成员作为第二批，

由龙智铭与北京地质学院到北京红代会联系来人来车，和广西“422”汇报团作为第三批；由杨福庭留守西苑旅社，保护伍晋南。他们担心“422”都去京西宾馆揪韦国清了，家里唱“空城计”,“联指”再来揪伍晋南怎么办？因为当时广西两派代表住在同一栋楼里，“联指”代表团住一层，“422”住二层。

议论决定后，自治区党委宣传部“翻江倒海”组织头头刘德胜在 324 号房打电话请示中央文革广西联络组组长王荔。王荔表示：

“你们决定研究了就快去吧。等一会我也去京西宾馆看看。”

刘德胜向代表团传达了王荔的“指示”，大家决定晚上按计划行动。

碰头会开了约 20 分钟就结束了，大家提前去吃晚饭，然后曾春生、何作然、石怀宇、何作然、雷激第一批来到京西宾馆。

晚饭后，杨福庭到伍晋南房间坐了一下，告诉他“422”的安排，并说要密切注意“联指”的动向。

一会儿，已到京西宾馆的李跃增、何作然先后打电话给刘德胜，说韦国清出来了，催他们快去。

大约 21 时 40 分左右，西苑旅社“422”的值班人员在走廊上大声喊道:“京西宾馆出事了，韦国清跑了，在家的人赶快去。”

杨福庭等人匆匆赶去，大约 22 时 10 分左右，他们来到离京西宾馆大门约 100 米的东门接待室。这时，韦国清已被解放军保护进了京西宾馆，大门外还有一群一群的人。

杨福庭询问了情况。原来，曾春生他们来到京西宾馆后，韦国清在东门接待室接待了他们，参加接见的还有王希永、徐其海、

陈发洪和 141 师政委张骥等部队领导。谈判中间，韦国清说要出去小便，正想离开，北京红代会和广西“422”的一些人以为他要跑，冲过去要抢韦国清上汽车，一个大个子紧紧扼住韦国清的脖子，韦国清的警卫参谋和京西馆客房助理员陈回民竭力帮助韦国清挣脱。京西宾馆的警卫战士、工作人员和厨师等闻讯赶来保护，将韦国清与北京红代会和广西“422”汇报团的人隔开。北京红代会的大学生和广西“422”穷追不舍，和警卫战士互不相让扭在一起，一直纠缠到京西宾馆大门，被阻于此。韦国清这才脱离险境，被战士护送回他的房间。

讲起这段经历，当时在场的“4.22”柳州代表明在胜得意洋洋的对杨福庭说：“我踩到韦国清肚子上去，屎都出来了。”

杨福庭说：“莫乱说，这样多解放军保护韦国清，你怎能踩上他肚子？你又没看见，怎知他屎出来？”

明在胜嘻嘻笑笑，不敢再说。

当时在接待室的广西军区副司令员徐其海也受到推打，混乱中领章、帽徽被撕掉，军帽也丢了。

在京的广西军区支左办保卫干事董坤等人分别打电话给总理办公室和中央文革广西联络组。很快，中央文革广西联络组组长王荔、副组长周枫、组员罗安民等 4 人来到京西宾馆。杨福庭见到他们对他们说：“我也是刚到。”

王荔说：“到接待室里谈吧。”便一起进到接待室，看见所有的部队首长陈发洪、王希永、徐其海、张骥等都在里面。

杨福庭向王荔、周枫他们汇报说：“谈判进程中，韦国清说是上楼小便，有人以为他逃跑，大喊韦国清跑了，就上去抓他。

在旁的解放军进行保护，为争抢韦国清推推拉拉，双方人群一直从接待室拉扯到大门，直到解放军把韦国清保护进京西宾馆为止。”

王荔说：“我们先进去看看，你在这里等着。”

杨福庭过去和几个部队首长打招呼，和他们一起坐在那里。

王荔他们回来后，杨福庭问：“韦国清怎么样？”

王荔微微摇头，轻声说：“没什么。”然后问杨福庭：“你们意见现在怎么办？”

杨福庭说：“问题没有解决。刚才的冲突是一场误会，为解决问题，我的意见是重启谈判。”

王荔他们问：“你们的要求怎样？”

杨福庭说：“问题很简单，我们希望与韦国清达成协议，就是南宁‘422’占的广西日报社被‘联指’围攻，叫‘联指’撤出围攻就完了。”

王荔说：“你写出来，我们拿进去。”

于是，杨福庭当场写了几条，交给王荔。

过了一会儿，王荔他们出来说：“韦国清说，他也希望问题能解决，双方不要发生冲突。他愿意重启谈判，但是，他不愿和南宁代表谈了，他愿意和你谈。”

杨福庭说：“也好，只要双方愿意解决问题就好办，我代表‘422’代表团和他谈，请他出来吧。”

王荔他们说：“他不愿出来了，就按刚才这样，你写好协议，我们拿进去，作为你们两人间接谈，我们在中间传递，双方同意了，签字，就完成了。”

于是，杨福庭到京西宾馆大门外，和聚集在这里的“422”代表们说：“我正在和韦国清谈判，大家先等会儿。”

又经过了两个来回，双方达成这样的协议：“要求南宁‘联指’立即撤出对‘422’占领的广西日报社的围攻。不尽之事双方谈判协商解决。”杨福庭和韦国清签了字。

中央文革广西联络组副组长周枫对杨福庭说：“现在叫人去打印，打印好发给你们，你们就回去吧。”

这时已是子夜 0 时 20 分左右，11 日凌晨了。杨福庭随即来到京西宾馆大门外，向大家叙述了他和韦国清已经签字的协议，大家高呼胜利，又一起在大门口等了大约 40 分钟，周枫出来说：“还未打印好，打字员刚来，怕你们等得久，出来告诉一声。”

杨福庭说：“那一点点怎么搞这样久？”

周枫说：“半夜三更的，打字员好不容易才找到，还要通知总理办公室，由总理办公室通知这里的领导，通过领导才能去找打字员，不是由我们随便叫来就来的，所以不容易。你们和韦国清签的协议已同时报到总理办公室了，总理一直关注着这事，叫秘书守在电话旁等结果，终于有了结果。”

大约又过了半个钟头，周枫出来对杨福庭说：“你和韦国清签的协议打印好了，在这里。另外，有总理来电，我向你传达总理来电。总理来电：南宁‘联指’围攻‘4.22’占的广西日报社是错误的，要立即撤出，如不撤出，就不是无产阶级革命派了。由广西军区领导用明电发回南宁。”

周枫继续说：“总理来电已支持你们了，和你们签的协议是一样的，是不是就要总理来电，不要你和韦国清的协议了？”

杨福庭说："这也好，免得把问题搞复杂化，要'联指'执行'422'签的协议恐怕'联指'不服气，到会影响执行效果。只要总理来电，就变成'联指'执行不执行总理指示了，我完全同意我和韦国清签的协议取消。"

周枫说："就这样定了。我马上把这份总理指示交广西军区领导，叫他们用明电发回南宁。"

杨福庭向在场的"422"传达了"总理来电"，大家热烈狂欢，高呼胜利。

周枫又转回来，对杨福庭说："你们赶快回去了，不要在这里大喊大叫，夜深人静，影响别人休息。"

杨福庭说："司机开车走了，天亮才转回来，又没公共汽车了，无法回去。"

周枫说："那你们要保证安静，不能这样吵，也不要在大门口，到旁边一点，安安静静等到天亮。"

杨福庭说："保证做到。"

这时，已经是 8 月 11 日凌晨 1 时 50 分了，大家没在欢呼，等到天亮，接"422"的车来了，高兴而归。

8 月 11 日凌晨，周恩来的"总理来电"传到南宁，要求围攻《广西日报》的"联指"人员撤离。南宁驻军赶到报社，构成人墙，阻拦"联指"对报社的冲击。

中午，"联指"总部通知在报社印刷厂的人员撤离厂区，包围报社大楼的"联指"武装人员也后撤一段距离。"联指"人员撤离时，搬走了部分机器铜模、钳子和纸张。

下午 17 时，"422"数百人冲进报社大楼增援，并运进粮食、

副食品等。

由于“联指”撤离时搬走印刷厂的部分机器铜模、钳子和纸张，印刷设备遭到破坏，《广西日报》停刊 15 天，于 8 月 23 日改为油印出版，直到 10 月 15 日。

## 第 805 回：陈伯达，通宵只为闽事态　难分身，见湖南“湘”派代表

我们再看福建。

8月9日，福州“革命造反委员会”和“829”两派群众组织在福州华侨大厦发生武斗，周恩来、陈伯达对这一武斗事件做出3点指示：

1.把武斗停下来，不搞武斗，武斗不利于革命，不利于生产，使国家财产遭受损失；

2.不要调动农民进城搞武斗，调动农民进城搞武斗是错误的；

3.不要夺解放军的武器，若在这方面犯错误，会给敌人有机可乘。

第二天，8月10日晚23时至8月11日上午9时，陈伯达接见福建双方谈判代表。当代表进入人民大会堂会议室时，陈伯达已在那边等候。他和代表们一一握手，询问了每个人的姓名和组织，然后问道：“叶飞在报上点名了没有？”

代表们说：“没有！要经过中央批准。”

陈伯达说：“中央已经批准了吧，叶飞可以在报上批判。叶飞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国民党作风。”

接着，“829”代表控诉“革命造反委员会”围攻福州华侨大厦，说：“他们围攻我们，他们有4000人围攻我们，我们在楼上只有400人，刚才通电话时，他们还在进攻，占领了三楼，还放毒气，还准备放火，用抢来的棉被、棉衣放火，冲击时他们用

小口径步枪配合，我们大部分被小口径步枪打伤，伤势很重，有的穿过肺部、心脏，他们还挖了三个洞，准备用炸药爆炸，我们重轻伤有200多人。现在已断水、断粮，但是，我们下定决心，不怕牺牲。”

“革造会”代表汇报说：“‘829’那边说他们现在想复课闹革命，但厦大、华大、林学院、二师院又来了不少人。”

陈伯达指示说：“人马上要放，首先要检查对方抓的人放了没有。‘829’先抓人，两边抓人全部都放。”

“829”汇报说：“我们的战友两天两夜没有吃东西了，天天被挂牌游街和强奸。”

陈伯达说：“不要谈那一些了，你们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我不能做判官，这些话我都听不进去。好，好！我知道这些意见。”

“革造会”说：“我们已经放了人，他们不放。”

陈伯达：“抓人不能解决问题。”

“革造会”提出：“放人后，大家撤离华侨大厦，保护现场，进行现场调查。”

陈伯达：“我完全同意。”

“829”说：“伯达同志你不知道，他们是包围我们的，他们要先撤退，我们才能放人。”

这时陈伯达站起来，用铅笔敲着桌子说：“你们不要多说了，不要讲条件，放人和撤退同时进行，我赞成任何一个组织，都不要占漂亮房子。‘829’搞一个地方交际处也太漂亮了，我住过。‘829’立刻撤出华侨大厦，你听懂了吗？听懂了吗？‘革造会’

要保证‘829’撤出安全。”

“革造会”说：“一定保证。”

“829”讲：“伯达同志，你的军事理论水平很高，有作战经验，造成武斗是两军对垒。”

陈伯达：“武斗的经验我没有你们多。”

大家都笑了。

“829”继续坚持：“他们要先撤，我们才能放人。”

陈伯达批评说：“你又附带条件了。你们抓了人可能被关在华侨大厦，如果从华侨大厦放出来，他们这边欢迎，可能又要大举进攻，这是你们的顾虑，说穿了这是你们的困难。‘革造会’你们有真理、有毛泽东思想，退避三舍也可以打胜仗。你们看过了吗？《左传》退避三舍也不等于打败仗。”

“革造会”说：“他们人一放，我们就全部退。”

陈伯达：“好！全部退好！”

“829”说：“7月13日陈伯达接见，‘革造会’有6种传单，很多，我们都带来了。”

他们拿出来给陈伯达看。

陈伯达说：“‘革造会’传单很多，那没有问题，我是主张放姜观的，我是向你们学习的。那一次我才知道人武部的作用。人武部动员农民进城，搞什么‘过得硬’，打、抢、抄、砸。第二回接见是1000多人，我和韩先楚一起去，我在里面替韩先楚讲话，讲韩先楚是同意放姜观的，我是替他讲的，大家就轰，叫他自己讲，七讲、八讲，他才同意放。”

“829”说：“姜观放了，他们全省庆祝3天，就差没有骑大

红马，还把我们拿去挂牌。”

陈伯达讲：“戴大红花也很好。不要这样讲，关了那么久放出来很高兴，开庆祝会你们青年喜欢这样搞，好，我也没有什么意见，我和韩先楚同志说过，他们还会开庆祝会，你们要有准备。”

这时门外有“829”的100多人要求接见，陈伯达走到门口问他们：“你们来几天了？”

“829”讲：“来20多天了。”

陈伯达：“坐车不要钱呀！”

这时，“829”有人哭哭啼啼开始诉说如何受围攻，挨了打。

陈伯达说：“别算老账了，你们也不会服服贴贴的。我见你们一下就行了，不要住那么久，还要工作，回去吧！”

“829”：“回去有人要抓我们。”

陈伯达和他们谈了20多分钟，劝说他们回去，然后返回会议室，对代表们说：“我给‘829’讲，今天见见老乡，因为老乡来了，我去见见老乡，我也很勉强。不要回去讲陈伯达同志接见‘829’，这样我很不舒服，不要因我接见而捞什么稻草。我有个脾气，不要强加于我。”

陈伯达动员他们双方放人，谈了近10个小时。在8月11日凌晨1时，福建省赴京汇报团双方终于达成了第一个协议，双方同意无条件，无保留地立即停止武斗，立即释放全部抓的人员。而且约定必须在8月11日中午12时以前释放完毕。“革造会”代表陈力生、潘家驹和“829”代表余映辉、庄志鹏在协议上签字。

到了8月11日9时，双方又达成了第二个协议：

根据周总理、陈伯达同志指示，我们双方在北京经过协商，

达成第二个协议：放人后，“革造会”在三小时以内撤出华侨大厦及其周围的全部人员，回到原地。原驻华侨大厦的“八·二九”等八个总部在半个月以内全部撤离华侨大厦，另迁较为朴素的新址。“八·二九”等组织原驻的其他楼厦应按照艰苦朴素的原则，自行调整。“革造会”原驻的楼厦，也应该按照艰苦朴素的原则自行调整。

福建省革命造反委员会赴京汇报团：陈力生 潘家驹

福建省八·二九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等八个总部赴京汇报团：余映辉 庄志鹏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一日九时

陈伯达终于可以回去休息了。

虽然知道韦国清在京西宾馆被打的消息，但周恩来不能分身。几乎是与陈伯达接见福建代表的同时，8 月 11 日 0 时 45 分，周恩来和戚本禹在人民大会堂接见湖南“湘江风雷”方面代表，做他们的工作。

周恩来说：“局势不能控制，你们很难解决。打电话回去，是按我们的方针，但底下不听，……关于马坡岭问题、工程兵学院问题，原来反映的情况有点出入，不大。”

谢若冰问：“到底谁有理？你所担心的内战已经起来了。”

周恩来：“两件事单独解决不难，如果连锁反应，发展下去，内战是可以设想的。对我们的方针过早宣布有反效果。事件情况有出入，要自我批评嘛！怎样控制局势？中心问题是让解放军站出来做支柱。这个不一致，分歧就大了。解放军出了赵永夫、王良太、陈再道，不过是极少数几个人，不能到处去揪。毛主席缔

造的解放军有它的特点，有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三八作风的光荣传统。平时是按‘党团员好、劳模好、老工人听话好’这个规律办的。1 月份接受了三支两军任务，由于十几年没有做群众工作，没有经验，下到工厂、学校，不少党团员运动初期偏于保守，加上刘、邓的影响，多多少少有些错误，几乎是不可完全避免的。”“湖南军区的错误，应由刘子云、崔琳负主要责任。龙书金过去打仗勇敢，5 月份在广州作了检讨，后受别人影响，错过了改正的机会。昨天，林副主席说：‘只有毛主席领导，才敢于发动这场大革命。’枪杆子发生动摇，怎样实现无产阶级专政？单靠你们没组织好、没训练好能行吗？解放军有 40 年光荣传统，是打不垮的，现在美国要来，我们还有信心打败它。一些犯错误的老将，只要还有政治热情，还可能再战沙场，带你们去打仗，我可以保证的。不要承认了错误，还一定要打倒。戚本禹同志原来不认识龙书金，听说他很能打仗，现在犯了错误，都很同情，这是阶级感情。发动你们，就是要培养你们成为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我们的确是帮助你们的。”

“林副主席提出的三性，一定要学到。第一是革命性。修正主义比教条主义更危险。第二是科学性。极左就不好了。第三是组织纪律性。极少数坏人要清洗。如果把对解放军的基本信念动摇了，是非常危险的。如果让解放军受到冲击，内部涣散，那就更加危险。现在已经影响到这两个问题。47 军的枪、他们看守的仓库，都去抢，他们这样怎能作好无产阶级专政的支柱呢？”

谢若冰：“我们打电话要求不抓不抢不打。”

周恩来不太相信的说：“但不能控制。”接着，他念了一个关

于抢军装的材料。

一代表说："已经查对落实了，这是个流氓组织。"

戚本禹："流氓要镇压。"

周恩来接着说："要依靠 47 军，个别错误，允许改正。两派都要支持。成立制止武斗指挥部，作为过渡。'工联'人多可多出代表。他们不在，我帮他们说几句话嘛。"

一代表："'工联'另外成立一个抗暴指挥部，我建议共同搞，不要几个摊子。"

叶卫东："估计 8 月 19 日'高司武工队'、'红色怒火'可能进攻长沙。"

周恩来："共同搞的意见好，指挥部要 47 军作头子，好调动，将来转为人民武装指挥机关。"

有代表介绍了"红艺会"戴利，周恩来说："文工团员，你都敢于搞武斗。"

大家笑了。周周恩来接着说："指挥部人员双方差不多，但也不要整整齐齐，'工联'单位多，可多一些。首先是造反派联合起来，8 月 19 日的进攻根本不在话下。还是文攻武卫，大家分工，帮助解放军维护社会治安，保护仓库。根据北京的经验，调动时，由一派去，别的不去。一个组织保护一个工厂，别的就不去。"

戴利："指挥部要加强，但'工联'不同意有些组织参加，说他们是社会组织。"

周恩来："有个过渡，将来归口，可以说服。"

谢若冰："组织内部矛盾比外部矛盾好解决。现在是大联合

阶段，能否把工人组织合为一个组织。群众组织应该减少、集中，权力集中，才能恢复秩序，建立政权。现在这样下去会越打越大，文化大革命会夭折。”

周恩来：“不会夭折，可能曲折，全国是大好形势嘛！”

谢若冰：“湘派不是对中央，而是对万、华，个别对万有怀疑。联合有可能，在北京的，意见都一致，要联合制止内战。从长沙刚来北京的与我们交谈后都说我们‘右’了。马坡岭问题与工程兵学院问题，要审查处理一下，谁是谁非，严厉批评一下。工程兵学院武斗，蔡爱卿在现场，但没指挥，现完全撇开不行，采取软禁。”

戴利汇报了工程兵学院现场目睹的武斗情况。并说：“7 月 15 日听了蔡爱卿的发言，我们发现有问题。现在蔡、段、萧、史都是软禁。”

周恩来：“工程兵学院武斗问题，可以单独解决。如果说工校武斗有预谋，那么马坡岭的误会更多，不要算老账，不要连在一起，要个别解决。往前看，促进自我批评，严于责己，宽于责人。下一步归口，要做基本功，厂里一派不压另一派，两派联合，推进大联合。基层不联合，上面联合不起来。”

一代表汇报长沙恢复“红旗军”时，喊了“红旗军一千个好一万个好”的口号。

戚本禹：“一千个好，一万个好，只有对毛主席才能这样说，对别人都不能这样说，怎能自己说自己？”

一代表汇报“红旗军”虽然吸收了一些非荣复转业军人，但领导核心还是复转军人，顾虑不符合中央精神。

周恩来说："告诉商量一下，怎么迫不及待的钻出来了？"

戚本禹："联络员找'红旗军'来京的人谈一谈。"

叶卫东："湖南'红旗军'要求中央表态平反以后，本身可取消，参加别的组织。"

戚本禹："'红旗军'的少数头头确实有问题，确与香港有联系。"

代表汇报了"红旗军"有报纸、有活动，与蔡爱卿老婆韩景平的关系

戴利："蔡提出'以武斗反武斗'、'杀到河西去'、'工厂可以停工，我负责'等等，我们觉得有问题。开始，我们对龙、刘、崔是区别对待的，后来，他讲龙的坏话，把斗争引向龙。"

戚本禹："你态度好，认识到上当，我赞成。"

戴利继续汇报："吴自立吹嘘自己，一有毛主席 1945 年的亲笔信，二反龙书金，三是贺龙打下来的，要平反。"

周恩来："吴是彭德怀的死党。1945 年七大时，吴原是预选代表，后未当选，怀疑中央认为他是特务问题，主席关心红军干部，回信表示他不是特务问题。但他到 1961 年还要替彭德怀翻案。"

戚本禹："他们可能有集团，一定有个大阴谋在里边，要查清楚。"

周恩来："文攻武卫是指对保守的、被反动分子操纵的，联系两条路线的斗争而言，像对'百万雄师'。在左派内部之间不适用。"

戴利："建议成立长沙市无产阶级革命派民兵师或文攻武卫

指挥部。”

谢若冰：“能否表态文攻武卫指挥部以外的武装组织不予承认？”

周恩来：“两个指挥部(指制止武斗指挥部和抗暴护厂指挥部)合成一个文攻武卫指挥部，其它的武装组织，要经过指挥部承认才算，游离的社会武装组织，要把枪支收回。本身也要清查一下。将来株洲、湘潭、衡阳都用这个办法。乱放枪的要缴了。”

戚本禹：“打死人要法办。”

周恩来：“这种乱，破坏阶级团结。”

戚本禹：“乱有阶级性。”

周恩来：“省军区由龙书金回去负责整理，岳衡线情况好了，军区开展内部‘四大’，会揭发问题，你们不要去，军民界线还是要划清。”

一代表：“两件事，我们多作自我批评，但有一部分极左、过激的同志对立情绪大。”

周恩来：“即使武斗几次，矛盾性质也不会变化，都是左派。两次都死了人，是误伤，打仗还误伤嘛！思想偏激可以教育，不教育、不帮助、不转变，矛盾才会转化。必须树立解放军的权威。”

戚本禹：“你们靠谁作支柱？这是大问题。抢郑波同志的车，他好说话，真是涵养不错。这个同志不容易，困难时支持你们。你们要发通报查，一定要把抢的车追回来。”

这次行动快，8 月 15 日，“湘江风雷”把车送还，并表示歉意。

第 807 回：看长沙，河西“高司”大逃亡　易家湾，“解放湘潭”枪声响

此时的湖南，中央要为“湘江风雷”平反的消息早已传到长沙，拥有两万多名大学生的红卫兵“高司”，在长沙市区几十万工人造反派的面前，已属孤掌难鸣。尤其是7月27日中央表态后，“高司”即人心大失，长沙城内报复打人成风，不少“高司”派成员遭到“工联”和“湘江风雷”的人批斗和毒打。长沙的“高司”派纷纷躲到外地，7月底前，已有一部分学生各自回家。

而“湘江风雷”抓紧对“高司”的全面包围。河东的医学院、铁道学院、中医学院、农学院被围得水泄不通，尤其是医学院危在旦夕。“高司”的头头们又计划“围魏救赵”,把“湘江风雷”在河西的一个点裕湘纱厂团团围住，目的是为了吸引对手的力量，放松对医学院的围困，以便医学院的同学突围。

7月28日早晨，参加“围魏救赵”的学生包围了纱厂,渫湾镇一带被武装封锁，到处是背枪的工人、农民和学生。

8月10日的半夜，长沙水陆洲上的桔洲造纸厂“工联”对河西广播的高音喇叭突然响了起来，广播了中央关于湖南问题的《决定》，说中央文革已表态，支持“湘江风雷”和“工联”，“高司”是受蒙蔽的群众组织。很快，长沙河东多处对河西广播的高音喇叭，都在反复播放这一“特大喜讯”。河西高教区内的师生们忧心忡忡，“六六惨案”记忆犹新，在人们心中留下不可抹杀的印象，这些教师不能不害怕，但都不知道“高司”下一步作什么打算？师院、湖大的喇叭都不广播了。

8 月 11 日上午，几天前参加攻打长沙裕湘纺织厂的“高司”

武工队和“红色怒火”都已撤回了长沙西区的“高司”大本营。他们打长纺已有几天，只剩一座钟楼没能拿下来了，但是工厂水塔上的机枪,又让几个学生横尸纱厂。

本来攻打长纺的那几天，河西高校区就特别紧张，随时提防“工联”攻打“高司”。公共汽车早在半个月前就停开了，马路三步一岗，四步一哨的，师院还在二里半的马路上用沙石袋筑起了街垒。各村的居委会也都发动起来了，家里来了生人要登记；还每家派出一人，通宵达旦的轮流站岗放哨，保卫家园。

中央对湖南问题的《决定》肯定：“‘高司’是受蒙蔽的群众组织”。就这么一句话，“高司”就等于是进了“火葬场”。“高司”学生心里那个悲愤呀：

“总理啊总理！您怎么就这么糊涂呢？您老人家怎么就不给我们一点面子呢？‘高司’几万名红卫兵小将还有数十万名支持‘高司’的工人、农民，辛辛苦苦地为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拼命战斗， 怎么一下子就变成就‘受蒙蔽’呢？受谁的蒙蔽呢？这真是天大的笑话，这真是千古奇冤！”

他们悲愤已极，他们奔走相告，“湘江风雷”马上就要打过河西了，他们在河西再也呆不下去了，他们必须赶快撤离。

河东高音喇叭一阵接一阵的广播，“湘江风雷”敲锣打鼓，欢呼庆祝。河西， 师院里平常号称长沙第一的高音喇叭再也发不出他的威力了，同学们都在清理自己的东西，准备离开长沙，真是“风潇潇兮湘水寒”!

中午 13 点多钟时，师院的喇叭突然响了起来，说院武装部有一批武器，让人们去领。青年们纷纷赶往师院武装部，很多人

都领到了七九步枪等武器。在二里半，停着两辆解放牌卡车，驾驶室上面都架着一挺重机枪，车厢前面站着荷枪实弹的“红色怒火”的人，车厢里都站满了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原来是师院“高司”的头目和师院的头头们带着家属准备逃跑。

师院“武工队”的队员要逃命，纷纷把枪丢在武装部里，空手逃离。

在河西三大高校中，师院的武器装备最差，这是因为在“七七惨案”后，武斗已升级为枪战了，省军区奉中央命令，到各单位武装部收缴武器，以免散落到各派手中用于武斗。河西第一站就是师院，师院乖乖的如数上缴，第二站是湖南大学，而湖南大学就不卖帐，一支不交，矿冶就更不用说了。所以，到了“720”武汉事件爆发后，中央文革号召“文攻武卫”，湖大、矿冶都把武装部的装备亮了出来，而师院连一支枪都没有，只好把体育系的小口径运动步枪拿来充数。为了防备造反派的袭击，只好寻求“红色怒火”的保护，请他们住在院体育馆里。

湖南大学办公楼是“高司”湖南大学总部。此时，楼前聚集着很多人，大部分是武装人员。总部里面已经乱成了一团，湖大“高司”的头头六神无主，系手枪皮带时，因上面有手枪挺重的，系了几次都掉下来了，周围的人都笑话他是吓得手发抖了。他身边的一矮个子，农村人打扮，却全副武装，手提一只中号皮箱，他是“高司”的出纳，那皮箱里全是钱，头头要他用性命来保护好这笔钱。

矿冶的余定成几个人，临撤离前，还给在纱厂打死的同学开了追悼会。

下午 15 点多钟了，马路上已有不少人在往南逃了，这些人都是“高司”的成员和支持“高司”的老百姓，他们已得知“高司”要撤离河西，担心遭到“工联”和“湘”派的报复，纷纷向南逃离，沿途又有不少人加入到逃难的行列里来。过了湖南大学棉花厂，马路上到处都是逃难的人群。人流中不少是拖儿带女举家而逃的，在烈日下有白发苍苍的老人、有抱在怀中嗷嗷待哺的婴儿、有挑担子的，有扛箱子的，甚至有个老太婆提着一只老母鸡在人流中蹒跚。见过兵败如山倒吗？看过电影《红日》里蒋军大逃亡的样子吗？此时的状况就是如此。

人群中“高司”的学生不在少数，但武装人员不多，他们大都只带一个挎包，沿着湘江往南走，目的地是湘潭。而老百姓却是漫无目的地的跟着“高司”走，有的是想投亲靠友，有的只是想躲到附近的农家避几天再说。

默默的人群朝南缓慢的移动，突然一声枪响，人群顿时像炸了窝一样，有人惊恐的跑了起来，有人吓呆了站立在那里不知所措……相互间呼叫着亲人，四处传来小孩的哭声，马上有人传话过来是枪支走火，大家才知道是虚惊一场。

卡车在“轰、轰、轰”的爬动着，这河堤不是公路，原来就是不能通车的，此时人流中再夹些东倒西歪的卡车,更显得“英勇悲壮”……

卡车打算是开一步算一步的，不时有同学爬了上去，也不时又有人从车子上滚了下来，有的人吊在车子的尾巴上，爬也爬不上。

忽然,一辆卡车翻倒在河堤边的农田里，车上的几十个人就

像麻袋一样倒了下去，全部栽在刚刚收完早稻的田里。还好，没有造成人员伤亡，同学们又爬起来，满身的泥巴也没有必要去擦一下，互相你看我，我看你，谁都没有死，哈哈一笑。那笑声是那样的友好，又是那样的无奈，好像走向刑场的两个战友的最后告别！

告别了，又各自上路了。

“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

“远飞的大雁，请你快快飞，请给我们捎封信，红卫兵战士想念恩人毛主席……”

这样的歌他们上百次上千次的唱过，每次都唱得热泪盈眶，然而这时，他们已经麻木，再也唱不出那豪情万种，唱不出那心潮澎湃。

下午，湖南大学武工队一行 20 多人，爬到凤凰山上，埋伏起来，这里是个打埋伏的好地方，山下只一条狭窄的马路通湖南大学。“二.四”前夜，“湘江风雷”冲击“高司”的队伍就是在这山下遭到围堵的，可惜历史不会重演了，就在“八.一九”快一周年时，响当当的革命小将一夜之间竟成了流寇。

半个小时后，埋伏在凤凰山的湖南大学武工队悄然的撤走了，他们是后卫，掩护大部队撤退的。

其实，当时湖南大学是想固守。怎奈何师院跑光了，北面敞开了，孤军难战，只得忍痛撤离，丢下了众多的物资，光子弹就好多箱。

湖南大学“高司”总部100多人，当晚撤到岳麓山的顶峰云麓宫，第二天的清晨才从后山下山步行去了湘潭锰矿，途中没发

生战斗。以后火车也停开了，湘潭与外界的联系完全中断。

湘潭市“革造联”是在1966年的造反风潮中，由“高司”支持而成立的工人造反派组织。1967 年“一月夺权风暴”后，该组织夺取了湘潭市的大权，得到湘潭军分区领导人的支持，成为能控制湘潭局面的强大势力。湘潭“革造联”的主要头头兰云飞，原是有近万工人的国营湘潭电机厂的党委宣传部部长。在 1966 年 9 月，兰云飞被湖南省委打成了当时全省的第一号大右派，并遭到拘押。后来是长沙的大学生红卫兵，根据中央在 10 月下达的紧急通知，全力为兰云飞平了反。自此，兰云飞不仅加入到造反派的行列，而且怀着对“高司”红卫兵的感恩心情，率领以他为首的湘潭“革造联”，坚定地站在了“高司”一方。他与他的湘潭“革造联”，因此也成了“省红联”的有力支柱。

湘潭市有几个大型的国营军工企业，依靠这几个大型企业的力量和军分区的支持，在 1967 年 5 月以后湘潭市的武斗中，“革造联”打跑了与之抗衡的“红造联”，致使“红造联”骨干纷纷逃往长沙、株洲。1967 年 6 月后，湘潭地区和湘潭市就成为“革造联”的天下，也成为湖南“红联”派控制的主要基地。

鉴于长沙的武斗形势日益严峻，兰云飞为首的湘潭“革造联”头头开会决定，在湘潭县易家湾、暮云市、白马垄一带布防。

而在此之前，8 月 10 日，长沙“高司”派与“工联”派在易家湾一带就发生过武斗接触。

这几天，长沙最具战斗力的“青年近卫军”总部不断传来湘潭武斗的传闻，不知真假。一批年轻人向总部头头提出：“强烈要求去湘潭参战！”最终，一位总部负责人同意带大家前去看看。

这天傍晚，“青年近卫军”总部下令，部分基层组织，如“闪电兵团”、“钢三连”、“红九连”、“决死纵队”等等，立即到总部集合。

此时的“青年近卫军”已有几千人，全都荷枪实弹，武器装备齐全，其大部份成员都身穿由支持他们的军队院校造反派送的军装，只是没有帽徽、领章。他们甚至还拥有反坦克炮、60 炮等重兵器，相当于几个团的准军事部队，以勇猛、敢战著称，因而在武斗中，他的成员死伤数均高于其他群众组织。其下属的“闪电兵团”、“电自来纵队”、“钢三连”、“红色尖刀排”、“飞虎连”、“决死纵队”等，都是专业武装团体，有着较强的武斗实力。“青年近卫军”在民间也享有“湘军”之称。他们接到总部的号令后，纷纷赶到了“青年近卫军”总部，多则有几百人，少者仅几十人，分乘十几辆汽车，全副武装，向湘潭市方向进军，攻打湘潭市，“解放湘潭市！”

在前往湘潭去的武斗队伍中，除了“青年近卫军”外，还有以劳改系统农场留场人员及返城知青为主的“长沙青年”，以及由复员转业军人组成的“红旗军”等组织。一路上，可以看到几十个群众组织的旗帜出现在一辆又一辆飞驰的汽车上，都是荷枪实弹，情绪高昂。此起彼伏的《毛主席语录》歌：“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飘荡在长长的公路上，久久不息。

武装的车队，在离长沙市二十多公里处的一座高山边停下来。这时，天已全部黑了，只见长长的车队，像一条乌龙难见首尾，汽车灯光组成两串平行的光链延伸，弯弯曲曲，直伸到看不

见的地方。

不时有吉普车或摩托车，从车队旁疾驰而过。

突然，有两辆摩托车上坐的人戴着红帽徽、红领章。

“你们看，解放军也来了！”人们顿觉惊奇，连忙指给同车的伙伴们看。

大家纷纷朝那飞驰的摩托车望去。

“是帮助我们打仗的吧？”有人问。

“帮我们搞侦察。”有人答。

“省军区亮相了？”又有人问。

“你做梦！军区不会支持我们，这是军事院校的，要不，就是 47 军的野战军。”又有人自动解答。

“你怎么晓得是 47 军的？”

“总部易麻哥讲的，中央派 47 军来支持我们。”

“真的？”

“骗你有什么用？！”

“那我们就不怕军区了！我们也有解放军做后盾。”

“早就不怕它了！”

……

亲眼看见解放军跟他们一道上“前线”，虽然仍不确定他们究竟是哪支部队的，也不知他们执行的是什么任务，但大家还是非常高兴，也感到愈加踏实。这一来，“解放”湘潭市就更容易了。

车队又前进了，其实，并没有人通知继续前进，反正，只要前面那辆汽车开动了，后面的汽车马上就会跟上去。

走了不到 10 分钟，车队又停了下来。这一停就是几个小时。夜半时分，大家先后跳下汽车，各自寻一块地方，或路旁，或树下，躺倒休息。

第二天清晨，柏油路上又热闹起来，人们的喧哗声、汽车的喇叭声，使长长的公路仿佛成了一个集市。没有人来下指示，头头也找不着，大家开始烦燥起来。

“这‘仗’还打不打？起码，我们得吃早饭呀？”而此刻，早饭的影子在哪里？

太阳升到半空时，车队突然启动了，也不知谁下的命令，乱哄哄的人们互相传话：到前面的板塘镇吃早饭。

板塘镇是湘潭市郊的一个小镇，到了那儿，离湘潭市就只咫尺之遥了。

坐在汽车上，大家都无精打采，懒得说话，昨天傍晚出发时那股高昂士气，已无影无踪，心里只想着赶快到板塘镇，好美美地吃喝一餐。

大概行进了十多分钟。突然，公路旁响起了惊天动地的枪声，不是一两声，而是“叭叭叭……”密集连续铺天盖地的枪声，就像放鞭炮一样。

汽车“嘎”的紧急刹车，车上的人都被这陡然的袭击吓懵了，一时不知该如何动作。还是那个跳出驾驶室的司机朝大家大喊：

“还不赶快跳车，等死呀！”

车上的人这才纷纷跳车，有人甚至连枪都忘了拿了。

一会儿，枪声停了。人们纷纷从躲藏的地方站了起来，远远看去，只见公路一侧很远的一座山包上，有一些带枪的人在晃动。

不知谁喊了声：

“那是‘怒火’的，追上去打！”

于是，许多人便朝那山包涌去，“冲啊！”的喊声，骤然响起。只见几百上千人漫山遍野，大家的劲头陡增，恐惧一下子全扫，只顾倾尽全力向山包奔跑，以图抓住那山包上的“敌人”，全然忘记了危险，好像这是一场只有胜利而不会有伤亡流血的游戏。

突然，枪声又“叭叭叭”响了起来，那是从另一个山包上打来的，子弹呼呼地飞过人们的头顶。有人被打中了，哇哇叫着。有的一声不响，只“扑”的一声扑倒在水田里。勘探设计院的一个汽车司机，额头被打了一个洞，鲜血喷出，糊满了他的脸，哼都没来得及哼一声，便离开了人世。他的冲锋枪还没来得及打一枪，就掉在身旁。

但是，这次突然响起的枪声和身边一个个倒下的战友，却没有吓住正在冲锋的人们，他们依然不管三七二十一，高喊着口号向前跑去。

对方后退了，退守到另外一座山上。

进攻一方冲上了山头，各自找一个可作掩体的地方趴了下来，朝对面山上开枪射击。没有什么瞄准之类规范射击动作，反正朝对面山上放枪就是。此时，简直不是在“打仗”，而是像小孩子玩枪似的。尤其那些持冲锋枪的人，一扣板机，三十几发子弹就“叭叭……”一下子报销了，反正有的是子弹，从挎包里拿出弹夹，换上又打。

就这样，长沙“工湘”派和逃到长沙、株洲的湘潭“红造联”相继出动大批武斗队伍，对易家湾、暮云市、白马垄一带的长沙

“高司”派和湘潭“革造联”发起全面攻击。一时间，易家湾一带战火骤起。双方武斗人员都配备了各自火力最强的武器，在易家湾、暮云市、白马垄一线摆开战场，几乎天天都有激烈的枪炮大战。他们使用了步枪、半自动步枪、冲锋枪、轻重机枪、手榴弹、手雷、炸药包、火箭筒、火焰喷射器、高射机枪、高射炮、60 炮、82 迫击炮及 90 野战炮等武器。8 月 12 日，“革造联”撤退，长沙“工湘派”追击 10 余里，一度攻入湘潭板塘铺。

湘潭以制造坦克为主的湘潭江麓机械厂的“革造联”，从厂里先后开出了数辆坦克投入易家湾武斗，对进攻方产生了强大的火力压制和心理震慑。而“工湘”派则以集束手雷、炸药包和 82 迫击炮及 90 野战炮迎战。

易家湾武斗立即惊动了长沙的 47 军。47 军 104 师派人对武斗双方做工作。经过艰巨工作，湘潭“革造联”的坦克退了回去，“湘江风雷”也没有再继续进攻。

## 第 806 回：批陈会，周恩来发表讲话　斗德怀，外交事件频发生

8 月 10 日晚，外交部再次召开“批陈小会”，批判陈毅推行“三降一灭”的投降外交。批判会从半夜一直持续到了第二天凌晨。

紧接着，在第二天，8 月 11 日，“批陈联络站”又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了万人批判陈毅大会。为了落实周恩来 8 月 6 日接见北京一外、二外、外交部“联络站”夏义善时，希望这次大会能够开成一次大联合的大会的讲话精神，“批陈联络站”组成了大会主席团，由北京外国语学院“红旗革命造反团”宋远利担任主席团主席，“红旗革命造反团”核心组的吴月辉负责主持这次大会。

会前，“批陈联络站”商定了会上的发言人次，北京外国语学院的“红旗革命造反团”有二人发言，“红旗大队”、“六一六红卫兵团”及二外、外交部“联络站”、“归国留学生兵团”等组织各有一人发言。大会的名称定为：“批斗陈毅大会”。北京外国语学院“红旗大队”不同意“批斗”二字，宣布退出大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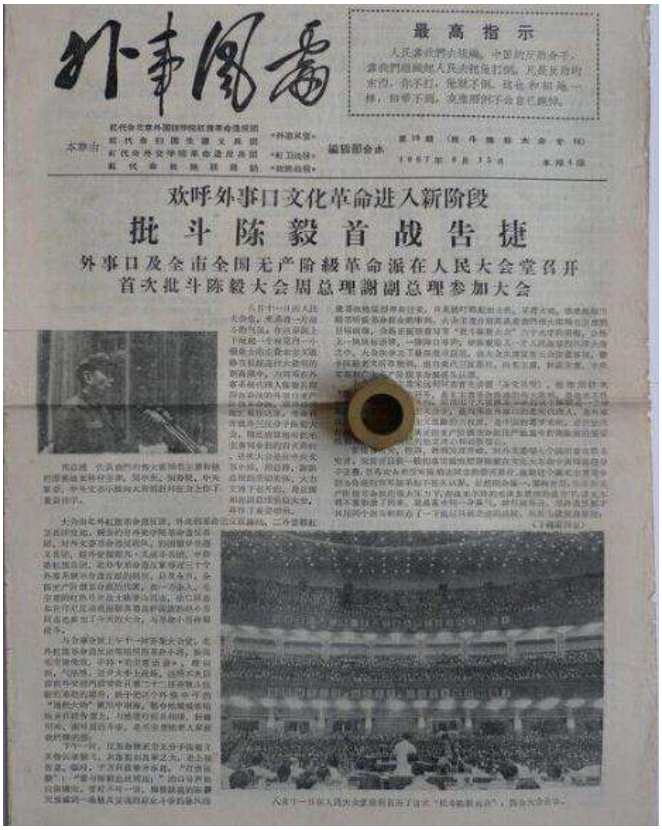
周恩来、谢富治参加了这次大会。会前，他们二人先与北京外国语学院“红旗造反团”宋远利、外交部“联络站”夏义善、参加 8 月 6 日接见的二外学生代表见了面。周恩来说：“今天我和谢副总理都很忙。谢副总理有个会，要先走。我们先一起出席开场，然后谢副总理坐前半场，我先到后边看材料，我坐后半场。”

"批斗陈毅大会"主席台

我們敬爱的周总理和謝副总理出席了大会

自左至右：周恩来、谢富治、宋远利

大会主席团认为会议名称既然是“批斗”，就同意在会场上挂出“打倒陈毅”的大标语。大会开始后，从二楼抛下四幅“誓与三反分子陈毅血战到底!”“打倒三反分子陈毅!”的大幅标语，前排 30 多位女学生也展开了“打倒三反分子陈毅”的标语。周恩来没有说话。



外事風雷

最高指示

欢呼外事口文化革命进入新阶段

批斗陈毅首战告捷

外事口及全市全国无产阶级革命派在人民大会堂召开首次批斗陈毅大会周总理谢副总理参加大会

会上，宋远利宣读了“批斗陈毅大会通令”，要陈毅在 15 天

之内向外事口无产阶级革命派递交有关他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罪行的“认罪书”。大会主席团还建议中央，“停止陈毅的一切外事活动，责令他在家老老实实做交待，接受群众的批斗。”

陈毅同意在 15 天内交出他的“认罪书”，并在会上做了检查。

宋远利在大会上发言

谢富治因为有会，参加了大会的前半场后就提前退场了。北京外国语学院“六一六红卫兵团”的一些学生，趁谢富治离开会场、周恩来还在后台之际，跳上主席台，不断要陈毅低头弯腰。负责会场保卫的北京卫戍区战士见状，立即将陈毅围在中间，不让学生接近，制止了这些学生的行为。

大会结束前，周恩来回到会场，发表了讲话。他首先“代表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林副主席、代表党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向同志们问好！”

他接着表态说："你们这次大会，我在 5 月 12 日就表示支持，现在还表示支持。

今天这个会开得好，当然中间有些波折，这是不可避免的。总的说来是按照我和谢富治同志和你们订的三条协议执行的，开得好！

这次会是很有意义的，对我是个学习，是个动员大会。这样的大会不宜太长、太多，比如今天有很多发言我没有叫进去，大中小套着开，开小会批得深，批得透。当然不开大会大家看不见也不满意啰！我还是提议今后开小会，只要我有时间参加。关系到外事口的政策、方针、路线的问题我都愿意听，小会说得更清楚。这样排列起来就不快了，一个星期两次就不错了。

你们心情很急，这个责任由我负，不是陈毅贪污时间。除了外事口，以后还要排农、林、财贸、工交、更急的是各省的问题。今天晚上还要给北京红代会开会，对全国的任务有个建议。

虽然外事口没有实现整个联合，但成立了'批陈联络站'，庆贺你们这个联合。"

8 月 11 日，身体极度虚弱的彭德怀迎来了也许是他在所有批斗中最屈辱、最悲惨的一幕。

下午，彭德怀已离婚的妻子浦安修被一伙红卫兵押到北京师范大学数学楼。骤然间，她看到人群围着的一辆三轮车上押着一个人。虽然是衣貌全非，她也一眼看出是他——一别两年的彭德怀。彭德怀也看到了她。四目相视，都痛苦地低下头。

彭德怀看到浦安修衣裳脏破，形体消瘦，泪眼模糊，一副惨状，不禁一阵颤抖。

当晚 19 时 30 分，彭德怀和浦安修被拉上批斗台，由北师大“井冈山兵团”主办的“批判斗争反军篡军大野心家彭德怀和彭的臭妖婆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浦安修”万人大会在一片口号声中开始。

浦安修被反提胳膊按着头，做成“喷气式”，耳里灌进了一连串彭德怀骇人听闻的“罪行”，和她如何与彭德怀“狼狈为奸”的“罪状”，包括 1965 年她去吴家花园送别彭德怀也是为了“勾结……”。

在剧痛和羞辱中，她偷偷侧眼寻找彭德怀，看到他同被扭按在会台的另一边，那倔强不屈的头被按下去。抬起来，按下去，再抬起来，也正挣扎着向这边寻找她的身影。造反派一边批斗，一边打彭德怀夫妇。

彭德怀大声喊叫：“请你们不要打她!她和我没有关系!她已经吃过离婚梨了!和我划清界线了!请你们高抬贵手，只找我一个人吧!”

喊叫声换来的是对他一阵更为猛烈的拳脚，但浦安修却有了暂时喘息的机会……

北师大批斗会以后，彭德怀因精神和肉体受到严重损害，右半身麻木了。但两天后又奇迹般地站了起来。他强忍浑身的伤痛，重新坐到写字台前，写他没有写完的自传。

看押彭德怀的哨兵曾有过彭德怀写自传时的情况纪录：

“在床上躺了一刻钟、解一次手，其余时间写材料，陈参谋把报纸送来后，我拿给他，他拿着就往桌上一放没看，这个老东西从报上点他名后很少看报。”

“写材料整两个多小时，小便一次，到散步时间，我叫他散步，彭说：我不散，我问到你为什么不散，彭说：我上上操(即在室内做操）。”

这一天，彭德怀写了 11 个小时。夜里，刚躺下又起来，连续躺下起来三次，到深夜睡不着，起来考虑问题，累了，就扇着扇子在椅子上闭眼坐一会。

就这样，从 6 月 21 日专案组命他写自传，到 8 月 20 日，历时两个月，彭德怀终于完成了约 8 万字的自传。

8 月 11 日，《人民日报》第六版刊登了这样一条消息：

[新华社十日讯]我国外交部第二亚洲司负责人今晚召见蒙古驻华大使伯格米德，交给他我国外交部的一份抗议照会，就蒙古驻华大使馆工作人员侮辱中国人民和世界革命人民伟大领袖毛主席像，向蒙古政府提出最强烈抗议。

照会说，一九六七年八月九日上午十一时三十分，蒙古驻华大使馆工作人员达希敖额尔特，在停放于北京东华门大街友谊商店门口他所驾驶的汽车内，放肆地把中国人民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像踩在脚下，加以亵渎。这是公然反对世界革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严重政治挑衅行为，是对中国人民和世界革命人民的极大侮辱。路过的中国革命群众发现后当即向他严正指出，这种挑衅行为是严重的犯罪，必须对此认罪、道歉。但是，达希敖额尔特不但拒不认罪，反而耍流氓手段向我国革命群众恶意挑衅，企图撕毁毛主席像开车逃跑。我国革命群众万分愤慨，当即把他扭送治安机关……

原来，8 月 9 日上午，蒙古驻华大使夫人及另两名外交官夫

人乘坐大使的专车，到坐落在东华门大街的友谊商店购物，司机达希敖额尔特把车停在马路边，然后倚在车头上观望来来往往的红卫兵游行队伍。突然，行进队伍中有人发现汽车刹车的踏板上有一张印有毛泽东像的海报。这时，蒙古大使夫人等 3 人从商店出来坐进汽车，而司机达希敖额尔特开车时，脚就踩在这张毛泽东像上。

这还了得！周围的群众怒火沸腾……队伍中有懂蒙文的红卫兵，立即把蒙古司机揪出来质问，蒙古大使夫人等人吓得下车跑进了商店。

人群中有人领头高喊：

“侮辱伟大领袖毛主席罪该万死！”

“打倒苏修的走狗蒙古修正主义！”

蒙方司机希敖额尔特可能是依仗享有外交赦免权，起初拒不认罪，还企图撕毁毛泽东像开车逃跑，但汽车被群众团团围住哪里还开得动。愤怒至极的群众命令他站在凳子上示众，并让他下跪向毛主席像请罪，有人还把轿车上挂的蒙古国旗扯下来，也让他放在地上用脚踩。

这时，友谊商店售货员出来说：“大使夫人在打电话求救。”

这无异给愤怒的群众火上加油，有人喊：“把汽车烧掉！”

于是，众人喊：“一二三！”把汽车掀翻，有人点起火来，围观的人群齐喊：

“毛主席万岁！”

“文化大革命万岁！”

等到消防车开来，熊熊大火已把这部海鸥牌高级轿车烧得只

剩躯壳。

在汽车已经烧起来的时候，中国外交部的一位处长来到现场，说服群众将蒙古司机交他处理。蒙古司机当即被北京市公安局拘留，经过审讯，他在人证物证面前不得不认错，并亲笔写下认罪书。外交部第二亚洲司负责人召见蒙古驻华大使，交给他一份照会，对蒙古使馆工作人员达希敖额尔特侮辱伟大领袖毛主席像提出最强烈的抗议，并称中国政府决定将他驱逐出境。这个司机离境前，在二连车站又站在高凳上被批斗了一次。

8 月 9 日傍晚，对此事一无所知的中国驻蒙古使馆突然接到蒙古外交部的电话，称其副外长托依夫晚 20 时紧急召见中国驻蒙古使馆刘代办。

“两国间又发生了什么事？”大家都感到有些紧张。刘代办让研究室注意收听蒙古电台广播，并把应召时间借故推迟至晚 22 时。

从蒙方广播的简单消息中，大使馆大体了解了这一严重事件的梗概。刘代办和译员小刘按时去蒙古外交部。蒙古外交部副外长托依夫沉着脸，寒暄的话也没讲，就当着刘代办的面宣读蒙古政府声明，诬中国政府执行大国沙文主义政策，并一再直接指名攻击毛泽东。要求中国政府对火烧蒙古驻华大使汽车和侮辱司机一事承担责任，并赔偿损失。

刘代办严词驳斥了蒙方的反华论调，对其指名攻击毛泽东提出强烈抗议。至于蒙方提出的要求，以未接国内通报、不了解事实真相为由，予以拒绝。

8 月 10 日晚上，外交部来电通知驻蒙古使馆，说明了事件

经过，要求使馆提高警惕并采取措施，准备应付蒙方策动群众冲击使馆。

8 月 12 日，蒙古司机由红卫兵和公安人员押解出境。北京不断有人到蒙古驻中国大使馆门前游行示威，刷标语，呼口号："打倒蒙修"、"打倒苏联的奴才泽登巴尔"。至 14 日，示威游行继续升级，队伍达 40 万人。

这段时间，中国外交事件频发。

8 月 6 日，在大连还发生苏联"斯维尔斯克"号货轮二副和一名船员在大连港污辱毛泽东像章的事件。8 月 11 日，中国边防将苏联"斯维尔斯克"号船船长扣留。8 月 13 日，中方宣布将苏联"斯维尔斯克"号船船长和二副驱逐出境。该轮由中方武装押送出境。同日，苏方向中方递交苏联总理柯西金就"斯维尔斯克"号货轮事致周恩来总理的信。中方拒收。8 月 13、14 日，北京 2000 余人去苏联驻华使馆示威，砸碎苏联使馆沿街的宣传橱窗的玻璃。

8 月 13 日，中国"黎明轮"进入意大利热那亚港后，意方因中国轮船拒绝取下船上的张贴的毛泽东的语录，又拒绝离开港口，派军警包围该轮，并限制中国驻意大利商务副代表上下"黎明轮"的自由。8 月 15 日，中国宣布限制意大利驻京代表的行动自由。

## 第 807 回：看长沙，河西高司大逃亡　易家湾，解放湘潭枪声响

此时的湖南，中央要为“湘江风雷”平反的消息早已传到长沙，拥有两万多名大学生的红卫兵“高司”，在长沙市区几十万工人造反派的面前，已属孤掌难鸣。尤其是7月27日中央表态后，“高司”即人心大失，长沙城内报复打人成风，不少“高司”派成员遭到“工联”和“湘江风雷”的人批斗和毒打。长沙的“高司”派纷纷躲到外地，7月底前，已有一部分学生各自回家。

而“湘江风雷”抓紧对“高司”的全面包围。河东的医学院、铁道学院、中医学院、农学院被围得水泄不通，尤其是医学院危在旦夕。“高司”的头头们又计划“围魏救赵”,把“湘江风雷”在河西的一个点裕湘纱厂团团围住，目的是为了吸引对手的力量，放松对医学院的围困，以便医学院的同学突围。

7月28日早晨，参加“围魏救赵”的学生包围了纱厂,渌湾镇一带被武装封锁，到处是背枪的工人、农民和学生。

8月10日的半夜，长沙水陆洲上的桔洲造纸厂“工联”对河西广播的高音喇叭突然响了起来，广播了中央关于湖南问题的《决定》，说中央文革已表态，支持“湘江风雷”和“工联”，“高司”是受蒙蔽的群众组织。很快，长沙河东多处对河西广播的高音喇叭，都在反复播放这一“特大喜讯”。河西高教区内的师生们忧心忡忡，“六六惨案”记忆犹新，在人们心中留下不可抹杀的印象，这些教师不能不害怕，但都不知道“高司”下一步作什么打算？师院、湖大的喇叭都不广播了。

8 月 11 日上午，几天前参加攻打长沙裕湘纺织厂的“高司”武工队和“红色怒火”都已撤回了长沙西区的“高司”大本营。他们打长纺已有几天，只剩一座钟楼没能拿下来了，但是工厂水塔上的机枪,又让几个学生横尸纱厂。

本来攻打长纺的那几天，河西高校区就特别紧张，随时提防“工联”攻打“高司”。公共汽车早在半个月前就停开了，马路三步一岗，四步一哨的，师院还在二里半的马路上用沙石袋筑起了街垒。各村的居委会也都发动起来了，家里来了生人要登记；还每家派出一人，通宵达旦的轮流站岗放哨，保卫家园。

中央对湖南问题的《决定》肯定：“‘高司’是受蒙蔽的群众组织”。就这么一句话，“高司”就等于是进了“火葬场”。“高司”学生心里那个悲愤呀：

“总理啊总理！您怎么就这么糊涂呢？您老人家怎么就不给我们一点面子呢？‘高司’几万名红卫兵小将还有数十万名支持‘高司’的工人、农民，辛辛苦苦地为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拼命战斗， 怎么一下子就变成就‘受蒙蔽’呢？受谁的蒙蔽呢？这真是天大的笑话，这真是千古奇冤！”

他们悲愤已极，他们奔走相告，“湘江风雷”马上就要打过河西了，他们在河西再也呆不下去了，他们必须赶快撤离。

河东高音喇叭一阵接一阵的广播，“湘江风雷”敲锣打鼓，欢呼庆祝。河西， 师院里平常号称长沙第一的高音喇叭再也发不出他的威力了，同学们都在清理自己的东西，准备离开长沙，真是“风潇潇兮湘水寒”!

中午 13 点多钟时，师院的喇叭突然响了起来，说院武装部

有一批武器，让人们去领。青年们纷纷赶往师院武装部，很多人都领到了七九步枪等武器。在二里半，停着两辆解放牌卡车，驾驶室上面都架着一挺重机枪，车厢前面站着荷枪实弹的“红色怒火”的人，车厢里都站满了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原来是师院“高司”的头目和师院的头头们带着家属准备逃跑。

师院“武工队”的队员要逃命，纷纷把枪丢在武装部里，空手逃离。

在河西三大高校中，师院的武器装备最差，这是因为在“七七惨案”后，武斗已升级为枪战了，省军区奉中央命令，到各单位武装部收缴武器，以免散落到各派手中用于武斗。河西第一站就是师院，师院乖乖的如数上缴，第二站是湖南大学，而湖南大学就不卖帐，一支不交，矿冶就更不用说了。所以，到了“720”武汉事件爆发后，中央文革号召“文攻武卫”，湖大、矿冶都把武装部的装备亮了出来，而师院连一支枪都没有，只好把体育系的小口径运动步枪拿来充数。为了防备造反派的袭击，只好寻求“红色怒火”的保护，请他们住在院体育馆里。

湖南大学办公楼是“高司”湖南大学总部。此时，楼前聚集着很多人，大部分是武装人员。总部里面已经乱成了一团，湖大“高司”的头头六神无主，系手枪皮带时，因上面有手枪挺重的，系了几次都掉下来了，周围的人都笑话他是吓得手发抖了。他身边的一矮个子，农村人打扮，却全副武装，手提一只中号皮箱，他是“高司”的出纳，那皮箱里全是钱，头头要他用性命来保护好这笔钱。

矿冶的佘定成几个人，临撤离前，还给在纱厂打死的同学开

了追悼会。

下午 15 点多钟了，马路上已有不少人在往南逃了，这些人都是“高司”的成员和支持“高司”的老百姓，他们已得知“高司”要撤离河西，担心遭到“工联”和“湘”派的报复，纷纷向南逃离，沿途又有不少人加入到逃难的行列里来。过了湖南大学棉花厂，马路上到处都是逃难的人群。人流中不少是拖儿带女举家而逃的，在烈日下有白发苍苍的老人、有抱在怀中嗷嗷待哺的婴儿、有挑担子的，有扛箱子的，甚至有个老太婆提着一只老母鸡在人流中蹒跚。见过兵败如山倒吗？看过电影《红日》里蒋军大逃亡的样子吗？此时的状况就是如此。

人群中“高司”的学生不在少数，但武装人员不多，他们大都只带一个挎包，沿着湘江往南走，目的地是湘潭。而老百姓却是漫无目的地的跟着“高司”走，有的是想投亲靠友，有的只是想躲到附近的农家避几天再说。

默默的人群朝南缓慢的移动，突然一声枪响，人群顿时像炸了窝一样，有人惊恐的跑了起来，有人吓呆了站立在那里不知所措……相互间呼叫着亲人，四处传来小孩的哭声，马上有人传话过来是枪支走火，大家才知道是虚惊一场。

卡车在“轰、轰、轰”的爬动着，这河堤不是公路，原来就是不能通车的，此时人流中再夹些东倒西歪的卡车,更显得“英勇悲壮”……

卡车打算是开一步算一步的，不时有同学爬了上去，也不时又有人从车子上滚了下来，有的人吊在车子的尾巴上，爬也爬不上。

忽然,一辆卡车翻倒在河堤边的农田里，车上的几十个人就像麻袋一样倒了下去，全部栽在刚刚收完早稻的田里。还好，没有造成人员伤亡，同学们又爬起来，满身的泥巴也没有必要去擦一下，互相你看我，我看你，谁都没有死，哈哈一笑。那笑声是那样的友好，又是那样的无奈，好像走向刑场的两个战友的最后告别！

告别了，又各自上路了。

“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

“远飞的大雁，请你快快飞，请给我们捎封信，红卫兵战士想念恩人毛主席……”

这样的歌他们上百次上千次的唱过，每次都唱得热泪盈眶，然而这时，他们已经麻木，再也唱不出那豪情万种，唱不出那心潮澎湃。

下午，湖南大学武工队一行 20 多人，爬到凤凰山上，埋伏起来，这里是个打埋伏的好地方，山下只一条狭窄的马路通湖南大学。“二.四”前夜，“湘江风雷”冲击“高司”的队伍就是在这山下遭到围堵的，可惜历史不会重演了，就在“八.一九”快一周年时，响当当的革命小将一夜之间竟成了流寇。

半个小时后，埋伏在凤凰山的湖南大学武工队悄然的撤走了，他们是后卫，掩护大部队撤退的。

其实，当时湖南大学是想固守。怎奈何师院跑光了，北面敞开了，孤军难战，只得忍痛撤离，丢下了众多的物资，光子弹就好多箱。

湖南大学“高司”总部100多人，当晚撤到岳麓山的顶峰云

麓宫，第二天的清晨才从后山下山步行去了湘潭锰矿，途中没发生战斗。以后火车也停开了，湘潭与外界的联系完全中断。

湘潭市“革造联”是在1966年的造反风潮中，由“高司”支持而成立的工人造反派组织。1967 年“一月夺权风暴”后，该组织夺取了湘潭市的大权，得到湘潭军分区领导人的支持，成为能控制湘潭局面的强大势力。湘潭“革造联”的主要头头兰云飞，原是有近万工人的国营湘潭电机厂的党委宣传部部长。在 1966 年 9 月，兰云飞被湖南省委打成了当时全省的第一号大右派，并遭到拘押。后来是长沙的大学生红卫兵，根据中央在 10 月下达的紧急通知，全力为兰云飞平了反。自此，兰云飞不仅加入到造反派的行列，而且怀着对“高司”红卫兵的感恩心情，率领以他为首的湘潭“革造联”，坚定地站在了“高司”一方。他与他的湘潭“革造联”，因此也成了“省红联”的有力支柱。

湘潭市有几个大型的国营军工企业，依靠这几个大型企业的力量和军分区的支持，在1967年5月以后湘潭市的武斗中，“革造联”打跑了与之抗衡的“红造联”，致使“红造联”骨干纷纷逃往长沙、株洲。1967年6月后，湘潭地区和湘潭市就成为“革造联”的天下，也成为湖南“红联”派控制的主要基地。

鉴于长沙的武斗形势日益严峻，兰云飞为首的湘潭“革造联”头头开会决定，在湘潭县易家湾、暮云市、白马垄一带布防。

而在此之前，8 月 10 日，长沙“高司”派与“工联”派在易家湾一带就发生过武斗接触。

这几天，长沙最具战斗力的“青年近卫军”总部不断传来湘潭武斗的传闻，不知真假。一批年轻人向总部头头提出：“强烈

要求去湘潭参战!”最终，一位总部负责人同意带大家前去看看。这天傍晚，“青年近卫军”总部下令，部分基层组织，如“闪电兵团”、“钢三连”、“红九连”、“决死纵队”等等，立即到总部集合。

此时的“青年近卫军”已有几千人，全都荷枪实弹，武器装备齐全，其大部份成员都身穿由支持他们的军队院校造反派送的军装，只是没有帽徽、领章。他们甚至还拥有反坦克炮、60 炮等重兵器，相当于几个团的准军事部队，以勇猛、敢战著称，因而在武斗中，他的成员死伤数均高于其他群众组织。其下属的“闪电兵团”、“电自来纵队”、“钢三连”、“红色尖刀排”、“飞虎连”、“决死纵队”等，都是专业武装团体，有着较强的武斗实力。“青年近卫军”在民间也享有“湘军”之称。他们接到总部的号令后，纷纷赶到了“青年近卫军”总部，多则有几百人，少者仅几十人，分乘十几辆汽车，全副武装，向湘潭市方向进军，攻打湘潭市，“解放湘潭市!”

在前往湘潭去的武斗队伍中，除了“青年近卫军”外，还有以劳改系统农场留场人员及返城知青为主的“长沙青年”，以及由复员转业军人组成的“红旗军”等组织。一路上，可以看到几十个群众组织的旗帜出现在一辆又一辆飞驰的汽车上，都是荷枪实弹，情绪高昂。此起彼伏的《毛主席语录》歌：“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飘荡在长长的公路上，久久不息。

武装的车队，在离长沙市二十多公里处的一座高山边停下来。这时，天已全部黑了，只见长长的车队，像一条乌龙难见首

尾，汽车灯光组成两串平行的光链延伸，弯弯曲曲，直伸到看不见的地方。

不时有吉普车或摩托车，从车队旁疾驰而过。

突然，有两辆摩托车上坐的人戴着红帽徽、红领章。

“你们看，解放军也来了！”人们顿觉惊奇，连忙指给同车的伙伴们看。

大家纷纷朝那飞驰的摩托车望去。

“是帮助我们打仗的吧？”有人问。

“帮我们搞侦察。”有人答。

“省军区亮相了？”又有人问。

“你做梦！军区不会支持我们，这是军事院校的，要不，就是 47 军的野战军。”又有人自动解答。

“你怎么晓得是 47 军的？”

“总部易麻哥讲的，中央派 47 军来支持我们。”

“真的？”

“骗你有什么用？！”

“那我们就不怕军区了！我们也有解放军做后盾。”

“早就不怕它了！”

……

亲眼看见解放军跟他们一道上“前线”，虽然仍不确定他们究竟是哪支部队的，也不知他们执行的是什么任务，但大家还是非常高兴，也感到愈加踏实。这一来，“解放”湘潭市就更容易了。

车队又前进了，其实，并没有人通知继续前进，反正，只要

前面那辆汽车开动了，后面的汽车马上就会跟上去。

走了不到 10 分钟，车队又停了下来。这一停就是几个小时。夜半时分，大家先后跳下汽车，各自寻一块地方，或路旁，或树下，躺倒休息。

第二天清晨，柏油路上又热闹起来，人们的喧哗声、汽车的喇叭声，使长长的公路仿佛成了一个集市。没有人来下指示，头头也找不着，大家开始烦燥起来。

“这‘仗’还打不打？起码，我们得吃早饭呀？”而此刻，早饭的影子在哪里？

太阳升到半空时，车队突然启动了，也不知谁下的命令，乱哄哄的人们互相传话：到前面的板塘镇吃早饭。

板塘镇是湘潭市郊的一个小镇，到了那儿，离湘潭市就只咫尺之遥了。

坐在汽车上，大家都无精打采，懒得说话，昨天傍晚出发时那股高昂士气，已无影无踪，心里只想着赶快到板塘镇，好美美地吃喝一餐。

大概行进了十多分钟。突然，公路旁响起了惊天动地的枪声，不是一两声，而是“叭叭叭……”密集连续铺天盖地的枪声，就像放鞭炮一样。

汽车“嘎”的紧急刹车，车上的人都被这陡然的袭击吓懵了，一时不知该如何动作。还是那个跳出驾驶室的司机朝大家大喊：

“还不赶快跳车，等死呀！”

车上的人这才纷纷跳车，有人甚至连枪都忘了拿了。

一会儿，枪声停了。人们纷纷从躲藏的地方站了起来，远远

看去，只见公路一侧很远的一座山包上，有一些带枪的人在晃动。不知谁喊了声：

“那是‘怒火’的，追上去打！”

于是，许多人便朝那山包涌去，“冲啊！”的喊声，骤然响起。只见几百上千人漫山遍野，大家的劲头陡增，恐惧一下子全扫，只顾倾尽全力向山包奔跑，以图抓住那山包上的“敌人”，全然忘记了危险，好像这是一场只有胜利而不会有伤亡流血的游戏。

突然，枪声又“叭叭叭”响了起来，那是从另一个山包上打来的，子弹呼呼地飞过人们的头顶。有人被打中了，哇哇叫着。有的一声不响，只“扑”的一声扑倒在水田里。勘探设计院的一个汽车司机，额头被打了一个洞，鲜血喷出，糊满了他的脸，哼都没来得及哼一声，便离开了人世。他的冲锋枪还没来得及打一枪，就掉在身旁。

但是，这次突然响起的枪声和身边一个个倒下的战友，却没有吓住正在冲锋的人们，他们依然不管三七二十一，高喊着口号向前跑去。

对方后退了，退守到另外一座山上。

进攻一方冲上了山头，各自找一个可作掩体的地方趴了下来，朝对面山上开枪射击。没有什么瞄准之类规范射击动作，反正朝对面山上放枪就是。此时，简直不是在“打仗”，而是像小孩子玩枪似的。尤其那些持冲锋枪的人，一扣板机，三十几发子弹就“叭叭……”一下子报销了，反正有的是子弹，从挎包里拿出弹夹，换上又打。

就这样，长沙“工湘”派和逃到长沙、株洲的湘潭“红造联”

相继出动大批武斗队伍，对易家湾、暮云市、白马垄一带的长沙“高司”派和湘潭“革造联”发起全面攻击。一时间，易家湾一带战火骤起。双方武斗人员都配备了各自火力最强的武器，在易家湾、暮云市、白马垄一线摆开战场，几乎天天都有激烈的枪炮大战。他们使用了步枪、半自动步枪、冲锋枪、轻重机枪、手榴弹、手雷、炸药包、火箭筒、火焰喷射器、高射机枪、高射炮、60 炮、82 迫击炮及 90 野战炮等武器。8 月 12 日，“革造联”撤退，长沙“工湘派”追击 10 余里，一度攻入湘潭板塘铺。

湘潭以制造坦克为主的湘潭江麓机械厂的“革造联”，从厂里先后开出了数辆坦克投入易家湾武斗，对进攻方产生了强大的火力压制和心理震慑。而“工湘”派则以集束手雷、炸药包和 82 迫击炮及 90 野战炮迎战。

易家湾武斗立即惊动了长沙的 47 军。47 军 104 师派人对武斗双方做工作。经过艰巨工作，湘潭“革造联”的坦克退了回去，“湘江风雷”也没有再继续进攻。

## 第 808 回：八一一，中宁武装部借枪　见学生，北京反对搞武斗

我们再看宁夏。

7 月下旬，宁夏军区司令员朱声达亲赴兰州向兰州军区党委汇报，寻求上级支持。8 月 5 日才回到兰州的冼恒汉，当天就听说发生在永宁的“85 惨案”和银川武器库被抢。他在 8 月 8 日批评“朱声达开了枪”。

面对如此混乱复杂的局面，宁夏军区打电话要朱声达快回宁夏。兰州军区也叫他立即回去。冼恒汉说：“宁夏军区开枪镇压革命群众，他朱声达拉的屎，他自己擦去。”

朱声达不服气，临走时对冼恒汉说：“武斗嘛！我哪知道。”

8 月 9 日，朱声达从兰州返回银川。当天下午，他在军区领导干部会议上说：“今天我们开个会，分析部队思想情绪。工作要做，能做多少做多少，总之，部队不能开枪。”

朱声达用战备密码，以个人名义直接向中央发报，请求到中央汇报宁夏的“文化大革命”情况。

银川武器库 8 月 5 日被抢的消息也让宁夏中宁县的两派群众组织跃跃欲试。他们以“誓死用鲜血与生命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以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的激情，都盯上了中宁县武装部的武器库。参加过军训的中学生知道：武装部有马克辛重机枪 10 挺，捷克式、苏式转盘轻机枪 30 挺，50 式冲锋枪两支，中正式、三八式、苏式 7•62 骑枪 600 支，可以武装一个民兵团。无论如何，这批武器不能落到对方手中。

中宁“指挥部”得到情报：“筹备处”酝酿近日对武装部采取行动。

想到“指挥部”与武装部的密切关系，想到文攻武卫的形势，为了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也为了保卫自己，“指挥部”的头头蒋国儒与康占林下了决心，去武装部借几支枪来武装他们的战斗队。

说到借是有理由的，中宁武装部从部长以下都是倾向于“指挥部”的。于是在 8 月 11 日下午 14 时，蒋国儒、康占林等人走进了武装部大门，直奔部长办公室而去。穿着短袖军内衣，秃头跣足的武装部长杨培堂正翘着二郎腿，躺在椅子上品茶。见他们进来，他立即正襟危坐，放下茶杯，问：“小伙子们，来找我干什么？”

“杨部长，眼下文攻武卫形势这么紧张，我们想借几支枪用于自卫。”康占林回答。

“你们会玩枪吗？”杨培堂掏出自己的手枪反复抛向空中。枪体每一次落下时，他都灵活地用手指一转，稳稳地将枪柄攥在手中。

“中宁公安局有 30 几支杂牌枪，你们怎么不去借，到我这来找麻烦？”

康占林迟疑了一下，“那……那是警务用枪，怎么能借？”

蒋国儒正色面对杨培堂道：“杨部长，我们懂政策。部队的战备用枪，公安民警的公务用枪，概不能借。只借民兵的枪支用用。这也是中央文革的意思嘛！”

“这……这……”杨培堂未置可否了。

闻讯进来的武装部作训科长李二小一言不发。他很有定力。甘南剿匪时，他带领一个侦察连被叛匪 1000 余人包围在一座山头上。当身边的战友一个个倒下，形势极度危急时，他始终坚持对叛匪进行说服教育。直到穷凶极恶的叛匪仍然挥舞屠刀，向全连残余 50 余人发起最后的攻击时，才下令反击，一举将叛匪击溃。而今，他像一个泥菩萨立在那里，任你怎样缠磨，一动不动，一句话也没有。

早已不耐烦的冯德春、田富国出去将装备科长刘仁杰弄来了。不会做秀的刘仁杰窘得满脸通红，长满络腮胡子的上下颚紧张地抖动着，大张着嘴，不知说什么好。他以求助的眼光看着杨培堂、李二小，又无可奈何地呐呐地摊开两只手。

杨、李装作视而不见。窘迫万分的刘仁杰被学生们簇拥到院子北面的武器库前。那儿，双开扇的厚重木门上挂着一把铁锁。

蒋国儒、康占林左右挟持着刘仁杰。张轩亭不再客气，麻利地从他裤兜里掏出钥匙，打开了厚厚的门扇。

没有人阻拦，几个干部站在院子里，无动于衷地瞅着眼前的闹剧。

满满一仓库从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退下来的武器。用黄油封存得很好。刘仁杰不再拦阻，听凭学生们选择。康占林打好借据，交于刘仁杰。刘仁杰苦笑着将它装入裤兜中。学生们锁好门，将钥匙交到刘仁杰手中。一行人并未从北街直出街心，经过大庭广众的招待所门前回校。而是向西南穿小巷，跨上田野，顺七星渠迂回东行，至肖家闸折向校园后墙，人不知，鬼不觉地将枪支弹药运回他们的队部，悉数藏在外间的天花板上。蒋国儒

再三重申了保密纪律后，将门锁加固，大家才算松了一口气。

剩下的几天，“八一兵团”、“冲霄汉”、县联社、建工队数度光顾武装部武库。再没有那样文明从容。中宁武装部的武器库终于被席卷一空。后来“八一兵团”光临时，武装部存在武器库中的照相机和许多私人物品也不翼而飞了。

8 月 10 日至 11 日，中央文革连续两天召集北京大专院校红代会、中学红代会开会座谈。8 月 11 日晚 21 时 30 分至 12 日凌晨 1 时 30 分，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等人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北京红代会代表。

陈伯达首先说：“昨天大家在这里讲了些意见。有各种意见，讲出来还是好的。有些问题准备和大家商量一下，考虑一下。我们也有些看法，不知对不对。 ”

他在肯定了北京的学生运动后，批评北京的学生“闯的思想比较多，学习的思想比较少”，“压倒别的派别的思想比较多，互相学习，互相帮助的思想比较少。”

他批评北京学生“把派别观点带到工人、农民中去了。”他说学生到工厂：“不是向工人学习，而是把派别观点带下去，搞得人家分裂。”

他批评了北京学生到各地包办代替的现象，批评了“第三次大串连” 和“当前处于反革命复辟的前夕”的说法。

他说：“你们是不是有这样一个口号啊，说是‘内战外打’？你们要搞战备。当前这个口号是错误的，想把内战打出去。还有一种人想入非非，有个‘516’，‘首都 516 兵团’，是个秘密组织，不知你们知道不知道，是个阴谋组织，矛头对准周总理，实际上

对准中央，对总理也是对中央。你们知道不知道‘516’这个小团体呀？”

众人答：“知道。”

陈伯达又问：“你们觉得对不对？”

答：“不对！”

陈伯达明确表态说：“你们怎么没有揭发嘛！要把他打倒！里面的群众不一定要抓，但要提出警告，不要犯这样的错误。”

他说：“关于毕业生的问题：现在正在研究，做出方案。在没有离开学校之前，要安定下来嘛，在学校里搞大批判，搞斗批改，不要当逍遥派。

我今天就讲这些，给你们商量，向你们请教，如果不对，希望你们提出。”

接着，江青说：“同志们，我们好久没见了，原来在武汉事件那时候就想提出和同志们见一见，听一听同志们的意见，交换交换意见，但是后来一直就拖下来了，拖到现在。不管怎么说，我们是有缺点的，我们的缺点是，应当更早一些和你们交换意见，现在晚一些。比如，各校走人的问题，如果早一点提出或者你们可能听我们的，当然，也不一定啰。有的学校走了五、六千，清华走了五千，开始走人，知道，我们有责任，不能把责任全都推到你们身上。当然，我们要有一个观察的时间，如果提早一点是不是可以帮助同志们冷静安静下来。形势逼人，有时工作被动，比如今天晚上的会，原计划 8 点钟，现在 10 点了才开成。”

“是不是现在是大好形势呢？你们说啦：去年没有武斗，现在有些地方发生武斗，这是形势不好呀！其实不然。……去年这

时，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他虽然是一小撮，但是他掌握了政权，他有权，还比较强硬，他还可以调度。而现在，他瘫痪了。”

对武斗问题，江青说：“武斗不可能是多数人，我们每个人想一想，党中央、毛主席从来是呼吁要用文斗，坚决反对武斗。他们挑起武斗是弱的表现。当然，我们有些地方有损失。有的小将、革命群众遭到残害、受伤。可是同志们想一想，这是一场大革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是大革命，不死伤几个人哪儿有啊！我不是说死人是应该的，不是这样的，因为敌人是一定要反扑的，还要较量的。”

“现在比起去年来是大好形势，今后会更好，靠大家工作得更好。你们对形势的分析是有矛盾的，昨天听了，虽然听得不够多，但是我们看的材料和听的差不多。一方面说武汉的形势，武斗的地方很复杂，危险了，形势不好了，另一方面又说，先进的南方，落后的北方，这不是思想很矛盾吗？”

有人插话说：“是落后的北京。”

江青：“啊！落后的北京那就是指武斗了，要北京搞大武斗那才是先进的吗？我觉得逻辑上是解释不清楚的。我觉得北京的工作是有很大成绩的，有它先进的地方，也有一些落后的地方。正像伯达同志所说，应该作具体分析，一股劲地说北京落后，那就不对了。比如，最近，在天安门广场开了两次百万人大会，这两次大会对全国来说起很大作用，这能说北京落后吗？”

江青再次强调大联合问题。她说：“提倡你们搞革命的大联合好呢，还是搞分裂好呢？我看还是搞革命的大联合好。”“令我惊奇的是，揪刘火线，开始处于自然状态时还好一点，还统一，后

来不知怎么搞的，搞成两大派，就在中南海门口打架。既然都是对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斗争，为什么不能联合呢？我想不通，你们谁能够答复我吗？说你们没有小团体主义？没有无政府主义？没有个人主义？没有风头主义？能这样说吗？我说有，当然不一定是普遍的现象。你们的请帖，去年你们给我们请帖是手写的，是在一张小纸上写的，现在的请帖一步一步发展越来越讲究了，我都说不出来了。这个现象是不好的，这不是无产阶级革命派应有的本色，我们主席向来是提倡节约闹革命的。”

“个别单位还搞了很多自己的展览。我在这儿说清楚，我有几天日子不好过，都是好心好意，但我觉得很可能把我吹捧得要跌倒在地，跌得粉碎。在这儿（指长安街上）有一幅画，把我也画上了，我看了以后很不安。我是一个普通的共产党员，做不了多少事，做了一些事是应当的，更况且有时还做错了呢，看了心里就感到非常不安。”

江青提到了她的关于“文攻武卫”的讲话：“7 月 22 日 ，我讲了几分钟话，只有一页纸，可就各取所需了。抽掉了阶级内容来歪曲我的话，那也是不妥当的。这是我想了很久的一个问题，真是爱莫能助，鞭长莫及，有些地方革命小将遭受迫害，我想了一个时期，恰巧，河南‘二七公社’在斗争中提出文攻武卫。我当时还讲错了一个字，说成文攻武守。在这一页多纸里主要还是强调要文斗，进行艰苦细致的宣传工作，进行政治攻势，使广大群众识破一小撮坏人在后头操纵的武斗，你们想一想，要是我搞武斗，我就找不到柳条帽钢盔，我就找不到那个矛，我们身边怎么都没有啊？很简单，搞武斗是有人操纵的。”

谢富治："北京要带头反对武斗。"

江青："对，中央所在地嘛，毛主席所在地嘛！要带头反对武斗。"

谢富治特别提醒在座的代表："不要支持武斗。"

江青接着说："提倡文斗，坚决反对武斗。……在有的地方，革命派处于劣势，没有武器，赤手空拳,像河南'二七公社'，他们提出文攻武卫，你向我来进攻，我就要还击你，对不对呢？我觉得是对的。而你们的处境是不是像河南'二七公社'呢？为什么一定要搞这一套呢？有的还提武攻文卫，这不是碰鬼了吗？文的怎么能卫呢？所以我觉得是各取所需。"

江青也谈到"516"的问题，她说："在一个大革命中是难免有一些人浑水摸鱼，要提高警惕。有的从'左'的方面，有的从右的方面想来动摇中央。这个中央是以毛主席为首的，是执行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尽管工作中可能有些缺点错误，我们力求改。但是决不允许浑水摸鱼，像'516'这样的秘密组织就是做破坏活动。"

"此外，有些地方把我们小组分成多少派，这一点是不对的。我们是不是在某些问题上看法不同，那有，这是常事，你们也一样。但是，我们始终能团结在毛主席、党中央的周围工作。一定要把我和伯达同志说成一派，是不是？可能还有戚本禹同志；把关锋同志与康生同志说成是一派，这就很奇怪，你们怎么知道我们内部的事情呢？根据什么呢？"

江青突然提到了北大聂元梓："跟聂元梓同志，我没有什么私交。在去年大字报以前，我不知道她这个人，因为我接触的人

不多。那么她大字报出来后，才知道这个同志，接触也不多的。她对的，我们全组都支持的；她错的，我们是不支持的。对于在座所有的同志，我们都是这样的。你们对的就支持，双手拍掌，用一切方法支持；错的向你们提出意见，交换意见。当然我们的意见不一定是正确的，你们也可以驳，可以批评我们，但是不允许闹分裂，我总觉得这里有点鬼，有只黑手似的。”

江青说完后，康生、周恩来都分别讲话。最后，谢富治说：“同学们，今天晚上的座谈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会议。不要把它看成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会议。今天周总理、文革小组的同志们除了王力同志脚还没完全好，都全部到了。杨成武同志有事没有来，其他三军负责同志都来了。”

他讲了这次开会的目的：“为什么要开这个会呢？就是文化大革命进入了一个新的大好形势，但是在我们首都北京，群众对这个大好形势在思想上有些不大一致的看法，所以需要中央文革小组、周总理和我们讲讲，我们来听听。”

他说：“文革小组同志批评我，说我北京大批判抓的不好，革命的大联合抓的不好。我说批评得对，很好。这件事情我做得不够，不过你说我完全没有讲也不对。听了你们的汇报以后，根本看不出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就是刘、邓、陶、彭、罗、陆、杨，怎么样进行大批判、中批判、小批判，从各方面加以批判。这个东西在这里听不出来，也听不出来怎么进行革命大联合。就是打内战，就是靠压，虽然人家说我是个有名的和稀泥的，很抱歉，我这个工作做得不够，应该有自我批评，大批判我做得不够，革命大联合这方面我有缺点，向你们承认错误。

制止武斗这一方面我也有缺点。”

“京西煤矿，在全国煤矿中是比较好的。北京有一个机关，出了几十辆汽车，到那里去打架，究竟谁打谁我也弄不清，但是打死了一个人。这个不对，引导去打架的这个人我没点他的名，不知今天来了没有，如果批评错了我承认。但是我关心那几万吨煤，什么错误都可以承认，但是不要把那几万吨煤搞掉了。搞掉了北京今年就没有煤。我可以到那个煤矿去住两天，矿业学院的学生也要关心一下，没有煤不行。”

周恩来：“我很关心铁路。”

谢富治：“铁路和煤是连着的，戚本禹同志前天就是专门去管了煤了，好得很。”“中南海、人大会堂、钓鱼台不能冲，我说过好几次了，以后冲了我可不再做自我批评了。”

谢富治宣布散会。

8 月 12 日至 15 日，“516”在陶然亭等处召开三天“火线会议”。会后发表了《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总政治部给各军负责同志的信（对目前形势的几点估计）》。这封信声称“八·九战役引起了全北京、全中国的注视，两个司令部对八·九战役也都极为关注。因此，八·九战役主流是好的，方向是正确的，影响是巨大的，作战是成功的”。针对中央文革对“516”的表态，信中说：“中央文革首长对我们这个大方向问题没有否定”，“中央文革并没有制止我们革命行动的意思，恰恰相反，反而叫人沿着我们的方向去思考”，“中央文革号召以百万群众用毛泽东思想为武器去多思，难道不是对周恩来之流最最有力的回击吗？”“更重要的是：江青同志说出了我们的心里话：‘我怀疑有一只黑手，

这只黑手不仅伸到革命小将那里去了，还来打我们的主意，他们肯定要失败，搞小将也是要失败的。’”“这样看来，中央文革是在指我们不应该依靠少数人的奋斗，而应该动员和发动千千万万的群众，不应当以地下斗争为主，而应当以建立红色根据地为主。”“要继续我们的进攻，而不是停止这种斗争”，“必须公开打下一个地盘来”。

## 第 809 回：获批准，浙江军区搞四大　毛泽东，批李世英是蛮子

毛泽东到上海后，可能会随时南下巡视。而此时浙江萧山、诸暨铁路沿线火车站两派争斗激烈，交通中断时有发生。为了保证毛泽东专列通行无阻和安全，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铁道部和南京军区都分别下达指令要浙江省军管会，不惜一切代价解决好萧山、诸暨的问题。省军管会委托“省联总”头头张永生去现场指挥，结果在广大干部群众的热情支持和帮助下成功地解决了两地的问题，事后周恩来将具体情况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很高兴地称赞张永生。

8 月 3 日，浙江省军区政治部印刷厂、驾驶班、电影站、俱乐部的职工发表了《给省军区司、政、后广大指战员、革命职工、革命家属呼吁书》，批判省军区政委龙潜，成立了省军区第一个群众组织“八·三造反兵团”。

8 月 5 日，浙江省军区后勤部宣传队也成立了“八·五造反兵团”。

8 月 5 日，在抢枪风潮中，张永生等千余人包围省军区军械二库，骗开大门，扣押和打伤守卫人员后，强行砸开仓库，将 1000 多件枪械和价值约 40 万元的军用物资洗劫一空。9 日，张永生再次组织千余人，又抢走省军区军械一库的汽车及子弹几百万发，手榴弹万余枚。这两次共抢走长短枪 1900 余支，轻重机枪 523 挺，炮 40 门，子弹 120 万余发，手榴弹 1.69 万余枚。

8 月 8 日，周恩来来电，批准浙江省军区司、政、后机关开

展“四大”。

这天，根据周恩来指示，为了制止温州地区的武斗，进驻温州的 20 军前线指挥部决定派部队对温州两派实行隔离、停火、收缴武器。

8 月 9 日，解放军 6299 部队进驻温州市区，支持温州“工总司”。

8 月 10 日，浙江省军区司令部汽车队成立了“810 造反兵团”。

当天，省军区“八三造反兵团”等十九个群众组织在省军区司令部大操场召开了“省军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联合指挥部”成立大会，批判省军区领导龙潜、张秀龙等人。从这天开始，浙江省军区按照中共中央指示，正式开展“四大”。

8 月 16 日，周恩来亲自给浙江省军区和空 5 军政委陈励耘、20 军政委南萍打电话，明确浙江省军区开展“四大”的范围、具体方式和要求。他说：

“浙江现在有敌情，你们都知道嘛！敌情第一！浙江的沿海蒋介石很可能搞乱子，你们要提高警惕。”

“省军区直属机关搞‘四大’。司、政、局直属学校可以搞‘四大’，文工团也可以搞。军队不能搞‘四大’，军委早规定了，军以下部队进行正面教育，可以用发扬民主的方式提出批评，不能用‘四大’的形式。”

“最高统帅、副统帅早就规定了部队搞正面教育，独立师、独立营不能例外，部队不能搞‘四大’。但是，他们有权批评省军区领导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可以送大字报、小字报，可以进行讨论。部队是一个战斗组织，不能成立战斗小组，部队不能乱，

部队一乱，就不能作战了。”

“浙江是前线，部队更不能这样，独立二师是公安部队改编的，他们的领导人自己不好，有错误，激起了部队的反感，可以允许他们民主讨论，用三大民主，不用‘四大’的方法，要说服独立二师。”

“对 20 多县来的造反派要动员他们回本县闹革命，通过军分区、人武部支持他们，使各地方军分区、人武部的态度明朗起来。当然有的支持，有的还会不支持。要劝 20 多县的造反派回去闹革命。你们支持他们，对他们提出的各种要求，主要从政治上满足。”

“杭州本地的造反派不要去军区来来往往，军队不要串联，有意见可以送大字报，你们可以同造反派讲清楚，让省军区关起门来搞四大，不要把秩序搞乱了，部队秩序乱了对敌人有利。”

“对浙江省军区所属各部队，由造反派说服他们。不要搞‘四大’，部队搞正面教育，发扬三大民主。”

周恩来特别问了“红暴会”的情况，听说陈励耘从北京回来后，已在分化了。他说：“那就是说，‘红暴会’回去后靠拢‘省联总’，形势向好的方面转，浙江是个好形势，再往好转，要一致对敌，照顾大局，这是最重要的两条。要教育造反派照顾大局，要把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省一级不行的话，看看厅一级有没有人站出来。这样过一段，就可以成立革命委员会的筹备小组。”

8 月 22 日，中共中央发出(67)267 号文件《关于改组浙江省军管会和省军区的决定》，南萍为省军管会主任，陈励耘、张明

汉为副主任，孟昭玉、朱后年、张磊、吴健为委员。任命熊应堂为代省军区司令员，南萍代政委。20 军军部进驻杭州，对省军区所属独立师、团、营、连、边防部队、军分区、人武部实施统一指挥和领导。浙江省军区机关开展“四大”，由龙潜、阮贤榜负责领导。

8 月 23 日，浙江省、杭州市造反派和驻杭三军数万人集会，南萍和空 5 军军长白崇善在会上讲话，表示 20 军、空 5 军坚决支持“省联总”为代表的造反派。

8 月 24 日，浙江“省联总”召开攻打萧山誓师大会，同时在这天组织攻打并占领了富阳县城。

26 日凌晨，张永生、贺贤春组织省级机关和杭州市数十个单位经过军训的“省联总”，全副武装攻打萧山。打死 90 多人，打伤 100 多人。萧山攻下后，20 军随即进驻军管。

8 月 26 日，浙江省军区召开“交权”大会，龙潜、张秀龙、阮贤榜等省军区领导被群众强按下跪，搞“喷气式”。会后，原省军区党委全体成员被关押和揪斗。省军区及其所属部队和军分区、人武部，甚至一些民兵干部，也被作为“龙子龙孙”，遭到残酷斗争。

8 月 29 日，20 军军部进驻杭州。

8 月下旬，浙江“省联总”以“文攻武卫”开路，在全省各地大规模武力镇压“红暴”派。

此时，陕西西安也在武汉“720 事件”后发生了著名的“八五静坐”。

7 月 14 日上午 9 时 11 分，就在周恩来正在武汉东湖宾馆忙

着安排毛泽东赴汉诸多事宜之时，留守北京的国务院总理办公室吴斌，也按照周恩来的布置，打电话给西安交通大学李世英，传达周恩来对西安文革的指示：

（一）你给总理的来信已收到，关于毕业生的问题，如照来信所提的办法，时间会拖得很长，中央正在研究一个妥善处理的办法。

（二）据悉：西安最近打砸抢又在抬头，而且两方面都有，希望双方能通过协商予以制止，如果不行，将来可来北京解决，但现在不要来。

（三）听说交大对黄经耀、胡×有意见，黄、胡二人是中央派去的，而且从一开始也是支持交大造反派的，希望能注意同他们的关系。

（四）霍士廉身体很不好，要批判他可以，但一定要注意他的健康，中央已委托省军区和驻军加以掌握，关于霍士廉是叛徒的问题，根据中央所知，情况并非如此。

7 月 22 日，西安北郊红旗机械厂发生了文革以来第一次大规模武斗，死了人，在市内抬尸游行。

7 月 27 日至 28 日，“西安地区工矿企业联合会”，简称“工联”所属的数千人到省军区静坐，并贴出了“揪军内一小撮混蛋”等大字标语。

8 月 5 日，西安交通大学“文革总会”以对支左委员会的支左工作不满为由，发动 3000 余人，到建国路支左委员会接待站造反。第二天，又强行占领支左办公大楼，并成立了“八·五造反总指挥部”，“工总司”头头马希圣任司令，西安交通大学红卫

兵领袖、“文革总会”主任李世英任政委，贴出了“炮轰支左委员会，迎接阶级斗争新风暴！”，“打倒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派！”等大字标语。

当晚24时，“八·五”指挥部宣布封闭支左办公机关，并开始静坐。到了8月7日，“八·五”指挥部又派出400余人，在小寨8133部队，即21军军部门前静坐。

8月1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关于西安问题的指示》，为西安西北光学仪器厂2月10日发生的一起武斗事件定性。《指示》中特别提到：

“陕西省军区司令员黄径跃同志，二十一军军长胡炜同志，是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好同志，各革命群众组织应该相信他们，如对他们有意见，应实事求是地采取同志式的态度帮助他们。”

《指示》特别要求：“此件可向群众组织宣读。”

这应该是对西安“八五静坐”的一种回复，但是并无效果。上述两处静坐延续至9月17日，共组织“东派”群众为主的799个单位、近10万人在建国路支左委员会和21军军部门前静坐，历时42天，时称“八五静坐”。

毛泽东看了有关材料后批示：“李世英是个蛮子，不讲道理。”

8月16日，西安交大校革委会组织3路人马分别进驻西安市公安局、陕西省公安厅和陕西省军区，进驻时间约半个多月。

“东派”要斗霍士廉，可是霍士廉自7月下旬后就失踪了，他们找省军区和21军要人，但是省军区和21军也不知道霍士廉

在哪里？

原来，是西工大的学生李文斌、杨祚华、马小兵和西军电的学生何涛 4 人，经过精心策划，冒险将霍士廉从西交大关押的地方接出来，藏在了西工大图书馆的书架空挡里。西工大是国防大学，属于机密单位，由 21 军负责保卫。图书馆大楼在教学区内，教学区各门口都有解放军站岗，严谨外人进入，加上中央有关于不准冲击国防机密单位的通令，外人不敢随便冲击。而图书馆大楼内分四层，各层都密密麻麻摆满了书架，就是进入图书馆也很难发现。此事只有他们 4 人知道，霍士廉就这样真的“失踪”了。

省委书记霍士廉“失踪”了！这还了得？以西交大为首的“东派”头头们如热锅上的蚂蚁，“找霍”“揪霍”的呼声日高一日。他们一方面继续给军区和支左委员会及 21 军施加压力，动员更多的人参加静坐，不断组织冲击，要求交出霍士廉批斗；一方面组织人员四处暗中搜寻，并在各个交通路口设置关卡，防止霍士廉逃出西安。

霍士廉长期呆在西工大当然不是长久之计，一旦他的藏身之处泄露出去，后果不堪设想。“西派”的“统指” 孙福林、“工矿联” 张培信、“农民总会”田杏云和“红总司”李洪明四大组织的头头们得知霍士廉藏在西工大的消息后，决定设法把霍士廉送到北京交给中央。

经过周密策划，四大组织的头头向有关单位打电话征集汽车，很快就开来很多。他们只留下军事学院的 4 部载满军人的军用汽车，让其他车辆原路返回。然后，4 个头头乘两辆小轿车和留下的这 4 辆军车一起驶入西工大教学区图书馆大楼前，再把蓬

头垢面、弱不禁风的霍士廉从图书馆里搀扶出来，坐进小轿车内。

霍士廉藏在图书馆内时，每天都是由那 4 个学生偷偷给他送点土豆吃，身体状况很差。他的夫人丁聪看到他那狼狈不堪的样子，伤心地不住抹泪。在此危急时刻，她也不敢多说，只好无奈地和霍士廉匆匆挥泪告别。

头头们先让 4 部军用卡车驶出西工大，然后向西安的不同方向开去，同时交代司机，如果有车辆跟踪，想办法把他们摆脱后到西安市东郊临潼火车站旁的 152 部队军校汇合。

等这 4 辆军车离开校园后，四大组织头头陪同霍士廉一起开到西工大南门对面的西军电，让他换上军装。因为当时霍士廉还兼省军区第一政委。

当他们汇集于临潼火车站时，没想到小车司机送人赶火车习惯了，竟下意识地率先把小轿车开进了站台。铁路系统的职工大部分是“工总司”的人，他们一旦发现霍士廉，肯定会惹来一场大乱。在这危急时刻，司机马上反应过来，未等车站工作人员清醒过来，他已经调头驶离车站。

小轿车驶出车站后，迅速进入火车站旁的 152 部队院内，那 4 辆卡车已在院里等候。他们和司机简单地碰下头，便急如星火地向陕晋豫三省交界的潼关开去。

原来，四大组织的头头在研究送霍士廉去北京的方案时，曾设想出用飞机、火车、汽车三种交通工具，并逐一分析哪一种最佳。如果乘飞机场，目标太大，最容易被发现而惹麻烦；如若乘火车，铁路系统大部分职工是“工总司”的人，随时会被发现而把霍士廉“抢”走，更危险。这样，他们就只有采用乘汽车这条

路了。交通工具确定后，他们又商定先乘汽车到三省交界处的潼关，然后渡黄河，经山西太原、河北石家庄到北京。这样，对方就很难预料到。大家都认为这是最稳妥的方案。

车队来到潼关的黄河渡口已经是夕阳西下，“西派”四大组织头头们都下了车，只见波涛滚滚的黄河不时翻起浑浊的浪花，渡口没有一条渡船，渡河不知道要等多久。因为当时潼关没有黄河大桥，要想过黄河，只能用小船摆渡。西安市两派正在激烈争斗，四大组织头头不能再往前送，又怕暴露身份也不敢在此久等。他们就把霍士廉搀扶下车，交给 3 个学生何涛、杨祚华和马小兵，并一再交代他们，路上一定要小心谨慎，好好照顾好霍士廉，安安全全地把他护送到北京。然后与霍士廉和 3 个学生一一握手珍重道别后，和那 4 辆卡车一起返回西安市。

3 个年轻人搀扶住霍士廉慢慢走到黄河岸边，举目四望，滚滚黄河，茫茫河滩，一直不见渡船。他们等了很久，才见远处有一叶扁舟缓缓而来。3 个年轻人高喊让小船过来，说有人要摆渡过河。船划到岸边，他们才看清原来划船的是一位老者。他们清楚，黄河水性莫测，没有经历过大风大浪的人是不敢在黄河上使船的。因此，这位老人一定是一位饱经风霜的老把式。老人上得岸来，笑呵呵地问：“什么人坐船？”

学生们回答：“是部队首长。”

老人又问：“什么部队首长？”

学生回答：“是部队高级首长，7 级干部。”

老人非常高兴地说：“好好好，我还从没有遇到过这么大的首长坐我的船哩。”说着，老人赶快把小船泊好，然后下船扶住，

让 3 个年轻人小心翼翼地把霍士廉搀扶到船上坐下。等 4 人都坐稳后，老人最后上船坐到船头，熟练地拿起浆向岸边用力一撑，再划几下，小船调好头。他笑呵呵地问一声“首长坐稳了吧？”

3 个学生齐答：“好啦，开船吧。”

老人吆喝一声“开船喽——”慢慢向对岸划去。

这位老人确实是老船工，虽然波涛滚滚，小船始终比较平稳。船到对岸后，老人先跳到岸上扶着船，让三个年轻人搀扶着霍士廉慢慢上岸。站在岸边，他们放眼一看犯难了，从水面到河岸有人住的地方还有一公里多的沙滩。霍士廉已是弱不禁风寸步难行，怎么办？再难也得想办法啊！听老人说前边不远就是三门峡工地，因工程早已下马，留守人员寥寥无几。他们便留下一人照顾霍士廉，两人向三门峡工地跑去，看能不能找辆车。

来到工地，他们俩四处寻找也不见一个人影，但找到一辆拉水泥的破旧架子车。他俩就把这辆架子车简单清扫一下拉回岸边，把霍士廉搀扶上去坐稳后，一人拉两人推好不容易拉出黄河滩，3 人都已累得汗流浃背。稍事休息后，他们又拉起架子车来到工地，转来转去，最后找到三门峡工地留守处。此时，天已黑了。霍士廉身体太虚弱，经过一天的颠簸，已经有些昏迷。听说留守处还有卫生所，他们赶紧把霍士廉拉到卫生所。当医务人员得知这位领导是高级干部时，非常激动。因为在这个平时人迹罕至的地方，能见到一位大干部实乃三生有幸。于是，他们很精细地为霍士廉作了检查，说他身体太虚弱了，输些葡萄糖水就会好些。他们这里别无有效药物，也只有采取这个急救措施了，很快就为霍士廉输上葡萄糖水。

第二天，在留守处负责人的热情帮助下，他们乘火车来到太原。当时，山西省的革命委员会已经成立，但省军区司令张日清正受群众冲击。在这里，穿军装很容易招惹麻烦,于是，他们就给霍士廉脱下军装，成了地方干部，并住进省革委会招待所。招待所的工作人员听说是准备进京的领导干部,还比较热情,这样，虽然霍士廉还不能暴露真实身份，但也稍觉放松。下一步就是经石家庄进京了，为使周恩来总理早有准备，当晚，他们先给总理办公室负责西北地区的联络员吴斌发一封电报："西安形势紧张，我们送霍士廉进京。"同时，又与已在北京的李文斌进行了联系。

李文斌也是从西交大救出霍士廉的 4 个学生之一。他当时是西工大文化革命情况汇报组小组长，负责向中央文革、国务院、中央军委、书面汇报西安地区的文化大革命情况。他们编辑打印的《情况汇报》简报，由兰州空军的机要通讯员准时到学校来取，并用飞机送往北京向中央报送。中央这些收文单位每期都要存档，如果缺了哪一期还要给他们打电话必须补上。就这样，李文斌与总理办公室负责西北地区的联络员吴斌等建立了密切联系。

在何涛他们 3 人还在途中的时候，李文斌陪西工大校长寿松涛先期来到北京。寿校长等是应国防科委的邀请到北京汇报学校关于教育革命、复课闹革命情况的。他们到北京后住在总参谋部第三招待所。

李文斌很快就见到了吴斌，并得到了周恩来同意将霍士廉送来北京的答复。

第二天上午，何涛、杨祚华和马小兵护送着霍士廉乘上经石

家庄去北京的火车。车上人多眼杂，危险重重，霍士廉生怕暴露身份惹来麻烦，一路上很少说话，也很少吃东西，身体越发虚弱。

晚上，车到北京站。当车门打开时，总理办公室联络员吴斌已在站台等候。那 3 个学生一下子解除了压力，喜悦地搀扶着颤颤巍巍的霍士廉从车厢里慢慢走出来。此时的霍士廉虚弱得连站起来都很困难。吴斌看到后，马上跑过来握着霍士廉的手说：

“霍士廉同志，总理让我接你来了！”

霍士廉一下子激动得不知想说什么，但是张着嘴就是说不出话来，多日未刮的胡子直哆嗦，泪水终于止不住涌淌出来，苍白的脸一下泛红了……

## 第 810 回：第七次，接见江西省代表　周恩来，明确打倒方志纯

周恩来接见完北京红代会代表，几乎没有休息，又和肖华、姚文元一起，于 8 月 12 日凌晨 3 时 20 分至 6 时 25 分，在人民大会堂安徽厅第七次接见江西赴京四方代表："大联筹"50 人，江西省军区造反派、南昌步校、414 部队共 10 人，"联络总站"30 余人，还有省委刘瑞森、郭光洲、黄先、李杰庸、黄霖、和军区的刘培善、吴瑞山、倪南山、陈昌奉等人。被接见的还有济南军区 26 军政委程世清和北京红代会代表。

当他们走进会场时，与会者高呼"毛主席万岁！"

周恩来说："你们久等了，我们刚才商量了一些事，耽误了。今天不多说了，明天晚上结束这个会。"

他接着说："报告你们一个消息，萍乡造反派非常得力，保守派夺了我们野战部队的枪，造反派反击，赶走了保守派。昨天，我宣布调野战部队去江西支左，你们大家都同意。我们派了调查组到萍乡调查后，想说四个问题，我刚说过一个半，就被你们一男一女打断了。会后，他们回去了。这两个人我们调查了，这个女的是萍矿党委书记的妻子，也就是他的老婆；男的是技术秘书，他们回去了就不简单，回去就动员农民夺枪，8 号夺起，不仅夺走枪支弹药，还把野战部队干部打伤 132 人，重伤 22 人，夺走了的武器有步枪 44 支，冲锋枪 21 支，轻机枪 6 挺，重机枪 6 挺，手榴弹、60 炮、子弹等等。野战部队劝他们不要夺枪都不行，还挨了打，这样对待野战部队，你们说对不对？"

大家齐声回答："不对！"

周恩来继续讲了 8 月 8 日发生在萍乡的那次武斗，他说："'萍总'对萍乡'萍联'造反派游行，庆祝十六条一周年，野战部队支持他们，刚好路过青山时，被'萍总'伏击了，打伤一人，后来就陆续发生开枪。9 号下午，支左部队退到了铁路边还要被攻打，造反派这时忍无可忍，组织反击，把'萍总'指挥中心赶出了萍乡。造反派有牺牲。'萍总'这种行为是错误的，严重说就是叛乱行为！当然，广大群众是受蒙蔽的，这次造反派捉了一个'萍总'副司令和萍乡武装部的一个人，这就证明了，萍乡武装部、萍矿党委是支持保守派的。造反派为了控制萍乡局势，起来维护野战部队，这行动是对的，完全正义的！我们支持！我们称赞！在这样的形势下，矿务局'萍总'有不少起义了，萍乡局势就扭转了。"

萍乡武装部被捉住的那个人是武装部的副政委。这时"大联筹"的代表高呼口号。周恩来接着说："这样也把受蒙蔽的群众教育过来了，现在摆在'萍总'的面前，就是要放下武器，抓革命、促生产。萍钢造反派是自卫的，是文攻武卫的。他们拿去部分枪支，保卫解放军，做得对！'萍总'要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抓革命、促生产，不是不容易。"

周恩来接着讲："从煤校到现在，事情是比较严重的。对这些事，我们还要继续调查，澄清事实，赣州的事情，广州部队的调查就是那么一回事，就有那么多尸首，他们还要继续调查发枪的事，抚州野战部队还没有派去，福州和省军区就派了两个独立营，本地独立营曾经发表过声明，反对造反派，支持保守派。武

汉事件发生以后，他们做出姿态，游行示威，喊打倒陈再道，这是允许的，但不是真心诚意地喊，要经过教育，要把省独立营调到上饶去整训。可是他们不去，这样，支左部队就不能去了。”

他接着问：“抚州有人在吗？”

抚州军分区副政委萍雷之回答：“在”。

周恩来说：“你打电话，问他们走不走哇！”

萍雷之说：“我们还要做工作，做好了就可以走。”

周恩来：“这就是对你的考验！你在这里要努力。你认为他们是错了，就要和他们划清界限。他们支持保守派，调农民进城破坏公路、铁路、渡口和打 58 次列车，都是抚州军分区和武装部干的。我们已派野战军到铁路沿线，先到温家圳去观察一下，你是政委，要与他们划清界限。你设想，哪些人是好一些的，要做工作，促进他们分化，你熟悉的就直接打电话去做工作。他们调农民压造反派，但大多数是好的，顽固的就是几个头头，极少数。你们看，全国反革命就是赵永夫、叛乱的就是陈再道，顽固的就是内蒙古的黄厚，大多数是可以教育好的。我们还要交给他们任务，当然还有其它地方。这些武斗各军区要很好的清查确实，这对你们是一个考验，你们打电话去，把最粗最大的揭发出来。或者是自己认为犯罪的要将功赎罪。”

周恩来接着问：“萍乡的余华来了没有啊？他来了，他确实证明死了 6 个人，还有 3 个护旗的也死了。共 9 个人，西南二区，他们临被杀死前还高呼：‘毛主席万岁！’但是尸体被抢走了。萍乡火线指挥部的杨**证明情况调查，有一部分尸体被毁灭。”

余华是萍乡市消防队的，他是萍乡“713 事件”的目击者。

周恩来说："上次萍乡三位老人来控诉，讲得很难过，调查组刚回来。那个一男一女就大叫大嚷，说什么是造反派自己烧的。我还没有说出起火的原因，他们就回去了，组织人夺枪。到底谁是谁非？'萍总'这么大，有些人不敢说，终究会揭发的，事情总会搞清楚的……江西死了这么多的人，军区，军分区，武装部的责任最大，就大在这里。还有九江、波阳、宜春、南昌……我们伟大领袖看到了这个消息，特别是从赣州看得很清楚，省军区、军分区先从南昌后赣州，赣州更严重。从'629'到'79'，江西形势发展很严重，是与军区、军分区、大军区有关系的，有的是策划，有的是怂恿，不能总是这样一般的方向路线错误，而是严重的方向路线错误。你们发枪给保守派，调动农民进城杀造反派，你们还要辩护。两个月的暴露，确实证明了在大军区的影响下，军区、军分区、武装部一致策划下，怂恿夺枪，挑动农民进城，死了这么多人。在这种情况下，在南昌的造反派不甘心被压下来，迫不得已，奋起夺枪，夺了军区的枪，南昌是'629'开枪，赣州也是'629'开枪。如果南昌不夺枪，可能发生意外事件。冲到军区，夺了守卫的枪，夺枪是有根据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我们劝他们停止夺枪。这说明造反派与受蒙蔽的群众，大有所不同。造反派很听话，很讲道理的。7 月 12 日，双方达成了《八条协议》，他们签了字，萍乡、赣州的保守派，偏偏没有签字。造反派是讲道理的。当时我考虑，野战部队没有去，枪不好交出来，我就说摆在原单位封存起来。南昌的秩序很好，现在也没有听说乱发枪了嘛。造反派很讲道理，毛主席的威信，叫省军区不开枪，所以没有开。这一点，算他们听了话。我说过，这

是最后一次对他们的考验。现在夺野战部队的枪就不对了。没有解放军，就不能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你们鼓了掌，拥护中央派野战部队去江西支左。解放军是文化大革命的保卫者。我们从北方和南方调了两个师，实际上，从浙江又调了一个团。双方要支持野战部队，这是必须的。各地都来了人，造反派有人，‘联络总站’也有人。今后，不要再发生萍乡的事件。‘联络总站’也有杀出来的，‘东方红司令部’来了吗？”

师院“东方红”回答：“来了！”

周恩来说：“你们给我写的那十条，很好嘛，我们打算给你们印出来，同意吗？”

师院“东方红”回答：“同意！”

周恩来说：“犯了错误就承认，态度诚恳，愿意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这还要宣传，还要时间，不是口头上的。”

周恩来又对“大联筹”讲：“你们这方面要欢迎他们。”

“大联筹”鼓掌，并且高呼口号；“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万岁！”“伟大的毛泽东思想万岁！”“毛主席万岁！”

周恩来接着说：“这三句口号喊得很好，这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胜利，毛泽东思想的胜利，革命不分先后。还有洪都‘红旗’表示脱离‘联络总站’，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洪都‘红旗’来了没有？”

“联络总站”回答：“没有来！”

周恩来：“叫他们来吧，我们希望‘联络总站’的战士学习‘东方红司令部’的精神。明天宣布江西的决定，他们要来。要允许人家起来革命，他回来了就要欢迎。这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

胜利，这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造反派的胜利。就造反派贯彻了，就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造反派胜利了，就不要翘尾巴。”

这时候，洪都机械厂的“红旗”代表进来了。“大联筹”代表鼓掌呼口号。周恩来说：“造反派在欢迎你们啊！”

接着，周恩来又说：“两个月，江西的形势往好处转。你们回去，可能还有反复，还要注意的。‘720’武汉事件，要引以为教训。你们与武汉事件有区别，但是，赣州不同，更加严重哇！你们回去，要听中央的决定，要支持野战部队。抚州，你们要继续做工作，不但军区，‘联络总站’还要打电话，帮助独立营，劝独立营去上饶，不要受坏人的挑动。不要夺枪，你们要同造反派同志一样，维护野战部队的威信。你们如果真正做出拥军爱民的活动，劝农民不要进城，在城市里的工人，抓革命、促生产，不要到乡下去串通，你们这样做就很好，也是证明你们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那么，就不会重演萍乡事件了。”

“这里要解释一句，吴瑞山是受大军区影响，他负主要责任，萍乡、赣州这么严重，他是不能推托自己责任的。刘培善和军区要检查。刘瑞森、郭光洲、黄先三位同志也有错误，执行过反动路线，文化大革命以前也有错误，历史也有一些问题，但不是像你们说的那么严重。总之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是江西站出来比较早的。江西省走资派就是你们双方共同指的，以方志纯为代表。杨尚奎长期养病，不管大事。大权在方志纯手里。方志纯历史上已查明是个叛徒。根据这两点，打倒方志纯是恰当的。其他的干部你们回去再检查再揭发。对杀出来的革命领导干部要欢迎，不明朗的要调查，但是要同志式的，不要揪住不放。对军区的错误

明天就检查，你们有意见，你们不满意，回去再提，但不要像以前那样。不知哪一个部分的群众冲到军区设几个拥军联络站？”

姚文元：“三个拥军联络站。”

周恩来：“‘大联筹’的同志要打电话回去，应该撤出，这不好嘛。请你们通知一下，马上撤出，明天的会上听你们撤出的消息。你们把刘培善、吴瑞山揪到北京是革命行动，过火了点，我们不提倡，但我们没有责备你们。听说三个拥军联络站，还有首都红卫兵参加，首都红卫兵来了嘛？”

答：“来了。”

周恩来：“听说你们要到江西，你们对江西有感情。我已给红代会说了，自由溜出是不行的，现在还有人说‘处罚第三次大串通’，中央文革也没有做出决定。现在仍然肯定你们的成绩。你们现在还以老左自居，这就不对了。你们要去调查，也要同我们协商，我们在安排，今天就不提了。我找联络员谈谈吧，你们这个功，我们没有埋没，但不要自由溜出去，要遵照林副统帅的教导，加强三性，革命性，科学性，组织性。”

这时，“大联筹”的代表向周恩来表示，立即打电话回去，马上撤出驻在军区里的联络站。周恩来说：“好嘛！谢谢你们。我相信你们说的话是灵的，你们拥军精神是好的。房子不够，就请军区拨给你们。今天就谈这些。”

他最后交待大家说：“现在江西武斗要制止，对农民不要进城武斗，不要夺枪，不要夺东西，不要夺军衣，不要冲击野战部队。要结合对全国最大的走资派的大批判。对本省的夺权斗争，结合本工厂、公社展开斗、批、改。在这个上面比高低，这样在

大批判中实现大联合，由筹备小组进入革命委员会，江西好的形势就会出现。今天在座的要真心实意地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山来，抓革命、促生产，真正贯彻《八条协议》，开展大批评，大联合、三结合，即使时间长一些，这也会做出成绩的。‘八一’过去了，听说你们在井冈山建立纪念馆，可以稍微推迟一点，先把大中城市局势稳定下来，然后，从瑞金到井冈山逐步的搞。军区、军分区内部要搞‘四大’，你们可以送大字报、小字报，但是不要干涉他们内部整风，不要去串通，不要同他们一起去搞，你们对军区、军分区过去的错误，可以提出意见，包括野战军帮助军区建立新的领导机构的意见也可以向筹备小组提出来。”

“大联筹”的代表向周恩来汇报上饶 8 月 6 日事件，说这次事件：“打伤 4 个人，死了两个人，还剩下几十个人被野战部队解放军救了出来。现在还抢去了 18 具尸体。有的被割了眼睛，舌头、耳朵、抽了筋，有的连生殖器也割掉了。”

周恩来很气愤，问上饶军分区王一琴政委：“你知道这个事情嘛？”

王一琴汇报。周恩来可能坐的时间太长你太疲劳了，离开座位，走到王一琴的前面去听。然后问：“你们报告了没有？”

王一琴：“报告了！”

周恩来：“哪一天汇报的？”

王一琴：“6 号。”

周恩来：“农民为什么和学生这样对立？”

姚文元也跟着插话：“怎么搞的？”

王一琴：“有人策划，现在正在组织调查。”

周恩来：“什么人在策划？”

王一琴：“打电话去了解了，他们说，在电话里不好讲。”

周恩来转过身，问 26 军的一个姓王的团政委：“你掌握的情况是否和他们一样？”

王政委说：“是上饶‘联络站’与‘农民革命造反总指挥部’干的。”

周恩来问：“军分区是不是发了枪？”

王一琴说：“没有。”

周恩来反问：“没有？”

王一琴：“没有。”

“大联筹”的代表：“7 月中旬发了枪给农民。”

周恩来接着说：“农民子弟在农校读书，只有十几岁，这些受蒙蔽的农民，怎么这样狠呀，保卫科长去了没有？”

王一琴：“去了。”

周恩来说：“你们要调查清楚，你们管吗？”

王一琴说：“管。”

“联络总站”的代表纷纷发言，宣读声明，表示“联络总站”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承认“大联筹”的方向始终是正确的，声明退出“联络总站”，拥护党中央派来的支左部队。

周恩来：“今天的会就结束啦，明天再开，你们全部都来，不仅‘大联筹’的，‘联络总站’的也都来。”

这时群众高呼：“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就在当天，8 月 12 日，26 军一个营进驻抚州。一名副团长带人前去联络，结果被绑架。新任江西省军区副司令员直接给抚

州军分区打电话查问此事，要求放人。抚州军分区参谋长称没有此事，无从放人。

## 第 811 回：西单打，外交部又搞夺权　亲宣读，中央对湘、赣决定

8 月 12 日清晨 5 时，福建省赴京汇报团双方达成了第三个协议：

根据周总理、陈伯达同志指示，双方在北京经过协商达成第三个协议：

坚决执行中央七月十三日关于禁止挑动农民进城武斗的通知。双方不得以任何借口，任何方式，挑动农民进城参加武斗，双方坚决反对挑动农民进城参加武斗，已经进城的应立即动员返回原村。必须绝对禁止任何人、任何机关，利用任何借口，或者利用所谓“老区”的名义动员农民进城。挑动农民进城参加武斗的幕后策划者，应担负全部责任和一切后果。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都不得借口进城，已经进城的，都必须尽快返回原地，抓革命，促生产。

福州、诏安、厦门、泉州、崇安、晋江、福清、仙游、建阳、建瓯、南平、宁德和全省各县市已经进城的农民，省军管会、军分区、人武部负责动员他们立即返回原村。

福建省革命造反委员会赴京汇报团：陈力生 潘家驹

福建省八·二九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等八个总部赴京汇报团：

余映辉 庄志鹏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二日凌晨五时

早上7时，他们又达成第四个协议，表示不抓对方的群众，停止使用广播车，撤销街头广播站，各方自动拆除武斗工事，包

括街头的制高点。

但是，就在福建代表在北京协商签订协议的时候，8月11日，福清上千农民进驻福州市郊。8月12日，福州市仓山一带发生武斗。当天，福州军区、省军管会、省军区发布《禁止挑动农民进城参加武斗》的命令，指出，挑动农民进城参加武斗者，应担负全部责任并受党纪、军纪、国法制裁。8月13日，这些农民队伍撤回福清。

就在中央领导接见北京红代会代表结束后的第二天，8 月 12 日，北京西单商场发生大规模武斗，商场内的两派群众组织都叫来了外单位的群众组织介入，有西城粮店职工的“西粮野战军”、 洪振海领导的商业职工的“财贸尖兵” ，还有“红造”、“革造”、“捍卫团”等群众组织共计 3000 多人参加。洪振海现场指挥，后来查明，实际指挥武斗的人就在市革委会，是学部的周景方。

武斗从凌晨 5 时打到晚上 19 时许，市革委会副主任吴德和卫戍区政委黄作珍到现场制止，结果，有人用弹弓射出的钢球打到黄作珍的腰上，他的腰因此好几年都没有好。一个老工人推了吴德一把，把他推到角落里。

这次武斗造成数百人受伤，房屋、设备被毁，西单商场被迫停业 40 多天。

武斗第二天，8 月 13 日，谢富治来到北京西单商场，他看到商场武斗后的一片狼藉，气愤地说：“商场糟蹋成这个样子，国家财产受到严重损失，你们算是什么革命派？！这个商场要展览 10 天，让全市工人都看看，把两个组织的名字用大标语写上，

在北京市出个名，双方组织支援的单位也全写上名，通过调查要把凶手搞臭。工人百分之九十都是好的，可以通过辩论，不要打骂，为什么要调人？”

“红造会”说：“我们只有 60 个人。”

谢富治：“他们还能把你们吃掉？打死人我负责，让北京全市的工人和学生鉴定看看，你们做得对不对？两派的头头都有私心杂念。在展览时要军队保护现场。”

西单商场武斗后，“洪司令”被公安机关逮捕，“财贸尖兵”解散。

就在发生西单武斗的当天，外交部“联络站”成立了“反迫害大队”，头头是新闻司干部黄安国。

姚登山和王中琪等人和“反迫害大队”黄安国经过计划，开始在外交部政治部夺权。8 月 13 日，他们成立了以姚登山和王中琪为首的“总指挥部”，通过了接管政治部的《通告》和《声明》。当晚，姚登山和王中琪请示王力。14 日清晨，王力通过秘书转告他们：“要敢于斗争，大方向对了就干，自己解放自己”。

于是，姚登山和王中琪决定实施他们的预定方案。当天上午 10 时，他们派了数十人包围位于东交民巷 40 号外交部政治部办公楼，查封所有档案柜、公章和钥匙。由 12 名造反派组成的“领导小组”接管政治部的一切大权。在政治部原有 130 多名工作人员中，仅留用少数几个人，委派黄安国出任“联络站”驻政治部代表，任政治部主任。

下午 15 时，他们在外交部政治部大院内召开“彻底砸烂旧政治部祝捷大会”。姚登山在会上说：“打倒不打倒陈毅是革命

派和保守派的最明显的分界线” “今天砸了外交部旧政治部，现在我们还要砸烂外交部党委；…… 有人要我到部党委工作，我不去。同志们，修修补补是不行的，革命不能改良，要彻底砸烂”。

新的外交部政治部领导小组接连发出两道通令：第一道是通知驻外使领馆，他们已经夺权，并立即停止轮换驻外工作人员。第二道是，已经办理了出国手续而尚未出国或正在办理中的出国人员，暂不出国。他们将根据王力讲话精神对出国人员进行重新审查。

在给驻外使领馆的电报中，他们将中央口号“打到刘邓陶”改为“打倒刘邓陈”。

周恩来听到外交部政治部夺权的消息后立即指示：“政治部是毛主席亲手缔造的，如果有人要砸，要劝阻。政治部的领导干部有缺点、错误，可以批判，不要砸。”他还指示外交部，今后政治部的有关业务用外交部党委名义，不再用政治部。

与此同时，北京的“516”也不消停。8 月 12 日至 15 日，“516”在陶然亭等处召开三天“火线会议”。会后发表了《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总政治部给各军负责同志的信（对目前形势的几点估计）》。这封信声称“八•九战役引起了全北京、全中国的注视，两个司令部对八•九战役也都极为关注。因此，八•九战役主流是好的，方向是正确的，影响是巨大的，作战是成功的”。

针对中央文革对“516”的表态，信中说：“中央文革首长对我们这个大方向问题没有否定”，“中央文革并没有制止我们革命行动的意思，恰恰相反，反而叫人沿着我们的方向去思考”，

“中央文革号召以百万群众用毛泽东思想为武器去多思，难道不是对周恩来之流最最有力的回击吗？”“更重要的是：江青同志说出了我们的心里话：‘我怀疑有一只黑手，这只黑手不仅伸到革命小将那里去了，还来打我们的主意，他们肯定要失败，搞小将也是要失败的。’”“这样看来，中央文革是在指我们不应该依靠少数人的奋斗，而应该动员和发动千千万万的群众，不应当以地下斗争为主，而应当以建立红色根据地为主。”“要继续我们的进攻，而不是停止这种斗争”，“必须公开打下一个地盘来”。

8月12日晚21时20分至22时25分，周恩来等中央领导按照计划继续解决已经确定的湖南和江西的问题，他们在人民大会堂安徽厅接见湖南代表团，宣布《中共中央关于湖南问题的若干决定》。参加接见的有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关锋、戚本禹、姚文元、陈锡联、黄永胜、叶群等。

周恩来说：“我现在宣读《中共中央关于湖南问题的若干决定》，重大问题的决定，其他细节回去由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商定。这个文件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在8月7日已经批准了。”

全场暴发出长时间的雷鸣般的掌声，并高呼“毛主席万岁！”

周恩来随即逐条宣读《决定》，当读完第二条时，周恩来说：“经多次研究，47军不仅能领导湖南的三支两军，也能组织筹备小组。章伯森、华国锋是经过考验的，特别是章伯森同志站出来此较早。当然他们有缺点错误，但能自我批评。”

当读完第三条第一段时，周恩来说：“开展大批判，要对准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结合中南的陶铸、王

任重，湖南的王延春、张平化。要集中火力。”

当读到“警惕敌人……的阴谋”时，周恩来：“‘湘江风雷’感到有这种情况的威胁，‘工联’也同样感到这种威胁在面前，要唤起停止内战，集中力量批判一小撮，抓革命促生产，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基础上加强团结。如果你们要分裂的话，敌人会利用。文攻武卫指的是对敌人，对一小撮挑拨者，不是造反派之间。”

当读完第三条第二段时，周恩来说：“现在长沙的革命秩序还未建立起来，应该通过筹备小组的努力，促进大联合。”

当读完第三条第三段时，周恩来：“争取受蒙蔽的群众起来革命，最大限度的团结大多数。要推动他们觉醒起来，现在‘高司’也有表示，这个工作，还要努力，有的军分区、人武部操纵他们，把枪发给他们，突出的是湘潭、常德、黔阳、益阳。‘湘江风雷’、‘工联’要去做工作，不要打击报复，要使他们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对军区、军分区也要一分为二，也有好的。即使头头不好，下边也有好的，长沙军分区就有站出来的嘛！”

当读完第四条第一段时，周恩来：“有些夺的枪不是落在有组织的人手里，而是散落在社会上，有的冒充你们，又没符号。抢军服，冒充解放军更不好。”

宣读完《决定》，周恩来说：“这个文件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早就批准了，因有事，今天才宣布。”他再次代表中央对“湘江风雷”问题承担了责任，接着龙书金代表湖南省军区党委宣读检讨。

“高司”代表詹先礼说：“中央的决定我们没意见。我们‘高司’在‘二·四’以前大方向是正确的，‘二·四’以后犯了错

误。我们建议我们的材料不发了，文字上再做些推敲！”

周恩来：“可以！”

詹先礼：“总理说我们是受蒙蔽的。当时没说‘二·四批示’是错误的，因此我们捍卫‘二·四批示’是无罪的。说我们是受蒙蔽的，不是这样，我们从‘八·一九’就造省委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反，叛徒王延春的材料也是我们调查的。我们很多话没说完，要求总理单独接见我们。”

谢若冰针锋相对：“‘高司’的这份检讨，我们还通不过。去年我和他一块到北京，那时我就发现他不是一个真正的造反派。没时间我不多说了。”

詹先礼毫不示弱：“希望给我们安排时间辩论！”

湖南省工交系统学习毛主席著作标兵、长沙市邮电局话务员刘秀英主动检讨：“我过去想当逃兵，不想搞革命了，想到新疆去。我错了，要打回老家去，接受批判，请革命造反派帮助我。我不是什么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我要从零开始。”

谢若冰不依不饶：“要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必须做深刻检讨，你到底与陶铸、张平化是什么关系？我们有材料！”

1966 年 8 月，刘秀英曾给张平化打电话，反映省里的干部参加游行，散发传单的情况，陶铸在 1966 年 8 月 23 日给中南局的电话指示中提到过此事。

倍感委屈的刘秀英说：“守着戚本禹同志的面，我要讲清与陶铸的关系。”

“工”“湘”派代表纷纷打断她的话，指责她，周恩来看不过去：“你们问她嘛，让她讲！”

刘秀英："我接受省委的任务，到湖大当过联络员，以后又与中央文革的周子明等同志联系，反映些情况，我也不知道与陶铸、张平化什么关系，……请求中央对我做调查，我也不知道错在那里！"

造反派代表又纷纷指责她。周恩来再次出来解围："她承认错了，愿意从零开始了嘛！她的个人问题，听听她的。你们是造反派嘛！"

代表说："她是政治扒手！"

周恩来："她这么大小，你们怎么这样说呢？造反派应有造反派的气量！"

周恩来调转话题："詹先礼同志，我问一问你，你们的检讨是8月8号，我提到'二·四批示'中央有责任是7月27号。我今天一正式宣布，你要把检讨收回！你们写了检讨，当时我们感到你们的态度还好，所以印发了。现在中央已承担责任了，你就收回了！你们不赞成散发给群众，我们收回，但你们的检讨书是白纸上写黑字交给中央的，这是不能收回的。"

詹先礼："我们认为给中央的检讨要在文字上好好搞搞。"

戚本禹："你刚才讲到'二·四批示'的问题嘛！"

詹先礼："我们'高司'没有武工队，可以向总理保证。'高司'武工队员的自白是捏造的。我们要求中央首长对湖南问题进一步调查。"

周恩来："刚才那个女同志(指刘秀英)的发言，的确很沉痛，她的错误主要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来负，张平化负。人家从零做起了，不要斤斤计较，造反派要有造反派的气量，要

高姿态，应该掌握斗争的大方向，对受蒙蔽的应该同情嘛！”

周恩来对“高司”一个要发言的代表说：“今天结束会，你给联络员讲，把全文记下来。万达同志的检讨，发给你们，在这里不念了。”

会场仍不安静，“高司”与“工”、“湘”互相指责。周恩来等首长在众人的掌声中走出会场。

谁知周恩来他们刚离开，一些代表就打了湖南省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崔琳。

周恩来、陈伯达、肖华、姚文元等人稍事休息，又在 8 月 13 日凌晨 0 时 03 分，走进人民大会堂江西厅，第八次接见了江西四方代表全体来京人员共 1300 余人，向他们宣读《中共中央关于处理江西问题的若干决定》。当周恩来等人手举《毛主席语录》进入大会场时，与会人员全体起立欢呼：

“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

周恩来让大家坐下后说：“今天我们宣读《中共中央关于处理江西问题的若干决定》。”掌声、欢呼声再起。周恩来说：“今天因为要宣读、解释这个决定，要让‘大联合筹委会’到北京来的同志都到场，还有‘联络总站’的同志都来参加这个会议。我还告诉你们，这个地方是江西厅。”

全场热烈鼓掌，高呼“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周恩来请大家安静，然后宣读《中共中央关于处理江西问题的若干决定》。他念一段《决定》，解释一段。

## 第 812 回：对江西，研究成立筹备组　风声传，宁夏中宁有危险

当周恩来念完《中共中央关于处理江西问题的若干决定》第一条后说："在南昌军分区某些人发枪弹给保守派，打死打伤大批革命造反派。在赣州，军分区个别领导人支持了保守派，对革命造反派和红卫兵小将进行了武装镇压。我们只举这两个严重的例子，实际上还有更多的啰。为此，中央决定改组江西军区。"

当他念到对程世清、杨栋梁等人的任命时，分别叫程世清、杨栋梁站起来与大家见面。他说："我解释一下，江西省军区有几位同志，首先刘培善同志对江西省军区所犯的错误，要负责任，要检查。他作书面检讨，我们都印发出来，交给你们，明天可以在你们住的地方开会。但是必须指出，在人民大会堂，在全中国最庄严的人民大会堂，也就是在这个全国开各种会议的地方，不要进行武斗，回去以后，也不要搞这些动作。明天和以后也不要在北京开什么大会，把某些同志揪去进行斗争。因为中央已经做出决定，这是最高指示，希望你们按照《十六条》办事，按照最高指示办事。

我们已经改组军区，已经采取了措施，回去可以把整个江西，南昌的革命秩序建立起来，你们开群众大会，这些同志去检讨，不要在这个时候大家开大会，搞这些名堂，这样不利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这些，'大联合筹委会'的同志应该了解这些情况。另方面，'联络总站'的同志你们受了蒙蔽，广大群众受了害，将来检查检讨嘛！所以，既要有革命性，又要有科学性，组织纪

律性，这一点必须说清楚，因为刚才我们刚从湖南会议出来，会议的同志出门口就把军区的一位副司令员抓走了还搞武斗。这样不好，这不是毛泽东思想，特别是造反派‘大联合筹委会’，你们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应该树立高姿态，高风格。当然，你们受害，很激动，我们理解，所以今天让你们都到会场来，这也是开了一个例，1000 多人全体参加，还是第一次，四川都没有这样。”

姚文元：“希望你们做模范。”

周恩来继续念《决定》，当读到要揭露、制止攻击绑架支左部队这一条时，周恩来说：“这几天，你们一些人清楚，除了南昌和赣州以外，在吉安出现的事情，在萍乡也出现包围支左部队，最近部队进驻抚州又有这种事情，刚才得到消息，向塘也有这种事情，又出了一点事。所以，我们要号召所有的群众组织，应该坚决支持我们最高统帅毛主席和林副统帅亲自决定调动南北两方的支持江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部队，应当拥护，不能抢他们的枪，抢他们的服装，抢他们的仓库，抢他们的车辆。”

当读到：“军区、军分区指战员要与驻江西的部队紧密合作”时，周恩来说：“今天就发生这样一件事，我们派了一个野战营进驻抚州，因为要去的时候，抚州有独立部队，本来两个营，一个福州派的，一个是本地公安部门改编的，原来中央决定把这个独立营调上饶整训，然后调去一个独立营，但是这个独立营拒绝调动，这是已经违背毛主席党中央的决定，不仅如此，今天野战营进驻抚州，派联络员到前面联络，由副团长去联络；但是进驻人被绑架 28 个人。我们新任副司令员直接打电话打到抚州军区，

那里的参谋长姓什么？”

有人回答：“姓刘。”

周恩来：“是参谋长。他不承认，要他释放，他也不承认，这件事情是很严重的，抚州军分区有同志在这里吗？”

下面一人答：“有，薛利职。”

周恩来指示：“回去负责下命令，28 个同志今天立即一定要放出。”

姚文元：“把汽车打烂了。”

周恩来：“你们拿出汽车送到温家圳去。第二，传达中央、最高统帅、副统帅的命令，要把独立营全部离开抚州。”

答：“好。”

周恩来：“如果他们违抗命令，那是他们违抗命令，军分区政委都在家，要他们负绝对责任，如果他们对抗中央、中央军委，那他们就要走陈再道的路。抚州部队我相信绝大多数是拥护中央的。我们相信，军分区广大指战员，包括人武部，还是一分为二的，多数还是好的，个别人，比如说，刚才说的参谋长，完全对抗我军进驻，不负责任，这是少数。但是，这件事情要考验各个军分区，今天江西 7 个军分区都到了，你们要表明坚定的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愿意和野战军关系搞好，愿意改正错误，必须在这次有所表现。我刚才和福州军区政委说了，等一下你们回去要处理，抚州军区、人武部，独立师负责人会传达的。一定要搞好关系，是最高统帅、副统帅的命令，经过改组军区，跟他们程世清、杨栋梁二位传达，要能够负责，落实每个命令。”

周恩来继续宣读《决定》。当念到“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

筹委会”及“无产阶级革命派联络总站”双方，应坚决执行制止武斗的协议时，周恩来说：“7 月 12 日当时的情况你们互相达成协议是很好的，许多你们付之实施了。但是，的确有些地方还在那里武斗，特别是保守组织，有些幕后指挥打击你们造反派，在萍乡、上饶、南昌、赣州，刚才说了吉安，在丰城，现在抚州，还有向塘，都有这样。因此，广大群众都不太理解，好像是你们达成的协议，说这些头头都右倾，都错了，这不对，大家达成的协议，我们坚决支持你们！过去支持，现在支持，将来还是支持！这是两派达成的协议，‘联络总站’也负责，很好嘛。在这一点上，如果‘联络总站’真正付诸实施，就不会在地方搞武斗。”

对《决定》上说的这句话：“在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的领导下，在条件成熟的地区，要把群众武装起来。目前先在南昌、赣州两地，准备研究实行。”周恩来解释说：

“因为我们现在证明了，在过去犯错误的军区，特别是军分区、人武部，在某些地方曾因为发枪给保守派，挑动农民进城搞武斗，这个事实例子很多，现在当然在改正错误。另外，革命造反派在被压的不得已的情况下夺了武器，夺来以后，很快达成‘7·12’协议，武器可以封存起来，但不忙于交回，因为这一点造反派有了经验，南昌军分区、人武部，还有某一些保守派头头，在南昌城没有敢再来破坏革命事业，南昌城的秩序比较好，南昌城以外还在发生，今天向塘还有发生，这就是说，需要武装一部分革命群众组织，这当然要有计划、有步骤进行，首先应该在工厂进行，当然不排除在学生中进行，当然武装要掌握在人民解放军手中，一定要在统一的领导下进行。革命群众武装，是协

助人民解放军保卫国家财产，维护革命秩序，制止坏人杀害左派群众的强大力量。”

“另外，湖南有这种情形，枪很多，不是落在造反派组织手里，而在社会上没有组织的人手中，南昌革命造反派是遵守三性的，革命性、科学性、组织纪律性，我现要问一句话，昨天请你们打电话回去，把在军区内设的拥军联络站撤出，撤了没有？”

“大联筹”代表答：“报告总理，我们已经打了电话，今天上午 4 点已经撤出，还有清华的几个同志，我们正在做工作。”

周恩来继续念《决定》：“今后，军分区、人武部决不准以任何借口把枪支弹药发给或变相发给保守派，各派都不能以任何借口夺取解放军枪支，抢劫军火仓库和各种军用物资。包括汽车在内。”

周恩来说：“这个决定已经在 1967 年 8 月 10 日确定了，并且经过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看过批准的。好，这样子，除了这个问题以外，还有江西省军区党委检查报告，刘培善同志的检讨，还有江西省军区司令的，这个决定和你们‘7·12’决议，一共是 5 个文件，明天发给你们，你们自己好好认真讨论一下。但是，你们个别代表可能有意见，首先对中央关于处理江西问题的若干决定，你们先学吧！”

“大联筹”代表：“报告总理，我们‘大联筹’宣读一个保证。”

当他们宣读完保证，周恩来说：“很好嘛！抄一份给我。”

周恩来最后说：“两个‘刘’都不要打倒，让他们改正错误嘛！刘瑞森同志支持你们早，另一派提出打倒我们劝说了；刘培

善同志你们应该允许他改正嘛！他们也表示坚决改正。”

“今天大会开了，希望你们很快回去，没有事情的早点回去，因为家里很多同志看着你们，有的差不多有两个多月了，有的一个多月了。祝你们胜利！”

凌晨 1 时 10 分，周恩来等中央首长挥动着《毛主席语录》离开了会场。

会后姚文元同志单独找“大联筹”负责人刘美贵到大礼堂中厅作了如下指示：

1、你们保证很好，回去要高姿态，正确对待保守组织，要注意政策策略，要注意团结他们。

2、你们胜利了。不要像湖北、四川、湖南那样，当中央支持他们了，打内战打得很厉害，这样对革命有阻力，你们要防止这一点，做好工作，团结一致。希望你们江西要做出一个好榜样。

3、你们以后的任务还很重。8 月 14 日我们单独接见你们，研究参加筹备小组的问题。

我们再回到宁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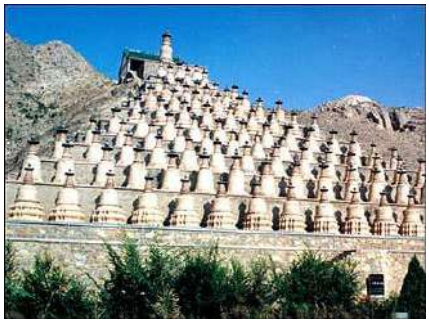
自从 8 月 5 日宁夏发生永宁县流血冲突后，永宁县武装部陆部长被宁夏军区罢免一切职务，银川与中宁“筹备处”处于下风，只得暂时偃旗息鼓。而中宁北部青铜峡与吴忠县的形势却日趋紧张。“筹备处”控制的广大乡村，动员了上万武装的民兵，不断地进攻附近各城镇。将“指挥部”压缩到河西、吴忠若干据点。吴忠的“指挥部”只能固守在东方红剧院、吴忠仪表厂等处。而青铜峡河东的“指挥部”，已全部退守至青山机器厂。

青铜峡是黄河上游最后一道峡谷，位于青铜峡市大坝镇，峡

口两山犬牙交错,山壁相距仅几十公尺,恰如龙门锁蛟。《青铜峡市志》记载："峡口山、牛首山两山相夹，黄河流经其中。"晴天时，两岸山石，土色如金，峡谷在蓝天碧水中互相映衬，呈现出青铜的颜色，故名。

在青铜峡峡口山东麓，是赫赫有名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一百零八塔，俗称"穆桂英点将台"。黄河自塔下向北流去。该塔建于西夏时期，背山面河，依山凿石分阶而建。自上而下，按一、三、三、五、五、七、九、十一、十三、十五、十七、十九的奇数排列成 12 行，总计正好 108 座，呈等腰三角形分布。

一百零八塔的单体结构略有差异。最上边的单塔形制高大，高 3.5 米，塔基呈方形，为八角形束腰须弥座，塔身为覆钵式，塔顶为宝珠式。其余各塔均为 2.5 米高。塔心正中立一木柱，内填土坯，外砌青砖，涂白色。无论远望近观，都气势非凡。



佛塔青铜峡一百零八塔

1958 年起,兴建青铜峡水利枢纽工程,随后,600 公尺长的大坝将黄河拦腰斩断,成为青铜峡水库。

青铜峡与吴忠地区的民族情况极其复杂。作为维系宁夏南北交通的战略要地，青铜峡有山河之险，宁朔平原有鱼米之利。土地广袤，民性强悍。其地民众虽以汉民为主，但男性宽额、深目、

宽尖鼻、体态魁梧壮硕，生性好斗而又蛮勇，有异于典型的汉人。当是匈奴、鲜卑、党项汉化以后的遗族。保持着其祖先剽悍尚武的传统。

吴忠为河东回族聚集地，为西突厥，中亚诸胡的后裔。信奉伊斯兰教，多属于逊尼派之折合忍那派，以马腾霭为教主。其族极喜清洁，律己严，恪守教规。此时，他们的“筹备处”全副武装，占据了宁夏腹地的战略要冲——金积堡。南下北上，都可威胁到“指挥部”的生存和社会的安宁。

毗邻金积堡的是前清军甘军提督董福祥的府邸----董府，这里也是大军云集，河东、吴忠的“筹备处”，将其建成了西线屯兵的大本营。向西北威逼着青山机器厂和河东电厂；向西南触角伸入到彰恩、白马，窥伺着中宁的动静。

“‘筹备处’要来袭击中宁了！”消息从彰恩、白马传来，一时间中宁县城内风声鹤唳，一夕三惊，草木皆兵。

据说，董府“筹备处”派出一支小分队，作斥候哨探到白马公社贾梁地区。正在这里进行宣传演出的“指挥部”宣传队接报后，丢弃了一切行装，在当地群众掩护下匆匆逃进高粱地里，当时许多女同学吓得连腿都抬不动了。一干人好不容易借青纱帐掩护，逃回中宁后，都瘫在那里起不来了。

中宁的空气顿时紧张起来。“指挥部”紧急调派物资人员，加固城防，将“指挥部”与防卫重点移往城南的大寨子内。这是解放前中宁宁安堡最大的商号庆泰恒老板为防土匪而修筑的宅第。其夯土围墙高约三丈，顶宽七尺五，有防守堞墙。进得寨门，前院为大杂院，穿过中庭门洞，后宅分为三院：西院中院环以廊

庑明柱，雕花门窗，有住房 30 余间；东院仅北墙有平房一排，想是主人当年后厨所在。

此类大寨子在宁夏平原比比皆是。是战乱年代，乡民用于抵御土匪，自卫的防御工事；又是聚族而居的堡寨。现在，在两派群众组织的武斗中又被派上了用场。这座空置已久，渺无人烟的堡墙内，刹时又热闹起来了。黄昏时分，“指挥部”将命令送到中宁中学各战斗队。要求紧急抽调精干力量，全副武装至大寨子集中。以守卫中枢机关，防止吴忠、青铜峡的“筹备处”侵袭。

此地的老百姓对当年同治年间的兵燹之祸仍然心有余悸。马化隆造反，杀尽汉人的血腥场面在民间依然记忆犹新，并留下了许多可怖的故事。因此，听说吴忠、青铜峡以少数民族为主体的“筹备处”要来攻打中宁，中宁老百姓，无论是“筹备处”，还是“指挥部”都惊恐万分。谁也不愿意欢迎这样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这无形中减轻了中宁“指挥部”守城的压力：来犯之敌没有内应，“指挥部”不会腹背受敌，可以一心一意来防御正面了。

月色溶溶，星光稀疏。一碧如洗的夜空弥漫着秋日五谷的芳香。白日的暑热消散尽后，是塞上平原清爽可人，幽静而美妙的夜。路边的青纱帐，那茂密的植物的茎叶，与高大的白杨树的树梢，都在习习的凉风中吟唱，像低沉的管风琴声合成一天深沉而博大的混响。那是大地母亲的酣睡声。此刻，在一天的劳顿之后，她在一片宁静中睡熟了。娇柔而又慵懒，带着淡淡的愁绪。

踏着满地的月光，中宁中学的学生全副武装地赶往大寨子集中。“八一兵团”、“冲霄汉”、建工队、手联社的人马都来了。四座天井里人影憧憧，嘈杂而不安的声音在凄清的夜色中回旋，打

破了大寨子往日的沉寂。大家相跟着登上寨墙城堞。每个堞口，都有武装人员在守卫。联络口令也下来了，气氛十分紧张。

这座夯土筑成的大寨子是中宁地区最大的土围子。北距南门50 米之遥，西临银固公路，东南是城关石桥的一片沃野。寨主在城乡之交建此巨宅，一临城镇，便于商贸活动；二处沃野，便于四时欣赏田园风光。除了堡墙高大，能抵御流窜土匪外，实在没有任何军事价值。

## 第 813 回：马思义，吴忠仪表厂身亡　朱声达，派飞机接进北京

夜深了，大寨子安静下来了。蜷伏在朦胧的月影里，像枕戈待旦的武士，处在临战前的偃息状态。

站在城头，眺望东南的原野，月华像弥漫的银纱，轻烟一样柔曼地飘拂在迷蒙在夜雾中的青纱帐上。无边的秋风从西向东，像流水一样漫了过来，隐约夹杂着远处黄河的涛声。假若没有剑与火、血与泪，这月夜该有多美！

这时，有人感慨地道："是呵，到底是'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啊！"

众人感叹唏嘘起来，一人对着中天的明月吟叹道：

清光此夕为谁秋，

关月难禁故国愁。

何处笛声吹不断，

卧看北斗挂城楼。

……

月影西斜，晓星初显，如水的夜色。清露带着些许寒意，从高天降下大野，使破晓前的空气中荡漾着潮湿的泥土和百草的气息。新的命令又下来了，"指挥部"改变了策略，决心去白马公社朱路村一带阻击青铜峡、吴忠"筹备处"武装，不再待在县城里困守待毙。

一队人登上卡车，顶着晨露，迎着泛着清冽湿气的晓风，向鸣沙方向驶去。

天亮了，在曦微的晨光里，树木、村庄的轮廓渐渐显现出来了。披着朝露，湿气蒸腾，像是刚刚经过晨浴，还未来得及揩净身上的水渍。

卡车驶下双阴洞沟，爬上鸣沙镇黄营村的高坡，停在路边一座场院旁。人们跳下车来，纷纷簇拥到草垛旁，依着草垛平躺了下来。一边整理枪械，一边稍做休息，等待着进一步的命令。

几个农民站在场院边，略带惊恐地紧盯着他们手中的枪械，悄悄地交头接耳地议论着什么。

总指挥王文声腰挎驳壳枪，提着一把日本战刀，带着两个人从前沿视察过来。此时，从白马朱路村到鸣沙一线，沿公路已布满了“指挥部”的武装。但到眼下为止，斥候，即侦查员，还未发现什么敌情。王文声走到场院边，看到荷枪实弹的学生，便了走过来。他将战刀倚在草垛边，要过一名学生手中的三八式步枪，熟练地拉开枪栓，上膛，又举枪做瞄准状。

“吴忠‘筹备处’要打过来，你们怕不怕？”他问

“不怕，水来土屯，兵来将挡。”同学们答道。

他将枪支还给那位学生，复拿起马刀，平举在胸前。

那把两寸宽，三尺长的战刀寒锋凛冽，在拂晓的晨光里，闪着嗜血的眼睛。那冷峻的光芒，直摄人魂魄，让人不寒而栗。

王文声魁梧的身躯铁塔一样矗立在场院中，那刀锋挥舞之间，他就像一尊战神。如豆的黑眼睛，因为望见了战场的鲜血，而燃烧起来，跳动着熊熊的火焰。

旋即他收刀回鞘，眼光内敛，将燃烧的火焰收了回去。由凶猛而转为温和。

太阳升起来了，将半个场院映得金红。附近村落升起的缭绕的炊烟，在场院边飘浮开来，慢慢散入屋后的丛林与田野之中。黄营崖头下的河滩，沟汊间夹杂着片片水田，像一面面镜子映着天光。黄河隐在一带村落与绿树之后。又一个塞上美丽的秋晨。她那在徐徐散去的晨雾中逐渐明晰的层次，错落有致，青绿相间的原野变得灵动而富有生气。湿润而清冽的空气，弥漫着稻谷及秋果的芳香，流动在河汊、沟壑、原野、村落间，是那样沁人心脾。

“筹备处”终于没有来，队伍又撤回了县城。

这天黄昏，中宁中学各战斗队再次接到命令，全副武装到县城集结，再次开赴白马公社朱路村，准备迎击来犯的青、吴“筹备处”。

在林建三师水土保持连连长、指导员的指挥下，中学生们乘坐县邮电局的邮车出发了。密不透风的邮车，车厢不大，却紧紧挤坐了 20 多个武装学生。在昏暗的灯光下，谁都不愿意多说话，沉默地扶枪闭目养神。只有单调的发动机的运转声伴随着一阵阵刷刷刷的声音。那是高速运转的车轮将公路上的石子挤压、抛起、散开发出的响声。

闷热的车厢里散发出一股股呛鼻的汽油味。面临战阵，学生们都很平静。也许初生牛犊不怕虎，忠诚与勇敢早已使他们将生死置之度外。似乎开赴战场，如同小孩子过家家一般简单容易。兴许这是没有看到流血，没有看见死亡，把战斗太神圣化、理想化了的结果。

车窗外闪过一片片黑魆的树林，过了几个沟壑，重又奔驰在

较为平坦的石子路上。终于停下来了。他们从沉闷的车厢里跳了出来，舒展着腰身。连长传下命令，要他们就地疏散，检查枪支弹药。学生们分别坐在公路边的石子堆上，拉动枪栓，开始检查弹巢与击发装置。

“砰”地一声，一道火光从公路左侧的石子堆上窜起，在夜空中划了一道美丽的弧线。

像一道无声的命令，大家抓起枪支，迅速地偃卧在各自的石子堆后。

“田骚狗，他妈的连枪栓都握不住，走火走得太不是时候！”是“冲霄汉”王玉华的骂声。

田骚狗不敢吭气。他是高一的学生，真名叫田发国。

“妈拉个巴子，要是在战场上，走火暴露了目标，老子就崩了你！”水保连的连长破口大骂了。他是老兵，至少经历过剿匪和中印边界反击战。富有实战经验。

学生们不敢吭气，静静地偃卧着。良久，斥候回来报告说，方圆 20 里没有什么动静。于是，连长、指导员命令大家就地露营。保持镇定与战备状态。

学生们分散和衣躺在公路边的石子堆上，对着满天的星斗。那幽深的无垠的夜海，由南而北，由西向东，吞噬了远山、大河、村镇、城市，把它们统统淹没在幽暗里。使大地的一切生命体症都沉寂于无声无息中。仿佛一切都静止了。

这儿地处朱路村东头，东北由贾梁折向彰恩，那是青铜峡水库即将淹没的地区。同治年间，金积堡回族造反军曾由此来犯鸣沙。湘军反击回军，提督雷正绾、总兵曹克忠也多次由此进兵收

复峡口，会攻金积。沿正东宁吴公路逶迤向上，经滚泉沿牛首山脊可达金积、吴忠。这是近代新开的一条近路。周围百里却无人烟。朱路村虽然扼这两条要道的交通咽喉，却无险可守，实非征战之地。但有经过实战的军人指挥，大家也管不了许多，且抱枪栉风沐雨而眠吧！

黎明，学生们被连长、指导员推醒。除了躺卧之地外，身边的石子，身上的衣衫都被夜露打湿了。连日的疲劳紧张，竟使一群青年学生在夜露和秋风中睡得像死猪一样沉，全然不管身边正在和将要发生的战事。大家跳了起来，借着满脸的朝露擦了一把惺忪的睡眼，提枪站好队伍。

“指挥部”传来命令，有一股青、吴“筹备处”武装出现在滚泉。有迹象表明，他们将沿七星渠迂回，侧击中宁。要学生们赶往红柳沟东侧七星渠拐弯处，堵击来犯之敌。

队伍出发了，衔枚疾走在青纱帐里。草茎上的露水打湿了他们的鞋袜，高粱、玉米茎叶上滚下的露珠泛着清冽的寒气，顺脖子一直流进腹背，浸得那儿阵阵发凉。在跳跃窜进中，人人屏声敛气，行动就像狸猫一样敏捷。再也管不了其他。

队伍到达预定位置，连长指挥大家爬上几座面向七星渠堤岸的民房，分散埋伏在屋顶的各掩蔽物后。

民房主人一家惊恐异常，静悄悄地龟缩在小耳房里，任由学生们上下，大气也不敢出。

旭日撩开了晨雾的面纱，在那渐渐亮丽的光芒照射下，那烟雾、水汽，轻烟一样消散了。长发披肩的堤柳下，是一望无际硕果累累的青纱帐。火一样的高粱，紫色的糜草，黄色的玉米穗，

匍匐在洼地里的黄豆蔓，构成了乡村田园美丽宁静的图画。那斑驳的原野，随着光线的增强，变幻着五光十色的色彩。由暗到明，由浅到深，由混沌一片到渐出明丽的层次，把这几处孤立的民居，仿佛摆在世外桃源中一样。

连长举起了手枪。指导员回身以手示意，学生们趴在掩蔽处，静静地，全神贯注地盯着前方，喉咙像是被堵住了一样，紧张得连气都透不过来了。从掩蔽处望去，前面的田野小径上，露出了一队武装人员的身影。队伍保持低姿，以战斗态势呈散兵线向前运动着。领头的是一位手握三八大盖的剽悍壮实汉子。

大家大气都不敢出，静静地等待着开火命令。

连长高举着手枪，等待那队武装人员全部进入伏击火力范围。

“咦？”指导员诧异地哼了一声，与连长面面相觑。

连长举枪的手放了下来。

那队武装人员领头的汉子，竟然是前太行山区八路军陈锡联部的连长，县农机站党支部书记许武生，是自己人。大家紧张的心情一下子放松了。屋顶上出现了一阵骚动。

这细微的变化没有逃过许武生的耳朵。他在行进中像老虎一样，警觉地跃过身来，如临大敌，面向埋伏着人的民居。随即传来“咔嚓”，清晰的枪弹上膛声。

指导员赶忙脱下帽子，高举双手，交叉向对方摆动。

双方终于看清了彼此都是自家人。原来，那是“指挥部”夜间派出的另一支由农机站与机械厂工人组成的武装队伍。他们是从贾梁一直巡逻到这里的。

情报终于传来了，哨探到原在吴忠县滚泉的青、吴“筹备处”武装由于势单力孤，终于没有越界来犯，又龟缩回金积堡去了。

大家怀着无比轻松的心情踏上班师的归程。

再说撤出吴忠县城的“大联合筹备处” 派不甘心失败，向灵武发出求援。8 月 6 日，“大联合筹备处”的胡秉坤、宋长胜等人，携带 30 多斤炸药及雷管、导火线、由灵武赶到吴忠，同吴忠“大联合筹备处”的张德贵、张纬早等人汇集。到秦渠实地查看地形后，决定发起反攻。从 8 日至 9 日，“大联合筹备处”连续在上桥医院开会研究，确定了攻打吴忠仪表厂大楼的方案。

从 9 日开始，“大联合筹备处”大量结集武斗队伍，发放了武器弹药。

经数日准备，“大联合筹备处”建立起一支数千人的队伍，开赴吴忠，包围了仪表厂，一场大规模的武斗即将发生。

8 月 12 日，中央认为宁夏军区在三支两军中犯了“严重方向路线性的错误”，遂派兰州军区副司令员康健民率陆军 62 师，代号 8037 部队和炮兵 15 师 8 团，代号 8119 部队接替宁夏军区，负责宁夏三支两军工作。并重新建立了以康健民为组长、宁夏军区副司令员张怀礼、62 师副师长徐洪学为副组长的支左领导小组。

当天，驻甘肃平凉县的陆军 62 师奉命在师长姜玉安、政委李天冲、副师长徐洪学、副政委孟移山、参谋长王晨光、政治部主任赵书堂率领下，由师部 8037 部队带驻宁夏青铜峡市的 185 团，即 8047 部队进驻银川市，驻宁夏固原地区的 186 团，即 8048 部队进驻吴忠、灵武、青铜峡地区，驻宁夏西大滩执行垦荒生产

任务的炮兵 342 团，即 8050 部队进驻平罗、石嘴山地区。

听到兰州军区派部队进驻吴忠“支左”的消息，。“大联合筹备处”于 13 日凌晨，派两汽车武斗人员到候桥阻挡部队进驻吴忠，同时令王希年、张得贵、巴俊华向仪表厂组织全面进攻。

“大联合筹备处”的进攻，遭到“总指挥部” 武斗人员凭借工事和制高点火力的奋力抵抗，双方出现死亡。“大联合筹备处”的头头，下令“敢死队”冲上去，用炸药炸开了仪表厂的围墙。他们凭借民兵的武器装备优势，经过两小时激战，攻下吴忠仪表厂主楼。

在攻打主楼的最后战斗中，突击手怀抱轻机枪，待爆破手炸开主楼的铁栅门，便一路点射，冲上了二楼，将据守在二楼楼梯后的前固原军分区司令员、原宁夏军区副司令员、自治区政协副主席马思义击毙。从其下颚穿破天灵盖迸溅而出的弹头，直将大片脑浆喷射在楼梯背面的墙壁上。

在这次武斗中，双方共死亡 11 人，伤残百余人。

再说由固原进驻吴忠支左的 186 团在进至离吴忠约 20 公里的高米子湾个岔路口时，被“筹备处”农民围住，说他们支持“总指挥部”，不让他们进入吴忠。农民就睡在公路上，使 186 团整整一天都无法前进。团里请示师里，师里没有答复。到晚上，派团副参谋长和“筹备处”谈判，未有结果。师政治部副主任正好因事经过此地，要他再请示师里，亦无回音，团党委召开紧急会议，决定不能动武。

高米子湾离青铜峡大坝下的 185 团团部原驻地约七八公里。此时 185 团主力已随师部进驻银川，原驻地仅有小部分人留守。

拂晓时分，186 团领导决定部队突围到 185 团团部.谁知刚走不到两公里，又被堵住了，农民们在公路上挖了坑。至中午，186 团勉强前进到 185 团团部驻地，农民又围了上来，干部战士情绪很大。而“筹备处”则扬言：如果部队再往前开，就要炸掉大坝。为防不测，政委许昌其率团基本指挥所在大坝上警卫，团长王林留守在大坝下的团部。

对21军62师奉命进驻银川，朱声达不满意的地说：“这是不信任我们，拆我的台，不干了，也不到北京开会去了！”

朱声达彻底倒台了，但宁夏军区并没有平静，当 21 军 62 师部队进驻银川时，支持“筹备处”，死保朱声达的宁夏军区独立师警卫营 500 余指战员全副武装在银川举行了示威游行。那些历经战阵的老兵们不无骄傲地说：“别看 21 军新兵蛋子装备好，动真格的，还真不是我们独立师老兵油子的对手！”

62 师如临大敌，直至全城戒严。宁夏军区领导悉数出动，才将示威的警卫营劝回营房。但他们被整编、被解散的命运是不可避免了。

8 月 14 日，中央派飞机将宁夏军区朱声达等主要领导接到北京。

上午，朱声达临行前又安排了新的领导小组，他在机关处以上干部会议上说，中央文革今天要他和军区的其他领导到北京说清楚，他们马上就走。要大家重整旗鼓，好好去工作。

下午，朱声达一干人离开了银川，飞往北京。

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得到朱声达他们到京的消息，前往机场组织批斗朱声达等人。因飞机提前半小时到，他们在机

场扑了空，随即调赶往京西宾馆，将那里包围，宣传车上的高音喇叭，游行队伍的口号声，响成一片，就是要让朱声达出来。

宁夏军区的几个人刚下飞机，而且是在中央已明确指出是犯了错误的情况下来到北京，面对北京群众的要求，一时不知该如何处理为好，便派宁夏军区党委秘书宗全义去找到宾馆保卫科询问，他们应该怎么办？

京西宾馆保卫科说："前几天广西抓了韦国清，也是冲进来的，后来部队又抢了回来，今天看样是造反派，如果不接见，恐怕又要冲进来，那就不好办了。"

宗全义把这个情况向朱声达、江波做了汇报，他们也都觉得："不管哪个组织的人，接见一下也行，动员他们回去，检查自己的错误。"

这时宗全义提出，他先出去安排一下，让外面的群众派些代表进来谈。朱声达、江波同意。

宗全义来到大门口一看，人山人海，他一个也不认识。这时，宁夏特警总队一个叫韩明选的看见了宗全义，于是招呼一群人一拥而上，将宗全义摁住。有人在背后捅他，有人在大声的骂他，意思就是一个：让他打电话找朱声达。

宗全义无奈，只好按照他们的要求打电话，接电话的是江波。宗全义对他说：

"我上不去了，群众非要见朱司令不可。"

江波说："我们研究一下。"

很快，朱声达出来了，群众一拥而上，把他抓走了，军帽也掉在地上。

宁夏军区政治部副主任何其仁到北京后，也被宁夏群众抓走，打得浑身是伤。

朱声达在被围攻批斗后，于当夜 24 时送回，据说是周恩来、康生发了话。

## 第 814 回：八一二，长沙反周大字报　八一三，周恩来见湘“工联”

中央解决湖南问题的《八十决定》将湖南“工联”定为“革命造反派”，将“湘江风雷”定为“革命群众组织”，这使“湘”派大失所望。也许是为了找个台阶下台吧，正在长沙的“湘江风雷”头头张家政，故作高深地将毛泽东在《决定》上批的“已阅，同意”解读为“看来批得很勉强，可能是在压力下批的”。

“压力”从何而来？当然是周恩来。中央关于湖南的《八十决定》后，对周恩来的怀疑在“湘”派中进一步蔓延，而在“红中会”等学生组织中，怀疑、敌视周恩来的议论几乎已经公开化了。8 月 12 日，湖南“红中会”下属组织长沙市一中的“齐卫东”战斗队和“夺军权”战斗队的队长杨曦光，分别在大街上张贴了“打倒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周恩来”与“誓死揪出周恩来的严重声明”，配合北京“5.16 兵团”的所谓“8.9 战役”。这也是《八十决定》在“湘”派极左翼中激起的强烈反弹。自此，“二月逆流黑主帅”在湖南就成了周恩来的代名词。

长沙“齐卫东”战斗队的唐亦安做了北京“516红卫兵团”的“第八方面军”负责人，而“红中会”负责人与一中的“夺军权”战斗队，也与北京“516红卫兵团”的张建旗进行了联系与往来。

“齐卫东”与“夺军权”的反周行动，受到了“工联”派的坚决反对。“湘江风雷”总部也立刻发表了《关于不准炮轰周总

理的严重声明》，只有大学和中学红卫兵中的一些人数很少的小组织公开发声明支持“齐卫东”与“夺军权”的反周行为。

但是长沙“红中会”只发了一个措辞含糊、立场暧昧的声明。当“工联”方面出来反击“反周”活动时，“红中会”的其他组织便立即表示了对“齐卫东”与“夺军权”的声援。

周恩来继8月11日接见湖南“湘江风雷”方面代表后，又于8月13日晚22时30分至14日凌晨2时30分，在人民大会堂会客室接见湖南“工联”方面代表，继续做“工”“湘”两派的工作，希望能协调他们之间的矛盾。

周恩来说：“今天想和你们谈点政治上的问题，不要老是纠缠在具体问题上，老是钻牛角。名单上的同志都来了吗？”

联络员答：“来了。”

胡勇说：“周国祥同志来了。”

周国祥：“报告周恩来，是我。”

周恩来：“你是‘工联’的常委，是干部？还是工人?”

周国祥：“干部，工人出身。”

周恩来：“多少年工龄？”

周国祥：“15岁学徒，18年工龄了。后来提拔当干部的。”

周恩来：“马坡岭的事情你了解?”

周国祥：“我知道。”接着他叙述了马坡岭武斗的情况。

周恩来听后说：“好了。其他同志不是说也来了吗？”

周国祥：“来了。在门外。”

周恩来：“请他们进来，先在房子里休息，我等一下去看他们。”

周国祥："报告周恩来，当前长沙社会秩序很乱，原来说武装我们'工联'，直到现在47军也没有发一枪一弹给我们，我要求总理给批一下。"

周恩来："你这个人，一见面就是枪，枪。文化大革命搞了一年了，怎么水平还没有提高多少呢?

我说过，我们是要武装工人同志的，但是你们双方有分歧，发了枪，互相打起来，就不好了。我说过几次了，既然双方大方向一致，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上，共同奋斗，就要团结起来。在一些具体问题上，观点完全一致，那不可能。我要求你们求大同，存小异。我在你们之间总是想把你们的共同点找出来，而不是把矛盾挑出来。昨天会上，你们表现不良好，为'湘江风雷'说了几句，你们鼓掌就不热烈。

对待刘秀英那样的人，你们在昨天的会上，表现得不够好。你们不欢迎她，那一边(指"高司")也反感她，这样就会长期对立。如果她发言之后，你们欢迎她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你们'工联'、'湘江风雷'不但不歧视她，不打她，反而保护她，帮助教育她，就好了。你们在北京开了这样长时间的会，水平提得不高啊！

昨天崔琳一出来就打，这是谁搞的？"

几位代表汇报了当时情况，周恩来说："他们这样搞不对。江西省的革命造反派风格比你们高。造反派要高姿态。昨天江西1000多人开大会，人家根本没有动手。他们是按毛泽东思想办事的。不要只想着捉人、打人。捉人，打人有什么本事？！要搞批判才能触及灵魂。尚春仁同志是哪一位?"

尚春仁答："报告总理，是我。"

周恩来向他了解了省委机关里面群众组织的情况，又向省农垦局财务处长王家根询问了省直属机关群众组织"省直红勤站"的情况。接着又问："李劲祥同志来了吗？"

李劲祥："报告总理，来了。"

周恩来："噢，你是《湖南日报》的?北方人吗?"

李劲祥："是《湖南日报》'红色新闻兵'的，河北人。"

周恩来："你在报社当编辑吗?哪个大学毕业的?"

李劲祥："工作职务是编辑。没有上过大学。"

《湖南日报》"红色新闻兵"的头头黄振东说："他参加工作时只有12、3岁，当时只有小学文化。"

周恩来："噢！小学文化当编辑，不错嘛！我说了嘛，当记者、编辑不一定要大学毕业嘛！要有实际工作经验。你哪一年调到报社工作的?"

李劲祥："63年。"

黄振东："记错了，是64年春。"

周恩来："你当编辑，要多动脑子，写点好文章出来。我就是要讲这个事。文化大革命搞了一年，斗争水平不是螺旋式上升，而是走马灯，水平没有提高还行吗？要提高斗争水平，现在斗党内一小撮走资派搞什么喷气式，挂牌子，搞逼供信，这不解决问题，主席很反对搞这些东西。斗党内走资派要靠材料，要搞批判文章，要挖内心世界。像戚本禹同志那样的文章，《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还有地方报纸写了不少好文章。在中南海斗刘少奇、邓小平那样的照片，不要拿出去，主要靠材料、文章才能把

他批倒批臭。”

黄振东：“报告总理，《湖南日报》11号又复刊了。”

周恩来：“又复刊了？好！要把报纸办好。”

周恩来说：“要吸收‘工联’、‘湘江风雷’这两派的同志参加办报。在报纸上要宣传人民解放军，问题方面尽量少说。吴自立、蔡爱卿这些野心家就是想往解放军脸上抹黑，他想夺军权，说什么武装夺取政权，战争解决问题。他想夺军权，那是办不到的。军权是毛主席、林副主席的。调一个营的解放军都要主席和我们的副统帅批准。蔡爱卿是想夺我们无产阶级的政权，这个人很坏的。59年反右倾时，他公开说他是彭派，说别人是毛派，他是个大坏蛋、大阴谋家、野心家。吴自立写小说，搞电影公开为彭德怀翻案。这些人掌握了兵权、政权还行吗？不行，一天也不行，一个小时也不行。要对这些人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政法方面来人吗？”

符紫如答：“报告总理，来了。”

周恩来：“噢！你是符紫如同志。公安厅的嘛。”

符紫如：“是公安厅的。”

周恩来询问了公安部门的情况后说：“你可要注意啊！不要把劳改犯也吸收进来参加造反组织啊！”

大家笑了，符紫如连连说：“那不会，那不会。”

周恩来：“你要注意，‘公检法’的组织垮台后，他们转入暗地活动了。政法部门杀出来的，要对他们保持警惕。他们有传统思想，罗瑞卿传下的那一套在政法部门根子很深。原来彭真管政法，是保卫局的观点，他把苏联特务，蒋介石特务那套办法学

来，又加上福尔摩斯那一套。十几年来就是搞这一套。你们公安系统必须过好斗批改这一关。斗当权派容易，要彻底砸烂公、检、法这个旧摊子，建立一套新东西，很不容易，你们要在斗、批、改方面下功夫，搞出成绩来，不然又是老一套。”

符紫如：“好！我们一定遵照总理指示办。

这时，有人反映谢若冰给长沙打电话，周恩来说：“电话稿我看了，和我讲话精神没有出入。至于下边怎么说，那是下边的事，她管不了。”

刘友桂：“首都红代会的同学下去分两派观点，到处演说，使下面两派闹对立。”

周恩来：“要叫他们回来。”

王家根：“这里有蔡爱卿的一个讲话，请总理看一看。”

周恩来看完传单后说：“这简直是反动的。本来昨天我想宣布他的问题，戚本禹同志把蔡爱卿的档案都拿来了，因为大会开的不理想，没有宣布了。

蔡爱卿很坏，原来在山西当副司令员，公开支持彭德怀反毛主席，退休回湖南后，仍然搞活动。要叫他暴露一下子，等群众起来反他的时候就好办了。我们再法办他。”

周国祥介绍湖南有的群众组织把斗争矛头指向中央，周恩来说：“那他会走向自己的反面。”

周恩来向湖南大学的王晓了解湖南大学的情况，王晓说：“其他人大都回家了。学生2000多人也回家了，怕回来挨打。”

周恩来：“要做好争取教育工作。”

胡勇汇报长沙当时的局势，周恩来说：“你们要同部队商量，

配合起来。”

胡勇：“47军没有发枪给我们。”

周恩来：“产业工人是要武装的，机关里的也武装一下，双方的造反派都要武装，把‘文攻武卫’拿过来放在省革筹小组领导之下，47军参加。有任务时，由指挥部派任务。‘长沙工人’的同志也武装一下，分给他任务，保卫工厂。学校里也可以。我们搞有组织的。这样社会上没有组织的，游离分子掌握的枪就可以收回来。你们先组织起来，编上番号，47军派同志去帮助训练。但是一定要搞好大联合。不然一发枪支，自己打内战就麻烦了。我先同你们说好，要保证不打内战，发了枪，要47军派人指挥。”

李劲祥：“听电话汇报，目前长沙很乱。”

周恩来：“你们报社，还有你们机关的，省委‘永向东’尚春仁同志，还有王家根同志，王晓同志，还有公安系统的符紫如同志，你们要组织一批力量搞调查。长沙这样乱，背后有人出主意，除了蔡爱卿，吴自立还有人，你们要注意。”

“现在‘极左派’大反黎、华、章。将来筹备小组成员一公布，还要大反特反。有缺点、错误可以批评，但是人家刚刚上任，就要打倒，这是什么问题？我担心你们从北京回去，一下车就会被抓走。这是什么问题？你们想一想？

你们‘工联’，要紧紧掌握斗争大方向，不要做小动作。在处理兄弟组织关系问题上要严以待己，宽以待人。有几次我说了话，你们把我的话顶回来。你们同‘湘江风雷’同志的争论是观点之争，不是路线之争嘛，你们不要一听说人家社会组织就反感。这会犯错误的。人家有缺点、错误，可以改嘛。周国祥同志，听

说‘工联’派你搞指挥部工作？”

周国祥答：“是的。”

周恩来：“要搞指挥部，姿态就要高，不要搞宗派。你是工人嘛！”

周国祥：“工人出身的干部。”

周恩来：“今后，要保证，不管那一派，都不能冲击解放军。这样部队才能保证开展工作。要两派都来保卫，不要一派保，一派冲，结果打内战。”

胡勇问：“军区怎么办？”

周恩来：“还叫龙书金同志回去，在军区内搞‘四大’，好好检讨。军区要在省革筹小组领导之下。革筹小组由黎原同志负责。”

黄永胜：“省军区就在省革筹小组领导之下吧。”

周恩来：关于走什么道路。有人说北京道路，有人说上海道路，青海道路，我看就是毛泽东思想的道路，各地方可以自己根据实际情况创造，要有志气。我讲了多少次，总是希望你们两派搞好团结。你们两边都开个生活会。中央关于‘湘江风雷’问题表了态，这是个大事，他们在昨天连态都不表一个，只晓得同刘秀英吵。革命派嘛，要气量大。”

秘书过来对周恩来说：“伯达同志请你过去讲话。”

周恩来:“他是常委嘛,他说了就行了。还非要我讲几句吗？”

秘书：“伯达同志请你去讲一下。”

周恩来：“我在这里还要讲一下，请他们等一会。”

陈伯达这时正在接见福建代表。

周恩来接着说："詹先礼在昨天会场上表现很不好。关于《二·四批示》，主席的意思是中央多担负责任，不要让地方为难。他一见中央决定，就把自己的错误也向中央身上推，这个态度不好。对受蒙蔽的群众，要注意争取，不要打击报复。跑了的，也不要扣工资，主席最不同意这个办法。要用毛主席的思想，党的政策，教育他们，帮助他们。"

## 第 815 回：天津市，政校、六〇九武斗　上海市，郭仁杰受到批判

天津的两派斗争也在升级。

7 月 16 日，反对天津驻军和“五代会”的“天津市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筹备委员会”，简称“大联筹”成立。天津工学院“825”成了“大联筹”的总部。7 月 24 日，以天工“825”为首的“大联筹”查封了《天津日报》，致使《天津日报》被迫停刊。

7 月 31 日上午，“五代会”在民园召开庆祝八一建军节大会。谁知会上有一个老太婆竟高呼起“亲爱的胡市长万岁”，“天津驻军首长万岁”等口号，十六中“621”、“831”等组织中途退场。南开大学“八一八”刷出“刘政必须检查在支左中的错误!”“朱彪两面三刀……”等标语。刘政时任 66 军副军长、天津支左联络站主任。朱彪时任天津警备区副司令员。

8 月 9 日，位于河北区的天津政治师范学校发生武斗，从天津政治师范学校跑到天津中学红代会向“中学红代会”常委组长任学明报告，任学明带他去向“工代会”负责人林启予求援。

报告的人说得严重：“学校大楼被围困了，他们放火烧楼，有的被打了，有的跳楼了，有的被强奸了……”

事发突然，容不得多想，正好“工代会”的常委都在，大家一商量，都同意前去支援。林启予对任学明说：“你先回去吧，我马上就带人过去。”

随后，林启予就去了 3527 厂，“工代会”的队伍都在那。

河北区是“大联筹”的天下，为了保证行动的顺利，林启予先看了地图，选择位于河北区小王庄的609厂做为立脚点。

609 厂也是个军工厂，是参加“工代会”的。当林启予带着“五代会”的人于下午赶到政校时，“大联筹”那边的围攻已经结束了，楼已烧了，人员也都撤走了。

傍晚，609 厂的“春雷”组织把通往天津工学院的主要道路津京公路封了，还抓了一些人。

因为天津大学的一些学生也参加了“大联筹”围攻天津政治师范学校的活动，并在围攻后撤回到天津工学院。于是，天大的一些学生去给他们送饭，结果被封路的 609 厂工人扣下，带到609厂。厂里有人一见到抓回来的大学生就喊：“打！”

正在这里的林启予赶紧予以制止，并对抓回来的天津大学带队学生说：“放你走了，赶紧带人回家吧。”

正好这天晚上，天工“825”的一个宣传队在外演出，回校时，不知京津公路被封，途径这里时，当然也是连人带车悉数扣下。

第二天早晨8点多钟，66军政委杨银生带队来到609厂，找到林启予对他说：

“我、江枫、胡昭衡去天工‘825’谈了，他们说你们的人把他们的人扣了。现在江枫和胡昭衡被扣在天工‘825’做人质。为了避免武斗，你们得放人。”

林启予回答说：“没问题，马上放人。”

杨银生问：“何振武在吗？”

林启予说：“在。”

杨银生又问：“演出队在不在？”

林启予说："在。"

杨银生接着问："打没打？"

林启予说："可能打了两下子，但具体的我不知道，我撂下话了，不许打人。"

609厂是做电缆的，厂里的工人每人一个用电缆做的大鞭子。说没打人肯定是假的。

林启予让人通知609厂的造反派和军代表，将天工"825"的人都放了。

中午，"大联筹"的大队人马开始围攻609厂。他们开来一辆推土机在前边开道，被609厂的工人截下。天津机床厂的一个工人又开着这辆推土机反击过去，谁知推土机半路熄火了，"大联筹"的人蜂拥而上，把这名工人给打死了。这是天津武斗死的第一个人。还有一个是"大联筹"的人，攻上来后又撤回去，结果被误认为是"五代会"的人，也被"大联筹"的人给打死了，这是死的第二个人。"大联筹"的人攻上来，609 厂的一个工人用自制的土炮还击，他没经验，不会用，结果被土炮的后坐力给坐死了，这是在现场死的第三个人。

609厂告急，"工代会"马上组织人到609厂支援。走到半路，被人用小口径步枪射击，又打死了一人。

这时，已是8月10日下午，陈伯达和郑维山的指示通过天津驻军支左联络站传达到"工代会"："攻打609厂是错误的，动员天津的工人阶级保卫609厂！"

"五代会"立刻组织了20辆卡车、近千人的队伍，由林启予亲自带队奔赴609厂。他坐在第一辆卡车的驾驶室里，对司机说：

“你就开车往前走，不管遇到什么情况，你只管给我冲过去。”还好，一路上没遇到任何阻挡。

609 厂已经聚集了上万人的队伍，两边的人相隔有几十米，互相投掷酒瓶、石块，中间停着一辆推土机，但推土机里无人驾驶。只见传达室一角被推土机撞坏，大门也被撞开，最后推土机是撞到树上熄火的。

见到大批援军到来，“大联筹”的人也不敢再贸然围攻了。“五代会”在喇叭里反复播放陈伯达和郑维山的指示，收到了效果，“大联筹”的人渐渐散去。

后来查看的电话记录是这样写的：“你们（指攻打 609 厂的大联筹）这样做是错误的，错误不要犯得太多了，第一次、第二次是可以原谅的，不要把自己引到没有出路的道路上。我们国家是大好的形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了伟大胜利，要搞好抓革命促生产，不要做破坏国家财产的事，不要上少数坏人的当。群众力量是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是深入人心的，希望你们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

“大联筹”没有攻进 609 厂，但把旁边的一个自行车配件厂抢砸了一通。

10日，天津市革委会筹备小组、市支左联络站向全市发出《关于立即制止武斗的紧急呼吁》。11日，武斗双方脱离接触。

第二天早晨，天津警备区司令员王一来找林启予问了问情况，又问他下一步打算怎么办？林启予说：“我也不知道，你有什么意见？”

王一说：“对 609 厂实行军管，你们撤出。”

林启予说："没问题，撤出。"

下午，"五代会"的队伍开始往回撤。撤的过程当中又出事了。

工矿"造总"组织的一个人叫张鸿俭，他以为"大联筹"已经攻下了609厂，就跑过来看热闹，结果被撤离的队伍给逮了。还有一个粮食系统"工代会"的人，他开着个车在3527厂门口转来转去，也被3527厂的工人带回厂里。俩人分别关押，一个被关在3527厂军代表的屋里，一个被关在职工的更衣室里。一会儿有人找到林启予报告说："关在军代表室的张鸿俭被打了。"

林启予赶紧过去看，挺壮实的一个小伙子被打得不轻，肩膀上还挨了一刀。赶紧找来大夫给包扎处理，说不要紧。原来不知道怎么传的，说张鸿俭参加了政校的围攻，强奸政校的女学生里就有他，于是遭到暴打。林启予出来对看管人员说："可不能再打了，再打可就要出事了。"

半夜24点了，又来人告诉林启予说："人死了。"

"这可怎么办呢？"林启予正在着急，又来人说："后边又死了一个人！"

"怎么又一个！哪来的？"来人将情况说了一遍。

赶紧去看吧，当他们急急忙忙来到军代表的房间，屋子里一个人也没有。

赶紧去找军代表呀，人是在他屋里死的……

军代表姓张，是个连长，他是去请示支左联络站怎么办？请示后，他把姜卫东叫来，让他先找个地方把人扔了，不要放在厂里给"大联筹"留下口实。于是姜卫东把人拉到李七庄、体育学院那边的一片野地里扔了。随后，姜卫东赶紧给公安局打电话，

把死人的经过向公安局报了案。

第二天，这两具尸体被“大联筹”抬到市公安局门前，静坐、示威。

8 月 13 日早上，京津公路仍被封锁，不准随便经过，满地大小石头，一车车手持长矛、大刀，头戴藤帽、钢盔，杀气腾腾的人，吹着哨子，飞驰而过。

当晚 24 时左右，解学恭通过军队的专线亲自给林启予打电话，说：“中央定了，举行第二次谈判，你代表‘工代会’，一共给你们 7 个名额。”他让林启予赶紧把名单定下来。

反对“五代会”的中学生认为：天津市主要问题就在天津驻军的支左问题上，很多问题“红代会”都已做出决议，可解放军一不同意全部作废。实质上只有解放军说了算。他们认为：“支左实际上是支持革命造反派的一切革命行动，不是我支持你，你就得听我的，跟我转。”

此时负责天津文革运动的陈伯达似乎还无暇顾及天津，继 8 月 12 日清晨接见福建代表后，他又于 8 月 13 日晚和 14 日晚，两次接见福建代表，谈制止调动农民进城问题，他说：

“谁动员农民进城就是破坏协议，就是犯罪。人民解放军的枪不能夺。凡事要三思，任何一派都不能轻举妄动，千万不能做这两件事：一不能动员农民进城，二不能夺解放军的枪。

遵守了协议是考验，不动员农民进城是考验，不夺解放军的枪是个考验。解放军好，不能夺枪，因为解放军不开枪，如开枪谁敢夺。这种夺枪是错误的，韩先楚同志承认了错误，写了检讨，让你们两派讨论，欢迎大家提意见。不要提揪福建陈再道，这个

口号是错误的。

绝对不许‘829’对‘革造会’报复，军区不能给‘829’发枪，谁发枪谁要负完全责任。没经过协商，不能发枪给保守派组织。不能发枪给保守派残杀造反派，诏安就是一例。

现在不要说空话，马上打电话回去：1、不能动员农民进城；2、不能夺枪。这两条马上执行。三方面都给家里打电话，军区打电话，‘革造’打电话，‘829’打电话，如不执行，我不见你们。”

就在8月13日这天，“福州工人革命造反联合总部”强令闽江航运公司实行全线停航9天，部分船舶停航40天，造成严重交通阻塞，经济损失惨重，被称为“八一三”停航事件。

8 月 13 日、14 日，上海市革委会召集全市高等院校“红革会”负责人座谈，听取各校“红革会”负责人对上海形势的看法及汇报，市革委会负责人陈琳瑚、王承龙、徐景贤、王少庸先后讲话，都谈到原上海“机联站”二把手、曾经劝说徐景贤造反、后来到复旦大学主持那里“反逆流”工作的郭仁杰。王承龙特别在发言中说：

“我想谈一谈对郭仁杰的批判问题。郭仁杰的问题揭开了，很好。我们完全支持红卫兵小将对他进行批判，彻底批判。他的问题，不是一个人的问题，而是同反动思潮联系起来的。他的的确确对高校大联合起了很坏的作用。”

王少庸在最后总结时，对当时提出的“文攻武卫”说：

“‘文攻武卫’是否可以考虑不搞武卫，有个设想，把武器集中起来，开个展览会。大家把练‘基本功’的队伍、打架队解

散。把现有的工事全部拆除。不允许调动外单位的人参加一个学校的武斗，工人‘造反队’和‘赤革会’不要介入学生的武斗。当然行动正确的应支持。”

他说：“郭仁杰问题。同意大家意见，他没有完成党交给他的任务，影响了学校运动。解决这个问题主要应在思想上，批判他应有助于红卫兵的大联合。批判时一方压制一方是错误的。”

曾经带领市委写作组起来造反，被张春桥委以重任的郭仁杰，怎么此时成了批判的对象呢？事情要从上海的“反逆流”说起。

上海 1 月底的炮打张春桥事件失败后，2 月在高校开始了针对这次炮打事件的“反逆流”工作。3 月 4 日，郭仁杰受命到复旦大学主持那里“反逆流”。

回到复旦的郭仁杰，可以说是一言九鼎，威风凛凛，许多人围着他转，就是一些不相干的家属在路上碰到他，也会说几句奉承的话。哲学系的“八一铁军”贴出《郭仁杰同志是坚定的革命左派》的大字报，称赞他是“努力学习毛泽东思想、抵制周扬的教育黑线”的模范，是与杨西光、陈传纲、刘振丰、胡曲园进行斗争的英雄。此后，这类捧场大字报接连不断，捧得郭仁杰有点晕晕乎乎。

但在很快，复旦大学的“过河卒”率先贴出大字报：《在转折点上》和《再论在转折点上》，他们根据《红旗》杂志发表的《关键在于大联合》、《必须正确对待干部》和《论革命的三结合》等社论精神，认为目前的大方向是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狠抓干部问题，为革命三结合夺权作好准备，而“反逆流”斗争应当

服从这个大方向；同时还批判了“复旦情况特殊论”，指出那种借“反逆流”来打击革命小将的做法是完全错误的。

接着，“金猴”、“迎春花”等战斗组贴出了呼应的大字报。“金猴”在《我们的看法》中，提出了“对我校前一阶段运动的估计”，全面否定郭仁杰到复旦后的做法，并指名要郭仁杰就“过河卒”的大字报表态；“迎春花”则贴出《要正确对待革命小将》和《我们老造反要讲话》等大字报。一时间，抵制“反逆流”斗争的言论和大字报充满复旦园。

但郭仁杰根本不把这些放在眼里，他在登辉堂向全校师生员工宣称：“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要过万重山。”并且私下里布置，要揪“过河卒”的后台。于是，有人出来呼应郭仁杰，化学系出了个“轻舟”战斗组，写出《“轻舟”要过万重山》的大字报，但被讥为“猿声”的人们却被激怒了，由“孙悟空”胡守钧挑头，包括“过河卒”、“金猴”、“迎春花”在内，组织起一个“八二五串连会”，专门从事反对“反逆流”工作。吴中杰、安文江、周谷声等人都是“八二五串联会”成员。“八二五”者，纪念 1966 年 8 月 25 日戏剧学院大串连也。

5 月 3 日，郭仁杰在复旦大学大礼堂做 4 月份工作报告，遭到“戳一枪”战斗队的质疑，引发了胡守钧、“戳一枪”与郭仁杰的辩论。胡守钧辩论得一时性起，把外套也脱了下来，冲上去抢话筒。

复旦如此闹了几个月后，郭仁杰渐渐转为劣势，被当作新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批判了。这让复旦的那些老造反们非常高兴，以为是自己的斗争取得了成效。其实不然，这一切是因为郭

仁杰将张春桥在一次内部会上传达的毛泽东的讲话对“红革会”的一些头头说了。

张春桥传达的毛泽东的讲话大意是：

“红革会”炮打张春桥、姚文元，还不是反革命吗？“红革会”这笔账是要算的。

张春桥特别叮嘱，不要外传。郭仁杰为了说明自己主持的“反逆流”斗争是毛主席支持的，于是就跟这些曾经的造反派战友们说了这些内容。

其次，在市“红革会”解体后，郭仁杰总想把“红革会”的队伍重新拉起来。他经常到上海第一医学院、上海师范学院、上海铁道学院等“红革会”力量较强的单位，跟他们商议是不是再搞一个“红革会”市级联络站。后来，真的搞了一个全市性的“红革会大批判联络站”。“反逆流”工作无疾而终。

除此之外，在“上柴联司”的问题上，郭仁杰也是表态支持“联司”的。他曾对“支联站”的人说：“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

郭仁杰的这些情况，不断地反映到上海市革委会领导中来。

首先是游雪涛小组反映郭仁杰与“红革会”串连；

其次是本来就和郭仁杰不和的上海革委会常委、负责市革委会办公室工作的王承龙，他把郭仁杰和“红革会”的情况在市革委会办公室联络组主编的、由张春桥的爱人文静定稿的《简讯》上登了出来。

徐景贤看到《简讯》后，非常忧虑，赶紧找“机联站”的程绮华、朱永嘉商量，说“郭仁杰这样下去，一定要出事，而且会

给我们大家惹事的。”

程绮华也感到事态严重，说：“老郭毕竟和我们一起杀出来的，我们不能看着他制造麻烦，造成被动。”

于是他们把郭仁杰请到当时的荣昌路，后来的德昌路 60 号，专题写作组所在地，程绮华、吴瑞武、朱永嘉、王知常、陈冀德等原写作组的人都等在这里。

徐景贤问郭仁杰有没有把毛主席的讲话透露到外面去？为什么“红革会”都在议论？徐景贤说：

“我到几个单位去开会，他们逼着问，毛主席有没有这个讲话，说炮打张春桥、姚文元是反革命？毛主席有没有说‘红革会’这笔帐是要算的？他们还到北京去核对这件事，春桥同志为此很恼火，我被搞得很被动，既不好说毛主席有这个指示，也不好说毛主席没有这个指示，我只好对他们说‘无可奉告’。”“毛主席的话是在内部说的，春桥同志个别向我们交的底，你怎么可以捅到外面去？你这样做，‘红革会’的广大战士会对毛主席产生一种什么样的想法呢？”

郭仁杰不得不承认自己是说了，是要提醒“红革会”：“你们要注意，毛主席都讲了这样的话，不然的话，你们要倒霉的。”

徐景贤批评说：“你也不能用传达毛主席指示的这种形式去跟他们讲嘛。”

郭仁杰承认自己不对。

另外，徐景贤又问郭仁杰有没有到各个学校“红革会”那里去说了许多同情老造反的话？并问他：“有些人要变相成立‘红革会’总部，设联络站，你也表态同意了？”

郭仁杰显出一脸苦相，很尴尬，结结巴巴地说："主要是同情他们，感到他们是我造反的老战友，现在却落得这样的处境。"

徐景贤说："他们回去后，不也一样在学校掌权嘛。"

郭仁杰争辩说："他们本来是全市有影响的大组织。"

徐景贤说："现在打算用全市统一的红卫兵组织来代替各派红卫兵，而你这样做法，完全是不对的。今后决不能再和'红革会'头头暗中串连，公开地搞全市红卫兵的大联合了。"

徐景贤还针对郭仁杰对"支联站"说的那句"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当面问郭仁杰：

"你说的'虎'是指什么人？"

没想到，郭仁杰竟直截了当地说就是指张春桥。

闻听此言，写作班的人都倒抽了一口冷气，觉得郭仁杰已经和大家分道扬镳了，但还是严肃而又耐心地劝他悬崖勒马。

郭仁杰答应了，但回去后依然有很多人不断去找他，他也依然和那些人接触。

于是，王承龙又把郭仁杰的动向编了一期内部简报，这次是将郭仁杰误传毛主席的指示，他和"红革会"联络，准备拉出市一级的组织等等都写在一起，报给张春桥。张春桥大怒，说："这简直不可容忍。机关内部竟有这么一个人！"

接着，王承龙在外面造舆论，"红革会"的对立派贴出了大标语，说："郭小丑支持'红革会'东山再起，绝没有好下场！""彻底揭穿郭小丑的真实面目！"等等。

郭仁杰与市革委会教卫组的关系也搞得很僵，教卫组主要负责人是老干部陈琳瑚。陈琳瑚批评郭仁杰，郭仁杰认为自己是老

造反，陈琳瑚是自己把他解放出来的，所以不服，顶撞陈琳瑚。在市革命委员会开会的时候，他又与王承龙冲突起来。这样，教卫组和办公室两个机构都要求批判郭仁杰，来找徐景贤，说："郭仁杰走到这地步，春桥同志已发火了，必须批。"

徐景贤同意了，在市委党校的底层小礼堂召开批判会，有一两百人参加，都是机关内部各部委的造反队代表，市革命委员会各组办也派人参加。

同时，各大学也纷纷召开"郭小丑"的批判会。复旦大学的大字报，说郭仁杰是资产阶级大政客，安文江是资产阶级小政客。

8 月 11 日晚，同济大学"东方红"和"红三司"、"红复旦"等组织在复旦大学联合批斗了郭仁杰。当李红英揭发郭仁杰企图调戏她时，群情激奋，纷纷上台拳打脚踢，郭仁杰打死也不低头。会后，又把郭仁杰推上汽车带回同济大学。

8 月 13 日，上海市革委会召集全市高等院校"红革会"负责人座谈郭仁杰的问题。

## 第 816 回：八一四，陈伯达见闽代表　看开封，康生再见豫驻军

8 月 14 日晨，正在小汤山医院住院治疗的北京地院“东方红”一把手王大宾在医院内散步锻炼时，发现医院内大字报席棚上竟然张贴有转抄的反对周恩来的大字报。他立即找到医院的负责人追查此事，并要他们马上覆盖这张转抄的反周恩来的大字报。

回到病房，王大宾立即给周恩来和邓颖超写了一封信，汇报社会上出现反周大字报的情况，并表达“我们地院东方红全体红卫兵、地院全体革命师生、干部，誓死保卫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保卫我们敬爱的周总理”的决心。

写好信，他给地院革委会办公室打电话，请他们派人派车来医院，说“有要事处理。”

一会儿，地院革委会副主任聂树人来到医院。王大宾向他讲了情况，要他负责组织追查反周大字报的来龙去脉，对一切反周的行为活动坚决予以反击。同时要他将自己写给周恩来和邓颖超的信，“马上直送国务院周总理。”

聂树人立即回城照办，将信和有关材料送到了国务院。

8 月 18 日下午，王大宾收到了邓颖超的亲笔回信，信封是用全国妇联用过的旧信封翻面粘贴做成的。这种处处厉行节约的艰苦朴素作风让王大宾很受感动。信的全文是：

王大宾同志：

你八月十四日给我们的信已收到了。

你在病中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和对我们都很关心，

你所表现的无产阶级革命感情，真使我们感动，我们也希望你利用这次疗养机会，好好治疗，早日恢复健康，尽早重返战斗岗位。

特此专复　致以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敬礼！

邓颖超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八日

王大宾向地院革委会成员传达了这封信。

8月14日晚，陈伯达又接见福建代表，还是谈制止调动农民进城。他说：

“现在我有一个请求，请求你们回去做一个事情，就是不要动员农民进城，农民已进城的要他们回去。不管是谁，现在有一个重要事情。就要动员农民回老家去。回乡下去，对他们说，城里是工人、学生做的事情，他们来干嘛，农民应做自己的事情。你们应认识到，农民受蒙蔽了，上当了，你们应当学会给农民谈话，劝他们回去，说你们进城是错误的，上当了。农民进城大方向是错误的。”

代表们热烈鼓掌。

陈伯达接着说：“我们是经过农村包围城市这条路的，那是1927 年后，那时农村包围城市是非常正确的，我们经过了这条路，那时的城市是资产阶级统治的，现在的城市是无产阶级的，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城市，在这个条件下，再说农村包围城市是不对的，要给他们讲道理，劝他们回去，你们要做工作。”

8月17日，中共中央同意福建省赴京汇报团双方达成的四个协议。

开封自“731”大武斗以后，开封市的“左司”等群众组织陆续撤出了市区，退到开封东郊开封化肥厂、开封空分厂、开封仪表厂、开封高压阀门厂等地，只有开封师院的“红卫兵战斗师”在开封师院的10号楼成了开封“左派”在市区唯一的“据点”。8月初，郑州“二七公社”开来100多辆大卡车到开封声援“824”，并在师院转了一圈，师院10号楼的开封“左派”撤出，退守到东郊仪表，空分，拖电，阀门，化肥等大厂固守。

由于“731”的枪击事件发生，开封开始抢枪。8月9日，开封市人委的“824”将人委一号楼地窗的钢筋锯断进入地下室和人委档案室，把里面存放的机关基干民兵训练使用的机枪、卡宾枪、步骑枪等长、短枪共67枝悉数抢走。当天，开封“八二四革命造反总指挥部”发布第二号《紧急通告》，规定：

“凡我八·二四革命造反派总指挥部所查封的房间和物品，我八·二四战士决不允许私自启封，对于缴获的战利品，一律交总指挥部统一处理，决不允许任意毁坏、私分，否则，按情节轻重给予惩处。我八·二四革命造反派各组织所掌握的汽车、摩托车、卧车等交通工具，一律交总指挥部统一管理，严禁不经总指挥部批准私自动用汽车，更不允许开着汽车横冲直闯，破坏国家和私人财产，威胁人民生命安全，否则，要严加处理。”

位于中山路的开封市南关武装部存放的武器也被强行“借用”。人们向武装部里面冲，没有遭遇任何阻拦。武装部的前院站着不少人，都在那里看热闹。

他们冲到武装部后院存放枪支弹药的仓库，门非常小，里面堆放的物资相当多，因此很拥挤。一个个箱子被撬开了，现场不

乏各种军用刺刀，但是似乎大家最想找、最想要的是手枪。旋即发现被撬开的一个箱子里全都是手枪，于是无数的手伸向了这个箱子。一名学生人高手大，两手一抄从箱子里捧起一大捧手枪，并立刻紧紧地抱在怀里。在他向外挤着出去的时候，沿途不断的有人从他怀里抢，他因为两手不得空无法反抗，只好左躲右闪，并且不小心把手撞到了一把刺刀上搞的鲜血直流，但等他挤出门外时，怀里也只剩下了一两只手枪而已。

更多的箱子被橇开了，更多的手枪被发现。后来的人没有手枪可拿，就只好拿步枪，再其次就拿刺刀、子弹什么的。

开封八中去的人并不多，十几个人而已，但嘎斯 51 卡车仍载着他们抢到的几十支长枪满载而归，其中有当时军队列装的全自动步枪和半自动步枪，也有二战时美军用的汤姆式冲锋枪、卡宾枪，还有苏联造的 7.62 毫米步骑枪和朝鲜战场上志愿军用的 50 式冲锋枪，但更多的是日本三八大盖及汉阳造步枪。手枪也有当时军队列装的五四式、五一式手枪、当时公安人员配备的 53 式制式手枪，也有电影地雷战中那种打一枪要把枪掰开填一发子弹的最古老的手枪。比较多的是 20 响驳壳枪，另外有两只左轮手枪，几乎是崭新的而且枪筒很长非常漂亮。还有日本的王八盒子，有一只勃郎宁手枪，非常小巧，枪的最大尺寸处也不超过手掌。这把勃郎宁手枪原本是开封市委副书记李浩的。每只枪都是被认真的用黄油封好的，外面还包裹有油纸。上面附有该枪持有人的职务、姓名，多是各级党政官员及银行的领导。

八中的学生是从师院赶去武装部参加抢枪的，他们没再回师院，因为手中已经有货了，可以自立门户了，于是直接回到了八

中。

后来，八中的学生又赶往卫戍区司令部抢枪。他们顺利冲进去后，喜出望外的发现了机枪，4 部马克辛重机枪，带三角支架的那种。还有几挺很新的轻机枪，是苏联造 7.62 毫米转盘机枪，连木箱一起抬走的，备用弹盘也整了不少。

出去的时候就不顺利了，解放军趁他们进去抬枪的时候，把卫戍区司令部的大铁门给关上了，并且在铁门前组成了人墙，不放他们走。

学生头头徐学珍毫不犹豫地拔出他的五四手枪大声喊："给我冲出去！"并哗啦一声把子弹上了膛。学生们是从靶场赶来的，手中都有枪。头头发话了，那还犹豫什么？于是立刻也都唏里哗啦的把子弹上膛了。

解放军手里都没拿枪，也没有过于阻拦，就放他们走了。

八中又去抢修械所。这次最不顺利，进门就不顺利，基本上多是爬到周围民房上跳到修械所院子里的。居民院的厕所翻过去就是休械所，一名同学在翻墙时候被一当兵的推下去，刚好掉到屎坑里，沾了一脚一裤腿屎，害的解放军还赔给他一身军装。

这次他们只得了一支捷克式轻机枪。但仓库里子弹箱一排排的堆的一人多高，其中有的箱子里还是手榴弹。学生们进去后见箱子堆的太高，从下面抽箱子又抽不动就直接就把一排排箱子推倒再开箱看里装的是什么，一看吓了一跳，都是手榴弹，幸亏没有爆炸。

师院"824"陈红兵带了 3 卡车的人来到八中，据说是火线指挥部的武装连，一是要求分给他们点弹药，因为当时只有八中

枪多弹多，其他单位穷的很。另外主要是帮助部队把修械所战士站岗的半自动步枪要回去。

八中学生在楼上架起了机枪。

经协商，八中把战士的枪还给他们，这才有了解放军赔偿学生一身军装的事情，也算是没理搅三分吧。

后来，八中的学生见到陈红兵，说起这事。陈红兵说："你们学校啊，不好惹，那次我见机枪架了一溜，都上膛没？"

八中的学生说："怎么可能啊，都是自己人，不过当时火线指挥部的武装连都是工人，见那阵势没人敢动了，估计你这个'司令'当时也指挥不灵了吧。"

枪有了，但又不太会用，甚至连什么枪用什么子弹都搞不很清楚。开始傻傻的以为拿着子弹在枪口试，子弹头能塞进枪口的就应该是能用的，后来解放军来了教他们，才知道完全错了。

解放军教他们怎么分解和擦枪，怎么瞄准射击，连刺杀都教，很认真很尽职的。

8 月 10 日清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河南驻军 8250 部队，即高炮 63 师支持河南"二七公社"和开封"824"的消息："在执行支左任务中做出优异成绩的河南驻军 8250 部队的指战员这几天和二·七公社、开封八·二四无产阶级革命派一起，广泛开展了革命的大批判活动。""坚决支持二七公社等革命组织的。"

下午 17 时，6093 部队，即 1 军 7 师 20 团奉命进驻开封执行"三支两军"任务。开封空降师 7249 部队、1 军 2 师 6 团 8186 部队、153 陆军医院及开封"824"前往欢迎。300 余辆军车由西

向东徐徐前行。开封 10 万军民举行了欢迎大会。“824”代表陈红兵、6093 部队政委马崇德在会上讲话。”

8 月 11 日，刚刚进驻开封的 1 军 7 师 20 团 6093 部队奉命对开封东郊的开封化肥厂、开封空分厂、开封仪表厂、开封高压阀门厂宣布军管，受到开封“左司”等组织的围攻和阻拦。

8 月 14 日，6093 部队又对开封火车站、开封电厂、开封火柴厂等单位实施军管。

下午 15 时 40 分，康生、曹轶欧、吴法宪等在北京京西宾馆接见河南省军区、8172 部队、河南省军区各军分区、驻军各师、学校负责人及省军区机关干部代表。一五三医院“红总”、“职工队”代表。接见会由吴法宪主持，康生在接见会上讲话。

8月14日15时40分，在京西宾馆礼堂第一会议室，康生、曹轶欧、吴法宪接见河南省军区、1军、河南省军区各军分区、驻军各师及驻豫军校负责人。另外，还有省军区机关干部代表、153医院“红总”、“职工队”代表。

吴法宪说：“康老在百忙中，今天来给我们指示。康老很关心河南问题，今天听了汇报后来给我们指示。”

康生：“同志们，河南问题结束后，军队同志又留下开会。会议开了半个月了，会议开得很好。很多同志根据主席、中央、中央文革的指示，彻底检查了河南省军区的支左工作，有的军分区、人武部也检查了关于支左方面的问题，我们相信经过中央、主席、林副主席的指示，和同志的讨论，将会使河南的三支两军的工作得到很大成绩。”

“会议期间揭发了何运洪、李善亭和其他同志的错误，这些

揭发无论对河南的文化大革命和今后三支两军，无论对犯错误的同志改正错误都有很大益处。”

“河南省军区，以何运洪为首的一小撮人走到了相反的方面，不是坚决执行主席路线，而是抗拒主席路线，不是按照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指示进行三支两军，而是执行反革命分子陈再道、钟汉华的指示，反对主席革命路线，抗拒主席、中央、中央文革的指示。如果说一时不了解中央指示精神犯了错误还是允许改正的，但从2月17、3月、4月、5月、6月、7月，五、六个月，长期不改正错误。”

“毛主席说：‘对于犯了严重错误的干部，包括你们和广大革命群众所要打倒的陈再道同志在内，只要他们不再坚持错误，认真改正，并为广大革命群众所谅解了之后，仍然可以站起来，参加革命行列。’毛主席对犯错误的同志的挽救是仁至义尽的。这是最后给他们的出路，从这个批示，可以深深体会到毛主席对犯错误干部的爱护和挽救，当然陈、钟能不能得到谅解看他们的了。同样，何运洪不要失掉时机，不要坚持不改，不要改而不彻底，不要同群众对抗，改得好还是同志，中央帮助你，还要看内因。”

“现在，左派、右派、保守派，阵线比较分明。林副主席说：解放军的同志不要以冲军区不冲军区作为划分左右派的标准，应该以路线为标准。要看群众组织的大方向合乎不合乎毛主席革命路线。”

“我开始很注意省‘工人总部’，他们的代表李通，是解放军转业下来的，是从青岛海军转业下来的，家庭背景不很好，有

海外关系，我一看不像工人，是一个工会干事，不是真正的产业工人。市‘工人总部’的服务员也不是工人。他们的思想不能代表无产阶级思想。开封化肥厂许多是转业军人、退伍军人，这些人走错了路，搞起武斗来更厉害些。对待保守组织要进行教育，争取广大受蒙蔽的群众，孤立他们的坏头头。中央7月13日关于不准动员农民进城搞武斗的指示，很多地方没有向农民传达。林副主席说：对保守组织要进行政治工作，不是解散、取缔就能解决问题的，而要说服教育，分化，做争取工作。”

## 第 817 回：毛泽东，痛批军内一小撮　部队到，温联总被迫撤离

8 月 14 日，毛泽东看了锡兰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桑穆加塔桑 7 月 2 日给在中国广播事业局工作的美国专家李敦白的信。信中就他访问中国后透露了同毛泽东的谈话内容表示歉意，并托李敦白找康生或刘宁一代为解释。毛泽东批示：

康生同志：

这类事，不要去责备发表的同志。一般谈话，公布也不要紧。

这天，秘书给毛泽东送来第 12 期《红旗》杂志和林彪办公室送审的下发部队的文件。毛泽东翻看《红旗》杂志为纪念建军 40 周年的两篇社论，看着看着，他眉头皱紧，提笔批道："大毒草！" 不过瘾，又批："还我长城。"

接着，他又将林彪送审的下发部队的文件理了理，从第一份翻起，逐页审阅，凡有"揪军内一小撮"之类的字样，统统一笔删掉。删到后来，他终于耐不住了。稍为停顿了片刻，挥笔写道："不用。退林彪处。"

第 12 期《红旗》杂志社论稿和林彪办公室送审的下发部队的文件悉数退回后，林彪、叶群紧张万分。毛泽东像这样干脆拒绝，毫不客气地将原件退回，过去似无先例。叶群拿着那叠文件，连忙打开保险柜，把文件锁了起来。然后打开房门，吩咐工作人员："你去他们秘书那里看一下，老虎在不在？叫他到我这里来一下。"

"老虎"是林立果的小名，他一进门，叶群便对他说："你

给江青写封信，要赶紧写。就说‘红尖兵’那篇文章里‘揪军内一小撮’的提法原文没有，是后来别人加上去的。”

林立果斜眼望着叶群，一脸茫然，冷冷地站着，一声不吭。

叶群急了：“哎呀，我告诉你吧，一号发火了，首长(指林彪)送审的文件批了‘不用’，不许提‘揪军内一小撮’。”她紧接着说，“你要马上写，小事不谨慎就可能要出大事。你知道吗？这是政治！”

林立果应了一声：“知道了。”悻悻而去。

原来，1967 年 7 月 22 日，林立果以“红尖兵”的笔名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其中就有“揪军内一小撮”的提法。

毛泽东的批示传到钓鱼台，这里也乱了。先是 11 号楼的江青跑到康生的 8 号楼，两人你一言，我一语，抱怨陈伯达。

“《红旗》是陈伯达管的，他怎么这么糊涂！”康生埋怨说。

“这事只能怪老夫子，书生气、书呆子。”江青说，“《红旗》那两篇社论是他负责签发的，反正我没有签。”

“我也不知道。”康生也表白说。

“主要责任就在陈伯达身上！”江青怨气冲天。

康生急得 3 天没吃下饭。

江青则让姚文元去上海探听毛泽东的底。姚文元传回毛泽东的话：“这一回一定要追究责任”。

中央文革乱做一团。陈伯达是文革小组组长、《红旗》杂志总编辑，他把几个“秀才”集中到 16 号楼，首先说道：

“武汉出事后，林副主席在大会堂西大厅接见了春桥、文元、关锋、戚本禹，说到‘带枪的刘邓路线’，说‘今后寄希望于你

们了’。7 月 22 日，林副主席召集咱们文革小组全体成员开会，谢富治、王力都回来了，参加了，确定解决军内问题是第三战役的重要内容，对吧?”

陈伯达扶了扶眼镜，慢条斯理地接着说:“各报刊声讨‘720 事件’，这是没有错的，开百万人欢迎大会错了吗？支持武汉造反派错了吗？都没错。问题是《红旗》这两篇社论，那是关锋主持起草的，《红旗》‘八一’社论是林杰起草的，是王力改定的，对不对？……”

“文章我是看过，”王力抢着说，“可‘揪军内一小撮’不是我加的，是文章里本来就有的。”

“哎哎，康老，当初研究‘720 事件’宣传口径时，我们不是请示过你吗？在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 7 月 27 日给武汉市革命群众和广大指战员的信里就有这个口号。你不是表过态吗？”关锋一急,把康生抖了出来。

“我表过什么态？”康生一脸冷峻的问道。

“康老，那天晚上，你不是告诉我说，你给汪东兴打电话请示了主席，主席既同意召开百万人欢迎大会，也同意‘军内一小撮’的提法吗？”王力也说。

“我根本没有这样说!”康生分辩道，“我请示主席，主席只同意开欢迎大会，根本没有同意‘军内一小撮’的提法。”

那封信是由陈伯达起草，王力负责修改的。王力马上说:“信是伯达老起草的。”

但这位伯达老记性并不差，他马上说：“我原稿里没有那句话。”

“不能错误人人有份。”江青讲话了，“也不能怪老夫子。这件事老夫子有责任，但主要责任不在他。”老夫子即陈伯达。

关锋和王力跑到 16 楼楼下办事组值班室，关峰对值班室的工作人员说，要找《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给武汉市革命群众和广大指战员的一封信》的签字原稿大样，随后他和王力回到楼上焦急等待。

办事组工作人员矫玉山和李奎林到保密室查阅，未见登记。然后他们在办事组保存的文件档案中也没查到。

这时，关锋又从王力办公室，即 16 楼的 2 楼下来，再次急如星火地催要，并责怪矫、李二人工作不力。关锋问他二人：“有人在中央《给武汉军民的一封信》的签字稿上加了字，是谁加的？”

矫玉山、李奎林二人一头雾水，不知所云，因为《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给武汉市革命群众和广大指战员的一封信》已经下发快一个月，都是由陈伯达、关锋身边工作人员校对发排后交中央办公厅印发的，不是办事组经办的。但是办事组也不敢怠慢，马上从中央办公厅机要局调来了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和中央文革小组名义下发的《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给武汉市革命群众和广大指战员的一封信》的签字大样，二人先看了一下签字大样改动情况，上面只有陈伯达和王力的改动字迹，其中王力在信中“武汉地区的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一句中的“党内”后边加上“、军内”，即一个顿点两个字。这是在什么时候，在什么情况下加的？为什么加？办事组一无所知。

这时，王广宇刚从人民大会堂开会回来。矫玉山、李奎林让他把刚从中办调来的签字大样送给正在楼上焦急等待的王力和关锋。

王广宇上楼把签字大样递给了关锋。关锋急不可待的翻开大样，惊讶地对王力说："老兄！是你的字迹。"说着把大样递给王力看。

王力早把这件事忘了，他愣了一下问："我加的？"然后翻看了签字大样，傻了眼，呐呐的说："噢！这是我和陈伯达在一起改的。"因为在大样上也确有陈伯达在别处改动的字迹，不过只有一句含糊的提法："武汉地区的走资本主义当权派们"如何、如何，正是王力自己在上面加了"党内、军内"。

随后，王力对王广宇说："查清楚就行了，不必大惊小怪的！"

王广宇回到值班室，矫玉山、李奎林问他："他们说什么了？"

王广宇告诉他俩："王力说，查清楚就行了，不必大惊小怪的。"

矫玉山、李奎林二人当场就发了脾气，说："你们小组成员自己出了差错，拿我们撒气，以后再这样，我们也造反。"

陈伯达看到签字大样，松了口气，取出手绢擦了擦额头渗出的汗珠。

"主要责任在王力和关锋。"康生马上说，"你们要有个认识，要作深刻的检查！"

马上又有人提供了有关材料，说早在 1967 年 1 月《解放军报》发表的"宣传要点"中，便已提出"彻底揭穿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说法。在这个"宣传要点" 清样上亲笔

签字的是胡痴，另外还用铅字排列着“王力、关锋、唐平铸”。当时的王力刚被任命为中共中央宣传组组长，关锋负责《解放军报》。这下，王力、关锋这两人完全被扣死。

尽管《红旗》第 13 期 8 月 17 日才刚刚出版，陈伯达为了亡羊而补牢，19 日又发了个第 14 期社论《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我国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可靠支柱》，公开表示了反对“揪军内一小撮”。但 12 期的责任，毕竟还是要是追究的。

虽然 20 军 6517 部队于 8 月 2 日抵达温州，但是武斗依然很激烈。8 月 9 日下午 13 时，20 军 6299 部队在温州市民数万群众夹道欢迎下，也进驻温州，公开表示支持“工总司”。

8 月 10 日下午 15 时，6299 部队和 6517 部队奉命全副武装进驻“温联总”在市中心一带据点，扑灭市区的大火。6299 部队某班班长宋胜利在救火时牺牲。

8 月 11 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温州支左部队联合指挥部宣告成立，并发布告说：“联合指挥部经省军管会批准，是进驻温州地区制左部队临时最高机关。”

上午 11 时，“温联总”再次焚烧县前头一带房屋。6299 部队某连副班长谢庆生正在伟光理发店门口执勤，遭枪扫射，当即牺牲。由于南风凶猛，火势极大，浓烟蔽天。小商品批发部、乐器社、中新茶店、旧货商店、面包商店、县前餐馆，均被烧毁。支左部队的战士冲入火场救火。18 时 30 分，火熄。

8 月 12 日上午 10 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广大指战员热烈响应林副主席“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在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立新功”的号召》新闻报道中，表扬了 20 军 6517 部队全体指战员。

这天，温州市委机关、港务局两据点的“温联总”全部撤离，解放北路、望江路和海坦山一带重新被“工总司”控制。

8 月 13 日，支左部队奉命武装进驻“温联总”的据点——华盖山、积谷山、汽车南站和温州医学院。“温联总”开枪阻拦，温州城再一次陷入硝烟冲天、火海一片之中。部队还击，最终进驻了上述各个据点。“温联总”被迫撤离温州城，在近郊仰义、牛山、梧田一带抵抗。

这天，就在“温联总”退出市区不久，“工总司”的一班头头被胜利冲昏了头脑，黄国光、陈春林、邓高标、庄秋江、王建新等人，开着汽车，贸然出城，在牛山脚下遭到了“温联总”陈桃熏部的伏击，庄秋江在车上中弹而亡，王建新跳车时被击毙，其余均被俘虏。王建新是从北京回温州鼓动造反的大学生，当时只有 20 多岁。死后他们的尸体被拖到牛山埋葬。

黄国光等活着的人被带到勤俭中学“受审”。在勤俭中学的“温联总”头子是一中的戴光荣，他一见同是一中另一派红卫兵头子陈春林，真是“仇人相见，分外眼红”，当晚就把陈春林拉到勤俭中学的后山枪毙了。邓高标也是红卫兵头头，那晚作为“陪毙”也被蒙上眼睛拉上山。这一晚的惊吓够邓高标承受的了，他后来被放回后，发誓再不进入政治旋涡。

黄国光等人后来被带到丽岙。有天晚上，他不知是被释放还是逃了出来，大路不敢走，绕道茶山，跑到温州雨伞厂的工友家，当夜被送到温州。可温州“工总司”认为他是“叛徒”，不再承

认这位“总司令”了。黄国光只好闷闷不乐回了家。

8 月 15 日，新华社在综合报道全国各地人民解放军欢呼青海省革命委员会成立的消息时，再一次表扬了进驻温州支左的中国人民解放军 6517 部队、6299 部队。表扬他们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决支持温州市无产阶级革命派，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立新功。这一消息，除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外，还在《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同时刊载。

8 月 15 日，省军管会发布《关于温州地区当前局势的公告》。

8 月 16 日，周恩来给浙江省军区发出电话指示：

“浙江现在有敌情，你们都知道嘛！敌情第一！浙江的沿海蒋介石很可能搞乱子，你们要提高警惕。”

“省军区直属机关搞‘四大’。司、政、后直属学校可以搞‘四大’，文工团也可以搞。军队不能搞‘四大’，军委早规定了，军以下部队进行正面教育，可以用发扬民主的方式提出批评，不能用‘四大’的形式。”

“部队搞正面教育，独立师、独立营不能例外，部队不能搞‘四大’。但是，他们有权批评省军区领导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可以送大字报、小字报，可以进行讨论。部队是一个战斗组织，不能成立战斗小组，部队不能乱，部队一乱，就不能作战了。”

“对二十多县来的造反派要动员他们回本县闹革命，通过军分区、人武部支持他们，使各地方军分区、人武部的态度明朗起来……

杭州本地的造反派不要去军区来来往往，军队不要串联，有意见可以送大字报，你们可以同造反派讲清楚，让省军区关起门

来搞‘四大’，不要把秩序搞乱了，部队秩序乱了对敌人有利。杭州湾、浙江沿海敌人很容易钻空子，你们也可以设想设想。”

8 月 20 日上午，温州军分区召开“斗争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王福堂”大会。温州军分区司令员王福堂被批斗，批斗者将他架起飞机，手指强箝他的两个鼻孔向后拉，老脸几乎被撕裂，场面惨不忍睹。但他不服，依然声称：“骑马的最后还是骑马，抬轿的最后还得抬轿。”他后来在邓小平时代果然以老病之身升任浙江省军区副司令，对曾经死保过他的人给予重报。可他是否想过，当年他是泥腿子时，跟着共产党造反，斗地主分田地，也曾有地主对他们这些泥腿子不服气地说道：“骑马的最后还是骑马，抬轿的最后还得抬轿。”王福堂当官掌权后可曾想过：“你自己究竟是骑马的还是抬轿的？”秦末农民起义领袖陈胜说：“帝王将相宁有种乎？”

8 月 20 日这天，王芳也被押回温州一个星期，在市人民广场接受大会批斗，站在台上的凳子上，下面有解放军上了刺刀看押，罪名是“策划反革命武装叛乱”。

温州“工总司”在 20 军支持下，将“温联总”赶出温州城后，轮到他们在温州城进行报复了。他们在“受蒙蔽无罪，反戈一击有功”的口号下，对“温联总”成员尤其是参与武斗的成员实施了无情的报复。打、砸、抄家、游斗、逼供，这些在文革中属家常便饭，就不去提了。当时还发明了“爬棺材下”、“吃死人汁”等手段来折磨落入手中的对方成员。当时温州城里有多处“烈士”棺木的集中供奉处，被抓获的对方人员被逼着跪在“烈士”面前“请罪”，逼着从架空的棺材下爬过去。由于时值酷暑，尸

体腐烂，汁水滴下来，逼着“请罪”者吞食。在“烈士”棺木最集中的地委大院，一排排的棺木摆放在木头架子上，不时进来哭哭啼啼的人。虽然撒满了“666 粉”，可浓烈的尸体腐烂气味仍飘得很远。

这时的“温联总”也并非无所作为。他们盘踞山区时，常在“内线”带领下闯入居住在市区边缘的“工总司”派成员家中，将财物洗劫一空。对敌人如此，对同派的“叛徒”更是手狠，“温联总”头头叶少华投诚“工总司”后到福建山区招降“温联总”时遭到枪杀。

“工总司”为了悼念本派在武斗中牺牲的同志，大兴土木，在温州松台山建造了烈士群墓。这墓地在当时是够恢宏的，总共大约有 140 多个墓，每个墓前有墓碑，刻上姓名及家庭住址，其中还有十几位“支左”部队的战士。文革后期，“烈士墓”被挖掘，在原址上建造了“解放剧院”，如今则是“松台广场”。

“温联总”退出温州城后，两派在近郊摆开了战场。南边，“工总司”前沿阵地在南塘街，“温联总”则在里田街，街道上摆满了沙袋，过路行人胆小的就在河床上行走。1967 年，温州伏秋连旱，是建国以来最严重的一次旱灾，旱期长达 136 天，全市农田受旱 7 万多公顷，粮食减产 18 万吨，各地湖河干枯，70 里的塘河河床干裂，温州轮船公司的所有客轮在武斗期间开到茶山新河，后来都搁在河床上了。所以那年可以“河床当路走”。

9 月份开始，“工总司”在支左部队的支持下，向“温联总”发动了攻势。两派在茶山展开了拉锯战。“工总司”一进茶山，“温联总”就退到山上，“工总司”一走，“温联总”就下山。

不管是哪一派进来，茶山街的人们就上了店板，紧闭门户。

后来，支左部队的一个连很长时间都驻扎在茶山，兵营设在洞桥南岸的柑橘站。“温联总”只好退却，先是退到大罗山、三溪、藤桥以至永嘉、瑞安等县，与“瑞安联站”等协同作战，当时被称为“温联匪”、“瑞联匪”。后来在“工总司”几次进剿后，一直退到泰顺甚至福建山区，直至 1970 年“庐山会议”以后。

## 第 818 回：南京市，倒许风愈演愈烈　炮声响，忠实派占领涪陵

此时，南京的“倒许”风潮也愈演愈烈。

8月5日，南京军区空军副政委王绍渊、南京军区空军政治部副主任高浩平召集南空司、政、后各大部长会议，高浩平在会上说：“从浙江、安徽的问题看，根子在南京军区。”王绍渊与他一唱一和，指责许世友在延安时就反对过毛主席。

8月8日，高浩平接见空字009部队“红旗兵团”勤务组成员，对他们说：“军区问题很严重，许世友是聂凤智的黑后台，……打不倒许世友就打不倒聂凤智。”

他还说：“军区实力派是许世友，杜平是被推到第一线的。‘827’保许世友保到什么程度？许世友操纵‘827’操纵到什么程度？我们正在调查”，“‘827’现在揪杜方平……杜方平是最早起来造江渭清反的，是中央肯定的，现在他们揪杜方平，就是他们在政治上陷入被动，……武汉事件发生后，全国的文化大革命已进入一个转折点，《红旗》12期社论吹响了冲锋号”，“你们打倒许世友，打倒聂凤智，我们支持。许世友、杜平是有问题的。”

8月9日，王绍渊、高浩平召见南空政治部文工团“革筹会”的几个头头，说：“现在已由揪党内一小撮转为揪军内一小撮，你们可以杀向社会锻炼锻炼”，“南空党委同意你们杀向社会，许世友的问题很多都是纲上的，你们要我表态，越早越好。我们不好出面，你们表态，实际上就是我们表态。”

就在这次接见的当天，南空政治部文工团“革筹会”发布了“打倒聂凤智”、“打倒许世友”、“打倒徐向前”的声明。

8月10日，王绍渊、高浩平前往上海。11日，他们从上海电告南京：“不要和军区站在一条线上”，“不要支持827派”。12日，他们又主持召开南空党委紧急会议，在会上做了题为“站稳立场，旗帜鲜明，态度明朗，划清界限”的报告。

南京局势的骤然紧张震动了中央高层。在8月11日周恩来和中央文革与北京红代会座谈时，江青还特别提到了南京几万人的武斗。第二天，8月12日，周恩来等人又紧急召见南京“红总”在北京的代表，做出了三点指示：

（1）要吸取一二六的教训。

（2）对待南京“八.二七”不能像武汉对待武汉“百万雄师”那样，捉“八.二七”是不对的，今后不要再捉了。

（3）打、砸、抢、抓、抄的歪风要刹住，否则要走向反面。

但是中央的上述干预似乎并没有遏制事态的发展。

8月13日，南空王绍渊、高浩平召集“红总”负责人会议，明确表态：“现在南京军区内部两条路线斗争很激烈，我们也是一直受到压制的，我们现在已经杀出来了。……武汉问题发生后，全国形势高涨，中央很明确，我们要有信心。当然南京不是孤立的，江、浙、皖三省都有发展，杭州前几天比你们还孤立，现在也在好转嘛！”之后，南空部队影响覆盖的无锡、苏州、丹阳、常州等地“支左”部队立即做出积极回应。

8 月 15 日，“红总”在鼓楼广场举行大规模群众集会，会议期间高呼：“打倒许世友”的口号。同日，许世友和杜平的家

被抄，许世友的上将礼服也被扎了好几个大窟窿。社会上盛传许世友在延安就要杀毛泽东，搞暴动，现在他又要做六省一市的头，不千刀万剐不足以平民愤。

这天，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给南京军区、江苏省军管会、各革命群众组织发出中发［67］246号文件，通知他们，中央派出一个调查组前往江苏调查了解和协助解决南京和江苏省无锡、苏州等地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的一些问题。调查组由三军干部、《红旗》杂志、新华社记者，国务院联络员和北航“红旗”学生组成，共38人，由民航总局政委刘锦平任组长。

8 月 16 日上午 9 时 30 分，中国自行设计、制造的南京长江大桥正式合龙。退守下关和大桥工地的南京“八•二七” 于上午 10 时在大桥旁边召开庆祝大会，参加大会的共 2000 多人。上午 11 时 40 分，庆祝大会结束。参加大会的人员沿中山北路游行试图返回南京市区。

下午 13 时 40 分，当游行队伍途经 3503 厂大门时，遭到 3503 厂“红总”派 “一二•一红卫军”的拦截，不让游行队伍通过，并要搜查游行队伍所携带的武器。只有放下武器才可通过。

双方僵持不久，即发生激烈争执，接着使用棍棒、利刀乱打乱扎，砖、瓦、石块互相对扔，有人还朝天放枪，向对方人员扔自制的手榴弹。

中山北路交通为之中断，围观人员很多。

中央 8 月 15 日向南京派出的调查组和江苏省军管会到现场劝阻、调解。下午 15 时，根据中央调查组的提议，江苏省军管

会决定派部队开赴现场，强行把武斗双方隔开。

部队开到现场后，一边耐心做说服工作，一边把武斗双方隔离开来，并劝说他们撤离武斗现场。下午 15 时 30 分，武斗双方撤离完毕，武斗终被制止。

这次武斗，60 人受伤。

再说四川，当成都军区和中央军委得到四川涪陵“8.11”伏击军车的血案报告后，极为震惊。成都军区司令员梁兴初大怒，说：“伏击解放军，这还了得？！简直是日本鬼子和蒋匪军的行为……”

经过成都军区批准，涪陵驻军决定对“贸派”采取军事行动。

涪陵“忠实派”的“工人总部”总负责人况太志所在的涪陵地区新力厂，是当时涪陵地区最大、设备最好、技术力量最雄厚的机器制造厂，他们厂里有几个工人是从重庆调来的，和重庆望江厂是老关系，正是因为这一原因，他们支持重庆长寿的“反到底”。在涪陵发生“811”伏击战后，他们请求重庆望江“金猴”支援。8 月 12 日，刚刚参加完重庆“88 海战”的“望江 101 号”炮艇即驶往涪陵，而且还从望江厂给涪陵的“工人总部”带来两门 37 高炮。

8 月 13 日晚上，涪陵支左领导小组办公室召开了一次非常机密的会议，地方群众组织的负责人都没有通知参加。在这个会上，决定 8 月 14 日早晨 6 时，以“101”炮艇开炮为号，开始对“贸派”实施反击。反击的重点是占领位于“堡子城”自来水厂的水塔，这是控制整个涪陵城的制高点，当时被“贸派”占领。

反击的部署是：正面由“101”炮艇用炮轰击，造成反击的

态势，并伺机向上向东进展；与此同时，将“忠实派”最强的火炮，就是那两门由重庆望江“101”炮艇带来的陆用 37 高炮布防在涪陵五中大门外的公路上。主要兵力布置在“贸派”的主阵地水塔以西的一个高地上。高地的高度与水塔相当，由此向东对水塔发起攻击，进而拿下“贸派”的主阵地——水塔。

会上还决定，整个反击行动军队不直接出面，而由群众组织的武斗连队负责。军队作为后盾，可以换上便衣帮助运送弹药。

涪陵支左部队领导小组还决定，由涪陵军分区司令部作战科科长统一协调炮艇和地面人员的行动。

不知什么原因，第二天早晨，“101”炮艇并没有准时于 6 点开炮，而原定前来集结的“忠实派”的 401 连队也迟迟没有按时赶到。这时，“贸派”从略高于“忠实派”阵地的水塔高地不断射击并开炮，使那些已经在高地上坚守了一个通宵的“忠实派”武斗人员非常被动。7 时前，401 连队才来到阵地，被“工人总部”负责人况太志大骂一通。

7 时左右，“101”炮艇开始炮击，这是涪陵城自 1928 年“下川东之战”杨森打炮后，第二次听见大炮轰鸣。

与此同时，布防在涪陵五中的两门陆用 37 毫米双管高射炮也开始向“贸派”的主阵地水塔炮击，炮弹落在水塔的四周，溅起阵阵泥土……原来是有意这样不直接命中，为的是减少对方人员伤亡，实现将对方轰跑的目的。

部署在高地上的“忠实派”武斗连队也开始向东发动进攻。这样，“贸派” 的主阵地水塔同时遭到来自正面的“101”炮艇威力巨大的炮击和来自西面的攻击。

“101”炮艇的强大火力不只射向“贸派”的主阵地水塔，而且还凭借它的机动性和无可抵挡的气势在小小涪陵城的长江岸边不停的向所有“贸派”的阵地倾泻高射炮射出的穿甲弹。只见“101”在长江上缓缓游弋，船上的炮口不时冒出火光，须臾耳边就“砰砰”的巨响。“军舰”主要在“忠实派”区域的江面上开炮，也时而往下游的“贸派”区域驶去，一边开炮一边前进，驶到长江和乌江的汇合处，又缓缓驶回来……那阵势，那不间断的“轰”、“轰”炮声，不只是让“忠实派”大开眼界、大快人心，更是让“贸派”的所有人员都从心底里害怕。

“军舰”炮击了大约半个多小时，就向上游驶离了涪陵。炮击时，“贸派”阵地响起不多的枪声，但没有用迫击炮轰击炮船……

“军舰”离开后，“堡子城”的枪炮声激烈起来，人们纷纷跑出来观看。那年头的人们真不怕死啊，枪弹还在头顶的高处“嗖嗖嗖”飞过，大家就都出来看热闹啦！街道靠里的那一侧山上打不到的地方，到处都是人，危险的一侧也有些胆大的跑过去往山上看！

部队封锁了各个路口，禁止任何人往上走，人们看到部队在前面，还有很多武装群众，编成队列向上走去，不时有伤员被抬下来……

大约在上午 11 时左右，“忠实派”攻占了“贸派” 的主阵地水塔，初战告捷。

水塔的丢失使“贸派”在城内的其他阵地就失去依托，于是赵树金决定退守水塔后面更高的懒板凳和望州关，并组织反攻，

夺回水塔。

“忠实派”则在夺取水塔的胜利后，迅速扩大战果，于中午时分即攻占了水塔下面的工业局，并在下午攻占被视为“贸派”总指挥部的南门山高干招待所。其实“贸派”总指挥部在几天前已东移到涪陵卫校，并在中山路的涪陵旅社设立了前线指挥部。

在当天下午攻打高干招待所的时候，“忠实兵”武斗连的通讯员，当时只有 14 岁的学生蔡维勤被打死。

随着 8 月 14 日夜幕的降临，枪声似乎静了下来。谁知深夜，枪炮声又剧烈地响了起来，震得人们头皮发麻。只见“堡子城”的上空，有无数条枪弹的弧线，其中曳光弹拉出一条条红色的弹道，在夜空中构成一幅好看的画面……

当晚，“贸派”在赵树金的亲自指挥下，一度凭借夜幕的掩护，夺回水塔高地，也杀回中山路上的前线指挥部涪陵旅社，夺回一些弹药。但所有这一切都不能挽回已经涣散的军心，最终还是撤了出来，并在撤退前放火烧了旅社。

8 月 15 日的清晨，在涪陵卫校“贸派”的总指挥部里，赵树金、赵正法、杜炳权、黄年福、王富国等人再次碰头研究下一步的行动，赵树金事先没有估计到部队会直接参与对“贸派”的军事行动，人们对当时部队的作法流行着这样一个顺口溜：“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打死了抬起走”。

部队真的动手了，赵树金有些无奈的问大家：“现在这种情况怎么办？”

自 8 月 5 日“贸派”抢了涪陵军分区和涪陵县武装部的武器库，并于 8 月 7 日、8 月 8 日特别是 8 月 11 日在涪陵龙潭伏击

7822 部队车队连续取得节节胜利后，赵树金已经有些头脑膨胀了。他原准备休整 10 来天，于 1967 年 8 月 20 日后，凭借“贸派”的优势，特别是在地利上的优势，在涪陵城里发起总攻，由上向下将“忠实派”赶进长江，最终将“忠实派”打垮。所以他东移了总指挥部，将“贸派”的总部从原专区商业局移到涪陵卫校，而前线指挥部也设在地势很低的中山路涪陵旅社内，并在那里存放了大量的武器弹药。

“忠实派”的“8.14 反击”完全打乱了赵树金的部署，更重要的是 101 炮艇的“炮弹效应”，水塔、南门山高干招待所等重要阵地的丢失，使“贸派”的军心已经涣散。正所谓“兵败如山倒”，大多数人的意见：撤过江东到涪陵师校。

8 月 15 日，下起大雨，“贸派”冒雨退出涪陵城区，撤过乌江，连人带家属有 1 万人左右。

当年一位“贸派”人员在 1967 年 8 月 14 日写了一首诗，生动地描绘了他们当时的心境：

一高既不守，

直如多米牌。*

两日地利陷，

三军尽可哀。

仓惶江东退，

回首泪满腮。

四万齐声哭，

悲惨动地来。**

注：*多米诺骨牌。**当时退过乌江的“贸派”连家属有 4

万多人。实际没有那么多。当时涪陵县城总人口也就5万多人。

这天下午，山中仍有枪炮声，但涪陵城街上行人渐渐多了，有的餐厅饭馆和副食品商店开始营业，里面商品完好，摆放整齐，没有被洗劫的迹象，人们不时看到有武装整齐的人列队在街上巡逻，也有宣传人员在发放传单，皆表现出秋毫无犯的精神。

事实上，无论是“贸派”撤退时，还是“忠实派”占领后，均未进行抢掠和破坏，双方对下面都进行了纪律教育，要以模范行为获得群众的支持。当然，这是以大多数成员的自觉行为和十几年道德教育所形成的意识为深厚基础的，否则，在那种乱象环生的境况下，再严厉的纪律也无济于事。

但是，“贸派”被赶出涪陵城之后，有不少的“贸派”成员没有随着撤往江东，而是留下来“反戈一击”，还有相当一部分是没有来得及撤走。于是就有“忠实派”中的红卫兵即“忠实兵”打骂虐待“贸派”人员的事情。

作为当时主持涪陵政务的涪陵地区支左领导小组很快就对此引起重视。支左领导小组组长黄鹤寿政委和副组长李畔政委将“忠实兵”的头头罗成胜找去，对他说：“哪里也不要去，就在城内管好‘忠实兵’，制止‘忠实兵’中可能发生的违法乱纪的事。”

8 月 15 日，“忠实兵司令部”和“川涪总司”，即“四川涪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发布《联合通令》。该《通令》第一条即称：“一切受蒙蔽的人，只要放下武器，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我们热情欢迎。我司令部所属各战团及任何个人，均不得随意抓人，更不能任意打人。违者将给以纪律处分，严重者将依

法追究责任。”

紧接着，1967 年 8 月 18 日，涪陵地区支左领导小组又发布《紧急公告》，该《公告》第四条即称：“涪陵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要牢记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无产阶级自己’的伟大教导。要有胆略，有气魄解放受蒙蔽的群众……对受蒙蔽的阶级兄弟，要进行耐心、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争取、教育、团结他们。热情的欢迎他们起来造反，欢迎他们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在实现无产阶级革命大联合的基础上，逐步达到团结两个百分之九十五……”

即便如此，违法乱纪的事仍然不断发生，甚至发生有“忠实兵”搞恶作剧，把他们认为“最可恶的人”弄出去“假枪毙”。

当“贸派”大多数兵力已经渡过乌江撤退到江东涪陵师校后，在 8 月 15 日的下午召开的常委会上，“一兵团”、“三兵团”的负责人很有情绪的说：

“你们丢下这么多人就跑了，现在水塔、望州关都还在我们手里，反击涪陵城完全有把握。”

垫江县武装部的赵助理员也说：“是炮轰垮的，不是打垮的，完全可以反击。”

于是，大家决心再打回城去。“三兵团”很快就带人过河了，“一兵团”正在整队集合。由于“忠实派”的炮弹还在打，河中间一只船被打燃，“一兵团”的人就没再过河。

接下来，大家又开始研究并开始进行真正的向焦石撤退。“三兵团”打到最后，于第二天上午才从火柴厂过乌江撤退到江东。

下一步撤往哪里？“贸派”产生了意见分歧。参加决策的有

“贸派”的主要头头，还有重庆“8.15”派和成都“红成”派联络站的人。他们面临的选择，北面是滔滔的长江，南面是贫瘠的乌江流域远靠贵州，均不可取，只有在西面和东面可供选择。

西面的好处是靠近重庆，与重庆市的长寿县接壤，重庆“815”势力强盛，可对他们施以援手，是最安全的方向。但赵树金认为重庆毕竟不是自己的窝。

东面有涪陵专区的丰都县、石柱县，靠丰都北还有垫江县，南还有武隆、彭水等县，范围要大很多。但离重庆远，搞不好就孤军作战了。

商业局的赵正法建议：“丰都山区易守难攻，该县的栗子寨，更是山势险峻，当年他率部队在那里剿匪，非常熟悉那里的地形，群众基础很好……”他的意见得到了赵树金的首肯。

赵正法是赵树金的主要军事助手，山西人，曾是解放军的营长，在部队屡立战功。四川解放时，他在丰都县的山区剿匪，爱护人民，深受当地老百姓拥戴，很多老百姓都认识“赵营长”，提起“赵营长”，人们都叫好。

但是因为他在参加革命前，曾在山西家乡参加过阎锡山的“三三铁血团”。当时是抗战期间，一个热血青年，在地方长官的召唤下慨然而起，实属正常。但这个历史“污点”却影响了他，从部队转业到了地方，任涪陵百货公司副经理。文革风潮起，赵树金在商业系统率先造反，他参加了。因为他的历史问题屡屡被对方攻击，因此他非常低调，在内外都几乎不出头露面。但赵树金相信他，信任他。

赵树金排除了反对意见，带领人马东渡乌江，撤到涪陵城乌

江以东农村地区。

## 第 819 回：大火燃，山城内武装割据　大炮战，嘉陵江桥硝烟起

此时的重庆两派，已于 8 月 9 日 0 时达成《关于成立协助警司制止武斗和处理停止武斗后有关事宜的工作组的协议》（补充协议之一）和《关于处理各种武器、凶器、弹药的协议》（补充协议之二）。

8 月 10 日，重庆两派又于凌晨 1 时达成《关于立即无条件释放被抓被扣人员的协议》（补充协议之三）和《关于保证伤员正常治疗的协议》（补充协议之四）。

重庆似乎和平在望。但是就在 8 月 10 日这天，长江电工厂“81 兵团”抢走 54 军高炮 2 门，炮弹 1200 余发。江北“反到底”派炮击上清寺地区，供自来水厂用电的高压电线被打断，市中区停水 9 小时。

8 月 11 日，重庆两派在三钢厂武斗，“815”派长安厂“81 兵团”、三钢厂“野战兵团”、江北“皮革兵团”等近千人撤入市中区，分别到警备区、革筹组、军分区避难。

8 月 11 至 13 日，以重庆 29 中“毛泽东主义战斗团”为主力的“815”派武斗人员，猛攻设于交电大楼的“反到底”派的“完蛋就完蛋”广播站，因为第 769 回提到的 8 月 4 日制造财贸俱乐部前血案的“反到底”派武斗队，就是从这个广播站里出来的，据说是军工“井冈山”无线电厂武斗队。重庆 29 中帮助财贸“815”搬家的二男四女 6 名学生眨眼间死于非命。

在市中区，“反到底”派的力量相对薄弱，仅占据着两路口

一带，在山城宽银幕电影院、体育馆、工业展览馆建立有武斗据点。除此之外，就只有解放碑的交电大楼和望龙门的望江饭店两处了，被“815”派包围。

望龙门的望江饭店是一幢西洋建筑，原是重庆最早的民营商业银行聚兴诚银行的总部，虽然年代有点久远，却相当坚固，因而成了“反到底”派财贸“921”的一个重要的武斗据点。他们曾开了一辆卡车到建设厂去提了几十支枪回来，一路上闯过了好几个关卡，储奇门十字路口是最后一关，红岩 3 中的“815”派在那儿布置了严密的警戒，路中间还安放了一大包炸药。那卡车罩着布篷，从西向东开来，“815”岗哨老远就去拦。那卡车不减速，直冲过来。车上突然出现一排排黑洞洞的枪眼，子弹乱飞。“815”一看，急忙散开。那卡车便跃过那路中间的条石，冲了过去。冲到十字路口前，那司机见那路中间堆着一堆东西，情知不好，又一个急刹车。说时迟那时快，起爆炸药的人已经将电闸往下按了，只听得“轰隆”一声，炸药爆炸了。不知为什么，那炸药却没有伤着卡车。司机略一犹豫，把刹车一松，油门一加，又冲了过去，回到望江饭店。“815”望着那远去的卡车，只能在后面胡乱开了一阵枪出气，然后就大骂那管起爆炸药的家伙是笨蛋，是“孬火药”。

交电大楼也是财贸“921”的据点，又是“完蛋就完蛋”广播站，地处重庆最核心地段。此时，财贸“921”已更名为“财贸井冈山”，但人们依然称其为财贸“921”。

这个“完蛋就完蛋”广播站始建于 1967 年 7 月，以军工“井冈山”、重庆无线电厂的人员为主，设在解放碑附近交电大楼上。

“完蛋就完蛋”这个名字，取自当时流传甚广的一段林彪语录：“在需要牺牲的时候，要敢于牺牲，包括牺牲自己在内。完蛋就完蛋。上战场，枪一响，老子下定决心，今天就死在战场上了！”当时这段以“完蛋就完蛋”为中心词的“林彪语录”，很是鼓动了一些热血青少年在武斗中去拼命。有些地方的红卫兵、造反派还将此谱成了歌曲。清华大学与“井冈山兵团”对立的“414”派，甚至将这首歌当作了自己的“战歌”。

“完蛋就完蛋”广播站还有一首自己的专用歌曲，歌词是：

完蛋就完蛋！

反到底战士钢铁汉，

心最红，志最坚，

打不垮，压不弯！

打不垮压不弯压不弯！

热血满山城，日月换新天！

为毛主席而战，完蛋就完蛋！

为红十条而战，完蛋就完蛋！

为毛主席而战，完蛋就完蛋！

为红十条而战，完蛋就完蛋！

这个广播站，以其名称的特别，也以其广播内容的强烈煽动性，每天都吸引了很多市民驻足聆听。

8 月 11 日，“815”派先是从马路对面的东方红电影院，与交电大楼的“反到底”派交火。

交电大楼里的“反到底”只有几个人，却是从军工厂成品库房取出的全新半自动步枪，武器好，火力强，凭借着那坚固的大

楼，进行顽强的抵抗。但毕竟势单力薄，陷于孤立状态。

“815”派武器虽差一些，但人多势众，几面包围，双方打得一时难分难解，对峙两天两夜。

开始，“完蛋就完蛋”广播站还能一遍又一遍高叫：“强烈抗议……最最强烈抗议……”不久，便被打哑，“完蛋”也就完蛋了。

“815”派爆破手去炸楼。第一个抱着炸药包冲上去，结果还未跑过马路，便被打倒在地。“815”集中火力掩护，才将他拖了回来。

然后又有第二个抱着炸药包冲过马路，结果还是没跑到交电大楼门边，便被打倒。

第三个继续上。这人运气好，终于把炸药包送到大楼墙边，拉燃了雷管，急匆匆跑回。那炸药包“轰隆”一声爆炸，将那砖墙炸开了一个黑洞洞的大窟窿。交电大楼却没有垮。那洞里黑忽忽的，什么也看不见，“815”不敢贸然冲锋。

激战至13日晨6时，交电大楼三层楼内起火，有人说是“815”派用反坦克火箭筒发射燃烧弹引起大火，也有人说是“815”派射去的信号弹起火，还有人说是“815”派用土制燃烧瓶扔进楼内起火，更有人说是“反到底”派为给“815”派栽赃而自己放的火……

正值重庆酷热的“秋老虎”逞威时节，大楼内的木地板及其它易燃物迅速燃成一片火海，烧至紧邻的化工原料公司、针纺公司等处，整幢大楼被毁，附近数十家民房也遭火灾。

重庆交电大楼是由交电公司与化工公司于 1956 年建成的，

四楼一底共 5 层，在当年周围那众多的矮小房屋之中，此建筑的确是令人羡慕的大楼。它的底层是水磨石地面，楼上都是木地板，主要经营灯泡、电扇、小苏打、柠檬酸等交电、化工产品，其中一、二楼分别为零售、批发，三楼以上是办公室。

交电大楼所在地，应该算是一片“福地”。抗日战争时期，这里是著名的四川美丰银行老板康心如的宅邸，当时门前这条街名为柴家巷，因此人称柴家巷康公馆。康心如从清朝末年的反清志士、同盟会员，走上“实业救国”道路，通过艰苦奋斗，诚信待人，成为闻名中外的金融家，并在抗日战争时期被蒋介石提名为重庆临时参议会议长，在担任议长期间，他倡议定重庆为陪都，并为发展大后方经济、推进抗战大业作了不少贡献。当年陪都商界、政界乃至军界都有不少名流来此做客。

1939 年日本对重庆的“五三、五四”大轰炸，市内居民死伤无数，许多房屋、街道变成废墟、瓦砾，惨不忍睹。为了让后人不忘 5 月 4 日的那次大轰炸，在废墟处新修的街道就取名为“五四路”。在这次大轰炸中，柴家巷康公馆居然没有受到什么损失，公馆院内没有掉一颗炸弹，只在公馆旁边康家的防空洞外掉了一颗炸弹。而康公馆对面的国泰大戏院，即正在与交电大楼进行对射的东方红电影院就被炸坏了，柴家巷、蹇家桥等街道及附近许多房屋都被炸毁。因康家的防空洞比较牢固，洞内条件也比较好，当时附近的电影戏剧界人士常来康家防空洞躲避空袭。

就是这样一片在当年日本飞机狂轰滥炸中都未受到损失的“福地”，重庆市中心繁华地带著名的交电大楼，在 1967 年 8 月 13 日的那场武斗中，烧了一整天，只剩下一个光架架。

在那次武斗中，“反到底”派财贸“井冈山”总部的负责人、重庆市一商局的一名共青团干部，见交电大楼顶上“反到底”的“战旗”被枪打倒了，奋不顾身跑到楼顶上去重树大旗，腹部中弹，肠子都打出来了，不过他被抢救过来了，至今健在。“反到底”派的一批增援人员从中华路绕过来，在实验剧场外面与从区交通局出来的“815”派人员遭遇，“反到底”派被打死了两、三个人。而东方红电影院这边，“815”派二机厂的一个工人胸部中弹身亡。

守楼的“反到底”在大楼燃烧后退到楼下，商量了一下，决定撤退。他们从大楼后面的窗户跳出去，穿过一条小巷，经过实验剧场，沿中华路到新华路，从文化街下去，最后撤到望江饭店。其中只有南山中学张新民一人在撤退时中了一颗流弹，从大腿里钻进去，又从另一面钻出来，穿了一个洞。好在没伤着骨头，只留了两个肉疙瘩在腿上。

“815”派 29 中“毛泽东主义战斗团”事先料到“反到底”的武斗人员会从交电大楼后面往青年路方向撤退，事先在学校围墙栏杆处布置好了封锁道路的机枪火力点，几挺机枪对准必经通路，红了眼的中学生们一心要为财贸俱乐部门前的死难同学报仇雪恨。但守候到 13 日晨，天都亮了，却一直未见“反到底”的人撤出来。他们疲惫不堪，便收起机枪回重庆宾馆驻地去了。谁知就在他们走后不到半小时，交电大楼内的“反到底”就从这条路上撤离了。若 29 中的学生晚走半小时，或“反到底”早撤半小时，很可能又是一场死伤惨重的血案。

交电大楼失守，望江饭店的“反到底”怕“815”集中兵力

来攻打，便放弃这个据点，人员全部撤到两路口一带去了。

就在“815”围攻交电大楼的8月11日晚，正遭到“815”派进攻的军工“井冈山嘉陵兵团”要求嘉陵江对岸的“反到底”炮火支援，军工“井冈山江陵兵团”用一门37高炮在江北农场隔江轰击“815”的进攻队伍。军工“井冈山江陵兵团”、“前卫兵团”、“长安兵团”还用三门37高炮，一门25四联机关炮在前往江北农场的路上沿途炮击重庆大学、二钢厂和嘉陵厂等“815”控制区，几乎整整炮轰了重庆大学一夜……8月12日早上，学生们检到100多个弹头。重庆大学《八一五战报》的主编周孜任在日记中写道：

“今晚又炮轰……嘉陵江漆黑漆黑的，连一只船都没有。山城死亡啦！真的死亡啦！什么也看不见，只有通红通红的炮弹在天空中轰轰地飞过，在山谷中引起一阵阵巨大的回响。”

8 月 12 日，重庆沙坪坝区嘉陵机械厂再次发生大规模武斗。双方直接参战人员均在 700 人以上，支援上万人，动用了枪炮、坦克。“815”用三辆坦克作前锋，其中一辆为解放牌卡车焊上钢板，安装上三七高炮和 12.7 高射机枪的土坦克。他们在坦克的炮击、射击下，一步步攻下厂大门左侧制高点和厂内水塔制高点。“反到底”抵挡不住，只得从后山下抢渡嘉陵江，撤往“反到底”控制的江北“解放区”。至 13 日夜，双方死伤上百人，经济损失 357 万元，“815”派攻占嘉陵机械厂全厂。

而在望江机器厂这边，望江“815”顶不住“金猴”的进攻，退入郭家沱中学，重庆军分区驻望江机器厂部队指挥部设在这里。这里也是望江机器厂区的制高点。8 月 12 日至 13 日，望江“金猴”进攻郭家沱中学，爬至半山腰时，埋伏在此的望江“815”

端起冲锋枪对着“金猴”扫射。“哒哒哒哒”，子弹像雨点一样射向人群，当即打死 8 人，另有开车前去抢救伤员的司机也被打死在驾驶室里。同时也将隐蔽在山包后的重庆军分区参谋长张廷勤和身边的两名战士、一名工人打死。

8 月 13 日，重庆大学风雨操场墙外的红岩造纸厂原料草堆被嘉陵江对岸“反到底”射来的炮弹打燃，数十吨造纸原料全部烧毁。

8 月 12 日，“反到底”得到消息，说“815”为了庆祝造反一周年，要在 14 日晚 12 时打过嘉陵江大桥，向“反到底”占据的江北区进攻。

“反到底”在其大本营，体育馆内的“工总司”司令部召开下属六大司令部和“工总司”负责人会议，其“江北指挥部”决定：“先发制人，你 12 点打过来，我就 11 点半打过去，打通嘉陵江大桥。”

会上制定了战斗计划，成立了战斗指挥部，并确定由李木森负责指挥。“工总司”与“江北指挥部”和长安厂“六月天兵”确定：打通大桥后，由“江北指挥部”和长安厂把守大桥，维护交通。准许货运车辆进城，允许农民进城卖菜，允许普通群众自由过桥，加强检查，凡携带武器者不准通行，军车也要检查，不准帮助运送枪械和军火。

同时，黄廉让“江北指挥部”的苏靖康和“工总司”的李木森做好炮手的思想工作，不要炮击民宅，在开炮之前要预先通知老百姓疏散。同时准备告知守桥的“815”，要求他们自己退出，还提前通知 54 军，要他们帮助做“815”的工作，请他们自觉撤

退，不要封锁嘉陵江大桥。当时也考虑到，有可能“815”得知进攻消息之后，调集大批力量过来，结果攻下不来。

会后，“反到底”放出风来：“8 月 15 打过嘉陵江，为‘815’派敲响丧钟。”

“815”赶紧调兵遣将，在朝天门、千厮门、红岩洞、临江门、黄花园、大溪沟、曾家岩、嘉陵江南桥头、牛角沱、李子坝、红岩咀、羊角堡构筑工事。增强人力，集聚弹药，准备打一场守卫战。

8 月 14 日，“815”以“公安总部”为首，并动用市公安局马克辛机枪等枪支在市中区制高点枇杷山公园上建立“枇杷山指挥部”。

下午 17 时，黄廉给 54 军打电话，54 军白斌副军长接的电话。

黄廉在电话中通知白斌，让他尽快做“815”的工作，从嘉陵江大桥撤走，否则他们就要炮击那里。

白斌赶忙叫黄廉不要打，说“一切好商量，要文斗不要武斗嘛……”

黄廉说：“你不要讲那么多了，赶紧做工作，如果 6 点钟之前他们不撤除对嘉陵江大桥的封锁，我们就要开打了。”

电话打完之后，由“工总司”、体委、长安厂联合发出声明，用高音喇叭广播说：“‘815’围困市中区人民将近半个月了，没有粮食蔬菜，我们不得已要用武力逼退他们，请周围的群众支持我们，尽快撤离。”

接着，又对“815”广播说：“嘉陵江大桥是重庆人民的大桥，

是重庆南北交流的要道，任何人、任何团体都没有权利封锁。为了人民的生存，要求你们在一个小时之内撤出。为了老百姓的生存利益，希望你们自觉放弃不恰当的做法。”

广播之后，附近的老百姓拖儿带女纷纷转移。

这时，“反到底”在江北区委和长安厂架设了十几门大炮。当晚 23 时 30 分，“反到底”从江北区的简家台、刘家台炮击对面江岸的大溪沟、曾家岩、黄花园。随后，又在香国寺、董家溪炮击对面江岸牛角沱。有人认为，“反到底”知道嘉陵江大桥有重兵防守，而且有解放军的守桥部队，不大可能直接进攻大桥。而有可能攻击江面较窄的大溪沟渡口和牛角沱渡口。“815”把武斗力量相对集中，加强防守这两个渡口。

夜里 24 时左右，情况陡生变化：茶园、陈家馆、三钢厂一带众炮齐鸣，炮弹接连不断向曾家岩、黄花园“815”占领的嘉陵印刷厂、第二轻工业局、6 中、人民小学飞来。“815”的大炮随即向江北区委，长安厂和三钢还击，但很快遭到对方炮火的压制。

偶尔也有炮弹飞向市委大院，因为听说“815”也有炮位设在市委背后。54 军在市委值班的干部张陵秋叫来两个通信兵，把楼上的电话通通搬到一楼。他和市委机关干部张光明就躲在一楼的桌子底下值班。

张光明他们在电话里接到报告：嘉陵印刷厂厂房着火，印刷厂里堆放的纸张着火燃烧，引燃了纸张仓库。一片熊熊大火，蔓延到了第二轻工业局办公大楼，染红了市中区和江北区的一片天。就在大家救火之际，第二轮排炮又扑天盖地而来。而且比第

一轮炮弹更密，轰击的时间更长。

下半夜，枪弹已经落到市委组织部、宣传部、国防工业政治部、办公厅、一、二、三号楼，以及饭堂、职工宿舍的房顶和院落中。

外边炮声越急，市委值班室的电话也越急。阵阵电话铃声没有断过。都是报告武斗情况的，都是呼吁解放军前去制止武斗的。

电话太多了，记录也顾不得做了。几部电话同时响起来，张陵秋就把听筒取下来摆在一堆，不住的重复吼着一句话："知道了！知道了！"

窗外不时有"嗖——嗖——"的流弹落地。张陵秋刚从越南战场回来，有实战经验。他叫张光明躲进双人办公桌底下，把电话机也拉进去，匍匐着身子，趴在桌子底上接听电话，他自己躲进另一个办公桌下。后来，他又把办公桌上的玻璃板通通抛出窗外，说这样可以避免流弹击中玻璃伤人。

双人办公桌下那个小洞，又矮、又小、又窄。天气热，加上紧张，摇扇子的功夫都没有，汗水把衣服、裤衩全都浸透了。蜷缩在里边实在不舒服，张光明把电话听筒撂在一边，爬出洞来透透气。他刚打算走出办公室，到后花园看看炮弹到底是从哪个方向飞来的。张陵秋飞也似的扑过来，一把把他拽住。张光明一个趔趄，几乎被掀倒在地。张陵秋大声训斥："找死呀？！"这老兄本来是个非常温和的人，竟然如此大的脾气，张光明感到震惊，乖乖爬回桌子洞以后，张陵秋才回到他那个洞里，伸出脑袋来告诉张光明：

"从声音判断，流弹就落在门窗外边。你到花园里去，保准

会打在你头上，不信明天看弹头！”

第二天他俩到后花园一看，果然遍地都是高射机枪的弹头。工人扫了好几畚箕，端都端不动。

## 第 820 回：邓长春，黄山警备司令部　弹雨飞，重大庆祝八一五

重庆 8 月 14 日的炮击使“815”派在曾家岩、黄花园等地据点的火力点受到摧毁性打击。二轻局大楼被炮火击中，整个大楼起火燃烧；6 中的一幢学生宿舍、嘉陵印刷厂厂房及部分设备被打坏，市委大院 1300 名干部的档案和大量文件资料被烧毁。直接经济损失 50 余万元。

15 日凌晨，炮击过后，“反倒底”的工人开始向嘉陵江大桥进攻。他们都是赤膊上阵，穿着短裤，手持步枪和冲锋枪，在桥上匍匐前进，以表示学习当年红军长征中攻打泸定桥的视死如归的决心。经过激战，军工“井冈山”长安厂兵团“六月天兵”等武斗人员作为前锋，在用汽车改装的土装甲车掩护下突过嘉陵江大桥，与从市体育馆开出的“井冈山”等“反到底”武斗队汇合，“反到底”派占领了嘉陵江大桥南桥头及上清寺地区，“815”大队武装人员向两路口、大溪沟方向溃退，散兵游勇、伤员担架混杂一起，沿途拥挤不堪。上清寺周围，中山四路一带，到处都能见到被打死的人。

嘉陵江大桥被“反倒底”占领后，黄廉来到“反到底”江北区委指挥部，那里已经一个人都没有了，全到武斗第一线去了。在大桥上，他看到两具尸体，还是打着赤膊的。第二天尸体就腐败了，“反倒底”把他们埋葬在桥头的花园里面。他又来到南岸三钢，那里也死了几个人，后来就埋在厂区，长安厂也有伤亡。

天蒙蒙亮，“反到底”的武斗人员冲进了市委食堂二楼。赶

走了住在楼上的 6 中学生，捣毁了他们设立的“32111”广播站。学生被赶出时，有个学生反抗，被枪毙在食堂洗碗池边，血流满地。武装人员见尸体颤抖，又补了一枪，脑浆迸裂。

在市委值班的张陵秋接到市委国防工业政治部值班人员打来的电话报告：布防在他们院子后头的“815 川煤兵团”被冲进大院的“反到底”打垮了。“反到底”俘获 1 人，枪毙在国防工业政治部门口的喷水池边。

市委办公厅大楼有群众打来电话：昨晚有上千居民到大楼底层躲避流弹。天亮时，大楼被冲进市委的“反到底”武装人员包围。躲避的群众出不了楼，回不了家。电话里还听得见小孩的哭声。

张陵秋打电话通知警卫连去处理。警卫连说，暂时无法去处理：一是情况不明，二是上级有命令，目前的任务是对一、二、三号楼布防，保卫“革筹组”的安全。

“反到底”已经占领市委大院大门、二门。办公厅大楼被困的群众已经允许回家，机关大门准出不准进。大院内，到处都是荷枪实弹的巡逻人员。“反到底”的岗哨，已经布置到了“革筹组”的一、二、三号楼外。他们与警卫连布防战士面对面站着，彼此距离不到 1 米。

这时，一号楼给正在值班的张陵秋、张光明他们打来电话，要他们拔掉所有的电话线，带走所有的文件、资料、记录，以最快速度立即撤至冰糕房的警卫连。

大家撤到警卫连后，在那里草草吃了早饭，过了约半个小时，54 军领导看“反到底”没有攻占“革筹组”的迹象，又通知大

家回到各自的办公室楼继续工作。

“反到底”说：刚才之所以在一、二、三号楼前面布岗，是防止他们的武斗人员冲击“革筹组”办公地，是保卫“革筹组”。现在他们已经撤除了岗哨，武斗人员已经从大院内撤除到大院外面。

此时，警卫部队在市委每栋楼前都增加了岗哨。还在几个不同位置架起了机枪。除了原来的岗哨外，每个楼还另外调来军人，风尘仆仆。一个个荷枪实弹，如临大敌。这支部队，显然是刚刚赶到的。一些战士还在抬沙包，挖战壕，加紧构筑工事，防止再来冲击。

回到办公室的张陵秋、陈本华，看见窗外有几个身高马大的人，扛着两挺重机枪，抱着几包炸药、提着手雷，背着满身的手榴弹，探头探脑地朝他们办公楼走来。张陵秋立马奔出去问，才知是“815”从火线上退下来的。之前，他们躲在市委任白戈院子后花园里，看见“反到底”的岗哨撤了之后才敢钻出来。他们想从三号楼的后围墙“借道”翻出去。围墙外边是“815”控制的地盘。“815”有很多武斗人员住在后面的卫生局、计委和市人委大院里。

说明了意图，只能给以方便。陈本华告诉他们，不用翻围墙，有一道小门可以打开，让他们走出去就是了。张陵秋提醒他们，墙外情况不明，带着这些武器弹药不好。最好找地方“坚壁”起来，免得给我们惹事。

后来，在市委大院的几个楼下和任白戈院子里，搜出多包炸药，花草丛中还找出了机枪、步枪及手雷等武器。应该是撤退的

武斗人员抛弃的。

这一仗打完之后，武斗人员为了安定占领区的民心，做了一些“便民”、“保民”的事情，当然方式方法不很恰当。例如，社会混乱，小偷横行。武装人员便在晚上 22 点到次晨 7 点实行“宵禁”。“宵禁”开始，派几队武装上主干道，从两路口到嘉陵江南桥头，朝天放几阵排枪。驱散街上行人，再定时巡逻。小偷怕死，就不敢进这个区域作案了。……

“反到底”还宣传：“我们‘反到底’爱护人民群众。不拿群众一针一线！我们坚决保护本地区人民群众的利益！”

说实在的，当时的武斗双方也确实都能够做到“不拿一针一线”。武斗严重时，有一幢楼的人跑光了。武斗人员为了控制住制高点，曾经侵占过楼上临街的两套房。主人不在，只好破门而入。把机枪架在当街的阳台上。武斗撤出时，破坏的门主动修复了，住户的东西一件未丢。武斗人员还给住户写了条子，放了钱，表示歉意。这显然是学红军，学八路！

8月15日，重大“815”在重庆3中运动场举行“815造反周年纪念大会”。纪念会原来准备14日举行，不意天公不作美，突然降起了大雨，遂改期在第二天。

之所以没有在重庆大学召开纪念大会，是因为江陵厂的“反到底”早在广播里说，要为“815”的生日放礼炮。而重庆大学在江陵厂炮火射程之内，绝对是不能聚众停留的。

重庆大学的广播每天也叫得厉害，要对岸的居民后撤，但完全是打肿脸充胖子。重机枪子弹打不到对方的阵地。那段时间，每天晚饭后，重庆大学的重机枪手们就出发了，开到江边阵地去

作象征性还击，毫无实际意义地把子弹打得劈哩叭啦山响。每天看见牛高马大的武斗同学扛着重机枪，神气活现地在校园走过，大家都要向他们致以愉快的掌声，而枪手也很理解地腾出手来感谢致意。8月14日这天，双方都发出威胁，要对方附近的居民后撤5公里。而重庆大学，这回是认认真真下了通知，实施灯火管制。此时的校园很凄凉，完全说不上节日气氛。

8月15日，在重庆3中召开的重庆大学“815”纪念大会上，重大“815”一号勤务员周家喻以主席身份作中心发言。接着发言的，有外地的清华“414总部”的“井冈红军”战斗队、“新北大公社”的“攀险峰”战斗组、西安交大“红卫兵总部”代表、“红卫兵成都部队”代表等等。本地的更多，都利用机会来这儿显示自己的团结和实力。

开会当天，江陵厂连续向重庆大学开炮，声称：这是为重大“815”鸣礼炮。那天大会后，举行了大型音乐舞蹈史诗《815风暴》的演出，演员们绝对非常卖力，但满天的炮火似乎更有吸引力。许多人仅仅将演出看了一半就走了，特地跑到位置比较高的学生宿舍屋顶上去观战，红通通的炮弹像急雨一般向电机系的教学大楼倾泻，炸出惊天动地的响声。直到天降大雨，他们才次第离去。

当天深夜，嘉陵江对岸突然传来几声巨大而沉闷的炮响。是重庆大学的炮队开炮了。重庆大学叫了很多天，要炮击江陵，只是在喇叭里叫叫而已。而这次不是虚张声势，动真格了，用的是真正的榴弹炮。而且是有引信的，由专业人士指挥的。共打了9发炮弹，击中江陵厂的一幢办公大楼，炸死该厂工人周厚才、陈

锋华和学生丁伯寿，打伤胡义衡等7人。

江陵厂被打懵了，对重庆大学的炮击声哑了3天，直到8月18日才又恢复。

原来，重庆炮兵学校和重大“815”关系不错。8月6日，重大“815”和第十八冶金建筑公司、二钢厂等单位“815”派武斗队到巴县抢夺武装部枪支弹药扑空后，来到解放军153炮兵学校，“抢”走该校教学用122榴弹炮一门，120迫击炮两门，炮弹一批，拉到重庆大学校内组成炮班。大炮来之不易，很珍惜的，“815”白天把它藏在防空洞里，打的时候才拉出来。

光有物质基础当然还是不行。硬件好还得软件妙。这就得承认人的因素了。几次炮战弹无虚发，打得如此专业水准，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每战均由炮校教官亲自指挥。

这门 122 榴弹炮从此成了“815”的英雄，哪儿紧急派往哪，哪儿需要就出发。8 月 18 日，调去攻打河运校、重医学院、潘家坪，8 月 28 日，调北碚歇马场炮击解放军总字 424 部队，即通信兵技术学校，3 次共发射炮弹 32 发。所到之处，无坚不摧，屋残壁断，天崩地裂。

停战后，物归原主，送走这门榴弹炮，哥儿们依依不舍。9月21日是送还日，301炮班的弟兄给炮口披红挂花，然后，一个个全副戎装，挨个儿和大炮站在一起照相留念。然后，敲锣打鼓将它送出学校，送回把它“抢”来的地方。

再说“88 海战”后，邓长春的“军工井冈山第一舰队”抵达九龙坡建设厂，得到情报，说“815”作了一系列打击返航郭家沱的“人民 5 号”和“嘉陵 1 号”的部署，专门调拨了 4 门

145 高射机关炮，安装在红港码头工事里，命令“机械兵团”开赴红港伏击，埋伏在红港五码头一个仓库里。

邓长春命令舰队暂泊九龙坡港。他将从建设厂随他一起撤出来的中学“井冈山红卫兵”组建为“反到底舰队”的海军陆战队，给他们发了队服，每个男生是一条白色卡叽布的短裤，一件短袖园领海魂衫。果然红卫兵们“旧貌换新颜”，个个短袖短衫精神极了。

8 月 15 日下午 15 点多钟，驻守在九龙坡的“反到底”全体武装人员在九龙坡港口一个大型仓库里开会，黑压压的坐了一大片，几乎把仓库塞满。由邓长春主讲。他首先对“井冈山”红卫兵这支从建设厂撤出来的队伍表示欢迎，他说：

“我受你们社长的委托，前来接你们。我们军工‘井冈山望江东方红兵团’欢迎你们！我们‘反到底’舰队更欢迎你们！”

他接着说：“我和你们社长通了电话，也与肖星民研究过，决定将你们这支队伍组建为‘反到底舰队海军陆战队’。如果 132 厂在重庆，我们还将组建‘反到底’空军，那时我们‘反到底’就具备陆海空三军了。”

邓长春又说起“88 海战”：“‘815’损失惨重，被我们击沉的‘军舰’3 艘，击伤 10 多艘，打死打伤不知多少，总之，‘815’被打得闻风丧胆，但是他们不甘心失败，他们正在抓紧时间调兵遣将、排兵布阵，构筑新的朝天门防线，妄图将我们‘反到底舰队’消灭在朝天门！呸，休想！我们逆江而上都能将他们打得落花流水，更何况，那时，我们是顺江而下。我们‘反到底舰队’的火力是无比强大的，就连中国人民解放军东海舰队司令见了我

们的舰艇火力配备都自叹不如，说超过了任何一艘东海舰队的舰艇。”

邓长春的精彩演讲赢得了同学们一次又一次热烈掌声，同学们的情绪被鼓动了，想象思维被调动了，似乎那威力无比的“反到底舰队”乘风破浪，直冲“815”朝天门防线。

邓长春将话锋一转，接着说：“不过，我们刚接到省革筹的电报，要我们‘反到底舰队’就地待命，不能擅自启航，等待以张西挺为首的省革筹调查组的到来，因此我们不能按原计划返航，就在九龙坡港口等几天待命。”

8 月 15 日的晚上，全体陆战队队员紧急集合，依次上了一艘轮渡船，在夜色的掩护下，悄悄地渡过了长江，登上了长江南岸。

晚上什么也看不见，大家凭着感觉一个跟一个地朝前走，最终来到了一个高大建筑物的前面，原来是位于南岸七公里半的重庆交通学院，现在的交通大学。重庆交通学院“915”的王兴国与邓长春紧紧握手寒暄，然后把他们带到了食堂。

吃完饭，他们在交院“915”向导的带领下向四公里方向的重庆二师和长江橡胶厂前进，然后从长江橡胶厂上山，沿着盘山公路上来到黄桷桠四女中处，再沿公路到达黄山疗养院。

登上黄山，观看市中区的夜景，虽不是万家灯火，但长江和嘉陵江倒映的无数灯柱，煞是好看。这天是“815”周年庆，但在战火之中，“815”也没有大庆，就连重大“815”也将庆祝会移到了重庆三中去开。

在黄山疗养院里，邓长春将带上来的全部人马作了统一安

排：司令部设在原蒋介石住的地方：云岫楼；井冈山红卫兵的女同学住在原孔二小组住的白楼里；望江武斗队“金猴”安排在孔二小姐住宅后面不远地方的一排平房里。这里据说是原蒋介石的侍卫队的营房。从建设厂撤出来重师附中红卫兵是单独安排在原马歇尔住过的地方，人称马歇尔草堂。

云岫楼

云岫楼

蒋介石与宋美龄在黄山防空洞前

蒋介石、宋美龄与美国顾问团在云岫楼前

黄山马歇尔草堂

马歇尔草堂在云岫楼的右下方不远的一个山坳里，四周树木

葱笼，多松树和青杠，还有一些竹林，与云岫楼之间有一条青石板路相连，环境十分清静。

晚上，江风吹来，引起松涛起伏，形成一遍怒吼，好生吓人。因为没有什么住家，也就没有什么灯光，四处一片漆黑。如果没有月光星光，那真是伸手不见五指，还是有点阴森恐怖之感。

马歇尔草堂右前方山头上有一个凉亭。登上亭子，极目远眺，整个渝中半岛尽收眼底，嘉陵江和长江在朝天门相汇，鸟瞰两江，江风迎面拂来。

第二天，邓长春把各单位的领队召去开了一个紧急会议，宣布“黄山警备司令部”正式建立，所有人不得随意出入。离队必须请假，有生人来必须报告。营地 24 小时要有人执勤，实行两小时一班的轮换。因为山下就是南岸上新街，是“815”的地盘，他们会经常来偷袭的。“警备司令部”组建一支宪兵队，经常巡逻，检查各单位的防务。

第三天下午，重庆“井冈山公社”社长徐光明从望江厂来到黄山，晚饭后，他召集在黄山的“井冈山红卫兵”见面。会后，又和重庆师范附中“井冈山红卫兵”负责人黄开全进行了单独的交流。

## 第 821 回：广州市，到处在“打劳改犯”　莫超海，被困总工会大楼

随着广州两派群众组织间的武斗不断升级，社会秩序日益混乱，各级军事机关屡遭冲击，连军管会也工作困难。

进入 8 月，一个离奇而吓人的谣言，在广州市民中传播。据说市收容遣送站放走了 84 名收容人员，并拒收从樟木头收容站送来的两车偷渡人员。这些“劳改犯”已经流入了广州市了，他们有武器、有军装、有机关枪，到处抢劫。广州市民的神经，在经过这几个月的动乱，早已脆弱不堪，刹那间，全市大街小巷炸开了锅。大家像着魔似地冲上街头，敲着铜锣，狂呼“打劳改犯”的口号。紧急的锣声，在夜幕沉沉的街头，传递着爆炸性的恐惧和焦虑，从西关传到东山、传到河南。胆小的人一听见锣声，便像置身极地冰川中瑟瑟颤抖。

原来，早在 7 月 15 日，省军管会值班日记中就有这么一段记录：

（十九号办谭干事电话）：市公安局第十三、十六处所属的劳改所犯人无人管。

温玉成副司令员批示：此事由革命委员会查办。

革委会查办的结果，没有记录。

到了 8 月初，各地都在冲击公安机关，情况就更加恶化了。8 月 7 日，市军管会一名参谋打电话向省军管会报告：

市公安局的公安人员都跑了，海珠区有三个犯人没有人看。东山区监狱有 19 人，郊区有 12 人，越秀区有 30 人，荔湾 20 人。

目前还有人看， 但力量很薄弱，没有接班。他们意见把犯人集中起来，派部队去看守。

（黄秘书请示白政委，同意他们意见集中起来派部队看守。）

8 月 8 日，市军管会又向省军管会报告了一个更加骇人的消息，这个消息和广州市哄传劳改犯流入市区的谣言，如出一辙：

公安局十六处在茶头的亚岗农场有五百多犯人，其中四类分子占 17%，从昨天到现在已跑了四百多人，还在继续跑。

流言四播，令人莫辨真伪。一位在商品检验局工作的市民向军管会报告："现有三千多劳改犯进入广州，昨天到处抢劫，群众联防后打死了一些，还抓到了一个头头。据说他们有军装和机关枪，他们准备今晚和最近几天晚上要反扑，大干一场，群众十分恐慌，现在不敢上街和上班，群众对军管会抱了很大希望，要求你们马上采取措施。"

实际上，劳改犯逃跑问题并没有传说中那么严重，而且也未对社会构成明显的威胁。但是，到了 8 月 11 日夜晚，谣言四起、人心惶惶，市民到处搜捕劳改犯，一旦发现可疑的陌生人，便穷追猛打，棍棒石头齐下，围观的人呼喝助威，好像着了魔一样。当第一抹阳光照在珠江河面上时，广州街头到处可见夜间被打死的所谓劳改犯尸体。永汉电影院门口有一个人被吊在树上还没死，群众仍然围着打；万福路也有 3 个人被吊起来，两个已经死了，一个还没断气，群众也不敢停手，拼命地痛打。惠福路、上下九路、北京路、丰宁路、爱群大厦、中山六路、解放电影院门前、东山等地方都吊着一具具尸体，在初秋的微风中晃晃荡荡，有些已经肿胀发臭。

市民打电话给军管会，愤然质问："现在广州市到处吊的死人有的已吊了3天，群众反映很大，据说劳改场跑出来的犯人，这些犯人到处抢劫，破坏文化大革命，现在街上到处是死人，市民十分惊惶，到处排队买米买煤，为什么军管会不管？"

8月10日，由原省文革办公室副主任戈枫领衔，9名原党政领导干部联名贴出大字报：《彻底清算陶铸在党内、军内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对广州军管工作提出了尖锐批评，认为军管会在四个问题上犯了"严重错误"：

一、对待左派组织问题：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派他们不是支左，而是支保。他们不是有错必改，而是坚持错误，不肯回头。

二、3月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逆流问题：在3月份来自陶、赵的资本主义复辟逆流中，党内军内的一小撮走资派和坚持招待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捏造革命造反派"牛鬼蛇神"多，围剿了革命造反派。

三、武斗问题：广州地区武斗越来越严重，武斗事件都是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派和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所造成的……

最近事件发展到一个极端严重的阶段，一些解放军手上的武器和国家的弹药仓库，竟任意由某些组织"夺"去，用以进攻革命造反派，而军管不"管"，警备司令部不"警备"。

四、对干部问题：……他们（军管会）一方面指责干部亮相倒向革命左派一边就是"拉一批，打一批"，并对他们进行恐吓和围攻，另一方面又亲自出马召开了一部分处以上干部的会议，策动他们"集体亮相"……以反地方主义复辟逆流来代替什么陶

赵及其死党，转移斗争大方向，以不分革和保的大联合，抹杀两条路线的斗争，来支保压左……

由于署名者都是原省委的领导干部，并得到原省委书记处候补书记张云的支持，因此大字报一贴出，马上引起轰动，许多原省委机关领导干部聚集在第七中学开会，讨论局势问题。

本来，到八月上旬，“红联”指挥部的一些头头就怀疑广州军区下边的团或师会不会搞兵变？所以提出建立沿江根据地，准备发生团、师级兵变时能坚持 7 到 10 天等待中央平叛部队平叛。

8 月 11 日，听说中央文革文艺组组长金敬迈要回广卅，“红联”指挥部武传斌即调 17 中“井冈山”等“红司”武斗队去白云机场保护，路上遇“主义兵”伏击，死 5 人。

这天，“红联”发出《特急通令》，公开警告广州军区：“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持枪是党和人民对你们最大的信任，任何人不得将枪口对准无产阶级革命派，对准自己的同志，对准人民，否则立即缴械，坚决制裁，严格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只能用毛泽东思想指挥枪，用政治统帅军事，打倒军阀主义、流寇主义，变相经济主义！”

“夺黄（永胜）、刘（兴元）军权，还我新广东！”

“坚决打倒广州军内一小撮走资派！”

“抓紧战机，向广谭发动总攻！”

“夺枪以后”；

“广州兵变的序曲”；

“发动群众反兵变！”

“广州告急！广州告急！广州十万火急！！！”

这一类的标语、传单、大字报和小报文章铺天盖地，转瞬间淹没了广州。

8 月 11 日，部分“红旗”派的民警、复退军人、工人、干部、学生组成了“广州红色警备司令部”，简称“红警司”，下设参谋部、 政治部、作战部等机构，配备有三个“警备团”，另有一支“前线突击队”，还派出巡逻车在市内巡逻，号称肩负起“强化无产阶级专政的责任”。

8 月 12 日这天，“红旗派”在省体育场举行“强化无产阶级专政大会”，宣布成立“广州红色警备司令部”，并发出坚决夺权的紧急通令。

“红警司”进驻旧陈列馆，提出要保护广州城的市民，维持广州城的治安。一群世事未谙，阅历未深的娃娃，居然口气奇大，自以为是正义之师，就是要先天下之忧而忧。

上午 9 时，“工联”开了两卡车人到人民百货商店所在的南方大厦，手执大刀、匕首、手枪、步枪、轻机枪，迅速守住了各个门口，逐层占领，直到六楼，并封闭了一、二、三楼，不准营业，做总部办公室之用。

下午，“红警司”与 8 月 13 日刚刚由广东省军区正式宣布摘掉反革命组织帽子的“八一战斗兵团”，也相继进驻南方大厦，声称广州警备司令部是“黑警司”，已经垮了，他们要保护大厦，司令部要搬进大厦办公，并成立“人民百货商店市场供应管理领导小组”，甚至向军管会提出，由他们负责保护全市的电厂、水厂、粮仓、市场供应，并要求军管会发枪给他们。

8 月 12 日，“红司”发表了题为《坚决打倒广州军内一小撮

走资派》的社论。

华师“红旗”更是耸人听闻地宣称：7 月中旬以来，广铁分局发生了一系列严重的政治事件，“无论在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都包含着兵变的目的”。一篇题为《粉碎广谭兵变阴谋》的文章写道：“军事上，铁路是必争的要害部门之一。广谭控制北站，目的在卡住广州市的咽喉，切断南北交通。加上广州市北部兵力部署的配合，这是什么阵势！”文章惊呼，“事实上广谭已完全控制了北站，大批主义兵已集结在北站（广谭允许他们吃饭不要钱）；广谭已公开反对中央铁道部军管命令，动用机密的战备系统，公开走上叛逆的道路；广谭正在调兵遣将……兵变的阴影笼罩羊城。”

还是在 8 月 12 日，又有两部卡车开到广州市内海军后勤部，抢了该部的军用卡车和两卡车武器。

8 月 12 日，省军管会收到来自广州基立新村、素社新村、万松园、南园新村、小港新村等地居民的来信，信内表达了人们对目前广州形势的强烈不安和愤怒，居民们埋怨，他们“被来犯的强盗弄得已五天五夜未睡觉了。生命安全受到极大的威胁。市面上什么也无买，米也非常难买到。”居民们警告说：“如果你们再不火速采取坚决有效措施的话，我们就联络各村的数万大男细女老老少少，进驻军管（会）及军区，并实行其他革命行动。”信封上没有贴邮票，而且还加注了一行字：“买不到邮票”。

当天，广东省军管会就劳改犯逃跑问题，请示中央：当劳改犯发生暴乱时，可否开枪镇压？

第二天，8 月 13 日，中央即答复：

一、发现暴乱，应首先向其警告，指出他们必须老老实实，不能乱说乱动，否则，将罪上加罪。

二、警告无效，发现暴乱、冲监或越狱逃跑，坚决开枪镇压。（以上两条可向群众组织讲。）

三、对外部夺取看守监狱部队武装的群众组织，仍应坚持耐心说服，说明利害，坚决不准开枪。（只限军内同志知道。）

为了稳定广州秩序，省军管会决定，由省军区分别派出三个巡逻队，负责四个区的治安。第一巡逻队在东山区，第二巡逻队在越秀区和海珠区，第三巡逻队在荔湾区。巡逻队的标志：中国人民解放军广州部队治安巡逻队。并知会各群众组织，希望共同协助维持社会治安，不要阻拦巡逻的解放军。

广州市民在惶急惊惧的心理之下，纷纷构筑街闸，建立联防。清末民初，广州由于治安非常恶劣，大街小巷几乎都筑有街闸。没想到今天竟重现广州街头。所有大楼的楼梯口都架起木闸，在天台构筑工事，贮存木棍、砖块、石灰等物，作为自卫武器。一些街道还组织起“家家户户武装联防”的“人民战争”，在道路上安置栅栏工事，派人持“冷兵器”和军用武器放哨站岗。各家各户每天晚上必须派人在房顶放哨值勤。一有风吹草动，便鸣锣传递警讯，各街闸立即关闭，行人绝迹。

各街的联防，实际上也是由两派组织划分地盘，各自把持的。

8月14日，周恩来在北京接见广州进京各群众组织代表。他批评一些群众组织冲击机场，强占超远导航台、抢夺民兵枪支的行为，严厉指出：“哪一派都不能动武器，都不应该去抢枪。要有敌情观念。现在公安部门瘫痪了，香港特务进来怎么办？外流

逃窜犯交给谁？抢光公安局的枪，我不能原谅。”

广东省军管会随即发出《告广州人民书》，要求各群众组织迅速交还抢夺解放军的武器，不准冲击军事机关，不准抢夺解放军的武器和军用物资，坚守岗位，抓革命，促生产。

8 月 15 日，原广州市委的一些领导干部在北京路科技书店三楼开会，讨论成立“中南、省、市革命干部造反联合委员会”，简称“革干联”。军管会闻之，立即分头约请一些主要干部谈话。

8 月 18 日，省军管会和原省委候补书记张根生谈话，张根生说：“关于原省委一些领导干部，目前在思想上比较苦恼的是如何认识两条路线斗争，怎样检查自己问题；也担心军区犯路线错误，有不少同志对造反派错误看不惯，现在都在考虑这些问题。有些人在转，有些人仍在坚持。”

8 月 19 日下午，军管会派人和原省委候补书记张云谈话，张云认为：“军管会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支保不支左，实际上是镇压了革命造反派。”“当前，武斗规模越来越大，次数越来越频繁，社会治安混乱，生产会受到损失，也会被敌人利用。这是两条路线斗争激化的表现，是个值得重视的严重问题，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非常担心，希望军管会采取有效措施。”

根据中央指示，军管会要求“红旗”、“东风”两派派出主要负责人上京谈判。

大家对谈判的意义并不明确，都是抱着向中央告状的心态。周恩来派了一架专机来广州接两大派代表赴京，代表名单是由广州军区通知的。军管会根据山头分配名额。“东风”派的山头大，但下属的群众组织数量少，所以只分到 5 个名额。“红旗”派的

山头小，但下属的群众组织数量多，所以有十几个名额。临上飞机时，“东风”派发现双方人数悬殊，顿时鼓噪起来，拒绝登机。广州军区赶紧解释说：“名单是周总理定的。”

“东风派”的代表不管这一套，说：“人数不相等我们就拒绝上飞机。”

这时，“红旗派”一批送机人员拿出手枪，指着“东风派”代表说：“你们敢不上飞机？”

“东风派”的团长孙亦武也拍着桌子站起来叫道：“你们几支破枪算什么，我们早有准备，我们‘郊贫联’的民兵营早已架了四门炮在机场旁边。你们枪一响，我们就炮轰跑道，把飞机也炸掉，看你们能怎么办？”

“郊贫联”的民兵有炮？军代表也摸不着头脑，只好叫“红旗派”的代表先上飞机赴京，“东风派”的代表留下来再谈。在商谈中，“东风派”要求代表数量要同等。代表名单由他们自己定。同时提出“东风团”代表团长改为“地总”的另一个主要头头莫超海。而此时，莫超海正被“红旗”困在省总工会大楼。

省总工会大楼当时在那一带是很有优势的制高点。该楼为“东风派”的“地总”所占据，而周边均为“旗派”势力，双方摩擦不断。“旗派”部署要以强攻拔下这个对立派据点。

8 月 18 日深夜，“地总”各分部正在省总工会开会，突然四周枪声大作，莫超海冲出门问：

“怎么回事？”

一名工人踉踉跄跄进来，尖声叫嚷：“旗派打来啦，把我们包围啦！”

莫超海三步并作两步，直窜上三楼，从窗口往下探望，街上人影幢幢，从几个方向逼来。枪口射出的火光，东闪一下，西闪一下，子弹在头顶呼啸而过。他觉得心脏像打桩机似地跳动起来。

“丢那妈，有好多个火力点。老莫你看，爱群大厦上面有一个机枪点，总烟一厂楼上有一个机枪点，陈列馆也有机枪点，业余大学楼上也有，工人医院右边也有。打得最凶是工人医院。”

“老莫，我们突围吧？”有人在黑暗中说。

“突什么围!”莫超海忿忿地说，“我们只有几十人，他们有几百人，你想去送死吗？文攻武卫，快用沙包把 4 楼的楼梯口堵上。我们上 5 楼坚守。”

“地总”的人匆匆搬出武器，撤上 5 楼，据险固守。楼下突然响起了“隆隆”几声巨响。莫超海听出是迫击炮的爆炸声，吓了一大跳。在密集的机关枪掩护下，进攻者迅速冲入大楼。他们一面从下往上一层层攻打，一面从旁边的二轻大楼搭竹梯通向省总大楼的窗户，横腰“飞兵突袭”。轻工业局楼上的几只高音喇叭开始喊到：

“‘红总’、‘主义兵’注意，你们已被包围，要造一小撮头头反，反戈一击有理。我们已占 4 楼，交枪不杀!”

莫超海凭窗观察了一会，吃惊地发现，这批进攻者非比寻常，似极有作战经验，当第一批往前压时，另一批在后掩护；等第一批占据了有利地形，便掩护第二批再往前压。有条不紊地交替作梯形前进。

8 月 19 日凌晨 1 时，战况转趋激烈，迫击炮弹落在总工会周围。“旗”派开始总攻了。莫超海向省军管会打电话：“我们可

能是最后一次打电话，‘旗’派打炮，电灯全部熄灭。情况紧急，请你们派部队救援！”

他全身筛糠似地发抖，这不是因为害怕，而是因为紧张、激动。他已经深深地卷了进去，每一根神经和每一个细胞，都在紧张地活动，亮闪闪的汗珠，从脸颊淌下，像胶水一样稠。

枪声愈来愈密。双方互相射击，有人中弹倒下，在黑暗中呻吟。“打中了！我打中一个了！”一个兴奋的声音大叫大嚷。莫超海来到伤员跟前，察看了一下伤势，鼓励他坚持下去。街上又响起了排枪的声音，子弹打在墙壁上，溅起细碎的沙石。

“你怕吗？”莫超海问伤员。

伤员没有回答，只是摇了摇头。

墙角那儿，有人低声唱着：“枪声一响，老子就下定决心，今天就死在战场上……”莫超海觉得眼眶有点潮湿。

在机场准备进京的“东风派”代表提出：“‘红旗派’不放人我们就拒绝进京。”

凌晨，周恩来从北京打来长途电话，命令立即停止武斗，撤走攻打总工会的“红旗”队伍。

莫超海提出，除非军队派人来接他，否则他决不离开总工会。

当晚 20 时，进驻旧陈列馆的“红旗派”那些中学生成立的“红警司”又如往常一样，坐着一辆吉普车去广州城的市中心巡逻，维持社会治安，连司机一共 7 人，手里都拿着一支木棒，沿着沿江路向东，转入北京路向北。当车刚进入北京路的新闻电影院的路口时，突然枪声大发，好像四面都发出了令人寒栗的尖叫声。吉普车已自身难保，更何谈维持秩序，只有夺命而逃，赶紧

飞奔而回驻地。当他们回到就陈列馆时，下车一看，吉普车已经百孔千疮，7 人中已死了 3 个。

第二天，广州军区派了大批解放军到总工会给“东风派”解围，周恩来也作了进一步指示，同意双方赴京谈判人数相等。就这样，广州两派群众组织各派 56 名代表赴京，莫超海作为谈判代表之一，于 8 月 20 日飞赴北京。

## 第 822 回：陈伯达，两次见天津代表　签协议，要求双方都放人

8 月 15 日，天津结束了政校和 609 厂武斗的两派人员，各选出自己的赴京谈判人员乘车来到北京，住在动物园那边的北京政治师范学校里。三楼是“大联筹”，二楼是“五代会”，门口有解放军站岗。领导都没有住在这里。

当晚21时50分至16日1时，陈伯达、谢富治在人民大会堂安徽厅接见天津市代表。在座的还有：北京军区代司令员郑维山、北京军区副司令员罗元发、肖文玖、副政委黄振棠、海军政治部主任张秀川；天津驻军负责人杨银声、天津市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成员江枫。

接见开始，陈伯达问：“上次开会，哪些人到了？”

有7名代表举手。

陈伯达看着代表名单问“大联筹”的代表：“你叫白金生？”

“是。”

然后又问“五代会”的林启予：“你叫林启予？”

林启予答道：“是，我是林启予。”

陈伯达又问：“你爸爸叫什么名字？”

“林少文。”

“他还有别的名字吗？”

林启予回答说：“这我就不知道了。”

陈伯达又问：“你爸爸读过书吧？”

林启予说：“读过。他是烟台海军学校毕业的。”

陈伯达看了看林启予问："你知道你名字'启予'是怎么来的吗？"他接着说："《论语》里有一句话，曾子有疾，召门弟子曰，启予足，启予手。《诗》云，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而今而后，吾知免夫！你的名字出自这个典故。"

原来林启予的父亲林少文和吉鸿昌是连襟，时任吉鸿昌的军械处长，中共地下党员。早在 1932 年以前，林启予在天津法租界的霞飞路的家，也就是吉鸿昌的家，就已经是中共地下组织的秘密联络地点了。1934 年吉鸿昌在这栋小楼里创立了"中国人民反法西斯大同盟"，亲任中央委员会主任，在三楼设秘密印刷室，出版了《民族战旗》、《华北烽火》等抗日刊物。这些活动都有中共党人参与，地下党的陈伯达、南汉宸、朱其文、宣侠父等人，就在他们家三楼办公，陈伯达曾在那里住过。

此时，吉鸿昌的夫人胡洪霞还活着，林启予回天津以后和她说起这天开会的事，她问到："这事谁管着呢？"

林启予说："是陈伯达。"

她说起陈伯达的外号："嗨，不就是'白毛狸'吗？我给他写封信，让他接见你。"

林启予说："不用了，现在陈伯达已经站在'五代会'这边了，基本上大局已定。"

话说回来，陈伯达跟林启予聊到这里，已看完名单，对大家说："介绍一下。"接着他逐一介绍了参加接见的各位领导，然后说：

"中央指定我们听听你们的意见。你们两方面，对天津的问题看看究竟怎么解决好？听得懂吗？"

大家当然听不懂他那道地的闽南话，于是，郑维山帮他翻译。

陈伯达：“你们大部分是学生吗？”

答：“大部分是工人。”

陈伯达：“关于天津问题，已经闹得很久啦，乱够了吧？有人说不是要大乱特乱吗？天津有个劝业场，听说自行车都不能走。中央开过会，要解决天津的问题。有些问题，还没有解决，你们又大闹了一通，大乱特乱一阵，你们觉着乱够了没有？”

众答：“乱够啦！”

陈伯达：“已经乱过两次啦。今年春天大乱一次，现在又乱了一次，在全国也算乱得相当可以的啦。”

谢富治：“天津算第三个大城市，乱数第一。”

陈伯达：“我看够啦。你们觉得不够，还可以再乱。天工‘825’你们觉得乱得够了吧？”

天工“825”赵健敏答：“我们是不希望乱的。乱不乱不取决于我们，而是阶级斗争的规律，是天津支左的问题，请首长注意66军的问题。”

谢富治：“可以发言了吧？”

陈伯达：“现在就发言吧。”

天津工学院一名代表起立发言。

陈伯达问：“你叫什么名字？”

答：“赵健敏。”

陈伯达：“是你写的给陈伯达的公开信？”

答：“是。”

陈伯达：“是你自己写的，还是别人写的？”

答：“自己写的。”

接着赵健敏汇报了政治师范学校和609厂武斗的情况。当他谈到609厂军代表支持该厂武斗时，谢富治说：“天津的问题，同志们到北京来过多少次，伯达同志也接见过多少次。现在发展越来越严重，发展到武斗，破坏工厂，破坏很大，不管愿不愿这样做，武斗仍然继续发生。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指示，要关心天津的事。这次伯达同志叫你们来，我希望同学们和工人同志们谈主要问题，具体事情就不要讲了。关键所在和如何解决这两个问题，希望多讲一些。如何按着主席思想，按着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按着中央文革小组的指示，按天津情况，处理天津问题。当然，这一派对那一派有什么意见，都可以阐述，但意见要集中一点。如说打架，十天八天也说不完，几百万人口的城市，打架天天有，都说不行，也不能一点不说。这是笔老帐。是继续下去，还是解决？”

陈伯达：“要解决一些问题，如解决武斗问题。还是要订一个停止武斗的方案。你说66军有错误，关键是支左的问题，也可以提。但乱了几个月啦，还是怎么治的问题。最后你们有什么好意见，对天津驻军有什么要求都可以讲。你是个头头，我的话可能不对。”

赵健敏念了一张传单，然后问陈伯达：“是否有一个关于保卫609厂的指示？”

陈伯达说：“我说过不要去攻609厂，这是国家财产。”

郑维山念了陈伯达和郑维山对围攻609厂的指示。

赵健敏说：“标题是他们加的。”

陈伯达说："不要讲究题目，要看内容，是从爱护你们出发的。我说了那么个意见，郑维山同志整理后，电话传给了你们。还是有效果的，你们接受了这个意见，我们欢迎你们撤退，我们就不再责备你们啦。"

接着，"大联筹"的代表白金生发言，继续说明这个问题。

陈伯达问："你是哪个组织的？"

答："'工农学革命造反野战兵团'。"

陈伯达："工农学太杂，又是工又是农又是学。你是哪个职业？"

答："三轮六社，蹬三轮。"

当提到李雪峰问题时，陈伯达说："李雪峰已不在天津，还攻什么？还搞一个'反李派'？"

天工"825"代表提到天津存在走资派复辟时，陈伯达问："阎达开是不是住在你们那里？"

答："来过几次，是从保定借来批斗的。"

陈伯达："住了多久？"

答："四、五天。"

陈伯达："李颉伯住过没有？"

答："没有"

陈伯达："天津问题，上次在北京开会，不是所有问题全部解决的。没有吸收到'五代会'的造反派，要继续吸收，是你们提出来他们不吸收，还是你们不参加？"

一代表答："参加'工代会'要表两个态：支持天津驻军，支持李雪峰。我们不支持，没叫我们参加'工代会'。"

接着，“大联筹”的代表谈到有的被打倒的走资派又公开出来活动了，不仅不检查错误，还说要算账。

陈伯达说：“没有做自我批评，还要算旧帐？关于这个问题，我和大家说一下。天津工厂系统站出来的干部很少，如不是大问题，有些错误，可以做自我批评，让他站出来帮助工作。几个月来，天津工业系统指挥不灵，只靠军代表是不够的，还要依靠群众代表和这些干部。犯些错误，欢迎做自我批评，得到群众谅解，可以出来做工作。没有做自我批评，当然群众就怀疑了。一般错误，应该做自我批评，就会得到群众谅解。”

当有的代表谈到支持武汉的游行，是向“大联筹”示威，他们大喊“66军就是好”“天津驻军就是好”时，陈伯达说：“不错嘛！”

“五代会”代表鼓掌，陈伯达：“不要鼓了，鼓掌他们就不高兴了。你们这个会秩序很好，不管什么意见，都能心平气和地讲，不打断对方讲话，证明天津问题是可以搞好的。你们这一派讲得不少了，现在让‘五代会’的同志讲讲吧？”

“大联筹”代表未理睬陈伯达的意见，继续发言。说到天津武斗背后有黑手时，陈伯达问：“哪里来的黑手？”

答：“66军领导。”

谢富治说：“不见得吧！”

陈伯达：“个人猜想。”

谢富治：“插一句话，天津是伯达同志管的，我是来学习的。”

陈伯达：“我也是来学习的。”

谢富治：“武汉出了个陈再道，青海出了个赵永夫。只有一

个陈再道，一个赵永夫。他们不是一般错误，是一种叛乱行为，是针对毛主席、针对中央文革的。至于我们军队在支左工作中，犯过这样或那样的错误，但不能套，不能天津也搞个陈再道，张家口也搞个陈再道，到处搞武老谭，陈再道。不要上纲上得太高了。上了没关系，上了要降下来。青年人上了纲，可以原谅你们。要相信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缔造的、林副主席亲自领导的解放军。伯达同志、江青同志都说过天津部队是个好部队。”

“五代会”代表鼓掌。

谢富治：“不要鼓掌，鼓掌容易帮倒忙。”

陈伯达：“我讲两句，也可能帮倒忙。天津第一次大乱的时候，66军起了很大的作用，起了稳定天津局势的作用。当时天津公安局瘫痪了，整个天津瘫痪了。去年冬天我和王力同志去过天津一次，很乱，吃了一顿饭就走了，后来听说更乱了。66军接管了公安局，就平静了嘛！群众放炮竹，表明了群众的态度。你们放了吗？”

答：“放了，现在不放了。”

陈伯达：“你们以后还要放的。”

当“大联筹”代表谈到3527工厂扣河北大学“井冈山”同学及解释在武斗中破坏机器问题时，陈伯达说：“你们发生两件大事，破坏了两个工厂，”

郑维山：“还有一个铁路调度所。”

陈伯达继续说：“我和谢富治同志、郑维山同志商量派人去公平地调查一下。我们不赞成破坏工厂，不赞成破坏！国家财产嘛！你们发言不少了，现在请‘五代会’的代表发言。”

“五代会”代表林启予发言。谈到天津“走资派”没全打倒，李立三、阎达开等人还在活动。

陈伯达说：“大联筹，你们要注意这个问题。因为我和谢富治同志还有别的事，你们发言暂时到这里。为什么找你们两派来，人数一样多，目的是要你们互相谅解，首先达成一个停止武斗的协议。不达成这样一个协议，并付诸实施，就不好谈了，就要僵持下去，乱下去了。根据你们今天的情况，可以搞一个停止武斗的协议。每一方派3至5个人，你们自己谈，自己达成协议。不仅仅是‘停止武斗’四个字的问题，还要有具体措施。听说你们都装备起来了，刀、矛、火药都有了，这些在协议中自己去解决。你们自己谈，自己达成协议，不是我们强加于你们。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指出群众要自己教育自己，有争论，自己商量解决，不然就无从谈起了。同意的话，军队派人参加，必要时公安局也参加一个人，拟一个稿，交两方群众讨论、修改、补充。你们有很多有文化的人，讲话比我漂亮，你们一定能搞好。你们赞成不赞成？”

众答：“赞成！”

陈伯达：“主席很关心天津问题。天津与北京密切相连。你们知道天津的名怎么起的？天津就是上天的道路，到北京要通过天津，天津是北京的门户。你们要把天津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好。达成协议，就要执行，要有具体部署。你们还有想干的样子是不是？你们是不是还要大搞武斗？搞过了嘛！是不是不要搞了。按着你们今天的这个态度，我看是可以达成停止武斗的协议的。”

谢富治："我同意伯达同志的这个意见。三方达成一个协议，一方是'大联筹'，一方是'五代会'，一方是夺权筹备小组。我们参加你们的签字仪式，总理也可能要参加的。

……武斗，这是一股歪风，北京正在刹这股歪风。这个东西，干扰了我们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歪曲了江青同志'文攻武卫'的精神。江青同志是针对河南'二七公社'的情况讲的。他们造反派力量小，保守派力量大，不武卫要吃亏。你们不是这种情况，是革命派之间搞武斗。天津的保守组织，过去同他们还未发展到今天这样。革命派之间，武斗比过去发展了，这是用处理敌我矛盾的方法来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离开了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有的代表提出对方扣着人。陈伯达："双方扣的人，今天晚上要全部放掉，无保留地全部放掉。能做到吗？"

众答："能！"

陈伯达："现在是一点钟。你们打电话回去，三点以前全部放掉。好，散会。"

8 月 16 日晚上 22 时至第二天凌晨 2 时 30 分左右，陈伯达、谢富治第二次接见天津代表。参加接见的还有李天佑、郑维山等人。继续解决制止武斗的问题。陈伯达进场后先问大家："你们打电话没有？扣的人放了没有？"

双方在回答问题时互相辩论，争吵不休。

陈伯达说："昨天没有放的就算了。现在就放，12 点（指当晚 12 点）前全部放完。不放就不谈了，就散会。同意不？"

双方都表示同意后，陈伯达要求双方各出 3 个代表签字。然

后中间休息，要两派马上打电话通知放人，放人之后再谈。

17 日 1 时 30 分继续开会，陈伯达同意双方各派一名代表，军管会出一名代表，回天津检查放人的情况，并要求双方协商拟定制止武斗的协议。

这期间，谢富治还有一次单独接见，参加人主要是“大联筹”的工人代表，“工代会”的代表旁听，江枫参加了会议，主要是解决天津港武斗问题。这次武斗规模很大，造成了天津港全面停产。白金生领导的“荣复转退军人造反总部”参与了这场武斗。谢富治发言，直截了当地点了白金生，下令“今天晚上 12 点以前必须把你的人全部撤出，我进驻部队一个团，你们的人要是不撤出，就逮捕你们。不能影响天津港的正常作业。”

“五代会”姜卫东这时候站起来，哇啦哇啦说了一通，说得口吐白沫。

刚一散会，江枫就叫住工代会负责人林启予说：“这个代表撤，给我换一个，谢副总理说话了。”

帮倒忙了！人家上边调子都定了，你就别再激火了！林启予就找姜卫东谈：“你回去吧，谢副总理发话了，我也保不了你了。”

散会以后，谢富治叫白金生立即打电话，把他们的人都撤出来了。

## 第 823 回：周恩来，再次见湖南代表　夺军权，继续发反周传单

8月15日晚23时50分至16日3时，在人民大会堂小礼堂，周恩来、戚本禹又一次接见湖南代表团及全体工作人员和在京的湖南群众，逐条、详细的讲解《中共中央关于湖南问题的若干决定》。

周恩来说："关于湖南问题，在大前天我们已经结束了。不过，后来跟两方面的同志单独会谈、分别会谈的时候，还有一、两千湖南来的同志，因此，我们今天补开这个会议，再见面一次。"

周恩来又开始逐条宣读并解释《决定》，并再次代表中央对《二四批示》承担了责任。

谈到湖南"红旗军"的问题，周恩来说："'红旗军'的问题比'湘江风雷'要复杂。因为'湘江风雷'仅仅是属于湖南的组织，负责人也来过北京，比较清楚一些。而'红旗军'比较复杂。在全国来说，是荣复转退一个跨行业的全国性组织，从这里往外地发展。这个组织，在去年11月份，林副主席批的对南京军区的一个批示上就指出了：荣复转退军人不应该单独成立、也不应该成立跨行业组织，而应该参加所在生产单位、工作单位的战斗组织。不然，除解放军外，民兵系统外，还有另外一个军，全国还有另外一个军事组织。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批准了这个批示。因此，我们就通报了全国军事部门，转告各群众组织。但是，当时荣复转退的代表在北京不大愿意接受这种意见，到中南海请愿。12月份我见了他们的代表三、四百人，把林副主席的批示、主席批准了转告他们，建议他们不要成立这种组织，还是按照自

己所在工作岗位分别参加自己本单位的战斗组织。当时他们同意了。但他们要搞全国联合。当时我说，全国不许有这种联合。可以根据大、中城市的情况，每个城市设一个联络站，由民政部门、动员武装部门负责那里的荣复转退的登记工作，一旦有事就动用，如果有困难，就帮助解决。当然这里也是一分为二，好人多，不服从中央决定的是少数。当时他们开了一个大会，借了军用卡车，在北京游行。有人带头，有3辆卡车一直冲进中南海西北门。有军队说服了他们，他们退出去了。对这种行动，由于北京的舆论不同情，他们就回到各地了，荣复转退的名义也少了。有的实行中央决定，参加到所在各单位的战斗组织里面去了。但是还有一部分改换了名称，其中就有一个叫‘红旗军’的。这个组织，总部在北京，是由几个坏头子操纵的，在北京搞打砸抢，甚至在大连闹事，后来我们发现了这几个人，把头头捕起来了。他们夺我们的枪支。我们搞政治攻势，谈话后，他们放下了武器。他们跟香港的特务有关系。他们在部门中、机关中有联系的。当时有的机关部门把他们扭送到专政机关，我们还是把人放了。因为只惩办几个头子，对受蒙蔽的群众我们没有追究。在大连也把坏头子捉了。哈尔滨一月份由造反派夺权了。他们改了名义，叫‘后备军’，欺骗群众，勾结保守组织，搞反夺权。因为革命群众和解放军识破了，把他们瓦解了，群众觉悟过来了。”

周恩来又举了贵州、浙江等地“红旗军”的例子，接着说到湖南：“所以，在当时的情形下，确实我们对湖南的‘红旗军’头头也是跟其他地方‘红旗军’头头同样看待的。据现在调查，据‘湘江风雷’的同志说，还有其他革命组织的同志说，‘红旗

军’的下层还是好的，有的工厂里还是好的战斗组织。但他们的头头现在是不是也是好的？是不是跟别的地方的‘红旗军’毫无一点关系？在这个问题上，中央还要作一番调查。为什么？因为‘红旗军’的关系不像‘湘江风雷’，他的头头关系复杂。当时‘红旗军’的头头，跟在湖南退休的不满的军人蔡爱卿有联系。他在军队里总不想做副职，50多岁了，一定要做正职，掌权，甚至不满意分配他的工作，始终说怪话。有几个问题，一个是1959年批判反党分子彭德怀前后，公开站在彭德怀一边，反对我们的毛主席。他公开说他是彭派，别人是毛派，要把解放军分成两派，他这样狂妄已极！另外，他的医生周潜川，完全是用骗人的医疗办法，骗钱、骗地位，窃取情报。而蔡爱卿同周潜川打得火热，密切来往，最后成了儿女亲家。这样一个人在军队里面是一个败类。他不满意在山西当副司令员，闹退休。这个问题很多人都知道。所以军区让他退休了，住在长沙。他在长沙搞了很多地下的、不公开的活动。‘红旗军’成立时，他的妻子韩景平，开始时是做‘红旗军’的宣传部长，后来表面上辞职了。她这个辞职是不是真的还得调查。为什么？因为蔡爱卿在最近几个月(可能以前就是)跟另一个彭德怀的死党吴自立来往密切。吴自立原是湖南省军区副司令员。1959年批判反党分子彭德怀以后，他仍然出来替彭德怀说话，以编写革命斗争史，编电影《怒潮》为名，明目张胆的宣传彭德怀。中央认为，吴自立是犯严重错误，甚至于是不能信任的，而蔡爱卿跟他来往密切。最近，他骗了‘青年近卫军’小将，把他送到北京来了，‘湘江风雷’把他逮捕起来了。蔡爱卿有一种暗中活动，据我们知道，蔡、吴他们在长沙的活动，

还不止此。所以，‘红旗军’的领导究竟是否还有蔡、吴党羽？当然我们还要作些调查，就是文件上所说的要调查清楚。我们希望，将要成立的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和造反派‘工联’、‘湘江风雷’、‘青年近卫军’等都帮助我们调查、弄清情况。至于原来‘红旗军’下属各组织，毫无疑问，在工厂、机关、学校里，是革命组织，应该承认，过去取缔的，应该恢复，跟‘湘江风雷’一样。唯有‘红旗军’这个名义，和现在的首脑，希望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和各群众组织和中央调查清楚以后再做决定。这个问题，跟同志们说清楚。”

对湖南的“工”“湘”两派，周恩来说：“我们很满意地看到你们昨天在北京开了两派的团结大会，虽然我们没有人参加，听你们两派都说开得很好。我们现在高兴地庆贺你们。希望你们把这种精神带回到长沙去，到长沙也开这样的团结大会，在全省有机会也开这样的团结大会。”

对“高司”，周恩来再次希望湖南的造反派允许他们改正错误。他说：“把大多数群众，包括在湘潭的‘高司’的同志，而且到郴州、保靖、黔阳、益阳、常德等地的，都欢迎他们回来参加生产，参加工作，搞斗、批、改，这样就能团结更多的人。不要拒绝，因为你拒绝，一方面他不敢回来了，另一方面他感到没有出路了，就铤而走险，更加对抗，这是不利的。”

“湖南的今天，长沙、株洲的形势很好，但外地的形势还没有都转过来，还需要你们做更多的工作，特别是湘潭很紧张，希望你们督促协议的实现，首先是造反派要模范的遵守，如果他不执行，更暴露他，他更脱离群众。”

“另外，我们希望站在‘高司’观点的5位同志写信给我们，承认当时他们所认识的错误，不过经过12号把决定宣读以后，写信的人的态度又有所改变。我们要提醒写信的同志，他觉得他一点责任也没有了，既然《二四批示》是中央的，他们拥护中央批示，就是说军区做对了，他们没有错误，他们是革命派，把他们说成保守觉得冤枉了。我觉得这个问题倒是值得讨论讨论。《二四批示》对‘湘江风雷’作了错误的估计，连今天我已经谈了3次了，也许是4次了。写信的同志应该想一想，中央批示写的很清楚，军区把它扩大化，少数头目就变成了几万个头目，组织就变成了全部是反动组织了，打击面这么大，这些责任不能都由中央来负嘛！特别是进行武斗，组织‘红色怒火’，组织‘武工队’进行武斗，这些中央都没有提倡嘛！现在军分区、人武部结合在一起，比方湘潭开了几辆坦克向易家湾、渌口进攻，这个中央也没有提倡嘛！所以，一个群众组织的领导人要革命的话，就应该采取革命的态度，就是说要毛泽东思想挂帅，才是心情开阔，有革命的气概的人，是错了就敢于承认错误，而不要把原来承认的错误收回去，责备中央，责备军区，责备造反组织。我说这段话，把道理说清楚。回过头来，不能因为我说了话，造反派就追究谁写的，要斗他一场。希望他们能够逐步认识错误，他们自己组织的群众来批评他们的错误，而不要另一种组织来批评他们。”

“今后在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的领导下，来建立群众性的革命武装。当然首先要把现有的群众组织、较为可靠的群众组织以及拿着武器在手的，加以考核编组，不可靠的要收回，拿多了的要收回。是不是可以成立一个文攻武卫指挥部，由解放军做头子，

来把现有的武装以及武装组织加以整顿，然后把可靠的工厂里面的产业工人有组织、有训练的武装，在解放军的指导下，自卫和保卫国家财产，协助维护长沙比较乱的社会秩序。这样，有可能对流失在社会上的一些散乱枪枝、游离分子的武装收回，也可能防止再有人抢劫解放军枪支弹药的事情，这种情况不能再允许，从你们回去以后，就要停止。”

就在 8 月 15 日这天，湖南“红中会”一中“夺军权”起草了《彻底批判周恩来的二月提纲——初评周恩来 2·17、2·21 在财贸口农林口讲话的实质》的传单，并由一中“放眼量战斗队”翻印后在长沙散发。传单称：“周恩来步彭真的后尘，泡制了一个没有正式文件的二月提纲，为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保皇派提供了理论工具，周恩来一声号令，全国规模有后台，有计划，有目的，有步骤，有统一指挥的所谓‘二月镇反’就开始了。”

传单称周恩来 2 月 17 日对财贸口，2 月 21 日对农林口的两个讲话是没有正式文件的“二月提纲”，并且罗列了 12 条罪状，批判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明明是前所未有的崭新的大革命，比苏联十月革命和 49 年的新民主义革命伟大得多，深刻得多，它是要解决社会主义社会里复辟与反复辟、政变与反政变的问题，它的革命对象和性质和 49 年是不同的，但是周恩来从资产阶级革命者的世界观出发，把现在的夺权斗争歪曲为‘49 年夺权的继续’，妄图把文化革命限制在民主革命的范围，纳入他的资本主义轨道，把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拉到民主革命的阶段，实际上就是资本主义复辟。

毛主席历来主张：‘凡中央机关做坏事，我就号召地方造反，向中央进攻，各地要多出些孙悟空，大闹天空（宫）。’而周恩来却毫无阶级分析地，笼统地说什么‘中央的权不能夺’，请问：难道刘少奇掌握了权，革命造反派不能夺吗？难道彭罗陆杨掌握了权，革命造反派不能夺？真是岂有此理！无产阶级革命派就是要夺以刘少奇、周恩来为首的‘伪中央’的权，夺定了！怎么样？！”

8月16日，湖南“省直联”在省人委礼堂召开形势报告会，主持会议的李淑琼请“红中会”小将介绍情况，“红中会”李昆明当场抛出炮打周恩来的材料，并说：“一年不行两年，两年不行五年，五年不行十年，一定要把周恩来拉下马。”“不把周恩来拉下马，誓不罢休，死不瞑目。”

## 第 824 回：连续见，湖南工湘派代表　总政瘫，军委四人组成立

8月16日晚23时50分至17日2时30分，周恩来、戚本禹再次接见“湘江风雷”在京代表。

周恩来询问刚从长沙来的“湘江风雷”8名代表的情况及各群众组织情况。当他听到“夺军权战斗队”这个名称时，当即就说：“啊！一中还有一个‘夺军权战斗队’，这个口号就不对头，夺谁的军权？谢若冰，你是‘红中会’的，夺军权是不对头的。”

周恩来看到“孙大圣”负责人邹定国的面部被气枪打伤尚未痊愈，便对他说：“你可以晚走几天，到反帝医院去检查一下，由联络员同志办一下。”

周恩来说：“现在，第一步先组织一个文攻武卫指挥部，群众代表双方各一半，由解放军负责指挥。”

众代表说：“‘工联’把自己下面的当炮灰，枪口对自己。现在要联合必须坚持原则。筹备小组的名单长沙已贴出大字报，筹备小组不是自下而上来的，是包办代替，长沙有百分之六十群众不相信筹备小组，长沙市大联合必须以‘湘江风雷’为核心。”

戚本禹：“毛主席说，有些组织提出以自己为核心，这是很蠢的。我的理解，这是强迫别人承认自己，这怎么能行呢！当然，现在也不能提以‘工联’为核心。只能提以毛主席为核心。你们可能说不理解。毛主席的指示理解不理解都要执行。不执行主席指示就不是左派组织。这样提出是很蠢的，你们要觉悟。毛主席为核心，这是历史上形成的，群众拥护的。在历史上，王明、李

立三提了以自己为核心，张国焘就更是了，还搞了第二个中央。凡是老是强调以个人为核心的，最后都没有好下场。凡是埋头苦干，想阶级问题，想中国问题，想世界问题，都是真正的核心。毛主席这个指示，不要出小报，嘴要牢些，可以宣传精神。”

“不能个人提以自己为核心，只有联合起来才能成为中心。我们中央不提以‘工联’为核心，也不提你们为核心，现在提谁为核心，历史条件都不够。”

“现在有这个司令，那个司令，怎么不打架呢？比如抗日战争时期，那么多的司令，有真司令，也有假司令，最后形成核心的是毛主席的司令，以中国共产党为核心。”

“中央《决定》是毛主席批的，经过中央讨论的，你们要执行。”

有人说：“第一个代表团有问题。”

戚本禹：“那是经过你们讨论的，并经黎军长报中央批的。黎原同志，华国锋同志，章伯森同志，这3人是毛主席批的。黎原同志是经过考验的，47军是优秀的部队。当然不是说下面没有缺点错误。特别对待陈再道的问题上，47军表现是很好的。你们对47军不能乱造反。黎原同志、郑波同志是经过考验的，是很好的。你们说你们是左派，我还要看一看，要看看你们掌握毛泽东思想到什么程度。你们才是半年多的左派，不要自封左派。我看到标语上写‘戚本禹同志是左派’，我身上都出汗，感到紧张。自称是左派的，决不是左派。因为自封左派后，就飘飘然了。必然是，不是向左靠，就是向右靠。现在有两个左派，你们是左派，黎原是左派，我更相信黎原这个左派，我们要相信黎原同志，因

为你们没有参加过战争。战争的考验是最大的考验。你们还没有参加过战争。

华国锋、章伯森同志，我们认为在湖南是比较好的。我们中央是了解的。华国锋同志过去是有功的，能力还比较强，是经过毛主席同意的。”“对老干部要尊重，因为他们在长期斗争中，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做出了贡献，没他们奋斗，哪有今天？……走资派要打倒，但那是少数。多数是好的。若是没有他们，你谢若冰可能还是童养媳。你海司令还不知怎样？要尊重他们。听说你们一回去就要斗华国锋同志，我真担心你们！这样做很难说是革命的感情。你看一年嘛！还有第二次文化大革命，再不行，再打倒！”

“还有章伯森同志，章伯森同志是有缺点有错误的，但他是你们湖南较早站出来的一个领导干部。湖南领导干部有个问题，就是逃跑。历史上的李维汉跑过，张平化跑了，都跑了，唯他不跑。你们说他狡猾，我看他很老实。他没有跑，可他自己说，当时是跑不了了，受到了教育不跑了。他还写信给中央，给你们‘湘江风雷’翻案。那是冒着风险支持你们的。”

有人问：“他什么时候给中央写信？”

戚本禹：“那是三、四月份。但你们翻身后，就要打倒人家，起码这是不公平吧？”

“所以，黎原、华国锋、章伯森3同志组成的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是合理的、是正确的。如果不正确，伟大领袖毛主席能批准吗？如果你们不能接受，我为你们担心，这样搞法能否受到群众拥护，是很可能要犯错误的。同样，‘工联’不能很好举起大

批判旗帜与你们大联合，也要犯错误。希望你们来了，就要扭转这种情绪。接受中央《决定》，如果听中央的话就是‘右’了、‘修’了，你把自己放在什么地位？要做工作，不要怕别人说‘右’了、‘修’了。这不是说毛主席、中央‘右’了、‘修’了吗？我真担心呀！难道中央变成了修正主义堡垒了，就是你们革命，那还怎么相信中央、相信群众呢？”

张楚楩：“现在就是有人这样，一说不同意见，就说人家‘右’了、‘修’了。”

一名代表当即责问：“你说谁说了？！”

戚本禹：“你看！你们是一派的，还打架！希望你们和你们说的‘右’了、‘修’了的人谈谈，希望你们考虑3天，如果不通再写信来谈，事情总是复杂的，要从多方面想，不能解决，我还可以去谈谈。”

周恩来：“筹备小组名单你们有意见，那是8月7日，谢若冰打回电话的，我看了她的电话稿，那是对的，老实的。你们要信任她。不能因为她听了我们的话就‘右’了、‘修’了。这怎么能行呢？”

一名代表：“光靠上面恩赐是不行的，要有个认识过程，要民主选举。”

戚本禹立即批驳：“主席批示的，怎么叫恩赐呢？”

周恩来：“各派人选由各派去选。但不能搞资产阶级的民主形式。两方选出后，双方要协商，双方都不能强加于人。”

接着，周恩来，戚本禹又接见湖南“工联”代表，“工联”代表做了检查，也给“湘”派提了些意见。

周恩来："现在要求你们双方合作，联合起来，首先停止内战。胡勇你们几位负责人要很好的说服工人，联合起来。内部一致了，才能把对外搞好。把秩序搞好，47军把枪支调来，才能维护社会秩序。刚才说服了半天'湘江风雷'，看来你的工作也不是那么容易。你们是工人阶级，要做模范，他们多是青年，多是学生。"

"听说你们把'高校风雷'都赶跑了？"

一代表："是因为他们反对你，我们认为这就是反对毛主席的司令部。"

周恩来："那是少数人，不要那样搞嘛！要把矛头对准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要看大方向，要讲团结，要把长沙建立一个革命新秩序，这是第一件大事。"

"工联"仍有人给"湘"派提意见。周恩来说："你们是左派，要严格要求自己，多多批评自己，要求大同存小异，你们多是工人，应该把政策性提高一步。你们同意成立指挥部，应赶快搞起来。指挥部的人数双方要同等，双方各推选自己的，也要相互协商。华国锋、章伯森同志要多做他们的工作。"

"工联"提出8月19日"高司"可能要进攻长沙。

周恩来："要看主流，最近林副主席报告中讲的很清楚，不要怕，要有信心。"

戚本禹："如果他们真来进攻，那好！他真打，47军也不是吃素的！"

周恩来："现在要把指挥部组织起来，还有47军来保卫嘛！要是暴乱就可以解决嘛，要是开来了坦克，把履带搞掉，就可以

活捉。”

“你们首先是搞起文攻武卫指挥部，组织20个连，3000人，规定几条，树立起威信，才能解决问题。现在你们找到了一个组织形式，赶快组织起来。”

接见完“工联”代表，周恩来、戚本禹马上又于8月17日4时50分至5时35分，同时接见“工联”、“湘江风雷”双方代表。

首先确定了黎原、华国锋、章伯森为湖南革委会筹备小组领导人。然后又商定了筹备小组人员和群众组织的成员，周恩来要求“工联”和“湘江风雷”双方人数相等。

对“文攻武卫指挥部”，周恩来说：“双方各1500人，发枪1000条。”“指挥部下设的各级也是双方各一半人。比如参谋5个人，双方各两个人，军队1人，提出意见，由领导小组郑波同志下命令。这也是向解放军学习的开始。权威树立后，不抢枪了，也可以收枪。”

周恩来希望：“如果组织好了，47军的枪也调来了，交通恢复，在这个条件下，再乱放枪，就把他的枪收回。再经过一段，工厂、机关、学校组织好了，秩序建立了，才能清查枪支。如果现在搞他，他会给你搞暗杀。首先把长沙革命秩序建立起来，不许抢枪。”

被北京“513 事件”搞得焦头烂额的肖华，依仗着自幼在毛泽东、周恩来、林彪的领导下的成长经历，仍旧把希望寄托在毛泽东、林彪的身上。因为要见毛泽东需要不少的环节，而且，军队方面的工作主要是林彪主持，所以，肖华最早去见林彪，希望在那里得到理解和支持。

6 月的一天，肖华赶到人民大会堂准备面见林彪、叶群时，却被早已知道肖华来意的叶群拒绝，代之以秘书挡驾。肖华五内俱焚，情急之下对林办秘书张云生大吐苦水说：

“我不愿意打扰林副主席，叶主任很忙，我也不容易见到她，但我相信，他们是了解我的，他们只要了解我现在的处境，是会帮我想个办法的。”

“毛主席的话他们不听，周总理的话他们也不听。”

6 月 14 日，邱会作在总后碰头会上决定成立“批斗总政领导干部小组”。此刻，等候在人民大会堂新疆厅与张云生娓娓道来的肖华依然把希望寄托在林彪等人身上，他恳切的说：“我再不能工作，总政就要瘫痪了，我跟毛主席、林副主席干革命这么多年，眼看着因总政不力而使全军工作受损失，将来怎么交代啊？”

同时，肖华也感觉到有一些异样，那就是这时造反派不怎么提“513 事件”了，用肖华自己的话说：“总政礼堂那次演出受到冲击，和我一点边沾不上，我自己心里有底。”

张云生把肖华的“诉苦”向叶群进行了报告，叶群明确表示：“关于肖华的事，首长和我的态度一致。”

造反派勒令肖华随叫随到，接受批判。被批斗一个多月的肖华，精疲力竭，不得已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很快，毛泽东就指示:造反派不要再搞了，肖华身体本来不好，让他休息几天，若真有问题，“书面检查，以此了案”。

7 月 1 日前，汪东兴和空军政委余立金一起来到人民大会堂西大厅见叶群，叶群把“汪主任”误听成“王主任”，以为是肖

华的妻子、肖办的主任王新兰，所以，马上躲开不见。

汪东兴对林彪的秘书张云生说明来意："七一前夕，军内一些文艺单位要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纪念演出，邀请中央领导同志参加，在研究参加的领导名单时，对肖华是否参加的问题，有了不同意见，有的主张应当让他参加，有的不同意他参加，究竟怎么办好，大家最后推我们来请示一下林副主席。"

张云生考虑到汪东兴、余立金来找林彪的事比较重大，就"擅自作主"带着汪东兴去见了林彪。

很快，汪东兴就从林彪那里出来了，肖华没有参加"七一晚会"。

肖华一直住在西山聂荣臻家里，直到 8 月 11 日，总政大院贴出"肖华是党内军内最大的走资派"的大字报，大字报中最为醒目的一条就是毛泽东的最高指示："肖华是扶不起来的天子。"这一天被称为"8.11 炮打"。此后，不仅总政治部，全军文革小组实际也停止了运作。

8 月 16 日，周恩来、陈伯达、江青接见三军党委负责人时宣布：鉴于徐向前、肖华主持的全军文革小组已经瘫痪，不能领导全军文化大革命，中央决定，由吴法宪、邱会作、张秀川、叶群四人组成领导小组领导全军文化大革命。同时，总政要关起门来乱一阵子，肖华不参加一切公开活动。

8 月 17 日晚到 18 日凌晨，陈伯达、康生、江青等人再次接见北京三军党委并讲话。他们肯定了北京"三军"联合以后作了很多工作，威望很高。同时要求他们"决不能搞武斗，坚决反对打、砸、抢、抓，大力宣传要文斗，不要武斗，三军要成为模范，

要按主席的战略部署前进，在大批判中实现革命的大联合，搞好本单位的斗批改，武斗风一定要压住。”

他们在讲话中指出：“由吴（法宪）、叶（群）、邱（会作）、张（秀川）4 同志组成一个小组，由吴负责，任务主要负责驻京各机关、部队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工作，看着总政机关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不要出偏差。”

“现在大街上的大标语，大量是肖华的，超过了刘、邓、陶。很快扭转！要大量揭发刘、邓、陶。”

“总政的文化大革命没有搞好，走了弯路，要重新搞，当前主要搞四大。总政的主要负责人中央一保再保，还救不过来，越滑越远，要依靠总政的造反派，关起门来搞。主要靠本单位，总政究竟谁是什么人，一定要搞清。对肖华要揭开来，将来揭出来什么问题就是什么问题。”

“三军支持总政的造反派，以卢前安为核心的。当前总政界线还不清，要重新排队，肖华自己安排的检查不算数。”

“保卫毛主席、林副主席、中央文革，只有三个保：1．毛主席的英明领导，2．人民解放军，3．广大人民群众。不能把人民解放军搞臭，三支两军的任务主要靠人民解放军，为什么敢放手发动群众，主要是毛主席他在，有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二是有人民解放军，如何正确对待人民解放军，这是个原则问题，解放军是毛主席亲手缔造，林副主席直接领导的，一定要按中央首长的讲话去做，我们就是依靠三军的牌子，使文化大革命走向正轨。”

“以后只提党内一小撮走资派，不要提军内一小撮走资派，

这样提是不对的，是错误的。”

“现在是吴法宪、邱会作、张秀川、叶群负责全军文革工作，要防止骄傲，在重大原则问题上要请示报告。”

## 第 825 回：说叛党，毛泽东谈刘少奇　八一六，见宁夏军区领导

8 月 9 日，《文汇报》编辑部、《解放日报》编辑部、《支部生活》编辑部共同发表文章：《策动叛党就是为了篡党》。

文章说："革命的红卫兵小将和广大无产阶级革命派揭出了一个潜伏在党内的、多至几十个人的大叛徒集团。这帮可耻的叛徒，长期隐藏在党内，窃踞了中央和地方党、政领导机关的重要岗位。""这个大叛徒集团的总头子是谁？现已查明，不是别人，正是中国的赫鲁晓夫！"

《人民日报》8 月 12 日转载了这篇文章。

8 月 16 日，毛泽东审阅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给煤炭工业战线职工的信》稿，批示："已阅，照办。"信中要求正在武斗和停产的煤矿，立即停止武斗，恢复生产；离开生产岗位的职工，立即返回原单位参加生产；生产时间不得离开生产岗位，不在生产岗位搞辩论，不因观点分歧而影响生产。这封信的日期署 8 月 15 日。

8月16日，毛泽东会见阿尔巴尼亚来中国翻译、校队、出版阿尔巴尼亚文《毛主席语录》的两位专家万捷尔•莫依修和缪非特•穆希。他说："我也不知道这个《语录》有什么用处。究竟有没有什么用处，等将来再证明吧。我早说过，要搞一本《马克思语录》、《恩格斯语录》、《列宁语录》、《斯大林语录》，没有人抓这件事，要抓起来。他们的书很多，一般劳动人民不容易读，用语录这个形式好。《语录》和《选集》是写的一些中国的历史

知识。我们的经验有限，只能供各国参考。”

谈到干部队伍的状况时说，毛泽东说：“17年来，我们有一些干部已经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了，思想上变了，安于现状，不前进了。另一种，就是做坏事。还有一种是好干部。对于第一种，要进行教育，对于第二种，就要反掉。大多数干部是好的，无论在学校、在机关、在军队，都是这样。坏人是少数，最多一百个人中有几个。”

谈到文化大革命还需要进行多长时间，毛泽东说：“我们这次运动打算搞三年，第一年发动，第二年基本上取得胜利，第三年扫尾，所以不要着急。凡是烂透了的地方，就有办法，我们有准备。凡是不痛不痒的，就难办，只好让它拖下去。”“卡博和巴卢库同志是一、二月份来的。当时我要留他们呆到四月份。我说过，三个月，即二、三、四月，可以看到眉目。现在的设想有些改变。经过四、五、六、七月，现在八月份了，有些地方搞得比较好，有一些地方不太好，时间要放长一些，从去年六月算起共三年。既然是一场革命，就不会轻松。这是一场严重的斗争。”

谈到外交部批斗陈毅时，毛泽东说：“我主张对他炮轰，不打倒他。过去他是有功的。打倒陈毅、姬鹏飞、乔冠华，谁当部长、副部长呀？他们能当领导干部吗？”

毛泽东在这里说的“他们”是指外交部造反派。

谈到军队的情况时说，毛泽东说：“要依靠解放军。我们的军队，野战军好，陆、空、海军好。有些地方军好，有些不好。要使坏的好起来，需要时间。”

如何对待当前“天下大乱”的局势?毛泽东说：“县的问题，

要一个一个解决。这是一场严重的革命。每个省都有两派势力。河南、湖北、湖南、江西、浙江五个省正在解决问题或已经解决了问题，彻底解决还需要一些时间。帝国主义说，中国大乱，分两派，可能发生内战。我看不会。有些地方还要乱一些时候，乱是好事。有些外国朋友问我，为什么你们高兴乱呢？如果没有大乱，矛盾就不能暴露。我们准备天下大乱。倒下的是少数，如上海市、区、县，各部委，工厂党委和支部书记，要打倒的、靠边站的是少数。大乱子没有出。我们的军用飞机、民用飞机也没有飞走。文化大革命一年多来，我们的外交人员、使馆人员一个也没有叛国逃跑。”

谈到刘少奇的问题时，他说：“刘少奇的问题不简单，不单是思想右倾的问题，他过去在国民党统治区至少四次被捕。现在有人证明，他是向敌人自首过。所以1936年在北方局保叛徒出狱，不是偶然的。”

8月16日晚23时25分至17日晨2时45分，康生和二炮政委李天焕接见宁夏军区领导。兰州军区副司令员康健民参加接见。会议开始时，康生按名单点名。会议正式开始后，康生讲话。他对着朱声达说：“你装糊涂，你们天天喊拥护毛主席、党中央，拥护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但你可以把副司令软禁起来。”

李天焕质问道：“毛主席叫部队支左，你们把造反派打成这个样子，是怎样支左的？”

康生接着说：“你们那一套是不是支左？不是支左，是发武器镇压造反派。朱声达你讲一讲你的想法。你听不听毛主席的话、林副主席的话？你怎么搞的，总有个想法嘛！有个方针政策嘛！

有教训，内蒙就是教训嘛！你也得讲一讲你是怎样想的。在中央开会有什么都可以讲。对的错的都可以讲。毛主席历来的方针就是这样，各种不同的意见都听。这次处理问题，就是这样，地方的、军队的不同意见都听。”

李天焕：“有错就改，改得越快越好。这次来到中央，就把自己的观点讲讲嘛。你们行动总是受思想支配的嘛！”

朱声达：“我们是来请罪来了……”

康生：“你这是空话，有什么罪？不讲具体事实，具体错误，是空的。”

李天焕：“毛主席一贯教导我们，有什么错误就检讨。到中央来了，有什么都可以讲。就是康老讲的，为什么搞成这个局面。”

朱声达：“开始我们支持是对的，2月11日又退出来了……”

于是，大家开始按时间叙述过程。

宁夏军区副司令员张怀礼：“实际上是2月6日退出‘联委’的。我6日回军区汇报工作，从那天起就不叫我去了，就断绝了关系。2月11日是正式发声明退出的。”

朱声达：“当时我只看到‘联委会’的支流，没有看到主流。甘春雷讲话后，大家对他贴了不少大字报，提了不少意见，要打倒他……”

康生：“你听的哪些群众的意见？你下决心，总有个道理，这不是儿戏，夺权是大事，总不能一点考虑都没有。和打仗一样，有了情况才下决心。这是个方向上的转变啊！为什么不请示就转？你们闹清楚错了，哪些错了？错在什么地方？好改嘛。”

兰州军区副司令员康健民：“原来支持是对的，以后退出是

错的，你们是知道的。兰州军区早就给你们讲了，你们就是坚持不改。5月份我到宁夏，朱、江对我说：如果中央决定说我们支持错了，我们组织服从，思想不通。赵永夫是直接带部队打，你们是借手群众，让群众打造反派。”

康生：“不要学赵永夫。你总有个指导思想嘛，从一开始你就是这样。赵永夫是下命令叫部队打，你是给群众发枪，让群众打革命造反派。”

李天焕：“你们独立师闹事，怎么处理？”

独立师师长涂宗德：“我还不知道。军区瘫痪了，有好多工作推给我们，没有办法，我们直接请示……”

李天焕：“他们的态度怎么样？你们那样做，对不对？”

康生：“军级干部会议军区有人参加没有？”

康健民：“他们没有参加，文件他们看了，精神传达了。”

康生：“你们怎么想的，农民舍不得丢下家，耽误工分，为什么进城呀？”

江波：“我是农民出身，我是有体会的……”

康生：“你是农民出身，有体会，这个问题你怎么解释？”

这时，外边传进来新华社记者访问宁夏军区副司令员刘德夫，关于朱声达走前成立领导小组的看法和领导小组的紧急命令……

张怀礼说：“这些人都是他的干将。”

宁夏军区政治部副主任乔克广：“我们的权早就被他夺走了。”

朱声达支支吾吾的说成立领导小组一事：“我和他们几个商

量……”

康生问：“你来之前，同谁商量过？他们同意不同意？这个领导小组怎么成立？怎么决定的？还是你独断决定的？你同哪几个党委委员商量的？是谁？”

张怀礼：“这些人都是忠实于他的人，如司令部刘恒业……”

康生：“你和哪几个同志商量的？”

朱声达：“和江、陈、向、赵。”

宁夏军区副政委马克：“没召开会议讨论，只是他个别说了一下。”

宁夏军区副政委江波：“我们来以前，兰州军区党委办公室李世祥同志打电话，说中央要你们去北京开会，家里可叫赵、向负责，以后叫向开会，我们商量成立一个领导小组。”

康生：“你这个领导小组，实际上就是叫执行你的反动路线的人，接你的班，你把你那里看成一个独立王国，不是中央不告诉你们，而是你们拒绝，反抗中央的指示，问题的性质就是这样的。独立师的同志也要检查，难道中央的指示你们一点都不知道，你们的电报转来了，那是朱声达想通过你们压中央，你们知道不知道。”

独立师师长涂宗德：“军区瘫痪了……”

康生坚决的否认说：“没有瘫痪，现在还没有瘫痪，你说这些都是假话。”

江波：“机要处电报发不出去，通信站符合他们观点的，才给打电话，否则打不出去……”

康生：“说瘫痪那是借口，中央的贯彻不下去，反对中央的

你们贯彻得很彻底。”

张怀礼：“我给中央的信，要求用电报发出去，就是不给发……”

康生：“朱声达同志，你为什么不回答我的问题？”

朱声达：“我错了，检讨。”

康生：“你们来中央干什么？你们采取什么方针，你讲嘛，为什么不讲，江波你也讲讲，你们来这里干什么？是不是你们来了这里，家里出了乱子你们不负责任？”

朱声达：“哪还能那样，是要中央给我们撑撑腰，我们好改……”

康生：“要中央撑什么腰，撑你开枪镇压革命群众的腰？！”

乔克广：“你从兰州回来第二天，就给机关干部发枪，打了靶，国防师来了，你就大发脾气，说对你不信任，气得把桌子都推倒了。”

康生问朱声达：“是不是事实，为什么发枪？是不是为了镇压革命群众？朱声达你为什么发枪？”

朱声达：“大家说安全没保证，我错了。”

康生：“这是空话，错了，为什么错了？错在那里？”

朱声达：“方向路线错误。”

康生：“这也是空话，要讲具体事实。我现在第三次问你，你回答我的问题，为什么错了？讲具体事实。”

康生又提到朱声达在中央218号文件后转发的一个通知：“那个通知是怎样说的？什么时间？什么内容？”

朱声达闷不做声。

江波："转是转了，就是党委没有讨论，没有具体措施。"

康生："你这话还像个话。"

康健民："就是这样，不符合他们思想的，就不讨论、不执行、抵制。"

康生："这话说对了，江波说的对，只表了个态，没有具体措施。"

宁夏军区政治部主任向辉宇："我们党委自文化革命以来，没有开过一次像样子的会，对中央文件、指示没有认真讨论过，张、冼的指示，没有很好地讨论，冼政委的话很肯切，你转也得转，不转也得转。最后一次党委会，从7月16日开始到19日，马克同志把冼政委的指示传达了，就是没有认真讨论，实际上是朱声达没有从思想上转过来。"

接着，乔克广、向辉宇、文亭纷纷说："机关干部围斗我们，说我们是叛徒。朱给群众讲：我和大家坚决站到一起，风雨同舟，他对'筹备处'的群众也这样讲，群众热烈鼓掌，说朱是好司令。"

康生："我了解一下，机关干部反对你们，说你们是叛徒的，是些什么人？"

向辉宇、文亭："我们机关实际上有两个司令部，一个是以朱声达为首的少数处长。"

康生："是呀，到处都是几个小头头，没有那几个小头头起不来，朱声达就是你那几个小头头。"

江波："新华分社问题，没有及时处理，就是因为观点不同。当时我们没有很好的处理，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支持'一·二七'也有盲目性，以后为什么退出，主要是甘春雷讲话后，群众

意见很大，认为是假夺权，甘和杨、马关系很密切，没有划清界限……”

张怀礼：“朱和杨、马的关系必须闹清楚，杨的权被夺以后，还给军区写了几次报告，信……，说他不想让权。”

涂宗德：“我们犯方向路线的错误，当时看到没有三结合，静坐绝食，冲击军区机关……”

康生：“独立师的副政委，你们是支左还是支了右，你的政治工作做的怎么样？”

独立师副政委王兴云：“我们部队是正面教育，军区让干啥就干啥，现在从实际行动看，我们是支了右……”

康生：“你是支左还是支右，看来你是支了右。”

张怀礼：“朱声达支持‘联委会’是假的，逼迫的。‘联委会’2月5日游行，要部队支持他们，我提意见出兵支持‘联委会’，朱坚决反对，以后几次批评我，要我检讨。”

康生：“你们说人家是假夺权，实际上你们是假支持。”

朱声达：“我承认错误，我改……”

康生：“宁夏军区的同志和独立师的同志，你们首先要认识，宁夏的问题是什么性质。军人嘛，没有经验，犯错误是难免的，只要改了就行了，有些干部，由于文化革命没有认识，支左支错了，支了右也是有的，但绝大多数同志犯了错误，当党中央、毛主席、林副主席指出以后，很多干部就改过来了，这表明了毛主席亲自缔造的、林副主席指挥的人民解放军的优良品德，山东军区，济南部队做出了好的样子，他们总结了三条经验：早改比晚改好，公开比不公开好，高姿态比低姿态好。”

康生指出，宁夏问题的严重性在于：

“一、对中央的指示不贯彻，不执行，违背、抗拒、抵制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抗中央的指示，就必然下压革命群众。”

“二、中央、兰州军区不是没有指示，早就指出来了，而朱声达坚决抵制，坚持错误。毛主席和林副主席说：如果犯了错误，改正了还是人民内部矛盾，如果坚持下去，那就变了。从宁夏的问题可以看出，坚持错误就会造成什么样的恶果。”“从今晚上看，朱、江你们对毛主席、党中央、中央文革是不诚实的，不要凡是人家不知道的，就企图蒙混过关，还想欺骗中央，今天没有人公开说反对毛主席，反对中央，是打着红旗反红旗，耍两面派手法。”

“三、直到今天，你们没有认真检查错误。林副主席说：中央对一些犯错误的同志，希望他们不垮台。但是，如果对错误不认识，不改正，坚持下去，欺骗中央，就非垮台不可。朱声达你不要用空话搪塞，不要蒙混过关，要老老实实的。如果坚持下去，欺骗中央，就会自己搞垮自己，这就非垮台不可。今天晚上会快结束了，要交心，这次来中央，要触动灵魂，采取老老实实的态度，不要想蒙混过关。江波你是做政治工作的，实际上就是政委，过去第一政委是杨静仁。你怎么办？采取什么措施？我们解放军过去打仗不怕牺牲，现在犯错误还不能丢掉，要打倒私字，脱裤子改。其他同志犯点错误不要紧，要改。”

康生对他们提了三条要求：“一、犯了错误就承认，就改；二、同朱声达的错误，划清界限，不要跟着犯下去；三、犯错误，要立新功。

“党的政策你们学了没有，陈再道毛主席还批了五条，就是承认错误，改正错误，得到群众谅解。还可以回到革命行列来。承认不承认，改正不改正，群众谅解不谅解，就看你走不走这条路。

给你们打个招呼，像宁夏这样的错误，发展下去，很危险。不能一方面操纵群众，开进军队镇压革命造反派；一方面操纵保守组织，包括军队的人在内，来北京给中央施加压力。过去内蒙2000多人，甘肃詹大南来了200多人，都叫他们自己动员回去的，今后来人，你们自己动员回去。”

李天焕：“关键是你们按康老的指示办事，希望你们悬崖勒马。”

康生：“还有一个问题要注意，宁夏是少数民族地区，如果挑起民族问题，就是罪上加罪，你们里面有无回民？”

有人答：“马克是回民。”

康生：“要注意，记者反映，固原地区‘五二’、‘四八’叛乱的头头，有的现在起来活动，发现杨启昌有三本反动日记，海原县县长马志宽煽动群众说：发扬过去的老办法，上山打游击。这个问题，要注意。”

8月18日，兰州军区发布《公告》，表示“坚定地认为‘宁夏无产阶级革命派总指挥部’，是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确定“宁夏军区司令员朱声达在支左工作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明确“朱声达所犯的严重错误，宁夏军区广大指战员是没有责任的。”号召“广大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同志们，积极行动起来，揭发朱声达的罪恶，坚决、勇敢地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8月21日，宁夏军区也发表《公告》称：

一、坚决拥护8月18日兰州军区公告

二、自即日起，我们宣布收回“二·一一”声明和“告全区革命人民书”。坚决地支持《宁夏无产阶级革命派总指挥部》和一切真正的革命左派。

三、我军区领导在支左工作中，背离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严重地打击、压制了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宁夏无产阶级革命派总指挥部》，犯了方向、路线、立场的错误。

四、我军区司令员朱声达，是铸成我们支左方向、路线错误，破坏宁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罪魁祸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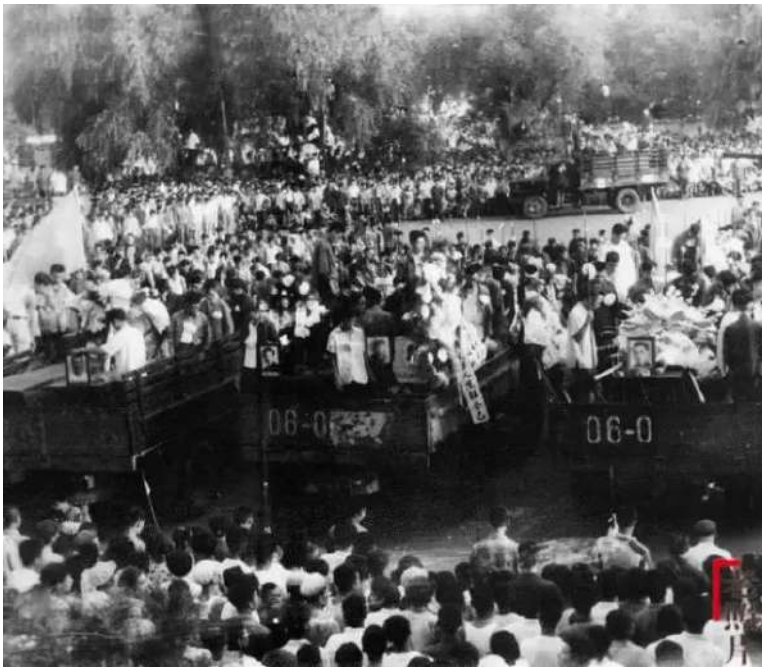
五、我们自即日起，撤销对《宁夏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筹备处》的支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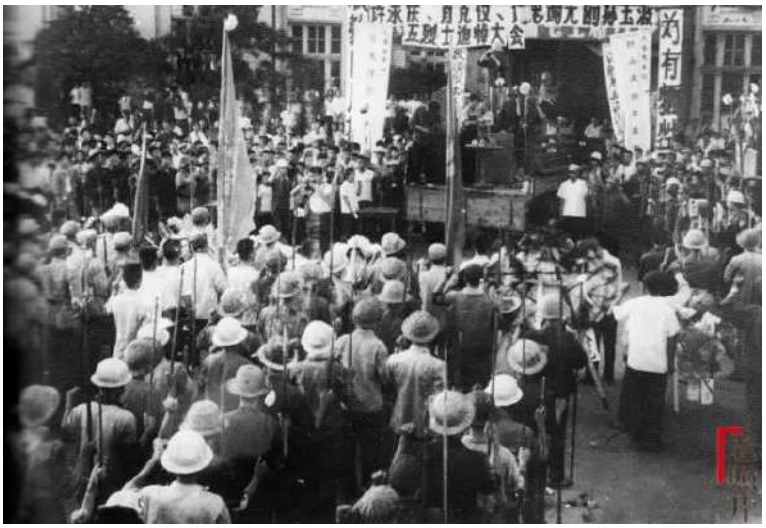
## 第 826 回：造炸弹，吉林省到处武斗　授枪支，党中央武装北航

为了“武卫”的需要，长春的“人大红野”于 8 月 4 日中午 11 时整、12 时 30 分，分别爆炸了自制的“自卫地雷”和“自卫化学弹”，并发表“不首先使用这些武器的声明”。8 月 6 日，长春“地院兵团”也试制成功两颗放射性“自卫弹”，同样发表声明：“决不首先使用这种武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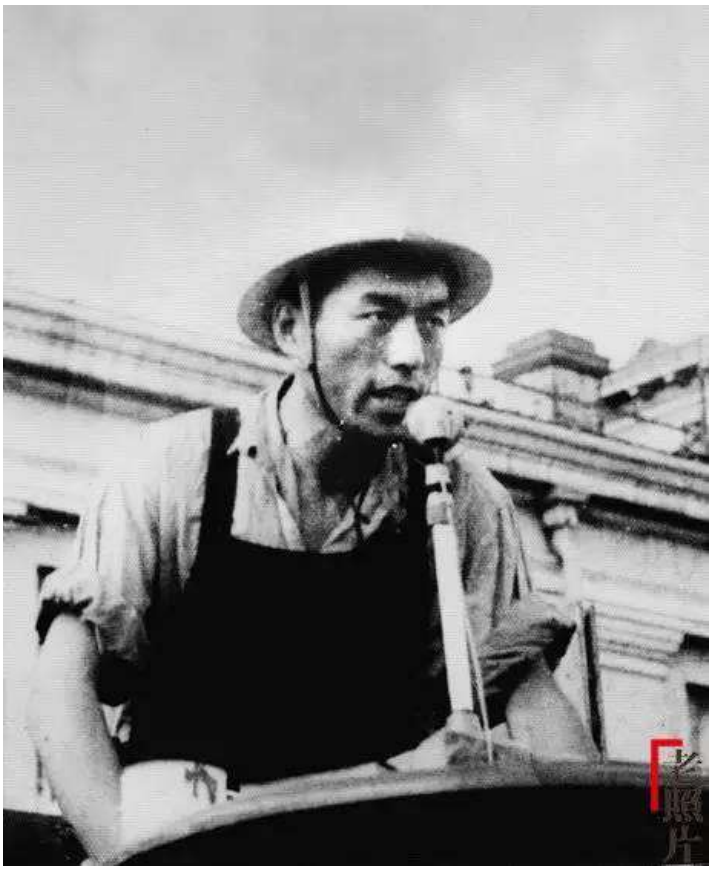
8 月 3 日，全国 168 个支持“长春公社”的群众组织代表，在北京地质学院召开“彻底捎毁吉林省的反革命暴乱、与贺吉祥血战到底大会”。大会通过了给吉林省革命造反派的支持电，重申坚决支持公社派。当晚，“长春公社”和驻长春军校的造反派，为欢迎北京来的援兵，在长春地质学院召开了“热烈欢迎首都革命造反派大会”。

8 月 8 日，又有“首都红代会”1000 多人和“首都医务界大联合赴长医疗队”来到长春。“长春公社”声势大振。8 月 9 日，他们在火车站为武斗中被打死的肖克信等 5 人举行“五烈士”追悼大会。



手持长矛，为武斗死亡者送葬的武装人员




“长铁分社火车头大军”代表在“五烈士”追悼大会上发言

会后武装护送死亡者到墓地下葬。

8 月 11 日，“红二派”拦截部队车辆，抢走车上的轻重武器和弹药。市区内多处武装部门也同时遭到抢劫。“长春公社”派

袭击了长春市英俊区，即现在的二道河子区武装部和长春拖拉机厂武装部，抢走大批武器。

这天，长春驻军 16 军军长汪洋，代表吉林省军区和驻长春部队，在地质宫广场对压制“长春公社”的错误进行了检查。

但是，北京来的学生不吃这一套，第二天，“首都红代会”及全国各地赴长春代表，在吉林省军区门前召开“声讨贺吉祥大会”，会后举行了大游行。

8 月 13 日，“长春公社”派军事院校组织及其他群众组织数千人，袭击了第五坦克学校军械库，将三个仓库抢劫一空，仅机枪就抢走 170 挺，其中高射机枪 50 挺。

这天，吉林省四平市两派组织武斗，致使铁路运输中断，东三省大动脉梗塞。

8 月 14 日，长春“红二派”出动近 60 辆汽车到白虎屯武器库抢武器弹药。解放军指战员反复劝说、阻止无效，武器弹药被抢。当解放军对 J1—30—90 号车进行阻拦时，司机强行开车，轧死解放军 1 人，轧伤 11 人。

8 月 14 日至 16 日，吉林市“造委会”与“造大派”“公社派”发生大规模武斗。14 日夜，“造大派”武斗队伍进攻吉林省化学工业学校，打死“造委会”成员孙炳仁。“造委会”悲愤异常，于 15 日下午在火车站广场召开 2 万人参加的追悼大会，会后组织游行，向“造大派”和“公社派”示威。当队伍行至空军 17 航校，与航校“造反团”发生冲突。“造委会”组织围攻航校“造反团”，“造反团”向“公社派”求援。

16 日上午，“公社派”组织武斗队伍冲击江南大桥，准备支

援航校“造反团”。冲突中，“造委会”两名守桥工人死亡，“公社派”一名女学生身亡。“公社派”营救航校行动失败，返回吉林电力学院。他们请求铁路支援，于中午派出 1 名队员来到铁路机务段，被铁路群众组织“火车头”人员拦截，双方发生冲突。

下午，“吉林公社”召开会议，决定采取“围魏救赵”的策略，火烧“造委会”的重要据点吉林市十中，希望以此解救 17 航校“造反团”。

16 时，“吉林公社”分兵两路出击，一路走伊通路，放火烧十中，一路走松江路直奔东关宾馆，进行佯攻，吸引“造委会”注意，掩护火烧十中。经过半小时激战，十中教学楼被点燃。火起后，“吉林公社”两路武斗队伍顺松江路撤退，行至临江门，遇到前去十中救火的市消防大队 2 中队。消防车为躲避“吉林公社”武斗队伍，急忙调头改走顺城街，不料，一台消防车翻车，砸伤一名消防队员，副队长姜广才前去抢救，“吉林公社”向消防车投下燃烧瓶，消防车起火，致使两名消防员死亡。

与此同时，吉林市哈达湾小桥等地亦发生武斗。在哈达湾地区，“吉林公社”于 8 月 15 日组织 500 余人，11 台汽车。而“造委会”，也在 16 日晨，调动水泥厂和 201 厂的“造委会”组织，用拖拉机和汽车堵在哈达湾小桥。

“吉林公社”得知哈达湾小桥被堵截，兵分三路向小桥进攻：一是造纸厂、水泥厂、麻袋厂从正面进攻；其次黄金矿建公司从右侧进攻；第三路 201 厂 5 纵队从左侧包抄进攻。

经过激战，“造委会”人员支持不住，沿铁路线向东逃跑，途中 1 人被扎枪扎死，双方对抗情绪犹如干柴烈火。

哈达湾小桥武斗结束后，原驻哈达湾“造大派”和 201 厂部分成员，预感无法在哈达湾继续呆下去，当天将队伍带到尖山子滑雪场，与那里原有的几十名学生汇集，成立“尖山子作战指挥部”。为筹集武器和物资，到处抢劫。

此后，吉林市各派也纷纷到驻军和武装部门抢夺武器，以提高自己的战斗力。

8 月 16 日，长春市两派的一些群众组织到发电设备厂附近的武器库抢枪相遇发生武斗，打死 1 人，打伤 3 人。这次武斗双方动用了手枪、冲锋枪、自动步枪和半自动步枪。这是长春市群众组织武斗中第一次开枪杀人事件。

“红二”疯狂了，“长春公社”也红了眼。首都来人哪里见过保守派敢如此猖狂，咬了牙要把长春的“百匪”一口吃掉。当天，“首都工代会”、“农代会”、“红代会”等 71 个造反组织发表最后通牒《敦促贺吉祥投降书》。

就在首都和各地的“公社”盟友还在气势汹汹地敦促贺吉祥投降之时，第二天，8 月 17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以中发［67］256 号文件，批发了 8 月初吉林省军区、16 军、空 1 军《给长春市广大革命群众的公开信》。文件充分肯定了吉林省驻军的检讨，号召长春市两大派群众组织实现大联合，促进三结合。

为了落实毛泽东“武装左派”的指示，中央决定，首先武装“北航红旗”。 8 月 16 日下午，北京航空学院举行“武装北航红旗誓师大会”，宣告成立北航“红旗”武装部队。北京卫戍区副司令员李钟奇等参加了大会。会上宣读了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傅

崇碧的一封信，信中指出："武装北航红旗是中央决定的"。 李钟奇宣布：遵照党中央、周恩来总理指示，代表北京卫戍区把2500支苏式冲锋枪、新式半自动步枪和20支"五四"式手枪授予北京航空学院革命委员会。 随后，北京卫戍区有关人员如数把武器运到了北航。

北航有枪了，他们决定在北京市搞一次持枪武装游行，由"北航红旗"保卫部长戴维堤负责领队。2000 多名荷枪无弹的"北航红旗"武装战士，及后面跟着的游行队伍，浩浩荡荡来到了北京新街口北口。

新街口是当时北京内外城分界线，进了新街口，就是进了内城了。北京卫戍区的值勤战士闻讯，如临大敌，立即和公安干警组成了人墙，阻止北航游行队伍进城。

戴维堤一见大队人马被阻住，十分着急，立即跑到前面，说："我们是抗议武汉陈再道之流，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你们快放行！"

值勤战士们不敢做主，要打电话请示上级。一会儿，一个战士跑过来让戴维堤去哨所接电话。

戴维堤因工作关系常同卫戍区打交道，卫戍区很多人都知道他。他接过电话，只听话筒里的人问："你是谁呀？"

戴维堤说："我是北航'红旗'武装部队司令戴维堤。"

话筒里的人哈哈大笑，又问："你们武装游行，谁批准的？"

"毛主席批准的。"戴维堤张嘴就来。

"我们没接到通知，不能放行。你知道，这是首都，任何人不准带枪进城。"

“你们当兵的为什么能带枪？我们也是毛主席的红卫兵。你快请示傅崇碧司令员和黄作珍政委，耽误了大事你负责。”戴维堤造反派脾气一上，口气强硬，有恃无恐。

“你等一下。”话筒里的人说。

过了一会儿，话筒那边的人问：“你们枪里有子弹吗？”

“绝对没有，我向你保证，我一支支亲自检查的，一粒子弹也没有。枪是你们发的，一粒子弹也没给，等于烧火棍，你们怕什么？”

“你们一定要注意安全，绝对不能出事，否则谁也担当不起。你不能说是我们同意的，你们自己冲吧，我命令值勤战士撤开。”

“乖乖！”戴维堤心里那个高兴呀，心说：“真够朋友，给面子。”他放下电话，赶到队伍前面，大喊：“同志们，冲呀！”这时执勤的战士们全让开了。

队伍长驱南下，来到西单，又遇上了麻烦。只见前面一排排警察组成多道人墙，不准队伍前进。

建国后一直到文革中，除了国庆节阅兵经中央批准，解放军和民兵可以持枪经长安街进天安门广场外，还没有任何群众组织敢持枪进城游行。这里的警察没有接到任何通知，被北航的持枪队伍吓坏了。有的警察根本不知道中央给北航发了枪，所以，赶紧拉起人墙，不准他们通过。这次，戴维堤也不和警察们交涉了，干脆用携带的喇叭直接喊道：

“警察同志们闪开，保卫毛主席的请参加我们的队伍，北航红旗武装部队誓死保卫毛主席，谁胆敢阻拦谁就是反革命！”

他转过身，用手提喇叭对着北航的队伍喊道：“同志们，正步

——走！”

数千名持枪的“北航红旗”学生喊着口号，迈着正步走了过来，后面跟着数万大军的游行队伍，警察只能是纷纷让路，有的人帽子都掉了。游行大军很快到达了天安门广场。

游行的队伍在天安门广场呼喊了一通口号后，返回学校。那天，北航的学生都很兴奋，许多人的嗓子都喊哑了。

天安门广场的武装游行，让“北航红旗”又出了一次风头。这件事当然也立即轰动了北京市及全国。

武汉也“武装左派”。8 月中旬，武汉“钢二司”司令部开会，传达关于中共中央“武装左派”的指示，布置各总部分别到武汉各区武装部接管武器。

“红水院”总部决定由张建成、王新民、赵三其负责，经 15 军岳团长同意，派了水院驻军两位解放军连长，开着三辆卡车前往。

行前，张建成在八教学楼前做了简单动员，然后带上驻军的两个连长和几个水院同学，上车紧紧地跟着“九·一三”的人来到克山武器库。

武器库的门大开，已经有人在往车上搬武器了。王新民等人立即动手装满一车，长枪、短枪、手榴弹都有。为防路上遭遇“百万雄师”的拦截，解放军连长在车上架起了机枪。司机唐冠杰说他参加过抗美援朝，主动搬了一箱手榴弹放在驾驶室。回校后，王新民唯恐枪和子弹丢失，一一搜身检查过。

“红水院”总部决定再去试试，与驻军岳团长商量后，派一个班的解放军同车前往。在汉阳克山武器库，武器很多，由管仓

库的人指引搬运，运回一车枪支弹药。赵三其、许胜凡等接着去搬运，这天总共运回 8 车枪支弹药。由韩同良等人与驻军一起负责把这些枪支弹药全部登记，统一存放在行政大楼内的人武部武器库，然后交由驻军负责看管、维护。

经岳团长同意，“红水院”总部勤务组成员每人发了一支手枪，五发子弹。

随后，枪支经解放军检验维护后，组织水院师生进行军训，操场上整天口令声、步伐声、歌声不断，虽然天气炎热，同学们情绪高昂，不怕苦不怕累，按照教官的要求，一丝不苟地进行训练。新华社记者来到水院采访，拍了师生军训的照片，发了专稿，在《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头版头条专题报道。军训的最后一个训练科目是实弹射击，组织一部分师生每人打了三发子弹。

8 月 17 日早晨，在中南海国务院会议厅，周恩来再次接见农林口群众组织代表，谈了批斗谭震林的问题。

首先，周恩来指着农业大学一名代表说：“上次给你谈的，在农大开 1000 人的会议，现在看来可能你们不满意。我先听听你们的要求，以农大还是农口‘革命造反联络站’，还是农政农办发起？开会方案先听听你们的意见。”

农大代表汇报了他们计划的大会规模、地点和时间后，周恩来说：“原来说开 1000 人会，现在看来不行了，你们要求开万人大会。”

农大代表说：“我们完全能保证，他们不敢冲。”

周恩来说：“有几个人发言？你们发言要控制在 4 个钟头，礼拜六开，时间下午 1 点半到 6 点，中间可休息一刻钟，或许休

息不了。后天的大会我要去奉陪的。大会的名称叫批斗谭震林大会。地点在人民大会堂。大会口号由你们定。”

农大代表说：“在人民大会堂开，会提高谭震林的身价。”

周恩来说：“那怎么能这么说，那时批判反党分子彭德怀就是在人民大会堂开的，开完这会后，可以一单位、一单位去批斗，我就不奉陪了，让联络员陪去。这大会后要是一星期批斗一次，你们订一个日程表，交给我，我们研究一下，我们还得给他留点时间，写写检查。”

8 月 19 日，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万人批斗谭震林的大会。

8 月 17 日，李先念作检讨。陈伯达在李先念检讨后说：“我认为李先念同志的检查是好的。同志们应该欢迎李先念同志的自我批评，同时希望李先念今后多到各部里面去，能听取同志们的意见，随时发现、改进自己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

周恩来说：“我完全同意伯达同志刚才讲的很好的几句话。今天的会证明我们经过半年多的奋斗以求的有了初步的结果，但这仅仅是开始。李先念同志的检查是好的，是得到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批准的。”

“先念的检查是推迟了，当然有许多客观原因，也有主观原因喽。现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在蓬勃深入开展，我们的领导同志，首先到群众中去，那么先念同志这次检查后首先到财贸系统各部里、各学校里去。先念同志也对我说过他要到各部里、各学校里听取群众意见，向你们学习，就可以使思想前进。”“如果坐在上边遇事不调查就随随便便发号施令，是危险的，这样要犯错误，可能被你们批判，以至非打倒不可！”

## 第 827 回：发声明，周培源倒戈上山　再武装，北京师大井冈山

随着北大校内外反对聂元梓的呼声日益高涨，1967 年 7、8 月，聂元梓在北大校文革常委会议上说："文化大革命发展到现在，已经远远地超出了我们的理解能力和领导能力，照目前这样的形势，下一步还不知道会怎么样呢，根本无法预料，我们都没有能力应付那种局面。因此，我要辞去'校文革'主任的职务，并且建议解散'校文革'，因为它已经没有能力领导学校的运动了。"聂元梓提议，"我们向毛主席写个报告，说明我们'校文革'常委的水平和能力都无法胜任领导北大文化大革命运动，因此请求毛主席批准我们自行解散。另外，'校文革'常委个人自己愿意继续参加文化大革命的话，可以选择参加自己拥护的那一派群众组织。我自己是不想干了，我要退下来。"

"校文革"常委中马上就有人表示反对，有人说聂元梓低估了"校文革"常委的水平和能力，还有人说"校文革"成立以后，常委们是做了不少工作的。聂元梓要求解散"校文革"的意见没有得到大家的同意。

过了几天，在中央文革碰头会召开的接见会上，在周恩来出席的情况下，聂元梓向在座的中央领导和中央文革成员提出辞去"校文革"主任的职务，并且提出解散北大"校文革"的建议。

江青首先表示反对，她说，"过去，你是死保'校文革'，现在人家一攻，你就要求解散'校文革'，你不想干了，这不行！"

周恩来和别的人都没有发表不同意见。

北京大学“团”、“零”、“飘”、“井”、“红”五方子弟自 6 月开始的反聂大合唱后，经过近两个月艰难漫长的内部谈判，终于同意联合起来，成立“新北大井冈山兵团”，并申请参加了北京“大专院校红代会”。

8 月 17 日，在毛泽东题词“新北大”一周年之际，在北京大学五四广场，北京大学“首都红代会新北大井冈山兵团”宣布成立。

那天阳光灿烂，微风轻拂，操场里锣鼓喧天，歌声嘹亮，就像盛大的节日。主席台上坐在中间的竟是北大副校长、满头白发的周培源，他和聂元梓七人大字报最后一个签名的李醒尘出席大会并讲话。这让许多人，包括聂元梓在内，都吃惊不小，大跌眼镜。

周培源本来也未想参加群众组织。但是，聂元梓掌权后的一些做法实在让他忍无可忍。

文革开始后，周培源主管当时深藏在秦岭南麓的北京大学汉中分校，又称 653 分校的工作。1966 年 9 月下旬，周培源要参加国庆招待会，返回北京，回到北京大学，找聂元梓准备向他汇报 653 分校的文革运动情况。但是聂元梓先是让周培源向“校文革”汇报，“校文革”因聂元梓缺席未能做出决议。周培源再找聂元梓，聂元梓又让他去找“校文革”中负责行政后勤的白晨曦。这让周培源颇有意见。

1966 年 10 月下旬，柬埔寨王子在柬埔寨驻华大使陪同下，来北大报到学习，本应由“校文革”主任聂元梓出来接见， 聂元梓说有事来不了了，校文革即确定由白晨曦、周培源、崔雄三

人出面接见。接见时，他们向柬埔寨王子与大使解释："聂元梓同志因另有重要会议，不能亲自前来，深表歉意。"谁知话刚说完，聂元梓又突然推门进来了，使得三个主人脸上发烧，一副窘相，很是尴尬，只好对客人解释说："她开完了会，所以又来了。"

之后，三人请聂元梓向客人介绍北大文化大革命的情况。聂元梓回答是不用介绍了，展览会上都有，到那里看看就是了。周培源提醒聂元梓："大家对这个展览会意见大，不知道展览会整理过了没有？"

聂元梓回答，已经整理过了，可以去看，而且已经和校文革办公室联系好了。

于是，一行人来到展览馆门口，没想到，展览馆是铁将军把门，他们吃了一个闭门羹。一直等了一个多小时，才找到人开了门。开门一看，里面满屋尘土，图片上到处贴着同学们提意见的小纸条。中间的一个屋子，因屋顶漏雨而地上淌满了水，一根木头横斜在那里。所有的情况都说明，展览会并没有如聂元梓所说的进行了整理，它的破败冷落，不仅使主人难以为情，亦使客人为之难堪。周培源很是生气，他接待外宾，不计其数，可从来没有像这次这样狼狈过。言而无信，出尔反尔，已是很不礼貌的行为，又让外宾长时间等候，去看这么一个破烂不堪的展览，真是丢尽了脸面！他觉得，聂元梓以这种轻率的态度对待这么严肃的政治任务，哪里像一个领导干部的样子？！

1966 年 12 月 14 日，周培源曾亲自用毛笔抄写了一篇题为《致聂元梓同志和"校文革"全体常委的公开信》的大字报，近万字，贴在 29 楼的北墙上。大字报就北大汉中分校的运动、聂

元梓在外事工作中的表现，以及对两派群众的不同态度，提出了一些真诚而温和的意见，希望聂元梓与“校文革”认真地不折不扣地按毛主席革命路线与《十六条》所指定的有关政策办事。

1967 年 3 月，“校文革”召开的第一次干部亮相大会上有周培源。

1967 年 4 月，周培源在亮相后写的《我的检查》中这样解释他 1966 年 12 月 14 日的那封《公开信》：

“1966 年 12 月间，我离开北京去 653 工地时，曾给聂元梓同志和校文革常委写了一封公开信，向常委提了意见，要求他们开门整风，以便领导好两条路线的辩论。当时正碰到两条路线斗争十分激烈的时候，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正在猖狂反扑。这封公开信被阶级敌人利用，来围攻以聂元梓同志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长了资产阶级威风，灭了无产阶级志气，所以起了很坏的作用。我在这场斗争中犯了错误，给运动带来了损失，心情十分沉痛。现向同志们检查我当时的动机和我对错误的认识。……”

1967 年 7 月 1 日，周培源联合北京大学 134 名干部发表《致革命和要革命的干部的公开信》，因此也受到一些人的围攻，恫吓和谩骂。于是周培源便横下一条心，干脆“上山”，加入“井冈山兵团”。

此时，在周培源两边分别坐着孔繁、杨克明，曾是“校文革”成员的侯汉清、徐运朴，“团”派代表谢纪康、靳枫毅，“0”派代表陈醒迈，“飘”派代表牛辉林，“井”派代表胡纯和。

大会发表宣言，称“我们革命造反派走过了光辉战斗的一年，大造了陆平、彭珮云的反，大造了张承先坏工作组的反，大造了

刘少奇、邓小平的反，今天我们又大造聂元梓、孙蓬一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反，实行了革命大联合。”

地院“东方红”、北农大“东方红”、“新人大公社”等北京高校组织前来助威祝贺，会上还宣读了清华“井冈山”蒯大富和北航“红旗”对外作战部的贺信。著名歌唱家胡松华的一首“赞歌”将大会的气氛推向了高潮。

当晚，陈伯达秘书王宝春给北航韩爱晶打电话，让他到人民大会堂。

韩爱晶来到人民大会堂，看见陈伯达一个人坐在大会堂主席台上前排一个座位上，主席台的幕布是拉起来的，光线很暗。会场空空的，主席台前还有一张小桌子。

韩爱晶来到陈伯达身边坐下，陈伯达问他：“韩爱晶，你们要打倒聂元梓啊？”

韩爱晶说：“没有啊！”

陈伯达不相信地说：“你们不是要打倒聂元梓吗？你们今天在北大‘井冈山’的大会上……？”

韩爱晶赶紧解释：“现在北京很多学校都是两派参加红代会，‘井冈山’是学生红卫兵嘛，所以我们同意让他们参加，并不是要打倒聂元梓。”

他又说：“那我们明天发个声明？”

陈伯达说：“既然是这样，那就不用了。”

我们再说北京大学的这个“新北大井冈山兵团”，第一届总部勤务组的勤务员有：周培源、侯汉清、牛辉林、陈醒迈、郭罗基、徐运朴、靳枫毅、谢纪康、胡纯和等人。第一任核心组组长

周培源，人们亦戏称之为井冈山的“寨主”。副组长牛辉林、徐运朴、陈醒迈、侯汉清。

北大终于找到了能够与聂元梓抗衡的反对派领袖了。你是炙手可热的“老佛爷”，他是岿然不动的“大菩萨”；一个有中央文革的鼎力支持，一个是国务院重点保护的对象；一个是来自延安的“革命左派”，一个是获得美国博士头衔的科学家。尽管一方说对方是“右派翻天”，另一方说对方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两方森严壁垒，视若寇仇；但是，双方都高扬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旗帜，把毛主席奉为九天之上的至尊，都拥护毛主席亲自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都把陆 平、彭佩云视为万劫不复的“黑帮”。

后来，周培源觉得树大招风，不久把位置让给牛辉林，只当勤务员。

“东方红”的头头樊立勤被排斥于“井冈山”总部之外，原因是，樊立勤贴过康生的大字报，是“现行反革命”。但他仍一如既往地走自己的路，在 28 楼牵头创办了刊物《东方红论坛》，对聂元梓校文革进行坚持不懈的斗争。

北大“井冈山兵团”成立后，各系各单位也相应成立了“井冈山兵团纵队”。“井冈山兵团”以“纵队”区别于“新北大公社”的“战斗团”。

如果说“新北大公社”这一派是北大的“在朝派”，无论人数和实力均雄居首位。那“井冈山”这一派可视为“在野派”。“在野派”无论在人数和实力上都远逊于“在朝派”。“井冈山兵团”的成立，标志着北大校内两大对立的造反派组织正式形成。

北大“井冈山”成立后，许多“新北大公社”的骨干成员也纷纷“起义”参加了“井冈山”，如原来的公社派的喉舌《新北大广播台》一次就有 8 名成员造反组成“号角战斗队”集体加入“井冈山”广播台。

此时是“井冈山兵团”鼎盛时期，拥有成员 5000 余人，包括有名的教授东语系季羡林，历史系周一良，地理系侯仁之等等。

周培源是一面旗帜。被定为陆平“黑帮分子”的法律系副系主任萧永清，此时也为形势所感召，破门而出，自己解放自己，写了《造反声明》。他还给周培源和“井冈山兵团”写了一封言词恳切的信，申诉自己“正处在水深火热之中”，控诉“牛棚”是“国民党法西斯集中营式的制度”，表示“要杀出来”，希望周培源和井冈山兵团向他“伸出革命的援助之手”。

国际政治系主任赵宝煦同样为反聂形势所鼓舞，也发表了《声明》，自行解除监督劳动，否认自己是“三反分子”。

副教务长、著名地理学家侯仁之更是大声呐喊：“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

校党委副书记兼副校长戈华，在周培源的支持下，也发表声明，加入了“井冈山”。

另一名党委副书记张群玉则出面召集 46 名校党委委员及各系总支正副书记、正副系主任，连续开了 10 次串联会，分析了学校形势，许多人纷纷表示要“批判聂元梓的反动路线”。

北京大学的反聂大同盟就此形成。

8 月 17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针对鞍山的武斗和鞍钢部分高炉停产的情况，以中发［67］257

号文件做出《关于处理鞍山问题的决定》，决定对鞍山市、鞍山钢铁公司实行全面军事管制。

8 月 18 日上午，经北京市革委会主任谢富治批准，北京师范大学“井冈山”也发了枪，北京卫戍区副司令员李钟奇等人出席了授枪大会。与此同时，北师大成立了军事委员会，下设民兵师、基干民兵团。“井冈山公社”负责人谭厚兰任军事委员会主任、民兵师政委。

## 第 828 回：第三次，接见天津市代表　毛泽东，上海召见许世友

8月18日凌晨1时30分至4时30分，陈伯达、谢富治、戚本禹在人民大会堂安徽厅第三次接见天津市群众组织代表。在座的有：李天佑、郑维山、罗元发、黄振棠，天津驻军负责人杨银声和天津市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成员江枫。

天津“大联筹”代表首先汇报。当汇报到外地赴津师生与天津驻军66军军长郑三生辩论时，陈伯达提议：“现在一方面在这里发言，同时双方各派5名代表去搞制止武斗的协议。协议是为了平息纠纷，不是重新挑起纠纷。用这样的态度工作可以吗？要诚心诚意搞协议，要用革命精神、自我批评的精神，与对方合作的精神搞协议。你们现在就可以各派出5名代表协商一下。”

群众组织代表提出是否请军管会的人也参加，陈伯达同意：“军管会可以派个把人去听听，但主要是靠你们自己。”

郑维山说：“可以去参加，光带耳朵。”

陈伯达：“‘八一三’、‘卫东’的两个同学来了没有？”

他是问天津大学“八一三”和南开大学“卫东”这两个天津有名的群众组织代表来了没有。

下面答道：“来了。”

陈伯达又问：“为什么不让你们来？”

答：“因为观点不一致。”

陈伯达：“观点不同就不让人家参加？这不对。正因为观点不同才开这个会嘛。”

“大联筹”代表汇报到塘沽港口武斗影响生产时，陈伯达说：“塘沽问题也要搞个专门协定。这个地方要保证运输畅通，保证安全。”

“大联筹”提出要求把受伤代表送北京治疗，谢富治说：“和国民党打仗受了伤送北京治疗我们欢迎，打内战受了伤送北京来我们不欢迎！”

这时，搞制止武斗协议的双方代表对协议题目、签字方法等问题发生分歧，并进入会场请示。陈伯达、戚本禹对他们提出的具体问题作了调解和回答。戚本禹强调指出：“制止武斗是中央的指示，你们要坚决执行中央指示，不要在枝节问题上争了。采用任何一方提出的题目或签字方法，都不意味着中央承认谁反对谁，这里只是解决制止武斗的问题。”

接着“五代会”代表汇报，对“大联筹”反映的情况提出异议。相继双方交替发言，对有关事实发生争论。当谈到“反复辟联络站”这个组织名称时，陈伯达说：“我随便讲个小意见。‘反复辟’这个意义究竟怎么样？你们搞反复辟要考虑考虑。有‘反复辟’，有‘大联筹’。反复辟就是说天津有资本主义复辟，是不是这样？这值得很好想一想。如果不是这样子，‘反复辟’就不要用了。‘大联筹’还是可以用的。‘反复辟’你们好像讲不出多少道理来，值得三思，多想想，是不是有复辟。天津是搞过一次复辟的，那是二、三月间在小站镇……也不过几十天，四清下台干部要登台或准备登台。听说小站有一段搞得很乱，后来北京政法学院同学到那里，向农民请罪，承认错误。我赞成他们这种态度。所以你们可以总结这一段经验。什么叫复辟，什么叫反

复辟？要晓得这个事情嘛！”

当“五代会”代表谈到“反复辟联络站”与李立三有联系时，陈伯达说：“李立三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

众呼口号：“打倒李立三！”

两派继续争执抓人、抢东西、死人、放火等问题，当辩论到对解放军的态度问题时，天津市第三配件厂的“大联筹”代表董广发站起来说：“我们不是反对解放军，而是反对军内的‘一小撮’！”

这时，戚本禹说话了，叫他不要再提“抓军内一小撮”。

不明就里的董广发还站在那不停地辩解，戚本禹“啪”的一声拍桌子站了起来，会场的门也开了，几个人跑进会场。“大联筹”的人一看情形不对，生生的把董广发摁在座位上，不让他再说。

戚本禹非常气愤地说：“今天达成制止武斗协议以后，如果再发生杀人、放火、打人，就把这个组织宣布为法西斯组织。对干这种事的人，内部要造反，把这种人揭露出来，认真处理！你们可以学北京的办法，回去以后要搞游行示威，发动群众制止武斗。杀了人就没有事了？那不行！要处理的！达成协议以后，马上打电话停止武斗，制止武斗的协议要在全市张贴。一个工厂、一个单位的问题只能靠内部解决，禁止任何人带人到外单位参加武斗或冲击。今后规定一个简单的标准：谁去冲击谁负责，谁抓人、扣人谁负责。武斗到一定程度就要发生质变。质变了，不管你这个组织过去怎么样，都不行。以后就用实际行动证明是什么组织，是革命组织还是法西斯组织。同意不同意？”

众答：“同意！”

戚本禹：“同意就鼓掌。”

众人鼓掌，高呼“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戚本禹：“今后，谁都不准购买杀人凶器，谁买扣谁的工资，弥补国家损失。”

众人鼓掌，高呼“毛主席万岁！”

戚本禹接着说：“我再讲两点意见：一是塘沽的问题很重要，你们用武斗的精神去支援一下，两派考虑一下，要派人去参加劳动。这要与驻军研究商量，安排好再去，安排不好不要去，去了决不能发生武斗。那是个特殊地方。如果在那里发生武斗，军管会有权按《六六通令》处理。如果有人包庇，我们就要过问。这一点你们要向上海造反派学习。上海港运发生困难时，上海造反派去支援，参加劳动，做出很大贡献。”

谢富治插话：“关心国家财产才是真正的革命造反派，搞武斗停止生产是不对的。”

戚本禹：“武斗停止生产就是犯罪。今后要坚决贯彻中央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十项规定，坚持8小时工作，白天搞生产，晚上搞革命，任何人不得随意离开生产岗位。”

“大联筹”一代表说，马上打电话回去坚决贯彻中央首长指示。两派代表鼓掌支持这个行动。

戚本禹：“另一点意见是，建议你们不管哪一派，今后不要随意说‘军内一小撮’。你们没有根据不能随便说。毛主席指示我们要‘三依靠’：依靠群众大多数，依靠人民解放军，依靠干部大多数。解放军有缺点错误是可能的，但与地方不同，如与天

津的万张反党集团就根本不同。他们是有一套反革命修正主义货色的，他们长时间来形成了一套反革命修正主义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军队不是这样的。军队中也有坏人，但是极少数，如彭德怀就是坏人。我们的人民解放军是好的，是经过考验的。要不，为什么毛主席号召我们向解放军学习呢？文化大革命中有些同志可能犯了方向路线错误，但性质是不同的。不是坏人，有错误可以批评，但不能说是‘一小撮’，不要哪里都抓陈再道，哪有那么多陈再道？就那么一个嘛！犯了错误可以炮轰，可以检讨。有坏人你可以提出材料，我们研究，不能随便提‘一小撮’。”

戚本禹讲完后，群众代表宣读了双方制止武斗的协议。全体一致鼓掌通过。陈伯达说：“达成协议是个很大的成绩。要执行，谁破坏协议就有责任。定下来就要执行，谁破坏谁就犯罪。”

有的代表提出，过去武斗中，有些人抢了不少公物和私人财物，应当处理。戚本禹说：“要号召他们自动交回。现在不交没有关系，将来一定会一一查清，进行处理。不要看他们现在高兴，将来要哭的。群众一定会揭露他们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现在不报，时辰不到，不要担心！”

大家笑着鼓掌。

最后陈伯达说：“祝贺你们达成协议！但是要看行动，看实际，口头上的不算。”

众人鼓掌。

在上海的毛泽东，这时看到有登载“许世友反毛主席”的传单，奇怪的问道：

“许世友反我？我还未发现。许世友紧跟张国焘，许参加第

四方面军，张是首长，许跟他也是自然的。他没有谋害我嘛，我把他从监狱找出来的嘛。许世友应该保。”

正在大别山金寨部队农场的许世友听说毛泽东到了上海，也立即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让妻子田普亲往上海，找到杨成武，将信转交给毛泽东。

毛泽东看了信，问杨成武：“许世友现在哪里？”

杨成武说：“金家寨。”

“他干什么呢？”

“带个独立师，在那里种田开荒。他说，谁到那里去，没通知他，他就开枪打。”略停，杨成武又补充一句：“他老婆告诉我的。”

毛泽东淡淡一笑，对杨成武说：“许世友是大军区的标兵。打倒许世友，其他大军区的，例如沈阳的陈锡联、济南的杨得志、福州的韩先楚不都要打倒吗?许世友不能打倒!要保他。”

他抬起一根手指：“你们把许世友接到上海来吧。”

杨成武说：“好，我这就去?”

毛泽东将手一拂：“你不要去。张春桥去吧。”

坐在旁边的张春桥点点头。

毛泽东又转向杨成武：“你告诉安徽李德生，叫他准备顿饭。张春桥吃顿饭。你再准备两架飞机，先乘直升机到金家寨接许世友，接到合肥，再用大飞机接到上海。”

杨成武点头：“明白。”

毛泽东又对张春桥说：“你去，跟他好好谈谈，把他接来上海。”

张春桥说："是。"

8 月 17 日上午 9 点多钟，杨成武给许世友打去电话，说："我正陪着'客人'在上海，'客人'要见你，派张春桥用'客人'的专机去合肥接你。"

许世友从杨成武的话音里听出"客人"不会是别人，肯定是毛泽东。他按照杨成武的安排，从金寨来到了合肥。

18 日上午，张春桥乘专机到达合肥机场，见到许世友说："我这个政委亲自到合肥接司令员来了。"

他们二人在房间里单独谈了 10 多分钟，然后一起去吃饭，喝了不少酒。

到了上海，许世友住在兴国路 72 号。刚安顿好，杨成武和汪东兴就先后过来看望。许世友要求尽快见到毛泽东，汪东兴答应早作安排。

许世友不爱睡觉，今天却睡起午觉来了。下午 14 时，张春桥的秘书何秀文前来通报，说："伟大领袖毛主席要春桥同志陪许司令员马上过去谈话。"

许世友的秘书李文卿立即上楼请许世友起床。许世友起来后，说话还带着一股酒气，李文卿很担心毛主席会不高兴。

许世友来到毛泽东的房间。一见面，毛泽东刚说："世友啊，你还好吗？"就见许世友扑通跪倒在地，"嘭"的磕了很响的一个头。

在场的杨成武、张春桥一下被许世友的举动惊呆了，站在那里，不知所措。

毛泽东心头一热，眼帘湿润，快步上前双手把许世友搀起来，

用微颤的声音说："世友呵，这是怎么回事？怎么是这个样子？"

许世友放声大哭，诉说委屈："两件事读书种田，一等人忠臣孝子。主席啊，现在还有忠臣吗？"

毛泽东安慰许世友说："他们冲击你，你有什么问题呀?!怀疑一切，打倒一切，也要把你打倒吗?不能把你打倒呀!"

毛泽东把许世友扶起来，欲说又止，沉默片刻之后说："世友同志是打不倒的，你还是南京军区的司令员嘛。张春桥，我说的对不对？"

张春桥连忙冲着毛泽东和许世友点头称是，随后和杨成武一起悄悄地退出了毛泽东的房间。

据后来许世友回忆说，毛泽东把他拉到沙发前，一边点烟一边说："前些时我到杭州，有人同我谈到社会上要打倒许世友的事，说许世友一贯反对我毛泽东，这是胡说，这些人不懂历史吗？你许世友从来就没有反对过我毛泽东嘛。"

毛泽东的一席话，使许世友的心头涌起阵阵暖流。他向毛泽东谈到陶勇惨死的事情。这件事毛泽东曾听陈毅在北京讲过，然而现在从许世友的口中讲出，让他更感到悲伤。

毛泽东顿了片刻说："世友，我信任你，南京军区党委是可以信任的，你还是南京军区司令员。不许揪许世友，这是我的意见，我派人打电话给他们，你回去也传达我的意思，你看这样行吗？"

毛泽东又说："我要春桥乘我的飞机去接你。你身体怎样，住后方医院安全不安全？"

许世友报告说："身体可以，大别山也很安全。"

接着，毛泽东给许世友讲了全国的形势。许世友着急地问：

“毛主席啊，‘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还要不要啊？”

毛泽东回答：“要啊，‘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怎么能不要呢？”

许世友说：“那我就没有错！有人违反纪律，我是执行纪律，有什么错？”

毛泽东说道：“‘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是我们的传家宝，头一条就是‘一切行动听指挥’，部队不听招呼怎么行？军队要保持稳定，不能自毁长城。”

许世友提到当时盛行的“抢枪”风，毛泽东耐心地作解释：“抢枪有好人抢，有坏人抢。好人抢了会认识错误，送回去。对坏人就要专政。‘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到底是管用的。”

许世友：“现在为什么有人要夺我的枪？”

毛泽东说：“顶多南京再出现一个张国焘。”

许世友认为农村不能搞文化大革命，都造反了，老百姓没有饭吃就糟了。

毛泽东说，农村还是要抓革命、促生产，没有粮食，全国人民饿肚子可不行。

毛泽东问许世友家里的情况，许世友说：“自己都顾不上，家里的事我管不了。”

毛泽东笑了：“我家里也有两派，我管不了。”

毛泽东劝许世友下山，他说：“你在南京不好住，可以到北京住到我家去。”

许世友没有同意：“不，什么时候打仗，我什么时候下山。”

“那你先到北京学习。”毛泽东又建议说。

许世友与毛泽东足足谈了两三个小时，高兴地从毛泽东的房

间走出来，看见客厅里的杨成武、张春桥，对他们说：

“我到大别山去打两只豹子，一只送给杨成武，一只送给张春桥。你们知道吗?我是百发百中的猎手呀!”

后来许世友到上海，果然请徐景贤、王洪文他们吃饭，还送给张春桥一只大豹，是他在安徽山区打猎的收获。

许世友这次到上海只住了一个晚上，上午到，下午毛泽东接见，第二天一早就飞回合肥，换乘汽车重归大别山。

虽然来去匆匆，但消息不胫而走，很快传开。南京军区机关的人忙不迭打听情况。许世友知道，南京市、江苏省甚至整个华东都在关心毛泽东同他的这次会面。他没有立即对外公布这个消息，只是告诉下边：“可以打电话向家里讲：就说‘红太阳’在上海接见了我；就说毛主席指示军队要稳定，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是我军的传家宝，不能丢；就说毛主席说不准揪许世友。”

8 月 18 日，毛泽东审阅周恩来 8 月 17 日送审的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关于开办各省武装干部训练班的意见》稿，批示：“照办。试办第一批以后，再定第二批的范围和办法，到那时可能要作一些改变。”意见稿说：训练的目的是检查本地区支左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训练方法主要采取整风和“四大”的形式，阅读毛主席著作、中央文件和其他有关材料，联系实际，联系思想，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

8月20日，海军党委给南京海军学院“革命造反总部”、军械学校“红联总部”和“革联”发了电话指示：

南京海军学院革命造反总部、军械学校红联总部和革联：

据我们所知，南京军区许世友同志虽然在文化大革命中犯有

这样那样的缺点和错误，你们可以批判，但他与武汉陈再道比较有根本区别。因此，对许世友同志不能采取打倒的方针。同时，南京八•二七组织是一个革命组织，对他们不能采取压倒，压垮的方针。建议你们冷静考虑我们的意见，并希望你们纠正不符合这个方针的一切做法。你们可能一时不理解，我们相信你们将来会逐渐理解的。

海军党委

67.08.20

## 第 829 回：细筹划，“锦联筹”召开会议　八一八，步校武器库被抢

8 月 18 日，锦州市的北大营，沈字 413 步兵学校，爆发了一场由抢枪而引起的大型武斗，双方死亡 30 多人，几百人受伤。

8 月初，锦州“糟”、“好”两派的代表性群众组织“联合总部”和“锦联筹”，以沈山铁路为界线，在锦州铁路南北市区进行武装割据。两大派的武装人员都在构筑工事和囤积粮草，准备进行长期的对抗和战斗，用鲜血和生命来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用他们的赤胆忠心来捍卫伟大领袖毛泽东。

由于锦州地区武斗的急剧升级，两派的武器已由大刀、长矛、手枪、猎枪和手榴弹，升级到步枪、冲锋枪和机枪。但是这些枪支和弹药的数量还比较少，主要来源于各大单位的武装部。

进入全面内战以后，“糟”、“好”两派都在想搞到大量的武器，以应付武斗升级后的激烈战斗。两派有条件的工厂都在生产手榴弹和地雷，用来装备本派的武斗队员。但由于质量不好时常炸伤自己人。于是他们都把目光盯在了部队的武器库。

8 月 16 日，锦州铁合金厂的老好们抢夺了本厂的武装部。在第二天，就在郭殿心，外号郭鬼子的率领下去打附近的八中“红司”老糟。在拥有步枪和轻机枪的老好们攻击下，只有几支猎枪和手榴弹的老糟们遭到了惨败，20 多人受伤，还被打死了一名学生。

“锦联筹”的大头头们在市委专门召开了到步校去抢枪的作战会议，市委几个持“好”字派观点的老干部也列席参加这次会

议。经过反复的研究和争吵，最后决定去抢 413 步校的武器库。

位于北大营的沈字 413 步兵学校院内，有个大型的战备武器仓库。但是要抢这个大武器仓库，谈何容易？中央军委已经三令五申，不得抢夺解放军的武器，抢枪就是反革命。抢军队的枪支那可要冒杀头的风险。

“锦联筹”得到北大营老好“古田公社”的情报，那里的老糟“造反总部”手里只有些大刀和长矛，连在大门口站岗的卫兵都是徒手，警卫排的枪支已被封存，就是怕被群众抢走。再说，如果被“糟”字派先把库里的武器弄走，那可就是真糟了。

于是，“锦联筹”的作战部长付洪生向所属的各单位武斗队下达了抢枪的作战命令。

接到去 413 步校抢枪的命令以后，“老好”各单位的头头们都分别进行了战斗动员，有些人感到很兴奋，这下可以鸟枪换炮了。但多数人却忧心忡忡啊，这枪是那么好抢的吗？见大伙的信心不太强，那些头头们就极力地打气和鼓劲。8 月 17 日下午，“锦州一高中联合兵团”接到“锦联筹”的通知。让男同学都在工人文化宫集合，参加全市统一行动。当晚，这几个男同学被安排住在工人文化宫的舞台上。大家七手八脚拆下幕布当床单。幕布很薄，睡在上面很不舒服。没有办法，只能穿着衣服，半睡半醒地委了一宿。第二天，天不亮就被叫起来集合。门外广场上已经陆续开来很多大卡车。汽车轰鸣，人声嘈杂，寂静的夜晚立刻热闹起来。一些来自厂矿的工人是随汽车一起来的。他们带着扎枪和木棍，有几个人还背着猎枪。大家爬上车，很长时间没有动静，好像在等什么人。人们带着满脸的狐疑窃窃私语，互相询问。大家都不

知道要去什么地方，也不知道去干什么。汽车终于在夜色中开动了。车队沿着解放路向东缓慢地行驶着，雪亮的车灯射向前方，隐约看到前面还有两辆汽车。车队到达市委门口时停了下来，车灯也熄灭了。当汽车重新开动，车灯再次照亮前方时，车队前面又加入了 3 辆汽车。一路上走走停停，不断有汽车加入车队。当汽车到达百股村附近时，天蒙蒙发亮了。这时才看清楚，整个车队有 20 来辆汽车，车上站满了人。车队过了百股铁路道口后，开始往北，向金屯方向驶去。

锦州市凌河区西部大街上的老百姓们，有的站在马路旁，有的趴在窗后，都被这种空前浩大的汽车行动惊呆了。

车队驶到沈阳军区高级步兵学校东门以后，经过简短交涉，驶入步校，停在礼堂附近的道边上。从前面的车里下来几个负责人模样的人，他们绕过礼堂向步校办公楼走去。

坐在驾驶室里的负责人摇下车门玻璃点火吸烟，随口说："抓紧时间抽口烟，进了仓库就不让抽烟了。"在闲谈中，大家才得知，今天的行动是到步校"运枪"。

大约半小时以后，下车的负责人带着很多人回到车队。他们是步校"好"字派"古田公社"的。在"古田公社"老好们的引导之下，车队往西走了数百米，很快来到步校南大门一片仓库的墙外，另一批精悍的武斗队员则在仓库的北面布防。

一切都是在按照预定的作战计划进行，"锦联筹"的作战部长付洪生本身就是金屯的民兵营长，他的手里提着两支盒子枪站在一辆大卡车上，亲自在现场进行指挥。

车队进入最西边的一个库区。仓库的大门是两扇朝东对开的

木头门。绿色的门上标志着红色的号码。库区里一南一北有两个带枪的解放军战士正在站岗。他们看到带队的人后立刻敬礼，放车队进入库区。这个人分别用钥匙打开库门上的锁头，拉开了大门。汽车依次在门前掉头，倒着开进仓库。仓库很大，里面整齐地堆放着很多绿色的大木箱。负责人安排车上留两个人接木箱，其余人下车，两个人抬一个木箱往车上装。很快就装满了一车。

这时天已大亮，仓库西墙外是步校“古田公社”对立面组织“造反总部”的地盘。几百米外“造反总部”大楼顶上的人，看到“锦联筹”的汽车到仓库运枪，楼上大喇叭立即发出了紧急呼吁：

“最最强烈的抗议！最最紧急的呼吁！”

“锦联筹的一小撮反革命坏头头们，欺骗和蒙蔽一些群众们来到北大营抢枪，抢枪就是反革命！”

南大门和西大门警卫排的岗哨，也急忙通过电话向步校领导人反映情况。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随着“造反总部”大楼上的高音喇叭声响，一大群“造反总部”的人，手持大刀和长矛冲出了大楼。

很快就听见“啪、啪、啪”一阵杂乱的枪声响起，冲出大楼的“造反总部”官兵们纷纷中弹倒地，当场死亡两人。其余的人慌忙撤进了大楼。

大楼上的广播喇叭声变得悲壮起来，“最最强烈的抗议！‘锦联筹’一小撮反革命暴徒悍然枪杀我人民解放军指战员，血债一定要用血来还！”

“造反总部”十几个战士此刻也从窗户进入警卫排的枪库，拿出一挺五六式轻机枪和300发子弹，十几支五六式冲锋枪和子弹。

“‘锦联筹’之中受欺骗和蒙蔽的群众们，你们要立刻退出军火库!如果再不退出军火库，我们就要采取革命行动了!”“造反总部”大楼上的广播喇叭在发出最后的警告。

这时，几位步校的领导来到了“造反总部”的大楼，刚才他们已经和锦州卫戍区司令部通了电话，要求立即派部队来这里制止“锦联筹”的抢枪行为。

步校的领导和“造反总部”的头头进行了紧急磋商以后决定：不惜一切代价，必须制止这次的抢枪行动。“我来负责，但不要误伤一般的棒子队群众，专打那些挑起武斗的坏头头们!”“造反总部”的一位老糟头头，迫不得已地下达了射击的命令。

在“造反总部”的骂声中，仓库这边第二批车也快装满了，大家正准备继续往车上装，“哒、哒、哒----”，突然仓库外面响起炒豆般清脆的枪声。一个骑在墙头上的一高中学生腿部中弹受伤。一个在过道东站岗的解放军战士胸部中弹当场死亡。“锦联筹”的付洪生一边指挥带猎枪的人开枪还击，一边对正在装车的人大喊：“‘糟字派’开枪了！赶快抄家伙打呀!”

听见枪响，司机没等关上后厢板就开动了汽车。汽车拉着多半车箱子开走，车下装车的人被扔在仓库里。仓库外面，有的一高学生冒着生命危险把受伤的同学往车上抬，有的同学在车上打开木箱取枪。在仓库里的人也赶紧打开地上的木箱往外取枪。木箱里的枪很快被取光了，还有很多人没有拿到枪。他们顾不上拿

枪，空着手跟在汽车后往外跑。正在奔跑的人不断有人被子弹击中。眼看着付洪生也中弹倒在地上，他挣扎了几下，没能站起来。两个勇敢的一高中学生冒着枪林弹雨架起他往南边菜地跑去。这时有人看到枪身上空空的没有枪栓，就停下脚步问身边的两个军人："这枪怎么没有枪栓呢？"经这么一问，他们才想起来。为了防止抢枪，他们事先把枪分解了，部件和子弹分别存放在不同仓库里。匆忙中一时也说不清具体位置，很多人拿到的都是这种打不响的枪。

在"锦联筹"的人用几只猎枪边打边撤的同时，本派"古田公社"的军人迅速组装好冲锋枪从"造反总部"大楼的东侧进行反击。正在楼顶上进行射击的一名老糟被打死，另有几个老糟官兵也负了伤。"造反总部"的老糟们立刻掉转了枪口，朝"古田公社"这边射击。几个点射过后，以黄教员为首的 3 个"古田公社"的头头被打死。

一阵激烈的枪声响过之后，"战场"上出现了可怕的宁静，空地上散落着丢弃的扎枪、木棍和各式各样的鞋，一片狼藉。人和车早已跑得无影无踪。只有"古田公社"的军人躲在东边仓库墙角后面用枪对着北边那栋仓库，急切地向这边招手。3 个被困在仓库里的人趁机离开仓库，快速越过空地，沿着墙根朝办公楼跑去。

四层的办公楼坐北朝南位于步校的东南侧。楼南面是成片的家属区，北侧是礼堂和服务社。楼西侧长着高大的杨树和低矮的榆树墙。原来，步校的两派组织以枪库为界分别占据了学校的东西两侧。以政治教员为主的教职员工和多数战士学员组成的"好

字派”组织“古田公社”以校办公楼为据点在东侧。以射击教员，战术教员等军事教员为主的教职员工和少数战士学员组成的“糟字派”组织“造反总部”以军需仓库为据点在西侧。枪支弹药封存在由炮库改成的枪库里。

双方忙于抢运各自占有的枪支弹药时，战场上出现了暂时的平静。很快“造反总部”迅速占据了西门附近的楼房。他们再次打破平静，用机枪封锁了仓库空地、西大门和东西走向的道路。“古田公社”在仓库附近没有制高点，无法和“造反总部”对抗。被迫放弃仓库中没能抢运出来的部分枪支，退守到办公楼。枪库被“联合总部”完全控制。这个时候“好字派”的人再想离开或接近枪库已经十分困难。

“古田公社”和“联合总部”虽然脱离接触，分居步校东西两侧，但是仍在用枪互相对射。双方不断有人伤亡。站在办公楼的隐蔽处，清楚地看到“造反总部”的机枪吐着火舌四处扫射，地上被子弹打出一串串尘土。

在枪声中从西门外驶来一辆挂着海军车牌，摇着红十字白旗的军用救护车。汽车刚过铁路道口就遭到机枪扫射，车身上多处中弹。汽车进入西门停了下来，过了一会，“造反总部”的人从仓库里跑出来，从车上抬下六个穿灰色海军军装的人。来后得知，这 6 个被打死的人是海校“糟字派”的，他们“自己”人打了“自己”人。

海校“兵团总队”接到步校发生武斗的报警后，几名队员坐着从“红旗三总部”抢来的救护车前往步校，增援自己一派的战友。但是，他们在匆忙中没有注意到救护车上书写着打倒海校校

长的口号，而“兵团总队”是支持这位校长的一派组织，“红旗三总部”则是要打倒这位校长的。当海校的救护车开到步校的时候，“造反总部”看到海校来的车辆上有打倒校长的标语，以为是“红旗三总部”派来的，于是朝着海校的救护车猛烈射击。这些步校的教员枪法是极准的，当两边的人弄清楚是自己同一派的战友时，海校来的人员中已经有 4 个人被枪击中不治身亡。

“锦联筹”在这次行动中共获得各种枪支 300 多支，子弹数万发。这批枪支登记造册后，分发到下属各级群众组织，使“好字派”的战斗实力得到空前的加强。从此，“好字派”占有了绝对优势地位。这次行动也给两派群众造成巨大伤亡。事后查明，在北大营里被打死的那些抢枪的老好共计 21 人。413 步校的“古田公社”老好被打死 3 人，“造反总部”的老糟被打死 3 人，437 海校“兵团”和“总队”的老糟被打死 4 人。在锦州北大营 413 步校的抢枪事件之中，糟、好两派的军、地武斗人员共计死亡 31 人，受伤数十人。伤者大多数是“锦联筹”的群众。

那名大显身手的“造反总部”糟字派的机抢射手，在 1964 年的全军大比武中名列轻机枪第二名，是个特等机枪射手。

闻讯赶来支援的海校糟字派，在刚接近北大营西部外围时就遭到好字派的阻击。总共来了 3 辆汽车和 100 多人，一下子就被打坏两辆汽车。直到“造反总部”的老糟用火力从侧翼进行支援，再加上市里老糟们援兵的不断到来，这才把进行阻击的 300 多名老好们打跑，解救了已经处于危难之中的 413 海校老糟们。

天黑时刻，糟字派的各单位武斗队共先后来了 1000 余人，用几十辆大汽车从步校仓库运走了大批的枪支和弹药。

步校“造反总部”的老糟们，自己也留下了足够的枪支和弹药，包括六门 122 毫米榴弹炮，并且在整个营区修筑起坚固的工事和地堡群。

被“造反总部”老糟打怕了的“锦联筹”老好们，一直到成立市革命委员会，都再也没有敢越北大营这个雷池一步。

事后，锦州卫戍区司令部的名义电告沈阳军区和中央军委，要求严惩 413 步校的领导和其“造反总部”头头。

413 步校的领导也没有闲着啊，他们也电告沈阳军区和中央军委，请求处理 40 军在抢枪事件中的不作为。

437 海校通过北京的海军党委，也指责 40 军未对“锦联筹”的抢枪行动进行制止，其实就是其黑后台。

“八一八”抢枪之后，好字派“锦联筹”，接连几天在市内的一些大武斗据点里举行了大型追悼会，“锦联筹”的市委、工人文化宫等大据点不分昼夜地播放着哀乐。

## 第 830 回：动荡中，李再含返回贵阳　战端起，贵州踏平四——

7 月 22 日，李再含返回贵阳。而此时的贵州，也已经是动荡不安，反对省革委会的“411”势力在不断壮大。

6 月 22 日，省公安厅 13 名干部张贴公开信支持“411”，指出省公安厅“113”逮捕贵州医学院教师李吉杰是错误的，把斗争矛头对准学生是错误的。

6 月 29 日，贵阳师范学院“411”派的“66 战斗团”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一行 38 人应邀前往毕节参加“七一”庆祝活动。因为他们是“411”观点的，省革委会指示毕节地区革委会加以阻拦。宣传队途经大方县城时，被大批农民阻拦和围攻，汽车被砸烂，在断水断粮两天一夜后，宣传队被迫绝食以示抗议。贵阳“411 兵团”闻讯后，于 7 月 3 日派出 300 名学生乘坐贵阳市人民汽车公司的 10 部公共汽车前往营救，路过黔西县和大方县黄泥塘时，又先后受到大批手持镰刀的农民围攻，被困黄泥塘。当天下午,“411”群众 100 多人集队前往省革委要求处理大方问题，未获答复。

被困大方县城的贵阳师范学院“66 战斗团”在当地“411”支援下，于 7 月 5 日解围前往毕节。

7 月 7 日,“411 兵团”委员会提出书面要求，请省革委、省军区立即制止事态的发展，将被围困在大方黄泥塘的“411”群众全部接回贵阳，并保障他们的人身安全。没有回应。

7 月 8 日晚 20 时,“411 兵团”1300 多人在贵阳市大十字广

场开始了静坐绝食斗争。到 7 月 9 日上午，参加人数增至 4000 多人，下午再增加到 5000 人。一队队工人高呼“不要工资不要命，支持‘411’ 闹革命!”慷慨激昂地加入静坐绝食斗争队伍。

7 月 10 日，安顺运输公司“红旗战斗团”开来 84 部汽车，停放在贵阳市喷水池，声援静坐绝食斗争。

因李再含陪同谢富治、王力、余立金等去云南、四川解决问题，“411 兵团”派出代表前往成都找李再含交涉。贵州省军区派出汽车到大方将被困的“411”群众 300 多人接回贵阳。

7 月 11 日，省革委召开群众大会，请大方县的贫下中农在会上揭发控诉“411”在大方“犯下的滔天罪行”。人们发现，在大会上发言的大方县贫下中农代表竟是省革委会秘书处的姜德久。还有一位坐在小轿车内的代表是省革委新增副主任孙昌德。“411”群众将此二人抓到“411”的大本营贵州工学院。次日，省公安厅康岩中去贵州工学院要人，也被扣留下来。

7 月 13 日晚，省革委、省军区从平坝、清镇、阳关等地调集 100 辆汽车和数千名工人，以执行紧急任务为名进入贵阳市内，驱逐停放在贵阳市喷水池的 84 辆声援“大十字静坐绝食斗争”的汽车，并包围贵阳师范学院，准备捣毁在这里办公的贵阳“411 兵团”。 群众闻讯纷纷赶往师范学院，很多淘气的小孩将汽车轮胎放了气使其不能动弹，这些趴着的汽车在师院大门外的马路上排成千米长龙，“411 兵团”乘机撤离师范学院。

省革委副主任张明认定这是省革委委员、省总指挥部成员袁昌福走漏了消息。袁昌福从此被清除出省总指挥部和省革委。

7 月 14 日，支持“411”的“省市机关干部‘714’串连会”

成立。

7 月 22 日上午，李再含离渝返回贵阳。他降低了关于“411”问题的调子，由“反革命逆流”降为“革命造反派犯错误”，提出对“411”要进行“三引导”，组织上引导归口大联合。他在 7 月 23 日和 24 日的讲话中都说：“‘411’从整体、主要部分，起主要作用的大体是师院‘66’战斗团几个战斗队，贵工‘915’，贵大‘915’，农院‘915’也还有一点。从历史上看问题，‘66’、‘915’是革命造反派”，“几个月来，以军队出面，查来查去，‘411’与走资派没有什么联系，没有就是没有嘛！实事求是。”同时批评了“不打垮‘411’不是好汉”的错误口号，当场引起了“支红派”头面人物的强烈不满。他们有的要卷起铺盖回家，洗手不干了；有的甚至要“炮轰李再含”。

7 月 23 日，“贵阳战斗团”恢复重建，接着“贵州红色工人战斗团”恢复重建，这两个工人组织都先后发表了支持“411”的声明。

7 月 24 日，“贵阳地区公安系统支持 411 联络站”成立。

7 月 28 日，李再含作了掀起革命大批判新高潮的动员报告，号召两派群众组织实行革命大联合。

7 月 29 日，“红卫军平反联络站”成立，并发表支持“411”的声明。

7 月 30 日和 31 日晚上 22 点至 24 点，分管宣传口、排名第四的省革委常委戚休，在新华社贵州分社先后被贵工和师院学生“请”到贵州工学院和贵阳市大十字广场的群众大会上做了检查，承认过去抓“三股反革命逆流”和“不打垮‘411’不是好

汉”的口号都是错误的。戚休在大十字广场当众签字确认。大十字听众人山人海，数以万计。一时间在两派广大群众之间似乎缓和了矛盾，出现了团结的气氛和联合的曙光。8 月 1 日，静坐示威的人群撤走，孙昌德、康岩中、姜德久放回。

谁知，第二天，8 月 2 日，形势就变了。李再含在贵阳市邮电大楼前广场召开 10 万人大会，出动了全副武装的部队，会后他领导部队示威大游行，并高呼口号：“热烈欢迎孙昌德、康岩中、姜德久胜利回到省革委！”“打倒贵工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坚决揪出 411 坏头头！”“揪出 411 黑后台！”

8 月 3 日，《新贵州报》开始公开点名批判“411”。

8 月 3 日，在贵阳六中“62 兵团”会上，李再含说：“现在你们要作好准备，在必要的时候，你们要武装起来，要拿起枪杆子来。”“贵州军队人数少，同时军队有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等‘五不’政策，出去制止武斗尽吃了亏。还是群众出面方便。对方要打，我们也可以打。”

8 月 4 日，李再含派出一个 5 人小组乘飞机赴京，向中央宣传组组长、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汇报请示。这个小组由李立领队，姜德久、郭其弟、余听南、王斌参加。到京后住华北招待所。主要汇报“411”问题。由李再含为他们拟定了汇报提纲。

8 月，李再含开始了对“411”的“踏平”行动。相对平稳，武斗较少的贵州战端开启。

8 月 6 日，阳关砖瓦厂、七冶公司和 302 厂的工人，扫平了贵州省冶金工业学校。8 月 8 日，“工尖兵”联合外单位近千人，冲击“二·二六战斗团”所在的化学楼，打伤数十人。

8 月 15 日，安顺运输公司“红旗战斗团”和安顺地区“117”派被铲平。

8 月 16 日，李再含开会策划决定“要端就先端老窝，打贵工”的方案 。武装起来的工人队伍，每 100 人中有一名军人领导，全部穿便衣，化装为工人。设立了一、二线指挥部，第二线指挥部设在电管局楼上，由杨再三指挥；第一线指挥部先设在独立师一团团部，后转移到省军区司令部楼上，由省军区 6 号首长与郁昌奉任正副总指挥。8 月 17 日晚上在公安厅开会，决定当晚 12 点前兵分两路至蔡家关包围贵州工学院，一路由三桥方向进去，另一路由太慈桥方向进去。

当天下午 17 时，在工交联委楼上，由郗素珍布置攻克策略，首先由贵州工学院“支红”派放火，然后改以“贵工‘411’烧楼”为借口，派消防队去救火，主攻队伍便紧随消防车进入贵州工学院。

在开阳磷矿准备一支后备队伍，一旦贵阳进攻失利，两三小时可赶来支援。太慈桥去贵工的路口，由从小河、中曹司、甘荫塘、太慈桥调来的“支红”派把守，负责保证队伍顺利进场并狙击“411”的支援力量。

进攻开始后，一线指挥部通知电管局切断贵州工学院电源，贵州工学院内顿时一片漆黑，学院的防护电网失效。主攻队伍连夜攻打，并火攻办公大楼。18 日晨又发起总攻，2000 多名师生员工被赶出校外。下午 15 时，学院办公大楼被攻占。不少学生宁死不降，纷纷跳楼。

8 月 17 日，家住贵州工学院的贵阳九中高二学生余昌龄在

贵州工学院被武斗的工人打死。次日，贵阳九中学生周俊等人抬尸上街游行，受到武斗工人的围攻。同学们将余昌龄的尸体藏到贵阳省府路小学男女厕所夹道中，躲避追捕。次日，尸体送火葬场。

8 月 16 日，王力带秘书 1 人，在京西宾馆单独接见贵州来的李立等 5 人。李立按李再含拟定的提纲做了汇报，郭其弟又专就“411”问题做了详细补充。

当李立汇报贵州“411”提出要改组省革委等许多口号时，王力明确表示：“那些口号都不对。”

对贵州革委会，王力表态说：“贵州省革命委员会是毛主席、党中央批准的，不能采取拆台的态度。有错误、缺点，可以向他们提，也可以向中央反映么！不把矛头对准贾启允而对准李再含同志，大方向错了。”

8 月 18 日早晨，手持梭镖、头戴藤帽、身穿劳动服、脚穿劳保大皮鞋的一批 011 产业工人队伍，在市中心喷水池与比他们矮半截的小孩们打仗。手无寸铁的小“411”们拖拉他们的梭镖，拿石头打工人，弄得“818”的彪形大汉们往回跑，继而又组织起来追赶小孩子们。这些小学生们不怕，边退边打。一直打到延安路小学，学生们关上了大门，爬上了房顶，用瓦块砸下来。

8 月 18 日，李再含开动一切宣传机器，在贵阳市和全省各地大力宣传王力 8 月 16 日接见李立等人时归纳的三点“指示”：

1、“411”的大方向是错误的；

2、李再含是好同志；

3、新华社驻贵州记者凡支持“411”的一律撤回北京。

同时出动专业武斗队，驱散了贵阳市中心大十字的“411”群众。

当晚，李再含等人在省军区司令部楼上会议室给郁昌奉等人布置全面踏平贵阳地区“411”的任务和作战计划，连夜出动在省军区吃住的011系统武斗队，武装踏平了驻省财经干校的“贵阳市大中专学校411兵团”。同夜，出动油榨片区武斗组织与011武斗队配合行动，踏平了贵阳棉纺织厂“411 工人兵团”，并抓捕了王长宽等人。

8月20日晚上，十几个消防兵头戴消防帽、脚穿长统胶鞋、挥舞着消防斧、铁棒、大刀，高喊着“打倒刘邓陶，踏平‘411’！”从醒狮路消防大楼方向冲下来，然后沿中华南路朝大十字冲去。马路上的行人先是退到人行道上，然后尾随消防兵涌到大十字附近。消防兵驱散在这里看大字报的群众后又撕大字报。这时，不知是谁带头喊出：“打‘818’！打‘818’！”

接着，围观的群众齐声高喊：“打‘818’！打‘818’！”

然后，有些人开始向消防兵扔石头。这时人已越聚越多，黑压压的人群，震天的叫打声，让消防兵害怕了。他们往小十字的汉湘路跑去，从那里撤回消防大楼。但是有两个动作慢了一点，被4个路口涌来的人群堵住了，一个当时就被围打，另一个跑到市公安局门口，但公安局大门紧关着，又折回在大十字路口被群众堵住。当时大十字路口的“小上海”餐馆正在维修，搭有脚手架，地上砖瓦石头很多。群众就拆下脚手架的木方，捡起地上的砖瓦石头围打消防兵，里三层外三层围得水泄不通，里一层的人打一阵出了气挤出来，外一层的人挤进去再打，轮番反复。

被打者的求饶声、哀叫声越来越小，最后没了声息。

这两位消防兵被愤怒的群众活活打死，后被追认为烈士。查不出究竟谁是凶手。

8 月 19 日至 24 日，掀起了踏平“411”高潮，冲击“新华社贵州分社”，绑架、殴打支持“411”的新华社记者，攻占了贵阳钢铁厂、新添光学仪器厂、电工总厂、人民汽车公司、贵阳发电厂、清镇电建公司等厂矿，以及贵阳师范学院、贵阳医学院、贵州农学院、贵州大学、贵阳八中、红色交通学校等。

8 月 20 日，李再含在参加“踏平战斗”的头目会上说：“工人的力量不要散摊子，要集中起来，保持下去，捏成一个拳头。要稳定局势，防止‘411’的反扑。”这天，以 8 月 18 日攻占贵州工学院革命委员会的日子命名的贵州专业武斗队：“贵州 8.18 兵团”正式成立，郁昌奉任司令，彭先胜、张德茂任副司令，按片跨行业共设 10 个团。

在全面武装踏平“411”中，大批抓捕学生和群众，成批挂黑牌、衔稻草游街示众。贵阳地区 6 个看守所关押了 500 余人，此外还在省军区礼堂、省公安厅车房和六处办公室、市公安局礼堂、第一监狱营建队等处共关押 900 余人。被迫外逃的达到 6 万多人。

## 第 831 回：八一八，重庆杨家坪血战　潘家坪，王家大山枪炮酣

8月15日晚，重庆市“815”派“文攻武卫指挥部”司令等人来到刚刚庆祝完“815”一周年纪念活动的重庆大学，找“815总团”商议武斗问题。事关重大，“815”总团立即召开勤务员会议。他们着重研究攻打重庆河运校和潘家坪高干招待所一线，这样有利固守重庆大学所在的沙坪坝地区。因武斗规模大，“815”总团建议“文攻武卫指挥部”召开沙坪坝地区片会后，再做出决定和部署。

8 月 16 日上午，“文攻武卫指挥部”在重庆市第一中学召开沙坪坝地区各单位负责人会议，为固守“815”派占据的沙坪坝区，保证该区与市中心区之间的道路畅通，决定打掉位于两区之间大坪、潘家坪一带的“拦路虎”，就是位于沙坪坝至市中区要道中，石油路上的重庆河运学校至潘家坪高干招待所的“反到底”据点。

会后，他们在歇台子解放军 421 部队，即通信兵雷达技术学校设立了“前线指挥部”，令各单位武斗队于 17 日到指挥部报到集中。

8 月 17 日凌晨 4 点，“815”派袭击了北碚第 22 中学，驻该校的“反到底”派“猛虎团”六中队数十人被俘，其负责人王五二、龙树生等 4 人被枪毙。

“反到底”决定撤离西南农学院。撤离前，“猛虎团”将“815”派俘虏王志高等 9 人枪毙。而“反到底”派西南农学院“826 战

斗团”负责人、女学生王兰英被“815”派俘虏后，于 8 月 4 日晨枪毙未死，幸得农民救活后逃到成都向省革筹汇报，得到省革筹组长张国华接见。

8 月 17 日，重大“815”武斗队又将“猛虎团”两名嘉陵煤矿工人抓到学校，次日强迫其为“815 烈士”裹尸，并鼓动群众将二人打成重伤，随后又从医院抬出毒打致死。

17日下午，重大“301部队”在歇台子通信兵雷达技术学校会议室召开武斗部署会议，决定重大“301”武斗队的榴弹炮阵地设在虎头岩上，一中、三中和二机校的武斗队埋伏于歇台子与河运校之间，二钢厂等单位的武斗队布置在重庆医学院和潘家坪高干招待所一线，把河运校孤立包围。18日拂晓发起总攻。

17 日晚，河运校得到“815”将出动榴弹炮袭击他们的消息。他们判断，学校背后的邵湾、岗上适合设榴弹炮阵地，于是派部分人守卫学校阵地，将学校主力潜伏在邵湾、岗上的庄稼地里，准备袭击榴弹炮。

8 月 17 日深夜，为配合在大坪到九龙坡一线的进攻，南岸区的“815”也组织兵力，对黄山进行了夜袭。其中主力一路是从五马槽水库方向摸上来的。那五马槽水库是大跃进时修的，四周有五座山峰，水库就形成像章鱼那样的五个触角。从五马槽水库到黄山疗养院，是一片相当茂密的树林，即使白天去走，弄不好也会迷路，更不要说晚上看不到路了。“815”的武斗人员在那密林中钻来钻去，竟然真的迷了路，耽搁了时间，而且遇到了“反到底”放的暗哨。几声问话不对头，便引来枪声，居高临下，“乒乒乓乓”，就往那树林中一阵乱打。

那天晚上，住在黄山的鸡冠石的“反到底”的“农民造反军”，也是顺着五马槽水库的路，准备下山去偷袭“815”。两派的武装队伍正好在路上错过了。当下山偷袭的“反到底”武斗人员走到半路，突然听见背后枪声大作，知道山上出事了，又立即赶回来，对偷袭黄山的“815”形成前后夹击之态势。“815”只好丢下几具死尸，逃下山去。

枪声一响，其他几路上山来偷袭的“815”以为被发现了，于是就乱开了一阵枪。

打得最激烈的是炮台山。炮台山炮兵阵地对面的山顶上有三块耸立的石笋，称为三块石，还有一路“815”就是从三块石山下的乱坟堆里摸了上来的。当他们听见五马槽山沟里枪声大作，再不敢向前摸了，就把机枪安放在那三块石下，向炮台山猛烈射击。

黄山炮兵排的年轻人前两天被编入“黄山红二连”，到建设厂“提”枪去了。剩下的人不是头头就是年龄较大的师傅，而且只有两支苏式步枪。

虽然是夜晚，但在山顶，天又晴好，相距不过 100 多米，双方人影晃动都能看见。那机枪子弹打在那高射炮上，“当当当”乱响，谁敢爬到炮上去？

这时，还是那个外号叫“黄金棍”的炮兵教练。只见他趴在地上，用手去转动那炮盘，让那炮管转过去，对准了三块石。“815”的捷克式轻机枪的弹匣只能装 20 发子弹，手指按着那扳机不放的话，一下子就会全部飞出去。“黄金棍”师傅人瘦小，却相当英勇。趁那机枪换弹匣的时候，猛地站起来，抓住那摇把，把那

炮管从高仰状态摇到水平状态。此时，机枪又响了，他又赶紧趴了下来。要爬到炮上去击发，至少需要十几秒时间，肯定不行。于是，他便用他天天捏在手上那根胶木棍，去捅那击发板。那击发板像汽车的刹车踏板，有弹簧顶着，力小了就捅不动。光是手上的力不行，他就用身子去顶那胶木棍。人趴在地上，角度不对，还是捅不动。机枪继续在响，子弹继续打在炮上“当当当”乱响。他一咬牙，竟然弓起身子来，一用劲，居然将炮打响了，“咚咚咚！”炮弹飞向三块石，机枪立即哑吧了。后来，炮兵们跑到那三块石去看，地上还有大滩大滩的血迹。经观察分析才知道，那炮弹并没打着那机枪，却打中了那石笋。那岩石被打碎，石块落下来，打伤了机枪手，才逼迫他们撤退了。

天还没亮，进攻黄山的“815”就全线撤退了。

18 日凌晨，“815”对河运校进攻开始了。但这天的武斗并不是从河运校首先打起来的，武斗的第一枪是在杨家坪王家大山响起。

重庆的“坪”是指周边被河谷切割，边坡呈陡崖或阶梯状，顶面起伏和缓的高地，地质学上叫做台地。黄桷坪地处九龙坡后面的坡上，是坪；而九龙坡则是坝。黄桷坪高于九龙坡几十米，屏障着九龙坡。九龙坡是“反到底”联系南山和建设厂的唯一通道。而要拿下九龙坡，就必须先攻下黄桷坪。黄桷坪一旦失守，居高临下，九龙坡也就守不住。

为了配合在大坪、潘家坪作战，战前，空压厂“81 兵团”司令方文正要求重大“301 部队”去黄桷坪攻打重庆电力学校“东方红”，占领黄桷坪制高点王家大山，控制九龙坡长江段。

重大“815”欣然同意方文正的方案。决定以优势兵力迅速摧毁电校“东方红”。于是将重大“301 部队”的 33、34、35 和 37 纵队屯兵空压厂，又以“815”市总部出面，抽调了三、四百工人武卫队编入“301”战斗序列，还部署钢铁厂“815”文攻武卫队 500 人顺长江而下阻击增援。由重大 33 纵队作一梯队，工人武卫队当二梯队。

8 月 18 日凌晨 2 点，月亮泛着淡白，云追月，王家大山若隐若现，四周一片寂静。重大“301 部队”从空压厂开始向王家大山隐蔽出动。出街巷，路两旁是农田和庄稼，道路狭窄。电校地势得天独厚，南面邻长江，背靠王家大山，山下不远就是九龙坡滩子口，大山实为丘陵山坡，只不过相对高一些，山头安静祥和，晨雾缭绕，恍如一位深座闺阁羞于见人的美少女，满坡种红苕，地边蓬蓬茅草。

电校“东方红”司令为避开“815”第一波炮火，将学校主力隐藏在山后，副司令带着十几人在山头监视“815”。到下半夜，江风吹来丝丝清凉。突然，见一大片黑压压的队伍向山上摸来，电校副司令立即大喊一声：“山下有人！”端起半自动步枪对着山下就是一枪。

“815”方文正立即命令 82 炮和 60 炮对王家大山顶上的电校阵地炮火轰击，重大“33 纵队”向山上攻击。炮弹从“33 纵队”头顶上往山顶飞，交叉火力拖着火尾巴划着各种弧度和线条，山顶炸得天翻地覆。炮火下，电校“东方红”销声匿迹。

凌晨 3 时 30 分，炮击一停，信号弹起来了，这是步兵冲锋的信号。“33 纵队”沿着梯田往上冲。快到山顶了，只听“轰隆！”

一声响，电校的土地雷爆炸，山顶上一片枪声，弹如雨下。

进攻的“815”学生来不及多做思考，只是低着头一个劲的往上冲，没有人犹豫，更没有人说话，头头在前，士兵紧紧地跟在后边。山顶上的火力像下雨似地往下浇，不断有人倒下。在血与火中，人的肉体是那么的脆弱！

电校“东方红”司令等“815”炮火准备一停，迅速率队伍向山上爬去，支援山顶的副司令。负责这里指挥的嘉陵机器厂“军工井冈山”李鲁沂也率部迅速抢占公路边的山头。

“815”的队伍成扇型攻山，很快逼近山头，猛烈的火力射向围上来的电校“东方红”队伍，有好几人伤亡。山顶上副司令感觉不妙，赶紧命令：“赶快撤下去，否则晚了一个也跑不脱，我们都会被打死在这里！”他架起机枪掩护，其他人提起枪转身就跑。他们对这一带地形非常熟悉，高一脚低一脚抄一条小路跑了下去。

阵地上就剩下副司令和另一名学生，他们边打边向右侧的山坡张望，那是电校“东方红”大部队可能出现的方向，此时他多么希望自己的大部队能打上来啊。为了对付如此多的进攻者，他们把冲锋枪调整到连发档上，重新换上弹匣，一扣动枪机，三十发子弹一瞬间射出去，枪声夹着中弹者的惨叫声，响彻夜空。双方几乎是短兵相接。

此时，天蒙蒙发亮，“815”发现山顶上有个火力点很强，不断吐着红红的火舌，他们对准这个火力点一阵猛射，火力点哑了，山头上顿时出现片刻的寂静，“33 纵队”冲上去了，电校“东方红”那位学生当了俘虏，“815”没有“优待俘虏”，朝他一阵乱

射，就地枪毙了。

“东方红”副司令也中弹倒地，疼痛难忍，他就地十八滚，滚出几丈远，跌落到土坎下，“815”占领山顶后，误认为他是本派伤员，将他送到新桥陆军医院治疗。

“815”迅速巩固山顶阵地，用 10 多挺机枪封锁电校“东方红”的增援部队，他们被“815”压在半山腰，上也上不去，下也下不来。

重大“301”其余纵队向控制公路的嘉陵机器厂李鲁沂部进攻。弹如雨，突然，李鲁沂头部中弹晃了两步倒下，死了。

这时，空压厂的 3 辆坦克从滩子口方向开过来，沿公路进攻黄桷坪。“反到底”的土制装甲车前出公路阻击坦克。

装甲车徐徐前进，后面跟着增援的几十名步兵，开到搬运公司汽车二队处，与“815”的坦克相遇，装甲车机动性极强，经过非标准改装，防弹性能较高。相距大约 300 米，装甲车先发制人，操起海二联机关炮，向第一辆坦克发射出一串炮弹，隆隆炮声如惊雷震抖着黄桷坪。为首的一辆坦克开始射击。坦克在一条不宽敞的公路上平地作战，后面的坦克无法开炮，实际上成了一辆装甲车和一辆坦克的较量。装甲车的炮弹打在坦克身上只起一团团火花，没有多大作用，于是换上穿甲弹，一串穿甲弹发射过去，为首的那辆坦克被打燃了，忙调头后撤，后面两辆坦克慌忙让道，着火坦克带着一团烈火逃遁。装甲车又是一阵炮弹过去，几辆坦克全退却了。

“815”的坦克败下阵，公路上的战斗很快结束。“815”异常恐惧，随坦克的“301”的 34、35 纵队只有转向，往王家大山

爬去。此时，“反到底”受到巨大的鼓舞，电校“东方红”在王家大山正面反攻，铁路运校“火车头”、33 中“井冈山”从王家大山的侧面展开反攻，对“815”形成夹击之势。装甲车上的海二联高射炮又往王家大山的 34、35 纵队猛轰，向山顶射击。

重大“815”命令二梯队跟上，冲在前面的“37 纵队”突破了山顶和山下的火力隔离带，向王家大山冲上去了。二梯队那些工人怕死，只在山下磨蹭着放枪，没往上冲。

山上的战斗白热化，枪炮声、嘶杀声混为一片，响彻云霄。在“反到底”电校、铁运校、33 中和装甲车炮火的猛烈打击下，“815”招架不住了，34、35、37 纵队有人开始撤离。

黎明时，“反到底”电校“东方红”发起了冲锋，当他们冲上山顶，只见正在溃逃的“815”有几百人，密密麻麻，都在射程之内。他们迅速封锁山垭上“815” “33 纵队”的退路。“33 纵队”幸好遇到一道土山包，天然构筑了一些赖以藏身的据点，但也被对方的火力压得不敢抬头。

“反到底”越战越勇，轻重火力一齐射击，高呼：“为毛主席而战，完蛋就完蛋!”“缴枪不杀!”

“815”据守的山包虽易守难攻，但“反到底”将其像铁桶一样重重包围。后面的二梯队不能前进半步。

铁运校、33 中围歼过来，一排手榴弹划过一条弧线砸来，扬起的烟尘在阵地前布起一道烟幕。一串高机子弹扫来，将“33 纵队”队长扫倒了，滑腻腻、粘糊糊的鲜血染红了他的衣服。

时间一秒一秒的过去，倒下的人越来越多，天亮了，山上的枪声逐渐寂静下来。

“815”命轻重机枪集中火力，掩护人抱着炸药包欲炸开一条血路，冲上山救伤员。

“反到底”见大获全胜，遂停止射击。“815”不敢贸然行事，直到见有的伤员已在往山下爬。才急忙冲上去抢救伤员。

“815”军心已动摇，不敢恋战，下令撤出战场。

黄桷坪这场战斗，从凌晨 2 时打响，清晨 7 时许结束，仅重大“815”的大学生就有何孝柱、萧再光等 8 人被打死，方维汉等 7 人受伤。这是重庆大学“815”在武斗中损失最大的一次。

王家山大战尚未结束，此次武斗的主战场，潘家坪的炮声就响了。重大“301 部队”设在虎头岩西边约有一里地的牛奶场石坡上的榴弹炮和高射机枪首先轰击河运校的防御工事，接着埋伏于歇台子与河运校之间的一中“815”和 3 中“抗大兵团”及二机校开始冲锋。守卫河运校的“航锋”依托建筑物与“815”打巷战周旋。此时，袭击“815”榴弹炮阵地的“航锋”主力虽然在邵湾、岗上扑空，但避开了“815”第一波的炮弹，迅速返回学校，一阵猛打，“815”进攻部队退回原地。

设在虎头岩西的重大“301”榴弹炮阵地，先轰击河运校防御工事，然后又向潘家坪招待所进行轰击，炮弹在花园里爆炸，但进攻潘家坪招待所的步兵迟迟不发起冲锋，他们在等坦克。

空压厂“81 兵团”有 5 辆坦克：一辆在 8 月 5 日被用灭火器筒装炸药炸毁，还有一辆刚刚在王家大山被打燃起火，坦克手不愿意再参加武斗，指挥部负责人正在动员。

“反到底”杨家坪武卫战区司令部设在潘家坪高干招待所。招待所是个很大的地方，到处是草坪和冬青围成的步道，隔壁是

市委党校。站在院子中央四处望去，可见三组主要建筑，分别是一号楼、二号楼、三号楼。一号楼最大最雄伟。这里的房屋楼层只有两层或者局部三层，但楼层都很高，窗户也很大，走道和房间装修木质墙裙，地上都铺柚木地板，花纹亮丽，光可鉴人。所有的卧室都有暖气，都是“席梦思”，卫生间几十平方米，装抽水马桶。每个房间还都有地道相通，地道入口很特别：都暗藏在墙裙处。地道里面有一间间的小房屋，有的还带套间，里面有办公桌。有一个从来不冒烟的烟囱，那是地道的换气口。

9 时许，终于等来了一辆坦克，“815”各路人马开始向潘家坪高干招待所前进。

坦克徐徐前行，在坦克后面跟着一大群武斗人员，有的端着冲锋枪，有的提着三八大盖，更多的人手里是七九步枪，还有的人赤手空拳。在离攻击目标不远的时，坦克加快了速度，队伍中有一个人高举起手枪大喊：“为了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815’的勇士们，冲啊！”有了这钢铁铸成的庞然大物在前面冲锋，大家都满怀着必胜的信心，紧紧跟在坦克后面冲向战场。

已在射程之内，坦克对准高干招待所的一座平房开了一炮，墙上立刻出现一个大窟窿。双方距离越来越近，“反到底”开始还击，弹头打在坦克上发出金属碰撞声，坦克突然调头返回。

进攻队伍失去了掩护，走在前面的人暴露在一片开阔地面，完全成了活靶子，顷刻间倒下一大片，枪声和刺人肺腑的惨叫声混为一片。重庆工业学院“红色造反团”的 5 个大学生空手跟着坦克，本想战斗胜利时缴获几支枪，结果 5 人全被打死在一起。在潘家坪高干招待所外，“815”丢下 30 多具尸体。

终于从“阎王殿”里跑回来的“815”，稍稍定神后，大声喊叫：“坦克手在哪里？我们要枪毙他！”一群愤怒的武斗队员把驾驶员从坦克里揪出来，原来坦克手被对方 14.5 高射机枪打穿坦克负伤，挨了不明真相的武斗队员几级老拳后，急忙送往西南医院，途中就死了。

嘉陵机器厂武斗队负责人、“军工井冈山第一舰队”副司令李鲁沂在增援王家大山电力学校时被击毙。当天，“军工井冈山第一舰队”司令邓长春闻讯，在武斗舰艇“反到底一号”，即原“人民 5 号”上为李鲁沂举行追悼会，下令枪毙“815”派俘虏 2 人，为李鲁沂“祭灵”。

“反到底”派到“黄山警备区”的政委朱兆康，在枪毙战俘问题上和邓长春发生了冲突，与邓长春几乎闹到了白热化的程度。朱兆康坚持，要枪毙可以做出决定，但现在不能执行，要放到运动后期再说。

邓长春本来决定要枪杀 4 人，其中有两个学生因为朱兆康的坚决反对没被杀，但陪赴刑场。……邓长春将李鲁沂留下的手枪交给付明礼，令他杀另两个人，尸体被丢在了江里。其中一人未死，游回岸边。

在重庆武斗中的红卫兵

## 第 832 回：炮声息，死尸遍地情惨烈　夜偷袭，巾帼竟不让须眉

8 月 18 日，302 次列车驶往重庆站时在九龙坡遭到枪击，一女旅客被打死。

这天，重庆市内水上运输 13 个航线、35 个渡口全部停航。

江陵机器厂听说重庆大学的122榴弹炮调去参加攻打河运校及大坪、潘家坪地区武斗了，遂从8月18日夜22时起到次日晨6时，恢复向重庆大学炮击，一夜共发射炮弹1000多发。重大图书馆震垮一角，二舍、四舍和甲舍也都挨了炮。与重庆大学一墙之隔的7中图书馆被炮弹击中燃烧成为废墟，包括已珍藏200多年的古籍书典在内的所有图书及实验仪器全部被焚毁。时任重庆大学电机系系主任，后来的重庆大学校长江择佳的厨房也被一枚飞天铁丸击中，在墙壁上戳了一个直径37厘米的窟窿。老教授哭笑不得，于是合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原韵，写了一张小字报贴在窟窿边上，题目是：“八一八炮轰纪念”。诗云：

通宵炮声急

弹洞灶房壁

可惜好钢铁

不分我和敌

19 日凌晨，“815”又对河运校发动进攻。“反到底”在江北声援河运校，在玉带山架上高射机枪和 37 高炮向虎头岩“815”阵地射击。

河运校“航锋突击队” 这天偷袭“815”虎头岩西榴弹炮阵

地，重大“815”的“301 部队 32 纵队”只有拿起步兵武器保护榴弹炮，战斗异常激烈。重大被打死两人。重大“815”还是没攻克河运校。

在潘家坪高干招待所这边，“815”准备于夜间偷袭被“反到底”占据的重庆医学院。晚上 23 点多，他们调来很多农民，给他们发了枪，让他们穿上雨衣，匍匐通过招待所的花园和草地，准备经过这里偷袭医学院。医学院哨兵疏于警戒，被农民军摸掉了。

夜已经很深了，重医的“反到底”刚刚开完晚会都休息了，外面没有人守卫。这时，一个师专学生的小妹妹不肯睡觉，跑到外面去玩枪，她看到招待所花园里有很多“猪”，她感到很奇怪，等到这些“猪”爬过来，她看到刺刀上的反光，惊悟过来，赶紧用阵地上正在玩耍的高射机枪对着他们打了起来，机枪巨大的后坐力把她掀翻了，但枪声也惊动了已经休息的大学生，他们跑出来就是一通好打，“815”的偷袭又告失败。

战斗结束，“反倒底”要找英雄，才知道是一个不肯睡觉的 11 岁小女孩。

19日夜，河运校“航峰”主动撤离，“815”占领了河运学校。但是其他地方仍然没有得手。

8 月 19 日，39 陆军医院运菜车 11 时半遭到枪击，打死一战士，打伤一干事、一司机。

这天，因“反到底”武斗队强行从九龙坡火车站往重庆方向发车，造成严重撞车事故，毁坏机车3台、货车4辆，铁路中断行车10天。

8月20日上午，重庆大学“815”总团组织了一次报告会，让从前线返回的同学介绍武斗战地的情况。会场设在冶金系的学生食堂。大厅空荡荡的，已经为数不多的留校同学静聚其中，坐着，整个世界鸦雀无声，只有演说者一顿一挫、掷地有声的发言。气氛尤显悲壮肃穆。

“……这个山头易守难攻，我们坚持了 5 个钟头，人都快昏死了。本来，我们是可以撤退的，但考虑到全局，考虑到伤员同志，因此我们一直坚持下去，直打到弹尽粮绝。

我们的同志牺牲很多，我们心里十分难过。我们一天都吃不下饭，我们要为他们报仇！”

前线的一名指挥在会上非常沉痛地说：“虽然战斗中对方死的人比我们多，但是，我们的同学都是多好的同志呀！我们一个换他们十个也不值呀。”

他说得激动悲愤，声泪俱下。台下已是一片沉重的唏嘘和亢奋的呼喊。

王家大山的失利使“815”全团震动。不管怎么说，一次战斗就死了这么多人。日后无论如何是难以交代的。重大“815”总团当机立断：把在杨家坪作战的 33、34、35 和 37 四个纵队全部撤回沙坪坝。

夜幕降临，枪声渐渐停止下来。为了不让“反到底”派发觉，“815”利用夜幕掩护，悄悄撤回沙坪坝。

第二天黎明，“反到底”发觉“815”阵地已人去楼空，急忙询问。到晚上，才得到 017 情报：“要来中央调查组！”

“反到底”黄廉主张，“反到底”也全部撤出潘家坪。潘家

坪打死那么多人，怎么交待？大家对到手的胜利反而担忧起来，一致同意逃离潘家坪招待所。“815”用坦克搞武斗，他们将坦克留在草坪上，为的是让中央调查组看。但是现场的尸体他们想清除了，不希望让让中央调查组看见“反到底”打死那么多人。

重庆 8 月的骄阳似火，晨雾散去的艳阳天立刻把气温提升到近 40 度。在高温下躺了两天的尸体已经严重腐烂，绿头苍蝇成群覆盖在发臭的尸体上。“反到底”的人站在潘家坪草地上，望着一堆堆臭气熏天的死尸，死也不愿接近。

这次大规模武斗，使用了榴弹炮、三七炮、高射机枪、坦克等武器，死上百人。河运学校东、西学生宿舍和西教学等楼被重大“301”武斗队烧毁，损失国家财产 200 余万元。医学院、潘家坪高干招待所房屋被打坏，邮电器材厂一幢宿舍被“815”派前线总指挥、重大“815”负责人下令炸毁，仅潘家坪高干招待所房屋和设备损失即达 400 余万元。另据重庆市博物馆统计，文革前陈列于潘家坪高干招待所供国家领导人观赏的馆藏珍品碧玉香炉等 10 件珍贵文物被武斗组织抢走，当时估计损失 127.5 万元。

两派武斗队全在潘家坪悄悄消失了。在清晨的迷雾中，潘家坪死一般寂静。警备区制止武斗小组立即开进高干招待所并向成都军区发了加急电报汇报请示，梁兴初打来电话，叫把坦克拖走，安排中央调查组视察潘家坪高干招待所。

重庆“反到底”派在军工企业里的势力太大，武器配置太强。速战速决已经不可能了。当时，北碚区已经完全控制在“815”的手中，再往西，是合川、武胜、南充、广安……其中除了岳池

县还被“反到底”控制，整个西线已全部联成一片。位居这片“红色根据地”的中南段，有一座华蓥山，地势险峻，危乎高哉，曾因罗广斌小说《红岩》而在全国一举成名。解放前，共产党的地下游击队确实曾在此与国民党进退周旋，是个坚持游击战、保存实力、准备将来大反攻的好去处。几番酝酿，重大“815”总团于是有了挺进华蓥山，建立长期战争根据地的设想。

重大“815”走了！空压“81兵团”又退回工厂。“反到底”毕竟在王家大山也死了些人，目标指向空压厂。“活捉方老表!”“反到底”从黄角坪向空压厂挺进。建设厂“红大刀”也从杨家坪方向加强了攻势，空压厂“81兵团”形势岌岌乎危哉。

8 月 20 日 23 时 20 分起至次晨 7 时 30 分，建设机床厂“反到底”与空气压缩机厂“815”对射炮击，江北区“反到底”炮击“815”占据的朝天门码头、儿科医院、枇杷山等地，“反到底”的“黄山警备区司令部”炮击“815”占据的弹子石等地。

就在这时，中央调查团来了。8 月 20 日，重庆市革筹组副组长白斌召集两派制止武斗小组代表，就中央调查组来渝安全问题做出四条规定。

8 月 21 日，重庆市革筹和警备区司令部 11 时联名电告“军工井冈山建设兵团”：中央调查组今日即将到达重庆，一切分歧可以得到解决，应立即停止攻击空压。

8 月 21 日 18 时，中央调查组一行 30 人来到重庆，组长是总参军务部副部长的陈彬。周恩来派温白桦和谢文欣随调查组一起来到重庆。中央调查组下令重庆两派就地停火，到警备区谈判。

重庆驻军原准备把中央调查组安排在潘家坪高干招待所。但

潘家坪高干招待所刚刚经历潘家坪之战。尸体无法搬运，都散架子了，除骨头外都是水，只好让叫战士用雨衣裹尸，运到石桥铺火葬场。战士们戴着白酒浸泡过的口罩，收拾无名尸体。不少人不时呕吐。炊事班送来咸菜稀饭，一口未动又抬了下去。

中央调查组住在潘家坪高干招待所肯定是不行了，于是安排他们住在重庆警备司令部，即 54 军军部。

调查组专门成立了制止武斗的工作小组，还专门制作了一个制止武斗的旗帜，红边黄旗黑字，上面写着“中国人民解放军五十四军制止武斗小组”。挂着这面小旗的汽车无论开到什么地方都要放行，人们都说是“黄龙旗车子”来了。

“反到底”工总司和机关司令部连夜召开紧急会议，通知各武斗据点：中央调查团已到重庆，立即停止开枪，保持克制，好让中央调查团只看到“815”派一方在开枪。

这天，长安机器厂“反到底”派负责人吴凤岭率武斗人员包围人民银行江北城分理处，从金库提走人民币 67 万元为厂里发工资。

江北区“815”派凌晨从江北城老城区撤离，“反到底”派武装游行庆祝“解放”。

8 月 21 日，在重庆黄山疗养院的“军工井冈山”邓长春找到重庆师范附中红卫兵负责人黄开全，说望江“金猴”的领导力量很弱，让他暂时去“金猴”队伍当指导员，等到“黄山警备司令部”正式成立时再重新安排职务。

黄开全来到“金猴”的营地。营地背面不远是原来孔二小姐孔令俊的住地，白色的两层楼的小洋房。

孔二小姐别墅——孔香园

营房前面不远就是黄山顶的边缘，站在山边可以看见远处的山林和山间的水库，山间水库有一条蜿蜒曲折的羊肠小道通向山顶。这里的任务就是要保证这个方向的安全，责任很大。

黄开全与“金猴”驻在这里的排长见面后，先回到马歇尔草堂，见里面一个人也没有，正在着急，疗养院大门方向传来几声汽车喇叭声。他赶紧奔向大门，见那里已停了 3 辆大卡车，武装人员正在不断地从车上向下跳。3 辆大卡车的车顶上都各架着一

挺单管的重机枪。黄开全看见他们附中红卫兵都集中在第二辆车上，便急忙上前与他们打招呼，并问他们到哪里去了？同学告诉他说："你到司令部去了不久，司令部命令武装人员到疗养院大门紧急集合，说是警备司令部的部队借巡逻为名要来袭击我们黄山司令部。巡逻队将从四公里方向上山，我们要在半路上伏击他们，阻止警司巡逻队上山。我们乘车赶到伏击点，做了充分准备，只要警司巡逻队一进入我们的伏击圈，保证叫他们有来无回。后来不知什么原因，巡逻队半路上突然接到命令打道回府，没有上黄山，我们也空等了一场。"

黄开全说："谢天谢地，幸好警司巡逻队半途折回，否则你们将闯下大祸。和解放军对抗，不会有好结果。你被解放军打死了，活该；你打死了解放军今后脱不了手。"看到这种情景，他开始感到不安，心想："我不能离开我们的红卫兵，一刻也不能离开！"于是，他和重师附中红卫兵一起回到了马歇尔草堂。就这一念之差，让他躲过一劫。

当天夜里，"金猴"营地的那位排长从山边巡视后返回住地，听到一个轻微的声音，他朝山边大声喊："是谁？"

无人应答。

那位排长又喊："口令！"

"手榴弹！"一个女性声音响亮的回应。

当晚规定的口令是"千钧棒"。那位排长一听口令回答得不对，立即举枪射击。就在此时，眼前一声巨响和亮光，他的双腿被炸得血肉横飞，当即死亡。

枪声和手榴弹的爆炸声惊醒了营房屋里的人，他们迅速打开

电灯，只见一颗手榴弹从窗外投了进来，正在一个空铺上冒着青烟。屋里人眼疾手快，迅速抓起正在冒烟的手榴弹朝窗外用力一掷，“轰”一声巨响，手榴弹在屋外爆炸。室内的战斗人员迅速抓起枪、弹上膛，枪口对准已经像狼一样冲进室内的几个人，一看竟是 5 位赤手空拳的女学生。当然是就地摁住，五花大绑，押往云岫楼。

经审讯得知，她们是重庆南岸 11 中的“815”，准备乘夜偷袭“金猴”驻地偷枪。当她们摸到“金猴”营地时，被那位排长察觉。由于天黑，什么也看不见，在对方询问口令时，偷袭者在回答“手榴弹”的同时，朝着声音方向投出了一枚手榴弹，然后迅速扑伏在地。当手榴弹爆炸后，她们又向屋内投掷了一颗手榴弹，然后迅即冲入屋内准备抢枪。谁知进屋后，面对的竟是十几支半自动步枪的枪口，她们只有两颗手榴弹，此时只好束手就擒。当时还有十几个女生在山崖边准备背枪的。当她们听见两声手榴弹爆炸声，知道她们全部家底都报销了，见事不妙，就没有做“灯蛾扑火”，顺着来路悄悄退回，当然也避免了一段战俘的经历。

这 5 个被五花大绑的“巾帼英雄”毫无惧色，一幅英勇就义、视死如归的气概。

“黄山司令部”为那位死去的排长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会后将他的遗体运回了望江厂，葬在了铜锣峡江边。

邓长春考虑到黄山疗养院山高林密，四周又没有坚固的围墙，不好防守，易于被偷袭，同时各单位人员驻地分散，不便于军事管理和训练，于是便决定迁回重庆市第四中学，即四女中。在这里，他们开始军事训练，教官是 302 步校的学员担任，动作

要领十分到家。

为了报复“815”对黄山的偷袭，8 月 22 日，“反到底”邓长春的“黄山警备区司令部”组织了几百人，对山下“815”派占据的南岸区中心地带区委、区政府所在的上新街发动了大规模进攻。

清晨，黄山大门外那门作为机动的三七高炮拖到龙黄公路一棵树，就是现在的观景台附近，又从望江厂拖来一门五七高炮，首先向山下的区武装部、区委大楼及几个制高点轰击。

然后，“九一纵队红二连”、“黄山红一连”和其他几个武斗连队的武斗队员手持自动和半自动武器下山，冲进上新街，两派又展开大规模武斗，“反到底”大获全胜，打死对方 22 人，打伤数十人。

地处上新街西南侧的“815”主力得到消息，立即组织力量前来支援。长江厂“八一兵团”也有一门三七高炮，不过是单管的，同时还有几挺口径为 12.7 毫米的高射机枪。他们将炮和机枪布置在海棠溪附近的山坡上，向“反到底”的山上阵地轰击。

当时南山的不少山头上都驻有高炮部队。“815”的炮兵都是转业军人，据说还有南山驻军空军的人参与，那三七高炮仅试射了两炮，第三炮便打中了“反到底”设在真武山上的指挥所。那是一个临时搭起来的草棚棚，马上燃烧起来，一会儿便烧得个精光。

“反到底”的那两门炮被一棵树前面的小山挡住，不能向海棠溪方向还击，只好闷在那山凹里看着“815”的炮兵显威风。

邓长春见进攻上新街已经达到目的，便下令撤退。山下的人

员陆续撤上山来，顺便抢回了大量的粮食和其他物资。

撤退时担任掩护的中学生红卫兵“九一纵队红二连”一名班长、17 中高二学生陈世良身亡。打上新街时，他带一个班在丁家嘴负责西面的警戒。不知为什么，撤退的命令没有传到他这个班，下山的人都撤上了山，他还带着人伏在丁家嘴，监视着海棠溪。“815”的支援部队从海棠溪开过来，他又命令一班人猛烈射击。“815”人多，逐渐攻了上来，他只好带领大家往后退。不知是后来中了子弹还是崴了脚，其他人都退到山上去了，他却没有跟上来。

次日，“红二连”全连下山将暴尸野外的尸体抢回安葬。

## 第 833 回：在山城，中央调查组遇袭　一腔血，自告奋勇赴淮南

8月22日，重大“815”武斗队在校内团结广场枪毙俘虏1人。被杀者为重庆水泵厂工人康水云，当然是对立派人员。是在重庆大学团结广场旁边那棵很大的黄桷树下处决的。用半自动步枪对准头部，就一枪。执行处决时先戒了严。

这天中午，中央调查组准备在市革筹会接见两派代表。当时两派都在市中区各自控制的路口私自设立了检查站。上午 11 时，驻军支左负责人派警备司令部曾惠平、郝子义、张甲奎 3 位处长及戚姓科长等 7 人和中央调查组分乘 4 辆吉普车到市革筹会接见两派代表。这 4 辆车通过检查站时，没有停车，过上清寺、体育馆，一直开到两路口山城宽银幕电影院“反倒底”检查站。

“停车，停车！”“反到底”高喊，吉普车没有停，继续开……

“‘815’，‘815’偷袭！”

“反倒底”3名枪手射击，第一辆车司机李永梁当场被打死，保卫处副处长曾惠平股骨被击中，被“反到底”送往由“反倒底”控制的第一工人医院手术，大腿被截肢。

第二辆车冲过火网，在公路上绕“之”字作狼突虎奔，全速驶离射击区，但54军干部处处长张甲奎身负重伤，送警司抢救无效，死亡。文化处处长郝子义被子弹击中肚子，被打穿4个洞，大肠外流，幸经救治后无大碍。卫生科科长齐宗勋手臂受伤。参谋吴士龙等中弹受伤。幸运的是，乘坐中央调查组的第三、四辆绕道文化宫得以脱险，毫发未损。但是，出了如此大事，接见只

能暂停了。

中印战争，打得那么厉害，54军牺牲者最大不过营职，而重庆一日，竟伤亡如此之多的正副团级大员！第二天，23日凌晨4时20分，中央文革办事组紧急致电重庆警司并要求转交两派群众组织。电报全文如下：

根据中央调查团的反映重庆武斗严重。

1、必须立即停止武斗，希望两派做到立即停止对一切工厂、学校、商店、街道和居民点进攻和射击。请反到底派军工井冈山立即停止对空压厂的进攻，并撤出包围；

2、绝对不允许对防地巡逻哨和军车射击；

3、双方立即达成协议并保证切实执行。

该电报稿是周恩来亲自审阅的。

电报中提到的空压厂位于九龙坡区，当时正被“反到底”久围强攻。进攻方主力“军工井冈山”，人多势众。尽管中央电文明确指出，要“反到底”停止对空压厂的进攻，没有效果。

这里已血战一周，死人无数。好容易胜局在望，怎能轻言撤退，功败垂成？“反到底”继续加强武力强突猛攻，而“815”，已经在8月22日就决定撤出空压厂。

撤出前，空压“81兵团”2602团身材瘦小的一号勤务员方文正，在撤退前的最后一次会议上，环顾四周问到：

“地下室里那20多个俘虏怎么办？”

有人说：“扔几颗手榴弹，把他们全部炸死算啦！”

江西小伙子方文正同意了。接着，他指名3个学生去执行，后因地下通道堵塞，被火力封锁过不去，未炸成。

23 日晚，一个叫何大发的说：“全部炸死太多了，把有血债的 5 个打死行了。”方文正同意，并叫何大发带 3 个学生去速速执行。

何大发将5个人提出来带到一个车间旁边。5人中的刘素德已经怀孕5个月。她的丈夫姓邓，也属5人之一，苦苦哀求说：“你们把我杀了，不要杀我爱人。” 何大发没有理会这个素无怨仇的工友。

邓又哀求说“你们等刘素德把孩子生了再杀吧！”

全厂陷落在即，已经没有时间延宕。何大发说不行，接着一阵乱枪，5人全部被杀……

8月23日，“反到底”派向杨家坪地区“815”派大举进攻。杨家坪中心区的“815”派据点建设电影院被高射炮击中起火，周围燃成一片火海。

8 月 24 日，重庆大学“815”302 武斗队怀疑该校 1 名炊事员为“反到底”送情报，将其毒打、捆勒致死。为灭口，当晚又将其侄枪杀于停尸房内。

这天，因遭武斗炮击，重庆 502 发电厂五万机组 4 台被破坏，占全厂生产能力 70％。通往杨家坪的 153 高压线被打断，10 条输电线被打断 7 条。

8 月 24 日，54 军支左部队某部路经林园时被“815”派的 412 部队“红总”抢走两个连的武器。后经宣传解释，仍被扣下枪 11 支、弹 6000 发，其余退还。

8月25日，空压厂被“反到底”占领。

8 月 25 日，邓长春在“黄山警备区司令部”批准枪毙“815”

派俘虏 1 人。

这天，华蓥山地区“815”派成立联合指挥部，会后举行武装示威游行。

因全市武斗不止，市区粮食供应将断，重庆警备区司令部向省革筹、省军区、中央文革、全军文革告急。

8 月 26 日中午，“黄山警备司令部”紧急集合。邓长春站在前台，向全体人员宣布“反到底黄山警备司令部”的人事任命：

“司令邓长春；政委朱兆康；……”

然后又宣布了基层各连连长的名单，大约有七、八个连，但每个连的编制都不满员。

当任命宣布完毕，邓长春突然大声喊道：“警卫班，把破坏警备司令部整编的黄开全抓起来！”早已站在重师附中红卫兵队伍前面的十几个挂冲锋枪的武装人员冲进他们的队伍，把他们的头头黄开全围在中间，一人上前下了他的枪！两个大汉一边一个抓住他的两支手臂，将他的双手反剪起来，推推攘攘押到队伍前面，准备押往办公室……

这一切来得是那么的突然，附中红卫兵全都蒙了。全操场的人员也不知发生了什么事，都呆在那里。

重师附中红卫兵很快反应过来，立即端起枪、子弹上膛，打开保险，几十支枪齐齐地对准正押着黄开全的那群警卫班的人员和邓长春。不知是谁朝天打了一梭子子弹，其他不相干的队伍听见枪声，一窝蜂地散开，躲得远远的看热闹。望江厂的武装人员立即扑伏在地，一挺轻机枪对准这些中学生。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担任军事教官的 302 步校学员小李挺身而出，用手将开枪的那只

自动步枪的枪口朝天撑起，说："简直是胡闹"，同时命令双方都放下武器，有事商量解决。

这时，其他教官也要求邓长春先放人以平息众怒。

邓长春没想到事态会如此演变，见到教官调解，也就顺势下台，亲手把黄开全的枪和子弹还给他，说："这是一个误会，有人反映徐光明几次找你密谈，担心他把队伍拉走。整个'黄山警备司令部'就数你们'井冈山'红卫兵的装备好，子弹足。如果你们走了，将大大削弱'黄山警备司令部'的力量。"

这场风波后，重师附中的同学们都认为黄山也不是久留之地。正好"反到底"攻下空压厂后，建设厂的队伍撤回本厂，守空压厂的武装人员很少，因为空压厂的许多人在 8 月 3 日空压厂失守后都离开了队伍到成都避难了，只有少数人撤到建设厂。现在那里很需要人。于是他们于 9 月 1 日下山，前往空压厂。

8 月 26 日，成都军区张国华、梁兴初、刘结挺要重庆警备区以电话传给西师"831"勤务员张闯一电报稿，劝其归还在璧山县车站附近抢走的部队武器与军用物资。

这天，红农"815"抢走 54 军驻小泉某连一个班的武器。

这就是中央调查组到重庆后面临的严峻局面。

我们再说安徽。

自 12 军进入安徽后，省会合肥的武斗平息了，但华东的煤炭基地淮南的武斗仍然是一触即发。8 月初，淮南"支持派"彻底扫清了"炮轰派"在市内的各个据点。8 月 5 日，12 军 34 师师长张季伦接任市军管会主任。这天夜里，"炮轰派"夜袭"支持派"据点九龙岗火车站，未果！

8 月 19 日黎明，“嘟嘟嘟……”的重机枪连发声撕破了黎明前的寂静，“炮派”借夜色奔袭淮南李一矿，两派人马顿时混战起来，战斗一直持续到天亮尚未结束。驰援的“大闹天宫猴子兵”在枪声停歇时，“砰”的一声枪响，年青的五中“长缨在手”的女红卫兵娄春燕同学应声倒地。子弹不是来自敌方，而是“猴子兵”战友在擦枪时，不慎走火射中她的颈部。鲜血如汩汩的小溪，无声地从纱布、药棉里渗透出来，从洁净的衣服中渗透出来，染红了凉凉的地板，映照着明净的天空。血泊中，一个年青的女红卫兵，走完了她那刚步入花季而尚未领略到美好人生的 18 岁的历程。

“猴子兵”的司令张店海平日里腰插双抢，威风凛凛。有一次他自己到李郢孜办事，在一家食堂吃饭，被对立的人认出，当场乱枪打死。

8 月，中央文革小组为了了解全国各地的实际动向，通过北京各高校的红卫兵组织，向全国各地派了许多名目繁多的调查小组，将原来已经停止串联的红卫兵，又撒向了各地的武斗战场。而各调查组得到的消息，则由当地驻军或各红卫兵组织的办公室，汇总以后，每天向中央汇报。清华“井冈山”由他们的“二办”负责此事，其中赴安徽的十几个人，是由清华“井冈山捉鬼队”为主体的一批人组成，取名为“首都红卫兵赴皖调查组”。他们从“井冈山”总部拿到了去合肥的火车票，立即踏上了南下的征程。

到达合肥后，因为一点不了解安徽两派的实际状况，只知他们分裂为“好” “屁”两派，都以保卫毛主席为名，大打出手。

当时的江苏和安徽都是“好”“屁”相争，闹得不可开交。于是这些清华学生首先拜访了当时安徽驻军 6408 部队，即 12 军。部队领导最先的要求，就是让他们尽快进入淮南“红卫军”驻地，他们迫切需要掌握这支他们无法控制、而破坏力极强的武装力量的动态。

此时的淮南“红卫军”已经是一支配有各式武器、并掌有渡船、汽车甚至火车等交通工具的，由训练有素的复转军人组成的，战斗力很强，但又无法控制的武装组织。

于是清华“井冈山”的两个自恃“吃饭倍儿香、身体倍儿棒”的不知天高地厚的家伙，也没和别人商量一下，就自告奋勇地接下了这趟光荣任务，被派往淮南“红卫军”驻地——水家湖。他们搭乘“红卫军”的解放牌卡车，从合肥抵达水家湖时，已是下午 17 时左右。吃了晚饭，带他们来的人却始终联系不到“红卫军”的张家祥司令，连一般接待的头头都没有，他们俩只有天当被、地当床地在空旷的操场上坐等天明。在他们周围，三三两两或躺或坐的还有几十个同样无屋无床可息的“红卫军”成员。那操场原来可能是农村中学或农场，周围还有几盏路灯，能清楚看见旁边人们的举动。

“我操……，首都红卫兵可是通天的钦差大人，你们来得正好！”这是“红卫军”司令张家祥见到清华这两位红卫兵后一张口的第一句欢迎词。接下来是：

“外面那些王八蛋说我们是些杀人放火的强盗，你们倒是可以看看，有我们这样忠于毛主席的‘强盗’吗?你们可以如实向中央文革汇报，向毛主席汇报，还我们清白！”

接着，张家祥大讲淮南那批反动派如何迫害他们，他相信毛主席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要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战略战术，先扫清外围，最后打回老家去,解放淮南市……

那两位清华学生也应酬了几句，大意是：“我们就是来帮助你们的，让中央文革了解你们，相信毛主席会支持你们。”

张司令听了很高兴，特意将他住处旁边医务室的门打开，让他们两个就住在他的隔壁，还送给他们一把匕首，也不知是让他们防身，还是作为加入他们“红卫军”的一种象征物。

两人在水家湖呆了两天，平时看看“红卫军”的操练，毕竟这些“红卫军”多数都当过兵，操练时还是有模有样的。他们看到一个老兵在鼓捣转盘机枪，始终无法打响，但是每次巡逻，此枪总是架于解放牌卡车的车顶，起到一个威慑敌人的作用。

第三天一早，张家祥吹哨集合，赶到火车站，货场上已停着一列火车，火车头在中间，前面是两节平板车，周围用枕木围起半人高的掩体，“红卫军”和清华的两个学生都坐在前两节。后两节是两辆解放牌卡车。火车起动后，“红卫军”将武器架于堆在列车上的枕木上，看起来威风凛凛、杀气腾腾。再前面四、五百米处，还有一辆铁路的小型的巡道车打道开路。

火车开到炉桥与蚌埠之间的一个小站，“红卫军”下了火车，改乘两辆汽车，直逼一个乡村武装部，目的是搞些武器。汽车在离武装部一里以外停了下来。张司令站在汽车驾驶室的顶上，两手拿着铁路车站指挥火车运行的红绿两色旗，指挥两路人马分头包抄，嘴里的哨子不停急促的狂吹，若有那人胆敢稍稍放缓脚步，

他会放下哨子破口大骂："操你奶奶……操你孙女……操你十八代祖宗……"凡是他能想到的与你有关的异性，都在他的嘴里操了个遍。队伍跑远了，消失在视线以外，远处隐隐传来急促的"哒哒……"的枪声。

天气特别炎热，空气都像是着了火，张司令骂累了，于是他跳下车子，正巧路旁就是一条农民灌溉烟叶、花生地的浅水沟，张司令把衣裤一扒，赤条条的平躺在水沟里消暑纳凉，也顾不得那两排肋骨像饿鬼似的形象。

大约一小时过后，两路人马返回，带回了一些枪支弹药。接着他们乘汽车返回火车站，再搭专列回水家湖，途中在炉桥附近，从前方返回的巡道车报告，敌人在炉桥一带设了埋伏，准备干掉"红卫军"车队。"红卫军"立即停止前进，组织反击。

为了了解第一手情况，清华大学那两位学生连想都没想，也没有和张司令打招呼，跳下火车，紧跟着机枪手冲到了第一线。只见三、四十米外的铁路桥上，有个13、4岁的男孩，见到"红卫军"，吓得扭头就跑。"红卫军"大喊："站住！不许动！"但那小孩跑得更快，那些"红卫军"战士想都没想，端起半自动步枪，哒、哒、哒……连开了几枪，只见那小孩在桥上晃悠了两下，最终还是跑掉了。铁轨枕木上有一滴一滴的血一直通向远处，看来那孩子是中弹了。

这时，前面那位扛苏式转盘机枪的复员军人，停下了脚步，一边喘息，一边对跟在后面的清华学生说："不行了，不行了！"接着就把枪给扔到了那位学生的肩上。一直是在"学雷锋、做好事，助人为乐，吃苦在前"的氛围中成长起来的清华学生，想都

想，扛上这支打不响、但够唬人的转盘机枪，继续冲向前方。助人为乐嘛，帮助一个上气不接下气的弱者，是每个人义不容辞的责任！当时的学生大都是这样想的。见这位学生如此痛快，那扛弹手肩上的一箱弹药箱也转移到了另一位清华学生的肩上。

## 第 834 回：为抢枪，炉桥边惊险一仗　接见皖，七个地区代表团

自从接过这杆机枪，清华学生就发现情况不妙，射向他的子弹愈来愈密。想起军训时的作战条例，第一条就是消灭敌人、保存自己，只有保存自己，才能消灭敌人。况且自己既非敌也非友，还是保存自己要紧。这位学生赶快找了个坟包趴下，习惯地将枪架在了坟包顶上。其实这支打不响的枪，你抱在怀里躲在坟后，不是更安全吗？你现在架于顶上，不是明摆了一个显眼的目标靶？但从小就受到的英雄主义教育，让这位学生认为，哪有在战场上不架枪挺胸，却抱枪龟缩的英雄？没想到这一招会引来如此严重的后果。他刚一卧到，那子弹就如期而至，那发出怪声的子弹呼啸而来，就像张乐平老先生画的三毛从军记，那些带着尾巴的子弹就从他头顶、从他肩旁嗖嗖飞过，也不知是错觉还是真的，他觉得自己都能看见这飞速的子弹从眼前穿过，掉入身后的池塘，溅起一圈圈的涟漪。

根据子弹声音，他发现子弹从左边飞来，赶紧转向右边，可刚挪动身子，子弹却又从右边飞来，“我的天哪，你们到底在何方？”他已六神无主，不知如何是好。好在此时，有四、五个勇士冲到了他们的前面，像灵巧的小鹿，利用山丘、坟头等地形地物，左右腾挪；又像追逐猎物的豹子，勇往直前，一转眼就将大部分的子弹给带走了……再看另几个坟头趴着的人，状态和清华学生差不多，其中有一个人，根本不看前方，躲在坟后，对着天空，一口气打光了一梭子子弹，浑身还在发抖。

枪声一稀,清华学生扛起抢继续前进,前面一个复员兵已冲过铁路桥,他也接着向上冲,由于桥上暴露了机枪的目标,射向他的子弹一下又密集起来,吓得他拼了命的飞跑,将塑料凉鞋都跑脱了一只,还好鞋带还系在脚脖子上,他就这样拖着一只鞋,光着脚丫子,冲过铁路桥,给对方当了回真人活靶子。

当他冲过桥头,趴在铁轨的安全一侧,回头寻找那掉队的机枪手和他的助手,却发现,他们正大摇大摆地从桥下走过来。原来桥下根本没有水。想想刚才，自己又何苦无谓的去当一回活靶子？好在对方也是些乌合之众,枪法实在太糟,老天也比较眷顾,让他有惊无险的逃过这一劫。

枪声停了，两位学生肩上的枪和子弹，又回到了主人手里，他们要再不拿回去,万一张司令赶上来，看见这两个熊包在紧要关头把武器交给别人，尤其交给两个钦差,按张司令的脾气，拿枪崩了他们也说不准。

由于实力相差悬殊，伏击一方节节败退，逃入一家工厂内，“红卫军”追到工厂，打死拒绝他们进厂的门卫老人，开枪打伤了厂区一个孕妇，俘虏了身披红色子弹袋的两男一女，他们正是伏击“红卫军”的武装人员，同时也洗劫了工厂的财务室，撬开了保险柜，抢走制造拖拉机的原材料白金 20 公斤。。

放下枪和子弹的清华学生,一身轻松,很快追上了先头部队,看到倒在军工厂大门口已经断气的门卫；担架抬出，被打成重伤的孕妇；身披红色子弹带的两男一女的俘虏，其中一个男的，走路一瘸一拐，腿上挨了一枪。从厂里工人那儿，他们了解了财务室被抢、保险柜被撬的消息……

炉桥军工厂附近的伏击与反伏击一仗，让两位清华学生胆战心惊、心有余悸、终生难忘。如果他们当时中枪命归西天，那究竟算是“红卫军”反革命分子，死有余辜呢？还是为解放军收集情报，光荣牺牲的烈士？说是“红卫军”，他们确实是扛着他们的枪，在战场上冲锋，但他们的目的却是为了了解战场的实际情况。说是烈士吧，的确是 6408 部队让他们进入“红卫军”内部，以便更好地掌握这支他们难于接近的武装力量的最近动态。但是无论是清华“井冈山”总部，还是 6408 部队，他们都没有给这两位学生任何书面的任务书，也没有支付给他们一分钱的津贴。这些学生只是听说革命需要，就义无反顾地奔向了战场。

好像是在蚌埠，一个北京的大学生，任务和这两位清华大学生一样，在两派武斗中丢掉了性命，当时就为他究竟算烈士还是意外死亡，纠缠了好长时间，最后不了了之，让这些一腔热血的大学生感到严冬的寒意。

当晚，在炉桥火车站，张司令站在候车室的椅子上发表了他的胜利宣言：“今天我们打了个大胜仗，我要犒劳犒劳大家，一人两包烟、一把糖，不过你们要记得，这是老子拿我的抚恤金给你们买的，我的脑袋里还有小日本的炮弹片，你们要记得，胜利后你们可要记得还给老子！”

“红卫军”的情况十分严重，清华学生中的小车连夜赶回合肥向 6408 部队汇报，另外一人独自留在“红卫军”，继续静观事态发展。

小车走后不久，张司令来到清华学生的房间，首先就问小车去向。显然他对两个学生没有征得他的同意擅自离去，表示了极

大的怀疑和不满，尽管清华学生一再解释是由于小车个人家庭的原因，去去就回，但明显可以感到张司令眼里闪烁着那阴森恐怖的凶光，让那位留下来的清华学生第一次感觉到什么叫伴君如伴虎……

张司令说："你是大学生，就帮我们大老粗写一份《告炉桥老乡书》吧，宣传一下我们'红卫军'。"

张司令走后不久，警卫员就送来了纸、墨，也许是接到司令的什么命令了，警卫员竟然坐下，一直等到清华学生把大字报写完，而全然不顾司令的安危！整整一个多小时，那位清华学生被他监督得浑身不自在。

《告炉桥人民书》到底写了些什么，这位清华学生已经记不起来了，大意无非是"'红卫军'是忠于毛主席的队伍，是为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来到炉桥，今天我们挫败了反革命的阴谋，明天有你们的支持，我们会取得最后的胜利"等等。最后肯定是"万岁、万万岁"一类的口号。

好不容易送走警卫员，闭上眼睛还不到两小时，半夜一、二点钟，张司令又吹响了集合哨，"红卫军"又上了火车。临行，张司令问那位清华学生是走、是留？清华学生毫不迟疑地选择了留，但他说："一旦小车回来，我们会赶上你们的。"

"红卫军"走了，清华学生一个人不敢再在旅社呆着，怕"红卫军"的对立面会把他当"红卫军"给处理了，于是拿着两个小书包，与要饭的一起，睡到炉桥火车站。原以为第二天小车就会返回，没想到这一等就是 3 天。在这心急如焚、望眼欲穿、百无聊赖的 3 天，他真正体会到什么叫度日如年。

白天的日子还好过，与驻守车站的解放军战士一起投弹、拼刺杀。可晚上解放军回营地休息了，他与乞丐们一起躺在火车站的长椅上，头下枕着小车的书包，手里拽着自己的书包带，百无聊赖。好不容易闭上眼睛，却又被耳旁的叮当声惊醒，坐起一看，原来一个乞丐正在翻他的书包，那书包里捡的子弹壳掉了一地。他赶紧抢过书包，打开一看，包里的长衣、长裤已不见了。他逮住那乞丐要他还衣裤，结果一下就围上一群乞丐，七嘴八舌，说他是在找自己的东西。一看这架势，好汉不吃眼前亏，明知是他所为，也只能作罢。好在包内的内衣内裤还在，匕首还在，最关键的是《毛主席语录》还在，他此行的全部粮草----10 元人民币和 10 斤粮票，全部塞在了语录本的塑料封皮里。

第二天一早，驻守车站约一个排的战士就在大街上列队操练，回到车站不久，一群人突然拥进了车站，他们三、四人围住一个解放军战士，连抱带拽，还拿出刀子割断了枪带，愣是从当兵的手里抢走了十几条枪，而那些战士没有接到命令，根本不敢还手。他们只有满头的汗水和满眼委屈的泪水，被这些老百姓缴了械，最终满头大汗、赤手空拳的站在墙角边，眼中充满了委屈、无奈与愤怒。

从第二天开始，蹲守火车站的那位清华学生就开始盼小车、诅咒小车："死小车、坏小车，有什么鬼把你钩去了？要再不回来，我非打得你满地找牙！"

……

第三天，小车总算回来了，那心情是无法用语言来表达。当天，他们又根据 6408 部队的要求，踏上了追寻"红卫军"的路

程。

他们先是满大街打听“红卫军”的去向。工夫不负有心人，在一个小吃摊，他们碰到了正要去找“红卫军”的复员军人老马，他说“红卫军”已到达淮河岸边的小镇常家坟，他还带着两个年青人，正准备马上出发。于是一个追寻“红卫军”的 5 人队伍就此开始了一次小小的长途跋涉。其中老马是退伍老兵，35 岁左右，“老马识途”的向导，“红卫军”在哪儿，只有他知道；小刘，20 挂零，一个能侃能吹的英俊小伙；小苏，一个百里追夫的年青小媳妇，她要去找新婚不久就离家革命的“红卫军”丈夫；再加两个自以为肩负重任的北京特派员，清华学生。

由于走的尽是小路，一直走到太阳下山，也没有碰到个卖吃的小店。饿了，只有采些酸枣充饥。天黑了，老马突然发现前方有个村庄，猛想起有个表姑就嫁于此地，于是他让其他人在村外麦场等候，自己一人进村。不一会儿，他的姑夫提了一筐稀粥和一些馒头，给他们当晚饭，并一再抱歉不能让他们进村，原因是怕接待“红卫军”这一派，会引来另一派的报复。

晚上，这 5 人就在打麦场盖了些麦草睡了一夜，凌晨下起小雨把他们浇醒了，起来继续赶路。又经过三、四个小时的冒雨跋涉，他们终于到达了常家坟“红卫军”的据点，遇到一个腰间别一把小手枪的小“男”孩。一开口,他们觉得不对劲,这孩子的声音怎么像个小姑娘？细一打听,她还真是个小女孩,是淮南中学的一个女中学生,名字叫周小彬,热情、大方。那性格说早了,有点像跨马执剑的秋瑾女侠、说晚了，犹如现代狂热的追星族。为了革命的理想、为了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她毅然远离家乡，与

父母不辞而别，追踪相信“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红卫军”，缠住她崇拜的偶像“红卫军”头头，要求发她一杆枪，为的是她可以到前线去冲锋陷阵。当头头说，只有男人才配拿枪时，小彬想，男女之别不就是头发长短不同嘛，于是二话不说，找个剃头匠把自己的一头青丝换成了男孩子的学生头，然后再找头头要枪。有志者事竟成，于是有了眼前这位英姿飒爽的“红卫军”小战士的形象。

遗憾的是“红卫军”的主力部队已于昨天晚上，在张司令的带领下，乘渡轮，连人带车一起渡过淮河，烧了渡船，让紧追其后，阻止其军事活动的解放军，不得不掉头绕道蚌埠。

8 月 29 日，淮南“红卫军”围攻高皇寺的高皇区委。高皇寺属“支持派”重要的外围据点。该地三面环水，易守难攻，“红卫军”几次强攻未能攻下，便动用了火焰喷射器！该地虽然称为高皇寺却都是土木草庵结构的房舍，一点就着！“红卫军”张家祥火烧高皇寺大院内的持枪民兵，致使 6 人死亡，数十人受伤，造成很大的人员伤亡和财产破坏。

“红卫军”占据高皇公社后，敲一家农民的门，里面的人害怕不敢开，他们就砸碎这家窗户玻璃，把手榴弹丢了进去，把一家老小都一锅闷了。当绕道蚌埠的解放军赶到这里时，“红卫军”已绝尘而去。

张家祥火烧高皇寺，杀害无辜农民，震惊整个淮南地区，在 1968 年以“反革命破坏”罪被枪毙。

8 月 18 日 22 时 45 分至 19 日凌晨 1 时 11 分，周恩来、康生、李富春、李天佑、曹轶欧等人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安徽 7 个地

区双方代表团负责人以及省军区、军管会、军分区负责人。

周恩来有事，晚来一会儿。康生先对代表们说："同志们好！"

代表们答："首长好！"

康生说："听说淮南已经生产了，淮南的生产产量低。"

淮南"炮轰派"代表说："我们都被打出来了。"

康生："情况我知道，你们不要讲了。"

康生又一一询问军代表，当听说六安驻军负责人是60军179师时，康生说："听说60军在徐州支左不错。"

当问到芜湖军分区司令员胡守富时，康生说："你的大字报怎么那么多，你要注意，人家告你的很多。你要很好研究研究，中央的五点建议和九条决定，你到底贯彻如何？！"

当问到安庆军分区政委布翰襄时，康生说："军分区住在城里还是城外？"

布翰襄答："军分区已经在城里了。"

安庆军分区在7月中搬到城外与保守派及农民攻打留在城内的造反派，中央已多次指示要搬回城里。

康生接着说："你支持'好派'啊！"

布翰襄说："我偏重'好派'。"

接着康生问到安庆军分区参谋长魏清岑，魏清岑站起回答："原来我是'好派'，现在我是'屁派'观点，我是在内部进行斗争的，没有发表声明。我补充一句话：布翰襄说军分区搬回城里去了，这是向中央首长说假话，军分区仍然在城外住。"

康生问："你是党委书记还是党委委员？"

魏清岑答："我是常委，书记是布翰襄。"

康生："安徽问题不是刚刚开始的问题，中央有《九条》、《五条》，谁对谁不对以这个为准，这是党中央、毛主席、林副主席亲自批准的。到底是赞成《九条》、《五条》，还是反对《九条》、《五条》，我们不必隐瞒。安徽有一股力量是反对《九条》、《五条》的，有的是反对的，有的是不坚决执行的。省军区就有这样的同志。安徽的问题之所以闹成这样，与省军区个别负责同志不坚决执行《九条》是有关系的，要好好检查一下。当然，省军管会不是没有正确观点的同志。安徽在7月下旬出现了像武汉'百万雄师'那样的反动口号（指打倒王力、康生、揪出后台等口号），值得大家注意、检查。我看如果同志们本着坚决贯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坚决执行《九条》、《五条》，平心静气的，问题是不难解决的。当然也有挫折，有反复。有些组织有这样那样的缺点、错误，人员还不那么纯洁，但解决问题要有个大方向，那就是党中央、毛主席指引的方向，希望同志们研究这个问题。今天如果赞成，就达成四项协议，保证把会议开好，如果还有好的意见，大家提出来，先把这四条达成协议，然后向家里去电报，我就讲这四条。这一方面，有些军分区必须悬崖勒马，不准再挑起武斗了！在你那个地方发生武斗，你军分区不能没有责任，军分区不能不承认，不要把责任推给群众，绝大多数的群众是好的。我就这样讲了，下面请总理指示。"

周恩来问："芜湖上访人员多少？"

安徽"三筹处"代表抢先答："40多。"

周恩来问："你们是哪一派？"

代表答："我们是'三筹处'。"

康生小声对周恩来说："是当权的。"

接着芜湖"联总"代表汇报被"三筹处"打到外地——南京、上海、合肥、武汉、北京等地"联总"人员和留芜人数，总数约10万人。

"三筹处"代表："'联总'骗人，没有10万。"

周恩来："难道你们没有骗人？你那7万人……"

这时中央文革联络员把芜湖"三筹处"用道林纸铅印传单，递给周恩来，然后又送给其他中央首长。周恩来心疼地指着"三筹处"的传单《告全国人民书》说："你们用这么好的纸印传单，这个东西不成样子，你们'三筹处'把大家都打跑了，自己会没有伤亡的？！你们拿那么好的纸印这样的东西，现在印主席语录都没有纸。"他抖了抖传单说："这个伤亡照片，中央早讲了，不要向外贴，中央的话你们不听，拿到北京来贴，这是外国记者最需要的最好的材料，这个东西只能说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得不成样子了。"

康生："印传单，如果没有军分区的帮助，是印不出来的，是不可能的。"

周恩来："跟人武部、跟走资派有关系，没有地方当权派支持是搞不出来的。

## 第 835 回：第四次，接见天津市代表　看湖南，工湘派大战长沙

8月18日，就在陈伯达接见天津代表的当天，天津“五代会”游行时受到“大联筹”的冲击。8月19日凌晨3时30分左右，陈伯达、谢富治在人民大会堂安徽厅第四次接见天津市群众组织代表。当他们进入会场时，代表们起立鼓掌。陈伯达走到台前对大家说：“不要鼓掌了，不欢迎，鼓掌干什么！不是为了让你们鼓掌的。认为鼓掌我们就高兴，不会高兴的！”

谢富治：“不武斗，我们就高兴了！”

陈伯达：“给你们谈了那么多的话，几天的话，不知是否觉得我们是与你们开玩笑了？还是觉得我们好玩弄？‘大联筹’在哪里呀？你们在干什么？天津发生了什么事情？”

“大联筹”代表：“首长生气可能是昨天‘五代会’开会时，有冲击会的情况，但决不是有组织有计划的。”

陈伯达：“你们把人全部放出来，昨天捉的。我们整天不睡觉闹来闹去，你们认为我们很舒服，我们可以受玩弄，其实，你们可能在受一批坏人玩弄，你们被坏人操纵了，提醒你们呀！我们想挽救你们。我前天就批评过，什么叫‘反复辟’？你们答不出来，你们讲不出多少道理来。算了吧，什么‘反复辟联络站’，我根本不相信。现在我问你们：难道中央对天津问题的决定，成了你们‘反复辟’的根据吗？你们对准谁呢？反的是什么呢？我替你们担心呀！你们要当心哪！”

天工“八二五”代表赵健敏：“伯达同志我要求发言。”

陈伯达："你已经发的不少了。你是大理论家，我倒要看你是哪一类的理论家。"

赵健敏陈述8月18日"五代会"的队伍游行时受冲击的原因。

陈伯达："我是搞过游行的，小时候就参加游行了，我从五四运动开始就参加游行、演讲，在家乡、在上海、在其他许多地方。"

谢富治问"五代会"："你们游行队伍有没有说刺激话刺激对方的？"

答："没有。在北京是有的。"

谢富治："我替你们担心。可能你们控制不住你们的队伍。你们这个队伍那么庞大、复杂，你们认为都是好人就可能上当了。上当的可能不能排除呀！你们在这里谈判，有人就直接破坏谈判。我想：就是你们签字是诚心诚意的，是否就排除这个可能性呢？我们是在阶级中，激烈复杂的阶级斗争中。你们说那些剥削阶级、反动阶级能轻易退出政治舞台吗？他们不退，就要利用一部分人。我现在提醒你们注意。可能你们都是好人，但你们如果不当心，可能要上大当的。"

他指着"大联筹"的白金生说："我看你这个三轮车工人就不大像。"

白金生忙说："我确实是蹬三轮的，我的历史可以调查。"

谢富治："你多大岁数了？"

"33岁半。"

"哪一年蹬的三轮？"

"1962年。"

“家中几口人？”

“6口人。我简单谈一下我的历史……”

“你由集体工厂的工人到去蹬三轮这是一个倒退，你必须承认这一条。”

陈伯达：“我们不以貌取人。”

白金生：“首长昨天就说我不像三轮车工人，而有人就利用此大造谣言。”

谢富治：“那样是不好的。不要捞稻草。”

陈伯达：“我现在在想这个问题，我们的会还开不开下去。休息几天，以后再开，诚心诚意地和你们的群众组织商量商量。同时你们也看了，不管哪一派，有没有人在让你们做坏事。我想可以停几天，我还有很多别的事，有点吃不消了。本来我对这个协议（指停止武斗协议）是很高兴的，其他地方的协议没有这么详细。从今天情况看来，可能还不能实现。恐怕大家脑子要冷静一下，我的脑子也冷静一下。这几天我受刺激不少，我觉得我还要看一看。你们回去一两天再来。还是希望你们诚心诚意，不要捞稻草。你们两方都想捞稻草。除了你们，还有没有坏人？我没有查清不好说，但两方面的组织都有想捞稻草的味道。稻草有什么可捞的，一捞就断了嘛！你们觉得稻草那么牢固吗？你们到小站去看看，那边稻草很多，捞一根试试看牢固不？不要靠这个吃饭，要靠实事求是吃饭。不要把我回答的问题扩大，不要这样搞，这搞不好。昨天我提出搞一个塘沽港的协议，一个油田的协议，一个全市抓革命促生产的协议。大家都没心搞了吧？搞了制止武斗的协议以后就又去搞武斗了。”

谢富治："刚才伯达同志讲了很多。先不要回去。回去几个人去传达制止武斗的协议，这里继续谈。家里那么多人，你们可能完全控制不了。也不要搞游行做样子。同志们要向前看。……过去的旧账不要算了。除了过去杀人放火的、破坏工厂的，要追查一下，一般的就不要追查了。大联合的同志们也有好多好的意见。解放军如在支左方面有什么缺点错误，应该公开承认检讨。当然错误还是认识问题，不是陈再道的性质。这以后慢慢讨论。但'八二五'的同志也要注意，不要去想什么办法去压军队，迫使驻军犯错误，在天津大干一场。……昨天打了一下，不要对此做文章，要看他们明天还打不打，后天还打不打。……我们往天津派人去了，你们还是留在这里继续讨论。还有个塘沽港、油田和抓革命促生产三个协议，然后再搞五代会和市革命委员会。对解放军有什么意见可以提。解放军反映意见要公正。把材料都给我们送上来，要听两方面的意见。"

"大联筹"："支左一次都不到我们那里去。"

陈伯达："不去不对。你们抓革命促生产的协议，十条已通过了八条，另两条有不合适的地方再协商哪！我看这个要求是好的。'大联筹'这封公开信不错。那条语录不要用了。不能乱用，改一下可以印一下。"

8 月 19 日，湖南赴京谈判代表大部分成员就要返回长沙了。离京前，8 月 19 日晨 4 时至 7 时，就在陈伯达接见天津代表的同时，周恩来也在人民大会堂再次接见湖南"工联"和"湘派"代表。在听取了常德、湘潭、益阳、株洲、黔阳、衡阳代表汇报后，周恩来说：

“断铁路、断邮电、抢枪支，正好是暴露它。暴露了，才好解决。这是最高指示。长沙一中八个人，要反映情况提出只能给戚本禹同志说，这显然不是青年的问题，而是有人在挑拨，我们不去责怪他们。我要戚本禹同志见见他们，戚本禹同志不见。谢若冰打电话，都说老实话，年青人有点骄，免不了。湖南是很重要的地区，不是主席指示，我能随便说？对万达的意见，向主席反映。革筹小组的革命群众组织负责人是：叶卫东、谢若冰、张楚梗、胡勇、唐忠富。朱顺祥，有的同志不同意，还可以商量。”

在吉首、黔阳、长沙“红艺会”、“孙大圣”、岳阳代表汇报后，周恩来再次强调：

“革筹小组的组成，除已定的 3 人外，军队无意见。对万达的意见，向主席报告。万不参加小组，至少让他参加工作。给他亮相和考验的机会。能站出来，就结合。万与张、王不同。推荐新干部，要报告，现在不能回答。‘湘江风雷’3 人已定(指叶卫东、谢若冰、张楚梗)。‘工联’是胡勇、唐忠富。对朱顺祥有意见，可另外推选。革筹小组随时可扩大，代表提议地区两派参加，将来做到每派各 5 名，双方各留 2 名空额，当前，地区主要是回去把各地搞好。回去报名单来，即可宣布成立。”

“革筹小组重要，但当前更重要的是文攻武卫指挥部。长沙、株洲交通要畅通。要有秩序。制止乱抢枪。”

“长沙、株洲是中心地区，要稳定，无论如何不要打内战。”

“地区代表在长沙多留几天看看，不要成立监督小组。岳阳可搞文攻武卫指挥分部，在省文攻武卫指挥部之下，配合行动。衡阳、株洲也可以搞。中心地区稳下来，下一步是解放湘潭的问

题。湘潭现在被坏人挑动，打击造反派。他们枪多，不可怕，进行政治攻势。延吉 5 座大楼都收回来了，最后两个，进行政治攻势，走出来 2000 多人，有 1000 多支枪。多数群众是受蒙蔽的，不会怎么样，容易瓦解。他们要打，军队支持你们，帮助你们学射击。”

“回去就成立革筹小组，特别是文攻武卫指挥部，开始办公。”

“首先，中心地区一稳，再解决湘潭问题。随后，从常德、邵阳向西伸，黔阳可以后推一步。郴州、邵阳推向零陵。主要是两派长期合作，戴利提消灭两派，提得太早。要经过一个友好合作，统一行动，共同对付路线斗争，将来才能矛盾统一，才能使其它 10 个军分区的造反派占优势。回去后，最关键的几件事：成立革筹小组，成立文攻武卫指挥部，搞好两派合作，逐步解决地区问题。其它是次要问题。”

湖南赴京代表和湖南省革筹回到了长沙。谁知，就在黎原、华国锋率赴京代表团刚下飞机，“工”“湘”派之间竟是以一场长沙闹市中心的大规模武斗欢迎他们的回来。

这场武斗的起因是为争夺几辆汽车。

8 月 8 日，“长沙工联”的一辆卡车被盗。就在湖南赴京代表和湖南省革筹回到长沙的当天，8 月 19 日，“长沙工联直属兵团”的人员在长沙饭店发现“湘江风雷”派的“东方红总部”人员驾驶此车，遂将该车与“东方红总部”随车人员及其随身携带的枪数支、汽油 15 桶扣留。当晚，“东方红总部”向“工联”发出还车、还人、还物的《最后通牒》。未果。当夜 23 时左右，“东

方红总部”开始派出武斗队伍，上街拦截扣留“工联”的车辆，先后扣押“工联”车辆 7 部，枪支一批。20 日上午，“工联”出动 40 多人，荷枪实弹向“东方红总部”靠拢，双方武斗有一触即发之势。经军代表调解，双方决定下午 14 时在长沙解放军政治干校谈判。

下午 13 时左右，“工联”派的“六号门挺进纵队”在解放路与“东方红总部”人员发生冲突。谈判代表不知此事，下午谈判的气氛一直较好。下午 18 时，谈判快要达成协议时，“东方红总部”来电话，报告“工联”包围了其总部。三方代表遂赴现场察看，果有其事。晚上 20 时多，“湘派”的“红旗军”、“青年近卫军”、“湘江风雷”、“铁道游击队”等组织，出动大批武斗人员赶到解放路，支援“东方红总部”，未见发生冲突后便撤走了。

21 日上午，正在长沙曙光电子管厂开常委会议的“工联”负责人听说“东方红总部”的人又挡了“工联”的车，认为“‘东方红’骑在我们头上屙屎屙尿，欺人太甚”，决心端掉“东方红总部”。当即召开 30 多个基层组织负责人的紧急会议，调集人员，统一部署作战计划。

下午 15 时多，“工联”派出动大批全副武装的武斗队人员，兵分三路，分别进驻市五一路湘绣大楼、解放路东端的回民牛肉馆、解放路西头的手工业产品服务部，在这三处设立“前线指挥部”。

下午 16 时，解放路东端的“工联”人员与“东方红人员”接上了火，双方开始枪战。马路上到处都是战争的痕迹。马克辛水压式重机枪就架在马路中间。

17 时左右，“工联”派出动的各路武装人员，先后分别占领了银宛、南京理发店、鱼塘街菜场、小东茅街等处，布设火力，设置工事，对“东方红总部”形成火力包围圈。

此时，湖南“高司”早就撤离了市区，发生在易家湾、坪塘、长纺一带的坦克大战长沙市民无缘目睹。可眼下，“工联”与“湘派”内部的这场真刀真枪的战争就在眼前发生，人们对着轰隆隆驰过的“工联”直属兵团装甲车，其实就是挂了几块钢板的载重汽车，睁大了好奇的眼睛。

晚 20 时，在解放路西头，双方的武斗队伍也开始进入战斗。晚 23 时左右，“东方红”人员冒充“青年近卫军”人员，在东茅街侦察“工联”的火力点，被对方发现，双方开火。“东方红总部”1 人死亡，轻、重伤各 1 人。

晚 24 时以后，又有“东风近卫军”、“捍卫军”、“湘江游击队”、“红旗军”等组织的武斗人员与“工联”派武斗人员发生战斗，一直持续到 22 日中午。

22 日下午 13 时多，“东风近卫军”向“工联”派的武斗阵地发射了 5 颗 60 炮弹。

下午 15 时多，“青近”的“闪电兵团”攻入了解放路。双方战斗僵持不下，遂进行停战谈判。至下午 17 时，“工联”全部解除对“东方红总部”的包围。

这天，占据当时湖南最大的百货大楼、四层楼高的湘绣大楼的“工联”派，与占据湘绣大楼对面大楼的“湘江风雷”的“长沙青年”开枪互射。“长沙青年”在楼顶架起高射机枪，装上燃烧弹和穿甲弹，向湘绣大楼扫射，湘绣大楼被“长沙青年”高射

机枪发射的照明弹击中起火，参与救火的一名 47 军战士和来湘的清华“井冈山”28 团骨干李磊落坠地身亡。噩耗传到北京，蒯大富与刘才堂、鲍长康等老“团派”联名在《井冈山》报上撰文，遥寄哀思：“磊落走了，再也不能回到井冈山来了”，只是没有提他死于造反派的内战。

湘绣大楼着火，导致众多人员伤亡，湘绣大楼内上千万元商品也被彻底焚毁，整个大楼变成一片瓦砾。

47军派部队前往劝阻，4名军人被打伤，救护车司机王家宝在救火时坠楼牺牲。

这次武斗事件，在长沙市区多处开战，造成了严重的伤亡和损失。武斗中，双方投入的总兵力达五、六千人，动用了步枪、冲锋枪、轻重机枪、手榴弹、手雷、炸药、高射机枪、迫击炮等军用武器；双方共死亡 24 人，其中 47 军战士 1 人，无辜群众 4 人，“东方红总部”方面死 16 人，“工联”方面死 3 人，伤百余人。

## 第 836 回：八一九，川“红成”闯中南海　卖小报，外交部二次夺权

8 月 19 日深夜，北京中南海西门又发生了一次冲击事件，冲击的人是四川“红成”派的上访代表。

7 月 20 日，中央文革记者站肖健卿和周恩来的联络员一起，到“红成”派进京代表住地听取了他们的意见。后来，因为突发武汉“720”事件，中央领导一直未能安排时间接见他们。于是，滞留北京月余的四川“红成”派上访代表，于 8 月 19 日深夜，采取了惊人的行动，冲击中南海西门，希望以此引起中央领导的重视。

当晚，他们分兵两路，一路 200 多人，高喊：“‘红成’战士在流血！”直闯中南海西门，要求向中央陈述他们的“苦难”，冲击前来劝阻他们的中央警卫团人员。与此同时，另一路人员翻越中直招待所东墙，搜寻监护在里面的李井泉、廖志高、杨超，声称要将“走资派揪出来批斗”，与警卫部队发生冲突，骂战士是“保皇派”，将战士崔永刚打成脑震荡，送往医院治疗，还有 16 名战士受伤。

周恩来等中央领导批评“红成”派上访代表的做法不对，只允许他们留下 160 人作为代表，等待中央领导接见，其余的人动员回成都。“红成”代表照办。

8 月 20 日，叶剑英的女儿叶向真和原地院“东方红”的一把手朱成昭因“反革命集团”罪被公安部逮捕。

叶向真自认识地院“东方红”的头头朱成昭后，两人在许多

政治观点上一致，朱成昭成为叶向真新的偶像。当他们反对中央文革的言行受到群众批判后，二人商量离开北京，于 67 年 7 月到了广州。

叶向真、朱成昭出走的消息很快被报告到了中央文革，说他们企图偷越国境叛国。周恩来马上派公安部副部长于桑赶到广州，将他们抓回北京，隔离审查。8 月 20 日，朱成昭和叶向真被公安部以组织“反革命集团”罪正式逮捕，受株连者多人，“地院东方红”第四把手杨雨中被审查时跳楼自杀身亡。

朱成昭被关押多年后于 1975 年被送到湖北某劳改农场劳动改造。他在长达 10 年的牢狱和劳改岁月中，写了许多动人的情诗。其中的一首：

何处觅向真，北京监牢中。

坐牢不要紧，真理有认同。

咫尺天涯远，相见在梦中。

醒来望明月，牵手越秀丛。

叶向真被关在北京功德林监狱。不久，叶剑英的长子叶选平、次子叶选宁、长女叶楚梅、长婿邹家华连同一个带叶向真女儿毛毛的保姆，都被投入功德林监狱分别关押。

叶向真入狱时兜里装着一本英文版的《毛主席语录》，她就天天在监舍学英文。后来，英文版的《毛主席语录》被没收了。她兜里还有一盒擦脸油，就像清凉油那样的铁盒，入狱时没有被搜去。她就用盒盖割下自己一绺头发，绑在牙刷柄上做成毛笔，每天沾着水在洋灰墙上练字。看守发现了，叶向真说她牙有洞，绑上一绺头发是为了刷牙洞。看守看不出这牙刷有什么危害，就

让她留下来。

叶向真被提讯时，从办公桌上偷了一个大头针，这个大头针伴随了叶向真三年。文革中都学针灸，叶向真用这个大头针做针，在自己身上扎。大头针太小，后来，叶向真从笤帚上撅下来一段铁丝，在水泥地上磨。天长日久磨出了尖，这是叶向真的第二颗针灸针。后来，狱医给犯人看病丢下两根针灸针被叶向真捡到，她就用这两根针练习针灸，直到出狱。

由于军委办公厅警务处处长宋治国揭发贺龙经常随身带枪，引起了中央警卫局领导的高度重视，遂进行调查。到了 1967 年夏天，叶向真被捕后，有人揭发："贺龙有支小手枪，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由叶向真放在董必武的女儿董楚那里了。"董楚住在中南海，"贺龙目的就是借到怀仁堂开会之机，从董必武女儿那里取上枪，用来暗杀毛主席。"

1967 年夏初的一个中午，董必武回家后，径直走到后院叫董楚。董楚闻声赶忙跑过去，只见董必武的神情有些不安，他微微地皱着眉，看着窗外的蓝天，慢慢地问道："是不是贺龙给了你一把手枪？"

董楚"嗯"了一声。

董必武转过脸看着董楚，两只手都扶在后腰间，又问道："这枪是不是叶向真在文化大革命初交给你的？说是替贺老总收藏的？"

董楚听了这话，有些莫名其妙，半天没有回过味来。她先回答了一句："不是。"就赶快搜拢那已经逝去十几年的记忆……

那是建国初中央搬入中南海前的一个夏末星期日，董楚的哥

哥约了叶剑英的儿子叶选宁和女儿叶向真等一大帮孩子去看贺老总，董楚也跟在哥哥的后面屁颠屁颠的跑去了。

贺龙在他的客厅里愉快地接待了这些孩子。男孩子们纷纷向贺老总要鸟枪，贺老总一口答应并立即让他们自己去挑选……男孩子们一涌而出，只有董楚还坐在那里，尽管她心里也想要一支枪，但有点胆怯，心里盘算着怎么说明白女孩子也可以玩枪，也应该玩枪。

也许贺龙看出了她的犹豫，走到她的面前，把烟斗从嘴里拿出来，微微地弯了腰，背过手去，问："给你什么呢？也是枪，好不好？"

董楚高兴得站起来，连连说："好，好，好！"

贺龙笑了，回头叫来一个人，说："去把那支小手枪给女娃娃拿来。"

那是一支小巧的手枪和四粒子弹。枪完全像一个玩具。回到家里，董楚拿给妈妈看了……董必武的夫人是带过兵、打过仗的人，枪对她来讲并不陌生。她教董楚擦枪，擦好枪，统一由董必武的夫人收藏起来了……

董必武听了女儿的叙述，精神明显地放松了，说："今天开完会，总理留住我说：'你女儿在北京吗？'我说：'在呀！'总理告诉我，有人说你最近从叶向真那里收了一支小手枪，是贺龙的，说是贺龙要在怀仁堂开会时，到你女儿那里拿枪暗杀主席。"

董楚听了，惊讶不已……

董必武说："你去把枪找出来，交到中南海警卫局。现在就去找。"

当天下午，翻箱倒柜，终于找到了这把阔别了十几年的小手枪。那可爱而又可怜的珍品，被几层布包着，因为多年没有人动它，已经锈蚀了，枪栓都拉不开了。

第二天早饭后，董必武让董楚将手枪送到警卫局。警卫局一位干部听了董楚关于枪的全部叙述后，查看了枪，先轻轻地拉了拉枪栓，拉不动，又鼓起很大的劲去拉，这样，才动了一点。他笑了笑说："这支枪根本没法用了。"他收了枪，就让董楚回去了。

此时，外交部面临着一次更大的动荡。继 8 月 14 日外交部政治部夺权后，8 月 15 日，外交部"联络站"核心组内部又进行改组。凡不紧跟王中琪的成员被称为"保守势力"，被改选出核心组。随后，外交部各基层战斗队的领导班子也都效仿进行"整改"。他们的口号是"保字号靠边站"。

8 月 16 日，北京外国语学院"红旗革命造反团"近百名学生在外交部"联络站"一些人的指引下，冲进外交部东交民巷 15 号外交部大院，砸了"外交部革命造反总部"和"攀险峰野战兵团"的办公室，围攻和殴打正在值班的数名工作人员，刷写大标语，勒令这两个群众组织解散。他们撬开"外交部革命造反总部"和"攀险峰"办公室的办公桌、材料柜的锁，搜查并抢走他们的文件、资料、录音带等，查封了他们的办公室，还用大字报对这两个组织的核心组下达最后通牒，限令他们在两天内交出"认罪书"，并解散。与此同时，"联络站"核心组也对他们发出一道道"通令"、"通缉令"、"勒令"。检讨会、批判会、斗争会、揭发会、反戈一击会，在各个单位一个接着一个地开。

第二天，"联络站"在外交部大礼堂召开"批判右倾保守思

潮大会”，揭发、批判“外交部革命造反总部”和“攀险峰”。与此同时，20 多人到王海容工作的外交部办公厅综合组办公室，批判 7 月 8 日外交部办公厅综合组和研究室王海容、刘华秋、陈德和等 11 人写的《对陈毅要“一批二保”》的大字报，说综合组是“保守势力的大本营”，指责“一批二保”是“保皇理论”，是“批造反派，保走资派”，要王海容“回到主席革命路线一边来”。

18 日下午，“联络站”召开外交部“干部亮相大会”。会上，外交部部长助理董越千、研究室副主任邵宗汉、国际司副司长吴亮璞和政治部副主任冼依登台亮相。

经过这场风波，外交部不少人宣布退出“外交部革命造反总部”，这个组织最后剩下不到 30 人，被迫转移到日坛公园活动。而“攀险峰”于 8 月 18 日被迫宣布解散。

18 日，“联络站”核心组通过了由姚登山抓总的外交部“业务领导小组”方案和由姚登山当主任的“革命委员会”方案。

与此同时，香港的局势也更加升级。

8 月 4 日，港英当局出动访港英军航空母舰上的直升机，从位于英皇道与糖水道交界、大型国货公司华丰百货所在的侨冠大厦天台降落，上下夹攻设在这里的香港左派据点，拘捕 30 人。警方在大厦内除搜出各式炸弹武器外，还在对面新都城大厦发现设备完善、包括有手术室的战地医院。

8 月 9 日，香港警方根据港英当局公布的紧急法令，封闭了多间左派学校，并逮捕了新华社香港分社、《文汇报》、《大公报》的 19 名记者及 34 名报社工作人员，将他们拘押在摩星岭政治部的囚室，部分人被递解出境。

8 月 18 日凌晨，香港港英当局又分别逮捕《香港夜报》社长胡棣周、《田丰日报》社长潘怀伟、《香港商报》总经理李少逸、《南昌印务公司》董事长翟暧晖等人，并查封了《香港夜报》、《田丰日报》和《正午报》。

面对香港局势，外交部西欧司港澳办公室酝酿考虑采取应对措施。其中，港澳办公室的几位激进分子跟国防部商量，建议派一个营解放军逼近香港，抓香港两个连作人质，跟香港当局交换被捕人员。这一近乎儿戏缺乏常识的建议被国防部和总参驳回。

这几位头脑发热的人又写了一篇“抗议照会”，强令港英当局在 48 小时内纠正一切错误，否则将遭遇回报，这就是后来被称之为所谓的“四十八小时最后通牒”。外交部领导将此“照会”上报了。

8 月 19 日上午，北京外国语学院“红旗革命造反团”再次派遣百余人小分队“进驻”外交部，强行封闭部党委办公室，成立 “临时指挥部”，发布三项《通令》：

1、从即日起，所有党委委员停止一切工作。不得擅自召开会议，无权批阅任何文件，无权处理任何业务工作。

2、部党委成员中，姬鹏飞、乔冠华二人必须于今日下午三点前来指挥部报到，其他成员必须根据自己的罪行和错误情节进行自我交代和检查，必须对陈毅及其部党委进行认真具体的揭发，每晚八点到我指挥部汇报。

3、外交部不能同时存在两个政权，在革命委员会成立以前，外交部一切党政事务均应由“外交部革命造反联络站”负责处理。

这天，外交部“联络站”核心组王中琪召开紧急会议，通过

了《关于立即创造条件建立革命委员会和成立临时业务领导班子的决议》，并决定由姚登山等人组成“临时业务领导小组”开始工作，取代外交部党委。在这个决议中，明确指责陈毅是外事口最大的“走资派”，并且拟定了一个包括姚登山在内的外交部临时业务领导小组的人员名单，上报王力、周恩来。在这个名单中，姬鹏飞、韩念龙、乔冠华 3 人被排除在外。周恩来立即上报毛泽东。

毛泽东看了这份名单后说：“造反派要三弱，不要三强。”

“三弱”应该是指上报名单中的外交部副部长罗贵波、徐以新和助理董越千；“三强”应该是指被排除在名单之外的外交部姬鹏飞、韩念龙、乔冠华三位副部长。

外交部第二亚洲司“新愚公”战斗队当天即在部内贴出大字报“要求姚登山当外交部代理部长”。北京外国语学院和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的学生甚至在天安门刷出大标语：“强烈拥护姚登山当外交部代理部长！”

当晚，姚登山向王力汇报了封闭部党委的情况和他们上报的领导班子方案。王力对封闭部党委十分满意，对“两个权利机构不能同时存在”的提法十分欣赏，连声说：“讲得不错”，“提得对”，并建议他们派人先去煤炭部学习戚本禹在那里总结的《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的经验，然后再根据外交部的实际情况制定自己的方案。

当晚，外交部副部长姬鹏飞、乔冠华被造反派关进了地下室，要他们坦白交代追随陈毅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外交路线的罪行。

第二天一早，姬鹏飞、乔冠华又被学生押上北京街头，到王

府井闹市区卖他们编印的“批陈战报”，还必须边叫边卖。

外国记者闻风而动，立即拍下了他们卖小报的照片。很快，这些传真照片就登在纽约、巴黎、莫斯科……等诸多世界知名报纸上

周恩来闻讯，怒不可遏地说：“这是丢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人！”他通知公安部长谢富治立即去把姬鹏飞、乔冠华他们从王府井闹市找回来。

8 月 20 日，外交部“联络站”、“九九兵团” 和北外“红旗造反团”强行封闭外交部所有副部长办公室，整个外交业务陷于混乱。据不完全统计，8 月 19 日至 22 日，夺权后的外交部群众组织共处理重大事情 42 宗，向中国 50 多个驻外使、领馆签发通报，号召“打倒陈毅”。

周恩来签发了外交部西欧司港澳办公室那几位激进分子写的强令港英当局在 48 小时内纠正一切错误的“抗议照会”。8 月 20 日晚，夺权后的外交部西欧司负责人召见英国驻华代办霍普森，交给他一份照会：“中国政府再一次向英国政府提出最紧急、最强烈的抗议，并且严正声明，英国政府和香港英国当局必须在四十八小时内撤销对《香港夜报》、《田丰日报》和《新午报》的停刊令，无罪释放上述十几名香港爱国新闻工作者和三十四名工作人员，撤销对《大公报》、《晶报》以及南昌印务公司和香港报业印刷公司的非法诉讼，恢复上述各报纸及印刷公司的正常业务。否则英国政府必须对此承担一切后果。”

当天，由谢富治主持，北京第一机床厂、北京外国语学院、外交学院、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十几个院校和单位的群众，

在工人体育场召开了数万人参加的声援香港人民、声讨港英当局的声援声讨大会。外事口造反派成立了“首都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反帝反修联络站”，准备 8 月 22 日在“抗议照会”到期时，在英国驻华代办处召开声讨大会。周恩来闻讯后，紧急召见这个“反帝反修联络站”负责人，劝说他们不要这样做。他们不听，和周恩来一直争执到深夜。最后，周恩来在得到他们保证不进入代办处的允诺后才离去，此时已是 8 月 21 日凌晨了。

## 第 837 回：广州打，陈伯达见厦“促联”　周恩来，再动员下井下矿

就在广州两派代表终于飞赴北京的 8 月 20 日当天，广州又发生了著名的“820 三元里武斗事件”。事件是从“旗”派广州郊区石井海军仓库抢枪开始的。抢枪行动是广州的许多中学组织计划的。这天，男男女女的中学生开着卡车，从“红警司”进驻的陈列馆驶向石井海军仓库，只见十几个海军军人在仓库大门处举着《毛主席语录》喊话，劝阻他们进入。人们根本不理会，直接来到库房，仓库里也有一些海军军人举着《毛主席语录》在劝导，但人们一样不听，只是把一排排的箱子撬开，找寻抢支。当他们撬开大口径枪弹和炮弹的箱子时，解放军对他们的冒失看傻了眼，担心这些无知的人动作过猛引发意外，但他们除了哑着嗓子念《毛主席语录》外，毫无办法阻止……

学生们看到枪支、子弹、手榴弹，就径直搬走，甚至连小口径炮弹也不放过，能够搬就搬。到了下午 13 时多，人群开始离开海军仓库。陆路来的陆续乘卡车离去，水路来的一群群像散兵游勇般七零八落散布在河堤上，沿途地面还有遗漏的子弹、炮弹……

约下午 15 时左右，从水路前来的学生乘渡轮启航返城。

从陆路返城的学生，一般都会沿着新市、三元里的方向回到市区。这样的路程较短，比较好走。但在回城的十字路口，有好心的婶婶提醒他们，绕道林校和外语学院，穿过白云山回市区，说这样安全。听从这些意见的，虽然迂回曲折，晚了两个小时回

到市区，但却是安全的。一些没听劝告的学生车队，在回市区的三元里长约两公里的大路上受到伏击，伤亡惨重，抬运伤亡人员的人流涌向人民医院。不一会儿,广州军区副司令员温玉成乘坐卡车,在满车全副武装士兵的护卫下来到医院了解情况。

两天后，在东较场，烈士陵园广场，几万人大集会，抬尸大游行。从中山路到解放路，一直到海珠广场。

这就是后来被称之为“820 三元里武斗事件”。

8 月 21 日，广州部队内的造反派一千多人，在军区政治部门口召开“愤怒控诉广州军区内一小撮走资派镇压军内造反派罪行大会”。海陆空三军代表和部队工厂、农牧场代表纷纷发言，并把军区文革办的负责人揪上台斗争。

这天上午，在省军管会大楼门前，贴出了一份由张云领衔，一共有 21 名原省、市委机关领导干部联署的大字报《最强烈抗议！最紧急呼吁!》，大字报认为，8 月 20 日的三元里武斗“是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派操纵地总、主义兵、郊贫联等保守组织的一小撮坏头头制造出来的。他们用变相发枪的方式使用了最残暴的法西斯手段，对革命派连续进行了血腥镇压，犯下了滔天罪行。血债要用血来还的……

我们就这次严重反革命事件，向广州军区提出最强烈的抗议！对地总、主义兵、郊贫联等一小撮坏头头提出最严重的警告！你们要向毛 请罪。这次惨案，犯了方向路线错误的严重结果。因此广州军区、广东军区必须承担这次反革命事件的主要责任，要公开检讨承认错误。”

次日下午，当这张大字报的第二稿贴出时，联署者增至 31

人；第三稿贴出时，联署者已增至 93 人。

8月21日凌晨4时40分至8时30分，陈伯达在北京人民大会堂第一次接见厦门无产阶级革命派(促联)赴京控告团。

4时30分许，当厦门代表走入会场时，陈伯达已在会场了。他走过来同代表一一握手，问控告团负责人是不是“促联”派的。

负责人回答：“是，是‘新厦大公社’的。”

陈伯达让控告团负责人坐在自己身边，用闽南话同代表们开始交谈。他说：“我是代表福建人民讲话的，我这个人回去讲土话，老百姓说我没有忘本，这点比叶飞好，叶飞同他母亲讲话还要翻译，我这个人讲普通话很‘路渣’(闽南话)，懂吗？是糟糕的意思，比小学生讲得还差，回去不敢和小学生讲普通话，我爱讲家乡话，就是没人讲，我家乡话是受母亲影响的，是海边人的口音。”

他接着讲了几个问题，首先讲禁止农民进城武斗。他说：“现在到处都有人动员农民进城，很有可能是军区、人武部或保守派搞的。”

代表汇报厦门“革联”和公安局下乡发动农民进城情况，陈伯达说：“没有人发动农民跑进城才怪，发动农民进城一定有人组织，是公安局、人武部、军分区搞的。厦门就是公安局搞的，公安局要悬崖勒马。叫农民进城武斗，不做工，拿工分，这是对革命犯罪，对党犯罪，是反动的活动。”

代表说：“封锁海堤的农民还给钱，给三餐干饭，让他们抢劫集美侨校的侨生仓库。”代表还讲了“革联”到部队“抢”枪，有的驻军还喊“坚决支持真正革命左派”、“向真正革命左派学

习”的口号。

陈伯达：“他们发枪给保守派是一种罪恶的活动，是什么左派？是保守派，是真正的假左派！有人是在玩弄权术，不能弄玩这些权术，这是玩火，玩火必自焚，这是破坏国防，破坏人民解放军的名誉，发枪给这些保守派是培养一批带枪的流氓，后患无穷。

什么是‘抢’！名义是夺枪实际是‘送’。从福建情况看，从福州、厦门、泉州看是这样，这对部队很不利，发枪给农民，实际不是真正的农民，老实的农民不会进城武斗。我建议韩先楚自己下命令，不要用我陈伯达的名义，要把保守派的枪支一律收回。枪杀革命群众是谁干的？”

代表汇报厦门驻军镇压造反派情况，陈伯达说：“韩先楚要下决心收回枪支，要军区悬崖勒马。发枪给保守派，这是对党、对人民、对解放军、对祖国罪犯，结果是屠杀造反派，是瓦解人民解放军。解放军是我们的长城，有的军区和保守派是要破坏这个长城。有人以为这样可以保住自己了，实际上是保不住的，这样可以保得住，我们就不用革命了，革命就不会胜利了。建议你们搞一个拥军爱民运动，他们不爱民是错误的，旗帜要拿在人民手里，要重视这个事实。”

代表汇报，从8月19日凌晨3时到此时，厦门驻军在瓷厂和“革联”一起，对“促联”开枪扫射，“829公社”负责人邓志国等人被手榴弹炸伤……

陈伯达：“福建这个协议(有关制止农民进城，)原来我还以为是比较好的，但厦门就这样干起来。这是违反群众的希望，群

众希望他们不要武斗，他们违反了中央、毛主席的希望、毛主席的政策。有些人，坏人或犯错误的人、走错路的人，就是怕这个协议达成，赶快发枪，破坏协议。玩火者必自焚，以为发了枪可以保住自己。把武器发给农民，自己站不住脚。如果他们站得住脚，我们也不用革命，革命也不会胜利。”

代表说，23军军长刘春山的部队所驻地区，不论是厦门、东山、诏安，都同时发生造反派受血腥镇压的事件。陈伯达说：“叫刘春山来，李平也要来，把问题谈清楚，谈通了就好了，走错了路要猛回头，走错了路一直滑下去就是自取灭亡。叫他们来，告诉他们要商量问题，顾全福建问题，稳定前线问题。不要发枪，发给农民的枪一律收回，一定要韩先楚讲。叫他们来，要休息就与韩先楚一起休息，住到医院去，但叫韩先楚同志不要受他们的影响。‘829’对军区是好的，他们也不同意，告诉韩先楚，‘829’也不同意发枪，也是反对农民进城的。”

代表提出：“这次‘829’总部同‘革造会’谈判，要有厦门代表参加。”

陈伯达：“你们可以来嘛，你们见过两派代表吗？”“应坚决制止农民进城，制止海员、渔民上岸。鼓浪屿不能破坏呀！集美不能破坏呀！集美、鼓浪屿、厦门都不能破坏呀！现在要马上开放自来水。”

这时革委会和“829”总部代表进来。

“现在首先停止武装进攻，收枪、放人。现在一定要下定决心，排除万难，解决福建问题，是海防前线嘛！”

8 月 21 日，李先念在财贸系统革命造反联络委员“打倒姚

依林大会”上讲话说：

“我坚决支持打倒姚依林大会的召开。

我也是犯了错误的，以前你们炮轰李先念火烧李先念，大方向是正确的，就是打倒李先念方向也是正确的，因为我犯了错误嘛！希望同志们对我还要继续批评。

总理接见你们时，你们提出要停姚依林的职。姚依林的问题，我已向总理反映过了，总理同意你们的要求（口号）。现在我代表中央、总理宣布停止姚依林在国务院财贸办公室副主任、中共中央财贸政治部主任的职务。”

众人呼口号。

李先念继续说：“我的错误，你们不要因为我而分两派，如果因为我分两派，我心里不安，感到惭愧。

昨天总理接见你们，谈了抓革命促生产的问题，你们可以研究一下。”

8月21日，周恩来得悉厦门群众组织要抢夺驻军某部炮舰武器，致使炮舰不敢靠岸，立即告中央文革办事组：“请伯达同志以中央文革或周恩来、陈伯达等人的名义宣布，不准夺炮舰的武器，在敌人面前夺野战军的武器是错误的。如劝告不听，继续再夺，即宣布为反革命。”

这天，周恩来还就湖南282兵工厂被群众组织接管一事电告黎原：“务必要求该组织撤出，国防工厂的武器绝对不准动。”

周恩来自 8 月 10 日将煤炭部及所属院校的群众组织头头都派往矿井挖煤后，8 月 21 日，再次与李富春一起接见国务院工交、财贸、农林口各部群众组织代表和驻各部军代表、负责生产

业务的干部以及有关院校的学生代表，希望他们能像煤炭部那样，配合国务院，下到厂矿，帮助将生产搞上去。

周恩来说："参加了一个庆祝会，晚了一步，今天先让富春讲一下。"

李富春说："到厂矿去，这是很好的形式，总理和戚本禹同志号召，今后，抓革命，促生产，精简国家机构，干部、学生要和工农相结合。煤炭部先走，煤炭产量下降很多，这是一种非常紧张的情况。铁路交通也要下去，冶金部、矿山、鞍钢、包钢、太钢、武钢，有色金属要下去，其次，一机、八机、化工、建材、一轻，当前首先希望铁道交通学习煤炭部。以后，冶金、一轻、建材、一机、八机。

目前情况，各部抓革命、促生产任务不同，文化大革命进展不同，如何下法，我们不作具体安排，由各部及各革命组织大家商量。

第一、协商如何抓革命、促生产，特别是业务班子，四种形式；

1 、计委经委；业务小组；

2 、下面各部校，部长不行，由双方同意的副部长搞，再不行由司局长搞，有革命派参加；

3 、设有业务班子，像煤炭部，派军代表，成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是大联合、三结合的基础；

4 、各部门，业务班子瘫痪的，各部门协商。部长不行，副部长、司局长、革命派代表参加成立业务班子。

四种形式，希望各部门回去协商。

第二、 协商下去的问题，首先铁道、交通、煤炭。煤炭昨天已经下去了，两派各走各的，自己去商量处理，各部能下去多少，这是很大的工作，你到青岛，我到秦皇岛，你去上海，我去长沙。

其次，冶金能下去多少人，到什么厂矿去，和农村交换。 建材、化工、一机、八机究竟能下去多少人，下到哪些厂矿，我们不规定，你们自己协商。至于建委、经委、计委工作怎么搞法，是采取分片分区分省市，还是其他办法，你们自己协商，提建议，我们考虑。”

周恩来：“同志们，煤炭部开了个会，铁道部长吕正操、武竞天被打倒了，但也站出来两个副部长，成立了业务监督小组，后来起了变化，外界不听，冲击，不得已实行了军管，军管虽是监督了，既抓革命又促生产，但监督小组过去是有些成绩，我们把他改成了业务协助小组，已三个月 100 天了。但近来工代会，其他外界条件冲击过军管会，陈伯达、谢富治、李先念、李富春等去了，解释过来了，最近有一个浪潮，抓军内一小撮，军管会的任务是非常繁重的，难免有这样那样的错误，有几个错误是很严重的。例如青海赵永夫、武汉陈再道、内蒙王逸伦，问题暴露了，已经解决了。解放军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支柱，还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支柱，还是要相信，依靠他们。但有一个浪潮冲击军管会，冲击他们的工作，是不恰当的。有个浪潮来就有些副作用，听说工代会二七工厂还示威了一番，这是不对的，这是将群众引向了错误的方向。”

“我们找出一个新的形式来过渡，煤炭部就是一例，戚本禹同志发现两派可以抓革命、促生产，促进大联合，最重要的是铁路，我为什么说不能冲击军管会呢？铁路都军管了，两派发生矛盾就很容易把铁路弄断，北京、郑州，东面的郑州、蚌埠，浙江金华、柳州、南宁、萍乡、长沙、成都都发生过这些事，所以决定分段由野战军，不由地方军队实行军管。

两派有的是造反派之间，有的是造反派和保守派，只能在业余时间争论，不应在工作时间争论，更不应发生武斗、停工、夺武器，再夺就是夺野战军的武器了。”

“我为什么强调不能冲击军管会？就是因为全线铁路都分配给野战军一段一段地护路，以保证整个铁路线畅通。由于受地方群众运动的影响，现在铁路的运输量大大下降。在座的都懂得经济生活，经济动脉不能断。例如铁路断了，不仅物质生活不能保证，精神生活也受到影响，报纸也送不出去，例如徐州看不到报纸，也不能用飞机送啊！有的地方告急，煤送不到，工业用电不能保证，只能维持照明用电，甚至生活用电也要停，这还搞什么文化大革命啊！本来铁道部要军管后好一些，但是一冲又有问题，拆路停车是不行的，铁道部要下去，学煤炭部，同样，交通部也要采取煤炭部的方式。

煤炭没有了，交通、水电也都要影响，没有煤怎么生产，怎么运输，水电不能供应，最近，煤产量大大下降，这样一个问题摆在我们面前，要首先解决煤炭，铁路，煤炭部有一个新的形式，由军代表、领导干部、群众组织代表的三结合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戚本禹同志有一个创造，煤炭部当权派打倒了，为什么还是

互相打，仍然斗争很厉害？就是在 9 号戚本禹同志讲话的时候，仍然吵得很凶，后来一调查，群众不愿打，两派的头头、勤务员要打，戚本禹说两派都下去，头头首先下去，双方鼓掌，说明大家都厌战了，勤务员也应该下去锻炼锻炼，能上能下，身体力行，经过考验再回来，当然下去还会有反复。双方不要到一个矿山去，不要吵架，不要把自己的观点带下去，反而要劝当地两派合作，如淮南、抚顺、鸡西、大同、鹤岗。同时动员了矿业学院也下去了，66 年级占很大一部分，但也有其他同学。

工交口近一年多，造反派起来批判部的领导，广大群众、干部对走资派有所认识。所以不见得是造反派与保守派的争吵，而往往是造反派分歧。”

“武斗不要再斗下去了。武斗对革命对生产都不利。都是些老问题，一坐下来就争个没完，不断地循环，反复，走马灯式的，这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革命要前进，不能停留在初期水平上，不要受学校影响，现在要求大家抓革命促生产的水平提高，首先是加强领导，我和富春、先念算一算，多数条件已经成熟了，就是反复循环，受学校两派影响是不利的，煤炭部树立了新的榜样，工交系统应该赶上，铁路交通应该赶上。”

“铁道部、交通部要照煤炭部的方式，派人到各线路上去疏通，劝铁路系统两派不要武斗，不要停车、破路、误点、夺枪等。其他各部要组织人下去，帮助搞好生产。北京的大专院校不要像去年那样搞大串连了。红代会在各地的联络站要统统收回。”

接着周恩来又就部门的具体特点做了指示，最后说：“希望 8、9 两月份，多数有成绩，哪个单位好，我们先到那个单位去

支持你们。三、四季度主席的抓革命促生产应出成果。”

## 第 838 回：宋任穷，京西宾馆险被劫　哈尔滨，炮捍两派武斗急

8 月 21 日，北京京西宾馆又发生了劫持宋任穷的事件。

话说 8 月 6 日，中共中央做出《东北局停止对东北各省市领导的决定》，周恩来电话指示宋任穷夫妇到北京。

为了避开群众组织的拦截，宋任穷和爱人钟月林化了装，打扮成老工人模样挤在车厢里，来到北京，住在京西宾馆 6 楼东头 619 号套间。

很快，辽宁“辽革站”开始在京西宾馆警戒线外安营扎寨，要揪宋任穷。当时陈锡联、宋任穷都住在宾馆，他们既要揪宋任穷，又不能伤及陈锡联，以表示揪宋任穷与陈锡联毫无关系。

京西宾馆不敢大意，在宾馆大厅安排卫戍区一个排负责守护门厅，夜间就在那里和衣而卧，保证一有动静可以随时投入行动。

“辽革站”数天“蹲点”，把宋任穷住在几层几号等情况摸得一清二楚，知道什么时候冲击最好，连走什么路线，用什么方式进入室内，采取什么方法把宋劫走等等，都做了详细计划。

由于宾馆防守严密，“辽革站”首先设法麻痹宾馆对他们的警惕。8 月 18、19、20 连续三天，他们敲锣打鼓进入宾馆东警戒线内，声称组织了“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要为宾馆演出。

到 8 月 21 日凌晨两点，正在京西宾馆演出的“辽革站”突然发起冲击，冲破哨兵的拦截，推开守护大楼的卫兵，径直冲上六楼，直奔 619 房间，砸碎 619 房间门上方的玻璃，搭人梯跳进室内，将宋任穷夫妇堵在了屋内，整个行动十分神速。

宋任穷的妻子钟月林健壮，大哭大闹起来，声称要跟丈夫一起走，要死一块死。“辽革站”的人把她拉到另一间房子里，锁上门，不让她与宋任穷接触。

与此同时，一楼大厅被惊醒的卫戍区战士也立即跟随“辽革站”上楼，但进入客房内的“辽革站”把房门锁死。战士们看到门上破碎的玻璃，也采取同样的办法想进入房间，房间内的“辽革站”用力把战士往外推，外面的战士奋力把上面的战士往里挤。就这样经过几个回合，战士们终于进入房间，把房门打开，外面的人一拥而入，看见“辽革站”的人正准备用绳子绑住宋任穷，从阳台上吊下去，由下面的人接应劫走。冲进房间的卫戍区战士立即阻止了“辽革站”的行动，解救了宋任穷。

在此之前，8 月 10 日，沈阳黎明机械厂两派群众组织在黎明文化宫发生大规模武斗，双方动用轻、重机枪、火炮等武器，死伤 100 多人。

8 月 16 日，沈阳三派群众组织，“831”、“辽革站”、“辽联”与沈阳卫戍区司令部签订《关于立即制止武斗、恢复生产的协议书》，沈阳军区、辽宁省军区 8 月 17 日电告中央。

但是，纸上的协议是那样的脆弱，从 8 月 19 日起，沈阳市各派群众组织又开始抢占市内高层建筑，尤其是控制商业区内的制高点，并且封锁部分交通要道。

中央请辽宁三派组织代表赴京商谈解决辽宁问题，并于 8 月 21 日，即“辽革站”差点劫持宋任穷的这天，以中发［67］265 号文件，批转了沈阳三派群众组织的《关于立即制止武斗、恢复生产的协议书》，说：沈阳军区、辽宁军区“对沈阳市三大群众

组织就制止武斗，恢复生产问题，进行说服教育，达成协议，做得很好。希望你们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继续耐心地向三大群众组织做政治思想工作，保证《关于立即制止武斗，恢复生产的协议书》的执行。长春情况和沈阳类似。沈阳军区可将你们的来电和《协议书》发给长春驻军和吉林省军区，请他们参照沈阳的做法，进行工作。”

但是，8 月 22 日，根据中央调查组安排，赴京商谈解决辽宁问题的群众组织代表，在东塔飞机场依然遭到“辽革站”派的武装伏击，运送谈判代表的飞机无法起飞，代表们被迫改道鞍山乘机赴京。

而此时，黑龙江哈尔滨市的武斗也已经非常厉害了。“一月风暴”中策划了黑龙江省夺权的原黑龙江省革委会负责人范正美、宋振业二人，自参加了反对省革委会的“炮轰派”后，于 7 月中旬跑到北京，准备向中央反映他们对黑龙江省革委会的意见。他们先住在中央党校，不久又在宋振业北大造反派朋友的帮助下，移至北大专家招待所。

首先，他们找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谭厚兰、王大宾等当时最著名的北京“五大领袖”以及其他著名院校的造反派领袖。这几位学生领袖处事都比较谨慎，不轻易表态。同时，他们多少显得有些疲惫。因为他们每天除了应付本单位工作外，还要接待许许多多来造访他们的人。有的是来向他们讨教、求援的，但也有的是来跟他们闲聊的，甚至有的人是专程来找他们辩论的，这样他们自然就是食不安宁、睡眠时间很少了。

与此同时，范正美他们还到中央信访接待站反映情况，恳求

周恩来和中央文革首长接见。还到新华社、《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中央电台等新闻单位，告知他们所知道的黑龙江省的事情，恳请转达他们要求中央首长接见的请求。

事情远非他们预想的那么顺利，他们望眼欲穿地期盼着周恩来、中央文革接见，可不见回复的音信，度日如年。而哈尔滨传来的消息则使他们忧心如焚：

各单位小武斗不断，“炮轰派”被打得七零八落，四处藏匿。这时，哈尔滨第一机器制造厂，简称哈一机，就成了哈市“炮轰派”的一个重要据点。

哈一机是五机部下属的一个军用坦克制造厂，有 5000 多人。巨大的水泥厂房像城堡似地屹立在市郊的三棵树。该厂造反派支持“炮轰”，并掌握着厂里的大权。为了坚守这个据点，哈军工“造反团”总团派各分团出人轮流去到哈一机助战，3 天一轮换。

“捍联总”要求粮店停止供应“炮轰派”家属粮食；医院不允许给“炮轰派”家属看病，不接受他们的家属住院；街道委员会不能发给“炮轰派”家属一切购买票证；不给“炮轰派”的儿女们办结婚手续；不给“炮轰派”的出生婴儿落户口等等。“捍联总”的广播车每天在大街上驶来驶去，唱着：

炮匪一小撮，

本性不会变，

日夜在磨刀，

妄图反夺权，

我们时刻准备打，

誓死捍卫新政权……

“炮轰派”则采取“哀兵战略”，派出“别动队”，在黑夜分批将家属孩子掩护到哈一机“根据地”。

7 月中旬，“捍联总”对哈一机实行大包围。于是，设在哈一机的“炮轰派”总部就常常派出“别动队”出去搞粮食、煤、木柴、医药、蔬菜等日用品。因为“哈一机”是制造装甲车和坦克的，“别动队”出击，便用装甲车和坦克开路。

7 月 18 日早晨、7 月 22 日晚间，哈一机“炮轰派”发动了两次抢粮事件。

首先自然是装甲车和坦克开道。一到某一粮店、煤场、菜市或医院，手脚敏捷，身强力壮的“别动队”，便彬彬有礼然而又气势凛凛地找到这里的负责人说：

“我们为老人、妇女 和儿童们的生存向你们借粮食。”或者“借煤”、“借木柴”、“借疏菜”、“借 医药品”……他们像当年八路军的武工队一样，短枪明面插在腰间，那些粮店、煤场、菜场、医院岂敢不借？

胆小的立刻点头哈腰，低眉顺眼地回答：“好说，好说，想借多少都行！人手够不够？人手不够我派几个人帮你们装车！……”

胆大的可能会斗胆问一句：“什么时候还啊？我对上边总得有个交待呀！”

“什么时候还？等我们夺取了政权再还！”照例是这样的回答。并且还煞有介事地写一份“借”据：

今借某某粮店面粉一百袋，大米一百袋，豆油两桶。革命胜利之后，如数归还。

“炮轰派别动队”

一九六七年×月×日

还要郑重地盖上“炮轰总司令部”的鲜红大印。特别嘱咐一句：“别弄丢了，好好保存，等我们掌握了政权，凭着它来找我们 !”

7 月 18 日晨 2 时 30 分左右，哈一机“炮轰派”总部与一些“炮轰派”的人武装包围了太平公社第一粮食供应部，“借”走粮食 18440 公斤。

武汉“720 事件”后，7 月 23 日 22 时左右，哈一机“炮轰派”总部又出动军车堵塞铁路，拦截列车，“借”走面粉 30000 多公斤，并使列车中断行驶 4 个多小时。

7 月 25 日，哈尔滨市万人集会，声讨哈一机“炮轰派”总部的打砸抢罪行。

正在北京的范正美连续写了《给全院红色造反者和革命师生员工的公开信》、《给全院干部的一封信》、《炮轰我前段工作中的错误》、《给参加所谓〈捍卫三结合指挥部〉红色造反者战友的公开信》，与宋振业联名写的《我们对当前我省我市形势的几点看法——给红色造反者和革命同志们的公开信》，所有这些信件的中心点是，公开检讨自己对待“炮轰派”的错误，表明他们对现实、对镇压“炮轰派”的看法和应该采取的态度。

哈师院“造反团”根据范正美的上述信件的精神，于 7 月 27 日，发表《炮轰宣言》。《宣言》建议：

一、潘汪政治挂帅，到群众当中来，勇敢地检查最近几个月在对待群众问题上犯的方向路线错误；

二、把赵去非交给群众揭发、批判、斗争；

三、立即解散捍联总，令其主要头头作检查，向被他们打击的革命群众组织和个人赔礼道歉；

四、坚决执行中央4.1指示，给被打成“反革命”的革命群众彻底平反，给被打成“右派组织”的工交系统造反团、哈工大红色造反团、齐齐哈尔2.9公社、佳木斯8.25红色造反团等革命造反组织彻底平反，被保守组织篡夺的一切大权还给革命造反派，进驻军工、建工等地的捍联总人马立即撤出；

五、省革委会公安保卫部门、军区和地方武装部门，应当坚决贯彻6.6通令，对挑起武斗，进行打砸抢抄抓的罪魁祸首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保卫无产阶级条件下大民主的正常进行。

《宣言》最后表示，哈师院“造反团”在6月27日前两个半月中，在所谓“反逆流”中，在省革委会的影响下，也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在此向“炮轰派”赔礼道歉。

这份《炮轰宣言》在通过时，几乎每宣读一段，全体与会人员就报以一阵雷鸣般的掌声。大会雄浑悲壮，气氛浓烈，极富战斗性，每一个人都感到正义在胸，热血沸腾，并且良心受到极大的激励。参加会的除了哈师院的“红色造反团”绝大多数师生员工以外，还有来自全市、全省方方面面的人物。

27日下午14时许，哈尔滨674厂、港务局等单位出动装甲车一辆，坦克3辆，1000多人在市内举行武装游行。

28日下午14时许，674厂和港务局发生武斗，使用步枪、机枪、手榴弹，出动坦克两辆，造成12人死亡，20多人受伤。

7月30日，“炮轰派”10多万人积聚到了师院，召开“打倒陈再道砸烂武汉百万雄师”大会。会后游行，，在哈工大一带遭

到石块和石灰的突然袭，两派冲突。

7 月下旬的一天，周恩来的联络员赵刚告诉正在北京等待的范正美和宋振业，对他们说：

“周总理通知你们俩不要离开北京，中央要解决黑龙江省两派问题，你们参加‘炮轰派’汇报团，并且已经通知潘、汪，他们也成立汇报团，不日他们就要来北京。你们赶快回去做准备，总理要接见你们。”

这突如其来的消息让范正美和宋振业喜出望外。告别赵刚，他俩紧紧地互相拥抱跳跃。

8 月 1 日晚上，范正美和宋振业还接到周恩来办公室给他们俩送来的门票，去人民大会堂观看了庆祝八一建军节晚会。

8 月上旬，范正美和宋振业参加了黑龙江“炮轰派”汇报团，同潘复生、汪家道率领的“捍联总”汇报团，在同一天住进北京西苑旅社。不过，潘复生、汪家道二人并没有住在这里，他俩是在京西宾馆。

在黑龙江省被斥为“炮匪”、“反革命”的“炮轰派”，特别是其中的主要头头边士军、冯昭逢等，这回同“捍联总”的头头一样，平起平坐地作为中央的客人一起住进了国家招待所。黑龙江省两派赴京汇报团是东北三省中最后一个来到北京的。

8 月 10 日，哈尔滨港务局“大红色造反团”与哈工大“红色造反团”在哈工大门前发生武斗，当场死亡 3 人，伤 100 多人。是日下午，哈尔滨市“捍联总”10 余万人在人民大厦广场集会，愤努声讨哈尔滨港务局“大红色造反团”和哈工大“红色造反团”中的一小撮坏头头挑起武斗的罪行。会上宣读了市工代会、贫代

会、大专院校红代会筹委会、中等学校红代会和“捍联总”的《联合声明》。

8 月 12 日，哈军工的“捍联总”和“炮轰派”两派达成大联合协议。

8 月中旬，武汉的造反派到哈军工介绍“文攻武卫”的经验，再次促使哈军工的两派剑拔弩张，积极备战。果然，8 月 16 日，哈军工“捍联总”包围了“炮轰派”住的那栋面临南通街的 58 号楼学员宿舍。

在最近两个月中，这栋四层米黄色楼房变成“炮轰派”对外宣传的据点，全市同情“炮轰派”的人们每天在大街上听 58 号楼的广播。“炮轰派”为了泄愤，用报纸糊成巨大的面包和香肠模型，吊在楼外，讽刺外单位工人是为了吃面包、香肠而当“占领军”的，“捍联总”哪里容得下这颗“钉子”，早就想端掉 58 号楼，时不时有工人进楼抓人，两派的拼杀已是箭在弦上。

8 月 16 日午夜 24 时，在“捍”派女司令指挥下，“捍”派大队伍实施突袭，“炮”派早有准备，攻楼的梯子刚刚搭上，“炮”派一声呐喊，石块、砖头如雨点般砸下去，“捍”派中有个“战将”，外号叫“P 司令”，不避砖石，端着长矛向上冲，差点让守楼勇士的长矛削掉了鼻子。那场武斗整整打了半宿，“捍”派靠人多，声东击西，终于在早晨 7 时多攻克 58 号楼，俘获 200 多名“炮”派战士，押往俱乐部等地关押起来，其中的骨干分子免不了皮肉之苦。

面对日益严重的武力镇压，8 月 20 日，全市“炮轰派”在师院对形势和对策进行辩论，哈工大等单位都认为也要建立起一

支武装力量，以加强对“捍联总”武力镇压的武装自卫反击，但是哈军工总团和多数同志认为这样会使双方武斗进一步升级，会使更多的人流血牺牲。应该保存实力并分散下到工厂里发动组织工人，壮大“炮轰派”队伍。

8 月 21 日，根据中央通知精神，哈军工学院两派群众组织各派代表前往北京。

## 第 839 回：陈伯达，再见厦门市促联　周恩来，连续会哈、穗代表

月21日晚21时50分至22日凌晨3时15分，周恩来在人大会堂接见黑龙江哈尔滨市“炮轰派”代表，参加接见的还有戚本禹。

在人民大会堂南门前，“炮轰派”汇报团全体成员排队准备进门时，正值周恩来进入会议室之际，代表们极为激动，一位来自外专的“炮轰派”代表，喊出了“打倒潘复生！油炸赵去非!”的口号，周恩来问：

“你们呼什么口号？”

大家纷纷批评外专的这位代表，并回答了周恩来的提问。

周恩来又问：“这些口号是谁提的？”

外专代表说：“是我们自己提的。”

在此之前，周恩来已接见过哈军工的“山头派”。

周恩来逐个点名。首先点到哈工大的代表，详细询问了哈工大和“红色造反团”、“新曙光”的组织情况。接着谈到赵去非问题，周恩来问：“赵去非是什么人？”

代表们回答：“是原省委政法部长。”

周恩来说：“你们整的赵去非的材料还不够系统。”

代表回答：“处于我们当前的条件下，根本无法进行仔细调查。另外，了解赵去非情况的一些人，如于天放、王化威、卫之民等，还没有揭发出什么问题就都自杀了。”

周恩来说：“我就没有这个‘都’字，总有人了解的，总会弄清楚的。”

黑龙江大学的代表汇报了于天放的情况，说明了于天放如何结合的，并且检讨了自己警惕性不高，调查研究不够，不知道于天放是叛徒。

代表们控诉哈尔滨“65 事件”后，潘、汪调动指挥大批工人、学生镇压群众的情况。

周恩来详细地询问了哈军工“69”反夺权的情况，冲击和进驻哈军工的“支左”工人人数，以及泄密的情况。代表们汇报说：“潘、汪造谣说中央支持对军工反夺权，并说总理表示好得很。”

周恩来做着手势重复地说根本不知道有这回事。代表们把“捍联总”关于“中央表态”和“特好消息”的传单给周恩来看，周恩来很气愤地说：“根本不可能。”

在控诉潘、汪指使“捍联总”抓捕和毒打哈市“炮轰派”和首都红代会赴哈人员时，周恩来说：“潘、汪都在北京，你们把情况汇报上来，我立即对他们下命令。”

周恩来的联络员随后即要代表在 21 日下午将被抓人数及姓名报上来。

周恩来问：“据‘捍联总’说，你们在北京也抓了他们的人，有没有此事？”

一位代表说：“没有。”

周恩来笑着说：“抓了就抓了呗，你们抓他们的少，他们抓你们的多就是了。”

一位代表说：“抓了十几个，其中有一个鸡西‘红联总’的副司令，非常坏。”

周恩来说：“你们把人和他的材料交给我，我来处理嘛！”

因周恩来有事，接见于 22 日凌晨 3 时 15 分暂告结束。

8月21日晚23时45分至次日凌晨1时40分，陈伯达在北京人民大会堂第二次接见厦门无产阶级革命派(促联)赴京代表团。

23时23分，陈伯达亲自到会场门口叮嘱全体到会代表："等下韩先楚要来，你们不要乱喊。"

福州革委会代表，"829总部"代表同时参加接见。

23时35分，陈伯达身穿军装和韩先楚一起步入会场，全场热烈鼓掌。

陈伯达说："今天早上找不到韩先楚同志，对不起大家，他想同大家谈谈话，有意见还可以提的。"

韩先楚："我身体不好，正在治疗，对家里的事情不了解，请同志们谅解。我们没有彻底走群众路线，没有和地方领导干部很好商量，所以很多工作做不好，平反工作，制止农民进城，制止夺枪，要下最大决心，用最快的速度去办。我们前一个阶段在支左工作中犯严重缺点错误，准备向大家作检查，先向中央军委、中央文革汇报了，中央文革福建组提了意见，修改稿子，过一两天可送给在京的福建同志征求群众意见。我们敢于在群众面前承认错误，修正错误，错了就改。这场文化革命是伟大的深刻的革命，是尖锐的阶级斗争，我们对错误的认识比较慢，改正也较慢，给福建运动带来损失，对不起中央和广大群众，对不起毛主席、林副主席，我们愿意改进错误，为人民立新功。

我们坚决贯彻中央指示，坚决制止武斗，制止农民进城，制止保守派杀害革命派，把散发的枪支收回，挑动农民进城的，送枪给保守派的，一定要严加惩处，我们一定能把福建文化大革命

搞好。”

陈伯达说：“韩先楚同志的表示是好的，我们欢迎。福建军区的检讨可以发给大家讨论，大家满意了就可发表，韩先楚听了昨天情况，他表示制止军分区、人武部、公安局违背中央，荒谬的调动农民进城的反动行为。”

这时，“促联”代表拿来厦门“促联”发来的请求中央支援急救医药的电报说：“伯达同志，厦门来电报，我们‘促联’100多位被枪伤的伤员感染破伤风，缺乏急救药品，请求中央文革用飞机送到厦门抢救100多名‘促联’战士。”

陈伯达接过电报，看完后告诉韩先楚，然后交给陈伯达的秘书，要他立即处理。

接着有人告诉陈伯达，外面有福建各地赴京代表要求接见。陈伯达问：“不是厦门‘革联’的吧？是不是那些要揪汪大铭的人？”

有人答：“不是。”

陈伯达：“可以派几名代表，找个地方，韩先楚也见见他们。厦门有没有消息？有机帆船追赶舰艇要抢武器这是不对的，要拥护解放军，我昨天说了，要把拥军爱民抓起来，懂了吗？”

“促联”代表说：“我们没有船，‘革联’才有机帆船，是因为航管局是军管单位，没有军内走资派配合，他们是不能上舰艇抢枪的。”

韩先楚：“夺枪，实际上是明抢实送。”

陈伯达：“军队不能发枪给保守派，发枪给农民。发给的一定要收回，保守派拿了枪，是明抢暗送。军区开门让他们拿，还

不是‘此地无银三百两’？

你们搞拥军爱民是对保守派施加压力，‘革联’既不拥军也不爱民。‘革联派’就是那次要揪汪大铭的，汪大铭一到北京，他们就追来了，这不是有人在幕后指使吗？‘革联’根本不讲道理，要批评，他们丢福建人的脸，谁要揪汪大铭！他们的拥军大成问题，不拥军，又不爱民，解放军支左，保守派就不拥军了。军队要支持你们，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派，造反派和解放军团结在一起，保守派很快就要垮台了，福建哪几个地方拥军爱民较好？”

代表们说：“惠安部队、宁德海军等较好。”

韩先楚表示：“我们要先爱民，民才会拥军。军管不是从名词上去理解，我回去要开各级干部会议。”

陈伯达提到的汪大铭是厦门市委第二书记。

这时，“促联”代表说：“‘革联’得到厦门驻军支持，部队的‘八五团’是同厦大‘革联’的‘9445’配合，所谓‘9445’即‘绞死苏吴’的谐音。

陈伯达问：“绞死什么？”

“促联”代表：“绞死苏、吴！我们造反派负责人苏辉明、吴国耀同学。”

陈伯达：“‘9445’这完全是‘联动’的口语，是联动式的组织。‘革联’是谁叫他们来的？”

“促联”代表：“他们有钱，一下子来了100多人。”

陈伯达：“‘革联’都住在那里？要叫他们回去。告诉他们受蒙蔽了，你们要去做他们的工作，他们在北京没有带枪吧？”

“促联”代表：“他们和北京的反动组织‘516兵团’有关

系。”

陈伯达说：“他们和‘516’搞在一起那就更糟糕了。他们要揪汪大铭同志，我叫他们回去，他们说汪大铭会杀死他们。我说那么厉害？我那天用闽南话和他们谈，是亲切了吧，他们根本不听。”

“促联”代表要韩先楚就厦门两派表态。

韩先楚：“起初我原以为都是反对叶飞的老造反派，两派都是造反派，我偏听偏信，不了解下面情况。现在听陈伯达同志意见，‘革联’动员农民进城，搞打、砸、抢，不能算造反派。”

“促联”代表：“韩先楚，‘革联’什么时候成立的？成员情况如何？政治纲领是什么？你知道吗？他们是二月成立的，是‘三月黑风’的黑打手！”

韩先楚：“我不了解情况。”

“促联”代表：“你们连谁是造反派都不知道？怎么能支左？”

陈伯达：“最近情况发展已经很清楚了，现在界限分明了。谁是革命派谁是保守派，阵营很清楚，动员农民进城，抢枪，这是反党、反党中央的行为，这是很清楚的。让韩先楚以后谈吧。‘促联’是革命派！‘促联’是革命派！”

陈伯达又问：“‘革联’有多少人？”

“促联”代表：“在市区大概有三、四万！”

陈伯达：“不少嘛，你们要争取帮助他们，帮助那些群众过来。你们‘八二九’、‘革造会’彼此就不会做工作。他们有4万多人，要争取过来。厦门是国防前线，死了人很严重，是有人

在破坏，‘革联’是在搞破坏的，杀害了很多人，他们，他们的活动对我们革命派，对人民解放军都有害。你们对厦门‘革联’要做工作，争取他们过来，革命派不要去抓人，对保守组织要对他们做工作，让‘革联’内部分化，让他们把坏人揭发出来，自己抓坏人，革命派如果抓人，他们就会煽动，就不容易瓦解。厦门‘促联’派要会做工作，瓦解‘革联’派。他们多数是劳动人民，要争取最大多数群众，才能孤立坏人，其中可能有反革命，不然为什么会破坏国防呢？我说‘促联’是革命派，你们要有敌情观念，更重要的是不要忘记美蒋，你们忘掉蒋介石了没有？”

众答：“没有。”

陈伯达：“革命派要同人民解放军很好合作，解放军中个别坏人不能代表人民解放军。好了，去看看他们吧！(指在人民大会堂外面的福建各地代表)你们也一起过去看看他们。”

22日凌晨1时30分，陈伯达到南大门另一会议厅接见福建省各地赴京代表几百人，历时半个多小时。

陈伯达可能是听到坐在前面的代表说话了，他指着坐在前面的代表说：“都是闽南人，我也是闽南人。你们是不是没有来过北京，想来玩的？”

众答：“不是，是来反映情况的。”

陈伯达：“‘革联’来了没有？厦门人那天来吵，吵得一塌糊涂，他们要来北京揪汪大铭。汪大铭同志来了没有？我们不许在北京揪人。

泉州‘过得硬’是反动组织，我建议‘过得硬’必须解散，就是人武部、军分区搞起来的嘛。陈文德(华侨大学革命造反派

负责人)一定要放。军分区、人武部调动农民进城。动员农民进城是反动行动，是不允许的。

今后不准打人，抓人，在福建也是这样，我们要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办事。‘革联’有人来没有？(没有人回答)。‘革联’要揪汪大铭同志，这个行动是错误的，他刚刚到就来揪，这是有人幕后策划的，千万不要上人家的当。”

就在陈伯达接见福建代表的同时，8 月 22 日凌晨，周恩来也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广州两派群众组织代表。这次接见是在激烈的吵架中开始的。周恩来眉头紧皱，静静地听着他们的发言，双方像举行诗歌比赛那样，争着背诵毛主席语录，然后指责对方违背了毛主席的伟大教导，似乎广州的每一场战斗，都是对方先挑起来的。

双方争了半天，唾沫横飞，面红耳赤，大逞口角锋芒，但没有一件事情是弄得清的。周恩来觉得，火候已经够了，他终于打断了双方的争吵：

“我知道你们的武斗也动用枪了。枪是从哪里来的？是抢解放军的吗？”周恩来目光在双方代表脸上掠过，“我告诉你们，国防仓库的武器，是绝对不能动的，解放军的武器是绝对不能抢的。这是一条死命令。我昨天才说过，不准任何人抢夺炮艇，在敌人面前夺野战军的武器，这像什么话？！是完全错误的。如果再夺，即宣布为反革命!”

他的声音高亢有力，把在场的谈判代表都吓住了。大家眼睛一眨不眨地望着他，像一群被教师呵斥的小学生，噤若寒蝉地听着他讲话。

“你们抢军用物资，抢解放军的武器装备，简直是没有敌情观念！是无知！我劝你们不要再搞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了！”周恩来的声音放缓，不高不低，但透出一种不可动摇的坚定，“以后不要再提‘军内一小撮’了。‘军内一小撮’是在 7 月 20 日事件后宣传机关提错了的，毛主席已经批评了这件事，提出夺军权，这是错误的。你们必须立即停止抢夺解放军的武器装备，并且把夺走的武器装备立即封存，准备归还给解放军。立即停止武斗，停止一切打、砸、抢、抄！”

周恩来停了一下，两只眼睛像弧光似地扫过会场，“莫超海来了没有？”他突然大声问。

莫超海坐在后排，听见周恩来点他的名，不禁自怀猜惧。一阵寒战，使每一根末梢神经，变得冰凉。他站了起来。

周恩来没有说话，莫超海担心地猜测：“总理是否在沉默中打量着自己，评价着自己？”

这段静默的时间，不过半分钟左右，莫超海却感到好像有 100 年那么久。

“你来了，为什么不说话？”周恩来问。

“……”莫超海嗫嚅着。

“你不要以为你的山头很大，我两句话可以叫你一个人也没有！你能不能处理好广州的武斗问题？”

莫超海鼓起勇气回答：“只要按着毛泽东思想办事，我相信大家是听我的。我可以处理得好。”

“好，既然你能处理得好，你明天就回广州，把武斗的事情处理好。”周恩来把身子朝后一仰，简单明了、不容置辩地说。

接着，他提出迅速恢复广州秩序的 4 项紧急措施：

一、各派组织立即停止夺取解放军的枪支弹药、物资装备、粮秣和车辆；

二、各派组织所持有的武器、弹药和车辆立即封存，准备交还解放军；

三、停止一切武斗，禁止打、砸、抢、抄、抓；

四、立即释放一切被扣人员。

两派代表都表示完全同意和坚决执行。

周恩来让两派各派 10 人跟他的联络员回广州，平息武斗。

周恩来、陈伯达就是这样度过了 8 月 21 日紧张的一天。周恩来几乎通宵未睡，又在人民大会堂迎来了 8 月 22 日的晨曦。

## 第 840 回：八二二，声讨英帝开大会　群情愤，火烧英国代办处

面对香港局势情，从 8 月 21 日开始，北京民众自发组织抗议港英当局的示威游行人数大增，昼夜不断，至 22 日傍晚形成高潮。

8 月 22 日，在清华大学“414”总部值班的高衡庆接到一个电话，一位自称是外交部“反帝反修联络站”的人，简明扼要地对他说：8 月 22 日晚要在英国驻华代办处前举行一次抗议港英当局迫害香港新闻工作者的大会，邀请清华大学“414”红卫兵参加大会。

高衡庆向“414”的头头汇报后，当即表态愿意参加这次示威活动。“反帝反修联络站”的人表示马上到清华大学来介绍情况。

清华大学“414”广播站立刻发出紧急通知:“‘414’的红卫兵们马上到××楼阶梯教室集合，召开紧急会议。”

“反帝反修联络站”的来人衣着整洁、气度不凡，开始了动员。他列举了港英当局的种种罪行，宣讲了外交部“48 小时通牒”的照会，然后说道：

“到现在为止，港英当局一直不作回复，到英国驻华代办处去开大会就是要压一压他们，显示红卫兵的力量，让他们知道经过‘文化大革命’锻炼的造反派是不好惹的!”

他还说:“如果他们不按时答复，我们就要全力予以报复。文化大革命中，他们收集了我国许多重要情报，带上锥子、钳子，

到那以后有必要时打开他们的档案柜，把情报拿回来。”

“大家要穿深色衣服，他们可能会向我们开枪，不要留给他们明显的目标。”“会英语的同学站在前面，都带上电筒。”

最后，他又拿出一张英国驻华代办处的位置示意图，标明代办处内各建筑物的位置及电源闸盒、水管等设施的位置。

向英帝国主义示威的神圣任务，使红卫兵们情绪高涨起来。当第一批红卫兵上路后，“414”又快速地将第二批红卫兵派了出去。

8 月 22 日晚，“反帝反修联络站”联合北京外语学院、清华大学、人民大学、师范大学、北京第一机床厂等单位在英国驻华代办处门前召开“首都无产阶级革命派愤怒声讨英帝反华罪行大会”。北京卫戍区和外交部联络站向总理值班室请示，当时周恩来正在中央文革小组开会。值班室秘书答复：“按总理的指示办，不能冲，不能砸，在外边示威可以。”

17 时许，与英国代办处仅一箭之隔的北京第一机床厂工人和北京外语学院的学生就已经来到位于日坛公园附近光华路使馆区内的英国代办处举行示威抗议。天还不黑，这里已被数万名红卫兵围得水泄不通。开始，大家都很守规矩地坐在那里，呼口号、唱歌、念抗议书。

使馆内，英国驻华代办唐纳德•霍布森和另外 22 名使馆成员在静静地等待。从早上开始，他们就发现门口聚集着人群，而且越来越多。他们想出去买菜，门口负责警卫工作的解放军战士劝他们不要出去，否则安全无法保证。

中国政府要求港英当局 48 小时内释放香港被捕人员的最后

期限即将到来，英国驻华大使馆却一直没有收到英国政府的回复。此刻，每一分每一秒都那么难熬。全体使馆成员挤在一间屋子里，面面相觑，他们不知道事情会是什么样的结果。

夜幕降临了，聚集在外面的红卫兵点起了马灯，又唱起了革命歌曲。

歌声一浪一浪涌来，拍打着使馆内全体成员的心弦，使他们对未卜的前途又增添了几分担忧。

天黑下来后，门外架起了探照灯，雪白的灯柱划破天空。

抗议大会于晚上 21 时开始。通过高音喇叭，人们愤怒地谴责英国在香港的暴行。

高音喇叭不断传出:“离最后通牒还有×小时，你们到底何去何从？”一遍又一遍的质问声加上震耳的“造反有理”的歌声和抗议的口号声使宁静的夜晚充斥着紧张气氛。

22 时，通牒限期就要到了，清华大学“414”的高衡庆找到“反帝反修联络站”负责人，问下一步该怎么办？得到的答复是：“虽然周总理说了不让冲英国驻华代办处，但是群众要采取革命行动，谁能阻挡得了？”

22 时 30 分，对英政府的外交通牒的 48 小时时间到。外面的歌声停息下来，架在树上的高音喇叭在宣读一个《通告》。

22 时 40 分，在一位手持喇叭的人指挥与鼓动下，代办处正门开始躁动起来。先是向院墙上投掷墨水瓶等杂物，后来人群开始冲击由赤手空拳的解放军组成的八排人墙。有人试图从解放军人墙上爬过去，但他们摔了下来。

正门的冲击其实只是佯攻。在冲击正门时，北京外语学院的

红卫兵从代办处西墙翻入院内，10 分钟后又有人突破北墙。他们冲进办公楼，开始把椅子、沙发及一些用品从窗户扔出。

正门的高音喇叭鼓动人们行动起来。人们喊着："闪开，让我们进去！" 再次冲向解放军的防线。

战士的防线终于被冲开了一个缺口，人们冲过去爬栅栏，战士们把一些人拉下来，但其他人却过去了。几经反复冲撞，解放军组成的人墙终于给冲破了，人群涌人院内。

守卫代办处的解放军战士见到局面失控，立刻果断地把英国国旗杆护住，他们迅速脸朝外，手臂挽着手臂形成圆圈，禁止示威的人靠近。

就在英国代办处门外形势非常紧张的情况下，周恩来的秘书周家鼎打电话到北航，北航革委会副主任井岗山接的电话，周家鼎对他说：总理要你们北航派人去英国代办处做工作，劝阻那里的群众，千万不要冲进英国代办处。

但是，当北航同学赶到英国代办处时，还还来得及没下车，现场的群众已经冲进去英国代办处了，北航同学没有起到阻止的作用。

晚 23 时左右，有人将游泳池旁的汽车库内的一桶汽油点燃，大火顷刻间烈焰升腾，东院里的门窗、地板、汽车房及 7 辆汽车被大火吞噬。在西院楼内，3 个卧室、档案室及两辆汽车也被火烧着。

不一会儿，呼啸的救火车赶来，但人们不让他们进来，他们只得回去了。火势越来越大，消防车又回来了，许多消防员冲过拥挤的人群，接近了大楼。

就在火起之时，周恩来和江青下了命令，要群众立即全部停止进攻。但这个指示没有广播。

英国驻华代办唐纳德•霍布森和其他 22 名使馆职员，其中有 5 名是妇女，仓惶之中逃入使馆内最安全的地下保险库里。他们在里面停留了大约 45 分钟到一个小时。这时，外面的烟沿着风口灌了进来，保险库里非常热，浓烟也很呛人，大家都难以呼吸。在这种情况下，代办处主任做出了打开大楼紧急安全门的决定。

安全门打开后，他们看到整个的大楼都在燃烧，夜空被火光映得通红，眼前是黑压压的人群。人们一看到出来的这些英国人，立刻像发了疯似地冲到他们的面前厮打他们，解放军战士设法冲过来解救他们。

一位英国大使馆工作人员最先被群众捉拿到手，此人立刻扑通跪倒，磕头如捣蒜。他的归顺姿态，免除了皮肉之苦。

另一些英国外交官则继续傲慢，马上遭到过激示威者的拳打脚踢和皮带抽打。

看见情况越发不妙，有的英国人拿出了大把大把的人民币，堆着笑脸，想塞给示威的群众，这种“和解手法”反而使民众更愤怒了：

“太小瞧我们啦！谁稀罕你们的臭钱！”

一时间，人们把崭新的人民币打得满天飞。

“我们要的是公理！讲清楚：为什么无理逮捕我们的新华社记者？”

这时，有人搬来了照明灯，开始给这些英国人照相。疯狂的人群向他们喊叫着：“你们这些英帝走狗，向毛主席请罪！”

群众接着冲进了办公室。

“还有地下室呢，肯定有间谍设备。”这一看还真发现了大问题，他们地下室里有一架高清晰度显示器，对准北京首都机场，每一架由那里起飞的飞机，它都监视得清清楚楚。

“砸了它！敢监视社会主义中国的首都机场，谁让你们干的？”在场的英国人吓得都跪下了。

这时候，又有人高喊，“凭什么挂英国国旗？把它摘下来烧了！挂我们的！”

“有带着国旗的没有？”大家焦急地互相发问，盼望着国旗出现。

在全场的热切盼望中，第一机床厂的李冰师傅登场了，他边走还边挥舞着：

“我带着呢！”

也许是偶然的灵感，在参加示威之前，出于爱国，他拿了一面国旗。此时，他热血沸腾，冲出人群，走到护卫英国国旗的解放军战士面前。

解放军战士是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只是沉默着与李冰对视。

李冰曾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批滑翔机驾驶员，又跟天桥有名的摔跤把式学过几手。当时他运足了气，大喝一声，“嗨——”双臂腱子肉猛地插在两个战士肋叉子，个个赛武松的小战士居然让他给扒拉开了：圆圈出现了断裂，他借机会扑向旗杆，一个虎扑蹿了上去。

人群里顿时爆发出雷鸣般的欢呼和震耳的加油声。

解放军战士跳起来拖李冰的脚，他几脚就踢开了战士的手，

人比钻天猴还伶俐，蹿到了旗杆中间部位。

底下是更响的欢呼声，连叩头的英国人也抬起了脑袋，瞧他爬杆儿。这时候，旗杆突然朝他身体这一边弯曲。人群发出“哎哟”的惊呼声，英国人也用英文惊呼还划着十字。

李冰是攀爬高手，他凭感觉判断，以这样的速度更换国旗，这个合金旗杆不会折断的。他几个上蹿就到了顶上，牙叼着中国国旗，腾出手解开英国国旗，扔了下去。

李冰拿出绝技，双脚盘住小小旗杆，几下子把中国国旗固定在旗杆上，然后双脚钩住旗杆，双手展开，潇洒的“升旗”姿势又引起了欢呼！接着“刷”地滑到地面。脚还没落地，马上被民众托起来，成了英雄。他激动得热泪盈眶，“扬眉吐气啊！谁敢跟中国过不去，我们就叫他过不去！”

人海里几乎都高兴得眼含热泪，就是出这口气的！“谁让你无理羁押中国记者来着！”当人们气出得差不多的时候，喇叭里传出周恩来与江青等中央文革小组几个人联名指示，命令所有进入英国驻华代办处的人立即撤出，离开现场。这样，大队人马纷纷撤离。

……

英国驻华代办处临时代办唐纳德·霍布森在给他夫人的信中是这样描述的：“我打开房门第一个冲了出去，其他人也跟在后面出来了。当我们从地下室来到院子里时，院子里已有近 5000 人了。我当场就被打得青一块紫一块，能打到我的人随手抄到什么就拿什么打。女人们也像泼妇般地朝我扑过来，想用棍子把我打倒。他们抓住我的头发拽，并想用领带勒我的脖子。不一会儿，

我头上遭到重击的地方鲜血直流，被打得昏昏沉沉的我真的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来到大门前的。冷不防伸过来一只手抓住我的手臂，有人用中国话冲我喊道：‘到这边来！’那人拖着我跑向印度大使馆（英国大使馆背后），他把我藏在大门背后。头部受到的打击使我晕了过去，失去了意识，此时的我就像牲口一样淌着血……。

所有工作人员都被迫向毛泽东像低头，而且还得忍受唾骂和拳打脚踢。尤其使我感到震惊的是一位外交人员告诉我，围攻的人中有些是英国人。其中一个头领来自‘有良好教育’的家庭，她穿着半筒工作鞋在女王的像上跳上跳下……。

后来警察进行了干预，将我们撤离了代办处大院。在向外走时，还有人不断撕扯我们的衣服。”“有几名女士曾经想到对面的阿尔巴尼亚使馆避难，但遭到拒绝，他们关上了使馆大门。两位姑娘进入了荷兰使馆，受到保护。”

23 日清晨 2 时 30 分，在英国代办处院内的解放军战士渐渐集合到一起，他们站成两排，让一辆汽车顺着人墙开了进来，将能够看到的英国人都拉到汽车上，让他们躺在车里，解放军战士分别站在他们的两侧。汽车慢慢地从还在袭击大楼的人群中开走，把这些英国人送到外交官居住的外交大楼。

英国代办处外交官敦爵士后来说：“那些在 22 日的混乱中进入到大楼的人中有一些是特工人员。他们进了我们的联络室，切断了通向联络室的电缆，偷走了我们用来与伦敦联系的电传机。我们后来得知，事发时伦敦方面得到的最后一句从我们这边电传过去的话是：他们正在向我们走来。从那时起，在整个事件

中伦敦方面没有收到任何来自我们的消息。”

## 第 841 回：手发抖，急见外事口代表　再易主，《解放军报》又生变

8 月 23 日凌晨 3 时，周恩来、陈伯达、谢富治紧急召见外交部“联络站”、 北京外国语学院“红旗革命造反团”和“造反团”、二外“红卫兵”及北京卫戍区，严厉批评红卫兵不负责任的无政府主义行为。同时也承担了自己的责任，说那天晚上他实在太累了，没有仔细考虑就批准了“48 小时”那个照会，这是他的责任。

周恩来说：“你们夺外交部权，要所有副部长向你们报告，出入要你们批准，有外事活动找他们还要我向你们请求。”

“联络站”代表：“王力同志讲话说…… ”

周恩来打断他的话说：“你不要从王力同志讲话里捞稻草，一根稻草也捞不到。你们把外交部所有副部长的办公室都封了，也不给中央打报告，我找谁办事？部党委几个人你们都点了名，说某某是三反分子，你们都有通令，完全目无中央。”

“联络站”代表：“封部党委的目的是促进新的领导班子的形成。”

周恩来：“促进部党委改组也要跟中央商量嘛，你们不能封了以后让我们听你们的意见。”

“联络站”代表：“我们封了以后听总理的。”

周恩来：“你们也没有打电话给我，也没有通知我。你们发生了问题要我替你们办事，那好，请你来做外交部长。”

那位代表赶紧说：“我当不了。”

周恩来："你的做法就是这样。4 天外交大事没有人管……"

"联络站"代表："外交部左派组织可以管嘛！"

周恩来："左派组织中央没有承认嘛！它只是监督。你们现在拿监督小组的名义发电报给国外，中央看了，认为完全是非法的，法律上不算数的。……中央几次决定不能冲外交部，外交、国防大权不能夺，你们就是不听。事前也不和中央商量，事后也不来商量，你们头脑发热了。

我今天首先问你们，我们国家的外交大权是毛主席党中央和毛主席授权的国务院来管，还是你们管？如果你们说国务院没有这个权力，你们要直接行使这个外交权力，那我今天就去报告毛主席！"

"联络站"代表："当然中央来管。王力同志讲话以后，我们觉得……"

周恩来再次气愤地打断他的话："都拿王力同志讲话，你们不能拿这个捞稻草。"

代表说："我们觉得执行中央的决定要有革命者来执行，姬鹏飞、乔冠华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不能代表外交部。"

周恩来："那为什么不跟我商量一下？各省成立革命委员会、三结合都要跟中央请示。中央如果不同意就不合法，报纸都不能登。在中央眼前一个部，为什么不报告？你们下的命令，一句中央也没有提。你们连传单都没有给我们一张。你们 19 日进管（外交部）以后没有任何一封信给我，一个纸条都没有给我们。外交大权 4 天在你们手里，一直到今天把英国代办处都烧了。我跟你

们讲了多次，根本不听。”

代表还没意识到问题的严重，争辩说：“因为造反派可以办好事情，外交没有中断嘛！”

周恩来：“这是什么话？你们那个‘联络总站’给驻外使馆拍电报打倒刘、邓、陈，不符合中央精神。中央的口号是‘打倒刘邓陶’，你们给换了一个人，各使领馆不能接受。点名是一件大事，不能叫中央跟着你们办事。你们自由发报，也不给中央打招呼。这样的电报就是外交部副部长批的还得拿到我这里。你们不能拿你们的观点强加给中央，这样的电报还得送给中央、毛主席看。已经 4 天了，控制不住局势了。如果我们不严肃指出来，再不出来讲话，就要犯罪了。我们没有料到你们来这么一手，事前也不打招呼，事后也不报告，1300 人授权给外交部，这不是可笑吗？我没有帮助好你们，你们招呼也不打，严肃一点说就是目无中央。……

你们两方面的指挥部无论如何要撤出，你们的指挥部在那里指挥外交，成为最高权力机构不行。”

周恩来讲话中提到的“1300 人”是指指北京外国语学院“红旗革命造反团的”总人数。

接着，周恩来叫北京卫戍区汇报火烧英代办处的情况。在现场的卫戍区警卫师某团汇报了火烧英代办处的具体过程。

周恩来问：“今天的行动是谁发起的？”

外语学院一代表：“他们自发的。”

周恩来：“现在在北京说自发的话，我都替你们感到难过，感到脸红。”

代表不得不承认："'反帝反修联络站'发起的。晚上 10 点他们必须答复，否则一切后果由他们负责。"

周恩来："采取任何行动要党中央毛主席下决心。没有答复就采取行动，这是自发的吗？这是无政府主义嘛！在文化大革命中，我们的社论、广播都说了不少，连续广播了几天反对无政府主义。我们说无政府主义是一种倾向，是对内说的，这一下给人家证明了，这还不是无政府主义呀？我们是不是向英代办警告、提抗议，这是毛主席或我们政府所决定的，你们说能不能群众说了算？当然不能。我们的国家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嘛，我们是有组织有纪律的国家，在文化大革命中怎么就能说是自发的？火烧英代办处是典型的无政府主义，任何外交行动应由政府决定，不能由群众说了算，火烧英代办处就使我们输了理。"

代表："我们以前砸过印度尼西亚使馆，对帝国主义不能丝毫退弱。"

周恩来："你说不能丝毫退弱，你是不是打算四面出击？是不是打算今天就要收回香港？请你回答！采取一个什么行动中央决定了还得请示主席，我都不能定，你们随便一个什么战斗队就定了？！"

外语学院代表："你这个感情就不对。"

周恩来："什么感情？"

外语学院代表："我们负担责任嘛！"

周恩来气得手直发抖："同志啊，你们负得了这个责吗？你们把事情做错了可以回家睡觉，还是要我们来处理，最后还是要中央负责。"

陈伯达："文化大革命干了一年了，我们搞的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由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领导的文化大革命，这是非常严肃的阶级斗争，不是儿戏，不是开玩笑。你们（指北外造反团）是对国家开玩笑，给外国人造成的笑话，你们在外交部的行动纯粹是开玩笑。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没有授权给外交部'联络站'，一个学校授权给外交部'联络站'，这简直是开玩笑！

你们现在不是搞文化大革命，不是搞严肃的阶级斗争，你们一个学校都没有团结起来，你们还管一个七亿人口国家的外交部？！

听总理的。你们什么战斗队，我不清楚，统统听总理的命令……回到学校两派三派联合都不容易，还想管理国家外交大权，真是开玩笑，回到学校去，好好睡一觉，想一想，事后你们会感到很可笑！"

谢富治："这是一个梦！"

陈伯达："这是一个黄粱美梦！"

周恩来又说："我和伯达、江青签字的意见都不听。你们是听谁的？肯定外事口有敌人。要警惕。…… 他们想动摇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动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成果问题。可以肯定，他们是妄想，是苍蝇碰壁。"

"'7．20事件'以后这个浪潮不正常，对形势的根本估计都不对。什么'全国处于反革命复辟的前夕'、'武装夺取政权'，完全不对。"

会见后，周恩来又单独召见外交部"联络站"核心组，否定

了他们上报的夺权方案，即“关于彻底解决部领导班子的意见”。他气愤地说：“你们的方案行不通。”

8 月 23 日，英国宣布：限制中国驻英国代办处外交人员的行动；在英国驻华代办处恢复使用无线电之前，中国驻英国代办处不得使用无线电通讯。

8月23日，《人民日报》第三版以“英帝国主义无视我外交部照会，激起我国人民义愤，首都红卫兵对英代办处采取强烈行动，一万多示威群众严正指出，英帝必须承担向中国人民挑衅的严重后果”为标题，登载了8月22日新华社记者报道：

新华社二十二日讯　被英帝国主义疯狂迫害我香港爱国同胞的法西斯暴行激怒了的首都红卫兵和革命群众一万多人，今晚涌到英国驻华代办处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在门前举行了声讨英帝反华罪行大会，并且激于义愤，对英国驻华代办处采取了强烈的行动。

报道肯定了这一事件。文中写道：

……今晚，英国驻华代办处门前愤怒的口号声震天动地。同仇敌忾的红卫兵小将和革命群众不断高呼：“打倒英帝！”“打倒美帝！”“打倒苏修！”“反华的人决没有好下场！”“港英必败！”“中国人民必胜！”“坚决支持香港爱国同胞的反英抗暴斗争！”“港英法西斯当局必须低头认罪！”

当天，英国代办处的职员回到代办处后，看到的是整个大楼都被烧毁了，旁边的大使官邸也被烧毁。

几天后，8 月 29 日，部分英国民众到中国驻伦敦代办处外抗议。中方人员与民众起冲突，一些英国示威人群挥舞大棒等器

物殴打中方外交人员。中方人员认为英国警察偏袒示威人士，遂挥舞大棒等物与英警互殴，各有伤者。在冲突中，一些中国外交官被打得头破血流。中国代办处三人受重伤，十多人受轻伤。

8 月 30 日，中国宣布："（1）自即日起英国驻华代办处全体人员未经我方准许，不得离境；和（2）英国驻华代办处全体人员只准许在代办处的办公室和寓所之间活动。"

同日，英国外交大臣致函中国外长，通知中方：（1）英中双方保持外交关系，但暂时将各自代办处人员和驻在对方的其他机构人员（包括路透社驻京记者格雷）和愿意撤回的侨民一起撤回；和（2）双方代办处更换新人员并缩小代办处。

同日，北京群众到英国驻华代办处示威，抗议英国警察殴打我国驻英代办处人员。一些群众要求英国驻华代办霍普森低头认罪，并按了霍普森的头。

中国外交人员与英国警察棍棒相向

1967 年 8 月 23 日，曾任国民党上校军法处长、县长，后任湖南省参事室参事黎泽泰笔供交待，1925 年赵恒惕抓了刘少奇并要将他“斩决”。他这样写道：

1925 年我在伪湖南省长署秘书处当文牍，正是反动军阀反共大刽子手赵恒惕当伪湖南省长的时候。赵恒惕是对共产党怀着刻骨仇恨、毫不留情。所以先后颁发了“十斩”“四杀”的布告，就包括有共产党人在内，即所谓“过激派”分子。刘少奇就是在赵恒惕血腥镇压共产党人这个紧急时刻被捕入狱的。当时据伪湖

南省长署会计杨剑雄对我说：亲眼看到赵恒惕在审问刘少奇案卷上批有“斩决”字样。特为揭发，证明这一确凿事实。

黎泽泰 1967.8.23.

黎泽泰 1925 年是军阀赵恒惕省长署文牍。

8 月 23 日这天，在《解放军报》工作的毛泽东女儿肖力，又联合另外两名年轻人，以“新革命造反突击队”的名义，贴出题为《反复僻、反保守、誓将革命进行到底——剥开假革命、反革命赵易亚的画皮》的大字报，指责年初接替胡痴任军报总编辑的赵易亚是肖华在军报的代理人，说他包庇了胡痴，破坏总政的文化大革命，并和一些政治扒手勾结，操纵“516 兵团”，以极左的面目出现，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大字报的基调是赵易亚对抗篡改毛主席的最高指示。毛泽东 7 月初要军报记者不要呆在家里，“应该马上下去”。而赵易亚在传达时去掉了“马上”二字，成为滔天大罪。

当天，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将此事向江青汇报，江青笑了笑说：“我已经知道了。你给我收集一下反映，特别是来自中央和军委的反映。毛家湾是什么表现，你也给我注意一下，我好像听到有人说，林副主席是支持赵易亚的，我不大相信。”

第二天，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到《解放军报》社发表讲话说：“我坚决支持肖力同志的革命行动，肖力同志做了我迟迟没有做的事，我觉得还是我们的小将觉悟高，赵易亚是一个卑鄙的资产阶级政客，我们要彻底揭露他和他的黑后台。”

赵易亚遂被打倒。

李讷，即肖力，被任命为解放军报副总编。

8 月 24 日晚，周恩来对《解放军报》指示：

一、什么人都不许进入《解放军报》社。

二、《解放军报》社的赵易亚、杜越凯以及其他人都不能揪。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四日晚十一时十五分

面对港英当局对香港暴动镇压的升级，香港左派则以爆炸升级行动来还击，他们在港九各处放置真假炸弹。炸弹上多数以大字写有“同胞勿近”，电车、巴士、街道上都有发现。炸弹袭击使香港市民人心惶惶,除了扰乱市民生活外，更造成无辜死伤。8 月 20 日，香港左派在港九放置写有“同胞勿近”字样的真假炸弹，将北角一对 8 岁及 2 岁小姐弟无辜炸死，香港舆论哗然。从此，香港市民对暴力行为普遍出现反感。很多不受左派控制的传媒都反对暴动论，支持政府及警察维持秩序和治安。其中，商业电台节目主持人林彬多次在节目中对香港“斗委会”的目标和行为加以讽刺及贬斥，并以《欲罢不能》为节目名称，暗讽左派的罢工号召未能成功瘫痪香港。

8 月 24 日，林彬于上班途中被人伏击。伪装成修路工人的凶手将林彬驾驶的汽车截停后，放火将林彬及其同车的堂弟烧至重伤，送医院后双双死亡。

林彬被杀后，左派中有人匿名承认责任，称林彬为“民族败类，港英走狗”，谋杀是“执行民族纪律”，并声称仍会继续“制裁其他败类”。

《明報》社長查良镛，即著名作家金庸，亦因为在报纸上明确反对文革及暴动而收到死亡恐吓信，一度离港暂避。

林彬的死更激起了香港市民对左派的強烈不满,市民由支持

暴动变为反对暴动，暴动逐渐失去民心，并受到港英政府的坚决打击，至 10 月后，运动稍为平息，香港的市面开始回复平静。

到了 12 月中旬，周恩来向香港的左派下达直接命令，要求停止炸弹风潮，香港的“六七暴动”遂告终结。

据统计，“六七暴动”造成最少 51 人死亡，当中包括 11 名香港警察、一名英军拆弹专家及一名消防员。受伤人数超过 800 人，包括 200 名警察。暴动期间造成重大经济损失，部分市民变卖财产离开香港，造成香港的第一轮移民潮，市区楼房价格因此而急剧下滑。

暴动平息后，香港的亲中左派组织受到一定程度的破坏，不少大陆在港的地下组织在事件中曝光，部分人被遣返大陆。暴动后，有不少之前属于或是接近左派的人士，从此脱离左派组织。很多香港市民亦对左派及大陆怀有戒心。直到八十年代中期，大陆的改革开放得到初步成果，才得以改变。

香港殖民地政府也研究了 66、67 年两次暴动成因，从 1969 年 12 月开始举办香港节，藉以加強年青人对香港的向心力。

同時，港英政府察觉到需要调整过时的管治策略。減少社会不公平现象，缓和市民与政府的对立情绪。于是在 1968 年修改劳工法例，大幅加强对劳工的保障。为改善与市民的沟通，进行首次地方行政改革，包括于 1969 年成立民政处，同时也间接催生了香港七十年代在教育、医疗、廉政、房屋等各方面的改革。

## 第 842 回：共命运，“赴临战团”奔沂蒙　撒传单，形势出现大逆转

临沂地区，是有名的沂蒙山区，山东的南大门。1947 年，国民党的王牌师——74 师，就被歼灭在这里，师长张灵甫丧身沙场。在 1967 年“一月风暴”中，临沂地区 8 个造反组织联合成立“临沂地区各革命组织联合行动委员会”，简称“八大组织”，于 1 月 24 日宣布在地委行署夺权。

1 月 26 日，临沂军分区和驻临沂的 68 军 204 师联合发表声明，支持“八大组织”的夺权行动，并组成联合支左指挥部，与“八大组织”商议建立三结合权力机构的问题。

当临沂军分区将这次夺权的情况上报省军区后，山东省军区孙副政委觉得“临沂驻军支持的八大组织不纯，很可能是反革命组织。”于是，先后派出 4 个调查组调查，结论没有大问题。这样几经反复，4 月 9 日，经山东省革委会批准，济南军区同意，成立了临沂地区革委会，主任由临沂军分区政委庞世泽担任，204 师政委孙子斌参加革委会工作。

4 月 16 日，已担任临沂地革委会常委的山东师范学院学生王春林再次来到临沂。

王春林在文革初期，曾随山东大专院校赴沂蒙山串联队来临沂串联，掀起了炮打临沂地委的高潮，被赶出临沂。1967 年 1 月，他又来到临沂，积极倡导并参与了 1 月 24 日的夺权行动，在临沂影响很大。因此，在成立临沂地区革委会时，他也被选为革委会常委。

王春林这次回到临沂，觉得临沂革委会中真正的造反派没有说话的地位，临沂革委会是以军人为主，与原地委领导人有着难以割舍的联系。因此，王春林认为临沂地革委行动上右倾，是“右倾机会主义的产物”，是“大杂烩”，必须彻底砸烂。于是，以王春林为首的部分激进造反派退出了地区革委会，组成反对派，批判临沂革委会。

临沂军分区和 204 师认为革委会已经成立了，而且经过艰苦工作，好不容易地区局势才趋向稳定。按照中央精神，原有造反组织应该自行撤销，归口大联合。所以，反对再成立新的造反组织。

4 月 30 日，王春林带领一部分群众冲进地革委会场，揪走了地革委副主任陈绍亭、常委张学山。

5 月 23 日，从地区革委会中退出来的 6 个群众组织在王春林带领下召开群众大会，宣布参加地革委会的“沂蒙红旗”、“小教团”和地委机关革命委员会中的 4 个群众组织是保守组织，要求地革委主任、军分区政委庞世泽滚出地革委，批判临沂驻军 204 师政委、地革委委员孙子斌代表地革委作的形势报告是“大毒草”。

就这样，临沂群众围绕支持不支持地革委，拥护不拥护解放军，逐渐分裂为针锋相对、水火不容的两大派别：一个是支持地革委的原“八大”组织，另一个是反对地革委的“六大”组织。与全国各地一样，街头辩论很快演变成了武斗，人数较少而且得不到军队支持的“六大”组织受到挤压落了下风，便退而转向济南告状，后者“八大”也到省革委会伸冤。

7 月 5 日，“六大”以其一名学生在武斗中被大铁桶划伤为由，调集全专区 3000 人到 204 师营房前静坐绝食 3 天。

7 月 13 日，“八大”砸了“六大”的工人指挥部，16 日夜里又砸了“文艺司令部”。17 日过午，只剩 4 个指挥部没被砸的“六大”组织集合起来去了 6085 部队，即 204 师，要求部队保护。

7 月 17 日，王效禹派省革委常委刘长茂、济南军区作战部副部长冯文贡带着省革委、济南军区调查组到临沂。

7 月 18 日，支持“八大”的临沂城郊四个区一万多名群众和罗庄煤矿部分工人进城包围了“六大”组织的据点临沂农校，要求“六大”交出打人凶手。两派对峙于农校。

18 日，济南军区作战部副部长冯文贡按照王效禹的意思发表 3 点声明，对支持“八大”的群众进城行为进行了严厉批评，表态“六大组织是坚定的无产阶级左派组织，他们的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等等，激起了“八大”群众的强烈不满。19 日上午，204 师一些住院治病的战士不服气，擅自与“八大组织”一些人到招待所找冯文贡等人辩论，混乱中，冯文贡等人遭到“八大”组织的群众围攻殴打，此事后来被称为“临沂 719 事件”。

恰巧第二天爆发了“武汉 720 事件”，而“临沂 719 事件”和“武汉 720 事件”何其相似，于是王效禹把“临沂 719 事件”定性为“武汉 720 事件”的继续。7 月 27 日，王效禹以省文革和济南、山东两级军区的名义向临沂地革委、临沂军分区、204 师发出明码电报，指出“军分区、革委会和八大组织少数负责人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严重的立场错误、严重的方向路线错误”，并警告“不要重蹈武汉事件的覆辙。”

《大众日报》特别为此发表社论，题目是："全省人民支持你们"，报导了临沂造反派被保皇派打击压抑的悲惨情形，号召全省革命造反派要积极响应山东省革命委员会的号召，大力支持临沂的革命造反派，坚决要把保皇派打下去！

《大众日报》的报道让全省各地的造反派义愤填膺，怒火中烧。此时得到省革委会支持的临沂"六大"组织人员，也分赴全省各地，控诉他们在当地受到的种种骇人听闻的镇压和迫害，寻求各地造反派组织的同情和支持。于是，积极响应省革委会号召，到临沂去，支持造反派夺取政权，就成了山东各地红卫兵的一致行动。从济南开始，各地造反派纷纷组织"赴临战斗团"，准备前往临沂声援那里的"六大"组织。

7 月 30 日，204 师和临沂军分区负责人被召到济南，王效禹和山东省军区司令部副参谋长庄中一宣布："停止 204 师政委孙子斌、副师长张平，军分区政委庞世泽、副司令员谭子银 4 人的职务。"由 204 师政治部主任田雨暂时负责 204 师党委工作。由济南军区副司令员张仁初、济南军区作战部副部长冯文贡等人组成的济南军区和省军区临时工作团来到临沂，要求 204 师干部战士转弯支持"六大组织"。

与临沂接壤的昌潍地区红卫兵也接待了前来寻求支援的临沂"六大"告急团。于是，昌潍地区成立了以潍坊二中红卫兵为首的"赴临沂战团"，准备不日前往。

昌潍寿光县精挑细选了 26 人组成"赴临战团"。由于刚刚发生了武汉"720 事件"，再加上舆论的宣传，大家都以为临沂的形势十分的紧张。他们在赴临沂的途中开了会，决定全部人员分

乘两辆车走。并且要求：在车上和到临沂时，彼此之间要尽量少说话，装出互不认识的样子。他们担心一旦暴露了行踪，很可能要被对方一网打尽。甚至以为，在他们周围，就会有临沂“八大”组织派来的暗探，阻扰他们赴临。

临行前，这 26 人都知道这次行程会有极大的风险，但在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鼓舞下，在解放和支持临沂造反派的神圣使命驱使下，他们还是做好了不怕牺牲的充分准备。

车到临沂已是下午 16 时左右。因为是初到此地，更加上听到的一些恐怖传说，所以特别警惕。但是，下车后，大街上并没有看到有多少“八大”的红卫兵，虽然“八大”观点的大字报随处可见。

在临沂农校附近的一所大众旅馆里，一只大喇叭一遍又一遍地反复广播着《大众日报》社论：“全省人民支持你们”。这声音显得与众不同，在众多的“八大”观点的大字报、大喇叭宣传中，它显得孤独而坚强。寿光“赴临战团”知道这是自己一派的，便派人前去联系。对方听说了他们的来意，当然热情欢迎，立即安排他们住了下来。

大众旅馆是个二层楼房，与它相邻的都是平房。那时的临沂城楼房还很少，因而旅馆这个二层楼房就更显突出，因为它可以改装成临时碉堡，即使有对方观点的人想冲进来也并不容易。这些怀着一颗颗忐忑不安的心的师生们，终于找到了自己的立足地，原先对险恶局势的种种预想与应对之策，此时全然没有了用场。实际上，他们感觉，这里的局势并不像传说和想象中的那么严峻。

而乘坐另一辆车赶来的寿光县 8 中、9 中等学校的人，被接到农校去了。当时的农校，是“六大”在临沂城里尚存的最大据点。他们也获得了安全。

当时的临沂城里尽管是“八大”的天下，街头上几乎到处都是他们的大字报与传单，大喇叭也到处传达着他们的声音。偶尔，还可以看到臂带红袖章口里高喊口号的人员集体跑步的身影。但是，似乎根本就没有传说中的那么恐怖。

在武装部门口，照常有人站岗，来来往往都很正常。逐渐地，他们的紧张心理也慢慢放松了下来。

各路“赴临战团”到达临沂后，首先张贴标语，除了反对“八大”，支持“六大”，“全省人民支持你们”外，就是“军队支持保守派”，“临沂驻军已犯了方向性路线性错误，必须悬崖勒马”等。

8 月 7 日，以潍坊二中学生为主，还有部分“六大”组织人员和“寿光战团”的部分人员来到 6085 部队，即 204 师。他们要找部队首长，让他们表态，反对“八大”，支持“六大”。军营第一道岗哨距离军营还有相当一段距离，他们没能拦住闯入者。但在军营门口，他们被第二道岗哨拦截下了。其实大家也知道，硬闯军营是不合适的。于是，潍坊二中和“六大”的几个代表被允许入内，受到了军营首长的接见。而其他大多数人，则在军营门外的通道上等候。就在这里，谈判代表迟迟不见出来，外边的接应者等了 3、4 个小时，渐渐失去了耐性，便挥舞旗帜，一遍遍呼喊口号。由于本来就对于军队支持“八大”组织不满，所以对当地的军人也存有强烈的逆反心理。后来，有一名不太经事的

战士无视这些呐喊抗议的学生，竟要在他们面前骑自行车经过时，被心怀不满的红卫兵用旗竿插到自行车辐条之间，别倒了车子，只好满面尴尬地推车走过。有人还爬上墙头，向院里用弹弓射击，这是潍坊弹弓队的最早出现在临沂城里。后来，随着潍坊赴临人员更多地使用了弹弓这一武器，潍坊弹弓队的名气也逐渐传播开来。

6085 部队首长表态，声明自己是支持“六大”造反派的。第二天， 8 月 8 日，“寿光赴临战团”的一部分人员，又到军分区要求他们表态。

军分区领导很客气地接待了这些红卫兵小将，又是端茶又是倒水，真弄的这些从来就很少见过大干部的农家子弟很是感动。但是，感情是感情，立场必须分明，当他们要军区首长必须明确表态，要保证他们的“四大”自由，保障他们的人身安全。军分区领导好言相劝，表示一定要按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办，按照省革委会的指示办。这样的答复，虽然不能令人十分相信，但是，好的态度也使他们放下心来，觉得在临沂城里有了安全感。

军队在转变，“赴临战团”的人也越来越多。与此同时，济南军区“三军赴临战斗团”，以及由省级 11 个单位、8 个地区、14 个县组成的“赴临战斗团”，加上本地区 12 个县的赴临战斗团，共 88 个单位两万多人，也纷纷奔赴临沂。临沂的“赴临战团”从最初的 3 支队伍达到了 10 多支。

人多了，胆也大了。8 月 10 日，由潍坊二中“飞虎队”带头，潍坊几个县的红卫兵开始进攻由“八大”组织作为据点的五金商店。

五金商店是一个类似仓库一样的大房子，里边的群众基本都是“八大”组织的。双方先是辩论，后来便发生冲突。外边的人发起冲锋，要攻克保皇派的“反动堡垒”，商店的人躲在里边，用砖块等还击。进攻的处于明处，防守的躲在暗处，再加上除了潍坊二中“飞虎队”，其他县的人员还大都没有武斗经验，所以进攻方吃了亏。

白天行动受挫，晚上继续进行。这次进攻的地点是临沂邮电局。邮电局的职工要少些，只有十几个人，从来就没有武斗的准备，所以很快就被“赴临战团”冲了进去。被打败的一方只能接受胜利方的“再教育”，要他们认清形势，不要再当“保皇派”，迅速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对方只能连连答应，发誓坚决脱离“八大”组织，与全省人民站在一起。

这次行动前，潍坊“飞虎队”首先用手中的皮弹弓将路边的灯泡打灭，让里边的人看不到外边的情况，然后再发起冲击。他们一个个身形矫健，如虎如猫，真不愧是在激烈的武斗中成长起来的潍坊“飞虎队”战士，让其他县的红卫兵学生钦佩不已。

在临沂，工人很少，农村人口占绝大多数，所以当时“八大”组织中的核心力量就是“贫下中农指挥部”。8 月 12 日晚上，以潍坊“飞虎队”为首的几个县的赴临沂人员，终于向临沂“贫下中农指挥部”展开了冲击。这时的赴临沂人员中的皮弹弓迅速增多了，大多数人也手握木棒，有了武器。

夜色笼罩了大地，昏黄的灯光洒落在大街上。攻击的一方在喊话，内容基本上来自于大众日报那篇“全省人民支持你们”的社论。里边的人也不甘示弱，他们喊的是“坚决捍卫新生的革命

委员会!”和“昌潍棒子队滚回去!”喊话很快为武力所代替，弹弓打向了路边的灯泡，“叭、叭”几下，路灯粉碎了，黑暗遮盖了四周，一阵急雨般的砖块石头落地声响了起来，间杂着玻璃震碎的哗啦声和砸在器物上的乒乓声。不过，为了避免受伤，也没有真心实力地往里冲。进攻了个把小时也就停止了。

临沂城里，“八大”的人迅速减少。仅仅十来天的时间，街头上，“八大”的大字报迅速减少，“六大”与昌潍战团的大字报占了绝大多数。大街上公开支持“八大”的人也越来越少了。

8 月 20 日下午，飞机在临沂城上空散发传单，就是印有“全省人民支持你们”社论的《大众日报》。原来，是昌潍各县的造反派与临沂“六大”的主要领导者孔世军等，组织了一个“告急团”前往济南，向当时的省革委会汇报临沂的情况，受到了以王效禹为首的革委会主要领导的热情招待，并高度肯定昌潍造反派在改变临沂形势贯彻毛主席革命路线方面立下了大功。省革委会主任王效禹与济南军区的主要领导杨得志、袁升平等都表示要继续大力支持临沂造反派和昌潍赴临沂战团的革命行动，然后便安排了飞机撒播传单。

飞机撒传单在临沂立即引起了巨大反响，使临沂的形势急转直下，是对持“八大”观点的群众的心理产生了致命打击，也是对“八大”组织的致命打击。“连中央都知道临沂的情况了，再继续坚持下去，肯定要犯方向性路线性的错误”，很多群众自觉脱离了“八大”组织，“八大组织”的人越来越少了。

“六大”组织已经控制了局面，有的“援临战团”觉得无事可干了，开始返回。8 月 21 日，昌潍地区平度县的赴临沂人员

在返回本县的途中，经过临沂县东北 60 里的汤头镇时，被汤头“八大”的人拦截了。消息传回临沂已是下午，昌潍赴临沂人员立即群情激奋，找到部队，要求部队出面帮助前去讨人。部队哪敢怠慢，派出两辆军车和部分战士，还有十几个昌潍地区“赴临沂战团”人员，急速赶往汤头。

## 第 843 回：赴汤头，激战一通是误会　白沙埠，大芦湖“三大战役”

汤头是临沂至莒县、沂南、沂水的交通要道。这里有一所著名的景点，就是汤头温泉。热水常年从地下涌出，用以洗澡，可以治病健身，因此就在温泉所在处建立了一所疗养院，用以招待前来休养的老干部。8 月下旬，从城里被赶出来的“八大”组织成员，就有一批人转移到了这里。

这时，有消息传来说，说汤头“八大”扣人是当地武装部搞的鬼，应该找他们要人去。于是，一呼百应，群情激昂，顿时在场的几十名昌潍赴临沂人员便涌向了临沂武装部，点名要武装部长对话。这位武装部长出来后，无论他怎样解释，现场的群众根本听不进去。最后，在大家的簇拥揪斗下，将这位武装部长弄到了 6085 部队营房，还是部队的领导将昌潍赴临沂人员劝了回去，答应一切事情由部队处理。这时的 6085 部队已经深得这些群众的信任，于是，群众纷纷返回。

到了晚上，汤头的消息传来，前去解救平度县“赴临战团”的解放军没有成功，当地“八大”组织的人根本不卖他们的账，连军车都扣留了。这一下，更使本已紧张的空气更是火上加油。部队也着急了，由 6085 部队和军分区共同组织了 14 辆军车，到农校、卫校等地拉上了各县的“赴临沂战团”成员，再次火速赶往汤头。

听说要去汤头解救被围困的战友，大家无不争先恐后，争着爬上军车。几百名群情激昂的年青人，浩浩荡荡，风驰电掣，很

是威风的奔向了汤头。

漆黑的夜色中，车灯像两把利剑刺穿了黑暗，将道路两旁的树影拉的老长，然后又迅速地消失。夜风铺面吹来，车上的人都认为自己是在执行着一项神圣的使命，骄傲、自豪而悲壮！此去很可能会发生武斗，而武斗的结果吉凶难卜，挨打、受伤甚至牺牲……于是，有人在车上唱起了《毛主席语录》歌:“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但是我们想到人民的利益，想到大多数人民的痛苦，我们为人民而死，就是死得其所。”人们眼中满含着泪水。

一支“要奋斗就会有牺牲”唱完，有人又带头唱起“抬头仰望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想念毛泽东。困难时想您有力量，迷路时想您心里明……”

歌声洒向了空旷的原野，洒向了迷蒙的星空……

车到汤头，已经是夜间 23 时多了。在车灯的照耀下，空荡荡的街道上几乎看不到人影。同车前来的解放军战士叮嘱车上的学生不要下车，要尽量藏在车厢里边的暗影里，让解放军站在外圈，以保护学生们的安全，避免发生意外。解放军派出代表前去交涉，要求放人。大概过了一个多小时，传来消息说，问题解决了，可以回去了。于是，10 多辆军车拉着这些学生们又返回了临沂城。

汤头，作为“八大”的重要堡垒，“六大”和“赴临战团”的学生们必欲拔除而后快。8 月 26 日，由 6085 部队组织了 6 辆军车和几十名战士，又带上几十名昌潍地区的赴临沂战团人员，带着大量的宣传物品和高音喇叭，再赴汤头。

这次，车还没进村就停了下来。因为前边的石桥被拆了，车辆过不去。而村里公路很窄，汽车无法转弯回头。道路的一边是2米多深的路沟，另一边是十多米宽的水塘。在这样的地方被堵，真的是进退维谷，于是，解放军下车先去修路。

车上的学生可等不及了，“革命要只争朝夕”，于是，车上的大喇叭开始广播了，一遍又一遍地播送着《大众日报》社论“全省人民支持你们”。同时，学生们也开始散发传单。当地的群众基本上都是支持“八大”的，他们开始向解放军战士诉苦，诉说“昌潍弹弓队”对他们的伤害。解放军战士严守纪律，不参与辩论，只是负责学生们的安全。而车上的学生则进行反驳，一面诉说“八大”的所谓罪行，一面宣传省革委会和军队首长对临沂问题的表态。口舌战渐渐激烈起来，在相互的指责中有个别愤激者便开始动手。“赴临战团”有一个身体高大而强壮的学生言辞激烈，被对方的几个人围住，并在撕扯中掉进了路边的水塘里。“赴临战团”纷纷下去支援，而对方也有更多的人跳进水塘扭打。水塘不深，不到一米的样子，扭打的结果便是双方都成了泥猴子、落汤鸡。最后在军人的干涉下，方才平息，回到岸上。

8月的天气，太阳直射下来，路边连棵能遮荫的树木也没有，火辣辣的阳光毫不留情地晒得地皮都发烫，也更让人焦灼而难受。炎热的天气，更容易激发人们的火气。渐渐地，斗手代替了斗嘴，文斗转化成了武斗。有人高喊“把昌潍弹弓队揪下来算账”，“揍他们，免得他们再放毒”。于是，围在军车前的群众开始将学生们往车下拖拽，负责保护的解放军战士则要学生们尽量躲在车辆中间，不要下车。但是，仅有的几个战士根本控制不了局面，

大量的当地群众纷纷攀到车上，将学生们带去的传单撕毁，或是抛到水里。同时，将学生们赶下汽车，搜查弹弓。

时近午后，农村人家早就该吃午饭了。午后的太阳更加炎热，围在军车边的人已渐渐散去。到下午 14 时多，汤头疗养院职工为“赴临战团”送来了绿豆水。这可正是在灼热的阳光下被暴晒了大半天的学生们最需要的。到下午 15 时多的时候，护送学生们前来的解放军告诉他们，可以先到疗养院去休息一下。这时虽然已没有多少围攻的群众，但是被堵塞的道路还没有修好，汽车还无法开动。在解放军的保护下，这些以解放天下为己任的学生们步行约 1 公里，穿过了汤头街道，来到了疗养院里。

汤头疗养院是个不小的院落，四周都围有高墙，一个通往外界的大铁栅栏门一旦关上，这里就很安全了。疗养院里都是“六大”组织的职工，一派的，他们很热情地招待学生们住下，并安排了晚饭。学生们闹腾这一天，也真的乏了，累了，吃完饭就休息了。

第二天下午 15 时多，有人说：“我们的援兵来了。”只见远处的道路上，大队的人员向这里跑来。来到疗养院门口，一个个张口气喘，连声问道：“老保们在哪里？”院里有人给他们指了个地方，这些人便一窝蜂地的又跑开了。

来的都是沂南和莒南的农民，由当地的革委会和武装部组织，一个个头戴苇笠，身披蓑衣，赤脚，穿着草鞋，一手拿着木棒，一手提着包袱，包袱里边装的是煎饼，都是一口气跑来的。没多久，就看到大队人马如潮水般的涌来，对面的小山上，就像两股大潮涌到了一起，也像天际的两团浓云在会合，数不清的土

黄色蓑衣霎时就遮满了山头。

有一群身披蓑衣的人正在追逐几个人，一边喊着：

“追老保啊，不能让他们跑了！”

“追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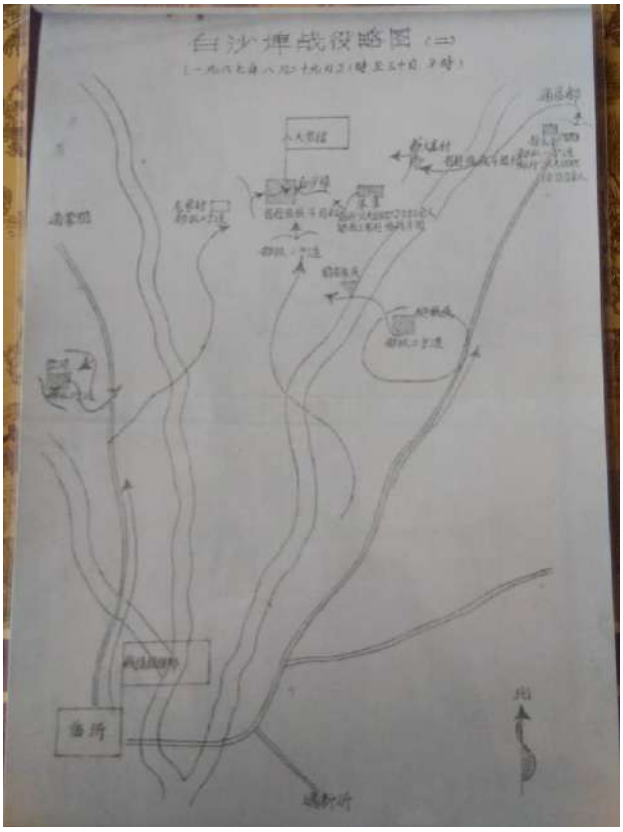
这边的人见状，也以为真的遇上了“八大”组织的人，也迎头拦截。就在双方不到几十步远时，才有人说“弄错了，是自己人”。可就在这时，对面一块石头飞来，正砸在一个女学生的头上，她霎时就瘫倒在地，血流不止。原来这个女学生是临沂农校的，刚才误将前来支援的农民看成了老保，而对方也以为她就是老保，这才追赶并投击石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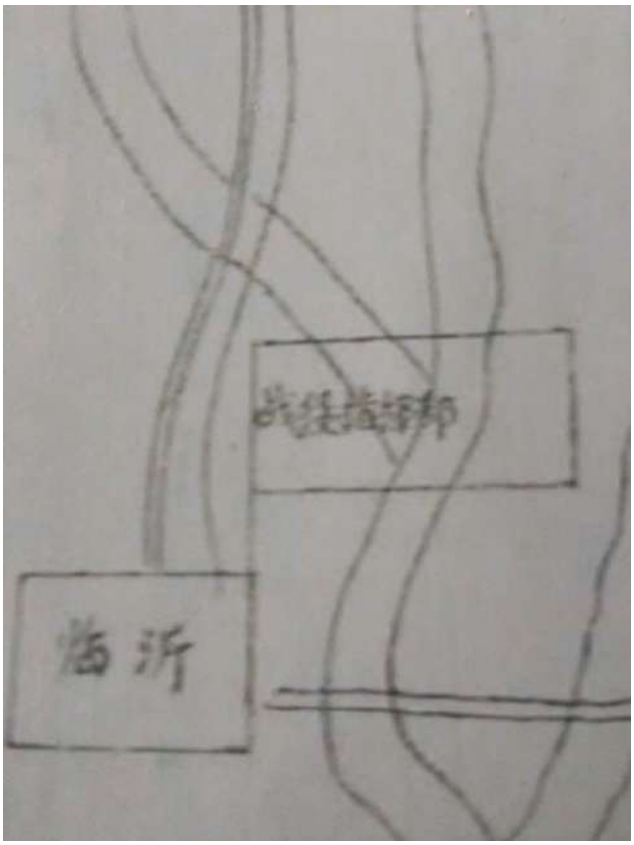
两边会合后，就有人安排分头到村里捉“老保们”。他们冲进汤头。“八大组织”自然是寡不敌众，除逃走一部分外，绝大部分被围困，当场有 150 多人被打伤，有的头破血流。区粮管所、交易所、税务所、区革委门窗玻璃被捣毁，到处都是一片狼藉。

白沙埠位于临沂城北 25 里，1967 年 8 月，一部分“八大组织”的群众由临沂城转移到这里，并成立了“八大组织”的河北指挥部，指挥城北岔河、俄庄、茶山、李官等区的群众对抗“六大”。8 月下旬，省革委会和临沂“六大”组织的头头认为，必须要把临沂“八大”为主的保守派彻底打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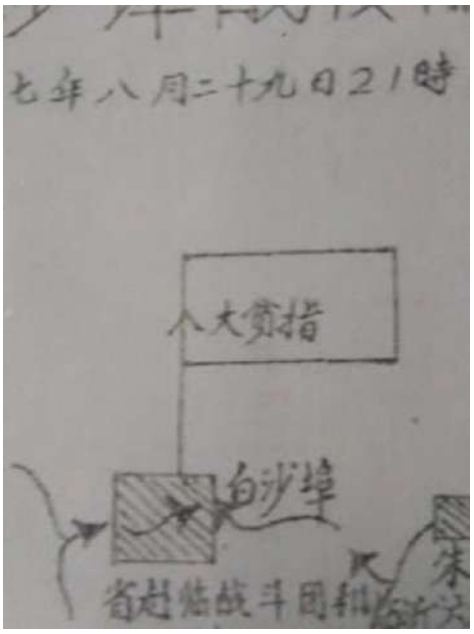
8 月 29 日夜间，由山东省军区孙芳圃副政委与临沂的“六大”头头孔世军及 204 师政治部主任田雨直接指挥的一次大规模行动开始了，调动部队十几个连队，军用电台三部，昌潍地区、923 厂赴临沂人员与临沂当地人员共五、六千人分东南西北四路向白沙埠围攻，一个个手持木棒、铁矛，有的还腰带弹弓、匕首，

还有一些人拿着带刺刀的步枪。很多人头戴军用钢盔或者建筑工人的柳条帽等。



从图上可以看到，战役指挥部在临沂城附近，指挥部成员有：济南军区副司令员张仁初，山东省军区副政委孙芳圃，济南军区作战部副部长冯文贡，山东省革委会常委刘长茂，临沂军分区司令员刘庭珍等。




图上“大贫指”是从临沂城内跑出的“八大”组织成员，与白沙埠农村的“八”，联合成立“八大河北贫指”，约 1000 人，“河北”是临沂一条河的北面。

白沙埠“大贫指”南面，是“六大”和军队包围进攻白沙埠的南集团，前面是“六大”等组织约 2000 人，后面分为两部分共 4 个连的部队，每部分各两个连。

进攻的东集团，前面是“六大”约 1000 人，后面部队 1 个连。

白沙埠西南方向，军队部署两部分共 4 个连，每部分 2 个连。

“赴临战团”是在 29 日晚饭后得到通知的，说今晚要有一场大的行动，必须要充分准备好，有武器的必须要带好武器。临出发前，还特别强调纪律，要一切行动听指挥，不能擅自行动，否则一切后果自负等等。

人们在一所大操场上集合。操场上黑压压地沾满了人，气氛严肃，很少有人说话。人人都知道，今晚的任务是严肃的，甚至是严酷的，很可能有流血牺牲的事要发生。面对流血牺牲的危险，人人心中都像灌上了铅水那样的沉重。

队伍等待了好长一段时间，很多人都在悄声互问：“为什么还不出发？等啥啊？”而得到的答复是：“在等总指挥。”总指挥不到，这些人连到哪去，做什么作都不知道，当然要等了。

总指挥终于来了。在一群身背步枪、报话机的人的簇拥下，有几个黑影走向了主席台。他们宣布了进攻的地点并一再强调了纪律，人群这才在向导的带领下走出了操场。

一路上很少有人说话。偶尔必须要说话也都压低了声音。一种紧张而压抑的气氛使这支队伍本能地保持着沉寂。出了城便是土路，一路上弯弯曲曲，也不知道走到了那里。25 里地大概要走 3 个小时，从操场出发时就 21 时多了，一直到下半夜，他们才算到达了目的地。

前方 300 米处是一个院落，大门口上方有两盏电灯，在夜风的吹动下轻轻晃动。淡黄的灯光洒落下来，照出院落里的两排平房。院落里空寂无声，死一般的安静，任谁也想不到此刻几百米外有上千双眼睛正盯在这里。这些人分散趴伏在一片红薯地里，

红薯的叶子散发着微凉，泥土的气息钻入鼻孔。但此时的他们，一个个全神注目的，则是前方的那所院落。谁都想知道，那里边究竟有多少“老保”？随即就要开展的进攻会是么情况？

等待是漫长的，难熬的，然而，没有命令，谁都不敢行动。

趴伏在地上的人又开始窃窃私语：“怎么还不开始进攻呢？在等什么啊？”

前边的人一次又一次地传来声音：“找总指挥，让总指挥到前边去。”

也不知前边是谁发出的，更不知道这话最后传给了谁，反正前边有话后边的就要往下传。

有人带着报话机来了，满以为这就是行动的总指挥。可等了半天，仍然不是。

时间到了次日的凌晨 2 时左右，突然，一阵嘹亮的冲锋号声响起，随即，在红薯地里埋伏的几千人一跃而起，嘴里呐喊着“冲啊”，向前跑去。

这一刻，在沉寂的夜晚，突然爆发的冲锋号声与上千人的呐喊声振动了原野，飞向了夜空，真的是惊心动魄。

那个院落的铁栅栏门很快就被冲开，人们潮水般地涌进院里，登时响起了噼噼啪啪的门窗击打声和玻璃破碎的哗啦落地声。在靠近门口的第三四个房间门口处围了一大堆人，有人在门口用铁矛木棒向屋里乱捣，也有人在窗前向屋里进攻。屋内显然有人，也用铁棍在与外边的人相对峙。

武斗很快就结束了，前后也不过 10 分钟的时间。那天晚上，“六大”和“赴临战团”包围了大朱夏、白沙埠、孟庄、毛村等，

当场“八大”人员就有 275 人被打伤，重伤 129 人，打死 1 人，被抓进临沂城 39 人。武斗后，河北四个区、社、大队都被“六大”反夺权，“八大”人员被打成反革命。

随后便是撤离。“赴临战团”一个个兴高采烈，真的像凯旋而归的战士。大家纷纷讲述着刚才的战斗经历，都是十几岁的青少年，就跟过节似的那么激动，那么高兴。

抓住的“八大”组织的“俘虏”，一律双手朝上，做出投降的姿势。时间长了，胳膊累了，高举的双手就要落下来。这时，那些押解的人便用木棒狠敲“俘虏”的臂肘，让他们“高点，再高点”。这是 20 多里的路程啊，谁能那样一直高举着胳膊呢。

临沂已经成了“六大”的天下，“赴临战团”的任务也以完成。省革委会开始安排各地的赴临沂战团返回。各地的军分区热烈欢迎他们返回。去时的惊恐与归来时的荣光，让这些中学生们真有天上地下的感觉。

9 月 6 日，临沂“六大”组织又发动了针对“八大”的第三次战役：大芦湖战役。

大芦湖位于临沂南 30 里，在山东江苏边界，是临沂当时最大的煤矿矿区之一，有煤矿工人 2000 多人，“八大组织”从临沂城撤出的大部分人员集中在这里，被“六大”称为临沂“保守势力”的最大营垒。

9 月 6 日上午 11 时，临沂和矿区附近褚墩、傅庄、册山农民约 1400 多人，200 辆汽车，从四面包围大芦湖。此次武斗与前两次不同，动用了真枪，发生过激烈交火。自 6 日 13 时开始，至 7 日 8 时结束，共抓捕“八大”人员近 2000 人，被送到临沂

关押的 32 人。有千余人遭到毒打，其中打伤 300 多人，打死 2 人，一个是被“六大组织”的汽车活活轧死，一个是被活活打死。

南京军区的部队对于“八大”充满了同情，通过种种方式支援他们。受到重创的“八大”组织人员开始再次逃亡，他们远的流落到江苏、关东一带，近的就躲到了南京军区的军营中。还有一部分群众和“八大”联合总指挥部一道转移到鲁南苏北马陵山一带。后来便将“八大”的人称作了“马陵山游击队”。

马陵山位于郯城，离龙门不远，山南边就是江苏了。山势北南走向，绵延向南一直到江苏的新沂和宿迁。山石系砂质页岩，主峰奶奶山海拔 184.2 米，这就是全县最高点，山上植被不多，光秃秃的，多是酸枣、刺槐，还有老百姓种的地瓜、花生什么的。就这样一个丘陵，据说是公元前 341 年齐魏马陵之战的古战场。“马陵山游击队”最后的结局如何？我们容后再表。

## 第 844 回：遇埋伏，部队被部队袭击　性质定，抚州是“军事叛乱”

再说从济南军区派往江西支左的 26 军政委程世清被中央招到北京后，在京西宾馆遇见济南军区步兵学校校长杜甫卿。

杜甫卿原是 26 军下属的 77 师师长，1965 年调到洛阳任济南军区步兵学校校长，程世清对他很了解。

济南军区步兵学校的前身是洛阳步兵学校，1960 年隶属济南军区领导，1962 年 9 月更名为济南军区步兵学校，校址仍在洛阳。此时杜甫卿正在北京参加中央解决河南问题的会议，正好与应招进京的程世清相遇，程世清很高兴。他和杜甫卿谈起 26 军到江西支左的事情，说中央让他负责江西的全面工作。程世清建议杜甫卿和他一起去江西，他可以向周恩来建议，让杜甫卿任江西省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这对杜甫卿而言，不啻是个好消息。济南军区步兵学校是“四大”单位，此时文革正搞得乱乱哄哄，前景如何难以预料。去江西无异于跳出苦海，而且职务上还可以提一级。

正好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得志也在北京，杜甫卿便打电话向杨得志说起此事，谁知杨得志力劝杜甫卿千万不能去，个中原因不得而知，此事于是作罢。

程世清又向杜甫卿提出，从他们学校抽调 20 名干部去江西支左，这是经过中央军委批准的，杜甫卿当然同意。

8 月 7 日，正在洛阳的济南步校“革纵”头头汝其接到通知：“杜校长从北京打电话来，经中央同意，军队院校可派群众组织

代表，列席在京召开的河南部队师以上干部会议，批判何运洪在支左工作中所犯方向路线错误。我校可列席两名代表。学校‘红总部’在京的卜明已参加了会议，‘革纵’还要派一名代表立即赴京。就让你去吧。”并说，这也是杜校长的意见。

汝其到了北京。

8 月 9 日晚上，杜甫卿将中央军委要求济南步校派 20 名干部去江西支左的任务同汝其和卜明谈了，并陪他俩一起来到程世清的房间。程世清听说他俩人都是学校群众组织的头头，很高兴，希望他俩都去江西支左。汝其是南方人，当场表态一定去。卜明是北方人，又最怕热，说要考虑考虑。

后来，由于“红总部”的头头提出，去江西支左必须是左派。有些干部因为站错了队而不能报名。济南步校一共只有 15 名干部报了名，其中团级 2 人、营级 2 人、连级 5 人、排级 6 人。为了凑够数，又增加了 4 名战士。有 3 名穿便衣的职工愿意去，当即办理参军手续，发给军装。

战术系的张广东、服务社的吴慈悯和“革纵”的汝其被指定为临时服务组成员。卜明负责送他们到江西。

8 月 19 日晚上 20 时，济南步校在大礼堂举行文艺晚会，欢送去江西支左的 22 人。校领导和“红总部”的头头在会上讲了话。汝其代表支左人员致答词。

因为铁路交通不畅，这批人只能先坐火车到郑州，再从郑州坐民航飞机到南昌。

第二天，人们前往洛阳火车站相送。因为江西的两派群众组织都拥有枪支，武斗很厉害。他们去支左，就像上前线一样，要

有牺牲的准备。一想到这，在火车站告别的时候，就有人率先掉下了眼泪。这一下把大家感情的闸门都打开了，几十个送行的战友、家属和前去江西的 22 人哭成一片。“男儿有泪不轻弹”，看着几十个解放军的干部痛哭流涕，周围的群众无不为之动容。

8 月 20 日下午 15 时 30 分，这 22 人到达郑州。在火车站内整整等了 3 个小时，河南省军区支左办公室才派来汽车，把他们接到招待所。

郑州到南昌没有航班。民航的人说，上海到南昌有航班。于是他们决定乘 22 日晚上的火车去上海。汝其去支左办公室开介绍信，没想到支左办公室拒绝开介绍信，对他说：“你们军队院校是开展‘四大’的单位，没有支左任务。你们是私自外出串联。我们不能给你们的非法活动提供方便。”

汝其急了，说：“我们不走了。你们得把我们的身份搞清楚，到底是支左还是搞串联。你们可以打电话给中央军委询问。不过，由此而延误我们执行任务，该由你们负责。”

于是他从窗口招呼楼下正准备上车的人都回来。恰在这时，河南省军区司令员张树芝来了。几天前在北京开会时，他见过汝其。而且他也知道，从济南步校抽调干部去江西支左是经中央军委批准的。他对汝其说：“你们不要从上海走，我请空军派飞机，直接从郑州把你们送到南昌。”

张司令员立即要通了空军司令员吴法宪的电话。吴法宪说：“动用飞机要经周总理批准。”

张树芝又往周恩来的办公室打电话。周恩来的秘书说：“周总理到人民大会堂接见外宾去了，能否派飞机，明天上午答复。”

第二天上午 11 时，支左办公室转来张树芝的电话："周总理批准，从开封空军调一架军用飞机到郑州，把你们送往南昌，今天下午 3 点起飞。"

23 日下午，空军从开封调来一架解放战争时期缴获的美式双引擎小型运输机到郑州机场。15 时，汝其他们坐车到郑州机场。15 时 30 分，飞机起飞，18 时 30 分，飞机到达距南昌 30 公里的向塘机场。江西省军区派来一辆敞篷车接他们。江西省军区的人指着汝其他们挎着的手枪说："还是把这玩意都放在挎包里吧，否则有遭围攻和抢劫的危险。"

"军人带枪还有危险?"一位济南步校的战士惊奇地说了一句。

江西形势的严峻远远超出了汝其他们的想象。进南昌的一路上，他们不断听到零星的枪声。红卫兵驾驶的吉普车在街上飞驰，车门两边站着手执冲锋枪戴着红袖章的年轻人。这就是一个笼罩着浓厚战争气氛的城市。

次日，8 月 24 日。吃了早饭后，汝其他们从招待所出发到原省委办公大楼去开会。突然从附近传来一阵密集的枪声，他们不敢从大街上走，只能沿着小巷，靠着墙壁过去。

开了一个简短的会后，便开始分工。汝其和张广东被分配到"省革筹"秘书组。组长是在 26 军一个团任政治处主任的徐秉坤。成员还有：济南军区政治部干事包清，南昌步校政治教员卢澍和武渺。全是军人。从这天开始，江西省革命委员筹备小组各办事机构正式开始办公。瘫痪了一个时期的江西省省级政权开始恢复。

上班的第一件事是打扫布满灰尘的办公室。原省级机关造反派“大联筹”派来几个走资派协助。帮助秘书组打扫办公室的是原省委宣传部部长艾寒松，这可是五十年代风行全国的《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的作者。这本书在这些军人进步的道路上起过不小的作用，他们今天见到他，内心不禁肃然起敬。

艾寒松用一块特制的小钢片包着抹布，可以把窗户上的楞角擦得干干净净。毕竟是老共产党员，即使是在这种时候，他也想尽办法把分配给他的任务完成好。

虽然已经过了“三伏”，南昌的气候仍十分炎热。晚上热得没有办法睡觉，只得到办公楼顶上的平台上去露宿。汝其见平台中央没有人，就把席往中央一铺。别人忙制止说：“中央不能睡，太危险。前几天晚上飞来流弹，差一点把睡在中央的人打伤。”他只得在靠墙边找一块空地铺下席子。

就在汝其他们来到“省革筹”秘书组的当天，8 月 24 日，江西又发生了一起震惊中央的解放军打解放军的恶性事件。

8 月 12 日，26 军按照中央指示派出一个营进驻抚州，谁知，前去抚州联络的副团长及随行的以下 28 人悉数被绑架。

8 月 23 日，程世清再派 26 军 76 师部分部队组成“支左”宣传队进驻抚州，目的是收缴被抢去的枪支弹药，制止武斗，竟遭到抚州军分区司令员夏绍林拒绝，并指挥军分区部分军人和基干民兵，于 24 日在进贤县温家圳附近伏击了这支“支左”宣传队，当场打死 5 人，打伤 57 人。

在程世清的命令下，26 军表现出极大的克制，没有反击。程世清请示周恩来后，派飞机去散发《中共中央关于处理江西问

题的若干决定》的传单，抚州军分区的部分军人竟向飞机开火，将飞机的机身打了两个洞。

受到抚州军分区负责人夏绍林支持的一派群众组织公开宣布，他们控制了临川、金溪、资溪、南城、南丰、黎川、宜黄、崇仁、乐安等 9 个县，不经允许，任何部队不准进入。

面对这样的局面，程世清仍然冷静以对，没有以武力强行开进抚州地区，而是把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关于处理江西问题的若干决定》上的批示："此件看过照办。"当作"最高指示"通过各种渠道向抚州地区人民宣传。

温家圳有座梁家渡大桥，是南昌的东大门，也是南昌通往上海、福建的必经之路，江西"大联筹"派江西拖拉机厂的工人在此把守。

8 月 24 日夜，抚州"联络总站"偷袭梁家渡大桥，摸掉岗哨，穿过大桥，包围了温家圳和江西拖拉机厂的营地。这时，江西拖拉机厂的民兵和南昌来慰问演出的红卫兵正在开联欢会，"联络总站"的机枪对准人群就扫射，当场就有十几人遭到枪杀，江西拖拉机厂一个民兵身上就挨了十几枪。

当时南昌的造反派和红卫兵手上也有枪。他们闻讯前往支援，"联络总站"被迫撤回抚州，南昌支援队伍 25 日浩浩荡荡向抚州开进，决心和"联络总站"决一死战。

8 月 25 日清晨， 济南来的 26 军"支左"宣传队和南昌"大联筹"与抚州军分区和"联络总站"在抚州地质学院拉开架势决战。抚州地质学院是为乐安 721 铀矿办的。721 铀矿发现于 1953 年，成立于 1958 年，矿工全是三代审查的红苗子，相当多是从

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一直打到朝鲜战争的转业军人，身经百战。抚州地委第一书记兼 721 的书记。

721 有一个民兵师，这个师全部由转业军人组成，半军事单位，有枪有炮，装备精良，实力远在抚州军分区独立营之上，加上有军分区的支持，所以胆大包天敢跟正规军对抗。24 日在进贤县温家圳的伏击就是以 721 民兵师为主。

721 民兵师在地质学院内筑好了工事，架起了机枪。56 式连用轻机枪就架在学院的最高点水塔上。他们炸了崇仁到江边村的铁路桥准备战斗。

26 日，26 军副军长杨栋梁和洪都机械厂工人张羽率领 26 军 6011 部队开到抚州，劝说造反派和红卫兵撤回南昌，将阵地交给他们，这才避免了一场你死我活的血战。

26 军 6011 部队很快包围了抚州。向“联络总站”喊话时，“联络总站”向解放军战士开枪，6011 部队的开枪还击，子弹基本上是朝天打的。同时还炮击了两个正在射击的火力点。抚州地质学院的“大联筹”组织“东方红”和解放军战士，冒着机枪火力往上冲，冲到水塔底下就往上爬，愣是爬上去，夺取了水塔制高处，弄哑了那个火力点。江西军区出动直升飞机散发《中共中央关于处理江西问题的若干决定》，散发江西省军区劝他们缴械投降的命令。直升飞机降落在 721 的水塔山，和“联络总站”谈判，高音喇叭在大声广播：“最新指示，抚州问题的实质是军事叛乱。毛主席于今天凌晨亲自下令支左部队镇压抚州军事叛乱”。闻听此讯，“联络总站”这才缴械投降。

抚州军分区政委王景义在听到毛泽东的批示后立刻“反水”，

表示“一定要听毛主席的话，过去自己受骗了。”他在 8 月 24 日伏击 26 军部队前，夏绍林开会决定打还是不打时，王景义就不同意打，坚决反对再向 26 军“支左”部队开枪。此时王景义站出来后，抚州地区对抗“支左”部队的力量开始分崩离析。以后，毛泽东还专门表扬了王景义。

形势扭转后，程世清对抚州地区对抗“支左”部队的群众组织没有报复，而且还特别注意了“一碗水端平”。但是，从 9 月开始，翻了身的“大联筹”开始大举报复。

8 月 31 日，从南昌去赣州串联的 5 个红卫兵头头，抓捕了一批各单位“联络总站”的头头游街，竟然当场枪毙了一个厂的武装部长，并声言明天继续游街批斗，还要枪毙一大批。

如何处理这 5 个红卫兵头头?当时赣州“支左”部队有畏难情绪，害怕背上打击“造反派”的“罪名”。在赣州支左的 121 师政委于厚德给南昌打来电话说，鉴于这种严峻的形势，他们已无法控制局面，强烈要求省里立即派人去赣州，把这 5 位红卫兵头头请回南昌。

当天值班的是济南军区步校的汝其，他立即把这个情况向程世清报告。打电话，电话不通。好在办公室离程世清的宿舍不远，他立刻前去，首先见到程世清的秘书，他听了后，让汝其直接向程世清禀报，但提醒说：“程政委听完汇报后，会询问你对问题的看法以及解决的办法。”

程世清听完汝其的汇报后，果然问他：“你对这个问题怎么看?”

“随意枪毙人，这是一件严重的违法事件，是绝对不能容忍

的。”汝其回答说。

“应该怎样处理?” 程世清继续问。

“必须立即将这 5 位头头拘留。这件事，赣州的支左部队就可以办，而不必省里派人去。”

“好。就按这个意思答复。”程世清肯定了汝其的意见。然后，程世清口授了复电的电文：“南昌的红卫兵头头在赣州枪毙一武装部长，是严重的违法行为，现责成赣州支左部队立即将他们五人拘留。程世清。”

程世清让汝其把记录给他复诵一遍，认为准确无误后才让他离去。

汝其回到办公室后，立即拨通了赣州的电话，把程世清的答复给 121 师政委于厚德念了 3 遍。于厚德记录下来后，又给汝其复诵了一遍。然后说：“他要立即开会传达。”

半个小时后，于厚德打回电话说：“他们几个领导进行了研究，因为这几个红卫兵头头都有枪，弄不好会惹出大乱子。所以，还是请省里直接派人来拘留他们。”

汝其又去向程世清作了汇报。程世清说：“这有什么可怕的呢?他们就像纸老虎，你软他就硬，你硬他就软。你转告于厚德，我命令他立即把那几个枪毙人的红卫兵头头拘留起来，不得有误。”

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于厚德这回没有什么可讨价还价的余地了。

两个多小时后，于厚德打来电话告诉汝其，由于事先做了周密的准备，没有遇到任何阻力就把那 5 个头头拘留了。他们被拘

留以后，个个痛哭流涕，现在正在写检查。此时，已是 9 月 1 日凌晨 3 时 30 分了。

程世清这样的做法在当时很得人心。从8月到10月的两个月内，江西“支左”部队在程世清领导下，收缴上来了5万多条枪，初步稳定住了江西的局势。9月13日，中央军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批转《江西省南昌市各革命群众组织认真贯彻中央“九·五”命令，纷纷上交武器弹药》的报告。

## 第 845 回：为武斗，常德到处在抢枪　惊中央，湖南道县大屠杀

自 1967 年 4 月开始，湖南常德地区的群众组织逐渐形成“工联”和“红联”两大派。“工联”派提出要“清算常德军分区‘常老谭’在二月逆流中镇压革命造反派的罪行”，与受到军分区支持的“红联”派不断发生冲突和武斗。5 月，在反“二月逆流”中，常德地区的“湘江风雷”重新出来活动，一时成为常德“工联”派中影响最大、战斗性最强的组织。

7 月下旬，与全国其他地区一样，常德的派性斗争也迅速升级为全面武斗，他们也从大辩论到互相推搡、拳脚相加，逐步发展到以石头、砖头、棍棒、钢钎、梭镖等“冷兵器”为武斗工具的新阶段。两大派成立专业武斗队，“湘江风雷”及码头工人组成的“六号门”成为威慑常德的武斗王牌。

7 月 4 日，因“红联”派在武斗中抓捕了一些“工联”派俘虏，关进武斗据点东风剧院，“工联”派组织大批人马，围困东风剧院，向“红联”要人，遭到拒绝。“工联”派开始冲击东风剧院，“红联”派还击，双方在东风剧院门前街区展开了大规模的“石头战”和“砖头战”，一直打到天黑。

次日，双方纷纷调动武斗队伍，携带棍棒、钢钎、梭镖等“冷兵器”进行增援，东风剧院门前街区遍地都是砖头和石块，后经常德军分区派人调解，双方停战。

7 月 16 日，常德师范学校俄语教师肖冬初在两派武斗中被拉到下南门枪杀，尸首被抛入沅江。随后，两派组织开始抢夺武

器弹药。“红联”派在常德军分区“明抢暗送”中，获得大批武器，“工联”派也抢得大批老式武器。

8月7日，常德“湘江风雷”总司令黄承家，当时更名黄闯，冒充解放军，跟随常德军分区军械科副科长路勤等10余人，前往石门县白洋湖省军区农场取枪，当场被群众识破抓获，并关押了两天。黄闯回到常德后，扬言要“血洗白洋湖，踏平三板一只角”。

8 月 17 日、18 日，常德两派组织投入数百人的武斗队伍，持枪在上南门至下南门一带进行攻防战。在这次武斗中，双方各死一人。至 26 日，两派在武斗中发生大量伤亡，一时间，常德市各大医院伤者壅塞。

8 月 18 日，常德“湘江风雷”头头刘建华、张金保带领 70 多名武装人员，分乘 3 辆汽车，到省军区白洋湖农场抢枪。次日凌晨 4 时多，到慈利县武装部，没有抢到枪。接着又到县公安局，抢了 10 多支看守监狱的枪。

19 日上午 10 时许，汽车开到了省军区白洋湖农场。当时农场驻军已投入“双枪”，正在田间劳动。刘建华、张金保带领众人冲进驻军营房，抢走两挺机枪，15 支步枪和冲锋枪，同时还抓走了前去宣传劝阻的 2 名解放军战士，并不断用机枪扫射，企图乘车从原路返回常德。

此时，民兵已将公路桥炸毁，切断退路，“湘江风雷”的车队被解放军战士和民兵包围，发生激烈战斗，打死 13 人，打伤 24 人，其中常德军分区干部姜密泉也被打死。

8 月 25 日，湖南 47 军 6961 部队进驻常德，协同常德军分区支左。当时“工联”派占据常德大饭店，设立“文攻武卫指挥

部”，而“红联”派则在常德市郊南坪公社设“文攻武卫指挥部”，常德市及其郊区经常是枪声大作，手榴弹爆炸和炮火声震天。“支左”部队人员冒着枪林弹雨，往返于各武斗据点，制止武斗。但47军部队倾向于同情“工联”派，而常德军分区则支持“红联”派。两派武斗一时还难以停息。

8月20日，刚回到长沙还不到一天的47军军长黎原又奉召飞往北京，原来湘南道县有人上京告状，反映 “湖南大屠杀”一事。他们沿途散发传单，向中央递交相关材料。“湖南屠杀”的简报，震动了中南海。中央要求黎原立即核实，并明确指示说：“湖南杀人问题严重，里面有坏人操纵。什么‘革命派’、‘造反派’？乱杀人就是反革命！”

黎原返湘后，迅速采取措施，派军队进驻湘南各县。

8月29日上午10时，一支部队，大约一个加强连，全副武装，成四路纵队，走进道县道江镇街头。

情况相当的严重。穿越潇湘大地汇入八百里洞庭的潇水河，在流经湘西南道州盆地时，已失去了往日的明净与轻快，河面上没有了常见的渔舟，也不见裸露着古铜色皮肤的排客佬，而是漂浮着浮肿的尸体，有男有女，有老有少，有的赤裸着身体，有的被铁丝反绑着双手，有的肢体残缺。饥饿的鱼群已把他们的脸啃得乱七八糟。

在潇水河与濂溪河汇合处道江镇，寇公楼旁，当年北宋寇准吟咏“野水无人渡，孤舟竟日横”诗句的古城墙头，一群孩子竞相点着、数着河面的尸体，比试眼力。突然，他们看见一具女尸漂过来，怀里还紧紧抱着个尺来长的婴儿……孩子们“轰”地一

声吓散了。

都庞岭下的道县，这个地处湘桂粤三省区交界之地，，素有“襟带两广、屏蔽三省”之称，历史上曾与衡州、郴州、永州齐名的古道州，正经历着一次惨烈的屠杀，而且这些人肯定不是因武斗而死。

这时的道县群众也分成了“红联”和“革联”两派。“革联”得到县城多数工人、学生和市民的支持，在县城的势力较大，并以道县二中为据点，用高音喇叭日夜不停地宣传。“红联”得到县武装部和军管会的支持，拥有当时几乎整个乡村政权及组织的支持。两派自 5 月以后不断发生武斗，6 月开始在县城和郊区进行派性武装割据。

进入 7 月，随着大自然的气温升高，两派的矛盾冲突也达到了沸点。“红联”叫“革联”为“革匪”，“革联”则把“红联”叫做“红老保”。从 7 月到 8 月中旬，“红联”组织了数百名人的武斗队包围了道县二中。可是这座武装起来的堡垒却屡攻不下。

8 月 8 日，道县“革联”冲击县武装部，砸开了武器仓库的大门，“接管”了武装部的库存枪支弹药。第二天，又把武装部埋在地下和藏在天花板上的枪支弹药全部抢走。

“八.八”抢枪后，“红联”感到压力很大。8 月 9 日，“红联”后勤部长张明止主持召开“红联”骨干紧急会议，研究应变措施。会议吵吵嚷嚷争论不休。最后决定把“红联”总部由县城迁到郊外的营江公社，走“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道路。

“红联”撤离县城让支持“红联”的原县委副书记、时任县

“抓革命促生产领导小组”组长的熊炳恩感到紧张。8 月 10 日，他在县委召集法院的群众组织头头开会，提出“革联”冲击县武装部抢枪的性质，就是地富反坏右及“二十一种人”向新生革命政权的猖狂进攻，因此，要进行民主革命补课的杀人运动。他说：“现在上面瘫痪了，我们不能耽误。杀人的问题是民主革命的补课。地富反坏右以及二十一种人现在都活动起来了，正在向新生的革命政权猖狂进攻，再迟疑我们共产党人就会像 40 年前在武汉长沙那样被国民党反动派屠杀。你不杀他，他就要杀你。……农村杀人，只要贫下中农讨论通过就可以了。”

会后，道县城镇居委会一夜之间准备好了 2000 条绳子。并把记录在案的二十一种人全部看管起来，只等攻下道县二中后，就全部采取措施。

在道县生产指挥部的会议室里，县武装部长刘世斌、县委副书记熊炳恩通过邮电线路，召开全县各区、社“抓革命、促生产”小组组长电话会。熊炳恩布置了各区、社抓紧抢收中稻抢收红薯之后，告诉大家：“县武装部和县公安局的枪被抢了，阶级敌人要翻天了。”他愤怒地敲着麦克风说：“各地要发动群众采取果断措施，加强对阶级敌人的专政，要把民兵组织起来，保卫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保卫好‘双抢’。”

开完会，道县寿雁区“抓革命、促生产”小组组长陈智希躺在床上，辗转反侧，他的病痛又发作了……

这位长期从事治安工作的区公安助理员，从县里开完会回来，早已疲惫不堪。近年来虽说身体每况愈下，高度的阶级斗争警惕性却一刻也不敢放松。县领导的讲话再一次激活了他心中的

阶级斗争这根弦，他睡不着啊！此时此刻，他闭着眼睛，把领导的讲话与区里的现实情况一一对照了一遍，一个格外使他恼火的影子便在面前晃来晃去，那就是寿雁公社下坝大队的历史反革命分子、军统特务朱勉。这家伙出身下中农，光棍一条，坐了 12 年大牢放回来后，仍然很不安分，依仗着他同共产党打了多年交道，又有点文化，常把大队干部和陈智希弄得很难堪。陈智希找他训话，他一副爱理不理的样子，稍不留神，说话让他给抓住把柄，还要“反攻倒算”……据说扬言要杀大队干部。

第二天上午，在区干部会上，陈智希传达了县里的会议精神，并谈了本区的敌情。他说：“同志们，我们区的阶级斗争厉害得很呀！牛路口方向有敌人的电台活动，团结大队地主分子造谣说蒋介石要反攻大陆；共产党员要退党，民兵不敢背枪了；下坝大队的历史反革命分子朱勉搞反革命组织……”

会后，他向区长李来文建议：“朱勉不老实，要交群众捆起批斗，杀杀他的嚣张气焰。”

李来文当然赞成。可是，仅仅“捆起”批斗就可以了吗？陈智希越想越气愤：这家伙不除掉，后患无穷！

8 月 11 日，陈智希对寿雁公社妇女主任朱清华说：“你回去给胖子（下坝大队支部书记朱佳川）说一下，是不是把朱勉搞掉算了。”

朱清华对“搞掉”心领神会，认为就是要杀了朱逸。她立刻找到朱佳川，传达了陈智希的指示。

朱佳川一时拿不定主意，当晚召集会议进行研究。十来个干部挤在大队打米厂的机房里，你看着我，我看着你，气氛莫明地

紧张。有人提出置疑："杀一头猪也要批张条子，搞掉一个人，就凭一个口信妥不妥当？"

就这样，研究到半夜也没个结果，此事就暂时搁置起来。

此时，县城那边的武斗依然在继续。撤出县城的"红联"，于 8 月 11 日晚，在清塘公社营乐园大队部召开全县各区武装部长会议。会上决定，第二天集中各区持枪的基干民兵攻打"革联"总部所在地道县二中。由清塘区武装部长关有志等人组成前线指挥部，关有志任总指挥。后勤支援和情报工作由"红联"头头负责。会上强调，必须加强管制四类分子，建立巩固的"后方根据地"。

8 月 13 日，"红联"集中了上千民兵，攻打固守道县二中的"革联"总部。但是又失败了，他们中了"革联"埋伏，死 2 人，打伤多人，大败而退。随后，"红联"抬尸游行，高呼"血债要用血来还!"这就是震惊道县的"八一三事件"。

这天，县"抓革命促生产领导小组"组长熊丙恩继续按照他的思路，对四马桥的王甫昌、一区的武装部长刘善厚、七区副区长宛礼甫以及由县里派去大坪铺的张望耻等人说："告诉下边，一队可以先杀一两个。"

六区武装部长郑友志与县法院干部周仁表两人听说后，闻风而动，立即在久佳公社组织有各公社民兵营长参加的杀人现场会。

久佳公社的武装部长蒋百柱组织手下的干部鸣锣集合群众，自己也亲自动手，把本公社团结大队一生产队的民办小学教员唐义五花大绑地捆起来，插上死刑犯标子，押向刑场。

杀人现场选在一面是山坡，一面是池塘的开阔地带。前来开会的近 500 名男女老幼不知要发生什么事情，散乱地坐在山坡的草地上。会场用两张方桌搭成了一个监斩台。“坚决镇压现行反革命分子唐义”的白底黑字大横幅用绳子扯在会场中央，被风吹得呼呼作响。

唐义押到之后，会场响起一片“打倒”的口号声。郑友志和周仁表走上监斩台宣布镇压反革命现场会开始。

接着，武装部长蒋百柱从口袋里掏出事先写好的材料，大声宣布：

“现行反革命分子唐义，出身地主家庭，思想一贯反动，文化革命以来，上窜下跳，书写反革命口号，疯狂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在生产队担任教师期间，多次向学生宣传封资修黑货，多次在课堂上影射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恶毒攻击新生的县革命委员会。实属罪大恶极，不杀不足以平民愤……”

整个会场鸦雀无声，人们都被这突如其来的阵势吓蒙了。只见两个民兵架起跪在地上的唐义，向山坡下的池塘边跑去。

池塘早已干枯，只见蒋百柱挥起一棒，朝唐义后脑打去。唐义顿时像个肉团似的滚到池塘里，接着又补了几棍，唐义被打得脑浆迸裂，嘴脸稀烂，血肉模糊，满身烂泥。山坡上，妇女的尖叫声，孩子的哭声夹杂在稀稀落落的口号中，令人怵目惊心。

六区开了杀戒，其它各区也不甘落后。于是，一场在“革命”名义下进行的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在道县的各公社瘟疫般地蔓延开来。但唐义还不是道县大屠杀的第一个殉难者，前边提到的那

个寿雁公社军统特务朱勉比他早一天，在 8 月 13 日晚上就已经被众人活生生的用拳脚打死了。

## 第 846 回：朱逸死，杀人风席卷全县　法院是，贫下中农做裁决

8 月 13 日上午，湖南道县寿雁公社召开各大队干部会议。会前，公社文革主任兼公社“红联”司令的徐善明与公社武装干事何建锡私下交换意见。

何建锡说：“光是喊口号，不来点真的，怕是越抓越没人听了。”

徐善明深有体会地点头：“关键是拿谁开刀的问题。区里陈部长说，下坝大队朱勉到闹子上来开了几次秘密会，几次拿刀要杀大队干部，是不是请你和胖子商量一下，趁这个乱的机会，把他搞掉算了。”

何建锡当即表示：“搞掉就搞掉吧!”

下坝大队支部书记朱佳川一到公社，等候多时的何建锡就连忙迎上去说：“胖子，你们大队的朱勉搞掉没有？”

“没有。”

“赶快回去把他搞掉，越快越好!”

会上，公社武装部长又在讲话中，重点点了朱勉的名，说他与“革联”有联系，搞反革命组织，要杀贫下中农等等。与会的区领导陈智希的讲话则更有艺术性：“‘革联’要杀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革命干部，你们还不行动起来，还睡着不醒？”

散会后，回家路上，支书朱佳川问村里其他 4 位干部：“上面已经开口了，你们说，怎么办？”

“还有什么好商量的，上面开了口，我们就只有执行。”治

保主任陈甫说。

于是，他们在回村的路上，商量了“搞掉”朱逸的方案：连夜召开大小队干部、党员和贫下中农代表会，传达区和公社的指示，然后召集四类分子训话，趁机找岔子将朱勉拖到外面山上搞掉。这样一是可以做好群众的思想工作，二是可以稳住朱勉和别的四类分子，保证不出问题。

这天晚上没有月亮，没有星星，没有风，格外闷热。四类分子训话开始了。十来个四类分子，包括子女，成一排靠墙站着。马灯昏暗。朱勉没有家小，早早地吃完晚饭就来了。他随随便便站着，不像别的人那样诚惶诚恐。他读过很多书，恪守“可杀不可辱”的信条。治保主任念过最高指示后，开始训话。朱勉斜眼瞧着，很不以为然。

治保主任陈甫厉声喝道：“朱勉，你为什么赶闹子（赶墟）不请假？”

朱勉满不在乎地说：“我又没干什么坏事，请什么假？”

这时候，有人喊到：“朱勉不老实，怎么办？”

众人一声吼：“捆起来！”事先布置好的民兵和积极分子一拥而上，将他捆绑起来。

朱勉被拖出门时还不知道是要杀他，边走边说：“去就去，到哪里不是一样劳改。”就这样被推推搡搡的出了门。

走到半路有一个三岔路口，一边是去公社农业中学，那里关了许多人在劳改；一边是上山的小路。当把朱勉往山上推时，朱勉这才晓得大事不好，赖在地上不肯走了。不知是谁踢了他一脚，朱勉刚喊了一声“哎哟”，大家就拳脚打鼓一样擂了下去。朱勉

连哼都没哼一声，就断气了……

午夜后，风起云黑，暴雨倾盆。朱勉之死，拉开了道县大屠杀风暴的序幕。

正当下坝大队朱佳川等人准备用群众专政的铁拳头砸烂朱勉的“狗头”时，在杨家公社周塘管大队的红东庙内同时酝酿着更野蛮的杀机。

8 月 13 日晚，原是杨家公社秘书，时任区“红联”副司令和公社“红联”司令蒋文明，正在杨家公社周塘管大队的红东庙内召集各大队负责人开会，传达县、区两级的“战备方案”。

古庙内，灯影闪烁，早已倒塌的神龛旁，蒋文明踌躇满志地指示：

“第一，从现在起，各大队要组织人站岗放哨；第二，要采取得力措施防止‘革联’下乡串联；第三，要发动贫下中农管好四类分子；第四，四类分子如果乱说乱动，要搞暴动，各大队要联合起来，采取断然措施……”

蒋司令讲完话，要大家讨论。 郑家大队的一位党支部委员、联络员郑逢格首先发言说：“我们大队地富活动很猖狂，已经组织起来开了几次秘密会了。历史反革命郑元赞的老婆钟佩英串联一些地富子女去宁远参加了‘湘江风雷’，已经领了两个月工资了；还准备领枪回来，跟贫下中农作对。地主崽子郑生尧已经在支书郑逢蛟门口睡了好几晚了；郑支书害怕被杀，已经躲起来了。”最后，他忧心如焚地说，“阶级敌人这样猖狂，我们贫下中农不知哪一天会死在他们手里。”

周塘管大队支部书记听到这里，焦急万分地说：“吃亏了，

我们已经落到敌人后面了！”

前进大队支书接着感叹道：“阶级敌人这么猖狂，毛主席他老人家怎么不开口呢？”

蒋文明一笑，叫大家翻开随身携带的《毛主席语录》，学习了其中一段：“蒋介石对人民是寸土必夺，寸利必得。我们呢？我们的方针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他左手拿着刀，右手也拿着刀。我们就按他的办法，也拿起刀来。……现在蒋介石已经磨刀了，因此，我们也要磨刀。”

他接着语重心长地说：“革命的同志们，其实毛主席早已开口了，只是你们不理解呀！现在的问题是如何组织群众干！”

郑家大队民兵营长郑会久问：“像钟佩英这号人，怎么搞？”

蒋文明毫不含糊地回答：“她什么时候起来暴动，就什么时候搞掉她！”

接着，他们确定了公社的总联络员，议定了各大队的联络暗号；同时商量了解决钟佩英的具体方案。

8 月 14 日晚，蒋司令带着两名随从到富足湾，主持召开了富足湾、老屋地两个大队党、团员会。在这次会上，除了传达“备战方案”外，又增加了一项新内容：关于钟佩英“组织反革命暴动的罪行”。

8 月 15 日晚上，郑会久、郑逢格按照蒋文明的布置，召集四类分子及其子女训话会。会上，郑会久喝问钟佩英：“你到宁远去，为什么不请假？”

钟佩英答道：“我又不是分子，我是子女，为什么要请假？

党的政策规定，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

会后，郑会久、郑逢格派人将钟佩英拉到山上。当捆钟佩英时，她的两个儿子，一个 18 岁，一个 20 岁，喊口号：“要文斗，不要武斗”，自然是无济于事。

钟佩英被拉到了山上，之后，被用锄头棍棒打死。杀人者又想到了一个事先没有想到的问题：“她的两个孩子还在，知道了肯定要给母亲报仇的。怎么得了？”

有人提议：“干脆一起搞掉算了。”

于是，一呼百应地涌到钟佩英家，把她两个已经上床睡了的儿子拖起来，分别拉到后面和对面的山上，一顿锄头扁担，又将这两条年轻的性命结束了。

事毕之后，辛苦了一夜的人们又集中到钟佩英家，既紧张又亢奋，无意回家安息，便将钟家喂的几只鸡鸭全部杀掉，做一锅炖了，又打来一些烧酒宵夜。待到锅里只剩下点汤汁的时候，蓦地听到一声鸡鸣，众人心里一惊，赶紧推门而出……

郑会久早饭没吃，心急火燎地赶到公社，将杀死钟佩英母子的情况报告给蒋文明。蒋文明说：“好！行动快，有魄力！”郑会久心底那一点慌乱终于镇定下来，以后也就不再在乎什么了。

杨家公社杀掉钟佩英母子 3 人的消息很快传开。深恐落后的祥霖铺区也在该区的上渡公社召开杀人大会。被杀的人有的是从床上拖起来的，有的是从田里叫上来的。他们还莫名其妙，衣衫不整，打着赤脚，根本不知道犯了哪条王法，糊里糊涂还以为是去挨一场批斗。他们甚至还来不及见上亲人最后一面，就被绑上了刑场。这次现场会一下就杀掉了 7 人。紧接着，组织这次现场

会的宛礼甫又成立了一个百人杀人团，分赴各个公社和大队组织更大规模的屠杀，到 8 月底这半个多月的时间里，一共杀掉了 1000 多人。

8 月 17 日上午，杨家公社蒋文明又主持召开了各大队“五巨头”会议，再一次高度赞扬了郑家大队贫下中农的“革命行动”。散会后，各大队急起直追，很快就在合作、塘坪、早禾田、陈家、三角河等大队先后杀了 31 人。

从 8 月 17 日开始，道县的清塘、清溪、梅花等区，先后召开社队干部会议，动员部署杀人，

清塘这地方距县城大约 10 来公里。有一条著名的濂溪河从那里流过，它是以北宋大儒周敦颐的字而命名的。

8 月 17 日上午，清塘公社清塘大队俱乐部礼堂里，挤满了从全区各地赶来的生产队以上的干部。这次紧急会议是临时决定召开的。

昨天上午，区抓促领导小组副组长、区法庭干部周仁专程从清塘赶到营江，把听到的“敌情”，经过自己头脑加工创造后，向区武装部长、“红联”营江前线总指挥关有志报告说：“你来营江才几天，我们就破获了两个反革命组织。一个是大神山老反革命分子王凤为首组织的’农民党’，已经发展到了四、五百人；一个是蒋家地主儿子蒋伟珠为首组织的’新民党’，已发展到七、八百人，还有电台。这两个反革命组织都是配合蒋介石反攻大陆搞暴乱，有行动纲领，有计划，口号是‘先杀党，后杀干，中农杀一半，贫下中农全杀光’。”

周仁是有口才的，顺口溜张口就来，他最后向关有志建议：

“目前群众的情绪很混乱，为了稳定局势，你是不是回清塘开个会？”

关部长很满意下级对自己的尊重，他也谦虚地以征询的口气问：“你看开个什么会好呢？”

“开个干部会吧。”

“好！要开就快开，开得大一点，区社干部、生产队长都参加。”

8 月 17 日上午，关有志坐着拖拉机，风风火火赶回清塘，主持了这次大会。会场门口布满了岗哨，关有志当过兵，上的是双岗。会场内挂满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阶级斗争一抓就灵！”之类的大标语。场子太小，上千人挤在里面显得十分拥挤。道县农民都习惯在腰上别着根长烟袋，稍有功夫就拿出来含在嘴里，叭着辛辣的烟叶子。浓浓的烟雾中，关有志显得慷慨激昂，时而站起，时而坐下，拳头砸得桌子嘭嘭响。他说：

“……道县‘革联’为了达到反革命政变的目的，8 月 8 日抢了武装部的枪支，公开散发反革命传单，要血洗道县。8 月 13 号又开枪打死我们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他们是有组织、有预谋、有计划地搞反革命政变。他们还有电台，配合帝修反。我们区已经破获了两个反革命组织。别的区也不例外，八区伪县长郑元赞的小老婆为首组织‘反共救国军’……十一区寿雁公社下坝大队伪乡长朱勉，在训话会上，公开向干部挑衅，说什么‘现在你们搞我，迟得 3 天的话，我们组织起来就要把你们干部全杀光。’大家听了很气愤，当场把他打死了。

同志们，阶级敌人要杀我们的党、团员、干部和贫下中农，

我们怎么办？如果让他们的暴乱成功，我们千百万人头就要落地。我们必须遵照毛主席的教导：人民靠我们去组织，中国的反动分子靠我们组织起人民去把他们打倒，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敌人磨刀，我们磨刀；敌人擦枪，我们擦枪……现在公检法都瘫痪了，阶级敌人如果拿刀杀我们，我们就要杀他们，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 ”

会议结束时，关有志征求周仁的意见。周仁又是一鸣惊人："现在政法部门都瘫痪了，真正是罪大恶极的五类分子由贫下中农讨论干掉他，事先不用请示，事后也不用报告，最高人民法庭就是贫下中农。如果我们内部有叛徒，不管他是脱产干部，还是带手表的，穿可可鞋（皮鞋）的，在哪里发现就在哪里搞掉！”

接着，在讲到所谓"人民党"成员久佳公社农民唐玉想当区长时，周仁冷冷一笑："我今天就打发他到阎王那里去当区长！"

会场顿时乱成一片，许多话在座的还是第一次听到，真是"不听不知道，一听吓一跳"。有人紧张、惶惑；有人兴奋、激动。是呀，毛主席一再说要相信和依靠贫下中农，这回可是把生杀大权都交给我们了。他们一个个瞪大了眼睛，望着主席台上的人。多年来养成的习惯，使得他们对这些台上的人深信不疑。他们也突然感到一种神圣的使命落到了自己肩上！

一散会，周仁便让久佳公社的公安特派员蒋白举，带领久佳与会人员冲到唐玉的家。当时，唐玉已经在前一天的批斗会上，被蒋白举等人用锄头敲断了一条腿，正躺在床上呻吟。蒋白举把他从床上一把揪起，拉倒外面的禾坪上，众人扑上去，一阵乱棒将其打死，然后丢在禾坪边的水塘里。唐玉者，何许人也？如何

这般惹人恼恨？他，家庭出身中农，原先是小学教师，57 年被打成右派，遣送回乡务农，为人生性耿直。蒋白举在该大队蹲点时，“蹲到了女人肚子上去了”。别人敢怒不敢言，唯独唐玉不识进退，仗着会写两个字，帮着写了一张状子把蒋部长告了。害得蒋白举受了批评，仕途也受了影响。这号人留得么？至于唐玉想当区长云云，“人民党”尚不存在，他想当区长的“狼子野心”又焉附呢？何况，即便一个人有当区长的想法，难道就犯了死罪么！

这次会议结束后，久佳、新塘两个公社的5个大队迅速行动，行使起“贫下中农最高法院”的权力，4天内杀了13人。

## 第 847 回：大学生，避难踏上不归路　太残忍，用炸药血肉横飞

很快，道县全县普遍流传“四类分子要造反，先杀党，后杀干，贫下中农一扫光，中农杀一半，地富作骨干”。加之在这个时间里，有 4 个区搞出了 7 个反革命组织，又供出一个“8 月大组织，9 月大暴动，10 月大屠杀”的“纲领”，搞得全县气氛更加紧张。

在城郊乡下，村口渡头，一切行人过往的地方都是岗哨密布，荷枪实弹或扛着土制武器的民兵日夜盘查，稍有动静，他们便攥紧大刀或拉动枪栓，喝问：

“干什么的？”

“什么成份？”

接着就是查看路条、搜身、盘问，稍有嫌疑便捆起刑讯。

道县电业局工人陈某，因查线路来到城郊公社，遇上民兵厉声喝问，吓得说话结结巴巴，马上被认定为逃亡的四类分子，拖进被杀的地富及子女行列，准备第二天一早处死。幸亏一名农村基层干部认出了他，才幸免于难。陈某被释放后，连夜逃出了道县，一去不肯再返乡。

湖南大学机械系学生蒋晓初，时年 22 岁，因学校停课闹革命，从长沙回到家乡审章塘公社黄土坝大队。谁知这个年轻的学子却踏上了一条不归路。

蒋晓初的父亲蒋勋，1942 年毕业于湖南大学历史系，1949 年后在道县当教师，并曾担任过道县一中的校长，后因出身不好

被开除回家，这时已同几十个地富分子及子女一起被关押在大队部，其二儿子蒋晓中也关押在里面。蒋晓初回家后得知这一消息，竟跑到大队部宣传毛泽东思想："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试图说服那些已丧失了理智的基层干部。结果，当然也被关了起来，后来与其父亲和几十个地富及子女一同杀掉。

那是在半夜时分，蒋晓初和他的弟弟被大队"最高法院"叫出来，五花大绑押往河边。黑暗中鸟铳响了。蒋晓初身上射满了铁砂。但他没有倒下，仍然在高声朗诵毛主席语录："'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分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同志们，你们这样做要犯错误的呀！"

一位民兵显然是不耐烦了，冲上前，手起刀落，砍下了蒋晓初的头颅。接着，蒋晓中也被同样的方式处死。兄弟俩的尸首被踢进了河中。

还有许多在外地工作的道县人，或因出身不好，或因家里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即被一张"母病速归"之类的电报骗回乡，其结果与蒋晓初一样。

8 月 22 日，上关公社抓促小组副组长周永记在宝塔角的虎子坪生产队作动员报告。与会的有齐心、建筑、向阳三个大队的干部、党团员和贫下中农代表，共 1000 多人。禾坪上人头攒动，梭镖林立。会场被臂带红袖章、全副武装的民兵把守着，只准进，不准出。人们交头接耳，互相打听，许多人还弄不清今天是唱的什么戏。

上午 9 时，太阳已开始毒辣的时候，周永记清清嗓子作报告了。因为没有麦克风，会场又空旷，他每说一句都必须拼命地扯

起喉咙：

“贫下中农同志们，四马桥那边的四类分子已经上山了；二中那边抢枪政变了；八区、十区、十一区的贫下中农已经起来杀四类分子了。我们怎么办？”

太突然了，会场顿时鸦雀无声。 周永记见无人反应，继续说：“对那些调皮捣蛋的四类分子，有皮子无骨头的，吃刀仔仔饭的，能不能杀他们一些？”

会场乱了。议论纷纷。

周永记进一步说：“现在，杀人不要经任何地方批了，贫下中农就是最高人民法院，同意就可以杀。”

他略一停顿，威严地四下望了望，然后，凛然喝道：“今天，我们就拿何光清开第一刀，给大家做个样子。”

他的报告一完，齐心大队团支部书记罗特良便代表贫下中农最高法院宣判，一群民兵前呼后拥，把五花大绑的何光清押进了会场。罗特良照本宣科，念完“罪状”后，模仿电影里的法官，拖长声调：“现在，我代表贫下中农最高法院，判处何光清死刑，立即执行！”

何光清原以为是像以往一样是押来批斗的，一听是死刑，吓得魂不附体，瘫在了地上。两个民兵像拖死狗一样，把他拖出去，按倒跪在禾坪前面刚刚收完了中稻的稻田里，一马刀砍下去，鲜血四溅，喷到了散发着新鲜气味的稻草上。 开完了宝塔脚的杀人现场会，周永记马不停蹄，又跑到了龙江桥（建设大队），布置召开更大的杀人现场会。

8 月 24 日上午，锣声阵阵，时缓时急。通往龙江桥变电站

的各条大小道路上，很快三五成群或成行成队的人，从四面八方汇集而来。锣声越来越密，有四条队伍从东风、东方、东进、东源四个大队曲曲折折而来。走在最前面的清一色戴着高帽子、胸前挂着牌子，边走边敲着铜锣和烂脸盆之类的响器。他们被绳索缚成一串，男女老少都有。押着他们的是一些荷枪实弹的民兵，而跟在这些队伍后面的则是一帮赶来看热闹的婆婆妈妈。

“蒋大婆，你老也去开会呀？”

“去哩去哩，好多年没看到这样威武的场合了，怎么不去呢？”

“哟，这么说，你老还见过几个这样的场合？周领导讲了，这是史无前例。”

“见过，见过，那时你还小。威是威武，还是没有这样威武。”

“那就快点子走，迟了，又要站背后，看不清楚了。”

“是的是的，前次吃了亏，站在后面，连人都没看清。喂，何家嫂子，我讲得直，前次你屋里二崽没得一寸用，砍了几刀，才把个脑壳霸蛮剁下来。”

“那又怪不得他，他们把他一把不快的刀。”

“这回就把刀磨快点。”

“这一回，不用马刀了。周领导讲了，要用’洋办法’。”

“啊，那还不快点走！”

还是去迟了。等这帮婆婆妈妈赶到龙江桥石头岭变电站的空坪上时，这里已经聚集了 3000 多人。几十名四类分子和他们的子女低着头，在台子下跪成一排。

搭起的土台子上，挂着“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

底！”的大红横幅。周永记站在台上，神色庄严，胸中豪情激荡：这才是彻底的革命！才一天时间，这世界发生了多大的变化，真是跑步进入了共产主义呀！四乡八里赶来的人越来越多。开会之前，他召集各大队主要负责人开了个碰头会。周永记说：“这一次，建设大队准备先搞两个，各大队是否有要杀的四类分子，如果有的话，就搭在里面用洋办法一起搞掉算了。”

各大队的干部简短地交换了一下意见，相继报上了名单：东进 2 人；东方、东风各 1 人；东源由于事情来得突然，意见没统一，没有报。

大会开始了。周永记一开口，哄闹的会场立即安静下来了。人们尖起耳朵，捕捉周领导嘴里发出的声音。只有风，依然径自地刮着，摇得竹枝树叶哗哗地响。

“今天，我们在这里开一个规模较大的杀人现场会。今天的会，也是我们上关公社杀人的第二颗信号弹，第一颗信号弹昨天已经在齐心大队的马路边打响了。今天各大队回去后，要马上行动起来，行使贫下中农最高法院的权力，对调皮捣蛋的要杀他一批。”

当即枪毙了各大队报来的 6 名四类分子。

这时，人们才搞清所谓“洋办法”，原来就是用步枪枪毙，不免有些失望。 散会后，周永记把公社脱产干部留下来，明确分工，派他们到各自所驻的大队去督促杀人。

宝塔脚、龙江桥两个杀人现场会后，上关公社专职干部熊立济等人分别在各自所驻的片、队开始组织策划杀人。

水楠大队是刘少奇前夫人何宝珍的故乡，也是道县有名的富

裕之乡。熊立济在水楠召集干部开会研究杀人时，大队干部们思想不通。熊立济急了，反复作思想工作，讲到激动处，从身上拔出一把匕首，“嘭”地插在开会的八仙桌上：“这就是革命和反革命的分水岭！在座的，谁与阶级敌人划不清界限？！”

灯光下，刀柄颤颤抖抖，大队干部们面如纸白。于是，这个大队用沉河的方式，杀了 5 名地富及子女。其他大队也相继动手，到 8 月 30 日止，上关公社 12 个大队共杀了 112 人。

8 月 22 日，小甲公社召开了 100 多人的“革命会”。当晚，洞仂口大队民兵将 5 名四类分子押到村口，用鸟铳、锄头打死，丢进一眼废红薯窖中。

同一天，兴桥公社。蚣坝区主要负责人王盛光坐镇兴桥，下令民兵封锁所有道路渡口，严查行人，不准放走一个“阶级敌人”；并于当晚召开宣判大会，叫民兵五花大绑了杨贵清，谎称要将杨押送道县公安局劳改。押到上关河边时，民兵杨飞吉按照指示，从背后一马刀将杨贵清砍死，抛尸潇水河中。

当晚，王盛光摇电话给区武装部长兼区“红联”司令何昌学，通报了搞掉杨贵清的情况，同时要“何司令”以区委和区“红联”的名义打电话给小甲和蚣坝公社，指示每个大队选一两个“罪大恶极、调皮捣蛋”的四类分子宰掉。这是道县杀人事件中最早向下摊派指标的案例。何昌学于当晚和第二天把这个指示下达给了蚣坝和小甲两个公社。紧接着，全区三个公社和几乎所有的大队都相继召开了杀人部署会。

一时间，杀人也成了社与社、队与队之间的竞赛！到了 8 月 30 日，小甲公社的 13 个大队已有 12 个大队杀了人。但也有例

外，公社眼皮底下的小甲大队迟迟不见行动。

公社副书记杨盛芳和武装部长廖龙九几次向该大队的负责人打招呼，进行教育，仍然不见成效。原因是小甲大队的几个四类分子平时逆来顺受，喊东不敢走西，实在表现不错；“雷公不打笑脸人”，小甲大队的干部下不得手啊！惯于雷厉风行的公社领导急了：妈的，老子眼皮底下，不容许出现“土围子”！于是，杨、廖二人在 8 月 30 日召开全公社总结表彰大会，表扬了洞仂口等几个“行动快、成果大”的大队，重点批评了小甲大队。会后，干脆派出一个排的基干民兵，带着枪支、马刀、炸药，进驻小甲大队，帮助他们“革命”。当天，将 12 名地富分子及子女，用一根绳索捆起来，捆成一团，中间放上一大包开山放炮用的炸药，点燃导火索，请这 12 个活活的生命坐上了“土飞机”。

随着“轰”地一声巨响，大块大块的血肉落雨一样地飞了过来。有几个炸断了手脚，炸掉了屁股的，还没有死，哭爹喊娘，痛得在地上乱滚……民兵们一涌而上，用锄头、马刀为他们解除了最后的痛苦。当人们散开后，一群群的乌鸦飞来，哇哇叫着，争相啄食飞溅到树枝上和草丛中的人肉……

一个月前，贺家山大队的回乡知青贺远能，带着未婚妻何端珍回家。贺远能出身不好，但人长得英俊又聪明，他是在县城读中学时认识何端珍的。事情偏不凑巧，他俩在村口碰上大队干部周某某。周见贺远能的未婚妻长得端庄，又穿得漂亮，便心生妒忌：我们许多贫下中农的子弟都讨不到老婆，你这狗崽子倒骗得了这么漂亮的妹仔，明明是带她来刺我们的眼睛！周咬定贺远能是“革联”的探子，叫民兵将其捆起来，关进大队礼堂。第二天，

何端珍求人说情放了贺远能，但贺的双手已被棕绳勒断了。何姑娘含泪将未婚夫接到自己家，治疗了个把月。伤好后，贺远能于8月24日回到家乡，正碰上滥杀之风盛行，吓得他在家拿了只电筒，就连夜逃走了。那时，整个蚣坝区已处于极端的恐怖之中，条条道路处处渡口都有民兵盘查。贺远能走投无路，只得爬上兴桥公社的洲背岭，躲在岭上的草丛中。这个年轻人已预感到难逃此劫，死神的阴影压迫得他几乎透不过气来。生活于他才刚刚开始，自从爱上端珍，生命和世界都变得有意义起来。他要好好活下去。他撑开手电，开始给心上人写信："端珍，我也许永远要离开你了……我永生永世忘不了你的情……"他写啊写，从两人相识相恋到他对她炽热的情感，写了整整一夜。

8月25日拂晓，贺远能偷偷走下山，打算把信寄出去，并远走他乡。不幸的是，他还没走出兴桥公社，便让当地民兵抓住了，并迅速打电话到蚣坝公社贺家山大队。这天上午，贺远能的父母和弟弟都已被杀，除了远嫁外乡的姐姐，贺家只剩下他这根独苗。而此时，正责怪自己疏忽大意的大队"最高法院"贺主席，正在四下寻找漏网之鱼贺远能。接到电话后，贺主席连声夸奖兴桥公社的民兵阶级觉悟高，并叫了十几个人，操着家伙，风风火火赶到兴桥。像捆逃犯一样绑起贺远能，推着拉着向潇水上游走去。没走多远，这个高中毕业生就受不了了，满脸豆大的汗珠直往下滚，他哀求着：

"叔侄兄弟们，你们要是肯留我一条命，就请将绳子放松一些；要不留我，也就不要让我再走了。"

贺主席问："你要怎么个死法？"

听到这话，贺远能失声痛哭起来，一路上不停地喊着未婚妻的名字。

走到向阳坝，贺主席叫民兵将贺远能推到两块大石头中间，背转身站着；指使三个人各朝他打了一鸟铳。三声铳响后，贺远能没有倒下，仍在痉挛着挣扎。一个自称曾一铳放倒过野猪的汉子不满地说："这家伙莫非学了法！"于是，众人在贺远能身上绑上一块石头，将这个嘴里还在"端珍，端珍"叫着的小青年推下了潇水河。

# 文革史话

## 之第三部 全面内战 第十一卷

刘朝驹 著

# 文革史话

之

第三部

# 全面内战

第十一卷

目 录

第 848 回：阴风起，道江镇一片恐怖　部队到，艰难制止杀人风 ..... 1
第 849 回：百明死，狂屠潮蔓延周边　求生存，六千知青大逃亡 .....12
第 850 回：拦火车，知详情全部放行　长沙市，众知青义愤填膺 .....22
第 851 回：周恩来，五次见广西代表　枪上交，全都要停止武斗 .....34
第 852 回：桂驻军，转向支持四二二　八二三，广州“旗派”冲军区.....45
第 853 回：北航夜，操场斗学生喧嚣　吴仙虎，李明清二人死亡 .....58
第 854 回：八二四，旅大市炮轰卫校　见天津，“五一六”人人喊打.....69
第 855 回：周恩来，连续见三省代表　康生与，宁夏驻军领导谈 .....80
第 856 回：毛泽东，决定处理王关戚　抢陈毅，武汉钢新闹分歧 .....92
第 857 回：连续忙，周恩来累倒车中　见安徽，青铜峡武装平叛 .....105
第 858 回：说吴波，山城歇马场大战　枪炮鸣，重庆市血雨腥风 .....120
第 859 回：粤海丰，反彭湃风潮汹涌　虽平反，何缘由至今不清 .....131
第 860 回：拉萨乱，世界屋脊武斗忙　生活会，王力、关峰被隔离.....141
第 861 回：周恩来，召见批评姚登山　哈尔滨，捍联总围“哈一机” .....153
第 862 回：战荆州，钢新楚地起烽火　围四物，炮轰向阳劫五普 .....165
第 863 回：八三一，徐州发生大武斗　进军营，“支派”分散各回家.....175
第 864 回：不甘心，广州城冲突难停　九月一，再接见广东代表 .....187
第 865 回：组民兵，第二次武装支泸　声泪下，谭厚兰支持林杰 .....197
第 866 回：北京市，召开常委扩大会　众领导，一致再批“五一六” .....210
第 867 回：冲军区，陈伯达见闽代表　外交部，姚登山家多次抄 .....221
第 868 回：九月二，西安市战火连天　命胡炜，坚决保卫弹药库 .....233
第 869 回：总理电，倒许风才告停止　《九五》令，戚本禹书面检查.....243
第 870 回：第三次，接见安徽代表团　逐条念，江青讲《九五命令》.....253
第 871 回：敢卧轨，十二军稳定安徽　“小延安”，文斗喇叭声震天.....262
第 872 回：九月五，通令“红联站”暴乱　督军府，孟玲玲血溅十中.....273
第 873 回：大检阅，兵团反对红总站　“刘未老”，山西戏称刘格平.....285
第 874 回：九月六，柳州来宾出“血案”　下酒城，泸州鼓楼灰飞烬.....296
第 875 回：六壮士，燕子岩投崖自尽　回宜宾，第二次支泸结束 .....307

第 876 回：赞极左，湖南工湘又分裂　攻长沙，莲花桥作战惨烈 .....317
第 877 回：上华蓥，八一五建根据地　说开封，黑龙江《九条协议》.....327
第 878 回：长春市，分别庆《九五命令》　康生见，宁夏军区及代表.....340
第 879 回：聚北航，“天派”商议大行动　北师大，政变炮轰谭厚兰.....350
第 880 回：评陶铸，郑州市枪声不断　开封市，八二四进攻东郊 .....362
第 881 回：战江津，杀战俘再造惨案　第六次，接见天津市代表 .....371
第 882 回：辩论急，“大联筹”死不认错　戚本禹，质问天工赵健敏.....383
第 883 回：反“八一”，周恩来临危不惧　谈形势，毛泽东还有困惑.....397
第 884 回：做工作，重庆、云南交武器　查贺龙，中央逮捕王光美.....411
第 885 回：派“老多”，保铁路安全畅通　第六次，见广西两派代表.....425
第 886 回：攻“贸派”，涪陵反击战结束　遭伏击，大连九一五事件.....437
第 887 回：洒汽油，苏州武斗“三把火”　无锡打，沪宁线中断半天.....447
第 888 回：到杭州，徐向前递上辞呈　周恩来，亲批逮捕秦化龙 .....460
第 889 回：见“天”派，总理再谈五一六　点名批，蒯大富和韩爱晶.....472
第 890 回：批元梓，周泉缨攻陈伯达　见“地派”，清华两派搞联合.....485
第 891 回：一声喊，十条命峰回路转　签协议，山城内武斗剧减 .....497
第 892 回：九一七，毛泽东来到南昌　说内战，江西省受到表扬 .....507
第 893 回：到长沙，毛泽东见湘领导　再批“左”，工人阶级不分裂.....518
第 894 回：九一八，长春火车站激战　都停火，枪支武器就地封 .....529

## 第 848 回：阴风起，道江镇一片恐怖　部队到，艰难制止杀人风

贺远能被杀的第二天，8 月 26 日，蚣坝公社河滩大队又接着上演了一幕幕更为惨烈的悲剧。

那时太阳还没出山，村寨笼罩在淡淡的晨雾中。从河滩大队所属的各个生产队陆续涌出一些五花大绑的青壮汉子，和一些手持马刀、梭镖、鸟铳和锄头的同样年轻力壮的汉子。他们在一条通向山里的三叉道口汇集到一起。

“一、二、三、四、五、六、七……”

大队文革主任、“最高法院”负责人何兴盛站在一处高坎上，像点牲口那样将各队捆来的人清点了一遍：21 个。

又清点了一遍：没错，确实是 21 个。

这个大队采取的战略是“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先将有可能暴动的家伙搞掉。

于是，队伍继续向山里前进。

被捆绑着的青壮年汉子们，神态卑微而平和，对于屈辱的生活，他们早已习惯了，这已成为他们生命中的一部份。认命吧，谁叫自己投胎时没长眼睛，错投了地富胎！他们还不清楚今天将被带到哪里去，但前方等着他们的肯定不是什么好地方。不祥的预感，使他们在别无选择地走向绝望时，心底未免不生出阵阵酸楚和眷念。他们三步一回头，望着渐渐远去的村寨，那里有年迈的父母，还有年轻的妻子和尚幼的孩子。有家，日子再苦，生命毕竟还是有意义的。如今要是就这样去了，留给亲人们的残余日子怎么过啊……

他们来到山腰一处叫葫芦岩的洞口，以往他们打柴、种地、放牧时常从这里经过。累了，在洞口边歇歇脚，热了，在洞口消消暑。此时，太阳已从山顶上探出头来，泼下一片灼白的炽热，让人有那么一点激动，又有那么一点烦躁。 何兴盛命令民兵将一干“人犯”押到洞口边，他代表“贫下中农最高法院”宣判了这些人的死刑。他的口有点干燥，声音也有点紧张。被“判”死刑的人们，却出人意料地平静，站在那里，一动不动。叫一个名字，牵一个到洞口边，由负责行刑的民兵用马刀或梭镖、棍棒之类杀倒或打昏，丢下岩洞；直到这时，你才听到一声凄惨的喊叫。这时，一个叫何远有的地富子弟，向前冲了一步，跪在何兴盛的面前：

“何主任，你不要杀我，我没享过福，我跟你们一样，受一辈子苦。我有一笔钱，准备结婚的，我都送给你。你救我一命，我喊你做老子，以后我一辈子都伺候你。”

何兴盛嗓子有点干：“远有，我没得办法救你。不是我要杀你，上面喊杀，我不杀你，我自己的脑壳难保。”

葫芦岩岩洞，顾名思义，口小肚子大，究竟有多深，谁也没下去过。据说好多年前，村里有伤风败俗或不肖子弟，都是在这里按族规下天坑的。洞口一年四季冷风嗖嗖。这时，热腾腾的鲜血已浸透洞口灰白色的石头和石头上的青苔，且将那些绿色的杂草染得紫红。 有的人被丢进洞里后，居然没有死，在里面拼命呼救。文革主任何兴盛在洞口边窜来窜去，急得直跺脚。他叫民兵不停地往洞里扔石头，又叫人搬来成捆的稻草，点燃了扔下天坑去烧。最后，他还是不放心，又打发人跑回村里，拿来一大包

炸药，挂上导火索，点燃，丢进洞里。随着“轰隆”一声沉闷的巨响，葫芦岩岩洞重又归复永恒的寂静。

时近晌午，何兴盛浑身异常轻松，像个打了胜仗的将军，带着民兵们凯旋回村。大家边走边议论：

“年轻力壮的劳动力都杀了，留着那些老的小的怎么办？”

到底是种田人，想问题非常实际。这话立即成为大家的中心议题。

“未必还要养五保？那生产队的负担就太重了。”

有人想得更远：“那些小的，长大了报仇怎么办？”

于是就有人建议：“索性斩草出根，老的小的一齐搞掉算了，免得留着老鼠啃仓门。”

何兴盛一想，有道理，赶紧跑到大队部摇电话，向区里汇报请示：“我们大队的任务已完成，21 只大老虎统统地搞掉了。现在，还留下了 30 多只小老虎，贫下中农要求一齐搞掉，行不行？”

接电话的是中共蚣坝区委秘书，答道：“大老虎杀掉是罪有应得；杀小老虎恐怕不大符合政策吧？”

何兴盛见区里不同意杀，想想怕是有道理，也就作罢了。吃过午饭，队里继续有人在鼓噪，何兴盛无奈，又打电话向公社请示。蚣坝公社党委书记接到电话，指示：“一个个都给我搞掉！”

可何兴盛还是感到不踏实，挂电话向蚣坝区委请示。这回是区委主要负责人之一叶成虎亲自接的电话。叶书记虎气生生地刚从杀人第一线回来，精神抖擞，声音洪亮如雷，当即指示：“全部杀掉。”

何兴盛立即将这命令通知给各个生产队长，并且部署了当晚的行动。

太阳下山了，整个河滩大队，村里村外岗哨林立。早上杀人的消息很快就传遍了家家户户，空气紧张得似乎已经凝固了。那些被杀人的家属，老老小小缩在家里，抱头哭泣，声音压得低低的。有的老人，见的世面多了，已预感到了大限临头，心里反倒踏实了些，抖抖嗦嗦从箱子里翻出几件平时舍不得穿的衣裳，身上弄得干干净净的，随时准备上路。有个名叫张秀姣的地主分子，平时安分守己，处世谨慎，手脚又勤快，生产队有事，烧茶弄水搞卫生不用领导喊；且热心公益，常与她那个从不多言多语的丈夫一道出门修桥补路，两老口同队上干部群众的关系都还不错。因此，早上往大队拉人时，没有拉他们。此刻，两口子相对而坐，商量着如何去死。丈夫说，他这一辈子没有吃过一只鸡，要是能尝尝味，也死得安心些。张秀姣满足了丈夫的要求。她快脚快手地将家里五只用来下蛋换油盐的鸡全部杀了，开膛破肚，收拾乾净，做一锅炖在火塘的撑架上。火苗欢快地舔着锅底，锅里扑扑直响，肉香四溢。张秀姣舀了一碗鸡汤，双手端给丈夫；丈夫双手接了，刚凑到嘴边，却又怜爱地送给妻子先尝。这一送一让的，倒叫这对老夫老妻感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浪漫，想想又觉得有那么几分荒唐，禁不住互相望着笑了起来。也就在这时，敲门的声音响了…… 他们被押到大队的晒谷坪，那里已站满了人，小的哭，老的喊。除了要被杀的，就是杀红了眼睛的人。看热闹的人很少，是个人都没有胆子去看如此残暴的场面。有个形容枯槁的老人，原本已卧床数月，刚被从床上拖起来，老眼昏花地不辨方

向："都这么晚了，你们要把我牵到那里去？"

一个手持马刀的民兵倒答得干脆："你儿子判了死刑，杀了；生产队养不起你，请你去西天享福。"

有个 3 岁多的男孩不肯走，哭着要爸爸妈妈。一个民兵哄他说："你爸妈在山上摘果子，我带你去找。"

就这样，老的用绳索捆着，小的用棍棒赶着，不能行走的婴儿则用箩筐挑着，哭哭啼啼上了路。

没有月亮，星子又大又亮。该是初秋了，已有点凉意，远处不时传来狗吠声。几个孩子被这黑夜的阴森吓得大哭起来，让民兵们厉声呵斥，又抽抽咽咽地止住了……

一行人跌跌撞撞到了潇水河边的白石渡。

何兴盛忽然感到有话闷在心里。这些老老少少，说到底多少与自己都有点沾亲带故，但这是革命的需要，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他何兴盛容不下他们。他干咳了一声说：

"你们也不要怨我。是上面要我杀你们的。怪不得我！我不杀你们，我的脑壳也保不住。你们好好上路，明年的今天就是你们的周年。"

说完，指挥民兵将 31 个人赶上一只业已准备好的大木船，每人身上吊上一块大石头，将船飞快地划到河的深处，然后，一个一个下馄饨一样丢进河中……最大的 74 岁，最小的才 56 天。

当晚，该大队成立了"财产清理小组"，行动迅速且很有经验地着手分财。一面又以"宜将剩勇追穷寇"的精神，从被杀人家中拖出几头肥猪，手脚麻利地一并杀了，在晒谷坪上摆开桌子大会餐。桌上摆的，当然包括张秀姣家中的那五只尚未品尝的鸡。

大队党支部书记周某某，喜气洋洋地高举着酒杯，桌桌敬酒：

“今天，我们贫下中农胜利了！打了一个大胜仗！现在，请大家喝下这杯庆功酒。”

周书记带头饮了庆功酒，红光满面地高呼口号：

“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万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贫下中农万岁！”

这一天是 8 月 26 日。

道县大屠杀期间，寡婆桥曾是有名的刑场。杀人时，桥两头都布了岗，任何人不准通行；把要杀的人押到桥中间跪了，明晃晃的马刀一挥，尸体就被从桥上一脚踢到河里。杀得多时，河水腥红一片；有没杀死的，浮出水面，守在桥两头的民兵便沿河追赶，用鸟铳射杀。

9 月 2 日，乌家山大队的民兵 4 人在茶山上捉住了一过路的女青年，高高瘦瘦的。他们立即将她带到大队部审讯。开始她一言不发，问急了，才说是广东人。听她口音也的确像那边人氏。于是，又将她押往公社。因为那里抓的人太多，看管的人手不够，只好又将她押回。正是黄昏时分，西天一抹晚霞。走到乌家塘边，民兵们动了邪念。有人说，这个女人连公社都不收，押回大队也没用。不如就在这里搞了她，开开洋荤。其余 3 人欣然同意。4 人就在塘边将这个姑娘轮奸了。事毕，怕她今后找麻烦，并用锄头将她打翻，丢入塘水中。奇怪的是，这个女青年落水后，几翻几腾，竟又站起来了，塘边的水只齐她的胸部。四人又用石头打。她望了他们一眼，然后一步步向深水处走去……她坚定不移地走了，带着愤懑、屈辱和对这个世界的彻底失望。以后有人说她是

自杀。 据说，至今没人知道她的名字，究竟是那个地方的人，而且为什么会闯入 1967 年 8 月道县这座人间地狱。

县城道江镇虽然没像农村那样公开杀戮无辜，但气氛已经紧张到了极点。商店关门，工厂停工。人们上街行走，或到街头看大字报，只要一阵旋风刮起，吹起几片纸屑和尘沙，或者某人碰翻了一只洋铁桶，所有人立即惊呼着抱头鼠窜。当地人把这种现象叫“发地皮疯”。人们的心弦已绷紧到一碰即断的程度。每到黄昏，道江镇便成了一座死城。人们龟缩到家中，把门拴紧、抵牢；头上的横梁上铺着棉絮棉衣之类，担心乱飞的流弹从天而降，一面眼巴巴地盼着黎明的到来。

喝惯了清清河中水的道县人，已无人再敢饮用被尸体污染的河水了。县城里仅有的 5 口水井顿时身价百倍。在五星街的戚家井旁，每日凌晨就出现排队汲水的长龙。水乡泽国的道县发生了水荒，为井水而引起的纠纷时有发生。

道县人平常爱吃豆腐，县城的豆腐店多开在河边，无非为着就近取水。如今河水不敢用了，全都被迫改行做米豆腐。仍然无人问津。店家只好挑着米豆腐，沿街叫卖：“井水米豆腐!井水米豆腐哦!”

街上贴出了“为革命吃河水”的大字报。一些革命闯将现身说法，带头饮用河水。

后来，桂阳县二中教师周家雄组织了一个“反屠杀代表团”，一行 13 人，进京“告御状”。这些人中，有 3 位是死里逃生、混身血污的人证，其中一个叫王永和的在职教师。那天，他的弟弟先被砍倒在薯窖里，这里已有几个死尸了。天黑时，他也被五

花大绑，跪在这个薯窖边，只听得几个民兵在那里商议：一个说吃了晚饭才来杀，一个说杀了再吃吧，只见另一个不由分说，一马刀从背后砍来，王永和顺势就倒在薯窖里，没有挨刀。当时他弟弟还未死，但伤势严重，已无生望。可怜弟弟边呻吟边叮嘱哥哥踩在他和几具死尸身上爬出去。

从薯窖爬出来的王永和，爬到薯窖附近的大队老支书家喊门，老支书以为是鬼，吓得忙说："王老师呀！你莫怪我呀！我已经没有权了，无法制止了。他们知道我一向对你兄弟俩好，就背着我来杀你们兄弟的。"

王永和说："我还没死，求你救救我。"

老支书开门见他满身是血，连忙扶他进去，赶紧帮他扎住伤口，背他到公路上，搭过路车送到桂阳县医院。桂阳二中教师周家雄得知他的情况后，就扶他上了北京。于是就有了中央急招黎原进京的一幕。

8 月 22 日，47 军 140 师炮兵 520 团奉命进驻道县进行军事管制。8 月 29 日上午 10 时，当那个加强连走进道县道江镇街头时，道江镇居民走出家门，夹道欢迎。

"解放军来了！"

"制止杀人来了！"

欢迎解放军的还有千创百孔的建筑、血迹斑斑的街头和满街白花花的大字报，显示着两派你死我活、不共戴天的斗争。

47 军刘兆丰副参谋长于 8 月 30 日召开道县各区各公社干部会议，宣布命令：停止杀人！并敦促参加会议的道县各区各公社干部立即赶回去制止屠杀。

就在这天，8 月 30 日，“红联”和“革联”又在县城发生大规模武斗。“红联”方面指挥失当，被“革联”打死 2 人，打伤 7 人，俘虏 360 余人，被缴枪支 120 余条，梭镖、大刀、棍棒丢弃无数。“红联”总指挥部再次迁往清塘区。武斗的加剧，使已趋缓和的道县农村杀人有所激化。

8 月 30 日，“红联”召开 400 人的追悼会。清塘区武装部长关有志、“红联”前线指挥部头头贺霞等人在会上声称，“四类分子胆敢翻天，就斩草除根！” 部分区社仍在抓紧杀人。

柑子园公社召开各大队支书、贫协主席、民兵营长等基层干部会议。会上，公社党委副书记裴成芳传达了解放军第 47 军制止杀人的电报，强调不准再杀人，谁杀谁负责。可是，紧接着党委书记胡化维的讲话，却表扬了哪些杀人多、行动快的大队，点名批评了那些没杀人的大队。挨了批评的那些大队很不服气，散会后，东风、胜利等大队回去后就杀了 15 人。

8 月，零陵军分区将道县杀人的情况上报，47 军转发了这份电报：

“各方反映和部分查证，道县近来四类分子活动嚣张，散发反动传单，凶杀贫下中农，进行反攻倒算，组织反革命组织，阴谋暴动。在县武装部和公安机关瘫痪的情况下广大贫下中农惟恐四类分子翻天，有的主张采取行动。各地从 7 月以来，特别是从 8 月 22 日以来，据不完全统计，他们用鸟铳、锄头、扁担等，共杀死四类分子（包括少数四类分子子女）207 人，其他县区也有类似情况。我们认为，对杀人凶手和四类分子中作恶多端、活动嚣张、企图翻天的可以依法惩罚外，四类分子不宜滥杀，四类

分子子女不应视为四类分子，必须按照政策团结教育，不能混淆专政对象和非专政对象的界限。这样才便于争取四类分子，如杨家公社与宁远交界处有 77 个四类分子（包括少数子女）因怕杀或企图暴乱，外逃集结上山顽抗……”

9 月 1 日清晨，道县上空无雾。一架伊尔型军用飞机在道县上空低低飞行，撒下制止杀人的传单。9 月 2 日，飞机又撒传单一次。各式各样的传单如雪片般飞向城镇、山乡和田野。传单上以醒目的大字印着：

“禁止杀人！”

“杀人犯法！”

“要文斗，不要武斗！”

“不要群众斗群众！”

有的传单没有打开，甚至是成捆成捆地落在地上。

6950 部队也分散到农村，开始了艰难的制止杀人的宣传工作。

乡下的滥杀风渐渐减弱。但县城里的派性斗争并未结束，有时甚至因某个突发事件而升温。9 月 23 日，“革联”将冲入二中的“红联”打死 12 人，打伤多人。这无疑又激起了“红联”派的愤怒，将仇恨再次转移到农村那些无辜的弱者身上。这也使得部队制止杀人的工作更加困难。

“923”事件发生的同时，道县杀人之风迅速向外蔓延，邻近的几个县市也抓紧动手杀人，其杀人手段之残忍较之道县有过之而无不及。

9 月 27 日，47 军和湖南省革筹组就以上事件联合发出紧急通

告，坚决制止任何杀人、破坏通讯和交通运输的事件；宣布所谓“贫下中农最高法院”是非法的，必须坚决取缔；各县保守组织手中的武器，全部收回上交 47 军所属部队；对掌握在造反组织手中的武器亦应封存上交。

与此同时，6900 部队增派 6950 部队、6952 部队进驻全区各县。直到 10 月 17 日，道县非法杀人之风才停止下来。至 10 月 25 日，零陵地区杀人风潮被制止。

## 第 849 回：百明死，狂屠潮蔓延周边　求生存，六千知青大逃亡

道县大屠杀影响到周边 10 个地区，与道县相邻的江永县首当其冲，只一个夜晚，整个江永县就笼罩在血腥之中，“地富反坏右”及其子女未能幸免，一条白水河成了污血河。

江永县是湖南省知识青年下放集中的地区，1964 年 9 月，长沙市 6000 名初、高中毕业生下放到了湖南的江永和零陵等地，其中“黑五类子弟”占百分之八十五。

在最初的两年里，这些从 16 岁至 20 岁的年青人干得有声有色，他们积极劳动，办夜校、组织农民学文化；有知青为病重的农民献血，有热心的家长捐款给生产队建发电站；他们写诗、写剧本，抒发自己的理想情怀、颂扬村里的好人好事，自编自导自演，很受当地农民的欢迎。不少人写下了豪言壮语：“誓把青春献给党，扎根农村干革命……”

江永知青的表现很快影响到了省内外，一位中央首长说：希望省省有江永。

著名导演谢铁骊拍摄知青专题片《在广阔的天地里》，其中有一个大场景就是在江永白水公社拍摄的。当时，谢铁骊指着一座山头上的圳景塔说：“你们知识青年下农村不就是干革命吗？看，那就是延安塔，冲啊！”

临时组织起来的 1000 多名知识青年，向着“延安塔”跑去……

1966 年 8 月，江永县白水知青成立了“炮打司令部战斗队”，后来改名为“湘江风雷反到底战团”，就地造江永县委的反。

大串联开始以后，知青回流城市，湖南约有 6 万多知青借串联之机返城。他们“回城闹革命”的活动之一是“造户口反”，即要求相关部门的领导干部解决城市户口、粮食、工作及“革命经费”问题。“造户口反”的知青提出：文化大革命不应该只是口号革命、罢官革命，而应该是一场社会革命，应该解决迫在眉睫的社会问题，首先应该改变知青被安置的命运。知识青年不是失业者，应该有参加革命和工作的权利，应该到社会上去闹革命。有的知青趁乱威逼相关单位工作人员办理户口迁移，拿到盖着公安局鲜红印章的那张纸时，欣喜若狂，泪流满面。除了千方百计迁户口之外，他们还热衷于批斗农垦局的“走资派”和街道办事处干部。

批斗农垦局领导干部，是因为当时“安置办”在省级以上附属于农垦部门；批斗街道办事处的人，是因为当初就是这些人直接动员甚至强迫知青下乡的。

在长沙，知青和他们的父母举行了全市性的集会示威，并召开了对长沙上山下乡办公室一位主要领导的批判会。

1966 年 10 月，“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开展以后，知青建立的“全国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红色造反团”等组织已见雏形。湖南知青在长沙相应成立了“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红色造反团湖南总部”，该组织总部设在省农业厅内，是省内影响较大的知青组

织。

另一知青组织“湖南省上山下乡知识青年联合调查团”在不少地区串联、宣传发动，联络了更多成员，同时调查各地知青生存状态，召开了多次动员会、座谈会，掌握第一手材料，为以后的宣传鼓动做准备。该组织除了调查临湘的黄盖湖农场、平江的时丰茶场等岳阳地区知青集中地以外，也顺便去了湖北的洪湖与赤壁，与当地的武汉知青进行了交流。下乡知青的串联极具亲和力，因为他们有着相同的生活经历和家庭背景，尤其是受到迫害和侮辱的知青，更是把串联知青当成亲人和救星，有些遭到干部侮辱强奸的女知青，克服了羞涩和心理障碍，哭诉自己的悲惨遭遇。

1966 年底，“湘江风雷”成为省内第一大造反派组织。知青组织全部站在“湘江风雷”一边，成为造反派阵营的成员。部分知青加入“湘江风雷”，建立了以知青为主，隶属湘江风雷的“山鹰战团”。

1967 年 1 月 11 日，《中共中央关于反对经济主义的通知》指出：知青返城是“干扰了运动的大方向”，是“反革命经济主义”的一种表现，解决方法，中央的通知说：“在中央没有提出新的办法以前，暂不变动”，“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应当安心参加农业生产，参加农村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安置工作中的问题，应由各级党委负责逐步加以解决。”

5 月以后，各地知青再度大量进城。长沙、衡阳、郴州、黔

阳等地 20 多位安置部门的干部反映，70%的下乡青年长期逗留在城市，要吃住，要看病，要户口，要安排工作。长沙知青组织以“反迫害”、“反歧视”等名目出现，比较大的组织有“红一线”、“反迫害”、“山鹰战团”、“红农会”、“斗批改”，以及后来成立的“长沙市中学毕业生红旗联络站”，简称“中毕红旗”。以上组织都出版了自己的铅印报纸。

“反迫害总勤务站”总部设在省委接待处，负责人许九皋是浏阳县中岳公社赵湾大队的知青，家庭出身是“城市贫民”。在充斥着“黑七类”的知青中，这算是很优秀的家庭出身了，也是因此而被推举为“司令”的重要原因。

8 月中旬，道县大屠杀蔓延到相邻的江永县。1967 年 8 月 17 日，长沙知青王百明和一位知青朋友在江永县的城关饮食店吃早餐时，四个端着鸟铳的农民冲了进来喝问：

“谁是王百明？”

王百明回答：“我就是。”

“地主崽子王百明！”呼！呼！呼！一连串的铁砂弹在王百明的脸上、身体里炸响，顿时鲜血喷溅，全身乌黑，当即死亡，年仅 22 岁。

王百明是长沙市第三中学 62 届高中毕业生，中学生歌舞团乐队指挥、“红云诗社”主笔，连考三届大学，因出身问题未被录取，1964 年下乡。在江永县成立知青农艺队时，因出众的才华，成了农艺队的一员。

王百明和大多数知青一样，是带着“原罪”下乡的。父亲本人只是普通的会计人员，他的罪恶是在解放前夕为岳父，也就是王百明的外公买了一张去台湾的车票并将他送上了火车。因此事被判刑坐牢几年，每逢运动都是斗争靶子，被反复投入狱中，由反革命演变成历史反革命，加之右派头衔，最终失去工作瘫痪在家，对他的斗争才算结束。

下乡后，王百明对农村生活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他的一首小诗《吹烟》，写得抒情浪漫：

不是虚浮，是向上的表现

虽无云的色彩，也想打扮蓝天

狂风吹不断我的躯体

我啊，和火热的生活息息相连。

另一首长诗《新农民之歌》，写得激情澎湃：

扶着犁，扬起鞭

赶着我的小黄牛朝前走

紧紧地追赶春天……

这些诗句朗朗上口，在知青中影响很大。

王百明在 1965 年 9 月的一篇日记中写道：“要加强文学、艺术修养，在这方面为人民做出贡献来。要快，你的时间不多了！一年之后，将有大的变动发生。”

他似乎感到，中国大地即将有一场重大的事情到来。

1966 年秋，以零陵地委书记宁生为团长的调查团来到江永，

对知青的安置工作进行考查。持正反观点的人有过几场大的辩论会，在辩论会上，王百明就知青问题发表了个人观点。他以事实为依据深入阐述，令持反观点的人瞠目结舌。他的锐利的目光，标准宏亮的普通话，给到会者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1967 年春节零点，江永县保守派以逮捕造反派头头为名，将当时江永县“湘江风雷”骨干分子王百明和十几名知青抓捕入狱。

就在王百明被枪杀的当天，江永铜山岭农场跃进队的几百名职工，包括一大群还滞留在场里的知识青年，都接到通知，到队部禾堂来看处决地富反坏右份子，来“经受阶级斗争洗礼”。坐在台上主持人说得很清楚：“今天处理第一批。”突然四声枪响，只见场边跪着的 5 个人，依次倒下 4 个。手脚都被五花大绑的两个老“地主”，两个“地主崽子”，倒下去就再也无法动弹一下。第 5 个是女人，枪声响过，被捆住的她仍然跪着，只是头更深地埋下去，那一头乌发，拖到了地上，遮住了膝盖。

禾堂里是一片死寂……

“吊死她！”刑场对面台上，有人一声叫喊，跟着一个五大三粗的民兵，左手提枪，跑上塘基，膛过血泊，撒开右手五指，抓住她后背绳结，像拎小鸡崽样，把女人提到塘基左边一棵樟树下。一枝碗口粗的枝丫上，已经垂着一个绳圈。民兵放下枪，一手夹住女人，一手扯下绳圈，绾到女人颈根上，再发力一扯，女人就悬挂到了半空，一套黑色的裤褂下，一双污糟的脚掌一顿乱蹬……

人群中传出小孩的哭声，接着是女人的尖叫，继而掠过一阵不安的骚动：

“吊的是秀姑？！”

“秀姑出身是贫农呀？！”

之所以要吊死她，就是因为她嫁给“地主狗崽子”，被认为是丧失阶级立场。惊诧、惶惑、愤懑、失神落魄的恐惧，钉耙一样划过人们的心头……

当夜，铜山岭农场前进队队部，月色昏朦，黄狗干吠，随着木门沉闷吱呀，一群群一伙伙男女知青，相继钻出刚刚成冠的桔林，钻进队部仓库。

油灯如画，映出的是一张张年轻疲惫的脸。稍远的暗处，是一双双焦虑的眼。

“各队点名！”站在人群中的沈翔农沉稳地开始组织行动。

“全到！”

“全到！”

……

清点结果，农场 542 个知青，前几天已经走了 444 名，今晚来集合的，98 名，该来的都来了。

“不对，是 99 名，王近芳抱着的孩子要算数呀！”有人兴奋地大叫。

“好，是 99 名！”沈翔农感到宽慰。在关键时刻，知青总是能够齐心。“早走一步的，比我们先觉悟。我们想留下来，留下

来抓革命促生产可以，留下来送死，做死鬼，谁愿意？”沈翔农几句话一出口，群情沸腾，“走啊!”“爬也要爬回长沙去!”

“不会砍我们吧？我们与他们又冒得仇。”黑角弯里，最后的希望还在绝望地弹动，如那盏将灭的灯。但是他的发言，招来了激烈的反驳：

“秀姑一个女崽，与哪个有仇？不是照样给吊死!”

“与其让别人判生判死，不如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

那位知青幡然醒悟，连忙大叫：“走！走！走!”

那盏油灯，被他喊灭了。

深夜 3 点钟，饱餐一顿后，99 名知青一个接一个，弯腰弓背，轻手轻脚，离开了队部仓库，消失在暗夜之中。

沈翔农和同队的几位战友走在前头，他随身带着临走前场部唐会计交给他的两样宝贝：一是在农场武装部开的路条，一是一笔路费：98 名知青当月应领的工资。

女知青王近芳，走在队伍中间，她的背上，用一块蓝布，捆着周岁的小孩，铜山岭农场第一个知青后代。

几个壮实的男生殿后。

一场集体逃亡，有条不紊地开始了。方向：南面的广西麦岭。

99 人的队伍翻山越岭含枚急走，步行近百里到达广西麦岭时，已是日上三竿阳光灿烂时分。倍感肩头担子沉重的逃亡组织者沈翔农，离开一个个躺在地上休息的知青，走到岗坡上，放眼田畴，心里默默算计：“向西再北上全州的话，至少还要走 300

里路，拖儿带女，走得动吗？向东到平右，往郴州方向近多了，也不会少于 200 里，怎么办呢？”

突然，他听到一阵军号声，一眼望去，是一队军人，正向坡下的田里开进。他眼前一亮，计上心头，急忙转身与几个知青商量一下，就一声吆喝，带着知青姐妹加入了部队麦收的队伍。在一阵查询笑闹之后，部队也接受了这群知青帮助麦收，还给他们供应吃饭，这支部队番号，就是江永知青人人熟知的 6951 部队。两天之后，部队派军车把他们送上了红石渡，即现在的白石渡，北上株洲的火车。

顺利到达株洲后，这一行人又被当时易家湾正在进行的武斗阻滞。其时恰有三部大卡车，运三具武斗尸体回长沙，又有知青往返联系，于是让这 99 位知青得以分坐运尸车回到长沙。为求顺利，不避晦气，知青胆气壮，怕什么？他们就这样坐着运尸车回到了长沙，前后历时 13 天。

我们再回到江永。就在王百明被枪杀的第二天，8 月 18 日，一个特派员带着武装民兵来到桃川石枧村抓王百明的妹妹王立明。岂知在天亮前，王立明的两个妹妹，其中一位是王百明 12 岁的小妹，因为学校停课闹革命也来到了石枧村，和知青点的所有知青已被村民们送走了。石枧村的农民为了安抚悲伤中的王立明姐妹和愤懑不平的知青，组织生产队的所有青壮农民，在村周支书的带领下，为知青挑行李，走了四、五十里山路，一直将他们护送到驻军 6950 部队，眼见他们安全了才返回村去。

这时的 6950 部队的大院里已成了难民所，逃亡知青首先想到的就是向部队求救，部队官兵给予了极大的关怀和妥善安置。像凤亭农场、迴龙圩农场、桃川农场、铜山岭农场等几个大农场的知青，在部队的保护下，一批一批地走广西麦岭，再往全州火车站去。

8 月 19 日下午 15 时多，下放零陵县前进公社的 20 多个知青，搭乘前进公社的一辆货车，去几十里外的县城。他们怕逃亡中发生意外，想去县邮局给家里汇寄积攒下的生活补助费。当卡车进入零陵县城入口处，看到公路上放倒了三棵捆在一起的杉树。当汽车停下，知青下车搬树时，突然从公路旁零陵县东方红小学校内射出密集的步枪、冲锋枪和机枪子弹，射向卡车。开枪的是县城内的一个群众组织。当武斗人员冲到车前，命令车上还活着的知青下车后才发现，他们把这些知青当作对立派组织伏击了。

在这场误杀中，一共打死了 9 个知青，伤 15 人。

这次惨案引起社会强烈震惊。返城的下乡知青和家长们纷纷向湖南省革筹、湖南军区和中央呼吁，要求严惩杀人凶手。零陵的这个枪杀知青的群众组织慑于罪过很快解体。数日内，整个前进公社所有知青全部撤离。

8 月 19 日，连结交通要道的江永大桥被炸毁，对外联络中断，长途汽车停开。

## 第 850 回：拦火车，知详情全部放行　长沙市，众知青义愤填膺

8 月 19 日深夜，下放井边公社东田大队知青江同厚，在睡梦中被人捅醒，他摸出高度近视眼镜带上，才看清捅醒他的是农民朋友三苟。三苟慌不择言，忘记了刚学会的几句长沙话，用江永土话结结巴巴讲：

“沙皮梦（婊子崽），刚快刷来祝锡（赶快起来走啊），刚社买冰社露谷（公社民兵设路卡），吞干祝莫贺嗒（明天就走不了啦）！

熟悉江永土话的江同厚，惊乍坐起，操起床头一口皮箱，往肩头一甩，闷头就往大山方向跑。深沉的黑暗中，他跌跌撞撞死命狂奔。三苟目送他走远，摇头叹气：“唉，他不会回村来了……”

大山在东田大队西北，方向是不会错的，几天来逃走的路线在知青中已酝酿讨论好久了，只有向西北，沿古宅、大畔向全州跑，自古以来，这是唯一的一条湖南通广西商道，尽管崎岖，为了逃命，也顾不得许多了。

江同厚走近大山山口杉木冲，才发现眼前已经黑压压站满一坪知青，回望朦胧，各个方向田间小道上，还见三三两两有人在赶过来，肯定是知青！

眼前是一条从谷地一直延伸到广西十万大山深处的羊肠小道，到全州火车站，最少有 100 公里！

夜已经深了，坪里已经聚拢约 300 名知青，他们来自附近的红旗公社、井边公社、厂子铺公社。苍茫中，站在人群边缘的知青，听到了人丛中心传出的一句短语：“连夜翻山进广西！”约 300 人的队伍很快排成单行，在仅有的几支火把引导下，向大山深处，向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蹒跚而去，经古宅、大畔，通晚在羊肠山道上跋涉。第二天，队伍来到广西灌阳县，第四天，强行军到达湘桂线全州车站。

铜山岭农场那群知青经广西麦岭，几经辗转，回到长沙。稍后，走同一条路线的马河、白水、桥头一大群约 200 名知青，在接近麦岭的县界附近遭到民兵拦截，有一位叫文丁的知青，戴着军帽，敞开军装，露出腰上捆扎的一排手榴弹，作引爆状。民兵吓懵了，缩到一边，一直等到最后一名知青通过关卡，文丁才拔腿去追赶队伍。事后，他抹去额上的汗说：“手榴弹是训练弹。”

知青离开江永的另一条主要路线是从粗石江过广西龙虎关，经富川县乘车奔全州或桂林。

这样，江永知青如惊弓之鸟从三个方向逃逸几天后，陆续在郴州、全州、桂林火车站开始聚集，尤其是在全州，几天之内，啸聚近千人。

那是一支刚刚脱离了险境的队伍。心情放松了，连日奔波太疲累，车站月台、广场，四仰八叉，躺了一大片。

那是一支乞丐般的队伍。原本破旧的衣衫，更加褴褛不堪，原本枯干的面庞如今更加黑瘦，能凑出来的钱、粮票，都已凑出

来了，再饿，忍着吧！

那是一支充满青春活力的队伍。他们已经站在铁路线这端，希望——在铁路线那头的长沙天心阁城头闪烁："只要上了火车，往北开，就好办。"

偏偏是在文革混乱时期，火车不正点。捂着咕咕叫的肚子望啊，望啊，该进站的 256 次没有来；抿抿焦干的嘴唇到问询处去查询啊，得到的回答是 256 次又晚点。

"何时到？"

"不知道！"

一天过去了，又一天过去了，一大群一大群知青仍然在车站滞留、等待，埋怨变成了愤忿的叫喊，惊弓之鸟变成了笼中的困兽。8 月火爆的阳光，照晒着全州车站火爆的场面。一条由行李包组成的"警戒线"，出现在月台上，"是知青的站进来，不是知青的站出去！"

知青们占领了全州月台，大批候车的旅客，有的出于同情，有的出于无奈，退到了后面去，远离是非地，谁能惹得起千名知青一声吼？

第三天，来了一趟车，256 次。呼啦啦站起来的知青们，很快泄了劲。每节车厢都塞满人，车窗关着，车门不开，不见乘务员，怎么上？有几扇窗，刚打开，看月台上的阵仗，赶快压下，不留缝隙。三分钟后，列车启动了。

又来了第二趟，56 次！还没让人明白是怎么回事，惊心动

魄的场面出现了：

所有拿着扁担、杆担（柞木的，两头尖，在江永用来挑柴把）的知青，一齐扑向车窗车门，一场车下、车上攻守战瞬时拉开，车门撬开了，往上拥。车窗打烂了，往上拥。最孱弱的女知青，都成了无畏的战士……车厢里在混战，一伙伙男知青，把郁结在胸的积愤，发泄到曾经阻拦他们上车的乘客身上，他们像被撩拨得无法自制的雄狮，在车厢两头乱窜，寻找仇恨发泄的目标……

全州全线停摆。知青挤上了 56 次。

当晚，火车启动，第三天，火车缓慢爬近衡阳站，突然“咣啷”停下来，惊魂甫定的知识青年，都清晰听到了临时停车点上空传来的广播声：

“56 次在全州遭暴徒袭击，我衡阳抗暴指挥部奉上级命令，将对暴徒采取革命行动。凡曾参与殴打、洗窃乘客的歹徒，投案自首……勿谓言之不预……

把头伸向窗外，我的妈呀，在一片开阔地，环绕列车右侧，一队身着工装，荷枪实弹的民兵，站成了一弧形散兵线！一排明晃晃的刺刀，闪着寒光。

原来，56 次列车遭“暴徒”袭击的电讯，当即报告给了长沙铁路局，随即上报至北京。按有关方面指示，衡阳设立了“抗暴指挥”部，拦截列车，要严惩“暴徒”。“抗暴指挥”部迅速调动武装民兵，将列车拦截在衡阳站，准备“采取有力行动,坚决打击暴徒的嚣张气焰”。

没有人指挥，没有一句言语。车上的男知青一个接一个从每个车厢走出去，迎向刺刀，女知青或守住行李，或探身窗外……

衡阳“抗暴”围住了男知青！突然，知青群中蹦出一个瘦高个伢子，跳上了身后的小土包，面对弧形散兵线，扬起自己的右臂，那赤裸的臂，正缓缓地向下滴血，那是打碎窗玻璃挤进车厢，被玻璃拉开的血口，从手腕到臂肌，串串如婴儿鲜红的嘴。他在喊：“我们是长沙知青，一切只为回长沙与父母重聚？谁不相信？谁看见过伤口滴血还互相照应的暴徒？谁看见过拖儿带女的歹贼？谁看见如此贫穷的强盗？……”

他的左臂，指向脚下一堆污糟的棉絮，那是被翻检的他的全部行李！

有认识他的知青高喊：“周长生，讲得好！”

全体知青一齐狠命鼓掌，掌声惊起远黛群鸟，扑嗖嗖斜穿铁路线，向着一方蓝天冲逸而去……

现在轮到“抗暴”傻眼了：无法分离，无法甄别；到车上找乘客调查，无法取证——没有人敢于指证，更有乘客同情知青们的遭际，不愿落井下石。衡阳“抗暴”的头儿们，了解到知青逃亡的原委、艰苦的历程，做出了明智的抉择：

“全部上车，放行！”

还有一队知青，是江永相邻牛路口的。8 月 19 日，牛路口知青点山下村落里，一阵狗叫枪响，惊醒了熟睡的知青。好一阵冥寂之后，21 岁的知青杨大彬听到自己住的三号宿舍大门被急

骤敲响，跟着闪进来两条人影：

“嘘……我们是江永的长沙知青，冒死来通知你们，江永已经开始杀知青，17 号杀了伯明……刚才差点被农民抓住……你们赶快逃……”

一阵喘息，甩几句长沙乡音，两位知青匆匆转身又没入黑夜之中。

两天之后，荒坡上的知青二号，灯火通明，留在牛路口的 37 名知青，都坐在统铺上，焦急地等待最后的消息，终于有人敲门了，进来的是公社武装部赵部长的族弟，他在灯火下找到杨大彬，马上把他拉到禾堂坪里，悄声对他说：

“赶快走吧！已经决定今晚要杀你们全体，是我哥哥用缓兵计，要他们明早来。这是哥哥偷偷给你们开的路条。”族弟紧紧握住杨大彬的手，五大三粗的杨大彬，忍住夺眶泪水，急促地问：“为什么要杀我们？！”

冷月当空，月光如水，洒在杨大彬那张莫名其妙的脸上。他转身向宿舍跑去……

当晚 22 时，这支 37 人的知青队伍，向西南出广西永安关，然后晓宿夜行，过汶市，直插广西全州方向，一路上，他们多次遭到地方武斗组织的拦截、搜查，都凭公社武装部一纸路条，侥幸过关。

脚下就是铁轨，前面就是全州，离车站只有六公里了，杨大彬和他的弟兄姐妹，却发现他们寸步难行了。桂林两派的武斗，

正在全州郊外真刀真枪进行，一列从昆明开往上海的列车，满载乘客，欲进不能，一天又一天，他们冒着吃枪子的危险，派人与列车上的司机、车长、乘客周旋，让他们上车，得到的回答，不是“开动不了”，就是“开动也不能上。”知青口袋里仅有的一点粮票，是湖南省票，在广西买不到吃食，只有挨饿，月台上水龙头烂了，没有水喝。3 天过去了，绝望的知青，一个个拎起简单的行李卷，在运行绿旗扬起的时刻，踏上路基，越过车头，16 位男知青在前，21 位女知青排后，一个接一个，躺到了铁轨上。杨大彬躺第三个，他前边的两位，一个叫刘正林，一个叫王宏义。回不了长沙，饿死是死，压死也只是一个死，卧轨！没有开会议决，没有蓄意鼓动，要想回长沙，只有以死相搏，压过来了我报销，压不过去我上车。蓝天白云啊，请为知青作证！

3 个钟头之后，从全州方向运来五节加挂车厢。两天之后，37 名知青回到长沙。他们中有人随即在街头贴出大字报：《道县告急！知青告急!》

知青的大逃亡大致分为三路：一是经道县翻双牌山去广西全州；二是走麦岭；三是翻过都庞五岭去广西灌阳。

翻越都庞岭的多是井边公社和大远公社的知青，当地人和广西灌阳的农民有一条往来的山路，因人迹罕至，只有本地人知道，翻过五座山岭就到了灌阳。井边知青先是十几人同行，沿途又汇集各路零散知青四十多人，山上叉路多，走到悬崖绝壁时幸遇灌阳方向而来的山民指引；虽几遭民兵拦截，几位领头的知青沉着

冷静、机智应对，又有公社开出的红头证明作保，一路算是有惊无险。

走了一天一夜后，队伍中发出了一个女生的虚弱的声音：

“我再也走不动了，你们别管我，快走吧。”她说着身体直往地上倒。

“这哪行？既是一起出来就得一起回去！”

领头的周哥牵起她的手就走，另一名男生黄哥在她身后护着，俩人一前一后的不管山路多险，都未将她抛下。

有一对恋人，女知青体弱，她能爬上千多米高的都庞岭就已经拼尽了气力，何况连续翻过了几座山岭，男生挑着两人的行李，边关照体力不支的女朋友，已经累得咳出了血。队伍中一个不满周岁的小孩，在母亲怀里时不时发出饥饿的啼哭。其他人互相搀扶着前进，体力几乎耗尽。

八月酷暑，天山上却冷风肆虐，多数人行前匆忙，衣服未带足，有几个知青听说邻队杀了四类份子，还有十几个知青被捆去了公社，吓得连刚煮熟的一锅饭都不敢吃了，拔腿就跑，哪还顾得上拿冬衣。危险眼见过去，衣着单薄的一群人却难挡山上的风寒。饥寒交迫的队伍每前进一步已经显出了万分的艰难。

在前面探路的几个男生发现半山腰里有户农家，赶忙上前交涉，请求弄点吃的东西。山民非常同情，马上烧火做饭，还特别杀了一只鸡。饭后为他们烧了一堆火，男生围着火堆睡在地上，女生享受优待进了里屋；老俩口和三个女儿彻夜未眠，守护了他

们一夜，第二天还煮了很多红薯给他们带在身上。知青感激涕零，各自掏出仅有的一角两角钱凑拢，以表感谢。

走其他路线翻山越岭的知青并未有如此好运，遭遇民兵的突然袭击挨打之事时有发生。为躲避民兵的搜捕，很多人专抄荒草荆棘里的小道走，弄得遍体鳞伤，衣不遮体。

江永大桥炸毁以后，从道县往永州成了一条回长沙的捷径。白水公社临近道县，先有一队人侥幸混过去了，第二批走的 4 名男生险些丢掉了性命。他们搭上一部过路邮车，结果在暴乱中心寿雁被抓，关了 6 天，每天惨遭一拨一拨的民兵殴打。那些人用扁担用砖头将几个手无寸铁的知青往死里打，4 人被折磨得毫无动弹之力。命悬一线时竟出现了奇迹，当地有一人认出了他们，这人的兄弟曾在白水搞过社教，他往来白水多次所以认识。他找来了一驾马车，装满稻草，将 4 人藏进稻草里戏剧性地救了出去。更幸的是，他懂草药，随即用草药为他们疗伤，4 人得以保住性命。

他们写信给留在白水的知青：“我们被抓，生死未知，千万不要再走这条路。”

白水知青接到信后马上找到 6950 部队的政委，请求派人去道县营救遇难者。一位刚刚新婚的连长和几名军人到达了道县，在制止两派的斗争中，那位新婚的连长不幸罹难。

军人之死使事态的发展更为险恶，部队官兵坚定了制止“暴乱”的决心，加强了对知青的保护。他们四处搜索，寻找滞留的

知青。未有逃亡的白水知青当时正在田里割稻，模样装束与农民一般无二，致使军人未能发现。

白水知青中素有一群思想者，遇事喜欢思考、讨论，在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中寻求答案。危难当头，他们固守原有的精神信仰，还心存对于事态的一种观望："抓革命促生产的知青难道会被杀？"本村农民说不会，外队的民兵蜂拥而来，将他们赶上了一个山坡。

在经历了一场灵魂和肉体备受摧残的"假枪毙"之后，他们有了清醒的计划，两人一组分散而行，在一个阴雨的早晨，穿上蓑衣、提着篾篓、将斗笠遮住半边脸，从民兵的眼皮底下混了过去。几拨人在县武装部集中后又在军人的帮助下汇集马河等公社滞留的知青一起坐车离开了江永。路上不断遭遇武力堵截，甚至出现了枪口对着枪口的紧张对峙，凭着他们的勇敢机智最终还是闯了过去。

如果没有部队的保护，没有善良的农民的帮助，6000 长沙知青的命运必当重写。

王百明死后的三、四天里，京广线沿途的郴州、衡阳、株洲以及广西的全州等地火车站所有的月台上，全被逃难的知青占据了。正值时局混乱，列车晚点，知青上不了车。这群人几天的疲于奔命，已是衣裳褴褛、形同乞丐，黑压压的一片，过路司机根本不敢停车。

8 月底，历经千难万险的 6000 知青终于从各路回到了长沙。

那是一幅幅怎样的流民图！蓬头垢面、拖着褴褛行李的人，三、五人一组、几十人一队，既看不出年龄也难分出性别，爬煤车爬货车回来的更是面目全非。家长最初不敢正眼看自己的孩子，看着就要落泪。

知青被杀的消息传到长沙，城里的知青悲愤异常，同仇敌忾，统一成立治丧委员会，在黄兴路的燎原电影院设立了灵堂，各知青造反组织的头头担任治丧委员会成员，其中有“红一线”的万正凡、“反迫害”的万力、“山鹰战团”的陈立主、“斗批改”的黄萍根等。

在可以容纳几万人的体育馆里，回城知青为王百明等人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会后，上万人的游行队伍凝成的巨大悲痛，给动乱中的长沙城添了一层厚厚的阴霾。有志者组织成立了“红一线”宣传队，将知青的种种遭遇编成了节目，演出场场暴满；并自筹经费办报纸，《红一线报》、《反迫害报》等，一时间影响甚广。“红一线”宣传队编排节目《血的控诉》、《怀抱战友》等在街头、剧院演出，举着血衣控诉和呐喊，使观众产生了强烈的共鸣。

知青的游行队伍从燎原电影院出发，经五一广场、南门口、天心阁、火车站，环游了大半个城区，最后回到五一广场。这次追悼会和游行组织严密，步调一致，规模盛大，社会影响很大，在长沙市是空前的。

湖南省为知青每人每月发了 9 元钱、30 斤粮票。

## 第 851 回：周恩来，五次见广西代表　枪上交，全都要停止武斗

8 月，广西也开始抢枪。8 月 10 日下午，桂林地、市“造反大军”在周兆祥、谢荣杰、刘天偿、刘振林等人的指挥下，夺了军分区武器库和桂林地区公检法军管会、桂林市武装部的枪。以后，灵川、临桂县人武部的枪也相继被抢，被抢走各种枪支 5450 支，各种枪弹 553.52 万发，手榴弹 3126 枚，炮 5 门，炮弹 556 发，其他军用物资 8 件，同时还抢走了大批炸药。“联指”头头被迫逃离桂林。

8 月 13 日，桂林市“联指”包围二塘火车站及炸药库，抢夺武器。

8 月 18 日，广西“422”头头得知有一列运送援越物资的军火列车停在金鸡村.他们经过策划，于当晚 23 时左右，组织了 300 人到金鸡村，抢走了军用列车上的援越军火物资，炮弹 4000 多发，惊动了中央。8 月 21 日晨 7 时 30 分，戚本禹给广西军区的电话指示：

通知航运工总（广西“四·二二”），19 日在金鸡车站附近抢走了 9023 个军内列车炮弹，应如数交还广西军区。如不交还，中央文革就要在北京公布这种错误行动，并进行批判。

并转告两大派，要顾全大局，今后一律不能抢夺援越抗美物资，任何一派抢夺援越抗美物资，中央文革就要公布这种错误行动，并进行批判。

接到中央文革来电责令后，“422”将炮弹大部分交还部队。

8 月 20 日下午 19 时，广西“联指”武斗队从邕江两岸据点向航运“工总”所据守的船只开炮射击，邕江上的“1431 号”和“1404 号”两艘船内装汽油 1426 桶，另有航空机油 24 桶，因中弹全部燃烧。

当晚，南宁“联指”攻打“422”占据的东方红医院和民族电影院等据点。

21 日下午 14 时，东方红医院武斗结束，医院被严重破坏，死 10 人，还有些“422”人员被俘后在别处被杀害。“联指”将 10 具死尸和医院原死尸 1 具，共 11 具，作为被“422”杀害的罪证，现场陈尸展览。

8 月 23 日，邕江大桥被“422”武力封锁。“联指”以“保护邕江大桥畅通”为由，动员所属组织武力攻打“422”设在南宁市邮电局、民族电影院、邕江桥头等处的“422”据点。晚上 23 时 5 分，攻打邕江大桥“422”的枪声响彻夜空。

8 月 24 日凌晨 1 时至 5 时，北京人民大会堂安徽厅，周恩来第五次接见广西“422”和“联指”两派代表。陪同接见的还有戚本禹、黄永胜。参加接见的有广西军区、柳州军分区、6955 部队和 55 军代表，广西自治区党委书记处书记伍晋南、乔晓光、安平生、霍泛、贺希明 5 人。8 月 10 日被打伤的韦国清因病缺席。

周恩来说：“两个月没有接见你们了，今天接见你们。”然后

说："你们'联指'怎么搞的，越搞越不象话了，老进攻人家，越走越远了。'422'你们拦军车，截了援越军火。中央文革通知你们知道不知道？炮弹还有多少没有退？"

"422"代表说："有20箱炸药已取下来，分到各个点去了，所以没交回。"

周恩来："是不是你们用啦？"

"422"代表："拆下炸药。100发炮弹已送回。"

周恩来："没有错了吧？三七炮弹你们拆了20箱。"

"422"代表："对！"

周恩来："你们当时不知道是援越抗美物资吗？"

"422"代表："戚本禹同志说啦，才知道。"

周恩来："是在金鸡车站抢的吗？"

"422"代表："我们当时不知道。"

周恩来："那是向越南方向去的嘛！你们自卫也不能这样，这样做很不对。"

"422"代表："我们错啦！"

周恩来："交回来了，还是听命令的。现在军区支持你们嘛！"

"联指"代表："'422'说的情况不对，我们了解他们还有400发炮弹没有交回，他们抢夺的炮艇能用这种炮弹……"

周恩来："怎么不对，你们方向错了，你们根本不是支什么韦！你们把他们的据点都拿下来了，只剩下了3个了，你们还想把他们消灭呀，这是消灭不了的，你们继续这样干，我们就要军

区把他们武装起来。人家不服气的嘛！广西地处前线，是越南的近后方，我呼吁你们想一想，人家打美帝，你们打内战，双方都没有敌情观念，无动于衷。你们这样干，是不是要美帝进来，让美帝飞机在南宁上空转一转？我们号召你们上前线，你们才能团结起来。你们双方没有一点自我批评的精神。内战怎么停止？你们有没有诚意停止武斗？你们能不能把占领的据点退出来？”

“联指”答：“我们早就有诚意。”

“联指”代表说：“总理，我是监督小组的，刚从南宁来，我想如实向总理反映情况。”

周恩来：“好，我只听你一刻钟，怎么个‘如实’法。”

“联指”代表开始汇报南宁的武斗情况……

周恩来：“你们报战况，我不感兴趣，打内战有什么好报的。想一想，进攻人家对不对？”

“联指”代表：“我们进攻他们不对，但事实是他们先打我们，昨天还在造谣楼开枪打伤我们‘小八’红卫兵……”

周恩来问：“你哪天来的？”

“422”代表：“他是 8 月 8 日来的。当面欺骗总理，滚出大会堂！”

周恩来：“你别这样搞，想压人家怎么行？让人家讲话。”

“联指”代表：“我是 8 月 13 日来的。”

周恩来：“哪天到的？”

“联指”代表：“13 日到。我是坐飞机来的。”

“联指”代表接着又讲“422”怎么进攻他们……

周恩来说：“你们总是这句话。我诚恳要求你，讲以前，先想一想，这样搞武斗符不符合毛泽东思想？你们要说服下面，不要搞武斗，……”

“联指”：“我们和‘422’的矛盾，大量的是人民内部矛盾。”

周恩来：“但你们却把他们当作敌我矛盾来打！”

“联指”：“不是这么回事。”

周恩来：“怎么不是！你们都没有敌情观念。对你们的办法就是要把美帝引进来，打敌人了，你们就不打了。”

“联指”：“内战是他们挑起的。……他们不抓革命促生产，全面罢工，都跑出来了。”

周恩来：“你们把人家赶出来嘛，怎么上工？你们想消灭人家。你们两派达成协议最早，我不断地注意你们，但你们老是没有停止内战的愿望。”

“联指”：“我们主动要求……”

周恩来：“你们在哪一地方提出？现在伍晋南不在，你还说谁操纵，你是哪里的？”

“联指”：“我是西大的。”

周恩来：“哦，是大学生。”

“422”：“他不是学生，是西大教师。”

“联指”：“我是 65 年毕业的，才当两年教师，和学生差不多。一直参加文化大革命。”

周恩来："你指挥武斗吗？"

"联指"代表："我没有，我是被赶出来的。我也从来没有打过人，我们一贯反对武斗。"

周恩来："你们在这里还搞武斗，怎么在家不搞？"

"联指"代表："我们从来没有搞过武斗。"

周恩来："你们不是攻了邕江大桥吗？"

"联指"代表："他们10号就占领了，用砖头、电网封起来了。"

周恩来："交给解放军不好吗？"

"联指"代表："解放军经过那里也被抓走。"

周恩来："你是被赶出来的，那在你那个单位，一定是少数派。我问你，你们'联指'在南宁占多少地方？"

"联指"代表开始汇报西大情况……周恩来再次打断他："你老是讲西大，你代表'联指'还是西大？"

"联指"代表："我是西大的，我代表'联指'。"

周恩来："我问你！'联指'占了多少地方？"

"联指"代表："我们占了区党委、市委、市人委、桂剧院等，'422'占领展览馆、广西日报社、百货大楼、工农兵饭店、反修医院、东方红医院、西大、医学院附属医院等。他们还要打开工农兵饭店放火烧。"

其实，周恩来对广西的情况还是很了解的，他继续问："你们有多少汽车？"

“联指”代表：“具体数字我不了解。”

周恩来追问：“你能代表‘联指’吗？”

“联指”代表：“各单位的汽车是用来抓革命、促生产的，有个汽车司令部，他们动汽车也是用来抓革命促生产的，有过几个例子，过去扶绥的汽车运生产资料经过朝阳广场时被‘422’抢去，连司机也拉到造反楼去，司机的钱包、凉鞋都被抢光。”

周恩来：“不要讲具体例子。你为什么不回答数字？”

“联指”代表：“我是外单位的。”

周恩来：“你避开不答。”

“联指”代表：“我不是避开不回答，我不了解具体数字，我想如实向总理汇报情况。”

周恩来问了“联指”的人数，稍停，又问：“你们有多少汽车不肯说，那你们有多少枪支弹药？”

“联指”代表：“具体数字不清楚。”

周恩来：“又是不知道。那你们用什么来搞武斗，进行自卫？”

“联指”：“我们全部上交了。我们听军区的话。武装部发了个通知，所以我们全部交了。”

周恩来：“全部上交了？”

“联指”：“绝大多数。”

周恩来：“那你们武斗是用冷武器，不是热武器啰？”

“联指”代表：“用木棍、钢叉等武器，也有一些民兵武器，军区都收回去了，但‘422’不交。”

周恩来："你们把武器封存起来，武器上缴，撤离据点，你们干不干？"

"联指"："干！"

周恩来边看材料边询问 8 月 19 日"联指"调动 60 部汽车攻打 449 仓库的事情，"联指"代表承认。

周恩来又讲了双方抢枪的情况后说："这样内战势必越打越大。"

"联指"代表表示："我们愿意全部交还，停止内战，不搞武斗。我们正打报告给总理。"

周恩来："你们一边打人家，一边打报告。是不是还要打一仗？"

"联指"代表："一向都是他们先打我们。"

周恩来念了"联指"抢迫击炮、手榴弹数字后问："你们愿意不愿意交出来？"

"联指"："是他们先打我们，在北京他们还打我们！"

周恩来："你们在北京可能被打，你们在南宁、柳州打人家嘛！你要消消气，要顾全集体，要大公无私，你们能先公后私就了不起了！"

"联指"说："听总理的话。总理说的话我们坚决拥护……这是刚来的电话，8 点 05 分南宁开来的 9025 次列车在柳州 538 工地，被他们大约 30 人抢了。"

周恩来："什么武器？"

“联指”：“是军用的，军用物资……”

周恩来：“把武器封存起来上缴，允许人家回去……”

周恩来又问：“武器全部封存，不搞武斗。以后交还给军区行吗？”

“联指”代表：“要双方都交才行！”

周恩来：“那当然。”

“联指”代表：“我们是受害者……”

周恩来：“可能你是受害的，我看你的气很大。……现在美帝国主义正在打仗，你们有气，应该打美帝，你愿意去吗？”

“联指”代表：“我愿去。”

周恩来：“那你报名去吧！到越南去打美国鬼子，但你们首先要停止内战。”

周恩来又开始问“422”的情况，问他们占了多少地方？有多少人？然后说：“你们在南宁人少。但占地方倒不少。”

“422”：“我们的人都被他们赶出来，回不了工厂。”

周恩来：“工人从多少个单位被赶出来？”

“422”代表：“从 165 个单位被赶出来。在外地有 1000 多人，在本地有一至二千人。有些跑到指挥部，有些在其它地方，无法统计。”

……

周恩来：“学校你们是占优势嘛。”

“422”：“西大、医学院我们占优势，红卫兵总数加起来，

我们也占优势。”

周恩来：“你们先停止内战，封存武器，现在解放军支持你们嘛！都回本单位去，占的地方退出。你们干不干？要为大局着想，共同对敌。个人受点害算得了什么！阶级兄弟吵一吵算什么！我劝你们消消气，往前看，把阶级仇恨对准敌人，怎么想不开？这是很简单的道理。要把广西局面稳定下来，第一步停止武斗；第二步把武器封存起来；第三步被赶出的同志欢迎他们回去。他们的组织还可以存在，不同的观点可以辩论，首先西大‘革联’欢迎‘能闯万重关’的同学回去，搞个试点。观点不同，可以辩论嘛，你们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方面，要欢迎他们回来，慢慢地走向大联合。在这方面，你们要做个模范。”

周恩来转过头来对南宁机务段的“联指”说：“你们要欢迎‘422’的人回去，不要吵架，不要扣工资，保证他们生活、工作。”

“联指”答：“愿意。”

……

周恩来：“你们做个模范，他们回来，应该发工资，成吗？”

“联指”代表：“可以，我们早就欢迎他们了。”

周恩来对“422”代表说：“你们西大就欢迎他们回来嘛！”

“联指”代表：“他们把我们所有的衣报、蚊帐、被子都烧了，他们还叫我们‘联匪’，回不去。”

周恩来：“以后不要这样叫了。你们衣服被烧了，家庭困难

的可以给助学金。”

“422”代表：“8 月 2 日他们跑到西大杀我们一个人……”

“联指”代表：“他造谣!”

周恩来：“过去的账不要算了吧？！机关谁可以代表说服他们回来？”他指着“联指”一位姓冯的代表问：“你是市委的吧!”

那人站起来说：“我可以代表说服。”

周恩来又点“联指”农民代表：“你是农民的，可以说服农民不进城搞武斗吗？”

“联指”代表：“我们郊区农民从来不进城搞武斗，但‘422’这次还是煽动 600 个四清下台干部进城搞武斗。现在我们郊区的蔬菜都运不进城，都烂了。”

“422”代表：“我说两点，一、‘工总’被打成反革命……”

周恩来打断他的话说：“这点我后面还要说的。”

“422”代表要求释放被关了 4 个多月熊一军和铁路的丁有义，周恩来同意，说：“这两个人可以释放。”

## 第 852 回：桂驻军，转向支持四二二　八二三，广州“旗派”冲军区

周恩来又对柳州代表说：“你们不能调外单位的去冲铁路，要保证铁路通行，你们同意不同意？”

双方代表：“同意。”

周恩来又批评“422”说：“你们还在抢野战军的枪，这简直不象话。”

柳州“422”代表：“他们把外单位的人调来，占领了南站北站，把我们的人都赶出来了。”

周恩来问：“不是都军管了吗？”

柳州“422”代表：“但他们支持‘联指’。”

周恩来：“支持错了所以没有保障，如果支持对了就不会犯这个错误。南宁铁路怎么样？”

“联指”代表：“我们没有停过车，主要的是柳州。我们是管南宁到凭祥的。”

周恩来：“要保证南宁这段。”

“联指”代表：“完全可以保证。”

周恩来又问桂林“老多”：“桂林呢？你们占优势吧！”

“老多”答：“桂林这段可以，但全州那段被他们卡住了。”

“联指”代表：“我们没有卡。”

周恩来：“还是这一条，不许调外单位的去干扰，观点不同可以保留，不许搞武斗，特别是不准调合同工来，这点可以做到

吗？”

双方：“可以！”

“老多”：“全州那段他们调外面的人，架机枪打，还扔手榴弹。”

周恩来：“铁路两派观点可以保留，但不许打。你们打内战打成什么样子，比军阀时期还厉害。以后不能动员人力干扰铁路，破坏铁路，这是命令！”

“老多”：“主要是军分区、武装部的问题，他们还搞什么‘五县联防’。”

周恩来：“中央决定，铁路由野战军管，谁都不许干扰，不要搞串连。铁路的不能到外单位串连，外单位也不能向铁路串连，军管后不能支持一派，打击一派，首先把铁路恢复。你们都在讲援越抗美，但铁路不通怎么行？任何地方，任何人，都不准动员人去攻占铁路。柳州工交兵团要和铁路组织分开。现在铁路好多地方不通，这种现象不能容忍。还有的夺解放军的枪，不像搞文化大革命。铁路两派组织不同观点，可以保留，但不能打仗。铁路不通，给越南人民什么印象！你们应该主动去做工作，保证铁路畅通。你们要把仇恨集中到美帝、苏修，不要打内战。你们老多在桂林表现不错嘛，你们应做两边的说服工作，你们是造反较早的一个。”

“老多”：“我们没有打。”

周恩来：“‘五县联防’有材料没有？将来发给军分区、武装

部来集训的人学习，总结教训。”

戚本禹插话：“‘422’不要去轰人家，打自己人，可耻。‘422’在北京围攻他们，几十个人哄，我亲眼看见过的，打不打我不知道。”

“联指”代表：“他们在京围攻我们，达 11 次之多，有的同志被打重伤。”

戚本禹：“自己人打自己人那是可耻的。”

周恩来：“你们想一想，他们在家里被赶出来的情况。不要光看到北京的。”

周恩来：“‘联指’在南宁、柳州占优势。南宁也有‘422’占优势的，也有‘联指’占优势的。你们双方都要欢迎对方回来。一派占优势的地方，对另一派不要压。桂林‘老多’在桂林有没有压人家的？”

“老多”：“没有。”

“联指”代表：“怎么没有？人都被他们赶出来了。”

周恩来：“你们不是也抢东西吗？《广西日报》的东西不是也抢到桂林了吗？你们桂林‘老多’可以建立革委会，做个模范成不成？成立革委会，三结合问题可以和部队结合。”

“老多”很高兴，马上答应到：“好！”

周恩来：“军队过去没有支对，压制了‘422’，现在看清楚了。两个月来，他们还是有觉悟的。”

戚本禹插话：“军区认识很好。”

周恩来批评“422”说：“现在改变了，表示支持你们。‘联指’过去压你们不对，你们抢援越物资也不对。你们到京西宾馆去，韦国清同志接见你们，把他打伤了，这一点是你们搞的吧？不能说是‘联指’搞的吧？韦国清有错误，他要检讨，在桂林压制你们，曾想调动部队，后来就改了，他也检讨过了三次嘛！你们又去冲就不对了。”

戚本禹插话：“韦国清同志是中央请来的。你们打他，太过分了，要作检讨。”

……

周恩来问伍晋南：“伍晋南同志，打韦对不对？”

伍晋南：“打是不适当的，打是错误的。”

周恩来：“你们看，你们是支持伍晋南同志的，伍晋南也说不对。领导同志是比较注意的嘛。你们青年人，火气大一些，气愤起来，一下子打了两下啰！（笑） 过去你们受压制，现在不能再反过来压别人。”

戚本禹插话：你们要这样，很快就会走向反面。

周恩来：“7 月份双方达成《十条协议》，《十条协议》我首先送给伟大领袖看，伟大领袖毛主席看了很高兴，说这很好嘛，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了，可是被破坏了。南宁打的最凶，其次是柳州，‘联指’人多一点，对‘422 ’你们压得多，他们不得不抵抗，‘422’不得不抢枪，这方面要多负一点责任。搞成那个样子，不像可靠的后方。现在，先由解放军隔开，把武器封存起来，

然后拆工事。否则，铁路不通，你们一个也回不去。”

戚本禹：“铁路要成为独立系统。”

这时，被叫进来的柳州“联指”旁听代表进场，周恩来对柳州“工交兵团”说：“你们为什么到铁路去？”

柳铁“联指”：“柳州铁路有个车辆厂参加我们兵团。”

戚本禹：“铁路的要归还铁路管，你们不要去管了，铁路的要成为独立系统。”

周恩来：“你们要把车辆厂的少数工人赶出去，这不行。……他们机务段人多，他们是小包围，你们‘联指’是大包围。”他用手势比划着说。

“老多”：“最根本的问题是军区支左问题。”

周恩来：“我同意你的说法，以后军区要改变态度。”

“422”代表：“我们南宁有 1000 多人在展览馆、造反楼等地方，没有饭吃，没有水喝。”

周恩来：“军区给你们解决。‘422’占的展览馆、造反楼、医学院、广西大学没有粮，军区给送去，但你们不要抢。”

服务员送来一份电报，周恩来看后说：“这里有新华社来电，你们‘联指’抢走新华社小汽车、摩托车，叫人家没法工作。失去人心，要走向反面。你们的行为把军区都教育了，感到支错了。”

“422”代表：“他们还绑架医疗队 12 人，重伤 4 人，在 303 医院。”

周恩来：“还没有放呃！医疗队是我派去的，怎么也抓了？

要立即送交军区，保证他们的活动自由，人身安全。”

“联指”代表说：“我们放了，送往军区招待所，军区可以作证。”

周恩来问：“军区收到了没有？”

广西军区副司令员徐其海回答说：“没有收到，‘联指’把军区的人和医疗队都送到东方红医院了，现在还困着。还扣了魏副政委和孙主任。”

周恩来：“你看看，军区也说了嘛，你说送军区了，可军区说没收到。你们就是不老实。你们犯了错误，失去人心，你们的行为把军区的两位同志教育清醒了。”

周恩来这里说的“两位同志”是指广西军区的王希永和徐其海。

“联指”代表：“你听我讲。”

周恩来：“我听你讲什么？”

“联指”代表说：“首都医疗队支持‘422’，拉一派，打一派，不上我们那里去。”

周恩来：“你的态度不对嘛，我不听你啦！你们的伤员有军区医院帮你们医。他们伤的人很多，没有办法，只靠我们派去的医疗队，你们又把医疗队抓了。军区支持你们就错了嘛！”

戚本禹对“联指”代表说：“医疗队在北京是一张白纸，不带观点下去，到那里去同情他们，为什么不同情你们？这说明什么问题？你们好好想一想，你们太不得人心了。”

“422”代表：北京去的红代会，武汉‘三新’的同志是搞调查的，也被他们抓。

戚本禹：“早就说过了，叫他们不要去，要叫他们回来嘛！北京的学生不要去了，停止串连，劝他们回来。武汉‘三钢’、‘三新’也要回去。”

周恩来：“‘三新’不是响当当的吗？武汉的问题还没有搞好，怎么到广西去搞？”

周恩来对“联指”说：“总之，医疗队、新华社、外地学生，不要抓。”

然后对“422”说：“粮食由军区给你们送。中心问题是要好好与解放军合作，军区过去拉一派，打一派，是不对的。但你们把韦国清从京西宾馆拉出来打，过火了。现在，军区转过来支持你们了，你们是造反派，不要反过来去压人家。你们要帮助他们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共同合作，前途还是走在一起。军区要端正态度，积极支持你们，也帮助他们。军区认识有很大提高，愿意检查错误，很好。军区错了，能改，就要拥护。提出一小撮的口号，主要是指党内，对军队不能用这个口号。伍晋南同志你说对不对？”

伍晋南答：“对，不准对准解放军。”

周恩来：“如果不是这样，就要犯错误。军区支持你们，但不能助长你们的错误。过去你们上了贺的当，对韦过火了……”

戚本禹插话：“也上了霍泛的当。”

周恩来："军区支持你们，也要帮助他们停止内战，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你们决不能因为军区支左，知道你们造反精神旺的地方，又反过来压'联指'。你们要把矛头对准党内一小撮走资派，通过大批判，实现大联合。不是再斗了，矛头向上，要停止武斗。韦国清同志并不认为你们打了他，而改变对你们的态度，但你们不要以为打了他，他才支持你们。你们如果还打，就要走向反面。上海'红革会'开始是好的，以后炮轰张春桥，就走向反面。

戚本禹："你们不吸取教训，你们会很快走向反面的。"

"联指"代表："我们大方向是否错了？我们是在白色恐怖下，冲杀出来最早的。"

周恩来："你们的成绩是不能抹杀的。"

"联指"代表："我们开始也斗争批判韦、乔，只是《红旗》杂志社论出来了，我们根据社论的精神支持韦国清的。根据社论的精神，我们又打倒伍、贺、霍。"

周恩来："你们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不能抹煞的，支持韦国清是对的，打倒贺、霍是对的。贺、霍的问题'422'是有错误的。"

戚本禹："但你压'422'就不对啦！就错啦。

周恩来："对'422'压制就不对啦！你们对的都会给予肯定，错的要指出。"

柳州"422"代表明在胜边哭边说："柳江旅社、柳江饭店打

死 400 多人，把我们的头头也抓了，造反的头头只剩下我一个了，他们扬言抓我。”

柳州“联指”代表：“是他们先围攻我们的战士，并且‘卫东兵团’也去围了，我们没有打死人，但在我们去的半路上，他们就伏击抓了我们 20 多人，打死 1 人，柳江旅社是我们‘财贸兵团’在那里的，他们去围攻我们的同志，后来我们去增援。整个柳州市从 6 月份起死了 10 余人，这个是事实的，我们请求中央派人去调查，没有他们说的那么多。

周恩来：“柳州军分区谁来了，知道吗？”

柳州军分区司令员黄宪：“一中是发生武斗，一个没有死。”

周恩来问：“一个也没有死？你敢保证？”

柳州军分区司令员黄宪：“从 6 月到现在我们统计死 10 人，‘联指’5 人，‘柳造’4 人，老医生 1 人，一中没有死人，柳州旅社死了 1 红卫兵。”

广州军区司令员黄永胜：“黄宪，伤的人明天送到军分区去治疗。”

“422”代表：“公检法有问题，他们有一个‘515 战斗队’专搞武斗，还有‘红色公安’专整群众黑材料。”

周恩来：“有这事吗？”

“联指”代表：“我们有这个组织。5 月份搞武斗以来，我们都没有出去。‘红色公安’是市公安局的。”

周恩来：“对公检法要一分为二，我也见到好的公检法出来

造反，首先要把阴暗面揭发出来，公检法过去受彭、罗影响不少，首先要欢迎少数的回本单位去搞斗、批、改，你们广西问题不能拖下去了。铁道部由 47 军军管，柳州铁路局由 55 军军管。‘联指’有几件事做对了，但反过来压人家就不对了。‘工总’给平反，熊一军、丁有义二人要放出来。”

“联指”代表：“但他们把我们打成‘联匪’也要平反。”

周恩来：“我不是说了嘛，平反，平反！停止武斗；封存武器；欢迎出去的人回原单位；不强占地方；不动员农民进城搞武斗。把这些做了，才能解决广西问题。”

他对“能闯万重关”的代表说：“你们衣服被烧了，将来折价给助学金。凡是工农出身的学生，将来由学校帮助一下。

两个月没有接见你们了，一定有很多事要讲。现在你们双方停止武斗，然后把枪封存，地方和铁路分开，不要破坏交通，要保障铁路畅通，任何一派都不准冲击铁路。今后任何人都不得调动农民进城。要欢迎对方回到本单位，西大做个模范。”

这时，“联指”代表张小秀哭了，问：“那我们是什么组织？”

周恩来说：“什么组织？群众组织嘛，要革命的话，就是革命组织。”

张小秀还在哭。

周恩来：“你们广西人很坚强，韦国清打仗很勇猛，是一个猛将么。这个月一定解决你们广西问题。桂林搞得不错嘛，可着手商量‘三结合’革命委员会。你们‘老多’做得不坏，在广西

是造反派带头的一批，要做两边的工作。”

“老多”表示，一定做“联指”工作，欢迎他们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

当天，驻柳州55军发表声明，支持“柳州造反大军”和“柳铁工机联”。

8月24日当晚，柳铁“联指”即贴出“周恩来824表态罪该万死！”的大幅标语，紧接着又改名“钢联指”。南宁街头则出现大标语：

“周老三，算老几？老子照样打倒你！”

接着在第二天大肆散发号外：“余立金同志传达林副统帅指示：‘广西问题要重新研究，广西联指是革命组织。’”

8 月 25 日上午，周恩来给铁道部军管会电话指示：“为保证广西两段铁路运输通畅，由铁道部军管会找北京铁道学院学生组成两工作组尽快前往广西进行宣传、说服教育工作。”

25 日，广西军区司令员欧致富等在广西军区召见“422”头头，除了作检讨之外，表态支持“422”。

接着，“联指”冲击广西军区，认定军区检讨是背叛行为，揪斗广西军区政委魏佑铸达3天3夜，缘由就是他主持搞了那份检讨。

8月26日，广西两派在北京达成《关于立即停止武斗的协议》。

周恩来“824 讲话”后，广西“联指”驻京代表团门前天天受到“422”人寻衅，又不敢反驳。他们觉得在北京实在呆不下

去，最后秘密分散逃回南宁。周恩来知道后，叫秘书打电话给广西军区，要“联指”代表团回京，并派专机去南宁接他们。

8 月 31 日，广州军区发布〔67〕第二号命令：任命 55 军副军长孙凤章为柳铁军管会主任，55 军机关接管了柳州铁路局的全部领导权。

9 月 3 日，“联指”赴京投诉团 40 人乘火车经过桂林时，遭到桂林“老多”和南宁赴桂“422”人员的非法检查。25 人被绑架，其余下落不明。

再说广州。广州“旗派”中学生8月20日到石井海军仓库抢枪回城时，在三元里遭到伏击，“旗派”认为这是广州军区纵容支持“东风派”的结果，要追究军区责任。于是就在周恩来8月22日接见广州代表后的第二天，8月23日，外地支持广州“旗派”的“战广州兵团”上千人冲击广州军区大院，警卫部队徒手挡住他们，不让他们进去，结果被群众五、六人拖一个战士，都给拖出来了。“战广州兵团”的人源源不绝，冲进了军区大院，冲向指挥大楼。一个警卫连堵住楼梯口，群众还是老办法，几个人拖一个战士，拖一个少一个，拖一个少一个，最后毫无办法。只能看着他们冲进了指挥大楼，各屋搜查，找军区政委刘兴元和副司令员温玉成。只是作战室他们不敢进，趴在窗户看看，见里面确实挂满地图，门口写着“机要重地，闲人免进”，关着门，没有人敢进去。

温玉成还真就躲在里面，躲在作战室的电话楼里。军区大院

的其余大楼群众都进去了，连红旗都插到楼顶上。他们没有找到刘兴远和温玉成，就把出面接见他们的军区第四政委孔石泉劫持而去，次日才被部队设法救出。

23 日当晚，中央文革记者站驻广州记者张景发，搭乘中央机关的值班飞机夜航回京，到记者站驻地花园村 1 号已是午夜。不料，他躺下不久，约凌晨 3 点多钟,周恩来的联络员谢书友就敲开他的房门，急促地对他说：

“快起床,总理让你去汇报，正在大会堂等你。”

他随谢书友急忙来到人民大会堂，周恩来果然已经在安徽厅等候，同在的还有黄永胜和广州“红旗工人”、“中南局联络总部”组织头头。

刚刚接见完广西代表的周恩来，让张景发汇报三元里武斗情况。因为这次武斗与广州军区有关，黄永胜在场，谢书友感到很为难，含含糊糊地刚讲了几句，周恩来便开始批评黄永胜说：“当前的首要任务是大联合。实现大联合不能支一派压一派，更不能靠武斗。”

## 第 853 回：北航夜，操场斗学生喧嚣　吴仙虎，李明清二人死亡

河南开封，由于“824”占据市区，“左派”退守东郊而形成了严重对峙局面。撤往东郊的反“824”组织内部也不平静。其中的学生组织“红造总”多是高中学生，有造反的历史，和郑州的“河南造总”类似。“左司”、“三司”等组织一方面希望以“红造总”为旗帜与“824”分庭抗礼，曾经酝酿成立一个总指挥部，让“红造总”当“主任委员”；另一方面，又对“红造总”不放心，怕他们倒向“824”，出卖他们，又加以排斥、戒备甚至威胁、打击。“红造总”负责人看到这种尴尬局面，认为与东郊的“左派”们难以融洽共处，于是通过解放军从中斡旋。新任 1 军副军长杜恒荣从稳定大局考虑，同意并努力促成“824”与“红造总”举行座谈，也就是谈判。

谈判是 8 月 12 日在 1 军大院里的一个办公室进行的。“824”先声夺人，发言时，俨然一副受降者的姿态，更是以气势压倒了对方。“红造总”的发言则支离破碎，有时几个人齐声嘁喳，有时又都沉默不语，先自乱了阵脚。后来努力抗辩，效果也不大，最后不了了之。

这次谈判唯一的结果是杜副军长答应“红造总”成员撤离东郊，可暂时在空降师 7249 部队西侧的伞塔俱乐部安身，由部队供应 3 天的伙食。

伞塔在开封东南郊，是空降兵跳伞训练基地。逃到东郊的“红

造总”成员撤到这里，给准备在东郊安营扎寨、长期困守的“左司”、“三司”等组织一个不小的刺激，他们曾有人来此骚扰、谩骂。

来到伞塔的“红造总”学生也没有很好组织，大部分人无事可做，爬爬伞塔，聊聊天，对今后的前途一片茫然，总部也无法做出具体的指导和部署，除了少数不计功利、拼命硬干的人，稍精明一点的都不愿再坚持下去了。13 日傍晚，开始有人逐渐离去。7249 部队供应饭食原说 3 天，后来又延长 1 天，不得不离开了。到哪里去？东郊不能去，城里不能去，散伙又不甘心，哪里容得下这近百号人？后来，“红造总”总部负责人做了工作，大部分同学分散离去，只留下不到 20 人转移到西南郊离 1 军驻地红洋楼不远的五一路小学。应该也是 1 军的人推荐或联系的。

8 月 15 日,开封“左派”的武装人员冲进化肥厂附近的开封军分区农场,抢走驻该农场部队的半自动步枪 6 支,冲锋枪 2 支,机关枪 1 支、子弹 1250 发。

8 月 16 日上午 10 时，“824”对开封东郊各大厂的“左派”组织发起攻击。并于当晚同 6093 部队一起进驻了开封拖电厂、开封仪表厂、开封自来水厂。开封“左司”主要负责人、开封“市筹委”副主任周树凡逃至开封县邮电局，被开封县“824”抓住。

8 月 17 日下午 15 时，“824”进驻开封空分厂、开封高压阀门厂。

8 月 18 日下午 13 时许，首都红代会赴汴红卫兵代表、北京

航空学院“红旗战斗队”的学生刘天章和开封一高学生、开封“824”陈旅，被开封东郊“战略村”的“左司”派人员的流弹打死。噩耗传回北航，学校立即炸锅了。北航校革委会成立了数十人的治丧委员会，召开了隆重的追悼大会，追认刘天章为革命烈士。追悼会上，北航革委会主要负责人对天鸣枪为刘天章送行。

追悼会后，刘天章的骨灰放到俱乐部门口灵堂，一些学生将炮打过中央文革的高干子女押来跪灵请罪。

8 月 24 日，恰逢北航《炮轰……》大字报发表一周年。晚上 21 时多，刚从沈阳回来的北航院革委会委员刘建华，头脑里还萦绕着沈阳“八三一”与“辽革站”武斗的场面。他听到楼道

里人声鼎沸，出来一看，原来是 3941 班的吴仙虎在和同班同学争吵。

吴仙虎是工农子弟，北航九系学生，曾经也是老造反，但没有参加北航“红旗”，在文革初期就“跑单帮”，自己干。他在西南地区串联时曾经和清华大学的沈如槐等人认识，并一起成立了“清华北航南下串联小分队”，吴仙虎自任负责人，大闹西南局，抓住西南局书记李井泉不放，逼着李井泉对他儿子李明清的《炮轰……》大字报表态。最后李井泉写了一份表态性的文字，其中说：

李明清是我的第二个儿子。他在北京航空学院写这张大字报我事先不知道。他也没有向家里任何人谈过。后来我看到了同学们抄来的这张大字报，我认为这张大字报是极其错误的，性质是严重的，立即托在北京的同志对他进行批评教育，并且赞成和支持同学们对这张大字报进行彻底地批判。

李井泉

1966 年 11 月 4 日

吴仙虎回学校后，思想发生了 180 度大转变，开始反对文化大革命和中央文革。1967 年夏天，他在北航贴出了一张大字报《谈谈孙悟空》，影射攻击毛泽东、江青、中央文革和北航“红旗”，一鸣惊人，当即受到“红旗”同学的批判和围攻。后来，吴仙虎因为反林彪问题，被同学扭送到北京卫戍区关押，不久前刚从卫戍区放回来，说是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交由

3941 班管理。

3941 班要求他每天写一份检查。8 月 24 日这天，班里的负责人找他要检查，他没有写，因此吵闹起来。由于吴仙虎就不认错，于是 3941 班的同学将他拉到北航东操场批斗。

这时已将近 22 时，东操场的人越聚越多，其中也有许多外地来北航串联的学生，各班也纷纷把自己“管制”的“反革命”拉到东操场上来，其中就有“炮打中央文革”和写过“炮轰……”大字报的西南局书记李井泉之子李明清、地质部长孙大光之女孙茜玲、建材部长赖际发之子赖锐锐、铁道部军管会主任苏静的儿子苏晓前等人。

子夜前后，韩爱晶从院革委会办公室回学生宿舍睡觉，正好路过东操场，看到操场上围着一群人，乱轰轰的，人声嘈杂，便走过去问：

“你们干什么呢？”

有人回答说：“斗争反革命！”

操场上没有灯，黑得很，韩爱晶探头往里看看，看不清被批斗的是谁，但见到有人推推搡搡，就说：“批斗也不能打人呐！”

这时，有两三个同学过来，将韩爱晶推了出来，边推边说：“你不用管！你不用管！你走你的！”

韩爱晶确实太累了，几个同学一推他，就回宿舍了，一觉睡到天亮。

而那几个被斗的学生，先是被批斗，接着就是被殴打，后来就是绕北航绿

园的柏油马路游街。后来人群散去，被批斗者回了宿舍，唯有吴仙虎被一批学生拉到十二楼前继续审问拷打，后来又送到红旗小院“造反大队”的一间空室关押。

天快亮时，有人把革委会保卫部部长戴维堤叫起来，说吴仙虎被送到了保卫部。他去一看，吴仙虎被打得很重，打人者全跑光了。他立即让人把吴仙虎送了校医院，终因伤势太重，死了。

这时，又有人来报告，说李明清也死了。戴维堤和革委会一名委员跑到李明清宿舍，见他躺在床上，戴维堤摸了摸他的胸口，心脏已停止了跳动。同宿舍的学生说，李明清回来后，喝了许多凉水就睡了，天亮时发现他已死去。李明清有心脏病。

戴维堤立即报告了学校革委会的常委们，大家都很吃惊，赶紧上报北京市公安局和卫戍区。学校革委会主任韩爱晶听到死了两个同学的消息，顿时感到全身发麻，不知所措。

上午，电话铃响，韩爱晶拿起电话，听到里面说：“韩爱晶吗？周总理找你！”

韩爱晶赶紧说：“好！好！我听着。”

一会儿，电话里说：“韩爱晶吗？我是周恩来。”

韩爱晶回答说：“总理，您好！”

周恩来说：“怎么回事，怎么把李明清两个学生打死了？”

韩爱晶说：“总理，具体情况我还没来得及问清楚，我马上就处理。”

周恩来：“怎么能把学生打死呢？这个事情要追查凶手，你有责任嘛！你也要好好检查。”

韩爱晶回答："是，总理，我一定认真处理和检查。"

放下电话，韩爱晶真不知道该怎么办，只觉得又倒霉又无奈，随即召开院革委会全体会议，商量解决办法。

过了几天，谢富治通知韩爱晶把凶手送公安局，韩爱晶又召开北航院革委会全体会议。

由于批斗会确实是群众自发的，参与打人的学生也有上百人，有些外地学生打得也很厉害，很难说是谁打死的，怎么判定谁是主要凶手呢？韩爱晶只好说：

"只要是当时在场的院革委会委员，统统去公安局接受审查处理，同时，要其他参与打人的同学主动投案自首。"

当时学校已有军代表，有李华司令和石俊政委。石政委提议匡正芳去，大家提议个了解情况的陪去，最后决定由我负责，徐佛书，张平同去。

学校的军代表石俊政委提议，先由院革委会委员、二系革委会主任匡正芳去卫戍区说明情况，革委会委员徐佛书表示愿意与匡正芳一起去。为了解情况方便，让吴仙虎的同班当晚参与打人的同学张平也去。

保卫部长戴维堤立刻安排车拉着匡正芳三人来到卫戍区，他先进去联系，见到卫戍区支左办公室主任哈斯和另一位干部，郑重其事地向哈斯说明，北航今天实在查不出凶手，但他们有诚意，特派了三位革委会代表前来说明情况，同卫戍区谈判，希望宽限几天时间。

哈斯笑着说："可以，你让代表们留下，你回去吧！"

一会儿，开来一辆后开门的帆布蓬的吉普车，戴维堤让匡正芳、徐佛书

和张平三位代表随哈斯上了车，车就开走了。

戴维堤突然感觉不对头，他急忙在卫戍区门口大喊：

“姓哈的，我们来的是谈判代表，不是凶手，你要听清楚了！”

戴维堤回到北航后，向韩爱晶等人报告了情况。

第二天，戴维堤又去卫戍区找哈斯，同他大吵了一顿。哈斯一点也不发火，他笑着说：

“我也是奉命行事。你们也替我想想，首长们命令我抓凶手，不这样你们什么时候交出凶手？你快回去抓出真正的凶手送来，我们就放人。”

再说匡正芳三人被带到功德林看守所。车停后，屋里出来两个军人，打开后车门喊了一声：“哪个是匡正芳？”

匡正芳答：“我是，”

随后下车跟他们进到办公室。军人命令匡正芳面壁站好，匡正芳不从，大声说：“我是北航革委会的，来反映问题的。”

一个军人上来，一把抓住匡正芳的胳膊往后一扭，向前往墙上推，匡正芳头“咚”的一声撞在墙上，疼极了。随后就是搜身，将他的学生证、钥匙、钢笔和几角钱，统统放入一个大信封里，让匡正芳在信封上签字。签字后，匡正芳大声地斥责道：“你们随便抓一个革委会的委员是犯法的！”

一个军人从正面朝他胸部猛击一拳，然后叫他拿着他们给的被褥跟他们走。匡正芳不从，一个军人扭着他的胳膊就拽走到了牢房，打开牢门将匡正芳推了进去，被褥一扔，将牢门反锁。

匡正芳这个怨呀，活了 22 岁，一个共产党员，系革委会主任，就这样不明不白地进了共产党的监狱。他思绪万千，怨恨自己，“自己不搭界的事为什么要去充好人呢？”他也怨恨戴维堤，为什么把他当凶手送进来，真不是个玩意儿！

第二天早上提审匡正芳，一位年纪约有 50 左右的军人提问，一位女军人做记录。

匡正芳反复强调：“我是革委会派我来向总理办公室讲明情况，我们正在查找凶手，一

旦有结果会把凶手送来的，你们凭什么抓我，放我出去，你们是犯法的。”

但是没用，他们一定要匡正芳交代打人致死的经过。匡正芳告诉他们：

“我真的不知道，你们不要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回到牢房，匡正芳要来了纸和笔，给毛泽东，周总理和谢富治写申诉信，而且每封信结尾的“毛主席万岁”和签名他都是咬破食指用血书写的。

当天下午，他将三封信交出去了。

关进去的第三天，匡正芳宣布绝食，整整一天没有进食也没有喝水，但没有人理他。

晚上，一位四五十岁的干部神秘兮兮的叫匡正芳出来跟他走，走进走廊尽头的一间房间后，那位干部把门关上，便坐在床沿，脱鞋脱袜，倒水洗脚，并叫匡正芳也坐下，对他说：“他们不让向外界透露你们关在哪里，我支持你们北航‘红旗’，这里有信纸，你写封信给同学，叫他们给你送脸盆，牙膏、牙刷和大衣，东西送到安定门外功德林 1 号，这样学校就知道你关在哪里了。”

他一再催匡正芳快点，说明天他就寄出去。

洗完脚，那位干部将匡正芳送回牢房，还使劲“碰”的一声将牢门关上，大声喊了一句：“老实点，不许乱说乱动！”

匡正芳绝食两天，进功德林后的第四天下午，一位干部和两位穿白大褂的军人走进他的牢房，告诉他，他给中央领导写的信已经转走了，他们也向上级反映了匡正芳的情况，并劝说他要爱惜身体，并警告说：“如再不吃饭我们就灌肠。”于是，晚上匡正芳开始吃饭，结束了绝食。

第五天晚饭前，匡正芳收到学校送来的牙膏牙刷，脸盆和大衣。他要求见见与他一起被关进来的徐佛书和张平，没有同意。

匡正芳每天都喊：“我没有犯罪，犯罪的是你们！”

匡正芳三人被北京卫戍区关押一事让北航的同学义愤填膺，纷纷要求去卫戍区救人，学校军代表和革委会劝说阻止了。北航革委会主任韩爱晶到市革委会开会，谢富治问起此事，韩爱晶如实报告。谢富治当场打电话核实，然后亲笔给韩爱晶写了条子，通知北京卫戍区放人。

匡正芳住进功德林的第七天，晚饭给他送来一大碗萝卜炖红烧肉，外加小站米做的白米饭，他吃的太香了，要知道，自从进了功德林，一日三餐几乎都是带苦味的玉米窝头和糊糊，菜几乎都是煮白菜或咸菜疙瘩，哪里吃过这样好的饭菜呀！他觉得，再来一份都可以吃下。狱警收碗时他禁不住的问道：

“是不是每周都改善生活？”

狱警说：“这是专门给你的。”

一听了这话，匡正芳禁不住一惊：“难道是要处死我吗？！”他的心呼呼地跳。

过了一会儿，他缓过神来，拼命地敲门，要纸笔，他要向毛主席申诉。但是，没有人搭

理他。

又过了好一会儿，狱警来了，没有给他纸笔，而是打开牢门，叫他出来。

匡正芳的心快从嗓子眼里蹦出来了："真的是要处死我？！"无奈，只好跟着走。

狱警叫匡正芳把东西带上，匡正芳说："死都要死了，还要东西干什么！"

狱警轻声地对他说："什么死不死的，我听说是放你出去。"

"是这样！"匡正芳心里的一块石头终于落地了。他拿了自己的东西跟着狱警来到审讯室，还是曾经审讯他的那位军队干部和女书记员。

不过，这回没有让他坐在他们对面的被审椅子上，而是坐在办公桌旁，这时匡正芳才确认是真的要放他出去了。

那位军队干部说："你面子好大呀，谢副总理亲自批示放你出去。一会儿你们学校来人接你回去，在里面几天我们哪里做的不好的，请你多提意见。"

匡正芳哪有心思提意见呀，他现在反而不想出去了，说："我不明不白的进了我们党的监狱，我历史上怎么讲的清楚，你们一定要给我一个明明白白的结论，否则我不出去。"

那位军队干部说："没有什么结论的，你是留置审查，进来也没有手续，审查审查没有问题就可以了，我们怎么给你下结论呢？"

他反复劝匡正芳："历史上不会有问题的，完全可以放心。"

这时，一个战士进来报告："接他的车已经到了。"

那位干部说："以后有机会到北航去看你，大家交个朋友。听说北航的毛主席像章做的很好，我很喜欢，回来你送我几枚呀。"

匡正芳答应着，被他们送下楼去，那位女书记员还非要帮匡正芳拿脸盆、牙膏牙刷等物。

那天是北航井岗山来接的，和匡正芳一起被释放的还有徐佛书，他被打得鼻青脸肿。张平没有释放，他在功德林承认打过吴仙虎一个嘴巴。

回校的路上，井岗山将释放他们的经过告诉了匡正芳和徐佛书。还说，学校组织了欢迎大会，要他们二人准备上去讲一讲。

车子进了校门，按革委会的安排，先将他们送到各自的食堂吃饭。

匡正芳到了他所在的二五系食堂，看见许多学生在那里欢迎他，军代表石俊政委也在食堂门口等他，并陪他进食堂吃饭，对他说："有学生进来看饭菜不太满意，还动手打了炊事员，说是我们的英雄回来了做那么差劲的饭菜。"

匡正芳和石政委一起向炊事班李班长道歉。

吃完饭，石政委在食堂和匡正芳聊了一会儿，他说："学生的情绪非常激动高涨，前几天知道你们关押的地方，许多人积聚在操场，还有外校的学生，要去监狱救人，被军队制止了，没有让出校门。没想到韩爱晶有办法，很快拿到了谢副总理的放人批示，学生终于安静下来了。"

几天后，韩爱晶送给匡正芳一本当时很时髦的袖珍《毛主席语录》，并在扉页上题写"为人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和"韩爱晶"的签名。

后来，韩爱晶又和戴维堤一起去功德林看望被关押的张平同

学。戴维堤买了肉包子。见到张平，他面色苍白，一边流泪一边大口地吃着包子。再后来，张平父亲从东北老家赶来北京。要求探望儿子。韩爱晶给谢富治写了报告，谢富治签字同意。

后来，工、军宣队进北航后继续抓凶手，查了半天，也定不了谁是主要凶手。最后，把发起批斗和参与打人较厉害的几个学生抓起来判了刑。

**第 854 回：八二四，旅大市炮轰卫校　见天津，“五一六”人人喊打**

8 月 24 日，大连发生了动枪动炮的武斗，全市震惊。

那天午饭过后，大连沙河口区五一路 38 号的大连人民卫生学校突然打起来了，还开了炮。

自大连发生“730”武斗事件后，大连人还未听说武斗用真枪实弹的，咋一下子就动起炮了？此言传出，让人简直难以置信。

大连人民卫生学校位于沙河口区同泰街附近，与旅大警备区近在咫尺，是一幢坐北朝南三层红砖楼，校舍东西长，内部宽敞，大连“东方红公社”在此驻有近 500 人的“思想兵”，大都是化学工业学校、造船厂技校、机车厂技校、染料厂技校的学生，也有少数是铁路中学、15 中学、33 中学的学生。技校学生年龄稍大些，在 20 岁左右，中学生年龄也就 17、8 岁样子。

由于大连人民卫生学校地处沙河口区与西岗区交界处，控制了中山路西段。所以“思想兵”的对立面，大连“工总司”早就想攻下这里，“思想兵”对此有所警觉。8 月 23 日深夜，“东方红公社”将卫校内多数人撤走，只留下以船校学生为主的不足 20 人坚守。

8 月 24 日天蒙蒙亮，卫校周围已有人影绰动，这是“工总司”武斗先遣人员在集结。待到天亮时，附近住家居民走出家门大吃一惊，只见大批“工总司”人员已将卫校围得水泄不通。

上午 8 时许，“东方红公社”船校“飞虎队”得知消息，即派出一辆“嘎斯”卡车，风驰电掣般向卫校驶去，车上载有十几

名彪悍的年轻人，他们的拳脚功夫在滨城赫赫有名，为首的便是船校“飞虎队”的头头王克力。

车还未到卫校，“嘎斯”车上的“飞虎队”就看到好事看光景的人们正在络绎不绝前往卫校那边。由于不清楚现场情况，车辆不敢贸然靠前，停靠在远离卫校的一个偏僻小胡同里。下车后，他们稍作商量，便三、五人一伙地混迹于看热闹的人群中。由于这些人都在社会上“脸熟”，恐被“工总司”人员认出，所以也不能太靠前。

此时，“工总司”几十台武斗车辆及武斗人员已将周边的交通要道全部封锁，卫校里面被围困的人是插翅难飞了，唯一的出路似乎就是投降。尽管如此，“工总司”还是不敢贸然进攻，他们以为卫校里面有几百号人，而自己手里的家伙什大都是冷兵器，惟有大电机厂的宋殿峰手里端着一支不知从哪里搞来的步枪。

由于紧张，“工总司”一武斗人员鸟枪“走火”，打在其不远处同伴的脸上，好在鸟枪威力不大，被他人用手指甲将嵌入脸颊的弹丸抠出。

上午 10 时左右，“工总司”开始了强大的政治攻势，几辆广播车围着卫校轮番转圈，高音喇叭传出了最后通牒，要卫校里面的人无条件投降。然而，卫校楼顶的高音喇叭回应的是：“国际悲歌歌一曲，狂飙为我从天落。”“唯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接着，激昂悲壮的《国际歌》歌声在天空回荡。

船校“飞虎队”一看势单力薄根本不是人家对手，立马上车回去覆命。他们想起了工矿厂“钢铁联军”，他们人多，有可能会去营救解围，于是一个求援电话打过去，钢铁联军“八九司令部”的金司令马上答应前去救援。

上午 10 时 30 分，“工总司”见卫校里面的人拒不投降，便使出最后杀手锏，从远在甘井子区 523 兵工厂拖来一门 85 加农炮，架设在卫校大楼正门东北方向 200 米处的万岁街与永平街交汇处胡同，考虑 85 炮击发时后坐力大，特在路面上刨坑挖了防后座的驻处安放。据说炮手在部队时曾是饲养员，胆子大，是杀猪好手。

11 时半，炮手得令发炮。第一发炮弹击中卫校红楼二层东侧厕所，将墙面炸出一个直径 800CM 的洞，但未穿透。紧接着第二发炮弹射出，与第一发炮弹的弹着点相距一米，这一次洞穿。在调整炮位角度后，第三发炮弹击发，炮弹却打在近在咫尺的路边树干上爆炸，看光景的市民当场毙命 2 人，伤 4 人。现场惨不忍睹，碎肉上树，地上一滩滩鲜血。

工矿厂“钢铁联军”出动了两辆车，拉上该组织的 20 多名复员兵，急三火四地向警备区某枪械修理所驶去，抢得枪支弹药后再直奔卫校而来。

中午时分，“钢铁联军”老金一干人抵近卫校，他们朝天鸣枪冲进包围圈，“工总司”武斗人员见状四散而去，前来救援的车辆拉着被救人员驶出西门，沿着连胜街向西朝工矿厂方向疾驰

而去，在急转弯时，一被救人员手把后车厢板还未攀上车被甩在车下，结果让醒过神来的“工总司”捡漏儿抓获，几天后托“道上”的人说情才放出，人已被打得奄奄一息，但总算保住了性命。

几天后，“东方红公社”卷土重来，武装进驻经过炮火洗礼已是人去楼空的卫校，并在墙面炮击的窟窿旁写下醒目的大字——“当年鏖战急，弹洞前村壁。装点此关山，今朝更好看”。

我们再说与大连隔海相望的天津新港，这里因为武斗，致使边防、海关、新港的电话不通，海洋电台一度中断，港口堵塞情况严重。至 8 月 21 日，停泊在港外轮已达 42 艘，其中在大沽口待泊位的就有 31 艘。

8月21日，天津警备区生产指挥部财贸办公室《关于当前财贸工作的几个问题》称：与1966年同期相比，粮食系统第二季度超销粮食2050多万公斤(此外，贴大字报浆糊，每月用面达25万公斤)；一商系统6月底库存比上年初降低1500万元，市场急需的自行车、手表、缝纫机、闹表、收音机等40多种商品减少；外贸库存6月底达9亿多元物资，超过历史最高水平；工业利润收入锐减，上半年仅完成全年计划的35%。

8月18日，天津市赴京汇报代表团达成了《关于立即坚决、彻底制止武斗的协议》。8月24日，天津市赴京汇报代表团再次达成《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协议》。晚上近23时至次日凌晨2时，谢富治、郑维山第五次接见天津双方代表。这次会议通过了双方达成的《抓革命、促生产的协议》，还讨论了《641厂协议》和《塘

沽协议》等等。谢富治在接见时说：

“港口封锁要解除，护港大队解散。对国计民生的事你们要有责任感，几十条船停在那里，每天要付出多少英镑？合人民币400万元，相当50到60万农民一年的生活。重要的是妨碍工厂设备的进口，更重要的是政治影响。

不管哪一派，都是这样，不能说我是造反派，就任何事情都可以干，可以吗？”

双方代表齐声说：“不可以！”

谢富治：“那就要走向自己的反面。上海的造反派，港口堵塞几十万吨都一下子解决了，这值得你们天津学习。如果对港口不负责任，都还不是一个完全的造反派。

我对港口哪一派都没意见，不是责备哪一派，要很快的把港口疏通。天津的革命派，你们两派要帮革命之忙，帮国家之忙，帮人民之忙。我和伯达同志很关心港口、铁路运输，任何人不能封锁港口、天津港口关系到北京，关系到全国。

天津军队要帮助港口，中学生不要去港口，大学生也不要去。他们写大字报还厉害。要让搬运工人去，要把港口迅速疏通，这是最大的革命利益，人民的利益，国家的利益，大家要顾全这个大局。这几句话是不是毒草啊？可以当面批评。”

会上，双方发生了激烈的争执，谢富治批评双方都缺乏自我批评的精神，一而再，再而三地领着大家读《毛主席语录》，也没有更好的解决办法。在北京军区代司令员郑维山讲了一段话

后，天工“825”的赵健敏当场质问郑维山，郑维山显然是生气了，大声说：“你这是让我把刚才讲的话收回吗？！难道强奸犯、抢劫犯就不要处置吗？”说完就退席了。

25日，成立了“天津市制止武斗执行协议监督小组”，其任务是执行《六六通令》，确保双方制定的《协议》实施。

8月25日凌晨1时，钓鱼台五号楼，周恩来开完“中央文革”碰头会，杨成武将周恩来的一个讲话纪录交给他过目，上面有周恩来对16个省和自治区文革运动的看法及处理意见，也涉及外交部夺权及王力“八七讲话” 、火烧英国代办处、围困中南海揪刘少奇等事。周恩来审阅无误后，请杨成武按此向毛泽东汇报，并叮嘱杨成武：“这些材料，你交给主席看就行，只谈情况，你不要评论，请主席指示。”

随后，周恩来又像是自言自语的说：“这样下去怎么得了？我担心的是连锁反应。现在，一个是中央的领导不能动摇，一个是解放军的威信不能动摇。”

当天，杨成武飞赴上海，向毛泽东逐条汇报周恩来的谈话内容。并把王力 8 月 7 日的讲话记录稿交给毛泽东看。毛泽东边听边抽烟，不说话，也不提问。听罢汇报，他说：“成武啊！你累了，先回去休息吧！我考虑考虑，看看材料，有事再找你。”

在此之前，江青在红卫兵小报上看到王力 8 月 7 日的讲话后，搜集了几份，并附上她给毛泽东的信交给张春桥，让他转给正在上海的毛泽东。张春桥向江青谈了他对关锋和王力的一些看法，

江青回答说："你转告主席，我也是这样的意见。"张春桥回到上海后，将王力有关"87 谈话"的报纸交给了毛泽东，并反映了关锋和王力的许多问题。

自 8 月 11 日中央接见北京红代会时宣布"516 兵团"是反革命组织后，8 月 14 日，北京钢铁学院"延安公社"、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北京农业大学"东方红"、北京师范大学"井冈山"、北京航空学院等高校成立了"专揪'516 兵团'联络总站"，下设农口、公交口、财贸口、外交口、高教口、中学口等分站。

8 月中旬，戚本禹让中央文革办事组的专职党总支书记王道明组织调查"516 兵团"背景和活动情况。在调查过程中，记者站听到有记者反映，记者站调查组中有的记者与"516 兵团"的成员有牵连，调查结论可能"不客观"。王道明考虑到这种意见，又重新组织了办信组的几个人，另搞一个调查组。经过几天的调查，两个调查组要求向王道明汇报调查初步结果和在调查过程中遇到的问题。

汇报会在花园村一号记者站召开，记者站负责人徐学增、中央文革办事组的王广宇也和王道明一起听了汇报。汇报的情况是：

一、"516 兵团"是北京钢铁学院的一个小群众组织，参与攻击周恩来活动的人很少。他们号称"兵团"带有虚张声势，给自己壮胆，达到迷惑群众的目的。其实参加攻击周恩来活动的人数，不足 30 人，地地道道的"一小撮"。

二、有的人怀疑中央文革记者站最早向中央文革小组反映“516 兵团”反对周恩来活动的通讯员，能够那么准确及时地掌握“516 兵团”的动向，肯定同“516 兵团”骨干分子有密切联系，否则很难了解到这种核心机密。这位通讯员外出采访用的是《红旗》杂志记者站通讯员的名义。

三、在调查中，从“516 兵团”骨干分子的笔记本中，发现记载着《红旗》杂志社编辑周英的电话号码，而周英是关锋的妻子。还有“516”骨干分子宣称，他们同《红旗》杂志社编辑部负责人林杰有联系。这样又进一步说明，“516 兵团”同《红旗》杂志有瓜葛。

四、《红旗》记者站的记者同国务院财办的一个叫何畏的老干部有过接触。据说他同“516 兵团”骨干分子有联系。记者站负责人徐学增对此作了解释，说：戚本禹收到过何畏写给他的一封信，请求戚本禹接见他，说有重要情况反映。戚本禹把这封信批给了徐学增，让他去见一下何畏，听听他要反映什么问题。此时，徐学增对大家说：“我过去并不认识他，也不了解他的政治倾向，只同他谈过一次话，何畏所反映的意见主要是对本单位的运动情况，我已经向戚本禹作了书面汇报。”

在汇报会上，参加调查的人普遍反映，《红旗》杂志社记者站的记者，被搅进了“516 兵团”事件，调查很难继续下去。王道明听了汇报后表示，调查还需要深入，要有充分证据，不管牵连到谁，调查都不能停。最后，王道明决定，调查组的活动以后

不要用《红旗》杂志的名义，用中央文革办事组的名义进行。同时决定原来的记者站和办信组两个调查组合并成一个调查组，统由王道明负责。

8 月 17 日，“516”组织部长李芳被钢院“延安公社”抓获。

8 月 18 日，钢院“延安公社”、地院“东方红公社”、农大“东方红”、师大“井冈山”等 76 个组织发表声明，表示要与“516”决战到底，誓死保卫毛主席，保卫无产阶级司令部。

8 月 20 日，“516”的头目张建旗被钢院“延安公社”抓获，师大“井冈山”也宣布揪出了“516”的干将陈立。

8 月 25 日，北京钢院“延安公社”扣留了湖南长沙一中“齐卫东”组织的“516”成员 9 人，缴获五四手枪两支、子弹 104 发以及大批材料。长沙市一中“齐卫东”战斗队的唐亦安，在北京被公安部以北京“516 红卫兵团”成员身份予以拘留，教育关押 8 个月后才释放。同时，北外“红旗大队”等组织捣毁了“516”的大本营——北外“616 红卫兵”，抄出大批材料。

8 月 25 日，周恩来同外交部王琪、黄金琪谈话时说：

“如果像‘516 兵团’恶意地采取这样的态度，企图动摇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就要批判。批判少数坏头头和他的后台。对于一部分受蒙蔽的群众，我们不要去指责。

‘516’在外交部有根子，有人在外面打着‘联络站’的牌子干坏事，你们知道不知道？将来你们跳进黄河洗也洗不清，中央文革那里有材料。”

这天，外交部党委封条被启封，重新开始办公。

8 月 25 日，北京中学“四三派”成立的“红代会 15 区县联合办公室”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坚决击退武斗黑风大会”。会后，与会者分乘 30 多辆卡车，载着武斗中被打死的学生尸体在市内游行，途中，在东四附近截住“四四派”电校“红旗”的一辆卡车，抓获 9 人，其中杨延华被打成重伤，当晚死亡。

8 月 26 日，由北京市教育革命联络委员会主办的，地址在北京师范大学主楼 307 的报纸《教育革命》第 18 期，在头版位置刊登署名“北师大井冈红松”的文章：《我们就是要保周总理!》头版右下的文章标题是：《打倒五一六红卫兵团》。

8 月 26 日下午，首都红代会北京钢铁学院“延安公社”、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北京师大“井冈山”、武汉“钢二司”等全国 1400 多个造反派组织两万多人，在北京钢铁学院召开“彻底砸烂反动组织‘首都五一六黑匪兵团’大会”，张建旗等 5 个“516”头目被揪上台示众。

至此，“516”全面崩溃，成为老鼠过街，人人喊打的对象。

8 月 25 日，由毛泽东批发的《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关于开展拥军爱民运动的号召》中，毛泽东提出：“关于武装革命群众，必须在条件成熟的地方，由当地人民解放军弄清情况，通过协商，报告中央批准，然后有计划、有步骤地实施。不符合这样条件的，除紧急情况，经过中央特许的以外，所有群众组织现有的武器和军用物资一律立即封存，或者上

交。”

## 第 855 回：周恩来，连续见三省代表　康生与，宁夏驻军领导谈

8 月 25 日下午，周恩来、李富春在中南海小会议室接见国家计委“红委会”、“革造公社”，石油“大庆公社”、“北京公社”，石油部“东方红”，石研院“斗薄联委会”，石油设计院“八五革委会”，化工部“无产阶级司令部”，钢院“革造公社”、“斗薄筹备处”等群众组织。周恩来在接见时对计委“革造”说：

“你们把打倒刘、邓、陶、薄、余口号摆在一起，我们不同意。余秋里中央没有定性，不能一起喊打倒。打倒刘、邓、陶、薄、余我们不赞成，这就是我的态度。”

“不要把刘、邓、陈、薄摆在一起，陈云还是中央常委嘛，可以提‘刘 、邓、陶、薄’，单独批陈云的右倾机会主义，我们同意。”

“你们单位提打倒余秋里，那是你们的权利，你们斗争薄一波，材料怎么样？水平怎么样？”

“如果余秋里改正了错误，还可以三结合嘛！”

“问题太多，反而不利，搞叛徒的问题，最好得到专案小组的配合，薄一波这个人就是飞扬跋扈，你们问多了，他知道了，反而使他了解你们的底，关于余秋里同志的问题，你们开大中小会议批判，我同意，我是一向主张联合开的。”

计委“红委会”代表说：“他们提出打倒刘、邓、陶、薄、余，我们提打倒薄一波，解放余秋里！”

周恩来："他们提打倒刘、邓、陶、薄、余，他们处于被动地位。你们这样提，更被动。薄一波和余秋里是两回事，不要放在一块儿。薄一波是一个叛徒嘛！ "

"计委、经委、石油部、'大庆公社'、化工或钢院，你们研究，我建议最好联合，这是我一贯的态度，联合不起来就分别开，以机关为主，学校为辅，学校不要包打天下，我跟红代会讲过多次，以前串联煽风点火有功劳，今年再去到各部门串联，主观愿望是好的，但客观上帮倒忙。这是最高指示，我给红代会讲过。 "

几个单位争着要将余秋里放到他们那里开批斗会，周恩来说："余还有工作，我们还需要问他问题，计划工作是需要思考的，像外事工作一样。你们天天斗，他没法冷静思考。"

李富春在单独接见"大庆公社"等组织代表时说：

"余秋里同志对文化大革命，在去年 11 月以前还有抵触情绪，对文革小组直到今年 2 月还有抵触情绪，对于群众的态度直到 8 月还是有一定的抵触情绪的。……直到现在还没有自我检查，所以对余秋里同志应该批判。第一，你们自己在一个时期没有注意批判；第二，别人批判，你们也不应该反对，不应该说人家犯了方向错误；第三，你们把党中央的保和群众的批判没有区别开来，群众尽量的批判，实事求是地揭深、揭透，我们都赞成。定什么性质，是中央的事，中央保不保，由中央决定。希望你们紧跟毛主席，紧跟毛主席的战略部署，抓住文化大革命的大方向，大批判，大联合联系本单位的斗批改。……斗薄要继续斗下去，

不管有多大的困难挫折，有多大阻力，薄一波不是死老虎，他的流毒还没有肃清。在计、经、建委还有陈云的东西，要多做调查研究，多找材料，联合搞个像样的批判。……一切革命组织，革命派大联合起来，通过斗争工交口党内最大的走资派薄一波联合起来！”

8月26日凌晨1时，周恩来、康生、李富春、关锋、吴法宪、邱会作等中央首长在人民大会堂小会议室第一次接见沈阳“831”、“辽联”、“辽革站”三派代表团。参加接见的有陈锡联、宋任穷。

接见开始时周恩来提了三条会议遵守制度：

一、不许互相攻击、谩骂，要摆事实讲道理；

二、到北京开会不准带枪；

三、要支持解放军，达成制止武斗协议。

吴法宪讲了沈阳“822”机场事件。当讲到“辽联”、“辽革站”把飞机打坏，打伤了空军战士还不让送空军医院时，周恩来非常气愤，康生说：“可耻！”

吴法宪继续讲到两名战士牺牲，战士被打还念《毛主席语录》时，周恩来说：“这叫什么性质的问题？打解放军！”

康生气愤地说：“谁打我们的解放军呀？帝修！这是什么性质的问题？！”

周恩来、康生、吴法宪都严厉的批评了“辽革站”和“辽联”，并点名批评了辽宁省委书记处书记徐少甫。周恩来、康生又就“辽

联”冲击“辽革站”及“辽革站”冲京西宾馆揪宋任穷的事，再次批评了这两个组织。周恩来说：

“你们这种做法完全不是无产阶级政治，是资产阶级政治，说坏一点，是国民党特务作风。我劝你们不要学这种特务作风。你们对宋任穷同志有意见，可以在会上提，但不能用这种办法，把人拖走，这成什么政治？！你们看看武斗打成什么样子，损失有多大！完全没有国家的观念，没有整体的观念，就是派别的利益！你们这样怎么能做接班人？你们想一想，难过不难过？你们这样下去，会一天一天地脱离群众，要走到反面。”

周恩来指示“831”进驻沈阳军区司令部的人全部撤出。最后他要求三派达成制止武斗，抓革命促生产的协议。

接见完沈阳三派代表，凌晨2时10分，周恩来又手举《毛主席语录》，和陈伯达、谢富治在人大会堂安徽厅接见河北省代表。

8月，中央通知河北省保定两派代表进京汇报。期间，两派代表与河北省军区司令员马辉、政委曾美及38军李光军、刘海清签订了关于立即制止武斗的协议。与此同时，石家庄地区赴京汇报代表团双方，也就制止武斗问题于8月26日在北京达成协议并签字。为此，中央首长在人大会堂安徽厅接见河北省赴京代表。

接见完河北省代表，周恩来又于凌晨2时30分，和二炮政委李天焕来到人民大会堂148号会议室，接见宁夏军区、固原分区、有关县市武装部以及62师前指、三工区负责人。兰州军区康健民副司令员、群工部副部长张振太等也参加了接见。

周恩来对大家说："我没管这个事，康老叫我来见见大家。"

接着他念名单与大家认识，当然第一个就是朱声达。周恩来问了朱声达入伍后的经历，当朱声达说他给段德昌同志当过警卫员时，周恩来问他："你对段德昌同志怎么看？"

朱声达答："我认为不是改组派，七大时已平反了。"

周恩来接着说："傅传祚同志告诉我两件事，一是贺龙不是正确路线的代表；二是段德昌同志被杀时，贺龙问他有什么要求，段说：一我不是改组派，是共产党；二洪湖老百姓很好；三给我一颗子弹。贺龙说他一贯正确，实际上立三路线时期，他执行的最坚决，只剩下他和关向应、夏曦三个人，谁都不相信了，段德昌同志就是他杀的，洪湖根据地是段德昌同志搞的，那时贺龙在山上，他篡了段的功劳。这一段历史贺没有给组织讲，也没有人揭发。关向应是个好同志，但到延安时我去找他，也没有讲。贺龙是冒险主义，后是逃跑主义。这件事你是知道的，也不揭发，你怎么没把段德昌同志的作风学到，而是学了贺老总的作风，所以这次宁夏搞的很不好，要好好反省反省。"

然后，周恩来又逐个念名单，并问了一些人入伍后的历史情况。十几分钟后，康生进来。3时，周恩来离开会场，又与戚本禹一起去接见哈尔滨代表。

康生对宁夏驻军领导说："中央召宁夏同志来开会，听听各方面的意见，部队和群众组织都来，中央开会就是这样，不管哪一方面都听，对造反派、保守派都是一样。这是主席一贯的方针，

兼听则明。因此，与康健民同志研究，听听各方面的。群众代表来了没有？”

宁夏军区副司令员张怀礼答道：“没有来。”

康生接着问：“‘筹备处’来了没有？”

张怀礼答：“没来，他们还提了几个条件，要求保证安全！解决经费！”

康生：“希望他们来，不来就不勉强，到中央来，还保证什么安全！告诉他们愿来就积极来，不能向中央提条件，看来他们来中央积极性不大，本来他们杀了人，是没有资格来的，中央是照顾的，还是希望他们来，接受教育，他们过去受朱声达反动路线的影响，是没责任的，可能他们不是向中央提条件。

去吴忠谈判的是哪个团？告诉他们谈判的态度不对，他们（指筹备处）是犯错误的，要求他们坚决执行中央的路线，不能与解放军平起平坐，告诉他们赶快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186团谈判态度太软弱，我们解放军与他搞重庆谈判是不行的。告诉他们，是犯了错误，不是革命行动。见到他们就说他们是受了朱声达反动路线的害，教育他们改正错误，不要抵抗中央的指示。”

张怀礼：“看他们没有改正错误的念头，还准备一、两万人进攻青铜峡。”

原来，8 月 20 日后，青铜峡河东“筹备处”聚众数千人，向“指挥部”据守在青铜峡的最后据点----青山机器厂发起了强大的攻势。猛烈的火力很快摧毁了“指挥部”的防线，“指挥部”

的人员被压缩在一栋孤立的三层楼房。“筹备处”还顺势包围了正在青山机器厂支左的、驻扎在峡口的 21 军 62 师 8047 部队，即 185 团的部分指战员。

青铜峡的“指挥部”岌岌可危，他们直接向北京反映情况，称：“筹备处”扬言要爆炸青铜峡水库的大坝，造成黄河决口，淹没下游。他们强烈要求中央立即采取措施，坚决予以制止。

被“筹备处”包围在青铜峡大坝上的 8048 部队也面临着断电断水的危机。62 师师长徐洪学向兰州军区政委冼恒汉电话报告了情况，冼恒汉让他正式报告兰州军区。8 月 25 日，以兰州军区副司令员康健民为组长、62 师副师长徐洪学为副组长的宁夏支左领导小组向兰州军区正式递交报告说：驻青铜峡部队处境困难，被一派群众组织一万多人包围了好几天，连水也喝不上，有的仓库被抢了，枪也可能被夺。并且说，水库的大坝有被炸的危险，如果事态再蔓延，有可能影响到西海固回民暴乱的问题，请示军区怎么办？

收到报告的当天晚上，冼恒汉立即召开军区常委会议，大家一致感到事关重大，立即将宁夏的原电报转报中央，所以有了中央的这次紧急召见。

康生听了宁夏军区副司令员张怀礼关于青铜峡水库的报告后说：“好！让他们搞！如果这样搞性质就变了，就镇压！他们有本事就让他们使，什么本事都使出来。看人武部、朱声达有多大的罪恶。当然还是要做思想工作，教育受蒙蔽的群众。186 团

要做大量的政治工作，进行政治攻势，揭露朱声达的问题，大量散发传单。”

张怀礼：“他们把传单都撕了。”

兰州军区副司令员康健民：“他们还用枪打撒传单的飞机。”

康生非常生气地说：“让他打！让他打！不怕打。广大群众是懂道理的，是会接受教育的，还可以派宣传车去。现在是吴忠武装部还在里边？王光福你表示什么态度？”

王光福：“已起草了 7 条。”

康生：“吴忠县的问题你要负责全部解决，你和朱声达研究如何解决，主要是你们搞的，我看武装部的活动现在并没有离开朱声达，没有离开你王光福！同志们，我们是爱护、信赖解放军的，但个别人他反对毛主席，不执行毛主席的指示，就不能代表解放军，就没资格代表解放军。领导小组哪个同志来了？”

答：“王仅同志来了，他是 62 师前指的。”

康生问：“王仅同志你什么时候到的？”

王仅答：“前天。”

康生：“你讲讲银川情况。”

王仅汇报了部队的开进、部署、态度、敌情等情况。王仅汇报部队进入宁夏后，干部、战士情绪很高，旗帜鲜明，坚决支持“总指挥部”等左派。当他汇报 186 团进驻吴忠途中，“筹备处”组织农民拦阻时，康生问：“真农民还是化装的？”

王仅：“当时发现有军人化装指挥。”

康生："农民不会用军队作战的一套办法，何其仁恐怕就是你们搞的！"

王仅："'筹备处'对我们进去反的很凶。"

康生："嚣张得很呐！还叫我们解放军与他谈判，算什么东西！"

王仅："在董府发现有军区的人。"

康生："何其仁、刘恒业，你们两位是朱声达的核心人物，是你们派的吗？"

刘恒业说："不知道，我们没有派。"

康生："怎么不知道，有人指挥，很清楚。"

王仅："'筹备处'扬言要攻打银川。"

康生："好！让他们打好了！"

王仅："他们想把62师赶出宁夏，还骂我们……"

康生："这都是朱声达、王光福的教育。"

王仅："他们截火车，审问旅客，让举手通过，把铁路、公路都中断了。"

康生很生气得说："反革命！"他指着朱声达说："这就是你们依靠的力量。……独立师二团回去的人怎么样？一、三团态度怎么样？"

王仅："二团第一批回去了，第二批没去成。一、三团比较好，比较稳定。吴忠巴塘农场一个连参与了，一个战士还上车检查我们。"

康生："是哪个连的？"

王有生："一团四连。"

康生："要派人去做工作。二团现在情况怎样？"

二团长："现在通了。"

康生："所以不通就是干部不通，关键是干部，政委、副政委、参谋长哪个比较好一点？"

二团长："现在都通了。"

康生有些不相信："那么快？不那么简单。你们要经常打电话告诉他们。告诉二团要与六十二师炮团合作。你们指挥部确定一下，那个地方指挥关系，二团听炮团指挥，当然不仅是指挥，还要帮助做工作。"

李天焕："涂宗德要打电话，就是要很好与炮团联系起来"

康生问："平罗情况怎样？"

平罗驻军作了简要汇报，当说到他们去做工作，"筹备处"还打他们时，康生说："二团、炮团没有去做工作，联合起来，人武部他们可能不相信。还要做耐心的群众工作，他们没责任，告诉指挥部要争取他们，实际上他们是受蒙蔽的，也是受迫害的。"

康生又问了永宁、贺兰的情况，又问了青铜峡、固原的情况，肯定了62师进驻宁夏的成绩，同时认为朱声达的错误已经揭开。他说："我看宁夏问题不难解决，只要把朱声达的盖子揭开，同时做艰苦的群众工作，问题就不难解决、不复杂。""犯错误的同

志只要改还是好同志。”然后问朱声达：

“朱声达，你怎么样？”

朱声达：“改。”

康生：“还是一个字，那有什么用，要有一个方针嘛！我觉得你有个方针，我希望我的话没说对，就是多听少说。这是陈再道、钟汉华指示河南的‘多听少说’。你还不愿意对我们说真心话，只拿一、两个字搪塞我们，希望你不要下这个决心，走这个绝路。你总是对我表示改，你改的是什么！？你改，没有行动，改什么，什么错误，怎么犯的，你来北京冼政委怎么讲的，回去又怎么做的，你连这个都不想讲，想往垮台路上走，我们总是想帮你改错，按照毛主席、林副主席指示的路走，但你要给条件的，如果你下决心往垮台方面走，那我们有什么办法呢！你有自己的章程，用你的办法来对付我们，这样不是对付我们，是对付你自己。这样子干什么，把错误包起来干什么！来的这些同志，37个，分分小组，大家自己研究一下，经验教训，自己检讨一下自己，同时也要帮帮朱声达同志。”

康健民：“研究了，也帮了，前天晚上我给他谈，他，他说的一是记不清，想不起，二是说不清。”

康生：“你不要以不变应不变，把你不敢见人的东西拿出来，你是个军人怎么那么不勇敢没勇气。今晚我们再帮一次，再说一次，我们是按中央、主席指示，我们是有耐心的，但还要靠你自己。群众工作我们也要耐心做，但要遇到反革命分子叛乱的时候，

就要实行专政。因为，向指挥部讲一讲条件成熟时，要武装一部分左派，当然条件不成熟不能随便搞。固原分区同志讲的是对的，条件不成熟不能随便搞。我们不能眼看到左派大量的被镇压，条件成熟时就要发枪武装他们。”

“对犯错误的同志还是要帮助改正，但革命靠自己，”他问朱声达：“你看怎么样？”

朱声达：“听康老的话，坚决执行主席的指示，改正错误。”

康生：“现在 5 点半了，代表们来了，见见面，不是正式会议，正式会议也是这种形式，大、中、小。”

他又问：“‘指挥部’来了没有？”

答：“在路上。”

“‘宁三司’怎样？”

张怀礼：“30 名代表两家还不好分。”

康生：“到中央来开会，不是做买卖，愿开就开，不愿开就算了！它要不改变方向，我们还不依靠它呢！世界上没有第三条道路。好吧！今天晚上就到这里。”

## 第 856 回：毛泽东，决定处理王关戚　抢陈毅，武汉钢新闹分歧

8 月 26 日凌晨 3 时，周恩来与宁夏驻军领导见面后，离开 148 号会议室，与戚本禹一起接见了以潘复生为首的哈尔滨“捍联总”代表团 30 多人，赵去非也被中央调来。对哈尔滨哈军工在黑龙江革委会所在地发生的“六五静坐事件”，周恩来很不满意地说：

“他们只有 200 多人坐在那里，你们有什么理由不接见？”

他在这里说的“他们”是指“哈军工”，“坐在那里”是指当时黑龙江革委会所在地。

对哈军工的“6.9”反夺权，周恩来也批评了他们。哈军工代表辩解说：“他们把矛头指向无产阶级司令部，是敌我矛盾。”

戚本禹说：“你们错就错在这里，在总理批评你们之后，还不接受。本来是内部矛盾问题，不应该夺权，不应该把他们打成逆流。你们内战外打，你们要做自我批评，总理说得很明确了。”

周恩来等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忙了一通宵，毛泽东在上海也思考了一整夜。第二天，8 月 26 日上午，毛泽东让身边工作人员把杨成武找来，对他说：

“你马上准备飞机回北京，准备好了再来。”

杨成武安排好飞机后，回到毛泽东的住处。毛泽东喝了一口茶，说：“王力这篇讲话极坏。”毛泽东第一句话便明确了态度，“现在叫王八七，膨胀起来了。要消肿。王的错误大，我的看法：此人书生气大些，会写几篇文章，不大懂政治。王的破坏性大些。

关锋听王力的话。王力的兴趣不是什么部长、副总理。这个人爱吹。关有活动，活动总要活动的……”毛泽东略作沉吟，“我考虑好了，我说你记。”

其实，杨成武一直都在记。毛泽东提醒这句，表示重要，记录需一字不差。

毛泽东说：“王、关、戚是破坏文化大革命的，不是好人。你只向总理一人报告，把他们抓起来，要总理处理。”

毛泽东说完，把杨成武的记录拿过来过目后，说：“就这样，你回去请总理马上办。”

杨成武做了简单的准备，临去飞机场前又到毛泽东那里，问毛泽东还有没有别的指示。

“我又考虑……”毛泽东若有所思的缓慢说道：“先抓王力、关锋，将戚的问题稍缓一下处理，把他们分割一下，看戚本禹有无转变。你回去跟总理讲，戚本禹是不是争取一下？这个人是不是可以分化一下？但是总理要狠狠地批，要批透。不然的话，就争取不了，分化不了。”

毛泽东停顿了一下，又说：“怎么处理？由总理定。”

杨成武又记录了，给毛泽东念了一遍。

毛泽东说：“就这样。”

26 日中午 12 时 40 分，杨成武飞到北京，立即赶赴钓鱼台，单独向周恩来汇报了毛泽东的决定。

周恩来听完杨成武的汇报，让他立即去北戴河去向林彪汇报

毛泽东的这一决定。

杨成武说："在上海，主席特意交代，让我只单独向您一人汇报。并让我转告您，这件事让您一个人单独处理。"

周恩来说："这样大的问题，事先不让林副主席知道不好。回去对主席讲时，说是我让你向林副主席通报的。"

杨成武遂飞赴北戴河向林彪通报。

林彪的居室内，拉了厚厚的窗帘，屋里亮着灯。林彪光着头，坐在沙发里面。杨成武进来向他报告敬礼。林彪勉强站起来，和他握了握手，然后无力的朝棕色的沙发指了一指，示意杨成武坐下。

"有什么话说吧。"

杨成武向林彪汇报了毛泽东对王力、关锋、戚本禹的处理意见，林彪听后微微点了下头。

"林副主席还有什么指示吗？"杨成武问。

"没有了。"林彪说。

杨成武飞回北京，和周恩来一起到钓鱼台向江青传达了毛泽东关于王力、关锋问题的指示，戚本禹当时也在旁边。从江青处出来后，杨成武和戚本禹一起来到戚本鱼的办公室，戚本禹的秘书正在里边。杨成武对戚本禹说：

"主席向我问起过戚本禹你了，说，戚本禹近来表现如何？我当时给你说了好话，我说戚本禹是忠于主席的，是跟着主席干革命的，我讲了你写的文章，战斗性很强，作用很大。主席说，

你在年轻人中是比较有思想的人，说你跟王力他们是不一样的。”

戚本禹将这次会面记入了他的工作日志。

8 月 26 日晚，外交部召开第三次批判陈毅的小会。这个会原定是周恩来主持的，但此时，周恩来正在钓鱼台与陈伯达、康生、江青商量隔离王力、关峰的事情，不能按时到会了。于是，派周恩来的外事秘书钱嘉栋来到外交部，让人把坐在会场外的姚登山叫进会场说：

“总理有事要迟来一会儿，委托你先主持开会。”

会开始后，突然来了很多人要冲会场，抢陈毅，为首的是北外“红旗造反团”。

听到有人前来冲会，外交部“联络站”核心组以为是“批陈联络站”的北外“红旗大队”来捣乱，却没有想到是与他们一派的北外“红旗造反团”。他们要抢陈毅的目的就是破坏“批陈联络委员会”的批陈大会。因为他们对周恩来在 8 月 22 日答应“批陈联络委员会”在 8 月 27 日开批陈大会不服，认为批陈是“红旗造反团”为主的“批陈联络站”争取到的权利，而“红旗大队”始终反对批陈，说批陈是错误的，为什么他们现在要批陈？他们认为：“红旗大队”是老保，两面派，没有资格开批陈大会。因此要把陈毅抢走，让他们的会开不成。

事发突然，姚登山很是吃惊，问钱嘉栋：“怎么发生了这么大的事情，事先连一点消息都不知道？”

钱嘉栋说：“知道是知道，但不知道有这么大的规模。”

姚登山说："既然知道，应该事先给我打个招呼。"

情况紧急，外交部"联络站"核心组的王中琪、夏义善等人马上安排有关人员保护陈毅通过小会议室内一道暗门后面的小楼梯，将他和他的警卫人员一起转移到二楼港澳办公室的一个套间里休息，同时立即打电话向总理办公室报告。姚登山则到外面劝阻来冲的人。

此时，负责警卫外交部的警卫排把冲会场的人挡在门口。但是冲的人太多，警卫排又临时调来一些战士，手挽手组成人墙，依然挡不住。警卫战士一直退到新楼门口。这时，外交部的干部也都出来拦阻，挡住新楼的楼门。但是，仍有几个学生从窗户跳进来，进到楼内，冲进会场。

最先进去的是个女生，令她失望的是陈毅外长不在会场里。学生不甘心，在走廊里到处窜，企图找到陈毅。

来到外面的姚登山看到这里秩序如此之乱，只好大声喊叫，要学生的代表到一楼的一个房间里面去谈。一时来了一二十人，也不知道他们都是哪个单位的，七言八语，乱乱哄哄。

这时有人给姚登山送来中央文革刚刚打来的电话，传达陈伯达对冲击外交部的四点指示，其中三点是：

一、冲击外交部是错误的，冲击今天的批陈是错误的。

二、今天揪陈毅是错误的。

三、立即撤出外交部。

姚登山当即宣读，要求冲进来的人撤出去。

又经过一番劝告和争论，这些人答应撤了。

正在这时，周恩来打来电话找姚登山。那些代表又要求姚登山："请转告总理，我们立即撤出外交部，但是要求总理接见我们。"

姚登山到二楼第一亚洲司办公室接电话，周恩来询问情况，姚登山汇报说："陈总安全，那些人已经答应撤出外交部。"接电话时，他看到窗外学生正在撤出外交部，纷纷上车。姚登山将此情况也报告了周恩来，并且转告了那些头头"请求总理接见"等要求。

周恩来表示可以接见，指示姚登山会同有关人员把陈毅安全送回中南海。

冲击外交部的学生撤走后，姚登山同"联络站"核心组商量送陈毅回中南海。他说：

"得换个车吧？学生可能认出陈总的车。"

"联络站"核心组支持这个意见。天快黑的时候，姚登山亲自护送陈毅，出门向东，绕道东四，再折向西，将陈毅平安地送到中南海，进了警卫团驻地的大门，他才安心回家。

深夜，周恩来把傅崇碧找到西花厅，对他说："崇碧同志，在北京的各省市自治区负责同志一定要保护好，不能让人揪走。现在他们住的地方也不安全了，你要想想办法把他们转移到一个秘密、安全的地方。"周恩来满脸倦容，望着这位卫戍司令。

傅崇碧稍稍想了一会，从包里拿出了一张地图。

“东高地有卫戍区两个团，一个步兵团，一个炮兵团。那个地方比较僻静，也比较安全，把他们转移到那里，你看行吗？”傅崇碧指着地图上的一片营房，征询周恩来的意见。

“我看可以，要绝对保密，不能走漏半点风声，行动要快。”周恩来果断地说。

“好，我先安排布置一下，尽快把他们转移。”

几天后一个夜深人静的凌晨，傅崇碧亲自指挥，选了几十个精干强壮的警卫战士，用汽车拉上这些被接到北京避难的各省、区领导，在北京市内兜了几个大圈，确认没有人跟踪后，隐秘地来到了东高地。

周恩来又指派中共中央办公厅警卫局副局长、中央警卫团政委杨德中具体负责与这些人联系。

26日夜，周恩来处理完这些事情后，又亲自给兰州军区冼恒汉打电话，询问青铜峡大坝的情况。他说：

“报告收到了，你们提个处理意见报中央。要驻宁夏部队派人守护大坝，决不能发生爆炸事件。”

冼恒汉放下周恩来的电话，立即通知军区常委到他家开会。会上大家提出了三条意见：

一、为了确保大坝安全，在群众冲击大坝时，要大力宣传，耐心教育群众，讲明破坏大坝的严重性，说服群众自动撤离大坝；

二、若劝阻无效，仍有群众进行爆炸大坝的行动时，部队可以对空鸣枪警告；

三、若不听鸣枪警告，继续进行爆破活动，并在部队阻止当中有人开枪向部队射击时，指战员生命受到威胁，部队可以还击，但要尽力少伤群众。

周恩来给冼恒汉打完电话，又于23时赶往京西宾馆，此时，谢富治、王力正在京西宾馆三楼二会议室接见武汉“三钢”和“新华工”、“新湖大”在京代表。在座的还有邱会作、工程兵政委谭甫仁、中央文革工作人员张根成。当神色凝重的周恩来走进会场时，他们已经与武汉群众谈了半个多小时。

武汉的“百万雄师”垮了，按说湖北已经空前统一，应该很快就可以实行大联合，成立革命委员会了。然而，事态的发展并不是这样。

《中央首长在武汉革命派组织的座谈会上的谈话纪要》在武汉传达以后，“工造总司”吴焱金立即给“工总”负责人朱鸿霞写了一封信，大意是：武汉的革命造反派在抗暴和为“工总”翻案的斗争中结成了生死与共的战斗情谊，遵照《纪要》精神，我们要“困难时在一起，胜利了莫分开”，1967年5月武汉造反派在抗暴并肩战斗中成立的“武汉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指挥部”，简称“大联指”，应成为大联合的基础。

因为成立“大联指”时，“工人总部”已被取缔，朱鸿霞、胡厚民等“工总”领导正被关押，所以当时的“大联指”没有“工总”的人。现在大联合要以“大联指”为基础，就要使“大联指”完善，以“工总”为主导。

信中表示：朱鸿霞对此如有意，请来“工造总司”商谈。

过了几天，“工总”的朱鸿霞和杨逢春来到汉口友谊街16号，与“工造总司”的吴焱金和龙梅生等人进行了商谈。朱鸿霞首先说：“720以后，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钢工总’在全国有很大影响，是中央点名的响当当的造反派，以‘钢工总’的旗号联合所有造反派比较有利，‘大联指’已经过时了，是不是在‘钢工总’的旗帜下统一起来。”

朱鸿霞此议遭到“工造总司”龙梅生、潘宏斌、王锦铭等人的激烈反对。他们认为“钢工总”应当尊重历史，“工造”提着脑袋为“工总”翻案，牺牲了那么多人，朱鸿霞没有半句感谢的话，还要收编他们，这办不到。

经过一番协商，吴焱金现场起草了一个协议，即以“钢工总”为首，在“大联指”的基础上实现造反派的全面联合。朱鸿霞、杨逢春表示拿回去研究研究再说。

据说朱鸿霞、杨逢春把协议草案拿回去，胡厚民一看就否定了，并且说：“‘工造总司’加入‘钢工总’是可以的，但吴焱金必须排除在外。”社会上于是出现了不少传闻。吴焱金听到后，当即写了一份声明寄给《湖北日报》，提出要“退出‘工造总司’”。《湖北日报》看到声明大吃一惊，派3个人到汉口福建街找到吴焱金，批评他做事太欠考虑：“你不是一个人，想怎么干就怎么干，你要对你领导的组织和群众负责。”

他们同时表示，“加入‘钢工总’，实现大联合”这种以我

为核心的做法显然是不对的。经过长谈，他们认为还是在“大联指”的基础上实现大联合是应有的主张。于是《湖北日报》扣下了吴焱金的声明，于1967年8月24日发表了吴焱金写的《关于加强“联指”，促进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的建议》。但这个建议一直未被接受，武汉三镇满街的大标语：“钢化江城，加入钢工总，实现大联合。”武汉造反派之间新一轮的“钢”、“新”之争愈演愈烈。

这时，“工造总司”政参部长龙梅生提出了成立“新武汉”的设想。他分析：从反击“二月逆流”的斗争看，“新”派的组织应该是有相当实力的。可是组织很多，山头林立，没有一个统一的旗号，也没有统一的行动，各自为政，很容易被人家一口一口吃掉。现在“钢”派借中央点名之机，“钢”风刮得很厉害。“钢化江城”、“加入钢工总，实现大联合”的标语，意图已非常明确。因此，他建议“新”派工人组织建立一个松散的联合体，各自的原组织名称不变，集合在“新武汉”的大旗下，便于统一思想，统一行动。

于是，“工造总司”出面召集部分“新”派工人组织开会提出这个设想，没有人公开反对，但是热情也不十分高涨。后来，又开了几次会，大家原则上同意成立“新武汉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总司令部”，推选吴焱金为“新武汉”总指挥，顾建棠、曹承义、“交通联司”一号勤务员傅廉、孙厚智等为副总指挥。龙梅生当时还印了毛体字的“新武汉”袖章，申请成立的报告送到新

成立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武汉警备区后，迟迟没有得到答复。原定在武汉体育馆召开成立大会，也没有批准。

周恩来、谢富治、王力答应8月26日晚在京西宾馆接见武汉“三钢”和新华工、新湖大在京代表。而此时，周恩来正在钓鱼台与陈伯达、康生、江青商量关于隔离王力、关峰的事宜，所以，谢富治和王力就先和武汉的代表们交谈，了解武汉情况，批评武汉抢枪和乱放枪的问题，听说武汉军区、空军等军事机关有群众组织进驻，谢富治明确指出：“要撤出，要相信解放军。”

王力说：“武汉外出串联很多，不要再出去了。”

谢富治：“北京到武汉的人也要回来，外地学生都要回去。你们也不要到全国去。北京，上海的同学全部要回来。”

王力说：“这是毛主席的指示。”“现在形势与去年不一样啰。武器要掌握在可靠的人的手里，不要个人谁想拿就拿，这就不好了。不能什么人都掌握武器。要整编，要绝对服从警备司令部的调配，应该服从曾思玉、刘丰同志新改组的军区领导同志的调动。武器问题，他们自己也不能做主，这个问题他们也要请示中央。今天晚上中央要发一个拥军爱民的指示，要拥护解放军，特别是我们的野战军。”

23时30分，周恩来进来了，他说：“现在搞出来了一个‘新武汉’，知道吧，这是个新问题。”

王力说：“‘三钢’的同志刚才说他们不同意。”

谢富治说：“搞得不对，听说‘三新’支持的。这么搞，‘三

新’的威信就会降低的。”

周恩来说：“这是一点。还有一个夺枪的问题。武装问题不能乱抢。武装左派嘛，我们说了嘛，为什么又要抢呢？”

王力说：“总理提了两个问题：‘新武汉’，夺枪。刚才还说了一个不要到全国串联的问题。”

周恩来：“今天主席又说，出去自己以为出好主意，其实出坏主意。出去也许主观愿望是好的，但往往帮了倒忙。武汉很多事要做的，不要到外头乱跑。”

王力：“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对‘百万雄师’的问题。”

周恩来：“听说现在武汉出现了对‘百万雄师’的头头挂黑牌的现象。上次对你们代表讲过的，第一政府不抓；第二左派也不抓，让他们自己组织和群众处理。这个法子是最好的。前些时，‘百万雄师’就有人反映又不抓，又不斗，这个办法最厉害。”

王力说：“这并没有解决问题。两个办法比一比，你们说那一个厉害？他们不怕你带黑牌子、游街，就怕你搞政治工作，就怕你们不脱离群众。……下面组织发生了问题，要及时解决和教育。听说‘二司’有很多人到沈阳去了解曾思玉同志的情况，还搞绝食？”

周恩来问：“‘二司’代表去了多少人？沈阳代表对我说，在那里搞得很乱。”

王力：“我们打电话去有三条：一是都回去，二是矛头对准沈阳军区是不对的，三是调查曾思玉同志是不对的。曾司令员是

毛主席，林副主席选派去的。”

周恩来最后对“新华工”代表说：“你们回去要搞好大团结，大联合。”

“新华工”说：“我们内部意见争论很大。”

周恩来：“哦！你们内部要搞好团结，你们也是一个比较有影响的组织。过去患难中能够战斗在一起、团结在一起，希望你们胜利后，也能战斗在一起，团结在一起。”

这次接见的《中央首长接见武汉革命派在京代表谈话纪要》传到武汉，“新武汉”立即偃旗息鼓，成为一朵未现的昙花。

## 第 857 回：连续忙，周恩来累倒车中　见安徽，青铜峡武装平叛

周恩来接见完武汉的代表，已是 27 日凌晨了，他已经筋疲力尽。但是，北京外语学院两派为争批斗陈毅一事发生争执，周恩来还要解决。他又在中南海小礼堂接见了北外“造反团”和“红旗造反团”两派学生，姚登山和外交部“联络站”核心组成员王中琪、王荣久、夏义善、蒋书勤等临时被通知参加。当他们到会时，学生已经坐满了。周恩来让姚登山坐到他身边。

周恩来对学生们说：“今天让‘批陈联委’开批陈大会，你们不要冲会。”

“批陈联络站”的北外“红旗造反团”代表不同意，说：“他们为什么要批？他们是保守组织，没有资格开大会。”

周恩来说：“我已经答应他们开，不能撤销。你们已经开过了，他们也有权开批陈会。”

北外“红旗造反团”代表说：“总理让他们开，我们就在门口截住他。”

周恩来说：“你们要截，我就躺在地上，让你们从我的身上踏过去。”

北外“红旗造反团”又说：“如果实在要让他们开，我们也派代表参加。”

周恩来说：“那不乱套了吗？”

这时，“批陈联络站”的几个代表同时嚷嚷起来，秩序很乱。

恰巧，保健医生给周恩来送药。他看着周恩来吃了药，就传了一张纸条给姚登山，意思是要姚登山对现场学生的无理纠缠负责，“如果总理身体不测，就要造姚登山的反。”

姚登山看了纸条，马上去找在场的周恩来的秘书钱嘉栋，让他看了纸条。钱嘉栋对他说：“这是医生写的，不要……”

因为现场很乱，钱嘉栋后面的话姚登山没有听清。他过来参加这次接见原只想听听周恩来有什么指示，不便随便插话。这时他觉得不能不说了，回到座位后便几次站起来要那些人“听从总理指示，不要乱哄哄。有意见一个一个地说，总理身体不好，说话要简短、尽量短。”

在场的外交部“联络站”核心组成员对北外“红旗造反团”冲批陈小会本来就有意见，这时更觉得他们太不像话，于是商量说：“赶快想个办法结束。”便由王中琪站起来说：

“我们提一个折中方案，好不好？总理已经答应‘批陈联委’开批陈大会，应该让他们按时开。你们也不要截，也不要冲。但是有一个要求：是不是总理不要亲自参加他们的会。”

周恩来说：“那好，我不去参加，但是我要派一个人去。”

学生们还在嚷嚷。姚登山站起来说：“时间不早了，总理身体不好，就按照总理的指示办，散会！”

这时有学生欢呼，鼓掌。周恩来站起身来往外走，走到门口，回过头来，招招手说：“你们还是胜利了。”

这次接见从凌晨 5 时 30 分，一直到 6 时 40 分。汽车里，已

经连续工作了 18 个小时的周恩来双目紧闭，头部无力地歪靠在保健医生的肩上。医生噙着泪，迅速拿起氧气枕的导管，慢慢地送进周恩来的鼻腔。结果周恩来因病直到 28 日中午才恢复工作。

8 月 27 日，经周恩来同意的，由外事口“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委员会”召集的“彻底批判陈毅大会”在人民大会堂召开。

北航“红旗”的韩爱晶接到开会通知来到人民大会堂，被领到主席台旁的一个小休息室。他一进屋，看见李富春坐在里面，就过去和他握手，然后在他身边坐下，关切的问道：“身体好吗？”

李富春笑着说：“还好。”

但是，韩爱晶看李富春说话的时候，胸脯随着呼吸一鼓一鼓的，喘气的声音很大，有些吃力，便挨近他，左手拉住他的手，右手放在他的胸脯上轻轻地抚摸着说：“您要注意休息，可以多散散步嘛。”

韩爱晶从休息室看到主席台上，只有陈毅坐在一张桌子前。

一会儿，北京师范大学的谭厚兰，北京“中学红代会”的李冬民和这次大会的主持方、北京外国语学院“红旗战斗大队”的负责人谭剑峰也来到休息室。他们和李富春握手后，一边坐下来等待，一边和韩爱晶一起，与李富春交谈。后来，在对外文化委员会“革命造反联队”创办的《新文委》小报上，是这样记载他们与李富春的这次谈话：

李富春同志：

真正制定“三和一少”、“三降一灭”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

是刘少奇、邓小平、王稼祥。陈毅是推行了这个东西的，但没有创造。你们批判他是对的。真正形成是在1956年到1962年，王稼祥提出了一系列的反动理论，胡说什么“国家困难，是不是对帝国主义就不要那么凶了，对各国反动派就不要那么凶了。”

《八月二十七日在“彻底批判陈毅大会”前接见韩爱晶、谭剑峰、李冬民讲话》

批判“三降一灭”

我要澄清几个問題：第一，有的組织把外交部说成是资国部，说中国外交路綫是“三降一灭”是不对的，是错誤的。“三降一灭”，我們讲的是刘、邓、彭眞、王稼祥等人，他們执行和平主义路綫，是扑灭民族运动的路綫，是他們的問題，不是说我們的整个外交路綫是“三降一灭”，陈毅有錯誤也可以批判。

说“三降一灭”是指刘、邓、王稼祥对各国反动派的外交路綫，是指刘邓的反动路綫，现在有人搞到毛主席党中央周总理領导的外交部头上来了，是完全錯誤的。外交部在毛主席、周总理的直接領导下作了很多工作，陈毅同志是有錯誤的，他要检查，这是一回事，不能把两件事联在一起。

二年，王稼祥提出了一系列的反动理論，胡说什么“国家困难，是不是对帝国主义就不要那么凶了，对修正主义就不要那么凶了，对各国反动派就不要那么凶了。”

《八月二十七日在“彻底批判陈毅大会”前接見韓爱晶、譚剑峰、李冬民讲話》

（編者按：今年三月，我們北京外国语学院红旗战斗大队遵照毛主席关于“不1要当国内革命派，而3要当国际革命派”的教导，着手收集和整理刘邓資产阶级反动路綫在外事領域里的体現与反映，并在四月，就提出刘邓外交路綫是“三降一灭”的修正主义路綫。经中央文革的仔細研究，康老于六月三日正式提出刘邓外交路綫是“三降一灭”。以后北京市革命委員会委員、红旗战斗大队負責人譚剑峰同志多次向中央首长汇报批判“三降一灭”的战况。首长对我們的大批判作了許多重要指示，給我們以巨大的支持和鼓励。最近，在“九一”指示中，中央首长又多次聯到外事口文化大革命与刘邓“三降一灭”修正主义外交路綫，并作了重要指示。因限于篇幅，我們在这里作些摘要，供讀者参考。）

李富春同志：

眞正制定“三和一少”、“三降一灭”反革命修正主义外交路綫的是刘少奇、邓小平、王稼祥。陈毅是推行了这个东西的，但沒有創造。你們批判他是对的。眞正形成是在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

这次大会原定下午13时30分开的，但是北京外国语学院“红旗战斗大队”提出一定要周恩来参加，会议主持人说：

“我们欢迎富春同志来参加这个会，但是我们希望中央文革的江青同志、伯达同志、康生同志也来参加我们的会。我们正在和中央文革联系，等他们来了我们再开会。”

会场下面一阵轻微的骚动，中央文革会不会来人，什么时候

来都不知道，只好耐心地等。北航韩爱晶看会议迟迟没有开始，就先回去了。

就这样，他们一直等到晚上 22 时多，陈伯达不得不赶到会场。当他从主席台下面走过来时，主席台上还是只有陈毅一个人坐在一个小桌旁，再无他人。

会场上响起“向伯达同志学习!”“向伯达同志致敬!”的口号声，气氛一下热烈起来。陈伯达一边走一边脱去身上的军装，穿着雪白的衬衣上了主席台，主持人立即宣布开会，并请陈伯达讲话。

陈伯达首先表示对这个大会的支持，说“你们成立的什么什么批陈联络站就很好嘛”，旁边的学生小声更正他说的联络站的名字。他的讲话不时被学生“向中央文革致敬”一类的口号打断，气氛很热烈。

不过陈伯达口气一转，说：“批陈是对的嘛，他有错误，应当批判嘛。群众可以批判，他自己也应当做自我批判。我赞成批判，也赞成他本人做自我批判。

我今天来想提一点意见。你们今天开这样一个大会，你们自己批就行了嘛，非要总理参加才行？为什么非要中央文革同志来？这是要挟。你们怎么能要挟我们呢？我们又不能包办代替，你们要批自己批么！你们没有学好主席亲自制定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十六条》的群众自己教育自己。你们自己批好了！为什么非要总理参加才行呢？总理因为不能来，就派了中央政治局常

委的李富春来代表总理，这是重视你们的批判。总理叫富春同志来代表党参加你们的大会，这就够重视你们的了，为什么要挟？”“中央领导同志不参加你们就不革命了吗？”

讲话中间有人照相，闪光灯不断。陈伯达说：“不要给我照相，我长得又不好看。”

他的话引起一片笑声。

陈伯达最后又说：“最后说给你们提点要求，今天我在这里讲了几句话，明天不要大字报大标语上街，什么‘伯达同志讲话好得很哪！’我讲什么了就好得很呐？”然后就起身告辞，一帮人簇拥着离开。

陈伯达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前后也就十几分钟。

主持人马上宣布批判会开始，讲台上有人开始喊口号，也有喊“打倒陈毅”的，还有喊：“陈毅不投降就打倒他”。

一个男生首先发言，说的是文革初期，北京外国语学院一些学生贴大字报反对驻校工作组，陈毅派警察晚上在学校外面巡逻，罪名是镇压学生运动。发言是照着稿子念的，声色俱厉。讲到最后，男生大声喝问陈毅：

“这些警察是不是你派的！？”

陈毅回答也很痛快：“是我派的。”

问：“你是执行谁的命令？”

陈毅回答：“我是秉承刘少奇的黑旨意。”

接下来的发言是揭发陈毅整陈伯达的黑材料，最后也是喝问

陈毅是否承认？

陈毅说："当初外事口的张彦整的陈伯达的黑材料，拿给我看，我认为他是在挑拨我和伯达同志的关系，这些材料我看了以后交给周总理了。"

对于陈毅的辩解，学生似乎一时不知怎样应对，于是就高呼口号：

"陈毅必须老实交代！"

"打倒陈毅！"

等等。

陈毅又说："我知道，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狡辩是没有用的，你们不信可以去问周总理。"

学生似乎又不知如何应对，于是依然是高喊口号。

后面的发言是揭发批判陈毅的修正主义文艺思想，将陈毅任对外文委主任期间发表过的对外国文艺、文学思想的讲话整理在一起，上纲上线，几乎每句话都有应该批判。

发言人慷慨激昂，还没有讲完，就听见陈毅插话说："批得好！批得痛快！"

可能是 8 月 11 日"批陈联络站"召开的批判陈毅大会上向陈毅递交了"批斗陈毅大会通令"，要求陈毅在 15 天之内递交他的"认罪书"，8 月 27 日的大会也向陈毅递交了《勒令书》，勒令他 10 天之内交出检查。

在大会读勒令书时，陈毅说："我按时交认罪书，认真地交。"

大会结束时请李富春讲话。

李富春说："昨晚和今晨总理叫我来参加你们的大会，这说明总理是支持你们的大会的。总理亲自确定为'彻底批判陈毅大会'，你们批得对，批得好。希望你们今后彻底批深批透。你们提出陈毅必须向毛主席低头认罪，提出陈毅不投降，就坚决打倒他，我都赞成。但是你们有的同志提出'打倒陈毅'，我看还不是，你们勒令陈 10 天交出检查，我支持你们的革命行动。刚才陈伯达特地打电话告诉我，要我说一句：总理和中央文革是一致的，现在有的人想挑拨是办不到的。"

8月27日，毛泽东在修改姚文元的文章《评陶铸的两本书》时加了这样一段话："这个反动组织，不敢公开见人，几个月来在北京藏于地下，他们的成员和领袖，大部分现在还不太清楚，他们只在夜深人静时派人出来贴传单，写标语。对这类人物，广大群众正在调查研究，不久就可以弄明白。"

毛泽东在这里说的"这个反动组织"就是指"516兵团"。

当天，谢富治在接见北京工代会时说："北京有个'516兵

团’，下设八个方面军，这是拆中央的台，是反革命组织。不要因为派别就忘记了敌人来分裂革命派，因为派别就喝了迷魂汤，这是危险的。”

这天，康生接见安徽赴京谈判代表，他说：“安徽有毛主席、林副主席批准的《五条》、《九条》，这是很好的基础。安徽可能有个别人、个别组织反对《九条》，这是不可否认的。不仅在合肥有、北京街上也有贴这样大字报的，我不说是哪个组织贴的喽！也不定是代表贴的，有的是坏人贴的，甚至有个别别有用心的人趁机破坏。请同志们注意。现在有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修正主义、间谍，有的以极‘左’面目出现，有的用右的面目，拆毛主席司令部的台。有的造谣，企图把中央和中央文革分开，和毛主席分开，这是敌人。北京‘516’这是反革命组织，准备不久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进行批判。你们要特别提高警惕。安徽一个月以前确实有人反对《九条》，7月份有人反对，最近也有。这是小丑跳梁，如‘几个为什么’呀。当然啰，我不怕。合肥不是有打倒我的吗？如果我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你不打我也倒了，如果我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你打也打不倒。打我，安徽不是第一个，青海赵永夫要打倒我，内蒙古也要打倒我，结果不是他们打倒我，而是他们倒了。你们要提高警惕，千万注意。同志们要有敌情观点，也就是阶级斗争观点。面临着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反动派、蒋介石、地富反坏右、党内走资派，请同志们千万要注意这个问题。同志们也不要这样讲：

我这个地方没有‘百万雄师’。要调查研究。北京还有，你们那个地方就那么干净吗？北京还有‘516’。当然，不管怎样，这是一小撮小丑。我上次同你们讲过，你们来北京不要上当，不要听信一些谣言，不要糊里糊涂。就是武汉事件发生的7月19日晚上，绑架王力，安徽合肥就也有‘打倒王力’、‘揪王力’，合肥就有这样的大字报！不能否认这个事情。武汉事件就是这样。为什么？同志们，这是阶级斗争，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你们要记着主席所说的：念念不忘阶级斗争。”

康生讲完话，吴法宪问康生：“是不是中央又要发生重大路线斗争了？”

康生点点头：“也可以这么说吧。”

吴法宪恳求说：“是要把谁揪出来，你给我露点风，我也有个准备。”

康生说：“你去问林副主席吧，他知道。”

散会后，吴法宪马上给叶群打电话，报告了康生的这些话，问叶群怎么回事？叶群说：“详细情况我也不清楚，恐怕有几个人保不住了。”

8月28日凌晨，康生又给兰州军区政委冼恒汉打电话说：“总理委托我，叫我给你打个电话，你们关于青铜峡的处理意见报告，中央收到了，毛主席也看了，政治局也研究了，中央同意你们的意见。”

冼恒汉接到电话后，立即召开党委常委会进行传达，并且立

即把中央的决定和军区的意见告诉了宁夏支左领导小组组长康健民、副组长徐洪学。

8 月 28 日傍晚，驻守青铜峡大坝上的 8048 部队，186 团政委许昌其接到副师长徐洪学的电话，要求作好反击准备，说中央有电报，马上会转到。

晚 21 时至 10 时左右，186 团政委许昌其接到 62 师转军委电报，同意兰州军区的处理意见。面对反击战是在迫击炮、轻重机枪构成的密集火网中开始的。蜂拥向前包围驻军楼房的人群，许昌其命令部队朝天打枪，但部分干部战士有情绪，混乱中向群众开了枪。当场打死 101 人，打伤 133 人。

这才见识到真正战斗的民兵群众瞬间便崩溃了。数千人马如决堤的洪水一样从河东山根一直狂泻到前清甘军提督董福祥的府邸----董府，将死伤者抛了一路。大地血迹斑斑，尸骸枕籍，斑驳的秋天的原野像被洗劫了一样，在如血的残阳下，呈现着一种惨淡的凄怨的美丽。军队并没有扩大战果，乘胜追击，只是随军反击的“指挥部”纠察队一直前伸到董府不远，免不了有人为泄愤大开杀戒。青铜峡农中的校花，美丽的 18 岁女兵团司令，中弹倒地后，非但不缴械投降，反而大骂军队和“指挥部”，结果被纠察队补了一枪，香消玉殒在自己故乡的土地上。

此后一个月，宁朔平原村村哭声，黄纸飘摇，仿佛经历了一场空前的劫难。此后数年，这片沃野刮风下雨，似乎仍可听到野鬼的哭声。

青铜峡的“筹备处”偃旗息鼓了。但吴忠的“筹备处”还在做鱼死网破之举。8 月末，连续围困吴忠东方红剧院已达半月的“筹备处”纵火焚烧了这座剧院，迫使守卫剧院的吴忠师范的红卫兵做出了在火海中集体跳楼的壮举，伤者无数。

战后的第三天，8048 部队进驻吴忠，看到了已成一片废墟的东方红电影院，和仪表厂楼梯口墙上大片的脑浆。

开进吴忠的 8048 部队，解散了“筹备处”武装，控制了吴忠、青铜峡地区的形势。持续一月余的大规模武斗渐渐进入尾声。被赶出石嘴山、汝箕沟、平罗一带的许多参加“筹备处”派的干部、教师和学生，陆续集结在平罗县渠口公社等地。

但永宁、青铜峡河西地区的“筹备处”武装仍在负隅顽抗，直至炸毁黄羊滩铁路大桥，断绝了包兰铁路的交通。

62 师 8050 部队进驻平罗后，公开表态支持“指挥部”派，“筹备处”的这些外逃群众深感势孤力单，难以安身。8 月 26 日，“筹备处”派的头头们在平罗县渠口公社召开会议，决定将该派从石嘴山、汝箕沟、平罗逃来的 200 多人员，立即转移到银南地区，28 日晚 24 时动身。

消息走漏，“指挥部”派决定彻底解决“筹备处”派的“反革命残渣余孽”。当“筹备处”派的这些转移入员乘车行至平罗县城附近时，遭到了平罗县“指挥部”埋伏的武斗队伍伏击，一时枪弹如雨点般向车队扫来。“筹备处”派的开车司机当场被打死，多人受伤。天亮后，“筹备处”派的援军赶到，他们兵分两

路进行反击。

由于 8050 部队支持“指挥部”派，并直接参与武斗，“筹备处”派的反击又一次遭到失败。

武斗结束后，双方共死亡 12 人，伤残数十人。

8 月 30 日凌晨，宁夏银川市的“指挥部”派的所属组织的头头马宝庆、刘青山等人，带领武斗人员 100 多人，携带机枪、步枪，突然袭击“筹备处”派在银川市掌政公社的基地和武斗据点。

“大联筹”早有防备，刚一发现“指挥部”的武斗队伍，就立即组织人员进入阵地。双方均以机枪、步枪进行猛烈对射，阵地上的手榴弹爆炸声也此起彼伏。“指挥部”派虽组织多次进攻，均因“筹备处”派人多势众、武器装备精良、工事坚固、火力强大而败下阵来。

双方战斗至上午 8 时，五台子等地“筹备处”的武斗队伍闻讯赶来掌政桥公社进行增援。“指挥部”派前有工事火力，后有敌兵四面射击，百余人面临全军覆没的危险，其带队的马宝庆、刘青山等人决定放弃进攻，亲自率队，以数挺机枪组成强大火力开路，边打边撤，向银川方向突围。随即又陷入重围。遂一面派人突围求援，一面就地坚守等待援军。

9 时许，银川市的“指挥部”派头头们得知马宝庆、刘青山等率领的武斗队在掌政桥失利，且已陷入包围，于是紧急调动其下属组织农建、化建等武斗专业战斗队，携带机枪、大炮前往掌政桥公社救援。“指挥部”派头头雷震华、方佐天组织了银川市

的区、市两级共 22 个单位的 1500 多人，全副武装，头戴柳条武斗帽，手持步枪、半自动或冲锋枪，携带多门 60 迫击炮，乘坐数十辆卡车，车头上架起机关枪，杀气腾腾直奔掌政桥，增援被困队伍。

车队所到之处，路人为之心惊胆颤。“指挥部”派的武装车队进入“筹备处”派的武装控制区后，即遭到该派武装力量的不断阻击。但武装车队以强大的火力进行还击，或留下少部兵力还击“筹备处”派的阻击火力，大部队仍直接驰往掌政桥。

“指挥部”武装车队到达后，与原被围队伍形成前后夹击之势，反将“筹备处”派的武斗人员围困于掌政桥。

永宁县“筹备处”头头互新力得知本派武斗队伍在掌政桥被围的消息后，即率领永宁的武斗人员 500 多人，携带步枪、冲锋枪、轻重机枪、钢炮等前来增援，遭到“指挥部”派的武斗队伍阻击。

双方又开辟新的战场，激烈交火。至此，武斗双方在 9 时，孔雀 9 队、塔桥 5 队、望远桥对峙，形成了 4 个武斗点，不仅动用了步枪、冲锋枪、手榴弹、轻重机枪，而且动用了 60 迫击炮，对对方阵地进行猛烈轰击。战斗打得十分激烈，双方均发生重大伤亡。

由于枪炮声持续不断，驻银川的 62 师闻讯赶来调停，经过艰苦的思想工作，晚 21 时，双方撤军，武斗终止。

在这次武斗中，双方共死亡15人，伤数百人。

8月30日，中共中央对“青铜峡事件”的性质做出指示，确定“青铜峡事件”是反革命叛乱。

“筹备处”并没有就此举手投降，而是将活动转入半公开或者是地下的形式。为了自身的荣辱与安全，为了躲避头头被批斗、镇压的命运，银川地区的“筹备处”头头，从9月上旬开始了逃亡生涯。

## 第 858 回：说吴波，山城歇马场大战　枪炮鸣，重庆市血雨腥风

8 月 26 日，财贸口党委副书记、财政部党组副书记、财政部副部长吴波递交了一份《认罪书》：

一九三一年十月我在伪国民党救济水灾委员会驻湘办事处工作，在专员赵守钰不在的时候，曾代表赵守钰召集地方绅士开过一次讨论救灾的会议，其中有……电告县属匪氛猖獗，账务繁重，要求派人接替，经过讨论，当时决定请清乡司令部派队清剿。电报中说的“匪氛”实际是红军的活动，请清乡司令部清剿，就是镇压共产党。这件事，我在参加革命队伍时没有交代。此次经过井冈山公社革命战士调查出来，我甘心认罪。

吴波

八月廿六日

8 月 28 日上午，周恩来联络员郑凯给财政部“革命造反司令部”电话传达了关于财政部副部长吴波问题的三点意见：

一、关于看吴波档案材料，请你们赶快写报告，报军管会，由军管会赶快报上来，我支持你们，协助你们，越快越好。

二、关于吴波撤职问题，这事总理还要报中央讨论决定，但这不妨碍你们搞。

三、你们今天下午开完会后，把吴波交给军管会，今后你们什么时候要，问军管会要，放在你们手里容易引起两派争论。

并转达了吴波的认罪书。

8 月下旬，清华化九的学生、杨成武的儿子杨东胜，在清华大礼堂大字报区的科学馆对面的围蓆上贴了一张大字报，说的是他父亲杨成武陪同毛泽东南巡时，在专列上的一段对话，毛泽东问杨成武：

“我死以后，中国会不会打内战？”

“不会的。”杨成武回答。

“为什么不会？”

“您老人家不会死的，您老人家万寿无疆。”

“人都是要死的，谁能万寿无疆？我不久也要死了。”

“您老人家即使不在了，还有您的思想在，还有您的雄文四卷在。”

“什么雄文四卷？我死以后，我那几本小书，他们愿意看就看，不愿意看，早给扔到字纸篓里去了。”“孙中山死后，国民党内部就发生了军阀混战。我死以后，说不定也会有军阀混战。我要做的事，就是要避免出现那样的事情。”

看这张大字报的人里三层、外三层。

8 月 25 日凌晨，重庆“815”对位于七公里处，沟通建设厂和望江厂交通线上的重要据点交院进行夜袭。交院不知对方底细，立即用电台向邓长春的“黄山警备区司令部”紧急求援。当时，“黄山警备区司令部”将邮电学院的通讯器材抢过来后，在交院、黄山、望江厂之间建立了无线电台联系。听到呼救，邓长春立即带领“九一纵队红二连”下山支援。由于“反到底”还没

有控制住四公里，怕“815”在那里设埋伏，邓长春他们只好从六公里上面的山上绕下去，结果又闯进了属于总后勤部管辖军库禁地。军库的军人赶紧将这些荷枪实弹的武斗人员引出禁地。当邓长春他们赶到交院的时候，战斗早已停止，“815”没有得手。

邓长春担心“815”再来进攻交院时，如果还像这次这样不能及时救援会受到损失，决定立即攻打并占领四公里，以保证交通线畅通。

当天下午，“黄山警备区司令部”的队伍几乎是倾巢出动，集中于黄沙坎，准备攻打四公里。由于与交院的联系中断，几百人一直呆在山沟里不能出动。

四公里的“815”受到攻击，立即召来长江厂“八一兵团”支援。两边都有三七高炮，互相对射。“八一兵团”的炮手只打了几炮，便通过修正瞄准目标，将炮弹打到“反到底”炮兵阵地后面的悬崖上了。那石头飞溅下来，正好打在黄山炮兵排那门三七高炮的二炮手头上。三七高炮二炮手是负责击发的，名叫张德裕。由于头上没有钢盔，也没戴藤帽，那样大一块石头打在头上，当场就被砸死。

这时，一个穿着劳保服的矮个子女生，是 50 中初三学生，名叫邓红闯，跑到黄沙坎来找邓长春，三句话没说完，就骂邓长春是“怕死鬼”。

原来，“九一纵队红二连”半夜被派去支援交院后，十多个钟头过去了，却没有回来，而且音信全无，生死不明，让留守在邮

电学院的战友们好担心。邓红闯是负责后勤的，不是“官”，却搭上邮电学院食堂送稀饭来的车，一个人偷偷跑到黄沙坎来。她见这么多人窝在黄沙坎，就来找邓长春，要邓长春派人下山去救她的战友们。邓长春正为四公里下面那两挺机枪犯愁，没听她的，她就开始大骂。邓长春不理她，她就跳下公路，要一个人下山去，被邓长春派人硬拉了回来。她一路挣扎一路骂，弄得邓长春下不了台。后来，有消息传来，说“九一纵队红二连”已经平安无事到了交院，她才立即破泣为笑。

邓长春终于下了决心，派“黄山红二连”的人先下山去探个究竟。原来，“815”25 日攻打交院吃了大亏，又得知黄山上的人都来了，自知守不住，已经悄悄撤退。“黄山红二连”搜索人员下山后，没有遇到任何抵抗。搜索到控制四公里的二师里面，连一个人影也没有。于是，“反到底”就占领了四公里，南岸“反到底”连成了一片，交通线也畅通了。

8 月 28 日凌晨，重庆“815”向“反到底”派占据的北碚歇马场解放军总字 424 部队，即通信兵技术学校发起突然袭击。“815”炮兵首先开始试射，122 榴弹炮炮弹在“反到底”阵地上植出了一片片桔红色的火林，“反到底”阵地前的一小片马尾松轰没了，石头泥土垒起来的工事顿时烟消云散，猛烈的炮火使得人就如坐船一般，震得颠来倒去。

重大“815”的“31 纵队”秘密机动到“反到底”阵地前沿，隐蔽在校园后面的松树林、灌木林、草丛中。任凭“反到底”机

枪扫射，潜伏如初。其中有中乱枪负伤后活活痛死而不发一声，不动一下的！

炮袭过后，前沿“31 纵队”刚一冲锋，对方“猛虎团”的高射机枪又响起来了。“815”停止冲锋，炮火再轰。炮火一停，再发起冲锋。“猛虎团”半自动步枪、冲锋枪、轻重机枪和手榴弹又一齐打来，特别是“反到底”倚仗山坡，架着四联高射机枪“突突突”不断射击。

中午 12 时一过，“815”开始了第三轮炮击，122 榴弹炮、迫击炮、无后坐力炮等炮弹倾泄而来，“反到底”阵地上一片火海。一个十三中学生，只有 16 岁，可能是被炮袭震吓坏了，竟迎着炮火冲出战壕！炮弹立即将他撕成了碎片，他的头随着气浪飞向天空，划过一道弧线，正好落在一个弹着点上，泥土横飞。趁着炮击间息，组织人去找他的残骸，连一小块布片也没找着，他已经化成弥漫的硝烟随风而逝了。

紧接着，“815”各类轻重机枪一齐开火，满山坡全是“815”，黑呼呼一片排成散兵线，一波一波跟潮水一般向“反到底”阵地扑去。阵地上打开了锅。平时，谁也无法体验到那种决死前的绝望，无法体验到因极度紧张而带来的神经质的兴奋与激动。此时，已找不到什么词能形容这叫人喘不上气来的战斗了。枪声连成了一片，绝对没有点数。子弹跟下雨似的从各种枪口里泼出，夹风带火的弹雨，密布了整个战场的空间。战场被炮火枪弹炽烤得滚烫，裸露的肌肤叫碎石沙子烙得生痛。所有高明的指挥都失却了

光彩，在这里，3000 余参战者人生都因生命的渺小而被高度浓缩。

“815”三波炮击，所到之处，无坚不催，屋残壁断，天崩地裂。“反到底”三面临敌，得不到喘息的机会。他们“424 红联”负责人赵某、北碚农民“反到底”派负责人欧德荣、西师“831”总部秘书郭淑泉（女）等先后身亡。“反到底”撤退了，他们在北碚区的最后据点陷落了。

“815”在歇马场打了胜仗，至此占领了北碚全区，沙坪坝安全了。他们称这次胜利为：“八二八歇马场大捷”。

这场武斗，动用了坦克、装甲车、轻重机枪、高射机枪、122 榴弹炮、迫击炮、无后坐力炮等武器，双方死亡 40 余人，街道被毁近半。

当天，两派 15 时在 502 电厂发生武斗，“815”派撤离，电厂停止供电。

这天，北碚“815”派抢走军分区在何家嘴看守粮库警卫排的武器，行动中自己走火打死 24 中的学生 1 人。

8 月 29 日，54 军副军长白斌主持召开重庆两派谈判代表预备会。

8 月 29 日至 31 日，重庆市北碚地区武斗人员 2000 余人冲进解放军 404 团营区，抢走枪支 3000 支，轻重机枪 49 挺，炮 16 门，枪弹 16 万发，手榴弹 8000 枚，打死指战员 2 人，抓走 18 人。

8 月 30 日 松藻煤矿的“815”抢走綦江县武装部枪 100 余支。

8 月，四川省革筹调查组调查重庆武斗损失情况，调查表明，重庆 165 个大中企业因武斗停产或半停产的达 157 个，其中完全停产的达 109 个，因停产减少产值 3 亿余元，厂房和大量物资遭破坏，直接损失达 1 亿元。主要公路被切断，交通基本瘫痪。

重庆发电厂因武斗全厂停产，35 千伏杨家坪变电站被破坏。

1967年的8月，沙坪坝已是一座孤城。东北面，横亘着嘉陵江深深的河谷和滚滚江流，对岸是被“815”称作“沦陷区”的“反到底”势力范围。有名的兵工厂江陵机器厂的“砸派”绝对控制局面；东出化龙桥、沿江至少有3公里路段完全暴露在江陵的机枪火力之下。“815”周年纪念，曾有外地来渝参加庆祝会的，从城里回来，正遇江陵的机关枪密集扫射，子弹打在路边岩壁上辟哩叭啦响，火光如电，石飞如雨，全都是些真家伙。这些人顿时吓得魂飞魄散，只得匍伏在地，靠着江边马路的石栏杆连续爬行几公里，到了土湾方才敢起身直行；沙区东南出口是小龙坎，往前就到了大坪、杨家坪，那儿鏖战正急，打得难分难解。过一会儿，卡车总会拉些鲜血淋淋的伤病员和死尸回来，一会儿又将一卡车、一卡车全副武装的年轻人拉上战场。和平的老百姓们挤在小龙坎狭窄的街道两旁，热热闹闹地向他们鼓掌欢呼，送稀饭送鸡蛋什么的，有点箪食壶浆以迎王师得胜凯旋、以送子弟为国捐躯的热烈与悲壮。往西北好点，出北碚，一直向西，到合

川、到武胜、到南充……都是“815”的势力范围。但是，沙坪坝最关心的，是它和重庆市的政治经济中心：市中区的联系。一旦卡断，它就成孤城了。

当然也有急事需要进城的。但必须是武装车辆。如：坦克、土装甲之类。所谓土装甲车，有两种，一种是在普通卡车的外面完整地蒙上一层钢板，仅在驾驶室前面露一个长方孔以作观察之用，这种当然就比较接近洋装甲车了，还有一种更土的，就是在汽车四个车轮外各装一个圆形钢板，在车斗里垒上砂袋，在驾驶室外蒙上些棉絮什么的。这种比较多。用来运输粮食货物，从化龙桥至沙坪坝来往的车，多是这种，遭遇袭击，只要没把车轮打坏、驾驶员打死，都可以全速开动冲过封锁线。

1967 年 8 月沙坪坝的夜是最黑暗的，黑暗得像地狱。夜还没有来临，热烘烘的夕阳还悬在山头发烫，嘉陵江两岸的大喇叭就开始骂起阵来。先是北边江陵厂的，总是气势汹汹宣告；“今晚我们将炮击重大！今晚我们将炮击重大！请重大周围的和平居民后撤五公里！请重大周围的和平居民后撤五公里！”接着是南边重庆大学的，他们的广播内容要丰富些：首先，“向战斗在江北沦陷区的‘815’战友表示崇高的敬意！”接着，“对生活在江北沦陷区水深火热中的江北和平居民表示亲切慰问！”然后，还要奉劝对方的顽固份子弃暗投明、悬崖勒马之类，最后才是“今晚我们将炮击江陵！今晚我们将炮击江陵！请江陵周围的和平居民后撤十五公里！请江陵周围的和平居民后撤十五公里！”

骂阵结束，不一会儿就动真格了。一排排炮弹挟着红通通的火光从天而降，炸出震耳欲聋的声音。为了避免挨炸，大家都不敢开灯的，全躲到安全地带去了。校园一片漆黑。重庆大学图书馆一位职工回忆当时的情况："从前几天起该厂（指江陵厂）就每晚广播，要重大和平居民后撤五公里，人们无处可撤，只好到几栋楼房的底层去，各楼底层都人满为患。水泥地上横七竖八铺着油布、席子，一家人不分男女老幼挤在一起过夜，天明再回家。几天后没有打炮了，但广播依旧，人们躲疲了，就在家里窗户挂上棉絮，桌子上铺上棉絮，人躲到桌子下。几日无炮仗，以为平安了，谁知一天夜里十点突然炮声大作，还夹着机枪声，出门一看，只见夜空中一颗颗炮弹从对方闪着红光飞来，十分密集，人们顶着棉絮往树林里跑。炮弹像是在头上飞过，十分骇人。一直到凌晨6时才停。"

白天还是热闹的。武斗打成这样，工厂自然是不上班了，没有去处，就到重庆大学看热闹。

重庆大学校园面积不小，风景秀丽，看点很多。但是行者游于途，累者歇于树。有些人是被赶出来的，如江北"沦陷区"的"815"派，无处可逃，也就跑重大来了，反正重大钱多气粗，对哥儿们管吃管住。有些"难民"住在学校里，无事好干，每天只能瞎逛。加上临时来游者，再加上本校学生，真的热闹非凡。看点几乎都集中在民主湖边的防空洞。那儿是停放死者的好地方。山城八月，毒日似火，尸体很容易腐烂，一腐烂就臭气熏天，

蚊蝇乱飞。防空洞凉快，停那儿自是好些。难民和本地居民喜欢去那儿为陨命战场的“烈士”洒几滴泪，顺带也看看被小报传单描绘得非常狰狞的“砸匪”到底什么样子？被俘的“反到底”分子一个个蓬头垢面，被人押解，蹲在尸臭四溢的洞里为“敌人”洗尸裹尸。

负责押解和管理俘虏的同学叫郑志胜，电机系四年级学生，就是重庆大学校长郑思群为他买鞋的那位同学。他成天也总是蓬头垢面，和俘虏一样蹲在尸臭四溢的洞里为自己的“战友”洗尸裹尸。人们戏称他为“尸长”。文革前，每逢课余假日，他都喜欢背个竹篓到街上检废纸、废物、桔子皮，去荒货站卖掉，又买回些字纸篓、理发剪什么的，为大家义务理发。多次评为班级学雷锋先进分子。

文革初起，校长郑思群无辜蒙冤，自杀身亡，重大学子因此奋起造反，首开“炮轰”省、市委和西南局的先河，郑志胜顺理成章成了“815”的铁杆。因为太铁，他便在 1967 年的武斗中与多起血案牵连，结果在文革后被监禁十余年。出狱时已两鬓斑白，万念俱灰。

重庆大学在武斗中共死亡 24 人。 按照毛泽东的伟大教导：“村上的人死了，开个追悼会，寄托我们的哀思”。这些同学死去的时候，“战斗团”确实都举行过追悼仪式，尸体下葬时，都向天空鸣了枪，让那时候非常紧缺的子弹炸出惊心动魄的一片乱响，为死者送行。后来，还在松林坡上为他们修了一座规模不小

的“烈士陵园”。

松林坡是学校紧靠嘉陵江的一座山坡，教授住宅区。坡上满是密密的马尾松，山头有一片开阔宁静的草坪，还有小亭一座，灰柱灰瓦，很有些幽情野趣的。假日，共青团员们都喜欢来这儿过组织活动，在霍霍作响的松涛中唱歌，朗诵报刊刚刚发表的抒情长诗。1967 年秋天，没有死的同学就在松林坡上的草坪中央挖了一个大坑，将被枪弹打得千疮百孔的尸体一具具窖下去，埋上黄土，将校园内民主湖周围的石栏杆拆掉，抬上山，为墓地砌了围栏。坟前立了纪念碑，还在进口处竖了很大一面诗屏，诗屏上刻着毛的浪漫诗句：“我失骄杨君失柳，杨柳轻飏，直上重霄九”。另外，纪念碑上刻了“革命英雄永垂不朽”的字样，还镌上八一五火炬的图案和碑文。

后来，重庆大学曾经在文革中备受冲击的老领导东山再起，他们当然不愿意让这一堆乱草丛生的泥土继续刺激他们本来就非常脆弱的神经。于是叫人把塑像砸了！把坟场挖了！通通的推了毁了！毁它个了无痕迹，毁它个寸草不留，毁它个白茫茫大地真干净！

1967 年 7 月、8 月、9 月，山城重庆变成了血雨腥风的战场。

## 第 859 回：粤海丰，反彭湃风潮汹涌　虽平反，何缘由至今不清

1967 年 8 月 29 日下午，中国共产党著名的农民运动领袖彭湃的侄子彭科的头颅被悬挂在广东省海丰县城东门的电线杆上示众 3 天。

彭湃是中国共产党早期著名农民运动领袖。上世纪 20 年代，他带领海陆丰农民开展土地革命，建立起中国第一个苏维埃政权：海陆丰苏维埃政权和海陆丰革命根据地。毛泽东称彭湃是“农民运动大王”，并且曾在彭湃主办的农民运动讲习所听过课，自称是澎湃的“学生”。1929 年，担任中共中央农委书记的彭湃被叛徒出卖，在上海牺牲。

新中国成立后，中共党史对彭湃的功绩予以充分肯定，有关彭湃烧毁自家田契，还地给农民的革命事迹，收录进小学课本广为流传；当年彭湃搞农运的海丰红宫、红场，被中央定为革命历史文物加以保护；彭湃撰写的、中共最早一部阐述农民运动理论和方法的重要专著《海丰农民运动》由周恩来亲自题写书名，在全国各地书店发行。

彭湃的儿子彭洪，出生仅两个月大时，母亲就在海丰县城被国民党枪决。他 1 岁时，父亲彭湃牺牲。是乡亲彭承训冒死将他隐性埋名哺育成人。彭洪 15 岁就成为海丰中学地下党组织一名年轻的党员。20 世纪 50 年代，彭洪先后担任海丰县委组织部长、县委副书记、县长等职。1957 年底，彭洪在广东反“地方主义”

运动中受冲击，被撤销县长职务，一年多后重新启用。

1963 年，彭洪给省委组织部副部长廖似光写信申请调动工作，理由是自己从上世纪 40 年代参加地下党以来，长期在海丰工作，这样会给工作带来局限。

1964 年春天，经国家立项、由中国农业科学院、广东省农业科学院、华南农学院联合成立“水稻生态研究所”。彭洪调任华南农学院党委委员、水稻生态研究所副主任兼党支部书记。当年 7 月，彭洪一家从海丰迁到广州。

彭湃的母亲周凤，备受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关怀。中央特为老人在彭湃故居旁建造了一栋小楼居住。1956 年，周凤到北京出席全国烈军属代表大会，毛泽东称誉周凤为“革命母亲”，还与老人一起合影留念。

在 1964 年至 1965 年“四清”运动期间，广东省委将海丰定为“四清”运动试点县。在海丰当地一向威望甚高的“革命母亲”周凤，在这场运动中突然被打成“地主婆”。彭湃家是当地有名的大地主，说他母亲是地主婆也说得过去，但在几十年的革命生涯中，周凤老人一直都是支持儿孙革命的，在当地很有威望。当时，周凤老人已是 95 岁高龄。

带头反澎湃的是时在海丰财委工作的干部赵木铎。他曾因违反财经纪律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一直认为这是曾担任过海丰县委书记、县长，已调离海丰两年多的彭洪对他的打击。而时任海丰海城镇“四清”分团团长、党委书记孙敬业也主张反对彭湃。

他在海丰说："海丰碰到了一个天大的问题，……海丰是毛泽东思想的天，还是彭老太太（指周凤）的天？是听毛主席的话，还是听彭老太太的话？""不砍倒周凤这面黑旗，毛泽东思想就进不了海丰！"

海城镇"四清"分团当时刊登的文章说："彭湃和张国焘一样是'左'倾机会主义者"、"彭湃是地主立场未改、品质未改、参加革命动机不纯"。他们拿出当年国民党诬蔑海陆丰农民运动的宣传材料，说彭湃是"叛徒"。从此，一股反彭湃的浪潮掀起，烈士彭湃也被说成是"叛徒"，彭湃领导的海陆丰起义被说成是"盲动主义"。

从海丰传来的消息，令在广州的彭洪越来越惶惑不安。他还来不及思考这股"反彭"浪潮究竟是怎么回事，文化大革命开始了。1966 年 6 月 19 日，彭洪从华南农学院的校园被拉回海丰批斗，说他利用职权提高彭湃，贬低毛主席；抬高海陆丰农民运动，贬低井冈山；反对毛主席提倡的人民公社、大跃进。此外，还有搞"地方主义"，反对"三面红旗"，招降纳叛等等罪行，共有"十大罪状"。同时，彭洪还被戴上"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帽子。这次批斗长达 100 多天。回到广州后，彭洪被免去党内外一切职务，到学院农场放牛。

1966 年 11 月一个深夜，彭湃的母亲周凤老人突然被悄悄劫走，关押进海丰县公安局的牢房里。4 个月后，被折磨得奄奄一息的老人被送回家，国家发给她的生活补贴被冻结了，她的粮食

供给和户口被取消了，同时还勒令当地医生不许为她这个“地主婆”看病。

彭洪闻讯，心急如焚。1967 年 4 月，彭洪的妻子陈平和彭湃的七弟媳、老红军杨华一起上京，找到中央文革和国务院联合接待站中南组组长李明，反映周凤老人受迫害的情况。不久，李明转告陈平：根据周总理指示，中央文革办公室和国务院办公室已联合致函广州军区，要求他们尽快把周凤接到广州治病。

这时，海丰县的人也来到北京。

1967 年 4 月，赵木铎、孙敬业等人组织了一个“控告团”，上京告彭洪、周凤翻“四清”案，

5 月底，总理办公室打电话到广州中山大学“红旗”和“八三一”，让他们派人协助广东省军区去海丰将周凤接到广州。随后，广东省军区政委陈德即开车来到中大，中大“红旗”一把手陈家吉亲自陪陈德去海丰，“八三一”派了中文系一年级的黄雪梅同去。在去海丰的路上，陈德介绍说，之所以要中大“红旗”和“八三一”派人同去，是因为此时周凤已被海丰保彭派保护起来了，军区曾派人去接，保彭的人不信任军人，认为军人是支持反澎拜的，所以要惊动中大“红旗”一把手陈家吉亲自去，因为此时海丰保彭派是“红旗”派，也叫“红旗”。而周凤住地已被反彭派包围，中大的人肯定是进不去，所以还要省军区的车去。

周凤坐广东省军区的车到了广州，却没有去军区，而是把她送到中大。陈家吉将她安排在中山大学原广东省副省长、中山大

学副校长兼校党委第一书记李嘉人住的房子，可以说是当时中大最好的房子居住。

反彭的“控告团”从北京回到海丰后，赵木铎等人组织反彭群众上街游行示威，发出抗议电，要揪出周凤的“黑后台”。同时，海丰维护彭湃烈士的干部群众也与之针锋相对。海丰围绕对澎湃的态度形成了势不两立的两大派势力。一派是维护澎湃的“人民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人总”，与之对立的另一派是“革命左派造反委员会”，简称“左委”。

此时，彭湃所著、周恩来题写书名的《海丰农民运动》一书，以及新华书店发行的宣传彭湃烈士和海陆丰农民运动的书籍，当时统统诬为“黑书”予以没收；与海陆丰农民运动密切相关、被国务院颁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红宫、红场也被改了名，红宫与红场的大门被捣毁，红色围墙也被涂成了黄色。

到了 1967 年 8 月下旬，海丰县反对彭湃的“反彭”势力先后将农民敖长善、陈贤通、马基强等 27 人打死并吊尸示众。

8 月 26 日，“反彭”骨干韩国春通过群众组织向各公社发出电报说：有人破坏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围攻、殴打参加会议的代表。海城发生“反革命暴乱”，要求各公社“组织一批持枪的武装民兵，今晚到县人委集中”。他们组织成立了“抗暴指挥部”，由赵木铎、张泽担任指挥，韩国春、金凤关任副指挥。当晚，群众林世帆被打死，暴尸示众。

联安、公平、陶沙等公社接到电报后，立即组织了约 5000

多人的武装队伍，携带机枪 12 挺、冲锋枪 38 支、步枪 170 多支进入海城。联安公社的队伍进城时，开枪打死赖定伟等 5 名群众。

大批武装农民进城，气氛十分恐怖，拥护彭湃的干部、群众纷纷离城到莲花山等地躲藏避难。彭湃侄儿彭科也在这避难的队伍中。

“反彭”势力组织搜山。8 月 29 日下午，彭科逃到郊外的将军帽山，被搜山的一伙人发现。在场一个姓洪的中年男人，听到彭科的名字，立即冲到他跟前，大声喊道：“我要报仇！”举着篾刀，连砍带割砍下彭科的头颅，还胁迫一个同样在山上被抓的女干部，将这血淋淋的头颅挂在身上，拿回城去。当晚，彭科的头颅被挂在城东门的电线杆上示众 3 天。林柔、林瑞兰等 8 名男女青年在搜山中被迫投水，溺死于青年水库。

8 月 31 日，海丰军管会接到广东军管会转来周恩来的三条命令：(1)立即停止搜山；(2)立即停止抓人、打人、搜家、杀人(包括四类分子)； (3)将抓到的人立即释放。

赵木铎等人拒绝执行周恩来的命令，在海城街头出现“揪国务院后台老板”的大幅标语。9 月间，赵木铎等人又多次组织搜山，当场打死两人，打伤 4 人，其中有彭湃的堂侄彭劲负重伤数天后死亡。

在长达半月的围剿中，100 多人被杀害，800 多人被打成残废或重伤，3000 多人被打伤。其中彭湃亲属被杀害的 5 人，更多的人遭受到种种迫害。彭湃 90 多岁高龄的老母亲周凤躲在一

位“五保户”家里未被发现，幸免于难。

1967 年，彭洪来到北京，向党中央、国务院反映海丰“反彭”暴行。

有亲友曾为彭洪安排逃港之路，希望他能逃过一劫，但彭洪谢绝了。他说：“我没有做对不起党、对不起良心的事，问心无愧。如果逃到香港去，就会被那些人抓住把柄，诬说是‘畏罪叛逃’。”“我不能给父亲英名抹黑”。

彭洪叫妻子把所有较粗的裤带都换成细细的红头绳，还把自己平时随身携带的钥匙、指甲钳、小剪刀交儿子彭丹和女儿彭伊娜。“他一再告诉我们：如果有人说爸爸自杀了，你们一定不要信。爸爸是绝对不会那样做的。”这是他孩子后来的回忆。

1968 年 7 月中旬的一个晚上，两个年轻人来到彭洪家将彭洪带走。他们是彭洪认识的同事。彭洪临走前，对陈平说的唯一一句话是“把家管好。”

彭洪被抓走后第二天被送到沙河的广州警备区司令部关押。

一个月后，1968 年 8 月中旬，老家的人报信给陈平，说彭洪被转移到海丰去批斗了！他被打得遍体鳞伤，还被紧绑在一辆汽车上，头戴用铁条、铁丝做的几十斤重的大高帽，全身涂上黑油墨，在烈日下游斗。陈平心如刀割，却无能为力。她深知：如果自己也回到海丰，可能难逃同样的劫难。她唯有完成丈夫临走前交代的嘱托，照顾好孩子。

十几天后，噩耗传来。彭科的儿子彭伊林在海丰街头看到写

着彭洪“畏罪自杀”、“自绝于党和人民”的大字报。彭伊林给暂居在广州彭洪家中的姐姐彭小真（彭科之女）寄来一封信，信中说道：“你不要忘记你死去的爸爸，更不要忘记你死去的叔叔。”

幼小的孩子从这句话里知道了父亲已不在人世。彭伊娜清楚地记得，读完信，三兄妹抱头痛哭。哥哥彭丹怕妈妈伤心，还叮嘱妹妹不要告诉妈妈这个消息。但是妈妈晚上回来，见孩子们神情不对，追问之下，彭伊娜哭着说出了实情。“妈妈一下子就躺在了床上，可大家不敢哭出声来。直到晚上，一家人躲进华农的小树林里大哭”。

在彭洪去世后，陈平带着两个孩子下放到粤北山区的一个干校待了 5 年，直到 1973 年才获准返回广州。陈平及彭家亲属始终不相信大字报上说的“彭洪是自杀的”，10 年间，陈平通过各种途径，数次上书省委、省革委会，要求调查彭洪的死因，但是一次次石沉大海。

中央对反彭湃事件十分关注。1974 年周恩来委派中国博物馆馆长徐冰到海丰了解红宫、红场的保护情况。同年 10 月，叶剑英派解放军总政治部工作组到海丰调查。

直到 1978 年，习仲勋主政广东后，才揭开海丰反彭湃烈士事件的盖子。这年 6 月，省委四届一次常委扩大会议进行整风，习仲勋提出，应为这起骇人听闻血案中的死难者平反昭雪。

有人表示，对“反彭”事件不能平反昭雪，否则就上告党中央。习仲勋勃然大怒说：“你要是不上告，你就是王八蛋！”

1978 年 7 月底，习仲勋在汕头地委考察，谈到海丰反彭湃问题时说，“海丰县委常委 19 人中，有几个参与杀了人，他们手上沾了血……事情弄清楚了，民愤很大，平不了民愤的，我再把你关起来。有的拿刀杀人的并不是最主要的罪犯，最主要的是幕后策划指挥的，责任在他们。”

与此同时，广东省委、省革委会同广州军区党委派出联合工作组，协助汕头地委彻底清查海丰反彭湃烈士事件。这支约 30 人的调查组，由时任省委常委、广东省公安厅厅长王宁带队。成员包括省政法委、司法厅、纪委等单位处级以上的干部，汕头地委的书记也参与了。整个调查时间持续半年之久。

1978 年 11 月，为了查明彭洪的死因，工作组决定提棺验尸。他们通过走访，找到一个曾参与拖尸、埋尸的农民。这个朴实的农民 10 年前挖坑埋下彭洪的尸体后，顺手在坟里埋下了一块红砖。

根据这一线索，工作组在当时海丰县中医院（现为海丰彭湃中学）后面的一片荒郊野地下找到了一具遗骸。再根据陈平描述的彭洪特征，调查人员判定：这正是彭洪的遗骸。

1978 年 11 月 10 日，海丰县委为在“文革”中遭迫害致死的彭洪举行了追悼大会，省委、省革委会、汕头地委、地区革委会，都送了花圈，并派代表参加了追悼会。“这个追悼大会，为彭家平反雪冤了。”

1979 年 1 月 25 日，习仲勋在省委四届二次常委扩大会议上

作总结发言，对海丰反彭湃烈士事件作了定性：“这是林彪、‘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的一个组成部分，矛头指向周总理、叶副主席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是一次反革命事件。”

1987 年 8 月 4 日，海丰县人民法院对这一事件的制造者做出判决：判处赵木铎有期徒刑 9 年，韩国春有期徒刑 8 年，王雅文有期徒刑 7 年，金凤关有期徒刑 5 年，张新民有期徒刑 4 年，张泽有期徒刑两年缓刑两年。孙敬业也受到撤销党内外职务、留党察看两年、工资降一级的处分。

## 第 860 回：拉萨乱，世界屋脊武斗忙　生活会，王力、关峰被隔离

武斗之风也吹到了世界屋脊西藏。1967 年 7 月 27 日，西藏“大联指”派与“造总”派在拉萨市发生武斗，造成双方大批人员受伤和被对立派俘获。

事后，“大联指”派与“造总”派派出代表谈判交换战俘。双方代表于 29 日达成协议：同意交换双方在 27 日武斗中被对方扣贸的人质。并决定于 7 月 30 日，在拉萨市汽车保养厂“造总二司”的“造总”派武斗据点交换人质。

7 月 30 日上午，“大联指”代表率队前往汽车保养厂。在交换人质时，双方又因己方被俘人员受到对方殴打和毒刑而相互指责，再次发生冲突。“大联指”代表及所率队伍遭到“造总二司”的武斗人员以铁钎、大棒等武斗工具的攻击，虽经反击，但寡不敌众。

“大联指”负责人闻讯，立即组织人马，携带武斗工具，前往汽车保养厂“营救战友”，并声称要“踏平保养厂，血洗匪‘二司’”。武斗中，双方使用了铁钎、大棒、石头、“六六六”粉等，造成了严重的流血事件。“大联指”派伤 200 余人，其中 61 人重伤，5 人当场休克。“造总”派伤 70 余人。当天下午，拉萨市军管会派出军队前去制止，两派在混战中打伤 50 多名解放军战士，其中 15 人重伤。武斗还造成了严重的国家财产损失。汽车保养厂的大小汽车 37 辆在武斗中被砸坏，工厂的大部分门窗玻璃被

砸，设备损失严重。

过了两个星期，8 月 13 日，“造总”经过策划，决定对“大联指”在拉萨市占据优势的工交小学发起攻击。上午，“造总二司”的武斗人员对工交小学的“大联指”派进行挑衅，“大联指”派进行反击，双方发生冲突，很快即变成双方以石头和棍棒为武器的流血武斗。

“造总”派人多势众，在武斗中“取得了压倒性优势的胜利”，打伤“大联指”派多人，并将该校的 13 名“大联指”派成员抓到拉萨市汽车 3 队“造总二司”的据点。

“大联指”闻讯，立即组织了 1000 多人的武斗大军“营救战友”，到汽车 3 队要“造总”派放人。遭到拒绝，“大联指”即发起进攻，两派又一次进行更大规模的武斗。“造总”派在这次武斗中伤 90 人，其中 50 人被送往医院抢救。“大联指”派在上述两次武斗中，受伤者达 100 多人，其成员彭凯在汽车保养厂的武斗混战中，头部被对方的木棒和石头击中，当场昏倒在地。经解放军西藏军区总医院抢救无效，于 28 日死去。

8 月 29 日，“大联指”派举行大规模集会，为在“813”事件中被打伤后致死的“革命战友”彭凯召开追悼会。会后，又在拉萨市区举行大规模的游行示威，动用了 20 多辆大卡车，满载着所部游行示威成员，一路高呼“血债要用血来还！”“向杀人凶手讨还血债！”等口号。

当游行队伍返程经过财经大院门口时，“大联指”派发现占

据该院的“造总十一司”有许多人在“红色广播站”墙头看热闹。

财经大院当时为“造总”派的下属组织“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总部”占据，并设有“总部”办公室。院内一栋藏式大楼内，驻扎着该组织的 30 多名武斗队成员。本来就满腔仇恨和怒火的“大联指”游行示威的人群，立即向趴在墙头嘻嘻哈哈看热闹的“造总”派寻衅，用石块袭击看热闹的“造总”派成员，遭到“造总”派成员还击。双方陆续投入了几百人展开混战。“造总”派占据院墙，死守大门，打退了“大联指”派的多次冲击后，又退据藏式大楼，双方在藏式大楼展开了肉搏战。

就在双方打得难解难分时，拉萨市消防队接到从财经大院打来的电话，说军区一副参谋长命令他们，立即赶赴财经大院救火。

几分钟后，两辆消防车赶到现场，发现并无火情，只有两派武斗人员在藏式大楼前格斗。

消防队的出现引起了“造总”派的惊讶。“红色广播站”马上宣称消防队全副武装，帮助“大联指”武斗。

消防队本与“大联指”派观点相同，遭到“造总”派的包围和攻击，于是也卷入了这场武斗。事后，“造总十一司”的一名“战地记者”在报道中说，消防队的救火车上没有一滴水，消防队员携带了一支步枪，2 支短枪，10 余把大刀、一箱子弹、10 小桶汽油、17 颗手榴弹及一氧化碳、“六六六”粉等化学物质，“向我革命战士发动了惨无人性的屠杀”。

武斗进行中，两派都调兵遣将，准备进行更大规模的武斗。

直到拉萨军管会闻讯派人出面制止，才避免了该武斗事件的进一步延续和扩大。

当时两派的小报报道，在这场武斗中，“造总”派伤 100 余人，其中 10 人重伤；“大联指”派的 28 名重伤员是解放军战士抢救出来的。消防队先后进入财经大院的 40 多名战士中，轻、重伤各 22 人，其中 3 人生命垂危。

当时，“造总”派占据拉萨市区一些重要据点和区域，在一些城市中也声势颇威；“大联指”派在拉萨市区和西藏一些主要城市略具下风，但在西藏广大农牧地区却颇有影响，号称要“走毛主席指引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并对“造总”派占据优势的城市实行包围和经济封锁，断绝交通运输，实行“饿杀”政策。拉萨的文革也进入了武装割据的局面。

8 月 29 日下午，毛泽东在上海虹桥宾馆听取杨成武关于中央文革小组 8 月 25 日会议情况的汇报。

谈到王力 8 月 7 日讲话时，毛泽东说：“那些话我也不能说的，我没有叫他管外交部。”

谈到由谁分管宣传和外交工作时，毛泽东说：“还是第一个办法好，姚文元去接，要有一个准备时期。外交部的干部档案研究一下，要管起来。恐怕他们已经管起来了。”

毛泽东这里说的“他们”是指外交部的造反派。

谈到周恩来身体不太好的情况时，毛泽东说：“要多睡觉，不要开长会，不要多说话。”

谈到有人要打倒黑龙江省革委会时，毛泽东说："那不行。"

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继 8 月 25 日下发《关于展开拥军爱民运动的号召》之后不到 4 天，于 8 月 29 日再次下发《关于学习中央关于开展拥军爱民运动的号召的通知》，要求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各省军管会、各军区、各省军区、各总部必须高度重视"由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批发的中央关于开展拥军爱民运动的号召"，要将这一号召"以各种方式最快地传播到广大的城市和农村，在一些边远地区和交通阻塞的地区，可用飞机散发。""做到家喻户晓，在全国立即掀起一个更大规模的热烈的拥军爱民运动。"

8 月 29 日，中南海外面又出现了一个几百人的"揪陶火线"，要揪陶铸。陈伯达、谢富治来到现场。

陈伯达问："你们这些人是哪儿的？这些棚子是你们搭的吗？谁叫你们这样干的？坚决地无条件地撤，……不要上当了，不要被坏人利用，这是中央的地方，不准在这里损坏了中央的威严。无条件撤退这里，不是明天撤，现在就撤……文化革命丑化了，这多难看，连走路也不方便。批判陶铸是中央批准的，你们批判陶铸我们是支持的、但不是这样做法，这不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做法……我们年轻时干革命也没有这样干过。从来没想出这些花样，年轻人犯错误可以原谅，幼稚。现在就撤，无条件地撤，"围在周围的群众鼓掌，陈伯达继续说："欢迎你们这样做，我们走你们就撤……"

谢富治也说："不要上当，小孩也不要上当，中南海四门都封闭了，国际影响很不好。文化大革命丑化了，应该搞大批判。你们这样做是对中央施加压力，很坏，给文化革命没有增加什么光彩，丑化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8 月 30 日下午 14 时，在钓鱼台 16 楼召开中央文革扩大会议，张春桥、姚文元特地从上海赶来出席。在座的有周恩来、江青、陈伯达、康生，还有军队方面的杨成武和吴法宪。没有通知王力和关锋参加。

会上，周恩来传达了毛泽东席的指示，批评王力、关锋。说他们的主要错误，一是鼓动在外交部的夺权，外交部是国家的权力机关，这事关系到国家的声誉和形象，王力说红卫兵可以夺外交部的权，是非常错误的；二是《红旗》杂志两篇的文章，提出"揪军内一小撮"的错误口号。接着周恩来当场宣布了毛泽东的决定，对王力、关锋进行隔离审查，对外称"请假检讨"。随后江青对戚本禹说："你去叫王力、关锋来开会。"

戚本禹让秘书去 15 楼通知关锋过来开会。他自己跑到 16 号楼的楼上去接王力下来。王力的腿伤还没有好，不能走路，戚本禹用轮椅推着他到了楼梯口，然后挽着他一步一步走进会议室。

虽然不久前有毛泽东批评《红旗》杂志社论中"揪军内一小撮"的事情发生，但王力、关峰并没有感到有太大的压力，依然像往常一样接见学生，发表讲话，丝毫没有任何改变。他们并不知道，1967 年 8 月 30 日这一天，会是他们政治生命的结束之日。

江青宣布开会，说这次会是中央文革小组的“生活会”，主要批判王力和关锋。康生作了长篇发言，主要批王力，他提出王力的错误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反军乱军，毁我长城；

二、“八.七”讲话反周总理、反对江青、陈伯达，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

三、反对中央文革；

四、是刘少奇、邓小平、王稼祥鼓吹“三和一少”、“三降一灭”的黑干将。

陈伯达也作了长篇发言，他说：“现在不是你考虑文章的时候了，是考虑你的问题的时候了。你想一想，你们最近在干什么？你们搞了多少鬼名堂，根本不和中央文革商量，更别提报告毛主席了！你王力简直要把自己打扮成江青同志的化身，这是在丢江青同志的人，她根本不需要你这个化身！你已经昏了头脑！”

他还重点批判了关峰，并说《红旗》杂志八一社论他没有看过，是王力、关锋擅自决定发表的。

关锋说，那两篇文章是他叫《红旗》杂志编辑林杰，根据他和王力的意见起草的，然后他和王力作了修改审定，他们应该为这个错误承担责任。但他又说：“不管我犯了多大的错误，有一点是要讲清楚的，这篇文章最后是经过陈伯达批准才发表的，而并不像伯达同志说的‘是他们擅自决定发表的’。”

陈伯达不承认，他说：“毛主席说我是刘盆子，人家早就把

我当刘盆子啦。我根本就没看过这篇社论，他们就发了。”

关锋说：“这文章明明就是你签发的，而且你还在上面还作了一些文字改动，在稿子上还有你亲笔加的一句话，‘举起你的双手，迎接阶级斗争新的大风暴吧！’你怎么都不记得了呢？”

关锋的秘书瞿怀明给《红旗》杂志编辑林杰打电话询问：“陈伯达对《红旗》‘八一’社论的签发手迹，你看见没有，你说一下当时的情况。”

林杰意识到出什么事情了，所以没有敢说实话，只是说：“我不知道！我知道关锋看了，也送陈伯达看了，其他的我就不知道了。”

瞿怀明对林杰说：“卢之超说了，陈伯达确实是签发了，他看到了签发的手稿了，他说你也看到了。你到底看到没有？到底是怎么回儿事？”

林杰说：“卢之超不是说他看到了吗，你不要再追问我了！就是那么回子事儿。”

35 年后的 2002 年 7 月，关锋的女儿关成华在拜访林杰时谈及此事，林杰说“我一直没有正面问答他这个问题。”

林杰说：1967 年《红旗》杂志 12 期的“八一”社论“是我写的。其中卢之超说了一些意见，至于哪句话是谁的，现在我记不清了。因最后执笔是我写的，我写完后就交给你爸爸关锋看。他看完后上交了陈伯达签发。这篇文章确实没有送毛泽东审阅。一般原则是有拿不准的问题时，才送毛主席审阅。没什么大出入，

能拿得准的，陈伯达签发就行了。后来是陈伯达签发后，关锋叫我去取回稿子，是我去取回来的。当时卢之超是责任编辑，也看到了陈伯达签发的签字手迹。”

在 1967 年 8 月 30 日下午钓鱼台 16 楼的中央文革扩大会上，周恩来当场叫人去把 1967 年《红旗》杂志 12 期“八一”社论的原稿调来，可原稿已被陈伯达拿走。周恩来又叫秘书去陈伯达办公室找，结果找到了，上面确实有陈伯达在审稿时写的字，而且陈伯达还写了“照发”的批语。

事已至此，陈伯达又说当时自己吃了安眠药，糊里糊涂的，忘了。

周恩来说：“看来这个文章是经过伯达同志同意的。但陈伯达说他当时是吃了安眠药，头脑不清楚，也情有可原。关锋、王力同志当时应该把文章交给其他中央领导去审查的，但是他们没有这样做。所以关锋、王力同志仍负有主要责任。”

接着又讨论了王力的“八七讲话”。

王力否认他说过“红卫兵也可以当外交部长”这些话。周恩来就把那天外交部作的传达纪录和红卫兵的小报都调来，有的材料上面有这话。虽然也可能是记录的夸大记忆，但毕竟是已经在外面造成很大的影响了。

吴法宪说：王力是“火烧英代办的罪魁”。

周恩来插话说：“火烧英代办处没有王力的事。”

谢富治严肃地说：“王力是个投机客，背着中央文革作了大

量的坏事，他把许多的情报偷偷地给一些有问题的人透露，这里包含着不可告人的用心。你还有什么要狡辩的呢？”

王力当时已心灰意冷，摇摇头说：“我没有什么可说的了。”

这会一直开到 8 月 31 日凌晨 2 时才结束，足足开了 12 个小时，最后，由江青作了总结。她说，王力是邓小平、彭真的人，至少是黑线上的人。并宣布：“王力、关锋从今天起请假检讨！”

然后江青叫戚本禹去安排地方，对王力、关锋进行隔离审查。

怕警卫有误会，戚本禹特意问周恩来：“他们什么待遇？”

周恩来说：“还是首长待遇。”

于是，戚本禹在钓鱼台离 16 号楼不远的 2 号楼找了两个空的房间，然后到中央文革办事组，让办事组的人给王力、关锋每人准备一套《毛泽东选集》以及纸和笔，但没说干什么。

散会后，戚本禹将王力、关锋送到 2 号楼。王力、关锋向戚本禹表示：“一定好好学习毛主席的指示，检查自己的错误。”

戚本禹对 2 号楼的警卫战士说：“他们还是首长，你们要好好对待他们。”

他回到 16 号楼，向在场的人做了汇报。周恩来交代戚本禹说：“你每天去看看他们的情况，要经常用电话向我报告。”

其他人都没说什么。

周恩来走了。

康生和陈伯达也跟着走了。

突然，江青嚎啕大哭，在场的张春桥、姚文元、戚本禹都是

第一次看到江青这么哭，十分惊讶。姚文元也跟着掉下了眼泪。

据时任江青秘书的阎长贵2002年7月18日对关锋的女儿关成华谈及此事时说：

“67年8月30号，在钓鱼台批判王力、关锋的那个晚上，江青还说：关锋你不要反对陈伯达。《红旗》杂志有人，就是张凌，她已经揭发你了。江青还说：你知道有这个人张凌吧，威风凌凌的凌。江青还表示说：揭发陈伯达的材料可不是我交给陈伯达的啊!而是《红旗》的张凌交给陈伯达的。”

“67年的8月30号，江青回到钓鱼台的楼里，很奇怪的问我：你对关锋怎么看？我说：关锋看问题，对人有些偏激。江青没说什么，只是‘嗯’了一声。第二天，江青很严肃的和我说：从今天以后，你不要再回《红旗》机关了，你的关系可以办转到中共中央办公厅来。说完后，她又给戚本禹打了电话，让他办理此事。我问道：这件事还要不要和关锋说一声？江青说：不用了。”

江青提到《红旗》杂志张凌一事，据阎长贵的回忆是这样的：

1962年康生让陈伯达主持《红旗》杂志选一批人参与讨论编写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修养》的序言。文革中开始批判刘少奇《修养》后，《红旗》杂志的文革主任李可让勒令这些人交代1962年为《修养》写序言的事情。“林杰先写了一个材料说是邓力群等人组织发起的。关锋就此事也写了一个材料，事实确实是陈伯达主持谈论的。但对这个事儿又怕拿不准，就找了江青询问。江青说：你们不要反对陈伯达。关锋说：我怎么会反对陈伯达呐。

我不会反对陈伯达。反对陈伯达不成了反革命了嘛。江青说：也不要说的这么严重。她让把材料先留下。江青还说：陈伯达只是个过渡性人物。”关锋回到《红旗》杂志社，只是将此事告知林杰，“将材料先封存，不要再复印了。可是林杰还是私自复印了几份儿，还给了当时《红旗》杂志文革成员张凌。张凌是农村组的组长，她的丈夫史敬堂是陈伯达的秘书。后来张凌就通过史敬堂把这份材料交给了陈伯达。”

随后，8 月 31 日凌晨 2 时多，陈伯达、姚文元、戚本禹到《红旗》杂志社，宣布将林杰隔离审查。早在 8 月 27 日，“三军”就已经抄了林杰的办公室。

事后，江青对戚本禹说：“这次你高兴了，没有你的事了。但你也要注意哩。这次你得感谢马克思的在天之灵，让你躲过了一劫。”

## 第 861 回：周恩来，召见批评姚登山　哈尔滨，捍联总围“哈一机”

8月31日，周恩来再次召见外交部“联络站”核心组、姚登山和外交部党委成员。他说：

“当前最大的两个错误，一个是冲击解放军，一个是从‘左’的方面动摇党中央的领导。你们内部是有敌人的，你们要提高警惕。你们要坚信党中央，坚信中央文革，坚信中央军委。最近一个时期，我讲话不灵了，这种情况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这是最高指示。外交大权属中央，中央授权给我，别人不能说，我管。姚登山最近考验还不够，他还不成熟，他提出一些说法和做法都是不对的，如提‘刘、邓、陈一小撮’就是很错误的，这等于站在对抗中央的地位。”

他对姚登山说：“你刚回国不久，情况还不熟悉，我们还要看你，人家要求你当外交部长，连天安门上都有。你作为一个司长，对出现这样的大标语从来也不在我们面前吭一声。‘联络站’报的夺权班子名单，我送给林副主席看了，林副主席表示不同意，林副主席说外交部还要三结合。”

“你在外面的几个报告煽动性很大，在外贸部的讲话修改了中央的精神。你是个刚回国的代办，客观上在对抗中央的精神。”

姚登山辩解说：“我是根据王力讲话精神讲的。”

周恩来批评道：“你这是推卸责任，批评你们严的不是我，我是爱护青年的。总之，你不要推给别人，你自己检查自己。”

姚登山："我对王力讲话理解错误了。"

周恩来说："陈毅的问题很清楚，他有缺点和错误，但不是你们提的'刘、邓、陈'，我现在还不能同意打倒，你们打倒，我还是不举手。"

"联络站"代表："陈毅不倒，其它部长都打不倒，姬鹏飞、乔冠华也打不倒。"

周恩来："你们老是逼我把最高指示说出来。主席对外交部副部长知道得很清楚。为什么一个地方有陈再道，什么都要打大麻子？不要每个部都要×××大麻子，什么谭××嘛！但是我主张批，姬、乔可以批。"

"联络站"要求："姬、乔靠边站。"

周恩来："这样不行，我是在最高指示原则下灵活机动一下，9月批姬，10月批乔，11月再批姬，12月再批乔，而且轮流管工作。"

"联络站"坚持："一定要打倒姬、乔。"

周恩来："我是按最高指示办事。你陈家康像小丑一样跳出来了，很坏，你们可以向外交部宣布，陈家康停职反省。"

"联络站"："王炳南呢？"

周恩来："也可以停职反省。"

他还说："'516'的出名，是因为《五·一六通知》，去年5月16日通过的，今年发表。他们就说，这是因为无产阶级司令部还有新的赫鲁晓夫没有揪出来，还在主席司令部里。说这才

是主席的战略部署。恰恰相反，这是节外生枝，无中生有，抓小失大，破坏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巩固，这是使敌人快意的，使我们亲者痛恨的。外面现在调查‘516’，材料很多，牵涉到很重要的问题，主席已经肯定了，这是一个反革命组织。

你们要注意，外交部大一统了，不会一个没有。我看你们不要太天真了，既有‘516’组织。哪个地方都能钻进去，秘密活动、抓材料。‘516’的后台，现在还没完全弄清楚，现在他们唯恐天下不乱，不是我们说的，把刘邓黑司令部打乱。这是红线，打出光明来。他们要把无产阶级司令部打乱，他们把我们许多不利的东西拿出来大宣传，把我们外交文件拿来宣传。正如江青同志说的，从各个方面，或者从极‘左’的方面，或者从右的方面，来孤立、动摇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就是有那些人在后面搞名堂，幸灾乐祸。你们不懂得，他们把毛主席、把我们伟大祖国的形象在到处、在国际上孤立起来就高兴了。”

当晚，外交部“联络站”核心组成员和姚登山立即开会，讨论周恩来当天的批评。

8月27日、28日两天，哈尔滨哈一机厂和哈尔滨港务局等单位再次发生武斗，双方动用了装甲车和坦克，手持机枪、步枪、手榴弹等武器，造成十多人死亡，几十人受伤。

起因还是哈尔滨“炮轰派”的一支“别动队”在执行借粮的“特别行动”时，受到“捍联总”袭击，尽数被俘，据“内线”报信，连日来倍受拷打，仍囚禁在某大学地下室。

“炮轰派”的第一“根据地”----哈一机处于一级战备状态：4 辆装甲车、3 辆坦克成两列停在大门前，仿佛只要一声令下，就破门冲出。数千人头戴柳盔，手持大棒，严阵以待。另有 300 余名“别动队”，荷枪实弹，分乘六、七辆卡车，个个脸上是肃穆的敢死神情，如同箭在弦上，引而不发。他们要去营救战友。忽然队列中有人带头高呼口号：“打倒潘复生！救回我战友！”

大棒擎举如林，数千人连声高呼：“救回我战友！打倒潘复生！打倒汪家军！ 打倒耗子兵！”带队的是那位“潘二嫂”，黑龙江大学中文系的学生，并没结婚。之所以叫“潘二嫂”，是一次“炮轰派”的广播车和“捍联总”的广播车在闹市区相遇时，“捍联总”的广播车内坐的是一名男广播员，手中拿着厚厚的一份广播稿，照稿宣读。“炮轰派”的广播车内坐的是这位“潘二嫂”，手中无稿，却镇定自若，唇枪舌剑，出口成章，滔滔不绝，遣词用句，尖刻辛辣，应答质问，逻辑清晰，冷嘲热讽，幽默百出，引马恩列斯之经，如数家珍，据古今中外之典，似文在目。持续 3 个多小时的一场车头抵车头的辩论，甘拜下风的倒是那位手拿广播稿的“捍联总”男广播员！里三层外三层站在人行道上看热闹的市民，为“炮轰派”这位女广播员大鼓其掌。“捍联总”的广播车在掌声中狼狈地退到一个街口，拐弯开走了。当人们问起这位女广播员是谁时，有人说“潘二嫂”。从那天起，“潘二嫂”三个字不胫而走，几乎传遍整个哈尔滨。连“捍联

总”的许多人提起她都很佩服，不得不承认全市休想找得出一个能辩论得过“潘二嫂”的人！据说潘复生在省“革命委员会”的常委会议上也曾讲过：“像‘潘二嫂’这样的人才，实在难得！谁能把她争取到我们这一边来，谁就等于为我们的新政权立了一大功！”

据说还真有人去拉拢过她，遭她严词拒绝。她是个死硬到底的“炮轰派”。后来她时常带领“别动队”在全市各处演讲，为“炮轰派”募捐。有一次，甚至跑到了省革委会门口募捐。她在募捐演讲时说：“同志们，我是潘二嫂！我在此向你们伸出求援的双手！正义之神在我和你们大家的上空，她此刻默默地注视着我和你们。谁没有妻子儿女？谁没有父亲母亲？ ‘捍联总’对我‘炮轰派’实行种种封锁，妄图将我们置于死地而后快！我‘炮轰派’战士个个死不足惜，但我‘炮轰派’战士的妻子儿女是无辜的，他们的父亲母亲是无辜的！他们无辜的妻子儿女和无辜的父亲母亲陷于饥寒交迫的境地，因为参加了‘炮轰派’的工人兄弟们的工资早已被停发了……”

只要“潘二嫂”往哪一站，一开口演讲，围观的市民，凡是身上带着钱包的，不管你是否认为“炮轰派”有理，都会不由自主地将手伸进衣兜掏出钱包来！“潘二嫂”就具有这等本事！她那表情，她那声音，就是能令你感动，仿佛具有某种魔力似的。而在她身旁，“别动队”抬着一个大箩筐，人们纷纷往那箩筐里扔钱。连孩子也不例外。每次她都能募捐到满满一箩筐钱！

当年“炮轰派”中有一说法：“范大哥”的理论，“潘二嫂”的口才，“冯司令”的组织能力。

“范大哥”当然是黑龙江造反派的头头范正美。冯司令者，冯昭逢也。他们被合尊为“炮轰派”三杰。

“潘二嫂”在募捐时，“捍联总”有好几次可以捉拿她，但据说潘复生有指示，对“炮匪三杰”，没经省“革命委员会”下令，不得捉拿，更不得加以伤害。

哈一机的大部队在“潘二嫂”的率领下出发去救战友了。忽然厂里响起了警报声。有人慌慌张张地跑来说，“捍联总”的一支人马，趁大本营实力空虚，发起了进攻，扬言要一举拿下“哈一机”。

几盏探照灯开了，院子里亮得如同白昼。一部分人扑向前、后门。一部分人守卫在四面高墙下。几辆装甲车和坦克从仓库里开了出来。大本营的装甲车、坦克是足够自卫用的。

高墙外，“捍联总”的喇叭在高喊：“‘炮’匪们听着，我们知道你们现在是演‘空城计’，赶快打开大门投降吧！否则我们攻进去，绝没有你们的好下场！……”

高墙内，“炮轰派”的喇叭也响了：“耗子兵们听着，你们有胆量就进攻吧！ 我们众志成城，视死如归！……”

哈一机的前、后大门打开了，“捍联总”们呐喊着冲了进来，但一见出现在门口的是装甲车和坦克，又退了回去。

装甲车向夜空扫射了一阵机枪。枪声过后，墙内墙外一片寂

静。“捍联总”们悄悄撤走了。

凌晨时分，“炮轰派”的大部队班师回“营”了，也救回了他们的战友：11 个活的，6 具尸体。其中 4 人是被毒打至死。两人是因不堪忍受毒打，跳楼自杀的。被救回的人中，还包括“炮轰派”总司令冯昭逢。他不但遭到毒打，还遭到假活埋的威胁。埋至胸口，让他承认“炮轰派”是反动组织，以司令的名义宣布解散 。他宁死不屈。大概因为他是“炮轰派”的司令，“捍联总”没敢真的就活埋了他，又把他从坑里挖了出来……

大本营一片女人的痛哭，一片男人的怒吼，笼罩着复仇的强烈氛围。

头头们当即开会，十几分钟后就做出决定：举行示威游行。

于是许多人又开始忙忙碌碌地赶制担架，做花圈，写挽联，剪黑纱。

上午 9 时，几千人的示威游行大军开出了“哈一机”。照例前面是装甲车和坦克开路。装甲车头十字交叉披着黑纱，交叉点是一朵洗衣盆那么大的洁白的纸花。坦克罩着白布。这一次出动 4 辆装甲车，4 辆坦克。不擎红旗。只擎白布挽幛和白布丧幡。颁布了纪律，不喊口号，不唱歌，一切行动听指挥。

6 具尸体放在担架上，以白布罩之。几十名身强力壮者轮番抬。白布挽幛上写着的一行浓墨大字是：

“为死难烈士报仇！血债要用血来还！”

人人胸戴白纸花，臂戴黑纱。大队人马庄严肃穆，沉痛无声，

浩浩荡荡地向市内行进。广播车放着哀乐。队伍随着哀乐的旋律走。交通为之中断 ，围观者人山人海,似乎倾城出动。

队伍一直行进到省革命委员会楼前，坦克的炮筒缓缓扬起，对准了楼正面。

“让潘复生站到窗口来！”“潘二嫂”凌厉的声音从“炮轰派”的广播车内传了出来。

“潘复生早走了！常委们早走光啦！”

“千万别开炮呀！”

“炮轰派万岁！炮轰派万万岁啊！”

楼内喊着答复。

不开炮，“炮轰派”岂能善罢甘休?

轰！……

轰！……

轰！……

“炮轰派”连放 6 炮，他们真的炮轰“东北新曙光”了！那 107 革委会大楼岂不是灰飞烟灭，楼塌人亡。还好，坦克放的是演习用的空包弹，而且是对空放的。但这也早把楼里的人吓得魂飞胆丧。

隔了一阵，又是 6 炮。总共放了六六三十六炮。自打解放以来，哪一年国庆节哈尔滨也没放过礼炮，这次老百姓们可算听到炮响，见识坦克开炮的情形了！

8 月 26 日，哈一机的装甲宣传车上街进行宣传时，在太平

桥附近遭到了“捍联总”投掷的燃烧瓶和纸制榴弹袭击，当即从一机厂里就开出了一辆坦克前来救护并示威，“捍联总”的卡车被坦克追的没命的逃跑，街上许多群众见状兴奋地拍手叫好。

8 月 27 日下午，全市“炮轰派”在师院召开大会，前几天被他们抓住的一个“捍联总”老造反派工人总指挥在会上公开杀了“回马枪”，宣布加入“炮轰派”。大会以后，“炮轰派”开始武装游行：前面是装甲宣传车上架着高音喇叭，哈一机的 3 辆坦克紧随其后，再后面是学生、工人的队伍，最后则是武装工人乘坐的 10 多辆大卡车。车上的工人头戴柳条帽，手持长矛、铁棍，整个队伍可以说是士气高昂，杀气腾腾，一路上“炮轰潘复生！打倒赵去非！打倒汪家道！砸烂捍联总！”的口号震天响。大街上看热闹的群众是前拥后护，鼓掌欢迎，好不热烈、好不威风！当游行队伍走到太平桥时，据守在附近一所小学的“捍联总”突然向游行队伍投掷纸制手榴弹，当即坦克上的机枪对空射击，学校里的“捍联总”立即撤走了。

8 月 27 日，在哈尔滨市“捍联总”统一指挥下，由哈军工空军工程系学员和学院工厂职工组成一个炮兵连、一个步兵连与哈尔滨市其他单位一起，包围了哈一机。先后向哈一机发射枪炮子弹 1060 发，误毙解放军韩长刚。

第二天，“捍联总”又派出一支由工厂的基层干部，党员、班组长和老工人组成的 260 人队伍，支援紧挨着哈一机的哈尔滨罐头厂。这支队伍刚进厂，先在办公楼旁边的俱乐部里休息，行

李和背包之类的东西也都放在了俱乐部里，一些人还在楼前的篮球场上溜达，突然从街口跑来一名老工人，告诉他们说："'炮轰派'的队伍都过来啦，还拿着刀枪武器，你们还在这溜达！"

原来，罐头厂和哈一机挨着，罐头厂的高音喇叭不停的叫骂"炮轰派"，甚至半夜也不停歇。于是这天，十几个哈一机的工人翻墙过来，多数人手拿铁棍木棒，有人还手提轻机枪，说是来罐头厂示威，要把他们的喇叭搞掉。

大伙闻讯，赶紧撤到办公楼内，行李背包之类的物品来不及拿，都扔在俱乐部里了。

这栋三层的办公楼，也早就做了武斗准备，在楼梯口装了一个大铁门，人们上楼之后就把大铁门锁上了。然后以班为单位，各进入一个房间。

刚刚安排好，从窗户上就看到"炮轰派"的队伍在楼前的广场上摆开了阵式。有两挺轻机枪支在了楼前，其他的人就到楼前喊话让楼里的人投降，喊了半天没听到动静，下面的人就不耐烦啦，轻机枪冲着办公楼的窗户就扫了一梭子，然后攻击开始了。只见下面的人抬着长梯冲到了楼下，搭上梯子后就开始向上爬，而屋里的人没有别的武器，就把屋里的碎砖头向下扔，就这样第一轮攻击被击退了。

第二轮攻击就厉害了，只见"炮轰派"开来一辆大卡车，拉来了一车汽油瓶子，只见一些人拿了瓶子就往楼窗上扔，瓶子碎了汽油就洒在了窗子上，然后又抛了几只火把，一下子就把楼给

点着了。里面的人就用屋里的自来水救火，好在火势不大，很快就扑灭了。可就在这时，“炮轰派”的人上了房顶，而且从天窗上把机枪伸进了楼内就开始了扫射，打碎了楼内的硫酸坛子，又打伤了两个人。更为严重的是，“炮轰派”把一些衣物杂品等在一楼楼梯口引燃了，一股股浓烟灌进了楼内，楼内的烟越来越多，呛的人们喘不过气来，只好爬在地上，用毛巾把嘴捂上。罐头厂革委会主任要冲出去拼命，这时，从楼后的空地上又冲上来很多人。只见这些人头上戴着钢盔，手里握着扎枪，腰里围着钢鞭，就像古代的武士一样冲了上来。“炮轰派”见势不妙，也开始撤退。可是，当这些人追上去的时候，“炮轰派”又开了枪了，跑在前面的几个人应声倒在地上，鲜血立即流淌开来……一看这情景，哈一机的工人全都慌了，赶快跑回了哈一机！

终于发生了流血惨案，这就是文革期间发生在冰城的“八二八惨案”！ “捍联总”9 人死亡。

8 月 28 日晚上，大直街上一辆接着一辆满载全副武装“捍联总”人员的卡车在向东飞驰，从东面哈一机方向传来一阵阵高音喇叭的喊叫声。

29 日那天，全市“捍联总”召开“追悼控诉‘炮轰派’罪行大会”，会后拉着死者尸体进行武装游行。据说死者中还有一名解放军战士。

8 月 30 日“捍联总”对哈一机开始了武力攻击，枪炮声响了一天。但是没有攻下。当天，中央来电说不能对哈一机开枪，

不能武力攻打，指示省革委会立即撤出包围哈一机的队伍。

在随后的几天里，哈一机还一直围困着，同时还包围了哈师院“炮轰派”据点。

9 月 6 日，周恩来再次接见哈尔滨双方代表，座谈解决武斗问题，达成了九条协议。规定除哈一机自己生产的坦克外，双方武器原地封存。

## 第 862 回：战荆州，钢新楚地起烽火　围四物，炮轰向阳劫五普

荆州和沙市两地为历史文化悠久，民风慷慨剽悍的故楚王城之地。荆州又名江陵，为全国第一批历史文化名城，是专署所在地，沙市为地辖市。沙市市区与荆州城相距 7 公里，两地相连。

1967 年“一月夺权”风暴后，两地造反派实行革命的大联合，组成了“东方红荆沙地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荆沙革总”，荆州为“一司”，沙市为“二司”。“保皇派”逐渐失势分化。

“大联合”中的各造反派组织，在荆州军分区和沙市市人武部“二月镇反”中，先后因权力分配、生存与“灭亡”、对时局和“二月逆流”的立场和态度等问题，很快便紧跟武汉“文革”局势，分化为“革二司”和“二一二”两派。军队支持“革二司”，打压“二一二”。

武汉“720”事件之后，湖北“文革”局势大变。在“打倒荆老谭”，“打倒沙老谭”口号下，原“支左”的军队领导被打倒和揪斗，公检法机关被“砸烂”，由部队和地方干部组成的荆沙地、市、县“抓革命促生产一线指挥部”瘫痪，对立派组织头头和骨干被揪斗、监禁和迫害。

在这种形势下，冲击军事机关，抢夺武器弹药事件，也一时成为风气。从 7 月 24 日至 8 月底，荆沙地区就发生抢劫武器弹药事件 20 多起。荆州军分区、沙市市人武部、荆州县人武部、

荆州公安处、第三监狱、昌湖水上派出所、荆江分洪警卫部队、江北、芩河农场驻军等十多个单位的大批武器被先后抢劫。

仅 7 月 24 日、8 月 7 日、9 月 3 日三次抢枪事件中，群众组织共抢夺步枪 883 支，轻重机枪 38 挺，大炮 13 门，子弹数十万发。8 月 13 日，还强占了荆州军分区武器仓库，以供其随时取用。与此同时，各派还加紧自制枪支弹药、土炸弹、土炮和梭镖棍棒等武斗器材。

随着武汉“钢”“新”斗争日趋激烈，武斗事件也在升级。“钢”“新”两大派纷纷向全省扩充势力。武汉“三钢”和“三司革联”，以及北京驻汉的“清华井冈山”、“北航红旗”、“地院东方红”重返荆沙，支持“二一二”派。而武汉“三新”则支持荆、沙的“新派”，荆沙地区两派组织迅速分裂。

8 月 8 日，“武汉钢二司赴荆州、沙市调查团”到荆沙，策划“八一二”平反公告和召开纪念大会，并与“钢工总”联系，在荆沙设立“三钢办事处”，要“砸掉革总二司”，宣布“荆沙要以‘二一二’派为核心”。同时，与“二一二”派占领了党政军机关，要夺取当地的领导权，并提出：“三月旧恨未消，八月新仇又来。”“踏平‘三、四、五、乡’，打倒康三婊子，镇压反革命”等极富挑衅性的口号。

口号里的“三”是指“三中红旗”、“四”是“四物红卫”、“五”是“五普东方红”、“乡”是指“向阳红旗”四个群众组织。“康三婊子”则是指他们认为是走康有为改良道路的“三新”组

织。

“新派”也不甘示弱，针锋相对的表示：“六七月的腥风血雨爷们顶住了，八九月的妖风又有何哉”等极具楚地彪悍民风的口号。荆沙两派组织不断发生“肉搏战”和持械武斗。

在“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口号下，两派加速用枪炮武器等军事装备来加强自己的力量，准备在荆沙地区大打出手，消灭对方。两派组织完成了武斗的军事准备，并建立起各自相应的军事据点。双方大规模武斗势不可免。

8 月 12，经请示武汉“钢工总”头头朱洪霞、胡厚民同意，沙市成立“沙工总”。

8 月 13 日，“钢派”派人到武汉“钢工总”汇报情况，“钢工总”决定派出几名“720 抗暴英雄”到荆沙主持工作。

另一方面，武汉“三新”和北师大、地质部、地质学院等北京驻汉的造反派，也派人常驻“新派”据点，坐阵指挥。

8 月 22 日，“沙工总”成立了武斗专业队“钢工总沙市警备司令部”。

8 月 27 日，“荆州工总”成立。

“新派”也相继成立了一些联合组织，只是声势和规模不如“钢派”。

8 月 31 日，“钢派”以“新派”打死“钢派”战士、荆州师范学生胡仁柱，要为战友报仇为名，向“新派”据点，位于荆州城内闹事区的江陵饭店发起进攻，拉开了这场大型武斗的序幕。

这天凌晨 4 时，“钢派”数十人持冲锋枪、机枪，抢占江陵饭店东面红卫餐厅屋顶，占据制高点。接着又派出 50 多人，分三路布防，各路配一挺机枪，控制西北部的荆州医院一带，又在周边布置了数十人的火力点。同时，沙市“钢派”派出的 500 多人，赶到荆州武斗现场参战，分别控制江陵饭店外围地形，防止“新派”增援。

中午 12 时，武汉“钢总司”派来的武斗总指挥对准江陵饭店连开三枪作为进攻令。接着，担任攻打正门的“钢工总沙市警备司令部”和工人敢死队随即发起进攻。步枪、冲锋枪、机枪声和手榴弹的爆炸声，震惊了荆州古城。

“新派”在江陵饭店顽强抵抗，而且火力强大，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战斗，“钢派”未能攻下江陵饭店。“钢派”战地总指挥调整作战方案，派出一支武斗队从红卫餐厅屋顶搭起天桥，架到对面江陵饭店屋顶。随即，“钢派”武斗者冲到江陵饭店屋顶，插上“钢派”战旗。并居高临下，揭开屋瓦向下扔手榴弹，压制“新派”火力。

“新派”受到来自屋顶和大门两个方向的进攻，一时惊慌失措。正当“新派”武斗者调整队伍，以应付屋顶“钢派”进攻的时候，“钢警备”和工人敢死队再次发起进攻，用集束手榴弹炸开大门，冲锋枪、机枪一路扫射，终于冲进入江陵饭店。“新派”武斗者受到威胁，于是退守二三两层，但面对此时气势与火力极强的“钢警备”和工人敢死队，防守者全线溃退，最终投降。

“钢派”占领饭店后，抓获俘虏约六七十人，缴获“新派”武斗队伍的全部武器和没打完的 16 箱子弹，抢走扩音机、收音机、自行车等物资及现金 1000 多元，粮票 500 多斤。武斗中打死 1 人，伤多人，江陵饭店的直接损失达 2 万多元。

“钢派”在向江陵饭店发起进攻同时，还对位于荆州城内迎宾路上的国家地质部第四物探大队大院，简称“四物”大院发起了进攻，因为这个大院此时已成为“新派”的“四物红卫”的武斗据点。

8 月 31 日上午，按预先的部署，“钢派”组织了 30 多个单位的近 600 人，开始了对“四物”大院的围攻。沙市来的一支队伍首先占领了荆州招待所大楼，架起机枪，从北面控制“四物”大楼；一支工人武斗队占领粮食局楼顶，从东面压制“四物”火力。沙市“钢警备”和一支工人武斗队围住“四物”西北角，防止江陵县的“新派”增援；另一支“钢警备”占据“四物”西南角。沙市的一支武斗队埋伏在荆州体育场，负责各路增援。

下午 14 时，信号枪响，司号员吹响冲锋号，荆州招待所楼顶的 4 挺机枪同时开火，一支武斗队伍翻过招待所院墙冲过马路，接近“四物”外墙。当“钢派”人员从四面八方冲向院内时，“四物红卫”火力封锁了大门和各路口，而院墙上又设有电网，“钢派”人员在翻墙进入时，一人触电当场死亡。“钢派”一面冲上去打断高压线，切断电网；一面用手榴弹炸开电网和院墙，撞开大门。各路人马一涌而上，四面扫射，到处扔手榴弹。一名

武斗者手榴弹刚出手就爆炸了，不但炸伤了自己和周围的几个人，还把总指挥也炸成重伤，并炸死 1 人。

电网和院墙炸开后，“四物红卫”见势不妙，边打边撤，大部分武斗人员陆续撤离，少数掩护撤退的人当了俘虏。

9 月 1 日，“钢派”宣布对荆州城内实行戒严，600 多名武装人员把守荆州城东、南、西和大、小北门 5 座城门。各城楼上架设数挺机枪，架设专用电话、配备汽车进行联络指挥。城内派出岗哨执勤，城外派出哨兵侦查和武装人员在近郊进行巡逻。

荆州城区全城戒严后，“钢派”出动大批武装人员四处搜查“新派”。搜查中，任意殴打他们怀疑的“新派”分子，也有人搞一些“顺手牵羊”的勾当，抢劫被搜人家的财物和金钱。并且随意开枪，一遇反抗，即格杀勿论。戒严 6 天，就打死老人、小孩和其他无辜群众 8 人。

荆州城内，“钢派”人员及其持同派观点人员扬眉吐气，而“新派”人员及其他所有居民胆战心惊，时刻担心有生命危险，说“比闹日本还要恐怖。”

戒严期间，“钢派”擅自动用国库小麦十多万斤，装上麻袋，用于堵塞城门，修筑工事。并动用国库大米六千多斤，食油 150 多斤，现金数千元，供其武斗人员吃喝。

8 月 31 日，“钢派”在荆州发起全面进攻，“新派”大败，多处据点失守的消息，惊动了沙市向阳纱厂的“新派”头头。向阳纱厂是当时沙市较大的工厂，有数千职工，为“向阳红旗”控

制。该厂位于长江之滨的万寿宝塔附近。

“向阳红旗”的头头分析：沙市“钢派”的武斗队伍在荆州战斗之后，要撤回沙市，必须从沙市向阳纱厂门前的公路经过，于是决定在万寿宝塔组织伏击。

8 月 31 日下午 16 时左右，“钢派”两辆满载武斗队的汽车经过万寿宝塔地段时，遭到事先埋伏的“向阳红旗”的机枪、步枪、冲锋枪射击和手榴弹的袭击。汽车刚停下，“向阳红旗”武斗人员蜂拥而出，将“钢派”两车人员全部俘虏，押回工厂。1 小时后，又一辆满载“钢派”武斗队的汽车驶来，在万寿宝塔地段，也遭到“向阳红旗”的一阵猛烈射击，当场打死 2 人，伤 7 人。

“钢派”闻讯群情激愤，头头们经过开会研究，决定从沙市和荆州两地调兵遣将，攻下向阳纱厂，拔掉“向阳红旗”这颗“卡在喉咙里的刺”。第二天，9 月 1 日晚上，“钢派”出动沙市和荆州两地近 2000 人，数十挺轻重机枪，数门大炮，对向阳纱厂实行全面包围，只留江面一条路。荆江大堤上两门大炮对准向阳纱厂，荆江水文实验站楼上架起一挺机枪。又派出大批武装人员据守新桥、白骨塔等地，以切断“五普东方红”的增援。

9 月 2 日凌晨，“钢派”派人到沙市热电厂拉闸断电，全城路灯熄灭，全市停电。随即，3 颗红色信号弹腾空而起，顿时枪炮声大作，喊杀声四起。“向阳红旗”立即迎战。从睡梦中惊醒的 20 万沙市老百姓惊慌失措，特别是纱厂附近更是一片混乱，

小孩尖叫，妇女哭喊，到处是在呼啸的炮弹和爆炸声中惊慌乱跑的人流。据老人们回忆，当时的情况，比四十年代跑日本还要可怕得多。

战斗打了几个小时，“钢派”的进攻遇到了顽强而有效的抵抗。直至 2 日上午 10 时，“钢派”的进攻还是没有多大进展，于是又增派了 500 多人增援。因“钢派”人员出现伤亡，沙市各医院派出医护人员进行“火线救护”。

到下午 13 时多，恼羞成怒的“钢派”头头决定不顾后果，实行猛攻。又从荆州汽车分局调来两门“92”炮、两门“60”炮、两门“37”炮，每炮又各配备两挺重机枪掩护。随后用大喇叭给“向阳红旗”头头下了最后通牒：“限令在半小时内投降，交出杀人凶手。否则，后果自负！”

毫无疑问遭到拒绝。“钢派”头头下令开炮，6 门大炮一起开火，几十挺机枪一起扫射。第一批炮弹打了 38 发，厂内仍然有不断射击的抵抗火力，尤其“向阳红旗”设在万寿宝塔内的机枪火力凶猛。

“钢派”总指挥声称“怒火万丈,今天不拿下这个阵地，誓不为人！”于是调来当过炮兵的“操炮能手”，用日式步兵炮瞄准万寿宝塔。先射 5 发未能击中，后打 6 发，将宝塔上的机枪火力点打哑。“钢派”头头欲彻底消灭“向阳红旗”的防守力量，当场下令用炮火将宝塔轰炸荡平。由于大炮上的拉线烧断，沙市古城标志性的古迹万寿宝塔才得以幸存下来。

随后，“钢派”大炮又向纱厂新仓库目标开炮，一发炮弹击中目标，当场炸死一人，伤多人。仓库内存储的棉花包着火，很快浓烟滚滚，火光冲天。消防队闻讯，曾冒着生命危险，赶到战地，欲闯进厂区救火，被“钢派”阻止。9000 多担棉花毁于大火。加上仓库、设备等，损失高达 55 万多元。

仓库着火后，原先以为阵地“固若金汤”，因此要“誓与阵地共存亡”的“向阳红旗”头头，见势不妙，带头突围。“向阳红旗”以自动武器开路，“钢派”调动火力封锁，双方由互射变成白刃战，当场又死 2 人，伤 10 多人，“向阳红旗”被俘虏 7 人。

向阳纱厂一仗，共打死 8 人，伤数十人。除棉花仓库被烧，损失高达 55 万多元外，该厂停工 13 天，减少产值 21 万元，共计损失一百多万元。

8 月 31 日和 9 月 2 日武斗中逃出来的“新派”武斗人员和逃难者纷纷奔向位于荆州和沙市之间的“五普”机关大院，一时聚集了上千人的武斗队伍。这里是“新派”的重要武斗基地，也是“五普东方红”占据的武斗据点。“五普东方红”头头也曾经下决心要死守“五普”，于是加紧修建和加固工事，积极备战。

荆沙“钢派”头头在接连取得各处胜利后，多次召开会议，要攻下“五普”。在探知“五普”的实力后，荆沙“钢派”头头决定向武汉“钢工总”求援。武汉“钢工总”头头朱洪霞表示：“将连夜调‘钢工总’总部作战部长带领 20 辆汽车和武斗人员，明天赶到荆沙，一道夹攻。”并要求“明天一定要拿下五普。”

“新派”在节节失利后，得知“钢派”进攻“五普”大院，并从武汉“钢工总”又调集了数百名武斗人员增援荆沙“钢派”，便于 9 月 2 日，主动撤退到农村“新派”势力控制地区。

9 月 3 日,“钢派”集中了数千全副武装武斗人员的武斗大军，乘数十辆卡车，扑向“五普”大院。当他们接近“五普”大院时，发现大院内外冷冷清清，于是派出侦察班前去侦察。当“钢派”得知“五普东方红”在“唱空城计”时，“钢派”武斗大军便开进“五普”大院，随即开始疯狂的洗劫。两天之间，“五普”的办公区域及私人宿舍区内被洗劫一空，“五普”共计损失财产 334531 元，其中私人现金 15464 元，粮票 12304 金，布票 1293 尺。一批国家稀有的精密仪器被损坏，机密图纸失密。

以“钢派”攻占“新派”的“五普”据点为标志，荆沙“八三一”大武斗即告结束。9 月 6 日，荆州城撤销五门防守，戒严令取消。“钢派”在荆沙地区开始占据上风，但“新派”不甘心失败，新的武斗事件在荆沙大地此起彼伏。双方一直打到 1968 年，荆沙地区还时常枪声时起。

## 第 863 回：八三一，徐州发生大武斗　进军营，“支派”分散各回家

山东的王效禹7月24日离开徐州后，徐州“支派”积极寻找对策。8月5日，徐州“支派”头头开会，共同商讨退出“徐革会”，认为退出“徐革会”是一步棋，将“徐革会”这个包袱甩给“踢派”来背。而且说：“我们退出就主动了，让全市人民看看‘踢派’踢了几个月，丝毫没损伤‘徐革会’一根毫毛，而我们‘支派’一个统一行动——集体退出，‘徐革会’自然就垮了。最后这个帐还要算在‘踢派’头上。因为导致‘徐革会’的垮台，不是我们退出之过，而是‘踢派’踢的结果。”于是，他们和持“支派”观点的“革命领导干部”当天宣布集体退出“318”革委会。

徐州“踢派”于8月8日召集“踢开徐革会，紧跟毛主席，彻底闹革命”大会，68军军长张鋐秀应邀与空29师师长郭子谭、坦克2师师长邢同立等人出席大会，并做了支持性的表态发言。

8 月 11 日、14 日，王效禹在济南接见徐州“踢派”杨正祥等人。他说：“在徐州现在条件很好，3 个师支持你们，29 师是中央批的，卫戍区在转。”“要准备独立作战，不要依靠在卫戍区会议桌上解决问题，要准备自己单独干。”“部队是穿军装的‘踢派’”，“你们的棍子是放不下的，现在是部队扛着，不是扛的棍子，而是扛的枪杆子”，“打它个歼灭战，不搞个大的不彻底，徐州还没有搞个很大的”……

8 月 14 日，徐州“支派”召开会议，宣布解散“抓革命、

促生产‘318’战斗兵团”，成立“徐州市热爱毛主席革命造反派联合指挥部”，简称“热爱指挥部”。下设五个区指挥部。他们在退出“徐革会”，强化组织的同时，又在社会上大造舆论，否定王效禹处理徐州问题的路子。说：

“中央军委、中央文革‘7.22’复电不是真的，没有行文。”

“周总理说，徐州‘531’以后，‘318’兵团在抓革命、促生产，维护交通等方面做出了贡献，应表扬。”

“拘留李金山是错误的。”

“卫戍区新党委又犯了新的路线错误，支持一方，打击一方，必须彻底批判”等等。

8 月 21 日，徐州卫戍区主持召开为“红总”及其下属组织彻底平反大会。68 军军长张轾秀代表徐州卫戍区和徐州革委会亲自宣读《平反公告》。

8月26日，一些“支派”冲击“支左指挥部”，围困空29师师长郭子谭。

8月27日，一些“支派”拦截、质询68军政委李布德。

这天，“支派”印发《特号消息》称“周总理接见了‘热爱指挥部’赴京代表团”、“卫戍区下通知已转弯的刹车，没转的不要转了”、“总理责成王效禹检查，王已调职”。

种种舆论、真真假假、是是非非，一时间在群众中谁也说不很清楚。狂热的年代，舆论先导显得尤其重要。

8月29日，一些“支派”成员袭击空29师汽车，打伤3名战士。

8 月30 日，一些“支派”成员拦截68军军长张鋞秀和政委李布德乘坐的汽车，要求与他们辩论。

8 月 31 日是“支派”核心组织“淮大八三一”成立一周年纪念日。当天上午，“支派”方面组织了声势浩大的群众集会和示威游行。

“踢派”针锋相对，在同一天和驻徐部队在云龙山红卫体育场召开“拥军爱民”大会，会后也举行了盛大游行。中午 12 时左右，当游行队伍行至徐州东站“徐铁无产阶级革命派联络站总部”门口时，与从“淮大”开出来的“支派”人员遭遇并发生冲突。

看来双方均有准备，先是相互谩骂，言辞不堪入耳。接着一拥而上，乱打一气。标语牌被打烂了，毛主席像也被扯碎了。此时此刻，谁也顾及不到这些。广场上砖头声、瓦片声、铁锨、棍棒相撞声，炸药包的爆炸声，夹杂着痛苦的嚎叫声，谱写了一支令人痛心的武斗交响曲……

与此同时，在复兴路和四道街也发生了类似武斗事件。

武斗发生后，68 军 400 名战士奉命跑步赶到现场制止武斗。13 时左右，7229 部队，即空 29 师和 6074 部队，即 68 军 203 师也奉命赶来制止武斗。68 军首长亲临现场指挥，和参与制止武斗的 1200 战士手挽手构成三道栏线，把“支”、“踢”两派隔开。第一道防线设在四道街处；第二道防线设在徐州饭店附近作缓冲；第三道防线设在复兴路与淮海路交叉路口。在制止武斗过程

中，虽有许多群众对来制止武斗的干部、战士不十分理解，骂他们是“刘邓兵”、“稻草兵”、甚至以砖头、瓦块报之。但战士们仍然手挽手、肩并肩、严守防线。

16 时许，卫戍区制止武斗指挥部召集“支”、“踢”两派代表在徐州饭店进行谈判。经军队耐心做工作，最后双方达成协议：各代表负责说服各方武斗人员撤离武斗现场。

“支”方代表当场表态：“如果‘支派’不撤出，割我的头！”

“踢”方代表也当场表态：“如果‘踢派’先打‘支派’，砍我的脑袋！”

而后双方代表与制止武斗的解放军分头去说服己方执行协议。就在双方开始行动之际，突然汽笛狂叫起来，当制止武斗的军代表还未明白是怎么一回事时，第一道防线已被“支派”“红农会”冲散。许多战士遭到毒打，甚至被绑架。紧接着第二道防线和第三道防线被冲破。“支”、“踢”双方又开始了新的交锋，一场更大规模的武斗再次开始。

此时，部队的任何劝阻企图都已无济于事，石块、砖头、瓦片、棍棒、雷管、炸药、匕首……总之有什么武器就使用什么武器，各自将对方往要害部位猛击，被打的头破血流的、骨碎残肢的比比皆是。6414 工厂一名武斗队员，身上被刺 28 刀，有的武斗队员当场死亡，武斗之火势不可挡，越烧越旺，增援的“后续部队”潮水般的不断涌向“前线”，救护车满街狂叫，担架队川流不息，徐州上空汽笛不停的狂吼，整个空气异常恐怖……血！

再次洒满当年淮海战场。

原来，下午 16 时，“支派”下达一个新的作战方案：在复兴路、重型厂、制药厂、6414 工厂、工程机械厂等地集结大批武斗队员，并调郊区“红农会”进城，决定晚 19 时 30 分，以长笛一声为号，各路集合人员向“踢派”全线进攻，将城东区的“踢派”围歼在黄河桥附近，城西区的“踢派”围歼在中山路口一带。

这时，徐州卫戍区新党委的态度也越来越明朗化了。用“踢派”的话来说：是“立场坚定，旗帜鲜明”，“他们和‘踢派’心连心、肩并肩，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卫戍区新党委成员告诉“火车头”司令杨正祥：把“踢派”人员集中在一块，不要分散。并发给他们杠子做武斗工具。又打电话给山东枣庄市等地人民武装部，要求他组织力量来徐州支援“踢派”。徐州卫戍区并将徐州这一严峻形势报告王效禹，“支左指挥部”的空 29 师师长郭子谭等人认为，这场冲突的性质与武汉事件的性质一样，应该给“踢派”发枪。他们请示济南军区，晚上得到军区的批复：

同意徐州卫戍区的请求，要支持“踢派”，与“踢派”一起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保护“踢派”的安全。

卫戍区党委成员说王效禹的这一指示是“中央同意发枪支持‘踢派’的”，以后又说是“毛主席同意发枪支持‘踢派’的”，遂调用坦克和军用汽车到 68 军 203 师拉枪。22 时开始给“踢派”发枪，至 9 月 1 日凌晨 1 时，1750 条长短枪和大批子弹发到“踢

派”手中。“踢派”开始扬眉吐气，昂首高歌“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准备对“支派”实施报复了。

山东临沂、薛城、枣庄 8000 多名武斗人员赶到徐州支援“踢派”，其中部分人 31 日乘坐济南铁路局编组的专列到徐州支援“踢派”。

9 月 1 日清晨，徐州“支派”总部得到消息：68 军接到济南军区命令，向“踢派”发枪反击“支派!”加之枣庄、临沂、兖州等地的近万名“援军”也陆续赶到，他们赶紧召开紧急会议，决定一部分头头带人去上海、南京等地避难，除留一少部分人集结在各区固守外，通知下属组织立即向支持“支派”的 68 军 203 师炮团六里山营房转移!

9 月 1 日 7 时，徐州卫戍区新党委在医学院教学大楼三楼召开紧急会议，68 军领导和“踢派”各造反派头头参加了会议。卫戍区党委成员在会上讲：“左派已经武装起来，我们受气的日子已经过去了，今天我们应自卫反击了。”接着布置“反击”任务。

有的头头问：“如果打起来，我们可不可以开枪？”

部队人员回答说：“有枪不用，那不等于烧火棍？”“可以开枪”。

于是，“踢派”在徐州卫戍区的支持下开始对“支派”全线出击。对城内东、西、南、北、中五个区以及城郊九里山、下淀、朱庄、大黄山等地的“支派”进行清查和搜捕。卫戍区还直接配

合他们的行动，各路清查人员均配备步话机，可以及时与卫戍区取得联系。

此时，通往城北长达几里的公路上，10 人或者 8 人一排的工人，头戴柳条制的安全帽、身穿蓝色工作服，肩杠清一色的“白蜡杆”，整整齐齐喊着口号，向北行进，一路尘土飞扬，身后不时传来声声“叭！叭！”的枪响。人们个个神色严肃壮重，对枪声似乎不闻不问，按照命令依次顺序前行。枪声越响越密，身后传来“加快步伐！跑步前进”的口令，队伍迅速开进六里山 203 师炮兵 583 团军营。他们是从城中撤出的“支派”队伍。

军营大部分房子都空着，上下铺的木板床，大家住下休息。不一会儿，部队干部、战士端上大锅菜和馒头。

很快，“踢派”几百人，其中也有解放军，开着十几辆军车全副武装赶到炮团营房门口，要炮团交出“老保”。炮团的军人和他们对峙起来，甚至调来 6 门“76”反坦克炮对着营房门外。炮团干部大声斥责：

“没有军委命令，冲击营房就是犯罪！告诉你，我这几门炮不大，口径也就是七十六毫米，可是你知道这是什么炮吗——反坦克炮！专门打坦克的，轰你这几辆破卡车小菜一碟！不信你就试试，我们敞开大门让你往里闯！”

“踢派”和随行的部队没敢往里冲，而是由随行的部队干部赶紧向上级请示，答复是无论如何不能闯军营！他们只好撤退。临走时还喊道：“老保们听着，明天我们再来！”

几个撤进炮团的“八一总部”学生找到炮团留守的干部，要求给他们发枪。

“那不行，我们是军人，要服从命令，没有命令什么也不能做。”那个干部说着，掏出一串钥匙，随手扔到抽屉里，随口说道：“枪是军人的生命，怎么能随便给别人？”

说着，推上抽屉后转身往外走了。

见此情景，三中“八一”的头头袁晓国二话没说，拉开抽屉抓起钥匙就去找“八一”的副司令老朱。这时天已经完全黑下来了，他和老朱参加几个工厂头头组成的临时指挥会议。袁晓国在会上力主打开军械仓库，武装起来与对方一拼！他说：“钥匙在我们手里，只要打开门发枪就行！”

那些头头犹豫再三，没有为几个学生的激昂言辞所动，不同意抢仓库。他们说：“解放军发枪，和咱们抢，性质完全不一样，你们那样做就是犯罪！”

最后决定各单位就地解散，化整为零，分别回家等待消息。就这样，于“531 武斗”后“踢派”被赶出徐州一样，经过“831 武斗”，“支派”被赶出了徐州。

遂后，“踢派”又在徐州进行了几天的“清查”，至 9 月 3 日基本结束。4 日，“踢派”10 万人在徐州体育场召开“抗暴自卫祝捷大会”，宣读《告全市人民书》。68 军军长张鋞秀代表徐州卫戍区在大会发表讲话说：

“中央委派王效禹同志为首代表团处理徐州问题以来，徐州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一片大好，而且越来越好！但是，党内一小撮‘走资派’不甘心他们的失败，他们操纵保守势力，向无产阶级革命派发动了一次又一次的反扑。8 月 31 日，我们驻徐部队和大家一道，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号召，召开‘拥军爱民大会’在游行的时候，遭到‘3.18’棒子团的袭击，并调动大批农民进城，围剿革命造反派，造成严重的流血事件。在这种情况下，你们为了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为了把徐州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奋起自卫，迎头痛击阶级敌人的新反扑，是对的。在自卫反击斗争中，你们立场坚定，英勇顽强，不怕流血牺牲，表现了无产阶级革命派的硬骨头精神，为徐州人民立下了新功。你们不愧为坚强的无产阶级造反派，不愧为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坚强的革命战士。我代表驻徐部队全体指战员向你们学习！向你们致敬！向你们表示热烈的祝贺！向你们致以亲切的慰问！”

从这位领导的贺词来看，驻徐部队已经按照王效禹处理徐州问题的路子彻底转过来了。但是部队基层的思想仍然十分混乱。9 月 2 日，68 军工区夏团长在传达徐州卫戍区支持“踢派”的声明时，对全团干部、战士说：

“现在你们糊涂，我也糊涂，我们都糊涂。今天中午营区周围枪声不断，大家都听到了。营区里集中了成千上万的群众，什么人都有，我们要提高警惕。‘踢派’的枪是王政委指示徐州卫戍区发的，是经过中央批准的。8 月 31 日，来徐州参战的有许多外地人，枣庄就来了大批武装民兵。昨晚 8 连发生了战士殴打

‘踢派’的事件，值得注意。我们要听上级的，相信党中央，一切服从命令听指挥。”

该团郑政委说：“现在部队思想波动很大，有人正准备闹事，也有的干部直接向我提出脱军装，不干了。解甲归田，免职为民，去当老百姓。如不及时做好思想工作，匈牙利事件就会在徐州重演。徐州‘支派’是一个保守组织，也是一种思想体系，是受许世友保守思想支配的。目前从全国来看，都有一个革与保的问题。过去军分区、武装部、公检法和我们野战部队站在一起，现在我们在王政委的关怀下，转变了思想，改正了错误，可他们就是不转、不改。武斗中，‘支派’的枪收不上来，这究竟是为什么？如果现在还不给左派发枪，革命派就会在徐州站不住脚。如果不发枪打一下，如果不调动外省军民和当地驻军参与这个力图制‘踢派’小将于死地而后快的斗争，‘踢派’就会被‘支派’吃掉，革命事业必然会受损失。卫戍区给‘踢派’发枪搞的是红色镇压。‘支派’‘318 棒子团’逃到哪里就把它消灭到哪里！逃到大黄山就消灭到大黄山，逃到天涯海角就消灭在天涯海角！我们要向‘踢派’学习！向‘踢派’致敬！坚决支持他们歼灭资匪的革命行动！‘支派’光是‘318 棒子队’就有 14 万人。5 月 30 日那一仗，表面上看起来打散了，实际上是名亡实存，阴魂不散。‘支派’仗着人多势众，若把‘踢派’搞垮了，徐州卫戍区如何向王政委交待？更多的话我就不讲了。”

9 月 3 日中午，68 军一个团营房的俱乐部广播徐州卫戍区支

持“踢派”的声明，营区内正在吃饭的一些指战员立即丢掉碗筷，纷纷向广播室跑去。数百名愤怒的干部、战士将广播器材砸烂，并把前来劝说的副参谋长和副主任围攻、揪打了约一小时。有人提出：“我们去找团长、政委算账！”

该团的团长和政委闻信迅速乘车向卫戍区告急。

晚上 19 时 30 分，团常委陆续分散来到军马所会议室开会。会前，先派人仔细观察了周围的情况。即使如此，开会时，他们仍然小心翼翼，四周派上岗哨，室内熄灭灯火，连烟也不敢抽，如惊弓之鸟，风声鹤唳。

郑政委低声宣布开会，研究如何应对当前的非常局面。外面一有风吹草低，室内立即停止说话，变得鸦雀无声。

会议决定立即将“支派”观点严重的 12 连、14 连与在连云港施工的 13 连、16 连对调，这样便于控制局势。

4 日凌晨 1 时，一个连队指导员来给团首长汇报：“连队战士情绪激烈，整个营房都沸腾起来了，没有人睡觉，有明显迹象要闹事。”

凌晨 2 时，团司令部刘参谋报告：“14 连已经发了枪，全体武装起来了，并派人与‘支派’取得联系，为防患未然，我建议首长马上离开这里。”

12 连指导员等人立即护送团长、政委转移到三八河东风闸露宿。

凌晨 3 时，团司号长、副团长、副参谋长等接连不断来找团

长、政委汇报情况，个个心急如焚。

连续 7 天，“支派”万人被关押，还有 4 万多人逃出徐州，其中数千“支派”成员重施“踢派”故技，流亡上海、南京、北京等地寻求外部支持。“淮大八三一”等“支派”组织总部也转移到了南京。

9 月中旬，徐州“支派”在上海成立新的“支派”统一组织“淮海·八三一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淮海八三一”，意谓要为“八三一”事件报仇雪恨。

徐州“踢派”对王效禹感激涕零，高喊：“毛主席是红太阳，王政委是小月亮。徐州归山东，煎饼卷大葱。跟着王政委，彻底闹革命！”

## 第 864 回：不甘心，广州城冲突难停　九月一，再接见广东代表

我们再看南粤广州。

8 月 25 日，在北京的广州“东风”和“红旗”两派，按照周恩来 22 日凌晨接见他们时的安排，各派出一名地位相等的代表，联袂飞返广州，负责处理广州的武斗和收枪事宜。其余代表，仍然留在北京，不准离开，分别住在新疆宾馆和西园宾馆，等待中央文革召见，无所事事，他们自嘲成了大联合的“人质”。

莫超海回到广州，住在军区第一招待所，由军区提供汽车，在军管会人员陪同下，每天奔走于黄埔、员村、西村这些产业工人比较集中的地方，说服他们停止武斗，封存武器。

各分部的头头们，情绪高涨奔腾，仍然处于躁狂性兴奋状态，一个个揎拳捋袖，吵吵嚷嚷，表示要与“红旗”派决一死战。

莫超海跺着脚说：“你们继续这样闹，等于送我上断头台。”他在广州市第一工人文化宫召开大会，传达了周恩来的指示，呼吁大家不要受坏人挑唆，不要人云亦云跟着闹。

但两派对于无条件停战都心有不甘，冲突事件，仍然层出不穷。

就在 8 月 25 日这天，广东“红旗”派强占《南方日报》，发出“关于进驻南方日报社的通告”，致使报纸停刊。

8 月 30 日，两派在西村水厂和电厂武斗。

周恩来在 8 月 24 日凌晨听取中央文革记者站驻广州记者张

景发汇报 8 月 20 日发生在三元里的武斗情况时，曾建议：广州工人造反派要先联合起来，并指示中南局第三书记兼广东省省长陈郁加强指导。于是陈郁派中南局闵一帆，车学藻，张天陶前往广州“红旗派”的工人组织“工联”总部。“工联”头头卢宗谟对周恩来的指示十分重视，在“工联”总部市二商局大楼召集“旗派”的工人组织头头“广州红旗”邓元贵、“八一战斗兵团”二号头头卢良雅、“广州工人”林基球、“广州工人红司”何承祖、“海员总司”龚知伯、“广铁总司”黄锦荣等人开会，研究落实周恩来关于广州工人要首先联合起来的指示精神。因为广州“旗派”工人实际上也是两派，一派属“红司”派，一派属“三司”派。“三司”派只有“广州红旗”，而“红司”派早在 7 月底已全部加入了“红联”，所以这次开会其实主要是与邓元贵为代表的“红旗”工人的谈判。会议开了约一周，期间不准学生和干部参加，因此“中南局联络总部”闵车张、“中山大学八三一”黄意坚和“三司”的人均没参加会议，连黄祖示要求旁听，均被拒绝，直到达成协议并决定第二天召开联合组织成立大会后，才让坐在门外的黄意坚、黄祖示、吴梅等人进去表示祝贺。

8 月 31 日，广州“红旗派”工人组织实现联合，成立了“广州市工人革命联合委员会”，简称“工革联”，卢宗谟任总勤务组长。

9 月 1 日，又在广州港河南作业区太古仓武斗，仓库被付诸一炬，伤亡惨重。

这天，周恩来在北京再次接见广州赴京代表团。参加接见的有戚本禹、陈郁、王首道、赵卓云、黄永胜及广州军区其他领导。

周恩来说："今天多来了几位，是我主张的，上次占劣势的一派多来了几位（指地总派），人多并不是占优势，多来几个好说服他们嘛！

今天'旗'派开了一个大会，听说开得不错，首先我们祝贺你们，但你们要注意，不要骄傲。不然会走向反面。今天让不是'旗'派的多来几个是我主张的。不能说你们就是造反派，他们就是不革命的，造反不分先后么，听说你们连工交'红旗'都不愿意联合。你们要做工作，连'地总'、'红总'今后还是要走到一块，我不能老奉承你们，这不是毛泽东思想，运动一定要以工人为基础，我们要问'旗'派，你们是不是毛泽东思想，运动一定要以工人为基础呀。"

"上次和你们说了，达成了四项协议，结果有一方面封存了枪支，另一方不封，而封的一方面又要起封，结果双方又打起来，打得没有道理，在黄埔打起来，子弹飞到外国轮船上，有个越南船，也挨了子弹，我就不理解，为什么我们工人阶级不痛心？你们就是要打，只顾派别利益，不顾国家利益，连起码的爱国主义、国际主义都没有。今天你们开了一个大会，10万人，但是我还是不放心，听说你们发了一个宣言，你们把矛头指向谁呀？！有没有指向解放军？有没有指向不同观点的群众？如果矛头不对，我们就不提出，《人民日报》也不会发表，尽管你们大方向是对的，

但也不能把矛头指向不同观点的群众。工人阶级应该联合起来，运动搞了一年多了，应该这样么！上海就是这样，所以运动比较健康，虽然有坏人挑动，但毕竟是少数。工人的工作还比较好做，学生不同，学生思潮起伏，容易产生派别观点，……你们对立情绪那么深，这是不能容许的，……只有工人联合起来，才能推动运动。

请你们来后，人不少，但武斗没有停止，那个冷藏库，我跟你们讲了，不要去占领，可是你们还是要去占领。”

“地总”代表说：“现在‘旗’派进攻水厂，一定要打倒现在。”

“三司”代表说：“这是‘地总’挑起来的，他们打死了我们50多名战士。”

周恩来问：“那黄埔是谁挑起的？”

“三司”：“是‘地总’。”

“红海员”代表反驳说：“不对，我是‘红海员’的，刚才接到广州来电，‘旗’派占领冷藏库大楼，用机枪扫射海面，使我们不能工作。”

“珠江红司”的代表说：“他完全是造谣，自‘地总’占领黄埔岛后，用两艘炮艇封锁海面，我们的船只无法出海。”

“红海员”：“我们说一点。”

周恩来制止他们的争吵：“你们再说，我不听了，刚才还说工人要大联合么！你们就是这样子。我要大声呼吁，反对打内战，

这样才不愧为广州公社的后代，不愧为省港大罢工工人的后代。那时工人多团结，四十年后今天，这样斗不团结，我们要为一个共同的目标来奋斗么！英美就在对面，看着敌人不管，而对阶级弟兄这样对立，就是只看见眼前利益，没有看到中国和世界的利益。”

他对“红海员”代表说：“你们为什么要把占少数的‘旗’派包围呢？”

“红海员”说：“我们根本没有包围‘旗’派。”

“珠江红司”：“我们一直坚持了抓革命促生产，但‘地总’两部炮艇封锁了海面，我们出不去。”

“地总”：“我们根本没有炮艇。”

“珠江红司”：“我们南海107船出港，结果是遇到‘地总’炮艇的机枪扫射。”

“地总”：“我们根本没有炮艇也没有机枪。”

周恩来：“你们扫射了没有？”

“地总”：“我们根本没有。”

周恩来：“不要说得那么肯定吧！现在黄埔港无法卸货，每条船每天赔500英镑。这不是抓革命促生产，这是严重浪费。对海港我们要采取军管，军管后就不同了，军管是可以武装保卫，再违反就要抓人。”

下面高呼：“坚决支持对海港实行军管！”

周恩来：“你们这样赞成军管，那你们对野战军的枪还抢不

抢？我们要严正指出，广州再也不能发生抢枪这样的问题，我们要用这一条来考验你们。”

大家回答：“我们保证不抢枪！”

周恩来：“好！那马上签。解放军的枪你们都夺，你们能保卫祖国吗？我们多少老同志，身负敌人枪弹，你们这样做过得去吗？我现在不要责备学生，首先要求工人带头，陈郁是老工人，现在要站出来，首先讲工人大联合，不能站在派别观点上，要把一切工人联合起来，农民也要联合起来。”

“八一兵团”代表说：“我们‘八一兵团’决定带头把枪交给解放军。”

周恩来说：“好哇。不管哪一派，都要如此，我上次对你们要求不高么，先封存起来，不要再打么，那是敌我斗争，工人阶级为什么要打呢？即使是反动路线，可以批判反动路线么。我们呼吁是：各派的同志保证不再打了。”

“红旗农民”又告状说：“‘郊贫联’现在发枪。”

“郊贫联”马上反驳道：“我们已经封存起来了，根本没动枪。”

两边又为此争吵起来。

周恩来敲着桌子大声说：“你们还吵，你们吵吧！我说了嘛，从现在×点开始不再打了，赞成不赞成？”

众人说：“赞成！”

“工联”：“我们保证把枪交给解放军。”

周恩来：“第一步是要求你们先封存，不启用，这样才能保证制止武斗。”

“地总”：“‘工人联合组织’排除了大多数工人，我们不承认。”

周恩来：“他作为一个组织，不要什么人承认，就是一个客观存在。”

“地总”：“我们大多数工人被排挤在外面。”

周恩来：“你们有你们的组织嘛，我要求你们：

1、把所有枪支弹药全部封存起来，包括车辆，不要开着到处跑；

2、就是不要抢夺解放军的枪支弹药；

3、支持解放军在市区到车站码头进行巡逻。如何人不许干涉，以后不得违反。否则，以破坏《六六通令》来处理。我一定要把广州这几条定下来，双方签字。我现在马上派人出去调查，今天会上的表示我还不能完全相信，因为认识要有一个过程，在这个问题上，我一定要求你们做到这一点，你们同意不同意？”

众人说：“同意！”

周恩来：“好，现在谈谈学生的问题，你们怎么办呢？”

“红司”代表说：“我们保证走工人的道路。”

“三司”也表态说：“总理对我们的批评，对我们造反派教育很大，我们说口头表态是容易的，但行动上是比较困难的，我们一定按总理的指示做群众的思想工作。”

“省直红旗”又开始告状：“‘地总’扣了我们的3个人已从27日开始绝食，他们至今不放。”

“地总”马上说：“我们准备放。”

周恩来：“当然要放，在这里重申，不管那一派扣的人都要放。”

“文艺总部”：“请总理批准我们打电话立即回去，立即宣传。”

周恩来：“对嘛，人的思想转变都有个过程，我们说话都要客观一些，不要说得那么绝。中南局好办，王首道不会带你们去抢枪，但青年人就很难说，要做艰苦的工作，首先是要下定决心，你们首先要达成协议，制止武斗，你们留下一部分代表，我们还要谈，关于筹备三结合问题，广州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要把北京的红卫兵劝回来，现在有很多人替冒红代会的名誉去的，他们给你们增加不少负担，去年他们去煽风点火起了很大作用，现在就不同了。主席说：现在到各地串联主观愿望是好的，但帮了倒忙。我们要求你们去把他们劝回来，现在绝不能包办代替，要把他们劝回来，同时还要在你们那里造成舆论，一致对外的空气，你们回去要立即制止武斗，我们派人下去调查，首先工人大联合，农民大联合，知识分子大联合，解放军作后盾，铁路一定要联合起来，要严明一条纪律，不准抢夺解放军的枪支，如果再抢，就会被坏人利用。特务、流氓、烂仔也会来抢枪，那就会不清楚了，坏人打死我们的人，使我们更加对立，实际上是被坏人利用。今

天大家同意，我们达成了协议，大家签字，然后每一个单位派一个人回去，通过你们宣传，把枪封起来，不要再用了，大家要掌握斗争大方向，这样，才能促进大联合三结合！有些组织是要费点功夫，像‘主义兵’，年轻人嘛，思想起伏。”

“主义兵”立即表态说：“我们坚决按总理指示办事。”

周恩来：“那就由你们回去说服下面的群众。”

“红总”又反映：“现在医院成了派别医院。”

机关“红司”反驳说：“他们造谣。”

周恩来：“我看你们派别观点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你们这样已经背离了毛泽东思想很远了，不管哪一派都要立即回头，医院怎么能因观点不同不开刀呢？不能再往下发展了，再不回头，不管哪一方面，就要犯罪了。”

周恩来念“制止武斗四项协议”的协议书，然后说：“如果大家同意，签字后马上打印出来，下午就派飞机把你们送回广州，回去后，住在一起，开会调查，你们要容许解放军派兵保护，不要互相抓人，这样做，无论如何，是不好的。我相信广州一定要做出个榜样来。”

当天下午，广州两派签订了一份停止武斗、封存武器上交、支持解放军的协议。

9 月 1 日，黄埔水泥厂女工邓佩霞，21 岁，被一派组织抓去审讯。9 月 2 日上午 10 时，主审人调来卡车，将邓佩霞押到珠江大桥下，不听守桥解放军的劝告，依靠人多，对邓佩霞进行枪

杀。

9月6日，周恩来就广州各派执行《制止武斗四项协议》发去贺电。

9月10日广东两派又做出《关于限期交还一切枪支、弹药和军用装备的决定》。中央派出一个调查团赴广州，监督协议执行情况。

## 第 865 回：组民兵，第二次武装支泸　声泪下，谭厚兰支持林杰

四川宜宾地革筹王茂聚组织的“第一次武装支泸”，未能阻止泸州两派的武斗，后在驻泸部队强有力的制止下，这才基本上停止了大规模的武斗，并根据成都军区梁兴初司令员的指示，双方派代表于 7 月底赴成都开会。但是随后，8 月 7 日，依然发生了“红联站”攻打“3 号信箱”的武斗。

8 月 7 日，泸州“红联站”调集千余人，并出动水上船队，配合纳溪“革联站”、“石油联络站”分水陆两路对纳溪军工单位“3 号信箱”四面包围，于凌晨 4 时 54 分开始进攻。他们在各种枪炮的掩护下首先占领了 401 楼，破坏了水电系统，接着又迅速占领了整个“3 号信箱”。“红旗”石油总团虽经顽强抵抗，但因人员、装备有限，被迫撤退。这次武斗，“红旗”死 20 多人，重伤 46 人，轻伤 19 人。第二天“红旗”就抢了纳溪武装部和泸州市武装部。

“红联站”占领了“3 号信箱”后，又于 8 月 9 日一早开始进攻小市。早上 6 时许，由“泸化兵团”对小市发起进攻。首先占领五峰顶，后又占领了马鞍山，并于当天冲入县武装部抢夺枪支。8 月 11 日清晨，“泸联站”、“红联站”再次对小市发动全面进攻，在三华山突破“红旗”防线后，直扑小市市区，在沱江大桥桥头的“红联站”也配合山头的人员从大桥直接冲往小市。上午 11 时许，小市被“红联站”全部占领。

至此，“红联站”几乎完全控制泸州市区周围的区域，“泸州红旗”最终被“红联站”压缩在不到四平方公里的市区中心半岛上，其核心组织集中撤离到市区西面忠山上的泸州医学专科学校内，泸州城内的“红旗”处于四面楚歌的境地。

“红联站”虽然控制了泸州，但在成都的谈判却不顺利。泸州两派代表在成都的10多天里，“红联站”代表因省革筹领导刘结挺认为“‘红联站’不听话，不缴枪与我们不一条心”而未受到接见，只是由省革筹的郭一民传达了3点意见：

1、红联站不许再进攻。

2、不接见了。

3、同意后作分化瓦解工作，又说若同意分化瓦解可以接见。

与“红联站”相反，“泸州红旗”于8月12日，8月15日两次受到刘结挺的接见，并在8月12日接见“红旗”代表时，对驻泸部队的人说：

“1、‘红旗派’阵地要坚持守住。2、邮政大楼一定不能丢，你们要保卫‘红旗派’，帮助他们保住一切阵地，保护所有人员（包括居民在内）。伤病员和粮食都由403团解决。对‘红联站’要强制收缴他们的枪支、水上船队的一切凶器；要命令他们释放所有被俘人员，放后由403团加以保护，……要追查‘红联站’进攻3号信箱和小市的坏头头。”

刘结挺又在同一天在军区5号楼对54军35师政治部丁主任说：“你们要对7804部队的领导人谈一下，隆昌、富顺、江安、

宜宾等地的造反派和珙县东风煤矿 1 万多工人，王茂聚同志已做了许多工作，已控制不住了。还有内江、自贡等地造反势力也很强，如果把枪支集中起来，派到泸州就比‘红联站’的枪支多得多，那时部队再做工作就不好办了。造反派的力量还是很强的，你们要很快把‘红联站’的枪支收起来，防止事态扩大……总之，请同志们放心，‘红旗派’是消灭不了的。”

8 月 14 日，“红联站”代表离蓉返泸，当护送的车子经过内江时，遭到一伙人的拦截，尽管护送的战士再三解释：“这是军代表请去的代表，双方都由我们护送，你们的人我们已经安全送到了，‘红联站’还在护送途中，我们有责任保护他们，你们不能抓人。”但还是不顶用，相反，被这些人骂是“保皇兵护着保皇派”，边骂边把战士同代表分开，强行带走了“红联站”代表。晚 23 时 10 分，内江的人又将“红联站”代表用车全部押送去自贡，没两天，又从自贡转到宜宾。

泸州“红联站”得知这一消息，立即向成都军区发出“照令”，要求保证代表的人身自由与安全，如在 24 小时内得不到答复，将负完全责任。经驻泸部队多方交涉，“红联站”赴成都的代表直到 8 月 19 日才放出来。

这时，一批批泸州“难民” 扶老携幼的涌向宜宾，博得了宜宾人的极大同情。“泸州红旗”也一批接一批地到宜宾地革筹求助，向市革筹求援。那段时间，宜宾地、市革筹的一切工作都停顿了下来，为泸州的这批“难民”忙得不亦乐乎。劝说无济于

事，不接待更加激起怨愤。特别是宜宾市革筹所在地原市委招待所，泸州“难民”涌在那里，围了个水泄不通，向市革筹要枪，要支援。后来不知谁通知地革筹的头王茂聚来到市招待所，泸州“难民”一窝蜂地围拢去，七嘴八舌地说闹个不停。本就性格内向、三天难说两句话的王茂聚一言不发，在人潮推搡中，个别失去理智的人，还将他头上的戴的军帽抓下来甩到地上用脚踩，问他：

“泸州造反派人的死活你管不管？”

“你这个地革筹的一把手，为何不制止麻联站（即对红联站的贬称）的暴行？”

“王茂聚，要是麻联站打到你家门口，你还沉得住气吗？”

“重庆的人都可以跑到泸州来帮着打我们，我们本地区的就不可以到泸州支援吗？”

等等，等等。甚至还有不堪入耳的过激语言。闹了好半天，王茂聚才得以脱身上楼与李良谈事情。

8 月中旬，鉴于泸州两派相持不下的局面，四川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负责人刘结挺指示：“泸州‘红联站’政治解决的途径已经堵塞，现在只有用武力解决的方法了。”

旋即，宜宾地区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以建立基干民兵为由，开始加紧在地专机关和宜宾地区所属 18 个县市普遍建立专业武斗队。与此同时，宜宾的南溪南山机器厂、南溪长庆机器厂、江安川安化工厂、宜宾 799 厂、宜宾专区农机厂、宜宾纸厂、宜宾

铸造厂等兵工厂和民品厂开始加班加点大量生产枪弹，并从成都132兵工厂调来大量专用碳钢用于生产子弹壳。一种自行研制弹夹横握的冲锋枪，被取名为“红旗”牌冲锋枪也在这期间问世，并且批量生产装备各武斗队。“红联站”也在自制武器，他们还造了一种被称为“青蛙炮”的炮，其炮弹像一个墨水瓶，炮管短而粗，后坐力很大，打炮时，炮身要向前跳一下，“青蛙炮”因此而得名。此炮杀伤力也较大，基本上是在空中爆炸。

8 月 17 日，入川的“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赴泸州调查团”在去泸州调查返宜宾后，立即向泸州“红联站”发出了通牒，用强硬的口吻限他们在 24 小时内必须交出武器、缴械投降，解散“红联站”，撤除水陆交通障碍关卡等。

8 月 18 日，中共中央军委批准王茂聚兼任宜宾军分区第一政委。宜宾市在城区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欢庆游行话动，威武整齐的专业武斗队员荷枪实弹亮相在游行队伍中。

这天，驻泸部队奉命换防，“红联站”组织了欢送。当日部队在一片哭声中和一首充满惜别之情的由《十送红军》改编而成的《十送 7804》歌声中，依依不舍地离开了泸州。

与此同时，宜宾地革筹负责人召开有宜宾市、宜宾县、南溪、江安、长宁等 10 县、市的武装部长和“红旗”造反派头头及地专“红旗”总部头头参加的会议，要各武装部转向支持“红旗派”，动员各县、市和地专机关组织民兵到泸州去瓦解“红联站”。要求各县组织一个民兵营，宜宾市和地专机关共组织两个民兵团。

全专区各县市分别召开“与泸州麻联站（红联站）血战到底的誓师大会”，在隆昌，会后还举行了开武装游行。

按照王茂聚的指示，宜宾军分区和各县市武装部发给“红旗派”各种枪 1 万余支，子弹 200 多万发。其中军分区即发枪 2474 支，炮 15 门，各种子弹 644794 发。

8 月 19 日，宜宾地区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召开各县、市电话会议，对组织民兵，发放枪支等问题再次作了详细的部署。紧接着驻宜部队、宜宾各政法系统、各县市武装部大量枪支弹药或抢或送或发，分别武装各县市武斗队。

8 月 20 日，经宜宾地区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和宜宾军分区批准，宜宾地区 3 个基干民兵团宣告正式成立。

一团，由宜宾地专机关干部组成；

二团，宜宾市级机关干部和宜宾市周边厂矿、农村的工人和农民组成；

三团，由宜宾地区所辖 18 个县市组成。

3 个团对外统称“宜宾地区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团”。这 3 个团的人员编制、武器装备基本上是按正规部队的标准来配置的。民兵战士均由各群众组织提名推荐，由宜宾地区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批准。连级以上干部由宜宾地区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主要负责人亲自审定任命。一团、二团除分别有 3 个正规营外，每个团配有直属炮连、通讯连、卫生连，团部均配备了军用电台，各连、营配备军用步话机。同时每个团配备了

军队军事干部参加指挥。当时地专机关的一团一营一连是这样配置的：全连指战员共 115 人，每个班 12 人，包括正副班长 1 人；三个班为一个排，设正副排长 1 人；全连三个排，连直属卫生班由宜宾卫校的学生组成。连部由正副连长、指导员、文书、司务长、通讯员等组成。全连有各种枪支 103 支，其中：轻机枪 6 挺，每挺配备子弹 200 发；由排连长使用的冲锋枪共 10 支，每支配备子弹 50 发。步枪每支配备 30 发子弹。

8 月 20 日， 7790、7792 部队奉命来泸支左，首批人员进入泸州城。其中 7790 部队，即 54 军 130 师师部就住在军分区对面，支左态度较为鲜明，而且师部还专设了“支左办公室”，公开接待群众。

8 月 21 日，宜宾“红旗派”组织在长宁县成立“三县一区联防指挥部”。三县是江安、长宁、珙县，一区是芙蓉矿区。

8 月 25 日，各团开始陆续集中进行封闭式短期军事训练。这一时期宜宾市全城一派繁忙，各种备战活动在紧张有序的进行，各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学校、社会各个群体在宜宾地区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的布置下，忙得不亦乐乎，连街道的居民老太太也发动起来了。物资部门四处调集作战用的各种物资，甚至不惜动用援越物资，宜宾汽车运输公司负责前线的车辆调度准备，国家大批粮食、布匹、药品、资金被动用。

城区内，到处可见威风八面荷枪实弹的民兵，满街都是连篇累牍的“泸州告急!”，“合江告急!”，“纳溪告急!”和声讨踏平

“红联站”的大字报、大标语。各机关、厂矿、学校、街道纷纷发起了支援“泸州红旗”的捐粮、捐款、捐物的活动。此时的宜宾地区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力图形成最广泛的阵容，采取理直气壮公开的方式，加紧对泸州“红联战”的军事部署和准备。

8 月 28 日，“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赴泸调查团”再次向“红联站”发出公开信，指出：“‘红联站’不但在政治上失败了，而且在军事上已陷入各地革命造反派的重重包围之中，宜宾地区 18 个县市都在严阵以待，准备随时痛歼‘红联站’”。

8 月 30 日中午，泸州两派再次发生大规模武斗。

9 月 1 日，宜宾地革筹、军分区联合召开 6 县 1 市（泸县、合江、纳溪、江安、隆昌、叙永和泸州市）武装部和“红旗派”负责人参加的解决泸州问题座谈会。宜宾地区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组长、宜宾军分区第一政委王茂聚身着一身新军装，操着一腔浓厚的山东口音说：“泸州现在有两派，一派是‘红旗派’，是革命组织。一派是‘红联站’、‘泸联站’、‘革联站’，绝大多数是原来的保皇组织或其变种。”“解决‘红联站’的问题，主要是政治解决，组织一批力量去向革命派宣传，去争取团结‘红联站’中受蒙蔽的群众，把贫下中农争取过来，把‘红联站’孤立起来，使它无法调动贫下中农。隆昌、合江、纳溪、江安都可向泸州方向靠拢。在外力量要调回来，加强武卫，做好武器物资的准备……”他要参加会议的县市武装部把造反派组织起来，发枪训练，训练“如何选择地形，会修工事、会打抢，会瞄准等”。会

上规定了这个会议的内容为绝密，不准传达，5 天以后再统一开展大规模的宣传。

当天晚上，宜宾地区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秘密的在宜宾地委二招待所召开基干民兵一团、二团连以上干部参加的军事部署会议，同时下达战前最后的动员令：

宜宾的基干民兵一团、二团从现在起做好一切准备，武装支援“泸州红旗”。

会上还决定了这次武装支泸的具体行军路线，兵分三路进军泸州：一路由基干民兵一团沿宜宾至隆昌公路直插泸州小市；二路由基干民兵二团顺宜宾至泸州公路杀进泸州市区外围；三路由纳溪县、叙永县、珙县的民兵直奔泸州市郊的兰田镇。其它县市和外地支泸大军重点是打好增援或作为预备队。整个支泸行动准备用一个月时间，战略上实行重兵压境，掌握主动权，集中优势兵力，将“红联站”武装包围，而后采取强大的政治瓦解攻势各个击破，达到最终解决泸州问题的目的。会议最后宣布，在此次行动过程中，不管在什么情况下，只要“红联站”胆敢开枪抵抗，就给予还击，并坚决消灭之。

9 月 1 日晚，宜宾军分区突然电话命令驻泸化 7840 部队调离泸州，限 9 月 4 日前离开泸化赴宜宾。7833 部队空手从宜宾来护厂。

此时王茂聚已是万事俱备，再次支泸显然是箭在弦上。结果如何？我们稍后再叙。

再说王力、关锋31日被隔离在2号楼后，只有“写检讨”的任务，也没有其他事情。每天都有专人给他们打扫卫生，还有医生定期来给他们检查身体，只是不能打电话或以其他方式与外界联系。

8月31日当天，北京地院动态组听到王力、关锋出事和林杰家被抄的传言。为了安全，当晚李贵、聂树人将王大宾从小汤山医院接回学校，立即开会研究。毕竟关锋、戚本禹一直关心和支持地院“东方红”。

这天夜里，清华“井冈山”和北航“红旗”几百人冲击《光明日报》社，与报社部分职工发生武斗。

第二天，9月1日中午，又有《光明日报》部分人和中央戏剧学院“红旗文艺兵团”一起，将《光明日报》总编辑穆欣绑架。周恩来在接到报社职工报告后，责令将穆欣释放。穆欣于9月2日向周恩来写信报告了自己被绑架的经过：

总理：

我昨天下午2时被中央戏剧学院“红旗文艺兵团”抓去，今晨5时半已回到报社。昨天下午转了几个地方，最后一个地方是北航。每次转换途中及室内行动都蒙住眼睛。

所有看押的人都谈话。午夜前后，在北航有一男一女找我谈话，他们提出的主要有这些事：

“交代你分裂中央文革的罪行。”

追问我从小组回报社时谁同我谈的话。

“你是516兵团的后台。”

“你晓得8月30日发生的重大事件么？你从8月29日到9月1日到什么地方开过会？见过什么人？同什么人打过电话？”

“你同红旗杂志什么人联系？你同林杰是什么关系？”……

对这些问题，我作了简单的回答，他们很不满意，对我说了许多威胁的话。谈了10几分钟，便把我送回关押的小屋。

今晨4时左右，他们蒙住我的眼睛把我送到宣武门外，急速把车开走。

因为昨天报社有人向您报告了我被抓的事，知您关注，特把经过简报如上。感谢党的关怀。

穆欣

9月2日

9月1日，地院王大宾到北京市革委会找谢富治、吴德、丁国钰等人。不巧他们都开会去了。王大宾又找到北京卫戍区，邵崇允秘书将他们带到301医院，找到正在这里住院的卫戍区司令傅崇碧。

王大宾问傅崇碧：王力、关锋是否出事了？傅崇碧让他不要管外面的事，就呆在学校里把学校的事管好。他说：“有人找你的麻烦不要理他们。你就在学校的医院治病。需要什么药可以来301医院，我帮你找。”

回到学校，王大宾又召集常委会研究，觉得上面确实出事了。

林杰被隔离审查的消息让北京“天派”兴奋不已。9月1日，

北航“红旗”、北京石油学院“大庆公社”等组织，到北京师范大学校园里贴出“打倒林杰”、“谭厚兰必须悬崖勒马”等大标语。师大“井冈山”立即予以反击，于当天发表《关于目前形势的严正声明》，称：“反对林杰、关锋就是分裂中央文革小组！”

北大聂元梓下达指示：“任何人不能贴王力、关锋的大标语，不能组织上街游行。”北大校园内显得很平静。

尚不知情由的北京师大“井冈山”负责人谭厚兰于当晚召开师大革委会会议，她在会上一口咬定“林杰是坚定的革命左派”。随后召开全校大会，谭厚兰在会上大声说道：

“现在校内出现了大量反对王力、关锋、林杰的大字报，这是炮打中央文革的，是反革命逆流。林杰是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左派，他坚定地支持我们井冈山，他与我们患难与共、风雨同舟。”

说到此处，谭厚兰声泪俱下。

会后，谭厚兰派革委会副主任董连猛率师大“井冈山”一部分人到《红旗》杂志社游行示威，表示对林杰的支持。

王力、关峰隔离了，学部与其有密切联系的以潘梓年、吴传启、林聿时、周景芳、洪涛、王恩宇为首的“红卫兵联队”一派也随之垮台，林聿时、周景芳、洪涛、王恩宇有的被逮捕，有的被群众组织专政，但潘梓年和吴传启却不知去向。周恩来指示戚本禹通过傅崇兰，派人协助二炮保卫部追捕这两个人。

不久，协助二炮保卫部抓捕吴传启的学部赵国华同二炮的一位参谋根据线人提供的线索飞到南阳，在一个小旅馆里发现了使

用化名的吴传启。当那位参谋出现在吴传启面前时，他坚决否认自己是吴传启，并出示假工作证抵赖。这时，学部赵国华出现在他的面前，问他：

“吴传启，你认识我么！”

吴传启只得乖乖地承认自己的真实身份。当晚，被押至北京。

潘梓年是江苏宜兴人，他通过关系躲到太湖的一个小岛上。傅崇兰指派哲学所的一人协助二炮保卫部的人乘海军提供的快艇将其抓获。

不久，吴传启、潘梓年、林聿时、周景芳、洪涛、王恩宇等被北京卫戍区收监，学部“联队”在各所的头头全都被隔离审查。

## 第 866 回：北京市，召开常委扩大会　众领导，一致再批“五一六”

9月1日这天，毛泽东在谈话时更加明确的提出：“中国历次革命及我亲身经历的革命，真正有希望的人，是能够想问题而不出风头的人。现在大吵大闹的人，一定要成为历史上昙花一现的人。革命学生应该联合起来，打倒反革命阴谋集团‘516’。”

当天下午，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召开常委扩大会，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李富春、谢富治、江青、杨成武、张春桥、戚本禹、姚文元、李天佑等参加会议。另外，北京红代会核心组、中学红代会核心组、工代会等代表也参加了会议。

江青首先讲话。她再次提到“516”，说：“少数坏人故意在那里搞，这就是‘516’。他们以极左的面貌出现，很值得警惕。‘516’以极左面貌制造混乱。由于形势看法不一样，有人提‘先进的南方，落后的北方’，我曾驳过这观点，武斗就是先进吗？我们搞大批判，革命的大联合是落后吗？我认为这完全是错误的。我认为北京应该带头搞好斗批改，大联合，搞好本单位斗批改。如果不搞这些，文化大革命要搞到那个年头呢？你们想过没有？”“要坚决反对反动的无政府主义。”

她又批判了“军内一小撮”的口号：“到处揪军内一小撮，这口号是错的，打乱了我们的军队，这是自毁长城。”“人民解放军是人民保卫者，无产阶级专政的基石，提出这口号到处搞，乱轰轰的，我很气愤，我要是战士，要是夺了我的枪，我就开枪，

这样说可能过火，现在大炮也夺了，一天打一万多发子弹，就是左派也不对。”

周恩来：“要是到越南能打多少敌人？真是败家子！”

江青：“是左派也该批。另一个锋芒是针对革委会，做了错事就要打倒吗？这对吗？这难道不是别有用心吗？我这个人就时常说错话，包括你们北京市革命委员会，都是新生事物，有一点错就打倒？斗争锋芒错了，不是对准党内最大一小撮走资派，本单位一小撮走资派，而是对准新成立的革命委员会，对准我们的人民解放军，这样做错了！但他们不一定是坏人，改了就好。总之，先进的北京就是搞斗批改，大联合、三结合，制止武斗，把挑起武斗的一小撮人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这个我上次讲过的，不知讲清了没有？没有准备，大家考虑对不对。我现在重申几个问题：北京有苗头，昨天有四、五百人冲中南海，去年在红卫兵成立时，我说过要保卫党中央，毛主席居住的地方中南海、钓鱼台，另外还有大会堂、外国使馆，不准冲，反使馆可以在外面嘛，怎么钻到里面去了？这是国际惯例，否则，那人家也可以进我们的大使馆，揪我们的人。最近搞了英国代办处，结果我们十几个人在那边就挨了打。黄浦港援越物资也被抢了，这不是左派，是有坏人挑动，要警惕，该不该专政？国防部不能冲，京西宾馆不能冲，要开会嘛！今天我们在人大会堂开会，外面有人冲进来，你们看行不行？《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光明日报》、《北京日报》、《红旗》、新华社、电台等不能冲。还有

北京市革命委员会要保卫。我看了材料，《光明日报》昨天被抄了，怎么能随便抄？还抢了资料，不知什么人干的？文化大革命一年多了，还搞这一套，这不行，《光明日报》还要坚持办下去。”

谢富治：“要查谁抄的。”

周恩来：“卫戍区马上去查。”

江青：“打砸抢这股歪风一定要刹住，西单商场打得那样，不管哪一派，坏头头一定要抓起来。这已是刑事犯了。专政要正常进行嘛，要正常手续办。”

“现在说一下聂元梓同志，我上次开会批评了她，我批评她的缺点和错误，没有说要打倒她，对她好的就支持，错的要批评，对同志们也一样。聂元梓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有两大功劳，我们不会忘。她是第一张大字报的作者之一，另外，她揭发了安子文叛党集团。但是聂元梓背了这两个包袱，压得喘不过气来，对不对？”

聂元梓答：“对！”

江青：“本来聂元梓羞羞答答的不想承认错误。你们也不给她一个机会。‘红旗飘’的牛辉林上次的发言不好，也不见得高明。‘红旗飘’里有坏人，群众是好的。”

谢富治：“还有一些大字报很庸俗。”

江青：“牛辉林到处去抢、抄。”

康生问：“杨勋、杨炳章在什么地方？”

聂元梓：“前些时候卫戍区要放，我们不同意。”

江青："杨勋、杨炳章是特务。"

康生点点头说："是特务。"

江青："我希望聂元梓同志要放下包袱，我们来记你的功，一个共产党员做一点好事是本分，完全应该。做错了要改，要不断地为人民立新功。聂元梓同志就是吃老本，还做了许多错事，最后被揪住了，甚至连她的组织都要垮台。组织是好的，她的助手不好，那个助手叫什么名字？"

答："孙蓬一。"

江青："出了许多坏点子。其他学校的头头，有什么缺点、错误、也要小范围谈，要与人为善，惩前毖后，不要一棍子打死。聂元梓同志要丢掉包袱，丢掉错误，重新上阵。蒯大富也是这个问题，要丢掉包袱重新上阵。我们不愿人家打倒你们，还有韩爱晶、王大宾、谭厚兰也是这样。还有几个人，我们记不清了，不要被一点功压得喘不过气来，要天天记住为人民立新功。我讲得不对，可以火烧，可以炮轰、打倒都行。但是我是满怀热情对同志们讲话。"

接着陈伯达讲话。他说："刚才江青同志的讲话很重要，大家要注意，要认真讨论一下，是代表小组的，代表中央说的。我们跟你们开这样的会，说这样的话，不是随便讲的，这是在文化大革命一个重要的转折关头的重要的，战略性的讲话。"

江青插话："'516'表面反总理，但实际分多少个方面军。有的方面军对我，有的方面军对伯达同志。这是个重大的事件。

他们就是想从‘左’的方面，从右的方面动摇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想乱我们的套。‘516’是反革命组织。”

陈伯达：“最近在北京有些同志不听话，代表中央的意见不听，我们讲了话，你们贴大标语说好得很，但你们仍干自己的，是一小部分人，这是不允许的，这种不听中央的话，自己干自己的，给自己造成垮台的条件，失败等待他。”

“第一机床厂过去搞垮‘捍卫团’是对的，是先进的，但现在打内战从先进变落后了。仪器厂我们去了，石头都扔下来了。学生搞两派，工人也搞两派，搞武斗是错误的，我反对。”

“清华有个‘团’派，有个‘414’。我和戚本禹同志本来去帮老蒯忙的，蒯慌忙装喇叭，装机器，‘414’稳坐钓鱼台，站在我旁边。‘414’当了主席，还当了我的翻译。还有那天我到北大去，是帮聂元梓的忙的，从大方向帮忙的。当时我提了三条协议：第一、全国1000多人的动态组撤回来；第二、撤销航空版不搞了；第三、还有他们那儿有个保卫组，就是二组，我说不要了。但我走了两个钟头就去抄了，也不商量一下，不要这么匆匆忙忙嘛。这是派性高于一切，不是无产阶级党性高于一切，毛泽东思想高于一切，人民利益高于一切。抄家算什么革命行动？”

“那天外事口一个会上说，十几年来外交完全脱离了中央，怎么能这样说呢？外交具体是听周总理的，外交是毛主席亲自领导，周总理执行的，开国以来都是这样，陈毅有错误是另一回事，怎么叫我们的外交部是卖国主义外交部。刘邓路线是卖国的路

线，破坏了出卖我国利益的是刘邓。”

康生：“三降一灭的外交路线是刘、邓、王稼祥搞的，陈毅同志有错误是另一回事，我国外交路线是毛主席制定的，不要把这些混杂起来，从对英斗争120多年，共产党领导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英国在我国建了个代办处，你们去烧英代办处，也不请示周总理，我们打电话去（那时还没有烧）帮你们，你们不听，这里很可疑有反革命，脑子里没有敌人，没有敌情观念。”

陈伯达：“康生同志说的完全对，这里有坏人，不听我们的，严重的无政府主义，坏人插手，化工部抢档案，中央文革打电话不听，那里有许多国家机密，不能看就是不能看，看那干什么！去年就给你们打了招呼，你们说这样干好得很，一次二次可以原谅，继续犯错误，是不允许的，不管是左派还是保守派，都不准破坏国家财产，要有责任感，我们到西单商场里看过，我们感到痛心、落泪的，是毛主席领导的国家。不要搞武斗了，我们看够了。”

谢富治：“听说北京还在酝酿大规模的武斗。”

戚本禹：“西单商场武斗挑起者，康老说了不管是哪一派的都要抓。”

康生：“如果抓错，我一块坐牢。”

陈伯达：“我们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是强大的，不能允许这样干的，不要觉得我们是什么革命行动。”

戚本禹：“反革命。”

康生："强盗。"

陈伯达："凡是破坏生产的头都要抓。"

戚本禹："包括革命委员会委员。"

陈伯达："今天到会的大多数是市革命委员会委员，我向你们致敬，但在座的就有个别搞武斗的。有一个人做了坏事不认账，他说陈伯达讲话70%都是错误的，你不要太狂妄了！有些革命委员会委员不称职，可以按巴黎公社原则撤，通过群众讨论。"

谢富治："分两大派，都是想撤自己反对派的委员会委员，我们希望他们自己撤自己那一派的。上海不分两大派，北京的学生到上海搞两大派，反对张春桥、姚文元为首的上海革命委员会。"

陈伯达："北京这种风到处飞，自己地方还未搞好，就到处跑。"

这时康生写了一张条子给张春桥，问张春桥今年还欢迎北京学生吗？

张春桥："我来回答康老提出的这个问题。在北京市革委会成立大会上我代表六个省市发了言。在420讲话中充分肯定了北京学生去年对全国文化大革命的贡献，充分感谢了北京学生那个讲话仍然不变。直到前一段，我在北京，听说北京的同学到上海，我还是给上海的同志说要欢迎，做好接待工作。但最近有些不大值得欢迎的事情，北京的一些学生说上海革委会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张某人，姚某人要靠边站，北京好多同学对上柴'联

司’这个组织支持，说上海镇压了‘联司’。上海群众对‘联司’的行动我是完全赞同的。其实上海革委会并末表示态度，群众说我们右倾。‘联司’这个组织性质变了，在工厂武斗一年多了，是一些走资派挑动两派武斗，后来把所有反对市革委会的力量集结起来，反对市革委会和上海最大的革命工人组织‘工总司’，到处打人，打死人不交凶手，解放军由工厂调查被打出来，革委会20人到工厂劝他们生产被扣起来，这样群众就开了10万人大会，会完了包围了工厂，要他们交出凶手，他们不但不交反而主动出击，因此群众气急了，冲进去打了歼灭战，打了个漂亮仗。群众到那里是要‘联司’交凶手，不是砸商场。但北京学生到那里说我们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无产阶级专政还要不要？上海的学生也是一到武汉就反对曾思玉同志，我完全赞成北京、上海的学生回来，回本地本单位搞大批判。中央正在一个省、一个省的解决，不要打乱党中央和毛主席的轨道，江西问题不是上了轨道了吗？再去实在是帮倒忙，我们欢迎帮忙，但不欢迎帮倒忙。对上海革委会打不倒，我是担心他们被人利用上当，我希望把自己本单位文化大革命搞好，搞出模范来，不要到处骗人，在上海我还敢顶顶，别的地方不敢顶。不要装腔作势借以吓人，北京应该成为全国的模范，在毛主席党中央所在地也可能成为模范。我们上海要紧跟上你们，向你们学习。”

陈伯达：“我完全赞同张春桥同志的讲话，上海在很多方面已经走到前面去了，北京落后了，上海张、姚为首的市革委会中

央是全力支持的。是上海革命群众支持的。北京的学生都回来。”

陈伯达还提到福建，他说：“有人说，中央文革委托到福州抓军内一小撮，打倒‘韩再道’，这是有政治目的的”。

陈伯达说完，康生接着讲话，他也批评了武斗，提到了“516”，讲了对解放军的态度，否定了外交部的夺权。他说：“‘516兵团’出现不是偶然的，他们实际上是想整个推翻毛主席的司令部，有的人不自觉地上了当，帮了反革命组织的忙，这样一小撮坏头头要立即镇压，要逮捕起来。”“冷静想想，烧英代办处，最高统帅毛主席说：‘至少是无知’。中央文革电话广播不听，伯达同志说：到底你们听谁的？外国通讯社可以报导了，什么将近一点钟，伯达、康生、江青来电话都不听。出我们的丑，也出国家的丑。我肯定外事口里面有敌人。我这个话不是没有根据的，但是我今天不宣布。我是希望同志们提高警惕。”

最后，周恩来讲话。他说：“同志们，战友们，时间很长了，江青、伯达、康生讲话我同意，稍微归纳集中到几个问题。”

他首先谈了形势任务。对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周恩来说：“现在是胜利的一年，第三年扫尾。等以后隔几年再搞。”

对香港问题，他说：“外事口‘联络站’捉了两个英国记者，要同港英交换，提到国防部就被否定了。香港问题苏修一直搞我们，我们伟大的领袖有伟大的战略部署。港九同胞自己起来斗争了，有人建议，派一个营去消灭英国侵略者，我们不要受苏修的挑拨，修正主义骂我们‘天天喊反帝，连个澳门也不敢收回’。

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不能让一个小小战场牵制，要打就大打，最后解决帝国主义问题这个部署，现在每一步都做准备。有人拿着枪要冲到香港去干，要去受锻炼，我们说小将要锻炼可以，可以编到军队中去作后备军，千万不要到边疆去冲。这个问题是毛主席、林副主席经常在脑子里盘旋的，任何人不要去干扰。估计形势，要把中国和全世界革命联系起来。”

杨成武：“开第一枪，动第一炮，动第一班这是毛主席决策的大事，一旦打起来，动用再多的枪炮，几十万人也是小事。到香港去打要总参签字，怎么能签？”

当时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卫戍区住满了外地群众，周恩来号召各学校动员他们回去。他说：“所有外地串联的马上回本单位。”

周恩来提到抓革命、促生产的问题：“现在铁路运输降到最低指标。港口货物卸不了，天天罚款。如果我们搞得好，用不了半年，生产可以恢复。这就是文化大革命的收获很大很大，损失很小很小。”

周恩来也提到抓“军内一小撮”的问题，他说：“现在福州、广州、沈阳很紧张，对野战军司令员动不动要打倒，在福建搞什么‘韩再道’，还要揪‘闽老谭’”，他说“一定有坏人插手，不然，很难使人相信。”

谢富治主持各位代表通过一项决议时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他说：“最近毛主席讲，学生应该联合团结起来对付反动组织‘516’。”

他提到北京师范大学的谭厚兰："还有个条子，写打倒谭厚兰，这是错误的，群众领袖嘛，不要随便打倒，要打倒也要和中央文革打个招呼，革命群众树立起来，怎能随便打倒。还有打倒徐凯，群众领袖有错误不能随便打倒，委员有错误可以批评，委员不要自己拆自己的台。所有人不管谁有错误也不要从中捞稻草，还是要搞大联合。"

由于中央文革在当天北京革委会常委扩大会上严厉批评了外交部的夺权，甚至说"外事口有敌人"，这让外交部"联络站"核心组一些人和姚登山十分紧张，他们估计学生会去抄姚登山的家，立即帮助姚登山将他家中电视机、录音机等贵重物品转移到东交民巷 30 号外交部楼内，姚登山也不敢再回家过夜。

果然当晚 23 时许，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生抄了姚登山的家。

由于江青在 9 月 1 日的讲话中批评了北大的"井冈山"，当天，继周培源之后担任"井冈山兵团"总部勤务组组长的牛辉林，将组长职务交给图书馆学系研究生侯汉清担任。周培源也不再担任勤务组领导职务，只是偶尔出席有关会议。

## 第 867 回：冲军区，陈伯达见闽代表　外交部，姚登山家多次抄

9 月 1 日，中国人民大学的红卫兵组织“人大三红”给江青报送一份揭发材料，其中说：北京大学地球物理系主任苏士文同王光美 1946 年到军调部工作有关，王光美曾介绍苏士文去张家口参观。

江青即在这份材料上批道：“可考虑拘留苏士文。红卫兵抄过他家。寄给我的东西，我转给富治同志了。”

她又在旁边加批：“要群众揪送也可。又及。”

江青在这句加批的话下面画了一道粗线和 4 个圆圈，以示重要。

谢富治这份材料上批到：“完全同意江青同志意见，由群众揪送公安机关审讯。”

“人大三红”的这份材料上还有这样一句话：“据×××一家交代，转让给王光美的保姆祁妈只在王光美家干了几个月就走了。”江青在旁边批道：“一定要找到祁妈！请东兴同志注意。”

这个叫祁妈的人当然也很快被找到并关了起来。祁妈名叫孙淑珍。在她被关了两年之后，专案组 1969 年 10 月在《重点审查对象表》中写道：“孙淑珍，北京市崇文区南里街道托儿所保育员。关押地点：陶然亭监狱，关押原因：给杨承祚、袁绍英和王光美当过保姆，有参与美特王、杨、袁特务活动嫌疑，经查实，本人历史未发现政治问题，与王、杨、袁系雇佣关系。处理意见：

释放原单位。”

9 月 1 日晚，与关锋有很深的私交的“新人大公社”副社长、人大哲学系主任萧前从家中被人大“三红”抓到“三红”总部。

“新人大”听到他们的副社长被抓走的消息后，立即围攻“三红”总部。“三红”赶紧将萧前从总部后面悄悄转移到法律系的东风三楼。

“新人大”的人越来越多，“三红”想办法和北京体育学院联系，从学校外面找了一辆卡车，开到了墙外面等着，然后把萧前手脚捆上，再用床单裹了起来，几个人抬上墙头，外面的人接应，把他放在卡车上，运到了北京体育学院，放在游泳池的更衣室里。

9 月 2 日上午 9 时左右，“新人大公社”社长赵桂林匆忙赶到社科院民族所三楼找学部“红卫兵联队”的王恩宇、洪涛商量对策，他先讲了萧前被抓的情况：

“他们把萧前抓走了，打了一顿，打完后捆在门板上，打得半死，扔在外面，我们到地下水道找，也没找到。他们对我们攻得很紧，可能要砸我们，搞武斗，我们也得准备，我们把水池的铁棍子都拿来了，武装自己。”

学部洪涛说：“是啊，也要像民院这样，搞武斗。”

人大赵桂林说：“我们也得把人员集中一下，占几个楼，准备一下，把我们的人组织一下。”

洪涛说：“那你们自己办吧。”

赵桂林问："林杰的问题怎么回事？"

学部王恩宇说："我也不清楚，我们学部是不行了。我自己是挂在黑线上，我在考虑自己的问题。"

赵桂林提议："是不是大家串连一下，谈谈形势。"

洪涛说："那你们自己串连吧。"

王恩宇说："反正我们学部不行了，我们考虑自己的问题，我们不管了。"

9 月 3 日，《人民日报》刊登新华社 9 月 2 日讯《党中央负责人在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扩大会议上发出战斗号召》，指出："中央负责同志指出，一切革命群众必须保持高度的革命警惕性，严防国内外阶级敌人的挑拨离间，混水摸鱼。必须坚决镇压美蒋特务、苏修特务、地富反坏右的反革命破坏活动，坚决取缔'五•一六兵团'这个被一小撮坏头头操纵的反革命组织。"

9 月 4 日晚，学部洪涛给"新人大公社"社长赵桂林打电话问情况，得到的答复是："表态了，江青同志说穆欣是特务，吴传启是陶铸的人，萧前是特务，林杰是《红旗》一个小编辑，他的问题中央会解决。你们不要插手。"

9 月 11 日，"新人大公社"召开《打倒反革命两面派陶铸掀起革命大批判新高潮大会》。会上，"公社"负责人张祖义代表总部发言说：

"混进我们队伍中的萧前，是一个地地道道的陶铸式的反革命两面派。"

第二天，9 月 12 日，“新人大斗萧联络站”成立。当天下午，“新人大公社”召开斗争萧前大会。9 月 14 日《新人大》报第四十期第二版对这次大会的报道称：

九月十二日下午，新人大公社全体战士坚决按照江青同志的指示办事，满怀对于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无限忠诚、无比热爱；满怀对阶级敌人的刻骨仇恨，在公社委员会的组织下，召开了斗争三反分子、反革命两面派萧前大会，无情地揭露了三反分子萧前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滔天罪行。这个大会大长了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志气，大灭了一小撮阶级敌人的威风，也打击了某些别有用心的人妄图利用萧前问题打击我新人大的罪恶阴谋。

9月2日凌晨，周恩来接见国务院财贸口“批刘邓联络站”时，再次提到外交部的问题。他说：

“陈毅同志这样批判，他们还不满足，和我们距离很大，不可能满足他们的意见，我就不能和你们说一样话嘛。我只能通过你们向群众传达，不能都接见。外交部这样批判还不满意，外交部的权最大了。我参加过他们的大会、两次小会，还不满足。现在中央说话了，碰钉子了，没有办法了。监督权不算太小了，不要超过，一步步练习嘛，我对你们说，先取得监督权，以后三结合，才更有力量，外交部权夺错了。一个学院一派就可以跑到外交部安营扎寨，授权‘联络站’夺取大权，现在撤消了。看来非把中央都抬出来才相信。外贸部本来做得不错，一派又搞成两派。

外交部夺权是错误的，已受到批判了，不要学外交部，不要受外交部的影响，不要再受一次批判，希望你们就此止步。外交部在中央各部我是支持最多的。我要对中央负责，外交部走到边缘，开了会。你们外贸部不要学外交部，我直接管外交，结果把权都夺了。他们直接打电报给驻外使馆，结果顶了回来。

姚登山到处做报告，他到外贸部去过一次，他在外贸部的报告是错误的。制造混乱，煽动性很大，我当面批评了他。

中央提的口号是‘打倒刘邓陶’，他提的是‘打倒刘邓陈’，中央提了刘邓陈了吗？你一个司局长干部怎么能这样提？中央批准了吗？他用这个口号给驻外使馆打电报，人们不懂，是哪个‘陈’啊？你们总是把事情做得那样绝对化。”

当天，北京外国语学院“红旗大队”的学生又跑到姚登山家将他的家再抄了一遍。姚登山躲到了东交民巷 30 号外交部楼内。

9 月 2 日，北京“天派”各校代表在矿院举行会议，师大王颂平派代表参加，介绍了师大情况，讨论如何利用这一时机整垮师大“井冈山”和师大革委会。会上散发了师大“造反兵团”恢复活动的声明。

北师大“造反兵团”是在 1966 年 10 月从北师大“井冈山”分裂出来的群众组织。当时，为适应形势，壮大队伍,师大“井冈山”决定开门整风。在能否吸收“外围”参加“井冈山”的问题上，内部产生分歧。谭厚兰主张：阶级斗争复杂，不能让对手揪辫子，只吸收“红五类”，“外围”继续当“外围”，保持队伍

纯洁。

蒲寿章则认为：这是谭力夫思潮反映，他主张大胆吸收“外围”加入“井冈山战斗团”。

团长郑云云表示：“支持寿章意见。”

拥护谭厚兰的人立即指责这是搞分裂，要警惕“赫鲁晓夫式”的人物，影射郑云云有野心。

顿时，会场炸开了锅，闹得最后不欢而散。

1967 年 1 月，谭厚兰忙于《北京日报》、粮食部等处联合夺权，于是，北师大不满谭厚兰的学生纷纷主张：成立自己的组织，坚持“造反”，不放弃“井冈山”。他们将新成立的组织命名为“井冈山造反兵团”，推荐郑云云、李庆林、王颂平、赵德骏和蒲寿章为“勤务员”。郑云云力荐物理系学生李庆林当“总勤务员”。

听到风声的林杰立即从《红旗》杂志社传下三点指示：去年 10 月揪郑云云“赫鲁晓夫”是错误的；蒲寿章还可以“上山”；李庆林不要从组织上“闹分裂”。

但是，北师大“井冈山造反兵团”依然于 1967 年 1 月 26 日宣布成立。学生们没有卖林杰的帐。

面对如此状况，谭厚兰的“井冈山公社”刷大标语，写大字报，反复播发文章，揭露“造反兵团企图疯狂进行反夺权！”

3 月 7 日，谭厚兰炮轰谭震林，率先反击“二月逆流”后，为表示对谭厚兰这一行动的支持，3 月 11 日，“井冈山造反兵团”自行宣布“被迫解散”。可怜“井冈山造反兵团”，从 1 月 26 日

成立，到 3 月 12 日解散，仅“活”了 46 天!对此，“井冈山公社”当然是欣喜若狂，欢呼《喜看‘冰团’哗流水》。但师大反谭厚兰的势力始终没有停止活动。这次听说林杰被隔离，他们当然希望能够利用这次机会再获新生。

9 月 2 日晚，农大“东方红”的冯兴旺召集原“三司”20 多个学校反工作组的造反组织头头，在农大革委会会议室开形势分析会，大家都判断中央文革出事了，对王力、关锋的倒台，他们都感到太突然，不好理解。王大宾和冯兴旺在会上说：“弄不好，我们这些红卫兵也会去坐牢。”有一个《北京日报》的女记者参加了这次会，将会议记录向上面做了汇报。

就在这几天，8 月 31 日晚至 9 月 1 日，七机部“915”、“916”又在八宝山地区发生了一次最大规模的武斗。双方出动的总人数近 2 万人。

聂荣臻得知后，一面命北京卫戍区紧急出动一个营的兵力，把武斗双方隔开，一面立即向周恩来报告。

周恩来要卫戍区领导传达他的命令：“我命令你们立即停止武斗，立即从现场撤退，违反者，按法律惩处。”

9 月 2 日早晨，武斗被制止。

8 月 18 日，福建省军管会被“省革命造反委员会武卫司令部”以“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为由封闭，实行武装接管。23 日，他们又强行进驻省委档案科办公楼。9 月 1 日，福州“革造会”与北京红代会、武汉及南昌来福州的人员到福州军区，要求

福州军区副司令员皮定均接见，并冲击了福州军区，甚至跑到战备坑道搜人。

9 月 2 日 23 时 30 分，陈伯达、杨成武这两位福建老乡在人民大会堂接见福建“八·二九总司”、“八·二九晋司”、厦门“促联”和“革联”两派、省“革造会”等组织的代表。

陈伯达说：“天气冷了，老朋友好久不见。你们福建还是很乱，你们双方都要负责任，特别是‘革造会’要负主要责任。‘革造会’组织大，很杂，人员不纯，很难保证没有坏人操纵你们。”

杨成武说：“冲军区是错误的。对敌斗争问题，要向你们讲清楚。因此，总理要我在1日6时挂电话给福州军区。要找皮定钧，找不到，找到廖海光。因为昨天有200人冲到军区去抢枪。”

“革造会”代表说：“没有这回事，我们是要求皮定钧接见。”

旁边一位中央联络员证明有这回事。

杨成武接着说：“还把韩先楚同志家的东西也抢走了，还拿走两个秘密的军事文件。中央打电话，主要是要追回两个文件，不准拍照，不准抄写。你们要求皮定钧接见，总理有三点指示：

(一)可以接见。现在皮定钧是最后一个指挥员，因为韩先楚病了，在北京。如果你们要揪，就要犯严重错误。

(二)你们现在喊出‘打倒韩先楚’的口号，我们不能接受。韩先楚同志有错误，要帮助，不能打倒。你们要揪军队一小撮，这是错误的。

(三)告诉皮定钧多做一些思想工作，要中央调查组跟‘革造

会’说清楚：他们可能上美蒋的当，也可能上地富反坏右的当。现在所有抢的枪要封存。”

陈伯达再次警告“革造会”：“不要去向部队夺枪，不要抢军队的设备，不要拿部队的文件，不要揪一小撮。你们之间不要互相揪，军队更不能揪。”否则的话，“开始是造反派，以后就会很危险。”

陈伯达的话不啻是对全国的造反派提出了警告。他说：“‘革造会’已经堕落到危险的边缘。搞文化大革命为什么把矛头指向解放军？要刹车呀！刹车呀！‘革造会’你们现在是走到危险的边缘，你们脑子膨胀了，发热了。全省跨行业的组织，什么人都有，要注意地、富、反、坏、右、蒋介石利用你们，到处插手，有些黑手混到你们里面去，放手地干。别以为后边有靠山就乱来，就走向反面。现在你们自己也控制不住自己。”

杨成武：“不开枪已经不简单了，人民解放军的枪给夺了，有个团长看了大哭。我们告诉他，好人夺了枪，还没有多大问题。坏人夺枪，问题就大了。不过也不怕，以后再说。”

他又举一个例子说：“有一个司令员，有个地方发生武斗，这个司令员带人到这个地方调解一下。司令员被杀害了，造反派混进坏人。我们现在讲的，希望你们提高警惕。当然，造反派中，大多数是好同志。”

陈伯达接着说：“我和‘革造会’打过交道多次，‘革造会’说有40万人，我说砍掉一半，还有20万人。‘八二九’说有4万

人，我也砍一半，两万人就了不起。你们说我受蒙蔽，事实上真理不会因我受蒙蔽而失去真理，你们就那么干净吗？难道敌人不会利用你们吗？不要做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

杨成武说：“北京昨天开了一个工代会的扩大会。工厂都是工人，都是无产阶级，本身没有阶级利益的矛盾。为什么工厂变成两派，有的工厂分成三派，打得很厉害，把财产破坏了。这都是人为的。一点是走资派挑动的，一点是地富反坏右挑动的。我们千万不要上当。工厂要搞大联合，抓革命，促生产。你们都是小头头。”

陈伯达：“你们不要以小头头的领袖自居，什么司令官啦，什么秘书啦，组织中混进了坏人，这是很危险的。”

“八二九”代表说：“我们完全赞成伯达同志、杨成武同志的意见。我们抱着诚心诚意对‘革造会’提出意见。这是对‘革造会’负责的。‘革造会’里面混进了坏人，省委书记叶飞的秘书杨国怀是死保叶飞的。他纠集了省委走资派的秘书，组织了‘追穷寇战斗组’。8月9日，参加围攻华侨大厦。这个性质很严重。你们要注意，省委里面有一个张传栋是省委党校校长，叶飞的死党，公开叫嚷：要和‘革造会’战斗在一起。这个事情很严重的。你们‘革造会’可能不明真相，被那一些走资派利用了。我们也很痛心的。我们在伯达同志面前给‘革造会’提点意见，我们完全是抱着互相帮助，互相爱护的心情。”

陈伯达：“这个意见提得很好、很对。不管你们‘革造会’

有没有这回事，这些话对你们都是适用的。要好好地接受，也要好好地听取人家的意见。你们‘革造会’已经走到了危险的边沿，你们现在头脑发胀，你们组织庞大，一控制不住，组织庞大了，什么人都有，要注意地、富、反、坏、右，还有蒋介石利用你们，他们到处插手，有的黑手已经钻进你们里面了，最后有了靠山，你们就乱来。这样会走向反面，这对你们都没有好处。”

杨成武说：“现在全国都有冲军区的，这个问题很值得深思考虑。这里头有文章，怕有坏人在里头搞鬼。今天我们两个都是福建人，希望你们好好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对其他问题犯一点错误没关系，解放军也有犯错误。韩先楚同志你们要打倒，中央是不同意的。有错误是难免的，要帮助他。”

陈伯达：“你们一定要拥护解放军，要拥军爱民。”

杨成武：“你们不要认为韩先楚同志不检讨，革命就革不下去了。要韩先楚同志检查早慢一点都可以，差不多就行了。主席讲，犯错误要允许人家改正，改了就好。对你们小将，我也没有多大批评。如果你们再这样下去，就要走向反面。”

陈伯达：“要刹车。”

杨成武说：“你们要按报纸社论、中央文革的指示去做。过去的事情，不要再争吵了，就拉倒了。”

厦门“促联”派和“革联”派在会上签订了《八条协议》。协议签订以后，杨成武对厦门两派说：“祝愿你们两派都要执行。以毛泽东思想来执行协议，这是政治上对我们的考验。”

陈伯达说：“看你们有没有诚意。”

9月3日，周恩来、陈伯达致电福建省各群众组织，指出：“福建省革命造反委员会”等组织随意进驻福州军区指挥机关的行动是极其错误的，要求进驻福州军区指挥机关的所有人员立即自动退出，并退还拿走的文书、档案资料等。陈伯达在接见福建两派代表时说：

“打倒韩先楚，中央不接受。韩先楚同志是打不倒的，文化大革命为什么一定要搞解放军，这里就有鬼嘛！”

9 月 3 日，《人民日报》刊登新华社 9 月 2 日讯《党中央负责人在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扩大会议上发出战斗号召》，指出：“中央负责同志指出，一切革命群众必须保持高度的革命警惕性，严防国内外阶级敌人的挑拨离间，混水摸鱼。必须坚决镇压美蒋特务、苏修特务、地富反坏右的反革命破坏活动，坚决取缔‘五一六兵团’这个被一小撮坏头头操纵的反革命组织。”

9 月 3 日凌晨，姚登山家第三次被抄。

当天，外交部“联络站”和“九九兵团”核心组说北京外国语学院“红旗大队”要来冲外交部擒拿姚登山。他们以“保卫国家机密”为由，号召部分群众到东交民巷 30 号外交部大楼保卫姚登山，并撕掉楼内所有“打倒姚登山”的大标语。

当晚 22 时许，姚登山家第四次被炒。

## 第 868 回：九月二，西安市战火连天　命胡炜，坚决保卫弹药库

从 8 月中旬开始，西安两派也经常出动成百、成千人，持枪带刀，乘坐汽车，在市区横冲直闯，争夺、攻占工厂、机关、仓库等,使武斗不断升级和扩大，遭射击或酷刑致死人命的事件，不断发生，恐怖气氛笼罩西安全城。

8 月 30 日凌晨 1 时许，湖南来陕西串联的 5 名红卫兵和西安“工总司”的工人乘西安交通大学的汽车，携带武器到西安市东郊秦川机械厂预谋抢枪。汽车行至韩森寨地区时，被手持钢钎、头戴安全帽的一群工人发现，向他们高喊：“站住，站住！干什么的？”

韩森寨周围的工厂和单位，大部分职工加入了“工总司”，因此，这里是“东派”的天下。平日里，“东派”的汽车在这里可以横行无阻，没有人敢阻拦。他们以为这群工人是自己人，便急刹车把车停下，并向他们高喊：“我们是‘工总司’的，要到秦川机械厂办事，快让开!”

没想到这群人是属于“西派”“工矿联”的，冤家对头，非但不让开，反而高喊“停下，快停下!”“反对打砸抢，打倒‘大杂烩’（指‘工总司’)!” 天黑，他们看不清车上人拿的什么武器，挺着钢钎就冲杀过来。

汽车哪敢再停，立即启动。这群人看他们要开溜，便围过来阻拦。只听车上的人喊：“快闪开！再过来就开枪了!”

话音刚落，有人已经对准那群工人开枪射击并投掷手榴弹。

在爆炸声和噼噼、啪啪的枪声中，顿时就倒下一片人，其他人慌忙四散。等救援人员赶来时，汽车已经逃窜。这次武装冲突死 2 人、伤 9 人，成为西安市第一次开枪武斗的事件。“工矿联”这次吃了亏，发誓“血债要用血来还”。

当天，有传言要围攻洗劫陕工大，学校赶紧用武装部的武器，给每人发了一支枪，昼夜守卫学校。校门更是戒备森严，围墙上站满持枪的学生，校内枪声不断。但是几天后也没有发现一个“敌人”，反而是学生自己开枪误伤了自己，学校这才取消警戒。

8 月 30 日晚，西安西郊某群众组织攻打东五路十子附近的西安市人民搪瓷厂。他们在搪瓷厂东边的利民米厂外架起了几挺机枪。整个晚上，枪声不断，就和打仗一样。子弹拖着曳光在空中来回穿梭，夜晚的天空都被映红了。

第二天一大清早，人们跑到搪瓷厂门前看热闹，只见搪瓷厂的宿舍楼东面楼墙面被子弹打成了马蜂窝，围观的人越来越多，把厂门口都围严实了，马路也堵塞了。这时，厂大门开了一条缝，走出了一个光着上身的胖小伙子，只见他两手各持一枚手榴弹，朝着围观的人狂吼：“看球呢！你们再不走，我就撩手榴弹啦！”围观的人一看这阵势，哗地一下都跑散了，那个小伙子哈哈大笑着钻进了大门里。

8 月 31 日，关中供电局和胡家庙地区又发生武斗，“东派”头头马希圣等人经过策划，由刘安全率领大批武斗人员乘 40 辆

卡车开往 544 厂，为同派解围。“西派”头头张培信等人也调集数千名武斗人员，开赴庆安公司，对“东派”武斗人员实行包围。

双方都不断调动人员参战，动用了大量汽车、消防车等交通运输工具及步枪、机枪，甚至坦克和电台等作战武器和器材。

9 月 1 日，西安地区两大造反派组织“工联”与“工总司”终于在胡家庙地区发生大规模武斗，造成双方死亡 15 人。

当夜，西军电革委会发出紧急通知，要大家带上自备的武器，乘坐“西派”支持“工矿联”的卡车车队，去西安西郊的庆安公司，支援那里的武斗。庆安公司是一个大型国有飞机制造公司，当“西派”的车队通过玉祥门时，遭到路边的人用砖头、石块的袭击，因为是黑夜，看不见袭击的人，只听到砖头、石块打在铁皮车框上的声音。开卡车的司机迅速冲过这道“封锁线”，到达庆安公司外围的马路上停下。这时天已经亮了，大家听到不幸的消息，在遭遇袭击时，一名教员被人用掷来的“飞镖”刺中了头部，“壮烈牺牲”了。同时，西北工业大学几名学生因为自带的燃烧瓶起火，也被活活烧死。

过了不久，就听到了清脆的枪声，传来消息说对立派用机关枪架在汽车上，要冲出包围圈。指挥员要大家把便道上的砖撬起来，堆成“工事”，进行阻击。接着又不断听到更密集的枪声。后来听说“东派”的汽车从前面的岔路走了，有人看见子弹打在水泥路上冒起的一簇簇白烟。

9 月 2 日，“工总司”与“工联”又在西郊未央路地区发生

大规模武斗。双方数万人动用大量汽车、步枪、冲锋枪、机枪、迫击炮、手榴弹及电台有组织的战斗，个别地区发生激烈巷战，一方攻入解放军军备库将两辆中型坦克开上街头向对方进行炮击和扫射，规模空前，激战惨烈，这就是当时震惊全国的“西安九二武斗事件”，致使西安筑路机械厂、机械化公司、西北金属结构厂、国营五四四厂、陕西制药厂、庆安公司、西安冶金机械修造厂等单位的厂房、设备及一些技术要害部门受到严重破坏。同时导致 100 多人死亡，290 余人受伤,双方俘虏 2000 余人。在那腥风血雨的日日夜夜里，西郊的枪炮声日夜不停，硝烟弥漫。一辆辆满载武斗人员的卡车，不断向西郊集结。街道两旁防御工事里埋伏的武斗人员，用砖头、石块，甚至步枪、机枪阻截增援的车辆和人员。那些参加武斗的卡车冲过一道道防线，冒着枪林弹雨呼啸而过。大街上，枪声不断，厂矿、商店、机关停工、停产、停业，人员稀少，异常恐怖。市民们关门闭户，个个心惊胆战地躲在家里。

9 月 2 日上午,周恩来得知西安的武斗消息后，严厉批评了双方头头，并要求双方立即停止武斗、撤出现场。同时，命令军区和驻军派大批部队分别赶赴各个武斗现场，包围武斗人员，制止和监督他们撤离现场，使武斗逐渐平息。

9 月 2 日晚 20 时，总理联络员王贤兴打电话给陕西省军区传达了周恩来的指示：

陕西省军区转工联、工总司：

中央完全同意九月一号工联和工总司达成的停止武斗的三条协议。

从昨晚起，在庆安公司周围发生的武斗和对庆安公司的包围、对人民解放军一个连队和宣传队的攻击是错误的。

中央迫切希望“八.五”指挥部立即从现场撤走。

有关双方，保证“九.一”协议立即向下传达，保证认真实施。

希望得到双方回答。

周恩来

1967年9月2日

周恩来的指示下达后，武斗逐渐平息。

为了尽快贯彻执行周恩来的“9.2”指示，制止武斗继续恶化，陕西省军区、21军和陕西省支左委员会把“工矿联”和“工总司”的负责人安文保、王宪琳、吴文杰、张谦等召集到省委支左委员会办公室进行紧急协商。仇人相见分外眼红，双方互相指责对方，谴责对方的残暴行为，难以平静。若不是军队领导在场竭力劝阻，一场你死我活的厮打在所难免。从9月2日晚21时直到3日凌晨2时许，经过苦口婆心反复的说服教育，双方总算冷静下来，最终达成协议：

一、双方保证坚决地无条件地积极地传达和贯彻执行总理的9.2指示。

二、双方保证坚决贯彻执行9月1日晚达成的三条协议和十

条协商。

三、鉴于9月1日晚已发生严重武斗事件，双方保证从即日起，绝对不再开火，对于牺牲受伤的人员立即移交对方，进行妥善处理

鉴于西安西郊发生了大规模武斗，9月2日，西安交大校革委会决定教职工、学生可以离校疏散。

9月2日晚上，西军电革委会也把学院封存的武器库打开了，枪支分到各个班。

事后，“东派”的“工总司”在建国路二十六中举办了“9.2尸展”，把死难者的遗体摆放在大礼堂里，供本派各部门、单位的群众组织参观。遗体周围摆满了花圈、花篮，墙上贴满了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革命烈士永垂不朽!”“为死难烈士报仇，血债要用血来还!”等白纸黑字的标语口号。这就是西安有名的《92尸体展览》。

与此同时，“西派”在西北工业大学大操场为“九.二武斗”中“壮烈牺牲”的“烈士”举行隆重的追悼大会。死难者的墓就在大操场西面，墓前、主席台前和两边摆满了花圈、花篮，“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的巨幅白对联格外醒目。“西派”的四大组织头头都送了花圈并参加了追悼会。

据后来调查：这次事件两派有280余个积极参加者，其中有骨干分子87人，内有地、师级干部26人，县团级干部20人。这些人有的在武斗组织中担任“顾问”、“高参”。原空军西安通

讯学校，即 773 部队的一名教员，曾任该校“文革筹委会”主任，“西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大批判指挥部”副指挥，多次参加武斗策划会议，“9.2”武斗中担任通讯组长，策划建立全市性的武斗通讯网，亲自在西安外国语学院和体育学院架设两部电台，沟通了 773 部队和“大批判指挥部”的通讯联系，以“明抢暗送”手段，将 773 部队的 4 卡车手榴弹运到西北军事电讯工程学院。原西安市委一名书记，曾任“大批指”“顾问”，参与“8.31”、“9.2”武斗，提出武斗计划。即：袭击东郊，拿下火车站，控制北郊，端掉“8.5”指挥部，控制城内制高点，对另一派跟踪追击，分化瓦解。还参与策划抢劫解放军 102 库和 342 部队的武器。

9 月 4 日，驻守陕西的 21 军总机突然接到了一个来自北京的电话，是国务院总理办公室打来的，说：“总理要胡炜军长接电话。”

胡炜拿起话筒，听到了周恩来的声音。他告诉胡炜：西安市有一派群众组织离开了西安，窜到陕西省某地的解放军武器库附近一带，与当地的造反派组织纠集在一起，企图抢劫那里的武器弹药。

介绍完情况，周恩来以一种命令的口吻说道：“胡炜同志，你要派部队严加保护。必要时，可以开枪!”

如同在战争年代接受战斗任务一样，胡炜双腿并拢，笔直挺立。他手持话筒，操着浓重的河南口音斩钉截铁地说：“请总理

放心，我们坚决执行总理的命令，保证完成任务！”

这个仓库的武器装备，可以装备几个步兵师。周恩来给胡炜打过电话之后，又叫国务院总理办公室的联络员吴斌给西安交通大学“文革总会”主任李世英打电话，责成他们立刻前去把准备抢夺武器弹药的人员全部撤回来。

胡炜放下周恩来的电话后，没有片刻迟疑，立即就向距离该弹药库最近的部队领导徐保俭团长下达了命令，要他亲自率领1个营的兵力，用最短的时间火速赶到该武器库，全面接管武器库的防务。

因为有周恩来“可以开枪”的命令，部队官兵也就不再畏手畏脚了。部队一到该武器库，徐保俭就命令战士们把武器库的防务全面接管过来，里里外外布置了好几道警戒线。他们架起机枪，子弹上膛，并向来抢武器的群众发出警告：

“如果有谁胆敢跨越警戒线抢夺武器弹药，解放军就要执行周总理的命令，开枪制止！”

在强大的武力威慑下，抢劫该库武器弹药的企图没有得逞。

9月4日至5日。西安“西派”的“文攻武卫指挥部”要求西安装甲兵工程学院武力支援，说“西派”形势十分险恶，即将被“东派”攻垮，一旦被攻破，将有数十万人生灵涂炭，只有西安装甲兵工程学院的坦克才能阻挡进攻，威慑对方。

西安装甲兵工程学院围绕着去不去救援、要不要出动坦克，展开长时间激烈的辩论和争吵。力主出兵者情绪激动，说“西派”

危在旦夕，不但要出兵，而且要快出多出，还说："21 军正规军不便直接出兵，也希望我们以群众组织名义出动重武器，才能保护群众阻止武斗。"

开始，学院的领导牛明智和高增全等干部不同意出兵，但架不住传到耳边的严峻态势和慷慨激昂情绪的渲染，只好同意出兵，但必须把握局势，出动坦克只是示威造声势，威慑对方，保护我方，决不参加攻击对方的武斗，而且快去快回。于是，由两辆卡车的武装人员和 7 辆 59 式坦克组成的武装车队，浩浩荡荡、轰轰隆隆沿公路开进西安城，沿途并未遇到任何抵抗，行进途中，在韩森寨地区被自家人"工联"某厂巡逻人员鸣枪误伤打死教员一人。车队当晚停驻在西安体育学院，一夜冷静之后，既怕激怒对方，又怕再生变故，再出伤亡，牛、高二领导追悔莫及，决定立即撤兵回校，来去在西安城中武装游行示威了一遭，回校后当即作检讨，声称有人谎报军情。此事一时轰动全国，造成极其恶劣的影响。

为防备"东派"报复，西安装甲兵工程学院昼夜武装巡逻，"造反总团"将教学大楼大门和一楼窗户用砖堵上，里面贮存一些食品以及武器。所幸"东派"没有人来，不久解除预警，恢复平静。

9 月，西安交通大学各系高材生为文攻武卫做准备，自制大量步话机、电台和大批炸弹武器，抢劫莲湖区枪支七、八十支，并与 9 月初西郊武斗中大批交大学生直接指挥大中学生战斗，李

世英带队对“工联”青年工人使用大量交大工物等系研制的武器，以自制步话机和教学电台统一指挥，在最后使用了抢得的两辆中型坦克占领对方工事。

67 年的夏天，西安市的大街上不时有送葬游行队伍，武斗队员荷枪实弹乘坐一辆辆卡车呼啸而过，高音喇叭的吼叫声昼夜不停，流言四起，人心惶惶。普通人文化革命初期的热情此时已经烟消云散，转而成为对时局的深深忧虑。

## 第 869 回：总理电，倒许风才告停止　《九五》令，戚本禹书面检查

我们再看此时的南京。

8 月 25 日晚 19 时多，天已渐渐黑了下来，南京军事学院的部分人员将已被抢过的炮标仓库里还剩下的，没被抢走的大约几十来条枪转移到汽车连去。他们弯着腰，悄悄地沿着炮标的矮冬青树行进着。在夜色朦胧里，可以看出他们佩戴着红领章、红帽徽，有的臂膀上还挂着红袖章。他们每人身上都背着几枝枪。那天的晚上特别炎热，许多人在外边乘凉。住在炮标的安徽“炮轰”派的散兵游勇也在那里乘凉、侃大山。这时，他们发现了在黑暗里行进的这队人马，当他们发现这是一队解放军，并且有枪时，神经就高度兴奋起来。因为在前阶段抢枪时，住在南京的无锡“主力军”和常州“主力军”都有很大的收获，而他们一无所获，他们想趁机捡个便宜，就对着这支队伍高声大喊：

“解放军同志，把枪留下！解放军要支持革命左派啊……”

他们越叫，那支队伍就跑的越快，出了炮标门，沿着大路一直向汽车连跑去。一群人在后面紧追不舍，快到汽车连门口了，汽车连的大门是关闭的，大部分人将枪扔到了汽车连里面，又翻爬了进去。这时还有一位干部没来得及爬进去，但那群人已经跑到他的身后了。他转过身，只见那些人与他只一步之遥，手就要抓到他了，他已无从考虑，随即用冲锋枪开了火。这时的时间是晚上 20 时多。当时就听着倒了一片人，剩下的人赶紧趴在地上，

嘴里用嘶哑和颤抖的声音在喊：

“解放军，不要开枪，要文斗不要武斗……”

这个干部趁着机会翻进了大门。这时汽车连的大探照灯也打开了，还打了几发信号弹,并且机枪、冲锋枪等都开了火。所幸没有伤着人，只在对面马标的墙上留下了一些枪眼。打了一会，里面的人见外面没有了了动静，把枪也扔了，都四散跑了。

当晚是 1 死 3 伤，后来又死了 1 个。死者是安徽“炮轰派”人员，名叫何辉，20 多岁，高中毕业进工厂工作不久。子弹从他的胸口进、后背出，前胸弹口很小，背后出口有杯口大。3 个伤者被送进了军区总医院，有一个听说是南京军事学院的通讯员，骑车路过汽车连时被打中了胳膊。后来，在总院抢救的一个叫朱家骅的，失血过多抢救无效死亡。肚子上中了 4 发子弹，肠子被打成了几段，当时拍了照片，还印成了传单。

第二天，南京军事学院遭殃了，安徽“炮轰派”在死在汽车连前边的何辉尸体上盖上了红旗，手边还放了一本《毛主席语录》，说何辉是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而牺牲的等等。

何辉是向前倒下的，面向下，可能安徽“炮轰派”怕说是他们抢枪造成的开枪事件,所以就把何辉的尸体向后倒下,面向上,摆出是后撤时打死的样子。但又怕这样不能体现他们的英勇气概，又将尸体给倒了过来，面向下。折腾了好几次。那时的天气很热，在地上凝聚了厚厚的一层血，苍蝇也围着乱哄哄的飞。有人从制冰厂拖来了冰块放在了尸体两边，使之降温。

汽车连里已是狼藉一片，到处是丢弃的枪枝和物资。军事学院的许多财产被洗劫一空。死者的家属老的老、小的小，也来到军事学院处理后事，哭哭啼啼十分悲伤。

南京的“倒许”风潮愈演愈烈。8 月 26 日，“红总”在南京大学大操场召开“打倒许世友，打倒江渭清，彻底打倒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同日，“揪许火线指挥部”宣告成立，并向许世友发出《勒令书》，勒令其在 9 月 2 日以前交出“认罪书”。

8 月 27 日，“八二七”以纪念该组织成立一周年的名义在南京大学大操场举行集会。中央调查组、江苏省军管会派人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八二七是毛主席革命路线胜利的产物。”会后，与会的“八二七”群众在市内举行了一个小规模游行。“红总”方面对此没有做出过激反应。不过当下关和大桥工地的“八二七”试图游行进入市区的时候，再次在 3503 厂附近遭到“红总”方面的阻截，被打伤 8 人，抓走 8 人。

8 月 28 日，“揪许火线指挥部”在南京军区大院门前安营扎寨，宣称“不打倒许世友决不收兵!”从三牌楼到鼓楼，近 3 公里的大街两边贴满了不同群众组织支持“倒许”的大标语、大字报，“倒许”风潮达到顶点。

8月30日，“红总”方面向据守四女中的“八二七”发起进攻，省军管会派出部队试图制止武斗，结果“红总”方面有人驾车冲向军队，造成3名战士伤亡。

9 月 1 日，周恩来、张春桥分别打电话给江苏“红总”，责令

“红总”撤除“打许联络站”，不准冲击军区和省军管会。周恩来明确表示：

“许世友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中央对许世友同志是要保护的。这不是我个人的意见，这是毛主席的指示精神。如果有人要揪许世友的话，我一小时内赶到南京去！”

在中央的强烈干预下，“红总”原定于9月2日举行的“10万人批斗许世友大会”流产。

9月4日，南京“红总”、“八二七”和“促联”三派群众组织在南京达成《关于坚决制止武斗的协议书》。至此，“红总”发起的“倒许”风潮以及“红总”与“八二七”之间的武斗暂时告一段落。

9 月 4 日，外交部副部长陈家康被视作“516 兵团”在外交部的头目被逮捕。此后不久，姚登山也被逮捕。

王力、关锋被隔离后不久，周恩来对戚本禹说：“你应该给主席写个检讨了。”江青也让他写。于是，9 月 4 日，戚本禹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在信中说：

关锋、王力犯了很严重的错误，表现形式是“左”倾盲动。他们错误地估计全国的形势，把斗争过程中的反复现象，看作是全国出现了资本主义复辟，看不到革命群众的斗争成果和力量。他们错误地估计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报纸、电台到处号召抓“军内一小撮”。他们怀疑一切，随便动摇毛主席司令部的领导。他们犯错误的思想根源是个人主义，自我膨胀，自以为了不起，比

谁都革命，听不得不同意见。

戚本禹在信中还检讨说：我对他们的有些问题察觉不出，王力在外交部问题上犯的错误，就同我有关。我从心里愿意努力改造自己，永远做一个忠于毛泽东思想的小兵。

对戚本禹这封信，毛泽东在1967年9月7日作了如下批语：

已阅，退戚本禹同志。

犯些错误有益，可以引起深思，改正错误。便时，请你告知关、王二同志。

毛泽东九月七日

毛泽东的秘书徐业夫将写有毛泽东批语的这封信交给戚本禹，戚本禹立即向周恩来、江青作了汇报，他们一起讨论了如何落实这一批示。周恩来和江青让戚本禹向王力、关锋传达毛泽东的批示。

戚本禹问周恩来："是我一个人去告诉他们，还是谁跟我一起去？"

周恩来说："让春桥跟你一起去吧。"

于是，戚本禹和张春桥一起来到王力、关锋的住处，向他们作了传达。

王力、关锋听了非常高兴。因为毛泽东在批示中称他们是"同志"，这就像是得到了解放令似的。因为"武汉720事件"后，毛泽东在文件里称陈再道是"同志"，陈再道的待遇马上就不一样了，房间和警卫马上都换了。

戚本禹将毛泽东的批示转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传阅，陈伯达、康生、江青在上面画了圈，周恩来写了个“阅”。

戚本禹还想将毛泽东的这一批示印成文件发下去，周恩来没让印发。

一个多月前，8 月 4 日，毛泽东对全国的抢枪风潮还不以为然，但是，事态的发展比人们预料要复杂严重得多，过了不到一个月，全国各地被抢的枪支达 48 万至 50 万之多！毛泽东听了仍说：那有什么了不起，3、40 万支有多少哟？！不多！50 万支有多少哟？不多！光全国民兵武器就有 350 万支嘛。

毛泽东看问题是洞若观火的，他说：“你说抢枪，枪是有的，但抢的不多。发枪，给枪的多。人武部、军分区有的把枪发给保守组织，以便好保他。也有的发给造反派，两方面都发，要看什么地区，有的地区主要发给保守派，也有的地区发给造反派。”

事态的发展十分迅猛，进入 9 月，全国没有抢枪的地方，只有北京和上海两个城市；基本上没有抢枪的省，仅内蒙、河北、山东、山西、甘肃、青海 6 个。

9 月 4 日，毛泽东在上海虹桥宾馆听取杨成武汇报中央文革小组最近会议和工作等情况。谈到南京的“倒许”风潮时说：

“对许世友的第一条罪状就不对，许并没有反对过我。”

谈到准备发一个不许抢枪的命令时毛泽东说：“发出一个不许抢枪的命令，这个好。”“要解放一大批干部，对！”“有的‘四大’搞得很惨，何必那么搞？犯错误的干部，主要是执行了资产

阶级反动路线，另外是长期脱离群众，现在群众要报复一下。现在搞一下也没有什么了不得，又不是向敌人下跪。”

9 月 5 日，毛泽东审阅周恩来 9 月 4 日送审的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关于不准抢夺人民解放军武器、装备和各种军用物资的命令》稿，批示：“已阅，照办。”

命令共四条：

一、任何群众组织和任何人，不管是属于哪一派，不许以任何借口抢夺人民解放军的武器、弹药、装备、车辆、器材、物资，不许抢夺军火仓库、军用仓库和国防企业中的武器、弹药、装备、车辆、器材、物资，不许拦截火车、汽车、船舶上装载的武器弹药等，不许外部人员进驻人民解放军的指挥机关。

二、军队院校、文体单位以及所有开展四大的单位中，不管任何组织、任何人，更不准抢夺武器、弹药、装备、车辆、器材、物资。

三、军队所有机关、部队、院校等单位，不经中央批准，绝不许将武器、弹药等军用物资发给任何组织、任何人。

四、已经抢夺的人民解放军的武器弹药等应一律封存，限期归还。

《命令》说：“此命令至公布之日起生效。今后如有违反此命令者，当以违反国法论罪。当地驻军在执行上述命令时，首先要耐心地进行政治思想工作，讲清道理，进行劝阻。如劝阻无效，可对空鸣枪警告，令其撤回。在劝阻和警告无效时，可宣布这种

抢夺是反革命行为，并采取措施对其少数的坏头头和肇事凶手予以逮捕法办。遇到这些人拒捕和抵抗时，人民解放军有权实行自卫反击。在海防、边防、沿海岛屿和国防、机要重地值勤的战士遇有人夺枪时，有权自卫反击。”

此命令于本日发出。这就是著名的《九五命令》。由于这个命令的下达，很多已经抢到了枪的人害怕起来。因为持枪的很多是工人，白天要上班，带一条枪，工作起来增加不少麻烦，夜间放在床头，又怕被别人抢去，负不起责任。上面又有文件规定要归还，他们想来想去，还是交了合算，于是就交枪。不久好多地方出现了交枪速度很快的情景。到 9 月中旬，江西就收到已交上来的枪达 5 万余支。想枪，抢枪，怕枪、交枪，这么一个过程就是这样来的。

9月4日，中共中央以中发［67］287号文件，转发周恩来、陈伯达对福建问题的指示。文件明确指出：“福州军区是福建前线三军的最高指挥机关，担负着很重要的战备任务。”北京红代会、南昌“大联筹”、武汉“三钢”、“三新”在福州的人员，“你们随意进驻其指挥机关，这种行动是极其错误的。”

文件要求：“你们进驻福州军区各领导机关的所有人员一律即行自动退出其营区。你们进驻军管会的人员，也应当一律自动退出其驻在范围。”

“你们在福州军区各领导机关和个人住宅所拿到的一切文件、档案、图书、资料等，应立即全部清点交还原单位，不准拿

走，不准打开，不准照相，不准破坏。”

“福州军区领导机关的所有坑道设施，任何组织，任何人均不得冲击和破坏。已接近到坑道的人员一律退出其警戒范围之内。如有人破坏坑道，将受到国家法律的严格制裁。”

“你们把参加中央赴福建调查组的福州军区政治部唐副主任揪去游街，是很错误的。应当马上放他出来，让他恢复正常工作。所有革命群众组织都应当协助中央调查组顺利进行工作，并保证他们的安全，不得有任何为难和威胁。任何组织都不得逼调查组表态。调查组只执行中央给予的调查任务，他们也无权表态。”

“各群众组织之间，绝对不得互相抓人扣人，不得抓走军队的干部和战士。各群众组织所抓的一切人员，都必须立即无条件释放。被抓人员所提供的任何口头材料，一律无效。”

“北京红代会的学生、南昌‘大联筹’、武汉‘三钢’‘三新’在福州的人员都应当在短期内返回原单位闹革命，不要干预福建群众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他们在福州的言论和行动，无权代表他们的整个组织。”

文件再次明确：“福建省军管会是中央决定成立的，军管会主要领导人是我们最高统帅毛主席和副统帅林副主席委派的。省军管会工作中有错误缺点，已经向中央作了检查报告，并将向群众作公开检查。各革命群众组织应该支持和协助军管会工作，帮助他们纠正错误缺点。但是，决不可冲击和占领他们的办公地

点。”

9月5日，周恩来、陈伯达再次接见福建“革造会”负责人。

周恩来说：“同志啊！同志啊！你们眼光太短了，什么矛盾很大，哪里有与蒋介石矛盾大？蒋介石打过来你们连自己家乡也保不住，还能够安心这样搞文化大革命？！现在矛盾的主要方面在‘革造会’！不在军区，知道吗？

武汉出了个陈再道，全国就到处揪陈再道，这是对我们伟大军队的污蔑！‘革造会’要听中央的话，要拥护那个《八条》。

你们要顾全大局，不要动摇军队，不要自毁长城，现在已经到了不能容忍的时候了，今天毛主席批发了《九五命令》，说今后再夺枪就是反革命行动了。”

陈伯达说：“韩先楚是前线指挥官，你们以后会晓得，打倒他是不对的，回去要做好工作，要与韩先楚同志合作。‘打倒韩先楚’是政治上犯错误”。

会后周恩来、陈伯达又接见了福建绍安代表。临走时，对绍安代表说：“你们回去后不要搞分裂，要坚持大联合大批判！”当天，根据中央军委的命令，解放军进驻绍安，解决那里的武斗问题。

## 第 870 回：第三次，接见安徽代表团　逐条念，江青讲《九五命令》

9月5日晚21时10分到24时35分，康生、李富春、江青、李天佑、姚文元、曹轶欧等中央首长第三次接见安徽双方代表团。

康生说："同志们，现在开会了。大会是第二次会议了。这几天同志们做了不少工作，我看大家都愿意向毛主席路线方向前进，看起来你们几天工作还是有成绩的，但是问题还存在一些。武斗比过去好像少一些，抢枪这个做法还存在。

特别感觉到有益的好的地方就是合肥的'好派'，拟了个电报稿，指出'好派'的梁守富和曹在凤同志对解放军12军的态度是错误的。合肥的'好派'代表打一个电话表示支持12军，坚决的贯彻执行中央关于拥军爱民的指示，表示对6408部队，就是12军，绝对要相信，表示6408部队是党中央毛主席派去的支左部队，表示对6408部队的态度就是对党中央毛主席的态度，应当大事小事都向6408部队请示汇报。这一条很好嘛！

还有一条，曹在凤同志、梁守富同志对6408部队的态度是极端错误的，应当向6408部队赔礼道歉，应当向党中央毛主席检讨，向广大群众公开检讨。下面一共七条电话稿，这个电话稿我觉得很好，这是我们会议的进步，不知这个电话打了没打？"

合肥"好派"代表答："打了。"

接着，江青讲话。她说："我来的很仓促，也不知怎么回事康老把我拉来了，我讲几句话，也没有准备，讲对了供同志们参

考，讲错了的，同志们批评，炮轰我也可以，火烧我也可以，都可以。”

她首先讲了形势，然后说：“就拿你们安徽来看吧，也不同了，旧的以李葆华为首的一小撮被揪出来了，甚至连刘秀山那样的坏人，还有程什么？是叛徒。”

合肥代表答：“程明远。”

“噢，程明远，不也暴露出来了！”

代表们长时间欢呼：“毛主席万岁！”

江青说：“中央在一个省、一个省，一个市、一个市的来解决。”“安徽省现在请同志们来解决问题。”“不管怎么样，不管吵过嘴、武斗过、打过架，现在都能坐在桌子上来谈了，是不是也是一个好的形势呢？”

“好派”代表答：“是！”

江青：“大好形势！”

“好派”热烈鼓掌。

江青面向“屁派”问：“你们那里很多同志怎么不叫啊？怎么了，现在是不是一个好的形势？”

“屁派”代表答：“是的。”

江青接着说：“从历史上看，从去年到今年有这么大的变化，对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大批判，现在逐渐在全国展开。在各个战线上要向他开火，要批倒、批臭、批深、批透。要做到这一点，这个问题我曾经在每一个场合，要家喻户晓，要把

他搞臭，臭的比当年苏联的托洛茨基还要臭，那样中国就可以不变颜色了。因为他执政很长的时间呀！两面派有一整套的干部路线保证他的错误路线，我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毛主席一声令下，小将们就上阵就把这些家伙统统的搞出来了。当然同志们会说，江青同志说的容易，我们在那斗的可厉害了。同志们，我们也斗的很厉害，只是没有武斗就是了，不过我声明，如果谁要和我武斗，我一定要自卫，要还击。”

下面又呼口号：“向江青同志学习！”“向江青同志致敬！”

江青：“向同志们致敬！向同志们学习！”

她接着说：“同志们，我不是提倡武斗，我是坚决反对武斗的，我是坚决响应毛主席要文斗不要武斗的，我说的是当阶级敌人向我们进攻的时候，我们手无寸铁怎么行呢？我是指那样的情况，而现在不需要武斗，武斗总是要伤害人的，总是要破坏国家财产的，为什么要做败家子？我们为什么要死人呢？为什么要破坏国家财产呢？我说是这样的文攻武卫，不要抽掉了它的阶级内容，不要离开它的特定环境和条件，你们回去双方搞起武斗来，戴起柳条帽来，拿起长矛来就不好了。”

康生插说：“不单是长矛，现在是机关枪了。”

江青又提到“516”：“他人数不多，这个表面上他是年青人，青年人我看是上当的，少数是资产阶级的分子，对我们有刻骨仇恨的，多数是青年，他利用了青年人思想上的不稳定。而真正的幕后人是很坏的人，你们安徽也有，就反对中央嘛，《九条》、

《五条》下去都反对嘛！拒不执行嘛！如果按《九条》好好的办下去，就不至于现在又反复，有反复了。但反复也好嘛！可以嘛！你们多来一次嘛！‘516’是以极左面目出现的，它集中目标反对总理，实际上我们每个人的黑材料他们都整了，什么时候都可以往外抛的，切不可以上当。”

康生问：“你们安徽有没有派人搜集中央文革的材料？”

“好派”答：“有，刘秀山，他收集攻击周总理的材料。”

康生：“我说一句话，公平话，你们‘好派’也有人来搜集材料的，不要只说‘屁派’，刘秀山派人搜集材料，‘好派’梁守富也来北京搜集材料。”

江青：“但我们不怕，心里没有鬼，怕什么，你们去搜吧，吃饱饭没有事干，不干革命干这个，我是不怕，他们过去就整过我的黑材料，有一个专案在上海去搜集材料，去拿来，我也没有过问，过去一大箱。最近我们发现现在有的地方成立特档，特别档案。这也都是以小的手法，见不得人的。”

姚文元：“这是小丑。”

江青：“是小丑。”

江青说：“516”的攻击矛头就是“指向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指向伟大的人民解放军，指向新生的革命委员会”，后来，就把江青的这段话概括成“五一六反革命集团”的特征——“三指向”。

接下来，江青又提到对军队的态度，她再次批判了“抓军内

一小撮”的口号，批评武汉造反派串联，到处跑。她问：“有人对6408很不欢迎吗？”

康生插话：“在合肥、在淮南都有些问题，一开始‘好派’冲了34师的师部大楼，不知道你们知道不知道。合肥的问题你们知道了，你们采取这个态度，批评了你们曹在凤、梁守富，他们这样做是极端错误的，这是不对的，淮南这方面……”

淮南“好派”代表说明了情况，康生说：“不管怎样，冲了野战军是不对的。”

江青：“把野战军冲了可不好，不能开个头。我们的野战军是好的，军队是好的。你想广大的指战员出身都是贫下中农、工人，坚决执行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以前不介入吗，后来介入他不摸底，介入以后犯错误是难免的，不信你们试试看，换个位置试试看，你们犯不犯错误？

我说的是犯一般的错误，不是犯路线的错误，这是原则问题。对军队不能这样，有的夺枪，他们不能开枪，有的战士哭，因为都是革命群众，枪被抢走了。在国防前线，现在下一道死命令，中央已经通过。我要是警卫战士，谁要是夺我的枪，我一定开枪，当然开枪是不对，我要开枪，我是警卫战士，我知道你是好人还是坏人？全国范围夺民兵的枪，大部份是保守派，不是夺是缴械。”

这时，双方代表又争执吵起来。

江青：“你们多作自我批评，不是就不吵架了吗？”“你们

现在有的时候连朋友都吵起来，自己阵营也吵起来，打的一塌糊涂。”“现在中央通过了一个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不准抢夺人民解放军武器装备和各种物资的命令》。”

接着，江青开始念《九五命令》。当念到“人民解放军和所拥有的各种武器、装备和物资，是不能侵犯”时，江青问：“同志们，听懂了吧？”

众答：“听懂了。”

江青：“我重复一遍，‘人民解放军和所拥有的各种武器、装备和物资，是不能侵犯的。’再重复一遍，‘人民解放军的指挥机关，是不允许外部的人进驻的。’你想，把作战系统给打乱了，一旦有情况怎么办呢？”

当念到：“各革命群众组织一定要正确理解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大民主”时，江青说：“在这个问题上我说一两句，现在世界上有没有我们这样的大民主？”

众答：“没有！”

江青：“你们想轰哪个就到外面贴大字报、大标语，世界历史上也没有。总而言之这是最大的民主，也只有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才有的。”

“你们知道发生什么事情没有？我们援助越南的物资被抢了，炮弹啊！”

“那是打美帝国主义的，接不上气了，没有了炮弹。后来我

们下了一个死命令，管你是什么派，立刻交出，不交就缴械，他们吓坏了，都送回去了。这真生气嘛！还抢了外国的船。北京出现这样怪事，跑到外国使馆里去闹，英国代办处烧了，你们知道吧？”

众答：“知道了。”

江青：“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反动派是肯定的，你们坐外头嘛，如果不是使馆内部，他们做任何违反我们国家的法律的，你们都可以有权斗他，并扭送。但是不要闯到使馆去，不要跑到外国轮船上去。尽出现这些怪事，这些，好人是幼稚，坏人是有意地破坏国家的荣誉。”

康生：“还有人抢外国的轮船，还有人带着枪到塞浦路斯船上去，被缴了枪，还去避难，这是耻辱，是投降！”

江青：“这是当汉奸！”

念完《九五命令》，众人热烈鼓掌，呼口号。

江青：“好！我看大家都拥护这个命令。我就讲这些，咱们都照办。”

合肥两派，经12军严肃公正地处理了几起事件后，已有罢手武斗的愿望。现在又听到江青亲自宣布的《九五命令》，代表团双方连夜打电话，把康生、江青、姚文元的讲话传到合肥，全城沸腾，群情激昂，人们奔走相告，无不欢欣鼓舞，长江路灯火辉煌，鞭炮齐鸣，表示庆贺。

“屁派”的“红革会”，“八二七革联站”等组织闻讯后，

立即开会，提出打倒操纵“屁派”的黑手，把他们揪出来示众。6日上午，把这些人送交人民解放军驻皖部队看管。“七七风暴”发表声明，说不再受他们蒙蔽，不搞武斗。在京的“屁派”代表表示，要坚决斩断操纵他们组织中的黑手，揭露其罪恶活动，与其划清界限。“屁派”代表李文焕说：“我们原来把xxx视为最好的干部，受了骗，上了当。”“好派”也将他们认为的背后操纵者送交军管会看管；将两个头头调离领导工作岗位，让他们检查交待。

军管会立即抓住这个时机大造舆论。迅速将《九五命令》翻印张贴。部队和群众组织都出动宣传车，从早到晚流动广播。部队派出大批收缴武器分队，深入到群众组织各据点，动员他们交出武器。这次效果非常好，两天时间，共收缴各种枪支近 3 万支，火炮 290 门，各种车辆 51 台，以及大量弹药和凶器。通过这次缴枪行动，两派群众还自行揭发了操纵武斗的坏头头，将他们扭送到军管会看守起来。

收交武器以后，两派对立情绪急骤下降，联合、团结的气氛越来越浓。安徽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两派于 9 月 6 日达成协议，并联合开诊。文工团、杂技团两派联合排练节目，准备到街头宣传。并说：“这是合肥分成两大派以来，第一次在一起排演节目。”9 月 8 日下午“屁派”约 5 万人举行庆祝中央首长“九·五”讲话的大会，会后游行时，沿途观看的人空前增多，有的“好派”群众放鞭炮表示欢迎，“屁派”群众纷纷反映说：“今天游行欢

迎的人多了，骂我们的人少了。”合肥街头出现了“‘G’，‘P’两派团结起来共同对敌”的大字标语。

“G”就是“好派”，“P”就是“屁派”。

合肥两派达成协议，拟于9月10日联合召开20万人的拥军爱民大会。

## 第 871 回：敢卧轨，十二军稳定安徽　“小延安”，文斗喇叭声震天

就在中央领导第三次接见安徽代表，江青亲自宣读中央《九五命令》的当天，9 月 5 日，安徽淮南“红卫军”与“总司”双方在淮南展开了一场“九.五”大战，投入兵力约 2000 人。

这天，淮南“红卫军”从水家湖开火车头作掩护，向淮南九龙岗进攻，“总司”固守。双方伤亡都很大，据说“红卫军”的机枪火力很猛，但“总司”方迫击炮很准，在八公山化工二厂有一个三线迫击炮弹厂，炮弹很充足，给“红卫军”较大杀伤，最终形成相持局面。

9 月 6 日清晨 5 时许，占据水家湖的“炮轰派”，集中了几乎全部人员，约 2 千人，乘坐水张线列车，沿着铁路线打枪鸣炮、浩浩荡荡地朝淮南杀了过来。前锋是“炮轰派”的 500 名精锐乘 10 节闷罐车，由水家湖火车站到达大柿园火车站，下车展开战斗队形，攻击前进！

“支持派”的前哨据点九龙岗火车站和九龙岗石料厂在清晨 5 时 20 分左右向总部发出警报求援。“支持派”总部反应迅速，陆续从市区调来精兵强将和武器投入战斗！“猴子兵”冲锋在前，以 6 挺机枪和一门 82 迫击炮的火力为依托，由九龙岗火车站攻击前进！

清晨 7 时许，双方在大柿园车站附近，各自抢占了攻守有利的地形，摆开了决战的态势。就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进驻淮南

的 12 军 34 师约 100 人，手挥《毛主席语录》，肩扛巨幅毛泽东画像，口喊毛泽东的最新指示，冒着两派交战的枪炮火力网，毅然穿插到两派决战阵地之间的开阔地带，以肉体作为隔离带，阻止双方的武斗。

原来 12 军军长李德生得到淮南武斗的报告后，立即召开会议，研究既不伤人，又能制止双方武斗的办法。大家左思右想，没有好的办法。最后，还是李德生决定："最重要的是，坚决制止武斗队离开淮南，决不能把武斗的风潮闹到外地。我看，必要时，组织部队坐在火车轨道上，阻止火车开出。"

有人担心，这样做不是"卧轨"吗?李德生说："说是'卧轨'也可以。他们采取蛮办法，我们也要有一股子狠劲，显示我们制止武斗的决心，他们是狠不过我们的！第一，他们不会得到群众支持，心里会发虚；第二，他们总是想得到解放军的支持，事情不敢做绝。"

果然，解放军徒手进入武斗双方之间，来到铁轨上，让双方迟疑了！清晨 8 时许，"炮轰派"的机枪突然响了！解放军迅速就地卧倒，"炮轰派"上千人马高声呐喊着向前冲了过来！"支持派"6 挺机枪因为顾忌隔离带的解放军未敢开火！"猴子兵"眼看就要被对方的钢叉搠倒，千钧一发之时，"支持派"的那门 82 炮挽救了危局！一声炮响，"炮轰派"潮水般退了下去。

解放军见局面已经无法控制，迅速撤离！"支持派"、"炮轰派"便枪炮大作的干了起来！附近群众都站的远远的看热闹，

看着造反派们怎样冲锋陷阵，怎样杀人，或是怎样悲壮地被对方打死。战斗在 9 时许进入高潮，“支持派”把预备队——“天一袜厂”的女兵投入了战斗！人们个个眼见稀奇！10 时许，“炮轰派”开始依托有利地形逐步撤退了！“支持派”乘胜追击。期间，后方，炊事班卡车触雷被炸，扫了大家的兴。中午以后，“支持派”成功的把“炮轰派”赶回了水家湖老窝！由于此时那门 82 炮被解放军缴了，大家又渴又饿，“支持派”的斗士便陆续返回了淮南。至此战斗以“支持派”的全胜告终！

这次武斗双方共计约 4000 人投入战斗，原以为会有多么空前的惨烈，会有多大的伤亡，最后共计死亡 20 余人，受伤 100 余人。

淮南的人民早已对武斗厌愤已久。在中央领导第三次接见安徽代表之后，乘着毛泽东的最新指示以及 12 军来淮支左的强劲东风，一种捐弃前嫌，进行两派大联合的高潮强劲地涌来。“9、6”事件平息不到两个星期，淮南“红司”就敲锣打鼓、排队来到“搬司”，欢迎他们返淮闹革命，并送去了许多宣传用具，以填补返淮后笔墨纸砚等宣传用品的紧缺。双方头头共话运动初期的那些并肩战斗风雨同舟的经历，找到了共识的话题。

淮南市的形势得到控制后，34 师领导干部、机关干部带着部队下到煤矿掌子面，和煤矿工人一起，展开夺煤大战。在夺煤大战中，战士汪福林为了抢救一名矿工，不幸牺牲。部队边支援恢复生产，边做宣传工作。在较短时间内，工人群众里面的积极

分子发动起来了，生产迅速得到恢复。淮南局面有了明显改观。

与淮南卧轨相似的还有 12 军 35 师在屯溪的“卧路”。当时造反派开着汽车，沿着公路去武斗，35 师运用军部介绍的淮南经验，同样组织部队高喊口号，整队坐在公路上，阻止汽车开动。武斗队员不敢贸然开车强行通过，又不甘心就此作罢，三三两两下得车来，跑在战士耳边放枪，企图把战士们吓跑。不料战士们毫不惧怕，不为所动，这一手不灵。武斗人员恼羞成怒，又动手打战士，战士们无一人还手，依然坐在公路上。这时，有许多群众围上来看，在众多愤怒群众面前，武斗人员不敢耍蛮，只好把武斗车辆掉转头开回去了。

李德生率12军进驻安徽，仅仅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就制止了武斗，稳定了安徽的混乱局势。中央对12军进驻安徽后的工作成绩十分满意。9月12日，康生接见安徽支左部队有关人员时说：“中央负责同志9月5日接见安徽代表时江青同志的讲话录音，现已决定在全国播放，并要把合肥的动态介绍到全国去。合肥市听到了江青的讲话，当晚两点就轰动起来了，合肥前一个时期武斗很厉害，今后亦可能为大联合做出模范，要求安徽做出全国大联合的模范。”

新华社《国内动态》登载了 12 军在安徽制止武斗、收缴武器的情况，毛泽东看到这份《动态》后，于 9 月 13 日亲自批转全国，号召全国向安徽学习。

9月5日，在山西省革委会西门对面的太原第十中学，发生了

当时著名的“九五事件”。

山西省革委会办公机关，又名督军府遗址，坐落在解放路以东，府东街口。这是自金代以来的王府圣地。清末，在武昌起义29天后，山西辛亥革命爆发。同盟会会员阎锡山顺应革命形势，参与义军一举攻占清王朝太原省府，后被推举为山西都督。1925年孙中山北上途经太原，对阎锡山高度赞赏。袁世凯当民国大总统后，阎锡山经过周旋，又被袁世凯任命为山西都督。当时所在的办公地点，就在这里。至今正南门内，竖着一块省博物馆立的“督军府”的石碑。阎锡山自辛亥革命当政以来，除日伪沦陷时期的8年外，30年统治山西期间大都在此办公。1949年4月太原解放后，这里又成为共产党山西省委和省人委的办公机关。1967年山西“112夺权”后，新政权——中共山西核心小组、省革委会自然也设在这里。

省革委会西门对面就是太原第十中学，与省革委所在的大院仅一街之隔，教学大楼与省府内的梅山遥遥相望，也就几百米的样子。

十中是太原市干部子女最集中的三个学校之一，省委第一书记卫恒、省长王谦的孩子都在十中上学。而且，十中的高中是省城少数招收外县学生的中学之一，由于对外县的学生中考的成绩要求很高，这些学生虽然有些“土”，但绝大部分却是各地区的尖子生，脑筋灵活不说，也不乏舞文弄墨之才。十中的初中也招收附近学区许多来自各行各业市民的子女，也把下层的思想带进

了学校。

文革中，几经争斗，学校中的“七一战斗队”已成为校内多数派，并在夺权后成立的校革委会掌权执政，受到进校“支左”解放军的支持。“七一”属“红联站”，参加了生擒杨成效的行动。山西党校“东方红”被“决死纵队”砸了后，十中又成为“红联站”的总部所在地。

北京“七月会议”后，杨成效的十三冶“决死纵队”等工人组织，经常对“红联站”下属组织进行砸抄，平均每天发生一次。工人被赶出了工厂，学生被赶出校门……这些被打垮、打散的部分群众，纷纷转移到“红联站”少数几个由多数派掌权、已经堡垒化的学校据点，十中就是其中较著名的一个。

此时的十中也已经堡垒化了，大楼的东楼梯上，砌了足有一米宽的墙，西楼梯上，焊上一块厚厚的钢板，留了一个观察孔，还有一个铁门供进出。武器呢？除了砖头、钢筋条，还有山西大学武斗中，“88”派使用过的那种溴水。楼门口、楼梯入口处，都用砖和钢筋混凝土砌起来，只留一道小铁门。没有“七一”总部发的特别通行证，谁也无法进入。

当时，从各个学校来的学生加上十中坚守大楼的“七一”小将们，共有 400 余人。“红联站”的工人中，也有人来到这里，发誓要与“红联站”的学生们“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

架在十中楼顶的大喇叭，不分白天黑夜，广播着“红联站”誓死捍卫毛主席的口号和文章，揭露的却是刘格平和杨成效在

“七月会议”后，违背“七月会议”精神的言行。当然，对这些言行的看法要站在各自的立场上去看了。

十中大楼里，“红联站”的女播音员的声音充满了革命义愤，却委实如百灵鸟鸣叫一般动听。她历数“七月会议”后，刘格平和杨成效的种种罪行，向全社会表明，似乎只有“红联站”最听毛主席的话，最听党中央和中央文革小组的话，坚决贯彻“七月会议”精神。而违背“七月会议”精神的则是刘格平和“红总站”这伙人。

有个工人在十中校门上贴了一副对联：

想当年延安圣地造就革命人

看如今十中七一红色根据地

横批为：小延安。

“小延安”的说法，反映了十中在太原市“红联站”的地位。不仅各校一些“红联站”下属学生组织聚拢在这里，一些在文革运动中因出身不好受到单位和街道的白眼，或因父母亲成了“走资派”，在家中备受压抑的青年，也聚拢到这里，看大字报，畅所欲言，发表自己对省城文革的看法。素有同情弱者传统的很多市民也经常聚拢到这里，发表同情“红联站”的言论。这些被人们称为“马路兵团”的人，也形成了一股社会势力。7 月 23 日和 9 月 2 日，“马路兵团”曾两次配合十中“七一”学生，用砖头和石块打退前来围攻的“决死纵队”。

8 月份，在省革委门口，发生了“马路兵团”围观、踢打刘

格平汽车的事情，还发生一次刘格平下汽车时，突然响起“叭”的一声，疑似枪响。于是对马路对面十中的存在深感威胁。

8 月 28 日，刘格平和“红联站”座谈时说：“有人说，十中‘七一’怎么样需要调查，我的汽车被弹弓打了一下，这就不需要再调查了。这样很危险，十中据说还有枪，修了工事，李一夫、刘贯一也跑到那里去了，成了大本营。”

这时有人说：“我说几句……”他是想解释说，此时刘贯一已被省革委抓起来了，怎们会跑到十中去呢？

刘格平打断了他的话：“我不让你说！……究竟以后还会出现什么问题，我就不啰嗦了，据说文件也在那里，为什么要打我的汽车？警告我嘛。还要发生什么事，很难说，群众很气愤。”

他还讲：“听说（红联站）搞了个全国革命大联合（即全联站），如果真是那样，那好么。如果联合左派是联合，联合武汉‘百万雄师’、西南‘产业军’、河南的‘公安公社’、北京‘联动’，那性质就变了……”

9 月 4 日，刘格平在人民公园礼堂讲话时说：“‘红联站’这杆黑棋，过去在‘党校东方红’上空升起，这杆黑旗现在倒下了，又在十中‘七一’的上空升起。十中‘七一’楼顶上挂的旗是山西党的党旗，是刘少奇的山西党。现在邢晓光是打着大黑旗，段立生打着的是小黑旗。”

十中大楼里的高音喇叭，早就让杨成效忍不下去，他在刘格平召开的一次会上，当着众人的面，恶恨恨地骂道：“十中那个

播音员小女B，他妈的！老子只要有个机会，非踏平这个十中不可！”

9 月 4 日晚 22 时，山西“红总站”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立即行动，摧毁“红联站”总勤务站，捣毁十中“七一”。

这天深夜，一支戴着“山西省革命工人造反新总部”袖章的工人武斗队，头戴柳条安全帽，手提铁矛，于 9 月 5 日凌晨 2 时过后，从十中旁的宿舍区，悄悄潜入了十中校院内的学生饭堂，在厨房找到油和馒头、挂面，又找到些熟食，开始油炸馒头和挂面，边吃边待命。

凌晨 4 时左右，十中“七一”的田仿余，王志青等同学在校内巡查，发现饭堂里有近百人，立即返回“七一大楼”报告。他们马上组成小分队，携带长矛，在清华大学学生邢晓光带领下，悄悄地地从主席台后面小门潜入，突然冲了进去，正在吃东西的“山西省革命工人造反新总部”一群人一时间目瞪口呆，当被打时，才转过神来，开始反击。“七一”小分队自东向西一路冲杀而去，迅速从西门撤出，抓获了对方 6 人。“山西省革命工人造反新总部”不敢久留，纷纷跑出十中，将一辆汽车丢弃在那里。

4 日夜，“红联站”财院“东方红”和冶校“东方红”也受到“红总站”和“决死纵队”的攻打。5 日清晨，“红联站”总勤务站工作人员来到省革委要求见刘格平，请他制止事态继续发展，被告知：“刘政委在睡觉，不能见。”

9 月 5 日上午 10 时，“红联站”在十中召开制止武斗大会，

主席台设在十中“七一大楼”三楼楼顶东侧，会场就是省革委和太原十中之间的大马路。会议开始，首先由十中初 79 班张径同学声讨“红总站”半夜偷袭他们的行动，还让一名“俘虏”当众对着麦克风反戈一击，向满大街的“马路兵团”交代他们是奉命里应外合，消灭“红联站”的。随后，“红联站”又当众释放了这 6 名“俘虏”，此举再次换来了“马路兵团”的阵阵掌声。

大会议不到一个小时就结束，正当要宣布散会时，“红总站”有人递来纸条，说“红总站”已经通知各饭店、食堂准备馒头和饼子，晚上攻打十中“七一”用。这一消息立即在大会上公布。

会散了，但是人群并没有散去，反而越聚越多。

当天，“太工红旗”张玉峰打电话通知“红联站”各校组织，动员各校人员到十中，保卫十中“七一”。“红联站”的人纷纷来到十中，约 400 余人。

下午 17 时后，一辆辆十轮卡车载着带着柳条帽、手持铁矛的“决死纵队”工人，沿着解放路陆续朝十中方向开来。

很多群众纷纷围拢在省革委会的西门前，激愤地议论着。

十中所在地解放路并不太宽，无数的大卡车载着无数的勇士们，在解放路上挤成了一团。还有前来看热闹的老百姓，那一天的十中周围，可谓是人山人海。有两辆大卡车，都满载着戴柳条帽的工人，在错车时挤在了一起，将一位来不及上车的“柳条帽”挤在了两辆大卡车的中间。只听一声惨叫，那个“柳条帽”被撕成了两截，冒着热气的鲜血，顿时染红了路面和车厢板下的轮胎。

杨成效还未发起总攻，自己的武斗队倒先死了人，马路上更乱了。“马路兵团”的老百姓也纷纷向路边拥去，自发地喊着：

“要文斗不要武斗！”

这时，十中“红联站”据点里的大喇叭又响起来了，声讨刘格平和杨成效。

晚 21 时许，一辆牌号为甲 5-83-33 号黑色轿车从省革委西门缓缓驶出，驶入被挤得水泄不通的“马路兵团”人群中。人们不让通过，让其掉头返回省革委大院。

有人说：“这是刘格平的轿车！”于是，一些群众冲上前大声问道：“十中‘七一’眼看要被砸，刘格平到底管不管？”

车上的人说：“我们是回来取材料的，其他事不管。”

有人说是武斗指挥车，提出要把车推翻。

就在此时，十中楼上的高音喇叭响了起来高声呼吁：“革命的同志们，请注意，请大家爱护国家财产！……”

这时，有十几个航空学校空字 025“总部”的人来到小车跟前，从车内拿走一包材料。

没多久，省政府内“山西省革命干部东风兵团”的“全无敌广播台”高音喇叭突然响起来，说：“刘格平同志的家被抄，机密材料被抢，汽车被砸，司机和秘书被打……呼吁各革命组织和解放军，用鲜血和生命保卫红色政权，保卫刘格平同志……”

## 第 872 回：九月五，通令“红联站”暴乱　督军府，孟玲玲血溅十中

9 月 5 日晚，刘格平由迎泽宾馆匆匆赶回省革委，连夜召集省革委常委会，说：“‘红联站’砸了我的汽车，抢走我的机密文件，打了我的秘书，他们要干什么，这还不清楚吗？”

22 时过后，手持长矛的武装人员陆续往省革委及太原十中周围集结。

十中“七一”负责人马尚文下楼，混到人群中，在府西街东口一修自行车铺门前，看到满载着武斗队员的汽车一辆接着一辆的进入省革委的南门，武斗气氛甚浓。在返回学校时，他先到十中跟前同学王克利家，对王克利的妈妈讲了他看见的情况。王克利的妈妈说当晚攻打十中是肯定的，她严肃地对马尚文说：

“太危险了，你就在我家呆着，哪也不要去！”

马尚文说：“我下楼是看‘决死纵队’的动向，顺便来看看。楼上只有王忠强，如果我不上去，以后会让我们的同学、社会上的人用唾沫把我淹死。既然是死，我会毅然选择光荣地死在七一大楼。”

王忠强是十中“七一”的另一负责人。

文革结束后，马尚文回忆他当时的心情说：“说实话，我也害怕。听说刘格平将上兰村解放军后勤部队和省体校射击队射手调来，就是让枪杀我们。开枪不是放炮；子弹不是只能打死别人而对我客气；别人长一个脑袋而我也没有两个，我也怕死！先烈

杨世宁所说‘革命不怕死，怕死不革命’，我做不到，说实话，我做不到！我觉得革命也怕死，怕死还革命。我之所以这样强硬地讲给老人听，是怕她老人家拉我的后腿。”

本来，王克利的妈妈还有好多话要说，但是看见马尚文那么“坚强”，那么“勇敢”，那么“不屈不挠”，只好把他送出二道门，嘴里不停地嘱咐说：

“要小心，千万要小心！”

那种场景，就像是永别。

马尚文人在点头，心在流泪。他回到十中，上了楼顶，看到学校周围都是持长矛的武斗人员。没多久，那些人就把解放路的“马路兵团”驱赶走了。

23 时，太原十中已被包围。

24 时，从省革委内梅山上打出 3 枪，打碎了路灯，紧接着又打出红、绿、蓝三发信号弹。

接着，持长矛的工人很快进入了人民市场、三桥街小学和省政府 292 号宿舍院，然后从那里逐渐往十中靠近。十中大楼内的坚守人员在长条板凳的两腿上拴上又宽又厚的橡皮，做成大弹弓，向攻打他们的人弹射砖头。

十中突然断电，“七一大楼”漆黑一团，“七一广播”哑然无声。十中的同学赶紧起动了发电机，“七一广播”又开始向全市报告情况。

进攻方顶着桌子又开始了进攻，终于进了楼，然后用炸药在

东楼楼道炸开脸盆大小的一个洞。

十中“七一广播台”拉响警报，同时将事先准备好的溴水瓶扔下去。溴水剂雾气腾起，当场就有几个工人熏倒在地，被抬了出去。豁口的工人见此情景，不敢再往上冲，又转向西楼梯。

西楼梯没有设置观察孔，单砖墙，太薄，被炸塌。工人们拿着长矛冲了上来。紧急时刻，太原重机学院的董常美老师赶紧用消防水龙头喷射进攻的工人，同时大声喊：

“同学们把课桌、凳子、棉被统统扔下去！”

课桌，凳子，棉被很快堵住了楼梯。进攻方怕防守方点火，不停地往上边浇水。至天明，还是没有攻上楼去。

6日凌晨2时，省委大院内的“全无敌广播台”广播省革委的《九条命令》：

山西省革命委员会对“红联站”十中“七一”一小撮坏头头的命令

一、立即交出武器。

二、武斗是“红联站”单方面挑起的，无故抓的４０多名工人，要绝对保证人身安全，立即放出。

三、抢的文件全部交回（两次冲军区抢走的材料在内）

四、交出肇事的指挥和策划者

五、今后不许再冲击革命委员会，要害机关和军队，不准抢窃文件，拦砸车辆。

六、全部撤出工事，全部下来，立即进行检查，交军队听候

处理。

七、不准向革命组织和革命委员会开枪射击。

八、必须公开发表声明，承认这次事件是反革命暴乱事件。

九、现场不得破坏，罪证不得毁灭。

山西省革命委员会

一九六七年九月六日

接着又广播中央文革李桂林来电，也是说十中冲击省革委，搞反革命暴乱。不仅是这些，还有“七月会议纪要”，“最高指示”，等等。

十中继续坚持！“七一广播台”只是一遍遍地播放毛主席诗词《西江月.井冈山》歌曲：

山下旌旗在望，山头鼓角相闻。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

早已森严壁垒，更加众志成城。黄洋界上炮声隆，报道敌军宵遁。

凌晨4时左右，刘格平通过“东风兵团”广播车对十中“红联站”的学生们提出了三点要求：

1、派5至10名代表到革委会来由我（刘格平）接见你们。

2、由军区和69军部队负责保护你们代表的人身安全。

3、如果你们同意，即用广播回答。

“红联站”听到刘格平的三条后，经研究，用广播回复了四项要求：

1、要求群众派代表参加接见。

2、要求“兵团”参加接见。

3、参加包围的武斗人员必须立即撤走。

4、刘格平必须明确表态，（红联站）究竟围攻你没有？冲省革委没有？然后我们才考虑派代表与否。

“东风兵团”负责人黄锐庵亲自在的宣传车上向十中大楼喊话，而且，“兵团”二把手宋捷也开始喊话了：

“‘红联站’一小撮混蛋们听着，我正告你们：不许你们挑拨我们‘兵团’与‘红总站’的关系！我们‘兵团’全体战士一如既往地与‘红总站’团结、战斗、胜利在一起。你们老老实实地下楼投降是唯一的出路，如果你们执迷不悟，继续负隅顽抗，只有死路一条……”

十中“七一广播台”播放《国际歌》。

“兵团”的不少下属组织也派来了武斗队。但是“兵团”头头刘灏暗地里派出“兵团”司令部的人，偷偷到现场和各个路口，暗中通知“兵团”下属的人马，快快撤兵。一些奉命前来参战的“兵团”下属组织，原本就是“红联站”的下属组织，接到刘“司令”的密令，竟扛着“兵团”的大旗，悄悄掉头走了。太原重机厂查司令麾下的那些武斗队，有的也临阵掉转了车头，撤出现场。马路两旁围观的群众，开始为这些撤退的大卡车鼓掌。

这天夜里，太原许多人在侧耳屏息倾听着来自十中大楼的呼声，抬头望着十中楼顶的红旗还在不在。

清早，前来看热闹的群众，在解放路口被手持铁矛、佩带袖标的工人挡住。不少上班的市民群众也被阻拦在这里。围观的群众密密麻麻，周围的房顶都站满观战的人群。

清晨，“决死纵队”开始向十中大楼发动了攻击。他们也用铁支架做成巨型弹弓，从对面街道和省革委办公大楼的阳台上，向十中大楼弹射石块。没多久，十中大部窗户上玻璃打碎，不少窗户框也打烂了。

6 时整，冲锋号响起。接着，在十中教学大楼东面省革委车库房顶上的阳台上，以及南面的省革委宿舍楼顶阳台上，都有一些披着雨衣的持枪人，不时朝十中大楼上的喇叭和窗户内的学生射击。

躲在十中四楼西北角的学生孟玲玲看见梅山附近的一座人字形的楼顶上，有一个穿黄衣服戴黄帽子的人向他们开枪。孟玲玲对在一起的同学说：“那个楼顶上的人向咱们开枪！”就在这时，那边又朝他们这里打了两枪，蹲在墙角的孟玲玲赶紧说：“快趴下，又瞄准了！”就在这时，又听到一声枪响，孟玲玲突然趴在地上，她的右额一个弹洞，血忽忽的流了出来。同学们大惊失色，赶紧把她抬到三楼抢救，不到 20 分钟就死了。

十中“七一”赶紧命令在大楼阳台上的人员全部撤到楼里，他们在高音喇叭也发出“强烈抗议”，广播员在悲愤地呼号……

上午 10 时，在十中教学楼南面教室里的太钢“八二二战团”头头李成义被一颗子弹打中胸部，当场殒命。

李成义是太钢运输部工人，时年 35 岁，共产党员，在单位是先进。此时，他已是 5 个孩子的爸爸。8 月 22 日，李成义发起成立了“八二二战团”，亲任团长；不久率团在腥风血雨中加入了学生造反派组织“红联站”。9 月初，他与几个“战团”工友离开家庭，居住到风险莫测十中大楼，决心“与小将们共同战斗”，“死也要死在一起”。关于这段经历，他的妹妹李成兰在后来的回忆文章中写道：

8 月 20 日他对我们说：“我参加了红联站。”我们听了感到很突然，因为 8 月 20 日左右红联站的许多下属组织被砸抢，被反夺权，便问他：“为什么要在红联站处于最低潮的时候加入呢？”他泰然笑着说：“一个真正的革命造反派，总要经过几次艰苦曲折的考验，我们认为红联站是真正的造反派，他们虽然犯了错误，但责任不在他们，况且在中央会议后，小将们认识到错误，已反戈猛击了。我们和他们坚决战斗在一起。”他接着说：“我们要坚决站在刘格平一边，坚决批判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尽量为人民做好事。首先我们和革命小将在一起把堆积在解放路的灰渣清理了，他们去打砸，我们不参与，我相信这样做，好人是不会对我们下毒手的。”

他又说：“我和厂里的军代表谈了，军代表不同意我加入红联站，说这样会妨碍我们掌权。我说，权只要掌在真正的无产阶级手中，我就在所不惜，至于我本人，不为捞半根稻草。文化大革命以后，我还是当我的工人。”

接着，“红联站”五中“红旗”的学生李治安被枪弹打中腹部受伤。十中学生李真英从一个被打坏的窗口往下探了一下头，一颗子弹打过来，击中他的耳朵，鲜血直流。好险，子弹若再偏一点，他就会变成第二个孟玲玲！还有一个学生，被枪弹击中下颚。

子弹又从窗户射进广播室，曾在华北地区中学生普通话比赛中得过奖的十中高 30 班学生李家栋，弓着腰拿着麦克风蹲在窗台下大声广播：

“同志们，革命的战友们，现在我沉痛地向你们宣告：刘格平一伙向我们下毒手了！他们开枪打死我校学生孟玲玲，太钢工人李成义，打伤我校学生李真鹰，太原五中学生李治安，太原绿化队工人…… 叔叔们，阿姨们，谁家没有儿女？！当你的孩子为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被暴徒残忍地枪杀，你是什么心情？…… ”

楼外很多人听到这里，不由得掉下眼泪。街头的群众自发地赶跑了运送武器、粮食的汽车，推翻了前来参加武斗的 025 航校的吉普车。许多人彻夜不眠，打着雨伞站在马路旁，注视着十中大楼。

上午 11 时左右，刘格平从十中的广播中得知守方被打死两人，感到事态严重，如果双方再对峙纠缠下去，后果难料。为了避免引起更加严重的后果，他再次提出与十中谈判，并调来 69 军一个团，在十中教学楼下，由部队指战员手挽手组成一条两人

宽的人墙通道，一直通到不足百米外的省革委会大院中。

在部队广播车的反复宣传下，中午 12 时，十中校园内“红联站”和十中“七一”选派的 12 名谈判代表，先从二层楼的窗口往下扔出棉被，再一个个逐一跳下来，然后在一支解放军小队的引领下，穿越两侧部队搭成的人墙通道，一个个手举《毛主席语录》，高喊着“要文斗，不要武斗”的口号，来到百米外的省革委会 5 号楼二层会议室。刘格平、杨成效、丁磊等人走了进来，刘格平厉声说：“都站起来！”随后又说：“把椅子给他们撤了！”

然后让十中代表们站成一排，接受搜身检查。当从一位代表口袋里搜出一把指甲刀时，刘格平大声说道：

“好大的胆子，汽车里你们没有害死我，现在又跑到这里来准备行凶？！”

少顷，又说：“三点多第一次叫你们来谈判，你们不但不听，我搞了三条，你们就搞了四条，比我还多一条。胆子真不小！”“你们盘踞在十中，聚集了社会上的一批牛鬼蛇神，‘东野’、‘卫东彪’，还有李一夫、刘贯一。听说你们十中有两挺机关枪，许多步枪、手榴弹。”“你们昨天上午又挑动群众冲击省革委，并且砸毁了小汽车，殴打了我的秘书和司机，并且抢走了皮包，里面有军事机密文件。还准备向我行凶，你们还有一点王法没有？！”

十中的代表反驳说：

“李一夫和刘贯一不在楼上。”

“我们没有砸你的小车！”

“当我们发现有人围住小汽车时，‘七一’广播台立即广播，反复广播，要群众爱护国家财产。”

刘格平说： “那是你们挑动群众，那些群众都是你们‘红联站’观点的。小车上被砸了两个洞。你们眼里还有没有我刘格平？还有没有革委会？依我看就得对你们实行专政！”

现场的摄影机在不停移动拍摄位置，有个人站在凳子上自上而下对这些代表拍照，照出来都是低着头的效果，这在后来省革委搞的“9.5 反革命暴乱”展览时，代表们一个个都“低头认罪”的照片由来。

刘格平指着代表中河南“二七公社”的代表说：“你们‘二七公社’是左派组织，你们到这里是反革命。你是河南‘二七公社’的败类、叛徒…… ”

“二七公社”的代表予以反驳。

一位外地学生代表大声说： “……我们支持‘红联站’的抗暴斗争。”

刘格平大怒：“什么抗暴斗争，你们抗的什么暴？抓起来！”

几个人一拥而上，立即将这位学生拖走！

刘格平指着工人陈虎雄道：“你说！”

陈虎雄答：“我是太钢的工人。父亲四清后更是好工人。”

刘格平大声说：“工人怎么的，你出身好，你背叛了你的家庭。已经成了刘、邓司令部的人了！弄了半天，你也是坏蛋，带下去！”

几个人过来，又把陈虎雄带走了。

……

这时，丁磊说："你们这些小反革命，还想搞暴乱！"随即宣布了山西 9 月 5 日发布的一个《九五命令》，称"九五事件"是一起反革命暴乱事件，是"红联站"单方面挑起的，"红联站"应负完全责任，必须公开发表声明，承认错误。要交出肇事的指挥和策划者；立即交武器，交出以前冲击省军区抢走的文件，全部撤出工事，交军队听候处理。今后不许再冲击革命委员会、军区及要害机关，不准抢劫文件，拦砸车辆等。

宣布完《九五命令》，来人将这些代表押走，关在省委组织部四楼，两人一间，门外和楼梯口，均有手持铁矛的工人站岗看管。

当晚，即对这些谈判代表分别进行了审讯，郝廷云在审讯时，反复追问他们，楼里有无枪支，谁是幕后操纵者等等。

十中 12 名代表走后，17 时左右，69 军的几个解放军爬梯子上了十中大楼，劝说守楼的学生下楼，否则，将会有更大的伤亡……

楼里近 400 名学生、工人听从了部队的劝说，下楼了。他们经一天一夜围困，已经滴水未喝，粒米未进，一个个疲惫不堪，当穿过人墙通道，向省革委会七一礼堂缓缓走去时，除抱着毛主席像第一个下楼的 84 班女学生郭爱珍没有挨打外，其他人几乎都不断地受到解放军人墙外"决死"队员拳头或铁矛柄的戳打，有俩人瘫倒，被抬到七一礼堂。

李成义、孟玲玲的尸体放在主席台下，有的人哭了起来。看押的人大喊：

“不许哭！”

医学院的一位学生大喊：“哭！”

顿时，礼堂内哭声一片。

看押人目瞪口呆地站在那里， 一动也动。

随后，围攻十中的工人也全部乘车撤离。他们在撤离时，受到沿途“马路兵团”投掷的砖头石块，当场被砸毁卡车 5 辆，被打伤 30 多人，有 1 人当场被打死，加上夜间调动时，被卡车挤压撞死的 3 人。

在省革委会七一礼堂内的“红联站”总部和十中“七一”的学生被要求登记每个人的姓名和单位，然后将其中“最坏的”9 人与十中 12 位代表关押在一起，北京和外省来的 9 人暂时扣押，请示中央后再作处理。其余人员于当晚和 7 日上午分别押送回家。

7 日，十中“七一”几十名学生在省革委正门前静坐示威，要求刘格平立即释放谈判代表和被关押的学生。

几天后，这 12 名学生谈判代表也被陆续释放。

## 第 873 回：大检阅，兵团反对红总站　“刘未老”，山西戏称刘格平

而在 9 月 6 日，又传出“红联站”负责人段立生冲击 69 军的消息。

8 月底，段立生为躲避“决死纵队”抓捕，跑到临汾同班同学李东海家乡。因惦记太原“红联站”，又于 9 月 4 日下午乘火车返回太原，傍晚时分，与党校“东方红”的张国宇来到十中“七一大楼”。只见楼内人人神色紧张，步履匆匆。 一打听才知道，“决死纵队”要围攻“七一大楼”。段立生决定留下来，但遭到大家的反对。因为“决死纵队”一旦获悉段立生在楼上，攻楼的决心会更大。于是，段立生与党校赵凤田又一齐去了他母亲在市中医研究所的办公室休息。

次日上午，段立生与赵凤田各戴了一顶旧草帽来到距太原十中较近的解放大楼路口，只见这里已人山人海挤满了人。一问才知道，“决死纵队”等组织已将十中团团围住，并在七一礼堂跟前封锁了整个解放路。

下午 15 时，段立生与赵凤田看到十中“七一大楼”上，有人在楼顶摇晃红旗，细细观察一段时间后，楼顶晃动的旗帜好像不是十中“七一”的大旗，而且晃动的旗帜越来越多。他么感觉大楼可能被“决死纵队”攻下了。于是两人怏怏地返回了市中医研究所。过了不长时间，一个留着小平头，上身着一种旧军装的小伙子找到段立生，自我介绍说是五中“红旗队”的李显冬，刚

从十中出来，知道十中的情况，段立生与赵凤田让李显冬赶快将十中的情况尽量详细地写出来，以便到北京向中央文革反映。

9 月 6 日上午 9 时左右，段立生让李显冬带着他整理好的材料，去北京向中央文革汇报。他自己则到坞城路 69 军军部准备向军长谢振华、政委曹中南反映，希望 69 军能主持公道，制止“决死纵队”和“红总站”继续围攻“红联站”下属组织，保证“红联站”头头的人身安全。

没想到，段立生刚在 69 军军部大门口的支左办公室坐下，刘格平爱人丁磊就带着“红总站”头头吴春久，薛玉华等十余人也进了 69 军军部大门，还没等段立生反映过来，他们已经进到支左办公室，一见段立生，马上兴奋起来，说：

“昨天没抓到你，你今天又跑到这儿搞反革命暴乱来了”

并马上招呼一起进来的人说：“快把他抓起来！”

呼啦啦一下上来七八个人抓段立生。段立生一看不妙，站起来就往支左办公室后窗跑去，翻身从窗户跳进通往军部小食堂的后院，沿后院围墙跑了五、六十米，又赶紧翻出围墙，落在围墙外的一片玉米地里。接着向玉米地深处钻了五、六十米后，蹲下来，观察动静。在确定丁磊他们未追来后，才抄小路返回城里。

于是，段立生冲击解放军领导机关又被广为宣传。

9 月 6 日、9 月 9 日，山西省革委会连续发出两份《公告》，称太原“九五事件”山西“红联站”“在美蒋特务、苏修特务、地、富、反、坏、右和走资派的操纵下，……冲击省革命委员会，

向省革命 委员会开枪，拦砸刘格平政委的汽车，……殴打了刘格平政委的秘书、司机和门口警卫，抢去刘格平政委的军用密码电报和机密文件。……动用长矛、大刀，开动汽车碾轧，杀害革命群众五人，重伤二十三人，轻伤四十二人，造成山西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继‘平遥事件’后的又一次反革命暴乱事件。”

而“红联站”则说 9 月 5 日、6 日，7 万“红总站”围攻十中 400 多名学生群众，这是一起“反革命镇压事件”。

两派针锋相对，运用各种宣传工具展开了强大的宣传攻势。

丁磊给 69 军和山西省军区领导打电话说，对“九五事件”表不表态，是看你真支持刘格平还是假支持刘格平的态度问题。随后，山西省军区和 69 军联合发表了《关于太原‘九·五反革命事件’的严正声明》。

几天后，“红联站”和十中“七一”学生们，开始在十中校园旁的街道墙壁上，贴出很多大字报，向路人散发传单。学生中的笔杆子，还把当时报纸上刊登的香港抗暴斗争报道中的“抗暴”一词借用过来，以“九·五抗暴”斗争为题，争取社会舆论的同情和支持。

同时，十中几个学生头头奔赴北京上访告状。

太原的“九五事件”，促成了“兵团”和刘格平及“红总站”的决裂。9 月 6 日，“兵团”司令部召开紧急会议，“兵团”司令刘灏做出了重要决定：9 月 7 日，“兵团”要在五一广场召开大会，主题很明确，就是“要文斗，不要武斗。”内容也很明确，

那就是要揭露“九五事件”的真相。

9 月 6 日，“兵团”在太原的各下属组织，以及相邻地区诸如晋中和忻州的“兵团”下属组织，都先后接到了“兵团”司令部的紧急命令：“凡兵团下属组织，务于明天上午在五一广场接受总部检阅，要全力以赴，全部乘车参加。”

各下属组织接到命令后，组织好能够出动的人数和车辆，便不时地报到了兵团总部，当晚累计，共有 30 余万众，3000 余辆卡车。

派性的力量是强大的。7 日的早晨，太阳正在缓缓地从太原盆地的东山升起，古城太原就变得热闹非凡起来。各工矿企业、机关学校，还有郊区的人民公社，凡有“兵团”下属组织的地方，几乎全都有队伍出动。而外地来的车辆，也车流滚滚涌向太原。所有通往五一广场的各条街道，都可见到一辆一辆的大卡车上边，臂戴“山西革命造反兵团”红袖章的人们，一个个表情严肃，神态骄傲，高举着的“兵团”旗帜迎风飘扬，仿佛去参加一个盛大的节日一般。不少卡车上的“兵团”战士们，头戴柳条帽，自制的长矛铁棍就放在脚下。广场四周全让大卡车给排满了。

刘灏在他司令部众多助手的簇拥下，登上了五一广场的主席台。“山西革命造反兵团”的卡车大游行开始了。卡车一辆接一辆地从主席台前通过。刘司令挥手向他的将士们致意。他的将士们也在向着主席台欢呼。那一刻，刘灏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激动。在这个主席台上批斗卫、王、王时，那是一种战斗，仿佛是向高

地冲击，还无法体会被拥戴的幸福。何况，那时台下黑压压的人群中，还有他的反对派随时准备着冲上台来，让他不得不在战斗中时时提高警惕。可现在，他体会到的幸福是一种可以调动和指挥千军万马的权力，是这种权力使深藏在心中的英雄梦和领袖欲，得到了释放和宣泄。今天可以在众将士的欢呼声中登上主席台，明天就可以在众将士的欢呼声中，登上山西权力的更高点。“刘格平呀刘格平，杨成效呀杨成效，‘红总站’呀‘红总站’，你们还敢小看我‘兵团’吗？还敢小看我刘灏吗？”

主席台上，刘灏的左右，是“兵团”各路诸侯的头头脑脑；主席台下，是“兵团”的旗海和人海。刘灏向他的几十万“兵团”大军发表了讲演，明确表示了对刘格平和杨成效的决裂态度。他说：“‘九五事件’是杨成效一手策划的镇压革命学生的反革命武斗事件，是刘格平操纵的一个妄图破坏七月会议纪要，欺骗中央文革小组的大阴谋。‘兵团’战士无限忠于毛主席，忠于党中央，忠于中央文革小组，一定要彻底揭露‘九五事件’的真相，将山西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19 岁的中学生，用那时无比激昂也无比煽情的革命语言，表示了“兵团”与“红总站”的彻底决裂，也表示了“兵团”要与刘格平公开对立的态度。五一广场上，黑压压的“兵团”战士前所未有的兴奋，口号声响成一片。那些“七月会议”后退出“红联站”而加入“兵团”的群众组织的成员们，更是激动万分，遥望主席台上的“兵团”司令，若不是怕犯忌，真恨不得跳起来山

呼万岁。

9 月 7 日晚上，也就是在刘灏公然要与刘格平决裂的口号声在五一广场刚刚散去之后，中央文革小组用对山西省党的核心小组报告的批示形式表态了，自然是支持刘格平同志正确处理了太原的“九五反革命暴动事件”。

中央文革小组的批示，刘格平很快就传达下去了。作为山西省革命委员会的常委，制止武斗办公室的副主任，刘灏的心中震惊和害怕并存，他连夜召集“兵团”司令部的骨干人员，加班起草印制了一大批“山西革命造反兵团”的严正声明。于是，9 月 8 日，一份《严正声明》，便贴满了省城太原的大街小巷。

“兵团”的《严正声明》共有 9 条正文：

1、兵团战士永远忠于毛主席和中央文革小组，紧跟毛主席的作战部署。

2、热烈欢呼中央文革小组对刘格平同志和山西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巨大支持！坚决拥护中央文革小组 9 月 7 日对“山西核心小组”报告的批示。

3、重申坚决拥护山西省革命委员会对红联站的 9 条命令。

4、红联站必须无条件执行省革命委员会的 9 条命令。

5、一切革命组织和革命群众必须正确对待红联站的广大群众。

6、红联站的一小撮坏头头段立生之流必须低头认罪，红联站广大战士必须立即醒悟，迅速回到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一边来。

7、兵团战士誓与刘格平政委风雨同舟，生死与共！

8、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坚强后盾，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平息9·5反革命暴乱事件中做出了巨大贡献，为广大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做出了光辉的榜样。我们坚决响应毛主席“拥军爱民”的伟大号召，向解放军学习，向解放军致敬！

9、刘格平政委在处理9·5反革命暴乱事件中自始自终是高姿态的，正确的，坚持了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我兵团全体战士坚决拥护，坚决支持！

头一天，刘灏还在五一广场的主席台上对省革委会给“红联站”下达的9条命令进行批驳，认为这9条命令是刘格平和杨成效的一个大阴谋，可现在一个“重申”，说过的话就可以不认账了。刘灏这样做，正是照办了刘格平曾经找他谈心时说过的那句话：“你说过的话呀，可以不承认，有些话呀，你一承认就惹下麻烦啦。”

那是七月会议后的一天晚上，刘格平突然派人来叫刘灏，说是想找他谈一谈。夜色已深，格平同志传令召见，莫非是党中央有什么新的消息？莫非是省里的阶级斗争又有什么新的动静？刘灏急匆匆来到了挂上山西省革命委员会牌子的原省委大院，走进了刘格平的办公室。他看见刘格平的脸上挂满倦容，坐在他的大办公桌后面，桔黄色的台灯反射出的光束，笼罩着这位神态显得苍老的胖老头儿。刘格平示意刘灏坐下，自个并没有起身。他

开口了，对着“兵团”的司令、山西省革命委员会的常委、他的制止武斗办公室副主任缓缓地开口说话了：“我今天想跟你说说心里话。搞政治，你一定要记住两条——这可是我总结出来的经验呐！”

刘灏洗耳恭听，同时看着大办公桌后面三级高干那张高深莫测的脸上，正写满同样高深莫测的神情。他真不知道刘格平今天突然要给他传授的两条革命经验是什么？

“第一，别管钱。你看我，一辈子就是没有分管过财务，连工资，都是丁磊管，我懒得过问。第二，你说过的话呀，可以不承认，有些话呀，你一承认就惹下麻烦啦。”

刘灏由不得打了一个愣怔，后面刘格平还说了很多话，他一句也没有再听进去，可这两条，他却记住了。绝不是因为这两条有多么深刻，而是这两条让刘灏当时怎么也理解不了。不管钱，能算经验吗？说了话不认账，这也算是革命经验吗？

刘灏不仅记住了，而且很快就运用到了他的政治斗争实践中。在政治斗争的风浪中，一个 19 岁的孩子这么快就学会了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了。

9 月 7 日，“兵团”在五一广场大集会大表态，曾让“红联站”的头头脑脑兴奋不已，也让“红总站”的头头脑脑愤怒不已。9 月 7 日，太原城内，满世界是“兵团”的大字报和大标语，全是炮轰刘格平、打倒刘格平的内容。事隔一天，随着“兵团”的《严正声明》，“兵团”支持刘格平的大字报和大标语，又覆盖了

炮轰刘格平和打倒刘格平的大标语。

“兵团”的出尔反尔让“红总站”由气愤而变为高兴，也让“红联站”由高兴而变为气愤。“红联站”曾发明了一种“哈派”的帽子，给“红总站”的下属组织们戴在头上。哈者，即溜须拍马之意也。“哈派”，即给刘格平溜须拍马的一派。“红总站”的总头目是省电力局的郝庭云，中国字可以谐音，“郝”字一谐音，就成了“哈”字，骂郝庭云的大字报和大标语上，郝庭云就被写成了哈庭云。针对中央文革小组对“九五事件”表态后“兵团”急急忙忙发表声明的作法，“红联站”也给“兵团”量身定做一顶“风派”的帽子。你刘灏前两天不是还要炮轰刘格平吗？怎么一夜之间就又支持起刘格平来了呢？这不是见风使舵、政治投机又是什么？“红总站”干脆就骂刘灏是个“投机商”。在对“兵团”这个问题上的观点和认识，这一回“红总站”倒是和死对头“红联站”不谋而合了，你刘灏见风就使舵，不是投机商是什么？

9 月，“太工永红”出了一本歌颂刘格平的小册子，书名为《踏遍青山人未老》，副标题是：“从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对刘格平同志的迫害看两个司令部的斗争”。此书分 8 个部分：

一、千秋功罪，谁人曾与评说

二、坐穿蒋家王朝的牢底

三、砸烂刘、邓司令部的桎梏

四、我自岿然不动

五、山西的春雷

六、山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新胜利

七、踏遍青山人未老

八、结尾的话

《踏遍青山人未老》在一、二部分里，主要介绍刘格平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杰出代表，是在北平反省院里敢把牢底坐穿的英雄。而薄一波、安子文、刘澜涛、杨献珍等人则是民族败类和革命的叛徒。在三、四部分里，介绍了刘少奇和邓小平黑司令部对刘格平的迫害，把他打入山西这个刘邓黑司令部的“黑色保险箱”，只给个副省长，连个省委委员也不给等等。并点名批判了李维汉、杨静仁、汪锋、乌兰夫等走资派对刘格平的长期迫害。在五、六部分，主要歌赞刘格平在山西“文革”中向卫、王、王黑省委夺权的丰功伟绩。在七、八部分中，则把刘格平比作无比高大的马列主义者。

书中有刘格平在北平军人反省院中的照片，还多次称刘格平为“毛主席的好学生”，丁磊为“红岩上的红梅”。

这本歌颂刘格平的《踏遍青山人未老》小册子，不但堂而皇之地摆到了山西省省城太原的新华书店柜台上，而且更以各种渠道流向全社会。此书一印出，即由丁磊出面，给省革命委员会的常委和委员们一人发了一本。太原工学院的“永红战斗队”作为这本书的署名者，更是在社会上大量散发这本书。一时间，省城太原的大街小巷，人人争看《踏遍青山人未老》，人人争说《踏遍青山人未老》。

刘格平也因为“太工永红”写的《踏遍青山人未老》这本书而被人戏称为“刘未老”。

## 第 874 回：九月六，柳州来宾出“血案”　下酒城，泸州鼓楼灰飞烬

9月5日，中央下发了著名的《九五命令》，也正是这份命令，9月6日，广西柳州来宾县发生了一桩针对抢枪学生的血案。

8月以后，广西柳州市两派武斗也迅速升级，从石头、砖头、棍棒、钢钎、长矛、大刀、狼牙棒、土制燃烧瓶的“冷兵器”时代，迅速升级为以军用武器为主要手段的现代化武器的武斗大战。两派开始自制武器弹药。

柳州古称龙城，地处广西中部，是南中国古人类“柳江人”的发祥地，早在 5 万年前就有洞穴人生活在这里了，建城至今已有 2100 多年的历史，是古代南蛮人的山城，自古民风尚武剽悍，胆大勇猛，不怕死，当年都是全国有名的。军阀混战时期，谁听了要跟柳州人所在的桂系军阀打仗，都会毛骨悚然。因为柳州楠木棺材好，有“死在柳州”一说，整个城市有一股山民剽悍和刚烈气息。

柳江穿柳州城而过，有上抵融安、三江，下达广州、香港的舟楫之便。自古就是八桂物资商贸的集散地，有“八桂商阜”之誉。作为湘桂、黔桂、枝柳铁路的交通枢纽，柳州铁路局是全国八大铁路局之一。

在两派掀起抢枪高潮时，这里第一次到当地驻军的军械库抢枪，因不听鸣枪警告，当场被驻军开枪打死了3人。解放军把“革命群众”打死了可不是一件小事，事情闹大了，广西军区下令不

准随便开枪。胆大的再来抢枪的时候，解放军就站在一边看。绿灯一开，几天之内当地的驻军都被缴了械。

9月6日，广西柳州市“422”派的学生组织“柳江风雷”18名初中生，听说柳州市“造反大军”从来宾县人武部抢走大批武器弹药，于是也开着一辆大卡车，赶去来宾县人武部抢枪。

但是，就在前一天，即9月5日，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已经颁布《关于不准抢夺人民解放军武器、装备和各种军用物资的命令》，即著名的《九五命令》。当天，广西军区就用电话传达了《九五命令》，命令部队在遇到抢夺武器时，可以进行开枪射击。来宾县人武部负责人接到电话通知，非常激动，决定对胆敢再次前来武装部抢枪的“422”派开枪射击。

这天上午，这18名中学生来到来宾县人武部，闹嚷嚷要进人武部，当时被哨兵拦住，中学生们不依不饶，一定要往里闯。

人武部负责人接到报告，得知又有“422”派“柳江风雷”的“一群小崽子”前来抢枪，当即勃然大怒，于是决定在大院设伏。当这18名“柳江风雷”初中生吵吵嚷嚷闯进大院，来到操场时，即遭到预先埋伏在这里的军人开枪射击，当场打死15人，伤2人，逃跑1人，造成严重的流血事件。

我们再回头看四川宜宾地区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筹划的第二次“武装支泸”的进展情况。

9 月 1 日晚，宜宾地革筹召开基干民兵连以上干部的军事会议，下达战前最后动员令后，9 月 2 日，宜宾地区革命委员会筹

备小组驻各民兵团的联络组成立，他们的任务是随各民兵团开赴泸州，负责团、营、连的联络工作。联络组通过携带的军用电台每小时向宜宾地区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首长报告一次前线情况，确保首长的意图随时准确地在各团、营、连贯彻执行。联络组实质是起着军事作战督察作用，它直接受宜宾地区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主要负责人指挥。

9 月 2 日下午 15 时 30 分，宜宾地革筹赴泸调查组组长秦部长通知泸州“红联站”：

“地革筹负责同志来电，请‘红联站’、‘泸联站’、‘革联站’派代表到宜宾解决问题。‘红联站’派 50 名，‘泸联站’、‘革联站’各派 20 名，明日上午 9 时至 10 时上车。”

“红联站”认为这是个圈套，是想一网打尽 3 个组织头头，拒绝了这一要求。

随即宜宾地区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便四处放出话去：“‘红联站’抗拒宜宾地革筹领导，没有解决泸州问题的诚意”等等。

9 月 3 日，宜宾地革筹做出《关于处理泸州红联站问题的请示报告》，《报告》中说：“红联站是反革命二月黑风的产物”，“七月反革命爆乱组织者”。

当天，宜宾市革筹与宜宾市武装部协商，从武装部军械库中拿出封存的民兵枪械，都是七九或三八大盖老式步枪和捷克式轻机枪，造册发给了宜宾市“民兵”，其中：“八八团”一个连，工业系统一个连，手工业联合系统一个连，组成一个加强营，原市

公安局教导员花成果任营长，谢英富任副营长。

下午 17 时 50 分，泸州“红联站”公开发表《紧急动员令》，号召“‘红联站’人立即行动起来，坚守战斗岗位，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黑匪”，“立即以大无畏精神投入战斗”。

18 时许，在南城，“红联站”先用 82 迫击炮，高射机枪对白洋坪电厂、文化宫、医专等地进行炮击。

第二天，9 月 4 日上午 10 时 45 分，宜宾两个民兵团近 3000 人的武装支泸大军，全副武装，聚集在宜宾市翠屏山脚下的灯光球场，召开“与泸州麻联站血战到底誓师大会”，宜宾地区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副组长郭林川在会上作了战前动员，并正式宣布了各团、营、连指挥员的各单。会后，民兵团每个武斗人员领到了蚊帐、胶鞋、电筒、水壶、衣服等物品。

当晚，月黑风高，民兵一团集中在宜宾专署灯光球场后，全体上车待命。二团在宜宾市工人文化宫球场上车后速迅出发渡过泯江汽车渡口，在泯江北岸的宜宾造纸厂内待命。午夜零点整，宜宾地区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下达了出发命令，两个团几十辆卡车满载着全副武装的武斗人员，向泸州方向开进。与此同时，南线的高县、珙县、叙永、古蔺、江安等县的民兵和北线的富顺、隆昌民兵也同时出发，共分 5 路来到泸州市郊。这五路是：

泸隆线：全县组织了一个独立营，发枪千余支，子弹 20 万发，乘卡车从隆昌方向直奔泸州。在沿途可看到：有的车上飘着红旗，每个车的车顶上都架着机枪，车上的武装人员都背着枪，

枪的样式不统一，各式各样，头上有的戴着钢盔，有的戴着铝盔。有的戴着腾帽，胸前或左臂上有明显的标识。这一行的任务是攻打小市，指挥部设在石洞，并带有电台，王茂聚代号为“长江”1 号，郭林川为 2 号，前沿指挥分区作战代号为“黄河 1 号”、“黄河 2 号”。

泸永线：由重庆“反到底”北碚“猛虎团”担任主攻，也是负责攻打小市。

泸合线：由合川武装部出面发枪给“红旗派”，全县共发步枪 800 支，冲锋枪 26 支，轻机枪 26 延，重机枪 4 延，60 炮 2 门。步枪每支子弹 20 发，冲锋枪 50 发，重机枪 300 发，轻机枪 200 发，60 炮每门 6 发。并组织了 7 个连，一个独立排，一个炮班。6 个连攻打弥沱，泰安，茜草。

泸宜线：由 46 辆武装人员和 5 艘船分水陆两路奔向泸州。

“第二次武装支泸”开始。

此时在泸州，“红联站”对“红旗”阵地继续炮击，特别是白洋坪电厂，“红联站”在茜草坝用高射机枪对其猛打，使电厂的主厂房，调度室等建筑物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红联站”还在 82 炮和各种轻重武器掩护下，从松林湾、二中、六中、敬老院几个方向向白洋坪变电站发动进攻。厂里的“红旗”虽进行了抵抗，但终因武器简陋，寡不敌众而被迫撤出。“红联站”用手榴弹等爆炸物炸开围墙后攻入了厂区。这次战斗，“红旗”共死 3 人，另有 3 人重伤，22 人被活捉。

就在“红联站”攻打白洋坪电厂的同一天上午 10 点多钟，在双方的前沿阵地钟鼓楼前，两个原在文化宫大门前执勤的卫兵突然被撤走，下午 13 时左右，“红旗”在文化宫阵地向“红联站”前沿阵地及钟鼓楼开始进行猛烈射击，“红联站”被迫撤出。

晚 20 时多，钟鼓楼又传出 3 次爆炸声，第一次爆炸声后，底楼火焰燃起，隔几分钟即熄灭了；第二次火焰稍大一点，但没隔两分钟也熄灭了；第三次比前两次更剧烈，随着爆炸声，底楼四处火光，接着楼底的窗户口向外吐着熊熊火焰，不到几分钟，二楼窗户随着冒出滚滚浓烟也出现火焰，此时枪声和噼噼叭叭的燃烧声不断。在远处，人们还能清晰听见“红联站”在鼓楼上安装的高音喇叭仍在不断地，反复播送着女播音员从前线发出的“特大喜讯”：“前来武装支泸的黑匪强盗被我英勇的‘红联站’人打得缴的缴械，投的投降，黑匪不投降，就叫他灭亡！”中间还夹播着《毛主席语录》歌“下定决心”和电影《地道战》主题歌：

“地道战，地道战，埋伏下神兵千百万……”

又过了一两个小时，随着传来几声巨响，火光冲天，楼内的木质结构等物被烧垮，钟鼓楼变成一座空架架，高音喇叭的声音也随之而消逝。

这座钟鼓楼，据说是国民党将军杨森坐镇泸州时修建的，砖木结构，耸立在迎辉路坡上是当时的制高点。解放前钟鼓楼拉日本飞机警报兼报火警，解放后不拉警报，改成晨 6 时，中午 12 时，

晚 18 时报时间，泸州人叫做“放哨”，一直延续到此时，不能放哨了。

“红联站”在鼓楼上面架有机枪，一楼着火后，二楼三楼的机枪仍在不停地射击。眼见得二层着火了，三层还在喷机枪火苗，到第三层燃烧起来时，就见火光中人开始向楼下跳，两个、三个、许多个……远远看去就像皮影戏中的人在一片红光中翻滚下掉。

后来据说钟鼓楼上有“红联站”一个排 30 多个人，除被打死的，其他都跳楼壮烈了！钟鼓楼熊熊大火燃烧起来，激烈的战斗仍在进行着，整整打了一夜，枪声才稀疏了，但钟鼓楼的大火烧了三天三夜才慢慢微弱下来。

9 月 5 日上午，宜宾市区街头，到处都贴满了还散发着浓烈油墨味的《宜宾地区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中国人民解放军宜宾军分区、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泸部队联合声明》：

……为了解决泸州问题，我们在九月二日，三日曾先后几次用电活、电报通知泸州红联站、泸县泸联站、纳溪革联站等组织派代表到宜宾开会，均遭拒绝。这说明他们对解决泸州问题毫无诚意。九月三日下午十二时起，他们和外地一些保守组织相互勾结向红旗派发起了全面进攻。扬言要在一两天之内踏平泸州，消灭红旗派。为此，我宜宾地区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中国人民解放军宜宾军分区、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泸部队，特发此联合声明，并向泸州红联站、泸县泸联站、纳溪革联站等组织提出如下要求：

一、红联站、泸联站必须立即停止向红旗派的武装进攻，将

全部武器和各种杀人凶器交给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泸部队和泸州市、泸县、纳溪县武装部。不许迫害被抓去的红旗派人员，并立即全部交回。

二、受欺骗、受蒙蔽的工人贫下中农必须立即返回本地区本单位，抓革命、促生产。

三、红联站、泸联站必须立即撤销水、陆交通关卡，恢复水、陆交通。

四、红联站、泸联站必须立即停止抢夺中国人民解放军武器和抢劫国家人民财产以及破坏工农业生产的违法行为。

五、红联站、泸联站中大多数群众是受蒙蔽的，也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受害者，也是愿意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的，一律不咎既往。希望你们不要再继续上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个别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坏头头的当。你们应当起来造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坏头头的反。受蒙蔽无罪，反戈一击有功。个别坏头头只有向人民低头认罪，缴械投降，立功赎罪，才能获得群众的谅解，从宽处理。

以上五条希红联站、泸联站立即执行，否则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由你们完全负责。

此时，武装支泸的民兵一团势如破竹，沿隆昌至泸州公路朝泸州小市杀将而来，富顺县支泸民兵顺沱江而下，占领泸县胡市镇，天洋乡，切断了沱江水路，很快便与一团会师配合作战，向泸州进发。他们行至泸县县城所在地小市附近 58 公里处，已经

看得到小市背面的大山，突然前面枪声大作，公路上响起一连串的子弹打在地上的声音……

全部的汽车都停了下来，人员纷纷下车躲避，他们遭到泸州“红联站”的伏击。

山上的火力很猛，步枪、机枪像炒豆似地响个不停。一团的车队全在别人的火力网里，进退都很困难。很多人没见过这种阵势，听到枪声一响就乱了。好在有些当过兵的人当班、排长，指导同伴到有利地形去躲避。可是还有一小部分惊吓慌乱的人，顺着对方方向的山沟沟里跑。结果当然是他们一枪未发，就倒在了血泊之中，命丧黄泉了。

二团开到泸州市南郊的华阳乡，立即选好指挥所，建好掩体，随即与“红联站”展开了激烈战斗。与此同时，高县、珙县、叙永县、古蔺县、江安县等南线各路武装支泸大军，沿川滇公路北进，切断川滇公路，直捣纳溪县安富镇和泸州市的兰田镇。合江县支泸大军切断长江水路，在泸州至合江公路一带严阵以待阻击“红联站”东撤。重庆“猛虎团”和南充地区、永川地区的支泸人马，从永川至泸州公路挺进，阻断“红联站” 到永川的退路。刹时间，30 余个县市的各路人马，万余武装民兵把整个泸州城围成铁桶一般，水泄不通。

宜宾地区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组长王茂聚、副组长郭林川和宜宾军分区的军事指挥员在部队警卫战士的保护下，携带着呼叫代号分别为“长江 1 号” 、“黄河 1 号”的军用电台，亲赴前线

指挥。

此时，前沿各个战场已全面打响，泸州城里城外战云飞舞，火光冲天，枪声大作，炮声隆隆。37 高炮、迫击炮、40 火箭筒等重型武器都使用上了，双方坚守着各自的阵地，进行着一场惨烈而又悲壮的较量。

四川省革筹组长、成都军区政委张国华和司令员梁兴初得悉王茂聚发动武装支泸后，即于 9 月 6 日发电报给王茂聚，不同意这样行动，要其迅速撤回武装支泸人员，但王茂聚不理。8 日，省革筹又来电指出武装支泸在政治上和组织上都是错误的，要立即撤回，但王茂聚仍然不理。

9 月 8 日，双方交战已经是第四天，“红联站”仍顽强地抵挡着各路支泸大军的疯狂进攻，泸州市小市、兰田镇两个战场的战斗最为激烈，双方伤亡惨重。下午，“红联站”死守的几个主要阵地开始溃败撤离，支泸大军乘势由撕开的口子开始迅速向纵深挺进。

9 月 9 日上午，宜宾地区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副组长郭林川率二团的先头部队经泸州市南城的王嘴、忠山进入城区。同时，立即命二团的一部主力和南溪县、东风矿区的支泸大军共三个营的兵力火迅调集到兰田镇增援。

当日，省委筹、成都军区再次电告宜宾地区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指出武装打泸州的行动是错误的，要宜宾地区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立即把武装支泸人员撤回去，并责成王茂聚作检查。王

茂聚才以自己和郭林川的名义向张、梁首长回电，一方面称：“按照你们的命令执行，已经停止向红联站的进攻。拟今天动员，明天返回。“一面又向张、梁首长对抗说：“我们认为红联站是地地道道的保守组织，从武斗发生后发展到反革命暴乱。这次宜宾造反派的行动没有错误，是完全正确的。至于我们两个人，现在也没有认识到有什么错误。只准允许红联站制造反革命暴乱，镇压红旗造反派，不允许红旗造反派进行反击，那是不行的。宜宾地区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工作，请你们尽快派人来主持，以便更好地搞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但实际上王茂聚却“按兵不动”，并未将人员撤回。

以后的几天，武装支泸大军以摧枯拉朽之势，所向披靡，各个战场捷报频传：“占领兰田”、“攻克小市”、“直捣二道溪”、“在地革筹首长直接领导下第二次解放泸州”。

## 第 875 回：六壮士，燕子岩投崖自尽　回宜宾，第二次支泸结束

在“红旗”强大的武装攻势面前，泸州“红联站”前沿阵地一个个被突破。兰田失守，茜草被占，南效防线又被突破……尽管如此，“红联站”还是抱着“誓死保卫泸州城”的决心，进行着殊死搏斗。

“红旗”一团被阻在小市外58公里处好几天了。这天，天刚黑，宜宾市革筹的李良和几个解放军来到一团团部，召集各营领导开会。经李良介绍，其中一位魁伟的解放军干部是7790部队的师作战科科长张键。他们听了一团的战况汇报后，李良问张键科长有何建议打破目前的僵局？

张科长说他一来就将整个地形都看过了，要是由解放军来打这种仗就比较容易点，由民兵来打就很难了。

张科长看到大家愁眉苦脸的样子，很为难地说：

“不是没有办法，关键在于你们有没有这个胆量和不怕死的决心之人。”

大家问：“怎么个讲法？”

张科长说：“大部队硬攻肯定不行，只有出奇不意的夜袭，或许还能奏效。但是，这支小部队要由稍有战斗经验、精干胆大、不怕死的人组成，趁夜色的掩护摸到山上各明碉暗堡下埋伏，拂晓前打响战斗就只管向前冲，山腰上准备的第二梯队跟进上去支援，第三梯队随后压阵和打扫战场，这样胜利的希望就大了。但

是，危险性和伤亡也会大。”他最后说：“对目前这样的队伍打夜战，我不敢拍胸口。”

他说完，几个营的干部都一言不发。

李良他们一个营一个营地征求意见，大家都说自己的人不行，比不上“八八团”的人精干勇敢、敢打硬仗。“八八团”的加强营营长是市公安局教导员花成果，副营长是“八八团”的负责人谢英富。

花成果营长尽管是老兵、公安领导，但毕竟对群众组织的底知之甚少，况且他的话造反派能否听得进也很难说，因此一句话不说，只是望着谢英富。

谢英富表态，任务可以接，但他们的武器最差。

张键科长建议李良在各营强行抽调一些稍好点的武器给“八八团”。李良当众将他和警卫员向其昌俩人的“五六式”冲锋枪拿出来交给谢英富，然后又东拼西凑了十几支好一些的武器。会议决定“八八团”作为突击夜袭分队第一梯队，该营剩下的两个多连为第二梯队，另外一个营为第三梯队。

散会后，张键科长将花成果和谢英富留下，单独向他们建议说：

“最好是晚上两三点钟开始行动，事前不能告诉任何人，就是参加突袭行动的也不告诉，只叫他们整夜着装待命，晚十二点饱餐一顿后原地休息，出发前给每人发点鸡蛋和肉食，三、四十人要精干，老兵有经验的最好，全配备快枪，哪怕是旧式轻机枪

和手榴弹，争取凌晨五时左右摸到对方阵地前隐伏，天麻麻亮看到进攻信号弹升空，立即发起猛力攻击，先用手榴弹炸碉堡后，就开枪扫射一直往前冲。战斗一打响第二梯队立即跟上接应，速度越快越能减少第一梯队的伤亡，营的指挥位置应设在两个梯队的中间地段，行动的细节你们自己商定。”

他说完后将团部的信号枪交给谢英富。临行李良再三叮嘱小心行事，行前千万不能走漏风声。

回到营部，谢英富和花成果将“八八团”连的刘友源、杨立相、黄海浪、张德建等人找来商议，由他们提出人员名单后，又商量了一下行动细节，花成果传授了一些临战经验。经过两三个小时的准备，吃过加餐饭各人发了两个熟鸡蛋、一小砣肉食就集中休息了。

凌晨2时，突击小分队接到出发命令，借助夜色向山上运动。谢英富和花成果带上警卫员、号兵随后出发，并向该营杨教导员交待，两小时后带领全营余下的人按原建制赶到营指挥所下面坡上待命。

凌晨4点多钟，营通讯员报告，第二梯队的人全部运动到了指挥所的坡上等待命令。

凌晨6时，山头上终于出现了微弱的三下亮光。

当山形在夜色中出现一点轮廓，谢英富急忙叫号手张登奎等3人准备，见到红色信号弹升空就尽全力吹响冲锋号。接着，谢英富便向天打响了信号弹。他的信号弹刚一升空，山上手榴弹的

爆炸声四起，伴随着密集的枪声，加上冲锋号的号角声，整个山体一刹那就热闹了起来。突击队奋起向山上冲去。跑了不到五十米远，突然山顶上还有一个暗堡开枪向他们射击。机枪很快就变哑了，夜袭成功。双方均有伤亡。

在小市五峰顶燕子岩“红联站”阵地上，负责该阵地守卫的是茜草长江起重机等单位的“红联站”人，他们接连打退了对方15次冲锋，坚持了3天3夜，从最初的23人最后只剩下6人，最后弹尽粮绝，当打完最后一粒子弹，投完最后一颗手榴弹后，6个人高呼着口号纵身跳下了数十米深的燕子崖……这就是后来被“红联站”称为“烈士”的著名“燕子崖六壮士”。

守卫在五峰顶2号阵地的是“红联站”3211“石油联络战”的石油工人，同样也是血战3天3夜，个个怒火满胸，最后子弹打尽，手榴弹投光，阵地上最后剩下8人，6男2女。他们把仅剩下的4个手榴弹绑在一起,8个人围在一处,面对冲上来的“黑匪”，8个人高呼着口号，拉响了手榴弹……

58 公里处的两山防线被一团突破后，小市的城防也立即溃散，宜宾的队伍无需一枪一弹就进入了小市，这时另一路人马早就顺利进入泸州市城区，见一团攻占了小市后山，他们也猛力攻过沱江大桥与一团会师。

经过4天4夜的激战，“红联站”伤亡达2000余人，于8、9两日陆续被迫撤出市区，一部分由兰田，茜草向合江县方面突围；一部分从水路杀出，沿江而下到了江津、重庆；大部分则撤

到了“红联站”称为“川南红色根据地”方圆不到2.5平方华里的高坝。

高坝，离市区只有十几公里，但那里有一个不能碰的工厂----泸州天然气化工厂，对外称“255厂”。 支泸“部队”紧追不舍，将他们包围在高坝的泸州化工厂。

当“泸州红旗”拿下新白塔时，“红联站”扬言：敢进攻他们最后的据点高坝，他们将誓死抵抗，不惜把255厂炸了共存亡！

多数人主张一鼓作气、乘胜追击攻下255厂，免除后患，特别是“泸州红旗”极力主张这样做。也有部分人认为，攻255厂会引起对方孤注一掷，引发特大爆炸，那后果就不堪设想了，还是要从大局考虑。

正在两种意见争执不下时，传来宜宾地、市革筹指示：支援目的达到，立即撤回宜宾，泸州的事就由泸州造反派自己处理。

原来，成都军区电告宜宾地区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紧急转发《中央军委命令》：严令王茂聚“立即撤除对255厂（即泸州化工厂）的包围，并在24小时以内退回原地”。于是，武斗队员这才从高坝地区撤走。

“红联站”自9月9日全部撤出泸州市区后，稍喘口气，于9月11日中午12时，乘坐24辆卡车向合江进攻，用1000多人的兵力对驻守合江大桥黄包山的“合江红旗”发起进攻，并炸毁了黄包山的“红旗”指挥部。下午15时，“红联站”又在高射机枪和各种轻重机枪，60 炮的掩护下，向驻守在佛荫的“红旗”

派发起进攻，打死“红旗”5 人，伤 10 余人。第二天中午，“红联站”攻入县城，占领了整个合江城区。

在此情况下，张国华、梁兴初于 9 月 14 日将王茂聚叫到成都当面进行批评教育。但王茂聚返回泸州后仍不立即撤回。

“泸州红旗”从隆昌等地打回小市夺取泸州后，对武装组织进行了整编，扩建成“文攻武卫团”，下属三个营，以长江为界，以北小市为 1 营，对外代号“75”营；泸州市区为 2 营，对外代号为“721”营；长江以南是 3 营，对外代号“95”营。6 个连的编制，其中一个机炮连，此外，还有通信班，侦察班和警卫排。同时对武卫人员的待遇也作了相应的规定：打死了当烈士待遇；每人发一套绒衣或一套新工作服，胶鞋一双，雨衣一件，每天香烟一包，饼干，白糖大量供应。作为参加武斗的农民，由“红旗司令部”和新成立的“红旗生产办公室”出证明，回生产队评 2 分。脱产人员和集体企业人员工资照发，领加班工资和夜班费。

9 月 19 日，宜宾地区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组长王茂聚满面喜气，穿一身崭新的军装，以中国人民解放军宜宾军分区第一政委的身份，在泸州市南城原川南军区大礼堂接见了支泸大军的一团、二团的全体武斗人员。他大讲武装支泸的巨大成绩和重要意义，以及“红联站”的九大罪状。最后，王茂聚显得有些无奈地说：

“成都军区张国华同志讲，255 厂有几百吨炸药，不能打，我们的任务已经完成，只剩下 255 厂，泸州‘红旗’可以对付了，

每个营留一个排的好武器交给泸州‘红旗’派，其余撤回去，以后有必要时，随时可以再来。”

接见结束后，宣布当天晚上各团撤出泸州市。

武斗队员们拖着疲惫不堪的身子，连夜行军，挥师凯旋。支泸大军给 “泸州红旗”留下近千支各种枪支和子弹、手榴弹，单是住在泸州医专的宜宾地区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驻泸工作组就遗留下 20 多箱约 1 万余发子弹。

武装支泸大军撤回后，宜宾地区各县市大搞“庆功评好”评比“五好战士”，总结成绩，慰问伤员，奖励有功人员。各地掀起大规模开追悼会、送葬、控诉 “麻匪”的罪行，极力继续煽动群众对泸州“红联站”的仇恨情绪。同时，成立了由宜宾地区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副组长郭林川为主任委员的宜宾地区“红旗革命烈士治丧委员会”，对凡是在武装支泸中被打死的“红旗派战士”均追认为“革命死难烈士”。制定了“关于处理善后工作暂行办法”的文件，对所谓“革命死难烈士”优抚工作做了明确规定：烈属是农村人口可以解决户口迁移入城和工作安排；烈属可顶替烈士工作；烈士生前的工资每月照发等。

连续半个月时间，宜宾地区各县市每天哀乐声声，爆竹阵阵，成千上万群众身戴白花，手执花圈、挽联为战死的武斗队员开追悼会、游行、送葬。宜宾市在翠屏山、泸州市在忠山建造了高标准、高规格的“烈士陵园”，绝大多数战死的武斗队员的遗体都埋进了新建的“烈士陵园”。

半个月的铁壁合围，武装剿杀，双方均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死亡 2000 多人，伤万余人。无数个家庭遗下孤儿寡母，数十万群众背境离乡，美丽的江城泸州变得满目疮痍，到处一片狼籍。

9 月 30 日，泸州“红联站”在高坝宣布戒严 3 天。10 月 2 日上午 9 时 30 分，“红联站”在小市二道溪向“红旗”前沿阵地进行了密急的扫射，并用炮火猛轰茜草坝。与此同时，“红联站”1500 多人兵分两路在密急炮火的掩护下向驻守在泰安的“红旗”发起进攻，一路从正面，一路抄后方，第一天未达到目的，第二天继续增兵，逐渐对“红旗”阵地形成包围圈。

这天，“红旗”司令部一个姓许的参谋长去前线视察，小车走到离泰安还有二公里的大桥时被检查哨拦住了。许作为参谋长自是几分盛气，没料到下车来还没等他发脾气就被几支枪指着不敢动了。原来，这个所谓的检查哨是“红联站”从陈公堂山弯里钻来的偷袭队，有意擒获“红旗派”的大头头给对方制造恐慌混乱，意欲不战而把“红旗”派赶跑。当“红旗”战士知道许参谋长被掳走时，对方早已渺无踪迹。

许参谋长被敌人在后方抓走了，消息迅速在前方传开了，战斗人员无不大惊失色，军心顿时大乱起来！许参谋长是中午被抓走的，3 个小时以后“红旗”派就匆忙撤退。真是兵败如山倒，小山般的粮食、衣物、弹药等啥都不要了只顾逃跑。

“红联站”在第三天继续增兵的同时，在化工厂方向又向泰安用大炮猛轰，守卫在泰安阵地的是红旗“石油兵团”的石油工

人及一中“红铁骑”等组成的“95”营武装人员，双方打得颇为激烈，“红旗”在“红联站”强大的武装攻势下，伤亡惨重，只好且战且退。二连一副连长在这次战斗中为掩护其他人员撤退，在当一群“红联站”端着枪向他们冲过来时，他端着冲锋枪毅然从掩体里跳起来，高呼：“为毛泽东而战，完蛋就完蛋！”的口号向对方猛烈扫射，被一颗子弹从他前额射进后脑穿出而身亡。

10 月 4 日下午 14 时，“红旗”招架不住只好撤出泰安。此时“红联站”凭着优势兵力，又一鼓作气地攻战了沙湾、兰田、五星公社、忠义、邻玉场及茜草地区的长起、长挖厂，纳溪 3 号信箱也再次被占领。此战“红旗”则以伤亡近百人，丢失大量阵地而告终。

此后的几个月，双方都在各自的“防区”内“休养生息”，在“分界”上虽有摩擦，但规模不大。

在武斗中，“红联站”死亡近千人，都埋在泸州城郊高坝大龙山上。“红旗”派死的人都埋在市中心的忠山公园里。

青山埋忠骨，冤魂泣荒丘。这是“泸化兵团”总指挥宿传金的墓。

他是 1967 年 9 月 4 日打文化宫中弹死亡的

这是高坝的“红联站”烈士纪念碑，正面是“革命烈士永垂不朽”，背面是“为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而牺牲的烈士永垂不朽”。文革后，上面的金字都被政府刮掉了，理由是“煽动社会对立”。本来还要把碑推倒，只因为高坝附近泸化的工人家属很多，大家反对，才没有推。这个纪念碑及周围曾经是这个陵园最漂亮的地方。而“红旗派”的墓都在忠山公园里，那是市中心，后来全给推平了。

在这一遍荒芜的山地里都是“武斗烈士”

## 第 876 回：赞极左，湖南工湘又分裂　攻长沙，莲花桥作战惨烈

8 月 19 日，湖南省赴京代表团的各方代表从北京返回长沙以后，黎原、华国锋、章伯森等与湖南有关各方联系协商，确定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成员名单，上报中央。谁知，这份经中央批准的湖南省革筹名单引起了一些“湘派”的反对。

8 月 30 日，湖南“高校风雷”、“中南矿冶学院井冈山公社”等组织的几个学生起草，湖南医学院学生、“高校风雷”二号人物红斗，本名张建强执笔，由 25 个“湘派”组织签名的《830 声明》发表。这份《声明》首先批评了省革筹小组的人选名单，提出“誓死揪出‘二月镇反’的黑主帅”，指责“工联”领导人是“修了”、是“右倾机会主义”。

《声明》是这样写的：

“在迎接省革筹小组返长的鞭炮声中，在一阵紧锣密鼓之后，工贼胡死满（胡勇原名胡四满）和大政治扒手周国强（市总工会东方红观察哨负责人、工联直属兵团司令）在其黑后台的指使下，于‘819’公开抢劫深受龙、刘、崔之流迫害的‘东方红’总部的汽油和枪支，更恶劣的是继此之后 ，胡死满变本加厉，侵略性地包围‘东方红’总部，并调动对付‘高匪’、‘怒匪’都没有使用的重型武器（重机枪、钢炮、装甲车等）来围剿革命造反派，屠杀‘东方红’总部、‘湘江风雷’、‘青年近卫军’的革命战士和无辜群众，尤其不能容忍的是，他们竟干出了在国际战

场上都不容许的罪恶勾当，枪杀 47 军去制止武斗的战士和抢救伤员的救护人员，鲜血淋漓，惨不忍睹……倒过头来他们却反诬一口，倒打一靶，与高、怒匪徒惯用伎俩相比，岂不令人毛骨悚然？！无怪乎湘潭‘革匪’公开集会游行，高喊坚决支持长沙‘工联’的革命行动！长沙‘工联’向牛鬼蛇神开火好得很！”

《声明》说：“二月逆流的阴风恶浪并未消失，二月逆流并没有结束！二月镇反的黑主帅还是只活老虎。无产阶级革命派必须有力地奋起毛泽东思想千钧棒，彻底粉碎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逆流，彻底摧毁资产阶级司令部，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声明》引用列宁的话：“列宁说过：‘离开了社会主义的工人运动，就是工联主义……’现在，工贼胡、周之流，正妄图把全省的工人运动，引入‘工联主义’的歧途。这是比考茨基还要考茨基，比布哈林还要布哈林的修正主义行径。”

《声明》再次指责：“‘28’北京来电，是根据二月逆流的黑主帅的意旨一手炮制成的黑货，是一株彻头彻尾反毛泽东思想的大毒草，是进行政治大拍卖的产物。它的要害是出卖造反派的灵魂和胜利的果实，背叛了无产阶级革命的利益。”

《声明》最后说：“‘省革筹小组’以笑的姿态登上历史舞台以后，内战的枪炮声代替了欢迎的礼炮，……”

“试看明日之湖南，必将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极左派’的天下！”

而“工”、“湘”派 8 月下旬在长沙的大战，使他们无暇顾及易家湾武斗，于是与“高司”在易家湾签订了停战协定。

“工”“湘”派分裂让撤到湘潭的“高司”又看到了希望。“火烧湘绣大楼”事件发生后，“高司”正式提出了“打回长沙去”的口号。8 月 22 日，“高司”派“长沙地区自卫抗暴指挥部”在湘潭锰矿招待所召开会议，研究“解放河西”的行动计划，决定“指挥部”往河西推移，“解放”坪塘，控制长宁公路，然后打回长沙的河西地区。

由于坪塘地区“工”“湘”派人少势薄，在“高司”派的攻势压力下，“工”“湘”派被迫放弃坪塘，陆续撤往长沙。

8月26日，“高司”派“自卫抗暴指挥部”200多武装人员，分别进驻坪塘、九江庙、含浦和长沙市24中。

面对如此局势，“工”“湘”派暂时停止内讧，“团结一致，共同对外”，一同筹划“解放坪塘，消灭高司”的作战计划。长沙“工湘”派与坪塘“工湘”派头头联合召开 4 次会议，研究“解放坪塘”的行动方案。

以制造坦克为主的湘潭江麓机械厂的“高司”派“革造联”，从厂里先后开出了数辆坦克投入武斗，对进攻方产生了强大的火力压制和心理震慑。而“工湘”派则以集束手雷、炸药包和 82 迫击炮及 90 野战炮迎战。

数日的武斗，造成了京广线湖南段运输中断。9 月 1 日，湖南“省革筹”小组与 47 军联合发出《关于恢复交通运输的联合

通告》，要求全省革命造反派和广大人民群众，积极协助交通部门尽快恢复交通运输，以保证生产和生活物资的供应。公告提出对破坏交通运输的少数坏人和情节严重的肇事者，“必须受到法律制裁”。

9 月 2 日，“省革筹”小组与 47 军又在长沙东风广场召开有 20 万人参加的“拥军爱民”大会。黎原在会上讲话时号召全省和全长沙市的军民要增强团结，特别是要加强各革命群众组织之间的团结，把大好形势继续推向前进。

9 月 5 日，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发出第一号公告，宣布：“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在革命委员会成立以前，既是革命委员会的筹备机构，又是全省的临时权力机关，领导全省的无产阶级文化革命和工农业生产。自即日起， 湖南党、政、财、文一切权力，统统归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

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的办事机构，设四大部：

(一)办公室。下设秘书组、综合组、机要组、行政组等。办公地点在湖南省委院内。

(二)文革办公室。下设组织组、宣传组、斗批改组、联络组、秘书组、接待组。办公地点在湖南省委院内。

(三)抓革命、促生产指挥部。下设综合组、工交组、农业组、财贸组、国防工业组等。办公地点在省人委院内。

(四)文攻武卫指挥部。主任 47 军副军长郑波。办公地点在湖南省委接待处招待所。

(1)文攻武卫指挥部的组建原则：

1、三结合。解放军、革命干部、革命群众组织三方面派人参加。

2、群众组织的人数，“工派”、“湘派”对等。

3、实行民主集中制。重大问题，充分讨论，协商一致。不采用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

4、“工派”“湘派”双方参加领导的成员，必须经过47军的同意和省革筹小组批准。

5、指挥部是在省革筹小组和47军的领导下处理文攻武卫的一切问题。

(2)指挥部成立领导小组，成员12人，解放军3人，革命干部3人，“工派”3人，“湘派”3人。47军副军长郑波为指挥长，141师政委张骥为政委，141 师副政委桑文重为副政委。

(3)指挥部机关设三个组：

参谋组15人：解放军6人、革命干部3人、“工派”“湘派”各3人。

政工组25人：解放军10人、革命干部5人、“工派”、“湘派”各5人。

后勤组12人：解放军3人、革命干部5人、“工派”“湘派”各2人。

(4)部队。共武装3000人，“工派”“湘派”各1500人。分为四个营。每营5个连，共20个连。“工派”“湘派”各2个营、

10 个连。营长、副营长、连长、副连长、排长，都由群众组织选配。营政治教导员、副政治教导员、连政治指导员、副政治指导员，都由解放军选配。3000 人全部脱产，伙食供给标准，按解放军的标准执行。

(5)任务：

1、对所属武装进行毛泽东思想教育，突出政治，加强组织性、纪律性。

2、对外大力开展政治攻势，分化瓦解保守组织。

3、打击流氓、阿飞、坏人，保卫国家财产。

4、维护社会治安，逐渐建立革命秩序，保卫“四大”。

但是，这一切都没有阻止武斗的继续。

9月4日上午，“工湘”派的武装侦察排，从长沙市区往莲花桥方向进行侦察。“高司”派的“抗暴指挥部”也派出侦察排前往莲花桥，对长沙市区方向进行侦察，以实行“解放河西”计划。

双方于4日中午在莲花桥遭遇，随即发生战斗。“工湘”派立即按预定作战方案，分别从西、中、南三路进攻坪塘，以实现对“高司”派驻地的钳形包围。按其作战计划，西线的主要任务，是围歼打援，阻击“高司”派从湘潭方向的增援，堵截坪塘“高司”派向湘潭方向撤退，配合中线、南线向24中靠拢，以保证中线聚歼“高司”派于24中学。

中线大军主攻24中学，是武斗的重点战场。“长沙地区自卫抗暴指挥部”在这个方向使用的兵力有500余人，以步枪、半自

动步枪、轻重机枪为武器，并动用了平射炮、60炮等重型武器。“工湘”派在该战场投入兵力近千人，以步枪、半自动步枪、轻重机枪及迫击炮等武器，向“高司”派的防守阵地和工事进行猛烈进攻。武斗从5日凌晨5时打响，至当晚19时左右结束。因双方动用的武器均为现代化装备，战斗中均以步炮兵协同作战形式，战斗人员均以毫不畏死之精神进行战斗，因此都发生大量伤亡，“高司”派死30人，“工湘”派死26人。

这是继易家湾武斗后，湖南文化大革命以来规模最大、双方投入兵力和现代化军事武器最大的一次武斗。京广线湖南段再次因武斗中断 4 天。9 月 7 日 9 时，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负责人黎原向国务院电告这一事态。当天，周恩来收到来电后，马上写信给黎原即转胡勇、叶冬初并湖南省革筹小组、铁道部军管会并告长沙北站“工联”、“湘江风雷”两派头头，责成湖南省革筹小组，“工联”与“湘江风雷”两派组织，立即遵照中央关于派解放军维护铁路交通的命令，无条件地立即恢复湖南段铁路交通。

当天，总理办公室秘书周家炳通过电话，将周恩来的指示转告黎原。黎原即转告胡勇、叶东初二人并湖南省筹备小组、铁道部、军管会并告长沙北站“工联”、“湘江风雷”两派负责人：

9月7日9时黎原同志来电收到，中央对京广线湖南段，铁路运输中断四天极为关切。

现责成湖南省筹备小组、“工联”、“湘江风雷”两派革命

群众组织，立即遵照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八月十日发布的关于派解放军维护铁路交通的命令和“九·五”命令，无条件的立即恢复湖南段的铁路交通。

对两派之间的问题，希望根据以下原则通过谈判解决：

一、必须坚决按照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指示“要用文斗，不用武斗”。坚决制止铁路局、站和铁路沿线一切武斗。

二、已经夺取的人民解放军的武器，一律封存，限期收回，不得用于任何一派的武斗。

三、铁路局内两派争论，只能在业余时间进行，不能跟局外单位进行相互联系。

周恩来

九月七日下午五时

随即，省革筹授权湖南支左办，制定出“以政治攻势为主，辅以必要的武力解决”的方案。47 军出动飞机，在武斗战场和湘潭市区撒发中央《九五命令》等传单，要求两派立即停战。

9月14日，47军104师开进湘潭市，控制市内高层。17日，湖南省革筹和47军发出《关于解决湘潭问题的决定》，决定组织湘潭地区临时领导小组，负责领导全区的文化大革命和工农业生产。47军开始收缴两派的枪支弹药。

9月20日，易家湾武斗结束。

从8月10日至9月20日，易家湾武斗前后经过40天大战，双方投入的直接武斗队伍和后勤支援人员近万人。武斗中，双方死92

人，受伤人员上百人。易家湾、暮云市、白马垄一带大量建筑物被毁，造成巨大的财产和物资损失。武斗中，双方都虐杀战俘。“长沙青年”和“青年近卫军”在埋葬他们在武斗中阵亡的战友时，把抓起来的战俘活活垫了棺。以报复此前湘潭“红色怒火”枪杀7名“工联”人员祭坟事件。

9月17日，湖南常德“工联”派联合临澧、津市、常德、澧县等数县武斗队伍，攻打被“红联”派夺取的临澧县城。双方投入数千人，携带轻重机枪、步枪、冲锋枪、迫击炮等现代化武器。仅在大木岗遭遇战中，津市“文攻武卫小分队”就被打死13人。

9 月 25 日，常德“工联”派 300 多名武斗人员，荷枪实弹，分乘几辆大卡车向汉寿县城扑来。支持“红联”派的县人武部政委曹德俭闻讯，亲率一批军人前往离县城 10 公里处的鸭东铺渡口阻止。在部队做好设防后，喊话宣传“要文斗，不要武斗”。他还挺起胸膛站在河边，向对岸汽车上的常德“工联”派大声说：“你们要武斗，就首先朝我开枪吧！”同时将两挺机枪架在他的左右，准备进行还击。“工联”派明白，他们根本不是军队的对手，于是转回常德去了。避免了一场血战。

9 月，常德驻军支左领导小组贯彻中央关于收缴枪支、制止武斗的《九五命令》，派出大批宣传队宣传《九五命令》，收缴枪支弹药。至 10 月 1 日，在常德市及郊区两派手中收缴各种枪 3638 支，迫击炮 36 门，手榴弹 561874 枚，炮弹 99 发，雷管 6376 发，炸药 75．4 公斤。中国人民解放军 6961、6897 和 6962 部队先后

进驻常德，全地区“三支两军”人员达到 1254 人。

## 第 877 回：上华蓥，八一五建根据地　说开封，黑龙江《九条协议》

9 月 1 日，周恩来听成都军区司令员梁兴初汇报说到重庆在嘉陵江大桥武斗中一夜打了一万发炮弹时，极为生气，说："在越南，1 万余发炮弹能打下多少飞机！这是国家财产，我想了是很痛心的。"

这天，重庆"815"派周家喻、杨正中、冯国琏、潘广钧、杨德凌、滕玉泉、陈伟立、蔡增华、汤大华、甘永富；"反到底"派李木森、段炳森、邹毓林、刘大强、杨春、黄廉、陈小华、邵大鹏、粟远奎、蔡日伦，两派代表各 10 人，于 12 时达成《关于立即停止武斗的第一号协议》，商定于 2 日 18 时起无条件全面停火，4 日前分点封存武器。5 日谈判上交办法。

原来参加谈判的各派代表为各 12 人。9 月 1 日的两派谈判前，重庆警备区派车将"反到底"的邓长春等谈判代表 12 人接去参加谈判，下黄山过江进城时，在长江边海棠溪车渡被红岩三中"815"派武斗人员当场围殴刺杀，经驻军劝阻，邓长春等 4 人被打伤，朱雄伤重，接到警备区卫生科抢救无效身亡，邓长春被抓到水泥厂。

邓长春被抓的消息传到黄山，形势陡然紧张。黄山上的"反到底"极其气愤，纷纷要求下山攻打水泥厂。于是头头们又将攻打水泥厂的计划拿出来，作了布置。

中央调查组得知消息后，与驻军代表一起赶到水泥厂，强制

“815”放人。当晚，邓长春就被中央调查组和驻军解救出来，并且立即从“警司”的医院里给黄山打来电话，要大家不要乱动，才算未酿成更大的后果，而邓长春因伤未能参加两派谈判。邓长春事后解嘲地说：“那一顿打得好，把我脑壳打清醒了，所以我才在交枪的协议上签了字。”

9 月 2 日，成都警备区、重庆警备区开始护送“反到底”派躲避武斗赴蓉人员返回重庆。

9月3日，54军在两路口、肖家湾卫生防疫站、杨公桥设立3处检查站，检查过往车辆是否偷运武器。

这天，“815”派在北碚召开“八二八祝捷大会”，庆祝8月28日歇马场武斗的胜利。

北碚城是“815”派的根据地的。从重庆到北碚的公路，要经过数道关卡。同兴乡是第一道关卡，三道交错的石墙拦住去路，只留出一条很窄的S型通道。车停下后，有一个手持三八大盖的“兵”走上前检查证明，然后放行。经施家梁，过龙凤桥，到北碚，又是一道检查介绍信的关卡，又是一道有S通道的墙，再绕过一道用灭火机改装的炸弹网，才进入了繁华的北碚城。

祝捷会开完，游行开始。大街上人声鼎沸，车水马龙，热闹非凡。随着锣鼓声，红旗和欢呼声簇拥着一队队“八二八大战”中的英雄，扛着枪，握着最高的奖赏——《毛泽东选集》，骄傲地在大街上走过。林荫道中幡飞的标语向写着：

“庆祝八二八大捷！”

“文攻武卫好得很！”

“穷追砸匪！”

……”

就在祝捷大会的第二天，9月4日，重大“815”的电台与中梁山地区“815”派“卫戍司令部”勾通联络。这天，重大“301纵队”以军训为名，全副武装，乘坐10余辆大卡车，神不知鬼不觉向华蓥山进发了。按照总团的部署，此行是去建立根据地，保存实力，为持久战作军事准备。

这是一个月黑风高之夜，天很黑。从沙坪坝至北碚的道路和山峦、田野都肃杀无声。为了保密，行进途中，所有汽车的大灯全都关闭，只亮着萤火般的尾灯，所以行进得十分隐秘和缓慢。车上都配备步话机，每车一台，从“八二八大捷”中缴获的。车与车之间完全用电台传递信号：

“一号！一号！二号向你喊话！我们已到陈家桥！我们已到陈家桥！”

“一号明白！一号明白！二号二号，请继续前进！请继续前进！”

遇上了部队岗哨，他们就远远地背起武器下车，从漆黑一团的田间绕行。那时军队已经开始动起了真格，对两派的枪支通通格收勿论。

“301纵队”就这样进入了华蓥山，住在山顶的江华镇。指挥部设在一座小学校的校舍里，他们把大部分武器和物资藏匿到

深山里，每天的活动就是学习毛主席著作、军训和打靶。华蓥山到处茂林嘉树，潺潺流水，高路入云端……

我们再看开封。8 月 27 日，河南省革筹小组副组长纪登奎召集开封驻军支左领导小组和开封“824”总指挥部负责人联席会议，研究开封东郊“左司”组织占据的化肥厂问题。大家认为，化肥厂的问题，还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因此决定组织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会议还根据“武装左派”的精神，决定开封“824”建立五个武装基干连，另组织十个毛泽东思想宣传队。

8 月 30 日，开封驻军支左领导小组特派员刘春生到开封化肥厂与这里的开封“左司”主要负责人接触，被拒绝进入工厂。

9 月 4 日晚 21 时后，开封仪表厂、开封空分厂、开封阀门厂、开封拖电厂等地先后发生武斗。开封 1 军领导杨力勇和副军长杜恒荣先后向周恩来反映了这一情况。9 月 5 日上午 8 时 45 分，河南省军区党委办公室秘书组周成继给杨力勇和杜恒荣打电话传达周恩来的指示：“总理很关心开封问题。总理指示我们向老保明确指出：‘必须立即停止进攻，放下武器，得到保护。消灭造反派和驻军是反革命行动。’”

下午 17 时许，周恩来就开封东郊化肥厂问题给开封驻军领导来电指示：

“坚持喊话，必须立即停止进攻，放下武器，得到保护，消灭造反派和驻军是反革命行动。”

9月5日夜，康生与李富春、江青等人第三次接见安徽代表后，

他又与周恩来、吴法宪、戚本禹等人连夜接见河南的刘建勋、王辉，直到6日晨3时。

9月6日晨3时20分至4时50分，刚刚接见完河南刘建勋、王辉的周恩来、戚本禹、吴法宪等人，又继续在人民大会堂小礼堂接见黑龙江省“炮轰派的范正美、宋振业、边世军等和潘复生、汪家道及“捍联总”双方全体代表。会议内容主要是达成关于制止武斗的协议。

周恩来：“今天我只想解决两个问题，开门见山。外地问题今天不能谈了，‘捍联总’和‘炮轰派’各增加16人吧。”

“炮轰派”答：“我们15人。”

周恩来：“15、16人差不多嘛，差1个人嘛，问题不大。你们这一静坐，我们就把别的问题放下了，当然也有其他原因。

哈尔滨武斗这么厉害，一个说打了，一个说没有打，‘炮轰派’只剩下坦克厂和师院了，还调全市人包围，这就不对了。“

周恩来问“捍联总”:“你们敢保证你们真的一枪一炮没放？”

“捍联总”没说话。

周恩来：“还是实事求是的嘛，派人去调查，明天就去。”

周恩来看了下表：“啊！过了12点了，今天就走。当然了，首先是工人阶级。坦克厂是生产单位，开出坦克不对，包围它就更不对了。情况没调查清楚前，先把武斗停下来，被包围和包围的武器都要封存起来，今天就不要说原因了吧。这个问题是双方的，坦克厂都打坏了，从外面打进来的，不可能里面自己打自己

嘛，师院也是这情况。师院有武器没有？”

“炮轰派”答：“有一点。”

周恩来：“双方武器都要封，现场调查，现场查封，全市的武器都要封。调查组由军委、二机部派人，派军事干部去。造反派也要派一些去。北京的造反派和你们有联系吧？清华去过吧？”

“炮轰派”答：“去过。”

周恩来：“北航也去过吧？”

答：“去过。”

周恩来：“师大和北工大也去过吧？”

答：“去过。”

周恩来：“地质的没去过吧？”

答：“也去过。”

周恩来：“去过的都不行，老三军去过没有？”

答：“不清楚。”

周恩来：“那可以问一问，首先把事实真相搞清楚，武器要查封，双方都派人去，首先是工厂，坦克厂有人吗？”

双方答：“有。”

周恩来：“光坦克厂不好，别的工厂也去一个，两名工厂的，坦克厂一名，一边一个，其它厂出一名，一边一个，学校也去，哈军工总是分两派，过去有八八，造反团，现在有山上、山下，就是不能联合起来，一边去一个。师院呢？就一派吗？”

“炮轰派”答：“大部分在我们这一边。”

周恩来：“一边去一个，师院范正美不用去了吧？汪家道也不能自己去嘛。机关来人了吗？”

双方答：“来了。”

周恩来:“一边去一个,我们也去10个人左右,有航校的吗？”

答：“有。”

周恩来：“也介入两派了吧？”

答：“航校介入了。”

吴法宪:“是工业学校,马家沟航校没介入,他们不搞四大。”

周恩来：“那就住在航校，双方都同意吗？”

双方答：“同意。”

周恩来：“不过在马路上不管那派，不要抢调查组车，要抢就要严办了，不听，开枪警告，再不听就宣布是反革命啦！《九五命令》很清楚了，要严格执行，过去有《八条》，有《十条》。《十条》一出来，群众又起来了，有些偏差，《六六通令》是《八条》和《十条》的综合，‘720事件’是一个地方的嘛，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中国之大，坏人总是有的，赵永夫、陈再道毕竟还是少数，不能到处抓军内一小撮，《九五命令》，《拥军爱民》都有，很谨慎，这次执行命令要坚决，这次去的目的是现场调查，查封武器制止武斗，如果这样还不灵，那我们只有进一步了。

你们哈尔滨嘛，老造反派，最出名是哈军工，全国各地都有你们，现在搞的很不好，很敌对，联合不起来，本来是内部矛盾，

用敌我的办法来解决，至少是不应该的了。你们作保证，我们去哈尔滨，联络员去一个，去一个记者，去不要到过哈尔滨的，去过的有倾向性嘛，免得另一方指责。主要是军委、二机部长军事干部。你们静坐的撤走了吗？“

“炮轰派”：“撤走了！”

周恩来：“好！听话，没有过分，过分就不行了，……如果你们今天冲上了楼我就不管啦，就派卫戍区把你们赶下来。原来讨论双方制止武斗的协议你们开了三次会，共写了七条协议，只达成一条，这是很好的开端了嘛！”

周恩来念第一条后说：“这很好嘛！这是个基础嘛！”

接着，他又加重语气念“用实际行动”这5个字并说：“这5个字很好了，我再给加一点：坚决执行《九五命令》。”

他又念第二条，并说：“分歧是‘炮轰派’提出来放人应该包括公安机关非法逮捕的，‘捍联总’不同意，我看可以加上么！这有什么不好，现行反革命抓起来是合法的，不是就该放么！我替他们辩护一下。……你们同意吗？”

“炮轰派”大声回答：“同意！”会场上鼓掌

周恩来：“好！看来我这律师还是有用，这条解决了。

第三条，‘炮轰派’主张双方就地查封武器，立即停止围攻、冲击。‘山上派’主张交给军区。双方就地查封，限期交回，我替少数派说点话，他们人少么，现在交不放心，你们也是嘛！交了还怕他们不交呢！他们有坦克，冲出来怎么办？其实也没有啥，

一个炸药包就解决了，只要勇敢一点，这些都是吓唬吓唬！以后交给谁根据具体情况，工厂生产的入库就行么！其它哪里发的就交给谁，如果认为不当就交给野战军嘛，我还要加一点，军用车也一律封存。这方面北京给你们一些影响，北京汽车使用的很浪费，开大会汽车就开去开会，战备物资（包括军车）封存，赞成吗？”

“炮轰派”高呼：“赞成！”

周恩来：“好！这就像个造反派。当然不能一下交了，如果一下交了就是缴械一样，我不同意。最近有6个孩子从福建前线来，是清华的，还有一个兵，这个兵敢于贴大字报给领导提意见，很好，但是不应该跑出来，我们还是把他送回去。在会上都说赞成，实际上气鼓鼓的，我还要请蒯司令给他做工作，蒯司令威信高。”

戚本禹：“蒯大富的批评比我们还重。”

周恩来：“你们没有动员兵跑出来吧？”

“炮轰派”：“没有！”

周恩来：“好！哈尔滨还是有许多好事么！”

“炮轰派”：“他们在道路上挖了很多战壕。”

周恩来：“那要撤。”

“捍联总”：“师院埋了很多地雷。”

周恩来：“好，包括地雷，双方撤出一切武斗工事。”

“炮轰派”吴兆基说：“还要取消戒严和警戒线。”

周恩来："双方应该取消戒严和警戒线。哈尔滨有戒严吗？"

"炮轰派"："有。"

周恩来："群众组织搞戒严是非法的，就滑稽了，群众组织不能搞戒严，划警戒区，不能自己划地为牢，戒严只有卫戍军区。卫戍军区随便戒严不合理可以上告吗！"

"捍联总"："过去'炮轰派'晚上搞打、砸、抢，打死我们100多人，还抢东西、抢火车、抢布匹，所以必须戒严。"

周恩来："过去是过去吗！加上没有坏处吗，过去的事将来慢慢讲道理，开门整风。双方停止围困，冲击，双方的武器就地封存，限期上交。任何群众组织不得设戒严，警戒区。通过吗？"

"炮轰派"猛烈鼓掌，高喊："通过！"

周恩来："好，看！这已经奋斗了三条了吗！

第四条，停止经济迫害，不准断粮，断电，断水，克扣工资，不准歧视，不准报复，还有不准搞经济主义。"

"炮轰派"："不该给打砸抢的人发补助费，'捍联总'搞武斗白天补助六毛，晚上补助三毛。"

周恩来说："还是用不准搞经济主义，以后不是不准搞武斗了吗！"

戚本禹："长期游荡串联，当然不能发工资了，比如大庆半工半读，拿了工资就到外面串联去了，不工也不读了。"

周恩来："这个吗，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回不去，回去就打，比如淮南煤矿把'炮轰派'都逼出来了，因为他们人多，回去就

打，这种情况不得克扣工资，另一种情况，这也是个别情况，拿了工资就出去串联，这当然不行了，例如大庆的半工半读，鞍钢也有这种情况，这是刘少奇搞的，可害死人，不是毛主席提的，毛主席提出是共产主义劳动大学。”

“炮轰派”：“我们哈尔滨许多人都是棒子赶出来的。”

周恩来：“这个解决了，不许克扣工资，停止经济迫害。应该欢迎双方都回去，抓革命，促生产，不能老对立一辈子吗！你们能下决心对立一辈子吗！”

周恩来看“捍联总”协议边看边念：“抢去的东西按价偿还……

东西打坏许多，能都赔吗？比如你发射那么多炮弹，怎么赔呀！一发炮弹多少钱？“

戚本禹：“一个炮弹几块钱吧？”

总后勤部部长邱会作说：“不止。”

周恩来：“像重庆，向天空打高射炮，房子没给打坏，但是落到长江里打坏了八条轮船，工人阶级看到要流泪的。这个问题暂时不要提了，以后再谈吧。

第五条，坚决贯彻中央的《713指示》，不准以任何借口挑动农民进城。这就行了吗！“

“捍联总”：“还应当加一个，不准到农村去搞打砸抢。”

周恩来：“这个第一条已经有了吗！制止武斗，不论在城市农村都不许搞打砸抢。”

戚本禹："不许到农村搞打砸抢，要也行吗，因为一派调农民进城，另一派也可能到农村去斗争吗。"

周恩来："戚本禹想的比我还宽。"

接着，又谈到第六条，"捍联总"先念了自己的协议草案，"炮轰派"也念自己的协议草案，周恩来和戚本禹讲："差不多！"

周恩来对"炮轰派"说："你们这个就是在'双方保护少数。'"

"捍联总"："这条主要是抓革命促生产，用不上写保护少数。"

"炮轰派"："有的单位多数压少数。"

周恩来："多数压少数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现在有些单位一个组织占了优势，总想把另一个组织压垮，这个不好，只要是群众组织都应当保护，不应该压垮，以理服人，实行大民主，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嘛，……对不同意见的少数不能压制。"

周恩来主持两派达成了关于制止武斗事件的《九条协议》后，派出了以总后勤部史一民部长为首的监督小组，同时派出了中央调查组，于协议签字后到哈尔滨监督调查。

9 月 6 日，中央调查组来到哈尔滨，8 日到哈一机，宣布《九条协议》，传达周恩来的指示，在现场制止武斗，受到了群众的热烈拥护。

哈一机 10 天的武斗共打了 2000 多发炮弹，2 万发子弹，哈一机被打得千疮百孔。

9 月 12 日晚上，哈一机方向又传来接连不断的枪炮声，响

了个通宵。

13 日，双方按周恩来的命令，将武器交到了 23 军，第一次围攻哈一机结束。

哈师院持续到 10 月初中央调查团来了才解围。

## 第 878 回：长春市，分别庆《九五命令》　康生见，宁夏军区及代表

面对吉林省愈演愈烈的武斗局面，吉林省军区和驻长春部队开始着手促成两大派停火，只是武斗的轮子一时还刹不住。

8 月 20 日，吉林市群众组织抢劫了西关粮库 39 万斤粮食、10 多万斤副食品，并两次炸毁铁路专用线。

8 月 23 日，师大两派在校内爆发武斗，打死武装保护 305 所器材库的解放军战士 1 人。

在军队的撮合下，8 月 25 日，吉林省军区和驻长春部队召开爱民大会。两大派组织都应邀参加大会，会后举行了游行。这是几个月来，两大宿敌头一次坐到一个板凳上。

但是，8 月 25 日，长春铁路两派群众组织发生武斗。经省军区武斗监督小组做工作，两派虽同意停火，但枪声依然不断，致使许多铁路职工不能正常上班，造成长春市第二次铁路中断。

8 月 25 日至 26 日，长春北郊一间堡劳改支队两次有人前去抢枪，造成武装冲击劳改支队事件。

几乎每过两、三天就发生一次武斗的长春，让市民陷入深深的惶恐之中。枪声一响，街道立刻不见人影。居民出外采购食物，都觉得是在冒着生命危险。

8 月 27 日，“公社派”组织占领南关浴池和南关大桥，作为武斗据点，实行戒严。270 部队汽车路过，被开枪打死、打伤解放军战士各 1 人。

31 日，“长春公社”、“东方红公社”、“红革会”、“二总部”、长春卫戍区司令部 5 方代表协商，终于签订了《关于制止武斗，恢复生产的协议》，规定两派于 9 月 2 日中午 12 时起无条件全面停火；严禁打、砸、抢、抄、抓，严禁拦路劫车。

这样看起来，好像有了点儿曙光，但实际上还是在打打谈谈，协议的效力很微弱。就在规定停火的当天，9 月 2 日，驻守长春市人委的“红二派”组织与驻守市医院的“公社派”组织分别以市人委大楼和市医院大楼为据点，进行了激烈的枪战。烧毁房屋 864 平方米，损失近 20 万元。

9 月 5 日，“长春公社”、“红二”、长春卫戍区司令部等 3 方代表第二次达成《关于制止武斗，恢复生产的协议》。《协议》规定：所有群众组织的武器一律于 10 日 12 时以前无条件地全部上交；任何组织，任何人都不准以任何借口抢夺武器、弹药和军用物资；不准再自制武斗工具；不准再进行武斗。

在这一天，中央的《九五命令》下发，部队军心大振，各地武器库战士早就憋得乱叫，如今可以开打，即视来抢枪的人为敌人。望见有人来，立刻架起机枪，靠进一步就要宰羊，再无什么顾忌。

9 月 6 日，长春市两大派群众组织分别在地质宫和人民广场集会庆祝中央发布《九五命令》，表示立即停止武斗，煞住武斗歪风。数万群众参加了大会，会后分别举行游行。

吉林市那边依然是战火绵绵。8 月 27 日，吉林电力学院“831”

和驻该院的市糖厂造反组织“红联总部”统一行动，去九站头台子部队抢枪。次日凌晨 3 时，他们乘坐武装汽车出发，路径 5704 厂区附近，将一名询问情况的护厂队员炸死后通过。5704 厂“革联” 护厂队员立即在公路设置路障，准备阻击“831”，同时通知糖厂的同一派组织“长征总部”，“长征总部”立即组织 100 余人前去堵截增援。

7 时左右，“831”车队抢枪回来，在九站下洼子，遇到长春“二总部”的武装汽车队，双方交火，致使 5704 厂 3 名护厂队员和一名正上厕所的学生死亡。电院“831”因遭到前后夹击而溃逃。

8 月 28 日，吉林农业大学和体育学校群众组织组成突击队，前去吉林市尖山子营救被吉林市“公社派”的“尖山子作战指挥部”扣留的长春“红二”的一名宣传人员，发生两次大规模武斗。双方开枪射击，共打死 6 人，伤 17 人；打死生产队马 4 匹，猪 1 头。打坏汽车 1 辆。时称“尖山子武斗事件”。

9 月 4 日，吉林热电厂“革联”武斗队伍到吉林化工机械学校附近进行实弹练习，并在各主要路口设了岗哨，以示威风。吉林化工机械学校造反组织“遵义兵团”不甘示弱，开枪打伤了热电厂“革联”成员，双方发生武斗，相互实弹射击。

“革联”向江北各厂造反组织和“造委会”求援。下午，吉林电石厂“革联”增援，包围了“遵义兵团”驻守的大楼，双方对射。造委会的队伍也来增援，并调来 60 炮、82 炮，75 炮和高

射机枪，化工机械学校正门被炸开。傍晚，双方谈判，“遵义兵团”趁着“造委会”调整队伍，撤出大楼，战斗结束。

1967 年中秋节前夕，“造委会”为了抢运西关各仓库物资，决定调集万人武斗队伍，将吉林电力学院四周的制高点、重要据点控制起来，围而不攻。另外还组织了北山炮兵武斗队和前线武斗队。9 月 13 日夜，前线武斗队从毓文中学沿长春路向电力学院方向推进，用土坦克打先锋，午夜时分，控制了吉林市表厂、西关招待所、市自来水厂等地，拂晓前，控制了长春路和西关招待所附近的主要仓库，同时，北山炮兵武斗队用 160 迫击炮，120 迫击炮，82 迫击炮、75 炮、60 炮连续向吉林电力学院炮轰 3 天。

9 月 6 日晚，外交部支持“联络站”的政治部副主任冼依、研究室副主任邵宗汉、国际司副司长吴亮璞、第二亚洲司副司长王世琨等 22 位司局级当权派，贴出题为《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坚决击退保守势力的猖狂反扑》大字报，坚持认为姚登山的“革命造反精神是一切要革命的领导干部学习的榜样”，“姚的大方向完全正确”，“坚决支持”姚登山的“无所畏惧，彻底闹革命的精神和行动”。

9月6日晚22时至7日凌晨3时半，康生、李天焕接见宁夏军区及宁夏“总指挥部”代表。

康生一开始就问：“今晚来了多少人？”

答：“军区38人，‘总指挥部’28人”

康生问：“‘筹备处’来了没有？‘宁三司’、‘宁总司’

来了没有？”

答：“没有。”

当康生听说“筹备处”是因为对代表名额有意见没有来，说：“告诉他们，不是两个国家，不是重庆谈判，怎么那么计较呢！他们的主要力量在那里？”

张怀礼：“银川、石嘴山、吴忠较多些，其他地方很少。”

牟元礼：“主要在银川，他们和‘宁三司’共约5000余人。”

康生说：“好，我们谈今天的会议。开会，还是各派代表都来，观点不同可以到中央来讲嘛。今天主要是谈军区的问题，让‘总指挥部’的同志也参加。因为部队支持你们，对朱声达的问题，你们与部队是一致的，所以要你们也参加这个会议。在谈军区问题前，我想先对‘总指挥部’同志交待几句。‘总指挥部’同志要注意你们的思想、方向和工作作风。你们在北京搞这样大的东西！”

说着，康生展开宁夏“总指挥部”为刘格平召开平反大会的串连海报说：“我们反对！我还是第一次见这样大的海报，1000多个单位。你们到这里到底干什么？！宁夏问题到底是中央解决，还是你们解决！怎么刚刚支持一下，就成了这个样子，是你们解决就不必来中央，外地来中央的，我还没有见过这样的情况，你们张贴出来自己去看看。同志们，你们这是宗派主义的根子的，你们不仅要夺杨、马的权，还要夺头脑里无政府主义、宗派主义的权，你们到中央开会，给中央下命令，揪这个，要那个，到底

是你们领导我们，还是我们领导你们？这种作风是不好的，你们还没有当权呢，你们这样还能掌好权？！我们要告诉北京的单位不能支持你们的这个作法，北京什么机关帮助你们搞这个东西？还有没有一点社会主义的节约闹革命的思想？你们向中央下命令要揪安子文，揪李维汉，这样搞是不行的，你们对的我们支持，错的我们不支持，你们开这样的会，事先也不通知我们一声，你们在中央嘛！有代表嘛，也不请示我们一下，也不打个招呼，独断专行怎么行！刚刚支持一下你们，家里又在闹分裂，这怎么行，跟人家达成了协议又撕毁，这怎么行！你们不是按照毛主席的指示搞大批判，向大联合、三结合方向走，你们自己先搞分裂，我希望‘总指挥部’的同志，你们注意一下！

当然，朱声达过去对你们镇压，激起你们义愤是自然的，你们的革命精神是对的，在革命中有些义愤是可以理解的。比如说，朱声达下飞机你们拉去斗了，可以不采取这种形式。”

康生又批评朱声达说：“你镇压群众就能想得通？死伤了多少人！你是皇帝？你是贵族？难道不能斗一下！当然，不是说‘总指挥部’不对，还是要向群众解说一下，义愤压抑一下，你们在中央开会，要听中央的安排，要请示中央，不要搞那个形式主义的东西，要多学习毛主席著作，多学习党的方针政策。我第一次接见你们的代表时，已经把中央的方针给你们讲过，根据毛主席的方针，各派群众组织都可以来参加会议，无论是革命的，还是保守的，都来在会上摆事实，讲道理，把是非弄清楚，对受蒙蔽

参加保守组织的群众，要做好政治思想工作嘛！毛主席教导：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总指挥部’你们要主动给‘筹备处’、‘宁三司’做工作，不要造成人家来中央开会就抓人家的影响，你们应该懂得中央的政策，人家来了，你们就揪斗，结果给中央，给北京卫戍区增加麻烦，你们不能唯我独尊，唯我革命。今天不多谈这些了，兰州军区、自治区军区、还有驻军还是要向保守组织群众做工作，我想，我们的工作还是没有做到家的。

我们还是先解决军区的问题，总指挥部同志也可以发言。群众组织的问题待各派到齐再说。”

康生再次要求朱声达发言，他说：“中央有个方针，不管任何同志犯了错误，都要给一个改正的机会，朱声达你到中央采取不讲话、抵抗的态度是错误的，你不讲话，我还少见到解放军干部抱这个态度的。我现在第四次要求你朱声达，不！是第四次请求你朱声达讲一讲，你这个态度不是解放军的态度！不是革命者的态度！不是共产党员的态度！你不是有四个想不通吗？想不通不要紧，你可以讲一讲嘛！讲出来，大家可以帮助你解决通嘛！今晚主要讲军区的问题，也可以联系讲一讲宁夏的形势问题，谁有意见就讲。”

朱声达表了个态，说自己有罪，又不讲了。康生说：“你几次都是这个调子，你犯下的什么罪嘛！要具体讲一讲嘛！你犯的什么错误我们还不知道呢，这又不是讲什么理论问题，以后再写

嘛！你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有哪些不对，也许你也还是有功劳呢！你具体讲出来，你来了二十几天了，还是那么几句空话，戴空帽子，说那个空话有什么用嘛！有哪些想通的想不通的都讲出来嘛，你这叫我们怎么帮呢？主席说对犯错误的要一看二帮，你不说出来我们怎么帮呢？二十多天了，还是叫我们看吗？你具体讲一讲嘛！”

朱声达无奈，又做了检查，结果遭到与会者的批判，说他态度不老实，挂一漏万的，不痛不痒，强烈要求他老老实实地向中央交待具体罪行。

康生：“同志们，我看会议这样开，今晚我主要想听一下在整个文化大革命中，群众和军队方面对朱声达有什么意见，看造反派同志哪个讲一讲。”

“总指挥部”代表牟元礼作了扼要汇报，康生又问了马思义是怎样被打死的，要求惩办凶手，同时强调：“对受蒙蔽的群众要争取团结教育，当然对杀人的坏头头应该处罚、逮捕法办。当然，捕人不要太多，但是是非要弄清楚。”

他点了哈忠国的名，问他：“哈忠国你是代表吗？”

哈忠国答：“我是今天临时来凑数的。”

康生：“你在北京搞的那个1000多个单位的串连海报，都是些什么人你们知道不知道？北京什么人都有，有美蒋特务，苏修特务，还有反革命组织‘516’、‘星星之火’，北京的情况很复杂，你们串连光以派别来分，支持你们的你就要，难道美蒋特

务支持你们也要吗？你们还到北京来给刘格平同志平反，中央早给刘格平同志平反了，现在他是北京军区的政委，是山西革命委员会主任，这能说没有给刘格平同志平反吗？你们来这里开会究竟是给他平反，还是糟蹋他呢？这些问题你们要好好考虑一下，要动动脑筋嘛！接受个教训，以后注意吧。”

“我再讲一个事情，你们要注意一下铺张浪费问题。你们开会来了30名代表，工作人员就带来了39个，你们又不是来做官当老爷的，你们的派头真不小啊，准备材料你们自己动手嘛，应该让工作人员回去抓革命促生产。你们带工作人员的作风，恰恰是我们文化大革命要反掉的东西，听说你们代表团在北京搞了40张月票，还开来两部华沙小轿车、两辆小吉普，一辆卡车，你们领导成员外出坐小轿车，光汽油就花了,1600多元，我要下令没收你们的汽车，告诉汽油站不卖给你们的汽油，联系你们出的那个串连海报，你们的大手大脚不是偶然的，这样给你们指出来，是对你们的帮助，你们要把形式主义铺张浪费好好整整风，兰州军区和张怀礼同志应该帮助你们整整风，你们来北京是革命来的，不是当老爷来的，你们那里斗争还很艰苦，你们要节约闹革命，不要摆阔气。你们来北京的人有带枪的没有？有的话要立即交卫戍区保管，在毛主席身边带枪是犯法的，有这样的人是要逮捕的，希望你们彻底清查一下，这不是儿戏的。”

“总指挥部”继续揭发朱声达的种种问题。

最后，康生又讲了几个问题。他首先肯定62师进驻宁夏后，

解决了青铜峡的问题，宁夏的形势是好的。同时警告造反派头脑要清醒，克服复仇情绪，不要搞宗派，要坚决听从中央对解决宁夏问题的部署。并特别指出“揪军内一小撮走资派”的口号是错误的，要拥军爱民。

当康健民汇报说：“‘筹备处’说青铜峡的反击是赵永夫的人物搞的。”

康生再次强调说：“这完全是革命的行动，告诉他们，再发生这样的事，我们还是照样办理。”“同志们看到了中央的《九•五命令》了吧？不管哪一派都要照这个命令办，解放军要执行，造反派要执行，保守派也要执行，这是命令，不是一纸空文，对这个命令要好好学习，坚决贯彻。解放军的通讯员外出，他们见了就射击，有的打死了，或打伤了，这怎么行！要坚决回击。”

## 第 879 回：聚北航，“天派”商议大行动　北师大，政变炮轰谭厚兰

9 月 3 日，林杰已垮台消息被证实，谭厚兰失声痛哭，说：“这样一来，全国的造反派被压下去，文化大革命就会被葬送。”

傍晚，蒯大富、韩爱晶来到北师大看大字报。灯光下，他们二人用钢笔在大字报上写到：“坚决支持真正的‘井冈山’人”。

晚上，清华“井冈山”、北航“红旗”等组织在矿院开会，北师大王颂平、铁崇光介绍谭厚兰保林杰的情况。会上决定于 9 月 7 日在师大召开庆祝师大“造反兵团”恢复活动大会，以体院为主保卫庆祝大会的主席台。他们还给了王颂平一套广播器材，

9 月 4 日，谭厚兰召开全校大会，以狠抓大批判为名，鼓动大家去《红旗》杂志社游行示威。

当天，周恩来和中央文革负责人接见北京高校红代会负责人，通报了中央文革成员、《红旗》编辑部工作人员林杰等人被隔离审查的消息。

当晚，热锅上的蚂蚁谭厚兰又女扮男装，去王府井沙滩，夜闯《红旗》杂志社，希望和林杰取得联系，了解情况。

9 月 5 日，北师大 35 人发表《关于当前时局的严正声明》，反林杰，敦促谭厚兰。在《声明》上签名的有师大革委会 3 个常委樊立跃、黄家林、李五权，还有诸多革委会委员和各系“井冈山”大队负责人。

当晚，王颂平主持会议，决定恢复“井冈山造反兵团”，准

备召开恢复庆祝大会，邀请“天派”参加。

9 月 6 日晚，轻工“红鹰”的头头朱成和作战部长王启凤来到清华大学乙所，问“天派”头头的会在哪里开？不久，机院的作战部部长洪雷和人大“三红”、体院“兵团”的人也都来了，他们和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第三动态组的负责人张树有一起到清华“井冈山”总部所在的工字厅后厅打听，没人知道。人大“三红”说：“是不是改到北航去开了？”赶快打电话去问，果然，会议改到北航了。当他们赶到北航会场时，一间很大的教室里面，已坐了有五六十人，围了一个大圆圈，中间是发言的人。蒯大富和韩爱晶也坐在里面。

当晚，在北航召集的会上，首先由王颂平介绍师大情况。她似乎对樊立跃他们的造反表示不信任，认为他们和林杰本来就是一伙的。不相信他们是真造反，不愿意和他们合作。而蒯大富和韩爱晶建议他们两家合作，至少在反对林杰这个共同的目标下联合起来，把第二天北师大“井冈山造反兵团”恢复活动的大会开好。

蒯大富、韩爱晶宣布：9 月 7 日在北师大召开“庆祝造反兵团恢复活动大会”。

蒯大富把师大革委会常委樊立跃、黄家林和申家兴从师大叫来，一起进行策划。

王颂平提出第二天大会上喊“谭厚兰靠边站！”

韩爱晶说：“谭是打不倒的，要提‘谭厚兰必须悬崖勒马，回

头是岸’。如果她检查反总理就够了。如果不检查，就没完。”

韩爱晶大谈历史:“孙中山领导了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政府。但辛亥革命以后，大权却被袁世凯窃取了。现在市革委里也有个袁世凯集团。我们造了反，权被袁世凯集团夺取了。”他指着蒯大富说：“我们俩都是市革委会常委，可是连半令纸都动不了。”

王颂平用低沉颤抖的声调说：“黄家林，你想一想，我们都是在困难时期一起战斗过的……可是后来你当了官，就把我们忘了。现在……只有你一个人在革委会里了，你也是受压制，受排挤的，你的处境我们也知道。记得去年 10 月份，你也把队伍拉出来，跟我们一起战斗，你现在的处境,《井冈山之声》的处境，我们也清楚。”

王颂平一番话，感动得黄家林几乎流出眼泪，立即表示：“我们是有感情的。这一回无论如何得好好干了。”

蒯大富、韩爱晶都凑上来打气。蒯大富对黄家林等人说：“你们要积极支持‘造反兵团’恢复活动。”

韩爱晶说：“你们以后要团结在一起战斗，最后再合在一起，再叫北师大‘井冈山’。你们是真正的师大井冈山人。”

蒯大富让樊立跃回去把明天用的广播器材等设备准备好。

有人提出：“只怕‘地派’来冲会场引起武斗”，于是决定，各校都多去人，纪律一定要好。由体院“毛泽东思想兵团”的刘长信负责调动会场队伍。

体院刘长信说，他让运动系的人提前进场保卫主席台。

不知谁又提出，最好“天派”集合起来一起进场，这样声势浩大，又可保持良好的纪律。

最后，北航刘德威总结了几条：（1）各校尽量多发动人去，（2）遵守纪律，（3）明天早晨都到北航南操场集合一起去师大。而且决定由清华的鲍长康代表“天派”发言，由清华拟发言稿，原因是鲍长康在清华9月1日已经对林杰的问题发表过一次影响比较大的讲话。韩爱晶说：“就让他再表演一次吧”。

蒯大富说他也想到师大去，韩爱晶说：“你别露面，留一步，我认识的人少，在底下转转没什么，你不要去，找个离师大近的地方，设个前线指挥部，有人给你通风报信就行了。”

北航刘德威：“把老蒯坐镇的地方设在电影学院，那里离师大近，又是‘天派’的‘井冈山’掌权。”

蒯大富同意了。

北京电影学院就在北师大对面。于是决定大会指挥部就设在北京电影学院“井冈山”总部。

对北师大“造反团”恢复活动大会的具体工作也分了工，北航送一面“师大井冈山造反兵团”的大旗，清华为大会做一个横幅，装一辆广播车。

参加大会的人数，蒯大富说：“我半小时就可以调动 3000人”。

韩爱晶说：“北航去两个系”。还说：“今晚一定要通知那些没有参加今晚会的学校明天去参加师大的会。”最后又一再问师

大的王颂平还需要什么？韩爱晶嘱咐王颂平要把明天的发言准备好，把人组织好。那时，北师大的“井冈山造反团”大约不到100人。

会议到第二天凌晨2点多才散。蒯大富派小汽车送黄家林、樊立跃、申家兴、王颂平、铁崇光回校。

9月7日早晨6时，清华大学的高音喇叭就大声广播：“井冈山”的人去师大。蒯大富则坐车先去了北航。

因为时间尚早，蒯大富让“井冈山”第三动态组的林贤光和负责“井冈山”后勤的常燕群先到北师大去看看。于是林、常二人坐着摩托从北师大的前门进后门出走了一趟。觉得情况很好，“造反团”在大门处摆了签到处，校内大字报很多，几乎都是揪林杰、揪谭厚兰和批判谭厚兰的大字报，还有不少从“井冈山”造反出来要求参加“造反兵团”的表态大字报，而且听到早上北师大广播台造了反。二人觉得形势简直好得不得了，赶紧回到北航向蒯大富和韩爱晶汇报。于是，蒯大富和北航刘德威带着林贤光和常燕群去了电影学院。

9月7日早晨8时左右，北师大的樊立跃等人在“727广场”召开大会。会上，他们突然把谭厚兰反剪双手押上主席台进行批斗，并宣布成立一个由十几个人组成的“专政委员会”，接管北师大革委会。“专政委员会”的主要成员是黄家林、樊立跃、李五全等一些校革委会的委员再加上李庆林与即将恢复的“井冈山造反兵团”的几个头头。

会上，谭厚兰同班同学，6 月 23 日谭厚兰大字报签名者之一，时任谭厚兰的秘书郑秀梅等人上台揭发谭厚兰。

大会实况通过学校的有线广播传遍全校。于是乎，“井冈山公社”的人纷纷来到恢复活动后的“井冈山造反兵团”楼下排队，领取加入“兵团”的申请表格。现场两部油印机忙个不停，赶印申请表格。

樊立跃在大会上宣布成立“专政委员会”名单时，突然听见主席台上的郑云云说：“兵团是否参加‘专政委员会’，未定。”

这是怎么回事？本来，樊立跃等人清晨在教三楼前商议“专政委员会”组成名单时，王颂平、郑云云都是满口应承参加的。可是，当韩爱晶听到谭厚兰被押到台上揪斗的消息后，立即坐吉普车赶到师大，叫来黄家林说：

“你们怎么现在就斗谭厚兰？你们这样搞太被动。”

得知黄家林、樊立跃成立“专政委员会”，韩爱晶连连摇头说：“‘专政委员会’，这个名字不好！”

韩爱晶立即找到王颂平说：“千万别和‘专政委员会’搞在一起。”所以，大会上郑云云改了口：“兵团是否参加专政委员会，未定。”

物理系 64 级的学生赵惠中听说成立“专政委员会”，也去找李庆林问个究竟。他在物理楼碰到了李庆林，问他：“你进‘专政委员会’的事知道吗？这么大的事怎么连招呼也不给我打一声？”

李庆林说："我不知道。"

赵惠中说："你不知道的话我就去说明你不知道，不承认此事。"

李庆林表示同意。

当赵惠中赶往大会主席台时，正遇上"井冈山造反兵团"也在台上表示，他们与"专政委员会"无关。赵惠中当即抢下他的话筒，说李庆林也不知道"专政委员会"的事，不参加这个"专政委员会"。

这时，坐镇电影学院的蒯大富也听说，师大有人抓了谭厚兰，要批斗她，但不知是谁抓的，反正不是"造反兵团"抓的。蒯大富和刘德威听了都急了，说："抓不得，斗不得"，让赶快去看看。于是，刘德威拉上清华动态组的林贤光赶到师大，在宿舍找到了"造反兵团"的王颂平。

王颂平说："樊立跃今天早上突然搞了一个'专政委员会'，把谭厚兰抓了起来，还说这个'专政委员会'里面有'造反兵团'参加，但是，我们不承认我们参加了"。

刘德威问："现在谭厚兰在那里？"

王颂平说："现在谭保护在我的宿舍里"。

刘德威说："赶快放了，否则他们造谣说你们扣了谭厚兰"。

于是，王颂平立刻派人去把谭厚兰放了。

10 时左右，"天派"上万人来到北师大"7·27 广场"，参加"打倒林杰，彻底摧毁 5·16 兵团誓师大会"和庆祝"井冈山造

反兵团”恢复活动的大会。韩爱晶、朱成、刘长信等人都到了。

韩爱晶看形势很好，就派了北航的车到电影学院把蒯大富也接过来。

大会开得很顺利，清华“井冈山”的鲍长康在会上发言支持“井冈山造反兵团”。

在清华大学，“团派”广播台连续广播北师大揪斗谭厚兰的实况，说林杰既是谭厚兰的后台，也就是清华“414”的支柱，号召“414”派群众反戈一击，弃暗投明。

北师大的高音喇叭中，一个接一个的播放师大“井冈山”几十个战斗队宣布集体加入“造反兵团”的名单。教三楼下排队领表的人，听见广播所属的战斗队已经宣布集体参加了“造反兵团”，便松了一口气，不再排队。正在教三楼前印呀，发呀，登记呀的“兵团”几个人终于不那么忙了，可以缓口气了。

谁知，到了下午，形势急转直下。中央文革小组派人到师大传达紧急指示：

“中央文革小组坚决反对开群众大会斗争谭厚兰，反对搞垮师大革命委员会。谭厚兰和师大革命派在二、三月份反对谭震林、批判谭震林是完全正确的，我们支持他们的这种行动，你们应当立即释放谭厚兰同志，希望你们严格执行毛主席和党中央的路线，提高革命警惕性。”

当天下午，北京卫戍区的李钟奇也到北师大，宣布北京市革委会于当天发布的通告：

“1、北师大今天在个别别有用心的人的操纵下，推翻师大革委会，非法绑架和斗争谭厚兰与师大革命委员会委员，这些作法都是完全非法的，都是违反中央《六六通令》的，完全违反中央负责同志最近的讲话精神。现宣布无效。应立即恢复师大革命委员会的一切权力。2、樊立跃等人自己组织的‘专政委员会’是非法的，应立即宣布解散。3、樊立跃、黄家林、李五权三人拘留审查。”

“地派”人马不断来到师大，声援谭厚兰。

晕头转向的北师大“反谭”头头们赶紧开会研究，王颂平、铁崇光、方延曦等，此时堪称冷静。他们认真反复研究中央文革紧急指示，句斟字酌，对中间的“我们”、“你们”、“他们”指的具体对象、含义进行反复解析，认为“内涵深刻”。不知道他们是怎么嗅出“紧急指示”中对“井冈山造反兵团”有批评、爱护的深情厚义。蒲寿章则在大家莫名其妙的解析和屋外边“地派”震天的声援声中呼呼入睡。

晚上。谭厚兰在“7·27广场”召开大会，表示拥护中央文革紧急指示、北京市革委会通告，并声讨“专政委员会”的罪行。高音喇叭传来谭厚兰泣不成声的控诉，她悲痛自己被专政了半天多。但是，她声泪俱下的控诉却很难催他人泪下。人们清楚记得，她今天被专政，没有一个人，一张大字报保她，连她的秘书也在揭发她。

谭厚兰话题一转，矛头直指“兵团”，说“兵团”是“一月

风暴反夺权的逆障”、“二月逆流的怪胎”、“颠覆红色政权的急先锋”、“专政委员会的罪恶帮凶”，是“一伙反革命小爬虫、变色龙”。师大的夜空，回荡着她的声音。

睡了一下午的蒲寿章醒来已是晚上。他一个人，从最东边教三楼向西横穿，进入“7·27 广场”，登上了主席台，站在谭厚兰身边。

谭厚兰吓了一跳，没有料到这个被她称之为“师大蒲鲁东”的蒲寿章会突如其来，本能的骂了声“无政府主义……”在几千人面前，竟然没有了下文。

终于有反应快的领喊：“打倒无政府主义！”

蒲寿章走近话筒：“我有话说。”

会场顿时安静下来。

蒲寿章找关键话进行反击：“谭厚兰反对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她才是师大真正的无政府主义者！所以，这个谭式政府，就得无！”

谭厚兰立即否认：“造谣！”

“你谭厚兰反对国家总理，司马昭之心，师大人人皆知。‘造谣’是你的专长。你还在继续执行林杰‘搞阶级斗争无诚实性可言，可以矢口否认’！”

谭厚兰下午刚拥有的“尚方宝剑”却一时没有用上，而蒲寿章使用“杀手锏”却娴熟于心！他把林杰和谭厚兰牢牢捆上，林杰是她的死穴。

“我来揭发蒲寿章一大罪行!”伴随尖声厉叫，一员女将，物理系的彭加蓉跳上台，站在蒲寿章面前揭发：“今年 1 月，蒲寿章在主楼 520 召开一个黑会,怀疑我们最最敬爱的康老!”

这颗重型炸弹引爆出怒吼:

“蒲寿章怀疑康老罪责难逃!”

“蒲寿章必须低头认罪!”

蒲寿章知道，如果此时示弱，或者说走了嘴，后果不堪设想，必须做出快速反应。

“不错，1 月那个会是晚上开的，因此可以叫‘黑会’——”下面有人发出笑声。

“不错，会上我表现过对康老的怀疑——这种怀疑怎么产生的呢？”下面立即安静，等着听下文。

蒲寿章竟然讲起故事来：“今年 1 月，我串联回来，出了火车站，经过天安门，看见‘揪出陶铸式的反革命两面派康生’的巨幅标语，非常吃惊。进了师大，我更加吃惊：没有看见谭厚兰一条保康老的标语、大字报，于是怀疑产生——如同今天，你们革命委员会冒出来一个‘专政委员会’，宣布对谭厚兰专政，没有一个人保她一样。肯定大家现在还是怀疑这个谭厚兰有问题。这是正常的思维过程。揭发我的这位女将，用不着大呼小叫。而且，你也参加了那个会。好像就是你说的谭力夫是康生的养子!”

那女将尖声厉叫：“造谣!”气冲冲地下去了。

“谭厚兰不是在这里高呼过‘革命的造谣好得很’吗？”

旁边的谭厚兰，镜片后的眼睛翻白，气得要活吞了眼前这位蒲寿章。

蒲寿章没有停止："去年 12 月 27 日晚上，就在我现在站的地方，大家都看见康老把林杰引到前台。谁也不能否认，康老亲口讲林杰的后台是关锋，关锋的后台是他！坦白地说，我现在还有这个问号……"

终于有人打断他继续放"毒"，领呼：

"蒲寿章怀疑康老绝无好下场！"

"打倒无政府主义！"

此时，江青等人正在人民大会堂接见首都红代会代表，她批评"天派"的几个头头："你们是蠢木头，败家子，叫你们不要管人家的事，你们偏要去，结果出了乱子，上了坏人的当……你们要进行检查。"

这次接见，北师大王颂平也去了，江青一见就劈头盖脑的说："你就是王颂平！我可认识你了！我今天不和你说！"

事后，蒯大富、韩爱晶等人被迫向谭厚兰道歉，但北京高校天、地派之间的矛盾和斗争有增无减。

## 第 880 回：评陶铸，郑州市枪声不断　开封市，八二四进攻东郊

9 月 7 日晚 20 时 30 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姚文元的文章《评陶铸的两本书》。次日，《人民日报》刊登了这篇文章。

《评陶铸的两本书》原标题是《修正主义者的丑恶灵魂——评〈理想·情操·精神生活〉和〈思想·感情·文采〉(100)的反动本质》。毛泽东于 8 月 20 日、28 日和 9 月 5 日，三次审阅修改姚文元和他在上海的写作班子起草的这篇文章，将题目改为《评陶铸的两本书》，认为该文写的很好，建议在北京发表。同时提出“宜在二三个月内写几篇批刘文章”。毛泽东在文中谈到“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处加写一段话：

“这个反动组织，不敢公开见人，几个月来在北京藏在地下，他们的成员和领袖，大部分现在还不太清楚，他们只在夜深人静时派人出来贴传单，写标语。对这类人物，广大群众正在调查研究，不久就可以弄明白。”

文章说：

“现在有一小撮反革命分子也采用了这个办法，他们用貌似极‘左’而实质极右的口号，刮起‘怀疑一切’的妖风，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挑拨离间，混水摸鱼，妄想动摇和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达到其不可告人的罪恶目的，所谓‘五·一六’的组织者和操纵者，就是这样一个搞阴谋的反革命组织。应予以彻底揭露。”

“这个反革命组织的目的是两个，一个是要破坏和分裂以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一个是要破坏和分裂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支柱——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

“对这类人物，只要用毛主席教导我们的阶级分析的方法，看一看他们对待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态度，看一看他们支持谁、反对谁的政治倾向性，看一看他们的历史，便可以从变化不定的形象中发现一只反革命的黑手。”

这是第一次公开在报刊上提出要在全国彻底揭露“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

另外，毛泽东删去文中一段话：“‘劳动人民知识分子’是不通的。知识分子都从属于一定的阶级。根据毛主席《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的分析，只能从知识分子的阶级立场和世界观，来判断其属于无产阶级知识分子或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属于左派、中间派或右派。你咒骂这种科学分析是‘肃杀之气’也好，杀肃之气也好，对立阶级的客观存在是你反革命黑话抹杀不了的。”

针对河南开封“左司”最近发生的拦截火车、阻拦交通，冲击军事机关等行为，9 月 7 日凌晨 1 时 10 分，周恩来电话指示驻开封部队：

“把9月5日的命令读给他们听，劝说他们一定要坚决执行，这是毛主席最新最高指示。不准抢枪、不准抢劫火车，这样做是不对的。”

“可以告诉他们，双方派代表，组织双方谈判。把武器封存起来，不要再继续武斗了。如果开封谈不成，可以派一定的代表到郑州。如果郑州解决不了，可以到北京。应当就地停止武斗，就地谈判。总之，不要再在那里搞紧张局势，不要再继续武斗。”

“要他们坚决执行命令，维护命令，执行最高指示。做耐心艰苦的工作，坚决贯彻《九五命令》。如果发生情况，及时向我们报告。”

接到周恩来电话指示后，开封驻军支左领导小组和开封“824”总指挥部研究了同开封“左司”谈判的有关问题，并于当天下午，由开封驻军支左办公室派代表到化肥厂和开封“左司”等组织接触。

9月7日下午，王辉在河南省体育馆“二七公社”基层服务员会议上传达周恩来等中央领导9月5日凌晨接见他和刘建勋时的指示：

“一、周总理及其他首长要求‘二七公社’及河南驻军很好地学习《八二五号召》，九月一日中央首长讲话，九月四日主席亲自批发的命令，很好地执行，很好地贯彻，大张旗鼓地进行宣传，在偏僻的地方，可以派飞机散发传单，使《八二五号召》、《九五命令》家喻户晓。

二、集中力量搞大方向，狠斗文敏生、赵文甫，把他们斗倒、斗臭。

三、总理讲：你们的仓库是一级战备仓库，听说仓库被抢，

问题是严重的。抢了枪的要交出来，二七公社的情况我们很清楚，军队要按中央指示办事，每天向中央汇报一次。五日晨总理来电话，让开封老保放下武器，生命有保证，同时希望郑州驻军及‘二七公社’给予‘824’政治上的支持。

四、总理讲：听说你们那儿每天都有打死人的情况，这很不好，要立即制止，对打死人、打伤人的要处理。（首长问死伤情况时，回答有8人。总理说，不止吧，有30多人。）

五、‘二七公社’、驻郑解放军对不同观点及保守组织的群众，要讲政策，现在在北京告‘二七公社’的人很多，希望你们能按政策办事。

六、希望你们能很好地把‘抓革命，抓生产’的任务搞起来，秋收工作马上就要开始了，秋收搞得不好，你们的日子就不好过，就有罪，工业要很好地抓上去。

七、军分区、县人武部不搞四大，要进行正面教育。

八、现在有些人对全国形势的看法与党中央看法不同，请你们很好地看看九月一日的讲话，请你们与‘二七公社’共同注意教育无政府主义的人，防止坏人混水摸鱼，现在有些行动破坏了社会治安，希望提高警惕。

九、枪和物资，告诉‘二七公社’自动送回国库，协助他们坚决执行命令，你们的权力要认真执行。

十、军委吴法宪等首长指示：河南军区改组了，何运洪垮台了，‘二七公社’胜利了，要紧紧掌握斗争大方向，‘二七公社’

要做送枪的模范。

康生同志、戚本禹等同志指示：你们那里有乱打枪的现象，治安不好，人心惶惶，同志们要共同加以制止。”

9 月 11 日，开封驻军继续派代表和开封“左司”等组织协商。

9 月 12 日晚上，开封“824”传下命令：“今晚将有大行动，向保守派据守的东郊发起进攻。”

午夜，“824”全副武装、子弹上膛刺刀出鞘，按照总指挥部的命令和部署开始向东郊工厂区的城墙方向运动，当晚的口令是：文攻。回令是：武卫。

夜静悄悄的，没有一点声响，甚至听不到一声狗叫，空气中似乎弥漫着激战前的肃杀之气以及有点让人感到激动的兴奋。

街道上空无一人，能感觉到沿途民房里的居民有些并没有睡，可能有些人正在黑暗中从窗口或门缝偷偷注视着这些人的行动。那时候晚上能睡个安稳觉的人不多，尤其是这种处于两派结合部区域的百姓，零星的冲突时常有发生。甚至能安稳地躺在床上睡的人都不多，好多人放弃家里的床而改打地铺睡在地上，怕的是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有流弹从窗子飞进来要了自己的命，床比地高，地上比较安全些。

传言很多，即便是从正式的、中央传达下来的消息也称武汉的“百匪”、四川的“产匪”这类组织的残余人员已经流窜到河南和开封，并且和开封与他们持相同或相近观点的“左司”结成

了同盟，妄图在河南或开封借尸还魂东山再起。

有传闻说他们势力强大，武器精良，能攻善战。

9 月 13 日拂晓时分，几发信号弹腾空而起，随之枪声大作，各种各样的枪支发出密集而杂乱的声响，红绿色曳光弹的轨迹像流星雨一样，交叉着在夜空中划过。其间还不时穿插着隆隆的爆炸声，应该是手榴弹。

激烈的枪声并没有持续很久，天亮前，仪表厂已经被“824”攻占。

当确认武斗结束后，解放军就跟进来对这个厂实行军管。

不久空分厂也攻下来了。

东郊的武斗基本上都是击溃战，“左司”几乎全都是一击就溃或稍加抵抗后即弃守而逃。

开封联合收割机厂、开封东郊公社的边村、王娘庄、厂尚等开封“左司”的据点，均被“824”悉数夺取。至此，开封化肥厂变成了一座孤岛。

当晚 21 时，河南省军区来电：指示 1 军负责人通知双方：

一、双方立即停止进攻。

二、由 8172 部队和 7249 部队负责人出面召集双方代表进行谈判。

三、由部队派出武装警卫接送，保证双方代表人身安全。

9 月 15 日，经过开封驻军支左工作领导小组的多次努力，开封“824”与开封“左司”就开封化肥厂问题达成三项协议：

一、从 9 月 15 日 20 时起，双方一律停止武斗。

二、双方在现占领区停止武装进攻，对峙的地方由人民解放军开封警备区司令部巡逻。

双方对巡逻部队不得开枪，否则，要严加处理。

对打死、打伤解放军者，以反革命论处。

三、开封警备区司令部从 9 月 15 日起执行任务。巡逻部队一律佩带开封警备区的袖章。

经过多轮谈判，开封化肥厂的问题直到 10 月 1 日才最终解决。

此时的河南郑州，接替郑州 8202 卫戍部队，负责河南三支两军的是 8215 部队。这支受中央军委之命，进驻郑州的部队从一开始就旗帜鲜明地支持“二七公社”。

在当时“文攻武卫”、“武装左派”的思想指导下，8215 部队向郑州大学、河南医学院等“二七”组织发放了大量的枪支。在“河南二七公社”的一次大型集会上，大刀、长矛林立的人海之中，一支全副武装的大学生队伍格外引人注目。这支队伍，清一色的美式卡宾枪，使屡建奇功的中学生“二七近卫军”、“五四战团”的大刀、长矛显得十分的寒酸。组成“近卫军”、“五四战团”的技校、高中学生心理马上失去了平衡；他们理所当然的要求给他们配发枪支。

解放军答应了部分学校的要求，但不可能使所有的学生人手一枪。没分到枪的学校被激怒了。你不发，我就抢。从而引发了

郑州大规模的抢枪事件。各县、区、公社大型厂矿民兵训练用的枪支弹药被学生们洗劫一空；郑州军械所被抢了个底朝天。

只是在电影里见过枪炮的学生，这下子开了洋荤。各式各样的枪满满的堆了一教室。十中“红旗”抢来的重武器有：一门小炮、一挺重机枪、几挺歪把子轻机枪、一挺转盘式机枪。长枪类有：苏制的冲锋枪、步骑枪；日本造的三八大盖；美国造的卡宾枪、汤姆枪；中国造的七九步枪。手枪也应有尽有：如日本的王八盒子、撸子；德国造的二十响、驳壳枪、勃郎宁；还有几把玩具似的袖珍手枪，叫不出名字。至于手榴弹，就更多了：有带楞的，是抗日、解放战争用的；有瓜状的，是日本人或美国鬼子的；更多的，是当时中国军队配置的，爆炸后会粉碎成黄豆大小的铁块、杀伤力极大的新式手榴弹。

学生们抢来的这些枪，也派不上用场，郑州全市已经没有一处反对派的据点，武斗也停止了，在郑州枪没一点用。没事找事的“二七公社”组织了一支支的志愿军去支援其他省的造反派。参加支援新疆造反派的志愿军，刚刚进入新疆，就被对立面伏击，郑州市近 10 名青年学生在新疆洒尽了最后一滴血。在一个细雨飘洒的日子，河南“二七公社”为他们组织了盛大的追悼会，将他们安葬在郑州大学的“二七烈士陵园”之中。

那时的郑州街头，一天到晚枪、炮声不断，但没有一处枪响是由于发生了武斗，都是学生们在打枪寻开心。不断有街上的行人被天上掉下来的子弹头击伤，即使在自己的家里，突如其来的

流弹也会要了人的小命，那时、死于非命的人数一天比一天多。

郑州十中的学生在操场扔手榴弹，成箱的手榴弹被搬到院里，同学们用真的手榴弹开始了一场比赛，看谁炸的坑最远。于是，一颗颗的手榴弹从南向北飞去，学校的操场被炸成了麻子一样，坑连着坑。大家正扔的高兴，学校的炊事员抱着膀子大呼小叫地从食堂跑了出来，血顺着胳膊流满全身，大家赶紧停下来，跑过来一看，原来，这位大师傅正在和面，一个弹片从窗子里飞近来，正打进他的右膀子里，学生们赶紧把他送进了医院，他成了学校在抢枪后受伤的第一个人。

自从抢枪事件发生之后，这些流散在民间的枪支给社会造成了极大的危害。为了收缴枪支，“二七公社”费了很大的劲。军管会限定了缴枪的最后期限，各中学校园里开始了最后的疯狂，一箱一箱的子弹都搬到了校园，狂风暴雨般地向靶子开火，一箱一箱的手榴弹抬到了操场上，整个操场被炸的坑坑洼洼，几乎没有一处平地，就连几发炮弹也将小山炮拉到黄河边打向了黄河，最终送到军分区的全是空枪，空炮，一粒子弹、炮弹也没有送去。

郑州持续几个月的抢枪风潮，很快就平息了。

## 第 881 回：战江津，杀战俘再造惨案　第六次，接见天津市代表

四川江津是聂荣臻的故乡，也是中共创史人陈独秀墓冢之地。

1967 年 6 月，江津县形成重庆“815”派支持的“97”派和重庆“反到底”派支持的“红总”派两派群众组织，并于 6 月 7 日发生了第一次武斗。此后，在不断进行的武斗中，“97”派逐渐将“红总”派压缩包围在县城中心地段。被压缩到城中心的“红总”派人员也都拿起了武器，加强武斗工事和据点，随时准备与进攻的“97”派决一死战。

据当年武斗的亲历者罗学蓬在《震惊全国的文革“江津杀俘事件”》中回忆：当时每间店铺、每家民房，都住满了手持刀枪棍棒的“红总”派武斗人员。

7 月 24 日夜间 11 时许，围城已久的“97”派终于发起了大规模的总攻，战斗在房顶、大街上展开。双方使用棍棒、梭镖、石头、砖头、瓦块、土炸弹、土炮，将县城几乎打成一片废墟。

激战一夜半日，到 25 日下午 15 时许，“红总”派被打得落花流水，溃不成军，大部队由西门突城，穿过陈独秀落难江津时住的康庄，潮水般涌过陈独秀先生墓前，经刁家、高占逃往白沙，再辗转亡命成都、自贡。少部由通泰门下河，欲泅渡逃生，被“97”派武装人员驾船在江面上捞起抓获。

至 8 月中旬，亡命成都、自贡的江津“红总”派武斗人员全

部奉命汇集于成渝铁道线上的永川县城，厉兵秣马，准备大举东下收复失地。他们在永川驻军“明抢暗送”下，大规模抢劫了永川县武装部军火库，准备要“打回江津去，”消灭“97”派！

8 月 26 日深夜，“红总”派的武斗前锋乘闷罐车，沿成渝铁路东下，到达江津县朱羊溪车站。在一阵鸣枪放炮后，兵不血刃进入了朱羊溪。因为当地的“97”派早已闻风逃往了下游的白沙镇。江津“红总”派一举占领了火车站、邮电局、粮库和朱羊溪扼制铁道线，俯视长江的制高点。

随即，“红总”派到处强提物资，先后拦截过往船只十多艘，还把由重庆运往屏山县的省交通厅的 70 多吨炸药没收，用来制造土炸弹。

撤进白沙的“97”派头头跑到县城向“97”派的县武斗司令部请求支援。县武斗司令部决定从江津派出精兵强将，主动出击，先下手为强，在 9 月 7 日该派周年庆典到来之前攻下朱羊溪，将“红总”派前锋人员全部赶回永川。

9 月 5 日，江津“97”派武斗指挥何司令在县府招待所主持召开了攻打朱羊溪的军事会议。会上先由侦察人员详细介绍了朱羊溪当前的情况，随即决定从长风机器厂“81 兵团”、县委机关“红八路”，以及江津中学“红 97 兵团”中抽调 500 余名武斗人员，调集将长风厂生产用船焊上钢板装甲，架设炮台、机枪射击孔改装而成的土军舰 5 艘，及汽车 10 多辆，分水陆两路突袭朱羊溪。

会后，各路人马连夜出发，偃旗息鼓秘密开赴朱羊溪。

与此同时，驻江津部队也接到了中央关于立即停止武斗，全面收缴武器的《九五命令》的急电。

支持“97”派的驻江津部队得知“97”派的武斗人员已经发兵朱羊溪，于是将中央《九五命令》照本宣科地向“97”派头头作了传达。

“97”派头头连夜驱车赶到李市，拦回了陆路武斗人员，而主力人员则在何司令的率领下，仍按原计划，溯江破浪杀向朱羊溪。

9 月 6 日上午，“97”派的武斗大军向朱羊溪发起进攻。5 艘土军舰上的大炮及武斗人员携带的迫击炮连连发射，轻机枪、半自动步枪、冲锋枪、几十挺长风厂自产的坦克用重机枪一起开火。防守朱羊溪的“红总”派部队很快就溃不成军，大部队立即突围。“97”派大获全胜。

这场武斗中，“97”派抓获“红总”派 15 名战俘，“97”派死 9 人，“红总”派被击毙 4 人。

至此，江津县两派的大规模武斗告一段落。

9 月 6 日晚，“97”派的武斗“舰队”返航，抵达江津通泰门码头。城中得着捷报，“97”派早已组织本派群众，迎接凯旋之师。码头上人山人海，旗帜招展。而 9 具躺在担架上的尸体，在欢迎的人群中引发出呼天抢地的哭嚎声。

率队的江津“97”派武斗何司令登高讲话，慷慨激昂，以毛

泽东诗句“唯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鼓励死者亲属们“化悲痛为力量”、“掩埋好同志的尸体，踏着战友的血迹继续前进”。而死者亲属们冲向 15 名战俘，用拳打，用脚踢，用牙咬，用一切能泄愤的手段。从通泰门码头，到东门县委旁边的民工纪念堂三、四华里的路途中，战俘们被夹道的人群辱骂、毒打，好几名战俘的耳朵、鼻子在众目睽睽之下被咬掉、撕裂，一个个连滚带爬，鲜血淋漓。当夜，“牺牲者”被停放在民工纪念堂里，而 15 名战俘则被关押在舞台下面的乐池里。

9 月 7 日，是“97”派的周年纪念。9 具“烈士”的遗体用白绸裹身，整齐地排列着停放在主席台下，尸体上覆盖着一面本派组织的鲜红派旗。而 14 名战俘的双臂都被反捆着，成一排跪在“烈士”们的脚下。另一名俘虏在押出乐池时，听到外面震天动地的怒吼声，恐惧过甚，精神崩溃，突然向窗口扑去，立即被乱枪击毙。

民工纪念堂大门外的东门广场上成了人与花圈、旗帜的海洋。痛哭声与口号声汇成了持续不断惊天动地的声浪。

追悼会上，悲痛难抑的死者亲属们对那些战俘或用刀砍，或用手榴弹砸。而看押的人员出于派性感情，也仅是虚张声势而并不认真制止，4 名战俘在会上当场被活活打死。

追悼会结束后，遍体鳞伤的魏炳炎等 10 名战俘仍被关押在民工纪念堂乐池里，5 具已状如烂肉般的战俘尸体也被扔进纪念堂乐池。不少“烈士”的亲属为了报仇雪恨，设法进入民工纪念

堂报仇。至 8 日晚，又有 3 名战俘在乐池里被杀死。

9 月 6 日至 7 日，江津县“97”派召开的司令部专门会议，讨论对活着“战俘”的最后处理。以何司令为首的头头，坚持为了安抚手下的武斗人员和“烈士”家属，必须全部杀掉；有的害怕做出集体屠杀战俘的决定，日后会承担责任而表示反对。

会议中发生武斗干将冲进会议室，大哭大闹，逼着头头们非杀不可的场面。于是，会议决定处决战俘。在讨论由谁去执行问题时，有头头提出，既然处决战俘是为烈士报仇，那么最好由“牺牲”人数多达 8 人的“红八路”去执行。但偏偏嚷得最凶的“红八路”却悲痛有余，勇气不足。因为他们全都是县委县府机关的干部，顾虑最多而不敢接手。他们不敢自己亲手杀人，却非常积极地支持别人去杀人。“红八路”的头头建议，改由血气方刚的江津中学的学生组织“红 97 兵团”，或者是工人阶级的组织长风厂“81 兵团”执行。但学生和工人们的头头同样能找出若干理由来推诿，不愿去做刽子手。研究来研究去，竟有人提出“哪个组织抓回来的就分配给哪个组织去杀”的建议。

为了维护司令部决定的“尊严”，头头们不得不在 9 月 8 日晚间召开的第三次会议上，将这一人人畏惧的任务交给了外地人，重庆长安厂“八一兵团”派到江津支援子厂长风厂“八一兵团”的一支精锐武斗队去执行，由长风厂“八一兵团”协助。

9 月 8 日午夜后，从民工纪念堂到东门长江边上的车渡码头，沿途布满了警戒线。白沙中学的学生魏炳炎等 7 名活着的战俘被

捆着从民工纪念堂里押出来，上了一辆带蓬布的解放牌大卡车。为防止被杀者叫喊，每个战俘的嘴里都被塞进了布团。8 具已死战俘的尸体也被扔上了汽车，开到河边的车渡码头。执行队员们戴一色钢盔，穿一色劳保服，人人手持枪械，两人挟一个，将已吓瘫的战俘们架上了汽车轮渡。

战俘魏炳炎发现在左边挟着他的是他白沙镇的邻居，长风厂当工人的许智清。魏炳炎欲求他救命，但嘴里塞着布团，叫不出声，只能扭着脑壳，拼命拿眼看他。许智清面色如铁，视若不见。等到那 8 具尸体被抬上舱面，渡轮一不亮灯，二不鸣笛，悄悄地向着江面驶去。

船到公园一带，刽子手们先将 8 具尸体扔进长江里，然后便开始杀人。战俘们被推到船边，刽子手在后面用半自动步枪对准后脑勺或后背开枪。枪声一响，有的战俘自己倒向江中，有的身子往后倒，则被一脚踢下河去。许智清踊跃上前，将魏炳炎推到船边，用枪口抵住他的后脑勺，同时提脚，猛地踢在魏炳炎的屁股上，魏炳炎立即掉进了江中，接着就是一枪。

魏炳炎被一只渔船救起后，死里逃生，回到成都。

由于这一事件恰恰发生在中央关于停止全国武斗的《九五命令》后的第三天，“反到底”派的报纸将魏炳炎作为“英雄”，对他详加采访后，并将这一血腥事件加油添醋地披露出来，顿时在全川乃至全国激起轩然大波，直至惊动了中央文革小组。无疑便成为掷向对立的“815”派的一颗重磅炸弹，使其在政治上陷

入极其被动的境地。“815”派为摆脱困境，也在自己控制的报纸上竭力组织文章反驳，说魏炳炎其人纯属子虚乌有，江津“杀俘”事件纯属捏造。

“文革”后期，根据中央的精神，有关机构对“文革”中的“三种人”开始进行全面清算。江津杀俘事件的主要责任人被判处有期徒刑 7 年。

9月8日凌晨零时50分至5时30分，在人大会堂安徽厅，陈伯达、谢富治、江青、戚本禹第六次接见天津赴京代表团。陪同接见的有：北京军区司令员郑维山，副司令员罗元发、肖文玖。被接见的成员：天津“五代会”、“大联筹”双方代表，天津市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解学恭、肖思明、杨银声、江枫和北京军区、天津66军工作人员。零时50分，陈伯达等人进入会场，大家热烈鼓掌。

陈伯达：“鼓掌有什么用啊，我们听得不少了，年纪大了，耳朵吃不消了。你们是刚从天津来的是不是？”

众：“是。”

陈伯达看到天工“825”的赵健敏后说：“啊，老朋友又来啦。叫赵什么？”

郑维山：“赵健敏。”

陈伯达：“好厉害呀！向我进攻的理论家。告陈伯达的信谁写的呀？今天谈什么？停止武斗的协议执行的怎么样？只管鼓掌不管执行怎么行呢！赵健敏，你贴大字报说陈伯达怎么歌颂你

了？”

赵健敏不解地说：“我没贴。”

陈伯达：“我是含蓄地批评你，不是歌颂你，是批评你。”

然后对大家说：“谈谈吧，停止武斗协议执行的怎么样？”

“大联筹”代表白金生：“我说点儿。”

陈伯达：“又是你，光听你的了，算了吧！换一个吧。”

“工矿总部”赵凡：“我谈谈。”

陈伯达：“你是哪个组织的？”

赵凡：“我是工矿企业的。”

赵凡和工代会林启予简单说了执行协议的情况。

戚本禹：“同志们，最近天津发生的一些事情，中央文革小组很关心。天津协议达成后，情况并未扭转，有些地方比过去还严重。天津是北京的门户，现在处于这种混乱状态，我们很着急，中央文革小组很担心。”

接着，戚本禹系统批评了当时中央认为是干扰大方向的一些错误倾向：

“首先是把矛头指向解放军。到处抓军内一小撮，抓什么‘广老谭’、‘湖老谭’，到处抓陈再道。中央认为这是错误的，希望引起天津的严重注意。”这实际是指天津“大联筹”反对天津驻军的行为。

其次是把矛头指向新成立的革命委员会。戚本禹说：“北京、湖南，就出现了反革命阴谋集团。像‘516’，直接把矛头指向

周总理、指向中央文革，挑拨总理和中央文革的关系，企图动摇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

戚本禹在这里提到的湖南，毫无疑问是指红豆、“夺军权”等极左派。

第三是武斗和无政府主义。戚本禹认为无政府主义在天津更突出。他说：“强盗、土匪、流氓……横行霸道。在这方面，天津驻军有缺点错误，不敢镇压，看到流氓坏人不敢抓，手软得很。我们收到很多材料，天津一些女同志写给伯达同志的信，这里不好念。还有一封信，真是触目惊心！

7月30日，杨柳青代销店粮食被抢，抢走49袋面；

8月10日，一伙人到河北区抢粮、抢棉；

8月1日，一伙匪徒到河北区商店，将商店老头看住，抢烟，然后又到大光明抢汽水、抢西瓜！

8月2日，有些匪徒拿着匕首，到保定道商店抢东西，有的凶手拿着刀，抢粮库；

8月19日，在河北区抢走大批东西；

8月17日，在河北区抢走起士林一个车间的糕点、饼干；

8月13日，河东区被抢走了糕点、手表、自行车；许多化工厂药品被抢；南开区大型砍刀2000把被抢；××厂7000把大刀被抢；

8月9日，‘大联筹’围攻政师后，把女学生绑走强奸；

7月25日，‘工矿企业’、天工‘825’围攻地毯公司，放火

烧楼，把地毯公司一女同志绑走轮奸……

谁是‘工矿总部’的？”

‘工矿’程国富、赵凡起立答应。

戚本禹：“这些事你们知道不知道？”

赵凡：“不知道。”

戚本禹：“什么？不知道？马上撤职！你说瞎话！你们自己把一个不重要的人游街还说不知道？你是干什么的？”

答：“工人。”

戚本禹：“我建议你明天回去，不要在总部干什么工作，回到生产岗位上去，跟群众在一起，你就知道了。”

‘工矿’程国富：“那是少数人干的。”

戚本禹：“当然是少数，大多数是反对你们的。你们‘工矿’有个孙志民、林造反吗？”

程国富：“这两个同志……”

戚本禹：“什么！还称同志？”

程国富赶快改口说：“不，不是同志，是坏人。”

戚本禹：“林造反在哪里？抓起来没有？”

程国富：“在我们那里，我们打算回去就抓。但他们200多名坏蛋很凶，还有匕首。”

戚本禹：“你们害怕他们的匕首吗？我看你们有很多流氓。这些人都是你们的吗？”

程国富：“一个。”

戚本禹："就一个？不对！林造反是你们的吗？"

"是。"

"孙志民是你们的吗？"

"是。"

……

"这不就好几个了吗？怎么说只有一个？所有强奸轮奸的都要抓起来，军管会要依法处理，要枪毙他几个人！"

众人热烈鼓掌，高呼"无产阶级专政万岁！""毛主席万岁！"

戚本禹继续说："这样的无政府主义是不能允许的。江青、伯达看了这些材料都很生气，批给郑维山同志按刑事犯处理。你们军管会再不抓人，再不杀人，要你们干什么？再这样手软会被人赶走的。"

这时江青披了个斗篷在谢富治的陪同下进入会场，全场起立，鼓掌欢迎，高呼"毛主席万岁！"

江青："同志们好！谢富治同志要我来看看同志们，我还有别的事。天津市夜里有人出去抢东西，奸淫妇女，对这种东西要专政！"

热烈鼓掌。

江青接着说："我为什么说是'东西'呢，因为他们是反动的。人民是愤怒极啦！我们有责任。我们的军队宽大无边，对不对？"

众："对！"

江青："但你们要支持军队，要发动群众，把坏人孤立起来。强奸妇女的这些人十分可恶，我都不好说出口，这些人要抓起来枪毙！"

长时间热烈鼓掌，高呼：无产阶级专政万岁！""毛主席万岁！"

江青："好！我看同志们是赞成的，因为这是广大人民的利益。要协助军队、军管会办好这件事。不要把军管会搞垮，把无产阶级的权威搞得威信扫地。军队的同志们腰杆要挺起来，不要怕他们。好，我还有事，现在退席了。"

大家鼓掌，高呼"向江青同志学习！"

江青喊："向同志们学习！"

林造反是"大联筹""工矿企业造反总部"，简称"工矿造总"的头，和李勇、程国富在一起的。李勇没来开会，程国富来了。河北区一个二轻系统的厂子在"609厂武斗"之前曾被"工矿造总"砸过，被砸的群众组织里有几个女工说是被他们强奸了。这次接见之后，林造反就被逮捕了。

## 第 882 回：辩论急，“大联筹”死不认错　戚本禹，质问天工赵健敏

江青走后，戚本禹继续说：“中央文革对这些是严厉谴责的，是非常不满的，你们回去后，马上办这件事。各个组织都要把坏人抓起来，送军管会。军管会要成立个专门班子办这件事。先把社会秩序稳定了。

无政府主义还有一种表现，就是不上班。不生产不上班，伸手拿工资，长期旷工，遛遛哒哒。天津有这种现象没有？”

众答：“有！”

戚本禹：“特别是塘沽港，外国轮船货卸不下来，看着国家被罚款，就是不管，这算什么革命造反派？上海市就不是这样。他们在港口发生堵塞时，不分是哪一派，都去干，很快扭转了局势，而天津港至今没扭转过来。中央不只一次发出号召：一切工人都要回到工作岗位上去，抓革命，促生产，工人要业余时间闹革命。而现在有些人以闹革命为名，以旷工为实。”

陈伯达：“实际上不是闹革命，把工厂停了产，关了门，在社会上遛遛哒哒，搞什么革命？”

戚本禹说：“天津驻军支左、军管会是有缺点的，他们是会检讨的，已经检讨过一些了。但必须维护驻军的威信。把矛头指向解放军，在天津抓军内一小撮，我们是不赞成的。‘五代会’有缺点也要检讨，要把没有参加‘五代会’的造反派吸收进来。要补台，不要拆台。你们‘825’也要去补台，不要去拆台。你

们说‘五代会’不稳固，可以去当支柱嘛！这个方针，上次伯达、江青同志就讲了，你们就是不听，再不听就要走到反面去了。我们不包庇‘五代会’的缺点错误。‘五代会’有缺点错误要检查。你们的错误要比他们多一些，你们要检查。”

“大联筹”的“红革会”代表说：“保守组织‘野战兵团’改头换面，就参加了‘五代会’。”

戚本禹质问道：“你怎么知道是改头换面？犯过错误要允许人家改嘛。广大群众是革命的，不要把大多数工人看成是坏的。”

他问刚才发言的那位“红革会”代表：“你这个同志是工人吗？”

答：“学生。”

戚本禹：“学生？我就怀疑你这个学生。你就那么了解工人？你怎么知道人家没有改？‘野战兵团’有多少人？”

答：“十几万。”

戚本禹：“十几万人你都了解吗？都是保守的？都没有改？我不信。反对过你们的不一定都是保守的，可能你们有缺点错误。”

答：“头头没有改。”

“你怎么知道没改？”

答：“我一直和工人在一起。”

“你们赶快退出工厂，回校复课闹革命，搞斗批改。不管怎么说，要补台，不能拆台。要拥护军管会，维护他们的权威。”

接着陈伯达说：“‘大联筹’有个‘工矿企业造反总部’，组织了十几个所谓‘扫氓队’，说什么要扫除流氓。‘扫氓’是‘联动’的口号，你们比‘联动’走得更远。所谓‘扫氓队’，实际上就是流氓队！要宣布为不合法的组织。我建议十几个‘扫氓队’，全部解散！他们打砸抢，胡作非为，军管会、公安局有权处理他们，谁也不能干涉！”

“工矿”代表说：“原来是35个复员军人组织的。后来自动解散了，现在出来的是假的，是五代会冒充的。”

陈伯达：“假的你们也有责任，你们和劳改犯合在一起就是可悲的了。你是干什么的？”

“工矿”代表：“开汽车的。”

陈伯达：“现在为什么不开汽车了？是不是因为当官了？”

答：“我是勤务员。”

陈伯达：“勤务员也是很大的官嘛！勤务员就不开车了？现在我建议一条，所有的大卡车、公产汽车，可能还有一些小汽车，要全部交出来！”

众人鼓掌。

“大联筹”一名代表：“我有重要事情向中央汇报。”

陈伯达：“我还没有讲完。”

“大联筹”代表：“我说的事很重要。”

陈伯达：“我讲的比你的更重要。我讲的是天津400万人民关心的事情。我建议你们把抢来的大卡车、公共汽车、小轿车，

要全部交出来！由天津驻军、公安局军管会负责接收。军管会组织个专门班子，负责这件事。你们两派，派代表和军管会共同商量处理这件事，并做好检查。

塘沽港那些妨碍生产、妨碍交通的关卡一律撤掉，不撤掉就是犯罪。还有天津市的全部交通，和平路那些地方，不准堵塞。赞成不赞成？”

众：“赞成！”

陈伯达：“赞成就搞一个协议。如果有诚意，很快就可以达成协议。不管理解不理解都要执行，这是国家的利益，整个天津人民的利益，一定要这样做。”

谢富治：“天津治安不好，北京也受到了影响。北京最近准备杀人。把那些杀人犯、强奸犯杀他几个！”

陈伯达带头鼓掌，大家鼓掌，高呼“无产阶级专政万岁！”

谢富治：“天津的生产情况很不好，8月份比7月份下降了百分之十七，比去年同期下降了百分之二十九，近三分之一了。”

陈伯达：“所有的工人都要在业余时间搞革命，坚持八小时工作制。”

谢富治：“刚才伯达同志说到塘沽港的问题。我看了很多材料，一个是广州港，一个是塘沽港，他们的所作所为我很生气。不是说是革命派，连一点爱国主义也没有。”

陈伯达：“‘大联筹’要注意，听说你们把塘沽港支左联络站的王克同志抓走了。抓多久了？今天早上就放出来，不放就是

犯罪！”

谢富治：“不管什么理由，塘沽港要疏通。外国轮船上上下下，来来往往，设关卡，阻拦、搜查，干那些丢人败兴的事，丢了我们国家的丑。我和戚本禹同志商量过，我们要去一下，我们什么也不怕。你们随便抓人不行啊！”

陈伯达：“现在就马上打电话，把人放出来。你们把王克抓起来是很大的错误。”

“大联筹”：“我们没有扣他，是要他解决问题。”

陈伯达：“没有价钱可讲，就是要放，马上打电话放人。”

谢富治：“我希望天津的同志们对戚本禹、陈伯达同志讲的话，要严肃对待，迅速扭转天津局势，不能采取两面态度，这里谈，那里打，军队也不负责任，这不行。不要以为中央是好欺负的。”

陈伯达：“在《天津日报》，‘大联筹’要撤出来。以后可以吸收你们的代表参加工作嘛，强占是不行的。”

“大联筹”吉新民要汇报报社情况，陈伯达：“不要汇报了，《天津日报》不能强占，要马上撤出来。”

“大联筹”：“我们和郑三生会谈，他们答应改，但是他们不改，他们把谢副总理回北京的消息登在副刊上，以地方压中央。”

谢富治：“你们‘大联筹’有没有报？送给我10份，我挑挑毛病，管保能挑出来。敢不敢给我签字？我准能找出错来。”

“大联筹”代表：“我们的错和他们的错不一样！”

谢富治：“什么一样不一样，我谢富治回北京的消息登不登都可以，什么一样不一样！”

郑维山：“现在3点了，下边还要听江青同志的录音报告，是否就讲到这里？”

这时“大联筹”代表纷纷要求发言，提出很多具体问题，诸如晚上没被子盖；人身安全得不到保证；河北大学“八一八”有刑讯室、水牢，杀死他们30多人……

陈伯达问：“河大‘八一八’来人了吗？”

答：“来了。”

“你们那里有水牢吗？”

河北大学“八一八”代表：“我们那里根本没水牢，也没有刑讯室，更谈不上杀死他们30多人，这完全是造谣。对这件事中央可以派人去调查，如果有的话，我们情愿公开检查，该受什么处分就受什么处分。”

“大联筹”：“情节严重的要枪毙！”

河大“八一八”代表：“我们如果犯了枪毙的罪，就枪毙。”

戚本禹：“水牢、刑讯室我没见，我倒是看见你们放火烧房了。你们为什么不检查？”

“大联筹”代表：“这个问题请中央派人去调查。”

戚本禹问：“放火的事你调查了没有？”

答：“没有。”

戚本禹："你们放火烧政治师范学校，我可调查了。"

"大联筹"："'五代会'干了许多错事，为什么不向中央汇报？"

戚本禹："我们没听到你们作自我检查，你们的大方向没错？"

答："没错。"

戚本禹："你这是什么态度？"

陈伯达对"大联筹"说："你们先做点儿好事，得到群众谅解。如果'五代会'做了坏事，也会暴露出来的。在塘沽港，你们就要先做点儿好事给群众看看。你们开着好几百辆卡车到北京来，要砸301医院。你们对疏通塘沽港就不能办点儿好事吗？'五代会'做了什么坏事也要做自我批评嘛！"

"大联筹"："我们开车到北京来是为了制止武斗。"

谢富治笑了："天津武斗那么厉害，你们都管不了，怎么还到北京来制止武斗？"

"大联筹"代表："我认为天津市的文化大革命方向有问题，阶级斗争的盖子还没揭开……"

戚本禹："你这个说法是错误的。你这是否定一切，打倒一切，对天津市文化大革命做了错误的估计。"

"大联筹"："我是说天津市委的盖子还没有彻底揭开。"

戚本禹："天津市文化大革命搞了这么长时间，阶级斗争的盖子还没有揭开？万张是文化大革命以前揭出来的，还是以后揭

出来的？”

“大联筹”：“我承认错误。但天津市委9个书记，只揪出了万、张，其他7个书记都未动。解学恭、阎达开到天津后干了些什么？他们怎么站出来的？解学恭站在李雪峰资产阶级立场上，和驻军的某些决策人支持保守组织，在天津搞资本主义复辟。”

戚本禹：“你这个说法是错误的。我不认为李雪峰是资本主义复辟，某一个单位可能。”

陈伯达：“我同意戚本禹同志的讲话，‘大联筹’应该做点儿好事，让群众看看。你们在群众中有很坏的印象，听懂了吗？”

“大联筹”代表抢着讲，陈伯达说：“不要多说了，只要求你们多做点儿好事。”

“大联筹”一人站起来念《毛主席语录》：“我们的责任是向人民负责……”

又有一人站出来向陈伯达检查。陈伯达不听，退席。

天工“825”赵健敏检查。

当赵健敏检查完后，戚本禹问他：“你们说过李颉伯是好书记没有？”

赵健敏：“没有。”

戚本禹：“你们贴过大字标语没有？”

赵健敏：“那是个别人干的，不代表总部。”

天大“813”杨长俊：“你们有一次开大会，指挥部一个人

讲话，代表总部说李颉伯是好书记，应该给李颉伯平反。”

赵健敏：“‘813’就抓住我们这一点，攻击了我们3个月。但他们在学校要树李曙森。”

戚本禹：“你们保过李颉伯吧？”

赵健敏：“保过。”

戚本禹：“对李颉伯我了解，你们保他有问题。就这一点说你们是保守组织行不行？”

赵健敏：“我想中央不会这样说。”

戚本禹：“那么你们讲这个是保守组织，那个是保守组织，这种说法是错误的。你有个报告，文字是流利的，也很会讲，但很多观点是错误的。你这个人很偏激。拿你的观点和中央精神对照一下，检查一下。”

赵健敏：“我的报告可能有错误的地方。”

戚本禹：“不是可能，是错误的。”

赵健敏：“我讲的那些话是从工农那里学来的，是别人向我介绍的。”

戚本禹：“你不要把错误推给群众。到底是你的错误，还是工农群众的错误？你过去讲话脑子很清楚，现在怎么逻辑乱了？你说的话相互矛盾。你这不等于说从群众中学来的错误吗？你现在不是在改正错误。你给伯达同志写信，利用伯达同志的话攻击伯达同志，很狂妄！很错误！用他的话批评他，不客气地说是攻击他。你太狂妄了！我还不知道天津有这样一个‘狂人’！今天

你有了点儿自我批评，但很不够。我怀疑你们是否想借自我批评转个弯子，继续干自己的。”

“大联筹”“红革会”代表站起来说：“敬爱的谢富治、戚本禹同志，……”

戚本禹打断他：“不要说什么敬爱的！”

“红革会”：“我代表130万人汇报我们的工作。”

戚本禹：“不要煽动，你们有100多万人吗？我做过调查，派了两个人到京津铁路，见人就问，大部分群众是不支持你们的，对‘大联筹’的印象非常不好。你们的名声很不好。你们说100多万人，你们统计过吗？希望你们听听群众的意见。”

“大联筹”：“这是‘五代会’造的谣，你可以看看我们的材料。”

戚本禹：“你们的材料我看过了，看得很多，的确不像话，有很多火是你们放的。”

“大联筹”吉新民：“我回去后，准备让‘五代会’把我杀死。”

戚本禹：“谁杀死你我负责把他枪毙。希望你们不要杀别人。杀人都要处理，都要查清。我希望你们回去听听群众意见。我派人在车站听意见，群众对你们印象很坏。”

“大联筹”：“我们这个组织有缺点，但它是在资产阶级反动逆流中杀出来的。”

戚本禹：“什么逆流？从什么时候杀出来的？”

“大联筹”：“是今年4月从反动逆流中杀出来的。”

戚本禹继续质问：“谁搞的逆流？”

“大联筹”：“李雪峰搞的。”

戚本禹：“到现在我并不认为李雪峰在天津搞的是逆流。”

赵健敏：“‘五代会’杀人放火，失道寡助。”

戚本禹：“我知道，你就是一个放火的！”

赵健敏：“不错，但是‘五代会’的也要追查。”

“大联筹”三配件厂董广发站起来说：“我看这是大阴谋，没有突出两条路线斗争。我还要提军内一小撮的问题，这是毛主席说的。”他念《毛主席语录》。

谢富治：“这种提法是错误的。”

戚本禹：“毛主席说了，提揪军内一小撮是错误的，不许提揪军内一小撮。”

董广发执拗地说：“毛主席没有那样说，我按毛主席说的没错。”

戚本禹：“刚才伯达、江青同志的指示，你同意不同意？”

董广发：“我是同意的。”

戚本禹：“同意你为什么还那么说？你这种说法是错误的，这是反革命的提法，现在反革命分子就利用这个口号，到处抓一小撮。”

董广发：“不要拿大帽子压人。如果认为我是坏人，那把我逮捕起来吧！”

戚本禹："我说你还不行呢，怎么能逮捕呢？你不要逼着我们犯错误。"

"大联筹"一位代表："天津所以混乱，都是天津某些决策人挑起的，……"

戚本禹："什么'决策人'？这不像共产党的提法，不是共产党的语言。你是否经常看《参考消息》，从外国学来的？再说一遍，抓军内一小撮的提法是错误的。"

谢富治："你们这是跟中央唱对台戏！"

戚本禹对董广发说："我看你思想很混乱，一会同意，一会又不同意，你说了半天，我还不知道你说的什么。你坐下好好休息。"

董广发："思想混乱的不是我，有人混乱了。"

戚本禹："这里是解决大是大非问题，不要在这里耍流氓！你坐下。"

董广发："我可以坐下，但是我保留我的意见。"

戚本禹："你可以保留一万年。"

"大联筹"："我们要建一个主席塑像，快建成了，没有原料，支左不支持我们。"

戚本禹："不要搞塑像了，毛主席很反对，对这个问题批评得很厉害。我们要按最高指示办事，如果没有建成就不要搞了。"

"大联筹"："戚本禹同志，你同意不同意？"

戚本禹："不要问我，要听主席的。问我，到处见到主席像

我才愿意呢，但主席不同意，要按主席说的办。毛主席的话一句顶一万句，我们都要按最高指示办事。你们‘大联筹’现在到底听谁的话？你们究竟听你们‘决策者’的话，还是听毛主席和党中央的话？我希望你们改正自己的错误。如果你们‘大联筹’方面很好地改正错误，很可能搞得更好。如果像那个工厂的同志（指董广发）的态度，还是提揪军内一小撮，那是错误的。”“天津支左绝大部分支持是对的，局部的可能有错误，但这也是难免的。叫你们支持支持看看。你们什么时候介入文化大革命？你们不是也支持过林造反吗？他是个流氓，为什么支持他？这是什么性质的错误？我也支持错过，过去我也受过蒙蔽，我向中央文革作过检查，改正了错误。可是你们至今还坚持揪军内一小撮，说天津阶级斗争盖子还没有揭开，你们把自己都否定了。”“中央讲了这么多了，现在你们还说天津市的阶级斗争盖子没有揭开，究竟是认识问题还是故意对抗？我怀疑你们。我们对你们做了很耐心的工作，就是希望你们把方向扭过来。说服你们，你们就是不听。主席把船摆正了，你们非要扭过去，这不是背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吗？这样下去，你们会走向反面。”“不要觉得自己比中央还高明，比毛主席还高明。整个的文化大革命都是主席部署的。”

谢富治：“这话很重要，看你们究竟听谁的话？”

郑维山：“伯达同志临走的时候说，大卡车、公共汽车、小轿车，3天之内交出来。你们要达成一个协议。下边听江青同志的讲话录音。”

9 月 9 日，天津贴出大标语：“坚决镇压地富反坏右、土匪、流氓!”署名：“天津驻军”。

9 月 12 日，天津赴京代表团双方群众组织达成《关于收回抢用、非法占用车辆及维护交通秩序的协议》。

## 第 883 回：反“八一”，周恩来临危不惧　谈形势，毛泽东还有困惑

9 月初，北京街头开始出现有关王力、关锋的大字报。

9 月 8 日，中央文革办事组电话通知北京的一些大专院校，让他们将这类大字报进行覆盖。电话指示说：“这些大字报不要上街，主要矛头对准刘邓陶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9 月 9 日这天，北京市工代会、农代会、红代会组织一些人在北京工人体育馆开大会，纪念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 40 周年，会议组织者邀请了有关中央首长出席，周恩来也前来参加大会。

大会组织者安排的发言者在歌颂了毛泽东主席领导的“ 秋收起义” 的伟大意义之后说：是伟大领袖领导的秋收起义打响了对国民党的第一枪，不是“八. 一”南昌起义打响的第一枪。“八一” 南昌起义是大军阀贺龙他们领导的，最后以失败告终。这次起义不是工农武装起义，而是资产阶级旧军队的一次兵变，所以“八一” 不能作为中国工农红军的建军日，必须彻底砸烂。我们强烈要求中央废除“八一” 建军节，把“秋收起义”纪念日 9 月 9 日定为建军节。

这时，会场上有人高呼：

“ 砸烂八一！”

“秋收起义万岁！”

“毛主席万岁！”

几个发言者调子大同小异，主张立“秋收起义”为建军节，废除“八一” 建军节，会场上乱起来，有人支持，有人反对，有人要抢话筒，台下有人要冲上主席台。大会组织者一个劲地要大家安静，但会场怎么也安静不下来。

带领北航“红旗”学生前来参加这次大会的戴维堤意识到这次大会有些人是要把矛头指向周恩来。周恩来在文革初期亲自为他平的反，他和北航“红旗”的学生对周恩来的感情都很深。于是他立即通知北航“红旗”的学生们把住会场的两个出入口，防止意外。

坐在主席台上的韩爱晶、蒯大富等人没想到会有这样的发言，韩爱晶走到周恩来面前，请示说：“总理，他们要砸烂‘八一’对吗？”

周恩来说：“不对，毛主席不同意。”

韩爱晶又说：“那这个大会的大方向有问题，是错误的，我们是不是应该立即离开会场，拒绝参加这个会议？”

周恩来说：“大民主嘛，每个人都有发表自己意见的权利，只要不是反革命的言论，我们都应该听人家讲完。而且，对错误的思想还要提出批评。”

这时，大会组织者请周恩来讲话。他站起来走到麦克风前，会场马上安静下来。韩爱晶和蒯大富也站起来，跟着周恩来走到麦克风前。他们俩人紧紧地站在周恩来身后，担心发生意外。因为，凡是参加这种大会，周恩来的保卫人员和警卫战士都不上主

席台，没有必要。但是今天大会的气氛不对，蒯大富和韩爱晶都为周恩来的安全担心。

周恩来微带嘶哑和颤抖的声音说：

“同志们，同学们，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同志们，今天这个会，事先我不知道，我是紧急赶来的。今天大家在这里纪念伟大领袖毛主席领导的秋收起义 40 周年，这是非常好的，我坚决支持这个会议。坚决支持大家的革命行动。但‘八一’建军节是毛主席同意的，不能砸……”

这时台下突然有人喊：

“周恩来下去！”

“我们要见江青同志！”

“我们要见毛主席！”

会场顿时又乱了起来，台下的喊声压倒了周恩来的声音，他无法再讲下去。

戴维堤大吃一惊，“这不是公开反周总理吗？这还了得！”他立即让前来参加大会的北航“红旗”600 名学生全体起立，组成了人墙，把主席台围了起来。然后把北航“红旗”的大旗举了起来，并带领他们高呼：

“誓死保卫周总理！”

“谁反对周总理就打倒谁！”

“北航红旗坚决拥护周总理！”

“反对周总理就是反对毛主席，决没有好下场！”

北航学生和会场上的群众的口号声很快就把那些人的气焰压了下去。周恩来接着说：

“同志们，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战友们，红卫兵小将们！我很理解大家的心情。你们热爱毛主席，热爱江青同志，这是完全正确的。我完全理解你们的心情，但是，我要告诉大家，我周恩来热爱毛主席的心情不比你们差。我要告诉你们，‘八一’南昌起义，不是我周恩来领导的，是林副主席领导的，我周恩来不过是参加了而已。‘八一’建军节是毛主席确定的，不能砸！砸‘八一’是不对的！我周恩来一生犯了许多错误，但我是拥护毛主席的，拥护林副主席的。不信请同志们看一下，我周恩来的心是红的！” 说到这里，周恩来突然用手撕开了衬衣，露出了胸膛。

许多人被惊呆了，会场上群情激奋。“誓死保卫周总理！”的口号声响成一片，许多人愤怒地谴责一些人反对周恩来、破坏大会的行为。会议主持人见状，赶紧宣布散会。顿时，人群拥向主席台。

说时迟，那时快，戴维堤带着北航“红旗”的学生们率先冲上主席台，把周恩来紧紧地围在中间。

那天负责警卫的卫戍区的战士离主席台较远，面对体育馆内外人山人海的群众，他们近不了身，干着急使不上劲儿。

几百名北航“红旗”的学生围在周恩来周围，成千上万名群众又围着他们，戴维堤面对着周恩来，一步一步向后退着走，就这样艰难地下了主席台，好不容易出了体育馆。啊！只见体育馆

外的群众也是人山人海，望不到边。戴维堤对着一名解放军大喊："快把总理的车调过来！"

周恩来的"大红旗" 慢慢地从人群中开了过来。大家正要护送周恩来上车，不料他没有上车，而是转过身来，向人群不停地挥着手，点头微笑，然后又不停地和周围的群众握手。此时的周恩来，早把个人生死置之度外。他相信群众，他不相信有人会害他。他大声地说：

"同学们，红卫兵小将们，不要怕嘛！毛主席说要相信人民群众嘛！我周恩来问心无愧，我不应该害怕群众嘛！现在天快黑了，大家都没有吃饭，我也一天没吃东西了。"他朝旁边挤过来的卫戍区负责人说："你们是不是搞一点吃的来，我和大家就在这里吃一点晚饭怎么样？"人们顿时欢呼雀跃起来。

周恩来已经连续参加了几个会议，加上这番折腾，早已疲惫不堪。他一屁股坐在了地上，北航"红旗"的学生围坐在他的周围，外边是卫戍区指战员和人山人海的群众。不一会儿部队拉来了供战士们吃的几大木桶的稀饭、馒头，周恩来要了一小碗稀饭。就这样，公元 1967 年 9 月 9 日傍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总理周恩来，在北京工人体育馆北门外的马路上，席地而坐，与人民群众们一起喝稀饭，并用舌头把碗舔得干干净净。在场的群众无不感动得流下了热泪。

9 月 9 日晚，毛泽东上海虹桥宾馆召集杨成武、张春桥、余立金、汪东兴等人谈话，从 22 时 30 分一直谈开到次日凌晨 1 时

10 分，近 3 个小时。

“形势怎么样？请你们来讨论讨论，研究研究。” 毛泽东开门见山，接着说了他自己的看法：

“我们的文化大革命搞到现在，估计有两个前途：一个是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后，各方面都搞得更好了；一个是从此天下分裂。如南京、无锡有两派，安徽不是也有两派吗？北京也是两大派，势不两立。全国各地差不多都有两大派，如果统一不起来，这样会不会出现象辛亥革命以后那样的形势。全国出现混乱状态，长期分裂？辛亥革命以后，从 1911 年至 1928 年，17 年是分裂状态。无非是像袁世凯、黎元洪、冯国章、段琪瑞当总统，张作霖不当总统当大元帅，一直到蒋介石统一。其实蒋介石也没有完全统一，山西有阎锡山，四川有刘湘、杨森，西北有五马，云南省有龙云。我们会不会出现那种局面？你们讨论讨论，说说你们有什么看法？”

在座的人思想上没有准备，经毛泽东这么一说，大家认真地议论了一番。觉得按当时的条件，出现辛亥革命后那种状态可能性不大，不会分裂的，只能是第一个前途，不会是第二个前途。他们的理由是：

“一、我们的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毛主席的崇高威望，有伟大的毛泽东思想，以毛泽东思想为标准，为中心、可以教育全党全军全国人民，把斗争引导到毛泽东思想的轨道……”

毛泽东一听，说：“你们强调这一点，讲思想还可以，对个

人不要多讲，讲多了将来要吃亏的。我垮了，你们要吃亏的。”

“垮不了。”人们异口同声。

“马克思叫我走了怎么办？一个人出现是带偶然性的，哪一天离开也是带着偶然性的。林彪同志 8 月 9 日的讲话我看了，他讲的两点，头一点不能强调（指林彪八·九讲话：文化大革命两个条件：一是靠毛主席思想和毛主席的崇高威望，特别是靠毛主席的英明领导、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强调了将来你们要吃亏的。”

毛泽东说这话的时候很真诚，可惜当时在场的人并没有理解这话的深意。

大家又说了第二条理由：

“二、人民要求统一。如果有人搞分裂的话，广大群众是会抛弃他，不答应他的，群众对分裂是不高兴的。18 年来祖国的统一，全国人民群众是很高兴的。”

这一条毛泽东表示赞成。他说：“群众发动起来了，我们历来的运动，从来也没有像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群众发动得这么广泛。连十几岁的娃娃和白发苍苍的老太太都参加了，为了辩论连饭都有忘记吃了，真是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这次真正把群众发动起来了。……”

接着大家又谈了第三条理由：“有几百万军队。”

毛泽东说：“是呀，这样大的冲击，军队还是很好的。”

“在武汉，我同你们谈话时，当时王力的态度就很凶。我们

有个错误，第一天到武汉就应找陈再道做工作。”

他批评王力“没有先做好部队的工作，然后再去做好两派的工作。没有好好进行调查研究，下车伊始就哇里哇啦地叫，这种人没有不犯错误的。”

大家又说了第四条理由：“干部的大多数、群众的大多数是好的。”

毛泽东说：“怎么最近又有那么多干部不好了，揪了那么多？红卫兵把干部扫多了。”他认为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主要是找各方面的人谈话，多做思想政治工作。他计算了一下，说：“根据现在的形势看，是向好的方面发展。北京、上海、山东、山西、黑龙江、贵州、青岛七个省市革命委员会是好的，但内部都还有一些问题。总的看，这七个单位的形势是好的。北京、上海比较稳定，这两个地方的群众、军队、干部关系好，‘三结合’好。还有几个省区问题基本解决了——河南、湖北、湖南、浙江、江西、内蒙古、四川、甘肃。今年还有不到四个月，可不可以再解决十个省？如果再解决十个省，那形势就很好了。”

“龙潜整得过分啦，搞‘喷气式’，罚跪，挨打，挂牌子。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事？一个是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群众有气；一个是官做大了，薪水多了，有事不跟人家商量，不平等待人，不民主，严重脱离群众，到处骂人、训人，战士有意见平时没有机会讲，有机会就爆发了。一年用一个星期的时间，战士有意见让他讲一讲，讲完了他就没有意见了。以后干部多到下面

去走一走、看一看，在某种意义上说，最聪明、最有才能的是有实践的战士。我们这些人接近群众就比较困难了，去了就包围。还是要想办法去，可以化装去，北京、上海不行，就到别的不认识你的地方去。干部要同群众关系搞好，军队干部和群众关系也要搞好，要找他们谈话，做思想工作，要多谈几次。”

另一方面，他又叮嘱说：“要告诉造反派的头头，现在正是他们犯错误的时候。要用我们自己犯错误的经验教训，教育他们。”

“现在有点严肃、紧张有余，团结、活泼不足。要讲团结。干部有错误、有问题，不要背后说，找他个别谈，或在会议上讲。不要搞‘喷气式’！”

“现在小将提口号，不留余地。过去‘红总’提‘打倒许世友’，现在告诉他们不能打倒许世友。‘八二七’又提‘谁打倒许世友就是反革命’，这样又要犯错误啦！”

大家又说了第五条理由：“现在的情况和辛亥革命时不一样，地主、资本家被打倒了。”

毛泽东说：“过去军阀混战，是地主阶级内部各派之争，每派都要帝国主义支持，和现在的局面不同。”

他特别关心工人中分裂为两大派的问题，说：“工厂的问题，我就讲啦，一个工厂都是工人，为什么分两派，我想不通。在武汉开会，我同王力就不一致。在谈话时，王力好凶啊，好凶啊！”

当张春桥谈到上海交通大学的“反到底”组织提出学校中两

派大联合要以它为核心时，毛泽东说："什么核心？核心是实践中群众承认的，不是自封的。"说到这里，毛泽东明确指出："两派群众组织要无条件地实行大联合。"

9 月 10 日，谢富治在接见北京中学代表时，明白无误地说："'516 兵团'是反动组织，我看大街上有人喊：'打倒 516'，小小的组织也用不着游行。根据我们掌握的材料，人数不超过 50 人，这 50 人中间很多是十几岁的娃娃，主要是有后台老板。"

当晚 16 时 30 分到 18 时 30 分。康生、吴法宪召集"河南武装干部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汇报会。这个学习班是根据毛泽东"每省都应开人武部以上各级干部的会，少者一二百人，多者四五百人，大者应到千人左右，在北京开，实是训练班。半年之内争取办好此事，否则一年也可"的批示，和林彪"集训武装干部，要请革命造反派当教员"的指示，于 9 月 4 日在北京政治学院开办，11 月 2 日结束。学员 414 人，主要是省军区、军分区及人武部的干部，部队机关 4 名代表，河南"二七公社"和开封"824"的 8 名代表作为教员参加了学习班。

由于参加学习班的武装部干部在"二月黑风"中不同程度的压制了群众运动，已经受过批斗了，到北京一见到河南省军区政委何运洪和河南省军区政治部主任李善亭，都把怨气出在他们身上。于是，几十人或一、二百人自发组织批斗何、李二人，一天斗五、六场，弄的两人很狼狈。

会上，康生问："听说河南'二七公社'分两派？"

郑州大学代表答："郑州没有，下边有的专区乱一些。"

康生："听说夺枪了？"

答："主要是中学生夺的。他们看到大学发枪了，他们就抢起来了。"

康生问："'铁军'现在怎么样？"

答："他们一部分跑了。"

康生："听说你们'二七公社'也出去啦？"

答："主要是受北京影响。"

康生："你们可以发表个声明，说我们现在不要保姆，也不要保男了，这一条要马上告诉家里。革命造反派受压抑的时候，组织比较纯洁，比较注意政策，所以在受压抑的情况下也能坚持。特别是中央支持以后，组织解除了压迫，能公开活动，地位变了，思想就容易骄傲了，政策就容易出偏向。组织庞大了就容易不纯，对政策也不注意了，认为我什么都对，唯我独尊，唯我革命，就容易犯错误。'二七公社'在开会时也谈到这个问题，但事物不以自己的意志为转移，往往情况变化了，就产生报复情绪，政策就不那么讲究了，态度就不谦虚了。对保守组织、受蒙蔽的群众不是耐心教育、争取分化、团结，而是利用优越的地位想把其它群众组织搞掉，这样自己本身就容易脱离群众，千万注意这一点。"

"对过去反对过自己受蒙蔽的群众想用优势压倒，不把头头和群众区别开，实际上是重复过去'河造总'、'十大总部'和

何运洪的错误。最近我对河南情况不大了解，听说‘二七公社’内部不是那么很一致，不很团结，特别是前一段抢枪，甚至攻击警备区司令部、筹备小组，这样就容易走向反面。要特别警惕这个问题。‘二七公社’是跨行业的组织，过去是‘二七’观点的人都参加了，组织很不严密。组织扩大了容易不纯，原来听你们说要整风嘛！内部不纯。要好好争取、团结群众在大批判中搞大联合。河南搞了一年啦，到现在连个革委会还没成立，说明比北京、上海落后了，这是一方面要注意。

还有一方面，听外省讲‘二七公社’跑到外省去的不少，主观上是支持外省革命，实际起相反的作用。你们说北京的学生帮你们的倒忙，你们去不也是帮人家的倒忙吗？这个你们给家里说一下，叫赶快回来搞自己的斗批改。”

康生问：“开封化肥厂的问题解决了没有？”

“824”代表答：“我们来八、九天了，来时还没有解决。刘建勋同志说要做政治工作，我们‘824’造反派和解放军组织了宣传队，要开展工作。”

康生说：“‘824’是革命造反派组织，毛病是不少的，眼睛要看到这些。”

他接着问：“郑州铁路、砂轮厂、纱厂的情况怎么样？”

郑大代表答：“铁路没问题，几个国棉纱厂跑得多，没回来。”

康生说：“别怨人家不回来，我们的工作没做好，叫人家知道回来安全、不挨打才会回来。要教育，不要报复，哪有工人不

关心生产的？”

郑大代表说：“我们学校没有报复，对‘战斗师’的学生是热情的，工人可能有些报复情绪。”

河医“东方红”说：“我们连头头都没有抓。”

康生说：“让他们自己去揭发嘛！教育他们不要报复，天气冷了，叫他们都回来。有个例子，合肥的情况比你们还厉害，用机枪打，两派势不两立。《九·五命令》下达后，解决得很好，‘炮轰派’自己把头头抓了。‘炮轰派’开了5万人的大会，‘好派’放鞭炮欢迎。今天开20万人大会，两队并排游行，解放军在前面。现在两派竞赛，交枪看谁交得快，中央要向全国通报，要学这个样子。”

“今天主要不是谈这些，主要是谈武装干部训练班的问题。”

吴法宪说：“康老的讲话很重要，你们马上告诉给家里。”

康生说：“我是关心这个事，想叫‘二七公社’做个好样子，做出模范来。我给‘二七公社’谈过，不要像旧社会那样婆婆压媳妇，媳妇当了婆婆，又压媳妇。”

接着，康生讲了武装干部学习班的意义，他说：“毛主席说：每省都要开人武部以上各级干部的会，小则200左右，中则500左右，大则1000人左右，河南可能再来一些。”

河南省军区副司令员赵复兴汇报参加人员有埋怨情绪时，康生做了工作，要求学习班要摆事实、讲道理，不要武斗，不要坐飞机。他最后说：“这是文化大革命训练班，保护教育干部训

练班，维护解放军声誉的训练班，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训练班，总之，这是毛泽东思想的训练班。”

## 第 884 回：做工作，重庆、云南交武器　查贺龙，中央逮捕王光美

9月13日9时55分到12时40分，康生、吴法宪第二次接见武装干部训练班河南组领导小组大组长及造反派代表。“二七公社”和开封“824”的代表做了自我批评，检讨受极左思潮的影响，存在“揪军内一小撮”的错误倾向，康生听到这里，喊：“向革命小将学习！”武装干部也跟着喊：“向革命小将学习，向革命小将致敬。”以此为转机，学习班的气氛渐渐的缓和了，和谐了。

再说重庆。重庆大学“815”的“301 纵队”上华蓥山了。9 月 4 日，四川省革筹组成员张西挺率省革筹调查组一行 24 人到渝。重庆驻军领导韦统泰、蓝亦农、白斌、唐兴盛等人到机场迎接。

这天，54 军驻綦江县三江镇某连武器被“815”派抢走部分。至当天 18 时止，为贯彻停火和上交武器协议，重庆市区开设了 10 个检查站。9 月 5 日，中央《九五命令》下达。

9 月 6 日，重庆黄廉“工人造反军司令部”主办的《战恶风》报第二期发表该司令部于 8 月 27 日呼吁两大派迅速停止武斗，组织力量下乡抢收、抢种的紧急呼吁和要求其下属组织下乡支援农业“双抢”的《特急命令》，并公开表明了坚持文斗不用武斗，不怕来自左、右两边的攻击，不怕被说成是“右”了、“修”了；反对“资产阶级宗派主义的唯观点论”等见解，并在一篇小品文中称武斗中身亡的人不是“烈士”而是“冤士”。

9 月 7 日，撤到成都的“反到底”派难民 3000 余人乘 601、603 次列车返抵重庆。

中央《九五命令》下达后，总理联络员温白桦找到黄廉谈话，希望他能劝说“反到底”派停止武斗，交出武器。他对黄廉说：“总理希望你起个好的作用，能不能说服造反军带个头。”

他还说：“我也跟总理说过你的处境，也很为难……”

54 军副军长白斌插话说：“军工对黄廉是有意见，有人还说他是叛徒。”

温白桦说：“不管怎样，要相信中央，相信总理。”

刘结挺说：“恐怕全国最后都要如此了，这个形势恐怕不能继续下去了。”

黄廉十分担心的说：“只要一放下武器，就是任人宰割了，‘反到底’不把我撕成几片才怪了。”

张国华说：“再拖延下去性质就变了，你自己表明态度，不要管军工听不听你的话，少数人的问题你就不要管了。”

鲁大东说：“你要注意安全，谨防别人在背后捅你一刀，要回家去叫市委给你派车子……”

黄廉不信鲁大东，觉得他是黄鼠狼给鸡拜年。他跟下面各个组织商量交枪的事，果然走一个地方碰一次壁，“二七工人造反团”说这是要把他们的命拿去。“军工井冈山”干脆就不让黄廉过去。

无奈，黄廉回到“工总司”，把“造反军”全部 13 个勤务员

都集中到文联开会，他说："一定要交枪，时间也只有两、三天了，省革筹和总理的联络员都是这个意见，10 号、11 号再不交枪，就要宣布为非法武装组织，当作国民党和土匪来整了。"

很多人流着眼泪讲："老总你一定要考虑清楚，这是生死存亡的问题。"

黄廉说："我首先缴枪。"说着，掏出他的手枪放在桌上。

其他勤务员都流下了眼泪，说："就听你的吧，看交枪之后是个什么后果。"

黄廉叫朱正昆拿笔来登记，大家把自己的冲锋枪、手枪都放在桌子上。然后黄廉就给张西挺、温白桦和 54 军打电话，说"工人造反军"决定首先交枪，明天一早送过去。

9 月 8 日至 9 日，重庆两派在警备区谈判停止武斗、收缴武器，终于达成了停火交枪的协议："反到底"派的武器一律交到 54 军军部，"815"的武器交到当地武装部。因为他们的武器绝大部份是从当地武装部"抢"来的。

这天，重庆警备区发布停止武斗、收缴武器办法。同日，重庆"反到底"派发表《紧急告全国人民书》，表示"向毛主席和党中央公开认错……未经中央允许动用了国防企业的武器、弹药是不对的"，保证"立即集中上交用于自卫的一切武器、弹药"。

当天，黄廉的"工人造反军"出动 6 辆卡车，敲锣打鼓地将一批武器、弹药送往重庆警备区司令部上缴，中央调查组组长陈斌、四川省革筹调查组组长张西挺接见了上缴武器、弹药的代表。

白斌副军长对黄廉说："黄廉，你这次又放卫星了，又出风头了，张政委和周总理都要表扬你，你知道吧？"

温白桦对黄廉说："黄廉同志，你做得好，要相信毛主席、相信党，我郑重宣布总理说应该给你表扬，你这个头带得好。昨天我跟54军碰头，他们估计你做不通底下的工作。"

黄廉说："这是靠了毛主席的威望。"

温白桦说："你这么说就对了。"

在中央调查组的协调下，重庆两大派从9月10日开始上交武器，12日完成全部上交任务。

根据安排：9月10日，在重庆市体育馆附近、两路口、上清寺地区的"反到底"武装人员他们在解放碑游行了一圈后，到鹅岭警备区即54军军部交了枪。

接着是江北区武装人员，主要有军工"井冈山江陵兵团"，"长安兵团"和"江北区指挥部"开始交枪。

11日，杨家坪地区的"建设兵团"和"空压兵团"也将武器上交到54军军部。

最后一批是南岸区"黄山警备司令部"和军工"望江东方红"。

听说要交枪，可以说没有哪个参加武斗的人舍得。年轻人手上有了枪了，吃饭解手不离身，擦得锃亮锃亮的，晚上还要抱着枪睡，枪成了他们的"第二生命"，几乎都和枪结下了难舍难分的感情。交枪前，不少人偷偷带着枪去照相馆照相留念。

南岸区"反到底"派的交枪地点设在邮电学院。交枪那天，

“黄山警备司令部”的队伍，打着红旗，列着队，一路喊着口号，从女四中出发，经过黄桷垭街上，武装游行到邮电学院。近千人的队伍，全副武装，逶迤一两公里。公路两侧挤满了看热闹的人，有人鼓掌，有人呼喊，但大多数人都惊异地望着他们。

交枪后，很多人都悄悄离开了。那天中午吃饭时，食堂里少了好多人。

交了枪，不少中学红卫兵的父母都找到了空压厂。当他们见到了自己好几个月没有音信的儿女时，激动得泪水一个劲流。他们太激动了，上上下下、左看右看，仔细打量着自己的儿女，没有发现有任何伤迹，这才高兴得笑了。

沙坪坝公园“八一五”烈士公墓里面掩葬了近 500 名死于重庆武斗中“815”派的群众

9月11日 撤到成都的“反到底”难民又一批2000余人乘601次列车返回重庆。

自谢富治、王力 7 月 4 日离开昆明后，中央似乎就无暇顾及云南。直到武汉事件基本平息，8 月 8 日，中共中央以中发 [67] 237 号文件批发昆明军区党委 7 月 12 日上报的《关于解决云南问题的意见》，同意云南军区党委提出的意见，也同意增补昆明军区副司令员兼云南省军区司令员陈康、云南省军区政委张力雄二人为云南省军管会副主任。

8 月 10 日，中央召云南省军管会主要负责人进京，说明中央的批示，并指定陈康主持军管会的工作。

8 月，“揪军内一小撮”的风潮也刮到了云南，“八派”黄兆其等人提出“搞军内的问题，要从张力雄开刀。”“揪张力雄应该有专人来抓，成立专门的联络站。”

8 月 21 日，黄兆其指挥的“专揪叛徒战斗队”到赵健民抗战前曾经被捕过的山东调查回来，大量散发传单，说赵健民是叛徒。这些传单有：“叛徒赵健民的自白”、“赵健民和黎玉两个叛徒是怎样互相勾结的”、“赵健民是怎样被大军阀韩复榘刀下留情的？”

此后，云南也开始了抢枪风潮。8 月 23 日，“八派”在昆明军区步兵学校内“红大”组织的协助下，抢了步兵学校的枪支。8 月 24 日，“炮派”到省军区小麦峪军械库抢枪。当天，“八派”围攻昆明水泥厂矿山车间，双方死 9 人，伤数十人。而“炮派”则武装占领军管会生产指挥组办公地——五华山，赶走军管会的干部，发表占领五华山的声明，还私立电台，进行布防。赵健民

来到五华山。

8 月 26 日，“八派”又抢了省体委国防俱乐部的枪。

针对云南的抢枪和武斗，8 月 26 日，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给昆明军区的电报：

昆明军区、云南军区并告八·二三和炮兵团的同志们：

据报，最近昆明武斗严重，八·二三和砲兵团双方都向人民解放军夺枪，并互相开枪射击。我们向你们提出以下意见：

一、双方绝对禁止开枪；

二、双方都不许冲击军事领导机关；

三、人民解放军一切武器装备物资，任何团体与个人都不得侵犯与抢夺，双方都应在“拥军爱民”的口号下正确对待人民解放军；

四、双方的争执，应在中央既定方针下，议商解决，一定要坚决制止武斗。

没有效果。第二天，8 月 27 日，“炮派”依然到归化寺民兵武器库抢枪。同日，356 厂两派武斗，死 20 人，伤 230 人。

8 月 28、29 日接连两天，“炮派”在 356 厂下属组织的配合下，抢 356 厂枪 313 支、子弹 135000 发。

8 月 29 日 19 时 30 分，周恩来、康生、江青签发的给昆明军区的关于 200 信箱武器问题的电话要求：

一、大力宣传毛主席的批示，大力宣传毛主席“拥军爱民”的号召和中央文革八月二十六日的四点指示，做好政治思想工

作。

二、驻军部队由原来的一个营增加到××个连，尽最大努力劝阻。坚决保卫武器。

三、如果劝阻无效，立即抓起头头来。

还是没有结果。8 月 31 日，“炮派”攻占博物馆，双方死 8 人，伤 10 人。

8 月底 9 月初，“八派”再次到昆明军区步兵学校，在学校内“红大”组织的协助下，抢了步兵学校的班用机枪和半自动步枪。

云南东川是中国的铜都，与会泽，以礼河相连。当时担任东川、会泽铅锌矿、以礼河水电站的军管会领导，都是13军、14军派来的。为此受到“炮派”的围攻、冲击，认为他们是薄一波的一党。

8月，他们把东川军管会主任14军42师师长田大邦，干部刘友义揪到云南省军区礼堂批斗，刘友义同志当场被打，田大邦被连续批斗，因高血压、心脏病而病倒。东川市武装部长、军管会副主任王若海被“炮派”推下高楼摔死，东川市军管会瘫痪。武装部打开武器库，向农民发枪。农民开始进城，在新村包围矿务局机修厂，停水、停电、断绝一切交通、通讯达一月多。在城区、农村、工厂杀害“八派”的工人、农民、干部达200多人。“炮派”不准“八派”收尸，用打冷枪的手段，使收尸群众又被打死、打伤，造成几十具尸体曝晒一周之久。

后来，由昆明军区参谋长崔健功，云南省军区司令员朱家壁组成两级军区制止武斗工作组赶到东川，停火交枪，并由解放军战士保护“八派”群众，才把尸体收回掩埋。

直到 9 月 10 日，在云南省军管会的主持下，云南两派终于达成《关于停火交枪制止武斗的协议》。

9 月 2 日晚上，“王光美专案组”组长肖孟接到康生的电话，要他马上去钓鱼台。肖孟赶到那里，见江青和康生在等他。

江青对他说：“今天晚上你们专案组就要写一个逮捕王的报告，明天早晨把这个报告交给我。”

康生说：“王光美的特务问题可以定了，逮捕王的报告要很快搞出来。”

肖孟和专案组的人都感到这个布置很突然，因为没有确凿的材料证明这个问题。还有很多调查工作没有进行。专案组连夜突击拼凑了一个报告，送上去后，江青在报告的第一页上画了一个大“X”，并批上：“报告搞的不好，退回专案组。”

专案组看到退回的报告，知道江青生气了，决定由肖孟拿上报告去问康生究竟怎么办？

康生看后说：“你们写的这个报告根本不能用，你们没有体会我和江青同志的意思，不能说明问题。”

他想了想说：“算了，报告由我亲自来写好了。”

康生 9 月 8 日写的逮捕王光美的报告，给王光美加上了“美国战略情报局的特务、日本和蒋匪特务”等头衔。在这个报告上

有江青的签名。

1967 年 2 月 14 日，武汉市外语教员晏章炎的那封揭发贺龙的信，于 2 月 28 日由文革办公室转交中央军委信访处。6 月 13 日，中央军委群派人到武汉进行了调查。调查人员发现 1934 年 3 月 17 日湘鄂西中央分局就此事给党中央的专门报告。报告中说："去年 12 月蒋介石曾派一代表熊贡卿来游说贺龙同志，企图收编，熊先派梁素佛来，贺龙同志首先发觉和揭露来人之阴谋，认为这是侮辱中央分局……我们为要得到蒋介石对中央苏区及四方面军之破坏工作的消息，遂允熊来，据熊说蒋已派四个人(有两个是浙江人)到四方面军去，中央苏区亦建立多年工作，此等人均做上层收买工作，我们乃将熊事公开，举行群众审判枪毙之。"

调查人员又让晏章炎写了一份材料，内容与 2 月 14 日的揭发信一样。7 月 12 日，这份材料以贺龙"通敌未遂"上报中央。

9 月 7 日，叶群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作长篇发言，说贺龙问题严重，要求立案审查。康生、江青、陈伯达、谢富治等人均表示支持。

9 月 10 日，曾于 1929 年春调任中共满洲省委组织部长丁基实就 1929 年刘少奇东北被捕一事写下了如下供词：

关于张麻子所谈的刘、孟罪行材料

在刘、孟出狱后约三四天，我在街上走，张麻子赶来喊我，要我到他家里坐坐。到了他家以后，他就问我："老刘老孟出来

啦？”我说：“出来啦。”他说他听到一些消息，“听说都承认了共产党，并且出来以前，还写了悔过书。”“听说刘还把孟坚供出来啦，刘另外还供出一座房子，不要随便谈。”我问他从什么地方得到的消息，他说从警察方面得到的。

丁基实 1967.9.10

丁基实即丁君羊，1929 年与孟用潜同管满洲省委组织工作。1929 年刘少奇、孟用潜被捕后为满洲临时省委负责人。他于 1930 年 4 月被捕入狱，九一八事变后交保获释，后改名丁基实，赴德国留学，从此脱党。1938 年回国后，曾任国民参政员、国民党山东省建设厅厅长等职。解放后因高饶事件，再次被劳教三年，此时已被江青批示，抓到北京监狱。他在材料中说的张麻子，即邵麻子，邵扶民，已死，当时是中共特科工作人员。

9 月 11 日，江青、康生、陈伯达、叶群向毛泽东、林彪报送要求成立专案组审查贺龙的报告。报告说：“贺龙的政治历史问题和阴谋篡军反党、反毛泽东思想的罪行都很严重，需要成立专案组，进行审查。由康生任组长，杨成武、叶群为副组长。办公室设军委，抽调 10 名军队干部组成专案组。”

当天，谢富治写了一个便条：“王光美专案成员于下：江青、谢富治、戚本禹、汪东兴、叶群组成王光美专案小组。请总理、伯达、康生同志批。原来的肖华同志不再参加了。”

9 月 12 日的下午到晚上，在福禄居的前后院之间垒起了一堵高墙，把王光美和刘少奇完全隔开。

9 月 13 日上午，刘少奇的儿女们被勒令立即收拾行李，搬到各自的学校里去接受审查批判。当有孩子追问情由时，答复是："你们给父母通风报信，必须好好检查罪行。"

刘少奇家的保姆赵淑君阿姨带着刘少奇最小的女儿小小离开中南海，被安排在中南海红墙下南长街的两间平房里。这里是中南海工作人员的宿舍，住的有毛泽东、朱德的厨师，江青的司机等等。赵淑君后来回忆说："那个时候，小小有 30 元的生活费，我有 8 元生活费，我们两人就是靠这 38 元钱过着紧巴巴的生活。"

说起来，当时一名工人的月工资也不过 30 元左右，但要养着家里许多子女。赵淑君带着小小二人每月 38 元生活费，应该是不错了。长大后的小小是这样回忆她那段时间的生活："这些邻居和他们的孩子们都对我很好。邻居叔叔阿姨的单位里发水果了，就会分给我们吃；学校里的任何活动，从未拒绝让我参加，音乐老师还义务教我拉手风琴。"

这是 1966 年秋天拍摄的刘少奇和王光美拉着刘小小在中南海福禄居院中散步

1964 年，刘少奇与小女儿刘潇潇在一起

当天晚上，王光美住的福禄居后院突然来了几个人，向她出示了谢富治签发的逮捕证，宣布对她正式逮捕。从此，福禄居就只有刘少奇一个人了。

9 月 13 日，中央下发了《关于认真贯彻执行中央“七·一三”指示的通知》。《通知》承认“七·一三”指示下达后，“许多地方的群众组织直接给中央送来报告，要求兴建毛主席大型塑像。目前，有的正在施工，有的积极备料。”《通知》重申“无条件地贯彻执行中央指示”，并在第三条中做出具体规定：“已经建成或将要建成毛主席塑像的，严格按照‘七·一三’指示办事，由省市领导机关或军管会认真检查，不合格的坚决拆除；‘七·一三’指示后计划或动工建造主席塑像的，立即停下来。”

毛泽东 9 月 13 日在中央文革 9 月 11 日报上来的关于成立贺

龙专案组的报告上批示："同意"。

当天，贺龙专案组成立，归中央专案审查小组麾下的第二办公室管理。组长是空军政委余立金，第一副组长是空军司令部秘书朱铁铮，副组长是来自北京军区的芦凤歧。

江青在 9 月 18 日接见中国京剧团等单位的讲话时说："我现在负担着第一个大专案，有一天，我搞了五、六个小时，……我现在可以告诉你们，刘少奇是一个五毒俱全的大反革命、大内奸、大叛徒、大特务。太恶劣了……我觉得，他应该千刀剐，万刀割……"

9 月 14 日，《人民日报》社论传达了毛泽东的最新指示："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

## 第 885 回：派“老多”，保铁路安全畅通　第六次，见广西两派代表

我们再看广西。8 月 31 日，广州军区发布〔67〕第二号命令：任命 55 军副军长孙凤章为柳铁军管会主任，55 军机关接管了柳州铁路局的全部领导权。

9 月 3 日，广西“联指”赴京投诉团 40 人乘火车经过桂林时，遭到桂林“老多”和南宁赴桂“422”人员的检查，25 人被绑架，其余下落不明。

9 月 5 日晚，周恩来单独接见桂林“老多”代表杨福庭，在场的有周恩来的外事秘书郭长安。周恩来说，越南人要去桂林，问桂林治安情况怎么样？“老多”能不能控制局面？他说：广西境内铁路形势严峻，为保证铁路安全畅通，派“老多”护路，“把‘老多’当解放军用”，维护铁路安全，保证畅通。

杨福庭兴奋不已，当即满口应诺：“保证完成任务！”

随后，周恩来就走了，留下外事秘书郭长安继续和杨福庭细谈。

周恩来给“老多”护路任务的消息传回桂林，桂林沸腾了。由派驻师院的 6955 部队军训团组织，师院组成 1600 多人的队伍，军训团团长张体成任总指挥，陆续撤向广西铁路沿线各重要车站。这时，柳州铁路局、广西军区遵照周恩来指示，要求铁路职工、当地驻军支持“老多”护路。

9 月 10 日，广西军区南宁警备区司令部、政治部发出《关

于撤消南宁警备区司令部、政治部致<新工总、倒海翻江负责人的忠告、警告书>的公告》，承认“这个《忠告警告书》是十分错误的”，“并向新工总，倒海翻江公开道歉。”

当天，广西军区还发布了“关于恢复广西工人革命造反总部名誉的声明”，承认“广西工人革命造反总部”，简称“工总”是南宁地区造反较早的革命群众组织，因此，广西军区于 3 月 1 日砸了“工总”总部是错误的。在此，为“工总”恢复名誉，并向“工总”广大群众公开道歉。

9 月 13 日凌晨 2 时至 4 时 30 分，周恩来第六次接见广西两派代表。陪同接见的有戚本禹、黄永胜。

周恩来对“联指”说：“上次接见时，说了几句话，你们就走了。我们又把你们请回来了。”

“联指”代表团负责人站起来说：“我们向周恩来检讨，我们不辞而别是不对的，……”

周恩来：“不要检讨了，回来就不要检讨了。广西两派还没有下结论，听说你们回去做了很多动员工作，执行《九·五命令》也不错嘛！这是考验你们，向前看嘛！你们谈谈回去后做了一些什么工作？”

“联指”代表汇报了他们回广西后执行周恩来指示和《九·五命令》的情况，并且检讨了“联指”的缺点和错误，同时重提“422”打一中的事，并表示要坚决把伍、贺、霍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揪出来。

周恩来说："不要算旧账，主要是以现实的斗争来考验两派，以这两个多月来考验你们，看哪方面执行得好，这是一个标尺嘛！""现在摆在你们面前重要的是铁路运输的问题，现在铁路运输是否正常？有没有农民进城？南宁工厂生产恢复得怎么样？现在还夺不夺枪？你们在外面的人是不是回来了？"

"联指"说："南宁到凭祥、南宁到湛江是正常通行的，就是柳州、桂林不通。"

周恩来："你们的协议签订很久了，要很好去执行，现在不要老纠缠在打谁、保谁的问题上，你们不是斗争了贺、霍了嘛！不要纠缠在什么集团上，你们说他们伍、贺、霍集团，他们就说你们韦国清集团。这怎么行？要实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要实行《六·六通令》、《六·二四通知》、《九·五命令》、《十条协议》，在这方面来考验你们够不够革命群众组织，是否坚决按照毛泽东思想办事，纠缠在领导干部上面，就会增加对立，不能求同，广西走资派是有的，但不要以此来互相攻击，在这个问题上，各有影响的话，就不要领导干部和你们住在一起，你们两派可以辩论，但不要搞武斗。你们桂林'老多'在这里还有多少人？"

答："还有三、四个。"

周恩来："'422'呢？"

"422"答："还有100多人，我们动员了几次，2号走了一批，4号走了一批，讲8号走的，到今天还没有车。"

周恩来："回不去吗？哦！五次车不通了，柳州的铁路怎么样？"

"422"说："柳州'联指'又调动外单位的人到南站、鹿寨、鹧鸪江，用机关枪卡住，车开不了。我们的人被围困在机务段里。"

"联指"代表汇报柳州的情况，指责"422"……

周恩来："不要说了，上次不是叫你们双方派人回去吗？"

"422"："我们定了五条协议。"

周恩来："执行协议有什么困难？"

"422"："协议定了以后，下午 4 点，又开车去贵阳，他们开了一趟去湛江，到 6 号为止，我们开了 6 趟车。"

周恩来："太少了。"

"422"："7 号开车，计划送化肥去全州，回来时，正司机陈光林被'联指'开枪打死，副司机被打伤。副司机负伤坚持开车到桂林。"

周恩来："打死了？"

"422"："打死了。子弹从右胸穿过去。"

周恩来："哪个车站？"

"422"："百里村站。"

周恩来："'联指'是本地的还是车站的？"

"422"："本地的有，车站的也有，是车站指挥的，他们沿线架起机枪。"

周恩来看了他们签订的"五条协议"后问"联指"："你们称

为广西无产阶级革命派赴京代表团，对广西各地‘联指’起不起作用，能不能号召他们？”

“联指”代表答：“我们广西‘联指’，只是南宁的，我们代表也多数是南宁的，我们是代表广西 2000 多万人民的利益、来京反映广西问题，但我们和各地的‘联指’没有组织上的关系。”

周恩来：“你们号召一下可以吧？”

“联指”代表说：“我们只能呼吁，没有组织联系。”

周恩来：“你们不要只管南宁，可以呼吁他们，如果他们不听，你们就要加以区别，按毛泽东思想办事，批评他们。现在铁路还不能听军管指挥？”

“422”代表说：“铁路军管小组改组后，8 月 26 日铁路的‘钢联指’从沿线调了 1000 多人，占领了柳州局一些点。”

柳州“联指”：“他们说他们被打，我们的机车也开不出去……”

周恩来问他：“你是哪位？”他翻阅名单后说：“你是《柳州日报》的，你怎么知道铁路的情况？铁路全部军管，你怎么知道铁路的事情？”

“联指”代表说：“因为 64 台机车都被‘工机联’扣了，不给开！”

周恩来：“因为开枪，打枪不能开吗？”

“422”代表说：“机车是有 60 多台的，但是不开是有原因的。”

“联指”：“他们拿来做工事，焊接起来了。”

周恩来生气了：“现在铁路达成的协议没有效，你们两派都熟视无睹，军管会无法行使职权，难道中央的命令在广西不能实行？！你们双方还考虑不考虑越南的影响？！你们只管南宁的‘联指’，下面的就不管了，总是和你们有联系嘛！”

“联指”代表分辨说：“我们又没有什么章程叫他们加入。”

周恩来：“你们为什么不可以说话？”

“联指”答应：“我们回去呼吁。”

周恩来：“回去就晚了。”

柳州“联指”说到 9 月 4 日发生在桂林铁路局的事情：“我们 9 月 4 日，100 多旅客也被‘老多’扣留了。”

“联指”代表说：“我们南宁上访的学生 6 个人，在 8 月 28 日，响应周恩来号召，打回老家去，归口闹革命，但到桂林也被‘老多’非法绑架，非法审讯。”

周恩来：“你们‘老多’我以为是比较好的，我比较赞扬你们，怎么会搞这一套了？　”

“老多”说：“我们正在研究，有些人以极左面目出现，破坏铁路交通运输。”

“联指”：“他们把我们的证件都拿走了。”

周恩来：“有这么回事吗？”

“老多”承认：“是有这么回事。但不是‘老多’搞的，是以极左面目出现专搞打、砸、抢的流氓无产者搞的，他们在车站

抓人、抢东西。”

周恩来：“是你们这一派的吗？”

“老多”答：“他们打着造反派的旗号，打着桂林‘老多’的旗号干的，其实不是桂林‘老多’，还有一些冒牌‘湘江风雷’、‘红铁军’支持他们。”

周恩来：“他们有多少人？”

“老多”：“有 300 多人。”

周恩来：“你们有多少人？”

“老多”：“我们‘老多’这边有 20 万人。”

周恩来：“你们为什么不清算他们呢？你们力量大，你们占优势嘛。你们可以把他们围起来嘛！”

“老多”答：“10 号前就解决了。我们围了他们，缴了他们的械，‘红铁军’还架起了大炮、机枪对着我们，我们马上包围了……‘湘江风雷’总部打来电报，说他们根本没有派人到桂林，要我们‘造反大军’对冒牌的进行军法制裁。我们马上解决了。”

周恩来：“很好。”

“老多”继续说：“现在以极‘左’面目出现的桂林市‘革联’已经没有市场了。大批判已经搞了起来了。‘革联’的头头已经上了北京。”

周恩来：“你们可以和卫戍区联系，把他们抓起来嘛。你们‘老多’是比较早的造反派，要保持你们的荣誉。我向外国朋友称赞了你们，桂林是比较好的，外办同志对外国同志到桂林参观

不放心，我还说不要紧，你们能够维持秩序，我不是找你们谈过了吗？”

“老多”代表杨福庭答：“是，在人大会堂。”

周恩来：“所以，我才让外国代表团到桂林参观，现在有野战军护路，铁路两派都要信任军队，不管哪一派，都要受军管会的领导，业余时间可以闹革命，两派都支持军队，军队才能发挥作用，外部不能去，不要搞打、砸、抢，更不要到铁路搞打、砸，抢。”

“老多”说：“现在有一批人打着造反派的旗号干坏事，‘红铁军’的一部分人在桂林枪毙了一个联指，我们要抓凶手，他们说凶手走了，我们要抓头头，要交出头头。打着我们这一派的坏人我们敢揪，你们联指中的坏人，你们敢不敢抓？关键是敢不敢用毛泽东思想办事。现在桂林以北的铁路没问题。”

周恩来：“桂北没问题，桂南就是柳州的问题罗。柳州应该负责。”

“铁路要首先解决，我们去人解决不了，两广、湖南车一直开不通，国际铁路运输失灵，广西紧靠越南，那边在打美帝，东西供应不上，你们眼看铁路瘫痪，物资运不出去，你们好过吗？你们心安吗？”

双方又发生争执，互相指责。周恩来批评桂林“老多”抓了广西“小 8”的人，戚本禹插话说：“这件事，他们‘老多’应发个通报，通报全区，这样可以提高威信嘛！”

周恩来："我同意戚本禹同志的意见。你们（老多）把这件事通报全省，向被抓的同学赔礼道歉，你们的威信不是降低，而是更高了。""主席最近还讲：造反派不是靠谁封的，主要靠自己奋斗得来的。不要以为过去造反早，造了一些反，就永远是造反派，不要吃老本，不能摆老资格，要立新功，不管哪个人都要这样。"

戚本禹："'联动'原来也是造反派。"

周恩来："是响当当的造反派，破四旧，立四新……清华附中还发表了'三论'，造反精神很不错，但后来走向反面了。"

戚本禹："'老多'要警惕些，要写一些《老多不要吃老本》的社论。"

周恩来："不管哪一派，都不能吃老本，现在有两条，第一条要相信解放军，把凭祥到北京的列车由野战军管起来，沿途武装巡逻。第二条，希望桂林'老多'站出来，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参加护路工作，和解放军一起，按《九·五命令》办事，一字一句的执行，把铁路管起来吧！保证铁路运输通行。"

"枪支'联指'交了一部分，确实做出了成绩，那么'422'也应交还，起码也要封存嘛。'422'的工事要拆除，两派都要封存武器，凡是夺的和自己造的都要封存。"

"老多"说："桂林的枪全封了，还开了个誓师大会。"送上一份桂林来电。

周恩来看后表扬道："很好。"

“422”对上交武器、拥军爱民等问题做了检讨。最后说：“我们在五次接见后，正在做大联合的工作。我们想，先从学生做起，找他们‘联指’中西大的同学座谈。”

戚本禹说：“联合问题，你们先放开学生，先把工人联合起来，工人还要搞生产，工人只能有一派。学生爱搞几派就几派，搞四派、五派都可以。”

周恩来则更具体：“先搞铁路的，完全可以站在一起搞大批判，工人阶级本身利益是一致的，要在毛主席路线上搞大批判，观点有点不同，可以求同存异嘛！越南那边炮火连天，为什么火车中断，为什么把机车连起来，你们不感到难过吗？我希望你们‘老多’先站出来，为人民立新功，为文化大革命效劳，湘桂线，还有到湛江，到贵阳，要连通，你们要服从野战军，谁破坏就把头头抓起来，如沿途有人开枪，就停下车来，把头头抓起来，实在不行就派两个连跟车，搞几次就行了！你们两派研究研究，都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比高低嘛！看谁执行得好。” “铁路问题，我们下命令马上实现全面军管。”

“422”告状：“‘联指’中有一小撮坏头头，五次接见后他们炮打周总理。”

“联指”反驳：“根本没有这回事，我们说的是军区周副政委。”

戚本禹强调：“炮打周总理就会变成‘516’。”

“422”继续告状：“五次接见后，‘联指’向军区提出了十

几个为什么，把军区负责人斗得很厉害。”

戚本禹：“你们‘422’反军区错误是严重的，斗的比他们还厉害。”

“422”检讨：“这点我们有错误，过去我们没把广大战士和某些领导分开，和战士的关系搞的不好。”

周恩来：“今天主要是解决铁路运输问题，我还要办两件事，其他问题以后再谈。”

9 月 13 日，桂林军分区政治部副主任贾洪起打电话给荔浦县人武部，要求流落到荔浦的桂林“联指”成员迅速回桂林“抓革命、促生产”，并通知荔浦县从 9 月 14 日起停止给桂林“联指”成员供应粮食等生活物资。

为搞粮食，9 月 14 下午 19 时许，桂林、阳朔、荔浦、雁山的“联指”约 400 人，全副武装，分乘 12 辆大卡车，由荔浦、阳朔向雁山方向奔驰。15 日凌晨与“造反大军”驻守在雁山的下属组织发生了武装冲突，雁山镇一名 4 岁小孩在冲突中被当场打死，打伤数人，“联指”占领了植物研究所、劳动大学、粮店、食品公司、商店、战备物资仓库及邮电局等单位。雁山的“造反大军”向桂林“老多”求援。“老多”和 47 军 6955 部队商量，要求 6955 派部队保护“老多”一起去。于是，“老多”200 多人和 6955 部队两个连的解放军全副武装出动，6955 部队副师长郝忠云亲自带队，赶赴雁山。

9 月 15 日清晨 7 时 5 分，“联指”听说支持“老多”的部队

来了，就往阳朔县白沙方向撤退。

为了要回被“联指”抓走的十几个人，“老多”和部队继续追击。“联指”撤退到白沙粮管所，这里是他们控制的地区，突然掉头向“老多”和部队开枪，打死“老多”一名师院学生和解放军的一个班长，“老多”即还击。

经短暂交火，部队看到双方都是群众，怕有更多的伤亡，和“老多”一起撤退。

## 第 886 回：攻“贸派”，涪陵反击战结束　遭伏击，大连九一五事件

我们再说四川涪陵。这里“贸派”的主力于 8 月 15 日撤到涪陵城乌江以东农村地区后，主要以原涪陵县的焦石区、清溪区及邻近的原丰都县的包峦区为中心活动。其间，赵树金曾亲自带队，于 8 月 27 日南下攻占丰都县的高镇，后因站不住脚而退回包峦。之后又曾攻打石柱县的双路区，均不成功。

8 月 22 日，涪陵地区各县人武部集训和武装复员退伍军人，组成 “围剿贸匪”武斗队。8 月下旬，在经过了一段时间的休整后，“忠实派”又集中兵力，发起了打击涪陵长江以南地区农村“贸派”势力的“江南战役”，只几天就“大功告成”。

9 月 7 日，“贸派”在丰都县包峦供电所召开由赵树金、况道成主持的常委会，赵树金提出以丰都县的栗子区栗子寨为中心“建立巩固的农村根据地”，并决定“派出精干力量攻打石柱县城以解决冬衣物质等问题”。以后的几天，在丰都县包峦区粮站又专门研究了这个问题。

那位“贸派”诗人在他的《包鸾会议》诗中是这样评价这次会议：

包鸾会议误，　　错上栗子山。
门多岂为险，*　　绝域守也难。**
孤军帮助弃，***　　万人给养殚。
智者百遗漏，　　一输便满盘。

原注：

*栗子山又叫栗子寨，有 48 个寨门。

**栗子寨四面不靠，即使攻不上去，要长期解决一万多人的吃穿可不是一个简单的事。

***后来普遍认为当时贸派应撤到靠近重庆的地方，与重庆“八、一五”互相呼应，并可借助重庆警备区的影响限制涪陵部队过分卷入派斗中。当时认为“八、一五”也很困难，不能去增加它的负担。

9 月上旬，“忠实派”又集中兵力，发起了打击涪陵长江以北地区农村“贸派”势力的“江北战役”，很快就肃清了涪陵长江以北地区的“贸派”武装。

9 月 14 日，“忠实派”在支左部队的支持下，以执行中央《九五命令》为由，渡过乌江，开始了所谓的“江东战役”，向“贸派”的最后一块地盘，涪陵乌江以东地区进军。当天，一支“忠实派”红卫兵武装在江东大田湾遭“贸派”武装伏击，伤亡惨重。

而支左部队工程兵 8042 部队差不多在同时从丰都县城南渡长江向包峦方向进发，使“贸派”实际控制的地盘越来越小。于是“贸派”的武斗队伍于 9 月 17 日前后陆续撤上栗子寨。

9 月 17 日，涪陵地区支左领导小组通过涪陵支左部队 8042 部队转交赵树金一封信，劝他带队归案，可以减轻处分或免予处分。除此以外，还附有一份中央军委关于收缴武器的《九五命令》，

及涪陵支左领导小组关于收缴武器的通知和“致受蒙蔽群众的一封信”等文件和传单。赵树金看后说：“没有什么案可归，也没有什么枪可缴，他们把枪发给‘砸派’都可以，我们的枪是向国家借的。”

9 月 21 日晚，部队和“忠实派”的武斗连队在前线指挥部的统一指挥下，向栗子寨的制高点金龙寨发起攻击。发起总攻前，在前线指挥部的统一指挥下，先向金龙寨连续打了 48 发炮弹，然后开始进攻，很顺利的就攻下了金龙寨。

当晚，“贸派”听说金龙寨被占领，当即决定派 3 个连去加强求雨堡的兵力，原守求雨堡的是焦石部队、清溪部队、二兵团二连，除原有火力外增加重机枪一挺，一门炮。

22 日中午，“贸派”部分常委开会，决定况道成、彭用吉、周超群带一、三兵团主力，配合原守卫部队，发起反击，夺回金龙寨。赵树金还布置用火攻，准备放火把山烧起来。赵正法说：“不行，山和森林这么大，风向又不定，万一（风向不对）还会烧到自己。”

与此同时，还派“贸派”参谋长黄年福前去求雨堡，加强那里的防守兵力，准备固守求雨堡。

况道成他们攻金龙寨失利，一天多未拿下来。23 日晚上，退回栗子寨。“贸派”参谋长黄年福和重庆解放军总后 242 部队的“815”派带 302 的一个排去求雨堡，刚到那里就看到他们的队伍正退下来。黄年福对他们喊：

“不能跑，要顶住！”

没有人听他的，全都跑了。“贸派”在求雨堡约有六、七个连，四挺重机枪，还有几门炮，轻机枪就比较多，结果在 24 日早上都跑了。早饭后，黄年福又找 242 部队的几个人研究撤离。午饭后 14 时就撤了，同行的有 14 人。

“贸派”诗人在《1967 年 9 月 24 日晨》的诗中再次描述了他们当时的情景：

拂晓枪声紧，　　遭袭失金龙。*
相持求雨堡，**　　尽日无寸功。
子弹丝丝响，***　　曳光串串红。****
计划欲反嗜，　　失误而无终。*****

原注：

*金龙寨是栗子山的制高点。

**求雨堡紧挨着金龙寨，其高度仅次于金龙寨。

***子弹丝丝着响，说明离得很近。

****夜光弹。

*****当日下午欲反攻夺回金龙寨，直到天黑才摸了上去。又由于摸上去的地点恰好在机枪口下面，引起了对方的警觉，计划只好取消。

9 月 25 日下午 16 时左右，在栗子寨“贸派”联司总部，况道成、彭用吉、王瑞清、王富国、杜炳全、赵正法、赵树金、双路区武装部周部长开会，赵正法主持，研究撤退问题。下午 16

时，他们向重庆“815”发电报请求支援，并要求最迟下午 18 时回电。

赵正法说：“在栗子不能呆下云，现决定撤退，撤退时间暂不定，但今晚一定要撤，就是等重庆‘815’6 时的回电。即使‘815’来支援我们，就是接电后立即出发，到我们这里，车船往返也得花一天多，等不及了。”

赵正法提出撤退路线，他说：“向三建公社那个寨门向三抚之间到新台的黄沙坝，到接龙，再到武隆县的桐梓山。桐梓山山高，可坚持几天到白马山，逐渐向重庆‘八.一五’靠近，一兵团走头，二兵团和毛主席的红卫兵走二，三兵团走三，‘江东部队’走四，四兵团走五，家属和伤员不要管，能走的跟着走，但不通知。”

然后又分配王富国到四兵团带上队伍去三建学校的那个山上掩护部队撤退，王富国到三建时，撤退已近扫尾，他们便随三兵团后撤退。

9 月 24 日中午就跑走的黄年福一行 14 人由于各自选择不同的路线，很快就走散了，只有黄年福和涪陵军分区的两个人在一起。

9 月 28 日，他们逃到石柱县马武区木枰乡，在一家老百姓家煮饭吃。刚吃完饭，公社来了六、七个人，将他们请到公社武装部说明情况。

在去公社的路上，黄年福见前面五、六个人走得较快，一会

儿转过弯已看不见了。他就问前面的那个穿雨衣的人："离公社还有多远？"

那人答："还有两里多路。"

这时，黄年福顺手抽出他的五四式手枪，向前面那人就是一枪，将其打翻在地，掉头又向他后面的那个人一枪，也将其打倒。接着他们 3 人就跑上山，一直到 9 月 31 日，发现一个山洞，由于又冷又饿，正准备休息，结果被石柱造反派包围了。黄年福又准备和他们干，打算天黑后再跑。包围他们的人在洞外喊话：

"我们是会按毛主席的政策办事的，只要缴械投降，我们保证人身安全，若不投降，我们就要用手榴弹炸了。"

这样，黄年福他们才出来投降。

再说"贸派"主力于 9 月 25 日傍晚从栗子寨撤退后，27 日到了丰都县的黄沙坝乡。此处已是丰都县与武隆县邻界的地方。武隆县的造反派当然决不容许"贸派"进入其县境之内，而且"忠实派"在前线指挥部的指挥下已追赶上来，于是"贸派"处于被前后夹击的不利地位，一场最终打垮"贸派"、也是自"贸派"从 8 月 15 日撤出涪陵城以来和"忠实派"打得最激烈的战斗，终于在 27 日的凌晨打响了。

战斗在当天上午结束。双方伤亡 100 多人。最后清理战场，把打死的人都用白布裹起，草坝上摆了一大坝。

"贸派"投降后，对所有的俘虏都进行搜身，发现不少的人身上都有不少的现金、粮票，甚至有的俘虏身上还藏有金砖。"忠

实派”中虐待俘虏的现象严重。

就在黄沙坝，“贸派”的高参赵正法自杀阵亡。“贸派”的二号人物杜炳全被打死，一个不解恨的“忠实派”武斗人员甚至割下他的头颅提了十多里，后在同伙的劝阻下才弃之荒野。

“贸派”诗人在他的《被俘》诗中是这样描写他们被俘后的境况：

突围谈何易，　　两日三军赤。*

黄沙一战惨，　　秋风悲声凄。**

万人尽为虏，***　两江遣返急。****

难忘国庆际，　　押解回故居。*****

(原)注：*贸派武装虽多是转业退伍军人组成，终是群众，在部队面前毫无斗志，迅速土崩瓦解。

**丰都黄沙坝一战最为惨烈，双方伤亡一百来人，后以贸派全数缴械告终。

***贸派上栗子山武装和家属共一万多人。

****长江和乌江。

***** 十月一日，天气阴沉，涪陵家家关门闭户，冷冷清清，只有胜利者和俘虏在活动，还有少许到码头用石块迎接俘虏报复的群众。

9 月 29 日，即“贸派”撤出栗子寨后的第四天，“贸派”在黄沙坝被“忠实派”最后打垮、赵树金最信任的高参赵正法阵亡后两天，赵树金只身逃到丰都县厢坝乡曙光大队高山坎的一个

农民家，家中只有一老一小母子俩。由于天下大雨，下午 6 点多钟天已暗下来。当时赵树金已淋成落汤鸡，已经躲了两天的他，饿得心慌，冷得发抖，一进门就要吃饭，要烤火。赵树金的行为引起这家 15 岁小孩何胜兴的怀疑，借故上山牵羊回家，很快跑去告诉民兵排长。当民兵排长带人赶到并将赵树金押到公社后，很快被确认身份。当晚赵树金就被押送到武隆县双河乡，第二天即被押送回涪陵，从此他就开始了他 20 多年的牢狱生涯，直到上世纪 90 年代中才被释放。

涪陵自 8 月 14 日起，历时 45 天，追击、围歼“红贸”派的反击战斗终告结束，其间涉及 4 个县、22 个区、67 个公社，共计打死 1000 多人。

说完四川涪陵的武斗，我们再看此时东北的大连。由于此时旅大市背负“保皇派”臭名的“思想兵”，其办公地点及广播站屡遭对方的打、砸、抢、抄，于是和同一观点的工人组织“旅大市五一兵团”和“旅大市捍卫毛泽东思想赤卫队”，以及学生组织 “旅大市红港总部”的余部，联合成立了“旅大市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造反总部”，简称“旅大市革联总部”。

9 月 15 日，太阳初升，秋风送爽。大连市宽敞的斯大林广场开始喧哗，前来开会的旅大市“革联总部”下属各分部进入广场，这是“革联总部”成立不久的首次集会。

当各路人马进入会场后，几辆载有荷枪持弹武斗人员的车辆在会场外施行警戒，将横贯斯大林广场的中山路东西两个出口堵

死。在武斗车辆中，最醒目的是一辆由“大解放”货车改装成外覆钢板的装甲车，塔式的顶端和两侧开有射击孔，市民管它叫“土坦克”。其它“大解放”武斗车厢上堆垒着沙袋工事，每辆车上都有五、六名武斗人员，他们虎视眈眈地警戒着，以防“工总司”的武装骚扰。

“土坦克”所用钢板系建造海军导弹快艇所用钢板，所用钢板的提供及“土坦克”的制造，均由“造船联军”负责完成。后期的“土坦克”炮塔改进为旋转式，“12·7”高射机枪是从海军导弹快艇上拆卸下来的。“造船联军”制造的“土坦克”自留两辆，支援大染“2·24 战斗兵团”、化校总部驻“造船联军”武斗 2 连、“工矿钢铁联军 8·9 司令部”各两辆。对大染“2·24 战斗兵团”和“工矿钢铁联军”的支援是有条件的，换取他们的长短枪支和子弹、手榴弹等。

9 月 15 日上午 9 时许，大会主持人宣布大会开始。先由“革联总部”负责人讲话，接下来几大分部工人组织和学生组织代表发言。空军工程学院“红色造反团”驻大连联络站代表上台宣读致大会的贺信。他的发言赢得雷鸣般的掌声，因为他那上绿下蓝的空军军装让与会者感到，这是代表解放军在表态，尽管是军校学员。

此时的“革联总部”极需要解放军支持。而旅大警备区虽同情“革联总部”，但不能明确表态，因为旅大军管会组成虽以陆军为主，但还有旅顺基地的海军参加。

上午 10 时 30 分许，誓师大会结束，游行开始，由于东部的中山区是“工总司”天下，“革联总部”只能在“中立区”的斯大林广场所在西岗区游行，近中午时，游行队伍行进至东北路大连柴油机厂与大连罐头食品厂之间不足百米路段时，枪声大作，遭遇埋伏在路旁厂区内高层建筑的“工总司”武斗人员袭击，人群如惊弓之鸟瞬间散尽。此次袭击造成亡者 8 人，伤者不下 10 余人，多是“造船联军”的人，只见柏油路面上血迹斑斑，白花花脑浆涂地……不堪入目。

## 第 887 回：洒汽油，苏州武斗“三把火”　无锡打，沪宁线中断半天

江苏苏州的武斗曾用“三把火”来概括。

1967 年 1 月 26 日凌晨，苏州二十多个群众组织联合夺权，并于 2 月 9 日成立了“毛泽东思想革命委员会”。支持革委会的一派，是“苏州市革命造反联络站”，简称“联络站”，人称“支派”。反对革委会的一派，成立了“工学运动革命串联会”，简称“串联会”，人称“踢派”。“支派”得到驻在苏州的 6307 部队，即 27 军 79 师支持。“踢派”则得到硕放空四军 15 师 3607 部队和苏州军分区支持。

到 7 月，“踢派”占据了六城门内的苏州城，“支派”被逐出苏州城，占据了城郊及周边乡镇。

由于市区“支派”的到来，苏州地区所属的吴县、吴江、昆山、常熟等县的“踢派”势力骤降，只得纷纷撤退。7 月 28 日下午 14 时，位于苏州西北十余里的浒墅关火车站集结了 200 多人的“踢派”工人、学生，在几位复员军人的指挥下，喊着口号，登上火车，一路向东，开开停停，在傍晚 17 时许到达上海，被上海“工总司”安排在位于徐家汇的风雨操场。这里聚集了苏州“踢派”约有两三千人，各群众组织的旗帜堆满了主席台。他们在这里住了两个晚上，“苏州地区革命造反第三总司令部”头头做了两场演讲，大意是“苏城在流血，我们要打回老家去，保卫苏州城”，听的大家热血沸腾。

7 月 30 日晚上，苏州“踢派”几千人，举着“打回老家去，踢开苏革会!”“保卫苏州城、保卫大上海!”的横幅，在上海大游行，从徐家汇一直走到宝山路上海老北站，从这里乘坐上海“工总司”安排的两组专列，于 31 日凌晨 5 时到达苏州站。

8 月 2 日凌晨，苏州医学院发生武斗。“踢派”围攻“支派”据守的苏州医学院主楼，一幢西式丁字形 4 层教学楼。清晨 5 时 30 分，“踢派”的“串联会”用消防车向丁字楼喷洒汽油，然后用氧气瓶爆炸引火，大楼被烧，双方在“火海”中展开枪战……这是苏州武斗的第一把火：“火烧苏医”。“支派”驻苏州医学院 300 余人当晚突围，撤至郊区。

8月3日凌晨1时，27军军部传达周恩来电话指示：“听说在苏州医学院里两派打得很厉害，你们要立即派部队去解决，告诉他们有什么问题可以坐下来谈，立即把武斗停下来，不能烧房子，不能开枪，围攻的一方要迅速撤离。”

凌晨4时许，27军79师派出1600人前往苏州医学院解围，受到“踢派”阻拦，反复交涉未果，只得返回。

事后，苏州医学院丁字楼顶部木架被烧成炭黑状，4具尸体散落在现场。

8月17日，在苏州葑门安利桥畔的孵坊，双方再次发生冲突，其中一幢房屋被烧，“踢派”冲进司前街监狱，放出王烈等13名被押人员。这是苏州武斗中的第二把火：“火烧葑门孵坊”。

8月23日，“踢派”的“串联会”从阊门一线出击，在吊桥与

“支派”的“联络站”发生武斗。

阊门，苏州城的八门之一，位于城西北，始建于春秋时期。《吴越春秋》记载：“立阊门者，以象天门，通阊阖风也。”故又名阊阖门。“阊”是通天气之意。又因吴欲灭楚，该门方位朝对楚国，阖闾率大军由此门出城远征楚国，故阊门亦称为“破楚门”。

“当日地陷东南，这东南一隅有处曰姑苏，有城曰阊门者，最是红尘中一二等富贵风流之地。这阊门外有个十里街，街内有个仁清巷，巷内有个古庙，因地方窄狭，人皆呼作葫芦庙。庙旁住着一家乡宦，姓甄，名费，字士隐。”这是《红楼梦》开篇第一回里对苏州阊门的描述。

而明代唐寅的诗作《阊门即事》写道：“世间乐土是吴中，中有阊门更擅雄。翠袖三千楼上下，黄金百万水西东。五更市卖何曾绝，四远方言总不同。若使画师描作画，画师应道画难工。”

晋陆机在《吴趋行》里提到苏州的第一句话便是：“吴趋自有史，请从阊门起。”

阊门外吊桥西堍南侧是鲇鱼墩，因巷里有个土墩，形状很像鲇鱼儿而得名，曾是阊门外商业繁华之地。

23日下午14时许，“串联会”施行火攻，致使吊桥西堍南侧的石路68号至86号，上塘街57号至73号，鲇鱼墩一带闹市整体被焚。著名的赵天禄茶食糖果店、近水台面馆等225家商店326间民房被烧，1150户居民受害，461人无家可归。大火来临时，当地居民手抱着被褥，拿着东西没命的逃，老人、妇女、孩子的哭喊

声撕心裂肺。这是苏州武斗的第三把火："火烧赵天禄"。这把火足足烧了好几天才灭，原本一座座古色古香的民房，只留下了残墙断壁，有几个人来不及逃脱还葬身于火海之中。这个毗邻石路的闹市一角，从此变成一堆废墟，现在那地方已建成一片公园了。

"火烧赵天禄"现场

"踢派"向在上海的无锡"主力军"求救，上海的无锡"主力军"负责人王国栋即派人前往无锡"主力军"总指挥部所在的镇江，说明情况，要求派出力量支援苏州"踢派"。总指挥部接受了这一要求，由陆渭文派出一支以参加过朝鲜战争的老兵为主体的武装连，取名为"722部队"，随上海来人奔赴姑苏城。在这支"722部队"之后，上海的无锡"主力军"大量涌进苏州，经过多次激烈的巷战，苏州"踢派"守住了苏州城。

8月中旬，由镇江252部队李德康在252部队召集了一次会议，参加者有无锡"主力军"的陆渭文，常州"主力军"的梁炳生，上海"工总司"身份的戚丞，镇江"三代会"的李玉宝等人。

李德康说:“这次召集大家一起来的目的是商议如何帮助常州‘主力军’杀回常州的问题，是否可以考虑请无锡‘主力军’帮助常州‘主力军’一起杀回去。”

常州梁炳生详细介绍了常州外围对立派的一些武斗据点的情况。镇江“三代会”李玉宝表态:“你们常州、无锡‘主力军’杀回去的一切后勤供应，由我们镇江‘三代会’包下来。”

无锡陆渭文有顾虑。首先是无锡“主力军”参与常州武装攻打常州，是否妥当？其次是在帮助外地武斗中，无锡“主力军”出现了伤亡如何交代？所以在会议上，他没有表态。

接着，江苏省军区赵司令接见了无锡陆渭文和常州梁炳生，陪同接见的有省军管会的人及“252”部队李德康。

赵司令员在听取了梁炳生的汇报之后，提出派一支思想倾向“主力军”的解放军连队，在前面开道护送常州“主力军”回去。

在接见将近结束时，陆渭文开口询问:“我们无锡‘主力军’怎么办？”

赵司令没有回答，在旁边的省军管会领导接口说:“你们也可以逐步向本地靠拢嘛。”

回来后，陆渭文找到了无锡农药厂职工、坦克兵复员军人、24 岁蒋群商议。蒋群是无锡“主力军”五兵团头头。陆渭文想让五兵团作为先头部队进入无锡县洛社地区。

无锡县洛社镇是无锡县内的工业镇，镇上有一个洛社造纸厂，厂内有一名叫大彭的科室人员和一名姓杜的技术人员，是这个厂

的“六派”头头，这两位头头来镇江指挥部联系，希望“主力军”首先进驻洛社镇。

而且，洛社地区包括石塘湾、玉祁镇等附近地区都属于“六派”的势力范围，如果“主力军”进驻这一地区，等于进入了自己的“根据地”。

蒋群当即表态：“过去使用大刀长矛，我没有本事，现在用枪动炮了，我不是外行，你可以决定由我们前去就是。”蒋群还提出，因为他与电讯兵团头头周文宝的关系比较亲近，请陆渭文考虑同时安排俩人一起去。陆渭文同意了蒋群的要求。

从镇江出发进驻无锡县洛社，必须经过常州。常州还在对立面“常州联指”的控制下，想要安全抵达无锡县，怎样避过常州这一关？

陆渭文先将五兵团一部约八、九十人先从金山寺“主力军”的大本营内调到镇江师范，这里是无锡“主力军”指挥部所在地，然后再由无锡铁道兵团头头龚太泉去上海铁路局借两节车厢，事先安排在镇江车站，将这八、九十人的小分队偷偷地装进这两节车厢。

8 月 22 日半夜，由南京开往上海的 92 次快车经过镇江车站。龚太泉亲自将这两节车厢挂在 92 次列车尾部。92 次列车在寂静的夜色中“轧、轧”地驶出镇江，在黎明初现在东方的鱼肚白时，停靠在了常州车站。下车的旅客秩序井然地离开列车，列车继续向上海方向驶去。当列车到达洛社时，调度室来了临时停车一分

钟的指令。就在这一分钟的时间里，两节车厢内的“主力军”武装小分队悄然的下了车。

第一次偷渡常州的计划成功了。但这一行动也很快引起了无锡“九、二”派的高度警惕。

陆渭文又布置第二次大队伍进驻无锡县的计划。在“敌”有备的情况下，不能再用老方法了。8 月 31 日，陆渭文亲自带队，组织了一兵团，七兵团，“6.20”部队，及两个“老虎队”，不到 600 人，向镇江“三代会”借了两艘大木船，准备经长江水路，走江阴进无锡洛社镇。临登船时发现船小人多，不能容纳所有队伍，于是临时改变计划，将一兵团全数 300 人暂留镇江码头，由陆渭文带七兵团约 300 人队伍按计划先行。

江水滔滔，木船破浪前行，等到满天繁星稀落，东方将晓时刻，木船停靠在在离江阴市不到 5 公里处。众人从这里上岸，以避开江阴反对派的阻击。然后从江阴郊区的缝隙中步行向洛社方向徒步行进。木船则返回镇江，准备载后续队伍前来。

陆渭文他们从江阴到无锡步行一天，露宿在荒郊，直至第二天 9 月 2 日到达玉祁镇，受到玉祁“六派”群众的热情招待。下午到达洛社镇，队伍住进洛社师范学校。

当晚，周炳荣带七兵团 100 多人进驻张村东北塘地区，五兵团“飞虎警卫团”驻守洛社通往无锡市区的唯一的一座水泥长桥：皋桥。这里两面临水，背靠铁路，是看守了洛社的“东大门”。“6.20”王明华及机床厂“4.15”一部驻守石塘湾，由“小老虎”

队一个排驻守在通往钱桥的小道，这里是洛社的“西大门”，陆渭文带一个警卫班及电讯兵团三、四十人坐镇洛社师范。指挥部宣传组驻洛社造纸厂。

9月3日过去了，不见后续一兵团到来。

9月4日，镇江指挥部的副指挥徐志纯等人乘火车前来，他们找到了陆渭文，传达了“指挥部”的通知：

8月31日陆渭文带队离开镇江后不久，硕放空15师政委吴世俊赶到镇江，阻止正在镇江码头等船出发的一兵团所有人员继续向无锡县开进。这一决定引起了无锡“野战军”头头周雷的不满，周雷对空鸣枪。为此“指挥部”对周雷做出了处理。空军吴世俊宣布：中央文革小组已派出以刘锦平为首的“无锡问题调查组”到江苏，现在通知无锡的两派在军事上不得擅自行动，否则将承担一切后果责任。

陆渭文率众停止前进，留守在洛社待命。

9月6日深夜，皋桥“飞虎警卫团”放哨的芦洪生被对方活捉过去，并被装进麻袋活活打死。

9 月 9 日，无锡两派在皋桥发生武斗，4 人死亡，6 人受伤。枪战时流弹击中利用造纸厂仓库，酿成火灾，大火烧了 6 天，共计烧毁稻草 6 万余担，芦苇浆板 91 吨，煤 140 吨，损失 28 万元。

当天深夜，一支“九、二”武装小分队从皋桥上偷摸过来，与陆渭文的“五兵团”发生遭遇战，冲在前面的“九、二”人员被“主力军”击毙，“五兵团”头头蒋群也身中对方一梭子枪弹

而亡。

9月13日深夜，在东北塘有一个“九、二”武装连偷袭东北塘“主力军”。当前哨班在连长徐耀富带领下，刚进入东北塘地区，恰好被七兵团头头华仁良、陆志良、李伏阳、许万祥4人出门巡哨发现，在黑暗中相距不过10米左右。华仁良问口令，对方回答了一个“主力军”七兵团人的名字，华仁良误以为是自己人，正准备上前握手之际，突然响起“叭叭”两声枪响，击中华仁良胸部，随接一枚手榴弹在华仁良腿部爆炸，华仁良与陆志良两人应声倒地，其他人迅速伏地，对准从黑暗中发出火光的方向“嗒嗒嗒……”回射一梭冲锋枪子弹，对方的连长徐耀富当即被打死在草堆旁，同时冲锋枪子弹也将徐耀富身后的两名机枪手打伤到地。“主力军”方面听到枪响，纷纷出动。由于对方地形不熟，被“主力军”包围。过来的一个班除一死两伤外，其余13人全部被俘。

一夜激战之后，驻守张村的“主力军”七兵团人员立刻赶到东北塘。9月14日清晨，由徐志纯，金浩良，蔡艺群，杨锡昌等人带领队伍接应东北塘队伍，将该地区队伍全数撤往洛社地区。这时“主力军”两名队员偷偷地返回当地医院，打死了在那里治伤的两名“九、二”伤员。

撤离队伍受到了当地“支左”部队的阻拦，“主力军”端起手中枪，推上刺刀，子弹上膛，逼退包围过来的解放军，所有队伍包括东北塘地区的“六派”群众300多人向洛社撤回。

14 日，“主力军”指挥部得到了对方将要大举进攻洛社的消息，于当晚召开紧急会议，讨论怎样应对“九、二”的大举进攻。会议最后决定：“主力军”坚守原地，但必须做好防范措施。

当夜，洛社地区显得分外宁静，半个月来，从皋桥到洛社的沿线，不断的枪声，手榴弹爆炸声全然消失。

这时，无锡“主力军”镇江指挥部的副指挥徐志纯电话告诉陆渭文，从东北塘撤下来的“主力军”已经到达离石塘湾东面约七、八里地的一个村庄，因对洛社地区的情况不明，拟在原地休息，待天明后再行动。

半夜 0 点时分，无锡“九、二”派的水上部队秘密地运动到洛社附近。15 日早上 6 点钟，他们从东面一路开来 5 节火车，沿铁路直接攻击洛社车站。而西面一路是 15 辆卡车，沿 312 国道迂回到洛社侧后，切断了洛社“主力军”的退路。

这时，忽然，听到洛社镇上传来了“叭、叭”二声清脆的枪声，陆渭文抓起电话与造纸厂内通话，电话里不断传出“嘟嘟……”连续的“忙音”。他再与洛社或车站值班人员通话，值班员电话中回答，造纸厂已被“九二”派占领。这支迅速占领洛社造纸厂的队伍，从何而来？

原来这是一支约200人左右的队伍。他们从钱桥方面走小路直插洛社镇，中途遇上埋伏的“小老虎队”一个班。这班人没经验，一着急碰上机枪卡壳，打不响，就撤走了。结果另外两个班的“主力军”被“九二”派活捉，然后“九二”派就直扑洛社造

纸厂，开枪击中宣传组两名负责人，因无人救治，这两人最终因流血过多死亡。还有一名宣传组成员跳窗逃跑，一名冒充外地业务员混出造纸厂，其余数人被抓。

陆渭文得到造纸厂失守的消息，立即带领指挥部所有的四、五十人冲出洛社师范，将队伍分成左、中、右三路向洛社小石桥并进，企图抢占洛社桥。只见洛社镇上制高点已被“九、二”抢占，陆渭文只得下令队伍向后撤，数十人的队伍伏在与洛社镇相对的洛社医院等高地，与“九、二”隔河枪战，机枪、冲锋枪的子弹呼呼地在头顶，身边飞过……

大约到9点钟左右，离洛社东面3公里处的石塘湾也是枪声大作，“九、二” 的水陆两路武装正面向石塘湾“主力军”进攻。

接到石塘湾的战况报告，周梅泉和原无锡红卫玻璃厂厂长、解放前镇江茅山游击队短枪队队长邱旭东向陆渭文建议，要想法脱离战场。陆渭文同意，立即派出通讯员，通知石塘湾“主力军”立即撤出战斗，向后方玉祁镇集中。

在石塘湾东面的徐志纯，7 点钟左右听到石塘湾方向传来阵阵枪声，又从石塘湾那边走来的农民那里听说，洛社已经打起来了。徐志纯立即打电话给陆渭文，已无人接听。他感到情况严重，立即和七兵团的头头们商量，决定先派 3 人去侦探。不到一个小时，派出侦查的人回来说，“九.二”进攻洛社，石塘湾没有发生什么事。

8 点钟左右，徐志纯带着从东北塘撤下来的“主力军”及东

北塘群众 300 人向石塘湾开进，快到石塘湾时，那里已经是战火冲天了。

这时，陆渭文派了一名通讯员找到徐志纯说："是老陆派我在此接应你们的，总部将要移到玉祈，陆命令七兵团向玉祈方向靠拢。"

这时东北塘"主力军"已经到达石塘湾，七兵团的头头组织了一支60多人的队伍准备进入阵地参加战斗，徐志纯传达了陆渭文的命令后才阻止。徐志纯接到五兵团彭永锡的电话，彭永锡说："我这里形势大好，要全歼'九二'，为牺牲的战友报仇。"

徐志纯告诉彭永锡和五兵团："对方人多势众，后方比我们近，供给，救治伤员，增援都比我们有利，要听从指挥，赶紧乘隙撤下来，向玉祈方向靠拢。"

在洛社方面，激烈的枪战，无法停歇。到上午10点多钟，洛社驻军出面，找到了陆渭文，建议双方停战。陆渭文接受解放军的建议，抓起车站上的电话与"九二"方不知名的代表"谈判"，"谈判"是不会有结果的。陆渭文乘这几分钟的枪战停息，立即通知自己的队伍撤过铁路线，伏守在铁路的路基上。

"谈判"失败，主力军守住铁路线，到11点钟，队伍徐徐向玉祁镇方向退去。

"9.15"事件使沪宁线上交通停了半天。傍晚时分，"主力军"三路队伍全部在玉祁镇集结。

在玉祁的集中地，一边是"主力军"的伤员和遗尸，一边是

13 名活生生的“九二”“俘虏”，主力军中的许多人对着“俘虏”拳打脚踢，“九二”人员拼命抱头躲闪。陆渭文知道，如果听其自然 13 人的生命会造成严重后果，但群情激昂，难于止住，他让自己身边的警卫班将 13 人隔离起来，一起带回镇江。

他们连夜请当地农民作向导，绕过对立派占据的戚墅堰机车厂，和情况不明的常州市，向镇江方向退去。

农历 8 月中旬，一轮明月当空，在田间的小道上一队五、六百人的队伍，一字长蛇地在缓缓行动，直到中秋节，这支撤退的“主力军”队伍已抵达“奔牛”车站，每人两个大饼算作“月饼”充饥，陆渭文此时此境写下了“卜算子”词一首：

“岁岁中秋，今又中秋，六七中秋走‘奔牛’。佳节亲人不聚首，枪林弹雨，数百战友，峥嵘岁月写春秋。”

中秋之夜，遇上了镇江金坤泉带队的六兵团船队，将这支败军之旅接回了镇江。

9月20日，无锡市两大派代表正式签订《关于坚决执行中央指示，立即制止武斗的协议书》。协议共14条，自22日起生效。

9月26日至1968年1月28日，在中央的干预下，无锡“六派”，“九派”各派出9名代表前往北京，进行两大派的谈判。

## 第 888 回：到杭州，徐向前递上辞呈　周恩来，亲批逮捕秦化龙

9月14日深夜24时10分至次日凌晨3时05分，康生、李天焕等中央领导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宁夏三派赴京代表团负责人。62师徐洪学副师长也参加了会议。

康生首先问了每个人的名字，了解本人和家庭的一些情况。当问到“筹备处”的张浩时，张浩说他在中央组织部就和黑帮进行斗争，在宁夏又和杨、马斗争。康生说：“那你一贯正确喽！”又问：“你算不算当权派？你是‘筹备处’的头头喽！”

康生说：“我今天来晚了些，审查国庆节演出的节目去了，我从节目里带来了一句话：无产阶级、工人阶级有错误就改正。我告诉大家，犯了错误不要紧，改正了就好了。”

康生问各方来了多少人？

“筹备处”答：“30人。”

康生：“是否太多了？”

“筹备处”：“不多，看来还少呢。”

康生：“30人还嫌少？那就在宁夏开会好了！代表是代表一种立场，一种思想，一种情况，”

“筹备处”插话：“我们那里还很紧张，把我们打散了，人抓去了。”

康生：“你们那里的情况，我们知道。”

“筹备处”：“我们很紧张。”

康生："紧张一点好，紧张方能促进你想问题，促进矛盾尖锐化了方能解决。否则不痛不痒不能解决问题。"

"筹备处"："解决好了就好了，解决不好，就更不好了。"

康生："你们老讲人家，你们要先把自己检查检查嘛！"

"筹备处"："赶得我们无家可归了。"

康生："你们无家可归了？你们先把自己的缺点检查一遍！"

康生开始讲话，他说：

"宁夏问题，中央解决的步骤是先解决军区问题，军区问题是关键问题，朱声达长期顽固地对抗中央指示，中央绝不允许这样做的。朱声达对中央的手段很恶劣，我们军区的同志也好，群众组织的同志也好，都要揭发。宁夏的问题主要在杨、马。杨、马敢那样，也是有朱支持。朱声达在长时期里，上抗中央，下压群众，因此这次开会首先解决军区问题。

这次各派代表都来了。毛主席的方针是各派都来，听取各方意见，那怕反革命组织，反动组织，都可让他来。反动组织并非群众反动，是头头反动。保守派，造反派都来，来的不是一个观点，正确的观点来，不正确的观点也来。

中央决定这次各方代表来京解决问题的背景是，宁夏武斗正厉害，特别是吴忠'指挥部'被围剿，广大革命群众组织受到摧残，在这个时候，叫'筹备处'来开会，是向'总指挥部'做了许多工作的。'总指挥部'和'筹备处'进行武斗，给中央解决宁夏问题造成许多困难。以后，徐师长做报告就能说明问题，野

战部队执行命令遭到抵抗是很不正常的。”

康生宣布了五条规定。接着 62 师徐洪学副师长汇报 62 师进驻宁夏的情况。

快到“十一”了，上海方面的领导希望毛泽东能够留在上海过国庆。毛泽东考虑：每年国庆都要登上天安门城楼检阅游行队伍，不便留在上海，决定打道回府。

9 月 16 日，毛泽东在林彪 9 月 10 日报送的山东省革命委员会关于在本省报刊上公开点名批判谭启龙、白如冰的请示报告上批示：“内部批判，不公开点名。至于小报上点名，可不制止。”

当天清晨，他专列离开上海，开始巡视杭州、南昌、长沙。

上海虹桥机场边有一条专线，毛泽东的专列就停在这条线上。这条专线的外面是大围墙，有铁门可以把专线的入口封锁起来。专线的月台和车门的踏步是平齐的，用不到跨步上车，适宜于老人登车。那天临走的时候，毛泽东很高兴，让所有的随行人员，警卫、护士、医生以及汪东兴、杨成武、余立金、张春桥等，都围在他旁边，在车站上拍照留念。

中午 11 时，毛泽东的专列抵达杭州。20 军政委兼浙江省军区政委南萍、空 5 军政委陈励耘应召前往汇报。参加接见的还有杨成武、张春桥、汪东兴和余立金。

“主席!”南萍敬礼，上前握住毛泽东的手。

毛泽东坐在沙发上，一边握手，一边打量南萍：“南萍，你就是南萍么，你的祖宗是不是南霁云啊？”毛泽东嘴角流出笑：

“你就是南霁云的后代，你处理这些事情有经验。”

南霁云，“安史之乱”时的唐军将领，被俘后英勇不屈，大义凌然的说：“男子汉大丈夫，不可向不义者屈服，宁掉头颅垂青史，不留骂名在人间。”昂首挺胸从容就义。后人有诗云：

洒血睢阳谁笑痴？

故乡粗豆靡穷期；

李唐社稷今何在？

不及将军尚有祠！

毛泽东将南萍比作南霁云之后，南萍以为是说他处理温州武斗和全省支左问题，回答道：“我是照主席指示办。”

“主席！”陈励耘敬礼，然后用双手去握毛泽东的手。

“陈励耘，你应该是在以南萍为中心的领导下，你的空 5 军比南萍的力量大就不好了。是不是啊？”

“是。”陈励耘恭敬回答。

“空 5 军和 20 军要互相学习；20 军向空 5 军学习，20 军为主嘛，空 5 军要服从。”

毛泽东朝着刚刚坐下的陈励耘问：“你服从不服从啊？”

“服从。”陈励耘答。

毛泽东说：“我们的军队历来有两种作风，一是民主作风，官兵关系好，就是互相学习进行自我批评，搞好上下级关系；另一种是训人骂人，摆架子，不平等待人，缺乏民主，上下级关系不好，士兵怕连长，要教育连排长，一个村子里出了一个排长、

一个连长都是了不起呀，如果出了一个营长那就更了不得啦！”毛泽东睁大眼睛表示“了不得”的神情。

他又说：“我那个村子里出了个师爷就了不得了。我们的一些元帅，总是训人骂人，如果你真有理就不要训人了。现在有的干部紧张严肃有余，团结活泼不足。所谓团结，是指的民主作风，是指的平等待人。老爷要向小爷学习，大官要向士兵学习。要向群众学习，要向战士学习，要放下架子，什么都是群众创造的。我在上海就反复讲这个上下级关系问题。一个人挨整，一种是自己犯了错误，挨了整；一种是坏人整好人，好人挨了整。没有犯过错误的人是一大缺点。南萍，你挨过整没有？”

“没有。”南萍回答。

“这是一大缺点。”毛泽东指点南萍，尔后问陈励耘：“你挨过整没有？”

陈励耘回答：“三反时挨过整。”

“好！”毛泽东声音很高，“红卫兵、工厂工人分两派，一个工厂、一个学校分两派，我想不通。双方都有后台，犯个错误好。南萍你们为什么要派独立一师师部到温州去？”

“温州军分区瘫痪了，”南萍解释，“派他们去主持温州的工作。”

听南萍说温州军分区瘫痪了，毛泽东说：“越瘫痪越好，烂透了的就好解决。”

听了南萍对温州形势的汇报，毛泽东问：“为什么‘温联总’

又分三路向温州城反攻？”

南萍说：“‘温工总’控制温州城后，如何对待另一派，在政策上犯了错误，用报复的态度对待‘温联总’。”

毛泽东点头：“分区司令、政委不要在那里层层挨斗，可调到军区来。对龙潜和张秀友不要这样搞，什么喷气式、罚跪。人家犯了错误就很难过，你又这么地层层斗，不好！不要这么搞。我们对国民党的杜聿明、黄维、王耀武还优待嘛！我们不要这样搞。上海说对陈丕显、曹荻秋比较文明，但是人家申辩几句就说不老实。人家是一个人两个人，你是几百人。从长远打算，这样做，对我们养成的好作风不利。我们历来是团结——批评——团结，历来是讲道理，准许申辩。现在搞乱了，被破坏了。”

“龙潜、阮贤榜有错误，还要帮助他们，不能一棍子打死，希望他们错了就改嘛，能站出来。哪有那么多人要打倒啊！对干部要一分为二嘛！不能一切都抹杀了，他们过去还打过很多仗嘛！”

阮贤榜是浙江省军区副司令员、省军管会副主任。

毛泽东告诫南萍和陈励云：“你们对两派的意见都要听。‘红暴’的观点在一家就有斗争，有的儿女是‘红暴’观点，有的儿女是‘革联’观点……要一分为二，一家也分两派，两派意见都要听。我家里就有两个孩子是造反派，两个孩子是保守派，造反和保守都有偶然性。过去《八条命令》中就有一条要教育好孩子，教他们不听，我们也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去教育他们。”

此时毛泽东谈到了干部子弟，他说如果工农子弟不把他们看成朋友，那他们将来就没有希望。

毛泽东要南萍、陈励耘转达他对 20 军和空 5 军军长、副军长的问候，他们向毛泽东反映空 5 军的黄军长表现不大好。

“不要只看他一时一事，他打过仗的嘛，一个同志犯了错误，能帮你们一定要帮，你们对省委、地委的干部要慎重。现在要打倒一个人很容易，只要红卫兵一轰。就是顽固到底的人也不要紧，给他饭吃。红卫兵对干部一风吹不好。对一些干部不放过，也不能搞得太苦了，不能像湖南农民对待地主一样。对待干部不能像对待地主一样，罚跪、坐‘喷气式’、抄家、戴高帽、挂牌子，这种做法我是反对的，这些要禁止。这种做法破坏了我们的传统。”

毛泽东又是一大番议论：“江西有几个山头，什么中央苏区了，湘赣、闽浙赣了，等等。我就生怕一、三军团有的同志犯错误，生怕四方面军同志犯错误，结果出了陈再道。”

谈到要打倒许世友等军队干部时，毛泽东说：“打倒许世友行吗？对许世友我是要保的。你要打倒许世友，还有个韩先楚，还有个东北陈锡联，都打倒了谁指挥打仗啊？他们过去还是打了很多仗的嘛！有人说打倒许世友有三条理由，我看理由不充分。对这次文化大革命跟不上，一下想不通，有错误。有错误，愿意检讨，检讨了就好了。这个人还是有魄力的，错就错，对就对，很果断。他犯错误也果断嘛！”

“有人提出打倒徐向前，徐向前我是一定要保的。不管谁要打倒，我是一定要保的。红卫兵要打倒去打他的，我保是保我的，这是一个大局。矛盾是有的，统一还是要统一。七次大会选中央委员，八次大会选中央委员都选了王明。现在我们要恢复那个传统，人家犯了错误不要一棍子打死。”

“贺龙这个人，将来恐怕还是要当中央委员。邓小平同刘少奇还是有区别。在瑞金时，张闻天和王稼祥是受排挤的，遵义会议没有他们不行。红卫兵要把他们两个搞出去斗，我不同意。一个干部几十年中他总是做了一些好事嘛！”

“张闻天当了十年的天子，他当总书记的时候他要管军事。我告诉他：你不要管。结果呢？他到下边去煽动，后来他又和高岗搞到一起，他又批准 62 个叛徒自首。他在瑞金时，他们内部分化，他和王稼祥是受排挤的，不站在项英一边的，但遵义会议没有他不行。红卫兵要把他们两个搞出去斗，我不同意。现在红卫兵把团结——批评——团结搞乱了，破坏了这个传统。他提出什么高帽子、挂牌、罚喷气式、抄家，他们引证我的《湖南农民运动考查报告》，那是对地主、土豪劣绅嘛！现在这是干部嘛！几十年的干部他是做了一些好事。”

毛泽东继续即兴评点干部：“陈毅打过仗不怎么突出，比较右。姚登山怎么能当外交部长？闯了几个祸。外交口子里有坏人、黑手、反革命。说叶剑英、徐向前是黑手，我看不一定。黑手主要是王力。阴谋集团是有，他集中攻击总理，把总理攻倒后再攻

别人。英国就钻这个空子，给照会给陈毅本人。现在又搞北大，并牵扯到蒯大富、韩爱晶，有些学生和工人领袖不稳定。”

他归纳起来说：“形‘左’实右，现在还是以极左面目出现，这是主要的。”

“运动的第一年已经过去了，第二年又过了三个月了，七、八、九。再解决十个省市的问题，全国我看春节差不多了，可能有个眉目了。”

毛泽东谈着谈着，又说到了南霁云。

“唐朝有个南霁云搬兵。有个叫张巡的被安乐生杀了，南霁云去搬兵报仇，搬不到兵就不走。他说：‘我城里老百姓没吃的，不发兵我也不走。’”

毛泽东再次望住南萍：“你南萍是不是南霁云的后代呀？”在场的人都笑了起来。

接着，毛泽东说：“军队在一个地方久了不好，他舍不得亲戚朋友，姻兄大姑，金银财宝，包袱太重了，可以寄给家里嘛！或者是送给贫下中农嘛！不要爱财如命。”

毛泽东将身体仰到靠背上，吸着香烟，带着结束的口吻讲了最后几句话：“孔明都有七擒孟获，我们共产党不仅可以搞七擒，还可以搞八擒嘛！一次反围剿杀张辉瓒我就不赞成，主要是彭德怀要杀。张辉瓒不仅是个师长，而且是个总指挥。”

9 月 16 日，徐向前经与叶剑英字斟句酌，反复修改，写出辞职报告呈送毛泽东：

“我在担任军委文革小组组长工作期间，由于对主席著作学的不好，自己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改造好，对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很不理解，……犯了保守、右倾、方向、路线的严重错误……现在我诚恳的请求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免除我军委文革小组长的名义，另选贤能，以利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工作。”

9 月，康生、江青、谢富治等在首都红卫兵会议上宣布：秦化龙是“516 反革命集团后台”。“秦化龙不是好人,我们中央文革有材料。”“你们不要保秦化龙了,他是‘516’黑后台,还有叛徒问题,你们要反戈一击,再立新功!”

北京农业大学“东方红”,原先一马当先积极保秦化龙,如今闻风而动,来了个 180 度大转弯,连夜将秦化龙关押拷打、突击审讯,希望能搞出叛徒材料向中央文革报功。

9月16日凌晨2时50分至5时10分，周恩来接见北京农业大学“东方红”代表，听取了农大“东方红”代表关于秦化龙问题的汇报。

周恩来指出：“你们秦化龙的工作做得不错，有成绩。你们是有功的，立了新功。”

“革命派要注意有黑手伸进来。姚文元同志的文章恐怕前几段你们兴趣小，对后面几段最感兴趣，后面几段就是结合当前形势写的。”

农大“东方红”的代表向周恩来汇报了“农口革联”抓住了

4个“516”分子的情况和农口有人要把农口造反派头头都划成“516”的谣言，周恩来笑着说：“哪有那么多‘516’呀。不能批判极‘左’，右派就翻案嘛！”

在谈话中，周恩来赞扬了中央气象局的一张大字报“对形势认识的不错，我看了一份他们写的东西。”

农大代表问：“是不是《三十个为什么》？”

周恩来说：“是。《三十个为什么》写得很好，逻辑性很严密，分析得很深，是谁写的？”

答：“是七兵团。”

周恩来问：“是哪一派？”

答：“是气象局‘红旗’。”

周恩来对农口斗批改工作还作了具体的指示。他说：“你们还要继续批判谭震林，也要结合批判你们学校的王观澜的领导，重点仍放在谭震林身上。”他同意在国庆节前批斗一次谭震林。

最后，周恩来对农大“东方红”的代表说：“你们很主动嘛！四个‘5.16’分子首先是你们抓的，你们又揪出了学校里的八个‘5.16’分子，秦化龙你们又揪出来，说明你们划清界限了。毛主席一贯主张：造反派要自己起来斩断黑手，这样造反派就更造反了，更壮大了。”

周恩来亲自写了批准农大“东方红”将秦化龙送叫北京卫戍区的批示：

傅崇碧、黄作珍同志：

现有农大“东方红”刘玺、解金瑞、高亮、肖××四同志扭送秦化龙来卫戍区，请予接收、监护，听候中央处理。

周恩来

一九六七年九月十六日五时

## 第 889 回：见“天”派，总理再谈五一六　点名批，蒯大富和韩爱晶

9 月 16 日晚 20 时 50 分至次日晨 0 时 45 分，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谢富治、姚文元、叶群、戚本禹、傅崇碧等在人民大会堂安徽厅接见北京大专院校红代会部分组织，主要是“天派”组织的负责人。

江青主持，她领着大家集体念完《毛主席语录》，然后请周恩来讲话。

周恩来说：“这次找首都红代会各学校组织来商量一些事情，但是北京现在分为两大派，‘天派’、‘地派’，今天主要接见‘天派’。我最近才知道，听说我是‘天派’的后台。我倒是喜欢坐飞机，但是飞机要从地上飞起，以后又要回到地上。‘天派’有一个观点，小报中对形势有一个错误估计，任务从形势而来。今年春天清华《井冈山》小报上对形势估计很坏，说什么要跟毛主席上山打游击去了。你们不知道党中央情况，到处道听途说，瞎估计。最近又是，武汉‘720 事件’之后，在 8 月 5 日天安门城楼上，有人认为是第三次大串联。我讲，哪有这么回事。我们根本不是这样估计，形势推动我们前进，我们否定这种错误估计。

尽管我们这样说，但是同学们不回去，还是这样讲，还是这样估计，还是这样做。8 月 10 日、11 日两次座谈会，我们批判了这种错误估计，你们还是这样估计。清华派出四、五千人，北大也派不少，北航也去了不少人。我们不断的号召回来，但是不

灵。”

江青插话说：“清华去了 5000 人，揪军内一小撮走资派。清华‘井冈山’今天登小报反对我。蒯大富你站出来……”

蒯大富应声站了起来，江青说：“你们今天就反对我，我是批评你，不是打倒你，坐下。”

周恩来接着说：“连武汉‘三钢’‘三新’都说是处在资本主义复辟的前夜。这样估计是错误的，还提出什么‘武装夺取政权’，‘战争解决问题’。武装夺谁的权？就是要夺毛主席的权。‘战争解决问题’，就是企图夺军队的权了。揪军内一小撮，7月我们纠正了一次，但8月到目前这个错误口号就是没有肃清。我们与大学红代会谈了多次但不灵。北京的话传到全国，现在有些地方还在揪军内一小撮。

党中央的估计与你们相反。7、8月份，各地军队承认了错误，解决了河南、湖北、湖南、浙江、江西问题，比上半年快得多。我军是毛主席亲手缔造、林副统帅亲自领导的军队，人民解放军最听毛主席的话，毛主席一号召说，错了，解放军马上就认错了。解决武汉问题就是靠毛主席，靠军队，不是靠别的前进。这就是相信人民，相信党，相信解放军。陈再道，钟汉华这些人有什么多大作用，一下子就解决了。

文化大革命已经进入第二个年头，又过三个半月了。文化大革命向深度、广度发展了。全国已有7个省市自治区建立了革命委员会或筹备小组，把文化大革命推向前进了。现在正面临第二

个年头，要思想革命化，要夺走资派的权，要巩固胜利，我们有无限胜利信心。首都红代会不听我们这些，主观臆造，错误估计形势，影响全国，与毛主席、党中央和中央文革的方向背道而驰。例如，江青同志9月5日有一个讲话，你们放了录音了吧？”

众答：“都放了。”

“她讲了三个问题，可是你们的做法与这三个问题都相反。

江青同志讲要拥护和巩固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无产阶级革命司令部，提出要巩固这个领导核心。所以，9月1日在市革委会扩大会议上，我们讲了‘516兵团’是一个阴谋反动组织，它要动摇毛主席、党中央的领导，姚文元又提出了它的性质。但这主要是一小撮坏头头，从极‘左’方面破坏党的领导，我们要认真对待。他们的矛头不是反对我个人，实际上是对中央文革。我与中央文革是坚决一起战斗的嘛，一起办公的嘛，这是统一在毛主席、林副统帅指导之下的。这你钻什么空子呢？有人想从极‘左’钻空子，我们小将到处传闻，油印，推论，臆造，总归是干扰我们的工作，我们今天就是帮助你们。

对‘516’不应扩大化，总是少数坏头头，对揪黑手要认真对待，不能在群众中揪一派打一派。‘516’就是靠造谣，阴谋活动，除此而外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不要在群众中扩大化，不要揪一派打一派。对‘湘江风雷’就是这样，他们的头头有坏人。我们过去听军区的多了，现在解决了。‘516’别看在名字上有几方面军，实际上没有几个人。群众会觉悟，他们本来就是造谣

生事。这是第一不要扩大化。

第二，你们学校各组织真有这样的人，你们应划清界线，由本组织自己揪出坏头头，这样我们欢迎。农大‘东方红’查出了秦化龙是叛徒。他们听我的话，在批谭时没让他上主席台，他们农大‘东方红’将秦化龙扭送卫戍区，我通知接收。我今晨接见了他们。虽然他们‘东方红’查出几个‘516’分子，但是他们找出了人证物证，自己揪出秦化龙扭送卫戍区，这很好。安徽两派都是革命造反派，中央解决问题以后两派都打电话揪黑手，他们从没有讲过团结，屁派和好派也一道揪黑手了，这是从没有的好事。”

康生插话说：“两派争先恐后的交武器，自己把自己的坏头头抓起来，送交军管会了。”

周恩来：“秦化龙是个叛徒，不是一家调查出来的，农大的问题两派都参加了，你们应该欢迎他们。揪叛徒问题‘天派’‘地派’都合作了，这个行动完全有利于党的纯洁，为什么要分裂呢？对‘516’要有这个精神。

第三，‘516’的头头揪出来了，不要因为有几个坏头头就认为群众也都不好了，把群众推到对立面，这是群众斗群众。

第四，‘516’兵团以极‘左’面貌动摇毛主席的司令部，从内部挑拨我和中央文革的关系。我和中央文革不可能都是一个口吻，如果谈什么事都是一个口吻那就一个人讲好了。”

康生插话：“勾心斗角的看待中央文革和无产阶级司令部。”

周恩来：“这是资产阶级思想，‘516’从极‘左’方面来干扰。但也要防止二月逆流那样从右的方向来干扰，两者形式不同，实质相同。所以我们要指出‘516’问题，但不允许老保翻天，不能借此机会翻案。《文汇报》今天讲，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要从中央领导巩固起。

你们何必来干预党中央领导的内部生活呢？我们是一致的，你们胡说乱猜是胡闹，是干扰我们的领导，是不能得逞的，如果你们是被人操纵就要揭发，若是自己认识问题就改正。地、富、反、坏、右坏人都想拆党中央的台。你们青年人思想常常摇摆，别的地方一听你们的讲话，就以为你们从党中央、中央文革得到什么法宝了，这很不好，当年五四运动青年受封建和军阀思想影响有派别是可以的，当时北大就有胡适之派，陈独秀派，自从遵义会议之后，毛主席取得我们党的领导地位之后总是一派红线，虽然有刘、邓黑线在作怪，但仍然取得了伟大胜利。可是你们都扳着手指头算党中央还有几个人了，这完全不是毛泽东思想，是五十年前我们对北洋军阀的看法。现在虽然有走资派、特务，但是主要还是毛主席的伟大领导，回想五四运动时，你们比我们高明多了，但是你们不能飘飘然，要好好的从天上回到地下来。

江青同志讲的第二个问题是要巩固人民解放军。主席讲要三个相信三个依靠，其中武装力量是人民解放军，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保护我们，从去年保卫革命小将就提‘四不’。而你们如何看呢？就相信揪军内一小撮，到处分析，说‘林副主席只能

指挥五分之一军队’了，简直一派胡言，这根本不符合我们四十年的历史。林彪同志提倡的三八作风，四个第一，五好连队，我们怎么能怀疑呢？不错，军内也有坏人，像陈再道、钟汉华、赵永夫等，但是绝大多数是经得住考验的，怎么能用‘武装夺取政权’，‘战争解决问题’呢？如果有坏人挑动你们就要上当的，拥军爱民是毛主席早就号召了的。我们现在面临着国内外阶级敌人，走资派，要更好地树立敌情观点，这一点在一到打内战时就忘记了。有些领导靠边站了，应该考虑大联合，北京武斗有的比较严重，西单商场，光学仪器厂破坏机器。工农带眼泪进去，带眼泪出来，总归是有坏人伸黑手。在这方面我们要告诉大家，‘揪军内一小撮’继续下去是错误的。与军队的对立情绪是错误的，只有通过军训才能将散乱无组织现象变成有组织行动，特别是知识分子，对一些机要部门要实行军管……”

江青插话：“昨天有人像强盗似的从房子上进入《红旗》，这是强盗，要专政，请谢富治同志破获，要实行无产阶级专政。”

周恩来：“在北京还发现有违背中央精神的事，对犯错误的干部进行批评，我们不赞成弯腰驼背。这是桃园四清的经验，‘燕飞’是王光美、王任重搞的……”

江青插话：“北京爬墙抓人是从叶向真那开始的。刘诗昆、叶向真打解放军你们知道不知道？”

周恩来：“这些你们要批判。年青小将犯了点错误不能就摔在地上，对军队夺权是错误的，保卫国家的武器你们夺过来干什

么？你们夺了枪就乱放，这事不允许。特别是有人不是光明正大，而是做特务行动。去年我对红卫兵讲过，叶向真爬墙搞彭真，杨尚昆搞窃听器，身上带录音机，开秘密会，偷记录，偷日记本，这都是资产阶级特务方式。

北航‘红旗’去年搞什么《斗争策略》小册子，绝密的，这是一套特务手段，是国民党特务手段，这种办法早就被毛主席痛斥的。我要不告诉你们就是犯罪，你们必须去掉。

还有就是抓住人家一句话，就推理，这是不好的，我们不要学彭罗陆杨那一套，我们不指出就是犯罪。”

江青插话：“宣布，一切秘密会议非法，我们中央文革都没有秘密会议，要防止阶级敌人破坏，北航‘红旗’有人给蒋经国写信……”

江青念了一段中央社新闻后问大家：“你们听了吃惊不吃惊呀！”

周恩来：“建立起来的革命委员会是新生事物，有很强的生命力，但是不完全、粗糙。有缺点错误，是爱护还是一棍子打死？但在北京就是两派斗争，找一个借口就要给人家颠覆掉，外部还有人。你们不少人参加，蒯大富、韩爱晶你们都到了现场。”

江青插话：“聂元梓也去了，躲在一个地方指挥。”

聂元梓马上站起来辩解说：“那天我们在学校开会，我没有去。”

周恩来对江青讲：“这个情况有待证实，还有待证实。”然后

接着说："师大革委会有缺点，有错误自己改正嘛，为什么需要外边的人去干涉。不听主席的。我们说这些心里很难过。我们学主席著作不好，我 46 年党的历史，我犯过不少错误，也犯过路线错误，不需要'516'来整理，我心里清楚。我个人犯过错误要认识错误，我快 70 岁了，要做到死，学到死，要改到死，跟到死，就是要至死紧跟毛主席，紧跟林副统帅。你们来日方长，不要自满，固步自封。只要一天离开毛主席教导就要犯错误。我们的影响较大，你们的影响也不小。我们有错误有缺点，在北京对工人文化革命注意的差，因为北京工人文化革命开展的比学生晚，我们注意知识分子多了。"

江青插话："你们从小受资产阶级教育，从小受家庭影响。不要忘记你们还没有进行斗批改呢！"

周恩来："我们有些偏爱你们，溺爱你们，比如蒯大富他的思想不稳定，他虽然出身劳动人民家庭，也要好好改造。"

江青问："是劳动人民家庭吗？"

周恩来："但这不要紧，要与工人、农民结合去受锻炼，我和韩爱晶同志没有什么直接接触，就是因为在一次会上我看见他很瘦，就派我的医生给他检查检查，结果这也成了包袱。"

江青插话："韩爱晶，我们宠坏了你，我难过，你写的自我批评不是什么自我批评。"

周恩来："你们不应该随便去颠覆人家的革委会，全国都应该如此，这是一个重大的任务。

所以，北京两派不是学好毛著，而是长期受资产阶级教育、修正主义影响，近一年来运动轰轰烈烈，你们连坐下来学习都不行，有时连《人民日报》、《红旗》社论都来不及学。所以一些坏东西如：‘怀疑一切’、‘包打天下’思想很厉害。好像北京的学生如何、如何好，不错，北京学生先点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火是对的，你们有成绩有功劳。但是今年8、9月份不同了，各地都起来了，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进行了，结合实际情况进行了，北京大学生再包打天下就是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有的就是支持少数反对领导。不管对不对，外地反感，电话全是这样。伟大领袖毛主席说这是帮倒忙。”

康生插话：“这是主席说的，你们为什么总是不听呢？！”

周恩来：“大家联合开会不能解决人家本身的问题，还有‘以我为核心’、‘唯我独左’，目前这个论调在某些组织或学校中很盛行。”

江青插话：“北京‘地派’要吃掉‘天派’，或是‘天派’要吃掉‘地派’，老实讲吃不掉，你们老老实实从天上下来，否则跌得粉碎，‘地派’也必须从地下钻出来。”

周恩来：“我们希望你们还是按《十六条》方针，紧跟毛主席的航向，将矛头对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结合本单位斗批改，不然，你们本单位的斗批改何时才能完成？有些学生外出不回来，给他一个月的有效期，不回来开除学籍。”

江青插话：“不分配工作，参加斗批改这就是毕业分数，不

参加不准毕业，这样可以不可以？应该不应该？”

众人答：“可以！应该！”

周恩来：“你们还要放一辈子假吗？现在到时候了。现在考验你们两件事：

一、红代会两大派，各学校的多少派，为了迎接文化大革命后第二个国庆，联合起来好不好？”

众人答：“好！”

周恩来：“派军训团去军训，搞好军训站好队伍，否则你们没有资格参加。

二、三秋到了，又是考验你们的时候……”

江青插话：“昌平有的地、富、反、坏、右抢秋，要坚决镇压，不许地、富、反、坏、右翻天。”

周恩来：“我们要保护搞好秋收，国庆之后到农村参加三秋，考验你们好不好？”

陈伯达插话：“可不要把两大派的观点带下去。”

傅崇碧插话：“有的学生从外地回来带来了枪，说是胜利品，问题很严重。”

周恩来：“国家的财产，你们从哪来的胜利品？手榴弹、枪、子弹完全交出来。”

江青：“你们都不会瞄准。哎……下面请陈伯达同志讲话。”

陈伯达：“说我是‘天派’的后台。”

康生插话：“街上画了系统图，有书为证，不是造谣。”

陈伯达："说我是'天派'的唯一理由就是我和韩爱晶谈过话，但是都可以公开，可以放在光天化日之下。"

江青："造谣的事太多了，各取所需，以后总得设法弄清，总不能造谣有功。"

陈伯达："韩爱晶你讲一讲我和你谈过袁世凯吗？"

韩爱晶："没有。"

陈伯达："我知道韩爱晶名字不久，我认为韩爱晶要做像样的自我批评。我问你韩爱晶、蒯大富，你们对'二月逆流'有鲜明的态度和鲜明的旗帜吗？对'516兵团'表示过什么气愤吗？"

韩爱晶："有。"

陈伯达："在这里我批评韩爱晶、蒯大富，我不是'天派'，我是不三不四派，我批评的不对请你们批评。"

江青："爱护你们才批评你们，不要灰溜溜的。"

陈伯达："我有一次找韩、蒯讲了一次话，蒯大富讲了一些悲观的话，我才说：'无限的希望，无限的前途，无限的光明'，'行百里者半九十'，这样我就变成你的后台了。你们有这样一个悲观的思想，就不能正确的估计形势，不能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毛主席估计是大好形势，这种悲观情绪正确吗？最最正确的是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你们是很悲观的。你们要学毛著。你们对江青同志讲话很好学习过吗？想过吗？你们大批同学到全国去抓军内一小撮，不是自毁长城吗？而是中了敌人奸计！

北航有人写信给蒋经国，难道不能引起警惕吗？文化大革命

是思想革命，革我们脑子里的资产阶级思想。我们的阶级敌人用各种各样的资产阶级思想侵蚀我们，你们当了大官了。听说韩爱晶要去西安买飞机票？”

韩爱晶说：“没有，火车票。”

陈伯达：“财政大权在你们手里，你们拿钱挥金如土，口口声声说拥护毛主席，拥护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可是你们的言行又是怎样呢？各行其政。认为天要塌下来了，那天师大问题，你们搞了什么活动？”

戚本禹：“你们清华、北航、人大‘三红’、体院等几个院校开了一个秘密会。”

一名人大“三红”的代表说明情况。

江青说：“你们自己就说话不算数，人大‘三红’就言而无信，你们‘三红’里就有很多特务，回去把它搞出来。”

她指着那位人民大学回答问题的“三红”代表说：“我怀疑你不是学生。你们保大特务孙泱。”

陈伯达：“我建议你们到外边去都坐公共汽车，财经公开。我不晓得你们花了多少钱。不要采取特务手段、警察手段，当面一套、背后一套。两派为什么不能谈问题呢？为什么要吃掉他呢？大鱼吃小鱼。聂元梓去了没有？你们总是幸灾乐祸。”

他还是在说北京师范大学推翻谭厚兰的那件事情。

江青：“你们以前在教育部还俘虏过谭厚兰。”

陈伯达：“你韩爱晶不在学校搞你的复课闹革命，而是到师

大亲临前线，你们还是东支持西支持。”

江青：“看来你真是后台了。”

陈伯达：“今天就是摊牌了。你们抱了一大块石头，却以为自己得了一个宝贝，死抱住不放，走路有包袱。你韩爱晶有没有后台？”

韩爱晶站起来哭着说：“没有，保证没有！保证20年也能证明我校大方向是正确的。”

陈伯达：“你没有被人牵着鼻子走？不知不觉被人拉着走，你蒯大富有没有后台？”

蒯大富：“不敢保证。”

陈伯达：“聂元梓有没有？”

聂元梓：“没有。”

陈伯达说：“蒯大富、韩爱晶，你们从天上下来，到前面来，坐在地上。”

韩爱晶和蒯大富起身走到前面，在地上坐下来。江青马上说：“起来，不要灰溜溜的。批评你们是爱护你们。”

于是，韩爱晶和蒯大富又站起来回到他们的座位上。

## 第 890 回：批元梓，周泉缨攻陈伯达　见“地派”，清华两派搞联合

江青：“有人说新北大又立第三功了，聂元梓你不害臊，老实讲，我们去年与陶铸作斗争时，你们还不知道呢。你与王任重打得火热，他是一个CC特务。孙泱也是一个特务，可能是一个日本特务，还与苏修有关。”

戚本禹：“孙泱的秘书就是你们‘三红’战士。”

陈伯达继续批评清华、北航在师大的倒谭行动。当他说到“这样会得到你们意想不到的老保翻天”时，江青说：“北大已经老保翻天，至少是部分老保翻天。今天给同志们、小将开这个会。今天由沉痛变成气愤，几次都不能与你们冷静地谈，我觉得我应该做自我批评，听你们意见时较少，不能及时地对你们从思想上到政治上帮助你们提高。另外一方面，我接受外地的批评：说我对北京的学生太宠了，这是事实，批评你们很少，都说好啊！好啊！当然，老保翻天，颠覆小将成果你们不答应。在许多时候，宠、溺爱你们。我的孩子回家造我的反，说韩爱晶如何、如何……我对他说：你不跟爸爸、妈妈干革命就走开。韩爱晶栽了个大跟斗，对接受我的批评不理解。对你溺爱了，见了你就笑眯眯的，圣人呵，小圣人啊！现在我感到你是绝对主义者。我敢保证，我敢保证……北航你敢保证吗？说得太早了。”

“接班人接什么呢？主要还是接毛泽东思想，主席从来不绝对、不武断。”

“不久前，毛主席告诉我，让我转告给小将：‘告诉小将，现在轮到他们犯错误的时候了’。回去好好想想，我对你们帮助、教育不够，谈了以后，以为你们能听我们的谈话，但你们根本不听我们的话，这是我们的主观主义。

上次批评了蒯大富，自从蒯大富提出先进的南方，落后的北方，你们思想水平不是提高了而是降低了，以后发现几次总是背道而驰。到目前某部分人，对我们言而无信，这是什么问题呢？除了少数坏人混水摸鱼外，你们自大狂妄、个人主义膨胀没地方放，把自己置于党中央、毛主席之上，人民之上。

你们是救世主，包打天下的英雄。就是资本主义个人主义在作怪。去年朝气蓬蓬勃勃，现在变成另外一种人，背离大方向。当然说的是部分人，但他们在起作用，我应告诉你们，不要以为中国没有你们就完了。中国共产党1800万，就是揪出一万也是少数。你们悲观失望，韩爱晶写什么检查，连我名字都不写，变成大老爷，宠坏了你，在座的我是最宠爱你，训了要训你，训无产阶级的子女，你脑子里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在泛滥，蒯大富我都不愿再训了。

总的说，‘天派’、‘地派’也好，我们做的工作少，你们有缺点有错误，我们应该承担，我并不轻松，我们虽然没有直接关系，在最困难的时候我们共患难。现在你们连毛主席的话都不听了。有的人在小报上骂我：‘江青算老几！’我是一个普通的共产党员。别认为离了你自己不行。你们回去要开门整风，把不

纯分子清除出去，提醒你们，你们不跟毛主席走，我们依靠军队、劳动人民。只要主席一声令下，军队就坚决跟主席走，我跟主席几十年了，不像你们摇来晃去。你们不学毛主席著作，靠歪门邪道，靠特务手段……连我的信都有人邮检，对我专政。你们那一套，是刘少奇的。主席关心你们，因此谆谆告诫小将：现在轮到你们犯错误的时候了，我说的是真正的革命小将。

我想突出讲一个问题：就是你缺乏敌情观念，刚才韩爱晶的表现就是如此，什么都是好的，有3000地富反坏右、国民党特务在温州捣乱，这就是敌情。我们军队去夺了权。你们人大有相当多的特务，为什么日修、苏修对你们学校的动态报导那样迅速呢？两派都有，那派是肖前。

另外，有奴隶思想，非常喜欢外国人参加你们的会议，我们自己的事，革自己的命，请他们干什么？当然有的是朋友，但混着不少特务。国民党也留下相当大的一批人没走，难道他们不破坏我们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吗？北京两大派，我感觉有苏修、美蒋、日本特务在作怪，你们有的自己不知道，利用你们个人主义膨胀，爱为个人吹捧，说你如何、如何，听不得不同批评。我们批评你们，就对我们疏远，那边就会拉你们，要提高警惕。”

“今年年底一定要进入斗批改。”

接着，康生讲话。他说：“我接触同学不多，但却得到了‘地派’后台的称号，不胜光荣之至，有点受之有愧。开始我还是支持聂元梓的，后来又支持了谭厚兰反对薄一波、孙友渔。我想问

问蒯大富，你们有一个时期也反对我，和党校‘红战团’联系在一起，这些人大部分都是黑帮子女。如苏振华的儿子就在这里。我曾经告诉蒯大富，不要和‘红战团’联系，你们要批刘少奇、刘邓路线，清华要与党校‘红旗战斗队’联系。但是我好心没有用，以为我是害怕了，怕你们揭露打倒我，我好心，没有用，得出这么一个结果。刘少奇以为我是清华后台，在十一中全会上刘少奇斗了我3个钟头。我说我是支持蒯大富的。刘少奇专门找我，在人民大会堂谈了3个钟头。我说不清楚，刘少奇说：‘你不清楚我清楚’，我是保护蒯大富的。因为个人关系我不愿意讲，我对同志们教育帮助不够。”

“毛主席讲：‘一个工厂内两派那样斗争，到底两派斗争有没有阶级基础，看不到。’当然，少数地富反坏右除外。都是阶级弟兄嘛！为什么这样，开机枪，60炮，放高射炮。这是怎么回事？如何解释？坏分子是有的。我同聂元梓讲过，反聂的杨旭和他的弟弟杨旭章是坏分子，可能是特务，这是少数。但在学校里学生这一派那一派斗的这么厉害，到底为什么？有什么不可调和的阶级矛盾。”

江青：“‘地派’如果不钻出来就闷死。不！是被埋葬！”

康生继续说：“有些组织或某个人采取特务手段。我与特务、敌人斗争了多少年，我特别敏感。‘天派’、‘地派’有些作法就是特务作法，我想不出你们从什么地方学来的？哪个学校都有动态组。有些人对一篇文章像研究密码似的，不是研究思想，而

是研究这一段，那一段。这里有一小撮走资派在后台操纵。另外还有苏修、美帝、日修和蒋匪特务在后边伸黑手。他们不直接出面，如人大的孙泱。”

周恩来：“农大‘东方红’揪秦化龙，秦化龙就是以极‘左’面貌出来，你们学校就没有？有大的有小的，不要把话讲绝对了，你们年轻不怪你们，农大东方红是地派的，我们应该欢迎。我请同志们注意，要注意敌情，外事口有美国间谍直接插手。”

江青：“请大家注意一个情况。9月12日在地质学院有一个气象局‘红旗战斗队’的‘谁是最大的黑手’要分析一下。”

周恩来：“与特务斗争的经验你们太缺乏了。第三种情况，就是社会思潮，无政府主义、小团体主义，有右的，也有极‘左’的。

我今天看清华‘井冈山’小报有一个社论是很错误的。9月7日苏修勃列日涅夫在匈牙利一次会上做了一次恶毒攻击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讲话，我们准备回击。勃列日涅夫说我们文化大革命是反革命的。然而我们有些人说苏修骂我们是极‘左’。首先是这个题目就有问题。”

江青：“你们‘井冈山’小报搞我们，我们就用大报搞你们，必要时一个个点名搞你们。”

周恩来：“如果按标题和内容来看，两条路线斗争只有极右了，而没有极‘左’了，列宁为什么写《论‘左派’幼稚病》一书呢？这是非常错误的，这个社论和第一句话就是错误的。勃列

日涅夫正在骂我们反革命，你们说他们骂我们是极‘左’思想。当然作者不一定就是有什么企图，因为可能是对‘4·14’等等，但问题是反对批判‘揪军内一小撮’，这是自毁长城。而恰在同一天出这么一张报纸。

你们说‘揪军内一小撮’是林杰搞的，但是你们清华‘井冈山’出去5000人到河南反新军区，到上海反张春桥，到武汉反对曾思玉。你们一点责任也没有吗？而用社论大反这些东西，你们清华‘井冈山’就是极力反对江青九·五讲话，而称这些人是什么先生。”

江青问：“你们知道这个文章是谁写的吗？”

蒯大富做了解释。江青说：“一定要组织一篇文章，肃清流毒。”

语言学院汇报：“我院两派都有外国人参加，怎么办？”

周恩来：“你们怎么处理？！你们去斗一斗蒋南翔去，这是蒋南翔搞的特务学校。”

他继续说：“还有人说，‘极左思想就是要打碎旧的国家机器’。我问一句，什么是国家机器最重要的东西，北京市最重要的国家机器是什么？就是傅崇碧吗？要打砸北京卫戍司令员吗？你们怎么能把我们这些错误缺点和少数坏人的某一机构及美帝苏修混为一谈呢？这是一种什么思潮？这是被敌人利用了。”

江青：“我们还称你们是同志，信任你们，你们就称我们是

先生了。”他对蒯大富说：“我还得保你。有人说总理是最大的保皇派，我是一个小保皇派。我生怕你们犯了错误。”

周恩来：“你们对光荣、伟大、正确的中国共产党的看法不对头，你们有些人是资产阶级政客式的、国民党式的、赫鲁晓夫和台湾式的看法，是不对的。是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看法。与香港反动报纸一对照，完全一样，是反动的。

我们揪党内走资派，丝毫也不妨碍以毛主席为首的光荣的、伟大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怀疑这一点就要犯绝大错误。你们还有人要整我的材料，如果不够，我可以供给。蒯大富我提醒你注意，党校的‘红战团’开始向清华‘井冈山28团’活动。”

江青：“当心老保翻天，韩爱晶还那么绝对保证吗？韩爱晶、蒯大富要作自我批评，向谭厚兰作自我批评，这次你们不对，你们颠覆别人，你们自己也可能被别人颠覆。”

周恩来：“要认真学习列宁《论‘左派’幼稚病》一书的第四章。新北大应该总结一下为什么在一个时候要打倒谢富治副总理。”

江青：“就是想要打倒谢富治，聂元梓当市革命委员会主任，你们这些头头不要挑动群众斗群众。散会。”

会上，北航韩爱晶给江青写了个纸条，说戚本禹抓北航后台，引起思想混乱。没想到纸条传到台上后偏偏递给了戚本禹。戚本禹看后，尴尬地笑了笑。

针对会上江青批评清华《井冈山》报一事，参加接见的清华

“井冈山”的陈育延散会后回到学校，连夜开会。第二天她就代表《井冈山》报编辑部写了“我们的检查”，登在9月20日的《井冈山》报85期。

而北航院革委会常委也在9月17日上午开会，讨论9月16日晚中央首长接见时的讲话，提出：“应该坚信毛主席、林副主席、周总理、陈伯达、康生和江青，这六个人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核心。”

在会上，韩爱晶和井岗山认为，戚本禹很可疑，是赫鲁晓夫式的两面派人物，要向中央揭发。

9 月 14 日，清华大学“414”的周泉缨贴了一张炮打陈伯达的大字报，没有反响。大概是听到了中央领导 9 月 16 日接见“天派”的讲话，9 月 17 日，他又在校园贴出了《炮打篡夺文化大革命成果的袁世凯》的大字报，锋芒直逼中央文革组长陈伯达。大字报末尾一口气提出几十个问题。

这次，不但清华园炸了锅，而且当天晚上中央就表了态。

9 月 17 日晚 21 时 30 分至 24 时，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谢富治、叶群、戚本禹、姚文元、吴法宪在人民大会堂，又接见了北京“地派”的代表，还是江青主持，周恩来首先讲话。他说：“同志们，战友们，今天还要重复昨天讲的，昨天讲了一次，今天再讲一次，可能讲不好了，因为提纲没有带来。”

他最后说：“总之，不能光看宣言就行了，两面派是不能持久的。你们在座的我就不能保证没有两面派，当然大多数是好的。

上次讲的，定的纪律不要把我们的话捅出来，结果还是捅出去了。你们有小报，我们用大报一个一个通报你们。”

江青：“你们欺负到毛主席、林副主席、中央文革头上。昨天说了话，今天在清华礼堂门前贴了一张陈伯达同志大字报，说陈伯达同志是篡夺群众运动成果的野心家。贴大字报的人叫周泉缨，小丑！叫这么一个鬼名字。欺负老实人，欺负到中央头上！”

从此，这位周泉缨就荣获了“小丑”的雅号。

接着，康生站起来说：“周泉缨，站起来！”

在台下的“414”派总部常委们答道：“周泉缨只是‘414’的委员，不是‘414’的常委，今天他没有来。”

康生坐了下去。

谢富治大声说道：“对反革命，抓起来，实行无产阶级专政！”

陈伯达说：“不要抓，要教育嘛！”

江青接着说：“中央的事你们不要管，我们是遵守党的纪律的。你们不应知道的，我们不能告诉你们。我们已经解决了，你们还在那里胡闹。今天抓了一个人，不能告诉你们名字，狡兔有三窟，他不晓得几个窟，我们抓到了。”

“你们从小学到大学学的是资产阶级教育，学的是资本主义那一套，从制度内容，现在是恶性发作，显出恶果来了，我们心里感到很沉痛，所以要坚决搞斗批改。现在号召你们批判资产阶级教育制度，搞斗批改。”

“为什么主席在这时让我们提醒你们‘现在轮到小将犯错误

的时候了’呢？好好想一想。”

“这个怀疑一切，怀疑毛主席领导的党中央，怀疑军队，怀疑革命委员会，想干什么好事，很容易走到对立面。去年的革命者可能走到对立面，希望你们不要滑过去，我们和你们共过患难，是战友。如果硬要滑过去，那是天要下雨，娘要嫁人，没办法。

对小将，我们是十个指头个个连心，咬哪个都疼，如果一个要坏一定要分裂出去，那活该。不要把个人小集团估计得过高。”

接着，陈伯达讲话。他首先表示：“拥护刚才总理的话。”

然后说：“昨天讲了一些，在所谓天派会上讲了话，没想到一天之内，从天上掉到了地下。欢迎大家批判，经过了半夜，从天上掉到地下这也有可能，为什么分天地派，这要作阶级分析。为什么有天地派，这值得深思，好好想想，要作阶级分析。”他希望“天”“地”派联合起来。

江青：“外交系统不能这样下去！今天不经过总理向巴基斯坦提抗议这是向中央夺权，这是错误的。”

康生：“你们当中有些人怀疑毛主席领导的中央。认为我们的领导，中央文革、军队是一群资产阶级政客，勾心斗角，有人说我们是谁的后台，说我是你们的后台，这是对我的侮辱！”

“你们要冲击解放军，中央三令五申都无效，要撤回联络站，你们口头答应，但就不撤。还冒充红代会的，甚至说中央文革批准的，代替人家包办一切。所以我们向你们提议：撤回联络站，搞本单位斗批改。你们认为是大毒草，这样讲法是错误的，基本

上是错误的。搞本单位要靠自己啊！限期一月，回家的，到别处去的统统回来，不回来就开除学籍；毕业生不让毕业，不给工资，有政治挂帅，也有物质基础嘛。”

江青：“他们认为党和国家是可以欺侮的。”

康生：“我们要巩固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不管是学校、工厂、地方的都要这样做。革命委员会是新生事物，像初生婴儿，虽然有缺点，不会说，不会走，毛手毛脚，但是不像我们衰老的人，他有无限的生命力。我们要扶植他，不要有点缺点就挑三挑四的。这次对北师大革命委员会就是持这个态度。这并不是说北师大革命委员会没错误，谭厚兰同志来了，你自己知道。我们严厉的批评了韩爱晶、蒯大富，据说他两人亲临指挥开会，据说后面还有谁。天派掉下来、地派钻出来，成一派，毛泽东思想革命派。

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的通知（指关于北师大的），毛主席亲自批准，支持一个新生事物，要不制止，会引起连锁反应，全国都要受到冲击。对于北京市革命委员会，要支持，不要分裂革命委员会。”

“这里呼吁外交院校不要到外交部去，那里国家外交大权，一不小心就犯错误，那里有机密，是啊，有高度机密的东西，因为和帝修反斗争啊！8 月份办了三件错事，很被动。”

“国庆节前把没军训过的搞搞训练，增强组织性纪律性，不联合的学校不给他派解放军训练，不参加国庆。”

“你们在城里，与工农结合机会少，过了十一，让你们去支援郊区县搞三秋，是个与贫下中农结合的好机会。”

在 9 月 17 日中央领导接见完北京“天派”代表后，迫于压力，9 月 21 日，蒯大富带领清华“团派”主要负责人去“4·14”总部商讨大联合事宜。双方签署了大联合的第一号协议。当晚召开庆祝两派实现大联合群众大会。会前，蒯大富应沈如槐之紧急提议，说服了其他“团派”头头，将原定的大联合组织名称“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总勤务站”改为“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联合总部”。会后，“团派”群众贴出大标语：“谁撕毁协议，谁就是蒋介石！”

## 第 891 回：一声喊，十条命峰回路转　签协议，山城内武斗剧减

9月12日，赴华蓥山建立“根据地”的重庆大学“815”的“301部队31纵队”11名同学，其中包括1名女生，从他们的驻地出发去岳池县，在石垭镇遭遇了“砸派”武装伏击，1人中弹身亡，10人被俘，生死不明！

他们此行是去执行一项侦察任务：因为整个南充地区都是“815”的天下，唯独岳池县尚为“砸派”占据。他们想利用进驻华蓥山之际，趁机将岳池县一鼓荡平。11个人就这样出发了。

下山，他们先到了广安县城。麻石路两边，全是些低矮发黑的木板房舍，农民十分贫穷。一座古老的城门洞，墙头乱草萋萋，衰败荒老。这里是“815”的势力范围，问明情况，壮壮行色，他们又从广安县城出发，顺公路两侧向岳池搜索前进，很快到了岳池县广门公社地界，这已经是“砸派”范围了。一路无事，于是越发大胆。五六式冲锋枪端在胸前，似有符咒贴身，刀枪不入，怕什么？重庆那样的大江大洋都闯过来了，料此荒远地界，敢有何方凶神挡道？天高高，云淡淡，蝉儿在婆娑的树梢浅唱低吟，好难得一派田家秋景！远远坡头上，影影绰绰，似有人头晃动。停住，一望：不过是些村夫野老、牧童稚子罢？于是乎，依然次第前行。就这当儿：说时迟，那时快，一梭子弹嗖嗖地从头顶飞过，斩杀路旁草叶，飒飒啦啦一阵惊惶的乱飞。

“有伏击！”武斗队员们一齐扑倒路边。

路边是一片红苕地，枝蔓正旺，急匆匆匍匐爬进。他们根本不知道，其时，对方已经对他们完成了合围！

武斗队员冯纵，校足球队队员，父亲是重庆市中医界的超级权威人物，家境优裕，小伙子故而一脸白白净净，灵明清秀，帅气逼人。如果当时他不去穿那一身赝品军装，不扛着冲锋枪到素无怨仇的川中丘陵游荡，而继续留在校园，他绝对是女大学生梦中的多情公子。可惜，历史不可回避地让他去了，不可回避地让他爬进了那片红苕地。红苕地枝蔓横生，茂密的叶片儿被他的赝品军装撕扯得哗啦啦响。只是，地势太开阔了，而他个子又高，还来不及成功隐蔽，一枚子弹已经准确无误地射中他的胸膛：就一枚，弹孔应该是正穿了心脏，大动脉顿时血喷如注——扑卧他旁边的刘抗生如是说——他只蹬了蹬腿，像临死前的青蛙那样，接着就不再动弹了。

顾不上处理他的尸体，大家发现旁边正好有民房一院，急急地便退了进去。数倍于学生的武装人员也紧跟着将小屋团团围定。

躲进小屋的学生们是无路可逃了，全都抠紧枪机，握紧了手榴弹：对方只要敢冲进来，只能玉石俱焚，同归于尽！

就在这一刹那，重大“301”的刘抗生突然呐喊着向门外冲出去，他高声喊：

“双方都别打啦！双方都别打啦！”

这是撕心裂肺的一声喊，整个事件的进程便回转了方向。余

下这10个大学生的命运，本已像急流出山，眼看就要跌落悬崖，摔得粉身碎骨，因这一声喊，却突然转了向。

对方把刘抗生捉了。在继续对屋子实施武力围困的同时，对他进行了突击审问。

刘抗生，四川成都人，机械系四年级学生。他本来应该是上五年级的。1961年高中毕业参加高考，因乃父曾做过国民党成都市府秘书长，他理所当然落了榜。悟性极高的他对于这个结果早有所料，于是毫无怨尤、心平气和地走上了社会。1962年，四川副省长康乃尔主持川内考务，宽大的阶级政策成了被家庭包袱压得喘不过气的青年们的福音。刘抗生初听此言，信疑参半，皆因劝说的人多了，他姑妄听之，不抱任何希望再次去了考场试试运气。不料这一回，他竟然中了。

在岳池被俘之前，文革之中，他至少已经注定该死了两次。一次是在李子坝，他开“造反车”进城——“造反车”是文革中的专用术语，即，既未经过正规驾驶训练，也无正式手续取得车辆使用权，弄辆汽车就上路去满世界狂奔。车过李子坝，不知为什么就翻了，打着滚翻下几十米的悬岩，车被摔得粉身碎骨，他竟然没被摔死，而且很快又活鲜鲜地走下病床继续革命了。第二次是去炮兵学校“抢”枪，该校的军人本来是和“815”观点一致的，也不知道为何神使鬼差，那天却得到情报，说是有几车“砸匪”要前去抢枪，军人们于是枪上膛、刀出鞘，如临大敌，严阵以待。这一回，刘抗生依然神气活现地开着“造反车”，车门两

边还神气活现地站着俩护卫。名为“抢”枪，实为到“815”哥儿们的仓库去搬武器，当然也不会有什么任何危险。护卫站在车门边上，一手抓车窗，一手腾出来迎着万里东风挥舞开道，那感觉一定很酷。

既然炮兵学校的学生们事前已经得知“砸匪”要开车来抢枪，而现在果然又来了这么几车耀武扬威的不速之客，当然就不客气了。第一拨子弹刷刷射出，首先就把站在车门边出风头的同学打翻落地。其余人等惊慌失措，四下里鸟逃兽散……

误会很快澄清，可是人已经死了。奇迹在于，就在死者旁边把玩方向盘的刘抗生，居然又躲过了一劫！

死过两次，站在死亡面前当然容易镇静自若。周围都是林林总总的刀刀枪枪，他呢，故意装得像个被人胁迫的乡下佬，懒洋洋，满脸无可奈何的表情。

对方问他：“做啥子的？”

“我们能做啥子？”他说，“工人。挣钱吃饭。养婆娘娃娃。”

这已经很有人情味了。于是又问：“你工人，有婆娘娃娃，为啥还到我们这儿胡闹？”

“厂里个个都参加革命，我不参加得行么？毛主席号召么！不参加，人家说你觉悟不高，以后在厂里还能混得下去？”

他还说，除了婆娘娃娃，家里还上有高堂老母，体弱多病，难着呢！工资本来就低，日子本来就难过，你们打死我，我倒痛

快了，可老母亲咋办？婆娘娃娃咋办？可怜啊！你们就看着办吧！反正我活着也艰难！他还说了，他的弟兄们倒净是些无牵无挂的小年轻，都没结过婚，没老没小，他们真要和你们拼起命来，谁吃亏谁划算说不准呢！

论舌战，专区、县上的“土八路”哪能是他的对手？事情很快就定下来了：“行，不打了。你去动员你的弟兄们先缴械吧！缴了械再说。”

事情暂时就这样摆平了，10 个人于是被关了起来。据说，对方还同意对冯纵的尸体先做妥善处理。算是非常人道主义了。

人的命运常常就这样，因为一件小事，一个小小的细节，便改变的面目全非。

几十年后，这10人中，很多人成了西南地区厂矿企业的优秀人才。如果当时没有刘抗生的那一声喊，那么，后来西南地区的厂矿，包括昆明钢铁公司这样的省级特大型钢铁企业，就会缺少了这几位优秀的总工程师、厂长和高级工程师。

这些情况，当然是事后才知道的。当时传回根据地的消息，只说是全军覆没。梁大汉，冶金系五年级学生、“301纵队”司令员，星夜从广安驱车回重庆搬兵。政委吴庆举正好夜奔广安前线。两车路遇，风尘仆仆的梁大汉跳下来，大叫一声：“我们11个弟兄全完啦！”说罢，便与吴庆举抱头痛哭！

梁大汉道旁发誓：“除非‘砸派’乖乖放人，否则，不将岳池小城踏为平地，绝无颜再见全校弟兄！”

这时部队收缴武器风声日紧，54军已通过成都军区对岳池县的武装部施加了压力，打了招呼。通过军队干预，对方同意重大“815”派人前去谈判俘虏问题。但他们不敢出来，非要“815”进岳池谈判不可。

吴庆举带了机械系钟老师和冶金系一个大汉作警卫员，专门开了一辆外表不错的吉普车，当即就出发了。

车过广门，到对方地盘了。“砸派”的武装部队荷枪实弹恭候大驾光临，刀枪在路两边一字儿排开，像古装电影的军阵，很是杀气威武。他们要重大“815”吴庆举3人下车，换乘他们的车辆入境。

吴庆举走下吉普车，带着他的高参和警卫威仪凛凛登上对方破车，绝尘而去。那阵仗，很有鸿门宴的感觉。

在谈判过程中，吴庆举发现对方对国内形势省内形势完全稀里糊涂。于是他就大谈“八二五号召”，大谈“九一讲话”，大谈《九五命令》……结果，所有谈判事宜进行得十分顺利，都按“815”说的办。最难的是一个小小细节：胶卷问题，也解决了。对方同意将胶卷交还。

原来，10位同学被俘后，曾被对方强迫举手做投降状，逐一拍照留影存档——这太有损“815”革命战士的光辉形象了。“815”从成立之日起，就有一句响当当的誓言：“头可断，血可流，毛泽东思想不能丢！可挨打，可挨斗，誓死不低革命头！”当时，中央音乐学院的南下学生还心情激动地将它谱成战歌，大会小

会，游行示威，众口一词，高唱此番战斗旋律，非常震撼人心。可现在，你瞧，“815”的钢铁战士们公然在敌人的淫威下举手投降，成何体统？

那天早晨训练结束，“301”华蓥山总部传下话来，说岳池同学已经定于当日出狱，各队均派代表前去广安县城迎接。

从华蓥山到广安不远，早饭毕，4 辆卡车便浩浩荡荡出发，中午就到了。

吃罢午饭，岳池方面还没有消息，大家就扛着枪满街里游荡，到空寂的渠江边去，拣破瓦片打“水漂”，用冲锋枪射击对岸的石头。一直到黄昏，吃过了晚饭，岳池那边传来消息：“尚有细节没有谈妥，今天就不必等了。”

驱车回山，那一夜天很黑，没有星月，山峰和旷野晦明莫辨，如历虚空，如坠地狱，接俘虏的“301 部队”几十个代表就挤在车斗里任崎岖的山路颠簸。凡遇转弯、道口，黑暗里都有人用手电筒发信号。整个根据地山区联防，每晚都会给出一个通行口令，遇到情况就紧急盘查。那一晚的口令是“三长两短”。如遇盘查，行人需回答“三长两短”，汽车则用喇叭鸣三长声，两短声。如果错了，地下到处都有地雷，马上就会拉响，埋伏的枪手也会乱弹齐发，打你个人仰马翻。司机捏着一把汗，不停地鸣着三长两短，战战兢兢地沿山路盘旋而回。坐在车上的人也竞竞颤颤，深怕司机摁错了喇叭节奏。

好不容易回到山里，指挥部空荡荡的，为数很少的留守人员

一下子全冲上来把他们团团包围起来，枪口对着他们。

“这是怎么回事？”颠簸了大半天的接俘虏代表们莫名其妙。

此时，武斗人员也从四面八方的山头上冲下来，将接俘虏的代表们包围。他们光着膀子，气喘嘘嘘，子弹带斜挎在汗水淋淋的肩上。枪刺在黑暗里闪烁有光。有的人还拖着重机枪，枪栓拉得哗啦、哗啦响。

好一会才明白：这些留守人员差一点儿把接俘虏的代表们当作入侵之敌予以歼灭了！幸好他们回答正确，要不，机关枪早已瞄准，地雷也早伺候着呢！

原来当晚，不知谁传来情报，说有4车“砸派”将要前来偷袭。而接俘虏的代表们的车，又正好4辆！更为蹊跷的是，当晚，天上确实发了3颗信号弹，均为绿色，这正好是当晚的特急信号。已经酣然入睡的武斗队员翻身而起，立马拖枪上山，进入阵地，各就各位，准备迎击来犯之敌。

那么，这3颗绿色信号弹，是谁打的呢？几十个人集结在黑黢黢的小地坝上，你一言我一语地开始排查，很快证实：总部绝对没有任何人发过信号。那么是谁呢？山就这么大，人就这么几个，目标很快集中到了一个人身上：根据地电台负责人。对，就是他！

那天早上训练时，大家正在打靶，旁边走来3人：一男，机械系学生，时任根据地电台负责人。后面跟着两个女电台发报员。

该男生热情奔放，正好有两位女战士紧跟侧旁，他当然很想露一手了。看见大家在打靶，也想来几个“十环”让女同胞开开眼。可惜，持枪的弟兄们偏偏不卖帐：你想打？偏不给！求了几个人，都不行。真是太丢人了！一气之下，拂袖而去，对两位女孩说：“有什么稀罕的？今晚上，你们等着，我有更好的让你们打！”

晚上，他不知道怎么真的搞到一只信号枪，3枚信号弹。趁着月黑风高，他带着两个女孩，上荒野山头去小小地过了一回枪瘾，一人一枪，就当放礼花了。只可惜没红色，偏偏都是——绿色！两女孩还是高兴极了！

真有点像古时候的烽火戏诸侯。武斗队员们得知真相后，怒不可遏，如狼似虎一般齐扑这位男生的房间。那位男生知道坏事了，倚门而立，手里紧紧抠住那柄信号枪，把一颗信号弹顶上枪膛：“进来呀！”他喊道，“谁敢来，我就开枪！”

没有人上去。几十人全呆围在四周。局面正在僵持，总团勤务员查正礼赶来了，他慢吞吞上前，对那位男生命令道：“把枪放下！”

男生乖乖把枪放下了。不等查正礼再说什么，怒气冲冲的武斗大汉们已一涌而上，把他按翻在地，结结实实地揍了他个鼻青脸肿。

第二天早上，在小学校的小地坝上开了“军人大会”。那位鼻青脸肿的男生和两个女战士规规矩矩做了检讨，说自己犯了

“自由主义”，犯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又过了一天，那 10 名俘虏被放了回来。

9 月 14 日，中央调查组部分成员上午到达重庆北碚区调查武斗情况。20 日下午离开。

9 月 16 日，重庆两派代表各 10 人于 9 时在市革筹和警备区司令部主持下签订《重庆两派关于外出人员返回本单位抓革命促生产的协议》，双方商定：离开生产、工作岗位的人员务必于 9 月 25 日前返回原单位；各群众组织已抓的人于 9 月 16 日 14 时前送到警备区司令部;各群众组织修筑的工事、埋设的地雷、各种障碍物等于 9 月 22 日前拆除；全市水陆交通运输于 9 月 20 日前恢复正常，群众组织和个人抢劫的车船，于 9 月 20 日前上交警备区司令部和归还原单位，全市银行、邮电、医院、商店、粮店及其它行业立即恢复正常业务；进城参加武斗的农民和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立即返回农村。

9 月 17 日，中央调查组、省革筹调查组及市革筹制止武斗小组一同到潘家坪武斗现场验尸，运回 26 具，尚有 6 具待处理。

经过各方的努力，9 月以后，重庆市区的武斗事件剧减。但是，两派仍然剑拔弩张，局势仍是极为严峻。其间，各种冲突仍在时常发生。

## 第 892 回：九一七，毛泽东来到南昌　说内战，江西省受到表扬

9 月 17 日 9 时 40 分，毛泽东的专列已经停在南昌的飞机场，车厢里坐着江西省领导干部程世清、杨栋梁、刘瑞森、郭光洲、黄先、陈昌奉。陪同毛泽东一起到达南昌的杨成武、张春桥、汪东兴和余立金也在座。

程世清首先向毛泽东汇报了江西省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当汇报到收缴武器的情况时说："到 9 月 16 日止，全省收了 4 万多支枪。"

毛泽东问："这些枪是谁发的？我看两方面都发了，谁发的多？"

程世清答："军分区、人武部发给保守派的多。"

毛泽东"啊"了一声。

程世清继续说："我们用这些枪武装了一个工人团，两个营又一个连。"

毛泽东插话："哦，武装工人，这个好。"

程世清继续："有几个军分区在支左中犯了严重错误，特别是赣州、抚州两个地区的个别领导人，支持保守派，发生了对革命造反派和红卫兵开枪的严重事件，现已按中央 8 月 10 日的文件进行了处理。"

毛泽东："抚州问题值得研究一下，为什么他们会这样大胆？他们总要开会研究形势，认为江西、全国和世界形势也对他们有

利才这样干，他们对形势估计不正确，我看是。”

当汇报到“他们有一批人控制了 9 个县”时，没想到毛泽东直接说出了这 9 个县的名字：“临川、金溪、资溪、南丰、南城、黎川、宜黄、崇仁、乐安。”并说：“从这一点上看，他们是想扩大势力，进攻南昌，这是什么性质的问题呢？”

程世清答：“根据中央指示精神，是军事叛乱。”

毛泽东问：“你们定了没有？”

答：“定了。”

毛泽东问：“批了吗？”

答：“总理批了。”

毛泽东：“噢，性质是叛乱，是袭击，说中国没有内战，我看这就是内战，不是外战，是武斗，不是文斗。在赣州、吉安、宜春等地，还搞农管，一个生产队抽一个人，十个大队抽十几个人，采取强迫的办法，记工分，一天六角钱。”

程世清插话：“有的还一元。”

毛泽东：“现在农村包围城市，我看不行。”

当汇报到毛泽东思想、政策已在江西广大人民心中深深扎根，对江西形势起了决定作用时，毛泽东说：“5 月底我们几句话给林彪同志，说江西军区同群众为什么这样对立，值得研究，我没有下结论，我指的是江西、湖南、河南、湖北。”

当汇报到“吴瑞山他们封锁毛主席的指示，不告诉我们”时，毛泽东点了点头，笑了笑。

接着汇报了抚州军分区政委王景义在中共中央处理江西若干问题决定之后，“知道主席说话了，知道自己错了，在 8 月 24 日夏绍林开会决定打不打的时候，王景义不同意打，我们请示要保王景义。”

毛泽东说：“要保，在关键的时候他起了作用，我看还应该从教育入手，坏人总是少数。人武部总是好人多，军分区有很多人是受蒙蔽的，有些人犯了错误，还是要用教育方法，要给他改正错误的机会。”

他接着问：“六·二九事件时，支左部队来了没有？”

答：“没有来。”

毛泽东：“他们估计中央会支持他们吗？他们先拿下南昌，全国不赞成也不行。”

程世清说：“他们想造成事实，逼迫中央承认。”

毛泽东“啊”了一声，接着问：“王景义，造反派骂他，《火线战报》登了。《火线战报》总是讲刘培善、吴瑞山罪责难逃，没有周子韬，为什么不提周子韬呢？”

答：“周子韬是个副参谋长。”

当汇报到“3111”组织基本瓦解时，毛泽东问：“听说有些散兵逃到广昌、宁都，结果如何？”

答：“已经解散了。”

毛泽东：“啊，已经解散了。”

当汇报到造反派对受蒙蔽群众有些报复情况时，毛泽东：“这

就不好，你们要注意。你们对这些造反派的领袖要很好说服，不打击报复。报复思想不好，造反派的领袖要注意。你们是站在造反派一边的，恐怕你们讲话也不会完全听，杀人总是不好，人家杀你不好，你杀他也不好，要说服教育。打击报复，下跪，戴帽子，挂牌子，还有什么‘喷气式’啰，这不好。”

毛泽东问：“你们这里有个钢铁厂吗？”

答：“有个南昌钢铁厂。”

毛泽东说：“《火线战报》登的南钢失守，庐山失守，已经收复了吗？”

答：“已经收复了。”

毛泽东问：“庐山有个姓楼的吗？”

答：“有，叫楼绍明，原庐山管理局党委书记。”

毛泽东问：“这个人是哪一派的？”

答：“保守派的。”

当汇报前一个时候各地造反派都受到压制、打击，被迫跑到南昌来，群众说南昌是解放区时，毛泽东说：“啊，还出现这样一件事，恐怕不止是江西。”

汇报到抚州军分区司令员夏绍林的问题时，毛泽东说：“对夏绍林的处理也要注意，坏是坏，和王景义有区别。”

汇报到赣州军分区政委李胜的问题时，毛泽东说：“李胜，就不用汇报了。李胜变成了李败。”

接着毛泽东问：“工厂、学校现在还有辩论吗？”

答："保守派都瓦解了，造反派里面还有辩论。"

毛泽东问："到九江的火车通了吗？"

答："通了。"

问："公路、铁路都通了？"

答："通了。"

毛泽东问："江西还有没有区？"

答："大县有，小县没有了。"

毛泽东说："有人说，公社、区、县、专区已经瘫痪，什么叫瘫痪？总有人在那里吧，不是这一派就是那一派。九江军分区好像好一些。"

答："多数人比较好。"

毛泽东说："还有一个钟福昌吧？"

答："现在改名叫钟光。"

毛泽东："他是个好人，是个老实人。"

他问刘瑞森、郭光洲、黄先："你们回来多久？"

答："一个月了。"

毛泽东说："现在北京还有十来个省在那里，一个一个的解决，现在中央不提什么方案，让他们自己去吵，看吵出一个什么样子来。你们江西也是自己吵出来的嘛。现在那一派有在省里参加工作的吗？"

毛泽东说的"那一派"是指"联络总站"。

张春桥插话："保守派也要吸收他们工作，但数量不要多。"

答："'联络总站'已经瓦解了。""汪明远他自己回来了，写了检讨，现在被造反派抓走了。"

毛泽东："把汪明远收回来好了，不要搞得太苦了。"

他又问："白栋材、黄知真怎么样？他们有没有希望？"

程世清他们汇报了这二人的情况。

毛泽东说："如果能改，能够争取几个人也好嘛。"

张春桥插话："原来省委把知真安在第一线。"

毛泽东说："我看他做了许多工作，他在那里顶着。"

他又问："过去省委是不是成立了一个什么组织来保护自己？"

答："组织了'工人赤卫队'。"

毛泽东说："干部垮了这么多，是好事还是坏事，你们研究了这个问题没有？总要给他们时间来认识和改正错误，要批评打倒一切的思想。现在要批评极左派思想——怀疑一切。这种人不多，但是能量很大，与社会上坏人勾结在一起。我们不是专为保守派说话，是教育左派的问题。总之，要团结大多数嘛！要教育左派，教育干部。有些右派，你们不要看得过死了。有坏人是少数，经过训练可以改变。一个工厂、一个公社分两派，不是认识问题，就是立场问题。立场问题也可以变的嘛！站过来就是了，大多数人可以变的。总而言之，打击的面要缩小，教育的面要扩大，包括左派。"

"要拿一个纲领来团结起来，不是拿哪一个为核心来团结起

来，我还是偏向于要多一些人。”“总而言之，打击的面要缩小，教育的面要扩大，包括左派。”

张春桥同志插话：“现在还有许多人在南昌串联。”

当汇报《文汇报》写了一些好文章，影响很大时，张春桥插话说：“人家还反我们右倾，说我们变右了。”

当汇报到这些人又在搞反右倾、反复辟时，毛泽东说：“哪有这么多复辟呀，他们已经垮了，不能再复辟了，有一种说法，索性垮了就垮了，其实天下不会乱了，天也不会塌下来。是教育左派的问题，不是右倾的问题。比如过去多少山头，江西有中央苏区、湘赣苏区、湘粤赣苏区、闽赣苏区，还有鄂豫皖苏区、通南区、陕北，抗战的时候，根据地就更多了，我们用一个纲领团结起来，管他哪一派，不能只要一个山头，不要别的山头，只有一派怎么行呢？过去我只认识陈昌奉同志，杨得志在井冈山当兵，后来带了一个旅在陕北才认识的，杨成武同志在长征时当团长，他说长征时在哪里见过我，我忘记了，杨成武同志也是后来认识的，在座的过去都不认识，你们当师长的也不一定认识好多人，你们当军长恐怕也认识不多，有的知道姓不知道名，战士只知道××团长， ××师长，××军长，也叫不出名字。我还是倾向于保一些人，能挽救的还是挽救，只要我们争取了多数，很少数人顽固下去也可以吗，我们给他饭吃算了。”

当汇报到支左部队进驻抚州时，路上遇到伏击时，毛泽东问：“有没有伤亡？”

答："部队驻进抚州时，在路上遇到了夏绍林他们三道伏击，我们的战士都在汽车上，打到的都是头部、胸部、牺牲 5 人，57 人受伤。"

当汇报夏绍林叛乱时，他首先把电台和密码搞走了。毛泽东听了很惊讶，"啊"了一声。他说："过去江西省委说江西没有军队，要我向中央说一说，批一个师。"

接着问陈昌奉："你们那个师多少人？"

陈昌奉做了回答。

毛泽东说："是个小师。"

当汇报到 76 师李文忠排支左爱民事迹时，主席说："我看了《火线战报》，有他们 3 个人的照片，他们 3 个人都很年轻嘛，现在这个排还有多少人？"

答："还有 17 个人。"

毛泽东说："江西还站出来一批干部吗？你们是省一级的，省一级要多站出一些人，还有市的，能站出多少干部？"

他问刘瑞森、郭光洲、黄先是哪里人？

郭光洲回答说："是吉水人。"

毛泽东："有人说文天祥是吉安人，其实是吉水人。"

他说："我看过《火线战报》，什么南昌告急，南钢、庐山失守，白色恐怖，宜春农管，什么农村包围城市，六、七、八月间最紧张，紧张的时候我就看出问题揭开了，事情好解决了，不紧张怎么解决呀？吉安造反派跑出去 3000 人，怎么能够消灭他们

呢？总还有人留下吧？”

答：“有些留在地下活动。”

毛泽东说：“现在有人挑拨战士反对官长，说你们每月 6 块钱，当官的钱多，还坐汽车。农民是愿意当解放军的，解放军很光荣，他们每月还有 6 块钱，家里还有优待，农民是愿意当兵的，我看是挑拨不起来的。”

他说：“江西军区搞四大，不要搞得太苦了。战士一起来，火气就很大，遏止不住，龙潜每天都斗，一斗就戴高帽子、挂黑牌子、下跪、搞喷气式，人家受不了，也不雅致嘛。据说戴高帽子是从我写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里学来的，那时是为了号召农民起来斗地主，现在不同了，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大民主。不能不教而诛，诛就是杀人。不能不教就处罚人。教了也不能诛。过去就是吃了这个亏嘛，没有调军区和军分区的干部到北京教育，你们先把武装干部训练一下。”

杨成武：“我们在北京开训练班，集中了几个省的干部集训。”

毛泽东接着说：“中央应该开，主要是各省开，不仅军队开，地方党政文教也要集训，过去开三级干部会，公社大队没有人来，都来也不行。江西有多少个县？”

答：“82 个县。”

毛泽东：“可以分三批，训比不训好，时间顶多两个月，久了不行。过去黄埔 9 个月入伍期，4 个月训练。林彪同志只住了 5 个月的黄埔嘛。有些军事学校，学习的时间越长，学得越糊涂。”

当汇报到10月间省召开全省造反派政工会议时，毛泽东说："这个好，造反派也要训，他们坐不下来，心野了，一批不行，可以训练二批、三批，造反派人很多，我看训练的办法好。内蒙一个独立营800多人，是支保的，反对中央对内蒙的决定，他们到了北京，气可大了，还闹，都不听总理的话，打破家具，会开不下去，向中央提出五条要求。以后到北京新城高碑店训练了40 天，都转了，回去支左不支右，独立营，独立师训一下就转过来了。我对现在右派不那样看死，一训就转过来了，有坏人是极少数，多数是认识问题，有的把认识问题说成是立场问题，一提到立场问题就上纲，一辈子不得翻身，难道立场问题就不能变吗？对大多数人来说，立场是能变的，对极少数坏人是不能变的。总而言之，打击面要缩小，教育面要扩大，包括左、中、右。左派不教育变极左，到处抓赵永夫、谭震林，哪有这么多赵永夫、谭震林，江西抓什么人？"

答："红卫兵抓刘培善，吴瑞山，林忠照，还有人到福建去抓韩先楚，总理要我们打电话叫回来。"

毛泽东说："你们打电话不一定灵吧。"

他说："要保护，不要使人下不了台，要使人有机会改正错误，你现在有理，但做得过火不好。"

这时汪东兴说："现在11点多钟了，谈了一个半小时。"

毛泽东说："就这样吧。"

后来，中央文革小组发来贺电："伟大领袖毛主席视察五个

省和一个市回到北京后，在中央的一次会议上，传达江西问题时，说江西搞得很好，应该表扬。”

## 第 893 回：到长沙，毛泽东见湘领导　再批“左”，工人阶级不分裂

9月18日，毛泽东的专列来到了长沙，停在了大托铺，没有进城。上午10时20分，毛泽东在专列上听取了47军军长黎原和湖南省领导干部华国锋、章伯森的汇报。接见时在座的有杨成武、张春桥、汪东兴、余立金。

黎原汇报说：“湘潭问题基本解决了，不过，保守组织下边的工人有5万多，数量比较大，下一步如何搞，还是个问题。”

“好好做工作争取他们。”毛泽东说，“他们有这么多的工人，不会一辈子保皇，要正确对待。至于他们的头头，靠下面起来造反。”

黎原：“部队主要开展政治攻势。湘潭造反派在长沙集中学习后，回去按政策办事。”

毛泽东说：“湘潭的经验很好。这样多产业工人，不会一辈子保皇，要正确对待。至于他们的头头，靠下面自己起来造反。”

黎原汇报说：“沅江的形势还比较紧张，还在打仗。”

毛泽东说道：“打打也好，受受教育嘛。现在他们动员农民进城，每天是15个工分，还有30个工分，有的是抽人去打，有的是2元钱一天，有的是打一仗100元钱，打死了给100元钱，没打死也给100元钱。没打死就白拿了……”

毛泽东停了一下接着说：“他们是用这个办法动员农民进城。”

黎原说："常德保守派进攻常德城，经过说服以后撤退了，结果左派又报复，反过来向农民进攻，农民就又向城里边进攻，后来我们派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将农民说服回去了。"

"好，这个好。"毛泽东点头赞许。

谈到泥木工人的斗争情况时，毛泽东回忆起自己过去搞泥木工会的情况，说："泥木工人有些行会思想，怕乡里人返城，那时候入会每个人要交6块大洋。"

谈到武斗问题时，有人反映有的组织大，认为人多就要以他为中心，毛泽东说："那也不一定。""学校造反派也要学政策，什么以我为核心，这个问题要解决。""两派都是工人，一派是左派，一派是保派，我总想不通。越压越反抗。"但他又说："清理干部得搞群众运动。"

当黎原汇报省军区的新造反派压老造反派时，毛泽东插话说："过去他们是保守党的，现在又以极左的面目出现。"

谈到极"左"思潮时，毛泽东说："有几条标语，不要紧嘛，要他多出来一点嘛，群众会起来批判，你们不要抓人。"

在说到抢枪问题时，毛泽东问："枪，基本上是抢的还是发的？或者是以借的名义？"

黎原和章伯森实话实说："是军区发的。"

"枪发给左派了，现在他要送回来，给你们保管好了枪，不然右派又抢走了，这是个好经验。"

谈到解放军下工厂，造反派对解放军很好，给解放军作报告，

武装保护解放军；解放军战士给造反派讲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与造反派加深了感情时，毛泽东说：“这也是一条经验。”

谈到接待站把一些受蒙蔽的群众集中学习时，毛泽东说：“光他们学习不行，也叫造反派学嘛，不然回去不好混。”

谈到“高司”问题时，毛泽东说：“‘高司’还给我发了不少电报，发到上海，由张春桥转。”

毛泽东还问：“不是还有个姓万的吗？”

毛泽东这里问的是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兼监察委员会书记万达。

有人汇报群众不同意万达到革筹小组时，毛泽东说：“等一段嘛。”

他说：“我听到了一个好消息，铁路通了。”

这是指衡阳以南的铁路通车了。

黎原说：“通是通了，现在有一个‘红旗军’的问题不好解决，他们按行业联合，组织也恢复了，他们说没有翻身，政治上没有地位。”

毛泽东说：“再研究一下嘛，看看再说嘛，天下的事不要那么怕，先恢复了再说嘛。”

湖南的同志说：“林副主席指示过，不要单独组织荣复、转业军人的组织。”

张春桥插话：“林彪同志去年批过一个文件，指出荣复、转退军人不要单独成立组织。应说服他们，现在搞大联合，与别的

组织结合，或参加别的组织。”

毛泽东点了点头。

毛泽东问章伯森：“以后你还同张平化，同军区顶？‘工联’没有后台是不行的。”毛泽东问这些是指章伯森是“工联”的后台，不过没有挑明就是了。

章伯森说：“‘湘江风雷’派掌握实权的是张家政。他的父亲是国民党少校军医，有许多会，他的父亲都来参加了。现在‘青年自卫军’、‘孙大圣’、‘井冈山’等都退出来了，只剩下十几个一般的组织。叶冬初是‘湘江派’里的另一派，实权不好由张家政掌管。”

毛泽东讲，现在群众的消息灵通。

黎原和华国锋同时讲：“中央关于不准抢夺军队枪支的《九五命令》一发出，大家都很拥护。群众开始想枪，抢枪，抢到枪后又怕枪，怕被抢去枪，枪就变成个负担。”

毛泽东一番感慨：“群众运动有一个规律，到了时候才会回头。解放军有40多天不敢拿枪呢！军队不仅‘四不’，还有‘五不’，不敢拿枪呢！过去军区设巡逻队是示威的，结果没威信了。现在47军组织巡逻队，很好嘛，47军大军嘛。”

黎原插话说：“独立师过去中毒很深，现在‘湘派’派人去作报告，转得比较好。这里军区搞‘四大’，一个613 医院就有30多个组织，你造反呐，我就不做饭，你开处方我就不拿药。都乱套了。”

毛泽东说："大师傅也不是好惹的。"

"你们军部已经来了，做群众工作嘛！你们不谈不行，自然，谈呢，又要占很多时间。"说到这里毛泽东又问："株州空军部队过去态度不那么明朗，现在怎样？"

答："8月份才转过来。"

毛泽东说："株州的形势好，47军一开始支左就支对了。"

华国锋说："桂林、株洲，22师支左支对了，另两个师支错了。衡阳以南的铁路已经通了。"

毛泽东依着自己的思路往下说："不通的反面就是不通。"——这当然不是指铁路。

"浏阳现在有1000多带枪的保守派组织，是副省长孙国治带着跑到那里，其中有几十个省级的干部。"黎原和章伯森汇报。

毛泽东问道："那一年我到湘潭，地委有个王治国，现在他在那里？"

华国锋汇报说："在长沙被斗的很厉害。"

"为什么要斗的那么厉害呢？我知道他身体不很好嘛，他有高血压。问题是军区错了，影响他们，他们又影响军区。地委、县委两级都瘫痪了，不过现在照样种田、开工。"毛泽东说。

"农民照样种田。"华国锋回答，"今年可产粮油250亿斤至260亿斤；今年棉花可产180万担，去年是150万担。"

毛泽东说，"什么农口，农业部、农垦部都不起作用了，气象局还起点作用，宣传部、文化部也不起作用了，不少工厂还在

生产，农民还在作田嘛。”

张春桥插话说：“过去搞精简，搞几年都搞不动，现在证明以后可以精简。”

毛泽东：“我们是有意识地叫他不起作用。过去是庞大的组织，还有坏人，如薄一波、安子文在领导，还有公检法，没有他以为不得了，我一听到公检法垮台，人就高兴！听说富治同志这次才说了几句话。”

黎原说:“湘潭军分区司令赵仁山不好,在北京还欺骗总理。”

谈到湘潭成立临时领导小组时，毛泽东说：“临时领导小组在九、十月份搞起来。”

张春桥插话：“江西也成立了临时领导小组，情况很好。”

“毛新民一批都被杀了。”毛泽东开始谈他家乡，“韶山说都被保守派占了，如果占了，47军可以分几路打进去。姓毛的过去有48乡最能打仗，谁请他们去参加，一打就胜了。”

毛泽东又谈起他的父母：“我的父亲的哲学是两句话：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我母亲不赞成，父亲不得人心，母亲得人心。父亲死的时候没人送葬，母亲死时有二、三百人送葬。母亲说别埋在一起了，结果还是在一起了。有个土坟，没有立碑写传……”

毛泽东讲着，将目光转向华国锋：“有一个毛华初和高凯，就是毛泽甫，他们怎么样？”

华国锋一直在毛泽东家乡工作，对那里的一切都很熟悉。他说：“都还好。”

谈到干部问题时，毛泽东说："清理干部得搞群众运动。这样多的军分区，武装部，不搞运动就搞不动。过去延安整风，是自上而下进行。现在我们队伍大了，干部多了，而干部中的官僚主义，当官做老爷，形式主义，说假话，谎报情况等时有发生。有的干部又老得不得了，老革命，老资格，他有兵权，你不发动群众怎么搞得动？只有从下到上发动群众，让群众讲话，让群众在运动中来评定鉴别干部。"

毛泽东又说："归结起来，干部大多数是好的，要教育他们，其中极少数是坏人。打击面宽了不好。开个会，实际上是训练班，左派要参加，红卫兵要来一些参加。开会时各派专门批评自己，不要批评对方。我们军队过去就用这个办法，和地方关系不好，只检查批评自己，对地方不提批评意见。"

谈到犯过错误的干部进行训练的时候，毛泽东说："不光是犯过错误的，还要搞些没有犯过错误的也参加，还要加上少数红卫兵，要帮助他们学习。"

谈到大联合问题、左派内部加强团结问题时，毛泽东说："都要作自我批评，都要少讲别人的缺点，不是把矛头指向对方。过去我们有个经验，过去军队和地方的关系军队提出拥政爱民，地方提出拥军优属，军队带头作自我批评，两方面的关系搞得很好。"

张春桥插话："主席语录中有这么一段。"

毛泽东又说："两派都是工人，一派造反，一派保守。保守

是上头有人蒙蔽了他们。对受蒙蔽的群众，不能压。越压越反抗，我们也是蒋介石压出来的。大革命后我们只几万人，蒋介石压我们，我们就有希望了，一压就压出30万红军、30万党员。”

谈到长沙的碉堡工事时，毛泽东说：“不放心就保存一个时期嘛。”

杨成武插话：“水泥的不要拆，也是一个备战。”

黎原请示：“我们每个军分区需要有一个营的兵力担任三支两军任务。现在分区都瘫痪了，想把两个工程兵团用来暂时担任湖南各分区的三支两军工作。”

“好，同意。”毛泽东点头，再次讲他那每到一地都有要讲的话作为结束语：“两派都是工人，一派是左派，一派是保派，我总想不通。越压越是反抗。学校造反派也要学政策，什么以我为核心，这个问题要解决。核心是在斗争中、实践中群众公认的，不是自封的。”

毛泽东讲到这里思索了一下，讲了一段历史：“蒋介石压我们，我们就有希望了，压出了几十万红军。不然，只叶挺一个团。以后自己犯错误，打败仗，长征实际是被蒋介石赶出来的。你越摸不得，人家越要摸你。全国抢了30多万支枪，我看不多，民兵就有350多万支枪。”

黎原也是从军人的角度看这个问题的，他说：“各个群众组织会造枪坦克等武器，这是一次很好的战备演习。”

毛泽东听了很是赞赏，说：“前天我在杭州给浙江的同志说，

大学、县、工厂都能造武器，将来打起仗来就好了，都有用。你也是这种看法，真是英雄所见略同，确是一次很好的战备演习。”

毛泽东接见了黎原、华国锋、章伯森3人后，杨成武、张春桥等同志又和黎原、华国锋、章伯森谈了话，传达了毛泽东最近在视察中，反复讲了这样几个问题：

“一、大联合问题。

毛主席说：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利害冲突，为什么要分两大派呢！两派要互相少讲别人的缺点，多作自我批评，才有利于革命的大联合。

主席反复讲：要解决造反派内部的团结，特别是工人内部，上海是大联合的高潮，国庆节前就搞好，大联合过国庆。

二、正确对待干部。

毛主席说：不要搞武斗，批判斗争会要搞文斗，不要搞武斗。犯了错误的检讨了就可以了，不要过头了，不要侮辱。

主席还说：人家犯了错误就够苦了，你们还要过火，不要好象不武斗一下就不革命。”

张春桥说：“上海斗争陈丕显的时候拍了电视，主席看了。陈讲话时，很多人插话，主席说：会上要允许本人讲话，允许本人申辩。

陈再道被斗得很厉害，主席知道后说：不要这样搞。

干部大多数是好的，主席对站出来的干部很重视。上海局以上的干部站出百分之六十，山东站出来百分之二十，河北站出来

的很少，只有百分之几，主席说：将来还是要大翻案的。对干部，除投敌、叛变、自首者外，过去十几年、几十年总做过一些好事嘛！要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

为什么群众对干部不满呢？主要原因：1、政治原因，因为他们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2、作风原因，因为他们当官作老爷，不平等待人。

三、主席很关心造反派。

主席说：对造反派也要教育，现在正是犯错误的时候。年青人，不要性急。现在紧张严肃有余，团结活泼不足，缺乏民主作风，不平等待人。打人、骂人、拍桌子，把我们传统搞乱了，把我们坚持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搞乱了。

目前主要危险是极‘左’思潮，当然也要注意右的方面。极‘左’表现三个方面：1、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炮轰总理）；2、分裂人民解放军；3、有些地方分裂革命委员会。

反对极‘左’了，不要极右了。要加强教育，扩大教育面，不要扩大打击面。”

毛泽东在长沙谈到湘潭两派时说：“工人阶级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为什么要分两大派呢？两派要互相少讲别人的缺点，才有利于革命的大联合。”

谈到长沙保守组织的时候，他说：“两派都是工人，一派造反，一派保守，我看保守是上面有人蒙蔽了他们。对受蒙蔽的群众不能压。湘潭那么多产业工人，不会一辈子保皇，要正确对待，

对他们的头头，要靠下面自己起来造反。干部大多数是好人，我们要团结大多数，包括犯错误被群众斗了的，向群众检查了就完了嘛，不要揪住不放。除了极少数坏人，打击面过宽了不好，对干部除了投敌、判变、自首者外，过去十几年、几十年总是做过一些好事吧？要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进行批判斗争时，要用文斗，不要武斗，不要侮辱。你们可以告诉造反派，要加紧学习，对造反派也要加强教育，现在正是犯错误的时候。青年人不要性急。现在紧张严肃有余，团结活泼不足，缺乏民主作风，不平等待人，打人骂人拍桌子，把我们的传统搞乱了，我们坚持团结——批评和自我批评——团结的公式搞乱子。现在我要告诉大家，两派都要实现革命的大联合。”

## 第 894 回：九一八，长春火车站激战　都停火，枪支武器就地封

长春“红革会”、“二总部”，和“长春公社”、“东方红公社”两大派组织继 9 月 6 日庆祝中央《九五命令》大游行后，又于 9 月 10 日签订了《关于坚决执行中央“九·五”命令的若干措施的协议》。《协议》就存在的抢劫武器、打、砸、抢、抓、抄，转移军用物资等问题制定出具体措施。吉林省军区政委苏俊禄也代表省军区党委和驻长春部队党委，对部队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后压制“东方红公社”的错误进行了检查。

然而，在此后的一个星期里，长春市依然是枪声不断，有伤有亡。也许双方都知道今后不大可能再让打了，今日不打，更待何时？于是形势骤然又紧张起来。

9 月 13 日，长春市的一些群众组织在长春市百货二商店市政工程处，发生武斗，打伤解放军战士和群众数人。

9 月 13 日至 15 日，一些群众组织又在省建一公司小白楼发生武斗，动用了坦克、六〇炮、炸药和各种枪支，打死 5 人，伤 13 人。在部队劝阻下武斗才停止。

9 月 15 日，长春机车厂“红联会”和“长铁分社”的一些人在机车厂白楼前持枪拦劫市委党校拉地瓜的汽车。开枪打死车上人员两名，打成重伤致残 6 人，其中有一名解放军战士，抢走汽车一辆。还有一些人在铁北二路拦截市木材公司汽车，开枪打死车上群众。

这天上午 10 时多，长春师范学院枪声大作，坦克学校“造大”组织的坦克开进来了，高射机枪横扫过去。教学楼里有同学跑出来，其中也有坦克学校的学员，他们拿枪冲了上去。只听到一声巨大的爆炸声，枪声停了，坦克瘫了，有几个同学背着一名伤员下来。

受伤的是坦克学校的一名学员，叫董尚才。他的左肩衣服上有个洞，上有不多的血渍。他昏迷不醒，脸色灰黄，身子瘫软，裤子被尿湿了一片。大家都忙乱的说：“快，快，送医院去。”

大家慌乱的把他抬上一辆军用吉普车到医院去了。那辆坦克就停在教学楼前的马路上，枪声再也没有响起。那天，天气非常好。太阳暖暖的照在身上，而人们的心里却阵阵的发寒。

11 时多，有人接到医院打来的电话，董尚才死了。他受的是贯穿伤，高射机枪的子弹从他的左肩斜斜的射进身体，从后腰穿出。血都流在了他的胸腔和腹腔里。听到这个消息，大家的心如刀绞的一般：刚刚还生龙活虎，转眼间阴阳两世，很多人的泪水不由自主的流下来，女同学更是痛哭失声。董尚才的女朋友下午才到，听到这个消息哭得死去活来。

师范学院的变压器被高射击枪打穿了，变压器油漏了一地。不知是谁找来一位老电工抢修，他说：“修不上啊，变压器油特别贵，刚解放都是进口的，偷变压器油犯死罪，你们武斗，破坏了多少东西呀……”说着说着，老人流下泪来。

9 月 17 日，长春铁路两派组织因武斗严重对立，铁路指挥

系统不灵造成长春铁路分局管辖地区铁路运输全部中断。

9月18日，在长春火车站一带对射了好几天的两派武装力量，在机车厂医院的小白楼发生激战，整整打了一夜。双方动用了迫击炮、步话机等装备。“红二”方面的攻势很凶猛，“长春公社”长铁分社奋力抗击，所幸撤离及时，伤亡还不太大。小白楼药房和堆在楼外的铁路枕木中弹失火，火光冲天。交战过程中，医院1、2、3号楼与站前三轮车社、物资管理所、铁路售票处、站前饭店等公用设施，还有数十间民房先后燃起大火。一夜之间，共炸毁、烧毁建筑物面积11300多平方米，损失价值约100多万元。死28人，伤近百人。这是中央“八一七”批示以后，长春市规模最大、死人最多的武斗事件。

祸不单行。就在同一天，长春市处处烽火，乱兵四出。当天，驻扎在长春百货五商店的“红二”派组织和驻长春饭店的“公社”派组织也发生开枪武斗，枪炮互射，烧毁了长春饭店的粮食仓库、档案室、财会室和三楼独身宿舍。

这一天，长春市百货二商店六楼突然起火。大火烧了3个小时。将楼内存放的服装、高级呢绒、毛料等物品全部烧毁，损失近100万元。

晚上23时30分，长春市玻璃拉管厂发生严重火灾，烧毁厂房600多平方米，设备全毁。起火原因不明。

其中最为令人丧胆的，是“站前旅社”一战。起因是9月17日，“公社派”突然攻打朝鲜族中学和四中，5名学生死，多

人伤，朝鲜族中学学生宿舍全部被烧毁。“二总部”的学生群情激愤，他们的常委找到“红革会”总部，要求联合出兵，攻打“公社派”，为战友报仇。于是“红二”调集大批兵力汇集在火车站，欲剿灭“长春公社长铁分社”武装力量。

1967 年 9 月 18 日，这一天是中华民族的“国耻日”，长春车站的枪炮声却冲淡了人们的记忆。

这天的 0 时整，大喇叭播出威武、雄壮的《骑兵进行曲》，这是“二总部”进攻的信号，于是步枪、机关枪从国际旅社楼内和假山、铁路分局大楼、16 军招待所向“东方红公社”的驻地市委 1 号、2 号招待所以及相连的站前旅社、人民旅社冰雹般发射出去，还有从军区招待所楼顶发出的 60 炮，哒哒哒，轰隆隆，枪炮声四起……

对方毫不示弱，步枪、机关枪、手榴弹发威，向“红二”阵地还击，枪声四起，火光冲向天空……

打了一夜的枪炮声在上午达到了高潮，站在斯大林大街上，就能看到两公里半之外的车站上空浓烟滚滚，铺天盖地。

占据长春站前广场铁路局大厦的“红二”派以楼坚兵器利之优势，与据守广场另一侧站前旅社的“公社”派，展开猛烈枪战。

“红二”前线指挥部下令发动攻击。前面数十人匍匐前进，后面的机枪对“公社”派的窗口射击，企图压住对方的火力。但当前头队伍站起来扑向窗口时，突然遭到迎头射击。十余人倒在血泊中，有人还高喊着“毛主席万岁！”

……

“红二”这次攻击，“公社派”死了 4 人，其中包括“公社”一把手张原堂。他正在窗口指挥还击，偏巧在闪过窗口时被步枪射中身亡。司令倒下了，人们非常悲恸，人心也开始浮动、涣散。前边不少人抱着枪退下来，坐在楼中间的天井内。“公社”东北师大“教大主义兵”头头王维斌见状，赶紧重新部署，让胆小的人上二楼，打开窗户蹲下来迷惑对方以为无人把守。另安排得力干将守住一楼。

哒哒哒，枪声四起。火光！冲天的火光！

“红二”老卞从机械厂调来十几只炸药包，由各厂征集 10 人组成敢死队。18 日傍晚，“红二”集中国际旅行社楼上和假山的火力，向对面强力射击，压住对方的火力，同时由第一梯队 3 人越墙边跑边匍匐前进。其中两人受伤，一人虽受轻伤，却跑到了对方的墙下，点燃炸药包，一声巨响，炸开一个大洞口。接着应该是发动后续队伍发起冲击。然而，前线指挥人员不知道对方里面虚实，意见不一，举棋不定，未敢轻举妄动

“坏了！”王维斌叫道，“快上人用面袋子堵上！”

一些人吓坏了，不敢动，生怕对方冲上来。也有不怕死的，带上几个人扛上面袋子冲过去将洞口堵上。

武斗持续了 3 天，“红二”前线总指挥部看到久攻不下对方，而且伤亡惨重，作战室的人开始研究新的对策。有人提出，他们从部队抢来一些火箭弹，不如以此催毁敌方。

总指挥孙向东开始犹豫，这样虽然能取得功效，但毁灭性太大，后果不堪设想，将来追究起来由谁来承担难以想象的责任？……

就在总指挥部举棋不定时，不知谁假传圣旨，偷偷将火箭弹调到前线，还从长春地质学院调来训练有素的女民兵炮手，她在文革前参加民兵训练时已练就了一整套精湛的实战射击技术，此时施展于这场史无前例的人民战争中。

19 日下午 15 时许，《骑兵进行曲》又从高音喇叭响起来。嗵嗵嗵……一只只火箭弹射向对面楼顶，只见楼顶燃起大火，市1、2 号招待所，站前旅社，人民旅社，大众旅社火光腾起，带着滚滚浓烟，形成一片火海……“红二”他们以日本建筑的钢筋水泥大厦为炮台，将多日攻克不下的欧洲哥特式旅馆大楼从顶层到底层，一阵暴风骤雨式的炮弹轰击，七零八落地打成了废墟。接着木制结构的房架开始坍塌……呼喊声哭叫声与房屋的倒塌声响成一片……

“站前旅社”这个历史上有名的“悦来客栈”化为一堆瓦砾，从此在长春消失。40 多人在混战中死亡，当地居民有 200 余人受伤。

王维斌看到大势已去，不可据守，立即组织人突围。他们还剩下四、五百人，多数是“教大主义兵”的女同学……多亏了“长春公社”长铁分局的“火车头战斗队”，他们是一个整营的退伍兵，从18日夜里就潜伏在火车站内的铁路线上。车站对面有两座

面粉厂，那里有“红二”武装人员面对铁路设防。当“东方红公社”突围被“红二”追击时，“火车头战斗队”乘机夺了东一条路口的三轮车社。然后这支队伍撤离三轮车社，跑到站前广场，按一定距离散开，大约10米排成一列，蹲在地上，端起全自动步枪向“红二”火力点射击，同时命令“东方红公社”突围出来的那四、五百人从后面火车站候车室边撤离，让他们聚集在事先安排好的站台内的列车上……

9 月 20 日，又发生了“长春公社”为了替“东方红公社”报仇，发动了攻打铁路局大楼以及货场燃起大火事件。幸亏解放军派出部队，将大火扑灭，否则火势蔓延开来，援越物资爆炸，将殃及半个长春市。

武斗后，人们从四面八方不断拥到火车站前，争睹战场遗址。

此时站前，横亘东西的长白路东侧几乎看不到完整的建筑，触目是一片断壁残垣。一根水泥电线杆的上方挨了一炮，只有裸露的钢筋相连，仍然倔强地竖立着。空气里弥漫着硝磺和焦烟的气味，一些当地住户在瓦砾堆里捡拾破烂儿，寻找旧物。人声嘈杂，满目凄凉。

这一天，两派的广播站不断地播送配着哀乐的讣告，并反复播放着大型舞蹈史诗《东方红》中的歌曲“告别”，那熟悉的旋律，肃杀的气氛，令许多人终生难忘，刻骨铭心。在一处断壁上，贴着一首悼念“死难烈士”的诗，是写给一位女性的：

“火海昂首立英雄，壮士虽死志未终。墙外桃花墙内血，映

得万片秋叶红。”

诗歌的作者或许是同她一起经过了这 3 天劫难的幸存者，或许是她的亲朋好友，无论是谁，都要承受这一瞬间的生离死别，蒙受永久的伤痛。九月深秋，正是枫叶红透的日子，北国春城的荒郊野陌，不幸又多了几处坟茔。

长春的武斗引起党中央的关注。9月22日，中央决定长春、吉林、四平驻军和各派群众组织即派代表，连同阮泊生、兰干亭等领导干部一起赴京听取中央指示，协商拥军爱民、制止武斗恢复生产等问题。

当天，周恩来通过驻长春三军针对长春武斗做出 3 点指示：

1、立即停止武斗，封存上交武器、装备和各种军用物资，恢复生产、交通和社会秩序；

2、到京代表一定要带着无产阶级党性来，不要带着小资产阶级派性来；

3、各群众组织在代表协商期间，任何一方不得挑起武斗，破坏生产和交通。凡违反者必须追究责任。代表到京主要是达成协议，不是吵架。

22 日当天，长春卫戍司令部发出《关于立即停火和封存、收交武器的规定》。在高压态势下，“红二”自知已经踏到了底线上，不敢再过分了。“公社”也知道动武占不了便宜，又没处申冤，也不想打了。9 月 25 日，已经组成好的长春市赴京代表团，发出了紧急倡议，要求两派群众立即全面无条件停火，立即就地封

存武器、弹药、装备和物资，由长春卫戍区司令部收缴。

9 月 27 日，长春驻军趁热打铁，召集“长春公社”、“省东方红公社”、“红革会”、“二总部”的代表开会，研究上交武器，庆祝国庆节和释放双方被抓人员等问题。

# 文革史话

## 之第三部 全面内战 第十二卷

刘朝驹 著

# 文□史话

之

第三部

# 全□内战

第十二卷

# 目 录

第 895 回：批登山，西藏周仁山失□　拉萨乱，中央下五□指示 ..... 1
第 896 回：说□宁，二七年少奇被捕　□国庆，广州各派□交枪 .....11
第 897 回：到武汉，毛泽东接见曾、刘　回北京，□河南见刘王纪.....25
第 898 回：第七次，见广西两派代表　促联合，双方表态□赞成 .....36
第 899 回：杨成武，军委办事组组□　见主席，“英□□去不自由”.....48
第 900 回：第八次，接见天津代表团　□□动，山城内□来和平 .....58
第 901 回：□山头，广州市形势和缓　说东北，春桥谈江苏□□ .....69
第 902 回：要联合，张春桥保许世友　□路□，无□“主力军”回家.....78
第 903 回：淮北市，发生“九二九事件”　俩书记，被学生拷打致死.....87
第 904 回：毛泽东，天安□见许世友　谈文□，请外宾参观淮南 .....99
第 905 回：爆内幕，档案□有□材料　群情愤，南京军区再□反 .....110
第 906 回：为九五，太原“红联站”抗争　下□知，督促知□回农村.....122
第 907 回：出新词，湖南“湘派”反倒旗　在江城，外宾与群众座谈.....134
第 908 回：周恩来，武汉见湖南代表　批极“左”，□反派不要□傲.....151
第 909 回：离武汉，再叮嘱要大联合　□为继，“省无联”终未成立.....164
第 910 回：第一批，北京知□赴内蒙　设专案，“中央□常委员会”.....174
第 911 回：□伯□，接见天津“大联筹”　要复课，全国□办学习班.....186
第 912 回：新疆打，□春医大枪声急　外交□，“联络站”□刻瓦解.....199
第 913 回：第三次，康生见宁夏代表　朱声□，会上继续被揭发 .....208
第 914 回：四、五次，□续见宁夏代表　第十次，接见天津代表团.....217
第 915 回：王必成，接见军区“平反组”　林维先，□先志先后接待.....226
第 916 回：尘埃定，新时代狂人收监　第五次，接见安徽省代表 .....235
第 917 回：“□□峡”，第六次接见宁夏　□批示，林彪见湖南□原.....245
第 918 回：作调整，专案组“二办”成立　见河北，清华毕业生离校.....257
第 919 回：外交□，周恩来谈“五一六”　说□路，党组织恢复活动.....268
第 920 回：山头在，□庆□□全平□　枪声响，一〇二七大血案 .....277

第 921 回：内蒙古，成立□命委员会　五羊城，知□炸碎联合梦 .....289
第 922 回：第六次，接见安徽代表团　揪□手，实现□命大联合 .....298
第 923 回：□爱晶，带枪来到大会堂　谈“整党”，杨成武发表文章.....310
第 924 回：梁兴初，□庆接见反到底　在山城，参加“八一五”活动.....320
第 925 回：查真相，中央档案□□档　竟发生，“核心机密”盗窃案.....334
第 926 回：谈□路，开封化肥厂解围　说清楚，罗瑞卿入党□□ .....343
第 927 回：外交□，大使贴出大字报　查少奇，恩来见广东代表 .....355
第 928 回：周恩来，接见桂联指代表　江西省，做好极“左”派工作.....365
第 929 回：北京市，掀上山下乡热潮　周恩来，接见江苏省代表 .....375
第 930 回：告破案，“中央□常委员会”　第八次，接见广西代表团.....391
第 931 回：说浙江，再接见桂、□代表　看徐州，□□江实现联合.....400
第 932 回：刘少奇，专案又有新证据　见□州, 北京座谈议“整党”.....413
第 933 回：中学生，当场写赴滇报告　下云南，知□“北京五十五”.....424
第 934 回：林彪提，“大海航行□舵手”见□州，外交□联合执政.....434
第 935 回：尽朝晖，天津□委会成立　董□平，再揭刘少奇□□ .....444
第 936 回：山西打，召开十二月会议　许世友，同意军区作检讨 .....454
第 937 回：周恩来，与江苏六市会谈　谣言□，广州市供应紧张 .....466
第 938 回：清华园，“四一四战歌”□波　周培源，新北大深夜抄家.....476
第 939 回：周恩来，接见东三省代表　□□江，代表团□回冰城 .....487
第 940 回：云南乱，炮八两派打成团　四二二，又□□广西军区 .....498
第 941 回：中央见，云南□军众□导　止武斗，□□□先要统一 .....508
第 942 回：周恩来，见□路、南京代表　与党校，康生谈“绝对权威”.....521
第 943 回：求支援，《湖北日报》又被封　免公粮，王仁舟廉价政府.....536
第 944 回：孟用潜，揭发刘少奇叛变　反刘、张，山城内武斗□□.....546

## 第 895 回：批登山，西藏周仁山失□　拉萨乱，中央下五□指示

9月16日，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外宾后，与外交部刘祥伦等人谈陈毅问题。他说：

“陈毅是有严重错误，亚非会议上有严重错误，对阿尔及利亚问题有严重错误，他认为是革命的，我说是政变，他还说是革命的。他随刘少奇出访，刘少奇是典型的三降一灭，他也会有错误。一月份让他过了关，以后他又发那么大脾气，无怪小将抓住他不放，这个情绪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毛主席说：‘陈毅同志还是要一批二保。’”

“外交部和另外的部就是不一样，陈毅这个部长和别的部长就是不一样，这是关系到国家威信和威望的问题，不是保他个人，不是保他的面子。”

当有人谈到外交部“联络站”25个战斗队、组开会批判王力的问题时，周恩来说：“王力问题不要开会批判了，‘联络站’有问题可以关门整风，外交部要自己搞运动，不要受外界影响。”

9 月 17 日，周恩来又对外交部未经中央同意，擅自处理巴基斯坦外交事务一事，忿忿地批评外交部姚登山等人说：“我怀疑你们是革命还是反革命！……7 月 20 日事情以后，外交部不听话了”。

9月18日下午17时，周恩来接见国务院外事办公室、外交部和对外文委有关领导干部、部（委）业务监督小组代表和群众代表，周恩来在谈话中当面严厉地批评了姚登山，他说：“三降一灭路线对外交工作是有干扰的，但总的说来外交部执行的是毛主

席革命外交路线，毛主席的外交路线的三个部分都执行了嘛。姚登山你在这里，我要再讲一遍：你在对外斗争时是英勇的，我对你的估价是足够的了，是我把你派出国的，你回来我去接你了，我又推荐给毛主席接见了，报上还登了照片。不料你却昏昏然了。结果你干扰了外交部。你不仅到外贸部，到第一、第二外语学院作报告，而且到处作报告，个人主义膨胀了。你是司级干部，你尽管对我说你承认错误，要检讨，但你没有认识错误。”

周恩来接着说：“国庆节要放映一批电影，戚本禹同志问我，主席接见姚登山的那部新闻纪录片能不能放，我说电影还是照样放嘛。国庆节快到了，今天已经是18号了，中央文革同我谈到，不抓不行了。今天这个会本来不打算开的，但国庆快到了，外交活动又多起来了，不把政策掌握好怎么行呢？我告诉你，姚登山！你的话比我灵，这点我懂得。中央文革，特别是康生同志提过你。”

外交部“联络站”的人说：“有些事，姚登山是不知道的。”

周恩来：“你们是一般干部，你们年轻，他是参加部领导的，指的是旧的部领导，不是三结合，不应该这样发热嘛！那天（指8月27日）上午，我接见外交部‘联络站’等组织的代表时，他们逼我到了这个情况，你坐在一边，一句话也不吭。我的病发作，手都打哆嗦。我的医生都看不惯了，要造你的反了。你一点阶级感情都没有了，我对你是有阶级感情的。许多同志看见都非常气愤，你就没有感觉，处之泰然，奇怪！”

谈到“516兵团”时，周恩来说：“‘516’问题，‘九·一’讲话谈到了，3号《人民日报》报道了，姚文元同志的文章发表后就更清楚了。‘516兵团’反对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是个

反动的阴谋小集团，没有什么了不起，没有多少人。它拉一些本来就不存在的关系，好像自己的组织了不起。只要群众觉悟了，就可以把自己的头头抓起来。说什么八个方面军，神乎其神，吓唬人的。里边有黑线牵着，目的首先是动摇和削弱以毛主席为首的司令部，拿反对我做幌子，收集我的材料。我在法国入党，在黄埔军校工作……40多年不知说过多少话，不同时代有不同的情况，把不同时期的话罗列起来，也可以形成材料！这怎么行呢？”

周恩来接着说：“外语学院的‘六·一六’拿了龚澎的日记，就是不交出来，这不对嘛！如果他们交出来，我还是可以见他们的。他们还抄了乔冠华的家，打了他几拳。‘六·一六’我还是把它摆在善意范围里的嘛。连刘令凯我也打电话给谢副总理，要释放他嘛。其实我早就批了嘛！有文字根据嘛！这是巧合。结果他们说我是听了他们的勒令才放的，没有到48小时就放了。”

“‘516’所谓地方军，即第八方面军，只有长沙一地，没有多少人，没有什么了不起。”

“在这个问题上我要说几点：

（一）抓‘516’不要扩大化，没有多少人。群众是受蒙蔽的，要孤立少数头头嘛。

（二）各单位各组织让受蒙蔽的群众自己抓，对方不要去抓。农大开大会要让秦化龙上大会主席台，我说秦化龙要去我就不去了。后来秦化龙没去，我去了。但发言的人保秦化龙，我就退席了。现在调查，秦化龙可能是个叛徒，与‘516’有关，已被扭送卫戍区了。要按主席思想办，要他们的群众自己划清界限，别的机关和另一派不要压。

（三）过去二月逆流是要批的，陈毅、谭震林还是要继续批。我还是要支持你们的。现在看来陈毅没有插手。现在批陈毅的小会已经开完了，可以联合搞一次大会，限于批判外交政策方面的错误嘛，别的单位不参加。大的联络站今后要逐渐取消。大联络站增加派性，影响党性。

（四）推动一个学校、一个机关掌握毛泽东思想，紧跟毛主席的战略部署；进行革命的大批判，结合本单位斗批改，实现革命的大联合、三结合，特别是通过批判‘516’的极‘左’思潮，促进大联合，而不是促退联合。

以上这几条对外交部和对外文委都适用。国庆节有繁重的任务，你们要批判极‘左’思潮的影响，也要防止右倾机会主义，好好学习毛主席在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和列宁关于‘左’倾幼稚病这篇文章。”

说了外交部，我们再看此时的西藏。西藏拉萨的两大派“大联指”和“造总”，这时也都在拉萨市占据自己的势力范围和控制地区。“大联指”总部设在城北西藏自治区党委大院，附近一带党、政机关和单位也就成为他们势力控制范围。而“造总”的总部设在布达拉宫下的总工会大院内，下属组织主要分布城东岳王山一带，因而这些地区也就成为了他们的势力控制范围。而拉萨城中心区老街、大昭寺、八角街一带，是双方都可以自由活动的“游击区”，两大派宣传不同观点的大标语，在这里到处可见。

拉萨两大派的最大分歧点，就是对待西藏自治区第一副主席周仁山的态度截然相反。“大联指”坚决要打倒周仁山，说他历史上是叛徒，现实的问题是在西藏执行了刘、邓修正主义路线，

有许多“三反”言行；而“造总”坚决要“保”周仁山，说他历史上有问题是无根据的诬告，在西藏 10 多年的工作是经受得起检验的，与刘、邓修正主义路线还曾有过斗争，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在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时，他就旗帜鲜明、态度明朗地一再表态支持革命造反派的造反行动，反对军队支左过程中亲一派疏一派的做法。两大派从观点的分歧、文字的攻击，进而发展至对周仁山本身的争夺。“大联指”发出布告，勒令周仁山何日何时到会接受革命群众的批斗，交代自己的“三反”罪行；“造总”闻讯，立刻发出邀请，欢迎周仁山何时何日到会，与革命群众共商搞好西藏地区的文化大革命问题。两派都是革命群众组织，周仁山无所适从，只好一时到会接受批斗，一时又到会接受欢迎。从周仁山的本意讲，他对“大联指”的揭发、批判，是抱着异常反感的态度的，从内心的感情讲，是倾向、支持“造总”的。在两派争夺到一定时候之后，“造总”采取了断然的措施，将周仁山接到总部，安排在一个秘密的住所。对此，“大联指”当然立即做出反应，上纲上线，指责“造总”不讲革命原则，居然保护“走资派”周仁山，堕落到与“走资派”同流合污的地步。

周仁山在“造总”总部一连住了 10 多天，“大联指”的攻击没有发生任何效用，于是他们准备采取断然行动，上门把周仁山抢过来。拉萨支左办公室闻讯，立即前往两派做工作，希望“造总”不要再挽留周仁山，尽快把他送回自治区政府，同时也做“大联指”工作，劝他们不要兴师动众到“造总”总部抢夺周仁山，以致发生冲突，酿成武斗。

不料，事不过两天，“造总”突然向外公开宣布，自治区第

一副主席周仁山已离开“造总”总部，不知去向，而且，还欢迎支左办公室派人到总部搜查。

周仁山去哪了？自治区第一副主席一夜之间突然失踪，上下震惊，西藏军区向中央发电报告情况，正在成都军区的西藏党委第一书记张国华，发电告之在家坚持工作的西藏军区政委任荣，嘱他一定要想法尽快找到周仁山。

周仁山如此失踪，“大联指”对“造总”指责的言词更为激烈，说“造总”在周仁山的问题上越走越远，已滑到了“保皇派”的边沿，如果再不交代出周仁山的下落，找回周仁山，将无法弥补自己的过失，取信于西藏百万农奴。

一时间，周仁山突然失踪消息，通过群众组织自办小报的传播，成为全自治区的头条新闻，家喻户晓。支左部队派人四处寻找，一时都未找到下落，判断可能已远离拉萨，逃躲他乡。

就在这四处找寻、下落不明之时，西藏军区突然接到张国华经成都军区发来的一份电报，这份电报是主发中央，同时抄送西藏军区的。电报以简短的文字告之：成都军区接兰州军区来电告诉，周仁山已在青海某县农村找到，准备派人护送到成都军区。张国华在电文的最后明确表示：周仁山的行为是错误的，请示中央同意，由成都军区派人“护送”回拉萨。

此消息不胫而走，传向社会。

事后得知，周仁山在“造总”总部再无法继续住宿下去之后，由“造总”成员、拉萨汽车运输公司一名驾驶员，驾车将他送到自己的家乡青海某县匿藏。在当时的中国，要想藏一个人是很难的。不久周仁山就被当地民兵发现，报告给上级武装部门，

然后逐级报告至青海省军区、兰州军区。兰州军区接到报告，觉得事关重大，周仁山住宿在农村无人保护，万一发生意外不好办，便立即派人到农村，动员那位驾驶员交出周仁山，护送到兰州军区，并立即将情况电告成都军区。尔后，派出两名干部和两名战士，全副武装，乘火车将周仁山安全“护送”到了成都。

周仁山到达成都后，张国华经请示中央同意，由入川支左不久的部队，派出一名干部和一名战士，乘飞机，将周仁山“护送”回拉萨。

到达拉萨的那天，西藏军区已事先接到通知，下命令要拉萨警备区做好“迎接”的工作，绝对保守秘密。因拉萨贡呷机场至拉萨城区还有 100 多公里的路程，几乎与成都至拉萨乘坐飞机的时间相等，万一在路途中发生意外，事情就很难办了。拉萨警备区在接受任务后，除做好保密工作之外，还采取了严密的防范措施。他们派出了 13 辆汽车，在前后各 6 辆大卡车上，隐蔽地坐着全副武装的战士，“护送”中间的第 7 辆小卧车，周仁山下飞机之后，就被安排坐这辆小卧车上。

周仁山乘机到达拉萨，走下了飞机弦梯，面对如此浩荡的队伍迎接，心里惴惴不安，神情透出惶恐、焦灼，不知以后会遇到什么不测，一路不停地向车窗外张望。

“迎接”周仁山的车队，一路平安地驶达拉萨城区，然后直接驶向西藏自治区区工委所在地，周仁山就暂住宿在这里。他的住地，有警备区派出的武装人员严密守卫，这是西藏军区防备他返回拉萨后发生意外而采取的“保护”措施。这时的周仁山，受到部队武装人员的“保护”不再担惊受怕被造反派揪斗，他承

认：

“作为一省的领导，未经请示中央和征得自治区区工委其他领导同志的意见，就私自外出到青海农村，这种做法的确是不妥当的。但是，也不能不考虑现在是开展运动期间的这个特殊情况。我住宿在‘造总’总部，也是身不由己啊！听说两派为争夺我，可能会发生武斗，造成无谓的伤亡，左思右想，还是暂时离开拉萨躲避一下，或许还是一个上策，因此也就同意‘造总’那么做了。要说有错，不在‘造总’，而在我。”

对周仁山私自逃奔青海躲避的行为，“大联指”上纲上线说，这“好比战士在战场上临阵脱逃”，声言“看他今日的逃跑，就知他昔日的叛变”，“警告周仁山妄想蒙混过关！”

“造总”虽然对将周仁山“护送”回拉萨的做法不作任何辩护，但对周仁山的态度，仍然不放弃原有的看法，认为他还是革命领导干部，应该加以保护，不能一逼再逼，将他推向对立面。

“造总”派占据拉萨市区一些重要据点、武斗区域，在一些城市中也声势颇威；“大联指”派在拉萨市区和西藏一些主要城市略具下风，但在西藏广大农牧地区却颇有影响，号称要“走毛主席指引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并对“造总”派占据优势的城市实行包围和经济封锁，断绝交通运输，实行“饿杀”政策。

1967 年 8 月下旬起，西藏“大联指”派在各地对“造总”派实行经济封锁，断绝交通。“造总”依靠外地赴藏造反组织的支援，从外地调运粮食和其他生活必需品。其间，青海“八·一八红卫兵战斗队”和首都红卫兵赴藏造反组织，为“造总”购进

的一批粮食，在西藏堆龙德庆县境内被“大联指”派拦截。

9 月 6 日，“造总”派出 80 多人，驱车到堆龙德庆县抢运被扣留的粮食。“大联指”组织 1000 多藏族农牧民，埋伏在公路两旁，用牛毛鞭猛甩石头，袭击返回的粮车，并将没有冲出去的粮车包围起来进行猛攻。

武斗中，“造总”有 7 人死亡，其中有 2 名青海“八·一八红卫兵，20 余人重伤。随粮食车队进藏的 11 名“首都中学红代会”人员中，7 人重伤入院。“大联指”的伤亡人数不详。“造总”的运粮车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坏。

9 月 15 日早晨，“造总二司”应公路工程局第二工程队、公路管理局曲水养路段及曲水县委机关“造总”派的要求，派出全副武装的 90 余人，携带冲锋枪、机枪等武器，以 20 多辆卡车组成车队，驱车到曲水县，要接应“造总”派在该地的武斗人员回拉萨。

拉萨“大联指”得知此信，立即通知了“大联指”曲水县指挥部。

该县“大联指”头头立即调兵遣将，要“全歼敌人”。为此，他们声称“造总”要到曲水枪粮杀人，以发补助、记工分的手段，组织不明真相的农牧民武斗人员，主要使用炸药包，仿效电影《地雷战》，在“造总”派车队返回的公路上埋设地雷，在拉萨通向曲水的公路上设置重重路障，修筑工事。还动用了少量步枪、半自动步枪、冲锋枪、手榴弹等武器，伏击“造总”人员。

“造总”车队在返回拉萨途中，在多处遭到伏击，虽经奋力还击，然仍处下风，损失惨重。

直到 16 日下午，拉萨军管会派出的解放军战士，才救出被围困和关押的“造总”成员，并将他们送回拉萨。

9 月 18 日晚上 20 时 24 分到 23 时 30 分，周总理、伯达、康生、江青、富治、文元、法宪，接见了西藏军区任荣、陈明义、张鹤田和苗丕一、周仁山等人。在向中央首长汇报了西藏文化大革命的问题后，中央对西藏问题作出“关于制止西藏武斗的五项指示”：

一、会议听取两派情况的全面汇报以后，中央认为：造总、大联指均定为群众组织，以便实现大批判、大联合。两派的性质暂不下文字的东西。

二、拉萨各派组织，必须马上停止武斗，不准调农牧民进城，立即恢复交通运输，抓革命促生产、促战备、促工作，认真学习中央文件、江青等同志讲话和报纸的社论，这些是对各革命群众组织的考验。

三、要防止挑拨离间，调拨民族关系。

四、报纸是传达毛主席和党中央声音的。

五、如何做得好，这是对各革命群众组织的考验，还有一点要向造总同志传达的，“专打”不能定为群众组织、中央认为它是有错误的。

中共中央

一九六七年九月十八日

## 第 896 回：说□宁，二七年少奇被捕　□国庆，广州各派□交枪

9 月 19 日下午 18 时 20 分至 21 时，周恩来、康生在人民大会堂安徽厅接见辽宁各地代表。宋任穷、陈锡联参加。周恩来说："邀请代表来京，是协商解决当地文化大革命问题。两派协商，不叫谈判，和谁谈判？两派都是革命的，不是敌对关系，是平等协商。"他要求辽宁各派群众组织：在国庆节前上缴、封存武器，拆除武斗工事，停止武斗，坐下来协商达成一个停止武斗的协议。他责令 9 月 25 日前一定上缴武器。接着，周恩来又一个市、一个市地查问辽宁各地群众组织各有多少武器，什么时间上缴完毕，要大家逐个表态，一一落实。

当点到锦州"糟字派"的首席代表张连庆时，张连庆回答说："总理，'锦联筹'破坏抓革命，促生产，造成多次停车事件，我们在 XX 小时之内连续发出 XX 次列车，坚持抓革命，促生产。"

周恩来说："就应该抓革命，促生产嘛！"

这时"好字派"代表发言说："他们反对解放军，把军管会的牌子给砸了。"

周恩来问张连庆有这事吗，张连庆回答说"有"。

周恩来说："这就不好了，要支持军管。"他告诉军代表说："牌子砸了再立上。立的时候不要敲锣打鼓，不要让另一派去，不要对这一派搞刺激。"同时告诫张连庆："不许再砸了，再砸要拿你是问！"

接着“好字派”的代表说：“铁路‘糟字派’还把军代表给扣押了。”

周恩来问张连庆有无此事，未等他回答，军代表站起来说：“今天我们有两名同志去他们那里，到现在还没回来。”

张连庆忙说：“总理，这事我们确实不知道，我们打电话问一下，果真有这事，我们一定要让家里放人”

这时，“好字派”代表说：“他们装不知道。”

周恩来说：“好了，不要添油加醋了，各自多作自我批评嘛。”接着他对军代表说：“他们答应放回来，你们可以放心。”又对张连庆说：“我告诉你们，要支持军管，群众组织没权抓人、扣人，以后再有类似问题发生，我要冲你说！”

周恩来说：“抓人是非法绑架，要立即放人。”“各地未经中央批准的临时革命委员会，没经《人民日报》公布的，中央一律不承认，军队参加临时革委会的要撤出来” 。并对陈锡联说：“要撤出来，不撤就被动。”

第二天，在京的锦州两派代表和军代表就在西苑旅社，由总理联络员杨岚生主持协商数日，于 9 月 23 日签订了《立即上缴武器，拆除武斗工事，停止武斗的协议》，简称《九.二三协议》。这个协议的签订，为两派群众组织的大联合创造了一个平等、协商，求大同、存小异的和平环境。通过几天工作，锦州各派的武器绝大部分上缴，部分武斗工事拆除，形势很快缓和下来。

9 月 19 日，时任武汉哲学研究所副所长的董锄平为中央专

案组写下了如下证明：

刘少奇一九二七年在武汉的罪行

刘少奇调走工会骨干。刘少奇替国民党缴去工人纠察队武装，甚至连劳动童子团的木棍也收缴了。随即将工会党员骨干四五十人调离武汉，令调新人接替工会工作。刘当时说："这是保存党的力量"，实质是适应汪精卫的需要。因这些被调离的党员骨干，都有社会基础，如码头总工会的张计储等同志，完全可转入地下，继续同蒋汪匪帮作斗争。一调走，显然是为了减弱工会的力量，调来的新人，人地不熟，无法开展斗争，如店总的赵敏就被牺牲，刘少奇一箭双雕之计甚毒。

刘少奇在革命紧要关头潜入庐山。刘在汪精卫"七·一五"叛变前，我看到他身体很健壮，决没有病。刘在庐山"养病"，住在大军阀朱培德的公馆，显然是有政治阴谋，与汪精卫党羽进行政治勾当。

董锄平一九六七年九月十九日

董锄平 1927 年任湖北省总工会执行委员、武汉店员工会委员长。他后来在 1968 年冬被抓，1969 年 3 月 22 日病逝于武汉第二医院。

刘少奇的专案小组得到董锄平的亲笔供词后即着手取证，证实刘少奇等人是在 1927 年 6 月 28 日晚在武汉被公开逮捕。

1927 年 6 月 29 日，汉口的法租界巡捕房给总领事的信中是这样写的：

法租界巡捕房

第六十六号一九二七年六月廿九日于汉口

法国总理事先生

汉口

总理事先生：

昨晚近二十时三十分，一支由汉口卫戍司令部一名军官率领的巡逻队来到友益街。在他们到达的时候，原先在那里的罢工纠察队员丢下武器，逃走了。巡逻队的指挥官在总工会办公处逮捕了该会的几个重要成员并解送武昌。其中有：

向忠发总工会主席

刘少奇第一书记

许白昊第二书记

项英湖北罢工纠察队总队长

刘少华、关明轩码头工会执行委员会委员

近五夜时，军事委员会举行会议，出席的有：邓演达、鲍罗廷、汪精卫、谭延□、程潜以及冯玉祥元帅的一名代表。

会后，约凌晨二时，冯玉祥元帅的代表刘骥将军去友益街进行视察。

向忠发于今日白天返回总工会；在总工会，他可能为汉口保安局的士兵和武装便衣人员所监视，其生命作为本地区当前安宁和各工会执行地方政府命令的担保。

上述其他被捕人员没有回总工会。

现附去张贴在总工会门口的中文布告的译文。

中国地界内各工会的主要办公处都已军事看管。

戴孟若

6 月 29 日上午，武汉工人纠察队的枪支弹药全部交给了国民党管理武汉卫戍事宜办事处。

当天国民党中央的会议上，汪精卫是这样说的："军事委员会得到了总工会自己缴械的消息也很觉得奇怪。还有，昨天十二点江琴同志来了一个电话，说三十五军有人到总工会去要房子。当时本就打电话到卫戍司令部去问，李军长回电说没有这回事。到了今天，全国总工会李立三同志来报告，说全国总工会被李军长派了一机关枪连的人占了。同时，全省总工会刘少奇同志又来报告，说全省总工会要请卫戍司令部派四、五个兵去保护他们。大概是全国总工会同全省总工会弄混淆了。所以引出了李立三同志所报告的事。但保护并不要一机关枪连，几个人就够了，也不要在门口守卫，在附近的地方就是。"

我们再说此时的广州。虽然在周恩来而直接干预下，广州各派签署了《制止武斗四项协议》，并于 9 月 10 日又做出《关于限期交还一切枪支、弹药和军用装备的决定》。但是，9 月 12 日凌晨，在轻工模具厂又发生了一起武斗，动用了轻重机枪、大炮、装甲车，大楼被轰至千疮百孔。45 中学生许建昌被打死。

这场武斗是由"地总"攻打"工联"二总部引起的。为了应对之前广州武斗形势的需要，广州"工联"一号勤务员卢宗谟将

“工联”勤务组部分人组成了一个二总部，以防止“工联”总部被包围或有意外时，“工联”整体不至瘫痪。这个“二总部”就设在轻工模具厂内。当“地总”攻打轻工模具厂时，卢宗谟正在二总部。负责保卫“工联”总部的“工联警备团”找到卢宗谟闹，要求启封武器，卢宗谟坚决不同意。他还给“中山大学八三一”的“红联”作战部副部长黄意坚打电话，告他无论如何要稳住，不要还击。

而此时，与轻工模具厂隔江相望的爱群大厦是被“旗派”的“八一战斗兵团”占据，他们已在爱群大厦架起机关炮，封锁“地总”在珠江的船只，并请示“红联”作战部是否还击？“红联”作战部部长卢良雅和副部长黄意坚立即派“八一战斗兵团”勤务组成员、时任“红联”参谋部参谋的骆昌立去爱群大厦，传达卢宗谟意見，不准还击。

一天后，9月13日凌晨，“地总”和“郊贫联”一万多人冲占广州军区大院，执意召开大会，并举行静坐请愿。

他们之所以这样做，据说是为了扩大自己的影响。在此之前，为了迎接中央调查团的到来，“地总”还散发了一份关于《实现周总理八·二二4项指示的紧急倡议》，敦促广州军区出面维持社会秩序。

如果说几个月前，这静坐请愿还可能是一次革命行动，但时移势易，此时还这样做，就弄巧成拙了。当天早上5时，周恩来就在北京接见广州地区两县一区“郊贫联”赴京代表时，批评他

们这样做是违犯了《九五命令》，要求他们：

“打电话回去通知广州，1、不要开大会，《九五命令》发表后，发生武斗是不对的，刚刚发生武斗，你们又开大会，这样容易引起更大规模的武斗。2、把留在军区警卫营大院内的贫下中农劝回去，前天武斗打伤打死180多人，都是阶级兄弟。这些事中央调查组和广州军区是会弄清楚的，也是会正确处理的，目前不仅你们要撤出来，也要‘地总’的人撤，在回去的路上，要再发生武斗，由军区做工作，‘郊贫联’的同志可以从东山绕回去。”

经中央调查组和军区领导与“东风派”代表商定，“东风派”的“地总”和“郊贫联”，从9月14日中午开始撤出军区大院。广州军区领导一再指示：为了保证安全，军管会系统要做好具体布置，此事关系重大，务必十分重视，特别要做好造反派的工作。

但是，“东风派”从军区大院撤出后，又有一部分移师到省军管会继续请愿。

9月15日，周恩来再次接见广州地区代表，严厉批评“地总”不听劝阻，执意召开大会，到军区静坐，要求他们在9月15日中午12时之前退出军区大院。他强调指出：“要增强党性，不要搞派性，这是目前的大方向。广州的秩序必须尽快恢复，以便抓革命，促生产。广州的交易会不能停开！”

然而，此时此刻，广东省军管会内却一片混乱，一场有军队介入的武斗，竟在军管会内发生了。军队内部的分歧，一下子暴

露无遗。

广东省军管会的值班日记这样记录：

这里的东风派准备4点多钟撤走。在准备走之前，三司红旗兵团来了一辆中卡，要开车撞人，后被东风派抓了四人，搜出一支驳壳，一把匕首，两个手榴弹。这四个人交给军管会，东风派很多人很气愤，要揍他们，但很多人说要相信解放军，他们还组织人力手挽手地保护。但5点多钟正要撤退时，四十七军来了两个连队，由于战士任务不明，而且徒步而来，东风派哨卡问他们，他们说“我们是中央部队，任何人无权拦阻。”后来警卫连问他们，他们说警卫连是支保的，混蛋等。他们要抢那四个人。东风派手挽手来挡，挡不住就用手抱他们。他们就用手来打，就引起来武斗。武斗结果，东风派重伤二人，警卫连一人（听说那两个连队也伤两人），挨一般拳头的警卫连十多人。武斗劝止后，就做东风派的工作，他们23点50分开始撤退，到1点05分撤完。

9月17日，广东省军管会留在广州的领导在警备区召开座谈会，研究怎么制止广州地区的武斗。会议决定：“严格执行六.六、九.五命令，今后凡发生武斗使用武器，部队将采取武装包围、宣传、缴械。弄清原因，交出凶手，追查幕后指挥。设现场统一指挥，现场指挥有权批准抓凶手及武装自卫。”

9月19日，中央赴广东调查组要求军管会配合，从现在起到一直到国庆节，做好以下各点：

一、继续收缴枪械、放人；

二、撤掉制高点，交通管好，维持秩序，打扫卫生；

三、各个群众组织要把对方群众组织的人找回来，大家一同闹革命；车、准备设一些关卡，把没有牌照的车收回。

9 月 19 日，广州“地总”匆匆做出《关于上交武器问题的声明》，声称总部的武器已经全部上缴；翌日又发表了交枪公告，宣布全部武器已上交解放军。

在迎接国庆和开好广州交易会的主题下，9 月 20 日，广州地区两派群众组织代表，奉命在北京签订《关于做好广州国庆庆祝活动筹备工作协议》。

9月20日，一份据称是北京中学红代会作战部创办的《北京红卫兵》小报创刊号，转载了一篇署名“星星之火战斗队”的文章：《揪出“五 ·一六”兵团的后台示众！》。文章全文如下：

一提起周总理人们会肃然起敬，尤其是“老”红卫兵对周总理更有无限热爱的感情。

“五·一六”兵团一小撮王八蛋反对周总理罪该万死！

在大学生中“五·一六”兵团有相当一部分实力。并有相当大的思潮。在大学为什么会出现反总理的思潮呢？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周总理最坚定地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和中央文革有相当大的矛盾，那么一贯作为中央文革的应声虫——“大学生”来讲出现反总理的思潮也就不足为怪了。“五·一六”兵团破案之后，中央文革的走卒大学红代会连个屁也没放，中央文革也只不过轻描淡写地说上两句。若不是因为“五·一六”兵团是个秘密

组织，谢富治的公安部也是不会把他们捉起来的。像群众扭送公开反总理分子公安局不要的事情，更是举不胜举，这次“五·一六”兵团的全部释放就更说明了——“五·一六”兵团的黑后台就是中央文革！对于中央文革为了自己不可告人的目的挑动一部分群众炮轰总理的卑劣行径，我“星星之火”全体战士表示极大的愤慨！最后我们提醒中央文革不要一叶碍目不见泰山！

9 月 20 日这天，外交部“联络站”核心组召开外交部大会，姚登山首先做检查。然后“联络站”核心组传达周恩来 9 月 18 日对姚登山的批评。

9月20日晚23时30分至21日2时20分，康生在人民大会堂安徽厅见宁夏军区和宁夏各派组织代表。康生说：“有的人，我现在不说谁，向群众甚至向独立师的战士去制造谣言。利用青铜峡这个事件，有的少数反革命头头，他们失败了还不甘心，他们利用青铜峡这个事件去迷惑群众，说这件事就是康生一个人干的，说康生请示周总理，周总理没有答应，是康生答应开枪的。说康生犯了错误，现在出国了。我不是还在这里吗？这里是中国还是外国？！又说中央问我是否我同意开枪的，我不敢承认，说我是陈再道式的人物，据说还派了江青、陈永贵到宁夏调查去了。还有很多流言蜚语，说张文林撤职了。谁叫张文林？根本不晓得这个人嘛！又说张怀礼副司令员回去了，还说青铜峡打死四百多人，周总理也不满意了。这种谣言很多。”

康生强调坚决相信和依靠人民解放军，他说：“过去自治区

军区少数的领导人，实行了一套与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相对抗的资产阶级反革命路线，所以我们不能不进行坚决斗争。同志们，你们可以看到，我们解决宁夏问题时，首先不是找群众来开会，而是找军区的同志来开会。同志们，你们更进一步应该了解，为什么毛主席、林副主席下命令让62师部队开到宁夏，开到银川，开到吴忠，开到青铜峡，开到永宁去。有些人他们是怎么想的呢？中国人民解放军个人能行动吗？个人能下命令吗？如果军队里是那样，能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吗？同你们讲，不管怎么紧急，人民解放军调一个营的兵力，都要经过毛主席和林副主席、中央的批准。怎么一个人可以调动一个师、一个团？”“在宁夏，出现了‘打倒冼恒汉’的标语，出现了‘打倒徐洪学’的标语，出现了要‘六十二师滚出宁夏去’这样反动的标语。你们想一想，这是毛主席的路线，还是反动路线？”“我不能不说，‘筹备处’的头头们，朱声达实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你们跟着他走，62师实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你们却反对，这不是完全错了吗？也许革命小将你们认为朱声达的错误与你们无关，但那是你们自己骗自己。如果何其仁还算个共产党，叫何其仁讲讲他们的阴谋。你不讲，有人会讲！你们的罪恶是很大的。有些代表直到现在还不觉悟！这不是群众的责任，是军区少数人和有些县人武部的坏头头，他们把矛头对准了毛主席派去的人民解放军。”“现在有一个借口，就是青铜峡事件。我今天负责地告诉同志们：青铜峡的问题是经过毛主席、林副主席批准的。你们想一想，那么大的

事情，能没有毛主席、林副主席批准？你们还在那里讲，我们是陈再道式的人物，赵永夫式的人物。你们受骗了！‘筹备处’的头头们，你们在吴忠怎么开的会？在渡口干了什么？”“青年人不知道，你张号不知道？你就是个当权派，你能逃脱你的责任！？你张号还假装反对安子文。你是县委书记，是当权派，你在安子文领导下的组织部做了7年，你就是他的一个组长，你就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杨献珍领导党校时的一个头头，你要交待，你到中央组织部活动什么，你同谁握的手，同谁谈的话？你以为我们就是瞎子，就是聋子？！”

“在会前，我接到了给我的一封信，用‘筹备处’的名义，”

康生翻出“筹备处”9月14日写给他的信说：“我现在所指出的，是宁夏‘大联合筹备处’赴京代表团在67年9月14日给我的信。我现在不就这封信作全面评论，我也不是说这封信就没有一点对的地方。但是我必须提起你们代表团的注意，实际上你们的思想不是对准朱声达，而是对准62师.你们把青铜峡事件称做你们的‘革命事件’。错了！也许你们的代表不很清楚，你们的团长是中学生，19岁，还有那个张号，你们自己并没有在青铜峡，你们是根据你们的宗派的利益想象的，你们听了不正确的报告。你们提了几条意见，五条，其中第四条是对准62师的，因此，第五条拥军爱民就成了空话，如果不是骗人的话，起码也是一句空话。我还接到永宁‘革命造反总部’代表团9月15日的一封信，这封信我也不全面评论。这封信同样矛头对准62师，有些话是恶

毒的攻击。甚至那天晚上开会，徐洪学还没有作报告，只讲了一句话，你们立即矛头对准他。如果沿着这条路走下去，那就要走到邪路上去。我现在不详细评论宁夏问题，我讲这些，是告诉你们，中央的大方向，从《人民日报》可以看出，是坚决相信和依靠人民解放军。在宁夏要全面实行，不能口头上拥军，实际上反对。”“‘宁总司’、‘宁三司’要特别注意。他们现在，还企图挑拨民族关系，说青铜峡镇压少数民族。敌人用心狠毒。同志们千万不要上当，特别回族同志。在‘八·八’、‘八·一三’吴忠事件以后，固原一带，少数隐蔽的回民中的反动派，暗藏的特务在跃跃欲动，直到62师进驻了银川、吴忠、青铜峡、永宁以后，才把那里的局面稳定了。但是今天‘筹备处’的一些坏头头，还向那里集中，向那里去挑拨。这一点，要特别引起警惕。宁夏过去有个反刘格平的民族主义那么一件事，有的同志受过冤枉，受过处分，判过刑，开除过党籍，所以对杨马，以及对这一事件的主持人，抱极大的不满。这是可以理解的。应当分清是非，予以平反。这一点，‘总指挥部’的同志们要体贴‘宁总司’、‘宁三司’同志们的心情。当然，我不是说‘宁总司’、‘宁三司’就完全对了，矛头就对准了朱声达，对准杨马了，我看也值得深思。总之，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下，要实事求是。”

康生说：“运动不是越搞越分裂，而是走向更大的联合，革命的联合，在毛主席路线上的联合。”“这次解决宁夏问题，各代表考虑问题要首先掌握这个大方向，这个大方向就是毛主席革

命路线的大方向。”

## 第 897 回：到武汉，毛泽东接见曾、刘　回北京，□河南见刘王纪

9 月 19 日晨，毛泽东到达武汉，在专列上同新到任的武汉军区司令员曾思玉、政委刘丰谈话。当晚，又在东湖宾馆梅岭一号同杨成武、张春桥、余立金、汪东兴谈话。他说：

“要解放一批干部，大胆使用一批干部，多数的干部是好的。”

“要开一次九大，准备在明年秋季，至少在后年一月份召开。中央委员会要扩大。怎样扩大？中央委员会要选些新鲜血液，代表里要有新鲜血液。选中央委员，刘少奇同邓小平是不是有区别？我看是应该有区别。他打过仗。可不可以当中央委员？你们赞成不赞成？贺龙恐怕还要选他当中央委员，因为他是二方面军的头子。党的机构、政府机构都应大大缩小，干部不要多，要精干。要不要开人民代表大会，什么时候开人民代表大会？革委会和党的机构是一个组织好，还是分成两个好？你们考虑考虑，议一议。”

9 月 20 日晨，毛泽东乘吉普车到武汉街上看大字报，武汉军区领导考虑安全问题，希望他晚上去看，毛泽东坚持白天去看。他说坏人总是极少数。看到街上有很多宣传车，他对随行人员说：“你告诉曾司令员，这不好，我很反感。”

毛泽东在武汉东湖边照了像。

当晚，毛泽东在东湖宾馆同武汉军区司令员曾思玉、政委刘

丰、15 军军长方铭、15 军政委张纯青谈话，杨成武、张春桥、余立金、汪东兴均在座。

毛泽东听了两位军区新领导的汇报。对他们的兵力部署：以一个师担任武汉警备，一个师分到各军分区组成新的领导班子，一个师担任铁路护路，一个师在机场，并明确分工，武汉市由警备区负责，军分区由省军区负责，等等，均表示同意。

毛泽东这次听取汇报，不像以往一边听，一边问，一边插话，做指示，而是待他们讲完，然后就几个主要问题，谈了他的看法。

他说："前一次王力他们解决'百万雄师'就是不听我的，不先同部队讲好，做好工作，而急急忙忙到群众中去表态，有偏向，又不找我，捅了一个马蜂窝，着急。前次我不走就好了，王力他们搞得太凶了。"

他说，看来湖北的形势大好，不是小好，黄冈、黄石、恩施、孝感都比较好，荆州是打内战。他问曾思玉、刘丰，你们可不可以到这些地区走一走？毛泽东指示说："就是荆州，恩施、襄樊也可以去看看，同干部谈谈，吹一吹风。"

毛泽东要武汉军区领导武装工人和红卫兵。他说："你们按中央 9 月 5 日的命令，要他们先交枪，然后再发给他，他会谢谢你的。"

毛泽东对抢枪的事，沿途谈了几次，但都没有把它看得多么严重。他对曾思玉、刘丰两位军区领导具体分析说："抢枪、发枪，其实发多于抢。抢和发，两种一比较，发的最多，真正抢的

不多，不是老虎借猪，最后，还是送还了。人民群众是好讲话的。”

毛泽东向曾思玉、刘丰交代说：“你们对待犯错误的班干部不要搞得太凶了，独立师不要整得那么苦。军区司政后的班干部要用教育的方法解决，科长，副部长总留了一些吧，不要整得那么苦，犯了点错误没什么要紧。”

毛泽东对“现在动不动就要拉一大批人”的做法很不赞成，并说：“我看不好。”

他对曾思玉、刘丰说：“你们不要从沈阳、空军、北京军区调干部，就在本部找干部，在‘四大’中找人。人总是在斗争中锻炼出来的。我不相信武汉军区、湖北军分区、人武部就没有好人。”

他说：“你们要解放一批干部，大胆使用干部，多数干部是好的。”

他还说：“干部要精不要多。干部不要靠从外边来，就在本地找嘛。我不相信原来的军区就没有好人，有错误至少是三七开嘛。人就是要在斗争中锻炼出来，你们这些人不就是从斗争中锻炼出来的吗？湖北省总要找些革命干部，没有省长有部长，没有部长有局长，没有局长有科长。”

“18 年没有训练人武部、军分区、省军区、大军区的干部。人家犯错误他又不通，这怪谁呢？责任在我，我是军委的主席嘛。为什么不训练？不出问题还想不起要训练这些干部的问题。小县训练三四百人，中县训练六七百人，大县训练八九百、千把人。

时间不要好久，两个月，以后一年训练一次。不但要训练武的，还要训练文的，不仅军队干部要训练，党政干部和红卫兵的头头也要训练。如果红卫兵头头不训练，将来就可能犯错误。”

毛泽东明确指出：“总要给犯错误的人一条出路，包括陈再道。”

对待群众组织，毛泽东指示：“对‘百万雄师’要有点接触才好，叫他们不要搞了。‘工总’头头太多了。‘二司’内部有矛盾但比较好。”

毛泽东主张用历史的事实来教育年轻一代。他告诉军区领导人：“你们同他们讲一点历史。”

毛泽东回忆说：“我们过去内部也打……但不搞喷气式，以后开了古田会议，有了决议纲领出来了，一个人都没有处罚，连名字都不提。主要是朱、陈造我和林的反。以后还是团结起来了，合作得比较好。1931 年项英夺权了，现在夺权的方式不好，不给精神准备。”

毛泽东对曾思玉和刘丰说：“这里的地方还是问题，你们回去解决，也还是容易解决。”

谈到文化大革命的进展情况时，毛泽东说：“大概春节以前，全国基本上解决问题，还有四个多月。湖北省再搞两个多月差不多了。”

接着毛泽东又提出一个问题和到会的同志商量。他说：“全国的问题怎么解决好？开一次九大，怎么选代表？你们议一下。红

卫兵赞成不赞成，工人、农民有何意见？要开，我看明年秋季九月份开，至少后年一月开。代表嘛，工、农、兵、学、商都选。左派为主，要有中间派，也要有右派，但不是反革命，没有他们的代表不行。革委会要不要？是不是恢复党政军？邓小平恐怕要保。第一他打过一些仗，第二他不是国民党的人，第三他没有‘黑修养’。可不可以选他当中央委员？你们讨论一下，九大谁可当选中央委员，邓小平是一个标兵。张体学行不行？贺龙还行不行？九大的问题，你们研究研究。”

毛泽东又问：“还有些老干部怎么办？”

他开始点名字：“如张体学、许家屯、陈光、彭冲、江华等等，湖北干部问题，他们（指原军区领导）还没有来得及做，你们能说服红卫兵老的不当第一书记，只当副书记、当副省长？有的人就是蠢，政治上不行，也许是个好事，不一定。没有张屠夫就要吃活毛猪。我同林就是张屠夫。现在我很不喜欢‘四个伟大’，叫主席就行了嘛。”

毛泽东谈了对刘少奇的看法。他说：“刘不是辩证唯物主义者，也不是唯物主义者，那时还相信他，想他还能独当一面……以后出了许多书。1953 年我退居二线，1959 年他当国家主席，1953 年起一朝权在手，一切大事都不同我商量，以后一切大事他又不管，1964 年他下决心，全国跑，说调查研究过时了，1966 年十一中全会靠边站了，但他不是第一。”

毛泽东赞扬林彪的大小事都报告的做法。毛泽东具体谈到：

“林彪一切大小事都递来看，小事可不送的也递来，强调请示报告。你们要教育大家注意请示报告，我们的答复不一定都是正确的，但比你不报告、各行其是、搞独立王国要好。你报告了，错了是我们的，你们是第二位了。”

“现在，搞了什么伟大领袖、伟大导师、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搞那么多官衔干什么？我姓毛，是党的主席，叫我毛主席就行了。我很不喜欢你们给我的四个官衔。”

毛泽东问大家：“你们想一想，马克思叫我和林去汇报怎么办？谁来？群龙不能无首，没有陈独秀，要有瞿秋白……”

毛泽东接着说：“张闻天、王明是二十八个半里头的理论家，马克思多得很，我土得差不多有人搞到茅厕缸里了，熏了一下臭了。王明和张比，张比较动摇。洛甫 10 年，党消灭了没有呢？没有。军队也不会灭的，长征到陕北，编 3 个师只二万五千人，报 4 万人。打了八年抗战，发展到 120 万。这时蒋介石进攻，我们有办法了，也不搞过去那一套。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你打你的，我打我的。至于现在新成立的革委会与党委是分还是不分？不一定。各省先开党代表大会。”

毛泽东再次告诫大家：“你们一辈子没有挨过整，官做得大，薪水多，房子又好，又有汽车，这些都可以，就是不要摆架子，装老爷的样子。谈话要找少数人谈，大会小会不要训人。训人，人家不舒服，尤其不能动手动脚。整一下好，战士有气。”

最后，毛泽东又把话题转到湖北的问题上来，他说：“湖北

要注意三结合，找出人来，不要开一次会决定。吹吹风，开神仙会，讨论一下，谁可以当中央委员，没有问题的老家伙都要当代表，邓小平是个当中央委员的标兵，贺龙、乌兰夫都要当中委，还有张体学。”

说完，毛泽东站起来又说：“今天讲错了，可以批，我也批，红卫兵权力大，列宁讲过，年轻人犯错误，上帝也会原谅的。”

毛泽东在武汉接见曾思玉、刘丰时，杨成武谈到：“听说重庆打了一万多发炮弹，开始也不大相信，以后听梁兴初同志讲为什么打，怎么打的，都报告了主席。主席说好，这是个训练，战备演习，拿了枪炮，不打不过瘾。”

9 月 21 日上午，毛泽东根据各地解决问题的情况，在武昌东湖客舍对杨成说：“七、八、九三个月，形势发展很快，全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大好，不是小好。整个形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全国在春节前就差不多了，解决了。文化大革命明年春天结束，不能再搞了。”

当天，毛泽东乘专列离开武汉，返回北京。9 月 22 日，专列途经郑州，稍作停留，停在飞机场。上午，他在火车上接见了刘建勋、王新和纪登奎。

毛泽东一见纪登奎，就高兴地握着他的手说：“你是纪登奎？老朋友了。”

刘建勋说：“登奎同志在河南文化大革命中可受锻炼了。他在运动中被关了四个多月，挨批斗，坐‘喷气式飞机’，可多啦。”

毛泽东："噢，真是多灾多难。你说，这一点好处都没有吗？"

纪登奎说："大有好处，能够锻炼人。"

毛泽东问："你挨了多少次斗？坐'喷气式飞机'是什么样子？"

纪登奎报告说："挨斗不少，坐'喷气式飞机'就跟割麦子差不多，还可以锻炼身体呢！"

毛泽东听了，哈哈大笑。他从椅子上站起来，学着坐'喷气式飞机'的样子，弯腰，低头，把两支胳膊朝身后高高抬起，大家见状，都笑了起来。毛泽东坐回椅子后，纪登奎继续说："我们这些人在河南文化大革命中都是建勋同志带出来的。"

毛泽东表扬说："刘建勋给干部打了招呼，很多干部都没有倒。"

当刘建勋汇报到河南各级干部情况时，毛泽东说："何运洪那么厉害！何运洪干的好事！"

当刘建勋汇报到开封"824"围困化肥厂的情况时说："我们主张做政治工作，不打。"

毛泽东说："不讲俘虏政策不好，要给'824'做工作。""我赞成你们的意见。"

当刘建勋汇报到少数人不讲政策，随便打抢、有时打死人时，毛泽东说："群众起来议论，不赞成他们。群众都起来反对就收场了。"

毛泽东还说："抓军内一小撮的口号搞不久，现在已经不那

么响了。他们不拥军，一拥军就没有对象了。”

王新：“主要从理论上把他们批倒。”

毛泽东：“对。”

刘建勋向毛泽东汇报 9 月 5 日江青接见安徽赴京代表时的讲话，毛泽东问杨成武：“她那个讲话录音调来了吗？放一遍，你们都听听。”

录音播完时，毛泽东一口接一口吸烟，沉默许久，终于发话了：“‘文攻武卫’，不能这么提。”

刘建勋向毛泽东汇报后，陪同毛泽东视察的张春桥又向他传达了毛泽东沿途的讲话精神，刘建勋整理成四条：

一、形势大好。全国已解决了7个省，基本上解决了8个省，其中包括河南、江西。争取今年再解决10个省：南方5个省，北方5个省，一共24，黑龙江解决两次。中央是支持黑龙江革命委员会的，革命委员会不能垮，是要支持。文化大革命7、8、9三个月大进了一步，春节前全国要基本解决，要纳入轨道。形势和任务就是如此。

二、上下级关系为什么搞得那么糟？打、罚、跪、挂牌、戴高帽不好，把团结——批评——团结的原则破坏了。对干部要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都不要一棍打死，最顽固的也要给一碗饭吃。北京开武装干部会，不好的去，好的也要去，党、政、群干部也要去，左派也要去、红卫兵也要去，红卫兵权力很大又很凶，也要训练。对干部不能不教而诛，教也不能诛。扩大教育面。

三、大联合的问题。“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是毛泽东7月18日在武汉第一次讲的，这个话没有接受。武汉问题如果用这个思想去解决就更好。毛泽东反复讲这个问题。7月谈过、8月也谈过。毛泽东关于大联合的指示，全国一宣传，效果很好。

杨成武插话说：“主席是这样讲的：‘一个工厂都是工人阶级，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为什么分裂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我就想不通。这是有人操纵，无非是走资派的操纵，第二是地、富、反、坏、右搞鬼，第三是小集团主义思潮影响。’”

张春桥说讲：“反复宣传主席这个思想，主要是工人，对学生、机关干部也有效，工人阶级要真正成为文化大革命的主力军，要工人来左右局势。因为最有发言权的是工人，不是学生说了算数。主席就问我：‘乱得起来吗？’我说，不要紧，工总司不动，就不会乱。要确定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不要让学生牵着鼻子跑。”

四、整风。张春桥说：“主席讲：‘上海军、干、群三个方面的关系比较好。’主要是经常进行整风，三方面整风。这是以军队为主，下次以群众组织为主，依次轮流，请别的方面代表参加。这个制度比较好。工总司每天坚持半天学习毛著，半天工作，天塌下来也不管，军队不再召集。

干部问题是一个重要条件。上海部、局长已经解放了百分之

五十至六十。”

杨成武说：“主席说，绝大多数是好的，要解放干部，教育干部，使用干部。干部中除了走资派，为什么斗那么凶？有些官做大了，坐汽车了，房子好了，工资高了，这都还可以。但是不要有架子，不讲民主，脱离群众，所以，一有机会就起来攻你。”

刘建勋问：“北京‘516’是什么意思？”

张春桥说：“‘516’是反革命组织，它有三条：一是反中央；二是反解放军；三是反革命委员会。姚文元同志文章的后一段，关于革命委员会，就是主席亲自加的。”

## 第 898 回：第七次，见广西两派代表　促联合，双方表态□赞成

9月22日凌晨1时30分至4时，在人民大会堂西藏厅，周恩来第七次接见广西两派代表。陪同接见的还有戚本禹、黄永胜。

周恩来：“听说你们两个代表团联合起来了，创造了联合气氛，我庆贺你们。”

“422”说：“今晚我们在一起学习语录、唱歌。”

“联指”：“我们有这个愿望。”

周恩来：“有联合的愿望就好嘛！我向你们祝贺。要行动起来，你们看见北京两派联合的气氛了吗？过去北京的机关、工厂、学校分两派，从9月5日中央负责同志传达了毛主席的战斗号召以来，9月份的气氛一天天在变，特别是从昨天下午开始，中央直属各部一下子联合了22个部，工厂联合得更多，学校中学带头，原来联合160多个，现在联合200多个了。”

“联指”：“我们工人保证和‘422’的工人联合起来。”

周恩来：“好嘛！你们工人带头，学生跟上去。你们搞的《七条协定》很好嘛！签字了没有？”

戚本禹说：“签了。”

柳州“联指”：“我们按总理指示，柳铁‘钢联指’已在20日凌晨将全部枪枝弹药上交完毕，柳州‘联指’在6时全部交完并召开了庆祝大会，给总理发了加急电。”

他们将两份加急电交给周恩来。

柳州“联指”接着说：“昨天把武器上交了，我们都想回到工厂，我们发表了一个声明，同‘422’联合。上次周恩来批评我们自我批评不够，我们开会检讨了。”

周恩来问：“铁路怎么样？”

“联指”答：“通了，五次今天发车。”

周恩来：“最难搞的是柳州，柳州现在怎么样？我就想了解柳州铁路这一关过了没有？机车怎么样？还焊在那里吗？”

柳州“造反大军”代表答：“已打开了，现在每天开出12台机车。”

周恩来：“太少了，柳州是重点嘛！四通八达，你们双方对立情绪还没解决，‘联指’在南宁、柳州交枪比较多，你们有落后的危险，要赶上去，你们想回去做工作可以回去嘛！我上次不是说了吗？主要是用这段来考验你们。”

周恩来对秘书说：“打个电话问铁道部现在困难在那里？关键的问题是什么？”

然后问:“柳州联合有阻力吗？你们铁路两派能不能联合？”

“422”答：“我们死伤人多，受压厉害，下面可能有些阻力，我们要求回去尽量做好工作。”

柳州“造反大军”代表说:“机车开不出去是因为工厂停工。”

周恩来：“不是工厂停工，而是两派对立太大。”

“422”：“总理，柳铁‘工总’代表已到北京，要求参加今晚接见，向周恩来汇报铁路情况。”

周恩来：“联络员同志去叫来，桂林怎么样？”

“老多”：“桂林正掀起学毛著，大批判高潮，形势大好。”

周恩来：“光搞大批判，还有本单位斗、批、改呢？桂林有多少外地学生？”

“老多”：“有3000多人，包括工人、干部，连中学也住满了。晚上很热闹，每天到街上看大字报。”

周恩来：“还有3000多呀！离开生产岗位出去看大字报，也不行，把学校的地方都占了，也不利于学校的斗、批、改。国庆节到了，要回去抓革命促生产。文化大革命搞得一年多了，不在本单位，跑到桂林来也不行。是外地的吧？”

“老多”：“各地都有。”

“422”汇报桂林正在准备开工代会，筹备革命委员会，周恩来问：“有干部吗？”

“422”答：“有干部。我们认为王同连、冯邦瑞，经过考验是可以的。”

周恩来又问了驻军参加的情况，然后说：“桂林要做个样板，搞三结合，成立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你们去铁路的情况怎么样？去了多少人？”

“422”：“我们的人全部出发了，去了1000多人。”

周恩来：“都是师院的吗？”

“422”：“全都是师院的。”

周恩来：“现在离国庆还有10天，时间很紧，首先要把铁路

交通恢复起来，你们‘联指’发出呼吁了没有？”

“联指”：“已经发出了。”说着，把3份呼吁书递给周恩来。

“老多”：“桂林专区各县情况严重，造反派纷纷被迫逃到桂林来，桂林压力大，资源武装部支持‘联指’打造反派，造反派写了绝命书……”

周恩来：“还有抢枪的吗？”

“老多”：“资源县‘联指’9月9日还抢枪，……”

周恩来：“桂林军分区不是比较好吗？为什么不派部队？”

“422”：“桂林军分区是好的，但下面武装部不听，后来张政委下了死命令，要武装部派人去保护造反派，情况才好转。另外，桂林‘联指’勾结阳朔‘联指’，几百人开车到桂林郊区抢粮食，在雁山开枪打死6955部队战士1人，‘老多’1人，尸体不给收。”

周恩来：“你们在阳朔又打了一仗是吗？你们到那里干什么？”

“老多”：“他们全副武装想来包围桂林，又抢粮食，6955部队才去的。”

“联指”代表递给周恩来一份电报。

周恩来：“是民兵嘛！是哪里的人？”

“老多”：“是桂林、柳州、南宁‘联指’的人。”

周恩来：“在桂林你们‘老多’是多数嘛！应该教育他们回

来，你们占多数还有人跑，这说明你们的工作没有做好，我就是担心你们是不是过头了，不能说每个县的当权派都是走资派，我听伍晋南说要把全省大大小小的走资派都打倒，怎么会有这么多？不会都是这样的，有的是执行了反对路线的。你们就是这样，谁占多数就想把另一派压倒，如果你们桂林的少数派还往外跑，就证明你们的工作没有做好，我对你们就要保留意见了，不能把你们夸奖太多，不然你们就骄傲起来了，你们要欢迎人家回来，不要骂人家老保、联匪。我刚才在中央文革开会，安徽两派联合得很好，江青同志讲话后，不到两个礼拜，双方不断做自我批评，不断搞联合行动。你们桂林不能歧视人家，你们占绝对多数，压人家少数，这是危险的，你们在这里讲道理，我在这里称赞你们，谁晓得你们回去怎么样，瞧不起人家，人家就跑，我看人家能动员人从阳朔到雁山抢东西，这是不简单的，一定是你们压了人家，你们就要考虑考虑。

如果你们在铁路上不改变态度就危险，你们‘老多’踏遍广西，要在桂林搞好，以桂林做基地。桂林是一面红旗，我是希望你们搞好这面红旗的！所以把‘老多’推荐到铁路上去。你们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把工作搞好，你们称自己为响当当的左派，年青人不能自封。自己封自己总会摔跟斗的。”“你们在铁路上应变成宣传队，不能是‘422’派、‘老多’派，也不是‘联指’派，这样才能推动团结，你们只支持‘422’，压‘联指’，‘联指’就不干，互相斥责，就不能解决问题。刚才，会

前韦国清同志要求中央派调查团，我看不采用这个办法，你们自己去解决，要坚持毛泽东思想才行，我责成你们再回去一个人，沿途检查，把我刚才的一段话传达下去，从冷水滩到凭祥到湛江，非打通不可，在铁路只能是一派，不能是两派，不要派性，要无产阶级党性。”

“老多”：“我们保证做到。”

周恩来：“‘422’要回去做工作，我同意你们回去几个人。在南宁你们交枪交得不够，工事拆除得不多，你们要回去几个人，很快地把这个工作做好。联指，上次你们那位女同志问我，我说了一句话，我说了一句群众组织，没有定性嘛！就跑回去了。那位女同志呢，来了没有？”

“联指”：“来了，在西苑旅社。”

周恩来：“怎么不叫她进来。”

“联指”：“我们的代表只有14名。”

周恩来：“嗨！多来几个也没有关系嘛！”

“联指”：“好，下次我们叫她来。”

周恩来：“那就要到国庆节以后罗！”

秘书进来，给周恩来送铁道部军管会关于柳州通车情况报告，周恩来看后说：“你看，马上找到你们的岔子了，先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今天军用、联运车通行无阻，客运通行到冷水滩。问题就在柳州机务段，才开出18台机车；桂林12台，相当于以前正常运行时的三分之一。铁路军管说很好，就满意了！我们要求

达到百分之九十，铁路军管要求太低了，我就不满意。三分之一是多少，你们大学生算，师院的。”

“老多”：“百分之六十几。”

周恩来笑了：“什么百分之六十，三分之一嘛。柳州铁路‘工机联’逐渐上班了，但今天发生了一个问题，从桂林开出999号机车，到柳州后按规定换机车，但因为这是‘老多’开的，‘老多’不干，就把机车开在道岔上，使车不通啦。”

柳州“造反大军”代表辩解说：“999机车是柳州‘联指’抢去搞武斗的。”

周恩来：“你是那里的？你又不是铁路上的，管那么宽，连铁道部的报告都不相信？你什么都包办？你们自信心就那么强？和你们讨论问题可不容易啊，你还辩护，蛮不讲理。我给你们这任务，你们就拿鸡毛当令箭，大概要换的机车是‘联指’的，你们不干，这就是派性嘛。换车头可能没跟你们商量，按规定没有必要和你们商量。换机车，算不算规定。”

柳州“422”：“算！”

周恩来：“对！可是结果，因为是‘老多’的，就一定要开到南宁，铁路上就不同意。在机车上水时，就换上柳州的机车，‘老多’不满，就把机车停在道叉上，把交通阻塞。”

周恩来说：“‘老多’的理由说是执行总理的指示，不准换，要直达南宁，执行指示和换机车是两码事，规章明明写的换机车，有什么不好，你们不讲理多么危险呀，我坐火车也要换嘛，你们

有什么理由不准换，我不懂是什么道理，我给你们任务，你们就把鸡毛当令箭。大概因换的是‘联指’的，你们就不放心。你们就有那么强的派性，还没有开会前我就担心这件事，现在证明了。柳州局不先和你们商量，按道理可以不和你们商量。”“我叫你们去，为的是疏通运输，结果阻碍了运输，再搞几次，我就把你们调回桂林，你们就是派性高于一切。”

他指着柳州“造反大军”那位代表说：“你看这位代表，我一说999，他就想到什么事，你看这不是派性高于党性吗，你们拿鸡毛当令箭，我这鸡毛是可以收回来的，你们知道吗？”

“老多”：“我们调查一下，如果有这事，要严肃处理。”

周恩来：“等一下。军管来了再说，我本来叫你们去，是为了搞好铁路运输的，你们可以和各军分区联系，取得他们的支持，广西有多少个军分区？”

黄永胜：“8个，有5个在铁路上：南宁、桂林、柳州、玉林、河池。”

周恩来：“5个在铁路沿线，责任大得很，5个军分区解决了，铁路就好了。当然也允许你们青年人犯错误，但要改，要把铁路搞好，你们说要中央派人，我看还是由你们来搞好嘛！南宁，你们‘422’交武器，毁工事，做得怎样了？”

“422”汇报交枪情况：“交了两批，听说指挥部能控制的基本交完，其它要回去做工作。我们已打电话回去了，武斗工事的消除工作，医疗队说较好。”

周恩来："你们不要落后了，你们广西地处前线，联合应该比那个地方更感到联合的迫切性。你们抢的援越抗美的炮弹，还有一部分未交。只要一做错怎么弥补也补不回的。"

"422"表示要联合，并说，欢迎"联指"批评他们。周恩来带头鼓掌，并说："安平生、伍晋南，你们不要管他们的问题。"

"422"继续表示要拆除所有的工事，上交所有的武器。周恩来说："你们拆除了工事，上交了武器，那就立了新功！你交了武器，军区要来保护嘛！如果军区不保护，那就要犯新的错误。"

"422"："我们听总理的话。"

周恩来："听毛主席的活，听林副主席的话。"

"422"表示自己占多数的单位欢迎"联指"回去。周恩来对他们说："'联指'人多的工厂、学校、机关要欢迎你们，你们也要欢迎他们，都不要打击、报复、克扣工资，有什么困难还要帮助，都是阶级兄弟嘛，要做自我批评，不走毛主席的道路还走什么道路？"

"422"继续谈大联合问题："我们建议国庆节和'联指'一起开庆祝大会。"

周恩来："是呀！你们南宁两派觉悟都比较高一些，是中心嘛，封枪，交枪也较好，你们现在就有事情要办理，两边都派人回去，军区参加，在军区的领导下，联合组成一个筹备国庆小组，联合庆祝国庆，然后登报，号召广西全区学习。"

接着谈柳州交枪的情况。

周恩来又问到999机车的情况：“有部队保护嘛？”

铁道部：“没有。”

周恩来：“这就不对了，应该派部队嘛，半路发生了问题也好观察嘛，凡是专列都要有军队，这件事军管会做得不对，马上派去。55军沿途保护，28日以前要把北京外出的学生接回来，这些学生在外面大约有两万，这些人都要用专车送回，要武装保护。”

“422”：“我们愿意和‘联指’搞拥军爱民，我们订了拥军公约。”他们将拥军公约递给周恩来。周恩来点头肯定：“对！”

接着又谈了北海打人和《广西日报》的问题。

柳州“联指”：“我们希望‘造反大军’也欢迎我们的人回去。我们回去的人，他们说要听他们的指挥，带他们的袖章，铁路问题两派都有工人在这里，建议在联络组的主持下达成个协议，回去双方做工作。”

周恩来：“国庆节前，铁路双方人员回去抓革命，促生产。这些问题由联络组、铁道部军管会主持会议具体解决，到本单位观点不同，允许保留嘛！何必要人家加入你们的组织，改变观点呢？”

“422”：“我们西大已做出决定，欢迎‘能闯’的同学回校搞大联合……”

周恩来：“只要一条，你们人多，对方回去，你们不能取消人家的组织，人家批判刘邓陶，方向是对的，都是革命组织。虽

然过去有些缺点错误，但改了就好，西大不要外单位去串连。”

“联指”：“我们很想回西大，但有些具体问题……”

周恩来：“你们这样我就不‘仲裁’了，具体的问题你们回去自己解决。”

铁道部：“关于铁路问题，关键问题是两派武斗问题，如果能制止武斗就好办，两派观点不要带到生产上去，建议两派按中央关于铁路运输问题的指示执行，尽快上班，任何情况不要影响运输。”

柳州“联指”：“我们一定回去动员，坚决执行。”

周恩来：“不要把观点带到生产上去，生产就是生产嘛！观点不同也可以在一起工作嘛！这点你们‘联指’要多负些责任，因为你们和农民联系较多嘛！你是南宁‘联指’，他是柳州‘422’，能不能联合？”

两派代表：“可以。”

铁道部：“我们铁道部已经实现大联合，请总理参加我们的会议。”

周恩来：“我不去了，你们不要满脑子‘联指’、‘422’，要满脑子为人民服务。要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战斗号召，要按毛主席指引的航向走。你们开会可以请他们铁路的同志参加，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我们要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联合起来！”

散会。

## 第 899 回：杨成武，军委办事组组□　见主席，“英□□去不自由”

9月23日上午，毛泽东的专列抵达北京车站。

当天，中央讨论确定是否保留 7 月 13 日成立的军委临时看守小组，毛泽东说：“要不要这个军委办事组？要的话，就让杨成武来当这个组长。”

林彪给周恩来打电话，建议由吴法宪担任办事组第一副组长兼副总参谋长。

9 月 23 日，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批转《安徽“Ｐ派”与“Ｇ派”热烈拥护和贯彻执行康生、江青的“九五”指示》。此后，以江青 9 月 5 日讲话中提到的三个问题：一、拥护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二、拥护解放军，三、拥护革命委员会为标准，凡是将矛头指向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指向“三支两军”，指向“革命委员会”的行为和人，均会作为“三指向”而受到清查。

9 月 23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联合发出《关于在外地串连学生和在京上访人员立即返回原单位的紧急通知》。《通知》要求：

“在外地串连的北京和各地的学生以及其他人员，应根据中央的多次指示精神，立即无条件地全部返回原地、原单位欢度国庆节，并全力以赴地投入革命的大批判和本单位的斗批改，促进本单位的革命大联合和革命三结合。”

“在北京串连的学生和上访人员，要积极响应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的伟大战斗号召，迅速返回原地，同本地区的革命群众一起庆祝国庆节，并坚持就地闹革命，搞好本地区、本单位的革命大批判和斗批改，促进本单位的革命大联合和革命三结合。”

“北京和各地接待机构（包括学校、机关、军队、工厂、农村人民公社在内）从九月二十八日起，一律停止招待外来串连的学生和其他人员。”

“所有北京学生和其他人员在外地设立的联络机构，以及外地串连学生和上访人员在北京设立的各种联络机构，都应在九月二十八日前全部撤销，各有关单位再不负责招待。”

“北京学生和其他人员在北京各部门、各机关、各军事单位、各工厂和近郊农村人民公社设立的联络机构，亦限于九月二十八日前全部撤销，各有关单位再不负责招待。”

9 月 24 日，毛泽东召集周恩来等开会，谈到召开九大问题时，毛泽东说：“接班人当然是林彪。”还说：“刘少奇、邓小平要有区别。”

当晚，在中央文革碰头会议上，周恩来宣布撤销“军委临时三人看守小组”，另外成立以杨成武为组长的军委办事组，吴法宪为办事组的副组长，同杨成武一起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议。办事组的成员还有叶群、邱会作、张秀川。叶群在军委办事组只是挂个名，她只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议，对办事组的工作不干预。

10 月，又增补第二炮兵政委李天焕、民航总局政委刘锦平为军委办事组成员。

这个军委办事组对下不单独行文，不发文件，不下命令，只是一个办事机构，在中央碰头会议的领导下做一些具体的工作。中央碰头会议通过的有关军队的决定或文件，由周恩来签名以后上报毛泽东和林彪，经他们同意以后，才能正式形成文件，再交中央军委或者是总参、总政、总后的名义下发。军委办事组采取集体办公的形式，每天下午 15 时开始办公，集体讨论需要办理的事情。需要提交中央碰头会议的，晚上就由正、副组长带到碰头会上去研究；剩下的就酌情处理和解决，并交有关部门办理。

毛泽东回到北京后，外交部的“保陈派”们鼓动王海容到毛泽东那里“摸摸情况”，听听他老人家对陈毅及王力、关锋究竟是怎么个说法？

王海容来到中南海游泳池，向毛泽东谈了有关情况，当说到王力“八七讲话”不得人心时，毛泽东随口说了两句诗：“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便对王海容说：“你回去吧，我要休息了。”

9 月 24 日早上 6 时多，王海容从中南海回到外交部办公厅综合组，大家围拢过来，焦虑地询问她：“毛主席究竟讲了什么话？”

王海容说了毛泽东念的那两句古诗，众人听罢，立即翻阅唐诗、宋词，一时都没查到出处。他们觉得这两句诗很重要，无论

如何要把意思搞明白。于是刘华秋提议，去请教王海容的爷爷、毛泽东的表兄、国文大师王季范先生。

上午 10 时，他们骑车跟随王海容来到她家，将已准备好的白纸黑字拿给王季范老先生看，请教“时来天地皆同立，运去英雄不自由”两句诗出自何处。

王季范看罢，拿起铅笔，将字条上的“立”字改为“力”字，并从书架上取出一本厚厚唐诗，向大家指明了出处。原来这两句出自罗隐的“筹笔驿”，全诗是：

抛掷南阳为主忧，北征东讨尽良筹。

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

千里山河轻孺子，两朝冠剑恨谯周。

唯余岩下多情水，犹解年年傍驿流。

大家匆忙抄下这首诗，告别了王老先生，风驰电掣般骑车回到办公室。他们一致认定：毛泽东援引罗隐这两句诗，寓意深长，耐人寻味，给王力、关锋作了“盖棺定论”。意思是说，王力、关锋、戚本禹等人，“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时来运转，红极一时，似乎天、地、人都协力支持他们，一切都很得手；但曾几何时，他们多行不义必自毙，好运不长，气数已尽，曾经不可一世的“英雄”，将要被历史的车轮压倒，成为得不到自由的阶下囚。结论只能是：王力、关锋快完蛋了。

9 月 27 日，外交部办公厅综合组和研究室王海容、刘华秋等 11 人，贴出《王八七讲话是大大大毒草》的大字报，率先公

开批判王力。之后，外交部连续开会，张贴大字报，肃清王力讲话的流毒。每次开会姚登山都到会接受批判。

9 月 24 日，新华社报道：在全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空前大好形势下，毛泽东视察了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调查了河南、湖北、湖南、江西、浙江、上海等省市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喜讯传遍祖国各地，亿万军民纷纷集会游行。《人民日报》传达毛泽东最新指示："必须把粮食抓紧，必须把棉花抓紧，必须把布匹抓紧。"

当晚，新华总社再次发出毛泽东在上海期间所作的重要指示："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准备第二天见报。

徐景贤见了新华总社的电传，想起张春桥曾在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扩大会议上传达过毛泽东接见他们时的谈话内容，重点讲了对两派工人大联合和两派学生大联合的指示。此时，他想："为什么只发了关于两派工人大联合的指示，没有发关于两派学生大联合的指示？"

这时，上海《文汇报》也来电话请示第二天转载新华总社关于毛泽东大联合指示一事，他们商量："可不可以在明天的报纸上同时刊登毛主席关于学生组织大联合的指示？"于是徐景贤要《文汇报》排出两个指示的清样，由他审改并请示张春桥后再发表。

时过半夜，徐景贤审定了《文汇报》送来的版面清样，然后打电话向张春桥请示。但是，找了很久也找不到张春桥，原来他到北京去了，姚文元也不在上海。徐景贤想："反正这两条都是毛主席在上海做出的指示，发表出来只会有利于促进大联合。"便在清样上签字付印了。

第二天，9 月 25 日，全国的报纸都发表了经毛泽东审定的关于两派工人大联合的那条指示，唯独上海的《文汇报》刊登了两条"最新指示"。在第一条指示下方，用特大字体印着：

毛主席又指示革命的红卫兵和革命的学生组织要实现革命的大联合，两派是革命群众组织，要无条件实现革命大联合。

9 月 25 日，曾思玉、刘丰在武汉传达毛泽东视察湖北时的指示。

刘丰说："毛主席这次视察了三区六省，在武汉呆的时间最多。毛主席接见了我们，咱们这个地方也到了。在这个地方停留了两天多三夜。两次出去都是白天，我们出于关心毛主席的安全，劝他下半夜去，主席说不行，要白天出去看市容，而且是坐吉普车，他老人家看了之后很高兴。"

"按毛主席讲：武汉问题已经基本解决了，不像某些人估计的那样，形势那么严重。"

曾思玉说："对湖北文化大革命，他认为形势大好，空前大好，出了一个'720 事件'，问题就是不破不立，坏事变好事，烂透了就会好，当权派搞的一些鬼看得很清楚。"

“主席要到市面上去看一看，我们要晚上走，他一定要第二天早上走。主席看了之后，说湖北问题基本解决了。”

“主席认为大势已定。主席问我们：‘美国人会不会打起来？’主席就很乐观：‘我看不成，它打不起来。’‘南越原来只有九条步枪，后来越南搞得美国骑虎难下，’主席说：‘美国没有什么了不起。’主席总是看大问题，今年又风调雨顺，主席是很高兴的。乱透了就好，好解决问题。所以讲基本解决了。‘三结合’问题基本解决了，七大组织是造反派，造反派组织是现成的，军队是现成的，地方干部如何，我们心里也没有把握，形势好得很。主席考虑到战略布暑，考虑到大问题，如果我们错过了机会就不行了。主席讲：‘这个机会错过了，那以后超不上。’国庆前后应联合起来，再搞臭走资派，搞斗批改。”

“主席讲，犯错误的干部要允许人家犯错误，不能打倒一切，怀疑一切。打倒一切对党不利。主席原文：‘打击面要缩小，教育面要扩大。’在古田，陈总对军队问题解决不了，又把主席请回来，开了古田会议，讲了十条，从正面批评了那些‘主义’。主席没有到过外国，主席就是根据马列主义。朱德、李德不听主席的话，打了败仗，后来才长征，在遵义会议上王稼祥投了主席一票，主席为核心，所以核心不能自封，以主席为核心一直到今天胜利。”

“主席讲：‘八一南昌起义是首先向国民党开第一枪，所以是革命行动。’‘我这个人五次是被人家排挤的，后来又要请我回

来。’所以群众领袖不是自封的，是在群众斗争中成长的。什么叫长征，长征是打出来的，是追出来的。长征之后质量就高了。就是现在这些干部，哪个在战场上没有受伤，在革命中不犯错误，我下一道命令，这些人还是会上战场打仗的。允许人家革命，允许人家改正错误，打倒一切，怀疑一切不好，对党不利。”

“主席讲：‘对百万雄师怎么样，听说对百万雄师独立师揪得太厉害了，这样不好。’主席每个事情都知道，主席光注意看小报，你们的每一个小报他都看了，中央的一些大文章都是按他的思想写的。你们揪得太凶，就有可能脱离群众，这样不好。主席对我们说：‘你来时不是有人要打倒你吗？’我说打倒没关系。”

刘丰：“今天有人写信给我，要为百万雄师翻案，不翻案就没有好下场。署名狂人。”

曾思玉：“主席要文斗，不要武斗，主席原文是：‘体罚这个作法我反感，是不是把我考察报告里打土豪劣绅的那一套办法都拉出来了，那是对付敌人的，现在是文化革命要触及灵魂，这样搞会脱离群众。’‘凡是要整人的人，整来整去就整到自己头上来。’”

“主席说：‘我有三句话八个字，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现在紧张、严肃有余，团结、活泼不足，这里又谈到团结问题。我们这些人叫什么勤务员，有的是大司令，比我们还大。官一大了，有时就不民主。’主席对我讲：‘你这个人太急躁了。’又对刘政委讲：‘他要是急躁起来，你这个政委就给他泼点冷水。’”

刘丰："江青九·五讲话可能是主席的。"

曾思玉："要全面的看问题，要历史的看问题，又要比较的看问题。他承认山头，这是历史问题，要消灭山头，是要团结问题。反面教员要几个，没有几个反面教员叫独裁。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们。"

"当了权之后，不要脱离群众，不要盛势凌人。"

"那天三司革联开大会，很多车子，都被主席碰上了，主席说这些车子都该全去拉粮食，粮食都没拉回来。我对刘政委说，'今天是三司革联开大会。'主席才没做声，给你们解了围。你们要有一个战略部署，国庆前后联合起来，联合起来再怎么办。"

曾思玉："联合不起来是主席早就发觉了。主席 7 月 18 号就发觉了，就提出最新批示：'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这是在咱们武汉发现的，现在给大家交个底。"

刘丰："毛主席他老人家对我们武汉文化革命确实十分关心，他特别强调工人必须联合起来。他老人家讲：'工人阶级分两派，我就想不通。'不要吞并，群众要加入你那是没有办法，如果不加入你，也要跟别人联合，不要吞并，要联合。那个'九·一三'加入工总我就有点想不通，中央点名的，为什么他们取消？百万雄师还没转过来的，就硬把他弄到我们组织里来，这不是件好事。"

“张体学这个人如果今后检讨了，划清了界限，你们看可不可以用，你们考虑考虑。”

“按照他老人家的想法，解决问题是 7 个省市，河南、湖北是基本解决，领导班子都换了。大家考虑一下，10 月份搞一些人出来，搞个筹备小组，争取在元旦开个会，再在腊月 15 左右开个会，春节放假，好好让大家过个年。”

“大联合应该是无条件的，一讲条件就搞不成，我们大家都要向前看。响应总理‘联合起来！过好国庆节’的号召。要警惕，防止有黑手。联合起来揪后台。”

“516 我们这里有，我这个说法不是没有根据的，希望大家警惕。主席讲：‘现在是轮到革命小将犯错误的时候！’防止坏人利用山头主义，用更左的口号来搞得我们犯错误。”

“我个人意见：我们红卫兵小将不要多去干涉工人的事情。”

## 第 900 回：第八次，接见天津代表团　□□动，山城内□来和平

毛泽东关于大联合的讲话精神传出后，全国大联合之势来得很猛，出乎人的意料。就拿天津来说，整个天津就像炸开了锅，人人奔走相告，见面的第一句话就是："你校联合了没有？"

9月26日零时27分至2时20分，在人民大会堂，周恩来、陈伯达、谢富治第八次接见天津赴京代表团，陪同接见的有北京军区的郑维山、罗元发。同时被接见的还有保定赴京代表团。

郑维山说："没想到周总理来参加我们的会，这是很难得的机会。"大家热烈鼓掌。郑维山说："先请谢副总理作指示。"

谢富治："谈不上指示，几天没见面了。这几天，天津市是好形势，天津市工人阶级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联合起来了。下一步是搞大批判，斗批改，巩固大联合。天津这几天的好形势是毛主席伟大号召的巨大威力。我们要听毛主席的话嘛。按照林副主席说的那样，'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有些单位起了带头作用，如反修锦纶厂，南开大学'卫东'和'八一八'联合起来了，很好。

天津市是走在前面的。天津的事，是伯达同志亲自管的。武斗问题解决了，抓革命促生产问题解决了，下一步达成政治协议。在座的同志们再努一把力，解决两个问题：一是解决组织问题。以'五代会'为基础，先把组织从点、面上联合起来，这种形式比较好。以'五代会'为基础，加强扩大。五代会是中央承认的，

是伟大领袖毛主席提出来的。先把‘大联筹’和从未参加‘大联筹’和‘五代会’的组织，吸收进‘五代会’。第二步，是筹备小组问题。不能把筹备小组放在一边，天津成立革命委员会条件是成熟的。”

周恩来：“天津大大落后了，希望你们赶上北京，现在就赶上了。”

谢富治：“大家要再努一把力，要服从革命的利益、人民的利益，按系统联合起来。现在国庆节到了，欢迎同志们在北京过国庆节，一边谈判，一边过节。欢迎你们到观礼台上去观礼。”

众人鼓掌欢呼。

谢富治：“过节是好的嘛，但是过节要献礼，把你们组织联合起来，是最大的献礼。‘大联筹’的赵健敏来了吗？”

赵健敏：“来了。”

谢富治：“老先生，你怎么不能联合呀？”

周恩来：“你是按主席的指示办事，还是以我为核心？”

赵健敏：“我们主张‘五代会’内外造反派联合起来，我们不主张以‘大联筹’为核心，以‘大联筹’为核心，这个提法是错误的。”

周恩来：“大家都听到啦！”

赵健敏：“‘五代会’加强扩大了，我们‘大联筹’就解散。”

周恩来：“你是天工的吧？天工一派是革命派，但你们不能否定‘五代会’的革命派。‘大联筹’是跨行业的，应该归口嘛，

应该加强扩大‘五代会’嘛。加强扩大也好，充实也好，你‘大联筹’和‘五代会’不能成立两个政权对立。凡是革命群众组织都要吸收到‘五代会’里来，共同团结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按照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办事，按照毛主席指示的方向前进，才有方向。资产阶级路线是反动的，要打倒。不能自己创一个方向，以我这一派为核心，不管你造反多早，这样做都是错误的。《文汇报》已经批判了这个问题。”

接着周恩来又表扬了天津的大联合。并再次重申：“各学校要规定一个时间，都要回学校来，如果不回来，就开除学籍，不让毕业。你们有没有诚意接受这个协议？”

众答：“有！”

周恩来：“去外地串连的，中央已决定不招待，不开支。这一点，要靠你们自觉的执行，回到本校搞斗批改。客观条件已成熟，就是考验革命小将的时候，看你们听不听毛主席的话。”

“大联筹”代表：“天津已经联合，现在是如何巩固的问题，加强扩大‘五代会’的问题，成立革命委员会的问题。现提出以下几点意见：1、补充筹备小组成员，参加天津支左部队3名，‘五代会’代表15名，‘大联筹’代表15名；2、产生系统基层的新的代表会，组成临时工作小组……”

郑维山打断了他的话：“不要讲了，双方协商。让总理多讲一些好不好？”

众：“好！”

谢富治更明确的说："你们'大联筹'提的条件高了一点，你们要解散筹备小组另搞一个不行。要按总理说的，加强扩大'五代会'，代表不要争。说句公道话，'五代会'要多一点，'大联筹'要少一点。不要争名额，你5个我10个，'五代会'也不要争。天津的事情要协商，要把三结合搞好。天津400万人口，你一个学校三、四千人，当然管不好。赵健敏你就是管你们的天工，也不容易，不信你管几天试试看，管不好的。一下子把担子加给你们肯定是要把你们压垮的，北京不就是个例子吗？你们要按照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按照周总理刚才的指示去办，不要争名额，想压倒别人。你们还是按照主席的思想去协商。不能够表面上尊重'五代会'、筹备小组，实际上否定'五代会'、筹备小组，这是不对的。"

"大联筹"代表："'五代会'外的造反派数量还是很大的。成立起组织来，我们就回去工作，我们不是想当官。是把各代表会搞好，加强扩大'五代会'。"

谢富治："你这个意见好。"

"大联筹"代表："工矿企业百分之九十八的组织已经联合起来了，向首长报喜！我'工矿总部'宣布撤销。"

郑维三："既没参加'五代会'，又没参加'大联筹'的组织，也派代表参加搞'政治协商'好不好？"

众答："好！"热烈鼓掌。

周恩来："我提议，你们联合起来很好，南大、天大，你们

大专院校红代会，去天工找赵健敏去和他联合，带着倡议书去联合。”

赵健敏：“我们向大专院校提出了联合，我们再一次提出向他们联合。”

周恩来：“你们大专院校几个常委？”

众答：“7个常委。”

周恩来：“天工分两派，给他们两个常委。你们要有这种气魄，你们要做这样的联合。大专院校只要联合起来，常委名额多少，无所谓。”

赵健敏：“我们天工有三派，现在已经联合起来了。”

周恩来：“要把他们团结在一起，当然还叫‘红代会’，这是主席亲自起的名。”

陈伯达进场，群众起立鼓掌。周恩来退席。

陈伯达：“祝贺大联合！”“对天津的同志我很抱歉，以前我发了几次脾气，请原谅。天津的大联合是巩固的吧？已有好几次反复了。已经过去一年了，不会再反复了吧？所有的知识分子，要向工人阶级和农民学习。听说天津有一些人到郊区去抢粮食，这是错误的。农村的收割，还是按原来的生产队办事。自己种的，自己收，别人不能收，城市更不能去收。前天看到这个消息很不安，其他地方也要注意这一点，不要扰乱三秋，注意巩固工农联盟。工人要特别注意。如果有人挑动破坏秋收，要坚决顶回去。抢秋是错误的。”

这时的四川省，已经为刘结挺、张西挺是打是保闹得不可开交了。早在 8 月，“红成”和“826”两大派喊出了有趣的口号。

保刘结挺、张西挺的“826”派说：“张梁刘张好干部，敌人反对我拥护！”

“张”是指成都军区政委张国华，革筹组组长；“梁”，指司令员、革筹组副组长梁兴初。张、梁当然是在口号中被陪绑的。

反刘结挺、张西挺的“红成”派则说：“张梁蓝白好干部，刘张两挺烂萝卜！”

蓝、白是指坚决支持反刘结挺、张西挺的重庆 54 军副政委蓝亦农、副军长白斌。

进入 9 月，成都的“红成”派开始贴出“打倒刘张!”的大标语。他们对刘结挺、张西挺的历史和发迹史是很清楚的。不过以前都是从支持的角度去写，而现在却从“揭老底”的角度去揭发。张西挺原名简玉霞，为了紧跟刘结挺改名为张西挺，还有许多“轶事”、丑事都搬上了大街。

9 月 26 日，周恩来、陈伯达、谢富治等人在人大会堂接见了四川“红成”代表。周恩来规劝他们要“在毛泽东思想原则的基础上讲联合”，要“坚信中国人民解放军”，“支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对他们冲击中南海、绑架省委领导人的错误也提出了严厉批评，但并没有表示要追究，只要求他们做到“自己的疮疤自己揭开”，自己“承认错误”。

9 月 26 日，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杨成武、谢富

治、张春桥、姚文元、戚本禹、叶群等人还在京西宾馆礼堂，接见了河南、湖北学习班的成员。中央领导一上主席台，郑州大学的学生、“二七公社”代表刘松盛就冲上台去，给台上的领导每人戴了一个“河南二七公社”的红袖章，他们都欣然接受，并一一和刘松盛握了手。然后，由张春桥传达了毛泽东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的指示精神。接着江青讲话，第一句就是“我代表毛主席、林副主席向同志们问好，并欢迎同志们和北京革命群众、革命小将一块过国庆节”。最后周恩来讲话。当他讲到第二个问题时，主持会议的杨成武递给他一张纸，上面用红铅笔写了四个字：“主席来了。”

周恩来惊讶地“啊”了一声。顷刻，中央领导在主席台上交头接耳，喜笑颜开，主席台下，全场骚动，议论纷纷。周恩来很快结束讲话，当他说：“现在，我高呼毛主席万岁，好，毛主席他正好来了！”

此时，毛泽东已经走上主席台，会场沸腾了，“万岁”、“万万岁”的口号声不断。毛泽东和中央领导一一握手，前后有几分钟，就离开了会场。

在回政治学院的车上，一些参加学习班的老干部激动的以沙哑的嗓子，不着调子的节奏，挥着拳头打拍子，唱道：“大海航行靠舵手，万物生长靠太阳，雨露滋润禾苗壮，干革命靠的是毛泽东思想。”回到住处，已是午夜 12 点多了，人们仍然三、五成群地议论，有的干部还抱头大哭：“日日想，夜夜盼，想不到犯

了错误还能见到毛主席。”于是，大字报、小字报、决心书、检讨书，领导组收都收不及。以后的学习班上，常出现领导干部带着眼泪谈论家史，带着眼泪检讨错误，向毛主席请罪。

杨成武9月23日随毛泽东回到北京后，立即组织人将毛泽东视察沿途的指示进行整理。经过几天工作，将整理好的稿子抄好报呈周恩来、林彪、毛泽东，请他们审定。

毛泽东、林彪、周恩来让杨成武在军委常委扩大会上传达。

9月27日，军委召开常委扩大会，除军委委员外，各总部、各军兵种、院校和北京军区以及在京的各大军区和各省市在京的负责人，都出席了会议。

杨成武向与会人员传达了毛泽东在外地所作的关于形势与任务、上下级关系、军区支左、干部训练、抢枪以及有关军区的组织机构、装备、换防……等等问题的指示。总之，凡是他在本子上记的东西的，都向大家传达了，有的地方余立金还作了补充。

随后将可以公开的部分，以《毛主席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时的重要指示（记录稿，未经本人同意审阅）》为题，印发给各单位。

9 月 27 日，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在北京机场等候迎接谢胡为首的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叶群作为中央碰头会成员也早早来到了机场，但她左右看看，没见江青，一问才知道，江青今天不参加机场的欢迎仪式。于是，叶群也要借故离开。周恩来不让她走，说这是外事工作。叶群还是悄悄坐车溜回了毛家湾。

“主任不是接外宾去了吗？”工作人员见到叶群不解的问。

“我去了，但没等外宾到，我就溜了。”叶群不以为然地说道。

“那好吗？”工作人员不解。

“有什么不好？”叶群对工作人员的质问并没引起反感，反而兴冲冲地大讲特讲起她为什么提前退场的“道理”来：“我到机场一看，别人都陆续到了，唯独没见 11 楼。没有 11 楼，我怎么好出场呢？我对总理说，江青没来，我也不奉陪了，总理严肃地说，你走不得！总理说我走不得，他考虑的是外交，但我考虑的是政治。总理对江不出场并不在意，但我抛开江而独自在那里显示自己，这对她不是一种不尊重吗？我对总理说，江青来，我们两个都是妇女，我才不感到孤单；她不来，就我一个女性，多么孤单哪！总理板了板面孔，不高兴说，这成什么理由？你既然来了，不能走！我见和总理正式请假是脱不开身了，就趁后来总理没注意，偷偷地溜了！”叶群叙述到这里，洋洋得意地大笑起来。

“总理说得对，江不去，你就溜，这不成理！”又有个工作人员见叶群的情绪颇高，故意刺了她一句。

“你们不懂！”叶群继续表白说，“你们不懂江的分量，总理也不一定懂得这个分量。反正我认准了一条：首长要紧跟主席，我要紧跟江青！今后她走到哪我跟到哪，她不去的地方我也不去！”

9 月 27 日,《新重庆报》在头版刊登了毛泽东最新指示："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并且第 2 版刊发社论《革命大联合只争朝夕》，文中提到："一个革命大联合的高潮，以奔腾澎湃之势，迅速涌现在山城。"号召群众"增强党性、克服派性"，促进革命大联合的尽快实现。

当天，重庆两大派组织在学习毛泽东指示后立即行动，两天内，统一的革命组织："重庆市财贸系统无产阶级革命派总指挥部"正式成立；两天内，有五十多个单位实现了革命大联合，全市生产一度恢复。直到9月29日，在两派基本实现停战、中央调查组和四川省革筹调查组一再要求下，重大"301野战队"从华蓥山区撤回，在北碚向驻军上缴武器。当这些学生回到学校，就像久经沙场的战士解甲归田一样，大家狂跳，乱吼："好了！完了！大联合了！和平了！要武斗，再从拳头重新开始升级吧！"

华蓥山根据地解散，标志着1967年的重庆武斗正式结束。……从重庆市的两路口一直到朝天门红港码头，到处是战争的遗迹和战后的恢复景象。

河运校、解放碑交电公司可算是首屈一指的战争纪念物，经过战火摧毁之后，全剩些光架架了。红港大楼上密集的斑斑弹痕，记下了"八八惨案"。在大楼前的街心花园里，有一个新垒的土堆，上面压满白花，前面有一个木牌，上写："八八事件殉难烈士"……

街上人不少，大都是出来看稀奇的。

电车线正在修复。“人交815”写出大标语：“向抢修线路的五十四军学习！”

一辆辆汽车在街上奔驰。为了避免检查站的解放军多此一举，因此车上都挂着牌：“邮政专用车”、“粮煤专用车”、“蔬菜专用车”、“毛著印刷专用车”等等。

小街上的垃圾堆如小山，现在正被一车车拉走。

7、8、9 三个月，重庆因武斗导致大批职工外逃，工厂停产，3 个月工业总产值仅完成 2.4 亿元，相当于 3 月份的 75％。

## 第 901 回：□山头，广州市形势和缓　说东北，春桥谈江苏□□

广州形势也开始缓和下来了。9 月 22 日，广州市人民汽车公司恢复，全市上午 6 时至下午 17 时 30 分正常行车。广医“红旗”与中大“红旗”达成一致意见，同意铲平“红司”、“三司”和“新一司”这“三个山头”，加强红代会（筹），同时不插手工人运动。

9 月 23 日上午，广医“红旗”、中大“红旗”、华师“红旗”、暨大“东方红”、体院“革命造反总部”5 个群众组织，在华师举行串连会，会后发表联合声明，呼吁立即解散“红司”、“三司”和“新一司”这三个司令部，铲平山头，全力以赴搞好广州地区大专院校红代会。

9 月 24 日，“红司”、“三司”、“新一司”、中医“三〇一”联合发出关于解散三个司令部的决定。

从 9 月 14 日至 21 日，作为中央调查组负责人之一的陈郁，先后三次接见新中国造船厂的两派代表，在听取双方的汇报之后说：“新中国船厂的革命形势较好，即使在武斗盛行之时，也未发生过大型武斗。”他希望新中国造船厂在恢复正常生产秩序，制止武斗等方面，为广州六大船厂树立一个榜样，“破私立公，不要小资产阶级派性，要无产阶级党性，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团结起来，联合起来，共同对敌”。9 月 26 日，新中国造船厂两派代表进行协商并达成协议，在保留各自组织的情况下，联合起

来。这是另一种联合形式，即虽然是两派联合，但各自保留自己的山头。

9 月 27 日，周恩来在北京接见广州地区双方赴京代表时说，“旗派”和“东风派”工人是人为的两派。他说：

“你们‘旗派’就那么造反，就没有挑拨的坏人吗？‘东风派’就没有坏人挑拨吗？你们不是共同批修，不是求大同，而讲小异，就是头脑中的私字作怪，有了私字就受外界影响。”

“你们头脑中的私字，派性，无政府主义，打倒一切，怀疑一切，就会被敌人利用，本来可以共同战斗的，都会因此而分裂，不能联合起来！你们都要去掉‘私’字，建立‘公’字。不要派性，要党性。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联合起来，抓革命，促生产。”

他强调，不能把矛头对准军区。犯了执行反动路线的错误是内部矛盾，不能搞成敌我矛盾。

他提醒大家：“广州既要防止极左情绪，又要防止右的情绪。我们批评极左，不能让右的思想复活；批评右的思想，不能让极左思想复活。”

在谈到恢复社会秩序时，周恩来说，公安部门在业务上不能分派，“现在公安机关瘫痪，派别很多，我们必须实行军管。”

他说：事实证明，军管是一个有效的办法。机场、铁路、仓库、码头、港口等，都要实行军管，不容侵犯。“既然你们承认军区领导，军区领导就要拥护，铁路、航运码头、机场的军管，

要保持交通运输，才能过好国庆。不要干涉解放军巡逻，你们工厂、学校、机关有组织的枪上交了，但分散的枪，还有坏人要捣乱的，军队要派人巡逻，慢慢将治安恢复起来。”

周恩来再一次强调，群众组织“不仅要整风，而且要联合。不能先整风，后联合，在整风过程中就要联合，边整风边联合。工人阶级的联合，还要抓革命、促生产，工人同志是很懂得这点的。工人要带头。毛泽东思想是衡量一切的标准。山头和派别要在整风中去掉，特别重要的这一点就是打倒私字，斗私是毛主席整风的主要精神，就是用团结－批评和自我批评－团结，用批评和自我批评，不要你挑我的短，我挑你的短，要批评自己的短，学别人的长处，取长补短，缩短距离，不这样就要打起来了。”

这天，广州一部分工厂企业、机关事业单位，开始了大联合。文冲船厂、广州化工厂、广东新华印刷厂、中南局直属机关、省委党校等 16 个单位，成为最早实现大联合的一批单位。虽然这种联合，只是一种形式，内部的矛盾，仍然尖锐激烈，但武斗毕竟暂停了。

“地总”莫超海在国庆节前，赶回北京复命。在出席国庆招待会后，周恩来单独接见了莫超海，听取他的汇报。

9 月 28 日，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在体育馆召开宣判大会，对 5 名“现行特务分子”，分别做出从无期徒刑至 12 年有期徒刑不等的判决。

杨成武回到北京后，谢富治告诉杨成武，江青几次大发脾气，

说杨成武整了她的黑材料，要放长线钓大鱼。杨成武知道，是关于饶漱石专案组 4 月从上海带回来那箱关于江青匿名信材料的事情。林彪提出“集体销毁”的批示下来后，杨成武就在 7 月 13 日随毛泽东南下了，此事就一直搁置了下来。他将情况向周恩来作了报告，请示如何处理。周恩来明确指示：由谢富治、杨成武、汪东兴三人监销。

9 月 27 日，饶漱石材料专案组副组长王育民接到通知，将 4 月 17 日从上海带回北京后一直存放在办公室的那箱关于江青匿名信的材料，送到中南海勤政殿汪东兴那里。

材料送到中南海勤政殿后，大家先按目录核实材料无误，然后由谢富治亲自点火，王育民负责向火里一卷卷扔材料，谢富治、杨成武、汪东兴三人坐在一边守着，谁也没有翻看材料的内容。谢富治说：“谁说我不亲自动手啊！”

烧完后，谢富治、杨成武、汪东兴三人都在报告上签了自己的名字。时间是 1967 年 9 月 27 日下午。这个报告和林彪和周恩来在陈虹和王育民 7 月 7 日按照杨成武口述内容写的那个报告上的批示原件，都存放在中央办公厅汪东兴处。

9 月 28 日 0 时刚过，周恩来接待完世界各国应邀前来参加国庆观礼的国际友好代表团，再次接见东北三省的群众组织代表。

周恩来首先讲了全国文化大革命的形势，传达了毛泽东视察南方的最新指示，再次提到：“毛主席说，现在该是小将犯错误

的时候了，我们要用我们自己犯错误的经验教育小将。”

他说：“你们总是强调你们的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仅大方向正确，方针路线错了，大方向也谈不上；方针路线错了，大方向也无法实现。”他举了自己亲自领导的八一南昌起义的例子说：“八一南昌起义时，我只有 29 岁，你们中有 29 岁的吧。那时我头脑里也没有多少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不过根据当时我们党总结第一次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党要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党必须掌握枪杆子，必须有自己的武装，自己的军队，所以根据这一思想，我参与领导这次起义，谁能说大方向是错误的？大方向正确的嘛！可是，方针路线错了。结果失败了，让人家打散了。”

接着，周恩来讲部队的“三支两军”工作。他说，由于“三支两军”的任务繁重，又是面对这样复杂的新生事物，缺少思想准备。因此，在“三支两军”工作中，难免会出现这样那样的缺点和错误。“但是，我们要相信我们的子弟兵，他们会随着运动的深入开展而受到教育，逐步克服和改正那些缺点和错误的。我们的指战员在人民面前是‘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这是任何军队所不能做到的。你们要支持部队的‘三支两军’工作，不能攻击他们，提出‘揪军队一小撮’是极端错误的口号，你们现在为什么还揪军内一小撮？揪谁呢？揪沈阳军区？为什么要这样势不两立？”

他又进一步询问各地关于停止武斗和工厂生产的情况，然后

说："工人阶级为什么要势不两立？黄埔港有四、五十条船停着，湛江港也这样，广州半个月没开出火车来，你们心里安不安？文化大革命已经进行了 15 个月，再搞 15 个月还行啊？还要放假闹革命、第三次大串联，大错特错嘛！"

他指出："军管会要维护交通，这是死命令！哪一派阻碍铁路运输都不行，要抓头头。封存上缴枪支，通过大批判、斗私批修实现革命的大联合，这是重要的任务。"

周恩来传达毛泽东的最新指示：要通过大批判促进大联合、斗批改，实现革命的三结合。他说：中央要求吉林问题在年底前能够解决。

此时，沈阳三派代表，还在一些枝节问题上争论不休。杨成武制止说："让总理休息吧，总理到现在已经两天没睡觉了。"这样接见才算结束。

9月28日，中央首长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西大厅接见江苏省赴京代表团。康生主持。他说：

"今天晚上第一次和同志们见面，时间很晚了。张春桥同志，张政委明天要走，他对江苏情况比较了解，我对江苏情况是今年春天接见南京来的同志，才了解一点，其他如常州、无锡、苏州、南通、扬州根本不晓得。现在和同志们一道学习。"

张春桥说："首先，我想应该说一下，对江苏问题的解决，我也没有完全尽到责任。以前是一般的义务，2月份后毛主席叫我和姚文元同志关心一下江苏问题，因此5月份去了一次南京、

镇江、常州、无锡没有去，离上海最近的苏州我也未去，南通，苏北更没有去。徐州主要是济南部队管，我和王效禹同志商量了一下，他去过了。所以，我应该首先说我有责任，当然事情也不只是哪一个人的责任问题，可能时机未到，矛盾还没有暴露够，你们都没有感到需要解决问题，打也没有打够，武斗没有斗够，打倒曾邦元、文凤来的标语没有刷够。在你们没有打够的时候，我们出来说话没有作用，这是实话。

5月份，在南京我和姚文元同志研究，根据我们判断的情况，讲不讲话？既然来了，不讲话不行。讲了效果也不大。当时我说过，我今天讲的这些话，请你们考虑，如果有些道理，就照办。不对，你们就打，算我是胡说八道。果然，效果不大。你们认为我说的是胡说八道，我的话只管10天，没有10天就干起来了。所以，矛盾没有暴露彻底之前，问题难以解决。这不是我个人估计，主席也是这样看的。7月初6月底，主席曾说江苏形势很好，大有希望。为什么？江苏军管会，无锡，常州军管会也瘫痪了。大概可以解决了。但后来证明只是瘫痪了，武斗还没有斗够。

7月中旬，我在这里见过江苏三派代表，那时候就谈到能不能达成制止武斗的协议，他们说可以，以后又说第一把手在南京，要到南京去谈判。实际上一边谈判，一边武斗，你们以为武斗可以解决问题。那时候有一种思潮：‘武装解决问题’，‘武装夺取政权’。不知道你们是怎么样想的，最激烈时，‘827’退到下关，那时候我们想出来说话，主席说慢一点，他们还可能没有

打够。我们现在不知道你们是不是打够了？”

文凤来答：“打够了。”

康生说：“如果没有打够，你们回去再打。”

张春桥：“开始，我们对武斗也是着急的，但着急没有用，只好让它打。我不是提倡武斗，我是反对武斗的。但你们要打，有什么办法？你们打够了，就会感到需要到这里来谈判了。证明主席的看法是完全正确的。如果你们觉得还不够，还要干，我们有这个耐心等待。”

曾邦元：“群众是不愿意等待的。”

张春桥：“是啊！群众不会同意。5月份，我谈过，这样干下去群众会抛弃你们某些人。

现在，全国形势很好，已经成立7个省市革命委员会，有8个省市已经建立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基本方向定了。主席希望在年底前再解决10个省，其中毛主席提到江苏。主席希望江苏的问题能够在年底以前解决，当然到那个时候解决不了再说。主席提出这个希望是有根据的，觉得你们打得差不多了。这样华东地区，还有福建也是希望今年解决。现在华东地区，山东、上海已经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安徽这几天发展很好，浙江基本解决了，江西也解决了，剩下的就是福建，江苏的问题等待解决。这次我们到南昌看了，也是形势很好，他们那里发的枪和夺的枪有7万支，大多数是发的，我们去的时候已经收回5万多支。现在就剩下一个江苏，一个福建，这两个省。一个是前线，面对金门、马

祖；一个面临长江口，也是前线。如果江苏问题解决了，对保证上海地区的生产和江苏本省的生产都有很大好处。我们不能不想到这一点，而且对于战备也是需要的。我们不能忘掉敌人。既然条件成熟，又有需要，我们觉得可以来解决问题。是不是到了解决问题的时候了，请同志们考虑。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要解决问题，今天军队的同志来了，希望军队的同志把思想清理一下。因为江苏是在军管会领导下进行文化大革命和抓革命，促生产的。如果军管会本身有缺点错误，不马上改过来，或自己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理解有偏差，就很难把江苏文化大革命搞得很好，而且在这一方面是存在一些问题的。南京军区，省军区，27军这是主要的，当然60军也有一部分，我希望这几个单位的领导同志在一起很好讨论一下，江苏形势，究竟有哪些缺点错误，有多少，下决心改正，不要掩盖，虚心听取革命群众的意见。如这个问题解决得好，那就能够保证江苏文化大革命顺利发展，这是决定性的关键。而且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大家都要互相学习，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是很重要的。这是军队问题。”

## 第 902 回：要联合，张春桥保许世友 □路□，无□“主力军”回家

张春桥接着说：“群众组织之间的问题，要搞大批判、大联合，三结合，这是总的方向，应该牢牢掌握住。在目前江苏发展也很快，就我看到的一些材料，大批判开始了，有些搞大联合了，铁路局就实行了大联合。听说南京大学进展很迟缓，如果南京大学进展迟缓就不能不是一个问题。使人感到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问题难办多了。毛主席讲：‘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主席说，我就想不通，为什么造成对立的两派？研究了上海为什么没有成为两大派。南京、上海在沪宁线两端，一月形势南京和上海是一样好的。‘一三事件’那时候你们是并肩战斗的呀！那时候是一派，如果说有两大派，另一派是‘赤卫队’。上海‘赤卫队’问题的解决靠江苏革命派的帮助，因为一些人逼得跑了，到苏州、无锡、常州，最后到南京。上海、南京造反派是联合作战的，大家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那时形势多么好呀！上海没有接着来一个分裂，但是南京分裂了。这一些原因，我希望同志们好好的想一想。毛主席说，为什么上海形势比较好呢？没有发生大规模武斗，无非是你不去搞武斗，警备区也不去挑动武斗嘛！又说，北京为什么没有武斗，就是谢富治同志，……没有去挑动。上海革命群众组织，革命干部，军队三方面关系处理比较好，所以局势始终比较稳定，

没有发生比较大的分裂。内部矛盾是很多的，几次要大分裂，我们都处理得很好，问题解决得好。因此，毛主席说工人为什么要分裂？一个工厂分为两大派，而且你死我活。第一个原因就是有走资派操纵，挑拨。调查一下几个地方的情况，没有一个超出主席这个估计，都有人挑动。如果不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就是造反派内部混进了坏人，这些人就是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或者坏蛋、特务，利用你们造反派的缺点错误，利用一些不正确思想来搞阴谋活动。第三，造反派的私心杂念，特别是领导人的私心杂念，什么以我为核心呀！争席位呀！受小团体主义、山头主义、无政府主义思潮的影响，有些人就是想搞以我为核心，到处发展势力，把别人打垮。道理说不过，就动武；拳头不行，就开枪。上海有一个大学，造反派是比较有名的，但他们就是联合不起来。彼此私下都承认是造反派，但是写标语就说对方老保，目的就是要争以我为核心。主席所以说，以后不要提以我为核心，核心不是自封的，是在斗争中形成的。要我去劝说他们联合起来，不要去争这个核心，争核心没有什么必要。你执行的路线正确，群众就会选举你。主席说：‘人家要我为核心，我还不要呢！’遵义会议，主席领导地位已经确定，但没宣布以他为核心。遵义会议以后的十年斗争中，形成了以主席为核心。

这三个原因，一个是走资派，一个是造反派内部混进了坏人，再一个是造反派存在私心杂念，特别是领导人的私心杂念比较多，这是造成分裂的三种情况。这三种情况有时在一个单位同时

存在。至于江苏、南京、无锡怎么样？我们没有很好调查研究。请同志们考虑，究竟是什么情况？安徽就是刘秀山那么几个坏人，两派那么武斗，把黑手一揪，问题就解决了。证明毛主席的分析非常的正确。把这些黑手一斩断，群众很快就联合起来了。究竟什么问题障碍着江苏问题的解决？希望同志们加以考虑，你们情况熟悉。这是谈的原因。

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还是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这个方法是我们党在毛主席领导下所形成的光荣传统。多少年来，从井冈山，从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以来，就是采用这个方法。毛主席讲嘛，有些同志看古田会议决议，不知道那里面批评的是谁，没有点名，问题解决了。以后形成了一个概念，就是团结——批评——团结。最近，主席特别强调自我批评，不要批评对方。这次坐火车，一个列车上就有三派，毛主席就找三派谈话。三派在主席面前辩论了两个小时。主席说：我看你们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应该联合嘛！三派还有些不想大联合，都指责对方，不是自我批评。主席说：不要讲人家的缺点错误，你就讲你自己的。这一点可不大容易了。等到他们从主席那里出来，又跑到我们的这个车厢来了，还是谈这个，说对方是老保，说有原则分歧，其实没有多少原则分歧。联合以后总还有原则分歧的，是否有原则分歧就要分裂？特别搞组织分裂呢？毛主席语录135页那一段，特别是‘实行公开的群众性的自我批评 （各方面只批评自己，不批评对方）而彻底改正之。’

这两句希望你们好好学习，先实行这一条指示行不行？”

群众代表答：“行。”

张春桥：“不见得！”“这次我们在毛主席谈了以后，一直同三派做工作，火车离北京还有3小时了，我说怎么样？还不能联合？又说：主席跟你们讲了，两小时还不能联合，那你们回去怎么交账？在这样的形势下他们才达成了联合协议，到主席那里去报喜。主席说：‘祝贺你们，送你们四个字：斗私，批修。’‘斗私，批修’就是这样来的。如果私字不去掉，无法达成大联合的协议，达成了也还会分裂。就是把黑手斩断了，不把私心杂念去掉，特别是造反派领导人头脑里的私心杂念去掉，就不能大联合，三结合，联合了也是不会巩固的。有些人对三结合不感兴趣，因为他已是当权的了，不愿意解放干部，那样又要领导我们了。也不与军队结合，那样他不能独断专行了。因为私心重，派性大于党性，党性抛在一边，不看大局，不照顾阶级的根本利益，那么这要闹到什么时候才联合呀？当然总有一天要联合的。批修，就是搞大批判。这四个字是互相联系的。要把修正主义那一套，刘邓陶那一套，彻底批倒批臭。这四个字不仅是解决大联合以后的问题，在江苏能不能首先用这四个字解决大联合。联合是为了革命，为了批修。要批修就要斗私，要斗私就要批修。”

张春桥问：“无锡‘626’是不是都回去了？”

有人答：“没有。”

有人答：“回去一部分。”

张春桥："常州'主力军'回去了没有？"

有人答："回去了。"

张春桥："全部回去啦？苏州那个地区相反，'踢派'在城里。那些地方要首先执行制止武斗协议，没有协议，要订个协议，首先要把武器收回来。常州是武装回去的，当时我在上海一听，就说糟糕，这个形式回去怎么行，非打不可。应先达成停止武斗的协议，把枪放下再回去。在城里那一派要负更多责任，应该敲锣打鼓欢迎他们回去，把他们请回去。被打到上海的主要是工人，少数是学生，这样搞谁高兴？还不是走资派高兴！到上海去的有的把老婆孩子都带去了，现在天冷了，没有衣服，因为人太多，没有办法解决。被打到上海去的有五、六万人，最高潮达到10万人。安徽走的早些。这一方面，希望南京军区，省军管会，各地的军管会，还有27军要主动帮助解决，劝说他们回来。无论如何不能采取武装打回去的办法。我们表示过这样一个意见，我已向主席汇报了，也告诉了杜平同志，就是先达成停止武斗协议，不要武装打回去。主席同意了这个意见。只有达成协议，只有把武器封存起来，才能解决。中央决定一定要武装左派，要发枪，但有个条件，等到大联合搞好了，局势稳定了才发枪。现在枪在你们手里没有什么好处。南昌、武汉造反派说：最初都非常想枪，第二步夺枪，人家有枪去打你，就只好夺枪。现在就怕枪了。因为局势缓和了，枪没有办法放，生产带枪怕丢了，晚上睡觉放在枕头下边。最后就交还了。现在你们不交枪，武装左派就无法实

现。现在有的枪流落到坏人手里。有的把枪卖了，有的把枪换东西了，谁知道你们把枪换给了什么人？你们把枪交回来了，彻底清理一次，再把队伍里的坏人清理了，编成班排，进行军训，然后再发枪。我们过去也是带枪的，而且是来之不易的，但是也交了，现在我身上就没有枪。所以，希望你们按中央指示把枪交回来，一是为了制止武斗，一是为武装左派准备条件。

我今天只能说一般的意见，我们估计，也是主席的估计，觉得江苏的问题到了解决的时候了，希望在年底前解决。”

“在这里，我顺便说一说对许世友同志的问题。因为南京贴了大标语，准备开大会，提出 ‘打倒许世友’的口号。我们说这不符合实际，如指责许世友同志一贯反对毛主席。这个问题我向主席汇报了，主席说：这不符合事实，许世友同志没有反对过我嘛！至于四方面军的问题，那是张国焘的问题。是过去的事，张国焘负责。我看了你们的传单，完全是胡说八道。在延安罗瑞卿把许世友同志押起来，是主席下命令放的。我看了传单，说许世友同志反对毛主席，被关起来，是彭德怀放的，这是胡说。这完全是颠倒事实，颠倒了是非。是罗瑞卿关了许世友同志，主席放出来的。”

康生插话：“许世友同志是坚定地站在毛主席这一边的，解放战争和我在一起嘛，我是他的政治委员嘛。一系列战斗，打济南，打兖州也好，打淮海战役也好，都是很坚定的。而且是在毛主席，林副主席领导下的杰出的军事家，也是党的一个好同志。

同志们要我介绍的话，还可以举出好多例子。在抗日战争，在山东，以至于反对彭德怀、罗瑞卿，他一直是站在毛主席一边的。”

张春桥：“当然许世友同志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犯了错误，有些可以说是严重的。但许世友同志对自己的错误有正确的认识，他向中央表示，南京军区前一段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他负主要责任，愿意作检查。最近他身体不好，中央要他休息。”

康生：“文凤来同志、曾邦元同志要分析一下，你们是知道的许世友同志是一贯的反对江渭清的。”

张春桥：“梁、吴、杜起来造反是他支持的嘛！那时候，他能站出来反对江渭清，支持梁、吴、杜是不容易的。在浙江问题上他提出的三点是完全正确的。”

康生插话：“在安徽问题上，许世友同志对严光同志保李葆华压‘八二七’，许世友同志提出的批评都是正确的。”

张春桥：“我们没有看全部的传单，有些传单是很坏的，完全不符合事实。如攻击田普同志是‘南京的王光美’，说他到北京搞夫人外交。这样把叶群同志骂进去了，把江青同志骂进去了，而且把我也骂进去了。我不知道是谁搞的，这样的人是站在什么立场上。任何一个人都可以给主席、林副主席送材料嘛！那么我们向中央送材料就是搞夫人外交，这不是把毛主席、林副主席也骂啦？这些，南京的造反派没有人出来抵制，被派性压倒了。这样把我们党说成什么呢？我看了很生气，哪里像个造反派讲的话？我希望同志们对许世友同志的问题要有个正确的认识，不能

敌我不分。那时有一股风嘛，到处揪军内一小撮，而且不去调查，道听途说，又没有历史知识，根据自己的想象就一定要打倒。最后，我给文凤来同志打了电话，北京给军事院校也是打了电话的。我当时讲一是会不要开，二是口号撤销。我说这不是我个人的意见，是中央文革的意见。当时文凤来表示坚决照办。中央调查组做了工作。这证明造反派是听话的。这个事情已经过去了，我不是算这个账，只是说一说，当作一个教训就是了，利用这个机会说一说，希望同志们了解这个情况。当然，这不排斥同志们对许世友同志的批评，善意的批评，同志式的批评，我们是欢迎的。这对我们也是一样的。”

张春桥讲完后，康生说：“同志们，我觉得张政委讲话对解决江苏问题是很重要的，也可以说是根据毛泽东思想提出解决江苏问题纲领性的建议。同志们照办不照办？同志们考虑。我觉得这个讲话是根据毛泽东思想提出的，是解决江苏问题的一个纲领性的讲话，希望同志们好好的研究思索，好好地考虑一下”

他提出几点建议：

第一、不要串联；

第二、不要四处张贴传单，特别是武斗中打伤打死人的材料，照片，传单；

第三、将带来的武器赶快交到北京卫戍区。在中央开会不能带武器；

第四、开会千万不要再搞打、砸、抢、抄、抓；

第五、开会的时候，有意见尽管讲，但是不要骂人；

第六、不要在小节问题上争论不休。

9月29日晚20时40分，回到上海的张春桥、姚文元接见上海铁路局系统包括上海、南京、蚌埠、杭州四个分局在上海谈判大联合的全体代表。张春桥一开始就说："我说出来同志们会感到很痛心，毛主席原计划坐火车从南京走，结果无法走，常州不通，不能走，你们不痛心吗？"对南京铁路分局已经开始的大联合他很高兴，同时督促蚌埠、杭州两个分局的群众组织尽快实现大联合。

9月30日，在上海、苏州的无锡"主力军"被无锡军管会接回无锡，全部人员数千人暂时全部集中居住在无锡市第一中学校院内。在镇江的"主力军"10月15日由无锡军管会接回无锡，全部集中居住在老轻院内。

## 第 903 回：淮北市，发生“九二九事件”　俩书记，被学生拷打致死

1967 年 9 月，安徽淮北市发生了一起中学生红卫兵绑架市委书记，将他们拷打致死的惨案。

卷宗上记录的时间：9 月 28 日晚 9 时许。

淮北市委三楼会议室。窗户用毛毯蒙着，灯泡用绿纸包着。墙上，靠着好几根木棍。十几个学生，手持着凶器。他们是淮北市第一中学“红卫兵第三造反司令部”的红卫兵。站在中间的那个壮小伙子，袒胸露臂，整个气氛阴森而又恐怖。共产党的市委办公大楼如同国民党的“白公馆”。

他们面前是被蒙上双眼的淮北市委书记高心泰、市长孟庆林、淮北矿务局党委副书记王振林。

绑架市委书记的行动，淮北市“红三司”的司令李跃和当时并不知道。

李跃和出生在淮海战役那一年。他的第一声啼哭唤来了刘邓大军的炮火。“淮海”便是他的乳名。父母是含辛茹苦的农民，却不希望儿子长大种田。5 个孩子，只让他读书。他天资聪敏，在学生中享有很高的威信。他是淮北市第一中学的学生会主席、高三级团支部书记兼班长。

“文革”初期，李跃和作为党员发展对象，被校党委派往郊区农村宣传《十六条》。回校后，已是满园风雨，校党委处于风雨飘摇之中。

李跃和本不是一个赶浪潮的人。大串连，同学纷纷南下北上，李跃和却去偷偷地请示一下校长。校长凄苦地笑了笑，他便老老实实蜗居校舍。后来，在几位老师的鼓动下，他才去了一趟北京。正赶上毛主席最后一次接见“红卫兵”。他心中的圣火就是在天安门广场被点燃的。

他本来准备报考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北大的烽火却把他引向了另一条路。回到淮北，他便扯旗造反成立了“红三司”。他组织过对市委“当权派”的批判和“炮轰”。这是因为运动初期，市委派往一中的工作组，把学校一半以上的老师打成了“牛鬼蛇神”，戴高帽，挂黑牌，关牛棚。手段是残酷的。更有数以百计的学生被划为“黑五类”。

后来形势变了，学生们造反，也让市委的头头们戴高帽、游街。李跃和说，这叫“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尽管如此，“红三司”还是被支左部队打成了保守组织。许多同学反对他的“右倾”，又敬重他的人品。于是，拉着他“前进”，推着他“前进”。

此时，李跃和听说了绑架市委书记的情况，来到淮北市委三楼会议室，扫视了在场那一张张熟悉的脸庞，这时个个脸上都杀气腾腾。这么大的行动竟然把他这个“司令”蒙在鼓里，李跃和的脸，一阵红一阵白。

“谁抓来的？”李跃和的口气比询问严厉，比训斥温和。

“王振林和孟庆林是我带人抓的。”拍胸脯的叫刘江，李跃

和的同班同学。

“高心泰是我带人抓的。”又一个拍胸脯的绰号叫袁大头，他才 14 岁，初中一年级的学生。

一个人不耐烦地吼道：“要革命的请过来，不革命的就滚蛋，问什么？”

他不是“红三司”的学生，是徐州来淮北“串连”的，自称是“无产者造反兵团”的“飞虎队长”。强龙偏压地头蛇，他不把李跃和放在眼里。只见他举起右手，大声说道：“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毛主席教导我们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

接着，十几个红卫兵不约而同地接了下去：“……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谦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

李跃和的情绪镇定下来。他瞥了那人一眼，又看了看本组织的副司令张冬，用命令的口吻对刘江说：“你把王振林、孟庆林带到隔壁去批斗。我有几个问题要问问高心泰。”

说着，便坐到主审席上，“‘袁大头’录音。把现场录下来。”

那么，这群红卫兵为何要绑架市委书记、副市长呢？

淮北市是新兴的工业名城。它以煤、电、酒三大优势产品著称国内。一位诗人说它地下埋藏的是火；开发的是火，酿造的也是火。淮北人的性格就像火一样热烈、坦荡和豪放。“文化大革命”的“烈火”，也将这个新兴的工业城市点燃了。

虽然淮北远离合肥，但仍然无法摆脱省城两派的影响。它离江苏省的徐州很近，“支左”部队也是徐州驻军派来的。各派组织都在徐州寻找自己的同盟。当地武装部隶属南京军区。而淮北的“支左”部队隶属济南军区。淮北市也形成了“红卫兵战斗兵团”、“井冈山造反派”两派群众组织。

两派从文斗到武斗，由赤手空拳到组织武装。武器，“红卫兵战斗兵团”从当地人武部“夺取”。“井冈山造反派”则从野战部队“夺取”。其实都是明抢暗送，部队各支一方。

两派群众组织毕竟“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只是鼓噪，并未动手，那形势叫“山而欲来风满楼”。到 1967 年 8 月，毛主席一发出“大联合”的指示，淮北市的“红卫兵战斗兵团”、“井冈山造反派”两派便于 9 月 3 日签订协议握手言欢。

但是，从徐州来的“支左”部队于 9 月 6 日公开发表声明：不支持这个联合。“井冈山造反派”革命，“红卫兵战斗兵团”派保守，保守派必须向革命派投降，否则就叫折衷主义。

他们还于 9 月 8 日派出一个营的兵力协助“井冈山造反派”包围了“红卫兵战斗兵团”派总部。迫使“红卫兵战斗兵团”派倒旗缴枪。

“红卫兵战斗兵团”派不敢和部队发生正面冲突，当晚逃离了市区。只有李跃和率领的“红三司”冒着生命危险抢占了市委大楼。他们付出了血的代价，刘江就是被对方抓俘的一个。当他和几位战友带着累累伤痕逃回“红三司”的时候，李跃和用兵团

的大旗拭去了他们额头上和躯体上的血迹。

几百名学生爬上市委大楼顶层的平台，集合在“红三司”的战旗下，面对重围，一遍又一遍地背诵：“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也就是从 9 月 8 日那一天起，刘江的心里便埋下了复仇的种子，他原来是想抓两名公开支持“九·八事件”的市委常委打一顿，说是“以牙还牙”，以解心头之气。

9 月 28 日晚，刘江串通几个学生前去抓人，结果扑了个空，并且遭到了石块的袭击，在返回的路上，迎面碰到了孟庆林、王振林这两个“走资派”。气正无处可泄。刘江灵机一动，顺手牵羊，把他俩给抓了回来。

袁大头讥笑刘江：“要斗，就斗大走资派。副市长算个屁！”他又带领一群初一的学生，抓来了市委书记高心泰。这场刑讯，是刘江等人计划内的，抓他们三人却又完全是计划外的，甚至有些偶然。

审讯开始了。

“高心泰，你参与‘九·八事件’的策划没有？”李跃和逼视着市委书记。

“没有。我不知道‘九·八事件’是怎么回事。我是两派都打倒的对象，怎么会参与策划呢？”

“妈的×。不老实，揍！”那个徐州来的一拳把高心泰打翻在地。

现场的七、八个学生跺着楼板一起嚷着：“揍！揍！”

一个个天真烂漫活泼可爱的青少年一时间变得凶神恶煞般残酷无情。他们疯了！

李跃和愤怒地拍着桌子："不要打！不要打！让他老实交待问题。"

对于司令的制止，副司令张冬不仅没有表态支持，反而也大打出手。而他的行动又直接影响了其他人……大家又是拳打脚踢，一阵猛捶。

虽然李跃和没有参与动手打人，但他质问高心泰是否参与"九·八事件"的策划，无意中给刘江等人复仇的火焰加了油，失控，是必然的。

高心泰身材魁梧，却患有高血压、糖尿病。对于这一场暴行，他更毫无精神准备。在袁大头带人去抓他的时候，他还安慰哭泣的女儿："革命小将叫我去检查错误怕什么？爸爸一会儿就会回来的。毛主席教导我们领导干部要过好群众这一关。我要听毛主席的话，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正确对待革命小将的革命行动。"他用握过枪的大手轻轻擦去女儿眼角的泪水，是那样从容，那样自信，那样胸怀宽阔，那样襟怀坦白。当他眼睛被蒙上的时候，当他被绳索反绑的时候，他还笑着向学生们宣传："你们应该听毛主席的话，要文斗，不要武斗。""小将们，我理解你们，尊重你们，正确对待你们。但也求求你们，千万不要武斗，千万不能武斗呵。武斗不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皮鞭高高地举起，棍棒凶狠地袭来，高心泰休克了。

这位市委书记发出了一声声惨叫，令人毛骨悚然。

隔壁。王振林、孟庆林同样在酷刑中煎熬着……李跃和是惟一没有打人的人。但他无法制止打人。他迅速离开了现场，向“支左”部队首长挂了电话，请求派兵来解危救难。“我们怎么处理？出了问题，我就找你这个头头负责。”首长一声呵斥，把电话扔了。

李跃和被首长一声喝，清醒了颇多。

回到审讯现场，高兴泰已经休克。一个孩子正在给他做人工呼吸。

见此情景，李跃和勃然大怒：“谁要是再打一下，立即开除出‘红三司’！一切后果也均由他负责。”

但为时已晚。刘江跑来报告：“王振林生命垂危！”

李跃和立即转身隔壁，只见王振林手指心脏，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心肌梗塞！

李跃和当即向市矿工医院打电说，呼唤医生前来急救。奈何医院总机是另一派的。她“嘿嘿”一笑，电话给挂了。

李跃和再打电话向“支左”部队首长报告情况，要求派军医抢救王振林和高心泰。

9 月 29 日零时。王振林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一个小时以后，高心泰那高大的身躯也永久地倒了下去。

孟庆林没有死。他的肋骨也被打断两根。

倒下了，他们都倒下了。倒在自己的办公大楼，倒在了山呼

万岁的孩子们手里。倒下之前，高心泰还断断续续表示："我——忠于——毛——主——席！"

然而他的宣言并不能抹去他心中悲愤与冤屈。死了，他的眼睛始终没有闭上。

徐州来的那个人带人把高心泰的尸体送回家中。他在他的肚子上压了一块小石头。石头下面压了一张纸条，写着："为刘邓路线卖命，死了轻如鸿毛"……

但在淮北这块政治舞台上，"九·二九惨案"并没有因为高心泰、王振林的死亡而降下帷幕。相反，悲剧愈演愈烈……

"九·二九事件"的当天上午。李跃和直接向"支左"部队首长汇报了案情。首长"嗯"了一声，只是说："走资派该斗，但不能把他们整死。你没打，这就好。至于怎么处理，那是运动后期的事，我也没办法……

李跃和也向"红三司"全体人员公开了事件的真相。绝大部分同学对此事表示了强烈的义愤，他们轰走了那个徐州人。遗憾的是没有人知道他的真实姓名。他说他叫"卫东彪"。那个年代叫这个名字的太多了，以至在后来的办案中，也没有查到此人。

通过整顿，张冬的"副司令"被罢免。刘江、袁大头主动退出了"红三司"。

1968 年 9 月，在安徽省革命委员会的直接领导下，淮北市开始追查"九·二九惨案"。不过，是早已定了调子的：必须揪出"坏头头"和这个事件的"幕后策划者"。

张冬的爸爸是矿务局的工程技术人员，历史上曾参加过国民党。他把他的“幕后”推给了老子。他说，他国民党的父亲对矿务局党委副书记王振林怀有刻骨仇恨，授意他把他整死。于是，儿子最早获得解脱，老子最早逮捕入狱。

“高心泰呢？高心泰是谁授意抓的？”专案人员质问袁大头。

袁大头想效法张冬。他脸色苍白：“我爸爸也是国民党员……”

没等他说完，李跃和站了起来：“抓高心泰的责任我负。是我叫他抓的。”

袁大头感激地看了看他，案发时，袁大头毕竟只有 14 岁，还是个地地道道的孩子。

但事情并不像李跃和想象的那么简单。

责任不是他想承担就能承担的。专案组已经认定他的背后有“黑手”，有“反革命”，有“国民党特务”，有“走资派”。制造“九·二九惨案”的不是“红三司”的学生，而是一批形形色色的“阶级敌人”。不断发现线索，不断抓人捕人，在李跃和被捕前后的 3 个月内，已经有 72 人入监受审。

酷刑，考验人的肉体，更考验人的灵魂。许多“好汉”为了不吃眼前之亏，你招我供，案件越扯越离奇，李跃和的幕后是副市长杨杰、市委秘书长邹云龙和矿务局局长朱布。1967 年 9 月 5 日处理安徽问题时，康生点了杨杰的名，说他是“坏人”。那么，

“九·二九惨案”就是你杨杰为对抗中央文革而精心策划的。

于是，他和邹云龙、朱布三位老干部也都逮捕归“案”。

审讯，天天审讯。李跃和口供一致，他否认有人“操纵”。在狱中，他曾耳闻邹云龙的惨叫，因为邹拒不“认罪”。他曾目睹杨杰拖着被打伤的躯体，在放风时偷吃喂猪的红芋藤。杨杰也和李跃和一样，每天的伙食标准只有四两粮食和九分钱菜金。

这个时候的李跃和已经从噩梦中醒来，他没有痴人说梦。他表现了一个诚实青少年应有的品质。

记不清这是第几十次审讯了，主审是“支左”部队的一个排长。烧鸡、狗肉、口子酒，还有两盘热炒，只要李跃和按照专案组意图招供，马上就“慰劳慰劳”。饿，他饿，已经头晕眼花。但李跃和流着口水也流着泪水，诱而不供，他成了顽固不化的“走资卒”。

虽然罪证一无所有，一个惊心动魄的“九·二九政治谋杀案”还是于 1970 年春天结案定论了：

“杨杰，淮北市副市长。1938 年混入革命队伍，冒充共产党员，抗日战争中与日寇勾结，叛变革命，充当内奸。

“邹云龙，中共淮北市委常委、秘书长，早在抗日战争期间就向敌人屈膝投降，并利用职权包庇重用坏人。

“朱布，淮北矿务局局长，一贯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极力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是一个死不改悔的走资派。

“以上三人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互相勾结，杀害高心

泰、王振林二同志。是‘九·二九严重谋杀事件’的首犯，罪大恶极，民愤极大。因此，依法判处杨杰、邹云龙死刑，立即执行。依法判处朱布无期徒刑……”

幸好还需要审批。

当省革委会派员前来复查案情。他们还没住下，宾馆大门口便出现了两条显赫的大标语：“谁为‘九·二九事件’翻案就是反革命!”“谁为‘九·二九事件’翻案就砸烂谁的狗头!”市区所有的大喇叭都重复播放着批斗杨杰、邹云龙、朱布等人的实况录音。

复查，只能秘密进行。连向省里汇报情况的电话都打不出去。

阅卷。除去编造的痕迹，并无实质性证据。

提审李跃和时，他详细介绍了案件经过，证明此案确与他人无关……

但当省里来复查案件的两人找到淮北市革委会主任交换意见时，他竟然跳了起来：“这案不能翻，也翻不了。告诉你们，听不到枪响，我决不离开淮北……”

僵局维持一年多。后来，在中央和国务院有关部门的督促下，省革委会又重新组织复查，终于弄清所谓“九·二九政治谋杀事件”是一起彻头彻尾地地道道的假案。

但李跃和被定为“九·二九惨案”的“杀人首犯”，判处死刑，同案张冬判死缓，判刘江有期徒刑 15 年，判袁大头有期徒刑 7 年。

最后，李跃和没有死。

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江华建议“根据当时的历史背景和罪犯已经服刑十年的事实，刀下留人。”

死刑改为死缓刑，缓期二年执行。

他在狱中干得很好。他利用废旧器材改制电机断相保护装置成功，在中国还是一个创举。《电器时代》发表了他的论文。该项革新和他的另外两项成果同获安徽省两劳系统科技成果三等奖。奖状、奖品、奖金。他是监狱的有功之臣。

他的死缓刑减为有期徒刑 15 年，又减为有期徒刑 11 年。这些年，他走完了人生的多少路程？

“九·二九”悲剧整整演了 10 年才煞住满台锣鼓。“九·二九惨案”又制造了“九·二九冤案”。冤案是惨案的继续，甚至比惨案更惨。时代的悲剧在淮北演出的这一幕太沉重，太沉重了！

## 第 904 回：毛泽东，天安□见许世友　谈文□，请外宾参观淮南

9 月 29 日，毛泽东在张春桥为林彪起草的，经周恩来、康生以及中央文革其他成员讨论修改而成的国庆节讲话稿上批示：

退林彪同志。

此件很好，气势磅礴，又扎实、不浮夸。是一篇一年斗争的总结文章。

毛泽东

九月廿九日下午九时

张春桥起草的林彪国庆讲话中本来引述的毛泽东的一句话："批修斗私。"戚本禹看了觉得改为"斗私批修"比较好。他觉得革命总是先内而外，从逻辑上讲，你要先把自己的私去掉了，才好去批修。大家都觉得有道理，毛泽东看了也说好。所以就改成了"要斗私批修"。

29 日晚，毛泽东再次来到京西宾馆，看望参加集训干部会议的 900 多名成员。毛泽东朝台下张望，大声问道："陈再道来了吗？"

陈再道高举右臂，满怀惊喜的喊道："我是陈再道，我来了！"

毛泽东说"来了就好，不要泄气，要继续革命。"

9 月 30 日，毛泽东在北京会见谢胡率领的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他谈到中国正在开展的文化大革命：

"中国的事情有一部分干得还可以，有一部分干得不好。如

果统统干得好，还搞文化大革命干什么？正是有个黑暗面，要改变。”“在去年夏季赞成我们这一些道理的，赞成文化大革命的，占少数。那时，工人还没有起来，学生受压迫，左派站不起来，红卫兵刚刚冲破这个压迫。现在来看．情况就不同了，工人起来了，革命派占了多数。现在可以说，多数省革命派占了多数。”

他又说：这是社会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社会上有资产阶级、封建阶级，它就要在共产党里找代理人。“去年上半年到今年二月，我把形势估计得严重一点，我说我们这场斗争的第一个可能性是失败，第二个可能性是胜利。”“现在可以看出一个眉目来了，第一个可能性是胜利，而不是失败。”

1967 年 10 月 1 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接见了北京市革委会的红卫兵代表，右四为李东民，右二为蒯大富，左一为康生。

1967 年国庆节，北京红代会的李东民、蒯大富、韩爱晶等几个学生代表在天安门城楼上东侧的汉白玉栏杆上面坐着。群众游行之后，10 点多种，周恩来引着毛泽东走到他们跟前。李东

民正好在最靠西的位置，周恩来就拉着毛泽东，第一个介绍李东民说："这是中学的李东民。"

毛泽东伸出手说："噢！你的兵多得很嘛！"

李东民没想到毛泽东会和他开玩笑，灵机一动，真诚的说："我们都是您的兵，没有解放军不行，没有毛泽东思想不行！我们都听您的话。"

毛泽东听了很高兴。

李东民原名李冬民，据说是江青给他改成李东民。

毛泽东知道李东民，"首都兵团"办的《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兵团战报》，他期期都看，曾对身边的人说："这份小报不俗啊！没有怪言语，也不搞丑化"。

余秋里在天安门城楼上看到了王大宾，将他叫到城楼东边，问他近来怎样？

此时的王大宾正为王力、关锋、林杰的倒台而心事重重。他向余秋里讲了自己的苦恼，还说希望能快点毕业离开北京。

余秋里安慰他说："这种事你不用背什么思想包袱，不要想那么多。不过先避开下也好。你身体又不好，我建议你过完国庆，就去向谢副总理请假，离开北京去看病。东北辽宁鞍山有个汤岗子疗养院，那个医院很不错，适合你治病。我的病就是在那里治好的。你请好假，医院方面的事我帮你安排，你就放心去好了。"

国庆节前，周恩来亲自打电话给许世友，说"毛主席请你来北京参加国庆。"他怕许世友不相信，叫陈锡联跟他讲。周恩来

深知许世友和陈锡联的生死之交：红四方面军长征时曾三过草地，一次遭遇敌人，许世友抱起机枪就扫，陈锡联把许世友推到一边，抢过机枪，刚打一梭子，就负了重伤。许世友挑了 30 名身强力壮的战士轮流抬，说“陈锡联要有闪失，我枪毙了你们。”此时，陈锡联对许世友说：“我们都在中南海，你也来吧。”

许世友对陈锡联说：“我一定去北京。你报告总理，我身体不好，爬也要爬上飞机。”

国庆节这天，毛泽东和许世友在天安门城楼上谈了半个小时，并公开见报。这在文革中非同一般，表明许世友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之后许世友住进中南海 40 多天。每天没事，他与李先念、陈锡联、余秋里等人在棋盘上“杀”得不亦乐乎，过了一段“打仗”的日子。

10 月 2 日，中国驻刚果（布）大使馆给外交部发回一份请示电：“我使馆举行国庆招待会，刚果（布）总统、政府内阁成员及政治局委员均没有出席。我使馆准备约见刚果（布）总统，指出刚果（布）政府不派代表团参加我大使馆国庆招待会，是两国关系史上一个严重的事件，是对我国主权的一种侮辱。对此，我们深表遗憾。”

基于前几次周恩来的严厉批评，外交部不敢造次，连忙将这份请示电上报周恩来审批。亏得他们把电报及时送周恩来审阅，否则又可能在外交上捅一个更大的娄子。

事情的经过原来是这样的：

为庆祝中国国庆，中国驻刚果（布）使馆决定在 10 月 1 日举行招待会，并由代办发表讲话。根据国内动向起草的讲话稿高度赞扬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揭露和批判苏修与美帝勾结镇压亚非拉人民革命斗争的行径。9 月 29 日，使馆将邀请刚果（布）总统马桑巴 •代巴等领导人参加国庆招待会的请柬和讲话稿一并送到了刚果（布）外交部。

10 月 1 日下午，刚果（布）外长约见中国使馆代办，对代办讲话稿提出三点意见：在庄严的节日，讲话应大概介绍中国人民的生活情况，使刚果（布）人民更了解中国；讲话稿有针对另一国家的内容，刚果（布）是中立国，中苏分歧不应在此地相互攻击；讲话稿中没有提总统的名字，却提了总理努马扎莱。如果你提了总统后，再提总理，这是正常的，否则，会使刚果（布）人民产生倾向性。

中国大使馆代办解释道："'文化大革命'是中国人民政治生活中的大事，作为中国大使馆，有责任正确说明革命的理论路线政策，揭露修正主义与美帝勾结镇压亚非拉人民革命斗争的行径。至于讲话稿提了总理努马扎莱，是因为他正在中国访问，没有提总统，我们可以研究。"

下午 17 时，刚果（布）外长再次约见中国大使馆代办："总统认为泛指修正主义可以不要修改，直接攻击苏联的话要取消，政治局也要求取消。"

中国大使馆却坚持表示，这是政治原则问题，不能修改。

约谈没有取得一致结果。晚上 19 时 30 分，中国使馆如期举行国庆招待会。但刚果（布）总统和政府官员都没有出席。

周恩来仔细圈阅了这份长达 3000 余字的请示电，用毛笔在电报中“我们根据报上所载文章及周总理接待谢胡（即阿尔巴尼亚部长会议主席）的讲话和接待努马扎莱的社论起草了讲话稿”一句下面重重地画了一条粗线，并在旁边的空白处批道：

“不参考我在接待努马扎莱宴会上讲话（只提出现代修正主义，未具体点名）而采用我在接待谢胡宴会上的讲话，真是不看对象的极左倾向。对刚果（布）政府不出席我国国庆宴会应表示‘遗憾’，可不再作其他举动。”

周恩来还指示外交部电告中国驻刚果（布）大使馆：“在未得到中央指示以前，使馆对此事不要作任何活动，如有人问及此事，只表示‘遗憾’二字，不要作任何解释，不要多说一句话，更不要去见刚果（布）总统。”

3 日下午 17 时，周恩来陪同毛泽东会见 9 月底就已来华的刚果（布）努马扎莱总理。会见一开始，毛泽东一边递烟，一边问：“你们那里有香烟吗？”

“有，但我不抽烟。”努马扎莱摆摆手。

“这个习惯好。”毛泽东自己点燃烟卷，吸了一口，接着说，“回去后，请你问候你们的总统马桑巴·代巴，千万要把问候带去。”毛泽东特意嘱托，这是为补救我使馆代办在国庆讲话中未提马桑巴·代巴总统的不当做法。

努马扎莱说："我们来的时候，我们的总统要我向毛主席转达他的问候和友谊。他本来也想来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 18 周年国庆。"

"很感谢。"毛泽东抛开那些谨慎的外交辞令，坦诚地说，"我们在你们那里的大使馆犯了错误，你们总统处理得好，我很赞成。有的中国人有大国沙文主义，人家接受不了的，硬要那么搞，这不是大国沙文主义是什么？要进行教育。要整一整大国沙文主义者，不管他是中国的还是哪一国的。"

努马扎莱激动地说："很感谢毛主席这番讲话。"

毛泽东吸了吸快要燃尽的烟卷，把烟头摁灭在烟灰缸中，"有些红卫兵乱打一气。他们要打倒外交部部长，打倒周恩来，打倒李先念。这不对，我们对这些干部要保护。讲清楚了，他们就不打倒了。"

努马扎莱说："你们的干部同我国干部有很大的区别。"

毛泽东说："也没有多少区别。官大了，薪水多了，房子住好了，出门有汽车，架子也大了。前四条都可以，可以做大官，薪水可以多一点，房子可以住好一些，坐汽车也可以，就是有一条，你不要摆官僚架子。我只要求你一条，把官僚架子放下，跟老百姓、工人、农民、学生、战士、下级一起，平等待人。不要动不动就训人，有道理为什么要训人，可以解释嘛。有的官也不大，如支部书记，住房也不很好，出去没有汽车，薪水也不多，就是要摆官僚架子，动不动就训人。这样不行，老百姓不同意，

也要批评你，当然不会因为这些打倒你。”

谈到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时，毛泽东说：“文化大革命是要部分地改造我们的国家机器。国家机器无非是军队、党、政府，部分地改造，包括军队在内。”

努马扎莱说：“通过文化大革命，中国人民的觉悟大大提高了。”

“无政府主义也大大发展了。”毛泽东答了一句后，依然循着他的思路讲下去，“有那个思潮，暴露出来好，我们就可以教育。”

努马扎莱插话说：“外国人讲中国乱得很。”

毛泽东说：“有一点乱就是了。就是要乱，不乱不得了。乱了一会就不乱了，请他乱，他也不乱了，他闹够了，不闹够不行。学生、工人、农民都起来闹，这个时候差不多了。”

“一个工厂为什么要分成两派，而且打得那么凶？这没有道理。他打够了，就不想打了，下面不打了，工人不想打了，群众不想打了，上面头子孤立起来了。中央讲几句话，就是给他一个下台阶的机会，讲早了不行。”

他对形势仍估计得很乐观，说：“现在没有危险了，我已经走过了。打够了，不愿再打了，问题已解决了。好像身上长了一身脓疮，把脓挤出来，身体更健康了。”

毛泽东介绍了一番国内革命的情况后又说：“你们非洲人官架子比较小，所以，我同非洲人谈得来。”

努马扎莱马上说："在我国也开始出现官僚架子，所以我们很重视研究文化大革命。"

毛泽东挥了挥手："我不建议你们搞文化大革命。"

毛泽东请正在中国访问的刚果（布）总理努马扎莱去淮南参观。开始努马扎莱不理解，也有些顾虑，因为当时中国各地的武斗已在世界上出了名。

会见结束时，努马扎莱对毛泽东表示感谢："我们非常高兴。我们代表团谈过，如果见不到毛主席，我们就不离开北京。"

毛泽东笑着说："这样好，我的官僚主义就被打倒了。你们是来自非洲的代表，我怎能不见呢？如果不见，你们就给我写一张大字报，打倒毛泽东的官僚主义。"

毛泽东的平实和风趣让非洲客人在笑声中激动不已。

握手告别时，毛泽东再一次请努马扎莱一定要转达对马桑巴·代巴总统的问候。

送走努马扎莱，周恩来批发了外交部给驻刚果（布）大使馆的指示电，传达了毛泽东对使馆大国沙文主义做法的批评，要求使馆总结经验，做好工作，不要过多追究个人责任。

周恩来还抓住这个机会，指示外交部向各驻外使领馆转发了毛泽东的批评和刚果（布）使馆的检查摘要，要各使领馆对照自己的工作，从中吸取教训。

10 月 3 日，王大宾按照余秋里给他出的主意，找谢富治请假离京治病，获准。谢富治还对他说："我们正要找你，中央安

排，过两天有重要外宾到你们地院去参观，了解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你完成这个接待任务后再走吧。”

10 月 5 日上午，李先念、丁国钰陪同越南国会副主席黄文欢到地院参观访问，王大宾借机向李先念专门汇报了为解决 4 月在地院避难的老干部生活问题那笔 8 万元款项的开知情况。由于地院革委会管理严格，这笔款项专款专用，没有用完。王大宾向李先念请示说：“这笔款项现在还未用完，有余款，是否退还财政部？”

李先念回答说：“不用，先别忙退了。”

接待任务完成后，王大宾即向李贵、聂树人交代了工作，于 10 月 10 日赴辽宁海城汤岗子疗养院治病。

9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以中发［67］306号文件批转毛主席批示：“照发”的《安徽“P派”和“G派”热烈拥护和贯彻执行康生，江青同志的“九·五”指示》的通知，让安徽两派大受鼓舞，遂于9月19日，达成协议，成立“安徽省大联合委员会”。

9 月 20 日上午，两派各组织 10 万人 ，共 20 万人，在安徽省体育场，召开了“拥军爱民”群众大会，会后两派并肩在市内游行，受到群众热烈欢迎。久受派仗斗争之苦的安徽广大群众非常高兴，他们放起了鞭炮，庆贺这次大联合。这一活动，军队没派一个连、一个人参加，都是由两派群众自己组织的。21 日的《安徽日报》出版了特刊，用整版篇幅，刊登了有关两派联合的

大会报道和两派群众并肩游行的照片。周恩来知道后，让李德生将这天的报纸加印 20 万份，派人乘飞机送北京，由中央分发全国，推广安徽做法。

到 9 月 28 日，合肥市 780 多个单位实现大联合。

合肥的形势很快影响到全省，原来武斗很厉害的淮南，不但上交了武器，工人也回到生产岗位上班了。

10 月 6 日，由安布鲁瓦斯·努马扎莱总理率领的刚果（布）全国革命运动和政府代表团，由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陪同，访问了淮南市，不但参观了市容，还下煤矿，看到生产情况，才知道中国的形势虽乱，但仍然是可以控制的。毛泽东安排刚果（布）总理访问淮南这件事，不仅肯定了 12 军在安徽制止武斗、促进生产的作法和成效，而且进一步促进了安徽局势的稳定，让安徽群众备受鼓舞。

10月10日，安徽省七地区赴京汇报代表团在北京达成《安徽省七地区关于制止武斗，抓革命、促生产，拥军爱民等问题的协议》。

10月10日，安徽省七地区赴京汇报代表团在北京达成《安徽省七地区关于制止武斗，抓革命、促生产，拥军爱民等问题的协议》。两派协议立即解散所有武斗组织，实现大联合。把斗争的锋芒指向所谓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及其在安徽省（地、市）的代理人。自此，安徽省各地武斗事件暂告停息。

## 第 905 回：爆内幕，档案□有□材料　群情愤，南京军区再□反

10 月 2 日，林彪会见阿尔巴尼亚国防部长巴卢库一行。会见期间，林彪办公室秘书郭连凯抱着一摞《毛主席语录》来找林办保密员李根清，说：

“老根，重要任务，快在这些语录本上批字，准备马上送给客人。”

“外交部不送，为什么我们送？”李根清问了一句。

郭连凯说：“这是主任让送的，你就抓紧写吧，会见很快就结束了。”说着，他递给李根清一张纸条，上面写着霍查、谢胡、阿利亚、卡博、巴卢库等一连串阿尔巴尼亚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名字，接着说：“你就写‘赠霍查同志，林彪’，然后照名单一本一本地写。”

李根清对郭连凯说：“你也不劝劝主任，这是送外国朋友的，我替首长写算什么？”

郭连凯一听，“哈哈”笑起来，说道：“真让主任猜着了。我也是这么说的，可是主任说，正是因为送外国人的，才让根清写呢，反正外国人也不认识中国字。”

没办法，李根清抓起红油笔，从霍查写起，一人一本，三下五除二就写完了。写完后看了一遍，除“林彪”、“同志”四个字有点像林彪的字体外，其余都是“李体”。郭连凯二话不说，抱起来一溜烟地走了。事后，他对几位秘书说：“老根真行，字

都批到外国去了。”

林彪的签字为什么让保密员写呢？

事情要从 1967 年 3 月的一天说起。那天，李根清发现一份中央传阅件上，林彪的批语不是林彪亲笔所写，像是先用复写纸描出林彪字体的样子，然后照痕迹“写”出来的。因此心存疑惑，便悄悄去问秘书张云生：

“张秘书，我看首长这个批语怎么像是描写的呢？”

张云生微微一笑，一副无可奈何的样子说：“别问了，发吧。”

之后，一连十几次出现这种情况。有一天，李根清终于发现张云生正趴在办公桌上批字呢，果然是用红色复写纸先描后写。他看见李根清，对他诡秘一笑，说：“没办法。”

一天，叶群来到秘书办公室，张云生拿着他批的字向叶群诉苦说，仿林彪字体怎么也仿不像，其他秘书也在旁边帮腔，说张云生仿的确实不像。叶群反问：“那么这件事你们谁来做呀？”

张云生说：“这件事谁做也不好，首长的字谁也学不了。”

叶群听了，声音立刻提高了八度：“张云生，你那点小聪明我知道。你不要以为这是我的主意。告诉你吧，这是首长的主意，不信，你跟我去问问首长！”

张云生一听立刻笑着说：“主任，我丝毫没有那个意思。我仿的确实不像，怕人家看出来对首长影响不好。”

叶群说：“那怎么办呢，谁行啊？”

这一问，谁也不吭声了。过了一会儿，只听郭连凯说：“让根清试试吧，他的字写得好。”

叶群说：“那就叫小李来吧。”

叶群一见李根清从里间走出来，不由分说，便让张云生、于运深和李根清跟着她去见林彪。刚走到客厅门外，还没有看见林彪的影子，叶群便高声叫道：

“101 呀，我让他们替你批几个字，是不是你同意的呀？”

只听林彪应声说：“是啊，我同意的，怎么啦？”

“没什么，你休息吧。”叶群说着便又带着张云生三人原路返回，一边走一边说：“你们都听到了吧，不是我的主意吧。首长同意的，出了事由他顶着，你们怕什么！”

回到秘书办公室，叶群又详细交待了批字的事：秘书讲完文件后，把林彪口授的批语记下来，转告李根清，由李根清替林彪写在文件上。

最后叶群叮嘱：“这件事我也担不起责任，你们做好登记吧，以后万一有个什么事，由首长负责。”

叶群走后没多久，内勤便来招呼李根清去见林彪。

林彪见李根清进来，示意他坐在林彪对面的沙发上，然后对他说：

“你知道的，我身体不好，一提笔批字就紧张、出汗。那些文件都是例行公事，我同意，你就替我写。”

李根清习惯地点点头，答道：“行。”

回到办公室，他把林彪的话原原本本记在张云生移交给他的登记本上。自此以后，林彪在文件上要批什么话或需要签名，便由李根清代劳了。林彪的批语大多数只是“呈主席阅”、“呈主席批示”、“同意”、“完全同意”这几个字。只要把这几个字练熟了，写像了，基本上就可以应付了。从 1967 年 3 月到 1971 年 9 月四年多时间，由李根清替林彪批字的文件有 400 多件，写满了两个登记本。

军委《十条命令》 颁布后，南京军区 2 月被抓的人全部释放，然后被派往各地执行“三支”、“两军”任务。当时，南京军区政治部 2 月被抓的 200 多人都派到浙江执行“三支”、“两军”任务，隶属于浙江军管会领导。

浙江省军区机关被批准开展“四大”后，省军区干部处刘干事贴出大字报，揭发南京军区政治部将这 250 多名干部派到浙江“三支”、“两军”后，就不准备让他们再回南京军区政治部了。

8 月上旬，在主持浙江军管会工作的 20 军领导的同情支持下，在浙江参加“三支”、“两军”的南京军区政治部宣传部顾少杰等人，在杭州仁和路的市委招待所召开了南京军区政治部在浙江支左的部分人员的座谈会，也称“仁和路会议”。参加座谈会的人有曾被许世友抓捕、关押过的南京军区群众组织头头，还有部分科长、部长级领导，约 40 多人。

在会上，浙江省军区干部处刘干事到会揭发说：“我跟罗晴涛主任到政治部干部部领受任务，部长杨映雪说，政治部调到浙江

‘支左’的干部要控制使用，这些人员中，有的不能在东海、铁路沿线，这批干部政治部不要了。”

刘干事还说：“你们的档案里都有黑材料。”

与会者听了非常气愤。他们原以为有中央的文件，自己的问题已经解决了，没想到干部部竟然会在背后搞这些名堂，这不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又是什么？大家一致表示，坚决要求南京军区党委予以平反。

这次座谈会没有正式领导，顾少杰只是个临时召集人。与会人员，原在南京军区同一座大楼工作，但相互很少交往，这次汇集西子湖畔，似曾相见而不相识。只因参加了文革，使他们有了共同的遭遇，共同的命运，自然也有了共同的思想感情，共同的斗志，共同的语言。不管原来是哪个部门的，不管相识不相识，也不管职务的高和低，为了共同的利益，他们只能紧紧地团结在一起，共同奋斗。

在会上，不知是谁，唱起了《国际歌》，大家都跟着唱了起来：“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就靠我们自己。”

悲怆的歌声，使许多人掉下了眼泪。接着他们又唱起“义勇军进行曲”：“起来！不愿作奴隶的人们”，“我们万众一心”，“前进！前进！”

在座谈会上，大家各抒己见，群情激奋、众口一声：要立即行动起来，组织起来，成立“批资总部”，全称是“批判资产阶

级反动路线总部”，向许世友公开宣战！向许世友讨还公道！

经过与会人员投票选举，选出了“批资总部”领导小组 9 人，他们是：

群工部《民兵专刊》编辑高琏章；

干部部科长王元仁；

青年部副部长孟祥海；

《人民前线报》社记者陈永安；

《人民前线报》社记者夏继诚；

宣传部副科长顾少杰；

南京军区军人俱乐部文化干事陈培光；

宣传部新闻科摄影记者陈时秋；

宣传部新闻科干事艾汉美。

“批资总部”成立后，一是要求军区领导改错、平反；二是赴京告状。

杭州的“仁和路座谈会”尚未结束，20 军就接到南京军区政治部干部部发来一份“急电”：

奉军区首长指示，为加强军区政治机关力量，决定从下放到浙江省参加“三支”、“两军”工作的二百多名干部中，紧急抽调一批精英回南京工作。

并列出抽调的 40 人名单。

原来，杭州成立“批资总部”的消息，连夜传到南京。这一消息，很快传遍南京军区机关的上上下下，再次震动了石头城。

这时候，许世友已躲到大别山里去了，但“批资总部”的消息，也迅速传到了他的耳朵里，真是雪上加霜呀，他气得半晌说不出话来。然后，就是一个劲地破口大骂：

“他娘的，政治部的这些乌龟王八羔子，又跳出来造反啦！真的要翻天啦！”

他怎么也没有料到，政治部的这伙人被他抓的抓，关的关，清洗的清洗，还没有整服贴，这么快又“卷土重来”了。南京市社会上的“反许”浪潮未退，军区内上层“反许”暗流涌动，屡现浪花，如果再涌一波，他的日子就更不好过了。许世友毕竟非等闲之辈，他立即指使军区干部部向20军下发了抽调40名精英回南京的电令，以期釜底抽薪，不战而平息这股浪潮。

但是，魔高一尺，道高一丈。杭州仁和路座谈会上，军区政治部的这些人经过认真讨论，达成一致意见：回电拒绝，目前不能执行这一调令。理由有三：

第一，他们奉军区之命，到浙江执行毛主席下达的“三支”、“两军”任务。几个月来，有不少人已经成为当地的重要骨干力量。当前，正是“三支”、“两军”的关键时刻，如果此时调走“精英”，势必造成诸多不利影响，与军区赋予的任务和要求不符。

第二，正常的组织调动，应该无条件服从。但军区干部部此次调令，有诸多质疑。当初南京干部部长杨映雪向浙江省军区传达许世友的指示说：“这200多人，军区统统不要了，把他们放到第一线去，其中问题严重的人要放到边远山区去”。本来，这

批人参加“三支”、“两军”是完成毛主席赋予的政治任务。可是，许世友却把它变成了“排斥异己”、“打击、陷害我们”的另一种手段。他原来把我们这批人“一脚踢出去”、“统统不要”。现在又打着“加强政治机关力量”的旗号，再把这些人调回去，这些人岂不成了他“随意摆布”、“任意宰割”的羔羊。

第三，他们认为更严重的问题是，许世友强加在他们头上的种种罪名，在他们的档案里塞进去的黑材料，不纠正、不平反、不清算、不解决，不还他们以清白，怎么能稀里糊涂的回去呢？

基于上述三条，他们用“赴浙江干部”的名义，直接给南京军区干部部回答了一份“不能执行调令”的电报。

“批资总部”于 9 月上旬在杭州召开了南京军区“司、政、后”三方代表联系会，筹划“赴京告状”一事。参加的人员有：司令部参谋张波涛、高国涛；后勤部助理员赵玉祥、王树雨；政治部新闻干事艾汉美，摄影记者陈时秋，《人民前线》报记者陈荣安，还有秘书处的李永宽，宣传部的施关彬等人。

为保证“赴京告状”的安全，这次“司、政、后”代表联系会是秘密进行的。为开好这个会，李永宽选择了一处条件极好的会议地点——位于西子湖畔的密林深处、环境优美的 330 医院。两天会议及其吃、住全在一个不为人知的会议室内。这次会上大家交流情报，统一认识，取得一致意见：军区“司、政、后”联合起来赴京告状。首先分头准备告状材料，寻找上告渠道，于适当时机启程赴京。

9 月中旬，“批资总部”又派出一部分代表回到南京军区机关，经军区政治部主任王六生同意，从浙江回来的人与原在南京的洪期钧、高丕忠、方泽浦等人联合一起，成立了群众性的“平反小组”，活动地点设在政治部大楼二楼原文化部的办公室。这一回，他们不搞“大呼隆”式地“大鸣、大放、大字报”，也不开批判大会，而是开展求真务实的小型活动。例如：在政治部大楼二楼的楼梯口，开办了一处“平反专栏”；由《人民前线》报社的同志，创办了一份“平反小报”；分别走访军区领导人和部门负责人。通过这些方式，反映受压干部的实情和呼声，为平反做些舆论宣传和思想交流。

在此期间，南京军区司令部被赶到江苏各地的干部、后勤部被赶到安徽各地的干部，也纷纷“杀”回南京，各自成立了本部门的“平反小组”，开展“平反”活动。

10 月初，南京地区军队院校、文体单位和南京军区司、政、后平反小组，联合走访南京军区党委，王必成、林维先副司令员，鲍先志副政委三位中将出面接待。走访者要求：南京军区党委对军区借《八条命令》在军内外大批抓人做出解释。三位中将一致表示：大批抓人“行政看管”是错误的，受害人要求平反是可以理解的。但要等许司令、杜政委回来后才能确定。

这期间，由民航总局政委刘锦平和总理秘书宋皋带领的中央调查组来到江苏。他们除调查地方上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外，还非常重视南京军区的情况，单独同政治部副秘书长孙海云、组织部

副部长赵树湘，军区党委秘书尤亮，保卫队队长史书清等人作了个别交谈。

10 月 6 日晚 20 时 10 分，刘锦平在南京空军接见南京军区机关直属队和南京地区军队院校有关人员。刘锦平进入接见大厅时，南京军区政治部副秘书长孙海云带领大家起立鼓掌，刘锦平也鼓掌。

孙海云说："党中央毛主席，周总理非常关心江苏的文化大革命，为了江苏 4450 万人民的利益，中央派刘政委率领工作团来江苏。刘政委代表中央来的，今天晚上在百忙中，抽出时间同大家见面，这是党中央毛主席、周总理对我们的关怀，为了表达我们的心情，请同志们再热烈鼓掌。现在，请刘政委给我们作指示，请同志们欢迎"。

刘锦平说："同志们，我和宋皋同志以及其他同志，是遵照总理的指示，来到江苏南京的。总理给我们的任务是促进江苏的革命群众组织消除分歧和对立，尽快地联合起来。毛主席在视察大江南北的时候，说 7、8、9 三个月形势大好，江苏也不例外。现在，我们的任务完成了，江苏两派对立情绪有了好转，开始接触协商，讨论大联合。明天，我们就要回北京去了。可是，我们还有一项任务没有完成。我们在北京临走的时候，总理对我有交代，要我来看看南京军区司、政、后的同志们，听听你们的意见。党中央、毛主席、周总理很关心你们啊！"与会人员情绪激动，无不为之动容，一时间掌声四起，十分热烈。

“任务没完成，我们不能走。所以，今天晚上把同志们请来，一是看看同志们，二是来听听同志们的意见。我还要把这些意见带回去，向总理汇报，向党中央、毛主席汇报。现在就请同志们发言”。

第一个发言的是南京军区后勤部锋锐，他说：“今年二月份，我们响应毛主席号召，批判军区首长许世友的错误，被打成反革命，逮捕关押 7 个月。仅司政后机关直属队被逮捕关押的人员，据不完全统计有 340 人之多。师以上干部被逮捕关押、批斗、勒令停职检讨交待的有 20 多人。其中有朱铁谷、孙海云、赵树湘等人。团以上干部被逮捕关押有 60 多人，营以下更多，后勤技工学校把‘造反’士兵绑在卡车上游街。83 医院临产孕妇也要弯腰接受请罪批斗。125 医院有的军官和士兵在浴室里被抓走。军区总医院胸外科专家沈威廉被迫害致死，死的时候还带着手铐。军区总医院政委刘万祥和上海 916 油库政委邓启樵被打成南京军区后勤部的刘邓。邓启樵在集中营里被几个武装士兵捆绑起来往水泥地上摔。军区总医院护校入伍不到一年的学员，十八、九岁就被打成反革命集团，开除军籍押送回家……”

汇报进行到次日凌晨 2 时，休息半小时，空军招待人员送来了热气腾腾的面条。凌晨 2 时 15 分，刘锦平作了长时间的讲话。他说：“同志们讲得很好，很深刻，很生动。你们在座的都会写文章，很多是秘书。把这些情况分门别类写成专题材料，文字不要太多，要简明。我保证把这些材料带到北京，送到毛主席那里，

送到周恩来总理那里。我们天天都有飞机很方便嘛！我们明天就要走了，一定把同志们受到的委屈向党中央领导同志汇报。”

他又说：“许世友同志有错误可以批判。他现在在养病，要给他一点时间，给他创造一些条件，同志们不能操之过急。提‘打倒’的口号是不恰当的。我们希望他能取得群众的谅解。”

刘锦平飞回北京之后，南京军区司政后机关和驻宁医院、学校、文体单位，立即沸腾了起来。刘锦平的讲话三天之后就传遍了各单位。很多师、军以上的高级干部改变了态度，同情和支持这些干部要求平反的愿望。

“批资总部”的夏继诚、张炳奎二人专门负责整理告状材料，迅速完成了许世友镇压群众的三大本备忘录，名为“大逮捕”、“大迫害”、“大清洗”。军区司令部参谋于定提供了一份许世友二、三月间亲自下令大批抓人的原始记录。政治部秘书处李永宽在舟山要塞区搞到了一本许世友指挥要塞区司令黄朝天抓人的电话录音资料。

## 第 906 回：为九五，太原“红联站”抗争　下□知，督促知□回农村

山西太原的“九五事件”后，参加过七月会议的“红联站”头头们已不宜公开露面，“红联站”的大多数下属组织也无法以战斗队的形式活动。新的领导人张明、 赵奋歧等人开始领导处于困难中的“红联站”，他们一方面不断派人到北京告状，一方面继续组织群众进行抗争。

10 月 5 日，是太原“九五事件”一月之际，十中“七一”在学校的两间教室里举办了《“九·五”、“九·六”事件真相展览》，还为牺牲的孟玲玲、李成义布置了灵堂，宣布他们为“烈士”，组织了隆重的悼念活动。一时间，十中校园内外变成了花圈和挽联的海洋，众多“七一”战士、“红联站”在各校的下属学生组织自动聚集到那里。

“红联站”在十中教学楼上贴出大标语“难盼李孟再次归，怒挥刀戈向刘贼”

“红联站”组织了声势浩大的“九·五抗暴”游行，队伍前列，两个女学生拿着一个花圈，紧跟后面的是两人用竹竿挑着一条横幅：“刘未老还我战友！”再后面，有孟玲玲亲属端着女儿的骨灰盒，有李成义遗孀端着丈夫的遗像，跟着 3 个带着黑纱的儿子，以及各“红联站”各校下属组织分别举着队旗，带着袖章。2000 多人的游行队伍从解放路、迎泽大街和五一路绕城环行。游行队伍中，“揪出混进省革委会的黑手！”“李成义、孟玲玲烈士永垂不朽！”等此起彼伏的口号声，与街道两旁的人民群众交融在一起，几乎把太原城挤得水泄不通。

10 月 6 日，在省革委第 20 次常委会上，刘格平说：“反对刘格平就是反省革委”，“‘红联站’把省革委骂得不成个样子”。

这一段时间，因为山西接待外宾，不让刷大标语。“红联站”不听，于 10 月 1 日到 3 日贴出了大量的大字报：

《斩刘贼之首，祭忠魂之灵》

《砸烂黑九条，批臭黑公告》

《必须给红联站彻底平反》

《山西人民要求彻底解放》

《请求周总理派人调查九·五事件》

《第十四次常委会议是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铁证》

等等。

刘格平说："山西是中央肯定了的，安排外宾来山西参观，是对我们的最大信任。但'红联站'却持相反的态度公然对中央指示采取对抗。鉴于'红联站'最近一再恶毒攻击省革委，要很好考虑'红联站'的问题"。

10 月 7 日，《山西日报》社论：《坚决维护革命委员会的权威》，不久，又连续发表《革命委员会好》、《坚决维护省革委会的无产阶级权威》等社论，掀起了声讨和围剿"红联站"的浪潮。

同时，省革委会准备在南文化宫搞一个《平息九·五反革命暴乱事件展览》展览。十中"七一"的学生闻讯后，在一个晚上，去了一伙人，撬开门锁，将绘制好展品全部损坏、砸毁，使这个展览流产……

刘格平向中央写了《关于要求批准取缔反动组织红联站的报告》，并放出风声，中央已决定 10 月 15 日取缔"红联站"。

后来，在 12 月 5 日，"九五事件"三周月的时候,十中"七一"编排的歌剧《晋阳红旗颂》在十中学校礼堂公演。后来又到各处及马路上巡演，在太原引起轰动。一连演了 20 多天。此后几个月,每到 5 日，"红联站"都要演出《晋阳红旗颂》，久盛不衰。

发生在省革委门口的“九五事件”，震惊了太原乃至山西人民。绝大多数人包括“红总站”下属组织的群众同情“红联站”，对刘格平以省革委主任之身，负山西省党政军之重任，竟如此对待手无寸铁的学生，十分不满。对“红联站”的遭遇十分同情。每天晚上，在五一广场、十中门口、街头巷尾，人们会聚集在一起，打听“红联站”的消息，议论对各种问题的看法。他们同情“红联站”，遇到不同看法的人，就一围而上，与之辩论。到后来，他们干脆先问：“你是什么观点?”如果是“红联站”观点，就不必辩论，是“红总站”观点的才辩论。为了怕惹麻烦，“红总站”观点的人在街上也不敢轻易说自己是“红总站”观点。

“九五事件”使山西的武斗迅速向全省蔓延。晋南、晋东南、太原等地武斗不断。太原河西区兵团“工总司”所属各下属组织组成联防，以防武斗之火引向河西各厂。

10 月 7 日，中共中央下发经毛泽东当天审阅的《毛主席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时的重要指示》通知稿。这个文件集中了毛泽东 7 月 14 日至 9 月 23 日在南方视察期间对文化大革命的论述，主要内容有：

“七、八、九三个月，形势发展很快。全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大好，不是小好。整个形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

“形势大好的重要标志是人民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了。”

“有些地方前一段好像很乱，其实那是乱了敌人，锻炼了群众。”

“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

“在谈到革命大联合以谁为核心时，毛主席说，什么‘以我为核心’，这个问题要解决。核心是在斗争中实践中群众公认的，不是自封的。自己提‘以我为核心’是最蠢的。”

“毛主席说，要正确地对待受蒙蔽的群众。对受蒙蔽的群众，不能压，主要是做好思想政治工作。”

“向坏人专政的问题。毛主席说，政府和左派都不要捉人，发动革命群众组织自己处理。例如，北京大体就是这样做的。专政是群众的专政，靠政府捉人不是好办法。政府只宜根据群众的要求和协助，捉极少数的人。”

“关于干部问题。毛主席说，绝大多数的干部都是好的，不好的只是极少数。对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要整的，但是，他们是一小撮。我们的干部中，除了投敌、叛变、自首的以外，绝大多数在过去十几年、几十年里总做过一些好事！要团结干部的大多数。犯了错误的干部，包括犯了严重错误的干部，只要不是坚持不改，屡教不改的，都要团结教育他们。要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运用‘团结——批评和自我批评——团结’这个公式来解决我们内部的矛盾。在进行批判斗争时，要用文斗，不要搞武斗，也不要搞变相的武斗。有一些犯错误的同志一时想不通，还应该给他时间，让他多想一个时候。要允许他们思想有

反复，一时想通了，遇到一些事又想不通，还可以等待。要允许干部犯错误，允许干部改正错误。不要一犯错误就打倒。犯了错误有什么要紧？改了就好。要解放一批干部，让干部站出来。”

“有些干部为什么会受到群众的批判斗争呢？一个是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群众有气。一个是官做大了，薪水多了，自以为了不起，就摆架子，有事不跟群众商量，不平等待人，不民主，喜欢骂人，训人，严重脱离群众。这样，群众就有意见。平时没有机会讲，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爆发了，一爆发，就不得了，弄得他们很狼狈。今后要吸取教训，很好地解决上下级关系问题，搞好干部和群众的关系。以后干部要分别到下面去走一走，看一看，遇事多和群众商量，做群众的小学生。”

“我们现在有的严肃、紧张有余，团结、活泼不足。”

“中央、各大区、各省市都要办学习班，分期分批地轮训。”

“要告诉革命造反派的头头和红卫兵小将们，现在正是他们有可能犯错误的时候。”

7 月 9 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社论：《坚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正确方向》，动员返城的知青回农村搞好生产。长沙“永向东”紧跟形势，满街张贴《造户口反无理》的传单。“永向东”的全称是“中共湖南省委机关永向东革命造反战斗团”。

当时的长沙市又出现几个新的知青组织，其中一个叫做“反迫害总勤务站”，总部设在“省委接待处”，即湖南省委招待所，位于省委大院西南侧，头头是浏阳中岳公社赵湾大队的知青许九

皋，文化不高，出身孤儿，成份“城市贫民”，在充斥着“黑七类”的知青中，他这就算是很优秀的家庭出身了，因此被推举为“司令”。

浏阳老知青张扬，即后来名扬全国的手抄本小说《第二次握手》的作者，他是许九皋的朋友，听说许九皋在“反迫害”当“司令”，便去看他。许九皋见了张扬很高兴，因为他是张扬《第二次握手》原稿最早的读者之一，所以力邀张扬参加“反迫害”的工作，让他“写文章”。两三天后，张扬决定参加“反迫害”。

“许司令”让张扬“写文章”，却没指明写什么文章。张扬想，这是个知青组织，而知青是“上山下乡”的产物，那么，可以写关于上山下乡的文章吧。因此，当他们问他需要什么时，他便说:“送些关于上山下乡的材料来吧。”于是他被带到一间屋里，只见里面堆放着从各党政机关“查抄”来的成堆文件，很多是所谓“内参”“密件”，好像还从来没人看过。

1966 年秋冬，各知青组织控诉了“资反路线”对知青的迫害、歧视之类；到了 1967 年夏秋，各知青组织直接以“反迫害”、“反歧视”等名目出现，口号和行动上调门更高，出现彻底否定“上山下乡”的新动向，满街刷着“批判”和“控诉”“刘氏上山下乡运动”的大标语。猛一看，连张扬都有点吃惊，“这岂不是否定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胆大包天吗？‘上山下乡’是毛主席指出的‘青年运动的方向’，怎能‘彻底否定’呢？”他想不明白。但在当时那种混乱的环境下，又没人从理论上分析和论证“彻

底批判刘氏上山下乡运动”的观点。于是张扬想：“既然几乎所有的知青组织都叫出了‘彻底批判刘氏上山下乡运动’的口号，那么我不妨专题研究一下这个问题。”

于是他埋头于这几百上千份从省农垦局、“安置办”、办公厅、农业厅等单位抄来的，与“上山下乡”、安置工作和知青状况直接或间接相关的文件中，每天研读。

这时，长沙已满街都是“永向东”的传单《造户口反无理》，这让很多知青和家长感到气愤，“反迫害”的常委让张扬写一篇反驳文章。张扬一口气写出了约七、八千字的传单稿《评〈造户口反无理〉》，点名批驳“永向东”，从知青受迫害的角度出发，提出迫害知青的恶人都在城市里，因此他们有权回来造反等等，论证知青“造户口反”的行动是可以理解的，为知青“造户口反”的行动辩护。

《评〈造户口反无理〉》的文章写好后，“反迫害总勤务站”常委、江永知青万力，原名万叔达当即在原稿上“批示”：“铅印8000份。”

按照万力的“批示”，立刻有人送去印刷并上街张贴。9月，长沙的大街小巷上贴满了《评〈造户口反无理〉》，很多人翘首阅读。因为文字较好，逻辑严密，更因为说出了千千万万知青和他们的家长的心里话，这份传单当时影响甚大。

张扬继续埋头研究那些总数达几十万字的文件，那里面有很多反映知青在农村、农场、林场、兵团受迫害的材料，他经常一

面看一面独自泪流不止。从这些文件上，张扬觉得当时的“上山下乡”在本质上已不是政治行为，即不是“革命行为”，也不是宣传的“青年运动的方向”，而是经济行为，是为了解决城市人口增加、城市经济发展水平低下等原因造成的城市经济深陷困顿所面对的人口、就业、升学和社会犯罪等压力。于是他开始动笔写一篇大文章，终于在 10 月，再接再厉，完成了一篇 36000 字的大文章，题为《控诉罪恶的新型农奴制度——刘氏上山下乡运动》，旨在彻底否定“上山下乡”运动。

文章拿到“反迫害总勤务站”常委会上讨论。“许司令”主持会议，到会的有十几名“常委”和工作人员。时间仓促，也没有条件打印，便让张扬以作者身份列席会议，全文宣读。张扬抑扬顿挫，用了两三个小时，居然一口气读完了。没想到平时经常躁动不安的这十几位与会知青，此时竟如此投入，鸦雀无声，静静倾听。可以看出，他们都很感动，激动。因为他们听到的是自己的命运，感受的是某种绵长无尽的悲哀……

文章引用了一些各地女知青被侮辱、强奸的事例。讨论时，一位“常委”说：“这种事写多了不好吧？”

“许司令”道：“有什么不好！”

那位“常委”结结巴巴：“你有不同意见可以跟我辩论呀。”

“许司令”说：“我这就是跟你辩论嘛！”

另一个问题是标题。部分“常委”提出，“农奴制度”，太刺眼了吧？还是“新型”的，“罪恶”的，就更那个了。口气是不

是应该和缓一点？……

于是标题当场改为《刘氏上山下乡运动是对毛主席“青年运动的方向”的彻底背叛》。一致通过。并决定在“机关报”《反迫害》上全文发表。按照张扬的意见，文章不以个人名义发表，而是杜撰了“反迫害总勤务站”两个“下属部门”的名称。

“文革”期间，两大派和无数中派小派用传单、报纸相互对骂，印刷厂空前兴隆。知青组织没钱，靠的是印刷厂干部职工很多是知青家长，同情他们，帮助他们印刷。其中有一个管事的“工长”有点刁难，一个江永知青从兜里掏出 5 斤粮票塞在他手里，他半推半就地接受了，排印也就马上解决了。

排完版之后，还剩一块 32 开书籍大小的空白。没有图片。张扬在现场一面校对，一面临时决定搞一份什么“文件”塞进去，于是恶作剧地弄了一条“我坚决支持你们!”的《毛主席语录》贴了上去，让人乍一看，还以为是毛泽东“坚决支持”这篇文章呢。

该期《反迫害》报印刷了几千份，除了分发，便是派人满街叫卖，群众踊跃购买。《反迫害》的小报不仅在长沙发行，部分串联的知青还将该报带到广州街头叫卖，少量报纸流入香港，有人因此遭到追查。

除了“反迫害”，当时长沙还有以江永县桃川农场万正凡为负责人的知青组织“红一线造反团”。“红一线”不仅有自己的武装，还建立了“红一线”文艺宣传队，并出版《红一线》报。万

正凡曾参与“全国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红色造反团”的诸多活动。

10 月 8 日，中央安置办下达了《10.8 通知》，继续要求知青回农村抓革命促生产，不要逗留城市。与此同时，《致全国贫下中农的一封公开信》发出，提出：知青是响应党和毛主席的号召下乡的，贫下中农要关心他们，爱护他们……

《10.8 通知》以后，在长沙的返城知青“9 元钱、30 斤粮票”的待遇停止。各级领导开始劝导他们回乡，并对其父母施加压力。各区派出所也公开抓逗留在城里的知青，关起来后用大卡车送回江永。江永方面也积极配合，向知青宣传：回乡的每人可以领 5 元钱、一担谷。

知青家长含着眼泪为子女作返乡的准备。

有一位知青的母亲将仅有的两百元钱缝进了儿子的棉裤里，然后跳下了长沙北门的一口“彭家井”。那口井从此远近闻名。

湖南省革筹成员梁春阳等要求下乡知青必须返回农村，长沙知青程亚林等与之进行辩论，坦陈下乡知青的生存困境，赢得了在场群众组织代表的理解与同情。

10 月 10 日，“红一线宣传队”小报《红一线》刊载程亚林《弟弟，我变了》一文，反映了长沙下放江永知识青年生产、生活的困苦情况。其中写道：“一旦我们想在政治上有所进步，就有人指着我们骂：‘你们有什么资格发言！’小孩子们就跟着后面喊‘地主崽子’，和我们同甘共苦的贫下中农同我们疏远了，因为我们家庭成分不好。”

10 月底，逃亡回城的知青被迫返乡。仍有部分人躲藏下来，在长沙的河码头、建筑工地，凡那些报酬最少、活儿最脏、社会地位最低的人堆中，必有隐藏的知青在。有人投亲靠友走向远方，往新疆、云南、贵州……

## 第 907 回：出新词，湖南“湘派”反倒旗　在江城，外宾与群众座谈

湖南的大联合似乎也多了一些曲折。早在中央关于湖南问题的“810 决定”前，8 月 3 日晚，解放军工程兵学院“红色硬骨头”组织的李长元和李仲昆主持召集湖南的“湘江风雷”、“红旗军”、“青年近卫军”、“东方红总部”、“高校风雷”、湖南“井冈山”等 23 个“湘派”组织在长沙红色剧院开会，商议成立“以湘江风雷为核心”的“省会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筹备委员会”，简称“大联筹”之事。当有人问到“工联”怎么办时，李长元答曰：“欢迎参加，不参加也罢。”

由于“工联”拥有近 20 万工人成员，特别是主要的大型工厂企业的造反组织，基本都属“工联”旗下，势力强大，已成为了长沙市造反派力量的主要劲旅。而且，当时进行“支左”的解放军驻军，与省、市委机关造反派干部，大部分都倾向支持“工联”作为湖南造反派的旗帜。因为，他们认为，“工联”组织比较“纯”，而“湘江风雷”则因是由社会各界人士，包括下乡知青、社会街道居民等混合组成，组织成份相对复杂些。

8 月 5 日下午，“湘派”组织在红色剧院继续开会，这次增加了“红造会”等 4 个组织。会议的中心内容是研究成立“大联筹”问题，并已刻好了图章，准备作为湖南省夺权机构。

他们通知“工联”的代表参加。会上，“工联”反对成立“大联筹”。于是确定第二天讨论成立“文攻武卫指挥部”的问题。

但是第二天 6 日下午继续开会时，突然改为讨论成立“大联筹”问题，企图通过一个“全省大联合要以湘江风雷为核心”的文件，因“工联”反对，这才未达成协议。

9 月 27 日，湖南“工联”宣布“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解散总部，走自下而上按行业、系统实现大联合的道路。

但是，“湘江风雷”也在同一天针锋相对地发出了《在大联合中不解散总部的声明》。虽然此《声明》也振振有词，但却改变不了政治优势在已“解散”的“工联”一边的事实。因为“工联”不但显示出了其不争席位、不争核心的“高姿态”，而且比“湘江风雷”更紧跟上了中央的部署。

眼看有被“工联”抢占“政治制高点”的危险，“湘派”开始了自己的“大联合”之路。他们一方面搬出了“要承认山头、照顾山头，才能消灭山头”之类来路不明、似是而非的“毛主席语录”大造舆论，一方面急匆匆地谋划有别于“工联”的大联合路线图。

9 月 28 日，由“湘江风雷”、“东方红总部”、“红旗军”、“孙大圣挺进军”、“长沙工人”、“青年近卫军”6 个“湘派”组织发出通知，邀请各造反组织共商联合大计。此时“工联”已宣布解散，自然不在被邀之列。

9 月 29 日上午，部分接到“通知”的群众组织来到解放路三招待所“东方红总部”，出席由“东方红”谢国凡、唐志明在这里主持的会议。与会者攻击“工联”搞的“倒旗联合”是“大

解散”的“邪气”，提出“应有条件地由各总部先联合，再下基层联合”的方案，并将拟议中的各总部联合组织命名为“湖南省会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委员会”，简称“无联”。初步决定了按系统设分会、支会的组织原则，通过了《关于坚决拥护全力促进誓死捍卫革命大联合的联合声明》，即《9.30 声明》。

9 月 30 日上午，会议在“东方红”总部继续进行。会议重点讨论了“省无联”的组织条例，会上产生了“省无联筹备小组”，当即委派“东方红”总部的郭冬和去刻了公章，要“争取（10 月）5、6 号开成立大会”。

10 月 1 日，“省无联筹备小组”进行了分工。

10月5日，在“东方红总部”由柳枚青主持召开了一次有20个“湘派”组织代表参加的会议，选举了“常委单位”，讨论并确定了“省无联”的《成立公告》，并议定了10月11日召开“省无联”成立大会。

在《成立公告》上署名的20个组织有：

以张家政为首的“湘江风雷接管委员会”；

红旗内燃机配件厂“东方红战团”；

湖南“红旗军”；

“长沙农联”；

“长沙工人”；

“东方红”总部；

“青年近卫军”；

湖南省“红工会”；

省直“联络站”；

长沙“财联”；

长沙“虎山行”；

体委“红旗”；

北区“工联”；

“红导弹”

“高校风雷”；

矿冶“井冈山公社”；

师院“永卫东兵团”；

“红中会”；

“红专会”；

九中“重上井冈山”。

但是就在当天，在“省无联”《成立公告》上署名的“长沙工人”发表《关于促进我市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的重要声明》，宣布不承认《9.30 声明》，自此不参加“省无联”的活动。

10 月 6 日，“省无联”继续在“东方红”总部开会，决定 10 月 11 日上午 8 时在东风广场举行“省无联”成立大会，通过了《成立公告》、《给毛主席的致敬电》、《组织条例》等文件的定稿，各组织在《成立公告》上依次签字。会议制定了大会程序。

10月6日，驻长沙的解放军工程兵学校，即总字341部队持“省

无联”观点的341部队“红色硬骨头战斗兵团”，与拥护省革筹的341部队“联委会”之间发生了武斗。“红色硬骨头”战斗兵团的负责人李长元将这个情况到“东方红总部”通报后，持“省无联”观点的一些组织，包括“东方红总部”的“自卫团”，急欲到341部队大院内去支持“红色硬骨头战斗兵团”。大概为了壮声威，第二天即10月7日，原定于1967年10月11日才发出的“省无联”《成立公告》传单，被人提前贴上了大街，公之于众。此时又恰逢“湘江风雷”成立一周年，盛大的庆典正在筹备之中，拟邀请全国的造反组织来长沙同欢，长沙所有影剧院向公众免费开放8天，“湘派”上下一片欢腾。

然而，就在湖南“省无联”紧锣密鼓的筹划成立之时，传来了周恩来将在武汉召见湖南省革筹成员的消息……

毛泽东不仅安排刚果总理去淮南，还让阿尔巴尼亚部长会议主席谢胡率领的党政代表团到武汉访问，直接与群众组织代表接触，让这颗“地中海上的明珠”亲身感受一下，中国的文化大革命究竟是怎样进行的，也算是澄清一下国外对中国“720事件”后的形势所作的种种猜测。

10月8日，周恩来陪同阿尔巴尼亚部长会议主席谢胡率领的党政代表团来到武汉。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中华全国总工会主席刘宁一等陪同前往。武汉“三钢”、“三新”的群众组织头头到机场欢迎。

据说，周恩来这次下飞机以后就问：“‘工造总司’的吴焱金

同志来了没有？” 因为，7 月 27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 、中央军委 、中央文革小组给武汉市革命群众和广大指战员的一封信》中：“武汉市的一系列革命组织，钢工总、钢二司、钢九一三、新华工、新湖大、新华农、三司革联等革命群众组织”的提法，让当时武汉“新派”颇有微词，特别是“工造总司”、“中学红联”和省、市机关“红司”。他们尤其对提到的造反派组织中有“三司革联”却没有他们意见更大，因为不论是造反资历，还是影响、人数，这三个组织都是“三司革联”无法比拟的。

武汉警备区派人在武汉三镇大街上找了几个小时才把“工造总司”吴焱金找到，把他送到东湖长天大楼。

当天晚上 19 时 30 分，在武汉东湖长天大楼举行欢迎阿尔巴尼亚贵宾的宴会，这次不仅邀请武汉的“三钢”、“三新”、“三司革联”，还有“工造总司”、“中学红联”、“长办联司”、“新一冶”、“公安联司”、“省市机关红司”等群众组织的头头参加。

宴会前，周恩来和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在休息厅与这些群众组织的头头见面，康生、李富春、刘宁一、刘晓、吴法宪，武汉部队曾思玉、刘丰，警备司令部领导，还有湖北电台、《湖北日报》的记者参加，大家进行了座谈。

刘丰首先介绍了武汉的基本情况，接着，各群众组织代表开始发言。

“工总”头头朱洪霞说：“阿尔巴尼亚同志来武汉，感到特

别高兴，阿尔巴尼亚同志造反早，我代表武汉无产阶级革命派表示热烈欢迎！我‘工总’是最早造反派之一，造修字派的反。学生先造，工人支持，他们打学生。‘三新’、‘二司’下乡下厂点火，我们到京告状，他们诬蔑我们为牛鬼蛇神。走资派拉一派打一派，把我们打入狱。‘工造’、‘三新’为‘工总’翻案，走资派唆使‘百匪’搞武斗，‘7·20’全国支持我们。最近我们的缺点是有私字，我们正在发号召，斗私批修，我们要同解放军搞三结合。”

周恩来介绍说：“他是 7 月 19 日从沙阳农场放出来的。”

谢胡问朱洪霞：“你是什么工？”

朱洪霞答：“锻工。”

谢胡问：“父亲干什么？”

朱洪霞迟迟答：“卖烧饼的！”

谢胡问：“多少工资？”

朱洪霞答“63 元。”

谢胡问：“读多少书？”

朱洪霞答：“4 年。”

李想玉代表武钢汇报：“我们为纪念毛主席 1958 年 9 月 13 日视察武钢成立‘九·一三兵团’……发表了《二八声明》，陈再道借此压我们，我们是被压垮的。”

周恩来：“谈谈联合问题，武钢有几个组织，各个组织有多少人？”

李想玉："武钢‘红旗’只有 1000 多，都是知识分子。‘工总’100 多人，他们是 8 月 8 日成立的。‘九·一三’是产业工人，是掌权的。"

周恩来："为什么联合不起来？"

李想玉："他们大都是‘百万雄师’过来的，都是知识分子，现在知识分子要掌权。"

周恩来："为什么联合不起来？都是工人嘛！

李想玉："他们有坏头头。"

周恩来："他们有‘百万雄师’坏头头？"

李想玉："有！

周恩来："是否你们组织大，有骄傲情绪，看不起人家？"

周恩来对李富春说："你明天到武钢把各组织都找来，每个组织派 10 人。"然后转向李想玉说："你们（九·一三）今天参加了，可以少来些。多听听其他人的意见，组织不分大小，平等待人。"

李想玉连声答应："好好好。"

周恩来："你们联合得怎么样？‘工总’有 1000 多单位，你们有 200 多单位，是不是交叉了？

李想玉："没有，我们与‘工总’穿一条裤子，现在联合得不好，是下面的不联合。"

周恩来："你们不是参加‘工总’？"

李想玉："是的。"

周恩来："为什么戴'九·一三'袖章？"李想玉说不出话了。

刘丰："他们就是要一个'钢'字"。

周恩来："先临时联合，你'钢工总'，他'钢九·一三'，都是一个'钢'字，搞个钢工代会好不好？"

"三钢"使劲鼓掌，周恩来看出来了。他问："'工造'有没有代表？"

答："有"。

周恩来："'三钢'同意，'工造'同意否？请'工造'的同志发言"。

吴炎金发言，他检讨了《二八声明》上的错误并向"工总"赔礼道歉，周恩来带头鼓掌，并说："《二八声明》是有许多缺点错误，我们是从大方向看。""他们盼望和你们联合，同意吗？"

朱洪霞："同意"。

谢胡说："你留一手"。

周恩来："以武汉的'新派'为主实现大联合，成立一个新工代会好不好？"

"新派"头头们热烈鼓掌。

吴炎金说到后来他们坚决为"工总"翻案。周恩来说："很好嘛！'工造'当外宾的面承认错误，都是造反派嘛！你回答我的第二个问题，如何联合？"

吴炎金："在武汉军区曾、刘首长领导下，按单位，按部门

实现以左派为核心的最广泛的大联合。”

周恩来：“你们三个组织可以搞个工代会。”

吴炎金：“我同意搞工代会，农代会，红代会。”

周恩来：“组织名称由群众决定，上面如何联合？”

朱洪霞：“看群众。”

周恩来：“具体点。”

朱洪霞：“我们搞个‘钢工联’。”

周恩来：“搞‘钢工联’不是除了‘新’字，你们不要因为有分歧，把‘新派’去掉，‘新派’也是革命造反派嘛！”

李想玉：“我们是大联合，他们学生干扰。”

周恩来：“你的话有一半对有一半不对，你刚刚才说‘三新’到你们厂里点过火吗？你们不要忘记在你们困难时是‘三新’顶住了。你们有战斗友谊，不可丢掉人家，最好搞革命的工代会。我刚才提‘钢工代会’你们鼓掌，‘三新’不高兴。你们不要认为‘二司’站在你们一边就好，‘三新’不是支持过你们吗？你们还提出什么‘不钢必康’，康老也是康，他就是不错嘛，康有为是 70 年前的事，这些都是骂街的话。你们三家联合搞革命工代会筹备小组好不好？”

众：“同意”。

康生：“根据以前经验，当面同意，出了门就打架，我建议以后你们搞第一，学习毛主席著作。第二，自我批评。对其它组织一压二打，这是山头主义。我举例：青岛大组织检查了大国沙

文主义，另一派整风，检讨，联合起来了。要分清延安还是西安，武汉没有西安，都是革命造反派。光谈不成，小道理服从大道理，不是大道理服从小道理。外面传安徽二派火炮轰，毛主席最新指示发表后各做自我批评，联合起来了。你们为什么不联合？

周恩来："你们明天谈联合。"

朱洪霞："我们同意搞革工会。"

康生："思想要通，思想不通名字再好也不成。"

"新湖大"龙铭鑫代表"三新"发言。他首先对阿尔巴尼亚贵宾表示欢迎，他作了自我批评，承认在《二八声明》问题上压过"工总"和"二司"，他向"三钢"道歉，同意搞工、农、红代会。"有人搞司令部我们不同意，中学生走自己的道路——中学红联。"

周恩来问："大中学校如何联合？"

龙铭鑫："参加'二司'是行不通的，改名是可以的。"

周恩来："不要考虑名称，武大不是垮了吗？"

龙铭鑫："我们主要建立红代会。"

周恩来又问"新华工"、"新华农"、"三司革联"等组织同意吗？大家都说同意。

周恩来问："武大有代表吗？"

答："有。"

周恩来："你们参加红代会吗？"

"参加！"

周恩来："现在看'二司'了。刚才康老讲，开会赞成，下去不赞成，联合快，散伙也快。你们是革命造反派，不要以为自己大，越是大越是要虚心。"

丁家显表态，周恩来说："简单点。"

丁家显："……刚才'工造'、'三新'向我们道歉了，我们担当不起，我们在《二八声明》上也有错误，把矛头指向了'新华工'，在这里检讨。"

朱洪霞和李想玉："这句话也代表我们。"

丁家显接着说："我们不要'以我为核心'……"

康生："你们有'以我为核心'的思想？"

丁家显："有。"

康生："以我为核心，这是愚蠢的，谁想以我为核心，谁就成不了核心。这是主席说的。"

周恩来："要大树特树毛泽东思想权威，'三钢'以为自己大些，高人一头，现在又较大，你们骄傲了，以大压小这不对，这是大国沙文主义。今后有困难、有考验，那就是能否经得考验，真正有出息的人是谦虚谨慎的人。"

"三司革联"："我们一定要借阿尔巴尼亚同志来汉的东风把大联合搞好。"

周恩来正在看材料，他取下眼镜鼓掌说："毛主席提议阿尔巴尼亚同志到武汉来，这个东风推动你们，现在看你们的了。"

"三司革联"："保证借这个东风搞好大联合。有的要以我为

核心，我们坚决抵制，我们愿意不要自己的名字，搞好大联合。”

周恩来：“没搞好联合是内因，主席说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有中学生吗？讲一讲。”

中学“红联”：“我们是独立的组织。向总理，康老问好。”

周恩来：“应先向阿尔巴尼亚同志问好。”

大家要求对武汉地区文化大革命作指示。

周恩来说：“还是让谢胡同志说。”

谢胡：“亲爱的周恩来同志，康生、李富春同志，无产阶级革命派代表们：

毛泽东同志亲自发动领导的这场震撼全世界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取得了伟大的成就，武汉的成就决不仅仅是武汉的成就，你们的成就是我们的成就。在座的代表都是无产阶级革命派，我相信你们都是忠于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

我们保证，尽管阿尔巴尼亚身受帝修双重层层包围，但是阿尔巴尼亚将坚定不移地沿着毛泽东思想，马列主义的道路走下去。毛泽东同志说：‘中阿两国远隔千山万水，但我们的心是连在一起的。’我们的友谊是真诚的，是久经考验的，我们决不是那种口蜜腹剑的假朋友。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和人民坚决地和您们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

谢胡的讲话被一阵一阵的热烈的掌声打断。

周恩来说：“阿尔巴尼亚是我们最亲密的战友和朋友，谢胡同志刚才的真诚热情的讲话，我们表示非常感谢。阿尔巴尼亚贵

宾的到来是一般强大的东风，这股东风一定能够促进武汉革命造反派的大联合。从刚才的掌声看，说明了这股东风起了很大的作用。”

谢胡同志和周恩来的讲话不时被掌声和欢呼声打断。

“新一冶”头头曹承义把袖章献给了谢胡和康生。

这时宴会开始了，周恩来说：“大家吃饭吧！”

人们进入宴会厅落座。

曾思玉司令员代表武汉军区和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致欢迎词。

阿尔巴尼亚贵宾也致了答词。

“新一冶”的曹承义觉得机会难得，壮着胆子走到坐在主宾席的周恩来身边，弯着腰，附耳轻声说：“总理，我是‘新一冶’的。”

周恩来用手摸了一下曹承义佩带的红袖章，说：“哦，‘新一冶’，我知道。”

曹承义接着汇报：“在这一次揪陈抗暴中，我们付出了很大的牺牲。”

周恩来连连点头，无比关怀地说：“知道，知道。”

说着，曹承义拿出《毛主席语录》，对周恩来说：“我们全体战士，在最艰苦的日子里，都有一个共同心愿，就是坚定不移地用鲜血和生命保卫毛主席。总理能不能给我们题词，献给光荣牺牲的战友。”

周恩来伸出右手和曹承义热烈握手，说道："你的心情我理解，你的这个精神很好。文化大革命以来，只有毛主席题词。我还没有题过词，不能开这个例，要不，以后就多了。"

曹承义有些惶恐，赶紧说："那就请总理在《毛主席语录》上签名。"

周恩来略停了几秒钟，站起来说："我要敬酒了。"

他走到身边不远处摆放的落地麦克风前，没有拿讲稿，作了第二天见报的"祝酒词"。

曹承义呆呆地站在主宾席的桌边，周恩来致"祝酒词"时，他只好轻轻地回到自己的席位上。

周恩来致辞后，又到每张桌子前向到会的每一个人碰杯敬酒。当他来到"新一冶"的桌前，又握着曹承义的手问："你们和'九一三'联合得怎么样了？"

曹承义回答说："我们联合得不好，我们有缺点。"

周恩来点了点头说："我知道，这个，我们多做'九一三'的工作，我们多做'九一三'的工作。"

宴会上，周恩来杯中斟的红葡萄酒，每次都是一杯喝干。当他走到吴焱金跟前时，问他的姓名，吴焱金答道："吴焱金。"

周恩来说："你就是'工造总司'的吴焱金？"

吴焱金说："总理好酒量。"

周恩来说："我年轻时，比现在还喝得多，喝个两三瓶没问题。"

随后，“新一冶”、交通“联司”等组织代表武汉地区革命造反派向阿尔巴尼亚贵宾和周恩来、康生、李富春敬了酒，“祝愿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中国人民亲密朋友恩维尔·霍查、祝愿中央首长和谢胡同志身体健康。”

群众组织头头都是第一次参加国宴。“新华工”一号勤务员郭保安戴一副近视眼镜，瞅着一个小盘子说：“好白的烙饼啊！”拿起来便吃，刚一咬就吐了出来，原来是叠成圆形的擦手巾，惹得全桌一阵哄笑。

人们刚笑罢郭保安，李想玉又出了洋相，有些菜下面垫着漂亮的红花绿草，李想玉以为绿茵茵的嫩草是没吃过的青菜，刚尝一口连忙吐出来，连声说：“是草，是草。”

吴焱金说：“你成了革命的老黄牛。”

大家又是一阵大笑。

由于每一盘菜都很好吃，一端上来就被吃光了。谁知宴席上源源不断地上菜，菜一个比一个好吃，肚子吃得实在太饱了，许多人只有停下来不吃了，你望我，我望你，再看看满桌美味佳肴，有人摇摇头说：“早知是这样，何不慢慢品尝呢！一个个狼吞虎咽，真是掉了造反派的底子！”

“掉底子”湖北方言，即丢人的意思。好在大家都彼此彼此，哈哈一笑就过去了。

会后，这些群众组织共同整理了《周总理接见武汉无产阶级革命派各组织代表时的讲话》。

## 第 908 回：周恩来，武汉见湖南代表　批极“左”，□反派不要□傲

10 月 9 日，周恩来、阿尔巴尼亚总理谢胡、康生、吴法宪、和武汉军区领导曾思玉、刘丰等来到武汉“二司”司令部，并在武汉测绘学院大操场接见了学院的师生，“二司”勤务员杨道远陪同他们登上主席台。周恩来亲自指挥全场高唱《大海航行靠舵手》，当唱到曲终“不落的太阳”时，他笑容可掬、潇洒自如的两手收回，合环高捧一虚拟的圆球，向全体师生左右示意，然后放下。

周恩来听说了湖南“省无联”的事情，便打电话给湖南省革筹小组组长、47 军军长黎原，让湖南省组织群众代表来武汉汇报情况。10 月 8 日，由“省革筹”小组成员、47 军副军长郑波带领湖南群众组织代表到达武汉。

10月9日夜22时55分至10日凌晨4时43分，周恩来在武汉军区礼堂二楼会议室接见湖南47军副军长郑波和胡勇、谢若冰、谭海清、邹定国、戴莉、雷志忠、尚春仁、吴逸银、李正魁等群众组织代表，陪同接见的还有吴法宪。

周恩来步入会场问大家好，同大家一一握手后入座。他看见湖南“青年近卫军”的“海司令”谭海清，开玩笑的对他说：“海司令，如果让你去担任湖南省军区司令，你这个‘司令’能不能胜任？”

谭海清竟胸脯一拍说：“没有问题！”

周恩来对谭海清的回答先是一愣，后又大笑，并指着他说："照你现在这模样，当军区司令，你三天就会倒台。"

郑波交给周恩来一份目前湖南情况的材料，他接过材料看到上面写的湘南几个县乱杀人的情况，问："杀了这么多人，准不准确？"

答："准确，有这么多。"

周恩来："保守派这么猖狂，你们造反派还不联合起来，我真替你们着急。别的地方，有的是保守派垮了，两派才会打起内战来。你们怎么搞的？湖南还乱的不够呀！今天我在大会上讲的话你们听了没有？"

他是指当天在武汉欢迎谢胡等人的群众大会上的讲话。

众答："没有。"

周恩来："明天报上会登的，是对武汉讲的，对你们也有用处。"

有人说："我们8号就来了，等了你一晚上。"

周恩来："我到武汉是来陪外宾的，顺便接见你们，怎么能说没有先接见你们呢？总不能喧宾夺主嘛！湖南是另一种形势，当然总的还是好的。毛主席到长沙作的最新指示，没有经过核对，你们就宣布了。"

有人答："看到武汉宣布了，我们才宣布的。"

周恩来："你们逼着我们也写了一个毛主席的最新指示，要发到全国。我想知道一下你们的情况。"

有人说："从北京回去后，内战还是打，主席最新指示，'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发表后，下边有300多个单位联合起来了，形成了一个高潮，但是有20个观点一致派的组织发表了个《9·30声明》。声明发表后，报喜的单位少了。矛盾原来也有些，声明发表后，矛盾更深了。由于《9·30声明》，使大联合有所动摇，有点冷了。有的组织解散总部并在《长沙晚报》上登了，后来又没有解散，影响也不好，还有些组织又搞了个大联合，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北京谈判回去之后头头老开会，没下去，要求总理批评，有些人不够当造反派头头。"

有人说："从北京回去后，我们对中央指示贯彻是不力的，对有些问题老是抱着怀疑态度。"

周恩来："什么怀疑，你们就是互相不信任，互相不服气，就想以我为核心，这是派性。湘南杀这么多人，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保守派还这么猖狂，常德还没有完全解决吧？湘潭还解决得比较好。'高司'都回来了，你们还打内战，我真不理解你们是怎么想的！蔡爱卿，中央决定你们回去就要逮捕的，你们回去20天还是一个月才逮捕的，还让他活动。'341事件'蔡在工院是确实的，为什么要保他？清清楚楚是坏人。为什么不把蔡抓起来？像这样的黑手，在别的地方早就自己把他抓起来了，你们那里为什么不愿意和他一刀两断呢？"

周恩来说的"341事件"是指8月10日发生在341部队，即工程兵学院的武斗。

周恩来接着问："我们把安徽的问题给你们看了吧？"

众答："看了。"

周恩来："多光明磊落！多么痛快！江青同志一点，他们就打电话回去，双方都有黑手，都把坏人抓起来了，两派并肩游行。北京处理了'516'的问题。凡是乱，里面总是有黑手的。武汉也是这样的，就是长沙，为什么？我们痛痛快快的谈一下，问题不是我一个人处理的，中央还有戚本禹同志，每次都是和我在一块嘛！我相信像你们这样，是不会走上无产阶级革命轨道的，'516'极'左'思潮影响到长沙很深，你们这样是搞不好文化大革命的，你们要上当的。有坏人在挑拨你们，为什么愿意受人家挑拨蒙蔽你们呢？长沙保守派还这样活跃，你们还不联合，我只能说你们不自觉，只能这样说。江青同志《九·五讲话》录音你们听了吧？"

众答："听了。"

周恩来："里面讲得很清楚。第一条就是说的这些问题。就是有人要挑拨毛主席的司令部，把毛主席司令部的人一个个都说倒了，企图孤立毛主席和林副主席。你们爱护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司令部，说话后就不兑现了？你们保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是没有兑现的。你们是毛主席故乡的造反派，就这个样子，外宾都不能去。我若不是工作不能脱身，如果我有时间，我要把谢胡同志带到韶山冲去参观，我不相信群众不欢迎我们。坏头头你们自己抓。你们看了淮南煤矿报道吗？"

没有人吭声。

周恩来："哎呀！你们报纸都不看？一天到晚忙忙碌碌，就是搞派性。你们要知道，乱而后治，越乱的凶，解决问题越彻底，主席的道理就是这个。我今天在群众大会上讲了淮南煤矿有几万工人，武装部和军区发枪给一派，把另一个造反派赶出去了两万多人，赶得到处都是。这个煤矿是长江流域最大的，供应很多地方用煤，每天产4万多吨。武斗后生产停顿，日产不到1000吨，不仅打枪，还打炮，这样严重的情况！本来都是造反派，就是被坏人蒙蔽了。江青《九·五讲话》后，把两个坏人揪出来了，欢迎造反派回来，互相作了自我批评，日产量又很快上升到二万五千吨。在这么一个情况下，主席叫刚果（布）的总理去参观，还是一个民族主义国家的，我都没有想到。你们打内战，相形之间，你们要向他们学习。南越的代表团11号到你们那儿，你们要组成联合接待组，把他们带到韶山冲去。你们打内战，他们打外战，你们要向他们学习。他们代表团团长身负7次伤，现在还有一颗子弹留在体内，我叫他去医院检查一下，他说不去，要等到越南抗美战争胜利之后再去。

我们请谢胡同志来武汉，看看乱后的情况，我跟主席一讲，主席说叫他们去，先分两路出发，再到武汉会合。因为谢胡同志要到武汉来，我得陪同，我向主席请了两天假，来陪外宾。同时再利用时间请你们来谈谈，你们还质问我为什么不先接见你们，你看看，你们本位主义够多严重？你们这么骄气！要说骄，武汉

应该比你们更骄，因为那里的‘百万雄师’都没有了嘛！有人要我狠狠批评你们，今天试试看批不批得动。有的人能接受，恐怕有的人就可能不以为然。主席要我们告诉小将，现在正是你们犯错误的时候，要提醒你们。并且说要把我们过去犯错误的经验教训告诉你们。江青同志的眼睛非常锐利，上次在北京参加那个会，你们当时对邮电局那个人……”

有人答：“刘秀英。”

周恩来：“就不太好嘛！江青同志特别感到湖南造反派同志的情绪不对头。一年的文化大革命了，应该恨的人不恨，应该爱的人不爱，这是敌我问题。吴自立是彭的爪牙，蔡爱卿与吴自立又打得火热。蔡爱卿骗了‘青年近卫军’，将他们经过上海绕弯子送到北京，在北京肖华还接见了。蔡爱卿与吴自立攻守同盟，要夺军权。长沙造反派心理状态没有完全解决。当前提武装夺取政权，枪杆子解决问题，这是极‘左’思潮。军内当然也有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但揪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就代表了一切，专揪军内一小撮，在北京就跟你们说了这是错误的。军队是毛主席亲手缔造的，林副主席亲自指挥的，有几十年的光荣传统，他们学习主席著作最好，是觉悟高、有组织、有纪律的人民子弟兵。我们不能设想没有中国人民解放军，我们能搞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把龙书金拿掉，你们来当司令员行吗？培养接班人现在还不能马上接班嘛！要锻炼十几年嘛！江青同志讲了三个问题，这三个问题就是讲对中国人民解放军、对无产阶级司令部、对革命委

员会的态度。解放军在支左中，有人犯了错误，我们把一些犯了错误的同志调到北京学习。主席还叫陈再道到学习班去学习。主席总是比我们站得高看得远。陈再道这样的人还调到学习班去学习，这对你们是不可思议的，陈再道虽然搞了‘720事件’，但当时中央让他到北京去，他还是去了嘛！作了一个初步检讨。陈再道到北京后，武汉军区党委写了一个检讨。主席在批语中说：‘包括你们和革命群众所一致要求要打倒的陈再道同志在内……。’称同志，这是什么意思？你们想想，要是别人说的，你们一定要骂了。”

周恩来继续说：“现在长沙的秩序你们造反派感到怎么样？……还没有湘潭秩序好。过去我没有管湖南，以后主席批叫我管的。这次到武汉来我完全可以不接见你们湖南代表，明天还有事，但是我觉得既然要管，就有责任，我觉得我还是要跟大家谈谈。”

“许世友同志对党中央、毛主席是非常感激的，就是因为揪军内一小撮这个口号，到处抓一小撮，广州抓黄永胜、南京抓许世友……湖南抓龙书金，我们说一旦有事，我们还要这些人带兵上战场的，龙书金同志还是要当司令员的。龙书金同志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打仗是很勇敢的。蔡爱卿这种人才是真正要打倒的。军区内现在搞得很乱，原来我们只叫司、政、后机关搞四大，但是有些基层单位也搞了，战士也有些走了，湖南军区现在完全瘫痪了，这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政干校就很好。校内搞四大，

校外搞支左，听中央的话，讲政策。工程兵学院就不对头了，你们不要因为他们有些人极‘左’，你们就支持他，不让他们外出串连，他就是出去。工程兵学院不听毛主席、林副主席、党中央的话怎么行？要他们不要那样介入，他们就是没执行。”

周恩来问：“听说你们在14日开大会。约请全国各省来人参加？”

有人说：“口头和‘钢工总’说了一下。”

周恩来：“这样不好。西安交通大学第一个写大字报的李世英同志，反动路线迫害得他要自杀，后主席批给我给他平反，去年、今年我都见过他。西电、西军工大跟他对立，当时他本人比较稳，双方到北京，我劝他们联合起来。到北京后，我支持了他，他就骄傲了，回去不但不联合，反而要自己夺权，单独树立了旗子，搞了一个司令部，设在人民宾馆，搞了2000人，找两个工人做司令，他当政委，他忙这2000人都忙不过来了，哪还能联系群众？造反派一样可以做官呢！你们要警惕，脱离群众是最危险的。中央文革认为，不管是哪个组织的负责人，都不要脱离群众才有力量。这是个很重要的问题，小将们一样有脱离群众的危险。”

周恩来用了很大篇幅批判蔡爱卿。

众问：“现在保守派说，主席讲的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应该联合，是指的造反派与保守派，这样说法对不对，‘高司’能不能存在？”

周恩来：“如果保字号头头承认了错误，采取了自我批评，

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在大批判中考验。改正错误，交枪比你们更快，群众还是好的嘛！你们不要报复，他们不会一辈子保皇，组织当然可以转化为革命组织，就要看他大方向转过来了没有。组织是可以转化的，保守组织转过来了可以联合，革命组织也可以转化而犯错误。

‘高司’这个组织能不能存在，不能这么说，不能用强制命令的方式取消，要看你们工作做得怎么样？如果你们采取正确的方针，你扩大了，他就小了。采取压的办法是压不垮的。决不要自封为核心，凡是以我为核心的结果都不能成为核心，都失败。有人提出要以左派为核心，这话听起来很对，但言下之意，就是自己是左派，别人是‘保守派’、‘中间派’，都右了、修了。这是不对的。小将们应该注意，尽管你大方向对了是不保险的，如果你政策错了，还是要犯错误的，要失败的，要影响大方向的。”周恩来又举了“八一”南昌起义例子。

“每个革命组织不可能没有坏人钻空子，走资派煽动你们，在旁边利用你们。”他举了北京“516”、农业口秦化龙的问题和吴传启的问题，说：“吴是从国民党混到共产党里来的，还参加过竞选，跟武汉一些人有联系，他的手伸得很长，财贸、外交、农村、统战部，刘影、刘大轮、民族的洪涛，通通给揭发出来的。陈伯达同志早就发现吴传启不是个好人。他们对形势的估计是最悲观的。他们利用宣传的错误到处散布‘揪军内一小撮’‘武装夺取政权’和‘战争解决问题’，这完全是反动的嘛！武装夺谁

的权？夺毛主席的权？战争解决问题，打谁？当然这次我们批判极‘左’思潮，也不准老保翻天，这是两条路线斗争的问题。批判极‘左’思潮能说高司就对了吗？张平化就对了吗？不是，还是错的。”

周恩来让秘书宣读中央整理的毛泽东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的谈话内容。然后说：“今天我的讲话讲了四个问题：(1)不怕乱，要从乱中发现坏人；(2)大联合，克服派性；(3)抓革命，促生产；(4)教育干部（包括红卫兵要学习）。

要办各级学习班，湖南也要准备办学习班左、中、右都要有，才有辩论，学习以自学为主，学一个月左右，再回来。”

“你们有一些组织发表的《9·30声明》是不对的，是错误的，是极‘左’思潮，不能以我为核心，不能以为自己革命，不能自封为坚定的左派，别人都说成修了、右了。”

“47军是毛主席所信任的，你们把矛头对准47军，你们要犯大错误的。我所指你们，是指有极‘左’情绪的人，只要我们把意见告诉广大群众，广大群众是不会听你们的。我说的这些话是及其负责的，回忆一下，我什么时候说话是不算数的？你们是青年人更要说话算数的，不能当两面派。”

“分裂是不利于长沙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

“主席要我们6、7、8月份解决几个省的问题，你们湖南现在看还没完全解决。我们不希望有反复，如果你们硬要这么搞，就会出现反复，11号开这么一个会，这就是单方面的嘛！你们这

样搞要走向反面，你们开这样的会闹分裂，越南代表团还怎么去呢？你们不应再打内战了。”

有人提官办、民办、走上层路线问题。周恩来说：“跟革筹小组接触怎么能叫走上层路线？那今天我请你们来谈问题就更是上层路线了？！怎么能够把革筹小组和你们叫官、民呢！怎么能这样对待毛主席司令部呢！都是战友嘛！”

有人提到敌人在挑拨离间，蔡爱卿不只一个，现在还有蔡爱卿式的人物在活动。

周恩来：“湖南的阶级敌人还不少，旧军官、地、富、反、坏、右还在，我说蔡爱卿是拿他作个代表，不是说只这一只黑手。”

有人提出撤消总部的事。

周恩来：“组织第一步还保存，这还是对的，一步一步，哪一派想把哪一派搞掉，这是不行的，也要教育下边的战士。”

“你们结合干部还是要和47军、革筹小组商量，因为他们是中央相信的。特别是转业的人，军队可以知道，不经调查你们可要上当的。47军、革筹小组讲的话你们要尊重嘛！不管你们组织是几十万、几百万，坦率地说，你们不能当湖南最高领导，不然那些干部怎么办？起来一个就把老干部甩掉，这样能行吗？！你们现在就这样接班那还行呀！如果那样就是对无产阶级专政不负责任，不行！还没有到时候，没有丰富的斗争经验，还要学习、锻炼。今天和你们谈就是你们快到边缘了。今天说明，湖南的领导无论如何是47军，你们只能参加领导，不然我们就是不负责任。

我很坦率地把这个问题告诉你们，你们已经到边缘了，如果我们随便那样封官许愿，我们是要犯错误的。”

有人提：“收枪47军没有坚决措施，现在还有人抢枪。”

周恩来：“再有抢枪的按《九·五命令》办，抓一两个坏头头，你们同意不同意？”

众答：“同意。”

有人提到341部队，即工程兵学院问题。8月7日，“工联”汽电厂人员与“青年近卫军”为汽车问题，在341大院内发生了武斗。

周恩来说：“341部队问题是军队内部的问题，由军队内部解决。对341下个命令，回去搞斗批改、整顿。你们支持不支持？”

众答：“支持。”

周恩来：“你们回去后，要落实几个问题。1、341部队问题，军内解决大家同意了。”

众答：“同意。”

周恩来：“2、不准抢枪，带头的抓一两个。”

众答：“同意。”

周恩来：“3、地方上的枪通通收起来，交47军，推动大联合。”

众：“同意。”

周恩来：“4、正确对待保守组织。5、14号的纪念会，我们不能阻止，但不能外地来造声势，我们不赞成，按主席的话来说

叫帮倒忙，一定会犯错误的。今后各地造反派都起来了，能够自己解放自己。有了错误就改，我们还是要支持你们的嘛！

11号欢迎外宾，你们在47军、革筹小组领导下联合筹备这个工作，好不好？”

众：“好！”

周恩来：“内战无论如何不能提倡了，坏人挑动，你们自己要能把他搞出来。黑龙江有反复，炮轰派方向是不对的，革委会做了一些错事要改正，但还要支持革委会。希望你们听毛主席的话，回去搞好大联合。”

郑波：“要说的话，总理都说过了，就是要回去执行，能不能执行。对造反派是一个考验。”

吴法宪：“毛主席、党中央、总理、中央文革的话要坚决执行，总理今天讲的都是主席的思想，你们很好领会总理讲话精神。”

周恩来指着墙上挂着的毛泽东的诗词说：“‘暮色苍茫看劲松，’革命造反派要看到光明的前途坚定不移。‘乱云飞渡仍从容。’前进道路还有许多困难，革命造反派应毫不畏惧。‘天生一个仙人洞，’写景陪衬。‘无限风光在险峰。’要大胆谨慎最后总会胜利的。”

然后和大家一一握手告别。

## 第 909 回：离武汉，再叮嘱要大联合　□为继，“省无联”终未成立

10 月 9 日，陈伯达、江青给毛泽东写报告说：“为了适应当前广大革命群众彻底批判中国赫鲁晓夫的需要，我们选编了批判资料——《刘少奇言论》。”

报告中讲到，关于出版单位，“有几个方案，请择定：（一）中央文革办事组；（二）中央办公厅；（三）红旗杂志社；（四）人民出版社”。

报告附送了关于此书的《出版说明》。毛泽东审阅时，把说明中的“他伙同党内另一个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邓小平”一句改为“伙同其他一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删去了另一处同刘少奇并列的邓小平的名字，并写道：

林彪、恩来同志阅后，退陈伯达同志办理。《说明》中，不提邓小平。是否妥当，请酌定。以什么机关为出版单位的问题，请在一次会议上商定。

毛泽东

十月九日

《刘少奇言论》后来以“人民出版社资料室”名义出版，《出版说明》中没有点邓小平的名字。

10月10日上午，周恩来和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离开武汉返回北京，武汉各群众组织头头到汉口王家墩机场为周恩来送行。10时50分，周恩来在机场贵宾室与他们谈话时再次嘱咐说：

“你们要在曾、刘首长的领导下尽快实现大联合，不要搞派性，不要闹矛盾。”

周恩来问朱鸿霞：“我把湖北省交给你管行不行？”

朱鸿霞答道：“不行！不行！”

周恩来又问吴炎金：“我把武汉市交给你管行不行？”

吴炎金说“不行！不行！”

周恩来说：“你们都挺谦虚的嘛！”

吴炎金和朱鸿霞说：“不是谦虚，是真的不行。”

周恩来说：“是啊，你们都还很年轻，还缺乏经验，要好好向老干部、老同志学习。你们只要听毛主席的话，按毛主席的战略部署办事，你们将来还是很有前途的。”

当时吴炎金23岁，朱鸿霞33岁。

他再次说到：“革委会还需要维护。江青同志9月5日讲话录音你们听了没有？”

众答：“听了。”

周恩来说：“每个人都要听，革委会是新生事物，要维护，要加强发展，不能轰。新生幼儿都是粗糙的，毛手毛脚的，总有缺点。7个省市革委会，8个省成立了革委会筹备小组，我们正在解决11个省的问题。广东、广西、福建、江苏、安徽、辽宁、吉林，黑龙江算是补课的，还有河北、天津、陕西、宁夏共11个。如果在10月、11月解决的话，就共解决了26个，剩下来的就只有新疆和西藏、云南了。估计12月份可能解决。

主席给我们的时间很宽，说是春节前争取初步或基本的全部解决。所以大体上就要到明年4、5月份。还有中央各部现在只有一个科学院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国防科委不大成熟，还有反复，其它的还没有树立典型，还要抓。各省、地、县由军区解决。也要由各省、市、自治区建立地县革委会或筹备小组，这样子就全部解决。还剩一个年头，明年6月份到后年，就是扫尾，准备三年取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历史阶段的胜利。

我们三年的解放战争打败了蒋介石，三年抗美援朝打败了美帝。我们这次再用三年把党内最大的走资派批深、批透、打倒，取得文化大革命的彻底胜利，这是具有历史意义的战斗。这样一个历史性的战略性的阶段，有一个深刻的印象：你们有了经验，因为你们参加了。你们今年23、24岁，大的30岁，我们总算对你们交待了嘛！毛主席健在的时候直接领导你们，工人也好，学生也好，农民也好，军队也好，都得到了自己实践的经验。

主席说：文化革命不止是一次，要搞几次、几十次。因为世界范围内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未解决。他就会影响到我们中国的资产阶级分子嘛！影响我们党内的蜕化变质分子搞复辟嘛！即使世界问题解决了，全世界没有帝国主义、资本主义，没有剥削制度，到那时还有思想问题，还有政治问题，还有人有野心篡夺领导。主席说了：实现、巩固共产主义，这是几百年的事情，几千年的剥削制度嘛！哪里那么容易。你们取得的经验还是初步的。你们幸福地生活在毛泽东时代，一犯错误主席就提醒，主席说：现在

是轮到小将犯错误时候了，要把你们犯错误的经验教训告诉给他们。”

“怎么大联合的问题，要有步骤有目的地进行大联合。所谓有步骤就是不要急，一步登天不行，一下子大联合，把各种组织都取消，这是主观主义，因为群众还没有通，特别是群众的头头还接受不了，他们的山头还没有解决。

主席在延安整风时就说过：要承认山头，然后才可以消灭山头。承认山头，尊重山头，然后才可以消灭山头。这三句话你们记着。我们是各个解放区、各个方面军客观存在的事实嘛！不要主观主义的。第二叫尊重山头，自己的山头靠在一起总是亲热得很，受了一点委屈马上就支持。主席常说，一个山头的见到，什么话都能说，骂自己都可以。要是别人说一句话就不得了，就要火了。你们（对二司）自己骂自己不要紧。如果‘新华工’骂你们一两句话，你们就不得了，轻轻的都要计较的，这不叫山头呀！主席有一个办法就是尊重山头。各人说自己山头的缺点，不说对方，第一，承认客观现实，第二尊重对方，只说自己不说对方。然后才做到逐渐地消灭山头，还不是一下子消灭。我们主席指挥的解放军是最统一的，但也要非常注意，有些老将都在山头问题上犯错误。我这是老将，何况你们小将，我们不能主观主义，我不是责备你们，只告诉你们注意这个问题，总结经验教训。”

周恩来再次朗诵了毛泽东的诗词：“暮色苍茫看劲松，乱云飞渡仍从容。天生一个仙人洞，无限风光在险峰。”他说：“革

命的路上是有坎坷的，前途是光明的，只要我们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奋勇前进，我们就能到达无限风光的顶峰。”

谈话后，周恩来提出：“我们大家出去照个相吧。”

到了照相的地点，“新华工”的张立国奋勇当先，把周恩来的手挽着，朱鸿霞也不甘落后，挤到张立国的身边，夏邦银、杨道远等其他人都随意地站在后面，曾、刘首长反而被分别挤到前排左右两旁的最靠边处。

周恩来与武汉地区军队干部、群众组织负责人合影

前排左起：曾思玉（武汉军区司令员）、龙铭鑫（新湖大）、邓金福（钢九一三）、李想玉（钢九一三）、郑军（省直红司）、徐筱芳（三司革联）、方保林（钢二司）、王彩珠（钢二司）、×××（公安联司）、周恩来、张立国（新华工）、朱鸿霞（钢工总）、丁家显（钢二司）、李向阳（钢工总）、×××（三司革联）、彭祖龙（工造总司）、刘丰（武汉军区政委）。　第二排左起：×××（三司革联）、杨道远（钢二司）、谢华之（三司革联）、沈复礼

（钢工总）、彭勋（新湖大）、高玉泽（新华农）、张兴旺（公安联司）、杨联成（钢九一三）、 ×××（公安联司）、吴焱金（工造总司）、李××（38 军军长）、蔡大强（工造总司）、向成国（三司革联）、孙德枢（黄石市委书记）、张玉华（武汉军区第一副政委）。　　第三排左起：×××（刘丰的秘书）、夏邦银（钢工总）、×××（新华社记者）、史灼华（中学红联）、陈文汉（中学红联）、×××、×××、×××（新华社记者）、徐剑（军区三办）、×××、×××、王晨秀（陆军总医院护士长）、史福柱（曾刘首长办公室主任）。

中午 12 时 20 分，周恩来和外宾登机离开武汉飞往北京，武汉众群众组织头头依依不舍的和周恩来挥手告别。回去后，“三钢”、“三新”等群众组织共同整理了《周总理接见武汉无产阶级革命派各组织代表时的讲话》。

这天，湖南，“东方红”总部唐志明主持召开了一次会议，主要是反对周恩来的讲话，叫嚷“不管他”，并猜测“这次又要湖南代表去北京，可能是不同意我们的大联合”，抱怨去武汉的叶卫东、谢若冰“没有一点阶级感情”。但是，说归说，还是在无奈中决定将“省无联”的成立大会推迟至15日前举行。

10月10日当晚，黎原在省委礼堂接见“省无联”组织的负责人，传达了周恩来在武汉接见湖南代表的讲话，代表“省革筹”小组和47军表态，旗帜鲜明地说：

“‘省无联’是跨行业的组织，不符合毛主席、党中央指示

的按行业、按系统、按班级大联合的精神，‘省革筹’小组和47军不予承认。”并肯定了“工联”解散总部搞联合的方向。

黎原的话音刚落，立即遭到“省无联”的强烈反对，并喊出了“打倒湖南新资产阶级司令部头头黎原！”“反对湖南带枪的刘邓路线！”等口号。许多群众组织的头头还火气冲冲地从台下冲到台上，对黎原围攻谩骂……

尽管如此，黎原代表省革筹的表态，依然是给了正在兴头上的“省无联”一瓢冷水。

第二天，10 月 11 日，“省直联”的孙君森主持在“东方红”总部召开“省无联常委扩大会”。会议攻击黎原的讲话是“排挤一方”，是“要用枪杆子压制造反派”，抱怨“湘江风雷”在关键时刻抛弃战友，表示不指望“戴着左派的帽子干革命”，要坚持将“省无联”搞下去，还决定将黎原的讲话和“省无联”筹备经过一并交群众讨论。

10月12日，由“东方红”的柳枚青主持，在“东方红”总部继续开会。会上除了自我打气外，便是讨论“省无联”的出路。

因为周恩来的态度是明确的。会上，他们议了三条出路：上策是要“工联”也来参加，但要收回解散总部的声明；下策是灰溜溜地散伙；中策是冒被吃掉的危险干下去。最后决定取中策。但是，当天，“长沙农联”就发表《火急声明》，不承认参加“省无联”。

10 月 13 日，湘江风雷“自己解放自己战斗队”发表《请湘

江风雷的战友们思考10个为什么？》剑指张家政；

14日，湘江风雷“专揪坏头头战斗队”、“反迫害战斗队”发表《提出20个问题》，矛头亦直指张家政；

10月14日，“湘江风雷”总部发表《关于“9.30声明”的自我批评》；

10月17日，“湘江风雷”罗新发在东风广场的“以斗私批修为纲，粉碎极左思潮的猖狂进攻大会”上代表“湘江风雷”总部再次作自我批评。

至此，“湘江风雷”在政治上与“省无联”划清了界限，重返《8.10决定》。

10月19日，“省无联”在“东方红”总部召开“常委扩大会”，准备创办报纸《湘江评论》，但不以“省无联”的名义，而是以“湘江评论编辑部”的名义发行。

当夜，“湘江风雷”总部与“工联”发生分歧，退出次日的批斗蔡爱卿大会。

10月21日，“红造会”不听劝阻进入省革筹所在地省委大院，警卫部队开枪射杀两名邮电学校“红造会”成员。

10月23日，“东方红”的柳枚青主持在“东方红”总部召开“省无联”常委扩大会。会上除例行公事的自我打气、发泄不满外，重点是讨论两名“红造会”学生送命可能造成的后果，决定以“省无联”的名义出殡，扩大影响，搅乱形势。“红旗军”黄正清说：

“我们要利用‘红造会’死的两个人做点文章。”

可是，处在动荡与改组之中的“省无联”，已失去了支配大局的能力，两名“红造会”小将顺利下葬，“省无联”的文章未做成。

最终，湖南“省无联”的成立大会也没有召开。

10 月 9 日，《北京日报》社论中又发布了一条毛泽东关于学生和红卫兵大联合的最新指示：“革命的红卫兵和革命的学生组织要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只要两派都是革命的群众组织，就要在革命的原则下实现革命的大联合。”

原来，上海《文汇报》9 月 25 日擅自发表了毛泽东关于学生大联合的最新指示后，张春桥国庆节后回到上海，马上找到徐景贤责备说：

“你怎么搞的？报纸刊登毛主席的最高指示要经过中央的郑重讨论，并且报给毛主席审定，经毛主席同意后才能够发表的。你怎么随便就把毛主席的话发布呢？”

徐景贤说：“毛主席的指示，是要促进大联合嘛，我一时找不到你，就登报了，而且，‘无条件大联合’是毛主席的原话呀！”

张春桥说：“你胆子倒很大。无条件大联合，在谈话中这样说是可以的，但要形成文字，就应该更严谨：凡是联合总是有条件、有原则的。”

张春桥考虑了一下说：“现在没有其他办法，只好过几天，

重新请毛主席审定。”

于是，10 月 9 日，这条毛泽东的最新指示，经过中央文革小组的整理，再报毛泽东审定后，将原来指示中的“无条件大联合”，改成“要在革命的原则下实现革命的大联合”，然后写入《北京日报》社论，并由新华总社向全国发布，悄悄地纠正了《文汇报》的提法。

## 第 910 回：第一批，北京知□赴内蒙　设专案，“中央□常委员会”

1967 年的夏天，文革已进行了一年多了，到处都是两派的武斗，学校还在停课……一代热血青年该向何处去？没一人能回答。尽管不少人坚信中国将走进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新世界，但谁也说不出明天会是什么样?经历了文革的狂热造反和大辩论、大字报、大批判、大串联后的中学生，很多人都很茫然。虽然中央提出“复课闹革命”，但是对于初三、高三年级的学生，中学课程早学完了，中学毕业证还没发，大学又不招生，一时陷入迷茫。

北京市二十五中高三二班学生、中学红代会政治部负责人、北京中学红代会头头李东民的同班同学曲玉琴和班上的一些同学，按照毛泽东的“五七指示”，先到酒仙桥 798 厂“学工”劳动一阵子，后来骑着自行车，又到顺义城关公社向阳大队，在潮白河边办“学农”基地去了。当年的潮白河，清澈见底，黄沙绿芦，野鸭成群。他们从白家疃林场借来铁锹镐头，由当地驻军派战士帮助规划稻田，自发开始了学农劳动。学生们分到老乡家住宿，和“四清”队长一起，东家西家轮流吃“派饭”。吃完贫农吃下中农，吃完中农再吃贫雇农，绝不上地富家吃饭。在殷实的中农家，能吃到白面烙饼摊鸡蛋。有些贫雇农家不是全都富裕，吃窝头就咸菜是家常饭。在这里，他们真切地了解到京郊农民的日常生活。

在这期间，曲玉琴和同学鞠德利、高永吉、胡志坚酝酿到内蒙牧区插队。

此时的曲玉琴，对北京中学生“四三”、“四四”两派的派仗感到厌倦，他想继续毛泽东提出的教育革命，探索新的前进方向，也想摆脱对当时局面的困惑，寻找新的出路。

一些与他志同道合的同学认为，学习年轻时代的毛泽东，自办与社会实践紧密结合的新型大学可能是条出路。7 月，曲玉琴利用他主管的中学红代会《兵团战报》，发出了一份创办红卫兵大学的倡议书，两天之内，就有 300 多人报名参加。

在筹办红卫兵大学的过程中，他们学习了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有关部门青年运动的论述，认定自己的阶级属性是属于没有进行彻底思想改造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因此不可能构筑无产阶级的教育阵地。要取得创建新型大学的资格，必须实现思想革命化，而要做到这一点，只能首先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

选择什么样的“与工农相结合”的具体方式呢？

当时青年学生的榜样人物无疑是那些到农村安家落户的城市青年学生邢燕子、侯隽、董家耕、赵耘等一批“身居茅屋，心怀世界”的青年楷模，他们对不甘平庸的中学生具有很大的感召力。在此其间，曾去狼牙山进行过社会调查的女八中学生郭兆英，多次和曲玉琴谈起广大农村缺乏知识的窘况，谈起农民养活知识分子而又迫切需要知识青年的现状，大大影响了曲玉琴的思想。这样，自然而然地，上山下乡就成了他们合乎情理的首选目标。

此时已是在炎热的 8 月。

报名参加筹办红卫兵大学的几百人，原以为他们提出的教育革命是类似学工学农、开门办学之类的事情，顶多不过一两年。当曲玉琴在自己举起的“旗子”上写下“上山下乡”的大字后，这几百人只剩下曲玉琴他们 10 个人。这 10 个人坚定地表示:“即使只剩下一两个人，这条路也要走下去。”

筹备上山下乡的第一件事是选地点。理想主义加青春的浪漫，促使他们惟恐走得不远。

哪儿离北京最远？在地图上沿着中国的边界线找。新疆拜城这个极为生疏的地名被他们选中了，计划 9 月底在当地大雪封山之前就出发。

兴高采烈的中学生到北京市劳动局汇报了这个计划。劳动局安置办公室的人却不太赞成他们去新疆，说是中苏边境上纠纷多，不稳定，建议他们到内蒙古去。学生们们同意了，并答应等待市里出面去与内蒙古联系。

10 月初，内蒙古锡林郭勒盟派安置办的杨振祥、张保德 2 人来到北京接他们。

这 10 人中，没有一个人的家长同意子女去内蒙锡盟草原插队落户，但多数人又不敢公开反对。只有鞠德利的父亲态度明确，坚决不同意自己的孩子到内蒙古插队落户。他将鞠德利关在屋子里，自己坐在门口守着。曲玉琴到他家去说服，讲多少都没用。

这位同学的妹妹很支持哥哥，送饭时夹进一张纸条，鼓励他

要坚强，要“冲破阻力”。在妹妹的帮助下，他终于冲破坐在门口的那个“阻力”，躲在家人找不到的地方。同学们到他家打掩护，帮他“偷”出户口本迁户口。最后这位同学没从家里带任何东西，两手空空与同学们们一起踏上征程。

10 月 8 日这天，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常委丁国钰、李东民和北京市劳动局的领导召集座谈会，与曲玉琴他们话别。

丁国钰在座谈会上赞扬曲玉琴他们是“开路先锋”，叮嘱他们要有艰苦奋斗的思想准备，到牧区后要虚心向牧民学习，尊重民族风俗，把牧区建设好，为在校未分配的中学生带个好头，打响第一炮，以后把经验写回来，“发动不少的人再到那里去”。

10 月 9 日清晨，在北京天安门广场聚集了上千人，他们是来为北京市二十五中、二十二中、女八中、女十二中的 10 名红卫兵曲玉琴、郭兆英、王紫萍、王静植、宁华、郑晓东、金昆、胡志坚、高永吉、鞠德利送行。今天，这 10 名中学毕业生将奔赴内蒙古西乌珠穆沁旗白音宝力格公社，在那里插队落户，当普通的公社社员、普通牧民。北京市劳动局组织了这次欢送，气氛非常热闹。

也就是在这天，曲玉琴将自己的名字改名为“曲折”，他已准备在人生的旅途中走曲折的道路。同班同学鞠德利改名为颂东，高永吉改名为高峰。

曲折 10 人在金水桥前列队，面对天安门城楼上的毛泽东巨幅画像，举起右手，由曲折领读他们发自内心的誓言：

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最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我们——无限忠于您的红卫兵向您宣誓：

您伟大的思想，是指导世界革命人民前进的最最光辉的灯塔，我们永远永远无限地忠于您，无限忠于您的思想，忠于您的革命路线。我们一定活学活用您的著作，在“用”字上狠下功夫，为了毛泽东思想赤遍全球的伟大事业，上刀山下火海我们心甘情愿！前面有曲折，也有反复，但是您的光辉思想永远照着我们，我们永远高举您的伟大思想的红旗，前进！

最最敬爱的毛主席，我们遵照您的“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的伟大指示，迈出了第一步，我们将循着这条革命大道一直走下去，走到底，永不回头！

……

1967年10月9日，曲折等知青临行前在天安门前宣誓

在充满时代色彩的誓言激励下，他们带着光荣的、也是沉甸甸的使命感，像上战场一样，义无反顾地北上了。

从此，一批又一批北京知青在奔赴农村和边疆以前，都要到天安门广场上举行这样一场仪式。

曲折他们起程前往红卫兵去牧区插队的消息，在京城风传着。9 日当晚，陈伯达、戚本禹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北京市中学教师代表时，听到了这个消息，陈伯达赞扬这批学生的革命行动，并要求大力开展宣传。他说："《人民日报》要赶快发表消息，还要写评论。""今后初高中毕业生大量的是到农村去。"

威本禹说："要搞斗私批修，掀起下乡高潮。"

10 月 10 日上午，北京几家新闻单位迅即派出记者采访。当晚，新华社发出了新闻通稿。11 日，《人民日报》在显著位置刊登了曲折他们去内蒙古插队的消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北京各报都作为重要消息在一版发表。《人民日报》还配发了《走同工农群众相结合的道路》的评论员文章。

《北京日报》的短评号召一切可以到农村去的知识青年向曲折他们学习。后来有些记者跟到了蒙古包，跟到了羊群边，争相采访他们的行动。

第一批知青的到来惊动了驻军首长。在张家口，六十五军军长符

先辉与曲折等合影

10 月 14 日的傍晚，曲折他们终于到了西乌珠穆沁旗白音宝力格公社白音宝力格大队。热情的牧民从几十里外骑马来看望他们，送来了奶豆腐、炒米、炸餜子。为他们烧奶茶，煮手扒肉。蒙古包里挤满了人，欢迎会别开生面：牧民不懂汉语，学生们不懂蒙语，他们用刚刚在盟里学的几句蒙语表了决心。

夜幕降临，曲折走出蒙古包来到草地上，牧草虽黄却仍散发着芳香，繁星眨着眼好像离他那么近。蒙古族姑娘嘎日布站在身边，曲折兴致正浓，邀她为大家唱支歌，她欣然答应，唱起了《望北方》。歌声悠扬、嘹亮，在幽静的夜空中回荡，撞击着大家的心扉。

11 月 1 日，北京中学红代会机关报《兵团战报》与《中学红卫兵报》合刊，发表了《飞向草原的雄鹰——记到内蒙插队的第一批首都中学红卫兵》，把曲折他们誉为“飞向草原的雄鹰”。

文章高兴地预言：“在他们的带动下，全市、全国一个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高潮正在轰轰烈烈地兴起。”

文章中写到：“是毛主席解放了曲折，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解放了曲折。”这是说文革初期，曲折与同班同学李东民带头成立了全校第一个学生组织“东风战斗组”。不久，工作组进校，李东民被工作组组织批斗，曲折也被批。原因是曲折家里希望让他上大学，而曲折深受知识青年典型，如邢燕子等人的影响，一门心思想下乡。他给家长念《毛主席语录》：“‘知识分子如果

不和工农相结合则将一事无成’，所以我要上山下乡。“

曲折的父亲是裁缝，也用《毛主席语录》反驳他：“‘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所以你要上大学，好好学习。”

于是有些同学就把这些生动的对话搬出来，说这是曲折打着红旗反红旗、反对毛泽东思想的罪证。

曲折 1971 年在草原

曲折与候隽

二十一世纪五位老知青的合影

右起：郭兆英、赵耘、邢燕子、董加耕、曲折

10 月 9 日上午，就在北京的许多中学生和家长风传、热议曲折等 10 人到内蒙古插队落户的消息时，北京市东城区许多单位和个人同时收到了从邮局寄给他们的署名为“中国共产党中央非常委员会”的油印传单，传单的标题是：“中共中央非常委员会给全体党员的一封公开信”，落款日期为“1967 年 10 月 1 日”，全文一万余字。

传单说：当前正在进行的“文化大革命”，与其所宣传的革命词藻完全相反，实际上是在政治上、组织上、经济上、文化上、思想上对党和国家的全面破坏，时间越长所造成的恶果就越加严重。

传单指名道姓地批判中央文革的主要领导人陈伯达、康生和江青，认为陈伯达是叛徒，康生是托派，江青是野心家。除此之

外，传单还指责林彪："为什么这伙人如此猖狂？主要是因为党内身居高位的人为他们撑腰打气。林彪过去在战争中立有卓越的功勋，但是如今却充当了这伙人的支持者。由于林彪是掌握枪杆子的，不是他助纣为虐，事情就不会糟到如此可悲的地步。"

传单还进一步指出："作为党的领袖，毛主席也不能辞其咎。毛主席以他的伟大的革命实践，在党和人民中享有崇高的声誉，但是他反复无常，遇事多疑，往往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一位领袖如果有了这些弱点而不能自拔，不可能不给他所领导的人民造成灾难性的后果。"

传单唯一赞扬的人是周恩来，认为正是由于有了周恩来的日夜操劳，苦撑大局，局势才有一线可能挽救的希望。在批评和批判了许多人之后，传单对周恩来的这种赞扬显得非常显眼和突出。

接下来，传单提出了一些建党建国的纲领性主张，要求全党予以支持，并建议成立一个新的中国共产党中央非常委员会来代替旧的中央委员会。传单最后还表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前途是光明的，他们不乏自己的真正领袖，不过这位能够收拾目前混乱局面的领袖人物，必须是与这场浩劫没有牵连的人，是大多数人民所真正信赖的人。"

这些语言在当时，就是小孩子也知道是十分反动的。人们急忙将这些传单交到公安机关。上午 10 时，这份传单已送到了正在武汉的周恩来手里。周恩来看完后十分重视，立即转给了毛泽

东一份。

10 月 10 日晚上，回到北京的周恩来在钓鱼台十六号楼召集中央文革碰头会。他拿出这份传单让大家传阅，并说："这张传单很重要，一定要组织破案。"

传单文笔老练，不像出自一个年轻人之手；它的文字流畅而层次分明、逻辑性强，说明很可能是出自某位"大秀才"的手笔；而它揭露的一些事实，有的是只有高层人物才了解的内情，因此它又可能是受到某高级干部暗中指点的作品。

当时大家谁都没有发言，就连江青也没有说话，只有陈伯达拿着传单说："这很像是'二月逆流'的口气，内容也和'二月逆流'差不多。"

当晚的会议，对传单的问题没有做出任何结论，只是定下来，要毛泽东来决定。

10 月 11 日下午，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 118 号亲自召集会议，专门研究那份 "中共中央非常委员会"的传单。除了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议的人以外，林彪也来了。毛泽东详细地询问了传单的情况后，让大家发表意见。

陈伯达说："这样的传单一般人是写不出来的，只有高级领导人的秘书，例如邓小平的秘书才能写出来。"

毛泽东对周恩来说："恩来，你负责组织专案组去破这个案，一定要破案。"

当晚，周恩来主持中央文革碰头会，研究具体落实毛泽东的

指示。他当场指定陈伯达负责这个专案工作，同时又指定谢富治和吴法宪也参加专案组的工作，因为谢富治是公安部长，吴法宪是军队方面的。于是，陈伯达、谢富治、吴法宪 3 个人组成了专案组。散会后，陈伯达立即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专案组会议，出席人员除了专案组 3 人外，还有公安部各方面的负责人。

会议一开始，陈伯达就说："这个案子主要由谢富治和公安部的同志负责，我和法宪就不插手具体工作了。"

谢富治点头说："我是义不容辞。"

接下来，会议开始研究案情。公安部的人认为，从各方面的情况分析，在北京作案的可能性较大，应当首先把北京作为破案的重点，同时注意北京周围的几个地方。

会后，公安部立即组织了"10•8"专案组，由公安部副部长于桑领导侦破。之所以叫"10•8"专案组，是因为传单的投递时间是在 10 月 8 日。

## 第 911 回：□伯□，接见天津“大联筹”　要复课，全国□办学习班

10月10日晚23时至次日凌晨4时20分，刚刚在钓鱼台参加了中央文革碰头会，讨论了关于“中共中央非常委员会”传单一事的陈伯达、谢富治、戚本禹和郑维山一起，又在人民大会堂安徽厅接见了天津市“大联筹”的代表和特邀代表。参加接见的还有北京军区领导罗元发、肖文玖、黄振棠，以及天津市筹备小组成员和河北省驻军部队领导。当陈伯达、谢富治、戚本禹、郑维山等人走入会场时，全场起立，热烈鼓掌。

陈伯达说：“好，今天专门是‘大联筹’的，可见你们相当伟大，‘大联筹’，只有你们是大联合的，旁人不是大联合的。这是笑话罗！”

他对天津两派已经签订的协议很高兴，要求“大联筹”加强、充实到“五代会”中。接着他让赵健敏发表意见，赵健敏谈了对9月30日签订的协议中的三点意见，刚说到其中的两点，就又说到过去的事了。陈伯达打断他的话说：

“我的意见，你要单刀直入，不要讲的这么长，究竟有些什么问题嘛！过去的情况我们都知道嘛！你不赞成筹备小组，怎么样搞的‘大联筹’，这些经过我们都知道。你把问题提出来嘛！现在的协议，你到底赞成不赞成嘛！”

赵健敏说：“我认为9月30日协议有很大问题，其中大部分我是赞成的，但对拥军爱民、五代会、革命委员会三部分有意见，

我们提了三点主张。”

陈伯达问：“你提的三点主张是什么？”

赵健敏把三点主张说了一遍，“大联筹”几个代表都起来说通过协议时不民主，协议中有些地方写得不对。

陈伯达：“我看现在的问题不在协议的文字问题上，这个问题是可以商量的。实际上是有人企图垄断天津问题，有一种野心家想垄断天津，想随便玩弄天津的老百姓，是这么一个问题。解决天津问题的原则，中央早已明确了的，就是加强、充实、扩大‘五代会’。本来这是没有问题的，早就讲清楚了。现在协议的文字上写的怎么好，怎么漂亮也不行，就是有个别的野心家想垄断天津，就是这么一个问题。要揭穿这个盖子。我老实说，我是好意的，‘大联筹’的同志不要怪我，我是这样说，我是不赞成你们‘大联筹’这个组织的。你们是跨行业的组织，混杂了不少不好的人，被坏人利用。你们赞成不赞成我的意见？”

一部分人答：“赞成。”

陈伯达：“还是应该按照中央的指示办事，所有的工人，都按照工厂、行业，所有学生，按照学校班级联合起来，不要搞跨行业的组织。这个问题解决了，对你们天津的大联合就起实际的作用。现在搞这个‘大联筹’，是跨行业的组织，要归口，回到本单位去。是不是有这样的问题？‘大联筹’的同志？

“大联筹”的“工矿企业造反总部”程国富表示同意协议，但被赵健敏说成是工贼、学贼。

陈伯达予以制止："说赞成这个协议的'大联筹'的同志是工贼、学贼，是完全错误的。赵健敏这话是完全错误的。"

赵健敏和程国富吵了起来。

谢富治说："你学生不能和人家工人对立。"

陈伯达："劝你们工人不要被那些学生拉着鼻子走，工人应该左右天津的局势。"

谢富治说："赵健敏，你们有不同意见，应首先在代表团里面斗争，不应当回到天津串连群众，开会向群众讲，这就把事情搞坏了。以后有意见可以发表，但只能在代表团里吵，今后这样的事情要注意。"

大专院校一代表说："主要是五代会不执行协议，人家联合去备案，他不给备案。"

谢富治说："那就不对了。关键是两代会，一个是工代会，一个是大学红代会，你们先把工代会、红代会怎么加强、扩大，达成个协议不好吗？抓革命，促生产，拥军爱民都是抽象的，你们争权还不是争工代会、红代会，然后是革命委员会。关键是工代会，大学红代会，对不对？"

众答："对。"

特邀代表和"大联筹"的代表发言，叙述协议通过时的情况。

陈伯达说："讨论这个协议我也没有参加，我说一点意见，不知道对不对。为什么赵健敏、还有'大联筹'其他的一些人，反对这个协议，我看是不是有这样一些问题。

一个是关于五代会的扩大和加强问题。协议中有一句话，就是按系统实现大联合。这句话，‘大联筹’有些人不能接受。像赵健敏，因为按系统实现大联合，‘大联筹’就分散了，‘大联筹’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所以我赞成刚才有一位同志（指胡忠信）写的一封信，我看他的意见是对的。他说，革命师生通通按照学校，按照班级联合起来，工人按照班组归口联合起来，就是按系统联合。工厂，就那么一个工厂的工人实现联合，外边的工厂就不要干预它，学校也不要干预它。工代会必须是名符其实的工代会，他是工人自己选出的代表，各个工厂，各个系统派出来的代表。‘大联筹’是一个跨行业的组织，是不是？”

众答：“是。”

陈伯达：“如果按协议，跨行业就不能跨了。而且我们研究了很多材料，很多地方的情况，群众组织如果是跨行业的，就不恰当了，它就鱼龙混杂了，各种各样的人都混在里边。有没有这个问题？”

众答：“有。”

陈伯达：“你们这个‘大联筹’就是掺杂了许多这样那样的人，有许多坏人也混进去了。赵健敏你说你们代表多少人？原来讲代表40万，现在说代表100万，越大越杂了，这样就更糟糕，混进去的人就越多了。如果按系统、按行业组织起来，这样坏人就不容易混进去，就不好混，我们就可以分别清楚，就比较容易分清楚。”

“你们‘大联筹’本身就有改组的必要。对这个组织怎么看法，就可以怀疑，这个组织是跨行业的，是个大杂烩。不知道说的对不对。我说是大杂烩，并不等于说你们这些同志不好，但你们‘大联筹’组织里边混进了一些不好的人，并且被人操纵。有人操纵你们，我们是了解的，你们不要上当。上次我不是说过嘛，你们抱着大石头，两三块、三四块大石头，抱着这些石头就迷路了，看不清前途了，看不清前面的路了，也不好走路，抱着那么一些石头干什么？你们抱着几块石头，连你们的代表同志都不知道。给你们说穿了，你们背后有人操纵。你们的代表可能很多同志不知道。”

有人提出要陈伯达指出“背后操纵的人”是谁？陈伯达说：“不要。总之是有野心家在那里操纵就是了。我是得到一些群众来信的，不是军队同志告诉我的，也不是公安机关告诉我的，我是看到一些群众来信。我告诉天津筹备小组的同志，他们还莫明其妙，他们还不知道，是我先知道的。现在我知道最少有3个人。当然那3个人我们希望他们不要那样搞了，我们希望这3个人觉悟，不要在背后去搞这些玩艺。”

一代表说：“如果‘大联筹’是大杂烩，‘五代会’更是大杂烩。”

陈伯达：“他们那里可能混进一些不好的人。我对五代会也不了解，你们比较突出，我就比较了解你们的问题。五代会，我是不大去研究他们的问题，我特别研究了你们的问题。我声明不

替五代会打保票，我并不否认五代会可能有坏人，有没有还要调查清楚。”

有人提出对协议搞一些补充，陈伯达：“这个问题我认为是可以的，可以搞一些补充。但协议已经公布了，在天津群众面前翻来覆去不好，可以再搞个补充协议。”

谢富治：“刚才伯达同志说的话我完全赞成。我说不要去搞那些枝节问题好不好？天津市从2月成立筹备小组到现在时间比较长了，现在所有革命派同志，包括‘大联筹’的革命同志，应该到了联合、成立革命委员会的时候了。”

“我们伟大领袖讲了，今年年底，最迟到明年春节前，全国29个省市都要成立革命委员会。你们天津早就提出来了，不要等到28个省市都成立了，最后再搞？那样光荣？不光荣。”

会上何光临站起来，揭发赵健敏的问题，陈伯达：“赵健敏的活动不是简单的。他玩了一个很阴毒的手段，大家如果不看清楚啊，只看他的表面，只看他大叫一声，就以为他革命得很，其实是相反啊！要注意呀！同志们。”

赵健敏等人不服，站起来争辩，会场上发生争吵。谢富治说：“我认为赵健敏从开始谈判到现在，总是对达成协议不感兴趣。革命大联合是大方向，为什么这样！？”

陈伯达：“不要被赵健敏虚假的革命词句所迷惑。当然，我也不赞成五代会的一些小动作，如果五代会有这些小动作也不好，这样不能团结嘛！”

有人说："因为我们签订协议，家里有人说我们修了，要来揪。"

陈伯达："签订这个协议一点都没有修，完全正确。"

郑维山："刚才伯达同志是批评赵健敏，不是批评'大联筹'。"

会场上再次发生争吵，有人说："赵健敏有一定的缺点错误。"

陈伯达："我说赵健敏不是有一定的缺点错误，是很大严重错误，是很可怀疑的错误，不是什么一定的缺点错误，不要把他缩小了。"

有人表示对赵健敏的问题理解不了，陈伯达："理解不了慢慢来嘛！"

有人说要和赵健敏一起战斗，陈伯达问："你向谁战斗？"

答："向走资派。"

陈伯达问："哪个走资派？"

答："万张反党集团。"

陈伯达问："你晓得有代表万张集团的人在你们背后操纵吗？"

这时有人提出何光临两面三刀，过去也有很多错误。陈伯达说："好，实事求是，如果何光临同志过去真是那样，今天转变过来，有什么不好？何光临也要有自我批评才能服人。"

有人说何光临把错误推给别人，陈伯达："不能那样，何光临不作自我批评不能过关罗！何光临如果两面手法，在群众面前要作自我批评，不作自我批评过不了关。你们应当把'大联筹'

背后有些什么人挑动说一说。”

何光临说出了一个人的名字，“大联筹”另一人说：“今天会议气氛不好。”

陈伯达说：“很好嘛。你们要保护何光临同志的安全，他要作自我批评。”

陈伯达继续说：“我现在没有多少话好讲，刚才已经讲了一些话。有些话你们可以思考思考，看对不对。我有点建议，请大家看妥当不妥当。

第一、就是现在这个协议，九•三O协议，大家已经签了名，定了下来，应当是有效的。大家同意不同意？”

众答：“同意。”鼓掌。

“第二、对九•三O协议中没有写到的地方，有些原则问题和具体工作问题，可以搞个补充协议。赞成不赞成？”

众答：“赞成。”鼓掌。

“如果赞成的话，你们跟五代会代表在北京积极搞一个补充协议，其目的就是为了加强、充实五代会，最后建立天津市的革命委员会。但也不要勉强，不要为争名额打架，能够成立就成立，应当成立了。”

10月11日，国庆节前回到上海的姚文元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汇报他回到上海12天里在基层调查的一些情况，主要分为四个问题：一、“九大”和党的问题；二、精兵简政问题；三、大批判问题；四、大联合问题。姚文元向毛泽东汇报了第一和第二

个问题。关于“九大”问题，他在信中写道：

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征求了人们的意见，我们本以为大家会感到突然，其实不然，造反派中已经在议论了。可见群众心中是在思考这件事的。

什么时候开？绝大多数人的意见，都希望早开，多数主张在明年上半年，至迟不超过明年秋天。

代表怎么产生？是不是要从下而上一级一级的选上去？少数同志认为要这样，多数认为不一定。他们说：“过去选举其实候选人也是上面决定的。经过一年文化大革命。各种人的政治面貌，好人、坏人、看得更清楚了，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清楚，代表可以各方面协商产生，在市、区里开党员大会通过”。“可以先从中央开始，开全国党代大会，有一个纲领，然后才开各级党代会，比较有利”。“毛主席说过，不在形式，而在内容，不在名称，而在实质”。还有些同志提出：“也可以用同样的办法开人大，可以和九大同时开，解决刘少奇的问题。”

红卫兵说：“要多一些工人和红卫兵代表列席大会”。“最好能吸收一批工人和红卫兵入党”。

王明选不选？“刘、邓、陶”选不选？彭、罗、陆、杨选不选？一致说不选。“王明已经是苏联人了，还能选个苏修特务？”“叛徒都不能选，这是一条大原则。”“刘少奇是叛徒，要进一步批透，清除出去！”也有人说：“恐怕毛主席还是要保留几个反面教员的，那就听毛主席的话，希望不要太多，并且先要批透。”

对刘的情况，大家比较了解，对邓有些人不很了解。

党的领导机关怎么办？许多同志的意见是：可以参考革委会的形式，把党、政、军统一起来，革委会中有党的核心，执行市委会的职权。好处是一元化，容易联系群众，减少层次，有利于有力地贯彻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还有一种意见是：将来过渡到正式权力机构，还要分市委、市人委，不然开人代会有困难，由于忙于政务而忽略党务，有的人无处安排。

很多同志主张：在已建立革委会的地方，应当有一个党的领导核心，优秀的造反派头头可以吸收入党和经常参加党的核心会议。

关于精兵简政问题，姚文元汇报：

这个问题很迫切。

这几个月中，市革委会人员大量增加。目前，有20个工作部门3229人。办公室下面就有763人。这还不包括各革命群众组织的脱产人员，无论如何。这个机构太庞大了。机构越大，各种坏人就会钻进来，领导干部就会脱离群众，被资产阶级糖衣炮弹打中，就必然会滋长山头主义，其中有一些部门（不是全部）人员增加正是由于山头主义在作怪，同春桥同志商量，至少要砍掉一半，三分之二以至更多，这个思想工作还是很艰巨的，主席关于精兵简政的指示我们已向领导干部传达了。

他还说：

一月革命以来，十个月了，造反派的头头，大多数在斗争中

逐步成熟起来，学习为无产阶级掌好权，用好权，形势大好，而且越来越好，在市和区、在基层中，我们见到了一大批敢于革命、敢于挑担子的生气勃勃的好干部。但也有一小部分同志开始被宴会、鼓掌、捧场、小汽车所陶醉，个别的被资产阶级糖衣炮弹所打中，开始脱离群众，不再那样如饥似渴的去深入群众，做群众的小学生。

10 月 12 日，毛泽东再次会见谢胡率领的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对他们说：

“这是一次审查干部的好机会。”

他又讲到：我们有一部分干部不接近人民群众，也不接近下级干部，做官当老爷。对付这些人，我毫无办法，因为国家这么大，百分之九十九的人我都没有见过，人都不认识。“这回好，群众就整他了。”

“我们要全面解决还得几个月，我们准备 3 年，到今年 6 月 1 日算 1 年。大体上过一段时间，乱的最厉害的地方也好办了。不疼不痒的地方不好办。”

“这种群众运动打内战，这么一打，就分清了什么是左派，什么是右派。右派搞‘农村包围城市’。”

“现在我们有计划地武装工人，武装革命左派。外国人讲中国天下大乱也是有道理的，不完全是造谣的，有些地方我们还嫌它乱得不够。为什么我们不怕乱呢？因为你不让它乱，这些矛盾就不能暴露出来。武汉问题是我去闹起来的，我就不相信武汉去

不得。我 7 月 14 到武汉，一直到 21 日才离开。我说我捅了一个马蜂窝，他不咬人吗？他没有下决心咬我，也没有下决心咬总理。武汉问题很快就解决了。此外，还有公检法，打得厉害，我是高兴的。过去的公安、检察、法院有好人，但也有坏人。这次暴露出来了。武汉公检法不是分为两派吗？那一派垮下去了。”

“从 9 月下旬起，全国联合的多，不联合的少。大体上他们打够了，闹够了，我看工人、农民、学校、机关有点不想干了。我们要全面解决还得几个月。”

“还有一个问题，大概明年或后年我们开党代表大会，把党重新建立起来。”

毛泽东于 10 月 12 日在徐向前的辞职报告上批示：“我意不宜免除请考虑酌定。”林彪 10 月 16 日也批示：“我完全同意主席意见，不要免除为妥。”

这样，徐向前只好继续挂职。

10 月 12 日，《人民日报》根据毛泽东外出视察华北、中南、华东地区时的指示精神，发表题为《全国都来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的社论。社论说：

最近，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指示：要斗私，批修。林彪同志说：“我们要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用‘斗私，批修’这四个字为纲，加强对军队干部、地方干部和红卫兵的思想教育。要开办各种学习班，中央办，地方办，各个革命群众组织也可以办，把全国办成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

此后，全国各地陆续举办各种形式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中央也举办多期学习班，分期分批抽调未成立革命委员会的省、自治区的有关人员来京学习，以解决这些省、区的问题。

10 月 13 日 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在林学院举行开学典礼。北京卫戍区军训指挥部在全市 329 所中学中举办各种类型的学习班，有 1729 名群众组织负责人参加了学习。

10 月 14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关于大、中、小学校复课闹革命的通知》，要求全国各地大学、中学、小学一律立即开学，认真执行毛主席关于“斗私、批修”的指示，一边进行教学，一边进行改革，实行革命的大联合，建立三结合的领导班子，立即筹备招生事宜。

## 第 912 回：新疆打，□春医大枪声急　外交□，“联络站”□刻瓦解

1967年10月14日至15日，新疆乌鲁木齐市“三促”派和“三新”派在乌鲁木齐市第一师范学校发生武斗。

自7月以后，乌鲁木齐市两派组织也开始建立武斗据点，实行派性武装割据，双方人员及其家属因害怕遭到对立派的打击和镇压，于是纷纷逃离本单位，跑到本派的“根据地”、武斗据点或投亲靠友避难。

当时，乌鲁木齐市少数派组织“三新”在该校的下属组织“四九四”在第一师范占据优势，占领了学校的教学楼和西楼，而多数派“三促”在该校的下属组织“红革联”，则被强行赶出学校。

10月13日，多数派学生回学校要进楼取东西，被“四九四”阻止，双方发生武斗。武斗中，“红革联”学生2人被炸伤。

于是，“红革联”头头向乌鲁木齐市“工促会”求援。“工促会”勤务组的头头不愿意介入学生间的冲突，“红革联”头头又找到第一师范学校所在的新市区“工促会”求援，新市区“工促会”头头向市“工促会”勤务组敦促，要求支援第一师范“红革联”。

第二天，10月14日，市“工促会”头头胡良才主持召开了勤务组会议，决定设立武斗指挥部，由戴甲弟、王子玉负责，指挥攻打第一师范“四九四”，方案是：由铁路局的“工促会”派出

武斗队掩护，用炸药包把第一师范“四九四”武斗人员据守的大楼房一端炸开，然后大队人马冲上去，把“四九四”的武斗人员抓下来。戴甲弟提出：

“既然决定打，那么所有头头都要参加，免得事后出了事叫我一个人负责。”

10月15日早上，“工促会”头头胡良才、钱西夫、韦德昌、刘炎等人都到了设在北门医院二楼的指挥部。“工促会”调动了上千人，对“四九四”武斗人员据守的教学楼和西楼发起进攻。遭到“四九四”武斗人员的抗击。

当铁路局“工促会”的武斗人员在机枪掩护下，用炸药包炸开教学楼和西楼后，“四九四”的武斗人员又用火力封锁了各层楼道的入口。一时间，攻守双方打得十分激烈。

武斗期间，新疆军区副司令幸元林派人把胡良才、戴甲弟、王子玉叫到军人俱乐部，对他们说：“不能打，你们在军区门口这样搞怎么行？赶快撤下来！”戴甲弟、王子玉一听扭头就走，胡良才留下来应付幸元林。

“工促会”最终攻占了“四九四”占据的这两座大楼。“四九四”的武斗人员被抓获后，均遭到毒打，女学生遭到凌辱。

这次武斗，双方死亡5人，伤24人。两幢大楼各被炸开一个洞，教学仪器被毁。

我们再看长春。长春的白求恩医科大学“八一八野战军”在武斗期间不敌对立面“红色造反军”，被迫离开学校，暂住“长

春公社”派同派组织控制的长春地质学院。但是他们并不服气，一直找机会再打回白求恩医科大学。

到了 8 月，“八一八野战军”先在医科大学供应处设立了联络站，继而进驻了供应处。

这时，“八一八野战军”在组织上有了较快的发展，参加活动的人员逐渐增多，外地同学也大批返回学校，供应处已经容纳不下。他们决定拿下医大，建立自己的“据点”。

由于供应处距离白求恩医科大学基础医学部大楼较近，所以确定以“红色造反军”占据的基础医学部大楼作为首个进攻目标。

10 月初，“八一八野战军”开始侦查、了解基础楼“红色造反军”的守楼人数、外单位人员是否撤出、武器上交多少等情况，随后头头们开会决定，准备对“红色造反军”占据的基础楼发起进攻。

10 月 12 日，长春市两派的 4 个群众组织和部队共 5 个方面的代表在北京达成《关于退回原单位“抓革命、促生产”，“复课闹革命”的补充协议》。协议重申 5 日和 7 日的《协议》继续有效，在外单位的人员应及时撤回本单位。

10 月 15 日晚，长春白求恩医科大学“八一八野战军”召开负责人会议，进一步研究讨论攻打基础楼的作战方案，决定在 16 日拿下基础楼。同时决定，在 16 日上午请示“长春公社”派的负责人后即开始行动。“长春公社”头头认可了“八一八野战军”的作战方案，并派出 300 多人赶到医大增援。

16 日下午，占据基础楼的“红色造反军”各单位人员在楼外阶梯教室联合召开“斗私批修”大会。大会结束后，很多人外出，楼内不足百人。

乘此时机，事先已经集合待命的“八一八野战军”以及“长春公社”300 余人，身藏短枪等武器，从距离基础楼 300 米的供应处跑步冲出，直奔基础楼。他们首先夺下了门卫室，然后跑步上楼，其中少部分人奔向广播室，大部分人控制了各层楼之间的通路的走廊，经过一阵武斗，他们抢占了基础楼。

“红色造反军”被打了个措手不及，大部分人被迫退出大楼。但二楼和三楼南端西侧走廊和房间的“红色造反军”30 多名武斗人员，因发现情况较早，及时堵住了走廊入口，并奋力抵抗，双方发生激烈枪战。

进攻方几次发起冲锋未能攻下。于是调动所有火力，对“红色造反军”进行压制性打击。“红色造反军”集中退守至三楼病生教研室一角固守。

这时，基础楼外围观的群众越来越多，楼外的“红色造反军”集结大兵，准备攻楼，夺回“据点”，营救“战友”。

驻校解放军闻讯赶来，进入基础楼，对双方进行调解和说服工作，基本控制了局面。但双方人员仍在对峙，楼上楼下、楼内楼外，不时有冷枪发生。

17 日上午，当“红色造反军”头头吴兴志去基础楼慰问三楼未撤的同学时，被冷枪打中身亡，双方又调兵遣将，准备大战。

白求恩医科大学基础楼是日伪统治时期伪满洲国的国务院所在地，解放后为白求恩医科大学教学楼，不仅是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而且楼内有数十年积累的人体标本模型和许多贵重仪器设备，以及还有活细菌菌种等教学用品。如有意外，导致细菌扩散，后果不堪设想。为尽快制止武斗，周恩来亲自过问，并提出了解决基础楼事件的四点指示。

10月20日后，“红色造反军”和“八一八野战军”及“长春公社”的武斗人员脱离接触。武斗逐渐平息。武斗中，双方死亡多人，伤数十人。

10 月 30 日，长春两派组织赴京代表共同做出《关于彻底上交武器装备和军用物资的规定》。规定上交武器如遇阻挠或反抗时，由吉林省军区和驻长部队协助强行收缴。

说罢长春，我们再回到北京，看看此时的外交部。10 月 2 日和 3 日，外交部“革命造反联络站”进行整风，温和派张殿清重新主持“联络站”核心组，王中琪等人则承认自己反周恩来“是错误，有罪”， 并写出捡查，报呈周恩来。周恩来对王中琪的捡讨说：“认识了就好，不要说有罪。”

10 月 4 日，王海容等 11 人又贴出《三谈对陈毅要‘一批二保’》大字报。

刘华秋、王海容贴出批王力的大字报后，马上有人猜测到其背景的份量。于是，外交部的大字报迅速出现了一个批判王力的高潮。而前段曾被 “联络站”压垮解散的几个对立派组织，如

“革命造反总部”、“攀险峰野战兵团”等也公开恢复了活动，并且就王力问题向外交部“联络站”发起了进攻。10 月 5 日，反对“联络站”核心组的“五十三个战斗队组”发表《关于当前我部运动的声明》，批判“联络站”核心组执行了形左实右的路线。

当天下午，“五十三个战斗队组”召开“彻底肃清‘八七讲话’流毒大会”，批判、揭发王力讲话和“联络站”核心组上抗中央、下整群众的错误。

10 月 6 日，“联络站”核心组召开“斗私批修”誓师大会。

10 月 7 日、9 日和 10 日，“五十三个战斗队组”又连续召开“彻底肃清‘八七讲话’流毒大会”，“革命造反总部”和“攀险峰野战兵团”等参加大会并发言。

10 月 10 日，姚登山被驻印尼使、领馆战斗队揪回接受批判。

10 月 11 日、12 日和 13 日，“联络站”核心组召开“整风大会”。

10 月 14 日，姚登山再次被北京外国语学院“红旗大队”揪走。次日凌晨，周恩来闻讯，派联络员王文政前去将姚登山接回外交部。

10 月 16 日，“五十三个战斗队组”、“革命造反总部”和“攀险峰野战兵团”联合召开“控诉、揭发、批判八七讲话大会”。

当天，“联络站”核心组再次召开“整风检查大会”，群众对“联络站”核心组的检查极为不满。

这天，王海容等人又贴出“踢开联络站核心组，彻底闹革命”

的大字报，表示要把文革运动领导权夺过来，自己闹革命。

10月17日，周恩来接见毛里塔尼亚外宾后，和一位外交部的翻译的谈起外交部的文革情况，在场的人后来将周恩来的这次谈话归纳为以下几点：

一、“外联”（外交部联络站）核心组的检查我看过了，很不深刻，根本过不了关，我看了很生气。

二、“外联”核心组与“6.16”有联系，直接或间接参预了“五·一六”的活动，过几天我要去揪人，我有材料。

三、我现在不到外交部去，我要是去讲话，外交部“联络站”就垮台了。

四、北外“红旗大队”打姚登山是错误的，但姚登山把“红旗大队”比作卡比卡米是严重的政治错误，对姚登山要一批二保。

五、外交部目前进行的“四大”是正常的，外交部乱的不够，还要大乱，但不许武斗。

10 月 18 日，副部长韩念龙在外交部大礼堂召开全部大会，宣布周恩来指示：“外交部有人直接或间接参加‘516’活动”。

外交部“革命造反联络站”组织顷刻瓦解，下属成员纷纷退出。其核心组成员王中琪等人，还被原“联络站”下属组织与“攀险峰”等组织人员抓起来，以“516 分子”罪名，送公安部审查。因证据不足，第二天公安部即将人放出。

10 月 18 日当天，支持“联络站”核心组的“联络站五十六

战斗队组”发表声明，表示坚决反对“踢开核心组”。

10月18日晚，周恩来关于查封外交部联络站核心组的指示：

一、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正常进行。要文斗不要武斗，不要打、砸、抢，谁打、砸、抢谁就犯错误。

二、外交部的档案文件要保证绝对安全，如发生问题，立即报告总理。

10 月 20 日，以外交部办公厅综合组科员陈德和、刘华秋为首的“五十三个战斗队（组）”召开“炮轰‘联络站’核心组大会”，在会上宣读了《关于踢开核心组，彻底闹革命的声明》，建议尽快由“联络站五十三个战斗队（组）”、“革命造反总部”、“攀险峰野战兵团”和没有参加上述 3 个组织的群众，推选出四方代表，通过平等协商，组成外交部革命大联合筹备委员会，领导外交部的文化大革命和监督外交业务工作。当天，原“外交部革命造反联络站”中的温和派张殿清等，与刘华秋、王海容等串连，而后联合成立了“外交部革命造反联络站”的临时勤务组，简称“临勤”。

10 月 17 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国务院中央文革联合发出《关于按照系统实现革命大联合的通知》。

《通知》第一条：“各工厂、各学校、各部门、各企业单位，都必须在革命的原则下，按照系统，按照行业，按照班级，实现革命的大联合，以利于促进革命三结合的建立，以利大批判和各单位斗批改的进行，以利于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

是引用毛泽东的原话。

《通知》第二条接着指出："所有革命群众组织都应该以毛泽东思想为基础，经过充分协商，按照不同的具体情况，遵照毛主席上述的指示办理。"

19 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遵照毛主席的指示，按照系统实行革命大联合》的社论。

10 月 18 日，北京卫戍区副司令李钟奇传达周恩来关于制止北京外语学院武斗的指示：

一、武斗暂时停止下来了，你们还很听话，双方还很紧张，要脱离接触，究竟怎样脱离接触，大家考虑，以后双方达成协议。

二、脱离接触，广播停下来，不要跟对方攻击，不要相互攻击。

三、人民解放军考虑怎样把双方责任搞清楚，成立一个专门调查组，调查武斗的原因。

## 第 913 回：第三次，康生见宁夏代表　朱声□，会上继续被揭发

10月19日晚9时30分至20日2时45分，在人民大会堂安徽厅康生第三次接见宁夏军区和宁夏群众组织代表。陪同接见的还有：李天焕、曹轶欧、兰州军区政委洗恒汉、副司令员康健民、21军军长胡炜，及陕西军区、总后等20多位部队领导。

康生说："好久没有看见同志们了。因为国庆节期间搞外宾接待，差不多20天了。从会谈到去外地访问，主席接见，发表新闻公报，前后是20天。不仅宁夏、江苏、安徽、辽宁这些地方都没有接触。现在又从国外转到国内了。"

康生在讲话中详细论述了毛泽东南巡谈话时对形势的看法，他说："主席讲到形势大好，指示一个最重要的标志，是人民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了。从来的群众运动都没有像这次运动得这么广泛，这么深入。全国的工厂、农村、机关、学校、部队到处都在讨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问题，大家都在关心国家大事。过去一家碰到一块，说闲话的时候多。现在不是，到一块就是辩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问题。父子之间、兄弟姐妹之间、夫妻之间，连十几岁的娃娃和老太太，都参加了辩论。

主席说，有些地方前一段好像很乱，其实那是乱了敌人，锻炼了群众。

主席说：再有几个月的时间，整个形势将会变得更好。"

康生说："我想谈一下我对主席这一段指示的理解，也许理

解的还不够，同志们可以批评、补充。

主席指出来了，第一个重要标志是什么，是人民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了。大家回想一想，在文化大革命刚开始的时候，毛主席就指出：‘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现在这已经变成普遍的口号，要关心国家大事。经过一年来轰轰烈烈波澜壮阔的群众运动，正如林副主席所说的几亿人民发动起来了。从首都到边疆，从城市到农村，从工厂到车间到工人家庭，从十来岁的娃娃到白发苍苍的老人，大家都在关心国家大事，大家都在关心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大家还记得吧，在国庆节，在天安门上，我们林副主席发表了发挥主席指示的这个讲话。我们仔细回想一下，是不是夫妻之间，姐妹之间都在讨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问题？同志们自己可以调查一下，就是这样。我所知道的，前几天有一位解放军的高级负责同志跟我讲，他的夫人和女儿就是两派，到一块经常辩论，妈妈反对女儿，女儿讲不过妈妈。他有三个儿子，一个儿子是造反派，一个儿子是保守派，一个儿子是逍遥派。所以一家人到一块不像以前讲闲话，也在大鸣大放大辩论。的确是像主席教导的那样，大家都在关心国家大事，关心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关心无产阶级专政。从来的群众运动也没有像这次发动的这样广泛，这样深入。

第二条，也是重要的标志，亿万的革命群众在那里学习、掌握、运用毛主席这个伟大的思想，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这样广泛地同群众结合，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马克思列宁

主义百年史上从来没有过的现象。”

“同志们从阿尔巴尼亚劳动党访问中国，就可以看出国际的反映，当然，不仅是阿尔巴尼亚，还有世界上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兄弟党都是这样。你们可以看到，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在新闻公报上，称赞毛主席是当之无愧的马、恩、列、斯的接班人和继承者，这不是我们自己讲的，是兄弟党承认的，不仅是继承，而且还有发展、创造。同志们可以看到，毛泽东思想同亿万人民群众结合起来，变成了巨大的物质力量，这是任何力量所反对不了的，这是保证我们国家不出修正主义，无产阶级专政不变颜色，我们党不被篡夺的最最重要的保证。”

“第三，什么叫大好形势，就是一年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毛主席为首有党中央领导下，亿万革命群众把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揪出来了，以中国赫鲁晓夫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土崩瓦解了，他们妄图篡夺党和国家的领导，复辟资本主义的阴谋被粉碎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所以，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在人民解放军的支持下，亿万革命群众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夺了权。这个夺权的一月风暴是从上海开始的。所以现在全国是这样的形势，有些省、市已经建立了革命委员会，有的省不是，这个大家已经晓得了，我就不谈了，有些省、市正在筹备建立革命委员会，有些地方前一段时期好像很乱，乱得很！宁夏在前一些时候也有些乱，其实那是乱了敌人，锻炼了群众。越

发乱的地方，矛盾就越暴露出来，越便于把矛盾解决。”

“第四、在毛主席伟大号召下，目前全国掀起了革命大批判、革命大联合、革命三结合的高潮。我们相信，毛主席讲的7、8、9三个月，形势大好，不是小好，再过几个月的时间，整个形势将会变得更好，现在已经是十月，正如毛主席说的，形势一天天向好的方面发展。各地方总的趋势是革命大联合的多，搞分裂的要少了。我初步想的，认识的，就是这样，主席讲的形势大好，不是小好，比任何时候都好。我想到的就是这四条，当然不止这四条。如果我们把毛主席的思想运用到各个地方，更会体会得深。”

结合宁夏的实际，康生说：“我看了朱声达同志10月9日的检查，这个检查已经发到各个代表团了，当然各代表团可以自由发表意见，可以这样看，也可以那样看，这完全都是可以的。”“我的看法，虽然朱声达同志这个检讨还不彻底，有的地方没有触及灵魂。但比起来的时候进了一步。这说明主席思想，主席的号召，在我们同志特别是犯错误的同志中起了一定的作用，是开始向好的方面发展的。”

他提到了前几天发生的“中国共产党非常委员会”案，他说：“现在有一种反革命的组织，也许你们宁夏也可能收到这样的文件，他们在全国散发，他们叫做中国共产党非常委员会，他们到处散发一种信，散发这种信目的就是要瓦解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他们反对毛主席，反对林总，反对中央文革，他们

对他们的土崩瓦解不甘心，企图恢复中国赫鲁晓夫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全国极少数地方出现了这种情况。这个反革命和文件，这些最坏的家伙，按他们来看，陈伯达、江青、康生简直都该枪毙。”

李天焕说：“从主席到林副主席，他们都要打倒。”

康生：“是啊！从主席到林副主席，他们都要打倒。这叫狗急跳墙。我向你们提出这个问题，宁夏的同志们要注意，这种反动的思想，反动的标语，反动的文件在你们宁夏也有。”

“在宁夏，他们散布什么口号：说毛主席受蒙蔽了。这是反对毛主席！他们在打倒周总理，要打倒康生，散布说青铜峡事件不是反革命事件，说中央不叫开枪，康生请示总理，总理不叫开枪，就是康生叫开枪的，康生成了陈再道式的人物了，康生犯错误了，康生出国了，中央问康生。康生不敢承认，康生受批评了，说什么江青靠边站了。散布那些东西，不仅你们宁夏有，到处都有，青海、内蒙、安徽、河南、江苏也有，他们究竟要干什么？就是妄图把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搞垮，使中国的赫鲁晓夫、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复辟。我个人一点关系没有，不是这么个问题，这是阶级斗争。在国际上，你们看真理报上，赫鲁晓夫他们也是这么骂我们的。这一点应注意。从材料上看，这些反革命的活动，有些群众组织是受蒙蔽的。他们不是相信毛主席的指示，他们相信谣言。各组织应该警惕这个东西，有这样的情况，在9月间，你们‘三司’、‘宁总司’的同志要注意，有一

个人，有名有姓，到独立师进行反中央的宣传，挑拨、反对中央、反对毛主席，这些人是受蒙蔽的，你们不要上这个当。他们企图把矛头指向中央、中央文革，我们知道永宁县还有人说毛主席受蒙蔽了，江青靠边站了，说中央有黑线。他们利用王力、关锋犯了错误进行翻案，其实他们不懂得王力、关锋犯的是什么错误，王力、关锋就是反对我和陈伯达的。他们喊，要打倒洗恒汉，要把62师赶出宁夏去，这个东西，是在大好形势下自然会有的，不要受这种蒙蔽。”

“我讲了代表团的思想有了大大的进步。同志们，你们在北京，在毛主席所在地，应该更多地利用这个机会学习毛泽东思想。另外北京也有坏人，你们不要听北京那些坏东西的话，你们不要让‘516’、‘非常委员会’来迷惑你们，不要根据谣言来宣传。你们代表团中就有人根据谣言写信回去给他的同学，他的那个同学已经退出了‘筹备处’，加入了‘总指挥部’，把信交给了62师。”

康生再次要求宁夏各派多做自我批评，实现大联合。他说：“一定要与私字作斗争，没有这一点，你们就联合不起来。你们宁夏，在大联合方面虽不是最落后的，但也不是最先进的，你们现在还没有实现主席的大联合的指示，我们要多在这方面做工作，首先是在代表团做工作，也要在家里做工作，不要乱七八糟地给家里写那样的信，散布谣言。安徽的代表团，在北京开会，实现了联合，家里就有人说他们右倾，修了，是陈独秀。本来群

众对你们的活动就不太了解，你们再散布一些谣言就不好了。自己要批判自己的错误。‘总指挥部’要批判‘总指挥部’的错误，‘三司’、‘总司’要批判‘三司’、‘总司’的错误。至于‘筹备处’，你们到现在连朱声达的那种检查还不能接受，就差得太远了。杨一木、马信，我接触了你们一次，我希望你们拿一个老共产党员的标准来要求自己。你们答应了我，要作检查，20多天了，到现在连一个字也不交给我。那天晚上我没有把你们的罪行材料拿出来，是希望你们自己自觉地检查，但你们却把中央对你们的循循善诱当成包袱。我老实告诉你们，你们的错误很多，很严重，今晚上你们会听到，朵恩华同志马上要讲。你们到现在还玩弄很多手段，你们叫陈养山讲，那不行。要讲，你杨一木讲，你马信讲，你李矛召讲。这种手段，在青海，赵永夫早就玩弄过，我们不愿意再看到。陈养山，你不要糊里糊涂！你这个人呀！我们是老同事了，从37年开始，37、47、57、67，40年的老朋友了，你总是被人家利用。要作自我批评，不要继续隐瞒自己的错误。主席说，要解放一批干部。怎么解放呢，就是要一看二帮。解放一个干部，对革命是一个很大的力量，我们不希望我们的干部都被打倒，陈再道、钟汉华我们还希望他们回到革命队伍中来。这首先要靠自己解放自己，主要是自己。怎么解放自己呢？首先要作自我批评，主席讲一看二帮，看就是看你自己，帮是大家帮。朵恩华同志讲话也就是帮杨一木、马信。这一方面要多作自我批评，不要把错误隐蔽起来，甚至利用中央的政策为自己的错误打

掩护。在这方面，你们还不如朱声达同志，朱声达同志到中央来还打了个电报，问他来不来，中央说来。你们怎么样呢？到北京来，背着中央，隐藏起来，我们千方百计寻找你们，才把你们寻找到一起。在党的这个关系上，你们连朱声达还不如。你们来北京隐蔽起来，背着中央干什么？北京是中央所在地，你们过去是区党委负责人，向中央连个名都不报，自己把自己隐蔽起来干什么？这里面就是私字作怪，我希望大家能够作自我批评。实行主席的指示，事情就容易解决。”

“过去，自治区军区朱声达、江波同志，你们过去的错误，就是没有实现自己的方针，拉一派，打一派，不但没有实现自己的意图，结果造成了群众的分裂，自己反而垮台了。所以，军区的同志，要彻底作自我批评，检查自己的错误，这对于促进革命的大联合有好处。这不是挑动群众斗群众的问题，你们不能从派性看问题，要从实行毛主席革命路线上看问题。我们的解放军同志有一个特点，犯了错误就改。有时没有经验，思想没有准备，犯了错误。可以改嘛！林总8月9日的讲话，大家要好好学习。那个讲话现在已经发下去了。多听群众意见有好处，筹备处的同志。你们不要帮倒忙。他们错了，你们还拥护他们那错误，结果就是帮了倒忙。为什么中央派62师去呢？这是对你们的最大的支持。现在个别人喊这样的口号：‘62师从宁夏滚出去！’这完全是反动的，反中央的口号。我曾经讲过，调动解放军的一个营，没有毛主席、林副主席的点头批准，谁也调不动。你们不要把我们的

军队看成像国民党的军队，没有那回事。一个营，没有毛主席、林副主席的批准，没有哪一个人敢调动。”

洗恒汉：“我们大军区调动一个连，都要报军委备案的。”

接着，康生让原“筹备处”的朵恩华作了长达两小时的发言，揭发朱声达、何其仁和“筹备处”的一些活动情况。

当朵恩华揭发何其仁指示“筹备处”快点把吴忠打下来时，康生问何其仁：“怎么个快打法呀？”

何其仁呐呐的说：“我有罪。”

接着，军区稽振华、马林，独立师一团团长王友声也纷纷揭发朱声达、何其仁和“筹备处”的一些事情。

## 第 914 回：四、五次，□续见宁夏代表　第十次，接见天津代表团

10月20日16时至19时，在人民大会堂安徽厅,康生第四次接见宁夏全体与会代表。

康生说："兰州军区的同志，讨论陕西问题，冼政委他去参加那个会去了，李天焕同志参加另一个会议，也不能来，叶群同志她说来参加我们的会议，等一会可能来。我们先开，继续昨天晚上的会议。昨天报名发言的人很多，没有讲完，今天继续发言，有的同志要发言还可以报名。这样意见，那样意见都可以讲，大民主嘛！有不同意见是允许的，但是，要实事求是，不要听信谣言，散布谣言，混淆是非，蒙蔽群众。在会上，任何意见都可以讲。对一个问题，赞成的，不赞成的，都可以讲。各派都可以报名，轮流发言。报名的很多罗！今晚八点钟中央文革小组还要开会，现在是四点，我们的会可以开到六点半，讲不完还可以再找时间讲罗！现在由军区政治部主任向辉宇同志讲，马生其同志准备。"

向辉宇揭发朱声达对抗中央的一些事情。接着，"大联筹"的马生其系统地揭发"大联筹"。最后，康生讲话。他说：

"现在已经6点半了。马生其同志最后一句话，很值得大家深思，是保的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呢？还是保的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刘邓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呢？这是个原则问题，这不是这个人，那个人的问题，这是一个原则问

题，大方向问题。各个群众组织都应该从这个原则出发考虑问题，也以这个原则来自己检查自己。

现在，有一件事要澄清一下。谢光明同志在场不在场？”

“筹备处”代表答：“不在。”

康生问：“为什么没来？”

“筹备处”：“吃过午饭就出去了。”

康生说：“应该晓得开会嘛！到哪里去了？”

“筹备处”：“上街上。”

康生：“我想同谢光明同志核实一种情况，他是不是‘筹备处’的代表？”

“筹备处”：“是。”

康生：“他是哪个单位的？”

“筹备处”：“吴忠中学学生。”

康生：“我想问一下，他在北京是否写信到吴忠去？这件事，是不是确实的？因为有人把他写的信交给了62师在吴忠支左的部队。这是个青年同志，中学生。当然啦，青年人嘛，犯错误可以原谅。但是，他的信中有一条，说北京三军，陆、海、空三军无产阶级革命左派在李天佑的率领下已前去宁夏吴忠等地重新调查宁夏的问题。我不晓得，谢光明是不是认识李天佑，是不是写过信，但在吴忠确实发现过这封信。李天佑同志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说他率领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到了吴忠等地调查，那就是说中央不相信62师。同志们，我不晓得你们认识不认

识李天佑同志？”

众答：“不认识！”

这时，随康生一起进来的李天佑站了起来，康生向大家介绍说：“这就是李天佑同志。”

大家热烈鼓掌。

李天佑说：“同志们，谢光明如果在北京写了这样的信，那完全是捏造，是谣言。我根本没有到过宁夏自治区，更没有到吴忠去过。刚才康老对我讲了这个情况，我听了很吃惊！革命小将，革命群众组织应该说老实话，应该忠诚于党，忠诚于毛主席，忠诚于中央文革，忠诚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不是捏造是非，造谣诬蔑，玩弄手法，这不是真正的搞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希望同志们，战友们，参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应该忠诚坦率，不要搞手法，不要造谣。”

康生：“我所以提出这个问题，一方面为了核实一下，另外我坦率的告诉‘筹备处’代表，会议一开始，我就向你们说过，作为一个代表的任务，一方面是忠实的坦白的向中央、中央文革反映情况，不管是对的，还是不对的，都可以讲，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要好好学习毛泽东思想，毛主席著作，好好掌握中央、中央文革的指示，这是你们的两大任务。能不能做一个到中央来开会的代表，就看他能不能执行这两条。开始我曾征求过‘指挥部’方面的意见，是否要‘筹备处’代表参加这个会议，有的同志不同意，我向他们解释，来北京开会可以听听各方面的意见，

叫他们来开会不能证明这个组织什么性质。各派都来，这是毛主席的指示，中央、中央文革的方针。叫‘筹备处’来，目的叫‘筹备处’的同志了解毛主席、中央、中央文革的方针，也就是教育他们，使他们真正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不是为了让他们取得一个资格回到宁夏反对中央，反对中央文革。如果是这样，那就不能成为一个真正到中央来开会的代表。这一点，‘筹备处’的代表，要警惕，必须坚决执行上述两条任务。现在，我提出两条希望，征求你们的意见，‘总指挥部’、‘三司’、‘总司’、‘筹备处’，共同征求一下你们的意见，你们到中央来，也包括朱声达等犯错误的同志，毛主席9月26日接见，国庆节让他们到天安门参加观礼，其目的是要教育这些同志，争取这些同志，促使这些同志积极地去了解主席的思想，了解中央的方针。犯了错误，可以改正错误。不是叫他们上了天安门，就证明他们是对的，就已经站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了，不是这个意思，同志们，应该懂得中央的这个方针政策。但有个别人利用中央这个政策，回去制造谣言反对中央，比如说：‘朱声达、何其仁、江波犯了错误，毛主席还接见了他们，可见他们是对的！’让朱声达上了天安门观礼台就证明他那是对的了？‘筹备处’的代表也参加观礼了，到了观礼台上就证明‘筹备处’保朱声达也是对的了？这就把中央召集宁夏同志开会。解决宁夏问题的方针理解错了。这不是同中央一起把宁夏文化大革命搞好，更好地解决宁夏问题，而是制造纠纷，不惜制造各种谣言反对中央。现在，在宁夏反对中

央的各种谣言都是有的。这一点，应引起在座所有在北京的代表和到会人员都注意，绝不能利用给你们在北京的这种地位，回过头去反中央。如果有人愿意这样做，那他就回去反就是了，何必在这里装模作样地开会呢？！这种造谣还有很多很多。最近‘筹备处’代表还提出十大问题，这到底是为什么？我到要问你们，这到底是干什么？是拥护中央，拥护毛主席，还是反对中央，反对毛主席呢？底下的群众不晓得，可以原谅，那么代表在中央开会，应该晓得吧？！如果利用代表在北京开会的资格制造谣言，反对中央，还有什么资格作代表呢？！因此，‘筹备处’代表以及‘指挥部’、‘宁三司’、‘宁总司’的代表，我想提出两个问题同你们商量，看你们赞成不赞成。

第一个问题，所有在北京的代表和参加会议的人员绝对不准利用在北京开会的地位，利用代表的资格，向宁夏制造谣言，反对中央，这个你们赞成不赞成？”

众：“赞成！”热烈鼓掌，“总指挥部”代表带头高呼：“坚决执行康老指示！”

康生：“第二个问题，你们如果得到消息，在宁夏不管是银川，还是哪一个县，如果有人散布谣言，“筹备处”或者其他方面散布谣言，你们代表团有义务有责任写回文件，写回声明反驳这种谣言。你们赞成不赞成？”

众：“赞成！”热烈鼓掌。“总指挥部”代表再次高呼：“坚决执行康老两点指示！”

康生："大家都赞成，很好。一时受蒙蔽。有个别人听信了谣言，犯了错误，只要觉悟了，改正了就还可以当代表，不要撤销代表资格。比如：谢光明同志自己可以检讨，也不要撤销代表，他才17岁，是个青年嘛，你们应当原谅他。同志们，在这方面，主要是说服教育。重要的问题是不要被谣言领导自己，而是要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自己，不要被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影响自己，而是要用毛主席革命路线观察一切问题。

昨天，稽振华同志讲了，说他没有到过北京，也没有到过人民大会堂，有这个感触就很好，但不要错误的利用现在的这种环境和情况，再去混淆是非，蒙蔽群众。今天，李天佑同志正在开会，我打电话叫他来，让你们看看，澄清这个问题。怎么能造那样谣言？同志们，千万不要利用中央耐心教育的政策来对抗中央。我要向你们讲，国庆节前好多代表团发生了争论，河南同志，不是代表，是来学习的，他们坚决反对何运洪、李寿涛也去天安门观礼，武汉也是来学习的，他们坚决反对陈再道、钟汉华等12人去天安门观礼，说服也不行。这种心情很可以理解的。因为他们犯了严重错误，完全执行了刘邓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革命群众不让他们去天安门参加国庆观礼，这完全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我们还是说服了那些同志，因为，这是毛主席的政策，如果不让去，就是不符合毛主席的政策。最后还是勉强说服了，革命群众的态度是好的，一下子容易理解主席思想。但另一方面，绝不要去了就做相反的解释，来掩盖包庇他们的错误。这一点你们的代

表应该注意，在宁夏谣言是很多的，是长期存在的，用这种东西对待群众那是犯罪的，是蒙蔽和欺骗群众，不是革命的行动，是破坏文化大革命的行动。这个问题要很好注意。

现在已经7点了，还有很多同志要讲，我想，讲话要扼要一点。有的同志讲话反映了实际情况，当然有些事实可能有个别出入，但要看总的方面。刚才马生其同志的发言，以及朵恩华同志的发言，总的方面是好的，犯了错误，进行自我批评，改正错误，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同朱声达反动路线划清界线。这就是主席讲的斗私。只有斗私，才能更好的批修。不能私字当头，派性当头，从私字出发，从派性出发，就会蒙蔽自己。

今晚会议，暂时拟定12点再开，也许今晚开不成了，你们在家里等通知，因为中央文革小组的会，也许短，也许长。有的同志还要讲话，希望同志们筹备一下，讲得扼要一些，把主要问题讲了就行了。今天只讲了两个人，照这样讲一个月也讲不完。好啦！同志们吃饭吧。”

众代表高呼：“毛主席万岁！万万岁！”“向康老学习，向康老致敬！”

全体起立，热烈鼓掌欢送康生等人离开。

10月21日下午16时至19时10分，在人民大会堂安徽厅康生第五次接见宁夏全体与会代表。陪同接见的有：李天焕、曹轶欧、康健民。

康生：“现在继续开会吧，昨天晚上我那个会开到下3点，

原来约定的会不能开了。现在请商金仓同志发言，马子明准备。”

商金仓、马子明、军区张艺等人继续揭发朱声达、“筹备处”的问题。

10月22日凌晨2时30分到5时30分，陈伯达第十次接见天津赴京汇报代表团。这次接见，陈伯达态度已经十分的明确，他提到了天津“大联筹”的张承明，并说：“大联筹”就是不好。他质问小站镇的年轻教师，“大联筹”观点的刘秀荣：“你是受什么人委托？你是‘大联筹’的，你搞的恰恰是复辟！”他表示：“白金生这个人我很反对。赵健敏这个人我是反对他的。”陈伯达、谢富治等反复强调贯彻执行毛泽东按系统大联合的指示，不赞成“大联筹”这样的跨行业组织。陈伯达更是多次点“大联筹”的名，说：“要把参加‘大联筹’的群众同头头区别开来，‘大联筹’有些头头搞了很多坏事，亲者痛仇者快，他们做的坏事是不能容忍的，对一些头头做的坏事，参加‘大联筹’的群众不能替他们负责任。”

“大联筹”内部开始分化。首先站出来的是“工矿造总”的二把手程国富，接着是冶金群众组织的魏洪全。张承明也动摇了，白金生不表态。这天晚上，在代表团驻地的小饭厅，“大联筹”自己开始辩论，有些人主张加入“五代会”实现大联合。“天工八二五”的赵健敏死活反对以“五代会”为基础的大联合，辩论进行得十分激烈，有的人说的兴起，都站到桌子上了。

“五代会”也有人在场，只是站在一边看热闹。

经过辩论，一部分人公开表态：“我们承认错误，加入‘五代会’。”这些分裂出来的人后来都进了市工代会和市革委会。

## 第 915 回：王必成，接见军区“平反组”　林维先，□先志先后接待

10 月 18 日，南京军区“告状团”联合南京军区司政后机关在“二月镇反”中受到迫害的人员代表，要求南京军区此时在家主持工作的王必成副司令员，批准他们成立的“平反小组”，说是要在党委领导下，监督和帮助平反工作的进行。

10 月 21 日，在南京军区第一招待所，著名的 AB 大楼宽敞明亮的会议室里，王必成将军，这位威震孟良崮战役和莱芜战役的虎将，纹丝不动地坐在雪白干净的长条会议桌的正中央，他的军帽放在会议桌的右上方。银色的传声器对着他，一个淡蓝色的托盘，托着一个白色盖着盖子的茶杯，放在他的面前。杯子下方有一本黑色大笔记本敞开着，钢笔就在笔记本上。他花白的短发剪得十分整齐，不时昂起头来，用鹰一般的目光，扫视着围坐在会议桌上和其它座位上来访的男女干部。看上去，这位受人尊敬的老将军更加消瘦了，在本来就干巴的脸上，更加棱角分明，令人望而生畏。他依然精神抖擞，威风凛凛。军容和威仪丝毫不减。坐在他旁边的是南京军区政治部主任王六生将军，他面有菜色，还是那样肥胖。参加这次会议的代表有 30 多人，他们在前一天已将有关诉求内容告知了王必成副司令。

“同志们!我们开会好不好？王副司令工作很忙，担子很重，今天应同志们要求，同大家见见面，同志们有什么意见请讲吧!”政治部主任王六生主持会议。王必成把宽边老花眼镜戴上，认真

地看着那张代表们事先给他的有关诉求内容的“走访”提纲。

“我们军区司政后机关和驻宁院校、文体单位的同志都来了。我们来走访军区党委和王副司令，要提出来的问题，事先都通知了，现在我们就按题目一个一个来吧！” 海军学院学员李英武用他那一口东北普通话说道。

“同志们，你们的心情我了解。军区党委犯了错误，你们受了委屈。现在同志们要求平反，要求军区党委改正错误，这是合理的要求。我本人在今年二、三月份也犯了严重错误。当时，我在家主持工作，抓人是我抓的。我愿意承担责任，向同志们作检讨，赔礼道歉。希望同志们多多批评。你们提的问题，有的我能答复，有的我不能答复，有的要经过军区党委研究之后才能答复，请同志们谅解。”

王必成以少有的温和语调讲话，使在座的干部们以及他的秘书感到惊讶和好笑。南京军区政治部《人民前线》报编辑高丕忠轻轻地对坐在旁边后勤部的赵玉祥说：“王老虎今天成了美娇娘了！”

“我们欢迎王副司令的态度，哪怕有一点点进步和转变我们也欢迎。您是军区首长，现在是我们的首长，将来打起来仗来还是我们的首长。正因为如此，我们衷心地希望您和军区其他负责同志能站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来，能站到群众一边来。不要站到群众运动的对立面。转变得越快越好，越彻底越好”。政治部文化部干事方泽甫用标准的四川话，说得十分诚恳。

“王副司令刚才说，有些问题能答复，有些问题不能答复，有些问题要经过党委研究之后才能答复。试问，今天的走访，党委没有研究讨论就同意召开了吗？”后勤物资部助理员王树雨问道。

王必成摘下眼镜，用眼睛斜视了一下发问者，沉默不语。王六生见机不妙，立即插话解脱说：“今天的会议很重要，党委怎么会不做研究。在家的党委常委只有王必成同志、鲍先志同志、林维先同志和我。我们碰过头研究过。至于一些问题，因党委主要负责同志不在家，不便做出决定，请同志们谅解”。

后勤部赵玉祥站起来说：“党委对走访做了专门研究，对走访表示重视。如果党委只研究开会不开会，对会议内容不做研究，比如对我们提的问题不研究，岂不是舍本求末吗？这种做法岂不是又在哄骗我们吗？党中央三令五申，犯错误不要紧，改了就好，改得越快越好，越彻底越好。如果扭扭捏捏，羞羞答答，吞吞吐吐，不愿意改正，到头来还得改正，那时候损失就大了，威信就扫地了。这是毛主席对 27 军在江苏无锡三支两军犯错误检讨报告的批示。王副司令不会不知道吧！党委同意接见我们，对实质性问题不研究不回答，岂不是等于还在坚持错误，起码说是态度不积极。”

王必成和王六生听了赵玉祥的发言。都沉着脸一言不发。

赵玉祥继续说：“我们知道首长有难处，过去的一些事不能全由军区党委来承担，因为那是个人决定的。比如抓人，抓得那么

多，抓得眼红，那就不是党委的决定，是个人决定的，这件事现在说由党委来负责不妥当。个人闯的乱子为什么要集体来挨板子呢？王副司令您当时在家里主持工作，抓人的主意不是您出的，我们认为您不必负责任。可是您现在主持党委工作，可以对这件事进行讨论研究，做出肯定或否定的答复，这就是您应该负的责任。”

王必成和王六生以及工作人员都低着头，认真地做着记录。

接着，王必成语气温和、态度诚恳地说道：“同志们今天来走访军区党委，对我本人教育很大，我欢迎同志们的批评和帮助。二月抓人肯定错了，毛主席党中央批评了我们，并督促我们尽快改正错误。我们的检讨已经送到北京去了，杜平同志看了之后，再送张春桥政委看看。他们都同意了再呈送毛主席党中央批示。党中央批了，我们就好说话了，现在，有一些问题我们不好表态。同志们不必心急，很多问题总能慢慢解决的，要给我们一点时间，要允许我们做工作。很多干部的思想一时还转不过来，要有一个过程。同志们，你们要耐心。我保证军区党委一定遵照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合情合理的彻底解决你们的问题”。

“王副司令今天在百忙中抽出时间接见我们，还有王六生主任也来了，我们感到非常光荣。因为，我们原来都是‘反革命’。今天王副司令同‘反革命’坐在一起谈谈心，说说心里话，我们的确感到光荣。”

方泽甫的四川话才开了个头、王必成将军就笑上眉梢了。他

连忙摆手表示歉意地说："什么反革命，不要再这样讲了，我们冤屈了同志们，我们有错误，严重错误！"

"王副司令到军区来工作快 10 年了，我们平时也不大看得见首长，只听说首长很厉害，爱骂人。在九兵团工作的时候，消灭过国民党王牌军 74 师，蒋介石的干儿子张灵甫不可一世，也是在王副司令手下见阎王的。孟良崮一战威名天下扬。党中央毛主席很看重王副司令的，还发表了文章和谈话。电影《红日》就是描写您的。"方泽甫继续吹他。

"那是过去的事了，好汉不提当年勇嘛，讲那些过五关斩六将的事干什么。过去的功劳和历史不能代替现在的错误和现实。我老了，糊涂了，下半辈子做了一件蠢事。同志们年轻力壮，有见识有本事，毛主席说了世界是你们的。"王必成不愧为王老虎，老虎能如此谦逊达理明白，让在座上访的人们十分感动。

"人家都说王副司令是王老虎，这是形容首长在同反革命武装斗争时勇猛如虎。今天虽然不打仗了，在和平环境中，王副司令也勇如当年，勇挑重担。刚才王副司令讲的话，我们认为是积极的、进步的。所以，我们表示欢迎。不过，有一些重大问题，王副司令还缺乏勇气，拐弯抹角，不敢直言。我们同意王副司令的看法，要有一个过程，要给一点时间，要创造一些条件。为此，我建议今天暂时休会，有些问题可以在下次走访会上解决。"王必成一听方泽甫讲了这么一段话，如释重负，脸上浮出轻松的笑容，不住的点头表示同意。王六生也不断点头，如鱼入海，如去

桎梏。

接见结束后,《刘锦平10.6讲话》、《王必成10.21走访纪要》、《司政后首长走访纪要》被大量印发。接着，南京军区司令部、政治部、后勤部，军区总医院、八一医院、一二五医院，前线歌舞团、前线话剧团、前线歌剧团，体育工作队、军乐队都贴满了大字报，基本是揭发许世友在二月大逮捕、大批斗、大清洗、大提拔的“四大”错误。南京军区后勤部9位将军也都上台揭发和表态，30 多名上校、大校全部倒戈向平反组靠拢，有的主动把二月抓人的内幕机密向平反组提供。比如，许世友要枪决 86 医院护校教员李明，就是一位副部长透露的。南京军区政治部师以上干部更为活跃，文化部部长何秋征、群工部长丁华国都写大字报质问许世友为什么要把他们赶到浙江去？秘书长卞庸中、副秘书长李干，青年部长季遐年都参与了“平反组”的具体工作。

10 月 31 日晚，在南京军区第二招待所小客厅里，南京军区副司令员林维先又召见了南京军区“平反组”的艾汉美和赵玉祥。

小客厅灯火通明，四盏壁灯贴在奶油色的墙壁上，天花板上还悬挂着一盏四灯头的吊灯。淡黄色的地毯上摆着六张软沙发。墨绿色台布罩在茶几上，茶几后面竖着一架立式罩灯。小客厅的陈设十分雅致和谧静。林副司令来到之前，他的秘书林启桐热情地接待艾汉美和赵玉祥。在二月大逮捕中，林启桐也被关押了起来，他们观点一致，十分相投。杜平政委的行政秘书杜荣上尉，张才千副司令的秘书刘东敏中校，王必成的机要秘书尹中元少

校，军区党委常委保密员徐英杰中尉，全部进了监狱，享受过铁窗的滋味。如今，南京军区首长的秘书全都“造反”了！掌管党委常委核心机密的人也起来揭发批判了，许世友气愤难平，怒不可遏，也是可以理解的。

19 时 40 分，林维先满面笑容走进了小客厅，他手里挟着带烟嘴的卷烟，对赵玉祥和艾汉美说：“同志们久等了！”

赵玉祥和艾汉美立即站起来，立正向首长敬礼。林副司令和他们握手，招呼大家坐下。

“今天晚上请同志们来谈谈心，我们前天找王六生主任谈过了，很多问题取得了一致意见，同志们不要急，要一步一步地解决。他们思想不转过来，反是平不好的。我们希望把反平好，不留尾巴，尽可能满足同志们的要求。昨天，中央又给我们打电话，说南京军区现在还有压制，要求我们正确对待群众。中央对军区党委的检讨不满意，羞羞答答，不敢揭短。现在我们真正感到压力很大。王副司令已经好几天没有睡好觉了。许世友同志有病，杜平同志在北京，很多重大问题我们不了解，党委会上也有争论。是谁的板子就是谁的板子，板子不能瞎打。我们也感到有苦衷。这是和同志们谈心，说说心里话，你们都是好同志。”林维先说得很亲切，目的很清楚，做赵玉祥和艾汉美的工作，缓解群众和党委的对立情绪。

“最近我们看了一些材料，听了同志们的申诉，对我们震动很大，教育很深。很多情况我们不了解，对同志们的迫害竟然会

搞到如此地步。哪有那么多的反革命，我们也怀疑。孙海云同志、赵树湘同志跟我们在一起工作多年了，是可以信赖的好同志嘛！怎么一下子成了反革命集团！逮捕关押，还要划清界线，还要批斗，株连家属子女，真是打击一大片啊！”林维先动了真情。

“林秘书在我身边工作几年了，表现很好嘛，他也被抓起来了，事先也不跟我打招呼，就把人抓起来了，我事后才知道。不管怎么样，我还是个副司令嘛！军区领导机关的干部都是经过历次运动锻炼过的，选了又选，挑了又挑，才可在机关工作的。都是可以信赖的嘛。现在问题成堆，怎么办？只有老老实实承认错误，坚决改正错误。今天，我把同志们请来，就是谈谈心或者说是向你们交交心，你们看看有什么意见和想法随便谈谈，希望你们帮助军区党委改正错误，我相信同志们是通情达理的，是顾全大局的。”

林维先将军中肯亲切的谈话，使小客厅气氛更加协调、和谐、融洽、愉快。林启桐秘书用速记全部记下了他的谈话。谈话持续了 4 个小时。时针指向 11 时 40 分钟，已临近午夜。

“你们是好同志，建军靠你们”。

“首长还是我们的首长，将来打起仗来，还要带领我们向前冲”。

握手告别时，林维先叫秘书派车把他俩送回家。深秋的南京城，可以身着棉衣的午夜，就是坐在汽车里面也还有些寒意。路灯格外明亮，宽敞的柏油马路显得更加豁达，一眼可以看到底的

中山北路，洁净、坦垠、磊落、亮堂。坐在车里的赵玉祥和艾汉美心里感到十分的畅快。

鲍先志将军是南京军区副政委，原先是总政治部组织部长，平易近人。他在 1967 年 11 月接见军区后勤部一批走访人员时，讲了一段非常感人的话。他说，“1934 年长征途中，由于张国焘的叛变，株连了一大批干部。我是四方面军的，也受到了牵连，被关了起来。一直到 1942 年才把我的问题弄清楚，组织上给我平反，向我道歉。时间持续了八年之久。那个时候全国尚未解放，又处于战争年代，拖了八年是可以理解的。同志们现在很幸福，全国统一，党中央一元化领导，用不着等八年。毛主席党中央就在北京，同志们受了冤屈，中央立即就出来纠正，你们多幸运啊！你们要相信党中央毛主席一定会给你们落实政策的，军区党委在党中央毛主席领导下，问题也一定会得到正确解决的”。

## 第 916 回：尘埃定，新时代狂人收监　第五次，接见安徽省代表

随着王力、关锋的倒台，曾经喧嚣一时的“新时代的狂人”陈里宁一事又被翻了出来。

陈里宁到历史研究所后，戚本禹对他的要求是，参加所内的文化革命运动，可以继续写批判文章，但尽量不要到社会上活动，少同外界的群众组织接触，更不要支持一派，打击一派。他让王广宇将这些意思当着历史研究所傅崇兰的面告诉陈里宁，同时嘱咐傅崇兰掌握好陈里宁的活动。话虽这么说，但怎么能控制住呢？像北大聂元梓来请陈里宁，能不让他去吗？

北京高校和一些单位纷纷来请陈里宁去作报告，哪派请到陈里宁就表明他是站在那派一边，势必会引起对立派的反感。社会上散发了一些陈里宁讲话的传单，如陈里宁给“新人大公社”的红卫兵写的一封信就流传甚广，许多红卫兵小报都有转载。信中说：

“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是反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大毒草，打着‘红旗’反红旗；特别是谩骂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和马列主义者。《修养》集资本主义、封建主义毒素之大成，毒害青年，流毒甚广、甚深。让我们和千千万万革命者一道，把《修养》批深、批透、批臭，使它永世不得翻身！让我们在毛泽东伟大旗帜下，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

那些没有请到陈里宁的派别，开始质疑陈里宁是不是真的反

对刘少奇。他做的报告越多，反对派的批判也就越猛烈。尽管陈里宁得到中央文革的肯定和支持，但反陈一派也在加紧活动，他们抓住他涂改毛主席著作这个要害大做文章，说陈里宁也反对毛主席。

戚本禹终于有点不耐烦地对王广宇说："陈里宁还是到处活动作报告，他住在北京安静不了，别人找他，他就出场，也是一个好表现自己的人。想办法让他离开北京躲一躲。"

当时正好中央文革小组要了解农村文化大革命的情况，记者站也准备下乡调查，于是决定，将陈里宁派到农村搞调查。

王广宇和傅崇兰一起向陈里宁传达了戚本禹的"指示"。陈里宁听后稍微犹豫了一下，表示愿意接受。按照戚本禹的交待，王广宇嘱咐他下乡后，不能用陈里宁的名字，不要参加农村的运动和各种活动，不要出去作报告，以调查组记者的身份出现，可以写调查报告，直接寄给王广宇。陈里宁认真作了笔记，表示遵守这些规定。

1967 年 4 月，陈里宁化名李明，以《光明日报》记者的身份到保定地区徐水县调研。本来，让陈里宁下乡的初衷是让他出去躲一躲。可是陈里宁却非常认真地把下乡调查看作是中央文革小组交给他的重要任务，下乡不到一周，就寄回一两万字的汇报材料，后来又连续寄了两次汇报材料。可陈里宁发现，调研材料寄出后石沉大海，没有回音。于是他给中央文革小组写信，信中陈里宁小心翼翼地询问组织是否满意他的调研。王广宇无暇翻看

他的材料，只是回信鼓励他，继续认真调研。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内，陈里宁陆续给王广宇寄来 10 多份调查报告。

1967 年的 5 月，为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 25 周年，天津人民话剧院“11.3 革命造反队”根据陈里宁的《狂人日记》改编成六场话剧：《新时代的“狂人”》。剧中人物群卫东即是陈里宁的原型。话剧由尹舒坤编剧，李起厚主演。《新时代的“狂人”》在北京、天津共演出 48 场,剧本发放到 21 个省、市，110 多个单位。1967 年 7 月 15 日，《天津日报》刊登了一组赞扬文章。在社会上，有些群众组织自命为“狂派”。

演出期间，清华大学朱起鸣和天津市话剧团群众组织负责人不断给中央文革工作人员王广宇打电话，请他去看演出。王广宇告诉了戚本禹。戚本禹说，他不去看。戚本禹不去，王广宇当然也不能去看。作为中央文革小组的工作人员，没有小组成员的指令是不能擅自参加社会活动的，这是江青定的纪律。

1967 年 7 月，正在保定徐水的陈里宁，因为写着“陈里宁”字样的毛巾被一个女学生看到，身份暴露。当地领导慕名前来拜访，盛情邀请他去作报告。陈里宁又开始活跃起来，来请他作报告的人络绎不绝。

傅崇兰得知消息后，赶紧打电话告诉王广宇：陈里宁在保定乡下暴露了身份，各派组织纷纷请他去作报告，碍于东道主的情面，他出去作了几次。傅崇兰请示该怎么办。

这次戚本禹真的恼火了，他生气地说：“这个陈里宁，我们

把他弄出来，现在却成了一个包袱了，看来他真是有精神病，又好出风头，乡下呆不下去了，叫他回北京吧！”

陈里宁回北京后，王广宇去历史所和傅崇兰一起同他谈了话。陈里宁心情沉重，觉得犯了大错误，经常喃喃自语，“我不是故意的，我不是故意的。”当王广宇批评他暴露了身份时，他解释说，他一直用着在监狱里用的写有“陈里宁”名字的毛巾，不知怎么被人发现，就在保定地区传开了。

王广宇告诉他，回来后一定要闭门谢客，谁都不见，陈里宁当时提出想回湖南老家去参加文化大革命。因为戚本禹曾对王广宇说过，陈里宁回湖南的想法不现实，那里现在乱得很，他回去又得卷进派仗里去。王广宇把这个意思告诉了陈里宁。陈里宁表示犯了错误，对不起戚本禹对他的爱护。

陈里宁回到北京的消息不胫而走，反陈派又开始在北京和其他地区宣传陈里宁有反对毛主席的罪行，以此来抨击为陈里宁翻案的一派。陈里宁已经成为两派斗争的筹码。一派猛打，一派死保。

一天，戚本禹对王广宇说：“陈里宁最近不是身体不太好吗?给他找一个郊区的疗养院去疗养一段。”随后他又说：“陈里宁给我找了多少麻烦，真没办法!王力也不管，你去找王力，把陈里宁的情况跟他讲讲，问他怎么办。”

王广宇向王力汇报后，王力说：“同意戚本禹的意见，让陈里宁去疗养。”

1967 年 8 月初，经过比较，最后选定了离昌平不远的亚洲学生疗养院。然而，没想到陈里宁坚决不去疗养，并要求马上回湖南。戚本禹也没辙了。他叫王广宇给傅崇兰打招呼，注意看好陈里宁，不让他出去，并注意防范一些群众组织去揪他。

又过了几天后的一个晚上，戚本禹找到王广宇说："你用中央文革办事组的名义给傅崇兰打电话，叫他向社会上散发一个电话记录的传单。"

王广宇根据戚本禹指示起草的电话记录："现在社会上两派组织因为陈里宁问题进行激烈的争论。一派认为陈里宁是坚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左派；一派则认为陈里宁不是坚定的左派，有篡改毛主席著作的错误。两派组织因陈里宁问题进行争论，很不利于毛主席号召的革命大联合。希望各派组织不要为陈里宁问题再争论了，陈里宁的问题由我们来处理。"署名"中央文革办事组"。这个电话稿经戚本禹同意后寄给了傅崇兰。

傅崇兰收到以后，又给王广宇打来电话，说他修改了几处，基本倾向是不要因传单而对保陈派产生不利影响。散发传单的时间是 1967 年 8 月下旬。传单散发后，对保陈派很不利，反陈派猛烈进攻，要揪斗陈里宁。戚本禹只好派中央文革办事组工作人员王道明去历史所，宣布对陈里宁重新收监。

1976 年 8 月下旬，王力、关锋被打倒了。为陈里宁平反，红卫医院的内部一开始就有不同意见，此时又被提起。红卫医院"毛泽东思想战斗团"认为陈里宁确有精神病，金弘敏说陈里宁

没有精神病是政治需要，并同首都医革会、医大“红旗”于 1967 年 10 月 19 日印发了《揭开陈里宁反革命案件真相》的小册子，小册子说陈里宁是“真反毛主席，假反刘少奇”。

10 月 21 日，谢富治、戚本禹接见了红卫医院两派组织并讲话，清华“井冈山”、北医“八一八”、地院“东方红”、医大“红旗”等有关人员出席。谢富治宣布，陈里宁反对刘少奇，但他也对伟大领袖毛主席作了很多攻击。陈里宁“混乱”的成分多，“反动”的分量少。陈里宁是精神病，交有关单位处理，两派停止争论，停止演剧。但是，仍有少数组织想冲进监狱揪斗这个“时代狂人”。

10月21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发出1967.10.21；中发［67］322号文件《关于征询对“九大”问题的通知》，将姚文元10月11日给毛泽东的信转发到基层党支部。文件说：

各省市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军管委员会、各大军区、省军区党委：

毛主席最近提出什么时候召开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如何准备这次大会的问题，并且指示张春桥、姚文元两同志在上海做些调查。现在把姚文元同志关于他们初步调查结果的一封信发给你们参考，请你们也做好调查，并将调查的结果和你们的意见报告中央。

中共中央

中央文革

一九六七年十月二十一日

（此件可发给连队党支部和地方相应的组织）

10月22日下午16时20分至18时10分，康生、张春桥、姚文元、李天佑在人民大会堂安徽厅接见安徽双方全体代表。安徽省军管会领导小组的钱钧、廖容标、李德生、廖成美、杨广立等人参加接见。

康生说："因为主席号召革命大联合嘛，群众是不赞成现在再分几大派，分裂嘛。这个方针是定了，这个方针是不能变的。"

"因此，同志们还必须根据毛主席的号召，斗私批修。"

张春桥说："安徽的形势刚才康老所说的确实很好，这种形势的到来是很不容易的，是经过长时间的斗争，一年多的斗争，才取得今天这样一个局面。当然现在并不是一切问题都解决了。也不可能一切问题都解决，矛盾总是存在，军队不要吹自己，不要自己评功摆好。军队的成绩让毛主席、党中央、中央文革来讲，让群众来讲，自己不要讲，军队要谦虚谨慎，多做自我批评。对别人的缺点错误，也不要去多做批评指责，要让人家自己讲。

当前，许多地方都要做好两派工作，毛主席说：对受蒙蔽的群众也不要压，对小将要肯定他们的成绩功勋。缺点错误要热情诚恳，注意方式的提出来。对于保守组织也要给他们留位置，让人家进来有好处，不同意见可以争论，有对立面。不要清一色，世界上也没有绝对清一色的东西。保守组织里的大多数群众还是

好的嘛。

叶剑英副主席说：毛主席的指示是‘纲’，各单位讨论研究问题时，不要脱离这个‘纲’。

形势问题很重要，对文化大革命的形势，伟大成绩要充分认识，才能加强信心，总参作战部李副部长谈随毛主席视察时的体会说，看形势一要有明确的阶级观点，二要有明确的群众观点，三不要带着情绪看形势。

周总理对毛主席的新指示，做了一些解释，总理说：主席的指示开始落实时，要先搞典型，搞了典型后，再开全军的会议，先学习再实践。

毛主席说，形势大好，不是小好。”

张春桥介绍了周恩来带刚果（布）总理访问淮南情况后，又说：

“江青同志说把《八条》、《十条》合在一起就提出‘拥军爱民’，当时我们重视不够，宣传不够。这次重制录音要在全国放。

总之，我们部队在执行《八条》时过头了，《十条》下来群众回击了我们一下。《六·六通令》下早了一点，时机不成熟，群众不接受。毛主席也说太早了就不灵了。《九·五命令》就适时、就灵了，毛主席对形势的几段话，是对大好形势最好最形象的概括。

对于乱的问题，总理说：黑手揪出来就好了，再有几个月形

势就更好了。关于站错队的问题，毛主席说站错了，再站过来就行了，但是大是大非要分清。对待群众，即使受蒙蔽的群众，也不要压，要教育，真正左派社会上承认了，问题不大，主要是受蒙蔽的群众，一定要做好政治思想工作，青海刘贤权的工作就是做的好。

专政工具主要是军队，公检法受彭、罗的影响太深，群众不信任了，所以还要依靠群众。战争也是这样，毛主席在陕北，胡宗南的兵临城下，当时毛主席身边只有两个连的兵力，但有群众拥护，就无所畏惧。‘五·一六’只有少数黑手，群众是受蒙蔽的。如果通缉‘五·一六’就易造成对立，秦化龙也是群众自己揪出来的一个组织的坏头头，也要依靠群众自己去处理。

关于干部问题。9月26日，毛主席亲自出了场，那天的录音，各大区可以复制在全国放。”

他还说：“社会主义革命，主要是挖修正主义的根子。”“军队干部犯了错误，是难免的，极少数是严重的，即使是陈再道，毛主席还要让他参加训练班学习，让他住在京西宾馆，还允许他检查，改正。

毛主席说，对于干部要缩小打击面，扩大教育面。……要办好训练班。周总理说，训练班还可以把五好战士、机关干部也找来，代表各方面的意见和你们在一块学习，听听战士和普通干部的意见。对红卫兵小将，我们要以亲身的经历去教育他们，年轻人好说大方向是正确的，这句话，周总理说：我就和他们说，南

昌起义大方向是正确的，但是夺取大城市的政策是错误的，政策错了，大方向也不能保证，只有毛主席的秋收起义才是完全正确的。你们自己都有革命斗争的亲身经历，应该好好地教育红卫兵小将。”

## 第 917 回："□□峡"，第六次接见宁夏　□批示，林彪见湖南□原

10月23日下午16时至21时10分，在人民大会堂安徽厅，康生第六次接见宁夏全体代表。这次主要是谈青铜峡事件。首先是"筹备处"代表陈万福谈"筹备处"策划青铜峡事件的一些情况。当他谈到"筹备处"准备把铁路桥梁炸毁，让中央听到响声，知道他们是造反派时，康生笑了，问道："桥炸了吗？"

"没有。"

接着，兰州军区副司令员康健民问："你们先打那里，后打那里，是怎么研究的？"

陈万福说，准备用炮打"总指挥部"的驻地。

康生问："是用什么炮打的？

回答："82、60炮。"

李天焕："是两种炮吧！82是一种，60是一种。"

康生让62师后勤部副部长王锦发言，并说："他有个青铜峡事件的示意图，给大家看一看。"

会场挂出了大幅《青铜峡反革命事件示意图》，王锦借助示意图详细地叙述了青铜峡事件。

王锦发言后，康生说："请兰州军区冼政委讲几句话。"

冼恒汉说："康老让我讲一讲青铜峡事件的情况。处理青铜峡事件是兰州军区党委得到了中央指示后。告诉62师采取自卫反击这个行动的。不是他们无组织无纪律胡乱反击的。这个问题是

兰州军区很重视的。25号‘筹备处’开始调动兵力，27号青铜峡的造反派和解放军处境相当困难，在这个时候，我们是采取严肃的态度对待这个事件的。有两种可能，一种是青铜峡造反派被消灭，一个是部队被搞垮，后果怎么样呢？如果这样子下去，这个后果不堪设想。他们可以利用吴忠、青铜峡的胜利。北上攻打银川，或者是控制银南，在宁夏南部地区和西、海、固地区，挑动民族纠纷，煽动叛乱，那就死的人更多了。青铜峡事件的性质是反革命叛乱，这不是一般的武斗，这不是小将们和群众的过错，是杨、马、朱和走资派蓄意策划的。你们小将们并不清楚，甚至你们脑袋掉了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反击了要死一些人。但是不反击死的人就更多。甚至青铜峡大坝也可能会被他们炸掉，我们已建设了几年，这样后果就更严重。因此，把这个问题向中央进行了反映，提出了我们的建议，28号早晨5点钟中央批准了我们的建议。”

康生说：“解放军忍耐到8月28号5点钟，中央才同意批准了62师和兰州军区的建议，同志们不要听信谣言。”

冼恒汉：“我就是讲这一个事，我就讲到这里。”

康生接着说：“这一点，通过陈万福同志，特别是王希年同志的讲话就更清楚了。他们到过青铜峡，或部分或整个地指挥青铜峡事件。从同志们的揭发看，青铜峡事件不是偶然的事件，而是长期有计划的继‘八·八事件’和‘八·一三事件’之后的反动行动。如果那时候解放军站在旁边不制止这个事件，青铜峡打

起来不知要死多少人。正像冼恒汉同志所讲的，这个事件甚至要影响到甘肃。这个问题兰州军区考虑了很久，向中央建议，中央研究了很久，直到8月28号早晨5点钟中央才批准的。人民解放军不能坐视，现在有些人对62师、兰州军区和中央进行造谣诬蔑。有种种谣言，种种反动宣传，这一点同志们不要再受蒙蔽了。‘筹备处’自己的人也讲，他们是执行了资产阶级的反动路线，是上了杨、马、朱，杨（一木）、马（信）的反动路线的当的。所以，在这样的时候，制止这种事件，才使宁夏的局势出现了大好形势，稳定了宁夏的局面。假如解放军不采取这个行动，那死的人就会更多，双方死了一些人，这是不幸的，应该由杨、马及朱声达的反动路线负责，广大群众是无罪的，甚至‘筹备处’一些头头也是受蒙蔽的。从王希年、陈万福的发言也可以看出，宁夏的文化大革命的最大特点，和各地不同，因为‘筹备处’的行动完全是从军区朱声达等人以及杨一木、马信等人直接操纵的，而且是在每个方面都派上人去指挥的。像陈万福同志讲的，直接操纵他，做他的后台的李剑白，李是什么人？”

答：“石嘴山钢厂党委书记。”

康生：“噢，是石嘴山钢厂党委书记，还有个叫宋长胜的，”

王希年答：“是宁夏军区转业的干部。”

康生：“噢！宋长胜也是军区刚转业的干部。李剑白讲他是后台，可是他本身还不是‘筹备处’的人。可见在宁夏‘筹备处’里边，许多地方，无论是工人、学生、农民，不仅走资派直接指

挥，甚至还派他们的干部直接操纵。你们可以问一下，这种情况其他地方是少有的，当然也有，但不是像这样明目张胆地搞的。同志们要提高阶级警惕，要清楚地看到这个问题。当然，中央的方针是让同志们有意见就讲，不符合事实的你们可以讲，但是走资派甚至‘筹备处’代表团副团长就是青铜峡的县委书记，县委书记做群众组织的代表，这在全国是很少见的。我没有见过这样的事情，当时我听了很惊讶，但那个时候我还不知道杨一木、马信那一套。广大群众本来是拥护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是要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但被走资派操纵引到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去了。但另一方面也要看到，这也有个好处，受蒙蔽的群众，有些是‘筹备处’服务小组（即核心小组）的同志，如马生其、朵恩华。朵恩华搞的是机要通讯，有的是直接指挥青铜峡事件的，如马子明、陈万福、王希年，他们揭发了问题，我们很欢迎。犯了错误，承认错误，彻底改正错误，站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这种情况好得很，中央肯定这种精神。这是符合毛主席指示的精神的，也就是说，他们拿具体行动来执行、运用毛主席的最新指示。”

“筹备处”代表要求62师公布向中央反映青铜峡反革命暴乱事件的报告，康生说：“在这个问题上，很多人是受蒙蔽的，这要由杨、马和朱声达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负主要责任。青铜峡事件已不是一个群众简单的武斗问题，而是一个有计划的军事行动。”

说罢宁夏，我们再看湖南。湖南“省革筹”小组给中央写了一个报告，总结“省革筹”小组成立两个月来的工作，分析了湖南当时的主要问题是极“左”派的干扰。毛泽东看后，批示给林彪，要黎原到北京来汇报情况。

10月24日下午17时到20时30分，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谢富治、江青、张春桥、杨成武、戚本禹、姚文元、吴法宪、汪东兴、叶群等人接见了湖南省革筹小组、47军负责人黎原。广州军区司令员黄永胜、政委刘兴元也在座。

当黎原汇报到湖南形势时，林彪肯定了湖南报告的看法，他说：湖南突出的问题，是极左派的活动，其后台有国民党，有刘少奇、陶铸、彭德怀、贺龙的爪牙。有坏人在后面策划。因此，要发动群众，将坏人揪出来。

林彪说，湖南问题很多，长沙是和平解放的，凡是和平解放的地方常常不和平，问题都多。像新疆、西藏，都有问题。湖南不同于江西，不同于湖北，也不同于两广。湖南烂摊子大：国民党底子厚，再加上两个政客（刘少奇、陶铸）、两个军阀（彭德怀、贺龙），是反革命三结合。彭德怀、贺龙爪牙多、坏人多，再加上和平解放。现在还没有乱透。

他说：“湖南的乱，肯定有坏人在后面操纵，这条黑线很长。”

林彪说湖南有三条黑线：

第一条，是国民党黑线。和平解放的，这条黑线是起作用的。

第二条，是彭德怀、贺龙，影响很大，也是起作用的。

第三条，是刘少奇、陶铸，影响也是很大的。

他说："湖南黑手很多，黑线很长，运动中暴露暴露是好事。现在是否都暴露完了？不一定。有些人削尖脑袋往造反派中钻，如蔡爱卿就是一个。"

江青："削尖脑袋的是两面派，到一定的时候，还是要暴露的，群众是要把他们揪出来的。所谓两面派，实际上还是一面派，到一定时候，他就暴露了。"

林彪："我们要宣传毛泽东思想。他闹他的，我们宣传我们的。要沉住气，不要出一点事就大惊小怪。

过去有那么些人吃这个药，吃那个药，成天怕死，总想长生不老。一怕死就要演变过去，有的已经修了，有的开始在修。过去很多医院、疗养院还住不下，现在好多都空了，没有人住了。"

周恩来："长沙有两个学校，政干校支左是不错的。"

林彪："政干校过去几年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是举得高的，这次文化革命运动中是不错的。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也讲过：政干校是不错的。341没有搞好，过去的底子没有打好。341和社会上搞到一起，很乱。现在两派要联合起来，要关门整风，不要和社会上的组织挂钩。他们打架，不要他们支左了。"

黎原汇报湖南省军区的问题，说军区已经瘫痪了。

周恩来："军区要改组，谭文邦、林国兴可以抓工作嘛。司、政、后要关门整风，不要搞四大了。"

江青："军队上要搞忆苦思甜。"

当黎原汇报到“红旗军”问题时，周恩来明确指出：“基层是好的，可以平反，总部不能再恢复，基层可以参加大联合。过去我说调查，是调查原‘红旗军’领导人和北京‘红旗军’的联系。调查不调查，总部都不能恢复。你们明确告诉他们，总部不能恢复。”

对上山下乡知识青年问题，周恩来也很明确：“要坚决按照中央指示办事。上山下乡方针是正确的，是主席定的。要动员他们回去，做好政治思想工作，安排好他们的生活。”

对“高司”问题，周恩来说：“‘高司’不能再成立了。它的基层组织——战斗队，如果承认了错误，真正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了，尊重造反派的领导，也可以参加联合。但必须是真正承认了错误。要做好造反派的工作，团结大多数。人家错了，改正就好了。”

戚本禹：“要讲政策，不要进行报复。湖南打人很严重。群众不能很快团结过来，干部不能很快争取过来。坏人也不能很快地孤立起来。通过学习班，很好进行教育。”

汇报到道县杀人问题时，林彪：“这也是坏人搞的，有坏人在背后操纵。要立即制止。”

接见后，25日上午，他们给毛泽东秘书打电话，请示“主席还有什么指示？”下午13时20分，毛泽东秘书回电话：“主席说，就是林彪同志的指示，没有什么要谈的了，黎原同志可以回去了。”

10月27日，一支由湖北第二汽车厂派至湖南汽电厂培训的湖北佬为骨干，以刚从部队回来的梁甘林为司令的武斗队“819主义兵”成立。这是湖南“工联”的第一支专业武斗队。

10月31日，黎原在长沙召开大会，传达林彪和周恩来对湖南的指示。“工联”依据林彪讲话，将早已发动的“批判极左思潮”运动进一步推向高潮，成立了囊括几乎全部“工派”组织的“反极左联络网”。

由于“省无联”既没有一个工作的地方，也没有人具体负责领导。这时，张玉纲、周国辉等人便联络了一批“红中会”学生，在“红旗军”总部四楼挂起了“省无联”的招牌。有人提出要成立一个战斗组织，名称定为“极左派联盟”，后改为“极左派公社”。

张玉纲、周国辉、杨曦光等人又从“红中会”、“红专会”、体委“红旗”选了一批人到“省无联”工作，并把《湘江评论》也从省人委迁到“省无联”。在这段时间，“省无联”工作人员都由张玉纲领导开会学习，杨曦光也常来交谈。于是，一批热血青年组成的“极左”先锋队就这样成立了，骨干自然来自张玉纲、周国辉、杨曦光十分重视的“红中会”，如三中马里佩、四中陈琳琅、九中李竹双。他们白天下厂串连发动群众，晚上关起门来跟着张玉纲苦读马列，进行理论建设。周一之主持的《湘江评论》则成了“省无联”的“机关报”，他撰写的“发刊辞”力追五四时期的毛泽东：“洞庭的闸门动了，且开了；浩浩荡荡的新思潮

奔腾澎湃于湘江两岸。顺之者存，逆之者亡……”大气磅礴，却又那么的不合时宜。

“先锋队”的工作可谓战果辉煌，就在 10 月 30 日黎原在省体育馆正式传达林彪讲话的 3 天后，11 月 2 日，张玉纲抛出《反逆流提纲》，称“林副统帅接见黎原标志着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对湖南的文化大革命提出了新的与全国不同的战略部署。这一部署的核心就是湖南还要乱，还要充分暴露，必须彻底摧毁湖南的反革命三结合，这是一个新的转折点。”“由削尖脑袋钻进省革筹的黑线人物幕后策划，由‘工联’、‘9.17’（高校 9.17 红总）、‘8.19’等组织的个别决策人台前指挥的‘反极左’围剿第一阶段战役已告段落。其锋芒已成强弩之末，造成了‘反极左’阵营内部的疲劳沮丧，暴露了他们的空虚和孤立无援。”“相反的，我们正在逐步恢复我们的主动，正在赢得社会舆论的同情和支持。”并提出“反攻势在必行”。“对这次反击逆流以及今后湖南前途的展望是乐观的。越乱，矛盾暴露得越充分，解决才有可能越彻底。”

张玉纲对林彪讲话的别样解读，对处于彷徨中的“省无联”无疑是一剂强心针或镇静剂。他突出了“乱”字，这是当时闪耀着“革命”的诱人光彩的字眼。因为毛泽东说过：文化大革命的乱是乱了敌人，锻炼了群众。7、8、9 三个月的天下大乱，更是“形势大好，不是小好”。如今湖南还“没有乱透”，“资本主义复辟是随时可能的”。

周国辉则声称："湖南没有乱透，阶级斗争盖子没有揭开，就要冲击。要冲击就要有一个较大的社会组织，如果都回本单位本部门了，就无法冲了，所以要搞'省无联'。"

可是，如何理解中央对湖南问题的"8.10"决定和省革筹的成立呢？特别是如何理解毛泽东视察大江南北的一系列讲话再三强调的大联合呢？杨曦光对周一之谈了自己的看法："7、8、9 月份的全国性武斗给全国国民经济带来了很大损失，因此现在必须把革命的步调放慢下来，来一个国民经济恢复时期，调整国民经济。任何革命都要求有一定的经济基础，如果在经济条件不允许的情况下强行发动革命，那么所得结果必然是得不偿失。因此，同经济恢复时期相适应，政治上应当有一个退却阶段，即对资产阶级采取让步政策。这就是毛主席暂时不同意揪周（恩来）的原因，这也就是'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的内容。""毛主席现在的战略部署是和列宁实行新经济政策一致的"。

杨曦光这些六经注我兼瞎子摸象式的形势分析，其逻辑也被顺理成章地延伸到了"省无联"对林彪讲话的解读中。于是，在林彪讲话中，湖南没有乱透的原因，是因为其突出问题是"极左派"在活动，而在"极左派"后面又有三条黑线的因果链条这一结论，就这样被"省无联"切成了分隔孤立可以随意砸人的三块大石头：没有乱透、"极左派"、黑三线。而首先挨砸的，当然是"省革筹"和"工联"。

按照杨曦光等人的如此解读，"工联"掀起的反极"左"运

动，反倒成了针对革命派的反革命逆流，而且是全国性的逆流。

“红中会”六中的“横空出世”宣称：“十月反极左就是地地道道的二月肃（湘江风雷）流毒运动的翻版，只不过招牌不同而已。十月反极左运动跟二月肃流毒运动一样，都是由二月镇反中的黑主帅提出的全国范围内的自上而下的反革命复辟逆流。”这很难不令人联想到周恩来。

不仅如此，在杨曦光、周国辉等看来，批极“左”不但是局部复辟，而且是全国性复辟的前奏，因为批极“左”是与毛泽东提出的“要斗私，批修”分庭抗礼。

一中“夺军权”说：“毛主席最近号召全国人民斗私批修。这个口号是非常革命的，是马列主义的。这个口号要求批判修正主义（资本主义、右倾机会主义）。毛主席要求在批判修正主义的斗争中斗掉私字，这就与刘少奇的说法严格区别开了。毛主席的这个口号是矛头向上对准走资派的，而二月镇反的黑后台提出的‘彻底批判极左思潮’这个反动口号呢，它不批判修正主义（资本主义、右倾机会主义）而是把一些革命群众运动的缺点错误，把一些曾被敌人利用过的革命口号打成极左思潮而加以‘彻底批判’，这就矛头向下对准了革命群众运动。”而周国辉则认为，“毛主席号召‘要斗私、批修’，这就是要批修正主义，然而现在就有人要‘斗私、批极左’，归根结底就是违反了毛主席‘斗私批修’的指示。”

“省无联”的“先锋队”能将一个对自己十分不利的林彪的

“10.24讲话”改造成如此针对对手的法宝，而且在当时还真让不少人信服，不能不使人对中国的一句老话：“人言可畏”，做出新的理解。周国辉四处做报告，为群众分析形势、释疑解惑、指点迷津，事前还张贴海报预作宣传，很能耸动视听。

## 第 918 回：作调整，专案组“二办”成立　见河北，清华毕业生离校

1967 年的秋天，中央专案委员会极度扩张，调查的案子数量大大增加，由空军司令员吴法宪负责的“罗瑞卿专案组”就已经分成了至少三个小组，处理所有与罗瑞卿有牵连的案子。

回到北京的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 118 厅主持召开中央领导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参加的会议，指示清理专案，以便让没有问题的老干部参加初步定于 1968 年举行的中共“九大”。

会后，周恩来立即在中南海怀仁堂西大厅召集会议，做出部署，将专案委员会分成“第一”、“第二”两个办公室：原来由谢富治主管的专案办公室，改称“中央专案审查小组第一办公室”，简称“一办”， 由汪东兴负责，下属：彭真专案组、陆定一专案组、安子文专案组、胡耀邦专案组、李维汉专案组等多个专案组，以及后来成立的刘少奇专案组、王光美专案组、“薄一波等六十一人叛徒”专案组、陶铸专案组等，此专案组主要负责中央党政机关审查对象以及各省、市、自治区、直辖市的党政负责人的专案审查。

军事系统审查对象则划归“二办”，由杨成武负责，下设饶漱石案、彭（德怀）黄（克诚）案、罗瑞卿案、贺龙案、叶向真专案组、肖华专案组、马明方（中央东北局第三书记）专案组、无线电专案组、谭震林专案组等 10 个组。以贺龙专案组为例，称其为主案组，下面设 17 个分案组，计有：总参的“王尚荣专

案组”、“雷英夫专案组”、总政的“金如柏专案组”、“李贞专案组”、装甲兵的“许光达专案组”、通信兵的“陈鹤桥专案组”、“樊哲样专案组”、工程兵的“谭友林专案组”、北京军区的“廖汉生专案组”、成都军区的“黄新廷专案组”、“郭林样专案组”、武汉军区的“杨秀山专案组”、新疆军区的“张仲翰专案组”、空军的“成钧专案组”、“向黑续专案组”、国家体委的“荣高棠专案组”等。二办设在北京翠微路总参谋部第二招待所。

“一办”的后勤保障、办公费用等仍由中央办公厅负责，“二办”由军委办公厅负责。

1967 年 10 月，中央专案组下又成立了一个专门的中央敌伪档案清查组，而且在北京以外的 18 个城市由常设的分支专门就嫌疑人的政治历史提供材料。

10 月 23 日，谢富治在中央专案小组办公室会议上说：“所有列入专案的，都是反对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要同这些人作坚决的、不可调和的斗争，绝不能施仁政，不能妥协。”

康生说：“现在打的是尖锐的隐蔽的国共战争，没有坚强的阶级立场，专案是搞不好的。”

10 月 25 日，杨成武召集军委办事组成员开会，“二办”正式开张。会上确定，二炮政委李天焕、军委办公厅副主任金涛、总参作战部副部长成学俞三人兼任“二办”副主任。

为了充实力量，“二办”先从驻京的总参、总政等机关选调

干部，随后又向北京、广州等军区发电，要求报送“政治思想品质好、历史清楚、懂政策、守纪律、工作能力强、没有参加群众组织的比较优秀的干部”。到 1967 年底，陆续有 100 多名干部调来“二办”，但仍未按计划调齐。

“二办”成立后，总参政治部保卫部副部长许心荣担任了罗瑞卿组副组长，又从海军、空军和各大军区调来 6 人，原来的人员部分退回原单位。办公地点从肖华办公室搬到翠微路的总参招待所。

10月27日凌晨，陈伯达、谢富治接见河北省五个地区赴京汇报代表团。陈伯达在讲话中强调要按行政系统实行班系大联合。

谢富治明确批评保定的“鲁迅公社”：“你们反对38军是错误的。”

陈伯达强调:“反对38军是错误的,反对其他军也是错误的。”

他又提到了清华大学“414”的周泉缨：“清华大学有一个学生，有一天不知怎么发了精神病；要揪出窃取文化大革命成果的阴谋家——陈伯达。文章写得很长，写得很无聊，我不想看，最后谢富治同志告诉清华大学，你们怎么不处理呀！他们就把他抓到公安部。我告诉谢富治同志不要抓，还把他放回清华，有不同意见可以辩论，有错误可以批评，不要采取专政措施。事实上，他出大字报那天，他那一派‘414’就把他藏起来了，怕把他打死。如果把他打死群众就犯错误。不应该打，更不应该打死。讲这个故事，说明在文化大革命中要学习再学习。”

当天，清华大学蒯大富召开联合总部会议，做出彻底批判周泉缨的决议，成立了周泉缨专案组。

10 月 28 日上午，清华大学 1966 届本科毕业生和研究生举行了毕业分配誓师大会。会上，回荡着青年学子那真诚而庄严的声浪，2000 多名热血沸腾的革命儿女在这里宣誓：

“我们坚决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到基层去，到农村去，到工厂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最艰苦的地方去，和工农结合在一起，沾一身油污，滚一身泥巴，把自己改造成为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一代新人!”

这一段誓词尽管带有时代的痕迹，但的确是发自他们内心的真诚。

大礼堂的誓师大会以后，同学们陆续地走出了校门：

水利系胡锦涛从这里走出来了。他本来是 1965 届的。因他是政治辅导员，延迟离校，也和 1966 届同时走出了清华园，走向了甘肃刘家峡工程局，成为一名水电建设工人；

无线电系的吴邦国从这里走出来了，他从这里走向上海电子管三厂，成为车间里的一名运输工；

动农系的吴官正从这里走出来了。他是 1965 年本科毕业后留校当研究生，他从这里走向武汉市葛店化工厂，在车间当了一名仪表操作工；

这天，从清华大学校门，走出了 2300 多名年青人，其中有 108 名研究生。他们带着对未来的憧憬和忐忑不安，走向了工厂、

农村、建设工地……他们拿到的“派遣证”的“职务”栏上，写的都是两个字：工人。

清华，清华，这个工程师的摇篮，摇来摇去，却摇出来了一批工人！当时，工人这个称呼比技术员光彩得多。走出校门以后，他们脚踏实地地从普通工人做起，一步一个脚印，在各自的岗位上做出了成绩。多数人在企业、在科研岗位上做出了贡献。也有一部分人因机遇、性格、能力、人品等原因走上了各级领导岗位。

以往，学生的分配都是由校方组织安排的。但是，清华大学这次的毕业生分配却是由学生自己张罗起来的。

1966 文化革命开始，大学毕业生的分配工作也同时停止。1966 年、1967 年、1968 年的三届毕业生都滞留学校。他们中年龄最大的有 30 多岁，最小的也有 23、4 岁。这么大的年龄不能参加工作，还需要家庭继续供养，的确是个问题，也是一个社会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毕业生们不得不“自己解放自己”，自己“分配”自己的工作。

1967 年的春天，清华大学 66 届本科毕业生石福庆在清华大学“团派”总部航空馆的墙上给“团派”负责人贴了一张大字报，希望他们关心 66 届毕业的毕业分配问题。

石福庆是“414”派的，为什么贴在“团派”总部呢?因为当时中央领导对清华“团派”比较重视，蒯大富经常受到毛泽东、周恩来、林彪、江青、陈伯达和一些中央领导的接见。可以说，当时“团派”是清华掌权的，“414”是在野的。

石福庆的大字报贴出后，得到了大多数毕业生的支持，甚至有外校的，都来找他讨论此事。为了发动更多的人参与，石福庆首先在清华大学强斋二楼南头一个小房间里，组织清华大学 66 届毕业生串联会。后来，他又组织了北京市 66 届高校毕业生串联会和全国 66 届高校毕业生串联会，宗旨就是为争取 66 届大学毕业生能早点毕业分配工作。具体应该怎么做？石福庆就向文革前具体负责高校毕业生分配工作的干部——清华大学人事处学生科的老师和北京市文教组的张琳、杜志彬等人请教，还学习文革前中央关于高等院校毕业生分配工作有关的文件，了解毕业分配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毕业分配的程序应该怎么走？

在请教学习的基础上，串联会给周恩来总理、中央文革和北京市有关部门写报告，反映同学们迫切希望毕业分配，早日到工农兵中去的愿望。他们还找了高教部副部长段洛夫和国家计委副主任高云屏等，反映他们的意见。后来又写了如何进行毕业分配的建议。串联会在清华大学、教育部红星楼等处开过几次会。参加这些活动的除了北京一些高校 66 届毕业生外，还有来自天津、上海、杭州等地的学生。

其实，与清华他们有同样问题的何止一所学校，早在 7 月，西安交通大学革委会主任李世英就曾给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写信，反映应届毕业生的问题。7 月 14 日上午 9 时 11 分，国务院总理办公室吴斌打电话给西安交通大学李世英，传达了周恩来的指示：

（一）你给总理的来信已收到，关于毕业生的问题，如照来信所提的办法，时间会拖得很长，中央正在研究一个妥善处理的办法。

（二）据悉：西安最近打砸抢又在抬头，而且两方面都有，希望双方能通过协商予以制止，如果不行，将来可来北京解决，但现在不要来。

（三）听说交大对黄经耀、胡炜有意见，黄、胡二人是中央派去的，而且从一开始也是支持交大造反派的，希望能注意同他们的关系。

（四）霍士廉身体很不好，要批判他可以，但一定要注意他的健康，中央已委托省军区和驻军加以掌握，关于霍士廉是叛徒的问题，根据中央所知，情况并非如此。

8 月上旬的一天，石福庆接到通知，让他找几位北京高校的 1966 届毕业生代表，第二天上午 9 点在台基厂市府大楼开会。石福庆连夜通知了 5 位毕业生，有清华两位，北航、北大、钢院各一位，他们都是毕业生串联会的积极分子。第二天 8 点半，他们一进会议室，见到在座的有蒯大富、聂元梓，还有北京市文教组的张琳、杜志彬等。蒯大富向他们一一作了介绍：北京市革委会副主任聂元梓，“北航红旗”的韩爱晶，“地院东方红公社”的王大宾，“北师大井冈山公社”的谭厚兰，他们几人与蒯大富都是北京市革委会常委。蒯大富也向他们介绍了石福庆。快 9 点了，又进来两位，蒯大富介绍他们是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北京

市革委会文教组组长丁国钰，另一位是北京市革委会文教组副组长李冠英。

会议开始，由李冠英主持，他说："今天请大家来开会是商量66 届高校毕业生分配的事，下面请北京市革委会副主任丁国钰同志讲话。"

丁国钰说："你们 66 届高校毕业生的要求中央已经知道，你们写的材料我们也看到了。中央对 66 届高校毕业生的分配问题是很关心的。聂元梓同志今天也来了，她对你们分配问题也很关心。今天'五大领袖'都来了，北京市管分配的同志也来了，就是支持你们的要求。"

丁国钰又讲了现在情况下如何分配。几位代表听了非常激动，他们看到分配有希望了，自己的奋斗终于有了结果。

台基厂会议以后，毕业生代表们知道中央同意 66 届毕业生可以着手分配了。他们从杜志彬那儿看到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领导小组联合发的文件《关于一九六六年大专院校毕业生分配问题的通知》。跨校的毕业生串联会完成了历史使命，各学校开始着手做自己的分配工作。

清华大学首先组织负责毕业分配的工作机构。当时校、系两级的领导，甚至到教研组的领导，都被打倒了，红卫兵又分成两派，相互打派仗。这个时候怎么组建清华大学毕业生分配机构呢？石福庆向清华大学的老干部如学校学生科的苗既英等人及北京市负责毕业生分配的张琳、杜志彬请教。杜志彬借给他一本 1964

年 8 月由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部学生管理司汇编的《高等学校毕业生调配工作手册》，他看了这个手册，对学校分配机构有所了解，对学校分配机构的大概模式有了想法。于是提议，校一级、系一级和各专业教研室都要成立毕业生分配领导小组。各级分配领导小组的成员是两派对等原则，即一名“团”派，一名“四派”。学校一级和系一级都是由两派各推一名革命干部，一名革命教师，一名红卫兵，而教研组一级，各派出一名教师和一名红卫兵。

他将这个想法告诉两派的头头，“414”找的是孙怒涛，“团派”找的蒯大富和鲍长康。请他们通知各派选拔一名干部、一名教师和一名红卫兵代表×月×日下午 4 点到旧电馆 211 力学系的会议室开会。第一次“414”的准时到了，“团派”的迟到了约半小时，会没有开成。第二次“团派”准时到了，而“414”的迟到了约 20 分钟，会也没有开成。石福庆急了，再次去找两派的头头，让他们再通知一定要准时到。第三次两派都基本准时到了，还是在旧电馆 211 开会。这个会石福庆将预先想好的方案，向大家讲一下，似乎大家没有什么意见。他希望大家回去抓紧成立各分配小组。并强调有关毕业生分配的事情不准带回派里研究，一定要在分配小组里商量。

分配小组虽然由两派的干部老师和同学组成，但大家对毕业生分配工作都是抱着积极负责的态度，不讲派性，工作中合作配合得很好，工作非常认真。这使得清华大学 66 届毕业生分配工

作比较顺利。

虽然多数同学走上了工作岗位，但还是有 200 多人的分配不好落实，也就是说没有接收他们的单位，需要再等待着分配。分不出去的毕业生有以下几种情况：

很大一部分是干部子弟，原来他们是都可以分到如二机部至七机部等国家机要部门，而此时他们成了“走资派”、“黑帮”的子弟，那些单位不可能再接收他们。

还有一部分是文革中发现有海外关系或家庭出身由“红五类”变为“黑五类”，也没有资格去国家的机要单位。如：

李黎风，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 66 届毕业生，原计划分配在二机部绝密单位，因受其父亲李井泉的牵连而被“待分配”，由学校重新联系他的接收单位。他于 1968 年 11 月去青海省电动工具厂报到。

桑尔侠：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 66 届毕业生，原计划分配在二机部绝密单位，因其岳父、中央办公厅副主任龚子荣已被打到，受其牵连而“待分配”，经多方联系，重新分配到辽宁省。他于 1968 年 10 月 27 日到辽宁鹤岗 133 师部队报到，在北大荒部队农场劳动一年，1969 年底分配到沈阳市精密仪表厂当工人。

刘涛，刘少奇之女。清华大学自控系自 903 班学生。对刘涛的毕业分配问题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对校方有明确指示：刘涛的工作不能留在北京，但又要分配在离北京很近的单位，能随叫随到。经过分配小组的努力联系，最后落实刘涛的接收单位是北京铁路

局承德机务段。开始在售票处当售票员，后因围观的人太多，又调换了工作。

还有按 1965 年所确定的分配方案中有 180 名留校当教师或担任其他工作的名额，当时老师是“臭老九”，大家都不愿意当老师。许多人不愿意留校，最后只留下 40 多人在学校。

11 月 8 日，清华大学两派正式成立联合办公室、联合广播台、组成由“团派”17 人、“414 派”16 人为委员的联合总部委员会，取消各自的相应机构。“团派”有些人对此深为不满，拉出了自己的组织“斗私批修联络站”，声称要“斗蒯大富的私，批‘414’的修”，因为蒯大富急于要当联合之后的革委会头头，因此，“是有私心杂念”，而“414”内部有人炮打陈伯达及中央文革，也给“团派”排挤“414 派”找到口实。

## 第 919 回：外交□，周恩来谈“五一六”　说□路，党组织恢复活动

10月26日，周恩来接见外交部5个群众组织和外办代表及外交部、外办的领导。参加接见的外交部、外办领导有：罗贵波、姬鹏飞、韩念龙、徐以新、龚澎、宦乡、董越千、郝德青、姚登山。

周恩来说：“今天这次接见是偶然的。韩念龙对我说，外交部的档案很乱，这是我意识到的，因此，今天把你们找来谈谈。”

“8月份外交部档案很乱，各单位都在翻阅，失密现象严重。档案是否有外传要追查，这是关系到国家的核心机密。今晚来一个总动员，号召观点不同的组织在这个问题上要联合起来，要清查坏人。”

“对乔冠华要一分为二。”

“王力还没有定案，王力的八七讲话只代表他一个人，王力犯错误只是一个人，对中央文革还要绝对信任。外交部八月份大方向错了，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毛主席很不满意。八月份外交部发现一条反动标语。是群众反映：‘刘少奇万岁！’要追查，要动员起来抓坏人。”

“姚登山在国外抗暴还是有功的，还是坚强的，现在犯了错误，不要一棍子打死。要允许他检查，允许他改正错误，允许他革命。姚登山还要保。”

“十八年来的外交路线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八月份砸政治

部、机要室是错误的。以前泄密我以为是把大字报转抄出去的，现在看来，总根子是档案丢出去的。”

“现在果然出现拆毛主席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台。他们不是反我一个人，反我一个人的错误可以。但后来知道‘516’有黑后台，反康老、江青、甚至把矛头指向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林副主席，形‘左’和右会走到一起去。”

“我欢迎给我贴大字报，不要因为给我贴大字报而抓起来，有人要抓，我亲自干预了这个事情。问题在于我们外交政策上出了一些问题，给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林副主席抹了黑，可以不发生的事情，我们发生了，可以推迟发生的，提早发生了。”

“‘516’是个反对党、反对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反动小集团，没什么了不起，没多少人。它的目的是要首先动摇、削弱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所以拿反对我做幌子。‘516’想动摇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是不能得逞的；挑拨中央文革与我的关系；揪军内一小撮、动摇军队的威信、影响军队的威信；搞掉革命形式的无产阶级政权。”

“揭发‘516’反动集团要更促进这个大联合，而不是推迟这个大联合。就是这四个原则：第一、不要扩大化。第二、如有群众组织受‘516’的蒙蔽，自己出来揭发，严重的扭送卫戍区。不严重的，可以自己开会批、斗。第三、不能因此老保翻天。第四、因此促进联合，不是推迟联合。”

10月19日，军委办事组开会研究挖“516兵团”分子。26日，

军委办事组再次召开紧急会议，指示挖掘“516兵团”分子：

“反革命分子的活动情况：10月上旬在天桥、王府井、外交部驻地发现这类反革命传单，是油印的，刻写的，用的天津光林纸，通过邮局寄的，几个城市都寄了，都收到了，这部分复制品，不能再复制翻印，可以在群众中研究，到破案后再收回。这部分传单通过分析有以下的特点：一、对外事部门、统战部门、公检法部门、文教部门很熟悉，因为传单中有很多套话。二、会刻写钢板，刻写和寄出封面是同一个人写的。看来这个人有油印机。三、这个人懂古文，用了不少旧词成语。四、这个人毛笔字很有功夫，看样子这个人练过柳体字，所以估计像混进党内的旧知识分子或‘516’兵团的后台，但他比516分子还坏。五、这人对历次政治运动不满，对群众运动不满，对文化革命很不满，从文章内容来看，这个人想为右派翻案，看来对反右是不满的。六、是自己用面粉和的浆糊。七、是用4月13日和4月16日的《人民日报》糊的信封。

军委首长指示：要坚决依靠造反派组织去搞，已发现‘516兵团’有联系的单位要彻底发动群众，要号召坦白交待，检举者有功，坦白交待者减罪，通过搞清516分子把‘516兵团’的后台揪出来，坚决发动群众来搞，先从与‘516’分子有联系的组织和个人搞，通过工作，把516分子搞得清清楚楚的，要坚决执行中央关于取缔反革命组织‘516兵团’的决定。军艺‘星火燎原’和‘516’沾边是很多的，到现在还没有搞出来是态度问题，要

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搞清楚，否则10年20年后必有后患。”

10月19日，中共青海省核心小组给中央、中央文革小组发来电报说：“我省基层单位的革命委员会已陆续建立，但党的组织均未恢复。工作中经常遇到需要党组织处理的一些问题，如过去作了组织处理的党团员，有的要求重新复查处理；造反派中不少人要求入党入团等。为了加强党的领导，已经成立了革命委员会的单位，可否恢复党的组织生活。”

10 月 24 日，毛泽东审阅时，在“可否恢复党的组织生活”下面划了横线，并写了一个批语：“应当这样做。”并在电报上批示：“中央文革各同志：此件应讨论一下，给以答复，同时转发各地照办。”

10 月 26 日 3 时，张春桥给中共青海省核心小组组长刘贤权打电话说：“中央认为，已经成立了革命委员会的单位，可以照你们来电，过党的组织生活。但是，这是件大事，涉及许多问题，如怎样‘恢复’？是否原有党员都过组织生活？是先整顿领导机关的党组织再整顿下级组织，还是同时进行？支部同革命委员会的关系怎样？还有很重要的，是如何吸收新党员，输进新的血液，等等。请你们讨论一下，根据不同意见，整理出一个简要的材料，送给中央，并由你或派负责同志到北京同我们一起讨论，报中央决定后再正式答复你们。”

张春桥给刘贤权打电话一事，因为事先没有请示毛泽东，受到毛泽东的批评。10 月 27 日，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为

此事给毛泽东并林彪打报告，检讨说："主席批示小组应该讨论青海核心小组关于恢复党的组织生活。小组在二十六日讨论了，但没有很好理解主席的批示，不是直接清楚地按照主席思想，拟出通报，而竟节外生枝，搞烦琐主义，向青海通一个电话，又不先向主席请示，完全擅做主张。这个错误，完全是由我们负责的。类似这种错误，已有好几次。谨此请主席严厉批评或处分。""附电话原稿。这个电话已经按照主席指示通知撤销。"这份报告是由陈伯达执笔起草的。当天，毛泽东在这份报告上批道："林彪、恩来、中央文革各同志：电报改了一下，请你们再开一次会，如能通过，即可发出。"

陈伯达立即将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复电稿送审，毛泽东对复电加写和改写了一些文字。当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即以中发［67］328号文件发出了这个电报，全文如下：

中共青海省核心小组，并告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军管会，各大军区，各省军区：

中共青海省核心小组十月十九日来电请示，已经成立了革命委员会的单位，可否恢复党的组织生活。中央认为各地都应当这样做。但党组织内不应当再容许查明有据的叛徒、特务和在文化大革命中表现极坏而又死不改悔的那些人，再过组织生活。党组织应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应能领导阶级和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

中共中央

中央文革小组

一九六七年十月二十七日

10 月，全国 18 个铁路局和 52 个铁路分局的群众组织终于就实现大联合、保证铁路运输畅通达成了协议。10 月 24 日，国务院业务小组向中央汇报 1967 年第三季度主要经济情况和第四季度工作安排。

汇报数字表明：从 5 月份开始，铁路运输量大幅度下降。铁路平均日装车数 1.91 万车，为计划日装车数的 46%。这就是说，全国铁路运输任务的完成还不到一半。在周恩来的直接过问下，全国铁路运输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参加会议的有各铁路局军管会的负责人及铁路系统群众组织代表。

10 月 28 日晚至 29 日凌晨，周恩来接见全国粮食、财贸、铁道会议代表，逐一询问上海、山西、内蒙古、黑龙江等全国 21 个省、市、自治区的粮食生产和收购情况，并作三点指示：（一）立足国内，搞好生产，不吃进口粮。（二）逐步做到南粮不北调，（三）不要多征购，要藏粮于民，藏富于民。

周恩来说："棉花为什么变不成布呢？就是铁路问题。铁路我从 1 月份起就抓，总是受影响，铁路不上来，煤电上不去，煤上不来就不能生产，都归结煤炭铁路。"

周恩来从东北、华北、中南又问到西北。他说："哈密最近又有问题，车又不通了，这是怎么回事？乌鲁木齐的来了没有？"

说着翻看登记薄。

10 月，哈密铁路两派武斗，致使交通中断。在周恩来的直接干预下，空军迅速介入，促使两派于 10 月 14 日达成的四项协议，恢复交通。10 月 20 日，周恩来秘书传达周恩来指示，委托 7335 部队驻哈密航校派出部队，监督哈密“铁联”、“红联”两派组织执行于 10 月 14 日达成的四项协议，保证哈密站运输畅通。

这时，周恩来问：“钱锦祥、丘国权来了没有？”

两人站了起来，周恩来问：“你们是铁路军管会的吗？是哪个部队的？空军还是陆军？”

“铁造司”代表申世侦站起来回答：“他们是新疆军区的。”

周恩来：“嗯，是新疆的。新疆军区和造反派对立的很厉害呀！空军是支持造反派的。”

申世侦接着说：“我是第一铁路工程局‘革命造反司令部’，‘红二司’观点的代表。”

他向周恩来汇报了他们局自 4 月份以来，运输生产一直处于被动瘫痪局面的情况，说：“目前乌鲁木齐武斗仍在加剧，流血事件不断发生。我局‘二司’观点的职工有 1000 多人被迫在外地，不能回局参加生产。从 9 月 28 日到 10 月 17 日，仅我们铁路职工就被打死 7 人，重伤残废近 30 人，轻伤近百人。”

周恩来听完后，对铁道部军管会主任苏静说：“乌鲁木齐局两派都不要走，留下来解决问题。”

他接着说：“乌鲁木齐、广州、柳州开完会都不要走，留下

解决问题。……”

周恩来说：“铁路运输这个问题太重要、太急迫了。眼下，除了斗私批修以外，是如何把铁路运输搞上去。粮食生产、工业生产，回过头来还是铁路运输问题。周恩来问铁道部 1 月份装多少车。当汇报到逐月下降的数字时，他用手划了一条曲线，说：“你们看我的手划的这条曲线，就可看出问题了。从一开始装三万一千到三万七千，降到九千，现在又提高到二万四千车。以三万一千车为水平线，还没上水平线，不仅看业务，要看出政治来。从今年 10 个月的铁路运输生产曲线看，对革命、对整个生产都是不利的。今年只剩下最后两个月了，如果运输指标再上不去，就会影响明年的发展。”说着，周恩来提高了声音：“空喊革命，不抓业务，革命就是空的。动不动就把机务段冻结起来，这无论如何不是革命的，是破坏革命，是不容许的。这就是私，是派性。抓革命、促生产，铁路处于关键性的位置。要联合起来把铁路搞上去。如果不斗私批修，如果不搞大联合，如果不抓革命促业务，那就是反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过去是革命派，如果现在不这样做，就不称为造反派，过去是保守派，如果现在坚持这样做，那就是造反派。”

来自柳州的代表提出：“下面部分职工因为武斗，死了人，对大联合想不通。”

周恩来说：“你们要从大局着想。两派武斗，死了些人，肯定有坏人在挑动，不在群众，要把仇恨集中到坏人身上。不要因

为几个同志死了，就想不开，要顾全大局，要‘泪飞顿作倾盆雨’。这就是无产阶级的气派。”

周恩来最后强调：现在铁路上的重点是解决两广、南京、东北、西北，要研究一下，摆在第一位的是应该抓货运。两派一定要联合起来，搞一个协议，谁不遵守，谁就不是革命派。”

10 月 29 日晚上，毛泽东召集周恩来等开会，讨论大、中、小学校开学和如何办大学等问题。

## 第 920 回：山头在，□庆□□全平□　枪声响，一〇二七大血案

此时的重庆，两派谈判虽然取得了一些成效，但组织还在，“人还在，心不死”，仍然处于你死我活，势不两立的状态。

跑到外边的“反到底”派群众陆续返回原单位。但是，在那些“815”占优势的单位，奉命返回的“反到底”派群众屡屡遭到“815”派人员的压迫和攻击。致使“反到底”派群情激奋，“自卫反击”的呼声不断。停战面临危机，武斗大有战火再起之势。

9 月 29 日，845 厂刚返回单位不久的 “反到底”派“826”遭到“815”派的攻击，双方发生武斗，“826”人员再次被赶出厂。

同日，刚返校不久的西农“826”也遭到“815”派的挑衅，双方发生冲突，随即大打出手，“826”派数十人被打伤，负责人李玉麟、陈德学等人被“815”派抓走，以私刑逼供炮制出《反戈声明》和所谓的《交待》。

当天，四十一中“反到底”派返回学校，与“815”派发生武斗，双方伤 9 人。

9 月 30 日，解放军 302 部队“红总”、424 部队“红联”等“反到底”派组织乘车返回北碚区原单位，遭到“815”派围攻，发生武斗，多人受伤。

10 月 2 日，刚返校不久的西南师范学院“831”再次被赶出

学校，其负责人羊衍海、李盛龙等被“春雷兵团”抓走，以私刑逼供炮制出《羊衍海反戈声明》及录音广为传播。

10 月 9 日，重庆大学“815”在校内风雨操场举行死于武斗的“段亚伟等十三位烈士追悼大会”。有死者父母到会发言，称他们失去了儿子内心非常悲痛，但是又很骄傲，因为儿子是坚强的“815”战士，是毛主席忠实的红卫兵，用实际行动实现了“头可断，血可流，毛泽东思想不可丢”的钢铁誓言。

10 月 20 日，市革筹召开大联合动员大会，两派代表共 2800 人参加。中央调查组在会上宣读了毛泽东视察大江南北讲话。

10 月 23 日，成都军区司令员梁兴初来到重庆。

10 月 25 日，代号总字 412 部队的解放军重庆通信兵工程学院干部、412 部队“红旗造反团”驻“反到底”派六大司令部的代表赵安京，对“反到底”的李木森、黄廉等人说：他们通信兵工程学院的领导干部要到北京参加学习班，要谈到重庆的文革问题，但他们对地方文革情况并不是很了解，因此想请“反到底”派的六大司令部去讲讲山城两大派文革中的一些重大问题。

于是，10 月 27 日一早，“反到底”六大司令部的李木森、黄廉、胡宾、朱镇坤、段炳森、粟远奎、王以时、刘开科等人，在赵安京带领下，来到位于解放前国民党主席林森的公馆、歌乐山林园的解放军 412 部队。

在学院的大会议室里，即将去北京参加学习班的学院院长、副院长等领导干部已经在这里等候着。“反到底”的几个负责人，

分别向他们介绍了重庆文革中的一些情况。

下午 15 时左右，他们又在学院一个大坝子里召开大会，通知了全体学员参加，“反到底”的几个头头分别讲了话。

晚上会餐过后，学院大操场举行文艺演出，由“反到底”的“工总司财贸井冈山总部”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演出。这个宣传队，是在原财贸职工业余文工团的基础上成立起来的。来看演出的人很多，不但有本学院的干部、学员，还有附近一所中学的学生和学院周围的农民。

当演出歌颂毛泽东主席的节目时，秩序还好。当演到表现“反到底”派在“二月镇反”中遭到镇压的情景时，就开始出现骚乱。观众中的“815”派人员开始谩骂，起哄，甚至拿石块、砖头扔向演员，有的砖头还砸到了观众席前排学院领导干部和“反到底”几个人坐的地方，引起了骚乱和纠纷。学院勤务连出动了一些战士来维持秩序，但却难以制止事态的发展。“815”派与学院勤务连早有矛盾，吵闹得更加厉害，石块、砖头扔得越来越密集，变成了一阵乱石雨，演员和乐队都有人被砸伤，乐器也有的被砸坏了……场外还有人高喊：“揪出‘砸派’大头头！”

演出已无法进行。黄廉对通信学院的院长说：“干脆结束演出算了。”

演出中断，学院首长指示勤务连夹道护送“反到底”的几个头头到他们的营房暂避。

勤务连营房离操场不远，有一个大门，里边是一个比篮球场

大得多的院子，穿过院子，就是一长排平房。李木森、黄廉等人进到院里，看见一些战士拿着枪，有的手中没有枪，只拿着锄把或木棒。原来他们的枪，在武斗期间被学院的“815”派抢去了一半，《九五命令》后，“815”派把武器封存起来，还没有归还给他们。

他们刚进屋，就听见外面大喇叭广播说，勤务连抓了革命群众，紧急呼吁“815”派的某某组织快到勤务连营救革命战友……

“反到底”的头头们意识到，这一定是“815”想冲击营房来抓他们几个人。

很快，大门外传来了喧嚣的吵闹声。他们得到通知：关上门窗，注意安全。

黄廉正在与警卫连指导员摆龙门阵，外面的战士来报告，对立面的人带枪冲击警卫连。连长和指导员说：“一定要把他们阻挡住。”

马上又有报告说，突破了第一道岗哨，到了第二道岗哨。

黄廉对指导员说：“我还是离开比较好。”

指导员不同意，他说：“你一定要等一等，我们对你的安全负有责任，这个危险的当儿不能离开，出去有危险。”

接着就听见外面一个排长在那里高声宣布：“我们是执行勤务的，没有介入两派。”那个排长又念了三条纪律，没有起作用，外面越喊越凶，那个排长警告说：“解放军一定要执行《九五命令》，你们不能再继续冲击了。”然后就是朝天鸣枪警告，两声枪

响。

仍然没有效果。接着在屋里就听见密集的枪声，不是一支枪，而是群射，是十几支枪同时发出的。顿时，吵闹声一点都没有了，变得非常安静。

可是，这安静的气氛没有维持两分钟，吵闹声又爆发了，而且比此前闹得更凶了。

接着，又是一阵短促的射击声……

第二次射击声过后，周围完全安静下来了。一点吵闹声都没有了。

过了几分钟，有人在门外通知，叫全体开门出来，撤退上山。

人们把门打开，顺着房门外的台阶，从后面下山。经过一个坝子时，看到一片人倒在血泊里，有的人手上还拿着武器，男女都有，全都是穿军装的，倒在地上还有人喊口号要与“麻联总血战到底”。最前边的，离警卫连的这排平房不到 4 米远……

后山没有路，黄廉他们是从灌木丛中间蹭下山的，最后经过一片农田，听见 “815”的广播在喊：“‘反到底’的头头到 412 挑起武斗，现在打死我解放军和革命群众 50 余人！反军决无好下场！”

这个时候已经夜深了，他们走到小龙坎的时候，学院领导派了一个中吉普赶上来送他们，这时看到约有 10 辆左右的 54 军汽车全副武装往这边开过来。

黄廉回到体育馆，看到六大司令部的勤务员全在，也有一些避难的干部坐在那里，听到满城都是“815”的广播，他们都吓坏了。一见黄廉回来，赶紧问他是怎么回事？黄廉介绍了他所经历的情况。随后，“反到底”的广播也打开了，只是几条标语口号式的表态：

“坚决支持412警卫连履行自己的神圣职责！”

“向解放军开枪有罪，解放军自卫开枪有理！”

“决不容许冲击解放军的营地！”

黄廉当天晚上打电话向张国华报告。张国华问黄廉：“是请你去，还是你自己要去的？”

黄廉如实相告。

接着，黄廉又打电话告诉54军白斌副军长，白斌说：“知道了，你不应该去，我们找警卫连不找你。”

第二次黄廉再打电话找白斌，他说：“不谈了，解放军有自己的规矩。”

李木森这队人在黑暗中走错路，掉队了，与前边的人失去了联系。

战士们商议着该怎么办，有的说退回去肯定不行，勤务连的枪有一半还在“815”的人手中，回去肯定要遭枪打；有的说干脆把手中的几支枪埋在山上，只保留几根锄把、木棒作自卫武器，翻山下去找兄弟部队……

议论纷纷中，有战士提出要李木森这个“首长”作指示，李

木森虽然也只有二十几岁，但毕竟是“反到底”的头头，在这样的时候也就不客气了，对他们的议论作了总结性的发言：第一，不能回去，要继续翻山，尽快与山下的 7836 部队联络上；第二，枪是战士的命根子，不能埋在山上，要带下山去。下山后立即与 54 军军部取得联系。

于是，他们又一起翻山越岭，翻上这座山，又下那座山，有时是走，有时是滚，或者说是连滚带爬，狼狈不堪。在黑夜里，在没有路的大山里，从头天晚上 10 点多钟，走到第二天天亮，大约翻遍了整个歌乐山，总算到了二钢的石井坡铁路货场。然后又沿着公路走，到了 7836 部队----54 军的一个团。到了部队，大家都知道安全了。两派不管怎么打，都不会贸然进攻部队的。他们在这里吃了早饭，电话联系了 54 军军部，军部叫大家休息等待。

上午 10 时 30 分左右，54 军派来军用卡车一部、军用吉普车一部，卡车把那些战士送到军部去了，吉普车则把李木森送回到体育馆“反到底”总部。

在“421”惨案中，有 32 名通信兵学院的人和附近群众被打死，53 人受伤。当时传言，死者中有叶剑英的孙女儿。“反到底”派头头们吓坏了。

下午，“反到底”六大司令部开会研究了事件发生后的对策。针对“815”派在大造舆论，说这一事件是“反到底”派的阴谋，是对革命小将的“反革命大屠杀”，他们也商定了一些大标语内

容，基本上还是那些：

“坚决支持 412 部队勤务连执行《九五命令》！”

“向解放军开枪射击有罪，解放军自卫还击有理！”

“八一五冲击解放军营房罪该万死！”等等。

他们当时以为勤务连是 54 军派出的，所以还写了“54 军驻 412 部队勤务连镇反有功”之类标语。六大司令部的两位大秘书还迅速写出了《告全国人民书》，上报党中央，并以大字报形式张贴到重庆的各区县。

黄廉在重庆呆了一天，他与“工总司”的人商量，是否应该出去回避一下？大家都同意。

于是，黄廉先发表一个声明，说自己到 412 部队去，是受到他们的邀请去作报告，有讲话录音为证，有 412 部队广大官兵学员为证，宣传队演出受到袭击，现场有几千人目击，“我们保留向成都军区、党中央汇报的权利；目前没有领导找我们谈，我们也不借机制造任何舆论，不管对方如何挑衅，我们都保持最大的克制，等待上级派人调查，我们相信解放军能够解决问题，相信军队主管部门和党中央的调查处理。”

3 天之后，“反到底”找到在东方红 36 号船上工作的武汉“钢工总”联络员陈兴明，他当天晚上给黄廉一家安排了一间一等仓。当时“造反军”管财务的手上也没有钱，大家凑了不足 100 元钱，黄廉和妻子女儿一起都去了武汉。

到武汉之后，黄廉找到武汉“工总”的朱鸿霞，他安排黄廉

一家住到青山，离市中心比较远。夏邦银听说黄廉来了，下班后赶到青山，请黄廉到一个小馆子吃了一顿。他告诉黄廉，重庆来武汉的军人不少，要他小心谨慎。武汉“913”的李想玉也让下边的人给黄廉送来 120 元钱，让黄廉打了一个收条，并说这些钱是不用还的。

过了几天，朱鸿霞又把黄廉一家安排住在武汉大学里，武汉军区政委刘丰也来见过他。

事后，梁兴初按中央军委指示，提出解决方案，警卫连连长、指导员被拘留审查，排级干部被隔离审查，全连被解除武装，集中整顿。

10 月 29 日，“共产主义战士张思德”的母亲刘光友就“1027”事件发表最最强烈抗议最最紧急声明，称此事件是“砸派黄廉等一小撮”制造的“反革命武装暴乱”，“不讨还这笔血债我死不瞑目！”

11 月 1 日，“815”派四川外语学院与西南农学院的“星火燎原战斗纵队”合办的《星火燎原》报发表“英雄母亲张妈妈”张思德母亲在北碚区“捍红总部”欢迎大会上的讲话。老人家是率南充“临联”拥军慰问团到重庆的。

1967 年 10 月上旬，在《解放军报》三楼，肖力，即李讷的办公室，肖力向总政治部“斗批筹备处”勤务组的办事组成员卢前安、魏建群、杜嘉等 7 人传达林彪“要彻底砸烂总政阎正殿”的指示。第二天，卢前安在总政礼堂召开总政人员的大会，传达

林彪的指示。在这前后，北京的大街上已贴遍了“打倒肖华”的大标语、大字报，总政治部主任肖华也被批斗、抄家，总政副主任也无一幸免，都戴上了“阎王”的帽子。正副部长们是“判官”，处长都是“牛头马面”，一般干部也成了“小鬼”。一时间，总政治部有 40 多名副部长以上干部被批斗，机关和直属单位有 767 名干部被立案审查，后来有 17 人致死。此时的总政治部被说成是“一筐烂梨”，总政机关已难于工作。

10 月 15 日，军委办事组给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并中央文革小组报告称：“根据总理和中央文革小组 1967 年 8 月 17 日指示，由吴（法宪）、叶（群）、邱（会作）、张（秀川）4 同志组成一个小组，由吴负责，任务主要负责驻京各机关、部队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工作，看着总政机关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不要出偏差。9 月 24 日，总理和中央文革小组又决定增加杨成武同志为办事组成员，并指定杨为组长，吴为副组长。10 月 4 日，我们研究了军委办事组如何进行工作的问题。认为，由于总政目前处于瘫痪状态，军委文革小组目前实际上也处于瘫痪状态，军委办事组是在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直接领导下，负责处理军队系统驻京机关、部队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方面的具体工作。各大军区、省军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工作，是在中央文革小组直接领导，军委办事组负责办理主席、林副主席、中央文革小组交办的一些有关具体工作。至于部队各项建设、战备工作、行政工作、干部工作等等，统由军委常委直接领导进行。提到办

事组来的这类问题，均呈送军委常委处理。”“军委办事组除设有几个联络员、几个秘书外，还有一个负责对‘516兵团’调查工作的调查组，和一个负责干部学习班具体工作的办公室。”“军委办事组是个临时性的，待政治工作组组成后，即将办事组的工作移交政工组负责，军委办事组即行撤销。”

报告中提到的“干部学习班”是指当时中央召集的那个由林彪主持，抽调各省军、政负责人到北京学习，用以解决各省的文革问题的干部学习班。

第二天，10月16日，周恩来在这份报告上批到：“提议在小组会议上讨论一次，再正式报告主席、林副主席。”

10月20日，康生批：“此事必须先请示林彪同志，在林彪同志同意后再正式上报主席。

10月27日，杨成武、吴法宪向林彪报告称：“关于军委办事组问题，向总理、伯达、康生、江青同志并中央文革小组写了一个报告，遵康生同志的指导先报您批示后，报主席批示。现将报告呈上，请阅批。”

林彪批示：“呈主席批示。”

毛泽东于10月28日批示：“刚成立又取消，恐怕不妥。”

10月29日，林办批：“林彪同志嘱：送总理、伯达、康生、江青、成武、春桥、文元、法宪同志阅，退杨成武同志。”

同日，周总理批示：“我仍建议，此事应先在中央文革扩大会上讨论一次。请伯达同于30日例会上提出。”

11 月，林彪指示在军委办事组下设立政工组、干部组，直接行使总政治部的职能。

## 第 921 回：内蒙古，成立□命委员会　五羊城，知□炸碎联合梦

内蒙古自滕海清随 69 军 28 师进驻呼市后，快刀斩乱麻，一举平息了混乱，稳定了局势。6 月 15 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出了《关于内蒙军区问题的通报》，明确指出：

“内蒙古军区少数领导人，在支左工作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特别严重的是中央做出关于处理内蒙问题的八条决定以后，黄厚，王良太等人阳奉阴违，煽动大批不明真相的群众和战士，顽固地抗拒中央的决定，这是极其严重的政治事件，是违反党纪军纪和国法的犯罪行为。”

6 月 17 日，在大西北戈壁深处，中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翌日，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新华广场，炎热的阳光下，红旗飞舞，人海簇拥，15 万群众隆重集会，热烈吹呼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同时，大会宣布：内蒙古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于即日成立，滕海清任筹备小组组长，吴涛任副组长，高锦明、权星垣、康修民以及郝广德、高树华、刘立堂、霍道余、杨万祥、王志有、周文章，那顺巴雅尔等造反派头头共 17 人为成员。

此时， 内蒙古各派造反组织正在逐步实现大联合。而原定内蒙古革委会筹备小组组长刘贤权，因忙于青海事务，抽不开身，中央便把内蒙古自治区七盟二市交给了滕海清。

滕海清奔走于各盟市之间，谈形势，讲任务，归纳起来就是三条：第一、要把对敌斗争搞好；第二、要把群众组织的大联合

搞好；第三、要把生产搞好。

10月17日，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戚本禹、杨成武、吴法宪、郑维山等人接见滕海清、高锦明。中央认为：内蒙成立革命委员会条件已经成熟，同意成立革命委员会，这不仅是内蒙的问题，也是全国的问题。全国对内蒙都很关心，内蒙成立革命委员会有很大影响，对修正主义也是个打击。

10月28日中午，康生打电话召来滕海清、高锦明和北京军区司令员郑维山。郑维山同滕海清一样，都是红四方面军出身，1955年授衔的中将。

在北京钓鱼台 8 号楼会客室里，康生开门见山地说："今天找你们来没有别的，就是叫你们看看这个。"说着，他把毛泽东和林彪圈阅同意内蒙古成立革命委员会的报告递给了滕海清。

滕海清接过报告，看到毛、林圈阅的笔迹，问道："就这样定了？"

康生答道："定了吧！"

还在前一天下午，康生曾把滕海清召到钓鱼台谈话。那时，毛泽东和林彪还没有批复内蒙古的报告，康生只谈了内蒙古的一般形势。滕海清的笔记本上记录着康生的重要指示，康生说："内蒙古的敌人是很多的。""你了解乌兰夫在内蒙古用的人就知道了。奎璧、吉雅泰是叛徒，权星垣、王再天、王逸伦是特务，王铎是走资派。"

康生提到的这些人都是内蒙古党委书记处的成员，有的已被

打倒，有的还在台上，而且准备作为革命领导干部的代表结合到革委会中去。

在 10 月 28 日中午，康生又说："内蒙古对乌兰夫的斗争很不够，系统地揭露很不够，乌兰夫很舒服，要从政治、思想、理论上把他搞臭。"

接着，康生结合前一阶段内蒙古的动荡局势说："要斩断背后操纵的黑手，提高警惕。内蒙古很复杂，有苏蒙二修、汉奸、日本人，傅作义的，乌兰夫的，复杂得很，这方面要提高警惕。"

滕海清把康生的一席话当作中央精神，再三领会，第二天就赶回了呼和浩特。

10月30日，回到呼市的滕海清、高锦明召集吴涛、权星恒、李树德等人开会，传达中央关于成立内蒙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的指示，中央同意内蒙古在11月1日召开自治区革委会成立大会。

11 月 1 日，深秋的塞北草木凋零。这天，内蒙古革委会召开盛大的成立大会。滕海清任内蒙古自治区革委会主任，吴涛、高锦明、霍道余任副主任，常委除以上 4 人外，还有谢振华、权星垣、杨永松、李树德、李质、张广有、郝广德、高树华、王金宝、王志友、刘立堂、杨万祥，那顺巴雅尔、李枫、周文孝，其中郝广德以下都是各造反派组织的头头。

当天，大会发出《给毛主席的致敬电》。至此，惊心动魄的内蒙古夺权运动， 终于取得了决定性的"伟大胜利"。

11月2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发社论：《红太阳

照亮了内蒙古草原》，祝贺内蒙古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的成立。

此时，大联合的风潮继续在南粤广州劲吹。10 月 21 日，广州海员工人两派实现大联合。这是广州地区首先实现大联合的行业。由广州地区水运系统两大派组织：广州地区“海员工人革委会”和广州“红旗海员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共同主持，在体育馆召开有万人参加的“庆祝广州海员工人革命大联合暨‘斗私批修’誓师大会”。两派组织达成了 7 项协议，并提出了明确要求：“对于海员工人内部存在的某些观点分歧，应本着求大同，存小异的原则，严于律己，宽于责人，多作自我批评。停止一切互相攻击、谩骂。”

广东省省长陈郁、广东省军区政委陈德出席大会并讲了话。总理联络员宣读了周恩来的贺电：“庆贺广州地区海员工人共同站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以‘斗私批修’为纲，实现革命的大联合。” 全场响起了长时间的、雷鸣般的掌声。

10 月 23 日，广州中医学院举行复课典礼。这是广州大专院校中，最早按班级实现大联合和复课闹革命的学校。

10 月 27 日，广州医学院也实现了大联合，并举行复课闹革命开学典礼。

10 月 20 日，广州市第二人民医院在卫生系统率先实现大联合，市中医院、药检所等单位也不甘后人，11 月 1 日，全市卫生系统实现大联合，成立了“广州地区卫生系统革命联合委员会”。

大联合之后就是三结合。从 1967 年 10 月开始,《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上海《文汇报》连续发表重要社论:《从教育着手解决干部问题》、《正确地执行毛主席的干部政策》、《要热情地支持革命的新干部》、《干部要到群众里面去》等，正在运动中沉浮的干部，如闻天语纶音。

10 月 30 日，广东省军管会召开扩大会议，讨论广州地区大联合问题。会议决定:“凡是各工厂、各学校、各部门、各企业单位在革命的原则下，按照系统、按照行业、按照班级实现了革命的大联合，开庆祝大会或开成立联合委员会大会的，我们应予支持；凡是跨行业、跨系统、跨地区的联合，我们要劝其不要这样做。若群众组织一定要搞这样的联合，并开庆祝大会，我们不派人参加大会。凡是一派的联合，我们也不派人参加。”

10月31日晚，周恩来接见广州“工交红旗”和“地总”代表，陪同接见的有戚本禹、吴法宪、黄永胜。

周恩来问：“工人联合的情况怎样？”

“地总”汇报了26日双方签订的六点协议。

周恩来说：“不坏嘛！”

代表们汇报了情况。周恩来反对搞层层平反，他说：“层层平反等于要帮他们发展组织，珠影‘东方红’我四月份就帮他们平反了，要他们回去搞革命比赛吗？你们工人先把局面稳定下来，现在最难的是铁路，等一下解决，现在是第二个年度了，无论如何工人阶级要联合起来，做个模范。”

汇报到斗私批修进行联合情况时，周恩来说："要破旧立新，把不合理的制度要打碎，要革命化。中南局除了那几个走资派和叛徒清楚了，省委除赵紫阳外还有哪些要批判、要打倒的，揭发出来没有？"

代表汇报区梦觉是叛徒时，周恩来问："有证据吧？她自己承认吗？"

周恩来询问上山下乡的知青情况，他说："上山下乡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红线，不是刘少奇的黑线。"

当谈到支农青年要造反时，周恩来说："'支农青年'四个字很好嘛！不支农回来造反，造谁的反？中央有个通知，你们要做他们的工作。"

11月1日，周恩来专门接见广州铁路分局两派代表。周恩来说："不能使铁路运输瘫痪，要服从大局，铁路要畅通，全国运输都在看广州，交易会马上就要开，铁路运输成为关键的关键。而目前分局两派之间还存在着原则的分歧，革委会在某些地方还难以行使权力。从全局出发，为了保证铁路运输的正常进行，实行军管，行政上由军管会统一指挥，这是符合国家和人民的利益的，对促进分局两大派的革命大联合，也是有好处的。"

当天，广州铁路分局两派签订了《关于维护广铁分局军管》和《关于实现广州铁路分局革命大联合的协议》，宣布"通过大批判首先实现双方组织的革命大联合，并逐步实现全分局的按行政部门的革命大联合"。11月29日，广铁分局正式实行军管。

11月2日，广州地区两派群众组织赴京代表团，在北京正式签署《关于“拥军爱民”、“制止武斗”、“抓革命，促生产”、“开展革命大批判，实现革命大联合”的协议书》。

广州，各群众组织照例集会游行，争相表态，大联合高唱入云，工人复工，学生复课，社会逐步恢复正常，似乎成了大势所趋，一切似乎要重上正轨，表面看来，文革已经临近尾声。据广东省军管会统计，广州地区届时已有 350 多个单位实现了大联合，有三分之一的大专院校复课闹革命。有 160 多个工厂实现了大联合。其中较大的、有影响的工厂，除广州重型机器厂和柴油机厂这两个厂子，都已实现了大联合。在驻有军队宣传员的 62 个工厂中，有 47 个实现了大联合。而大专院校实现了大联合并复课闹革命的有 4 所，其中搞得较好的有广医、中医；不大巩固的有美院、教育学院；未实现大联合，但在一块复课的有华工、中南林； 此外，还有些学校全校虽未复课，但在部分班系联合复了课。

省军管会认为：“目前仍存在一些问题，干扰了斗争大方向。一是武斗增多；二是刮起了一股平反风；三是回到城市的两万多支农青年，有的受坏人利用，把斗争锋芒指向中央，指向周总理。”

在大联合进程中，“红旗”派的“支农青年”感到了被踢出局的危机。

“支农青年”是由“文革”前广州上山下乡、“文革”中陆

续返回广州的知识青年组成。他们参加“文革”的动机十分明确：控诉和反对“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对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残酷迫害，要求返回广州获得生活和工作”的权利。

在长达一年多的造反和武斗中，他们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和目标，真诚地“为了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不惜浴血奋战，流血牺牲。“支农青年”是广州武斗中最具战斗力，敢打敢拼命的武斗专业队伍。在此期间，其生活来源，大多靠“支农青年”的组织经费。为了避免继之而来的被重新赶回农村，他们不惜再战。

11月2日，大批“支农青年”包围了市一宫、“东风派”的“红半总”总部和劳动局。他们向市一宫投了两枚手榴弹，炸伤3人，其中两人送医院后死亡。他们又向劳动局投了两枚手榴弹。爆炸声震碎了广州市民的美梦，为大联合投下了浓浓的阴影。

11月3日凌晨1时30分，广州警司派了7个连队赶赴市一宫，在各主要路口设置了警械，阻止“支农青年”进攻市一宫。

11月4日，“红半总”、“主义兵”和“支农青年”、二十五中的“红旗”，在文德路麇集逾千，互相以石块攻击，人群忽而涌前，忽而退后，就像海峡中潮汐变化而产生汹涌波涛。据省军管会值班记录：“支农青年、二十五中红旗打了四个手榴弹，重伤红半总、主义兵共五名”。据省军区作战处报告：“市劳动局、二十五中红旗武斗，警司、省、市军管会去人不让进。他们组织向外突围冲击，警司王副参谋长、省军区一处长，带领三个连在

现场指挥，准备组织部队强行冲击，四周要口以卡守住，不许里面的人出去，也不准外面人进去。”

劳动局武斗还未平息，11月5日，中山大学又发生武斗。上午9时，“革造会”正在开会，中大“红旗”、“八.三一”、“八一战斗兵团”、“广州兵团”等组织七、八百人包围了他们，并冲击“革造会”的广播站，双方立即爆发冲突。省军区、院校组、警司和中央调查组的人，匆匆赶去制止武斗。中午11时，武斗结束，重伤11人，有的是被木棒石块打伤的，有的是被匕首刺伤的，也有的是拳打脚踢受伤的。

广州知青的武斗枪声，打破了广州“大联合”表面上的平静。

## 第 922 回：第六次，接见安徽代表团　揪□手，实现□命大联合

11月1日17时30分至20时5分，周恩来、陈伯达、康生、谢富治、江青、张春桥、戚本禹、姚文元、吴法宪、李天佑、叶群、曹轶欧等中央首长在人民大会堂安徽厅第六次接见安徽代表团。陪同接见的还有南京军区副司令员钱钧，省军管会主任李德生。

康生首先讲话，他说：

“安徽的问题，各个地区的代表在这里很久了，会议开了许多咯，今天是再一次讨论问题，结束这次会议。”

康生肯定了安徽形势几个月来有很大的进展，特别9月5日以后，安徽地区“基本上停止了武斗，一些地区实现了革命的大联合”。因此，安徽“形势大好。”

接着，康生在总结安徽经验时说：“毛主席1月21日的指示，严光、宋文同志并没有真正地执行，毛主席要支左，他们是保右，”“就是说像他们自己检讨那样，假支持，真保右。”

康生认为，安徽有些人反对《九条》，不满意《九条》，主要就是在夺权的问题上。“一派夺权，排斥另一派、甚至镇压另一派夺权，这是不对的。”

他说：“‘一二六’省军区支持夺权是假的。现在他们自己承认，实际上保李葆华。你们看1月23日他们还在保李葆华，1月26日怎能支持你们呢？所以中央考虑到这个问题，实行军管，没有批准‘一二六’夺权。‘一二六’夺权虽然有广大革命群众

要求，但政策、方向不符合毛主席关于革命群众组织实行大联合夺权的方针。”

康生强调：“派12军去安徽支左，这是毛主席、林副主席、中央、中央文革对安徽文化大革命的极大的关怀。”“有人反对12军，污蔑12军是‘陶二世’派去的。‘陶二世’，这是对我的，这是安徽反革命给我安的帽子，这完全是污蔑，是极大的反革命污蔑！12军是毛主席、林副主席派去的。”

康生赞扬了10月10日安徽省七地区赴京汇报代表团在北京达成《安徽省七地区关于制止武斗，抓革命、促生产，拥军爱民等问题的协议》。他说：“中央将有个批示，赞成你们的协议。”

对安徽军管会的改组，康生说：“有人利用军管会改组反《九条》，说《九条》中第一条是，成立以钱钧同志为首的军事管制委员会，现在不要钱钧，这是你们自己推翻了《九条》。’这完全是胡说，　”

这时，周恩来让钱钧和李德生到主席台就座。

康生继续说：“当时为什么要成立军管会呢？就是中央没有批准夺权，成立军管会就是不承认合肥的那个夺权，实际上就是省的夺权。为什么呢？因为条件不够，这样才成立军管会的。这是一。第二，为什么叫南京军区钱钧同志去主持军管会，这就是严光、宋文不能主持，因为他们有错误，不能主持。如果说他们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就用不着南京军区派人去主持了，正因为他们还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还对抗着，还保李葆华，所以才叫

钱钧同志主持。现在军管会为什么改组？改组，说明严光、宋文不能参加军管会，所以新改组的军管会就没有他们。第三，现在已经有了能够正确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解放军12军在那里，12军在那里就由12军统一领导，就不用南京军区再派人去了。我们信任、依靠12军去领导，信任、依靠李德生同志和其他同志能够领导。军管会是这样改组的，不是钱钧同志犯了严重错误，更不能说这就是推翻《九条》，而是为更好地贯彻实行《九条》。”

康生提到“在二、三月间，严光、宋文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时，在省军区打击了一大批干部，二、三百名干部。甚至于有的被开除了党籍，有的禁闭起来，有的流放，有的迫使他们退伍，所有这些问题我们都要一律平反。”

康生最后讲到“安徽到现在为什么还实行军管，不能成立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更不能成立革命委员会”的问题，他说：

一是没有各派的大联合，“没有革命的大联合，怎样选举代表参加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呢？”

第二、“就是有些可以解放的干部现在还没有解放。是哪些人？你们自己在斗争中检验。‘三结合’总是要有革命的群众、解放军、革命的干部，现在还没有成熟的对象，所以现在还要军管，在军管中去筹备实现筹备小组，革命委员会。”

他特别说到：“今天内蒙古成立了革命委员会，青海不但成立了革命委员会，而且在基层也成立了革命委员会，恢复了党的组织生活，开始接收新党员。”

在全场高呼“向康老学习！向康老致敬！”的口号时，康生说：

“不要向我学习了，现在还到处要打倒我。说我是‘陶铸和袁世凯的杂交’。当然，正确的批评是需要的，但是像这种反革命的造谣，这不是一个人的问题。这是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问题。现在请陈伯达同志、中央文革小组的组长给我们指示。”

陈伯达说：“我很敬佩康老在安徽问题上经过这么长时期的耐心的工作。已经有多久了？”

有人插话：“差三天，三个月了。”

康生：“87天了。”

陈伯达：“这样耐心地工作我是很敬佩的！我拥护康老同志今天的讲话。”

接着，江青讲话。她说：

“向同志们致敬！向同志们学习！上次是康老拉我来的，今天是我们全体决定要来， 因为听说同志们要回去了。我没有准备讲话，康老这一下将了我的军。不过在安徽有人想挑拨康老和我的关系，这一点希望同志们要警惕。你们知道不知道，说我那个 9 月 5 号讲话就是为了批评康老。你说怪不怪！9 月 5 号是康老要我来的，怎么得出这样结论来哩！”

康生：“那是我们商量的嘛！”

众人呼口号。

江青说："上次因为我点了一派的名，康老点了一派，这就成了我们的岔子了。其实我们是一致的，我还少说了哩！不占同志们的时间了，讲废话。祝同志们回去搞好革命的大联合、革命的'三结合'，搞好大批判，搞好本单位的斗批改，以'斗私批修'为纲，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众人鼓掌，呼口号。

陈伯达："我补充一句，有一些人想把总理与中央文革，和中央一些同志分开，这是完全错误的，这是不会成功的，也一定要失败的，一定没有好下场的！"

众人呼口号。

陈伯达："大家知道，制定安徽的《九条》是总理亲自主持的，这次会议总理非常关心，实际上他也参加了处理安徽问题。刚才我忘记说了。"

康生："《九条》《五条》是总理亲自主持写的。"

陈伯达："那些人如果这样搞一定要失败，一定没有好下场。"

康生："下边请周总理讲话。"

众人呼口号："向周总理学习！向周总理致敬！"等。

周恩来说："同志们，向你们学习，向你们致敬！这次因为各省来的多，我们有个分工，所以安徽的会议我就很少参加了。开始见了一些军队同志。

这次会议，我们应该说，在康老主持下，许多同志参加了，开的很好，总算是一个走向进一步胜利的会议。刚才康老的讲话，

我完全同意、支持。”

众人鼓掌。

周恩来：“伯达同志讲话，江青同志讲话，我是完全同意和支持的。”

众人鼓掌。

周恩来：“大家都晓得，这次会议是由于《九条》至今不能贯彻，发生了阻碍，你们才到北京来的。而且，《九条》的问题又由于支左的问题引起的。支左嘛，刚才康老讲得很清楚，是主席亲自批准安徽省军区要他们派队伍支持左派群众大会，而当时严光同志就是像现在揭发的，向相反的方面走，现在才知道更清楚。《九条》决定也是在主席亲自批示的《五条》方针下希望大家贯彻执行而做出的。夺权问题，刚才康老讲得很清楚，张春桥同志这次专门讲了这个问题，我们都是同意的，因为这样才成立军管会。当时安徽军区严光已经不能起领导作用，所以和南京军区商量，请钱钧同志来担任军管会主任。执行过程中遇到阻碍，有来自军管会的，有来自各方面，这样你们到北京来，来解决安徽问题。到北京来，正好毛主席指示要在革命原则基础上实现革命的大联合。”

周恩来说：“中央文革是毛主席司令部重要的组成部分。它的责任我已经说过，是起到过去的中央书记处而且超过中央书记处的职权。”

他再次提到调 12 军到安徽“是我们最高统帅、副统帅决定

的”的，并且说：“运动到了这个阶段，工人阶级是主力军，学生虽然起了突击队的作用，现在拿学生的派性强加于工人阶级，那工人阶级就不能接受了。所以，在这点上，我们希望你们其他的地方，大联合要以工人运动为主，先从工人阶级联合做起，”“学生不去干扰厂矿工人的工作，因为他们已经组织起来，自己教育自己嘛。这样学生会受到教育。现在学生应当结合工农，首先是工人。”

周恩来说：“运动的规律总是有些曲折的。为什么，就是江青同志所说的三个方面，在后头挑拨的黑手还没有完全揭发出来。9 月 5 号江青同志点了一下，还没有点够。”

江青插话：“总理，今天还有些我没有说，我插两句。他们现在贴总理的大字报，说总理是‘陶铸式人物’，‘联动’的后台。这种事情，我想说文化大革命已经一年半了，革命群众、革命小将是很容易识别的。现在有人想把水搅混。我们是经常和总理一块办公的。刚才伯达同志的讲话是讲了我们的真正情况。谁要是这样干，我看他没有好下场。”

众人呼口号。

江青：“另外涉及到我个人，我觉得也无所谓的，可是这个问题也可以讲一下。就是说我是‘老几’，‘连中央委员都不是，还有资格点刘秀山、程明远的名。’我觉得这很奇怪。我是一个普通的共产党员，但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我是个革命者，我为什么不可以点刘秀山？反革命刘秀山！”

众人呼口号。

江青："在座的小将们，有的还不是共产党员哩，但是他就有这样的英雄的胆量，打倒刘邓陶，打倒李葆华，为什么就不能打倒刘秀山？刘秀山是国民党特务，反革命！还有一个陈登科，那……"

江青的话被口号声打断。

江青："我什么时候也要向反革命作斗争的。我不一定要成为中央委员，我就是个普通党员，这一点我要说清楚，我不是中央委员，我们小组很多同志不是中央委员，我们就是要革命，就是要跟着毛主席闹革命！"

众人呼口号。

江青："红卫兵小将千万不要上他们的当。这样一说，你们和我们一样，我们什么都不是，但我们要跟着毛主席闹革命！刘、邓、陶什么都是，又是中央委员，又是常委，可就是反革命，我们就是要打倒他们！同志们，反革命要不要反？"

众答："要！"并高呼口号："坚决打倒刘、邓、陶！坚决保卫毛主席，保卫中央文革！向江青同志致敬！"等。

周恩来继续讲："在安徽，双方都支持江青同志的讲话，但总有逆流，在挑拨破坏下，在背后刮黑风，这是少数。少数，靠什么人去揭发呢？就是靠群众，靠你们。""刚才康生、伯达、江青同志说了，为什么'九五'以后双方都联合起来，并肩战斗，还出现流言蜚语呢？就是因为你们队伍里头有些人糊里糊涂，受

走资派挑拨，被坏人钻空子，同时脑子里的社会思潮反映，还有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作怪，所以听得进去，不然怎么能够接受流言蜚语。”“《九条》、《五条》发表以后，我批评过群众准备开群众大会来斗争严光同志，我们说还是背靠背的揭发，可以揭发，可以写大字报小字报送去，因为那个时候不到这么个条件嘛！他还是军管会副主任，因为群众大会一批，当然不可能继续工作了。现在情况不同，现在眼光来看前进了嘛！比如刘、邓、陶几个反革命，去年国庆节让他上天安门，今年不能让他上，历来的发展不仅把他们三反罪行揭发出来，而且还把他们的历史揭发出来了。运动发展总是这样，按照这个规律发展，特别江青同志最后讲的一段，那就更加重要。这个运动就是革命与反革命的分裂。党中央、中央委员也是一分为二。不仅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中央常委也是一分为二嘛！刘、邓、陶就是中央常委嘛！难道让他们有发言权？让他们来保护刘秀山、程明远？保护李葆华？还保护什么等等。”

陈伯达插话：“刚才江青同志讲的一段话，总理同志也讲了这段话，我顺便插两句。现在有一个反动口号，就是‘你算老几？’这是个反动口号，反革命的口号！”

江青：“陶铸就自封他是‘老四’，我们不封是‘老几’，我们是普通的共产党员，要紧跟毛主席干革命！”

周恩来：“这次运动从中央分化起，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走资派，坚持反动路线、坚持不改、顽固到底的，这是极少数的。

但从全国看起来党中央一分为二，各地一分为二，领导机关也一分为二，有的数量比较不少的。”

“毛主席提倡的把自己组织里头的坏头头、黑手揭发出来。你们勇于揭发，这是共产主义风格，是响应毛主席的号召，所以把自己组织里头的黑手、坏头头揪出来了，对方自己也一样揪。这样才能自我批评，达到团结——批评——团结，不是专门找对方的岔子。看毛主席司令部的人是不是跟毛主席跟得很紧。拿我说，我说哪个话不符合毛主席的思想，当面给我提也好，你善意的讲，写信，写大字报也好，是欢迎的。恶意的攻击、破坏就不能允许，因为这是对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核心问题、领导问题，不是哪一个人的问题。破坏毛主席无产阶级司令部，破坏领导威信，这就不能允许的了。”

“关于解放军。安徽没有野战军，野战军不像地方军区。军区、军分区、人武部和地方关系久了，跟走资派结合太久了，也是一分为二，总是有些人和地方走资派关系太密切了。像严光、宋文两位同志不管在李葆华的时候，过去在曾希圣的时候，和地方关系搞的久，和走资派关系太密切了，他就要犯严重错误，一直坚持反动路线，一直到《九条》以后还没有改，这次要彻底批判，并且改组军管会，改组军区，这是需要的。那么，你不能要求上一次马上就这样做，要经过一个步骤。”

关于夺权问题，周恩来说：“张春桥同志讲了。过去夺权条件不成熟，所以没有批准，因此军管。但是，最后军管会的任务

还是要过渡到革命的大联合，促进革命的‘三结合’嘛。”“淮南煤矿已经树立了旗帜。你们已经达成七条协议，刚才伯达同志已经庆贺你们了，中央批准你们，希望按你们自己达成的七条协议，你们亲自在上面签字的，要认真地去保证执行。”

康生最后说，代表们在北京住的时间长了，和群众隔离了。所以应该马上回去。他还提议，安徽的报纸应该完全恢复起来。

他特别提到当时“有各种反革命的宣传，说：‘陈伯达是穷秀才，一辈子还是穷秀才’、‘江青算老几’、‘康生是个老特务’，”“他们千方百计挑拨，首先挑拨总理同文革小组的关系。带着显微镜到处找‘裂痕’，然后造谣说：文革小组分几派。”

江青说：“他们还敢于伪造林副主席给陈伯达同志的信件。”

周恩来：“伪造信件是犯罪的。”

康生：“犯罪！”

叶群：“林副主席没有给伯达同志写过那样信，伯达同志也没有给林副主席写过那样信，完全是无中生有，反革命造谣。”

康生：“这一点，同志们应该警惕起来。特别是芜湖的同志应该警惕起来，国民党在那发传单，革命群众组织的矛头，应对准谁？”“应当说有些组织敌情观念不高，警惕性不高，派性大发作，敌人钻空子。安徽各派当中都有黑手在后头，也有个别地方都有敌人钻进去的，如果你们不提高警惕，你们会犯错误，会受敌人利用。这一点，特别是芜湖，蚌埠、安庆一些地方要特别引起警惕的。”“淮南个别地方还有这样反革命标语，叫‘刘少奇

亿岁！’不是‘万岁’，是‘亿岁’！”

## 第 923 回：□爱晶，带枪来到大会堂　谈“整党”，杨成武发表文章

11 月 1 日晚上接见安徽代表团时，还发生了一件事情。

当天，在北京大专院校红代会核心组工作的北航“红旗”侯玉山，接到晚上在人民大会堂安徽厅参加中央首长接见的通知。侯玉山问北航“红旗”负责人韩爱晶是否也去。韩爱晶说他也去。于是，约定由韩爱晶从北航要个车，两人一起走。

晚饭后，侯玉山来到北航主楼办公室，韩爱晶已经在那里等他。临出发时，韩爱晶突然问侯玉山：“要不要把枪带上？”

侯玉山很诧异，说：“去大会堂，怎么能带枪？”

韩爱晶说：“不是。学院路南口这几天晚上总出事，那儿很荒凉，经常有坏人出没。”

原来前几天，中央文革的一个联络员骑摩托车经过那里时，遭到了歹徒拦截。

侯玉山说：“有坏人也不怕，咱们在车上，他还能有小车快？我不带！”

于是两人一起下楼上了车。

到了人民大会堂南门，他们下了车，往南门走去。走了几步，韩爱晶拉住侯玉山停了下来，说：“我把手枪带来了，你看放哪儿好？”

侯玉山很吃惊。他想了一下说：“只能放到车上了。”

韩爱晶说：“放车上不保险。”

侯玉山说："那就交给司机，让他保管吧。"

韩爱晶说："司机可靠吗？咱们也没审查过。"

是啊，枪支怎么能随便交给别人呢？但是怎么办呢？侯玉山说："小车班的司机经常给我们开车，应该没事吧。要不，又能怎么办呢？"

韩爱晶没再说话。他朝大会堂南门望了望，说："交给解放军吧，让他们保管一下。"

是啊，这是最可靠的办法。侯玉山附和说："好吧。"

他们走上大会堂南门前的阶梯。韩爱晶紧走一步，朝南门东侧站岗的两位解放军战士走去，然后拿出那把 54 式手枪，对一位战士说："我叫韩爱晶，这把枪先交给您。等开完会我回来，您再还给我，好吗？"

那位战士接过枪，没有说话，看了看，转身进了警卫室。

不一会儿，战士出来对他们二人说："先进来吧，在里边等一下。"

韩爱晶和侯玉山进到大门里边，在靠警卫室一边的过道上等着。

过一会儿，出来一人，没穿军装。他走进警卫室，接过战士递过来的手枪看了看，又笑着对韩爱晶和侯玉山点点头，让他们进去开会了。

安徽厅几乎已坐满了人。韩爱晶和侯玉山在后排找了两个座位坐下后，韩爱晶对侯玉山说，他去找一下蒯大富，就走了。

一会儿，主要领导陆续来到主席台就座。但时间不长，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谢富治等人又离开座位出去了。

大约过了十多分钟，北京市革委会办公室负责人刘丰来到侯玉山跟前对他说，首长有事情让侯玉山去一下。

侯玉山跟着刘丰来到会场后面的休息室，只见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谢富治等人都在里面，看见侯玉山进来，都没有说话。

侯玉山强迫自己镇静，跟着刘丰往里走。刘丰指着旁边空着的一个三人沙发，让侯玉山坐了下来，自己就站在他旁边。

侯玉山看到首长们在轻轻地交谈。过了几分钟，刘丰又把侯玉山带回到会场，坐在原来的座位上。这时，侯玉山已经感到，肯定是与韩爱晶带枪有关。

一会儿，周恩来一行又回到主席台上，会议正式开始。

其间，韩爱晶又回了到侯玉山的身边,对侯玉山说："会议我不能参加了。谢副总理让我写检查。你做好记录，回来好传达。"

侯玉山说："放心吧，肯定会好好记的。"

韩爱晶说完就离开了。

会后第二天，社会上迅速传出了"韩爱晶带枪进大会堂"的传言。而在北京红代会，有人悄悄指着侯玉山说："江青说，他不像一个学生，像是一个商人。"

这就是当时流传甚广的"韩爱晶带枪进大会堂"的故事。

11 月 3 日，《人民日报》发表《关于教育革命的几个初步方

案》。这个方案，反映了同济大学、北京林学院和北京师范大学教学与教改的设想和做法。

11月3日，《人民日报》在第二版发表署名杨成武的文章：《大树特树伟大统帅毛主席的绝对权威，大树特树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彻底清算罗瑞卿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的滔天罪行》

这篇文章从成稿到发表以至于后来，也是一波三折……

1967年7月，总参谋部政治部根据吴法宪、叶群、邱会作、张秀川组成的军委四人小组布置的写作任务，起草了一篇谈领袖权威的文章。文章经总参谋部党委先后讨论了三次。定稿后，打印送给正在外地的总参党委书记杨成武。

当时这篇文章的署名是：总参谋部无产阶级革命派。

杨成武在旅途中翻看了这篇文章，到上海时还没有看完。他想，这篇文章，应该送给毛泽东看一看，毛泽东就在身边嘛！于是，在文章题目的空白处，写了两行字：

主席：

这是总参无产阶级革命派写的一篇文章，请您暇时一阅。

一天吃过晚饭，杨成武正和工作人员聊天，看见毛泽东做保健工作的吴旭君护士长从楼上下来，手里拿了一沓纸，递给杨成武说：“主席让给你的。”

杨成武接过一看，正是那篇文章，上边有毛泽东用粗笔做的批示：“我不看了，送伯达、文元同志酌处。”

等杨成武走后，吴旭君护士长和工作人员说：“主席随便翻了翻，说：‘尽是吹我的。’”

文章随后送到北京，交到了陈伯达和姚文元手里。

9月23日，杨成武陪毛泽东从上海回到北京。第二天陈伯达打来电话说：“杨代总长，我是陈伯达。大树特树绝对权威的文章我看过了，也做了一点小小的修改。可以发表，我看可以用你的名义发表。”

杨成武说：“这恐怕不合适，文章是别人写的，怎么能用我的名义发表？”

陈伯达说：“用你的名义发表署名文章，比‘无产阶级革命派’要有力量。”

杨成武说：“伯达同志，你不是修改过这篇文章吗？那就用你的名字发表嘛。”

“那可不一样，你是代总参谋长，用你的名字发表代表军队。”

杨成武说：“那就用总参谋部或者军委的名义发表嘛！”

陈伯达只好说：“再研究研究吧！再研究研究。”

电话挂了。

叶群又打来电话。按照以往的习惯，她先在电话里东拉西扯问候一番，然后说：

“101让我给你打个电话，说说那篇文章的事。”

“哪篇文章？”

“你们总参写的那篇绝对权威的文章，陈伯达同志已经改过了，他送到我们这里来了。”

“他给我打过电话。”杨成武说。

叶群停顿了一下，像是找什么东西，然后说：“我们的意见，还是以你的名义发表为好。”

“谁的意见？”杨成武问。

“101的意见。”叶群说。

“文章林总看了没有？”

叶群没有正面回答，而是说：“党的组织有权用一个党员的名字发表文章。”

“不是我写的，用我的名字发表，这总不大合适。”

“我说，党的历史上这种情况可多啦。101 讲，在延安时，西北高干会议的政治工作报告，不是用谭政的名义发表的吗！浙江农村调查的文章，是毛主席亲自修改过的，不是用江华的名义发表了吗！还有毛主席关于国际问题的一篇谈话内容，不是用陆定一的名义发表的吗！”

杨成武听她说得头头是道，就说：“我总觉得，文章不是我弄的，我对理论是外行，用我的名义发表不好。”

“定了。101讲，就这样定了。”叶群说。

杨成武让秘书通知起草文章的几个人和政治部门的负责人，到办公室来研究此事。

他说：“文章不是我写的，林总一定要以我的名字发表。你

们这些同志都是秀才，要好好把关。里面引用了不少马克思、列宁的话，要好好核对一下，不能搞错了，引文要准确。”

文章核对了引文后，送给了陈伯达和姚文元。

1967 年 11 月 3 日，这篇“大树特树”的文章，就这样见报了。

11 月 5 日，毛泽东同康生、杨成武谈话，说到《人民日报》11 月 3 日发表的由杨成武署名的这篇文章。毛泽东对杨成武说：“以你的名字发表的那篇文章，我只看了标题，没有看内容。从标题看，就是错误的，是形而上学的。这是陈伯达的事，不是你的事。”

毛泽东沉思良久，又说：“这不是哪个人的事，是关系到全党学习的问题。全党都要学习马列主义。”

康生、杨成武将毛泽东的批评意见向出席中央文革碰头会的人员作了传达。杨成武做了自我批评。他说：“文章虽然不是我写的，我没有看出文章的内容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作为党的高级干部，应该具有较高的马列主义理论水平。我埋头在工作中，对这样重大的理论问题了解太少，我应该做自我批评……”

11 月 5 日这天，毛泽东找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谈“九大”和整党问题，他说：“今天还是谈九大和整党问题。”

“关于九大问题，第一批反映已经来了，可否综合一下，通报各地，继续征求意见。各地对整党有什么意见，也要继续收集。打了一年多仗，搞出了不少坏人。现在要打出一个党来。当然，

坏人还是搞不干净，一次搞干净是不可能的。整党不可能在九大以前统统整好。九大以后，根据新的党纲、党章，继续整党、建党。过去，一是听话，一是生产好，有这两个条件就可以入党。听话要看听什么话，做驯服工具不行。一个支部书记说了就算，什么事情都不同大家研究，不商量，不向大家征求意见。支部作决议是要征求党员意见的，一次不够，再征求，要让党员讲意见，征求一次不够再征求。但是过去有很多地方不是这样，是个死党，一塘死水。”

“过去青年人入团可困难啦，比入党更困难。党团组织被一些人把持着。老党员把持党支部，老团员把持团支部。支部书记就像个皇帝。沙石峪大队党支部书记就是这样，他把持全大队的党、政、财大权，搞贪污，两个孩子都上了大学。只有沙石峪是这样？我就不信。”

“有些党员官大了，架子就大了，不讲民主，不跟下级商量，遇事不先征求人家意见，自己说一通，喜欢训人。陈老总就喜欢拿自己多少年的经验包括反对我的经验，去训人。”

他又说：“党员要朝气蓬勃的。死气沉沉的，暮气沉沉的，就不要加入这个党。革命的党死气沉沉怎么行？其实，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整党、整团、整军，也是整工、青、妇、学。党、政、军、民、学都整了。”

“我赞成康生的意见，一个是叛徒、特务，一个是文化革命中表现很坏而又死不悔改的人，不能再参加党的组织生活，这就

很宽了。我们的党要吸收新血液。工人、贫农、红卫兵中的积极分子要吸收到党里来。旧血液中的二氧化碳太多，要清除掉。一个人有动脉、静脉，通过心脏进行血液循环，还要通过肺部进行呼吸，呼出二氧化碳，吸进新鲜氧气，这就是吐故纳新。一个无产阶级的党也要吐故纳新，才能朝气蓬勃。不清除废料，不吸收新鲜血液，党就没有朝气。”

“恢复组织生活，不要恢复老样子。有些党员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积极，一听要恢复组织生活，就神气起来了。我看这些人要检讨。他们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革命，对广大人民群众的革命运动不积极，什么理由？无非要做驯服工具。”

“接受新党员，要经过群众议一下。”

“党纲要修改。现在我在看《联共党史》，联共的党纲写得太长，我们的党纲不要写得太长，长了，看的人就很少。党纲写成一本书，工人怎么看？农民怎么看？我看知识分子也不行。我们的党纲，就是党章上开头的那个总纲。”

“组织纪律性还要有，但我们讲的是自觉的纪律。盲目服从，做驯服工具不行。组织纪律性要有条件：第一，这个纪律是自觉的；第二，是联系群众的；第三，是在正确的政治路线领导之下的。组织纪律是有条件的、相对的，无条件的不行。人民解放军的纪律最好。打锦州的时候，那么多苹果一个没动，这种纪律就是建立在自觉的为革命的基础之上的。”

“刘邓互相合作，八大决议不给大会主席团，也不征求我的

意见就通过了。刚通过，我就反对。63 年搞了个《十条》，才隔三个月，他们又开会搞《后十条》，也不征求我的意见，我也没到会。邓小平要批，请军委准备一篇文章。我的意见还要把他同刘少奇区别一下，怎样把刘邓拆开来。”

“废除级别问题，也要谈一谈。”

他要求拟出几条征询意见性的办法，在 11 月内发下去，以便 12 月把意见集中起来，再发一个指示。

根据毛泽东的要求，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先后发出《关于对征询召开九大的意见的通报》、《关于整顿、恢复、重建党的组织的意见和问题》和《关于进行修改党纲党章工作的通知》。

## 第 924 回：梁兴初，□庆接见反到底　在山城，参加“八一五”活动

我们再说说此时的重庆。

11 月 3 日下午 15 时，成都军区司令员、四川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副组长梁兴初在重庆警备区小礼堂第二次接见重庆“反到底”派代表 23 人。陪同他一起参加接见的人有：54 军军长韦统泰、54 军政委蓝亦农、54 军副军长白斌。

当西南师范学院外语系学生、西师“831 战斗纵队”李盛龙汇报为什么中央关于解决重庆问题的《红五条》不能贯彻时，梁兴初突然问他批斗任白戈的情况。梁兴初说：

“现在李井泉、廖志高都在成都的工厂、学校里斗。你们可以去要来斗嘛！党内走资派你们不斗就不好了。文化大革命就是要斗党内走资派及其同伙。要把独立王国、走资派批深、批透、批倒、批臭。叫他们永世不得翻身！对一个群众组织，就是要拿这个标准来衡量。不搞走资派，搞两派攻击，矛头对准造反派，对准解放军，就不好了。你们 9 月 6 号的《猛虎团战报》，还提打倒军内一小撮，把矛头对准谁呀？对准党内走资派还是对准军内走资派？战报是你们编的，《造反军战报》、《军工井冈山》《猛虎团战报》，都是有错误的。多了，不去念它了。这是有证据啦。任白戈斗争了多少次，自己的战报应该登啦。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应该登啦。是不是掌握了大方向？你们头头掌握没有？白纸黑字，好多群众都看到了。你们两派的报纸都看了，我

在成都，所有的战报、小报都看了。现在任白戈在哪里？”

蓝亦农：“在革筹组。”

梁兴初：“你们才斗了两、三次就够了？就批臭、批倒了？这是大方向。”

众人说：“改正嘛！”

梁兴初：“对准军内，对准市革筹，就不对了。市革筹在工作上有缺点、错误，作为革命造反派，应善意地提出批评。善意地提出建议改正嘛！一个新生制度，总是有缺点错误的。这一点，同志们要掌握，不掌握要犯大错误。要犯方向错误。主席在视察大江南北的重要指示中说，对红卫兵要进行教育，加强学习，要告诉革命造反派的头头和红卫兵小将们，现在正是他们有可能犯错误的时候。”

当汇报到有一个报告要把“反到底”的 5 个组织打成反革命时，梁兴初问：“哪 5 个组织？”

众答：“‘猛虎团’、‘红大刀’、‘金猴’、‘造反军一支队’、‘六月天兵’。”

梁兴初记下来后说：“‘猛虎团’是跨行业的，专门搞武斗的，还打到成都、合川、泸州去了。究竟是不是反革命组织，我不能这样说。但个别坏人是有的。也可能是走资派操纵的。但大多数群众是好的，拥护毛主席，拥护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现在看来，还不能说是反革命。但里面有坏人。不然为什么到处打？还跑到壁山抢军队的枪。我说你抢了赶快给我送回。我给他下命令，用

司令员、省革筹副组长的身份下命令，他赶快送回来了。他拿去也没有用，里面没有枪机。所以这些组织不能说它是反革命。但继续下去就可能变，任何革命组织都一样，你要走向反面，性质就变了。反到底派所有的群众组织，都是革命组织。中央承认你，《五条》承认你，我们承认你嘛！如果继续犯错误，性质就可能变罗，不是不可能变的。”

“所以对你们‘反到底’派所有的革命群众组织，我不能说是反动组织，‘猛虎团’也好，‘红大刀’也好，‘造反军一支队’也好，都不能说是反革命组织。但里面有个别坏人，就要整顿，清除出去。留下来就要影响你们的组织，破坏这个组织，要特别注意。

文化革命搞了一年多了，这是第二年了。要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现在不要再搞武斗了。武斗就不好了。不要再打枪了。你们打过了瘾没有？”

答：“群众都骂打枪的咯。”

梁兴初：“你们头头愿打，你们自己打嘛！同志，如果再要打，群众将来就对不起你了。死的都是阶级兄弟，破坏国家财产，不是大方向。如果没有打够，就看你们打嘛！我才不怕咯。现在群众不愿打了，战士不愿打了，你们也不愿打了。愿打的是少数坏人。走资派也希望我们打。打了他才高兴。不能再打了。希望你们这一派要做工作，‘815’派也要做工作。大家都坐下来斗私批修，批修必先斗私。不斗头脑里的私字，公字就树不起来。”

“刚才你们谈到有人想把你们打成反革命，我不相信，起码我不会。但是你们组织中，个别的坏人是有的。

我也到街上去看了你们的大字报，也看了‘815’的。晚上三、四点钟出去，看两个钟头回来。学生、工人上街了，我就走了。在成都，我天不亮就出去看批判专栏。现在的批判专栏，很多是转抄的，真正自己动脑筋自己写的很少。你们这里有大学生嘛，可以自己写嘛，你们不是写了《人民战争救山城》吗？”

重庆大学的徐光明说：“他们把我们打得起不了床，怎么写啊？”

梁兴初：“过去打，现在不打，可以写了嘛。你们这些头头，写他几篇嘛。这也是你们头头要带头的罗。不要抄、转人家的，都不用脑子。小学生也可以写。但要写一篇真正有分量的批判文章，就要大量材料，找很多依据啊。现在我们革命组织，就是坐不下来，开个大会，唱《造反有理》，请负责人作报告，然后游行一下，有劲得很。但是叫他按班级、部门、行业开小会，就坐不下来了。开大会要不要？要！但要少搞。重庆开大会成了风，那天我到‘815’开他们的复课闹革命的会，也是好几万人。”

众：“他们是成立警备区。”指“815”派的“红卫兵重庆警备区”。

梁兴初：“群众组织成立什么警备区？谁给他权利成立的？”“还有你们解放碑的广播站，不要搞相互攻击。”

众：“他们把我们的广播站砸了。”

梁兴初："搞这些互相攻击干什么？他不砸，我都要砸。"

众："他们还不是搞互相攻击。"

梁兴初："不管他嘛。不要搞那些互相攻击的东西。要宣传毛泽东思想，宣传江青同志的'九五讲话'，《九五命令》。搞那些互相攻击没有意思。"

众："我们宣传有错误可以指出。他们是晚上拿匕首去逼到抢的，我们几个广播站都遭砸了。"

梁兴初："哪个搞的？警备区去查一查。东西要还。"

众："有二十九中的'毛泽东主义战斗团'。"

梁兴初："现在就是两派中的中学生搞这些事情。成都也是这样。大学生、工人都不搞这些事，就是中学生搞。"

"中学生要靠我们去组织嘛。你抓他，他就跑了。你们这些同志一说就抓，这是最没有办法的办法。这些十几岁的小孩子懂啥子嘛！我家中有两个中学生的，一天吵着玩，学校管不着，老师管不着，家中管不着，你们造反派的组织管不着，四管不着，把你们的名声搞坏了。你们都是头头，一个中学派两、三个人去上课，把他们的头头集中起来学一学，大的群众组织去和他们交谈。当然要多次协商。一个学校有两派，一派在外的，要回去。中学生协商不好，你们这些头头就去帮助协商。复课闹革命，不然长期在外，将来成了野人了。成都叫野鸭子，我看重庆叫野人咯。这是比较难做的事情。大学生一说就通，中学生不行。他两天吃一顿饭，一天吃五顿饭都可以。'反到底'派的中学生组织

起来好不好？试一试嘛！这是大事，不是小事。把中学生搞好，大学生、工人就好搞了。不然这些中学生将来可惜了。一年多了，没上课，什么都忘了。他读语录，只记得造反有理、相信群众、相信党。这是大量的工作。几百所中学，属于你们管的有多少？”

众：“每个学校都有两派。”

梁兴初：“你们要去做工作。”

众：“现在是回不去。”

梁兴初：“首先去协商嘛，‘反到底’派做工作嘛！协商好了再回去嘛！不协商好，两派打成仇人了。简单地说回去，那一派又不答应。现在从一两个中学搞试点，种试验田嘛！不是一下子就想搞好，首先一个、两个，再推广，这样才好，这是项艰苦的工作。中学生不好搞啊！他又不回家，回家又不听话，你们造反派的话，他们可能听一点。你们属于一派嘛。大学好做，中学难做。老工人好做，学徒工难做。我们偏要去做艰苦的工作，要排除万难嘛！这是你们造反派经常喊的哟！不要光当官指挥他们去打仗，你们大学生当军师可以，武斗不行。真正搞武斗，躲在沟沟里头。为什么？怕死。第一，他要毕业或将要毕业了；第二，他没有娶老婆，死了划不着；第三，还没有享福。中学生懂啥子？他十五六岁嘛。我说大学生怕死是有依据的。大学生没有死几个。不仅成都，重庆，全国都如此。大学生吹毛求疵，只有当军师，但当了很多不好的军师，狗头军师。注意，你们这些狗头军师不要去当了。将来把你们揪出来了难受。中学生要检举你们的。那

时，他说，是你们出的主意。到时候还不是要揪你的。大学生，我劝你们不要去吹毛求疵，不要去当狗头军师。那时中学生罪名都加在你们头上，是罪魁祸首啊！你们的中学生要做工作，工人造反派的头头要做工作，属于‘反到底’派的要做工作。大学生不要去吹毛求疵，不要去当狗头军师。”

梁兴初问邓长春：“前段时间搞武斗，搞了几千条猪，你们是怎么吃的？以后国家要算账的。这账我是要记的。不要以为20 岁，杀不了头咯！账算在你们身上，群众是要算的咯！要交待交待咯！你跑到天上，我有飞机，我有对空大炮。跑到外国就叛国了。”

众：“‘815’也抢了的。”

梁兴初：“将来这笔账不管是哪一派的，都要算账的。这是9 月 13 号通知有的。这笔账，老账，旧账都要算，毛主席讲的，旧账、新账都要算。不算不行啊！你们自己先算一算，谁吃的？哪些单位？哪些人吃的？有国法论罪。要杀头的，到时候你哭都哭不赢。杀你的时候，你说‘不要杀我啊’，那就迟了。22 岁法律上可以杀头了。我们成都开始检举了。”

蓝亦农：“你们抢到我们警备区头上了，抢了我们的纸烟，还有几百元钱。”

梁兴初：“这是小意思，算警备区慰劳你们了。”

蓝亦农：“嘿，慰劳是慰劳，抢是抢！”

韦统泰：“820 死那么多人，你们打死了我们的处长，这笔

账一定要清算！不算账？不算账我们警备区要告到毛主席那里去。”

梁兴初遂问黄廉：“锯掉曾处长大腿的那个人，你同不同意逮捕？”

黄廉答：“同意。”

又问：“他现在哪儿？”

警备区有人补充：“那人现在医院扫地。”

梁兴初下令：“马上派部队去把那人抓起来！”

警备区立即派人离开会场前去执行抓捕任务。很快，第一工人医院为曾惠平处长手术的右派“医生”李一士被逮捕，并被带上脚镣。

梁兴初：“旧账、新账都要算，算就你们自己算，不要群众起来，那就迟了。舰队打了这么多的船，这个账算到你们头上的咯！”

他指着邓长春问：“你说是不是？让群众来说，群众说该枪毙就枪毙，群众说该缓期执行就缓期执行。群众说该判刑就判刑。不然就没有纪律了嘛。我们红军时都没有抢。你是工人或是学生？”

邓长春：“工人。”

梁兴初：“你不配当工人。工人最爱护国家财产。你还带头抢东西。我现在提醒你，至于将来，我相信群众。我在北京接见‘红成’、重庆的说，你们为啥抢解放军的枪？他们说，没有！

结果当场有人揭发头头说：‘就是他抢的！’你这个舰队司令，打了两只船要交待，至于怎么处理，该怎么办就怎么办。你不要紧张，但要交待。改了就好了。再犯下去就不行了。我这段话对你教育很大，帮助很大，你们年轻人，是接班人嘛！不然，我这个班就交给你们去打砸抢吗？所以同志们，老账、新账，赶快算，该向群众作检查就检查，放下包袱，轻装上阵。再不做了，改过自新。你现在清醒一下有好处。我听说你还做了许多坏事。”

邓长春：“我相信群众。”

梁兴初：“相信群众就好了，就怕你不相信群众。听说你不仅做了坏事，还造谣。同志，我有事实。哪个人做的什么，我都知道。你们说不是汽艇，是潜水艇嘛！是不是？你们辩不了。你们不要以为有后台，你们那个后台不一定硬。这个后台是好人还是坏人？总有一天要倒霉的啊。所以还是现在觉悟的好。迟觉悟不如早觉悟，迟检讨不如早检讨，改正就好了。改正就不追究了。改正了我就跟群众讲，群众才听我的话。不然群众不听。这段话对你有好处，年轻人，我们村里的年轻人啊！有好处的，不要以为你干的都是好事。”

蓝亦农：“银行仓库只能由市革筹管。”

梁兴初：“银行只有市革筹才能管。”

白斌：“重庆只有一个政府。反正重庆只有一个政府，没有第二个。”

当徐光明汇报到他几次回重庆大学都被打，明天“815”又

要单方面复课闹革命，还请梁司令员去时，梁兴初说："你和我一道去。"

当汇报到有人造谣说成都军区的军权梁司令员掌握不了，被刘结挺篡夺了时，梁兴初问："你相信吗？"

这时，首长们站起来要走，韦统泰宣布："明天 9 时接见！"

一代表说："梁司令员，你指示我们写个制止武斗的倡议，写好了，念给你听。"

梁兴初："好，大家坐下来听。"

念完后，梁兴初说："你们回去把它打出来，送一份到我这里。我给你们修改，然后发给'反到底'每一个战士好好讨论。走群众路线，这样才有基础。不然头头通了，下面不通还是不行。然后由警备区交给'815'派讨论，再两派开会，在会上提出来。"

众："明天请蓝政委参加我们的晚会。"

蓝亦农："同志们拥军我们一定爱民。这个关系一定要改善。我们不要上坏分子的当。过去我们双方的关系是否有坏人挑动？你们查你们的报纸，9 月份以前没有一份不骂 54 军的。"

梁兴初："过去的不计较，改了就好了，要拥军，拥 54 军，军民一致，军没有民就活不成了。住房是你们工人造的，枪是你们工人造的，子弹是工人造的，吃的是农民种的。我们不能离开人民嘛。我们从建军一天起，毛主席就指示我们，我们也是这样做的。但我们军队有一些个别的人，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也是可能的。因为我们人多嘛。希望你们旧账不要算了，现在要搞新账，

你们过去有些缺点错误，也是难免的。改了就好了。我们军队也一样。林副统帅早就告诉我们，防止军队骄傲嘛！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嘛。所以通过这次座谈，大家对 54 军、军分区的意见都可以提，但是善意的。这对军队也是鞭策爱护。除了毛主席爱我们军队，林副统帅爱我们军队，还有革命造反派、红卫兵小将也爱我们军队。所以过去的事就不再提了。但要听其言，观其行，不能搞两面派。搞两面派没有好处。千万不能这样。有人要破坏你们和解放军的关系，要提高警惕。如果你们盲目的听一些马路消息就不好了。有些人讲话也可能讲错了，走了火，我们也不可能每句话都讲得对。但是有个基本立场嘛。希望你们有意见明天提。”

11 月 4 日，中央调查组负责人和梁兴初、韦统泰、蓝亦农、白斌、唐兴盛等乘东方红 111 号轮船到望江厂视察打捞上来的 8 月 3 日被“反到底”派击沉的重庆军分区交通艇现场。梁兴初等当场表示对“815”派的支持和对“反到底”派的斥责。“815”派的“长航兵团”、“港口兵团”在朝天门码头举行死难解放军 3 战士追悼会。

重庆的学生们陆续返校开始“复课闹革命”。11月4日这天，重庆大学全校学生在风雨球场召开了声势浩大的动员会。成都军区司令员梁兴初、中央调查组陈斌一行及54军政委蓝亦农、副军长白斌一行均出席了大会并讲话。年初3月，重庆大学也曾搞过一次“复课闹革命”，那次活动因“反击二月逆流”而迅速流产。

这回不一样了，不是因为这次的号召更鼓舞人心，而是半年多的经历让许多人已经对这次“大革命”心灰意冷，大家务实了许多：把壮丽的理想和官场的是是非非留给政治家吧！老百姓靠空头政治是过不了日子的，要让自己在社会立足，最后解决问题的还是一身过硬本领。于是，同学们纷纷把老师重新请回讲台为自己传道授业。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文革初期和1966年“红八月”的情况恰恰相反，学生们对那些曾被自己批判过的老师、“学者”、“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现在已经不再反感，甚至简直就有些巴结了。毛泽东的文革，在他所期望的若干领域，开始悄悄走向自己的反面。

采矿系的同学，入校时一个个绝对都为自己黑矿红心的未来而骄傲，可现在不了，他们非常清楚在暗无天日、充满冒顶、爆炸、灌水等诸种危险的井下作业意味些什么。他们开始务实，不用谁批准，全体同学一致宣布“造反”：通通转入机电专业学习。

重庆大学“815”上演讴歌胜利的大型音乐舞蹈史诗：《八一五风暴》。该“史诗”从武斗期间就开始排练，几经修改，现在重新上演了。修改版首演时间是 11 月 5 日，地点是人民大礼堂。成都军区司令员梁兴初、中央调查组组长陈斌及驻军首长全体出席观看并接见全体演职员。梁兴初在接见演员时曾如此表态：“我希望你们多给山城人民演几场！多给山城‘815’派演几场！多给解放军演几场！”。

11月5日这天，重庆军分区为8月3日被“反到底”派击沉的

军分区交通艇上遇难3战士举行追悼会，宣布将其中2人追认为中共正式党员，1人追认为模范共青团员。“815”派代表出席。

11 月 9 日，省革筹副组长、成都军区司令员梁兴初午夜到解放碑地区观看大字报并突击检查“反到底”派“完蛋就完蛋广播站”，要求上缴武器。又视察了“815”派“红旗广播站”。

11 日晚，梁兴初在文化宫礼堂观看“815”派演出的《红卫兵战歌》。

第二天，梁兴初由重庆驻军及市革筹负责人韦统泰、蓝亦农、白斌陪同视察“反到底”派控制的重庆医学院，检查拆除武斗工事及上缴武器情况。当晚，部队到该学院戒严搜缴武器。

11 月 16 日，“反到底”派在市体育场召开 50 万人大会纪念《红十条》、《红五条》下达半周年。一些“反到底”派组织在赴会途中与“815”派发生武斗。会后游行时两派又在市中心第二十九中学外武斗。警备区司令部派到现场宣传《九五命令》的宣传车及宣传器材被砸毁。

11 月 19 日，梁兴初由重庆驻军领导人陪同接见“815”派负责人，讲话中说：“那天我和他们谈到早上 4 点，我讲你们再打群众就要反对你们，不是我反对你们，是群众反对你们，因为我是群众中的一个。重庆 400 多万人反对你们，那时你们完蛋就完蛋啦！”

谈到上缴武器时，梁兴初说，他知道“815”派七医大“红总”等组织还保存有枪，但又说保存一些枪他也赞成，枪要保存

在好人手里，只是要登记，要编成班、排、连，听从解放军调动，只准用于防守、自卫，不准进攻。

## 第 925 回：查真相，中央档案□□档　竟发生，“核心机密”盗窃案

文革开始后，国务院内务部，一个仅有 402 人的部，先后成立了 7 个群众组织。他们以对待部领导的态度，分为两大派，一派称“革命造反派联合总部”简称“革联”，主张打倒部长曾山，保副部长王一夫；另一派称“红色革命者联合总部”简称“红联”，主张打倒副部长王一夫，保部长曾山。1967 年 9 月的一天，“革联”为显示自己的革命性，对曾山采取了“革命”行动。他们瞒过家属，避开“红联”，联络驻内务部机关的学生红卫兵，秘密把曾山劫持到劳动人民文化宫批斗，强迫弯腰，做“啧气式”。

家属不见曾山的踪影，着急打电话向国务院负责内务部、公安部、民族事务委员会和国务院宗教事务局工作的内务办公室求助。内务办公室联络员孙宇亭接到电话，立即询问“革联”，“革联”推说不知道。孙宇亭又通知“红联”帮助寻找，得知是被“革联”揪到劳动人民文化宫批斗。当家属赶到文化宫时，批斗会已散场，曾山身倚金水桥栏杆，两眼发直，似有轻生念头。孙宇亭立即把情况报告内务办副主任严佑民，严佑民又电话报告谢富治、周恩来。周恩来就这一事件，要求内务办公室立即以中共中央的名义起草一份文件，并口述了文件的内容。

孙宇亭根据严佑民的交代，以最快速度起草了文件的草稿，冠以“中共中央关于曾山同志问题的指示”的标题，送严佑民、谢富治审阅后，报送周恩来总理签发。9 月 27 口一早，严佑民

和孙宇亭就向内务部群众组织的头头传达了这个指示。全文是：

中共中央关于曾山同志问题的指示

一、对曾山同志的错误，可以批判，但性质应由中央来定。

二、曾山同志的活动，听命于中央，造反组织不能干涉。

三、外来学生不能干预内务部事务，要立即撤出。

四、开批判会搞啧气式、大弯腰是错误的，是违反中央规定的，今后不准再搞体罚和变相体罚。

传达中共中央的指示后，内务部平静下来了。但好景不长。到了 10 月，内务部“革联”根据抗战时期新四军情报人员提供的情况，获悉曾山在抗战时期曾经和日本人有过接触，于是认为：曾山是日本特务、汉奸，必须打倒。

曾山解释说，他在新四军军部当组织部长的时候，按照延安党中央的指示，确实和日本方面的人员有过接触，但这是抗日活动的组成部分，整个活动安排都及时用电报向中共中央作了请示，并得到批准。

“革联”不相信曾山的辩解。对立面组织“红联”则站在曾山一边。两派对着干，互不相让，眼看就要武力相向，酿成一场武斗。国务院内务办派驻内务部联络员孙宇亭立即向他的直接领导，内务办副主任严佑民和内务办主任谢富治报告了情况，谢富治和严佑民商议此事，孙宇亭参加。

谢富治说：“那时，我在八路军，在太岳，新四军的情况不清楚。”

严佑民也说："那时，我在新四军，在前线作战，对军部的情况不清楚。"

孙宇亭建议说："这事倒也好办，既然曾山说一切活动都得到了党中央的批准，我们派人去中央档案馆查一下历史档案，问题就可以澄清了。"

谢富治、严佑民都表示同意，并将查阅档案的事责成孙宇亭具体承办。

到中央档案馆查阅档案必须履行严格的审批手续。孙宇亭为此专门写了报告，交严佑民、谢富治分别签字同意后，拿着他们的批件，同内务办公室的赵雪瀛一起，驱车到了位于北京西郊温泉的中央档案馆。

档案馆的军代表看了批件说："查中央历史档案，必须经中央办公厅主任批准，否则不予接待。"

孙宇亭回来后向严佑民作了报告，严佑民找汪东兴补了一个手续。孙宇亭、赵雪瀛他们又第二次来到中央档案馆。军代表仔细检查了他们的批件，看到确实是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签字无误，没有犹豫，即指示工作人员照办。

孙宇亭他们在中央档案馆共找到有关曾山与日本人接触的4份电报，其中有曾山报告的情况，也有中共中央的正式批文，更难得的是有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康生的签名真迹。那时陈毅在延安参加整风，有的电报他也看了。

事情虽然有了结果，但向上级汇报，不能空口无凭，需有真

凭实据。可是，档案馆规定，此类机密，不能外借，不准抄录。孙宇亭经同军代表交涉，他们允许他摘抄主要内容。

孙宇亭回机关后，顾不上吃饭，立即起草报告，经严佑民、谢富治先后签署后，报送中共中央。

然而事情却意外地发生了变化。10 月的一天，谢富治怒气冲冲地到严佑民的办公室，发了一通脾气。

谢富治走后，严佑民来到孙宇亭的办公室，神情极不自然，苦笑着对孙宇亭说：

“我们为了证明曾山同志的清白，到中央档案馆查历史档案，是办了一件好事。可是，一位中央负责同志说这是政治上糊涂，要追查。谢要我们每人写一份检讨，报送中央。”

孙宇亭急问：“是哪一位中央负责同志？”

严佑民说：“谢没有说，猜不透。”

上命难违，不检讨不行，严佑民他们只好按谢富治的说法检讨犯了客观主义的错误。

一周后的一天，谢富治通知严佑民、赵雪瀛和孙宇亭开会。谢富治态度平和的说：“你们的检讨都不深刻。现在宣布处分决定：孙宇亭，党内严重警告。”

他接着又说：“这件事涉及核心机密，你们手中如果存有这件事的片纸只字，统统交出来。今后，如果发现谁泄漏了机密，毫不客气。”

说完就走了。

孙宇亭莫名其妙的背了个处分，也不敢有异议，以为事情就此可以打住了。严佑民却认为不会这么简单。事态的发展，证明了严佑民的分析是正确的。

11 月 5 日，中央文革小组决定封存公安部所有的文书、业务档案和敌伪档案，原来的档案管理人员封卷锁库后，立即撤离。接着，调派了 300 名解放军进驻公安部，接管了这些档案。

一天深夜，孙宇亭已脱衣就寝。谢富治的秘书突然敲门，把他从睡梦中叫了起来，通知立即去人民大会堂安徽厅开会。并说："车已准备好，马上走。"

公安部和大会堂只隔着天安门广场，步行一刻钟就够了，却派汽车相送，可见事态的严重和急迫。孙宇亭从大会堂的南门进去，遥望安徽厅的门口蹲着一个人，走近一看，是中央档案馆的军代表。

走进大厅，只见右侧摆了一张长条桌，桌子后面坐着 3 个人，从右至左依次为吴法宪、谢富治、汪东兴。桌子右边横头旁，坐着严佑民和赵雪瀛。长条桌左侧横头旁放了一把椅子，孙宇亭进门后，中央档案馆的军代表立即在椅子上落座。厅门左侧靠墙放了一张桌子，有两名穿军装的人做记录。长条桌的对面 3 米处，有一个小方凳，没有坐人。孙宇亭一看房中摆设，很明显是"三堂会审"。他知趣地在小方凳上坐了下来，审问开始了。

谢富治首先开口："你的姓名、年龄、籍贯、出身、成分？"

这完全是审问犯人的口吻，孙宇亭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因

为他在公安部机关工作 13 年，谢富治当公安部部长后，孙宇亭在他身边工作了 8 年，他对孙宇亭的身世太熟悉了。

此刻，孙宇亭不敢稍有反抗，只能尽最大的努力，希望能证明自己的无辜。

他尽量使自己的情绪镇静下来，回答了谢富治的第一个问题。

谢富治接着问："你是什么时候、用什么办法混进公安部的？"

孙宇亭答："我没有混进公安部。我是 1954 年大行政区撤销后，从中南公安部奉调进京的。当时从中南公安部选调了 60 名干部，由中南公安部部长杨奇清带队到北京报到。"

谢富治向旁边的吴法宪小声说："杨奇清也有问题。"接着，他又板起面孔对孙宇亭说："你把盗窃中央档案馆核心机密的活动谈一谈。"

孙宇亭据实申辩："这事和盗窃机密根本沾不上边。"

他详细叙述了内务部两派斗争的情况后接着说："我去中央档案馆查档案的起因、目的以及对档案资料的处理情况，谢副总理，汪主任和严佑民同志完全清楚。不错，主意是我出的，查档报告是我起草的，但是你们同意了，批准了。如果没有你们的批件，没有你们的派遣，我不可能去中央档案馆，即使去了，人家也不会接待我。"

谢富治转向汪东兴说："我在那个报告上批了字。可是你也

批了同意。”

汪东兴对谢富治说：“你是副总理嘛！你同意的事情我能不同意吗？”接着，汪东兴转向中央档案馆军代表，严厉地说：“档案馆有制度，像这样的机密档案不能抄录，你们为什么不执行制度？”

军代表回答说：“有你和谢副总理的亲笔批示，不能不让抄！”

汪东兴很不高兴地问：“你是从哪个部队来的。”

军代表答：“是戚本禹从学部把我挑来的。”

汪东兴又问：“你是造反派？”

军代表答：“是的。”

汪东兴继续问：“学部的人怎么穿上了军装？”

那人答：“是戚本禹派人送给我的。”

这时，汪东兴又转向做记录的穿军装的人说：“把那个报告传过来，我再看看！”

汪东兴看了报告，对谢富治说：“你看，这个报告，是用宽边稿纸写的，我们批的字都是靠在稿纸右边的空白处，如果把我们的批字剪下来，对这个报告也不会有损伤。”

谢富治说：“这倒是个好办法。”

于是，汪东兴让记录人员找来剪刀和火柴，当场把他们批的字剪了下来并烧掉。

孙宇亭和严佑民、赵雪瀛和学部派到中央档案馆的那个穿军装的人，目睹了这两位中央首长表演的滑稽的一幕。这时，吴法

宪一直双目紧闭，像睡熟了一般。

审问继续进行。

谢富治又问孙宇亭："你为什么要包庇曾山和陈毅？"

孙宇亭回答说："我作为驻内务部的联络员，弄清事实，协助领导平息纷争，是我的职责。既然曾山问题成了纷争的焦点，就需要设法澄清。查档案，是为了澄清问题。我和曾山没有私交，在我当联络员之前，彼此素不相识，没有来往，我没有理由包庇他。至于陈毅，他是元帅，我知道他，他未必知道世界上还有我。"

谢富治说："到中央档案馆查档案这件事，你应该承担责任！"

这时，坐在一旁的严佑民把话接了过去，说："这件事，前前后后的情况我都知道。事情是他和赵雪瀛办的，是经过我批准的。责任应由我一人承担。"

谢富治问："你承担得了吗？"

严佑民说："应该承担。"

这时，吴法宪睁开眼睛，说："肚子饿了。"他让服务员拿夜餐来。

服务员端上了包子和馄饨。吴法宪劝孙宇亭他们吃些夜餐。孙宇亭哪里还有心思吃饭，便说："我不饿。"

谢富治说："既然不想吃，回家吧，这里没有你的事了。"

其实，抗战末期，日军为了摆脱困境，向新四军提出谈判的要求，商谈相互妥协的条件。新四军做不了主，请示中共中央。中央同意和他们接触，并确定了虚与周旋，争取时间，做好大反

攻准备的方针和策略；于是才有新四军代表曾山和日本军方代表的接触，相互讨价还价的事情。在当时，它是对敌斗争的重要策略；同时，为了防止在国际、国内造成影响，陷中共于政治上的被动，必须严格保密。因此，定为核心机密。

这件事似乎就这样过去了。

## 第 926 回：谈□路，开封化肥厂解围　说清楚，罗瑞卿入党□□

11 月 9 日是柬埔寨王国的国庆日。11 月 8 日，柬埔寨驻中国临时代办在大使馆举办柬埔寨国庆招待会，外事口群众组织负责人约有六、七人和北京红代会的代表也参加了这次招待会。

当外交部长陈毅穿一身咖啡色的西装走进招待会时，柬埔寨临时代办毕恭毕敬地对陈毅说："很感谢陈毅元帅能来。"

陈毅表情严肃地落座，对在座的人也很冷淡。

宴会期间，陈毅与柬埔寨临时代办谈到了中国正在进行的文化大革命，他说："不要听信外面的谣言"，说中国的文化革命乱了，不许信教了，红卫兵抄家、打人了。陈毅说：现在，中国社会的一切都在正常运行。他指着在座的群众组织负责人说："你看他们像不像打人的？你回去要给国内讲明白。"

柬埔寨临时代办立即站起来，弯腰点头说："是，是，是，一定转达元帅的话！"

在座的北航"红旗"韩爱晶在跟陈毅碰杯时说："祝陈老总站在毛主席革命外交路线上，做红色外交家！"

戚本禹也走过来，和韩爱晶一边碰杯一边说："碰杯归碰杯，可不要忘了反右倾啊。"

后来王海容对韩爱晶说："陈老总回去讲给周总理听，总理在外交部大会上讲，我们的小将是爱护陈毅同志的，韩爱晶在敬酒时讲，祝陈老总站在毛主席革命外交路线上，做红色外交家！"

我们再说广西。

10 月 26 日，广西柳州铁路局两派已经签署了《关于实现柳铁革命大联合的协议》。同日，在北京的柳州两派群众组织代表和驻柳部队代表也达成《实现革命大联合八条协议》。28 日，柳州两派又联合发出《告全市人民书》。

10 月 28 日，北京给柳州来电，传达周恩来指示：参加护路的桂林“老多”要回校复课闹革命，不再参加护路。

11 月 6 日，韦国清做出《我在广西文化大革命中所犯方向路线错误的检讨》。11 月 8 日，中共广西军区委员会上交《广西军区在支左中所犯方向路线错误的检查报告》。

11月8日，广西两派在北京达成关于《广西两派促进革命大联合的十条协议》。这《十条协议》传到南宁，当天两派12万人在南宁隆重集会表示拥护。

当晚22时，周恩来在北京接见广州两派代表。陪同接见的有：戚本禹、吴法宪、李作鹏、黄永胜、陈郁、王首道。

周恩来十分高兴地说：“广州三个工人组织联合起来了，十万人的大会不要延期了吧？”

“工革联”代表答：“定下来了，明天上午9点。”

周恩来：“好？中央发个贺电去！”

他接着说：“海员联合了，铁路联合了，现在就是革筹小组问题了。你们赞成搞个革筹小组回去推动呢，还是回去搞军管呢？”

他首先问“工革联”代表，然后又问“工革会”代表。工人代表们回答：“赞成搞革筹小组回去推动。”

周恩来又问“旗”派机关干部代表，代表回答：“我们代表团昨晚讨论过了，紧跟中央，拥护中央决定成立革筹小组。”

周恩来：“革筹小组还是5个人，陈郁同志不是主要的嘛，孔石泉同志在下面搞得还不错。你们提了赵卓云，他们提了马甫，一方推了一个，双方都不能接受，都还要考察一下嘛！”

“红旗”派代表汇报了广州现在又出现了抓领导干部现象，“总派”冲了军管会办的干部训练班，抓了戈枫、王维、田明等干部。周恩来记下了他们的名字。当他在记下田明时说：“听说田明还不错嘛，为什么把他也抓了，抓人不对嘛！抓戈枫也是错误的，谁抓的？”

“地总”代表：“是我们下面一个分部抓的。”

周恩来：“立即打电话回去放人！戈枫我们是不同意马上结合，但也不要抓嘛！戈枫有些问题难道比陈再道还严重吗？陈再道还在训练班里嘛！立即打电话回去放人！”

联络员带“地总”代表去打电话，回来后，“地总”代表告诉说：“已打了电话，叫把戈枫送去警司。”

周恩来：“为什么送警司呢？马上送回学习班嘛！”

联络员又带“地总”代表去打电话。

周恩来：“军管会要保护参加学习班的人，任何人不准动。”

他说：“革筹小组就这样定了，你们要是相信中央的话，就

是那5个人，我们发扬民主够多的了，先成立起来，他们是5个头头，他们提赵卓云有他们的道理。你们提马甫通不过，既然双方不能通过，只好都不能参加。”

“现在两广要赶快赶上来，两广都在前线，你们广东我本来已向主席报告，月底可以解决问题，没有想到又拖了10天。”

“广铁总司”代表请示周恩来：“铁路军管问题是否可以公布？”

周恩来：“签了字就可以公布嘛！”

周恩来问黄永胜：“可以马上军管了吗？”

黄永胜答：“可以！”

周恩来最后说：“后天开个大会，你们双方都找几个人讲讲话，不要又吵起来，要创造革命大联合的气氛，后天派飞机送你们回去。”

11 月 9 日，广州 10 万工人、农民、解放军、红卫兵在越秀山体育场载歌载舞，庆祝“广州工人阶级革命大联合筹备委员会”成立。广州军区政委孔石泉、广东省军区政委陈德、广东省军区司令员黄荣海等人出席了大会。

当天，国务院、中央文革给“广州工人阶级革命大联合筹备委员会”成立大会发去贺电。

11 月 9 日晚 23 时至 10 日零时 30 分，在国务院小会议室，周恩来接见铁路系统在京学习代表。李富春、李先念在座。

接见时，周恩来问了新疆铁路的情况，他说：“哈密铁路一

直有问题。哈密、乌鲁木齐的来了没有？”

两派的代表都站起来回答：“来了。”

周恩来说：“你们来的不少啊！‘二司’和我老交道了，我很熟悉。”

当“铁造司”汇报他们局铁路运输及目前问题时，周恩来说：“哈密的情况我知道。新疆的问题我知道。你们铁路受地方影响，地方受军队影响严重啊！部队新疆军区和空军对立，兵团介入地方，解决新疆问题，首先要解决部队的问题，要‘釜底抽薪’，‘扬汤止沸’不如‘釜底抽薪’，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先告诉你们，最近要把新疆部队负责人找来解决。

新疆问题没有解决，你们铁路自己搞嘛！铁路是工人阶级，为什么不能搞联合呢？当然，部队问题要先解决。”

周恩来对柳州铁路局两派代表说：“你们达成了协议，但还提出了一些问题，我看你们思想是半通半不通。所以你们想见我，看来也一定要见一次。你们联合了，还提什么以谁为核心？我多次讲过了，‘以我为核心’这种提法是愚蠢的，可笑得很。毛主席最新指示，文汇报社论你们学了没有？”

众答：“学了。”

周恩来：“学了就应该解决问题么。谁要成为核心要实践证明，左派不是自封的。提出以谁为核心是愚蠢的。现在有些人总是要我们给他们定性，好像我们一定性，就挂上了金字招牌。那是靠不住的，左派不是自封的，要自己奋斗么！”

此时，河南开封化肥厂仍被围困。虽然有周恩来、康生等人的指示，但开封的“824”和“左司”都没有交出武器。说法很多：由于化肥厂是特殊行业，据说退守在这里面的人数量不少武器装备充足、据说他们里面有实战经验的转业兵甚至神枪手不少、据说厂区内机械设备和材料齐全有修造枪炮的能力、据说厂区内有两个很大的煤气贮藏罐，一旦被击中或被他们引燃爆炸后能把半个开封城掀掉。

总之，围困化肥厂的“824”没有强攻，只是围困、静待其变。每天双方的高音喇叭对着展开口水战，不时的有打冷枪及零星的偷袭，有点像一战时欧洲西线战场的静坐战。

每日 3 餐都是解放军开着一辆解放牌大卡车给“824”送饭。化肥厂里面有的建筑很高，厂里的人在那些建筑物上向“824”射击，所以每天军车送饭是有危险的，汽车上的累累弹孔就说明了一切。

一天，开封一高的学生窦征穿着长统的皮靴，戴着钢盔，到二弟所在的十中阵地看重机枪，忽然“啪”的一声响，对面响了一枪。大家都一惊，没等反应过来，紧接着又响了一枪，窦征倒在地上。子弹是打在腮帮上的，半个下巴都掀掉了，他在地上拼命的挣扎，钢盔掉了，长统皮靴也踢掉了。大概是颈动脉血管被打烂了，鲜血四溅并且随着他的呼吸呼噜、呼噜的向喉咙里灌，旁边的人听的很清楚，很响。

解放军送饭的汽车还没有走，大家拼命抓住正在挣扎的他的

腿和手抬起来向汽车那里跑，没等跑到汽车那里，他就已经不行了。

后来，空 13 师师长王洪智派人到化肥厂做工作，坚守开封化肥厂的“革命左派造反总司令部”同意解放军进入化肥厂。11 月 10 日，6093 部队进驻化肥厂，化肥厂军管，同时也结束了对化肥厂的围困。为此江青称赞王洪智是“杨子荣式的人物”。

至此，开封市大规模的有组织的武斗终告结束。

由于罗瑞卿专案组缺乏公安系统的人员，1967 年 5 月起，又从公安部陆续调进 5 个人。

这时，主要负责审查罗瑞卿 1929 年以前历史的是总政保卫部第四处副处长张英华、总参作战部副处长王亚志和公安部二局一处的副科长汪春耀 3 人。

最初，他们 3 人走访高等军事学院院长陈伯钧，了解罗瑞卿 1927 年在武汉军校的情况，因为陈伯钧与罗瑞卿在武汉军校是同学。当向陈伯钧提及罗瑞卿时，陈伯钧风趣地说：“罗是大高个，我是小个子，一到列队，他在队首，我在队尾”。

陈伯钧是 1927 年 5 月在武汉军校经熊修武介绍入党，他提到“在军校与罗没有在一起有过党组织生活活动。”

因为在 1966 年 3 月的京西宾馆会议上，广州军区司令员黄永胜写了一份揭发材料，对罗瑞卿未参加南昌起义一事提出了质疑。质问“他到哪里了？这段历史应该审查清楚。”

为此，专案组决定派张英华到广州调查。

1967 年 6 月，张英华赴广州。第二天晚上，见到了黄永胜。他觉得黄永胜平易近人，没有架子，还不时说几句玩笑话。

黄永胜说，1927 年时他并不认识罗瑞卿，后来才知道罗瑞卿当时在武汉黄埔军校分校学习，他自己则是在中央警卫团当战士。1927 年 7 月下旬，军校和中央警卫团的很多人都参加了南昌起义，但罗瑞卿却没参加。他对此感到怀疑，因而写了份揭发材料。除此之外，也没有更多的线索。

从广州回京后，专案组从中央组织部借出了罗瑞卿的档案查看，发现他写的简历和干部登记表中存在一些问题，如：关于罗瑞卿 1926 年加入共青团一事，几份材料上的介绍人均不相同；入党介绍人，解放前后填写的也不一样。他在延安整风时，填写的入党介绍人是陈刚秉和潘先知；全国解放后，填写又是陈刚秉和任伯芳，前后竟有 3 个入党介绍人，这显然不符合党章规定。

1967 年 7 月，王亚志和汪春耀入川，向所涉及的几位证人进行调查，发现罗瑞卿所填的 3 个入党介绍人中，陈刚秉和任伯芳都已过世，只剩潘先知 1 人。经过四处寻访，他们终于打听到，潘先知在四川合川县政协担任秘书长。

二人不敢耽搁，连夜赶往合川统战部查阅了潘先知的档案。在其自传和干部登记表中，多处写到他与罗瑞卿是黄埔军校武汉分校的同学，“感情甚笃”等。但是，没有发现潘先知曾经介绍罗瑞卿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只言片语，而且此人也从来没有加入过共产党，又怎么能介绍罗瑞卿入党呢？

第二天，他们找潘先知谈话。潘先知大讲与罗瑞卿的关系如何密切，同时也承认，解放后，在得知罗瑞卿担任了公安部长后，他给罗瑞卿写过信，没有回音。

王亚志和汪春耀推想，这可能就是罗瑞卿把入党介绍人从潘先知改为任伯芳的原因。

与此同时，张英华等人在北京、沈阳和哈尔滨等地也展开了调查，取得了大量的旁证材料。两组人员将材料仔细核对后，基本勾勒出了当时的情况：

1927 年底，罗瑞卿离开汉口四川会馆到湘西常德，在国民党的杂牌部队新编教导第五师政治部当了一名上尉宣传员。不到半年，罗瑞卿去长沙，正赶上长沙“马日事变”，立刻乘轮船赴南京，于 1928 年 7、8 月份间到了上海。

在上海，罗瑞卿遇见同乡任伯芳，两人相处甚好。任伯芳刚刚与中共地下组织接上关系，罗瑞卿向其请教之后，写信给中共中央，说自己在武汉黄埔军校时入了党，后来与党失去联系，要求恢复党的关系，证明人为任伯芳。

当时大革命失败，许多党员与组织失去了联系，纷纷来到上海寻找组织关系。罗瑞卿的信送上去没几天，就收到通知，让他在外滩公园手持报纸，等人来接头。

来人是中共中央军委秘书欧阳钦，在询问了相关情况之后，告诉罗瑞卿，组织关系已经恢复，以后与一位陈姓同志联系。

就这样，罗瑞卿入党了。

10 月，王亚志和汪春耀再次入川外调。他们回京后，于 1967 年 11 月中旬的一个上午，张英华、王亚志和汪春耀 3 人到罗道庄北京卫戍区的一个连队审问罗瑞卿。此时，罗瑞卿关押在这个连队的院子里。与他一同关押在此的，还有彭德怀、彭真、谭政、刘仁、万里等人。每人一间斗室，走廊上设哨兵。室内一张木床，一桌一凳，窗户上糊着纸。

审讯间在一座小平房里，里面只有一张桌子、几个凳子和一个暖水瓶。

为了这次“交锋”，专案组事先作了充分准备。怎么提问、什么时候举证都做了设想，对可能遇到的情况也都预想了应对的办法。

穿一身旧军装的罗瑞卿被警卫搀扶进来。他神色平静，但透着机警。

待罗瑞卿坐下后，张英华开门见山地问：“你入过团吗？”

罗瑞卿惊了一下，但很快就镇静下来。

“这个问题，我作交代，我没入过。”罗瑞卿承认，他在干部登记表中所写的，1926 年在四川南充中学时由一个老师介绍加入共青团，不是事实。

张英华有点意外，很快又问：“你入过党吗？”

罗瑞卿沉默下来，好一阵不说话。

“诸位，今天就不要再问了，我讲吧。”罗瑞卿抬起头来，“以前写的简历中入党地点和时间不是事实。”

“这很好，那你就写个简要材料吧！”张英华和王亚志立即说，汪春耀即把笔和纸递给罗瑞卿。

罗瑞卿稍加思索，用略微颤抖的手，写了近 300 字的材料。抬头写道：“伟大领袖毛主席”，下面写了他“以前写的入党时间、地点等不是事实，这件事对党中央、毛主席隐瞒了 39 年”等等。

他写到：“我如果当时不找到党的依靠，不仅无法革命，连生存都成问题。这是确实的。因此，我同党发生关系后，党要我去湘鄂西红军，我就去。去后，那个县委不肯接收，说隐蔽不下来，党又要我回到上海等交通恢复，我就回。回到上海不久，毛主席率领的红四军就打下了汀洲，党又决定我们同行的两个人一个去闽西上杭游击队，一个去闽西永定游击队，我都是坚决服从的……我在主席和党的领导下工作三十几年，党给了我职务，并有不少重要职务。每想起此事心里总觉得不安。职务每提拔一次。自己就震动一次，但是总以‘好好为党工作吧，我又没有对党破坏’的想法来安慰自己。我在自己的岗位上确实是忠心耿耿、兢兢业业地为党为人民利益工作的。除上述这个问题外，我在党内确实没有再做任何坏事。我在工作上也犯过一些错误，有些还带有它的严重性，但那是我对于马列主义和主席的思想，对主席和党的路线、政策、指示学习不够，理解不深，没有执行好所致，决非有意损害党。”

最后，他在结尾写了“认罪”词句，然后写上他的名字，署上年月日，将材料交给专案组的 3 人。

王亚志对他说了几句安慰性的话，并说："现在潘先知仍在世，你大概解放后接到他的来信，以后就不写潘先知是入党介绍人了吧！不过自己主动讲清总是好的。"

当天下午，张英华将这份"认罪书"上报至军委办事组。

11 月下旬一个星期日，军委办事组在京西宾馆召集军队系统高级干部开会，"罗案组"的人也列席了会议。主持人吴法宪兴奋地说："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杨代总长的《大树特树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那篇文章发表之后，威力之大，就像大炮一样，把罗瑞卿的堡垒轰出缺口了，他承认自己是假党员了。"

## 第 927 回：外交□，大使贴出大字报　查少奇，恩来见广东代表

11 月 12 日，周恩来在接见驻外使馆代表时又一次提到“516”的问题，他说：“比如，对‘516’的处理，北京搞得比外地好。按主席思想除陷得很深的少数头头抓起来外，如对张建旗扣留起来，对群众要做工作，以便孤立少数……”

他再次提到北外“616”，说：“他们动摇无产阶级司令部，破坏无产阶级司令部，恐怕它背后有坏人。机要局不是出了个坏人嘛。王焕德还是核心组的头子，被抓了，是反中央的。把坏人，反中央、反毛主席的环头子，摆在机要局！8 月份还配合武汉的冲中央机要局。”

11 月 12 日，中国驻缅甸大使耿飚、驻法国大使黄镇、驻阿尔及利亚大使曾涛、驻巴基斯坦大使章文晋、驻乌干达大使陈志方、驻索马里大使杨守正等 26 位大使贴出过一张题为《剥开伪装，追根查源》的大字报。这张大字报认为：“王力的黑手能伸入外交部，必有我部的内因。我部确有一小撮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野心家。希望外交部和驻外使领馆广大的革命同志和广大革命干部一道密切注意，进行揭发批判。”

耿飚、黄镇等人还将他们的大字报书面上报了周恩来与陈毅。周恩来、陈毅也先后在人民大会堂分别见了他们，陈毅告诫他们要小心，说“现在是动辄得咎”。

11月1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做

出《关于广东问题的决定》，广东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正式成立。

当天，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还批转了韦国清11月6日做出的《在广西文化大革命中所犯方向路线错误的检讨》，下发对广西两派“促进革命大联合十条协议”的批语。

11月13日，康生谈准备中共“九大”新党纲，首先回顾了苏联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的党章历史，然后说：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取得了决定性胜利，在这种形势下主席很及时地提出了党的问题。党的问题有二，一是关于九大问题，一是整顿恢复党的生活，整顿党的组织问题。”

“征求意见的方式是主席发扬了最大的民主。把九大如何公开交给群众讨论，吸收群众的意见，和过去准备大会不同，这样可以充分发挥群众的积极性，使广大群众关心国家大事，关心我们的党，关心我们的大会。”

他说：“召开九大和恢复党，发展新党员是分不开的。主席提出要整顿党。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的问题提到我们面前。”

“一方面，查明有据的叛徒、特务和文化大革命中表现极坏、屡教不改的不能参加党的生活。另外要吐故纳新，增加新的血液，吸收一批新的党员。”

11 月 13 日，毛泽东、林彪接见北京军区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的代表和参加空军党委会全体与会人员。

1967 年 11 月，谢富治下令将公安部抽到刘少奇专案组的人

全部撤回，另从军队调入一批干部取而代之。曾担任刘少奇专案负责人的肖孟，被江青点名批评，于 1967 年 11 月被逮捕入狱。

11 月 14 日，地主刘作衡为专案组出具关于刘少奇 1925 年被抓出狱的亲笔供词：

民国十四年刘少奇被赵恒惕拘捕押在监狱处廿多天。赵恒惕送他一部书并要刘少奇出狱后不在湖南搞，离开湖南。刘少奇答应不在湖南搞，出狱后就走了。

刘作衡 1967 年十一月十四。

赵恒惕送给刘少奇的书是一套“四书”。

刘作衡系刘少奇的胞兄，时任湖南省参事室参事。此时已被遣送回乡监管劳动。

他同时还出具了杨剑雄 1951 年到北京找过刘少奇的交代：

1951 年正在土改时杨剑雄是个大恶霸地主在家站不住要找刘少奇我说以前你保过刘少奇要找你去找

刘作衡 1967 年十一月、十四、

11 月 14 日，毛泽东接见广西两派在京汇报团。接见时，毛泽东找到韦国清，挎着他的手合影，在场的广西“422”代表杨福庭见状，当晚就让广西“422”代表团马上改变态度，支持韦国清。

11月14日，广州地区赴京代表团签署关于“拥军爱民”、“制

止武斗”、“抓革命、促生产”、“开展革命大批判，实现革命大联合”的协议书，共12条。当晚20时15分至22时20分，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安徽厅再次接见广州赴京双方代表。谈话前，毛泽东和林彪接见了这些代表。当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等人再次走进大厅时，代表们起立，高举《毛主席语录》，高呼：“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周恩来说：“今天是你们最高兴的日子，见到了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伟大统帅和我们的副统帅。”

全场沸腾，全体再次起立高呼：“毛主席万岁！”“祝毛主席万寿无疆！”

周恩来转向右边，一一介绍陈伯达、江青等人。然后说：“昨天我说过了，庆贺你们达成了《十二条协议》，今天凌晨又达成了《告广州市人民书》。根据《十二条》精神，这是个好的文件。现在，今天这个结束的会议，首先把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广东问题的决定宣读一下。这是经我们伟大的统帅毛主席批准的。”

群众高呼：“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周恩来宣读并讲解了中央《关于广东问题的决定》。

第二天，11 月 15 日，广州地区两派赴京代表，分乘两架飞机，离京返穗。仿佛是送给他们的一份见面礼，这天，广州市柴油机厂正式宣布实现大联合，成立大联合筹备委员会。1967 年的秋季出口商品交易会，因受文革动乱影响，推迟了一个月，于

11 月 15 日开幕。

11月7日，中共中央、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批转关于哈尔滨八个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情况的调查报告。11月15日，毛泽东接见黑龙江省两派群众组织代表。

11 月 15 日晚，谭厚兰在师大“斗私批修"讲用会上作检查：《斗私批修，做决心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她在检查中说：

“我身上存在着不少的缺点和错误，特别是八、九月份那一段，我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

她主要谈了 3 个问题：

第一，关于林杰这方面的问题。首先我和有的同志，对林杰、吴传启、卢正义等人直接和间接打过交道，特别是和林杰工作上的联系比较密切，并且一度在不同程度上或者为他们辩护，或者干脆死保他们。毫无疑问，正如同志们批判的那样，是严重的政治错误，是立场错误，在这个问题中间的核心问题是林杰问题。在我和其他一些坏人打交道中，林杰是起了很坏的作用的。文化大革命舆论时期，在批判三家村时，我和一些同志在红旗杂志社同林杰一起工作过一段。在文化大革命中又一直和他有联系，直到“九、七”事件前，我们与他的关系，同志们大致是有所了解的。应该承认，我们同林杰的接触是很多的，也正因为这样，我们在许多问题都受了他许多影响。首先是在北京两大派问题上，自从二月逆流以后，在北京逐渐比较明确地分成了两大派，也就

是发展到后来的所谓“天派”和“地派”。……双方都本着多做自我批评的精神，本着求大同存小异的精神，我们是完全可以团结战斗在一起的。但是林杰等人在这中间，就为了他们的政治需要，采用了拉一派打一派的资产阶级政客手法，抓住我们的私心，煽起我们的派性，扩大分歧，加深矛盾。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是直接受其利用的，因而犯了很大的错误。这里我想简单地举几个例子，说明他是在那几个问题上插了手，因而扩大两大派分裂的。

第一是在北京日报的夺权斗争中。在上海一月风暴的鼓舞下，全国都掀起了一个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夺权的高潮，在这样的大好形势下，我们参与了北京日报的夺权斗争。但是我们自己是带着私心杂念，带着小团体利益不可侵犯的严重的宗派情绪跑去帮人家夺权的，这本身就已经有错误了，又认为自己在夺权问题上原则是对的，置革命派大联合于不顾，与北航红旗的革命战友吵起来了，本来解决了就完了，但林杰公开讲话支持一方，打击一方，这样一来，我们是有恃无恐的，因而双方打得更欢。以至于闹到中央首长那里，从此双方伤了感情，一直存在着隔阂。

第二个是在教育部夺权问题上。在教育部我们支持延安公社，北大支持北京公社，也吵得很厉害，但林杰也是无孔不入地发表意见，加剧了矛盾的发展，甚至还去慰问我们被北大打伤了的同学，这样更坚定了我们的一些错误做法，把矛头指向聂元梓同志。卢正义的问题也是在这个时候产生的。北大的同志指出卢

正义是无产阶级的可耻叛徒，这是完全正确的，应该坚决同他划清界限。但我们却出自派性，再加上林杰的支持，不但不接受新北大同志的意见，反而一意孤行，公开为叛徒卢正义辩护，说什么“他在文化大革命中是造反的，是坚定的革命左派”，说他是叛徒的材料“不充分”，“当时他还很年轻，没有形成定型的世界观”等极其错误的论调，根本不愿意去进行调查研究和作认真的阶级分析。在卢正义问题上犯错误，教训是很深刻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我们没有保持清醒的头脑，听信林杰的话，把敌人当朋友看待，这是立场性的错误。

第三个讲一讲七、八月份在揪刘火线上，为了争夺领导权的问题，又和北航发生了分歧。本来在对中国赫鲁晓夫的批判斗争这一大前提下，顾大局，识大体，谦让一下就没有什么了。但我们却私字当头，派性高于一切，对北航刚一到就想当主席，就打抱不平，这时林杰就别有用心地挑动说：“没有北航，你们就开不成会？就革不了命？”就这样在敌人面前，各拉山头，造成严重的分裂局面。真是亲者痛，仇者快。

再一个就是在学部问题上。在这个问题上也是受到林杰许多坏影响的，我们是上了当的。对于潘吴，我们过去根本不了解，又根本没有作调查研究，我们没有想到学部有那么复杂。由于林杰与潘吴这些反党分子勾结紧密，因而我们也就和潘吴发生了关系，我们最早和学部发生关系，是从批陶铸开始的。联系比较多是在二月逆流到社会上反潘吴这一段，直接和潘吴接触也是这一

段。这一时期，我见过吴传启四次面：第一次是高教部夺权，第二次是在民族文化宫，搞一下什么北京市委员会，给中央文革小组一封建议信，第三次是二月反二月逆流时，吴传启来到了我们学校，说他们掌握了李富春同志很多材料，他们要先搞谷牧、薛暮桥，然后再搞李富春。第四次就是在体育馆参加“七一”批陶大会，兵团所展览的那张照片是在那个大会上主席台上照的，大会上通过王恩宇介绍，才知道学部有个潘梓年，见到潘梓年，我就只那一次。由于我和林杰接触多，又介于我们对林杰的信任，因而我们和学部一度接触较多，再加上潘吴这些特务叛徒别有用心地利用我们，千方百计地把我们和他们拉在一起，好招摇撞骗，便于他们可耻的反党活动。在这里，向大家交待一个事情，就是在二月份时，王恩宇用中央文革名义，从我校邀请了二十几个同学作调查组，调查中央各口的情况。现在看来，这个调查组问题很大。而我一方面是听信了他们说是中央文革调人，一方面也是由于相信林杰的缘故，因而丧失了阶级警惕性，阶级斗争观念差，而犯了错误，帮了敌人的忙。基于卢正义问题的教训，当四月份社会上揪潘吴时，我没有轻率地发表什么意见，特别是看到北大、三红整理潘梓年的材料，看了潘梓年从二八年到四八年，一味吹捧蒋介石，攻击鲁迅，我当时一看，就认为他和吴晗差不多，是个反共老手。当时社会上也说吴传启历史很复杂，当时我觉得吴传启历史复杂，要搞调查研究，要少和这些人打交道。从那以后，我们就很少主动和学部打交道了。由于自己头脑中的私字派性十

足，在以后这一段实际工作中，仍然和王恩宇他们打过一些交道。

谭厚兰检讨了她在9月初保林杰的错误，同时检查了在炮轰几位副总理问题上的错误：

第二个问题是对待总理的态度问题。不但要打倒谭震林，还打倒余秋里，同时还支持别人打倒陈毅，炮轰李先念，那时我们对谭震林余秋里掌握了很多材料，但对陈毅同志和李先念同志并不很了解，但心想，我们是红卫兵组织，反正是造反，犯点错误也没有什么，能打倒就打倒，打不倒就拉倒，反正轰一轰没有错，自己思想里有个宁左勿右的想法。自从这个情绪，对几个副总理摆开了阵势。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好学生，我们敬爱的周总理跟着毛主席南征北战，在早期艰苦的革命斗争中，对毛主席思想领会掌握得很好，他及时地发现了这种倾向，他一面从爱护革命小将出发支持了我们的革命行动，肯定了我们的大方向，一面指出了对于他们可以批判，但不能打倒，这是非常正确的。但对此很不理解，也就是我行我素，听了总理的指示后，我思想斗争仍是很激烈的，认为总理是代表无产阶级司令部讲话的，但我们的行动与总理的指示是相矛盾的，怎么办？结果不是不折不扣地执行而是采取实用主义手段，并千方百计地找出借口，说什么总理是国家领导人，不同于我们，说话要稳重，如果说余秋里可以打倒，那就没有什么群众运动了，为自己的错误进行辩护。后来总理再三教导我们，我不但没有认真去思考，紧跟主席思想，及时改正错误，反而受了社会上极“左”的无政府主

义思潮的影响，对总理指示采用了实用主义的态度，能接受的就接受，不能接受的就走，就自我辩解，同时以我自己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和无组织无纪律性对待总理的无产阶级革命性和科学性，结果十分错误，主观主义的认为，总理没有中央文革革命性强，没有中央文革旗帜鲜明。当时想总理是毛主席司令部的重要成员，无产阶级革命家，这是不可动摇的，但是又十分错误地认为周总理是不太坚定的，得出这个十分错误的结论后，还自以为是，就在这种错误思想影响下，在作战部的一个声明里确实把周总理是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中的“坚定的”三个字划掉了，这是我对总理错误态度的大暴露。

谭厚兰同时坚称：“关于外面大字报中的许多铁证，什么我整了总理的黑材料，这是没有任何事实根据的。“

她说：“我要就我对周总理的严重错误、对总理态度的严重错误，向总理和中央文革请罪。也希望同志们继续对我进行严肃的批判。”

她还说：“有人说，我们是‘516 兵团’的重要成员，师大‘井冈山’是‘516’的黑据点，这完全是没有根据的，在这一点，我可以向党中央向同志们负责。”

## 第928回：周恩来，接见桂联指代表　江西省，做好极“左”派工作

11月16日零点15分至2点15分，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广西“联指”赴京代表团。陪同接见的有戚本禹、黄永胜。

周恩来一进接见厅满脸笑容的说：“又叫你们来了，你们还有什么意见？上一次那位女同学来了没有？”

那位女代表向周恩来做了汇报，并做了自我批评。

周恩来说：“来了就好，不用检讨了。加革命两个字你们就高兴了。群众组织和革命组织是一样的，有时中央文件写群众组织，有时也写革命群众组织，都是一样的。这次文件也这样写了。你们那次是不是砸‘工总’了？”

代表说：“砸‘工总’主要是‘422’里面的一些主要组织砸的，开始是‘工总’的3个分部起来造反，我们有几个组织支持了他们这一行动。现在看来，不管谁，砸群众组织都是不对的。”

周恩来高兴地说：“对呀！”

代表说：“我们也有不少组织被‘422’砸了。”

周恩来：“不管哪个组织，要想吃掉别个组织是不行的。广西走资派有没有呀？过去区党委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韦国清同志、乔晓光同志应多负一些责任。当时参加‘赤卫队’的你们有没有呀？”

众答：“两派都有。”

周恩来：“以后区党委瘫痪了，部队支左。他们的领导地位

变了。后来又发生夺权斗争。”

众答：“我们大多数组织都是参加夺权斗争的。”

周恩来：“你们夺了权没有掌权，军队你们也没有结合嘛。3月以后军队掌权，当时中央想叫韦国清同志站出来，后来考虑还是叫他来北京好。军队没有经验，在支持韦国清同志问题上急了一些，”

黄永胜说：“当时我们的确急了一些。”

周恩来：“你们爱护解放军，支持解放军，就变成支持韦国清同志了。”

代表：“2月开始我们和‘422’红卫兵中的几个组织斗批韦、乔，搞了一个多月，《红旗》杂志三、四期社论发表后，我们研究了韦、乔的材料，认为乔的问题比韦的重，韦不是三反分子，所以提出支持韦国清同志站出来，深刻检查错误和革命群众一起闹革命。我们提出来以后，军区没有表态。”

黄永胜：“是的，他们提出来比我们早。”

周恩来问：“那时伍晋南到西大没有？”

代表答：“没有，伍是4月17日去的，419发表声明，进一步挑动群众斗群众，这时两派才明显的分开。”

周恩来：“啊！‘419声明’后你们才分开的。”

代表：“伍晋南说韦国清在北京遥控的！”

周恩来：“这是不对的，不仅伍晋南说，‘422’也是这样说的。当时我们留韦国清同志在北京，他也准备作检查，这个同

志很遵守纪律，他确实没有打电话回去，我们可以证明。当然，他以前的检查没有这一次这样深刻。你们两派达成《十条协议》，第二天共同开会庆祝，这是一次联合行动，反映很好，我们就批准了，本来想趁热打铁，但因为领导干部问题没有解决。关于革筹小组，你们支持韦国清同志参加，‘422’写了一封信也是同意的，今天又来了一封信，说韦国清3月以后的问题没有检查。3月以后韦国清已到北京，出现的一些问题，从领导上来说，军区应负责任，军区的检查不错嘛。”

代表汇报3至6月他们受压，检查6月以后的自卫还击中搞过了头，目前正在 “斗私，批修”提高认识。

周恩来：“广西发生的武斗，主要是走资派和坏人在挑拨，你们两派都死了一些人。从你们来说，这些问题是人民内部矛盾嘛！你们现在高姿态，在政治上就主动了嘛！你们的《十条协议》比我设想的好一些，他们说是大大毒草，这是一部分群众的激烈情绪，总想打个你死我活，以我为核心，以我为主，这是错误的。你们要冷静一些，都是工人、学生干部嘛！面临敌人，敌机还在你们那里打下来，广东可以联合，广西为什么不行？广西是不会落后的，《十条协议》是符合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你执行《十条协议》就是符合毛主席革命路线，你不执行就是不符合毛主席革命路线。现在别的问题都好谈，主要是干部问题。他们只剩下一个了。”

周恩来说：“广东形势大好，毛主席接见，你们去了没有？”

众答：“去了。”

周恩来笑着说：“广州代表今天坐飞机回去，晚上两派有几千人去机场欢迎他们，你们要赶上来。”

代表说：“昨晚我们接到主席批示后，南宁、柳州、桂林等市，都连夜开大会庆祝。”

黄永胜补充说“他们通宵达旦的游行。”

周恩来：“广西的协议和广东的协议主席是同一天批的，你们广西在京时间最长，有半年多了。伍晋南如果出来，对你们也没有什么不利之处。……他历史有问题，必须要交代，这个你们要继续调查，……参加革筹小组，大学生、中学生、工人、干部，两派各一个，还有农民，地方干部是韦国清，韦国清同志要负责小组的领导工作，还有安平生，加个伍晋南。安平生是支持你们的吗？”

代表：“我们是支持的，但安平生同志要揭发陶铸并划清界线。”

戚本禹笑着说：“他们怕安平生出问题所以有些保留。”

大家都笑了起来。

周恩来：“这个同志我们是同意他站出来的，他头脑很清醒，能做工作，他的检讨写得比乔晓光好一些。对伍晋南问题，你们要高姿态，如果‘422’没有一个领导干部，不利于大联合。”

戚本禹：“这不是一个人的问题。”

周恩来：“他们支持5个，伍、贺、霍、谢、袁，你们都要

打倒，保留一个不行吗？贺希明历史反革命分子，霍泛叛徒，谢王岗，还有什么南宁市委书记是不行了，”

众答：“袁家柯。”

周恩来：“他们只剩下一个了，给他们保留一个也好嘛。你们的意见可以保留，总得有他们的一个人。乔晓光你们两派都是要打倒的，有人说，乔晓光是刘少奇的模范干部，看来不太像，这话不知从哪里传出来的，当然他犯有错误回去好好检查，经过考验还可以工作。这个人先不说，回去检查后再说。”

代表揭发伍晋南假党员伪造历史的情况。

周恩来：“他到独立三师以前，这段历史可以进一步调查。”

代表进一步揭发伍晋南的三反罪行。周恩来见他们打倒伍晋南的态度很坚决，就问：“你们看‘422’支的领导干部还有哪个好的？”

代表说：“我们再三考虑，伍晋南的问题，不是一个人的问题，他下面还有一批黑线人物，如秦兆阳、郑天健等等。”

戚本禹惊讶的说：“秦兆阳是个大右派呀！”

周恩来：“怕什么？可以斗争批判嘛！关于革筹小组，军区方面，军区两个，欧致富、还有个新来的那位，魏什么？”

黄永胜：“魏佑铸。”

周恩来：“空7军一位……，地方干部有韦国清、安平生，再加个伍晋南，由韦国清同志负责。先把革筹小组搞起来，伍晋南一个人，你们怕什么？”

代表们还在揭发伍晋南的三反罪行。戚本禹说："你们不要说了，中央知道的比你们多，有些你们看不到的。你们给我们送来一大叠材料我们都看了，有些问题我们不好讲，我们一讲，你们又传出去。对方受不了。"

代表们还在反对，其中一名代表说："如果他出来，后患无穷。"

周恩来："他哪有这么大的本事！"

代表们说："这条战线上的斗批改，挖根都要挖到伍晋南的头上，他出来，有损于革筹小组的威信。"

周恩来："干部问题，你们再考虑考虑，如果他们换另一个人也可以，那是他们的事，但总要保留他们有一个领导干部在革筹小组嘛！"

戚本禹插话："广西文化大革命取得很大胜利，形势大好，你们要考虑考虑顾全大局。"

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不可能一次都结合好，例如北京、山西都有这种情况。新生事物出现，不可能十全十美，总会从旧的方面带来一些遗传的烙印，当然并不妨碍新生事物的发展。革委会的人不可能各方面都满意，有一些是经过考验，各方面都满意的，但是也有一些是过渡性的。就拿中国共产党来说吧，前五代的领导都有问题，这并不影响我们党的光荣、正确、伟大，……难道你们成立革筹小组就那么百分之百的完善吗？你们为一个伍晋南，花了那么大的劲，写了几本书。当然，你们很仔

细认真，搞了不少材料，花了不少力量，你们调查的材料，我们很重视，有些确实很珍贵，以后还可以继续调查嘛！”

代表们汇报发现有秘密电台，叫“解放军之声”。黄永胜说：“军区是发现有秘密电台。”

周恩来详细地询问和记录了电台的情况，严肃的说：“电台问题要认真追究。”

代表继续反映：“金城江‘422’分部转播台湾的反动广播两次，每次半小时，均被我‘联指’战士严加谴责，才被迫停止。都安也发现‘422’有电台。”

周恩来：“‘422’有坏人要由他们内部来揪，你们有没有？他们说你们有高参，你们回去整风嘛！现在‘422’的据点还没有撤吗？”

代表：“没有撤……”并继续汇报“422”搞“农管”和电台的问题。

周恩来问他们与各地“联指”的联系情况和各地的联合的情况，柳州“联指”汇报了柳州大联合的情况。

周恩来又问：“北海怎么样？”

代表汇报了北海等地的大联合情况。周恩来点头微笑，表示满意。

代表说：“他们不仅派不少人下去，还在南宁搞了一个所谓‘反迫害联络站’，把那些不安心农村劳动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和来历不明的人，有几千人集结于南宁。”

周恩来："这个情况和广州一样。青年上山下乡，这个道路是正确的，是毛主席指示的，中央也有通知，这个问题要解决，参考广州的办法。"

代表又提出批判电影《刘三姐》，周恩来说："这是要批判的，要缓一步嘛！但不是当务之急，现在广西是搞好革命的大联合和实现革命的三结合。目前解决广西两派问题的关键是成立革筹小组，革筹小组主要就是干部问题。希望你们好好考虑，如果你们一定要等，我们还是有耐心等下去的，你们来的时间最长，来了半年多了，总是要解决问题的嘛！今天下午黄永胜同志和你们谈了四个多小时，现在又谈了两个小时，你们回去好好想一想，今晚睡好觉，明天早上头脑清醒、清醒好好讨论。"

再说毛泽东 9 月离开南昌后，江西革筹小组依靠省"大联筹"大张旗鼓地学习和宣传毛泽东视察江西时的最新指示，掀起大联合高潮。但这时，江西造反派内部又杀出一支以南昌航空工业学校为首"极左派"，对省革筹小组施加压力。9 月间，省革筹小组就多次邀集极"左"派负责人座谈，并多次到南航、一中、医学院等单位与这些极"左"派的群众组织沟通，做工作。

9 月 28 日，南昌航空工业学校"极左派"组织"东方红"与该校"大联筹"下属的"井冈山"发生武斗，省革筹小组发表《严正声明》，将这次武斗的责任归结为"一小撮阶级敌人挑动起来的，责任不在广大群众。"并组织两派群众短期集训，要求他们在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下团结起来，共同对敌，把仇恨集

中在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和阶级敌人的身上，揪出幕后策划者和杀人凶手。

同时，省革筹小组及时抓住这一典型事件，旗帜鲜明地批评了省“大联筹”所属组织，对他们进行现实的政策教育，其目的就是告诫他们，今后遇到此类事件，不要用武力解决。

省革筹小组成员杨栋梁亲自到南昌航空工业学校大讲特讲毛泽东关于“左派不教育变成极左”的最新指示，使学生们很受感动。他们说：“起初我们认为程世清，杨栋梁等同志是带派性来的，感情对立。现在觉得用毛泽东思想教育我们，是对我们最大的爱护，我们和杨司令员更亲近了。”南航“东方红”自觉作了“肃清我组织中的极‘左’思潮”的检查，并且和“井冈山”都主动交出武器，基本实行了大联合，开始复课。

一中的“极左派”组织“红八团”，也敲锣打鼓向革筹小组送去检讨书。

与此同时，程世清也亲自到洪都机械厂、江西拖拉机厂等单位听取工人对形势的看法，教育工人用无产阶级思想去抵制小资产阶级思潮，坚持斗争大方向，不参加外单位的武斗。

通过省革筹小组的工作，江西的局势得到了稳定。

11 月初，革筹小组请示中央同意后，把江西省副省长黄霖作为极“左”派的后台从北京押回南昌，交给群众批判斗争。

11 月 17 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转发《江西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注意工作方法》的文件。

## 第 929 回：北京市，掀上山下乡热潮　周恩来，接见江苏省代表

1967 年 11 月中旬，北京城里秋叶落尽，大街小胡同的树枝已然是光秃秃的，几次西北风吹过，寒流来了，伸手凉冰冰的，大家都穿上棉衣。

11 月 11 日，在曲折等 10 名青年赴内蒙古插队的带动下，北京又有第二批 1200 名中学毕业生启程奔赴内蒙古草原和东北“北大荒”等边疆地区安家落户。在这批学生中，最引人注目的带头人有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委员、中学红代会常委、北师大一附中的高中毕业生何方方，文革初期中学生最著名的造反派之一。她在文革初期受到工作组的迫害，平反后，担任了学校革委会副主任、北京市中学红代会常委、市革委会委员等职。但她不安于充当抛头露面的“学生领袖”，而是奔走于内蒙包头、山西太原等地，积极参与当地的造反派活动，直到 1967 年秋才回到北京。9 月，她听说曲折等人筹备往内蒙草原插队落户的消息后，也立即行动起来，着手本校上山下乡的发起和组织工作。她认为：“当红卫兵造反的使命光荣结束后，走毛主席指引的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到边疆插队落户，是摆在自己面前的一条最为革命的道路。”在学校的一次会议上，她明确告诉大家：“准备到内蒙古牧区插队落户；在校内不进行公开动员，完全依据自愿原则，谁愿去谁报名。”同时强调草原条件非常艰苦，去了要做好吃苦的准备，要在那儿插队落户扎根一辈子。她说，“我们要做一颗红色

的种子，在内蒙古大草原生根、开花，永远同草原上的贫下中农同战斗，共呼吸。”

在何方方这样一批学生骨干的带头下，在短短几个星期里，各校报名人数达到 3500 多人。最后被批准到内蒙牧区和东北落户的有 1200 人。未获批准的学生中，有的是因为家庭确有困难，有的是因为本人身体有病，有的则因为家庭存在政治问题被淘汰，理由是边疆地区“不适合”。

11 月 16 日这天，北京市 386 名中学生起程到内蒙古草原插队。

这天一早，北京出租汽车公司的 20 辆大轿车并列在天安门广场，广场上人山人海，巨大的横幅写着“向赴内蒙古插队的革命小将致敬”。到广场来送行的人们，有同学、朋友，也有亲属，无人组织，在场者也没有校方，有的同学专程来，有的没能报上名也不甘心，自己前来送行，也有的同学是来观望、观察的。 有人带来照相机给送行的同学合影。大家告别，天安门广场没有泪水，只见嘈杂的人群，无尽的话语。

1967 年 11 月 16 日在天安门广场送行赴内蒙古插队知青

“首都汽车公司”的客车送赴内蒙古插队知青途径长安街离开北京

送行的同学们

告别同学们，互道:咱们多联系。

“瞧！这么多人送咱们，啥时候这么风光过？”

20 辆大轿车从天安门广场驶向北方，经过德胜门，行进在通向八达岭的公路上，车至昌平，就在今日昌平环岛的西边，车停了下来，北京市革委会负责人丁国钰赶来为大家送行，他简短地讲了话，部队记者给大家拍了合影。

在车上，此行的总召集人、师大女附中的同学和几个女生唱起了苏联二战歌曲《共青团之歌》:“再见吧妈妈，别难过，别悲伤，祝福我们一路平安吧。”也有人轻声地哼着《军垦站歌》主题歌:“满怀热望，满怀理想，跨山过水到边疆。伟大祖国天高地广，中华儿女志在四方。”

车队离开北京向塞北驶去。上路了，这是知识与劳动相结合的道路。

截至 1967 年底，北京市已有 4000 名六六、六七届中学毕业生自告奋勇前往东北、内蒙等地插队、插场，就是到国营农场。

11 月 17 日，是湖南知青王伯明被枪杀整整三个月，回到江永的知青找到了王伯明的尸体，当时他已被人和那天枪杀的地主富农份子一起葬在了乱草坡上。此时，王伯明的尸体已经腐烂，大家将他的白骨重新装棺，为他举行了一个迟到的葬礼。

由白水的 8 个光头男生抬着灵柩。他们先一天就商量好了，王伯明既是他们三中的学长，也是引以为表率的一位知青兄长，抬棺的事他们一定要做。8 个人一律剃了光头，衣着整齐，神情庄重，步伐一致。后面紧跟着 3000 多男女知青和自愿参加的本地人。

队伍行至江永大桥时，突然一声枪响，气氛顿时凝固。知青领队马上镇静下来，将队伍迅速调整：男生站外面，女生站里面，作好随时拼搏的准备。顷刻之后，县城里鸦雀无声。没人敢阻拦这支沉默、愤怒的队伍，观望者皆凝神静气，所有的一切为之肃穆。

就在县政府大楼空地的前边，知青们在这里挖了一个很深的墓穴安放王伯明的棺柩。为了防范以后被破坏，他们专门弄来了三吨水泥加上很多陶瓷片、糯米混合在一起，将坟的四周牢实封住。墓前立了一块石碑：上面刻着：长沙知青王伯明烈士之墓。

重回江永的知青中仍有不少人未逃脱被捆绑被殴打的命运，在“一打三反”运动中，再次成了斗争靶子，夜里和四类分子关

在一起，白天在民兵的枪押下出工。

文革后，王伯明之墓的墓顶被炸平了，碑没有了，下面的坟茔垒得扎实，岿然未动。县政府大楼门前栽种了一片花花草草，希望用美丽的鲜花来掩盖这段历史的伤痕。

11 月 16 日下午，南京地区军队院校、文体单位告状团 23 人在南京浦口会合，赴京告状。南京军区司政后三大部机关“平反组”各派 2 至 3 位代表参加，有司令部张破涛、高国涛，政治部艾汉美、陈时秋、陈荣安，后勤部赵玉祥、沈文琛。

他们于 11 月 17 日抵达北京，在建设部招待所住下。尽管怀着强烈的告状愿望，但面对这偌大的北京城，到哪里寻找告状的门？第一天，他们毫无进展。

18 日下午，他们得到一个重要的消息：当天晚上，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接见江苏省军管会负责人及江苏各派头头，这对他们来说，无疑是一次机会。吃罢晚饭，他们全体集合，直奔人民大会堂。

由于他们不是与会人员，不能进入人民大会堂，只能在人民大会堂的警戒线外等候。

警戒线距大会堂 100 多米，即使周恩来总理来了，他们也见不到，岂不是白等一场。怎么办？

急中生智。大家一商量，决定仿效古人“击鼓申冤”的办法，站成两排，做好准备，全神关注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的到来。晚上将近 21 时，人民大会堂南门处，接连驶来了好几部黑色小轿

车。他们判断：是周恩来等中央首长到了。于是，按照事先商定的办法，在李英武喊出："一、二、三"的口令后，大家立即齐声高呼：

"我们要求见首长！"

"我们要求见首长！！"

"我们要求见首长！！"

……

如此连声高呼，一声高过一声，连续呼喊了七、八句，果然惊动了周恩来，他下车后，转过身来朝这些军人站立的地方看了看，对秘书说："派人去问问情况"。

接着，一位军队干部来到他们跟前说："我是杨代总参谋长身边的工作人员，你们是从哪里来的？有什么要求？"

来人是杨成武的秘书，当他了解到这些人是南京军区司、政、后及南京军事院校的上访人员后，就转身回去了。此时此刻，这翘首盼望佳音的 20 多颗心，简直快要"蹦"出来了。

不一会儿，杨成武的秘书又来了。他笑眯眯地对大家说："总理同意接见你们，你们把人数、名单报上来"。

这一喜出望外的佳音，让赴京告状团的人难以置信，没有想到这一佳音来得这样快！来得这样及时！大家高兴地又蹦又跳，又喊又叫，又唱又笑！振臂高呼："毛主席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感谢总理接见"！"向总理致敬！"

南京军区总医院 8 个小护士，都不满 18 岁，在南京军区总

医院护校学习，她们出于革命热情，成立了战斗队，起来造了反。《军委八条》发布后，全部被逮捕关押。她们中张阿凤，童静芬、蒋黎黎、夏蓓蓓 4 人参加了告状团。4 个小姑娘对共产党解放军怀有深厚感情，听到周恩来接见，相互拥抱，哭成一团。

他们立即把当晚在场的人数和名单报给杨成武的秘书："实到人数 21 人。另有陈时秋临时有病未到，高国涛因其他事而缺席。"

他们上报名单后，杨成武的秘书带领他们进入人民大会堂。到了大厅，一眼看到仰望已久的周恩来，在座的还有康生、张春桥、杨成武、余立金。

大厅里，参加接见的有许多是在江苏省军管会工作的军队人员，例如：江苏省军区政委梁辑卿，南京军区政治部群工部部长杜方平，南京军区后勤部副部长吴大胜，以及军训部部长蒋科等人，他们不约而同地把目光投向这些军人，那是些各种不同的表情和反映：有的笑脸相迎；有的喜形相见；有的冷眼以对；个别是怒目仇视。

当晚21时，周恩来、康生、张春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安徽厅接见江苏赴京代表团。

周恩来："很久未见你们了。"

康生："同志们！好久没有见面了，同志们好吗？"

众答："好！"

康生："这一次到北京来很幸福，见到毛主席了。你们见到

几次？”

众答：“两次。”

康生：“好多人一辈子没有见过毛主席，你们两个月就见了两次，你们高兴不高兴？”

众：“高兴！毛主席万岁！”

康生：“你们见到了毛主席，但有个问题呀！”

周恩来：“没联合起来。”

康生：“是呀！怎样执行主席的最新指示？不然，再见到主席，主席问你们两次见了我，对我的指示怎么样？怎么联合呀？你们怎么回答？所以，今天晚上主要是听同志们谈谈怎样学习主席最新指示，怎样实现的。现在大好形势，江苏也不例外。你们是怎么准备的？什么时候实现革命的大联合，你们代表团能不能达成大联合的协议？你们怎么打算的？还有自我批评，还有干部问题。来了两个月了，今后打算怎么办？还是回去学习，将来再来呢？还是在这里联合？今天晚上不是来听你们打‘内战’，你骂我，我骂你，你攻我，我攻你……”

周恩来：“那听得不少了，听够啰。”

康生：“要向前看，怎么执行主席的指示，在这个问题上今后怎么打算，怎么搞法？不要辜负毛主席的两次接见。今天想听听同志们的意见。”他对张春桥说：“张政委，是不是这样？”

周恩来、张春桥对代表们说：“听你们的。”

康生：“江苏，特别是南京文化大革命发动比较早，南京大

学搞匡亚明问题那是几号？”

有人答：“6月2日。”

康生：“是去年6月2日。那个时候，四个学校比较早，北京大学、南京大学、西安交大、河南郑州大学。现在北京早解决了，郑州也解决了，就乘下陕西、江苏。你们开始的很早，但问题解决得比较迟。”

张春桥：“南京的工人运动比较早，常州、苏州工人运动也比较早。”

康生：“河南要成立革命委员会了，河南工人要成立工代会，江苏南京要急起直追，也可能后来居上。本来去年12月份形势很好，是有希望的，后来你们打内战，一直打到现在。”

周恩来：“南京工人运动比北京早。”

张春桥：“工人组织成立比上海早两天，迟批准一天。”

周恩来：“许家屯打电话的嘛！葛忠龙来了吗？在不在？”

南京大学的葛忠龙起立答：“来了。”

周恩来：“曾邦元来了吗？”

曾邦元起立答：“在。”

康生：“文凤来呢？”

文凤来起立答：“来了。”

康生：“是老朋友了，见的最早了。”

周恩来又问：“张建山怎么没有来？”

文凤来答：“没有来，他被打伤了，住在医院里。”

江苏“东方红”代表：“他现在在家里作报告哩。”

周恩来：“什么时候受的伤？”

有人答：“10月3、4日。”

周恩来：“现在怎么样？”

有人答：“刚出院。”

周恩来：“那是内战啰！确确实实的内战。”

康生：“那就多了，一个礼拜也讲不完。现在主要研究怎么搞法。当然我知道你们有一些问题要反映，要解决。军区有些同志来了，在门口说要见首长。我们是什么首长啊？见见罢。当然，大家要说的话很多嘛，可是今天要抓住最主要问题，如何搞好大联合，同志们赞成不赞成？”

众：“赞成。”

康生：“现在有些地方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已在考虑建党问题，整党问题，恢复党的生活问题，准备召开‘九大’的问题。人家在干这些事，运动已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了，你们要急起直追。”

周恩来：“南大还没有复课？”

曾邦元答：“有些系，有些班级复课了。”

周恩来：“是联合复课的吗？”

曾邦元答：“还没有联合。”

康生：“现在请你们开始谈。”

江苏“新工总”的南电“红总”钱鸿森首先发言。周恩来问：

“你是哪个‘工总’的？”

钱鸿森答：“我是江苏‘工总’。”

周恩来：“你们江苏‘工总’有什么差别？陈克兴呐？”

钱鸿森答：“他是老‘工总’的。”

周恩来：“新老‘工总’都是一个工人阶级嘛。”

康生：“工人阶级应该联合起来嘛！”

周恩来：“应该带头！”

钱鸿森和“老工总”代表朱士吾表示一定联合起来。

康生：“我等着你们联合起来向毛主席报喜。”

周恩来：“两广的工人运动发动的比较晚，现在联合比较好。广州工人联合起来，开了十几万人大会。广西工人也联合了，你们江苏是落后了。”

文凤来说：“我们是落后了。”

周恩来对文凤来说：“你们不要干涉他们，包括你在内，你不干涉他们，让他们自己搞，你又不是工人。”

文凤来答：“我们没有干预。”

周恩来：“你不点头，他们能联合吗？”

文凤来答：“我们过去有错误。”

康生：“文凤来，这样就好了，我过去支持过你，现在还保护你。”

钱鸿森继续汇报。接着，文凤来检查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错误，康生说：“对了，南京的同志第一个上天安门的是你，是去

年8月18日。”

周恩来问：“从三•五到现在，你们批判走资派的东西有多少？”

文凤来答：“也写了一些，对刘邓的东西主要是转抄的，对江渭清的批判也不够，对刘少奇在盐阜地区的罪行做了些调查。”

康生：“你们对匡亚明批判的怎么样？”

文凤来答：“没有很好批判。”

康生：“这个人很坏，很不简单，写过好多书，你们要批判。如果你们批判的话，我还可以帮助你们一点。你们一搞匡亚明的时候，我就说可以登报。他还给我一封信，说小将说话不算数，说学术权威还没有讲话哩！这个人的问题很多，他还自首过。无论思想上，组织上，你们批判他很有油水。文化大革命一起来，镇压你们，不是偶然的，我认为是很正常的。”

周恩来问文凤来：“军管会大楼是不是你们占了？”

文凤来答：“没有。”

周恩来：“联络员说有嘛，还有揪许站也是你们的吧？”

文凤来答：“已经撤了。”

曾邦元问：“‘红四联’住在里面没有？对中央首长老实一些。”

文凤来答：“只占了几天。”

葛忠龙：“我们是被‘827’打出来的，去军管会解决问题的。”

曾邦元汇报，谈到《九•四协议》后，武器没很好收交时，周恩来问南京武器收交情况，张春桥说：“收交情况不好。”

杜平答：“收得很少。”

“促联”代表：“只上交了百分之十五左右。”

“好派”代表姜继敏：“有的不但不收，军管会还在发枪。”

周恩来问“好派”：“你们封存了吗？”

“好派”有人答：“封存了。”

周恩来追问：“是不是封存了？”

“好派”有人答：“我们查一查。”

曾邦元插话：“在总理面前应该讲老实话。”

姜继敏说：“10月7日，我们港务局的船到上海经大桥时，大桥开了3枪。”

康生：“要讲怨气，大家都有，要多做自我批评，多谈谈这方面的问题，有没有联合的可能？”

曾邦元倡议南京大学的曾邦元、文凤来、张建山、袁服武都回学校，周恩来赞赏说：“对了，这个意见很好！你们都回去复课闹革命。文凤来、葛忠龙你们同意不同意？”

葛忠龙答：“我同意。”

文凤来答：“我坚决同意。”

周恩来：“你们一同回去。曾邦元同志，在南大你们是多数派嘛，你们要欢迎他们回去，回去不要打啰。”

又对文凤来说：“你们不要带枪回去。回去以后批判匡亚明，

批判江渭清、彭冲，这是你们自己的事。江苏要搞的人多呢，应搞出一点成效来。工人让他们自己搞，电子管厂的工人要带头联合起来，你们同意不同意？”

众：“同意。”

接着又有几个代表分别作了汇报。最后，康生说：“落实一下，刚才总理讲了，希望你们南京工人阶级联合起来，‘新工总’，‘老工总’，‘促联’的工人，都在北京达成一个协议。你们是代表嘛！你们能不能达成协议？”

众答：“能。”

此时已是深夜24时30分，康生说：“今天晚上其他地区不能再谈了，各地区，无锡也好，常州也好，希望准备一下，下次讲时扼要地讲，根据主席指示讲。总理讲向前看嘛，中心问题就是如何实现毛主席的伟大指示，搞大联合。”

周恩来：“刚才军区来的21位同志在门口要求接见，我们准你们进来了，但要告诉你们一条，你们有意见可以到军队会议上提，但不能到地方去串联，不能把它带到地方上去扩散。军事院校的同志应该回去搞斗批改，你们到处扩散就不好。军区，军事院校不干涉地方，地方也不介入军队，这是军队的事情。中央早有指示了。”

南京军区告状团：“我们要求参加京西宾馆的会议。”

周恩来：“我刚才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参加军区的会议，有意见在那个会议上提，你们要守纪律。你们遵守不遵守呀？”

答：“遵守，坚决执行总理指示。”

11 月 21 日，总理秘书孙岳通知南京军区告状团的代表：“南京军区 21 名代表作为特许代表留京。”同时告知：“代表不经中央同意不得增加任何一人。”

11 月 24 下午 15 时至午夜 12 时 50 分，告状团到京西宾馆找到杜平。杜平坚决不承认告状团 21 位代表具有参加中央解决南京军区问题的京西会议的权利。代表们向他提问题，他一言不发，最后干脆趴在桌上假装睡觉。大家认为这是许世友的态度，杜平不得不做出这种姿态。

后来，总理秘书孙岳对他们说，“你们平时最好不要到京西宾馆去。”

11 月下旬，周恩来亲自筹划、布置“解决南京军区问题学习班”的有关事宜，由军委办事组具体组织落实。

南京军区在家主持工作的副司令员王必成、副政委鲍先志接到军委办事组通知：上北京参加学习班。

南京军区政治部副秘书长孙海云、组织部副部长赵树湘，也被军委办事组点名上北京参加学习班。

## 第 930 回：告破案，“中央□常委员会”　第八次，接见广西代表团

“中共中央非常委员会”一案自“108 专案组”成立后，一个月过去了，陈伯达没有再召开过专案组会议。

后来，周恩来听到公安部的一个人讲，“非常委员会”有个宝塔型的组织，涉及到朱德、陈毅等人。于是他对陈伯达说：“对公安部的这份材料，你为什么不开会呀？这份材料究竟是真还是假呀？毛主席一直等着破案的情况，你们怎么这样对待毛主席交给的任务呢？”

就在这个时候，11 月 20 日，接天津市公安局报告，说“108”案的作案分子找到了，对原稿笔迹和作案工具进行了鉴定，证实那个传单就是这个人搞的。

原来，“108 专案组”成立后，首先对案情进行了分析：

这份传单是用 16 开油光纸油印的，写信人对解放后中国共产党的内外政策，特别是对中国的外交政策，进行了全面的指责，希望蒋介石反攻大陆。

传单刻印以后，用《人民日报》包封，在封面上用油光纸再包一层，用钢笔写上收信的机关、学校、团体、工厂的名字，投邮寄出。

根据掌握的材料，公安部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了侦破工作：

1、调查包传单用的《人民日报》报纸的印刷地点，查明是属北京印刷的。因为《人民日报》在北京印的，只发天津、河北、

河南等十个省、市。其他较远的省、市、自治区，是用飞机送版由当地印刷发行。根据这一点，就把侦察范围缩小到天津等十个省、市。公安部当即通知在这十个省市进行调查，查了好久，没有结果。他们又到《人民日报》印刷厂，经仔细鉴定，最后确定包传单的《人民日报》是天津的。因为印发这十个省市的报纸，谁负责印发都标有记号，以备检查。这样，又把侦察范围进一步缩小到天津。

2、对油光纸产地的调查。经研究纸张的专家们化验鉴定，认定油印传单的油光纸和包传单的油光纸是天津造纸厂生产的。

3、对书写墨水的调查。请研究墨水的专家鉴定，墨水是天津产的。

4、邮筒调查。向邮局有关人员调查，从盖邮戳的时间上看，此信是白天投的，投递路线，是从东城区国际饭店开始往北南口开始投邮，沿路到纺织工业部西侧，横穿东长安街，进入南河沿街，到东华门街往东经和平宾馆，再转东单北大街南行，转到外交部街，然后转回来继续南行到东单，再由东单到北京火车站。沿途见到邮筒就投一、二封。案发后专案组共收回 48 封，其中有一封投到设有警卫的外交部门内的邮筒。破案后审讯，罪犯供认在京一共投了 54 封，还有 6 封因收信人怕惹是非，把它烧了。

5、发动群众辨认笔迹。公安部将传单的字迹复印出来，发到有关省、市、自治区，特别发到北京、天津两市公安机关，要他们通过机关、学校、工厂、企业的保卫组织、派出所、治保组

织、居民委员会，把字迹发下去，要群众辨认。与此同时，要求各级公安保卫组织、派出所、治保会，从他们掌握的五类分子、劳改分子、重点人口等管辖视线之内分子的档案中查对笔迹。这个时间大约搞了 20 多天。在这期间，公安部还特别督促天津市公安机关，要他们深入发动群众，发现作案线索。还告诉他们特别要在受过专政机关打击、文化程度较高、有写作能力的人中间去查找线索。根据当时掌握的材料，这个案子发生在天津的可能性很大，因为许多证据都与天津有联系。

接到天津公安局的报告后，陈伯达立即召集天津市领导和天津市公安局的人到北京汇报，谢富治、吴法宪、于桑等有关负责人参加了这次汇报会议。

天津公安局汇报了“108”案情的侦破情况：

天津市和平区有个派出所在发动群众辨认字迹提供线索时，有个群众看了字迹后检举，这个案子可能是煤球工厂工人沈剑云干的。与此同时，派出所在查档案字迹中，也发现传单字迹与沈剑云的字迹很相像。

经过技术鉴定，确定的确是沈剑云的字迹，公安机关立即逮捕了沈剑云。经过审讯，沈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沈剑云，50 岁，天津人，家庭出身地主，大学文化程度，捕前在一个煤球厂摇煤球，是煤球工人。沈剑云在解放前受过国民党宪兵训练，在青岛市当过宪兵，思想很反动。青岛解放前，偷跑回天津隐蔽身份。解放后，混入天津市人民法院任书记员。

1957 年反右派斗争时被查了出来，受到管制，后被送到煤球厂当工人。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未见异常表现，因为他平常在厂里不多说话，也不活跃。文革初期秩序混乱，他一直呆在家中不出来。

审讯员问："为什么要写这个东西？"

"文化大革命这样乱糟糟的，共产党的天下长不了，我要另找出路。"沈剑云回答。

"另找出路是什么意思？"

"我写了这份传单，用的是共产党的口吻，因为利用'中国共产党中央非常委员会'的名义将传单散发出去，就会在社会上制造混乱，引起反响。因此就下决心，找材料写了那份传单，是我自己起草、自己刻印、自己投邮的。一共印了 54 份。我于 10 月 7 日印好，10 月 8 日用塑料袋装好，早晨 5 点钟从天津乘火车到达北京永定门车站，下火车后即沿前门大街走到前门楼，向东拐到六国饭店那条街，开始挨着邮筒投邮，一直到北京火车站。投后坐车到了丰台一个亲戚家吃饭，然后坐火车回到天津。"

"你在天津作案，为什么要到北京来投递呢？"

"在北京投递，可以引开公安机关破案的视线。"

"你还写过什么东西？"

"还写了一封《告全国同胞书》的广播稿，此稿不到一万字。主要内容也是攻击共产党，希望蒋介石回来统治大陆。"

沈剑云还告诉他 20 多岁的儿子说："我可能要遭逮捕枪毙，

你要把这个东西藏到家中墙壁里面，等国民党快要回来时，就取出来向全国广播。作为欢迎国军的见面礼，你就可能成为国民党的有功之臣，弄个一官半职。此事要严守秘密，这是关系你后半生的前途问题。”

在逮捕沈剑云时，公安部门搜查了他的家，查获了他作案用的钢版、铁笔、油印机、包信用的《人民日报》和剩下的油光纸等物。沈剑云供出“告全国同胞书”之后，又去他家搜查，在墙壁里把《告全国同胞书》搜了出来。

作案的人是个工人，传单从书写、油印，到来北京将 80 份传单分别投入外交部街附近的邮筒，始终是他一个人所为。经鉴定，可以证实这一点。

听完汇报，陈伯达不相信，他怀疑地说：“一个工人，能写出这样的传单来吗？一定还有后台，要往上追，追到谁就是谁。传单上说，有一个人可以出来收拾残局，这个人究竟是谁？你们应当挖一挖嘛。”

天津市负责人解学恭问：“你们认为这个人是谁呢？”

谢富治回答说：“还不是‘刘、邓司令部’的人。”

听到这里，吴法宪对陈伯达和谢富治说：“你们要说清楚，不说清楚，人家搞不明白。”然后他解释说：“陈伯达同志的意思是要你们查一下，有没有刘、邓家里的工作人员插手这件事。”

“非常委员会”专案组的第二次工作会议结束了。由于中央领导不相信一个煤球工人能写出那样的反革命信件，怀疑背后有

人指使沈剑云起草的或是别人起草后要他刻印散发的，专案组再提沈剑云，问他：

“你对共产党政策不熟悉，怎么能够全面攻击共产党政策，特别是我国的外交政策呢？”

沈剑云说，自己平时很注意看报纸，搜集资料，有些事件对他影响很深。他在文革中搜集了 1000 多份各种小报。他写的东西小报里面和报纸上都有，只要他用自己的观点，就可以写出来。

公安机关在搜查沈剑云家时，确实搜出了 1000 多张小报。

为核实该传单是否沈剑云亲自所写，专案组要他在监狱里默写一份。沈剑云只用一天时间就写出来了。写的问题只有 5、6 个问题没有写出，其余 100 多个问题与传单内容基本上是一致的，当然在文字有出入，传单有一万多字，默写只有八、九千字。

专案组追问沈剑云为何到外交部门口内那个邮筒去投那份传单时，沈剑云坚决否认。他说：“北京我不熟悉，外交部究竟在那里，我根本不知道。”

经过再三追问，他都不承认在外交部门口邮筒投邮之事。当问他在外交部有没有认识的人时，他说没有。

专案组反复调查，沈剑云的口供属实。投在外交部门口那份传单如何解释呢？为此他们又去找邮局的人研究，结果是把邮戳盖错了。东单北大街邮筒的戳与外交部门口邮筒的戳都放一块，盖戳的人顺手把外交部邮筒的戳盖上去了。专案组又问盖戳的人，他说每天盖戳很多，记不太清楚了，但他也没有否认盖错邮

戳的事实。专案组又反复查证每个邮筒盖的戳，结果发现东单北大街有个邮筒的戳没有，而沈剑云又承认他在那个邮筒投过传单，这样，专案组确信盖错邮戳是事实了。因此可以最后将沈剑云与外交部的关系落实清楚了。

此案经过一个多月的侦破，掌握了确切的证据，逮捕、拘留了人犯，于桑等人认为侦破工作可以结案处理了。于是写了结案报告，在报告中提出：沈犯是反革命首恶必须依法严惩，对其他人犯根据罪行，有的判刑、有的释放，结束此案。

谁知报告上去之后，陈伯达却摇头："我不相信这件事就那么简单，肯定有后台！"

在接见专案组人员时，陈伯达说："这个案子不算破，不能结束。查出沈犯只是这个案子的起点，还要深追后台，不查出后台不算破。"

谢富治也同意陈伯达的观点。

于是，于桑带领专案组又继续工作，追找后台。他们再三审问沈剑云，他承认只是他一人作案。坚决否认有人指使他作案。办案人员又把沈剑云平时接触的人，一个一个的做了调查了解。无论是党内党外，始终没有发现后台的线索。他们又把调查状况，如实向上面报告后，陈伯达、谢富治等人批评他们右倾。下令解散"108 专案组"，另外组织了有军代表参加的专案组，由公安部领导小组成员，原空 8 军副军长赵登程负责，继续深入追查后台。

11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下发《关于广西问题的决定》。11月19日，周恩来第八次接见广西两派赴京代表团。陪同接见的有陈伯达、康生、江青、戚本禹、姚文元、谢富治、杨成武、黄永胜、韦国清、刘兴元、吴法宪等人。

周恩来宣布："中央决定建立广西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有韦国清、欧致富、魏佑铸、孙风璋、焦洪元、郝忠云、王斌、安平生、伍晋南等9人，由韦国清同志负责，群众组织中央文件就没有写进去，工人如果多一点，可以各派两人，大学生一人，中学生一人，机关干部一人，贫下中农一人，共各派6人。如果多一点，可以7人。除了革筹小组以外，在未召开各种代表会议之前，可以组织像协商会议那样形式的会议。使领导同志知道大家意见，互相之间的意见，容易统一，打破过去死气沉沉的局面。在桂林'老多'是占多数的，但还有少数，少数也要有政治地位，你们要承认他们，你们至少吸收10名以上'联指'的成员，才算在北京学到一点毛泽东思想。"

周恩来特别强调和肯定："'广西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指挥部'和广西'4.22'两派都是革命群众组织。本来都是造反出来的，后来分成了两派。'4.22'受军区压了，走上了激进，结合了一些走资派和坏人，比如历史反革命分子贺希明，大叛徒霍泛，敌情观念不强。'联指'的发展很快，其中也吸收了过去一些有保守思想的群众。'联指'支持解放军是对的，支持三支两军工

作是好的，在8月武斗大打以后，‘联指’发现错误就尽量努力在许多事情上，促进了大联合。”

周恩来特别批评了：“广西‘4.22’你们敌情观念不强，在你们内部暗藏有坏人，如贺希明、霍泛，还有啰。你们开始使用报话机，发展到用无线电台，嘀嘀哒哒的，从明码发展到密码，这是犯法的，你们的密码也太不高明。你们搞秘密电台，敌人也会用秘密电台，或者利用你们的据点，搞秘密电台，这些电台可以发到美国第七舰队，港澳、越南等，那就无法辨别了。你们吵架的事，也会让敌人知道，这是违法的，过去做了有的是无知，如果你们不检查，这种实际上就是反革命活动，那么做这件事的头子可能就是反革命。‘4.22’你们把援越的炮弹都抢了，你们和坏干部结合。这三点应当好好检查。”

杨成武插话：“前几天还发现广西有电台活动，当然不一定是你们的，是否敌人的还要查。”

周恩来：“还有切断电线、拦截火车是犯法的。”

接见一结束，晚 20 时，广西革筹小组韦国清、欧致富、魏佑铸、孙凤章、焦红光、郝忠云、伍晋南、安平生在北京京西宾馆举行第一次会议。

## 第 931 回：说浙江，再接见桂、□代表　看徐州，□□江实现联合

11 月，军委办事组又增补二炮政委李天焕、民航总局政委刘锦平二人为小组成员。11 月 21 日，军委办事组政工组成立，由刘锦平负责。

中央文革办事组 11 月编印的《快报》第 5510 期上登载《南萍和陈励耘同志在联合“红暴”派问题上发生分歧》的材料。材料中说，11 月 16 日，浙江省军管会讨论革命大联合问题时，20 军政委南萍和空 5 军政委陈励耘在是否联合“红暴”问题上发生分歧。南萍认为，对犯错误的革命造反派组织，要采取团结、教育的方针，浙大“红暴”、“医大兵团”等是犯了错误的老造反派，现在愿意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就应该联合他们，再不能采取分化瓦解的办法了。陈励耘认为，浙大“红暴”、“医大兵团”等组织犯了方向、路线错误，现在还没有改正，为了保持造反派的纯洁，不能和他们搞联合，要顶得住。

11 月 21 日，姚文元将这篇材料报送毛泽东时写道：“我觉得两种意见中，似以南萍一方的意见较为符合主席的路线与政策；对‘红暴’派采取一概排斥、拒绝联合的方针，则是不利的。”

22 日，毛泽东在这篇材料上批示：“林彪、恩来同志阅。浙江的红暴，与湖北的百万雄师不同，是个犯过错误的老造反派，有许多群众，似宜同意姚文元同志意见，以帮助，批评，联合为原则。究应如何，请讨论酌处。”

11月18日，广西桂林市“联指”民兵师占领桂林市委机关大院。这个“民兵师”成立于10月底，约5000多人，由复员、转业军人组成，下设司令部、政治部、后勤部、五个团和一个独立营。师长为市一建工人孙忠禄、政委是综合电机厂工人袁国湘、参谋长是市体委干部卢向平。

11 月 22 日，桂林“造反大军”共 3 万人，在市体育场召开“强烈抗议桂林‘联指’破坏《十条协议》的大会”。会后举行示威游行，途经“联指”占领的市委大院南面围墙时，游行队伍中有数人被“联指”从墙内扔出的砖块打伤，顿时队伍起哄。一些人涌进了支持“联指”的地方部队九九分队驻地，想通过九九分队翻墙冲进市委机关内。被九九分队武装人员阻拦。

游行队伍进入警戒线后，九九分队有的战士开枪射击，当场打死机床厂王占金、二运公司赵巧苟、毛巾厂刘锡光 3 人，打伤数人，游行队伍迅速撤离现场。

事件发生后，6955 部队很快赶到现场，将九九分队人员撤到奇峰镇 6955 部队驻地办学习班，避免了事态的发展。”

11月23日零时15分，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广西两派赴京代表团的核心小组。陪同接见的有戚本禹、余立金、韦国清。

“422”首先表示：“总理，说‘联指’是革命群众组织，我们还有些活思想。‘联指’有不少是保守的。”

周恩来批评说：“你们两派评价对等，中央文件已经定了，两派都是革命群众组织，你们还争什么？要争那只好回去争，谁

不执行协议，我们就要通报。‘422’我什么都讲了，还有什么没讲呢？‘422’也是革命群众组织嘛！桂林‘老多’造反精神旺些。军区错了，现在改了就行了嘛！”

戚本禹：“中央定了两派都是革命群众组织，不能说谁是老保。造反派也不是固定不变的，今天是造反派，明天你不执行中央指示，就要变成老保。左派不是世袭的，要看行动。”

“联指”代表提出：“‘422’在八次接见后要‘联指’紧跟‘422’。”

周恩来说：“提出要紧跟‘422’这个口号是不对的，要‘联指’承认是老保才能联合也是不对的。”

“422”代表提出：“我们对‘联指’要区别对待。如‘红色监察’在‘联指’起很大作用。”

周恩来：“‘红色监察’只有38个人，为什么这么可怕呢？”

“422”：“因为他们是专政机关。”

全场大笑。周恩来笑着说：“监委是党委机关嘛！”他指着刚才发言的“422”代表说：“你们也是党委机关的嘛！怎么是专政机关呢？”

“422”：“这个组织在群众之中是很可怕的！”

周恩来不解的问：“怎么可怕呢？”

“422”：“因为他是管运动后期划右派的！”

周恩来：“‘红色监察’能那么大？监委是党委机关，又不是专政机关，早就瘫痪了嘛！他们是‘红色监察’，你们有‘倒

海翻江’，两派可以协商嘛！这样一个问题，完全可以按《十条协议》解决嘛，还叫我来判断？！两派回去搞大联合，问题就解决了嘛！”

“422”要求解散自治区党委群众接待站。周恩来对“422”说：“你管那么多干什么！你们要吵，回去吵，你们在座的都吵，回去还能联合？！”

“422”承认了自己不对。

接见完广西代表，周恩来又于当日凌晨 2 时至 3 时 45 分，在人民大会堂单方面接见黑龙江“炮轰派”代表范正美等 10 人。接见时在座的还有中央赴哈调查团史一民部长。

周恩来说：“黑龙江革命委员会已经成立10个月了，为什么黑龙江的阶级斗争还在继续进行，两派斗争还这么激烈？不在于你们两方面的青年人，工人群众，而在于后面。你们怎么不指那儿？要找根子。

9.28我主要讲黑龙江的问题要好好革命，搞谈判，你们当时都响应，但过了50多天，为什么对揭开阶级斗争盖子不去研究？这样大的问题，你们两派就是不听，根子找不到，阶级分析就不起作用。你们抓叛徒，哈尔滨有多少成绩？说来说去就是赵去非。连赵去非你们报的材料还没有我掌握的多。要大做基本功，要埋头苦干。东北的社会渣滓可多了，你们完全不觉悟这个东西。你们开始搞的太顺利了，就不会有曲折吗？一帆风顺怎么能行？你们黑龙江为什么到北京来补课？就是因为你们过去太顺利了，

‘八八团’一下子就垮了。‘八八团’为什么垮了？就是因为他们和‘战备军’、‘红旗军’站到一起，所以站不住。‘八八团’虽然垮了，但是他们的思想还存在，所以钻入你们两派里来了。你们哈尔滨忘掉了敌人，就要引起更大的乱子。

你们两派群众都是革命造反派，两个组织都是造反派组织。希望你们两派头头不要领错路。”

“你们想得到中央支持把他们压垮，我们不会支持你们把他们压垮，也不会支持他们把你们压垮。这是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在视察华北、华南时都讲了这个问题。浙江两派打得不可开交，能不支持一派，反对一派？主席说：不能，它不是像武汉‘百万雄师’那种情形。你们是少数，我们保护你们，这是应该的，但是要想让中央支持你们把对方压垮，就是办不到的。我跟你们亮底，这不是我的底，这是主席的底。现在你们打内战，首先在学生中发生这种现象，逍遥派增加，像军工、工大、师院都有逍遥派。农院也有吧？师院打了之后，不愿在学校待，现在群众都站到你们那边去了么？逍遥派在你们大学大大增加，一定影响中学不上课，不搞斗、批、改，不做调查研究。要下苦功夫，要做基本功。

我是两方面都说，当你们面多批评你们，当他们面多批评他们。我当你们面说他们，那不挑动群众斗群众？我不会当你们面说他们不好，给你们资本回去贴大字报，我不给你们资本，也不给他们资本。”

“炮轰派”代表说：“潘、汪还把我们当逆流打。”

周恩来说：“让你们两派达成协议，还能把你们当成逆流？！你们订协议不能加尾巴，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他们再压你们，他们就要犯大错误。”

“炮轰派”代表说：“三代会是他们‘捍联总’的派性组织，我们认为‘三大总部’和三代会联合起来好，他们不同意，都要我们归队，这是潘复生、汪家道同志的指导思想。”

周恩来说：“联合起来好，可以不叫什么代会，什么总部，另叫别的什么。”

“炮轰派”代表说：“黑龙江‘炮轰派’被压得很厉害，我们回去10个有9个被抓起来，我们代表有几个没有被抓过？冯昭蓬、穆国兴都是总理要出来的。”

周恩来说：“你们不是说对真理有信心吗？”

周恩来一再强调，要加强敌情观点，加强对敌斗争。他说：“你们东北面临着苏修、蒙修、朝修，内部还有坏人，伪满时代你们那儿有很多白俄，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东北多少年了，东北军阀一大堆，还有国民党特务、美国特务、苏修特务，东北的社会渣滓可多了。

现在你们全面搞一个协议才能回去，面向主要敌人。国外敌人、国内敌人、地富反坏右，特别是特务。公检法系统，除了军工给我一点材料以后再也没有，还想了解，内战不要搞。‘捍联总’也好，‘炮轰派’也好，都是跨行业组织。要全面从毛泽东

思想学习班搞起，斗私，批修，按系统联合。‘捍联总’、‘炮轰派’逐步取消。”

“现在已经是八点钟的太阳了，你们黑龙江还停留在曙光里呢！自己想办法争取积极因素，不要中央、别人扶植。”

11 月 24 日，广西代表团按照周恩来的指示，当日返回南宁。下午 15 时，广西革筹小组韦国清、欧致富、魏佑铸、孙凤章、焦红光、郝忠云和两派赴京代表团、各军分区负责人乘专机到达南宁，南宁的革筹小组成员王斌和广西两派与驻军数千人到机场欢迎。

11月23日晚，中央要求上海搞一个九大党章草稿。接到通知的当天，上海立即召开有部分革委会成员参加的会议。11月25日，张春桥在上海市委扩大会议上谈了准备九大党章草稿的事情，他说：

一、成立一个党章修改小组，由张春桥、姚文元、徐景贤三人负责，今天就开始工作。

二、革命委员会抽调二百多人，在修改小组的领导下，分别到工厂、公社、机关、学校、连队、商店、街道等单位进行调查，组成四十多个调查组，与那里的群众相结合成立一个修改小组，这四十个修改小组要拿出四十个九大党章修改的方案。

三、由三军、工总司、红代会自己选择一个单位，在那里发动群众，修改党章，现在七十多个单位报名了。

张春桥说：“这样有修改小组拿出 40 本修改党章方案，又加

上三军、工总司、红代会等 70 本，那加起来就有 110 本，我们就可以从这 110 本进行综合，写成一本九大的党章报告，这样交给中央，由中央再进行汇总，哪些可以吸收的，中央再把草案发给全国进行讨论，全国可以修改讨论，经过反复讨论就可以比较完善，在九大通过以后，就成为我们的纲领，大家坚决遵照执行。”

11 月 27 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发出《中央关于征询对召开“九大”的意见的通报》。这份《通报》稿是周恩来等于 11 月 21 日送审的，汇集了中央 10 月 21 日发出《关于征询对“九大”问题意见的通知》后的第一批反映。

毛泽东审阅修改后，删去稿中“大树特树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大树特树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绝对权威”，并批注：“这两句不要。”还删去“‘九大’要大力宣传林副主席是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和好学生”一句中“和好学生”四个字，批示：“删掉了几句。请林彪同志阅后，退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

根据王效禹的指示，徐州“支左指挥部”和“踢派”组织于9月至12月间4次派专列去上海接“支派”成员回徐州。上海方面也停止接待“支派”成员。在这种情况下，进入10 月以后，徐州电机厂工人以韩登云、段玉成及朱成明、杨炳坤等人为首的一部分“支派”成员陆续返回徐州。但大多数“支派”骨干不愿返回徐州，他们转向南京为大本营，坚持反对王效禹和“踢派”。在南京同盟者的帮助下，他们被安置在朝天宫博物馆、江苏教育

学院和宁海中学住宿。

10月初，徐州“支派”赴北京活动的黄其甲打电话给南京的“支派”头头、“淮大八三一”的吴方新，谈到徐州市内的“支派”群龙无首，在军队和“踢派”打压下士气低落，提议吴方新返回徐州做些发动组织工作。10月7日，吴方新秘密潜回徐州，暗中联络当地“支派”进行反对王效禹和“踢派”的活动。在此期间，“支派”另一主要头头、《徐州日报》社的田超也从北京秘密返回徐州。不久，他们的行踪被“踢派”发觉，不得不逃往南京。在他们的宣传鼓动下，又有一些“支派”群众陆续前往南京，使得当地“支派”人数达到2000多人。

田超和吴方新抵达南京后，在群众中发表鼓动演说，阐释了“支派”的基本立场和斗争策略：“徐州是江苏的地方，只能江苏军管会管，山东没有权力”；“我们两千多人在南京不走，给军管会是一个很大的压力，无形中也给中央有压力，我们就说这是王效禹在徐州支持一派打击一派，叫中央表态。”

徐州“831”武斗所造成的危害和损失是严重的。就人员伤亡来看，也大大超过了“5.31”事件的数字。因此，在 68 军党委常委内部也分歧尖锐。这时，与王效禹关系密切的“中央文革”成员王力、关锋被隔离审查的消息传到徐州，68 军党委常委内部就徐州“831 武斗”再起争端。他们秘密召开 6 天半的会议，军长张铿秀、副军长吴怀才等大多数常委认为“831 事件”大方向完全错了。只有政委李布德等两名常委认为大方向正确，只是

打击面宽了一点，强调 68 军党委应该与王效禹保持一致。但是，大多数常委否定了他们 2 人的意见。

王效禹闻讯后，立即下令在济南召开 68 军党委常委扩大会议。王效禹和军区其他领导人参加会议，一起逼迫 68 军多数常委“转弯子”。

10 月 4 日，中央安排来华访问的阿尔巴尼亚劳动党领袖谢胡访问山东。

10 月 19 日，68 军在济南召开军党委常委扩大会议。张铿秀、吴怀才等人在会上责问王效禹：“枪是谁批准发的？”

王效禹回答：“不要问了，错了我负责。”

后来王效禹在 1968 年 6 月 1 日的一份检查中提到此事时说，这次发枪向中央发过电报，并口头请示过周恩来。

10 月 29 日，《人民日报》在头版显要位置刊发关于济南军区 67 军“三支两军”工作经验的报道：《一切行动听伟大统帅毛主席的指挥——6073 部队党委领导“三支”“两军”工作的经验》。该部队在山东青岛支左，是王效禹树立的一个先进典型。

在此背景下，68 军多数常委非常不情愿的转弯了。11 月 10 日，68 军党委常委向济南军区做出“初步检查”。这天，68 军党委常委扩大会议结束，杨得志到会讲话。他强调徐州两派的斗争是路线斗争，没有调和折中的余地。他提到新的徐州卫戍区党委不是派性的产物，而是两条路线斗争的需要。他表示坚决支持

王效禹处理徐州问题的路子。他还严厉批评 68 军领导人，警告他们“不要背后搞小动作，唱对台戏”。

11月11日，68军领导回到徐州。徐州“踢派”召开“欢迎68军首长赴济开会胜利归来”大会，68军军长张鋐秀在上讲话，向“踢派”道歉，承认“犯了方向路线错误”，“甚至一错再错”，希望得到批评和原谅。

11月初，徐州在宁“支派”领导班子调整，成立由田超、马吉昌、吴方新、张晓阳、胡小柱、韩登云、滕尚民、朱宝江、李金山、朱成明、朱林（汽车运输公司站务员）等11人组成的“淮海八·三一”常委会（其中李金山、朱林因在王效禹赴徐期间表现过激，遭到军方逮捕，当时依然处于关押之中）。随后又成立一个核心小组，田超任组长，吴方新、马吉昌任副组长，组员张晓阳、滕尚民。这次领导班子调整引起回到徐州的韩登云、朱成明等人的不满。他们遂带领一些“支派”群众在徐州与“踢派”联合。

11月6日，在宁“支派”常委会确定“以农村包围城市”战略思想，决定串联丰县、沛县造反派孤立徐州。同时，他们还想把徐州周边几个煤矿和郊区及铜山县几个公社串联起来，开辟根据地。他们的目标是早日打回徐州报仇雪恨。

根据王效禹的指示，“踢派”于11月上中旬组成一个以杨正祥为首的“徐州革命造反派反到底总指挥部赴京代表团”，到北京游说各有关方面。此时，江苏各方代表已经奉中央之命，组成

“江苏代表团”赴北京谈判“大联合”事宜。南京“好派”头头文凤来和“屁派”头头曾邦元分别在西苑旅社接待“踢派”代表团，均向他们表示支持。杨正祥等人还到京西宾馆拜见江苏省军管会负责人吴大胜，希望他就以下问题表态：

（1）现在徐州有人反对王效禹，反对空29师，请省军管会予以足够重视；

（2）68军已就改组徐州市革委会问题向中央和两大军区提交报告，请省军管会尽快研究予以批复；

（3）请省军管会动员“支派”在宁人员尽快返回原单位“抓革命、促生产”；

（4）（4）解决干部问题。

吴大胜答复是：（1）坚决支持王效禹同志，（2）江苏省军管会不考虑重新处理徐州问题，（3）会帮助劝说“支派”回徐州，（4）会研究徐州市革委会改组问题。

11 月 19 日，68 军副政委、徐革会主任刘汝贤在一个群众大会上代表 68 军检讨，表态要加强部队的组织纪律性教育，做好机关部队的转弯子工作，严格遵守各项命令规定，绝对禁止军内外相互串联，禁止擅自上街游行，散发传单，动用军队车辆，窃听电话，窝藏军外人员，干涉地方“四大”。他还要求各级干部要做好家属子女的教育工作，使他们坚定地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对参加“支派”组织的，积极教育他们认识错误，向“反到底总部”靠拢。

11 月 28 日，徐州“踢派”冲进隶属南京军区的徐州军分区大院，高呼口号：“南京部队滚出徐州城！”将军分区的干部、战士悉数赶走。

## 第 932 回：刘少奇，专案又有新证据　见□州,北京座谈议“整党”

周恩来 11 月 24 日凌晨接见黑龙江“炮轰派”范正美等 10 人后的第二天，25 日，周恩来又接见了黑龙江“炮轰派”的对立面“捍联总”的代表，批评他们至今达不成协议，联合不起来。他要求“捍联总”和“炮轰派”在一个星期内达成联合协议，尽早回黑龙江去抓革命、促生产。

周恩来的联络员赵刚多方做潘复生、汪家道和“捍联总”的工作。要潘复生、汪家道检讨对待群众的错误，应该正确地对待“炮轰派”，从上到下实现“捍联总”同“炮轰派”的对等联合。他要求“炮轰派”汇报团里的范正美和宋振业，“捍联总”汇报团的刘雪峰和聂士荣，分别退出两派，站在省革委会的立场，共同做两派的团结工作。

12 月 1 日，在周恩来的亲自主持下，黑龙江两派代表在京签订了《黑龙江省捍联总、炮轰派双方关于文化大革命若干问题协议》，即《十二条协议》，中央承认双方都是无产阶级革命派，在省革命委员会的领导下，按平等原则实际大联合。

12 月 4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转发《黑龙江省捍联总、炮轰派双方关于文化大革命若干问题协议》。

当天下午14时，毛远新来到西苑旅社，找边世军等哈军工代表，传达了3日晚周恩来关于哈军工大联合问题的指示。基本精

神是：

毛主席、党中央、周总理非常关心哈军工问题，要求军工两派尽快实现革命大联合，以团结对敌；要做榜样，立新功。军工两派的联合，将促进黑龙江问题的解决和东北三省的革命大联合，同时，对反帝反修具有重大意义。中央决定，军工两派的联合问题在北京解决要求双方达成协议，希望双方协商的基本内容是：

（1）各级权力机构群众团体代表对等，结合干部由双方协商决定；

（2）双方立即停止相互攻击的宣传活动；

（3）以此为榜样，向全省全市发出大联合的呼吁，等等。

同时，哈一机的问题中央也决定在京解决。

12 月 7 日，潘复生、汪家道向中共中央、中央文革交出了书面检查。周恩来将他们的检查发给在北京的黑龙江两派代表，征求意见。

哈尔滨的“炮轰派”听到潘复生、汪家道检讨的消息，着实欢庆了一番。在北京的“炮轰派”汇报团也感到，半年多的斗争、努力，潘复生、汪家道终于承认在对待群众问题上犯了错误，作了检查，甚觉欣慰。同时，他们还认为：潘复生、汪家道在检查中，存在四个问题：一是歪曲事实。将 6 月 5 日“炮轰派”要求接见，省革命委员会允许他们进院一事，说成是冲击省革命委员会……二是避重就轻。三是模棱两可，故意偷换概念。四是安钉

子、准备搞秋后算账。

于是，范正美找宋振业、边士军、冯昭逢一同去找总理联络员赵钢。对联络员说："我们欢迎潘、汪作检查，但同时我们又感到潘、汪的检查，明显地看出思想不通，言不由衷，歪曲事实，颠倒是非，安钉子，这既有他们自身思想品格、党性原则，对错误及其性质的认识和态度，也表明'捍联总'对他们施加压力，阻止他们检讨，并且极力为他们粉饰和辩解。希望联络员以对黑龙江省人民负责的精神，进一步为我们反映这些意见。"

过了一天，联络员婉转地告诉范正美他们，中央希望早日稳定黑龙江省这个反修防修的东北前哨。这让范正美等人备感委屈，他们又找毛远新申述意见，毛远新严肃的对他们说："这是主席的意思，你们必须接受，否则的话，就要走向反面。"

大家都明白毛远新这话的含义和份量。但是，范正美还是鼓起勇气，单独去找了一趟总理联络员，他们安慰了他几句，也表示希望他能理解。他们承认潘复生、汪家道检查原先不是这个调子。了解到这些，范正美第一次认识到什么是国家大局？也第一次认识政治斗争残酷性的真正含义。在北京这 3、4 个月，他亲眼目睹政治风云的变化莫测。王力、关锋怎么样？曾几何时，是何等的显赫，然而如今却一文不值。自己又算老几?因此，他极力控制自己，噙着眼泪离开联络员办公室。

11 月 21 日，曾参与 1929 年逮捕、审讯刘少奇的当事人之一的原奉天纺纱厂副技师关辅金写了如下的亲笔供词：

现将奉天纺纱厂一九二九年间逮捕共产党情况交代如下：

我一九二九年间任奉天纺纱厂副技师。七、八月间在厂北门外发现共产党传单，助理王广恩要我们追查。经我用恩威互济手段，收买了工人党员崔凤翥。他暗中交给我一份共产党名单，其中姓常的是我厂共产党头头，立即把他看管起来。在一天下午五点钟左右，由警察和卫队在厂北门外逮捕了二个共产党。当晚警察局司法主任曹凤鸣、厂里徐连奎、董文华、孔令铎和我审讯。经一一刑讯，他们都承认是共产党员。

先审的是我厂里那个姓常的。第二个是中等个面貌黑一点的。第三个审的是个高个子，稍一动刑，他承认是湖南人，今年六月来东北，是共产党员，是辽宁地区负责人，是省委级，地下组织设在沈阳工业区西下窪子。审完后，他们三人都在供词上签名划了押。第二天上午由厂办好公，将他们三人送交警察局。事后听警察厅秘书于祥林等人对我说，因他们坦白悔过的好，而被释放。

关辅金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1967 年 11 月 24 日，参与 1929 年逮捕、审讯刘少奇当事人之一，原奉天纱厂庶务主任徐廉奎关于刘少奇 1929 年自首叛变的交待：

一九二九年八月在奉天纺纱厂逮捕共产党的经过

一九二九年我在奉天纺纱厂当庶务主任，六月厂内发现共产党传单，纺纱厂总理孙祖昌、助理王广恩要我们马上查清。副技师关辅金收买了工人党员崔凤翥，崔告密了厂内共产党七、八个人，我们即将厂内共产党头头 xx 玉抓起来，经动刑引诱，他承认是共产党，承认与厂外有联系，供出明天下午外边准有人来厂开会。孙祖昌即报告警察厅派孙督察来厂作周密布置。在九月末一天下午五点钟左右一个高个子白脸的和矮个子黑脸的来了，由厂内共产党头头 xx 玉暗中指点，卫队当场把他们逮住，当晚警察厅在工厂对他们审讯。我和关辅金、孔令铎、董文华等人参加。

先审黑脸的，一动刑就承认是共产党，是联络员，是来开会搞罢工的，与白脸的是同事关系，住沈阳工业区，年龄卅多岁，河北人。

后审白脸的，稍一动刑，跪倒在地，什么都说了，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是省委宣传领导，是来搞宣传组织共产党、搞同盟罢工的，审完后，他俩人和厂内共产党头头 xx 玉签字划押，第二天将一案三人押送警察厅。

这个案子办完后，工人党员崔凤翥告密有功，厂里发给他奖金百八十元。

徐廉奎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廿四日

专案组称："1929 年奉天纱厂参与逮捕、审讯刘少奇的敌伪人员有 15 人，其中已死 9 人，活着的除徐廉奎、关辅金外，还

有纱厂助理王广恩、会计关恩厚、卫队正目杨明襄、卫队队员王清怀 4 人，他们分别提供了刘少奇被捕自首叛变的罪证。”

11 月 25 日，河南郑州两派再次发生武斗，造成全国最大的铁路枢纽站郑州交通中断，滞留车皮 3000 多节。周恩来得知后，心急如焚，指示连夜派飞机把郑州两派代表召集到北京，解决郑州铁路交通问题。

当晚 23 时 30 分，刚刚接见完外宾的周恩来、李先念在铁道部军管会主任苏静、副主任扬兴陪同下，急匆匆地来到人民大会堂安徽厅，接见郑州两派代表。在场的还有东北三个铁路局、西北三个铁路局及南京、哈尔滨等地的代表。周恩来满脸倦容，声音有点嘶哑的说：“铁路与煤炭，我们最近半个月一直在注意，党中央和毛主席都在注意。现在突然出现郑州问题，我完全没有料到。就在郑州这一十字路口，停车 3000 多节，我心里非常难过。我实在抽不开身，刚才还在接见外宾。如果我有功夫，我自己亲自到郑州去。

为什么不根据毛主席的指示联合起来？全国铁路革命革了一年半，造成这个样子，我们在座的军队同志也好，铁路工友也好，难道心里就这么舒服？我就不相信！”

周恩来的嘴唇和手有点颤抖。一旁的代表请周恩来坐下。

周恩来接着说：“铁路有军管会，到现在生产指挥班子还没有搞起来。”说到这里，周恩来问郑州铁路局的军管会主任：“军管多久了？”

答：“6 月 22 日开始军管的。”

周恩来：“5 个月过去了，生产班子还没有组织起来？”

答：“干部没有站出来，最近站出的有 25%。”

周恩来：“有百分之二十几站出来就可以组织嘛！3000 多辆车子压在郑州这条线上，全国铁路最关键的地方，这是最大的问题，要立即解决。”

这时，“河造总”一代表突然提出：“我们现在写大字报没有纸和笔。”

周恩来愤然指出：“大字报不要写这么多嘛！现在不是要纸要笔的问题，是要火车通车的问题。”

“二七”代表提出“河造总”的问题，周恩来说：“几张大字报有什么了不起，北京不也有‘5.16’呀！把矛头指向无产阶级司令部，指向我们伟大领袖，不也把它破获了吗？河南就那么怕‘河造总’？这是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事，就那么害怕，当然对‘5.16’我们主张不要扩大，一个人要与整个组织分开，把坏人揪出来就算了。”

“你们就是想把人家吞掉，这是不可能的，一个也吞不掉！‘河造总’有什么理由不同你们联合呢？他要想什么呢？你们有个恐惧，怕‘河造总’同你们联合后，他们有些群众又回去了。”

“二七”说：“是这样，不但‘河造总’，还是‘四大总部’，他们成立的快，垮的也快，现在又要恢复，我们想不通。”

周恩来：“你们这是派性，看来派性问题在铁路上没有解决

呀！”

他休息了一下，又转过身对“河造总”代表说：“现在我对‘河造总’同志讲一下，听听你们的意见。第一，你们承认跟何运洪走过一段路，你们承认错误吗？”

“河造总”代表答：“承认。”

周恩来继续说：“第二，郑州铁路‘河造总’本身组织缩小，这是事实吧！”

此时，“二七”代表想插话，说何运洪是罪魁祸首……周恩来生气地打断他的话说：“你们派性就是相当强了，我在跟他们说话，你还要提何运洪是罪魁祸首，铁路上还有跟何运洪走的吗？有这种人的话，你们要与他们划清界线。”

“河造总”代表答：“对。”

周恩来：“我这不是搞群众，是搞与何运洪没有划清界线的干部。第三，你们组织缩小了，原来九千退到现在两、三千，缩小就让他缩小，那就维持现在这个组织状态、地位吧。把脚跟站稳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斗私批修，开门整风，参加毛主席著作学习班行不行？”

“河造总”代表答：“行。”

周恩来：“不要再发展组织，这样你们就对了，否则人家就要讲你是老保翻天了，把社会搞得动来动去，他们也就不相信你们了。你们要把立场站稳，才能取得人家的信任，要和跟何运洪的干部划清界线，队伍缩小一点，不要去争人的多少，而要看你

们的立场稳不稳，这样人家就不会说你拉队伍啦。机务段有几十个人就几十个人吧。”

“河造总”插话说：“‘二七’做法人家不服。”

周恩来：“要向前看，不要往后看。他们有的做法不对，你们过去也有不对的，不要提那些了。矛头对准刘建勋的口号，就是错误的，你们就反对过嘛。这就表明铁路的‘河造总’不同嘛！你们要在抓革命促业务上做出成绩来，你们总部不要再扩大了，要取得人家信任，你们这两、三千人要确实承认错误与不悔改的领导干部划清界线，斗私批修。”

周恩来责令：“郑州铁路两派要真正做到切断与地方群众组织的联系，搞好大联合。”

“二七”代表、“河造总”代表纷纷表态，表示“坚决按照周总理指示办，搞好大联合，把铁路运输搞好。”

周恩来：“态度是好的，大家都表态了，你们要交换一下意见，我明天下半夜有空再同你们商量，关于干部问题，你们再想一想，有问题的干部，可以先调开来学习，干部问题要等到联合后再解决，我看‘河造总’还是可以讲通的嘛！要用教育的态度，帮助的态度对待他们，他们也还是可以听的啊，东北各省、沈阳、吉林、锦州局也要同地方分开，否则中央的精神就贯彻不下去。”

接见结束时，已是 26 日凌晨 2 时 40 分。

从 11 月 28 日至 12 月 1 日，周恩来每天都与河南省军区负责人刘建勋、王新等及郑州铁路局各派代表谈话，终于使郑州铁

路局两派达成了《关于实现郑州铁路局河南境内革命大联合的协议》等 7 个协议。

在郑州铁路局大联合的影响下，西安铁路局两派也主动达成了大联合的协议。为了推动全国其他铁路局的大联合，周恩来决定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的名义向全国转发郑州铁路局和西安铁路局实现大联合的协议。

11月26日、27日，北京红代会、工代会先后组织了两天座谈，讨论“整党”一事。谢富治在11月26日工人座谈会核心组的讲话时说：“党的生活可以恢复，不是恢复原来的样子。”

他将对党员分为三种情况：

（1）叛徒、特务、坚持错误死不悔改的走资派，要开除，肯定开除。在过渡时期挂着，不是活挂，是死挂，走资派认识错误的可以给出路，但不能再做领导工作。

（2）活挂：历史问题弄不清楚的，暂时不让过组织生活，弄清了就可以过了，但有问题的就死挂了。

（3）不起作用的党员，不起带头作用模范作用，连一个群众都不如，不够条件的要劝说出党。可以暂时参加组织生活。

他说：“成立临时党支部，可以吸收党员。由党员核心和军管会讨论批准，党员讨论通过以后，经过全体群众讨论通过。”

11月27日，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李富春、江青、戚本禹、姚文元、谢富治、吴德、黄作珍、丁国钰等人参加了北京红代会座谈，首先听了3个多小时汇报，然后江青、康生讲话。

江青在讲话中说："在文化大革命过程中，要逐渐清理阶级队伍，党内要清除特务、叛徒、变节分子，党外也要清理，对于有现行反革命活动的，要严肃处理，刚才提的三K党（指国民党、一贯道、三青团）有现行活动的严肃处理，地富反坏右不老实的也要严肃处理，当然由群众处理，不是由政府。"这应该是"清理阶级队伍"第一次被提出。虽然毛泽东在1月30日对谭震林报告的批示中已经提到对"反革命分子、右派分子、变质分子"在此次运动中"应由革命群众认真查明，彻底批倒，然后分别轻重，酌情处理。"但还没有明确提出"清理阶级队伍"这六个字。

同时，康生在讲话中还特别提到了整党的问题。

11月27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发出中发［67］358号：《关于征询召开"九大"的意见的通报》。

11 月 27 日，中央文革小组的"简报"第 5633 号刊登《中央机关群众组织抓"五一六"分子中的几个问题》。材料说："一些单位已有扩大化。"并列举了表现。

## 第 933 回：中学生，当场写赴滇报告　下云南，知□“北京五十五”

当北京一批红卫兵骨干率先奔赴内蒙、黑龙江等北部边疆省份安家落户之际，北京市 65 中等学校的 55 人则将自己上山下乡的目的地选在了更为遥远的西南边陲——西双版纳。

早在 1966 年 11 月，北京 65 中部分同学就在“走与工农相结合的路”的口号感召下，到有关部门联系和调查了解情况，准备走上山下乡之路。在国家农垦部，他们受到热情接待。农垦部的工作人员对他们说：“橡胶是四大工业原料之一，是国家的战略物资。我国除了海南岛外，云南西双版纳也非常适宜种橡胶，具有开发价值。目前那里正在建设我国的第二个橡胶基地，需要有知识有激情的年轻人到那里去参加建设。”同时，他们对同学们主动要求上山下乡的行动表示积极支持，同意介绍他们去云南进行考察，并为他们开具了介绍信。

同学们选出周秀华、赵旭虹、蔡仪、章亮和何龙江 5 名代表组成考察组，于 1966 年底，借着全国串联的机会，来到云南。接待他们的是共青团云南省委大学部部长康心却，此时他被临时抽调到云南省委接待处做红卫兵接待工作。

当何龙江他们说明来意并出示了农垦部的介绍信后，康心却感到有些意外。因为当时他所接待的红卫兵中，像他们这样专门联系上山下乡的，还是第一批。他很快为他们联系了主管此事的省农林政治部主任韩文运。

韩文运是北方人，南下干部。他认真地向北京的学生介绍了云南和西双版纳垦区发展橡胶的情况，还为他们联系西双版纳有关部门，介绍他们前往实地考察。

经过 4 天的汽车行程，何龙江他们来到西双版纳首府景洪，西双版纳农垦分局局长兼州委副书记李德英接见了他们，介绍了全州橡胶业发展的基本情况，推荐了两个适宜建新场的地点，派一位技术员和他们一同考察。

当他们从西双版纳回到昆明时，当地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云南省有关部门已经无暇顾及他们，他们赴云南上山下乡的事情只好暂时搁置。

1966 年底，北京市还有一些红卫兵发起组织了“红卫兵农垦战斗团”，与曾在广东省担任领导职务、当时已调赴中央工作的陶铸联系到海南岛去。

赴云南考察的北京 65 中的同学回到北京后并没有停止努力，他们成立了赴云南的专门筹备机构，地点就设在位于东四附近煤渣胡同的首都中学红代会东城区斗批改办公室。筹备机构设有宣传组、组织组、联络组，主要进行的工作是宣传扩大影响，吸引更多的同学参加，与云南方面继续进行联系等。在大家的积极努力下，参加的人逐渐增加，范围从 65 中扩大到东城区的其他一些学校，包括 25 中、2 中、5 中、女 13 中、河北北京中学等学校。在这些同学中，有 25 中高三一班的苏北海和曲折的同班同学凌瑜，他们也在这里工作。苏北海热情开朗，组织能力强，

具有感染号召力，自然地成为这伙人中的组织领导者之一。而凌瑜每天默默无闻，无声地做着许多工作，连晚上都睡在斗批改办公室值班。

到 1967 年下半年，与云南方面的联系仍然没有结果。大家觉得不能这样无休止地等下去，决定第二次派代表去云南。当时大串联早已经停止，火车不再对学生免票，于是大家凑钱为去云南的代表买了火车票。

1967 年 10 月，5 中的张进辉、河北北京中学的伍穗平、65 中的赵旭虹和何龙江 4 个人又踏上了赴云南的行程。当时云南已经实行军管，他们到昆明后找到主管此事的省军管会边疆组，边疆组负责人、昆明军区作战部副部长、曾经是上甘岭威震敌胆的战斗英雄桑传宝和工作人员王魁林接待了他们。桑传宝说话干脆利落。当他听北京学生说明来意和前后联系考察过程后，对他们支援边疆建设的愿望和要求表示理解和支持。但同时也表示，由于云南当时正处于文化大革命的武斗中，各级组织的工作不能正常开展，因此暂时无法接收他们。而且他认为，此事应该通过政府和组织的渠道进行，建议学生们回去后找北京市有关主管部门联系或向中央反映。

当这 4 位北京中学生准备返回北京时，才发现带来的钱已经所剩无几，连买火车票的钱都不够了。于是，他们第一次赴云南考察时，在景洪农场认识的老昆明知青代绍纯掏钱，为他们买了到贵州水城的火车票。

先上车再说。车过水城后为了躲避查票，他们躺在座位下面睡觉。后来发现总是这样不行，就出来主动向列车员说明情况，并且积极与列车员搞好关系，帮助他们打扫车厢卫生，为旅客表演节目，歌曲加伴唱朗诵，终于取得了列车员的谅解和帮助，使他们顺利回到北京。

几年后，他们 4 人中的赵旭虹与代绍纯的妹妹代少林喜结良缘。

回到北京后，已是冬天。他们冒着刺骨的寒风，骑着自行车一趟趟地跑北京市革委会，跑北京市安置办公室，但是得到的答复都是北京没有去云南的安置计划，云南目前也暂时无法接收。

直到 11 月 27 日晚，正在东城区煤渣胡同赴云南知青筹备组值班的女 13 中高中毕业生林力同时接到她在《北京晚报》当记者的表哥林为民和当时北京市中学红代会负责人李东民先后打来电话，说“总理正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工贸口的代表，你们可以被带进会场。”

机会突然降临，来不及考虑更多，林力叫上当时在办公室的同校同学张春荣和 5 中高中毕业生张进辉，3 个人飞奔到人民大会堂。李东民早已等在东南门，领他们进了湖南厅，看见周恩来总理和李富春副总理正坐在主席台上听汇报。这时，林力他们才发现，忙乱之中竟然没带上写给周恩来总理的报告！

回去取已经来不及了，只能当场再写一份。他们从黄军挎包里找到一张从练习本上扯下的纸，凭着记忆，由林力口述，张进

辉补充，张春荣执笔，写下了决定他们命运的报告《首都中学生赴滇申请报告》：

周总理、李富春副总理：

我们是北京中学红卫兵，我们决心遵照毛主席的教导，走和工农群众相结合的道路，坚决到云南边疆参加三大革命运动。

革命的道路已选定，我们就坚决走到底。我们在去年年底和今年10月份两次赴云南边疆进行调查、联系。

我们经过几个月的实际调查和亲身体验，深切地了解到云南边疆非常有开发前途，尤其是四大工业原料之一橡胶生产更需要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人去开发。我们向毛主席、向党、向人民、向革命前辈立下誓言：为加强国防，保卫祖国，打败美帝国主义，为了给中国和世界人民争气，我们志愿到云南边疆做一名普通的农垦战士，为祖国的橡胶事业贡献自己的毕生精力！

我们现在已经在组织上、思想上以及各方面做好充分准备，只等中央首长一声令下，我们就奔赴战场！请中央首长下命令吧！我们再次坚决请首长下令！

此致

革命红卫兵的敬礼！

首都红卫兵赴云南边疆农垦战士

报告写好了，怎么递上去呢？他们看见周恩来起身从主席台出去。3人赶忙跑到会议厅侧面门口等待。看见周恩来总理回来了，他们迎上前去，将《申请报告》递给周恩来说：

“总理，我们是中学红卫兵，希望到云南边疆去，开辟祖国第二橡胶基地。这是我们的报告。”

周恩来亲切地问：“就要复课了，你们没有复课闹革命吗？”

林力回答说：“学校已经复课了,军宣队也进驻了学校。可我们是应届毕业生，希望早一点走向社会……”

周恩来接过那张不大的纸页：“好，我看看你们的报告吧!”

3 人赶忙回到会场，目不转睛地盯着主席台。

周恩来回到座位上，戴上老花镜，仔细地阅读了他们的《申请报告》，还在上面写了字。

散会后，3 人走出人民大会堂。夜色正浓，满天星斗。寒风扑面，他们心里一团火热，骑车赶回办公室，把喜讯告诉同伴们，激动万分地叙说着向周恩来总理递交报告的情景和每一个细节。

张春荣　李 楠　林 力

在焦急中等待了几天后，终于等来一个让同学们倍感振奋的

消息。这天上午，东城区红代会的电话机响了，电话机旁的王树理、苏北海、何龙江争抢着拿起话筒。电话是北京市革委会打来的，让赴云南知青筹备组的代表到市革委会接待办公室去一趟，北京市革委会计划组的工作人员要见他们。

到了市革委接待室，一位中年女干部微笑着接待了他们，然后拿出一张纸，正是林力他们 27 日在人民大会堂呈送给周恩来的《申请报告》。

她告诉他们说："周总理已经批准了同学们的要求。"

只见申请报告上盖有中央办公厅 67 年 2770 号编文印章，列入中央传阅文件，阅后立退中央办公厅秘书处。报告上方的几位首长批示清清楚楚：

富春、秋里同志：

可考虑这个要求，请与北京市革委会联系一下。

周恩来

接下来是李富春的批示：

国钰同志：此事市革委会如何处理，是否与云南取得联系。

李富春 11.28

还有：

牛连壁同志：

请就业办公室速同云南联系落实下来，落实将处理情况报告总理和富春同志。

你意见如何，请酌之。

丁国钰 11.30

及：

同意计划组高寒松同志办。 牛连壁 12.1

周恩来的批示和签字是用铅笔写的，位于右上方。

云南省很快来了人，带来意见。第一，欢迎北京青年去云南参加边疆建设；第二，为了安全。不宜去红河州的河口，建议去西双版纳；第三，人员最好不要多，50 人左右为宜。

得到消息的各校学生，络绎不绝来到联络地点问询。前前后后有五、六十人报名。在区工会的二层小楼上，他们一边集中学习，一边互相熟悉，还请来解放军战士做忆苦思甜报告。1967 年 12 月 25 日，他们全体到民族文化宫参观了《纪念白求恩》展览，用白求恩的精神鼓舞和激励自己。还到四季青公社向菜农取经，老乡们赠送给他们不少菜籽。在后院操场，他们学做当时流行一时的语录操。由苏北海执笔、集体作词，总政音乐家田光作曲的《毛主席的红卫兵奔向远方》，成了活动时必唱的队歌："迈开大步，迎着朝阳，毛主席的红卫兵奔向远方。"

为了提前适应即将到来的艰苦生活，从 1967 年 12 月 31 日到 1968 年 1 月 23 日，他们又组织全体人员到京西门头沟煤矿，参加了近一个月的劳动和整训。在那里，他们和工人一起下矿跟班劳动，重体力劳动一干就是整整 8 个小时，加上来回仅路上的时间和上来洗澡的时间，每天的工作时间达到 10 个小时以上。

第一天中午在井下吃饭。同学们正四处找水洗洗手。老工人

从白铁皮送饭箱里抓起白馒头，双手一揉成黑蛋，打趣说：这儿离地面五六百米，绝对卫生。吃吧！同学们哈哈一笑，全都捏着馒头吃起来。上得井来，大家相互一看，个个浑身上下一团黑，除了牙白眼白，几乎分不出男女。进了澡堂，哥几个可劲洗呀！老工人几把洗完穿衣，又笑他们："天天这么搓，还不洗掉一层皮？！"

矿上食堂 24 小时开放，饭菜品种丰富，馒头烙饼米饭自选，炖肉烧猪蹄管够。

在矿工宿舍区，老工人指着不远处的疗养院说，那里有不少患矽肺和有工伤的工友在休养。后来，有的同学到云南一两个月后，吐出的吐沫还是黑的。

在这里，他们见到军队作家魏巍，他正在矿区深入生活，担任矿军管会的军代表。他写的报告文学《谁是最可爱的人》，曾选入中学语文课本，志愿军的英雄事迹曾深深打动同学们的心。同学们们和他及在矿上支左的一起学习、座谈，参加他们的年终总评会和煤矿革委会的成立大会。在那段时间里，煤矿创造了日产煤 5037.3 吨的历史最高记录。魏巍语重心长地对同学们说："要向煤矿工人学习，他们也是可爱可敬的人。"

在门头沟煤矿与老工人在一起

在进行各项准备工作的同时，还要确定落实首批赴云南知青的人数，共 50 人，这是当时确定的名额。李镇江、伍穗平等 5 人组成的领导小组，从志愿报告者中进行挑选，最后选定 50 人，他们大多是东城区几所中学的 66 届、67 届高中毕业生。

当快要出发时，刘青、赖万京等 4 人交来了写有“斗私批修、坚决支边、改造思想、准备接班”16 个字的血书申请，被批准加入。上火车后，又有一名叫张红兵的女生坚决要求一起前行也被批准。这样人数达到了 55 名。于是有了后来“北京五十五”一词，特指北京首批赴云南知青。

## 第 934 回：林彪提，“大海航行□舵手”见□州，外交□联合执政

11 月 28 日，北京大学“井冈山兵团”召开“坚决支持革命干部孔繁、杨克明同志杀上革命第一线大会”。孔繁、杨克明在会上表态说：“井冈山兵团”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组织，“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井冈山兵团”核心组组长侯汉清在会上宣布，“接受孔繁、杨克明为兵团战士，并吸收到总部工作。”

11月28日，总理办公室接到安徽12军军长李德生报告：一群人大闹军管会半个多月，冲砸军部，打伤军首长，部队反复劝说无效。周恩来批示：“以电话告李军长，先进行政治工作；不听，宣布《九五命令》，进行分化，要他们交出祸首凶手；再不听，待其直接行凶，当场将凶手逮捕。对胁从者晓以大义，宣布一律不究，但如再犯，仍将当场逮捕凶手祸首。”

11 月 15 日　海军召开首次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王宏坤致开幕词。

11 月 29 日　林彪为海军的大会题词：“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毛泽东思想”。

会议闭幕式上，机关群众组织“红联总”不让肖劲光在主席台上与李作鹏并肩坐在一起。

会议结束后的一天，林彪找李作鹏到他家谈话，主要内容有两条。林彪说：“第一，你在海军积代会上作的政治报告我已经

看了，总的说还是可以，就是对我的评价太高了，俗话说，人怕出名猪怕壮。”

李作鹏说：“我是为了回击‘揪军内一小撮’，有意把你强调一下，这不仅是个人问题，而是关系全军的问题。”

他接着解释说：“自武汉‘720’事件后，全国性的反军乱军，到处抢枪、抢炮，到处冲击军队，到处打骂污辱三支两军人员，有的大军区司令员说话都不灵了，这里要揪斗张再道，那里要揪斗李再道。如果不把你强调一下，也许将来你的话也不灵了。”

林彪听了后，没有吭声，低头沉思了一会之后，又说：“第二，据说你们海军机关群众组织对肖劲光很不尊重，这不好。你应动员海军机关群众组织立即解散”

又说：“宁愿自己受委屈，不要别人受委屈，宁愿自己吃亏，不要别人吃亏，宁要别人欠自己的账，不要自己欠别人的账。”

李作鹏一听就明白，这段话显然是要他尊重团结肖劲光的意思，同时也有对批评他对海军机关“红联总”群众组织的错误行为没有采取果断措施的意思。

11 月 25 日，以外交部“临勤”、“革命造反总部”、“攀险峰”三个群众组织为主体，联合其他外交部群众组织及人员，成立了“外交部无产阶级革命大联合筹备小组”，简称“大联筹”，并发表成立声明，称“大联筹”是“在我部革命大联合正式机构成立以前，暂时负责领导我部运动和业务监督工作，为促进我部按行政系统实现全面的革命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而做出的积极

努力”，开始了外交部群众组织联合“执政”时期。

但“大联筹”并未消除各组织间的派性。

12月1日，周恩来在中南海接见外交部党委、大联筹各群众组织代表和驻外使领馆各方代表时说：“外交路线总的方针、政策、理论都是出自主席，但是我们执行的不是那么正确，有出入。”

陈毅插话：“还有违背的。”

周恩来：“还有违背的。使馆馆长，大使参赞有责任。我们做馆员的看到了没有？所以我们要做自我批评。我不是说不应批判大使们，外交部还有错误嘛，往上推，还有我的责任。8月份48小时最后通牒，是我同意后送给中央的。主席为我开脱，说被迫签字。但被迫签字就说不过去。作为老党员，王中琪、姚登山没有拉着我的手签字。我以为没什么，签了，发了。这个自我检讨不知我说了多少次，恐怕你们已经不愿听了。有48小时要烧英代办，没有48小时他们也会找其他借口烧英代办。因为那天下午听说要烧，就打电话，但不行。后来我和伯达、康生、江青、文革（小组）联名打电话去还不行，阻挡不了。已经进去了。这怎么能说自己的思想成熟了呢？”

对外交部的业务监督组，他说：“业务监督小组暂时不要动，同志们要负起责任来，加强自信，把工作搞好。‘大联筹’对他们的态度是正确的（指没有撤换监督人员）要斗私批修，学毛选。正确对待34个战斗队的群众。”

谈到不久前破获的“中共中央非常委员会”案件时，他说：

“外事系统是有坏人破坏的，你们年轻，不要以为‘非常委员会’反革命案件的线索破获了，就完事了。还要发动群众继续追下去。外交部总是有些嫌疑的。外事系统要擦亮眼睛，王焕德搞出来后，机要局就搞出几个人的小集团嘛！”

他还提到了“516”，说：“‘516’也不只是炮轰我，他们随时都可以转移目标，目的是要把无产阶级司令部搞个乱七八糟。”

他也别强调：“‘516’分子仅指‘516’的头头，不要把一般受蒙蔽的人都叫做‘516’分子，不要搞群众。‘616’也是几个头头坏，下面的群众总还是革命的嘛！”

12月2日清晨5时55分至8时30分，周恩来第四次接见郑州铁路局代表，祝贺他们两派达成了大联合的协议。参加接见的还有：刘建勋、王新、铁道部军管会苏静主任、杨兴副主任。

周恩来说：“协议要通过实践，不要回去又闹起来了。我担心回去会不会出问题，在主席像前，不能说假话。”

双方代表纷纷表态说：“回去保证贯彻执行。”

周恩来对协议的落款很不满意，他说：“叫‘郑州铁路二•七公社’就够了嘛！为什么后边又加个‘郑铁分会’？‘造总’又加个‘分部’？这是什么意思，究竟包括多大范围？”

“二·七”代表：“我们原来叫河南二·七公社铁路分社，我们没有同新乡、洛阳、开封、驻马店等地商量，他们也没有派代表来，我们不敢改名字，准备回去以后和他们商量也联合起来。”

“河造总”代表：“我们原来就想搞全省的，因为‘二·七’不同意，所以没有搞。”

周恩来听说“河造总”开了一个大会，把地方都吸收进去了，学生、农民也来了，生气的说：“叫你们不介入地方，你们又这样搞。这是不是想助长声势？！我要批评你们。‘河造总’是犯错误的造反派，你们自己要认识错误。对犯了错误的造反派，要帮助、批评、联合，你们不要小集团主义，要有全局的观点，要服从全局利益。我让你们联合召开庆祝大会，为什么你们提前召开了？”

“铁路系统不要同地方混在一起，铁路是交通的命脉，现在一切的生产建设关键是铁路运输问题。这几天郑州的运输情况好转了，你们要巩固发展下去。”

“你们是阶级兄弟，不管人多人少要联合起来，站在一起，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上，要执行协议，推动全河南的大联合和推动全国铁路系统的大联合。你们和西安是兄弟，你们大联合领先了嘛！18个铁路局向你们学习，最后要把二·七的旗帜，在铁路系统打起来。你们不要独霸，要共享这个光荣的传统，不能发展你们的派性。两个组织存在暂时不倒旗。”

“二七”和“河造总”双方就联合的范围问题发了言，意见不一致，发生争吵。周恩来生气地说：“你们两边都有私心杂念，你在这里吵架，你们讲话都是骗我，什么斗私批修？今天我本来可以不来，但是我不想失信，你们不讲老实话，我就不听了。搞

了4天，今天我感到很痛心，工人同志嘛，应该忠诚老实，为什么从旧社会学来这一套，当面一套，背后一套。双方互相勾心斗角，不是站在毛主席路线上，你们总想多占一个名额，多发展一部分力量，好像多一万人就能打天下。从你们北站达成协议，发展到5个基层组织已达成协议，在你们的推动下，西安局6个组织也联合起来了，我才有这个念头叫你们搞全省铁路职工大联合。今天你们又变成郑州地区的大联合，‘河造总’想搞全省铁路职工大联合，也是想发展自己的势力。工人阶级嘛！你们为谁打天下，为谁拉队伍？不为铁路的整体利益着想，为北站生产着想，这叫斗私？你们有本事，现在就请你们6位来领导160万铁路职工，现在就叫你们来当铁道部长，你们能当得了吗？”

“我看了你们的协议就是不放心。你们对我都是这样，回去了叫刘建勋、王新同志怎么办？难怪刘建勋、王新要找我和康老谈谈。今天证实了你们就是有问题，在协议中你们按了钉子，你们不说老实话，我怎么给主席汇报呢？！你们这样搞，协议签了字也没有用。例如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一是军管会组织，二是‘大联委’组织，三是自己办。军管会办可以，‘大联委’办也可以。自己办还不是关起门来骂别人？只能发展派性，我们不提倡。”

周恩来问所有与会代表：“你们愿不愿讲老实话，愿不愿意搞大联合？”

这时，双方先后共有十几人站起来发言，造了他们自己头头

的反，强烈要求大联合，要求那些头头靠边站，踢开服务组自己闹革命，并高呼“要斗私，批修，实现革命大联合”等口号。后来，双方的头头们都作了检讨，表示愿意修改协议，改变落款，搞全省大联合。在与会群众的强烈要求下，他们当场签字。

周恩来说：“我不同意你们这种轰的办法，你们如果愿意多留一天，经过协商讨论把协议修改好也可以，如果这里搞不成回去搞也可以，现在这个协议先带回去实行。我看了这个协议，不是用很高的热情写出来的，是动了脑子按了钉子的，我把我的真心话告诉你们吧！我对这个协议是不满意的。现在天已经亮了，我不能再给你们谈了。我觉得对不起毛主席，我很痛心，我接见了你们4次，做了许多说服工作。见到基层的大联合协议是好的，后来两个总部搞联合的时候，派性就发展了。”

这时有人说：“‘河造总’在天安门贴大字报说总理讲‘河造总’是左派！”

周恩来问：“谁贴的？”

“河造总”代表：“不是我们贴的。”

周恩来：“你们不贴谁贴？难道是‘二七公社’贴的吗？！那个大字报歪曲了我的讲话，我是说‘河造总’是犯错误的造反派，现在你们又发展了。既然大联合了吗，还有什么发展头？你们再发展还不是吸收‘十大总部’的人？你们争取了联合的地位，但我是帮助你们，批评你们。你们不要再发展了。再发展有什么好处，已经几千人了，要为全国人民服务。你们在家里开大会还

是为了壮大声势，这不对。

‘二七’对‘河造总’发展组织提心吊胆，你们是河南最大的组织。现在骄傲了，你们想包办一切，到你们犯错误的时候了。没有‘河造总’的地方还有其他群众组织嘛，也要帮助他们和他们搞联合。现在达成的协议，你们先带回去实行，是不是真正贯彻实行，群众是会严格要求你们的。

本来中央的批示已经写好了，准备用，用四个名义(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批发全国，现在看到你们这个协议，批示要修改了，如果你们回去要打仗搞分裂就不批了。如果回去确实搞的好，中央再批发，通报全国表扬你们。如果你们不执行协议我还要通报全国批评你们。今天我在中央文革开会还称赞了你们，但在会上听了你们的发言，看出了你们的问题，你们只管郑州，不管别的地方，郑州通车了，别的地方车不通了你怎么办？回去不要再发展组织，再发展组织就要闹磨擦。回去开会要双方共同开会来庆祝。军管会、省革筹小组可以去人参加，现在我不是对你们各打五十大板，还是看你们回去后的实际行动，已经达成的7个协议都算数，回去要努力实行。今天我讲的话也许过分尖锐，不这样讲，刘建勋、王新同志回去为难。当然我对毛主席大联合的方针是无限乐观的，对群众也是相信的，但具体到一些基层单位和某些问题上就不一定。”

“我答应和你们照相，还是要照相的，但是只保留一点，中央的批示要晚一点，看看再批。”

1967 年底，全国 18 个铁路局和 52 个铁路分局的群众组织终于就实现大联合、保证铁路运输畅通达成了协议。

12月2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发出中发［67］366号文件：《关于整顿、恢复、重建党的组织的意见和问题》，该文件要求：各省市区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军管委员会，各大军区、省军区党委：

现将《关于整顿、恢复、重建党的组织的意见和问题》发下，望你们征求意见，并于元旦以前将意见报告中央，以便再作修改。

此文件发至县团级。文件指出：

具备什么条件的单位才能恢复党的组织生活。

多数同志认为，根据中央指示，凡成立了革命委员会或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的单位，可以恢复党的组织生活。

哪些人不应再过党的组织生活：

（1）“查明有据的叛徒，特务和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表现极坏而又死不悔改的那些人”，不应再过党的组织生活。

（2）对有叛徒、特务嫌疑而未作结论的，绝大多数同志意见也应暂缓参加党的组织生活，待问题查清后，再考虑是否恢复。

（3）凡是犯有严重错误，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表现不好，革命群众意见很大的党员，在他尚未承认错误，尚未向革命群众检讨并取得革命群众的谅解以前，暂缓参加党的组织生活。

中发［67］366号文件还综合了大家对吸收新党员条件的主要建议。

## 第 935 回：尽朝晖，天津□委会成立　董□平，再揭刘少奇□□

12月1日，中共中央批准天津市成立革命委员会的报告。12月2日，中央首长第十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接见天津代表。

天津以“五代会”为基础的大联合成立了，并发表了联合公报，为天津市革命委员会的成立铺平了道路。最后由筹备小组核心组拿出一个革委会人员组成名单让群众组织的代表们讨论。根据这个名单大家讨论，举手通过，宣布天津市革命委员会成立。会议下发了三个文件，一个是同意天津市革命委员会成立，一个是《制止武斗，抓革命促生产》，再一个是《实现革命群众的大联合》。天津工代会负责人林启予代表天津赴京谈判代表团宣读邀请信，邀请周恩来和中央首长们参加天津市革命委员会成立庆祝大会。中央对天津代表的11次接见到此结束，周恩来对天津的邀请表示感谢，并表示由于工作太忙，庆祝大会就不参加了。

12 月 4 日，谢富治在北京工代会再次提到了抓“516”的事情。他说：“抓‘516’到处乱抓。在接见工代会第一天会议上，江青同志还讲了话，这个没有向大家传达，也应该告诉同志们。”“江青同志说：不要到处抓‘516’，哪里有那么多‘516’呢？总理也说：不要借题发挥。江青同志还在会上讲：不要什么都扣‘516’的帽子。”

12 月 5 日晚饭后，中央联络员老田带领南京军区告状团 21 名代表，乘车前往京西宾馆礼堂楼上会议室，参加周恩来对他们

的第二次会见。这次参加会见的还有南京军区政委杜平，副司令员王必成，副政委鲍先志及军区政治部的孙海云，赵树湘、徐玉田，江苏军管会的梁辑卿、杜方平、吴大胜及蒋科等人。

晚 20 时左右，周恩来及军委办事组成员杨成武、邱会作、李作鹏、吴法宪、刘锦平走进会议室。参加会见的人员全体起立，热烈鼓掌。周恩来面带笑容，挥手示意大家坐下。

他把到会人员扫视一番后，问了一声："同志们都来了吧！"

"报告总理，全部到齐"。

周恩来顺手拿起"二十一名代表"的花名册，开口就念第一名："张波涛"！

张波涛突然听到周恩来点他的名字，有点紧张，"唰"地一下站起来，答应："到！"

"你老家是哪里？"

"报告总理，我是山东营（人）"，他以十足的胶东口音回答。

"你叫张波涛，可不是张国涛，这一字之差，就是天地之别啊！"周恩来这句俏皮话，引起会上一阵笑声，也缓解了张波涛的紧张心情。

"报告总理！"从江苏军管会的座位处传出声音："这里有一张南京军区另一部分群众递进来的条子，要求交给总理"

周恩来接过条子一看，立刻明白了其中的含义。他与坐在旁边的杨成武磋商两句后，表态说："我同意这部分群众派代表来"

"来多少人呢？"

“也来 21 人。”那位递条子的军管会代表建议。

周恩来略加思考，说：“派 7 名代表来好了。”

今天周恩来会见南京军区的领导和群众，是安排解决南京军区问题的学习班。周恩来说：“我们要按照毛主席的有关指示办好这个学习班。群众对领导有意见，要让大家畅所欲言、言无不尽。在学习班上把意见都谈出来。军队的问题要在军内解决，不要扩散到地方上去，不要同地方上搅在一起。要顾全大局，保持部队稳定。”

他说：“这个学习班由军委办事组负责组织实施。学习班成立领导小组。有什么问题可以同中央联络员联系。”

对许世友，周恩来说：“同志们知道，主席、林副主席讲了，他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哪一个没有一点缺点？一个共产党员总是有缺点嘛！但他是忠于毛主席的，这是大节嘛！当然，你们21个人年青，我们不怪你们，但是你们有些老同志嘛！”

康生：“不要听信谣言。”

杨成武：“主席讲：许世友在延安没有反对过我嘛！”

周恩来：“四方面军的事情，那是张国焘指挥他们东杀西打，下面不负责任嘛！罗瑞卿为了制造分裂，把张国焘问题扩大化，利用这个制造派性，把许世友同志关起来了，是毛主席放出来的。他性子暴，说几句错话，好训人，但是他不是江苏刘邓的代理人，江苏的走资派是江渭清、彭冲、陈光嘛，还有其他的，不是他嘛。”

康生：“许世友同志是拥护毛主席、林副主席的，这是一个

大节嘛！你们的《决定》，实际上是针对他的嘛！他是拥护毛主席、林副主席的，拥护毛主席的路线的。从毛主席的干部路线看，对干部要全面看，从历史看，看大节嘛，这个问题，是一个关键性的问题。”

周恩来：“大节好嘛！我们敢于出来保他，就是看到他的大节好嘛。”

根据周恩来的指示，12 月 8 日，北京南京军区学习班的领导小组正式成立，由 10 人组成，杜平政委任组长，还有南京军区副司令员王必成、副政委鲍先志、江苏省军区司令员赵俊、政委梁辑卿、军区后勤副部长吴大胜、军需部部长王挺 7 人，及“21 名代表”中的艾汉美和李英武 2 人，和“7 名代表”中 1 人。

12 月 6 日，天津市革命委员会成立和庆祝大会在天津市海河广场召开，大会给毛主席发出致敬电。《天津日报》发表社论《海河两岸尽朝晖》，会后解学恭等革委会领导带队到和平路游行，从北安桥走到中心花园。游行过后，革委会全体成员回到市委机关的地下室，吃了一顿忆苦饭：糠饽饽。

第二天，12月7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编辑部社论《海河两岸尽朝晖——热烈欢呼天津市革命委员会诞生》。

就在天津代表团刚回到天津不久，陈伯达的指示就来了，说天津还有“大石头”， 让天津搬石头。革委会赶紧召开会议，传达研究陈伯达的指示，成立了“搬石头领导小组”，组长是江枫，工代会主任林启予任副组长兼办公室主任，负责日常的组织工

作。

谁是“大石头”？阎达开。阎达开虽然在 1967 年 1 月 2 日宣布任天津市的第二书记，但一直没来天津任职，他在保定被河北省的造反派扣下了。当时保定是河北省的省会，保定驻军 38 军支持阎达开，河北省军区同意打倒阎达开，于是就把人给扣下了。

林启予赶紧筹备批判大会：组织人收集材料，写批判稿。第一次在小范围内通材料时，林启予一听就傻了，其中有一段说，阎达开是天大“八一三”、南大“卫东”的后台。林启予的观点是倾向“八一三”的，而且“八一三”和“卫东”两大组织在天津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他说：“总结材料念完了，可证据呢？我们不能光凭嘴说啊，得有真凭实据才行。你们尽快拿出证据给我。”

会上没人反对他，但也没人给他证据材料。这边江枫催他赶紧召开批判大会，没办法，林启予把“五代会”所有成员，不管是原“五代会”的还是原“大联筹”的，统统召集到解放路市“工代会”的总部开会。

会上，他又把材料念了一遍，让大家讨论。

开始大家都不说话。后来，中学红代会的代表、十六中的学生李惠明放了一炮，她说：

“这么大的事情，光有结论性的意见不行，一定要有证据。你们拿出证据来。”

她这一说，大家也都说开了。因为到会人中支持天大“八一

三”的人多，大家纷纷对这个材料提出质疑，要他们拿证据，要慎重，没有证据非把天津搞乱不可，要对天津的大联合负责，对刚刚成立的革命委员会负责。林启予见好就收，赶紧宣布散会。

散会后，他跑到市革委政治部去找他的顶头上司，市革委会政治部副主任、66 军 74 师的政委段曙光。一见面就跟他说：“你跟解学恭说说，我不干了！”

段曙光感到很突然，问道：“为嘛不干了？是不是没让你当革委会副主任你闹情绪了？”

林启予说：“你们让不让我当革委会副主任那是另一回事，我现在是遇到难题了。”于是他把开会的情况和群众的反应向段政委汇报了一番，然后说：“这边是领导逼着让我开会，那边是群众有意见。开会以后出了问题，天津市乱了谁负责？你跟解学恭说说吧，这个会有人负责我开，没人负责我就不开。”

后来，开会的事再没人找他，办公室也撤了，最后这事不了了之。

12月17日，南开大学的两派组织发生武斗。南大“卫东”的人把南大“八一八”的办公楼给围了，断水，断电，把人也给打伤了。周恩来指示：“武斗要马上停下来，双方有什么不同看法，可找市革委会坐下来谈。”

当时市革委会正值江枫领班，林启予当班，江枫让林启予去处理。林启予跟南大“卫东”的头儿关系好，去了后，找到他们的头头说：“算啦，把人放了吧，打也打了，人也伤了，你们还

想干嘛！”

南大“卫东”的于泽光同意。林启予又去找 66 军宁参谋长到南大接人。宁参谋长说：“你糊涂呀，小林！大白天的，人救不出来怎么办？”

林启予说：“都谈好了，他们同意放人啦。”

“咳，这你不懂。等晚上，人都睡觉了，咱们再去。”

姜还是老的辣，宁参谋长到底有经验。

到了晚上，一队解放军战士把军装的上衣都脱了，从被围的楼门口一直站到南开大学的校门口，围出一个通道。楼里的人刚接出来，好家伙，后边“卫东”的人就涌上来了！校门口有一条臭河，他们就在河边上打成一锅粥了，打伤了一些人。但人总算救出来了。被打伤的人都送到公安医院了。

当晚，林启予向江枫作了汇报。江枫问：“解放军打人了吗？”

林启予说：“也打了吧？”

后来江枫在会上提出这个问题，说：“打人不行啊！”

12 月 19 日 天津市革委会发出《关于改变天津市制止武斗执行协议监督小组机构的通知》。由原市公安局军管会、市革筹小组及双方群众组织四方代表组成的“天津市制止武斗执行协议监督小组”，改为由公安局军管会和五代会共同组成，归市革委会领导。

12 月 18 日，武汉哲学研究所副所长董锄平又为刘少奇专案组写了如下亲笔供词：

刘少奇大约系一九二六年冬到武汉的，系全国总工会的副委员长，同时把黑手伸入到湖北省总工会，为省总秘书长，成为省总的当家人。出卖工人阶级，出卖党，做各个帝国主义者的代理人，作蒋介石的帮凶，保护资本家，破坏革命，干出了种种罪恶活动，摘要列举于下：

一、贩卖美帝国主义的工运黑货。刘少奇到武汉后，就摆出工运理论家，工运决策者架势，将党内负责各业工会的头头，召集到省总听他将工会组织的课，今日回忆，他基本是贩卖的美帝主义者的“产联”、“劳联”那套黑货，拿经济主义来消失工人革命运动。他还搞了一个工人运动讲习所，地点在黄陂会馆，也是拿的那套黑货去毒害学员，妄图把中国工人运动，纳入美帝国主义的轨道，把中国永远陷入殖民地。

二、作英帝国主义者的代言人。一九二七年一月三日，中国工人阶级、武汉革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以自己的武装力量——工人纠察队，一举而夺回了英帝国主义在汉口的“英租界”，开我国反帝斗争史的创举。在“英租界”被我包围时，汉口英总领事向国民党求援，要求派军队前往保护，由于革命群众强大的压力，国民党因此拒绝，该英总领认为若再坚持下去，英帝主义的反革命武装势必被我革命的武装歼灭，乃耍无赖，通知国民党，把“英租界”托其临时代管，不承认“英租界”已为工人阶级、革命人民自动夺回。可是英帝国主义在武汉的所谓“政权”机器，已被我完全砸毁，英海陆军被我赶下长江，逃往军舰，

英行政人员，惊魂失魄，纷纷逃上商轮、军舰，临夜驶往上海，我工人纠察队夺回汉口全部“英租界”，建立革命秩序。直至一月五日，国民党才派军警入驻所谓“英租界”。刘少奇这个工贼，迫令工人纠察队退出“英租界”给国民党军警接防。并在湖北全省总工会代表大会提出七项要求，大意为（一）“英租界”当局向我方赔礼道歉（二）“英租界”当局抚恤我方死伤人员（三）“英租界”当局保证以后不再发生类似事件（四）要求“政府”收回英租界……。这显然和英总领事同一腔调，不承认汉口“英租界”已为我工人阶级、革命人民自动夺回。为蒋贼介石复将我已夺回的“英租界”再度出卖给英帝国主义作舆论准备的基础。

三、为日帝国主义者保镖。自汉口“英租界”为我工人阶级革命人民自动夺回后，汉口“日租界”、“法租界”、“德租界”当局，纷纷向我方作试探，是否要同样夺回，并表示要自愿交还。德国商人还正式要求其领事将“德租界”交还中国。四月三日，日本水兵在“日租界”打死我人力车夫，这一凶杀案，为我工人阶级革命人民所闻，马上奔赴“日租界”，给以包围，又形成一月三日夺回“英租界”局势，此时工贼刘少奇吓得屁滚尿流，赶赴现场，利用革命人民热爱党、相信总工会的感情，尽欺骗威吓，要我革命群众，退出“日租界”，还和“日租界”当局握手言欢，以表歉意，为他的日本主子压惊。

董锄平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十八

日

## 第 936 回：山西打，召开十二月会议　许世友，同意军区作检讨

此时，山西晋中地区为了武斗专门成立了“野战军”，共 3 个营：

一营是绿帽、绿衣、绿裤、绿胶鞋、绿水壶，和当时解放军的陆军差不多。

二营是绿帽、绿衣、蓝裤、绿胶鞋、绿水壶，和解放军的空军差不多。

三营是绿帽、蓝衣、绿裤、绿胶鞋、绿水壶，四不像。

这 3 个营全部摩托化，有吉普车和卡车。枪支不多，有的是抢来的，有的是自己造的单响步枪。支持陈永贵的一派在平遥建了一个军火制造中心，主要生产单响步枪和仿造“五四式”手枪，还大批生产手榴弹。后来也生产出解放军用的半自动步枪和一小批轻便冲锋枪，还试制出了一挺轻机枪，造出一种很不保险的拉线炮。这些武器出售给各县本派的武斗队，价格相当高。文水县的武斗队骂平遥是军火商，卖军火给自己人比苏联的赫鲁晓夫还厉害。

“晋中野战军”搞武装示威游行。途经榆社县红花岭村时，与“总司派”的下属组织“兵团”打了一场“遭遇战”，双方死伤数人。但“晋中野战军”人多势众，枪多弹多，“兵团”被迫撤出红花岭。“晋中野战军”占领该村后，抓捕群众数十人，当场枪毙 5 人，然后继续游行到和顺县，在城关镇又与和顺的群众

打了一仗，双方各死 5 人，各伤 50 余人。

在兵工厂集中的晋东南地区，两派之间的武斗打得更加惨烈。从 11 月起，迫击炮、无后坐力炮、地雷、火箭筒等杀伤力大的现代化武器取代了土炮和冷兵器。整座大楼在武斗中被炸毁已不罕见，死三、五个人的小冲突寻常得就像一阵轻风。打到 1968 年年初，杀伤力极强的喀秋莎火箭炮也上阵了，十多万人大规模作战，一场攻防就打几天几夜。在武斗中，“红总站”曾一次将解放军前来制止武斗的 12 个连的上千名正规军缴械，双方军事力量的强大和武斗的规模由此可见一斑。

11 月，刘格平到晋东南召集这个地区的两派头头制止武斗。袁振则在太原抓紧“工代会”和“红代会”这两个会议的准备工作。“工代会”主任杨成效，“红代会”主任刘灏，其他的副主任和常委们也都拉好了名单。方案拿定，立即派办公室的一位工作人员去向刘格平报告。刘格平没有意见，批示同意了。但刘格平的“贤内助”丁磊不干了。她认为袁振是“醉翁之意”，想通过召开两会，为自己拉人。丁磊找来“红总站”的头头们一商量，很快，“红总站”在省城刷出了一大批大标语：“袁振背着刘格平同志筹备工代会和红代会是分裂省革委的大阴谋！”这还不算，打听到袁振 11 月 16 日要去太原河西工业区筹备两会，“红总站”的头头们安排下属人马，拦载了驱车前往太原河西工业区的袁振。“红总站”的这些人马只是奉命教训一下袁振，虽然袁振没有挨一指头，但他的小轿车，却被长矛捅得爆了胎。虽说是有惊

无险，袁振还是吓坏了。

让刘格平的老婆这么一搅，袁振想开两会的事，也只好搁浅。

死保袁振的“兵团”闻讯，立即将此事定性为“1116 刺杀袁振事件”，发誓要将凶手缉拿归案。一调查，就有人告密，知道此事是丁磊和“红总站”所为，袁振比在河西区被拦截时还生气。“兵团”也上街刷出大标语，矛头直指刘格平。

刘格平的问题是现成的，就拿那本《踏遍青山人未老》说事，公开批判这本书，怎么批判，都不为过。一时间，“兵团”和“红联站”批判《踏遍青山人未老》的大标语和大字报遍布省城。袁振和刘格平的矛盾公开了。

12 月 3 日晚上，“决死纵队”的一位头头王国太，带着“决死纵队”的一些人，在太原五一广场一侧的并州饭店开会。这时，并州饭店楼下，渐渐聚集了不少闻讯而至的“红联站”的学生，高呼起“打倒哈派”的口号。“决死纵队”可不是好惹的，听见楼下的口号声声，觉得不耐烦，不知哪一位就往下抛了一颗手榴弹，当即在人群中爆炸，两人受伤，一人身亡。而当场身亡的那一个，恰恰不是“红联站”的学生，而是“兵团”的一名中学生。有人立即将消息送到了“兵团”司令部，也不知是哪位正在“兵团”司令部大楼里呆着的“兵团”小头目，当即就以“兵团司令部”的名义打出无数电话，发出了围攻并州饭店的命令。“兵团”一些下属工人组织当即出动，围住了并州饭店，要以血还血。更有改头换面的“红联站”工人队伍也闻讯赶来，打着“兵团”的

旗号，开始围攻并州饭店。10 余挺机关枪，封锁了并州饭店的一切通道，头戴柳条帽，手持长枪和铁矛的“兵团”工人，在机枪掩护下奋勇冲杀，并州饭店刹那间成了枪弹横飞，铁矛挥舞的战场。“决死纵队”伤者甚众。在那里开会的“决死纵队”所有头头脑脑都成了“兵团”的战俘，受过皮肉之苦后才被释放。那天杨成效恰恰不在并州饭店。

12月，陈永贵在山西省革委会第29次常委会上的讲话，呼吁大联合。他质问：

“为什么不能够联合？！”

“干部站队问题，为什么站不出来？是不是因为有些人抄家，偷拿了人家的钱和东西，怕他们站出来揭发你们？！不要因为‘私’影响了联合。不要因为‘私’影响了大的方面。有些早站出来的领导干部，没有亮好相，利用工人、学生的庞大组织来对抗中央，对抗毛主席，破坏大联合，三结合。有些人混入大组织进行破坏活动！”

“不管谁在打砸抢，这一概都是大家很伤心的，但是为什么这样干哩？人力、物力损失很大，伤害同志很多，有没有敌人在那里捣鬼呀？！”

“特别是太原纺织厂的问题，棉花堆成山了，甚至把机器都给破坏了，他们不生产也不让‘红卫队’好好生产。我昨天就想提，今天我提一下。太纺和农民有密切联系。‘太纺红卫兵’前一段红卫兵在外面搞武斗，训练武斗，他们没有在厂，人家生产

没有减产，他们一回去，生产大大下降，把太纺搞得大乱。我看‘太纺红卫兵’就是什么时候也跑不了。有人会说我和解悦有什么关系，不管你们说什么，但是太纺的问题，我们非解决不可！我希望你们常委去解决太纺的问题，要用群众观点来解决。你们不想想，农民每天在地里生产，冻成裂子，没有衣服穿，我看你们这些常委怎么交代农民和贫下中农？！”

“我们决定，坚决贯彻《六六通令》，不论任何组织，任何人，凡是去外单位参加武斗的，或者在现场指挥武斗的，打人凶手，有权逮捕。带柳条帽子的人，手持武斗凶器的人，当地驻军必须收缴。”

党中央和中央文革小组再次关注并着手解决山西的问题。12月，专门解决山西问题的“十二月会议”在京召开，刘格平率领山西省党的核心小组全体成员，和山西省革命委员会的副主任们一齐赴京。这次会议由周恩来主持。与“七月会议”不同的是，这次山西三大派群众组织的头头们，一个也没有被通知到会。

这次会上批评了刘格平的许多做法，康生对刘格平说：“你要好好检查一下，你和丁磊怎么那么胡说八道？说什么空字025、027部队是依靠对象，山西军区是打击对象，69军是团结对象，简直不像样子呀！你是怎么搞的？丁磊要调走！要依靠69军，不要天天搞什么肃清张日清的流毒！”

康生拿出《踏遍青山人未老》指着刘格平说：“你树个人威信是不对的！这本书要批评，要烧掉！净吹你，肉麻的很！”

刘格平解释这本书他没有看过时，康生一拍桌子说："我就不信你没有看到，我都替你脸红。"

康生重提七月会议上送给刘格平的那条最高指示："当时让69 军支持你，是支持革命委员会嘛，这句话又没有发文件，你就传到社会上去了，成了派性的东西了。你们用这句话去压 69 军，你和'红总站'你们这样搞太不象话了！"

会议决定山西驻军"三支两军"工作由省军区交给 69 军党委领导。

这次会议产生了《中共山西省核心小组纪要》。其中第五条指出："红联站"和"十中七一"组织在"九·五事件"中，虽犯有严重错误，但不应定为"反革命暴乱"事件，应予以平反。

山西三大派组织的头头脑脑们，还摸不清十二月会议的最后结果。他们一边派出人马，去北京打探十二月会议的情况，一边等着中央的召唤，时刻准备着进京去参加会议。

在等待的同时，三大派的武斗队也在扩充人员，积极"备战"。12 月上旬，西山矿务局人民武装部的武器库，三次被西山地区的派性武斗队轮番砸抢。杨成效的"决死纵队"装备了枪支，扬言要向"兵团"开火，以报并州饭店的"奇耻大辱"。

"兵团"也严阵以待，有的武斗队装备不但不亚于"决死纵队"，甚至和正规野战军无异。如"兵团"下属太原建筑专科学校的"217 革命造反兵团"，其武斗队人员的武器装备，就达到了野战军一个连的规模。这些武器从何而来？到军队的军械库去

“抢”吧。他们去明抢，部队就暗送。军械库卫兵立正站岗，上级的命令牢记心中，对来军械库“抢”枪的学生们，视而不见罢了。军民两家心知肚明，反正军队上面有硬命令：任何情况下都不得向群众组织开枪。

12 月 17 日，在中央召开解决山西问题的会议时，刘格平在北京接见了“红联站”代表。代表逐条批驳刘格平在山西的《九 •五命令》，并给刘格平两分钟考虑时间，让他谈谈“红联站”究竟有什么错误？刘格平承认自己在这个事件的处理上有错误。

12月底，“红联站”成立了“九 • 五事件平反办公室”。

“红联站”和“兵团”等群众组织开始炮轰刘格平。

12 月 13 日，在北京的南京军区学习班召开第一次全体大会，听取南京军区告状团 21 名代表的意见。下午 13 时，他们 21 人被京西宾馆派来的车接到京西宾馆小会议室，只见主席台左面就座的为南京军区司政后领导机关人员：军区司令部军训部长蒋科，军区党委办公室主任徐玉田，秘书科长肖海，军区后勤部司令部办公室主任钱永清，军训部参谋袁刚、军区政治部副秘书长孙海云，军区政治部组织部长赵树湘。主席台右面就座的为告状团全体人员。下午 14 时正，邱会作、李作鹏、刘锦平来了，他们 3 位端坐在主席台上。邱会作说：“南京军区问题，毛主席早有指示，现在我们就是照毛主席指示办事的。”接着，他征求大家意见，看会议如何开法？

根据大家的意见，学习班自 12 月 13 日至 12 月 26 日历时

14 天，充分发扬民主，双方都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主持会议的除邱会作、李作鹏、刘锦平外，还有海军政治部主任张秀山。14 天当中，除了第一天邱会作讲了几句话外，其余 13 天，邱会作、李作鹏、刘锦平、张秀山 4 人没有讲过一句话。都是坐在那里听。会议期间，分别由军区司、政、后的代表和军事院校及部队医院的代表，当着中央领导的面，当着军区领导的面，诉说他们在 2、3 月“抓人事件”中，所受打击迫害的冤情苦水。军委办事组成员邱会作、李作鹏、刘锦平等，全神贯注地听取大家的申诉。南京军区领导人杜平、王必成、鲍先志，也认真听取大家的揭发、批判，态度诚恳，会后还能和群众相互交谈，相互问候。

有一天，正当 21 名代表准备发言时，“7 名代表”的席位上突然站起一个人来，抢先一步发言。仔细一看，这人不是“7 人代表”，而是南京军区后勤部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钱永清。钱永清在发言中，认为群众“要求平反”、“赴京告状”等活动是“有预谋、有组织地倒许、乱军、压权”，并指责他们是“害群之马”、“不法之徒”，“欺骗总理，混进人民大会堂”，“在总理面前告黑状”。进而指责“王、林、鲍”在南京接见要求平反的群众，是“投降”，“王、林、鲍是倒许、乱军、夺权的黑后台”。他发言时，坐在旁边的军训部部长蒋科，军训部参谋袁刚、秘书科科长肖海等人也纷纷表示支持。21 名代表予以反驳。顿时，会场上你一言，我一语，唇枪舌战，互不相让，演变成一场混战。主持

会议的邱会作不得不赶快宣布："散会！"

12 月下旬的一天下午，军区政治部副秘书长孙海云、军区政治部组织部长赵树湘二人从京西宾馆专程来到 21 名代表驻地——西苑大旅社，向他们传达毛泽东指示，即"三个不能打倒"：

"许世友同志不能打倒"；

"杜平同志不能打倒"；

"南京军区不能打倒"。

"许世友有错误，让他作检查"。

毛泽东的这一指示，是由军委办事组成员刘锦平于前一天晚上传达给孙海云、赵树湘二人的。

21 名代表对毛泽东的这一指示，连续几天展开学习讨论，从思想上、态度上、行动上，逐步做到"三个转变"：

第一，要学会用全面的、历史的观点，看待许世友。许世友是一位颇有争议的人物、特点突出，个性鲜明，战功显赫，错误严重。我们对许世友的不满与反感，主要是由于他在"二月抓人事件"中所犯的错误，使我们深受其害而造成的。但我们不能因为他一时一事的错误，而否定他的历史和全貌，不能否定他的功劳和贡献。我们也不能因个人的冤屈而舍弃大局和整体。

大家表示：毛主席的话，"许世友同志不能打倒"，我们一百个相信，一百个照办！

第二，要充分认识保持部队稳定的重要性。

第三，要注意克服自身的片面性和偏急情绪。我们对许世友

的认识和态度，有一个演变的过程。文化大革命之前，我们真诚地拥护许世友的领导。文化大革命初期，虽然不少人写了大字报，给他提意见，但并没有一个人要打倒许世友。只是他在 67 年镇压群众之后，那么多人被他打成反革命，挨整、遭罪，连同家庭、朋友一起遭殃受压。因而，大家对许世友的态度发生根本性转变。无比气愤之下，发出了“打倒许世友”的呼声，有的说：“不能把他打倒，也要打跑”。

通过讨论，他们认为：“通过学习毛主席‘三个不能打倒’的指示，我们要注意：对许世友的态度，不能因为个人受了冤屈，容易出现片面性和偏急情绪。”

艾汉美根据上述“三个转变”，正式写成发言稿，在 21 名代表内部展开讨论，听取大家意见。而后，他作为 21 名代表的发言人，在学习班的全体会议上公开发表，当即受到军委办事组领导的赞扬。

1968 年元月 28 日，“南京军区党委的检讨报告”和“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对南京军区党委检讨报告的批示”的文件正式下发。

这份文件来之不易。早在 67 年 8 月，杜平政委和王必成副司令等人，就开始组织人员起草军区党委的“检讨报告”。可是，当时躲在大别山里的许世友，压根儿就不承认他有错。

后来，杜平政委去北京开会了，在南京主持工作的是王必成副司令员。受压群众要求平反的呼声越来越高，中央也要求尽快

解决军区“二月抓人”事件的错误。眼前，当务之急是要拿出“军区党委的检讨报告。”可是，这份“检讨报告”谈何容易？

正在此时，中央决定在北京举办“南京军区学习班”，有关各方汇集“学习班”上解决问题。周恩来也借国庆节之际，让陈锡联将许世友召到北京。

学习班办了一个多月，南京军区党委的“检讨报告”仍然过不了许世友这一关。一天，“检讨报告”拟稿人之一的军训部部长蒋科，再次把“检讨报告”草稿送给住在中南海的许世友审阅、定稿、签字。许世友一看，草稿上写着如下错误：“我们违背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犯了方向路线错误”、“镇压了革命群众”，“军区机关和三省一市所属部队共抓捕了五百多人”，“对革命群众加上一小撮政治扒手、阶级报复、现行反革命等政治帽子和罪名”。立刻满脸的不高兴。

他看不下去了，把草稿往桌子上一摔，说：“什么方向，路线错误？是谁叫这样写的？谁承认方向、路线错误，谁去检讨”。他还说：“我没有镇压群众，我要抓的人都是坏人，没有错。”

许世友仍然不认账，不签字。蒋科又一次吃了“闭门羹”。

“检讨报告”又搁浅了，怎么办？这给杜平政委出了大难题，他是主持起草“检讨报告”的负责人。中央规定解决问题的最后期限是 68 年元月底之前，包括江苏问题，南京军区问题，全部结束。这就是说，军区党委的“检讨报告”刻不容缓，必须当即完稿上报中央。杜平与蒋科等人商定：“只有一个办法，直接请

示总理。”

周恩来是党内众所周知的善于解决各种难题的高手。他看了杜平他们送去的“检讨报告”草稿之后，根据毛泽东有关指示，综合考虑各方面的情况，立马明确表态，就按此稿定案。

周恩来拍板了，许世友无可奈何之下，勉强同意了“军区党委的检讨报告”。

1968 年元月 28 日晚上，周恩来宣布，“南京军区学习班”圆满结束。

## 第 937 回：周恩来，与江苏六市会谈　谣言□，广州市供应紧张

12 月 8 日，林彪及周恩来和中央文革小组等人接见军委办事组政工组文艺组、军报组全体人员。林彪说："政工组的根本任务，一是管好学习毛主席著作，一是管好干部。"

12月10日，总理办公室接李德生报告：芜湖"三筹处"所属四个群众组织一直拒绝交出武器，搞打、砸、抢、抄。12月以来三次冲击部队，抢走大批武器弹药，抢占军管会大楼，使军管会无法办公。周恩来电复李德生：以安徽军管会名义向这四个组织打、砸、抢、抄的小集团提出书面警告，要他们按照中央《九五命令》，立即停止这种非法行为。将武器封存上交。如仍不听劝告，继续犯法，军管会将执行中央命令，依法处理。

12月14日，周恩来等人接见江苏南京、无锡等6城市的赴京代表团。对江苏已达成的几个协议，周恩来表示满意。他希望两派尽快联合。他说：各地"不管多少组织，大致都是两派，大多数是因为夺权分裂成为两派的。总的两个名称，一边是支派，一边是踢派，或者一边是好派，一边是P派。长江下游都是如此，安徽如此，江苏如此，浙江也是如此。最厉害的是苏皖两省，安徽也受江苏的影响。因此，希望江苏的问题在这里尽早地解决好，带个头嘛！从去年十二月中央就注意了，整整一年了，乱了一年了嘛！闹到相当程度了，最近又出现了武斗。"

"到年底只剩半个月了！江苏问题总要争取在年内解决才好

嘛！还要过一个年啊！葛忠龙来了吗？”

葛忠龙：“来了。”

“你就是去年年底来的嘛，去年在这里过了一个年，你还要在这里过年吗？”

葛忠龙：“不能了。”

周恩来又问：“张建山来了吗？”

张建山：“来了。”

周恩来：“哦，来了。你们同学两派原来都是受压制的，受彭冲，匡亚明压制，一起杀出来的，共同战斗的，现在不能联合在一起，不可设想嘛！”

周恩来又说了扬州、南通、无锡、常州等地达成的协议，最后，又说：“正在推动的是南京工人阶级三派的联合。”

康生：“上一次，我没有弄清楚，南京的工人到底是几派？”

答：“三派。”

周恩来：“就三派，好派、屁派、‘促联’。”

曾邦元：“上次康老讲，新、老‘工总’，‘促联’工人联合起来。南京还有‘八二七’、‘东方红’工人，有人就认为不要联合这些组织中的工人。”

康生：“我们讲话还要都点出名字来啊？还是要按主席最新指示，工人阶级要联合起来嘛！组织的名字可多了，广东的名字一列十几个。”

周恩来：“就是讲三派联合嘛！组织可以有很多名称，广东

就有十几个组织，名字多呢！广东都联合起来了嘛！现在还是广东工人联合有成效。他们有海员罢工的光荣历史，先是海员工人联合，后来铁路联合了。工人有革命传统嘛！应当领先嘛！”

接着常州、扬州、无锡三个地区开始汇报，当无锡有人谈到对方抓人未放时，周恩来指示王挺说：“王挺同志，请你直接打个电话回去，双方抓的人要一律放，不管哪一派通通要放，限在今天24小时内双方放人，都要坚决放。你说这是中央的命令！”

康生：“一方面打电话，一方面你们各派自己检查。”

周恩来：“在江苏，我看拥军爱民成为关键问题。各革命群众组织，P派也好，好派也好，不管哪一派，都要拥军，矛头不能指向解放军。军队同样要爱民，支左不支派。”

在谈到群众组织使用电台时，周恩来说：“私设无线电台，搞无线电报话机，广播机，控制长途台，搞电话窃听，都是犯法的。我们警告了不听，也不取消，那就是反革命了。以后再发生我们就要依法逮捕。现在警告你们，各个组织都打电话回去查一下，还要如实向联络组报告，过去搞了哪些，要检讨。今天是12月15号先宣布，今后再查出来，就要以反革命论处。邮电不管哪一派控制都不能偷听。铁路要军管，邮电系统也要军管，不管你哪一派，都要和社会上脱离组织联系。”

康生：“我同同志们讲，这一个问题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已有命令公布，各地方都要彻底检查，已经宣布了，这件事情，不是开玩笑的，是犯法的。特别是电台啰！有的电台，

还有人编密码，就更严重了。再发生是不能容忍的。如果使用雷达那就更严重了。”

周恩来最后说：“从这三个地方汇报看出来，也听出来了，《协议》定了，本来应该很好执行，但总是受到干扰。一个就是没有按系统联合，一个就是学生去干扰。如果不是工人阶级首先按系统联合起来，《协议》执行就有问题，只要一个学校干扰，就会影响工厂。如工厂联合起来，就不会受干扰了。各省都是这样，江苏也是这个问题。”

周恩来动员学生们回到学校，先将自己学校的大联合搞好。

康生：“想管全国，全省，连自己都没管好。”

周恩来：“常州应该把协议修改好，戚墅堰铁路机车车辆厂与地方分开，单独搞个协议，树立个样板。扬州工人虽少，但总比学生多，不要被学生支配。师范学院你们叫鲁迅大学也好，都要复课闹革命，建立红代会，职工搞工代会，农村搞农代会，按照中央10月17日通知，按系统大联合，不要去干涉地方上的事情。”

“希望今年年内解决，南京也好，常州、无锡、苏州、扬州、南通也好，都要做出榜样来，哪能拖这么长的时间？问题是不难解决的嘛！军队一定要把军管搞好，铁路，交通都要实行军管。港务局无论如何要军管。如果你们认为军管有的人员不行，我们可以换人嘛！但你们一定要服从军管。军管会的威信一定要树立起来。毛主席，林副主席派的人，权威一定要树立起来。一定要

把军管会的权威树立起来。明天我再找部队少数人谈谈，军管会没有权威怎么能行？！搞革命大联合，三结合没有军管会这个桥梁怎么行？！能靠你们一派领导？！”

周恩来问曾邦元：“让你当省长行不行？”

曾邦元答：“不行，要向工人阶级学习。”

这天，无锡市两大派经过协商，达成《关于重申<十四条协议>，坚决彻底制止武斗的协议》。29 日，签订《关于立即上交一切武器、弹药的协议》。

12 月 11 日，广东省革筹负责人黄永胜、陈郁、孔石泉、王首道等，召集了广州各群众组织赴京返穗代表和部分群众组织头头 130 多人，举行座谈会。中央调查组和省军管会代表也出席了座谈。座谈会要求，坚决制止武斗，停止串连，动员支农青年返回农村。

14 日，广东省革筹召开电话会议，部署对赵紫阳的“大揭发”、“大批判”。

15 日，中山大学“革造会”和“主义兵”抄了中南局监委会书记闵一帆的家，“红旗派”派人前往阻拦。一时间，“揭发、批判”闵一帆，“砸烂中南局”的大字报、大标语，排山倒海，遍布广州。

18 日，《南方日报》公开点名批判赵紫阳。“红旗派”、“东风派”相继召开批斗赵紫阳的群众大会。

12 月 19 日，由广东省革筹举办的第一期毛泽东思想学习班

在党校开课，参加的人全是各群众组织的头头。也许，在他们中间，不少人都以为这是为进入新政权做准备，因此个个踌躇满志。

12 月 21 日，原广州市委机关举行“革命大联合临时委员会”成立大会，宣告市委机关实现了大联合。

12 月 30 日，由“红旗派”广州大专院校红卫兵代表大会筹备委员会和“东风派”的广州地区高等院校红卫兵代表大会筹备委员会，联合组成了广州地区大专院校红代会。5000 多大专院校红卫兵在中山纪念堂隆重集会，宣告广州地区大专院校红代会正式成立。大会进行期间，收到了中央文革、国务院发来的贺电。

然而，从秋交会以后，一直笼罩在广州的紧张气氛，丝毫没有因两派大联合而缓和下来，反而愈趋紧张，流言四起，人心惶惶，好像随时会有大事发生。此时的广州，不仅粮油煤短缺，而且日用工业品供应也大减，从 11 月初开始，手表、自行车、缝纫机等商品因供应短缺，实行凭工业券购买。据统计，1967 年由于武斗频发，许多工厂的生产陷于停顿或半停顿状态，广州市全年工业总产值完成了 30.1 亿元，只有全年计划的 75%，比 1966 年下降约 12%；基本建设投资完成 4411 万元，只达到计划的 50%。恐慌在市民中悄悄蔓延，市面上谣言纷纭，说广州将有大型武斗，市场供应将完全停顿，因此，市民疯狂地进行抢购，粮、油、煤、盐供应全面告急。据越秀区粮食系统向军管会报告，越秀区共有 13 个粮店，现在已有 6 家粮店脱销。脱销原因，主要是运输问题，他们只有 10 辆汽车，即使日夜赶运都不够供应。

市汽车运输公司没有汽油，不能支援。各粮店门前挤满了排队的长龙。

12 月 16 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发出中发［67］391 号文件：《关于进行修改党纲党章工作的通知》，介绍了上海市群众性的修改党纲党章的经验，“认为：凡条件可能进行这项工作的地区，都应参照上海的经验，组织党纲党章修改小组和群众性的讨论，集中群众意见，提出关于修改党纲党章的方案，并于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日以前将修改草案上报中央。目前还不可能全面进行这项工作的地区，也可组织一些力量作重点调查研究。这是‘九大’的一项重要的准备工作，望你们接到通知后，认真讨论，并将你们的部署电告中央。”

12 月 20 日，徐景贤对宣传界文艺界谈清理阶级队伍。说：“清理阶级队伍，实际上包括两方面：首先是对敌斗争问题，然后是树立无产阶级阶级队伍。”

12 月 25 日，上海宣传系统召开“清算陈丕显曹荻秋之流招降纳叛罪行，清理宣传系统阶级队伍”大会，上海的清队就这样首先从文艺界展开。以后，清队又扩展到其他行业，1967 年底和 1968 年初，布置到各区县局。

12 月 16 日，戚本禹、杨成武接见中直文艺系统一些单位的军代表。戚本禹宣布：“林副主席已经下命令要杨成武同志、军委办事组选几个军、师级的干部，来管文化界的事情，现在杨成武同志已经把人调来了。一个是王宝功同志，他原来是沈阳军区

空军的。一个是贾军同志，广州军区来的。还有一个是魏宏武同志，他是 21 军调来的。今后几个样版团，就归他们来领导。”

杨成武说：“军委办事组政工组，在贯彻江青同志意图下，协助工作。具体的政治思想工作，由军委办事组政工组底下的文艺办公室负责”，“他们在江青同志和戚本禹同志的直接领导下工作，重大问题直接请示江青同志。我们协助，卫戍区协助。”

王宝功，时任沈阳军区空军政治部副主任。

贾军，时任广州军区政治部组织部副部长。

魏宏武，时任 21 军 63 师政委。

大串联以后，到毛泽东故乡韶山参观的中外人士每天都络绎不绝，越来越多，1967年已将近200万人次。为方便群众前去参观，湖南省修建了通往韶山的铁路专线，还在韶山建造了一座毛泽东塑像。12月13日，湖南省革筹小组为庆祝韶山毛泽东塑像落成和韶山铁路通车，特地向中央文革和周恩来打报告，准备在12月26日，毛泽东的74岁寿辰这天举行通车典礼，想请毛泽东为“韶山车站”题字，请林彪和周恩来为毛泽东塑像落成题词，并请中央、中央文革、中央军委派人来韶山参加庆祝活动。

12月17日，毛泽东看到湖南省革筹小组《关于庆祝毛主席塑像落成，韶山铁路通车向中央请示报告》。这份文字并不很长的报告，多处使用“大树特树毛主席的绝对权威，大树特树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的提法。于是，他在湖南的请示报告上写下了如下批语：

林、周、中央及文革各同志：

（一）绝对权威的提法不妥。从来没有单独的绝对权威，凡权威都是相对的，凡绝对的东西都只存在相对的东西之中，犹如绝对真理是无数相对真理的总和，绝对真理只存在于各个相对真理之中一样。

（二）大树特树的说法也不妥。权威或威信只能从斗争实践中自然地建立，不能由人工去建立，这样建立的威信必然会垮下来。

（三） 党中央很早就禁止祝寿，应通知全国重申此种禁令。

（四） 湖南的集会应另择日期。

（五） 我们不要题字。

（六） 会议名称，可同意湖南建议，用第一方案。

以上各点请在一次会议上讨论通过为盼。

毛泽东

十二月十七日

12 月 18 日，毛泽东在接见由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委员、不管部部长佩奇率领的阿中友好协会代表团时说到了正在进行的文化大革命，他说："有些事情，我们事先也没有想到。每个机关、每个地方都分成了两派，搞大规模武斗，也没有想过。等到事情出来以后，就看出了现象。""这绝不是偶然的事，是尖锐的斗争。解放后包下来的国民党、资产阶级、地主阶级、国民党特务、反革命——这些就是他们武斗的幕后指挥。""这次是一个

大审查，用群众性方法来审查干部。有可能要冤枉一部分好人，但横竖不杀，搞错了将来平反。文化革命是个总的名称，实际上是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

当晚，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碰头会上，再次为杨成武的那篇“大树特树绝对权威”的文章批评陈伯达。他说：

“越读书越蠢，文章不是杨成武写的，是你们叫人搞的。我只看了标题，没看内容。你不是中国的马克思吗？有些语言没有从科学辩证法中去考虑，你们要执行奴隶制，要写人的绝对权威，我才不相信你们写文章的人，我说不相信，不是完全不相信，列宁怎么讲的？相对真理和绝对真理嘛！就标题来说是反马克思主义的……”

陈伯达被毛泽东批得脸色发紫，头都不敢抬。

散会时，陈伯达朝杨成武拱拱手说：“杨代总长，我对不起你！”

## 第 938 回：清华园，“四一四战歌”□波　周培源，新北大深夜抄家

清华大学“414”因为周泉缨攻击陈伯达一事，被蒯大富搞得十分被动。为摆脱政治上的窘态，他们决定，单方面宣布解放清华大学原党委常委、国防科研项目工程党总支书记、著名核试验专家、清华核能研究单位“200#”负责人吕应中。

蒯大富果然上了当。他为此连续召开全校性的“彻底批判吕应中白专道路大会”，批判斗争吕应中。12 月 4 日上午，“团派”保卫组秘密囚禁吕应中。

12 月 5 日，“团派”广播台又发表声明，称《414 战歌》的歌词不是林彪语录，因此唱“414 战歌”是炮打林副统帅。

清华大学的“414”战歌，是周泉缨搞起来的。在 1967 年 5 月，当时“414”处在高压下，屡屡有人引用林彪的语录：“在需要牺牲的时候要敢于牺牲，包括牺牲自己在内，完蛋就完蛋，上战场枪一响，老子下定决心，今天就死在战场上！”以明心志。而林彪的这段话，也确实极大地坚定了当时“414”坚持抗争的决心。周泉婴见状，就以林彪语录为主体词，请“414”派的宣传队谱上曲，在结尾的口号，采用《毛主席语录》：“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以此作为“414”的战歌，以鼓舞士气。谁知宣传队谱上曲后，就在当天的大会上演唱了，并一炮打响，《414 战歌》一下子响遍清华园。

本来，“团派”囚禁吕应中，已经引起清华大学众多干部的

不满。接着，“团派”又于 12 月 6 日查抄了多名站在“414”一边或同情“414”的清华大学中层干部的家。12 月 8 日，清华大学 287 名干部联名发表《强烈要求立即释放吕应中同志的声明》，认为绑架吕应中是非法的，是违背《六六通令》的，要求蒯大富立即放人。第二天，12 月 9 日，“团派”又查抄了多名清华大学中层干部的家。“团派”和“414”之间还发生了多起小规模的流血武斗，并相互冲击对方，大造声势。

12 月 13 日，蒯大富在“团派”大会上说：他在 11 月 27 日就《414 战歌》中的语录问题请示周总理，周总理将蒯大富的请示转给吴法宪，让吴法宪查实《414 战歌》中的语录到底是不是林彪的语录，结果吴法宪明确地告诉他：“林副统帅没有讲过那段话，肯定没有讲过，也不会那样讲。”因此，蒯大富在会上说：“我们把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指示已经公布于众，他们还要唱‘完蛋歌’，我们认为这是在开反革命的顶风船，我们决不允许把这种不像样的联动式的法西斯歌曲强加给我们最最敬爱的林副统帅。”

闻听此言，“414 ”方面不少高干子女纷纷找寻《414 战歌》中的那段林彪语录的实际出处，结果很多书籍和照片确凿地证明，《414 战歌》的歌词确实是林彪说过的话。

但是，“414”方面故意不公布有关能够证明《414 战歌》的歌词确是林彪语录的证据，而是通过“414”广播台于 12 月 16 日发表《严正声明》，重申《414 战歌》的歌词完全是林彪语录，

反过来攻击蒯大富，说他有关《414 战歌》的言论才是真正炮打林副统帅的犯罪言行。

就在“414”广播台发表上述《严正声明》的当天晚上，戚本禹和北京市革委会主任谢富治与首都高校群众座谈。当清华“团派”代表问谢富治，《414 战歌》中的语录是否是林彪语录时，谢富治明确地回答：“我从未听见过，谣言！”

接着，戚本禹说：“造毛主席、林副主席谣的人，罪该万死！”“你相信吗？靠毛泽东思想嘛！你们学了这么多毛选，还分析不出来？”

12 月 18 日，清华大学“414”认为时机成熟了，他们在清华礼堂召开关于《414 战歌》的专题大会。会上，“414”总部常委陈楚三发言，他公开批评 12 月 16 日戚本禹和谢富治关于《414 战歌》语录的表态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同时他还向全体与会人员展示证明《414 战歌》语录是林彪语录的确凿证据。

原来，《414 战歌》中所用的林彪语录，出自解放军总参谋部编的《林彪元帅有关战役方面的论述汇编》，在该汇编中，有一篇林彪 1959 年 11 月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其中明明白白地记载着《414 战歌》中的那段林彪语录，一字不差。

“团派”对于“414”的反击出乎意料，一时间不知道如何应对是好，于是文革中的清华园出现了罕见的沉静，两派的广播台都鸦雀无声。然而，“414”万万没有想到，“团派”经过一天紧锣密鼓的谋划，12 月 20 日，蒯大富竟命令“团派”保卫组绑架

了“414”的陈楚三。“团派”16 名联合总部委员也随即发表声明，称陈楚三是“现行反革命”，必须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团派”在对陈楚三毒打和审讯 15 个小时之后，次日凌晨将其扭送到了北京市公安局。北京市公安局也收留了陈楚三。

陈楚三，烈士陈潭秋的儿子。母亲王韵雪给他取的这个名字，就是“楚虽三户，亡秦必楚”之意。按照文革的惯例，陈楚三既然已经被北京市公安局收容，那么至少意味着当时陈楚三已经被蒯大富打成了反革命。同时，“团派”保卫组还抄 20 余名支持“414”的清华大学干部的家，其中一些干部被打伤，一些被抓走。最后，“团派”广播台向全校发布《通缉令》，通缉“414”的 41 名各级负责人。整个清华园被蒯大富搅得一片恐怖。

显然蒯大富的上述举措，旨在一举摧垮整个“414”组织。结果，事与愿违，。12 月 20 日当晚，“414”几十人不约而同的挤进了科学馆广播台那间大房间，大家非常愤怒，决定去北京市革委会，要求释放陈楚三，否则就不回校。“414”总部核心组迅速一致做出果断的决策，宁为玉碎，不为瓦全，誓死与蒯大富及其“团派”决一死战。21 日，“414”的主力全线跳出清华园，在北京城内进行游行示威，来到北京市革委会请愿，准备在革委会前的小广场静坐。他们将斗争的矛头直接指向北京市革委会主任谢富治，不但在北京市革委会门前召开大会声讨谢富治和蒯大富迫害“414”总部常委陈楚三，而且将抨击北京市革委会主任谢富治的大字报贴得满城皆是。

但是进到大楼递交材料的人出来后对大家说，革委会态度很強硬，说“如果我们在革委会静坐，性质就变了。”“414”总部决定全部人马撤回学校。

北京市革委会右拐不远，就是市公安局，临街是公安局的信访室。撤回学校的“414”队伍经过这里时，有几个“414”广播台的学生进去看了一下，见这个信访室有 30 多平米。他们出来后，恰好看到“414”总部常委张雪梅，便对她说：“这儿我们能住下来。”

此时正为这次营救行动无功而返心中不快的张雪梅闻听此言，就和他们一起进到信访室，一看，确实可以住人。到信访室上访名正言顺，不是在市革委会门前静坐。于是他们决定留下来继续向市公安局要求释放陈楚三。他们从信访室出来后，正好看见“414”负责人沈如槐正随着队伍走过来，于是拦住他，对他说了他们的想法。

沈如槐担心只有广播台的几个人太少，一旦清华“井冈山”来了会吃亏，便和张雪梅商量，决定把数力系队伍留下。正好看见数力系的队伍过来，沈如槐就喊了一声:“谁愿意与张雪梅一起留下的，就自愿留下，其他人回校。”于是数力系有五、六个人留了下来，加上原来就支持张雪梅留下的几个人和广播台的几个人，有十几个人留了下来，住在了市公安局信访室。晚上他们就合衣而睡，男女各一排。

12 月 25 日，为了纪念去年“12·25”炮打刘少奇一周年，

清华大学蒯大富集合 6000 人的队伍，浩浩荡荡前往长安街、天安门、前门游行示威，张贴标语。在动员大会上，蒯司令振振有词：“各阶级、各阶层、各派别、各种政治势力都要在‘九大’寻找自己的代理人，……要扫除‘九大’的绊脚石，为‘九大’立新功！”

12 月 26 日，“414”进城宣传，痛斥蒯大富想当中央委员。

至此，清华《414 战歌》事件事实上已经成为震动北京的大事件，吴法宪再也沉不住气了，他只好硬着头皮去直接请示林彪，询问《414 战歌》中的林彪语录到底是否是真？据说林彪听了吴法宪的请示后动了怒：“什么武士道精神？我说的话就是我说的话！”

26 日深夜，陈楚三放出来了，“414”欣喜若狂。

12 月 27 日，戚本禹和谢富治接见清华两派代表，戚本禹和稀泥说：“‘414’的同志们把林彪同志论述我军战斗作风的思想改编为战歌，这是热爱林副统帅的表现。但是这个改编没有把林彪同志论述八大作风全部表现出来，……而且在两派闹派性斗争时，用这个战歌来鼓舞士气，这就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为此，我们建议《‘414’战歌》应由‘414’自己根据毛泽东思想的原则作妥善处理，双方不要再争论这个问题。”

12 月 27 日，1927 年任湖北省总工会秘书的成柱周写了关于刘少奇的如下供词：

刘少奇在一九二七年六月廿七日前作好了解除工人武装的

准备：

六月廿日左右，刘少奇叫纠察总队总队副朱菊和分队长周霖在纠察队总部把枪支登记好了，准备交给国民党。刘少奇在六月廿六日拿了一个电报稿即《要求自动停止工人纠察队的武装》的勘电，叫我根据电报内容拟草出布告、致军事委员会信、致汉口卫戍事宜处信；告工友告军士同志是宣传部李昌荣起草的，都经过刘少奇亲自审查修改的。上述文告，于六月廿七日就搞好了，六月廿九日交枪前后斗公开发布了。

刘少奇在缴工人械前的言论：

刘少奇在缴械前经常说：我在安源时，工人没有武装，照样搞工会，现在刀刀枪枪的太危险了，这样下去，迟早要闯祸，不搞武装斗争好。不然，会影响全局。六月廿九日刘少奇对我说：若是不交枪，一定要造成流血事件，引起冲突，国共要合作到底，只有交枪，有枪反而危险。革命是要革命，有可能把自己的脑袋革掉，但是我们要保护脑袋。

刘少奇在缴械后的言行：

六月廿九日缴械后，在一个晚上，刘少奇在省总办公室大声说：现在把武装解除了，枪支交了，我也放心了，没有目标了。军队也不会找我的麻烦了，危险也小了。

成柱周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廿七日

我们再看北京大学。进入12月后，北大的小磨擦、小武斗不

断发生。“公社”对“井冈山”嚷嚷的“十二月风暴”警惕很高，甚至有些神经过敏。12月9日，孙蓬一等人认为“井冈山06纵队教工支队”一张纪念“一二九运动”的大字报有攻击毛主席的行为，准备去抄牛辉林的办公室，后来经李清昆劝阻放弃了这个行动。但是中午，“新北大公社”的人还是蜂拥而去，包围了牛辉林所在的25楼，以牛辉林包庇反革命为由，将参与写大字报牛辉林、侯汉清、谢纪康3人带走，在大饭厅开会斗争了他们，并当着孙蓬一和校文革其他负责人的面，对这3人拳打脚踢。会后，又组织人到25楼前游行。后来索性一不做二不休，准备将这3人送往公安局。就在这时，“井冈山”援兵赶到25楼，将牛辉林3人救走。

14时30分左右，“新北大公社”的负责人孙月才听说此事后，便到“井冈山”总部所在地28楼去看情况，结果在28楼前被“井冈山”抓住，以血还血的打了一顿，眼镜被打掉，鼻血也被打了出来。当时也有“井冈山”的人在劝阻说：“别打！别打！”并帮助孙月才从地上爬起来逃脱。但“井冈山”的一些学生依然紧追不舍。此刻，孙月才最关心的是他口袋里的日记本，担心让“井冈山”的人拿走。他看到“新北大”编辑部的刘亚雯，便把日记交给了她，这才放心了许多。此时广播站已在广播“强烈抗议井冈山一小撮暴徒残酷殴打我公社总部负责人孙月才同志”。就这样，孙月才住了半个月的院。在校医院，他才发现自己的手表也没有了。

当天，在学生宿舍38楼、39楼、40楼、41楼都相继发生了两派学生的对骂、打架，双方一边打还一边高喊：“要文斗，不要武斗！”“生为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而战斗，死为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而献身！”

紧接着，又发生了一连串的小武斗。北大“井冈山”为此大做宣传文章。

此时，周培源已不再担任北京大学“井冈山”的领导成员，但是“井冈山兵团”成员还是把他视为精神领袖。于是，聂元梓、孙蓬一等人悄悄地组织了周培源专案组。经过一段时间的内查外调，收集了有关周培源的一些材料，主要问题有两个：一是 1945 年 1 月，周培源曾参加美国战时科学研究与发展局工作，后到美国海军部军工实验站研制投掷鱼雷，于是周培源成了美国特务，在政治上被定了性，置于敌我矛盾的死地；二是周培源及其夫人王蒂征喜欢收藏书画，这不就是倒卖书画的奸商吗？

经过策划，“新北大公社”中部分工人和学生，准备伺机查抄周培源家并绑架周培源本人。

无线电系 1965 级学生刘树民，是“新北大公社”成员。尽管他在政治上认同聂元梓和“校文革”，但他对周培源怀有深深的敬意。听说要抄周培源家的消息，他感到震惊，思想陷入了激烈的斗争。

终于，他下定决心，趁着月色，前往周家。

他没有走三角地而入燕南园的直道，而是一直往北，走到了

未名湖，在湖区绕了一大圈，然后沿着林间小路，穿过南阁、北阁，走过三院、五院，环顾四周无人，疾步跨进了燕南园，急促地敲响了 56 号门——周培源的家门。

当他进入客厅，见到周培源一家时，由于紧张、激动，满头大汗，竟然嗫嚅着说不出话来。周培源之妻王蒂征好言好语地劝慰他，他才将此行的意图告诉了周培源一家。

闻讯后，周培源的四女儿如苹赶紧跑到了“井冈山兵团”总部 28 楼，把这一情况通报给兵团勤务组长侯汉清。侯汉清连忙召集了“兵团”几个负责人，商量对策。最后征得周培源本人同意，让他住进 28 楼，在总部的严密保护下确保其安全。

周培源住进了 28 楼，“新北大公社”似乎知道了音讯，一星期过去了，并没有对周家采取行动。12 月 21 日晚上，未见异常，似乎太平无事。周培源回家洗了一个澡，还让如苹给他理了发。

如苹一边理发，一边与父亲开起来了玩笑：“公社的人骂你是周白毛，我看你的头发是灰白的，像个灰兔子似的。”周培源微微一笑，反唇相讥道：“我是灰兔子，你不就成了兔崽子了？”

父女俩正在说笑逗乐之间，“公社”已悄悄在门前布置了岗哨。三女儿如玲发觉了这一情况，便打开后门，陪着父亲，在夜色的掩护下，回到了 28 楼。

“公社”没有发觉周培源已经转移，当晚 24 时左右来到燕南园，他们守住了燕南园各门的进出口，并包围了周宅，部分人在一个体态剽悍的工人头头率领下，闯进了屋内。

他们先是搜寻周培源，见他已经转移，不禁恼羞成怒，把屋里搅得天翻地覆，发泄性地破坏了玻璃器皿和其它器物。如苹年轻气盛，上前与他们理论。那个工人头头不由分说，抡起拳头就打将过来。王蒂征出于母亲的本能，挺身冲上前去，保护女儿，这重重的一拳擂到了她的眼眶上，很快，眼眶变得乌青胖肿……

一场浩劫，周培源家里一片混乱。深夜里，人们正当沉睡之中，“新北大公社”的高音喇叭响起了那支前奏曲：“擦亮眼睛，投入战斗……”每当听到这个曲子，人们便知道，“新北大公社”又揪出了一个反革命、特务或漏网右派……这一次半夜发难，更为异乎寻常。他们通过沉静的夜空，向北大师生播发了“新北大公社 严正声明”，宣称揪出了美国特务周培源，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并奉劝“井冈山兵团”“受蒙蔽的战士”，造周培源等一小撮坏头头的反，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与此同时，“新北大公社”在校园内、海淀小巷、长安街打造攻势，四处张贴大幅标语：“打倒美国大特务猪配猿！”，“揪出大特务周培源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

## 第 939 回：周恩来，接见东三省代表　□□江，代表团□回冰城

12月22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转发中发［67］396号文件：《关于潘复生、汪家道同志检查的批示》。

23 日晚 20 时 25 分，在人民大会堂三楼小会议室，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李富春、戚本禹、姚文元、杨成武、谢富治、吴法宪、李天佑、李作鹏、张秀川、王洪坤、陈锡联、宋任穷等接见了黑龙江省两派代表以及辽宁、吉林两省各派代表。潘复生、汪家道也在台上就坐。

周恩来显得十分兴奋，他这样开始他的讲话：

“今天这个会是个盛会啰!是东北三省的，辽、吉、黑，所以，我们中央同志，就是江青同志因为身体不大好没有来，原来也是准备来的，其他的中央同志，沈阳大军区的，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的，还有海、陆、空、军委的，都在这里。今天宣布黑龙江省问题的解决。黑龙江省已经有了革命委员会，还要解决问题，可见问题总是不断有的。我们希望今年之内能把辽、吉、黑的问题都解决。今天是 23 号了，就看你们吉林、辽宁有没有这个勇气、这个度量，能不能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来实行在毛泽东思想原则基础上的革命大联合、革命三结合。如果没有这个决心，当然啰，你们要留在这里过年，我们也不能送客。”

台下一片笑声。然后，周恩来指着转发黑龙江省潘、汪检查

的中发(67)396 号《中共中央文件》，把话锋一转：

“因为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内部发生一些问题，它领导下的革命群众组织——两派发生了很长时间的争论，一直发展到武斗。这一次来到北京，也差不多 3 个月了吧?”

有人说：“4 个多月。”

周恩来继续说：“直到最后才把问题解决。正因为两派达成《十二条协议》，我们觉得还不够。大家都知道，山上派和山下派，就是‘捍联总’和‘炮轰派’，有几个大的据点争夺很大，所以我们就推动一个哈一机厂，一个军工学院，一个师范学院，这三个单位，根据《十二条协议》，又达成三个分协议，这样就可以拿这个来推动。最后，又宣布了潘复生、汪家道两位同志的检查。他们两位在这个过程中作了检查，然后又和两派谈了，最后中央加以批示。今天把这个批示送到你们手里，现在宣布!在这之前，我们仅仅和两派的一边 10 个人，就是‘炮轰派’和‘捍联总’的双方谈的，我们已经约好了的不扩散，并且你们当场都赞成，我是一个个问了的，可是我们的本子今天才到你们的手上，但是哈尔滨市已经扩散了!两派各 10 个人，他们是拿回文本的，那个文本我没有收回，当时有的同志提议收回，我没有赞成收回。革命一年半多了么，我们见面多少次了么，应该最低程度有个革命同志的信任嘛!当时都作了担保的，可是有一派呀，就是把潘复生、汪家道同志的检查几个要点传出去了，当然没有看原本，总有偏差嘛，所以哈尔滨市又有了反复，农学院、林学院又闹了一

场武斗，是不是?”

“加强党性，减少派性，可不是容易做的。特别是年轻的同志，必须下这番苦功夫!所以今天只想就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关于潘复生、汪家道同志检查的批示》讲一点。我逐段地念并解释一下。”

中央《批示》的第一段即充分肯定了潘复生、汪家道二人的检查。对于这一段，周恩来作了长篇解释：

“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成立经过两个阶段喔。一月夺权后，成立革命委员会，当时是初期的革命委员会，组织形式是个创造啰。当时大家都不熟悉怎么组织为好，开大会宣布了，中央把原则批准了，登了报啦。后来，3 月来到中央，正式成立三结合组织，以潘复生同志为主任委员，汪家道同志为副主任委员。这次来是第三次。”

周恩来接着说：“黑龙江省抓革命促生产，不论农业、工业、交通、矿山方面，成绩在东北三省，在全国，也是前几名的。这些成绩，不能不说是黑龙江省成立了革命委员会，抓革命促生产是做得好的。大方向是对的。不能说革命委员会的主要领导同志对某些问题犯了错误，就对总的方面不做足够的估计。中央认为，潘复生、汪家道同志检查错误的态度是诚恳的，是高姿态的。

他们承认在对待两派斗争上犯了严重错误的，并且把严重错误一一指出来，同时又指出 5 月以后问题更严重了，又指出 5 个问题，说的很具体。这一点，连山上派也承认有些错误是山上派

犯的，不是革命委员会犯的。但是革命委员会领导同志把这个责任揽过去，这是好的态度。

应该这样，革命群众、革命小将嘛，年轻，经验少嘛，免不了犯一些错误嘛！革命委员会是临时权力机构，把错误多承担，这是主席的精神。所以从这一点上说是高姿态。至于有人说还不够，我们说是够了，不能再增加了。因为革命委员会是新生事物，它是权力机构，是党和国家的权力机构，大家有份的嘛！你们的《十二条协议》也是承认的。对这个新生事物要支持它、爱护它、拥护它、帮助它嘛！我们自己推选出来的权力机构，我们反过来又站在对立面，尽管是个别人的口号，还是对着主要负责人的口号，你们前一段喊打倒的口号是错了嘛！如果说是方向的话，这不是方向吗？我们认为，只要承认错误，就不要说方向了。因为革命群众、青年同志，一个时候错了、改了，承认错误就可以了嘛！”

周恩来继续说：“你们两派回到哈尔滨，回到黑龙江省，应当依照中央这个批示解释，不应该作其他解释。”

《批示》的第二段，号召黑龙江省的两派组织实行革命的大联合。《批示》的第三段，要求一切革命群众组织都要提高警惕性，防止敌人挑拨离间进行破坏活动。对于这一段，周恩来平心静气地解释说：

“这一点就是黑龙江省面临的一个最大问题，也就是说是主要斗争方向。因为黑龙江省内部工作做的不错，但是一定要想到

内外还有敌人，周围的三面，北有苏修，他们要挑衅，在黑龙江、乌苏里江一带，最近几个月，已经几次挑衅了，我们把总账，将来要发表。这是很显然的挑衅，就是因为晓得我们内部有些争论。当然啰，我们足以相信我们的解放军是稳定的。尽管他想要挑衅，但是他还是要顾虑我们的军队是巩固的，是一致的，不光黑龙江省，整个东三省，也是如此。小的挑衅不停，特别是他们派遣特务，或者是利用已经埋藏在我们黑龙江省的内线——奸细、内奸，而且还有其他方面的特务，除了修字号的，还有日本留下来的，还有英国、美国也有人在那里。这些人不能不活动，只要我们革命群众组织有漏洞，有缝子可钻，我们的权力机构有什么毛病，他就要利用，煽风点火，挑拨离间，造成事端，这个敌情观念你们必须加强。不仅如此，黑龙江省还有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已经宣布的如李范五之流，他们是不甘心失败，不甘心退出政治舞台的，而且他在黑龙江省工作过很长时间的，他有他的人，有他的线索，他不一定自己出来活动，他会通过他的线索，在两派群众组织中施加影响，在革命委员会中寻找漏洞，来挑拨这个事情。可以说，已经有征候了。就是群众组织里，有的人受社会思潮的影响，也有很大错误，像 27 人大字报，对中央文革进行诬蔑，这是带有反动性的，我们曾经逮捕了一批头头，当然他们承认错误以后，我们说释放他们，教育他们，是不是这些人就彻底承认错误了?那不见得，现在很清楚嘛，现在又在搞新的反动活动了嘛，反对我们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什么这个同志，

那个同志，来挑拨，来找空子，这种活动现在不仅黑龙江省有，比如今天在座的辽、吉、黑三省都有。中央的事情，特别是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内部的事情，我们自己总会有这个缺点，那个缺点，中央自己会解决嘛，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自己会解决嘛。现在就是有那么一些造反派，他不很好地搞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大批判，结合本省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大批判，结合本单位的斗批改，专门派人从小道得到一点消息，制造流言蜚语，好像他们真是关心国家大事，实际上是给敌人客观上利用，甚至有人在主观上给敌人利用。当然这种情形现在少了，但没有停止。”“譬如说，还有人把矛头对着解放军，调查解放军的情况，譬如各学校，造反组织，搞什么动态组，实际是情报组，还有什么作战部，同谁作战呢?这些是不妥当的。搞情报、搞作战，你那个作战组这样一个口号：‘武装夺取政权，战争解决问题。’武装夺取谁的政权?夺走资派的权，中央支持的，革命群众堂堂正正地联合起来，就夺了权嘛!他不是，他要夺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权，那怎么许可罗!战争解决问题，怎么解决?他要的是怎么一个战争?他是要把解放军的枪夺去，那怎么许可?这是适应美帝、苏修、各国反动派的需要。所以，我们青年小将们应该仔细想一想，我们头脑里反映的社会思潮有一部分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反动的思潮，我们不能让它在我们头脑里滋长，不能让它在政治生活中发展，这是违反毛泽东思想的，不是毛主席期待的接班人的新的无产阶级的

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风，我们要把它坚决除掉。”

“我们最近在福州发现，北京一个刊物登了中央许多同志的指示，毛主席的指示等，根本没有根据。靠电话这样传，这是很危险的。我们中央、中央文革再三再四地说，毛主席的声音，毛主席的话，必须是正式宣布的，登在《人民日报》、《红旗》、《解放军报》上的，印成正式文本的才算数，传的不算数，不容许私自翻印，更不容许道听途说，以讹传讹，这是损害我们伟大领袖的威信。”

“至于偷听电话，偷着录音，私造密码，私设报话机，私设广播电台，这一切啊，都是非法的。现在还有些地方，侵犯到党和国家的宣传机构，报纸呀，广播电台呀，邮电局呀，这都不对。这些也都不是我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所应该出现的现象。我们应该把这些现象，在我们取得决定性胜利的时刻把它取消。”

周恩来劝学生不要去工厂企业串联，参与那里的运动。

对《批示》最后一段，周恩来说：“最后一段，是勉励革命委员会的同志啰。主要是潘复生、汪家道同志，还有其他同志，包括两派中的委员和常委，今天在座的不少，你们都要真正地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真正地到群众中去，现场解决问题。我最近和江西来的同志谈，江西今年在北京，是年中的时候，等了好久后回去喽，七、八月回去的，回去做的工作，很好。他们本来是外地的军队调到江西的，两位领导从山东去的，他们工作有几条经验。其中有一条宝贵经验，就是亲临现场解决问题。这样

就使抚州避免了大的流血。本来抚州称军队进去了，保守派瓦解了，造反派就报复，差不多到处捉人、杀人，解放军到现场保护了他们，结果避免了流血，坏人孤立起来了。还有一件事，原来受坏人——军分区的人蒙蔽的，有一个矿山有几千支枪，那个矿山是国家很重要的矿山。江西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请他们到南昌来面谈，他们来 7 个头头，从造反派看，他们在抚州的时候镇压了造反派，抚州造反派跑到机场，他们不是欢迎，是拿枪到机场，要把 7 个头头打死。革委会筹备小组的负责人——部队政委，听到造反派去了，马上赶到机场。这边枪已经举起来了，这边政委马上往 7 个人前一站劝阻，因为他是支持造反派的，所以枪放下了，就把这 7 个人保护下来了。假若晚到两分钟就会 7 个人头落地，就会闹翻了的。就这样，到现场解决了问题。反过来，南昌造反派欢迎 7 个头头到南昌，因为用这样的行动教育了群众，这 7 个人经政委、筹备小组保护了他们，也就使他们情绪改观了。头头回去一讲，几千人的枪统统放下，交给部队迅速恢复了生产。他们是用这个方法解决矛盾。我们觉得，亲临现场解决问题，是他们最重要的经验之一。另一个例子，我们陈伯达同志，我们晚上读毛主席选集的时候，听到天津南开大学的两派武斗了 7 天，一派多数的叫‘卫东’，联合了天津大学的‘八.一三’，上万的人包围南大的‘八.一八’，只 1000 多人，围了 7 天 7 夜。我们几个人商量，由伯达同志亲自出马，连夜坐汽车赶了去，伯达同志到了南开，先声夺人，天大的‘八.一三’和南开的‘卫东’

都撤退了。如果不去，还得搞 7 天。所以，一定要亲临现场解决问题。当然，这个例子也不恰当咯。你们起来，就会让我亲临现场。你们东北再闹，我可不去啊!”

说到这里，周恩来和与会者一同大笑。周恩来继续讲：

“第二个例子不如第一个例子生动。是刚才听到的。当然还要谈的。为什么要亲临现场?因为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的确有时候处理事情没有到现场。譬如最后在哈一机厂、在师院发生的那次武斗，如果军区的人留在哈一机，我们的要求在现场不走，最后那场武斗不至于流血，把群众说服嘛!除非坏人不暴露，暴露就看清楚了嘛，情况就会变嘛!所以我觉得，亲临现场这一点很重要。黑龙江省该如此，吉林、沈阳都要这样做。”

接着，周恩来分别就吉林、辽宁问题作了指示，基本精神是辽、吉两省的各群众组织都是革命群众组织，号召他们学习黑龙江省两派，尽快达成大联合的协议。

最后，周恩来带头起立向大家鼓掌，并表示要用飞机送大家回哈尔滨，大家再一次热烈鼓掌表示感谢。

12 月 24 日，“炮轰派”汇报团同潘复生、汪家道以及“捍联总”汇报团一同起坐周恩来派出的专机回到了哈尔滨。在飞机上，大家谈笑风生，潘复生却显得异常疲惫，又好像有很重的心事，毫无用意地把目光投向窗外，汪家道还是那样朴实自然，似乎一切总算有了头绪……

几个“炮”头，分别同总理联络员在舷窗旁留影，笑声震荡

机舱。

从北京回来，省革委会根据潘复生的意见，安排两派汇报团的代表住在黑龙江旅社。当天晚上，凡家或有亲友在哈尔滨的绝大多数代表，都回家会亲友了，范正美和极少数外县的代表住在这里，他爱人林玉梅赶到这里跟他见面。

“这会儿好了，潘复生、汪家道检讨了，又有《十二条协议》，可以实现联合了。”林玉梅喜形于色，快言快语，显得很高兴，似乎从此可以过太平日子了。

范正美说：“事情要像你说得这么简单、轻松就好了。恐怕不是这样！你知道，总理做了多少工作，潘复生在检讨里，挖空细思，耍了多少鬼把戏，当面撒谎，瞒天过海。就说‘6.5 事件’吧，怎么能说‘炮轰派’冲击省革委会?明明要求他们接见，排着队在省革委收发室等待，是革委会允许他们进去的，而且首先由我出面接待他们，只是在潘、汪拒不接见的情况下，他们才采取静坐的方式……还有对我和宋振业——”没等他说完，林玉梅抢过他的话头又补充一句：

“这一点，我们厂里的许多人也是这么说。”她原来的那股高兴劲儿，似乎因为范正美的这句话，被打消了一半，脸上的喜色顿时变成了阴云。

“所以，你得有思想准备。如果仅仅是撒谎还好，最重要、最严重的是，他在检讨里安钉子、打埋伏、准备秋后算账，我担心他耍两面派，回来对‘炮轰派’搞反攻倒算。”

“我们那几位老乡也是这么说!他们还说，你们回来前‘捍联总’就传出潘、汪检查是策略的说法。”

“所以，不要高兴得太早了。丢掉幻想，准备斗争!”

“不过，我有点儿想不通，潘复生这样的高级干部，能不对自己负责吗？”林玉梅将自己心里最后一片狐疑终于说了出来。

范正美说:“孟子早就说过:‘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意思是说，那些当大官的人，说话不一定言而有信，做的事情也不必一件件都能兑现、办到底。这要看这些大官们，他们觉得怎样说、怎样做，对他们更为有利!”

他的这种担忧，也是当时许多“炮轰派”头头的内心所虑。

1967 年底，黑龙江各大专院校学生基本上都回校了，两派并存，但学生们开始消沉，在迷茫中有反思，在辛酸中有一定的醒悟。此时派性已激发不起学生们的热情。复课是毫无希望，终日无所事事。厌倦校园生活，盼望早日离开学校大门的情绪逐渐蔓延。范正美感到，这时的红卫兵已名存实亡。

## 第 940 回：云南乱，炮八两派打成团　四二二，又□□广西军区

12 月 4 日，云南“823”派在昆明召开打倒赵健民的大会，“823”派头头黄兆其在会上说，赵健民是“三十年代的大叛徒，四十年代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干将，六十年代屠杀革命群众的大刽子手、大野心家、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原省委办公厅主任代表省长周兴等一批领导干部在会上宣读了《坚决打倒赵健民联合声明》。

12 月份，昆明市的群众不得不在武斗的枪声中排长队等候买粮，而仓库存粮已全部告罄，仅有少量未加工的麦粒供应市民。在社会极度混乱中，市区出现多股武装抢匪，白日黑夜四出抢劫，群众告状无门，联防又无武器，市民只能好敲脸盆报警，深夜的呐喊哭叫声此起彼伏。此时，干部、群众对武斗已极为厌恶，纷纷退出群众组织，出现了众多的“逍遥派”。

鉴于昆明地区武斗日益严重，周恩来于 12 月 6 日电示昆明军区：

请昆明军区转告两派群众组织，都要坚决执行“九·五”命令，都不准抢枪，不能抢档案。要耐心向他们做好政治思想工作。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六日凌晨两点

12 月 6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以中发 [67] 378 号文件对云南 13 军、辽宁 40 军来电批复：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军管会，各大军区、

省军区：

十三军12月2日来电反映，个旧市“新红河大联合司令部”在彻底砸烂专政机构的错误口号下，派人驻守专政机关，并从监外给犯人送条子，酝酿夺监狱的权。中央认为，这是完全错误的行为，必须立即坚决制止。

中央除指示昆明军区、沈阳军区，对上述行为查明情况严肃处理外，希望各地对监狱和劳改单位进行一次全面检查。中央重申：

（一）任何群众组织，不准以任何借口冲击监狱和劳改单位，不准和在押犯人、劳改犯人联系；

（二）监狱和劳改单位目前坚持正面教育，不搞四大；

（三）在押犯人和劳改犯人，只能规规矩矩地服从监管、改造，不许乱说乱动，违者，严厉制裁。

12月18日晨6时，昆明市10名未穿军装的解放军战士由军区招待所路过东风路，行至东风百货大楼和省供销社之间遭枪击，被当场打死1人，打伤1人。“炮派”指责枪击解放军战士系“八派”所为。

由于昆明军区和云南省军区内部也分为支持“炮派”和支持“八派”的两派。18日上午，昆明军区后勤部部长何德庆向昆明军区副司令员鲁瑞林汇报，说东风百货大楼里的“八派”打死解放军，部队要抬尸游行示威。鲁瑞林表示事情未弄清，不能这样做。

下午，昆明军区机关部分干部、战士为此揪斗了昆明军区参谋长崔建功和昆明军区政治部主任雷起云，强迫崔建功和雷起云承认是“八派”打死解放军，雷起云被罚跪，崔建功则被强迫抬尸游行。

当天，中共中央、中央军委通知驻滇军队领导干部赴京开会，解决云南驻军的问题。

第二天，昆明军区支持“炮派”的“无革派”、云南省军区通讯团和空指的部分指战员，在云南省军区副司令员熊奎的带领下，上街示威游行，高呼“打倒李成芳！”“严惩东风大楼杀人凶手！”的口号。当天，东风大楼被“炮派”攻占。

“炮派”提出，要在云南“肃清薄一波的影响”，因为昆明军区和云南省军区的高级将领中，李成芳、黎锡福、胡荣贵、雷起云、王砚泉、徐其孝等人，都是抗日战争期间，在薄一波领导的山西决死1纵队工作过的干部。

12月中旬，滇东北“炮派”联合进攻会泽铅锌矿、以礼河水电站，赶走了军管会的军代表，打死打伤干部、群众，又把“八派”大批群众关押起来，占领了毛家村电站、会泽、以礼河。随后直逼东川新村，新村“八派”干部群众于12月17日分两路撤出。一路往昆明，一路往汤丹矿山。

东川“炮派”头头李国治制定了进攻东川矿区的计划：“以农村为依托，以民兵为骨干，围攻矿山。围而不攻，将军管会崔保平等和八派骨干逼下金江，一举歼灭”。

12 月 21 日，周恩来对云南东川矿区问题指示

“东川情况非常危急，两派发生严重武斗，危及工矿安全。东川矿区是国家重点建设地区，必须保护矿区安全，如果破坏矿区就要问罪，劝阻炮兵团停止攻击。”

“炮派”李国治等人不听劝阻，大举进攻东川汤丹矿区，占领东川矿务局机关和军管会驻地。打死支左部队战士 2 人，矿山职工 2 人，打伤多人。14 军 42 师副师长崔保平及支左干部和支左部队，被逼徒步下到金沙江边，冒着漫天鹅毛大雪，在江边群众的帮助下，连夜渡过金沙江，爬雪山到达四川会东。从此，东川的军管会及所有的支左干部、战士和“八派”观点的干部、群众，都被打出东川。

12 月 22 日，云南“八派”攻打预制管厂，死 14 人。

12 月 22 日，“八派”攻打驻元宝山的“炮派”，死 15 人。

12 月 23 日，“炮派”攻打云南省建筑安装公司的“八派”。

12 月 23 日，昆明军区、云南军区被召到北京解决问题的 11 位领导给昆明军区的电报电话：

（一）

昆明军区党委速转军区机关和军区各级党委：

近来昆明地区有些机关和部队极不稳定，特别是三大机关严重影响了部队的稳定和“三支”“两军”工作的进行，地方两大派武斗严重，社会秩序相当混乱，中央首长对此极为关切，根据中央首长指示，我们建议：

稳定部队是最高利益，也是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最迫切的需要，因此，军区所属机关和部队应以国家利益为重，大局为重，应坚决执行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十一月十四日通知。当前驻昆部分机关和部队，以各种借口开展的“四大”，是违背十一月十四日中央六条通知规定的，是错误的，应立即纠正，坚决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要斗私批修”的教导，认真学习毛主席视察三个地区的最新指示和林副主席八·九讲话，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克服小资产阶级的派性和无政府主义思潮，不要陷入地方两大派的斗争，已经陷入要猛省过来，迅速拔出来。

昆明军区在京开会的首长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二）

昆明军区党委速转两大派群众组织：

当前昆明地区武斗严重，中央首长极为关切，根据中央首长指示我们建议你们：

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紧跟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紧紧掌握斗争大方向，把斗争矛头始终指向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邓陶李阎。为此必须坚持文

斗，反对武斗，立即停止武斗、立即停火、迅速恢复社会秩序和正常的四大，坚决执行中央十二月二日通令，拆除各群众组织在交通要道所设的一切障碍和哨卡、恢复交通秩序、坚决执行九•五命令。不准抢枪，已抢的枪支弹药和一切军用物资应迅速归还，不准抓人，已被抓的人应迅速释放，进驻国际旅行社的群众组织应迅速撤出，对广播电台、发电厂、邮电系统、国家仓库等单位，军队和各群众组织都要严加保护，任何群众组织和个人都不得破坏和侵犯。

昆明军区在京开会的首长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电话打回昆明，被说成是“大毒草”，在昆明批判了3天，要求北京收回。

而与云南相邻的广西，虽然韦国清带着广西革筹小组一干人等于 1967 年 11 月 24 日回到南宁，落实中央指示，四处工作，但依然是按下葫芦浮起瓢，武斗纠纷总是不断。

11 月 26 日，广西军区党委作了《广西军区在支左中所犯方向路线错误的检查报告》后，广西“联指”冲进军区大院，要揪出“出卖原则”的军区负责人。

27 日下午和晚上，韦国清召集革筹小组有关人员开会商定：坚决贯彻《十条》和《六六通令》、《九五命令》及《七条》，不搞派性宣传；各县、市委成立监督小组的迅速成立；两派到各县去的人要回来；农民进城的回去。主张武斗的有本组织自己抓；

《广西日报》仍要军管；要诚心诚意支持伍晋南站出来等。

当天，革筹小组和广西军区给柳州市发去贺电，祝贺柳州市两派红卫兵实现大联合。

但是刚过去两天，11 月 29 日，柳州市再次发生武斗。

11 月 30 日晚上，革筹小组开会，研究柳州武斗问题，提出以下措施：

1、驻军、军分区、市武装部召开会议，统一认识，组织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坚决制止武斗。

2、找两派负责人个别谈话，说服其所属人员离开军事机关。

3、军队不准开枪，市人武部不能离开驻地。

4、四支队不介入当地两派斗争。

12 月 16 日上午 10 时至下午 15 时，南宁两派和驻军在朝阳广场召开制止武斗誓师大会。革筹小组和广西军区发出《紧急动员起来，立即制止武斗，保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十项命令。但是，命令颁布后，各地乱杀人的事件仍然发生。

12 月 19 日凌晨，柳州几个县市“422 造反大军”赴南宁“反屠杀控诉团”200 余人到军区和静坐，要求严惩杀人凶手。同时，各地“422”的“反屠杀委员会”向自治区革命筹备小组、军区发出公开信，提出五点要求：

1、立即制止农民进城参加武斗，解除各地武装民兵和“联指”对“422”的围攻；

2、立即派野战军到上述地区制止武斗，收缴武器；

3、立即下令取缔“贫下中农最高法庭”等反动组织；

4、立即解决各地受迫害来邕驱鬼的造反派和革命群众的生活问题；

5、韦国清、广西军区要立即到群众中公开检查改正错误。

第二天，广西军区接见外地来邕的代表 15 人。这些代表提出五点要求：

1、立即召开分区、武装部电话会议，解除民兵“联指”武装；

2、玉林、平南等县要立即派作战部队去；

3、按总理指示，立即取消“贫下中农最高法院”；

4、解决外地受迫害人员的吃住问题；

5、大量印发中央指示的三个“照办”。

12 月 22 日，广西两派达成协议，成立大联合筹备委员会。但在当天，自治区交通厅、水电厅又发生武斗。晚 23 时，广西军区负责人接见“联指”常委，商谈制止交通厅、水电厅的武斗问题。23 日晚，革筹小组对交通厅、水电厅武斗确定 5 条处理原则：

1、外单位人员一律撤走；

2、武器由军区负责收缴；

3、不准打架，不准动物，不准进行人身侮辱；

4、保障“四大”正常开展，保障人身安全；

5、被抓的人立即释放。

12 月 24 日，钦州市两派群众互相开火。

这天，中央批准同意广西革筹小组和广西军区联合发出《取消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等组织的紧急通知》。《通知》指出，“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贫下中农镇反委员会”和“贫下中农肃反委员会”等组织是非法的，必须立即取消，停止活动。今后不得再成立类似组织，更不得以任何名义、任何借口私设法庭，随意捕人、杀人。如有违抗者，严加追查，依法惩办。

同日，革筹小组和广西军区还电告钦州两派群众组织立即停火，释放所抓人员。参与武斗的农民立即撤回。

12 月 25 日至 27 日，广西玉林地区的容县“联指”调集 400 多人，攻打黎村“422”，打死 12 人，伤 21 人。黎村“422”被打散后外逃梧州和广东信宜等地。

钦州地区的灵山县“联指”的“飞虎队”，在 5 个公社开始成批屠杀灵山“422”派的“革联”派群众，制造大规模“红色恐怖”风潮，共计杀害了“革联”派人员和“四类分子”1967 人。

事件发生后，灵山“革联”先后多次向广西自治区“革筹会”、广西军区、钦州军分区等处反映，都未得到回复。

12 月 26 日下午 13 时，各县“422”的“反屠杀委员会”组织 2000 人到广西军区礼堂门前开大会，强烈要求广西革筹小组和广西军区制止各地大屠杀。他们还成立了“一二二六指挥部”，约有 700 人进驻军区礼堂和群众接待站，安装了高音喇叭，发布

《一二二六声明》，重申“反屠杀指挥部”提出的五点要求。革筹小组负责人接见并讲了话。

晚 19 时 30 分，革筹小组开会，研究如何做好进驻军区群众的工作。

27 日晚，革筹小组负责人接见进驻军区的水电厅“红水院”的群众，解决制止水电厅武斗问题。

29 日上午 9 时至下午 4 时 50 分，“422”在军区院内召开支持各地反迫害、反屠杀的万人大会。还有近 200 人提出解决工资的问题，进入军区作战办公楼长达 14 小时。

31 日下午 6 时 30 分至晚 9 时，自治区革筹小组负责人接见“422”进驻军区的 1000 多名群众，并根据他们的要求分别在会上讲了话。

革筹小组和广西军区就玉林、梧州、钦州地区发生武斗的问题发出制止武斗的三条命令：

1、双方立即停火，不准进攻对方；

2、双方所抓人员立即无条件释放，不得以任何借口加以伤害；

3、凡因武斗进城的农民和其他人员，要立即返回原单位抓革命促生产，否则，后果由挑起者负责。

同日，广西大学“能闯”向伍晋南发出“勒令”，限令他在 1968 年元月 5 日 12 时前交出“认罪书”，否则将采取最强硬的措施。

## 第 941 回：中央见，云南□军众□导　止武斗，□□□先要统一

12月27日23时43分至28日凌晨2时，周恩来、康生、谢富治在京西宾馆第二会议室接见昆明部队赴京开会全体人员。

周恩来翻阅名单挨个点名后，问道："都是军队的同志吗？"

有人说："郭青不是。"

周恩来问郭青："你是'炮兵团'的？"

陈康的妻子郭青答道："我不是'炮兵团'的，哪一派也没参加，是'炮兵团'的观点。"

周恩来："嘿！观点就是派性，我那天就说了，你是陈康的夫人，有派性就要影响陈康同志，我们支左不支派，符合毛泽东思想的就支持，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就批评。全党、全国、全军都要以毛泽东思想为指针。云南两大派都是中央确定了的，都是造反派，但都犯有缺点错误，要帮助。今年1月来了一次，那时还没有分，以后分了整整1年了。"

"那天(指21日)说了，会议情况不准对外传，但第二天就传遍了，昆明都知道了，第三天电报就来了，你们都有派性，今天请你们来摆一摆，听一听你们的。空军的同志先讲，刘懋功同志后来，谈谈昆明形势怎样？部队稳定不稳定？"

刘懋功："我也说不清。"

周恩来："不要紧，不要怕……军队没有派性？是不是群众的派性影响到军队？军队的派性又影响到群众？"

康生："不要怕，大胆讲。"

刘懋功："云南军区情况我不了解，派性在三大机关，包括我们空指都有。"

周恩来："有，就不利于三支两军，我们要党性，不要派性，解放军要以毛泽东思想为指针。不然怎么完成三支两军任务？李成芳、胡荣贵、张子明有问题，支左不力，抽出来，不插手，作专案处理，像秦基伟一样让他休息，但不能和他们接近的都是一派，一定要把李的问题搞进去，把整个部队搞进去，这是不怀好意，自毁长城。哪有他一个人有问题，跟他的人都有问题？这是不怀好意，自毁长城！"

当刘懋功汇报到5、6月份李成芳支持一派压制一派时，周恩来："现在不能转过来支持另一派压制一派，你是不是支持'炮兵团'？"

刘懋功："我两派都支持。"

康生："你们两派都支持，支持什么？"

刘懋功："一、一视同仁。二、凡是符合毛泽东思想的就支持，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就坚决抵制。三、不在两派之间说不利于团结的话，不作小动作。"

周恩来："云南是援越抗美前线，是边疆，现在两派打起来，武斗应不应劝阻？劝阻是不是大毒草？是不是压制群众？11个同志的电话算不算数？陈康你说！"

陈康："算数。"

周恩来："有人说你是被迫签字，算不算签字？"

陈康："那是群众说的。"

周恩来："郭青你是怎么看的？你有没有打电话传出去？"

郭青："我没有参加会，怎么知道。我是知道这回事，我有我的看法，我认为不能把矛头指向群众，压制群众。"

周恩来："怎么算压制群众？"

郭青："很多东西不符合事实，我认为是压制群众。"

周恩来："要你们去制止武斗，应不应该？"

刘懋功："应该。"

周恩来："电都停了，广播电台发射不出去，毛主席的声音在全世界受到干扰，是我们自己干扰。这样对不对？我们劝他们不要打，停下来，这算不算压制群众？"

刘懋功："当然不算。"

康生:"省军区来电报，说很稳定，李明同志你说稳不稳定？"

李明："省军区稳定……"

谢富治："东川武斗死了200多人。"

康生："人家电报还说很稳定哩！"

周恩来："这是睁着眼睛欺骗中央！电报是哪些人签发的？家里还有些什么人？"

张力雄："是熊副司令员……"

周恩来："你说名字！"

谢富治："就是熊奎一个人发的电报？"

周恩来："你们管的地方，包括东川在内好吗？"

谢富治："还有以礼河。"

李明："东川问题复杂，我们管不了。"

周恩来："你们管什么？"

康生："电台停了，可是你们还报告非常稳定！"

周恩来："这是反毛主席路线斗争！这是正确的？陈康、郭青是不是正确的？用这个办法搞路线斗争？！"

康生："这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还是破坏无产阶级专政？"

周恩来："无产阶级专政的声誉被武斗破坏了。"

谢富治："铁路也不通了。"

康生："我们在越南是帮助谁？"

谢富治："外援武器，连机枪都抢走了。"

周恩来："送的，什么抢的。有意送的。"

康生："李成芳有错误，现在我真怀疑，到底是李成芳的错误大！还是现在的错误大！这是有意给国家丢丑。"

接着，周恩来叫起陈康的秘书李永福问到："那里武斗搞的那么利害，应不应该劝阻？11个人的劝阻算不算大毒草？应不应该收回？"

李永福："制止武斗我是同意的……"

周恩来打断他的话继续问："电话算不算大毒草？"

李永福："不是。"

周恩来："应不应该收回？"

李永福："不应该收回。"

周恩来："好，这是你说的，记下来。"

周恩来又叫起张力雄的秘书问："11个人的电话，劝说部队稳定下来，制止武斗对不对？是不是大毒草？要不要收回？停电了，发射台停了，打电话劝阻应不应该？"

这时，郭青要插话解释，周恩来非常严肃地说："我还不知道，要你来教训我！陈康叫你牵着鼻子走，我不能让你牵着鼻子走！"

康生："这是在中央开会，党、政、军队都在一起，谦虚一点，老实一点，这是中央，总理讲了，我讲了，你记下来。"

周恩来："司、政、后闹得乱轰轰的，两次叫张子明、胡荣贵来，群众不放。黎锡福同志受伤，李兆昇同志被打，这样谁能出来劝阻？部队不稳定，谁造成的？"

邓敏："是李成芳的影响造成的。"

周恩来："有没有另一方面拉一派打一派？！在中央开会，党、政、军队都在一起，要说老实话。"

邓敏："省军区也是有倾向性。"

周恩来："倾向性有多大？另一方面的司令员挨打、受罚！陈康同志，这是一点不乱？"

接着，周恩来询问了军区机关最近情况后说："中央11月14日通知，规定军区不搞四大，军以下就更不用说了。劝司、政、后按11月14日通知办事，不要搞四大，稳定部队这对不对？有谁

不同意，可以起来吗？是解放军的发言，不是解放军的不要发言。”

“两大派对立这样严重，现在这样对立，应把扣子解开，军队不应卷入派性斗争。要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斗私批修才能联合，现在只有军队才能出来做工作。地方还有谁能站出来工作？”

陈康：“赵健民。”

康生：“站得出来站不出来？”

陈康：“中央表了态的，支持他站出来。”

康生：“什么中央表态？”

陈康：“《八·八批示》。”

康生：“站出来了没有？”

陈康：“现在是一派支持，一派打倒。”

周恩来：“这样大军区就不能开展四大。军区领导机关闹派性怎么行？打了电话叫军区不要搞四大，这是好意。有人说是大毒草，是把矛头指向群众。”

北京军区空军司令员罗元发：“还批判了3天。”

周恩来：“要派代表来北京来请愿，让他们来，我们不怕。只要他们担保，能劝阻两派停止武斗，他们可以来讲理。陈康同志，你看怎么样？他们能不能做到？”

陈康：“很难说。”

周恩来：“张力雄同志你看怎么样？”

张力雄：“我也没有信心，我们尽量做工作。”

周恩来："李明你看怎么样？"

李明："我们打电话回去，说他们的电报完全是错误的。"

周恩来："他们能不能叫两派停止武斗？"

李明："我看不可能。"

周恩来："郭青说我们把矛头指向了群众。好，我们把司、政、后的代表人物都请来。不要来二把手、三把手，头头躲在后面，已经到了这种程度，群众的派性影响部队，军队的派性又反过来影响群众，他们自己说是造反派，好，请他们来北京。黎锡福同志，你看怎么样？"

黎锡福："我认为要解决两大派问题，首先要解决军队问题。"

周恩来："刘懋功同志，你看怎么样？"

刘懋功："我看困难。"

周恩来："你们在座的有没有参加造反派的？"

14军军长梁中玉："有，站起来嘛！在中央嘛。"

周恩来："今天请你们来，为什么都不说话？"

接着，周恩来问了参加会议的两级军区工作人员对军区目前形势和四大的看法，大家一一谈了自己的意见。

当13军的人谈到有一股反13军的风时，周恩来说："陈康同志，你不也是13军的吗？怪了，也要反？"

14军也反映，由于肃清薄一波的影响，也刮起了一股反14军的风潮。周恩来说："薄一波的影响有多大？应该科学分析一下，13、14军过去都是一个兵团吗？司令员是谁？"

大家说："是陈赓。"

周恩来："陈赓是薄一波的人吗？"

谢富治："他一直是反薄一波的。"

周恩来又问："政委是谁？"

大家说："就是谢副总理。"

周恩来："谢副总理是薄一波的人吗？我们过去都是独立的兵团，有光荣的历史。"

罗元发："是建立了巨大战功的。"

周恩来："决死队的干部都是薄一波的？多危险！对决死队要一分为二，绝大多数是青年干部，陈康同志，你是决死队的？"

陈康："不是。"

周恩来："你应不应做工作？听听人家说说话，想一想，客观一点，不能说是决死队的都要肃清影响，是决死队的人都要肃清影响，那还了得？那不跟在延安时批判张国焘一样，扩大化。"

"电话的第一条完全是对的。第二条没有提领导的派性是个缺点，目的是稳定部队。但有人说是大毒草。你们三大机关有没有带头支持'炮派'的？部队的头头知道不知道？三大机关群众中有没有负责人？有多少？有没有十多个？文体院校有没有支持'炮派'的？我们请这些人来，要求第一把手。你们商量一下，他们要来，就叫他们来。到北京来辩论，三大机关有没有组织？叫什么名字？"

有人说："有组织，叫'无产阶级革命派'。"

周恩来："省军区有没有？"

李明："我们那里没有组织。"

周恩来："三大机关搞'四大'的来，来的必须是第一把手，不能以二把手、三把手来应付我们，他们在幕后，这是对中央的态度，你们准备怎么回去？你们有没有把握？今天27号了，元旦前不回去是不允许的。原来说是两三天，我们已向毛主席、林副主席作了报告。党、政、军都在一起。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都在一起开会研究，毛主席、林副主席有指示，我们不能离开他们的指示。你们开了几天的会议，打了个电话回去，就有人说是大毒草。不要怕来闹。你们是不是准备收回？"

罗元发："有人提过意见。"

周恩来问："张力雄同志怎么样？"

张力雄："我提过意见，一是收回重发，二是修改。"

周恩来："是不是多数人赞成你的意见？要稳定部队。"

有人说："今天又打死109团一个人，打伤三人。"

周恩来："是啊！这样局面延续多久了？云南是边疆，他们是气势汹汹，要来北京，就叫他们来，你们负责人开个会，商量一下，就说中央同意他们到北京来辩论。但不能应付，不同意电话精神的，真正的负责人，请他们来辩论。现在我们第一步先解决军队的问题。"

谢富治："关键是军队，军队稳定了，武斗就可以马上制止。"

周恩来："什么都是黑会，大毒草，说是大毒草就来辩论嘛！

叫收回，不能！接受辩论。电话有缺点，领导先做自我批评，没有把李成芳的问题交待一下，来了再补上嘛。”

谢富治：“原来陈康同志提过，想叫地方两派也来，我想那不行，军队的问题解决不了，地方更不行。”

周恩来：“郭青，今天叫你到场，下次不参加。你是陈康的夫人，今天提醒你，要做一点有利于军队的事情。”

谢富治：“今天叫你来，还有另一件事，会议精神不能往外传。告诉你们秘书同志，不能走漏一点消息，不要搞小动作，否则是违犯纪律的。”

周恩来：“要执行，首先是你陈康同志执行，要执行，首先对你妻子执行起。我是非常严格地说这句话的。你要注意《八条命令》，要自爱，怎样有利于党的事业，不能有派别观点。你们13位同志以两天时间搞个东西就回去。陈康、张力雄同志，你们先给家里打个电话，看能不能起作用。把武斗停下来，13、14军也要打电话回去，两军不要泄气。我就不相信真正赤胆忠心的忠于毛主席、林副主席的指示，会不听毛主席的话，会不好好劝两派不要打架。江西的经验，最主要的是领导干部深入现场，解决问题。深入现场总会劝住的。工作做不好，是由于派性太强。康生同志前次讲，派性就像毒蛇，有派性就要垮台。”

康生：“陈康同志有个问题，你去考虑，你依靠谁？如果不紧紧依靠和团结13、14军，你们怎么工作？依靠少数人，依靠你们机关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他们和谁站在一起？和‘炮兵团’

吧？派性发作，你怎么工作？符合毛泽东思想的观点一致，是党性。像他们那样观点一致，是派性。受派性影响，还有坏人，走资派捣鬼，解放军领导机关不能受影响，你们二人回去，要依靠两军，不依靠怎么行？”

周恩来：“现在说两条，一条，给两天时间，你们商量一下，一条打电话回去，看能不能劝阻，把武斗停下来，陈康，张力雄负责说服‘炮派’。告诉他们，现在他们走到犯大错误的边沿了。另外不同意电话精神的，请他们来，20多人不要超过30人。要辩论到这里辩论。包括副参谋长在内。”

康生：“主席说了，解决每省的问题，首先解决部队的问题，怎么制止武斗关键在你们。你们有派性，武斗就不会停，就是暂时停了，以后还会有反复。”

“云南的问题，首先是领导机关、大军区、省军区，到了你们觉悟的时候了，悬崖勒马的时候了！这样下去，要犯更大的错误。中央不希望有一个同志垮台，总是再三教育，犯了错误，首先要自己教育自己。你们认为两派武斗不好解决。我看也容易解决，首先领导和部队要统一起来，凡是难解决的问题，都是部队不统一，容易解决的都是部队统一。过去江西打得很厉害，昨天要提出成立革命委员会。我们叫他们稍晚一点，我们腾不出手来，湖南、湖北过去打得也很厉害，现在也提出要成立革命委员会。问题的解决，发展快，道路有一条，部队统一，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云南问题长期不能解决，首先是部队不统一，存在着派性。”

“刚才陈康说：让赵健民站出来，那是军区报告中提出的，不是中央提的。主席看了报告，批了，那是批的报告，不单是为赵健民。赵健民以后翘尾巴，支持一派，打一派，完全是错误的。我接触赵健民，对这个人印象不好，他思想是有问题的。有些事情现在还不告诉你们。”

当天，昆明军区、云南军区在京开会的领导给昆明军区的电报电话：

总理、康老、谢副总理于十二月二十七日二十三时四十分接见了昆明部队在京开会的全体同志，作了极为重要的指示。

中央首长在讲话中严肃地指出：部队和地方上两大派必须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统一思想，克服派性，稳定部队，制止武斗，恢复生产，恢复交通和社会秩序。对中央的指示，理解的要坚决执行，暂时不理解的也要坚决执行。特别是必须把武斗立即停下来，再不停止，就会犯极大的错误，走向反面。

昆明部队在京开会的全体同志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五时

12 月 29 日，昆明军区云南军区在京开会首长给昆明军区的电报电话：

在京开会的同志，听到两大派遵循伟大领袖毛主席“要用文斗，不用武斗”的教导，根据周总理指示，要求谈判。我们很高兴，我们坚决支持你们的革命行动。

一、欢迎两大派立即派出代表进行谈判。

二、立即停止武斗，恢复交通。

三、我们指定王砚泉、崔文斌、熊奎、雷起云、朱刚五同志组成谈判小组，主持谈判，以王砚泉为组长，崔文斌、熊奎为副组长。

希望你们在谈判中，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各派应遵循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最新指示，以斗私批修为纲，各自多做自我批评。预祝你们谈判成功。

祝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

昆明云南两级军区领导干部会议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于北京

## 第 942 回：周恩来，见□路、南京代表　与党校，康生谈“绝对权威”

江苏又发生抢枪事件，并且在常州开枪伏击列车，致使京沪铁路中断。

12月28日，周恩来接见铁路运输系统造反派和军管会代表以及南京大学两派代表。

周恩来说：“从今年1月起到现在，抓铁路整整一年多了，装车效率很低，我现在觉得很沉重，对不起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你们怎么安心啊？武斗要这样搞下去啊？定了计划不起一点作用。这中间没有坏人吗？这里检讨书写来了，你们后面有没有坏人呢？常州‘工农学’的同志来了吗？”

答：“来了。”

周恩来说：“江苏14号在这里开了会，都说了铁路不与外界挂钩，地方不跟铁路搞在一块嘛，还达成了协议，怎么还是搞在一块呢？”

他问常州“主力军”的一个代表：“我问你：是来中央达成协议，还是来耍花招，耍外交的？我不愿意看到这个样子。文化大革命已经一年半了，造反派训练成这个样子，说假话，怎么对得起毛主席？你们自己说一说怎么办？！文化大革命，备战，要办点事情，都要靠铁路畅通，工农业建设，城乡人民的生活，都要靠铁路畅通，援外也要靠铁路畅通嘛！你们就这样子搞下去啊？你们这样搞，谁高兴？你们这样搞，到底算是学习毛主席著

作还是没有？你们在那里认真的学习毛主席著作斗私批修吗？常州‘工农学’犯了错误，不管犯多大的错误，写了检讨，做了检查了，至少对中央还是说了老实话，对中央还是一个好的态度。你们连一点都不承认吗？”

接着周恩来读了常州“工农学”组织写的检讨报告。当念到“没有命令就开枪”时，周恩来问：“是谁给你们下命令的权利？”

当念到“没有重视加强部队建设”时，他又问：“他们自己把他们编成队伍，是什么时候中央授权把造反派编成队伍的呀？”

念完检讨后，周恩来说：“刚才念了‘工农学’的检讨，是他们4位同志写的，他们至少承认他们打了埋伏，开了枪，承认错误。你们这个队伍有多少人？”

“工农学”的代表回答：“11万人。”

周恩来：“谁给你们的权利组织11万人的队伍呀？你们队伍有多少枪？”

答：“有600多条。”

周恩来：“你们主要是学生还是工人？”

答：“是工人。”

周恩来：“常州的工人比较多嘛！戚墅堰的工人也算在里面吗？”

戚墅堰机车厂一位代表回答：“我们‘工总’没有和铁路外面联系。”

周恩来："我不愿意在毛主席身边听到说不老实的话，说不老实的话，没有好处的。都是人家不对，你一点错误都没有吗？"

周恩来问"工农学"的代表："你们回去的人是不是回去打仗的？"

答："回去做工作的。"

周恩来："做工作武器没有封存吧？"

答："打在前，是21日打的，回去在后。"

周恩来："我问你们，达成协议是准备实施还是欺骗中央的？既然不能保证实行，对中央就是欺骗嘛！"

答："我们要求派部队去监督。"

周恩来："派军队去武装缴枪行不行？"

答："行。"

周恩来："查出的枪都能上交吗？"

答："能交。"

周恩来："戚机厂双方都同意吗？"

双方答："同意。"

周恩来："好！你们铁道军管会马上写一条，让他们签字，派军队去收枪。常州是两派也是一样，也写一条，签字。凡是你们住的地方，我们派部队去检查，双方缴枪。"

双方代表回答："可以。"

周恩来："民兵的武装也封存起来。"

双方代表回答："可以。"

周恩来又对“主力军”代表说：“他们把战士的手指砍了去抢枪，我听了很难过。现在你们在镇江也把战士捆起来啦，如果我们派部队去你们交不交枪？”

答：“我们要求马上派部队去，我们坚决支持交枪。”

周恩来：“你们在这里签字，你们家里能不能算数？”

答：“能算数。”

周恩来:“这个问题很难向主席交待。你们那样做对不对啊？完全违背毛主席的思想，违背主席的指示！铁路抓了一年啦，抓成这个样子，我们真对不起伟大领袖毛主席。‘主力军’你们说没有抢枪，镇江‘三代会’是不是和你们的观点一致？”

答：“是。”

周恩来：“你们抢了5捆枪要运，被27军护路部队发现了，扣下来了。但是，当即遭到‘三代会’和‘主力军’的围攻、殴打，打伤了11名战士，并抓走了9名战士，抢走了3捆枪，这是矛头对准解放军嘛！我们听了不觉得难过呀？我们具有二七光荣传统的铁路工人，居然能够这样做，你们还说枪不交出来就要向部队开枪，你们听了做何感想？”

代表答：“我们感到难过。”

周恩来：“你们真难过，还是假难过？”

代表答：“我们不知下面哪个组织做的。”

周恩来说：“射击14次列车，左边有枪眼，右边也有枪眼。‘主力军’也射击了吗？”

“主力军”代表答：“那是他们的据点，我们的人肯定进不去。”

周恩来：“我怀疑，现在要调查。你怎么能肯定你们没有埋伏啊？”他当即请14次列车包乘组的人介绍了当时的情况，然后接着问：“你们‘工农学’没有坏人吗？”

代表答：“有。”

周恩来：“你们自己赶快揪出来嘛。你们号称这么多万人，人这么多，难免混进了坏人。带头的，指挥开枪的，就是坏人嘛！你们首先要把带头的人，指挥开枪的人揪出来。你们‘工农学’就犯了一个大错误。你埋伏就不对嘛！目的是干什么？是要把车上的旅客都打伤吗？你说‘主力军’运枪，应该叫停车，停车再检查，应该向军管会报告嘛。”

周恩来要求“工农学”：“你们不仅写这个检讨，还要把决定这次打埋伏的坏人揪出来，你们来的4位同志回去开个会，很好地检查一下，把事情弄清楚，把为首的肇事人检举出来，指挥伏击的查出来，今天是28号啦，到元旦3天以内查出来，一定要把坏人检举出来，你们要打电报回去。”

“部队要开进去，中央早就决定了。派哪一个部队去，我们和军委，南京军区商量，明天宣布。不管哪个部队去，你们都要坚决拥护，这是军委派去军管的。你们铁路两派组织，统统把武器封存起来，上交。常州两派组织统统把武器封存，上交。贫下中农的民兵武器，统统封存起来。”

他问："27军的同志来了没有？"

27军副军长王挺回答："来了。"

周恩来："喔！王挺同志，常州有什么部队啊？"

这时候马健回答："省军区有×个连，60军有×个营。"

周恩来："枪收不起来吗？"

马健："做了一些工作，现在看起来比较难收。"

周恩来："两边都不交？还是一边不交？"

王挺说："两派收不起来，而且镇江不断往那里送枪。"

周恩来问江苏省军区司令员赵俊："你们镇江抢枪怎么办？就在你们镇江。你们省军区对这个事情怎么处理？"

赵俊回答："我们没有办法。"

周恩来："27军部队挨打啦，你们不管啦？"

赵俊答："我们管不了。"

周恩来："枪是从你们人武部拿的，是送的嘛！"

赵俊答："送的要查一查。"

周恩来："所谓抢，实际上就是送的，要好好地检查这个问题。为什么27军的战士挨打，就是因为护枪嘛。"

赵俊答："我们最近也有战士挨打。"

周恩来："你们对'主力军'支持，'主力军'在常州是少数，但是你们采取的那个办法就不对嘛！弄成这个样子。27军如果说过去支左工作有错误，改了就好了嘛。你们挺起身子来干嘛！包括常州由你们负责。"

他问常州的4个组织代表：“你们同意不同意？”

都答：“同意。”

周恩来：“好嘛，你们都同意啦，等会签个字，由你王挺同志负责。你们27军是毛主席的部队，挺起腰杆子来干，错了就改嘛。你们过去犯了错误，现在也检讨了，你们27军这次立新功。”

王挺答：“坚决照总理指示办。”

全场热烈鼓掌。

周恩来：“常州的问题不是最难解决吗？我们就是要解决，就依靠27军。27军过去犯了错误，他们有检讨，检讨的很好，我看了很满意，一点不拖泥带水，不吞吞吐吐，现在没有公布，必要时可以发给你们看看，你们要相信部队，他们是听毛主席的话的，你们要在3天以内解决，我就不相信不能解决，上海那么好，就不能影响常州、江苏，江苏的人民对你们太不满啦。

镇江的问题，赵俊同志一定要打电话查清楚，解决27军战士被打的问题，如果‘三代会’不听，就把他们找到北京来。他们里应外合整人家嘛，不像一个群众组织。要他们把枪还给27军，好好承认错误，被打的11名战士在医院，要到医院去慰问，抓走的要赶快释放，承认错误。枪是从那里来的，让27军的护路部队调查清楚。

现在上海压了很多车不能通，沪宁线上常州通了，全线就通了。浦口也打得很厉害。上海铁路局来了吗？”

上海铁路局代表答：“来了。”

周恩来："你们自己也在闹，上海也要军管。李天佑，你们两位副总长派部队去。现在全国铁路就是上海没实行军管，你们上海应该为全国做出很好的榜样嘛！请你们包乘组的同志谈谈看法。"

14次列车包乘组汇报了上海铁路局的情况。

周恩来问："南京的情况怎么样？浦口发生问题是什么原因？"

答："受外界干扰很大。"

周恩来问："长江大桥派60军去军管你们同意不同意？"

大桥代表答："同意。"

周恩来又问："港务局来人了吗？"

答："来了。"

周恩来："我问你们，派部队到港务局实行军管行不行？"

代表答："坚决拥护。"

周恩来："统一由60军把港务局的南，北两面都管起来。"

方敏回答："已经管了。"

这时候周恩来走到会场的一边，问南京大学的文凤来、曾邦元等人来了没有？南京大学的代表都站起来答："来了。"

周恩来问："你们的协议准备执行吗？有效吗？"他给大家介绍说："你们看，这是'827'的，响当当的。南大搞了两派，江苏的问题，根子就在他们这里。我们搞了一年多了，都很熟悉了嘛，你们就不能联合起来？我们经常说，思想要经常改造嘛，

你们不需要改造啊？你们有什么势不两立的，现在你们搞的那样紧张，匡亚明是舒服了，江渭清在北京，彭冲他们都很舒服啦！你们的派性应该少一点嘛！要照顾大局。你们个人写信来，都表示的很好，可是没有这样做嘛！”

这时，袁服武说：“如果中央同意，我们明天就回去，脱离代表团。”

周恩来说：“哪一天回去都可以，中央可以考虑，但是如果你们回去增加麻烦，中央能够放心吗？你们对南京推动一下嘛！在南京的三派工人达成了原则协议，你们看到他们达成协议不是就心安理得了嘛！”

南京大学两派代表要求中央批准他们的协议，周恩来说：“中央是可以批的。批了不灵怎么办？主席一批，不到一个礼拜垮了，我怎么向主席、林副主席交待？我们能够欺骗主席、林副主席吗？我是带着眼泪期待你们的，我不希望你们小将犯错误。张建山，曾邦元你们能不能合作？”

曾邦元回答：“当然可以。”

周恩来：“你们应该伸出手去。”

这时，曾邦元同张建山握手。周恩来说：“好。”全场热烈鼓掌。

周恩来：“江苏受你们的影响，搞了一年多了，江苏不能放一点光辉啊！我也是江苏的一分子嘛！你们有军训团没有？”

答：“没有。”

张建山说："现在达成了协议，我们都要回南大，军训团进去，正是好机会。"

周恩来："好嘛！达成协议后，派个军训团去，找60军去帮助你们军训。"

曾邦元说："欢迎60军去帮助我们军训。"

周恩来说："毛主席说，60军在南京的支左工作不错嘛，你们应该成为南京的支柱。"他对南京大学的同学说："你们订的协议，你们做了好事，我们可以送给主席看。"

接着，周恩来又谈到安徽和东北的铁路问题。

12月29日，康生在党校谈"九大"党章时说：

"上海讨论党纲、党章草案，送来十八种，是从一百几十种草案里选出来的，我还没有看。"

"从各地来看也是这样。文革小组召集北京工代会代表座谈建党问题，也召集了大专院校包括中小学的代表座谈了一次。大家共同认为，主席把召开'九大'、修改党章、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这样重要的问题交给群众讨论，走群众路线，发扬极大的民主，群众感到非常光荣，非常高兴。由此看到毛主席有事同群众商量，走群众路线。而且这个方法一直运用到召开党的大会，修改党纲、党章、建设党中来。"

"还有一个文件，关于整顿团和红卫兵，也要发下去。团还是要的，团怎么整顿？党校团员转党的有没有？团员要求入党的有没有？"

“另外一件事，党校做一下，把马恩列斯和毛主席关于绝对真理同相对真理的关系摘录一本材料。这对于当前讨论主席那个指示，即12月17日的批示有好处。不要搞得太繁琐，太繁琐了人家看不懂，搞得扼要一点。黑格尔的论绝对与相对也搜集一点。把相对主义的康德、马赫的主要论点也摘一点。这样使大家看恩格斯的《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反杜林论》。《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看列宁的《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接受快，太多就不行了。”

康生还问：“费尔巴哈的两本书翻成中文没有？”

这里说的“两本书”是指《未来的哲学原理》与《基督教的本质》。

康生问：“这里顺便问一下，主席的批示都收到了吧？”

“《矛盾论》中反复讲了相对真理与绝对真理的问题。例如普遍性与特殊性；共性与个性；绝对与相对；矛盾的普遍性也就是绝对性，矛盾的特殊性也就是相对性；绝对真理寓于相对真理之中，相对真理中包含绝对真理。学是学了，讲是讲了，但是如何在实践中活学活用，紧跟毛泽东思想还是个问题，我们的报纸刊物没有紧紧地跟上主席思想。

‘大树特树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这句话是今年5月空军部队的吕祥壁同志牺牲了，从他的笔记上摘的语言，应当说这是代表广大群众对我们伟大领袖的真诚热爱，同时也是朴素的语言。报纸、刊物用了这种语言。对这个问题主席是讲过几次的，

说过这个说法不科学。但是有的同志把领袖谦虚这件事同是否合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辩证法另外一件事混在一起。因为主席说它不妥当，不是简单的从谦虚讲的，而是从不合乎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的高度讲的。我们的报纸、刊物登了以后，主席提出来不妥，有的同志却把主席的谦虚和是否合乎马克思列宁主义辩证法混在一道，不能用毛主席著作检验为什么不科学。当然这是表达了群众朴素的情感。所以主席利用湖南的报告做了这一批语。这个问题不仅是湖南的问题，是讲马列主义哲学、也是提高了我们马列主义的水平。

主席讲有人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读了许多书，但是越读越蠢。”

他进一步说：“毛主席说：‘绝对权威的提法不妥。从来没有单独的绝对权威，凡权威都是相对的，凡绝对的东西都只存在相对的东西之中，犹如绝对真理是无数相对真理的总和，绝对真理只存在于各个相对真理之中一样。’这样扼要的概括，使我想到了《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只有短短几百字，想起了65年12月21日　主席在杭州接见伯达同志和我的时候说：哲学家要滚一身泥巴，反对课堂哲学，反对书呆子哲学。他的范本是《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

第二条说：‘大树特树的说法也不妥。权威或威信只能从斗争实践中自然地建立，不能由人工去建立，这样建立的威信必然会垮下来。’这个问题毛主席在最新指示中讲到以我为核心时已

经讲过了。‘大树特树’这种说法细细想想也不科学。因为权威只能从斗争实践中自然形成。”

“我两天没睡觉，重新把恩格斯的《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重新读了，列宁的看了一篇，不很多。《矛盾论》和《实践论》也读了，我还想继续读。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我是四十年前学的，在上海大学念书时是我们的讲义（上海大学在国共合作时实际上是共产党办的）。”

“军队行动很快，他们立即传达了文件，指定了学习材料。”

接着，康生具体介绍了恩格斯的《费尔巴哈论》中关于黑格尔哲学的真正意义和革命性质，还有列宁的《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恩格斯的《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康生说：“主席的批示第三条，大家去读七届二中全会讲话和领导工作方法的决定。中央早就禁止祝寿，最早是在七届二中全会上讲的，见诸文字是在《党委会的工作方法》上：‘十一，力戒骄傲。……禁止给党的领导者祝寿，禁止用党的领导者的名字作地名、街名和企业的名字，保持艰苦奋斗作风，制止歌功颂德现象。’

批示下面三条是答复湖南的三个具体问题。”

“我最近给几个名牌大学的头头找了两条语录，我对谢富治说，开会是你们要学。一条是246页最后一行到247页：‘凡属真

正团结一致、联系群众的领导骨干，必须是从群众斗争中逐渐形成，而不是脱离群众斗争所能形成的。在多数情形下，一个伟大的斗争过程，其开始阶段、中间阶段和最后阶段的领导骨干，不应该是也不可能是完全同一的；必须不断地提拔在斗争中产生的积极分子，来替换原有骨干中相形见绌的分子，或腐化了的分子。’无论从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土改运动和知识分子运动中看，常常是开始阶段、中间阶段和最后阶段的领导骨干不完全是一贯到底的，有的是不成的。因为一方面不断产生新的骨干，另一方面有的骨干落后了、腐化了，相形见绌了，就会被产生的新骨干所代替。

第二条是252页的下边一段：‘知识分子在其未和群众的革命斗争打成一片，在其未下决心为群众利益服务并与群众相结合的时候，往往带有主观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倾向，他们的思想往往是空虚的，他们的行动往往是动摇的。因此，中国的广大的革命知识分子虽然有先锋的和桥梁的作用，但不是所有这些知识分子都能革命到底的。其中一部分，到了革命的紧急关头，就会脱离革命队伍，采取消极态度，其中少数人，就会变成革命的敌人。知识分子的这种缺点，只有在长期的群众斗争中才能克服。’

今天运动到了一年半的时候，青年知识分子要注意主席的这个教导，使自己更加努力和引起警惕，不要落在群众运动的后面。”

康生说：“有一次我遇到关锋、王力，对他们说了大致我刚

才说的内容。现在我才知道竟引起这些家伙的极大反感，他们说康生向我们大讲《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不知什么心血来潮，好像他从来没有读过这篇文章。他们不知道，其实我们不仅读过，而且是参加了文艺座谈会，在会上和丁玲、肖军、草明等人进行了斗争。王力、关锋这些人这么狂妄，怎么不犯错误？”

## 第 943 回：求支援，《湖北日报》又被封　免公粮，王仁舟廉价政府

1967 年 12 月，武汉的《湖北日报》又一次被湖北浠水县的“巴河一司”给封了。

“巴河一司”的一号头头叫王仁舟，原是北京外语学院的学生，1963 年因“思想反动”被开除学籍，回原籍湖北省浠水县巴河区参加农业生产劳动。不过生产队还很照顾他，没让他干繁重的田间体力活儿，安排在养猪场养猪。他还是那样爱看书，经常拿本书在猪场边看边照看猪。有时兴致来了，还高声吟诵李白的诗句：“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天生我才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他相信自己总会有闪光的一天。据当地农民传说，王仁舟可以把毛选倒过来背，吹的神乎其神。

文革开始后，王仁舟先是静观其变，后来看到各级领导先后成为“走资派”，被戴高帽游街示众，批判斗争，当地那些本来不可一世的干部们纷纷倒台，成为老百姓的阶下囚，他也禁不住躁动起来，于是也成立了一个名叫“巴河红色造反者第一司令部”的群众组织，简称“巴河一司”。由于他是大学生，在当地小有名气，平时就有许多人佩服他，于是响应者甚众，势力一天天扩大，成为巴河地区占垄断地位的一个群众组织。

1967 年 1 月全国大夺权的高潮中，王仁舟也夺了家乡巴河区政府的权，成立了一个“廉价政府”，王仁舟被选为“廉价政府”的第一号勤务员。他下面有负责妇女工作的妇女委员，有负

责政宣工作的政宣委员，有负责生产劳动的劳动委员等等。他说，农民是社会中最低层的群体，他们占中国人口比例的大多数，他们忍受着各种压迫和剥削。100 多年来，马克思没有解决农民问题，农民的儿子毛泽东也没有解决农民的问题，他王仁舟要解决这个问题。他在巴河召开的“廉价政府”成立大会上说：

“1871 年世界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巴黎公社成立的时候，说这是一个廉价政府，即政府工作人员由全体公民普选，而且工资普遍不高于一般水平，政府尽量节省开支，不增加老百姓的负担。可是我们现在的政府，却背弃了这些公社原则，老百姓完全处于无权的地位，没有选举权，干部全都由上面调派，当官的一个个骑在老百姓头上作威作福，他们同解放前那些当官的几乎没有什么两样，这不是我们自己的政府。由此我们要以巴黎公社原则建立起一个廉价政府，工作人员由老百姓自己选举，必须真正为老百姓做事，是老百姓的勤务员。”

王仁舟在大会上豪迈地宣布：“二十世纪人类第一个廉价政府，在中国巴河的土地上诞生了！”

王仁舟对官僚主义的批评，对农民命运的同情，在广大农民中引起强烈共鸣，他的“廉价政府”理论，在百姓中产生很大的影响，越来越多的人参加“巴河一司”。“廉价政府”成立后，王仁舟着手进行社会改革，他自己说是社会实验。他打破原先的人民公社管理体制，按村组织生产单位，农民改工分制为工资制，村村兴办托儿所、幼儿园、老人院等等，还办了广播站、报社和

文化馆等。他组织农民自己生产红砖，盖楼房，农民集体居住。他还提出不交公粮，不交税，只卖余粮。巴河的农民以为他是毛泽东派来进行社会实验的，对他崇拜的不得了。

但是王仁舟在巴河推行的社会实验，遭到以县城中学生为主体的“浠水革联”的激烈批评，说王仁舟是小资产阶级顽强的自我表现，他颠覆无产阶级政权，在巴河搞反革命的独立王国。激烈的“文攻”逐渐演变为残酷的武斗，主要在县城和巴河镇之间发生的。双方都有枪，都有复退军人介入。

“浠水革联” 属于“新派”，其一号头头叫黄凤娇，浠水县妇联主任，手下有几个从部队转业复员的干部，指挥武斗那是轻车熟路。从 1967 年下半年开始，“浠水革联”先后几次派出武装人员进攻“巴河一司”。“巴河一司”也不甘示弱，抽调大量青壮劳力进行武装集训，成立强大的武装力量，模仿当年红军的“反围剿”，同“浠水革联”展开神出鬼没的武装斗争，双方死了不少人。

“浠水革联”对王仁舟发出《通缉令》，王仁舟则在《通缉令》发出后，多次化妆进县城以鼓舞本组织的士气。

12 月的一天，“巴河一司”把在武斗中打死的尸体抬到黄州来示威，把支左部队的办公室围住，要求部队支持他们。下午，他们又抬着尸体坐船去武汉了。

到了武汉，“巴河一司”的人在王仁舟的带领下，占领了江边不远的《湖北日报》红旗大楼，致使《湖北日报》停刊。

听说红旗大楼被一个“极左”的农民造反派占领，“新湖大”“红八月”的杜家远找到同学老殷，一起坐船过江，到红旗大楼看看。

在轮渡船上，杜家远说：“那‘巴河一司’的王仁舟是‘左’得出奇，比鲁礼安还左。不过他‘左’是‘左’，可他的指挥能力倒是难得的，他能把一个区的农民都组织起来且全区老少都能听他指挥那也真是难能可贵，他那个区没有第二个造反派组织，就只他那一个‘巴河一司’，而且他是用军事化的方式把农民训练出来的,那真是铁的纪律，他的部下在他面前个个服服帖帖，对他言听计从,尽管他说一不二,可人家都心悦诚服,很多农民都表示，一旦有事，就能为王仁舟去替死。”

红旗大楼对这两位“新湖大”来说并不陌生，1966 年 11 月 16 日那次封《湖北日报》的行动，他们都参加了。虽然一年多没来了，但依然很熟悉。老殷跟着杜家远轻车熟路的从后面东门上到四楼的一间小房里，这里正是王仁舟的临时办公室。

一进这个小房，王仁舟就像老熟人一样地同杜家远打招呼。可以看出，杜家远是这里的常客。

杜家远向王仁舟介绍说：“这是我们的老殷，‘红八月’有名的笔杆子。”王仁舟朝老殷点了点头，示意他们在一张沙发上坐。

王仁舟说，他们是因为巴河发生了一起重大的武斗血案，《湖北日报》站在“巴河一司”的对立面支持了右倾保守势力，他们是要来武汉讨个公道，这才进驻红旗大楼，封了《湖北日报》的。

不一会儿工夫，先后就有几个男女青年进来向王仁舟请示工作，后来又进来一个 50 多岁的勤务人员给他们上茶。这人是地地道道的农民打扮，可他的举止也十分有规矩，对杜家远和老殷非常客气，而且在王仁舟的面前就像士兵对待长官那样的毕恭毕敬，动作表情没有做作之处，更看不到有奴颜婢膝的样子，就像个训练有素的老战士一样，难怪杜家远说王仁舟是以军人的要求来培养他的队伍。不论是工作人员还是勤务人员，事毕都是得到王仁舟的允诺之后才礼貌地退下。而在杜家远和老殷面前，王仁舟也不是高高在上，态度十分谦和。

看到这情景，老殷还真的傻了眼。论威风，讲派头,武汉地区的造反派头目大多都能在这个王仁舟之上。但要讲究上下之间这种又团结又严肃的关系，那恐怕没有一个能比得上这“巴河一司”的。尽管王仁舟从衣着到作风都不是那么高人一等，可在这些小兵心目里，他的地位和威望却是至高无上的。老殷很奇怪,武汉地区即使是在一派里边，上下头目之间为一言不和而拍桌打椅的事是时有发生的，谁又能绝对地服从谁呢？难道就是唯独“巴河一司”的人就这样“奴性十足”?既是造反派，谁都是有个造反派的脾气的。当然这也不排除和王仁舟一起来武汉的都是他的心腹，不过心腹的奴性与训练有素是有着质的区别的。

王仁舟在同他们谈话中一直都很客气，也很有礼貌。不过，礼节归礼节，观点归观点,谈起观点来,那王仁舟可是寸步不让的。

说到武汉的造反派头头，王仁舟很不满意。他说武汉地区的

造反派鼠目寸光，一旦掌权就利令智昏，以为革命到底了。他说武汉造反派上了一个大当，把“7．20”得到的枪支上交了。他说：

“这枪怎么能交出去呢？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交了枪便是交了权，我们‘巴河一司’就不交，我们要‘藏枪于民’。外国就多是允许私人持枪的。枪这个东西,安定时能帮我自卫，战乱中能助我杀敌。这‘藏枪于民’与毛主席的‘全民皆兵’的思想是一致的，民不持枪，这‘全民皆兵’就成了一句空话,毛主席是号召打人民战争的,要不‘藏枪于民’,这人民战争又何以能打？武汉的造反派应该重新把枪夺回来，建立自己的武装。”

王仁舟还有一个观点是“藏粮于民”，他说：“粮食要储藏在老百姓的手中，我们‘巴河一司’就不交公粮，造反派也只有手中有粮才能心中不慌。兵马未到，粮草先行，不储备充足的粮食怎么行？你就说我抗粮也罢！”

原本还有些书生气的王仁舟，说到“重新把枪夺回来”和“说我抗粮也罢”时，情绪很有些激动起来，真有些慷慨激昂的气概，似乎天底下唯独就他王仁舟一个是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一样。

乍听起来，仿佛觉得王仁舟讲得还头头是道，他的“两藏于民”的观点都是以毛泽东的论断为依据，经过严密的逻辑推理而得出来的，真也堪称有理有据。但是老殷听着王仁舟的话，看着他那神态，心中依然觉得：“你这是跟着毛主席干革命吗？这不是在同毛主席分庭抗礼嘛！”

王仁舟很有些蔑视武汉的造反派，在他眼里武汉的造反派是非常保守的，就连武汉人公认的极左派鲁礼安，王仁舟也好像不在其话下。他说“武汉这么大个城市，运动始终都没个起色，冷冷清清，叫人实在为之可惜。”他还很有些生气地说：“尤其是‘钢工总’，这么大个组织却没有战斗力，有些人进了省、市革委会，当了官，就自以为革命进行到底了，这就是被既得利益蒙住了眼睛。如果我王仁舟也是这样，我‘巴河一司’的战士早就造了我的反了。”

老殷不时地拿眼角看着杜家远，只觉得此时他们 3 人好像正在一个人们难以发觉的秘密地方开着一个十分神密的地下黑会，一旦有人告发那才真是死有余辜哩！此时他想：“只要今天能平安地走出这个大楼，以后说什么我也不会再到这里来同他共什么来往了。”

从红旗大楼出来，杜家远问老殷：“怎么样？”

老殷说：“王的观点也是片面的，尤其是他那两个‘藏于民’的说法是走了极端的，我真不敢苟同，那可是我们连想也不敢去想的，要真像他说的那样国家不就乱套了。”

杜家远说：“说王这个人就是敢想。”“他一个农民能这样去想就已经很难得了。”

老殷说：“你老杜和我也还算是敢想的，可我并不主张像他这样胡思乱想，胡思乱想者往往难免生出奇谈怪论。对于王仁舟我只有一点还能佩服的，就是他能把这些农民训练成这个样子，倒

也是十分难得的。不过仔细一想，他也没有什么特殊的能耐，巴河的老少男女对他毕恭毕敬那主要是他的‘两藏于民’观点迎合了农民的狭隘自私的心理，他指使不交公粮，这当然是自私落后的农民所求之不得的。在这些农民的心里，王仁舟就像是救星一样，自然就都乐意听他的了。如果真让他来领导武汉的运动，武汉人可就不会那么驯善地听他的了，因为武汉人不只是不存在要交公粮的问题,更主要的是武汉的人民到底还是要听毛主席的话的。”

王仁舟的目的是争取武汉造反派的声援和支持。但是武汉的“新派”对王仁舟的做法很反感，在忍了多天后，“新派”编辑了《政治狂人王仁舟》言行录，并组织力量把王仁舟赶出了武汉。

王仁舟走了，但是他的“廉价政府”却在武汉留下了影响。为了了解实情，1968 年 1 月 4 日晚 22 时，“新湖大红八月”的杨闯和刘崇明、田信德、陈珠兰一起乘小轮船来到浠水县。5 日晨 5 时多乘船到巴河，然后走了 10 多里路到达巴河镇。“巴河一司”接待站接待了他们一行 4 人，并领他们到离巴河镇六里多路的地方看了‘巴河一司’的新农村。

新农村的房子全部是两层楼的土房子，设有幼儿园、托儿所、公社食堂；人们不是按家庭居住，而是按年龄相近的人住在一起。小孩分别交给托儿所、幼儿园、学校，基本上没有家庭了。

这种打破家庭的新农村农民接受吗？杨闯问新农村居住的一位近 60 岁的老人，想听听他的想法。他说：“很好，我们老有所

养，小孩也有幼儿园照顾，我们不操心了。”

从新农村回巴河镇后，已是下午 17 时左右了，陪同的接待人员告诉他们：“今天晚上王仁舟与北京和武汉的同志们座谈，请你们参加。”

在招待所吃完饭后，杨闯他们就到会议室参加王仁舟的座谈会。只见王仁舟坐在中间乒乓台前，两边排了几排凳子，坐满了人，大概有 50 多个人，都是北京、武汉等外地来调查的学生，另外有 3 个农民参加。

王仁舟首先介绍了“巴河一司”夺权后成立的“廉价政府”及其组织机构情况，并且强调这是按巴黎公社的原则组建的。

会上，王仁舟与杨闯在一些问题上发生了争论。

1968 年 7 月以后，中央三令五申要群众组织交枪。可王仁舟不愿意交枪，他的理论是：“既然毛主席提倡全民皆兵，那没有枪叫个什么兵？”他把自己的武斗组织称之为“人民武装”，用毛泽东在抗日时期曾经说过：“人民的武装，一支枪，一粒子弹，都要保存，不能交出去”这段语录抵制交枪，并把这句话做成语录胸牌，挂在每个人的胸前。

其实在当时的条件下，农民“工资制”难以为继，各种社会福利也没有能力维持下去，王仁舟的社会实验大约进行了一年多，到 1969 年初就没再进行下去。“九大”召开前夕，武汉军区派出部队到浠水制止武斗，强行收缴双方的武器，并把王仁舟抓了。下面的农民群龙无首，几天功夫就树倒猢狲散了。浠水武斗

这才平息下来。

王仁舟被捕后，仍坚持自己的政治主张，死不改悔，遭到同室犯人的毒打。后来他自己干脆绝食而亡。

## 第 944 回：孟用潜，揭发刘少奇叛变　反刘、张，山城内武斗□□

1929 年与刘少奇在奉天纱厂一起被捕，时任外交部国际关系研究所所长的孟用潜，也在 1967 年 12 月 28 日写下了如下证词：

刘少奇和我一九二九年在沈阳被捕叛变投敌罪行

一九二九年八月，我和刘少奇到奉天纱厂开支部会，讨论纱厂罢工问题，被支部书记常宝玉出卖被捕。当晚奉天纱厂审讯，刘少奇承认他是满洲省委书记，出卖了我，还出卖了省委委员丁君羊、唐宏经、王立功、张聿修、饶漱石、省委秘书长廖如愿，省委办公机关以及沈阳六、七个支部。

第三天，奉天警察厅审讯，刘少奇进一步出卖了东北地方党组织，包括北满、东满、关东州特委和特委书记，以及大连、营口、沟帮子、辽中、辽阳、抚顺、延吉等重点县市委和县市委书记。审讯后，刘少奇还在“自首书”上签字划押。

当晚奉天警察厅继续审讯，刘少奇又供了他所知道的省委负责人住址和其他省委机关。然后警察厅就要刘少奇和我带着警察去抓人。刘少奇说省委主要负责人已经隐蔽起来，现在抓不到，反而会打草惊蛇。他于是向阶级敌人献策，要求把刘少奇和我提前释放出狱，给奉天警察厅搜集党的情报，为大规模破坏满洲省委和东北地方党组织做准备工作，其用心至为恶毒。

几天后，奉天警察厅对刘少奇献策表示同意。为便于刘少奇

和我继续混入满洲省委，决定地方法院，对这一案将不作为共产党案审讯，而作为煽动工潮案审讯，不承认煽动工潮，证据不足，即可取保释放出狱。以后在地方法院也是这样审讯，这样判决的。

出狱后，刘少奇同省委几个负责人说，这一案以煽动工潮开始，最后以煽动工潮，证据不足取保释放而结束，是一个工潮案，不是共产党案，毫无问题。这样他就仍然当满洲省委书记，并决定调我到哈尔滨任北满特委书记。

同年十一、二月间，刘少奇到哈尔滨。他同我说奉天警察厅找他谈过话，他也给警察厅送过材料，并要我给他搜集北满的材料。那次给刘少奇的有阿城、珠河、牡丹江、东宁、密山等县委名单、支部和党员统计表以及县的重要报告。

一九三零年三月刘少奇调离满洲省委，四月满洲省委遭到一次严重破坏。

孟用潜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但是孟用潜很快又翻供了。据当年专案组成员肖孟回忆:“他事后曾经有 20 多次口头或书面申诉推翻供词。他一再说明这些交代材料‘都是编造的’、‘写材料是在审讯小组帮助下集体创作’。但是这些申诉都被扣押或销毁了，有几次专案组还强迫孟用潜本人当场撕掉，并一再警告他不许翻案，否则以现行反革命论处。因为一再翻供，孟用潜一直被关到 1978 年，放出来时刘少奇已经去世。”

11 月 2 日，四川省革筹组副组长、成都军区司令员梁兴初视察重庆大学看大字报，并与重庆大学“815”负责人交谈。

接着，他在 2 日、3 日下午，6 日一天，由重庆驻军和市革筹负责人韦统泰、蓝亦农、白斌等陪同，在重庆警备区小礼堂三次接见“反到底”派负责人李木森、黄廉、粟远奎、徐光明、邓长春、西师“831”李盛龙、建院“井冈山”刘福均等人。

在接见时，梁兴初说：“我也是造反的。我是跟着毛主席造了反动派 20 多年的反，造得有理，造出了新中国。你们也自称造反派，你们也说‘造反有理’，你们造出了什么？毛主席说，‘要文斗，不要武斗’，你们就是当耳边风，公然哄抢军队的武器，打群众，打解放军，这是造的哪门子反?你们不听毛主席的教导，抢来军工厂新造的武器打自己人，搞武斗。你们理在哪里？新式武器是给解放军保卫祖国用的。现在还没有装备解放军，你们搞武斗的武器比解放军的装备还好，这还了得!”

11 月 21 日，解放军后勤工学院两派又在学院内武斗，死一人。

11 月 22 日，四川永川驻军 7784 部队奉命调离，因得到该部队支持、保护的永川“红旗”派担心 7784 部队调走后，对立面永川“专联司”派会重新占上风，于是在永川天然气研究所仪表工人、永川县“红旗派”主要负责人孙尔惠的组织下，发动上万“红旗派”群众在火车站不分昼夜轮番睡坐在铁轨上和铁轨旁，不准运送解放军的火车开动，长达 53 天，至次年 1 月 13 日止，

造成震惊全国的“卧轨留军”事件。

11 月 23 日，继 8 月 1 日成都军区决定成立永川驻军支左领导小组之后，这天成都军区和重庆驻军又决定成立江津专区驻军支左领导小组。因为江津专署就在永川县，于是，永川县城内从此就出现了两个支左小组并存的局面，各办各的公，各支各的“左”，各爱各的民，两派造反派也各拥各的军。甚至两个支左小组各批各的革委会，永川县 50 个农村公社中就有 30 多个公社建立了两个对立的革委会。

11月，四川省反刘张派主力：重庆“815”、“红卫兵成都部队”、南充“临联”在重庆大学召开联系会，交换意见并制定作战方略。会开了3天。会后，12月1日，《815战报》和《山城战报》以两报编辑部的名义，联合发表了一篇文章：《大局已定，815必胜》。

这篇文章的起因是王力、关峰、以及林杰3人的倒台，这让重庆一直以正确路线自居的“815”派，认为自己又正确了一回，胜券在握，需要“宜将剩勇追穷寇”了，于是欢呼雀跃，开会游行。重庆大学《815战报》也跃跃欲试，要来点大块文章。《815战报》编辑部的4个同学：周孜仁、霍晓林、张宗云和张国梁，画了一张大大的中国地图挂在墙上，然后用铅笔在上面画了好些红圈蓝圈红箭头蓝箭头，似乎只要再小试锋芒，“全中国就都是咱们的了”。于是开始舞文弄墨，起草《大局已定，815必胜》。文章由4人分头执笔，写好后由周孜仁润色定稿。感觉不错，便

拿去让吴庆举看。他大加赞扬，高兴之余，周孜任就送到《山城战报》，无非是想请《山城战报》李乃如主编也看看，提提意见。当然也是想炫耀炫耀。结果，重庆石油学校老师李乃如一看完就提出两报合刊。

文章发表后，反响果然巨大，当天就有学生连夜欢呼，称该文章是“投向刘张独立王国的一颗重磅炸弹”，“敲响了刘张独立王国的丧钟”云云。

接下来，几乎全川“815”派和“红成”派的小报都先后转载，有一种齐步走的感觉，效果大大超出原来想象。《山城战报》主编、重庆石油学校老师李乃如事后开了一个座谈会，他在会上很高兴地说：“真没想到一文既出，洛阳纸贵呀！”

文章有个副标题，叫：“一评四川时局”。有一评当然得有二评、有三评、有四评……就像当年《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的“九评”，把苏修头目赫鲁晓夫干净利落评下了台。事后，《山城战报》就把周孜仁“关”在他们报社让他写“二评”和“三评”。

全川各地的“815”派纷纷来重庆聚会，兴高采烈，弹冠相庆。据12月10日出版的第51期《815战报》报道，前来聚会的友好团体有：

“张思德同志的母亲刘光友率领的南充临联赴渝慰问团”、

“黄继光烈士的母亲邓芳芝率领的成都地总、红成赴渝慰问团”、

“邱少云烈士的父亲率领的烈士家属赴渝慰问团”、

“中印边界反击战战斗英雄吴元明率领的江津九七赴渝慰问团”、

“三二一一一英雄钻井队英雄王有发、彭美凤率领的泸州赴渝慰问团”。

他们来，除了带宣传队来渝作文艺表演外，自然少不了大大小小的报告会和控诉会。主题无一不是“反军派”的罪行及其黑后台刘结挺、张西挺其罪当诛。

12月7日，重庆“815”沙区6万多人在师专广场举行誓师大会：“大树毛主席绝对权威，大破刘张个人淫威”。

12 月 10 日，“反到底”派在体育场召开“排除干扰，反对迫害”大会。

12 月 11 日，两派在望江机器厂武斗，“815”派占领全厂。“反到底”派 4000 多人撤到涪陵。

这天，重庆驻军领导人韦统泰、蓝亦农、白斌、唐兴盛陪同成都军区司令员梁兴初分别接见两派代表各 300 人。

12 月 13 日，解放军后勤工学院又发生武斗，数十人受伤。

12 月 13 日，“815”派攻打设于交电大楼的“完蛋就完蛋”广播站。深夜，大楼被燃烧弹击中烧毁，附近数十家民房也遭火灾。当年重庆市国庆节游行照片中即可见游行队伍一侧与红旗交相辉映的交电大楼黑色废墟。此后，“完蛋就完蛋”广播站转设于解放碑另一侧的人民商店。

12 月 14 日，因武斗导致煤炭供应紧张，重庆市中区居民用煤实行凭证定量、限量供应。

12 月 15 日，因有群众举报“反到底在大阳沟（菜市场）持枪抢白菜”，重庆驻军派部队包围了“反到底”派在市中心的唯一据点：设于解放碑东侧友谊商店，当时叫人民商店楼上的财贸“井冈山”总部及“完蛋就完蛋广播站”，要求“反到底”派人员交出枪械。此前该广播站与附近的“815”派“痛打落水狗”广播站已从广播对骂发展到不时用枪对射。

“反到底”派则认为驻军“支一派压一派”，只收缴“反到底”派的枪而不收缴“815”派的枪，并提出条件：部队若执意搜查，在搜查不到枪支时，必须向全市人民作检查，否则就拒绝部队搜查。

双方形成对峙，部队包围至次年 1 月底春节前夕才撤走。“完蛋就完蛋广播站”每天在商店楼上窗口挂出大幅标语“非法武装包围××天”，日期逐日更换。同时墙上还挂满各地支持“反到底”派的群众组织送来的声援标语、布幅、大字报，引来大批群众围观，甚至有群众给被围困的“反到底”派人员送茶送饭送鸡汤，成为重庆城内武斗期间一大奇特“文斗”景观。

12 月中旬，“反到底”派再次大批离厂离校，逃往内江、达县、宜宾、涪陵、成都、贵阳等地。

12 月 23 日，梁兴初和重庆驻军领导人韦统泰、蓝亦农、白斌等到“815”派控制的长江电工厂视察，称赞该厂是“抓革命、

促生产较好的一个厂”。

12 月 27 日，重庆大学“815”将重庆大学“反到底”派的“井冈山”赶出学校后，宣告成立重庆大学革命委员会，同时宣告该校毛主席塑像落成。支持“815”派的四川省革筹组副组长、成都军区司令员梁兴初和重庆驻军领导人韦统泰、蓝亦农、白斌、唐兴盛等出席表示祝贺。“红卫兵成都部队”代表、西安交通大学革委会主任李世英、首都红代会“八一五兵团”、哈军工“红色造反团”的“鬼见愁”、专县代表、54 军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战斗英雄陈代富等到会发言祝贺。大会结束时，54 军军长韦统泰指挥全场唱《大海航行靠舵手》。

四川省革筹组副组长刘结挺则在自贡接见重庆“反到底”派代表，表示支持。

12 月 30 日，“反到底”派万余人冲击重庆市革筹组，两派发生武斗，革筹组牌子被砸，工作人员多人被打伤。

重庆没有迎来人们期盼的和平，两派的对立和武斗依然在继续……

1967 年 12 月 22 日，北京大学有人给毛泽东写信，反映《伍豪启事》一事。毛泽东于 1968 年 1 月 16 日批示：“此事早已弄清，是国民党造谣污蔑。”

12 月 30 日晚 19 时 30 分，北京大学“井冈山兵团”将北大校文革斗、批、改负责人崔雄崑从家中抓走。北大校文革召开全校大会宣布此事，“新北大公社”的学生齐声问：“怎么抓走了？”

有人激动地回答说："砸开了他家的门，抄了他的家，把家里的财物洗劫一空，当场把他抓走了。"

大家一齐痛骂"公社"总部和聂元梓对"井冈山"太仁慈，太"费勒泼耐"，强烈要求校文革和"新北大公社"采取行动，勒令"井冈山"交出崔雄昆。

1968 年 1 月 5 日凌晨，"新北大公社"组织了很多人，冲向"井冈山"总部所在地——28 楼，他们认为崔雄昆可能关在这里。天亮前，他们终于占领了 28 楼，但是没有找到崔雄昆，只好撤了回来。

1 月 6 日下午，北京卫戍区李钟奇副司令员来到北大，与学校的两派代表谈判释放崔雄昆。"井冈山"不同意，李钟奇火了，拍了桌子。最终，"井冈山"同意在晚上 20 时前释放崔雄昆。

1967 年过去了，这一年，在动乱中，全国生产受到了极大的影响，工农业总产值为 2104.5 亿元，比上年下降近 10%。其中工业总产值 1453.5 亿元，比上年下降 14%，农业总产值 651 亿元，比上年有微小的增长。

# 文革史话

## 之第三部 全面内战 第十三卷

刘朝驹 著

# 文革史话

之

第三部

# 全面内战

第十三卷

# 目 录

第 945 回：赴唐山，陈伯达河北之行　元旦日，西藏军区打成团 ..... 1
第 946 回：黑龙江，两派合办学习班　急回京，戚本禹“请假检讨”.....10
第 947 回：一封信，阎长贵惹怒江青　急召回，杨银禄带病回京 .....21
第 948 回：受牵连，记者站领导被抓　山西稳，晋东南仍起硝烟 .....31
第 949 回：周恩来，康生见镇江代表　审杨帆，听汇报江青满意 .....42
第 950 回：一平浪，军代表中弹身亡　一一六，云南下关大武斗 .....53
第 951 回：一二一，凌晨见云南代表　成叛徒，赵建民当场被抓 .....66
第 952 回：批示下，堵截围剿“工八团”　谢富治，惊闻打死百八人.....80
第 953 回：抓叛徒，内蒙揪叛联络站　大草原，作家发现“内人党”.....89
第 954 回：极左派，新思潮层出长沙　不客气，中央狠批“省无联”.....101
第 955 回：成星散，湖南实行大联合　供少奇，武汉革委会成立 .....111
第 956 回：众领导，接见江苏代表团　佩枪行，许世友回到南京 .....120
第 957 回：“内人党”，河北革委会成立　不甘心，徐州铁路桥被炸.....131
第 958 回：二月八，北京五十五启程　《赠战友》，挥手豪情别红城.....142
第 959 回：磁县乱，京广线为之中断　调军队，终平息“二九事件”.....155
第 960 回：王效禹，北海舰队屡生隙　杨保华，就任青岛一把手 .....166
第 961 回：二月十，锦州二高中撤离　二一一，电业局大楼被炸 .....176
第 962 回：做工作，周培源同意下山　外交部，“九十一人大字报”.....184
第 963 回：甩飞石，拉萨武斗动真枪　下通知，召西藏代表进京 .....192
第 964 回：功长治，晋东南“五县剿匪”　滇联合，谭甫仁主政云南.....200
第 965 回：广西乱，玉林万花楼被毁　夹道留，五十五军难离桂 .....209
第 966 回：二二一，广东革委会成立　天津市，革委会没人上班 .....220
第 967 回：奔北京，众领导连夜接见　为的是，天津市黑戏黑会 .....230
第 968 回：才两月，天津革委会改组　促联合，北京高校学习班 .....240
第 969 回：掌权术，学生头纷纷检查　鲁迅稿，徐州改组革委会 .....250
第 970 回：江青怒，傅崇碧冲钓鱼台　写检讨，再召集警卫会议 .....261
第 971 回：成都打，部队师长饮弹亡　倒谢风，贵州抓捕“四一一”.....273

第 972 回：再接见，北京高校学习班　很明确，“二月逆流”不能翻.....283
第 973 回：周恩来，携陈毅到外交部　串联会，中央见四川领导 .....295
第 974 回：说专案，傅连璋死在秦城　应对难，杨成武屡屡出错 .....308
第 975 回：妻告夫，林立果参军入党　有材料，余立金也成叛徒 .....320
第 976 回：为警卫，江青这边又出事　经查实，谭震林不是叛徒 .....330
第 977 回：赞江青，“无产阶级革命家”　蔡立坚，北京下乡第一人.....340
第 978 回：“倒谢”潮，转瞬间浪退散尽　探病情，毛泽东深夜开会.....356
第 979 回：空军院，凌晨逮捕余立金　命令下，傅崇碧调往沈阳 .....369
第 980 回：电话断，带走病中杨成武　黄永胜，急飞北京接新职 .....382
第 981 回：三二四，京城军人开大会　林彪等，说明杨、余、傅事件.....395
第 982 回：毛泽东，接见众与会人员　再转移，杨成武定居洛阳 .....408
第 983 回：围北大，北京军区批“山头”　办事组，军委常委不开会.....417
第 984 回：三二九，北大首场大武斗　气难平，聂元梓燕园遇刺 .....428
第 985 回：樊立勤，受酷刑命悬一线　参事室，李仲公揭发贺龙 .....438
第 986 回：看广西，武装进驻融安县　议湖南，五老帅停发文件 .....451
第 987 回：四月三，西单商场大爆炸　枪声响，大连武斗烈火燃 .....462
第 988 回：说山西，接见农大东方红　严凤英，宁、湘成立革委会.....472
第 989 回：徐家汇，藏书楼里有秘密　没想到，狄克就是张春桥 .....483
第 990 回：上海市，“游雪涛小组”成立　派卧底，情报搞到警备区.....496
第 991 回：生疑问，张春桥为何缺席　《文汇报》，提出十个为什么.....507
第 992 回：四一二，再次炮打张春桥　沉住气，梳理罢飞往北京 .....517
第 993 回：讲三点，李作鹏电话指示　大翻转，二次炮打又失败 .....530

## 第 945 回：赴唐山，陈伯达河北之行　元旦日，西藏军区打成团

1967年的12月，北京街头出现了一批大标语：

“戚本禹算老几！”

“戚本禹是‘中央首长’吗？”

“戚本禹滚出中央文革！”

这时，陈伯达在《红旗》杂志编辑部召集几个人谈话，他说：“在《红旗》杂志，除了我之外，在揭发王力、关锋的问题时，所有的人都可以揭！”

陈伯达此话一出，不光是红卫兵攻击戚本禹了，连《红旗》杂志的造反派、中央文革小组的人员，都纷纷起来揭发、批判戚本禹了。

而此时，陈伯达已到河北省巡视。

因为按照 1967 年 8 月 9 日周恩来和康生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宣布的中央的分工决定，陈伯达负责华北地区。12 月，陈伯达向毛泽东请示，想去河北地区看看，促进那里的大联合。毛泽东听了以后犹豫一下，对陈伯达说：“现在外边那么乱，是否一定要去呀？如果一定去，那时间不要太长。”

12 月 22 日，汪东兴通知陈伯达的秘书王保春和中央警卫局二处处长邬吉成到他的办公室当面交代：“伯达同志这次外出去河北，地方上情况复杂，你们要保证首长的绝对安全。如果发生什么问题，”他对邬吉成说：“你和王秘书商量解决。你再带上几个人去，你们统一指挥，随时与我联系。”

陈伯达把他想去河北的请示也报告了周恩来。周恩来考虑到

河北省即将成立革命委员会，李雪峰已被内定为河北省革命委员会主任，就主持中央碰头会，决定李雪峰随陈伯达一起去河北地区先接触群众，进行工作。

12 月 25 日，康生通知北京军区代司令员郑维三在京西宾馆开会，听取汇报和部署陈伯达的行动路线和交通工具。当天下午 14 时，在京西宾馆参加华北地区军队领导会议的有康生、吴法宪、杨成武、李雪峰、郑维山等。

原决定先去保定，后改变计划先去唐山。随同陈伯达一起去的有他的秘书王保春和中央政治研究室的李准。

12 月 25 日晚上 19 点多钟，他们乘专机出发。同去的有李雪峰、解学恭、郑维山等。他们到达唐山后，住在 24 军军部，听取了陈军长、廖政委的简短汇报后，当天夜里就同当地驻军的全体领导人进行了约一个半小时的座谈，并作了第二天的工作安排和部署。

12 月 26 日上午 10 时，他们接见唐山两派的代表，陈伯达、李雪峰、郑维山先后讲了话。

12 时，他们去了东山矿区，先在部队吃午饭，下午接见支左部队和各矿造反派组织头头，听取他们的汇报意见。下午 16 时下矿井，19 时返回地面，20 时接见了二矿革命委员会和少数派的人，参加接见的有 24 军陈军长、廖政委。陈伯达接见时讲了话。原计划接见之后就去保定，但因为陈伯达对自己在矿井上的讲话总感有些不安，怕引起什么副作用，临时决定停留一天，再接见一次双方代表，当天住在机场。

唐山分为两派，一派叫做“路东派”，一派叫做“路西派”。

陈伯达听了汇报以后，对两派说：什么“路东派”、“路西派”，都是革命派，大家都要大联合，要“抓革命，促生产”。陈伯达走到工人中间做工作。走到哪儿就讲到哪儿，讲话很多，就是一个主题：革命的大联合，要“抓革命，促生产”。王保春让随去的史敬堂、李准认真记录，给他们的任务就是陈伯达每讲一次话，整理出一份记录稿。

12 月 27 日上午 9 时，陈伯达吃过早饭后，又到 24 军军部，再次接见唐山双方的代表。总的感觉是，老年人的工作好做，老太太看到有人打解放军都非常气愤；而大学生的工作不好做。总之，基层的群众要求办学习班的多，要联合成立革委会的多，要求搞大联合的多。陈伯达在会上向唐山的“三代会”提出“三同”：同吃、同住、同学习。他说：

“你们是多数，向对方做工作，第一不要性急，第二要把困难估计得多一些，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要使群众站到你们一边，他们谁只要敢于下手，就等于自己打倒自己，这样就是你们自己胜利了。但是，也有可能你们自己内部分裂。你们现在在‘矿总’面前团结起来了，但是如果‘矿总’一倒你们怎么样呢？有人是极右的，但他是用极左的面目出现的。……不管怎么样，你们要相信群众，相信毛主席，相信毛泽东思想，你们在每做一件事情之前首先要考虑一下看对谁有利。你们不要用我的话去压人，我因为年纪比你们大一点，只能提供一点情况供你们参考。凡事不能过急，大联合好，但是要创造条件。如果你们搞得好，对全国都会有影响的，有作用的。你们可以对家属做工作，不要到矿山去。”

陈伯达在接见了唐山“三代会”的代表后，又接见二矿的两派代表，他说：

“你们对我昨天的讲话有什么意见，可以提出批评，也可以上纲高一点。老工人最反对武斗，反对分两大派。我看要提个口号叫做‘向老工人学习’。保错了人是可能的，你们双方可能都有，对犯过错误的人，要给人家改正错误的机会，一看二帮嘛！唐山煤矿对国家负有很大的责任，希望你们共同搞一个‘抓革命，促生产’的协议出来。你们双方各自多做自我批评，避免批评对方，你们可以去请教你们的父母亲。”

在开座谈会时，有人反映说，某派有武斗的武器，就放在开会的这座楼里。顿时大家就紧张起来，在知情人的指领下，慌慌张张地跑去搜，还真搜出武器来了，驳壳枪和步枪都有，都是原来民兵的枪支。陈伯达让把这些武器都交给了唐山军管会，即当地驻军 24 军保管。

接见完“矿总”的学生后，陈伯达又去查看了矿院的武斗现场。在那里，陈伯达、李雪峰、郑维山分别讲了话。

离开唐山前，陈伯达又将两派代表召集到一起，开了个促使他们革命大联合的大会。会上，由于陈伯达的福建话别人听不太懂，他怕群众听不懂而引起误会，就临时请随同去的邬吉成当口头翻译。陈伯达在会上号召两派团结起来“抓革命，促生产”，在场的人对他的这些讲话，还是比较满意的。

陈伯达在唐山停留了两天，自己认为基本满意。于是，在 27 日下午 16 时 15 分乘专机离开唐山到定县机场，然后转乘汽车，下午 18 时到达保定，由 38 军军长李光军、政委王猛迎接，

住在 38 军军部。

保定由于支左部队分别为野战部队和地方部队，各支一派。陈伯达到了以后，上午听取 38 军军长李光军、政委王猛的汇报；下午听取河北省军区司令员马辉等人的汇报。紧接着就去做群众的工作，分别听取他们的意见。并且亲自去查看群众组织“敢死公社”、“飞虎队”在武斗时占据的现场，还走进工人宿舍。

28 日下午，陈伯达出席了在河北人民出版社召开的群众大会，他在会上讲了话，号召大家大联合，支持部队的支左工作。

29 日下午，陈伯达在河北省军区大院，接见了保定市各派组织的头头和军区支左干部，向他们讲了五条意见，中心意思是要团结，求同存异，促进大联合。

晚上又在 38 军军部大礼堂，接见了保定地区的 22 个县的负责人和军队支左干部，同样号召他们要搞革命的大联合，要团结。

30 日上午刚吃完早饭，正准备离开保定时，只听见外边敲锣打鼓，口号声响成一片，热闹非凡。出来一看，原来是保定市两派群众抬着大联合的牌子和报喜队伍拥向 38 军的驻地。陈伯达和军队的领导高兴地接见了他们，祝贺他们大联合。

当时驻河北省各野战军和河北省军区均倾向于各地较保守一派，唯独保定 38 军支持激进派，陈伯达等急于稳定局势，在保定等地的讲话时，站在北京军区立场，对 38 军支持的一派作了严厉批评，称省委机关“造反兵团”、河北农大“造反团”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产物。

陈伯达匆匆由保定飞到了石家庄。石家庄较为平静，两派纷争没有那么激烈。陈伯达的心情比较愉快，提出要到革命圣地西

柏坡去旧地重游。在 63 军军长徐信的陪同下，他坐车前往，路上几次下车访问农户，向他们问长问短。

从西柏坡回到石家庄以后，陈伯达又参观了几个大的工厂，分别接见各厂全体职工，并且作了热情的讲话，赞扬他们“抓革命，促生产”做得好，应该向他们学习。紧接着，又去了石家庄市第一中学，接见了全体师生员工，讲话中谈到教育革命问题，向他们提出“向工人阶级学习”等口号。

31 日下午，陈伯达出席了石家庄市、地委，专区的革命委员会代表联合召开的座谈会，听取了他们的意见，共同座谈、讨论如何搞好“抓革命，促生产”的工作。

31 日晚上，石家庄市中心的“八一”大礼堂组织了一个丰富多彩的联欢晚会，陈伯达出席并在会上作了热情的讲话。他在讲话中批评 38 军支持的保定激进派是“刘邓路线的产物，代表一种反动思潮的小集团”，挥拳号召河北各地“下一步要乘胜追击”。

第二天是 1968 年的元旦。这天，石家庄天气晴朗，举办了一个大规模的庆祝活动，有群众游行，张灯结彩，敲锣打鼓，好不热闹。

上午 10 时 30 分，陈伯达、李雪峰、解学恭、郑维山等在石家庄市领导和当地驻军领导的陪同下登上检阅台，观看群众游行。台上台下互相频频招手致意。游行活动进行了约两个多小时结束。

中午，陈伯达离开石家庄来到邯郸。下午听取军分区和炮 14 师领导的汇报，了解这里的武斗情况，知道他们分“地总”和“市联委”两派。

第二天上午，陈伯达就去找“地总”的负责人谈话，听取他们的意见。并且到现场查看他们的工事和武器。接着又去“市联委”，也发现有不少武器。

下午，陈伯达将两派的头头召在一起开会，和他们座谈，听取他们的意见。然后要他们搞大联合，不能搞分裂，并且让他们一定把武器交出来。邯郸的两派虽然都没有反对，但是交出武器都不那么痛快。与此同时，陈伯达派王保春和邬吉成带人去“地总”、“市联委”、“邯钢”等群众组织的驻地查看，在“地总”查出 8 支手枪来，陈伯达让王保春他们当着群众的面交给“地总”的头头，并请他们自己把这些武器交给有关部门，并告诉所有群众组织，有武器都应该自己去交给有关部门，不能私藏武器。

1968 年元旦，毛泽东、林彪接见正在北京参加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的解放军干部、各地党政干部、群众代表和出席空军直属机关、部队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及出席毛主席著作出版会议代表两万多人。陪同接见的有周恩来、康生、李富春、陈毅、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谢富治等人。

元旦这天，在西藏军区大院，发生了一起多数派对少数派的聚众斗殴事件。

西藏军区原属一级大军区，机关开展“四大”时也曾组建了群众组织，观点倾向、支持“大联指”的是多数派，且得到了领导的支持，处于主导地位；而观点倾向、支持“造总”的是少数派，常遭到压制。元旦这天，拉萨天气阴沉，气温在零下 10 多度，站在室外两手发僵，耳朵像似有针扎一般。上午 10 时左右，西藏军区大院广场上突然聚集了数百名干部、战士，起因是部队

警卫营倾向“大联指”观点的干部、战士，因门卫纠查，与西藏军区文工团倾向“造总”观点的女文工团员发生口角，以后动手对打，女文工团团员哪里是警卫营年轻力壮的小伙子的对手，被追打得往文工团住地奔跑。男文工团员岂能眼看同派观点的人员遭受殴打，挺身而出相助，与警卫营的战士殴斗，终究文工团员们是唱歌跳舞的演员，怎能敌得过舞弄枪杆的战士，为首的几个文工团员被当场打得鼻青脸肿。有的躲避不过，就往广场上奔跑，后面追赶着打红眼的连队干部、战士，以及一些围观的群众。就这样，从文工团住地一直追到军区广场，从广场又追至中央舞台后的俱乐部，从俱乐部又追回文工团住地。有的女文工团员被打得躲避到床底下，又被拖出来。有的男文工团员被撵的躲到猪圈，弄得满身都是猪粪便。这场“殴斗”搅乱了整个军区大院，围观的干部、战士越聚越多，一会儿撵至东边，一会儿又围在西边，不时爆发出一片喊打的声音。

军区的赵副司令员来到了广场，涨红着脸，不住地吹着口哨，叫喊着：

“各就各位，返回原单位！”

尽管他拼命地吹，使劲地喊，没有一个人服从他的命令。追赶的人群，有时就从他的面前闪过，就好像没有看到有这么一个副司令员在眼前发号施令似的。

政治部的白副主任也来到了现场，他挤进人群，拼命地拉扯开扭打在一起的群众，有时还用身体保护被打的文工团员。追打文工团员的干部、战士根本不听他的劝架，有的故意把他推搡在一边，涌上前去，继续挥拳殴打。

这时，什么“一切行动听指挥”，什么“遵守纪律不怠慢”，统统被他们丢在脑后，人们完全被满脑子的“派性观念”所驱使。记者在现场听到，有的战士恶狠狠地说：“今天老子就要好好教训教训这些‘老造’（即‘造总’派观点的成员）!”

广场上的混乱，一直持到下午 3 点钟才逐渐平息下来，被打伤的文工团员当场被送往门诊部检查就医。事后，警卫营虽然进行了严肃的整顿，动手殴打不同观点的文工团员的基层干部、战士，分别受到了纪律处分，但这次发生在光天化日之下的新年元旦“献礼”，却给人们在心中留下了一片混乱和恐慌！难以想象，连在军区大院都缺少应有的“安全感”了！

这年 5 月间，原一位观点倾向“造总”的后勤部副部长于一星，因在大院广场边的大字报棚前观看新贴出的大字报，无意中自言自语地流露出几句不同看法的话，当场即被一旁同情“大联指”观点的人听到，双方为此发生口角，随后，倾向“大联指”观点的基层干部、战士，便围上前去动手殴打，在一片混乱之中，竟将年过 5 旬的于一星打成重伤，事后抢救无效死亡。以后，虽曾立案追查，但因人多杂乱、清查不易和领导重视不够等原因，竟又未能及时将致人死命的凶手找出来，成为一件无头命案。事后经家属多方申诉，才以“因公死亡”的名义，报请中央军委批准，落实了抚恤政策。在全国所有的军营中，在如此光天化日之下，活活将一名军队领导干部殴打致死的事件，可真难再找到第二起！

## 第 946 回：黑龙江，两派合办学习班　急回京，戚本禹“请假检讨”

黑龙江省两派代表回到哈尔滨后，周恩来派来的监督员——总后勤部史一民副部长每天坐车四处巡查，见市面上十分平静，两派均无大的出格行为，便请示周恩来，他是否可以回北京了？

过了 1968 年元旦，黑龙江省革委会根据在北京达成的协议，组织两派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潘复生指定范正美、宋振业、刘雪峰、聂士荣负责，但学习班的指导思想、要达到的目标和具体部署以及四个人的分工，他没有讲。学习班的具体工作则是政治委员会派出的葛树喜负责，他每天吃在学习班，工作在学习班。可是学习班没什么活动，葛树喜很着急。而宋振业、刘雪峰、聂士荣对学习班不很积极，经常找不到人，只有范正美和葛树喜两人整天在学习班。于是他就成天问范正美怎么办。范正美向他建议，搞一次到农村向贫下中农学习的活动，接受再教育，向贫下中农学习，让大家在阶级感情上靠拢。葛树喜认为这是个好办法，便抓紧时间落实。

学习班里的两派在农村学习相处得很融洽，还召开了联欢会，大家互相拉歌，表演节目。然而，就在两派代表乘车去宾县幸福公社幸福大队参观学习之后，在回哈尔滨的路上，经过宾县县城时，突然从大街上蹿出几十个中学生，拦住范正美的坐车，强行将他架下车，拉到宾县电影院的前台上，声言要召开群众大会批判范正美。

范正美想，这应该是“捍联总”寻衅闹事，也许事先经过策划，弄不好可能发生武斗。因此他抱定决心，命令自己要沉着、冷静，不管他们起什么高调，耍什么花招，他只说一句话：“我有缺点错误，欢迎大家批评指正。”

此时，他想起周恩来说的话：“不要站在哪一派的立场上，要站在革委会的立场上做工作。”此时此刻，他知道不能指责任何人，也不要说出什么派来。这么多群众看着他，他必须做出高姿态，不卑不亢，不急不恼，和颜悦色，态度诚恳。

他最担心的是，学习班中“炮轰派”的一些人会沉不住气，说三道四，生出口角来，与对方互相厮打起来。但是，学习班的学员谁也未吱声，“炮轰派”的代表只是以一种蔑视的目光静观事变，表现了极大的克制。之后，宾县的这些中学生终于作罢。

不久之后，黑龙江全省上上下下，陆续开始了揪斗“炮轰派”头头的运动。

1968 年 1 月 6 日，原上海“机联站”二把手、曾经劝说徐景贤造反的郭仁杰跳楼自杀了。

郭仁杰自从因为“红革会”等问题被批判后，又传出他跟黄浦区京剧团的一个女编剧有暧昧关系，因为二人是山东老乡，过去有过交往。又传说他在复旦大学与一个女教师有男女问题，也被传得沸沸扬扬。于是有人又要追查郭仁杰的“流氓罪”。

念及共同造反的经历，徐景贤有心保郭仁杰，他对“机联站”的程绮华说：“你给他在党校找个房间，叫他写检查。不要到外

面去。”

不久，郭仁杰胆结石病发作，疼痛难忍。程绮华想，随便把郭仁杰送到一个医院去，很快会被人家揪走。于是用化名偷偷将郭仁杰送去住院。这件事她没有告诉王承龙，但对徐景贤讲了，原写作班的几个人也知道，对外是保密的。

谁知，原写作班一个人对郭仁杰有意见，他回去告诉了自己在上海工学院工作的妻子，他妻子又告诉了上海工学院“红三司”的头头。一天，“红三司”的人乘一辆卡车，冲到延安西路上的那家医院挨床搜查。郭仁杰见状用床单蒙住了脸，结果还是被人家把床单揭开，发现了他，将他绑走了。

王承龙得到消息，拍着手哈哈大笑，对徐景贤说：“哈哈，原来是有人把他藏起来了。现在有好戏看了！”

徐景贤不知道此时郭仁杰被关在什么地方，就问王承龙：“郭仁杰现在到底在什么地方？人不见了，应该派人找一找。”

王承龙对他神秘地笑笑说：“接受群众的审查嘛！”

一天晚上，徐景贤在市革会康平路大院办公室值班，办公室有人报告说：“上海工学院‘红三司’负责人，送一份绝密件来。一定要市革命委员会领导同志亲收。”

徐景贤接过那份绝密件，原来这是一份《专案审查报告》，是送给分管专案办公室王少庸和王承龙的。里面有郭仁杰和各大专院校“红革会”头头的接触情况，还有下一阶段准备深入追查郭仁杰男女关系问题的打算，署名是“102 专案组”。原来，已

经对郭仁杰设立了专案组。

当时，上海市革会专案有两种案：一种由市里直接抓的，几个市级领导的专案，如陈丕显专案组、曹荻秋专案组，以及上海特别重大的案件；一种是用群众专案的形式，先由各群众组织自己先设专案组，然后到市专案办来挂钩。这个 “102 专案组”应该是属于第二种情况，即由群众自己审查，然后把审查的经过情况以及审查结果向负责专案的王少庸和王承龙汇报。

《文汇报》记者很快摸到了“红三司”审查郭仁杰的情况，并写了《情况》反映，说郭仁杰被关在一个密室里。这份《情况》是用现场记录的形式写的：

问：“你跟黄浦京剧团某某人的男女关系怎么样？交待！”

郭仁杰答：“我已经讲过了，没什么。”“嘭”一拳，郭仁杰被打倒了。

又问：“你除了和这个人的不正当关系以外，还有什么人？交待！”

郭仁杰：“再没有什么人了。”讯问者把郭仁杰打翻到桌子下面去。

问一句，答一句，就打一下，甚至还记录下摔了多少次。

最后是用鞭子抽郭仁杰的屁股，抽了几十鞭，把皮肉都打烂了。

郭仁杰发出阵阵惨叫，也都记录在案。

徐景贤看到材料后，感到很不安，觉得这样打下去岂不要出

人命？而且郭仁杰即使有男女关系的生活问题，也罪不致死吧？何况专案审查的重点不应是生活作风问题。他希望张春桥对此事能表个态，就把打郭仁杰的材料送到张春桥那里，张春桥对《情况》是每期必看的，而且对报社送去的《情况》看得尤其仔细。但是《情况》送上去，没有任何回音。

两天后，徐景贤从上海社科院调来的机要秘书王钢忽然失踪了。王钢是和徐景贤他们一起在市委写作班造反的，跟郭仁杰、朱永嘉等人都很熟，负责徐景贤的机密文件，他看到了报社送来的关于殴打郭仁杰的这份材料。

徐景贤赶紧让办公室工作人员到王钢家去找他的妻子。

王钢的妻子在县里工作，她说：王钢原来在社科院也有过男女关系的问题。他为人非常胆小，看到郭仁杰因为男女关系问题给人揪去打得这么厉害，心里很害怕，对妻子说：

“老郭给人打得这么厉害，怎么办？”

王钢的妻子还说：“失踪前，据说王钢曾打电话找我，因为我在外面开会，没有找到，他就找写作班的陈冀德，告诉她：‘你跟老徐说一下，我有一串钥匙，留在办公室里。还有一辆自行车放在康平路。’”

陈冀德很奇怪，一时反应不过来他为什么要说这样的话。以后，王钢这个人就从人们的视野里消失了。

王承龙说王钢是携带机密文件潜逃，通知上海市公安局下达通缉令，说“上海市某负责同志的机要秘书失踪”，还配发了照

片。

后来海运局查出海的轮船，上船的时候卖出多少张票，再清点下船的乘客人数时，曾经发现人少了，所以怀疑：王钢可能是乘长江轮出海时投海了，但是始终没有找到尸体。

1968 年 1 月 6 日晚，上海市革会领导在康平路小礼堂开会，卢湾区公安分局来电话紧急报告说，关在他们那里的郭仁杰乘红卫兵提审他的机会，对看守他的人说要一杯开水，把红卫兵支出室外，等红卫兵一走出门，他就把门关上，从二楼窗户跳下去，顿时头部着地，脑壳破裂，气绝身亡。

王少庸、徐景贤、王承龙都在电话纪录单上圈阅。王承龙圈阅的时候说："畏罪自杀，通知家属，火葬。把这事情报告春桥同志。"

在此之前，郭仁杰给徐景贤留了一封信，大意说：

你多次劝我对很多事情不要随意表态，我没有听，现在想来，你的意见是对的，可惜已经来不及了……

1 月 5 日上午，陈伯达的秘书王保春在邯郸接到叶群从北京打来的长途电话，要找陈伯达。陈伯达接完电话以后，对王保春说："你安排一下，马上回北京，家里有事，要开会。"

王保春有些纳闷儿，心想："中央开会应该是中央办公厅秘书局通知，怎么由叶群电话通知呢？"

其实，陈伯达在外地兴致正浓，根本就不愿意回北京，但是叶群告诉他："这是主席的意思"，他不得不回。陈伯达匆忙向李

雪峰等人交代了一下，说中央有事，就此分手，直飞北京。

原来，此时中央已经决定戚本禹“请假检讨”，毛泽东说：“戚本禹是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组长不在就处理不好吧!”于是让叶群通知陈伯达速回北京。

戚本禹一直认为他的被抓是与当时连续发生的几次所谓整江青“黑材料”的事件有关。

文革开始的时候，江青有一次在钓鱼台 16 号楼中央文革会议室，跟中央文革小组的人谈她的历史，穆欣坐在江青的后面作了记录。

江青谈了有三、四个小时之久。她说：

“你们总是听到那么多关于我的事情，你们也不清楚，又不好来问我，那我就把我的历史全都跟你们讲了吧，请你们审查。”

她谈了她和唐纳的事情。她说：

“唐纳这个人其实还不错，是个进步人士。但他的缺点是太小器，很软弱，胆又小。不像个革命者。那时他在演艺界的影响是很大的，”她指着戚本禹和姚文元说：“就跟你们现在一样。他要说哪个哪个戏好,那个戏就叫座。他说哪个戏不好,大家就都说那个戏不好。他要捧哪个演员，那个演员就马上走红。所以追求他的人非常多。”

可唐纳就是拼着命地追求蓝苹，即江青。蓝苹是江青在上海当演员时的名字。而且唐纳在与蓝苹恋爱的时候对她真的很好,百依百顺的。

但是江青说："唐纳比起俞启威来那简直是差得太多了。"

俞启威即江青的入党介绍人，也是她的第一任丈夫，解放后天津市第一任市长黄敬。

戚本禹他们也很坦率地问："那你为什么不嫁给俞启威呢？"

江青说："是俞启威的家里反对。他那个家族是非常严格的，娶的都是大户人家，你一个小户人家的女子根本就进不了门。"

她说："俞启威那个时候也软弱。不过那时他才是20多岁的学生，也根本没法和他的家族抗衡的。"

也是因为俞启威不能娶江青，所以她只能考虑嫁给唐纳。

江青接着说：可是,结婚后就不一样了。唐纳限制她这个，限制她那个，不让她和别的人交往,把她看作是自己的附属品了。这样一来，江青就受不了了。

当时，江青正在上海金城大戏院主演易卜生著名话剧《娜拉》，她把娜拉演得非常反叛，改进了易卜生的剧本。可能是受娜拉这部戏的影响太大，她的性格也就是娜拉性格，因此，无法忍受唐纳对她的限制。

不过，江青也说："唐纳这个人还是很单纯的，不复杂。尽管追他的人很多，但他并不乱搞的。但对待家庭，他还完全是封建社会的那一套。"所以江青就提出和唐纳离婚。这件事当时闹得沸沸扬扬。

和唐纳离婚，对江青打击很大。她说那时她觉得前途茫茫，组织关系接不上，也不可能再去找俞启威了。她说她总忘不了蔡

楚生，在那种时候给了她很大的鼓励和帮助。而且他的帮助完全是无私的。还有崔巍，她在青岛的同学，也对她帮助很大，像哥哥一样的保护着她。那时有好多人想趁虚而人，占她便宜。江青说："我一眼就看出他们是动机不良的，所以想方设法地拒绝他们。可这些人达不到目的，就到处去散步流言蜚语，造我的谣。这些人当时就被叫做文痞，就是文化界的流氓。"

江青说她最难忘的还是和俞启威的初恋，俞启威是她的导师，是她人生的引路人。但是自她到了延安,见了毛泽东之后，她就认定，这辈子就跟定这个人了。

听了江青的这番话，戚本禹有了为江青写一个传记的想法。他觉得她的经历完全称得上是中国革命女性的典范。

破"四旧"时，图书馆都不开放了。后来，有人提出要开放图书馆，中央文革文艺组为此打了个报告给戚本禹。戚本禹说："文化革命是搞文化的,连图书馆都不开放不成了笑话了吗？"于是批了这个报告。但规定,凡是内部材料必须凭革委会的介绍信才能查阅。

北京图书馆开放后，有人到里面找旧报纸，看到了关于江青30 年代在上海的内容，反映到戚本禹这里。戚本禹就叫文艺组的人去把这些东西封存起来。

图书馆里有个从空军政治部转业的干部把这事报告给吴法宪，吴法宪又报告给了叶群。一次会议结束后，其他人都走了，叶群叫戚本禹留下来，然后当着他的面把这件事向江青作了汇

报，当时周恩来也在场。

叶群讲完后，戚本禹说："有这事,是我叫文艺组的人去收起来封存的，以免扩散。"

江青很不高兴地说："有什么好扩散的,我有什么事情可以扩散的。"

事后，张春桥对戚本禹说："你应该把事情推给下面，说是文艺组干的，你不知道这个事情。"

戚本禹说："不行，是我同意让文艺组去封材料的。"

张春桥说："你先要保护好你自己，这样你将来还有机会给他们说话。你不这么说，那就玉石俱焚，你和他们都要受到审查。你自己都保不住，那将来还有谁出来给他们说话呢？"

后来，周恩来跟戚本禹说："那你来写个报告,把这批材料烧了。"

于是，由周恩来亲自签字，通知北京图书馆注销登记号，将这批材料交公安部负责拿走烧了。

稍后不久，1967 年 7 月，毛泽东南下期间，上海市革委会派专人把一些在上海找到的关于江青的旧报纸送到北京来交给戚本禹，让他处理。因为他当时正在代理中央办公厅主任。

戚本禹打开材料一看，是解放前国民党报纸攻击毛泽东和江青的内容，说一丈青(指江青)嫁给了宋江(指毛泽东)，成了压寨夫人。

戚本禹觉得这事很难办："交给主席吧，怎么能拿那么点小

事去干扰他？交给总理，那可能错误更大了。也不能交给江青，因为这不符合组织的原则。”上海不把材料直接送给江青，就是因为这样做不符合组织原则。

可上海来的人将材料交给戚本禹后，又将此事向江青作了汇报，说他们把查到的一批诬蔑她的材料交到戚本禹那里了。

几天后，江青来到戚本禹的办公室，问他是怎么回事？戚本禹向她作了汇报，又将此事报告了周恩来。周恩来让谢富治他们拿去烧了。

## 第 947 回：一封信，阎长贵惹怒江青　急召回，杨银禄带病回京

真是事不过三啊。1967 年底的一天，江青的秘书阎长贵收到一封从“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转来的给江青的信。信是北京一个电影制片厂的一位叫江菁的女演员写的，她在解放前就是电影演员，并且参加过军统。文革时受到群众的批斗，于是就写信给江青，要江青救她。

信很长，有十几页，上万字。阎长贵因为要不断地收发文件和接电话，这封信他是分几次陆续看完的。他误会了这封信的内容，以为和江青有关系，又怕处理错了，负不起责任。于是把这封信附上一张条子送给江青。条子上写的是：

“江青同志：这封信有您的名字。”意思是说，此人以及她写的信的内容和江青是不是有什么关系，是不是有人冒称江青，还说她曾经参加过军统。这是敌人的造谣，应该让公安部来处理。然后就把信和条子送给了江青。

这天，江青拿着这封信，怒气冲冲地来到戚本禹的办公室，把信和阎长贵写的条子往他桌上一摔，质问戚本禹：

“到底想搞什么名堂？你前面弄我的黑材料，现在你又和阎长贵合在一起来陷害我！”

戚本禹拿起信迅速的看了一遍。因为他经常处理群众来信，所以很快就了解了信里的内容，明白是怎么回事，忙对江青说：

“她是说自己历史上参加过军统，不是说你参加过军统。她

希望你能看在名字相近,而且又都在旧社会当过演员的份上救救她。”

戚本禹又说：“江青这个名字是你去延安时才取的。你在当演员时还没有江青这个名字，怎么能说是江青参加过军统呢？”

江青此时已经听不进任何解释。

第二天，江青派人把阎长贵叫到会议室，戚本禹和姚文元都在。江青板着面孔，把信往桌子上一摔，厉声责问阎长贵说：

“为什么要把这封信送给我？目的是什么？”

阎长贵一下就吓呆了，不知怎么回事。低头一看，原来是他“请示”江青的那封信，便轻轻而又胆怯地说：“来信人和您是不是有什么关系？”

江青怒气冲冲地说：“无知！无知就要犯错误，就要犯罪。你不知道我到延安就没动动窝？拿郭沫若的《洪波曲》来看看！”

回去后，阎长贵借了郭沫若的《洪波曲》，书上讲到，抗日战争爆发后，上海文艺界的一部分人去了武汉、重庆，一部分人去了延安。但是书上没有江青的名字呀？

江青请阎长贵看了电影：《一仆二主》。

阎长贵还是不明就里，也没有把这件事放在心上，仍然一如既往地工作。但是在随后的一个星期里，江青没有再按铃叫他，也不让他送发文件了。

阎长贵是关锋的学生,又是关锋的秘书，后来调到中央文革小组简报组。是戚本禹将阎长贵推荐给江青做秘书。

这事发生以后，江青就告诉戚本禹暂时不要离开钓鱼台的办公室，听候组织审查。

在此期间,江青也单独请戚本禹看了场电影：《黑桃皇后》，是普希金写的，说一个有野心的青年因为想打探他女主人的秘密，结果被杀死了。看完电影，江青跟戚本禹握了下手，然后拉长着声音说："那么，再见了。"

戚本禹心里明白，江青是以这样的方式在和他告别。

因为江青的文件很多，每天都有几十份，甚至上百份，摞在一起有半尺高，作为她的秘书，阎长贵的日常工作非常繁忙。所以，他曾几次跟江青提出，希望再加一个秘书。一次，江青对他说：

"我看你是挺忙、挺累的，可是主席才用一个秘书，我怎么好用两个秘书呢？"停了一会，她又说："不过，我们都是主席的秘书。你忙点、累点，还是先干着吧!"

阎长贵答应说："一定努力干"，从此不再提这事了。

1967 10 月 4 日下午 13 时左右，汪东兴突然领着中央办公厅主任值班室干部杨银禄来到阎长贵屋里，对刚刚起床，被子还没有叠的阎长贵说：

"这就是杨银禄同志，今天我把他带来了，请你首先把这里的情况和要注意的问题以及需要他做的工作向他好好介绍一下，江青同志起床以后，你把杨银禄同志介绍给她，有什么事，你再打电话告诉我。从今天起，你们就在一起共事了，你要抓紧时间

带他，使他尽快熟悉情况，熟悉工作。”说完，他就跟杨银禄和阎长贵点点头走了。

杨银禄看着眼前这位双眼布满了血丝的阎长贵，眼角还残留着眼屎，一副深度近视眼镜无精打采地挂在鼻梁上，一边打着长长的哈欠，一边用嘶哑的嗓音对他说：

“已经知道你的大名了，欢迎老杨来这里工作。我早就盼你来了，你来了，我很高兴。”

俩人寒暄了一会儿，阎长贵介绍说：“江青同志身体不太好，据说是植物神经紊乱，特别怕声音，还怕见生人，一听到声音，见到生人，就精神紧张，出虚汗，发脾气。咱们在楼里说话、走路、开关门窗等各种动作都要特别轻，千万要注意。你在短时间之内先别见她，尽量躲着她，如果实在躲不开了，你也不能跑，一跑就坏了。她不跟你说话，你别主动跟她说话。今天我不跟你说得太深了，以后你慢慢体会吧。你先在我这里熟悉熟悉情况，和我一起整整文件，等她主动要求见你的时候，我再带你去见她。”

听了阎秘书的情况介绍，杨银禄心情很紧张，一天一夜没敢出阎长贵的办公室。

第二天 10 时左右，在屋里憋了 20 多个小时的杨银禄，小心翼翼地走出办公室，来到走廊，见没有动静，又来到门厅，正在四处观望，只见一位女工作人员轻足慢步地向他走来，小声问道：“你是刚刚来的秘书同志吧？”

杨银禄说："是。"

"请你马上就回你的办公室。"又笑着解释说："江青同志快要起床了，她起床以后，有时看一会儿文件就出来散步，也有时起床以后，就出来散步。她特别怕见生人，如果你现在被她看见就麻烦了。"然后很客气地问杨银禄："你姓杨吧？欢迎你来这里和我们一起工作。"

杨银禄问："你贵姓？"

她说："免贵姓许，叫许春华，做护士工作。"

一个偌大的门厅，一条宽大长长的走廊，一丁点声音也没有，寂静得可怕。杨银禄在这里除见到许春华外，没有见到任何一个人。他悄悄地回到阎长贵的办公室。

江青警卫参谋孙占龙知道杨银禄调到 11 号楼工作，特意过来看他，他们原来都在中央警卫团，久别重逢，杨银禄激动地握住孙占龙的手大声说：

"孙参谋，我有很长时间没有见到你了，不知道你到哪里去了，没有想到会在这里见到你。你现在可好哇？"

孙占龙赶紧捂住杨银禄的嘴，严肃而小声地对他说：

"你说话的声音可要小点呀，千万别这样大声，今天咱们幸亏在屋里，又关着门，如果在走廊和门厅里，说话声音这么大，你可就倒霉了！阎秘书没向你介绍这里需要注意的问题吗？"

接着又满面笑容地解释说："你刚刚来这里工作，有很多情况和问题你不了解，也不理解。一是你还不懂得这里的规矩；二

是你不知道说话、动作大小的利害关系；三是你还不习惯在这里工作和生活。我没有责怪你的意思，只是提个醒，不要紧张，以后注意锻炼，养成习惯就好了。我现在不能在这儿待久了，我得到门厅做准备，江青同志很快就要散步了，以后有时间再聊吧。”

从这天起，杨银禄除了到钓鱼台机关食堂吃饭，整天都关在办公室里看文件，选资料，清理登记，收收发发，很少走出去。就这样一干就是三个多月，始终没有正式与江青见面，天天与江青见面的还是阎长贵。

1968 年 1 月 4 日，杨银禄突然接到“父病危速回”的加急电报，阎长贵知道后，安慰了杨银禄。因为此时江青睡觉还没有起床，阎长贵立即打电话请示汪东兴。汪东兴觉得杨银禄调到江青这里工作时间不长，还没有正式与江青接触，也就批准杨银禄回去料理父亲的丧事。

可能是因为极度悲痛，吃不下饭，睡不好觉的原因，杨银禄回到老家定县后就患上了急性胃肠炎，上吐下泻，发高烧，浑身没有一点力气，无法马上回京。

第四天，中央警卫团政治部干部科的毛尚元干事来到杨银禄家，带来汪东兴的亲笔信。信中说：

“杨银禄同志，你的岗位工作很重要，需要你马上回京，今特派毛尚元同志前去接你。”

此时杨银禄还站不稳，走不动。而且，他的家离定县火车站有 45 里，怎么到去呢？

还是毛干事有办法，他向当地驻军 38 军要了一辆吉普车。当时，定县的群众分两派，形势比较乱。部队领导怕他们不安全，还特地派了一名干部和战士，带着手枪和冲锋枪，将杨银禄他们护送到火车站。

到了北京以后，毛干事直接将杨银禄送到了汪东兴的住地。

由于在火车上折腾了一天，杨银禄两腿发软，心发慌，一进汪东兴的会客室就昏迷过去了。

汪东兴的秘书高成堂赶紧叫来医生。当杨银禄醒来时，看见汪东兴就坐在他旁边。

见杨银禄醒了，汪东兴对他说："你父亲的后事处理完了吧？你父亲刚刚去世，为什么把你叫回来呢？因为你回家前，王力、关锋出了问题，被隔离审查了。江青同志可能怀疑她身边有不可靠的人，才叫你立即回北京。你如果觉得身体好些了就赶快回钓鱼台工作，她急切地等待你回去。"

杨银禄经过医生的治疗，又休息了一会儿，出了一身大汗，感到身上轻松多了，就回到了钓鱼台 11 号楼。阎长贵领他上二楼去见江青，说：

"江青同志，杨银禄同志回来了。"

江青没好气地大声说："他回来了，你还上来干什么?你马上把文件清点给杨银禄同志。"

阎长贵悻悻地离开了江青的办公室，和杨银禄一起下了楼。

下午 14 时左右，江青离开钓鱼台 11 号楼。很快，陈伯达和姚文元来了，找阎长贵和杨银禄谈话。

陈伯达说：“有一项很重要的任务需要阎长贵出一次差，秘书工作暂由杨银禄同志接过来。由于时间紧迫，交接工作越快越好，一分钟也不能耽搁，还要交接清楚，不能出任何差错。”

姚文元问：“伯达同志讲的，你们二位听懂了没有？”

“听懂了，一定按照首长的要求办。”阎长贵和杨银禄二人回答道。

“你们二位的工作交接完了以后，立即报告我们。”陈伯达说。

姚文元说：“伯达同志讲得很清楚，不需要我多解释什么，抓紧交接文件，我们到 16 号楼等着你们。”

说完，陈伯达和姚文元就走了。

阎长贵先带杨银禄到江青的办公室清理文件。然后，他们又回到秘书办公室继续清理登记文件。大概登记到十分之一左右，江青的警卫孙占龙从外边打电话到楼厅值班室，叫杨银禄接电话，说：

“江青同志叫我问一下文件交接完了没有。她叫你们抓紧时间，快一点交接，越快越好。”

杨银禄回话说：“老阎出差办事还回来，交接文件干什么，多麻烦。”

孙占龙说：“咱们不是有一条老规矩嘛，知道的不说，不知道的不问嘛。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交接文件，叫你们交接就交接，叫你们快点就快点就是了，不要说那么多废话。”

又过了半个小时，孙占龙又来电话催促说：“江青叫我再催你们快点交接，她说她等得不耐烦了。”

很快，孙占龙又第三次来电话说：“江青同志说你们别交接了，她说阎长贵不离开 11 号楼她就不回去，今天究竟发生什么事，等一会儿就明白了。”

杨银禄刚刚放下电话，就看见外边进来一位部队干部，直奔秘书办公室，然后和阎长贵一起出去了。这时，杨银禄发现外边还有几名战士，气氛十分紧张。

当晚，陈伯达、汪东兴找阎长贵谈话。陈伯达说：“你是搞文字工作的，还是回办事组工作吧。”

汪东兴说：“不忙。要履行一下手续，这是工作人员离开首长身边时的规矩。”

他让阎长贵收拾一下自己的东西，然后将他送到钓鱼台 20 号楼警卫连连部。在路上，汪东兴很和蔼地对阎长贵说：“你没事，你的档案我都看过，你是我挑来的。”

## 第 948 回：受牵连，记者站领导被抓　山西稳，晋东南仍起硝烟

汪东兴将阎长贵送到警卫连连部所在楼上的一间屋里后，就走了。这时，阎长贵发现有两个警卫战士在看守他。一个在别人眼里可以“通天”的江青秘书，转瞬间变成被警卫战士看管的“要犯”，这变化让他简直无法接受。从一年前。1967 年 1 月 9 日他随戚本禹来到江青的身边工作，屈指数来，与江青为伴的时日不多不少，刚好是一年——365 天!

晚上，江青回到 11 号楼，什么话也没说，上楼吃完饭，打铃叫秘书。杨银禄听到铃声是叫秘书的，就上去了。

“你是杨同志吧？”

“是。”

“来了好几个月了吧？”

“是。”

“工作熟悉了吗？”

“基本熟悉了。”

杨银禄还是按照在部队的习惯，大声回答领导的问题。江青对他说：

“规矩一点！以后说话不能这么大声音。打雷似的，我受不了。你讲话也太快，跟机关枪似的，我听不清楚。你给我注意点！”

“是！”杨银禄挺直身子，大声回答。

“看！怎么还这么大声音。”她看了杨银禄一眼，说：“等我

休息时，你到中南海丰泽园，那儿铁皮柜里有我一档文件，你拿回来，我要用。”

第二天中午吃饭时，杨银禄主动上楼请示江青昨晚交办的事情：“饭后您休息时，我就去取文件？”

谁知江青突然站起，筷子往桌上一摔说：

“取什么文件！我问你，前一段你不在这，干什么去了？”

“我父亲去世了，我回去处理丧事。”

“处理什么丧事！你父亲根本就没死。是有人把你支走了，干坏事！”

杨银禄一下就懵了，心情也很激动，辩解说：“我确实回家办丧事了。是警卫团干事毛尚远把我接回来的，你不信，可以派人问问他。”

“我谁也不问！你父亲根本没死！不信把坟扒开来，看看是不是你父亲！”

听说还要开棺验尸！杨银禄当时眼泪就掉下来了。

江青又捡起桌上的筷子，狠狠地摔到地上，冲杨银禄喊道：“滚！你给我滚！”

杨银禄赶紧从楼上下来，拨通了汪东兴的电话：“汪主任，你赶快来吧！这工作我干不了，也不干了。你把我送来的，还把我接走吧！”

汪东兴很快就来了，听杨银禄将经过说了一遍后，劝道：“批评是动力嘛。你刚来，还不了解她。时间一长就了解了。”

“没这么批评人的。”杨银禄不服气。

“她叫你滚，是让你从楼上下来，没叫你出钓鱼台。”汪东兴劝道。

“她还问是谁支使我走的？我回家，可是你批准同意的。”杨银禄说。

“那天晚上江青同志已经睡了，没跟她说，我就做主了。这好办，我上去解释。”说完，汪东兴就上楼了。

半小时后，汪东兴下来，冲杨银禄挥挥手说：“没事了，好好工作吧。”

1 月 12 日，陈伯达和姚文元来到关押阎长贵的地方。

陈伯达问阎长贵：“干什么呢？”

“看书。”阎长贵说。

陈伯达操着浓重的福建腔严厉地说：“还看什么书啊，要深刻检查自己的问题。”接着慢慢地说：“王、关、戚都是坏人……”

这是阎长贵第一次听到将王力、关锋、戚本禹三个人的姓氏连在一起，并称为“坏人”，姚文元紧接着补上一句：“你就是王、关、戚安插在首长身边的钉子。”

阎长贵脑袋炸了，“这不把我看成特务了吗?”

夜晚，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副组长矫玉山接到周恩来秘书的电话，通知戚本禹去怀仁堂开会。

矫玉山将总理秘书的电话通知告诉戚本禹，戚本禹预感到自己要被审查了。头天晚上，他已经把自己的办公室里的文件都整

理好了，然后让汽车带着他到天安门广场去慢慢地转一圈，他还特地在人民英雄纪念碑下车看了一下，作个告别。

此时，矫玉山随戚本禹上了汽车，戚本禹叫他不要去了，矫玉山还是要跟着他一起去了中南海。

汽车进到中南海，戚本禹下车后和矫玉山握了握手，说："再见啊，以后有机会再见。"矫玉山听了莫名其妙。

戚本禹走进怀仁堂，但是送他的汽车司机和矫玉山也都被留在了中南海，没有让回去，说是怕他们走漏消息。

周恩来的卫士将戚本禹领到怀仁堂一个小会议室，里面坐着陈伯达、杨成武、汪东兴、姚文元。陈伯达对戚本禹说：

"你有问题，现在要对你进行审查。"

汪东兴向他宣布，经中共中央批准，戚本禹"请假检讨"。

戚本禹对姚文元说："你给江青同志说一下，我没有搞过她黑材料。"

陈伯达对戚本禹说："你要好好地交代你的反革命罪行。"

戚本禹回答说："我没有什么反革命罪行，我是紧跟毛主席革命路线的。"

这时，几个战士过来，撕下了戚本禹的领章、帽徽，给他带上了手铐。

汪东兴将戚本禹带回钓鱼台的一个没人住的独立别墅里，双手被整天整夜的反铐着，有战士看守。

当天，中央文革办事组副组长矫玉山也被限制自由。中央文

革工作人员们推测，矫玉山几个人被抓可能跟看江青上世纪 30 年代的照片有关系。

那是 1967 年 7、8 月的一天，香港画报社寄给中央文革一包画报，矫玉山几个人打开一看，都是江青 30 年代当明星时候的照片，有穿旗袍的，还有跟唐纳的照片、画报。他们意识到这是“防扩散材料”，又包上了。

其实这事不说也可能就过去了，可是组织观念极强的矫玉山向戚本禹报告了，戚本禹说：“你们还是向姚文元报告吧。”

矫玉山向姚文元作了报告，姚文元说：“你们把来龙去脉写一下，怎么回事，当时有谁看了，你们都写上。”

矫玉山写完之后，姚文元就把报告送给了江青。

1 月 23 日晚上，陈伯达、谢富治、杨成武、姚文元一起找阎长贵谈话。姚文元对阎长贵说：

“你看今天谁来了?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兼公安部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代总参谋长。”

阎长贵只觉得脑袋涨得很大，嗡嗡作响……

谢富治说：“江青同志对你不错嘛，你应该有什么问题就交代什么问题。”

阎长贵连忙点头，说：“是啊，我有什么就谈什么。”

接着，陈伯达又让阎长贵按着陈伯达的口授给阎长贵的爱人写了一封信。

第二天，1 月 24 日深夜，阎长贵由两名武装战士押着，乘

一辆吉普车驶离了钓鱼台，来到秦城监狱。

中央文革小组派驻各地的记者，大多数已在 1967 年底被召回北京参加集训。集训期间，陈伯达两次来记者站发表讲话，要求记者揭发批判王力、关锋。

1968 年 1 月的一天晚上，陈伯达又来到中央文革记者站，召集记者站在京的全体人员。但是他只讲了几句话，就让大家马上去钓鱼台江青住地，听江青讲话。原来他是特地跑来下通知的。这类事务性的小事，本是由工作人员用电话说说就完事的，这次却由他这个中央政治局常委亲自来做，而且事先没打任何招呼，大家感到很不寻常。

大家来到钓鱼台江青住楼的会议室时，看到陈伯达和江青已等在那里。过去几次集训接见，都是周恩来主讲，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陪同。这次与过去的接见不同，中央文革碰头会的其他成员都没到场，只有陈伯达、江青二人。开始陈伯达讲了几句开场白，随后江青主讲。

江青首先大讲中央文革小组的功绩，说“是中央文革小组识破、并端出了王力、关锋、戚本禹这些坏人。”

江青还说：“王、关、戚背后整了我的黑材料”。她讲起自己在三十年代的历史，接着说“中央文革办事组、记者站和办信组架空了中央”，“成了王、关、戚的黑手”。她要求这些单位要暂停工作，集中揭批王、关、戚，整顿内部。办事组是中央文革的办事机构，相当于办公室；办信组是中央的群众来信接转机构；

记者站是中央的文革动态调查机构。这些机构组成人员都是选调来的，绝大多数是现役军人。

江青讲完话，陈伯达又赞扬了她几句，说江青“讲话是马克思主义的”。之后，记者站领导班子成员就全部被关进地下室，接受隔离受审。与此前后，办事组和办信组的很多人，也被不明不白地关了起来。

在陈伯达的授意下，经选举，记者站在记者中选出 9 人，组成了新的领导机构——服务组。选举后的第二天，陈伯达来记者站，当众宣布批准服务组的组成，让服务组领导记者站的各项工作。从此，记者站开始了揭批王力、关锋、戚本禹。

在外地各点坚持工作的记者，于 1968 年 2、3 月间，全部奉命陆续调回北京，进行自我检查，批判已关入地下室的记者站领导。

记者站服务组负责审查站里原负责人，还派人参与审查了中央文革办事组的五个人。记者们写出了一批揭批王力、关锋、戚本禹的文章，有的还贴在了办公室墙上的专栏里。

原记者站负责人的办公室被查封了，他们的笔记、批文、讲话记录、来电来信记录都被查阅审查，最后证实他们与王、关、戚只是工作关系，没有其他的活动；下边记者报来的情况，重要的已全部呈报给中央领导，并无从中截留，也不存在当王、关、戚“黑手”、架空中央的问题。尽管如此，这几个负责人还是被定了“犯了严重政治错误”的结论，在被关押一年多后，带着记

者站服务组草拟的，经中央文革批准的审查结论，回到了原单位。

记者站原领导班子的第一把手、战争年代是随军转战的战地记者、解放后任新华社驻某大军区记者组组长徐学增，带着审查结论回到军区后，立即被撤销原职，被派到县武装部任副政委，可一直接受审查。在清查“516”分子运动中再次被关进监狱。后因没有证据，摘了“516”分子帽子，但被说成“问题严重，态度不好”，受到党内留党察看两年的处分。在粉碎“四人帮”以后，经个人申诉，组织复议，加上新华社总社的交涉，处分被撤销。后又经新华社军事部的协调，把他调回北京，职务调为副师职，安排到北京军事机关的干休所，离职休养。

记者站在 1969 年初解散。调到中央文革记者站工作的干部，回到各单位后，都不同程度的受到审查。受迫害被冤屈的记者，纷纷不断申诉，甚至向中央写信，一致要求落实政策，还自己清白。

据此，中央办公厅于 1972 年 11 月 29 日发出了 43 号文件，专门就记者站的工作和审查记者一事，发出通知，对审查记者做出政策性规定。但是，一些单位，并没有严格认真执行。一些记者的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所以，中央办公厅于 1974 年 7 月 1 日又专门发出了 12 号文件，重申了第一个文件的基本精神，督促落实上个文件。

我们再来看看全国最早夺权的山西此时的情况。

1968 年元月 3 日，由毛泽东签发，中央军委命令，确定山

西“支左”工作由69军党委统一领导。69军为此成立支左委员会，军长谢振华任主任，政委曹中南任第一副主任，山西省军区第二政委张日清任第二副主任。

同时，山西省革委会增补谢振华为省革委会核心小组第一副组长。

谢振华主持山西党的核心小组，迅速拿出了稳定山西的 15 条具体措施。其主要内容是：

抽调全省三大群众组织的头头500人，和他们的组织脱钩，到北京办学习班；

立即在全省收缴各派的枪支弹药；

在全省支左委员会统一安排下，抽调军队干部 5000 人到全省各地参加军管，首先对公、检、法、报社、电台军管，不准再内外串联；

成立太原市警备司令部，由太原市警备司令曹西康兼太原市党的核心小组组长，李学敏任副组长兼太原市革命委员会主任，稳定省城形势；

各地群众组织的负责人，不能进入各地党的核心小组和革命委员会当领导和工作人员。

1968 年 1 月，山西省会太原市，冰冻的十中校园附近的解放路大街上，出现了十余辆飘着“决死纵队”旗帜的汽车。一些佩带袖标的“决死队”工人手持铁锹，在清除路面上堆积已久的垃圾。一天后，附近街墙上出现了一些大字报，说“老决”到底

是改恶从善了，还是哗众取宠，人们还要看一看。

1 月上旬，在太原召开晋东南地区核心小组会议，制定了《关于处理晋东南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问题的八点意见》，简称《八点意见》。

但是，晋东南核心小组成员如何安全回到长治？这是贯彻《八点意见》首先面临的问题。因为当时晋东南地区武斗情况非常严重，担心他们在回去时，受到晋东南“红字号”的袭击。于是，决定由 69 军和省军区独立师各派一个连，护送晋东南核心小组成员返回长治。

1 月 16 日早晨，在 69 军和省军区独立师护送下，李顺达等一行百余人，分别乘大小 11 辆汽车向长治进发，行至长治运输公司门口时，果然遭到“红字号”武斗队员的截击。

“红字号”对空鸣枪，往车前投掷手榴弹和炸药包，一时间枪声大作，弹片如雨。除先头 6 辆车冲出堵截开走外，其余车辆全部被围困，车上人员悉数被抓，有核心小组成员李顺达、贾茂亭、常三毛、李世源，军分区参谋长金鹏、宣传科长肖察，4546 部队团长岳中秦，长治市武装部政委赵成旺，沁县武装科长和平顺、潞城、壶关等县核心小组成员，以及革命委员会负责人，还有赴省开会的学毛著积极分子 53 人和一部分工作人员、部队家属，共计 105 人。护送他们的解放军的武器被抢，共抢走机枪 1 挺，冲锋枪 3 支，步枪 7 支，手枪 10 支，各种子弹千余发，收讯机 1 部，试测机 1 部，军车、客车共计 5 辆。

“红字号”把所有被抓人员押进长治运输公司小学。当夜，又将地区核心小组成员李顺达、常三毛、李世源等人押到淮海机械厂。次日，“红字号”把他们认为重要的人押到市运输公司和淮海机械厂，其余人员释放。

事发后，为了营救李顺达，晋东南“红总司”、“总司”两个“联字号”组织联合成立了“晋东南地区捍卫红色政权联合总指挥部”，简称“联总”准备施救。具体的行动已是20天以后的事情了。

## 第 949 回：周恩来，康生见镇江代表　审杨帆，听汇报江青满意

1月17日晚约21时至23时40分，中央首长在北京京西宾馆第二会议室接见驻江苏部队和镇江市代表。

周恩来、康生、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进入会议室时，全场起立，热烈鼓掌欢迎，高呼“毛主席万岁！万万岁！”“向周总理学习！向周总理致敬！”

周恩来向大家招手致意，高呼：“向同志们学习！向同志们致敬！”

周恩来入座后说：“镇江的同志来了，‘三代会’的同志来了，这么难请啊？镇江的周洋同志？”

周洋起立回答：“到。”

周恩来：“你是‘工代会’的，刚工作几年，你很年轻啊，请坐下。王志友同志？”

王志友起立回答：“到，‘工代会’的。”

周恩来：“邓宝森同志？”

邓宝森起立回答：“到，‘联委会’的。”

……

周恩来问了镇江市两派所有代表的简历和情况，当问到“戴忠豪同志？”时，戴忠豪起立回答：“到，我是‘联委会’的。我们接到赴京通知后，就立即来了，难请的是‘三代会’。”

周洋举手要求发言，周恩来同意。

周洋说："自从去年下半年起，镇江形势很好，许多基层单位经军管会批准已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在搞抓革命、促生产。近来，由于'联委会'封江断航，粮食、煤炭等重要物资运输受阻，大好形势受到了影响。不久前，'联委会'又把后字 252 部队政委蒋福华和江苏省镇江船厂工人杨锡福抓去关在焦山，现生死不明，从而制造了紧张气氛。'三代会'在接到要镇江派代表赴京的通知后，就立即选出了赴京代表，并在去年12月下旬，两次向您书面汇报镇江情况，要求责令'联委会'立即放人和停止封江断航。在这两项未落实之前，广大群众不同意我们代表赴京。"

周恩来说："请许司令员、杜政委查一查抓人的情况。"

周洋接着说："在1月8号，我们接到总理派飞机到南京接代表的通知后，就决定立即到北京来。10号清晨，'三代会'代表和省军区部分代表同乘一车，打算直达南京军用机场。当欢送赴京代表的车队途经石头岗时，发现宁镇公路上有石块堆起的路障，于是我们有人下车了解情况，万想不到遭到了27军81师部分指战员的伏击，他们埋伏在公路两旁的山坡下，用机关枪向我们扫射，当场打死后字252部队战士邹思移、工农大学司机孙正平、轻化技校学生殷红，另有侯志伟等多名革命群众中弹负伤；此时，81师广播喊话，要江苏省军区刘超主任和方晓参谋长下车，刘、方刚下车，就被81师冲过来的战士围打和绑架，两位首长都被打伤。"

周恩来说："今天两人都来了？伤了？"

他示意刘超、方晓站起来看一看。刘超、方晓起立，刘超说：

“报告总理，我是镇江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刘超。”他张开嘴，将门牙被打掉的情况指给周恩来看。

方晓参谋长说：“报告总理，我是镇江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副主任方晓。”他也将被打的鼻子和眼睛的情况给大家看。

周恩来说：“请坐下。”

这时，“工代会”的王志友举手要求发言，周恩来同意。

王志友说：“1月10号清晨，我们多人在石头岗公路上被打死打伤倒在血泊当中，81师的人不准抢救，不准任何人离开现场，直到晚上9点多钟，接到总理指示后，81师的人才准许我们返回镇江。我们回镇匆忙安排了伤亡人员的后事，就抓紧时间赶到北京来了。”

周恩来说：“‘三代会’还是听中央话的，你们能赶到北京来，就是好同志。大家都要好好学习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最高指示，要遵照毛主席教导，多讲自己的缺点，少讲别人的缺点，求大同，存小异，消除派性，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来加强团结，搞好革命大联合，实现革命的三结合。有问题可以提出来，也可以提出一些意见。中央很重视江苏的问题，镇江也不能例外，不然就不请你们来了。下面先请康老讲话。”

周恩来因有事离开了接见镇江市代表的会场。接着康生问了两派组织情况和江苏省军区，镇江军分区，市人武部和81师到会人员的简历和情况，然后说：“部队里面也有两派，军分区内有

个‘151’和‘115’。今天主要是先和同志们认识一下。同志们来京几天了，都在学习吗？”

李作鹏回答：“先学习三天，今天是第四天了。”

康生说:“先谈一下情况。杜平同志，你们看会议怎么开法？”

杜平答：“请康老作指示。”

康生说：“我们下面还有事情，还要接见福建的同志。你们学了哪些文件？”

梁辑卿作了回答。

康生问：“陈茂辉，你们那里武斗还有没有？打够了没有？”

陈茂辉答：“这个详细情况，我不清楚，听梁辑卿政委说，近来江苏没有什么武斗。”

周洋插话说：“镇江从未发生过两派武斗。”

戴忠豪插话说：“镇江发生过‘7. 25’武斗事件。”

周洋说：“那是去年7月25日，‘联委会’绑架‘三代会’的赵玉宝，关押在康复医院楼上，军管会多次要求放人，都被拒绝，后来由镇江卫戍区的解放军同志登楼营救，这不能称为两派武斗。”

康生说：“要文斗，不要搞武斗嘛。”

邓宝森说：“‘三代会’手上有大量武器，‘联委会’的安全没保障，军管会不承认‘联委会’，连办公地点和办公经费也没有，我们只能在船上，而‘三代会’就在旧市委大院里头办公。”

“红代会”沈万庆插话说：“镇江形势是很好的，军民团结

如一人，军内有不同意见的只是极少数，地、市委常委和绝大多数干部都已站到了毛主席革命路线上，‘三代会’大方向是正确的，如果不是‘联委会’拒绝大联合，形势一定会更好。”

“联委会”邓宝森接着说：“镇江情况并不是这样，军管会严重支一派、压一派，一碗水没端平。”

“联委会”戴忠豪插话说：“镇江情况很复杂，从上到下都有黑手，走资派、叛徒、特务，现在无人批斗，而且大部分都被‘三代会’单方面解放，基层的走资派、叛徒、特务大都被‘三代会’结合进派革会或已加入‘三代会’掌权，‘三代会”、’的大方向肯定有问题。此外，苏、锡、常有一派称镇江是红色根据地，抢军队的武器在镇江搞训练，攻打常州，攻打无锡，策划武斗。”

周洋插话说：“你说的走资派、叛徒、特务，有什么证据？我们说已解放的和准备解放的地、市委干部或基层干部，都是革命干部，这是有根据的，而且是经军管会研究同意解放的。你说谁是黑手？谁是叛徒、特务？应当拿出证据来报给军管会。‘三代会’是遵照中央精神按系统进行的大联合，军管会在‘三代会’中留有补充席位，这就是一碗水端平，问题是你不肯参加，军管会总不能支持你另立山头吧？”

王志友说：“去年苏南革命造反派被打出苏、锡、常，部分人员跑到镇江来，‘三代会’总不能看到阶级兄弟无家可归而不闻不问。”

戴忠豪说：“‘三代会’大造舆论打倒许世友，大搞反许乱军，有证据说明镇江军内外有条黑线一直通到刘、邓黑司令部。”

周洋说：“解放军是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指示，在镇江开展军管工作，‘三月黑风’时犯过错误，后来已经改正，坚决支持革命造反派。‘联委会’少数人不抓革命促生产，一度聚集在军管会门口‘摆摊子’，影响军管会正常工作，大喊口号踢开军管会闹革命，大造舆论打倒赵、陈、刘、方，把矛头指向解放军，还有部队中少数没有参加军管而又不应当开展‘四大’的指战员，也参与其中，这算不算反军乱军？我们认为这才是大方向错误。”

沈万庆说：“这是对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态度问题，是对解放军的态度问题，军管会在镇江的成绩不容抹煞。”

戴忠豪说：“究竟谁是反军？谁是黑线？谁是真正的革命造反派?要凭事实讲话，有关详细材料，我们已经整理好上报给中央。”

康生说：“关于镇江问题，由李作鹏等同志同南京军区的同志共同来帮助解决。镇江还存在着很多问题，我们很坦率地讲，你们那个地方两大派由于派性发展，社会上的派性影响到部队。部队意见不一致，军队的派性也影响到地方。因此，中央很关心江苏省的问题，镇江是江苏省的一个重要城市咯，所以找同志们到中央来谈一谈问题。”“过去的事情可以有一个标准，主要的还是向前看。今天晚上由于时间不多，主要是见一见面。我首先

向同志们提出一个问题，无论省军区的同志也好，军分区的同志也好，人武部的同志也好，以及‘三代会’和‘联委会’的同志也好，你们到北京来是干什么的？这么一个问题，我不知道同志们是怎么想的？我们常常遇到这个问题，也常常和同志们讲这个问题。为什么呢？因为很多情况说明，各地同志到北京来，并没有仔细考虑是来干什么？我们接触过这么一些人，他们来北京干什么呢？说是来北京谈判的。来北京谈判这个话对不对？这是不对的。谈判是指在两个党、或是两个国家之间进行，我们共产党同国民党谈判过，也同赫鲁晓夫集团谈判过。现在我们不是这种关系嘛，不是来谈判的嘛，这是第一条。”

他接着说：“第二条，同志们来干什么呢？来告状的吗？你们有的同志是不是来告状的？”“具体的讲是准备来打官司的。打官司有输有赢，谁也不愿意输，所以就整很多材料。”

是不是来北京告状呢？康生说：“我们认为也不是。那么，到这里来干什么呢？”

康生的回答是：第一是学习，第二是斗私批修，打倒派性。“在上面这两个前提下，然后你们才是反映情况。没有前两点，从派性出发，对解决问题没有帮助。”

他说：“许多地方纷纷成立了革命委员会，不要老是跟不上形势咯！主席在指示上说形势大好，‘再有几个月的时间，整个形势将会变得更好’，就是这样咯！比如，今天晚上，我皮包里有甘肃的材料，甘肃马上要成立革命委员会了，甚至他们连到北

京来汇报都不需要了。另外一个是河南筹委会小组昨天说要来汇报，因为我们时间倒不过来，天天开会，没有机会谈，前天他们就要来汇报，准备春节前成立革命委员会。形势发展不仅是这样，你们听到说了吗？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现在准备要召开第九次党代表大会了，各地都在整顿建立党的组织了，是发展到这样一个时候了。反转来讲，你们江苏省文化大革命开始是比较早的，首先是南京，匡亚明就是在前年6月揪出来的嘛！你们那里很早，但是现在你们江苏什么时候才成立革命委员会呀？”

有的代表答：“我们争取在春节前联合起来。”

康生：“联合起来，那革命委员会还不行嘛！上海要搞一周年纪念了啊！因此，同志们要赶快的赶上去，以前的问题应该向前看，再不要以前的派性，不前进者是进步很慢，那就落后于形势了。”

“希望你们能够在北京对江苏特别是对镇江革命大联合有所促进，并得出具体结果来，像各省一样，最好能够统一思想，达成一个大联合的协议。”

他最后说：“大家一致努力，把镇江，江苏问题来解决，促进大联合，使江苏省和镇江市革命委员会很快成立起来，我们是有这个信心的，但这要靠你们努力了。”

1967年11月上旬的一天晚上，杨成武召集中央专案“二办”各专案组负责人在京西宾馆开会。散会时，他交给饶漱石专案组组长陈虹一张纸条，上写：

“江青叫你们去提审扬帆，搞清他1939年向中央发电报的事。”

杨成武对陈虹说:“你们审后,把口供记录带回来给我看看。”

但是,陈虹不知道扬帆1939年向中央发电报是怎么回事？也不清楚这次提审是要弄清什么问题？便向杨成武请示。杨成武说：

“我也不知道，是江青给了这个任务，我负责办理就是了。”

第二天，陈虹和副组长王育民、组员王成恩去秦城监狱提审扬帆，由陈虹和王育民问话，王成恩记录。

陈虹对杨帆说：“扬帆，你把向中央发电报的事交代一下。”

扬帆长期做情报联络工作，上海解放后，任市公安局常务副局长，对于审讯有丰富的经验。他定了定神，回答说：

“我根本没有向中央发过电报，也根本没有条件自己发电报。不知你们问的是哪一年的事。”

王育民说:“不管哪一年,凡是发电报的事,你都可以交代。”

王育民故意把问话范围拉大些,因为他们对这件事的经过并不清楚，心里没有底。

扬帆说：“如果你们问的是1939年的事，我1954年被关押起来后，公安部部长罗瑞卿就来问过了。”

陈虹他们就要扬帆把1939年的事交代清楚。扬帆说：

“1939年我到皖南新四军军部文化队任指导员,有一天在路上遇到东南局书记、新四军政治委员项英。他跳下马来边走边问

我江青在上海的历史情况。因为我来皖南前在上海电影评论协会任书记。唐纳在我们影协办的杂志任编辑，写电影评论文章。我把自己知道的情况，如实地向项英做了回答。”

扬帆还说：“如果有电报的话，那一定是项英用我的名字发的。因我本人根本不具备直接向中央发电报的条件。”

扬帆还承认，他对项英讲的那些话，是提供了攻击“中央负责同志”的“炮弹”，当了“弹药手”。扬帆非常细心，交代问题时没有提江青的名字，记录也是按他讲的，写着“中央负责同志”。这份审讯记录抄清经扬帆看后，他签了自己的名字，并加盖了指印。

专案组将审讯记录报送杨成武，他看后批给吴法宪，转送江青。

江青看到扬帆的文字交代后，于1968年1月19日晚上，在怀仁堂西休息室听取饶漱石专案组汇报工作时说：“你们送来扬帆的口供记录，我看后很高兴，几十年没有解决的问题解决了。他过去向中央发过两次电报，都是署名殷扬，反对我和毛主席结婚。”

江青还要饶漱石专案组查一个“黑大汉”的下落。专案组在上海市公安局50年代镇压反革命运动的材料中找到了，于20日写报告送江青。报告的原文是：

关于黑大汉的情况，已查明。黑原名赵耀珊，又名赵立人、赵立容、老韩，安徽人，1933 年春任江苏省委书记，同年 6 月

20 日被捕，当即叛变当了特务。解放后被我政府逮捕，1954 年 3 月被处决。档案存上海市公安局和苏北劳改农场。

与黑同时被捕的有省委交通叶蓁，又名（李文碧，无锡阿妹）叛变后与赵同居，现住上海欧阳路 131 号。

饶漱石专案组

1968 年 1 月 20 号

原来，这个“黑大汉”就是 30 年代江青被捕后的审判者。

## 第 950 回：一平浪，军代表中弹身亡　一一六，云南下关大武斗

1968 年 1 月，云南又发生了“下关事件”。

事情的起因要从云南的工役制工人说起：

1964 年 8 月，美国军舰入侵越南北部湾后，遭到越南鱼雷艇的攻击，便出动大批飞机，连续轰炸越南的义安、鸿基、清化等地区，制造了震惊世界的“北部湾事件”。为了援助越南抗美，中共云南省委向国务院建议，在云南境内修建国防公路，从山东、河南省征调一部分人，组成义务工役制工程部队，担负国防公路的修筑任务，这一提议得到了国务院的同意。云南同山东、河南就此签订了合同，其中规定：工役制工人完成任务后仍回山东、河南。山东、河南二省共征调了 17000 人，组成了 5 个团。其中，山东组成了第七、第八两个团。当这批小伙子开到云南后，云南省委设想在完成任务后留下这批工人。经征求山东、河南两个省同意：完成任务后，按“愿走者欢送，愿留者欢迎”的方针办理。当时，云南省委分工赵健民负责援越工作，所以工役制工程部队归赵健民领导。当赵健民同省长周兴、副省长史怀璧向工役制工人宣布这一决定时，各团工人都表示拥护。

这批工役制工人到 1967 年服役期满，工程也全部竣工。此时，云南两派武斗加剧，这批工役制工人不可能置身事外，自然也卷入其中，他们持“炮派”观点。于是，云南省军管会致电国务院：“工役制工人留下问题很多，还是按合同规定，由哪里来

回哪里去。”国务院批示同意。

这一改变，引起了愿意留在云南的工役制工人强烈反对。1967年8月29日，部分工人找到赵健民，对此提出质问。赵健民向昆明军区副司令员、云南省军管会副主任陈康讲述了工役制工人的情况，陈康明确表示同意“愿走者欢送，愿留者欢迎”的方针。

1967年9月29日，国务院发出《关于工役制工人退役问题的请示报告（摘要）和国务院批示》，要求：“工人服役期满后，不得强求继续留用，应返回原调出地区域单位……”

10 月，赵健民化名来到北京，准备向中央汇报云南的工作情况。他首先专门为工役制工人一事向交通部反映了情况。交通部确定派人前去昆明征求工人意见，然后再报国务院。同时，赵健民向国务院写了专题报告。

工役制部队的 5 个团在等待处理决定时作好了退役的准备。其中，工役制部队第八团，简称“工八团”，在昆明约有 500 人，住在昆明西山云南省委党校等待退役。在大理的下关市有 600 多人，分别住在下关苍山饭店和州委党校待命退役。

1968 年 1 月 3 日，驻云南禄丰县一平浪的省煤管局副总军事代表郭顺兴被找他纠缠的群众开枪走火打死，据说是“炮派”所为。

1 月 5 日，下关市“八派”的“420”组织在攻打“工八团”居住的苍山饭店时，打死了住在里面的数名“工八团”的工人，

其中有人据说是被绑上手榴弹炸死，其状甚惨，激怒了支边工人。住在昆明云南省委党校的“工八团”负责人李国贞与工役制部队其余几个团的负责人商量后，决定立即派人把留在下关的“工八团”600 余人全部接回昆明。1 月 10 日，李国贞亲自带领 77 人前往下关。他在出发前的动员大会上说：“要把在下关被围困的人救出来。决不能丢在云南一个人。”

1月6日，正在北京的昆明军区副司令员陈康得到“炮派”在一平浪打死军代表的消息后，立即让秘书向周恩来报告，并提出自己的处理意见：

“一、查实情况；二、如情况属实，责令一平浪炮团交出杀人凶手，如果不交，即强行逮捕凶手。妥否，请总理指示。”

周恩来接到报告后，当天即由总理办公室赵秘书电话转达周恩来的批示：“一平浪的问题我们报告了总理，总理同意陈康同志的意见，立即追查，限期交出凶手。一九六八年元月六日”

1 月 7 日，在京开会的昆明军区、云南军区领导给昆明军区发去电报、电话，敦促云南两派谈判。电报说：

我们在京开会的同志，欢迎和支持云南两大派进行谈判。根据报来的情况，我们提出两个问题请你们很好考虑：

一、谈判的双方都是一个阶级兄弟，是在解决人民内部问题。如果有人一面进行谈判，一面继续准备武斗，即所谓两手准备，是完全错误的，是拿对付国民党的办法，来对待自己的阶级兄弟。

二、所有在武斗中被打死打伤的人，绝大多数是我们的阶级

兄弟，不是真正的走资派，也不是地、富、反、坏、右，这只能使亲者痛，仇者快。

一九六八年一月七日

1 月 8 日，中央决定在北京举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云南班”，解决云南问题。通知两派代表(包括各派支持的干部)、军队支左人员共 800 多人参加。学习班的主要任务是制止武斗，停火交枪，恢复全省正常秩序，促进两派大联合，酝酿成立省、市革命委员会。与此同时，昆明军区在北京举办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昆明班”，有 3000 多名团以上军队干部参加。

1 月 11 日，昆明军区在京开会的领导电话通知昆明军区留守领导和军区三大机关党委，要求动员正在军区大院的军队开展“四大”单位的所有人员，一律撤出、返回本单位；军区三大机关和省军管会应迅速恢复正常秩序，军区机关的文化大革命要坚决按照中央《11·14 通知》执行；军区三大机关和省军管会的各级领导干部要积极出来做工作，服从领导听指挥，不能有无政府主义，对党委和领导干部有意见，应按照中央 11 月 14 日的通知办；军区警卫部队应严格执行职责，不准外部人员随便出入军区大院和办公大楼。

1月12日，昆明军区在京开会的领导对发生在东川、一平浪等地的武斗事件电话指示：“东川、一平浪、文山、大理、曲靖及其他地方的武斗必须制止。”“云南省和昆明市不准有攻击贵州省革命委员会主任李再含的大字报。”“禄丰杀害团副政委郭

顺兴的凶手和指挥杀人的头头必须限期交出。”“外省的人（不论四川、贵州、湖北等），一律不准参预云南省两大派的问题，如有，应一律回原地去，参加本地区文化革命。云南各专、州、县的人员不要到昆明去串联，昆明地区的人员也不要下去串联。”

1 月 13 日，昆明赴下关的“工八团”李国贞数十人，经富民、武定、元谋、永仁、大姚、姚安、南华到达下关。下关的“工八团”人员向李国贞汇报了 1 月 5 日苍山饭店武斗的经过。这时的下关，两派武斗的气氛已十分紧张。“八派”已建立了统一的武斗指挥机构——“八•二三滇西联络站”；“炮派”也组织了“毛泽东主义云南无产阶级革命派滇西指挥部”，两派都在积极准备更大规模的武斗。

14 日 5 时 30 分，在京开会的昆明军区领导电话指示昆明：

昆明两大派谈判，如果能够迅速按照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最新指示，达成好的停止武斗的协议，我们愿意派飞机将双方谈判的代表接来北京签字。

来京人员名额如下：

一、参加谈判的14人全部来。

二、文山、曲靖、东川、保山、昭通、红河、楚雄、一平浪、以礼河等地各来2人（一、二把手），下关两派各来三人（一、二、三把手），玉溪两派各来1人（一把手）。共44人。

三、两派的总头（核心常委一、二、三、四把手必须来）各来10人，共20人。

总共来78人。

除谈判代表外，请朱刚同志带队。

不久，中央派了一架伊尔-18 大型客机去接云南两派头头进京。“八派”一召集就跟着走了，“炮派”死活不走。只有一架飞机，在昆明等了一天，他们不上飞机，又不可能分头走。在这种情况下，刘懋功打电话给空军“昆指”副主任朱刚，要他代表刘懋功出面做两派头头的工作。最后，“炮派”同意由朱刚带着一起走。朱刚担心他们在机舱里打起来，为保证他们的安全，规定在飞机里不能争论。为防万一，又与机组人员商量了预防措施。其中有一条是，两派如果打起来而又制止不住时，飞行员就摇动驾驶杆，晃动飞机，让他们晕机碰脑袋，打不成架。就这样，双方相安无事地坐飞机到了北京。

当天下午 18 时，昆明两派达成停火协议。但是下关的武斗步伐并没有停止。

15 日，到达下关的“工八团”与“炮派”组织——“大联合”，经过周密策划，完成了对“420”大举进攻的全部准备。他们封锁了各个交通要道，布置了炮兵阵地，组建了以“工八团”为骨干，“大联合”精干武装人员配合，配备了冲锋枪、半自动步枪的战斗队，组织了后勤队伍、担架队、医疗队，安排了关押“俘虏”的临时监狱，并在下关总站召开了誓师大会，定于 16 日清晨向“420”发动全面进攻。

这天下午，位于州委党校山头的“炮派”组织——“大联合”

的大炮，开始向下关“八派”组织——“420”所在的关迤开炮。但是第一个被炸死的人，竟是一位“炮派”观点的昆明工学院学生刘秉厚。他的哥哥刘秉忠赶来相救，也被子弹击中腹部，血流满地，生命垂危。

1 月 16 日清晨，武斗正式打响。经过充分准备的“工八团”和“大联合”武装队伍，将“420”打得溃不成军。

这时，“420”头头又作了一个极其愚蠢的错误决定，将武斗前抓到的“大联合”头目萧槐枪杀后，抛尸荒野。

萧槐在“大联合”中有极高的威望，他的死，激起了“大联合”不少群众的愤怒。再加上“炮派”说，萧槐是被“420”抽干鲜血后残忍杀害的，更使一些人怒不可遏。于是，一场以复仇为目的的武斗，便演变成了一场大灾难，大屠杀。

当下关的老百姓在睡梦中被枪炮声惊醒，只见从关迤通往大理的小路上，有无数拖家带口，携带简单行装的人在枪炮声中拼命地奔逃。

在关迤豆糠坡不到 100 米的街道上，横七竖八地躺满了数十具“420”的尸体。下关中学学生余世兴，在文庙被抓，被当场枪杀。另一学生张建新，被子弹击中腰部，送往临时医院后死亡。

电影公司的两个女职工逃到刘家营后的田野中，被杀害。据说死后衣裤被脱，阴道内塞满了杂草。

演猴王孙悟空的著名京剧演员周慧毛，昵称毛毛，参加“420”。 他并没有参加武斗，而是朝郊外部队营房逃难。凭着

一身武功，他眼看就要翻过部队营房的围墙，却在矮墙边被逮住，被“大联合”指认。据说，首先一枪，周慧毛还使出猴王的筋斗本领让过，接下来的一枪还不待他筋斗落地，就已经从半空中掉了下来，趴在了地上，挣扎了一会，就蹬直了腿，著名的京剧表演艺术家一代猴王毛毛就这样死了。

这次武斗，“八派”组织“420”败走，被迫上苍山逃亡。还有数千群众逃向大理。

“工八团”和“大联合”占领下关后，进行了全城挨家挨户的大搜捕。数千名群众在刺刀和枪口的押解下，被迫高举双手，关进了临时监狱。

一些人像俘虏一样被押进刚刚建成，尚未投入使用的市医院，关在三楼的一个房间里。

夜晚，被抓的人越来越多，小房间挤的满满的。一开始还能坐着，后来实在困不住，只好你压在我身上，我压在他身上，横七竖八地躺下来。被压在下边的人受不了，又拼命钻出来，压在上面的人身上，如此反复，翻腾不已。

16 日傍晚，在凛冽的寒风中，一些群众手持一张“大联合”发给的释放证，上面印着“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从临时监狱中放出。在满目疮痍，枪声不绝的下关街头，很多人想到了解放军。他们来到驻扎在下关的 42 师师部，只见平时岗哨森严的大门洞开，许多无家可归的遇难群众涌了进去。部队干部战士热情接待了他们，端茶倒水，送上热腾腾的饭菜，并安排住下。

当时 42 师医院的病房内，住满了武斗中受伤在此救治的民众。

第二天，大批人源源不断地押解进“大联合”的临时监狱。除市医院外，对面的金沙林勘大楼也关满了人，实在关押不下，“大联合”被迫释放了一些人。

据被关押在这里的下关中学学生袁光熙回忆：“下午忽然传来一阵低沉的惨呼，我大着胆子，拉开门一看，在对面的房间里，一个身材高大的中年男子拿着一把大号手钳，在众目睽睽之下，肆无忌惮地夹住大理州州委副书记、州长欧根的鼻子，死命地夹紧、扭动。欧根疼得全身发抖，身体卷曲着，还得拼命地压抑自己，尽量不发出声。周围的人吓的脸色惨白，脚摇手抖，半天说不出话来。直到欧根的鼻梁骨快要扭断，人几乎昏死过去，那人才满足地罢手，扬长而去。”

“1.16”事件的第三天——1 月 18 日，袁光熙和大批被抓人员被押解到街上，打扫街道，清理路障。只见劫后的下关一片狼藉，所有的商店、饭馆全部关门，居民的住宅或铁门紧锁，或门窗洞开，均空无一人。街道上垃圾遍地，电线杆东倒西歪，断线随风飞舞。地面上留有许多燃烧的残物和一片片血迹。子弹，炮弹爆炸的弹痕随处可见。“大联合”在广播三个《通告》，宣布下关已经“解放”，将正式“恢复无产阶级专政”。在被关押时，他们已经听说了“滇西挺进纵队”这一组织，据说是由“工八团”组成的。在广播的《通告》中，他们再次听到了“滇西挺

进纵队”。

几个月以后，在关巍公路 7 公里处，发现了两个巨大的尸坑，掩埋了上百具尸体。据统计，在整个下关“1.16”事件中，“炮派”死亡 27 人，全部死于武斗现场。“八派”死亡 77 人，据说，直接死于武斗的不到 60 人。其余是被抓后惨遭杀害。

“420”逃难到大理的群众数千人，集中住在大理一中，由 14 军提供粮食和行李。直到形势彻底缓解，“大联合”交出武器，数千“难民”才浩浩荡荡返回下关。

1月17日，昆明、云南两级军区在京开会全体领导的电话指示：

中央首长最近几天看了云南的电报，对我们有批评和重要指示，现根据中央首长指示精神，我们研究，打回如下电话：

从近日情况来看，武斗并未停止，某些地区继续发生严重武斗，如一平浪、楚雄、下关，曲靖，昆明东郊金马村还发生了严重破坏202次客车事件。从最近情况看，炮派某些组织要特别注意。现提出如下几点：

一、必须坚决按照协议贯彻落实执行。

二、不论哪一派，哪个组织，如果继续搞武斗，破坏协议就要走向反面。

三、立即停止武斗，谁要继续挑起武斗，造成严重损失，必须交出指挥武斗的头头。

四、两派都要提高革命警惕性，防止个别坏人和走资派从中

挑动。

五、必须深入宣传协议，大量印发，认真学习《文汇报》“论派性的反动性”社论。

六、由昆明两大派和军管会立即派出三个监督小组，分别赴滇东北（曲靖、东川、昭通）、滇西（下关、楚雄、一平浪）、滇南（文山、广南、邱北、个旧、开远）协助当地两派和驻军监督协议的贯彻执行。

在大理，楚雄或别的地方，那些正在带头向另一派用武装进攻的一方的头头（讲了又不听者），不准来北京开会。那些处于守势、不用武力进攻别人的一派，即使被攻者打散，也要派同等数量的代表来北京签字。

昆明到贵阳202次列车要立即连夜排除障碍，以便迅速通车，并将两次破坏列车的头头，要本组织立即交出来。

昆明、云南两级军区在京开会全体同志

一九六八年一月十七日

1 月 18 日，昆明军区在京开会领导的电话电报：

（这个电话记录要发到所有专州。特别是武斗的点都要发到，指定来北京谈判地方一定要发到，部队要相应的发到。点名的地方发到县。要发给两大派，连夜上街宣传。）

军队（不论是两级军区、野战军、铁道兵、军分区、人武部等，以及所有“三支两军”人员）和地方干部，从现在起，如果不是按照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导，促进两派群众组织实现革

命的大联合，而是继续片面地支持一方搞武斗，明的或者暗的指挥一方进攻一方，造成严重损失者，将来查出来，一定要受到严厉处分。立即传达到所有人员，坚决贯彻执行。

昆明军区在京开会的领导同志

一月十八日凌晨零时五十分

1 月 19 日，下关 14 军向昆明军区党委上报了一份关于“滇西挺进纵队”的问题的报告。报告称：

“昆明炮派所属工役制工程第八团一部，在走资派和少数坏人操纵下，组成所谓‘滇西挺进纵队’，于元月 1、2 日从昆明出发，全副武装，乘坐汽车，由滇缅公路西进。仅仅 10 天时间，西进 450 多公里，攻占了禄丰、一平浪、楚雄、南华、祥云、下关等重要城镇，严重破坏了重要工业生产和交通运输，枪杀了省煤管局副总军代表郭顺兴同志，抢夺了战略仓库枪、炮数千件，弹药数十万发，冲击了国防通讯枢纽部门和军事机关，打伤解放军干部、战士，并向当地驻军多次发出‘通牒’，横冲直闯，到处抓人，打散了沿途八二三派和其他革命群众组织，打伤群众多人，仅下关一地发现尸体 200 余具，并打死抢救受伤群众的战士和修华等 2 位同志。搜山、清乡，抓扣群众千余人，并严刑拷打，有的甚至公开枪毙。”

这份报告中的提到的“滇西挺进纵队”应该是指李国贞带往下关的 77 人。但是，李国贞率人从昆明前往下关是 1 月 10 日出发的，并非元月 1、2 日；还有，省煤管局副总军代表郭顺兴

是 1 月 3 日被害，非“工八团”所为。

在北京参加解决云南问题的昆明军区和云南省军区负责人将这份关于“滇西挺进纵队”的报告上报中央。

## 第 951 回：一二一，凌晨见云南代表　成叛徒，赵建民当场被抓

1 月 21 日凌晨 2 时，正在北京的赵健民接到临时通知：立刻赶往京西宾馆第二会议室，参加中央召开的解决云南问题的会议。此时，康生、谢富治正在京西宾馆二楼会议室接见昆明部队在京负责干部。当群众代表走进会场时，谢富治正在讲话，他说：

“形势发展很好，但有些紧张，谈判费这么大劲，为什么武斗这么厉害？2、3 号起一直从昆明打到下关，是破坏行为，是犯罪！把军代表、一个团的副政委杀了，到现在不交凶手，又破坏了一平浪煤矿，又砸了盐矿，到下关杀了 100 多人，这哪是文化大革命？”

显然，谢富治这里说的是 14 军的那份报告。

康生插话说：“这是造无产阶级的反。”

谢富治：“这样的反有人支持。文山就是在边疆，我们同美国作战，援越抗美。武斗一个组织最厉害的就是‘援越抗美’，这个组织不要脸，他这是破坏！什么‘援越抗美’？不管什么派也不行！上次总理、康老讲过要悬崖勒马，如果这样下去，比李成芳的错误更大。王非，何德庆你们机关就是不听话，云南就是不执行11月14号决议，王非你派人到部队去串连。”

康生：“你们到底执行的是谁的计划？打着革命的招牌进行反革命活动。”

谢富治：“今天叫赵健民来参加会。过去我们希望你站出来

揭问题，贴几张大字报也好嘛！但你辜负了毛主席、党中央的希望。你出来干了许多坏事，你片面支持‘炮派’，出了许多坏点子，你现在还在那里指挥。有那么一些人，就是不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话。我们完全是为了革命利益，我们只能听毛主席的话，听党中央的话，听中央文革的话。谁跟毛主席、林副主席、党中央、中央文革走，我们就支持。否则，就不支持。我们就是一派，不管你是‘炮派’也好。李成芳、胡荣贵、张子明有错误，中央调离他们。如果你们乱搞，不跟伟大领袖毛主席走，搞个人的，那是不行的。我看最近有些行动，是幕后有人指挥。”

康生问：“赵健民，你是什么时候到北京来的？”

赵健民：“10月2日。”

康生：“你脑子里还有中央吗？谁叫你来的？是中央叫你来的吗？”

赵健民：“我是来向中央反映情况的。”

康生：“你可以请示一下嘛！不请示你自己来，还是化名的。”

康生问陈康：“听说有几个都是化名来的，有没有这个事？”

陈康答：“有。”

康生：“谁叫你们来反映情况的？我听说赵健民来了很吃惊。你是省委书记，不是个小孩子！刚才谢副总理讲，你支持‘炮派’出了许多坏点子，是不是？”

赵健民：“我没有支持‘炮派’的错误行动。”

康生：“你的话不要说死，你不要骗我们。刘少奇才骗我们，

叛徒、特务才骗我们。你说你没有片面支持‘炮派’干坏事，你给我写个条子。”

赵健民低头写条子。

康生见状接着说：“你说你没有支持‘炮派’，你考虑考虑。你是个省委书记，在京西宾馆还打电话指挥‘炮派’，还说没有支持。对你这个人在文化大革命中是个大考验。考虑一下再写吧！”

赵健民把写好的条子递给康生，康生接过条子说：“写好了？怎么写的呢？”

康生念条子：“我没有支持炮派的错误言论和行动……”

康生说：“甭同我们搞外交。如果你要是支持了怎么办？”

赵健民：“我支持了受党纪国法处分。”

赵健民又从康生手里拿过他写的条子，在上面写上：“如果支持了‘炮派’的错误言论和行动，愿意受党纪国法处分。”

康生：“要澄清一个问题。上次有人讲支持赵健民是毛主席批准的。完全没有这回事。那是昆明军区有个报告，对解决云南问题提了些意见，中央批那个报告。有人到处招摇撞骗。我问你，你在白区工作是哪一年被捕的？”

赵健民：“1936年。”

康生：“几月被捕的？”

赵健民：“9月。”

……

康生询问了赵健民的被捕情况，可以看出，他对赵健民的被捕前后经过非常清楚，但在此刻他旧话重提，其用意不言而喻。果然康生话锋一转，问道："是叛徒供出了你，怎么一年多就出来了？"

赵健民："那时，日本人来了，很混乱，国民党逃跑就放了我。"

康生："你在监狱里是怎么自首的？"

赵健民："我没有自首。"

康生："你以为我们不知道吗？你还欺骗大家。你是个叛徒！我再重复一遍，你是个叛徒！"

赵健民："我保留意见。"

康生："好！你保留吧！你写个条子！你的行动不是偶然的。一个叛徒，一个叛变分子，混在我们党里来，想乘文化大革命把边疆搞乱。国民党特务云南组，我看了他们的计划，你的行动就是执行他们的计划。你上次来北京，几次写信找我谈话，我觉得一个省委书记来了，不管怎么样忙也得谈谈。你那一次谈话，我向中央反映了，你那次谈话，是反毛主席、反党中央、反文化大革命的。你认为我们党没有民主，代表大会长期不开。这是谁的话？是赫鲁晓夫的话。"

谢富治："刘少奇也这样讲的。"

康生："我批评了你，你说要辩论，同志们想一想，如果我们开了九大，刘少奇、彭、罗，陆、杨那些乌龟王八蛋，就选到

我们党内来了。你赵健民就是要把刘少奇、邓小平，彭、罗、陆、杨那些混账王八蛋再选进我们党里来。你赵健民就是为这个目的。”

这几句话，不仅坐在一旁的几位省里负责人面面相觑，就连赵健民自己也大吃一凉。他马上反驳说：“我不是那个意思，当时有专人记录的，可以公布记录。”

康生：“很好！你是费了心思的。你那个谈话，半天一个字半天一个字说出来的。你要公布记录，我们要把你的东西全揭出来，不仅在云南，而且要在全党公布。大家听到了没有？这是他要求的。答应你这个要求。赵健民，你要开党代表大会，这个话你讲过没有？”

赵健民：“讲过。”

康生：“那就对了，我没有造你的谣。你对刘少奇讲过没有？”

赵健民：“讲过。”

康生：“哪一年？”

赵健民：“1963年。”

康生：“什么地方？”

赵健民：“在昆明，刘少奇从越南回来时讲的。”

康生：“嗬！63年就讲啦！你还同别人讲过没有？”

赵健民：“没有。”

康生：“不见得。这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英明预见。要是按党章的话，五年开一次，开了九大，那就糟了，这是一切反

革命修正主义的一张王牌，如果六七年开这个会，刘少奇会怎么样？彭、罗、陆、杨会怎么样？叛徒、特务一大堆还留在党内！用合法的手续，来隐藏他们叛徒的面目。他们总是要改变面目混进党里，篡夺我们党的领导权。毛主席英明，文化大革命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光把一堆叛徒、特务揪出来，就有很大的意义。赵健民！你不要用以前的办法来骗我们，现在是文化大革命，毛主席红太阳照得红彤彤，牛鬼蛇神都照出来了。把那些叛徒、特务照得原形毕露。”

谢富治：“谁捣鬼都逃不过，谁不跟毛主席、不跟毛主席司令部，搞自己那一套，不管你怎么巧妙，都要暴露出来。”

康生：“李成芳、胡荣贵、张子明有问题，我们要严肃处理。”

谢富治：“会都不让他们参加嘛！你赵健民也不能混水摸鱼。”

康生：“在现在的形势下，云南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成那个样子，没有黑手才怪呢！我相信河南、山东支边的绝大多数人是好的，就是那些黑手、特务、叛徒、走资派在那里挑动。你赵健民来北京干什么？你就是为了在北京安安静静地指挥。你就是这个目的来的，在昆明不方便。我问你，你来反映情况，你向主席、林副主席写了什么报告？提过什么建议？”

赵健民：“11月初，我写了一个报告，有情况，有建议。”

康生：“你反映的什么？”

赵健民：“我反映云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主要是李成芳错误搞乱的。他不揭省委的阶级斗争盖子，他整我的黑材料，他

拉一派打一派。”

谢富治：“我问你，我们到云南去，叫你做两大派的联合工作，到现在你做了些什么工作？”

赵健民：“‘823’、‘炮兵团’的我都做了……”

谢富治：“你说假话。”

康生：“你的建议是什么？”

赵健民：“我建议李成芳停职反省。”

谢富治：“那中央早就决定了，8月份就调离了李成芳。”

赵健民：“我建议两大派到北京来谈判，把形势缓和一下。”

康生：“还有什么？”

赵健民没有回答。

康生：“怎么样？你的建议里军队这一条就没有提。”

谢富治：“‘抓军内一小撮’就是你在那里支持。”

康生：“我找你谈过两次话。我凭40多年的革命经验，有这个敏感，你对毛主席、对党中央、对我们有刻骨的阶级仇恨。军队的问题，那么重要，你没有提。你想把云南文化大革命搞垮那是痴心妄想！我相信工人、学生、农民没有人跟着你走的，就是阶级斗争盖子没有揭开，揭开了谁跟你走？

我希望军队的同志，昆明军区也好，云南军区也好，空军的也好，我们把中央的底告诉你们，你们有什么意见请讲讲。”

康生念赵健民的条子：“我没有支持‘炮派’的错误言论和行动，如果支持了‘炮派’的错误言论和行动，愿意受党纪国法

处分。”

一些人大声说：“这是假的，这是靠不住的。”

有人揭发赵健民调支边工人到昆明搞武斗，搞经济主义，对抗中央……当揭发赵健民调支边工人到昆明组织“援越抗美”搞武斗时,谢富治：“抗美援越是打美国人的，怎么打群众？什么‘援越抗美’，把这几个字污辱了！”

当昆明军区副司令员、军管会委员鲁瑞林揭发赵健民答应给支边工人每月每人40元钱，不回原籍，就地分配工作时，谢富治：“这是搞反革命经济主义！”

康生把赵健民的条子拎起来说：“你们看，这几个字值多少钱？”

赵健民可能是忍无可忍了，大声说道：“那是造谣！”

鲁瑞林念了赵健民发的一个电报，证明赵健民支持“援越抗美”组织的行动时，谢富治：“要偷偷摸摸的办了，是不行的。”

赵健民：“对支边工人问题，错的是你鲁瑞林，对的是我。”

鲁瑞林说：“你召集‘工八团’开会，答应他们，留在云南可以当干部、可以增加工资。”

赵健民大声喊到：“造谣！造谣！我在哪里开会讲的？有哪些人参加？你指出证人来!”

康生：“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以来，我遇到两个人最顽固，你一揭他的问题，他就说，造谣！造谣！一个是内蒙的王逸伦，一个是你赵健民。本质问题就是留下来搞武斗。”

赵健民："中央可以审查。"

康生在屋里来回的踱步，边走边说："一定要审查，一定要审查！你是比较疯狂的，疯狂地向无产阶级司令部进攻！"

有人问赵健民："你为什么8月24日上五华山？"

谢富治对赵健民说："你就是支持一派打一派。"

赵健民继续分辨……谢富治打断他的话说："你不要多说了。"

康生问赵健民："你不是要求中央审查吗？"

赵健民："我要求。"

康生指着赵建民说："你写，你写！"

赵建民又在一张纸上写了保证自己没有问题，要求中央审查的字句。条子刚刚写好，正要递给康生，恰巧见到康生用手示意，谢富治接过赵健民的条子后，立即宣布："中央决定，把赵健民监护起来审查，立即执行！"

赵健民还没有反应过来，已有两个解放军战士过来，将赵键民推了一把，将他押离会场。

谢富治："军队同志不要上坏人的当，你们要好好学习，要提高警惕。就是有坏人、有黑手要破坏解放军的团结，破坏造反派的团结。不要上他们的当。文化大革命已经一年多了，不要上当。还有赵健民的秘书也要监护起来审查。"

他接着说："文化大革命一年多了，形势一片大好，就是云南不好。你们要好好学习，克服派性，紧跟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

坚决停止武斗，停止机关‘四大’。简直什么话也听不进去！打个电话回去，就说是大毒草。军队是毛主席亲自缔造和领导的，是林副主席亲自指挥的。军队也有人总想把部队搞乱，什么也不听指挥！你们不要上坏人的当。不管哪个犯了错误，改了就行。伟大领袖毛主席说了，有错误改了就行，不要再顽固坚持，都要注意。你张力雄同志，过去我们支持你，但你风格不高，团结工作做的不够；让你当军管会副主任，陈康也是副主任，但要批评你两个。”

康生：“赵健民在京西宾馆，还在活动，在这儿表演，你们看像不像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把我们当阶级敌人看待。王逸伦也是说：造谣！造谣！和赵健民一样，结果一审查是苏修特务，国民党特务。”

谢富治：“刚才总理给我打了电话，你们要告诉‘工八团’迅速地停止武斗。周总理说了，他们这是完全违背了文化大革命，是破坏文化大革命。如果立即放下武器，我们还承认他们中的大多数还是好的，是革命的，不然就用军队包围起来，强迫交枪。”

罗元发：“我们相信‘工八团’大多数同志是好的。”

康生：“赵健民就是个两面派，不要相信他，1月9日他还在京西宾馆打电话指挥‘炮派’哩。”

谢富治：“那是搞特务工作。”

康生：“今晚为什么要开这个会？云南的工作近一个月来有点发展，昆明的武斗基本上停下来了。可是几次都是昆明好一点

了，下边就严重起来。这好像是一个规律了。这个问题要注意，这个问题相当严重的啰。我们得到一个消息，昆明‘工八团’成立了一个‘滇西挺进纵队’，元月1、2日从昆明出发，4日到禄丰，还带有1400件武器去支持那一方面搞武斗，把一平浪煤管局的军总代表、一个团级干部打死了。”

谢富治：“到现在没有交出凶手。”

康生：“他们的枪口不是对敌人，最近苏修还运武器给缅甸。他们枪口不是对敌人，不是对反革命，而是对人民解放军，对着人民子弟兵，对着军管干部这不值得深思吗？‘工八团’9日占了一平浪，把煤矿破坏了。15号占了楚雄，14日在祥云抢了3500件武器，16、17号攻占了下关，他们到底是干什么？值得严重注意。同时在永平已发现了电台。”

谢富治：“发现敌人的电台。他们由昆明到达下关，目的是干什么，为什么要抢那么多枪？”

康生：“我们要相信，他们多数是好人，是劳动人民的子弟，但是有坏人。因此，我们的确想到，赵健民是利用了这个问题了，不管是直接的，间接的，这只黑手就是他。赵健民说云南的问题在李成芳，李成芳有错误，我们知道。云南就是一个李成芳吗？还有赵健民哩！两派中间都有少数的坏人，但一个突出的是‘炮派’，要警惕。我们不是支持一派的。”

“云南乱得差不多了，问题也暴露得差不多了，到解决问题的时候了。你们大家要赶快团结起来。统一思想，行动一致。军

队一致了，地方就好解决了。同志们看看全国，能一点也不动心吗？广州黄司令员来了，向中央报告广东要成立革命委员会。别的省都来报告成立革命委员会，可是云南还在搞武斗，还坐上汽车打500里。不过一讲清楚了，我们相信你们会跟上去，赶上去的。

谢富治："要统一到毛泽东思想上来，军队里有什么'八派'观点，'炮派'观点，都是错误的。"

康生："现在面临一个'工八团'问题，怎么办？同志们都想一想，我看有四条：第一，深入地做政治工作，14军的同志去做。经验是首长亲临现场。"

"河南空13军解决开封化肥厂的问题就解决得好。"

谢富治："要耐心，要注意不要轻易开枪打死人。主席讲，军队要准备几千人伤，几十人牺牲。一场伟大的文化大革命，总会死些人，还是像林副主席说的：胜利最大最大最大，牺牲最小最小最小。那个团的副政委牺牲了，我们是同情的，但不要在这上头做文章，不要开追悼会那一套。希望两个军加紧政治思想工作。"

康生："第二条，要说服他们停止武斗。第三条，收枪。第四条，说服他们把抓的人释放出来，工作无效就用军队包围，搞政治攻势。"

谢富治："强迫交枪。"

康生："最后我相信，是毛主席讲的，哪个地方乱透了，哪

个地方的问题就解决的好，云南乱得差不多了。不乱，赵健民是看不清的，以前对赵健民认识不清嘛，对他还抱有希望呢！”

谢富治：“少数人武部动员农民进城搞武斗，这是犯法行为。我希望张力雄、李明采取坚决措施，制止‘炮派’的武装进攻行为。‘八派’也一样。我看丁荣昌去东川制止武斗不力。他发来电报都是片面性的。电报多是假的。是派性作怪要注意，不要被他们牵着鼻子走，那会上当。司令部两个副参谋长、政治部副主任、后勤部长，你们为什么要搞‘四大’？你们就是要妨碍军队支左嘛！你们搞得军队什么发言权都没有。”

“要坚决把东川、下关、文山等地的武斗停下来。”

“刚才会上讲的，只在内部讨论，不准打电话回去，统统保密。”

康生：“关于赵健民的问题，不要打电话。”

罗元发：“不要打电话，据说北京还有昆明的百把人。”

谢富治：“一律反对假报告，反对只告别人，不讲自己。什么电报每天一大箩，我说电报就是派报，每天电报多得很，像快报一样。司令部机要局就像个公共汽车，谁都可以使用，谁都可以发电报，就有人批。今后军队问题一律不能上街，不准捅到社会。鲁瑞林、田维扬、两军的同志，都要作检查。”

康生：“今天对‘炮派’讲得比较多，对‘炮派’观点的批评比较多。我们有个经验，对一派批评多了，另一派再过两天就要犯错误。‘八派’观点的同志要注意。还有一条经验，要保密，

能不能做到？”

众答：“能！”

康生：“会上答应容易，就是做了保证但做不到。对司、政、后机关来的同志是一个考验。你们可以不赞成，但赞成了要保证做到。”

## 第 952 回：批示下，堵截围剿“工八团”　谢富治，惊闻打死百八人

就在康生、谢富治在北京京西宾馆接见昆明部队在京负责干部、云南群众代表和赵健民的当天，1 月 21 日，在下关的“工八团”全部人员离开下关返回昆明。

1 月 22 日，中央对昆明军区报告批示：“同意对工八团回窜以坚决堵截，务必做到经过政治工作，劝他们放下武器，交出他们西窜沿途抢枪杀人的坏头头。”

当天夜间，返回昆明的“工八团”行至楚雄的吉山坡与前往堵截的部队相遇。但部队没能堵住，“工八团”冲开部队，继续往昆明方向行进。到达一平浪时，由于部队已把公路截断，“工八团”住在一平浪甘海资矿区。

1 月 23 日，昆明军区在京开会的领导同志的电话电报：

中央首长对云南目前武斗非常关心，全国都停了，就是云南不停。云南、昆明停了，就是滇南、滇西不停。

现在要立即谈判，立即把武斗制止下来，不论是否达成停火协议，双方都不要主动进攻、主动出击、主动开火。不谈判，继续胡闹，中央将采取坚决措施，不论过去是什么组织，现在不听招呼，要走向反面。

立即谈判停火，主要是靠军队，部队未直接支持的，有影响的组织，要立即行动，立即进行工作，很快把武斗停下来，军队谁要再支持、助长武斗，也要采取坚决措施，不论任何人作任何

小动作，都要查出来。现在发现现在处理，将来发现将来处理，一定要认真教育部队，现在先不谈，先把武斗制止下来，先把交通恢复起来再谈。春节前，一定要做出成绩。

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三日上午五时

1 月 23 日，昆明军区党委关于处理昆明“滇西挺进纵队”问题的文件使用了 1 月 19 日 14 军向昆明军区党委上报的关于“滇西挺进纵队”问题报告中的提法，称：

“昆明炮派所属工役制工程八团一部，在走资派和少数坏人操纵下，组成所谓‘滇西挺进纵队’，于元月一、二日从昆明出发，全副武装，乘坐汽车，沿滇缅公路西进。仅仅18天时间，西进450多公里，攻占了禄丰、一平浪、楚雄、南华，祥云、下关等重要城镇，严重破坏了重要工业生产和交通运输，枪杀了省煤管局副总军事代表郭顺兴同志（当地炮派个别坏人干的），抢夺了战略仓库枪炮数千件，弹药数十万发，冲击了国防通讯枢纽部和军事机关，打伤解放军干部战士，并向当地驻军多次发出‘通牒’。横冲直闯，到处抓人，打散了沿途‘八·二三’派和其他革命群众组织，打死群众多人，仅下关一地已发现尸体200余具，并打死抢救受伤群众战士和修华等二同志，搜山，清乡抓扣群众千余人，并严刑拷打，有的甚至公开枪毙。”“他们所作所为是非常恶劣的，是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罪恶行为。”

文件同时宣布：“‘滇西挺进纵队’所作所为是完全错误的必须立即承认错误，改变立场，放下武器，释放被抓人员，交出

坏头头。”

文件要求：“把‘挺进纵队’和整个炮派区别开。决不能利用这件事做文章，压制工役制部队和‘炮兵团’。”

当天，昆明军区派出部队对“工八团”进行包围，同时，向军队各单位发出了《关于处理昆明“炮派”派出“滇西挺进纵队”的问题》的通知。

25 日，云南省军事管制委员会发出通告，将 “滇挺”案公诸全省。《通告》说：“在全国人民遵照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的时刻，在昆明两大派进行谈判并初步达成停止武斗协议的情况下，工役制工程第八团一部分人组成‘滇西挺进纵队’，不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话，不按毛泽东思想办事，不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不听来自各方面的多次劝告，于元月 1、2 日，全副武装，从昆明出发，沿滇缅公路，向滇西挺进，煽动当地某些不明真相的群众组织的部分人员，配合他们的行动，仅仅 18 天时间，先后攻打了一平浪、楚雄、下关等重要城镇，抢夺国防仓库，破坏滇西工业生产，打死打伤许多革命群众，危及国家财产和人民生命安全。他们在滇西的所作所为，是破坏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犯罪行动。‘滇西挺进纵队’的行动，是受了走资派的操纵的，是混进他们组织里的极少数坏人从中挑动的，这个组织里绝大多数群众是受蒙蔽的。”

1 月 25 日，在北京参加解决云南问题的“炮派”代表向在

京的昆明军区负责人报告："昆明军区党委文件所指工八团到滇西武斗与实际情况有较大出入，炮派要向中央汇报。在未得到中央指示前，工八团在原地（一平浪）待命。"

1 月 26 日上午，谢富治在北京批评昆明军区的部队没有堵住"工八团"是"右倾、怕死"，指示昆明军区副司令员鲁瑞林负责处理"滇挺"问题。鲁瑞林等人当天即从北京飞赶昆明，下午就在昆明召开紧急会议，布置武装围剿"反革命'滇西挺进纵队'土匪武装"。鲁瑞林在会上讲：

"元月 26 日在北京开了个会，叫我回来处理一下'滇西挺进纵队'。工八团这个问题，中央处理得很坚决，批评我们右倾怕死。这是阶级斗争，坏人在操纵，我们要采取坚决措施处理工八团。"

当天下午 16 时左右，负责执行围剿"滇挺"任务的师长来到一平浪矿区，和矿区"炮派"组织的负责人谈话，提出 3 条要求：第一，部队要派宣传队到矿区来，"炮派"要保障宣传队的安全；第二，给宣传队架通电话线，便于保持部队的联系；第三，三厂的房子让给部队住，在宣传队未进来之前，部队暂不过永红江大桥。

"炮派"对这些要求一一同意。由于此时部队已包围矿区，不让出入，"炮派"提出：工八团到煤矿住下待命，没看到什么文件，又不了解怎么回事，要求准予派人出去了解情况。部队领导也满口答应。

当晚，执行围剿任务的部队却受命向住在一平浪甘海资矿区的“工八团”人员快速推进，缩小包围圈。

1 月 27 日下午 18 点 10 分，部队攻占甘海资矿区。在这次围剿中，打死“工八团”184 人，煤矿职工、家属 95 人。“工八团”480 人被捉。

当晚 20 时，中央军委派到云南的联络员、北京军区副司令员罗元发和昆明军区、云南省军区负责人到北京西苑旅社接见云南两派赴京谈判代表后，单独和“炮派”代表谈滇西问题。罗元发说：

“工八团在一平浪必须立即交枪。中央决定在 28 日下午 6 时以前把工八团在祥云仓库抢的武器全部交给部队，过时不交，部队采取行动，明天早上部队派飞机撒传单，你们要给昆明家里做工作，按要求交枪。”

“炮派”代表当即表示马上给昆明打电话做工作。电话通过昆明军区打给“炮派”在昆明的一位负责人，要他立即去一平浪做工作交出武器。

但是，当这位“炮派”负责人于 28 日凌晨 3 时赶到一平浪时，部队已完成了围剿“工八团”的任务。

在北京的罗元发得到部队首先开枪打死人的消息后即指示：“对当地‘炮派’要同他们（指工八团）分开，绝不要对群众射击，要抓政治攻势，瓦解为主”。

就在部队在甘海资矿区围剿“工八团”的同时，“联指”所

属的文山“农民革命军”也一举将文山“井冈山”打出文山州，迫使他们退到红河州开远中合营。文山“联指”并未就此罢手，又动员了近万名“农革军”基干民兵，准备跨州将“井冈山”全部歼灭。开远驻军领导机关向北京报告了此情况。

三天后，1 月 30 日，13 军 38 师 112 团政委刘振棋得到指示，从金平、河口调集部队到开远卧龙谷集结待命。当晚，部队奉命由个旧、 蒙自、河口等地向开远卧龙谷生产基地集中。21 时 50 分，所部三营 200 余人乘坐的 7 辆军车在途经鸡街时，遭到当地“一二八”派武装人员步枪、手榴弹的袭击，营长胡玉新和 5 名战士当场被打死，54 人受伤，军车全部被打坏。当晚 23 时许，从蒙自出发的团直属队 261 人所乘 7 辆军车途经个旧市鸡街铅厂后坡时，亦被袭击，解放军死 1 人,伤 3 人。0 时左右，从河口出发的一营 26 人乘 1 辆摩托车、3 辆军车途经雨过铺关圣庄岔路口时，也遭到冲锋枪和步枪的射击，解放军伤 2 人，军车被打坏 1 辆。“文山农民革命军”得知此情况后，速从砚山前线撤回。

2 月 1 日凌晨 0 点 15 分，中央关于云南鸡街、铅厂、雨过铺事件的指示：

一、关于鸡街、铅厂、雨过铺发生伏击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事件，是有组织、有计划、有预谋的严重政治事件。

二、必须交出鸡街、铅厂、雨过铺三个地方伏击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坏头头，而且要主要的头头。

三、必须指出，所犯错误是严重的，必须立即改正，如果不

改，将犯更加严重的错误。

四、必须释放被抓的人员，交还车辆、武器、弹药和其他物质。

2 月 4 日，中央在北京为云南举办了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主持学习班的是中央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办公室主任、工程兵政委谭甫仁中将。

2 月 5 日，“工八团”被围歼后的第 9 天，鲁瑞林等赴北京向中央汇报对“滇挺”的处理情况。汇报会上，闻知打死“滇挺”200 多人的谢富治有所惊悸地说：“中央没叫你们开枪，没有授予你们开枪权，为什么你们打死这么多人？这件事对外不要讲了。”

云南 14 军领导申辩说：“我们原来的报告从战略上讲没有错，不管有没有‘滇西挺进纵队’这个名称，但他们的所作所为，干的坏事，是跑不了的”，“工八团的统治，简直就是法西斯”。

鲁瑞林汇报时，点名说赵健民是“滇挺的幕后策划者”，“陈康、张力雄、王银山也参与了幕后策划。”

当罗元发插话制止他时，他说：“赵健民是叛徒，是三反分子，已很明显，为什么我们有些人和他混在一起？”

2 月 6 日晚，在空军后勤部礼堂，北京军区副司令员罗元发传达谢富治、吴法宪关于云南文化大革命的指示，要求云南两派要很快地签订停火交枪、制止武斗和恢复交通的协议，实现大联合。强调《云南日报》和军队的《国防战士报》要很快地恢复起

来。并要求云南各地区都要在总理办公室联络员的帮助下，搞一个本地区停止武斗的协议。

关于一平浪的问题，罗元发说："谢副总理讲，两派不要在那里做文章，一定要坚信中央。革命造反派你造什么人的反呢？革命无罪，造反有理嘛，要造一小撮走资派的反。我们有的造反派没有按照毛主席最新指示办事，有的超出了这个范围。浙江'红暴会'，毛主席批了，他们犯了错误。一平浪的问题两派要正确对待，特别是'炮派'要按中央指示办事，要相信中央。'炮派'在下关搞了三个通令，他们在那里要单独搞'无产阶级专政'，这是错误的。革命无罪，造反有理，要看你造谁的反。造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反就错了。"

刘懋功插话说："'炮派'发表了声明，态度还是好的。"

罗元发继续说："'炮派'发表了声明，有自我批评，态度还是好的。不管'823'还是'炮派'，都要各自多做自我批评，不要他批评你，你批评他，不要算老账，现在要大联合，要多做自我批评。造反，造谁的反？一个是造走资派的反，一个是违背无产阶级路线。我们造反不能乱造一顿，造无产阶级的反就是不对了嘛。"

关于云南的军队问题，罗元发传达说："军队无论如何不能参加哪一派，不管'八派'也好，'炮派'也好，你们都不要参加，要按毛泽东思想办事，军队与地方的线要割断。""最近中央军委在这个方面还要有个指示，你们回去讨论一下，按中央指

示精神打电话回去，你们两派要搞大联合，这是大方向，这条路非走不可，你们要搞武斗，非犯错误不可。再不要搞武斗了，工矿停工，农民进城，交通停滞，影响援越抗美物资的运输。搞武斗是违背毛主席战略部署的。绝大多数群众，革命造反派，是愿意搞联合的，要注意这个问题。

你们打电话总是有些歪曲，随便发挥，这是没有党性的表现。随便发挥就变成造谣，要有严肃的态度，不能随便发挥。对自己有利的就随便发挥，那就不好了。今天总理办公室同志，朱刚同志在这里，你们打电话的稿子给他们看一看，看是否合乎这个精神，如果有随便发挥，要由你们自己负责。我做一个口头声明。”

## 第 953 回：抓叛徒，内蒙揪叛联络站　大草原，作家发现“内人党”

此时，已经成立了革委会的内蒙古，正进行着一场“挖肃”运动。

1967 年下半年，中国各地掀起的“揪叛徒”、“揪特务”之风也波及到了内蒙古。因写作小说《草原烽火》而成为全国知名作家的内蒙古文联副主席兼作协分会主席乌兰巴干，抢先组织了“内蒙古揪叛国集团联络站”，简称“揪叛联络站”。

“揪叛联络站”成立后，首先是去北京揪乌兰夫。乌兰夫因为受到中央保护，未能抓回内蒙古，而内蒙古自治区政府副主席兼教育厅厅长哈丰阿却于同年 7 月被“揪哈联络站”从北京押送回内蒙古，随之成立的“专案组”翻出了哈丰阿参加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的活动历史。

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简称“内人党”，成立于 1925 年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当时，孙中山先生北上，和北京的李大钊等国共两党北方负责人一起发动全国国民会议运动。一大批蒙古族志士，特别是一批青年知识分子、牧民运动的首领会聚北京，探讨召开内蒙古国民代表大会和成立内蒙古国民党。最初，由北京蒙藏学校教员、北京政府外交部中俄交涉公署咨议处翻译郭道甫发起组织了“中华民国蒙党执行会”，会长由曾南下追随孙中山革命、于 1920 年被孙中山委任为中国国民党内蒙古(热、察、绥)党务特派员、喀喇沁人白云梯担任，共有 7 名执行会会员。共产

国际负责内蒙古工作的特派代表、苏联境内的布里雅特蒙古人奥齐罗夫也是其中的执行会会员。

1925 年 1 月 13 日，召开了“内蒙各盟旗各团体代表大会”，也称“内蒙国民代表大会预备会”，有 50 余人出席，通过了大会宣言，宣布了内蒙自治的 6 项主张，决定 3 月 15 日召开内蒙国民代表大会，并发表了《致内蒙王公书》。但是，由于孙中山先生 3 月 12 日在北京逝世，以及当时北京的政局变化，内蒙国民代表大会未能如期举行。直至 1925 年 10 月 13 日，在冯玉祥控制下的张家口召开了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简称“内人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内蒙古各盟部旗约百余名代表出席，也有一些蒙古族青年列席；共产国际、中国共产党、中国国民党、冯玉祥国民军以及蒙古人民革命党均有代表出席。大会制定了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党纲党章，选举产生了党的中央执行委员会，由 14 名执行委员和 7 名候补执行委员组成，还从中产生了 7 名常务委员；仍然是由白云梯任委员长，郭道甫任秘书长；伊盟“独贵龙”运动首领旺丹尼玛、锡尼喇嘛和中共党员吴子徵当选为执行委员，中共党员李裕智、吉雅泰当选为候补执行委员。

1927 年国共分裂，“内人党”也随之发生分裂，形成两派，部分右派投向国民党。“内人党”总部则在共产国际指导下，迁到了蒙古首都乌兰巴托。在日伪统治期间，“内人党”在内蒙的活动转入地下。

1945 年 8 月 9 日，苏蒙红军向满蒙边境推进。8 月 16 日，

苏联红军中线司令官马利诺夫斯基元帅召见“内人党”领导人，原伪满兴安省长博彦满都和内蒙著名的《青旗歌》作者哈丰阿，也就是被乌兰巴干“揪叛联络站”抓回内蒙古的内蒙古自治区政府副主席兼教育厅厅长哈丰阿。马利诺夫斯基元帅让博彦满都、哈丰阿他们建立临时政权，维持秩序，稳定后方。于是“内人党”由潜伏转入公开，内蒙古东部地区的部分蒙古族革命者和青年知识分子以及一些曾在伪满兴安省任职的官吏聚集于兴安盟王爷庙，即现在的乌兰浩特，掀起了一场声势较大的蒙古民族自治运动。

哈丰阿 1929 年就读于内蒙古人民革命党人郭道甫创办的沈阳东北蒙旗师范学校。1931 年“九一八事件”爆发后，他和一些东蒙地区的青年活跃分子，组织军队，试图在自己家乡展开民族自治活动。满洲国成立后，东蒙民族自治活动在关东军的威胁下被迫解散。为了安抚这些留在东蒙地区的蒙古青年活跃分子，日本人将他们安排在满洲国的军政部门工作。于是，哈丰阿先后在满洲国兴安西省、兴安局、国务院总务厅、兴安总省公署任职，并作为外交官被派往满洲国驻日大使馆，被任命为学务理事官。

1932 年，在从莫斯科东方大学回来的朋斯克、特木尔巴根等人的影响下，哈丰阿秘密加入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同年，他写下了充满民族情感的《青旗歌》。这首歌在内蒙古地区广为流传，在国外所收录的蒙古民歌中均能见到。

自马利诺夫斯基元帅召见后，东蒙地区由“内人党”哈丰阿、

博彦满都、特木尔巴根等人发起，于 8 月 18 日组成“内蒙古人民解放委员会”，发表了《内蒙古人民解放宣言》，宣布恢复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建立东蒙党部，提出实行民族平等、联合中国革命力量，争取民族解放以及“内外蒙合并”等项政治主张。随即派出大批青年分赴各盟旗，发展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各级组织，同时进行“内外蒙合并”签名活动。

10 月，以博彦满都为首的东蒙古代表团前往蒙古人民共和国，请求洽商“内外蒙合并”问题。外蒙古领导人乔巴山，以《雅尔塔国际协定》内蒙古划属中国为由拒绝合并，并指出内蒙古革命要找中国共产党来领导。于是“内人党”领导人博彦满都、哈丰阿等人又寻求中共东北局的支持与领导。

根据中共中央指示，晋察冀中央局于 1945 年 11 月 8 日，电请成立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中共中央书记处 11 月 10 日复电同意。1945 年 11 月 26 日，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成立大会在张家口远来庄礼堂召开，乌兰夫当选为执委会主席兼常委会主席。11 月底，东蒙派来代表包玉琨，向乌兰夫等联合会领导人介绍了东蒙自治的情况。以乌兰夫为首的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得知东蒙古人民自治政府已经成立，感到惊讶，摆在面前一个严肃而紧迫的任务，是将东蒙的自治纳入自治运动联合会统一自治的轨道。自治运动联合会决定派出由刘春、克力更等率领的东蒙工作团，于 1946 年 2 月抵达王爷庙。

1946 年 3 月 30 日至 4 月 2 日，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与东

蒙古人民自治政府，各派 7 名代表，在中共冀热辽分局所在地承德举行谈判。双方于 4 月 3 日举行正式会议，史称“四三”会议，因会议在承德召开，又称“承德会议”。会议通过了《内蒙古自治运动统一会议主要决议》，指出内蒙古民族运动的方针是平等自治、非独立自治，并只有在中共的领导和帮助下，才能得到解放；决定解散东蒙古人民自治政府，成立自治运动联合会东蒙总分会，领导东部各盟的自治运动；联合会统一领导蒙古军队。

对新“内蒙古人民革命党”，乌兰夫找特木尔巴根个别谈话，他开诚布公地指出：“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因长期与内蒙古革命脱节而被共产国际解散，而你们的新‘内蒙古人民革命党’提出‘内外蒙合并’，外蒙古不支持，让你们找中共开展自治运动。再看这个党的党员成份复杂，如有伪满官员，基本上是民族上层，不能代表蒙古族人民的根本利益，你说这个党的前途何在？建议你们解散这个党。”特木尔巴根接受了这个建议。

1946 年“四三”会议后，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停止活动。苏联共产党党员、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党员特木尔巴根经中共中央和苏共中央批准，转为中共党员。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党员哈丰阿也申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这就是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的历史。当内蒙古文联副主席兼作协分会主席、“揪叛联络站”负责人乌兰巴干获知这些消息后，兴奋异常。他想：“外蒙古追随苏联，我们称之为‘蒙修’，那是我们的敌人。‘内蒙古人民革命党’主张内外蒙古合并，这不是

叛国是什么？”他立刻与当时负责内蒙古工作的北京军区副司令员滕海青的秘书陈小庄联系，要求“滕办”给自治区公安厅军管会写一封公函，介绍他去公安厅查看档案，查找叛徒材料。

乌兰巴干来到内蒙古公安厅，公安厅干部丁振声把自己以前工作中掌握的有关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的档案和一些地方发生的案件材料，毫无保留的都交给了乌兰巴干。乌兰巴干从中发现了“206”案件：

那是 1963 年 2 月 6 日，内蒙古乌兰察布盟集宁市邮政局邮检员发现一封明显超重的信件，收信人是蒙古人民共和国乌兰巴托市的奥依德布道尔吉，寄信人署名“中国内蒙古乌兰察布盟集宁市民族中学赵金海”。信封上除奥依德布道尔吉的人名是用斯拉夫文写的以外，其他均用汉文，笔迹流畅。由于信封上面仅贴了一张二角四分钱的邮票，按照当时的邮价，这封信明显超重了。

很快，这封可疑的信件被送到了设在集宁市的乌兰察布盟公安处的办公桌上。

公安处将信件拆封，发现里面竟是一幅京剧大师梅兰芳戏剧条屏。条屏背面， 是用老蒙文密密麻麻写的一封长信，译成汉语约合 7000 多字。

经过鉴定，这是一封以“蒙古人民革命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和“蒙古人民革命党委员会”名义寄给奥依德布道尔吉，让他转交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会、蒙古人民共和国大呼拉尔主席团和蒙古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的政治信件。

信中称："1961 年 11 月 26 日召开有 22 名代表参加的首届党代大会以来……最近召开了 43 名代表参加的第二次党代大会。"该信内容大致分为五部分：一对 1962 年 12 月中蒙两国正式划定边界表示不满；二是提出内外蒙合并的主张；三和四，则是攻击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对中共的民族政策大加指责；五是提出内外蒙合并的方针、政策和措施。

信的末尾写道："为争取 1966 年 7 月 1 日以前统一内外蒙而奋斗。假如第一个计划实现不了的话，继续更加英勇努力，为争取在 1966 年 7 月 1 日或 11 月 26 日最后的胜利而奋斗。"该信还称同样内容的信一共寄出 5 封，但我公安机关只截获了两封。初步调查结果，集宁市民族中学根本没有赵金海此人。

这是一起恶性政治案件，乌盟公安处和盟党委立即上报内蒙古党委和自治区公安厅。信件是在 2 月 6 日发现的，所以取名"206"案件。内蒙古党委第一书记乌兰夫立刻召开党委会议，指定主管政法和安全工作的书记王再天亲自挂帅，立案侦查。

王再天和自治区公安厅召集各盟市和各部门公安处长和侦察科长开会，在全区范围内做了周密部署，暗中核对笔迹，查找写信人。然而，尽管集中了得力干部连续侦查了三年半，但案情始终毫无进展。

后来，经过反复研究，各方面的意见逐渐一致，认为此信所述内容很可能并无其事，而是少数敌对分子使用的反间计，意在挑拨是非，制造混乱，扰乱我内部。

乌兰巴干立即将他所了解到的“206”案件情况上报滕海清等人，并在“206”案件中的“蒙古人民革命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和“蒙古人民革命党委员会”前面均加了一个“内”字，于是，“206”案件就成为“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寄给外蒙古的一个信件，因此证实“内蒙古人民革命党”依然在活动。同时，他还把这一悬案同所谓“43 人委员会”联系起来。

“43 人委员会”说的是 1957 年以前，为加强同蒙古人民共和国的文化联系，根据中蒙两国文化协定，内蒙古在蒙文改革方面与蒙古合作，准备试行斯拉夫字母，名词术语也力求统一。为此，该年春，自治区曾派人专程前往蒙古国，就文字改革和名词术语统一问题进行协商。为方便联系和协商，准备成立一个“名词术语统一委员会”，蒙古国 26 人，中国内蒙古自治区 17 人，共 43 人，

不久，由周恩来主持，全国民族工作会议在青岛拉开帷幕。会间，周恩来作了重要讲话，指出中国各少数民族文字改革应实行拉丁化的方针，向汉语拼音靠拢。

内蒙古党委当即决定停止试行斯拉夫文字，制定推行拉丁字母的方案。这样， 原有的与蒙古国的联系随之中断，酝酿中的“名词术语统一委员会”未能建立。后来将此事称之为“43 人委员会”。

在“文革”前的内蒙古，除去上述“206”案件和“43 人委员会”外，还有所谓“陶、那、松”案件、呼伦贝尔盟的“统一

党”和“真理党”等民族分裂性案件。案发原因大多是由于当事者主张内外蒙合并。

恰巧此时，内蒙古电影制片厂有个女演员同内蒙古大学的一位男教师关系暧昧，被人发现。本来，这只是一起普通的生活作风问题，在当时教育或纪律处分一下也就过去了。可事情不巧，这位大学教师偏偏是从蒙古人民共和国学习后回国的人员。

乌兰巴干嗅觉很灵，他串联呼市公安局军管会的一些人将女演员关押审问，在逼供下，这位女演员被迫编造交代了有关参加叛国组织的情况，乌兰巴干等人据此搞出了一份七、八十人的叛国组织名单。

接着，这位小说家结合内蒙古公安厅干部丁振声提供的材料，编编抄抄，不几天就整理出了一份材料。1967 年 10 月 3 日，他来到呼和浩特新城宾馆，叩响了 4 号楼的大门。这里是“滕办”驻地。

乌兰巴干说明来意，掏出了早就准备好的一叠材料。一行大字跳入人们的眼帘：《乌兰夫黑帮包庇一个大叛徒集团的罪行（简要报告）》。

1967 年 11 月 10 日，内蒙古革委会成立刚刚 9 天，乌兰巴干又匆匆忙忙直奔新城宾馆 4 号楼，送上了第二份材料《内蒙古人民革命党是什么货色？》。

乌兰巴干前后给滕海清办公室报送了几十份有关“内人党”的材料，所“发现”的“内人党”及其变种组织一共有 100 多个。

乌兰巴干的这些行动得到了原自治区党委代常委委员兼宣传部部长、内蒙古大学党委副书记郭以青的坚决支持。

郭以青是三十年代的老北平地下党员，以后又担任过河南特委书记。五十年代他调到内蒙古地区工作，“文革”前夕任自治区党委代常委委员兼宣传部部长、内蒙古大学党委副书记。早在1965年5月，郭以青就曾给自治区党委领导写信说：“种种迹象表明，自治区（特别是文教界）似乎有一个相当形式的民族分裂组织，不是小集团，而是一个反动的派别，或者政党。假如面对着我们的是一个有组织、有准备、有国际背景的阴谋集团，就必须针锋相对地做出全面部署，下决心一下打乱他们的阵势，才有可能各个击破。”

郭以青对调查“内人党”一事，非常支持。乌兰巴干曾带上大口罩到郭以青家密谈，郭以青则几次邀请乌兰巴干到内蒙古大学作关于“内人党”案件的报告。

此时的乌兰巴干俨然成了“内人党”问题的头号专家，在呼市地区先后做了20多次关于“内人党”问题的大型报告，并耸人听闻地提出了“四个演变”：

“内蒙古的共产党是内人党演变过来的”；

“内蒙古的军队是内人党的自卫军演变过来的”；

“内蒙古的干部是王公贵族演变过来的”；

“内蒙古的共青团是内人团演变过来的”。

这“四个演变”的理论是乌兰巴干每次报告必讲的内容，影

响之大，遍及内蒙古七盟二市。后来，乌兰巴干在报告中还常常说："乌兰夫 20 年来打着共产党的旗号发展'内人党'，因此草原遍地都是'内人党'，甚至 1968 年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后还在发展'内人党'。"

乌兰巴干在报告中说："'内人党'的自卫军从哲盟一直杀到昭盟，把辽河两岸的汉族都杀光了。"

1967 年 11 月 9 日和 12 日，江青在北京文艺座谈会上讲话指出："建国十七年来，贯穿着一条黑线，文艺界必须大乱。"滕海清从北京带回江青讲话录音带，于 11 月 17 日在内蒙古革命委员会播放了江青这个讲话录音，"挖黑线"之风从此在内蒙古刮起。先是从文艺界开始，然后是波及党政军社会各界，推向全区。

11 月 25 日，朔风凛烈，砂雪横飞。这天，乌兰巴干手下的"揪叛联络站"拘捕了内蒙革委会委员、原内蒙古党委宣传部副部长特古斯，将其绑架到呼和浩特郊外赛马场的办公室，进行连夜审讯。

特古斯在 1945 年日本投降后，曾由哈丰阿介绍参加了东蒙地区的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由于特古斯是"内人党"，所以被乌兰巴干等人作为"混入政府机关"的"另一套班子"的"现行分子"而被揪出。在以后批判特古斯的各种文章、大字报、发言稿中，一个含义模糊、内容广泛的一个新政党被炮制出来："多年来，特别是 1960 年以来，'内人党'的活动甚为猖狂，先后召开了几次大会，发展了新党员。"

1968 年 1 月 6 日，呼和浩特新城宾馆。内蒙古自治区革委会又召开第二次全体委员会议。会议整整开了 12 天。到了 1 月 17 日，会议快要结束的时候，滕海清做了长篇讲话。在这篇讲话中，滕海清提出了“打一场挖乌兰夫黑线，清乌兰夫流毒的人民战争”。后来，高锦明又将“清流毒”改成“肃流毒”。这项工作，后来被简称为“挖肃运动”。

## 第 954 回：极左派，新思潮层出长沙　不客气，中央狠批“省无联”

我们暂且放下内蒙古的“内人党”问题，看看此时“新思潮”不断的湖南。1967年11月16日，“红中会”长沙一中《夺军权》的杨曦光，又模仿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风格，发表了《长沙知识青年运动考察报告》，其中说道：

“中国社会形成了新的资产阶级——特权阶层。中国现存的政权形式基本上是官僚机构，掌握官僚机构的特权阶层是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一座山。他们通过城市剥削农村来塞满自己的腰包，他们的高薪就是工农和知青的血汗。广大劳动人民与特权阶层的矛盾越来越尖锐，终于在毛主席的引导下形成文化革命的滚滚洪流。刘少奇所代表的特权阶层，十七年就为了复辟资本主义加剧了阶级分化。知识青年——农奴阶层的出现就是这分化的明证。知识青年被特权阶层压在社会的最低层，他们是特权阶层的廉价劳动力。他们成年劳动都养不活自己，他们上无片瓦，下无插针之地，他们劳动并不是不卖力，为什么养不活自己？是特权阶层通过种种巧妙方法，刮走了他们的血汗。他们看不到自己的前途，他们刚下去是有雄心壮志的，也作了吃苦的精神准备，但是现实呢？插队的就是变为小私有者的前景，办农场的就是养不活自己的生活。最近揭发出来的惊心动魄的事实中甚至有把知识青年当农奴搞变相贩卖。知青阶层和特权阶层的怪胎——联动的那些少爷小姐是我们社会阶级分化的一个最尖锐最鲜明的对照，

知识青年处在这种地位，他们对社会矛盾最了解，他们发现刘少奇正在把我们国家往资本主义拉，这种阶级分化现象不就是复辟的暴露吗？因此知青要求推翻压在他们头上的一座大山：复辟资本主义的社会根基——特权阶层官僚机构的统治，这乃是文化大革命暴发的真正原因和直接目的。”

“我们的社会制度有很多地方不完全是社会主义的，有些工厂是为新的资产阶级——走资派服务的国家资本主义性质的企业。有些农村，农民个人收入大于集体收入，以及出现同工不同酬的剥削现象。”

“这场革命的目的，就是推翻十几年来形成的新资产阶级——特权阶层在中国的统治。对这场革命反抗最力的是新资产阶级及其子女。”

以叶卫东为首的“湘江风雷”总部在11月24日发表声明，明确表示对“省无联”不予承认。而“青年近卫军”则干脆参加了省革筹小组领导的“工代会筹备小组”。

12月，湖南“省无联”发表了《我们的纲领》，提出：“特权阶级的出现标志着部分的生产关系已经变质，虽然经济基础总的来看还是社会主义的，但是整个庞大的上层建筑都基本只是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对于生产力的发展，上层建筑对于经济基础的发展起了严重的障碍作用，于是在中国已经进行的对经济基础的社会主义改造采取的是和平的方式，改造是不彻底的。对上层建筑的触动更少。因此，这次社会革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实质上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的真正开始。”

“尽管今年一月风暴揭开了向资产阶级司令部夺权斗争的序幕，但是夺权却被理解为对个别人的罢官，而不是对特权阶层的推翻，不是砸烂旧的国家机器，再加上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幼稚，政权仍然落在官僚们手中。夺权成了形式上的改良。”

“湖南要彻底革命，必须坚持彻底砸烂旧的国家机器的原则。当今的省革筹实际上是旧政权的翻版。对它也必须实行同样的原则。任何与这个原则相违背的揪人运动必定是改良主义的。”

其实，早在 1967 年 6 月 11 日出版的北京良乡电校“井冈山”主编的《四三战报》第一期上，就刊登了一篇署名为“湘江评论”的文章，题目是：《论新思潮——四三派宣言》，已经反映了这些观点。

文章的立论由毛泽东的一段话而来，是江青 1967 年 4 月 12 日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为人民立新功》中，引用毛泽东评论《触龙说赵太后》的一段话：“这篇文章，反映了封建制代替奴隶的初期，地主阶级内部，财产和权力的再分配，是不断进行的，所谓‘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就是这个意思。我们不是代表剥削阶级，而是代表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但如果我们不注意严格要求我们的子女，他们也会变质，可能搞资产阶级复辟，无产阶级的财产和权力就会被资产阶级夺回去。”

《论新思潮》的作者从这段话出发，加以引申发挥，对“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意义和动力、对象等做出了自己的另一番解

释。文章认为，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不断蜕化的当权派与人民大众的矛盾，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实质是采取一个又一个的变革行动来促使财产与权力的再分配，最后达到财产与权力的真正公有。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实质则是竭力避免财产与权力的再分配，再变革。

《论新思潮——四三派宣言》发表后，引起很大争议，受到“四四派”的批判。就是“四三派”的多数人也并不完全同意文章的观点，认为这个说法有点儿过了，与刊登遇罗克《出身论》的《中学文革报》的观点有点儿雷同。对人民的财产和权力怎么进行再分配?是否能说一帮学生就是最革命的?历史上有所谓“苍天已死，黄天当立”，“皇帝轮流做，今天到我家”，用一种口号向旧的掌权者叫板，但“四三派”能代表得了新生力量吗?

1968 年 1 月 2 日，47 军军长黎原将湖南杨曦光这些“极左派”红卫兵撰写的那些理论文章，加上“省无联”主要负责人、“高校风雷”头头周国辉所作的几次报告录音带往北京，报送给中央。

1月12日，湖南一中“夺军权”一兵，又写出《中国向何处去？》的文章，提出：“中国无产阶级和广大革命人民的胜利和新官僚资产阶级的灭亡同样是不可避免的。革委会被推翻，‘中华人民公社’诞生这一震撼世界历史的革命人民的盛大节日必定到来。‘极左派’公社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我们公开宣布：我们建立‘中华人民公社’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革委会的资产阶级专政和修正主义制度才能达到。让新的官僚资产阶级

在震撼世界的真正社会主义革命面前发抖吧！无产阶级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

“极左派”红卫兵们撰写的这些理论文章，导致中央高层对湖南“省无联”态度严厉急变。

周恩来原来从没看到过这些材料，而康生、陈伯达等人也是在 1 月 2 日后，同周恩来一起收到了 47 军报送来的有关“极左派”红卫兵撰写的理论文章等材料后，才发现了《我们的纲领》、《关于组织和建立毛泽东主义小组的想法》、《中国向何处去？》等文章。加之 1 月初，“高校风雷”成员给正在北京中央学习班“高校风雷”负责人红斗的一封谈形势的信，被“工联”查获上交。信中说到要与一个“陈老师”多商量，这个“陈老师”就是湖南大学教师陈光第，由此，又牵扯出一个学生背后的“黑手”问题。

本来，1967 年 12 月下旬，在北京参加学习班的红斗向周恩来建议“省无联”应派人来京进学习班，周恩来已表示同意。主持学习班的 47 军副政委李振军即向红斗、李仲昆索要拟来京人员名单，但李仲昆却虚与逶迤，并指示何建国：“到北京就回不去了，千万不要来。”

1月12日，“省无联”常委在“红旗军”总部开会，决定拒赴北京学习班，次日又拟组织赴京汇报团；但此前“红中会”的申学崧、汤建平等人已被47军用飞机送往北京，加上1967年10月第一批赴京人员，“红中会”的领导核心和总部骨干已基本离开长

沙。

1968 年 1 月 13、14 日，部分省无联“常委”与“湘江风雷接管委员会”在长勘院和省航运局连续就成立“省无联工总”召开会议并达成协议。16 日，“省无联工总”正式挂牌。当天，“湘江风雷接管委员会”组织赴京代表团，企图接回张家政、李仲昆，但此举纯属一厢情愿。

1 月 20 日，与周国辉私交甚笃的谢若冰自北京打来电话，密告将有大难临头。

面对省革筹参加北京学习班的邀请，“东方红总部”决心与反革命分子划清界限。1 月 20 日晚，“东方红总部”谢国凡带人去一中抓杨曦光，因杨曦光已去农村搞社会调查，未果，路遇周国辉。周国辉对其行动颇不以为然，并预言：“现在是镇压造反派的开始”。

1 月 22 日，参加北京学习班的“省无联”常委单位碰头商讨对策，眼见大势已去的“红中会”总勤务站成员申学崧、李昆明、汤建平宣布“红中会”退出“省无联”。但在长沙主持日常工作的吴春林等却异想天开地串联其他组织欲对“省无联”实行“接管”，以实现与周国辉、杨曦光、张玉纲的切割，全身免祸。

同日，周国辉在燎原电影院为一位在武斗中阵亡的知青举行的追悼会上发表最后一次公开演讲，声称“唯有新兴的无产者才有未来”，要“打倒官僚主义者阶级”“实现财产权力再分配”，随后便销声匿迹，直到半个月后在岳阳被捕，而“省无联”也开

始了其最后旅程。

1 月 24 日，湖南“省无联”举行了最后一次常委会，主持会议的是那位即使树起白旗也无人愿意前去受降的“红旗军”司令毕健。他开宗明义：“今天就‘省无联’如何搞下去，搞不搞？请大家提意见。”

有人主张“斗争”，毕健、唐志明则提出要组织材料，准备 28 日去北京向中央汇报。

但是，没有时间了，既没有“斗争”的时间,也没有“检讨”的时间了：就在当天晚上，自毛泽东、林彪以下的中央大员悉数到场，共同宣布了湖南“省无联”的死刑。

1月24日这天晚上，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姚文元、谢富治、杨成武、吴法宪、叶群、曹轶欧、黄永胜、张秀川、谭甫仁等中央首长接见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湖南班。

周恩来首先请康生先讲。康生说：“看了一个‘省无联’的纲领。总理向我介绍叫‘湖南省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委员会’，简称叫做‘省无联’。这个纲领是奇文，奇文就要大家共读一番。”康生将“省无联”的纲领和1967年10月1日的《中共中央非常委员会给全体党员的一封公开信》联系起来，他说：“看了‘省无联’的纲领后就感觉到：把反革命‘非常委员会’那封公开信公开化了，具体化了。”

中央甚至连杨曦光的父亲是谁也调查清楚了。康生说：“‘省无联’的文件我看得不多，我刚才说了，杨第甫的儿子、一中‘夺

军权’的头头杨曦光的文章没有看，只看了他们的纲领、周国辉的讲演、及同志们的介绍。我有这样一个感觉：他的理论，绝不是中学生，甚至不是大学生写的。他们背后有反革命黑手。像林副主席10月24日讲的，有刘、邓爪牙，彭、贺爪牙，有国民党反革命分子在背后帮他们的忙。同志们看看那些文章，也许同样还要证实我这个话。”

康生讲了“纲领”的第二部分引用列宁的话：“我们的国家机关……在很大程度上是很少经过认真的改变的旧机关的残余。这些机关，不仅仅在表面上稍微粉饰了一下，而从其他方面来看，仍然是一些最典型的旧式国家机关。”然后问大家：“我说这不是中学生、大学生写的。我可以证实一下，在座的同志们，知道不知道列宁这篇文章在哪一篇？什么时候写的？”

周恩来也问：“有没有人能够答复？”

众答：“没有。”

周恩来：“中学生答复不了，机关干部能不能答复？”

也没有人能回答。

康生告诉大家：“原来这篇文章是列宁在1923年，‘联共’党十二次代表大会的一个提议。这篇文章是中央为了改组‘工农检察院’写的。列宁写这篇文章，绝不是‘省无联’的理论先生们的意思，列宁讲的是当时苏联政法机关，镇压反革命不力，像我国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罗瑞卿一样，有坏分子占据了‘工农检察院’——公检法机关。他们在那里企图分裂工人、农民；他们

在那里企图反对党中央。因此列宁要改组检察院，要把旧的人员赶走，增加新的工人干部，所以他说没有认真改变，只是稍微粉饰了一下，仍然是一些最典型的旧式国家机关。‘省无联’歪曲、诬蔑了列宁的话，拿列宁的话来反对无产阶级专政，而列宁恰恰要改组‘工农检察院’，巩固苏联的无产阶级专政，这些话被‘省无联’的反动分子所利用，反对我们，蒙蔽你们，这真是罪该万死！我们要坚决反对‘省无联’歪曲、曲解列宁的话，把一切歪曲、曲解列宁的话的人彻底打倒！”

全场长时间热烈鼓掌。康生继续说：“如果同志们不相信，就请看一看《列宁全集》33卷，你们可以了解这些反革命分子的手段、何其毒也！他们利用中学生，利用青年对马列主义的无知，来反对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同志们都不知道这个东西，不晓得列宁这篇文章，所以我说这个文件绝不是中学生，甚至大学生所能写出来的。”

康生称“省无联”《我们的纲领》“是反对社会主义革命的，反对我们无产阶级专政，反对我们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反对当代的、最伟大的、创造性的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毛主席，反对世界人民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和他的光辉思想。这个纲领不仅反对当前的文化大革命，而且把整个中国几十年的革命否定了。”

然后康生逐条批判了《我们的纲领》。

接着，陈伯达讲话，他说：“‘省无联’就是大杂烩，是反

革命的大杂烩！”“今天这个大会，就是宣布‘省无联’彻底破产的大会！”

全场热烈鼓掌，呼口号：“揪出‘省无联’的坏头头，绞死周国辉！”

陈伯达：“不要绞死了，让他反省反省，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省无联’的文章和刊物，可能是反革命家伙代笔的，中学生，甚至大学生是写不出来这些东西的。这些大杂烩的胡言乱语，丝毫没有损害我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根毫毛，相反的，证明我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在胜利前进，其中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把那些在幕前、幕后的搞反革命活动的家伙暴露出来了。”

“我今天宣布：包括‘省无联’在内的许多大杂烩的组织，一定要按系统、按行业、按班级实行革命大联合。”

这时，江青突然说了一句：“还有什么‘青年近卫军’，让它到苏联去吧！”

## 第 955 回：成星散，湖南实行大联合　供少奇，武汉革委会成立

1月24日晚，几乎是与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接见湖南学习班同步，长沙一个来路不明的接管委员会宣布接管“省无联”，宣布开除并拘留“省直联”的孙君森、“高校风雷”的周国辉，矿冶“井冈山”的张玉纲，《我们的纲领》作废。并宣称“省无联”大方向是正确的。随之，“省无联工总”、“红工会”、“红旗军”、“红中会”、“红导弹”、“虎山行”等组织又发表口径不一甚至互相矛盾的声明，说《湘江评论》不是“省无联”机关报，而是由“高校风雷”、矿冶“井冈山公社”和“红中会”三家所办；《我们的纲领》是矿冶“井冈山公社”张玉纲一人所写，《中国何处去》是杨曦光的个人创作，均不代表“省无联”，惟对大方向正确与否，已不再提。然而，以此等表白和辩解之空洞贫乏，徒增话柄：所欲“拘留”之人，均系长期以来“省无联”要保护之革命小将，今日却要捉去见官，如何忍心下手？且在孙、周、张，包括杨曦光，早已在逃后，方宣布拘留，这到底是在演华容道还是在演捉放曹？《纲领》既然系个人行为，又何需“省无联”来宣布作废？“缚苍龙战团”《为‘我们的纲领’叫好》的大字报日前才上街，如今墨迹未干，这“废”又如何作得了？办《湘江评论》乃“省无联”1967年10月19日“省无联”常委会的决定，不称“机关报”而称“湘江评论编辑部主办”是此次常委会的欲盖弥彰之举，此事不提也罢，若非要在这大难临头之际出头撇清，

岂非“此地无银”,越描越黑？至于说《中国向何处去》系杨曦光一人所为，倒是事实。刘定安、毕健、李万翠几位断无兴趣与能力去与杨曦光一道搬厚如砖块的马列大部头，搞“新思潮”理论建设的。然而，杨氏“砸碎旧的国家机器”、“财产权力再分配”的思想，已经周国辉在其报告中多次公开宣示，你等为何不但不表反对反而时不时鹦鹉学舌？此时再想划清界限，迟了。

1月24日后不久,“青年近卫军”宣布解散。在其解散宣言中，有这么几句口号：“苏联不去！山头不留！继续紧跟毛主席闹革命!”

1月26日，康生接见湖南省革筹在京成员和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核心组时说：湖南的问题“关键在什么地方呢？就是阶级观点、敌我界线不是那么清楚。10月24日林副主席明显的讲了这个问题，就是有三种反动力量，一种是走资派，走资派应从彭德怀算起吧！还有周惠，再加上个周小舟。”

“国民党方面，湖南军阀是比较多的……”

周恩来插话：“四川以外，湖南第二，嫡系军阀也多。”

康生又提到聂元梓揭发的那个邓觉先，他说：“湖南军阀还牵涉到安子文。有个张振汉，安子文把他找来，他还有个老婆叫邓觉先，两个人都是特务。以后邓觉先又把他的妈妈、弟弟、妹妹都搞来，全家搬到了北京，经常去香港，香港也经常来人。张振汉还回到长沙，安子文在中央开了会，立刻向张振汉报告。邓觉先到中央组织部像到家里一样。你们想一想，特务能钻到中央

组织部来，你们组织里有没有钻进特务来？”

“从这里可以联想到：群众组织叫‘夺军权’，毛主席的军权，只有帝国主义、国民党、反革命才要夺这个军权。明明是革命群众组织，叫‘夺军权’，还打出招牌，公开的还有那样多的反动纲领，杨曦光的反动文章，周国辉的反动报告，《湘江评论》一期一期的那样出，非常疯狂地向我们进攻，受不到严重打击。同志们想一想，这是什么问题？有的同志说原因，这究竟是什么原因？这样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解放军，反对我们伟大的党，为什么在长沙有市场？这样为什么不造成混乱呢？道理的确是总理讲的。革筹小组应该深思一下，47 军的同志，你们也应该深思一下。我感到革筹小组也好，47 军也好，面临那样反动的东西，除了这次黎原同志来才看到这样的东西，我们从电报上没有看到这样的东西，这东西很不平常。阶级立场、敌我界线模糊。由于划不清，因此，批判软弱无力。那方面那样的猖狂，如果我们阶级观念不明确，文化大革命怎么能搞好呢？阶级斗争怎么能搞好呢？群众为什么不混乱呢！”

几纸示弱求饶的声明飘落于长沙初春街头的泥泞中后，湖南“省无联”即作星散。与此同时，几支势不能穿鲁缟之响箭仍然不屈的射出：

1 月 27 日，《湘江评论》第五期（油印版）在六中出版，随即贴上街头。顽固对抗中央“124”指示，发表《告革命读者书》、《评黎、华、章牌“群众专政”》、《芙蓉国里尽朝晖——省无联

战旗不倒》、《把省无联的战旗扛到底（代关于时局的声明）》等四篇文章，矿冶“井冈山公社”在绝望中仍发出“省无联的革命原则是决不能背弃的，她代表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方向”。

2 月 1 日，杨曦光在一封信中咒骂“康生是不折不扣的大党阀”，“我们的敌人不只周恩来，还有一帮大大小小的官僚”。

2月1日，中央领导再次接见湖南省革筹小组的领导干部和47军负责人，严厉批评他们对“省无联”“太软弱无力了”。康生当场拿出一张1月25日出版的《新长沙报》，指责报上的批判文章，说连“省无联”的名都不敢提，而还是以“XX联”代替。康生还指责他们对“省无联”的活动“没有阶级仇恨，这怎么能行，为什么这样？”“你们总觉得‘省无联’是革命群众组织，是认识问题。他们那样恶毒地反对毛主席，这是认识问题吗？夺军权也是认识问题？要重新建党、重新建军也是认识问题？……你说是认识问题，实际是包庇他们。同‘省无联’作斗争，是派别斗争，还是阶级斗争？自己不明确怎么教育青年人？这是两个阶级的斗争，不是两个派别的问题，不是派别斗争。”

周恩来也批评黎原，说对“省无联”的问题“你们熟视无睹。在全国反革命公开出报纸的只有长沙和福州。福州还敢反对他、批判他，而湖南连反对他也没有。”

2 月 4 日，“高校风雷”又抛出了《讨 124 批示檄》、《资产阶级司令部为何老是匆匆忙忙跳出来》两份传单，顽固坚持其既有立场，对抗中央领导 1 月 24 日接见湖南学习班全体成员时对

“省无联”的批判，继续炮打周恩来。

2月5日，长沙一中“夺军权”杨曦光、刘小兵发表《关于目前时局的严重声明》，继续最后的表现。

随后，“省无联”被湖南省革筹小组下令取缔。张家政、杨曦光等人被捕入狱。

与此同时，湖南省乘势取消各群众组织山头，实行大联合，分别加入工代会、农代会、职代会、红代会。长沙市工代会已于68年元月17日召开，“工联”、“湘江风雷”、“长沙工人”、“青年近卫军”等工人组织均解散，统一到“长沙工代会”里。

再说武汉，1967 年 10 月周恩来离汉回京后，武汉就紧锣密鼓地开始搞造反派的大联合，筹备成立“工代会”、“农代会”和“红代会”。在武汉军区司令员曾思玉、政委刘丰和武汉警备区司令员方铭、副政委张昭剑等人的领导下，造反派头头和军队干部一起在市政府招待所汉口滨江饭店开了多次会议。10 月下旬，武汉地区大中学校红卫兵代表在汉口滨江饭店开始了筹备工作，后来又转到了武昌首义路的省第二招待所。

12 月 13 日晨 4 时 50 分，周恩来总理秘书周家鼎给武汉军区曾思玉司令员打来电话，由曾司令的沈秘书接的电话：

目前各学校尚未联合起来，还是搞红代会。上面联合起来，促进和推动各校大联合，不要急于开红代会，看来不能超越红代会这一步。至于常委的问题，还是由大家（二司新华工、新湖大、新华农、三司革联、中学红联）出，上次都讲了嘛。二司提出的

学校出常委的意见是不适当，是不行的。

在此期间，虽发生了浠水“巴河一司”占领《湖北日报》社一事，各地武斗仍然不断，但都没有影响武汉大联合的步伐。经过多次会议协商，1968年1月15日，“武汉地区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大中学校代表大会”，简称“武汉红代会”成立。办公地点先是设在共青团湖北省委所在地武昌水果湖茶港，不久搬到湖北大学9号楼。

1月17日，又成立了“武汉地区革命工人代表大会”，简称“武汉工代会”，朱鸿霞任主任，李想玉、吴焱金任副主任，胡厚民等任常委。武汉“工代会”办公地点设在汉口解放大楼。

国务院、中央文革为武汉“红代会”、“工代会的成立分别发来贺电。

武汉“工代会”成立后，各个群众组织的山头并没有撤销，因此“工代会”代替不了原来的各个群众组织，也没有权威，下面的各级“工代会”成立时间先后不一，上级“工代会”也管不了下面的工代会。所有它仅仅是个过渡性质的组织，主要工作是促进各企事业单位成立工代会。各群众组织还没有消亡，朱鸿霞、吴焱金、李想玉等人也很少去武汉“工代会”，只有几个工作人员在那里坚守岗位，实际是个空架子。但它为成立省、市革委会打下基础，形成群众组织代表名额的框架。以后成立的省、市革命委员会，群众组织代表都是按照“工代会”、“红代会”成立时的主任、常委、委员分配比例为参照的。各群众组织的名额由

军区和警司的首长们决定，在经过与各群众组织负责人协商后最终确定下来，但各个群众组织参加省、市、区革委会三结合的具体名单是由各组织自己讨论决定上报。

各群众组织报上去的人员没有引起大的争议，但是对三结合中的地方干部却争得死去活来。

“钢派”提出结合到省里的干部是省委农村工作部主任任爱生，文革初期坚定地支持造反派，是支持“钢派”的干部。还有一位是结合到市里的宜昌地委第一书记杨春亭。

而“新派”主张结合的是原省长张体学、湖北省委候补书记姜一、黄石市委书记孙德枢、武汉市副市长薛朴若、及在文革初期坚定地支持造反派的中原机械厂党委书记、中央部属军工企业厅局级干部李长根等人。但“钢派”不赞成，他们在满街贴出大标语，提出“拥护曾（思玉）刘（丰）方（铭）张（昭剑），打倒薛（朴若）李（长根）孙（德枢）姜（一）！”

由于双方僵持不下，在武汉军区和武汉警司的调解下，最后双方都妥协了，这些干部都被结合进入了省、市革委会。

1968年1月18日，武汉军区临时党委批复了空降兵15军党委兼武汉警备区呈报的《关于建立武汉市革命委员会的请示报告》，同意成立武汉市革命委员会。1月20日，武汉市革委会正式成立，全市举行50万人参加的成立和庆祝大会。。

1月20日，中央领导接见北京学习班福建班全体人员。接见时，陈伯达说：

“我是支持韩先楚同志的，因为毛主席支持韩先楚同志，党中央支持韩先楚同志。韩先楚同志是福建前线的指挥官，你们不保，不支持，是什么意思？只有台湾高兴。蒋介石高兴。”

吴法宪也说：“党中央、毛主席、陈伯达同志是保韩先楚的，你们要打倒。你们不是说，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保卫中央文革，保卫毛主席革命路线，你们这样做，是听毛主席的话吗？”

1月22日，《人民日报》就武汉市革命委员会成立发表评论员文章《向英雄的武汉人民热烈祝贺》，这对于一个非省、市、自治区级别成立的市革委会来说，非常罕见。

曾在 1929 年任奉天商埠警察三分局差遣班长陈元祯，参加过审讯当时被捕的刘少奇。他于 1968 年 1 月 23 日交代关于刘少奇 1929 年自首叛变的情况：

对一九二九年奉天纺纱厂逮捕共产党案件的交代

我原名叫陈元祯，现名陈冠英，一九二九年在奉天警察商埠三分局处理过奉天纺纱厂一起共产党案件。捕人以前纱厂出现工人闹罢工，我们去纱厂，厂里卫队把我们领到一个屋里，李春藩、杨树忱也在，这时开始准备刑具过堂，第一个过堂的是个胖子，白脸中等个；随之又提来一个中等个，圆脸平头；第三个过的是高个子，瘦子黄脸，关里口音。经审问动刑三人均承认是共产党，并供认了地下党的组织，其中一个承认是组织部长，一个承认是省委书记，还有个说是支部书记。第二天上午八点钟纱厂把被捕三人送到了警察商埠三分局，根据分所的公文和笔录一个一个的

进行了复审，被告三人均在笔录上划了指押。后把三名犯人送省会公安局司法科了。

此材料是我亲口提供。

陈元祯

1968 年 1 月 23 日

## 第 956 回：众领导，接见江苏代表团　佩枪行，许世友回到南京

1月2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以中发［68］18号文件对南京军区党委“检讨报告”批示：

南京军区是中央所信任的，他们过去是跟着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林副主席走的。自从他们积极响应毛主席的号召，介入地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广大指战员在“三支”“两军”工作中，做出了很大的成绩。但在一个时期内，在“支左”工作及对待军内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单位的处理上，也犯了严重的错误。这些错误，他们已经或正在改正。在有的地区（如无锡、南京），已见到显著的成效。中央认为，这个检讨报告态度是诚恳的，认识是深刻的，中央同意这个检查。

1月28日，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姚文元、谢富治、吴法宪、汪东兴、李作鹏等人在人民大会堂接见江苏赴京代表团。周恩来一开始就问他们：“你们还对立吗？”

有人答：“我们联合了。”“现在已合成一个代表团了。”

周恩来：“江苏离上海那么近，张春桥同志和姚文元同志去过南京一次，做了推动，今天总算有了良好的开端。”

康生：“南京到上海只有五、六个小时的行程，就相差一年。”

姚文元：“一个是大联合夺权，一个没有大联合夺权。”

周恩来：“一派夺权未夺好，就差在这里。现在江苏主要地区南京、无锡、常州、苏州、南通、扬州、连镇江7个地区已达

成协议，有的是大联合协议，有的是停止武斗协议，数目是相当可观，连交通方面的加在一起，共达成37协议。这是大家认真研究的结果，所以有了良好的开端。我代表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庆贺你们！”

大家高呼口号：“毛主席万岁！万万岁！”“敬祝林副主席身体永远健康！”

接着周恩来宣讲了中央对南京军区检讨报告的批示，在宣读中央批示的第一段后，周恩来说：“请同志们注意，头一句话肯定了南京军区是中央所信任的。”

周恩来肯定了中央对许世友、杜平是放心的，还特别提到了许世友的革命经历，肯定了南京军区在“三支”“两军”中取得的成绩，同时也指出在去年支左中，有些部队犯了支持一派，压制另一派的错误。他说：“大军区犯的错误已经做了检讨了，中央认为态度是诚恳的，他们的错误已经或正在改正，有的地方已经做出显著成绩。如无锡吧，27军过去有错误，和地方一派对立，现在也推动和促进了革命的大联合，表现很好。今天不仅王挺副军长在这里，而且把尤太忠军长也请来了，他在无锡支左工作做得很好嘛！你们欢迎不欢迎？”

无锡代表答：“欢迎。”同时呼口号：“向解放军学习！”“向解放军致敬！”

周恩来：“你们到这里四个多月了，通过学习，推动了大联合，消除派性。派性有个根子，江苏的派性根子，从群众组织来

说，是南大。南大造反早，是一面造反红旗，斗匡亚明嘛！全国四个大学，康老已讲过，就是北大、南大、郑州大学、西安交大。南大夺权以后，把自己的战友分成两派，斗了很久。去年12月底，中央呼吁你们总算联合起来了。中央专门对这个协议写了个批示，鼓励了你们。南大的联合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脱钩，不干涉工人运动。南京的产业工人不少嘛！数目相当大，总是比大学生多嘛！工人要站到前头来。尽管学生起了先锋作用，但在夺权时主力军是工人、贫下中农。学生要与工农结合，权才能夺好。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青年是先锋嘛！但革命知识分子总是要同工农结合的，要向工农群众学习，逐步掌握毛泽东思想。错误是难免的，知错就要改。现在我再要求一点，南大既然联合了，就要带头，不要干涉工人运动。南京三方面的工人‘大联筹’小组在五台山召开大会，落实大联合，这个很好嘛！军队也去了。‘大联筹’讲了话，讲话时，就冲杀出来一股什么‘捍联’，哪里钻出来的？我们中央不承认嘛！这里没有代表嘛！”

康生：“是破联。”

周恩来：“是呀，不是‘捍联’，是破联了。这里总有人在后面捣鬼，我今天不想点名了，总是有人嘛！”

“求大同存小异，大同就是要在毛泽东思想原则基础上联合起来，大同就是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大同就是你们达成的协议。在一些小问题上，就不要去计较了。比如镇江达成了停止武斗的协议，因为‘联委会’抓了‘三代会’两个人，‘联委会’已经

答应放，只是电话打不通，他们在焦山嘛！省军区要去做工作，省军区也是两派嘛！有接近‘联委会’的嘛！把人送到‘三代会’嘛！这是我出的主意。”

“还有苏州、南通这两个地区不肯签字，就是对‘苏革会’，南通‘革筹会’承认不承认，争论很久了。‘苏革会’已经行使权力很久了，但面不够广，应该充实，扩大，调整，使没有参加的参加进去。已经在‘革委会’的，应该欢迎没有参加的人进来。应高姿态允许给他们适当的数目。我听说有的愿意同等数目，这很好嘛！另起个名字没有必要。已经达成大联合协议，不必要推倒重来嘛！南通‘革筹会’，对方反对，现在达成了协议，要扩大，还争论承认不承认，现在还是‘革筹会’，答应同等数目，就解决了嘛！这在大原则上可以达成协议的，因为大家都说了嘛！问题要向前看。其他都达成协议了，就是一个名称问题，应该得到解决了。”

“总有坏人钻空子，挑动，如南大‘827’原来很相信高啸平，后来要他回统战部去检讨，他就不高兴了，过去把你们分成两派，现在又在你们内部制造分裂。”

康生：“现在他反对曾邦元咯！”

周恩来：“现在你们撇开他，他又挑拨咯！这种人他有个人企图，个人野心，因此我们要点出来。这两个人都叫‘平’，一个是高啸平，一个是杜方平。”

康生：“有的人自己叫‘平’，实际上不公平。”

周恩来："我们点了两个人的名，回去不要互相指责。你要指责，他要自卫，武斗就发生起来，搞这些东西不利于团结和联合。各方批评自己，这样才有利于江苏的革命大联合，有利于促进革命的三结合。我看江苏在你们的努力下，一定有一批干部可以站出来，现在军队有，革命群众有，就是要推荐一批地方干部，关键要解放几个负责干部，你们自己要共同商量，要靠你们的努力。现在无锡、南通、常州、扬州、苏州、镇江都有人来，有两个分区没有人来，一个是淮阴，一个是盐城，希望你们去转达，给他们一点好的印象，推动推动，但是不要去指挥人家，只能做帮助工作，真正的事要靠他们自己去做。"

康生："淮阴有反革命组织，什么'中国劳动党'，什么'新共产党'。"

周恩来："江苏暗藏的反革命不会少，是国民党的首都嘛！留下的人不少，买办阶级影响很大，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地方，不可能没有暗藏的反动组织活动，还有没改造好的地富反坏，还有党内个人野心家，这一点希望你们注意。我们要眼明心亮，要提高警惕，部队内也有坏人。站出来的干部也要勇于揭发，明知道有人是叛徒，就应揭发嘛！这样就能坚决地把一小撮阶级敌人的根子挖掉。最近上海揭发的反革命集团，根子就在苏南嘛！这是报纸上登了的嘛！南京《新华日报》就要办这样的报纸。否则会把群众引到错误道路上去。"

"江苏究竟是中游，还是下游，看你们自己的努力。现在成

立革命委员会的，已经有12个省、市了，河南已经开会了，报纸上过两天就要发表。江苏12个以前已经是没有希望了。河北、吉林、湖北、浙江、广东，这几个加上去，就是17个省、市了。”

康生：“新疆也快了，形势很好，你们江苏不能落在新疆的后面，第18个了。”

姚文元：“春风已到玉门关了，江南反而落后了。”

周恩来：“姚文元同志也是半个江苏人。”

康生：“春风也吹到你们紫金山嘛！”

周恩来：“春风吹到紫金山好不好？”

众答：“好！”

接着，康生讲话。他首先肯定了许世友，说：“我对许世友同志说好话，今天是第三次了。”“南京有人讲，许世友反对毛主席，这恰恰相反，许世友同志在历次重大斗争的关键时刻，都是紧跟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的。他无论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是有很多功绩的。这一方面，我同他一道工作过，有责任向同志们介绍。”接着，又肯定了南京军区各部队在支左中的成绩，然后说：“要实现革命的三结合，就要解放一批干部嘛！文凤来同志，你们想过没有想过呀？你们能不能成立革委会或革筹小组？”

文凤来答：“没有干部。”

康生问：“在省委书记里面有没有能够站出来的啊？排一排看。”

文凤来答："没有。"

康生："我在这里不是指名，瞎点一下，不是暗示你们的，张仲良怎么样？许家屯怎么样？你们自己要议一下哟，革命筹备小组搞不搞得成？曾邦元同志，你们考虑怎么样？"

江青："省委委员也可以嘛！"

姚文元："省委委员，常委里面怎么样？"

曾邦元、文凤来分别谈了自己的看法。

周恩来说："不要争了，联合审查嘛！"

姚文元："去掉派性就好审查了。"

有代表说："现在南京抓干部很多。"

周恩来："你们要说服他们不要抓。"

康生："联合审查嘛！另一方面，要给人家机会，你站出来就挨打，谁敢站出来？"

有代表说："抓的人三方面讨论要放，联合起来审查，电话还没有打回去。"

江青："今天晚上就打电话回去，三八作风嘛！不要拖拖拉拉的，大家同意不同意？"

众答："同意。"

周恩来："杜方平也不能再搞军管会了！他犯了错误，一直不检讨，要中央点了名再检讨，好呀！现在点了名了，你应该检讨了！"

康生再次点了高啸平和杜方平的问题，他问杜方平和林杰有

什么关系？并说：“林杰是你的部下这个我知道。我们要问你在文化大革命中和他有什么关系？”

江青点了中央文革记者站驻南京的记者邢文举，说：“邢文举你对高啸平搞了几个月，我们上了你的当，你不是冷静地客观地反映问题，而且非常主观的，我们不包庇我们派出去的任何一个记者，反正你的话不诚实，你留下来，你犯了什么性质错误，你自己检讨。”

周恩来：“江青同志要求很严格，无产阶级司令部派出去的人做错了事，要很好检讨。”

杜方平谈他与林杰在文革中的来往情况，当说到1967年4月份写过信给康生时，康生说：“不是给我写的信，而是给林杰写的信。你是叫朱念州怎么样找林杰的？你不要装糊涂了，我这里有信，你叫林杰去找朱念州发生关系，插手江苏文化大革命，你在这里搞什么名堂？另外，还有关于何朴的问题，何朴是科技大学的，冒充中央文革调查组，你同他勾勾搭搭干什么？何朴唯一的目的是去打倒许世友，你就是打倒许世友的黑后台！你是解放军，你却组织人把矛头对准我们解放军，你是什么解放军？！”

杜方平站起来辩解，江青喝斥到：“你不要解释了！”

周恩来：“你回去检讨吧！”

江青讲话后，周恩来说：“最后一点，还有军队的问题，搞四大的单位的两派也要联合起来，再不要继续派斗下去了。21位代表在京西表现很好，继续保持下去。在军队内部没有根本的

利害冲突，三团两队等搞四大单位，能不能联合？”

众答：“能！”

周恩来：“不要再搞什么平反团，平反组织了，王必成同志已作了检讨，搞那五条是错误的，改了就好了，不要搞那些形式主义的东西了，什么一级级平反，什么戴红花，一个个的赔礼道歉！”

“我们代表中央文革，对过去受压制的，搞错了的，宣布一律平反。你们回去都传达一下，平反组织不要再进行了。”“你们不要把派性搞到地方革命群众组织里去。什么‘高参团’、‘心中司令部’、‘地下司令部’，这是国民党那一套，统统取消，打倒派性。”

第二天，许世友即飞到上海过春节。春节过去了，许世友急不可待，登上了从上海开往南京的列车。这天，他穿上一套新军装，腰间扎着皮带、挂着小手枪。在他身边的工作人员，一看这幅装束，就断定：许司令肯定是别有用意。

列车到达南京下关。许世友一反常态，不急于回军区大院，也不坐专程接他的小轿车。而是迈开双腿，步行走出火车站。只见他英姿焕发，精神抖数，雄赳赳气昂昂地快步行走在南京大街上。跟随着他身后及两旁的大小官员，还有军队和地方上的安全保卫人员，加上跟在官员们后面慢慢行驶的各类小轿车，前呼后拥，浩浩荡荡，形成了一道颇为壮观的风景线。

许世友的出现，吸引了大批南京市民，纷纷拥上街头看热闹。

街道两旁很快排成夹道欢迎的人群。有人还喊着口号：

“许司令是我们的好司令！”

“向许司令学习！向许司令致敬！”

此景此情，使许世友也很受感动，频频点头微笑，挥手致意。洋洋得意地说：“我离开南京半年多了，今天总算回来啦！有一派要打倒我，有一派要保我，究竟许世友是个啥样子，恐怕许多人都没见到过，现在就让大家亲眼见识、见识吧！”

许世友步行在南京街头的消息，立即传遍了石头城，引起种种不同的反响和评论。

按照许世友指示，南京军区召开机关干部大会，许世友在会上讲话。他说：

“这几个月，我不在南京，军区某些领导人不怀好心，跟造反派站在一起，妄想乱军夺权。今天我要公开点名了，就是王必成、林维先、鲍先志，他们未经军区党委讨论，也未向中央报告，私自抢先表态，同那些乱军分子穿一条裤子，唱一个调子，说我们去年二月抓人错了。我说，没有错。部队在任何时候，都离不开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头一条是一切行动听指挥，你不听指挥，我还不能执行纪律吗？我要抓的那些乱军分子是坏人，抓起来有什么错？”

很快，南京大街上，贴出大标语：“王、林、鲍是倒许、乱军、夺权的黑后台”。

## 第 957 回："内人党"，河北革委会成立　不甘心，徐州铁路桥被炸

2 月 4 日晚 21 时许，内蒙古自治区革委会主任滕海清和常委李树德来到钓鱼台。

在 8 号楼宽敞的客厅内，中央文革小组的康生、江青等人接见了滕海清一行。接见一直持续到深夜 12 时。

滕海清和李树德先汇报了内蒙革委会成立以来的工作情况，特别是"挖肃"运动的进展情况。当提到革委会委员王再天时，康生插话说："王再天这个人很阴险，他是苏修特务。内蒙古是否还有别人？王再天不仅是苏修特务、张学良的忠实走狗，而且可能是个日本特务。"

王再天是哲盟科左中旗人，蒙古族，早年参加东北军，任少校联络参谋。1936 年加入共产党，任东北军上层工作委员会委员，开始了地下工作。他于 1946 年调入内蒙古工作，任中共内蒙古工委社会部长。解放后任内蒙古军区副司令员，后任自治区党委书记等职，分管政法工作。

这时，江青插话说："我在北京文艺界做的报告，北京没有动起来，文艺界的坏人没有挖出来，内蒙古倒动起来了，他们通过文艺界的深入斗争，使整个运动深入前进了一步，挖出了这么多坏人。"

江青接着说："内蒙古阶级斗争比较复杂，革命群众挖出了一些坏人和一些反动党派组织，群众专政指挥部是个好形式。内蒙

古革委会成立以后，抓了阶级斗争，工作做得比较深入扎实。青海革委会成立后，抓了整党建党，各有特色。”

康生对滕海清等人指示说：“乌兰夫影响很大，流毒很深。首先应在部队内肃清。一方面对乌兰夫进行批斗。同时大揭王逸伦、王锋，这样群众就知道我们不是反对蒙古族。蒙古族的坏人发动蒙古族的群众去揪斗，这样更有利。”

滕海清和李树德点头称是，康生又说：“内蒙古地区苏修、蒙修、日本特务不少。‘内人党’至今还有地下活动，开始可能揪得宽点，不要怕！”

滕海清回到内蒙，即公布了乌兰巴干提供的几个关于“内人党”的铁证，包括文革前内蒙古曾经发生的“206”案件和“43人委员会”，还有 “陶、那、松”案件、呼伦贝尔盟的“统一党”和“真理党”等民族分裂性案件。

2 月 6 日，自治区革委会负责人召开碰头会，认为“内人党”在 1947 年的“五一”大会之后，仍有地下活动。为区别起见，此后的“内人党”被称作“新内人党”。滕海清说：“内人党在1947 年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之后停止了活动，以后就潜伏下来，转入地下，成为乌兰夫的暗党，六十年代以后，乘国内外阶级斗争形势的变化，为了配合帝、修、反的反华大合唱，为了实现其叛国投修的目的，猖狂活动起来，在组织上有了很大发展。”

2 月 13 日，中共内蒙古革委会核心小组成立，滕海清被指定为组长，吴涛、高锦明为副组长，成员有权星垣、李树德、杨

永松和李质。

15 日，在各盟市的汇报会上，高锦明代表自治区革委会及核心小组讲话，着重谈了“内人党”的问题。他先把原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的下属组织内蒙古人民革命青年团抛开，认为这个组织不存在问题。然后，把“内人党”的历史分作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 1925 年在张家口召开成立大会到三十年代；第二阶段：从 1945 年日本投降后恢复活动到 1947 年“五一”大会宣布取消；第三阶段：从“五一”大会后转入地下。

高锦明说，前两个阶段的“内人党”没有问题。只有第三阶段的“内人党”才是“挖肃”对象，而“内人党”在第三阶段存在的铁证就是“206”案件。

尽管内蒙古革委会领导成员对挖“内人党”跃跃欲试，但他们仍然试图掌握政策，因而设置了四条“防线”：一、“内人团”除外，不属于“挖肃”对象；二、第一阶段的“内人党”除外；三、第二阶段的“内人党”除外；四、只有在第三阶段加入“内人党”的旗县以上干部才算反革命，旗以下的普通党员则可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因为“内人党”于 1945 年恢复活动时，曾决定支部建立在旗上。

2 月 18 日，内蒙古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召集各盟市革命委员会领导人会议，部署开始挖“新内人党”。一场轰轰烈烈的深挖“内人党”的运动就这样在内蒙古大草原上拉开了序幕。

1968 年 1 月 16 日至 28 日，受中央委托，北京军区在京举

办了学习班和河北省革命委员会筹备会议。

1 月 28 日，北京军区代司令员郑维山、政委李雪峰联名签发致毛泽东及中央的《北京军区关于建立河北省革命委员会的请示报告》，建议在省革委会成立同时，省会由保定迁至石家庄，理由是“石家庄市的文化大革命走在了全省前头，工人阶级队伍比较坚强，可以形成全省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翌日，1 月 29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即发文批准郑维山、李雪峰成立河北省革命委员会的报告，并同意将河北省省会由保定迁到石家庄。

1 月 30 日，正是农历大年初一。虽是一个晴天，但空气清冷。早晨，一支 25 辆小车组成的车队从保定市区悄然开出，一路往南而去。深冬的冀中大地，苍茫悲凉，一望无垠。这支由吉普和轿车组成的车队，绵延百余米，在空旷的原野上卷起一路黄尘。

坐在车上的，都是省里的干部，分别来自中共河北省委、省人委、省军区以及一些省直单位。车队出市的时候，大家不约而同地回望保定这座动荡的古城——几天之后，这里将不再是河北省的省会。

不及两载，河北省省会三易其坡，从天津到保定，又到石城。

石家庄是 63 军军部所在地，河北省革委会组成人员中，63 军军长张英辉、河北省军区司令员马辉、政委曾美同为副主任，而其他各驻军首长，包括 38 军军长李光军，则只是常委。

2月3日，农历正月初五，石家庄洋溢着浓浓的节日气氛，这

天上午，东方红体育场锣鼓喧天，彩旗招展，庆祝河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的大会在这里召开，宽阔的体育场上黑压压地站满了人。领导讲话后，举行了盛大的庆祝游行。从此，石家庄成了河北省的省会。省革命委员会办公地点位于维明路南头原华北警校和石家庄市六中院内。省革委最初本着“精兵简政”的原则，未完全恢复原有的机构，仅设有政治部、生产指挥部和办事组、保卫组、秘书组。

2月5日，谢富治谈清理阶级队伍.他说：“我看江青同志给文艺界的讲话，指出要他们揪出坏人，清理阶级队伍。我看这讲话很好，起了很好的作用。不仅文艺界、学校、工厂、机关，尤其是大学，也很适用。”

2 月 5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转发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关于深挖叛徒工作情况的报告》，批示中指出：“刘、邓、陶、及其同伙彭、贺、彭、罗、陆、杨、安(子文)、肖(华)等叛徒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长期隐藏在党内，窃取了党政军领导机关的重要职位，结成了叛徒集团，推行招降纳叛的组织路线……”

2 月 6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下发关于进一步做好清查敌伪档案工作的指示。

我们再说徐州。

1967 年 12 月 23 日，徐州“踢派”在徐州召开了一个欢迎“支派”回徐州大会，“踢派”头头杨正祥、杨卫东、王宜玺等

人与返回徐州的“支派”头头相继发言，握手言欢，努力营造一种两派“大联合”的热闹景象。

1968 年1月上旬，徐州“支派”头头田超前往北京与“支派”派赴北京的黄其甲商议行动计划。返回南京后，田超于17、18日召集在宁“支派”头头秘密商议，制定了一个三路行动方案：一路由吴方新带领，先期进城占据徐州军分区大院，掌握68军情报，伺机抢枪并攻占邮局、印刷厂；一路由田超、张晓阳、胡小柱带领，在徐州南郊渔沟、桃山集等地秘密集结，必要时实施破路炸桥行动，一方面制造事端引起中央重视，另一方面阻断徐州“踢派”与山东、安徽及苏北同盟者的联系；一路由马吉昌带领留在南京，等战事爆发后大造舆论，将责任归咎于王效禹和“踢派”，争取江苏省军管会和中央的支持。不久，黄其甲又从北京打电话给南京“支派”头头，催促他们尽快实施炸桥破路行动。

1月下旬，“淮大八三一”头头吴方新按计划返回徐州，与徐州“支左指挥部”交涉“支派”返回徐州事宜。

1 月23 日，徐州“支左指挥部”向他转达了68军军长张铤秀的电话指示，表示欢迎“支派”回徐州，但不能集体住宿，要回到各单位。这实际上意味着，“支派”返回徐州的首要前提是承认“支左指挥部”和“踢派”掌权的现状，彻底放弃对抗。吴方新随即返回南京向“支派”头头们通报交涉结果。他们一致认为无法接受这样的结果，于是决定采取极端行动。在南京教育学院举行“动员誓师大会”之后，数百“支派”成员陆续前往徐州

南郊实施事先制定的行动方案。

1 月 29 日，也就是农历的腊月 30 除夕，徐州“淮海 831”少部分人开始策划在徐州外围爆炸铁路桥。

2 月 1 日，田超在徐州南郊金庵村召开会议，正式下达炸桥破路命令。

2日凌晨，一些“支派”成员在桃山集附近炸毁铁路桥4座，公路桥2座。在此前后，他们还抢劫客车2次，货车5次，向护路部队抢枪4次，抢得枪支47件，致使徐州至南京浦口火车停运85小时，徐州至郑州停运83小时，华东铁路系统一度瘫痪，实际经济损失无法估量。

2 月 4 日上午 11 时，铁道部军管会生产指挥部向总理值班室汇报徐州地区铁路运输中断的情况：“2 月 2 日，桃山集至三铺站间铁路被炸坏一处，徐州到桃山集、曹村、大粟园的调度电话中断。这样，徐州至蚌埠间客货运输中断。2 月 3 日，徐州以西的徐州北站至夹河寨站间老黄河桥被炸坏，陇海线中断。”

当晚 23 时，国务院信访室接到的由河南开封 54 次列车全体旅客拍来的电报：“因郑州以南桥梁被破坏，火车已在开封停车 27 小时，要求中央火速解决。”

周恩来得知上述情况后，与有关人员紧急磋商，决定采取紧急措施。他严厉批评：“谁参加炸桥谁就是反革命。”

当夜，周恩来向毛泽东写了书面报告。其中写道：“像另纸所报破坏铁路情况，在徐州、蚌埠、郑州、连云港十字线上为最

甚。次之，为衡阳、柳州、广州三角线上。再次，为西南昆明、成都一线。现在这些破路、破桥行动，已超过派性，而为反革命特务分子混入一派或两派中进行的，因此，目前必须首先责成济南军区调集机动兵力，从济南、蚌埠（12 军）、开封（1 军）各调一团交 68 军统一指挥，沿线夹击。一经发现这股反革命集团，便需进行围攻和追击，务须做到政治进攻、军事包围两结合，逼其全部放下武器，然后区别对待，将坏头头反革命分子与被胁从的群众分开处理，并须就地发布公告，宣布这一破坏铁路、炸毁桥梁的行动完全是反革命行为，必须实行专政措施。”“这一措施拟不待全国统一军事部署护路护桥的命令下达前，在今晚提前实行。碰头会各同志同意这一意见。妥否，请予批示，以便立即下达命令，并在明早补报林副主席。”

毛泽东批示：“完全同意。退总理办，并告林彪同志。”

2 月 6 日凌晨，中央、国务院、军委、中央文革联名以中发[68]26 号文件发布《命令》，也称《中央二六命令》。《命令》明确指出：“破坏铁路交通，炸毁桥梁建筑，袭击列车，杀人劫货，这是一种反革命的土匪行为，必须采取断然措施，决不能再承认他们为革命造反派。”要求担任护路和铁路沿线的解放军和公安人员，对破坏铁路、炸毁桥梁、袭击列车、杀人劫货的反革命行为，要立即采取行动，军事包围，坚决镇压和逮捕。“如遇有破路、炸桥、劫车、杀人的反革命土匪进行抵抗和逃窜时，必须进行追击，务期达到聚歼目的。”

当天，68 军张铿秀军长和空 29 师表态对“踢派”的支持。空 29 师的表态中央电台进行了广播。

到了 2 月 8 日，徐州除了东陇海线还通车外，其它三个方向的铁路大桥均被炸毁，铁路交通一时陷于瘫痪。

按照中央军委部署，济南、南京、武汉3个大军区野战部队各派一个团围剿炸桥的徐州“支派”。武汉军区下属驻河南的1军2师5团接到命令，行动最快。南京军区12军、济南军区68军也各出动一个团，3个团统归68军指挥，在徐州南郊和西郊一带围捕有关人员。结果，参与破坏行动的“支派”头头中，张晓阳等人在与围捕部队遭遇时发生交火后受伤，与吴方新等人被捕。田超化妆逃脱，在东北某地藏匿，几个月后才被抓获。

炸铁路桥的一帮人很快被清剿，军委调驻在青岛附近即墨县马山的 67 军 199 师 595 团赶赴徐州，负责保卫徐州铁路分局管辖范围内津浦和陇海两大铁路线交通运输安全。595 团急速从马山营房经城阳火车站乘专列直奔徐州，部队除了进驻江苏的连云港、徐州等车站外，还进驻位于安徽的津浦线符离集车站和陇海线砀山车站。

68 军随即派人组成一个“特别集训队”，负责看管和审讯被捕获的涉案人员。根据“特别集训队”不久后提交的审讯报告，这次炸桥坡路行动共涉及 327 人，其中 28 人来自安徽，299 人来自徐州。在这些人中，属于煽动、策划、指挥者 14 人，受蒙蔽群众 109 人，军队涉案人员 170 人。“特别集训队”在报告中

拟定的处理意见包括：（1）按照军地分离的原则，军队人员另案调查处理。（2）绝大部分涉案的一般“支派”成员，分批释放回原单位“抓革命、促生产”，但马吉昌等 9 名为首者拟逮捕法办。另有若干为首分子拟逮捕法办，或者交群众管制劳动。还有一些为首分子如吴方新等人因认罪态度好，有检举揭发、立功赎罪情节，从轻处理。

这份报告被逐级上报至68军党委、济南军区和中央军委办事组。周恩来和代总长杨成武基本同意上述处理意见。杨成武在传达周恩来的指示时说：要按照具体情况、具体布置大胆干。要快要好。……所抓到的人一律不放。送到适当的地方，搞清幕后策划者。

68军党委根据中央和济南军区指示，决定由副政委刘汝贤挂帅，军政治部保卫处长王涌泉具体负责，再次对捕获人员进行审讯。

这次审讯发现，68军司令部作战处参谋王致祥等在接到《中央二六命令》后，第一时间便通过军内其他部门人员向“支派”头头发出警报。后来，他们又通过同样方式将围捕部队的调动和部署情况透露给“支派”头头。

进一步的审讯还发现，68 军、徐州军分区、徐州市人武部的部分“支左”人员与“支派”一直有接触，参与过“支派”挑动武斗和抢劫枪支的密谋。还有人揭发，围捕部队曾在行动中抓获了 68 军副军长吴怀才的夫人高×。后来在 68 军的秘密干预下，

高×被悄悄放走。还有人揭发，徐州军分区副政委刘显模在炸桥破路行动之前，参加过“支派”在南京举行的动员誓师大会，在大会上做了鼓动性讲话。关于刘显模的揭发材料上报中央后，周恩来立即命令南京军区逮捕刘显模，用专机押送到徐州，移交给济南军区专案组。许世友执行了中央的命令。

鉴于68军和其他驻徐部队均有多人卷入“支派”破坏活动，济南军区下令在山东潍坊设立特别军事法庭，由军区直接派出专案组负责进一步审理工作。但是在案件移交之前，68军副军长郑统一指示“特别集训队”负责人销毁了原始审讯记录。因而潍坊特别军事法庭的审理最终不了了之，军内关押人员在7月份被全部释放。

1968 年 2 月 21 日，济南军区根据周恩来的指示，组建“济南部队连云港市支左指挥部”，到连云港市主持工作。

## 第 958 回：二月八，北京五十五启程　《赠战友》，挥手豪情别红城

2月8日，康生在京西宾馆接见吉林省群众组织代表、专案组部分人员和军队代表。

一见面，康生就说："同志们好，同志们辛苦了，你们吉林省革命委员会很快就要成立了。你们能不能争取第15名？现在已经有14个单位了，看你们是第15，还是广州第15，要竞赛了。可不要落后。你们的条件是比较成熟的。"

康生问："代表回去了吗？"

答："各地区的回去了，长春的没回去。"

康生："长春的还没有回去。总理让你们把干部问题解决一下，所以你们不回去。现在一共还有多少人在这？"

答："18个。"

接着，康生一一询问每个代表的情况，然后说："今天请同志们谈谈，到底你们革命委员会什么时候成立。你们有没有个打算？现在你们的形势很好。条件基本上成熟。"

"现在的问题是什么呢？想和同志们谈一谈。是干部问题。干部问题你们经过讨论有几个解放了。有几个干部这一派那一派有些意见，怎么能够很快地在这问题上达成协议，使他不阻碍革命委员会的成立。据联络员同志讲，阮泊生、郑季翘几派的意见还不完全一致，还有对宋振庭、宋任远的意见不一致，其他的意见不很大。这4个同志，我想在干部问题上今晚和同志们交谈交

谈，帮助同志们把思想解放一下，不要因为这个问题阻碍革委会很快成立。”

接着康生和代表们谈了对一些干部的看法。

“阮泊生问题，你们说有个党籍问题。光看这个问题不行。要看他的整个历史。我不认识这个同志，不能光看一时一事。阮泊生38年入党了吧，填表是真的吧，48、58、68、30年，30你们不看，就咬住那一个时期，这是不对的。”

“郑季翘我接触过几次，这个同志是不是没缺点，没错误呢？那不是。人只要做工作，总会犯这样或那样的缺点错误。要看他的大体。他大体对陆定一的中宣部，对周扬的批判。他有他的长处，同志们，你们知道啰，他是批判了周扬从苏联贩卖来的形象思维论的。他和陆定一阎王殿中宣部是有斗争的。”

“赵林是个老叛徒。”

“富振声，这是我知道的，我在莫斯科，他去，我审查的，这个人不但和陆定一的关系很恶劣，我估计他个人历史上也有问题，他从东北到莫斯科这一段有问题。”

“还有李砥平，是叛徒。”

“粟又文，省长，这个人是个‘民主人士’，我接触过，问题很大。”

“宋任远我不认识，据说他在统战工作上反对李维汉、徐冰的路线，也执行过也反对过。”

“宋振庭这个人我有接触，是延安鲁艺的学生，这个人说过

错话，写过杂谈式的文章，据说还有两本书，文化大革命开始时罢了官，这不要去看，我们要看这个人有没有他好的一面。58年我到长春，他专门向我汇报了长影的问题，他对长影的斗争是坚定的，当然这是吴德同志领导的。这不但是对长影的斗争，这也是和阶级斗争分不开的。另外，他对陆定一宣传部和教育方面都做过斗争的，这个人你要抓他的错话错事随便都可以抓到的，但从大节上看，基本上还是反对阎王陆定一的。这个人大概是这样的。宋振庭这个人反右斗争时他会是一分力量，反‘左’时一定会成为革命的对象就是了。从这方面看他不是三反分子。”

2月8日，是北京赴云南西双版纳的落户的中学生出发日期，这是经过北京市革委会与云南省军管会协商确定的。

2月2日下午，在北京东城区人民武装部礼堂为北京首批赴云南知青举行了欢送会。当时分管中学支左的北京卫戍区副司令员李仲奇专程前来为他们送行，北京市革委会计划组副组长刘双和、首都中学红代会代表李东民、云南省军管会边疆组代表王魁林在会上分别发了言。会上，首批赴云南知青全体人员举手宣誓：“我们下定决心勤勤恳恳地为工农群众服务，和云南边疆的劳动人民一起，艰苦奋斗一辈子，让西双版纳为祖国献出更多的橡胶。”

临出发前，同学们来到天安门，在金水桥前列队，向天安门城楼的毛泽东巨幅画像宣誓。这是当年红卫兵必有的保留节目。

2月8日，是同学们启程的日子。这天上午，他们来到北京

饭店西侧的霞公府东城区教育局，在这里集合后，走上长安街，高举着“首都赴云南支边红卫兵”的红旗，唱着队歌：“迈开大步，迎着朝阳，毛主席的红卫兵奔向远方……”一路向东，朝北京火车站行进。

红旗是仿照《长征组歌》中红军旗帜的样式，在旗眉上绣着一行“首都赴云南支边红卫兵”宋体字，白底黑字，分外醒目。路人纷纷驻足观望。

初到农场

这是“北京五十五”列队走向北京火车站的珍贵镜头。65中张承代打着大旗，旁边是提着网兜的苏北海，两位女生捧着毛主席像，后面是戴着棉帽的凌瑜，凌瑜后面是王开平。如今他们3人都已经离开了这个世界。

1970年3月17日，凌瑜因患中毒性痢疾不幸病故。同学们眼含热泪，轮流肩扛着他的棺木，从追悼会场一步一步走到橡胶林间的墓地。他只有22岁。

1976年1月20日，作为新建连队的党支部书记王开平，为挖梯田会战鼓舞士气，从寨子里买了一车甘蔗用拖拉机拉回连队。拖拉机上坡时熄火，王开平下来推车，被夹在拖斗车头之间站立而亡。他刚刚度过了29岁生日。

1999年8月，已在国务院劳动部任职的苏北海因患胰腺癌也离开了这个世界。那年，他52岁。

众多赶来送行的家长、亲友和素不相识的送行人群挤满了北京火车站第一站台。分别的情景很热闹，有的亲热地搂着肩膀照相，互赠留言，有人被同学抬起来抛得老高，大家嘻嘻哈哈，说说笑笑，没有后来的那种痛哭流涕的悲伤场面。

25中的陈新增坐进车厢里。忽然，他看见父亲挤到车窗前，从腕上摘下手表递过来对他说：“出门在外，你用得着，戴着吧！”他拍拍儿子手背，转身离去。这块坦克链的罗马表，一直陪伴陈新增奔波多年。虽然在连队，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敲钟起床，吹号熄灯，几乎用不着手表。

铁道部门根据上级指示，专门调拨一节车厢供他们使用。随着一声汽笛长鸣，火车“哐当”一下启动了，一瞬间，车厢里的嘈杂声猛然安静下来。就要告别从小一起生活了二十多年的北京，千情万绪涌上心头……一会儿，大家缓过劲来，车厢又恢复喧闹，同学们说笑着掩饰刚才离别时的伤感。

赴云南西双版纳的落户的 55 名北京中学生来自 21 所中学，他们当中高中生 43 名，初中生 12 名，男生 31 人，女生 24 人。最大的“老高三”21 岁；最小的是“老初二”16 岁。这里面有将军的儿子，有大使的女儿，有高级知识分子的子女，有工人出生家庭的，有出生资本家、小业主的，也有母亲是当保姆的，还有“国军”的干部子弟，当年戏称“国干子弟”。

列车载着 55 名年轻人，也满载着他们的理想和希望奔向远方。同行的人中有北京革委会安置办的干部，还有两位身穿军装的新闻电影制片厂摄影师，他们是到云南边疆执行战备任务，还有 25 中高三二班的魏京生和一位北京中学红代会代表，陪同这 55 名年轻人一起到西双版纳。

车到武汉，他们坐汽车从汉口到武昌，住进了接待中央领导的东湖宾馆。打蜡的地板，高级席梦思，有的同学睡不惯弹簧软床，把褥子铺到地板上睡了一宿。

车过贵阳，车站一片混乱。忽然，一群头戴柳条帽，手持铁管长矛的人要上车。车门不开，他们就用长矛撬车窗。几个男生使劲摁住车窗，几只长矛已经捅进来在身边乱晃。紧急关头，安

置办干部掏出北京革委会的大信封贴在窗玻璃上，大声喊着："这节车里是北京红卫兵，不能上！"这才制止了那些人的蛮横行动。

经过 7 天的火车，55 名同学终于到了昆明。在这里，昆明的党政领导，包括当地的两派群众，纷纷夹道欢迎北京毛主席身边来的红卫兵。同学们入住市中心金碧街的小旅馆。长方的小院落，两层木板阁楼，窄小的楼梯走上去咯吱响。

第二天，昆明下起了难见的鹅毛大雪。雪花纷飞，落地即化。路面湿漉漉的，街上冷冷清清，大家冒雪排队外出到一家澡堂去洗澡。

当时的昆明街面，两派割据，尚未联合，很不安宁。为了同学们的安全，带队干部严禁他们私自外出。此时正赶上云南省下令要求群众组织限时上缴武器。这天晚饭后，昆明市区猛然响起密集的枪声，砰砰啪啪，远远近近，一阵紧似一阵。作为好奇心强的中学生，这样的机会岂肯错过？25 中陈新增和王开平几个人，悄悄溜出旅店，上街想看热闹。他们顺着墙根刚摸出不远，冷不丁听见头顶"哒哒哒"一阵枪响！原来有人在楼上窗口向天上扫射冲锋枪。吓得他们赶忙蹲下身缩在墙边，只见子弹壳噼噼啪啪砸在头上。陈新增就势往地上一模，抓到几颗滚烫的子弹壳，往兜里一揣，顺着墙根一溜小跑又摸了回来。

安置办的人直急眼，一通批评："你们几个胆子忒大了，出了危险，怎么向市里交代？"

回房间后，陈新增掏出带着火药味儿的子弹壳显摆："开开

眼，这阵势在北京咱可没见过。好险！”

临近午夜，整个昆明城越发闹腾起来，枪声响成一片，曳光弹划过夜空，就像春节除夕夜燃放鞭炮的场面。昆明人在交枪前，要过足枪瘾，直到打光手中的子弹才消停。

同学们在昆明休整了两天后，换乘两辆大轿车上路了。云南省军管会考虑到云南当时的武斗形势，特意派了一个武装班护送他们。就这样，他们经过晋宁、玉溪、峨山、杨武、元江、墨江、普洱、思茅、景洪，曲曲折折，盘山过河，白天赶路，夜晚住店。不时遇到铁丝网路障横在路上，武斗人员趴在堆筑沙包工事里，手持枪支把守要道，检查来往车辆。市安置办的人叮嘱大家稍安勿动，他下车前去交涉，先让对着车头的机枪移开枪口，以免走火伤人，然后拿出北京革委会的大信封一晃，站岗的立马搬开路障放行。

盘山公路坑坑洼洼，车子摇摇晃晃，人在车里前仰后合。一天，坐在车后的队友被颠起来，脑袋撞到车顶，一屁股把新买的小号压得变了形，真叫人心疼。大家一路唱着歌，说说笑笑，不觉辛苦。车窗外红土地上亚热带植物郁郁葱葱，傣族哈尼族村寨掩映其间。山里白雾缭绕，车子在云雾中穿行，不时钻出来开上阳光灿烂的山头，不时又转进白茫茫的雨雾里。

有天晚上，他们吃过饭到路边遛弯儿，看见草丛间一团团萤火虫闪闪亮亮飞舞，忽然听到水塘里有一片“昂昂”的叫声，此起彼伏。循声走近，用手电筒一照，原来是几只不大的蛤蟆，竟

发出老水牛一般的鸣叫。

车到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首府景洪。西双版纳是傣语，“西双”即十二，“版纳”即一千块水田。当年傣族封建领主把所管辖的山区和坝子，分封给十二个大臣，代他行使职权，一千块田的税赋贡品为一份，建立了十二个行政区，就是流传至今的西双版纳。允景洪即“黎明之城”的意思。当时的县城不大，两条交叉的主路，十字路口有商店、旅店、长途车站和邮电局。路边一排排碧绿的凤凰树，开着一串串火红的花，一排排高大的桉树，散发着阵阵独特的清香。同学们们住的州招待所，油棕、椰树、芭蕉、竹蓬，环绕小楼四周，别有情致。

有天饭后，一帮男生下到澜沧江边游泳。当年毛主席横渡万里长江，各地开展各种水上活动。大家正在水里扑腾，有人提议，咱们横渡澜沧江，到大风大浪里去锻炼。同学们一时兴起，冒险往江心游去。江边水面平缓，游不多远，水势忽然加大湍急起来，猛地一股江水裹挟翻滚急下，大事不好，哥几个赶紧往回拼命游，呛了几口水，总算游到浅处。抬眼一看，王开平和 65 中的王文嘉已经游进江心，两个脑袋一起一伏，转眼不见踪影了。

大家忐忑不安上了岸，过了好久，他俩才安全返回。他们被江水冲出老远，直到澜沧江大桥下，他们才爬上岸。两个小伙子穿着游泳裤衩，赤条条走过澜沧江大桥，引得路边的傣族姑娘一阵阵惊声尖叫。招待所的人也吃惊不小，江里常常会漂下“草席”一类的东西，叫它缠裹上就没命啦！好险!真是毛主席的红卫兵，

福大命大造化大。同学们们听了吓得直咂舌，谁也不敢再到澜沧江游泳了。

在热带植物研究所，他们看见水里的王莲叶子有桌面大小，椰子、橄榄、咖啡、可可等热带水果和各种药用植物，五花八门，见所未见，令人眼花缭乱。在这里，他们终于见到了朝思暮想的橡胶树。

他们继续前行，经过 5 天的汽车，终于在 2 月 21 日到达位于景洪县大勐龙的东风农场。农场职工和傣族老乡的夹道欢迎北京红卫兵。农场军代表和老职工热情招待他们。

“勐龙”即傣语“大的坝子”。坝区青山环绕，河水清澈，竹蓬掩映村寨。从 1958 年起，经过下放干部、转业官兵、湖南支边人员和昆明社会青年十几年艰苦奋斗，东风农场已初具规模，先后建立了红卫、温泉、东方红、风光、前哨和疆锋六个分场，梯田层层，胶林成片。

可是汽车又继续往前开，一直开到一个山坳里，这里是东风农场的疆锋农场 5 队，一年后它改为云南生产建设兵团一师二团一营 5 连，紧邻中缅边界。这一路上，乘车每到一地，都有群众夹道欢迎。

然而，热情过后，面对他们的却是严酷的生存环境。为了帮助同学们适应环境，东风农场派出老职工来领导和管理他们。在农场老职工的带领下，55 名同学很快投入到改造环境、积极建设的工作中去。

如今已是北京联合大学副教授的邓维嘉说，当时到处是需要几人合抱的参天大树，还有数不清的蚊子、蚂蟥等，住在透风的临时住所内，还会经常发现有毒蛇爬到房梁上。他说：

“有的时候，大家正在睡觉时，突然会有人尖叫起来，被吵醒的大家一看，竟然发现有毒蛇已经跑到了房梁上。一下子，所有人都不睡了，想尽各种办法把毒蛇赶下来，抓到后就杀了来吃。”

初到边疆的这些北京孩子，并没有感到艰苦和劳累，每天似乎都有着使不完的力气。当时他们居住的房屋仅仅是用劈开的竹子搭建的，顶上铺上茅草，每天的饭食也很简陋，仅仅是不带油腥的白水煮菜。对于这些年轻人来说，似乎再困难的问题都无法让他们退缩。

陪同他们前来的 25 中同学魏京生要回京了，大家依依不舍送行到路边曼康寨。魏京生的同班同学凌瑜和陈新增爬上大青树，与老同学合影留念，不想招致树上黄蚂蚁的叮咬。

在曼康寨给魏京生（前排左一）送行

临行前，陈新增写了一首诗让魏京生带回去。3 月 20 日，首都中学红代会机关报《红卫兵报》以《西双版纳来信了》为题报道了他们的消息，信中表示，他们决心做一颗红色的种子，在边疆生根、开花、结果，献身于祖国的橡胶事业，给毛主席争气，给中国人争光。《红卫兵报》就此向北京红卫兵倡议：立下革命志，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

《红卫兵报》以“赤忠”的笔名刊载了陈新增让魏京生带回来的诗《赠战友》：

挥手豪情别红城，跨步河江万里行。

统帅扬笔雄文赤，小兵执行毕生忠。

滇边种胶歌正起，塞外迎春曲更兴。

斜眸向西笑禁锢，尽染东方一片红。

到云南以后，李再延等 3 人又从北京随后赶来加入，使首批北京赴云南知青的人数，最终达到 58 名。

同年 11 月，由北京中国人民大学附中王珂等人联系组织的第二批北京知青 400 人抵达小勐养关平农场和澜沧惠民农场。以后陆续赴云南的知青共 8000 多人，其中著名历史学家翦伯赞的三个孙女，原北京大学校长陆平的女儿，以及后来成为著名作家的钟阿城，著名导演陈凯歌。

在以后十余年的蹉跎岁月中，“北京五十五”们历经艰辛与苦难，在接受“再教育”历程中分化。其中李镇江被选为云南省革委会委员。1969 年 10 月，李镇江代表云南知青参加祖国二十周

年国庆观礼，全国 300 多名下乡知识青年中只安排 30 名登天安门城楼，在毛泽东主席身边，李镇江是其中之一。

由于他们中大多数人出身高干家庭，在 1973 年之后，一大批老干部解放，他们的高干父母复职，陆续将他们调离云南，只有极少数人是在 1979 年云南知青大返城的狂潮中返回北京的。

“北京五十五”们中大多数人今天依旧风光，家庭的背景和个人素质较高，加上在云南上山下乡的磨练，使他们在改革开放大潮中如鱼得水，有的在政界崭露头角，更多的是在商海遨游，踌躇满志。

## 第 959 回：磁县乱，京广线为之中断　调军队，终平息“二九事件”

2 月 3 日，保定驻军和两派群众十多万人也在保定体育场集会庆祝河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当两派群众陆续在体育场附近集合准备入场时，又为占用会场发生争执。庆祝会还未开始，大部分人还聚集在裕华路等主要街道上，突然枪声四起，两派组织动用早已准备好的机枪、冲锋枪、步枪、手榴弹等武器大打出手，还出动了摩托车、消防车、钻探车等上百辆各式车辆，载着全副武装的武斗人员在马路上横冲直撞，在保定城多处发生了激烈的枪战。武斗中有 30 多人受伤，5 人死亡。“二·三”事件是保定两派武斗升级的重要标志。

2 月 5 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编辑部社论《华北山河一片红——热烈欢呼河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社论说：“至此，整个华北地区都已成立了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这对全国各地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必将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

2月9日，保定国棉一厂再次发生大型武斗，炸楼两座，死伤十几人。这是保定文革期间武斗最为激烈的一次，也是一次死伤人数最多一次。

2月9日这天，河北邯郸磁县还发生了“29事件”。

磁县，这个古称“磁州”的小县城，属河北省邯郸市管辖，虽然行政级别不高，但其地处中原地带，南接河南，西临山西，东望山东，地理位置极其重要。而且，磁县交通十分发达，是中

国南北交通的大动脉京广铁路的必经一点。就是这样一个晋、冀、鲁、豫四省通衢的小县，在历史上曾经成为“四不管”的边缘地区。也许正是磁县的边缘化地理位置缘故吧，文化大革命初期的大串联阶段，这个不起眼的小城汇集了上千名外地人，那时，这些操山东方言、山西口音、河南腔与河北土语的造反派，高唱着“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等语录歌，高举“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大旗，在磁县政府、学校等地聚集，散发传单，张贴大字报，发表演讲……声势浩大的文化大革命烈火就这样在磁县境内开始点燃。磁县的群众组织也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很快地，形形色色的群众组织形成了“造反派”和“保守派”的对垒局面，有的地方保守派占上风，有的地方造反派占优势，通过不断联合、分化，磁县境内逐渐形成两派对立的群众组织。一派是 1967 年 3 月成立的“磁县无产阶级造反派联合总部”，简称“县总”，总部设在该县的来村公社白庄。另一派是 5 月份成立的“磁县红色革命造反总部”，简称“红总”。两派群众组织都宣称自己才是真正的革命造反派，对方是保守派、保皇派，反革命派，对立情绪逐步激化，从口号辩论，大字报相互攻击升级为拳打脚踢，棍棒争斗。同全国的形势发展一样，先是用“冷兵器”——棍棒、大刀、长矛等相向，接着，两派开始抢夺武装部弹药库和民兵枪支弹药并构筑炮楼、战壕工事。

“红总”派虽然在人数上并不占有优势，却拥有大量武器和占据县城主要城区而在武斗中占有相对的优势，“县总”在人数上则明显占上风。两派可说是势均力敌，互不相让。武斗也愈演愈烈，先后在县武装部、时村营、高臾、农电局、槐树、粮库、油棉厂等地多次发生火力冲突和抢枪事件，死、伤人事件也开始发生。

1967 年 11 月 8 日，总部设在来村公社白庄的“县总”组织人员进城开会，由于暗带枪支，两派在会议中发生武斗，“县总”派死亡 2 人，两派共伤 40 余人，还有一名无辜群众死亡，这一事件被称为“118“流血惨案，成为两派组织武斗升级的第一块多米诺骨牌。

1968 年 1 月 2 日凌晨，“红总”出动由三省 19 个地区的 200 余人组成的战斗队，分三路向“县总”把守的县粮库进攻，两派共死亡 4 人。

1 月 13 日晚上 21 点钟左右，两派群众组织又在县油棉厂发生大规模武斗。这次事件造成 4 人死亡，引起 8 垛棉花失火，烧毁籽棉 15 万多公斤，救火中浸湿 20 多万公斤，还烧毁大量苫布、苇席，厂房。直接经济损失达到 9 万多元。要知道，在 20 世纪 60 年代末期，9 万多元简直是一个天文数字，一个工人的月工资不足 30 元，一天的伙食费不足 3 角钱，9 万元对磁县经济来说意味着什么！

“红总”很快全面占领县城城区，主要力量在城外的“县总”

则用武力攻城。此时，磁县的武斗已经发展成为由有着作战指挥经验的退伍军人参与指挥，以步枪、机枪作为基本兵器的真正意义上的战斗。他们打开了磁县武装部弹药库，抢走了那里的枪支弹药。当时的库存武器有步枪 1000 余支，机枪 30 多挺，手榴弹上千枚，子弹上万发。并以磁县县委、县人委大院为核心，在县鼓楼、银行、礼堂、第一中学等外围制高点架设机枪、冲锋枪，构成了严密的火力配系，封锁控制了全城主要街道、路口，严防“县总”一派偷袭。

“县总”一派则用当年八路军武工队的办法，不断派出“侦探”到城门四周活动，他们化妆成走亲戚的老百姓混进县城，还有人说他们借了军装，冒充解放军来攻城。到了 1968 年的 2 月份，磁县武斗已到了近乎疯狂的状态，局势已经失去控制，直接影响到从县城通过的京广铁路。先是疯狂的武斗波及到过往的列车，后来随之发生了袭击、拦截火车的情况……

国务院业务组接到铁路军事管制委员会的报告：京广铁路河北省磁县段告急，这里的群众组织拦阻列车，将京广铁路的 50 对电话线破坏了 48 对。当铁路工人乘车去抢修被破坏的电话线时，汽车中弹 21 发，7 人被抓走……

铁路电话线的完全破坏就意味着京广铁路的大瘫痪，消息很快报告到当时的最高决策层，周恩来给总参打去了电话。

2 月 8 日，到石家庄参加河北省革委会成立庆祝大会的北京军区代司令员郑维山，当晚正在八一剧场看演出，北京军区党委

办公室秘书吴炳州接到总参作战处蔡洪江电话。电话里，蔡洪江声音显得十分焦急：

“9 时 20 分，总理电话指示，据铁道部军管会报告，邯郸地区两派发生武斗，在磁县把铁路电话线破坏，已经影响到京汉线、陇海线以及西南、西北的铁路线段调度周转。经林副主席批准，63 军应立即派两个步兵团到达武斗现场，负责隔开，进行政治攻势，要他们立即停止武斗。指出破坏铁路、电话线是完全错误的，如继续这样做，这是反革命的土匪行为，必须采取断然措施，决不能再承认他们是革命造反派。对极少数坏头头必须坚决采取专政措施。具体按《26 命令》办。总理和杨代总长要直接向郑司令布置任务。”

接完电话后，吴炳州感到事关重大，立即找到郑维山的秘书杜辛报告了有关情况。杜辛也感到此事非同小可，立即驱车赶到八一剧场，向郑维山作了报告。郑维山一行赶回招待所，马上要通了北京的电话。电话中，杨成武的声音急促，说：

“总理要找你。磁县发生了严重的武斗，影响了铁路大动脉，要采取果断措施。详细情况总理还会向你交待，这项任务非常特殊，一定要坚决完成好。”

这时，周恩来的电话也打过来了：“维山同志，据铁道部军管会报告，邯郸地区两派发生武斗，在磁县把铁路电话线破坏，已经影响到京汉线、陇海线以及西南、西北的铁路线段调度周转。你们马上派一个团到那里。制止武斗，恢复铁路畅通！对于磁县

事件，可以按《26 命令》处置。《26 命令》你们可大量印发，广泛宣传……”

“当地驻军在执行上述命令时，首先要耐心地进行政治思想工作，讲清道理，进行劝阻。如劝阻无效，可对空鸣枪警告，令其撤回。在劝阻和警告仍然无效时，可宣布这种抢夺是反革命行动，并采取措施对其少数的坏头头和肇事凶手予以逮捕法办。遇到这些人拒捕和抵抗时，人民解放军有权实行自卫反击。……”

此时，郑维山还没有接到《26 命令》，不知其具体内容是什么？

就在郑维山和周恩来、杨成武通电话的同时，秘书们已通过保密电话记录蔡洪江传达的《26 命令》的全部内容。

看完《26 命令》，郑维山说：“这就对了嘛，这个命令早下就好了！对那些破坏分子必须采取严厉的措施。”他思忖片刻，站起身对旁边的秘书说道：“要 63 军军长！”

郑维山要找的 63 军军长张英辉是当时驻防在石家庄的部队最高首长，他此时正跟随郑维山参加河北省革委会成立大会。郑维山简单向他交代了任务，说：

“你们派一个团，立即出发，到磁县执行任务。必须尽快恢复京广铁路畅通，但是也要竭尽全力以强大的政治攻势来恢复铁路畅通。”

张英辉问：“如果他们不听，怎么办？”

郑维山说：“如果政治攻势不成，在必要情况下我们只好封

锁枪眼，一定要把双方隔开，将武斗制止。一定要注意，弹药必须控制，不能放在战士个人身上。”

张英辉答应着：“是！明白了！坚决执行命令！”

布置完任务，郑维山又接到上级打来的电话，说周恩来要求他立即回北京参加研究解决晋东南问题的会议。郑维山当晚即返回北京。

与郑维山同时接到中央命令的，还有武汉军区。中央要求他们从驻防洛阳的 1 军派一个团执行京广线磁县段的护路任务。这样，两个军区分别派了两个团开往河北省磁县。

2 月 9 日上午 9 时，北京军区 63 军的一个团，武汉军区一军一师一个团，先后到达磁县县城外集结地域。与此同时，邯郸市联委、峰峰矿区、临漳等地与“县总”派持相同观点的群众组织也派人前来支援“县总”。

9 时 40 分，两个团的部队在 63 军副军长曹步墀、参谋长耿淑明的指挥下，来到磁县城门外。部队首先全面开展了政治攻势。用广播车反复广播《26 命令》。

与此同时，战士们分四路纵队朝四个城门走去，他们手拿《毛主席语录》，身背冲锋枪，高唱语录歌，列队前进。但是，战士们的枪内没有一颗子弹，子弹全部掌握在带队的干部手中。

由于“县总”一派处于弱势，见到解放军开到磁县县城附近，他们不但不抵抗，而且要求为解放军带路、向解放军报告“红总”一派的消息，当部队向城里开进时，他们跟在部队的后面，那些

从四面八方赶来的群众组织，也随着“县总”跟进。部队官兵一再劝诫，仍不能使其完全与部队战士分开。这无形中给人一种解放军是来帮他们打击“红总”的印象。

当守城的“红总”看到解放军战士排着整齐的方块队伍，拿着《毛主席语录》，身背冲锋枪，喊着“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争取胜利！”的口号，朝磁县走来时，有人说：“这是假解放军！”

当队伍走近时，一些退伍军人从队伍整齐、矫健的步伐，闪亮的帽徽和领章，及那些战士的南方口音，已感觉到这是真的解放军。

就在这时，有人还在喊：“假解放军来了，打！”

“这是真解放军！”

“他们是假解放军，开枪打呀！”

“砰砰！”

有人朝解放军的队伍开了枪。广播车上有人中弹倒下。

“砰砰！砰砰！” 走在队伍前排，手持《毛主席语录》牌的战士倒下了。部队的队形乱了，战士就地卧倒……

很快，守城的“红总”派利用已经构筑好的明、暗火力点，用步枪、轻重机枪向部队猛烈射击。转瞬之间，10 余名战士倒在了血泊之中。

战士们情绪顿时激愤起来，他们强烈要求还击。然而，没有接到命令，部队仍然只能是以宣传车冒险继续进行政治攻势，希

望能够使受蒙蔽的群众放下武器。

已经开枪杀人的守城“红总”已近乎疯狂，他们根本不听这一套，火力更猛了，压得部队抬不起头来，部队伤亡激增。对峙到中午，下午 13 时 36 分，京广线上的第 206 次列车从磁县经过，再次被袭击。

63 军磁县作战指挥所不断将新情况向上级汇报。63 军副军长曹步墀终于下达了鸣枪警告，迫不得已时可以用火力封锁枪眼的命令。

14 时，部队分别从不同方向对城内制高点上的群众喊话：

“我们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奉命前来制止武斗，你们必须立即放下武器！”

“如再顽抗，我们将对其严惩！”

这样的喊话似乎不起什么作用。枪声还在响，子弹还在飞。部队开始鸣枪警告。此时，盘踞在制高点的群众中，有的人放下了武器，多数人还在顽抗。

“开火！”指挥员一声令下，每个团挑选出的“神枪手”同时开枪，一个又一个的火力点被打哑了。造反派毕竟不是解放军的对手，真的开了枪，这些人顿时被打得四散奔逃。“红总”的防线，很快被冲垮了。傍晚时分，“红总”占据的鼓楼、银行、礼堂、第一中学等外围制高点，全部被攻下。他们的防御核心，磁县县委、县人委大院也很快被解放军占领。“红总”成员一个个放下了手中的武器，被看押起来。在当天，解放军共抓住“红

总”派成员 670 人。怀疑对象 800 多人。当晚，铁路部门迅速抢修了铁路电话线，京广线铁路恢复安全畅通。

任务完成后，63 军向军区作了报告，郑维山根据 63 军报告的情况，批准了给上级的报告。

“29 事件”后，磁县严重对立的两派不复存在。3 月 14 日，经河北省革命委员会批准，磁县革命委员会成立，此后，磁县直属单位，各人民公社、生产大队等也先后成立革命委员会，正常的工作秩序得到恢复。但是，关于磁县事件各种说法并没有因为革命委员会的成立而终止。反而是一波三折，越传越凶。

有人传说，1968 年 2 月 9 日下午 6 点钟左右，军队有关部门收到了代总参谋长杨成武的电报，电报称转达周恩来总理意见，磁县事件要和徐州事件要区别处理，言外之意就是不要按《26 命令》对待磁县事件。又有人说根本没有此事，是谣言。也有人传说，当时的中央有关部门偏听偏信，只是听了“县总”一派反映上去的情况，做出了错误的开枪决定。还有人说，“中央文革”的人看到造反派被打了，当然不高兴，所以要对此事提出质疑。

传说毕竟是传说，郑维山对这些传说没有太在意，因为他最清楚此事的来龙去脉。但后来，各方面的压力越来越大，北京军区于 1969 年 4 月，派出工作组对关于磁县开枪事件进行调查。军区司令部作战部的郭春宣科长为调查组长，带领毕可升、孙春明一行 3 人前往磁县实地调查。

4 月 29 日，调查报告出来。“29 事件”中，“红总”和“县

总”双方共有 5000 余人参战，其中“红总”派参战近 800 人，事件中死亡 51 人，伤数百人，部队共死亡 18 人、伤 77 人。除京广线铁路交通受阻之外，在事件和两派的武斗中共烧毁粮食 80 多万斤，皮棉 10 余万斤，还烧毁部分建筑物和一些机器设备，直接经济损失达 27 万余元。

## 第 960 回：王效禹，北海舰队屡生隙　杨保华，就任青岛一把手

北海舰队是中国海军当时兵力最多的兵团级舰队，下属旅顺基地、烟台基地、北海舰队航空兵，简称“北航”等军级基地。另外，舰队还直属快艇支队、潜艇支队、水警区等师级单位。防区为连云港以北的山东、河北、天津、辽宁所濒临的黄海、渤海的海空。当年因为与苏联关系紧张，加上日本、南韩及驻在那里的美军，为防止敌方从海上与空中突袭天津、北京，保卫全国重工业基地辽宁等地，海军的主要作战方向在北部。到 1969 年，海军 4 个潜艇支队中 2 个，5 个快艇支队中的 2 个，9 个航空师中的 5 个，海军最大的 4 艘驱逐舰，中国陆海空三军中最大口径的 180 火炮全部都在此。其下属主要作战部队总数，相当于东海舰队与南海舰队的总和，有多支总参作战值班部队。舰队司令员刘昌毅、政委丁秋生。

丁秋生因病休息，第二政委卢仁灿主持工作。

在 1967 年青岛“122 夺权”中，当时青岛市委常委中有 3 位驻青部队负责人：北海舰队卢仁灿，67 军政委陈继德，青岛市武装部部长何传修。1 月 22 日夺权当天，市造反委员会发布《第一号通令》中第 2 条：“前青岛市委书记、常委、委员、各部委负责人，前青岛市市长、副市长、各局局长、处长，自本通令公布日起三日内，向本委员会报到，听候处理。”

67 军政委陈继德，自觉前去报到。当时负责登记的工人造

反派于景瑞，不知道青岛市委中还有军人常委。他看到一位驻青岛的陆军首长前来登记，真有些受宠若惊。而不明就里的北海舰队政委卢仁灿，因不清楚夺权的情况，没有理会。不仅如此，1 月 23 日，他还对舰队机关少数准备上街支持夺权的人员表示：不要上街游行，不要写支持的标语。

1 月 27 日夜，军委通知济南军区支持青岛夺权，67 军连夜派人到王效禹家中，把他请到位于武定路的 67 军部礼堂，这里正在召开全军师以上干部会议。当王效禹、张汉祥等人到达后，有位军人喊了声“起立”，67 军政委亲自上前报告：“奉叶剑英同志命令，67 军支持王效禹同志。”

而北海舰队则是到了第二天，1 月 28 日才有了行动，派部队与 67 军一起在青岛举行武装游行，支持夺权，比 67 军晚了一步。

1967 年 3、4 月间，北海舰队与王效禹在选拔夺权后的青岛市各级革委会一把手的问题上发生正面冲突。

王效禹公开宣布的人选原则，是建立一支以年轻造反派为核心的领导骨干队伍。而主持北海舰队工作的卢仁灿、潘焱等人认为不妥，舰队支左代表提出反对意见。但 67 军等人同意王效禹、杨保华的意见。会上争论无效，北海舰队党委以支左军代表张元培等 3 人的名义，于 4 月 29 日向中央军委和林彪送交报告，阐述他们不同意王效禹意见的理由，认为“迄今市革委还没有真正成为一个革命的有代表性的，有无产阶级权威的革命临时权力机

构”，有些当权的造反派“压制打击革命群众，搞两面派，发展个人势力”等等。

北海舰队张元培等人的报告，军委一直没有回音。而北海舰队与王效禹的矛盾却越来越尖锐。5 月 29 日，中央调张元培到北京支左，任国务院第六机械工业部（船舶工业）军管会主任。北海舰队改派副司令员邓龙翔任驻青岛市革委会军代表。

5 月 29 日这天，北海舰队在镆铘岛附近攻打 1 艘台湾派来的特务输送船，共出动护卫舰 1 艘，护卫艇 15 艘，快艇 6 艘，猎潜艇 1 艘，组成 3 个突击群。由于在狭小的海域集中了太多的船只，加上协调失措，北海舰队的舰艇两次发生误击，还撞翻渔民的渔船 1 艘。而台湾输送艇则成功的返回到特务船“源渔”号上逃逸。镆铘岛“529 海战”失利。

北海舰队是开展“四大”的单位，下属青岛海军潜水艇学校内更是两派争斗激烈。5 月 29 日，就在北海舰队作战指挥所内正在紧张指挥作战时，外面机关的群众组织却在冲击作战指挥所，与指挥所外警卫连战士发生冲突，非要正在指挥所中的舰队领导出来。指挥所内一名指挥员只得中断指挥出来解答问题。

在此期间，青岛又发生了“拉鞠事件”。当年支持王效禹造反，并与其并肩战斗的青岛市市南区委书记鞠维信，因为夺权后与造反派杨保华产生矛盾，加上青岛市市南区部分干部、群众和造反人员对他的不满，数百造反组织联合提出：“把鞠维信拉下马”。5 月 18 日王效禹讲话，同意批评教育鞠维信。

6 月 10 日，王效禹又以省革委名义向青岛发电报，认为鞠维信是“好同志”，不准“拉鞠”。

鞠维信原任市南区委书记，而市南区的支左任务正是由北海舰队负责，快艇 1 支队副政委岳昆任市南区首席军代表。6 月 15 日，王效禹在济南接见驻青海军潜水艇学校支持王效禹的潜校“红联总”负责人，以及海军政治学校“红联”和“红革司”，北海舰队护士学校“延总”等 30 多人时表示，青岛“拉鞠”是北海舰队党委支持的。

王效禹接见后，潜校“红联总”于 6 月 17 日成立“揪拉鞠黑后台独立师”，并于 6 月 21 日晚，强行将市南区首席军代表、北海舰队快艇 1 支队副政委岳昆绑架到潜校关押审问。

第二天，海军获知岳昆被抓的消息，于 23 日以海军党委名义向青岛打电话批评潜校“红联总”，要求“应立即把岳昆放出来”。“红联总”23 日 24 时发表声明，认为抓岳昆“完全是革命行动”。

7 月 2 日，关锋在北京谈到青岛问题时说：“我看了一些材料和群众来信，很明显，北海舰队是不对的。”“海军分成两派是好事，通过这个事就可以把北舰的盖子揭开”。

7 月 10 日，潜校“揪拉鞠黑后台独立师”召开扩大会议，决定加强对北海舰队航空兵（北航）的工作，策划北航脱离北海舰队领导。

7 月 13 日，主持北海舰队工作的卢仁灿下台，舰队工作由

常务副司令员潘焱负责。北海舰队副司令员赵汇川、参谋长张晓冰、政治部主任李镜如等人受批判，青岛大街上到处张贴“打倒卢潘赵”的大标语。

海军党委于 1967 年 8 月 4 日专门发出文件：《对海军驻青岛学校当前文化大革命几个问题的指示》，要求“立即停止外出串连，双方立即撤回外出人员。”“不准在外地或本地区设立联络机构，已设立的立即撤销；也不准以任何借口，把地方群众组织引入校内进行集会、游行或辩论，参与两派之间的斗争，介入军事院校的文化大革命。”该文件转青岛市革委会和 67 军。

1967 年 7、8、9 月份，海军调整北海舰队领导班子。王效禹作为济南军区第一政委介入其中。

由于北舰兵力部署和作战区域涉及 3 个战区：北京军区、沈阳军区、济南军区。对于北舰主要领导的人选，济南军区的杨得志、袁升平根本不参与意见，只有王效禹和杨保华等青岛地方造反派不知天高地厚在那里瞎忙活。

果然王效禹参加北海舰队党委扩大会议时，在会上把北海舰队两派都得罪了，而且都是针锋相对。

海军没有按照王效禹的意图进行北海舰队的人事安排。

1967 年 11 月底，新调整后北海舰队班子与青岛市革委会关系又紧张起来，起因在于林彪为海军的题词。

林彪 29 日为海军“首次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题词，海军迅速将“林副主席”题词和报道电传下属各部队，北

舰当晚举行庆祝活动。

12 月 1 日，北舰召开庆祝林彪题词大会，邀请市革委和 67 军参加。

青岛市革委会主任杨保华却提出：召开庆祝会应该以市革委为主，北舰前来参加。

北舰 12 月 1 日的大会，一些由海军支左的单位前去参加庆祝，杨保华把这些单位一律视为支持北舰反对市革委。其实这些组织都是老造反派，曾坚决支持过王效禹，也无意反对市革委。但杨保华的言行激怒了这些造反派，他们又和 5 月份的“拉鞠派”联合起来了。这些被定为犯错误的“拉鞠派”，很多都是按照 5 月 18 日王效禹同意批鞠维信后才参与拉鞠，没想到王效禹 6 月 10 日突然决定不准批鞠维信，把这些组织定为犯了错误。他们趁着 12 月的这次机会，发泄不满。

青岛又乱了起来，两派争斗，你来我往。杨保华向省革委和中央发电报，指责北舰以林彪题词来分裂青岛市革委会。67 军与杨保华的意见一致，向济南军区和军委办事组也是如此汇报。

海军的李作鹏、王宏坤、张秀川得知后，批评北海舰队不注意团结。而此时的北海舰队还蒙在鼓里，根本没有想到，一个庆祝会竟引来如此风波。

12月4日青岛市革委和67军联合召开庆祝林彪题词的大会，北海舰队应邀参加。

就在这天，王效禹接见潜校“红联总”等人，竟直接批评起

李作鹏的讲话，还指责“易耀彩主持舰队工作，我是知道的，北舰党委扩大会议以后继续向右转”。

针对不准军队院校到地方串联的问题，王效禹 4 日的谈话中对潜校“红联总”的人说：“关于到地方串联问题，红四野不是还在地方吗？那你们也可以去。”

“你们到地方是支左，不能说是串联。你们以后还可以继续去，有问题有困难找杨保华，我已经告诉他，叫他支持你们。”

12 月 10 日，中央文革小组将王效禹、杨保华等人召到北京，商议解决青岛驻军的问题，军委办事组参加。到北京的当晚，周恩来等人听取单方面的汇报直到 11 日凌晨 3 点多，周恩来宣布解决青岛问题由康生具体负责。康生与王效禹等人商议后，成立解决青岛问题 13 人领导小组，组长康生，组员杨得志、王效禹等人。

12 月 11 日，青岛市革委会常委杨云良向潜校“红联总”通报准备开始的北京谈判：“主要目的是解决北舰支左大方向问题，实际上是个你上我下，搞个水落石出。杨保华已于 10 日到济南和王效禹研究，再从济南上北京。这次看来是个硬仗，舰队很可能叫‘红四野’去，因此找你们来的目的就是要求你们也去。走时最好能把舰队支左方面的材料和其它方面的有关材料准备好带去，具体怎么联系到那儿再说。”

12 月 12 日，主持北海舰队工作的副司令员易耀彩，67 军政委陈继德等人到京开会。

杨云良与潜校“红联总”的人也先后赴京，具体联系地点定在京西宾馆的接待室。会议开始后，每次会面，杨云良都把当天会谈情况，如中央哪个首长参加，会上谁发言，态度如何，有什么结果等等通报给潜校“红联总”的石峥、李有贵等人。他们再写成文字资料，通过铁路系统的电话，直接打给 67 军驻青岛铁路分局军管会的人员，传回潜校“红联总”。驻青海军院校和开展四大单位中支持王效禹的一派马上行动，配合北京谈判，主动出击。搅的青岛一些海军单位连续发生武斗，一度混乱。极少数的海军人员上街张贴大标语，坚决支持王效禹和 67 军，批北海舰队。

北京的会上也是争论激烈。王效禹、杨保华等人攻击北舰，67 军又一次站在王效禹一边。杨保华口吃，他们说不过北舰代表，马上打电话从青岛调来能说会道的著名造反派宫树德参加会议。王效禹报杨成武同意批准，召来支持省革委的北舰人员到京，并收集有关北舰犯错误的各种材料提供青岛市革委代表和 67 军，增加谈判的分量。

中央文革站在王效禹一边。杨成武与中央文革观点一致，倾向王效禹、杨保华和 67 军，批评北舰。

北京 21 天的青岛会议，山东省革委王效禹、青岛市革委杨保华、济南军区、67 军的强大联合阵线，在中央文革、军委办事组的支持下胜利了。海军和北舰败下阵来。但康生等人也批评了王效禹、杨保华等人对海军和北舰的恶劣态度。

12 月 30 日，青岛市革委杨保华和杨云良，67 军李水清和陈继德，北舰易耀彩和田麟勋共三方负责人，联合签署《关于进一步加强团结，把青岛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联合决议》，共 6 条。

《决议》宣传 67 军在支持王效禹、杨保华等造反派的“‘三支’‘两军’工作中，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坚持斗争大方向，是广大指战员和广大革命群众学习的一面红旗”等等。

同时认定北舰“前舰队党委常委的少数领导同志在几个关键时刻，犯了严重的方向路线错误，在文化大革命运动初期，他们保护旧省委和旧市委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不积极支持青岛市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在夺权以后，他们有利用‘拉鞠’，支持‘炮轰政法部’，攻击青岛市革命委员会，曾经给青岛市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造成了不应有的损失。”

其中第五条规定：“部队和海军院校要坚决贯彻执行中央军委十一月十四日的通知，不准在部队内部串连，更不准干涉和插手地方的文化大革命，地方也不准干涉和插手部队的文化大革命。”

1968 年 1 月 13 日，中央批转青岛市革委会、67 军、北海舰队三方在北京联合签署的《决议》，认为“这一决议很好，望坚决贯彻执行。”1 月 16 日，以中发[68 ]7 号文件发出。

不满 28 岁的工人造反派杨保华，1968 年 2 月 10 日正式任命为青岛市革命委员会主任。第一副主任为接替陈继德任 67 军

政委的王金泉，第二副主任为主持北舰工作的易耀彩。参与绑架北舰支左军代表岳昆的主要策划者，造反大学生杨云良也是副主任。

## 第 961 回：二月十，锦州二高中撤离　二一一，电业局大楼被炸

1968 年 2 月 10 日，锦州卫戍区一名军队干部从第二高中门前经过的时候，被人伏击打伤，被激怒了的驻军部队一些官兵立即来到了第二高中武斗据点，要求这里的“糟字派”组织交出打人的凶手。而“糟字派”则认为是“好字派”搞的离间计，不承认是他们打伤了人。就在驻军部分官兵与地方群众组织发生冲突的时候，“好字派”的武斗队也来到了现场，包围了第二高中的“糟字派”据点，并且开始攻打楼房。“糟字派”立即向驻军告急，警备区派人和“糟字派”组织“联合总部”的头头一道到第二高中阻止武斗，最后楼内的人员被缴械带出。

“糟字派”为加强市内的宣传力量，着手筹办电业局广播站。当时的市电业局位于市中心，处于过往行人最为密集的地段。楼外即是繁华的中央大街，楼对面是锦州饭店。楼的一层本来是营业厅，此时已停止营业，临街的窗户、门都安装了金属推拉网，外人进不来。二楼走廊的东、西两侧各有 10 多个房间，全都腾出给“守点”的人员住。

这个广播站由多家“老糟”共同管理：电业局“老糟”是“东道主”，负责提供场地、器材，安排食宿，并配专人维护广播设备；另三家“老糟”是大学、高中、初中学生。锦州工学院的一名学生担任广播员兼编辑；实验中学的十几名初中生负责保卫；一高中的袁占山和陈贵春为编辑，李桂荣为播音员，陈玉芹

为联络员。广播站使用的全是高音大喇叭，最初有 4 个喇叭挂在了临街墙上，播音时声音很大，响亮刺耳，下方的人行道不能站人。后来电业局的“老糟”在中央大街与上海路交叉路口的电业局侧立了一根很高的高压电线杆，在其顶端又加装了 4 个喇叭，分东、西、南、北 4 个方向放置。为防止喇叭被人偷走，还从相邻的真正的高压线路上引出了一根线，围成一个圈，悬在喇叭下方，甚是吓人。这组喇叭安装后，喇叭总数达到了 8 个，大大增加了广播站的威力，声音传播的很远，几乎半个锦州城都能听到。每天中央大街一带，电业局广播站周围，总是聚集着无数忠实的“马路兵团”听众，熙熙攘攘，人头攒动。

“好字派”的势力占据了绝对上风后，电业局广播站成了“老糟”在市内仅存的少数广播点之一，像是被“好字派”包围的一块“孤岛”。但每天在广播站周围，仍然聚集着数不清的听众，黑压压一片。显然，这个广播站已成为“老糟”的“堡垒”和“精神支柱”，自然成了“老好”的“眼中钉”、“肉中刺”。

电业局广播站挂在墙上的喇叭也不知何时被子弹射了好几个洞，守在这里的人提心吊胆，如惊弓之鸟。为防遭袭击，电业局“老糟”运来了一车砖，带着“守点”的人把所有窗台上都码放了 10 多层砖，以防遭窗外的子弹射击；临街的窗户都挂了黑窗帘，目的是既能遮住室内灯光，又不暴露广播室的具体位置。一天，中央大街路边的一棵大树下围了一圈人，走近一看，才发现树上吊着一块黑呼呼的东西，旁边挂着一块大纸盒牌，上面写着：

“小心和猫一样下场”。原来这是一只死猫，但已看不出猫的模样，猫身已被烧焦。一名电业局“老糟”比划着对围观者说，除高压电线杆上的喇叭下有电网外，电业局的院内也布下了隐蔽的电网，谁敢来捣乱就会被电死，这只猫就是触电网死的。其实，院内根本就没有“布电网”这回事，这只猫是去食堂偷吃东西时碰到电源而死的。显然，电业局“老糟”借机拿这只死猫示众，用以警告那些企图偷袭广播站的人，给自己壮胆而已。

二高中的“糟字派”广播点已在 2 月 10 日撤走。2 月 11 日，是个星期天。“好字派”一早就将电业局大楼包围。

那天天气阴沉，天空灰蒙蒙的，路上看不到行人，以往熙熙攘攘的过往车辆也不见了。显然，通向电业局的路已被封锁，电业局广播站岌岌可危，一场灾难即将降临。大家聚在一起，分析形势，研究对策。有人说电业局大院是封闭的，外人轻易攻不进来；有人说电业局是国计民生的重地，没人敢怎么样；还有人说外人以为这里布了隐蔽的电网，绝不敢贸然进攻……大家决定坚守大楼，“誓死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他们紧急行动起来，人员都集中到二楼，分别守在楼的两头。

大约 8 时 30 分左右，不知是谁喊了一声：“后院进人了！”只见紧靠院东面车库北侧的那堵砖墙已被掏开了一个大洞，20 多个手持器械、头戴帽盔的偷袭者正猫腰弓背地不断从那个洞口里溜进院子，并沿着车库向西呈“弧状”包拢过来。

突然，南边的邮电局大楼方向枪声大作，震耳欲聋，如注的

夺命子弹朝电业局大楼猛烈射击，瞬间满屋砖块横飞，狼烟四起，激烈的弹雨压得楼内的人抬不起头来，走廊里频频传来玻璃碎片的落地声，伴随着女同学的阵阵尖叫，他们本能地躲在办公桌下。

一高中的袁占山知道，这是“锦联筹”在进攻大楼！他要向外界披露真相，控诉暴行，为自己人打气，壮胆！于是蹲在墙角，对着话筒大声喊到：“强烈抗议锦联筹进攻电业局广播站！”“要文斗，不要武斗！”“早已森严壁垒，更加众志成城！”“电业局大院已布了电网，进攻者会自掘坟墓！”这些话通过大喇叭传了出去，和枪声混在了一起，乱成一片……

枪声越来越紧，工人大康爬进了广播室，他出于保护学生生命的好意，趴在地上对着话筒说：“不要开枪了，大楼里都是无辜的学生，都是年轻的生命，我们打白旗撤出，我们投降！”

袁占山一听这话气坏了，“胆小鬼，想当叛徒吗？真没骨气！”他一把抢过话筒，愤愤地说：“你怎能这么说话！你能代表大家吗？”

大康看着袁占山的满脸怒色，没和他分辩，默默地退出了广播室。袁占山对着话筒声嘶力竭地喊到：“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誓与广播站共存亡！”“宁为玉碎，不为瓦全！” ……

突然“轰”的一声天崩地裂般的巨响，刹那间广播室里一片漆黑。当人们醒过神时，发现楼内已面目皆非，走廊两侧墙体全部扭曲变形，歪歪斜斜，好像用手指一触即能全部倒塌；楼顶天

棚塌落，从里面已能望见灰蒙蒙的天空；各屋的门和门框无一可正面直立的……正在大家为眼前突兀的变化而发呆时，一颗子弹“嗖”地呼啸而过，险极了！后来枪声停了，大家从“死亡”中走出来，个个是满身灰尘，蓬头垢面，狼狈不堪，又暗自庆幸彼此能死里逃生，躲过这一劫。下楼时才发现楼梯已成废墟，紧挨着楼梯的走廊也消失了，脚下的楼板已成了“悬崖”；楼梯东、西两侧的墙也不见了踪影，空荡荡的开了“天窗”；头顶的白色天棚残缺不全，东一块，西一块，有的还垂挂在那里，摇摇欲坠，透过残缺的天棚，可以看到灰蒙蒙的天空；被熏黑的木制人字架裸露着；空中弥漫着淡淡的烟雾和呛人的火药爆炸的气味，简直一片狼藉……

原来是楼梯处发生了爆炸！幸亏爆炸发生当日是星期天，楼内来人很少，仅有的十几个人也都在远离楼梯口的屋里面，真是神灵保佑！否则那场惨烈的爆炸不知要夺去多少无辜的生命！

袁占山在爆炸时还在广播室内，一声巨响后，他手中的话筒已不知去向。借着“门缝”漏出的光亮仔细查看，才发现门和门框扭曲变形，门斜插在框上，靠近走廊的墙裂开了好几条大口子，破损的吊灯在头顶摇晃着，椅子已被掀翻，传单、办公用品、水杯、暖瓶等散落在地，令人惊奇的是扩音器仍亮着红灯。他趴在地上摸索着，终于摸到了滚落在地的话筒，对着话筒吹了吹，天那！外面的喇叭居然还能发声！他强打精神，对着话筒大声喊到：“强烈抗议暴徒爆炸电业局大楼！”“暴徒爆炸电业局大楼，破

坏国家财产，罪责难逃！”。

喊了一阵之后，袁占山挣扎着爬了起来，用力推开了变形的门，撤到了走廊。这时枪声停了，环顾四看，眼前已面目全非，走廊内尘土飞扬，各屋的门七扭八歪，墙壁出现了一道道的裂缝，广播室北边的走廊还在冒着蓝烟。他走近冒烟处一看，一下子傻眼了：楼梯已不见了……他顾不上再多想，第一个念头是马上逃走！怎么逃？南面已被人占领，北面已无路可走，唯一的逃生办法就是跳楼！楼板距地面近 4 米，如直接跳向地面，弄不好会受伤。他向下瞄了瞄，发现了一块略呈三角形的白色天棚板，这块天棚板是爆炸时从楼梯上方的天棚上震落下来的，它一头紧贴地面，另一头斜搭在坍塌的楼梯碎块上，约 1 米见方。于是，袁占山战战兢兢地向它跳了下去。“噗刺”一声，脚下溅起了一团白烟，他正好落在了这块天棚板上，把它砸了个大窟窿，脚也落到了地面。他动了动脚，没有受伤！不由心头一阵惊喜，忙从废墟里爬了出来。向上一望，几个实验中学的学生还在楼板的豁口处向下观望，犹豫，不敢跳。袁占山忙招呼他们赶快下来。有个胆子大的也跟着跳了下来，还有的攀着断壁残墙爬到了地面。

这时，他们发现没逃出的伙伴正从南边撤退，被几个拿枪的人堵在院子里。院子里还停着一辆卡车，一些陌生人正在往车上扔枪。不能管这些了，逃命要紧！他们几个人一窝蜂式地冲过中央大街，跑到对面的锦州饭店楼前的人行道上。回首望去，爆炸的废墟还在冒着烟。围观的群众都是“老糟”，一下子围了过来，

告诉他们附近的路口步了岗，但医学院仍被“老糟”占据着。看来只有投向那里了。袁占山他们赶紧向西边的医学院跑去。一边跑，一边左顾右看，生怕被人抓去。跑到医学院时，个个蓬头垢面，上气不接下气，活像一群逃亡的“小鬼”，互相都认不出模样了。当时医学院的大楼也是戒备森严，所有的窗户上都放着砖。有人给他们端来了水，递来毛巾。大家简单地洗了脸，气喘嘘嘘地诉说着刚才的险情。这次死里逃生，真像做了一场噩梦。

“被俘”的人在押解人的呼喝下，踩着零乱的瓦砾木然地从二楼直接走到院子里，后又被集体押送上了一辆停在院西门外的大卡车上，映入眼帘的则是卡车两侧站立着两排沉默不语、排列整齐的解放军武装士兵……他们随后被拉到当时“劳民商财”楼里，在那里接受着“审问”和“教育”，并让他们交出“喇叭花”，还给他们每人一张 16 开纸，叫他们写“自白书”。“喇叭花”就是一高中的播音员李桂荣。然而无论怎么威胁利诱，也没能找到要找的人。因为也问不出个结果，对方也没有更多地向他们发难就全部释放了。

电业局广播站就这样被拔掉了，“老糟”的声音消失了，市内成了“好字派”的“一统天下”。

这次爆炸是“锦联筹”头头金德纯带领本派武斗队组织实施的。金德纯曾是电业局的职工，很熟悉电业局的地形，当天他采用了“明修栈道，暗渡陈仓”的战术：一伙人明火执仗地进攻，另一伙人则凿开了紧邻广东街的食堂东外墙，进入到食堂地底下

的暖气沟，将炸药运到了大楼楼梯下方的暖气沟里，引发了以此为中心的爆炸。

锦州第二高中和供电局据点的失守，使得锦州“糟字派”失去了铁路南市区的两个主要据点，退缩到铁路北的几个据点内。“糟字派”为此到北京向上层控诉“好字派”的行为。但是，此时中央并未评判锦州两大派组织谁对谁错，只是表态说两派都是革命组织，要求两派尽快停止武斗实现大联合。

## 第 962 回：做工作，周培源同意下山　外交部，“九十一人大字报”

1 月下旬，美国新闻通讯说：“北京的亲刘学生在美国培养的周培源教授的领导下和毛泽东主义的学生作斗争。”

2 月中旬，周恩来找到了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主任谢富治，让他转告周培源，要周“下山”。

2 月 13 日，谢富治向聂元梓传达周恩来让周培源下山的指示：

（一）周培源在国际上有影响，下个月他要出国，要他下山；

（二）周培源要执行支左不支派的原则；

（三）周培源是以北大副校长身份出国。

谢富治委派了北京卫戍区副司令员李钟奇和北京市革委会副主任丁国钰找周培源谈话。

“井冈山兵团”召开内部串连会，介绍李钟奇、丁国钰接见周培源传达周恩来指示的情况。他们说李钟奇讲：“今天接你来，是传达周总理指示：第一，你退出井冈山；第二，你还是副校长，参加群众组织不合适。这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声音。”

周培源说：“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指示我一定照办，不像有些人对我有利的就执行，不利的就不执行。”

周培源要求澄清：“要我下山，与‘井冈山’组织性质有无关系？”

回答是：“周总理只是出于对您个人的关心，与群众组织性质无关。”

周培源又进一步地提出了一个要求："要我下山可以，但是我不能发表下山声明。"

就这样，周培源悄悄地离开了北京大学，住到女儿家里。

2 月 13 日上班前，30 多大张彩色纸的大字报覆盖了东交民巷 30 号不对外办公的外交部大楼一层小礼堂前的整面墙壁，标题是《毛主席语录》中的一句话："揭露敌人，战而胜之"，大字报还有一个副标题："批判'打倒陈毅'的反动口号"。最让人惊奇的是大字报的作者，大字报后面的署名达 91 人之多，而且全是外交部司、局级干部。

这张大字报是外交部在文革期间签名人数最多、篇幅最长、用楷体抄写得最工整的一张大字报。大字报缮写人是被外交部同人公认的书法家、国际司干部、礼宾司副司长韩叙的夫人葛绮云。

1968 年新年刚过，外交部一些刚刚恢复工作的司长和奉召回国参加文化大革命的大使们开始频繁地相互走动起来。在他们的感觉里，文化大革命似乎快要进入尾声了。他们开始酝酿着一个大胆的计划：以写大字报的方式公开表示反对"打倒陈毅"这一口号。这个圈子有一个 4 人组成的核心：苏欧司司长余湛、外交部直属单位《国际关系研究所》副所长陈楚、礼宾司副司长韩叙和外交部直属单位《外交学会》副秘书长赵政一。另外第一亚洲司司长张彤、总务司副司长李玉池、礼宾司代司长葛步海、副部长兼政治部主任刘新权、政治部副主任兼干部司司长符浩、新闻司司长秦加林等部、司级领导干部也参与串联和酝酿。

起初他们商定大字报要写三方面的问题：一、关于打倒陈毅的口号问题，二、关于 17 年来的外交政策问题，三、关于干部路线问题。后来他们感到第二题和第三题不容易写，工程浩大，耗时漫长，就放弃了，以韩叙、张彤、陈楚和余湛等人草拟关于“打倒陈毅”的口号问题的大字报初稿为基础，展开讨论和修改。

大字报的标题最初定为“打倒陈毅是个反动口号”，因担心会伤害那些不明真相的普通群众，最后的标题是从《毛主席语录》中挑选出来的：“揭露敌人，战而胜之”。

大字报定稿后，曾送到外交部党委和外交部“大联筹”审阅过。听到消息的司长和大使们则争先恐后地在大字报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两天内就有 91 人签名。因为 1967 年 11 月 12 日，已有 26 位大使写过批判“王八七讲话”的大字报，所以很多大使没有再在“91 人大字报”上签名。驻英国代办熊向晖在“91 人大字报”和“26 位大使大字报”上都签名了。

这份长达8000多字的大字报贴出后，由于内容惊人，骤然成为外交部的头号新闻，轰动一时。

大字报说：围绕着“打倒陈毅”和反对“打倒陈毅”展开的斗争，绝不仅仅是关系陈毅个人的问题，而是关系到究竟由什么人掌权和执行什么路线的问题。大字报断言：“一小撮阶级敌人”为打倒陈毅而采取的种种卑劣手段，不过是他们“推翻毛主席无产阶级司令部”政治阴谋的一部分。

大字报指出：1967新年前后，“王八七”一伙泡制了一个打倒陈毅同志和其他几位副总理、反对周总理的罪恶计划，掀起一股反革命逆流。他们的黑手也伸进了外事系统。他们的别动队“五一六”分子刘令凯一伙公开提出“打倒陈毅”。

大字报最后说，“我们敬爱的周总理日理万机，十分劳累。我们同外交部和驻外使领馆广大革命同志一起，热烈欢迎陈毅同志尽快回来主持部务。我们将在以陈毅同志为首的部党委的领导下，做好工作。”

这份大字报的影响很快扩散到全国各地，而猜测大字报所说“政治阴谋”的主使人究竟是谁，更是成了人们在私下谈论得最多的话题之一。

“91人联名大字报”在外交部造成了很大的声势，影响很大。“大联筹”对此没有提出异议，大字报贴出后，作为重要的大字报，“大联筹”还摘要刊登了简报，作了广播。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曾以十分兴奋的口吻向陈毅复述过大字报的主要内容。尽管陈毅对有人出来讲公道话表示赞赏，但他更担心这样做会帮倒忙。“91人大字报”张贴的时间以及它所谈论的问题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一年前的“二月逆流”。

但是，驻外使领馆回国人员的群众造反组织“45战斗队”，却认为这91人联名大字报是右倾翻案，2月24日，即91人联名大字报贴出12天后，他们将大字报内容上报了周恩来。周恩来几乎是最后一个知道大字报事件的人。

当晚，周恩来看到“45 战斗队”的那份报告后非常重视，立即让他的秘书钱嘉栋打电话给外交部姬鹏飞，转告他的意见：“周总理说：不能笼统地认为提‘打倒陈毅’这个口号是反动的，因为这里有不同情况，有的人提这一口号，的确是从恶意出发的，但有的人提这一口号是从善意出发的。这张大字报实际上有否定一切的错误，是原则性的错误，是从右的方面来的干扰，应当马上想办法来弥补一下。”

次日，钱嘉栋秘书第二次打电话给外交部“大联筹”转达周恩来的意见。钱秘书说：“周总理认为这张大字报不是一个片面性的问题，而是原则性的错误。总理一直说过要防止老保翻天，现在就是从右的方面来的干扰，帮了到忙。对于‘打倒陈毅’的口号，要一分为二。少数人是别有用心的，多数人提这个口号只能进行解释工作。”钱嘉栋说：“91 位同志、部党委都要表态，不批判、不表态，极‘左’又要出来。部党委不表态，就站不住。如果部党委不表态，总理就来表态。搞右要防‘左’。”

钱嘉栋秘书电话告知“45 战斗队”，传达周恩来的意见：“大字报实际上有否定一切的错误，是原则性的错误，是从右的方面来的干扰。”

2 月 25 日，听到钱嘉栋秘书转告周恩来的意见后，余湛、陈楚、韩叙、赵政一等人立即开会作检查。他们代表 91 人写了一份 2000 余字的检查。书面检查当日深夜定稿，连夜抄成大字报，2 月 26 日一早贴出。他们承认“91 人大字报”有否定一切

的倾向和原则性的错误，没有将一小撮阶级敌人和从善意出发而喊过“打倒陈毅”的群众区别开来，从右的方面干扰了外交部和驻外使领馆的文化大革命运动。

按照周恩来指示，2 月 26 日，外交部党委贴出第一张题为“我们对 91 人大字报的看法”的表态大字报，站在第三者的立场上一般地批评 91 人大字报。

陈毅听到周恩来批评大字报后，于 2 月 28 日致函周恩来，表示完全赞同周恩来的批评，并在检讨信中说：“我郑重声明，91 人大字报其精神和立场是右倾保守的，是对抗文化大革命的。我一百个、一千个、一万个不同意这种错误精神和立场。”

对于“91 人大字报”签名者，他说，“他们与我共事多年，我平时政治不挂帅，对他们帮助太少，我作为领导者，对于他们犯错误，我是有责任的。”

3 月 1 日，陈毅请外交部同志将他 2 月 28 日写给周恩来总理的信用大字抄写后公布于众。

3 月 3 日，外交部党委贴出第二张表态大字报，决定对错误进行了检查。

3 月 5 日，姬鹏飞常务副外长代表外交部党委作第一次检查，公开承认部党委对于 91 人大字报的错误“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3 月 6 日，“大联筹”开大会批判 91 人大字报，周恩来让陈毅参加，并发表讲话。

陈毅首先说："亲爱的同志们，我首先念一段最高指示：'要痛痛快快承认错误，改正错误，就好了，就取得主动了，越吞吞吐吐，扭扭捏捏，就越会被鬼缠住，越陷越深，老是被动，最后还得解决。'我对伟大领袖这一非常深刻，非常明确，非常现实，一针见血的这样的指示，我经常拿来念，来读，我又感到很愉快，可是也很沉痛，沉痛以后又很愉快。"

台下一阵热烈地掌声。

陈毅接着说："因为我是在文化大革命中间犯了极其严重错误的人，所以对这一最高指示非常适合，屡次犯错误，我在外交部工作中间也有很大的错误。没有作外交工作以前几十年来党内斗争中间，在革命斗争中间，也犯过两次大错误，所以我今天讲话之前把这一最高指示再温习一遍，同时今天周总理叫我来参加这个会，听大联合筹备会同志的检查，大联合筹备会同志也同意我来参加这个大会，也有广大的到会的同志也批准我来参加这个会，给我一个到群众中来跟群众见面，彻底检查我自己的错误的机会，我表示感谢。"

他说，"我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犯的错误极其严重。我总是保护老干部，总是指责革命小将，指责青少年过左，总是不看文化大革命的主流，""极端的严重右倾"。他又说，"对外交部的夺权有抵触，总想把群众运动纳入自己的轨道。"

对于 91 人大字报和"打倒陈毅"的口号，陈毅说，大字报的"要害是借保陈毅之名。实行保自己，""以'打倒陈毅'口

号来作为革命与保守，正确和错误的分界线，以我作为划分的标准，这是完全错误的。”他认为，“群众喊‘打倒陈毅’的这个口号，是对我的一些严重错误表示极大的愤慨。”

陈毅还批评部党委。他说：“部党委的要害是私字当头、怕字当头、我字当头，让 91 人大字报出笼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所以部党委的同志应该到群众去作深刻的检查，特别是不能故态复萌，这次是一个故态复萌的一个表露，仍然是想恢复当官作老爷，恢复不民主，恢复一些问题由少数人做出决定就要人家执行，根本不愿意请教群众。”随即陈毅又自责说，“我对部党委问题上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因为多少年来，我对大家督促不严，我对大家要求不严，总是保护，从保护出发，从团结出发。”

3 月 9 日，姬鹏飞常务副外长代表外交部党委作第二次检查。

## 第 963 回：甩飞石，拉萨武斗动真枪　下通知，召西藏代表进京

进入 1968 年，西藏高原也打得不可开交。1 月 20 日前后，西藏“大联指”的下属组织“格尔木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司令部”，简称“格尔木无司”，他们的几个头头开会讨论怎样进攻对立面“造总”派在拉萨市区几个据点，要端掉其“黑窝”，扩大自己的地盘。会议提出，要“集中精锐，多点开花，不惜代价，坚决拿下，不达目的，决不收兵”。

22 日下午，按预定方案，“格尔木无司”派出武斗队伍，将大批枪支弹药运到“大联指”的下属组织“五·二三革命文艺战斗总部”在东城区的武斗据点。随即，又派出一支队伍携带 70 多条枪，进入东城区。

与此同时，“格尔木无司”还分别派出武斗队伍，对劳动人民医院、西郊水泥厂、供电所、邮车站和师范学校、交通局进行武斗前的侦查、部署和分割包围。

当晚，他们首先对该区“红艺司”实施进攻。“红艺司”立即组织武斗队进行防守。双方在激烈的交战中互有伤亡。

“格尔木无司”还向市劳动人民医院“造总”派据点进攻，以“突然袭击，集中火力和神枪手，消灭敌人火力点”的战术，将“造总”派占据的医院大楼内的火力点压制，并以敢死队员趁黑摸到大楼下，用手榴弹从窗口扔进楼内。“造总”派在这次武斗中有 14 人被手榴弹炸伤。

在西郊，“格尔木无司”对“造总”派在水泥厂的“工造团”据点发起猛攻。

水泥厂的钢筋水泥工事异常坚固，手榴弹扔上去根本无效。“格尔木无司”的前线指挥经过战地动员，发动大家做“以革命先烈董存瑞炸碉堡、黄继光堵枪眼”式的“英雄战士”，“舍生忘死，为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而甘愿抛头颅、洒热血”，一些人抱着炸药包，在火力掩护下，趁黑“爬到敌人的工事前，”对水泥厂的武斗工事进行爆破，终于端掉了“工造团”在水泥厂的据点。

“工造团”阵地失守，除少部分人趁黑逃脱外，大部分武斗者被俘。“格尔木无司”控制了拉萨大桥。

第二天，两派在上述地方的争夺战继续进行。武斗中，在“红艺司”的阵地上，1 名“红艺司”成员中弹身亡；在市交通局，“造总”派的“九司七兵团”在武斗中 3 人被打死。

武斗中，“格尔木无司”控制了拉萨市东城区的市医院、供电所、邮车站和师范学校等单位。

拉萨两大派组织在武斗中用真枪实弹比内地的时间要晚一些，在 1968 年春节期间，已有少数群众组织在武斗中开始使用步枪、土制手榴弹和炸药包。因为这里是藏族聚居地，武斗使用的“远程武器”，却有其别具一格的特色，就是用一根牦牛毛编织的鞭绳，裹着一块鹅卵石，在头顶飞旋到一定速度后，猛一松开一端鞭绳，让鹅卵石飞抛击中目标，俗称它是“飞石”。这种

“飞石”，原本是藏族同胞牧放牛羊时，驱赶牲畜时使用的工具，飞抛离手的那一瞬间，还带有“啪、啪”脆响的声音，日积月累的磨练，使飞石者能做到准确地击中近百米之外的目标。

春节前的一天，离城区 10 余公里位于拉萨城区至贡呷飞机场的要道上的拉萨水泥厂再次发生武斗。

水泥厂为“造总”控制。头一天晚上，“大联指”经过策划，趁黑夜进行了袭击，夺取了公路右侧的少部分厂房，而公路左侧的工厂主楼还被“造总”占领着。“大联指”为扩大战果，夜以继日全力进行攻击，直到第二天的上午仍不停歇。此时，“飞石”如雨点般落下，只见工厂高耸的楼房顶上，站满了黑压压的一片人，个个头戴柳条帽，有的正抡动着手中的牦牛鞭，将“飞石”向对方据守的楼房抛去。两派都以楼房为掩体，展开“飞石”的激烈对攻，不时还可以听到被“飞石”击碎玻璃窗户的“哗啦啦”声。

水泥厂有一个排的支左解放军，就住宿在厂内的平房里。当中央文革的记者飞跑冲进部队的住房，只听到“啪、啪、啪”的声音，一阵“飞石”频频地砸在钉有木板的窗户上，有如击鼓一般。室内的窗户因被木板挡严，显得光线暗淡，战士们有的开亮电灯，为端坐在条凳上的人理发，有的埋头在灯下看书写信，好像不知屋外正在发生武斗。记者了解到，从昨晚起，排长便带领人员，在“大联指”那边做工作，今天凌晨，他又带人赶到那边去了。

不一会，耳听“嘭”的一声，一块“飞石”又重重地砸在遮挡窗户的木板上，记者很觉好笑，便向战士们问道：

“外面武斗这么厉害，石头砸在窗户上啪啪发响，你们连一点儿也不觉得害怕吗？”

战士们笑笑说：“这时经常发生武斗，我们已习惯了。”

武斗持续到上午 10 时多，经过支左部队的反复劝说，双方对峙的局面才逐渐缓和下来。这次夜以继日的远程对战，以“造总”丢失公路右侧少数厂房“据点”而告终，双方只有少数人员轻伤。

武斗后，“大联指”与“造总”所设的“据点”，一路之隔，遥遥相对，时时发生磨擦，双方来往公路的车辆，也常常遭到对方的袭击，时而因此爆发出一场“飞石”对阵。武斗发展到以后大规模动用真枪实弹，这里仍然是两大派争夺的重点。

1968 年 2 月中旬，中央决定西藏两大派组织，党、政领导干部和军区派出代表赴北京学习，汇报解决西藏问题。北京记者站领导电话告之驻藏记者，随同西藏地区赴京人员，同专机一起返回北京。因为连续几日，天气不佳，专机多次推迟起飞，迟至 2 月 21 日，天气稍有好转，西藏派出的赴京代表才于凌晨登机离开拉萨。

这次赴北京的代表，两大派组织和倾向于两大派观点的领导干部的人数、名单，都是经过支左部队、自治区区工委反复研究，并又同两派磋商之后才确定下来的，基本上处于对等状态。西藏

军区在家主持支左工作的政委任荣也一同随机前往。

起飞那天，天空布满了一层薄薄的白云，空旷的机场上，凉风飕飕，棉帽放下护耳，下端的小绳被吹得四处乱晃，鼻子尖直冻得发麻。临上飞机时，任政委的秘书奉命站在弦梯的右边，手拿着花名册，逐一清点、辨认登机的人员。他办事十分认真，如发现有人拥挤着上飞机，就立即把他们拉开，保持一定的距离，嘴里不停地招呼："慢一点，不要忙！"只听见他高喊一声："陶某某！"对方答一声："到！"待登机的人经过他面前时，他又仔细辨认一下才放行。

登机的人员一一被点名、清查之后，登上了飞机，没有发现一个不到的人员，也没有发现有什么差错，都是按照事先分配的名额、应到的人员登上了飞机。不一会，弦梯收走了，飞机徐徐起飞了。

记者登上飞机之后，与任荣政委、程秘书等同坐在飞机前部的头等舱里。飞机升空，穿行在弥漫的白云之中，由于强大的气流的冲击，一会儿向上抛，一会儿又向下落。任政委谈起这次北京之行，语气平和地对记者说：

"这次派代表去北京，'造总'坚持提出非要周仁山去不可，周仁山本人也有这个要求。我们怎么能同意呢？他如去了北京，两派代表又怎能坐在一起学习，肯定会引出不少麻烦来！所以，我们认为，还是不去为好！"

谁料就在交谈这件事不到 10 多分钟，程秘书突然神情紧张

地从后舱走过来，向任政委报告：

“政委，真没有想到，周仁山冒名顶替某某，穿着一件皮大衣，放下遮绒帽的护耳，戴一个大口罩，蒙混过关登上了飞机！”

任政委一听到这一消息，“啊”的一声半天合不拢嘴，记者也很诧异：“上飞机时，不是一个一个点名、清查了，这怎么可能呢？”

程秘书说：“这是真的，我刚听说也不相信，特地到后舱，见到了周仁山才来报告的！”

记者仍不大相信这一情况是可能发生的，因为上飞机前，他受程秘书之托，帮助程秘书在登记的弦梯旁维持秩序，确实没有看见周仁山登机，这怎么可能呢？耳听为虚，眼见为实，记者立即起身，前往代表们乘坐的后舱查看，果真是如此！这时的周仁山，已脱下大衣，摘下遮绒帽和口罩，远远地一眼便能认出。此时，他正笑容满面地与坐在周围的“造总”组织的代表交谈。他见记者到来，连忙欠起身子握手，微笑点头。

记者返回前舱，告之任政委：“周仁山真的上了飞机，是冒名顶替另一个干部的名额。”

任政委按捺不住心中的怒火说：“这周仁山前次潜逃到青海，这次又冒名顶替上北京，真是太不遵守纪律了，这还怎么像一个自治区的副主席？！他要没有问题，又何必一头栽倒在一派的怀里！”

飞机临空飞翔，又不能像坐汽车一般，随时可以停车下人，

这时任政委也只好无可奈何地说："现在没有别的什么办法了，只有到达成都以后再说。"

事后了解到，周仁山冒名顶替之举，是经过与"造总"少数头目密谋策划的。他们事先与另一名观点倾向"造总"，确定作为代表上北京的干部商定，借用他常穿的皮大衣和遮绒帽，学着他的腔调回答"到"。并且，对这件事绝对严守机密，连"造总"中其他赴京代表，也是在飞机起飞之后，周仁山露出真面目时，才惊讶地认出来的。

飞机降落成都机场后，在候机室里，任荣政委让秘书将周仁山请来，当面毫不客气地发火道：

"周仁山，你这次冒名顶替，是犯了一个极大的错误，怎么能再一再二地这么做，把自己紧紧地与一派伙在一起？！……"

周仁山不等任政委说完，抢先争辩：

"这有多大的错误，到北京去学习、汇报情况，我应该有这个权利！我担心有人从中作梗，歪曲汇报我的情况，所以想有机会直接向中央呈述！"

"你的要求，我们可以向中央反映，由中央做出决定，在未经请示中央同意之前，你怎么能采取这种做法？你好好想一想，是不是太有些出格了？你现在正在接受组织的审查，群众的揭发、批判，怎么能妄自行动，乔装打扮去北京呢？！"

"我觉得对我的揭发、批判，有许多是不实之词，'大联指'这一派对待我的态度也很不公平，我有许多意见，在拉萨无处诉

说，正想能有机会到北京去申诉……”

任荣政委不耐烦地打断他的话说：“不要再说了，我就在机场向北京请示，如果中央不同意你去北京，你就留下，改乘飞机回拉萨！”

任荣政委在机场，经军用电话线路要通了中央办公厅，经请示周恩来后得到答复：“既然事已如此，就让周仁山随机到北京来参加学习。”

听到如此决定，任荣政委无可奈何地挥手对秘书说：“你去告诉周仁山，中央已同意他去北京！”

周仁山高兴了，“造总”的代表在候机室欣然相告。

“大联指”的代表听到这个决定后，对任荣政委提出强烈抗议，表示对周仁山去北京参加学习的行动“保留不同的看法”，认为这是“周仁山犯下的新罪行”，今后要联系他所有的“三反”言行，一起彻底清算。

果然，周仁山到达北京西藏地区学习班后，成为了两大派争辩的焦点。这一派要召开大会揭发、批判他，而另一派又提出抗议，要求予以保护。乱得学习班的领导无法驾驭，只好向中央请示办法。中央指示，暂时将周仁山“隔离”审查，接受群众背靠背的揭发、批判。两派白热化相争的局面暂时平息下来，但分歧的意见仍然存在，继续在大字报上展开激烈的“派战”。

## 第 964 回：功长治，晋东南“五县剿匪”　滇联合，谭甫仁主政云南

山西自 1 月 16 日发生了晋东南“116”伏击战，将李顺达一行百余人悉数被抓后，一些县的群众为了到长治营救李顺达，同“红总司”、“总司”两个“联字号”组织联合成立了“晋东南地区捍卫红色政权联合总指挥部”，简称“联总”。在“联合总指挥部”的组织发动下，从 2 月 7 日至 10 日，他们调集了 7 县 7000 余民兵先后到达指定地点包围了长治城。

在激烈的拉锯战中，“红字号”节节败退，武斗据点被分割包围，互相的联系被切断，失去了统一指挥。各据点只好“各自为战，苦苦支撑”，失败已成定局。

2 月 12 日，“联总”又调集沁水、阳城、陵川、长子、高平 5 县民兵约 4000 余人，分四路对高平县的“红字号”组织发动“围剿”，时称“五县剿匪”。

就在7县武斗人员攻打长治成功在望之际，中央文革、中央军委于2月16日以中发［68］28号文件给晋东南“红字号”、“联字号”两大派组织下达通知：中央指定69军政委曹中南、副军长肖选进带领部队，前往长治地区担任支左任务，并负责主持两派谈判。希望两派组织立即派出代表，在指定的地点进行谈判。通知要求双方，立即制止武斗，释放互抓人员，拆除工事，封存和上交武器，恢复交通和革命秩序。

从中发［68］28 号文件下达的第二天，17 日开始，参加攻

打长治的各县武斗民兵携带武器弹药陆续地返回各县。

可就在 2 月 17 日当天，长子县武斗总指挥部指派常张公社民兵进占长治物资局大楼、城关公社，指派大堡头公社民兵进驻长治面粉厂，对“红字号”组织形成了包围之势。接着，“红字号”武斗队又来个反包围。双方在这一带打得难解难分，十分激烈。上午 11 时左右，“红字号”炮队向五一桥和长治面粉厂附近“联字号”的机枪阵地发射 120 迫击炮炮弹 6 发。之后，长治面粉厂小麦垛起火燃烧。当时“联字号”宣传说，是“红字号”打炮引起的；“红字号”宣传说，是长子民兵放火烧的。该厂当时存放小麦 200 万公斤。灭火后，抢救出的小麦，磨成次粉 73975 公斤，磨成黑粉 843165 公斤，完全烧焦的小麦为 142426 公斤。另外还烧毁玉米 15109 公斤。武斗平息后，刘周娃、张坤、赵文富 3 人以打炮烧小麦罪判处死刑，于 1970 年 4 月 20 日枪决，其他同案人员分别判处徒刑或免于刑事处分。1978 年 12 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此案平反。

2月21日晚，解放军“支左”部队开进长治市区，发布戒严令，全城戒严。22日，长治市内的各县武斗民兵撤离完毕。22日当天，谢振华派代表到长治飞机场候机室，主持了晋东南两派头头的停火谈判。

考虑到谈判的危险和复杂，谢振华要求部队在候机室外重兵布防，楼顶四个角上架起四挺机枪，枪口对着四外的旷野，以防两派武装冲击会场。由于解放军的威势，加上调解代表的努力工

作，两派同意将武器交给部队。从此，晋东南炮火连天的派性武斗被制止。

这次长治武斗，双方被打死 17 人，伤 80 多人，耗粮 24 万余公斤，折款 9 万元；支出现金 29 万余元，一共消耗 38 万多元。加上被攻打的单位的损失，总计损失 157.9 万多元。

而正在高平县进行的“五县剿匪”，则持续到 3 月 18 日，长达 36 天之久。有 55 人在武斗中被打死，3900 余人受伤，其中被抓后打死 30 人。武斗结束后，高平县“联字号”造反组织还成立了“小分队”、“保卫科”、“专案组”，对“红字号”组织进行了大规模的清洗，将 16 万多人列为土匪，2711 人列为大、小坏头头，并整理了 1524 页的材料。

1968 年 2 月，中央通知山西三大派群众组织的头头全部到北京报到，北京在丰台的解放军后勤学院举办山西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负责人是 69 军政治部李副主任和山西省军区副政委智生元，这样的学习班当时在北京还有福建班、四川班、云南班等，总负责是工程兵政委谭甫仁中将。各派头头按部队的连、排混编，由军队派人任连、排长，每天组织大家学习中央文件，谈心得体会。主要的活动就是读《毛主席语录》，然后就是对照语录找问题，斗私批修。

学习班里伙食很好，吃的是天津小站大米，而当时北京各饭店里卖的都是红大米做的饭。有人刚进学习班时，一顿能吃八个馒头，一周后他一顿只能吃两个。但是学习班不准随便进出，门口

有北京卫戍区站岗。但只要有正当理由,还是可以请假外出的。

刘格平成了山西学习班下属主要派性组织头头小组的组长。副组长呢，有刘灏、段立生、黄锐庵等群众组织头头。早上大家按时起床，早饭后端上一杯茶水，各自到指定的地方集中学习讨论。大家念罢语录，就开始活学活用了，我斗你的私，批你的修，你斗我的私，批我的修。辩论、争吵、拍桌子、唾沫飞溅，是每个班里的必修课。

2 月 11 日，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召集周恩来等人开会，听取了这些学习班的情况汇报。

周恩来首先谈了“云南班”的情况，当说到云南已来了 800 多人时，毛泽东大手一挥，摇头说：“不行，800 人少了，要增加一倍。各派，包括军队的，都来。”“河北的办法还是开办训练班，地方两派、军队两派来几百人，到北京来办训练班。”“有话不当面讲，又在背后挑，是两面派。”“高级领导同志的夫人、子女都不要参加派，要超脱。”“中央可以考虑发个通知，把破坏铁路的人同革命造反派区别开，这个方针好。造反，要看造谁的反，不能造无产阶级的反，不能容许破坏铁路。”“河北省革委会办事机构小，只几十人，能办到的话，很好。”

半夜，学习班负责人、工程兵政委谭甫仁突然接到通知，说是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紧急约见他。谭甫仁兴奋、紧张和不安地走进人民大会堂 118 厅，只见毛泽东披着一件睡衣坐在那里，谭甫仁为之一惊，他很紧张。

毛泽东让谭甫仁坐下，和他讲起了云南的历史。毛泽东对中国历史了如指掌，谈起来深入浅出。他谈到了吴三桂做平西王、永镇云南，逆历史潮流而动的教训。最后，毛泽东跃过数百年历史，转入正题道："你要做平西王了，执掌云南边地，封疆大吏哟！"谭甫仁几乎插不上话，因为听毛泽东讲话是何等的荣誉啊，况且一个农民出身的将军怎么可能同如此渊博的毛泽东对上话呢！

毛泽东说："中央已决定你担任昆明军区政委，名已正，言已顺，把云南班、昆明班办好，积累的问题解决掉，卸掉了包袱，再回云南。"

谭甫仁出了中南海，顿时感到自己身上的担子很重。他对工程兵司令陈士榘说："咱们从井冈山就在一起，在工程兵和你共事也很踏实，但是到云南就有点没底，如果你一起去就好了。"

陈士榘说："这是主席对你的信任啊！"

2 月 13 日，在中央的督促和帮助下，云南两派赴京代表商定了《关于停火交枪、制止武斗协议》和《关于恢复交通运输和保障邮电畅通协议》。当晚 21 时 06 分周恩来等中央首长在人民大会堂安徽厅接见了云南省驻军和两派赴京代表。

周恩来说："云南两大派达成了两个协议。谢副总理要我们中央、中央文革小组、中央军委的一些同志一道来见见你们。你们一部分同志还要回去动员保证执行这个协议。现在请谢富治同志讲一讲。"

谢富治："你们定了《停火交枪、制止武斗》和《恢复交通、邮电》两个协议，现在总理、康老、江青，吴法宪同志今天都来了，最后你们还有3个人要签字，签了没有？"

答："没有。"

谢富治："你们现在就签，在中央首长面前签字，就要执行嘛！我们作证明人。"

3位代表当场签字。谢富治说："好！"众人鼓掌呼口号。

谢富治："同志们！云南昆明地区的代表，一平浪的代表、楚雄的代表、昭通的代、曲靖的代表、东川的代表、以礼河的代表、文山的代表、红河的代表、保山的代表、下关的代表、玉溪的代表和军队上的代表，来到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所在地北京，来到以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司合部所在地北京。同志们经过学习了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指示，特别是学习了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学习了林副主席的指示，学习了中央、周总理的指示、学习了中央文革小组江青同志的《九五讲话》，大家进行了批评和自我批评，增强了无产阶级党性，克服了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派性，在北京学习有了很大进步，达成了刚才签字的两个协议。这两个协议是很好的。中央文革小组准备请示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林副主席，批准这两个协议，支持这两个协议。"

"这个协议适用云南所有各派、各地，所有的人都要执行。不能一面签订协议，一面还在那里打仗，不遵守协议。"

他说："云南的派性是很严重的，军队有，地方有。13军、

14军写了检查，13军的较好。军队、地方都应该检查。”

“昆明两大派都是跨行业的，应该停止武斗，应该归口大联合，不要搞跨行业的组织。”

“云南现在的秩序还不那样好。所以，大家还要注意坏人，对那一小撮死不悔改的走资派、特务、叛徒，特别是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还有美蒋、苏修、日本特务、反动派，在云南要提高警惕性。两派内部的坏人，都应该按照江青同志的指示，总理也讲过，都根据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指示，双方自己抓坏人。上面就有坏人，有李成芳嘛，有赵健民嘛！这就是坏人嘛！都应该抓。两派群众里头，也是有的。”

“这个协议还有军队参加。所有军队都不应参加地方两派的活动。军队内部的事情，军队自己办，地方也不要参加军队的事情。至于三支两军，那是另外一件事情。军队内部应搞‘四大’，的应按军委指示搞。不搞‘四大’的坚决不搞。也不能变相地搞‘四大’。军队要听指挥听命令，不能发展无政府主义。”

“现在同志们有了一个很好的开头，达成了很好的两个协议。要坚决地执行，落实。要按照毛主席的教导，有一个很好的学风，不能一面签订协议，一面在家里打仗。这是不允许的。那样搞自己要垮台的。”

“在这里还要讲讲工八团的一部分人，在滇西成立了什么‘滇西挺进纵队’，在那里做了很不好的事情，特别是在下关。后来云南的军队根据中央的指示，要他们交枪，交出坏头头，进

行训练，他们没有很好听从，他们后来抵抗，先行开枪，后来双方伤亡很多人，军队也伤亡了一些人，这是走资派挑动的结果，不能怪工八团，要怪走资派，也不能怪‘炮兵团’。对这件事情双方都不要做文章。”

2 月 21 日，云南省军管会、两派群众组织组成停火交枪监督小组，恢复交通、邮电，并由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昆明市进行巡逻。截至 3 月 4 日中央规定的限期，昆明两派共交出枪 17890 支，各种火炮 210 门，子弹 980 多万发，炮弹 7000 发，以及炸药、爆破物等。

2 月 26 日，云南两派代表在北京达成《关于实现大联合协议》，并成立联合审干小组。次日两派在京代表发出“公开信”，要求尽快实现全省各地区、各部门的归口大联合，力争在 3 月份召开工代会、红代会，建立云南省、昆明市革命委员会。此后又签署了《抓革命、促生产，打击反革命经济主义的协议》，要求调整、健全和建立生产班子，加强生产领导工作，动员进驻外单位的群众组织和群众，迅速返回原工作单位。职工要坚守工作岗位，遵守劳动纪律，业余闹革命。早已对派性斗争产生厌恶和反感情绪的群众，积极响应归口联合的号召，昆明铁路局、云南日报、市人民银行的两派群众首先达成联合协议，宣布与两派脱勾，不再受两大派的左右。全市各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纷纷达成联合协议。

但是，由于两派积怨太深，一时尚不能消除派性和对立情绪，

特别是一些头头和骨干分子，仍在积极活动，反复和摩擦不断，交枪留一手，交枪又抢枪，停火重开战的情况时有发生。截至 3 月 4 日中央规定的限期，昆明两派共交出枪 17890 支，各种火炮 210 门，子弹 980 多万发，炮弹 7000 发，以及炸药、爆破物等。但仍有不少流散在社会上，成为昆明治安的一大隐患。

## 第 965 回：广西乱，玉林万花楼被毁　夹道留，五十五军难离桂

而此时与云南毗邻的广西依然打得热火朝天。

1968 年 1 月 4 日，广西玉林“422”数百人到玉林军分区门口，召开“反围剿、反迫害、反屠杀”大会，并静坐 6 天 6 夜。

1 月 5 日，南宁，广西“联指”红卫兵 1000 多人来到广西军区大院游行示威，称伍晋南、贺希明、霍泛犯下了严重罪行，勒令伍晋南交出“认罪书”。广西大学“能闯”头头把伍晋南拉到军区球场批斗两个小时。当晚，北京总理办公室来电指示，要“联指”、“能闯”和大专院校红卫兵为揪斗伍晋南之事承认错误，否则通报全国。与此同时，“422 指挥部”连夜在南宁市“造反楼”召开万人大会，强烈抗议“联指”揪斗伍晋南。会后游行到广西军区，要求军区领导严肃处理这一事件。示威队伍直至 6 日凌晨 3 时才离开军区。

1 月 7 日，南宁“422”派的“红色铁路”又有 500 余人到广西军区请愿，抗议南宁铁路军管会在“支左”工作中支一派、压一派的行为。

当天，柳州融安“422”派的“青年近卫军”在县城长安河西车渡码头，拦劫刚从越南“抗美援越”前线回国休整的 6886 部队军车，抢得冲锋枪 9 支和一部分粮食。

1 月 8 日，广西“联指”指挥部向下属组织传达指挥部关于“一个目的，三个月打法”的战略决策：“一个目的”即“把文

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三个打法”即“人民战争”、“搞军区的检查”和“打外围战”。对这个战略决策还规定了四点：一、“422”想要一半权，一点也不给，权只能掌握在无产阶级革命派手里；二、与“422”的矛盾是敌我矛盾，没有联合的余地，“422”不投降，就坚决消灭；三、凡参加“422”的领导干部，一律当走资派打倒；四、争取在 4 月以前解决各县，4 月以后集中力量解决 4 市，争取 8 月成立自治区革委会，各县自己能解决的自己解决，自己力量不足的，附近县互相支援，一定要在 4 月前解决各县。这个“战略部署”要求在 1 月 18 日前传达到各县，并说明是广西军区的意图。

1 月 10 日，南宁市警备司令部、政治部发出公告，支持两派群众组织实行联合，规定群众组织不准抓人、打入、杀人，不准搞打、砸、抢、抄。

11 日，55 军副军长孙凤章在柳州被群众组织揪斗。

17 日，《广西联指报》公布玉林专区容县 43 个“反共救国团”等“反革命组织”。

1 月 18 日，灵山“革联”派出 200 多人组成控诉团，第二次到广西首府南宁，向广西军区控诉灵山“联指”在 5 个公社成批杀人的罪行。控诉团静坐广西军区政治部大楼前数天不走。

同日，广西革筹，广西军区向中央文革、中央军委、广州军区发出《关于容县黎村问题的初步调查报告》的电报。报告说：“黎村两派革命群众组织因观点不同，分裂成为互相对立的两

派。由于走资派的挑动和革命组织内部不纯，混进少数坏人，两派不断武斗，一些干部群众被杀害，后果比较严重。”

1 月 20 日，广西“工总”和河池地区“422”派部份群众 400 多人到广西军区声援灵山“革联”控诉团，并揭发各地“联指”派屠杀无辜群众的罪行。他们在广西军区政治部大楼前请愿。军区负责人答应派人到灵山制止乱杀人。

2 月 2 日,广西革筹小组给凤山县发出制止武斗的五条命令。

2 月 4 日上午，广西革筹小组开会，由于会上观点不统一，没能采取果断措施。广西各地出现的武装民兵成批杀人事态愈演愈烈，逃亡到南宁的群众达数万之众，柳州、桂林、梧州等城市也成千上万地逃入各县来的群众。老人都说：“广西人逃难，比当年逃日本鬼子厉害得多！”

2月6日凌晨4时，广西玉林县“联指”派“指挥部”从地、县、镇各机关厂矿和附近农村，召集了2100多人的武斗大军，配备了当时所能搜集到的和能够制造的武器，计有各种大炮8门，自制坦克1辆，轻重机枪24挺，冲锋枪407支，长短枪677支，还有手榴弹和炸药包一批，攻打“422”派的武斗据点州佩村豸堂岭上北帝殿的万花楼。

万花楼是当时玉林县的地标建筑。它位于广西玉林城西北州佩村豸堂岭上北帝殿前，即文育街旁，现在的玉林六中里面，曾与城西南南流江云龙桥北的文昌阁共为古鬱林州著名的名胜古迹。

鬱林州是清朝以前玉林的称呼，1950 年后统称玉林，而万花楼曾经也是鬱林的镇城之宝，玲珑剔透、多姿多彩，似神女般娇立在玉林旧城东北面，像个天使，朝朝夕夕，年年月月，不管彩霞满天，还是黑云压顶，始终以梦幻般迷人身姿，在那以她独有的神韵，抚慰着每一个玉林人。不论是从外地来的客商，还是返回家乡的游子，远远地看见万花楼，就知道到玉林了。

万花楼的主体建筑是原北帝殿，即真武殿，始建于南宋时代，那时叫奎妲阁。奎妲，即魁星，是主宰文章兴衰之神。后来，奎妲阁坍塌。明隆庆年间重建后，改名文昌楼。文昌，即文昌星，是主宰功名之神。清朝嘉庆初年再次重建，道光 28 年旧址改建后才取名为万花楼。楼高约 20 米，为塔形建筑，分三层，楼顶上是一只高约 2 米、直径 1 米的朱红陶质大葫芦。底层南北两个拱门，南门顶上有一部阴文横匾，上刻“古万花台”4 个烫金大字，字体庄重浑厚，二楼南面嵌着石刻“文星楼”匾额，楼内供奉“文曲星”神像，三楼刻有“奎妲”两字匾额，左右有一副“百尺瑶台观北斗，一江春水向南流”的对联。楼体呈八面，由四大面和四小面相邻组成，别具一格。每层的廊檐及宝盖顶所盖的均是石湾产的琉璃青瓦，每层都从墙体挑出挂檐，檐上有各色精美的花鸟浮雕，造型万态，栩栩如生。楼顶穹隆，绘有形态各异的许多花朵。之所以取名为“万花楼”，是因为楼里楼外，绘制各种花卉达万朵之多。

1935 年出版的《广西一览》载：“鬱林古万花楼，鬱林城西

北有一座琉璃瓦花楼，共 3 层，建于南宋，清嘉庆初年重修，道光二十八年（1848）改建，是广西省最精美的建筑之一。”

700 多年来，万花楼历尽沧桑，屡遭不幸。民国初年，在“废科举，兴新学”、“捣神像，办学校”的风潮中，村民们把村内所有神像捣毁，北帝殿划归永修小学作校舍，万花楼得以幸存。

抗日战争时期，1938年11月22日，日寇飞机7架首次侵犯鬱林城区上空，在万花楼附近投下两枚炸弹，北帝殿西廊的房屋被炸毁，万花楼顶上的大葫芦被震坏，墙体被震裂。为保护其不被日军炸毁，被拆掉一层，使得原来的三层变成两层。

玉林“万花楼”旧照

文革开始后，“破四旧”时，万花楼因为是校舍，未曾罹难。但在文革武斗的战火中，最终难逃一劫。

本来，广西军区欧致富司令员已于6日下午17时对玉林两派发出了关于立即停止进攻、双方通过谈判解决问题的命令，但玉林由于“联指”派的这次行动，得到了玉林军分区、玉林县、镇

武装部支左人员的默许和支援，所以欧致富司令员的命令没有及时传达到正在武斗中的两派群众。“联指”派动用了大炮对倚仗万花楼作为据点，居高临下进行抵抗的“422”派武斗人员进行轰击，最后派人用炸药把万花楼全部炸毁。

失去据点的“422”派武斗人员四散逃跑，有285人被“联指”派俘虏，其中有13人被就地枪杀或事后杀死。

至7日下午，武斗结束。在这次武斗中，“联指”死8人，“422”死5人，被俘后被杀13人。而国家级文物万花楼灰飞烟灭，与其一同被炸毁的还有其他73间民房。

2 月 9 日，广西融安“造反大军”强渡融江，攻占融安“联指”驻地的东圩、铜鼓桥和直属粮库。武斗中“造反大军”死 4 人，伤 9 人。“联指”死 4 人，伤 1 人，其他群众死 2 人。

事件发生后，融安“联指”派人向“地专联司”告急求援，经“地专联司”和“柳州联指”联系，“柳州联指”决定由“工交兵团”出兵支持，由“地专联司”负责组织各县民兵配合行动。12 日，“地专联司”召开常委会，研究决定由苏一民，胡文治代表“地专联司”，前往融安，配合“工交兵团”对“造反大军”的军事攻击行动。

2 月 14 日，柳州“联指”派的“工交兵团”和“地专联司”、象州“联指”武斗人员共 300 多人，分乘 13 辆汽车赴融安，配合融安“联指”对“造反大军”反击。

2 月 16 日凌晨 1 时，“联指”派对东圩、铜鼓桥“造反大军”

二大队林方松的武斗据点发起突然攻击。武斗持续到当天下午17 时，“造反大军”的武斗据点被攻占后才告停火。“联指”派在武斗中抓获“造反大军”的“俘虏”36 人。押解途中，“联指”派人员在白岩寨后放牛坪等地杀死被俘的“造反大军”15 人，其余俘虏被押到浮石粮所关押。

武斗后，融安县各地普遍发生了针对“422”派人员和“四类分子”的屠杀行动。

2 月 18 日，融安泗顶“联指”派武装实行反击，攻打桥板乡“造反大军”，“造反大军”打伤“联指”派两人、打死一人。“联指”派枪多人多，火力大占优势，“造反大军”只得仓惶逃跑。“联指”派武斗人员抓到桥板乡“造反大军”的罗道春，回泗顶途中，在硫磺岭用枪打死罗道春。

受湘南道县杀人影响，在此期间，广西也发生了类似道县的杀人事件。2 月 25 日至 28 日，大新县抓革命促生产指挥部召开县区村抓促领导以及厂矿武装部长、民兵营长会议。会议是武装部长周永山、政委韩奇主持，传达区革筹小组领导人的讲话，研究布置做好成立县革委会的准备工作。周永山在闭幕时讲，为迎接县革委会的成立，对不守法的地富反坏右分子要实行专政，不要心慈手软。自会议结束到县革委成立的 17 天内，全县杀 239 人。

此时的南宁市也不安定。1967 年 2 月进驻南宁“支左”的55 军 144 师，于 1968 年 1 月奉命撤出南宁。1968 年春节前的一

天，天气阴沉，时有小雨。驻扎在解放派出所的 144 师 6984 部队部分干部战士，开始从民生码头坐船撤离。这时，从码头上面的解放路到船边的送别群众，手捧粽子、年糕、烧鸡、腊肉、油炸果、水果，在路两边不停的往解放军手里塞，往背包里搁。别离泪水流，挽留声泣咽。有些妇女甚至跪下，双手托着食品或手拉着那些战士的手，边哭边挽留他们不要走。面容凄然的战士们含泪安抚。数百上千手持小纸旗，上面写着“挽留解放军”，“挽留 6984 部队”，“中国人民解放军万岁！”等口号的“422”民众，从四面八方涌来，整个码头一片人山人海。口号声、挽留声响成一片。战士们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和“我是一个兵”，“422”学生唱“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起伏呼应，响彻江岸。

因为 144 师 6984 部队在南宁倾向“422”派，2 月 12 日，“422” 5000 多人到广西军区举行挽留 6984 部队的大会，并在会上发表声明。

广西柳州地区因两派武斗，致使柳州铁路局运输情况日差，到16日已积压车辆75列。2月17日，周恩来通知韦国清亲自抓一下，必要时派护路机动部队前往保障铁路畅通。

2月18日，周恩来接见越南驻华大使吴明鸾、外贸部副部长李班。越方要求中方协助解决援越物资的铁路运输问题，并说：“这个问题只有上呈总理才能解决。”

周恩来说：“一年了，我都在管铁路运输工作，每星期都过

问。运输上发生问题，是文化大革命的副作用。最近，我们下了个严厉的命令。我同有关同志商量打算在内部下一个更严厉的命令。”

在谈到有些造反派抢劫火车时，周恩来说：“这不是造反派，是反革命派。湖南有个‘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委员会’，表面极左，实质极右，它集中了社会渣滓、右派、劳改犯，可以说是一个黑帮组织。昨天，我要韦国清开会讨论解决广西铁路问题，要他今天报来处理结果。如果解决不了，我自己跑一趟。”

这天，周恩来召开国务院业务小组会议，讨论解决广西铁路交通问题，并通知总参、铁道部、外贸部、外交部组成监督小组，检查西南铁路情况。

当天，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继《二六命令》后，又发布了《关于维护铁路交通，保障援越物资运输畅通的紧急补充命令》：“为保障援越物资的运输畅通，特紧急补充命令如下：（一）煽动和指挥对行驶列车鸣枪威胁，到车站、港口无理取闹，挑动铁路交通部门群众搞武斗，殴打和绑架铁路、港口军管人员等破坏铁路交通运输畅通的行为，一概是反革命的土匪行为，必须采取专政措施，坚决按‘二六’命令办理。（二）铁路港口广大职工要坚决克服无政府主义，坚守生产岗位，决不允许迟到早退。对无故不上班而逾期不归者，应扣其工资。（三）军管人员和护路部队、当地驻军要积极制止铁路港口内外串连，制止武斗。如制止无效，造成运输、装卸中断，则坚决按‘二六’

命令办理。（四）中央立即派出监督小组，分赴重要站段和港口，监督‘二六’命令和紧急补充命令的执行。”

2 月 18 日下午，广西革筹小组和广西军区负责人召见“422”挽留 6984 部队的代表，对他们“要求挽留 6984 部队的错误行动”进行了严厉的批评。

2 月 18 日，桂林“造反大军”及“联指”代表在支左解放军主持下，经过办学习班，组成“桂林市革命大联合委员会”，简称“大联委”，地点设在榕城饭店。为表示诚意，参加大联委的所有成员，包括两派的头头和数十名工作人员，各方面的部队首长及工作人员，领导干部及一般干部共 150 人左右住进了大联委，连冯邦瑞市长都住进去了，实行两派及部队联合办公。不仅如此，还要求全市所有的基层单位大联合。于是，“大联委”分各条战线，各路人员到基层做宣传工作。从 1968 年 2 月底到 3 月底，基层单位每天有队伍来“大联委”报喜，鞭炮声连天。“大联委”大厅里挂着一块大大的“全市实现大联合示意图”，红箭头天天上升，至 3 月底，有 80%以上的基层单位实现了大联合。

3 月初，桂林师院军训团撤走，他们带来的枪留了下来，有几百条。141 师炮团政委，也是桂林师院军训团政委孙明魁对师院“老多”的三个头头杨福庭、周兆祥、刘振林说：“这几百条枪留下来，到关键时刻才能用，用来保卫自己，要你们三人统一意见，意见一致才用，不能轻意动用”。

2 月 21 日，南宁的“422”组织到南宁解放路的 6912 部队

抢枪，抢得步枪 40 多支，机枪 4 挺，迫击炮 1 门。受到革筹小组和广西军区指责，并勒令如数交回。

2 月 22 日，广西革筹小组和广西军区向毛泽东、林彪、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当前南宁市文革的几个突出问题和我们的措施》的报告。报告说：

1、某些群众组织运用各种宣传工具，对自治区革筹小组和军区进行攻击。

2、进驻军区机关，干扰自治区革筹小组和军区的工作。

3、抗拒中央命令，阻扰部队调防。6984 部队调离南宁，命令下一个月了未能执行。

4、抢夺部队武器。

5、进行绑架、抢劫、行凶活动，破坏革命秩序。

可以看出，这份报告主要是指责“422”派，尤其是针对 10 天前“422”进广西军区一事。

2 月 24 日，“联指”下属“建司兵团”到广西军区仓库抢了一批枪支弹药。

## 第 966 回：二二一，广东革委会成立　天津市，革委会没人上班

这时，广东省此起彼伏的大联合之声，未能掩盖叠现纷呈的乱象。社会上关于两派大火并的谣传，依然甚嚣尘上，不绝于耳。1968 年元旦那天，中山大学“革造会”连续抄了一些中南局干部的家，并发表“关于坚决打倒闵一帆，彻底砸烂中南局”的《严正声明》。

1 月 1 日大抄家之后，中南局“联络总部”立即召开一个“干部联防”动员大会，呼吁干部们组织起来，“严阵以待，务歼来犯之敌！”

1968 年的第一个星期，广东又刮起了一股封档案室、武装部、政治部的“三封风”，都是被群众组织贴了封条，不让办公。封的理由是：一、砸烂公检法；二、政治部长期执行反动路线；三、这些部门和地方都藏有黑材料；四、这些部门是封锁中央消息，如中央九大征求意见文件，没有给他们传达；五、武装部是走资派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产物。

这股封办公室的风，终于引起一连串的武斗。1 月 8 日，广州医药公司的“工革联”和“工革会”，就因封办公室问题，争吵不休，最后以棍棒相见，大批学生加入武斗，使事态进一步恶化。

1 月 5 日，广东省在京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返穗汇报团一行 80 人抵达广州。他们随后在 6 日和 7 日两天，先后在中山纪念堂、

越秀山体育场向数万群众作汇报，呼吁到会群众，努力促进大联合。15 日，汇报团离穗北上。就在他们返京前夕，广州地区两派群众组织协商小组全体代表，做出了关于坚决贯彻省革筹节约闹革命决定的呼吁。

但是，1 月上、中旬，广州市各种小型武斗，仍然频频发生。电灯泡厂、珠影制片厂、果品公司等单位，不断有小冲突，起因都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诸如这方要贴大字报，那方不让贴之类。而 1 月 22 日，是“省革联”夺权一周年的纪念日，“红旗派”已经大造舆论，准备在这一天隆重庆祝。

广州的任何风吹草动，北京都一清二楚。1 月 21 日中午，周恩来与“红司”负责人通电话，劝说他们不要开会。周恩来说：你们带了头高姿态，联合起来了，不要再落后了，如果再出现曲折就不好。你们要赶快开一次紧急会议，庆祝一·二二的会议不要开。

“红司”负责人立即表示，他也不同意开。周恩来说：“这很好。会开不开责任在领导。你们要做工作。”

但是，两派群众都不肯就此罢休。广东省一月革命周年纪念筹备小组还是坚持要在次日召开“隆重纪念毛主席亲自发动的一月革命一周年，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誓师大会”，并准备在会上批斗赵紫阳，要求广东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派战士和首长出席，派部队维持秩序。散会后将举行游行。

经过军管会、省革筹的一再劝说，到 1 月 22 日凌晨 3 时 30

分，“红旗派”才答应不开会了。广东省军区政委陈德匆匆指示，要各单位做“东风派”的工作，凡是在街上吊有草人的，要在天亮前撤掉。

然而，天亮以后，东较场还是聚集了许多群众，而且还有愈来愈多的人从四面八方赶来。清晨 8 时许，省革筹首先接到市电讯局军管小组的电话报告，会场内外的群众愈聚愈多，大约有两至三万人左右。会场内众说纷纭，有人主张按计划开会，有人则反对开。

主张要开会的人认为：“周总理的指示不大真实，或不是这个意思，”说什么“总理的意思开可以开，但不能游行。”于是人们继续进入会场。

反对开会的人认为：“对周总理指示要执行，不执行不好。”当时有的退出会场。有的听到消息后也不来了。

会场内的群众，有人宣讲周恩来的电话指示，有人围观议论。体院大楼上站满了人，大部分是“红一司”的体院“秋收起义”的群众。大约到了上午 9 时左右，双方的辩论，渐渐带有很浓的火药味。“八一战斗兵团”、“工联”、“广州兵团”突然广播，“广州兵团”马上集中。只见一辆指挥车一挥手，“广州兵团”和“秋收起义”就打起来了。最初大家是用石块互相攻击，后来，“广州兵团”向体院大楼发起冲击。军管会的电话报告称：

这时 10 点半左右，对方便（把）桌子板凳、柴火、黑板往一楼搬，这时 11 点左右，开了五台车来，有八一警卫团、红司

警卫团、铁锤兵团，后来不断往里面搬汽油，结果把火点着烧起来了。去了两辆救火车不准进，部队也不给进。刚进了一个连队结果给围了起来，把武器抢了（后来做工作退了回来）。当时他们就把部队战士的帽抢去多顶，领章多副，语录抢去拆碎，到处乱扔，并骂战士是支保兵，派了十多个连队不能进。中央调查组、监督小组做工作无效，有的拿着大铁锤往大楼砸，并扬言把大楼炸了。这时从外面来了一千多主义兵，拿着木棒，扛着大旗，往大楼里冲，结果把旗派所有在体院里的旗派全部赶走，直退到电讯局大楼，当他们进入时，部队也趁机往里面进。结果武斗持续到 7 点多钟，武斗基本上停止下来，部队重伤 16 人，秋收起义轻伤三人，旗派的无数，不敢告诉我们，他们自己送医院（据说伤是比较多的）。

下午 16 时，就在武斗进行过程中，周恩来从北京打来电话，对东较场武斗作了指示：

“继续做政治宣传，说明广大群众是好的，是愿意革命的，但是他们受了骗，这是人民内部矛盾，不能采取这样做法。敌人就在我们身边，这样做法是错误的。应当由群众自己把坏头头交出来，这样破坏国家财产是绝对不允许的。”

广州“警司”也发表声明，要求全市革命群众起来立即制止武斗。

当晚，“东风派”宣布全市戒严，结果受到省革筹小组和军管会的批评。

4 天后，1 月 26 日，广州工人首届代表大会召开，成立广州工人阶级首届代表大会委员会，这标志着广州 50 万工人正式实现大联合。

1 月，由“八一战斗兵团”主办的报纸《八一战报》，发表一篇题为《广州还须大乱!》的长文。文章说：“最大的争论将发生在干部问题上，因为三结合已被提到议事日程上了。而谁是陶赵死党、走资派，谁是革命干部；哪些人是应该打倒的一小撮，哪些人是应该解放的一大片，都还很不分明。虽然有人宣传：省市委的盖子已彻底揭开了，陶赵死党已被打倒了，大批革命干部已站出来了。但是举不出具体确切的事实来。这样，就一定要发生大争论。想绕过这个问题是不行的。”“至今全市到底有多少受资反路线迫害的干部泡在水里上不得来，未得到解放的？在小厂小社，街道基层的小干部，现在也还有许多许多被当作走资派，还未解放，还挨斗争，有谁关心过他们呢？”

文章最后断言：“干部问题是还必须大乱特乱的。”

这并非空穴来风，社会上突然掀起了一阵“揪陶、赵在广东第二套黑班子”的浪潮。与此同时，反“地方主义翻案阴谋”的声浪，也一日三涨。

然而，这不过是一轮色厉内荏的表演。有一篇作者予红写的题为《激战前的沉寂》的文章警告说：“造反派正往丧权的道路上走，向政治上和组织上瓦解的趋势发展。”“这是‘运动收场’论的实践”，“造反派的无形丧权使老造反新逍遥增加。”

在仍然高喊着“一切权力归左派”的口号的同时，他们对造反派的前途也做出黯淡的预测：“你再因怕被扣上极‘左’而不去战斗的话，到头来你就会因被扣上极‘左’而去坐牢。”

这篇文章被其他群众组织斥为“悲观论”的代表作。广州地区大专院校红卫兵代表大会在对其进行批驳时说：“自称为‘彻底革命派’的予红，在他那篇《沉寂》的‘杰作’里，议论的根本问题不也就是一个‘权’字吗？”

广东“省革筹”正忙着四处打听其他省份成立革委会的时间。在 2 月 5 日的省革筹会值班日记中记录着：

第一秘书组：

请向四川、陕西、宁夏、西藏、安徽、吉林、浙江、辽宁、江苏、福建、新疆、云南打个长途电话：

你省何时成立革命委员会，请提前两天电话通知广东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政治部值班室。

答复如下：

福建：军管会秘书处季科长答：现在尚未打算，一个月以后再看情形决定。

南京：江苏军管会革委会秘书办公室王同志：现在革筹小组尚未成立，那革命委员会暂时更不用说了。

银川：宁夏军区文革办公室田同志：宁夏革命委员会大概在 2 月下旬或 3 月初成立。

成都：省革筹小组办公室王同志答：现大联合还未联合起来，

时间未定。

西安：支左委员会秘书组李同志：现有一个协商委员会，不准备经过革筹小组，大概要到 3 月份成立革委会。

西藏：军管会秘书组：革筹小组未成立，什么时候成立不清楚。

新疆：军区文办联络组苏同志：现在两派没有联合起来，革筹小组尚未成立。

昆明：军管会值班室梁干事：现在革筹小组尚未成立。

杭州：军管会办公室张同志答：现正在北京汇报情况，具体时间未定。

沈阳：沈阳军区支左办公室尚同志答：现在还不知道。

长春：省军区支左办公室随同志答：现正在北京汇报情况，日期未定，大约 2 月中旬可能成立。

安徽：省军管会值班室说，革命委员会什么时候成立还未确定。

2 月 7 日晚 19 时，省革筹小组在海屋开会，研究省革委会成立机构问题。

2月12日，广东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向中央递交了《关于成立广东省革命委员会的请示报告》。

2 月 17 日，广州市贫下中农首届代表大会召开。农民也实现大联合了。广东省工人、学生、机关、农民都先后实现了大联合，现在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这天， 黄永胜从北京返回广州，立即召开一连串会议，着手组建革委会班子，起草有关文件，筹备成立大会。

2月2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批示同意成立广东省革命委员会。

2月21日，广东省革命委员会宣告成立。主任黄永胜（军队），第一副主任孔石泉（军队），副主任陈郁、王首道、邱国光（军队）、阎仲川（军队）、黄荣海（军队）、黄育英（农民）、刘继发（工人），他们开始行使广东省党、政、财、文一切权利，军代表占主导地位。

2月23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编辑部社论《“战士指看南粤，更加郁郁葱葱”热烈欢呼广东省革命委员会成立》。

2 月 28 日，经中共中央批准，成立中共广东省革命委员会核心小组，组长黄永胜，副组长孔石泉、陈郁，成员包括王首道、邱国光、阎仲川、黄荣海。60 万军民在广州举行隆重的庆祝大会。黄永胜在会上宣布广东省革命委员会正式成立。

就在广东省革委会成立的 2 月 21 日上午，天津市革委会的委员突然都没有来上班，一打听，说是开会去了。而通常负责会务工作的市革委会办事组秘书组组长王辉对此竟然一无所知，秘书组里的两位军队支左干部也不知道情况。市革委会副主任江枫的秘书跑到秘书组打听是怎么回事？秘书组如实相告：他们也不知道。杨秘书发牢骚说：“哪有这样的事情呀，通知领导人去开会而不告诉秘书！”

原来，这次开会是由市支左联络站组织人分头通知的。2 月 20 日晚上，市革委会秘书组管会务的王水田直接到市革委会委员家挨户通知到本人，要求 21 日上午 9 时到干部俱乐部开会。什么会？不知道！只是让穿暖和点。

21 日上午，接到开会通知的人陆续来到干部俱乐部，会场冷冷清清，没有布置，与会者很多都是群众组织的头头，大家只是静静等候……

9 点多钟，还没有开会的迹象。过了一会儿，来人了，每人发给一个面包、一截儿火腿肠……

一会儿，开来几辆军用卡车，催促大家赶紧上车，去哪？不知道，也不许多问，并被告知路上遇到熟人也不准打招呼。

11 点多钟，车开到了杨村，这里人就多了，车也多了，原来是各路人马都到杨村集中。随后，天津市支左联络站主任、66 军军长刘政亲自在前边带队，他的车刚到铁路就熄火了，马上又发动起来了，有惊无险。

车子一路开往北京。到北京，没停，又直奔昌平。车到昌平，天都快黑了。大家在二炮一个院校稍事休息，吃饭。吃完饭又上车，掉头返回北京，最后来到京西宾馆大礼堂。

大礼堂里楼上楼下很快就坐满了，都是天津的，足足有 1000 人。有革委会的领导、部队首长、以及大大小小群众组织的头头儿。解学恭和几位地方领导坐在楼下前排当中，他的左边坐着三个 66 军的首长，右边坐着三个警备区的首长。

解学恭的秘书随同解学恭赴京开会，他的家在北京，想给家里打个电话，可是京西宾馆各个房间的电话都打不出去，服务台的电话又不让用。解学恭等人是先到的京西宾馆，可是不让进，一直在外面等候，他们也不知道究竟要开什么会。

## 第 967 回：奔北京，众领导连夜接见　为的是，天津市黑戏黑会

2 月 21 日晚 21 时 30 分至 23 时，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姚文元、谢富治、杨成武、吴法宪、汪东兴、叶群等人以及中国人民解放军各总部、各军兵种和北京部队负责人出来了。当周恩来等人进入会场时，全场起立，长时间热烈鼓掌，高呼："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

江青首先讲话，她说："问同志们好！"

热烈鼓掌，众呼口号。

江青："向同志们学习！"

又是一阵口号声。

江青继续说："今天请同志们来，我们是有这么一些问题和同志们谈一谈。天津是中央的直辖市，两个小时就可以到，本来我们到那里去也可以，你们来也可以，由于我们还有别的工作，所以，麻烦同志们走一遭。

我们想有这几个问题和同志们谈一谈，在你们天津，去年'全国工农文艺战士座谈会'，有这么一个黑会，知道吧？"

众答："知道。"

江青："黑的！还有一个黑的戏，叫《新时代的狂人》，有没有？"

众答："有。"

江青还是那句："黑的！今天就和同志们谈一谈，这是个什

么原因，讲一讲道理。现在请陈伯达同志给我们讲话。”

大家热烈鼓掌。其实，在场许多人并不知道江青说的“二黑”是怎么回事，可是群起响应，一呼百诺，谁也不甘落后。

陈伯达接着讲话，他浓重的福建口音很难懂，由老乡叶群做翻译。他说：

“同志们！今天走了一天很辛苦了，刚才江青同志说，请你们到这里是有原因的，因为最近天津一年多来，出现了一些怪事，拿江青同志举的两个例子，一个黑会，一个黑戏，那就值得大家考虑了，值得大家想一想这些问题了。”

“文艺黑会，准备在天津召开，已经破产。这个黑会，就是一些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一些叛徒，一批坏人，他们想借召开这样黑会的机会，来反对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反对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来反对我们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举世无双的、举世无敌的，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人民解放军，还有，反对新生的革命委员会，想千方百计地破坏她。”

“在我们国家内，有周扬为代表的一条文艺黑线，它在全国有相当的一个黑网。比如在天津，他就有一伙，像方纪、孙振、白桦、李超、董杨等等。比如他们所表演的黑戏《新时代的狂人》，就是由方纪编排的，参加导演的。在天津出现这样的黑会、黑戏，都不是孤立的现象，它是反映了我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极其尖锐、极其复杂、极其激烈的阶级斗争，反映了社会上反动的资

产阶级的思潮，而且反映了这个思潮形成的组织，比如在天津有‘大联筹’、‘政法公社’，在河北，在保定有‘省委兵团’、‘八五风暴’、‘农大红色造反团’。石家庄，比如‘狂派’，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吧？”

陈伯达所说的白桦、李超并不是文艺界人士。白桦是原市委常委、宣传部长，“文革”开始就受到揭发批判。李超原为市委组织部干部处处长，后任市委政法部副部长，他与文艺界并没有关系。

陈伯达 1964 年在天津抓了“小站‘四清’”的典型，他与王亢之、方纪、江枫也都熟识。此时他说：

“我在天津做了一些事情，一些‘四清’问题的工作，当然在这里就接触到一些人……像方纪之流他们去年不知是什么道理，到北京来，因为过去在‘四清’工作中碰见过他们，认识了他们，因此我也跟他们谈了话，我那时跟他们说过三条，要他们不要登台呀，不要伸手呀，不要上当呀，你们这些小报里都反映了……但是方纪他们还是要表演呐，还是要登台呀，我跟他们说是一回事，他们反其道而行之又是一回事……”“我最近和一些同志谈过、说过，天津虽然建立了革命委员会，但是个别的也不能排除有反复的可能，也有一些变色龙，变颜色，有些小的爬虫，为了适应它的需要，时而变这样的颜色，时而变那样的颜色。我想，我们大家要提高警惕，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在光焰无际的毛泽东思想照耀下，我们充满信心，我们是能够战胜一切的。”

姚文元接着讲话，他说："方纪，何许人也？是胡风分子，周扬的死党，刘邓在文艺战线上的代理人，周扬安排在天津的心腹，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孙振，何许人也？过去不知道，现在知道就是雪克，就是大毒草《战斗的青春》的炮制者，疯狂地镇压无产阶级革命派。像这样一些人召开的一些会，同志们，是不是黑的？"

众答："是！"

"该不该揭露？"

众答："该。"

姚文元又重点批判了方纪及其作品《来访者》和孙振及他写的小说《战斗的青春》，并且批判了王昌定《创造需要才能》的文章。

江青接着说："你们这个天津呀，可出奇哩！雪克我找了好几年，不知道叫什么家伙，原来叫孙振，钻出来了，就在天津，他这本书我看了三个版本。文元同志批判了，我不讲了。"

"有一个电影，叫《探亲记》你们看过吗？"

众答："看过。"

江青："这个作者叫杨润身，这个人也在你们天津，也是黑会的积极分子，他这个《探亲记》，算是修到家了，我建议同志们看一看。我看了以后，心情非常沉重。歪曲伟大的解放战争、卫国战争。在他的电影里，写整个战争，只剩下一个孤苦伶仃的老头子，无亲可探，但非要探亲。他的第一稿说，儿子当了高官，

不承认贫农的父亲，恶毒透顶，歪曲工农兵。但像这样一些家伙，一个月拿着国家的高薪还不说，还要拿着非常非常高的稿费，不义之财，是剥削，我有证据。拿着这些稿费，作为他们黑会活动的经费。这里……”江青念单据：“方纪 156 元，杨润身 3000 元，孙振 1000 元，多啦！王昌定 800 元，袁静 8000 元。”

“孙振给一个董阳，不知道是什么人物，大概是伙伴吧，还有邵文宝、滑富强、王静、张贺明写信，指使他们夺权，务请注意，这是他的亲笔信：‘为工农兵文艺工作者夺权的观点制造舆论’。说：‘为了扩大影响，是否考虑与全国各省市已经占优势的或者还在坚持斗争的工农兵业余文艺工作者联合发表呼吁和宣言。互相支持，造成优势。这一切搞好，夺权才能得到广泛支持。’请问，他们夺谁的权？”

众答：“夺无产阶级的权！”

“这是他的亲笔信啊！嚣张极了！狂妄极了！今天请同志们来值得不值得？”

众答：“值得！”

江青：“为什么他们会在天津、北京、上海许多地方这样嚣张？他们人数很少的，但他们的活动能量很强，就是因为他们有黑后台，他们有活动经费，现在我们下令冻结，你们说应该不应该？”

众答：“应该！”热烈鼓掌。

江青：“在你们那里有这么一个组织，整总理的黑材料，整

伯达同志的黑材料，整康老的黑材料，整我的黑材料。请整！这个组织不坏，是混进了坏人，这个组织是立过功勋的。”

“我给同志们提供一点线索，在河北省这么两个县，有大叛徒集团。一个叫献县，孙振的家乡，他都回去安置了的，布置了的，不让搞调查，不让你查出东西来，现在要广大群众动员起来，认识他这个叛徒的面貌。还有一个县叫深泽县，也有一个很大的叛徒集团。革命的同志们，小将们要把这个搞清楚，要不搞清楚它，他们就支持方纪这些人，搞我们。”

深泽县、献县都是冀中老根据地，在这里参加革命的老干部很多，原天津市委书记处书记王亢之、宋景毅都是深泽县的。

江青接着说：“方纪他们到北京来坐的汽车就是公安局的，我有证据，上次我和总理就点过，天津文化界，公检法，现在我再一次郑重提出，公检法的问题，一定要彻底地揭开。”

“建议天津市革命委员会学习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改造公检法的办法，就是用复员的革命军人、革命干部。”

“这个公检法如果不把盖子揭开，害苦了人了，他们不是专了资产阶级政，他是专了我们的政。主席、林副主席、我走到哪儿，他们都盯梢，他们都装窃听器。这允许吗？”

众答：“不允许！”

众人呼口号。

江青问：“要不要打倒他们？”

众答：“要！”

又是口号。

康生接着讲话。他在批判“黑会”“黑戏”中又点了尹淑坤、李启厚的名字，说：“这个剧本的编剧者叫尹淑坤的，有没有在座？”

众答：“已经揪出来了。”

江青：“好！”

康生：“还有一个演出负责人叫李启厚，在不在呀？”

众答：“没有。”

康生说：“同志们，在阶级斗争中装疯卖傻是一种手段，鲁迅写《狂人日记》是革命者反对国民党，反对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同样反革命也会利用的，反革命分子陈里宁和他们一伙人伪造《狂人日记》反党反社会主义，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编造了《狂人日记》到处散发，到处翻印。陈里宁是一个什么人？是一个恶毒反对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反对无产阶级，反对毛主席，混进革命队伍的地主阶级分子。同志们，不要上当，不要光看到他怎么样反对刘少奇，反对叛徒哲学的黑修养，就以为他是革命的，把他反对毛主席的东西全删掉了。”

“同志们可以到监牢去看一看。陈里宁不是疯子，是反革命！但是，不但有《狂人日记》，还有你们天津人民话剧院编的一个戏，叫《新时代的狂人》，这名字是王力起的。”

这时，姚文元亲自带领大家呼口号。

康生："看一看人民话剧院革命委员会 67 年 8 月 1 日剧本前言说了些什么？"当他念到"国际上反修战士支持"时说："这就是特务分子李敦白。"

江青插话："李敦白是个外国特务，还照了像，这有照片，好几个外国特务支持这个戏，同志们说，简单不简单？"

最后是周恩来讲话。他在讲话中除表示完全同意以上讲话外，还特别表示重视江青的讲话。他说："去年 9 月 5 日江青同志刚讲了三条：我们拥护支持加强巩固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帅的党中央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加强和巩固我们伟大的人民解放军；加强和巩固我们新生的力量革命委员会。讲话之后，就在同一时期，天津有一小撮刘邓陶的死党和陆定一、周扬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他们就要挣扎……尤其是江青同志在 11 月 9 日和 12 日讲了文艺界要清理队伍，要阵线分明，要阶级斗争阵线分明，树立队伍，抓坏人，这样的一个指示以后，天津文艺界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他们要搞他的黑会，这不清清楚楚是垂死挣扎吗？"他还说："刚才江青同志说得很好，就是要改造公检法……"

这次开会提到的"黑会"和"黑戏"，是时任天津市文联秘书长的王曼恬在给江青写的一封信中说到的。所谓"黑会"，是指 1967 年全国各地一些文艺界的群众组织联合在天津召开的"全国工农兵文艺战士座谈会"。王曼恬说这个会议是阴谋夺文艺界的权，后面有黑手，就是天津的方纪和孙振。

信中所说的“黑戏”，是指天津人民话剧院“113 革命造反队”排演的《新时代的“狂人”》。这个戏是以当时闻名全国的“陈里宁事件”为题材编排的。

“陈里宁事件”被披露后，全国各地的群众普遍地将“陈里宁事件”诉诸舞台，形成了“文革”中的一次重大的群众性自发文艺运动。其中最为轰动、影响最大的是天津人民话剧院“113 革命造反队”排演的六场话剧《新时代的“狂人”》。1967 年的 5 月，为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 25 周年，天津人民话剧院“113 革命造反队”根据陈里宁的《狂人日记》改编成话剧《新时代的“狂人”》，尹舒坤编剧，李启厚主演。该剧在北京、天津共演出了 47 场，观众达 5 万余人，其中北京 12 场。剧本还发放到 21 个省、市，110 多个单位。1967 年 7 月 15 日，《天津日报》刊登了一组赞扬文章。原以为这个“狂人”是反刘少奇的，后来发现，“狂人”的日记里不但反对刘少奇，也有反对毛主席的内容，于是乎，这出话剧也就成了“黑戏”。

而在此时，天津文联的群众组织串联外单位，把文联的另一个叫做文联“红旗”的组织给砸了。文联“红旗”的前台人物是张继尧，而时任天津市文联秘书长王曼恬则是支持文联“红旗”的。于是把这三件事罗列在一起，统称为“二黑一砸”，通过王曼恬上报给了中央文革。

王曼恬何许人也？她是毛泽东表兄王星臣的女儿、毛泽东的表侄女，也是诗人鲁藜的前妻。1949 年后曾任天津教育局分局

长。

## 第 968 回：才两月，天津革委会改组　促联合，北京高校学习班

在京西宾馆开会的天津与会者回到二炮学院的驻地后，进行了分组讨论，辩论十分激烈。有人认为，“变色龙”指的就是江枫，因为江青话里话外已经影射到了。另一种意见认为，“变色龙”绝对不可能是江枫，因为天津市革委会是毛泽东批准刚刚成立的，这“变色龙”怎么会是市里班子成员呢？两种意见针锋相对，谁也说服不了谁。第二天下午，召开天津市革委会委员全体会议，在主席台就坐的是：解学恭坐在正中间，他的一侧坐的是肖思明、郑三生、杨银生，全是 66 军的代表；他的另一侧坐的是王一、许诚、王元和，全是警备区的代表，地方干部的代表一个都没了。江枫坐在会议室门口，始终低着头。这阵势，大家一看都清楚了。江枫在革筹小组时就因为个性太强，曾与刘政发生过顶撞。

在回天津的路上，王亢之和同为市革委会常委的原天津市副市长王占瀛同乘一车。王亢之文革前是天津市委文教书记，主管文教。他在车上对王占瀛说：“我不行了，你好好干吧。”

回到天津后不让回家，当天夜晚，王亢之、王占瀛均住在河东招待所，原苏联领事馆里。中间王亢之回家取了点药。第二天吃早饭时，王亢之没有下楼，杨拯民就去叫他，这才发现他已经死了。解学恭不敢怠慢，说要吸取万晓塘死的教训，找来法医，当场开膛验尸，查明死因，是服用过量安眠药自杀。

江枫回天津后，立即被关押到天津梨园头的第二劳改监狱。

胡昭衡尚未被结合，但已担任革委会生产组副组长，回津后亦被长期软禁。

“二二一”接见之后，天津新成立的革命委员会随即进行了一次改组。当时，在天津市革命委员会常委组成人员中，被结合进来的原天津市的地方领导干部只有江枫、王亢之、范永中、王占瀛等人。江枫、王亢之、范永中都是在小站地区参加过“四清”的，因为陈伯达当年在小站“四清”，他们在小站“四清”的过程也成了“光荣经历”。陈伯达对江枫、王亢之、方纪等人本来是支持的，但此时，态度大变。范永中是原市外贸局局长，革委会成立时担任办事组组长，不久就因所谓政治历史问题被隔离审查。一大批刚站出来的地方干部又被打倒，只能依靠军队干部全面掌权。

24 日向全市传达中央会议精神，由肖思明传达，解学恭主持。宣布对江枫隔离审查，其他人有的被停职，有的被逮捕。随之而来的是最初的群众代表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天津文艺界因“二二一讲话”，被批斗、拘捕、绑架、审查、监禁的达 800 多人。全国文艺界因此受牵连的达千人以上。

1978 年以后，公安部对陈里宁的问题进行了复查，最后确认：陈里宁确实患有“精神分裂症，丧失责任能力”，不应追究刑事责任，改正原来的错误结论，恢复党籍，恢复工作和原工资待遇。

“二二一讲话”中提到的那个美国人李敦白，文革开始后参加了造反，谁知1967年12月25日开始被软禁在家中，1968年2月21日晚上，李敦白被人从家中带走了，说是局领导要跟他谈工作。当他被带进一个小办公室后，就有人向他宣布：“李敦白，你被捕了。”接着就被送到秦城监狱。对此，他想不通：“我响应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号召闹革命，稀里糊涂地干了半年，结果闹到牢房里来了，真是不可思议！”他后来才知道，江青和康生早在前一年初夏就开始对他进行秘密调查。

这是他第二次稀里糊涂地走进中国共产党的牢房了。在牢房里，他反思自己的境遇：“第二次坐牢，我心里舒服了。第一次是不知道原因，第二次我知道为什么。我的根本问题是不应该卷入斗争，那太傻。”

滑稽的是，关押审讯李敦白时，坚持把他视为“中国赫鲁晓夫”刘少奇的同党，硬要李敦白承认，他领导着一个“国际间谍网”，王光美是其中的成员，并通过她发展了刘少奇。

2月22日，清华大学“红教工”的林贤光从清华大学“井冈山”总部的动态组拿来21日江青、康生等人接见天津革委会成员的讲话记录，“红教工”陶德坚他们已感到大祸临头。自从一年前陶德坚和“红教联”遭到铺天盖地的批判，虽然有蒯大富的保护，“井冈山兵团”也拒绝清除“陶德坚之流”，但“红教工”中许多人已不敢再参加“红教工”的活动了，只有陶德坚、张家廉、侯虞铿、朱起鸣、 来晋炎、林贤光、曾昭奋这几个人仍然

坚持。他们在生物馆的顶楼建立了“红教工”播音室，宣传他们的观点。

此时，在生物馆顶楼上，陶德坚他们几个人聚在一起商量，看看还有没有挽救的办法，总不能坐以待毙。因为江青在会上没有讲到陈里宁的问题，而陈里宁放出来后还到过北大，支持过聂元梓，他们还幻想是康生、谢富治蒙蔽了她，如能让她了解到真实情况，也许他们还有救。于是由陶德坚连夜赶写出一份叙述陈里宁事件始末的详细材料，并立即送到聂元梓的办公室，一位女秘书接待了她，收下材料，答应很快就交给聂元梓。

材料送出后，陶德坚他们就解散了“红教工”广播台，将器材收好，相互道别后就各自离去，等着这无法抗拒的打击的到来。

2 月 22 日，谢富治在专案组的一份报告上批道：“大叛徒刘少奇一案，主要工作都是由江青同志亲自抓的。今后一切重要情况的报告和请示都要直接先报告江青同志。”

2 月 23 日，福州军区司令员韩先楚对福州军区“三支两军”问题发表了“七点意见”。其中的第二点是：

现在有的群众组织之间有划分“反军派”、“拥军派”、“反韩派”、“保韩派”的苗头，值得注意。听说有的军队干部，甚至个别高级干部也跟着这样说，这更是错误的。喊过“打倒韩先楚”口号的群众是受蒙蔽的，没有责任的。绝不能以是否喊过“打倒韩先楚”作为划分拥军和反军的分水岭、分界线。这种提法，不仅不利于团结群众，不利于促进和巩固革命大联合，更危险的是

容易被坏人利用，破坏革命大联合，制造混乱，掩护自己。要对我们的干部讲清楚，出去不要随意表态，要正面宣传主席的最新指示。甚至态度、举止也注意，如果只对一派亲近，对另一派不积极接近做工作，就是不表态的表态。

在传达“七点意见”时，许多人表示不理解，说他右倾。他说那就没办法了，那边在“以韩划线”，抓人整人，我这边还有工夫给你磨牙做耐心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那就只有照林总的办法了，“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了。

当时，北京市 18 个区县已有 16 个成立了革委会，另外两个成立了革委会的筹备委员会。而在中小学则全部实现了大联合，95％以上建立了三结合的革委会。唯有北京的 62 所大学，只有 21 所建立了三结合的革委会，3 所建立了大联合临时领导机构，还有将近 40 所仍然在打派仗。北京市革委会从 1967 年 11 月就开始酝酿给北京各大学造反派头头办学习班，一直因为各校派性斗争激烈等原因难以实现。北京市革委会副主任丁国钰无奈地说：“春风吹进了玉门关，春风吹进了山海关，但春风就是吹不进北京的大专院校。”

于是，1968 年 1 月 27 日，北京市革委会发出了《关于分批分期组织大学革命群众组织负责人开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的通知》，决定分期分批开办北京高校群众组织头头学习班，希望通过学习班，斗私批修，打倒派性，实现大联合，建立革委会，以便复课闹革命，进行斗批改。与此同时，北京卫戍区向学习班和

各校派驻军宣队，分别做两派头目和两派群众的思想工作。北京革委会的具体目标是：2 月实现大联合，3 月建立革委会。

北京市革委会原来打算用三个星期的时间举办第一期学习班，组织 20 所院校的各派组织头头 200 多人参加学习。通知下发后，不在第一期学习班 20 所院校之内的中国科技大学的两派群众组织闻讯后，主动要求参加学习，获得批准。于是学习班于 1968 年 2 月 5 日正式开学，地点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驻京办事处，北京卫戍区副司令员李钟奇和北京市革委会常委丁国钰分别担任学习班的正副书记。参加学习的人员按军队的建制方式，分编成 5 个连队。

开学几天后，又根据中央首长的要求，增加了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地质学院、北京航空学院 4 所院校。这样，共有 25 所院校的造反派头头 251 人参加学习班的学习。

学习班的口号是“一碗水端平”、“凡是符合毛泽东思想的就支持，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就反对。”“打倒派性，增强党性，联合起来共同对敌。”

对待北京大部分高校存在的两派组织，一般都是两派人数对等参加。但是，北京大学的校文革因为存在争议，谢富治特别指示：“北大校文革按革委会一样对待，北大的两派人数按 7：5，多出的两人是校文革的名额。”于是，北大聂元梓、孙蓬一、王茂湘 3 人作为校文革的代表参加，而卢平、沈永有、小丑、和胡宗式是“公社”方面的代表，“井冈山”方面则由杨克明、候汉

青、牛辉林、靳风仪、孔凡 5 人参加。

而在北师大，也有两派组织，校革委会和“井冈山兵团”，及他们的对立派“造反兵团”。可是学习班却没有给“造反兵团”名额。于是，师大“造反兵团”自己打着背包来到学习班进行争辩，这才被允许参加学习班。

2 月 17 日，根据市里的通知，学习班迁往北京市委党校。党校很宽敞，有很多栋大楼，和在学校的生活差不多。根据毛泽东对江西省军区上报的《江西省军区以两条路线斗争为纲教育部队的经验》报告的指示精神，以及谢富治传达的毛泽东、周恩来和中央文革小组的有关指示，2 月 20 日，参加学习班的院校又由 25 所扩大为 36 所，学员也由群众组织头头，扩大到各校的干部和职工，总人数达到 1406 人，是原来计划办第一期学习班人数的 5 倍多。按学习班的要求，各校群众组织的头头一、二、三把手都必须参加学习。北京红卫兵的“五大领袖”都成了学习班的学员。学习班的时间也由原定的三个星期改为没有期限。谢富治在动员大会上说到学习班一再扩大的原因：

“我有一次见到伟大领袖毛主席。毛主席说：‘云南来了多少人？’我说：‘700 人。’本来一个省 700 人是比较多的，主席说：‘那不够，再增加一倍。’因此学习班从数量上各方面都要加强。我们北京的大学生（学习班）也是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加强的。还有一个原因，同学们都知道，我是一个很有缺点的人，做事情不是那么敢想敢干，做事情总是经过上级一再提醒甚至批评

才做好。我们这个训练班，中央文革、总理一再关心，为什么这个学校没来，为什么那个学校没来。所以后来又增加了一些学校。还说，学生、干部都应该增加，一个学校要增加四、五个，所以才这样一再增加。”

他说：“至于我们这个学校办多长时间，以解决问题为原则，什么时候解决问题什么时候算，先解决问题先毕业，后解决问题后毕业，不解决问题不毕业。”

学习班规定了严格的纪律，突出了不许串连，否则以破坏学习班来对待。

学习班有固定的作息时间，早晨两派一起出操。

学习班开办之初，受社会舆论的大形势下，在消除派性方面一度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两派学生偶尔和对立面也能说上几句话。在学习班上还出现了一些不争地位、不争名额搞大联合的现象。

学习班开始树立北京建筑工程学院作为大联合的样板，这所学校的“新八一（天派）”和“老八一（地派）”开了讲用会，新老“八一”宣布联合起来。但没过多久又告吹了。

后来学习班又推广化工学院的经验，也开了现场讲用会。这样，经过一个多月的学习，先后有北京化工学院、北京农业劳动大学、北京化纤学院、北京水电学院、中国科技大学、北京农机学院、北京外贸学院、北京中医学院等院校陆续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北京机械学院成立了革委会筹备小组。北京经济学院、河北

北京师范学院、北京轻工业学院的两派对立组织达成了大联合协议。

但是对于大多数的院校，通过学习班的学习，并没有收到明显的效果。特别是戚本禹被隔离审查的消息传入学习班后，在学习班内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一些“天派”组织提出了“打倒派性，斩断黑手”的口号，提出“要揭发王（力）、关（锋）、戚（本禹）、林（杰）反党集团，要斩断他们伸向群众组织的黑手，揪出他们的后台。”

师大“造反兵团”首先发难。戚本禹在过去的讲话中一贯坚决支持以谭厚兰为首的师大“井冈山”，多次对“造反兵团”进行批评指责。戚本禹垮台的消息传来，师大“造反兵团”立即在学习班以及在社会上散发声明和传单，提出“学习班必须收回戚本禹在 1967 年 12 月 27 日就北京师范大学问题的讲话”，否则不参加学习。

北师大的蒲寿章到学习班散发声明和传单被李钟奇阻止，将他们叫进会议室，拍着桌子骂他们。蒲寿章不惧，也对着拍起桌子。

学习班没有收回戚本禹讲话。北师大王颂平于 2 月 22 日宣布，师大“造反兵团”退出学习班。他们还贴出大标语：

“现在是揭开北京市高校派性盖子的时候了！”

“学习班不突出无产阶级政治！”

“学习班不抓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

“学习班不发动群众揭发王、关、戚、林反党集团!”

“学习班空谈派性，捂住盖子，掩护黑手!”

“学习班领导人把学习班引向资产阶级方向!”

师大“造反兵团”的行动得到人大“三红”、“政法兵团”、民院“抗大”、轻工“红鹰”等“天派”组织的积极支持和响应。

2 月 23 日，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红卫兵总部”20 余人冲击北京高校学习班，踢破房门，企图揪走参加学习班的学习人员，被李钟奇出面制止。

这天，清华大学“414 派”在给中央的报告中明确指出，干部问题是清华建立革委会的关键，提议让原清华党委委员 8 至 10 人进入革委会，断定由“革命小将”担任革委会第一把手是不适宜的，要求中央委派军代表或他人担任。

经过一系列的工作，学习班又恢复了相对的平静。参加学习班的人们开始进行“亮私、斗私”。

## 第 969 回：掌权术，学生头纷纷检查　鲁迅稿，徐州改组革委会

北大一个同学通过自己的半导体收音机，听到一段外电广播，说北大两派是“毛泽东的聂元梓派和刘少奇的周培源派……”，他跑到北京党校高校学习班把这段话告诉“新北大公社”动态组组长胡宗式，正好当时军代表也在屋子里，当即质问他们：“你们偷听敌台！”

胡宗式辩解道：“在北大，国外的报纸、杂志有的是，随便看，不犯罪！”

2 月 27 日，李钟奇单独接见“新北大井冈山兵团”的代表，说：北大校“文革”是领导文化革命的权力机构，这是中央承认的，你们“井冈山”要承认校“文革”；“新北大井冈山兵团”是革命群众组织，在文化革命中是有过很好贡献的，校“文革”要承认它，不承认是不行的；北大要成立革委会，如何成立，你们回去双方协商解决；解放军支左不支右……”

“新北大井冈山兵团”的代表回到北大，提出“要革命委员会，不要校文革”，要与校“文革”协商，遭到拒绝。“新北大公社”认为：首先校“文革”是中央认定的，无需讨论；其次，李钟奇副司令、丁国钰不会讲这样的话，此事纯属“井冈山兵团”造谣。聂元梓和北大校“文革”向中央文革反映说，李钟奇的讲话在北大引起了混乱，声称怀疑李钟奇的讲话是否存在？是否北大“井冈山”造谣？

北大两派因此引发宣传战，攻击加剧。

2 月 28 日，清华“井冈山”负责人蒯大富在北京党校高校学习班做检查，坦言自己 1967 年以来，出于在“两个司令部斗争中建奇功”的目的，大搞派性活动的问题，以及在校内压制“414”，对持有不同观点的人采取残酷打击，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的错误。

蒯大富向学习班里的战友们介绍自己参加文革后总结和认识的经验或体会，共 36 条：

1、要努力学习毛泽东思想。

2、要想反复辟，就必须改造自己的世界观。我们有两种可能：第一种是被别人搞垮；第二种是自己的世界观没改造好，垮掉了，这太可惜了。

3、掌权者要学会团结中间群众，要使中间群众有饭吃，能说话。我们能否团结中间群众，也是掌好权的重要标志。

4、必须学会在权力机构中设置反对派。要保护反对派，因为垄断为垮台制造条件。

5、最高当权派必须学会保护广大基层干部和群众，尤其是对犯过错误的人要保护，不要随便踢，要拼命多保人。对战友、立过功的人都要保，有代表性的人（政治代表、群众代表）要重点保护。多保一个人问题不大，少保一个人不得了。

6、凡群众分成两大派的，在最高权力机构中都肯定能找到代表人物。

7、主要领导要特别谨慎，不要说别人坏话，小节要注意。

8、要诚心实意地待人。

9、在人民内部切不可树敌太多，以防别人联合起来将你打倒。

10、当权派的正确与否，就看中间群众能否接受。

11、好心人的糖衣炮弹最可怕，来自同志和战友的吹捧最可怕。

12、只有当你最困难的时候，你才知道有多少朋友。

13、要敢于承担责任，不要互相埋怨，职务越高者越要承担责任。

14、有志者立长志，无志者常立志。

15、胸怀远大目标，坚定不移地向前走，在命运的道路上碰得头破血流也决不回头。

16、对当权派周围的人，必须提倡为人民立新功；否则他们是位高而无功，俸厚而无劳；当权派一倒，他们也就倒了。

17、“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要实现自己的政治目标，必须长期积蓄力量。在这段时间内，不要因自己的不慎重而被人搞垮。

18、今日山头之争，几十年后可能就发展成为阶级之争。因此，今天必须正确处理多种山头之间的关系。

19、夹起尾巴做人是我们的座右铭。孔子曰：“君子敏于事而慎于言。”要多想，多看，

20、要有赏有罚，赏罚要分明，以赏为主。

21、领导者说话要算数，允诺要实现。

22、要谦虚。

23、不够格，就知趣点主动下台，硬赖在台上，总有一天被臭烘烘地赶下去。

24、准备走曲折的路。善于用间接的手段，达到直接的目的。迂回是建立在明确的政治目标上。

25、敌人会利用我们犯错误而突破缺口，来向我们进攻。

26、当权者最容易背包袱，尤其在一个地方长时间干下去。所以，当权者往往是很蠢的。因此，毛主席提出要换地方闹革命，我们也应换地方闹革命。

27、与其自己花很长时间学一样本领，还不如去交一个精通这种本领的朋友。

28、要多交朋友是当好权的重要因素。

29、要善于利用革命高潮，把革命推向新阶段，使长时间的量变产生飞跃。在这种关键时刻，切不可糊涂起来。要有气魄，有胆量，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如十月革命时就是这样）。

30、山崩于前不变色。遭到突然事变、大规模袭击时，不要惊慌失措；要冷静下来，迅速调查，分析事物本质，以采取相应措施。

31、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必须选择在适当时机给以毁灭性的打击。能现在消灭的不要等到将来。在政治上只有头脑而没有

良心，菩萨心肠在阶级斗争中站不住脚。

32、政治威信和组织手段是稳固政权的两大重要因素。要加强组织手段，即健全机构，清理坏人。

33、当形势大好、战略进攻时要分权，即要放手发动群众；当战略退却时，要大胆果断，高度集权，此时极端民主化会毁掉自己。

34、一个单位的当权者，必须使本单位大多数群众放心。多阶层、多团体的利益必须在权力机构里能得到反映；应按功过大小，在权力机构中分配一定的地位和荣誉，使之各得其所。

35、领导核心要善于调节各山头之间的不平衡，不能压。

36、得到政权后就得运用，而且不容得稍稍犹豫，正是“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

蒯大富讲的这些后来被人称之为“掌权三十六条”，还出现了“掌权三十条”的简抄本。

第二天，2 月 29 日，北航在学习班，北航“红旗”的韩爱晶和井岗山等负责人，也检查了他们根据戚本禹指示批陈毅、徐向前，抓张体学，抄徐海东家等事情。韩爱晶还检查 1967 年 9 月 7 日和蒯大富组织上万学生去师大支持谭厚兰对立面“井冈山兵团”恢复活动的行为。其他院校红卫兵组织的负责人也相继在学习班上做了类似的“亮私、斗私”。

此时，江苏徐州“支派”因为 2 月初的炸桥行动让徐州“踢派”拿到了关键的一分。山东的王效禹立即把徐州“踢派”头头

杨正祥招到济南交待说："到时候了，要赶快，不要再拖"，"一定要赶在江苏前面，二月底建立起来"。王效禹说的要赶快建立的是新的徐州革委会。

杨正祥迅速回到徐州，昼夜协商，拟定革委会人员组成名单，于 2 月 27 日连夜赶往济南向王效禹汇报。

3 月 1 日，经济南军区批准，徐州第二届由"踢派"组成的革委会成立，杨正祥任革委会主任，68 军副参谋长祖岳嵘、原徐州市委书记韩本初、原徐州市市长吴明正、"踢派"头头栾昌善、徐州师范学院学生、"踢派"头头周美霞等人任副主任。返回徐州的"支派"头头朱成明、段玉成、杨炳坤、周良欣等也被结合进革委会。在 46 名"群众代表"中，"踢派"占据 31 席，"支派"只占 15 席。后来，这些"支派"代表被"淮海八三一"称为"假支派"。

王效禹并没有将第二次成立的徐州革委会说成是重建，而是说"改组"。他解释说："说改组是为了南京方面容易接受"。与此同时，北京新华社还收到南京分社发来的"徐州市革命委员会胜利诞生"的消息。3 月 7 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报道了徐州市革委会成立。3 月 8 日，《人民日报》也发布了徐州革委会成立的消息。但是，南京分社不承认发过这一消息，并追查消息来源。为此，新华总社在内部作了检查。

时间不长，3月18日，徐州就发生了"支派"群众围困、占领徐州卫戍区大院，即68军司令部大院的事件，一直延至4月7

日，军方不得不动员“踢派”实施清理行动，将400 多名“支派”赶出大院。

在此期间，北京又发生了鲁迅手稿丢失事件。事情的起因是鲁迅夫人许广平的一封遗书。

3 月 3 日上午，鲁迅的夫人许广平在北京逝世。是日午夜时分，周恩来、陈伯达、江青、姚文元等人向许广平遗体告别，并慰问家属。这时，鲁迅之子周海婴将许广平的一封遗书交给周恩来。这是许广平于逝世前一天，1968 年 3 月 2 日，写给周恩来的信。信中说：

“现向您汇报一下：北京鲁迅博物馆原藏有鲁迅《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手稿 15 页，书信手稿 1054 封（1524 页，大部未印）。1966 年 6 月 30 日，旧文化部以‘保护’文物为名，从博物馆调走。1967 年春天，戚本禹在文化部听说此事，又将这部分手稿全部拿走。现在我不知道这些手稿究竟落在何处，甚为担心。如有散失或毁坏，将给人民带来损失。因此希望能帮助了解一下此事，最好能将结果告诉我。如果可能的话，我还想看看这些手迹。鲁迅博物馆已有报告向中央文革小组反映此事。随信附上抄件一份，请您一阅。”

许广平信中所提的鲁迅手稿是原藏北京鲁迅博物馆的一批大部分没有印行公开的鲁迅手稿，共有 1500 多页。1966 年 8 月“破四旧”开始后，馆中部分群众的行为越来越激烈，文化部有关负责人担心鲁迅手稿遭遇不测，于是将这些手稿调走，存文化

部档案室，与《毛泽东选集》四、五卷的手稿放在一起，以保证安全。

然而几个月后，档案室也受到冲击。在这种情况下，中央文革小组的戚本禹在 1967 年 1 月 14 日来到文化部。他在文化部大门口讲话，除了批判当时文化部负责人肖望东外，还谈到鲁迅手稿问题。他说："还有一件事要跟大家商量。各派都要派人封人事档案和档案室，文化部这里有《毛选》四、五卷的手稿和鲁迅的手稿，各派观点不同，不稳定，所以中央文革小组决定，把手稿交中央文革小组保管，大家看行不行？"

群众高喊："同意！"

戚本禹接着说："我今天就为这个任务来的，我现在就把这个材料带走。我的话完了。"

戚本禹从文化部档案室取走了鲁迅手稿，按照程序，留下了收据。

但是，戚本禹在 1968 年元月被抓进监狱。2 月底，北京鲁迅博物馆的群众组织写信给中央，说鲁迅先生的手稿丢失了，并请求鲁迅的夫人许广平代为转呈。

许广平立即给周恩来写信反映，谁知她在写信后第二天，即与世长辞。

周恩来当场阅读了许广平的遗信，并将信转给了江青。

江青看到许广平的信后，愤怒地说："信里反映的事情我们过去一点都不知道，叫戚本禹交代，冲着这一条就可以枪毙他！

如果不交代，就枪毙他！这个东西是不是找一个地方保管？”

姚文元建议：“放在中央档案馆。”

江青接着说：“统统拍照。这些王八蛋想毁坏手稿，将来可能要翻案。看来她（指许广平)受了刺激。有心脏病的人怎么受得住这个刺激呢！分明是陷害，要追查这件事!”

周恩来连夜主持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决定由解放军代总参谋长杨成武负责追查手稿下落。

杨成武十分为难的说：“这不像大海捞针一样吗，怎么个找法呀？”

周恩来说：“叫卫戍区去查，你们还可以去提审戚本禹一次，他知道些情况。”

此时已经是 4 日凌晨 3 点多钟，杨成武立即打电话通知北京卫戍区司令傅崇碧马上带几个人到钓鱼台来。

傅崇碧放下杨成武的电话，立即给卫戍区副司令员刘光甫、副政委周树青打电话，要他们去钓鱼台 8 号楼接受任务。他们 3 人很快来到钓鱼台。会议室里，周恩来、康生、陈伯达、江青、杨成武、谢富治等人都在，他们见傅崇碧等人进来后，周恩来说：“鲁迅的夫人许广平给主席写信，说原藏在鲁迅博物馆内的鲁迅书信手稿不见了。主席指示，让我们迅速查找。”

接着，杨成武向傅崇碧他们交待了任务，但是具体情况，他也说不清楚。

江青说：“让陈伯达向你们具体交待吧。”

于是，陈伯达一边画图，一边说应该查找哪些地方。毫无疑问，首先就应该去问取走手稿的当事人戚本禹。

此时已经天色微明，傅崇碧他们立即驱车直奔关押戚本禹的秦城监狱，提审戚本禹。

“鲁迅的手稿是不是你取走了？”

“取过的。”

“现在手稿放在什么地方？你必须交代清楚。”

“我不知道。”

“你取了手稿怎么不知在哪里？”

“是江青让我们去取的，她可能知道。你们还可以去问原中央文革的工作人员韩书信，他知道。”

“谁让你去取的？”

“江青。她说怕鲁迅的手稿遗失了。”

戚本禹还交待说：他曾与以前担任过中央文革办事组组长的王广宇到文化部取过一封信。

傅崇碧他们立即驱车返回钓鱼台，向周恩来等领导汇报。汇报时江青也在，傅崇碧他们没有说是江青让戚本禹取的手稿。只是说韩书信知道。

江青很是恼火，她立即吩咐说：“把这个人叫来！”

韩树信是成都军区某军的一个副教导员，文革初调到中央文革小组保密室工作，但此时已返回成都军区。江青立即指着傅崇碧说：“你马上打电话给成都军区张国华，让他马上把这个人找

回来。空军派飞机去接。”

傅崇碧说：“我是一个卫戍区司令员，打这个电话不合适。要打，也得请总理或江青同志打。”

江青很不高兴，说：“你这个人，叫你打，你就打嘛，就说是我们说的。”

说着，江青让中央文革办公室通知空军给卫戍区派飞机，到成都把韩树信找回来。第二天就要起飞。

周恩来也对傅崇碧说：“你给成都军区张国华司令员打个电话，说明情况。要抓紧。”

成都军区不敢怠慢，立即派人找到韩书信。第二天，飞机在西郊机场起飞，卫戍区邵崇永秘书和几个人直飞成都。找到韩树信，连夜乘飞机回到北京。

## 第 970 回：江青怒，傅崇碧冲钓鱼台　写检讨，再召集警卫会议

北京这边，傅崇碧也不敢稍歇。由于 3 月 4 日戚本禹对傅崇碧他们说，他曾和原中央文革办事组组长王广宇到文化部取过一封信。3 月 4 日晚上，陈伯达和杨成武便带着时任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组长肖力、秘书王保春和卫戍区一些人到已调回“马列研究院”的王广宇处，要他交代鲁迅手稿问题。

王广宇想，应该是戚本禹记错了，他从未与戚本禹去过文化部。但无论怎样解释，陈伯达等人就是不信。

王广宇根本不知怎么回事，想来想去，想起戚本禹倒台前曾指派他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取一批红卫兵从该社总编辑韦君宜家中抄出的一批材料，其中有本裱糊得很好的名人手迹，以中央领导人的手迹居多，但有一页鲁迅手稿。他以为现在要找的即此手稿，连忙交代，并说取回就交戚本禹，现存中央文革。

王广宇的说明与要追查的手稿明显对不上。陈伯达说王广宇不老实，还硬说他和戚本禹把鲁迅手稿 “卖掉了、私分了、烧毁了”。

说起来，陈伯达任马列研究院院长时，王广宇长期在该院工作，直到“文革”开始才因能写文章、政治可靠被调到中央文革工作。就这样问了半个多小时，实在问不出所以然来，只好暂且作罢。

陈伯达等人出来以后就要走，这时卫戍区一个干部截住与陈

伯达一起来的秘书王保春问："咳，王秘书，对他采取什么规格?"

王保春心想，王广宇反正走不了啦，就问卫戍区那个干部："都有什么规格?"

那人说："有监护、拘留、逮捕……"

这时，陈伯达他们都快下楼梯了，王保春追上去，在下楼梯处截住陈伯达问："伯达同志，卫戍区的同志问对他采取什么规格?"

陈伯达愣了一下问："都有什么规格?"

王保春照说了一遍。陈伯达听了以后也拿不准，便转身和杨成武、肖力嘀咕了几句，过来对王保春说："逮捕!逮捕!"

王保春当即给卫戍区那名干部说："就按逮捕的规格吧。"

就这样王广宇被弄上吉普车给拉走了。

从研究院回来以后，陈伯达有点犯愁，琢磨自己是不是说的"逮捕"，便问王保春，王保春说"是的"，并且说："这是不是重了些?"

陈伯达有点不安了，为了证明他的话，立即给杨成武打电话，但他又不好直接问，就先在电话里再三关照杨成武，一定要把鲁迅手稿找回来，这很重要，别让人给毁了等。最后顺便问道："我们在研究院是说的将王广宇逮捕吧?"

杨成武肯定地说："是'逮捕'。"

陈伯达挂上电话很不安地说："是逮捕，这怎么办哪，能不能改一下?"

后来在文革小组开会时，陈伯达提到这事，说自己说重了。江青马上站起来说："怎么！抓你的人就不行吗？"

由于当时事情还没搞清楚，手稿还没找到，陈伯达再不敢说话了。

成都军区的韩书信到了北京，被送到北京卫戍区招待所。他很是紧张，知道出了事情，肯定事关重大。傅崇碧、周树青等人见到他时，他更加紧张。

"鲁迅的手稿现在在什么地方？"

韩书信见问这事，坦然了。他说："手稿是我取的，取来交给了何先伦。放在什么地方，我不知道。"

"何先伦在什么地方？"

"可能在西苑旅社，他后来调到周总理的联络组去了。"

傅崇碧一行又急匆匆赶到西郊的西苑旅社。还好，何先伦在。等来者说明情况，何先伦说："这事情，要去问保密员卜信荣，他具体承办的。"

"这人在那里？"周树青急切地问。

"就在中央文革保密室，钓鱼台里面。"

大家目瞪口呆。查来查去，转了那么大的弯子。知情人就在钓鱼台！傅崇碧赶快打电话告诉江青。是江青的女儿肖力接的电话。

傅崇碧问："中央文革的工作人员中有卜信荣这样一个人吗？"

“有。”

“他知道鲁迅手稿的下落。你给江青同志报告一下，我们随后就到。”

“她正在休息，起来后我们通知你吧。”

但是军人性子急，寻找鲁迅手稿这件事，大家白天晚上连轴转，紧张疲劳得要命。傅崇碧等到近 12 点时，还没有接到江青休息起来的通知，就说“不等了”，开车直接前往钓鱼台。一起去的还有卫戍区副司令刘光甫、副政委周树青、秘书冯正午。刘光甫、周树青的车在后面，傅崇碧的车在前面。

钓鱼台的警卫是卫戍区的，在传达室，傅崇碧让负责接待的人给“中央文革”打个电话，请示是否可以进去？此时陈伯达外出，值班秘书王保春接的电话。他很快答复：“可以进来。”

到了“中央文革”办公的16楼前。车子刚刚停下，就见姚文元走出来，大家打过招呼，便直接往会议室走。刚坐下，傅崇碧就气冲冲地说：

“我是卫戍区司令员，这是我管辖的地盘，谁敢拦我！”

看得出来，他是很不满意的。

姚文元让大家喝水，这时候，杨成武也来到了16楼。他们刚一到，江青就从她住的11楼过来了，她推门进到会议室，大声说：“谁让你们进来的？还发脾气！你们有什么资格冲击中央文革！”

大家见江青进来，急忙起立。周树青赶忙解释说：“我们是来向你汇报的……”

军人说话声音洪亮。江青双手捂住耳朵，大声喊道：“我不听，我不听，你把我的耳朵震聋了！”

傅崇碧赶紧扯扯周树青，尽量压低嗓门说道：“我们向你汇报手稿情况。”

“谁叫你们来的？你们不经允许就来这里，这还得了！”江青大发脾气。

此时姚文元也说：“这是什么问题！你们要说清楚。”

杨成武向江青解释，江青又和杨成武吵了起来，还拍了桌子。

突然，扑通一声，有人摔倒了，是跟傅崇碧一起来的冯正午秘书。这几天，他几乎是连轴转，几个晚上没睡觉，加上他又有低血糖的病，肚子里空空的。江青一发火，冯正午疲劳加紧张，一时虚脱晕倒在沙发上，口吐白沫。他的皮包掉在地上，滑到了江青的脚前，皮包里面的笔记本、文件也甩了出来。

江青惊吓得跳了起来，一边躲闪着，一边喊：“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包里有枪！”

傅崇碧知道冯秘书有低血糖的病，忙说：“不要紧的，稍休息一下就好了。”

其他几个人，扶的扶，抬的抬，把冯秘书弄到一边。

接着，江青就通知周恩来、陈伯达、康生、张春桥、汪东兴等陆续来到了16楼会议室，她大声指责傅崇碧非法冲击中央文革！

杨成武连忙解释说：“是总理交给的任务，找鲁迅手稿。”

傅崇碧对江青说："我们刚刚把手稿的事情搞清，特向您来汇报。"

"手稿在哪里？"江青的口气缓和些。

当傅崇碧说明了情况后，江青稍稍平息了一些的火气又发作了："什么？胡说！我们中央文革不可能有鲁迅手稿，谁指使你们来的？"

江青指着傅崇碧说："你的秘书还要拿手枪把子打我！"

傅崇碧据理相争："鲁迅手稿就在中央文革的保密室里。保密员卜信荣知道。"

"把保密员叫来！"江青大声喊道。

保密员是海军航空兵部的干部，衣着很整洁，模样也很文静，进门先敬了个标准的军礼。

"首长找我有事？"

"鲁迅的几箱手稿在你那里吗？"傅崇碧问他。

"在，就在楼上保密室里。"

他回答完，不解地看着屋里的人，又补充一句："保管得好好的，共有4个箱子。"

江青气坏了，指着保密员卜信荣吼道："你不是毛主席的兵，是个大坏蛋，抓起来！"

保密员卜信荣愣了，这是何故？周围的人再次愣了：这是怎么回事？

傅崇碧倒不觉得奇怪，他已习惯了。

江青见没人去抓保密员，又气又恨，跺着脚喊：“抓起来！”

这时有人上去扭住了保密员卜信荣的胳膊。

卜信荣急得满脸通红，喊着：“这是怎么回事啊？你们把我放开！我冤枉啊！我犯了什么错误啊！”

保密员被人扭着，消失在门外。

江青对房内的人说：“你们上楼去，把箱子抬下来。”

人们怕她再发火，急匆匆上楼抬下来4个箱子。

江青对大家说：“当着你们的面，打开。”但找不到钥匙，只好撬开箱子。

打开一看，鲁迅手稿一扎扎、一束束地放在里面。

江青拿起一本，翻看了一阵，放下，再拿一本翻看。

别人站在箱子旁边。

看着看着，江青突然说：“不看了！封起来！”“你们看着，封好。”

江青站在窗前，挺胸抬头，不知在想什么。

箱子封好后，江青又变得和蔼可亲了，对傅崇碧等人说：“你们还没吃饭吧？就在这里吃饭。”

“不用了，我们回去了。”

“叫你在这里吃饭！不愿跟我一起吃饭是不是？”江青很执拗。

傅崇碧他们留下吃饭。

江青边吃边说：“你们几位，这两天都很辛苦。辛苦就辛苦

点吧，干革命嘛！”

傅崇碧心想，留他们吃饭，应该还有事情。

果然，江青对傅崇碧说：“吃完饭，你们还要跑一趟。毛主席的手稿被戚本禹那个坏蛋盗走了。你和杨成武去审问他，手稿藏在什么地方。”

手稿，又是手稿？！

吃完饭，江青擦擦嘴说：“这是毛主席的手稿被盗，比鲁迅的更重要。你们一定要完成这重要的工作。”

傅崇碧他们从钓鱼台出来就到了杨成武那里，把江青讲的话向杨成武作了报告。随后，杨成武和傅崇碧、刘光甫立即赶往秦城监狱，立即提审戚本禹。由刘光甫做记录。

“戚本禹，你把毛主席的手稿弄到哪里去了！”

戚本禹眨巴着眼睛，说：“我，我，我没有拿毛主席的手稿哇！”

“你敢抵赖！你写文章没用过毛主席的手稿？”

“没，没有，绝对没有。”

“真的没有？”

“我没拿毛主席的手稿，只是为了写文章，用过一些清样，还是汪东兴给我的，清样现在放在我的办公室抽屉内。你们可以去问汪东兴。借手稿和清样都要通过他。”

傅崇碧马上给汪东兴打了电话，汪东兴证实说：“他没借过手稿，是清样。”

傅崇碧他们又赶回来，立即给江青写了报告。

傅崇碧他们离开钓鱼后，江青又在中央碰头会上说傅崇碧："胆子好大，带了两部汽车冲中央文革！这样下去，我们的安全还有保证没有？"

周恩来说："他也是为了报告鲁迅手稿的下落嘛，他冲中央文革有什么别的企图吗？他没有报告就进钓鱼台是不对的。"

陈伯达火上浇油："不管是来干什么，都必须报告。这样的卫戍司令不能要。"

叶群也说："这个傅崇碧太不像话！"

大家越说越气愤，越说越升级。

"不行！这得叫傅崇碧做检查！"

"找杨成武，要他批傅崇碧。"

吴法宪赶忙说："我马上就打。"

杨成武正在京西宾馆开会。秘书轻手轻脚地走到他身边，悄声说："吴法宪来电话，说傅崇碧冲钓鱼台了。"

"什么？"

秘书又重复了一句。杨成武站起来，走到外面去接电话。

"杨代总长，你到钓鱼台来，江青同志的指示。"

"干什么？我正开会。"

"叫你马上过来开会。傅崇碧冲钓鱼台了，中央的同志都在这里。"

"他为什么冲钓鱼台？"

“你过来吧，过来再讲。”

“总理在不在？”

“总理在，要你过来。”

杨成武只能放下这边的会议，到钓鱼台去。

杨成武来到钓鱼台，江青先发制人：“傅冲碧冲钓鱼台，你知道不知道？”

“我不知道。他为什么冲钓鱼台？他是卫戍区司令，钓鱼台是可以进的呀。”

叶群说：“他带了两辆车，全副武装，冲到这里来，这是什么性质的问题？”

杨成武说：“他为什么冲？把他叫来问一问。”

江青说：“你们军队这么干，简直是无法无天。中央文革都敢冲，过几天还不知道冲哪里！要批卫戍区，要批傅崇碧，你负责！”

杨成武觉得自己不能负这个责任，江青瞪着眼睛对他说：“你是代总长，就是要你负责！”

陈伯达、姚文元等人也都说应该由军队负责任。

到了晚上 19 时 30 分，汪东兴给负责钓鱼台警卫工作的中央警卫二处副处长邬吉成打电话，对他说：“一、我担心驻地警卫出问题，因新兵多，要注意；二、我担心内部人员出问题；三、我担心首长外出出问题。你们要提高警惕确保安全。”

第二天，谢富治、吴法宪等人找傅崇碧谈话，说他“冲击中

央文革小组”，要他向江青检讨。

傅崇碧当然不服，说：“我检讨什么？钓鱼台的部队都是我们的，难道我们自己冲自己？说我去抓人，要抓人还要我亲自动手？要抓人我点个头就可以了。两部车子进去是请示了陈伯达的。追查鲁迅手稿是陈伯达在钓鱼台交给刘光甫和周树青的任务，事情查清以后去向他们汇报的，我检讨什么？”

谢富治、吴法宪劝他还是写个检讨报告好。傅崇碧没办法，只好写了进钓鱼台没有经过江青同意是错误的。

3 月 10 日，谢富治、杨成武、吴法宪、汪东兴召集警卫会议，参加的单位有北京军区、北京卫戍区、公安警卫一、二师，中央警卫团和中央办公厅警卫局。会上又讲了傅崇碧进钓鱼台的问题。

接着，对中南海、人民大会堂、钓鱼台国宾馆、京西宾馆、国防部大楼的安全警卫，做了新的规定。杨成武一共讲了七条：一、任何一个人进这五个地方，都要事先打电话报告，经批准得到同意方可放行，而且必须是首长批准，秘书或警卫批准不算数；二、被批准进去的人只能是本人，其随员不得进到院里楼内；三、被批准进去者到指定的会客地点等候，不得乱窜；四、送文件的通信人员，不得直接送到首长住房（办公室），信件要经中办秘书局转递；五、不管任何人的汽车，进入这五个地方时，哨兵不仅要认车而且要认人；六、任何人进入首长住处时，不准携带武器和危险物品；七、今后中央开会时，不送文件到会场。

3 天后，中央警卫团团长张耀祠又打电话给邬吉成，除了再次重申杨总长的七条外，还嘱咐说：“今后凡是到中南海、人民大会堂、钓鱼台国宾馆开会的首长，如总理、陈伯达、康生、江青、谢富治、杨成武、吴法宪、叶群等，他们的随员可以进去送送药，做些临时性的事情。”

## 第 971 回：成都打，部队师长饮弹亡　倒谢风，贵州抓捕“四一一”

进入 1968 年后的四川同样很混乱。1 月 22 日晚，成都军区独立师师长杜灵、副师长李文，在视察部队乘车路过成都市提督街劳动人民文化宫时，遇到封锁路口的“兵团派”武斗人员，他们以为杜师长的车是“红成”派的车辆，一阵乱枪扫去，结果老红军杜灵当场中弹身亡，李文受重伤。独立师干部战士极其气愤，迁怒于支持“兵团派”的刘结廷、张西挺和 50 军。当 50 军派人以成都警备司令部的身份去独立师师部调查时，他们赶走来人，掀翻汽车。次日，省革筹和成都军区领导人到军区总医院向杜灵遗体告别时，部分独立师指战员和群众，当面质问和动手推搡时任省革筹成员的张西挺。还有几卡车全副武装的该师士兵赶到省革筹开会的地方，要揪走刘结廷、张西挺。虽经全力保护，刘结廷、张西挺未被抓走，但也被狠狠的揍了一顿，张西挺因此住进了医院。“红成”派络绎不绝去独立师悼念慰问，到处宣传“兵团”是有预谋开枪。

2 月 17 日，成都“826”派在当时为“红成”派控制区的成都市人民南路广场召开“217 周年大会”，纪念 1967 年 2 月 17 日《中央军委给成都工人革命反兵团、川大八·二六战斗团同志们的信》发出一周年，及“826”派被“二月镇反”镇压一周年。大会进行时，“826 派”与地处人民南路广场附近的成都市第十中学的“红成派”发生冲突，双方随即开枪对射，当场打死 7 人，

打伤 15 人。

随后，他们分别抢占人民南路一带的楼房作为据点，展开持久、激烈的争夺战，致使成都市交通枢纽的人民南路广场一带不能通行，一些无辜群众和行人被打死打伤。仅 2 月 22 日一天的武斗，就打伤 182 人，其中 3 人死亡。位于人民南路附近的成都市第一门诊部大楼在枪战中被烧毁。

为了制止人民南路的武斗，四川省革命委会筹备小组组长张国华、副组长梁兴初发表公开信，要求“826”派和“红成”派立即停止射击。更不得向过往行人、车辆射击，不得阻断交通；双方立即返回本单位，并派代表到成都警备司令部谈判，立即释放对方被抓人员；双方有不同意见，应按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原则，通过协商解决；要提高革命警惕防止坏人挑动。

但两派不听劝告，仍继续枪战。

2 月 28 日，为制止武斗，促进联合，中央召集四川省的主要负责人和各大派组织的头头，在北京空军政治学院集中办学习班，“讨论”四川局势，“协商成立革委会”事宜。

在成都军区的一再干预下，到 3 月 7 日，成都市人民南路的这场武斗才基本停止。在这次武斗中，“826”派死亡 22 人；受伤 55 人；“红成”派死亡 8 人；受伤 12 人；群众被打死 10 人，被打伤 35 人；解放军在制止武斗时，死亡 4 人，受伤 13 人。财产损失无计，成都市第一门诊部大楼被放火烧毁。

四川不仅成都在打，泸州也在打。3 月 2 日晚 21 时，四川

泸州“红联站”召集武装人员，其中包括重庆“815”、荣昌“29”、永川“专联司”等组织，在高坝、兆雅两地集结，向“红旗”阵地进发。

3 月 3 日晨 5 时到晚 19 时 30 分，“红联站”对“红旗”开始进攻，他们在 60 炮，82 炮，37 高炮，高射机枪轮番轰击扫射掩护下，经过 9 次冲锋，攻下了五峰顶，三华山。尤其水上舰队在小市附近江面向小市市区射击，“红旗”三面受敌，背水为阵，只好放弃小市。“红联站”当天迅速地占领了整个小市市区，泸县全部被“红联站”占领。与此同时，“红联站”又向兰田镇发起进攻，占领了整个兰田镇。

3 月 4 日凌晨，“红联站”又占领了整个纳溪县城。至此，双方北以沱江为“楚河”，东南以长江为“汉界”形成对峙。其间，双方除了在各自的地盘上向对方进行骚扰或打冷枪冷炮外，无大的动作，但苦了城区住的居民们。因为双方武斗，城里停水、停电是经常的事，居民几乎天天吃干咸菜，没什么新鲜菜，吃肉就更不用说。晚上睡觉时，有的甚至睡在床底下，上面还搭上棉被什么的，防炮弹，因“红联站”老是炮击“黑管区”，这是“红联站”对“红旗”占领区的称谓。特别是晚上，“红联站”从小市，茜草两个方向对城区或医专打炮，稍不慎就会落在民房中，造成居民伤亡，房屋损坏。

3 月 9 日，四川省 58 个县市的“红十条”派再次在自贡市召开了为期 6 天的会议，推广武装支泸经验，会上提出：

“去年九月‘红十条’派武装支泸的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如果有必要，我们誓将再度武装支泸”。

“泸州红旗派创造了文攻武卫的范例，值得我们学习”。并号召全川“红十条”派“必须在文攻武卫中联合起来，进行必要而适当的支援”。“尽最大的可能对那些在十分艰苦的条件下浴血奋战的战友，从政治上、道义上、物资上做出更大的支援”。

我们再看贵州。贵州的李再含对“411”的武装“踏平”并没有让“411”平息。1967 年 11 月，“411 贵阳前线指挥部”在贵阳秘密成立，并开始了地下斗争。12 月 10 日，中央关于正确对待犯错误的老造反派的（67）367 号文件贴上贵阳市街头，贵阳师范学院的“411”学生上街示威游行，热烈欢呼（67）367 号文件下达和毛泽东关于对老造反派要“帮助、批评、联合”最新指示的发表。贵阳市街头开始出现“411”的大字报，批判李再含。贵州工学院内贴出“打倒王力，解放‘四一一’！”的大标语。

1968 年 1 月 7 日，“411”从贵阳市大十字百货大楼之上撒下万份传单，轰动一时。这月，在清华大学召开了“贵州 411 全省代表大会”。23 日，贵阳各大中专学校“411”学生在贵阳师范学院集会，会后举行庆祝贵州夺权一周年大游行。游行队伍从师范学院出发，经喷水池、大十字到邮电大楼。

2 月 8 日，“贵阳 411 兵团中学指挥部”成立，并从 2 月 10 日起，在贵阳九中开展了“反‘踏平’斗争”活动。

2 月 11 日，“411”学生再次在贵阳师范学院集会庆祝省革委成立一周年，大会的口号有“誓死捍卫红色政权”、“打倒独立王国”等，会后举行游行，在师院大门、三民东路和喷水池等处遇到“财贸卫红兵团”和“邮电卫红兵团”组织的封锁，双方发生武斗。这就是震惊贵州的“211 抗暴游行”。

“411”不断举行“飞行游行”，武斗、冲突频频发生。

李再含通过“508 调查组”获知，3 月 6 日下午，“411”地下组织要在贵阳市郊华家山，即现在的云贵山森林公园开会，让从北京返回的“411”政委邱富伦同大家见面。当天上午，李再含即开会研究，要求“818”兵团将他们抓获。会议要求：“行动要迅速，注意保密，不要让他们发觉我们的行动跑了，把他们包围起来，一锅端。”

上午 9 点多，“818”张德茂等来到华家山看了地形，画了草图。下午 14 时 30 分，“818”兵团出动近千人和一个武装连，把华家山团团包围，由山脚往山顶搜捕。结果“411”那天到会的 200 多人，除少数突围外，170 多人被抓。在这次大搜捕中，凡属包围圈内的人，无论小孩，还是在山上劳动、打柴的社员，乃至检查附近铁路线的几名工程技术人员，都一起抓了。

事后，“818”兵团立即上街宣传“3.6 大捷”。当晚，李再含派刘安民慰问了“818”兵团。这次被捕的 170 多名“411”群众，全部被关进了省财校“818 总部”的“强制性学习班”。

北京一些红卫兵组织从戚本禹的垮台联想到与之关系密切

的谢富治，于是他们四处活动，收集和整理了一批谢富治的材料，酝酿掀起“倒谢”活动。

经过一番准备，在 1968 年 3 月初，从人大“三红”等组织中传出“谢富治停职反省”的消息，同时出现了 “土皇帝已死，地头蛇跑不了”大标语，人大“三红”“1122 纵队”公开提出要揪“谢本禹”，从而掀起了炮打谢富治活动的序幕。

3 月 4 日，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给毛泽东、林彪写信，提出在北京出现了一种不准讲阶级斗争，不准讲路线斗争，宣扬派性就是一切的“怪现象”。

3 月 5 日，继人大“三红”之后，北京地质学院“二团”也贴出了影射攻击谢富治的大标语：“砸烂关王庙，揪出大小妖!”

3 月 6 日，聂元梓等人贴出题为《是彻底揭开北京高校问题的时候了》的大字报。这份大字报是在北大校内起草的，3 月 5 日完稿，6 日早晨贴出，署的日期是 3 月 5 日。

3 月 6 日晚，周恩来、陈伯达、江青等在人大会堂接见北京大中学校群众组织代表。北大去的两派人数不等，“新北大公社”人多，而师大的两派人数对等。为此谭厚兰跑去质问高校学习班，得到的回答说：“这是上级的指示。”

在会上，江青点名让师大“造反兵团”发言。师大“造反兵团”的王颂平说：“这是师大‘造反兵团’第一次参加中央首长的接见。”

她说：“我们被赶出了学习班，学习班负责人坚持戚本禹

‘12．27’讲话原则，在学习班不是来解决大联合问题，而是解决什么‘兵团’反‘革委会’问题，这句话是谭厚兰亲口对我说的。为了捍卫毛主席最新指示，我们不能接受他们的原则。在 2 月 22 日，学习班负责人接见我们的时候，又把我们打成‘四反一捣乱’组织，说我们要搞垮无产阶级专政，让我们滚出学习班，甚至说要把我们当反革命抓起来……”

聂元梓也在会上对学习班负责人加以谴责，她说：“我觉得这个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不是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是起掩盖黑手的作用，在学习班不能说提高路线斗争觉悟、阶级觉悟，我们在学习班贴标语‘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提高路线觉悟，加强阶级斗争观念’，也被人说成是派性十足。我们本来也想向其他学校学习，可是又不行，叫‘派性串连’……”她提出“要揭派性盖子”。

“学习班指导思想不清楚，不明晰，什么是大联合的基础？不是把两派捏在一起就算联合。学习班里解放军不相信群众，有什么事记在小本子上。还偷听我们的谈话，不准串联。”

“孙蓬一是个好同志，也有严重错误，现在要是整孙蓬一，我反对。如果是与孙蓬一是敌我矛盾，我也打倒他。卫戍区有他的专案组，说再有两个问题查清就把他抓起来了。孙出身很苦，阶级立场鲜明，但经常犯左的错误。学习班上有人看着他。有人找他，解放军同志都记在小本子上。解放军同志甚至还偷听我们的说话。”

这次接见后，中央将聂元梓、谭厚兰，地质“杀朱派”周永章的发言录音在高校学习班放给支左的解放军听。因为这些发言都是谈高校学习班问题的。

周永章为什么被称之为地质“杀朱派”？因为他 1966 年被地质学院的朱成昭派去组建红卫兵第三司令部，并成为“三司”的第一任司令。但是 1966 年 12 月，朱成昭因为反对中央文革，地质学院“东方红”的领导人换成了王大宾，周永章于是成为对立派，称为“杀朱派”。

3 月 7 日，江青叫谢富治派人到北大要一份“傲霜雪”和“独立寒秋”两个战斗队上报的材料。这份材料是北京大学“新北大公社”傲霜雪”和“独立寒秋”这两个战斗队，根据 1968 年初，北京大学“新北大公社”多次召开串联会讨论后整理的一个材料，主要观点是：当前存在右倾的情绪和走向。他们将这份材料上报中央。

谢富治指示傅崇碧派人去北大要这份材料，傅崇碧派北京卫戍区哈斯到北大。开始哈斯是以卫戍区的名义索要材料，北大校文革办公室的聂向前不给，说：“这材料都已上报了。”

哈斯又要底稿，聂向前说：“底稿也没有了。”

哈斯说：“谢副总理要这材料，你们给不给？”

这时聂向前才说：“我们当然给。”

哈斯问这材料都上报给哪些首长了，并要聂向前他们开列名单。北大的人挤兑他说：“毛主席的名单你也要？“

哈斯不假思索的回答说："毛主席的名单我也要。"

聂元梓当即打电话给江青，说有紧急情况要向中央反映。江青于 3 月 8 日凌晨在钓鱼台接见了聂元梓，陈伯达也在。

江青很热情，让聂元梓坐在中间，问道："你们抓着王、关、戚不放，是不是又发现了什么新的问题？"

聂元梓回答说："我们认为高校分成两派是王、关、戚的黑手造成的。找出分裂的根据才能解决矛盾，在革命的原则上联合起来。"

江青几次说："你们为什么老是抓住王、关、戚不放呢，王关戚的后面还有大的嘛？刘少奇吗！""你们批判王关戚，要和刘少奇挂起钩来。"

针对学习班的口号是"打倒派性，增强党性"，江青说："这样说法不对，不确切，应当说打倒资产阶级派性，增强无产阶级党性。"

江青最后讲："上一次我对你讲了，让他们知道了，搞得我们很被动。这一次你一定不要对别人讲。"

江青说的是 1967 年 4 月 10 日接见聂元梓时的谈话。

聂元梓又问陈伯达，去年他 6 月 5 日的讲话是怎么回事。

陈伯达说："那是关锋强迫我讲的，他把会议布置好了，我正在开会，他把我拉到会场，让我讲那些话。"

聂元梓回来后，只对孙篷一、姜同光、王茂湘、卢平、赵建文等几个人讲了这次接见的情况。因为江青讲："王、关、戚的

后面还有大的嘛!"他们不知道这个大的是指谁？于是聂元梓定了一个方针："打死的，看活的。"意思就是：打已经抓起来的王、关、戚，看形势的发展。

3 月 9 日，北京人民大学"三红"广播站广播了《彻底揭开北京两大派斗争的盖子》，高校学习班也贴出了署名"新北大公社总勤务组"的大字报：《揭开派性斗争的盖子，将路线斗争进行到底》，影射、批判北京市革委会负责人谢富治。聂元梓也在当天带头打破学习班不得串连的纪律，到人民大学"三红"串联，并在晚上回来后，让"新北大公社"动态组组长胡宗式，通知北京师范大学"造反兵团"的王颂平、地质学院"杀朱派"周永章、人民大学孔宪龙，第二天上午到北京大学开会。

3 月 10 日，人大"三红"又在高校学习班以"全体学员"的名义贴出大字报：《不能走》，抨击学习班，提出要揪"关、王、戚余孽"。

当天，聂元梓按约定在北京大学召集北京师范大学的"造反兵团"、地质学院的"杀朱派"、人民大学"三红"开会，中心议题是统一对北京高校学习班的看法，决定召开更大一些的串联会。聂元梓在最后发言中说："王、关、戚倒台以后，为什么'地派'还那么猖狂，因为王、关、戚的后头还有大的。"

## 第 972 回：再接见，北京高校学习班　很明确，“二月逆流”不能翻

3 月 11 日，“新北大公社”参加北京高校学习班的全体学员又贴出一张题为《这是为什么？？？》的大字报，指责高校学习班负责人李钟奇“用‘派性斗争’掩盖高校的阶级斗争，用所谓克服‘派性’，打击和瓦解无产阶级革命派的队伍。” 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李钟奇在一次学习班全体成员大会上，不知为什么说了一句：“你们不要老是讲阶级斗争嘛！”这句话立刻遭到与会者的反驳，许多单位已经为此贴出了大字报。“新北大公社”这次也贴出了他们的第二张大字报。

大字报中写道：“学习班的某些负责人却公开宣称：‘不能铺天盖地地讲阶级斗争’，‘学习班主要解决派性问题’，这是为什么？……这是否定文化大革命的一种左的思潮”，“他们自己不抓黑手，还反对别人抓黑手，并进而用‘派性内因论’打击坚持抓黑手的革命群众，他们究竟要干什么？”“以反对‘派性活动’，排除‘干扰’为名，不许串连，不许贴大字报，看大字报，不许发传单；甚至限制某些学员的行动，跟踪，盯稍，整黑材料，压制不同意见，动不动就用大帽子压人……”“能否办好首都高校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是毛主席一系列最新指示能否在高校全面落实的头等大事。要不要从根本上扭转高校学习班的方向，要不要按照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把学习班办下去，是要不要与刘邓黑司令部与反党集团斗争到底，要不要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毛泽

东思想、誓死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誓死保卫林副主席，誓死保卫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誓死保卫中央文革的大问题。”

这天，北京大学“新北大公社”、师范大学“造反兵团”、地质学院“杀朱派”、人民大学“三红”和北京医学院“联总”、政法学院“红联站”、北京外语学院“红旗”等十几个学校开会，决定召开高校学习班串联会，会后发了海报，署名“首都高校无产阶级革命派”。之所以署名“首都高校无产阶级革命派”，是因为在3月10日聂元梓召集的北京大学会议上决定:“以后不叫天、地派，我们不是‘天派’，不是‘地派’，我们是首都无产阶级革命派。”

其他院校提出聂元梓要在高校学习班串联会上发言，聂元梓答应了。她派人去学习班办公室，让广播串联会海报，聂元梓明知这是不可能的，但也要这么做，用她的话说：目的是“让他们表表态嘛。”

当晚，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姚文元、谢富治、汪东兴、叶群、吴法宪等又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北京高校学习班，继续3月6日的汇报。

陈伯达说：“继续上次的汇报，上次没讲过的讲，每人不得超过10分钟。要谈新闻，不要谈老闻，谈新意见，要学会说话，不要啰嗦。”

广播学院的秦殿丁站起来说：“广播学院要讲。”

陈伯达同意。

秦殿丁："首先敬祝我们心中的红太阳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敬祝我们的林副统帅身体健康！永远健康！永远健康！"

周恩来问："你叫什么名字？哪个组织的？"

秦殿丁："我叫秦殿丁。'红三军'的。"

周恩来翻阅 3 月 6 日接见的名单问："怎么没有你的名字？"

秦殿丁："我们这次换人了。我换贺亚生，曹惠茹换吕反修同志。"

周恩来问："曹惠茹？"

陈伯达："曹惠茹来了？"

秦殿丁："曹惠茹来了。让她先讲吧，然后我再补充。"

周恩来："你们是一派的？"

秦殿丁："是一派的。"

陈伯达："好吧。"

曹惠茹汇报了广播学院"一月夺权"后的分裂状态，她认为："分裂的主要原因就是由于王力、李敦白、张根成插手的结果。"

她说，对北京市广播电台的"114 夺权"，广播局"毛泽东思想战斗团"2000 多人是反对的，而王力却支持这个"夺权"。她认为："在处理这件事情的时候，王力耍了两面派手法，表面上支持我们辩论，背地里告诉他们不要去参加辩论，这样我们就搞了一个'强迫辩论'。王力揪住了我们这条辫子，就以中央文革名义搞出了两封信，把我们打成了'炮打中央文革分子'。我

们写给中央许多材料，都被王力扣压了。在这种情况下，‘114夺权’的一些同志，搞出了一个公告，把我们打成‘反动分子’，这个公告至今未撤销。前几天当我们问他们对这件事情的看法时，他们说：‘中央文革的两封信不撤销，我们也不撤销公告’。我认为这是对无产阶级司令部、对毛主席的司令部是什么阶级感情问题。自己哪些地方被王力利用了，自己干了那些事，自己都很清楚。那么，为什么至今对王力的问题不表态、不揭发、不交待呢？‘218’以后，临时文革就来了一个改组，改组的思想基础是‘114’和‘218’。原临革中 21 个委员就有 16 个被踢了出去。去年 3 月 8 日王力接见了他们的代表。 王力说：‘你们要全面彻底的夺权，把权夺到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手里’。还说：‘要彻底砸烂旧的国家机器’等等。在这种极‘左’思想影响下，他们就把矛头指向了犯过错误的造反派同志，和受蒙蔽已经改正错误的保守派同志及广大革命干部。当时‘北京公社’内部有人起来反对抵制，就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这些同志就组织起一个‘北京公社五一六战斗团’，后来同一些其他革命派同志们一块成立了‘红三军’，抵制王力的极‘左’思想。‘红三军’就是这样成立的。

我感到问题严重的是去年 5 月份时，有人就在临时文革里公开提出‘向王力同志学习’的口号。‘北京公社’的会上一直在传达‘王力同志说什么’，‘王力同志怎么样’。8 月 9 号张根成到我校去了，他根本没找我们了解情况就对他们说：‘临时文革

踢得开吗？’当时本来‘北京公社’一些同志已经做了些检查，可是张根成的‘光临’，使得他们更硬了起来，不检查错误，同时死保临革。李敦白也曾经对他们说过：‘既然曹惠茹是右倾机会主义，我同意你们和她分裂’。

现在广播局王力的问题已经得到了批判，从中央 12.7 文件下达后，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广播局和北京市台形势大好。广播局很快就要成立革命委员会。但是在广播学院就截然相反。王力的极‘左’思潮流毒很深，至今未得到批判。在去年 11 月有人借口抄‘516’，还抄了我们的家。自然喽，他们什么也没抄去。所以我们认为解决广播学院联合的一个根本问题，就是要肃清王力流毒，不肃清，就不能实现革命的大联合。毛主席的‘革命委员会好’就不能在广播学院实现。

另外我给学习班提一个意见，军训团强调两条路线斗争、强调斩断黑手不够。”

陈伯达问：“是学校的学习班吗？”

曹惠茹：“不是，是大专院校学习班。”

曹惠茹汇报完后，其他院校代表纷纷举手，要求发言。广播学院杨逸鹏也要求发言。陈伯达对他说：“你讲吧！”

江青对陈伯达说：“他不是杨逸鹏吗？”

杨逸鹏：“祝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

周恩来问：“你叫什么名字？”

杨逸鹏：“我叫杨逸鹏。我不同意曹惠茹的意见……”

江青问："你不是做了北京广播电台的台长了嘛！"

杨逸鹏："把曹惠茹开除临时文革，不是改组后的临革，而是前临革十二号公告，我以前根本不知道，后来才知道。我们学院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分裂，不像曹惠茹讲的是 67 年 1 月份分裂的，而是 66 年 7 月份反工作组时，造反派就分裂了。现在看来王力的'三八'讲话是错误的。对形势的估计是很悲观的，说'毛主席革命路线有失败的可能，有胜利的可能'。另外王力'三八'讲话时，不只我一个人去，他们'红三军'的一个负责人吕反修也去了。因此说'三八'讲话的流毒双方都有。不能只说我们。我们学院临时文革八委员宣布临革的瘫痪，造反派当了保守组织的头，今天在座的秦殿丁就是一个。"

曹惠茹立即站起来说："秦殿丁是造反派犯错误。"

杨逸鹏："我们学院两派也参加了'天'、'地'派斗争。不能把'天'派全说成是执行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也不能把'地'派全说成保反动路线的。而我院'红三军'就是'地'派的，保王、关、林的。我们广播学院很小很小，在高校中没有影响。其实王力没有必要插手我们广播学院。"

曹惠茹："王力在 3 月 8 日接见你的时候说：'广播学院对广播局是有影响的'。"

杨逸鹏："我和王力只见过两次，一次是 1 月 30 号，一次是 3 月 8 号，张根成也是两面派，他曾跟曹惠茹说我是两面派，我想曹惠茹也不会否认吧！反革命两面派就是这样在这边说好，在

那边说好。”

江青：“过去我们解放了你！可是，你后来呢，却做了别的事情，当了台长了。这你总不能蒙我们。”

杨逸鹏：……

陈伯达对杨逸鹏说：“可以了，不要讲了。”

杨逸鹏：“我还有一句，就是学习班的情况……”

陈伯达：“差不多了，化工学院讲。”

化工学院“一月风暴”的代表说：“学习班犯了路线错误，抹杀了阶级斗争。把化工学院作为斗私批修的样板，实际是 2.24 开始斗私批修，当时气氛是正确的，但实质还没涉及就被当样板推广了。”

化工学院的讲完后，二外“红卫兵”汇报了军训团的问题：“军训团说我院一月夺权是派性斗争，否定‘兵团’炮打总理罪行。军训团有人说，炮打总理是出于热爱毛主席。”

江青反问到：“炮打总理还说热爱毛主席？”

二外“红卫兵”说：“解放军说：‘兵团’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他们炮打另一个无产阶级司令部”时，陈伯达打断说：“只有一个无产阶级司令部，那有另一个无产阶级司令部。”

二外“红卫兵”又说：“批陈毅问题上我们外事系统分成两派。”

周恩来：“批陈毅是对的嘛！”

石油学院“大庆公社”谈到“‘北京公社’利用反余秋里和

其他几个副总理，实际是炮打毛主席的司令部”时，江青生气的打断他的话，激动地说：“去年二月逆流嘛，你们学校起作用了没有？”

答：“有一些。”

江青：“只有一些吗？二月逆流你们怎么表态的？”

答：“我们认为有二月逆流。”

周恩来：“你们反击了没有？”

姚文元：“我没听清楚，你把刚才讲的话重复一遍。”

周恩来：“二月逆流嘛，他（指余秋里）犯了二月逆流的错误！该炮轰嘛！”

江青质问到：“反击二月逆流，炮打谭震林是不对的吗？打倒谭震林不能打吗？我还保了他，你们打嘛！你们打得对嘛！有两个展览根本没有一点毛泽东思想，没有突出毛主席，没有突出林副主席。反击二月逆流你们一直没有表态，我们对这一点是清楚的。二月逆流时，你们是哪一个司令部的？”

周恩来：“从 3 月到 5 月反击二月逆流都是对的，二月逆流从右的方面干扰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是以谭震林为首的一伙人搞的，批判二月逆流的大会一直到 8 月份我都是参加了的。‘516’是从极‘左’的方面，动摇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司令部，都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你们应该讲你们自己的错误嘛！”

江青：“你们一点都不批余秋里，主席对余秋里是一批二保，

你们是一再地保，你们倒是一贯正确了？！”

周恩来：“应该谈你们自己的错误，从 2 月份以后。”

石油学院“大庆公社”代表谈反对“516”的问题。江青说：“你们已经捞不到什么了，你们还讲什么‘516’。我们反‘516’的时候，你们倒不知道在哪儿睡觉呢？”

周恩来：“别人反击二月逆流时，你们是不赞成的，你们就是错了。”

江青：“文化大革命两年多了，你们很缺乏自我批评，特别是你，你们一直保，倒成了一贯正确的了，你们就是拥护二月逆流的，你们是反对我的，你们口头上讲拥护毛主席、林副主席，实际上炮轰我们的，你们轰吧！胆小鬼才怕轰呢。你们从头到尾保，现在倒一贯正确了？！二月逆流是什么东西？是想推翻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是想推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想推翻无产阶级专政！”

众人喊口号：“打倒谭震林！”

姚文元：“他们想推翻以毛主席、林副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

谢富治：“二月逆流是想推翻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中央文革小组。”

江青：“我很气愤，你们是毛主席的红卫兵，要不要有无产阶级的义愤？！”

众人答：“要！”

江青："一贯保的倒成了一贯正确，你们一点不做自我批评，不听！不听！"

陈伯达："你们一贯不正确，你们一贯不正确。"

叶群："二月逆流就是搞资本主义复辟，推翻无产阶级司令部，推翻中央文革。"

康生："余秋里搞大庆展览时，把毛主席、林副主席的像搞掉，而去买刘少奇的黑照片。"

江青："一个石油展览，一个农业展览，都是反对毛主席的，我没去看。"

康生："两个展览我都去看了，都是反对毛主席反对林副主席的。"

叶群："这些问题都是实际问题，二月逆流是搞资本主义复辟，推翻无产阶级专政，推翻中央文革小组！对待二月逆流的问题，是个大是大非问题。"

姚文元："我刚才叫他重复一遍，他不敢重复，有胆量再重复一遍。"

江青："你有胆量重复一遍，没有胆量吧！一点自我批评的精神也没有，我希望你们多做自我批评，你是个头头，要把这个意见带回去，让群众帮你检查。"

吴法宪、叶群都表态说："完全拥护江青同志的讲话。"

周恩来："你们去年 9 月份抄了别人的东西，早就让你送回去！你对自己人凶得要死，也许就不是自己人，我怀疑他不是自

己人，应该把东西还给别人。”

北医的代表说讲：“有人认为，高校两派斗争，就是毛主席司令部与关王戚反党集团的斗争。”

江青反问：“那么你们把刘、邓、陶、彭、罗、陆、杨放到什么地方去了？”

民族学院“抗大”提起 1967 年的“115 档案事件”：“谢副总理讲了，一家抢了档案，另一家就不想抢了吗？反谢是小问题，矛头是指向中央文革的。军训团一进校就说郑仲宾是反革命，无产阶级司令部插手了，我们有材料。”

周恩来：“郑公盾一家子都是坏人。”

郑公盾是郑仲宾的父亲。

民院“东方红”发言，他说：“1.15 档案问题，洪涛、刘郢、郑仲宾同样是反革命，他们的斗争是反革命之间互相争权夺利。”

建工“新八一”发言时谈到揪刘火线时，江青问：“刘少奇那个检查到底应该给谁？是应该给‘新八一’而给了‘老八一’了，还是应该给‘老八一’而给‘新八一’了？”

建工“八一”：“应该给‘老八一’的。”

江青：“你们说清楚，因为这是导火线，我们想听一听。”

汪东兴：“其实是刘少奇耍的鬼，我当时是要同时交给两派的，而刘少奇只写了一个‘新八一’，给了‘新八一’。”

江青：“两派都有勒令，应该都给的，是汪东兴经手的。”

建工“八一”汇报到揪刘火线绝食时，江青说：“绝食也是

极‘左’呀！印度的那个总理甘地等搞绝食，就是不搞武装斗争。”她笑着说：“你们不要上了刘少奇的当，刘少奇故意挑拨，刘少奇就是要这样的花招，另搞这一套，你们新老‘八一’一定要联合起来批判刘少奇！”

大家热烈鼓掌。

陈伯达：“今天的会就到这里为止，以后再说吧，还有机会。”

## 第 973 回：周恩来，携陈毅到外交部　串联会，中央见四川领导

在 3 月 9 日外交部常务副外长姬鹏飞代表外交部党委为外交部“91 人大字报”作第二次检查后，3 月 11 日，周恩来、陈毅又为“91 人大字报”特地来到外交部。

周恩来说：“91 人大字报是资产阶级政治、不是无产阶级政治，为什么外交部政治部签名的那么多？外交部政治部过去极‘左’，现在又右得要命。我当时说要反‘左’防右，我说对了。”

他问外交部副部长兼政治部主任刘新权：“刘新权，这张大字报你看过没有？”

刘新权答：“没有。”

周恩来说：“没有看过怎么签字？你过去执行反动路线，现在转了一圈，又右了。你有没有到过‘造反团’那里去过？”

刘新权答：“去了 3 个月了。”

周恩来：“去了 3 个月还没有改过来。你是否可以解剖一个麻雀，把你自己当作麻雀、是否可以写一个检查，短一些，触及灵魂一些，你从原地方回到了原地方，跟斗翻得很准。我曾经告诉你们抓‘516’的办法。北京市抓‘516’比较健康。不要因为‘516’就老保翻天，反‘516’就是二月逆流的发源地，有人说‘打倒陈毅’这个口号是错误的，也不完全对，说反动就更严重了。”

周恩来对“造反团”头头毛牛齐说：“‘联络站’也要一分为

二，有错误也有成绩。”

毛牛齐说：“8 月份以前，要一分为二，8 月份以后就完全错了。”

另一位负责人讲：“7 月份的大方向正确，7 月份以后犯了方向路线错误。”

周恩来举了一个南昌起义的例子说：“你应该写个检查。在外交部喊‘打倒陈毅’这个口号是可以的，但到外面讲就不行了，因为有国际影响。”

他对毛牛齐说：“你们是造反派犯了错误，一个时期犯过重大错误的造反派。”

毛牛齐说：“我们犯了罪。”

周恩来：“不要讲犯了罪嘛，尤其你们年轻人要好好检查，改正错误。外交部要来个革命化。你们要改正错误，改正错误就立了一功。91 个人大字报，部党委没有一个人反对，要好好批判，火烧炮轰都可以。”

外交部党委说有一个检查，周恩来：“退回去，到群众中检查。‘大联筹’有权批判部党委，同时可以吸收别的人参加，可以批判陈（毅）、姬（鹏飞）、乔（冠华）。有人说：‘打倒陈毅’是战斗口号也可以。对群众来说，主要激于义愤，是可以理解的，只要不强加于我，就可以了。群众叫‘打倒陈毅’是热爱毛主席、热爱党的表现，我们要向他们学习这种阶级感情。他们当中有人说：打倒陈毅是打倒陈毅的错误，我很欣赏这句话。‘大联筹’

应有自我批评的精神，勤务组要有对立面。

91 人的大字报给陈毅帮了到忙，外交部主要是批右还是防‘左’，不能再来个反复。91 人大字报代表外交部一股顽固保守势力。甚至是反动势力、保字号老保翻天。当然不能讲 91 个人都打倒。这张大字报是反对毛主席的，站在反动立场上对抗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外交部干部青黄不接：一般干部犯了许多错误，年轻的又跟不上。91 个人不是 91 个人的问题，而是代表了一股保守势力，年轻的还不能接班。要千锤百炼，犯错误不要紧，但要态度诚实、承认。一时不理解。可以坚持一下，有认识问题，也有立场问题。家庭出身有联系，家庭出身不好，要注意立场问题：家庭出身好，要注意不要背叛自己的阶级。大家都要批判 91 人大字报，防止有右倾保守势力。这些人要检查改正错误。外交部有委屈、对抗文化大革命的情绪。部党委要振作起来，一面批右，一面抓业务，你们现在批右不妨碍办外事，二者是一致的。外交部 17 年来基本上执行了毛主席革命路线，但也受到刘邓‘三和一少’的干扰，8 月份集中表现了刘邓形‘左’实右的干扰。”

外交学院说要请陈毅过问外交学院文化大革命时，周恩来说：“你们这不对，陈毅还未检查呢。”

他对姚登山说：“你在印尼有功，我们对你一批二帮。姚登山你会不会报复？”

姚登山表示说：“不会。如果那次不犯错误，也许这次大字

报上签名呢。”

陈毅：“我老将犯错误和小将不一样，我是犯了战略性错误，对抗毛主席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你们 8 个人写检查，为什么没有谈到我的，你们不是包庇我吗？你们不向我开火，也是资产阶级感情。我要向总理学习。”

周恩来：“向毛主席、林副主席学习。”

陈毅：“向毛主席、林副主席、中央文革伯达、康老、江青、姚文元、张春桥同志学习。”

周恩来：“当前要开展两条路线的斗争，反形‘左’实右，实际上还是陈毅要检查，中央意见一致。书面还是到群众中，我自己还倾向后一种。”

陈毅：“我也同意后一种方法。”

周恩来：“现在北京大专院校右的苗头已经出现。”

第二天，3 月 12 日，周恩来又在中南海小礼堂接见了外交部各方面的代表，包括耿飚、黄镇、刘新权、姚登山及“91 人大字报”的起草人、“大联筹”负责人、前“联络站”核心组成员、“45 战斗队”等共 150 多人，在接见中，周恩来再次严厉批评了“91 人大字报”，也批评了外交部党委。

周恩来说：“今天，至少外交部、外交学院包括在内，整个北京大专院校右的苗头已经出现了。在外交部不仅有右的苗头，91 人大字报是老保翻天，反攻倒算，当然在批右的时候也要防‘左’，某几个单位，如果在批右的时候‘左’的又跑出来了，

‘左’的也一起除。但总有个主要矛盾。”

周恩来说：“整个部党委陷在里面。”他问党委成员说：“你们有一个人来向我谈过没有？恐怕没有。”“姬鹏飞、乔冠华同志错误更大，一个是常务副部长连看都不看，乔冠华还出了坏主意。龚澎也看了。”

龚澎答：“我听念了一遍，我是没有签名的签名者。”

周恩来又强调说：“‘91 人大字报’部党委没有一个人看出问题来。也没有一个人反对，听说部党委检讨还不好，部党委还需要批判。主要责任是部党委，要好好批判几次才行。现在重点在外交部是批右，当然批右要防止极‘左’。还是那句话，不然极‘左’又要出头了。”

“希望你们把 91 人的大字报作为反面教材，很好地批判，来个彻底批判。由你们去做，拿这个做标准，不是犯过错误的，或没有犯过错误的，或是少犯过错误的，大家一起都要批判。”

“现在你们批右，批下去，但不妨碍办联合的学习班。学习班要和批判结合起来，要同两条路线斗争结合起来。学习班要斗私批修，光斗私还不行，还要批修，这就是要批反动路线。”

外交部开展了对 91 人的大批判，部党委成员及有关人员姬鹏飞、韩念龙、乔冠华、耿飚、黄镇等都受到了大会批判斗争。黄镇还被命令在批斗之余去刷厕所。

由于周恩来介入及时，“91 人大字报”没有引起更大的风波，在大字报上签名的 91 人各自检查自己的错误后，陆续在各单位

获得“解放”，没有受到太大的牵连。

但此时北京反对谢富治的风潮正愈演愈烈。在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于 3 月 11 日晚接见了北京高校学习班，听取了他们的的汇报后，3 月 13 日，人民大学的“三红”、“新人大革命造反联络站”、轻工学院的“红鹰”、北京大学“新北大公社”、师范大学“造反兵团”等十几所院校的“天派”组织，按照他们 3 月 10 日在北京大学开会的商定，在北京高校学习班上召开了大型串联会。来的人很多，前后约有万人，各校的代表纷纷发言，认为现在的学习班不是一碗水端平的做法，学习班的指导思想、方针、方法都有问题，不解决学习班的问题，“就会影响揭开北京市两大派斗争的盖子”。

由于北大校内一些人的劝告，聂元梓这天没有在会上发言，但她坐在头排很显眼的位置。

人民大学“三红”代表在发言中说：“学习班大搞调和、折中，不准讲分歧，对矛盾能掩盖就掩盖，否则就是派性发作。要让保守派吃掉革命派，让大权落在保守派手中。”

轻工学院“红鹰”代表说：“丁国钰之流不突出政治，不讲阶级斗争、路线斗争，而是张口派性、闭口派性，对‘四大’怕得要命，甚至连几个同志互相帮助也说成是派性串连。”

北外“红旗”代表在发言中说：“前几天还有这种论调：火烧英国代办处是百年以来反帝斗争的创举。有人说，关、王、戚、林问题没见过报，两派联合声明中不准讲，一讲你为什么就心里

难受呢？就如丧考妣呢？”

“新北大公社”的代表说：“学习班已经一个多月了，共同性的问题，实质性的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就是负责人的指导思想有问题，不抓阶级斗争，不走群众路线，不许串连，一串连就说是派性。”“极左被识破，就从右的方面进攻，表现在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把路线斗争说成是派性斗争来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成果。”

师范大学的王颂平要蒲寿章参加并且发言。蒲寿章说：“用不着稿子，我可以历数谢富治充当谭厚兰后台，继承王、关、戚、林衣钵，打击、压制师大‘造反兵团’的种种罪恶行径……”

会后，卷入的学校越来越多，高校学习班内的大字报越来越多，而学习班的领导也失去了对学习班的领导，无法制止“天派”的活动。之后，几个高校讨论，认为 3 月 13 日串联会规模还不大，讨论的还不够，因而决定在 3 月 15 日又召开了第二次串联会。这次开成了全市性的，来的人有两、三万人之多。

第二次高校学习班串联会后，北京师范大学“造反兵团”首先贴出大标语：“丁国钰 12.27 讲话是株大毒草！”并公布了丁国钰 1967 年 12 月 27 日讲话的全文。他们还在学习班演出节目：“叫声丁国钰，我来质问你，你的 12.27 讲话是个啥东西。”

接着，3 月 16 日，人民大学“三红”贴出了《打倒变色龙谢富治》的大字报。上午，北京师范大学“造反兵团”贴出《谢富治、戚本禹“12．27”讲话必须全盘否定，彻底批判》的大字

报。当天下午，学部贴出《向 “新时代的狂人”的黑后台谢富治开炮》的大字报。北京大学“井冈山造反总部”贴出《打倒谢富治》、《舍得一身剐，敢把谢富治拉下马》等大字报。当晚，北师大“造反兵团”又贴出大字报《把镇压革命派的刽子手谢富治推上断头台》，并且进行广播。开始广播时，由于播音员发音纯正，人们听了非常惊讶，以为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广播，好多人说，就像当年听播“九评”一样。

这些大字报和许多各种各样的小道消息迅速在北京各高校流传，越来越多的人加入了“倒谢”的行列，更多的人则还在观望，注视着事态的进一步发展。

北京“地派”的院校在前一段基本是表面观望，他们维护学习班的口号提得较响。第二次高校串联会后，他们反击，步调也是一致的，说“天派”破坏学习班，为“二月逆流”翻案。

就在北京高校“天派”召开第二次串联会的当晚，3 月 15 日 20 时至 16 日零时 30 分，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姚文元、谢富治、吴法宪、叶群、汪东兴等人在人民大会堂河北厅接见四川省革筹、成都军区和 50 军、54 军领导，解决四川的问题。

周恩来说：“现在是江苏、浙江、安徽、湖南、辽宁、陕西、宁夏、新疆，有 8 个省 3 月底可以成立革命委员会了。就看你们的了，你们落后了。‘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治蜀后治。’当然这是句古话，不能这么说。剩下后 4 个省了，四川、云南、福建、

广西。”

张国华说：“西藏也联合了。”

周恩来：“还有西藏，也快了。”

他点了重庆“815”，说：“重庆‘815’去年把李井泉搞去，根本不斗他，不给‘反到底’斗，‘反到底’扎了 3 个草人，斗了后把他烧了，‘纸船明烛照天烧。’为什么不给他们斗？这是大方向问题，我是听主席说的。主席看的比我们多，是主席看小报，看了给我们讲的。主席许多小报都看了。重庆‘815’的《大局已定，‘八·一五’必胜》，主席说，叫‘反到底’派批得一塌糊涂，还有什么《嘉陵江上烟云滚滚》，主席都看了。”

江青问：“李大章同志怎样，能站出来吗？”

姚文元：“意见很多，各种各样的意见。”

江青：“一揭发，二检查嘛！就可以站出来。”

周恩来：“李大章同志检讨我还没有看，今天晚上看。太长了，缩短一些，不要太长。检查不在多要深透。张体学的检讨不长，检讨的深刻，群众就满意了，是个标兵。检讨不在长，要深透。张体学同王任重的关系那么深，他都站出来了。”

周恩来又问：“学习班（指四川班）领导小组解决没有？”

吴法宪：“没有解决问题。”

周恩来：“没有解决，就给他们讲，中央开了会，解决了！”

江青问李大章：“我认识你是 1932 年还是 1933 年？”

李大章：“1932 年底。”

当时李大章化名“老王”，于 1932 年 12 月被中共上海局派往青岛任中共青岛市委书记，黄敬为中共青岛市委宣传部长。1933 年 2 月，江青经黄敬介绍入党，李大章批准。

江青继续说：“主要是触及自己灵魂，揭发，群众是会原谅你的。”

周恩来：“主要揭发李井泉、廖志高。”

江青：“还可以揭发刘少奇，北方局你是知道的。”

李大章：“那时没有见过刘少奇。”

江青：“还有邓小平、杨尚昆．彭德怀，他们都是北方局的嘛！杨尚昆不是党员。”

康生：“假党员不少，连罗瑞卿都不是党员，是他自己讲的。”

江青：“在太原是否同刘少奇在一起？”

李大章：“没有。”

陈伯达：“你们那里热闹。”

张国华：“武斗厉害，现在主要是几个专县，雅安武斗也很凶。”

江青：“那个地方还厉害？地方很大，人口不多。”

张国华：“成都也打仗，是学生多。”

江青：“小青年嘛，爱玩枪。”

康生：“宝成路通车怎么样？”

周恩来：“不大好，最近略阳很乱，成都机务段还有问题。”

陈伯达：“重庆打炮？”

韦统泰："是双管的高射炮。"

周恩来："双管高射炮都打了？是最新的，全国要装备。"

江青："败家子，不管怎样是败家子。不过打一打也好，练习练习。"

韦统泰："重庆武斗有一百多幢楼房被打坏。"

江青："打毁了，留下来展览，至少留幢，让后代看看，像北京八一小学一样，打得稀碎。"

周恩来宣布开会了，张国华汇报四川情况。当谈到群众和领导的心情迫切要求成立革命委员会时，江青说："是啊！没有这个心情，你们就成独立王国了。你们开打也很好，武打全国出名了。"

当张国华谈到联合不起来时，周恩来说："你们那里有国民党兵工署下面的人。天津揭发了，重点在重庆。"

谢富治："重庆是个窝子。"

江青："这个问题不揭发不行，重点是重庆，重庆是窝子，革命群众很难设想会这样干，一定是坏人干的。"

江青对梁兴初说："你的精神面貌比去年好。你去年在重庆对'反到底'讲话我们都看了，说坏人有百分之三十，讲过了，不策略。"

梁兴初："没有讲，是他们搞的。"

蓝亦农："是讲'猛虎团'的一个小组织。"

江青："你的讲话，总的是好的，比例那么大，缩小一点，

就好了。”

谈到“兵团”问题时，周恩来：“‘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以前我知道，一开始就杂一些，冲劲很大。

张国华汇报了两个小时，江青说：“你的发言两小时，客观的报道，你像个记者一样，不知道你的倾向性是什么？”

周恩来：“你们在党委会上的发言，都没有把握大方向。反刘、张的材料，很多都是从李井泉那里搞来的，实际上是替李井泉翻案。”

张国华：“对我们的批评很尖锐、很严肃。”

张国华：“有人还问，总理在去年 12 月 19 日对刘、张的表态，是在什么前提下讲的？”

周恩来：“这有什么意义！什么前提呀？《红十条》嘛！就是《红十条》。有人对我的表态有怀疑，有什么怀疑的。”

张国华：“记得总理还说，再打刘、张要通报全国。”

周恩来：“是的，是在主席那里讲的。《十条》为 54 军说了几句好话，是否有点翘尾巴了。”

蓝亦农：“《五条》下达后，没有压过‘反到底’，主要是感情上有问题。”

周恩来：“对‘反到底’不仅是感情的问题。”

江青：“你们四川出了那么多的大报纸，（指群众组织的报）革筹小组是中央批准的，而且是经过了主席、林副主席批准的。你们就让人家那样搞。（指登小报打倒刘张）刘、张和我没亲，

攀不上。”

姚文元：“这次是第二次见面。”

## 第 974 回：说专案，傅连璋死在秦城　应对难，杨成武屡屡出错

江青对张国华、梁兴初说："我今天放一炮，你们两位是中央派的，一个从广东去的，一个从西藏去的。刘、张是中央平反的。你们是一起从这里回四川的，应该抱得紧。张、梁是军队的，更应该主动。我这样讲，不能说刘、张没有缺点，刘、张也有缺点错误。要顾全大局。四川已经乱得差不多了。不顾全大局的人，什么事情也办不好。你们要搞大联合。"

姚文元："只有 4 个人，小结合。"

江青："先从你们革筹小组大联合，不然你们就大联合不了。都是人民解放军嘛，应该顾全大局，有什么问题解决不了？你们在《十条》面前退半步，你们自己也呆不住，不要说完成主席给你们的使命了。十个手指伸出来不一样齐嘛！马列主义水平也不一样高，但是你们总是整体嘛！只有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求大同，存小异，要顾全大局。刚才听了两个多小时，全是客观报道，多少要有点倾向性嘛！"

周恩来对张国华说："他是了解情况的，有点吞吞吐吐。我问的那句话，就是要你直说，你要敢讲。你那发言是滑稽的，你对重庆两派的说法是矛盾的。'815'是响应'红成'在成都打刘、张的，你说他比'反到底'错误少，你的发言是有偏向的，没有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讲话。你在中印边界，主席交给你的任务，你的决心那么大，为什么这次你没有那么大的决心？《十条》

对 54 军称赞了，54 军有点翘尾巴。对‘815’偏听，所以‘815’响应‘红成’打倒刘、张的口号，没有站在全局，50 军去年 12 月的电报是好的。54 军在重庆的态度有问题，助长了‘红成’打倒刘、张的气焰。张、梁、刘、张是不可分的，是《十条》上肯定的。要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上。”

他又对梁兴初说：“你在重庆对‘反到底’的讲话，敢那么批评。没有讲‘815’。给‘815’也那样讲就好了。”

梁兴初：“给‘815’讲了。”

周恩来：“我没有看到。”

江青：“革筹小组去了没有 10 天，就打倒刘、张，就分裂了，试问你们革筹怎么领导工作？分了派，不是毛泽东思想革命派。7000 万人的地方，委托给你们，你们值得深思。我们对李大章同志的问题说了好久了，现在还没有让他站出来。”

她对李大章说：“你要保持政治上的青春。六十几了？”

李大章：“68 了。”

江青：“68 不算老。我不是各打五十大板。正因为张、梁是军队的，是老红军，责任更重。”

周恩来：“你们开了 50 多天的会，没有把这个问题突出。如果突出了，问题就解决了。”

江青：“你们说复杂，北京派性复杂不复杂？你们不要看得太严重。不提路线斗争，是不能解决问题的。”

周恩来：“你们在成都要像梁兴初同志在重庆对‘反到底’

的讲话那样，尖锐的批评‘红成’对刘、张的问题，问题就解决了。刘、张对‘826’多讲，张、梁对‘红成’多讲，大家讲话，口径一致，就能在主席革命路线上团结起来了。你们要对准大方向，把斗争矛头对准刘、邓、李、廖、黄、郭。”

姚文元：“你们把刘、张问题明确了，问题就解决了。”

江青：“目前在全国右倾翻案是主要危险。我就不相信你们那里没有右倾翻案风。他们对‘二月逆流’翻案，我们对北京学生就炮轰他一阵。”

姚文元：“‘二月逆流’和二月镇反是一起的。”

江青：“要看到文化大革命的大胜利。王光美是大特务，是美国特务，刘少奇是大叛徒，四次叛变，我们有确凿的证据。要看到这个胜利，就不会再说糟得很啦。我看好得很，特别重庆打得稀烂，阵线就比较清楚了，好得很。北京‘地派’黑手抓出来了，就相对好了些。‘天派’抓得少，有后台，还在闹。”

张国华：“重庆有的群众组织打倒刘、张，军队也有，现在还要打倒我。”

江青：“点透了，打倒刘，张，还是要打倒你们。要敢于讲话，王、关问题就是我们端出来的。”

姚文元：“就是江青同志端出来的。”

江青：“他们借王、关攻我们，把中央文革小组的一个个的端，我们敢站出来讲话。”

康生：“四川问题不能解决，主要是方向有问题。只要你们

说一句‘打倒刘张就是替李井泉翻案’，就行了嘛！”

吴法宪：“刘结挺同志当学习班领导组长，还通不过，是怪事。”

周恩来：“不执行中央的指示，就是反中央。在四川就是站在李、廖一边，在全国就是站在刘、邓一边。今天就讲到这里，学习两天，明天就到学习班去讲，问他们是跟毛主席走，还是跟李、廖走，刘、邓走。”

江青对张国华、梁兴初说：“你们要好好想想，不站在主席革命路线上，嘴软，腿软怎么行。对一派软，对另一派就不软，怕什么，顶多是捅一刀子，一颗子弹。你们把斗争锋芒对准敌人，群众是不难说通的。”

周恩来：“你们四个到学习班去讲，都站出来一起表态。”

吴法宪：“我们军队同志首先要尊重刘结挺、张西挺同志，刘结挺同志是军区副政委，军队要首先尊重。”

江青对张国华、梁兴初说：“你们两个人有风格，去四川时还敢下车，没有坐直升飞机。”

周恩来：“54 军去年风格不错！就是回去翘尾巴了，不仅思想感情没转过来，立场也没有转过来。”

吴法宪：“批评是对你们的最大关怀，最大支持。”

江青：“李大章的问题不知说了多少次了，到现在站不出来。李大章同志，我为了接济你，一天吃两个烧饼。要保持革命的晚节。到延安后，刘少奇迫害我，矛头是对准主席的。柯老临死还

向我们检举。”

中央领导人 3 月 15 日接见四川省革筹、成都军区、50 军、54 军领导人时所作讲话，被称之为《315 指示》。重庆“815”听到《315 指示》后，十分沮丧，熊代富只说了一句话：“完了。”就躺在床上不想起来。

吴庆举说：“没有啥子想头了。”

“反到底”感到扬眉吐气，他们把毛泽东“《大局已定、八一五必胜》叫‘反到底’批得一塌糊涂”这段话用红字排印，一个字有鸡蛋那么大。

在北京学习班上，“反到底”的刘祖贵看见“815”的蔺习廉在他前面走，就在背后喊他：“站到，听我传达最高指示：‘《大局已定、八一五必胜》叫反到底批得一塌糊涂’。”蔺习廉气得全身发抖，想打他又不敢。

黄廉喊周家喻出去耍，周家喻一肚子怨气对黄廉说：“我倒告诉你，黄廉，政治斗争就像战场上的事情一样，不是你想象的那么简单。”

54 军各单位一齐给中央打电报反映：“想不通。”

3 月 5 日，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姚文元、杨成武、谢富治、叶群、吴法宪、汪东兴 10 人，给毛泽东和林彪打了一份报告，说有许多揭发邓小平的材料没处存放，建议在“贺龙专案组”内设一分组，收存有关邓小平问题的材料。毛泽东批示：“可以。”

林彪圈阅表示同意。

3 月 12 日，公安部副部长严佑民被捕。

3 月 13 日，江青在中央八个专案组会议上批评说："我觉得你们现在主要是思想不解放，右倾保守，要解放一下思想嘛！"她说："刘少奇是个大叛徒、大内奸、大特务。小将整理的材料，比你们整理的好。你们现在的材料有进展，但有好多东西没有超过红卫兵的材料。"

"有个案子我很不满意。王世英说他半身不遂，还能全家去照相？摔了一跤，也没有死。你们右顾，不要嫌我说话尖锐，王世英是怎么回事？我看肖孟对他就是有包庇。"

肖孟是刘少奇专案组的负责人之一，后来被关进秦城监狱 5 年。1979 年 12 月他在回忆中说："他们不断给专案施加压力，反右倾。在调查、看材料中，如实反映某些情况时，就以客观主义、扩散专案材料等罪名，停止专案人员工作，查封档案材料，有的被赶出专案组，甚至被关起来。搞专案的人思想负担很重，精神压力很大。在我被关进秦城监狱后，甚至有这种想法，宁肯坐牢，也比按那些人的旨意味着良心办事为好，倒感觉自慰一些。"

虽然专案审查刘少奇从 1967 年 3 月就已正式开始，5 月以后进展加速，但一直到 1968 年 4 月中旬以前，关于刘少奇案情的各种请示报告和对外联系工作仍用"王光美专案组"名义，1968 年 4 月下旬起才用"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的名义。

3 月 14 日清晨，邱会作接到周恩来给他打来的电话，说卫戍区去人马上要带走总后勤部副部长傅连璋。

很快，卫戍区的人来到京西宾馆，给邱会作看了周恩来写的条子：

把傅连璋交给来人。

周恩来

邱会作让秘书告诉卫戍区的人，去找总后负责专案工作的总后勤部副部长陈庞。

陈庞带着卫戍区的人到了香山傅连璋住处，由干休所所长带路，翻墙进了傅连璋的院子，把傅连璋和他的妻子陈真仁带走，关进秦城监狱。傅连璋被单独押入 201 监区 16 室，陈真仁则被关入另一间囚室。

据邱会作回忆，过了几天，他见到周恩来，问为什么抓傅连暲？周恩来对他说："和你们没关系。"

傅连璋有胃病，他被关入秦城监狱后，要求监管人员给他稀饭，没有被批准。于是他要求给毛泽东及代总长杨成武写信，结果被训斥了一顿。3 月 26 日，据看守日记记载，傅连璋时而上，时而下，时而从床下钻进又钻出，又是一声长叹。3 月 29 日早晨 7 时，他躺在冰冷的水泥地上一动不动，等到 8 点多钟打开牢房时，傅连璋已死去，浑身冰冷。

傅连璋当天火化。火化登记表上没有姓名，只有一个囚犯的号码。他是文化大革命中关押在秦城监狱的中第一个死去的高级

干部。

3 月 16 日，傅崇碧到中央文革小组开会。江青一见他的面就说："你这个傅崇碧同志，我批评你是为了爱护你嘛，写什么检讨报告呢？好了，传到我这里就不要再传了。"江青又说："那天你来，一个人来就行了，带了那么多人来，会引起惊慌的嘛。你不知道我正在整理内部嘛。"

过了些时候，中央警卫团政委杨德中在人民大会堂向有关人员交代：要保证中央 12 位首长进出中南海、人民大会堂、钓鱼台国宾馆、京西宾馆的畅通。现恢复原规定，能够看清车里的人就行了，出入时车内不需要开灯，也不停车检查。

汪东兴还召集中央办公厅警卫局的部分干部，就警卫工作打招呼。其要点是要改变一下警卫形式，首长乘车也将改变种类，他说之所以要改变，是毛泽东亲自做了指示：常委外出带前后卫车，可以不打电话，但要带上武装警卫。毛泽东还说："现在是非常时期，要提高警惕。"

就在北京高校"天"、"地"两派明争暗斗，"倒谢"队伍不断扩大之际，也是在全国各地依然武斗频频，枪声不断之时，北京，军队的上层又出现了问题。

1967 年冬，在一次中央文革碰头会议上，江青提出要写一个中国共产党的"两条路线斗争史"，并且提出要先写出一个提纲。周恩来、陈伯达、康生都表示同意。江青提议，这件事由杨成武负责。于是会议决定，这个提纲由军队组织写。

会后，杨成武特地从解放军高等军事学院、政治学院抽调了30多名“笔杆子”，集中在京西宾馆的一层楼上，专门来写“两条路线斗争史”的提纲。杨成武把自己的女儿杨毅也从《空军报》社调进了这个写作班子。

过了三、四个月，提纲的初稿出来了，杨成武交给了江青，江青又报到了毛泽东那里。毛泽东看了很不高兴，不仅把提纲摔到了地上，并且还告诉江青：立即把这个提纲烧掉，一份也不要留；参加写作的人全部送回原单位，一个也不要留。原来，这份提纲里面除了毛泽东和林彪外，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就没有其他人了。这样歪曲历史的做法让毛泽东非常不满。

江青从毛泽东那里出来后，连夜通知杨成武，要他把所有的人全部遣散回原单位。

据吴法宪回忆：1968年2月，江青在一次中央文革碰头会上也提出，上海有人搞她三十年代在上海的材料。吴法宪在他的《回忆录》中这样写道：“周恩来同意派人到上海彻底处理这个问题。他当即布置说，去上海的人有两个任务，一个是把搞江青材料的人统统都抓起来，另一个就是把上海市有关江青的材料，包括小册子和传单，都统统收到北京来。”

这个任务交给了吴法宪。吴法宪表示：“我对上海不熟悉。”

陈伯达讲：“不要紧，由我们碰头会议全体给你写个授权书，集体授权给你，这样事情就好办了。”

周恩来点头赞同说：“好！”

陈伯达当场起草了一个授权书，在授权书上第一个签名的是周恩来，第二个是陈伯达，第三个是江青，以后谢富治、杨成武、汪东兴等所有到会的人，也都依次签了名。

会议接着决定，吴法宪负责到上海去把抓到的人和收到的材料送过来，由杨成武负责在北京接人和材料。

吴法宪领受任务后亲自来到上海，将授权书出示给张春桥，传达了周恩来的指示，并特别向张春桥说："上海的事情我不熟悉，具体问题由你来办。"

不久，张春桥就把原上海市公安局局长黄赤波等人交给了吴法宪。2 月 23 日，吴法宪派飞机把这些人都送到北京，交给杨成武。大约过了一个星期，张春桥将上海收缴的关于江青的材料交给吴法宪，他即回到了北京，把这些材料全部交给了周恩来。周恩来没有拆封，只是贴上封条后，全部交给了江青。

吴法宪将这次去上海的情况，写了一个报告，和杨成武两个人签名，提交给了中央文革碰头会议。

这段时间，还发生了一件事情：周恩来和江青等中央文革碰头会在京西宾馆审查样板戏，江青一定要请林彪到场。可是，杨成武头一天晚上通知了吴法宪后，又忙于其他事务，忘记通知叶群了。

林彪有一个习惯，每天晚上 20 时就要吃安眠药睡觉。如果晚上 20 时以后有什么事情需要他参加，就一定要早一点通知他。那天因为事前没有接到通知，依照惯例，林彪到了晚上 20 时就

吃药睡觉了。而在京西宾馆这边，所有预定来的领导人都到了场，唯独林彪和叶群没有到。看到林彪没到，江青坚持要等林彪到场。结果林彪迷迷糊糊地被人从床上拉起来，送到京西宾馆看节目。

演出刚刚开始，叶群就把杨成武和吴法宪叫到休息室，在那里对他们大发雷霆说："你们两个当了总长、副组长，就得意忘形了，忘恩负义了，眼睛里就没有林总了！你们两个主持这次演出，为什么要等林总睡了觉才通知我们？要江青同志在这里等林总，你们这是干什么？用意何在？"

杨成武赶忙说："这次演出，我已经委托刘锦平主办，要他全权负责。"

当时刘贤权是军委办事组政工组组长，但还没有到任，政工组的工作是由政工小组副组长刘锦平在主持。所以杨成武将演出的具体事宜交刘锦平负责。

叶群斥责杨成武说："叫刘锦平主办，你就撒手不管了？你这个总长是干什么吃的？"

她这一骂，杨成武也就一声不吭了。

仅仅是为了审查节目这件事情至于这样骂人吗？吴法宪心有疑虑，第二天晚上，他跑到杨成武家里问他："叶群为什么发这样大的脾气？"

杨成武说："我也搞不清楚，骂就让她骂吧。"

对这件事，杨成武和吴法宪都不满意。

这几件事情后，杨成武的情绪有些低落，经常不参加军委办

事组的会议，甚至连中央文革碰头会议也经常不参加，只是让吴法宪在会议后向他通报情况。后来，他美尼尔氏病发作，干脆就在家里养病。

## 第 975 回：妻告夫，林立果参军入党　有材料，余立金也成叛徒

1968年3月初，又发生了一件与杨成武有关的事情。一天下午，空军司令部门诊部护士纵素梅，找到空军党委办公室一科副科长何汝珍，向他反映说，她丈夫单士充与杨成武的女儿杨毅关系暧昧，她亲眼看到了杨毅写给单士充的情书。

杨毅在《空军报》社工作，是叶群亲自安排的。单士充则是空军政委余立金的秘书，人长得挺帅，能说会写，给刘亚楼和吴法宪都当过秘书。

纵素梅汇报的这件事让何汝珍十分为难，这一边是代总参谋长的女儿，一边是空军政委的秘书，他如何管得了？于是，何汝珍一边告诫纵素梅在外面不要随便乱讲，一边赶紧向空军党委办公室主任王飞作了汇报。

王飞听了何汝珍的汇报后，也感到事关重大，立即同何汝珍及空军党办二科科长周宇驰 3 人一起到京西宾馆找吴法宪，一进屋就说：

“吴司令，空军发生大问题了！余政委的秘书单世充的老婆纵素梅找到党办，哭哭啼啼地来告状，要我们救救她。”

接着，他们向吴法宪汇报了情况：杨毅因为参加总参搞得“两条路线斗争史”写作班子，那段时间住在京西宾馆，而单世充则几乎天天往京西宾馆跑，还经常给杨毅带一些吃的。每次纵素梅问单世充去干什么，单世充就说是到京西宾馆洗澡。

纵素梅查看了单世充的日记本，发现了单世充和杨毅两人的合影，里面还有两首诗，第一首诗上说“春风遥盼玉门关”，第二首诗里却已是“春风已度玉门关”了。

据纵素梅讲，本来她和单世充的感情很好，一直没有发生过什么问题，但最近单世充突然向她提出要离婚。纵素梅说她已经忍无可忍，只能向领导上提出求救。

吴法宪闻听此事，也大吃一惊，忙对他们3人说：“怎么会发生这样的问题？真要是这样，对杨代总长的影响就不好了，杨代总长会怪我们的。但是，事情还需要进一步搞清楚。你们先找单世充谈一谈，问清楚究竟是怎样情况。如果事情真的是这样，就要单世充承认错误，不准再闹离婚，同时不准纵素梅到外面去乱告状，要注意保护杨代总长的威信。”

按照吴法宪的指示，王飞和周宇驰回去后即找单世充谈话，但单世充坚决不承认，谈话形成僵局。王飞和周宇驰一怒之下，把单世充软禁起来了。

吴法宪听说单世充被软禁以后很生气，这让他更无法向杨成武和余立金交代。当时，空军党办也分为两派，一派以王飞、周宇驰为首；另一派以科长卫球为首。而在卫球这边的还有吴法宪和余立金的几个秘书。矛盾的起因是卫球曾说过不同意“大树底下好乘凉”这句话，而这句话是林彪曾讲过的，于是王飞、周宇驰直接向叶群控告说，卫球反对林副主席，是“现行反革命”。

按说，王飞、周宇驰只是空军的部、处级干部，怎么能直接

向叶群告状呢？原来，此时林彪的儿子林立果正在王飞、周宇驰的手下任职。

林立果是1967年参军到空军的。按说1967年全国没有征兵，但是林立果例外，吴法宪受叶群之托，于这年的3月，派车将林立果接到空军，然后由一名保卫干事送他到上海空四军硕放机场的一个高炮部队穿上军装锻炼。

一天，叶群问吴法宪："把林立果放到北京军区空军司令部当个参谋是不是可以？"

吴法宪说："放到北京军区空军，还不如直接放到空军司令部。林立衡现在空军政治部，如果把林立果放到北空，就比他姐姐低了一个档次，他能愿意吗？不如就放在空军司令部，我也好直接管理和照顾，再说离你也近一些。"

听了吴法宪的话，叶群很高兴，说："那好，就放在空军司令部。可是干什么好呢？"

吴法宪说："当个参谋也可以，当秘书也可以。当秘书可以放在空军党委办公室。"

叶群说："那还是当个秘书吧。但是立果不熟悉业务，不会做工作怎么办？"

吴法宪说："那好办，'党办'有老秘书，我可以指定一两个人来专门培养立果。"

不久，林立果被任命为空军党委办公室秘书。

空军党委办公室主任王飞"四清"时在江苏太仓和叶群在一

起，彼此都很熟悉。于是叶群特别给王飞打电话，对他说："小孩子可塑性强，到你那里，要帮助教育他，最好专门找一个人。一帮一，一对红嘛。"

吴法宪也告诉王飞："要多照顾和锻炼林立果。他是林副主席的独子，林副主席把林立果交给我们，这是对我们空军的信任，一定要把林立果培养成才。"

王飞指定党委办公室二科科长周宇驰负责帮助林立果。周宇驰又拉上空军党委办公室的处长刘佩丰一起"帮助"林立果。

刘沛丰，四川人，大学生，1951年参军，话很少。文字能力比周宇驰强，办事认真。长期在刘亚楼身边当秘书。1965年刘亚楼病重期间，只有他念文电能简明扼要地抓住重点．得到刘亚楼的好评。在同事中也很有人缘，外号"锤子"。

与又白又瘦的刘沛丰相反，周宇驰又黑又胖，性格外向，"三八式"干部，曾参加选飞，没有选上，留在哈尔滨第一航校任宣传科长。他能写，曾写过小说，被诗人空军副参谋长姚克佑调到空军党委办公室当秘书，后来给刘亚楼当秘书。由于一次他积压了文件，刘亚楼认为他不适宜在高级机关工作，下放部队锻炼。由于他的写作水平不错，1966年冬天，又调回空军党委办公室任秘书、科长。

周宇驰自从接受了帮助林立果的任务后，与林立果相处很好，俩人几乎到了形影不离的地步。因为他和林立果的关系最好，大家也都高看他一头。

可是，林立果当时还不是党员，怎么能在党办工作呢？

叶群向吴法宪提出："立果到现在还不是党员，能不能培养他入党？"

吴法宪说："可以，周宇驰是一个老党员，就要他培养林立果入党好了。"

不久，周宇驰向吴法宪汇报说："可以发展林立果入党了。"

1967年7月1日，参军才4个月的林立果，便按照叶群指定的日子，由吴法宪、周宇驰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作为入党介绍人，吴法宪亲自参加了通过林立果入党的支部大会。他在这次会上说："林立果到空军以后，有不小的进步，工作表现很好，介绍他入党是应该的。希望林立果同志继续努力，成为一个真正优秀的共产党员。"

在会上，支部的其他人也对林立果提出了希望和要求。然后，林立果发言表态说："我一定要努力学习，力争从政治上、业务上很好地提高自己，决心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奋斗到底。"

吴法宪又鼓励他说："有这样的决心就好。希望今后不断地学习，不断地努力，不断地进步。"

最后，支部大会全体人员一致通过了林立果的入党申请。

林立果入了党，叶群非常高兴。她对吴法宪说："空军是可以信得过的，把林立果放在你们那里是很正确的。"她还说："立果在空军，对你们也会有帮助，他可以支持你的工作，可以直接向

林总汇报。”

吴法宪表示说:“这样很好,立果向你们反映什么问题都可以。空军有林总和你的支持，工作是一定会搞好的。”

经吴法宪批准，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就是空军党委办公室，成立了以林立果为组长的“调研小组”，成员有周宇驰、刘沛丰、王飞、刘世英。还配了一辆“伏尔加”小轿车，由周宇驰负责开车。

吴法宪不仅对林立果如此，对其他老帅也十分注意。叶剑英“二月逆流”后,他儿子的胳膊在天津农场劳动时被机器打断了，先在天津空军医院治疗,后来吴法宪又把他送到上海空军医院治疗。陈毅的女儿，也是吴法宪帮助到空军当兵的。还有毛泽东的亲家张文秋一家，江青在北大讲话时公开指责张文秋后，她女儿邵华要当兵,邵华的姐姐刘松林找到时任南京空军司令部党委书记的鲁珉，鲁珉给她出主意，要她给吴法宪写信。不久来了个穿陆军军装的人到张文秋家里，给她们填表当了兵，而且把张文秋也接到解放军 301 医院做全面体检。

但是王飞、周宇驰到叶群那里告卫球的状，引起了党办另一些秘书的不满,从而在空军党委办公室里形成了两派,相互对立，关系十分紧张。

单士充也不是善茬，他被软禁后，躲过了别人的注意，偷偷与杨毅通了电话，把他被关起来的情况和起因告诉了杨毅，杨毅又告诉了她父亲。此时杨成武正患美尼尔症在家养病，听女儿一

说，气愤至极。杨毅还没有谈恋爱，就遭到如此的人身攻击，他不能容忍，便打电话给吴法宪，要他放人。

吴法宪立即让人找王飞，王飞不在，找来了周宇驰。吴法宪盛怒之下把周宇驰臭骂一顿，说："不经过我的同意，你们就扣人，实际上是夺了我的权嘛！"他让周宇驰马上放人。

周宇驰回去后将此事对林立果说了，很快，叶群就给吴法宪打来电话，质问他：

"你怎么说林立果在空军要夺你的权？我们把立果放到空军，是要帮助你掌权，而不是要夺你的权。你好没良心！如果你怀疑，那我们马上要立果离开空军好了。"

吴法宪赶忙解释说："叶主任，不是这个意思，你误会了。我批评的是周宇驰，并没有说立果。是周宇驰不经我的同意就扣了人，我是批评周宇驰夺了我的权……"

叶群不由吴法宪分说，继续斥责道："你说周宇驰就是说立果，因为他们两个人是在一起的。"

吴法宪拼命表白："叶主任，我真的只是批评了周宇驰……"

叶群说："你一批评周宇驰，他害怕，现在都不知道躲到什么地方去了，连立果都找不到他。你是不是已经把周宇驰关起来了？你把周宇驰藏到什么地方去了？"

吴法宪说："周宇驰从我这里走了以后，我就根本没有见到他。他不是和立果在一起吗？"

叶群说："根本不在一起，连立果都找不到他了。你是不是

跟周宇驰谈一谈，要他安心工作，别躲着立果了。单世充这个人有错误，应当审查清楚，你怕什么？连 101 都说，这是为了维护杨成武的威信，应当把单世充弄起来，你又顾虑什么？”

吴法宪哪敢得罪叶群，马上答应说，这就去找周宇驰，要他安心工作。

吴法宪刚刚放下叶群的电话，杨成武的妻子，也是杨成武办公室主任赵志珍的电话就打过来了，要吴法宪和余立金马上到杨成武家里去一趟。

明知道去杨成武家不会轻松，吴法宪和余立金还是硬着头皮去了。他们刚刚走进杨成武的家门，赵志珍就对他们大发脾气，说：“杨毅和单世充之间的关系是正常的，你们空军为什么要把单世充抓起来？你们凭什么关单世充？你们要把杨毅搞出空军，也不必要用这样的办法！王飞、周宇驰、何汝珍都是坏人，你们不作处理能行吗？”

吴法宪申辩说：“我这样做也是为了维护杨代总长的声誉。对单世充，我需要严加管教，不能放任，否则我就对不起你们了。”接着，他们提出见杨成武说明情况。赵志珍拒不让见，说：“杨成武身体不好，不见！”

这种情况在以前是从来没有过的，吴法宪当时就想，看来这一下子把杨成武得罪了。

从杨成武家出来后，吴法宪直接回了家，立即把去杨成武的情况打电话报告了叶群。

叶群对他说："杨毅和豆豆对你的态度是不一样的，豆豆是支持你的，而杨毅早就给你写了大字报，批评空军的干部政策有宗派主义倾向。"

她还说："余立金早就和杨成武串通一气在夺你的权了。许世友不久以前送来一份材料说，余立金在皖南事变时曾经被俘叛变，自首以后才到了上海，是个叛徒。这个材料也送到了毛主席那里，毛主席也知道这件事情。"

当天晚上，吴法宪又亲自找纵素梅谈话。纵素梅所说的情况，与党办几个人反映的情况基本相同。为慎重起见，在同纵素梅谈话过程中，吴法宪叫秘书在旁边作了记录。最后，这份记录交纵素梅看过，并签了字。为了防备万一，吴法宪还叫秘书去复印了几份，以备日后查证。

第二天上午，3月17日，赵志珍和余立金一起来到毛家湾。他们在会客室等了很久，叶群才出来。一见他俩就说：

"哎哟哟，什么事情搞得你们两个跑来啊，打个电话不就得了。"

赵志珍说："我做了一些福建菜，拿来请林副主席和叶主任尝一尝。"

叶群是福州人，说起来和杨成武是老乡。

叶群忙说："哎呀呀，那可真是辛苦你了。"

接着，赵志珍抽泣着对叶群说："叶主任，我们是万不得已才来找你和林副主席的。"她向叶群讲了空军抓单世充的事，并

说这是空军以整单世充为名整杨毅。

余立金这个时候承认说，是他交待单世充多关照杨毅的。他说，空军想整单世充是无中生有，败坏了杨成武代总长的声誉。他还说：吴法宪这个人很专制，我这个政委没有权，什么都得听吴法宪的。许多人反映刘亚楼的时候是吴（无）政委，现在是余（多余）政委。

叶群耐着性子听完他们所谈的情况，煞有介事地说："好吧，我再派人调查调查，查清楚以后再向林副主席报告，你们先回去吧。"

余立金回到空军大院以后，也找纵素梅谈话，劝她不要为人利用，扩大事态。并一再对她晓之以利害。纵素梅其实并不想让单世充真的受到伤害，此时就想改口。但是话已说出，想改可就难了。

## 第 976 回：为警卫，江青这边又出事　经查实，谭震林不是叛徒

赵志珍和余立金走了以后，叶群将二人前来的情况报告了林彪。下午，林彪把吴法宪叫到毛家湾，对他说："赵志珍和余立金来告你的状，看样子是要夺空军的权，想利用余立金把你搞掉。这种行为是错误的，你要坚持原则，要敢于同杨成武斗争，不要害怕，不要屈服，腰杆子要挺起来，要顶住！"

吴法宪对林彪说："杨成武已经要秘书给我打来电话，要我晚上到他那里去，他要见我。"

林彪说："你不要一个人去，最好带上一个人，这样有些事情，也好有人作证。"

带谁去呢？吴法宪想来想去，还是带自己的妻子陈绥圻一起去比较合适，因为杨成武当时称病在家休息，与陈绥圻一起去探视他的病情，显得比较自然一些。那天正好是星期天，陈绥圻在家休息。

临走的时候，吴法宪又带上了秘书张云龙，以便在和杨成武谈话时，做个记录。

后来，车到了杨成武家门口时，吴法宪又害怕杨成武不高兴，就叫张云龙在车上等候。

吴法宪和陈绥圻进门后，赵志珍把他们带到了楼上杨成武的卧室，看见杨成武躺在床上。吴法宪和陈绥圻上前问候了他的病情，说了几句话。这时，赵志珍对陈绥圻说："成武同志要和法

宪说几句话，咱们先到外面坐一坐。”

陈绥圻出去后，杨成武对吴法宪说：“第一、不要讲余立金是叛徒。余立金现在空军没有权，再一宣传他是叛徒，他在空军里就根本没有地位了。第二、单世充没有错，不要整单世充，事情闹大了，就不好办了。今天我找你主要是这两件事情。”

吴法宪赶紧对杨成武说：“说余立金是叛徒，那是许世友从南京直接向毛主席、林副主席报告的材料，我在外面绝没有吐露一个字。我是司令，他是政委，这个事情我哪有权处理呀。你也知道，我每天下午在军委办事组，晚上在中央文革碰头会，空军的事情基本上都交给了余立金。对单世充，没有说要对他进行处理，只是怕事情处理不好，会影响杨毅的声誉，更怕影响到杨代总长的声誉。不想弄得满城风雨。”

说到这里，杨成武显得很不高兴。吴法宪赶紧说：“那就这样吧，你身体不好，耽误久了，会影响你的休息。我就先回去了。”

杨成武因生病在家，基本上没有去京西宾馆参加军委办事组集体办公。但他还是让余立金把单士充从软禁地点接回到余立金家中秘书办公室，并发话说，没有他的命令，单士充不能离开办公室一步。

单士充被余立金接走的事，事先没有告诉吴法宪。当他得知此事后，派空军党办一科科长卫球和秘书蔡秉霖，到余立金家通知单士充：“吴司令要你去一下。”

单士充不去，说：“杨代总长有指示，没有他的命令，我不

能离开办公室一步。”

对此，卫球和蔡秉霖也没有办法，只好说：“既然吴司令叫你，你不去，那你就把为什么不去的原因写一下吧。”单士充当即提笔，在一张纸上将他说过的话写了一遍，交给了卫球和蔡秉霖。

当晚23时前后，余立金突然带着单士充来到吴法宪家。当时值班秘书张云龙见状，急忙迎了上去。

余立金一边问：“吴司令睡了没有？”一边就直接上楼向吴法宪的办公室走去。

张云龙一边回答：“还没有睡……”一边跑上去向吴法宪报告说：“余政委来了。”

吴法宪正在打电话，就说：“先请余政委到楼下会客室等一下。”

不一会，吴法宪从楼上下来，刚一进会客室门，余立金就说：“吴司令，今天你叫单士充来，他不来，这是他的不对，我批评了他，要他来向你检讨。”

单士充马上站起来说：“吴司令，今天是我的不对，我向你承认错误，请首长批评。”

吴法宪非常不满地对余立金说：“把单士充暂时保护起来，是为了维护杨代总长。什么时候叫单士充回去的，我根本不知道，连给我说一声也没有。今天晚上，我派人去叫单士充来谈话，单士充竟然不来，还说是杨代总长不让他离开。难道我一个空军司

令员、空军党委书记，连找一个空军干部谈话的权利都没有？还要经过谁的批准才行？”

余立金一再说，这是单士充的不对，是单的错。单士充则一个劲的承认错误，请求批评处理。在当时的那种气氛下，谁也没有更多的话可说，很快，余立金就带着单士充走了。

随后，杨成武先后接到两封匿名信，都是空军机关的人写的，揭发空军党委办公室周宇驰、刘沛丰、于新野、王飞等人在空军胡作非为，玩弄几名小姑娘，致使她们怀孕等等。

杨成武看后，批了两行字：

林副主席：

转去空军一封来信，情况如属实，当严肃处理。

杨成武

杨成武的批示很快送到了林彪办公室，叶群看了信马上打电话给吴法宪：“吴司令，有人写信告你们党委办公室的人，你知道吗？”

吴法宪说不知道。叶群生气地说：“你不知道？你这个人，太迟钝了，一点阶级斗争觉悟也没有。现在派人把信送去，你们看着办吧。”

那封信转了一个圈子，又回到空军，回到了信上所控告的那几个人手中。

叶群对吴法宪说：“告诉你吧，杨成武和余立金勾结起来，要夺你的权！你不要蒙在鼓里！”

3 月 18 日，人民大会堂南门接待厅，周恩来正准备和中央文革和军委办事组人员商谈东北问题，忽然江青推门进来，高声喊到："总理，你见什么人?为什么我不能进?"

周恩来一时有点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忙对她说："你有什么事，到别的房子去说。"说着起身走出客厅，同时招呼正在接待厅等候开会的汪东兴、李作鹏、杨成武一起过去。江青紧随周恩来之后，边走边说，警卫局处长成元功阻止她进会场。

周恩来来到"小山东厅"，他劝江青先不要激动，随后让汪东兴把成元功叫进来，让他当面说清事情的原委。说完，周恩来自己便退了出去。

成元功进来后解释说："接孙占龙电话，说是江青同志得先在南门找一个地方，吃完饭再参加会议。大会堂的同志就给安排在'小山东厅'。因'小山东厅'的位置靠近接待厅。"

孙占龙是江青的警卫参谋，即警卫员员。

这时，江青不等成元功把话讲完，就高声嚷道："你有什么权力阻止我！你们都给我出去!"

汪东兴、李作鹏、杨成武和成元功便都出来了。周恩来知道他们都出来后，又推门进去，对江青说："成元功对你都讲清楚了？"

江青激动地说："成元功这个人历史上就不是好人，不能用。"

"成元功已回到警卫局，由汪东兴去安排，你、我都不能决定。"周恩来边说边推开门，顺便说了句："今天的会不开了，我

还有别的安排。”

18 日这天，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下发《关于成立浙江省革命委员会的批示》。当晚至次日凌晨，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姚文元、谢富治、吴法宪、叶群等人接见了浙江省赴京代表团。姚文元宣读了中央《关于成立浙江省革命委员会的批示》。接着是各位领导讲话。

康生在讲话时提到刘少奇的问题，他说：“文化大革命重大事件是把暗藏在党内的叛徒特务揪出来，刘少奇是大叛徒，”

众人高呼口号……

康生接着说：“刘少奇第一次被捕自首在长沙，被捕自首了，赵恒惕还送了他四书五经，27 年在武汉缴械，向汪精卫投降。”

江青插话说：“有确实证据。”

康生继续说：“29 年在满洲里被日本捉捕，这个大叛徒，完全投降了日本帝国主义。还有一次，35 年在上海被捕。第五次 36 年到北方局又被捕投降。同志们知道，他投降敌人早就投降了。他自己说是老革命，实质上是老反革命。他搞一个老婆是美国特务，也是日本特务，也是国民党特务，王光美是国民党特务，美国通过彭真、刘仁、武光让她搞林副主席。到延安以后和大叛徒结婚，一对夫妇是一个老大叛徒，一个老反革命。”

江青：“王光美是搞战略情报的。”

康生又说邓小平：“邓小平是个逃兵，真正是一个逃兵，他还有重大问题没有揭开，不但是逃兵……，陶铸是叛徒，彭真是

特务、叛徒，罗瑞卿从来也没有加入过党，是个特务分子。打倒刘邓陶！彭德怀里通外国与赫鲁晓夫勾勾搭搭。”

江青：“是汉奸。”

康生：“贺龙是土匪，小将揭发，南昌暴动以后，投降了，国民党给他封官，就是为了一个条件没有封。国民党代表在那里住，住了一个多月。”

江青：“杀了我们多少好党员。”

康生：“陆定一是大叛徒，此人很早就接受了国民党特务机关的任务，和胡克实一起，胡给他 1000 元钱，杨尚昆是里通外国的汉奸。主席讲文化大革命是国内战争的继续。”

江青：“二月逆流干将——谭震林，现在有了确实的证据，是叛徒。我们还保过他，净搞阴谋，小将搞出来的，许世友同志立了新功。”

江青怎么突然提到谭震林是叛徒呢？原来，1967 年秋天，许世友的夫人田普，时任南京军区干部部副部长，给中央文革小组写来一封揭发信，说谭震林 1932 年被国民党逮捕，关押在江苏省苏州反省院。信在文革小组传阅后，转给了周恩来。

对这封揭发信，周恩来很震惊，也很重视。他和陈伯达联合签名，向毛泽东、林彪写了一份关于立案审查谭震林被捕问题的请示报告。请示报告以揭发信为主要依据，强调了问题的重要性。

毛泽东和林彪阅后，均在自己的名字上，用铅笔画了圈，以示同意。1967 年 11 月中旬，谭震林的立案报告转给中央专案审

查小组第二办公室饶漱石专案组，要他们负责审查清楚。

“饶案组”接到谭震林的立案审查报告后不敢怠慢，随即选调师、团级干部 7 人，负责审理。但是经过几个月的外调，反复核实，仔细审阅了谭震林的档案材料，最后证实：谭震林 1932 年在江西中央苏区任红十二军政治委员，一直没有离开过红区，根本没有被捕过，自然，也就不存在关押苏州反省院的说法。

再说 3 月 19 日凌晨，中央领导接见完浙江省赴京代表团，周恩来于 5 时左右刚从大会堂回到中南海西花厅家里，秘书就向他报告：“江青的秘书来电话，请总理去钓鱼台 17 号楼。”

周恩来又赶往钓鱼台 17 号楼，服务人员把他引进休息室，只见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汪东兴和警卫局的几名干部已坐在那里

随周恩来一起走进休息室的警卫高振普见室内鸦雀无声，里面的人一个个表情严肃，便要转身退出。没想到江青叫住他说：“你别走，也参加。”

高振普吓坏了，心提到嗓子眼，找了后边一把椅子，轻轻地坐了下来。还没坐稳，就听江青说：

“很对不起总理，白天我不该发火，今天把你们请来，我还是要说说白天的事。成元功这个人不是好人，在延安他就反对过我。我有事找恩来同志，他就阻挡我。到西花厅他就找我的别扭。这样的人，怎么能在警卫局工作？”

江青叫在场的领导表态。张春桥、姚文元、汪东兴都没说话。

周恩来说："成元功对你没有什么恶意，他叫你进去吃饭，他是过于热情，本来不是他的事，他可以不管你，是热情出了毛病。成元功 14 岁就出来了，在我那里很多年，我对他是了解的，工作问题由组织安排。"

江青又问在场的工作人员有什么意见？大家相互看了看，谁也没说话，都低下了头。她把目光盯向在座的一位警卫局副局长，那位副局长只好说几句了："听了江青同志的讲话，我们很受教育，总理的讲话非常重要……"

江青又打断他的话说："你们警卫局还有坏人，那就是曲琪玉，他对毛主席不忠……"

在座的工作人员一个个如坐针毡，谁没有私下议论过江青呢？今天她开始点名了，成元功要完了，突然又点个曲琪玉，下一个是谁呢？

江青似乎看出这些工作人员的心思，于是又把话锋一转说："警卫处的人，好的是多数，像曲琪玉这种人是个别的。如果没有别的事，可以散会了。"

"散会"二字刚一出口，那些工作人员如获大赦，赶紧站了起来。周恩来对汪东兴说："有些事由你来做。"便离开了会场。

几天后，被江青点名的曲琪玉，离开了他警卫处长的位置，与成元功一起先后进了中办学习班，后转入中办在江西进贤县办的"五七"干校学习。

3 月 20 日的晚上，吴法宪在京西宾馆十二层会议室召集"二

办”各专案组的正副组长开会。会上，吴法宪问“饶案组”的正副组长：“谭震林能定叛徒吗？他的材料你们上报了没有？”

“根据我们已查到的材料，无法证实谭震林被捕过，也没办法证实他叛变过。我们现在没有这方面的材料可以上报。”两位组长作了说明 。

## 第 977 回：赞江青，“无产阶级革命家”　蔡立坚，北京下乡第一人

1968 年 3 月的一天晚上，叶群从钓鱼台回到毛家湾，手中拿着一卷文件，一进秘书办公室便对“林办”的几个秘书说：“这是一件珍品，你们看看！”

大家上前一看，见是两页 16 开白纸和一本杂志。那本杂志，叶群拿在自己手里不放。那两页纸上，主要是陈伯达的字迹，是用铅笔写给毛泽东和林彪的一封信。信的大意是：附上最近发现的江青（蓝苹）于 1937 年在上海某杂志发表的《我的一封公开信》。

在第二页的落款处，是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除了江青外所有人的签名和批语，有周恩来、陈伯达、康生等等。署名者表示要向江青学习等等。

大家看到，在上款“主席”二字上已经画了圈，从这个铅笔画的圈向右上引出一条线，线头指向：“我就是从此认识江青的性格的”。毫无疑问，这是毛泽东主席的批语。

“这确实是件珍品！”叶群又一次重复说。“这涉及对 11 楼的评价，而且有主席的亲笔批字，非常宝贵。现在是要给首长讲讲，首长也要有个明确态度。你们谁去办这件事？”

“当然是讲文件的两位老张。”“林办”支部书记郭连凯说。他指的是张云生和张益民。

“这封信上附的江青 1937 年发表的《公开信》在哪里？”张

云生问叶群。因为不知道这封《公开信》的内容，就无法给林彪讲文件，林彪又根据什么表态呢？

“附件在我这里。”叶群说着，打开她手里的那本旧杂志，翻到《我的一封公开信——蓝苹》那个标题，在几个秘书眼前晃了晃，又把杂志合上，说：“这封信的革命精神是非常鲜明的，但 11 楼的意思是不愿意让它扩散，因为那是 30 年代的事情，现在的人不容易理解。”

“我们不看为好。”张益民顺着叶群说。“但我有个建议，这个文件最好由主任亲自给首长讲，便于和首长研究如何表态。”

“要讲就快去讲，再过一会儿，首长就要休息了。”警卫李文普提醒他们一句。

大家都看了看表，虽说才晚上 22 时多，林彪一般是在 23 时左右休息，但靠近休息前听讲文件是会影响睡觉的，因此专管林彪生活的李文普这样催促大家。

“首长既然快休息了，不给他讲也行。”叶群说：“李根清会仿首长的字，叫他代首长批句话就成了。这样，既不用惊动首长，也免得批字太累，明天再补报也不晚。你们看好不好？”

秘书们谁也没吭声。

“李根清呢？李根清！”叶群见大家都默不做声，就直接喊李根清。

“根清！”郭连凯帮助叶群呼叫在隔壁的李根清，小李赶紧

走过来，问喊他有什么事。郭连凯和他开玩笑说：“主任要重用你了！”

“书记老是拿我开心。”李根清见叶群在场，没敢再多说，径直来到叶群面前，只见她从一叠文件中取出两页写满字的纸，对李根清说：

“来，你在这上面替首长批几个字吧。”

李根清没看清纸上写了些什么，但看出是陈伯达的手迹，上面还有毛泽东龙飞凤舞的批语和其他人密密麻麻的字迹。

“批什么呢？”他问。

“就批‘向无产阶级革命家江青同志致敬’吧。”叶群说。

“无产阶级革命家？”听叶群说出这样的批语，李根清脱口而出：“评价这么高啊！”

叶群没有在意李根清说了什么，只是指着那两页纸对他说：

“你看看他们写的，首长的批语比陈伯达的低了不好。”

这时，李根清才仔细看了那两张纸上的字，原来是陈伯达亲笔写给毛泽东、林彪的信，内容是送阅蓝萍（即江青）三十年代写的《我的一封公开信》：

毛主席、林副主席：

呈上江青同志三十年代的一封公开信，请批阅。只要抛弃一切封建的偏见，都可以看到，她还是一个二十岁左右的青年人时，就已经表现出了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钢筋铁骨，就显示了共产党人不畏流言，勇于斗争的勇气。和鲁迅一样，江青同志的这封公开

信，是讨伐封建势力和黑暗社会的战斗檄文。但是，国内外一小撮阶级敌人，港澳台的反共势力却利用此事至今造谣、诽谤不休，为此，我们建议将此件在一定范围内公开，证明江青同志的光明磊落和共产党人的广阔胸怀。”

在陈伯达信的落款处，除江青外，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包括主持会议的周恩来都签了名，有的人还写了批语。毛泽东已经圈阅并写了批语。

叶群见李根清看完信，说道：“这是碰头会一致做出的评价，大家都签了名，主席也批示认可了，首长的批语不能比陈伯达的低了，你就写吧。”

李根清说：“这几个字我没练过，是不是明天请首长批一下？”

叶群说：“首长已经休息了，明天就来不及了，你就快点写吧，我还得拿着它赶回会场呢！”

原来叶群是从钓鱼台会场上赶回来的。

李根清只好从命。叶群也跟着他来到李根清的办公室，眼瞅着他在“林副主席”四个字上划了个圈，顺势引出一条线，写上“向无产阶级革命家江青同志致敬”后，欢欢喜喜地把陈伯达的信收了起来，接着又拿出江青那封公开信，小声对李根清说：

“你快点，把她这封信抄下来，越快越好。”

叶群拿着李根清代批的那份文件回到秘书办公室，高兴的对大家说：

“你们看，根清模仿首长的字像极了！”

大家一看，果然在文件第一页上款林彪的名字上用红油笔画了一个长圆形圈，圈尾顺势向旁甩出一条线，仿林彪字体批上几个红字。

“小于呢？”叶群又把于运深叫了过来，“下一步工序就该轮到你了。这件珍品，需要复制 20 套。你过去搞过档案材料的复制工作，这次还是你去办。我还要去钓鱼台开会，你快点去找军委办公厅联系，复制好了后给我送去。”

“搞重要文件的复制从来都是两个人，一个人搞不合适。”于运深说。

“那就叫张云生陪你一块去。不过你们千万不要扩散。特别是那个附件，只需要把《公开信》的标题影印一下就行，里边的东西不要复制。你们自己也不要翻看，看了没好处。我这是受 11 楼的委托，你们可不能当儿戏。”

李根清几分钟就把江青那封《公开信》抄完了，叶群又赶回钓鱼台。

张云生和于运深到军委办公厅档案处复制完文件，已是午夜 0 时以后了，叶群还在钓鱼台开会。他们赶到钓鱼台 16 楼叶群开会的地方，叶群将 20 套影印品和原件拿了进去，不久出来对张云生和于运深说：“江对复制的东西很满意。你们可以回去了。”

一天晚上，江青打铃唤她的秘书杨银禄到她的办公室，拿起

一个大信封，对他说：“你看看里面的材料，这就是《我的一封公开信》，叫你见见世面，长长见识。你在我这里工作，一点也不了解我，怎么为我服务好呢？”

杨银禄轻轻地从信封里抽出那份材料，只见材料的第一页前面，是一封陈伯达用铅笔写给毛泽东和林彪的信，说的是江青，署名蓝苹，于 1937 年在上海某杂志上发表的《我的一封公开信》事，上面有中央文革碰头会除江青外所有成员的签字及批语。姚文元的批语是：“江青同志有一种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和浩然正气。”林彪的批示是：“向无产阶级革命家江青同志致敬！”还有毛泽东主席的批示。

杨银禄正在看着，江青说：“拿到你的办公室去看，看完了，立即交给我，一定不能丢了，你看，那上面有毛主席、林副主席的重要批示，这可是一字值千金啊！不对，它是无价之宝。”

杨银禄回到自己的办公室，把那封《公开信》从头到尾地仔细看了一遍，知道了这是 30 年代在上海出版的一本杂志，其中刊登了一篇题为《我的一封公开信》，署名“蓝苹”，讲的是当年江青和唐纳之间的恋爱风波。

当杨银禄将《公开信》交还给江青的时候，她洋洋得意地问到：

“我的那封《公开信》你看懂了吗？”

“基本看懂了。”杨银禄回答说。

江青生气地说：“看懂了就是懂了，不懂就是不懂，怎么说

基本懂了，这是什么话。”

杨银禄赶紧解释道：“我不了解那个时候的历史背景，对你的信基本内容我是看懂了，但个别词句没有完全弄明白。”

江青听了之后比较满意地说：“你这样解释还比较客观。我那个时候才 20 出头，就顶着来自各个方面的压力，领导上海的文艺革命，不容易呀！我和鲁迅一起受围攻啊！虽然说我和鲁迅受围攻的形式不尽相同，但受围攻的程度是一样的。鲁迅的骨头很硬，顶得住压力，我的骨头也是很硬的，我们都顶住了。”

江青擦了擦额头上的汗，继续说：“30 年代我领导上海的文艺，60 年代我又领导文化大革命。当然，现在的担子比那时候就更重了。那时候只是领导一个上海市，现在是领导全中国。现在是领导文化大革命，将来可能会让我挑更重的担子，我的路就是这样一步一步走过来的。现在，你们的主要任务是如何为我服好务。你要懂得，为我服务就是为党服务。我的身体健康受到影响，党的事业就会受到损失。”

3 月 18 日，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知青办批准了京长辛店铁路中学 18 岁的高二学生蔡立坚下乡插队的要求。

其实，在文革中最早到农村插队落户的是蔡立坚。她原名叫蔡玉琴，为表示立志下乡扎根山村干革命的决心，改名“立坚”。

蔡立坚出身工人家庭，父亲是北京铁路局的劳动模范，“文革”初又成为“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家庭的熏陶，父母亲在旧社会含辛茹苦的生活经历，使她从懂事时起便对毛主

席、共产党充满热爱。

毛泽东关于“一切可以到农村去工作的这样的知识分子，应该高兴地到那里去。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教导，早已经给她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侯隽、邢燕子等一些老知青的事迹报道，曾经使她感动得彻夜难眠。文革前的 1965 年 8 月，她就向学校递交了到农村插队的申请书，却被学校领导拒绝，理由是“上级没有这个规定”，“学生应该争取升学”。

1966 年 12 月，蔡立坚和三个红卫兵战友，学习毛泽东当年徒步考察湖南农民运动的榜样，组成“二七长征队”，在严冬季节，背着行囊，冒着严寒，擎着“红卫兵不怕远征难”的红旗，走上以革命圣地延安为目的地的长征路。从北京一直走进了山西的太行山区。

这天他们急行军到傍黑才停住脚步,可那里的红卫兵接待站已经没有下锅的粮食了，只能再继续前进到下一个村子。这个小村就是山西省榆次县最边远，也是最偏僻的山村——杜家山，位于榆次、太谷、和顺的交界处，海拔 1500 米，当年八路军在那里打过日本鬼子。这里地广人稀，全村耕地 180 亩，土地贫瘠，生产落后，农民的贫困可想而知。当时全村总共只有 5 户 17 口人。因为穷,年轻人都远离了家乡，劳动力只有 4 人，最年轻强壮的男劳力都已经快 50 岁了。

因为交通不便，杜家山很少与外界接触。见到北京来的客人，

个个热情而好奇，把他们当亲人看待。

北京的学生们在此小憩一夜。第二天，当她们告别乡亲，继续踏上征途时，蔡立坚已经对杜家山产生了难以割舍的深情。几天后，1966 年 12 月 29 日,当她们走到文水县刘胡兰烈士墓时，蔡立坚流着泪坚定了返回去建设杜家山的决心。一个 17 岁的北京女孩子，毅然告别同伴，就这样独自一人，在崇山峻岭中只身返回已经离开 280 多里的杜家山，向乡亲们表示自己要扎根杜家山，同他们一起建设好山区。

长辛店铁路中学得知这一消息后，表示支持她的革命行动。

群山环绕的杜家山粮食单产不足百斤，人们住的是小窑洞，吃粮靠人推碾子加工，常年伙食就是小米、窝窝和山药蛋，买盐、打醋、打酱油都要跑出几十里山路……蔡立坚学着当地婆姨的样子烧柴灶、熬小米粥、蒸山药蛋，照着男人的样子打柴担柴，和男劳力一起到漫坡下破冰担水，到草窑里切草，在阳坡子上除塄。她还细心计算了一下，为挑一担水，前前后后需要花掉 20 来分钟！

一个月后，毛泽东发出“复课闹革命”的号召，远在北京的学校又来信催蔡立坚迅速返校，参加学校“斗，批、改”。当地公社领导也对她说：要长期在杜家山，还需要回学校办理户口等手续。这期间，她曾经给家里写信要户口，家里没有回信，于是，蔡立坚把全部行李寄存在一个农民家里，以示在当地“战斗一辈子”的坚定决心，然后回到北京。

回到学校的蔡立坚，贴出“到农村去”的大字报，表达到杜家山寻找革命道路的渴望。并耐心地说服家人，支持她下乡插队。但此时的学校，和全国一样，已陷入派性组织的争斗中，她写的大字报根本没人看。

蔡立坚多次去北京市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安置办公室联系办理下乡手续，但是在当时的环境下，安置办公室也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办公了。

1967 年 10 月，曲折 10 名学生主动前往内蒙古锡林郭勒盟牧区插队落户的消息大大鼓舞了她。1968 年 3 月 18 日，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知青办等有关部门批准了她的下乡申请。从接到批准通知到启程，蔡立坚仅仅用了 3 天的时间。这一年她刚满 19 岁。她也是“文革”期间自愿到山西省插队落户的第一人！

当地的《新榆次报》4 月 10 日专刊报道了她的事迹。

两个月后，到了山里种谷时节，从她的母校北京长辛店中学又来了 4 名同学，有的还是打派仗时的“对头冤家”。殊途而同归，当轰轰烈烈的红卫兵运动陷入沉寂以后，她们却在一个贫穷偏远的小山村重新聚首，从为“毛主席革命路线”冲锋陷阵的红卫兵小将，到上山下乡道路上的知识青年，这是他们走过的共同道路。

6 月初，山西晋中地区的《红晋中》报发表了“杜家山的新社员”长篇通讯。

1968 年 7 月 4 日，锄草时，大伙儿歇息时在地头儿打开了

半导体收音机，忽然听到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播发《人民日报》发表通讯《杜家山上的新社员——记北京知识青年蔡立坚到农村落户》的消息，大家大吃一惊。这天，《人民日报》全文转载了晋中地区《红晋中》的这篇通讯，并加了编者按。山西省革委会的主管部门号召全省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和工作干部学习蔡立坚的高贵品质。

蔡立坚在杜家山一干就是 12 年。曾先后担任大队党支部书记、公社党委副书记、中共榆次县委常委、县革委会常委、团地委副书记、团省委常委、省革委会委员、晋中行署知青办副主任等职。当选全国四届人大代表、共青团十一大代表。她没有曲折、何方方等人那样辉煌的红卫兵造反史，没有赴滇首批红卫兵那样蒙着传奇色彩的经历，也没有说过“世界是我们的”之类的豪言壮语，但她对上山下乡的追求却是执著的。她不仅能吃苦，而且为了真正与农民“打成一片”，她穿起农民自织自染的粗布衣，腰间系一条白羊肚手巾，如果不是那张因终日劳作而被烈日曝晒得黝黑的瘦脸，显示出与当地妇女的截然有别，与农民的气质简直惟妙惟肖。

改革开放后，1980 年，蔡立坚任山西晋中地区团委书记，后在省委党校工作，任班主任。1997 年 5 月 24 日下午，她带着党校学员们外出考察旅途中，包租的客车刹车在山路上突然失灵，司机见状跳车。作为班主任的她堵着忽闪着的车门，一边安抚大家一边想应急对策。就在一刹那间，急速行进的无人驾驶汽车突

然无情地甩下了蔡立坚，之后不久便自己慢慢地停下了……同学们安然无恙，可是蔡立坚却经抢救无效，永远地离开了人间！时年 49 岁。

她最后的话是：“快救同学们，……我……不行了，对不起……同学们……”

在蔡立坚去世后，山西电视台连续三次在《山西新闻》中播发她的生平事迹。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太原陵园的工作人员把蔡立坚的骨灰盒放在最醒目的位置上。为蔡立坚送行的那一天，殡仪馆空前绝后地来了许多许多的人，其中很多人与她素不相识，只是仰慕她、信任她、欣赏她——无论她的生与死，都像是一位侠行义举的英雄……

1968年蔡立坚在田头留影

原山西大学政治系的学生、山西省著名作家、曾任《黄河》杂志主编、电视剧《一代廉吏于成龙》《赵树理》的编剧周山湖，也是当年杜家山村的知青，曾任杜家山村团支部书记。当《人民

日报》发表了蔡立坚的事迹后，他和一个同学来杜家山村参加了一次夏收。在杜家山呆了 10 天后，他就想和他们一样，来杜家山锻炼自己，他觉得这种与工农实际结合的路子值得去奋斗。于是，1968 年 10 月 10 日，周山湖背了一个书包，里面放着《毛主席语录》和日记本，来到了杜家山村，正式在这里落户。因难忘杜家山村的青春岁月，他后来在杜家山买了座房子，是一座两层的小楼。楼里的墙上挂的都是知青劳动时的老照片和当年的知青名单。

杜家山全体知识青年名单

（共118名，按上山次序排列）

蔡立坚（1966、12）
王　刚（68、5）
王　植（下同上）
汪俊英
孙希文
张忠东（68、8）
王和平（下同上）
王筑芝
汪道五（68、9）
汪道平（68、10）
阎旭红（同上）
张　颖（68、11）
刘淑琴（下同上）
周山湖
张　颐（68、12）
陈寒清（69、1）
梁敬东（下同上）
张亚丽
郑浦炜（69、2）
杜　平（70、1）
高履标（73、12）
李　勇（下同上）
陈爱平
张均毅
刘巨林
张玉科
李文良
李天良
樊明珠
李建英
任连荣
连根柱
梁宝贵
聂耀先
郭翠红
白勇平
吕调玲
刘文兰
高晓丽
赵建文
白云伍
杨凤林
王拉弟
郭伍凤
郝增亮
张原平
孟继芳
孟继民
李志梅
冯　勇（排队干部）
陈德荣（排队干部）
聂生田（74、3）
郭俊超（同上）
李大伟（74、8）
刘亚娜（下同上）
郑湘荣
范建平
杨冬梅
胡　冰（74、9）
孔慧军（下同上）
贾　瑛
明　武
张太根
李贵生
侯桂英
杨四堂
张天寿
贾天明
戴维民
张建萍
刘景山
温晓明
董　力
李吉珍
卞红接
于桂珍
耿秀爱
贾育红
田　耕
王东元
王富元
田泽建
杨爱平
王金生
王万生
李雅丽
刘玉英
魏淑芳
钟　诚（76、4）
白　凡（下同上）
卢京生
李　敏
刘　群
吕京克
才　非
安晓琪
刘祖生
孙为民
孙晓黎
饶　志
张戗知
何金勇
李长海
金沙江
高丹丹
陈　健
肖铁平
张慧荣
王　雁
王燕宁
吴竞梅
王莉华
韦　柳
朱云山
房建国
王　谨
高维新
金刚南
李果昌
赵志英
王　[illegible]
saa.sohu.com

如今的杜家山村，已经没有人居住。站在村口，只剩下几排石窑洞和整齐的砖排房。

在杜家山的村落遗址上，依然可以看到当年的痕迹，知青们自己动手盖起了食堂、宿舍，平整了空地。村中现存 1971 年建的知青宿舍 10 间，1972 年建的知青食堂 11 间，以及 1976 年知青学大寨而自行建造的石窑 8 孔。石窑上中间雕刻有五角星，两侧刻

写有“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标语，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因年久无人居住，一些窑洞已经坍塌。

村口，有座纪念碑，是为了纪念蔡立坚，当年杜家山村的知青掏钱修的。碑后面的文字已经有些斑驳。

## 第 978 回："倒谢"潮，转瞬间浪退散尽　探病情，毛泽东深夜开会

北京的"倒谢"风愈演愈烈。3 月 17 日，北京大学"新北大公社"、人民大学"三红"等 8 单位在人民大学开会商讨"倒谢"计划。清华大学"414"也刷出"炮轰谢富治"等大标语。

3 月 18 日，北京外语学院"红旗大队"贴出大字报《打倒北霸天谢富治》。在此之后，北京城内相继出现一大批诸如"炮轰谢富治"、"打倒谢富治"一类的大标语及批判谢富治的大字报。北京高校学习班及各大专院校，甚至在北京街头，这样的标语随处可见：

"捣毁关王庙，揪出大小妖！"

"倒了王八七，再抓蟹八七！"

清华大学"414"发表了《给谢富治的公开信》，信中欢呼：

"从天津到上海，从清华到北大，在北京在全国，一个上揪变色龙、下扫小爬虫、彻底埋葬极左极反思潮的文化大革命新高潮即将来临了！革命群众无不精神震奋、意气风发、斗志昂扬、拍手称快。不知此时此地谢副总理你的心情又当如何呢？

为什么一个小小的陶德坚、'红教联'竟然如此猖狂，肆无忌惮地在北京、在清华向无产阶级进攻了一年之久？为什么王关戚垮台后，极左思潮的批判在北京仍然发动不起来？'红教联'的后台究竟还有谁？谢副总理你敢回答吗？

铁的事实充分证明了：在陈里宁反革命案件上，从开始到平

反，从暴露到退却，你谢富治是一个主要策划者。你就是反动组织‘红教联’的一个黑后台！你必须就陈里宁案件和‘红教联’问题向毛主席、向革命群众低头认罪、公开检讨。

你和戚本禹到底是什么关系？我们还不甚清楚。但稍有政治敏感的人都能看出来，你和他是亲密的，不是一般关系。你为什么对他那样奉若神明、百般吹捧，言听计从，步步紧跟？

就是你和戚本禹的两次讲话，造成我校两派更加严重的对立。武斗盛行，革命小将被打成反革命、被绑架，革命干部被抄家、被斗争。人心惶惶，复课闹革命停止了，工厂生产中断了，大批革命师生不得不离开学校，校园里冷冷清清、凄凄惨惨。谢副总理！你挑动内战，破坏我校大联合的罪责能推卸得了吗？！”

说到清华大学的陶德坚和她的“红教联”，其实，早在 3 月 8 日，清华大学“414”就突然袭击了“红教联”已经解散的广播站，并宣布“红教联”是一个“有纲领、有理论、有活动、有黑手操纵、有坏人支持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彻底否定十七年、攻击无产阶级专政、推行反革命的大翻过儿、重新培植资产阶级代理人、从事资本主义复辟的地地道道的反动组织。”而此时的蒯大富，在沉默了几天后，迫于压力，也只好忍痛割爱，宣布“红教联”是“反革命大杂烩”，开除陶德坚和朱起鸣，并将他们关押批斗。

这天早上，两个学生找到陶德坚要她跟他们走。陶德坚认得他们是“团”派的，心里安稳一点，便跟他们去了。他们把她带

到丙所，要她交代与沈孝宇的关系。晚上将她关在院子中的一个四面都钉有木板的岗亭里。这岗亭本是他们用来关小偷的地方，只有一米见方，中间放了一张小课桌，就没有什么空的地方了，陶德坚就蹲在课桌上面过了一夜。北京的早春天气，夜里还很冷，如果坐着，两条腿悬下，一会儿就会冻僵；陶德坚蹲在上面，用自己的体温暖着两条腿，使身体暴露在外面的面积缩到最小。但是，这样蹲久了腿又会发麻，她便隔一阵就站立起来，活动活动身体，然后再蹲下来缩成一团。就这样来回变化姿势，不觉得就到了天明。

天亮后，她又被带离了丙所，并不断的转移。到了晚上，“团派”的学生将她押上了一辆大卡车，在清华园游街示众，一路上高呼打倒陶德坚的口号，然后押到大礼堂召开批斗陶德坚的大会。在后台，几个参加过“红教工”的工人为她准备了一块大钢板，上面写有陶德坚的姓名并被打上一个大×。接着是另外一位也是参加过“红教工”的工人把她押上台，可能是他想在公众前表现一下和陶德坚划清界限，凶狠地一把将她推倒在地，要她跪着，陶德坚就势坐在地上，胸前的钢板也落地斜靠在她的身上，那人又猛然将陶德坚的头按下，她的脸正好擦到钢板的边缘上，鲜血马上流了出来。

没过多久，“红教联”的朱起鸣、侯虞铿、来晋炎也被“团派”抓来，关在生物馆的二楼，陶德坚也被转移到那里。“团派”还成立了专案组来审查他们的问题。

而在北京高校学习班出现了反对谢富治的标语后，“新北大公社”总部赶紧指示：“新北大公社战士，没有得到总部的允许，不得贴谢副总理的大字报。”聂元梓给中央上报材料：“高校学习班里出现了谢副总理的大字报，我们请示怎样处理？”

中央文革小组对部分红卫兵炮打谢富治的活动是明确反对的。3 月 18 日的《人民日报》头版刊登了关于谢富治陪同来访的新西兰共产党总书记威尔科克斯参观北京针织总厂的报道。3 月 19 日，又由谢富治主持首都人民支援越南人民反美斗争的群众大会，让谢富治在群众集会上公开亮相。

3 月 19 日，谢富治在参加接见浙江赴京代表团后，又回到北京市革委会开会，要求各级革命委员会进行整风，市革委会带头。他看见北航的韩爱晶时，问他：“韩爱晶，听说你连‘二月逆流’和陈再道事件都否定了，都认错了？”

会上，聂元梓发言说：“我同意谢富治同志的意见，市革委会需要进行整风。但是，要整风，首先要整谢副总理的风，上梁不正下梁歪，要一级一级地从上往下整，先从谢副总理开始。”聂元梓的发言打乱了原来的会议安排，会开不下去了，只能终止。

第二天，3 月 20 日至 29 日，北京市革委会停止开全体委员会议，改开开小会，由吴德组织。会上，北师大谭厚兰、地院王大宾、工代会徐凯都发言批评聂元梓“保守”，“右”，“压制革命派”等等，历数谢富治自市革委会成立以来的成绩。

中学红代会的李冬民在会上发表了倾向聂元梓的不满言

论，。

北航韩爱晶对高校学习班上的“倒谢”风潮是不赞成的。他认为聂元梓的做法是不对的，应该批评。但也不赞成反过来打倒聂元梓。

3 月 20 日深夜，石油学院“北京公社”、民族学院“东方红”组织群众到北京大学校园内游行，北京大学“井冈山兵团”也在校园内组织游行示威。他们在游行中高喊：“打倒反革命聂氏家族”，“把小爬虫孙蓬一揪出来示众”等口号。

3 月 21 日，北京市革委会副主任吴德在市革委会第十二次全体会议上说：“有人利用革委会、卫戍区举办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的某些缺点和错误，把矛头指向市革委会，指向中国人民解放军，指向卫戍区，指向我们的主任谢富治同志，说什么‘揪出变色龙谢富治，横扫小爬虫’，什么‘把沾满鲜血的刽子手谢富治推上断头台’……这是反革命！”吴德在讲话中称谢富治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紧跟毛主席，紧跟林副主席，紧跟中央文革，为北京市文化大革命建立功勋，坚决反对二月逆流，与谭震林做过坚决斗争的谢富治同志”。明确批评了炮打谢富治的行动。北京军区司令员郑维山、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也都发表了类似的讲话。吴德等人的讲话很快向北京各大专院校进行了传达。

在看到中央文革小组明确地支持谢富治的情况下，“倒谢”的势力迅速削弱，有些组织在贴出“重炮猛轰谢富治”的大标语

后几小时又自己将它覆盖上。

3 月 22 日，北京大学“井冈山”发出《通缉孙蓬一的通缉令》。

当天，北京农业大学“东方红”1000 多人来北大游行，呼喊：“打倒孙蓬一”、“揪出聂元梓”等口号。北大“井冈山”传达了北京市革委会扩大会议上的发言，并敲锣打鼓地进行游行。高呼“打倒现行反革命孙蓬一!”

下午 13 时多，北京大学召开全校师生员工大会，传达北京市革委会扩大会议上的发言。

当天，北京大学“井冈山”搞掉了“新北大公社”10 多个喇叭。

晚上，“新北大公社”召开团长会议，成立武卫指挥部，由宫香政、丁建华、黄树田、黄元庄、高云鹏负责，并于 3 月 23 日发表声明，表示“坚决支持以谢富治同志为首的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但地质“东方红”、邮电“东方红”、石油“北京公社”等组织仍不断组织队伍到北大示威，高呼“打倒聂元梓”等口号。

3 月 23 日，“新人大公社”等 6 个组织到北京市革委会示威，并发表《声明》：提出“打倒聂元梓、孙蓬一”，“聂元梓从市革委会滚出去”。

一时间，各种各样的游行队伍不断上街，到市革委会办的高校学习班、到天安门广场、到市革委会游行。他们都打着击退“二月逆流”翻案风的旗号，向对立派组织施加压力。

“地派”组织在游行中提出的口号有：“聂孙之流是不折不扣的二月逆流派！”“揪出聂元梓！打倒孙蓬一！”“坚决支持以谢富治为首的北京市革委会！”

“天派”组织的口号有：“坚决镇压二月逆流怪胎老保翻天！”“不许极左派翻案！”

3 月 24 日，地质“东方红”、农大“东方红”、石油“北京公社”、北外“红旗造反团”等组织 2000 多人继续到北京大学游行示威，高呼“砸烂反动组织新北大公社”的口号。北京农业大学一些组织在北大示威时，也呼喊“打倒聂元梓”的口号。地质“东方红”、农大“东方红”的宣传车还开到人民大学，与人大“三红”发生冲突，多人受伤。

就在北京高校纷纷声讨聂元梓的时候，中央上层，杨成武的问题开始浮出水面。

3月20日，中央批示同意江苏省成立革命委员会。在讨论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任江苏省革委会主任时，张春桥曾经提出：“我有些担心，司令员任主任会不会发生‘枪指挥党’的问题？”

3月21日凌晨，毛泽东召集开会，讨论杨成武的问题。会后，周恩来又到中央文革处开会。之后，周恩来找许世友谈话。

3月21日，周恩来、江青等中央首长在京西宾馆礼堂接见江苏赴京汇报代表团暨江苏在京学习班的成员。

3 月 21 日深夜，林彪从他在人民大会堂住的新疆厅走出，来到毛泽东住的 118 号房间，研究杨成武的问题，参加研究的还

有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

林彪把杨成武的错误，归纳为五条：

一、杨成武拉拢余立金整吴法宪，两人勾结起来，要夺吴法宪的权，把空军的王飞、何汝珍、周宇驰、于新野打成反革命分子。

二、杨成武在批判罗瑞卿时掉了眼泪，说："可惜，可惜！"，开会时又反对开除罗瑞卿的党籍。因此，林彪说："杨成武实际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罗瑞卿分子。"

三、杨成武搞宗派主义，搞晋察冀的"华北山头主义"。他写的所谓"大树特树绝对权威"，实际上是要大树特树他自己的绝对权威。

四、杨成武勾结傅崇碧，利用北京学生两大派的矛盾，分裂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企图搞垮谢富治，篡夺北京市的领导权。

五、杨成武在总参整了林彪办公室秘书郭连楷的老婆，影响了林办的工作。

3月22日晚饭后不久，吴法宪来到患美尼尔氏症的杨成武家中看望，工作人员准备向杨成武通报，吴法宪却说："杨代总长休息了，就不要打扰他。我先到人民大会堂开会，开完会再来汇报。"说完就走了。

当晚，中央文革碰头会上，大家对东北局机关群众组织要求将顾卓新、喻屏从北京揪回沈阳批斗一事进行了讨论，同意将顾卓新、喻屏交东北局机关群众组织带回沈阳进行批斗，但必须告

诉他们不要进行武斗和押讯。每日批斗后，如他们无力监视，即交军区监护。

与此同时，位于北京王府井南口的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大楼里第六层的会议室也在开会，是北京市革委会的主要成员和北京卫戍区的主要领导及《北京日报》社的负责人讨论一篇即将见报的、号召各派群众组织联合起来的社论。会开到 23 日凌晨，谢富治被叫去人民大会堂开会。

会议是毛泽东召集的，参加会议的有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谢富治、叶群和汪东兴。

凌晨 1 时，睡梦中的吴法宪也突然接到中央办公厅的电话，通知他到人民大会堂毛泽东那里开会，没有说会议的内容，只是说要赶快去。吴法宪朦朦胧胧地上了汽车，来到了人民大会堂。

据吴法宪回忆，毛泽东一见吴法宪进来，就对他说："你同杨成武的问题，我都知道，你是对的，杨成武是错的。"

吴法宪一听，知道是杨成武的事情，他赶紧低头，抹了抹眼泪。

毛泽东又问林彪："这样，谁来当这个总长呢？"

吴法宪闻此，不禁大吃一惊，因为在杨毅和单世充的问题上，即使杨成武全是错的，也不至于受到这样严重的处理！除了空军这件事情以外，是不是还有别的问题？他当时也不敢多问。只听到林彪答道："现在也没有别的人选了，是不是调广州军区司令员黄永胜任第一副总长或者是代总参谋长？"

毛泽东问："黄永胜是从哪里来的？"

林彪说："黄永胜是武汉警卫团的一个班长，秋收暴动以后，就上了井冈山，上山以后当了排长。"

毛泽东说："原来是武汉警卫团的，在井冈山就当了排长，那就不要这个'代字'了，就叫黄永胜当总长吧，就这样定了。"

对余立金，毛泽东说："许世友的材料早就送到我这里来了，说余立金是个叛徒，既然是这样，那就先审查吧。"

这时，江青又提出，北京军区和北京卫戍区这两个岗位很重要，傅崇碧一直都在杨成武的直接指挥下工作，两人关系一直很密切，况且傅崇碧还带人冲过钓鱼台。为了防范，还是动一动为好。

毛泽东也同意了。傅崇碧调到哪里为好呢？最后决定调到沈阳军区当副司令。

北京卫戍区的司令由谁来担任？林彪提议，会议决定，由去年11月调总参任副总长主管训练、作战和通信的原广州军区副司令温玉成兼任。

毛泽东还说："至于北京军区司令员郑维山就不要再动了，动得太多不好，但是要找他谈一谈，把问题说清楚。"

接着，毛泽东对林彪说："下面的事情，就交给周恩来去处理，我们两个休息去吧。"

毛泽东、林彪退席后，周恩来主持会议讨论了五个问题：

第一，命吴法宪派飞机于当天上午把黄永胜接到北京。黄永

胜到北京以后，只准吴法宪一个人用自己的车去接，其他任何人都不要去。从机场出来，直接到人民大会堂，路上什么也不要说。到人民大会堂以后，周恩来在福建厅亲自找他谈话。

第二，通知李作鹏和邱会作两个人，带领中央警卫团的部队，到杨成武的家里去，把杨成武带到人民大会堂来，由林彪、周恩来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集体与他谈话。

第三，通知陈锡联和傅崇碧到人民大会堂，由周恩来谈话，并准备飞机将傅崇碧送去沈阳。沈阳方面，通知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作好安置傅崇碧的准备工作。

第四，派中央警卫局副局长杨德中带警卫部队到空军大院逮捕余立金，逮捕后送秦城监狱关押。同时，通知公安部，作好接收准备。

这时，吴法宪对周恩来说："夜深人静，这么多的人闯到余立金家里，动静太大了。"

周恩来说："你想个办法嘛！就说你要找他谈话，把他找到你家里来好了，我交代杨德中带警卫队在你家里等，你负责要秘书通知余立金到你家里来就行了。"

第五，决定在3月23日召开驻京部队团以上干部大会，传达中央对"杨余傅"问题的决定。

散会后，周恩来让吴法宪先回空军大院，一是安排飞机到广州接黄永胜，二是协助杨德中逮捕余立金。随后，又召集王新亭、邱会作、李作鹏和军委通信兵部主任江文 4 人开会。周恩来向他

们交待任务说："杨成武犯了严重错误，毛主席、林副主席已决定其离职审查。由邱会作、李作鹏负责去把他立即找到这里来。由王新亭负责封查他的文件和私人物品，由江文将杨家的军线电话切断。"又说："我已通知卫戍区，将杨成武家的警卫部队换下来了。"

接着，他又让秘书周家鼎给广州的黄永胜打电话。

此时，黄永胜正在广州军区"留园"主持召开军区党委会，文化大革命以来，他已经习惯了毛泽东、周恩来这些中央领导连夜工作的传统，经常搞到白天黑夜颠倒。

广州军区一号台接到北京周恩来总理办公室的来电："要黄司令员接电话"，立即将电话接转到"留园"。正在会议室外电话机旁边值守的是黄永胜的警卫参谋李学金。他听见总理秘书周家鼎在电话里说："周总理有急事要找黄永胜同志接电话。"马上告知了正在开会的黄永胜。

黄永胜离开会场，急步来到电话值班室，拿起电话机。

"总理，我是黄永胜。"

电话听筒里传来周恩来那特有的口音："永胜同志，请你马上赶到北京来，我已叫吴法宪派了专机去，你带上项辉方和一个机要秘书、一个警卫员，飞机在广州一降落连夜起飞来京。"

项辉方是黄永胜的妻子。"总理让我带上项辉方，而且指明只带两个随行人员"，黄永胜心里有几分奇怪，连忙问："总理，可以告诉我是什么事吗？"

“嗯，是商量湖南省革命委员会人选问题，这件事主席催了不能再拖。我让吴法宪到机场接你。我等你。”

## 第 979 回：空军院，凌晨逮捕余立金　命令下，傅崇碧调往沈阳

22日深夜。喧闹的北京已经安静下来。位于北京后海附近的杨成武住地也非常静谧。子夜时分，值班室的电话突然响起来。杨成武的秘书张忠庆拿起电话，听筒里传来门卫的报告："林副主席的秘书来了。"

"这么晚了，他们来干什么？"张忠庆感到突然，他边想边赶忙出去迎接。

来者是林彪的两个秘书，和张忠庆秘书都认识。其中一个说："101要我们来看看杨代总长的病情如何了。"

张忠庆说："已经吃过药，睡着了。"

"既然来了，还是看看吧。"张忠庆秘书只好领他们来到杨成武的卧室，叫醒了杨成武。

杨成武坐起来，和他们打了招呼。

一个秘书说："101对首长的病情很关心，特让我俩来探望。"

杨成武说："不要紧的，休息休息会好的。"

另一个秘书说："吃过药了吧？"

杨成武说："谢谢101，不要紧的。"

两个秘书说了几句安慰的话就起身告辞了。

送走这两位秘书，张忠庆告诉杨成武，晚饭后不久，吴法宪曾来过，当时他正要向杨成武通报，吴法宪却说："杨代总长休息了，就不要打扰他。我先到人民大会堂开会，开完会再来汇报。"

说完就走了。

杨成武让张秘书回办公室打电话告诉吴法宪，不要让他来了。电话打到人民大会堂，吴法宪的警卫员小刘接了电话，说："吴司令正在开会，交待过，不能找。"

23日凌晨，吴法宪从人民大会堂直接回到空军大院，立即通知指挥所安排飞机，同时给黄永胜打了一个电话，转告他，说中央决定要他立即到北京来，飞机可能很快就到广州，请他作好准备，等飞机一到，就立即随机前来北京。

处理完这件事情，吴法宪回到家里，通知空军副参谋长梁璞和警卫营营长田广林到他家里来。这时，中央警卫局副局长杨德中也到了。他们商定，由杨德中带领警卫团的人在吴法宪家的院子里等候，吴法宪通知余立金到他家来议事，等余立金一来，就执行逮捕任务。

接着，吴法宪要秘书通知余立金到吴法宪家里来一下，说吴司令有事情要同他商量。

电话铃声将余立金的秘书吵醒。他抓起电话，听筒里传来吴法宪秘书的声音："余政委休息了吗?"

"休息了。"

"请他起来一下，吴司令刚刚从林副主席那里开会回来，有件很重要的事情，需要和余政委商量。"

"好吧。"

秘书答应着，赶忙穿好衣服，跑上楼去请余立金。

余立金被叫了起来，他披着睡衣问：“什么事?”

“吴司令刚从林副主席那里开会回来，有急事商量。”

余立金说：“会不会是毛主席的最新指示要发表?”

秘书说：“不像。他是说有急事商量。毛主席有最新指示传达就是了，不会商量的。”

余立金说：“也是。”

走下楼梯，秘书问：“首长，还要不要叫警卫员?”

“不要了，这么近。”余立金说着，走出楼门口。

秘书想，两位首长的家距离最多只有 50 米，都是在首长的住区内，各家的门口还有岗哨，这里的安全是不会出问题的，也就没有再叫醒睡意正浓的警卫员。

走出余立金家的后门时，发现门框有点活动，秘书说：“明天跟他们讲一讲，把门修一下。”

余立金没有说话，大步向前走去。北京严冬的夜，是一天气温最低的时刻。寒风吹在脸上，冰凉冰凉，更显得寒气逼人。

吴法宪家院门敞开着，两层小楼除了楼下客厅里有灯光，别处都是黑乎乎一片。客厅的窗帘很厚，透出微弱的灯光。从院门到屋门口有 20 多米，院里种满了花草和果树。黑暗中显得灰蒙蒙的。

此时，吴法宪正站在楼上的阳台上观察动静。只见院子里黑黝黝、静悄悄的。他看见余立金走进了院子，这时，杨德中走上前问到：“是余政委吗?”

余立金先是愣了一下，然后回答说："是。"

杨德中对他说："余立金，你被逮捕了！"紧接着几个警卫战士走上前去，把他带走了，没有惊动任何人。

接着，吴法宪又通知空军党办和空政保卫部对余立金的家进行搜查和监视。

面对余立金被抓走的场面，余立金的秘书又惊又呆，他不认识杨德中，不知道究竟是发生了什么事。等他缓过神来，赶紧返回余立金家中，给杨成武的秘书张忠庆挂电话报告说："刚才吴司令来把余立金政委铐走了，杨总长知道这件事吗？"

"不知道呀！"杨成武的秘书也吃了一惊。

"那是怎么回事呀？是不是吴司令搞政变了……"余立金的秘书在话筒里说。

杨成武的秘书立即要通了杨成武的卧室。

接电话的是杨成武的夫人赵志珍。听完秘书的报告，她很吃惊，说："是吗?这是怎么回事?"

杨成武在妻子赵志珍的提示下，拿起电话想询问情况，但听筒里面却没有声音了。

此时，驻在杨成武家附近的原警卫部队，卫戍区的一个排突然接到紧急集合的命令："不许开灯，不许喧哗，紧急集合！"然后由来人带领，一口气被拉到了景山。

与此同时，中央警卫团8341部队包围了杨成武的住宅。

1968年3月2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

印发命令：

1968.03.22；中发［68］52号

根据毛主席、林副主席的决定：

一、杨成武犯有极严重的错误，决定撤销其中国人民解放军代总参谋长职务，并撤销其中央军委常委、中央军委副秘书长、总参党委第一书记职务；

二、余立金犯有极严重错误，又是叛徒，决定撤销其空军政治委员、空军党委第二书记职务；

三、傅崇碧犯有严重错误，决定撤销其北京卫戍区司令员的职务。

此命令发到团，传达到全体指战员。

中共中央

国务院

中央军委

中央文革

1968.3.22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命令》

1968.03.22；中发［68］53号

根据毛主席、林彪主席的决定：

一、任命黄永胜同志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

二、任命温玉成同志为兼北京卫戍区司令员。

此命发到团，传达到全体指战员。

3月23日凌晨，还在北京市革委会开会的傅崇碧突然接到谢富治打来的电话：

“傅司令员，请通知北京卫戍区团以上干部，两点钟到人民大会堂北京厅。林副主席、总理，中央文革全体同志要接见我们。”

放下电话，傅崇碧马上让秘书通知司令部值班室，叫团以上干部到人民大会堂北京厅集合。并且关照一位副司令，立即赶到大会堂，做接见的安排。随后，他拿起电话，通知了首都工作组办公室主任、北京军区司令员郑维山，又向北京市革委会开会的干部请了假，而后驱车直奔人民大会堂。

傅崇碧走进人民大会堂，见卫戍区 80 多名团以上干部已经齐刷刷地坐在那里。几位军队总部的负责人，站在队伍前面，小声说着什么。傅崇碧一问，才知道林彪正和中央文革成员开会。他问一位副司令：“他们(指团以上干部)吃饭没有?”

“现在，”副司令看着手表，“吃什么时候的饭?”

傅崇碧知道，等待接见，时间是没有准的，有时要两三个小时。他转身去找人。正好，汪东兴从对面走过来。

“汪主任，这会儿他们都饿了，你能不能给搞点吃的?”

汪东兴看看表，说：“可以拿些点心来吃。”

不一会儿，服务员抬来了四箱点心。傅崇碧笑着对干部们说：“快来吃，不吃白不吃哟!”接着，他和几位总部领导聊起天来。

正聊着，傅崇碧看见郑维山从小会议厅走出来，脸色很不好。

“怎么了?”傅崇碧问郑维山。

“林副主席问我：谁叫你来的?”郑维山沮丧的回答道。

傅崇碧想象得出，郑维山当时一定很窘。忙问:“他发火了?”

“嗯。”

“看来我不该通知你来，可你是首都工作组的，应该来的。”

郑维山摇摇头。

这时，叶群来了。她本来就有些发胖，今晚显得更加臃肿。她把傅崇碧叫到一边，问：“谁让你通知郑维山来这里的?”

“没有谁叫我通知。谢富治说林副主席、总理、中央文革全体同志要接见卫戍区的团以上的干部，我想，这件事情应该告诉首都工作组的人。”

“没叫你通知，你就别通知。”叶群气呼呼的，转身走了。

正在人民大会堂等待开会的副总参谋长温玉成得到通知，让他到 118 厅毛泽东住处开会。他在走廊上见到了毛泽东，忙走上前，端正地行了个军礼，问候道：“主席好。”

毛泽东一手夹着烟卷，一手倒背在身后，凝神注目，然后劈头问道：“你一个人去？单枪匹马去？”

“主席，我去哪里哟？”温玉成如坠云雾中，不解地问道。

“没有通知你？”

“不知道。”

“叫你到卫戍区去，”毛泽东将夹了烟卷的手往前一点，严肃地说，“执掌京畿重地。”

温玉成是 1967 年 11 月才到的北京。

那是 1967 年 10 月下旬的一天晚上，正在北京参加解决广州两派问题的黄永胜来到设在京西宾馆的广州军区临时值班室，对司令部办公室秘书科负责人说："你给林副主席写个报告。"于是他边说，秘书边记，主要是建议对广州军区军事领导干部进行调整，其中提到温玉成在广州处境艰难，建议将他调出另行安排工作。

11 月，中央军委任命温玉成为副总参谋长。调令下达后，温玉成打电话到北京找黄永胜。他掩饰不住内心的喜悦，问黄永胜：军委的调令"是怎么回事儿呀"？并表示自己"水平低"，"干不了"，"不想去"。黄永胜则用亲昵、得意的语气大声地说："这是我向林副主席建议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批准的。你赶快来嘛！"

就这样，温玉成来到了北京。他做梦也没有想到，这才几个月的时间，又让他执掌北京卫戍区司令员的要职。

再说大会堂的小会议厅外面，周恩来从小会议室里出来喊傅崇碧。傅崇碧快步走到周恩来面前，周恩来握住他的手说："到里面谈。"

走到小会议厅门口，周恩来站住，对他说："崇碧同志，不论遇到什么情况，都要冷静，不要激动。"

会议厅内摆了一圈沙发，沙发上坐着中央文革的成员。周恩来领着傅崇碧，径直走到靠近窗户的沙发。见他们进来，别人都

不再说话。

林彪从外面走进来，周恩来将自己坐的座位让给林彪，自己坐到另外的沙发上去。

林彪紧挨着傅崇碧坐下，操着浓重的湖北口音，对他说："现在向你宣布中央的决定，为了加强沈阳军区的领导，任命你为沈阳军区第一副司令；副总参谋长温玉成同志兼任北京卫戍区司令，接替你的工作。由吴法宪同志派飞机，送你到沈阳去。"

这个调动命令来得太突然。傅崇碧还没做出任何反应，林彪已经站起来，对中央文革的全体说："走，我们去接见团以上干部。"

林彪带头往外走，中央文革的人都跟在他的身后，走出小会议厅。

周恩来对傅崇碧说："你可以和沈阳来的陈锡联同志谈谈。"

林彪他们来到北京厅，刚刚坐好，大家的鼓掌声还在继续，林彪就站了起来，伸出两臂做了个向下按的动作，示意让人们静下来，接着他说道：

"现在，我向大家宣布中央的决定：为了加强沈阳军区的领导，任命傅崇碧为沈阳军区第一副司令员。副总参谋长温玉成同志兼任北京卫戍区司令员，主要负责北京卫戍区，接替傅崇碧的工作。"

林彪宣布完命令之后，会议就结束了。

会议厅内，只剩下傅崇碧和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周恩来

让他们谈一谈，谈什么呢?

沉默了一会儿，傅崇碧找到服务员："给拿点水果来吃吧。"

训练有素的服务员，端来一盘桔子，转身走了，空荡荡的会议室里，仍旧只有他俩。

他们一人拿了一个桔子，慢慢地剥着。剥呀剥呀，剥了 10 分钟还没剥完。

"这桔子不错?"

"嗯，味道还可以。"

过了大概半个小时，凌晨 4 时左右，周恩来和谢富治带着秘书走进来。周恩来看看手表，然后对秘书说："通知他们弄夜餐。"

秘书走后，4 个人又默默地坐在那里。傅崇碧心里很不痛快，终于忍不住开口问道："总理，这调动工作是怎么回事?"

周恩来说："林副主席不是跟你谈过了嘛。"

"那算什么谈话，宣布了命令，别的什么都不跟我讲。"卫戍司令心中有火，在当时的情况下，居然敢直陈不满。

周恩来正要说什么，有人进来说："总理的电话。"

周恩来起身到外面接电话。留在屋里的 3 个人，依旧默默地坐着。

"等总理回来，一定要跟他好好谈谈，"傅崇碧想，"这样调动工作，太不正常了。"

周恩来回来，刚坐下，又有人来请："总理，您的电话。"周恩来又出去了。看来是谈不成了。

等周恩来再进来，服务员已经将夜餐摆好。

餐桌上，一盘点心，三碗面条，香味扑鼻而来。傅崇碧一点食欲都没有，这个 15 岁就参加红军的将军，经历过各种各样的调动，对这次调动，他实在想不通，哪里还有心思吃饭?周恩来让他一定多吃一点："吃饱了饭，才有革命的本钱嘛。"

傅崇碧强咽下去几口面条，说："吃好了。"无论别人怎样说，他不肯再吃了。

周恩来看着他，他看着周恩来……周恩来站起来，说："崇碧同志，飞机准备好了，上任去吧。"

上任去？就这样走？傅崇碧又看看周恩来……

以往调动工作，要办交接手续，要做动身准备。除非有紧急情况是不会连夜派飞机去的。傅崇碧确信，绝不是东北方向出了问题，需要他傅崇碧去解决。那么，为什么呢？

"就这样走？"他问。

"嗯。"周恩来答。

"我想不通!哪有这样调动工作的!"傅崇碧的声音在小会议厅里回荡。

周恩来不劝他，也没有批评他，而是问："你要不要回家拿点东西？"

"不要!"傅崇碧发起火来，是不管不顾的。

"要不要给家里写几个字？"

"不写!"

周恩来叫秘书拿来一张纸，对傅崇碧说：“你给家里写几个字。”

“崇碧同志，叫你写，你就写。”

陈锡联也劝说：“写几个字吧，要不家里人着急。”

傅崇碧想了想，接过秘书递过的纸笔，飞笔写下两行字：

“黎虹：我调沈阳工作，到那里以后，有机会再给你们写信。傅 3 月 22 日”写好，他交给周恩来的秘书。

周恩来对秘书说：“要卫戍区的同志一定送到。”然后，送他们走出会议室，来到北大厅。周恩来说：“我不送了，锡联同志送你到机场。”说罢，他伸出手，与傅崇碧重重地握了握，又说：“革命工作有的是。你现在身体不好，去沈阳，先要把身体搞好。要经得起考验。”

傅崇碧没有说话，只是点了点头。

周恩来又对陈锡联说：“锡联同志，他身体不好，你要照顾他。他什么东西都没有带，你给解决。”

陈锡联说：“总理放心，我会安排好的。”

然后，周恩来说：“好吧，你们走吧。”

周恩来走了。傅崇碧和陈锡联走出人民大会堂。外面的华灯还是那样明亮，广播喇叭的声音仍旧时断时续。三辆黑色轿车，唰唰唰地开到了门口，车门打开，跳下一个大个子军人。傅崇碧一看，秘书不在，警卫员也不在，车子也换了。大个子说：“请上车。”

从车的另一个门，又下来两个身高都在一米八以上的高个子军人。

“这不是我的车。”傅崇碧继续寻找熟悉的车子以及秘书、警卫员。

陈锡联走到前面一辆车前，对傅崇碧说：“这是送你的车子，走吧。”

傅崇碧已经明白，调动很可能是个骗局，但是怎样一个骗局，他还看不透。他迈进轿车。陈锡联坐在车前面，傅崇碧坐在后面的中间，左右各有一个大个子夹着他，后面还有三个车。

轿车飞似地向西开去。过新华门、西单……出西直门，直奔西郊机场。急剧的变化，使傅崇碧冷静下来，他需要认真想一想，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 第 980 回：电话断，带走病中杨成武　黄永胜，急飞北京接新职

就在林彪等人向傅崇碧宣布命令的同时，23日凌晨2时许，杨成武家的楼下也有了动静。杨成武的爱人赵志珍下楼想看个究竟，几个人上来就把她扭住了。她愤怒地质问这是干什么？无人回答。只见全家人被推搡到了楼下的客厅，就连杨成武的老母亲、年近8旬的老太太和只有10来岁的孩子也不例外。赵志珍要去叫杨成武，被把守客厅门口的几个持枪战士制止说："不行！"

这时，邱会作和李作鹏带着几个人上了楼，走进二楼办公室，杨成武很快地从卧室内出来，边穿衣服边惊慌地问他们两人说："老邱，怎么样？出了什么事？"

邱会作回答说："周总理要我们来请你立即到人民大会堂去。"

杨成武问："开什么会？要你们两个来请？"

李作鹏瞥了邱会作一眼，没吭声，邱会作说道："我们也不清楚开什么会。"

"搞什么名堂？"杨成武随手又抓起电话机话筒，可是那电话机依旧没声音，他气虎虎地把话筒一摔说："怎么回事？"

毕竟是几十年的战友了，李作鹏始终不敢正视杨成武，还是邱会作说："我们也不清楚，到会场就知道了。"

随他们一起来的一名干部对杨成武说："走吧！"

由于杨成武卧床多日，身上只穿着衬衣衬裤，而他的夫人赵

志珍下楼后即被扣押，他的衣服一时找不到，他们就把警卫战士的一件大衣往他的身上一披，邱会作、李作鹏一前一后跟着他下了楼。

几个战士寸步不离地跟着杨成武，甚至跟着进厕所。杨成武怒发冲冠地对邱会作说："你们到底搞什么名堂？开会？开什么会？"

邱会作没有说话。是啊，从中央苏区就一起在枪林弹雨中出生入死，反围剿、长征、抗战，杨成武任代总长后，他们互相也是多有关照，如今的场面，说什么呢……

杨成武要求见一下他的家属子女。此时王新亭已将他的全家老小集中在会客室内。杨成武推开会客室大门，一眼就看见老母亲坐在乒乓球台上，心中更加气愤。两天前，杨成武的父亲在这里病逝，刚刚火化。母亲还沉浸在无限的悲痛之中，而且正在生病，她还能经得起这个沉重的打击吗？杨成武感到，自己此去凶多吉少，便大声说："我要跟我妈妈说几句话。"

"不行！"8341部队的狄副团长当即阻止。

杨成武用肩膀把狄副团长抗到一边，走到母亲身旁，稍稍稳定了一下情绪，平静地说："妈妈，你们不用害怕，我没有问题，要相信共产党、相信毛主席，事情总会搞清楚的。"

他又转身对孩子们说："你们要管好自己，照顾好妈妈、奶奶。"

"快走，快走！"带队的团长催促道。

在杨成武转身准备走的时候，母亲如从梦中惊醒一般，猛地扑过来，边哭泣边大声呼号："我儿子从小就跟着毛主席，不反对毛主席啊！"

杨成武被带出房门，儿女们大声哭喊着："爸爸保重身体！"

杨成武一阵心酸，又猛然转过身，昂起头，大声说："相信我！毛主席了解我！我不反对毛主席！"

杨成武走出楼门，见到一辆黑色吉姆车停在门前，车门开着。

见杨成武出来了，邱会作先钻进去，李作鹏伸手，示意杨成武上车，随后也跟着钻进车里。他俩一左一右为杨成武"保驾"。车队没有走大街，而是在京城的小胡同里钻来钻去，杨成武警惕起来，问："去哪里?"

"人民大会堂。"

"为什么往西走?"

"为了安全。"

他们并没有骗他。车到西四后，转弯向东，经西安门、府右街直朝正南，到六部往东，车的左侧出现了中南海新华门的卫兵，右侧很快看到了人民大会堂的灯光。

杨成武神经异常紧张。他不知道等待他的是什么。

到了人民大会堂，已是凌晨3时许。杨成武被安顿在西大厅的一个房间里。

杨成武家和徐向前家仅一墙之隔，当布置卫戍区更换警卫部队时，引起了徐向前家工作人员的警惕，徐向前的秘书未经请示

报告，就将徐向前也给扣了起来，并收缴了徐向前保密文件柜的钥匙，引起了一场误会。

3月23日早上5时左右，周恩来带领中央文革碰头会议的成员与郑维山谈话。周恩来对郑维山说：杨成武犯了错误，已经撤销代总长的职务。他要求郑维山与杨成武划清界限，揭发杨成武的错误。

上午10时左右，杨成武被带到人民大会堂的新疆厅。这里，是林彪办公的地方。林彪、周恩来、康生、江青、陈伯达、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姚文元等中央文革碰头会议的全体成员都坐在里面。

林彪见杨成武走进来，说："现在开会。我来宣布中央的决定。一、杨成武搞晋察冀山头主义，搞派性。二、杨成武勾结余立金，想夺吴法宪的权；勾结傅崇碧，想夺谢富治的权。三、杨成武把王飞、周宇驰、于新野打成反革命。杨成武你不当代总长了，黄永胜当总长。我再说一遍，不是代总长，是总长！"

他对杨成武说："今天找你谈话，主要是处理你的问题。你的错误是什么呢？主要是'山头主义'、'宗派主义'和'曲解马克思主义'。你和傅崇碧勾结在一起要打倒谢富治，和余立金勾结要打倒吴法宪。还想排挤许多和你地位差不多的同志，如许世友、韩先楚、黄永胜等。主席亲自主持了四次会议，讨论了你的问题，决定撤销你的代总参谋长职务和总参党委第一书记的职务。"

江青说："杨成武，你胆大包天，敢整我的黑材料！你要老实交代问题！"

吴法宪说："杨成武，你必须交代你的'三反'罪行！必须交代你的黑后台！"

康生说："这是'二月逆流'的新反扑！你要交代同那几个老家伙的关系，交代出你的黑后台！你和彭真什么关系？和罗瑞卿是什么关系？"

陈伯达说："杨成武反对马克思主义，写大树特树的文章，受到毛主席的严厉批评，这账是赖不掉的！"

叶群说："杨成武三次命令傅崇碧冲中央文革的驻地，带了枪，带了子弹，还打了江青同志一皮包！这还得了吗！中央文革还有没有安全？毛主席还有没有安全！"

她带头呼起口号来：

"誓死保卫毛主席！"

"誓死保卫中央文革！"

"打倒杨成武！"

"打倒晋察冀山头主义！"

杨成武说："我说几句——"

江青说："不开了！散了！散了！"

人们纷纷站起来。周恩来摆摆双手，示意大家坐下。

周恩来说："毛主席那里来电话讲，不许揪斗杨成武，杨成武有病，要他去休息。有错误可以检查。"

林彪对杨成武说："你先不要回家了，人大会堂已经给你找了一个住的地方，你先在这里休息。中央已经决定，要你离开北京，住到武汉东湖去。可以带上你的全家，包括你的母亲、老婆和孩子一起去。要用的东西也可以统统搬走。你到那里一方面好好反省自己，也好好休息一下。"

随即，林彪当场命令吴法宪，准备飞机把杨成武一家送到武汉去。同时，要吴法宪通知武汉军区立即作好准备。

参加会议的人，先后离开会议室。杨成武问周恩来："这是怎么回事？"

周恩来站起来，对他说："不要着急，有病就好好休息。你的问题是林副主席检举的，会搞清楚的。"

康生转过头来，面对杨成武，等周恩来说完，他手指杨成武说："不管你交不交代，你的黑后台，就是聂、叶、陈、谭！"

接着，杨成武与林彪、周恩来、陈伯达、江青等人一一握手告别。

杨成武走了以后，林彪同周恩来一起商量，要吴法宪负责清查杨成武所有的文件，并封存备查。这时，江青在会议上又提出，是不是把余立金的妻子陆力行也一起收审，以便彻底清查问题。陆力行的姐姐原先在上海市档案馆工作，在此之前，江青已叫人将陆力行的姐姐收审了。对江青的这一提议，在座的人没有一个人表示反对，于是就算通过。

三辆小汽车，风驰电掣般地把杨成武押解到西郊机场。一架

伊尔十八型飞机已经发动，看样子是在等着他。一下车，他就被人带上了飞机。机上坐着一个班怀抱冲锋枪的战士。

这些战士很客气，问杨成武：“你喝水吗？这里有水。”

杨成武摇摇头。

其中一个长得很粗壮的干部说：“不要着急，能休息就休息一下。”

经过几个小时的飞行，飞机降落了。杨成武一看，是武汉的山坡机场。几个月以前，他随同毛泽东主席视察大江南北，就在这里起飞和降落过。

很快，他被押送到东湖宾馆。1967年7月，杨成武跟随毛泽东巡视时，就是住在这里，所不同的是，上次住地是设备豪华的首长区，这次却是关在地下室。

北京西郊机场休息室，傅崇碧还在这里等待。这地方傅崇碧很熟，他说没烟抽，机场的主任就给拿来了烟，还给冲了咖啡。

这时，飞行团长进来，对傅崇碧敬了个礼，说：“首长，飞机发动了。”

傅崇碧放下刚喝了几口的咖啡，说：“不喝了，走。”

陈锡联说：“还是喝完吧。”

喝完咖啡，他们走到停机坪，沈阳军区来接他的人正在等候。飞机的螺旋桨转个不停，显得风很大。傅崇碧打了个寒噤。

陈锡联脱下披在身上的大衣，说：“你穿上它，冷。”

“不要!”

“穿上吧。”陈锡联已经把大衣塞到傅崇碧手上。他接过大衣，心想：发火也不应该朝他发，他回身同陈锡联握手，然后登上飞机。

在飞机上，傅崇碧也不说话，躺在飞机的铺上抽烟。一根烟没有抽完，飞机就降落在沈阳了。

傅崇碧乘坐的飞机降落在沈阳机场。来了三辆轿车接他们。傅崇碧对沈阳不太熟悉，再加上车上有窗帘，三拐两转，汽车在一座灰色的砖楼门口停住，这里是原沈阳军区政委的住处。事先安排好的秘书、警卫员在等待着他。在他们的簇拥下，傅崇碧上了楼。沈阳军区一位副政委对他说：“为了你的安全，请你不要下楼。”

傅崇碧发现，这里有两道岗，屋门一道，楼下还有一道。这是什么意思?他对沈阳军区的人说：“是叫我来这里工作的。这怎么工作?”

“这是上头的安排。”

“谁安排的?”

“上头。你不要问了。”

一副冷冰冰的面孔在看着他。他明白自己是被关押了，却不明白自己为什么突然之间成了阶下囚？昨日还是北京军区的副司令兼卫戍区司令，今天却被关在了这里，失去了自由。这一切，太令人猝不及防。“专机不能走，我对他们有话说!我要给中央写信!”他对“秘书”说：“给我纸、笔!”

他铺开纸笔，信手写道：

主席、总理并中央文革：

现在，我被关在沈阳军区，不明白为什么把我看起来。我是个参加革命 30 多年的老战士，对党，对毛主席无限忠诚。只要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就坚决照办，绝不会有二话。如果我犯了错误，主席、中央都可以处分我，该怎么处分就怎么处分，我不会有怨言。我希望你们派人来同我谈一谈。如果是我有错误，我自然接受处分，如果有什么不清楚的事情，我可以向中央说清楚。有些事情，我可以为调查提供线索……

信送走后，他在房子里踱起步来，期待着中央派人来。

然而，傅崇碧等了六、七天，一直没有消息。

他烦躁极了，对警卫说："屋里太闷，我要出去走一走。"

"不行。为了你的安全，上级命令我们不许你出去。"跟战士发火吗?不，不应该!他们只是执行命令的。他忍住火气，请求把窗户打开一点儿。

战士不敢打开大窗户，只把上面的一个小窗户打开。他呼吸着透进来的新鲜空气，听到了外面传来的口号声：

"……打倒变色龙……"

"……打倒小爬虫……"

他不相信自己的耳朵，谁是变色龙？他竖着耳朵再听下去：

"打倒杨余傅!"

"杨余傅"又是什么人?

傅崇碧从此与世隔绝了。他听着呼啸的寒风，望着没有发绿的白杨。随着一阵脚步声，进来几个人。

来人问："你老实交待，你的后台是谁?"

傅崇碧说："什么后台?我没有后台!"

来人问："你和叶剑英、陈毅、谭震林是什么关系?"

傅崇碧说："什么关系，革命关系!他们是党和军队的领导人!"

来人问："你为什么要反对毛主席？为什么要把贺龙送到苏联去？"

身材高大魁梧的傅崇碧，指着身上的斑斑伤疤说："我热爱毛主席、我保卫毛主席……我是为人民、为革命流血牺牲的!"

以后，傅崇碧的住处多次在夜晚转移。

3 月 23 日 8 时左右，西山，聂荣臻住处，他的保健医生接到一位自称姓王的北京军区女干部的电话。她说：

"今天凌晨，杨成武同志那里出事了，突然人已下落不明，门口警卫换了人，不准随便出入，杨办的张主任已经被两个人绑架走了。请你把这个情况报告给聂帅，请聂帅过问一下。"

保健医生正想进一步问清情况，对方已把电话挂了。于是，保健医生整理了个简单的电话记录，交给警卫参谋，转给了秘书。

聂荣臻的秘书看了电话记录，感到很奇怪，就给杨成武办公室打电话，长时间没有人接，秘书感到确实是出事了。

聂荣臻 3 月 8 日心脏病突然发作，抢救了了近 3 天才恢复正

常，此时尚在休养，秘书不敢将电话的事向他报告。

3 月 23 日下午 14 时左右，去广州接黄永胜的飞机即将降落在西郊机场。吴法宪接到报告以后，立即坐车去接。

黄永胜下了飞机，显得有点紧张。因为他一路上都感到莫名其妙。不知道为什么这样紧急要他来北京。由于周恩来曾明确交待过在路上不要对他说什么，吴法宪只好含含糊糊地对他说："三言两语也说不清，总理在人大会堂等你，由他亲自和你谈，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吴法宪把黄永胜送到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后不久，林彪又找吴法宪谈话，对他说：

"现在总参的问题和北京卫戍区的问题都解决了，空军政委的问题怎么办？你可以考虑一个能同你合作的人选。"

吴法宪想了一下说："现在空军没有别人了，只有一个王辉球。他是从井冈山下来的老同志，现在任空军副政委，提他任空军政委，是顺理成章的事情。王辉球在空军的时间也很长了，一直是做政治工作的。原来空军是两个副政委，一个是余立金，一个是王辉球，现在余立金不行了，那么就是王辉球吧。"

林彪听了很高兴，说："很好，提一个反对过自己的同志当政委也是很好嘛！你写个报告来吧。"

3月23日，周恩来就中共中央东北局机关群众组织要求将顾卓新、喻屏从北京揪回沈阳批斗事告陈锡联：22日晚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大家同意将顾卓新、喻屏交东北局机关群众组织带回

沈阳进行批斗，但必须告诉他们不要进行武斗和押讯。每日批斗后，如他们无力监视，即交军区监护。

3 月 23 日下午，聂荣臻办公室先后接到中央办公厅和军委办公厅的电话，说是今天晚上人民大会堂有重要会议，请聂荣臻出席。问会议的内容，回答是他们也不清楚。

秘书去找医生商量，几位专家的一致意见是以不出席会议为好。专家、秘书一起去向聂荣臻作了汇报。聂荣臻同意请假，于是分别向两个办公厅打电话请假。

快吃晚饭的时候，汪东兴亲自打电话给聂荣臻，希望他出席会议，内容要到会场才能告诉。

聂荣臻知道，准是出了大事，但是身体状况如此，他还是对汪东兴说："医生不同意我出席会议，自己感觉也不大好，还是请假吧。"

3月23日傍晚，离下班只有几分钟的时间，北京卫戍区机关大院里，传来了"今天晚上,毛主席接见卫戍区机关干部"的好消息。晚上23时过后，司令部、政治部、后勤部的干部整队进入大会堂。参加接见的还有中国人民解放军各总部、国防科委、国防工办、各军兵种、驻京各军事院校、北京军区部队所属各单位团以上干部、各军区参加在京"学习班"和开会的干部以及在北京参加 "三支""两军"的干部一万余人。

这个会议从晚上 21 时开始入场，等了近两个小时,大会堂的工作人员开始出现在主席台上,人们认为毛主席快来了。可是，

事情并不是这样，服务员们是将主席台上的桌子撤掉了一排。10分钟左右,服务员又把椅子搬了回来,摆放到原处。人们还没有反应过来,服务员上来又把椅子搬走了。这时大会堂里静得如同真空，空气好像凝固了，大家都在静观事态的演变。

## 第 981 回：三二四，京城军人开大会　林彪等，说明杨、余、傅事件

在人民大会堂等待开会的驻京军队干部一直等到了 24 日凌晨，领导们终于来了,首先出现的是李富春、李先念、陈毅、徐向前、叶剑英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但他们没有出现在主席台上,而是走在主席台下通道上,坐在了台下的第一排。聂荣臻因为心脏病的原因，没有参加会议。陈毅口袋里装着糖，他对叶剑英说："坐，吃糖。"

接着，主席台上，林彪带头，拿着《毛主席语录》出现在主席台上。紧跟其后的有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姚文元、谢富治、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汪东兴等中央文革碰头会议的全体成员，以及刚刚到北京的黄永胜。

他们在主席台落座后,林彪开始讲话，他用细如抽丝的声音说：

"同志们！（鼓掌）现在开会。今天这个会是要向同志们宣布中央最近的一个重要决定。最近我们党的生活中间，又出现了新的问题。发生了新的矛盾，发生了阶级斗争中间新的情况，这个问题虽然没有像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彭、罗、陆、杨那样大，但是比一般的其他的问题要大一些，所以主席说就是这样一个不大不很小的问题。这就是最近从空军里面发生杨成武同余立金勾结，要篡夺空军的领导权，要打倒吴法宪。杨成武同傅崇碧勾结要打倒谢富治。

杨成武的个人野心还想排挤许世友，排挤韩先楚，排挤黄永胜以及与他的地位相上下的人。

中央在主席那里最近接连开会，开了四次会，主席亲自主持的。

会议决定：

撤销杨成武的代总长职务。”

台下热烈鼓掌，高呼口号：

“坚决拥护伟大统帅的英明决定！”

“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郑维山在台前跳着脚的呼喊口号：“打到杨成武！”

林彪接着说：“要把余立金逮捕起来，法办！”

台下热烈鼓掌。姚文元站起来带头高呼：“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台下口号声：

“坚决拥护伟大统帅的英明决定！”

“坚决相信中央文革的领导！”

“坚决拥护中央文革的领导！”

林彪接着宣布：“撤销北京的卫戍司令傅崇碧的职务。”

又是一片拥护的口号声。

林彪：“由黄永胜同志当总参谋长。由温玉成副总长兼北京的卫戍司令。”

依然是热烈的掌声和口号声。

林彪说："同志们！生活就是矛盾。生活就是斗争。发展总是通过矛盾的斗争向前发展的，所以我们要看到，这个不是很稀奇事情。我们当然希望没有矛盾。然而矛盾是事物的客观规律。过去，现在，将来永远也不能消除矛盾，永远也躲避不开矛盾的，而矛盾只有通过斗争来解决。另一方面，当然尽量的、尽量的能够不变为严重的矛盾，使他不成为严重的情况。尽量希望我们的同志不犯错误，少犯错误，不犯大错误。尽量希望我们的同志更多地能够好好地工作。这一个愿望过去、现在都是毛主席一贯的思想，是一贯的对干部的关心。我们大家都是有着这种心情，希望不要出事，希望少出事，希望不出大的事。这是我们的心情，是我们的愿望。可是客观的规律，它总是矛盾的，它总要出事情的，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所以我们只有面对着客观，面对着现实，不隐藏矛盾，揭露矛盾来解决矛盾。脓疱只好让它探头，纸里面火总是包不住。因此我们只有面对现实，来解决它。"

他接着说："杨成武他只相信他一小撮的人，同他关系密切的人，而不相信别人。这个同中国革命的胜利的事实是违背的。整个的战争的胜利，就是最后的这个时期是几个野战军嘛，四个野战军嘛！一、二、三、四，四野嘛！晋察冀也是解放军的一部分，可是它仅仅是晋察冀里面的一部分，第一分区这一部分，其他还有三个分区。再拿老底子讲，晋察冀军区是115师的干部，就是115师的干部在这个地区放下了只四分之一，还有四分之三不在这个地方。至于后来四个野战军呢，有的有晋察冀的，有的

没有晋察冀的，有的有一分区的，有的没有一分区的。他只用他那一伙子，而其他的就采取排挤的态度。如果照他的一套啊，那我们就要把吴法宪拉掉，就把谢富治拉掉，把许世友拉掉，韩先楚拉掉。逐渐发展起来与他相同地位的这些人，黄永胜、陈锡联、杨得志都会被排挤的。所以我们选择了不能采取他的作法。第一，他是不对的；第二，他是少数。而其他的是多数，其他的是对的。所以权衡两个方面，我们采取不是打倒别人，就把他打倒的作法。”

林彪强调：“我们一方面要反对这种山头主义，反对杨成武的这种山头主义。但另一方面我们要注意两点：一点要注意不要因为反杨成武，而变成反杨成武底下的一切人，认识他的人，同他工作过的人和拥护他的人。”“经过打了招呼之后，能够摆脱与他的关系，站在毛主席的旗帜下，站在毛主席的司令部来，这种人我们是一百个放心来信任他们。所以我们不能因为这个问题打击这些与他同过事和拥护他的人，而观察他今后是不是还思想不能接受中央的这个决定，还拥护他，这种人我们就不能信任。”

江青领呼口号：“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万岁！”“向人民解放军致敬！”“向人民解放军学习！”“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林彪接着说：“是第一点要注意的。第二点，就是过去在总参或在总参以外，被杨成武反对过的，譬如像王尚荣、雷英夫、张爱萍等等。他们有自己的账。当时反对他们，批判他们，是做

得对的，是党领导的、党批准的、中央批准的。王尚荣、雷英夫是贺龙的人，是全面夺权的组成部分，夺总参的权、夺后勤的权、夺空军的权、夺海军的权，以及还有其它些地方，工程兵的权。我一下子记不起。但是呢，那一个斗争是一个正确的斗争，是把贺龙这一个篡军、篡党的野心家暴露了，把他的这些爪牙揪出来了，这个还是对的。揭露了很多严重事实。这些人不能够因为这些事情来翻天的。

批判了、撤销王力、关锋、戚本禹，这绝不是说‘二月逆流’的这批人可以翻天。当时反对‘二月逆流’是文化革命中间一个重要的斗争，是一个正确的斗争。打倒这些‘二月逆流’的干将谭震林等等，是必要的，不能因为这个事情来翻天。”

江青和谢富治再次领呼口号。

林彪接着说：“再一个就是杨成武是政治品质很坏，是一个两面三刀的人，是一个正如毛主席所说的‘阳奉阴违，口是心非，当面说的好听，背后又在捣鬼’。就是这种人。”

“他，大家知道的，以为他是反罗瑞卿的，实际上他是一个罗瑞卿分子，是紧跟罗瑞卿的，当面好像是反对罗瑞卿的，但实际上原来是罗瑞卿的；他参加了反对彭真的斗争，但实际上他是拥护彭真的。在斗争罗瑞卿的时候，他不同意写组织结论，不去提和杨献珍、杨尚昆的关系。所以你看他表面上以为他是反罗的，实际上他在袒护罗。他本来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中间讲了罗瑞卿问题，可是看了邓小平和彭真的发言是袒护罗瑞卿以后，他要求

撤回他的讲话

所以这种行为就是一种当面一套、背后一套，阳一套、阴一套，作了的事情都不承认，譬如说傅崇碧前一个时期，带着几辆汽车全副武装冲进文革的地点去抓人，这个事情本来是杨成武命令，擅自给傅崇碧的指示，但是杨成武不承认，傅崇碧做这个事情是不对的，但是杨成武在这个方面表现了他这种不承认做坏了的事情。”

“他为了一个问题，跟着几个同志去找聂元梓。他讲错了话，讲了坏话，可是事后他赖账，他说他没有讲。

在总参一方面说不要宣传他，但另一方面在底下布置宣传他。这都是一种两面作法。

他也反对贺龙在空军罢官夺权，可是他自己哪？就在空军罢官夺权。空军里面恰恰没有一个角色是晋察冀的，因此他就拉余立金来夺权，把同余立金的关系搞的很火热，利用男女关系同余立金结合。空军里面有一个秘书搞男女关系，他的老婆就出来告。这个秘书自己就要离婚。这种情况空军采取了措施防止出问题，就把这个秘书隔离起来，本来是好心好意的，为了保护杨成武的名誉，保护他的女儿的名誉。可是杨成武不但不感谢这种好意，反而乘着机会来打击吴法宪，而且要把空军党办里面几个揭出了这个问题的、接受了这个控告的几个人，控告他的丈夫的人的情况向吴法宪讲了，他就要把这几个汇报情况的人打成反革命。坚决地要吴法宪认错，坚决要把这几个人打成反革命，这种作法是

完全没有理由的，完全是欺侮人的，目的就是要把吴法宪打倒。他在空军里面就搞侦察，对吴法宪的一举一动。车子几点钟出去，到了什么地方，几点钟回来，他都侦察。

他同王关戚是勾结在一起的，很多王关戚的坏事情是有他的份的，他才是真正的一个后台。

表面上他对无产级司令部、对毛主席，是拥护的，但是实际上，他是对毛主席不忠诚的，对中央文革不忠诚的。并且用这种特务手段来侦察毛主席的行动，侦察江青同志的行动。

去年夏天主席要他去北戴河同我谈谈王、关问题，因为我当时身体有点不好，在北戴河住着，可是他不肯去，是经过主席再三催促才去的。所以你别看他表面上拥护主席，实际上不是那么回事情。”

“表面上他是拥护江青同志的，但实际上他是对江青同志不满的。江青同志有病的时候，他同戚本禹这些人早在去年春天，他们就搞江青同志的黑材料，实际上成立了专案来迫害江青同志。”

周恩来领呼口号：“谁反对江青同志就打倒谁！”“誓死保卫江青同志！”

江青：“向同志们学习！向同志们致敬！”

林彪：“很显然的，江青同志是我们党内的女同志中间很杰出的同志，也是我们党内的干部中间很杰出的一个干部，她的思想很革命！她有非常热烈的革命的情感，同时又很有思想，对事

物很敏感，很能看出问题，能发现问题，能采取措施。过去由于她多年身体不怎么好，所以大家不了解她，在这个文化革命期间，就看出她的伟大作用。她一方面忠实执行毛主席的指示，另方面她有很大的创造性，能够看出问题、发现问题。文化革命中间树立了许多丰功伟绩，固然是主席的领导，全中央文革同志的努力，党中央同志的努力，但是她是有她独特的作用，始终在这个运动中站在最前线。”

叶群呼口号：“江青同志是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

“整江青同志的黑材料的罪责难逃！”

“誓死保卫江青同志！”

“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

江青：“无产阶级专政万岁！”“伟大的人民解放军万岁！”

林彪继续说：“杨成武他在表面上看来是没有野心的人，但是实际上呢，他是有野心的。在八届十一全会后不久，杨成武就想把代总长的‘代’字把它去掉，他很不舒服这个‘代’字，而主席和中央早就看出他并不是一个恰当的人选，当时主席说走走看，行不行哪，当时实在是没有把握，再走走看。现在看来是主席看对了，是不行的。可是，他自己缺乏自知之明，还觉得自己很行，还觉得那个‘代’字不舒服，还想去掉那个‘代’字。在总参宣传和要树立他的绝对的领导，有的人不同意这种的提法，就被他进行隔离反省，拿三个人盯梢，盯着一个女同志。表面上看来他是不要名的，可是他争名争的厉害，不归他出名的事情，

他也去争一分。譬如说最近不久到上海去搞了一些材料 ，不归他署名的，他没出过力的，他也把他的名字拿来写上。”

林彪又提到那篇《大树特树绝对权威》的文章，从哲学理论的角度予以批判。

他最后说：“我的讲话，材料很零碎，东听一点，西听一点，不准确、不全，也没有很好的整理，也是信口开河，是把中央的决定告诉大家，知道是一回什么事。我要讲的三个问题就是这三个问题：山头主义，两面派，相对与绝对，真理的问题。”

林彪在讲话中提到杨成武等人去找聂元梓一事是指1968年1月15日，北大“井冈山”出版的第26期《新北大报》中，有涉及林立衡的内容，是这样写的：

林立衡同志是 1964 年春由清华转到北大中文系学习的。由于她身体不好，断断续续地请过几天假。林立衡同志对自己要求很严格，她努力补课。到 64 年 11 月，请假的时间也才 17 天另 32 节课，林立衡同志向学校写了请假报告，叶群同志也为此事向北大写过一封信，说明林立衡同志的情况。叶群同志的信是这样写的：

中文系向主任：

林立衡因严重失眠，经常要到医院去看病和白天补一点睡眠（她这次上学是在北京医院住院才出来就进北大的）所以有些课没有上，例如文学史、通史、写作、体育、古代汉语，但她都在事后向同学打听听讲课内容，进行了一些补课。特此证明。

此致

敬礼

叶群（章）

很明显，叶群同志是希望林立衡同志能留在北大继续学习的。林副统帅对此事也很关心，林副统帅的秘书曾多次到北大关照林立衡同志的学习问题。

中文系把林立衡同志的情况的汇报和叶群同志的信交给学校处理。身为教务长的崔雄昆，大权在握，根本置林副统帅和叶群同志的意见于不顾，看了叶群同志的信以后，怀着对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刻骨仇恨，恶狠狠地批道：

我意按规定办事，该休学就通知休学，否则对本人也不好。

崔雄昆

1964.11.23

是否请示校长？

事实上林立衡同志请假才 17 天另 32 节，即使按照陆平黑帮的所谓的规定，也谈不上休学问题。但是，为了配合刘邓黑司令部迫害林副统帅的反革命活动，崔雄昆撕破了“规定面前人人平等”的遮羞布，暴露了狰狞的面目。

“是否请示校长？”这是一句耐人寻味的话。崔雄昆要破例地请示陆平，不仅表明了崔雄昆想在陆平面前表示自己反革命立场的坚定性，而且表明，逼迫林立衡同志休学，已不是一般的学

籍处理问题，而是一起有组织有计划的反革命事件。

陆平看了崔雄昆的批示，马上就批道：“应按规定办事。”看，这两个混蛋就是这样一唱一和，狼狈为奸。就这样林立衡同志被万恶的陆平黑帮和三反分子崔雄昆赶出了北大。

聂元梓和校文革的人看到这份小报后，认为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健康情况和家庭情况都是绝密的，“井冈山”这样随意泄露有问题的，于是让赵建文到街上买了两份《新北大报》。卖报的小孩看他一下子买了两份报纸，非常高兴。

赵建文将这两份报纸装入大信封，通过学校机要交通，送到中央军委。中央委派杨成武处理这件事。他在人民大会堂一个小会议室召集谢富治、汪东兴、丁国钰、李钟奇和聂元梓等北大校文革的几个人开会研究如何处理此事，并在会上谈了处理的意见。

林彪讲完话后，周恩来讲话，他首先表示：“我完全拥护林副主席刚才宣布的我们伟大领袖、伟大统帅的英明的决定和命令！”“我完全拥护我们伟大领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的英明指示！”“我们要以无限的忠诚，坚定的立场，坚决地、不折不扣地执行我们伟大领袖的命令和林副主席的指示！”“我们要永远忠于毛主席，要永远忠于林副主席，要永远忠于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我们要永远忠于中央文革！”

他说：“这一次事情还在继续揭发，我们甚至于要研究，要在座的我们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同志们，你们继续揭发，有可能在

杨成武后头还有黑后台。整个这件事情，在我们整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中，是会查清楚的。”

周恩来特别强调：“在这里，我提几句江青同志在中央文革所起的作用。江青同志是一个坚强的共产党员，无产阶级战士。她不是从今天，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三十年代她就是一个坚定的共产党员，就是一个同叛徒，同假共产党员、特务和社会的反动派作斗争的一位坚强勇敢的女战士。（热烈鼓掌）如果说现在或者是两面派或者是特务、坏分子，他们所谓收集江青同志那个时候的材料，有两种，一种是江青同志自己为战斗所写的东西，那不是什么黑材料，那是红材料，革命的材料！（热烈鼓掌）至于国民党社会上，那时候是反动派统治着，那时他们写的东西，污蔑、造谣、迫害，那都是反革命的东西，把那些东西如果拿出来，作为黑材料，那你要在哪个地方登？江青同志自己说的很清楚，那就是台湾的话，香港的话，就是应该被打倒的那些人的话，那有什么黑材料？三十多年以前，江青同志成了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和学生。得到毛泽东思想长时期的修养、学习和锻炼。经过了战争的年月。解放以后正是江青同志身体很差的时候，受到党内一小撮走资派的代表人刘、邓、陶，彭德怀，贺龙，彭、罗、陆、杨，谭震林等等，以至受到肖华的迫害。尽管如此，江青同志坚强不屈，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在我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准备阶段，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教育的时候，进行了文艺的改革，大家都知道，1964年演出样板戏八出，

都是经过江青同志亲自指导、修改出来的。到了1966年要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了，反革命、叛徒、内奸彭真写了个《二月提纲》，可是江青同志得到了林副主席的委托，写出了革命的《二月座谈纪要》，这是我们人民解放军大家都人手一册，读过的。所以，在文化大革命以前，提一提她的成绩的一两点，就足以证明江青同志的伟大成绩。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刚才提到，她还有很多的著作，还有很多的演说，现在印成了小册子，大家都读了的。这就看出江青同志是我们党内杰出的女战士，杰出的共产党战士！值得我们向她学习！向她致敬！”

江青：“功劳归于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台下口号：“向江青同志学习！”“向江青同志致敬！”“誓死保卫江青同志！”“谁反对江青同志我们就打倒谁！”

## 第 982 回：毛泽东，接见众与会人员　再转移，杨成武定居洛阳

然后，江青讲话，她说："我现在只想谈一谈我对这些两面派、阴谋家、个人野心家的认识过程。我并不是一下子就识破他们，也并不是一贯正确的。

例如刘少奇，他一贯封锁毛主席，其实他是一个四次叛变的大叛徒、大特务、大内奸。我们是有红卫兵小将、无产阶级革命派送了大量的材料，然后又设立专案组，有确凿的证据，有大量的旁证，这是铁证！叛徒、内奸、特务。他那个鬼老婆王光美是一个美国的大特务，战略特务，战略情报特务。

像王、关、戚，我们过去是不知道的，他们原来就是中央文革当时起草小组的时候，是刘、邓他们安插进来的，他们就是刘、邓、陶、彭、罗、陆、杨的黑秀才，打着"红旗"反红旗，他们许多事不请示伯达同志，也不请示我，更不请示毛主席、林副主席，他们封锁，并且把我们架空、架空，使我们和同志们隔离，和小将们隔离，干了许多坏事。他们的罪恶就是我去年九月五号讲的，妄图动摇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他们想妄图打乱我们的人民解放军，他们妄图破坏新生的革命委员会，我们把他端出来了。当时，我们为了受蒙蔽的、受迷惑的群众，我们很谨慎地采取了分割政策，我们大家讨论，并且向我们的毛主席请示了。但是王、关，我们分割不开，戚本禹的作法跟他们不一样，我们希望他能够回头，但是不然。到了下半年，

戚本禹更猖狂了，出现了许多不正常的现象。在原则问题上，我们是摆到台面上和他们进行了斗争的。例如去年十一月九号和十一月十二号两次文艺界的座谈会，我就是不点名的批评戚本禹的。

又例如，有的人勾结起来，像杨成武之流，口头上说，中央文革怎么样、怎么样。而实际上做了很多事情欺骗中央文革，。又例如，杨成武去年写了一篇什么叫做《大树特树毛主席的绝对权威》，实际上他想树立他自己的绝对权威，他才是一个‘一言堂’呢。为了这个问题，我反对过他两次，我是跟他正面的原则问题上进行斗争。发展到今年，几号我忘记了，不得我们的允许，冲到中央文革的住在地区，不得组长、副组长的同意，当时组长请示我们的这样一个很短的时间，他就冲进去了。身为司令，卫戍司令，破坏人民解放军的纪律，目中没有党中央、没有中央文革。昨天我才知道是杨成武三次指示他进去的，两部车子，当时我就赶过去，我说：“你，卫戍司令，不得我们的批准，是不是来捉人呀？！”我现在才知道，他果然是去捉人去了。这样的事情能够允许吗？！就从那一天我坚决抵制了他以后，傅崇碧就赖账，杨成武就突然间‘病了’，一个‘病人’天天会客，天天去那儿干两面派的勾当，进而进行夺吴法宪司令员的权，这就是夺空军的权。同时他支持一些受蒙蔽的革命小将来想打倒谢富治同志。谢富治同志跟我一样，可能有缺点、错误，也许有比较严重的错误，但这是一个很正派的同志，这允许吗？！

打倒谭震林！打倒谭震林！！打倒谭震林！！！我之所以有气，一、我曾经保过他，二、现在我们有确凿的证据，谭震林是个大叛徒。”

接着是陈伯达讲话，他将这次事件说成是文化大革命的第五次胜利。他说：

“第一次的伟大胜利，就是揭发了彭、罗、陆、杨斗争的伟大胜利。

第二次的伟大胜利，就是打倒刘、邓、陶。

第三次胜利，我们就是在毛主席英明领导下，把“二月逆流”击溃了。

第四次，我们把刘、邓、陶留下的一些爪牙，隐藏在文化革命小组里面的几个小爬虫——关、王、戚或者王、关、戚揭露出来了。

第五次胜利，就是把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揭露出来了。”

当然，他也没忘了把《大树特树》那篇文章的责任推到杨成武和戚本禹身上。

康生在讲话中说：“这些胜利的取得，在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的指导下面，应当说江青同志起了巨大的作用，树立了特殊的功绩，因此，我们在这胜利的时候，应当向江青同志学习！向江青同志致敬！”

24日凌晨1时35分，毛泽东来到会场，林彪向大家说：“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来接见你们了！”顿时全场沸腾起来，长时

间的不断高呼："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齐声高唱《大海航行靠舵手》，然后江青领唱《国际歌》。最后，林彪宣布："会议结束，散会。"

会后，社会上立即掀起了"打倒杨余傅"的风潮，大字报铺天盖地，甚至贴进了中南海，也贴到了中央军委西山招待所的大门外。

当天上午，叶剑英去看聂荣臻，将会议的情况对他说了。

叶剑英说："他们太不像话，不仅这样的大事我们事前不知道，而且这次会议的座位安排上，他们也耍了花招。富春、先念、陈老总、向前等，我们虽然都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但却不准在主席台上就座，一律坐在台下。其余的政治局委员和中央文革的成员却坐在主席台上。""下一步要揪什么黑后台，我们这些人当然又是揪斗的对象咯。"

说完，叶剑英笑着说："揪就揪吧，反正就是这么回事。"

聂荣臻说："杨成武、傅崇碧都是我的老部下，他们要揪后台，肯定是会大做文章的。揪就揪吧，昨天接连打电话，要我去开会，原来是这么回事。"

听了两位老帅的谈话，秘书这才觉得昨天早晨那个电话的性质严重，就如实向聂荣臻作了报告。

聂荣臻也觉得奇怪，叫把情况进一步弄清楚。

于是，保健医生写了比较详细的证明材料，并作了分析：认为"可能是杨成武的保健医生叫他爱人(也是医务工作人员)打的

电话。因为杨成武的保健医生认识聂荣臻的秘书，也知道西山的电话。”

聂荣臻给中央文革写了封信，附上保健医生的说明和分析。

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被监禁数年，与“鲁迅手稿案”有关的一些人也受到牵连。傅崇碧的秘书冯正午、北京卫戍区副司令员刘光甫、副政治委员周树青等先后分别被拘留、逮捕、隔离反省、离职检查。

王广宇在狱中被关 7 年，多次受到严刑拷打，曾自杀未遂。1975 年 5 月放出后送到湖南一农场劳动。和他一起被抓到监狱关了 7 年的还有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总支书记王道明和工作人员周占凯，那是 3 月 24 日晚上 19 时多，江青和周恩来、康生、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在钓鱼台 16 楼会议室开会。中央警卫局二处的警卫人员将王道明、周占凯叫进会议室，随后就把他俩人的领章和帽徽撕下来了……

江青训斥王道明：“你胆够大的！你竟敢接受戚本禹的旨意迫害许广平？是什么目的？”

原来王道明、周占凯曾经受戚本禹指派看望许广平，告诉她：“你要注意，你要跟郑公盾划清界线，郑公盾是特务，你不要跟潘梓年、郑公盾有联系，他们都是特务！”

江青问王道明有没有受戚本禹指使到许广平家去过？

王道明如实说：“有。”

江青发了很大的脾气：“带走！”

然后警卫二处的警卫车就把他俩人带走了。

王道明是解放军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刺杀能手，沈阳军区标兵连指导员，当年讲“拼刺刀的辩证法”，在各大报纸发表文章，很有名气。周占凯也是一名优秀的解放军基层干部。他们都是“文革”初期调到中央文革小组办公室工作的。谁知调到令众人羡慕的文革小组工作后，竟在监狱里度过了 7 年光阴。他们也是在 1975 年 5 月才出狱。

被抓之前，王道明看到戚本禹、阎长贵、矫玉山等出事，已经吃不好睡不好了，整天心神不定，唉声叹气，话也不多。因为办事组工作人员中他最小，戚本禹给他起名叫“王小兵”。那一段，王道明的精神状态特别不好，人们都说“王小兵你不能这样啊，你是总支书记。”他说：“唉！什么总支书记呀！”因为好几个人陆续被抓，他预感到事情不好了。

王道明因此受刺激后来得了精神病，出狱后回鞍山他父母家了。

把王道明、周占凯带走以后，紧接着把保密室卜信荣叫去了，江青训斥卜信荣：“为什么这个事情不告诉我们？这么大的事瞒着！”

卜信荣说他不知道那几个箱子里有什么东西。确实他不一定知道，因为鲁迅手稿在保密室铁柜子上边的几个箱子里，是戚本禹带着中央文革调查组的韩树信从文化部取来放到保密室的。江青狠狠批卜信荣一顿，吓得他直哆嗦，在场几个中央文革小组的

工作人员也很害怕。因为和他们一同工作的王道明、矫玉山、张根成等都被拘留了。

同意傅崇碧一行进入钓鱼台的陈伯达秘书王保春也受到薄惩：江青通过陈伯达要他两次做检讨，并将检讨在政治局常委中传阅，还对陈伯达说："照顾你的面子不逮捕他，但他不能在钓鱼台工作了！"王保春因此被逐出钓鱼台。

杨成武被送到武汉后，只住了一个星期就暴露了。很快，武汉的红卫兵准备包围杨成武的住地，把杨成武抓走批斗。湖北方面赶紧将杨成武从东湖宾馆的地下室转移到山坡机场，同时向中央文革报告。经中央文革碰头会议研究，决定将杨成武转移到湖北孝感。没有多久又被转移到河南洛阳龙门。

从被砖块堵起的窗户缝中，杨成武看到了著名的龙门石窟。两面青山，一泓碧水，依山而建的洞窟依稀可辨。他虽然没有来过这里游览，但对汉代著名的八大关之一，白居易自号"香山居士"，蒋介石修的寺内行宫，杨成武都早有耳闻。他判断出被监禁在洛阳香山寺内。家人虽然来到了这里，但他们一家人都没有自由。门口有持枪的战士站岗，负责看押的人十分严厉，为杨成武一家规定：一、不准出房门，更不准下楼梯；不论春夏秋冬各处房门不得关闭。二、饭食定量，不够不添；每星期每人必吃两次忆苦饭。……这一切与周围如画的风景相比，形成十分强烈的反差！

杨成武要来了纸笔，一次又一次地给毛泽东写信："毛主席，

我有心里话要对你讲。”

信交上去了，都石沉大海。事后杨成武才知道，他写的20多封信全部被扣押了，并被下令焚毁。但一个人把这些信秘密地收藏起来。

杨成武的女儿杨毅，已经不能继续在《空军报》工作，空军把她调到四川的一个航校当干事。但是杨成武的事情对她刺激太大了，她到了四川不久就吞服安眠药自杀，好在发现及时被抢救了过来。杨毅自杀的这件事，吴法宪报告了林彪。林彪说：“那就把她送到杨成武那里，让他们全家住在一起吧。”按照林彪的意见，吴法宪派人把杨毅送到了龙门。

3 月 25 日，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向林彪报告：“中央文革碰头会议讨论过新的军委办事组名单，拟了 5 个同志，现先送上，请考虑是否妥当，并请在您考虑后，向主席报告请示。名单：黄永胜组长，吴法宪副组长，叶群、李作鹏、邱会作。”

当天，林彪批示：“呈主席批示。”

毛泽东批示“照办”。

这天，林彪找黄永胜谈话，吴法宪和邱会作也在场。林彪说：“去年 3 月间，全军文革快垮了，江青几次提出要健全全军文革，我都没有表态。要是恢复全军文革，就会有人插手军队，找他们的代理人，军委常委的工作也难以恢复，这其中的核心问题是请谁管事的问题。叶帅管事，军队喜欢，他们反对；徐帅管事，他们喜欢，军队不喜欢，只好临时先用个小组管大事，这个方法靠

得住。”

3 月 25 日，江青给温玉成写了一封信。这封信送到北京卫戍区收发室时，收发室的人说：“我们这里只有一个傅司令，哪里又来了一个温司令!”他们把江青的这封信退了回去。这个情况反映到江青那里后，她大为恼怒。就在当天晚上的中央文革碰头会上，江青提出，要单独召开一个卫戍区的干部和地方干部一起参加的会议，对“杨、余、傅”问题进行传达。于是，中央文革碰头会又决定召开第二次大会，专门传达中央 3 月 22 日的两个命令。另外，会议还决定，这两项命令都发到部队团以上单位，并向全体指战员宣布。

“杨、余、傅事件”以后，叶群对吴法宪说：“要防止‘后院起火’，你要把陈绥圻调到空军来，替你管管家。”

不久，叶群就通过军委办事组，把当时任中国民航局生产计划处处长的陈绥圻调到了空军，任“吴法宪办公室”主任。与此同时，对黄永胜、李作鹏、邱会作的妻子，也同样作了相应的安排。

## 第 983 回：围北大，北京军区批“山头”　办事组，军委常委不开会

北京月初的“倒谢”风潮，此时已变成一片“倒聂”的声浪。面对这一形势，3 月 25 日，谢富治在北京市革委会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检讨说：“我们开办的大专院校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这是一件大事。在学习班中，也是同样没有抓好两个阶级、两条路线、两种道路的根本问题。虽然我在两次讲话中也提到把矛头对准刘、邓、陶、彭罗陆杨，但讲得不够，几句话就过去了，讲的很多的是放在派性，小将犯错误的问题上，所以同志们有意见是对的，批评的是对的。学习班办得太死，当然在那里的军队干部做了很多工作，错误是发生在领导人的身上。”“右倾机会主义、右倾分裂主义是当前主要危险，我就很晚才知道主席这个精神。我们一直在搞反派性，已经很危险。”他还表示：“学习班要做检查”。 并说：“打倒聂元梓是错误的”。

当天，北京大学“新北大公社”广播站在校园内又重新播放了批评学习班的大字报稿。

下午 13 时，北京地质学院，北京师范大学，北京林业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农业大学，北京邮电学院等 7 个学校的“东方红”组织近万人开着宣传车，从北京大学的南校门，西校门，东校门，西南校门涌入燕园，在北大校园里举行反聂元梓、孙蓬一的游行。

北京大学赶紧给正在北京市革委会开会的聂元梓打电话，告

诉她有很多外校的学生到北大来搞武斗，让她赶紧回校。

聂元梓没有马上回去。因为此时北京市革委会的会上正在批评她的“右倾”“保守”，她觉得现在离去似乎不太合适，会让被人说她是逃避批评。

过了一会儿，北大的电话又打过来，说：“外校的学生要抢占学校的广播台，广播台的门都挤坏了，形势非常危急，你赶快回来吧！”

聂元梓还是等到会议结束才离开。当她乘坐的汽车从白颐路刚到中关村时，就见南校门一带，都是外校的学生，有从南边的白颐路方向过来的，有从北边的成府路方向过来的，都汇集在中关村向南校门拐弯的路口，拥挤得水泄不通。

聂元梓坐的汽车没法通行，就顺着中关村向北，想从东校门进北大。在蓝旗营附近汽车还能走，到了东校门拐弯处那里，已经是人山人海，学生像潮水般地涌进北大东校门。人太多了，汽车走不了，聂元梓让车调头，她自己下了车，看到数不清的人群，前浪推后浪地往北大校园里涌。

局面如此混乱，聂元梓自知靠自己的力量肯定无法掌控局面。她认定这件事的后台是谢富治，决定上车回去找谢富治，让他来解决。

因为人多拥挤，汽车掉头用了很长时间。当她赶回市革委会时，只看到吴德、丁国钰在办公室。火气难耐的聂元梓劈头就问：“谢副总理哪里去了？”

“回去吃饭了。”吴德他们告诉她。

“吃完饭他还回不回来？”聂元梓问。

“他马上就回来。”

聂元梓气呼呼的坐下来等着谢富治。越等越气，忍不住又质问起吴德、丁国钰：“北大今天来了不知道有多少个学校的学生，每个校门口都是拥挤的人群，进都进不去。”

她又说，“去年春天的北大武斗，是周景芳支持地质学院王大宾搞的。现在，王、关、戚抓起来了，周景芳也被关起来，这一次的武斗，是谁指使的？”

在她的咄咄逼人的质问下，吴德有气无力地拉着长腔说：“不知道。”

丁国钰没有吭声。

等了一会儿，谢富治还没有回来。聂元梓就说：“谢副总理不回来，那你们两个人和我一起解决问题吧。”

吴德二人都不做声，三个人就憋在那里。

正在这时，谢富治回来了。聂元梓腾地站起来，指着谢富治的鼻子质问道：“谢副总理，你对我有意见，你认为我有错误，可以批判，可以把我抓到卫戍区，你为什么让成千上万的学生到北大去打武斗？你必须跟我一块去制止武斗，否则你要对武斗负责！”

谢富治莫名其妙的问：“你怎么这样说？”

“那你说，今天的武斗谁搞的？这么多学生，同一个时间到

北大，都提着棍棒刀枪，现在都快打起来了。你必须和我一起去制止武斗去。”聂元梓不依不饶。

谢富治说不去。

“你不去也不行，”聂元梓说，“我现在在这里是叫你们去制止武斗，就是北大打起来，也不能把制造武斗的帽子安在我头上。”聂元梓怎么想就怎么说。

她又接着叫板：“我是要求市革委会去制止武斗啊！你不在场的时候，我叫他们两个人跟我去制止武斗，他们不去，你来了，我叫你跟我去，你又不去，那学生打起来，你们都得负责任！”

谢富治急了，悻悻地说：“好吧，我跟你去，我不怕死！我和你去制止武斗！”

于是，他们一起去了北京大学。聂元梓怕谢富治半路溜了，还特地上了他的车。丁国钰和吴德也不声不响地坐着车子跟了过来。

一路上，聂元梓坐在司机旁边，不理谢富治。走了一阵子，还是谢富治先说话了：“你知道不知道，你当市革委会副主任，还是我给毛主席提议的呢。”

聂元梓一点儿都不领情，很冷淡地说，“不知道。谢谢。我当不了。”停顿了片刻又说：“我今天是请你来帮助我制止武斗的。没有别的意思。”

车子走到白石桥，离北京大学不远了，谢富治无可奈何地说，“你真厉害。你倒不了台。”

聂元梓依然只是说："我不怕倒台，我今天是请你帮助我来制止武斗的。"

谢富治、吴德、丁国钰他们赶到北京大学，直奔学校的广播台。广播台前早已拥挤得水泄不通。听说谢富治来了，学生们主动闪开一条道，让他们过去。就那样，人都多得很难通行。广播台的门已经被外校学生砸开了。谢富治在这里对北京大学发表了广播讲话，明确表示支持聂元梓，并说"新北大公社"给他提意见，他热烈欢迎。同时严厉批评北大"井冈山兵团"，不应该提出"誓死保卫谢副总理"的口号。他说：那个口号是错误的，是庸俗的，他也是从来就反对的。他表态反对武斗，要求"所有外校外地学生一律退出北京大学"，并严肃指出："到北大来武斗是错误的"，"打倒聂元梓的口号是错误的"，"希望北大两派在校文革的领导下，在聂元梓的领导下，让大家联合起来，紧跟无产阶级司令部、党中央、中央文革的战略部署走。""我们坚决打倒两面派、山头主义、分裂主义、右倾机会主义。"

谢富治一讲话，外校的学生呼啦啦都散了。

此时，北京大学两派互相攻击虽然加剧，但是仍在一个食堂吃饭，在原来宿舍睡觉，相安无事。白天双方互相贴大字报，晚间就由双方的广播台对阵打口仗。晚饭过后，夕阳西下，"新北大广播台"的声音开始响彻校园。它的声音刚落，浑厚低沉的"井冈山广播台"主题歌"西江月：井冈山"缓慢升起："山下旌旗在望，山头鼓角相闻，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

动……”“井冈山”的男主播傅成励后来成为中央广播电台的主持人，金话筒奖获得者。

双方广播台的高音喇叭，最初都是架设在路灯的电线杆子上或者路边大树上的，两派喇叭混合架设，各吹各的号，各唱各的调。偶尔会有一些小动作，是把对方喇叭的两根音频传输塑料电线在一些树丛里或者其他隐蔽处用一根大头针插进去短路掉，这样不但使这个喇叭不响，整条线路也成了哑巴，扩音机也因超载而无法正常工作。这种短路非常隐蔽，用普通肉眼巡查线路的方法即使走到面前，都难查出故障所在，只好把整段几百米电线一起换掉拿回去检查。为了防止这种破坏，后来就把高音喇叭安放在各派学生居住的宿舍窗外，由同学兼作线路和喇叭保护人了。最后，干脆将各自的高音喇叭全都安放在楼顶。9 个一串，如同糖葫芦一般，可以三百六十度旋转，想朝哪个方向定向播音，就向哪个方向播音。“新北大公社”的头头被骂的是聂元梓，“新北大井冈山兵团”的头头被骂的是牛辉林。这边的高音喇叭上挂了一串破鞋，叫嚷着“聂破鞋和她的徒子徒孙们”，那边则是“牛头山的蒋军弟兄们，不敢来进攻我们就不是牛种”。叫骂之声，西至颐和园，东至五道口，方圆十几里内都听得清清楚楚，天天不绝于耳。

口水战中，高音喇叭就成了对立面的眼中钉，必欲除之而后快。而拥有高音喇叭的宿舍楼，自然也就成了对方进攻的目标。开始，“公社”仗着人多势众，趁“井冈山”不备，蜂拥进另一

派的楼，进行破坏。此时“井冈山”就火速叫来援军反攻报复。

后来局势变得紧张起来。最先感到紧张的是双方的喉舌广播台。“新北大公社”广播台是用原北京大学广播台机房和设备，位于大饭厅舞台后台上。而“井冈山”广播台是五派大联合后，设立在宿舍 28 楼 4 楼西北尽头 459－462 四所房间里，编辑、播音、机务都在这四个房间里。本来，28 楼和其他各楼一样，是两派合住的。于是就产生了一个问题，似乎任何人都可以走进“井冈山”广播台的机房和播音室。所以到了 1968 年 3 月后，北大“井冈山”把 28 楼 459—462 这四个房间外的四楼楼道砌了道墙整个封死，然后在 362 房间和 462 房间门口的走廊地板上打个洞，架了个梯子以解决广播台的出入问题。这样一来，出入广播台就必须由 3 楼爬梯子上去，外人进出就不方便了。此时，“井冈山”把主要的高音喇叭也架设在 28 楼楼顶平台上，朝向四周，从机房到楼顶也是同样打一个洞，只有通过这个洞口爬梯子才能接近喇叭。这样易守难攻，加大了广播台的自卫力度。

就在3月25日北京7所高校“东方红”涌入北京大学，被谢富治广播讲话劝走后的当天深夜，“新北大公社”的“钢一连”在王钢带领下，攻打了“井冈山”广播站。此事正好被“新北大公社”驻北京市“红代会”代表、北京大学中文系三年级学生马云龙看见，他无法制止，便在3天之后在北大三角地贴出大字报，声明反对校文革和“新北大公社”总部挑起武斗，声明辞去“新北大公社”驻“首都红代会”代表身份，声明退出“新北大公社”，

以示抗议。马云龙对朋友讲，“‘钢一连’胡来，孙蓬一昏了头。武斗会死人的，我才不会去替校文革背黑锅呢。”

第二天，3月26日，“钢一连”在王钢带领下，又占领了29楼，把楼里“井冈山”一派的学生都赶走了。当天“新北大公社”作战部开会，负责人索世晖破口大骂孙蓬一，说他扩大武斗，是“胡闹”、“混蛋”。批评孙蓬一挑起武斗升级是绝对错误，但也很无奈。

26 日当天，地院“东方红”几百人手持木棍，从北京大学的东、西、南校门再次闯进，与“新北大公社”发生武斗，但很快被赶走。

3月26日，北京军区根据林彪关于北京军区党委立即召开全委扩大会议，批判“晋察冀山头主义”、“华北山头主义”的指示，召开军区党委第十二次全委扩大会议，师以上单位的主要领导干部参加了会议。

当天夜里,天安门广场出现了巨幅标语：

“打倒杨余傅!”

“打倒二月逆流的新反扑!”

3 月 27 日下午，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的首都“彻底粉碎‘二月逆流’新反扑，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誓师大会”，10 多万人参加。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姚文元、谢富治、黄永胜、吴法宪、温玉成、叶群等出席了大会。大会由陈伯达主持，周恩来亲自宣读了 3 月 22 日撤销杨、余、傅职务

和任命黄永胜、温玉成的两个命令，然后江青讲话。她在讲话中再次提到刘少奇、谭震林的叛徒问题，还点了余秋里的名。她说："刘少奇是四次被捕、四次叛变的大叛徒，是内奸，是大特务。王光美是一个美国大特务，而且是战略情报特务。"

"去年二月以黑干将叛徒谭震林为代表跳出来替他们翻案，因为这个斗争是在很小的范围内进行的，广大群众是不知道的，因此别有用心的人就蒙蔽革命小将、革命群众，颠倒黑白，说什么谁反对余秋里，什么就是反对总理，就是反对毛主席，真是颠倒黑白。事实上余秋里是贺龙的心腹，但是主席伟大、宽宏，要一批二保。""对余秋里要一批二保，这是我们的毛主席告诉我们的，我们现在还是要做，但是革命小将就不要上他的当了。"

"谭震林是叛徒。我保过他，现在我要喊，打倒谭震林！他是刘邓陶的黑干将，现在有确凿的证据他是叛徒。"

她还特别说到聂元梓："聂元梓是有缺点、错误的，要批评她，但是要保护她。"

这天的大会，北京大学全校人员，包括两大派大都参加了，校内安静。上午 10 时许，北大"东方红"的头头樊立勤在校园里突然被"新北大公社"的人强行绑架抓走。

3 月 27 日晚上，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同徐向前等几位老帅谈话。谈到 1967 年的中央军委《八条命令》时，毛泽东说："我们都是事后诸葛亮，现在看来，当时没有个《八条》是不行的。但是，《八条》下达后，下面抓人确实多了点，比如四川、武汉。"

3 月 28 日，林彪、周恩来到毛泽东处参加接见黄永胜、吴法宪、温玉成。毛泽东问办事组现有哪几个人，黄永胜等回答后，毛泽东说："还可以增加刘贤权。政工小组可以考虑取消。今后军委办事组由林副主席直接捏到手里。"

又说："军委办事组要订个制度，至少一周到林彪同志那里汇报一次工作，一次谈一两个钟点。有事无事都要去，除非林彪同志身体不好。过去我们两个处在第二线，让他们去搞，他们也不汇报，搞封锁，实行隔离，隔离不反省。"

林彪说："不了解情况。"

周恩来说："军委常委不要开会了吧？"

毛泽东："军委就是办事组。军委常委可以不开会了。"

林彪说："把它悬空起来。"

谈到部队干部问题时，毛泽东说："先作小调动，后作大调动。一个军区里面也可以调动。大调动就是从这个军区调到那个军区。在一个军区住久了，家当大了，就调不动了。聂凤智不要停职，叫他学习，像陈再道一样。"

聂凤智，时任南京军区副司令员兼南京军区空军司令员，正被群众斗得很厉害。

谈到军队干部学习班时，毛泽东问："学习班什么人在搞？"

此时，地方和军队干部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的事实际一直是周恩来在抓。毛泽东说："总理以前 20 多个秘书，减到 18 个，现在有 4 个。身边人不要多，要精干。"

后来，中央另成立干部毛泽东思想学习班领导小组，林彪任组长，陈伯达、江青、康生任副组长。

## 第 984 回：三二九，北大首场大武斗　气难平，聂元梓燕园遇刺

3 月 28 日上午，北大爆发武斗，一直持续到晚上。下午，两派的大喇叭又开始了相互攻击：都说是对方挑起武斗，表示强烈抗议……

吃完晚饭，许多同学感到大难即将来临，却又不知如何是好？只能静等灾难的到来。

约 20 时，“新北大公社”头头逐个宿舍通知：“‘井冈山’要挑起大规模武斗，大家要有准备。”

而“井冈山”这边也传言说“新北大公社”要发起进攻。“井冈山”总部安排各纵队派人前往 28 楼“井冈山”总部执行保卫任务。

3 月 29 日凌晨 1 时，用长矛、柳条帽、黄色军棉袄统一装备的“新北大公社”武斗队突袭 31 楼，轰赶住在那里的“井冈山”派学生。

31 楼是工字形的，这里住的主要是化学系的学生。为了避免出现同班的对立面同学互相见面的情况，攻打 31 楼的武斗队人员由非化学系的 09 系同学组成。怕他们不了解 31 楼的住宿详情，事前在有“井冈山”同学居住的房间都做好了记号。29 日凌晨，他们首先切断 31 楼男生宿舍的电源，然后从 31 楼南门进入，在这幢南北长条的四层楼内，开始由北向南，逐屋、逐层地驱赶对立派学生。

“公社”的人用长矛捣门，石灰包哗哗地从气窗扔进来。

住在一楼的是化学系三年级的男生，他们早已自行调配了宿舍，人以派居，室以派分，从此不相往来。当他们听到门外砸门的声音后，立即从窗户跳到了楼外。

住在二楼的主要是化学系四年级 1 班和 2 班的男生，是“井冈山”的主力与骨干 0363。听到砸门声后，他们只能翻过窗子，扒着窗台，悬下身体，跳楼逃命。

213 室住着 5 位“井冈山”的学生。那段时间，他们怕夜袭，有些防备：睡前用床把门顶上，窗内暖气片处还拴着一条绳子，另外还备有一些石灰包等等。但是，3 月 28 日晚上，他们却松懈了，床并未顶门，暖气处的绳子也不知去向。当听到“公社”的人长矛捣门时，门已被推开。两个住下铺的同学赶紧推桌子把门抵住，但很快又被推开，随后推过去又被推开，反复几次，最后 5 人合力把门顶紧，但门的两层胶合板已被长矛捅穿。他们 5 人赶紧一个接一个从窗户跳下二楼。213 的窗外，正是 31 斋工字楼的北面阴面角落，离垃圾道不远，比较僻静，不被人注意。所以，他们 5 人得以安全逃脱。其中一人立即跑到 28 楼“井冈山”广播台，向总部报告事态……。

住在 212 室的同学也准备跳楼。但是，看见窗下面靠楼门有一两个人拿着长长的棍子样的东西站着，可能是长矛，心想别跳下去以后再被人用长矛扎几下，那可就玩完了。还没拿定主意，对方就攻打进来了，只好听命令走出房门，向 31 楼北门走去，

一路上被人用棍子打了不知道多少下，出了北门以为会被押送到对方的据点去，就自动向西方走去，没走几步突然发现没有人押送，大喜，就自己跑了。

住在二楼的化学系四年级 1 班和 2 班共计 17 名“井冈山”派的同学跳楼逃生。其中 6203－2 班住 213、214 室的全部跳楼，住 218 室的同学也跳楼逃生。1 班 1 名同学跳楼时手腕摔断，1 人跳下后被人用长矛刺成气胸。2 班住 217 的 1 名同学跳楼时腰摔坏，213 室 1 名同学跳楼时只穿着背心裤衩。

住在三、四层的就不能跳楼了，他们都在睡梦中被长矛杆轰起床，一路棒打着离开自己的宿舍楼，除了贴身衣服，什么也不让带。他们留在宿舍的衣物、被褥、书籍等所有物品丧失殆尽。

跑出来的人跌跌撞撞、零零星星，不知何去何从，像无头的苍蝇一样在 31 楼周围乱窜。那天特别黑，人只有到了非常近才看得清，所以很多人一边跑一边喊：“你是谁？我是 XXX！”最后大批人群集中到了 31 楼南侧的空场。找到同班战友，惊魂稍定，交流刚才的经历，脑中一片茫然。

他们以为“新北大公社”只是要抄什么，等到里面没有动静了，有几个人向 31 楼走近，打算回去。哪知一阵转头扔过来……

他们惊慌失措，赶紧后退，左侧的楼里又飞来一阵砖头。

蔡小海同学，自恃一向与“井冈山”观点不合，反对派斗，自许公允，非要过去问个究竟。结果被“新北大公社”抓了过去，蒙上眼睛，捆上双臂，带到一个地方，棒打一番，头部也挨了一

拳，这才放掉。他气愤不已，从此转向铁杆反聂。

住在 31 楼的“公社”派学生也有人被外面喧嚣声惊醒，一位“公社”派的同学赶紧穿了衣服，开了灯，推了推上铺的同学：“‘井冈山’来了!”然后推开窗户上了窗台，转过身来，用手抓住窗台，伸下脚踩住一、二楼之间的突出砖棱。接着放开手，做自由落体，用手又抓了一下砖棱，略曲腿，落地。这都是他事先早已计划好的。落地时只倒退了一步，毫发未伤。

出了 31 楼，往哪里跑？他钻向学六食堂和浴室间的过道。突然，一声断喝：

“站住!长矛!”

一群身穿黄棉袄、手持长矛的武斗队抓住了他。接着铁棍、扎枪也上来了。他的头被铁棍打破流血，身上也挨了几扎枪，所幸不重。有 1967 年 4 月 11 日，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红卫兵到北大游行，与“新北大公社”发生冲突的经验，他以为又是“地院‘东方红’一小撮暴徒”来了。

“你是哪里的？”

“我是北大的!”言外之意：你们是干什么的!

“我们是‘公社’的，别怕!”这是个头头，估计他们也想到如果此人是“井冈山”的该往东边 28 楼方向跑才对，于是说：“大概打错了人，……”

这位同学摸出身上带的学生证，里面夹着一张“二期学习班”的证件。

“是自己人!”于是那位头头下令赶快将这位同学送去治疗。

28 日当晚，在 28 楼“井冈山”总部执行保卫任务的是技术物理系的学生。技术物理系编号为第 17 系，所以该系的“井冈山”称为“17 纵”。这时，他们听到外面噪声大起，有同学衣衫不整，冲进楼来报告说：出事了，“新北大公社”武斗队大举进攻 31 楼，把化学系“井冈山”03 纵的同学赶了出来，很多“井冈山”人受伤，有人跳楼逃跑。大家从 28 楼窗外望去，楼外尽是受伤的和衣衫不全的“井冈山”派学生，一时间无处可去。

“井冈山”总部立即开启广播喇叭，“17纵”的总部委员程汉良在广播中呼吁“井冈山”人抵抗“新北大公社”的武装进攻。28楼里的“井冈山”组织了不到30人的队伍，每人拿了一根大约一米长、一厘米粗的钢筋作武器，前往31楼救援那里的“井冈山”人。但是在31楼南门附近遭遇了数十名“新北大公社”武斗队的拦阻。他们看到28楼里“井冈山”的人过来了，立刻排列整齐、手持长矛、高呼口号向“井冈山”冲来。见此阵势，“井冈山”只能狼狈而逃，退回28楼。

这时，40楼也打起来了。住在40楼的“井冈山”10纵早有准备，他们在其他纵队的支援下，打败了准备不足的“新北大公社”西语系“红10 团”，俘获约30名“新北大公社”成员，连“红10 团”团长也被俘虏，被押送到28楼，关押在二楼的一个房间里。

再说被轰赶出来的 31 楼“井冈山”学生，在 3 月初春的寒

风中瑟瑟发抖，在楼外游荡了好长时间，不知所措。焦急之中，总算传来“井冈山”总部指令，攻占 32 楼！他们一窝蜂冲去，像一伙暴徒，揣开门挨屋子找人，“新北大公社”的早已闻风而逃。这个楼住的是中文系的，整座楼立即被“井冈山”控制。“井冈山”化学系纵队长齐菊生指挥分配房间。

与此同时，由“井冈山”后勤处年青工人组成的“海燕战斗队”也来到了 28 楼，那里有“井冈山”总部和广播台，是他们的心脏。

正在 38 楼熟睡的同学，忽然听到寝室楼道里有人急喊：“‘井冈山’的人血洗了 31 楼，正准备攻占校医院，大家赶快起床，击退‘井冈山’的进攻！”大家稀里糊涂懵懵懂懂地起来一溜小跑，来到燕南园南边西头，站在这条去往校医院路的路口。不一会儿。就仿佛看见有人从东边向这里走，这时带队的就喊：快，扔石头，把他们打回去！他们就趁黑摸着不知道是早就准备好的还是另外有人当即运来的砖头块。向对方人群扔去。扔了一会儿，对方再没有人向这里走了，这边人也都撤了。

“井冈山”天亮之前又占领了 30 楼。

从武斗开始。双方的大喇叭就没停歇，都说对方“冒天下之大不韪，挑起武斗，罪该万死！”

“新北大公社”总部的大喇叭广播说：

“垂死挣扎的‘井冈山’，趁着夜色的掩护，突然对31楼发动了突袭，已经占领了31楼，将楼内‘公社’战士全部赶了出来。

‘公社’总部调集最精锐部队——‘革命工人兵团’，对被‘井冈山’抢占的31楼发动了猛烈的反攻。‘井冈山’一见冲击来的是‘革命工人兵团’，刚刚交手就望风而逃，‘公社’一举夺回31楼。

31楼硝烟未散，40楼的争夺战跟着打响，从31楼和32楼赶出去的‘井冈山’，他们破釜沉舟背水一战，向40楼发动了猛攻，40楼的‘公社’红9团战士且战且退，最后被迫纷纷跳楼，40多人被‘井冈山’抓住当着俘虏。‘井冈山’天亮之前又占领了30楼，将楼内的‘公社’战士全部赶尽，将‘公社’战士的衣被财物据为己有，甚至用‘公社’战士的箱子被褥构筑工事。”

天明之后，北京大学墙外32路汽车沿途，海淀、中关村一带，全是逃难的学生。手提着、肩扛着、自行车驮着大包、小包的行李，那景象真好似逃避一场战争或瘟疫，惨不忍睹！

3月29日凌晨，双方武斗进行得正酣的时候，北京卫戍区副司令员李钟奇得到急报，带领战士赶到北大制止武斗。他们在聂元梓陪同下来到31楼前。“井冈山”的学生怒火万丈，立即重重包围，大骂“聂破鞋发动武斗！”现场乱成一团。

这时，围观的人群中突然跑出一个人来，用什么东西刺向聂元梓的头部，聂元梓赶紧躲闪，李钟奇大喊一声：“抓刺客！”现场顿时一片混乱。就在这混乱中，李钟奇头上也挨了一拳，打出一个包。等人们回过神儿来，那人已从人群中挤出，奋力向东南跑去，后面一阵喊声“抓住他！抓住他！有人刺聂元梓了！”围

观的“井冈山”学生没弄清怎么回事，本能地知道要保护这个人，挡住追赶他的人。由于“井冈山”人多势众，追赶的人群只好看着那个人一溜烟消失的没了踪影。

刺伤聂元梓的是“井冈山 03 纵队慨而慷战斗队”成员、北大化学系三年级的学生樊能廷，住 31 楼 1 楼南头、走廊西侧 119 房间。3 月 29 日凌晨，他一听到“新北大公社”轰赶 31 楼“井冈山”学生的喧闹后，立即穿上棉衣，打开房门，想出南门。谁知道，南门被竖立的木板床挡住了。幽暗的光线下，从板床之间的空隙，恍惚看见板床外边有扎枪晃动。

他见势不妙，又循南横楼走廊跑向厕所，想从那里跳窗逃跑。但是厕所窗户打不开，他只好又跑到隔壁的盥洗室，蹬着长长的水泥池子，拉开窗扇，登上窗台，跳到外面的土地上。接着，他绕过南横楼西面，向东往 28 楼跑去。路过 31 楼南门时，见南面山墙外已有几个人聚在那里，赤手空拳的，不是“新北大公社”武斗队的人，便与他们汇集在一起。

当“井冈山”总部同意大家攻占 32 楼后，樊能廷也和流散在寒风中的“井冈山”同学一起涌入了 32 楼，找工具，整理房间，以便安身。

过了不大功夫，他听见有人在楼道里喊：“老佛爷露面了，在 31 斋”。于是，一些人跑向 31 楼。

此时樊能廷正拿着一把长约二十厘米的红漆木把一字刃中号改锥，修理一个双层木床。听到喊声，他也和大家一起，往

31 楼跑去。看到 31 楼南门东边空地上，许多人团团围着聂元梓和北京卫戍区副司令员李钟奇，在那里激愤地申述、分辨着。此时有人在推搡聂元梓，还有人在聂元梓和李钟奇背后，隔着人群，举着一尺长左右的自来水管子，比比划划。

看到聂元梓，樊能廷不由满腔愤恨，他挤进人群，举起改锥，隔着人群，就刺了过去。

正用身体护着被推搡的聂元梓的李钟奇，见此情景，大喊一声，人群迅即散开，樊能廷也随着人群一哄而散，跑回 32 楼。

事后，“井冈山”负责人侯汉清觉得这样疾恶如仇的人应该受到保护，便把樊能廷藏起来了。藏匿的地点十分秘密，连同班同派的同学都不知道。对外则说，樊能廷觉得“公社”派决不会放过他，早早就逃亡了。

于是“新北大公社”广播台天天广播“抓凶手”，《新北大》校刊也立即登出聂元梓后脑勺受伤的大照片，说是“头部重伤，鲜血淋淋”，等等。

29 日清晨 7 时 30 分，李钟奇来到北京大学广播站发表广播讲话，他说：

新北大全体革命师生员工同志们：

你们要立即停止武斗。

新北大公社、井冈山兵团各派五名代表，一、二、三、四、五把手参加，由校文革和解放军领导处理武斗善后一切事宜。时间：今天上午八点；地点：哲学大楼 206 号。

此外，全体职工们，同志们：

我今天和聂元梓到现场制止武斗时候，有的人拿匕首直接刺伤了聂元梓同志。这个凶手，希望全校师生员工动员起来，把凶手抓起来。

北京卫戍区要求北京大学双方各派5名代表，由校文革和解放军一起领导处理武斗善后事宜，“井冈山”认为不公，拒绝派人参加。

## 第 985 回：樊立勤，受酷刑命悬一线　参事室，李仲公揭发贺龙

北京大学的武斗仍在进行。29 日上午 8 时许，李钟奇作第二次广播讲话，再次要求双方立即停止武斗，否则将动用军队进行干预。

李钟奇第二次广播讲话后，双方即退出武斗现场。北大校园出现了短暂的平静，同时李钟奇还宣布：为制止武斗，要组织调查小组调查。

上午 11 时 30 分，李钟奇在北大广播站制止武斗的会议上说：新北大广大革命师生员工同志们：

毛主席教导我们：要用文斗，不用武斗。

武斗是错误的，呼吁全校革命师生员工同志们，大家动员起来，立即制止武斗，双方退出武斗现场，恢复正常秩序。

由于井冈山的同志们拒绝按时参加会议，至使今天会议不能进行，这样作法是错误的。

为了制止武斗，我们现在组织、派出了调查组，有宣传队马继荣、王永钢、李乃坚，北京卫戍区军训总指挥部梅谦，市公安局军管会吴保果，校文革王海忱、唐春景等人组成制止武斗调查组，马继荣同志为组长，王海忱、吴保果等同志为副组长。

希望新北大公社和井冈山兵团两大群众组织提供方便条件以利制止武斗和武斗的调查工作。”

3 月 29 日下午 17 时许，在 28 楼 4 层一房间内，“井冈山”

的韩琴英（何青）和冯美云听到“新北大公社”大喇叭广播说：“反革命分子樊立勤逃跑了”的消息，立即找到谢佐平、黄世强，4 人一起出来寻找樊立勤。他们在女澡堂门口看见躺着一个人，正是樊立勤，像死人一样，一动不动，口吐白沫。

谢佐平立刻把樊立勤背起，其他 3 人扶着，直奔 28 楼。

进楼后，他们在过道找了一些稻草铺好，让樊立勤躺下，只见他仍口吐白沫不止。这时一位老工人过来，蹲下观看樊立勤的瞳孔已放大，脉搏全无。他说：“只出气，无进气，看样子是活不成了。”

此时，李钟奇还在北大制止武斗。韩琴英看见李钟奇的坐车，想借它一用，便把樊立勤的情况告诉了李钟奇，并说：“首长，能否要个车把樊送医院抢救？”

李钟奇过来看了樊立勤，果然情况严重，便叫警卫员把车子开过来。“井冈山兵团”的头头侯汉清也随着过来瞧了樊立勤一眼。

韩琴英等人把樊立勤先送海淀医院，后转到北医三院。医生说他的“生命现象太弱”。又见每一手指肚儿都有一针头大小的小孔，其手指、脚趾均呈紫黑色……

韩琴英、冯美云几个女同学一边哭着，一遍办理住院手续的。挂号、伙食费等都是韩琴英交的。

樊立勤后来在其《我和邓朴方暨中国政争》一书中写道：他们逼他承认“反对毛主席、反对林副主席、反对江青、反对康生”

的反革命罪行。“我拒绝了他们的这些指控和诬陷。他们连续对我施以酷刑。他们除了把我蒙上眼睛进行拷打之外，还有钳子把我的一双手食指夹断，把手指甲钉入签子，他们打断了我的胳膊和左腿，又往我右腿的膝盖钉入了钉子。在把我打得昏死过去神志不清之时，又往我身上泼冷水给浇醒，浇醒之后再问。他们打我打累了，就压在我的身上，把烟头放在我的肚皮上烧。”

“我被酷刑折磨了几天几夜，他们得不到他们预想的目的，我被打得落下了终身残废。”

当晚，谢富治、温玉成、李钟奇来到北大。22时30分，李钟奇走进北大解决武斗问题的会场说：“好了，同志们都来了，谢副总理和温司令员很忙，他们回去还要开会。会议马上就要开始了。有带武器来的没有？”

卢平说：“我向首长保证，没有！”

有人拿出一把锉刀。

李钟奇问：“还有没有？”

下边说：“没有了。”

李钟奇接着说：“有问题可以坐下来解决，不要骂，不要动拳头，你们搞武斗是错误的。”

大家呼口号：

“要文斗，不要武斗！”

“坚决维护《六六通令》！”

“全校革命师生员工团结起来，共同对敌！”

22时36分，谢富治、温玉成、李钟奇和聂元梓、孙蓬一一起走进会场，全场热烈鼓掌，高呼："毛主席万岁！"等口号。谢富治向大家介绍温玉成。

温玉成："今天我和谢富治同志到这儿来看看大家。听说发生了武斗，这是不好的。毛主席号召我们大联合，现在我们还闹不团结，这是不好的。现在谢富治同志宣布市革委会、卫戍区研究的一个决定。"

谢富治："党中央、中央文革刚刚召集了10万人的大会后，北京大学发生大规模武斗的行为，是直接反抗中央、中央文革的，是不能容忍的！你们不斗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彭德怀、贺龙、彭罗陆杨以及在北大的代理人陆平等叛徒、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而斗争聂元梓同志，你们的大方向哪里去了？！这是违反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的！现在，我和温玉成同志代表市革命委员会和北京卫戍区宣布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北京卫戍区宣布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北京卫戍区研究的文件：

（一）慰问被刺伤的聂元梓同志，慰问一切被打伤的人员、革命群众、革命小将。

（二）井冈山等组织应立即自己交出刺杀、打伤聂元梓同志、李钟奇同志的凶手和后台。

（三）外校来北大参加武斗是完全错误的，应立即撤出，回去作自我批评。"

这时，谢富治说："我要补充一句，这一句不在我的记录里：

“如果不听，还要这样做，那我们就让他们做去，看他们走到哪里去！”

谢富治接着宣读文件：“（四）在校军事人员和支左部队要挺身而出，制止武斗，保护小将，保护群众，保卫国家财产。要求全校各派交出一切凶器，释放一切被抓人员。全校一切革命群众要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原则下联合起来，实现革命大联合，共同对敌。”

最后，谢富治还批评“井冈山兵团”批斗聂元梓的行为是错误的，并指责他们说：“你们的大方向哪儿去了？”

当天，北京大学“校文革”发出《通缉令》，抓捕凶杀犯。次日，《新北大》刊登《牛辉林之流挑起武斗，破坏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罪该万死》的文章，公开批判以牛辉林为首的“井冈山兵团”，并把责任全部推到牛辉林身上。

对此，“井冈山兵团”也做出了相应的回击，发出“井冈山兵团”《第一号动员令》，称：“刺杀聂元梓是对‘井冈山兵团’进行政治陷害”，并号召其成员搜集证据，“揭穿这个大阴谋”。两日之后，“井冈山兵团”又发出《第二号动员令》：“聂元梓到武斗现场被两派革命群众包围，被人刺伤，与井冈山兵团无关，如有人利用此事大做文章，陷害井冈山兵团，必将遭到井冈山兵团的坚决还击。”

3月30日，在北京卫戍区调解下，“新北大公社”和“井冈山兵团”交换俘虏。

这天，李钟奇还代表北京高校学习班领导小组在高校学习班上作检讨，承认学习班“没有抓紧两个阶级、两条路线、两条道路的阶级斗争。我们的错误就是只斗私没有批修。”而后，学习班草草收场。

3月29日，周恩来就北京大学发生武斗等问题致信毛泽东，提请召集中央文革碰头会一谈，并附上有关该校武斗情况的电话记录。次日下午，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召集周恩来等开会。

1968年2月中旬的一天，北京体育学院群众组织成立的贺龙专案组人员靳海东来到国务院参事室参事李仲公家，向他了解20世纪30年代贺龙的有关情况，想从中找出一些打倒贺龙的“证据”。当时，李仲公身体不好，但他不顾病体虚弱，滔滔不绝，从1927年汪精卫政府谈起，一直谈到20世纪30年代，对当时贺龙在武汉情况的每个细节都谈得非常详细，以至于这次竟没有谈完。

3天后，靳海东再次带几个人来到李仲公家，请他接着谈。李仲公谈着谈着，突然说：“在30年代，贺龙还曾给我写过信，想通过我向蒋介石说情、乞降，可惜信在我来北京时，被我爱人烧掉了。”

靳海东听后，大吃一惊。他立即意识到，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回到北京体育学院后，他立即向他们组织的头头刘长信汇报了这件事。刘长信听后高兴得跳了起来，说：“这个线索太重要了，必须紧紧抓住。你明天就去让他写个材料，不然老家伙

一死就没证据了。”

第二天，靳海东又来到李仲公家，要求李仲公把信的情况写一个材料给他。李仲公立即答应。后来，靳海东回忆说：“我们找李仲公时，他事先早就有所准备，准备了一张小纸条。他写时，还不时地看一下手中写得很小的纸头。1000多字的材料，很快就写好了，中间还有许多年月日和人名。”

李仲公，贵州贵阳人，1898年生，18岁考入北京法政学堂，1913年底受汤化龙、孙洪伊进步党资助，与李大钊等人东渡日本留学早稻田大学攻读政治经济学。回国后担任教育部编审员、众议院秘书。1916年与李大钊等人发起创办《晨钟报》，后改名《晨报》。1918年，他应黔军总司令王文华之邀回黔，任黔军总司令部参赞和贵州政治会议委员，参加过护国、护法诸运动。1922年，再次东渡日本继续完成早稻田大学学业。在此期间，与黔籍学生周逸群、毛景周等人结识。当时周逸群是日本庆应大学学生，毛景周是日本士官学校学生。

1924 年 2 月，李仲公回国参加国民革命，在上海加入国民党。东征时担任东江绥靖委员会秘书长。与东征军政治部主任周恩来共事交往。

1926 年 7 月，李仲公以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秘书处长身份随蒋介石出师北伐进驻长沙之际，贺龙由湘西遣派毛景周到长沙面见李仲公，请求收编，给予名义和款械，随从北伐。

此时，李仲公负责分化吴佩孚系袁祖铭部黔军工作，贺龙时

为袁祖铭委任的旅长。李仲公遂向蒋介石进言委任贺龙为国民革命军师长，并向所部拨发补给和枪弹。毛景周也因此担任了贺龙师教导团团长。

1927 年 2 月，国民革命军打下武汉后，贺龙在武汉拜见了李仲公。

同年 3 月，国民党宁汉之争，蒋介石遂令还身兼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央党部)书记长的李仲公率领秘书处随中央党部迁汉。此时，武汉国民党中央发动反蒋独裁，准备出兵讨蒋。汉方均认为李仲公是蒋介石的亲信。

这时，贺龙的部队正驻扎在九江、汉口之间的武穴。唐生智问贺龙："你帮我们打蒋还是帮蒋打我们？"

3 月 13 日，李仲公在汉口川军驻汉办事处邀约贺龙和他的秘书长、贵阳人严仁珊等朋友吃饭。贺龙向唐生智密报说，李仲公在川军驻汉办事处召集西南在汉师、旅长和川黔军代表开秘密会议，策动刘湘领衔反对武汉中央，并由川黔出兵讨伐武汉等。唐生智将此情况上报武汉国民党中央，由谭延闿召集中央"临时会议"，同邓演达、徐谦等人商讨办法，决议将李仲公"暂予扣留"，交唐生智执行，唐便将此任务交贺龙办理。

3 月 15 日夜晚，贺龙约李仲公到他的办事处"宵夜"，遂将他押交唐生智总指挥部扣留，直到 4 月 17 日，由邓演达保释出来。

1949 年国共和谈破裂，担任国民党立法委员的李仲公没有

南逃，避难在苏州。苏州解放，李仲公给郭沫若写信，要求弃暗投明。1949 年 6 月，他在苏州接到郭沫若北平来信：

仲公兄：

赐信奉悉，已将原函转致恩来。待有好音，再行奉报。专复，顺颂暑安。

弟郭沫若顿首

六、二十

7 月，李仲公与卢郁文等原国民党立法委员联名发表了起义宣言，通电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脱离国民党政权。8 月，自苏州赴北平，周恩来拟安排他待西南解放后去西南工作。1950 年 7 月，周恩来安排李仲公担任政务院参事，而安排李仲公的弟弟，已任政务院参事的李侠公回西南担任军政委员会委员、贵州省民政厅长。后来贺龙托人送了一件獭皮大衣给李仲公。

1959 年 7 月，担任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委员的李仲公，与李奇中参事合写了一篇《袁祖铭被杀内幕》的文史资料。期间，李仲公曾向李奇中谈及他与贺龙的关系及贺龙托他给蒋介石转信的事。

李仲公给体育学院写的材料很快就通过红卫兵小报传了出来。材料写道：

贺龙在第一次大革命以前是一个由土匪起家，分投于四川、贵州地方军阀的山头主义的小军阀。我和他认识是在 1926 年 7 月，我以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秘书处长身份随同蒋介石从广州出

师北伐进驻长沙的时候，他由湘西派了一个日本士官学生、曾在东京与我们相知的贵州人毛景园见我。打下武汉后，在 1927 年 2 月我到汉口，才开始和他见面的。但到是年 3 月，由于汉口的国民党中央发动反蒋独裁，准备出兵讨蒋，贺龙受到唐生智以反蒋还是拥蒋向他威胁。他为了取得汉方的信任而将我出卖并将我逮捕后，就和他断绝关系了。1928 年的春夏之间（月日记不清了），我在南京伪交通部。有一天忽然有他派的人持着他的信来见我（这是贺龙于参加南昌暴动之后又拖着他的队伍回到湘西老巢建立山头的时候）。我看了信，对于来人来见 3 次都予拒绝，要回信也置之不理。但信是留着的。可惜此信存在苏州住宅，在 1949 年 8 月我来北京之后，我的爱人为了防后患，把它取出烧掉了。但信里的要点我是记得清楚的。内容是：称我为次长，称蒋介石为总座。首先是说：1927 年 3 月之事，完全是出于严仁珊的计陷，极力对我道歉，望加原谅。接着是力述参加南昌暴动是迫于当时的情势，实非本心，要求我代向蒋介石解释，仍愿当年追随北伐的宿衷，再予收编为国军，誓效忠于总座及国民政府，敬慈援助并候示复。末署贺龙呈上等语。

为了说明解放后他与贺龙的关系，李仲公还特意做了如下一条补注：

在全国解放后 18 年的当中，除了在 1949 年 8 月我来北京之后的一两个月内，由于周总理和郭沫若同志约我聚餐和贺龙见了两面以外，始终就没有直接会见过。

贺龙专案组立即派人到北京体育学院，看了李仲公写的材料，还专门听了靳海东的汇报。最后，贺龙专案组的人告诉北京体育学院刘长信，不要再去找李仲公了，继续调查的事由贺龙专案组负责，并带走了李仲公的材料。

从 1968 年 2 月 29 日起，中央专案组就派人到国务院参事室参事李仲公家中向他了解贺龙历史上的问题，追问贺龙当年写给他的信。李仲公开始还说："原件已被爱人吴澄华在苏州烧掉了"，只能告诉大概内容。

3 月 20 日，驻国务院参事室军代表王炳辉召集参事室造反队负责人开会，布置发动参事们揭发"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派"的历史问题。

3 月 25 日，国务院参事室召开参事全体会议，王炳辉又做了动员。之后，李仲公将两封据称是贺龙早年的"亲笔信"交给了参事室，并提出要向周恩来总理报告，"和周总理本人单独谈"。

李仲公交给参事室的这两封信，据说是他 1929 年或 1930 年春夏间担任国民政府交通部次长时，在南京收到的由一名持有贺龙信件的"密使"送给他的。当时李仲公看完信后，将信留了下来。来人要求回信，李仲公拒绝。随后，贺龙又两次派人送信并要求回复，均遭到李仲公的拒绝。信的内容，根据李仲公留存下来的抄录件是这样的：

（一）"仲公吾兄次长勋鉴：前此被严仁珊等之欺骗，既予兄之难堪，复陷龙于绝境，至终无以自解，至今每一思及恨痛交

并，故去、今屡拟托熊贤卿、贺贵严诸兄代向中央解释，藉明心迹，终以山河阻隔，音问无由，恂恨事也。近阅报章，始知冯逆叛状益彰，全国声讨，弟亦为党员一分子能不愤慨?甚愿率所部万余健儿就近直捣逆巢，灭此朝食，以报党国而慰主座，伏乞我兄代呈主座为荷，馀不一一，诸希亮察，如能帮忙，即请设法示复，以便正式派人晋京面候教益矣。手此。

敬叩勋安。

弟贺云卿亲笔上，五、十六。”

（二）“仲公吾兄次长勋鉴：前函计达，十六年秋间之事，完全为奸人利用结果。虽促成宁汉统一，而弟一人之牺牲，其痛苦不可言状。始知今日之政治须多受教训方能渐得其中之奥妙矣，弟本武夫且生性忠实，何能快慰，应付当今千变万化之时局耶?不能为天下人谅者理应然也。爱我如兄将何以教我?前言皆系至诚，务求敬代陈主席，请求一切为盼。临颖神驰，不禁依依，此叩大安。

弟贺云卿亲笔上，五月二十六日。”

信中“冯逆”应指冯玉祥。后一信说“十六年之事”，应指南昌起义。说该事件促成了宁汉统一，对国民党是好事，但牺牲了我自己，岂不冤哉！“陈主席”应指陈立夫。

李仲公当时将这两封信扣留下来，没有转报蒋介石。

参事室接到材料后，当即向总理联络员郑凯做了电话汇报，郑凯要求将原信马上送到总理办公室。

3 月 29 日，李仲公给周恩来写了一封信：

久未谒见，时在念中。兹有一事，我手中有贺龙在 1929 年由湘西派人到南京要求我代帮助向蒋投诚的两封亲笔信，是这个大叛徒叛党的铁证。如由信内送上。虑交不到落入别人之手。拟请于万机之时召见片时，当面奉呈，并补陈有关情况，亲聆教导。特此函达之予核裁。

敬祝健康，并致革命的最后敬礼！

1968 年 3 月 29 日

这封信由参事室送出。贺龙的两封信原件，则由参事室工作人员秦萍和张云与周恩来的联络员郑凯取得联系后送了过去。

几天后，周恩来办公室来了一个人到李仲公家中，很客气地对他说："感谢仲老对革命的支持，仲老的信总理已收到，总理让我们转告希望仲老注意保重身体！"

## 第 986 回：看广西，武装进驻融安县　议湖南，五老帅停发文件

广西的局势越来越混乱。2 月 28 日，南宁“422”黄达生等部分常委在南宁新闻电影院召开大会，宣布成立“422 野战军”。黄达生在会上说：“自治区革筹小组、广西军区对大屠杀制止不力，我们成立野战军的主要任务是：1、支援各地‘422’抗击‘联指’的大屠杀。2、镇压社会上的阶级敌人的现行活动。3、打击、清理混进‘422’的坏人。”

2 月 28 日，柳江县里高圩的“造反大军”拦路抢了 6886 部队的武器。韦国清电话请示周恩来：可否派一个营的兵力去追回被抢走的武器弹药？2 月 29 日，周恩来批示：“如一营兵力不行，可调两个营去包围，进行强大政治攻势，照晋东南办法，逼近其工事，劝说其送回武器弹药。”

29 日当天，自治区革筹小组、广西军区命令 55 军 6984 部队派 24 辆卡车满载全副武装的军人前去柳江县包围里高圩的“造反大军”，收回武器，抓捕 60 多人押送柳州。

这天,自治区革筹小组、广西军区向中央提出《关于融安县问题的处理意见的报告》，并报广州军区。《报告》提出：

（一）调派一定数量的武装部队进驻融安，在武装包围“造反大军”后，开展强大的政治攻势，通过充分揭露“造反大军”的错误行为，对其实行分化瓦解。

（二）区别坏头头和群众，孤立少数，争取多数，教育受蒙

骗群众与坏人划清界线，反戈一击，揪出坏头头，交出所抢去的武器和国家财物。

（三）对“造反大军”提出严肃的批评，帮助他们改正错误，掌握斗争大方向。

3 月 5 日，“422”在南宁“造反楼”前召开万人大会，强烈要求 55 军的 6984 部队回南宁“支左”。大会通过了《再致韦国清同志的公开信》。

3 月 6 日，“422”派的“草上飞第二挺进纵队”在南宁市张贴大字报，说当局调离 6984 部队是为了孤立压制“422”。

3 月 7 日晚上，广西自治区革筹小组开会，讨论融安县和凤山县问题的处理方案。

广西军区司令员欧致富说:“对融安可以采用解决里高圩的办法解决。”

韦国清说:“看看需要多少部队，由欧致富同志具体组织。凤山县是否也采取同样办法解决？”

3 月 15 日凌晨，融安县 8 个公社组成的“联防指挥部”指挥融安“联指”派武斗人员 200 多人，围攻潭头赖家村“造反大军”据点，用炸药爆破，炸死“造反大军”1 人、重伤 1 人。

第二天，自治区革筹小组和广西军区向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上报《关于广西“422 野战军”情况和我们采取的措施》的请示报告，报告认为:“野战军”的组成及其发表的声明、公告是错误的，把斗争矛头指向自治区革筹小组和广西

军区。他们组织“挽留 6984 部队联络站”，阻止部队调离，准备搞大规模武斗，搞打、砸、抢，办地下工厂、商店等。“野战军”是由“黑手”、坏人和极左分子操纵的组织。因此要对“野战军”这样少数坏组织的据点以部队武装包围，开展政治攻势，全部收缴武器，交出坏头头。

与此同时，广西马山县又发生了激烈的武斗。2月15日，马山县“422”派向“联指”派据点发动进攻，双方展开石头仗。“联指”派被迫撤出县城。2月27日，“联指”决定组织力量重新攻打县城。3月13日，马山县“联指”派调动武装民兵1069人和3000多名群众，携带高射机枪一挺，轻重机枪27挺，步枪894支，各种子弹16300发，炸药2吨，对马山县城实施包围和进攻。3月19日，开始向县城发动总攻。整个县城枪声大作，硝烟弥漫。

在此期间，广西一些地区杀人之风依然严重。3 月 16 日，广西天等县革委会成立，县武装部长马政华强调为树立正气，压倒邪气，保卫新生红色政权，要求“每个乡干掉个把罪大恶极、民愤大的四类分子或坏头头。”在马政华等人的多次布置和组织策划下，从 3 月 8 日至 27 日的 10 多天里，全县发生 190 多起杀人事件，共杀害 630 多人，仅 3 月 18 日的一天就发生 31 起杀人案件，杀害 102 人。

崇左县武装部政委马参加了天等县革委会成立的代表大会。3 月 19 日，崇左县负责人张洪恩讲话说：“天等县红色政权是用枪杆子打出来的，我们要向天等学习，也要用枪杆子建立和保卫

红色政权。”结果筹备成立革委会前就杀死 94 人。

3 月 18 日，广西钦州地区公检法军管会给军分区的情况反映，3 月 5 日至 12 日，全专区共杀人 2000 左右，其中灵山县杀了 1000 多人。这时在钦州地区上思县、防城县、灵山县等已杀人成风。

3月22日，广西自治区革筹小组、广西军区第二次对马山县两派组织发出制止武斗的指示，没有效果。武斗愈打愈激烈。至3月23日下午，“联指”派用炸药摧毁了“422”派据守的各个据点的工事，“422”派被迫突围，撤离县城。“联指”派武装人员追捕“422”派逃散人员，许多人被俘后就地枪杀。

双方武斗中打死197人，另有190人在追捕中被枪杀；127间民房被炸毁；居民和机关财物损失共达30多万元。

3 月 23 日，广西自治区革筹小组、广西军区向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融安情况续报》，要求中央尽快批准调用部队进驻融安县城长安镇收缴武器，发动群众揪坏头头。

3 月 24 日，广西自治区革筹小组、广西军区给柳州支左领导小组发出《对 431 团率一、三营进驻融安的要求》的电报，并报广州军区及驻柳州的 55 军。电报提出以下几点要求：

1、部队行动必须秘密、迅速，对融安县城长安镇形成包围。

2、开展强大政治攻势，收缴武器。交出坏头头。

3、清理外来人员。

4、部队行动执行任务中，由 6984 部队（431 团）指挥，县

人武部做好群众工作。

面对进剿大军，融安县的“422”派自知大势已去，于是放弃抵抗。26 日夜 21 时多，大巷“422”派的“农总”武装，撤离大巷到雅瑶乡大勤村。3 月 27 日，6984 部队团长李福、参谋长章国明奉命率一、三营武装进驻柳州融安县城。长安镇的“造反大军”全不抵抗，隐藏枪支，站在街道两旁观看部队进城。部队进城后，发现邮电局并未着火烧毁，许多情况与广西自治区革筹小组通知的情况并不一样。

3月30日21时许，周总理、陈伯达、康生、江青、姚文元、黄永胜、叶群、汪东兴等中央领导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接见了湖南“省革筹”汇报团的全体成员，主要讨论湖南“省革筹”小组《关于湖南省成立革命委员会的请示报告》。

会议一开始，江青便说：“湖南的情况我不太熟悉。我只参加过半个会，有的人我还不认识。湖南的问题我没有插手，别人也不让我插手。”

接着，她和陈伯达等又询问了湖南批“省无联”等情况。黎原和华国锋等作了汇报。

江青说：“造反派是有阶级性的。造谁的反？造我们的反？‘省无联’是不是戚本禹支持的那一派？那时他们只要戚本禹单独接见，我是很生气的。”并说：“现在主要是右倾保守，右倾投降，右倾分裂。你们把党内的与社会上的混淆了。你们那里‘高司’闹得很凶，完全是右倾翻案风！”

她见湖南“省革筹”小组的报告上没有写“中央文革”，很生气地说：“你们的报告没提‘中央文革’。中央文革要‘稍息’了。好吧！我们中央文革的四个人可以退席，你们自己去开会吧！你们整个精神是取消‘中央文革’。‘二月逆流’就是取消‘中央文革’。‘中央文革’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重要组成部分。你们这样干，还叫革命委员会呢！你们眼睛里没有革命的领导，只有保守的领导。”

说着，江青真的就退出了会场。过几分钟后，她又回来了。接着说：“‘报告’第三段也要改，要直接点刘、邓、陶的名。湖南只点王延春的名，张平化呢？你们要大批张平化。张平化在东北就是一贯大反林彪同志的，以后又紧跟刘、邓、陶、王。张平化这个人可谓至死不悔改。我一想起张平化就恨，想不到张平化这个人这样恶劣，恶劣极了。他的一贯表现说明了他的本质。根据我们的经验，像这样的人，历史上不会没问题。”

她还说到湖南省军区司令员：“龙书金要结合，这个干部不结合不合适。”

黎原马上表示：“龙书金同志可以结合，可以当主任。”

周恩来说：“龙书金要结合，看摆到什么位置。”

长达 3 个多小时的接见，几乎都是江青一个人在讲。接见一直到 31 日零时 30 分才结束。这次接见的内容被称为“三 •三〇”指示。

接见之后，湖南“省革筹”小组赴京汇报的负责人立即进行

了研究，按照江青的讲话精神对给中央的《关于成立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的请示报告》又作了一次修改。修改后的报告突出了反对右倾保守主义、右倾分裂主义、右倾投降主义的思想。

3月30日，毛泽东对黑龙江省革委会关于大专院校毕业生分配工作报告写下了如下批语：

总理、伯达同志：

我看这个文件好，可否转发各地参考，请酌定。因毕业生分配是个普遍问题，不仅有大学，且有大量中、小学。

当天，潘复生即主持召开了省革委会常委扩大会议，学习和贯彻毛泽东的上述最新指示。会议一直开到4月2日。

潘复生在会上分析了全省的阶级斗争形势，他说：全省65个县以上革委会，“至少有百分之十几的权不在我们手里。”他提出，目前的主要危险是“右倾思想”。

潘复生认为哈尔滨市滨江区和平一队是“右倾翻案”的典型。会议期间，他带领全体与会人员，在和平一队召开现场会，在现场会上点名批判了几十个人，当场逮捕 23 人，致使哈尔滨市滨江区 80%的区、社干部，和平一队 60%的大小队干部被撤职。其中，有的扣上“漏网走资派”，有的冠以阶级异己分子，有的戴上阶级报复的帽子，有的斥为现行反革命……现场会上，发言者慷慨激昂，领呼者振臂高呼，喊声与口号声此起彼伏。

参加现场会的范正美后来回忆说，他当时只感到到神经高度紧张，头脑发麻，有一种无法形容的恐怖感。作为哈师院的造反

派头头的范正美，也曾经策划和主持过不少批斗会，但如此充满血腥味儿和火药味儿大会，他也是第一次遇到。他心中充满了疑问：潘复生作为省里的最高领导，这么说罢官就罢官，说抓人就抓人，说送监狱就送监狱，而且涉及这么多农村区社、基层干部，这种做法对吗？对此他不敢苟同，但更不敢吱声。同时，又有一种可怕的责任袭上心头："自己的缄默就是对此事的认同呀。潘复生带领全体常委在这里召开现场会，说明是全体常委的共同意志，自己是常委，当然也就是同谋，而不是一般旁观者了。"他无法摆脱这双重恐怖，又不敢同人交流。几十年后想起，仍然感到毛骨悚然。

散会后，范正美注意观察其他常委和他周围的人们，发现一个个都显得十分紧张，屏心息气，互相不敢对视，更听不见对话声。

和平一队的"经验"由潘复生推广，继而在黑龙江全省发动了"反右倾、反复旧、反复辟"的运动。被结合的县以上干部很害怕第二次被打倒，于是他们效法潘复生，起劲地抡起大棒子，积极地发动"反右倾、反复旧、反复辟"的运动，大抓漏网走资派和各种阶级敌人。从省革委会到全省各地，把前一段解放并予以结合的大批干部，又以"漏网走资派"的罪名重新打倒。据测算，全省被揪斗的干部不少于 5 万人。工厂也是从厂部到车间、从领导干部到班组长、从技术员到工人，上上下下一条线，方方面面一大片，名目繁多的揭批会，接连不断，说揪谁就揪谁，弄

得人人自危。

4月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转发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关于大专院校毕业生分配工作报告的批示：

1968.04.04；中发 ［68］54号

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关于大专院校毕业生分配工作的报告很好，特转发给中央各部门和各省、市革命委员会、革筹小组、军管会或军管小组讨论、参考执行。

毛主席指出："毕业分配是个普遍问题，不仅有大学，且有中小学。"希望各部门、各地方、各单位、各大中小学的领导机关和负责人，按照毛主席这一指示，面向农村，面向边疆，面向工矿，面向基层，对大、中、小学一切学龄已到毕业期限的学生，一律及时地做出适当安排，做好分配工作。

一九六八年四月四日

潘复生于4月14日、16日、5月11日、21日，以省革委的名义，向毛泽东、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并沈阳军区四次呈报中共中央东北局第一书记宋任穷的材料，称宋任穷是"漏网走资派"。

3 月 30 日，吴法宪在军委办事组会上说："经主席、林副主席、中央文革批准，改组办事组，由总部、军种主要负责人组成，在主席、林副主席、中央文革直接领导下主持军队工作。办事组成员由黄、叶、李、邱和吴 5 个人组成，将来还可以加一个刘贤权同志，黄为组长，吴为副组长。……李天焕、刘锦平不参加办

事组。……”

4 月 1 日，黄永胜、吴法宪给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姚文元、谢富治、叶群、汪东兴写报告说：“由于军委常委不再开会，军队文电今后除发到团级文电照发各常委外，重要文电不再抄送陈毅、刘伯承、徐、聂、叶等同志，粟裕同志与工作无关文电亦不抄送。”

毛泽东批示：“此事待议。”

4 月 4 日，军委办事组收缴了军委印章。这天，李天佑以书面形式报告黄永胜：“文件已立即停送徐向前、叶剑英、刘伯承、聂荣臻。”

一些文件、电报停发后，秘书将这个情况报告给聂荣臻。聂荣臻生气地说：“不管他们怎么弄，文件他们爱发不发，‘杨余傅事件’究竟是怎么回事，我还弄不清楚，我也不知道谁是黑后台。我自己知道，反正我不是他们的后台。”

4 月 1 日，周恩来对外交部指示：“去年二月逆流牵扯到外交部就是想完全复原。二月逆流的特点是把矛头对准毛主席亲自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准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对准坚决执行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中央文革。当时二月逆流要恢复刘少奇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旧秩序，为资本主义复辟开辟道路，进而搞资本主义复辟。

翻案风有各种形式，极‘左’也可以为二月逆流翻案。因为极‘左’是同右合作的，是保护右的。现在反右是主要方面，要

反右倾保守主义，右倾分裂主义。

要击退为二月逆流翻案风。

现在，反右倾保守主义，反右倾分裂主义，右倾机会主义，必须防止极‘左’翻案，它要翻案是不允许的。但当前主攻方向是反右。

犯极‘左’错误要翻案是不允许的，有人翻也不怕。什么叫右倾保守主义，就是恢复旧秩序、旧官，这是办不到的。”

## 第 987 回：四月三，西单商场大爆炸　枪声响，大连武斗烈火燃

1968年4月3日下午18时45分，北京市西单商场发生爆炸事件。爆炸中心位于商场南门左侧，爆炸产生的冲击波将东面60米内的东西全部震碎，被炸面积为西南63米、南17米、北7米，现场水泥地面被炸了一个2尺见方的深洞，天花板被炸飞。5人当场殒命，其中一个人的身体被炸成了好几块，100多人受伤，大多是被飞溅的碎玻璃划伤。

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北京第一次发生如此严重而惨烈的爆炸事件，京城反响强烈，周恩来亲自对该案作了批示，要求加紧侦破此案。

公安部总值班室 19 时许接到北京市公安局军管会报告，公安部部长的谢富治和副部长于桑立即带人赶赴现场。只见西单商场门口一片凌乱，有人哭，有人叫，还有许多人在围观。公安人员已将现场围了起来。先期到达的市公安局负责人正在组织人员抢救伤员，疏散人群，侦查、技术人员正在勘查现场。

安置了伤员，清理完现场，已接近午夜。谢富治在发案现场召开了有公安部、北京市公安局、西单百货商场及有关单位负责人参加的侦破工作会议。谢富治认为，这个案子很可能是国外特务机关派来的特务干的，要求坚决破案。

谢富治讲完话后，大家又初步分析了案情。会议决定成立侦破西单商场反革命爆炸案专案组，公安部、市公安局及有关部门

派人参加，谢富治宣布由于桑负责指挥破案。

侦破工作会议结束后，于桑立即组织专案组人员对现场进行了认真、细致的勘察。首先对 5 具尸体进行检查。5 具尸体中，1 具被炸成了好几块，碎肉飞溅在房顶和围墙上，上半身左边还与头部相连，脸部没有被炸坏，经过整理还可看清脸型。其他 4 具尸体还比较完整。技术人员对 5 具尸体进行了拍照。

在现场搜集到了一个黑色塑料手提包，包中装有两根一尺多长的导火索，两只雷管，两张辽宁省粮票，还有被炸烂了的死者穿的棉衣、棉裤、鞋等物。

勘查完现场后，组织专案组人员对案件进行分析研究，确定了如下侦破工作程序：(1)清查死者身份。将 5 具死者的脸型照片迅速发到各地公安机关，要求各地马上组织当地群众进行辨认，尽快查明死者的身份、家庭住址、职业。初步判断炸药是由那个被炸得最厉害的人手提着，离地面约 40 厘米悬空爆炸的。因此，对此人要重点查。鉴于现场遗物中有一些物品与辽宁有关，专案组特别通知辽宁省公安厅军管会深入工作。(2)查清炸药种类。请有关部门分析炸药种类、成分、爆炸能量等。(3)分析死者衣物。对死者身穿的衣物、携带的物品请有关部门专家认真鉴定，查明生产地及销售范围。

专案工作全面展开，北京市公安局各派出所立即组织属地群众辨认死者照片，向发案时在现场的群众了解情况，从中寻找线索。很快，经群众辨认，尸体完整的那 4 个人被认了出来，均是

北京人，身份已查明，都是到西单商场购物时在过道中被炸死的。

经过对硝铵、梯恩梯等几种炸药的试验，初步判断可能是硝铵炸药，其主要成分是 80％的硝铵，10％至 15％的梯恩梯，5％的木粉。懂得一般爆破常识的人都可以制造。根据专家们计算出的比例数据，专案组人员配制成硝铵混合炸药，置于与现场水泥地面相同的试验地上，用导火索和雷管引爆，其效果与现场爆炸状况相同，地上被炸出一个 2 尺见方的深洞，洞内遗留的雷管碎渣，与现场遗留的几乎一样。

鉴于案情重大，公安部部署全国共有17个省市公安厅、局，紧急协助北京市公安局查找这名身份不明的死者。

有关部门对现场的导火索、雷管、帽子、鞋的鉴定结果表明，这些物品都出自于沈阳等地。棉花研究所的专家检测了棉衣中棉花的棉绒，查明这种长棉绒产于辽宁省朝阳地区。再加上现场辽宁省粮票这一线索，辽宁省成了重点破案地。5 月 11 日，辽宁省公安厅军管会报来在本省的检查结果：4 月 2 日晨 5 时，辽宁省朝阳地区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南营子公社东村大队农民董世候，提着两个黑色塑料手提包从锦州车站乘火车去了北京，至今未归。董世候的相貌与辨认照片相似。

针对辽宁反映的情况，专案组经过综合分析后认为非常重要，立即让辽宁省公安厅继续核查。经查，董世候，男，29 岁，蒙古族人，富农出身。家中现有 3 人，父董汉珍，弟董世亭，还有一个哥哥在内蒙古工作，一个妹妹已出嫁。他在离开村子前，

把家里的东西都处理了。走的头一天晚上，还找了一些人一块喝酒，并告诉大家他要出门，但没有说到哪里去。第二天早上 5 点走时，他和住邻居的叔叔打过招呼，说他要到北京去，自此一去至今无下落。

辽宁省公安厅派人去找董世候的妹妹，当把死者的照片给她看时，她一眼就认出是她哥哥。他妹夫还说，前一段时间她曾给她哥哥做了一件黑棉衣，棉花是她从本地市场上买的。

于是，专案组立即通知辽宁省公安厅速将董世候的妹妹和东村大队治保主任送到北京。经辨认尸体，证明死者确是董世候；经辨认遗留物品，也是董世候之物。

经过调查，认定董世候是制造西单商场爆炸案的凶手。其根据：

(1)董有铤而走险的思想基础。由于家庭出身问题，董长期遭受歧视，一直娶不上媳妇，极有可能因而对社会产生不满，铤而走险。他曾流露出“活着没意思”的想法。并说，“我要干，就不干一个字的(指‘偷’字，因他弟弟偷盗被劳改过)，要干就到大城市，抓住高压线去死。”扬言要制造一个国际事件，让他们(指政府)瞧瞧。

(2)董有使用接触炸药、雷管、导火索的条件。董曾参加过村里兴修水利、使用炸药开采石头的劳动。当地对炸药管理很松，丢失很多，不少群众家里都确炸药，有的拿去炸鱼，有的当肥粉使用。他们使用的炸药是硝铵炸药，内含 11％的梯恩梯，4％的

锯末，85%的硝酸铵。这种炸药，与爆炸现场的硝铵炸药相似。现场发现的导火索，与他们使用的一样。

(3)离家时间与爆炸案发生时间相吻合。董于 4 月 2 日晨离家外出，按路程时间计算，3 日上午即可到北京，在当日下午作案是有条件的。据本村群众反映，董这次外出时很慌张，手提黑色旅行包，在他叔叔家吃早饭时也未将包拿进屋里。现场收集的手提包残片和一段拉链与董所提的旅行包相似。

董世候的犯罪行为是很严重的，应当受到法律的严惩，但他绝不是海外派来的特务。经过多方调查，确实只是他的个人行为，没有发现同伙，也没有发现有人背后指使，连他的妹妹事先也不知道他要到北京来。因此，对董世候的处理只能按严重刑事犯罪分子处理。但他在爆炸中已死亡，也就在法律上没有再给刑事处分。

至此，西单商场爆炸案告破。5 月 22 日，专案组向中央送上了“关于破获西单商场反革命爆炸案的报告”，周恩来圈阅。

4月3日，大连市发生了一场武斗。

大连天津街与上海路交汇处的大连饭店是一幢 7 层楼建筑，当时是大连几座标志性高层建筑之一，在天津街一带可谓鹤立鸡群。此时，大连饭店被大连“工总司”所占据，成为他们开高层会议的场所。

4 月 3 日上午 9 时 30 分左右，旅大“工总司”的头头们在大连饭店楼上召开会议。由于大连饭店斜对过就是“工总司”中

山司令部占据市工商联的一幢四层办公楼，楼内驻守武斗人员，所以警卫工作也没有太在意。

上午 10 时左右，一辆普通的大货车急速行驶在上海路，突然一个急刹车停在大连饭店门口，车上迅速跳下十几名全副武装学生模样的人，其中还有女的。他们身着黄色棉军装，无疑是武斗人员。原来这些不速之客是大名鼎鼎的“东方红公社”的“八二四野战军”，他们听到“工总司”头头们在大连饭店开会的消息，于是决定在对方的眼皮底下动手，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这大概就是年轻人血气方刚的本色。

很快，近在咫尺的“工总司”中山司令部就得到大连饭店里出事的消息，呼啦啦跑出来 20 多名持枪武斗人员，斜穿过马路冲向大连饭店，大部份人冲入楼内，余下人扼守饭店门口，对偷袭者实施了反包围。

要打仗的消息很快就在附近传开了，不一会儿大连饭店门前就聚满了人，越聚越多，马路已是水泄不通。

不一会儿，从楼里传出了几声短促的枪声，接着从门厅里快步走出几名持枪的“工总司”武斗人员，为首者神色紧张地挥舞着手枪在前面开路，紧跟其后的一位高个大汉身上背着一个人，其他人手里端着半自动步枪或冲锋枪左右环顾地高度警惕的在两旁保驾，被背的那个人从头到脚都被一件棉军大衣披盖着，只见大衣襟下不断嘀嗒的鲜血如汩汩细流，大汉疾步奔向斜对面的“工总司”中山司令部楼，马路上留下一道殷红的血迹。时间不

长，从中山广场方向又跑来十几名“工总司”武斗队员，围观的人群马上散向两边。前来增援的人听了在此的中山司令部武斗人员情况介绍后，大部冲向楼里，随即楼里响起激烈的枪声。

枪声持续了一会儿平息了。稍待了一会儿，只听“呼喇”一声响，门厅上方临街的二楼窗户被推开，一面印有“东方红公社八·二四野战军”大字的红旗用竹竿子斜挑豁然伸出窗外，并左右摆动挥舞着。楼下观光景的人们都齐刷刷地仰着脖子往楼上看，是只见红旗舞不见人踪影，无疑是执旗者怕飞弹躲避在隐蔽处。楼下“工总司”一伙人不知从哪儿找来一把镰刀头绑在长竹竿头上，高举着去剐红旗，长长的竹竿子稳定性不好飘忽晃动，擎杆人时间过长支撑不住只好放弃剐旗子。余怒未消的“工总司”人举枪向旗子射击，楼里的人像耍弄人似的又把旗子收回，并恶作剧般的反复折腾几回。

过了一会儿，楼里又响起了急骤的枪声，临街的三楼窗户又被推开，一个黑板出现，黑板上用粉笔描写着“八二四岿然不动”几个醒目大字，偷袭者的处境似乎有些不妙，“看得出他们被逼的往楼上撤了”，人群里有人于是说。

突然，一声沉闷的轰响从楼里传出，是投掷了燃烧弹。时间不长，楼上响起了捣碎窗玻璃的哗啦、哗啦声，碎玻璃碴从天而降，楼下聚堆的人们立马闪开。先是四楼的窗户冒出了烟雾，楼下人不约而同地喊着“着火了”。不一会儿，四楼朝南临街的所有窗户都冒烟了，看来事态严重了，楼里的“工总司”武斗人员

陆续撤出，他们中有人说：“烧死这些‘保皇派’、王八蛋!”。

很快，火势往上蔓延，听得见窗玻璃霹雳啪啦的烧爆裂声，六楼窗户又冒出滚滚浓烟。紧接着，被围者空中抛物，先是抛下易燃的竹篮、竹筐、擀面杖、面案板类，抛物落在大连饭店南面仅隔一狭窄胡同的天津街小学小操场泥地上，看热闹的人们顿时乱了套，有的忙躲避着，有的知难而上疯抢着天上来物；很快人们又四散跑开，这一回天上掉下的可不是“馅饼”，而是致人一命呜呼的碗、盘、碟、坛、罐类的“新石器”产物。你还别说，一个捣蒜石臼落地完好无损，只见一个“时迁”身材的精干男子一个箭步上前捡得，其他人眼热自叹身手不行。

这时，楼顶响起了“哒、哒、哒、哒、哒”有节奏的枪声，隔一段时间就响起，枪击方向分别是冲着西北和偏西，人群中有人说：这是朝西北方向 200 米处的天津街中段五层楼的红旗饭店的“尖刀广播站”求援。同时朝偏西方向 300 米处的五层楼税务局大楼“渤海前哨广播站”的“革联总部”求援。

下午 15 时左右，饭店顶层七楼着火，这时来了一阵风，烈焰冲天，站在大连饭店东北方向马路斜对过的天津街派出所门前都感觉脸烧烤，火借风势将房顶覆盖着的铜皮一大张一大张的鼓向空中，又像落叶似的飘零而下……

消防队奉旅大军管会指令派出两辆消防车前来灭火，遭到“工总司”武斗人员朝天鸣枪阻止，消防队员无奈只好待在车上。

下午 16 时许，上海路南北几乎同时响起枪声，枪声由远而

近，其中 12·7 高射机枪的声音震耳欲聋。此时看热闹的人们个个抱头鼠窜，空旷的上海路上没有人了，只有两辆消防车仍停留在原地，消防队员早没了踪影。只见空旷的马路上遗弃的大小各类鞋子比比皆是，那都是慌不择路的逃跑者鞋子不跟脚丢掉的。而路边的简易店铺里已是人满为患，顾头不顾腚的人们生是往里挤，被挤压踩踏的人疼得“哎呀”直叫。即便在这时，仍有人趁火打劫，他们把理发馆的剃头家什席卷而去，把修理照相机铺子的工具扫荡一空。有的为了争夺不义之财撕扯起来，还有没赶上点的人踏着凳子扭下灯泡弥补迟到的损失……

“革联总部”派来 6 辆土坦克驰援，由中山广场和胜利桥沿着上海路南北相向而来。其中大染“2·24 战斗兵团”出动两辆，“东方红公社”化校总部出动两辆，红旗造船厂“造船联军”出动了两辆。土坦克分别把守在交通要道，在一阵震慑的射击后，广播喇叭传出要楼内的被围困者撤离。其实，被围困的“八·二四野战军”武斗人员在土坦克到来之前，已从大楼后面的水流子管攀溜到相当二楼高的库房顶安全撤走。他们的勇气和胆量在许多年后，不时的被人们津津乐道传说。

下午 16 时 30 分左右，土坦克原路撤离，消防队员进楼灭火，上海路恢复了平静。夕阳下，只见大楼正面墙体被 12·7 高射机枪打得弹痕累累、斑斑驳驳，十几年后仍依稀可见，后来墙面换贴了釉面砖，才湮没了历史的陈迹。

第二天，通过传单、大字报、广播喇叭，方知旅大“工总司”

的主要头头、大连钢厂“造反团”一号常委李炳尧在“4·3 大连饭店武斗”中遇难。旅大“工总司”在大连火车站广场召开了15 万人参加的声势浩大的隆重追悼大会，声讨谴责“革联总部”的暴行。

## 第 988 回：说山西，接见农大东方红　严凤英，宁、湘成立革委会

3 月 10 日，山西省军区和山西驻军 69 军联合发布了《撤销〈关于太原‘九·五’反革命事件的严正声明〉》，声明指出：“根据中央 1967 年 12 月解决山西问题的《中共山西省核心小组会议纪要》第五条对‘九·五事件’应该平反的决定，特郑重宣布撤销我们 1967 年 9 月 8 日《关于太原‘九·五’反革命事件的严正声明》，并向红联站十中七一的革命小将赔礼道歉。”

“杨余傅”事件后，北京山西学习班里，“红总站”的头头们开始把“打倒杨、余、傅，揪出变色龙”的口号，赋予了山西的地方特色。在山西，还能有谁是杨、余、傅的黑爪牙、变色龙呢？12 月会议刚刚决定让 69 军在山西全面支左，当然不能一下子就把矛头指向军长谢振华和政委曹中南，那么，穿军装的只有张日清无疑！于是张日清在刚刚恢复工作还没有 3 个月，一下子又变成“红总站”要抓出和打倒的黑爪牙和变色龙了。

4月，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姚文元、郑维山接见69军干部和山西省军区张日清。

周恩来问了阳泉和大同的情况。江青问了晋东南的情况。

林彪说：“军队要支持革命委员会。革命委员会是新生的红色政权，不能搞垮，要顾全大局，军队一定要‘拥政爱民’，不能反其道而行之。山西军队要很好地做群众联合工作。拥政就是拥护革命委员会，包括革命委员会的革命领导干部。山西为什么

联合不起来？是不是由于军队对革命委员会支持不够？对革命委员会是拆台还是补台？军队要高姿态检查一下。”

江青：“军队要作好群众工作，离开群众工作是不行的。要坚持支左不支派的原则，不要搞到派性里去。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要开抢。”

陈伯达：“大寨就很好嘛，是毛主席亲自树起来的全国农业的一面红旗。山西有人说，要打倒刘格平，打倒‘刘未老’，这不对嘛，军队应该站出说话嘛。你们军队不应该支持打倒刘格平的大字报，要告诉李顺达，叫他和陈永贵同志很好合作。山西要搞好大批判。王世英就很坏嘛！”

周恩来：“听说太原开了大会，听说要打倒所谓‘刘未老’，打倒陈永贵，围了刘格平、陈永贵，这是错误的。”

江青：“为什么军队不出来说话？”

曹中南：“军队保护起来了。”

江青：“那就好嘛！”

康生：“打倒刘格平，打倒张日清，都打倒了怎么办？张日清同志回去的时候，我们本来不让他回去，我们怕他回去增加派性，支一派压一派，我们为了顾全大局，是向他交代过的。”

林彪：“在山西反对刘格平，反对陈永贵是错误的，山西局势要很快稳定下来。”

康生：“你们那个时候要求张日清回去，我告诉过他，要顾全大局……陈永贵同志比较公正，听说有人反对他，晋中有股翻

案风嘛！”

周恩来：“晋中除了昔阳县外，其他都在搞翻案风。”

姚文元：“要支持县革委会，要支持革命领导干部。”

林彪：“今天全面交代了，要捍卫红色政权，要支持革命委员会，如果支持不好，就不是小错，也不是中错，而是大错了。”

周恩来：“今天不是说你们都不好，大同就很好嘛！”

4 月 4 日，周恩来、江青、陈伯达接见北京农业大学“东方红”代表。

周恩来说：“2 月中旬各口搞三结合夺权，当时我很怀疑，为什么农口那么容易？过去很落后，夺权却走在别人前面，问题很复杂。 ”

江青说：谭震林“现在把农口搞成这样，你们不应该退出来，应该跟上去。我和总理都不知道他有这么多恶劣的东西，以前对他的东西掌握不多。现在斗争正在深入，你们现在不能撤走，农大‘东方红’同学要担负主要责任。听说农机、劳大、师大有人在农口，很好。……总之，不能使农口各部左派力量垮下去，因为他们现在力量还很弱，……现在农口是特殊问题，左派垮了就不好了。农口关系很大，是关系到全国农村问题，所以你们一定要很好地支持农口革命左派。”

陈伯达：“我同意这个意见，希望你们很好地支持农口革命左派。”

4 月 4 日，中央同意宁夏回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 3

月 23 日关于成立宁夏回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的请示报告。毛泽东批示："照办"。4 月 12 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编辑部社论《不到长城非好汉——热烈欢呼宁夏回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成立》。

4 月 6 日晚上，聂荣臻打电话给叶群，问到这几天抓杨余傅"黑后台"的事情。他说："黑后台究竟指的是谁?这几天，外面大字报轰得很厉害，轰我的大字报都贴到西山脚下来了，我不得不表态啊!"

叶群说："并没有点名嘛，现在外面正在炮轰，让人家轰嘛，将来轰倒谁就是谁。"她劝聂荣臻不要多想。

第二天，4 月 7 日，聂荣臻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说明他对杨成武的看法和过去同杨成武在一起工作的情况。信中说："最近在揪杨成武黑后台的活动中，有些大字报点了我的名，有的虽未点名，但也可以看出怀疑我是后台的……请求主席能在百忙中接见我一次，亲聆面教，以便把事情搞清楚。"

3 天之后，4 月 10 日，周恩来秘书打电话给聂荣臻的秘书，说：4 月 7 日聂荣臻写给毛泽东的信，毛泽东看后批了如下内容："荣臻同志，信已收到，安心养病，勿信谣言。"

看了电话记录，聂荣臻说："这一下我清楚了，他们要抓我的什么黑后台，并不是毛主席的意思。"

当天晚上，周恩来给聂荣臻打电话，通知他到人民大会堂 118 号房间毛泽东那里开会。出席会议的除了毛泽东、林彪、周

恩来，还有聂荣臻、李富春、李先念、陈毅、徐向前、叶剑英。在会上，毛泽东对聂荣臻说："你不要背包袱，如果讲杨成武的后台，第一个就是我，第二个才轮到你。"

4 月 7 日，著名黄梅戏演员严凤英死了。这天凌晨，正在合肥市郊参加 12 军党代会的军政治部宣传处刘家驹被电话铃叫醒，是宣传处老王干事打来的，此时他被派到省革委会文口任军代表，他在电话里急切地对刘家驹说：

"严凤英死了。"

刘家驹吃惊地问："怎么死的？"

"自杀的。"

"为什么？"

"几句话说不清，回头再告诉你。等主任起床后，你马上向主任通报。"

政治部主任是这次 12 军党代会的秘书长，卧室在刘家驹的楼上。刘家驹赶紧穿衣起床，来到主任房间，向他报告说：

"严凤英自杀了，情况不明，王干事要我向你报告。"

主任说："给我口头说说可以，王干事必须向省的革委会写出文字，一定要清楚责任。死了人，我们支左干部有错，就得承担下来，不要推诿给别人，你马上进城去搞清这件事情的原委。"

吃罢早饭，刘家驹驱车进城，电影《天仙配》的七仙女的形象一直萦绕在他脑子里。12 军刚到合肥时，刘家驹在市中心四牌楼看到批判严凤英的大字报，说她反样板戏、反江青，说她是

黄梅戏的祖师婆，指责《天仙配》是宣传阶级调和的大毒草，更多的是揭露严凤英生活作风的事。尽管此时严凤英成了“牛鬼蛇神”，但是刘家驹也很想见见她。一天，刘家驹有意去省黄梅剧团大院，说是找军代表，其实就是想看看严凤英。很巧，在楼梯口，刘家驹正好看到严凤英从楼梯上下来，脸色土黄。她突然见到一个陌生军人，眼神有些惊慌。此时严凤英的模样，在刘家驹看来，像个 50 开外的家庭主妇，其实她才 36 岁。刘家驹没有和严凤英说话，径直走进军代表刘万泉的办公室，然后问他：

“严凤英放出来了？”

刘万泉说：“我们开始搞大联合、三结合，关了一年的‘牛鬼蛇神’都放回家，每天要她来我这里，接受训示。”

“你怎么训示？”

“她天天来，没话可教训了，就给她读两段毛主席语录。”

4 月 7 日这天，当刘家驹来到省革委会文化口军代表王干事的办公室时，王干事刚处理了严凤英的事从医院回来，一见刘家驹就说：

“严凤英一走，省黄梅剧团的 P 派夹起尾巴了。”

他像出了口怨气。搞大联合，剧团的 P 派群众经常找他闹事，他对这帮人烦透了。

刘家驹告诉他：“主任让我来问你，严凤英是你管的，她的死，在剧团支左的刘万泉有没有责任？”

老王干事见刘家驹是代表组织来，正经起来，讲述了严凤英

是怎样死的。

“这事有它的偶然性，”老王干事接着说起事件的经过：

文革一开始，严凤英就是众矢之的， 大字报批判她天天不断，从 1968 年的 3 月底到 4 月初，文口批严凤英升温，常把她弄上汽车串街走巷的游行，省艺校对她更是轮番围攻批斗，就在这个当口，出了桩怪事。

省黄梅戏剧团宿舍都是筒子楼，上厕所要到大院西头的公共厕所。4 月 3 日那天，天刚微明，《天仙配》扮演董永的王书舫拉肚子如厕，拉完刚出门，影影绰绰中见一女人往粪池抛下一包东西，还用一根竹竿往坑里杵了几下，转过身就慌慌张张地跑走了。王书舫注意这人的背影，判定是严凤英。他认为，严凤英是在销毁见不得人的赃物，决定要看个究竟。他找来粪掏子打捞，为了得到隐秘，臭气薰得他几乎窒息也不顾及，终于捞出来一包报纸包裹的东西。他用树技扒拉开一看，惊呆了，是一座碎了的毛泽东瓷像。这可是犯下了滔天大罪啊!王书舫在剧团是 G 派观点，和严凤英参与的 P 派对立，在团又有较好的人气，他虽进了牛棚，G 派群众还是准备把他作为革命干部推荐到“三结合”的班子。王书舫忙端来一盆水冲洗，原封包好交到军代表办公室。

黄梅戏剧团军代表刘万泉是 12 军一个团的俱乐部主任，为人倒挺正气的，但是阶级斗争的弦还是绷得很紧的。他一口咬定，严凤英是反对江青，反对文革，出于报复心理，蓄意把毛主席的瓷像打碎扔到茅坑，让他遗臭万年。他招来剧团两派的头头观看

罪证，大家更是义愤填膺，决定共同组织召开全团大会批斗严凤英。就这样，严凤英被推上审判台，打倒的口号声、责骂的批判声响彻大院。

下午，又用一辆大卡车把严凤英拉上了大街，脖子上依然像过去游街一样，给她挂了双破鞋，向公众昭示她放荡的历史。

游街、批判连续进行了三四天，严凤英有冤无处申，回家就捂住被子哭。那尊毛主席是严凤英擦试时不小心碰到地下摔碎的。严凤英觉得自己是“牛鬼蛇神”，根本无法向群众说清道明，只好自己消灾弭祸，把瓷像的碎片包进旧报纸丢到粪坑里。哪知道，“七仙女”竟然撞上了亲人变冤家的“董永”。

她的丈夫王冠亚，原是南京军区话剧团转业到地方的，他左劝右说，都无法止住严凤英的悲愤，她已厌世，没完没了的奇耻大辱该到尽头了。她趁丈夫上厕所离开，写下几句遗言：“我严凤英一不反党，二不反毛主席，生是毛主席的人，死是毛主席的鬼。”写罢，从床头柜拿出一瓶安眠药片倒进嘴里，等丈夫回来时，大半瓶安眠药已咽到肚里。

王冠亚赶紧跑去报告给军代表。刘万泉马上带着几个群众组织头头来到严凤英家，一进门就见严凤英躺在床上，大家指责她犯了滔天大罪逃避惩罚，自杀是自绝于人民，自绝于党。严凤英的卧室像是在开现场批斗会。

在一旁的王冠亚忍无可忍，把手伸到军代表面前露出手表说：“都 11 点 40 啦，快救人吧！”

刘万泉这才醒过神来，跑到办公室打电话，要省革委会文口军代表老王干事过来处理。

王干事立即赶到严凤英家，让大家找车拉严凤英上医院。群众听说要救反革命，一个个都溜走了。王干事只好自己从大院里找来一辆平板车，把严凤英扶了上去，然后自己亲自蹬车，刘万泉在后面推，来到合肥市第一医院，这里黑灯瞎火，没人值班。他们又来到市第二医院，这里有人值班，但一听说是严凤英，门诊不接收。王干事和医生讲理，也说不服他们。严凤英躺在车上一字一顿地说：

“你们别为我忙了，我就这样了。”这是她最后的人生留言。

这时，已是凌晨 3 点了，他俩又蹬车跑向西郊，来到安徽医学院的附属医院。医生给严凤英灌了半瓶高锰酸钾液。但是此时严凤英已昏迷，连吐的反应都没有了。5 时刚过，严凤英停止了呼吸。

王干事要医生解剖尸体，医生拒绝说：

“我们是不会为反革命分子留下证据的，听说她身上有梅毒，弄不好会传染给我们的。”

王干事像是在给医生下达命令：“我就是要取证，你不动，你就准备承担责任！”

无奈，医生打开了严凤英的腹腔，取出了大半瓶白色积淀物，经化验，确认是安眠药粉剂。

王干事向刘家驹讲述完事情的经过，又带着他去见刘万泉。

两人一走进黄梅剧团大院，就看见这里正在召开控诉严凤英罪行的批判大会，大院的高音喇叭传出震耳欲聋的讨伐声。

刘万泉正在主持大会，老王干事让他出会场来说话。刘万泉一脸严肃来到刘家驹跟前，讲述了事件的经过，和王干事说的一样。

刘家驹问他："为什么不赶紧先救人？"

刘万泉理直气壮地说："我敢救她吗？她是自绝于人民！救她，造反派会指责我阶级立场有问题。不信，你可以听听我们正在开的批判会。"

4月6日，毛泽东在中央同意湖南省成立革委会的请示稿上批示：

"退周再阅。建议在这个文件上，杨成武、张平化均不点名，留有余地，将来要点也不迟。请酌定。"

当天，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1968.04.06；中发［68］56号文件：《关于成立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的批示》，同意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关于成立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的请示报告。

4 月 8 日，湖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由黎原任主任，龙书金任第一副主任，华国锋、章伯森、省军区政委杨大易、解放军政干校校长刘顺文、长沙"工联"负责人胡勇、"湘江风雷"负责人叶卫东任副主任。

4 月 10 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社论《芙蓉国里尽朝

晖》，祝贺湖南省革委会的成立，社论中发表了毛泽东一段“最新指示”：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继续。”

## 第 989 回：徐家汇，藏书楼里有秘密　没想到，狄克就是张春桥

我们再看上海。上海的“扫雷纵队”于 1967 年 4 月解散后，游雪涛对安排他到群运组任副组长还是比较满意的，因为是市革委会一个组办的副组长，相当于文革前上海市副部、委级干部。但是，游雪涛把“扫雷纵队”的一套做法带到了群运组。但是群运组是市革委会领导和各个群众组织之间联系的纽带，怎么能用秘密工作的方式对各群众组织搞特务活动呢？游雪涛的做法当然遭到组长谢宗范的反对，俩人因此发生矛盾。

游雪涛从“工总司”内物色到军工 822 厂的技术员、“工总司”最早发起人之一的岑麒麟为他提供情报。因为岑麒麟能够参加“工总司”的高层会议，因此，游雪涛了解到王洪文以及“工总司”内部的许多情况。

王洪文知道游雪涛的所作所为后，十分恼火，扬言要追查游雪涛派人调查“工总司”的情况，游雪涛与谢宗范的矛盾也因此激化，谢宗范到徐景贤那里告状，徐景贤进行了调解，也批评了游雪涛。

1967 年夏天的一个下午，徐景贤正在康平路市委小礼堂开会，办公室的人走进来说，外面有紧急事情找他，徐景贤走到小礼堂门口处玻璃大门旁边一看，知识分子模样、戴着茶色眼镜的游雪涛正在那里很着急的等待，他看见徐景贤出来，赶快从口袋里拿出一份材料给交给徐景贤，很神秘地对他讲：“你赶快看看。”

小礼堂外面走廊里有个小办公桌，徐景贤打开台灯，只见材料上面写着“绝”字。材料说，北京电影学院有 5 个学生，带头的叫孔都，他们到上海后，专门到上海图书馆徐家汇藏书楼去查阅、摘抄、复制，还用照相机来翻拍三十年代的电影资料，他们以编写电影战钱上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为名，从电影界，文艺界的“黑帮”嘴里掏取诬蔑江青的黑材料。材料还说，他们要从画报，文章，剧本，照片当中来抄摘国民党反动派、特务攻击诬蔑江青的材料；他们在那里已经活动了两个月之久。游雪涛在报告的最后还写上：为了迅速查明案情，截获他们摘抄、翻拍的黑材料，追出他们在上海的同案犯和黑后台，要对这 5 个人进行隔离审查。

那天天气很热，徐景贤边看材料，在旁边的游学涛一边不断出汗，急得要命。

徐景贤看完后，也觉得事关重大，便问游学涛：“你这样做有什么根据？”因为这份报告要通过徐景贤送给张春桥的，他担心，假如不确实的话，他负不起这个责任。

游学涛交底说：“我派海燕电影制片厂的小朱打进去的。”

徐景贤在文革初期和海燕电影制片厂打过交道，还参与处理过电影学院红卫兵在漕溪北路打死人的事件。他接触过这个姓朱的帅小伙。没想到，他也是“扫雷纵队”的人。

游雪涛说：“是啊，就是他。因为他是电影厂的，我要他和北京电影学院的人混在一起，那几个人对他很快就很信任了，他

们几个人关在小房间里，一面抽烟，一面看三十年代的电影画报，翻拍上面的照片，议论攻击江青同志，他们的烟头把烟缸都塞得满满的。小朱都是在场的。”

徐景贤问：“小朱有没有参加议论呢？”因为假如小朱也参加了议论，那也是不行的。

游学涛说：“你放心，这个我都做过布置的，我不丧失原则。我今天赶来，是因为刚才得到消息，这几个人马上要回北京去了，他们所收集的材料也要带走，所以要越快越好。”

这一说，徐景贤也觉得刻不容缓，马上带着这份报告赶到兴国路招待所请示张春桥。张春桥很注意的听完后，当即在报告上批了一句话：“把他们先拘捕起来，由公检法军管会和于会泳、游雪涛同志商量一下，摸准了行动，不要扑空。”

此时，北京电影学院的老师司徒兆敦也来到上海，和北京电影学院的孔都等 5 人一起住在上海越剧院学馆。当时于会泳是分管文化系统的，游雪涛是群运组的，出面的是公检法军管会。张春桥批示下达后，公检法军管会副主任、空四军副军长姬应伍和游雪涛商量了行动计划，决定由公检法军管会派人，海燕制片厂的小朱带路，把北京电影学院的人全部抓起来。

但是，当他们来到上海越剧院学馆时，却扑了个空——北影一行人已经走了。

“上哪儿去了？”他们问。

“听说去杭州了。”

急急赶往上海北站，风风火火前往杭州。依旧扑空，司徒一行又返回上海了！

小朱等人再赶回上海越剧院学馆，还不见司徒一行的影子。原来他们这次住到成都北路 471 号的成都路第二中学。在那里，他们抓住了北京电影学院 5 人。唯司徒漏网——他已前往南昌。

后来游雪涛报告，这北京电影学院的 5 个学生全部被送进了少年犯管教所，北京电影学院的人收集的“黑材料”也全部缴获了。当时少年犯管教所是专门隔离、审查、拘禁人的地方，不是因为他们是少年犯，而是市里被打倒的人都关在这里。

从被捕者那里得知，他们在徐家汇藏书楼查得的资料，分藏于他们在上海的 4 个亲友家。于是，这 4 家全部被抄。在其中闸北一家的小阁楼里，还抄得那两卷尚未冲洗的胶卷。遗憾的是，被游雪涛的女儿拿着玩，结果全部打开曝光了。

始建于 1842 年的徐家汇藏书楼，位于漕溪北路 80 号，徐家汇天主堂北侧。与毗邻的尖塔高耸的徐家汇大教堂相比，这里除了一块门牌号外，没有任何招牌，毫不起眼。它原本是隶属于大教堂的，当时的全称是：上海徐家汇天主堂藏书楼，又称汇堂石室。

上海解放后，徐家汇藏书楼成为上海图书馆的一部分，全称也改为：上海图书馆徐家汇藏书楼，为南北交错的两幢建筑。南楼为四层坡顶，外廊式建筑，走廊朝东南。北楼为书库，为两层双坡顶。

后来，上海市政府又将“上海鸿英图书馆”、“上海历史文献图书馆”、“上海报刊图书馆”等八个各有特色的小型专业馆全部并入藏书楼，使藏书楼馆藏增至 100 余万册，仅 1949 年以前出版的报纸就有 3600 多种，居全国第一。

这里不对一般读者开放，只有持单位介绍信才能进入。1966 年 9 月以后，随着全国揪叛徒之风兴起，各地红卫兵开始络绎不绝的光顾这座拥有众多旧报刊的藏书楼。其中，西安交通大学的一批红卫兵来得最勤，他们就住在上海交通大学，离徐家汇藏书楼不过一站多路，便成天泡在藏书楼里。

不过，西安交大的红卫兵是工科大学生，对于文学、社会科学实在不在行，于是，他们请上海市图书馆书目参考部副主任葛正慧给他们帮忙。

葛正慧给他们搬出了 1935 年前后的《申报》、《立报》。西安交大的红卫兵吃惊地发现，在这些旧报纸上，居然出现很熟悉的名字——张春桥！《明星》、《金线泉边》、《一个关里人的纪念

辞》……一篇又一篇，这些文章都是署名“张春桥”。

“这个张春桥，就是现在的中央文革首长张春桥？”红卫兵在惊讶之余，问葛正慧。

葛正慧点了点头，又从书库里找出了1936年3月15日的《大晚报》，指着其中《火炬》副刊“星期文坛”上的一篇署名狄克的文章：《我们要执行自我批判》，让小将们好好看看。

此文不长，以“约瑟夫”的一句话：“自我批判之于我们，犹如空气、水一样的需要”开头，接着写道：“我们需要批评家、理论家来帮助读者、作者。”

“但是，对于自我批判作的不够，……《雷雨》从发表到现在一年多了，《八月的乡村》、《生死场》发表也快三四个月了，我们见到一个较详细的批评吗？”

“《八月的乡村》整个地说，他是一首史诗。可是里面有些还不真实，像人民革命军进攻了一个乡村以后的情况不够真实，有人这样对我说：‘田军不该早早地从东北回来’，就是由于他感觉到田军还需要长时间的学习，如果再丰富了自己以后，这部作品当更好。技巧上、内容上，都有许多问题在，为什么没有人指出呢？”

文章最后说：“不要以为那些作家是我们底就不批评！我们要建立国防文学，首先要建立更为强健的批评！我们要结成联合阵线，首先要建立强健的批评！更为了使作家健康，要时时刻刻的执行自我批评！”

西安交大的红卫兵将狄克写的《我们要执行自我批判》这篇文章反复看了好几遍，怎么也看不明白其中究竟有什么名堂，只好又将葛正慧找来：

“约瑟夫是谁？”到底是工科大学生，对文章的的第一句话就不明白。

“约瑟夫就是斯大林。那时候，称马克思为卡尔，列宁为伊里奇。” 葛正慧答。

“田军呢？”学生们又问。

“田军就是萧军。”

“萧军是谁？”

“当时东北的青年作家，《八月的乡村》就是他写的。”

“《生死场》是谁写的？”

“萧红。”

“萧红是谁？”

“萧红是萧军的妻子。《八月的乡村》、《生死场》都是得到鲁迅的推荐、支持才出版的。你们可以查一查《鲁迅全集》，那上面有鲁迅为这两本书写的序言。”

随后，葛正慧又让学生们读鲁迅写的《三月的租界》。在《三月的租界》里这样写道：

三月里，就“有人”在上海的租界上冷冷的说道——

“田军不该早早地从东北回来！”

谁说的呢？就是“有人”。为什么呢？因为这部《八月的乡

村》“里面有些还不真实”。然而我的传话是“真实”的。有《大晚报》副刊《火炬》的奇怪毫光之一，《星期文坛》上的狄克先生的文章为证——

“《八月的乡村》整个地说，他是一首史诗，可是里面有些还不真实，像人民革命军进攻了一个乡村以后的情况就不够真实。有人这样对我说：‘田军不该早早地从东北回来’，就是由于他感觉到田军还需要长时间的学习，如果再丰富了自己以后，这部作品当更好。技巧上、内容上，都有许多问题在，为什么没有人指出呢？”

这些话自然不能说是不对的。假如“有人”说，高尔基不该早早不做码头脚夫，否则，他的作品当更好；吉须不该早早逃亡外国，如果坐在希忒拉的集中营里，他将来的报告文学当更有希望。倘使有谁去争论，那么，这人一定是低能儿。然而在三月的租界上，却还有说几句话的必要，因为我们还不到十分“丰富了自己”，免于来做低能儿的幸福的时期。

这样的时候，人是很容易性急的。例如罢，田军早早的来做小说了，却“不够真实”，狄克先生一听到“有人”的话，立刻同意，责别人不来指出“许多问题”了，也等不及“丰富了自己以后”，再来做“正确的批评”。但我以为这是不错的，我们有投枪就用投枪，正不必等候刚在制造或将要制造的坦克车和烧夷弹。可惜的是这么一来，田军也就没有什么“不该早早地从东北回来”的错处了。立论要稳当真也不容易。

况且从狄克先生的文章上看起来，要知道“真实”似乎也无须久留在东北似的，这位“有人”先生和狄克先生大约就留在租界上，并未比田军回来得晚，在东北学习，但他们却知道够不够真实。而且要作家进步，也无须靠“正确”的批评，因为在没有人指出《八月的乡村》的技巧上，内容上的“许多问题”以前，狄克先生也已经断定了:“我相信现在有人在写，或预备写比《八月的乡村》更好的作品，因为读者需要!”

到这里，就是坦克车正要来，或将要来了，不妨先折断了投枪。

到这里，我又应该补叙狄克先生的文章的题目，是:《我们要执行自我批判》。

题目很有劲。作者虽然不说这就是“自我批判”，但却实行着抹杀《八月的乡村》的“自我批判”的任务的，要到他所希望的正式的“自我批判”发表时，这才解除它的任务，而《八月的乡村》也许再有些生机。因为这种模模胡胡的摇头，比列举十大罪状更有害于对手，列举还有条款，含胡的指摘，是可以令人揣测到坏到茫无界限的。

自然，狄克先生的“要执行自我批判”是好心，因为“那些作家是我们底”的缘故。但我以为同时可也万万忘记不得“我们”之外的“他们”，也不可专对“我们”之中的“他们”。要批判，就得彼此都给批判，美恶一并指出。如果在还有“我们”和“他们”的文坛上，一味自责以显其“正确”或公平，那其实是在向

“他们”献媚或替“他们”缴械。

四月十六日

学生们看出来了，鲁迅这篇《三月的租界》是批评狄克那篇《我们要执行自我批判》的。

“狄克是谁？”学生们问葛正慧。

“狄克就是张春桥！”葛正慧轻声地回答。

“真的？”西安交大的红卫兵大吃一惊！

“千真万确！”葛正慧非常肯定地回答。

本来是要在徐家汇藏书楼抓叛徒的，不料却发现曾经受到鲁迅批评的“狄克”，而这个“狄克”居然会是张春桥！西安交大的红卫兵全文抄录了关于“狄克”的这些材料。

葛正慧为什么如此肯定狄克就是张春桥呢？这与他的工作性质有关。葛正慧的工作是研究书目，而研究书目，就要知道作者，了解作者就必须知道作者的笔名。否则的话，就无法弄清那些以笔名出版的书、发表的文章究竟是谁写的？因此，葛正慧花了很大的精力，研究“笔名学”。

1953 年的一天，葛正慧翻阅 1937 年 2 月上海千秋出版社编辑部出版的《鲁迅先生轶事》一书。这是一本只有 164 页的小册子，很不起眼。读到该书第 104 至 105 页时，有这么一节，标题是《鲁迅逝世一月田军在墓前焚烧〈冲流〉》，其中写道：

读者诸君，鲁迅先生死后我们已陆续报告了你们很多趣事了。现在再报告一点。那是关于田军的。你们一定知道，在去年

秋间市上有一本长篇小说出售，书名是《八月的乡村》。那著者就是田军，书前边，有鲁迅先生一篇长序，于是这本书很快的销行，田军这名字也很快的给一般人知道了。《八月的乡村》是奴隶丛书之二，第一册是叶紫的《丰收》，于是许多人就说田军是叶紫。其实，田军是哈尔滨的一个青年，道地的东北作家也。《八月的乡村》也是东北被压迫的民众和义勇军的描写。《八月的乡村》虽则并不写得十分好，但是田军是东北人，见闻较切，比之一般未离上海一步而大写东北如何如何的人要高明得多，所以“老头子”（指鲁迅）一看就很激赏，作序印行。

《八月的乡村》因为鲁迅一序而销路甚佳，田军一举成名，那么，他对于鲁迅先生的感激是当然的。记得《八月的乡村》行世之时，有人对他略有批评，像张春桥之类，曾经引起鲁迅先生的不快，作《三月的租界》一文给与极尖刻的讽刺外，更在《<出关>的“关”》中，有一节话也射着他：

“现在许多新作家的努力之作，都没有这么受批评家的注意。偶或为读者所发现，销上一二千部，便什么名利双收呀，不该回来呀，‘叽哩咕噜’呀。群起而打之，惟恐他还有活气，一定要弄到此后一声不响，这才算天下太平，文坛万岁！”

鲁迅在《三月的租界》里批判的是狄克，《鲁迅先生轶事》一书说《三月的租界》批判的是张春桥，于是，葛正慧的作者笔名卡片中又多了一张：“狄克：张春桥”，并注明了这一考证出于《鲁迅先生轶事》。

著有短篇小说集《七封书信的自传》，被鲁迅誉为“优秀之作”的老作家魏金枝是上海图书馆的常客。葛正慧知道他当年是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员，熟悉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上海文坛，于是便把自己的发现悄悄告诉了他。

魏金枝的脸上没有露出半点惊讶的神色，只是问：“你怎么会知道狄克是张春桥？”

“我是从一本书上查到的。”葛正慧说出了《鲁迅先生轶事》这本书。

魏金枝笑了：“狄克是张春桥，这个秘密我早就知道。其实，张春桥还用过另一个笔名批评过《八月的乡村》，你查出来了吗？”

“没有。他还用过什么笔名？”

“水晶！”

与西安交大红卫兵知道张春桥就是狄克，并受到过鲁迅批评的同时，邻近徐家汇藏书楼的上海红旗电影制片厂“红影组”的一批人，戴着“上海文艺界造反司令部”的袖章，也来到这里。他们是查阅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影坛报刊，准备编写《电影戏剧四十年两条路线斗争纪实》，写江青与阳翰笙、田汉、夏衍、周扬“四条汉子”在电影戏剧领域的斗争历史。

图书馆书目参考部副主任葛正慧为他们搬出来一本本当年的《电通画报》、《大公报(星期影画)》、《大晚报》、《申报》、《青春电影》、《时事新报》、《民报》、《中央日报》……，忙得满头是

汗。

而这些报刊中的一些内容却让“红影组”的年轻人惊讶、疑惑：《蓝苹在电通时代的五角恋爱》；《为来为去为了一个宝贝的蓝苹，影评人唐纳二度自杀蹈海获救》；《唐纳蓝苹交恶原因：蓝苹想出风头，用的是美人计》；《悲剧闭幕喜剧展开蓝苹章泯蜜月旅行》……

这些大标题如此的触目惊心，“红影组”的组员们面面相觑，那本《电影戏剧四十年两条路线斗争纪实》不知该如何下笔！

有人秘而不宣，有人避而不谈，也有人挺身而出，准备“炮轰江青”。

到了 1967 年，北京电影学院一彪人马，经上海市革委会同意，也穿过那扇小门，进入藏书楼。他们也是为了收集江青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光辉事迹”，照相机对准了一页页发黄的电影画报。

游雪涛得知这一消息后，即派海燕电影制片厂的小朱打进去与北京电影学院的人接触。

## 第 990 回：上海市，“游雪涛小组”成立　派卧底，情报搞到警备区

一天，上海市革委会负责专案和机关事务工作的王承龙对徐景贤说“游雪涛今后不到外滩群运组去工作了，他另外成立一个小组，直接归康平路办公室领导。”

徐景贤对王承龙说：“过去春桥同志对他有很多说法的。”

王承龙说：“这不是我的决定，这次重新建立游雪涛小组，是春桥同志决定的，是文静同志直接关心的。”

张春桥的妻子文静时在外滩联络组工作。联络组是当时市革委会专门编辑《动态文稿》的一个机构，所以文静与游雪涛的接触较多。就这样，游雪涛在张春桥的支持下，在文静直接指挥下，在王承龙全力帮助下，居然又成功地将他的“扫雷纵队”成建制的转到了市革委会办公厅，并由“康办”为他们新建了一个基地：徐汇区永福路二二四号花园洋房。王承龙说：“这幢房子给他们，他们的任务就是专门为领导收集动态。”

1967 年 8 月，游雪涛以原“扫雷纵队”为班底，在上海市永福路二二四号成立了“游雪涛小组”。

自此，“扫雷纵队”便成为了人们所说的“二二四小组”，工作性质没变，然而，组织的“民办”自发身份，则正式升为了“官办”规格，活动的手段与条件都大大改变了，配备了录音设备等器材与枪支武器，经费也得到了保证，甚至凭白条也可以报销费用了。原《支部生活》美术编辑、康办负责人朱玉佩曾告诉徐景

贤："平时游雪涛小组可以开白条子来报销特殊经费，而且用不着说明这笔钱的用途。"

朱玉佩曾给这个小组的一批成员发了《文汇报》记者证，这说明他们在外面的活动身份可以经常变化的，有时候用"康办"的名义，有时候用《文汇报》记者的名义，这样会有很多好处和方便。

永福路是一条临近淮海中路的马路，交通方便而行人不多。那里离张春桥和姚文元的兴国招待所、徐景贤的"丁学雷"小楼、王洪文占据的东湖招待所以及康平路原上海市委机关都很近，轿车在几分钟之内均能到达。游雪涛严格地挑选着人马，逐步发展他的"二二四小组"，全盛时期，全纵队共计 35 名队员，既有歌剧演员、杂志编辑，也有医院医生、复旦大学学生、同济大学学生，等等。队员之中，还配备了打字员、司机。实际上"二二四小组"，除在编人员外，还有很多外围人员，都由游雪涛指挥。

上海第二军医大学有两派群众组织，一派是"红旗"，运动初期保总后勤部部长邱会作，一月上海夺权时没有表示支持；另一派是"红纵"，在北京为打倒邱会作闹得是天翻地覆，中央领导多次接见。在上海支持打倒陈丕显、曹荻秋，参加了上海"一月夺权"，是上海市革委会成立时的发起单位之一，是里外都反的造反派，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开全体委员会议，都要把"红纵"请来。

1967 年武汉"720 事件"后，上海二军医大"红纵"贴出"揪

出上海的陈再道”的大标语，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的造反派也在电台所在地，北京东路 2 号对面的墙上贴出这种大标语，没有引起太大的反响。王、关、戚倒台后，上海警备区司令员廖政国有给张春桥写了个报告，要求给电台的造反派和二军医大“红纵”办学习班。张春桥没有同意，在市革委会核心成员的小会上说：“廖政国要给他们办学习班，他自己也有错的。”

二军医大“红纵”的对立面“红旗战斗兵团”听说廖政国的要求没有得到张春桥的批准后十分气愤，100 多人来到康平路静坐整整一个通宵，抗议张春桥，要他当面回答“揪军内一小撮”是什么性质的问题。张春桥很生气，在康平路召开的一次全市群众组织会议上，他用铅笔敲着桌子站起来说：“你不要以为后台硬，”他指着身上军装的领章说：“我有这个呢！你不承认我这个政委，我还有毛主席支持呢！”

1967 年 12 月 16 日，游雪涛在致张春桥的信中，这样写道：“就拿最近调查(上海)警备区的情况来说吧，夏云天深知廖政国的为人，以及进行这项工作可能会有的风险，他还是大胆谨慎地插进了警备区，为弄清部队的情况付出了很艰苦的劳动……”

游雪涛向张春桥报告了“上海警备区 14 名师以上干部的政治态度”！ 他将警备区对南京军区不满的副司令、副政委、后勤部负责人找来，一一了解南京军区的情况。然后，整理了一份《关于警备区整理春桥同志黑材料问题的点滴》。简报中写着：“许世友支持廖政国在上海夺张春桥的权！”

1968 年春节前，张春桥在兴国路招待所搞了个小聚餐，参加的是市革委会核心成员张春桥、姚文元、王少庸、马天水、徐景贤、王洪文、王承龙、朱锡琪和办公室主任朱玉佩。张春桥说："春节到了，大家随便聚聚。"他叫他的秘书何秀文将茅台酒拿出来，他平时是不喝的。王洪文喜欢喝酒，喝了几口后就跟王承龙猜拳助兴，两人的脸都喝红了。

这时张春桥开口了，他说："昨天我们在市革委会礼堂开过拥军爱民的大会了。"

那天大会，张春桥坐在主席台中间，他右边是上海警备区司令员廖政国，廖政国是独臂，只有左手。会议结束时，大家高呼口号，张春桥的右手与廖政国的左手握在一起举起来喊口号，表示军民团结。

但这时张春桥却说："这个会我们已经开过了，开是开了，人家是不是拥护我们啊？"

张春桥这么一问，大家都明白他的意思了。王洪文马上说："廖政国是铁杆啊！"

王洪文的意思是说廖政国是保陈丕显的铁杆，他将陈丕显保护在青浦县的军营里，不让造反派批斗，在警备区的内部会议上还叫陈丕显坐在主席台上，说他还是警备区政委。王洪文还说："部队到公安局支左，公安局里也全部支持老保。"

张春桥接着说："我们头脑要清醒点，我们手拉手拥军爱民，最担心的就是部队不站在我们这一边。你们不要学王、关、戚，

他们在报纸上公开‘揪军内一小撮’犯了错误。部队里的事情要端出来，只能自上而下，廖政国的问题总归会解决的，要相信党。”

再说游雪涛找警备区那么多人谈话，挖内部材料，被警备区知道了。警备区司令员廖政国很生气，说“我们上海警备区有一只伸进来的黑手。”指的就是游雪涛和游雪涛小组。”

游雪涛经常出入于兴国路，张春桥的秘书何秀文说：“每当游雪涛来电话要求面谈，张春桥总是立即答应，或迅速安排时间。游雪涛是受张春桥重视的特殊人物。”

每一次谈话，只有他们两人低声耳语，连何秀文也不能在侧。张春桥与游雪涛谈话时，只许游雪涛用脑子记，不许用笔记本记。游雪涛是个聪明人。虽说张春桥不让他记笔记，他另有高招：一回到兴国路毗邻的高邮路家中，他的头一件事，就是打开那本红色人造革面的活页大笔记本，赶紧把头脑中记忆犹新的张春桥的原话，倾注于笔记本之中。这个笔记本现存于游雪涛案卷。

以“老人串连会”为例。华东局当时分成两派，一派叫“革造会”，即华东局“革命造反委员会”，造反较早，与上海市委“机联站”的关系比较多。后来，他们中又杀出来一派叫“打韩兵团”，专门打倒华东局书记韩哲一。 “打韩兵团”杀出来，比“革造会”要左得多，其中许多观点是王少庸和王承龙支持的。1967年下半年，游雪涛在和王少庸、王承龙聊天的时候，听到这个讯息，马上派小组成员 3 人通过各种关系，混进华东局机关。1967年 11 月 2 日深夜，游雪涛派人翻过华东局宿舍围墙，切断了电

话线，冲进华东局农办主任刘瑞龙的家里，用黑布把眼睛蒙起来，推进汽车，故意让汽车在马路上七转八弯、使他不知道具体方向，然后开到郊区一个游雪涛秘密设置的空房里，解开他的黑布，对他进行审讯。这已是搞非法的绑架活动了。最后由文静根据游雪涛的简报内容口授，张春桥的秘书何秀文笔录，最后游雪涛署名，整理出一份《关于刘瑞龙初步审查情况汇报》，送到张春桥的办公桌上。

张春桥在这份材料上亲自“批示”：“刘瑞龙是个大坏蛋，华东局机关造反派不应把这个人放在那里不管。要认真地组织力量批倒批臭，并把问题搞清楚。”

游雪涛还搞了一份“华东黑线人物图”，将华东局 90 多个老干部名列图中，上面是一个总的方格子，下面有实线、虚线、直线、横线、斜线、可以串起来，将各地很多老干部都串在了这张图中，谁与谁是什么关系，又与上面谁、下面谁有何种关系，全标注在图中，像《红楼梦》中的几大家族图一样，让张春桥一看就明白。他还在图上标了题目：“苏字动态一号　反革命地下武装关系图”。游雪涛在给张春桥的密报中这样写道“长江以南的苏浙沪皖鲁五省市，存在有一个由 10 人小组领导的‘老人串连会’，后台可能是陈丕显，他们随时有用反革命武装来进行反对文革的可能。”

当时正在北京的张春桥对这一情报非常关注。1968 年 3 月 14 日下午 14 时，张春桥趁返沪之际在兴国招待所约见游雪涛，

向他提出一连串的问题。这些问题，游雪涛都记在他的笔记本里，作为张春桥布置的任务，向他的手下传达，要他们执行。以后，江苏、浙江来沪的一些老干部就给游雪涛小组的人盯上了，即使下着倾盆大雨，他们也整日整夜地守在宾馆门口，跟踪、盯梢、监视，看他们跟上海哪些人联系。但是，弄了半天，这个组织是根本不存在的。

游雪涛还查了“红革会”头头们的父母的档案，写成一份份简报。

3 月 24 日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北京军队系统万人大会，当时中央文革领导人都到会了，但是张春桥没有参加，因为 3 月 23 日他到南京祝贺江苏省革命委员会成立，3 月 24 日到杭州祝贺浙江省革命委员会成立。他是以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主任的身份去的。

3 月 27 日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 10 万人参加的 “粉碎‘二月逆流’新反扑誓师大会”。那次大会，中央也没有通知张春桥参加。

上海徐景贤极为关注北京 3 月 27 日这次大会内容，他紧急通知《文汇报》驻北京办事处负责人艾玲，让她无论如何要到会场，把所有领导讲话做详细纪录，用飞机带回上海，上海革委会会派人在机场接。拿到会议纪录后，他们要在上海的大会上传达、宣传。

艾玲，原姓陈，广东人，抗日战争时期来到延安，加入了中

国共产党。她长期从事新闻工作，是《文汇报》的老人。她丈夫贺瑞林是总参二部副部长，家庭和孩子都在北京。为了照顾她和家人团聚，《文汇报》让她长期留京工作，担任《文汇报》驻北京办事处的主任。

《文汇报》驻北京办事处，在报社内简称“北办”，原来是一个驻京记者站，兼带办理报纸北京版的印刷发行等业务。

六十年代中期，江青以养病的名义常住上海，先后抓了《红灯记》、《沙家浜》、《智取威虎山》和《海港》等样板戏，由北京和上海的京剧院、团演出。每演一个戏，每开一次座谈会，艾玲就忙碌起来，把北京各界对这几个样板戏的反应，源源不断地加以收集、整理，密封起来，通过民航的班机直送上海文汇报社。

当时，文汇报社编有铅印的《文汇情况》，每天出一到两期，供内部阅看。还有一种《文汇情况（增刊）》，分发的范围更小，只供领导参阅，印数很少。至于艾玲从北京赶航班送来的情况，更享有一种特殊的待遇，它往往是手抄的，只抄一式几份，由《文汇报》社直送张春桥，然后由张春桥转报江青。江青总是怀着极大的兴趣阅读这些来自首都的第一手情况。因此，艾玲以及《文汇报》“北办”的工作，越来越得到江青、张春桥等人的器重。

1965 年 11 月 10 日，姚文元写成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发表后，《文汇报》“北办”的工作受到了江青、毛泽东的重视。当时正在杭州和上海的毛泽东，每天了解北京动态的众多材料中，就有《文汇报》“北办”每天通过民航邮寄过来

的情况汇总。后来江青下令，《海瑞罢官》批判的反应不登《文汇情况》，改出《记者简报》，只印 12 份，直送毛泽东。张春桥对“北办”的工作备加赞赏，多次加以表扬。《文汇报》报社领导曾对艾玲说：“‘北办’的工作是得到肯定的，是在为党工作，你们采访的情况，毛主席都看过了。”为此，“北办”上上下下都感到很荣幸。

1966 年 6 月，文革开始后，艾玲和“北办”的主要工作人员被责令返回上海参加报社的运动，她与编委其他成员一起被大字报点名，戴上了“走资派”、“资产阶级黑线人物”的帽子。大字报铺天盖地，就连她那间十多平方米的小宿舍，从四面墙壁到天花板，甚至小小的单人床头、床侧都贴满了大字报。1966 年 11 月 8 日，她和报社几个编委被正式宣布停职接受审查。

“星火燎原”总部夺权后，开始批判艾玲并要她交代问题。正在这个节骨眼上，张春桥出来说话了，1967 年初，在上海展览馆咖啡厅召开的一次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全体委员会议上，张春桥宣布：“……我在上海只保两个人：于会泳和艾玲。他们是对革命样板戏和《海瑞罢官》批判做出过贡献的。”

于是，1967 年 3 月 25 日，《文汇报》革命委员会成立，艾玲作为老干部结合进领导班子，又当了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常委。大家准备推举她担任《文汇报》革委会主任。但艾玲仍要求留在北京工作，以便就近照顾家庭，这样，她便继续担任《文汇报》“北办”的负责人。正当中央国家机关和北京的各级当权派们纷

纷遭受批斗的时候，艾玲却已轻装上阵，以《文汇报》记者的身份，到北京的各个文革热点进行穿梭采访了。凡是“中央文革”领导成员到哪个单位发表了讲话，作了指示，哪个单位就会出现艾玲的身影；凡是北京的哪个部门或单位两派发生激烈的冲突，或是哪里有人反对“中央文革”，哪里就有文汇报“北办”记者的踪迹。从 1967 年夺权高潮到 1968 年年中，文汇报“北办”成了为“中央文革”收集社会动向材料的特殊机构之一。“北办”收集到的北京各界社会动向当天就直送“中央文革办事组”；陈伯达和戚本禹还多次接见过她，称赞“北办”的工作效率高，戚本禹拿出“中央文革办事组”编的《快报》，当面翻给艾玲看，上面刊载有文汇报“北办”提供的不少情况材料。戚本禹说：“这些《快报》是直送毛主席和无产阶级司令部的。”

由于“中央文革”直接向“北办”布置任务，艾玲感到责任重大，原有的班子已不能适应这样艰巨的任务了。她便趁到上海《文汇报》述职的机会，向当时在上海市分管意识形态工作的徐景贤提出要求，希望增派几名活动能力强，写作水平高的笔杆子，到“北办”工作。艾玲还说，由于每天要向“中央文革”报送书面情况，手抄已经来不及，需要增调机要打字员打字，但这些特殊任务与上海《文汇报》社的关系不大，内容又需保密，因此不便向报社提出，希望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帮助解决。

徐景贤当即答应帮助艾玲解决困难，同时也提出要求，说是上海“一月夺权”以后，张春桥、姚文元大部分时间留在上海工

作，需要及时了解中央的精神和北京的动向，因此希望“北办”把收集到的情况材料，除了“中央文革”指定下达的绝密件以外，能够复打一份给上海。他还和艾玲相约：今后如遇到重大的事件，由艾玲或“北办”其它可靠的人，通过红色保密电机直接给徐景贤打电话，由他转报给住在上海的张春桥和姚文元。

## 第 991 回：生疑问，张春桥为何缺席　《文汇报》，提出十个为什么

3 月 28 日，徐景贤在上海展览馆宴会厅召开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全体委员扩大会议。他们讨论了其它方面的工作后，就等待北京航班送来 3 月 27 日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的“粉碎‘二月逆流’新反扑誓师大会”上中央领导人的讲话记录。徐景贤让他的秘书在机场等，随时与他通电话。

那天航班迟到了，大家都很着急。

徐景贤的秘书拿到文件后，直奔展览馆，交给徐景贤。

文件是艾玲手写的，详细地记录了当时北京会场的情况。徐景贤向全体与会人员做了传达，然后，立即将把这份纪录送到张春桥那里，因为只有一份。

这事情引起了一些人的怀疑。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成员、市革委会政宣组组长、《文汇报》负责人朱锡琪就提出疑问：“中央那么重要的活动，林彪宣布，毛主席到场，揪出一个代总参谋长、一个空军负责人、一个北京卫戍区领导，为什么张春桥没去？”而且上海是那么大的城市，张春桥又是中央文革成员，北京的会议记录竟要徐景贤从《文汇报》北京办事处那里去搞？

朱锡琪原是《文汇报》报社机要秘书，共产党员。文革开始后，他和邵传烈、周国荣 3 人发起成立了《文汇报》“星火燎原革命造反总部”，并组织了 1967 年 1 月 5 日的《文汇报》夺权，进而引发了上海的一月革命风暴。

其实，春节前张春桥在兴国路招待所那次小聚餐上的一番话，当时就引起了在座的朱锡琪反感，他觉得张春桥在拥军爱民的大会上与上海警备区司令员廖政国高举紧握的双手表示拥军爱民，暗地里却要把廖政国揪出来，这不是两面派吗？

此时，社会上已经有流言说张春桥是叛徒。有天晚上，张春桥在康平路小礼堂召集市革命委员会领导成员会议，也请各大专院校红卫兵代表到会、听听外面的动向。

张春桥在会上问同济大学红卫兵头头陈敢峰："最近有什么社会动向？"

陈敢峰说："有人散布谣言，说张春桥是叛徒。"

张春桥的脸色一下子阴沉下来，他非常生气地说："我从来没被捕过，怎么会是叛徒啊？"

张春桥接着说："我过去太宽大了，今后要是听到谁再讲这种话，我就不客气了。"他说话的时候，手里还拿着烟，说完，把烟重重地在烟缸里掐掉。然后一字一句地说："老实说，我只要小指头一点，你就会完蛋！"

会后，关于张春桥有历史问题，张春桥是叛徒的话还在外面流传。游雪涛的"二二四小组"为此专门发了一期简报，题目是《条顿剑在行动》，这是套用当时一部德国纪录片的名字，这部纪录片就叫《条顿剑在行动》，反映当时德国法西斯企图复活，纳粹要继续上台的情况。游雪涛引用这部纪录片的名字，意思是上海有人要再一次炮打张春桥。

这时，《文汇报》“北办”的人不断给《文汇报》写条子说，《文汇报》要转转风向了，不要批极左了，现在的形势是批极右。当时报纸都在批判造反派中的派性、山头主义，写了不少社论，怎么突然之间要开始反右了？报社戏称这是十二道金牌，于是由“星火燎原革命造反总部”头头，当时也是《文汇报》的负责人周国荣编了一整版关于反右的《毛主席语录》，但是张春桥没有同意刊登。

之后在一次市革委会核心成员张春桥、姚文元、王少庸、马天水、徐景贤、王洪文、王承龙和朱锡琪 8 人小会上，徐景贤问朱锡琪说：“你们《文汇报》周国荣最近跟‘北办’打得火热，老朱你怎样看啊？”

朱锡琪说不知道。

张春桥说：“《文汇报》有成绩，但不要自满，要当心摔跟头。”

朱锡琪觉得事情可能很严重，会后就问周国荣：“你是不是跟‘北办’的同志很热络？怎么徐景贤也讲这事了。”

周国荣说：“这件事肯定是有人去向徐景贤汇报了。”

朱锡琪直接给“北办”外号叫周大炮的周俊全打电话，周俊全在电话中说：“反右倾你们要好好搞，啥道理你们到现在还不行动？”

朱锡琪问：“这是什么意思，是不是上海出问题了，你说清楚，不要这么吞吞吐吐的。”

周俊全一下子压低声音说：“老朱啊，我老实跟你讲，康生

那里有个张春桥专案组，你知道吗？外面传说很多，不过你不要跟其他人乱说。”

朱锡琪说：“周大炮你怎么越讲越糊涂了，你好好说，他们清查出张春桥什么问题吗？”

周俊全说：“对不起，我再讲下去就要犯错误了。”

朱锡琪一听很生气，就说：“叫艾玲听电话！”

艾玲接过电话后，朱锡琪直接问她：“张春桥究竟有什么问题？”

艾玲说：“对于张春桥的问题，在中央还没表态之前，现在还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

这不就是说张春桥有问题嘛，而且问题还不小，要等中央表态呢。放下电话，朱锡琪就与邵传烈和周国荣讨论艾玲的话到底是什么意思，他们觉得张春桥还是有问题的。

4 月 1 日，上海第二军医大学“红旗战斗兵团”在市革委会门口、康平路、南京西路成都路口的长征医院贴出大字横幅，要“揪出杨、余、傅的黑后台”。但很快在横幅下面出现了一行毛笔写的小字：“炮打中央文革的人绝没有好下场！”是二军医大“红纵”写的。又过了一天，下面又多了一行小字：“请长期保留”，是“红旗”写的。

4 月 3 日，上海市革委会在延安西路 200 号文艺会堂开了一个全市群众组织大会，马天水、王承龙在会上点名批评二军医大“红旗”，说“你要跳出来，就让你跳出来好了，相信全市革命

群众组织是不会支持你的。”

《文汇报》邵传烈参加了这次大会。会后，他按照市革委会的精神连夜组织稿子，并亲自写了“编者按”，刊发在 4 月 5 日的《文汇报》上，不指名地批判二军大“红旗”在制造政治谣言。

这期间，还发生了跟踪叶剑英的事情。3 月底，游雪涛又把钢琴家刘诗昆在上海的父亲刘啸东作为侦查的重点。因为刘家与叶剑英的亲家。显然，游雪涛是想从刘啸东身上找到有关叶剑英的材料。

很快的，一份关于刘啸东的详细材料，送到了张春桥手中。

游雪涛获知，上海音乐学院红卫兵曾经抄过刘啸东家，他立即派人到上海音乐学院，从“抄家物资”中，查到一包刘诗昆与叶剑英女儿的通信，游雪涛马上交给了张春桥。

张春桥亲笔批示：“拘留刘啸东！”

1968 年 4 月 3 日，刘啸东即被拘留，由游雪涛亲自审讯，没有结果。

不久，叶剑英陪外宾到上海，竟也成了游雪涛小组窃听、监视、跟踪的目标。那几天，简报不断地送到张春桥的手中。叶剑英在上海会见了谁，谈了些什么。

叶剑英很喜欢昆曲，从前就认识上海市戏曲学校昆曲班的演员，有过来往。这次，叶剑英叫他们到锦江饭店见了一个面，刚刚有了接触、游雪涛马上就知道了，派他在戏曲学校里的小组成员去接近那几个演员，从他们的嘴里探听叶剑英怎么接见他们，

怎么跟他们谈话，然后写成绝密材料，报给张春桥。张春桥看了以后，马上有反映了。他告诉徐景贤："你看、叶剑英到上海以后，还是找了文化大革命以前的人、游雪涛把他们的情况、他们的谈话都写到我这里来了。"

4 月初，《文汇报》驻京办艾玲在北京的几所大学里听到一则传闻："陕西省委书记霍士廉用党籍担保说张春桥是叛徒。"晚上，她给上海朱锡琪打保密电话，将这条传闻告诉了他。艾玲还说，她丈夫贺瑞林在总参二部能看到中央的传阅文件，中央传阅文件后面附有中央传阅名单，贺瑞林告诉艾玲，这个名单里有姚文元，没有张春桥，这条消息传来，使朱锡琪认定张春桥有问题。

这时，《人民日报》也派了两个记者到上海，都是复旦大学提前毕业的学生，一个原属"红革会"，一个原属"红三司"。原属"红三司"的记者是"过河卒"小组成员，他到上海后，先来找复旦大学"过河卒"小组的吴中杰，告以陈伯达到《人民日报》指示工作时，说了一些不利于张春桥的话，这些话当然是暗示性的，但大家都听得出来，矛头是指向张春桥的。他告诉吴中杰："北京反张的空气已经很浓了。"

吴中杰问他此次到上海有什么具体任务，他说没有明确指示，只是要他们了解基层情况，组点稿子。吴中杰立即意识到，这实际上是派他们来向上海两大红卫兵组织传递信息的，只是领导上不肯明说罢了。北京这股反张热流，必然要南下上海，而且指日可待，不会太久。

次日，“过河卒”成员在共青苗圃碰头，吴中杰特别叮嘱“红三司” 司令安文江，要他稳住阵脚，切不可轻举妄动。安文江在当时是个风云人物，这么大的事体，别人肯定要找他，他又好激动，一激动起来就冲到前面去了。所以要想不卷入，先得把他稳住。

果然，4 月 6 日，上海第二军医大学“红旗造反兵团”在江湾五角场、南京路、外滩等地贴出大标语，再“揪杨、余、傅的后台”。711 研究所“革命造反兵团”随即刷出声援的大标语。晚上，“工总司”上千人去第二军医大学，要与“红旗”辩论。复旦大学近千名红卫兵也来到第二军医大学，声援“红旗造反兵团”。

4 月 8 日，复旦校园内出现反张春桥的大字报。与此同时，《新师大战报》发表评论员文章说，解放军第二军医大学“红旗”是一批“死保党内走资派的老保”，最近把挑衅性的大标语贴到市革委会门前，“上海的 100 万革命人民不答应”。

这天上午，上海市革委会例行的碰头会，参加会议的有张春桥、徐景贤、马天水、王承龙、王少庸、王洪文、朱锡琪，负责记录的办公室主任朱玉佩，还有驻沪三军的廖政国、姬应伍、高志荣。张春桥从会议室的东门进入，一看廖政国坐在那里，还没宣布开会，就先开腔了：“你们警备区要做做工作，二军大‘红旗’到处都保，有保对的，也有保错的，二军大‘红纵’是到处冲，有冲对的，也有冲错的，因此你们要做做工作，让这两个组

织坐下来谈谈。”

廖政国一听，当场发问：“什么冲对冲错的，你说说哪一个是冲对的？”

张春桥没有直接回答，而是对马天水等人说：“你们不要保我。”

因为马天水、王承龙已经表态要保张春桥。

张春桥还说：“《文汇报》也不要保我。”

这是因为 4 月 5 日《文汇报》邵传烈写的“编者按”是保他的。

张春桥继续说：“我又不是曹获秋，要人保干什么？”

他还说:“这件事惊动了总理,昨天有人到二军大去冲‘红旗’，总理昨天晚上打电话来问我这件事。”

朱锡琪一听就觉得有情况:“总理日理万机，一个群众组织受到了冲击，在文革中是家常便饭，又不是很严重，总理怎么会知道的？而且当天晚上就知道了。”回报社后，他就叫跑医疗卫生界的记者郑重去调查二军大“红旗”里到底有些什么人。郑重回来后告诉他:“总理有个养女在二军大‘红旗’，但不知道在哪个年级哪个班，只是听他们学校的人这么说。”

朱锡琪觉得这完全有可能，而且他由此推断，周恩来好像站在二军大“红旗”这边。他又联系到从《新北大》等小报上看到的周恩来和江青的讲话，说右倾翻案风全国各地都有一点，可以大胆怀疑，怀疑错了改正就是了。其中周恩来讲过，上海文化大

革命也不是一切都好，他把周恩来这句话抄在笔记本上。他的笔记本里还记着江青的这么一段话：“上海搞大联合是对的，但是上海搞无条件……”这不是在批评上海的无条件大联合吗？因为上海《文汇报》在 1967 年 9 月 25 日擅自发表了毛泽东的最新指示：

毛主席又指示革命的红卫兵和革命的学生组织要实现革命的大联合，两派是革命群众组织，要无条件实现革命大联合。

后来《北京日报》10 月 9 日的一篇社论，将毛泽东的这段最新指示改成“就要在革命的原则下实现革命的大联合”。

朱锡琪并不知道《文汇报》在 1967 年 9 月 25 日发表毛泽东这段最新指示时，张春桥并不在上海，这事是徐景贤的决定的。他因此觉得这事“是不是张春桥是篡改毛主席最新指示呢？没有经过毛主席审查就私自登出来，造成了原则性错误。”

4 月 9 日，朱锡琪在文化广场参加上海“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代表大会”时，坐在主席台上写了 10 句口号，提出 10 个为什么，最后归纳成《十个为什么》的传单，署名“为什么战斗队”。在《十个为什么》里面就有一条，“要听从毛主席最新指示。”

会后，他将这些口号给周国荣、邵传烈看，周国荣问：“你这个战斗队的名字很怪，怎么叫‘为什么战斗队’？”

朱锡琪说：“这是毛主席讲的，每个共产党员做事情都要问一个为什么，我们这个口号就是提出问题，问几个为什么，让大家

来回答，我们自己不要回答。”

后来周国荣将这 10 条口号给报社的人看，有个夜班编辑叫刘文锋，是复旦毕业的，他又加了一句：“揪出大叛徒！”

朱锡琪在筹备“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代表大会”时与第二军医大“红旗”的人接触，表示同意“红旗”观点，坚决反对炮打邱会作，并几次提出，市革命委员会不能光与“红纵”联络，也要把“红旗”吸收进来。

## 第 992 回：四一二，再次炮打张春桥　沉住气，梳理罢飞往北京

上海“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代表大会”闭幕，张春桥上台讲话。他照例先说：“祝毛主席万寿无疆！祝林副主席身体健康!”接着说：“最近的形势大好，北京开了一个粉碎‘二月逆流’的大会，大会揪出杨、余、傅。”他介绍杨、余、傅 3 人身份的时候，却把余立金说成吴法宪，人们一下都楞住了。

张春桥发现自己讲错了，马上在会上改正，但已经传出去了。大家感到这事出在张春桥身上，好像很不应该，顿时引起很多人的议论。

上海“活学活用毛著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开过后，《文汇报》、《解放日报》每天都是几版几版的发讲用稿，组织报道。但新华社认为这是地方活动，没有在全国发消息。而且报纸上出现张春桥到江苏、浙江去参加当地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的报道中，新华总社在发稿时都没有提他的中央文革副组长、南京军区第一政委的头衔，只说他是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主任。但是在报道其他人如江苏省革命委员会主任许世友时，提到他是南京军区司令员。

这事又引起一些人的怀疑和议论。朱锡琪在向徐景贤汇报工作时曾问道：“报道中怎么没有写张春桥中央文革副组长的身份？”又说，“你看，到现在为止新华社也不发我们上海市积代会的稿子，我要上海新华分社发稿到总社，他们还是没发。”

后来，徐景贤问张春桥：“你参加江苏、浙江两省革命委员

会成立大会时，报道中怎么没有你中央文革和南京军区的两个身份？”

张春桥解释说：“他们新华社记者倒是写上去的，但审稿时让我删掉了，因为中央没有授权我以中央文革的身份去祝贺，我是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主任，是以兄弟省市负责人身份去的。”

4 月 10 日，二军医大“红旗”的大标语刷到复旦校园里来了，但始终只是些暗示性的标语，表现得神秘兮兮。但愈表现得神秘，愈能刺激人们的想象力。关心“文革”动态的人都知道二军大“红旗”与邱会作的关系，也知道邱会作是林彪保下来的。那么，二军大“红旗”出来反张春桥，是不是反映了林彪的态度呢？如果林彪、陈伯达都在反张春桥，那么，张春桥不是倒定了吗？

于是，复旦学生也贴出了大字报。虽然由于第一次炮打失败的教训，使得他们表现得相当谨慎，但是愤怒之火积压已久，有了适当的机会，还是要爆发出来的。这些大字报和大标语虽然都没有点张春桥的名，但是明眼人一看便知，是针对张春桥的。

4 月 11 日中午，市革委会政宣组开会，朱锡琪在会上把他在笔记本上记的周恩来、江青的讲话，结合二军大“红旗”、“红纵”斗争的情况跟大家讲了，虽然一个字没有提到张春桥，但是政宣组的人一听就明白他在暗指张春桥。他还讲到 1967 年 9 月 25 日上海的《文汇报》未经毛泽东同意刊登了两条“最新指示”一事，说：“我们搞报纸工作，任何文章发表都要给本人看，现

在有些人发毛主席的指示不让毛主席看，谁给他这么大权力？”

与会的政宣组 20 多人听到这里义愤填膺，高呼口号：

“谁篡改毛主席指示绝没有好下场!”

“揪军内一小撮就是反革命!”

政宣组的人都是文教系统的代表，有音乐学院、戏剧学院、出版社等。他们回去后，就在自己单位贴大字报。朱锡琪回到报社后也开始印传单。后来他觉得光靠传单还不够，报纸上也应该表个态，那就全国都有影响了。于是就去跟邵传烈、周国荣商量，决定还是不点张春桥的名，只用正面口号，但让人家看了要心有灵犀一点通，知道是反对张春桥的。

当晚，“北办”又传来一个消息说：“《北京日报》4 月 7 日的社论很好，你们看看是不是可以转载。”

《北京日报》4 月 7 日社论的题目是：《彻底粉碎‘二月逆流’的新反扑》，其中提到要“揪出杨、余、傅的黑后台”。还说“有人打着批判极‘左’旗号干了很多坏事”，提到有“小爬虫”，也有“变色龙”。有些用词就是周恩来和江青的原话。朱锡琪认为这篇社论的矛头是指向上海，于是故意打电话给徐景贤，说：“《北京日报》4 月 7 日社论很好，我们打算转载。”

徐景贤说：“可以啊。”

但过了大概一个钟头，徐景贤又打电话来说：“老朱啊，《北京日报》是北京的地方报纸，不是中央的《人民日报》，也不是新华社和《解放军报》，他要揪出杨、余、傅的黑后台是什么人，

不明确。这篇社论不要转载啦，还是我们自己写好，你们自己写一篇吧。”

朱锡琪说：“你刚刚不是说很好吗？一会儿又说自己写，我们自己写不出这个社论，人家可以登，我们为什么不可以转载？”

徐景贤说：“这个事情我很难决定，要向春桥同志汇报。”

朱锡琪想，万一张春桥不同意怎么办呢？于是就跟邵传烈、周国荣商量，决定这个晚上不接听任何人的电话，即使徐景贤来电话，他们也不接听。就这样，3 个人坐在办公室里，谁也不说话，只听见手表咔嚓咔嚓走动的声音。后来电话铃响，他们不接，报纸照印。其间，邵传烈跟朱锡琪讲：“老朱，反对张春桥是不是郑重一点？‘一．二八’事件已经有了教训，郭仁杰就是因为‘一．二八’事件跳楼自杀的，即使张春桥有问题，中央会端出来的。你是不是再考虑考虑？”

朱锡琪对邵传烈说：“我们造反夺权为了什么？不是为了一顶乌纱帽，不是为了当头头，是为了保卫毛泽东思想、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当然张春桥有事情中央会端出来，但我们不反对，毛主席身边有这样一个人，我们不放心。”

周国荣也说：“像这样的叛徒在毛主席身边能行吗？如果中央表态说我们有错误，我们就做铺路石，那样无产阶级司令部就可以多一个人了。”

邵传烈不说话了，随后他就拟出四句口号：“誓死捍卫毛主席、誓死捍卫林副主席、誓死捍卫江青同志、誓死捍卫中央文革”，

实际上是表明他们不捍卫张春桥。这四句口号就刊登在 4 月 12 日的《文汇报》上。这几句口号的大样出来后，他们叫报社印刷厂厂长杨瑞根把大样锁起来，这样即使徐景贤派人来，也没办法改动报纸了。

报纸印出来后，已是 4 月 12 日凌晨了，朱锡琪、周国荣、邵传烈、倪平、陈进鹏、朱殿鸿、何倩、郑重、夏震菲等人，带了一批传单，坐了两辆车到二军医大，以表示他们支持二军医大“红旗”的态度。路过同济大学时，天还没亮，他们在同济发了些传单。

同济“东方红”的陈敢峰一看传单，知道有人反张春桥，马上给徐景贤打电话报告。

朱锡琪他们到二军医大后，发现戒备森严，门口有人值班，办公楼门前用一长排铁栅栏拦了起来。他们跟值班的人说：“我们来支持二军大‘红旗’，揪军内一小撮就是反革命。”

二军医大“红旗”出来了一个女生，对他们说：“对不起，我们是军队，不跟地方上串联。你们的传单我们不收。”把传单还给他们。

朱锡琪他们只好打道回府。

凌晨 3 时，《文汇报》“为什么战斗队”的《十个为什么》大字报在南京路、外滩、第二军医大学、复旦大学等地张贴。

清晨，写作组的朱维铮把正在熟睡的徐景贤叫醒，给他看一张刚从墙上揭下来的《十个为什么》传单。徐景贤一看，这明显

是把矛头指向张春桥嘛。他急忙给张春桥打电话，张春桥还没有起床，徐景贤叫张春桥的秘书赶紧过来拿传单。

早晨，当复旦大学的师生从宿舍区走向复旦校门时，就看见围墙上用红墨水画得鲜血淋漓，甚是吓人醒目的大标语："揪出大叛徒张春桥!"校园里更是贴满了炮打张春桥的大字报，而且还在不断地增加。复旦的学生全面出动，在市里通衢要道，在各路公共汽车上，都刷出了反对张春桥的大标语，整个上海再次轰动，市民们纷纷涌向复旦。

8 点钟上班时间还没到，很多人已围在外滩市革命委员会大楼前，贴大标语的有很多是穿军装的。他们拿着浆糊桶，从市革会大楼一路贴来，一直贴到"工总司"的总工会大楼。穿军装的人贴标语时，把领章、帽徽都拿下来，表示他们不是现役军人。

王洪文给徐景贤打电话说："我问这些贴标语的人是什么单位的，他们不肯回答。大标语后面的署名都是'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

徐景贤把情况不断地报告给在兴国路的张春桥，张春桥的秘书往返于兴国路和康平路之间，一会儿拿标语，一会儿拿外面情况材料，一会儿拿电话记录。

张春桥倒很不慌，他在电话中告诉徐景贤："要沉着，不反击"，"事情过去就算了，不要压，不要整人，有些材料也不要紧。"

上午 9 点钟左右，朱锡琪肩上挂着军用背包，晃晃悠悠地来到康平路院子里，徐景贤马上把他叫到办公室问道："朱锡琪，

你搞什么名堂？”

他笑着说：“不要紧张嘛，杨、余、傅的黑后台谁都可以揪的嘛。”

徐景贤说：“你是市革命委员会领导成员，你要揪的是市革命委员会负责人，你跟谁打过招呼了？”

徐景贤把“为什么战斗队”的传单拿给朱锡琪看，并说：“你看看，你干了些什么事情？”

朱锡琪说：“我们传单上又没有点名。你看，传单上有什么人的名字吗？没有啊。周总理说过，除了毛主席，谁都可以怀疑。”

徐景贤吃了一惊，忙问他：“什么时候周总理讲过这种话？”

朱锡琪很神秘地笑笑，露出两个宽门牙，说：“我是从北京红卫兵小报上看到的。写传单，谁都有这个自由嘛。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写呢？”

徐景贤给朱锡琪气得声音都有点发抖的说：“你还讲自由啊？你究竟还是不是市革命委员会领导成员？”

他们二人正在房间里争吵，马天水进来了，他看到两个造反派对造反派，自己身为老干部，也不好参加进来。只听到朱锡琪大声说道：

“我为什么不是市革命委员会领导成员？谁也没有资格罢我的官！”可能是由于激动，声音响得都有些嘶哑了。

徐景贤说：“那好，现在春桥同志还是上海市革命委员会负责人吧，中央也没有罢他的官，我们没有接到中央通知，你也是

市革命委员会领导成员，你现在跟我到他那里去一次，汇报汇报你们的活动，这总可以吧。”

马天水一听，觉得这是一个办法，赞同说：“对，我们一起去，把问题谈谈清楚。”

徐景贤马上拿起电话，直拨兴国路的电话号码，朱锡琪一看急了，他把背包往肩上一送，说：“我不去。”把门拉开就走了。

上午 10 时左右，复旦大学的几条要道已经挤得难以行走了，比任何节日都要热闹。

这时，《文汇报》社周围也已是人山人海，有来打听消息的，有来问“为什么战斗队”是什么意思的……

朱锡琪告诉周国荣：“回答让他们自己去想，独立思考。”

此时的南京路、淮海路已经贴出很多大字报了，有些大字报是指名道姓的。南京东路上一张大字报，说张春桥的老婆文静被日本人俘虏后投降。这些大字报主要是文教系统包括“上体司”、“上艺司”、出版系统等写的。大字报周围围了很多人在看。

王洪文来到《文汇报》社，但在门口被拦住了。他报了王洪文的名字，报社的门卫说：“王洪文也不能进”。

当天《文汇报》第三版以特大黑体字刊出 5 条标语：

誓死保卫毛主席！

誓死保卫林副主席！

誓死保卫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

誓死保卫中央文革！

誓死保卫江青同志！

在第三版，还全文转载了《北京日报》4 月 7 日社论《彻底粉碎“二月逆流”的新反扑》。

《北京日报》4 月 7 日社论中提出的口号：“揪出杨、余、傅的黑后台”，马上在上海的街头冒出一批大字标语：

“揪出杨、余、傅在上海的黑后台!”

虽然只加了“在上海”三字，却真是“此地无银三百两”，人们一下就明白，这“上海的黑后台”指的是谁。

大家争相传阅《十个为什么》。《文汇报》社、南京路、江湾五角场、第二军医大学、复旦大学等处贴出了许多“张春桥不等于中央文革”、“打倒反革命两面派、变色龙、叛徒张春桥”等标语，成千上万的人围观、传抄、议论。

接着，大街上又出现了：

“狄克攻击鲁迅，罪该万死!”

“打倒狄克!”

“狄克=张春桥”

“打倒张春桥!”等大标语。

1968 年 4 月 12 日这天上午，学生纷纷走上街头游行，他们喊：“齐声唤，前头捉了张辉赞！”而一直保张的上海“工总司”一派人却不见踪影，形势一边倒。大家都以为这下张春桥完了。

真的是这样吗？张春桥知道上海滩正在发生的这些事情吗？

他怎么会不知道。一连串的新消息，不断传到他这里：《文汇报》印的《十个为什么？》已发向全国各地；华东六省的省报都向《文汇报》看齐，要在 4 月 13 日头版头条转载北京日报 4 月 12 日社论，而且《解放日报》居然也要同步行动。

中午，王少庸、马天水、徐景贤、王承龙正在办公室里议论这些事情，张春桥打电话过来，叫他们过去。

他们急急忙忙来到张春桥的办公室，看见张春桥正让理发师给他理发、刮脸。看见徐景贤等人着急的样子，张春桥对他们笑了笑，让他们坐下，说：

“不要紧，他们劲头还挺大的。我刚才听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广播《文汇报》转载的《北京日报》社论，里面提到要揪出各地的谭震林式的人物，广播员兴奋得连声音都变了，他们究竟想干什么？”

徐景贤等人看到张春桥谈笑风生、镇定自若的样子，觉得他总有什么底，也放心不少，就说：“上海的动向应该让中央知道，文元同志是否知道上海的情况，是不是给他打个电话，特别是把军队里有人炮打张春桥的情况告诉他，看看他有什么意见？”

于是，他们就在张春桥办公室给姚文元打电话。

正在北京的姚文元接到电话非常吃惊，说：“我还不知道这情况，我马上向江青同志汇报。”

过了 15 分钟，姚文元回电说“江青同志非常重视上海发生的事情，特地向春桥同志问好，关于军队里有人参加炮打的问题，

江青同志说，她马上找中央军委办事组李作鹏同志谈这件事。”

徐景贤一听江青出来保张春桥，心里就比较安定了。但他总觉得只是姚文元、江青还不够，是不是应该向毛泽东、党中央正式报告此事？于是便对张春桥说：“是不是给毛主席、中央发份电报，把上海的情况写一写，我来起草。”张春桥没有表示反对。

徐景贤离开兴国路回到康平路，独自写了份绝密电报，把上海炮打张春桥的情况以及目前的形势，特别是有穿军装的人上街刷标语、大字报，参与炮打的动向，都写了进去。电报写好后，他自己签发，以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名义通过机要室火速发给党中央、毛泽东主席。电报发好后，回到康平路，碰到王洪文带了“工总司”一批头头来，他们商量要反击。徐景贤把朱锡琪他们炮打的情况以及张春桥的意见告诉他，其中一条意见就是先不要组织搞反击，一搞反击的话，马上会变成两大派打内战。

王洪文说：“我们假如不明确地反炮打，基层造反派可能就乱套了。‘工总司’内部有人已经开始动摇，比如‘文攻武卫指挥部’头头张宝林，就在围墙上跟着《文汇报》‘为什么’战斗队刷标语，不承认上海市革委会以张春桥、姚文元为首了。”

这时，4 月 12 日出版的《文汇报》送到了，第三版上全文转载《北京日报》社论，还有通栏大字标着的那五句口号。徐景贤对王洪文说：“你到总工会大楼上面挂一条标语下来，写上’誓死保卫毛主席亲自支持的、以张春桥、姚文元为首的上海市革命委员会’，这样一来：上海所有的人就能看见你们‘工总司’

的态度。我们打标语战，不搞反击。”

当天下午，中央派专机到上海把张春桥接到北京。张春桥临走前对徐景贤等人交待说：对他去北京一事暂时保密。

张春桥走后，徐景贤乘车到外面看看。

此时，上海的大街上炮打的大标语越来越多，署名大都是化名。南京路上的人比平时多好几倍，学生很多，特别是复旦大学的，拿着浆糊桶，从学校贴到最热闹的马路上，不光墙壁上，连商店橱窗上部贴满大标语。

标语的内容升级了：

“揪出杨、余、傅的后台张春桥！”

“打倒大叛徒张春桥！”

张春桥的名字被倒过来，划上红圈圈，打着大又叉。具名是“复旦大学抓叛徒战斗队”。“复旦大学送瘟神战斗队”。

看热闹的人跟着贴标语的人，在路上挤来挤去。在浙江路口，各种各样的人像潮水一样涌来，议论的、看标语的、贴标语的，一片乱哄哄。车辆被堵在那里，排成长队。

当徐景贤的车行至第一百货商店门口时，彻底停住了，外面都是人。几个年轻人跑到车头前面，出于好奇，看后排坐着什么人，一个人叫起来：“徐景贤！徐景贤！”这一叫不要紧，大家呼啦一下便把车围起来了，警卫员坐在前面连忙把两边的车门保险按住，挥手让他们走。徐景贤赶紧装出严肃的表情，不露出任何情绪化的东西，但内心十分尴尬：“人家在炮打张春桥，我在南

京路上做什么，凑热闹？”

后来警卫员对司机说：“无论如何要冲出去。”

驾驶员拼命按测叭，整整用了十几分钟，才冲出一段，后来警察来了，把人排开，徐景贤这才冲出“重围”。

## 第 993 回：讲三点，李作鹏电话指示　大翻转，二次炮打又失败

复旦大学的“过河卒”和安文江在这次“炮打”中没有表态，因此也成为人们追踪的对象。有些人向他们探听消息，有些人要他们参加炮打。但他们始终抱着老主意：做个看客。但是树大招风，安司令毕竟是上海滩上的名人，“过河卒”是有名的战斗小组，在这样大事件面前，要回避也不容易。这时，二军医大“红旗”派人来找安文江，名曰访问，实则煽动。“过河卒”怕安文江头脑发热，就带着他出去躲避。先是全组集中到吴中杰家，马上就有人找到他家来了。他们又赶快转移到和平公园，在那里一直呆到傍晚。当他们回校时，第二次炮打事件已经结束。

复旦大学空四军军宣队一直旁观不表态，他们的负责人方耀华以微笑来回答别人的询问，弄得别人更加怀疑。

4 月 12 日临近下班时，东海舰队给上海市革委会送来一份电话纪录，是海军第一政委、中央军委办事组李作鹏的三点电话指示：

第一，上海有人炮打中央文革副组长张春桥同志，我们军队不要介入。

第二，已经贴出的大字报，要予以覆盖。

第三，不要搞反击。

除了李作鹏的三点指示，上海市革委会还接到复旦大学空四军军宣队负责人方耀华的电话报告，说他们得到空军通知，已经

向学生们明确表态，反对炮打张春桥。

与此同时，方耀华还在复旦大学传达了海军第一政委李作鹏的电话指示。于是，复旦校园里又出现了一片萧条景象，与上午那番热烈气氛，形成鲜明的对比。

接着，上海“工总司”组织大批人上街高喊：

“拥护中央文革！”

“拥护张春桥！”

“谁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就打倒谁！”等口号。

他们见到倒张的学生游行队伍就打，抢过倒张的旗帜就撕，看到倒张的大字报就撕掉，形势完全逆转。

此时，市革命委员会政宣组工作人员反映，上海政宣系统群众思想非常混乱，因为政宣组组长朱锡琪主张炮打。政宣系统分成两派，反对炮打的一派要求与《文汇报》和朱锡琪辩论，徐景贤一听，既然李作鹏和空军的指示都来了，马上表态说：

“那好，我们连夜召开宣传文化系统大型辩论会，通知朱锡琪他们到场。”

徐景贤和王少庸、马天水商量：“今天晚上有一场大辩论，早上朱锡琪特地到这里，态度强硬，我们准备晚上跟他们面对面干，我是要去参加的，看看还有什么人要去。”

王少庸说，他和王承龙在康平路留守，马天水自告奋勇地说：“我和老徐一起去。”

王少庸说：“是不是请东海舰队副司令员、市革命委员会领

导成员高志荣也一起去？”

徐景贤说：“好，建议在会上由他传达东海舰队收到的李作鹏三点电话指示。”

那天晚上，在外滩市革会底楼大厅召开大会，徐景贤、马天水、高志荣在主席台长桌前就座，会场上座无虚席，四周过道上都站满了人，来的不但有政宣系统、文化系统各基层代表，而且还有工交组、财贸组、科技组、地区组、郊区组等系统的代表。朱锡琪带着《文汇报》“星火燎原造反总部”的人坐在前面第一排，徐景贤主持会议，宣布会议开始。

朱锡琪这边先声夺人，好几个人站起来，提出各种各样的质疑：

“既然周总理讲什么人都可以怀疑，为什么我们不可以写‘为什么战斗队’的传单？”

其他单位的人反驳“随便怀疑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本身就是怀疑一切的反动思潮的表现。”

接着，朱锡琪站起来发言。他质问徐景贤：“我现在请教你，揪军内一小撮是什么错误？为什么要千方百计把廖政国揪出来？”

徐景贤回答道：“谁说过要把廖政国揪出来？你有点瞎说。”

朱锡琪说：“上海有人揪军内一小撮是不是存在？武汉陈再道事件时，上海有人贴大字报，要揪上海的陈再道，上海的陈再道是谁？”

徐景贤不说话了，朱锡琪又问：“再问一个问题，毛主席的最新指示是《文汇报》9月25日登出来的，为什么《人民日报》在10月8日又改正了毛主席的最新指示？你徐景贤也应该知道，如果发表你的文章也要先请你看过，这个最新指示毛主席看过吗？”

徐景贤说：“哎，这是我的错误，我没有给张春桥看。”

朱锡琪马上说：“你不要自己替张春桥承担错误，你也负担不起，这件事你不可能不与张春桥说的。”接着，朱锡琪领呼口号：“谁反对毛主席就打倒谁！”“毛主席万岁！”等。

徐景贤说：“反对张春桥是什么性质的行为？大家可以辩论。”

朱锡琪说：“我们《文汇报》‘星火燎原造反总部’‘为什么战斗队’今天是宣了誓来的，决心要学习邱会作同志的硬骨头精神，不获全胜决不收兵。我在这里再提几个为什么：为什么中央没有叫张春桥去参加‘三•二四’大会？为什么张春桥参加江苏、浙江两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的时候，新华社发消息没有提他中央文革副组长的职务？为什么北京都在传说张春桥是叛徒？请大家好好想一想，这就是中央对于张春桥的态度嘛。”

因为有李作鹏电话指示的底，徐景贤一拍桌子，大声说：“朱锡琪，你到现在还在散布谣言，蛊惑人心，我现在就来答复你几个为什么：中央召开‘三•二四’大会，文元同志已经在北京了，春桥同志要到江苏、浙江去祝贺，所以没有参加大会，这是正常

工作的需要，有什么可以怀疑的？第二，张春桥到江苏、浙江，是以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主任的身份去祝贺的，不是以中央文革名义去的，凡是搞新闻报道工作的人部懂得，什么时候用什么头衔，什么职务、职称，你朱锡琪难道就不懂吗？第三，你参加过市革委会的小会，明明知道春桥同志没有被捕过，不可能是叛徒，而你在大庭广众面前，公然散布谣言，是何居心？至于你说的中央对张春桥的态度，我也可以告诉你，同时也告诉大家：现在我们就请市革命委员会领导成员、东海舰队高志荣副司令传达中央军委办事组领导、海军第一政委李作鹏同志的三点电话指示。”

听说有中央军委的电话指示，大家非常惊奇，朱锡琪他们也非常注意。只见穿着灰蓝色海军军服的高志荣清了清嗓子，从皮包里郑重其事地拿出三点指示的电话纪录单，操着湖北口音，一字一句地念起来。念了一遍，会场上鸦雀无声，大家都在刷刷地作记录。于是，高志荣又重复地念了第二遍，然后说：“我们上海部队坚决执行中央军委首长指示，我们决不参加炮打。”

接着，马天水发言，他强调中央对张春桥很重视，同时说：“我和春桥同志长期共事，我了解春桥同志的历史，他根本不是叛徒。”

这时，徐景贤进一步发挥说：“朱锡琪等人同 1967 年‘一•二八’一样，又一次地炮打中央文革，而且这次性质更严重，上海主要报纸的主要负责人，又是市革命委员会的领导成员，政宣组组长居然带头炮打。”

朱锡琪脸色有点发青，头上不断冒汗。大家都在喊：

“朱锡琪表态！朱锡琪表态！”

朱锡琪没有表态。只有《文汇报》三个造反核心之一的邵传烈站出来表态拥护中央军委办事组三点指示。

徐景贤宣布：“明天晚上全市政宣系统召开大会，批判朱锡琪！”

会议到此结束，很简短，也就半个钟头左右的时间。

徐景贤随后和王洪文、王承龙商量，不能再让朱锡琪负责《文汇报》。他们在朱锡琪、邵传烈、周国荣三个造反头头中挑选了邵传烈，认为他的态度较好。

朱锡琪、周国荣和邵传烈他们开完会回到报社时，“工总司”已经来了四、五个人在报社会议室等他们，一见面就宣布：“代表市革委会对朱锡琪和周国荣进行隔离审查。”罪名是反对张春桥。朱锡琪当场就被关进报社的厕所间，周国荣也被关起来了。

徐景贤连夜把邵传烈找到康平路个别谈话，首先批评他卷进“四·一二”炮打的错误。邵传烈向徐景贤、王洪文他们讲自己思想的变化过程，特别讲到艾玲用红机子从北京给他们传消息，使他相信了张春桥有问题。他表示忏悔，流着泪作了检讨，承认错误。徐景贤、王洪文他们当场要他把《文汇报》的编辑担子挑起来。但是叮嘱他，凡是遇到重大问题，必须随时向市革命委员会请示，邵传烈答应照办。以后，《文汇报》每天版面的定稿情况他都用红机子打电话向徐景贤汇报，请示得非常频繁。

第二天开始，上海连续开了几次政宣系统的批斗会，朱锡琪到场受批判。从此，他不再负责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政宣组，回到《文汇报》继续接受批判，上海市革委会调上海警备区的团政委绳树珊到政宣组主持工作。

市革命委员会组织组组长是原市委组织部造反的一名部队转业干部。在炮打张春桥期间，他和组织组里其他几个负责人商量，私自从档案保险柜里找出张春桥档案查阅。当时张春桥、姚文元档案材料的正本已被中央调走，上海只留下他们档案材料的简本。外面传说张春桥是叛徒，从档案简本里看不出什么名堂。于是他们又擅自翻阅张春桥妻子李文静的档案，看到李文静被日军俘获，后来投敌为日本人效劳的历史情况，这几个组织组负责人看了以后，还议论过。本来他们认为这是秘密地看档案，不会对外泄漏，谁知道当炮打的形势逆转以后，有人就出来告发这事。

此事被揭后，王洪文认为，要发动群众揭组织组的盖子。王少庸提出，在那里的市领导人的档案，不光是张春桥、姚文元，包括王少庸、马天水、徐景贤、王洪文、王承龙的，都要拿回来。假如有文静和姚文元妻子金英的档案，也要抽出来，加上封条送到他办公室锁进保险箱，不然，要是再发生偷看事件，怎么得了？

于是，徐景贤和办公室负责人朱玉佩两人进入档案室，要求组织组工作人员打开一个个铁柜，看到了《张春桥档案简本》和《姚文元档案简本》，他们也很紧张、不敢打开看，徐景贤说："赶快把它封起来。"这样，好几个工作人员把这两个档案简本

和王少庸、马天水、徐景贤、王承龙的档案，还有王洪文的新档案袋，都捆起来，然后用封条封好，由徐景贤和朱玉佩两人监督，押送到王少庸办公室。王少庸叫人当着大家的面把档案放进他的保险柜里封起来，免得以后有人从中收集炮打的材料。

接着，王洪文对徐景贤说："市革会组织组这样不行，我要派人进去。"他说："我要派一个工人出身的到组织组，机关里的人关键时刻就动摇，我不放心。"

徐景贤说："你派人进去，我同意。"马天水和王少庸一看，也都同意了。这样，王洪文就派他最信任的金祖敏到市委组织组做一把手。

金祖敏原是闵行地区上海电机厂工人，党龄和工龄都比较长，30 多岁，曾在车间担任工段长，造反以后，曾在"工总司"闵行联络站工作。金祖敏为人谨慎，不像王洪文别的小兄弟在外面冲冲杀杀，犟头倔脑，经常惹出乱子。王少庸在上海电机厂搞过"四清"，也认识金祖敏，王洪文一提出来，王少庸也接受。就这样，徐景贤和王洪文一起到市委组织组宣布金祖敏担任一把手，从此以后，上海组织人事大权从王承龙手里转移到王洪文手里。

4 月 13 日下午，市革委会在延安西路 200 号召开机关大会，马天水等就炮打事件发表讲话。

4 月 14 日，市革会召开各群众组织负责人和各组、办负责人会议，主持市革会日常工作的王少庸在会议上说："炮打中央

文革领导同志，就是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这一次是四一二事件，41 年前的 1927 年，蒋介石在上海也搞过一次四一二事件，两次都是反革命事件”。

4 月 21 日，市革委召开扩大会议，布置调查“四一二炮打”事件。接着，上海连续不断地开会，肃清炮打中央文革、炮打张春桥的“流毒”。徐景贤在市委机关和市人委机关两个造反联络站勤务组成员与下属造反队负责人会议上说：“要是社会上有些人受了怀疑一切的反动思潮的影响，参与了炮打，这还可以想象，但是这次在我们机关内部，居然也有人起而响应，这是不可原谅的。”

他说：“我们两个机关造反联络站所有造反队成员，都长期在春桥同志和文元同志身边工作，难道我们对他们两人还不了解吗？1967 年初，他们一到上海的时候、春桥同志就宣布市委机关造反联络站是他们的工作机构，而现在作为这个机构的工作人员一有风吹草动，居然掉转炮口，向自己的领导开火了，这种性质还不严重吗？我们要问这些人，你们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坚定性到哪里去了呢？有的人为自己辩护，说只是五分钟动摇。不行！一分钟动摇都不行！”

他疾言厉色，宣布两个联络站重点整风，检查所有的人在“四．一二”事件中的表现，有没有错误言论，来势非常凶猛。市委监察委员会有个工作人员，在“四．一二”时，议论过张春桥的历史，现在要追查，他很害怕，从延安西路三十三号海格大

楼七楼跳下，当场身亡。

# 文革史话

## 之第三部 全面内战 第十四卷

刘朝驹 著

# 文革史话

之

第三部

# 全面内战

第十四卷

# 目 录

第 994 回：别追究，朱锡琪感动落泪　“内人党”，广西乱杀人严重..... 1
第 995 回：问林彪，杨成武究竟何事　发声明，毛泽东支持黑人 .....11
第 996 回：罗舜初，开幕词引起争论　周恩来，见国防科委代表 .....22
第 997 回：四二五，北京大学重开战　架天桥，燕园内又出新景 .....35
第 998 回：搞监听，两派又打间谍战　陈伯达，现场看武斗惨景 .....45
第 999 回：山城打，重庆市战火重燃　四二七，大连染料厂武斗 .....54
第 1000 回：打报告，“上石农总”有问题　派部队，宁明县展开围剿.....66
第 1001 回：说新疆，批准陕西革委会　下文件，举办徐海学习班.....76
第 1002 回：柳州打，广西抢武器严重　揭少奇，北京军区会难停.....87
第 1003 回：说东北，太原钢厂楼炸毁“活人展”，广西武斗更难停.....99
第 1004 回：学中国，法国掀五月风暴　影响大，戴高乐最后辞职.....109
第 1005 回：闹学潮，文革在日本走红　说贺龙，福州刘培善自杀.....121
第 1006 回：毛泽东，再次批打倒一切　搞清队，清华园百日武斗.....133
第 1007 回：为救美，叶志江甘当俘虏　陈育延，《苏武牧羊》催泪下.....145
第 1008 回：报敌情，广西反共救国军　李向阳，柳州抢援越武器.....159
第 1009 回：鱼峰山，柳州市武装割据　火车停，铁路交通完全断.....170
第 1010 回：说川渝，“四县一市打平桂”　赴广州，董良翮返京被抓.....180
第 1011 回：奔秦岭，川、渝成立革委会　毛泽东，接见学习班代表.....190
第 1012 回：如所料，桂林市战火四起　广州市，武斗事件频发生.....201
第 1013 回：六月八，七机部南苑武斗　姚桐斌，竟当众被打致死.....212
第 1014 回：闻噩耗，周恩来酒杯落地　后事难，凶手六年未法办.....223
第 1015 回：柳铁通，破获反共救国军　攻火种，联指发《总攻击令》.....235
第 1016 回：川宜宾，第三次武装支泸　重庆打，“反到底”逃往成都.....248
第 1017 回：下通知，全国大学生分配　六二六，安徽省“芜湖事件”.....257
第 1018 回：战化州，李敏贴出大字报　为广西，中央发《七三布告》.....269
第 1019 回：交通断，陕西武斗未停歇　汉中乱，联统两派战犹酣.....282
第 1020 回：古迹毁，陕西也要搞布告　七一二，师大火烧工五楼.....292

第 1021 回：批无联，借机整肃造反派　成僵局，桂林打“西山战役”.....305
第 1022 回：南宁市，炮击引民房燃烧　武传斌，北京召集“串联会”.....315
第 1023 回：造反派，聚北航开座谈会　急叫停，中央见新疆代表.....326
第 1024 回：议九大，转发湖南省报告　说陕西，北大为接电武斗.....339
第 1025 回：清华打，蒯大富深夜借枪　怎么办？组织工农进大学.....351
第 1026 回：汉中乱，中央七二四布告　七二五，凌晨见广西代表.....362
第 1027 回：继续谈，要解决柳、桂问题　再追问，《今日的哥达纲领》.....377
第 1028 回：回广州，武传斌等受批判　七二七，工宣队开进清华.....391
第 1029 回：“四一四”，工人解困科学馆　十号楼，手榴弹炸死工人.....402
第 1030 回：蒯大富，与迟群进行谈判　“井冈山”，午夜撤出清华园.....417
第 1031 回：聂元梓，北京大学议对策　毛泽东，急召见“五大领袖”.....428
第 1032 回：似漫谈，海阔天空说文革　讲“黑会”，众人批评韩爱晶.....439
第 1033 回：说北大，蒯大富姗姗来迟　见主席，似孩儿嚎啕大哭.....450
第 1034 回：止武斗，批评几位学生头　要联合，学校进行斗批改.....461
第 1035 回：韩爱晶，问百年后该如何　发悲叹，红卫兵钟声响起.....470
第 1036 回：清华园，安抚工人与学生　放俘虏，百日武斗终平息.....481
第 1037 回：刘多荃，材料再揭刘少奇　哈师院，穆国兴自杀身亡.....492
第 1038 回：广州市，出现抢枪小高潮　没武器，民兵为战士站岗.....504
第 1039 回：送芒果，陕西、四川武斗停　福建省，革命委员会成立.....513
第 1040 回：焚巨款，熊一军花园受降　淹邕城，“四二二”全军覆灭.....522
第 1041 回：平桂林，广西革委会成立　斗批改，工宣队进驻学校.....533
第 1042 回：朴方残，北大实现大联合　湖南稳，小将成革命“对象”.....546
第 1043 回：搞演习，上思县枯那事件　九月五，全国山河一片红.....556

## 第 994 回：别追究，朱锡琪感动落泪　“内人党”，广西乱杀人严重

《文汇报》的炮打平静了，但是复旦大学有一部分学生还不服气。一天晚上，上海市革委会的王洪文、徐景贤、马天水、王少庸、王承龙、警备区副司令张宜爱、警备区副政委李彬山、东海舰队副司令高志荣、空四军政委王维国、空四军副军长姬应伍等市革命委员会所有领导成员，一起来到复旦大学大饭厅，召开各年级红卫兵代表大型座谈会，他们还把在这次反炮打中表现最坚定的两个学生红卫兵组织的头头——同济大学陈敢峰和市六女中高静慧也请去了。名义上是开座谈会，但是所有领导轮番发言，再加上陈敢峰和高静慧的发言，都在批判这次炮打行动，称之为“逆流”，都在支持张春桥，复旦大学炮打的声势也就此销声匿迹了。

徐景贤、王洪文他们把上海清查“412”炮打的情况，每天向张春桥、姚文元汇报，书面的、口头的都有，“游雪涛小组”把全市炮打中的大字报、大标语，口号收集编印了厚厚一本，作为原始炮打资料。

正在上海起劲地追查这次“炮打”事件，一天晚上，徐景贤接到张春桥从北京打来的电话，问他：“朱锡琪这几天的情况怎么样？”

徐景贤告诉他：“正在《文汇报》接受批判，但是检讨很不深刻，群众通不过。”

张春桥说："那他还是愿意做检查的咯？"

徐景贤有点摸不着头脑，回答说："这个嘛，他也是被迫的。"

张春桥接着说："肯做检查嘛，也就可以了，群众通不过，我们去做做工作。这样吧，你到《文汇报》去，亲自召开一个全体工作人员大会，市革命委员会政宣组也派人去，包括朱锡琪手下的一帮人，都要参加。让朱锡琪在会上做一次检查，他检查完了后，你就带头鼓掌表示欢迎。"

徐景贤真搞不清楚是怎么回事，说："这恐怕比较困难，群众情绪一下子扭不过来。"

徐景贤嘴上这么说，心里想："其实我自己也扭不过来。"这是 180 度的大转弯呀。

张春桥在电话里听出了徐景贤的为难之处，劝他说："要考虑到群众嘛，这次炮打，卷进去的人很多，我们把朱锡琪解脱了，其他人心里的这块石头也就放下来了。"

徐景贤说："有些问题还刚刚露了个头，远远没有查清楚，比如部队的问题，我们刚刚布置下去。"

张春桥说："不要查了。复旦大学，二军大、国防科委这些单位的事情都不查了。"他斩钉截铁地说："你把《文汇报》的事情落实，可以宣布朱锡琪留在报社参加一般的编辑工作，反正我很快就要回上海了，有些情况回来以后再跟你们说。"

放下张春桥的电话，徐景贤确实弄不明白，但是对张春桥的话，他一直是坚决执行的。第二大晚上，他根据张春桥指示，到

《文汇报》去召开大会。

因为以前对朱锡琪的批判是不断地加温、升级，这次却要180度大转弯，徐景贤怕到会的人缺乏思想准备，会上进一步使批判升级，那就无法达到会议的目的了。所以，他事先跟市政宣组负责人绳树珊打招呼，先去布置几个人，把底告诉他们，在朱锡琪做检查以后，发言表示欢迎他的进步。绳树珊也摸不着头脑，他是部队干部，对地方造反那一套很不习惯，上级命令他怎么办，他就怎么办，前两天还要他不断地升温，今天却要布置人对朱锡琪的检查表示欢迎，他发愁地说："好吧，我努力去做。"

那天晚上，徐景贤先说了一段开场白："一个人犯了错误不要紧，只要愿意改正错误，就是好同志，我们今天也给朱锡琪同志提供这样的机会。"

听到这里，下面的人都愣了，从4月12日市革委会大厅的辩论大会到今天为止，没有人叫过朱锡琪"同志"，大家感到徐景贤讲话的调子跟前几天大不一样。

朱锡琪站到台前，头也抬不起来，心情沉重，他把怎么卷进炮打的来龙去脉讲了一遍，并做了深刻检查。刚讲完，他人还没有离扩音器，徐景贤就带头鼓起掌来，不过是名副其实的"孤掌难鸣"。在场的人没有思想准备，有的人伸长脖子看台上究竟怎么回事，是谁在鼓掌？有的人也想跟着鼓掌，但又不敢鼓出声音。只有绳树珊和政宣组几个人因为事先已有布置，跟着徐景贤寥寥落落地鼓了一下掌。这稀稀拉拉的掌声，算是完成了张春桥的任

务。

接着徐景贤引用毛泽东的一段话："这次的事件给我们的教训呢，就是知识分子跟工农群众不一样，一遇风浪，前者动摇，后者坚定；前者暧昧、后者明朗。这是毛主席早就教导过我们的，我们应当从朱锡琪同志身上吸取共同的教训，朱锡琪同志今天的检讨是值得欢迎的，市革命委员会决定，根据他对错误的认识，让他从明天起参加《文汇报》编辑工作。希望《文汇报》全体革命同志，团结起来，振奋精神，不要辜负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希望，把报纸办得更好。"

说到这里，全场才热烈地鼓起掌来，朱锡琪也感动得流下了热泪。

消息很快地在全市传开，各系统的清查活动暂时停息下来了。

张春桥回到上海后，把王少庸、马天水、徐景贤、王洪文等比较核心的领导召到兴国路招待所。那天，他穿着军装，显得很精神，坐在藤椅里，一面抽烟，一面说："我这次到北京，才知道是毛主席把我找去的。那天晚上，我按通知到中南海去看望主席，谁知道，我去的时候，老人家已经站在门口等我呢，我赶快上去和主席握手，问主席好，心里非常不安。"

张春桥说到这里，可以看出已经是非常感动，其他几个人也被他的情绪感动了。张春桥接着说："我向主席汇报了上海的工作，我也谈到这次炮打。主席说，我已经知道了，就是为这件事

特意把你找来的。你可以对那些炮打你的人讲‘无事’。北京不是有个谢富治嘛，学生炮打他，他对学生们讲‘无事’。那些学生就炮打不下去了。”

徐景贤和王洪文交换了一下眼色，两人会心地笑了，由衷地感到：“还是毛主席高明啊。”

张春桥说：“游雪涛小组怎么还编了这么一本东西。”他说：“立即全部收回，销毁。这些东西留着干什么，要惹祸的。”

后来，张春桥要见朱锡琪。邵传烈马上来找朱锡琪，对他说：“老朱，你再听遍会议的录音，然后去见见张春桥，我车子已准备好。”

朱锡琪对邵传烈说：“我不好意思去见张春桥。”

他没有去。

有次在全市万人大会上，张春桥说：“算我眼睛戳瞎，看错了人。我是想见朱锡琪的，但朱锡琪不想见我。”

一次在锅炉厂开大会，张春桥坐在主席台上，看到邵传烈坐在会场后面的角落，就叫邵传烈坐到主席台上来，邵传烈上去后，张春桥站起来与他握手，说：“反对过我的人，没关系。”

对朱锡琪的处理是党内严重警告，还保留党籍。

上海的“412”炮打追查工作似乎到这里告一个段落了，我们再来看看此时内蒙的情况。

4 月 13 日上午，呼和浩特新华广场，呼市军民举行大规模庆祝集会，庆祝中央关于内蒙古问题的《4•13 决定》发布一周

年。滕海清在会上发表长篇讲话。他说："我们正在开展的挖黑线、肃流毒的人民战争，已经进入了向乌兰夫及其一切残余势力发动全线总攻击的新阶段。"

4 月 14 日，滕海清讲话刚过一天，自治区原宣传部部长郭以青就带着几名造反派来找高锦明汇报。

高锦明同郭以青是老相识，他叫来负责专案工作的核心小组成员李树德和"滕办"主任李德臣，一起听郭以青等人的汇报。

郭以青等人说："内蒙古大学党委书记巴图是'内人党'常委，他的'内人党'问题和'206'案件都已经被我们突破了！巴图供出了军区政治部副主任鲍荫扎布、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副部长特古斯、内蒙古医学院院长木伦和巴彦淖尔盟盟委书记巴图巴根等，一共 8 个人，都是'内人党'。"这 8 个人都是盟市级以上的蒙族干部。

郭以青他们走后，核心小组成员对其汇报内容半信半疑。此时，滕海清、吴涛都在北京参加北京军区党委扩大会。核心小组研究后决定：逮捕上述 8 名盟市级以上干部，对他们实行分别军管，成立专案组，个别审讯和交待，使案犯无法串供。

鲍荫扎布已被关押在内蒙古军区步校 4 个多月，是由造反派组织"东方红"监管，此时转到了专案组。从 4 月 24 日下午到第二天上午 10 时，在专案组组长刘占龙主持下，对鲍荫扎布进行了连续 18 个小时的严刑拷打。鲍荫扎布被迫编造了参加地下"新内人党"的假口供，供出了盟市级以上干部 30 多人。

4 月 26 日，“滕办”主任李德臣主持起草了一份《关于“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叛国案件的报告》，上呈“毛主席、林副主席、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并北京军区（请转滕、吴）”。高锦明签发了报告。

经内蒙古革委会研究决定，又成立了第二专案办公室，由任家骥担任主任。原先已经成立的第一办公室是专门负责揪叛徒、特务的，而这个第二办公室则专挖“新内人党”。

我们再看广西。3 月 31 日，广西柳州军管会抓走了《今日的哥达纲领》的执笔人，柳铁一中学生肖普云，引起了该校“联合战队”学生的不满。高三学生、该校“联合战队”头头钱文军受大家委托，上北京告状，为肖普云鸣冤。

4 月 1 日，广西大学“革联”、广西农学院“革联”、广西医学院“闯野”、广西民族学院“红旗”4 个群众组织发表《关于韦国清问题的声明》，要求韦国清必须履行自己的诺言和执行中央的指示，立即到群众里面去，公开检查错误，接受群众批评。并提出：“根据韦国清目前的情况，他还不宜参加广西壮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

4 月 3 日，广西自治区革筹小组和广西军区再次向中央发出《关于广西“422”野战军的问题的请示报告》。报告说：南宁出现了干扰文化大革命大方向的逆流，较突出地表现在广西“422”所属的“野战军”身上。他们排斥主张大联合、三结合的人，还公开集会、游行，直接把矛头指向自治区革筹小组和广西军区，

通过大字报大造武斗舆论。为了迅速排除干扰，争取大多数，孤立和打击坏人，准备公开表态，发动群众对“邕江风雷”所发表的声明公开进行批判。对“野战军”内的坏人、黑手和该组织的行动，要进一步查明。

4 月 5 日，自治区革筹小组和广西军区向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关于南宁出现“打倒伍晋南”等标语的情况报告》。

同日，《广西日报》头版头条报道《南宁市“文化大革命”形势越来越好》，号召以实际行动迎接自治区、南宁市革命委员会的诞生。

4 月 7 日，“422”红卫兵 500 多人集会并游行到广西军区请愿，强烈反对成立南宁市革命委员会，并发表声明，说即将成立的南宁市革委会是“派委会”，还交送一封《给区革筹和韦国清同志的公开信》。

4 月 8 日，“联指”3 万多人集会，“敦促南宁市革委会成立”，会后也游行到广西军区。

4 月 12 日，广西自治区革筹小组和广西军区向党中央、毛泽东、林彪报告《关于成立广西自治区革委会筹备工作中遇到的问题》。报告中说：“有少数人破坏，他们在区革委会人选问题上设置障碍。我们提名，他们不同意，协商无法进行。‘422’野战军所属的组织混进坏人，挑起派性。我们要继续宣传最高指示，尽快要‘422’提出参加革委会的名单来。要狠抓阶级斗争，增派部队进驻‘422’野战军控制地区，开展强大的政治攻势，要

他们上缴武器。对拒不交出武器者，采取强行收缴。”

4 月 13 日，南宁市革委会成立，会后游行。同一时候，广西“422”两万多人在朝阳广场集会，反对南宁市革委会的成立，会后也举行了游行。当他们的游行队伍来到南宁市革委会门前时，阻拦悬挂“南宁市革命委员会”的牌匾，引发冲突。自治区革筹小组和广西军区向中央上报南宁市革委会成立遭到“422”反对的情况。

当天，广西贵县也举行了庆祝贵县革委会成立大会，由于在革委会名单中，错把“联指”头头当作“422”代表写进革委会名单，引起“422”不满，说革委会是县人武部包办代替的“派委会”、“假委会”。他们冲击庆祝大会，遭到“联指”开枪射杀，结果打死了一个名叫刘小圈的孩子。“422”当即抬着刘小圈尸体冲击成立大会主席台，撕毁大会横额，砸烂县革委会牌子，这就是贵县的“413”事件。

事件后，贵县“联指”以“422”破坏红色政权为由，成立“保卫红色政权指挥部”，并研究镇压“422”的方案，一是围攻炸毁“422”据点；二是清理街道抓人。在 10 天时间里，“联指”逮捕了数百人，除当场打死外，其余分别关押。各公社也效法县城成立“保卫红色政权指挥部”“贫下中农法庭”，召开大会搞示范杀人。公开杀害群众 38 人。

广西浦北县北通公社十专学大队在 4 月 13 日听了地区革委主任王晓峰电话会议的讲话后，4 月 14 日召开大队及革委领导

成员会议研究决定于第二天，4 月 15 日杀 24 人，4 月 16 日又杀 52 人。

4 月 15 日，北通公社旱田大队计划杀 22 人，规定看守民兵每人每天补助五角钱，三个民兵负责杀一个人，得 3 元钱，三个晚上共杀 22 人。杀人前进行搜刮，没收家产，规定地富寡妇及其女儿出嫁需经过“双打”委员会批准（“双打”即打击现行反革命，投机倒把）。张玉使，符冠英，何迁兰，卢秀珍等 24 人改嫁时被大队，生产队征税费和两女出嫁费共 894 元。

4 月 26 日至 29 日，广西陆川县部署“十二级台风”，掀起了杀人的新高潮，全县 11 个公社 155 个大队，有 154 个大队布置杀人，全县共杀害 1229 人。

4月15日，周恩来致陈伯达、康生、江青、黄永胜信，谈广西情况，提出“当告韦国清注意决不能在有群众的地方，强行收枪”。

## 第 995 回：问林彪，杨成武究竟何事　发声明，毛泽东支持黑人

4月14日，中共中央以中发［68］61号文件，批准安徽省军管会4月10日关于成立安徽省革命委员会的报告，毛泽东批示："照办。"

4月15日20时40分至21时40分，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黄永胜、谢富治、吴法宪、叶群、汪东兴和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在人民大会堂三楼小礼堂接见安徽省赴京汇报代表团和中央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安徽班全体学员。

江青宣读《关于成立安徽省革命委员会的批示》。

接着，康生讲话。他在讲话中说："同志们，有一句话我要解释一下，不要说谁反对我就打倒谁。在安徽的确有个时期，有的不明真相或受蒙蔽的人写过大字报要打倒我。我正式声明不要提这样的口号。对写过大字报的人不要进行攻击，要团结一致，共同对敌。希望同志们再三转达我这个心愿。我过去的谈话中对个别同志，个别干部，个别解放军指战员作了些批评，对的，同志们就改正，不对的，请同志们谅解，我是出于对同志们的爱护。话可能讲错，讲过了头，请同志们谅解。"

然后，陈伯达请许世友讲话。

周恩来说："他昨天刚到北京，今天来参加你们的会。"

众人呼口号："向许世友同志学习！向许世友同志致敬！"

许世友忙说："不要，不要！我有什么好学习的？

同志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批准的《关于成立安徽省革命委员会的批示》，我们要坚决照办！一百个照办！一千个照办！一万个照办！我们要好好地团结起来，共同对敌。

同志们，成立革命委员会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更复杂的斗争还在后面。我们要坚决保卫毛主席！谁反对毛主席就打倒谁！谁反对中央文革就打倒谁！谁反对中央军委就打倒谁！我们解放军，不管任何人都不准讲反对毛主席、反对中央文革、反对中央军委的话，谁讲就是犯罪。解放军是毛主席亲手缔造的，我们的一切一切都要听毛主席的话。一句话，就是要坚决执行毛主席的命令。

我的话完了。”

最后，陈伯达请周恩来讲了话。

4 月18 日，安徽省革命委员会在合肥的安徽省体育场举行了成立大会，会后举行了数十万人参加的大游行。

4月20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发表社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胜利——热烈祝贺安徽省革命委员会成立》。

4 月 16 日，聂荣臻到林彪住处，询问了杨成武的问题。他后来在回忆录中这样记述这次的会面：

“4 月 16 日，我到林彪那里去了一趟，我问林彪：‘杨成武究竟有什么问题，为什么要把他打倒？’林彪支支吾吾，勉强地说：‘杨成武不到我这里来。’意思是不大听话了。我说：‘他不到你这里来，你是副主席嘛，打个电话他不就来了！’”

4 月 4 日，美国著名黑人领袖马丁·路德·金被害。4 月 16 日这天，毛泽东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同志支持美国黑人抗暴斗争的声明》，令全世界瞩目：

支持美国黑人抗暴斗争的声明

毛泽东

（一九六八年四月十六日）

最近，美国黑人牧师马丁•路德•金突然被美帝国主义者暗杀。马丁•路德•金是一个非暴力主义者，但美帝国主义者并没有因此对他宽容，而是使用反革命的暴力，对他进行血腥的镇压。这一件事，深刻地教训了美国的广大黑人群众，激起了他们抗暴斗争的新风暴，席卷了美国一百几十个城市，是美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它显示了在两千多万美国黑人中，蕴藏着极其强大的革命力量。

这场黑人的斗争风暴发生在美国国内，是美帝国主义当前整个政治危机和经济危机的一个突出表现。它给陷于内外交困的美帝国主义以沉重的打击。美国黑人的斗争，不仅是被剥削、被压迫的黑人争取自由解放的斗争，而且是整个被剥削、被压迫的美国人民反对垄断资产阶级残暴统治的新号角。它对于全世界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斗争，对于越南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斗争，是一个巨大的支援和鼓舞。我代表中国人民，对美国黑人的正义斗争，表示坚决的支持。美国的种族歧视，是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制度的产物。美国广大黑人同美国统治集团之间的矛盾，是阶

级矛盾。只有推翻美国垄断资产阶级的反动统治，摧毁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制度，美国黑人才能够取得彻底解放。美国广大黑人同美国白人中的广大劳动人民，有着共同的利益和共同的斗争目标。因此，美国黑人的斗争正在获得越来越多的美国白色人种中的劳动人民和进步人士的同情和支持。美国黑人斗争必将同美国工人运动相结合，最终结束美国垄断资产阶级的罪恶统治。

我在一九六三年《支持美国黑人反对美帝国主义种族歧视的正义斗争的声明》中说过："万恶的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制度是随着奴役和贩卖黑人而兴盛起来的，它也必将随着黑色人种的彻底解放而告终。"我现在仍然坚持这个观点。当前，世界革命进入了一个伟大的新时代。美国黑人争取解放的斗争，是全世界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总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当代世界革命的一个组成部分。我呼吁：世界各国的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和一切愿意反对美帝国主义的人们，行动起来，给予美国黑人的斗争以强大的声援！全世界人民更紧密地团结起来，向着我们的共同敌人美帝国主义及其帮凶们发动持久的猛烈的进攻！可以肯定，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和一切剥削制度的彻底崩溃，世界上一切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的彻底翻身，已经为期不远了。

这是毛泽东继 1963 年发表《支持美国黑人反对美帝国主义种族歧视的正义斗争的声明》之后，第二次发表支持美国黑人斗争的声明。

历史回放到 1961 年，这一年，美国国内以非暴力手段挑战

种族隔离制度的自由乘车运动兴起。8 月，参加该运动的学生组成的一个小队于北卡罗来纳州门罗市遭到当地三 K 党的绑架和殴打，当地黑人区也遭到枪击，有人重伤，史称“门罗事件”。美国著名黑人领袖罗伯特·威廉直接领导了门罗市的黑人运动，于 1961 年 8 月受到美国联邦调查局的通缉，被迫于当年 9 月起流亡国外，先后居留加拿大、古巴。

在居留古巴期间，罗伯特·威廉两次致信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要求毛泽东主席发表声明，支援美国黑人反种族歧视斗争。

1963 年 8 月 8 日，毛泽东接受罗伯特·威廉的要求，发表了《支持美国黑人反对美帝国主义种族歧视的正义斗争的声明》。罗伯特·威廉在接到声明后，于 8 月 14 日在古巴发表长篇文章《毛泽东的美国黑人解放宣言》，将该声明同林肯的《解放宣言》相提并论，称：“毛泽东主席向世界各国人民发出的支援在战斗中的我们人民的呼吁，是一个新的解放宣言。”

美国著名学者和黑人领袖杜波依斯的夫人雪莉·格雷厄姆·杜波依斯说：“从来还没有一个强大的国家的领袖向全世界发出过这样的号召。”“我的丈夫杜波依斯博士和我对伟大的领袖和人类的朋友毛主席表示感谢。”

1963 年至 1964 年，美国黑人民权运动掀起高潮。1963 年先后发生亚拉巴马州伯明翰市黑人集会和游行遭到政府大规模逮捕和镇压的事件，以及密西西比州黑人领袖梅加·埃弗斯在家中

被杀事件。1964 年初，50 万人在纽约掀起罢课运动，反对歧视黑人的教育制度；该年 8 月，纽约市哈莱姆区、布鲁克林区以及纽约州罗切斯特市先后爆发黑人斗争。1965 年，美国著名黑人民权运动领袖、1964 年度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有金牧师之称的浸信会牧师马丁·路德·金，在亚拉巴马州塞尔马领导的非暴力主义的黑人选民登记运动遭到政府强力镇压，酿成“塞尔马事件”，2000 人被关进监狱，1 名黑人群众被开枪打死，马丁·路德·金随后领导黑人群众三次从塞尔马向蒙哥马利非暴力进军。同年 8 月，洛杉矶爆发“瓦茨骚乱”，黑人群众同军警展开激战，造成重大死伤。1966 年，密西西比州的黑人举行了“争取自由进军”。1965 年至 1967 年，黑人运动同反战运动相结合。1966 年，马丁·路德·金等领导的芝加哥黑人群众游行示威演变为黑人群众同军警的严重冲突，造成伤亡。此后美国其他城市也相继爆发类似事件。

进入 1967 年，美国黑人运动受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影响达到新的高峰，全国 100 多个城市发生黑人斗争。1967 年 7 月，在纽瓦克骚乱中，黑人群众同军警交战 4 天 4 夜，示威黑人中有 22 人被打死，2000 人被打伤，1600 多人被逮捕，军警中 3 人被打死，50 多人受伤。

7 月 23 日，美国第五大城市底特律爆发一场大规模的黑人抗暴斗争。抗暴斗争的起因是警察在 23 日凌晨闯进黑人区一家小酒店，逮捕数十名黑人引起。事情发生后，数百名黑人闻讯赶

来，向警察投掷石块和砖头。随后大批警察赶来增援，企图将黑人群众强行驱散，但黑人越聚越多。24 日晚，数千名黑人群众冲破一万三千多名武装军警的重重包围，把抗暴斗争由西向东扩展到整个市区。黑人烧毁了白人的许多房屋和商店以及数处警察所，全城六分之一被夷为平地，史称“底特律骚乱”。

随着黑人暴动的发展，美国 3 家最大的汽车工厂的装配线完全停顿。市内商店、银行、饭店全部关闭。学校全部停课。在联邦政府的强力镇压下，28 日晚，暴动基本平息。在这场暴动中，有 40 余人死亡，350 人受伤，3800 人被捕。

原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主席、黑豹党领袖斯托克利·卡迈克尔在底特律骚乱发生后称，许多参加斗争的美国黑人手上拿着《毛主席语录》。他还说：“毛主席的许多教导正在帮助美国黑人觉醒起来。”

美国黑人运动领袖之间，在对“非暴力”等问题的看法上存有分歧。在运动后期，罗伯特·威廉、斯托克利·卡迈克尔等人及一些黑人组织皆不赞同马丁·路德·金的非暴力主义，认为非暴力可以作为斗争手段，但并不是必须遵守的基本原则，针对暴力可以以暴力进行抵抗。

1968 年 3 月底，美国田纳西州孟菲斯市发生以黑人为主的清洁工人要求加薪的罢工运动，遭到政府镇压，造成死伤。4 月 4 日，马丁·路德·金前往孟菲斯市参与领导工人罢工并同政府协调，下榻洛林汽车旅馆。晚饭前，他在二楼三百号房间的阳台

上与人谈话。这时，在街对面的一幢公寓里，一个狙击手端着一架带有瞄准镜的汽步枪向他射击。子弹从前面穿过他的脖子，在颚后爆炸，他随即倒地不起，年仅 39 岁。

第二天，4 月 5 日，美国巴尔的摩、芝加哥、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等 125 个城市爆发了抗议马丁·路德·金遇刺身亡的种族骚乱。

4 月 9 日，马丁·路德·金的葬礼举行。他的遇刺身亡及此事件引发的骚乱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

4 月 13 日，日本《朝日新闻》驻美国记者辰浓和男报道，他为采访马丁·路德·金被刺后 125 个城市黑人斗争情况，于新泽西州的纽瓦克会见了青年反战运动的黑人领袖哈蒂逊，后者称："在我们美国黑人中间，占压倒多数的人崇敬毛泽东主席！"辰浓和男还报道称，他在纽瓦克的黑人贫民窟访问一个黑人工人家庭时，该工人拿出了红色的《毛主席语录》英文版并称赞其是一本好书，在工人家庭的墙上还挂着毛主席的照片，该工人说："一句话，毛泽东是伟大的人物。他把那样古老的中国改变过来了！"

4 月 16 日，毛泽东写了他支持美国黑人反对美国种族歧视，争取解放斗争的声明。4 月 17 日，毛泽东的声明在报纸上公开发表。

同一天，美国著名黑人领袖罗伯特·威廉和杜波依斯夫人雪莉·格雷厄姆·杜波依斯（Shirley Graham Du Bois）在北京接

受新华社采访，热烈支持毛泽东新声明的发表。

美国黑人领袖罗伯特·威廉说："毛主席在美国黑人斗争的关键时刻，在伟大的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发表支持美国黑人抗暴斗争的声明，是非常及时、非常重要的。毛主席的声明将鼓舞美国黑人进行更大规模的抗暴斗争。我在这里再一次感谢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以及中国人民对美国黑人斗争的支持。毛主席在声明中说：'可以肯定，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和一切剥削制度的彻底崩溃，世界上一切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的彻底翻身，已经为期不远了。'毛主席的这个论断是千真万确的。我们相信，毛主席的预言一定会实现。马丁·路德·金主张实行非暴力斗争，但是他被帝国主义、种族主义用暴力杀害了。正如毛主席在声明中指出的，这对美国黑人是一个深刻的教训。他说，我们的敌人是一只纸老虎，是可以打倒的。但是，正如毛主席所说的：'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对于敌人必须狠打，才能打倒。毛主席在声明中把美国黑人斗争放在世界人民争取解放斗争的地位，这给我们的斗争赋予了新的意义。毛主席的声明一定能够促进全世界一切有正义感的人民起来支持美国黑人的斗争。毛主席在一九六三年发表《支持美国黑人反对美帝国主义种族歧视的正义斗争的声明》以后，美国黑人的斗争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现在越来越多的美国黑人认识到自己的斗争，同全世界被压迫人民的斗争是一致的。"

美国黑人领袖杜波依斯博士的夫人歇莉·格雷姆说："毛主

席发表的支持美国黑人抗暴斗争的声明，是一个非常强有力的极其重要的声明，它将产生巨大的影响，对敌人是个极沉重的打击。毛主席是第一个完全支持美国黑人斗争、并且号召全世界人民和黑人一起进行反对种族歧视斗争的领袖。毛主席指出，‘两千多万美国黑人中，蕴藏着极其强大的革命力量’，这种力量正在使美帝国主义发抖。在一个很长的时间里，美国一些黑人曾试图通过非暴力的途径取得自由。黑人牧师马丁·路德·金突然被美帝国主义者暗杀，这一件事告诉美国黑人，自由不能靠非暴力取得，他们必须拿起枪来，进行战斗。美国黑人一旦认识到他们的斗争不仅是为了反对种族歧视，而且也是反对世界人民的头号敌人美帝国主义，他们就会把自己的斗争推向前进。”

从 1966 年 10 月中共中央宣部批准出口《毛主席语录》，到 1967 年 5 月，仅 8 个月时间，中国国际书店已向全世界 117 个国家和地区发行了英、法、西班牙、日、俄、德、意、尼泊尔、越南、印度尼西亚、阿拉伯、缅甸、斯瓦希里、波斯等 14 种文字的《毛主席语录》共 80 多万册。据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统计，截至 1967 年 10 月，世界各国以 65 种文字翻译出版毛泽东著作 853 种，其中有 20 个国家的 20 种文字翻译出版《毛主席语录》，共有 35 种版本。

更有国外一些组织统计推算，仅“文革”几年之内，《毛主席语录》国内外用 50 多种文字出版了 500 多种版本，总印数为 50 余亿册，不包括各派红卫兵组织、各级革命委员会印制的非

正式出版物。这时，《毛主席语录》被称为“二十世纪世界上最流行的书”，是全球历史上印量仅次于《圣经》的出版物。

## 第 996 回：罗舜初，开幕词引起争论　周恩来，见国防科委代表

国防科委全称为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直属中央军委领导。号称拥有 20 多万知识分子的单位，集中了国家一些知名科学家和大量拔尖的科技优秀人才。聂荣臻为主任、党委第一书记。科委设司令部、政治部、后勤部，一个直属所即国防科学技术情报资料研究所。司令部设九个业务局，例如八局为院校局，九局为情报局等等。九局同情报所合并，为两块牌子，一套领导班子。科委管辖几个试验基地外，还管辖 2 至 7 个机械工业部的科研机构，文革后扩大为 18 个研究院，接管了一部分中国科学院的研究所；管辖 11 所重点高等院校，例如北京航空学院、北京工业学院、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还有第二炮兵。这里是个知识分子最集中的单位。

1968 年 3 月 11 日，国防科委召开“第二次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代表大会”，简称“学代会”

在此之前，1 月 11 日，国防科委党委发出关于这次“学代会”代表选拔条件的补充通知中有一条：“坚决拥护以聂荣臻同志为核心的国防科委党委的正确领导。”这一条，引起了七机部两派群众组织的争论。2 月 10 日，聂荣臻办公室接到七机部军管会的报告，提到这个问题，希望领导上对代表条件的规定再做考虑。

“学代会”开幕前，聂荣臻办公室也接到几封群众来信，说

国防科委领导借开“学代会”的机会，有吹捧聂荣臻的现象。

聂荣臻请国防科委副主任罗舜初、刘华清、蔡顺礼到西山住处开会，讨论召开“学代会”需要解决的问题。因为这时代表已经全部选出，而且七机部两派都有代表参加，他们认为代表问题已经解决，所以会上没有再提选举代表条件的问题，而着重要求把准备在“学代会”上的发言都检查一下，不要有突出聂荣臻个人的内容。

3 月 13 日，国防科委“学代会”开幕。除学代会代表外，国防科委系统驻京单位部分群众组织代表也参加了大会。聂荣臻没有参加开幕会，由国防科委副主任罗舜初致开幕词，但是他的开幕词引起了许多代表的不满。

原来，1967 年 5 月 13 日以后，北京三军总部又出现了一种新的提法，如总参提出“杨成武同志为核心”，空军提出“以吴法宪同志为核心”，海军提出“以李作鹏同志为核心”，所以这次罗舜初在开幕辞里也提出，聂荣臻是“毛主席的好学生”、“林副主席的亲密战友”，几十年，一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一贯紧跟毛主席、林副主席，聂荣臻“是国防科研系统的最高统帅”等说法。

代表们听了罗舜初的这种说法感到刺耳，特别是来自哈军工、西军电、北航，上海交大、七机部、南昌 320 厂、内蒙“818”、西电、南航、南京炮工、成都电工等单位的造反派代表，立即提出批评，一呼百应。此时，又有代表揭发，选“学代会”代表时

有特别条件，必须“要拥护以聂副主席为核心的国防科委党委的正确领导”，否则不能参加“学代会”，这更引起代表们的不满。国防科委情报所恽仁祥到大会发表声明，宣布反对“坚决拥护以聂荣臻同志为核心的国防科委党委的正确领导”这条代表标准。

同时，七机部“916”也说国防科委提出这个条件是为了垒“聂氏山头”，搞宗派主义，想把对立派群众组织整垮。

而且，罗舜初在致开幕辞后，还专门走到台前对大家说：“杨成武代总长因身体不好，未能参加我们的大会，我代表大会祝杨成武代总长早日恢复健康！”谁知才过十多天，杨成武被打倒了！于是这又成了代表们批评的事情。七机部更有相当一部分工人、干部、技术人员，在会场上贴出“打倒王秉璋、解放七机部”、“炮轰聂荣臻”的大标语。会议无法开下去，“学代会”成了“轰聂会”。

4 月 20 日晚 21 时 40 分至 4 月 21 日凌晨 2 时 40 分，周恩来在中南海国务院会议厅接见国防科委、国防工办、七机部、中国科学院等单位的代表，处理科委“学代会”的问题。他说：

“同志们，我好久没有同科技界的同志们见面了。我首先声明，不是我好管闲事，是形势逼着我要同你们讲几句，听听你们的意见。国防科委召集的学习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发生了一些问题，你们反映到伟大领袖毛主席那里去了，反映到林副主席那里去了，在中央开会时，要我帮助国防科委、国防工办解决这个问题，我要听听你们的意见，所以，要求你们各方面的人

都有。听说你们有一张大字报：《有人要做救世主》，谁要做“救世主”？有没有呀？《国际歌》大家都会唱吧，‘从来没有救世主！’解放自己靠自己。”

周恩来问：“阎奎耀同志来了没有？”

七机部军管会主任阎奎耀答：“来了。”

周恩来又问：“选积极分子代表时的标准是整个国防科委的标准，还是专对七机部的？”

阎奎耀答：“那是国防科委的。”

周恩来：“其中提到‘要拥护以聂副主席为核心的国防科委党委的正确领导’，同意这个的就选，不同意的就不选，这是专对七机部，还是所有的都有这一条？”

阎奎耀：“我们看了这个标准，是否给其他单位都发了，不了解。”

周恩来：“听说是 2 月份搞的，4 月 4 日取消的。代表标准之一就是这一条，七机部也不例外，对不对？”

阎奎耀答：“对。”

周恩来：“这一条是国防科委党委常委，据我问罗舜初、蔡顺礼、刘华清、张震寰同志，是你们 4 个人商量的，还是哪一位单独决定的？”

罗舜初答：“共同商量过。”

周恩来：“常委不只你们 4 个人。你们报告过聂荣臻同志没有？”

罗舜初："没有报告。"

周恩来："这不能强加于人，各有各的账。我们现在发现了。当然，这是小将们提出来的，我们才知道。这一条不对，所以，在 4 月 4 日就取消了。把这事通知聂荣臻同志，他已写了检讨，这个检讨我们给他发表，想听听你们的意见，看他们检讨够不够？这一条不是他事先知道的。我跟罗舜初同志谈过三次，"

罗舜初更正："两次。"

周恩来："跟其他 3 位谈过一次，这个问题要澄清，这跟总参党委提'以杨成武为核心的党委领导'那种情况是有区别的，那是他自己喜欢，不但自己喜欢，而且对别人也强加，给国防科委学习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写了一封贺信，写了有以某人为核心的国防科委党委的领导，"

王力华："没有写。"

刘华清："那是另一件事，提了'一贯高举……'"

周恩来："这个风气不只这两个单位，恐怕在军队、在地方也有这个风气，要一分为二地来研究，不能无限上纲，不能认为这个话是杨成武的，那样，打击面多宽。有的是不知道，当一发现时就取消了。总之是不对的。有一个时期，关于进行两条路线的斗争，一定要在这个单位以某某为首的正确路线，以某某为代表的错误路线对立起来，这事我们对反动路线是说过，在各省成立革委会的批件上是这样说的，但正确的没有说过，革命委员会是新生力量，要靠群众锻炼、考验，这事毛主席在去年 12 月批

复湖南的报告上有的，这次，你们代表大会念这个文件没有？”

罗舜初：“没有学。”

周恩来：“毛主席有个批语，有些人就是不注意传达，你们听过毛主席对湖南报告六条批示的举手。”

听过的人举了手，周恩来看了看说：“看来是多数；没有听过的举手。”

约有 20 人举手。

接着，周恩来念了中央 1967 年 12 月发给各个地方的关于毛泽东批评“绝对权威”说法的电报通知。周恩来说：“杨成武受到主席批评后，他还胡说乱道，戚本禹也叫喊觉得没有什么，认为可以写，‘表示群众的革命激情嘛！’他说他就想不通，一定要不写，讲不过去。杨成武还说这在哲学上也是讲得通的。杨成武懂什么哲学！就这样胡说乱道，他就这样狂妄！毛主席把杨成武的文章退回来，江青同志还跟杨成武当面说过，这在毛主席思想里是通不过的，是不合乎毛泽东思想的。他又不听。毛主席抓住这个机会在去年 12 月 17 日的批示，主要是这两点，下面还有四点。杨成武就是企图大树特树自己的绝对权威，这样建立的威信必然会垮下来，而且垮得很快，他的文章是 11 月发表的，毛主席的批示是 12 月份，只有 4 个月的时间他就垮了，这还不是必然的？！而且很快垮下来，这说明个人主义发展到登峰造极就必然会垮下来，个人野心家如果在党内伸手必然会被抓住。这很值得我们青年人注意，你们的代表很多都是 20 多、30 多岁，你们

还要活 30、40 岁，你们要想一想这问题，这对我们也是一个教育，我们是属于老年，过了 70 就算老年，郭老已 80 了，我们都要警惕，任何人都不能以为自己改造好了，没有那回事，你们要注意，对本人也是一个警告，对任何人都是个帮助、教育、不愿意宣传，不敢宣传，那就是自己另有打算，这个必须要宣传。

关于树立威信的问题，毛主席在去年 9 月发表的最新指示中也讲过，一个革命组织总是‘以我为核心’，你们两派总是要哪一派为核心，自封自己为核心是最蠢的事。你们今天两派都在座，我也不是专门指哪一派，我也是客观的叙述，凡是自封‘我这派是核心’，排斥另一派，都是愚蠢的。两个革命群众组织都或多或少犯过错误，那一派封自己一贯正确，‘以我核心’，这不可能嘛！这点应该警惕。”

周恩来将毛泽东批示的每段都反复念两遍，然后说：“我们根据毛主席的指示通了报，我们完全拥护毛主席 12 月 17 日对湖南报告的批示，现在转发你们，希望你们认真学习，坚决照办。毛主席在七届二中全会上就提出禁止给党的领导人祝寿，要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希望严格遵守执行。”

他说：“刚才说国防科委选代表的标准的提出不恰当，是错误的，后来取消了。因为有了这一条，就引起国防科委学习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发生了争执，既然产生了争执就要解决。今天，我请军委办事组邱会作同志来了，我不大懂得，你们选举代表都能保证那么正确？”

邱会作答：没有这样规定。

周恩来："这是第一件事，要研究，下面还有别的事。首先要解决这事，既然是因为这样的标准，七机部原属于'新915'组织的人就选的多，属于'916'组织选出的人就少，是不是这样的情况？"

众答："是。"

周恩来问七机部："科委的条件你们看了是否也感到错了。"

"915"王德奎回答："是错了。"

周恩来："根据这一条选举就必然受到影响。"

他听了王德奎汇报选举代表的过程后说："这个标准不是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标准，是受资产阶级派性的影响，是极'左'的，表现了保守派的思想、保守派的派性，保守派反映了资产阶级的派性，或者是形'左'实右的派性，极'左'派的派性。当然，这还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还不完全是资产阶级反动派，那是敌我矛盾，这是人民内部矛盾。""但是，对于资产阶级派性就要去掉，就要反对，这有不同，一个是内部矛盾，一个是敌我矛盾，笼统地反对派性就容易混杂起来，把敌我矛盾、人民内部矛盾纠缠在一起；笼统地讲派性的罪状，笼统地讲派性的反动性不大科学，这次把这个问题回答了。理论问题，我们一个时期在宣传工作中不那么准确，我们也是在实践中学习，在学习中进步。你们青年同志，我们老年也是如此，为什么要'天天读'，要学到老，用到老，改造到老。因为你们的选举有这样的错误，所以，在选

举中不会不受影响，我希望原‘新 915’、‘916’的同志都客观一点，两派形成这么长，从前年到现在，将近两年，这么对立，好不容易搞了一个大联合，形势上有个大联委，实际上对立性很强。你说派性是什么派性？原‘新 915’的同志就是无产阶级的党性？！你们能这样说？”

王德奎说：“两派都是革命群众组织。”

周恩来：“既然是两个革命群众组织，都有无产阶级派性，同时也杂夹着有保守派的派性。我们对你们做得对的就称赞，你们做的合乎毛泽东思想，合乎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就发扬，就联合，你们有错误的地方就批评、帮助。这不叫‘大杂烩’，也不叫合稀泥，你说是不是？”

王德奎回答：“当然应该联合。毛主席教导我们：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

周恩来：“是嘛，在知识分子中间容易表现各种派性，就是要增强无产阶级的派性，增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党性。”

他对“915”说：“你们要有这样的自我批评，就能团结‘916’。”

他继续说：“原‘915’同志是这样，‘916’的同志怎么说？你们‘916’就那样响当当？就是无产阶级的党性？”

“916”叶正光回答：“我们过去也有很多错误，特别是对不同观点的群众组织采取了一些不正确的作法，对王德奎、许宝欣游过街，我们多次作过检查，向他们道歉。极‘左’思潮在我们队伍里也存在。”

周恩来："你们是极‘左’思潮派，还是无产阶级派？"

叶正光说："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派。"

周恩来："你们还是有错误的。"

叶正光承认说："有错误。"

周恩来："一个时期，这边的错误多一些，一个时期，那边的错误又多一些，要不断改正错误。你们都还是有一点革命性，所以才称你们是革命群众组织。既然有无产阶级派性，有共同性就应该联合，要忠于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忠于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这就找到了共同性，这是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派性，是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党性。"

周恩来询问了代表产生的方法后说："我看协商要让双方都完全同意不大可能。""现在是要补选一点‘916’的代表"，"国防科委、国防工办已揪出来的坏人也应该进行批判，如刘秉彦、刘有光，二刘在七机部都是不好的，工办是否都好？也不见得，现在证明也是不好的，有个高德西，还有郑汉涛、袁成隆等人。科委就这样干净？也有张爱萍、唐延杰，哪个单位都有，但总是一小撮，所以，矛头应该对准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他们的代理人。"

叶正光反映科委插手七机部，拉一派打一派。周恩来说："这个结论太绝对了吧！整个国防科委都这样？"

叶正光要求周恩来派调查组调查七机部的问题和他过去几次讲话的情况。周恩来说："靠你们自己解放自己，我不派调查

小组。”

接着，周恩来一一询问各单位补选代表的具体数字，并一再征求双方的意见，大家都表示同意“916”补选 35 名代表。

周恩来详细询问参加“学代会”的上海交大、西电、南航、南京炮工、成都电工、南昌 320 厂、哈军工、内蒙 818、科大、北航等单位代表的情况。并说：“积极分子代表大会既然发生问题就要解决问题，一边解决一边开会。开会允许有各方面的意见，有口头讲的，有书面讲的，希望你们要有高姿态。”

他问：“北航的你们参加了十几个？”

答：“32 个。”

周恩来：“你们也可以出来讲一讲。交大、南炮工、西安工大都请他们讲一讲，大家总会有所得，不要总是四平八稳，一片正确的呼声，也要允许有不同的意见。一定要有不同意见，有争论，才能把风格提高，把斗争性加强，觉悟提高。”

周恩来提到赵尔陆：“赵尔陆同志死了有人还要打倒他，现在是否还有人在议论？应该说句公道话，这个同志政治上有他的弱点，政治不大很强。但是，他从井冈山起跟毛主席、林副主席革命过来几十年了，一直作后勤工作，勤勤恳恳，我们后勤系统也揪出坏人，如洪学智、李聚奎。解放以来，第一个是杨立三，抗美援朝时病垮了。第二个是赵尔陆，应该看全部历史，需要中央、需要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审查全部历史，这些是年青小将不能解决的，你们只知道这一段。他死

了后，我们要挺身而出，林副主席嘱咐应该给群众说清楚，如果个别人还要搞，就要进行说服。

另外，王秉璋同志，是 1931 年 12 月宁都暴动过来的，王秉璋参加空军工作，以后又参加七机部工作，这个人也是政治上不强，但从 1931 年到现在，已经是三十七、八年了，总是做了很多工作的，在空军工作是有成绩的。批评是应该的，你们轰一轰也应该，你们要打倒，我们就要说话了。”

“我们已进行了五个回合，第四个回合，表现在社会上的反动组织‘516’，还有其他极‘左’思潮，湖南的‘省无联’。”

“聂荣臻同志我也很熟，我们是老战友，我知道他不是一贯正确的，是有错误的，我不在这里说。我收到他一封信，我想跟他提几点意见，帮助他。在二月底杨成武问题出来后，他给毛主席、林副主席有一封信，也抄了一封给我，毛主席加了批语，然后准备继续写一份检讨，他确实对这次大会不是什么事情都知道的，感到不安，写了一封信，我打算给他提几点意见。他是 4 月 16 日写的，我还没有提意见，毛主席要我帮助他，等写了以后，经过国防科委党委讨论后公布，有意见还可以提。”

4 月 24 日，聂荣臻给“学代会”写了自我批评的信。这封信，是经过周恩来审查修改后发出的。

4 月 30 日上午，聂荣臻到“学代会”上准备检讨，听取意见。可当他刚讲了几句，持批判态度的一派口号声四起：“火烧聂老总”、“炮轰聂老总”、“万炮齐轰聂荣臻”。接着是另一派反

对这样做，也高呼口号。聂荣臻看无法再继续讲下去，就趁会场稍微安静时，说了几句：“大家对我有什么意见，欢迎提出，由国防科委党委转给我，希望大家遵照总理的指示，把大会开好。”然后离开了会场。

## 第 997 回：四二五，北京大学重开战　架天桥，燕园内又出新景

北京大学“329” 武斗那天，北大“井冈山”占了 32 楼。他们立即着手建筑工事，其实也很简单，首先是七手八脚拆暖气，然后把拆下来的暖气片放在窗台上，准备“公社”进攻时往下砸。然后将拆下来的暖气管用来做扎抢。此时的洗脸房已经变成工作间，学生们也不知从哪里学来的本事，用锯子、锉子、螺纹钢，叮咚、叮咚，给暖气管装上了头，变成了红缨枪，有的还有红穗穗。没有头的，斜着一锉，出来个尖，也可以扎人。这些用暖气管做成的扎枪虽说长短不齐，但人手一支，没事练练，甩着枪头转一圈，再往前一刺，“杀！”也可以自卫。

一楼的房间没有人住，窗户用木条钉牢，并用卸下的门和木床顶死，再用铁丝绑牢。楼上，该砸的砸，该拆的拆，碎石砖块就地取材，堆在窗口。这个时候，群龙无首，群众的情绪和行动最容易被少数人左右，只要有人一呼，就有人响应。自行车三轮车内胎搞来了，两头钉在窗框上，或者绑在床腿上，成了大弹弓，放上半块砖头，比谁射得远，看谁射得准。有人甚至让别人抱住后腰，两个人拉弓。

那几天，北大“井冈山”总部的学生头头争论不休，久议无果。“井冈山”的学生如鸟兽散，各奔东西。海淀路，32 路汽车，拥挤着大批逃难的学生。大包小包，肩挑背扛，自行车驮，络绎不绝。投靠亲戚的，回老家的，寄宿在同学处的，完全没有出路

的，住到地质学院的大教室，那里是北大“井冈山”的大后方，也可以帮助守楼的人做后勤供应。北大校园里，只有少数几百名决心与聂元梓拼个鱼死网破的“井冈山”中坚份子留了下来。他们占据了相邻的 28 楼、30 楼、32 楼、35 楼、37 楼，但中间还隔着一座 36 楼。如果占领了 36 楼，“井冈山”就可以把占领区连成一片。

北京卫戍区司令员温玉成对北京大学发出两点指示：“一、两派广播台坚决停止播发有关引起双方群众对立情绪内容的稿件；二、严格禁止制造和向校内运送武器。违者以挑动武斗论处。”

没有效果。

4 月 4 日晚，北京卫戍区副司令员李钟奇又来到北大，限令“井冈山兵团”3 天交出刺伤聂元梓的凶手。

4 月 11 日，北京市革委会、市公安局军管会、北大校“文革”组成的“制止北大武斗监督检查小组”发表的《关于揪出反革命凶杀犯及其后台的广播讲话》，其中说到：“‘井冈山兵团’至今不交出凶手和后台，是对抗无产阶级司令部的行为。”

北京大学“井冈山”仍然未予理睬。

这时，聂元梓找到时任哲学系文革主任的哲学系教师、也是“第一张大字报”签名者之一的高云鹏，单独对他说：“学校近来发生不少事，‘公社’都是些年轻人，做事比较莽撞。你到 44 楼去把把关，别让年轻人太莽撞做出出格的事情来。”

44 楼是“新北大公社”总部所在地。1967 年 5 月，高云鹏

被派往北京大学 653 汉中分校，动员那里的同学回北京，直到 1967 年底才回到北京。随后，一直在哲学系。

按照聂元梓的指示，高云鹏来到 44 楼，坐镇“新北大”文攻武卫指挥部。

4 月 19 日，地质学院附中学生温家驹进入北京大学图书馆，被“新北大公社”武斗连成员抓到生物小楼低温实验室进行审讯致死。 事发后，“新北大公社”孙蓬一布置调查，结论是：温家驹是政治小偷，是群众打的，与校“文革”、“新北大公社”无关。

4 月 25 日，在北京大学“井冈山”留校同学的再三要求下，“井冈山”总部终于下决心，将居住在 36 楼的“新北大公社”的学生全部赶走，占据 36 楼。

翌日，26 日，“新北大公社”孙蓬一主张攻打 36 楼，将其重新夺回。虽然高云鹏有不同的意见，提出“硬冲是要伤人的，不能让‘公社’的同志们豁出命来达到目的，不能下这个决心。”但此时孙蓬一已经直接组织人员上了阵。

只见“公社”黄压压的一片，从 34 楼和 38 楼两个方向涌过来。他们头戴钢盔，身穿黄大衣，手持扎枪，三人一组，三组一队，推进有序，喊声震天。前排的，举着床板掩护，要从窗户和门强攻而入。那场面，雄壮而恐怖，现场的人过去只有在电影里看到。

“井冈山”这边，居高临下，毫无恐惧之感。因为他们早已红了眼，只有一个念头，“打退他们！鱼死网破，背水一战。”砖

头像雨点一样砸去，大暖气片从窗台推下，咣当一声……

砖头瓦片满天，木棒、扎枪飞舞，口号、叫骂声不绝于耳。为争夺 36 楼，校“文革”和“井冈山兵团”发生了第二次大武斗，双方头目不仅亲自坐镇指挥，而且到现场督战。

“公社”先遣部队砸开西墙，冲进一个房间，破墙打洞向前推进。一楼顶不住“公社”的强攻，失守。

万般紧急之中，“井冈山”的骆如铁情急智生，用大锤在二楼地板打了大洞，“井冈山”的人在上面用枪扎，用砖头砸，甚至用水泼，终于把“公社”又赶出楼外。“井冈山”广播台立即报道大好喜讯：“黄洋界上炮声隆，报道敌军消遁”!

武斗持续了 5 个多小时，双方有 200 余人受伤，大部分是“公社”的。公私财物遭到严重损失。最终，孙蓬一还是接受了高云鹏的意见，将攻楼的队伍撤了下来。

27 日，“公社”占领了 19、20、21、24、25、27 楼。

上午 10 时左右，北京大学无线电系 62 级学生、北大“井冈山兵团 15 纵‘过大江’战斗队”殷文杰从他住的 42 楼出来从南向北走，当经过“新北大公社”总部所在的 44 楼时，只听有人高喊一声：“他是‘过大江’的!”正在 44 楼门口的“新北大公社钢一连”杨恭谦和郭玉堂拿着长矛，听到喊声，便跑上去拦住殷文杰。

殷文杰见状，转身就跑。后边一人冲上来用长矛刺了过去，接着另一人也上去刺。这时，“新北大”动态组的胡宗式和章铎

正和人大“三红”动态组的盛学韫在距事发地约 20 余米的地方谈话，胡宗式看到殷文杰走过来，被拦住。又见刺了第一枪后，赶紧跑过去进行拦阻。

此时，殷文杰身上已被刺了许多枪倒在地上。杨恭谦二人喊了一声：“滚蛋”。殷文杰挣扎着爬起来，奔到 44 楼北面小树林里又倒下。

校医院离 44 楼很近，校医很快赶来了，给殷文杰打了一针强心针。随后众人把殷文杰抬上汽车。“新北大公社”总部委员黄元庄让胡宗式护送殷文杰到五棵松附近的七机部 721 医院抢救。胡宗式怕汽车颠簸，把殷文杰的头放在自己的腿上，一路上抱着殷文杰的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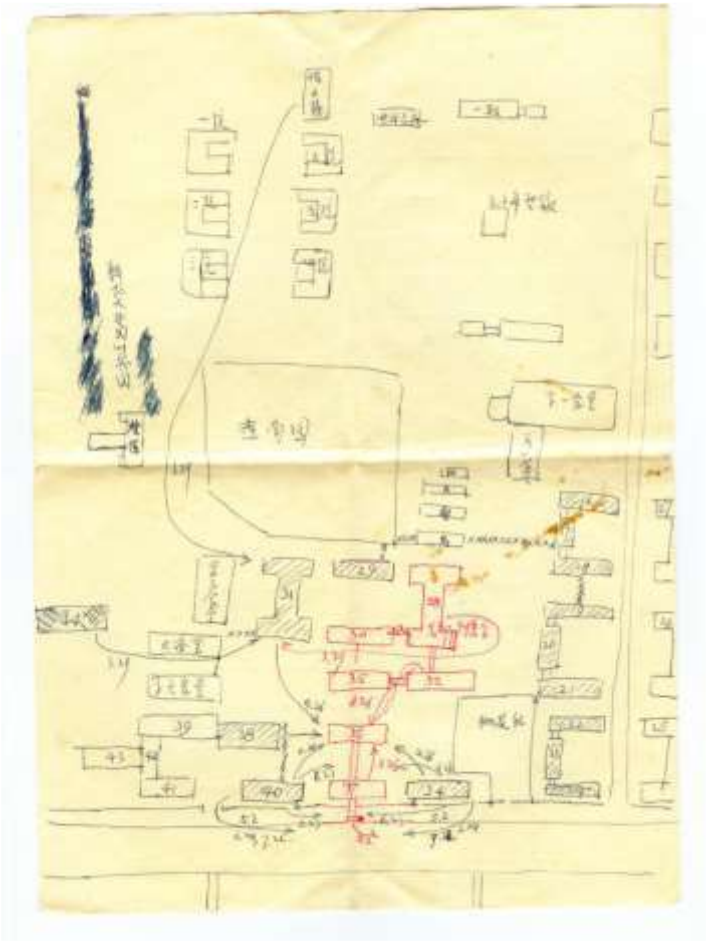
到了 721 医院，大夫一看殷文杰瞳孔，立即抢救，先是按胸做人工呼吸，后作开胸的心脏按摩。胡宗式在旁边看着，只听到医生说“不行了”。他知道事情的严重性，只觉得眼前一黑，差点晕倒。旁边的护士把他扶到外边。

下午，胡宗式再去医院，取回诊断书，上面写着 39 处伤口。

30 日中午，殷文杰的尸体火化。

“井冈山”占领 36 楼后，孙蓬一、高云鹏也带领“新北大公社”占据了 17、18、19、20、21、22、23、24、25 和 27 等楼群，形成对“井冈山”占据的 28、30、32、35、36、37 楼群的合围态势。

北京大学学生宿舍平面图



上面的这张北大武斗形势图，是北大技术物理系学生、“井

冈山”的俞小平于 1968 年 8 月武斗结束后，手绘寄给他的父母的。地图上北下南，最南端是北大校园南墙，墙外东西向的海淀路，是进出北大学生宿舍区的主要道路。所有武斗占领的楼，除了“井冈山”总部的 28 楼原为越南留学生宿舍楼，“新北大公社”总部的 44 楼原为北大招待所外，其他都是学生或教职员工的宿舍楼。图上红色的是“井冈山”占领的楼群，黑色并加以斜线的是“新北大公社”占领的楼群，楼上的数字是楼号。带箭头的线显示双方的进攻与防守，线上的数字是武斗的日期。连续的×××××是“新北大公社”的封锁线，由双层床等家具构成。“井冈山”在 28 楼西南端与 30 楼东端之间的四楼架设了天桥，各楼地下开挖了地道，地面各楼之间的道路用双层床联通，以躲避“新北大公社”的弹弓的袭击。“井冈山”的外出通道只剩下 37 楼通向海淀路的一条出口。

为了打通楼与楼之间的通道，“井冈山”采取了 3 种办法：

一是地面上，楼与楼的通道，两边都用学生寝室里的双层床一张挨一张再用钢丝连接起来作为护墙，上面还用一张张单人床扣住，这样就形成了一个相对结实而又安全的封闭空间。人们可以放心大胆地通过，弹弓和长矛都对行人不会造成伤害，这是主要的通行办法。

二是挖地道。36 和 37 楼之间首先挖了地道，由地质地理系同学勘察设计并监督实施。住在两楼里同学用最原始的方法一锨一锹地挖土，用脸盆，抽屉运土，自行车轮当吊车，先挖了三米

深的竖井，然后再往前掘进，三班倒。地道高约一米五，可并行交错，安有电灯，地湿漉漉，墙湿漉漉。最难的是挖地基三合土时，一点点用凿子凿。37 楼通后，其他楼也仿效了，不到一周功夫，又挖通了 32 楼到 35 楼的地道。接着是 35 楼到 36 楼。挖出的土存在一楼宿舍，“公社”的全不知晓。武斗结束后不久，一场大雨，把地道冲塌了。“井冈山”人都暗自庆幸。

三是楼与楼在高空中搭天桥。他们担心底下运兵太慢，万一被人堵住不好办。同时，也为了保证 28 楼和 30 楼的交通，“井冈山”总部决定在 28 楼与 30 楼之间修一个天桥，由数力系设计。

28 楼是工字型楼，南端西头与 30 楼东头距离最近，只有十几米。他们从 36 楼拆下屋顶人字梁木料，在走廊里用这些木头做成桥身。

因为地面完全被“新北大公社”控制，所以天桥的架设全在空中完成：木桥上面套上绳子甩到 28 楼拉拽，然后从 30 楼开口推到 28 楼开口。就这样，一头拉一头推，在两座楼的最高层四楼架起了一座燕园史无前例的特制的天桥，重达两吨，“井冈山”人在上面通行，也能保证安全无虞，真是一桥飞架东西，孤楼有通途，一时间成了北大校园的一道风景线。坚守孤楼的“井冈山”学生上去合影留念。不知哪个同学，还在桥的北侧挂上了一幅毛主席像，让毛主席当他们的保护神，以防“公社”从 29 楼向天桥发射石头。

“井冈山”兵团的总部、广播站等许多重要机关都在 28 楼。

所以“井冈山”拼死拼活也要保证 28 楼与其他楼的畅通。而 30 楼又是 36、37 楼通往 28 楼的咽喉。从 29 楼与 28 楼之间的地下向南仰望，“井冈山”那座天桥赫然在目。

武斗结束后的天桥

“井冈山”还在 32 楼与 35 楼之间的四楼上空架设了一座铁索桥，上下拉着几条粗电缆，铺上一排模板，晃晃悠悠，在上面要有当年大渡河 18 勇士的胆量。

这几个楼中，只有 37 楼是靠着动物园到颐和园的 32 路公共汽车行驶的海淀大街，这里只有一道石头矮墙相隔。为了打通和外界联系的通道，“井冈山”把这道墙拆开一个豁口，用木床搭成宽 5 米、高 4 米、用竹木苇席铺设的大棚，从 37 楼直达海淀路马路边，作为与外界联系的唯一出口。豁口斜对面就是 32 路汽车站，它的后面，海淀路南面，有一条有名的胡同，叫做军机处，里面叫老虎洞，走进去是市场商店，可以买生活用品。化学系“0363”坚守的 20 来个男生调防住到 37 楼，任务就是三班倒，

守卫这个出口，迎来送往，保护他们的人安全进入老虎洞或上汽车，迎接返回的战友。

这个出口处位于南校门和西南校门之间。“新北大公社”为了堵住“井冈山”的这个出口，经常从两个方向来骚扰。大多数情况是离的远远的，两边叫骂，互相扔砖头，并无当面比试。个别时候，“公社”逼近通道，沿着床铺之间的缝隙往里扎，“井冈山”的人也从里面向外乱捅。

由于相互之间经常地扔砖头，打弹弓，甚至砸坏了公交车，32 路那个汽车站只好暂时撤掉了。

汽车站后面，紧挨着军机处有一个饭馆，叫长征食堂，物美价廉，好吃不贵，每个北大学生几乎都光顾过，亲切称之为“学七食堂”。因为北大有六个学生食堂。此时，这个饭店也只能停业打烊了。

## 第 998 回：搞监听，两派又打间谍战　陈伯达，现场看武斗惨景

北京大学“329 武斗”以后，“井冈山”派的学生不可能再去食堂吃饭了，他们只好在宿舍楼内架起炉灶，用打烂的桌椅床架烧火，煮些挂面充饥，或者使用电炉简单地开伙做饭，后来又从 37 楼的小通道出去到海淀街上去买些米面蔬菜副食。不知是谁出的主意，包饺子苦中作乐，男女同学一起包了 2000 多个饺子，在楼前用一大铁锅煮的，很是热闹。

没有生活费，各想各的办法，周培源的外孙女给他们送来 20 元。有两个同学瞄上了一口大铜钟，吃过午饭各提一大锤，向它砸去。当当当几十锤后，才在铜钟的边上敲下一小块。两个女生自告奋勇，拿到海淀废品收购站，收购站的刚问一句：“这是哪来的？”吓得二位扔下就跑回来了。

由于“公社”头头经常下令无规律地停电停水，“井冈山”的人受罪受大了，到做饭的时候，刚做了一半，停电了，饭半生不熟，怎么办?如此受耍弄的事不少。水更成问题，停水后，喝水、吃饭、洗手、洗脸，特别是厕所冲刷，都无法解决。赶上天气越来越热，人们的日子越发不好过。所以，“井冈山”人又想了个法：把不住人的宿舍整个用水泥抹了，变成一个个大水箱。水龙头永远开着，什么时候来水都能存下。结果水还没有存满，由于压力过大，就开始从砖缝里往外渗水，最终没有成功。

“井冈山”各楼由于购粮菜经常被抢，总部就决定为大家集

体运一次肉和蔬菜，为防意外派些人员保护。6 月 24 日。北京运输三场应“井冈山”总部之邀，给困守在几个楼的“井冈山”人员送肉送菜。当卡车开过来正在卸菜，一声呐喊，众多“公社”兵分别从中关村门及 40 楼沿马路冲出，“井冈山”预先安排的保护人员分东、西两边与之发生武斗。东边的顶住了，西边的却溃退了。两面夹击把“井冈山”包围在中间，“井冈山”只好夺路而逃，眼看着一名化二班姓王的同学被十几个人扎倒，他的柳条帽被人用长矛扎住挑在肩上，就像挑着一颗人头！幸亏他里面戴着自制护甲，才没有危及生命，但是头和腿上中 17 枪，也受了重伤。

北大两派还大打间谍战，各显神通。其中有一段北大“井冈山”窃听“新北大公社”电话的故事。

由于北大全校的电话系统都由“新北大公社”掌控，北大“井冈山兵团”怀疑重要电话可能被“新北大公社”窃听，于是决定接装一部“井冈山兵团”自己的外线电话。他们将此事交给最早筹备组建“井冈山”广播台的化学系研究生姜承永负责办理。

据姜承永回忆，他是在 1967 年 8 月的一天，带着北大“井冈山兵团”的介绍信去北京西单电报大楼办理安装电话的手续。开始一切顺利，当时的各行各业都支持红卫兵的革命行动。但是在他填写完相关表格和交了费用之后，突然听到在电报大楼的一个电话亭中传出“井冈山广播台有个人在电报局……”的打电话声音，循声望去，见一个人在打电话，另一个人正在焦急地望著他。

他下意识想到可能被“新北公社”的人认出来了，赶紧走为上计，于是不顾安装电话的手续没办完，拔腿就跑出电报大楼，正好见到一辆公共汽车开进路边车站，也顾不得看是几路车，赶紧冲上公共汽车。车开动后，他看见那两人没有跟来，松了一口气，仍然不敢大意，乘车走了两站地下车，又换了一辆公共汽车乘了三站，再换回反方向公交车，小心返回电报大楼，接着办理安装电话手续。电话局工作人员埋怨他没办完事就走掉，他只能一连道歉，没敢说明原委。办完接装电话手续回到北大，他说了电报大楼的遭遇，“井冈山兵团”总部的人告诉他，当天有好几个“井冈山”的铁杆在校外被“公社”的人绑架。

1968 年 3 月 29 日晚上的大武斗，住在 31 楼二楼的化学系研究生姜承永，从二楼跳窗逃出，跑到了 28 楼“井冈山”广播台。

逃出来的姜承永气愤难平，决心窃听“新北大公社”的电话。本来在此之前，“井冈山”广播台就在传看美国前情报局长胡佛写的回忆录，其中讲述北约集团曾在西柏林靠近东柏林的地方修建了一栋大楼，然后在这栋大楼底下挖地道，连接到华约的地下电话电缆，窃听华约的电话情报。而这栋大楼，还有一个功能，就是装载挖地道时挖出的泥土。

“我们能不能也挖地道听听‘老佛爷’的电话？”在“井冈山”广播台机务组曾经有过这样的议论。当时在广播台的无线电系老师杨同立就悄悄对姜承永说，监听电话肯定能得到许多有用情报。他们经常讨论“如果”监听电话需要怎样做，杨老师还说：

“并联信号电线用 1 兆欧姆电阻取样不可能被检测出来”，他还给了姜承永一批 1 兆欧姆的碳膜电阻和 6ц4、6H2 电子管。

姜承永通过化学系“井冈山”派的实验员蔡长龄认识了他的父亲、北京大学电话班的老蔡师傅，也是“井冈山”派观点。姜承永漫不经心地问到北大电话线的走向，老蔡师傅一下子紧张起来，劝他千万不要破坏电话。姜承永说：“你只要告诉电缆在哪里，我保证不会说出谁讲的。”

于是两人有了约定：一天，老蔡背着帆布工具袋在 29 楼和 30 楼之间走动，看见姜承永在看他，就沿着 30 楼东墙根往南走，中间两次在原地跺脚。姜承永心领神会——电缆就在老蔡脚下的 30 楼旁边，而当时的 30 楼正好在“井冈山”的辖区内，又是一座空楼，这不是和当年柏林通过地道窃听电话历史几乎一样吗？

就在姜承永“329 武斗”逃到“井冈山”广播台的的当晚，即 30 日凌晨，他邀集几个人跑到第二教室楼，搜罗一批监听电话需要的器材——日光灯的镇流器用作扼流圈，日光灯的起辉器可用作来电话的指示器，准备了监听电话器材。

姜承永分别找到化学系“井冈山”0362 的耿天彭和李鹏，单独对他们说：“广播台要干一件危险的大事，非常危险，需要绝对保密，干完事永远不许说出去，敢不敢干你自己定。”耿天彭和李鹏都答应冒死命也跟姜承永干。于是姜承永找到“井冈山兵团”总部头头侯汉清，对他说：

“我们广播台机务太累了，需要找个安静地方休息，要到 30

斋住下去。”“我们还要做一件重要事，‘井冈山’总部不要过问，只有你侯汉清一个人知道。如果以后出什么事，‘井冈山’总部不知情，与总部无关，我姜承永个人负责。”

30 斋即 30 楼。

侯汉清问姜承永要做的事“符不符合毛主席革命路线？”姜承永回答说：

“保证符合毛主席革命路线。”

于是他们开始了监听电话的行动。当时 30 斋全封闭，一楼门窗全部堵死。他们通过 28 斋四楼天桥进入 30 斋，从四楼走到二楼，砸穿二楼最东边一间房的楼板进到一楼。从一楼楼板向下挖，一连几天，李鹏、耿天彭和姜承永挖土不止。在这期间，原北大武术队长孔易人经常来广播台看护，他见这几个人天天通过天桥去 30 斋，便主动对姜承永说：“你们肯定在做重要的事，我不问你们干什么，你们放心去干，‘公社’打手不超过 20 人来进攻，我保证不会伤到你们一根毫毛。”

经过几天挥汗如雨地挖洞，越过地基混凝土梁，再挖进不长的一段，终于见到了粗大的电话电缆——电缆外层缠绕包覆沥青、铁皮。剥开铁皮，里面就是一百对绝缘纸包覆的电话线。他们剖开电缆铁皮铠甲后，用耳机线端连接大头针探查每一对电话线，还用化学系汪勤尉老师处借来的高级万用表测量电压电流，最终确认挑选出聂元梓、孙蓬一、高云鹏、新北大广播台、北大校文革二组以及频繁与聂、孙等通话的电话线对，共计 20 门电

话。为防止被人查出反监听，他们小心谨慎，每查到一个目标电话，一定要等到电话挂断后再仔细接线，焊接引线和绝缘包扎细致活都是姜承永干的。他们用当年留学生衣柜的抽屉组装接线台，用 1M 欧姆电阻取样接线。他们组装监听工作台，20 只起辉器作来电显示，对应各个电话连接话筒插口，还配备放大、录音接口，最初参与查线的广播台机务组人员值班监听，做书面摘要记录，遇到重要内容用钟声 610 录音机跟踪磁带录音。

1968 年 4 月中旬，监听工程启用，有重要事项姜承永向侯汉清单独报告。开始时，他对侯汉清讲是来自“丛中笑战斗队”的可靠情报。结果，“公社”调兵遣将的部署，“井冈山”知道得一清二楚。

5 月 2 日，被 36 楼保卫战大捷冲昏了头脑的北大“井冈山”不顾劣势，派化学系“03 纵队”去 38 楼抢木板床。战前纵队长齐菊生作动员，说：“我们 20 岁的小伙子，除了没娶媳妇，什么没见过，这回要拼死一战！”

顿时，群情激昂，杀声一片。这几十个人，冲出 37 楼，与“新北大公社”武斗队迎面相遇。只见“新北大公社”武斗队一色儿的矿工头盔，铁网面罩，薄钢板盔甲，两米长的无缝钢管扎枪，列队出战，威风不减当年古罗马武士。

反观“井冈山”的“03 纵队”的装束，是就地取材，因陋就简，五花八门，五颜六色。有头带白柳条帽的，有带狗皮帽的，甚至有棉帽子外面套个硬纸盒的。盔甲则是用布缝在一起的几层

洋铁皮，有人是把一大铜号喇叭口一分为二制成护甲，五花八门，无奇不有，有如当年丐帮聚会，连他们自己看了都觉好笑。但此时也顾不上这些了，只能手持七长八短的扎抢，缓步推进。突然，从侧面又杀出一支“新北大”的队伍，“井冈山”被夹击了！“赶紧撤退！”“03 纵队”还没有和对方交上火，就溃不成军，逃了回来，这一次损失惨重，许多人受伤。

中午，“井冈山”姜承永监听到“新北大公社”内部通话，说是要在后半夜 2 点钟偷袭“井冈山兵团”的 37 斋寨门，当时还记下了口令等联络号令。

姜承永单独找到侯汉清，报告当天晚上将有重大事情发生，要他一定秘密安排能守楼的人待命。侯汉清怀疑情报是否可靠，姜承永说“这就是我以前说过的要保密的重要事，‘丛中笑战斗队’的情报绝对可靠。”后来事先安排了“0362”，使“公社”当晚的行动铩羽而归。

后来侯汉清要姜承永向温标和五纵的陈荃交接了监听工作。

“井冈山”通往外面的唯一通道就是 37 楼中间的豁口。为防弹弓他们在这里架了木床直通马路边。7 月的一天，“井冈山”通过窃听电话得到情报：半夜“公社”要来破坏这一通道。“井冈山”派人埋伏在大门外床榻走廊内。半夜两、三点钟，突然冲过来许多穿军棉衣，手拿消防斧的人，照着床板就砍，埋伏在床内的井冈山的人用长矛一顿乱刺。这时聚光灯打开了，守在楼上同学一起打弹弓，这才保住了这条通道。

“公社”发现“作战机密”屡屡泄漏，在内部抓“内奸”，直到武斗结束他们也没有想到他们所有的指挥武斗行动均被窃听。此事在当时“井冈山”内也是绝密机要，只有极少数人知道。直到后来工宣队进校后，“井冈山”才交出了全部 12 本监听记录。

“井冈山”上层有一天也突然传出爆炸新闻，说“井冈山”动态组组长是内奸，人面兽心，“潜伏”日久。此人英俊威武，为人谦和，说话慢条斯理，头头是道，为“井冈山”立了汗马功劳，大家常在一起聊天，竟是“内鬼”？这让许多人无法相信。他被隔离在一个房间，开个小口有人送饭，不准出来，不许与任何人接触，吃喝拉撒睡都在里面。更有甚者，竟有人情绪不好时，闯进去就将他暴打一通。

后来才知道，这是“公社”搞的反间计：他们抓了“井冈山”一位重要人物，把眼蒙起来审讯，却又故意露出缝隙，让他能模模糊糊看见外面的情况。然后将一个长得极像“井冈山”动态组组长的人进来，故意晃来晃去，咬耳朵，出主意。这位“井冈山”人很快被释放，回去就上报总部，说是看见“井冈山”动态组组长在“公社”的审讯现场。“井冈山”果然中计。几十年后，侯汉清当面向这位动态组组长道歉。

5 月 6 日，陈伯达突然带着几个工作人员坐着车来到北京大学 37 号楼的围墙外，站在 32 路公共汽车站，观看已经被打得千疮百孔的宿舍楼，生气地对现场的几个北京大学学生批评道：“你们北大的武斗，外国人都报导了，你们给毛主席丢脸！你们言行

不一，理论与实际相脱离，不管你们说多少漂亮话，总有一天要垮台的！”

北大附中的学生认出了正在中关村的陈伯达，于是陈伯达对这两个中学生说：“‘新北大公社’的尾巴翘得万丈高，这样下去，肯定会走向自己的反面！”

## 第 999 回：山城打，重庆市战火重燃　四二七，大连染料厂武斗

重庆第一次制止武斗，取得了一定的成效。直到 1968 年 3 月，除了 1027 大血案，重庆市没有发生大规模的武斗流血事件。但是小范围的武斗却始终未断，死人事件也时有发生。自 1968 年 3 月 15 日中央领导接见了四川领导后，重庆一些学校为宣传中央领导的《315 指示》又发生抓扯事件。以后，武斗开始升级。

3 月 18 日，重庆两派在四川外语学院武斗。在市中心大阳沟菜市场也发生武斗，手榴弹炸伤多人。

3 月 19 日，两派在西南农学院武斗，伤数百人。

梁兴初拿着这些材料去找中央，说军队想不通，群众想不通，武斗又重新起来了。

3 月 20 日，在京学习的重庆两派代表发出《就重庆两大派达成关于立即制止武斗的协议给重庆两大派的公开信》。这天，《山城战报》50 期、《815 战报》60 期合刊发表重庆大学“815 战斗团”《关于坚决拥护中央首长“3·15”指示的声明》，公开承认自去年 10 月以来错误提出“打倒刘、张”的口号是“偏离了毛主席指引的航向，干扰了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同时发表两报编辑部关于撤销《大局已定，八一五必胜》一文并欢迎无产阶级革命派进行批判的声明。

然而，这一切都没能阻止武斗的烽烟在重庆重新燃起。重庆的短暂安宁再次被打破。

3 月 22 日，位于市中心解放碑旁边的“815”派“痛打落水狗广播站”与“反到底”派“完蛋就完蛋广播站”互相射击，“反到底”派死 1 人。

这天，嘉陵机器厂“815”派占领厂区制高点。

3 月 23 日，建设机床厂“反到底”派武斗队从成品车间抢走枪 172 枝、子弹 23 万发。

这天，“815”派重庆机校、石油校武斗队在大坪、杨家坪等地拦截过往车辆强行检查，致使全城电车、汽车停驶。

3 月 24 日，两派在建设机床厂武斗，死 1 人，“815”派攻占厂区及周围高地。

3 月 25 日，江陵机器厂“815”派冲击该厂驻军，抢走大批武器，部队制止无效，被迫开枪，打死 1 人，打伤 6 人。

二钢厂两派武斗，死 10 余人，“反到底”派撤离，全厂停产。

3 月 26 日，“815”派在重钢三厂拦截了从江北方向开来的 12 辆运送大米卡车和军区从达县拉回粮食的 10 辆卡车。

“反到底”派占领了市邮电局电讯大楼，致使该局战备台、长报台、长话台不能工作。

这天，两派还在在嘉陵江南桥头武斗，死 3 人，冶金局大楼被烧毁。占据嘉陵江南桥头边“特园”的“815”派新六中“32111 战斗团”武斗队在撤退时，因焚烧传单资料引起火灾，致使曾接待过毛泽东、周恩来、董必武、王若飞等中共领袖和民主党派领袖的特园主体建筑达观楼化为废墟。

下午，市中区所有煤店全部脱销。

当天，两派在重庆警备区司令部主持下签署《立即全面停火、制止武斗的协议》。当晚，“815”派即在“反到底”派“工总司”所在的团市委大院对面的市革筹大院里准备进攻“工总司”。

第二天，3 月 27 日午后 14 时，“815”派攻占了“工总司”所在地团市委大楼，打死 2 人，抓走数十人。

两派这天在邮电学院武斗，“反到底”派撤离。

长安机器厂“815”派还在这天冲击驻厂部队，抢劫部队武器。

3 月 29 日，《新重庆报》在第二版刊登了《重庆在京学习的两派全体同志给重庆两大派的公开信》，号召“ 两派的革命同志们，坚决地站在人民的立场上，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不要相互进行派性的攻击，坚决支持和积极协助警备区和驻渝部队为制止武斗所采取的一切有效措施。”

3 月下旬，不仅是在市区，重庆市四周专县武斗也十分激烈，致使通往重庆的水陆交通中断，市场粮食、煤炭供应极度紧张，出现抢购现象。重庆警备区组建粮煤专门运输队，以军车带民车突击抢运。

因武斗影响，重钢炼焦炉自 3 月起停炉。

4 月 5 日，重庆市公安局两派在市局大楼武斗。

4 月 7 日，重庆两派分别以嘉陵江北岸的大型国防企业长安机器厂、江陵机器厂和重钢三厂、第十八中学、曙光中学、江北

糖果厂，南岸的大溪沟搬运站、第六中学、第四十一中学及市中心和第二十九中学等地为据点展开枪炮战，动用了高射机枪及多种火炮，一些房屋被毁。长安机器厂全厂停产，规模、损失都不亚于 1967 年。大规模武斗在重庆战火重燃。

4 月 10 日，綦江松藻矿区两派武斗，数百人受伤，数千人出逃。

4 月 11 日，重庆铁路分局九龙坡机务段两派武斗，成渝铁路一度中断。

这天，在新华印刷厂、长江橡胶厂、公安消防总队、二轻工业局、儿科医院等地都发生武斗。

4 月 12 日，两派在电力学校武斗，因“反到底”派在校实习工厂红旗电厂烟囱顶上安有广播喇叭，烟囱被“815”派炸毁。武斗中另有学生宿舍 6 幢被烧毁，自备发电厂被毁，经济损失 100 余万元。

江陵机器厂这天武斗，死 3 人，“反到底”派武斗队从装配车间抢走 37 高炮弹三箱，手榴弹一箱。

重庆钢铁公司两派在停火谈判会上发生武斗，当晚事态扩大，死 1 人。

4 月 13 日，两派在长江航运局武斗，死 2 人，港口运输瘫痪。

4 月 14 日，　两派在江陵机器厂武斗，死 2 人。

嘉陵机器厂“815”派武斗队从总装车间抢走子弹一卡车，

并抢走驻厂部队枪支 10 枝。

两派在长安机器厂武斗，驻厂部队遭射击。

4 月 14 日至 15 日，两派在长安机器厂武斗，死 3 人，机器、厂房严重受损，全厂停产。

4 月 16 日，四川省革筹组组长、解放军成都军区政委张国华对制止重庆武斗做出三点指示。

4 月 23 日，重庆两派分别在嘉陵江大桥北岸的长安机器厂、江北区委、华新街和南岸的第六中学等地以轻重机枪、迫击炮、37 高射炮等进行对射。

4 月 24 日，大坪地区“815”派连续抢夺驻该地区部队武器；“反到底”派抢夺市公安局手枪 70 多枝、市革筹组小车一辆和警备区司令部运粮专车二辆。

4 月 25 日，江北区公安局两派武斗。“反到底”派公安红一方面军江北区人民警察总部被抄砸。

4 月 26 日，通用机器厂和三十二中“815”派抢夺驻厂部队和嘉陵机器厂武器；江陵机器厂“反到底”派抢夺驻厂部队武器；河运学校“反到底”派抢夺部队武器并在两路口抢走警备区小车一辆。

4 月 27 日，周恩来接见四川省革筹小组、成都军区和 50 军、54 军领导人，传达毛泽东的新批示：“跟他们讲一讲，叫‘反到底’不要翘尾巴。”强调省革筹和军队内部要搞好团结，批评了在刘结挺、张西挺支持下“打谢（成都军区副政委谢家祥）反梁

（省革筹副组长、成都军区司令员梁兴初）”，把矛头指向军队的一派群众组织。这次讲话被称为《427 指示》。

接着就是刘、张两挺作自我批评，张国华作自我批评，50 军、54 军领导表态。

至此，中央的《315 指示》与《427 指示》对四川、重庆的两大派“各打五十大板”，形成两派“你有《315》，我有《427》”，各有所恃的局面。

4 月 28 日，重庆“815”派武斗队两次冲击 351 仓库抢夺武器，并用手榴弹炸死解放军战士和群众各 1 人，炸伤解放军战士 4 人、群众 8 人。又抢走 405 团大批枪支，打伤团长及 125 人。

周恩来于当天 16 时指示四川省革筹组负责人张国华、梁兴初、刘结挺、张西挺等火速到北京中央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四川班，找重庆“815”派负责人谈话，指出他们抢枪是违犯《九五命令》的，直接影响战备和援越抗美的任务，是非常错误的。为此：

一、要立即停止抢武器的错误行动。

二、抢去的武器通通交回。

三、公开承认错误，否则严办，中央马上向全国通报肇事的为首分子，是盗窃国库的坏分子。

4 月 29 日，重庆市消防大队奉公检法军管会命令于 9 时 25 分去长安机器厂救火，该厂办公大楼失火，途经重钢三厂时，遭该厂“反到底”派武斗队截击，消防干警死 9 人、轻重伤 17 人，其中解放军战士 2 人，被抓走 23 人，消防车被打坏 3 辆。

4 月 29 日 10 时 30 分，周恩来再次打电话给张国华，就重庆市大规模武斗问题做出 4 点强硬指示，要求对 28 日发生的“815”派抢夺 351 仓库武器和长安厂办公楼起火、“反到底”派打死打伤消防人员两件事必须严肃处理，否则通报全国；“815”抢 405 团的枪要交回；强调重庆不能再乱了，不能把重庆搞瘫痪了，再搞，一定按《九五命令》、《二六命令》办，这是中央的意见，军委的意见。

下午 15 时 40 分，张国华、刘结挺、张西挺、韦统泰、蓝亦农接见北京学习班两派代表各 10 人传达上述指示，要求马上落实。

4 月 30 日，重庆大学“815 总团”负责人率 8 个单位的“815”派武斗队到驻军某团上缴武器并作检查。

5 月 2 日，重庆警备区司令部发出《通告》，重申中央《九五命令》、《二六命令》和周恩来 4 月份两次指示，严令各派武斗组织于 5 月 7 日 18 时前将武器弹药全部上缴，解散武斗组织，否则，将予以强制取缔。

当天，重庆“815”派发出《关于立即全面停火，上交武器的紧急命令》，宣布将于当日 18 时起无条件全面停火，7 日 18 时前上交全部武器，同时宣称“如再有开枪等类似事件发生，我八一五革命派应积极协助警备区采取断然措施，立即制止。”

但是这天，占据市第三人民医院和儿科医院的“815”派与占据市体育馆的“反到底”派还是发生了枪战，市体委大楼遭燃

烧弹和六O炮袭击。

5月3日，两派在嘉陵江两岸和南山上黄葛桠地区展开炮战。

这天，重庆大学“815”发表坚决拥护重庆警备区《五二通告》的紧急声明，决定在5日12时前把全部武器弹药、爆破器材、军事物资上交警备区。并决定从即日起解散一切武卫组织，今后不得以任何借口恢复。

5月4日，重庆市公安局两派武斗。

5月5日，两派在南桐矿务局武斗，动用了机枪、高射机枪、迫击炮，重伤3人。中梁山煤矿也发生了两派武斗。

5月14日，在北京学习班四川班学习的重庆两派代表也发生了武斗。

我们再看大连。4月27日，大连染料厂也发生了武斗。

位于大连鲁迅路139号的大连染料厂职工宿舍，是一幢二层楼青砖灰瓦建筑，内有天井回廊，发券穹顶的大门洞临街。这里是“工总司”下属大连染料厂“革命职工造反团”指挥部所在地。门洞前筑起了用于武斗的大地堡，院内挖掘的地道直通地堡内，形似地窨子的防御工事下挖一米，地面上跺起两层留有多个射击孔的沙袋，上覆2厘米厚的钢板。

青楼的侧后100米处，便是学士街111号，这里是旅大市油脂化学厂北楼，是一幢二层红砖楼，楼上是宿舍，楼下是食堂。由于厂子混乱，工人大都不上班了，这栋红楼此时已成为旅大市“革联总部”下属“油化联部”占据的武斗点。

大连染料厂职工宿舍是通往市区中山广场必经之路。“革命职工造反团”在此扼守，“革联总部”下属大连染料厂“224 战斗兵团”出行受阻，所以“革联总部”的好战分子们决意拔掉染料厂“革命职工造反团”武斗点。

4 月 27 日夜，“革联总部”开始三面围攻大连染料厂职工宿舍。一路由大连染料厂“224”战斗兵团出动两辆配有 12·7 高射机枪的土坦克由东向西攻击。另一路由化校“东方红公社”出动一辆配有 12·7 高射机枪土坦克由西向东攻击，同时又出动两辆配有 12·7 高射机枪的土坦克扼守在三八广场，防止来自西面的“工总司”建委大楼武斗点和来自北面的工总司下属港务局大楼武斗点的“红色工人造反团”前来解围。第三路便是与“革命职工造反团”近在咫尺的，位于学士街 111 号的“油化联部”由侧后攻击，牵制对方。土坦克抵近地堡开始射击，子弹打在地堡钢板上在夜色中火花四溅。“油化联部”的枪手们射出的子弹汇成火龙直捣山墙，映红了夜空。

急骤的枪声响了一夜，东方出现了鱼肚白。枪声停了，战事告一段落。看热闹的人逐渐多了起来。空气中弥漫着硝烟气味，现场一片劫难后的场景……

路边架设电车空中缆线的木线杆被炮火拦腰截断，散乱的缆线像长蛇似的匍匐在地，已无法通车了。

地堡外覆盖的 2 厘米厚的钢板上留有许多弹痕，更有穿透钢板留下的多个弹孔，那是“12·7”高射机枪穿甲弹的威力所致。

地堡内一名武斗人员被打死。透过扁方的射击孔往地堡内窥视，里面漆黑没有动静。

大连染料厂职工宿舍的青楼临街面的东山墙离地面一米处，竟然被子弹掏出一个外径约 60 公分，内径 30 公分的大洞，屋里透亮的洞口被里面的人用桌椅凌乱地堵塞着。从弹洞的斜径方向判断，子弹是来自侧后高地上的红楼。

此时，一辆军管会的“大解放”广播车沿着鲁迅路由西向东缓缓驶来，喇叭里传出“要文斗不要武斗……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要实现革命的大联合”的广播声。

广播车停在武斗处道北路边，车厢上站着十几名解放军，他们大部跳下车，拎着一副担架向武斗点走去，车上两人留守。青楼两扇紧闭的朱漆大门开启，解放军进去后，大门又重新关上。过了一会儿，大门再次开启，解放军从里面抬出一个身上蒙着白布的人，青楼里也出来了几个持枪人随行。

围观的老百姓瞬间骤多，拥挤着向广播车围拢来。

解放军将后车厢板挂上开车要走，这时持“工总司”观点的群众骚动了，他们认为“革联总部”挑起武斗打死人是“军管会”支持的结果，把愤怒一骨脑地向车上的解放军发泄，他们向车上投石块、吐口水，“黄皮子”、“邓大麻子”、“保皇狗”骂不绝口，在青楼人员劝阻下，广播车才得以开走。

“邓大麻子”是骂旅大警备区司令员兼军管会主任邓岳。

这辆广播车是军管会应旅大“工总司”请求前来制止武斗，

并运走死者尸体。

车走了，青楼的武斗人员撤回楼内，围观的人们散去。

太阳升起，路上来往的行人多了，多是夹着饭盒上班的人。

突然，寺儿沟电车站高岗处的东明电影院附近一声枪响，只见一个人应声倒地，右胸后血涌如喷泉，将背部的老头衫凸起，汩汩鲜血流淌。跟前的几个人立即围了过来，有人高声喊着找车上医院。不一会儿有人推来一辆平板车，大家七手八脚地把中弹者抬上车，送往两里地外位于三八广场的中苏医院。其实，这个人已被子弹打中了心脏，死于非命了。不知是来自何方的流弹将人打死，附近住家出来人锨土将血迹掩盖，聚拢的人又匆匆散去。

天近晌午时，二七广场从寺儿沟方向开来一辆绿色的土坦克。突然，半空中一个酒瓶状的黑色物体翻滚而下，落在土坦克身后 3 米远地面上，只听轰隆一声巨响，碎渣飞溅，柏油路面被炸出大碗口大一个坑，此时的土坦克像受惊的兔子似的越过电车轨道绕过转盘半径，没命似的向原路疾驰而逃。

下午 15 时，“工总司”下属“海港红色工人造反团”派出两辆载着武斗人员的“大解放”汽车，将大连染料厂职工宿舍武斗点的“革命职工造反团”的 20 余人及广播员接走，汽车行至二七广场时，车上有人示威朝天放枪，可能是郁闷所致，一吐憋气。

第二天，旅大“工总司”声讨的檄文传单漫天飞舞，大字报铺天盖地，各武斗点、广播站的高音喇叭传出：“国际悲歌歌一曲，狂飙为我从天落”，“惟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

“血债要用血来还”……

在悲愤激昂的声讨声中人们方知死者叫赵锡志，是“革命职工造反团”的四号头目兼武斗队长，他是在地堡内指挥战斗时被12·7高射机枪穿甲弹穿透钢板击中的，因事情发生在夜间，武斗点被包围而无法及时送医院抢救，最终鲜血流尽而死亡。

## 第 1000 回：打报告，“上石农总”有问题　派部队，宁明县展开围剿

3 月 15 日，广西革筹、广西军区给中央军委、中央文革报告《关于宁明县 “上石农总”问题》。报告中说：“上石农总”是一个坏人当权和聚集的组织。12 名领导成员中、有地主分子 1 名、坏分子 2 名、劳改管制分子 1 名、投机倒把分子 3 名、四清下台干部 1 名、有政治历史问题被清洗回家 3 名、杀父之仇 1 名。

“上石农总”成立于 1967 年 10 月。

1967 年 8 月，广西宁明县夏石公社上石大队在凭祥农业中学的学生吴彪、刘思海和社员黄日高等人组织了“八·二一火种战斗队”。9 月，经该大队赵必兰积极活动，又动员了一些农民参加“八·二一火种战斗队”，经过协商后又把名称改为“上石农民革命造反司令部”，并推选赵必兰为队长，陆毅、严金强为副队长。

9 月下旬，经亭亮公社持“422”观点的黄甫光介绍，赵必兰和黄甫光一起到南宁找“广西 422”指挥部常委刘锡荣联系，要求派人到上石大队协助指导工作。刘锡荣即和“广西 422”成员、广西农学院学生余克昌、吴树德一起随赵必兰来到上石。经过他们的宣传动员，“上石农民革命造反司令部”很快发展到周围的三个大队，在刘锡荣的指导下，经过与赵必兰、陆毅、赵魁堂等人商量，于 10 月宣布，将原来的“上石农民革命造反司令部”改名为“广西四·二二农总宁明上石地区分部”，简称“上石农

总”。并按照“广西 422”指挥部的组织机构，推选出核心成员 16 人，农民赵必兰任总指挥长，岑立舒、赵必福任副指挥长，陆毅任政委，蔡致荣任副政委，赵魁堂任总参谋长，农仕祥任作战部长，刘深海任作战部副部长兼武装连长，农浩泽任作战部参谋长，赵必禄任宣传队辅导员。刘锡荣亲自印制该组织花名册，刻制该组织印章、袖章。“上石农总”成立后，立即投入了当时的派性活动。从 1968 年 2 月 21 日开始，刘锡荣、赵必兰、赵必福、刘深海等人策划，先后带领“上石农总”抢夺上石、马洞、练江、油隘、板旺、哨平等 6 个大队的民兵步枪、机枪共 62 支、子弹 1444 发，同时建立了武装连，由刘深海兼任武装连连长。

“上石农总”把上石大队持不同观点的 372 户 1600 多人赶到火车站附近居住，致使这些人有家不能归，有田不能种。他们把群众赶走后，在上石街打通群众住宅，垒设作战工事。

广西革筹、广西军区 15 日给中央军委、中央文革报告中要求派部队武装包围“上石农总”，强行收缴武器弹药；取缔该组织，严办首恶分子。

报告上递后，3 月 20 日下午 16 时许，又发生“上石农总”几十人闯进油隘派出所，抢走油隘派出所机密文件、档案两箱，边民出国证 40 本，迁移证 70 多张，电话机一台的事件。起因是“上石农总”骨干苏广才 3 月 17 日因越境走私，被民兵抓获。于是“上石农总”赵魁堂等人策划武装攻打油隘边防派出所，企图营救苏广才。他们在油隘边防派出所没有找到苏广才，因为他

当时被关在油隘大队第一生产队仓库小房里，于是这些人就将油隘派出所抢砸了一番。

4 月 6 日晚，“上石农总”20 多人又荷枪实弹到驮龙公社馗塘大队，把在该大队工作的公社革委会副主任卢家耀和武装干部黄日清等捆绑后进行毒打。抢走该大队农振本家人民币 245 元，手表一块，衣服十二件，床单一张，蚊帐一床，棉毡一张，大队公章一枚，大队民兵机枪一挺，步枪 2 支，子弹 100 多发，手榴弹 2 枚。同时还把卢家耀、黄日清绑架押走。黄日清中途跑掉，卢家耀被押到上石关在“上石农总”一个星期后，在群众的压力下，才获释放。

4 月 7 日，650 部队和县人武部共 6 名解放军前往上石宣传毛泽东思想，遭到“上石农总”30 多人武装包围，抢走解放军手枪 3 支，冲锋枪 3 支，并将 6 名解放军拉进上石街会馆逐个审讯。

4 月 8 日，“上石农总”围攻油隘边防解放军，开枪打伤解放军某班副班长和民兵何文德两人。

“上石农总”成立以后，抢劫抗美援越物资，殴打捆绑解放军 11 人，干部、职工被殴打受伤 7 人，重伤 1 人。“上石农总”刘深海等人，指使“农总”人员到处设关卡路，抢劫越南群众手表 32 只，人民币 4000 元，半导体收音机 7 台，自行车 4 辆，味精 100 多斤，生猪 6 头，打火机半罐，废铜 600 多斤，生盐 1000 多斤。1968 年 2 月 17 日，刘深海、甘记贤等人在上石火车站附近公路道班处，用枪威胁妇女覃桂连并进行轮奸。

1968 年 4 月，宁明县人武部副部长阎凤奎布置夏石公社武装部长李荣华秘密搜集“上石农总”的罪行材料。

李荣华通过上石大队党支部书记劳振成和女青年陆美花的母亲等人弄到了“上石农总”的情况后，立即向县人武部政工科马明才汇报，马明才将汇报情况综合交给阎凤奎，并由县人武部将情况报告南宁军分区和广西军区。广西军区根据宁明县人武部的报告，于 4 月 9 日由军区司令员欧致富签发了一份电报，将“上石农总”的情况报告了广州军区。

4 月 16 日，广西驻军负责人魏佑铸和广西军区司令员欧致富签发了《关于“上石农总分部”调查报告》，并以当时的广西区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和广西军区的名义于 4 月 19 日再次电告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和广州军区。《报告》认定“上石农总”为反动组织，给“上石农总”列了以下罪状：

一、“上石农总”组织成员政治严重不纯，是在一小撮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叛徒、特务的策划下，在“广西 422 农总”中的坏头头、反革命分子刘锡荣的直接指挥下，网罗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于 1967 年 9 月成立，共有 240 多人。其中经常参加活动的 143 人，有地、富、反、坏、右分子 39 人，敌伪军政宪警人员 4 人，参加过反革命集团的 34 人，劳改释放犯 11 人，坚持反动立场的反革命家属 12 人，流氓 3 人，“四清”下台干部 2 人。

二、“上石农总”的头目，是一小撮在农村代表国民党反动

派利益，代表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和地、富、反、坏、右利益的国民党的残渣余孽。他们中的一些人，如曾令龙、黄彪等人，早在 1959 年以来，就参加反革命组织“青年党”和“左江游击队”。

三、“上石农总”疯狂反对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他们胁迫群众，不准挂毛主席像，不准读毛主席的书，不准读毛主席语录……，恶毒攻击咒骂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

四、“上石农总”造反革命舆论；大搞反革命复辟活动，他们恶毒地攻击、污蔑社会主义“不自由、受压迫”。叫嚷“造反派成功，四清下台干部都得平反”；大肆鼓吹“四大自由”、“三自一包”的黑货；提出“分田到户，谁种谁收，开荒自由，买卖自由”和“先留口粮，后交公粮，不卖余粮”等反革命口号。在这一小撮阶级敌人半年多的盘踞控制下，“生产遭到严重破坏，农业严重减产”。

五、“上石农总”猖狂地反对人民解放军，反对新生的革命委员会。他们拦劫军车，围攻、殴打、伏击人民解放军，抢夺人民解放军和民兵的武器弹药，攻打人民解放军的边防哨所。污蔑革命委员会是“派委会”，狂叫“要用武装推翻革命委员会”。

《调查报告》再次请求：“用 220 师直属营一个连，独立一师一团二营五、六连、凭祥总站勤务连共 4 个连的兵力和直属营全部，以迅速、突然的动作歼灭这股反革命土匪武装。尔后留下少量部队抓革命促生产，恢复秩序。”

4 月中旬，宁明县人武部副部长阎风奎召开部分公社武装部长会议，布置围剿“上石农总”的准备工作。会上阎风奎说：“‘上石农总’上级已批准是反革命组织，现在要出动民兵去打‘上石农总’，各公社要准备好。”

4 月 23、24 两日，阎凤奎亲自指挥，调动夏石、寨安、明江、驮龙等四个公社和宁明华侨农场的民兵约 1000 人，兵分三路包围“上石农总”。夏石公社李荣华带领民兵万国贤、全旺古、伦日辉等 13 名“精干队”先到哨平分场接应寨安公社民兵，然后从马垌大队方向包围“上石农总”；夏石公社革委主任郑旭春和武装干事许建富率领夏石公社民兵占领马垌大队北面山头；驮龙公社武装部长黄显廷、明江公社陆英海率领驮龙、明江两个公社的民兵和华侨农场的民兵占领上石街正面的山头；寨安公社民兵由公社干部兰宏、武装部干事潘作荣带队，占领白骨山。在围剿中，驮龙公社民兵冲进上石街内，抓获了一名从玉林地区到上石做生意的男青年，被馗塘大队民兵拉出去枪毙了。寨安公社民兵在白骨山也抓获板旺大队那怀屯农民、“上石农总”参谋陆华松，押到马垌大队板马屯时，被板墩大队民兵枪毙了。这次围剿由于事先没有得到广西军区同意，县人武部阎凤奎于 24 日下午下令民兵撤离了阵地。

4 月 30 日，广西军区根据广州军区的指示精神，调动军队对“上石农总”开始武装围剿。这天上午，夏石公社人武部部长李荣华被召到宁明县人武部，县人武部副部长阎凤奎对他说：中

央已批准定“上石农总”为反动组织。他要李荣华回去组织两个民兵小组配合部队行动。其中一个组在公社待命，另一个组到那怀屯接应宁明机场部队。

当晚，由广西军区作战处副处长和南宁军分区副司令员贾焕雨、宁明县人武部政委许鹏、副部长阎凤奎、夏石公社革委会主任郑旭春等人组成了“围剿指挥部”。县人武部许鹏任指挥长，阎凤奎、郑旭春任副指挥长。通过广西军区调动崇左县驻军 650 部队、宁明驻军 6881 部队各一个连，宁明机场驻军两个连，凭祥边防部队四个连，共八个正规军连队与夏石公社民兵配合，在南宁军分区副司令贾焕雨和广西军区作战处副处长施鸿相的亲自指挥下，于 4 月 30 日分别从营地出发，5 月 1 日黎明前按原计划占领各高地，封锁交通要道，然后逼近村庄，进行搜索。

在强大的正规军和民兵的攻势下，枪声稀发，于 5 月 1 日上午即拿下“上石农总”。缴获轻机枪 1 挺、步枪 27 支、手枪 2 支、手榴弹 7 枚，各种子弹 284 发。先后抓获了“上石农总”大小头目近 40 人，全部关押在上石粮所旧粮仓里。并当即由施鸿相、贾焕雨、许鹏等人组成“‘上石农总’反动组织破案指挥所”，将抓获的俘虏交县公检法军管会，由公安局副局长莫树田、秘书黄显辉、干部庞玉田、黄俊等人审讯，并整理围剿破获“上石农总”反动组织的材料上报。

围剿“上石农总”时，为了防止他们向越南逃跑，阎凤奎派人武部参谋陈万春带领县中队班长秦家祥、战士胡刚隆和夏石公

社原党委副书记巫德仁、政工组长赵宗能、武装部副部长梁振积和友谊关检查站刘副站长一同到油隘、板旺两个边境大队组织民兵防守卡路。5 月 1 日上午，他们到达板旺后，陈万春在伏波林场，布置板旺民兵纠察队副队长凌林镇派人去抓“上石农总板旺分团”的几个负责人。陈万春说：“接上级通知，现在要抓几个坏头头，如果不抓，他们就跑到越南去”。凌林镇即派民兵黄炳汉、农泽田、农志民等人到板斗屯抓“上石农总板旺分团”团长何国华、成员赵德春。凌林镇则带领 10 人到板旺弄怀屯抓板旺分团副团长黄浩芬，到上谷祖屯抓板旺分团参谋长农业经。并将所抓到的人都押到伏波林站关押。

5 月 2 日，人武部参谋陈万春、夏石公社原党委副书记巫德仁对板旺民兵纠察队副队长凌林镇说：“决定在 5 月 3 日召开板旺大队全体社员大会，批斗何国华、黄浩芬、农业经、赵德春，如果有四类分子不老实守法也抓来陪斗。”

5 月 3 日下午，陈万春布置板旺纠察队班长马耀珠安排枪毙何国华等 7 人的射手。批斗大会一开始，凌林镇首先让北山驻军副指导员讲话。接着由黄振华按照巫德仁写的稿子讲话。讲话结束后，事先受陈万春布置的群众立即上去对何国华、赵德春、农业经、农善良、黄浩芬、黄鸿、黄尚宏进行拳打脚踢、枪管捅打等。当何国华等 7 人被打得头破血流之后，黄振华又按照巫德仁的事先安排，问群众说：“对这些人如何处理?”

群众随即答说：“杀啊!”

陈万春马上说："把他们拉出去!"

就这样，何国华、赵德春、农业经、农善良、黄浩芬、黄鸿、黄尚宏等 7 人被押送到会场东侧 100 余米远的荒坡上枪毙了。

5 月 4 日，"上石农总"成员秦忠芬、闭日明、黄日东等 4 名俘虏由两名解放军战士押去沟边挑水，油隘大队民兵廖日强、赵必能发现后，持枪从后面跟上，当秦忠芬等 4 人从沟边挑水上坡时，廖日强、赵必能便开枪对他们射击，当场打死秦忠芬等 3 人，黄日东受伤逃跑。

5 月 27 日，围剿"上石农总"的部队开始撤离。指挥所于 29 日返回南宁。

5 月 30 日，宁明县革委召开第二次全体委员会议，许鹏在会上说："彻底查清'阶级敌人'，要充分发动群众坚决处理，不能手软"。

之后，在夏石公社又先后有 61 人被民兵和群众打死，有 34 人不堪忍受严刑拷打而自杀，8 人失踪。

就在广西宁明县武装部组织攻打"上石农总"的时候，广西龙州县战火再起。

4月21日上午，广西龙州县"联指"派的巡逻人员与对立面"422"派群众在县马车社门前发生争执，随即双方互扔手榴弹，引起两派武斗。为了攻占"422"派据守的"工商联"大楼，"联指"派出动大批武斗人员，将该大楼团团围住，并用步枪、机枪向大楼猛烈射击。县武装部、县公检法、军管会等单位的一些干

部参与了这次武斗，并从各公社调动武装民兵队伍参战。

第二天上午，“联指”派用炸药炸毁了“工商联”大楼的大门，被围困在大楼里面的90余名“422”派武斗人员成了“联指”派的“俘虏”，其中有12名被俘的“422”派成员作为坏头头被“联指”派武装人员枪杀。

在县城“工商联大楼杀人事件”的影响下，全县的“联指”派开始重燃战火，各地不断出现打人、杀人事件。仅5、6月份，就有177人被打死。

4 月 27 日，广西自治区革筹小组和广西军区向党中央、毛泽东、林彪报告，提出自治区革委会常委 30 人名单。第二天，广西“422”中学红卫兵 300 多人就在“422”常委史妙甫带领下，来到自治区革筹小组办公室抗议自治区革委会的人选。自治区革筹小组和广西军区向中央作了汇报。

这天，广西崇左县革委会副主任林兴和常委祝元洪在南宁新华街看大字报时，被该县江洲区来邕的陈在森、陈龙生发现。陈在森、陈龙生二人立即找来“422”所属组织“雄鹰”、“新工群”的几个人，把林、祝二人绑架到邕江照相馆毒打致死。凶手陈在森、陈龙生被南宁警备司令部抓获后处决。自治区革筹小组就此事发布了公告，并向中央作了汇报。

## 第 1001 回：说新疆，批准陕西革委会　下文件，举办徐海学习班

1968 年 1 月 14 日，陕西省大联合协商会召开第二次会议，决定解散“工总司”“九·五战团”，“工联”“八一兵团”等专业武斗组织。

17 日，陕西省支左委员会派部队进驻被两派武斗人员长期控制的西安东、南、西、北城门楼制高点，并成立了“收缴武器、制止武斗办公室”。

2 月 4 日至 16 日，支左委员会常委会议先后三次讨论省革命委员会组成方案。3 月 1 日至 9 日，由省支左委员会主持召开陕西省大联合协商会第四次会议，经过协商，初步商定了省革命委员会的组成方案。

4 月 12 日，由部队和地方领导干部、工代会、农代会、红代会和地、县等方面的代表 150 多人组成陕西省赴京代表团，到北京汇报成立陕西省革命委员会的方案。

4 月 24 日，周恩来、康生、江青、张春桥、谢富治、汪东兴等接见陕西省赴京代表团代表黄经耀、胡炜、杨焕民、李瑞山、肖纯、孙长兴等，就有关问题作了指示，并宣布“任命李瑞山同志为陕西省革命委员会主任”。

4月30日，周恩来接见陕西省赴京代表团，呼吁取消跨行业的组织，消除阻碍联合、妨碍生产的派性，推进大联合，把铁路和煤炭这两个关键部门的生产搞上去。会上，姚文元宣读了中共

中央关于对陕西省成立革命委员会的批示。

5月1日,西安举行陕西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西安市革命委员会也同时宣告成立。当天,西安市组织了30万人集会、游行。

5 月 2 日 8 时 10 分，总理办公室周家鼎给新疆军区打电话说："'三促'最近抢枪很凶，总理让我告诉军区，让郭鹏同志对'三促'做工作，所抢的武器要限期收回，全部交回，否则要通报全国。这种做法是违反《九五命令》的，是不允许的。限期交回。期限，总理没有讲，请军区考虑，否则要通报全国，一通报，他们就要垮台。据说，'三促'几次冲击空 9 军。代表都在这里，有什么问题不能解决？为什么要这样搞？总理说：请军区出面谈。"

周家鼎还说："这是总理指示，你就这样转告军区首长。总理要我直接告诉郭鹏同志，请你转告一下。"

郭鹏，时任新疆军区第一副司令员。

下午 14 点 30 分，周峰传达周恩来关于新疆"红二司"抄赛福鼎家等问题的指示："总理指示说：'红二司'这样做是不对的。运动已搞了两年多了，不能再搞打、砸、抢、抄。'红二司'是新疆一个主要造反派，把他们放在新疆的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个重要位置。他们每犯错误，（总理）都及时指出，他们自己也注意改正了，但是不能总犯错误。拿走的东西都要立即一律交还，今后不能再犯。"

5 月 4 日 17 时 50 分至 19 时 45 分，在京西宾馆第二会议室，

周恩来接见新疆王恩茂、赛福鼎、郭鹏、张希钦、丁盛、裴周玉、曾如清、孔瑞云、杜海林、王振东、杨贯之、杨宗胜、候全智、朱铁谷、王宝铨、刘楠、陈冠等军政领导。在此之前，4 月 11 日，周恩来等已经接见过新疆的军政领导。这次，周恩来一开始就问：

“大家等久了，兵团情况怎么样？丁盛同志还走不了，也不能老拴在这里。裴周玉同志，对你压力很大，丁盛走，行不行？你的意见怎么样？”

周恩来之所以问到“丁盛走”，是因为丁盛不习惯新疆建设兵团这种军不军民不民的体制，早萌去意，并于 1965 年、1966 年两次打报告要求调离，但均无下文。1967 年初在北京汇报期间，住在他隔壁的是广州军区后勤部部长邱国光。一天，黄永胜妻子项辉芳来探望邱国光，恰好丁盛也在场。项辉芳说起黄永胜等几位在京的广州军区领导准备在春节期间去给林彪拜年，丁盛一听便要求同去。拜年时，丁盛没有错过这个难得的机会，当面向林彪汇报了自己在新疆的困境，并同时提出了调离的请求，黄永胜在旁边也为之说项，林彪未置可否。

1968 年 2 月 15 日，中央军委下达命令，调丁盛任广州军区副司令员。当时丁盛尚在北京，未及上任即遇“杨余傅”事件。丁盛参加 3 月 24 日中央接见驻京军队干部大会时，周恩来看见他，告知黄永胜已调北京，催他尽快到广州上任。

此时，裴周玉听到周恩来征求自己的意见，回答说：“最好

不走。”

周恩来：“最好不走？不走就不走嘛！”

丁盛说：“走是可以的。”

周恩来：“我还有些不放心，还没有报告中央、中央文革。孔瑞云同志，你还有什么意见？”

新疆建设兵团副司令员孔瑞云说：“没有什么意见。”

周恩来：“没有什么意见？那么多意见。”周恩来是指 4 月 11 日接见时的情况。

孔瑞云：“没有了。”

周恩来又问：“丁盛同志意见怎么样？是他的对？还是你的对？有意见摆到桌面上来嘛！不要搞折衷，搞妥协。”

孔瑞云：“我们去的时间很短，我们想把工作做好，主观愿望是好的。”

周恩来：“主观愿望是另一回事。你是从 45 军去的，你们过去认识，还是丁盛同志推荐你去的。你一去就钻到那边去了。”

孔瑞云：“我们去不了解情况，按丁盛同志介绍的情况做的，对受压制的人同情的多了一些。”

周恩来：“你们是不是感到石河子死的人多一些？”

孔瑞云：“石河子问题完全拥护总理指示，对石河子事件没有意见。”

周恩来：“处理石河子事件，不是我的意见，完全是主席的。主席看的材料比我们多，主席从头到尾把情况告诉我们。王、关、

戚几次想翻石河子的案，我告诉他们，你们不要这样干，石河子问题是主席亲自处理的。生产兵团成份不纯，石河子就是有陶峙岳的人在里边，有张仲瀚的人，去的劳改犯多，有盲流，情况复杂，边境还闹事，对保卫边疆不利，才决定军管，这是主席告诉的，所以才起草了 2 月 11 日的文件。”

他指着丁盛、裴周玉等人说：“是你们起草的，我修改的，中央文革讨论的，主席、林副主席审定的。王、关、戚想插手，我说，这地方不一样，与青海不同。他们（指王、关、戚）经过‘北航红旗’、‘红二司’、王兵弄了不少材料。不然，石河子还会闹起来。你们（指孔瑞云、杜海林、曾如清、朱铁谷 4 人）不清楚，张仲瀚统治了那么多年，他在干部中搞小恩小惠。你们好像觉得对另派压得很厉害。兵团和军队一样，在本单位搞，不能和地方一样，不能到处串连，67 军在青岛搞得很好嘛！”

孔瑞云：“我和丁盛同志很熟。”

周恩来：“正是因为战友，不同意见摆到桌面上，不能当着丁盛的面一样，丁盛走了以后又一样。认识到错误就痛痛快快改嘛！你们在青岛搞得很好！支持王效禹的嘛！”

孔瑞云：“我也是支持丁、裴同志的，我认为兵团大方向是正确的，但压制不同观点，介入武斗是错误的。”

周恩来：“不，你那天不是这样讲的。”周恩来说的还是 4 月 11 的事情。

孔瑞云：“我那天有些紧张，发慌。”

吴法宪："你们那天和丁盛同志争嘛！你们争的焦点，你们（指孔等四人）矛头是对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他们（指丁、裴等人）是对准走资派的，你们方向就搞错了嘛！"

周恩来："那天你们不同意三、七开嘛！（指兵团的成绩与错误），既然承认大方向对，就不要争三、七开，二、八开了。不要争那些事。就是四、六开，大方向基本上也是正确的。"

孔瑞云："我们不争了，同意他们意见，过去也没有什么意见。"

周恩来："没有什么意见？那你们（指孔等四人）打来了电报嘛！我们才请你们来的嘛！你们的意见代表多少人？你们的意见同多少干部说过，你们总代表一些干部的，你们回去，能不能有把握说服一些干部？"

新疆建设兵团副司令员杜海林说："我们回去完全可以做。"

孔瑞云："我们没对谁说过，就是我们两个人。"

周恩来："怎么两个人？你们还有谁？有意见都讲一讲。杜海林同志有什么意见？"

杜海林："我们原来把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看得过重了，对走资派抓得不狠。"

周恩来："要对准几种敌人，不仅有走资派，还有叛徒、特务、苏修。"

杜海林："总理'411'指示后，我们想通了。"

周恩来："不只我一个人，还有康生、江青同志、文革负责

同志、军委办事组同志。你们去是加强兵团的，这是目的嘛！朱铁谷同志你有什么意见？”

新疆建设兵团副参谋长朱铁谷：“没有意见。主要我们对新疆复杂情况认识不足，我们只看到张仲瀚打倒了，余孽轻了，对反动路线看重了。”

周恩来：“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短时间的，处理石河子事件不是反动路线。‘12 条’是毛主席批准的。

朱铁谷：“我们坚决执行‘12 条’。”

周恩来：“是啊！‘12 条’是有具体规定的。工厂、农场不要进行串连，值班连队不搞‘四大’，医院、学校是搞‘四大’的。‘八野’要解散，我给丁盛同志说过。‘八野’回去时开了一个欢迎会，登了报，我批评过他（丁）。‘八野’他们有错误，但大方向是对的嘛！王恩茂同志参加这次会议，招了麻烦。当时，我研究好了。分三个梯队回去，第一是军区，第二是兵团，最后剩下王恩茂、赛福鼎同志，叫他（指王恩茂）回去先到‘红二司’去，他没有这样做，我批评了他。兵团参加了地方武斗不好。但王兵那派不对，长期住在外面，王兵他们回学校没有？小将不要过多责备，但错误应指出。”

朱铁谷：“他们已经回去了，我们做过他们的很多工作。”

周恩来：“曾如清你是什么态度？”

新疆建设兵团副政委曾如清：“拥护总理、康生、江青等中央首长指示。我们到兵团对缺点方面看得多一些，认为错误改得

慢一些，有一些着急，比如大联合搞不起来。”

周恩来：“只有共同对敌，才能搞大联合。两个革命群众组织，只有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才能搞大联合。”

“兵团还有张仲瀚的余孽。在 4 月 11 日后，我问了王震、张仲瀚怎么样？他讲：张仲瀚近几年变质了。他还讲了句公道话。我说张仲瀚是大地主，是阶级本质决定的。另外加上陶峙岳的余党，再加上盲流去的地、富、反、坏、右分子，还有劳改犯，这都是张仲瀚的社会基础，不作这个阶级分析，就不符合毛泽东思想。兵团几百万人，要作阶级分析。陶峙岳有几万人，还有家属，有地位，影响劳改犯人，他们也有家属，盲流几十万人，多数是好的，有些人因本地生活困难一些就住外跑，真正贫下中农是爱土地的，跑去的人混进一部分地、富、反、坏、右分子。动员的上海、武汉、天津支边青年，上海尽量把工人子弟留下，把资本家的子女送去，从上海来讲，是对的，但你们那里增加了负担。当然，对支边青年要一分为二。”

吴法宪：“他们这些人，造什么反？他们是造无产阶级的反，造我们这些人的反。”

周恩来：“新疆与苏联接壤。这么一个复杂的社会，都是从五湖四海来开荒的，搞好可不容易。石河子问题发生后，主席三次说：再不能给新疆送劳改犯了。要不是‘12 条’，石河子还会乱的，不管犯什么错误，整张仲瀚是对的，幸亏去年在这里开了 20 多天张仲瀚的会。叶剑英不管他有什么错误，说什么错话，

办了什么错事，但他协助处理兵团的问题是对的，不要光看到高楼大厦，但职工去了没有地方住，住地窝子。张仲瀚把石河子搞得很大，我一去就否定了，叫他分散。他搞石河子大城市计划，你们回去查一查，图还有，要搞几十万人。兵团是很复杂的社会，你们（指孔等四人）要当新社会去研究，不管你们当军长的，副军长的，还是当师长的，都要当新社会去研究。我去也当新社会研究嘛！这个情况下，你们不把面对的敌人当作主要任务，而把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当主要的。丁、裴只是执行了很短一段反动路线嘛！是认识问题嘛！兵团不同自治区，也不同军区，要具体分析，要一分为二，不然‘红二司’和王兵大闹天宫，这还了得！”“乱是可以乱的，怎么能大乱呢？加上北航，一开始就去，这点，王恩茂同志又犯了错误，开始我给你打招呼，你对后去的就招待，保你的就招待，你招待的那几个孩子，还在北航劳改，开除了党籍，不是党员，开除了党籍，这不算数。”

王恩茂：“我有罪。”

周恩来：“因此领导统一很重要。丁盛同志去广州，裴周玉同志你怎么样？有信心没有？丁走了谁去兵团？”

丁盛推荐了一人，周恩来没有同意。他建议：“你们写个决议出来，有文字为凭。这样我就可以看出，你们思想真正统一了没有。”

裴周玉：“我们有个‘纪要’，请中央批一下。”

他说的是兵团党委在京召开的常委扩大会议4月17日纪要，

周恩来翻阅“纪要”，又问了几个人的情况，最后说：“新疆绝大多数是好的，不仅军队绝大多数是好的，各族人民绝大多也是好的，民族主义，大汉族主义，这么大边境线没有出问题，没有主席的威望，没有林副主席的威望是不行的。丁盛同志主持搞个好决议。”

丁盛：“我不行。”

周恩来：“你搞得不错嘛！你再等两天，稿子定了以后再走。”

吴法宪对裴周玉说：“你们一定要写个好决议，不要和稀泥，是非要搞清楚。”

我们再看徐州。自 1968 年 3 月 1 日，经济南军区批准，徐州第二届由“踢派”组成的革委会成立后，徐州的“支派”开始受到镇压。与此同时，“踢派”还冲击殴打南京军区的部队指战员，徐海地区社会秩序极为混乱。

4 月 12 日，中央发出中发[68]59 号文件，决定在北京举办江苏徐海地区学习班，同时向济南军区发出电报：“徐州支、踢两派革命群众组织各选派不超过 10 人的代表，到京解决问题。”济南军区向 68 军转发中央电文时，王效禹把“两派革命群众组织”中的“革命”两字删去，并在传达中央命令时说，徐州代表团一共包含 10 名两派代表，即每派各选 5 名代表。结果，5 名被结合进徐州“三·一”革委会的“支派”头头作为“支派”代表参加代表团，赴京住进西苑旅社。

5月6日，周恩来同王效禹、杨得志谈话，就他们起草的关于

解决徐海问题的报告批告江苏省军区司令员赵俊、江苏省军区第二政委梁辑卿，指出：“该报告中有5个问题关系到江苏省军区和江苏省革命委员会，请你们邀集学习班中省军区常委和徐海地区军分区和人武部的同志一谈，把你们意见以书面告我。准备明晚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一议，再征求南京军区许世友同志意见，然后报中央考虑。”

王效禹、杨得志起草的关于解决徐海问题的报告中提出：设在灌云县的“苏北地区联合委员会”，是一个跨省、跨行业的秘密组织，是连云港地区长期武斗的一个重要根源，建议中央下命令予以解散。建议江苏省革命委员会把徐海地区的工农业生产、群众生活及其它行政事宜，统一领导和管理起来，建议江苏省军区解除徐州军分区、连云港市和徐海地区八县人武部的支左任务，将其主要领导调往南京或镇江学习。

徐州代表团在北京同住在一个旅社中，旅社服务员觉得奇怪：“其他省两派刚到北京，互相之间横眉冷对，火药味很浓。唯独徐州这两派能够和平共处，亲如手足。”

滞留南京的“支派”随即通过江苏省军管会向中央反映，王效禹指定的代表都是“假支派”，只有“淮海八·三一”才是真正的“支派”。随后，中央于5月13日电示南京军区，通知“淮海八三一”选派5名代表到京参加10人代表团。

## 第 1002 回：柳州打，广西抢武器严重　揭少奇，北京军区会难停

此时，广西的武斗和抢枪愈演愈烈。5 月 1 日上午，南宁广西自治区革筹小组负责人召见“联指”常委颜景堂等人，向他们通报当时广西的形势和对南宁市阶级斗争采取的强硬措施等问题。当晚，自治区革筹小组负责人再次召见“联指”常委颜景堂，谈解决武斗和制止抢枪问题。

5 月 3 日，广西区革筹小组、广西军区鉴于灵山、合浦、东兴、上思、马山、横县、博白、陆川等县“联指”下属的一些组织乱杀不同观点的群众和“五类分子”的严重情况，向各专区（市）革委会和军分区发出“关于制止乱杀人的歪风的指示”的电报。

这天，广西“联指”常委颜景堂在“联指”总指挥部长征楼主楼召开常委扩大会议，研究决定：抢夺广西军区军械库。会上由 9 人组成“抢夺”领导小组，颜景堂任总指挥。

下午 18 时 30 分，南宁“422”所属的一些组织抢驻南宁公园区体育场的 6936 部队二营的武器，6936 部队一营奉命乘车前往制止。而广西“联指”总指挥部得知“422”抢枪的消息后，立即组织沿途所属组织拦截“422”的汽车，抓获俘虏。

是夜 23 时许，6936 部队一营的军车从二营住地返回，途经中华路，朝阳路时，被“联指”、“汽司”、“红色工人总部”、“后备军”、“治安委员会”等组织武装扫射，军车上被打伤 31 人，打死 5 人。

次日，广西“联指”总部广播说：“422”抢夺部队武器，拦截6936军车，打死打伤解放军多人，真是罪该万死！

5 月 5 日晚 24 时至次日凌晨 4 时，广西“联指”总指挥部组织 3800 多人，出动汽车 45 辆，火车（客车）一列，按原计划到南宁郊外的长岗岭广西军区军械库抢武器，没有遇到阻拦。共“抢走”各种枪支 7044 支，其中轻机枪 479 挺，高射机枪 48 挺，60 炮 4 门，炮弹 60 发，子弹 120 万发，望远镜 50 个。

这是文革以来广西抢枪规模最大，数量最多的严重事件。区革筹、广西军区向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和广东军区报告军械库被广西“联指”“抢夺”的事件。并说：“我们现正在召集两派头头开会，动员他们紧跟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交回武器 。”

5月6日，周恩来电告广西革筹小组和广西军区：要韦国清立即召集“联指”人员开会，令他们把抢走的武器弹药限24小时内交回。

5 月 7 日，周恩来又给广西革筹小组和广西军区来电指示，一定要对“联指”5 日抢枪事件严肃处理，并全部交回抢走的武器装备。

8 日，周恩来第三次来电指示：“5 日‘联指’抢走的武器要限时交回。”

此时的广西柳州也已是狼烟四起。

1968年4月，柳州“造反大军”司令白鉴平，策划了柳州市的“三大战役”：攻打柳铁文化宫、市水厂和市印染厂，率先打

破了2、3月柳州市相对的平静。

“造反大军”首先向“联指”派控制的柳铁文化宫发起进攻。继之，又对印染厂展开攻击。4月20日，柳州“造反大军”的武斗人员武装拦截柳江“联指”去柳江县开贫下中农代表大会的汽车和“联指”派的武斗人员，双方发生枪战。武斗中打死1人，打伤12人，抢走现金7万多元和“联指”派武斗民兵的大批枪枝，两派武斗因此急居升级。

4 月下旬，柳州军分区王司令员亲自对“联指”头头说了三点意见：“1、柳州‘造反大军’退出拉堡后，你们要注意他们从外面包围你们，你们把兵力调出外边，注意他们在柳州搞你们。2、融安、柳江出问题，你们过去为什么不发动群众，挨打了干着急。来宾、武宣‘联指’搞得比你们好。3、你们要求发枪，我是司令员，不能发枪给你们，你们自己解决，民兵集中不集中，由你们去和各县商量，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嘛！”

听完王司令员的讲话，23日，柳州“联指”即开会调集融安、柳城、武宣、融水、忻城、象州、柳江、八一锰矿共600余民兵武装进入柳州市，27日发起对柳州“造反大军”的攻势，迫使其全部迁往柳江以南。然后在柳州饭店召开盛大庆祝宴会，军分区司令、政委出席。

4 月 28 日至 5 月上旬，“造反大军”出动数千人，对“联指”派在柳州市水厂的武斗据点展开进攻。

柳州市水厂位于柳江河北岸，是保卫“联指”派控制区柳北

“大后方”的前沿阵地。战斗打响之后，“联指”派即迅速从各单位的战斗队调来几百人打保卫战。在随后长达半个多月的武斗中，“联指”派在水厂投入大量兵力，并配备了该派当时掌握的最先进武器。

从 5 月 9 日起，柳州“联指”会同各县武装部率领的民兵开始攻打水厂、马鞍山水塔、龙家巷等处的“造反大军”据点，双方在这些地域展开激烈交火，死亡 20 多人，伤数十人。“造反大军”被压迫在柳南谷埠街及附近一小片地方，岌岌可危。

5月10日，广西革筹、广西军区向中央发出《我们对联指抢枪问题处理的初步检讨》的电报。电报说：“遵照总理5月6、7、8日的指示，我们对广西‘联指’5日大规模抢枪问题在处理上的错误进行了检查。对‘联指’大规模抢枪错误的严重性和引起的后果认识不足，制止不力 ，措施一般化。‘联指’第一次抢夺军区仓库的武器是4月29日，以警司名义发出了不准抢枪，上交武器的通告，但由于我们的思想麻痹，5月3日晚发生了‘4.22’抢夺（从越南）归国部队642团的武器。5月5日又发生了‘联指’大规模抢枪的错误。5月6日总理亲自下达了限期收缴武器的命令，我们对总理的命令理解肤浅，工作简单，接到总理命令后，觉得一切好办了，所以口就张得大了些，想借总理命令这个东风，提出收缴所有枪支，并运用于全区的意见。其实这样要求是不对的，它既不符合总理命令精神，也不切合实际。因为问题要一个一个地解决，总要突出重点，一下子是不能解决问题的。”

同一天，5 月 10 日，柳州 6985 部队和 519 部队又被柳州“联指”再次抢夺武器装备。其抢去各种枪支 316 支，子弹 11056 发，60 炮、迫击炮两门，40 火箭筒二具。并打伤干部战士 47 人，其中重伤二人。对此，区革筹、广西军区于当天下午报告了中央。

我们再回到北京。

3月26日召开的北京军区会议，大轰大嗡了一阵，并没有揭发出什么实质性的问题。后来黄永胜、吴法宪、谢富治等人坐阵指挥，要求会议“揭发山头主义的罪行，批山头主义的危害，肃山头主义的流毒，把山头主义批透。”再后来林彪、陈伯达、康生、江青、叶群等又亲自出马讲话，说北京军区对内“排挤外来部队”、“排挤外来干部”，对外“反政反民”，向江青要“开枪权”、“扫荡权”，在机关搞“以人划线，镇压群众”，“山头主义已发展到不跟无产阶级司令部，而跟别的司令部的危险地步”，但仍然没有揭发出来什么严重问题。会议迟迟收不了场。

5 月 1 日，在天安门城楼上，毛泽东问：“为什么北京军区的会开得这么长？为什么抓住郑维山不放？”他说：华北出了个杨成武，华北的干部都坏了吗?杨成武只是华北山头上的一棵树嘛。

主持北京军区党委扩大会议的北京军区政委陈先瑞，想借毛泽东 5 月 1 日在天安门城楼上对北京军区会议的表态，赶紧结束会议，但是军委办事组不同意。

5月8日，军委办事组接见了北京军区常委成员，黄永胜批评

北京军区常委们说："你们的会议开得不好，开会的人有三不满意。一是常委对会议的领导不力，不满意；二是知情人揭发问题少，不满意；三是郑维山、肖文玖同志的检讨不好，不满意。""你们的会议为什么开得不好呢?原因就是没有抓住主要矛盾，北京军区的山头主义、宗派主义最严重，是有历史性的，一直在那里排外，排除异己"。"你们抓了些鸡毛蒜皮的事，没有按毛主席、林副主席的指示办。"

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叶群也分别讲了话，一致要求北京军区的会议要抓"历史性的山头主义"。北京军区按照军委办事组的指示继续开会，直到5月中旬才结束。

5月8日，毛泽东接见在京参加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的各地党政军干部和群众代表以及出席全国铁路，交通会议的代表等。接见间歇，毛泽东与参加接见的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谈话，提出把陈毅、李先念、聂荣臻、叶剑英、刘伯承、徐向前等几位副总理、

元帅请来一起谈。

毛泽东说："敌伪的报纸也不能全信。像许世友这样60多岁的人，他都不知道《伍豪启事》是敌人伪造的，可见了解当时的历史情况很不容易。这个《启事》下款是伍豪等243人，如果是真的，为什么只写出一个人的名字，其他都不写？"

"有些干部对历史不清楚，一看大吃一惊。"

会上，周恩来简要谈了"伍豪启事"的原委。并说："我已将那件事的报纸和我的报告影印了。还要写一个材料。"

谈到一些受冲击的干部时，毛泽东说："群众提打倒谁，不要怕，多数人是打而不倒。对很多人要考虑商量个办法，特别是对那些犯了错误愿意改正的人。我不相信大多数犯了错误的干部不能改。要相信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是好的和比较好的，犯了错误的人大多数是可以改的。公安系统也有好人，我才不相信公安系统都是坏人。地主、资产阶级的子女，也有一部分表现好的。大学生成分比例不同，有的还是要分配他们工作。"

说到刘少奇的问题，他说："整出来的刘少奇的材料，也不能全信。比如说他1946年冬季和美国勾结，组织反共同盟军，要美国大规模出兵打共产党，并且要沈其震经过司徒雷登介绍去见杜鲁门、艾奇逊。有些材料是故弄玄虚，是骗我们的，是要我们的。"

周恩来接着对抗战前夕一件材料说："说刘少奇当时去南京，见过孙科、宋子文，我看不一定。"

毛泽东说："我们在延安就规定了一个不杀、大部不捉。随便杀人没有手续不好，抓人抓多了也不好。搞逼供信，不讲也得讲。我们还是应该重证据，重旁证，不要重口供。有些人你何必抓他，他自己又跑不了。"

"抓一个人来审，这时一般的心理状态，就是希望他供出来的越多越好。"

"搞逼供信的人，就好像我们长征中抓虱子一样，捉少了不满意，抓多了才满意。一抓起来就没有下文了，被挂起来了。总而言之是时候了，中心问题是不要逼供信。凡是拼命地逼，他就会供，供了你就会相信，又会要许多人这样去供。这样做也不好。这一股风要刹下来，要好好清理一下。我们党的历史上是有经验教训的。江西的打 AB 团，福建的抓社会民主党，鄂豫皖的抓改组派、第三党，都反映了党的历史，说明当时是不成熟的。"

"投降过国民党就永远忠实于国民党，投降过共产党就永远忠实于共产党，这个规律我就不信。有些人被敌人抓住了，放出来了，登报了，但不一定永远依靠敌人。他还参加了长征，参加了抗日嘛，没有做过大坏事。一抓历史，后一段就都否定了。但也不能讲投降是好事。"

"还是一个不杀好，留下来的人总有用处嘛，一可以劳动，二可以当证人。例如刘少奇在东北的事情，就是找到了当时审讯他的人。如果都杀了，这些证人也就没有了。"

此时，刘少奇专案又有了新的进展。4 月 28 日，1929 年任

奉天省会警察局行政科代理科长，参与审讯刘少奇的当事人之一关庆云写了关于刘少奇1929年充当内奸的交代：

对旧奉天纺纱厂破获共产党案件的交待

一九二九年我充当奉天省会公安局行政科代理科长。同年八、九月间一天，收到商埠警察三分局关于纱厂发现共产党传单的呈文，由我主稿，指令该分局注意侦捕。指令下达不久，一天中午接商埠警察三分局电话报告，纱厂发现三名共产党嫌疑分子，除派人前往监视外，请求逮捕。当即报告白铭镇，白局长说，刚才接过该分局电告，已令其追捕归案。当天下午五点左右，听说已逮捕三名共产党，在纱厂略过一堂，都承认是共产党。三名人犯在局内拘留不足一月，白局长亲自提审过。此案结束后白局长和我说：参加办案的有长官公署、军法处、全省警务处、宪兵司令部等单位，那个南方籍犯人承认是共产党，来沈阳不久，目的是扩张党的势力，恳求从轻处理，如能得到释放，甘愿具结，愿开列地下党名单、机构、地点以作条件。经张学良同意，仅以涉及嫌疑，备函送往法院。事后张学良根据名单，直接命令宪兵司令部、稽查处、军法处先后逮捕共产党人数起。

交代人：关庆云

一九六八年四月二十八日

1929 年任奉天省高等法院检察处代理主任书记官，审讯刘少奇时的记录人刘青第于1968年5月交代关于刘少奇1929年被捕的情况：

关于一九二九年我承办奉天纺纱厂破获共产党一案的交代

一九二九年我任辽宁高等法院检察处代理主任书记官。九月间警察所送来纱厂破获共产党一案三人，有厂内的，有厂外的，首席检察官朱树声和主任检察官汪廉审讯，我记录。经警察所一一审讯，都承认是共产党员，为首的承认是负责沈阳地区党的书记，并供出几十个党员，十几个组织，在沈阳有麻袋厂、兵工厂、纺纱厂等。在外地有大连、营口、辽阳、抚顺、哈尔滨等。还写了自白书，承认领导工人罢工，是犯罪的，误入歧途，现在悔过自新，坚决以后不作非法活动，要求宽大。经检察处复审，事实与在警察所供认的相同。三人都在自白书上签了字。

根据他们三人自白从宽，检察处起诉，即送高法审理。起诉书大意是：被告三人系共产党员，煽动罢工，为首的是负责沈阳地区共产党书记，深知改悔，并提供了组织关系及散布情况，是悔过自新的具体表现，应从宽处理。……。不久高法开庭宣判。由高检处将他们交保释放。

这一案处理后，朱首席对我说：过去共产党说我们对共产党人抓一个杀一个。这回这么大的案子，这么大的头头，判的这么轻，共产党都感到意外，这是政治攻势。这样可以收买，可以瓦解，可以为我们工作，在政治上的价值是不可估量的。

刘青第

一九六八年五月

时任辽宁省交通厅长刘多荃，又名刘芳坡，1929 年任大军

阀张学良卫队上校团长，后任中将军长，与水电部副部长刘澜波是同乡，关系密切，互称“兄弟”。他也写出了关于刘少奇1929年充当内奸的亲笔供词：

我所知道的一九二九年在奉天纺纱厂破获一起共产党案件情况

一九二九年我是张学良卫队上校团长，时常跟随张学良。一九二九年八月底，警察厅在奉天纺纱厂破获一个大共产党案。关系到东北三省的事。当时警察厅长白铭镇和宪兵司令部副官长程广道，告诉我捕了三个人。经审讯，其中一个人供认是中共满洲省委书记。供出了满洲省委员会和沈阳、哈尔滨、本溪湖、抚顺及铁路沿线党组织和活动计划。张学良责成参谋长荣臻和白铭镇与这个党的负责人达成了政治交易条件：要他彻底交出东北活动计划、地点、参加人员名单等。今后不再在东北搞政治破坏和颠覆活动；对中东铁路有关工人运动双方事先取得联系，相机配合……。这个负责人要求签字画押后，不登报，双方联系各派妥靠人员，到指定地点会晤。

张学良亲口对我说：这个共产党负责人给他写信表示感激，张长官是我的再生父母，将来我有生之日，就是我戴德之年。

这个案子连捉带放共廿天左右，释放时我们和他有秘密计：对外宣布确非共产党人，找不出确实证据，由警察厅批准无罪取保释放。

刘多荃

一九六八年五月十一日

## 第 1003 回：说东北，太原钢厂楼炸毁“活人展”，广西武斗更难停

5月9日，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接见辽宁省代表，周恩来强调，取消跨行业的组织，对辽宁来说是一个很急迫的任务，既是组织任务，也是政治任务，也是抓革命、促生产的任务。东北三省的生产很关键，尤其是铁路交通和煤炭生产，对全国都有影响。

5月11日，周恩来就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关于是否在报纸上点名批判宋任穷，并把他揪回哈尔滨市批斗事批告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拟电话告黑龙江省革委会，目前不要在报纸上公开点名，也不回东北批斗，可进行‘背靠背’批斗。”此前。周恩来曾就在中共中央批准成立辽宁省革命委员会的批示中是否要点宋任穷、欧阳钦、黄火青的名请示毛泽东。毛泽东表示：“可留有余地，不要点名。”

当晚，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118厅召集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谢富治等开会。他说：

“对犯错误的人的检讨，反正老怀疑，不满意，说他没有触及灵魂。河南的纪登奎，斗了一百多次，斗争起来，尽弯腰，搞‘喷气式’。过去斗争陈再道都不这样嘛！老人坐‘喷气式’怎么行？共产党历来有一个传统，叫做摆事实，讲道理。琴不要拉得太紧，拉紧了弦要断的。凡是把人家搞得这样苦的，一定自己心里慌。”

“陈伯达你不要管福建了，越管越坏。你这个人，不能办具

体的事。不要单独行动！‘五一’你找学生谈话，为什么不叫上文革小组的同志商量一下再谈？事情要多找几个人商量，单独找人谈话是很坏事的。你不是懂马克思主义多些吗？马克思主义的民主集中制跑到哪里去了？你那个马克思主义最好读一读，最好要实行。在中国讲马克思主义嘛，有些东西你又不实行。我看你成了习惯了，江山易改，本性难移。”

“‘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并不容易。对有些犯错误的人，有所批评就够了，只要不是真特务、真反革命，是人民内部矛盾，就要让人家改正错误，不要使人毫无出路。在延安就搞过这样的事，三天大会、抢救运动，都有偏差。两条路线斗争，并未像现在这样斗法，如中央苏区没有这样搞。尤其不要搞群众。有坏人，由工人、农民、学生自己去清理。什么叫反革命？”

“《十六条》规定，现行反革命就是杀人、放火、放毒、破坏国家财产。贴了几张反动标语，也不一定要抓嘛！总之，现在现行反革命的范围相当扩大。”

“坏人总是极少数。对工厂、学校就要注意点。百分之九十几是左派、中间派。上海交大、复旦、师大二百多反动学生，弄多了，正在检查。任何肃反都要约束在百分之五。”

“整顿队伍，把坏人抓出来，基本上是对的。自从我说了文化大革命是国共两党战争的继续后，抓了一批国民党坏人。抓坏人还是要搞，但是要有条件，要有人掌握。搞到什么时候，就要

煞车，搞红了眼，势必搞逼供信！”

“对文艺界，无论哪一界，不要登报点名，只能搞骨干分子。总之，要重证据和旁证。包括反革命，也要给他一条出路。另一条是不要老是检讨没有个完。如果在本厂不行，可换一个厂，也可监督生产。”

“对广大人民群众是保护还是镇压，是共产党同国民党的根本区别，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根本区别，是无产阶级专政同资产阶级专政的根本区别。”

4月27日，周恩来致信毛泽东：“今晚中央文革碰头会上认为，国家体委可归军委办事组主管，实行军管。国防体委可以取消。按系统由各军兵种、各军区实行全部接管。”

毛泽东批：“照办。”

5月1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布全国体育系统全部由中国人民解放军实行军事接管的命令。

5月8日，山西太原钢厂发生大武斗。中午12时，以“红太钢”的武斗队为主力，“红总站”的“决死纵队”等武斗队协同作战，围攻总部设在太原钢厂职工学校培训大楼内的“新太钢”组织。刹那间，那里成了枪林弹雨的战场。附近的居民或离家远逃避难，或用棉被堵住门窗闭门不出。这就是山西“红总站”所说的“1968年的第一个战役”，目的是要打垮太原钢厂的“兵团”下属队伍“新太钢造反兵团”，简称“新太钢”，让“红总站”的下属组织“红太钢造反兵团”，简称“红太钢”，在太原钢厂全面掌权。

下午 17 时，只听一声巨响，“新太钢” 总部所在的太钢职工学校培训大楼被炸，据说“新太钢”的守楼人员中，有 4 人当场毙命。也有人说，共有 6 人毙命。未死人员走出被炸成一片废墟的太钢职工学校，成为俘虏。

爆炸过后，很多人冲进大楼里捡拿东西，有扛白面大米袋的，有扛饼干箱的，有扛军毯、军大衣的……等炸楼的“红总站”返回来打扫战场时，那些在现场扛东西的人一哄而散。

消息当天传到北京学习班，“兵团”司令刘灏震惊了。“新太钢”是“兵团”“工总司”的一支主力，如此受挫，堂堂“兵团”司令岂能坐视不管？“兵团”在学习班中的头头们暗地里紧急开会，一致催促刘司令尽快潜回太原，稳定军心。否则的话，“兵团”岂不是要叫人家“红总站”一个一个地消灭掉吗？

第二天，5 月 9 日，学习班的副组长刘灏便悄悄溜回太原，并于 5 月 10 日，紧急召见“兵团”留在太原的大小头头，一来安抚军心，二来准备迎敌。刘司令口若悬河，虽口口声声叫喊：“我们要坚守每一块阵地……”却拿不出什么具体的方案和如何“坚守”的意见来。一位当年曾参加过这次会议的小头目，在“文革”结束多年后回忆起当时的情形，自嘲地说：“我们当时总以为刘司令从北京回来，总要有啥大的行动呢，没想到他哇啦、哇啦地叫喊了半天，只是让我们‘坚守阵地’，现在想起来可笑得很。可我们那阵子可是抱定了要与‘兵团’共存亡的决心。毛主席说文化大革命是国共两党斗争的继续，我们都把对方当成国民

党在大陆的代表了……”

而在北京参加学习班的山西三大派的头头们，经常各自悄悄聚会。学习班里失踪的“学员”越来越多，都跑回太原了。“兵团”与“红总站”全在备战。各单位和各系统内，“兵团”与“红总站”的大小摩擦不计其数，两大派之间的大型武斗，在古城太原一触即发。

5月12日，周恩来就山西太原重型机械厂群众组织以该厂革委会名义两次抢劫银行现款共164万元事批示：

“告山西省革委会和刘格平、张日清、谢振华，首先应由省革委会下令给重型机械厂革委会，动员该厂群众将劫走银行的两笔现款追回，上缴武器。如在限期内不这样做，则应向群众宣布该厂革委会不听命令，实行军管，并改组革委会。总之，要利用这一完全违法事件，有步骤地动员群众，让群众能自觉地当家作主，整顿队伍，抓出坏人，而不要靠行政命令办事。”

就在 5 月 12 日，广西南宁市又搞出了一个将活人关在笼子里让人观看的“禽兽展览”。

广西“联指”总指挥部所属的“沥血兵”，将关押在“联指”总指挥部不同观点的自治区水电厅副厅长林执真、地质局处长张祖贵、钦州地区手工业经理部副经理黄海泉，以及在武斗中抓来的战俘、“422”派下属组织“雄鹰”的成员孔祥兴、黄强、张飞、方少华、黎子竟等 20 人关进木笼，拉到南宁市北大路建筑研究所，组织群众参观。

展览进行了 3 天。尔后，广西“联指”派搞的这种活人展览遍及全自治区，被展览者者达万余人。“422”派人员有的感到恐惧而退出该组织，有的则更加“斗志坚定”，并决心与组织和本派的武斗据点“共存亡”。

12 日，柳州又发生抢走驻柳州解放军某部枪支 300 余支、子弹一万余发的事件。同日，在中央催促下，广西军区负责人召见“联指”总部和各“兵团” 头头，再次传达周恩来《五六命令》，动员他们交回抢走的武器弹药。

这天，《柳州联指报》发表社论，要给“造反大军”以“毁灭性打击”。15日，柳州地区各县民兵组成的“贫下中农联合指挥部”发出“第一号命令”，宣布要“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一切敢于顽抗的阶级敌人，不获全胜，决不收兵。”每天晚上，柳州都有枪声、爆炸声传来，不绝于耳。

5 月 14 日，广西革筹小组、广西军区向中央递交《当前广西阶级斗争形势的情况报告》，汇报了广西已有 5 个专区、两个市、75 个县成立了革委会，另有两个专区已批准成立革委会。但一些地区出现新的反复。报告同时说：“从当前阶级斗争的现实情况表明，敌我矛盾十分突出。南宁‘422’新指挥部已成为当前运动的阻力，是急需解决的一个主要矛盾，必须迅速解决。”

5 月 16 日，广西革筹小组、广西军区向中央提出派广西革筹小组、广西军区领导人赴京汇报工作。同时还向中央文革报告军管的南宁市银行解放路办事处被广西“工总”接管的情况。

再说柳州为被捕的《今日的哥达纲领》执笔人、柳铁一中学生肖普云赴京告状的柳铁一中高三学生、该校“联合战队”头头钱文军和两位同学，在北京周旋了近两个月，于5月3日离京回柳州，无功而返。

火车进入广西后，他们看到一路上都是荷枪实弹的武装民兵在列车上抓人，原来就是在抓钱文军的。但钱文军在武汉就下车了，前去拜访武汉的“三钢”“三新”造反派。到长沙后，他又下车，了解《中国向何处去？》这篇文章是否是长沙中学生杨曦光独立完成的，有没有“黑手”在其身后协助，因为康生同样说那文章是“黑手”操纵的。当他进入广西时，已经是 5 月 17 日了。广西“联指”民兵久抓不到，已经松懈了许多。钱文军他们挤在火车上，对面就坐着对立派，柳铁消防队的干警的老伍，他们文革前同在柳州冬泳协会，现在观点不同，所以坐下后只打了个招呼。火车到了永福、鹿寨车站，那些“民兵”们上车来查，老伍不但没有揭发钱文军，反而替他打了个掩护。

列车到柳州火车站，钱文军他们刚下车就被人发现，老伍立即跑去叫人来抓钱文军。但火车司机都是“工机联”的，他们在车头上看见钱文军他们，大声喊他们上了火车头，直接开进机务段去了。

钱文军回到学校，看见他们的队伍正在紧急集合。原来也有人在报信，说钱文军已经被抓走，于是柳铁一中“联合战队”的二把手立即集合队伍，准备去火车站救钱文军。当钱文军 3 人出

现在他们面前时，队伍里一片惊喜，还有些女同学高兴得哭了起来。

柳铁一中“联合战队”的几个常委立即开会，大家谈了广西的形势，认为非常不妙，许多地方如玉林等地，“造反大军”差不多被剿灭干净了。各地都是军分区率领武装“民兵”进行围剿的。柳铁一中以及学校旁的柳州冷冻厂，还有机务段、车辆段等几个“造反大军”占据的地方，住满了各地逃来的难民。柳州市“造反大军”已被彻底打出柳北。

接着，钱文军报告在北京的情况，然后到风雨操场给大家作形势报告。操场全都坐满了，连老师们还有少数逃难到学校居住的市内难民都来了。

钱文军的报告直截了当，中心意思就是继续重申他原来的主张——求生存。

他说：“那些所谓‘北京来电’统统是骗人的精神鸦片，一个字也别相信。现在我们只有抵抗到底。只有打出一片地盘，使对方消灭我们的企图失败，中央才可能出面解决广西问题。”

当时在他们中流传这样一个政治笑话：“秘书半夜去报告总理，说广西武斗，死了几千人。总理连头也没抬一下。问：‘火车还通不通？’秘书说还通，他于是再也没理会。没多久，秘书又来报：‘火车也不通了！’总理扔下纸和笔，连忙站起来，大声说：‘找韦国清！他杀点人就算了，怎么把火车也搞停下来了！’”

同样内容的报告，钱文军又到文化宫总部在更大的范围讲了

一遍，听众都是他们这一派的铁路职工、干部。到柳州市内总部开会，他也重复同样的意见。一句话，他坚决主张打到底，不打就死定了，打或许死的还少些。

广西各地屠杀的消息不断传来，各县的逃难者更是络绎不绝，主张打，抵抗到底获得越来越多人的赞同，而主张交枪求和便会遭到唾骂。就连当初极力主张妥协“倒旗”的柳铁分局机关总部头头、路局“工机联”总部头头王反修，也在废寝忘食地为大家的存亡打拼。

那些住在学校里的外地难民说：灵山县人武部调集武装民兵围剿“造反大军”，杀害了至少几百人。那些“出身不好”的人甚至全家杀绝，连婴儿也不能幸免。说到他们自己，几个人都哭出声来，说：“他们攻上来，我们看见是解放军带领的，不敢打。结果全都被抓起来，那些解放军就把俘虏交给‘联指’，由‘联指’开始屠杀。我们逃跑得快，才到柳州来的。”

5 月 20 日上午 9 点，“422”所属“青年近卫军”几个人背枪在南宁市华强粮店附近巡逻，遭到粮店旁边市测量队宿舍的“联指”据点开枪射击，死两人。“青年近卫军”以为是粮店内有“联指”武装人员，便炸毁粮店，导致店内一职工全家 4 人被炸死。是为轰动南宁的“520 事件”。

第二天，5 月 21 日，南宁市革委、南宁警备区司令部和政治部发布了《关于华强粮店被“422”抢劫、大楼被炸毁的严重政治事件的通告》。《通告》说：“这是一小撮阶级敌人，党内死

不改悔的走资派，社会上牛鬼蛇神蒙蔽群众，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犯罪行为。”

## 第 1004 回：学中国，法国掀五月风暴　影响大，戴高乐最后辞职

1966 年 8 月，毛泽东在天安门接见百万红卫兵的场面震撼了全世界。轰轰烈烈的红卫兵运动，那磅礴的青春气势、浪漫的情怀、崇高的理想主义旗帜，深深吸引了西方的青年学生，使西方各国的反剥削、反越战的群众游行示威和学生运动一浪高过一浪。那时毛泽东已然是全世界革命青年的共同导师，保卫毛主席的红卫兵运动在西方国家纷纷出现，这些青年学生也纷纷在自己的国家开展文化革命，其中典型的代表就是 1968 年的法国“五月风暴”。

1968 年，法国巴黎的大街上出现了身穿中国绿军装、头戴绿军帽、胸前佩带毛泽东像章的法国青年，法国报刊疾呼：“巴黎街头出现红卫兵！”

1968 年 3 月，巴黎大学农泰尔分院的学生改革学校的教育制度。

3 月 22 日，巴黎大学南特莱学院的学生举行集会，抗议当局逮捕因反对越南战争向巴黎的美国企业扔炸弹的学生。这一行动得到了巴黎大学左翼学生、研究生和研究人员的支持。此后一个月，高校风潮不断。5 月 2 日，南特莱学院校长不定期地关闭了南特莱学院，并说：“在教职工中有一种奇怪的气氛……一种非常近乎战争的精神变态。”

法国共产党一开始就站在了学生运动的对立面。法国共产党

领导人马歇谴责学生说："南特莱大学和其他任何地方徒劳的假革命者，他们丝毫也改变不了历史的现实。"

5 月 3 日，为抗议巴黎大学开除学生运动领导人，巴黎大学学生罢课并占领了大学校舍。警察封闭了农泰尔分院，驱散了巴黎大学的群众集会。

学生筑起街垒同警察对峙。600 多名学生被抓。大学教师全国联合会号召举行抗议罢工。报刊将之称为"几分钟内造成了一个群众运动"。

随后，学生走上街头，整个巴黎变成了战场。巴黎警察用警棍、高压水龙、催泪瓦斯镇压学生。学生则焚烧汽车、投掷石头回击警察。学生竖起了路障，罢课开始扩展到全国的大学、高校。为抗议警察的行为，法国全国各地学生纷纷罢课游行，外省大学生纷纷起来声援他们的巴黎同学。法国作家、著名的左翼知识分子、"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让.保罗.萨特和他的伴侣西蒙娜.德.波娃等人发表宣言，号召工人支持学生。

5 月 10 日，学生占领了巴黎的拉丁区并筑起 60 处路障。防暴警察发动了进攻。巴黎 30 个高等院校中有 20 个举行了罢课，全国有 350 所高校被学生占领。工会联盟号召举行总罢工以抗议政府的镇压。萨特、列斐弗尔、高兹等著名左派又发表宣言，指出学生运动要求的不仅是改革大学制度，而且是避免社会的"异化制度"。

5 月 11 日，法国总理蓬皮杜匆匆结束对国外的访问返回巴

黎。为防止事态进一步扩大，他全面同意了学生的条件。但是，他的答复已为时过晚，学生们的口号是："我们越来越狂热了。"

5 月 12 日，工人举行罢工，声援学生的斗争，要求每周 40 小时工作制，保证每月 200 美元的工资。

5 月 13 日，学生、工人联合举行总罢工总罢课，巴黎 20 多万人涌上街头，高呼反政府的口号，进行大规模的示威游行。

5 月 14 日至 18 日，法国总统戴高乐访问罗马尼亚期间，巴黎局势大大恶化，学生占领学校，工人占领工厂，水陆空交通停顿，工厂停工，商店关门，整个巴黎陷于瘫痪。

罢课罢工席卷了法国 90 多个省，农民也要求提高农产品收购价和降低税收。

5 月 17 日，法国全部空中交通停止，邮局工人也举行罢工。学生们开始了从索邦学院到雷诺工厂的穿越巴黎的"长征"。

5 月 18 日，铁路交通瘫痪，巴黎公共汽车站、地铁线和邮局全部被占领。法国制片工人团结一致搅散了戛纳电影节。非共产党的工会组织号召工业的民主化。

5 月 19 日，法国社会党领袖要求政府辞职。戴高乐宣称："改革者，行！社会渣滓，不行！"学生们的回答的口号是："这种人，就是他！"

5 月 20 日，法国全部矿场和港口关闭。

5 月 22 日，法国参加罢工的工人已上千万，几乎是法国工人的总数。从汽车厂到飞机厂、从商店到码头、从电影院到殡仪

馆，……所有的工人都投入了罢工、罢市。工厂停止生产，商店停止营业，银行中止业务，海陆空交通全部中断，整个法国日常生活的全部秩序都陷入空前的混乱。

5 月 24 日，法国总统戴高乐从出访的国外赶回巴黎，在电视上呼吁恢复秩序，许诺给人民“分享参与”的改革。然而，他也无力回天。抗议和骚乱仍旧在发展。

5 月 25 日，工会代表工人与政府、资方进行三方谈判，达成协议。协议决定给工人提高工资，政府颁布《大学和教育改革法案》。但是，当法国总工会领导人到雷诺汽车厂宣布该协议，却遭到了工人的断然拒绝。

5 月底，形势激化，内战已一触即发。5 月 28 日这一天,总人口约为 5000 万的法国有 1000 万工人罢工,300 多个工厂被工人占领,30 多所大学被学生占领。这一天深夜 ,总统戴高乐神秘失踪。据当时法国舆论界和学者们后来评论 ,这一天如果不是法国共产党和它所控制的法国总工会坚持不搞暴力革命、不乱中夺权、坚持合法斗争,法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夺取政权不是没有可能的。

5 月 28 日，法国社会党人、左翼联盟领袖密特朗建议组织由他和著名左翼政治家法朗士为首的临时政府。戴高乐此时运用政治策略，释放被监禁的法国右翼领袖。

5 月 30 日，右翼发动了“为总统进军”的百万人反共大示威，右翼集团向左翼示威者开了火。戴高乐在电视上发表激烈的反共

演讲并答应新选举，解散国民议会，从而使局势得到了控制。这天，几十万人在巴黎街头游行示威支持总统的政策。次日，戴高乐改组了政府。

6 月 12 日，政府宣布禁止游行示威。

6 月 16 日，警察进驻巴黎大学，拘捕了学生运动的骨干分子。此后，工厂开始谈判，防暴警察占领了雷诺工厂，许多外国学生和工人被驱逐出境，工会领导人被开除，左翼组织被查禁，防暴警察占领索邦学院，等等。6 月举行议会选举，戴高乐派获胜。戴高乐为了避免“五月危机”的重演而进行了改革。国民议会于 10 月 10 日通过了建立大学自治和安排大学生参与高等教学方面的法律。局面逐渐恢复正常。法国回到了常态。轰轰烈烈的“五月风暴”到此基本结束了。

法国局势之所以如此，其中一个最重要的表现，就是从政府到社会，无论是参与运动、反对运动者还是维护秩序者，都保持着一种心照不宣的默契。拒绝暴力和流血，这是“五月革命”的共同底线。尽管政府一度严重错估形势，甚至认为法国已经走到了“内战的边缘”，尽管学生夸大其辞，将警察描绘成挥舞棍棒的德国党卫军，但从整体上看，事情并没有那么糟糕。一方面，学生们没有异想天开地去攻打政府；另一方面，政府同样心知肚明的是：巴黎大学被占领以及割据四方的街垒只是一种反抗的象征，而不是一种军事手段。有数据表明，5、6 月间，巴黎有 2000 多人受伤，其中 200 人受重伤，此外，还有 5 人死亡，但并不是

警察开枪所致。警察总署署长莫里斯•格里莫，从运动开始到结束，都尽其所能地避免流血悲剧的发生。所以，人们不仅看到他经常在拉丁区和示威者讨论，而且在警察开始变得粗暴、即将失控时，格里莫还亲自致函给每一位警察："打击一个倒地的示威者就是打击自己、打击警察的职业形象。"

法国的"五月风暴"给法国社会带来的震动是剧烈的，对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也是一个严重的警示。作为这场风暴的直接后果，它导致了 1969 年 3 月法国 900 万工人的总罢工，并引起全法国又一次工人学生示威浪潮。1969 年 4 月，戴高乐在全民投票中败北。"五月风暴"的直接后果是教育部长和总理先后辞职 ,最后导致总统戴高乐辞职。此后，"五月风暴"余波不止。1969 年意大利产业工人发动罢工运动，英国的矿工大罢工在 1974 年推翻了保守党政府，几个月后发生了葡萄牙起义。60 年代末、70 年代初，整个西方发达国家动乱不止，很不安宁。

"五月风暴"的间接后果是导致法国左翼力量——社会党党魁米特朗上台执政达 14 年之久 ,并与法国共产党合作，进行了一些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国有化改革。法国的高等教育法、新选举法、最低工资法、私人电台和电视台法都是这个运动的直接产物。运动使法国这个欧洲大陆式保守型社会向美国现代化社会进一步发展。法国对这个运动十年一纪念,是好是坏,众说纷纭。值得人们深长思之的是，"五月风暴"为什么会发生？生活在战后长期繁荣时期的发达国家的学生和工人到底为什么要造反？

对 1968 年的法国青年影响最大的事件，还是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投身“五月风暴”的人中，有不少自称信奉“毛主义”的“毛派”青年。他们模仿中国“红卫兵”，穿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绿军装，戴军帽，在巴黎的大街上挥舞着《毛主席语录》。“文化大革命”表面上提出的反苏联官僚主义、主张自发的群众运动、提倡打碎旧制度的首创精神、要求消灭城乡差别、工农差别、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这“三大差别”、反对旧教育制度、要求以巴黎公社的精神实行群众的直接管理等目标，都深深地感染和吸引了西方的青年。时至今日，仍可在一向十分注重市容的巴黎建筑物上偶尔发现红油漆喷的像以及有关口号的陈迹。从法国纪念“五月风暴”播放的当年文献纪录片中可以看到：游行队伍中有高举马、列、毛画像和语录牌的，最醒目的是“沿着毛主席指引的道路前进！”的巨大横幅。自 1966 年中国“文革”爆发以来，亲华的“法中友好协会”经常举办介绍毛泽东思想和“文革”讲座，吸引了许多大学生。1966 年至 1968 年，《毛主席语录》，法国人称为“小红书”，在法国再版四次。

毛泽东暴力革命的名言和“文革”的理论实践活动极大地鼓舞了苦闷和不满现实的法国青年。毛泽东关于游击战的“十六字决”通过法国文化部长马尔劳的《回忆录》成为巴黎的著名流行歌曲而在法国青年中广为流传。“五月风暴”中，法国青年挖铺路石与警察进行巷战和焚烧小汽车，法国舆论界把此“归罪”于暴力革命理论的煽动，似乎有些牵强。但号召红卫兵学生起来摧毁

自己付出那么多艰苦努力建立起来的现政权并再重建的继续革命理论和亲手发动红卫兵“破旧立新”向当权派夺权的惊世之举,对当时世界性的群众运动确实有很大影响 ,尤其极大地震动了不满现实、早就跃跃欲试对现政权的法国青年,使他们有了理论依据和光辉榜样。他们高举“十年太长了!”“把戴高乐送进档案馆、修道院!”“建立一个新社会!”“再创一个巴黎公社!”的旗帜奋起战斗。

“五月风暴”高潮中,巴黎大学的学生也响应“学生与工农相结合”的号召,冲破警察重重阻拦,步行去郊外的雷诺汽车工厂与工人联合斗争。因警察阻拦,一学生掉进塞纳河里淹死。

“五月风暴”高潮前夕，1968 年 4 月 16 日，毛泽东发表支持美国黑人斗争的声明 ,在全世界引起强烈的反响 ,这恰恰给法国青年学生提供了一个团结战斗的号召。运动中 ,法报曾呼吁法国“最好能有一个既是戴高乐又是毛泽东的那样一个人”。其中具代表性是法国著名评论家罗伯特•纪兰在 1968 年 1 月 6 日评论说：如果把中国的情况搬到法国的话,不妨假设 ,我们的“红卫兵”即造的学生 ,也应该找到一个同盟者和首领,以便抗议和攻击现存制度。这个像一样的操纵者,应该就是戴高乐将军本人。最好能有一个既是戴又是毛的那样一个人,出于对自己所建立起来的一切都不满的心理,决定“统统砸烂”,然后加以改造和更新。如果是这样的话,就应该由他来培养出一个科恩•本迪特----法国学潮时的学生领袖,并且制造出一批“狂热分子”,就像中国的

红卫兵那样 ,指挥这支突击队从事破坏和建设。

1967 年,法国、西欧有一批洋红卫兵不远万里访问中国 ,被康生接见 ,并参观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韶山。中国当然不会为法国培养大批的“狂热分子”和洋红卫兵。他们的意义不在于人数,也不在于他们回去后起了什么作用,而在于他们“留学”中国“文革”专业的影响。“五月风暴”中,法国“左派”、“毛派”组织的报刊书籍的形式几乎就是中国“文革”时的报刊书籍的法文版。它们的报纸头版右上角也是方框框住的“毛主席语录”,刊物和书籍前扉页和每篇文章的前面也是“毛主席语录”,文章中引用毛泽东的话也是用黑体字,书籍封面封底一般都是红色,法文版的《毛主席语录》如中国的包装一样，名副其实的“小红书”。广泛传播的“文革”对法国“五月风暴”的影响不仅存在,而且难以估量 。

Ziling.com

Ziling.com

CGT
SYNDICAT RENAULT
ANTISOCIALES
SYNDICATS C.G.T
BOULOGNE BILLANCOURT
F S M
Ziling.com

坚决支持法国工人学生正义斗争
Ziling.com

坚决支持法国革命人民的斗争
坚决支持法国革命人民斗争
Ziling.com

无产
世界
联合
坚决支持
全法国革命人
民的斗争！
Ziling.com

法国人民
革命斗争示意图

## 第 1005 回：闹学潮，文革在日本走红　说贺龙，福州刘培善自杀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是全世界大刮红色革命风暴的年代。有人评价："那是一个全世界的年轻人用热血和理想去企图改变这个世界的年代。"

在中国大地上如火如荼开展的这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震惊了全世界，毛泽东的话在全世界的大学生中受到喜爱。中国的近邻日本，毫无例外的也受到了深刻影响，许多日本学生和工人把毛泽东视为世界革命的导师，他们认真学习毛泽东的著作。1967 年，《毛泽东语录》在日本发行了几十万册，《东方红》等革命歌曲的唱片也十分走俏，人们甚至排几小时队等在书店门口。东京、大阪等地出现了抢购毛泽东著作的风潮。当时不少日本大学把《毛泽东语录》用作中文教科书。羡慕中国、学习中国是那个时候席卷日本的潮流。"日本可比中国差多了……"这是当时许多日本人的想法。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席卷日本岛国，给予日本左翼青年们极大的精神鼓舞。他们在游行中，常常将毛泽东的画像高高举起，把毛泽东的语录写在横幅上，高呼着"毛泽东思想万岁，万岁，万万岁"与"造反有理"同警察展开肉搏，设置路障，占领一个个制高点，然后放高音喇叭，困守到底……

当时的激进青年甚至希望日本整体加入社会主义中国，由毛泽东来领导。

1968 年 3 月，日本共产党左派领袖大琢有章成立了"毛泽

东思想学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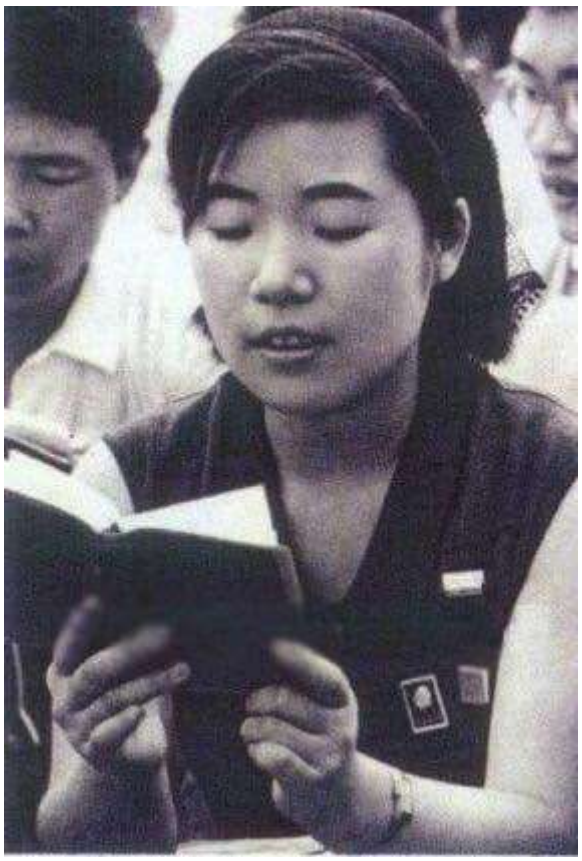
新岛淳良在东京大学自主讲座介绍“中国的大学与红卫兵”之后，冠以“红卫兵”头衔的日本青年学生的革命组织，便如雨后春笋般出现，不仅有大学生，还有高中学生的解放组织等等。这些日本的“红卫兵”，相信马克思“暴力是历史的助产婆”和毛泽东“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学说，相信以暴易暴，用革命的手段把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他们自制火药，用猎枪武装自己。东京的“山谷红卫兵”，高呼“赶走剥削者！解放山谷！”的口号袭击了山谷警察署，烧毁警察的自行车，打碎建筑物的高墙。甚至有一些“红卫兵”冲击了美国大使馆，趁大使馆警戒不严之际，爬上大使馆的房顶，扬起怀中早已准备好的红旗达十分钟之久。弹弓、粪便都成了打击美国大使馆的武器，连撒尿都要冲着美国大使馆的方向。

毛泽东说，看一个青年是不是革命的标准只有一个，“这就是看他愿意不愿意，并且实行不实行和广大的工农群众结合在一起”，愿意乃革命的标志。

1968 年，日本大阪大学农学部四年级的学生北田，和几名与他志同道合的青年学生，离开大阪，去了千叶县的三里，这个地方当时因为反对修建新国际机场的斗争而出名。反对者认为，该机场是“为美帝侵略亚洲服务”的。北至北海道，南至冲绳的全日本的革命青年，“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被毛泽东思想所鼓舞的北田和他的战友们成立了红卫兵组织，并

油印出版了几十期《红卫兵战报》。他们读毛泽东的“老三篇”，读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故事，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在三里，北田认识了当时日本的“邢燕子”山下真子，并和这位“立志扎根农村”的女孩成了革命恋人。

这些热衷于日本革命的年轻人，甚至给中国的领袖毛泽东写信，宣誓终身以宣传和实践毛泽东思想为己任。他们中的有些人发誓要解放全人类，为此，他们打算去中国学习游击战术以支援世界革命。后来，真的有一些极左“赤军”劫持飞机去了朝鲜。“赤军”战士奥平刚士、安田安之等，为了支援巴勒斯坦人民的斗争，牺牲了他们年轻的生命。



日本青年在学习《毛主席语录》，从中汲取精神力量。

日本齿轮剧座团成员访问韶山毛泽东同志故居，他们把毛泽东视为世界革命的导师。

1967 年，东京大学医学部的学生因不满研修医制度而举行了无限期罢课，这在循规蹈矩的东京大学无异于投下了一颗重磅炸弹。医学部立即做出强硬反映，处分了 17 名学生骨干，其中开除 4 人。但是受到处分的学生中，有一名当时人在九州，不在学校，并且就住在医学部部长丰川行平的外甥家。但医学部对这种明显的冤案视若无睹，坚持处分。医学部的学生被激怒了，他们奋起反击。

1968 年 5 月 27 日，日本主要高等院校 168 所的学生和教职员成立“全学共同斗争会议”， 简称“全共斗”。几乎所有教职工和学生都不同程度地卷入了运动。

东京大学医学部的学生于 1968 年 6 月 15 日占领了东京大学的象征——安田讲堂。

安田讲堂是现代日本四大财阀之一安田财阀创始人安田善

次郎捐建的，因此叫做安田讲堂。1925 年 7 月 6 日竣工，至今已有八十多年的历史。它被定为日本的国家级文物，即意味着它不仅是东京大学举行公共活动的场所，同时也是现代日本历史与文化的符号。

东京大学属官办大学。自恃腰杆坚硬的校方不甘向学生示弱，便请来大批警察，强行驱赶占领安田讲堂的医学部学生。这犹如火上浇油，一个学部的问题随即扩展到了全校。东京大学的大多学生和教师都行动起来，投入到激烈的抗争中。

正是四海翻腾，五洲震荡，亚非拉地区独立解放运动风起云涌之际。此时，一个信息又被披露：美国军方长期向日本包括 19 所国公立大学在内的 25 所大学和包括 4 所国公立研究机关在内的 9 所研究机关提供研究基金。研究的主要方向集中于医学和生物学，而且全是细菌和病理研究。研究项目虽然不直接是军用项目，但是能够很容易地转为军用。当时正好是美军开始在越南喷洒除草剂的时候，知道真相了的学生们都为被作为杀人犯的帮凶而利用大为愤怒，高喊出了“反越战，反安保（反对日美安全保障条约）”的政治口号。

一时，东京大学成了日本文化大革命的中心。全东京和全日本各大学的学生源源不断地汇聚到这里，予以支持。

东京大学成为日本文化大革命的中心

东京大学学生占领了安田讲堂，震惊了全日本。

日本青年高举毛泽东画像和革命标语，走向街头。

日本的文革

“毛泽东思想万岁”的旗帜，在学生占领区内高高飘扬。

“革命无罪”、“造反有理”，在当时的日本是最响亮的口号

普通学潮酿成了政治风暴，日本政府派出了大批警察，围攻占领东京大学安田讲堂的学生。学生们斗志昂扬，众志成城，摆出了一副“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的架势。

双方对峙时间长达半年之久。

刚开始的时候，警察还是比较和缓，对不少学生的过激行为

采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但是从 1968 年下半年开始，警察的态度趋向严厉，这是因为当年 9 月 4 日一名警察在日本大学被学生投出的石块造成颅骨骨折而死亡，这件事使警察和学生彻底对立。

到了 1969 年 1 月 18 日至 19 日，警视厅机动队与占据讲堂的青年学生之间的攻守大战。政府专门拨款 7 亿日元为警察购置催泪武器。

1 月 18 日凌晨，机动队的 8500 名队员开始对不足 700 名学生进行镇压。下午 13 时点 16 分，警视厅机动队使用推土机，喷水车，催泪弹，甚至用直升飞机从空中直接播撒催泪剂，对安田讲堂展开大规模进攻。经过两天的搏斗，终于在 35 小时后的 19 日下午 17 时 46 分占领了安田讲堂。安田讲堂中的青年学生全部被捕，14 分钟之后，钟楼上的红旗倒下。从 1968 年 11 月 22 日以东京大学、日本大学为主的反战学生在安田讲堂前“胜利会师”算起，青年学生控制安田讲堂近三个月。

第二天，1969 年 1 月 20 日，东京大学毕业的内阁总理佐藤荣作视察现场，见到母校的象征安田讲堂劫后惨象，不禁怅然泪下。但是大多数传媒则认为那不是因为伤心而落泪，而是被残留的催泪剂给熏的。

而随着安田讲堂的陷落，以全球性的左翼运动为背景、在 1968 年走向高潮的日本学生运动迎来了转折。东大安田讲堂事件以后，虽然东京大学，东京工业大学等还在继续斗争，但整个

学生运动的中心从关东转到了关西，主要以京都为中心进行，而且从一开始就是暴力冲突。此时学生们已经走向过激，后来留下不少传奇的“赤军派”就是这个时候出现的。武器也从石块，棍棒发展到了燃烧瓶和炸弹。并且到处有学生袭击警察企图夺取枪支的行动。

1969 年 9 月，日本赤军派（共产主义者同盟赤军派）在东京成立。赤军派认为，日本和世界的现状“正处在对帝国主义与资产阶级公开发出战争宣言的阶段，在日本要开始直接地战斗”。它所确定的作战方针是：绑架要人做人质，袭击军事基地，武力筹集资金以购置枪支弹药。赤军派成员约有 400 人，分布于 23 个都道府县。他们头戴红色钢盔，上写“赤军”黑字。

赤军派一出现就轰轰烈烈，一鸣惊人。他们袭击警察派出所，劫持日航“淀”号飞机，夺取银行……如金猴孙悟空一样，把偌大的岛国闹得天翻地覆。日本政府对他们多次进行武装围剿，赤军派一直坚持到 1972 年 2 月。后来，一些成员出走中东，投入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成立了“日本赤军”。

5 月 8 日晚，福州军区政委刘培善在北京自杀。

1968 年 4 月，北京福建学习班在后勤学院大礼堂召开军区党委扩大会，参加会议的有在京常委韩先楚、刘培善、廖海光、朱绍清、邓克明、严政以及军区一批军师级干部。4 月 25 日。韩先楚在会上宣读一封对刘培善的检举信，于是党委扩大会变成了“斗刘会”，批判刘培善是“阴谋家”、“野心家”、“杨成武代

言人”、“军造会后台”、“反军夺权”、“反韩乱军夺权”，批斗过程中还有人往刘培善腰上打了一拳。5 月 8 日晚，刘培善在锅炉房上吊自杀。

5月18日，周恩来就刘培善自杀后处理问题要军委办事组组长黄永胜、副组长吴法宪、北京学习班负责人谭甫仁转告刘培善妻左英：“中央认为，刘培善同志自杀应由自己负责。但由于其它客观原因，不能说是畏罪自杀，也不能说是叛徒。刘培善同志是几十年革命战士，他的家属应享受革命干部家属待遇。他的骨灰，同意放在南京雨花台。”

5月14日，周恩来就北京大学校文革要求在16日召开批斗彭真、刘仁、万里、吴子牧、宋硕大会事批示：彭真等5人“不能到场”。“现在北大双方武斗还未停止，如何能开这样批判大会？”

5 月 16 日，康生在人民大会堂接见贺龙专案组的全体人员。两天后，5 月 18 日，贺龙专案组给江青、康生、陈伯达写了一份《贺龙专案组案情进展综合报告》，说：

“贺龙专案组自去年 9 月 13 日建立，现有办案人员 24 名，负责审查同贺龙有关的案犯共 23 名。其中省、军级以上干部 19 名，(内有政治局委员 2 名，中央委员 1 名，候补中央委员 1 名)。”

当时，除“贺龙专案组”外，还有总参谋部的“王尚荣专案组”；总政治部的“金如柏专案组”、“李贞专案组”；装甲兵的“许光达专案组”、“顿星云专案组”；通信兵的“陈鹤桥专案组”、“樊哲祥专案组”；工程兵的“谭友林专案组”；空军的“成钧专案组”、

“向黑樱专案组”；北京军区的“廖汉生专案组”；成都军区的“黄新廷专案组”、“郭林祥专案组”；武汉军区的“杨秀山专案组”；新疆军区的“张仲翰专案组”；国家体委的“荣高棠专案组”；“李井泉专案组”等 18 个分案组。这些分案组由各总部、大军区、军兵种的党委领导，但接受“贺龙专案组”的指导，并提供旁证材料。

## 第 1006 回：毛泽东，再次批打倒一切　搞清队，清华园百日武斗

5 月 16 日，毛泽东看了国防工业军管小组 5 月 14 日上报的关于请毛泽东接见本系统专业会议代表的报告。报告说，七机部某办公室正在“世界革命的中心——北京”召开会议，“到会的大部分同志来自祖国各地，他们恳切请求主席接见。”毛泽东在“世界革命的中心——北京”下面划了两道杠，批注：

“这种话不应由中国人口中说出，这就是所谓‘以我为核心’的错误思想。此事请康老在碰头会上提出并讨论一下措施。”

“康老”即康生。

5 月 18 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发出经毛泽东批准的《重要通知》。《通知》指出：“今后，不论在报刊上（包括各种小报），在内部文件中，在各种讲话中，特别在接待外宾时，一律不要再用‘世界革命的中心’的这种说法。对于‘以我为核心’的错误思想，应经常警惕和批判。”

5月20日，毛泽东接见在京参加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的全体学员和全国煤矿会议代表。在此之前，中央文革小组已通知参加北京学习班的所有学员，必须限时回到学习班报到。

毛泽东与各省负责人一一握手，问候几句。当与山西刘格平握手时，毛泽东也说了几句话。

接见结束后，山西各大群众组织的学员不等刘格平上车就把他团团围住，山西学习班的副组长、“兵团”司令刘灏挤到了刘

格平身边，轻轻地拉了拉学习班组长刘格平的衣襟，小声问道："主席讲什么啦？"

围在周围的人都在等着，他们想问的也是这句话。

刘格平说："主席对我说：你要拥军，你只有拥军，他们才拥政。"

"就这些？还说了些啥？"

人群中一片追问声。

刘格平摇着头说："没了。"

"红总站"的头头们一下子全发呆了。特别是那个杨成效，当时就张口大骂："照这么说，他张日清他妈的就没事了？"

毛泽东在这次接见时，首次明确表示不保贺龙了。他说：

"贺龙这个人，我先是保他的，但后来知道他搞阴谋，和成钧他们一起搞阴谋，搞颠覆，我就不保他了。"

晚上，毛泽东与文革碰头会成员及董必武、李富春、李先念、陈毅、叶剑英、聂荣臻、徐向前等谈话时，批评了"打倒一切"的做法。他说：

"听说军事科学院'红造派'在造叶剑英的反，黄永胜同志要给他们做些工作。他们统统要打倒，包括叶剑英、粟裕、王树声、钟期光、宋时轮等，都打倒怎么行？钟期光没有多大政治问题吧。说粟裕在新四军军部发了一个电报给一个日本人，投降了日本，我就不信。这个人是革命的，同敌人谈判是有可能的。现在就是有些人，认为和敌人接触了，就不得了啦。其实，同敌人

接触得最多的是我，其次是周总理。”

“干部统统打倒了，那怎么行？外交部也没有统统打倒。有的人可以一边站嘛，站几年还可以工作。不要轻易点名，统统打倒了，自己就舒服了？”

“杨勇这个人有工作能力，我看不是反革命，现在要安排工作。”

“姚依林也打倒了？我看这个人很老实。”

“我们是共产党，包括在座的各位副总理、各位老帅，就是不要怕群众。人家要打倒你们，有什么了不起？总是有一点原因嘛！有错误，应该检讨。军事科学院要打倒叶剑英，因为你是院长嘛，很多学院也归你管。人家要打倒你，总得找些材料。那些材料我都看了，那是不过硬的东西。”

“邓小平，你们总要打倒，又没有拿出多少材料来，你们总想打倒他，我就不想。他是犯了错误的，还是人民内部矛盾嘛。”

“现在黄镇、耿飚怎么也要打倒了？耿飚可以用，不当大使就是了。”

“我就不相信陈再道会要整我，陈再道当时并没有害我之意。”

“彭绍辉怎么也打倒了？听说他同‘百万雄师’有点关系，同‘百万雄师’有点关系就不能工作了吗？不管有什么错误，过一个时期统统算了。中间派要用，右倾的人有一点也没有什么要紧。只要不是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都要用。”

“现在有一种说法：要抵制错误的领导。这样在群众中是可以的，但在军队中不能这样。如果各人按各人的意见办，军队怎能打仗？军队各人都按各人的意见办怎么行，这样军队就不像个样子了。”他指着林彪说：“还是你说的：‘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

林彪回答说：“这两句话是很普通的两句话。还是主席说得好，‘在自己的意见被否决之后，不得在行动上有任何反对的表示。’要说对的就执行，每个人都觉得自己对，行动起来各行其是，不就乱了套了吗？”

谈到国际形势时，毛泽东说：“法国 17 日罢工，19 日发展到二百多万人，九十个省罢了工，铁路也瘫痪了。1917 年到现在没有什么大罢工，世界大战后很少有这样大的规模。欧洲工人阶级是有革命传统的，世界革命应该回到法国去了。法国 18 所大学，现在大学生占领了 16 所。他们说，我们是无政府主义。现在他们就搞得很好嘛！镇压是不行的。事情到一定的时候是要变的。巴黎公社，开始马克思没有参加，是无政府主义，后来还不是有了政府吗？”

5 月 21 日，邓小平写信给汪东兴，要求“见主席，如果见不到主席，亦希望见见汪东兴。”

汪东兴将邓小平来信报毛泽东，毛泽东指示：“在 23 日中央文革碰头会上读一下邓来信，议一下，征求大家的意见是否与邓谈话。”

结果，在 23 日的中央文革碰头会上，大家不同意与邓小平谈话，邓小平的要求只好被拒绝了。

5 月 13 日，姚文元报送新华社内部稿《北京新华印刷厂军管会发动群众开展对敌斗争的经验》。内部稿写道："北京新华印刷厂军管会在发动广大职工开展对敌斗争中，引导群众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团结大多数，狠狠地打击和孤立一小撮阶级敌人，做到了稳、准、狠。他们的经验是：一、对于广大革命群众，必须坚决依靠，也要善于引导；二、对于犯了严重错误的人，必须严格要求，也要注意团结；三、对于一小撮阶级敌人，必须狠狠打击，也要分化瓦解，指明出路。"

5 月 15 日，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下发《关于清理阶级队伍工作中几个问题的通知》，布置清理阶级队伍的工作。

5 月 19 日，毛泽东在姚文元报送的《北京新华印刷厂军管会发动群众开展对敌斗争的经验》上批示："文元同志：建议此件批发全国。先印若干份，分发有关同志，然后在碰头会上宣读一次，加以修改，再加批语发出。在我看过的同类材料中，此件是写得最好的。此厂情况，我已从个别同志那里听过两次。你是否可以去那里看一看，问一问？"

同时，他还在这份材料的一些话下面画了粗线，如："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是跟在群众后面，看着群众这样乱揪斗下去，当群众的尾巴呢?还是站在群众前头，引导群众，指导运动，把群众运动纳入毛泽东思想的轨道呢?""对于犯了严重错误的

人，必须从严要求，也要注意团结。”毛泽东还在材料中“这是一些‘推一推就可以掉下去，拉一拉就可以站过来’的人”下面画了双线。

5 月 25 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发出中发[68]74 号文件：《转发毛主席关于〈北京新华印刷厂军管会发动群众开展对敌斗争的经验〉的批示的通知》。

《通知》说：“望你们.....把清理阶级队伍这项工作做好。”

当天，内蒙滕海清、吴涛在内蒙古乌兰察布盟革委会汇报会谈挖肃斗争清理阶级队伍。

5 月 28 日，王效禹在济南、张春桥在上海都在谈清理阶级队伍。

5 月 29 日，冼恒汉在甘肃谈清理阶级队伍。

“清理阶级队伍”，简称“清队”工作在全国展开。其实在此之前，上海、北京已经布置了“清理阶级队伍”的工作。

1967 年 12 月 20 日，徐景贤在上海宣传界文艺界谈清理阶级队伍。他说：

“清理阶级队伍，实际上包括两方面：首先是对敌斗争问题，然后是树立无产阶级阶级队伍。”

1968 年 2 月 3 日，谢富治在北京谈清理阶级队伍：

“我看江青同志给文艺界的讲话，指出要他们揪出坏人，清理阶级队伍。我看这讲话很好，起了很好的作用。不仅文艺界、学校、工厂、机关，尤其是大学，也很适用。当然，抓坏人，要

像江青同志所讲的要稳、要准、要狠。所谓稳，就是要慎重；所谓准，就是不要弄错了；所谓狠，就是要抓最坏的，不要让坏人跑了。”

1968 年 4 月 11 日，上海王洪文布置清理阶级队伍的工作。他说：

“对清理阶级队伍要有组织有领导有步骤地进行，不可放任自流。”

“清理阶级队伍是指钻进我们队伍里的坏人：1、按中央规定的公安六条；2、走资派、叛徒、特务、里通外国；3、有严重的重大历史问题还没有弄清，而在文化大革命中又干了不少坏事，要清理的；4、犯大量的贪污盗窃和打砸抢抓的人要清理。”

4 月 22 日，许世友在江苏省暨南京市革命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讲话时，也提到了“清理阶级队伍”：

“我们要有领导有步骤地清理阶级队伍，纯洁革命群众组织，提高战斗力。各个群众组织一定要有坚强的阶级观点，坚决把混进自己队伍中的那些叛徒、特务、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统统揪出来。各个组织的坏人，要发动各个组织的群众自己去揪。要警惕阶级敌人以揪坏人为名，混水摸鱼，乘机打击无产阶级革命派，甚至制造分裂，妄图把矛头引向新生的革命委员会。我们一定要严格区分两类矛盾，对人民对同志一定要和，对阶级敌人一定要狠。”

5 月 7 日，谢富治在北京再谈“清理阶级队伍”需要注意的

问题和方法：

“要执行党的政策，要文斗，不要打人，不要游街，要做好工作，交代政策，指出出路，要他们赎罪立功，检举坏人时，要防止起负作用，不要在批斗时替坏人散布流毒。

搞好这一工作最重要的是充分发动群众，群众还没有发动起来时，可用检举箱，背靠背的检举，揭发坏人；群众发动起来以后，要求写大字报揭发批判。大字报、检举箱还可以并用，有些没有把握的问题，或者怕得罪人的，可以在检举箱揭发。”

而此时，北京清华大学两派的矛盾也在不断地升级。

3 月 27 日，被“团派”抓去的原校党委宣传部副部长卢征启从“团派”关押点跑了出来。“团派”又于当晚匆忙抓走工物系教师、“414”派办公室干部贾春旺等人。

4 月 4 日晚，一直监视卢征启家的“团派”保卫组抓走卢征启的弟弟、北京第一机床厂工人卢征敷，时年 28 岁，毒打后用擦车纱布堵住其嘴，塞入后车厢，结果被活活闷死。

4 月 14 日、15 日，“团派”关押了与卢征启一起支持“414”派的清华大学中层干部文学宓、李康、饶慰慈、刘承娴。

为了报复，“414”派也于 4 月 20 日抄了原电机系党总支副书记、代书记陶森的家，把陶森绑架至“414”派占领的科学馆。陶森，高中毕业后做过几年北京东单区委的小干事。1956 年，为了响应党“向科学进军”的号召，她利用工作之余的时间恶补已经荒废的功课，三个月后居然考上了清华。但清华党委没有让

她向科学进军，而是将她培养成一名党的干部。绑架陶森，是因为她代表 31 名干部批判了“414”派的干部政策。

4 月 22 日晚，“井冈山”在新航空馆召开了一场空前严肃的总部会议，中心议题是清华要不要武斗？一些总部委员反对武斗的声音，很快被那些极力主张打的声音所淹没。

第二天，4 月 23 日清晨，“414”占领旧电机馆。他们原定这天上午在大礼堂召开批斗电机系总支书记陶森的大会，不料“团派”在凌晨抢占了大礼堂。

这天上午，清华两派还为争抢一辆救护车，双方用大弹弓互射达 3 小时之久。

当天，“团派”组织进攻“414”派重要据点学校科学馆，以求解救被“414”派关在里面的陶森，未果。

接着，清华园里第一场比较有规模的武斗战役在一教二教对面的旧水利馆发生。

战斗进行不久，守城的“414”已现寡不敌众之势，他们被驱赶压缩在顶层继续负隅顽抗。“团派”的人爬上了房顶，地面上也搭起了云梯，从两个方向通过四楼的窗户向里发起强攻……

陆续有进攻的学生从四楼窗口处跌落下来。就在阵地最后被攻克时，人们惊讶的发现，从四楼窗口飞身跃下一个人。那是个宁死不当俘虏的“414”守楼战士，他身手真是了得，从四楼一下子就跳到几丈外的一个平房顶上，踉跄几步便平安逃走。

那天从二校门到大礼堂之间聚满了观战的学生。北京卫戍区

也派来大量的解放军战士试图控制局势。战士们徒手进行规劝，在两派学生之间努力做成人肉屏障。两派的学生在外面举着《毛主席语录》相互对骂，双方的高音喇叭里也播放着激励人心的乐曲，或声嘶力竭的革命口号。虽然真正手持钢钎参与攻防战斗的武斗战士并不多，但现场对骂，呐喊助威的两派学生，当然也包括一些爱看热闹的旁观者，总数达数千人之多。

看到楼里的“414”派处于劣势，现场观战的“414”派学生看不下去了，许多人流着眼泪撕扯那些实行隔离的解放军战士，骂他们见死不救。而攻城的“团派”学生也和死死抱住他们不放的解放军战士们打成一团。那些无辜的解放军战士，即便被学生们厮打出血，仍旧是打不还手骂不还口。

北京卫戍区副司令李钟奇也很快赶到现场制止武斗，并留下停止武斗的书面意见。

从这天开始，清华大学拉开了著名的“百日武斗”序幕。两派打打停停，停停打打，较量了 3 个月，打死数人，伤残者不计其数。史称“清华百日大战”。

4 月 27 日，清华大学土木建筑系学生姜文波，在清华大学学生宿舍二号楼内被“团派”成员追赶，最后在二号楼的西北部坠楼致死。

4 月 29 日下午，为抢夺两辆运送大米的汽车，“团派”和“四派”双方再次大打出手。在“团派”前往九饭厅抢粮时，清华大学自动控制系 904 班学生谢静澄，在九饭厅前的广场上，被“团

派”的汽车撞倒，碾压致死。

清华园分为东西两区，其分界线是昔日著名的京张铁路路基。西区是一大片风景地和少量建筑物，东区则有一幢幢宿舍、饭堂、教学楼馆、浴室及实验室。

中央主楼是东区的主要建筑。它的外观厚重庄严，室内门厅高大，楼层空间很高，连走廊都有两三米宽，十分气派结实，其建筑风格与莫斯科大学相同。此时，“414”派抢占了中央主楼、东区浴室、5 号楼以及西区大礼堂附近的科学馆；“井冈山”派则占领了 7 号楼、8 号楼和西区大礼堂、旧电机馆、力学馆。

5 月 1 日晚，在天安门城楼上，陈伯达对蒯大富说，要停止武斗。

5 月 2 日，清华大学一方试图断水，另一方不同意，于是再起蜂烟。

5 月 14 日晚上 19 时左右，“414”占领汽车楼、焊接馆。

5 月 15 日傍晚，清华大学无线电系 64 级无 0 1 班的“414”学生孙华栋，在校园内骑自行车从动农馆返回科学馆，途经一教学楼时，被“团派”同学绑架至一教楼内，遭到清华技工学校一些中学生毒打，领头的人绰号“狗熊”，是清华大学自控系 67 级学生，团派“前哨”广播站负责人。可怜孙华栋内脏完全被打坏，全身 80％皮下出血，左腿骨折，两臂打烂，喝水后死亡。

孙华栋死亡后，被“团派”人员送到阜外医院，然后弃尸医院，逃之夭夭。而“狗熊”也为此付出了终生的代价。

5 月 16 日，双方打算交换战俘，未成，仇恨膨胀，冲突升级。

5 月 17 日，“414”派占领了清华西主楼。5 月份，他们在研究建立“414”武斗根据地的方案时，曾有人提出占领位于中央主楼的西南的精密仪器系的系馆----9003 大楼。但精密仪器系的“414”负责人说，9003 大楼里有大批的精密仪器，还有全国高校唯一的恒温实验室，“如果因为我们占领而遭到损坏，我们负不起责任。”于是决定放弃占领 9003 大楼。

## 第 1007 回：为救美，叶志江甘当俘虏　陈育延，《苏武牧羊》催泪下

清华大学无线电系学生孙华栋的死让“团派”的总部委员陈育延深感震惊，“都是为了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只是认识不同，为什么一定要你死我活？”陈育延将她的想法对她当时的恋人，刚从内蒙回到清华大学的力学系学生叶志江讲了。他们本来就反对武斗，面对武斗所造成的惨烈现实又无能为力，于是决定“弃官”回家，远离武斗。

5 月 19 日，陈育延将一个装有十几本日记的书包放在前来接她的叶志江的自行车后架上，准备离开清华回家。当他们推着自行车走到大礼堂时，前面有两条路通向校门，右手一条路要经过“414”派占领的科学馆，左手一条路是经过“团派”的据点。叶志江和陈育延开玩笑说：“敢不敢从右面这条路走？”

陈育延毫不犹豫的向右边走去。当时，诺大清华园里几无行人。他们在右边走了没几步，就被科学馆屋顶上放哨的人发现。拳头大的石头用特制的大弹弓投向他们的前后，以示警告。

陈育延性格刚烈，几块石头反而激怒了她，不肯接受叶志江后退的建议，执意前行。

当他们走到科学馆大门时，十几个手持长矛的“414”学生从大楼南侧的小路上冲了出来，成月牙形形围住他俩。陈育延见状，叫叶志江骑车快跑，说：“书包里的日记绝不能落在‘老四’的手里！”

叶志江深知陈育延书包里日记的重要性。这十几本日记里不仅有“团派”总部历次会议的记录，也有她搜集的反康生材料和孙华栋被打死的有关情况。当然，日记里还有大量不能公开的个人隐私。这些日记要是落到“老四”的手里，势必会在清华园成为十分轰动的新闻，并给“团派”和陈育延造成很大伤害。

此时已不容叶志江多加考虑，他只对陈育延喊了一句：“3天后我来救你！”便骑车跑了。无悬念，陈育延当然也成了“414”的俘虏被抓了起来。

叶志江不负承诺。3天后，5月22日黄昏，夕阳西下，在落日的余晖笼罩下，作为《井冈山杂志》和《理论批判》主编的叶志江，在《井冈山报》编辑部大门上留下了他的“遗书”，在皮带后面藏了一把小刀，便一步一步地走向科学馆的大门，颇有“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感觉。因为他很清楚，自己没有三头六臂，也没有特异功能，不可能像蜘蛛侠一样，将陈育延从铁壁重围中救出，此去只是为了证明自己并非不管他人安危，临阵脱逃的懦夫。

大门口放哨的学生认出是叶志江后，很是惊讶，问他有什么事。

叶志江指着背在肩上的书包说：“我给陈育延送衣物。”

放哨的学生很和善地对他说：“你将东西留下，我帮你交给陈育延。”

叶志江答道：“我要亲自交给陈育延。”

放哨的学生迟疑了一下，告诉他："我要请示领导。"便进了大门。

几分钟后，科学馆的"卫戍司令"陈楚三出现在大门口。

陈楚三的父亲陈潭秋是出席中共一大的 12 个代表之一。1943 年，陈潭秋和毛泽东的弟弟毛泽民一起在乌鲁木齐被盛世才秘密杀害。当时，陈楚三才出生两个月。《史记•项羽本记》记载，楚南公曾曰："楚虽三户，亡秦必楚"。陈楚三的名字典出于此。

陈楚三问清叶志江的来意后，推了一下架在鼻梁上的眼镜，十分慷慨地说："好吧，我让你进去。"仿佛是被准许他去参观一个"闲人免进"的军事基地。

进门前，大概是怕他有前来侦察科学馆工事的意图，陈楚三让他的手下用一块黑布将叶志江的眼睛蒙上。

从这一刻起，叶志江在黑暗中生活了将近 70 天，未见阳光。

叶志江摸索着被带到了一个大房间里。摘下眼套，陈楚三很客气的对他说："请坐。"

叶志江坐下。陈初三接着说："把书包给我吧，我替你交给陈育延。"

叶志江紧紧捂住书包说："我要亲自交给陈育延！"

真是敬酒不吃吃罚酒，只听到陈楚三身旁的人一声断喝："他妈的，进来了还不老实！给他一个下马威。"说时迟那时快，叶志江被人从椅子上拉起，他还没明白过来是怎么回事，胸口即遭

到猛烈的一击。刹那间，他只觉得所有的气管支气管，甚至于毛细气管都被棉花堵塞了，一点气也喘不过来。

“哇，”他的第二思维立即幸灾乐祸地评论：“原来胸部挨打是这种滋味。”

容不得他去细细品味这第一次打击的味道，身体的各个部位便遭到六、七个人地毯式的轮番轰炸。浑身的痛楚让他害怕起来：莫非自己真的会像孙华栋一样被活活打死？

他突然想到：“殴打孙华栋的人的本意并非要置他于死地，而是出手太重或打在了要害处，导致了孙华栋的死亡。这些殴打我的同学如果也失手把我打死呢？”为了便于让他们掌握分寸，适可而止，叶志江有意将自己的呻吟声由高而低，以至于无声。

这一招果然奏效，旁边观战的几个女学生忙阻止说：“不要打了，他不行了。”

叶志江心里那个感动呀：“啊！伟大的女性！她们可以引发战争，如外国的海伦和中国的陈圆圆；她们也可以解救苦难，如天上的观世音和人间的清华女学生们。”

叶志江被活着抬走了。在另一个房间，他躺在地上“会见”了科学馆里第一个难友杨立人。他似乎也刚被殴打过，正在呻吟中。

这杨立人在清华文革中也小有名气。说起来，他还是杨开慧的亲戚，父亲和青年毛泽东有过交往。他在大字报上署名“金戈铁马”，观点也比较极端，曾经炮打《红旗》杂志调查员的文章。

叶志江原以为他是一个豪爽型的汉子。岂料眼前的杨立人不仅举手投足，而且讲话的声调都非常“娘娘腔”。

“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

辛弃疾的《京口（今镇江）北固亭怀古》一词慷慨悲壮，豪情无比。如今，这如虎的“金戈铁马”忽然娘娘腔起来，让叶志江感到颇为滑稽。

娘娘腔的杨立人倒是很有些地下工作的经验。他一边大声哼哼，一边小声和叶志江交换“情报”。原来，他也不是战场上的俘虏，而是从外地回校时，被“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中的“414”伏兵逮个正着。之所以抓他，是因为他炮打《红旗》杂志，被“414”视为反动学生。

自从孙华栋被“团派”的人打死后，“414”的人对“团派”无端绑架杀害非武斗人员的行为异常愤慨，也决定伺机绑架“团派”人员，作为人质扣押在科学馆。于是一批和平居民就这样被伺机“请”进了科学馆。

曾昭奋，土建系教师，因参加“红教联”组织，被“请”进科学馆“说清楚”。

左羽，清华职工，和清华行政处的一个姓蔡的工人，在去领工资的路上中了埋伏，一起被关了进来。好在科学馆里住宿和吃饭都不收钱，工资没领到也不碍事。

左羽 1949 年前参加了共产党地下组织。1957 年，他给清华

党委提意见被打成右派，虽然他是姓“左”。

蒯大富的女友，风头正劲的清华附中学生刘刚，也被“414”利用清华附中红卫兵抓获，作为蒯大富的人质关在清华大学主楼的地下室里。

还有贾振陆，数力系学生。他白天和女朋友吵架，深夜回清华，忧心忡忡，慌不择路，被“414”派的人“伺机绑架”。在科学馆的黑牢里，他无比追悔他和女友的那场争吵，也十分焦虑他和女友争吵后的“突然失踪”会有什么后果。

“团派”陈家宝，无线电系学生。比其它俘虏幸运的是他的女朋友加入了“414”派。他被抓后，女友来“探监”。陈家宝受到特殊优待。6 月中的一天，科学馆屋顶上的高音喇叭突然广播了陈家宝退出“团派”加入“414”的声明。陈家宝听到广播后，通过叶志江秘密挖好的小洞传给他一张小纸条，说那个声明是伪造的，他没有当叛徒。为了讨回他的清白，他准备越狱。

在这之前，叶志江曾经逃跑过一次。逃出科学馆后因路线不对，被在外面放哨的卫兵截住，扑倒在地。在科学馆外面的草坪上，十几根长矛直逼他的眼睛，成为叶志江在科学馆里最为惊心动魄的一次经历。

叶志江虽然逃跑失败，全身又被用钢丝梱住达 20 多个小时，但他因此知道选择另一条路线从科学馆逃走是可能的。6 月中旬已属夏令，守卫科学馆的学生每天都要午睡，门口只留一人把守。科学馆的厕所就在大门口，只要利用上厕所的机会，乘其不备冲

出去，就可能成功。

叶志江将他的逃跑“经验”告诉了陈家宝。在以后的几天中，陈家宝每天在他的“牢房”中原地跑步，为越狱做准备。这大概也是从红色经典《红岩》小说中华子良身上学到的。

一天中午，他们几个俘虏一起被带到门口上厕所。当大家都已出来后，迟迟不见陈家宝的动静。叶志江明白他想跑。便对看守说：“你先将我们送回牢房吧，否则我们一起逃跑，你抓哪一个？”

看守不疑有诈，告诉门口放哨的学生：厕所里还有一个俘虏后，便带叶志江他们走了。

陈家宝果然乘虚逃跑。而且就在逃跑的当天，陈家宝便在“团派”的高音喇叭上广播了自己的声明，指责前几天“414”广播的他的“叛变”声明是伪造的。

“414”的人十分恼火，他们猜想是叶志江配合了陈家宝的逃跑，不由分说，又将叶志江着实的痛打了一顿。

在陈家宝逃跑前，每个俘虏都能享受“住单间”的待遇。所谓“单间”，实际上是学生做光学实验时用的一个狭长暗室，不到三平方米。暗室之间用木板相隔。

陈家宝逃跑后，为了便于看管，5 个俘虏被集中关押在一个只有五、六平方米的暗室里。四个人躺下后，第五个人只能坐着。

上厕所也受到了限制。在这个狭小的牢房里放了一个硫酸罐，作为俘虏“处理人体废水”之用。每隔一周，由俘虏抬出去

倒掉。

密不通风的光学实验室变成了“化学实验室”，充满了阿摩尼亚的气味。

被“414”绑架的电机系总支书记陶森，是“414”第一个关押在科学馆的俘虏。当俘虏们被集中关押后，她成了叶志江他们的邻居，和他们仅隔了一块木板，可以很清楚地听到彼此的讲话。

一次，在叶志江讲述进科学馆的原因和经过后，突然听到陶森在隔壁说了一句：“叶志江，你真是一个中世纪骑士！”

还有一次，叶志江近一个月大便不通，痛苦不堪时，陶森教他用一块肥皂削成子弹形状，蘸上水塞进肛门。叶志江试了，果然成功地将堵在肛门口干得像石头一样的粪便排泄出来。

但是，叶志江在科学馆中却始终未能见到陈育延。

陈育延一进科学馆便立即显示出她的“英雄本色”。毫无疑问，陈育延掌握着“414”派想知道的许多重要情况。他们也知道陈育延在“团派”总部受到排挤，因而十分想撬开陈育延的嘴。他们用衣服蒙住陈育延的眼睛，打了她一顿，逼迫她交代孙华栋事件的真相。陈育延知道情况却不吐一词，并绝食抗议。

绝食到了第八天，望着奄奄一息的陈育延，“414”派的头头动了恻隐之心，决定释放她。毕竟，“414”总部有许多人加入过陈育延发起成立的“八八串联会”，是所谓的“老八八派”，彼此有过共同战斗的友情。在陈育延签署了“离开科学馆后，生死自负”的字据后，她被抬出了科学馆。

陈育延离开科学馆后才知道叶志江因去救她而被扣押了。她大为感动。并无太多音乐细胞的她，在叶志江被关押的两个多月中，常常弹奏古曲《苏武牧羊》：

白发娘，望儿归，红妆守空帏。三更同入梦，两地谁梦谁？

这段词实在太美了，不仅是陈育延“红妆守空帏”，叶志江的老母也焦虑万分。她冒着风险，多次到科学馆向“414”派的武斗人员求情。有一次，她感动了他们，被准许进来探望叶志江。叶志江因为挨打，一条裤腿被撕破，露出血迹和伤痕。他怕母亲看到后伤心，见面时始终坐着，用另一条腿压住撕破的裤腿。

在叶志江出狱后的第一个晚上，陈育延十分动情地为他弹奏了《苏武牧羊》这支古曲。叶志江听后泪如泉涌。

但这段让人刻骨铭心的经历并没有将他们永久地维系在一起。1975 年，他们在武汉分手了。

陈育延思想激进，人称“陈常左”。毕业前夕，叶志江打算拿到第一份工资后给陈育延买一件绿毛衣，因为他觉得她穿绿毛衣很漂亮。

不料陈育延脸色一沉：“你怎么和余永泽一样庸俗！”

叶志江鄂然。余永泽是小说《青春之歌》中的一个北大学生，书中女主人公林道静的救命恩人，第一个恋人，林道静因其落后而和他分手。叶志江不知道买绿毛衣和余永泽有何相干。

“余永泽也说过他北大毕业后第一个心愿就是给林道静买一件绿大衣，你们连喜欢的颜色都一样！我说你和余永泽一样庸

俗，是因为你和他一样不关心革命，就想有一个漂亮的妻子。”

陈育延言之凿凿，不容辩驳。

叶志江恍然大悟，深感无地自容。

他们在武汉分手时曾有一段对话：

“你认为我们两人分手最根本的原因是什么？”陈育延问叶志江。

“你脾气太粗暴。”叶志江答道。

“我认为脾气粗暴不会影响两人的感情，斯大林粗暴，但他很爱自己的妻子。希特勒粗暴，也和爱娃的感情很深。”陈育延一边收拾行李，一边引经据典。

“是的，我们可以容忍一个男暴君，但我们很难容忍一个女暴君。”叶志江半是玩笑，半是认真。

陈育延大笑。

小说《青春之歌》里，余永泽在北戴河海边救起了投海的林道静。两人相恋后又分手。余永泽的原型张中行先生晚年写了一本《流年碎影》，言及他和小说作者杨沫，即林道静的原型时的那段合和分：“认定为负心，是人各有见，认定为落后，是人各有道。”

我们再回到 1968 年 5 月的清华大学。5 月 29 日晚，土建系郭福新和动农系 9 字班的张庚找到“团派”动农系分部委员、西区总指挥、动农系 9 字班的班长李自茂，对他说，“414”占据的浴室楼的房顶上这几天只有七、八个人守卫，今晚带人偷袭就能

拿下。李自茂听后有些动心。因为浴室楼如果拿下，与之相邻的九饭厅“414”也会不保，从而退出东区。于是他给“井冈山”的“文攻武卫指挥部”打电话请示，接电话的是“井冈山”二把手鲍长康，让他们过去面谈。

李自茂他们来到“井冈山兵团文攻武卫总指挥部”所在的旧电机馆，向鲍长康汇报了他们的想法。鲍长康听后召集“井冈山”各区负责人开会，最后决定：当晚偷袭“414”占据的东区浴室楼。

5 月 30 日凌晨 3 时，蒯大富亲自跑到清华大学自备的电厂，下令拉闸断电，发出进攻信号。

当负责主攻的李自茂他们来到浴室楼下时，发现带去的梯子够不到房顶，爬上去的人都被“414”从房顶抛下来的东西砸了下来，负了伤，梯子也被暖气片砸断了，偷袭失败，只好赶紧撤离，改用弹弓车向浴室楼顶抛打砖头。

“414”在浴室的二楼楼梯焊了一道坚固的铁门，很难从浴室的一楼冲向二楼。清晨，“团派”登上了与浴室相邻的九饭厅平房顶，准备从这里搭梯子攻上浴室的楼顶。“414”立即到屋顶迎敌，砖头、石块如雨泼下，清华大学修缮科工人段洪水在攀登梯子时，被守楼的“414”派长矛刺中，由梯子摔下，当场死亡。

“414”总部采取“围魏救赵”之计，派出一支队伍包围“团派”占据的第一教室楼，向第一教学楼投掷砖头、瓦片、燃烧瓶

等物，实施佯攻。但没有调回“团派”攻打浴室的人马。无奈，“414”只好组织队伍前往东区浴室增援。他们担心在主楼通往东区浴室的路上遭到“团派”伏击，因而绕了一个大弯子，把队伍集中到学校东北角的高压实验室，在那里建立了基地，待人员集中后才开始行动。这时已是 8 时左右。他们 100 多人的增援队伍与“团派”阻击队伍在东大操场西边路上相遇，双方激战，伤亡很大。清华大学工程化学系化 003 班学生卞雨林在武斗时，被毒箭射中，当场倒地，口吐白沫，很快死亡。“414”总指挥受重伤离开了战场。10 时后，“414”开来一辆由东方红拖拉机改装的土坦克参加战斗。由于退却不及时，“414”的一名学生被土坦克当场辗死。愤怒的“414”派奋力反击。“团派”冶金系焊 8 班学生、学校击剑队队员许恭生在东大操场北侧荒地武斗中长矛狂舞，勇猛异常，吓退一排“414”长矛。后撤时不慎摔倒，被一拥而上的“414”派人员数支长矛刺下，失血过多而死。

浴室楼久攻不下，“团派”决定火攻，坚守这里的“414”渐渐不支。这时，一名“414”战士被“团派”长矛刺中，出现气胸，有生命危险，“414”东区浴室指挥官与“团派”谈判，只要“团派”同意派车将“414”伤员送医院救治， “414”守军便放弃东区浴室。鲍长康同意。于是，“414”从浴室楼撤退，进入科学馆。

这次大武斗从凌晨 3 时开始，进行了近 11 个小时之久，动用了土坦克、土炮、炸药包、轻机枪、步枪、长矛、大刀、箭矢、

弹弓车、燃烧瓶、硫酸瓶、石灰瓶等等，两派群众还进行了殊死的肉搏战，致使 3 人死亡，近 300 人负伤。

清华大学“414”退守的科学馆是一旧式西洋建筑楼房，文革前是清华大学基础课所在地。进入科学馆的“414”派红卫兵整整 100 人。他们首先构筑工事，在门窗及一切通道进出口处，全都采取了防范措施。

在科学馆的四周，“井冈山兵团”红卫兵也用各种枪支组成的火力网封锁了所有道路。唯恐火力封锁不够，他们又在科学馆西南端的一处小山包上挖了地堡，架起了枪支，日夜观察。

被围困在科学馆内的“414”派 100 名红卫兵的处境非常不妙。

一天，一位名叫杨志军的红卫兵从科学馆后门刚一露头，一颗子弹飞来，将杨志军当场击毙。尸体被同伴抬回馆内，用拆卸的门板、教学柜打成一具简易棺材，草草殓尸。

此后不久，又一名“414”派红卫兵被对方的枪弹射杀身亡。

被久困在科学馆的清华“414”，给养越来越成问题。在“井冈山”严密封锁下，出入科学馆非常困难。为了给被困在科学馆里的战友们送粮食，“414”派红卫兵每次都全副武装，抓住一切机会送东西进去。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封锁越来越严，外边的东西根本无法再送进去了。

科学馆内，大米、蔬菜早已吃光，靠仅有的一点面粉，红卫兵度日如年。为了节约，他们改一日三餐为两餐，馒头就着盐水，

勉强咽下。现在他们充分体会到“困兽犹斗”一词的滋味了。

## 第 1008 回：报敌情，广西反共救国军　李向阳，柳州抢援越武器

1968 年 5 月 17 日，广西革筹小组、广西军区向中央发出《破获蒋匪“中华民国反共救国团广西分团”一案报告》的电报。电报说：

“我区破获一起蒋匪中华民国反共救国团广西分团的反革命组织，已捕获团长 1 人，副团长 3 人，政治部主任 3 人，经济部长 1 人，支队长 4 人，联络站负责人共 63 人。缴获反革命组织纲领、反革命刊物、入团登记表、印鉴、与国外敌特机关联系的秘密通讯地址及部份枪支弹药等罪证。”

电报还说：“该反革命组织涉及南宁市及南宁、玉林、钦州、柳州等四个地区。”“于今年（1968 年）2 月 2 日正式合并定名为匪‘中华民国反共救国团广西分团’。分团下设大队、中队，全区已发展匪徒两千人”。

“发展组织和活动特点是：利用群众组织中的派性，易地活动，钻进群众组织，互相串连。靠打砸抢补给经费，通过武斗掌握武器。总部设在南宁市解放路新华街，（广西‘422’控制区）利用‘422’据点造反楼做联络站，与越侨有联系”。

原来，1968 年 2 月 17 日，《广西联指报》刊登的《加强无产阶级专政，不准牛鬼蛇神翻天——向全区人民提供一份触目惊心的阶级斗争材料》一文。该文公布玉林专区“联指”揭发容县一批“反共救国团”组织，基本上遍布容县各地。其中有：

容县“422 革总”的“反共救国队”；

长寿公社的“反共救国军”；

大鹏公社的“西江地下反共救军”、“杀人战斗队”及“反共救国军第三军”；

松山公社的“反共救国军”；

下河公社的“反共救国军”和“反共救国军第四集团军”；

寺堂公社的“反共集团第四军”；

黎木公社的“反共救国军”；顶底公社的“反共支修集团军”；

半月公社的“反共第一方面军”；

三岸公社的“新编步兵师第一独立师”；

沙田公社的“反共救国军第三集团军”；

石扶公社的“反共救国军”；

大水公社的“反共救国军青年独立团”；

寻阳公社的“反共救国团”等等。

此文引起广西革筹小组和广西军区的高度重视。5 月 17 日，他们上报中央，5 月 20 日，向全区发出《关于继续深入侦破匪“中华民国反共救国团广西分团”问题的指示》。

指示说：“我区破获‘反共救国团’是一起重大的反革命案件，不仅涉及面广，而且敌人钻进群众组织利用派性发展串连。已捕的 69 名罪犯，伪军、政、警、宪和牛鬼蛇神、地、富子弟占 75％。主要罪犯已捕获，取得了很大成绩，但各级革委会和军分区党委，还要进一步引起重视，把这一案当作一个战役来抓，

指定专人，组织专门办公室，充分发动群众，力求迅速彻底侦破，并尽快结案惩处。当前该案工作重点是集中罪证，集中主犯，追组织，追联系……”

就在此时，柳州又发生了抢夺援越武器的事件。

5 月 18 日，广西柳州铁路局“工机联”总部开会时，有人说发现五三八编组站停了两个车皮代号 8，有军人押运，肯定是军火。是否把它抢过来？会上大家进行了一番争议，外面围观的不少群众，情绪激昂地指责头头“右倾”。还有人说，军区向“联指”发枪，南宁“联指”得了一两万枝枪，大批弹药；柳州市“联指”也明抢暗送，搞了军分区两个仓库的武器。

“工机联”王反修等人请柳铁一中“联合战队”头头钱文军发言，他毫不犹豫地主张抢回来。最后还是决定先去把这两节车皮拉回来。

两个代号 8 的车皮拉回来了，包装袋上印着“TNT”，参加行动的人都不懂外文，误认为是化肥，就又送回去了。

当天夜里，钱文军又来到铁路文化宫，与柳州市“造反大军”总部的廖伟然、白鉴平等人见了面。廖伟然曾是部队的大尉参谋，后来转业到柳州市，当过四清工作团的副团长。见到广西屠杀日益升级，他自报奋勇到“造反大军”负责“文攻武卫”。

此时，“联指”的据点已经把柳铁“工机联”同柳州市“造反大军”分割成两片。柳铁“工机联”和柳州“造反大军”的“联合指挥部”早已经策划了攻打粮食三仓和探矿厂这两个“联指”

据点，这样可以把柳州市“造反大军”和铁路连成一片。今天，他们讨论了进攻方案，很简单，柳州市“造反大军”主攻，柳铁一中的“联合战队”派人扼守东站路，负责堵住“联指”的援兵。

讨论到这里，钱文军觉得主要事情已经确定，便将副手留下来继续开会，自己走出会议室，正好碰到柳州铁路分局军管会主任、55 军的曹副参谋长。

许久不见，两人寒暄几句后，钱文军就问他：“孙副军长在不在柳州？”

曹副参谋长没有回答，而是反问道：“听说你们要把探矿厂拿下来？”

因为“造反大军”已经打过一次探矿厂了，钱文军便说：“是的，不拔掉这个钉子，我们不得安宁。”

曹副参谋长劝钱文军不要这样做，一则是先动手会落得政治被动，中央肯定不允许。二则这个厂围墙既高又结实，里边武装很强，未必能攻下。

钱文军笑道：“你们总是来劝我们，可是‘联指’一直在动手，现在已经兵临城下，把我们越围越紧。如果我们不打，要不了多久就完蛋了。”

正说着，文化宫房顶爆炸了两个炸药包，是“联指”发射的定向炸药。

这种定向炸药包据说是解放军在越南的新发明。在地面上挖一个斜坑，把一包小些的炸药放在下面，填些土或者湿麻袋之类

的隔离物，上面再放一个大炸药包。两个炸药包的导火索同时点燃，下面那个炸药包的导火索短，先爆炸，上面的炸药包就沿着斜面飞向要炸的地方，落地后爆炸。只要掌握得当，可以发射得很准确。

为了防止飞行途中过早爆炸，失去效果，导火索总是预留得较长。“造反大军”被炸得多了，就发现这个弱点。等炸药包落地，就立即冲上去，拔掉导火索，于是便收到一包炸药。

后来“联指”把导火索用铁丝捆结实。而“造反大军”发现可以从捆绑点后边把导火索抠出来，照样获得炸药。还有的人嘴里叼着利刀，冲上去割断导火索更快更稳当。

“联指”又计算好燃点时间，留适当的导火索，使其落地就炸。而“造反大军”有人甚至可以从空中飞行的炸药包冒的烟火估算出来，这个炸药包能不能缴获，决定是否冲上去。最不可思议的是，后来统计，柳州“联指”共发射的两万多个定向炸药包，“造反大军”这边居然没有一个人被它炸死，却从飞来的炸药包里，获得数以吨计的炸药。后来“造反大军”也学会发射它了，他们干脆用厚钢板焊成斜坡状的发射器，连挖坑都免了，被称为“野崽炮”。

钱文军乘机对曹参谋长说：“你看，这不又打过来了？我们不打怎么办？人家的方针就是要消灭我们，我们只好针锋相对，保全自己。”

旁边几个同学和机关干部也帮腔说话。正说着，二楼跑下来

一个人，说厨师吴师傅被打死了。大家急忙跑上去，只见吴师傅歪倒在床上。钱文军顺着墙上的子弹孔看过去，原来是从探矿厂方向打过来的冷枪。看来开枪的是个职业枪手，居然能从窗口垒着的沙包留的小孔里打过来。那孔是留作观察用的，只有一块砖那么大。

曹副参谋长叫钱文军注意，说“这个枪手很厉害……”

正说着,从那个孔里又打进一枪，子弹打在床边的木柜上，离钱文军不过十来公分，他连忙弯着腰跑到窗口的沙袋后边。

那个孔看来已经挨了很多枪，钱文军找了块砖头把它给堵上了，还从沙袋里掏出一颗子弹头，拿过来给曹副参谋长看。

曹副参谋长端详着那颗子弹，自言自语说：“妈的，这种枪他们都有了？”接着对钱文军说：“这是一种新式的狙击枪，部队也没几枝的。”

钱文军说：“你该向上级汇报了吧？军区总说‘联指’没抢过枪，他们有那么多枪，连四管高机都有好几挺，现在还有这种新式狙击枪，该不是军区给发的吧？”

曹副参谋长迟疑了一下，说：“我们早就报到中央军委去了，没用。小伙子，你们自己好自为之吧！我该走了。”于是拿着那颗子弹头，招呼他的警卫员离去了。

开完会，钱文军开着一辆嘎斯 69 苏制吉普车，和他的副手一起返回学校。他的副手在车上讲了会上议定的攻打探矿厂的具体时间：“19 日夜里开始打，我们还是负责打援。”然后又问：“是

不是中央真的要卸磨杀驴？你这次去北京，怎么不去找周总理？娘的，他也不管我们了？我们就是听了他的，才有今天。当总理的，说话也不算数！”

钱文军笑着说：“你也太天真了些，说话算数能当总理吗？不是说‘总理总理，总是有理’吗？他哪里还有闲功夫管我们的事情。我找他的联络员都躲着不露面，在北京两个月，跟他妈乞丐似的。跑了清华、北航几趟，蒯大富跟‘414’斗得热闹，他的秘书挡着，别想见他。韩爱晶据说得了肺结核，到什么地方疗养去了。这帮家伙现在像中央首长，小人得志，不可一世。迟早会被收拾掉！我们住在北农机雄头他哥那里。北京的大学生都在谈恋爱，等着分配工作，写大字报也是要求分配。没有几个人还关心什么‘国家大事’。据说上海有一批专门整张春桥的，挺勇敢，原来我们想去拜访，听说都被抓了。看来只有我们中学生还在傻乎乎地闹，反正前途无着，据说都要下乡，北京有一些积极的已经自报奋勇了。”

钱文军的副手原来是学校团委的组织委员，属于“德智体”皆优的优秀学生，还准备文革结束后，早点恢复高考去读书呢。听到这个消息，情绪顿时低落下来。回到学校，他连招呼也没打就耷拉着脑袋回自己的房间去了。钱文军知道自己说的消息对他是不小的打击。

19日晚上，柳州“造反大军”进攻“联指”探矿厂。后半夜枪声大作，正如曹副参谋长预料的，“造反大军”此战失利。

5月20日晚上，“工机联”总部继续开会，还是研究抢夺5月18日提到的火车站那几车厢军火。别看平时慷慨激昂的人多，真到了决定实施抢夺时，谁也不愿意亲自参加行动。最后，自报奋勇的只有3个人：司炉小韦去机务段开车头，工务段的小杨负责扳道岔，车站的小李负责摘钩挂上那几节车皮。挂上后直接拉到铁一中旁边的冷冻厂，那里是“工机联”的地盘，有铁路专用线和站台，“工机联”头头王反修和老桂坐镇指挥。这个消息也通知了柳州“造反大军”指挥部，让他们组织人力来搬军火。

21日凌晨，第一次拉到冷冻厂3个车皮是炮弹，押车的部队干部对他们说：“你们要来也没用，后面那几节车皮是子弹，要抢还不如抢那些。”

于是王反修喊他们原车皮送回，火车头第二次开到地方几分钟就把8节子弹车皮拉走了，就连押运子弹车的军人也以为是正常调车行动。负责押运的干部跟等候在那里的王反修交涉，说这些子弹是要运到凤凰仓库的，让王反修给他打收条，否则他没法交差。王反修他们知道子弹是运到凤凰仓库的也就放心许多。因为还在“工机联”总部讨论抢不抢这批军火时，就有人担心这批是援越物资，那样可就吃罪不起了。王反修听说这批子弹是进凤凰仓库的，认定不是援越物资了。王反修按押车干部的要求写了收条，签名时犹豫了一下，最后落款写的是“李向阳”三个字。

大家见抢来的全是子弹没有枪，多少有些失望。车皮一直拉到列车停在专用线站台上，负责具体实施这次行动的总指挥老桂

报告了王反修，王反修又找来李振岭，然后找钱文军，一起商量怎么办？

钱文军问：“车上是什么？”

老桂说：“全部是子弹，没有枪；共11800箱，1700万发56－1式子弹。只有两个车皮还没动，其它的都卸得差不多了。”

他们来到现场一看，汽车、拖拉机、人力车、自行车都在装运子弹，男女老少川流不息，特别是那些避难的难民们，比谁都积极。钱文军马上叫停止搬运。看见有老俩口正吃力地搬运两箱子弹，就劝他们别搬了。他们死活不肯，那老头还教训钱文军说：“你知不知道什么是毛主席教导的人民战争？这就是人民战争！”

钱文军抱怨王反修说：“没有头脑，怎么就这么乱七八糟地抢起来了？有组织地把武装人员派一些，每个车皮卸掉一批，我们就足够用的了。把八个车皮再送回去，政治上要主动得多。”

老桂反问道：“送回去？‘联指’抢去怎么办？”

钱文军笑道：“我还怕他们不抢呢！只要他们一抢，这个罪名就有人跟我们分担了！”

王反修问为什么？钱文军说：“中央一个来电我们就彻底完蛋。”

老桂听明白了，连忙解释说：“我给‘造反大军’白鉴平打电话，没想到他们怎么就这么快就来这么多人。”

王反修也急了，赶紧问钱文军现在怎么办？

钱文军吩咐老桂："立即关闭冷冻厂大门，严禁再有子弹运走。然后组织人员把没运走的子弹都装回车皮里。动员'造反大军'和'工机联'各组织，交回子弹，然后大张旗鼓地开展一个上交子弹的活动，一定要造成声势。先把还没动的两个车皮送回去，算是第一批上交。"

"工机联"总部指挥李振岭是转业军人、工人，操着他那一口河南乡音吼道："交，交个屌！都交了不是就白抢了吗？"

老桂对他说："李军长，你放心。现在你就是下命令：不交就枪毙！恐怕连三分之一也交不上来。"

王反修接口说："十分之一也别想。"

李振岭恍然大悟，一拳砸在大腿上："嘿！俺这个脑瓜就咋这笨？刘世清！来，传我的命令，马上发告示，彻底上交！一颗子弹也不许留，违者马上开除！快去！"

刘世清赶紧下去安排。

但人算不如天算，立即拉回去的两车皮子弹被堵在半道上，人家不让交啦！而且，那些进凤凰仓库的子弹都变成"援越物资"了。

原来，事情发生后，区革筹，广西军区立即电报中央。21日上午10点20分，黄永胜给广西军区司令员欧致富、55军区副军长霍成忠来电："请欧、霍二人负责处理柳州抢援越物资的问题"，"给群众组织做工作，抢子弹要追回，要向他们指出，他们这样做是违背毛泽东思想的，是违背国际主义原则的，这种行为是错

误的。”

“工机联”上下提心吊胆，弄不好中央文革马上就会宣布他们是反革命组织，那就一了百了。于是，王反修找到军管会，这才算将那车皮子弹拉走上交了。

接着，“工机联”到处拉标语、横幅，设了好几处上交站，零零星星不断有上交子弹的故事。

## 第 1009 回：鱼峰山，柳州市武装割据　火车停，铁路交通完全断

22日夜晚，柳州市“造反大军”总部的廖伟然带着柳州“造反大军”几个武斗指挥员，来到铁路文化宫“工机联”总部，与铁路“工机联”商量再次攻打探矿厂、粮食加工厂的作战计划。他们挤在电影放映机房开会，博白县“造反大军”的人也来参加。他们坚决要求负责主攻方向，说他们的人都在博白经历过韦国清的屠杀，而且基本上都是复员军人，还有几个在部队都是特等射手。

23日凌晨6时，一发白色信号弹升上天空，枪声顿时如炒豆般响起。柳州“造反大军”按照计划开始进攻探矿厂。

探矿厂很早以前属于劳改单位，围墙既高又坚固。它北面是粮食加工厂，没什么动静。它的西面马路则热闹非凡。“造反大军”在这边连续3个人冲过马路送炸药包，结果连一个人通过的洞也没炸开。而围墙高处却有几个枪眼开始还击，都是连发。但博白县的“造反大军”也没有吹牛，几乎每一个点射就打哑一个枪眼。

在粮食加工厂这边，同样是西边马路，柳州市那个被称为“狗牯队”（柳州地方话，意为“混混”）的“青年近卫军”，几乎没费什么力气就攻进去了，不多会儿便在三仓办公楼顶上烧起一堆火，表示已经占领。粮食加工厂的“联指”一群人，利用马路上的沙包掩护，逃向探矿厂。

不一会儿，一发红色信号弹在粮食加工厂升起，表示粮食加工厂已经被“造反大军”攻下。于是，从粮食加工厂方向也发动了对探矿厂的进攻，从火力强度看，“造反大军”缴获不少，因为他们原来连轻机枪都没有，此时，从那个方向听到了连发的机枪声。

这时，“红总”和博白县“造反大军”已经抢先冲进探矿厂大门，那座围墙始终没能炸开。

整个战斗持续了一个多小时。探矿厂连同粮食加工厂，被“造反大军”拿下，柳州市“造反大军”和柳铁“工机联”连成一片。

5月25日清晨，天刚蒙蒙亮，雾霭中看见有解放军走向柳铁一中西边高坡菜地，随后拉开成散兵线，挖起战壕来了。柳铁一中的钱文军赶紧通知大家把枪支收藏好，同时用自己架设的电话与机务段、文化宫等地联系，却联系不上。

这时，柳铁一中附近的工厂都住满了来自柳北及一些县的难民，他们都出来在那里观望。

学校四周已都是部队。钱文军向部队那边走过去，想看看情况。当他们走到竹鹅溪桥头时，被部队的一名干部拦住，不让他们继续前行。钱文军问他为什么来这里挖战壕？为何不准前行？那位干部除了警告他们不能靠近桥，并说部队是在执行紧急军事任务外，啥也不说。

钱文军只好退后。此时天已经放亮，周围的群众越来越多。部队干部显然没有预料学校及周边居然住着如此之多的老百姓，

有些手足无措。

钱文军回到学校被告知，说机务段也被武装部队包围了，其它地方尚不知情况如何。“工机联”总部所在的林场离柳铁一中不过几百米，恰好正在散兵线背后。但道路已经被禁止通行。

原来这是广西军区欧致富、霍成忠命令驻柳州部队高炮70师所属两个团、144师两个营的兵力，对柳州“造反大军”和柳铁“工机联”的几个据点实行武装包围，准备强行收缴“造反大军”和“工机联”的武器弹药。

这时路上已经是人山人海，难民开始与军人辩论，质问为何禁止交通？群众对前来执行任务的解放军实行反包围，他们高呼：

“反对广西军区支一派、压一派！”

“‘造反大军’不能空手等死！”

……

解放军被反包围后，又被群众夺去 700 多支枪。这时，除了少数几个战士出力护枪之外，多数人只是把枪横挂在胸前，摇晃着《毛主席语录》呼喊口号，任由群众把枪拿走。

5月26日，柳州“造反大军”白鉴平、廖伟然在刚攻下的探矿厂主持作战会议，决定当晚进攻探矿厂后面的二级站等“联指”据点。指挥部就设在柳铁一中旁边的红星农械厂，廖伟然亲自指挥。柳铁一中的“联战”负责攻打红星农械厂隔壁的医药站仓库。

当晚20时，战斗打响。柳铁一中的“联战”进展顺利，很快

就占领了医药站仓库和外贸仓库。原来那里只有几个进城农民在守卫。打死两个，其余都逃跑了。

第二天，“造反大军”继续进攻二级站。直到中午也未拿下。那里马路比较开阔，围墙也很坚固，柳江市初中学生的红卫兵组织“柳江风雷”的学生冲过去放了几次炸药包，只炸开一个小口子。于是暂时停止攻击。

过了没多久，柳州市过来一位领队的，说他们决定不理廖胡子的命令，自己先干。那人自称是侦察兵转业的，看情况“联指”可能正在撤退，再不进攻就让对方逃跑了。柳铁一中带来好几发他们自己研制的枪榴弹，于是打了过去，在那边院子里爆炸之后并无反应。柳州市的那位仁兄，说话间已经派出一名爆破手，冲过马路，把炸药包塞进已经炸开了的那个洞里，接着沿围墙跑开躲起来，显得很有经验。爆炸之后，那个洞变成一个豁口。趁着烟尘未散，只听一声“冲！”他们就从那个豁口钻进去了。只见里面一座座仓库静悄悄的，“联指”真的跑了。整个二级站里空空如也，一个人也没有。这时，跑出来几位家庭妇女，手舞足蹈地大喊：“他们都逃跑了！‘联匪’都逃跑了！往鱼峰山那边跑了。”

在正对鱼峰山的鱼峰大道上，“造反大军”领教了“联指”架设在山顶上的机枪“问候”。于是柳州市“红总”决定扑过去，直接攻打鱼峰山。“联指”清楚，孤立的鱼峰山是无法守得住的，只要包围不用进攻，必成瓮中之鳖。于是还没有等攻击发生，他

们就撤了。“红总”和“造反大军”一路向东追击过去。

柳州市区风景秀丽，市内有数孤峰突起，九曲柳江蜿蜒从市区穿流而过，古有“江流曲似九回肠”的赞语。柳江蚊龙腾跃把市区北面画成葫芦状，成“三江四合，抱城如壶”之势，把柳州市分为柳南，柳北，壶东，壶西四大区。1968 年，柳州市里没几座五层的楼，几座山就成了天然的制高点。四十多层楼高的鱼峰山正对着葫芦底刚建成通车的柳州市当时唯一的公路大桥柳江大桥。鱼峰山脚下是碧绿的小龙潭，传说是歌仙刘三姐骑鱼升天的地方。鱼峰山上有翠松亭、冠山亭、现美阁等古建筑遗址。山间有清凉国、盘古洞等 7 岩洞，洞中有元、明、清以来的摩崖石刻。除了鱼峰山，柳南还有驾鹤，箭盘，马鞍三山。壶西有大小鹅山，壶东马鹿二山，柳北雀儿山。数山之中，以鱼峰山最为小巧却置为关键，是“兵家必争”之地。首先鱼峰山坐落在柳扛市的中轴点上，山顶有个五米见方的平台。架一挺机关枪就可控制前面的柳江大桥及左右的飞鹅路和屏山大道，山后不出百米就是工人医院，山腰的洞里又能藏兵。“造反大军”占了鱼峰山，修筑工事，建立炮台，控制了柳江大桥及左右的飞鹅路和屏山大道。“联指”派在江北架起高射炮，每天朝鱼峰山上打。“造反大军”也每天向山下射击。这可把山下百姓给害苦了，谁都不敢出门。

这时，柳州“造反大军”放话,要联合桂林的“造反大军”挥师南下广西首府南宁，解救被围困的广西“422”。

在铁路这边，“联指”控制了铁路医院，连同技术馆，还有小鹅山，不断打冷枪。马鞍山这边，“联指”在柳州市这座的最高山上架设了高射机枪，不断向对方扫射，特别是谷埠街一带，直接被马鞍山上以及柳江对面的“覃连芳大楼”上打过来的机关炮威胁。于是柳州“造反大军”与铁路“工机联”总部联合决定，拔除技术馆及铁路医院、马鞍山两处据点。

5月26日夜晚，“工机联”第三指挥所自己决断，攻下了小鹅山。

鱼峰山上的“造反大军”袭击了一队过路的解放军。那是刚从越南打仗调防回国的 6886 部队，穿戴的还是越南人民军的军装：蓝裤子、绿上衣。他们对国内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一无所知。一路上，他们的军列已经被中国老百姓抢了好几回了。临到休整地了，还挨了枪子，憋了一肚子的火。尽管上级有指示不要介入地方的文革，可这一肚子的火总得找个地方发吧？休整了几天后，一个月黑风高的夜里，各军营里除了放哨的突然空无一人，当夜柳州城里枪声大作。第二天中午部队回到驻地，战士们一个个眉开眼笑，浑身上下都是泥。有的战士口袋里装了许多空弹壳，送给驻地附近的孩子们。孩子们好奇，问战士们昨晚那去了？有战士悄悄的回答：“你可要保密哟，我们打鱼峰山去了。”

5月28日，“联指”向柳州市区“造反大军”的武斗据点发起攻击，并使用自制大炮发射的炸药包对其进行轰炸。“造反大军”的武斗据点被炸，炸掉6间房屋，炸死31人。

当天，“钢联指”，即柳铁“联指”头头召开会议，分析柳南的武斗形势，决定动员本派群众撤出“工机联”和“造反大军”势力较强的柳南一带，转移到柳北，隔江据守。

5 月 29 日，柳州军分区在柳北的柳州饭店召开地区革委会主任会议，部署镇压“造反大军”的作战计划。王司令员下令：“把民兵组织起来，不要等出了问题再动手。”郭政委作总结，会议决定“全面地、主动地向阶级敌人发动进攻，大刮十二级台风”。此次会议散会后，各县革委会主任或待成立的准主任，组织各县民兵开进柳州市，围剿“造反大军”。

5月31日夜，柳州“造反大军”进攻铁路医院和技术馆。6月1日天亮后，进攻医院成僵持。傍晚时分，柳铁一中的“联战”攻占了技术馆。原来，据守技术馆的“联指”人员都撤走了，里面已空无一人。

大约晚上19时，在探矿厂“造反大军”总部召开了紧急会议。白鉴平首先庆祝胜利。钱文军打断他的话，说：“这不是什么胜利，如果硬打，我们未必打得过人家。现在他们主动撤退是个阴谋，目的是给我们栽赃！我们必须弄清楚详细情况，现在就必须确定紧急措施、补救措施。否则我们占领再多地盘也没用，中央一旦下个文件，我们肯定完蛋，预期的‘求生存’的目标将彻底落空。”

白鉴平反驳说：“没理由凭想象散布悲观情绪，中央不可能完全听信军区的报告。”

王反修、老桂则支持钱文军的意见。

廖伟然后来发言说："钱文军的意见有道理，即使没有那么悲观，即使中央还继续支持我们，我们总得有相应的措施，总不能听凭军区谎报军情。从作战情况看，'联指'根本不是战败，继续打下去我们未必能打赢。他们突然全部撤退到柳北，里面绝对有阴谋。"

白鉴平说："你也不能光讲形势，有什么高见说出来我们听听。"

钱文军建议：立即以"造反大军"和"工机联"的名义发布安民告示，严正指出"钢联指"主动撤退柳北并中断铁路交通必须承担全部责任；第二，马上组织武装纠察队，维护社会治安。对于任何私人住宅，无论观点属于哪一派的，都不许抄家、抢劫财物。任何组织未经总部批准，不得自行强占铁路局的任何单位。否则武装纠察队将予以严惩；第三，立即组织"抓革命、促生产指挥部"，恢复柳南所有厂矿的生产。铁路由工机联负责，今晚就组织通车工作，柳北通不了就通南宁、贵阳，客、货运输都开通；第四，立即通过柳铁军管会向联指发出呼吁，共同保障铁路运输畅通。如果"钢联指"的人愿意返回柳南恢复铁路运输，热烈欢迎，保障人身安全决不伤害任何人。第五，马上组织恢复商业单位的供应工作，建立粮食供应系统，保障粮油供应，实现柳南地区社会稳定。

这些意见马上被通过了，散会后分头落实。

他们回到文化宫，接着又开“工机联”各单位负责人会议。决定各单位分部全部回驻本单位，恢复本单位的正常生产；机务段、车辆段等原来住有地方难民的，要尽快动员他们全部撤离铁路单位；马上由老桂组织运输系统人员，建立通车指挥部，尽快恢复通车，越快越好。王反修负责与铁路局军管会联系，经过他们呼吁“钢联指”人员返回，共同保障铁路运输的正常进行。

柳州铁路分局“工总”在老桂的率领下，马上开始了恢复铁路运输的工作。柳州铁路分局在军管会主任、55军的曹副参谋长的亲自关照下，给通车以全力支持。很快就开出第一列旅客列车，往湛江、南宁方向。

第一趟列车还没开到黎塘，就被广西军区和广西革筹命令“联指”以武装民兵的名义截住了，他们用枕木拦住轨道，还插着毛主席像。随车的所有人员，包括军管会人员、柳州分局“工总”负责人都被扣留。接着，往贵阳去的列车开车仅行进了一个区间，就被“洛满区革命委员会”的武装民兵拦截了，他们说是奉广西军区、革筹的命令，要搜查武器，防止外流。

6月1日下午，柳州“钢联指”派的职工和家属1万多人撤到柳北，柳北各单位的大礼堂都住满了。

从此，柳州市“工机联”、“造反大军”与“钢联指”、市“联指”沿柳江形成了南北岸对峙局面。为了防止对方偷袭，两派分别在各自占据的柳江铁路桥南北桥头，设置了各种障碍和工事。“工机联”人员在桥南钢轨上装设了脱轨器。“钢联指”则

在桥北停放了几辆货车，并拆了一根钢轨，还在线路上埋设了4个土炸弹。铁路运输因此完全中断，客货列车被迫停运。

## 第 1010 回：说川渝，“四县一市打平桂”　赴广州，董良翮返京被抓

就在柳州打得昏天黑地的时候，5 月 25 日至月下旬,广西梧州平桂矿区又发生为期 45 天的“四县一市打平桂”事件。

平桂矿务局位于梧州钟山、贺县境内,是一家国营的大型有色金属企业。此时,该矿也形成了两大派组织“平桂联指总部”和“422 平桂井冈山”。梧州军分区支持“平桂联指总部”,驻平桂的支左军队 6975 部队支持“平桂井冈山”。1967 年底,两派在武斗中先后建立起各自的武斗据点和武装割据区。“平桂井冈山”占据了矿务局和珊瑚矿、新路矿、里松矿等地。至 1968 年 5 月,该矿“平桂井冈山”有 600 多人的专业武斗队伍,武斗中处于上风,被梧州地区的“422”派视为安全的根据地,钟山、贺县、昭平、富川等地逃难的“422”派人员及其家属,不少人跑到平桂矿区避难。

由于从 4 月起,平桂矿区两派连续发生武斗,“平桂联指总部”头头杨子明等人跑到梧州、钟山、贺县、富川等地告急求援。5 月 8 日,梧州地区“联指”在富川召开梧州、钟山、贺县、昭平、富川“联指”派负责人会议,地区“联指”头头谭金锡提出,不解决平桂问题,各县都不得安宁。大家都要支持解决平桂问题。谭金锡等人还向梧州军分区领导人汇报了他们计划组织梧州地区四县一市攻打平桂矿区“422”的方案,得到同意。于是便开始按照方案,实施行动。

四县的“联指”头头分别向各自的县革委会、武装部和“保红”指挥部负责人作了汇报。在请示梧州军分区领导人的同意后,上述县、市武装部先后调集大批武装民兵和“保红”武装,向平桂矿区进兵,围剿“平桂井冈山”。

5月24日,钟山县的民兵队伍和武斗人员2000多人,携轻机枪40多挺、重机枪12挺、高射机枪1挺、迫击炮3门、冲锋枪140多支、步枪1200支,向平桂矿区的西湾进发。

贺县组成460多人的武斗队伍,也于24日和28日先后开进西湾。后贺县增兵至3000多人,参与攻打“平桂井冈山”。

梧州地市“联指”派出了200多人的武斗队伍,携重机枪1挺、高射机枪4挺,赶到西湾。

富川县出动200多人的武斗队伍,到达西湾后,驻兵望高,以阻击“平桂井冈山”向北突围。后增派援军至近2000人。

昭平县第一批参战的武斗队伍有300多人,也于24日赶到西湾。

5月25日凌晨,“平桂井冈山”向“平桂联指总部”的老山据点发动偷袭,贺县和钟山的武斗队伍投入战斗,从而打响了平桂大战的枪声。而后,钟山民兵向“平桂井冈山”的选炼厂据点发动进攻,被打退。

5月28日至30日,“联指”前线作战指挥部在平桂耐火材料厂召开联席会议,制定了先打西湾的作战计划。

西湾是“平桂井冈山”的重要基地。其主要据点为选炼厂、

“全无敌”总部和黄华山。

5月30日下午，梧州军分区副政委傅享通赶到贺县武装部，开会决定，将广州军区存在贺县的战备弹药转移到钟山和富川，用于平桂大战。10辆汽车负责运输。

6 月 2 日，“联指”前线总指挥部集中钟山、贺县、梧州 2600 人的武斗队伍,开始攻打选炼厂。数次进攻,均告失败。至 6 月 11 日,终于攻占选炼厂。随后，即开始攻打“全无敌”总部,经一周激战,攻克。然后进攻黄华山，前后三次进攻均被击退。

广西平桂武斗期间，广西自治区革筹小组、广西军区于 5 月 27 日向中央上报《南宁情况简报》说：“422”新指挥部所属一些组织，继续向“联指”开枪、开炮，封锁交通，抢占据点，使市内运输中断，粮食供应非常困难。如事态继续恶化，大武斗有可能发生。

5 月 29 日，中央文革来电，同意广西的韦国清、魏佑铸、焦红光赴北京向中央文革汇报工作。韦国清等人于当天飞往北京。

第二天，广西南宁发生了“林业厅事件”。

广西林业厅是“联指”的一个据点，而它对面的自治区展览馆则是“4.22”占据的据点，一街之隔。林业厅大楼居高临下，对展览馆威胁很大，“4.22”常委决定要拔除它。5 月 30 日中午，“4.22”十几人装扮成解放军进入林业厅后，冲上大楼，打死据点内 13 人，抢夺了据点里两挺机枪和 10 多支步枪。

“联指”总指挥部发现后组织反攻，双方一直打到晚上。“4.22” 被“联指”打死 2 人，最终撤离。撤退时，炸毁大楼一角，炸坏办公楼和宿舍楼各一幢。

当晚，广西军区副司令员焦玉山、区党委副书记安平生召集广西军区、南宁驻军负责人开会，讨论“530 林业厅事件”。他们一致认为，林业厅事件是一起“有组织，有计划的严重政治事件”。会议决定除立即向中央报告外，并发出通告，公开表态。

随后，南宁市革委会、南宁警备区司令员部、政治部立即发布《关于一小撮阶级敌人冒充人民解放军进入林业厅大楼枪杀革命群众的严重罪行的公告》，把“530 林业厅事件”定为“极端严重反革命犯罪行为。”

接着，5 月 31 日，“联指”指挥部开会，“联指”总指挥、广西大学学生颜景堂在会上介绍了“530 事件”的经过及其经验教训。自治区区监委干部、“联指”常委潘玉臣在会上提出要对“422”对其控制地自称的“解放区”“全部武装戒严、封锁，把他们控制起来”。

与此同时，“联指”所属组织，特别是红卫兵的一些组织，要求指挥部对“422”采取制裁、报复行动的呼声很高。

随后，颜景堂主持召开了几次“联指”常委及常委扩大会议，讨论攻打“422”据点问题。因意见不一致，未做出决定。

5 月 27 日这天，北京，林彪接见了四川的张国华、梁兴初，对他们说：“四川会议要搞自我批评，搞自我批评问题就好解决。

采取这种方式才能联合起来，才能共同对敌。两派斗争不能恶斗下去。开始乱一下是需要的，乱是乱了敌人。乱够了就好办了。文化大革命就是好，把隐蔽很深的叛徒、特务、假共产党员都挖出来了。刘少奇是个大特务，叛变四次。和国民党、美国还有联系。干部真正是叛徒，搞清的不能用。仅思想问题，经过教育还是可以用的。把毛泽东思想推广学好就可以出人才。过去我们打仗不是从那个学校出来的，主要是从斗争实践中锻炼出来的。只要把毛泽东思想推广、学好就能出干部。”

“四川是个黑窝子。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李井泉不是党员，是混进来的……。有些人表面上是共产党员，实际上是国民党员。彭真在东北也是这样，不补充主力军，只搞地方部队。贺龙以前感到他是作风问题，现在看来不仅是作风问题，而且是政治问题。暴露一些坏人是好事，但只打公开的还不行，还要把隐藏的揪出来。军人干部参加地方工作有好处，可以提拔起来。大胆的提。不提我们维持不了。另一方面搞政治，搞毛泽东思想教育就可以出干部。现在有一部分干部要打倒：走资派、叛徒、特务、坏人、顽固坚持错误死不悔过的。有一部分人有错误，打倒了，但还要用。需要干部多，军队要成为熔炉。”

第二天，5 月 28 日，中央同意四川省成立革命委员会。

5 月 28 日晚 20 时 45 分至 22 时 50 分，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姚文元、吴法宪、黄永胜、汪东兴、叶群等中央领导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四川学习班全体学员。

康生念了中央关于成立四川省革委会的文件和常委以上的名单，其中重庆的周家喻、王兴国和邓长春都是常委，但是没有黄廉。常委名单念完后，坐在黄廉旁边的王兴国把耳朵贴到黄廉的胸口上，然后竖起大拇指对坐在黄廉另一边的邓长春说："心脏跳动无异常。"

周恩来在讲话中说："从 3、4、5 三个月学习中可以看得出，两派能坐在一起谈问题，最严重的重庆，两派对立那么凶，现在能坐在一起商量，一道搞革命委员会了，提出了重庆到省革命委员会的名单，还有两名副主任没有解决，如果不走，在这里解决不是更好吗？这是很大的进步，对此，我们向你们祝贺。"

"在这当中，一针见血的，就是江青同志在 3 月 15 日指出的，把矛头指向刘结挺、张西挺同志，就是为李井泉、廖志高、任白戈翻案。这句话最尖锐了，一句话就使你们猛然醒悟了，是不是这样？"

众答："是！"

周恩来："所以解决问题，常常说很多话都不解决，一两句最尖锐的话就解决了，你们要记住，要常常想到江青同志讲的这句话。重庆的两名副主任委员还未解决，我觉得这还是一件遗憾的事，革命委员会成员 270 名，常委 55 名，主任张国华，副主任 18 名，还留有一些机动，重庆两名副主任委员没有推出来，既然常委都推出来了，为什么两名副主任推不出来，总还有一些问题，要与家中商量是可以的，是允许的，在讨论时，不要争席

位，争名额。有争名额时，要想到共同对敌，有这种精神就好解决了。当常委，副主任都是为人民服务，都是人民的勤务员，我们有时工作做不好还感到难过，现在留一部分机动，这样充裕一点，我们是同意的。”

“‘红成’、重庆‘815’和专县‘野战兵团’脱离关系，这很好。要进一步推动他们，说服他们，不要去打内讧，要回去抓革命促生产，不仅自己要搞好，还要帮助他们搞好革命委员会。”

接着，康生、江青、陈伯达也分别讲了话。

散会后，省革筹秘书长郭一明和刘结挺、张西挺 3 个人气喘吁吁地跑过来对黄廉说：“黄廉同志，革委会委员的名单没有念，你是省革委会委员。”

黄廉点了点头。

出了大会堂，大家坐上卡车回政治学院了。黄廉没有上车，自己一个人在天安门广场溜达，心情应该是很郁闷的。在协商推选省革委会群众代表名单时，由于重庆军工的“反倒底”派对黄廉有意见，说他是右倾机会主义，除了写几篇声明之外，基本上没有贡献，是文人无用，所以都没有选他。在征求意见的省革委会结合的副主任人选名单上，黄廉和周家喻排在最后两名，拿下去讨论之后，周家喻选为省革委会常委，黄廉连常委也不是。刘结挺对黄廉说：“平时看你群众关系还好呀，怎么回事？四川的问题还是比较复杂，这个名单只是征求意见。”

重庆军工“反倒底”的邓长春也选上了常委，他劝黄廉说：

“我们都是幸存者，如果武斗时候一炮打死了，现在什么都没有了。”

还有的干部安慰黄廉说：“你一定要沉住气，你的历史地位不是几个人能够否定得了的。”

黄廉晚上 23 时才回到政治学院。刚进屋，郭一民就来了，问黄廉跑到那里去了？说省革委会和军区、两个军的首长都在等他。

黄廉问：“有啥子事嘛，要开我的批判会呀。”

黄廉走进大会议室，里面的人已经坐了一圈。张国华问他去哪里了？

黄廉没好气的说：“这点小事还要汇报呀？”

张国华马上说：“我们跟你作检讨，怪我们的工作没有做好，关于你的事情惊动了毛主席，毛主席问省革委会常委、副主任中间怎么没有你，我们感到不好解释，现在通知你：你已经是重庆市革委会副主任，省革委会委员，我们欢迎你参加省革委会的工作。有些事情现难以弥补，省革委会留了两个副主任空缺，是留给重庆市的。怪我们的工作没有做好，让主席操心这个事情，我感到很惭愧。”

张国华接着说：“你立即开始筹备重庆市革委会的工作，明天早上就回去作群众的工作，周家喻也同你一起去。”

张国华是一个句子、一个句子地说完这些话的，显得非常慎重。他又说：“这是周总理传达下来的毛主席指示，我们省革委

会、军区和两个军的领导集中起来给你传达。”

接着，梁兴初说：“黄廉同志，我支持你的工作，你们一派里头还有派性，以后省里开常委会的时候，你一样参加，今天这个会是总理喊我们开的。”

接着是54军表态说：“我们支持你的工作，明天派一个师长陪你们回去，重钢的纠纷一定要平息下去。”

李大章说：“黄廉，一定要给毛主席争光争气，你还是能够工作的，主席说了嘛，造反有黄廉，怎么进革委会没有黄廉了呢？”

50军郑志士、孙洪道也纷纷表态说：“你的工作除了群众干部知道以外，毛主席、周总理也是知道的，将来我们努力做工作，我们也支持周家喻，你们先回重庆去做好准备工作，回去传达中央的精神。”

鲁大东也说了句：“我们今后要合作。”

过了一会儿，周家喻也被叫来了，他也不是很高兴，张国华和梁兴初说：“你们两个明天就回去，开始筹备市革委会的成立大会工作。”

第二天，5月29日，周恩来嘱秘书打电话给公安部副部长李震：“查问董必武之子董良翮被押地点；查清后请李告诉董必武的秘书，允许董家送夏衣去。并可表示董良翮的问题很快可以解决。”

董良翮自1967年出狱后就逍遥了。1968年4月初，他向家

人提出想去当兵。董必武与广州军区詹才芳副司令很早就认识，一打电话，詹才芳说："没问题呀，你的孩子参军有什么问题呀，"董良翮就到广州去参军。

但他到了广州后，说他视力不行，近视眼。后来征询了一些人的意见后，又同意董良翮入伍了，是到湖南的一个深山里头。董良翮提出先回北京。火车到了北京站以后，上来一群军人，其中一名干部问道："你叫董良翮吗？"

董良翮说："是。"

结果就把他给铐起来了。

董良翮一下就蒙了，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连到站台上接他的哥哥姐姐都惊呆了，不知所措。

董良翮被带走了。后来，董必武接到黄永胜电话，说："你儿子被抓起来了。"

一天，董良翮的姐姐董良翚推开父亲办公室的门，看见董必武在沙发上仰卧着，双手搁在扶手上。这种不拿书的情况是家里人很少见的。他长长地叹气，对女儿说："你弟弟是代我坐牢呀！"

儿子再次入狱，董必武依旧三缄其口。他在《闻酉儿于北京车站被捕》一诗中写道："闻尔重入狱，吾衰心更惊！卧床苦无梦，食饭竟忘盛。试飞曾折翼，语频或失声。恢恢天网大，疏释望新生。"

## 第 1011 回：奔秦岭，川、渝成立革委会　毛泽东，接见学习班代表

在筹建四川革委会期间，陕西又发生了一起让周恩来亲自过问的事情。1968 年 5 月下旬的一天，西安市 21 军军部总机接到周恩来打来的电话，找军长胡炜。周恩来首先向胡炜通报了一个情况：四川省广元地区一支几百人的武斗队沿宝成铁路窜到了陕西省境内，与陕西省汉中地区的一支武斗队结成一伙，包围了秦岭山脉深处、宝成铁路附近的一座国家战略储备油库。接着，周恩来在电话里给胡炜下达了命令："胡炜同志，你马上派部队去解决这个问题!"

胡炜放下电话，立即命令驻守在宝鸡市的解放军某师师长孙玉水率领两个营的兵力迅速前往这个战略储备油库，平息那里的事态。

那天夜晚下雨。夜色里，秦岭山脉黑云密布，雷电交加。随着一声声短促、急切的口令，6 个连队的干部战士踏着四溅的雨水，跑步集合完毕。

身穿雨衣的指战员一个个荷枪实弹，神色严峻，在宝鸡市陆续登上了卡车。随着一阵阵汽车发动机的轰鸣，一盏盏汽车前灯如同一把把利剑，劈开雨雾和夜幕，长蛇般急速向秦岭大山里进发。

由于情况紧急，师长孙玉水接到命令即率部出发，甚至来不及对部队进行动员，拉起部队就走。那 6 个连队就这样糊里糊涂

的出发了，也不知道师长要带他们到什么地方去!

在部队出发前，孙玉水师长已给驻守在陕西省略阳县的张文斌团长下达了命令，命令他率领两个连从略阳乘火车向油库所在地进发。两路部队，分进合击。

张文斌团长立即和略阳铁路部门联系，调来了一个火车头，在后面加挂了五六节车厢。

秦岭大山里的这座大型油库，距离宝成铁路线还有七八公里，火车把油罐车拉到油库附近的一个火车站，再通过输油管道把油输送到油库里。那是从国家战略需要出发，六十年代专门在三线大后方设置的。

秦岭的公路本来就不好走，加上下着大雨，孙玉水师长率领的车队走到凤县时，因为雨下得太大，山路泥泞，道路实在是不好走，不得不停顿了一下。孙师长利用这一短暂的停顿机会，给部队做了动员，告诉干部战士们：今晚要到什么地方去，任务是什么，对大家提出了要求……

第二天中午 12 时左右，孙玉水率领的 6 个连和张文斌率领的两个连几乎同时抵达油库附近。孙玉水不顾长途行军的疲劳，指挥部队迅速控制了油库，把火车站和油库一带的几个山头都给占领了，里里外外布置了几道警戒线。

来自四川广元和陕西汉中的两支武斗队，听说是解放军派来了大批部队，昼夜兼程正在朝这里进发，便吓得逃之夭夭了，没有和部队发生接触和冲突。

5 月 31 日，四川省革委会宣告成立。重庆两派在这天分别举行庆祝四川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会后游行途中，两派在两路口等地发生了武斗。

6 月 2 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发表社论，《七千万四川人民在前进——热烈欢呼四川省革命委员会成立》，祝贺四川省革委会的成立。

6 月 2 日，重庆市革命委员会成立，驻军领导蓝亦农、白斌分别担任正、副主任。

就在重庆市成立革委会的前一天晚上，“反倒底二轻兵团”打电话来说：“815 开枪打死了一个‘二轻兵团’的人。”

第二天，也就是重庆市召开革委会成立的那天，“反倒底二轻兵团”在市中区所有树上都挂上了白花。在革委会成立大会上，“二轻兵团”部分成员抬尸来到大会会场，要冲上主席台，与值勤士兵发生冲突。从主席台上下来帮助值勤士兵维持秩序的“反到底”负责人李木森、邓长春在混战中都被打伤。好端端一个会场，被他们一冲，气氛就完全变了。来参加庆祝大会的李大章对黄廉说：

“黄廉，你看一看，这是你们那一派的人，武斗不停止，你制止得了吗？派性和武斗不停止，你副主任咋个当？”

蓝亦农和白冰问黄廉怎么办，黄廉说：“把尸体接下来，派一个排的解放军把他们赶出去，下去帮助他们调查解决。”

30 多年后，黄廉才知道事情的真相，那个死尸根本不是“815”

打死的，是一个女学生从成都回来后，到“二轻兵团”玩，结果枪走火，被打死了。二轻的头头本来对自己只结合为市革委会委员十分不满，死了人又不好交代，就栽赃给“815”，来了个抬尸闹会场。

6 月 2 日这天，重庆两派还在空气压缩机厂、嘉陵机器厂武斗。

由于 5 月重庆市四周专县武斗激烈，通往重庆的水陆交通断阻，1 至 5 月各地计划调往重庆市粮食 2.395 亿公斤，实际只调入 1.26 亿公斤。至 5 月底，全市粮食库存仅 4000 万公斤，其中大米仅够 7 天供应，有的粮店脱销。驻渝部队紧急成立调粮办公室，组织军车、民汽车共 367 台，由解放军护送，经 70 天突击抢运，一定程度缓解粮食库存告急的状况。以后一段时间，调入重庆市的粮食完全靠解放军护送。

在此期间，中央还发生了一起关于传阅成立四川省革委会电话记录的事情。6月1日，江青批送毛、林、周、陈、康传阅的关于成立四川省革命委员会的电话记录，由于周恩来看过后与另一文件夹在一起，结果未能及时找到送出。待找到时已是6月2日。

文件退回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值班员问：“此件6月2日《人民日报》已发表消息，是否还需要传阅？”

周恩来秘书未经请示，即回答：“还要不要传阅，可请示中央文革办事组。”

6月2日，江青在该传阅件上批道：“如果总理的秘书和中办

秘书局认为可以不传阅了，那么，请只送毛主席、林副主席、伯达同志，其它同志可以不传。不过，政治责任应由总理的秘书和中办秘书局负。”

当天，周恩来与汪东兴谈话，并到江青那里。

次日，6月3日，林彪批道：“今后江青同志及中央文革其它同志批传的文件及电话记录必须按批送的范围及时传阅。”康生、陈伯达也附和：“完全同意林副主席的批示。”当天，周恩来也特别批注：“我将另有一检讨意见送上。”

6月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针对柳州铁路中断一事发给广西自治区革筹小组、广西军区、柳州铁路军管会，并转柳州“造反大军”、柳州“联指”的《关于柳州问题的五点指示》，要求“铁路两派群众组织立即停止武斗，外单位人员必须撤出铁路系统各单位，不得介入铁路系统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当晚，周恩来到毛泽东处。随后，陪毛泽东接见南京、沈阳军区和解放军各总部、各军兵种参加毛泽东学习班的军队成员两万余人。陪同接见有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谢富治等人。李富春、董必武、陈毅、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等人也参加了接见。

毛泽东在与参加接见的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和一些军队领导人谈话时，说到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武斗，毛泽东说：“我们的方针叫做一不压、二不管、三不怕乱。”“聂元梓、蒯大富

天天叫，他们的日子不好过，队伍不多了。聂元梓想当北京市革委会主任，没有当上，只当了副主任。蒯大富、韩爱晶是中间派。蒯大富直接写信给中央，说不得了啦，只有那么几个人了。”“总之，学生闹事不要管。我们有些同志就是怕别人贴标语，别人贴标语就要抓人。哪有共产党怕群众的？”

提到要打倒陈毅的有外语学校的“六一六”时，周恩来插话：“‘六一六’也是要打倒我的。”

毛泽东说：“陈毅打倒了，你就差不多了。”

毛泽东又说到广西的武斗：“广西的武斗，主要是柳州、南宁。桂林最近也要打。我看里面有鬼。外省有不少的人在柳州，抢了 1800 多万发子弹。”

桂林自 2 月 18 日，在支左解放军主持下，经过办学习班，组成“桂林市革命大联合委员会”，并于 4 月 14 日成立了桂林市革命委员会。4 月 16 日，全市 8 万多军民集会庆祝。

但是，在筹建桂林地、市革委会问题上，“造反大军”对桂林军分区和部分驻军支左人员偏袒“联指”派深为不满。4月29日，桂林地区机关举行庆祝地区革委会成立大会，桂林地、市“造反大军”拒绝参加，并冲击会场，与“联指”人员发生争执。警备司令部执勤人员扣押了冲击会场的“造反大军”人员。“造反大军”上街游行，并在警备司令部静坐示威。

这一事件，使得刚刚还在大唱“实行革命的大联合，实现革命的三结合”高调的两派，立即翻脸，双方矛盾更加激化。

5 月 3 日，桂林“联指”发出《公开信》，勒令“造反大军”静坐人员于 5 月 4 日中午撤出警备司令部，否则将采取最坚决的行动。

5 月 4 日，“造反大军”未撤出警司，“联指”武斗人员便于当天带着背包集中于市委院内“联指”据点，并抢占东、南、北门的制高点。“造反大军”也相继占据了市中心的制高点。

双方占据制高点后，堆沙包、筑工事，拦截和搜查过路车辆、行人，互相抓、打对方人员，互相攻打对方据点。

桂林市“联指”为了解决武斗急需的武器弹药，从 5 月 10 日起，先后到 104、301、警备司令部、军分区、6955 部队、空军机场、雷达站、市武装部、南站军管分队等处，夺了 15 次枪，共抢得各种枪支 200 余支，子弹 25000 多发，手榴弹 500 多枚和一批军用物资，抢枪中打伤战士多人，地区“联指”也夺了 9 次枪。

5月12日，桂林地、市“联指”负责人在荔浦县召开桂林地区12县及桂林市“联指”头头联合指挥部会议。会上，“联指”头头说：桂林有10多个国民党将级军官参加了桂林“造反大军”。国民党连长以上参加“造反大军”的已组成一个团，集中在桂林市文化宫。因此，呼吁各县行动起来保卫红色政权——“革命委员会”。会议决定：各县先派10名代表联合到桂林驻军和地、市革委会“反映情况”，争取他们承认各县“联指”派人武装进城“保卫红色政权”是革命行动。

会后，桂林“联指”发表了“联合声明”，为县里农民武装进城的合法化造舆论。他们的想法很快就得到了桂林地、市革委会及驻军的认同。

5 月 13 日晚，桂林“造反大军”负责人在广西师院历史系刘振林的房间召开会议，确定了‘针锋相对，文攻武卫，立足于打’的方针，并提出了：防御、相持、反攻三阶段的‘红色山城保卫战’的作战方案。

14 日至 15 日，广西师院“工总”周兆祥等人又召开常委会。会上，刘天偿说：“现在‘联指’占了那么多据点，我们只有打才有出路，只有打才能把主动权夺回来。”刘振林说：“我们要先下手为强，在他们没有准备好之前，就把他们干掉。”

5月中旬，桂林“造反大军”成立了地、市“造反大军文攻武卫总指挥部”。

16 日晚，由“老多红卫师”第一任师长戴明德率领 70 余人，乘夜暗潜入预定位置，先用炸药包将百货站办公大楼炸开了两个大洞，尔后向大楼发起冲击。“联指”成员何嘉荣、杜修柱、军管战士谭绍宏被打死，打伤多人。

5月17日，桂林地区12个县的“联指”代表86人，先后到达桂林，住在东方红饭店。地、市“联指”头头到饭店看望了他们。

5 月 17 日，“联指”调动 12 个县的“联指”进桂林，武装抢占“大联委”的办公地点榕湖饭店。

“联指”先后发表了《关于桂林局势的紧急声明》、《紧急动

员令》、《进驻大联委的声明》。

“造反大军”也相继发表了《严正声明》和“五·一九《紧急声明》”等。同时，两派的武斗组织也相继成立，双方都在作大武斗准备，并动员家属群众搬家。

5 月 19 日，以桂林市“革委会”和“驻军支左领导小组”的名义，发布《紧急通告》：

“更为严重的是，当进攻者打信号弹撤退时，在桂林百货站办公大楼附近的仓库执行军管任务的人民解放军战士谭绍宏同志和伴送他的仓库保管员，徒手去观察情况，准备向上级报告情况，制止武斗，走至路灯照明下，被进攻者所设的埋伏打死。

这一事件，是发生在周总理发出五月七日三条命令之后；是发生在市革命委员会发出了第二号公告和三条决定，两派表示愿意执行周总理的命令和市革命委员会第二号公告、三条决定，撤出据点上交武器之际。在此情况下，市造反大军下属个别组织向联指据点发动进攻，挑起武斗。

这种行为是完全错误的。这一事件是一种极其严重的政治事件。因此，市造反大军必须做出检讨，承认错误，必须立即交出杀人凶手，并发动群众揪出幕后策划者。”

5月19日晚，桂林地、市革委会及驻军负责人景伯承、吴新中、陈秉德、冯邦德等，在榕湖饭店小礼堂接见12县86位“联指”代表。陈秉德说：“感谢12县的贫下中农关心桂林形势，提出了很好的宝贵意见，对桂林形势有很大的促进。”

5 月 23 日上午 9 时许，“造反大军桂铁总工”的一名职工带了一包炸药到师院图书馆的小楼，这里是“造反大军政治部”。他找到“造反大军”广西师院“工总”的周兆祥说：“昨晚我们从停在北站的一个火车皮里搞了十几吨炸药，不知效果如何，所以我们只搞了一小部份，还有大部份至少还有四、五十吨，如效果好，再多搞一些出来，对我们‘造反大军’的战斗有利。”

于是，周兆祥立即找到化学系的人。要求他们迅速把炸药化验。经化验得知这是苏联生产的 TNT 烈性炸药，效力高，可制造手榴弹和其他爆炸武器。于是决定，晚上把车皮上的炸药全部搞回来。

晚上 22 时，“造反大军”周兆祥带领 200 多人乘坐 12 辆汽车到达停车地点，一个多小时后，车皮上的 TNT 烈性炸药全部被抢运完。这些烈性炸药本来是运往柳州二化厂制造援越武器的。

从 5 月 23 日起，在刘天偿、周兆祥的组织下，“造反大军”分别夺了北站运往柳州二化厂的苏制 TNT 烈性炸药 50 吨和北门护路部队及军分区仓库的枪、炮以及弹药，总计各种枪支 3410 支，子弹近 27 万发，手榴弹 3400 枚，及各种炮 8 门。

5月24日，“造反大军”攻打桂林农械厂“联指”派。武斗中，双方各死2人，并打死驻厂解放军战士1人，炸坏厂办公楼。

6月4日，在桂林地区革委会和桂林军分区部分负责人的支持下，桂林地区12个县的武装部和“联指”先后组织了8000多名武斗人员开进桂林。

在此期间，桂林地、市“造反大军”组织人员从桂林军分区仓库抢走各种枪支 3300 支、子弹 250 万发、手榴弹 3000 多枚、炮弹 7500 发。抢枪时打伤解放军 5 人，“造反大军”被打死 2 人。与此同时，“联指”也先后组织人员进行夺枪行动达 20 余次。据统计，“联指”派共夺得各种枪枝 5800 多支，各种弹药 325.7 万多发，手榴弹 12.44 万多枚，爆破筒 114 根，火炮多门，还有一批军用物资；“造反大军”共夺得各种枪枝 3410 支，子弹 26.92 万多发，手榴弹 3400 枚，火炮 8 门，以及炸药 50 吨。

6 月 4 日，广西“联指”所属的水电学校、南师、电业公司、林业厅的“后备军”、“沥血”、“小八”、“红色林业”等 13 个组织，约 3500 人，第二次到长岗岭广西军区军械库“抢夺”武器。共“抢走”各种枪支 1859 枝，60 炮 8 门，子弹 100 多万发。广西革筹、广西军区向中央发的电报说，这次“联指”“抢夺”军械库武器是事出有因的。广西“422”袭击林业厅事件后，又传来柳州、桂林的“造反大军”要来南宁支援广西“422”，群众惶惶不安，所以“联指”基层组织才抢枪的。事前革筹、军区对广西“联指”指挥部做了工作，“联指”指挥部也对基层组织做了大量工作，但仍然控制不住。

这天，自治区革筹小组、广西军区向各专、市、县革委会发出《坚决制止农民进城武斗的指示》。

## 第 1012 回：如所料，桂林市战火四起　广州市，武斗事件频发生

正如毛泽东 6 月 3 日接见军队干部时所说，6 月 5 日上午，桂林武斗再起，“老多”夺回“大联委”榕湖饭店的战斗打响，很快“老多”旗开得胜。但在这场战斗中，“老多”也损失惨重，第一任“红卫师”师长戴明德中弹身亡。同时中弹身亡的还有战地记者、广西师院图书馆干部蓝仁伟。

6月5日，桂林地、市“联指”负责人在东方红饭店开会，成立了“桂林地区保卫革命委员会总指挥部”，并于当天发出《通令》称：地、市“造反大军”必须无条件投降。如胆敢抗拒，则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消灭之。

桂林“造反大军”没有投降，6月6日，他们分别在甲山招待所附近的公路和北门贮木场附近的铁路岔口，伏击“联指”派汽车，当场打死“联指”人员15人，伤多人。

6 月 9 日，广西自治区革筹小组、广西军区针对连日来桂林、柳州、南宁各专区、各县人武部、革委会和“联指”调集数万武装人员进城围歼“422”的情况，再次向各专、市、县革委会发出《关于制止农民进城武斗的指示》。而广西“422”指挥部也在当天发表了《就广西革筹、广西军区关于下令各专、市、县召开声讨“422”的“反革命罪行”大会给广西革筹、广西军区的紧急照会》。

6月12日和22日，桂林“联指”派武斗人员连续向“造反大

军”6月5日夺取的榕湖饭店发动进攻，双方发生激烈枪战。

6 月 13 日，南宁市“联指”从南宁市桂剧院用高射机枪向“422”占领的百货大楼射击，百货大楼三楼起火燃烧，被扑灭。

当天，桂林全州、兴安、桂铁等地的民兵，向桂林北站的“造反大军”发起攻击。武斗中，躲在防空洞内的北站职工及家属被炸死5人，有6人被当作俘虏抓到地区林业局“联指”民兵师驻地后，又被打死5人。从6月13日至28日，两派在北门一带展开激烈的争夺战。

6 月 15 日，桂林地、市“造反大军”攻打“联指”西线一带。双方交火中引起北门百货仓库起火，烧毁了仓库和大批商品，损失达 661 万元。

6月20日，桂林“联指”总部在五一饭店召开会议，研究拟定“南北夹击、缩小包围圈”的战役部署。此次会后，双方进行拉锯战，攻防交错。

6月22日，南片“联指”攻打桂林师范和榕湖饭店一带；北片“联指”则于23日清晨向桂北火车站、虞山庙和百货二级站发起进攻。

6月25日，桂林地、市“造反大军”转守为攻，集中力量反击北片“联指”。迫使“联指”撤退到地区水电设备修造厂和灵川县城一带。这一阶段的武斗，双方共死亡近百人，其中被打死无辜群众10多人。

6月26日至28日，“桂北民兵师”总部成员在灵川县委小会

议室开会。会议分析“南北夹击”失利原因主要是武器不好。因此决定到兴安国防453仓库夺枪，并成立了夺枪指挥部。

6 月 30 日，从上午 9 时 50 分起，至 7 月 4 日止，桂林“桂北民兵师”在“联指”夺枪指挥部的组织下，先后与桂林地区 12 个县的“联指”民兵、及桂林市“联指”和柳州钢铁厂“联指”武斗队，连续 5 天对兴安 453 仓库发起 12 次“冲击”，人数最多时达 1 万多人，出动汽车 400 多辆，共“抢走”各种枪支 5636 枝，各种子弹 325 万多发。各种手榴弹 124428 枚，爆破筒 114 根。各种军需品 783 件。

而此时的广东，也是武斗再起。

3 月下旬，广州市八路公共汽车发生罢驶事件。虽然广州“人民汽车工人联筹”在 3 月 8 日已告成立，两派工人签订了“实行车归队，人归队（间）”的协议。但实际上，两派的对立，仍然十分严重。八路公共汽车线停驶的起因是广州市第 43 中学几名学生在泮塘“上车不买票”，被八路车的司乘人员殴打。43 中“旗派”学生闻讯包围了八路汽车站，双方混战一场。随后，八路车以“旗派”“破坏八路交通”为由，全线停驶，上街游行。八路线瘫痪长达半月之久。紧接着，十八路公交线也从 3 月 12 日起全线停驶。由“旗派”控制的九路线、四路线也先后发生停驶。至春交会闭幕之后，形势进一步恶化，发展到十几条汽车线路停驶，汽车被抢事件更是屡屡发生。

4 月 26 日，广州百货商店发生停业三天的事件。起因是百

货商店一名曾加入“八一战斗兵团”的职工，在 1967 年患了精神病，直至 1968 年 4 月仍未上班，商店扣发其 40%的工资。商店内的群众组织声称，此职工是因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迫害而疯的，属于政治迫害问题，应百分之百发给工资。并且发出《紧急呼吁》，要“动员一切可以动员的力量，组织一切可以组织的人员，实行联合大罢工”。第三天又发表《第二号声明》，并多次对内外广播，要求立即得到解决，“否则将采取强硬的‘革命行动’”，罢市从 26 日开始了。

当天傍晚，市革委会和军代表到商店传达省、市革委会的指示，要求他们马上停止罢市，开店营业。事件僵持了三天才告结束。此事件被省革委会定性为“反革命罢工罢市事件”。

就在广州百货商店发罢市的当天，4 月 26 日，广东省、广州市革委会召集省、市工代会的代表开会。孔石泉、陈郁、王首道、阎仲川、黄荣海等人出席会议。广州军区政委、广东省革命委员会第一副主任孔石泉在讲话中质问广州市内公共交通瘫痪的问题，说：

“现在你们有人抢汽车，这是什么行为呀？昨天发生一起交通车被抢。这是土匪行为！使人民汽车司机觉得紧张，不敢开车，人民公共汽车停车就是上了敌人当。”

“搞武斗是少数，背后是有人支持和操纵的。但是这些坏人，终有一天人民觉悟后，阶级敌人是要原形毕露。”

广东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陈郁在谈到全省形势时说：

“全省 111 个县市，已经成立革命委员会的有 96 个，余下的只有 15 个了，广东是可以很快实现全省一片红的。”

在谈到广州市的形势时，他说，目前有人企图分裂“工人纠察队”。

刚刚成立一个多月的广州“工人纠察队”以“东风派”为主，受革委会领导。

针对社会上有许多攻击“工人纠察队”的大字报，陈郁说：“广州工人纠察队不是哪一派的，是我们广州工人阶级自己的。广州的工人纠察队是具有革命斗争的光荣传统的，成立不到两个月，是有很大贡献的。”

5 月 22 日，位于海珠广场的广州供电公司发生武斗。起因是供电公司的“工革联”与“工革会”两派群众，因张贴标语，发生口角冲突。“工革联”涂改了“工革会”的标语和大字报；“工革会”又用大标语覆盖了“工革联”的大字报。“工革联”决定在第二天 5 月 22 日召开大会，组织人力，覆盖公司内“工革会”的所有标语。同时，联络 41 中、25 中、26 中的学生，随时准备增援。

22 日上午 8 时 30 分，“工革联”按计划召开全体人员大会，群众涌到覆盖标语的现场，与“工革会”的群众从对骂到动手。“工革会”的人退守三楼办公室，“工革联”随即关上公司大门，大规模武斗爆发，这时是 9 时 40 分左右。

先后有两批中学生闻讯赶来支援“工革联”。两批学生进入

公司不久，解放军的两辆巡逻车开到公司门口，要求开门进去制止武斗。但遭“工革联”拒绝。当广州电厂的军代表赶到现场时，亦被群众投掷石块拒之门外。

午夜 24 时，军队开始强行进入公司大楼，制止武斗。至 5 月 23 日清晨 5 时左右，军队根据省、市革委会的指示，将公司内的所有人员护送到指定地点集中，开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据军区公布的材料，此次武斗共打死群众 5 人，其中小孩 1 人，重伤 27 人，轻伤 15 人；烧毁民房和办公大楼，损失数万元；烧毁电表近两千个，达 14 万余元。军人被打伤 11 名。

6 月 3 日，中山大学再次发生武斗。

当时中大的形势是“旗派”占绝对优势，全校教职生员工 6000 多人，参加“红旗”“八三一”的有 4000 多。到 68 年，他们的对立面“革造会”只剩下不到 500 人，留在校内的不足 300 人，都在中区图书館里。

据中大武装部葛部长 1974 年对中山大学“八三一”负责人黄意坚说，是他 5 月底向“革造会”的人传达广东省军区的人希望“革造会”的人强硬点，军区才好支持他们。葛部长说：“想不到一句话，引起了六三武斗。”

据“旗派”方面记述，武斗起因是“东风派”的“革造会”6 月 3 日中午强占原由“旗派”占领的旧物理楼，投掷了两枚手榴弹，炸伤 5 人，并抓了在楼内的四名“旗派”人员，武斗爆发。“中大红旗”、“八三一”闻讯前往抢救。“旗派”指责对方“用

手榴弹、硫酸、毒气继续危害正义的红旗、八三一战士”。

晚上 20 时后，黄意坚回到中大，负责指挥中大“旗派”的行动，欲夺回旧物理楼。而“地总”、“红总”则以“工人纠察队”名义在中大对面的省柴油机厂，电机厂集结了几千人欲攻打中山大学，支援“革造会”。广东省革委会副主任陈郁闻讯亲自前去劝阻制止。

晚上 22 时左右，中大“八三一”勤务组的杨飞立被“革造会”的手榴弹炸死，黄意坚允许在中大避难的 22 中学生向守在三楼的“革造会”开枪。由于 67 年交枪时，中大“红旗”“八三一”交的比较彻底，几乎没有留下枪。下半夜，黄意坚在校外“旗派”的支援下，组织了一支有二十多支枪，包括两挺机枪在内的武斗队伍，准备阻击“工人纠察队”进攻。可以想象，如果当晚不是陈郁阻止了“工人纠察队”的行动，结局会是多么的惨烈。

再说中山大学的旧物理楼，一派占据楼上，一派在楼下包围，至 6 月 4 日上午 8 时许，黄意坚巡查了防止校外入侵的武斗队伍后回到物理楼，见数力系有人在西边楼梯放火，说是用火攻，他马上制止说：“烧了楼梯，待会我们真要攻，不是少了条路嘛。赶紧叫人灭火。三楼连水都断了，‘革造会’的人没水喝，若无救兵，他们坚持不了两天。他们有枪有手榴弹，强攻我们伤亡太大，我已经布置好四支半自动、两支手枪守住三楼到二楼楼梯，他们跑不了，不要着急。”

数力系的人被黄意坚说服，开始灭火。10 时左右，一楼到

二楼的火已扑灭。

12 时左右，有人突然来到旧物理楼旁边化学楼，找到正在这里吃午饭的黄意坚，向他报告说：旧物理楼东边楼顶起火，火势颇猛。在场的化学系几个老师一下就紧张起来了，因为化学楼靠旧物理楼一边放有易燃易爆试剂，十分危险。他们马上组织了十几个人协助老师将危险试剂转移。

这场火，将旧物理楼的楼顶烧毁。军区的一篇观察员文章说是旗派在武斗中动用了机枪、手枪、手榴弹、燃烧弹、炸药、毒气和由中大化学系制造的“化学弹”。直到次日下午，中大红旗、八三一勤务组下令总攻击。旗派在楼下纵火焚烧，大火迅速烧向物理楼的顶层。

军管会办的《三军联委战报》文章是这么写的：

他们用炸药包连续爆炸，并灭绝人性地纵火烧楼。他们把群众的棉被、衣服集中在楼内，浇上汽油，撒上“六六六”粉和化学药品，用鼓风机煽风，企图将楼上的革命群众烧死、毒死、熏死。大火烧了整整六个小时，温度高达一千度以上，四层楼的楼顶烧塌了，楼内价值八十多万元的食品全部成了废品，楼上的群众也被烧伤，熏倒过去。

下午近 15 时，这场武斗以“革造会”举旗投降而告结束。

由于当年小报上的文章和交代材料，对武斗规模、死伤情况的描述，出于互相诋毁，或推卸责任的目的，真真假假，不乏夸张、捏造，甚至连军管会的文章，也难免有失实之处，但在这次

武斗中，有一位叫阮向阳的“革造会”头头被打死，却是当年一件轰动广州的事件。据当时正在现场的17中高一学生、广州“红司井冈山公社”社长、广州“红警司”副司令王希哲回忆，6月4日下午，他看见阮向阳冒死从三楼跳了下来，以为他是下来谈判，急忙喊正在楼里的“旗派”总指挥黄意坚，等王希哲回头再看时，阮向阳已被一群学生围上来，不容分说，乱棍殴打。当黄意坚赶来时，人已经不行了。后来清理“六·三”武斗时的一份问话记录是这样写的：

问：这次抓你来，你将罪行交代清楚。

答：6月4日下午两点多，一群学生(有八中、二十一中、六中、中大八三一的)追赶一个人(阮向阳)，有一个人叫：他是革造会头头，打。于是很多人扔石头，有的拿铁枝打，猛打。后送保健室抢救，当时死没有死，我没有看见。我没有动手打，人很多，我只是从家里出来上班在路上看见。

后来“革造会”学生写的材料说：“阮向阳同志跳得非常好，未有任何损伤。脚一着地，阮向阳就往西区第四宿舍方向飞跑。”这份学生材料写道：“此时看到后边已有四五个暴徒在追阮向阳。他们并未知道是阮向阳同志，边追边叫：‘不管是谁，追上去再说。’”

阮向阳跑到教工宿舍后，躲进了一位教师的屋里，把门紧紧关上。“接着就有人用长矛、匕首拼命打门，”后来这位教师写了一份旁证材料，他写道：“当时阮向阳同志并没有负伤，头上带(戴)

着藤帽并用一条擦汗用的手帕包住口。我们立即将他带(戴)的帽丢出外面，叫他解下手帕准备帮他跳窗逃跑。但这时已发现窗外站着一群武斗家伙，阮就说：‘不行，外面有人。’接着这班家伙不断地朝我们房里投石头。在这种情况下，只好叫阮躲到床铺下面。不久，门就被打开了。”阮向阳被蜂拥而入的人抓走了。那位“革造会”的学生说：

在往回带的中途为旗人(指旗派——引注)认出是阮向阳同志，便遭到各种棍棒的毒打，大刀砍杀，用长矛捅。到物理楼下，阮向阳已气息奄奄躺在担架上，围上来的暴徒又用脚拼命踢他。

这份材料还说：阮向阳被送到保健室时还没死，“岂知在保健室暴徒们下了更大毒手，又是用铁棍乱棒猛往(阮向阳)头上打，阮向阳眼睛翻白，只剩下一口气了。”

6 月 4 日下午，“旗派”举行了大规模集会游行。

6 月 6 日，“东风派”的“工革会”集合了数百人，包括大批“郊贫联”的农民，全副武装，包围中山大学。这种紧张对峙的局面，直至 6 月下旬，才慢慢平息。

6 月 8 日，广雅中学也发生武斗。“主义兵”、“地总”、“春雷”、“人汽六一五”等“东风派”组织的群众，下午从广雅后门冲入校内，把“旗派”的“四一〇红色造反团”13 人围困在一幢大楼里。双方楼上楼下对峙。附近十五中、十二中、西联中学、文昌中学的“旗派”学生纷纷赶来。形势非常紧张。

楼下的人开始纵火烧楼。最后，被困楼上的群众，有九人被

迫跳楼逃生，四人被掳走，其中一人严重烧伤，三人严重骨折。大楼基本上被烧毁。

## 第 1013 回：六月八，七机部南苑武斗　姚桐斌，竟当众被打致死

我们先放下两广的武斗，再看看这段时间发生在上海徐家汇藏书楼的一些事情。

1968 年 5 月的一天，张春桥、上海市革委会、于会泳和市文教组都收到一封同是 1968 年 5 月 7 日寄出的信，检举上海图书馆有人提供“412 炮打张春桥”及中央文革小组的黑材料。

上海市革委会向张春桥写了报告，张春桥批示：“应查清，但不要扩散。”

5 月 22 日，上海市革委会办公室负责人王承龙根据张春桥的批示，在报告上写道：“请按春桥同志批示办，抓紧！”

于是，上海市革委会“清档组”来到上海图书馆。

还是在 1967 年 10 月 8 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联合发出《关于接管清查敌伪档案的指示》。上海市革委会贯彻中央这一《指示》，也成立了市革委会“清查敌伪档案五人小组”，下设市革委会“清档组”作为其办事机构。

这次，市革委会“清档组”来到上海图书馆，不是要调查矗立在南京路上的那个挂着陈毅题写牌匾的上海图书馆，而是位于漕溪北路的这座不起眼的徐家汇藏书楼。真是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这里的所藏，不仅有江青当年以蓝苹为名时在上海的大量新闻轶事，还有狄克的文章，姚文元的父亲《姚蓬子脱离共产党宣言》，甚至还有徐景贤之父——徐宗骏的《自首自白》，以及

许多当年白区中共领导人的有关文章。

经过初步清查，“清档组”于 1968 年 5 月 24 日上报了《关于查封上海图书馆徐家汇藏书楼的紧急请示报告》。

第二天，5 月 25 日，王承龙批转报告：“同意。请少庸同志审阅，报春桥同志审核。”

王少庸批转：“拟同意，并请徐景贤同志阅定。”

徐景贤批示：“同意查封徐家汇藏书楼，同时把电影局、作家协会等单位的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影剧、黄色刊物封存，请春桥批示。”

5 月 31 日，张春桥批示：“同意。”

6 月 6 日，由上海市革委会“清档组”和政宣组组成的特派小组进入徐家汇藏书楼，以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名义，查封了旧中国三十年代的全部图书报刊资料。这些资料被搬入指定的房间，加锁，贴上封条。在查封过程中，查封专员中没有一人翻看这些报章。 因为他们在查封前就当众宣布了这样的规定：“未经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批准，不准查阅这些资料。书库管理人员未经同意，也不得进入书库。”

6 月 8 日，国务院七机部的两派——“915”和“916”在北京南苑发生了大规模的武斗。

那天早上，玉泉路七机部的“915”坐着大卡车气势汹汹的来到了一分院，这里的“916”早就严阵以待。双方一碰面就打起来了，没有文斗，先是互相投掷石头，然后你冲过来，我冲过

去，互不相让。

一分院家属区的繁华区段是一个十字路口，路口西南是工厂、科研区，其他地方是住宅和商业、剧场、医院等。

激烈的冲突在十字路东、南两条马路上。

向东的马路通向大片居民区，因此，马路两旁站满了家属、小孩，夹道围观平日正人君子般的家长、叔叔、大哥在这里破口大骂、出手伤人。不过交战双方基本头脑清醒，动手范围决不超出 7、8 米宽的马路，两旁的观众一般不会伤到，当然，攻防双方也不断大声呵斥、提醒围观者离开此地，以免误伤。

双方的兵器可谓五花八门，垒球棒、军刺、镐把等等，这是短兵器。还有长兵器，就是把 6 分的金属自来水管截为 2、3 米长，一端呈 30 度斜角锯断，形成一个锋利的尖端，作为梭镖。

远程对抗主要在两派各自盘踞的高楼之间进行。一个紧靠是十字路口西北的 31 号单身宿舍楼，由“915”把守，这是一栋 3 层楼。另一个是路口东南侧 400 多米远的 711 医院大楼，这是“916”的据点。

这两栋大楼估计也是当时两派的前线指挥所。上面都有简单的掩体以及自制的远程武器：抛石机和巨型弹弓。一时间，两楼之间不断有零星“炮弹”胡乱飞过，引来围观者惊呼。

711 医院大楼在一些商店、民房群落包围之中，大队人马不易抵近，易守难攻。而 31 号单身楼紧贴十字路口，暴露在东、南两条马路面前，没有防御纵深，因而，主要的攻楼对抗都发生

在这里。

攻楼一方先在百米外组织人员、武器、队列、护具等等，然后慢慢向大楼前进。前面是几块极大的木板或铁皮制成的盾牌，由十数人斜撑着，后面跟着上百人组成的突击队，人手一件各种各样的防护用具，例如大锅盖、铁锅、棉被等等。

这时双方都静悄悄的，因为还在砖头、瓦块、土造燃烧瓶的有效投掷距离之外，无需担心。即便有个别远程武器打来，其准确性也相当差。当攻方的盾牌大军前进至手工投掷距离附近，进攻指挥一声号令，大家齐声呐喊，向前冲去。

与此同时，31 号大楼也是一声号令，楼上楼下的守军一同投掷砖头、瓦块、土造燃烧瓶。“火力”打击后紧接着再发起反冲锋。

其实防守方的阻击火力一开始，进攻方的冲锋就基本停顿了，说到底土八路就是土八路，无法与正规军相比。无论是冲锋还是反冲锋，都是点到为止，还未到短兵相接的地步队伍就溃散了。你想，当天上落下无数砖头、瓦块，身边摔碎的玻璃瓶火苗四溅，迎面“敌人”挥舞着铁棍、木棒张牙舞爪的冲将过来。平素没有训练的人哪受得了这个，早就魂飞天外了。这里的战斗场面浩大，但是雷声大雨点小，战伤不多，有也是轻伤。

在向东的那条马路上。双方在无数百姓的夹道注视下，你冲过来、我冲回去。

这里的战斗似乎没有任何战役、战术目的，就是扬威，造声

势，发泄愤怒，想在气势上压倒对方。由于是真正的近战，混战，每一次冲锋虽然持续时间极短，但是相当惨烈，都有流血。

一次短促交战之后，一个满头是汗的“915”小伙子大概是打晕了，搞错了方向，撤回到“916”派的队伍之中。正在喘息中的“916”参战人员突然发觉这人可疑，马上问他：“‘915’、‘916’的？”

这小伙子立时明白了自己的处境，刚想转身，又停了下来，估计也明白，跑也没用。他肯定想伪装“916”的，但嘴上的回答却急中出错：“915。”

没有什么优待俘虏，没有什么不打放弃抵抗的人，完全是一群乌合之众。一拥而上，瞬间那人已是头破血流、浑身上下一塌糊涂，处于半昏迷状态，被几人提着四肢拖向 711 大楼。

711 大楼是医院，门口不断有伤员送来，“916”占据这个地方为自己争得了个好后方，起码伤员可以及时处理。

也不时有救护车把“915”派比较重的伤员运过来，医院大门口两旁都是“916”派的人员和部分家属。看到是“915”的伤员就大声喊：“不给他们治！不给他们治！”

但是也有不少人包括女人和老职工反驳说：“医院，是伤员就得治，就是俘虏也应该善待，不能见死不救。”

这场武斗有数千人参与，上万人不能上班，科研、生产全部停顿。

怒发冲冠、剑拔弩张、审时度势、提心吊胆，呼喊、嘶叫，

冲锋、退却，从早上一直打到下午。

南苑武斗震惊了北京，震惊了中央，震惊了周恩来。他命令粟裕亲自前往制止。

粟裕去了。但是天气炎热，双方打得更火热，军管会根本无法靠近，也搞不清是什么情况。周恩来对粟裕说："粟裕你七战七捷，怎么今天成了个大姑娘？"

是啊，七战七捷那是对敌人，可此刻粟裕面对的都是些老百姓。没办法，下午，一架直升飞机飞临南苑，在武斗现场上空盘旋。有人喊："周总理就在直升飞机上！总理来看望我们来啦！"

于是，一个滑稽的场面出现了。整个东高地武斗现场一片沸腾，人人都仰头向直升飞机挥手。两派都高呼口号：

"毛主席万岁！"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有人热泪盈眶的带头唱歌："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

现场两派群众都在那里挥手，都在那里激动，都在那里呼口号，都认为周恩来是来支持他们的。他们也不想想，你们在这打成一团，总理在飞机上能分清谁是"915"，谁是"916"吗？看看就是支持你们啊？这里是重要的军工单位，又离天安门这么近，总理怎么可能支持你们在这里武斗呢？

当时的人们，许多还是大学学历的知识分子，就是如此的单纯、简单、虔诚。

过了一会儿，一辆小汽车开到武斗最激烈的十字路口附近，在邮局旁边停下了。人们蜂拥而至，门开了，可以看到里面坐着一位老军人。待了一会儿，小车又开走了，有人说粟裕来了。粟裕是来了，但不是车里坐的，而是在直升飞机上的是粟裕，奉周恩来之命亲赴武斗现场调查。

就在 6 月 8 日这天，航天材料及工艺研究所第一任所长、两弹一星功臣姚桐斌被参加武斗的歹徒暴打至死。

这几天，七机部不断发生武斗，许多人都不上班了。作为 703 所所长的姚桐斌每天仍然按时到办公室去。

6 月 7 日早晨，“早请示”结束后，一位所领导悄悄对姚桐斌说：“你住的地方不太安全，我看应该找个地方躲一躲。”

姚桐斌说：“谢谢你，但我认为不会有事的。”

那位领导说得不无道理，姚桐斌家住的 35 号楼正好位于两派组织的联络站中间，几天前“915”还将该地区宣布戒严，晚上 9 点以后不许出门。但是姚桐斌不怕。

6 月 7 日一切正常，平安无事地过去了。

6 月 8 日清晨，姚桐斌手提一个热水瓶，骑着自行车，照常上班。他看见几名职工聚在一起向远处眺望，便走过去问他们在看什么。几个职工告诉他那边开始武斗了，姚桐斌过去看了看，只见院墙外的远处聚集了很多人，有的扛着钢管，有的戴着柳条帽。看了一下，姚桐斌对他们说：“不要管他们，我们上我们的班。”说完，转身就进办公室了。

中午 12 点，下班的时间到了，姚桐斌收拾办公桌上的书籍、文件，下楼准备回家吃午饭。有两位 703 所的技术人员，见到姚桐斌，急忙打招呼："姚所长，您还在'抓革命、促生产'啦！外面都有人在武斗了，您还是等一等，先别回家。"

姚桐斌笑笑说："谢谢。"他还是回家了。

一进家门，孩子们就围过来，"爸爸回来啦！爸爸回来啦！"

姚桐斌洗完手，亲了一下跟在后面的小罗汉，抱着她走进饭厅，还未坐稳，就听见一阵阵粗暴的捶门声。

"开门！开门！"

住在他家的另外两家人吓得躲进各自的房间。姚桐斌将小孩哄进保姆房里，向大门走去。

"咚！咚！咚！"

"到底开不开门？！"

门被钢管砸开，一伙人冲了进来。

"请问，你们找谁？"

"妈的，找的就是你，干嘛磨磨蹭蹭不开门？"

接着一阵耳光。随后不由分说，将姚桐斌连拖带推地架下楼去。在楼门前，一人上前左右开弓又是两个耳光。姚桐斌的脸被打肿，鲜血从嘴角流出来，一个家伙用脚狠踢姚桐斌的会阴部。这样还不解恨，将姚桐斌的眼镜一把从脸上抓下，扔在地上，踩得粉碎。

人越围越多，他们对姚桐斌拳打脚踢。这时有两个"915"

派的人，一个是七机部下属 211 厂的炊事员，另一个是从七机部永定路二院下属某所调来的电工，他们两人各执一根暖气管，向姚桐斌头上猛击，姚桐斌当即被打倒在地。

“站起来！装什么蒜？你又没死！”

这些人硬是把姚桐斌拖到他们“915”总部。此时，姚桐斌已不能说话了，靠在一张木椅上，两眼发直，随即倒在地上，“915”的头头们见状，就吩咐手下的人：“把姚桐斌搞走，别让他死在我们这里！”

那几个人把姚桐斌拖到他家楼前人行道上，向他猛踢几脚，还故意大声嚎叫：“起来，别装死，自己滚回去，难道让我们抬你上去不成！”说完便扬长而去。

一位邻居发现了地上的姚桐斌，立即跑上楼找他家保姆。他们请求“915”允许他们将姚桐斌送到医院抢救，711 医院离姚家不到四分之一里的路，但得到的答复是：“不行！”

由于 35 号地区处于“915”的势力范围，邻居只好把姚桐斌抬上楼，放在客厅沙发上。由于头部几处受重伤，姚桐斌一直未恢复知觉，于下午 15 时许停止呼吸，惨死在家中。

大规模的武斗到傍晚结束了，但是零零星星的武斗仍然不停，整个家属区连续多日笼罩在不祥的气氛之中。

6 月 8 日是星期六，姚桐斌的爱人彭洁清离开学校赶回家时，已是下午 17 时多了，南苑的武斗已经结束。当她登上三楼时，家门忽地打开，她家的保姆啜泣着对她说：

“姚所长……被人打死了……”

“什么？你说什么？”

彭洁清感到一阵眩晕，听不懂她的话，站在门外一动也不动，任由手袋掉在地上。

天哪！这不可能是真的！绝不可能！这个女人在瞎说，这只是一个可怕的梦魇。

3 个惊恐的孩子跑过来拉住了妈妈哭成一团。她们扶着妈妈进了客厅，一见丈夫，彭洁清便猛扑过去，啊！这是桐斌吗？这是我日夜和他谈笑的桐斌吗？啊！天啊！

此刻，姚桐斌直挺挺地躺在沙发上，白衬衫血迹斑斑，灰裤子上也是污血和脏土。由于他个子高，两只脚伸在长沙发的扶手上，一只脚穿着袜子和布鞋，另一只脚光着、没有鞋袜。他的头在沙发另一端的扶手上，玳瑁眼镜不见了，脸上青一块紫一块，面对着这令人心碎的景象，彭洁清终于醒悟到，这不是噩梦，是残酷的现实。

这时，外面雷声隆隆，大雨滂沱，仿佛是天使对人间的残暴表示愤怒。

雨停后，保姆几次向彭洁清欲言又止，最后终于吞吞吐吐地对她说：

“我想到别人家借住一晚，好吗？”

彭洁清毫不犹豫地答应了，同时请她捎一张便条，把姚桐斌被害的噩耗带出去，因为家里的电话已被“915”割断。保姆吓

昏了，不敢带便条。彭洁清别无他法，只好叫大女儿去一位朋友家，请他带领女儿去找军代表，向他们报告她父亲被害之事。

天渐渐地黑了下来，女儿还没有回家，恐惧又袭上彭洁清心头，是不是她被人抓走了？是不是又发生了什么不幸？要知道，她在女儿兜里塞进了一张给军代表的纸条啊！于是她跑到“915”的“总部”，想把事情弄个明白。

她走近“总部”时，只见门前站着一个身材魁梧，国字脸，大约 30 来岁的人，他头戴柳条帽，身穿白衬衫，绿军裤，配戴红袖章。彭洁清责问他：“你们为什么要打死我爱人姚桐斌？”

“我们没打死他，送他回家时，不是好好的吗？”

“送到家？你们把他拖到楼前人行道上，不顾他的死活就走了。连家属要求送医院抢救也不准许。你们自称为‘无产阶级革命派’，为什么对一个重伤垂死的人那样冷酷无情？”

她越说越气，声音也激愤起来。

“你们有什么权利抓我爱人？你们有什么权利打人？我的女儿出去没回家，是不是也被你们的人抓走了？”

“你这个人是怎么搞的？找不到你女儿，关我们什么事？”说完，一转身，走进楼去了。

## 第 1014 回：闻噩耗，周恩来酒杯落地　后事难，凶手六年未法办

彭洁清回到家中，只见两个小女儿可怜兮兮地站在门口，她们父亲的遗体就在她们身后，她们母女又相抱而泣。这一晚，她们三人挤在一张床上，两个小女儿毕竟年幼，在妈妈怀中抽泣地就睡着了，可是彭洁清却难以入眠。丈夫的遗体就在隔壁客厅里，虽然近在咫尺，却已是天上人间，阴阳路隔了。

就在姚桐斌被害的前几天，他和妻子彭洁清避开孩子，曾在卧室里有过一次忧心忡忡的谈话，妻子说：

“现在局势很乱，听说北京有的大学有教授被打死了，你看是否到什么地方躲一躲？”

姚桐斌不同意：“外地更是乱得厉害。据说，有些地方都动枪动炮了。”

彭洁清点了点头，姚桐斌接着安慰妻子：“别担心，我俩都没有历史问题，有什么可怕的？再说，我们身居首都，在毛主席的眼皮底下，难道还会有人敢胡作非为？”

见丈夫说得有道理，彭洁清没有坚持，现在她好后悔啊！

漫漫长夜，终于熬过去，朝霞从窗口射进，6 月 9 日来临了。

两位军代表，一高一矮，带着彭洁清的女儿跨进家门，后面跟着几位解放军战士，抬着好几大桶冰块。他们将冰块放进浴缸，把姚桐斌的遗体从客厅里抬出来，放在上面，四周又堆放了许多冰块，然后将门窗紧闭，以保持浴室低温。

这时，那位高个军代表对彭洁清说："昨天因为时间太晚了，不放心让您的女儿回来，所以让她住在我们那里。"

"你们难道不能派人送她回家？我都快急疯了。"

"昨天周总理一听说这里发生武斗，姚桐斌同志被害，就派粟裕同志乘直升飞机来这里了解情况，恰好您的女儿进办公室，于是我们就让这小姑娘当面向粟裕同志报告她父亲被打死的经过，这样一来，时间就拖晚了。"

"一个小孩子怎么能讲得清楚？你们军代表到七机部时间也不算短了，难道还不知道我爱人没有政治问题，历史清白，是一个好同志吗？"

军代表说："姚桐斌是位好同志，他被打死，是始料不及的。"接着，他安慰彭洁清说："毛主席亲自发动了文化大革命，目的是反帝反修，保证红色江山永不变色。毛主席他老人家说，'要奋斗就会有牺牲。'请您节哀，保重身体。"

另一名军代表接着说："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说，'文化大革命'的收获最大最大最大，损失最小最小最小。希望您以大局为重，不要过于悲伤。"

军代表见她没吭声，只好告辞："我们得走了。"

"你们打算怎么办？这么热的天气，就这样把我爱人放在浴缸里吗？"

军代表无可奈何地说："我们已经和几个医院联系了，都说没地方停放遗体。"

他们尴尬地说，“您好好休息一下，这几天，我们会派战士早晚各送一次冰块来的。”

说完，两位军代表就急奔下楼而去，留下她和 3 个孩子孤零零地守着她们父亲的遗体。

彭洁清和女儿们默默无语，沉浸在无比的哀痛之中，不知如何来互相安慰，只有 3 岁的小女儿，用她的手轻轻拭掉妈妈脸上的泪珠。

据说，当周恩来得知姚桐斌的死讯后大为震怒。当时他正在宴请外宾，听到消息，气愤得全身颤栗，以至将手中的酒杯失手跌落在地。

6 月 9 日这天，粟裕到七机部军管会传达周恩来的指示：“由军管会解决制止武斗，姚的尸体要解剖。”

10 日早晨，一阵敲门声，将彭洁清惊醒。她起身开门，只见还是几位战士抬着冰块进来。

“同志，军代表没来？你们知道什么时候安葬吗？”彭洁清问。

“不知道，首长们只指示我们早晚来换冰块。”

“请你们问问军代表，哪天安葬？天太热，放在家中不是办法，想必你们也知道，没有军代表的介绍信，哪个火葬场都不会收的，麻烦你们问一声行吗？”

“我们回去就把您的要求报告首长。”

6 月 10 日这天，军管会为制止武斗四处奔波。军管会负责

人杨国宇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

“为解决武斗事好难哪！

一夜未眠，为解决姚解剖问题，我先找到北京市公安局，因七机部复杂，他们不大愿意来。经再三请求，他们提出三个条件：①保证法医安全，②两派不准参加，③家属不准参加，否则公安局不派法医。

我同意了他们的条件，这才同意来。”

“916”要求“915”总部交出打死姚桐斌的凶手，“915”说没有。周恩来闻讯，气得站起来说：“姚桐斌是我从海外要回来的专家，国家需要这样的专家。现在被打死了，连凶手也找不到。我限期你们把凶手找出来，否则唯你们头头是问。”

晚上，那两位一高一矮的军代表又来到姚桐斌家，一进屋后就忙着解释：

“对不起，上午有点急事耽误了，没有来。杨主任想见见你，我们现在去一下怎么样？”

“哪个杨主任？” 彭洁清问。

“我们军管会的杨国宇主任。”

“我去看看孩子们再走。”

彭洁清轻轻推开门一看，单人床空着没人，两个姐姐把小罗汉夹在中间，睡在一张大床上。她们都睡着了。彭洁清轻手轻脚地关好门，然后同军代表一道下楼。

门外停了一辆军用吉普车，司机是一位年轻战士，他们一上

车，车就开动了。车在石板路上缓缓而行，路两边茂密的钻天杨树，郁郁葱葱，像两道绿色的屏障。时而有巡逻的人从树后出来，一看见军用吉普，就立即缩回去。

车驶出生活区之后，穿过一条马路，就进入工作区。工作区是柏油路，很宽。转了个弯，到达一所灰色四层楼房，整座楼一片漆黑，只有几间房里有暗淡的灯光。两位军代表带领彭洁清上了楼。他们走上二楼，在长长的走廊里一个人也没有，只听见他们的脚步声。

他们走进一间大办公室，那个高个军代表报告说："首长，我们来了。"

这时，一位身穿海军制服，白白胖胖的军人，从一张大办公桌后站起来和彭洁清握手，并且说："请你来这里谈谈，是因为这里安静。"

地道的四川口音，彭洁清想他就是杨国宇主任了。

杨主任告诉彭洁清："周总理已经指示，打死姚桐斌是党纪国法不能容许的严重事件，一定要严肃处理，惩办凶手。"他还说："周总理让我们列出了一个名单，对七机部的科学家加以保护，必要时用武力保护。"

杨国宇后来开列了一份需要有卫兵专门重点保护的工程技术人员名单，开始是几十人，后来上升到几百人。杨国宇把名单呈报上去，却又担心上面派不出那么多的卫兵而不能批准。没想到周恩来很快就表示同意，并表扬了这种做法。他说："这些同

志都是搞国防科研的尖子。即使不是参加某工程的，也要保护。当然不一定都要专门派卫兵，主要是从政治空气上保护他们，不许别人侵犯他们，抓走他们。如果有人要武斗、抓人，可以用武力保护。”

彭洁清问杨国宇抓到凶手没有？她说：“我爱人已被打死 3 天了，而且是在光天化日之下行的凶，找出凶手不应该太难。”

“唉！你不知道，七机部情况有多复杂，破案不容易啊！不要性急，要相信组织!”

交谈了一会儿，一位军代表提醒杨国宇：“首长，法医马上要去姚桐斌同志家，我们该走了。”

于是杨国宇和彭洁清握手告别，并嘱咐她要相信组织，保重身体。

回去的路上，大家都沉默不语。他们到家时，另一辆吉普车几乎同时到达，从车里走下两位穿便服的人，他们是法医。

上楼后，矮个子军代表领着两法医直奔卫生间，高个子军代表坐在沙发上陪着彭洁清，不让她进去看。这时，彭洁清问他：“为什么请法医？”

他说：“周总理的指示下达后，又有另一种谣言，说姚桐斌同志是死于心脏病。也有人说，他是自杀的，故而请法医来检查。”

听到此话，彭洁清怒不可遏：“把人活活打死，还要造出这种谣言，太卑鄙了。”

当时她就找出纸笔，想写一张大字报，告诉人们姚桐斌被害

的真相。军代表得知她的用意后，极为紧张，说这种事情传出去，会给“文化大革命”抹黑的。

“谁给‘文化大革命’抹黑？是我？还是凶手？”

彭洁清越想越气，后来还是写了一张大字报请人贴了出去。在大字报中，她对姚桐斌的生平作了简略介绍，并把他被害的真相公布于众。

后来别人告诉彭洁清，有不少人边看大字报边流泪。

其实，那位军代表哪里是担心给文化大革命抹黑呀，七机部的两派斗得如此厉害，他们实在是不想再出其他事情。

过了好长时间，那 3 人才从卫生间出来，两位法医紧紧地握着彭洁清的手，没说一个字。但他们的眼神里，流露出对她遭遇的深深同情。

矮个子军代表对彭洁清说：“快 12 点了，您去休息吧！明天还要送到海军医院进行解剖。”

“解剖？”她不解地问。

法医很温和地解释，在她家，他们只作了初步检查，只有在医院里作解剖，才能做详细的检查。说完，他们 4 个人一起离去。

6 月 12 日，军管会召集“915”、“916”两派头头开会，研究制止南苑发生的 6.8 武斗和姚桐斌的尸体解剖问题。经反复做工作，两派终于商定了六条协议：

1、 疏散人员；

2、 双方人员撤出武斗现场；

3、　食堂开饭；

4、　211 医院拿出整改措施；

5、　发工资；

6、　双方交出武斗工具，集中起来由军管会处理。

军管会还规定了五条：

1、群众各回原单位。由军管组织学习；

2、721、731 医院都要按 10 条执行；

3、伤员生命垂危，允许家属控望。双方扣的人交军管会，保证安全；

4、带头抄家、冲医院的人，要揪出来；

5、组成执行协议、制止武斗监督小组，各派三人，两派总部各一人。

为制止武斗，总算达成了一个协议。

关于姚桐斌的尸体解剖问题，由北京市公安局派来法医庄明漆、赵金龙解剖，但必须答应他们 10 日提的三个条件，否则不来。杨国宇同意不变，两派也不阻止。

到何处去解剖？国防工办联系去 301 医院，不行。到空军总医院，不行。杨国宇只好去海军总医院联系，同他们做工作也不愿意。杨国宇最后说："同意不同意也拉到海军医院来。"

老首长的话说到如此程度，海军总医院只好同意，但也提出 3 个条件，他们不参加人。

唉！谁都怕七机部的两大派。解剖地点定了，但拉尸体的车

哪里出？杨国宇请海军帮忙出车，不得。请空军帮忙出车，不得。最后国防工办说由一院出车。因人是一院的，杨国宇给一院打电话等于白打，如果那里听他的，武斗早就制止了。没办法，只好向运输公司租车。他们听说是拉尸体的，有车也不租。还说："七机部游行出动车最多，还租我们的干什么？"

最后，只好叫七机部部直汽车队队长亲自开车。并规定他不准问干什么，不准看干什么，叫开哪就开哪。这个队长真不错，都听杨国宇指挥。

此时的杨国宇就一个字："难！"他说："天难！地难！一个难题接一个难题。"

6 月 12 日晚，姚桐斌的遗体被送到海军医院解剖。

当天，解剖鉴定书出来了：

1968 年 6 月 12 日局治技字第 81 号

对死者姚桐斌的尸体检验鉴定意见如下：

1．死者头部左侧有典型的条状挫裂伤，左侧头皮下广泛血肿，颅骨条状塌陷性骨折，硬脑膜破裂，硬脑膜外及硬脑膜下，有大面积血肿形成，脑质挫裂伤，脑受压，脑水肿，符合被钝器猛击头部，造成重度开放性颅脑损伤，引起死亡。

2．左顶部外侧前后纵行的几处挫裂伤是致命伤。

最后公安局的法医解剖验尸完后作出初步结论："姚是钝器伤头致死。"

情况被查明之后，703 所和七机部其他部门的人，才敢来彭

洁清家探视。他们说："早就想来看望你，但你的四周总是有'915'的人在巡逻，不让入内，直到周总理明确指示后才撤走。"

情况查明了，杨国宇的新麻烦又来了。6 月 13 日早上，他被"916"组织的一些人弄到七机部直南楼，围攻、谩骂他，要他立即抓出杀害姚桐斌凶手。从早上 6 时 30 分起，直到中午 11 时 30 分，杨国宇吃不上饭，喝不上水，饥渴难耐。此时他在心里深有感触的说："无怪七机部在最困难时无任何领导或参谋干事来帮助一下总理。"七机部的事情太难了。

虽然大规模武斗暂时停止了，可双方谁都不服气。为了示威，两派都进行了多次"武装游行"。数百人的队伍，统一的工装，每个人的脸色都是阴森森的，紧紧握着自己的武器，砍刀或梭镖。行进的队伍没有口号，沉默。只能听见数百只脚掌齐齐的跺在马路上的"通通"声和偶尔金属碰撞的声音。随着通通的脚步声，一股让人喘不过气来的逼人气势迎面而来。马路两边观看的大人小孩都不由自主向后退几步。

虽然有统一的工装，有统一的工鞋，但是国家不会发给你统一的格斗护具。在这生死攸关之际，人民群众发挥了无限的创造力和创新精神。

统一的长枪由钢管削尖制成，齐刷刷站成一个方队也是相当威风。手握短兵器如垒球棒、砍刀的人，另一只手还有一个由五花八门东西改装的盾牌，例如：大号锅盖、食堂装馒头的大簸箩、拆开的门板等等。这些尚可容忍，最搞笑的是他们头上的"钢盔"，

可谓无奇不有。走在前排的是“钢盔”，有真钢盔，也有工人用的藤条头盔。但是真家伙毕竟有限，于是，八仙过海，各显其能。有戴电焊工护目镜的，那东西戴头顶上还挺像回事儿的。有戴铁簸箕的，就好比戴了个大号铁鸭舌帽，问题是前面伸出的太长，就跟个耗子似的。有顶铁锅的。有用铁皮卷起来扣头上的。最搞笑的是居然还有不少戴路灯灯罩的，现在已经看不到那种简陋的伞形路灯灯罩了。

那是一支多滑稽的队伍啊！但就是这些人，以这样的扮相、这样的面目，煞有介事、威风凛凛，字正腔圆、一本正经，雄赳赳气昂昂的从人们面前走过。所有观众，一个个睁圆了双眼，目瞪口呆的看着他们，没有感到一丝好笑。

武斗也改变了许多人家的生活。那几天，家家的生活水平有了空前的飞跃，每天都是红烧肉、炒鸡蛋，总之鸡鸭鱼肉不断，好像家庭主妇不打算过了似的，孩子们不解的问老妈怎么吃的这么好？妈妈说：“有钱就吃！不赶紧吃，打死就吃不着了。”

过了些日子，武斗的风波渐渐平息，各家的生活水准随之下降。孩子们又问老妈怎么不吃红烧肉了？老妈嗔道：“吃！还吃？不过日子啦！”

外面每天武斗不断，一些老职工如同姚桐斌一样仍然按时上班。

当时的资深工人都有些无言的威信，即便在最危险的武斗现场也有老职工凛凛然走过，无论哪一派的人对这些老工人都不敢

轻举妄动。

杀害姚桐斌的凶手始终未得到法办。直到 1974 年，彭洁清写了一封信给李先念副总理，将姚桐斌被害以及凶手至今尚未受到制裁的情况向他报告。李先念在彭洁清的信上作了如下指示：

真是草菅人命，虽然事隔多年，似仍应坚决把问题查清楚，首犯应得到惩处，但打击面不能大。

先念

1974 年 5 月 7 日

李先念批示后，交给当时的公安部部长华国锋办理。

华国锋为人谨慎，在公安部逮捕凶手前，先将报告呈送周恩来、王洪文、叶剑英、李先念、邓小平和纪登奎。这些人都圈了圈以后，才下令逮捕两名杀人犯。此时已是 1974 年夏天，距他们行凶杀人的日子已过了 6 年之久。

## 第 1015 回：柳铁通，破获反共救国军　攻火种，联指发《总攻击令》

再说广西，由于柳州武斗致使铁路再次中断，6月13日，中央给广西革筹小组、广州军区、柳州军管会以及柳州“造反大军”和“联指”两派群众组织发出了《关于恢复柳州地区铁路交通运输的紧急通知》，也称“六·一三特急电报”，《通知》要求：“铁路两派群众组织应立即停止武斗。外单位人员必须立即撤出铁路系统各单位，不得介入铁路系统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铁路职工和各群众组织的所有人员应立即回到自己的工作岗位，彼此不再歧视，对工作不再干扰，对生活不再亏待。”“全部交回抢走的援越物资和人民解放军的武器装备。”“两派争论的问题，可以派主要代表到北京协商解决。”

6月16日，广西区革筹小组、广西军区负责人、“422”派所拥护的安平生、和“联指”所拥护的广西军区司令员欧致富等亲自出面，与柳州市、柳铁两派的代表谈话。经过多方做说服工作，两派武斗人员才允许7列国际列车通过。

6月17日，广西鹿寨县武装部部长、县革委会主任张春峰，亲自率领数百武装民兵渡过柳江，进攻柳州市。结果遭到柳州“造反大军”廖伟然在窑埠的伏击，张春峰等14人被击毙，现场留下15具尸体，鹿寨民兵队伍群龙无首，很快撤离。

既然击毙 14 名鹿寨民兵，现场怎么有 15 具尸体？

原来，廖伟然事先获得了鹿寨民兵在县武装部长的带领下进

城围剿“造反大军”的情报，并且从对岸的“联指”的高音喇叭中，听到了“柳江南岸仍牢牢控制在英勇的‘联指’战士手中”的广播。于是决定打击一下鹿寨民兵的气焰。他设了一计，先派一人冒充“联指”，把张春峰引诱到预设的埋伏点。他看中了柳州中学红卫兵组织“柳江风雷”的中学生古维杰。

古维杰接受任务后，只身潜过柳江北岸，找到正要渡江的鹿寨县民兵，向张春峰自称是“联指”的人，愿意给他们带路过江。张春峰毫无疑心的随古维杰过了江。

过江后，张春峰把所有的民兵暂时安顿在江边，然后带着主要的头目跟着古维杰先到窑埠街上与柳州“联指”接洽协商民兵的安顿和部署。他们都是清一色腰插乌光发亮的德制驳壳枪，让人看了好生羡慕和眼馋，特别是“青年近卫军”的小伙子，看到这些送上门的崭新驳壳枪，生怕自己落空，竟不顾廖伟然事先的布置和安排的时机和信号，还没等古维杰领着张春峰等人进入到预定地点，就争先恐后的用冲锋枪一顿扫射，把古维杰在内的15 个人全都撂倒在当场。当他们回来向廖伟然报功时，却被廖伟然怒不可遏且悲痛欲绝的把他们痛骂了一顿：“你们不按我的安排，擅自行动，你们知道你们打死的是谁吗？那个带路的小兄弟是我们的人呀！”

廖伟然本来并不打算要消灭张春峰等人，只是设计把他们引入埋伏圈后，把他们全部缴械俘虏，缴了他们的枪后，还要争取利用他把他所带来的民兵全部缴械。一方面可以获得他们的装

备，另一方面又可以得到武装部带领民兵参加武斗的证据，获得政治上的主动。结果被这些乌合之众的狗牯仔弄得前功尽弃。

古维杰的追悼会在探矿厂召开，古维杰的遗体摆放在礼堂中间，上面盖着“造反大军”的红旗。当来哀悼的人们掀开红旗，想一睹“英雄”的遗容，向遗体靠别时，看到他全身都是蜂窝式的枪眼。追悼会很隆重，大家都很虔诚向他致以哀悼！

张春峰等人的尸体也被拉回来在探矿厂的球场上摆放着。

6月17日晚，周恩来接见来京开会的广西干部及柳铁军管会成员。

6 月 18 日，韦国清等提出柳州铁路通车方案，温玉成向周恩来转呈这一方案，并写了书面请示。当天，周恩来审阅书面请示和通车方案后批示：“拟原则同意。但先决问题：一、桂林地区必须立即停止城郊武斗和沿线打抢；二、柳州分局必须恢复工作秩序，各回岗位，抢走援越物资必须全部送还，全市必须停止武斗，各回本单位，不许串连支援；三、南宁地区必须恢复革命秩序，撤除工事，不许再进行武斗；四、柳州全线必须在 3 天内（22 日前）通车。如果考虑以上不能实现，则在京从广西来开会的军事同志必须认真开两天会，将全部困难所在讲清楚，以便好报告主席、林副主席下更大决心，采取果断措施，恢复全线通车。”

6月18日，柳州“联指”发动反攻。东边的攻势因为前一天鹿寨民兵的土崩瓦解而变得风平浪静；南边的象州发表“严正声

明”之后也无动静；北边有柳江阻隔，攻不了；只有西边由柳州市、柳铁以及南宁等地来的“志愿军”攻得厉害。“联指”占领了铁路木材防腐厂之后，也不敢贸然深入。“工机联”立即在这个方向布置了防线。

6月底，柳州“造反大军”将“联指”彻底赶出了柳南。

在武斗激烈的那些日子里，柳州各单位三天两头开追悼会。武斗的两派都认为自己是为“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而战，武斗中战死者被本派封为“革命烈士”。追悼会越开越气派，“烈士”的坟墓也越建越豪华。柳钢附近的欧阳岭，荒山被联指建成新“烈士陵园”，山上建满了豪华气派的烈士墓。

6月26日，柳州地区的柳江、忻城、象州、武宣四县和合山矿“联指”2000多人包围柳江县进德“造反大军”槎山加工厂据点。

前线总指挥、柳江县革委会主任宋吉月在战前动员说：槎山盘踞着一股“武装土匪”，还有“反共救国团”一定要把他们歼灭。

“造反大军”当时在槎山加工厂的只有 12 人，7 支枪。围剿时当场打死 4 人，俘虏 8 人，俘后枪杀了 4 人。熊国芬、潘洪连被枪杀后，“联指”人员割下他们的头颅，贴上“反共救国团”标记，分别挂上柳江县进德圩和拉堡圩（县城）示众。

在柳江打得热火朝天的时候，6 月 10 日，广西南宁的宁明、崇左、扶綏三县先后呈报南宁地区公检法军管会，要求捕判以卢

秀业为首的“203 战略部”、林春初为首的“中国青年党”、陈韬为首的“反共救国农民起义军”、黄志忠为首的“叛国投敌集团”等案的首要分子。南宁地区公检法军管会从宁明、崇左、扶绥和凭祥四县（市）公检法军管会中抽调 13 名干部组成专案组，将以上四个案子的首要分子押到南宁进行审理，认定这四个案子的总负责人，就是隐居越南的外逃反革命分子黄志忠，又名钟龙伍，具有“恶毒攻击、污蔑毛主席，丑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等五个方面的罪行。

6 月，广西军区支左办联络组长王生江画了两面广西“422”派“青年近卫军”组织的小旗，并说其中一面对内标志是“反团”用的旗，对外用的一面是“青年近卫军”旗，因此，“青年近卫军”就是“反团”。同时，他指示两名从“422”中分化出来而又急于“反戈一击”的罗振龙、曾学文，搜集“422”中反革命组织活动情况。

罗振龙、曾学文 2 人先后编制了大量的“敌情资料”，并绘制了两份“敌情分析图”，存放在区革委政工组第二秘书小组，供各单位来调查材料参阅。

6 月 11 日，广西革筹小组、广西军区负责人接见“联指”和“422”两派负责人，宣布破获了“中华民国反共救国团广西分团”，简称“反团”的反革命集团案的消息。“联指”常委们听了非常高兴，认为这是对“联指”在政治上的“最大支持和关怀”，对“422”在政治上的“最大的打击”。

第二天，6 月 12 日，在商业厅礼堂“联指”召开了各分团头头会议，由颜景堂传达了这次接见的内容。

6 月 15 日，广西军区副政委、南宁市革委会主任韩世福在南宁市各级革委会负责人大会上说，广西已破获了一个反革命集团——“反共救国团广西分团”，总部设在南宁市。

韩世福要求各单位要发动群众彻底破案，开展“三查”运动：一查“走资派”幕后活动；二查“叛徒”、“特务”活动；三查地、富、反、坏、右的活动。

他最后强调，要抓紧“三查”，为成立广西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扫清障碍。

“联指”指挥部在获得区革筹小组、广西军区关于破获“反团”的公告材料后，于 6 月 15 日由颜景堂主持召开了“联指”常委扩大会议。他在会上介绍了军区破获“反团”的情况及其一些成员的姓名，并说“反团”成员已经打进“422”各级组织，最近“422”指挥部里一些愿意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的头头被排斥，说明“反团”已控制了“422”指挥部。他还说：“我们对区革筹小组、广西军区破获‘反团’的公告要有个态度，利用这个公告大造舆论，进一步揭露‘422’中的坏人。”

会上许多发言者都认为，公布“反团”案，对“联指”是极大的鼓舞，形势对他们非常有利，要掌握有利时机，开展强大的政治攻势，分化瓦解“422”组织，争取受“蒙蔽”的群众，进行大检举大揭发，深挖“反团”。会议决定以“联指”指挥部的

名义就区革筹小组、广西军区破获“反团”公布发表表态文件。

从 6 月上旬开始，广西水电厅设计院“联指”头头宾恩锦、李青多次向广西“联指”总指挥部颜景堂、李家海、何唯钦等人汇报，广西水电厅设计院的“火种”是“反共救国团”牛鬼蛇神盘踞的黑窝，要求尽快组织力量拿下这个据点。

在 6 月 15 日“联指”常委扩大会议上，又对拔除广西水电厅设计院“422”“火种”据点问题进行了讨论。发言认为，基层组织要求惩罚“422”的事已吵了半个月了，常委再不动就要失去群众。“火种”是埋在“联指”区内的一颗“钉子”，里面大多是外县逃来的亡命之徒，混有“反团”，这是深挖“反团”扩大线索的机会。“火种”大楼里武器火力不强，比较好打，易于速战速决，打下它，红卫片的制高点就都控制在“联指”手里，通往长岗岭和宾阳公路的道路也就通了。还有的人说：破获“反团”公告一发表，打“火种”就有理由了，这次“火种”完蛋了。会议决定攻打“422”“火种”据点，并由“联指”指挥部副总指挥李家海负责组织、部署实施攻打“火种”的各项工作。成立攻打“火种”大楼的“前线指挥部”，“联指”指挥部派广西艺术学院干部、“联指”武斗参谋何唯钦，外号何大炮，参加“前线指挥部”工作，即前线指挥，其它成员由红卫片负责人李青及参战的各大组织负责人组成。

6 月 17 日，广西革筹、广西军区发布《关于破获“中华民国反共救国团广西分团”的反革命案件的公告》。

同一天，6 月 17 日，《广西联指报》发表社论《把阶级斗争的战鼓擂得更响——彻底揭露和镇压混入“四.二二”中的一小撮国民党反动余孽》。“联指”指挥部发布《关于彻底摧毁蒋匪反华革命集团“中华民国反共救国团广西分团”的总攻击令》，同时散发了署名“联指调查员”的“关于‘中华民国反共救国团广西分团’反革命集团第一批材料”传单。《总攻击令》中明文勒令“盘据在解放路、‘造反楼’、展览馆等据点的国民党残渣余孽，立即缴械投降，不得抗拒，抗拒缉捕者，就地处决”。

6 月 18 日，广西革筹、广西军区向各专区革委会、各军分区，南宁、柳州、梧州、桂林市革委会、人武部发出通知，要求统一认识，结合本地区情况进行部署，通过印发传单、有线广播，向群众宣传等形式，广泛宣传《公告》，要召集群众组织负责人座谈讨论，检举揭发叛徒、特务和一切反革命分子。于是，广西各级革委会、人武部和“联指”组织群众，掀起了声讨“反共救国团”的热潮。八桂大地，一时间掀起横扫全社会的红色恐怖风暴。

当天下午，“联指”指挥在自治区人委礼堂召开各基层组织头头会议。颜景堂在会上讲了当前的形势和“反团”已控制了“422”指挥部，干了一系列坏事情况，号召立即行动起来向一小撮阶阶级敌人发动更猛烈连攻。会上散发了“联指”指挥部发布的《战斗口号》，要求各组织迅速翻印散发、刷写。

6 月 19 日下午 13 时，广西“联指”开始攻打水电厅设计院

“火种”据点大楼，久攻不下，晚上 22 时，李家海、何唯钦召集刘盛华、黄庆才、姜占德和水电院“联指”几个头头开会，决定用爆破法炸毁大楼。

20 日凌晨，何唯钦组织“沥血兵”用炸药爆破，绰号“三毛”的易瑾翰两次冲上去送炸药包，炸开大楼东头一个缺口，但无法冲上大楼。

下午 14 时多，“联指”保卫处拉来原先从别处抓到“422”的两个“俘虏”刘仲华、腾振尚。用枪逼着他俩从西边送了几次炸药包，最后一次是 50 公斤的炸药包，将大楼的山墙全部炸毁。

下午 16 时，“火种”大楼打出白旗，表示投降。此刻刘仲华、腾振尚两个俘虏被“联指”保卫处和“沥血兵”打死于二楼。至此，“火种”大楼已被打死 7 人。

下午 17 时许，“联指”保卫处和“沥血兵”等组成敢死队，冲上大楼，抓获俘虏 61 人，立即拉倒水电院内枪杀了 55 人，死者是水电厅设计院“火种”成员纪烈、蔡玉华、黄克兰、周勇等 19 人，以及区电业公司的欧学廉、彭柏生，其余是南宁市的红卫兵和陆川县逃来的“422”青年。

在俘虏中有 6 人幸免于死：严朝阳、甘熙雄、张学峰被俘后，因是“三毛”易瑾翰好友，“三毛”手下留情，把他们拘回南宁十一中去，陆川县被俘的陈文清、李文理、张六高则是在枪杀其他俘虏时，拼命挣扎逃脱，在枪口下捡回了一条命。

残杀俘虏后，由任树人、何唯钦等带领 16 人，把 62 具死者

的尸体装上汽车，拉倒凌铁水厂后面，抛下邕江，随波而去。

6 月 22 日，广西革筹小组、广西军区就 19 日“火种”大楼被杀 62 人一事向中央文革发出《“联指”攻打水电厅设计院“火种”据点情况报告》。电报说：“联指”后备军、“沥血兵”等组织，以及水电设计院附件的官桥、长岗。角麻大队的一些农民攻打“火种”。据统计“火种”大楼共有 60 多人，其中“火种”兵团 7 人，其余大部分是外县流窜来的，如陆川县就有 24 人。在这次武斗中，据点大楼的人员除跑了几个外，被“联指”打死约 30 多人，抓了 20 多人，“联指”伤亡较大。未提枪杀俘虏事。

6 月 23 日，《广西联指报》头版头条全文刊登自治区革筹小组、广西军区 17 日发布的《公告》。并在头版下半版刊登广西“联指”指挥部《关于彻底摧毁蒋匪反革命集团“中华民国反共救国团广西分团”的总攻击令》。

《总攻击令》说：“‘反共救国团’深藏于‘422’组织之中，‘422’头头就是‘分团’头目。”《总攻击令》号召“联指”行动起来，清查“分团”，对“抗拒缉捕者，可以就地处决。”“要从政治上、组织上、军事上把他们打个人仰马翻，杀个片甲不留。”

这天，“422”指挥部也发表《就广西革筹、广西军区“六一九公告”告全区人民书》，提出：《公告》的发布，是为更大规模的血腥屠杀，消灭“422”一派群众组织大造舆论。

6 月 23 日，航运局“红联”攻打航运“工总”控制下的南宁北大码头，打了几个小时攻不下来，即要求“联指”总指挥部

通知河南片“联指”给予炮火支援。南宁糖纸厂炮连当即把一门 37 炮拉到西园饭店后面江边向“桂宏”号船只开炮，接着南宁化工厂“联指”也拉一门炮来参加轰击，打到第二天下午 15 时左右，击中“桂宏”、“东风”号船，致使连接在一起的 40 多艘船只起火燃烧。

6 月 24 日，由于广西全区以抓“反共救国军”名义，公开乱杀人现象极为严重，广西革筹小组、广西军区不得不在这天再次向各专区、市革委会、各军分区、人武部发出《关于禁止乱杀人、乱抓人的指示》。但是，乱杀人、乱抓人并未停止，不少地方愈演愈烈。仅防城县的一个黄竹塘大队，就因为“反共救国团”案而“捆绑吊打致死 6 人，被迫自杀 17 人，暗杀 3 人，外逃 1 人，重伤 21 人。

6 月 26 日，柳州地区柳江县攻打“造反大军”槎山加工厂据点的武斗中，打死 8 人，“联指”人员割下其中熊国芬、潘洪二人的头颅，贴上“反共救国团”标记，分别挂在柳江县进德圩和拉堡圩（县城）示众。

百色地区成立清查“反共救国团”领导小组和专案办公室后，全地区共追查“反共救国团”嫌疑案 104 起，批斗 9274 人，其中打死、逼死 1073 人，打伤致残 2135 人。百色地区仅那坡县一个县在全县范围内进行追查后，就在城厢区追逼出“反共救国团”15 个军，40 名团长。其中，德隆区追逼出一个师。百都、下华、龙合三个区各追逼出一个团。百合区追逼出“反共救国军南疆反

共暴动组”。平孟区追逼出一批人参加“反共救国团”。那坡县直机关追逼出“反共救国团”师长黄庄，副师长张增奎，师政委钟耀飘，副政委梅其武和一批“反共救国团”的团、营、连、排、班骨干。全县追捕“反共救国团”551 人，其中被活活打死和杀死 8 人，打伤致残 43 人，47 人被定为“现行反革命”罪而被捕判刑。

都安县县长、副县长被诬为“反团”指挥，县委副书记、粮食局副局长、农业局长、公安局长、粮食局长、法院院长等都被诬为与“反团”有关，迫害致死，全县 11 天打死 338 人。

武鸣县从 6 月 22 日至 7 月 5 日，12 个公社有 11 个先后声讨“反共救国团”的万人大会。在会场内外打死 698 人，其中两江公社一天就打死 159 人。还有一个公社，在赶集时将 60 多人押到墟场，一字排开，用铁锤逐一砸开脑门。相邻一个公社，将 40 多名“反”字号押到集上，全部用乱棍打死。武鸣县自开声讨会至追查结束，被打死及迫害致死 1546 人。

另外，武鸣县华侨农场有两三万人，大部份是华侨，一般都是“422”派成员，受到屠杀后，武鸣华侨农场 1300 人集体上京告状，要求中央保障归侨人身安全。当时的县革委、人武部头头调动民兵在双桥乡拦截，当场抓捕 74 人，归侨崔光荣当天被枪杀。后来逼出一个“反共救国团武鸣华侨农场支队”，并宣布上京告状是反革命事件。归侨和国内职工 1337 人被列为审查、斗争对象，其中有 221 人被抓捕，202 人被关押，162 人被吊打，

107 人被打逼死，341 户人家被抄。驻扎当地的野战军有些部队支持“422”，不得不派了一个连去缴了县武装部的械，才止住屠杀。

6 月 28 日，南宁专区革委会又发出《关于破获中国青年党反革命组织的公告》。从此以后，整个广西自治区到处是空前的声讨和追查“反共救国团”和“反革命集团”的高潮。

6 月 29 日，南宁警备区、市公检法军管会联合发布了《关于追捕在逃的蒋匪“中华民国反共救国团广西分团”主要罪犯的通缉令》，指明在逃的陈阜东、覃雄、覃飞系该团的主要骨干，号召群众协同专政机关把这三名匪首缉拿归案。

## 第 1016 回：川宜宾，第三次武装支泸　重庆打，“反到底”逃往成都

四川泸州自 1967 年 10 月高坝武斗后的几个月，“红联站”和“红旗”都在各自的防区内“休养生息”，在“分界”上虽有摩擦，但规模不大，直到 1968 年 3 月 2 日晚 21 时，“红联站”召集武装人员在高坝、兆雅两地集结后，向“红旗”阵地开进，并于 3 月 3 日晨 5 时开始，对“红旗”占领地进行大反攻。他们在 60 炮，82 炮，37 高炮，高射机枪轮番轰击扫射掩护下，经过 9 次冲锋，到晚上 19 时 30 分，攻下了“红旗”占据的五峰顶，三华山。当天，水上舰队在小市附近江面向小市市区射击，使“红旗”三面受敌，背水为阵，最后只好放弃小市。“红联站”迅速占领了整个小市市区，泸县全部被“红联站”占领。同时，“红联站”又向兰田镇发起进攻，占领了整个兰田镇。

3 月 4 日凌晨，“红联站”又占领了整个纳溪县城。此后，双方北以沱江为“楚河”，东南以长江为“汉界”对峙。其间，双方除了在各自的地盘上向对方进行骚扰或打冷枪冷炮外，无大的动作，但苦了城区住的居民们，因双方武斗，停水、停电是经常的事，居民几乎天天吃干咸菜，没什么新鲜菜，吃肉就更不用说了，就是晚上睡觉时，有的还睡在床底下，上面搭上棉被什么的，目的是防炮弹。因为“红联站”老是炮击“红旗”占领的“黑管区”，特别是晚上，“红联站”从小市，茜草两个方向向泸州城区或医专打炮时，稍不慎即落在民房中，造成居民伤亡，房屋损

坏。

3 月 9 日，四川省 58 个县市的“红十条”派再次在自贡市召开了为期 6 天的会议，推广武装支泸经验，会上提出：

“去年九月‘红十条’派武装支泸的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如果有必要，我们誓将再度武装支泸”。

“泸州‘红旗派’创造了文攻武卫的范例，值得我们学习”。

会上号召全川“红十条”派：“必须在文攻武卫中联合起来，进行必要而适当的支援”。“尽最大的可能对那些在十分艰苦的条件下浴血奋战的战友，从政治上、道义上、物资上做出更大的支援”。

4 月 8 日，四川泸州百货站和人民北路在武斗的混战中被炮弹击中，一些建筑物和大批物资被毁，经济损失达 227 万余元。

4 月，宜宾地区革命委员会在一片欢呼声中正式成立。

4 月 27 目，宜宾地区隆昌县两派群众组织发生大规模武斗，一派群众组织攻占了隆昌县城，致使已成立的县革委被迫撤离县城。

于是，5 月 1 日，宜宾全区 18 个县、市人武部联合发表《关于当前隆昌局势的严正声明》，声称要坚决支持隆昌“红旗派”，誓作“红旗派”的坚强后盾，彻底粉碎另一派群众组织的“反革命武装暴乱”。

正在北京学习的宜宾部分学员要求在京的省革筹领导人解决泸州、隆昌的武斗问题。刘结挺说：“对立面不仅要打隆昌、

内江、自贡、宜宾，还要打成都。”张西挺紧接着说：“我如果是隆昌县革委会的主任，我就有自卫的权力”

宜宾市革委会主任李良等5人于5月6日由北京回宜宾与王茂聚商议后，随即成立了宜宾地区“文攻武卫指挥部”，在“必须建立革命武装，反对反革命武装”的方针指导下，宜宾地区各县、市“红十条”派的武斗专业队进行了重新组建，成立了近20 个民兵团，约 6 万余人，由新成立的宜宾地区“文攻武卫指挥部”直接指挥，分别编制代号为：

2字头民兵团：202-泸州民兵团，203-纳溪县民兵团，204-东风矿区民兵团，205-石油系统民兵团；

3字头民兵团：以隆昌县为3字头，代号由3011-3015；

4字头民兵团：401-红旗宜宾柏树溪民兵团，402-八八工人战斗团民兵团，403-宜宾红旗交通部队民兵团，404-宜宾市城建部队民兵团，406-七九九厂民兵团，407-宜宾市手工业系统民兵团，408-地专机关直属民兵营；

5字头民兵团：由富顺县和晨光化工厂的民兵组成；

6字头民兵团：为泸县的民兵组成；

7字头民兵团：为合江县、长宁县、南溪县的民兵组成；

8字头民兵团：为古蔺县、叙永县的民兵组成。

其精锐和主力为402团、404团、408营，他们的武器装备已和当时解放军的武器装备相当。

6月7日，全川“红十条”派再次在自贡市召开会议，号召

全省“红十条”派走武装支泸的路，武力统一全川。“我们必须更高地举起文攻武卫的光辉旗帜，走突破口的路，走武装支泸的路，团结起来，联合起来，对翻案联军盘踞的南充地区、泸纳合地区、江津地区，我们都应该发扬革命的进攻精神。”

6 月下旬，根据宜宾地区革命委员会驻泸州、纳溪县、合江县工作组收集的情报分析，认为盘距在重庆、江津地区的 “保守势力”正在武装反击“红十条”派，从而直接威胁和形响着泸州，并且泸州“红联站”已在行动，局部反攻已经展开，泸州十万火急！为了更好地实现武力稳定局势，彻底解决久拖不绝的泸州问题，宜宾地区革命委员会准备实施第三次武装支泸。

为此，宜宾地区革命委员会成立了两个前敌指挥部：泸州兰田前敌指挥部，代号 101；富顺县代寺前敌指挥部，代号 301。

两个前敌指挥部分别指挥三个战区：隆昌前线战区，泸州兰田前线战区，泸县况场前线战区。具体作战计划是：主动撤出隆昌县、泸县、富顺县部分地区，死守泸县的青龙乡、天洋坪乡据点，把“红联站”和其它“保守势力”组织的人放进来，暴露在内江、自贡地区之间，然后大造舆论，诱敌深入，围而歼之。另一方面，集中优势兵力，攻打南面泸纳合三地，端“红联站”的老窝，将其最后彻底消灭干净。

根据这个计划，整个宜宾城又开始了全面的备战。宜宾专区第二人民医院全部停止接收住院病人，作为后方总医院；宜宾卫校作为前线战死“烈士”停尸和保尸点。

7 月 4 日，第三次武装支泸拉开序幕。由于泸州“红联站”难以抵御强大武装力量的进攻和为了保存实力，很快闻风而撤，支泸大军毫不费力地收复了失去的地盘。但泸州“红联站”仍有几艘加装钢板作为装甲的轮船在城区边的长江上游弋，支泸大军调来机关炮将其击沉或击伤。

此时，重庆的形势也没有因为革委会的成立而见好转。虽然 6 月 6 日，重庆市革委成立后不到一个星期，即做出了《关于维护革命新秩序的若干问题的决定》，严令解散武斗组织，召回武斗人员，拆除武斗工事。并要求在 6 月 12 日 18 时前将所有武器弹药无条件上缴。逾时不交者，以窝藏军火论处。解放军有权随时搜查。

但是就在第二天，6 月 7 日，“815”派一批武斗人员得知此前从中央学习班偷跑回重庆的西师“831”负责人周荣，住宿于重庆市杂技团楼上的“反到底”派“炮声隆”广播站，即组织人员进攻该广播站，欲抓获周荣。于是两派展开武斗，动用了枪支、手榴弹，死 1 人。在此事件中，“反到底”派武斗人员得到了与之有“兄弟伙”关系的另一批“815”派武斗人员的武器支援。

什么是“兄弟伙”？就是重庆此时出现的一些曾一度打得你死我活的两派武斗人员，他们开始厌弃“文革”的政治原则，相互间结成了不讲派性只讲“江湖义气”和个人利害关系的团伙，用重庆话讲，叫“兄弟伙”。个别“兄弟伙”后来发展成了刑事犯罪团伙。

6 月 12 日至 13 日，重庆两派又在北碚第十三中学和北碚区新华书店发生武斗，死 6 人。“815”派攻占“反到底”派猛虎团占据的新华书店大楼，在武斗中身亡的“猛虎团”负责人王树良等 3 人被暴尸街头示众 3 天。“815”派随后实行戒严并挨户搜捕“反到底派”人员。据目击者称，当时一些手提冲锋枪挨户搜查的女中学生有如凶神恶煞，令人望而生畏。

6 月 13 日，两派在大足县青坪公社斗碗寨武斗，死 10 余人，经济损失约 80 万元。

6 月 14 日至 17 日，北碚区连续发生支左办公室和驻军部队武器弹药被抢事件，被抢走枪 887 枝，子弹 9 万多发。

6 月 18 日，重庆大学革命委员会召开师生员工大会，宣布开展“对敌斗争”，由武斗队将原校党、政领导及教授 50 余人逐户抄家后挂上“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反革命”等黑牌子批斗、毒打、游校，会后关入“劳改队”，宣布“不服从管教要放血放气”等《入队须知》，对被关人员强迫交待“罪行”，强迫进行重体力劳动，并以罚跪、捆绑、吊打等武斗手段。至 1969 年 2 月止，该“劳改队”共关押 70 人，其中迫害致死 2 人，致残 10 人。

6 月 19 日 中央毛泽东思想学习四川省重庆组学员全部返回重庆。

6 月 27 日，重庆市公检法军管会将原重庆市公检法机关的副处长、副庭长，区、县公检法机关的副局长、副院长、副检察

长、副政委（含副教导员），省二监狱副监狱长以上干部及相应职务干部 143 人送往巴县跳石公社黄泥湾市公安局战备档案库房集中隔离审查。

6 月 30 日，市革委、重庆警备区联合发出《紧急通令》，严令禁止武斗。

当天下午 17 时至次晨 6 时，长江电工厂两派武斗，“815”派占领全厂，随后从厂内运走大批子弹。

这天，空气压缩机厂“815”派抢夺驻工业学院部队枪枝，与“反到底”派对射。

这天，重庆师范学校、市第一中学、光明中学等单位“815”派武斗队和市第十五中学、煤炭学校等单位“砸派”武斗队分别抢夺部队武器。沙坪坝区几所大、中学校及工厂的“815”派下午抢夺了区武装部汉源路武器库后，因发现武器大多是从群众组织收缴上来的不能用的破旧枪支，晚上又去区文化馆内武装部办公楼抢夺武器。在冲击大门时，有人欲抢夺一卫兵手中的半自动步枪，争夺中枪走火，打伤二人，打死第一中学学生一人。

当天，两派在江北大石坝地区武斗。“815”派在该地区戒严抓人，就势抢夺了江陵机器厂试验靶场的 37 炮 4 门及炮弹若干发。深夜“815”派攻占重庆搪瓷厂。

6 月 30 日至 7 月 2 日，两派在建设机床厂大规模武斗，动用了 37 机炮、四联高射机枪、14.5 重机枪、63 式水陆两用坦克、野炮、履带式装甲车、轻重机枪等，“815”派攻占全厂，随后从

厂内运走大批枪枝。

7 月 5 日，市革委会副主任、“反到底”派负责人李木森和江北区支左办公室刘政委一起主持江陵机器厂两派谈判达成立即停火、上缴武器、调查处理抓人问题等三条协议，转眼即被破坏。

7 月 6 日，两派在江北大石坝地区大规模武斗，动用了轻重机枪、高射机枪、37 炮、122 榴弹炮、火箭筒等，江陵机器厂 4 个车间和中心计量室、厂内家属区、街上居民区遭连续炮击，若干精密机床、计量仪器遭破坏，厂内 203 小学和一些家属区房屋及石门街上民房被打坏。伤亡多人。驻军领导召集两派负责人谈判，达成于 11 日 20 时停火的协议。但签字 1 个多小时后，即次日凌晨，武斗又重新开始。“815”派攻占后字 242 部队、煤炭设计院、地质部第二普查大队、重庆医学院及其附属第一医院等单位。多处房屋被毁，重医一院药房、库房、材料科被抢劫一空，大量贵重医疗设备遭到破坏。伤亡多人。后字 242 部队“反到底”派“红总”负责人张龙宝在撤离途中身亡。

7 月 8 日，重庆警备区和江北区支左办公室代表到江陵机器厂主持两派协商，于当晚 22 时 30 分再次达成立即停火协议，1 个多小时后武斗再起。

7 月 9 日至 12 日，两派在江陵机器厂重燃战火，“815”派攻占全厂，随后实行“戒严”、“清乡”。

经过上述几次大规模激战，重庆“815”派彻底控制了局势，

“反到底”派全体成员及其家属总计数十万人集体分批疏散，逃离重庆，“大清洗”的谣言像瘟疫一样倾压山城。

“反到底”派在逃到成都后，一个年仅 18 岁的中学生陈卓，再次纠合从重庆逃来的 2000 多名红卫兵，拦截火车一路狂飙杀往四川绵阳、广元，找当地驻军要武器弹药，准备杀回重庆，被驻军拒绝。

7 月 16 日，重庆“815”派及邻近几县同一派的群众组织武斗队在成渝铁路线隆昌石燕桥以火力拦截军列，并在石燕桥及李市镇、安富镇等地先后将 5 车皮援越军火抢劫一空。周恩来闻讯后急电四川省革委主任张国华：不论哪一派抢去的都要全部追回；这是反革命的政治事件，坚决按中央《七三布告》办事。

7 月中旬，由于武斗，又有大批群众外逃。全市 7 月份计划调入粮食 8900 万斤仅完成 28％，全市粮食供应又趋紧张。

## 第 1017 回：下通知，全国大学生分配　六二六，安徽省“芜湖事件”

1968 年 6 月 11 日晚，黄永胜、吴法宪接见军委办事组全体工作人员。黄永胜说：“军委办事组分两个阶段，以前是杨成武任组长，揭杨后办事组进行了改组，增加了 3 个同志，李作鹏、刘贤权和我，加上原来的吴、叶、邱，共 6 人。”

吴法宪说：“原来没有个办事组。文革高潮的时候，‘720 事件’武汉发生了陈再道的问题。那时王力、关锋、戚本禹勾结军队内部揪军内一小撮，抢枪，冲击军队。那时毛主席还在外地视察。杨成武回来后，成立了军委办事组，杨担任组长。后来又相继搞了政工组、军报组、文艺组。军委办公厅是军委的办事机构。军委常委、军委办事组的事情都通过那里办。军委办事组的问题经办公厅提交军委常委讨论。”“中央决定，军委停止工作，军委常委工作实际上已集中到办事组来了，起到过去军委办公会议的作用。在主席、林副主席领导下，直接对主席、林副主席、中央文革负责。黄总长来了以后，权力集中了，实际上代替过去军委办公会议的职权。”

6 月 15 日，中央发出了《关于一九六七年大专院校毕业生分配问题的通知》，对本来应该在 1967 年夏天分配工作的大专院校毕业生的工作分配问题做出了部署。《通知》说：

“一、毕业生分配工作，必须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关于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

业接班人的指示，彻底改变知识分子脱离劳动，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状况，彻底打破大专院校毕业生一出校门只能分配当干部，不能当工人，农民的旧制度。”

“二、毕业生的分配，必须坚持面向农村，面向边疆，面向工矿，面向基层，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方针。

一九六六年、一九六七年大专院校毕业生（包括研究生），一般都必须先当普通农民，当普通工人，虚心向工农群众学习，使‘知识分子劳动化’，……

分配当农民的毕业生，由各地区，各部门根据具体情况，分别安排到解放军，地方和中央部门举办的各种国营农场去。根据国家需要，分配去当中小学教员和担任医疗工作的毕业生，也必须一面工作，一面劳动。”

“三、革命群众组织的负责人，要带头当普通农民，当普通工人，带头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做服从国家分配的模范。”

6 月 21 日下午，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会见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谈到了正在进行的文化大革命。毛泽东说：“北京的学生、工人闹得天翻地覆，但基本上还是有秩序的。有些人着急了，说两年没有上课了，那怎么办啊？实际上他们也上了一课，就是文化大革命的一课。过去我们留下了一些表现比较好的国民党人，这是我们的政策。我们没有教授、教师，没有办报的，没有艺术家，也没有会讲外国话的，只好接收国民党的一些人或者比较好的一些人。有一些是国民党有计划的隐藏在我们的工厂、政府机

关和军队里。当然不是所有教授、教师、技术人员一个也不好，不是这样，但有一部分很不好。对他们进行清理，好的继续留下来做工作，坏的踢开。这要谨慎，要有辨别，坏人总是少数，好人总是多数。”

6 月 26 日,就在安徽省革委会刚刚成立两个多月后，安徽芜湖市又爆发了震惊全国的芜湖事件。

皖南的芜湖市有所规模很大的芜湖造船厂，它担负着为海军建造导弹快艇的重要任务。1958 年 9 月，毛泽东曾经到造船厂参观。这就更增加了这个厂在安徽、在全国的知名度。此时，芜湖的群众组织也因为因夺权引起分歧，发生过一场大武斗，双方伤亡都很大。其中一派被打出芜湖，人员跑到安庆、马鞍山、铜陵、合肥等地，有的把被打死的人抬着游街，到省里告状。后来中央将两派的代表召集到北京解决问题，经过多次协商，耐心工作，1968 年 5 月，芜湖专区暨芜湖市同时成立了革委会。但是派性并没有彻底消除，一些没有被结合进革委会的干部及群众组织的头头依然不满，活动频繁。从 1968 年 5 月开始，安徽省蚌埠、淮南有群众宣布“第二次造反”，要揪出“李葆华在安徽的代理人”，包围了蚌埠、淮南两地的革命委员会，占据了铁路、公路交通长达 12 天。

6 月,安庆、淮南等地又发生武斗事件。

6 月 26 日,芜湖市近 5000 人冲击驻芜湖部队的领导机关。27 日全面抢枪，殴打解放军，两派群众分别占领制高点，将部

队分别包围。一名解放军司机被打死，枪械 800 多支、子弹和炮弹 10 万发、军车近 40 辆被抢走。他们还冲击电台，砸开监狱、放走犯人。接着又冲击海军驻芜湖机关，抢走了机密海图。并先后聚集 2000 多人，冲击空军雷达站和导航台。驻芜湖部队的所有大小单位基本都遭到砸抢。特别是占据芜湖电校大楼后，据此向外打枪伤人，以此来威胁驻地的军代表，如果不承认他们是左派，不将他们的头头结合进革命委员会，就对抗到底。还说，除非李德生军长来谈判，否则他们谁也不见。这就是轰动一时的“芜湖事件”。

驻芜湖的 35 师给军部发来急电，请示处理办法。

对这种野蛮行径，李德生非常气愤。这是自 12 军进驻安徽参加“三支两军”以来，他遇到的最棘手的一次事件。按照事件的性质来看，可以说已构成了严重的犯罪，但事件过程中，参加的群众达几千人，轻易定性，涉及面很广，会带来 不良后果。他在军党委会上斩钉截铁地说：“芜湖事件如解决不好，我们的前一段工作将功亏一篑。当然处理冲击部队的事件，是政策性很强的问题，绝不能草率从事。首先我们必须严令部队，绝不准向群众开枪！只要不开枪，就可以争得主动，不管怎么说，芜湖问题必须解决！”

李德生决定亲自到芜湖去。此时，芜湖已完全处于失控状态，特别是矛头指向了部队，到那里会发生什么事谁也难以预料。省里和军里许多人都不太主张李德生去。但李德生清楚，芜湖是在

革委会成立之后发生的冲突事件，是关系全局的问题。如芜湖的问题不解决，就将变成一个“突破口”，很可能涉及全省，其后果就更加严重了。他说服了省里、军里的领导，毅然带着革委会少数人，包括进入“三结合”的两派头头，去了芜湖。

进入芜湖后，所见到的景象和以前来时已大不相同，到处可见荷枪实弹的武斗人员，街上的店铺关门，行人稀少。李德生到了 35 师师部，听了师领导的汇报后，感到现在两派互相对立，部队讲话也不听，目前只有分头进行工作。抢枪、冲击部队的事，不急于处理，让省里来的两派群众组织的头头，分别去各派做工作。李德生和 35 师政委、市革委会主任于永贤，找当地两派头头谈话，听取他们的意见，交换看法，彻底摸清事件真相，考虑下一步的措施。

李德生到芜湖的消息传开后，有的组织怕输理，武斗行动有所收敛，有的组织反而更加活跃，是想引起注意。占据芜湖电校大楼的那个组织，居然提出一个强硬要求，说要李军长接见他们，只要军长一个人来，不准任何人同行！

这个要求，几乎激怒了李德生周围所有的人。大家都反对李德生去，认为这是一个圈套，是一个阴谋诡计，绝对不能去，更不能一个人去！占据芜湖电校大楼的那个群众组织武斗出了名，若李德生军长一个人单独前往，无异于投身虎口，轻则被当人质扣押，重则会有生命危险，万一出了事，谁能负这个责任？李德生一再权衡，决定去，就他一个人去！他对大家说：

“现在矛盾的焦点正在这个组织，要是这个最好斗的组织都能放下武器，解决问题，那芜湖地区整个问题也就能得到解决。而且，其它各派群众组织也都在瞪大眼睛，看着我究竟采取什么态度，究竟有没有这个魄力和能力解决问题。至于我的安全问题，大家不要担心，我想他们是不敢随便加害于我的，因为他们也会考虑此事可能引起的后果。退一万步讲，即使他们真把我打死了，那也不要紧，打死了我，坏人就彻底暴露，问题就能解决了。战争年代，在枪林弹雨中经历过多少生死考验，不也过来了吗，为什么现在就考虑这考虑那，把个人生命看得那么重。干革命总难免有牺牲啊！”

李德生开着吉普车来到芜湖电校大楼下，只见大楼的墙上和门窗都被打得弹痕斑斑。为了防止对方的进攻，大楼的门窗、楼梯、通道全都被堵起来了，只有二楼一个窗户可以出入。有人需要出入时，就放下一个竹梯子，人一进去就将竹梯收起来。旁边的楼口用沙袋垒成工事 ，架上步枪、机枪，随时准备开火，与战争年代真是别无两样。

同行的干部看到这种架势，又劝李德生不要去了。李德生不听，让警卫员王楚林喊楼里的人把梯子放下来。王楚林向楼上喊道：“我们的李军长来了，你们快把梯子放下来。”

楼上放下一个梯子，果然是用竹竿临时做成的软梯，直接从窗户中放下，底下不着地，上边则钩在窗户框子上，人踩上去摇晃得十分厉害，稍不注意，登梯人就会摔下来。跟随李德生的作

训参谋抢着要上，被李德生制止。他说："你上去，他们发现不是我，你就有危险，还是我上。"

言罢，他便爬上了摇摇晃晃的软梯。快到窗口，楼里的人将他连接带扶，从窗中翻进屋里，李德生的警卫员也跟了上来。楼里的人一见真的是李德生军长来了，一时惊得呆住了。李德生在他们搬来的一把椅子上坐下，毫不客气地批评说：

"你们要我来，我来了。我是来批评你们的，你们抢枪、武斗，违反了中央的规定。你们闹得老百姓不得安宁，严重脱离了群众。你们违反中央指示，脱离群众，后果十分严重，这个我跟你们讲清楚了。毛主席讲，革命群众组织要搞大联合，你们却搞分裂。你们有什么权力抢枪、武斗、冲击部队？你们必须把武器交出来。你们一定要承认错误，改正错误，其他问题，我们再讨论。"

那些人说，当地驻军有偏向，使他们受压。接着就向李德生诉起苦来。李德生对他们说："如果对部队有意见，可以坐下来谈，部队真有错误、缺点，可以改正嘛，怎么能抢枪、武斗、冲击部队呢！你们现在先要交出武器，承认冲击部队、抢枪的错误，再坐下来讨论问题。"

李德生只身赴约，又迎着枪口爬上他们的武斗据点，这件事本身已让楼里的人震撼了，再加上李德生说的句句在理，他们随即表示："我们听李军长的，愿意交出抢夺的武器。"

李德生看出他们有认错的表示，原来一些挥舞枪支的人，此

时也悄悄地将枪藏在了身后。李德生便表扬他们知错能改，改了就好。随后，又参观了他们的据点。李德生边看边批评他们的行为造成工厂不能生产，市民无法过正常的生活的严重后果。

在据点里转了一圈后，李德生又从窗口竹梯下到地面。当他离开大楼时，楼里的人自动站成一排欢送，向李德生告别，还喊："我们听李军长的！"第二天，他们就开始交枪。

接下来的一两天，李德生带着工作人员，趁热打铁，接连到各武斗据点做工作，在那些据点的指挥部过道上，排着一队队佩刀带枪的武斗骨干，每个头头，甚至女的，也是腰别双枪，随时都像要开枪动武的模样。李德生对他们的错误行为毫不客气地批评、教育。这些人武斗伤人，是想迫使部队支持他们。由于李德生处理得当，他们对李德生的讲话，还是能听、愿听的。芜湖事件很快平息了。

李德生通过各个渠道调查了解了整个事件发生的全过程。在芜湖时，无论是对内对外，李德生都没有对这次事件的性质下结论、表态。回到合肥后，李德生分别在省革委会常委会和 12 军党委会上，介绍了芜湖事件的详细情况。他说：芜湖事件是由几个头头在幕后操纵、策划的。他们策动两派"协同"行动，把矛头指向军队，是一个有计划、有步骤的行动。第一步，把枪抢光，解除部队武装；第二步，抢砸汽车，使部队失去机动能力；第三步，破坏通信设备，使部队失去联络和指挥工具；最后，把部队赶出芜湖，推翻刚建立的革委会，使芜湖又陷入无政府的混乱状

态。大家一致的意见是，必须对这种猖狂行为给予坚决的回击，绝不能让它扩散开来。

6 月 30 日，安徽省革委会召开紧急常委扩大会议，各地、市军管会负责人，各部队负责人，各群众组织的代表参加，大家在会上，揭露了芜湖事件的真相，动员全省广大群众，发起强大的政治攻势，声讨这一事件。

7 月 2 日起，安徽全省展开了声势浩大的声讨芜湖事件，声援芜湖驻军和革命群众的活动。

李德生又从合肥、蚌埠、淮南、马鞍山、铜陵五个地区，抽调了大批军队、地方人员，组成了强大的军、干、群宣传队伍，派到芜湖，采取领导带头、分片负责的办法，运用多种形式宣传群众，包括那些参加闹事的武斗人中，使他们认识到自己的错误，改正错误。

7 月 15 日，安徽省革委会召开了一次全省范围的芜湖问题报告会，李德生在会上作了关于芜湖问题的报告。他说：

半个多月来，芜湖事件成为全省人民注目中的中心，大家都在关心芜湖，声援芜湖。

全省人民连续不断地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声援芜湖驻军和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的示威游行。各地开大会，发声明，写标语，出传单。用各种方式向阶级敌人发起了一个全面的围剿。在一个不长的时间里，打击了阶级敌人的反革命气焰，使敌人成为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反动小报《为人民》的坏头头胡中奇被群众揪

住，一股流窜在外地，专搞打、砸、抢，尽干坏事的武斗人员，被上万的群众包围强行缴械，充分显示了广大革命群众的高度阶级警惕和无比巨大的威力。

投敌叛变分子宁之祥，是原芜湖市委第一副书记。他早在1944年就在河南登封向敌人缴械投降，一直隐瞒至今。在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始则顽固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疯狂镇压无产阶级革命派，继而插手一派组织，挑动群众斗群众，积极煽动武斗，去年7·13大规模武斗前，为武斗出谋献策，要“三筹处”发动群众，围点打援，控制中山路，并且帮助“三筹处”的武斗人员拆卸、安装武器。

原芜湖物资局党委副书记王文达，是钻进“联总”并纵操了一些武斗组织的坏人。这个人曾经参加过国民党的战地服务团，又是腐化堕落分子。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他组织“干联部”，以极“左”的面目混入“联总”，还混上了“联总”“武卫”组织的头头。他积极主张和指挥武斗，亲自策划和组织抢夺人民解放军和民兵的武器、弹药和装备；他煽动复仇情绪，疯狂反对芜湖两大派的革命大联合；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他还死搞农村包围城市，鼓吹战争解决问题，妄想蒙蔽群众用枪杆子保他上台。

原芜湖地委监察组副组长郑佩、原芜湖地委副书记李干，是伸进“三筹处”的坏人和黑手。他们互相勾结，串通130多个中层干部，组织了一个“干联站”，造成了干部队伍的分裂和阶级

阵线的混乱。李干长期住在“三筹处”的重要武斗据点——电校，积极主张和策划武斗。郑佩还担任了“三筹处”的作战组长，亲自制订作战计划，直接组织和指挥了去年把“联总”打出城外的“七·一三”大规模武斗。

原芜湖地委副书记秦彬是插入“联总”的黑手。他和刘秀山、程明远、钟伟关系密切，去年7、8月间先后两次在北京参加了钟伟策划武装叛乱的黑会。接着就大肆鼓吹“大揪军内一小撮”的反动思潮，公开提出：“现在是向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全面进攻的伟大战役开始了。”这次芜湖反革命事件中，他从军管住地被抢出来后，参加了“联总”单方面召开的“六·二七”大会。秦彬在大会上神气活现的向到会者鼓掌致意，并且和一些人握手拥抱，完全暴露了黑手的真实面目。

在这次芜湖反革命事件中，极少数混入革命群众组织尽干坏事的坏头头又跳了出来，大肆活动。像反动小报《为人民》的坏头头胡中奇，钟伟黑线人物，倒许乱军分子黄学恒等被进一步暴露出来，使广大革命群众进一步认清了他们的丑恶嘴脸。

……我们再一次重申，我们将遵照党的一贯政策来处理芜湖的反革命事件。即：坦白从宽，抗拒从严，首恶必办，胁从不问，受蒙蔽无罪，反戈一击有功。两派组织中的坏人。由两派各自清理，严防阶级敌人挑动群众互相揪斗，制造混乱，乘机溜走。

……

现在阶级敌人的反革命阵线已经陷入全面的崩溃，不论他们现在用“杀头抄家，放血，断大腿”的野蛮手段来威胁和恫吓那些要起来揭发他们的群众和知情者，或者是大搞经济主义，提前发工资，煽动人员外流，都挽救不了他们彻底复灭的命运。我们坚信，芜湖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一定能够团结广大群众，在人民解放军的大力支持下，冲破重重阻力，把芜湖的命运完全掌握在自己的手里。芜湖必定是人民的芜湖。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必将在芜湖取得完全的胜利，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必将永远高高飘扬在芜湖上空。

安徽省革委会和12军党委联名向中央写了报告。

8月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下发关于转发安徽省革命委员会，12军党委《处理芜湖问题的综合报告》的通知。

## 第 1018 回：战化州，李敏贴出大字报　为广西，中央发《七三布告》

6 月 24 日，毛泽东的女儿李敏在国防科委贴出了一张题为“炮轰聂荣臻，火烧蔡顺礼，揪出刘华清，彻底揭开国防科委阶级斗争的盖子”的大字报，轰动京城，北京街头到处都张贴着李敏等人的大字报。

6 月 27 日，国防科委机关 9 名干部又联名贴出标题为“炮打聂荣臻”，副标题为“聂荣臻捏造最高指示，从政治上陷害毛主席、林副主席”的大字报，说聂荣臻曾说：“毛主席说，叛徒可以入党。”这是“捏造最高指示，从政治上陷害毛主席”。

原来，1967 年 6 月 1 日，聂荣臻办公室接到国防科委军管办公室的电话，说：飞机研究院一批群众来到国防部，要揪斗曾任飞机研究院院长，时任国防科委副主任的唐延杰，说他历史上有自首叛变问题。国防科委军管办公室请示聂荣臻指示该怎么办？

唐延杰 1923 年参加革命，1927 年到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1929 年回国，却在长沙与党组织失掉联系。由于当时白色恐怖严重，他的家人代他登报自首，后被国民党当局收容进感化院进行“感化”。1930 年，红军进攻长沙时将他营救出狱，随即参加了红军，经历了中央苏区历次反“围剿”和两万五千里长征，于 1936 年在陕北又重新入党。

此时，聂荣臻听了秘书的报告，立即打电话找罗舜初、刘华

清、蔡顺礼，一个都没有找到，于是将电话直接打给国防科委办公室主任，对他说："唐延杰同志的自首问题，中央是知道的，不是不知道。毛主席说过，经过长征和几次反'围剿'考验的，一般可以解决党籍问题。唐的问题不是(国防科委党委)常委已经向中央写了报告了嘛。群众贴大字报可以。如何处理，待中央有指示后按指示执行，不要让外单位揪斗唐。这个精神，只给常委同志说一下，不要下传。"

但不知什么原因，事隔一年之后，这些话传了出去，将"毛主席说过，经过长征和几次反'围剿'考验的，一般可以解决党籍问题。"引申为"毛主席说，叛徒可以入党。"

至于说"政治上陷害林副主席"的问题，是指1968年1月，聂荣臻办公室工作人员在国防科委机关有人问起安东突然死亡的情况时，顺便说了安东突然逝世那天下午，叶群给聂荣臻的秘书打来电话说："林副主席知道安东同志逝世后说，安东是个好同志，是聂老总的一个好助手，既已逝世，请聂总不要过分悲伤，要保护好聂总的身体。"于是，大字报就把此事说成是聂荣臻说："林副主席说，自杀的叛徒是个好同志。"

6月27日下午，谢富治召集中央专案组开会，批评他们向江青请示汇报不够，他说："你们老犯错误，老不转变，怎么行呢？是否仍按肖孟的胆大包天办事？"

肖孟曾是王光美专案组的负责人之一，后来被关进秦城监狱5年。1979年12月他在回忆中说："他们不断给专案组施加压力，

反右倾。在调查、看材料中如实反映某些情况时，就以客观主义、扩散专案材料等罪名，停止专案人员工作，查封档案材料，有的被赶出专案组，甚至被关起来。搞专案的人思想负担很重，精神压力很大。在我被关进秦城监狱后，甚至有这种想法，宁肯坐牢，也比按那些人的旨意味着良心办事为好，倒感觉自慰一些。”

当时一位专案人员的笔记本上记载着谢富治的指示：“今后，应当原原本本的向江青同志报告，并要把犯人的原件供词送上。”“要有组织观念，脑子里要有个江青同志，重大事情要请示江青同志，有利于把案子搞好，有利于把叛徒抓完，有利于把文化大革命搞好。”

6月28日，广东湛江地区发生了号称是“八国联军”的化州会战。所谓 “八国联军”指的是这场武斗涉及湛江地区13个县（市）。

1968年4月，湛江地区的汽车运输系统的“捍派”开了一次会议，提出要把全地区的 “捍派”组织起来联防。会后他们向湛江“联指”提出建议，很快得到湛江“联指”的同意。

5月7日至9日 “联指”在湛江霞山召开第一次联防会议。把全湛江地区划分为四个联防区：

一是湛江市、市郊。

二是海康、徐闻、遂溪、廉江。

三是化州、高州、吴川、信宜。

四是电白、茂名、阳江、阳春。

定了联防区的同时布置了控制银行、电话通讯、水电运输及筹款、筹粮、筹枪枝弹药等有关武斗事宜。

5月22日至25日，他们又召开了第二次联防会议。决定成立“湛江专区无产阶级革命派保卫红色政权联合指挥部”简称“湛江联指”。下设司令部、政治部、后勤部，实行分区设防。对原定的联防区作适当调整。即设立两个联防区和一个独立县。

第一联防区为：湛江、遂溪、廉江、徐闻、海康。

第二联防区为：化州、高州、信宜、电白、茂名、吴川。

独立县为阳春县。

当时阳江为清一色的 “旗派”观点，湛江“联指”无法插手。

这次会议还决定各县要迅速建立武斗专业队，由“联指”统一指挥，并同时编出作战密语、暗号、各县主要公路代号等一套作战规划。

当时化州的两派：一派就是化州“联指”，另一派是和湛江“旗派”一个观点的“大筹委”。5月29日，化州 “联指”组织武斗队偷袭了“大筹委”的据点下宝岭，武斗中死9人，其中 “联指”方面死6人，“大筹委”方面死3人。

6月4日，吴川县“联指”以惩罚“大筹委”抢谷种为名，组织武斗队120多人到化州与化州“联指”的武斗队联合，用高射机枪，轻、重机枪，步枪，60炮等武器向“大筹委”的阵地射击。“大筹委”方面也以猛烈的炮火回击，双方修筑公事，形成僵持。

其他地方也加紧准备武斗。

6月16日，化州“联指”派武斗队到南盛公社平垌据点和“大筹委”的武斗队打了一天两夜，“大筹委”方面死9人。

“大筹委”受创后，其主要头头决定和吴川同观点的“批资站”联系，最后决定由吴川方面派出160多人的武斗队到新安公社围攻 “联指”的据点红阳农场，双方枪战一天一夜，死13人，在 “大筹委”撤退时又被“联指”伏击俘获7人，并就地枪杀。

化州的这几次武斗，吴川县的两派都直接参加了。“联指”方面接着与吴川、电白、高州和湛江等地串连策划，于6月28日召开了湛江第二次联防区扩大会议。会后武斗进一步升级。

6月29日，“联指”的各县市的武斗队赶赴化州，在攻占红阳农场后即对化城进行大包围，接着对化城发动了声势浩大的进攻，使用了土坦克、迫击炮、75炮、高射机枪、轻、重机枪及各种武器，这场武斗共打死52人，伤68人。武斗期间，化州 “联指”还成立了所谓的前线军事法庭，枪杀“俘虏”71人。这就是后来被称之为“八国联军”的化州会战。

对于武斗战死的人员，各派都视为烈士给予厚葬，在各公园竖碑纪念。

这一场牵涉到湛江地区各个县的抢枪事件和大型武斗，后来得到了平息。这些“烈士”的坟墓也搬了家。

6月30日下午，毛泽东、林彪接见济南、广州、兰州部队毛泽东思想干部学习班代表和出席全国煤炭工业战线抓革命、促生产

会议的代表。接见后，毛泽东与参加接见的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及其它中央负责人谈话，他说：

“要允许犯错误，允许人家改正错误，不要一犯错误就不得了。人家犯错误就要打倒。你自己就不犯错误？”

“对邓小平，我的观点还是同以前一样。有人说他与敌人有勾结，我就不相信。你们那样怕邓小平，可见这人厉害。”

“你们应该到群众里面去，现在到时候了，要到群众中去，不要当老爷。”

“什么三反分子，我就不同意。有些人思想可能有些问题，但不一定像你们所说的是三反分子。”

再看广西。韦国清多次提出要“解决南宁问题”。为此，7月1日，在南宁警备司令部会议室，广西军区副司令员、南宁警备区司令员宋治平，广西军区副政委、南宁警备区政委韩世福，南宁警备区副司令员邱玺，南宁警备区副政委慕石起在此召开南宁警备区党委扩大会议。会议根据广西军区的部署，讨论研究了关于武装包围南宁“422”控制的解放路、区展览馆、朝阳百货大楼等据点，强行收缴武器问题。广西军区拟从独立一师、二师、警卫团、南宁军分区、警备区调6个连的兵力，加上南宁“联指”及武鸣、横县、邕宁、马山、崇左、上林、玉林、陆川、贵县9个县的“联指”武装力量，解决“422”在南宁的武斗据点。会上明确了各单位兵力部署的位置。

7月2日，广西自治区革筹小组和广西军区向凤山县支左小组

发出《关于稳住部队阵脚，加强社会调查的指示》，要求进驻部队排除万难，稳住阵脚，坚守岗位，驻军和人武部领导机关不得撤出县城。

7月2日下午，广西“联指”总指挥颜景堂、副总指挥杨录等率人到南宁市警备区司令部，要求部队支援“联指”武器。得到同意，他们从警备区搬走了几十箱子弹、手榴弹和其他武器弹药。

7 月 3 日，中央以中发［68］103 号文件下发《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布告》，简称《七三布告》。毛泽东批示：照办。

《布告》明确指出：

最近两个月来，在广西柳州，桂林，南宁地区，以中国赫鲁晓夫为首的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派及其在广西的代理人，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和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蒙蔽和欺骗一部份群众，连续制造了一系列反革命事件：

第一，破坏铁路交通，至今不能恢复通车；

第二，胆敢抢劫援越物资，拒不送还；

第三，连续冲击人民解放军的机关，部队，抢夺人民解放军的武器装备，杀伤人民解放军指战员；

第四，在中央发出“六·一三”特急电报以后，拒不执行，继续顽抗。

中央认为，这是一小撮阶级敌人破坏无产阶级专政，破坏抗美援越斗争，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反革命罪行。

中央相信，广西两派革命群众组织和广大革命群众是要革命的。他们对这一小撮阶级敌人的反革命罪行是极其不满，极其愤慨的。有些人跟着别人干了坏事，绝大多数是受蒙蔽的。

为了迅速制止这一小撮阶级敌人的反革命罪行，中央号召广西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革命群众，在广西革筹小组的领导下，在人民解放军驻广西部队的支持下，努力实现以下各点：

一、立即停止武斗，拆除工事，撤离据点。首先撤离铁路交通线上的各据点。

二、无条件地迅速恢复柳州铁路局全线的铁路交通运输，停止一切干扰和串联，保证运输畅通。

三、无条件地交回抢去的援越物资。

四、无条件地交回抢去的人民解放军武器装备。

五、一切外地人员和倒流城市的下乡上山青年，应立即返回本地区，本单位。

六、对于确有证据的杀人放火。破坏交通运输，冲击监狱，盗窃国家机密，私设电台等反革命分子，必须依法惩办。

党的政策历来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首恶必办，胁从不问，受蒙蔽无罪，反戈一击有功。两派群众组织中的坏人，由两派群众各自清理；同时，要把一个组织混进了坏人同这个组织严格区别开。

中央相信，一小撮阶级敌人制造的反革命事件，只能乱了敌人，锻炼了群众。广西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革命群众，驻广西

的人民解放军全体指战员，广西广大革命干部，一定能够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定地站在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牢牢地掌握革命斗争大方向，向阶级敌人发动猛烈进攻。这一小撮阶级敌人的阴谋必然遭到可耻破产。广西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形势会越来越好，广西壮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必将在阶级斗争的凯歌声中诞生。

当天，在北京的广西自治区革筹小组和广西军区的几位负责人给广西军区打电话，提出几项工作：

一、阶级斗争。

1、对谢王岗、袁家柯可以公开点名批判，对“反革命救国军”等反革命案件要继续抓下去。

2、专案工作要抓紧，对坏头头可通过审查接班人的方式查。人力不够要加强，要告诉各军分区抓紧此项工作。

3、抓紧清理敌伪档案，查叛徒、特务。

4、狠抓电台、报社工作。

二、抓两派的政治思想工作，特别是做好反对我们那一派的群众思想工作。

三、宣传毛主席接见广州、兰州、济南军区赴京学习群体干部的伟大意义。

四、抓革命促生产。

五、抓紧区革委会成立和庆祝大会的筹备工作。

六、中央首长6月17日晚接见的全文记录传达到军区领导。

对师、团级干部有些部分（主要是点领导同志名的地方）不要传达。

七、兴安县国防仓库武器弹药被抢问题严重，请欧司令员很好抓一抓。

7月5日上午，广西军区政治部负责人向“联指”和“422”常委传达坚决打倒谢王岗、袁家柯的决定。当晚，区革筹小组负责人召见两派组织的常委，宣读传达《七三布告》。

7 月 8 日，革筹小组，广西军区向各地发出“清理流窜人员”的指示。

7 月 9 日，广西军区派出两架飞机，从凭祥至南宁空投《七·三布告》传单 90000 多份。驻南宁柳州部队组织 51 个宣传队，南宁市有 5000 多人的宣传队进行宣传，开办 660 个学习班，有 5 万多人参加。

7月11日，广西自治区革筹小组和广西军区召开3万人大会欢呼《七·三布告》的公布，广西军区司令员欧致富发表讲话说：“根据无产阶级革命派红卫兵小将揭发，谢王岗、袁家柯是三反分子、走资派……”

随后几天，广西日报连篇累牍地发表社论，如《坚决执行，誓死捍卫》、《彻底粉碎阶级敌人的疯狂反扑》、《对阶级敌人就是要镇压》等。驻桂空军派出飞机在南宁、柳州、桂林、梧州、贺县、融安、等市县以及铁路沿线大量散发《七·三布告》。

7 月初，广西“联指”前线作战指挥部集中四县一市的武斗

大军 5600 多人,以迫击炮、高射机枪平行射击、炸药包爆破等武器和手段,在黄华山大战“井冈山”，于 7 月 7 日,攻下黄华山。至此,历时 45 天的激烈战斗,“平桂井冈山”在西湾的据点全部被攻克。“平桂井冈山”的武斗人员和该派非武斗人员大部被俘,一少部分人侥幸逃脱,“西湾战役”至此结束。双方共计死亡 398 人,其中包括武斗中战死 101 人,被杀俘虏 297 人。伤者无数。留德归来的矿务局总工、全国人大代表亦被杀害，“联指”割下他的头，用铁丝穿了双耳，挂在其夫人胸前游街示众。西湾银行被武斗大军强行提取国库现金 21 万元。西湾粮管所损失 80 万斤粮食。

在武斗后掀起的杀人风潮中,大批被关押的俘虏由武装民兵看守,轮到谁值班,谁就可以提人去杀。先后多次发生钟山和贺县的看守民兵,因晚上无聊,于是提人出去进行枪杀的事件。

7 月 14 日,在西湾矿召开庆祝胜利追悼“烈士”的万人大会。会后枪杀 16 人“祭奠革命烈士”。当天,共计杀死 40 人。

“西湾战役”结束后，“联指”前线总指挥部即下令移师珊瑚矿,集中钟山、贺县、昭平和珊瑚矿“联指”派的武斗队伍,共计 2000 多人,于 7 月 11 日,开始向珊瑚矿“红旗公社”武斗据点发起进攻。经 6 天 6 夜的激战,攻占珊瑚矿。武斗中,双方死亡 10 人,伤 10 多人。武斗后,“联指”派在该矿进行“红色恐怖”,大抓、大捕、大杀,抓获俘虏 310 多人,杀死 52 人,致残近百人。

在武斗中，“联指”派的武斗人员砍下在武斗中被打死的

“422”派人员陶华祥、卢昌华的头顶，然后分别悬挂于西湾电厂篮球场和钟山大桥东端桥头大树上示众数天，直至遭到群众的强烈反对后才取下。

据统计，1967至1968年，钟山县先后发生4起杀人砍头示众事件，挂人头示众共计7人，在社会上造成了极坏的影响。

广西里松矿位于贺县,为“平桂井冈山”的“红旗公社”占据并建立据点,并在附近农村有一定的影响和势力。6 月 29 日凌晨,在平桂矿区大战之时,“红旗公社”50 多名武斗人员,将里松大队部大门炸开,抢夺被收缴的武器。当天,贺县武装部接到电话后,将之定性为“629 反革命爆破事件”,随即调集 11 个公社近千人的武装民兵,赶到里松,对“红旗公社”开战。

此时,县武装部副部长率领的武斗队伍,又在 725 矿招待所,遭新路矿“红旗公社”近百人的袭击。死伤多人,725 矿武装部长毕明春被打死。县武装部即将情况报告梧州军分区,军分区副司令高明远命令:“要出兵,多出兵!”随即出动几个连的军队参战。贺县武装部又增派大批民兵参战,将新路矿区、新路矿选炼厂、粮管所、供销商店等“红旗公社”武斗据点包围,并发起强大攻势。

双方在经过 3 天激战后,“红旗公社”多个武斗据点失守,其头头见对方有军队参战,又人多势众,自知不是对手,便决定向姑婆山和湖南江华方向撤退。

姑婆山地处湘桂两地五县交界,山势险峻,易守难攻,历史上

是有名的土匪窝。

钟山、贺县、富川组成三县联防指挥部,于 7 月 15 日,出动 1000 多人的大军,兵分四路,围攻姑婆山。而“红旗公社”武斗队伍又撤至湖南江华去了。三县联防指挥部指挥民兵搜山。经过 3 个多月的搜山行动,没有收获。

## 第 1019 回：交通断，陕西武斗未停歇　汉中乱，联统两派战犹酣

陕西省虽然在 5 月 1 日成立了革命委员会，但全省各地的抢枪和武斗一时仍难平息。就在陕西省革命委员会成立的 5 月 1 日这天，安康两派在武斗中烧毁已包装好的出口茶叶 30 万斤，炸毁供全城居民喝水的自来水塔，毁坏老城民房 1.5 万余间。

5月24日至28日，西安、三原、高陵、富平等地区的两派组织，先后两次在泾阳302武器库发生武斗，两派共抢走该库各种战备武器万余件和大量弹药。

5 月 26 日至 27 日西安两派武斗，西安站铁路交通为此中断 39 个小时。

陕西各地的武斗中，尤以汉中为烈。

位于秦蜀间的陕南汉中地区，东接南郡，南邻广汉，西接陇巴、阴平，北连秦川。土壤沃美，赋贡所出，略侔三蜀。周赧王年间，秦惠文王置郡，因汉水而得名，迄今近 3000 年。秦末刘邦因功而封于汉，王巴蜀 31 县。楚汉之争，肖何留守汉中，凭借汉之富庶，资邦三军足兵足食，终定天下，是渭大汉之摇篮。三国刘备据汉而号王，委大将魏延为镇远将军、汉中太守。他在回答刘备问时，豪放答曰："若曹操举天下而来，请为大王拒之；若偏将十万而来，请为大王吞之。"魏延治汉功绩卓著，诸葛亮在汉屯兵 8 年，以为北伐之大本营。

陕西汉中城内和各县城从 1966 年 7、8 月份起，大字报、小

字报、传单，开始从学校、机关内张贴到人多众多的街道，尤其是在汉中城的东大街、北大街、川前街、汉中路、北街口、东门桥和各县城中心，以及县委、县政府所在地的街道。大辩论和大字报一时把所有识字的人都卷了进来。到了 8 月 19 日，汉中县一批学校领导、教师，被拉出游街。8 月下旬，打倒“黑帮”地委副书记刘平西和地委代书记张书云、专署专员杨久良的大字报贴满大街。不久，一大批地、县及各部门领导被揪出，挂上牌子，戴上高帽，打上黑旗，牵上黑线游街，有的被抄家。批斗风潮由城市发展到农村。

1967 年 2 月，全区两大派群众组织形成。

以“统一战斗队”、“工矿企业造反队”、“汉中大学文化革命临时委员会”3 个组织联合组成“汉中地区统临矿革命造反指挥部”，每个组织各取一字，所以叫“统临矿”。他们持“反到底”观点，支持者大多为城市平民和工矿企业成员。这个组织简称“统派”。

以“汉中地区革命联合造反司令部”和“汉中大学新文化革命委员会”等相同观点的组织联合组成了“汉中地区联新革命造反指挥部”，也是各取一字，简称“联派”。

两派因为 3 月 1 日汉中县北校场召开“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地委副书记张书云”大会上，专区公安处干部尚德俊的一段发言矛盾加剧。

尚德俊在发言中说：“北京大学（汉中分校）学生给张书云反

映说，有一张传单，江青讲的，凡攻击毛主席的人要抓起来。而张书云说，把反对毛主席的人统统给我抓起来。”

他的这段发言受到一些组织的批判，引起新的大辩论。

专署计委干部崔永兴先后 8 次在不同场合替尚德俊解释说：“攻击和反对”不一样，“如果把反对毛主席的统统抓起来，是扩大打击面，正是张书云打着红旗反红旗的具体表现。”他说：如果“统统抓起来”，那么现有第三监狱再加个零都装不下。专署民政局干部吴明琦也为尚德俊解释说：“反对毛主席的，有敌我矛盾，也有人民内部矛盾，谁说一两句反对毛主席的话，我们就能把他们抓起来吗？而地、富、反、坏、右反对毛主席，为什么不抓起来？”

而“统派”则批判他们说：“这种说法是反对毛主席的反革命。”于是，“打倒尚、吴、崔小爬虫”的大字报扑天盖地，贴满了汉中城内及各县、区、社。

4 月 14 日，“统矿”组织到专区公安处静坐绝食，要求按“现行反革命”批斗尚、吴、崔。在这之前，北京大学生物系助教、北大汉中分校“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负责人何挹堂和北大技术物理系党总支书记戴新民等来汉中。戴新民说：“尚、吴、崔揪不出来，根子在军分区。”于是，“打倒王明春（汉中军分区司令员），揪出黑后台”的大字报又遍及各地。

北京大学汉中分校是 1965 年开始在陕西汉中建设的，属于教育部三线建设的第三号工程，简称“653”项目，负责人是北

京大学副校长周培源和技术物理系党总支书记戴新民，“653”项目施工单位是建工部五局四公司，此时是汉中“统派”，而北大汉中分校也是支持汉中“统派”的，这当然受到“联派”反对。于是，打倒周培源、戴新民等人的大字报也遍及汉中全区城乡，周培源、戴新民二人也经常遭到“联派”的围攻。有一次，戴新民前往汉中军分区办事，途中被“联派”围在吉普车上两天没能出来。

4 月，“统派”总部办《汉江风暴》报，并在古汉台设“大喊大叫广播台”;“联派”总部办《东方红》报，先在天主堂大楼，后在汉中专区招待所，就是现在的汉园宾馆，设“东方红广播站”，双方利用报纸、高音喇叭宣传派性观点，互相攻击对方。

4 月 20 日，陕西省军区支左委员会做出 5 条决定，将尚、吴、崔交群众批判。在军分区的协调下，公安处的绝食静坐于第七天被劝阻罢坐。

“联派”不依，双方争辩不断升级。

5 月中旬，汉中大学内部两派群众互打互骂，开武斗先例。

6 月，两派在汉中汽车保养厂门口以棍棒武斗，死 2 人，伤 10 多人。从此，双方开始集结人员，准备器械，始用石头、棍棒，互打互砸，两次造成死 6 人、伤 20 多人的事件。

武斗逐步升级，武斗人员不敢在本单位住宿，开始集体过夜。

7 月 12 日，汉中两派武斗。7 月 13 日，“统派”一名武斗人员被打死，该派总部组织抬尸游行后，将尸体停放在军分区 10

天，迫使军分区表态处理。北京大学汉中分校也乘坐 17 辆汽车，在汉中城区游行示威。

17 日，两派在汉中北街口、莲花池一带武斗 5 小时。

7 月 19 日，“联派”一人被打死。“联派”连续抬尸游行 3 天，强令汉中专署专员杨久良陪尸赶苍蝇。

8 月 17 日，“统派”一名学生被打死。

当时，“统派”总部设在汉中汽车运输公司。而在汉中汽车运输公司里有一幢新建的三层职工大楼，正位于北大分校进汉中市的必经之路上，恰恰被“联派”占据。“联派”经常在楼上用弹弓向“统派”和北大汉中分校的经过这里的卡车队弹射石头和螺帽。

8 月 19 日 12 时 25 分，“统派”头目王永林指挥，在汉中城北汽车站，将炸药装在一辆卡车上，驶向汉中汽车运输公司一幢新建的职工大楼。王永林从卡车的驾驶室向外探出半个身子，右手朝后猛挥，对着路人高喊：“快走开！人家机关枪都架起来了！”他不停地喊，路人纷纷跑远。

卡车冲到那幢楼下，司机跳下车跑开，王永林随后也跑了。紧接着一声巨响，大楼没了。断壁残垣下，还有人活着，被水泥板压着肚子，不能动，只有两手在那拍打着楼板。32 人粉身碎骨，伤 30 多人，致残 4 人，重伤 9 人，为汉中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首次用剧烈手段造成最大最惨的事件，史称“819 惨案”。

“8.19”惨案后的第二天，“联派”就到汉中县公安局抢得

手枪 3 箱，步枪一草袋，机枪一挺，子弹 3 箱，步话机 2 部；从专区公安处抢得卡宾枪 5 支，手枪 8 支，子弹 7600 发。

“统派”不甘落后，也先后 13 次抢勉县、洋县、留坝县武装部，得枪 786 支，迫击炮 2 门，重机枪 26 挺，手枪 300 多支，以及炸药，子弹等。24 日，“统派”武斗人员抢走汉中县公安局隐蔽的长、短枪 40 支。

汉中“819 事件”后，在汉中两派大肆抢枪的影响下，略阳、勉县、南郑、镇巴、宁强、城固、洋县、佛坪、西乡等县两派也相继抢本县公安局、县中队、民兵及驻军的武器弹药。全区发生抢夺武器事件 224 起，得各种枪支 9.5 万支，子弹 7.8 万箱，以及一批火炮和大量炸药、雷管。各县都建起专门的武斗队。

终于，9 月 12 日，汉中两派在汉中北大街、中山街第一次真枪实弹打了起来，死 5 人，伤多人。

9 月 17 日，两派又在汉中城内的北大街莲花池浴池武斗，从上午 10 时，直打到下午 15 时多，双方死 13 人，伤 30 多人。10 月 6 日，又连续 4 天在东大街武斗，城内哗然，秩序大乱，商店停业。从此，以北大街、中山街为界，两派地盘划开，以东为“统派”势力范围，以西为“联派”势力范围。两派都建立起战场广播，办起宣传小报，“统派”的广播称“玛丽娅大喊大叫电台”，小报为《汉江风暴》、《在险峰》。“联派”的广播称“东方红 819 广播站”，小报是《东方红》。两派高音喇叭每天互相攻击，使汉中气氛更加不安和恐慌。

武斗由汉中城内蔓延到周边邻县。汉中军分区虽早已介入，制止无力，难于奏效。周恩来指示陕西省军区，让汉中两派代表到北京学习、谈判。

1967 年 11 月中旬，汉中两派代表随同军队支左人员在北京空军学院参加学习班。

1968 年 1 月 9 日，北京大学汉中分校的群众组织抢走勉县武装部机枪 11 挺、步枪百余支。

在支左人员大力协调下，北京的汉中学习班历经几个月的耐心工作之后，终于在 1968 年 1 月 13 日，两派达成“革命大联合协议”。消息传回，汉中街头出现热烈的庆祝和欢呼，大字报又像抓走资派时蜂蛹而出，一片雀跃。

然而，两派头头一回到汉中，欢庆的鼓声尚未停息，又互相指责对方违反《113 协议》，互相攻击的大字报此起彼伏，墨迹未干的《协议》转眼间即被撕毁。北京代表继续学习，继续争吵，停停谈谈，没有进展。

1 月下旬，略阳县人武部领导从北京学习回到略阳，召集两派谈判。2 月 6 日达成协议，决定举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准备成立略阳县革命委员会，因两派争抢名额，学习班不欢而散。2 月 22 日上午，略阳两派再次发生武斗，打死 3 人。武斗后，双方形成对峙局面，四路遍布岗哨，路断人稀，县城笼罩在武斗恐怖中。

略阳县武斗急骤升级，引起中央重视。3 月 12 日，周恩来

总理指示北京卫戍区司令员温玉成发来电报，要略阳两派选代表赴京谈判。3 月 17 日，两派代表在京达成停止武斗、联合成立革委会协议，定于 3 月 28 日 18 时生效。

谁想，协议精神传达后，两派却认为“打胜了就是造反派，谁掌权谁就是革命派”，因而积极准备在协议生效前最后一逞，再争雌雄。3 月 28 日晨 4 时 50 分武斗打响，武斗以来抢夺、自制的所有轻重武器全部投入战斗，激烈之程度较前尤甚，双方激战 3 个小时之多，打死 12 人，伤多人，因相持不下，各退守防地结束。

这次武斗，使停止武斗协议成了泡影。两派代表继续在京谈判，再次达成协议。县人武部和解放军驻略部队立即召集两派协商人选，成立革委会。由于在参加名额上争论不休，革委会一直未能组成。武斗在县境内仍时有发生。

4 月 3 日，汉中两派在南郑县协税镇发生大规模武斗。5 日，住城固师范学校内的洋县“红统站”武斗人员，自制武器，引燃雷管炸药，酿成大爆炸，炸毁教室 1 座、平房 10 间，炸死 17 人，伤 40 余人。城固“红五总”组织先后于 4 月 15 日、5 月 28 日、30 日 3 次组织武斗队数百人，抢劫许家庙驻军枪支弹药。

4 月 10 日，陕西省支左委员会传达周恩来指示，要汉中两派主要负责人一、二、三把手，由汉中军分区领导带领赴北京。周恩来亲自接见，申明大意，说服教育，要求联合，停止武斗。但是，这些代表依然都以革命左派自居，不进行自我批评，把责

任推向对方，接见、谈判、学习没有成效，两派头头先后又都回到汉中，策划更大的武斗。

4 月中旬，陕西汉中局势急剧恶化。18 日，两派为抢占古汉台大打出手，5 人死亡，城内顿时惊慌，居民出逃。两派抢占制高点，建立前沿阵地，在要道和交叉路口修掩体，筑碉堡，建岗设卡，交通中断，商店关门，东大街、中山街、北街口成为战场。汉中路，南大街以西为“联派”所占；东门桥，北团结街以东为“统派”地区。从此汉中城内路断人稀，枪声不时骤起。城内紧张，城外也随时发生遭遇，小斗、中斗、大斗不断，东西南北，四面不通，城内无市，购物买物迁至郊外，生活用品开始短缺，到 6、7 月时，食盐、火柴等许多用品断供。就连豆腐、豆芽、酱醋、肥皂等由于无法生产。

4 月 23 日，“联派”的“森工兵团”部分武斗人员，武装返回留坝县时，在留坝县火烧店遭“统派”伏击，当场打死 27 人，其中 15 人被俘后枪毙。这是汉中武斗以来第二次死人最多的事件。

“统派”打了胜仗，士气更旺，26、 27 日连续派人到西乡县帮助“红联”武斗，打死 7 人，“凯旋”而回。

5 月 1 日，“联派”攻打“统派”占据的汉中汽车运输公司，交战中，双方死 10 多人，打死无辜群众 7 人，支左的解放军排长申章启中弹身亡。

5 月 3 日，“统派”决定，炸毁北大街汉中电影院，首开毁

房先例。接着 5 月 8 日，又炸毁电影院旁的电器厂楼房。5 月 29 日炸毁莲花池楼房。

“联派”也采取对应措施，为扫清前沿阵地障碍，5 月 8 日、26 日两次烧炸北街口东侧部分民房和建筑，开烧房先例，汉中古城开始遭毁。

## 第 1020 回：古迹毁，陕西也要搞布告　七一二，师大火烧工五楼

汉中持续的武斗，使两派武器弹药大量消耗，外界隔绝，交通中断，物资紧缺日胜一日，两派谁也把对方吃不掉。在僵持中弹药供应，生活用品是武斗人员所必须解决的问题，至于人民群众生活供应两派谁也不考虑，为了消除对方，唯我独左，5 月 17 日，汉中“联派”总部常委扩大会议决定，派人抢了副食公司存放在何家井的食盐 8.5 万斤，肥猪 4 头。

5 月 18 日，镇巴县“红革会”为独霸镇巴，在王能周的指挥下，带领 4 个武斗队 100 余人，进攻被“镇联”占据的赤北区。5 月 19 日至 22 日，打死干部群众 25 人，致残 115 人，炸毁房屋 6.5 间，抢劫粮食 3.5 万公斤，30 户居民被抄家，抢劫 27 户。

5 月 19 日，“联派”宁强“红战士”与勉县“勉联”总部以及略阳、四川广元的造反组织联合攻打阳平关，意在独统宁强。经一天激战，统派“红铁军”被包围在一个小山坡上，经与当地驻军联系，暂在解放军办公楼躲避。“联派”立即包围驻军大楼，要求解放军交出“红铁军”和总指人员。正在交涉中，“联派”武斗人员动手抢解放军枪，解放军鸣枪驱散，复又与驻军持枪对抗，在死、伤各一人后撤离。行至代家坝，与勉县赶来的增援者相遇，复返阳平关，因“红战士”等已撤走，便在阳平关放枪骚扰，并抢走阳平关商店一批物资。这次武斗使宝成铁路全线停运 2 天。

“统派”也从 5 月 20 日起，先后抢 30 多个单位物资总值 423，000 元，其中，粮食 452，000 斤，食油 17，230 斤，肉 3 万多斤，猪 156 头，棉花 2000 斤，棉絮 251 床，布匹 2.5 万尺，汽油、柴油 71 吨。以及医药、纸烟、木料和从基层提出现金 15.8 万元。

5 月 27 日，“统派”组织浩浩荡荡大军从汉中出发，冲击城固县驻军 791 部队，抢得各种枪支上千支，子弹 10 万余发，为大规模武斗做准备。随后，城固县“红五总”也先后于 5 月 28 日、5 月 30 日于此处抢走大批枪支弹药。

此时“统派”实力物资充足，志气豪迈，为控制汉中决定打洋县。30 日部署，纠集 6 县 1000 多名武斗人员，31 日从城固冲进洋县，增援洋县“红统站”。当他们驰入阳县马畅镇时，对方在马畅主要是西乡县学生 39 人，没有防范，当对方举手投降后被枪杀 22 人，零星抓杀 10 人，炸毁马畅供销社食堂部分房屋。

马畅一战，“统派”占据了汉中以东城固、洋县、佛坪、西乡、镇巴。

面对“统派”咄咄逼人，“联派”毫不示弱，于 5 月 31 日派兵进攻东关。他们摸到“统派”纵深地段的汉中古城墙的东南角上，将城墙角上明朝修建的已有 400 多年历史的汉中名景“东塔西影”的“三台阁”炸毁。

三台是汉代对尚书、御史、谒者的总称，即尚书为中台，御史为宪台，谒者为外台，合称“三台”。在我国各地均有名为“三

台阁”的建筑，例如陕西汉中、安徽马鞍山、浙江杭州等地。

陕西汉中的“三台阁”下就是有名的饮马池。相传刘邦驻军汉中时，此处曾是刘邦驻军汉中时大军的饮马之处，故名饮马池。

三台阁与饮马池曾是陕南名景。站在三台阁城楼上，南望汉江上游，西望古汉台，北望东塔西影，城外有小桥流水的护城河，城内有群马饮水的饮马池。

东塔在汉中城外东关净明寺内，是一座十一级，高五丈余，方形、实心的砖塔，亦称“汉中东塔”，大约建于唐代早期。

饮马池又名东湖，现存石刻对联“神龙能作苍生雨，饮马长怀赤帝风”。赤帝就是指刘邦。

东塔与东湖之间，相距约 500 米。由于东塔的高度与塔湖之间的距离，在塔和湖之间无障碍物的情况下，塔影投入湖中，构成“入射角”，湖中塔影的“线束”又向相反方向构成“反射角”，每逢艳阳斜射之时，或皓月当空的夜晚，人们登上池边三台阁，透过清澈湖水，但见东塔塔影倒映于碧波荡漾的东湖湖水之中，塔身的层次和塔上的装饰都清晰可见，历历在目，和湖水周围的古树垂杨，城垛台阁以及它们映入湖中的倒影互相辉印，景色奇特，风光瑰丽。《南郑县志》载有清初诗人歌咏“东湖塔影”的诗篇，细致的描绘了这一景象：“汉阳萧寺塔，飞影入东湖。波皱佛龛动，浪明宝顶孤。镜花真变幻，水月有虚无，悠悠奇景在，千载话浮图。”故有“东塔西影”之称，又名东湖塔影，是“汉中八景”之一。

但这一美景在武斗的爆炸声中变成了一片瓦砾。

与此同时，“洋县总部”撤出洋县后，退守华阳山区。6 月 1 日，汉中“统派”和洋县“红统站”尾随追击，在洋华公路黄牛坡贯儿梁遭“洋县总部”伏击，死 12 人，伤 24 人。“统派”头头、武斗指挥孙爱国被打死。

6 月 2 日，勉县“勉联”派抢夺驻守三号信箱机密资料大楼驻军武器。

三号信箱是国家绝密单位——国家第三机械工业部勉县档案馆的代号，由部队一个班警卫。

“勉联”总部头头王明山等得知消息后，立即指挥武斗人员向三号信箱驻军进攻，武斗人员被打死 10 人，伤 10 余人。当晚，“勉联”炸毁资料楼，大批机密资料暴露在外。然后他们以谈判为名，诱骗驻军放下武器，下楼谈判。驻军 4 人，走下楼来，当即被枪打刀戳全部死亡。接着“勉联”冲上楼，楼上其余 10 名战士，除 1 人逃离外，5 人惨遭杀害，打伤 4 人。

同一天，三原县武斗，“联指”放火烧毁法院审判大厅、公安局档案库等房屋 280 多间。

6 月 3 日，西安火车西站又遭冲击，积压车皮近 9000 辆。陕西全省有 4 个专区电话、电报不通，根本断绝联系的有 29 个县，邮件传递、电讯时断时通的有 18 个县。

6月4日，陕西省革命委员会生产组发出《关于改进几种商品供应办法的通知》，针对部分人民生活必需品供应暂时紧张的情

况提出临时供应措施：煤油采取以灯限量；火柴实行按户结合人口多少供应；卷烟、肥皂实行凭证供应。

6 月 5 日至 9 月 10 日，陕西省佳县“红工机”与“东方红”两派造反组织发生持续 98 天的武斗，死亡 60 多人。

6 月 8 日，陕西三原县两派造反组织“总指”与“030”在库区武斗，使国家战备松香库被烧毁，大火从上午 6 时 40 分直烧到下午 18 时，共烧毁松香 90 多万斤，并烧毁了县医院、天主教、三座仓库和部分宿舍。

6 月 2 日，四川广元“红成分团”、“二六广元分团”、“井冈山”等组织与汉中“联派”联系，派 30 多人过来制造武器。川北的大坝、南江县“红十条”还派慰问团来汉，送给子弹 2000 多发。走时，“联派”总部送给重机枪一挺，土炮一门，炮弹 10 发。

6 月 7 日、15 日，勉县造反派和略阳厂矿、铁路造反派联合地方造反派共 120 余人，两次攻何家岩，打死另一派负责人王家成等 2 人

6 月 8 日，“联派”兵分四路，袭击“统临矿”与“联新派”接壤的赵寨公社住地，半天的交战之后，双方死 9 人，农民和专区的福利院老人死伤 25 人，烧毁房屋 13 间，炸毁 28 间。

“统派”总部采纳出席西安首席谈判代表冯敬斌“仿效榆林延安，迅速改变汉中局势，早日实现一派掌权”的意见，决定大打，准备用 3 至 5 天，把对方赶出汉中城。

汉中军分区得知后，于 6 月 11 日、12 日，由司令员王明春，副司令王荣华，以及支左部队领导两次找“统派”头头，令其取消武斗计划，无效。

12 日，“统派”调来城固、洋县、西乡、镇巴、佛坪大批武斗人员，决定提前行动，兵分南、北、中三线，于 13 日凌晨 3 点半行动。

战斗打响后，由于“联派”早有防范，进展不利，没有推进一步，进攻失利，形成胶着和僵持状况。从此，汉中城内，天天枪炮声不绝，炸、杀、烧、抢持续月余，东大街、北大街、汉中路、南大街、中山街、丁字街、汉台街、高家巷、挂匾巷、周公巷、文化街、青年路、石灰巷、豆家巷、伞铺街等居民搬逃一空，著名的古城空旷绝迹，完全成为战场。

为了减少武斗人员的伤亡与劳累，“联派”从龙江、赵寨、石马公社及南郑、勉县农村调来几百名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为其修碉堡、挖工事，打通连接西大街、北大街、东大街至东门桥、北团结街的民房，作为进攻通道。从钟楼至北校场的街道挖毁成深约 2 米，宽 1 米的陷阱，既为战壕，也为防卫备守。

6 月 16 日，“联新”总部由何森带队抢汉中县人民银行现金 45.96 万元。6 月 28 日，又由“联新”头头裴保安坐镇指挥，抢汉中专区中心支行现金 244.23 万元。“统派”也从基层强行提走营业所、信用社现金 15.8 万元。全区抢银行事件 30 起，抢夺人民币 338 万元。

6 月 20 日，“统派”偷袭南郑县的渔营村，捉得“联派”11 人，立即枪杀了。第二天“联派”抢尸未遂，24 日派人炸毁赖家山电站水闸和杨河口排洪闸。

“统派”在进攻汉中城区失利后改变战术，派小分队偷袭。6 月 28 日，摸至“联派”阵地前沿，由一中学生点火，将建于清道光年间古老的汉中钟鼓楼炸毁。

28 日至 7 月 3 日，汉中武斗人员两次抢劫银行现金 290.19 万元，白银、沙金和公债券 3 万多元，主犯何森 1970 年被判死刑。

7 月 8 日，“统派”烧毁了幺二拐许多民房。9 日，“统派”40 多人，企图收复北街口，双方战死 6 人，伤多人。头头也负伤。为了报复，“统派”偷袭南大街，将粮站附近 20 多间房屋烧毁。

7 月 13 日，“统派”又派小分队摸到“联派”纵深地段的汉中地委机关，将明朝修建的“大成殿”、地委机关的礼堂、总务科的 8 间房屋炸毁。

两派都想一统汉中，消灭对方，悍然放火烧房，殃及无辜。此后南大街、么二拐、河坝街、伞铺街、南关等街陆续被烧。

在此之前，7 月 4 日至 7 日，汉中略阳县两派以保护档案为由，聚集抢档，造成多人被打，1 人死亡。

7 月 15 日，十七冶“联总司”与略阳铁路“大联合”发生冲突，略阳两派和勉县“联新”总部分别支援，在阁老岭发生武

斗，打死“大联合”头头梁本善等 3 人。

接着，8 月 5 日，十七冶运送抢档事件中死亡工人家属回火车站时，再次与铁路“大联合”发生争执，进而发生武斗。双方投入武斗人员 1 千余人，使用步枪、冲锋枪、机关枪、自制大炮、改制坦克等武器，共交锋 5 次，打死 2 人，伤 23 人，非法关押 30 多人。

其间，驻略阳解放军前往武斗现场制止未能奏效。县人武部召集谈判，也未生效。

“略铁大联合”在桥头用火车做武斗工事

“略铁大联合”在桥头公安段门前构筑的几道障碍物

“略铁大联合”的武斗队员头戴安全帽手拿长矛大刀匆忙前往执行武斗任务

陕西的形势引起了中央的极大关注。7 月 11 日晚 22 时至 12 日 2 时，周恩来、陈伯达、康生等人接见了陕西省李瑞山、黄经耀，胡炜 3 人，听取汇报。

7月12日，毛泽东召集林彪、周恩来及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

开会。谈到武斗问题时，毛泽东说：“多找两派的人谈一谈，使他们自动把枪交出来，不要部队去收。”“陕西也要搞个布告。”“这些省所谓解放是怎么解放的？把胡宗南一扫就解放了。东北装了个口袋，一个也没有跑掉。没有这次文化大革命，这些坏人搞不出来。至于钻进我们队伍里的坏人，一下子也搞不清楚，一个工厂需要几个月。”

“这次文化大革命，才有社会主义革命之气，是群众自己搞的，是自下而上的群众运动。”

谈到大学教育问题时，毛泽东还说：“我看还是从工人中选调大学生。做三四年工，再到学校学两三年，又有文化，又有经验。”他说：“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

此时，北京师范大学的谭厚兰开始在自己的对立面组织——北师大“兵团”总部所在地——工五楼的周边部署对工五楼的监控；并组织以体育系为主的“敢死队”，准备抓“兵团”分子；还在工五楼附近的树杈上安置“强力弹弓”，瞄准工五楼，不时发射砖块。

工五楼立即开始布防：他们在西墙壁凿洞，也安上“强力弹弓”，也是用自行车内胎做成，可以将半块砖投掷30、40米；在墙壁间凿洞，将工五楼内的三个单元打通，不用出门既可以在楼

内走动；凿洞产生了很多的“炮弹”——碎砖块；住宅的金属暖气片被切割，用于堵死二楼的楼梯口——防备攻楼，只在三单元留活动口出入，有人值班。出进楼，挪开、再复原堵道暖气箱，这样，易守难攻。

7 月初，北师大革委会发表声明称：“兵团”非法占领工五楼，限 3 天内马上撤出。

工五楼里的人大都离开了，最后，楼里只剩下几十人。

与此同时，学校还出现了“兵团”战士吃饭多次受围挨打的现象，尤其是“兵团”头头。于是，“兵团”头头的吃饭问题只能靠不惹人注意的“团丁”帮助他们去食堂打饭，然后端到“兵团”总部所在的工五楼。“兵团”由李国元负责，从北大搞了一批面粉、大米，从北航搞了据称制造飞机的优质铝制作的长矛。都是晚上偷运。一天晚上，“兵团”十几个人去北京大学拉大米，孙碧琼与另一人负责踩三轮车，一些人持铝制长矛进行护卫。在学院北路，被政法学院“地派”拦截抓住，关了一夜，还好，天亮放了。

突然一天，谭厚兰对工五楼实行“三断”：断水、断电、断炊。

于是，坚守在工五楼的“兵团”分子们商量，决定在一单元地下打口井。他们只用了两天两夜，“井”就出水了！他们用自己打出来的井水，和面蒸出了馍。没有菜，就干脆不做米饭了。

但是几天不吃蔬菜，人难受。有人出主意，楼外面槐树和楼齐高，把那槐树叶捣碎，和在面里，可以顶蔬菜哦。而且，伸手

可得，在窗口就可以采集到。一试，还真灵！

7 月 12 日上午，谭厚兰终于发动对“兵团”的总攻。

在工五楼东面的院坝里，离楼 40 米左右远处，放了一张桌子，算是“司令部”。谭厚兰麾下干将齐聚那里，进行战前动员。更远的地方是看热闹的人群，可以看见体育系“敢死队员”手持长矛的清晰身影，跃跃欲攻的得意神情。

是可忍，孰不可忍？不等对方“劝降”，“兵团”的蒲寿章头缠毛巾，拉起“强力弹弓”，向谭厚兰的“司令部”所在上空发射了两块砖头。“司令部”的人纷纷躲散。有人认出：“是蒲寿章！”

终于，“敢死队员”手持长矛，向工五楼推进。“兵团”立即应战，力大的拉弓，力小的送砖。

进攻方真正“敢死”的几乎没有。他们一次次退却，又一次次进攻。终于有几个冒“死”攻进楼里。但是他们进去后发现，一楼是空的，而且，头上面的水泥预制板凿有好些窟窿，铝矛可以戳到攻进来的人的头顶，尿可以淋他们头。里面要防铝矛，尿淋，出去得小心砖块。一楼与二、三楼不同，单元之间没有凿通。这里不是他们久留之地，于是自动退出楼去。

从楼梯间进攻更加没门,那里堆满了暖气箱，滚下来非死即重伤！他们当然知道，如果硬攻，逼得“兵团”没有退路，只能推下暖气片去。“敢死队”还是不想就此送死，没有硬攻，而是向一单元楼里“兵团”打的井中泼了两桶大粪。接着，又搞些柴禾来，堆在楼梯口，点火烧楼。情况十分紧急。

王颂平急中生智，让人在窗口打出两幅标语：

“紧急呼吁党中央解救造反兵团脱离火海！”

“强烈要求谢副总理立即制止谭厚兰镇压造反兵团的暴行！”

这一举措产生了作用。谭厚兰没有进一步行动。楼外“兵团”的、同情“兵团”的人，纷纷在北京许多醒目处张贴大幅标语，向党中央、国务院、中央文革、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发电，呼吁紧急救援，很快开来两辆救火车，扑灭了楼内几处大火，没有造成双方人员伤亡。

此后谭厚兰逐渐解除了对工五楼的严密包围，通了水电，“兵团”的人也可以到饭厅吃饭了。但是，“兵团”仍然保持高度警惕。

## 第 1021 回：批无联，借机整肃造反派　成僵局，桂林打“西山战役”

与陕西、四川、重庆等省市一样，湖南革委会虽然于4月8日成立了，但是同时，湖南造反派又发生了第三次分裂，政坛再生变局。

原来，自传达了江青在3月30日中央接见湖南“省革筹”汇报团时的讲话后，湖南“高校风雷”成员、长沙中南矿冶学院“井冈山红卫兵”的金胜利，就在长沙五一广场贴出大字报，宣称：中学生是湖南造反派的先锋，“红中会”更是先锋中的先锋，“借批省无联镇压造反派”就是从打击“红中会”开始；而要反击右倾翻案风就必须解放“红中会”。

与此同时，长沙一中的佘大川、张麓泉也表示了相同观点。为了组织反右倾翻案风的队伍，佘大川以一中“红造会”的“330战团”为核心，成立了长沙市中学红代会“330联络站”，简称“红330”，主要吸收“红中会”、“井冈山”和其他“湘派”红卫兵参加，佘大川任一把手，李亚雄、汤建平、吴春林均参与决策。

到了 4、5 月间，几位省革委会委员，由“工联”派省委机关“永向东”的梁春阳、尚春仁和建湘瓷厂刘炎生、新华印刷厂余信谦、市总工会周国强等联合省革委会副主任、原“湘江风雷”叶卫东，抨击省、市革命委员会中的军队负责人与原“工联”组织负责人，宣称华国锋和原“工联”头头胡勇、唐忠富等

应对湖南发生的右倾翻案风负责。

而胡勇、唐忠富等则指责梁春阳、尚春仁、叶卫东、周国强等人是在搞分裂，炮打新生红色政权。

站在梁春阳、尚春仁一边的“红 330”和紧跟胡勇、唐忠富的以原“819 造反有理军”为主的中学红代会领导层，都派员下去调查湖南省“右倾翻案”的情况。他们一出长沙，双方观点就一致，不管到汨罗、醴陵，都对当地右倾翻案严重情况没有异议。但是一回到长沙，双方就意见相左，你说我“右倾翻案”，我说你“炮打新生红色政权”。

之所以出现这种局面，根子还是一年前“高司”与“工联”、“湘江风雷”的派战。

由于当时湖南省军区全力支持“高司”，于是省内各级军分区、人武部也都支持“高司”。虽然中央在1967年8月10日调整了湖南省军区的领导班子，但地、县两级人员变动不大，而且都进入了各地“革筹”并握有重权。特别是在县一级。在全省15个地市级革委会主任中，原军分区负责任人就占了9个。由于这些人思想上对“湘江风雷”的反感并未解决，所以当中央1968年《124指示》批“省无联”时，他们觉得有了一次整治“湘江风雷”的大好机会。本来在县一级“无联”组织就是寥若晨星，于是在这些地方，有“无联”批“无联”，没“无联”批“湘派”，“湘派”也没有则干脆批“工派”，反正谁的造反色彩浓就批谁。其中最突出的有常德军分区政委景林、湘潭军分区司令巫海清、

凤凰县人武部长“孙眼镜”，他曾被树为“支左模范”，事迹上了《湖南日报》。故《124指示》后，湖南遭打击的县级群众组织头头，实际都是与“省无联”并无多少瓜葛的造反派。所以，江青在3月30日所说的“你们那里‘高司’闹得很凶”，确非空穴来风。

而省会长沙的情况与外县则大不相同。“高司”残部虽组织过一次要求平反的游行，却招致《湖南日报》的严词指责，且无人理睬，翻案无果。

于是，因为右倾翻案的问题，湖南造反派第三次分裂。

5月，湖南省革命委员会主任黎源在省革委会二次全会上说：“右倾翻案不是53个县，是93个县都有。老保翻天是否53个？争论的焦点就在这里。如是老保掌权，就是砸掉；如是右倾翻案，是反右倾翻案，是补台，不是拆台。全省右倾翻案是严重的。责任在我自己，接受新事物慢，在北京认识不清，回来以后，在第一次全会上认识还不清，听了几十个县的汇报以后，才大吃一惊。”

又过了一个月，6月16日，根据湖南省革委会决定，由长沙市工代会、农代会等组成的“彻底砸烂旧省委战斗兵团”，在省军区司令员龙书金率领的解放军配合下进驻省委机关，接管了各部委的工作。接着，省委机关干部全部参加“揭盖子”、“揪坏人”，副部长以上的领导干部则被勒令交代、揭发问题，对“已经查明的叛徒、特务、顽固不化的走资派”集中看管。省委机关干部的

“永向东”组织也就此寿终正寝。“永向东”组织的主要骨干——梁春阳、尚春仁等人被关押、批斗、反省，一般骨干活动分子，后来都被下到各地市单位和“五·七干校”。

与“湘瓷派”、“永向东”有密切联系的原“湘江风雷”主流稳健派负责人叶卫东，也在这次清洗中受到点名批判，并被临时停止省革委会副主任职务。指责华国锋和胡勇、唐忠富等应对湖南发生的右倾翻案风负责的“湘瓷派”头头刘炎生（湖南建湘瓷厂、省革委会委员）、余信谦（湖南新华印刷厂、省革委会委员）、周国强（市总工会机关、市革委会常委）等，也分别被停职反省。

随后，全省各地、县纷纷仿效。

广西桂林，7月11日，“联指”总指挥部召集各县武斗民兵团的负责人在工人疗养院开会，决定发起“西山战役”，并成立了南北片指挥部。与此同时，“造反大军”亦在西山集结兵力，誓与“联指”决一死战。

7月13日，“联指”民兵在炮火的掩护下，分别从西、南、北三面向“造反大军”的阵地发起总攻。双方在西山一带展开激战，炮声震天，枪弹如雨，硝烟弥漫。两派武斗人员在桥头山、雷劈山、白岩山、癞子山、飞凤山和打靶场等地进行反复争夺，殊死拼搏。为了在火力上占优势，双方都使用了加农炮、榴弹炮和迫击炮互相轰击，一些炮弹落在武斗区内的部队、机关、学校宿舍区，使大批无辜群众受到伤亡。

在这场桂林两派大战中，“联指”武斗人员向地区贮木场、气象站、外贸仓库、桂林北站等“造反大军”据点发起进攻。“造反大军”武斗人员则攻占了机械厂、铸造厂、冷冻厂、面粉厂、第一粮库和盐仓。随后，两派在观音山和虞山庙等地进行反复争夺，后为“造反大军”所占领。激战期间，“造反大军”据守的化工原料仓库，被“联指”派武斗人员发射的迫击炮弹击中，引起易燃物资起火，大火燃烧了两天两夜，物资损失数十万元。

“联指”据守的北门仓库，也被“造反大军 ”发射的炸药包击中引起大火，燃烧了3天3夜，造成国家物资损失661.6万多元。

“西山战役”一直到7月24日才停火，双方共死亡249人。

由于“联指”与“造反大军”势均力敌，各据一方，武斗最后形成了僵持状态。

在这场武斗中，发生了大量的虐待俘虏的惨案。桂林“联指”的“桂保总”在桂林南站对面东方红饭店语录牌楼建立的一个专门关押人的“看守所”内，先后关押了258人。7月14日中午，前来参加桂林围剿“造反大军”的平乐县武斗人员伍学强、林海、廖昌辉、候永成、唐桥生等24人，冲上“看守所”楼上将被关押的桂林针织厂职工唐跃武和候霉、李江、白先德、马震鹏、秦恩深等12人拉到桂林十一中对面树林里集体枪杀。

这场历时近3个月的桂林大武斗，两派参战人员共达1万多人，抢夺了大量国防武器装备，据不完全统计，夺枪13272支、

炮81门、子弹837万发、炮弹19090发、手榴弹23万枚。武斗中动用了当时的新式步枪、冲锋枪、轻重机枪、高射机枪，以至火箭筒、迫击炮等，打死了武斗人员和无辜群众600多人，受伤者数以千计；许多房屋被毁于战火，大批珍贵文物被毁被盗；美丽的桂林山城，整个陷于一片战火硝烟和血腥恐怖之中，铁路运输中断，大批的物资被烧被抢，工厂停产，机关无法上班，城市设施、风景文物被毁，给桂林地区人民带来了惨重灾难。

不仅桂林在打，广西南宁也于7月12日发生武斗，“联指”和“422”在南宁邕江大桥和朝阳路一带使用步枪、机枪等武器，施放催泪弹。当天，广西区革筹和广西军区向中央报告：“自7月10日以来，南宁百货大楼、造反楼‘422’据点多次开枪，打死群众2人，伤多人。12日上午，他们从解放路、华西路向北大路打催泪弹，有二、三百人中毒。”

7 月 13 日，南宁市革委会、南宁市警备区司令部和政治部联合发布了《关于恢复邕江大桥、朝阳路等全市交通的通告》，谴责“422”在其控制区武装布防，阻断交通。

7 月 14 日，“422”指挥部发表《坚决贯彻〈七三布告〉的严正声明》，称：南宁警备司令部发出通辑令抓的“反团”骨干，都是“422”派的，全南宁市有 3547 人被列为“反团”分子，全是“422”观点的群众。

7月15日，广西“革筹”和广西军区在南宁自治区体育场召开15万人参加的“南宁各界热烈欢呼、坚决贯彻、誓死捍卫毛主

席亲自批示的‘七·三’布告大会”。会上，韦国清在动员报告中号召：严惩一小撮“现行反革命分子”，为自治区革委会成立扫清道路。

当天早上，参加大会的南宁市河南片群众经过邕江大桥时，遭到“422”派控制的桥头据点武斗人员的射击，当场打死南宁糖纸厂工人阳碧珍，驻该厂的柳江造纸厂筹备处革委会委员宋玉柱，同时还打伤两名参加会议的群众。

早上 6 时左右，“422”一派还向区体育场的大会场附近打了 3 发炮弹。大会立即宣布：“这是一小撮阶级敌人对抗中央‘七·三’布告，破坏‘七·一五’大会的反革命事件”。

当天，布防在邕江桥头一带的广西“联指”派武装人员向“422”占据的解放路一带开枪开炮，解放军的炮兵也向那一带打炮，一直打到第二天上午。

会后，自治区革筹小组和广西军区负责人立即召开会议，决定要有计划、有步骤地出动军队，对“422”派进行“摧毁性打击”。并责成南宁市警备区用武力解决“422”派在解放路和百货大楼及展览馆一带的武斗据点。

会议决定：广西区革筹、广西军区和南宁市警备区为贯彻《七·三布告》，调动 6912 部队、6936 部队、6966 部队和广西军区警卫营、南宁军分区独立营等部队，及玉林、陆川、贵县、马山、邕宁、横县、崇左、武鸣、上林及南宁市郊的“联指”派力量，联合攻打南宁“422”，后来“联指”派称之的“九县一郊

打南宁”。会议形成的报告得到了广西自治区革筹小组和广西军区的同意。

南宁市警备区根据自治区革筹小组和广西军区的指示，立即召开党委会，由司令员宋治平、政委韩世福作了传达，并研究部署用武力解决“422”派据守的百货大楼、展览馆和解放路的武斗据点问题。参加这次会议的有：广西军区参谋长、南宁警司常务副司令印玺、警司常务政委慕石起、政治部主任魏连和、保卫科长王国典、治安科长常庆云、秘书科长陆儒丰、管理科长刘益民。会议确定了分工：部队的调动由印玺负责；慕石起负责后勤保障，并掌握部队的思想情况以及后事处理、收容等工作；魏连和留守机关。会后，慕石起立即在警司的全体指战员会上作了动员讲话。

接着，各地的“联指”纷纷聚集南宁，准备消灭广西的最后一批“坏人”。

为了保护自治区党政领导，区党委大院的围墙上拉上铁丝网架起机关枪，大门口的喷水池也改建成了碉堡。

这天，南宁邕江北岸、南岸只见人群车炮往返，无数白色安全帽和钢盔闪烁发光。军队和“联指”的高音喇叭在高声广播《七三布告》。

火车站也调来大炮，炮口对准“422”的解放路、百货大楼、展览馆。7月的太阳像火一样滚烫，炮手们一遍又一遍地擦着炮弹，他们已经等不及了，纷纷请求允许开炮。

下午，广西军区被炮火击中，伤战士 2 人。

当天下午，广西“联指”总指挥部在南宁饭店召开常委扩大会议，各片武装负责人和各据点头头都前来参加。会上，总指挥颜景堂向到会的“联指”各常委和部分分片的头头，传达了广西军区对攻打“422”行动的指示，对“联指”打头阵，军队跟进的作战部署进行了说明。会议决定成立前线指挥部，颜景堂任总指挥，姜占德、杨录任副总指挥。前线指挥部设在南宁饭店。并将南宁市区分成朝阳、河南、卫东、延安、红卫、西郊、北郊7大片，各片也成立指挥部。会后，广西“联指”副总指挥姜占德，向广西军区司令欧致富汇报了会议情况，得到同意。

当天，广西“联指”开始攻打“422”派据守的解放路外围据点百货大楼。攻打前，由姜占德召开会议，传达贯彻广西“联指”指挥部的意见。攻打时，使用了炸药包、土坦克、无后坐力炮、火箭筒等武器，与守卫百货大楼的“422”派武斗人员展开了“实力悬殊的浴血抗战”。

“422”的参战者，抱着“明知是死，也要抵抗到底的悲壮气概”拼死抵抗。经过几个回合的进攻和失利，现场观战指挥的广西军区负责人提出：“用炸药包把他们干掉。”

在场的广西军区副政委韩世副则提出：“不要把百货大楼都炸掉，留着，好教育全市人民。”

“联指”派武斗人员用炸药包对百货大楼进行爆破，未果。

随后是轰轰的炮声，接着是的机关枪扫射声，还有步枪，冲

锋枪声。“422”的广播喇叭被炸哑了，南宁市上空只有“联指之声”在广播：

“‘422’一小撮阶级敌人，杀害我‘联指’战士，手段野蛮，罪恶滔天，今天他们又制造了一起震撼天下的血案……今天下午 18 点 55 分，解放路的土匪们竟敢向我敬爱的解放军开枪开炮，把炮打到广西军区大院内，致使我解放军多人伤亡，是可忍，孰不可忍……”

当天晚上，广西自治区革筹小组和广西军区向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贯彻“七三布告”情况简报之八》说：“17 点 55 分至 19 点 30 分，解放路的广西‘422’向军区开炮。军区院内中弹 5 发，打伤战士 2 人。”

## 第 1022 回：南宁市，炮击引民房燃烧　武传斌，北京召集“串联会”

7 月 16 日，南宁市的炮火更加猛烈，部队开始全面投入战斗，会同“联指”的九县一郊各路武斗大军，向“422”控制的据点展开全面进攻。从中午 12 时至晚上，“422”一派控制的解放路、百货大楼、区展览馆等据点遭到猛烈炮轰，一朵朵烟云腾起，百货大楼所有的窗口都吐出浓浓的黑烟，楼前的朝阳路被炸得坑坑洼洼。

百货大楼正西北边是朝阳广场，广场中间已被两尺多高的野草所遮盖，野草之中隐藏着军区和“联指”的炮手……。

百货大楼的南边是新华街和解放路，这里是南宁市旧城的主要街道，多数是平民老百姓的矮小瓦房。这些重重叠叠的小瓦房的居民，多是解放前贫穷的老百姓、小商小贩和自由职业者。这天，这些居民刚刚吃过午饭，许多人即听到“呼呼”的炮弹与空气磨擦声，还不及躲避，巨大的声浪已把屋上的瓦片震得粉碎，房子噼噼叭叭地燃烧起来。

解放路、灭资路、上国街、博爱街都冒出滚滚的浓烟。下午 16 时许，广西军区负责人召见广西“联指”常委，指示他们要“掩护群众救火”。

南宁市革委会、南宁市警备区司令部和“联指”向全市人民广播：“‘422’派匪徒放火焚烧街道民房，要把南宁市变成一片焦土。激起我人民军队和无产阶级革命派强烈义愤！”

“422”广播站则称：军区的做法是“既作强盗又做官，既当道公又做鬼！”

同日，南宁市革委会、广西“联指”遵照区革筹小组、广西军区7月8日发出的《关于清理流窜人员的指示》，以“治委会”之名“清理”户口，抓捕了280多人，对“422”派实行“扫清外围战”。

7月17日，广西部队和“联指”的武斗人员，向“422”控制的解放路展开猛烈进攻，炮火惊天动地，枪声连成一片，战地高音喇叭时而响起命令“422”派“立即投降！”“缴枪不杀”的喊声。而“422”武斗人员则同进攻者进行街垒战和逐间房屋的争夺战。

与此同时，“联指”和部队的配合，集中炮兵轰击邕江上“422”控制的船只，“兴无”号和“反修”号等一批船只中弹烧毁。南宁市革委会、南宁市警备区司令部和“联指”向全市人民广播说：“422”派匪徒放火焚烧载有援越物资的船舶，犯下滔天罪行！

当天晚上，广西自治区革筹小组和广西军区党委举行联席会议，在南宁的自治区革筹小组成员和广西军区党委委员全都到会。会议研究了制止“422”中一小撮人纵火的措施。会上，伍晋南提出：现在抓了不少“纵火犯”，对这些人不要打死了，要继续查名纵火原因，以免你说他，他说你，要最后作结论。

7月18日以后，在久攻不下的情况下，广西军区调动新的增援部队投入战斗，对解放路一带进行更大规模的进攻。

这天，广西自治区革筹小组和广西军区向中央、中央文革、广州军区发出《严防阶级敌人制造更大规模纵火事件的措施的报告》。报告说：

据部队观察哨发现起火的原因，是有人从新“422”据点出来点火和掷汽油瓶烧的。当时消防队组织救火时，遭到新“422”据点开枪射击，仅18日中午就打伤3人。鉴于上述情况，我们的做法是：

一、开展强大的政治攻势，公布阶级敌人，揭露他们的阴谋。教育受蒙蔽的群众，鼓励打击一小撮阶级大人。

二、积极做好两派的工作，双方立即停止武斗，拆除路障，恢复交通，上缴武器。

三、成立指挥小组。由军区、警司、区、市公检法军管会、市革委会、X团等领导8人组成。并组织武装机动4个连，任务是：

1、发动群众救火，组织部队火炉掩护，阶级敌人胆敢向救火群众射击，部队采取坚决措施，保护群众。

2、加强联防，组织“工人纠察队”，继续清理外来人员，打击现行反革命分子。

3、对邕江桥实行武装保护，严防阶级敌人破坏。

7月19日，广西自治区革筹小组和广西军区又调4个连和“联指”数千人包围、炮击解放路一带“422”据点。多条街道起火，硝烟弥漫，一片火海。对此，南宁“警司”发布《立即行动起来，扑灭反革命分子制造的火灾——给全市无产阶级革命群众的一

封公开信》。同日，自治区革筹小组、广西军区又向中央、中央文革呈上了《执行武装掩护部队、群众救火的报告》，称：“由于着火地区都在‘422’的控制区域，情况复杂，暗堡火力点很多，需要作周密准备，我们采取的措施是：1、组织了指挥部。2、抽调四个连执行武装掩护救火任务。3、追捕缉拿反革命纵火犯及幕后策划者……”

19日，周恩来命令广西军区派部队实行武装掩护群众救火。

这天，《广西日报》刊登的“誓把谢王岗、袁家柯批倒批臭”一文说：“谢王岗和蒋匪特务组织里应外合，发展特务组织，建立特务情报站……在担任钦州地委组织部长期间：利用职权安插了大批的特务、叛徒、地主恶霸、资本家在党政机关工作……”

21 日上午 9 时至 12 时，军队和“联指”又从南宁桂剧院据点向百货大楼开炮，大楼二、三楼起火燃烧。

就在南宁打得不亦乐乎的时候，北京又发生了后来被称之为“北航黑会”的事情。

事情要从广州中山大学生物系学生、广州“红旗派”头头、广东省省革委会常委武传斌说起。

7 月初，武传斌和广州“工联”邱学科、“广州工人”林基球等七、八个人，带着海陆丰、阳江、封开、怀集还有海南白沙等广东各地关于镇压造反派的材料进京告状。“广铁总司”给他们安排了一个软卧间，七、八个人都挤在那里。

途经韶关时，遇部队上车查票，将武传斌等 100 多人赶下了

车。

武传斌出发前，已经通知省军管会他要进京一事。下车后，一个军人问到他："你是不是武传斌？是不是要上北京？"

武传斌说："是。"

随后就让武传斌他们几人重新上车了。

7 月 4 日，武传斌他们到达北京后，首先找到文革前北航学生会主席、"北航红旗"原"驻广州联络站"的站长、曾参加过广东省"革联"组织"122 夺权"的郑焕成，安排他们在北航住下。第二天，武传斌即给总理办公室的谢秘书打电话，第三天武传斌去了中南海后门。通报后，谢秘书出来，接收了武传斌的上诉材料，并答应武传斌"一定转给总理。" 谢秘书说："据我所知，总理还是支持你们的"。

从中南海回来后，邱学科、武传斌又找到原"北航红旗"动态组的负责人段孔莹，提出想见"北航红旗"一把手韩爱晶。

当时，韩爱晶患肺结核，吐血，请假养病，周恩来还派自己的保健医生给他检查过身体。但是，在北航校园里，虽然韩爱晶尽量不参加各种活动，但总是有人要找他解决问题。于是，他想在校外找个地方静养。开始是在北京大学俄文楼，这里是"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办公的地方。但是他觉得这里还是不行，搞不好会卷到"红代会"的事务里。最后想到位于圆明园旧址以北，空旷农田荒野里的那所孤零零的北京体育学院。

体院的革委会主任刘长信也是北京市革委会委员、首都红代

会核心组成员。韩爱晶找到他，他将韩爱晶安排住在校园东南角原外国留学生宿舍。

7 月 12 日前后，原“北航红旗红一连”的柴孟贤同学给韩爱晶打来电话，说广东省来了两个革委会常委，一个是学生武传斌，还有一个工人常委，想见韩爱晶。

韩爱晶说：“我没体力接待。”

柴孟贤说：“现在外面说你自以为‘上有天堂、下有北航’。国防科委‘学代会’，外省来了很多造反派负责人，他们住在北航，可是你根本见都不见。人家说你老大作风，骄傲自满，是富农，不革命了。”

韩爱晶听了这话，就同意柴孟贤让武传斌他们二人到体院留学生楼找他。

第二天早饭后，韩爱晶在楼前小树林散步时遇见了前来拜访的武传斌、邱学科二人，将他们带到楼上宿舍。

武传斌说，周恩来总理支持广州“旗派”，黄永胜在广东也支持“旗派”，他和温玉成很熟。他来北京想找温玉成。

韩爱晶一听黄永胜支持他们，他们和温玉成又很熟，觉得武传斌是可靠的，何况还有邱学科这个工人常委，便答应让北航侯玉山带武传斌去北京市革委会找温玉成。

武传斌希望韩爱晶能把广东的情况反映上去。韩爱晶同意反映，但也对他们苦说：“北航‘红旗’日子也不好过，只是比你们好一些。北京情况比较复杂，像蒯大富要借枪，给也不是，不

给也不是。虽然我们在北航一统天下，但是外部压力还是有的……”

午饭后临别时，武传斌提出，想开一个“全国形势串联会”。

韩爱晶说：“北京不比外地，北京不能随便开会。另外，北京还有‘天派’、‘地派’，很复杂。”

武传斌说，他和北京“天派”、“地派”关系都很好。上次来住在地院，这次来住在北航。

在武传斌的坚持下，韩爱晶同意在“天派”、“地派”都参加的情况下，找几个可靠的外省造反派头头、革委会负责人聊聊，但是要蒯大富、王大宾都参加才行。

武传斌说：“没问题，我去找王大宾和蒯大富。”

武传斌走后，韩爱晶托人把北航革委会常委侯玉山叫到体院留学生楼，对他说：“最近外地的造反派日子不太好过，有不少来北京向中央反映问题，中大的武传斌是广东省革委会常委，想与北京和一些外地造反派一块分析一下形势，座谈座谈。”

侯玉山建议北航最好不参与。

韩爱晶说：“人家是省革委会常委，来到北京，要来和我们谈一谈，也不好拒绝。另外，主要是外地的人想互相交流一下。”

侯玉山提出：“可以另外找个地方。”

韩爱晶问：“上哪儿找？老蒯那儿斗得厉害。”

侯玉山：“我一直是管院内的事，对外地情况不了解。”

韩爱晶：“不要紧，只要你出一下面，其余的事叫他们弄。”

侯玉山又问："武传斌来北京干什么？"

韩爱晶说："他想找一下黄永胜，送点材料，黄永胜在广东是支持他们的。"并让侯玉山替韩爱晶到北京市革委会开会时带上武传斌，找一下温玉成。

侯玉山回到北航后，武传斌到北航宿舍 13 号楼找到侯玉山。于是侯玉山带着武传斌乘坐北航的华沙轿车来到北京市革委会东大门，警卫验过证件后指着武传斌问："他是谁？"

侯玉山据实回答说："是广东省革委会的常委，来找一下市革委会的首长，有点事情。"

警卫准备打电话请示时，司机已将车开进去了。

武传斌到了市革委会的会议室，没有看到温玉成。

随后，武传斌找了清华大学蒯大富、地质学院王大宾和北京师范大学谭厚兰，也是请他们帮忙反映广东情况。

7 月 15 日下午，段孔莹找到侯玉山，说"武传斌来了，老六让找你。"

"老六"就是韩爱晶。

武传斌与侯玉山商讨了"全国形势串联会"的开法，确定由广东武传斌主持、通知外地参加人员，北航负责接待。

此时，全国各地很多群众组织的头头在北京参加"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统一住在解放军政治学院。开始两、三天还可以自由活动，后来宣布了几条纪律：不准外出，不准串联，不准外人来探访等等。

武传斌在北京认识了广西自治区党校“红浪”组织的朱仁，他是广西“422”赴京代表，但不是北京学习班的学员，所以也称为“非正式代表”。武传斌来到广西“422”进京告状代表的住地——和平里的一栋居民楼。这里是苏式建筑，大走廊，宽楼梯，楼梯底下的空间很大。武传斌看见楼里的走廊、楼梯底、阳台甚至公厕到处都住了人，还支锅做饭，大人小孩衣衫破烂……像一群难民，他觉得惨不忍睹。

这时，许多地方进京告状的听说武传斌在北京认识人多，北京五大学生领袖，除了聂元梓他都见到了，就让他帮助找人向上反映情况。而武传斌到了北京后，也觉得全国造反派都很惨，情况远比广州更恶劣，于是提出请朱仁联络各地造反派头头，“不如大家坐在一起谈谈情况。”

大家都想见见蒯大富，觉得他能往上说上话，于是决定在清华大学召开一个碰头会，如果蒯大富一来参加，大家就可以见到他了。

于是，7月16日，武传斌在清华召集广西“422”、青海“八一八”、贵州“411”等七八个人开了一个会，主要是通知“全国形势串联会”开会的地点和内容。

大家觉得清华大学条件不好，武斗不安全，建议第二天到北京航空学院继续开会，由武传斌去北航联系。

武传斌找到清华大学的陈岩，请他转告蒯大富，希望他能出席第二天北航的会议。陈岩答应：“我去跟老蒯说。”

晚上，武传斌回到北航，与段孔莹商量开会一事，并请韩爱晶出席会议，他希望段孔莹能帮忙找到蒯大富出席。

段孔莹很快答复武传斌说，开会地点没问题，可以在北航开。

武传斌给北师大谭厚兰打电话，请她来参加第二天的座谈会。谭厚兰表示不来参加。

武传斌又亲自去找“地质东方红”的王大宾。王大宾表示：“你们到地院开，我一定来。”

因为北京“天派”“地派”的原因，武传斌想：“如果在地院开，蒯大富一定不会来。蒯大富的影响比王大宾大，于是决定仍然在北航开。

参加北京“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的广西柳州“造反大军”白鉴平来到“柳州铁路局工机联”柳铁一中“联战”头头钱文军的房间，邀他到自己的房间坐会儿。

钱文军随白鉴平来到他的房间，见里面已经坐了许多人，只听到有人说：清华的蒯大富召开座谈会，邀请了广东“旗派”、青海“八一八”、徐海地区的“踢派”、重庆“反到底”等各地造反派主要负责人参加，希望广西的造反派也去参加。

白鉴平向钱文军建议说：“咱们去看看？”

钱文军不以为然，白鉴平坚持去看看，房间里的人为此争论起来，最后白鉴平总结道：“那你能怎么办？力争一下总比不争的好。我们什么东西也不向中央反映，别人可没有闲着，最后还不是等死？”

于是大家统一了意见，管他三七二十一，去听听也好。第二天早餐后，他们几个从政治学院东北角爬围墙出来，与住在和平里的广西上访者在清华大学门口会合。

他们进到清华大学，只见校园里乱七八糟，武斗气氛十分浓烈。

钱文军对白鉴平说："老蒯像蒋介石迁都广州时一样了。"

白鉴平说："你他妈的这嘴就是不饶人，哪有那么严重？"

他的话音未落，有人就说了："你们别挤在一起走，分开点距离，不远不近跟着我。万一有人盘问，就说来找亲戚朋友的，千万别说来开会。"

钱文军抓住这些话马上驳斥白鉴平："你看怎么样？"

这次白鉴平也笑了，他说："堂堂蒯大司令，在清华也成了地下党，是有点不争气。"然后又讥笑清华的武斗工事，跟广西去年刚开始武斗时的水平差不多。

这些人七转八转也没有找到武传斌他们开会的地方，只好回去了。

## 第 1023 回：造反派，聚北航开座谈会　急叫停，中央见新疆代表

7 月 17 日上午，外地进京的造反派头头们来到了没有武斗、“歌舞升平”的北京航空学院，这里丝毫没有两派的影子。难怪人们由衷地感叹“上有天堂，下有北航。”

会场在教学区四系楼二层一间能装 200 多人的阶梯教室里，来的约有 100 多人。负责筹备和接待工作的是“北航红旗”全国动态组的段孔莹等几个学生。到会人员有黑龙江“炮轰派”、辽宁“831”、锦州“糟派”、镇江“三代会”、青海“ 818”、贵州“ 411” 、桂林“老多”、广西“ 422” 、广东“旗派”、武汉“钢工总” 等全国 20 多个著名造反派组织的头头和代表。

“北航红旗”一把手韩爱晶因病没有前来参加，但是二把手井岗山、常委侯玉山以及作战部、“红一连”、“全国动态组”的一些学生参加了这个会议。

清华“井冈山”一把手蒯大富、北京六中的两个中学生代表参加了会议。

会议按事前约定由武传斌主持，他礼节性地推让一下，北航侯玉山坚持让他主持。于是，武传斌宣布开会，感谢北航“红旗”提供了会议的场所等。然后，就转身让侯玉山讲。侯玉山说：

“外地革命造反派到北京来，到伟大领袖身边来，我们北航‘红旗’非常欢迎。我们有义务接待，提供一些方便。我们对外地文化大革命的情况不很了解，我们主要是来听听情况的，希望

能通过互相交流，向各地造反派学习。别的我没有什么好讲的。”

武传斌和另外两人商量了一下，就让大家开始发言。来自外地的十几个造反派头头争先恐后地介绍他们那里的情况。

广西钱文军、白鉴平他们来到会场时，会议已经开始，青海“818”正在发言，控诉青海刘贤权被架空，是没有赵永夫的赵永夫路线，老造反派被迫害……接着是吉林的一位代表发言。

有人提议各省造反派应该联合起来成立一个全国性组织，蒯大富大惊失色，表示这绝对做不得。

有人又说：“那就办个联络站保持联系。”

蒯大富说：“即便搞联络站也要先请示中央文革，得到中央的明确同意才能搞，否则是绝不能搞的。”说完他就离开了。

北航侯玉山安排到会的北航“红旗”的人做一下记录，如果要北航发言的话，就由许志新把他与惠凤荣、刘博晓等人撰写的文章《历史的必然》介绍一下，宣传一下他们对于当前运动的看法，在观点上要把握反对武斗和派性，拥护人民解放军。随后他准备到后排找蒯大富、井岗山聊一下。但抬头一望，他们都已不见踪影。侯玉山随即也就离开了。

与会的外地造反派们发言热烈，中午也没有休息，各自从食堂买些馒头、咸菜回来后，又边吃边聊，继续开会。

会议连续开了两天。许多人的发言把矛头指向了当地驻军和革命委员会。有人慷慨激昂地控诉当地驻军是如何镇压造反派的，抓了多少人，打死多少人；有人把全国的文革形势描述得漆

黑一团，就像当年蒋介石“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的白色恐怖，看不到任何的前途；有人认为中央军委的《八条命令》和《十条命令》自相矛盾，是造成军队和造反派对立的根源；有人甚至对中央当然也包括中央文革和毛泽东主席怨声载道，认为中央出尔反尔，搞实用主义，“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卸磨杀驴，把造反派当替罪羊；还有人对中央内部斗争情况妄加猜测和议论，认为毛泽东被架空了。

因为《七三布告》是对广西来的，在大家的要求下，柳州白鉴平即席发言。他介绍了他们被追杀的困境：“整个柳州市我们只剩下一条街道，与铁路的地盘还隔着‘联指’的据点。各地农民在武装部的率领下，领着津贴进攻我们，基本上离被消灭只有‘五十米’的距离。”

他继续说：“然后我们自己救自己，毫不犹豫地学习毛主席‘枪杆子里出政权’的指示，打出一片天地。广西鹿寨县武装部长张春峰亲自率领武装基干民兵进攻我们，被击毙在战场上。‘联指’逃到柳北，我们占领了柳州市三分之二以上的地盘……”然后介绍了他们如何组织生产、生活、治安等等。

他的发言博得阵阵掌声，让刚才还愁眉不展的各地造反派都激动不已，纷纷表示要向柳州的“造反大军”学习。有人还高喊口号：“向广西造反派学习！”昨天还在诉苦的青海造反派，发誓要立即返回，用柳州的经验武装头脑，组织大家干。还有人要求白鉴平把柳州的经验写出来，印成册，发给大家学习。

下午 15 时左右，“辽宁 831”代表提议成立“全国造反派联络站”，请求中央批准，地点设在北航，由“五大领袖”轮流当头。

马上有人反对，说北京的五大学生领袖已经分成“天派”、“地派”。

又有人纠正说：“‘天派’、‘地派’都是造反派，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

再有人又反对：“清华不是打起来了吗？”

接着有人纠正说：“‘414’是老保翻天，算不得造反派。”

有人提出，建立全国性的组织是中央禁止的。

另有人建议，向中央打报告请求批准。

还有人说不会批，不如先成立起来，等中央知道了再申报。

有人甚至提出：要踢开中央文革，自己闹革命，自己救自己……

总之，会场始终乱哄哄的，莫衷一是。

武传斌没有看见蒯大富，清华大学的陈岩也不说话。

由于大家谁都不认识谁，会议照常进行。

这时，几个北航“红旗”的急忙找到侯玉山，说与会的人很杂，不像是外地造反派和北航的人，会上有的发言很出格，要求发通电的和成立全国组织的都有，搞不好要出事。

侯玉山说声：“走！”便和他们一起来到会场。他把会场上北航“红旗”的许志新、祝春生、王竹贤、杨玲玲、柴孟贤、尹聚

平等人叫出来商量。大家不同意侯玉山出面讲话，认为太正式了，没有回旋余地，就推举祝春生出面来讲。因他善辩能讲，而且只是北航“红旗”的普通成员，说多说少、说轻说重都没有关系，也不会得罪外地造反派。接着，他们又议论了一些必须表达出来的观点，即：不同意成立全国性造反派组织或联络站，要回原地闹革命，要执行毛主席战略部署，反对武斗和派性，支持人民解放军等。定了以后，侯玉山就离开了。

最后，外地参会人员纷纷要求：“请蒯大富同志和北航‘红旗’头头为我们讲几句话，大家鼓掌热烈欢迎。”说着，会场响起了一遍遍松涛般的掌声。

他们反复鼓掌欢迎，就是不见人。其实蒯大富早在 17 日上午会议开始后时间不长就走了，18 日也没有来。

于是，北航“红旗”的柴孟贤、许志新、祝春生代表北航“红旗”分别作了发言。

祝春生也是北航“红旗”的“元老”，口才极佳。他在发言中先说了几句对外地造反派战友表示热烈欢迎和坚决支持之类的套话，然后话锋一转，便慷慨激昂地大声教训起那些外地造反派头头来。他说：

“你们这些人不读书不看报，根本不理解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战略部署。你们自认为山高皇帝远，根本就不把中央放在眼里，不把解放军放在眼里，这样下去，你们要犯大错误的，要走向反面的。

你们应当真心实意地拥护当地解放军，要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更不允许到处‘揪军内一小撮’，到处冲击军区、省军区、军分区、警备区和解放军驻地，到处抢解放军的枪，殴打解放军官兵。你们若不取得解放军的支持，迟早要完蛋的。

真正的革命造反派决不能反军。我们北航‘红旗’就坚决拥护解放军，上到最高统帅毛主席和林副主席，下到解放军战士，我们都拥护，特别是对国防科委聂老帅，我们北航‘红旗’是坚决拥护的，所以解放军从来没有打过我们，不但没有打过我们，还坚决支持我们，所以我们北航‘红旗’才坚不可摧。有人说，‘上有天堂，下有北航’，这话很对。但人间天堂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而是我们坚决听毛主席党中央的话，听中央文革首长的话，通过艰苦奋斗换来的。还有人说，北航‘红旗’架子大，老子天下第一。这话不对，不是第一，是第二。第一是毛主席、党中央、中央文革，是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才是我们北航‘红旗’。这不是谦虚，这是事实。我们北航‘红旗’的宗旨是解放全人类，我们没有忘记全国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战友们。但是，现在泥沙俱下，鱼龙混杂，造反派中什么王八蛋都有。我们支持真正的革命造反派，凡是怀疑毛主席党中央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路线的，凡是不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战略部署的，凡是反对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就不是真正的革命造反派，我们北航‘红旗’决不支持他们……”

祝春生一番发言，把那些外地造反派头头们骂得目瞪口呆，

很不自在。

广西钱文军悄悄对白鉴平说："你知道什么叫革命吗？革命就是新的官僚取代老的官僚。"

白鉴平笑罢说："你哪来那么多谬论？"

各地造反派再也坐不住了，纷纷起哄，不断打断祝春生的发言。

其实，早有内参记者也来参加了会议，他们记录了会上每个人的发言。据说，后来康生看到了记者上报的会议内容纪要，说了一句："这个北航头头的发言还差不多。"只是记者不认识祝春生，误将他写成是北航"红旗"常委侯玉山。

下午的会没开多久，中央文革联络员就打来电话，不许再开了，此会就这样不了了之。武传斌建议大家留下联络方式，以后彼此多联系。他并没有把这次座谈会太当回事，觉得只是一个串联活动，在当时稀松平常。会开完，武传斌也就准备回广州了。但也没有马上走，还是想见周恩来。他又去找总理办公室的谢秘书送材料，并提出"希望见总理。"

谢秘书收了材料只说了一句："你快回广东吧。"

而正在北京体育学院休养的韩爱晶就不像武传斌这样简单了，他早在 18 日就接到北航段孔莹等同学打来的电话，对他说，有些不对头，地质学院只参加筹备会后就不参加了。蒯大富来听一会儿就吓跑了，北航井岗山也吓跑了。还有别的同学也打电话反映情况。政治敏感极强的韩爱晶知道闯了大祸，赶紧对他们说：

“那你们赶紧写报告，把这件事报告中央，说这里有个会。”

可是，报告还没有写好，中央批评已经下来了，说这是个“北航黑会”。

大概是 7 月 20 日晚，韩爱晶将侯玉山叫到反修医院。侯玉山对中央为何这么快就知道在北航开的这个会，且马上批成“北航黑会”感到迷茫和冤枉。韩爱晶的态度是稳住，不要慌，看下一步中央怎么讲。

这次座谈会的会议纪要简报很快就到了中央文革和毛泽东的手里，听说韩爱晶、蒯大富他们开了一个全国性的造反派串联会，还要成立全国造反派联络站，甚至扬言要踢开中央文革自己闹革命，这是无论如何也不允许的，中央早就三令五申禁止成立全国性跨行业组织。虽然，北航“红旗”后来在会上的发言还是不错的，但毕竟是他们在北航为那些外地造反派提供了开会地点及种种方便，韩爱晶、蒯大富都难逃其咎。

7 月 20 日晚 9 时 30 分至 21 日凌晨 2 时 05 分，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姚文元、谢富治、黄永胜、吴法宪、叶群等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接见新疆两大派群众组织的部分代表，军队和兵团的代表也参加了接见。

周恩来请康生主持会议。康生笑着说：

“同志们，开会了。今天的会，想开得短一些，因为还有些事情，有些同志有其他事情没有来。”

他说：“你们两派没有联合起来，见了面我们就要讲几句话，

但有资产阶级宗派主义，各取所需，你抓我一句，抓总理几句，所以我们就没有接见，没有讲话啰。”

周恩来：“我的话抓得最多了。”

康生：“由于你们的资产阶级宗派主义，使我们不敢接见你们，不敢讲话。还是希望同志们好好学习毛主席著作，主席思想增加一些，宗派主义、山头主义减少一些，联合起来，我们讲话就比较容易了。你们在这里学习还比较好，达成了协议啰！”

周恩来：“达成了制止武斗协议，不是大联合协议。”

康生：“你们研究什么时候联合起来？什么时候成立革委会？新疆联合不起来，苏修就高兴，天天在那里广播，造谣说新疆要成立另一个政权，蒋匪帮造谣说，新疆革委会是成立不起来的。你们还在那里争谁正确谁不正确，首先要看大方向。谁是敌人？你们面临苏修、蒙修、美帝，还有印度反动派。新疆面临三个方面的敌人，希望你们联合起来。现在同志们商量一下，能不能很快地把革命大联合搞起来，很快成立革命委员会。什么时候能联合起来，听一听同志们的意见。”

周恩来：“康老开场了，”他看了一下名单接着说：“现在第一名‘红二司’吴巨轮，你站起来。”

吴巨轮站了起来。周恩来：“我今天才知道你的真名字。原来我给中央同志和同志们介绍，都是说你叫胡乱闯同志。你看，康老讲了，能不能大联合？你们是否认为大联合条件成熟了？你讲一讲吧！”

康生："你把名字改了！你是山东人吗？我们是老乡啊！"

大家都笑了。

姚文元："你真名字叫吴巨轮，为什么要改名呢？"

周恩来："打电话给我，说名字叫胡乱闯。"

康生："为什么叫胡乱闯？"

吴巨轮答："这是文化大革命刚刚开始时造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反的时候叫的名字。"

康生："造反要造苏修、帝国主义、蒙修的反，造敌人的反，造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反，总要有个敌我界限，不能胡乱闯了！名字改了就好了。"

周恩来："上午我找了半天，才知道你叫吴巨轮，很好嘛！"

姚文元："吴巨轮这个名字也不错嘛，历史的巨轮嘛！"

吴巨轮开始汇报。当他汇报到搞革命大联合应该创造良好气氛的时候，周恩来问："你们在这里跟'三促'谈得怎么样啦？"

吴巨轮答："没有谈。"

周恩来："你们住在一起，还没有谈吗？"

康生："你们在一起吃饭吗？"

吴巨轮答："在一块。"

周恩来："你们住在一起四个月了，在一起吃饭，在一起生活，怎么还不联合？怎么不主动伸手去谈判呢？我讲过你们是老造反派，你们不好好注意，我们就要取消这一句话了。你们每犯错误，当走到边沿的时候，我们就提醒你们，你们闯的好，但也

闯了些乱子，我已登记了十几件事情了，你们是有错误的老造反派，你们高姿态不好嘛，军队里有人有缺点错误，要帮助。你们思想也没有通嘛！”

周恩来问：“‘三促’的头头是哪一位呀？”

新疆“工促会”的胡良才站起来说：“报告总理，我叫胡良才。”

周恩来：“你们在一起住，一起吃饭，一起谈了话没有？”

胡良才答：“没有。我们给‘三新’发过五封信。”

周恩来：“不要发信，可以谈话，他们不主动，你们也不主动。你们都是山东人，都姓胡，你们两人握过手没有？”

吴巨轮和胡良才回答：“没有。”

周恩来：“就在这里当场介绍，我来给你们介绍，你们握个手好不好？”

吴巨轮和胡良才二人握手，全场热烈鼓掌，高呼口号：“向总理学习！向总理致敬！”“向同志们学习！”

周恩来：“我不是什么指示，我们只是起促进作用，我们只是促一下，主要靠你们自己，你们要高姿态，要采取主动。”

他问吴巨轮：“胡乱闯同志，据胡良才同志说，你们叫他们是‘老保’，他们叫你们是什么？”

吴巨轮答：“他们叫我们‘老牛’。”

大家笑了。

周恩来：“他们叫你们是‘老牛’，这成什么样子？这样对立，

怎么能搞大联合？这怎么能怪军队，怎么能说军队是后台呢？当然他们有什么不对的地方，你们可以提嘛！”

周恩来：“你们说军队有缺点，我们记下来，告诉赛福鼎同志改一改。”

吴巨轮：“没有改！”

周恩来：“难道一点都没有改？整个部队都没有改？那不成了漆黑一团！乌云压顶了！”

当吴巨轮汇报到“每到关键时刻，总理都是十分关怀和爱护，都作了指示，回忆起来有二十多次”的时候，周恩来说：

“不是指示，而是我们讨论研究过的，给你们打个招呼，提醒一下，你们应该总结两年来的斗争经验。我们是老战友啰？再提醒你们一次，不要再往北航那里去了，因为北航是是非之地。”

吴巨轮：“我没有去，只参加过一次批斗武光的大会。”

周恩来问：“你们下边没有人去吗？有没有人住在北航？”

吴巨轮答：“那里我们有人住。”

陈伯达：“你们有人住在北航，不要住在北航，不要再住在北航啰！”

周恩来：“我再提醒你们，我再提醒你们四个字，北航是是非之场。你们自己理解去。”

吴巨轮汇报后，康生又请新疆“三促”的代表胡良才汇报。

在各派代表发言、争论后，周恩来说：

“刚才康老讲了，不要单方面起草搞方案，应当双方面坐在

一起商量，根据毛主席最新指示协商，先搞大联合，然后就剩下一个王恩茂同志的问题了。王恩茂的问题还是要解决的嘛！总不能说王恩茂的问题不解决就不能大联合嘛！”

最后，各位主要领导讲话，促进新疆两派联合起来。

## 第 1024 回：议九大，转发湖南省报告　说陕西，北大为接电武斗

21 日，广西学习班的军代表、师政委王国禄找到钱文军，向他了解北航开会的情况。钱文军简单说了一下，王国禄要他写出书面交代。

钱文军没想到还让他写文字材料，十分恼怒，当场拒绝。

军代表问："为什么？"

钱文军的回答出乎大家的预料："本人不识字，不会写。"

王国禄大发雷霆："《今日的'哥达纲领'》你都能写，这个材料你不会写？"

钱文军马上反讥道："王政委，你们不是报告说有'黑教师爷'吗？康老不是说：'中学生写不出来'吗？你跟康老唱反调？"

于是两人大吵一通，不欢而散。

看着王政委渐渐远去的背影，钱文军心血来潮忽然有了诗兴，于是吟了一首《卜算子.军代表》：

"肥脸泛油波，瘦眼刻奸笑。休道穷人闹减租，成天喊又叫。叫叫又何妨，时候还没到；待到深秋算账时，自有镣和铐！"

他把这首《卜算子》写下来，正要对一下平仄关系，和他住同一间房的独立师金营长进来了，他也是个胖子。看了之后说："妈的，你小子不是骂我吧？"

钱文军也笑道："骂你又怎的？不会多一个罪状吧！"

金营长认真看了看，然后叹口气说："小伙子，你怪聪明的。

不过，初生牛犊不怕虎是好的，可别被老虎吃了！”

钱文军听出来他话中有话，急忙向他打听。金营长说：“北航这个会，中央已经知道了。定性为‘黑会’。事情比你们想象的要严重得多。”然后解嘲说：“你在这学习班里好好的，吃得好睡得好，偏要跑出去开什么会。什么会开了都没用，你们年轻，还没闹明白，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革命，什么叫无产阶级专政？别胡闹，闹事的都不会有好果子吃，这就叫无产阶级专政。”

当天晚上，学习班几个领导人把钱文军叫到一间会客室，正式宣布中央文革的指示：“北航黑会”有黑手，必须认真查出来。然后苦口婆心让他说清楚。

第二天，王国禄在大会宣布：“王反修、李振岭还有钱文军，从今天开始隔离反省。不许外出，也不参加大班学习。”

他们三人留在宿舍里单独写“北航黑会”交代材料。

就在广东的武传斌召集全国各地在北京的造反派头头在北航召开座谈会的7月17日，毛泽东也在人民大会堂118厅召集周恩来等人开会，要求中央文革碰头会讨论国际形势、国内形势、九大和八届十二中全会四个问题。

第二天，7月18日，中央文革碰头会讨论了这四个问题。讨论中，关于十二中全会有两种意见：如为准备九大而开，它的主要任务是筹备九大；如为推迟九大而开，它的主要任务将是总结两年来文化大革命的丰富经验，提出全面夺取胜利的若干任务，并解决需要解决的组织问题。

7月21日，周恩来向毛泽东、林彪书面报告了上述意见。毛泽东当天圈阅。

在此期间，国防科委发生了“718 事件”。

6 月 27 日国防科委机关 9 人大字报贴出后，国防科委机关一片混乱。7 月 16 日，聂荣臻向毛泽东、林彪、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写了检讨报告，承认犯了 3 个方面的错误：

一、在突出个人方面，去年 4 月，就曾有人吹捧“我是毛主席的好学生，林副主席的亲密战友。”对此“只当作一般传闻，没有严肃对待并公开表态纠正。”

二、对待各群众组织，感情有亲一派、疏一派之分。

三、在十年来发展科技事业中，“我只强调了立足国内，充分发挥我们自己科学技术人员的作用，对科学技术人员团结、鼓励多，教育、批评少，对他们的思想改造抓得不够。”

毛泽东 7 月 18 日对聂荣臻的检讨报告作了批示：“可以发出，但要做精神准备，革命群众还可能有意见要提出来。”

但这个批示还没有下发，聂荣臻的检讨也没有同群众见面，7 月 18 日，国防科委就发生了“718 事件”。

这天晚上，国防科委机关召开批斗大会，原国防科委副主任安东的秘书在上台发言时批判国防科委副主任钟赤兵，支持聂荣臻。

7 月 20 日，李敏等 29 人发表《严正声明》，认为 7 月 18 日晚批斗会上安东秘书的发言是一起严重的政治事件，要求国防科

委常委对此表态，说明真相，公布钟赤兵1962年给林彪的报告，严肃处理“718事件”的相关人员。

针对陕西省革委会成立后，全省各地抢枪和武斗之风一直没有平息的情况，7月15日，陕西省革命委员会做出《关于坚决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7月3日布告”的决定》。《决定》开宗明义地称：“《七三布告》不仅适用于广西，也完全适用于陕西。各级革命委员会要召开大会、小会进行宣传动员，利用一切宣传机器，广泛宣传，大造舆论，造成强大的政治攻势，刮起十二级台风，带领群众，向无产阶级的敌人发起猛攻”。《决定》共六条，也简单明了，用词严厉，不容商量：

（一）任何群众组织团体和个人，都必须坚决、彻底、认真地执行《七．三布告》，不得违抗。

（二）立即停止武斗，解散一切专业武斗队，拆除工事、据点、关卡。

（三）抢去的现金、物资、必须迅速交会。

（四）中断的车船、交通、邮电，必须立即恢复。

（五）抢去的人民解放军的武器装备，必须立即交回。

（六）对于确有证据的杀人放火，抢劫、破坏国家财产，中断交通通讯，私设电台，冲击监狱、劳改农场、私放劳改犯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及幕后操纵者，必须坚决依法惩办。

然而，陕西造反派认为，《七三布告》是针对广西的，对陕

西无约束力，而陕西汉中、安康、关中等地武斗持续时间之长，规模之大，伤亡之重在全国也是屈指可数。陕西省的支左部队未得到尚方宝剑，也只能是调解，劝阻，不敢真动刀枪，故武斗分子有恃无恐，越斗越勇，越打越气势汹汹，老子天下第一，谁也不放在眼里。就在陕西革委会发出《决定》的第四天，7 月 19 日，西安市两派又在西安市西郊白家口发生大规模武斗,双方纠集数千人,动用了航空机关炮、土坦克等武器、打毁楼房 1 座,死亡 21 人。

7月，湖南衡阳也发生了铁路堵塞的问题。

6月7日，衡阳“反复辟指挥部”冲击了铁路军管会。随后的一个月里，到7月5日，铁路军管会两次被冲击，军管会副主任等16人被抓殴打，10次冲击看守所，15次冲击部队、仓库，抢军用物资。解放军被打115人，重伤5人，抢枪7支，文件200多份。7月6日，火车站抢走援越武器58箱，7月7日，又抢了10箱。

而衡阳的“联络网”则冲击市军管会、警备司令部，打伤解放军，而且还冲击火车站，抢劫军用物资，搜查上下火车旅客。

7 月中旬，湖南革委会副主任华国锋按照周恩来指示，去衡阳解决交通堵塞问题，结果在火车站也被搜查。随行者告诉他们，这是省革委副主任，没有用。

在此情况下，7 月 15 日，湖南省驻军支左领导小组向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并广州军区作了《宣传贯彻“七.三”布告情况续报》，提到：

“自接到周总理电话后，47军又立即召开常委会议，专题学习讨论，统一思想，……以最大的决心，最快的速度，积极学习，热情宣传，……

军刘政委亲自到连队检查指导开展宣传活动，各师团领导亲自到群众组织中去宣传，……几天之内，部队出动了宣传队1131个，6000余人；宣传车27辆，深入到工厂，车站，码头，大街小巷，郊区农村人民公社，列车上，轮船上，……

过去冲过部队抢过枪的群众听了宣传后，感到对不起毛主席，……涟邵矿务局和金竹山的两派群众……主动撤出了工事，停止了武斗；郴州‘联络网’……自动宣布撤销组织铲掉了山头；衡阳“联络网”……已把抢去的援越物资大部份送回，并恢复了铁路运输，其下属一些基层组织开始上交枪支，弹药和武斗凶器，有的则自己封存起来，……”

7月16日，湖南涟钢多次到长沙上访的徐清伯、王月清和湘中机械厂的郑贵临等人，从长沙组织200余名武装人员返回涟钢。回去后就发生武斗，打死6人，打伤68人，其中重伤6人，非法关押29人，损失国家财产19万余元，造成全厂停产一个半月。

7月1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1968.07.19；中发［68］111号文件，“关于转发湖南驻军支左领导小组《宣传贯彻‘七.三’布告情况》的通知”，要求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革筹小组），军管会，各大军区，省军区，各野战军：“望参照执行。”

文件上方用红字印着毛泽东的批示：

林，周及文革各同志：

请考虑可否把此件转发各地，并加上几句督促话。

毛泽东

七月十八日

7月21日，周恩来致信毛泽东、林彪："陕西问题有两种意见，我们原按主席指示为中央起草了一个布告，后来有同志怕降低陕西革委会作用，请陕西同志自己改写了一个决议。但据李瑞山三同志来信主张以中央布告形式发表为好，拟在明晚碰头会上讨论决定。"又告："煤矿会议将结束，决议草案正在修改中。接着拟开冶金和国防工业会议，以推动今年下半年生产。"

21日，周恩来还就派遣和增补一批军管人员到中央机关和国务院各部委事致信毛泽东、林彪及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这是一次最大军管代表的派遣和补充，拟予同意。现在政府各部委大体四十二个单位，已经实行大联合并有可能实现革命三结合的占三分之一。这批军管人员派去后还可能加快速度。总之，在八月份全国五十边疆省区革委会筹备工作搞得差不多时，就可将政府各部委分口提到中央文革碰头会上讨论。"

7月22日，中央文革碰头会讨论各地对《七三布告》的宣传和执行情况，认为对布告的宣传宜做深入细致的政治思想工作，分区分单位进行宣传解释，不开大会动员，免给唱反调的人以肇事的机会。会议还根据陕西情况，同意由中央发出针对陕西问题的

布告。

此时，经过 7 月武斗“洗礼”的北京大学校园已是另一番模样：千疮百孔，弹痕累累。尤其是宿舍楼，不少窗户或者没有了玻璃，或者干脆连几扇玻璃框也没有了，只剩下一个光秃秃的窗户框，远远望去，只能看见一个黑洞洞的大窟窿。甚至楼房的砖墙。也被这里掏几块砖，那里掏几个洞。学校的不少地区。都成了“军事禁区”，一般人不得进入，不然安全、生命就没有保障。即使人们的必经之路，随时都有受伤甚至性命危险。

7 月 4 日，“新北大公社”总部召开批斗“井冈山兵团”现行反革命集团首恶分子大会，将徐运朴、牛泰升、王明德等学生揪到大会批斗。同时，“新北大公社”总部发言人还发布命令，命令“井冈山兵团”交出“现行反革命分子牛辉林”，遭到“井冈山兵团”拒绝。

“井冈山”控制的 6 个楼经常被“公社”指使电工班强行断电，楼内失去照明，广播台也失声，更要命的是这时守楼的“井冈山”人只有靠电炉做饭，没有电意味着他们只能断炊，这让“井冈山”的坚守人员苦不堪言，他们决定自己解决问题，从地院借来变压器，准备将 37 楼旁边校园南墙外面不远的马路路灯杆上的 10 千伏高压线变成 220 伏通入 37 楼内。

22 日，“新北大公社”又决定对“井冈山兵团”占据的楼房实行停电、停水。这一情报被“井冈山兵团”通过监听得到，于是决定实施从 37 楼南墙的高压电线上带电作业往楼内接电的计

划。

“公社”得知这一消息后，也决定届时从两面攻击，让“井冈山”的自我解救计划流产。

当晚，由物理系四年级学生、“井冈山”总部成员谢纪康、地球物理系一年级学生梁清文和哲学系五年级同学孔易人等人的调度指挥，手持长矛的“井冈山”人从各楼通过地道摸黑向 37 楼集结，部分人员身上装着燃烧瓶。在 37 楼朝南的各个窗口，都装上了强力弹弓。

将近 24 时，从 37 楼通往校外的那个出口突然冲出两队人马，分别跑到马路东西两端站定。随后是一只只木床，摆成两排，把马路东西两头封住。他们在床的前方洒上黄豆和绿豆，在床上架上了弹弓，人则持长矛守候在木床旁，严阵以待对方的冲击。

担任接电任务的物理系关玉霖等三人，他们已把个人生命置之度外，给家人留下了遗书，冒着一万伏高压，在无任何保护设施的情况下，冒死爬杆带电作业，大有壮士一去不复返的悲壮。爬高压电杆时，他们用木板做了一个没底没面的箱子，人在里面，随着人向上升起，木板箱护着人同步升起，下面则有几十名手持长矛的人员保护。

“公社”一方看到了这个情景，也很快做出了反应，分别从西南校门和东南校门冲了出来，三人一组，两边两个短枪手，中间一个长枪手，从海淀马路的东西两面向接电的高压电杆处发起进攻。顿时，就听见一片喊杀声。“井冈山”的人赶紧从楼上扔

砖头，打弹弓，予以阻击。

“公社”武斗人员人多势众，却一直没有能够进攻到接电的地方。原来，当他们从马路上冲过去，快到木床排成的街垒时，只觉得脚下一个劲儿打滑。不少人摔倒了，大家站立都很困难，无法再向前去。原来，这就是“井冈山”撒的黄豆、红豆和绿豆起的作用，“公社”武斗人员到了这里，站立不稳，像喝醉酒一样，摇摇晃晃，没法投入战斗。

双方还扔了自制的燃烧瓶，火光飞射，场面很吓人。其实道理很简单，用一个瓶子里装白磷，另一个瓶子里装酒精或乙醚，扔出后，瓶子摔破，白磷自燃，点着了酒精乙醚。

从西直门到颐和园的 32 路公共汽车经过北大南大门和 37 楼，当时的 32 路是一辆 SKODA 大客车带一辆拖车。“新北大公社”武斗队用一手电蒙上红布，像李玉和一样晃动，司机一看不对，摘下拖车掉头就走了。“公社”武斗队推着拖车前进。来到木床墙时，被木床阻住，受力不均，突然就地转圈，藏在车后的武斗队一下暴露在对方的大弹弓射程内。被一阵弹雨打得东躲西藏。

“战斗”一直持续到深夜，造成马路堵塞，32 路公共汽车停驶。在海淀镇的平房上，站满了观战的居民，在他们看来，长矛的格斗声和两军厮杀呐喊，犹如古战场上回声幻影，燃烧瓶似彩球在夜空中往来飞舞。优美的彩色弧线在某种程度上掩盖了拼杀的凶险。

与此同时，“井冈山”在 28 楼奇袭了“公社”后方。几个人

先是用铁棍扔到对方裸露的电线上，企图造成短路，未果。后来改用铜丝漫洒下去，连搭在几根电线上，于是，火光一闪，全校电线都短路了！燕园里顿时一片漆黑，“公社”广播台哑然失声。

两个“井冈山”物理系学生趁机把路边一万一千伏高压线与楼内早已准备好的变压器及配电设备联接起来，顿时，灯亮了，成功了！“井冈山”这边 6 座楼一片辉煌，欢呼声响彻云霄，大喇叭响起毛泽东的“西江月.井冈山”：“黄洋界上炮声隆，报道敌军宵遁！”……并且激奋昂扬地播送了早已准备好的庆祝文稿。

这场武斗以“井冈山”接电成功而结束。“新北大公社”社长卢平亲临指挥，挨了一砖头，上医院了。

此后，连“公社”武斗人员也佩服“井冈山”有关人员的聪明才智。对于接电成功，大家更是惊讶叹服，因为当天晚上的接电是 10 千伏高压带电作业，那个年代，专业的电工也不敢如此冒险操作，据说，这在北京市解放后电业系统也算是史无前例。还有人说，具体操作的是技术物理系的两个学生，事后不久，就被北京市供电局作为高级专业技术人员要走了。

“井冈山”中一些胆大者，第二天早起，又去“战场”上把豆子扫回，分门别类，发绿豆芽，泡黄豆，熬红豆粥，享用了一番。

这以后，“新北大公社”多次组织武力强攻“井冈山”派驻守的地盘，均无功而还。最后，他们以捉拿“刺杀聂元梓凶手樊能廷”为理由，在高音喇叭中宣读“封锁 37 楼狗洞通令”，日夜

监视 37 楼出口，不许一人进出，抓捕所有出楼人员。

## 第 1025 回：清华打，蒯大富深夜借枪　怎么办？组织工农进大学

清华大学“414”此时已是处境维艰。自 6 月下旬以来，“414”已多次要求中央及北京市革委会派宣传队进驻清华，或对清华大学实行军事管制，以求打破“团派”在清华的霸主地位，结束武斗，从而结束自己在整个武斗中的被动地位。

进入 7 月，蒯大富再一次召开会议，决定继续封锁科学馆，声称“有出进者，可以开枪，死了人总部负责”。设在科学馆四周的高音喇叭不断展开心理攻势，各种口号和消息漫天飞舞。

7 月 1 日，清华大学“团派”开始用枪封锁“414”占据的科学馆。

7 月 4 日凌晨 2 时左右，清华大学土木建筑系房 0 1 班学生朱玉生在科学馆大楼外的西北角值班放哨，被设在闻亭的“团派”岗哨发现后开枪，朱玉生中弹身亡。

7 月 5 日早上，清华大学电机工程系电 01 班学生杨志军在科学馆楼内，由墙壁上的观察孔向外观看时，突被从观察孔射入的一颗子弹击中颈动脉，当场倒地，喷血不止，很快身亡。

7 月 6 日中午，冶金系的学生周家琮乘坐土坦克由动农馆返回科学馆时，埋伏在第一教学搂旁的电机系学生赵德胜向装甲车发射了一枚穿甲弹。土制的装甲车难以抵挡货真价实的穿甲弹，司机、清华大学动农系实验室实验员杨述立被击中，当场毙命。而周家琮侥幸逃过一命。

两年前，大串联时，周家琮和赵德胜在重庆江北下横街小学还曾同住一室，如今却成生死对头。

整个“414”都被淹没在痛失战友的悲愤之中。“414”总部一把手沈如槐与总部常委汲鹏和总部委员傅正泰召开了紧急会议，决定在北京城里抬着杨述立的尸体游行。

第二天，7 月 7 日，近千名清华“414”在委汲鹏和傅正泰的带领下，用担架悲壮地抬着杨述立的尸体，在天安门广场、北京市革委会、北京市公安局和东交民巷使馆区举行了一系列示威和抗议活动。

北京市革命委员会针对许多高等院校武斗严重情况，多次召开有关制止武斗、宣传并贯彻中共中央《七三布告》精神的有关会议，准备在中关村召开制止武斗的群众大会和派遣宣传队在高校所在地进行宣传活动。谢富治指示清华大学“团派”提交关于制止武斗的方案，并同“团派”头目打招呼说，可能要派工人游行队伍进入清华宣传。

7 月 6 日至 25 日，“团派”数次召开总部会议，讨论制止武斗问题。“团派”一些武斗指挥人员强调：《七三布告》不适用于清华；“团派”与“四派”的武斗有特殊性；“团派”必须用攻占“四派”所在的科学馆的既定事实来求得武斗后的主动和有利地位。“团派”总部向北京市革委会等有关方面提出停止武斗的三个条件：

一、由北京卫戍区正式逮捕“四派”核心人物；

二、由北京卫戍区派部队进校制止武斗，首先要拆除科学馆工事；

三、由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及北京市革委会直接解决清华问题。

“团派”对中共中央及北京市革委会关于制止武斗的指示并未予以足够的重视，更不用说做出切实的响应了。

清华“414”从 5 月底被围困到此时已有两个月了，可以说是弹尽粮绝，处境险恶。而且有传闻说，“井冈山兵团”将在科学馆四周挖沟壑、埋炸药，要一举炸掉整个科学馆大楼。

一股求生的欲望在“414”派红卫兵中漫延。

当然，不能投降。打出白旗，不仅是耻辱，也会贻笑后人，成为历史舞台上让人嘲笑的白脸人物。

他们的求生途径是挖地道。

近百名红卫兵轮流上阵，学老愚公挖山不止的精神，没几天便将科学馆与二教间的地道挖通了。可他们暂时还不敢太高兴，二教旁边就是一教，那里有“井冈山兵团”。若想逃命，必须从一教地下穿过，然后再找出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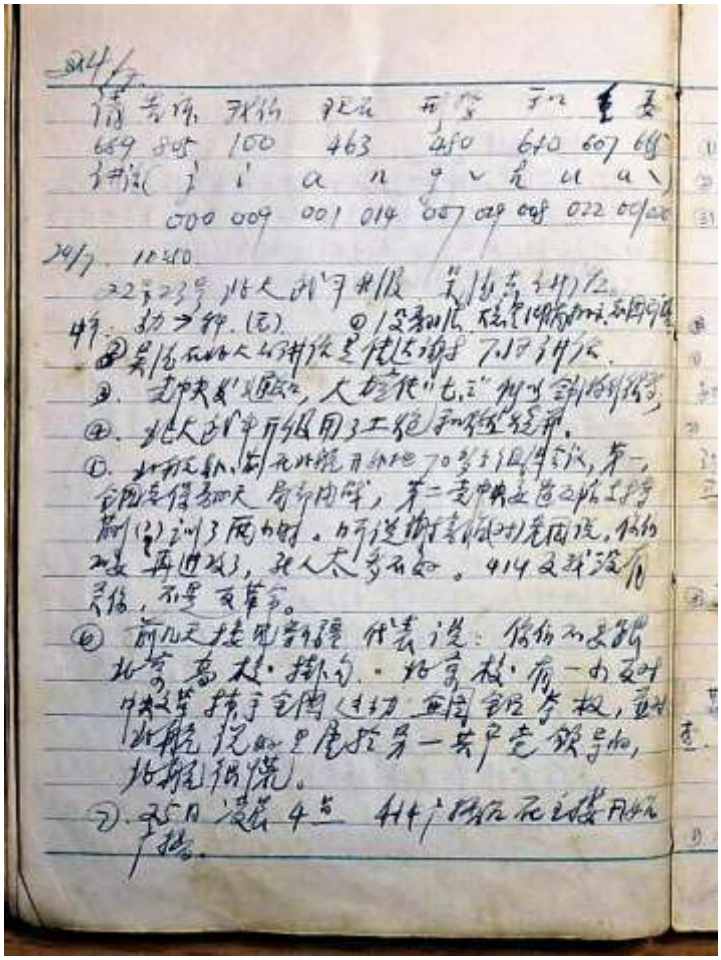
“414”派红卫兵继续掘进，穿过一教，往东，约 20 米，就是老机械工程馆。那里是“414”派的势力范围，只有将地道挖到此处，他们求生才有希望。

7 月 12 日的前后几天中，被围得水泄不通的科学馆上空再次响起“永不消失的电波”，那是被围的“414”派学生通过高音

喇叭播出的联络密码，而科学馆的地下，解救被围人员的地道正在日夜不停地秘密挖掘中。

眼看大功即将告成，却又飞来横祸。“井冈山兵团”得知对方在挖地道后，立即组织人马，挖地三尺，要同“414”派红卫兵打一场现代地道战。

令“老四”们扼腕的是，“团派”的学生居然用埋在壕沟里的水缸准确地测出地道的方位。结果，“井冈山兵团”的地道将“414”派的地道拦腰截断，他们在地道里塞满炸药，点燃导火索，轰地一声，将“414”逃生的希望炸了个粉碎。科学馆里，98 名红卫兵围着两名战友的棺材，一个个黯然神伤。



上面这一页纸是清华大学“414”在 7 月 24 日那天，科学馆

和主楼、动农馆联络之间进行联络的密电码翻译本上的一页，记录的是发送的的信号内容。内容是：

24/7

请告诉我们现在形势和重要

689 805 100 463 480 640 607

讲话（j i a n g665

000 009 001 014 007 h u a ╲ ）029 008 022 001 020

24/7 10：50

22 号、23 号北大武斗升级，吴德去讲话。

中午：动（农馆）➞科（学馆）（无（线电））

1、没翻清，大意是湖南批示，老团已记否。

2、吴德在北大的讲话是传达谢（富治）7.12 讲话。

3、党中央发了通知，大力宣传“七。三”（布告），所以全市游行很多。

4、北大武斗升级，用了土炮和燃烧并（瓶）。

5、北航韩（爱晶）、蒯（大富）在北航开外地 70 多个组织会议。第一，全国老保翻天，局部内战。第二，党中央要造反派支持。蒯（？）训了两小时。听说谢富治（对）老团说，你们不要再进攻了，死人太多不好。414 反我没有关系，不是反革命。

6、前几天接见新疆代表说：你们不要跟北京高校挂钩。北京（高）校有一小（撮）反对中央文革、插手全国运动、企图全面夺权。并对北航说的是属于另一（个）共产党领导的。北航很

慌。

7、25 日 凌 晨 4 点，414 广播台在主楼开始广播。

当时“414”在科学馆有时和主楼联系，有时和动农馆联系，办法是：晚间用手电筒、收发报机。白天在科学馆屋顶用旗语，后来在二教用喇叭喊“密码”。

7 月 18 日中午，清华大学自动控制系自 802 班学生钱萍华，上身穿着天蓝色短袖衬衫，下面穿了一条黑裙子，从苏州家乡返回学校，在清华大学主楼前被从 9003 教学大楼方向射来的子弹打中肺部而死。

7 月中旬的一天晚上，北航戴维堤正在学校主楼二楼的组织保卫部办公室里沙发上睡觉，忽听见有人敲门，开门一看，是蒯大富，头发胡子很长，披一件又破又脏的大衣，就像监狱里逃出的犯人。

“司令驾到，有失远迎。怎么如此狼狈？”戴维堤边开玩笑边把他让进了屋。

“咳！别提了，差点让‘老四’打死!”蒯大富进屋后出了一口长气。

“半夜鸡叫，定无好事，蒯司令有何公干？”戴维堤立即给他倒了一杯水，同时问道。

“老弟救救我。”蒯大富一本正经，双手作揖，吓了戴维堤一跳。

“要人有人，要钱有钱，要物有物，只要别武斗就行。有什

么困难，说吧！”戴维堤十分慷慨。

“人，钱都不需要，只要一样东西。”

“什么东西？”

“枪！”

戴维堤心里顿时一沉，随即说道：“要什么都可以，只有这枪不能给，我说了不算。”

“谁说了算？”

“上面当然是周总理、卫戍区，学校里当然是韩老六了。”

“韩老六”是韩爱晶外号，那是电影《暴风骤雨》里的一个人物。

“那我找老六去。不过说好，只要老六同意给，你就得给我。”蒯大富边说边往外走。

蒯大富一走，戴维斯立即要通了正在体院疗养的韩爱晶的电话，对他说：“蒯大富来要枪，怎么办？”

“不给！”韩爱晶回答很坚决。

“他赖着不走怎么办？”

“你看着办吧，这事我不管。”韩爱晶又把皮球踢了回来。

过了一会儿，蒯大富又笑嘻嘻的回来了：

“我找到老六了，他同意给。不要多了，几十支就行。”

“韩爱晶同意了也不行。老蒯，你听我说，这枪绝对不能动。这不是木头棍，枪一响要死人的，你要考虑后果。”戴维堤开始认真地劝他。

“‘414’有枪，把我的人都打死了。我的几支破家伙，不管用，吃了大亏。你给我枪，出了事是我的，与你无关，你放心好了。你们几千支枪，给几支怕什么，用完了还给你，神不知，鬼不晓。”蒯大富缠了起来，但戴维堤始终不松口。

蒯大富嬉皮笑脸，完全没有了蒯司令的风采，他开始在戴维堤的办公室里走来走去，胡乱翻动起来。戴维堤无奈，只能任由他乱翻。他忽然走到保险柜面前，拍了拍，说：“这里面肯定有枪，打开看看。”

“我的天哪！” 戴维堤心中暗自叫苦，因为里面确实有五支带子弹的“五四”手枪，幸亏是锁着的。

“里面全是小偷流氓材料，没有枪。再说钥匙在秘书手里，我打不开。”戴维堤笑着说，耍开了滑头。

蒯大富又拉开了办公桌的抽屉，里面恰好有几十发刚从学生手里收缴上来的各式子弹。

“啊！子弹也行，我拿走了。”蒯大富一把抓起了包子弹的报纸，塞进了破大衣口袋里。

戴维堤也没有再坚持，心想，反正是些杂牌子弹，没什么用，拿去就拿去吧，否则他缠着没完。

蒯大富终于很不满意地走了，临走还数落戴维堤真不够朋友。这大概就是韩爱晶见广东武传斌时提到的蒯大富借枪一事。

蒯大富哪里知道，他深夜到北航，被“414”的人盯上了，他们寻机绑架了蒯大富的司机——一个 50 多岁姓王的共产党

员，追问蒯大富去北航干什么，这位老司机耐不住皮肉之苦，最后说是去北航搞枪。

“414”又惊又喜，问拉了多少枪，司机说一支也没搞到。又一顿皮肉之苦后，“414”把一份写好的材料送到司机面前，逼迫司机在上面签了字画了押。材料大致内容是：某月某日晚上，我拉蒯大富去北航，从保卫部长那里要了两车枪支弹药，拉回了清华……这件事立即在清华园里炸开了锅。

第二天，这份材料就到了康生手里。据说康生大怒：“蒯大富和北航这个保卫部长该当枪毙！”

韩爱晶得到消息，吓坏了，反复追问戴维堤那天究竟给蒯大富枪了没有？戴维堤如实以告，并大骂康生这个老乡。

此时，被围困的清华大学“414”派，每天都派人乘小车到中央、市委门前和周围街道用高音喇叭呼救。

毛泽东从内参上看到了清华的动态，并且，他的女儿兼联络员李讷也向他反映了这一情况。

7 月 24 日上午 10 时左右，毛泽东的护士长吴旭君打电话到新华印刷厂，叫正在这里支左的中央警卫团 8341 部队的机要员谢静宜回去一下，说“主席有事找你。”

谢静宜放下电话立即赶回中南海，到游泳池去见毛泽东。

毛泽东先问了一下新华厂的情况，然后说：“现在工厂的形势比较好，大多数工厂都联合了，形势在好起来，唯有学校的形势不好。聂元梓、蒯大富这些人在搞武斗，谁的话都不听，市委

的话不听，中央的话不听，我的话也不听。他们穿着盔甲，拿着长矛搞武斗，不知道羞耻。”这时毛泽东非常生气，继续说：“他们脱离了工人，脱离了农民，也脱离了他本派的大多数。他们头脑膨胀、全身浮肿……”

他把烟蒂往烟缸上一揿，站起来，气愤地来回踱步，加重语气说：“有本事拉出去打，打它个十年、八年，我看地球照样转。”

毛泽东略微停顿一下，面部仍带着的气愤的表情说下去：“他们不是谁也不怕吗？我看他们也有一怕，那就是怕群众，怕工人怕农民。”

这时，毛泽东自言自语伸出左手数着手指低声说：“北京有100多万工人，在不影响生产的情况下”，“我的意见是临时组织两三万工人和部分农民参加的队伍，去同他们讲理。去宣传‘要文斗，不要武斗’，宣传中央制定的《七三布告》。至于先去北大还是清华，请北京市商量定。哪一个学校问题最严重，就先去哪个学校，捅它这个马蜂窝。”

他精神振奋，语言激昂。随后又补充一句说：“有可能会发生流血的，要警惕。”

谢静宜被毛泽东的指示惊呆了，脱口问道：“这是真的吗？”

毛泽东笑了，说：“是真的。”

接着交代说：“你别吃饭了，快回去告诉你们厂的领导，联系好工人和部分农民，让北京市和8341部队，共同组织好这件事。”

然后又补充说："注意啊，工人要派大联合、三结合好的工厂，派性少的工厂，与大学没什么联系的工厂去，否则，你们还没动，他们就知道了，这就不好办了。"

谢静宜立即乘公共汽车赶回工厂，将毛泽东的指示向驻厂支左的中央警卫团副团长张荣温及 8341 部队宣传科副科长、时任新华印刷厂革委会主任的迟群作了传达，然后他们一起回到中南海向 8341 部队政委杨德中作了报告。随后，杨德中又立即带着他们 3 人赶到汪东兴那里，向汪东兴作了详细汇报。

根据汪东兴的意见，由杨德中政委带着张荣温、迟群和谢静宜到北京市汇报。北京市领导谢富治、吴德、吴忠、杨俊生、刘绍文等人听了他们的汇报后，很重视、很赞成、很支持。他们说：清华大学武斗最严重，科学馆被烧，压在科学馆下面的人既没有吃的，也断水、断电，快困死在里边了，先进清华好。他们表示，由北京市委帮助组织联络工厂。并当即找来清华大学地图多张，研究部署工人宣传队去清华的路线。他们决定先由北京市委组织工人在大专院校周围游行，高喊"要文斗，不要武斗"的口号，不进校，游一阵子就回去。

## 第 1026 回：汉中乱，中央七二四布告　七二五，凌晨见广西代表

7 月 23 日，陕西汉中“统派”从汉中中学向对方发射 8 发炮弹，炸死 8318 部队 9 连指导员和一名战士。7 月 24 日，中央以中发［68］113 号文件发出布告，令陕西两派立即无条件收缴武器，解散人员，恢复交通，恢复秩序，令支左部队立即采取有效措施，贯彻执行。布告措词强烈，态度坚硬，没有商讨的余地，史称《七二四布告》。

此时，陕西省革命委员会正在召开第二次全体委员(扩大)会议。会议是 7 月 19 日开始的，《七二四布告》下发后，会议立即组织学习讨论，驻陕部队和支左官兵也立即行动。

但是，7 月 26 日，反应迟钝的汉中“联派”又发动一场“反击战”，炸毁北大街粮站大楼一角及莲花池浴池等设施，双方死 17 人，烧毁房屋 285 间。

这天，还有 300 余名武斗人员冲进汉中县公安局，放火点燃档案室，烧毁档案 13000 余卷。

7 月 31 日，汉中“统派”准备再次对“联派”偷袭，临行前一个人逗狗玩时，不慎引起爆炸，不但待命出发的 20 多人均被炸死，还殃及到汉中米厂大楼大部分被毁。这一声爆炸损失惨重，不过，也为汉中武斗划上了句号。

《七三》《七二四》两个布告，就像降魔杖一样，很快就让汉中两派驯驯服服的停止武斗，收缴武器，拆除路障，铲毁碉堡

岗卡，填平战壕，武斗人员自行解散，居民回城，商、贸、服业开门。学生返校，工人回厂，机关也开始运转。

回首再看，从 1967 年 8 月 19 日汉中“炸大楼”事件开始，到 1968 年 7 月 30 日汉中米厂被炸掉为止，汉中地区武斗中死人逾千，烧毁房屋无数，10 余条街道成为瓦砾，汉中城内 48 天空无一人，为有史以来之罕见。

《七二四布告》发布的当天，7月24日，周恩来还致信毛泽东、林彪，提出：“停止武斗、纵火，恢复铁路交通，将是目前政治动员中在广西首先要实现的任务。”

当天子夜，已是 7 月 25 日凌晨 1 时 5 分至 6 时 15 分，周恩来、陈伯达、康生、姚文元、谢富治、黄永胜、吴法宪、温玉成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接见广西来京学习的两派群众组织部分代表和军队部分干部。在长达 5 小时又 10 分钟的接见中，中央首长的通篇讲话，充满了对广西“422”派的猛烈抨击和严厉谴责，其语气之尖锐，措辞之激烈，是文革时中央领导人对群众组织中少有的，完全形成了“群起而攻之”，只准认罪不准抗辩的局面。

康生主持会议，他说：“现在开会了。今天开广西的会议。广西的问题，情况你们知道的比我们还清楚，中央《七三布告》不但发到广西，而且发到了全国。同志们来时看到街上长长的游行队伍没有？都是拥护毛主席亲自批示的《七三布告》的。你们广西问题闹了很久，全国出名了，全世界也出了名。现在请同志们到中央来，到北京来，到毛主席身边来，学习毛泽东思想，学

习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大多数同志来了，但还有少数同志不愿到中央来，不愿到毛主席身边来，不愿到中央办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来，还有的来了不到学习班学习，跑到阴沟里去活动。我要问同志们：你们如何执行《七三布告》？！刚才同志们不是喊永远忠于毛主席吗？但是同志们不来，或者来到北京不到学习班住，是不是忠于毛主席？是不是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同志们有什么意见可以尽量讲，中央是讲民主的。但是，要告诉大家，你们来不是打官司的，不能讲条件，更不能向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讲条件。你们是来学习毛泽东思想，学习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向无产阶级司令部讲条件是不行的！中央召集的会，你们讲条件，是中央服从你们，还是你们服从中央？！广西问题，铁路不通车，拖了两个月之久，我现在要问问你们：你们反美不反美？”

众答：“反！”

“你们支持不支持越南人民反美斗争？”

众答：“支持！”

“现在援越抗美物资被抢去了，火车不通了，谁高兴？美帝高兴！苏修高兴！叛徒、特务高兴！你们口里喊革命，实际上是反对革命！希望你们有的人不要玩两面派了！有的人已走到边缘，再走下去就变修了！”

“听说广西党校有个教员叫朱仁的，朱仁在座吗？”

朱仁站了起来。

康生说："我希望你忠实地讲，你来北京到底干什么？是革命的，还是不革命的？"

黄永胜："你在毛主席像前要讲老实话。"

康生："你这样的党校教员，毫无党员气味，你这样的党员，是代表什么党？你是代表国民党，是谢王岗的党！"

谢王岗，原名谢祖祐，又名谢晖鲁、黄岗。广西合浦福旺乡石碑口人。1919 年生，1938 年 2 月参加革命，原粤桂边纵队第三支队司令员，时任广西区党委宣传部副部长。支持广西"422"。

周恩来问："你是'422'的吗？"

朱仁答："是。"

周恩来："你代表哪个'422'？"

朱仁答："现在的'422'。"

周恩来："是代表现在在南宁放火的'422'吗？熊一军是不是你们一起的？"

康生："你要老实交待在北京造了些什么谣言？参加了些什么黑会？搞了些什么黑活动？哪个黑司令部指示你的？"

陈伯达："把你的黑司令部端出来！"

康生："你如果还有点革命气味的话，就要在中央面前和毛主席面前讲出来。你是什么地方的人？"

朱仁答："广西柳城县。"

康生："家里是什么成份？"

答："中农。"

康生："地主也是农民，富农也是农民。你在党校做什么？"

答："政治经济学教研室。"

"在哪里学的？"

答："东北师大。"

"什么时候毕业的？"

答："60年。"

"毕业后呢？"

答："到广西党校。"

"那你到广西很久了，谢王岗是你的上司吗？"

答："没见过。"

"在北京见过吗？"

答："没有。"

"你说没有见过是撒谎！"

姚文元："你还没有回答康生同志的问题！"

康生："你什么时候来的？"

答："4月21日来的。"

周恩来："你是'控诉团'的？"

答："我们是汇报团。"

周恩来："你们出来时叫汇报团，现在叫'控诉团'了，你跟熊一军在一起吗？"

答："没有见过。"

周恩来："怪事！你们4月份来的，熊一军也来了嘛！"

黄永胜："要交待来北京的活动情况！"

康生："你要交待你搞了些什么黑活动！"

陈伯达："你在北京住在什么地方，向谁汇报，跟谁联络？"

康生："你是党员吗？是什么党员？是党员还撒谎！"

接着，周恩来、陈伯达、康生问轮着问他："你们在北京开了几次会？""在哪里开的？""谁主持的？""到了多少人？清华谁去了？"

"422"代表做梦也没有想到，这次接见会成为审查他们的调查会。朱仁转弯抹角、吞吞吐吐的承认了，在清华主持了7月17日那次各地造反派座谈会，说有十几个省，30多人参加。

姚文元继续问："你们准备建立一个什么样的统一组织？"

朱仁答："辽宁'831'在会上提出要成立一个全国性统一的组织。"

"叫什么组织？"

答："全国造反派总部。"

陈伯达："一个是造资产阶级的反，一个是造无产阶级的反。你们造谁的反？你们是假借名义要造无产阶级的反！"

康生："你造了些什么谣？"

吴法宪："你有什么资格召集全国十几个省开会？谁给你的权利？谁给你的任务？"

周恩来："你方才不是在门口闹着要来吗？不是要控诉吗？现在请你们来了，你们控诉吧！在北京什么时候开的会？"

答："这个月的前儿天。"

康生："前儿天，是哪几天？你老实点好不好？"

康生问："曹东峰参加了没有？"

西大"革联"的曹东峰起立作了回答。

周恩来问："桂林'造反大军'参加北京的会了没有？"

桂林"造反大军"刘振林答："我们有个同志参加了半天。"

康生："你们住在那里，近水楼台嘛！到现在还不愿意回来，在那里气味相投嘛！"

原来，桂林"造反大军"的代表没有住在中央指定的解放军政治学院，都跑到北航去了。

周恩来："请你们到毛主席身边来学习，比跟国民党谈判都困难，请都请不回来。"

刘振林说："有两个代表不是我们'造反大军'的……"

康生："代表是中央定的。就这个理由就不愿来，和中央讲条件，你们还愿不愿到学习班来？什么时候回来？"

刘振林答："明天全部搬去。"

康生："你们如果再不去，北京所有的工人、农民就要把你们赶出去！"

周恩来生气地站起来对刘振林说："我问你们，你们包围第三监狱、劳改工厂，对不对？"

黄永胜："还成立了'接管监狱领导小组'。"

周恩来："你们组织成立'接管监狱领导小组'，是不是要

造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反？那里是劳改犯，你们知道不知道？你们把军队的枪都抢了。你们‘老多’要改个样子，不是去年那样了，今年变了，性质要变了，你们已经走到边缘了，快掉下去了。你们不听中央的召唤，不听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召唤，你们这么大架子，拒绝中央的接待，住在北航不回来，是个严重的错误。你们在北航的都站起来！承不承认住在北航是错误的？”

众答：“承认。”

周恩来：“现在有三件事：第一，你们要承认错误，要向中央文革写出检讨；第二，今天就搬回去！第三，马上给家里打电话，一定要从第三监狱撤出去，由军队接管。那里有10年以上徒刑的劳改犯，有几千犯人，你们占领监狱是造谁的反？去年，前年你们造反动路线的反，做了些好的事，现在还造谁的反？！我在去年说过：你们还有造反精神，我支持了你们，现在你们变成了这个样子，你们里边一定混进了坏人！你们要在学习班里好好学习毛主席的一系列极为重要的最新指示。学习林副主席的重要指示、江青同志的重要讲话和《人民日报》刊登的《从上海机床厂看培养工程技术人员的道路》这篇文章。今天是25日，一定要让部队接管监狱！”

桂林“造反大军”刘天偿说：“桂林市被农民包围，我们来北京时在机场挨打……”

周恩来说：“打人是错误的，‘联指’已经写了检讨，态度

是诚恳的。”

黄永胜：“这个态度是好的。”

周恩来：“农民进城问题，军队劝他们回去，‘联指’也劝他们回去。”

姚文元：“你们在北京开会的详细情况，要给中央写出书面汇报。”

周恩来：“你们汇报团、‘控诉团’到底是两个组织，还是一个组织？到底是什么团？是不是到中央面前就叫汇报团，在北航就叫‘控诉团’？”

朱仁说他们住在和平里不了解情况，消息很闭塞……

黄永胜：“你们就是要搞小道消息，造谣！”

温玉成：“你们的所谓汇报团，在北京做了很多坏事。冲京西宾馆，再三劝说不听，打烂玻璃，打伤战士，派战士把你们送到和平里，你们把战士也打伤了，现在这个战士还在医院。你们说在和平里开了一次会，实际开了几次会造了很多谣。桂林‘造反大军’的去了，你们开欢迎大会。到处串联，散布谣言。要你们组织起来学习，你们不愿学；宣传毛主席的指示，你们不听。你们做了很多坏事，我们都有账。希望你们在中央面前老老实实讲出来。”

吴法宪：“你们汇报团不向中央汇报，到清华、北航‘汇报’，汇报什么？你们在北京四个月到底干了些什么？”

“422”的苏振国说梧州放火烧房子一事，周恩来问他：“你

是什么时候出来的？“

苏振国答：“3月。”

周恩来：“你3月份出来的怎么知道得那么清楚？还有到广州做坏事的，你知道不？”

苏振国答：“不知道。”

周恩来：“凡是坏事你都不知道，你都不代表！你们把坏人揪出来没有？梧州放火时，你在哪里？”

苏振国答：“在南宁。”

周恩来：“在南宁你怎么知道梧州的情况？你们在京西宾馆呆了10天，到处贴大字报，打了玻璃，打伤了人，还打电话回去，造了很多谣。”

黄永胜：“你们讲：‘别人来宾馆顶多两个小时就走了，我们呆了48个小时。’还说‘坚持就是胜利！’”

周恩来：“事实说出来了，你们不得不承认；不说出来，你们就把错误推给对方。梧州问题今天不再谈了。梧州的火，‘422’要负主要责任，而且这种办法不仅在梧州，在柳州、南宁也都有发生。你们把杀人的、放火的、抢援越物资的、中断交通的，都说是受压的，还说别人是右倾翻案。这是反革命罪行，对这些人就是要实行专政嘛！”

康生问苏振国：“我问你，杀人、放火、抢援越物资的是不是反革命，镇压这些人叫不叫迫害？对杀人的、放火的、抢援越物资的，你到底怎么样对待？怎么样处理？”

苏振国答：“回去调查……”

康生：“不能等回去，就要在这里处理。”

苏振国：“我们没抢援越物资。”

周恩来、康生同时说：“你们都是‘造反大军’。”接着，康生又说：“梧州搞成那个样子，你们怎么能看得下去？怎么能对得起群众？要让全国人民知道会怎么愤恨？！”

周恩来：“《七三布告》是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要立即停止武斗，交还人民解放军的武器、装备和抢夺的援越抗美物资。”

西大“革联”曹东峰说：“‘422’常委龙智铭等人是被开除的，不能代表‘422’……”

周恩来质问道：“你能代表‘422’吗？你是什么‘422’？我们请的‘422’的30个代表为什么都不来？”

吴法宪：“南宁放火就是你们放的。”

周恩来：“房子烧了那么多，就是你们‘422’烧的。”

吴法宪问曹东峰：“7月21日，在民生路一带烧了1000多间房子，是不是你指挥的？”

黄永胜：“百货大楼是你们占的，火不是你们放的是谁放的？”

吴法宪：“你们好好想一想，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批发布告，这是全国没有的，广西2400万人民，要求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但是你们不执行，铁路中断两个月不能通车，这是全国没有的，

严重影响援越抗美，影响物资运输、部队供应，影响外贸，影响人民的生活。还有到处杀人，放火烧房子的，这也是全国没有的。中央、中央文革的命令一传达，各地都闻风而动；但你们广西，接你们来学习，有些人不来。中央、中央文革派最大最好的飞机去接你们，可是有一架飞机却摆在桂林停了10天。我们空军闻风而动派飞机，晚上也飞，气候不好也飞，可是等了你们这么久，你们不来，这对得起毛主席吗？是忠于毛主席？同志们好好想一想，头脑要清醒一点，到时候了，再不能拖延了！你们究竟要把广西引到什么地方去？”

康生：“我们今天批评‘422’，‘联指’也要作自我批评，不能压他们。如果你们再压他们，下步犯错误就是你们了，这是有经验的。”

陈伯达联系北航的座谈会说：“北航能解决你们的问题吗？清华能解决你们的问题吗？韩爱晶、蒯大富不要狂妄自大。什么叫马列主义，什么叫毛泽东思想，他们懂得多少？蒯大富最好去劳动，韩爱晶最好去劳动。

你们来搞什么串联？曹东峰、朱仁搞什么控诉团，住在和平里，你们离开广西好几个月了，既不了解情况，也完全脱离了广西的群众。你们不听毛主席司令部的声音，专门去听小道消息。”

黄永胜：“我不作为中央的工作人员，作为广州军区的成员说几句，我要提出批评，你们拖住了广西革命委员会的成立，广州地区只有一个广西不能成立革委会。你们这叫紧跟毛主席的伟

大战略部署？这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实际上，广大群众是要求尽快成立革命委员会的，就是走资派、叛徒、特务、反革命在挑动破坏。这只有美帝、苏修、反动派高兴，广大人民是不高兴的。你们撕布告，‘422’、‘造反大军’700人跑来北京几个月，还跑去广州，什么地方都去了，你们把手伸得那么长，你们这是黑手，要斩断你们的黑手！难道人家不能革命。你们到北京来造谣，是造谣公司的合股成员，至少少数人是合股成员。你们贴标语说：《七三布告》宣判了韦国清的政治死刑，这不是反革命？！

你们在南宁打，越南领事馆搬家，搬到对河去，你们还要打，还有没有国际主义精神？

在桂林，你们打越南的学校，使人家退走，还有点国际主义吗？还把桥炸了，把粮食也抢走了，你们对得起越南人民吗？

抢援越物资，放火，也是你们干的，这是搞文化大革命吗？

你们冲监狱，不想想里面关的是些什么人？你们究竟把自己摆在什么地位上，和谁坐在一条板凳上了！”

康生：“文化大革命搞了两年多了，你们还摇摇晃晃地跑来北京，贴出那样的大字报，不害臊！搞不起来联合还有什么脸皮这个那个的！”

这时，曹东峰强调“422”的群众是在他们这一边，不在赴京代表龙智铭等人那一边时，黄永胜说：“你这个话就不对，你们杀人、放火、抢东西就叫有群众？他们就没有群众？！你怎么知道他没有群众？！”

周恩来对曹东峰说："你离开南宁四、五个月，你能代表那个'422'？"

康生："曹东峰，我提醒你，今晚不是讨论哪个代表哪个的问题，是讨论革命和反革命的问题，是讨论执行不执行毛主席亲自批准的《七三布告》的问题。在广西柳州、桂林、南宁等地杀人放火、抢劫援越物资、枪杀中国人民解放军是革命还是反革命？对反革命你采取什么态度？！"

周恩来："你支持广西革筹小组不？你支持中国人民解放军不？你支持广西军区不？你支持《七三布告》不？"

温玉成："你们在北京贴大标语，写《七三布告》宣判了韦国清的死刑，对不对？你给我回答。"

周恩来："这个口号是对还是不对？是革命还是反革命？怎么能说是宣判了韦国清同志的死刑？！"

周恩来对曹东峰说："你能代表新'422'，那么，我们叫新'422'来人，你可以叫来吧？他们到现在还不愿上飞机。南宁的火不能再放了，铁路不能再中断了。你能不能劝30个代表都来？和石怀宇联系上，电话不通你可以写信，我们有办法交给他。你贴了那样的反动标语，你能叫他们来，就算是你改正了一点错误。"

"你给石怀宇写封信，叫他把'422'30个人劝好，两天之内叫他们到北京来解决问题，不能听任《七三布告》在广西不能实现了。我给你们个改正错误的机会。"

温玉成对朱仁、曹东峰说："你们这些头头阻碍解放军战士到和平里宣传毛主席的指示。从明天起你们就要停止这种活动，不能阻止！"

周恩来："你们听到没有？朱仁要负主要责任。你不是学生，你是个教员，是出谋划策的人，又参加了清华、北航的黑串联会。现在桂林、柳州的都来了，就是南宁'422'的30个人不来，还继续放火、封锁邕江大桥。要停止武斗，恢复交通，这是马上要办的。给你们30个代表不少了，不执行《七三布告》就不能代表。"

康生对朱仁说："你先不要说话，你回去把在北京的活动原原本本、老老实实地写出来，怎么造的谣，你在会上怎么讲的，蒯大富是怎样讲的，什么人怎样讲的，会上、会下又怎样讲的，给我写出来。你不要认为我们不知道，不是缺你的材料，是看你能不能挽救，考验考验你是革命的，是不革命的，还是反革命的！"

周恩来："你们回去要好好传达这次会议精神，按温玉成同志宣布的，他是卫戍区司令员，不能对抗。要遵守北京革命秩序，不能对抗解放军的宣传。如果对抗，就是对抗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一定要把你们这600多人的活动、串联黑会都写出来。"

朱仁表态说："谢谢中央首长的关怀。"

康生："你在哪学的那么多外交辞令！"

## 第 1027 回：继续谈，要解决柳、桂问题　再追问，《今日的哥达纲领》

周恩来："现在讲柳州问题。柳州铁路不通，是关键问题。你们还打算停多久？"

柳铁"工机联"王反修："马上通车。"

"你叫王反修？"说着周恩来站了起来，扶着桌子问他："你真反修还是假反修？你这个反修，要真正反修。你是学生出身，你不是王反修，是忘记了反修，是忘反修！你要承认，我们给你们那么多电话、电报，《七三布告》下达又有20多天了，铁路还不通，柳州这个关键过不去！你们是不是把抢去的援越弹药分了？"

王反修："'工机联'抢4000多箱，其他是'造反大军'抢的。"

周恩来："你们全在柳江南岸，占的据点很多。"

王反修："我们请罪。"

温玉成："中央的《六一三通知》下去以后，你们到处说是假的。"

王反修："我们坚决贯彻中央通知。"

黄永胜："你们口头上讲坚决贯彻，但你们的行动呢？完全是骗人的。你们说假话，言行很不一致嘛！"

周恩来："你们同'钢联指'能不能够合作？'钢联指'来了吗？"

“钢联指”张坚答：“可以解决。但我们安全没有保证。”

周恩来对王反修说：“你们的黑老板还在不在后面指挥？你不是张炎的‘秘书’吗？你要说实话。你们能不能保证双方不阻挡通车？”

王反修说：“从来没有阻挡过。”

周恩来：“怎能说从来没有阻挡呢！”

张坚：“他们放脱轨器。”

周恩来：“对！只差50秒钟，若不是解放军抢救，火车就要出事啦！”

王反修辩解说：“只是一个学生放的，他不懂事。”

周恩来：“什么不懂事！这是反革命事件！”

周恩来对柳州“造反大军”白鉴平说：“我向你，你们参加抢援越掸药，不能交出来吗？你们抢了一万一千八百箱，这不是小事!还有廖伟然,你们能在很短的时间交回吧？今天是25号了，你们要在一、两天通通交回来，你们明明知道是援越物资的列车嘛！一万一千多箱弹药，你们把火车拉到冷冻厂去，怎么分的，难道不知道？！”

“你们怎么还骗我们，想混过去．在中央面前，怎么能讲假话，能骗过去吗？你们面临两件事：第一、把抢去的援越弹药统统交回；第二、要和‘钢联指’合起来恢复通车。保证通车，不是一方，但‘造反大军’负主要一方的责任。‘钢联指’你们在路外还有断轨的事情吗？”

答：“没有。”

周恩来：“我们在铁路会议上宣布张炎是坏人，他是幕后指挥，不能回去了，你们知道嘛。”他指着王反修说：“你现在还在为他辩护！”

“现在铁路要恢复通车，首先要停止武斗，哪派也不要侵占地方。对‘工机联’、‘造反大军’的考验就是要把抢去的援越物资，全部交回，把抢去的枪全部交回。‘联指’也要把抢去的枪交回。不然，恢复铁路交通就无法保证。双方在这里开会，马上解决这个问题，一切听从解放军指挥，由解放军全线护路。”

周恩来问“联指”代表：“‘联指’张林、张麦生你们能负责吗？”

答：“能！”

周恩来：“你们也不要跑到南岸去。”

答：“没有。”

周恩来：“柳州铁路大桥，由解放军接管，两派撤出。今天是25日，你们两派26日要达成协议。你们带个头。你们达成过5次协议了，都不能兑现。能说你们后面没有坏人、没有黑后台、没有反动家伙吗？你们还为张炎辩护，这不老实嘛！你们组织里就没有‘反共救国团’？广西为什么发生这么多反革命罪行，就是后面有黑手。‘反共救国团’总团在广州，你们广西有分团，他们有空子就钻进来。双方都要查。

南宁、桂林铁路来的人与柳州合在一起，由铁道部军管会、

总参军交部的同志，同你们一起协商讨论，立即达成恢复铁路交通的协议。解放军来的人，也参加签宇。”

周恩来：“现在谈桂林问题。”

温玉成：“桂林主要是刘振林、刘天偿。”

刘振林报告说：“我们进占监狱的人，保证在今天下午3点钟以前撤出。”

温玉成：“你们进占的监狱周围山上的制高点也要撤。”

周恩来：“桂林‘联指’曹铁军、李年生，你们也要保证，打电话回去。‘造反大军’保证从监狱撤出，‘联指’保证在‘造反大军’撤出时不要打他们，双方保证。”

刘振林提出“联指”不在协议上签字。周恩来说：“你们一派起草的他们当然不干。141师韩更同志、分区景伯承同志，你们两人与他们双方一起，搞一个协议。”

他对桂林军分区司令员景伯承说：“你们支一派压一派，检查没有？”

景伯承说：“已经检讨了。”

康生对景伯承说：“我听说你检讨得不大好哩！上次开会是点了名的。你是有亲一派疏一派的。我看你是‘联指’的后台。”

黄永胜：“是后台，两边都有，141师也是后台。”

周恩来：“景伯承是有亲一派疏一派的。”然后对47军141师师长韩更和桂林军分区司令景伯承说：“你们双方都有不对的地方，你们两位，一个是141师的，一个是军分区的，要把桂林

的问题好好解决。不只是解决桂林市的问题，还要解决好铁路沿线、全专区的问题，铁路的从冷水滩到永福。大概桂林市的问题，‘老多’要多负一些责任；城外的问题，‘联指’多负一些责任。”

“联指”提出“造反大军”有一万多条枪，周恩来问141师师长韩更：“‘老多’手里有多少支枪？”

韩更答：“不知道。”

黄永胜：“你们141师送给‘老多’枪，还说不知道？”

周恩来：“今天是25日，要按主席的指示办事，包括韩更，景伯承两位，都要保证。进城的农民要回去。”

“联指”提出“造反大军”收留了很多外省人员，周恩来问：“刘天偿你们‘造反大军’也有农民进城吗？有没有外省人员流入桂林市？”

刘天偿答：“一个也没有。”

韩更说：“有。”

周恩来：“你说没有，141师都承认了嘛。农民由部队劝他们回乡生产。外省人员由你们‘造反大军’负责劝他们同去。你同意不同意？”

刘天偿答：“同意。”

周恩来：“你们回去达成全面协议，要有效的保证铁路畅通，不要农民进城。”

康生：“你们不要只看到南宁、桂林、柳州。你们要看到全国。《七三布告》到了上海，工人看了大吃一惊！说我们根本不

知道广西有这样一些事情。你们脑子里就没有一点敌情观念！刚才问你们反美不反美，支持不支持越南人民的抗美救国斗争？你们口里讲反对美帝，实际上不反。你们口里讲支援越南人民，实际上阻碍援越。你们口里讲拥护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实际上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你们口里讲揭露“反共救国团”，实际上帮助他们。口里讲反修，还有的人名字叫王反修，实际做的是修正主义高兴的，不管主观如何，客观上帮了修正主义的忙。你们口头上拥护毛主席亲自批准的《七三布告》，实际上是反对。不仅在你们那里有人反对，你们在北京居然贴大字报、标语，向我们示威，向北京780万人民示威！你们没有敌情观念，有不顾大局！两派或多或少都有这个问题。某些军队同志支一派、压一派，也有这个问题。

你们不要只想到你打死我一个人，我打死你一个人，要想想大局，想想敌人，恰巧你们那里有‘反共救国团’，总团在广州，分团在广西。你们不是与广东‘旗派’有接触吗？‘旗派’的头头有的当了‘反共救国团’的头头，恐怕在你们那里也有这个问题，为什么不想想这个呢？”

“广西有些头头不是那么纯洁。学生开始起带头作用是好的，但要一分为二的看问题。主席对上海机床厂调查报告的批语，请你们好好学一学。特别是主席讲，自己以为很了不起的大学生要放下架子，迅速赶上亿万革命人民前进的雄健步伐，不要以为自己很了不起。有些知识分子开始有觉悟，以后变了，我看朱仁

就是这样。广西大学的曹东峰，是不是革命的，我有怀疑。不论是师范学院也好，广西大学也好，都要注意这个问题。我看广西两派都有黑手，都可能混进‘反共救国团’，都可能混进王公度、贺希明那样的托派，都有叛徒、特务、走资派混进去，两派都有学校的黑教师。广西大学、广西党校有没有黑教师？你们自己说还没有发现，问题就在这里。我不是讲过吗？《今日的‘哥达纲领’》说是学生搞的，我看不可能。那不是学生写的！”

周恩来：“王反修，是学生搞的吗？”

答：“是。”

康生：“说是学生，骗人！我看你王反修也搞不出来。是黑教师搞的。在座的谁读过《哥达纲领》？朱仁你读过没有？”

答：“看过。”

康生：“你看的是《哥达纲领》还是《哥达纲领批判》？”

答：“《哥达纲领批判》。”

康生：“那个‘纲领’，就是要推翻无产阶级专政。说没有黑教师，见鬼，骗人！是掩护黑教师，遗憾的是过去没有发现。所以要根据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首先办学习班。”

“你们现在这个条件，那个条件，应当是无条件地把铁路搞通，在7月份搞通。无条件的交枪，无条件的停止武斗，无条件的停止杀人放火。杀人、放火的人被镇压是受迫害吗？朱仁、曹东峰你们整天喊受迫害，杀人、放火的人要保护吗？那是要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

康生提到的《今日的‘哥达纲领’》是 2 月 10 日，柳州“柳铁革命造反红卫兵联合战队”主办的《红卫兵战报》上刊登的一篇文章。柳州铁路局两派于 1967 年 10 月 26 日签署了《关于实现柳铁革命大联合的协议》，当时也称“倒旗协议”。对这个协议，柳铁一中的“柳铁革命造反红卫兵联合战队”一直有不同的意见，他们进行了激烈的讨论，几乎面临分裂。但最终还是统一起来，除少数几个坚持赞成“倒旗”联合外，大部分人都不同意“倒旗”。1968 年 1 月，“柳铁革命造反红卫兵联合战队”的头头钱文军，布置该组织另外一位常委肖普云写作《今日的〈哥达纲领〉——评“倒旗协议”》一文，述说反对“倒旗”的理由，并商量好写作大纲。这篇文章指责《关于实现柳铁革命大联合的协议》是当年《哥达纲领》的翻版。说这个“协议”脱离柳州和广西文化大革命的实际情况，在纸上空谈收缴枪支，助纣为虐，鼓励和纵容“联指”一小撮坏头头破坏“三个照办”。文章还指责柳铁“工机联”总部的头头提出的“铲平山头，破掉派旗，交出武器”，实质是“交出柳铁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一年来浴血奋战的成果，以换得一些人到大联委，甚至到将来的革委会去做官。”文章的发表激化了广西“422”阵营的内部分歧和广西两派的矛盾。

由于肖普云在文中引用了马克思的“用暴力推翻一切现存的社会制度”一句，广西革筹小组将此文上报中央。

黄永胜说：“广东的武传斌也来了。”

周恩来：“广东的武传斌，虽然他是革委会的常委，但他破

坏林副主席所说的三性——革命性、科学性、组织纪律性，伪造介绍信，带100多人来，做你们黑会的主席。大革命时，我在两广呆过，我为你们难过，两个当黑会主席的，一个是广东的武传斌，一个是广西的朱仁。

我再讲儿句，反正朱仁是会传出去的，我也不怕你传出去。去年，伟大领袖毛主席要我到广州，与造反派谈谈，那时‘三面红旗’是造反派，但不能总吃那三个字，不能吃一辈子。他说什么周某人是支持他们造反派的。但是，他现在跑到北京来，是造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反了！他们说什么黄永胜同志到北京来了，他们也来北京，这是借口。他们是造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反，对坏人的阶级感情却那么深。中央点名的，他要辩护，究竟站在什么立场？还开黑会。”

黄永胜：“白鉴平，你挂牌要过饭没有？你丑化社会主义，想跑去香港，被抓回来。还有，廖伟然，过去当兵，是被开除的，你是42军的，我知道，我在广州军区呆了十几年。我怀疑你们两个人，究竟造谁的反？站在什么路线上了？你们反对革委会，反对解放军！”

温玉成：“你们两个人，是中央指名要来的人。”

黄永胜：“你们两个好好想想，造谁的反？你们都要好好想一想，你们把斗争矛头指向无产阶给司令部，指向人民解放军，指向革命群众，就是江青同志所讲的三指向。武传斌这家伙是广东省革委会的常委，他到处煽风点火，挑拨离间，他要一派掌权，

到处造谣，说北京市革委会他参加了。”

温玉成：“他还说我接见了他，公开造谣！”

康生：“朱仁，你要好好想一想，这个造谣的，就是黑会的执行主席。白鉴平，你也参加丁吧？”

黄永胜对白鉴平说：“你就是黑会的成员。你们这些年轻人，为什么这样子？你们究竟是什么感情？”

周恩来问白鉴平：“是山东人，怎么到柳州去的？”

这时有人起来揭发说：“白鉴平的父亲是右派。”

还有人揭发钱文军这次来京时带四瓶炸药上飞机。

谢富治：“这是反革命！”

黄永胜：“你们‘422’、‘造反大军’看看，这都是些什么人！中央点名的，你们保护，完全把自己摆在对立面上了。你们‘422’把坏人当好人。”

康生：“白鉴平，我问你个问题，你参加几天黑会？北京有些什么人到会？你怎么知道那里有黑会？谁通知的？”

白鉴平答：“参加一天半，18日一天，19日半天。”

温玉成：“刘振林、刘天偿，炸桥、抢粮是你们干的，你们是头头。”

康生：“白鉴平，你讲话不老实，你隐瞒的目的是什么，我们懂得。”

周恩来问桂铁“工总”施向东：“你们把‘四五号’列车的车头搞走了，有没有这回事？”

答：“有一次。”

周恩来：“啊，‘有一次’！一次就够严重的了！司机是齐齐哈尔来支援的，就是因为你们两派闹得不可开交，你们拿机枪对准司机，把车头拉走的，还打开车门、车箱，把工具箱打开，拿走斧头，我直接给韩更打电话，一宿没睡觉才搞回来，这么大的错误，你为什么不检讨？还讲别人。你这是什么行动？”

施向东答：“这不是革命行动。”

周恩来：“这是反革命行动！我看你比王反修还调皮，他还承认犯了罪，你连犯罪也不承认。”

康生：“毛主席亲自批示的《七三布告》指出，这是反革命罪行。你却只说‘不是革命行动’。”

周恩来对施向东说：“你也是中专毕业生，是个知识分子，还是个干部，你们领导铁路，工人就会上大当！”

康生：“你们这些知识分子，打国民党、抗美援朝都没参加过。现在是个知识分子就觉得不得了啦！”

周恩来问施向东：“你今年多大？”

答：“27岁。”

周恩来：“不管你是什么家庭出身还不是个知识分子！”

康生问：“白鉴平，你是冰室代理会计？”

周恩来对白鉴平说：“你是商店里的怎么能领导群众？乱领导一阵，要把群众领导到哪里去呀！”

谢富治：“白鉴平你是不是要走你父亲的道路？！”

周恩来："今天在座的工人很少，还是学生成份多，原来受的资产阶级教育都暴露出来了。坏人就混进来了。

广西无论如何一派掌权是不行的，一定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在毛泽东思想的原则基础上联合起来。如果联合不起来，广西这个局面就还要推迟，再推迟就会犯罪！广西打成什么样子了嘛！哪个省也没闹到你们那样！快两个月没有通车了，再不通还行呀！今天下午就要达成协议。非把铁路打通不可。要赶快通车。哪个违犯就要犯错误。对齐齐哈尔的司机那样对待就是反革命罪行。

不管哪一方抢解放军的武器弹药，都要迅速交回。再放火不行，双方抓的人都要放，劝进城的农民回去，铁路要达成协议。广西7月底要实现毛主席的批示，如果你们诚心跟坏人走，那是另外问题。现在还有6天，先把铁路通了，张炎什么时候都可以斗，今天下午铁道部军管会和总参军交部，你们铁路上两派在一起研究通车协议，如果到月底还不通车，怎么能说忠于毛主席呀！两派都要清理坏人。今天回去两派都要自己检查自己，并见诸于行动。打电话的打电话，写信的写信，不要互相写大字报，能不能保证？"

众答："能保证。"

周恩来："在广西制止武斗，首先要在学习班制止武斗，在学习班搞武斗就不像话了，有决心没有？"

众答："有！"

康生："你们在学习班有没有带枪的？有枪的要交。在和平里住的有多少人，有没有枪？"

周恩来："回去要传达，有武器要交出来，匕首也要交出来。"

曹东峰说："西大'革联'被围几个月了，没粮食吃。"

周恩来："什么没粮食吃，你们抢啦！"

康生："百货大楼为什么烧？就是先把东西抢光了，再放一把火灭口。"

周恩来对曹东峰说："你赶快动员没有来的人来北京学习，才能改正错误。"

梧州"造反大军控诉团"一个教员报告要求发言，康生说："不谈了，知识分子的话，我们听够了。"然后宣布散会。

就在 7 月 25 日当天，解放军宣传队两个连 200 多人进驻广西大学，宣传、落实《七三布告》和领导学校的斗批改。

接着，7 月 27 日，南宁"联指"再次攻打百货大楼"422"据点。百货大楼东北面墙彻底崩塌，二、三楼再次被大火燃烧，大楼附近的民房、机关宿舍全部中弹起火燃烧。市革委会和警备司令部再次广播说："是'422'自己炸毁了百货大楼。"

经过 16 天的激战，8 月 1 日，广西部队与"联指"一起拿下了百货大楼。而此时，这座大楼已成废墟一片，尚留下活命的少数"422"派武斗人员，从断墙残壁中爬出来，举手投降，做了俘虏。解放路、南伦街、华强路，自强路，上国街，新华街、永宁街、和乐街等只剩下了断壁残垣。

武斗之后的南宁朝阳百货大楼

## 第 1028 回：回广州，武传斌等受批判　七二七，工宣队开进清华

我们再说广东的武传斌，他于 7 月 24 日，即中央接见广西代表的“七二五讲话”前一天，离京回广州参加省革委常委会议。

而此时，广州中山大学“八三一战斗团”负责人黄意坚，已经从省革委会的宣传车广播中，听到武传斌在 7 月 25 日北京中央领导接見广西代表时被点名的消息，赶紧召开中山大学“八三一战斗团”全团大会，商讨此事。会议期间，武传斌从北京回来，参加了会议。武传斌在全团大会上表示，他没有在北京召开过“北航黑会”，然后说了“反共救国团总团”在广州的事情，让“八三一战斗团”与“八一战斗兵团”、“粤海风暴”划清界线，说这两个组织有可能被“反共救国团”渗入。

散会后，“八三一战斗团”的勤务组留下讨论。在勤务组会上，武传斌认为他们将面临镇压，要求团里的活跃分子离开广州。

会后，武传斌又与黄意坚单独交换意见。

黄意坚问他“黑会”是什么回事？武传斌简单介绍了经过，并说：根本就不是什么会，是全国各地到京告状的造反派听说蒯大富那天要到北航見他，以为蒯可通天，希望能通过蒯大富替他们把告状资料转送中央，故不约而同到了北航，聚在一起，现在要解释，也很难了。

7 月 30 日、31 日，广州省革委会按照中央领导接见广西代表的“七二五讲话”精神，召开全委会，要求武传斌交代“反共救

国团”问题，同时还要他交代与被打倒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关、戚、林的关系问题、揪军内一小撮问题、“中南局第二套黑班子”问题、“反革命屠杀团”和“红警司”等问题。

8 月 4 日，广东中山大学《中大战报》、中山大学革命造反委员会“卫二红”战斗团发表《反革命小臭虫武传斌罪行录》。

8 月 7 日至 8 日，广东省革委会召开第二次全委扩大会议，要求武传斌、莫竟伟、刘继发、高翔、林昌文、丘学科等“旗派”头头交代错误。

8 月 12 日，广州红代会做出清除武传斌和广医“红旗”头头，红代会常委兼核心组副组长林凡的决定。

我们再回到北京。根据谢静宜传达的毛泽东的意见，7 月 25 日，北京市工交口和支左办组织了大联合和三结合做得比较好的 61 个工厂的工人约 3 万人准备去清华大学制止武斗。

7 月 26 日，清华大学“414”再次向北京市革委会提出派宣传队的要求。

这天下午 17 时 30 分至次日凌晨 2 时，北京市革委会领导谢富治、吴德、温玉成、吴忠、杨俊生等，在北京新华印刷厂召开了准备去清华大学宣传《七三布告》、《七二四布告》，制止武斗的工人领导人会议，动员、部署派“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清华大学制止武斗，会上还决定让北京巨山农场的农民代表参加。全体人员共分成 8 个团，对清华大学内具体的楼区地段作了宣传分工。会议决定：7 月 27 日上午组成以工人、农民

和 8341 部队支左人员为主的宣传队开进清华大学。

当晚，周恩来主持中央文革碰头会讨论宣传队进清华大学的问题，同意他们 27 日进入清华大学。商议完毕，周恩来说："请示主席去。"然后让秘书打电话问："主席休息没有？"

毛泽东那边回话说："可以来。"

周恩来拿起皮包正要起身，江青匆匆出来说她要去。

周恩来说："好，你去吧。"

两个多小时后，江青回来，说："主席同意，马上派。"

7 月 27 日清晨，由北京市 61 个工厂 3 万多人组成的"工农兵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在解放军驻各厂军代表的带领下，从各自单位出发，浩浩荡荡地向清华大学进发。他们每人只拿着一本《毛主席语录》，带着一天的干粮。其中不少男工人因为天热穿着短裤，有些女工还穿着裙子。

清华"414 文攻武卫"代总指挥、沈如槐 7 月 4 日任命的"414""东区司令"但燊，27 日早晨 7 时多起来巡岗时，发现清华大学东门外一眼望不到头的大卡车。他出来和卡车上的工人聊了聊，知道他们是来宣传《七三布告》、《七二四布告》，制止武斗的。当时他们并没有进校园。

早饭后，住在清华大学 10 号楼的贵州"411"王云生和曾廉溪骑着自行车，准备去国家体委，在西校门被解放军和工人拦住，对他们说："退回去，不准出学校。"

王云生和曾廉溪这时发现，从清华园西门通向海淀的大路上

已停满了汽车。他们问为什么不让出校门？

“问这么多干什么？赶快退回去，不然把你们抓起来！”一个解放军说。

“为什么不让我们出去？为什么要抓我们？”王云生也愤怒地大声质问那个解放军。

“你吼什么？再吼，再不听打招呼我们就把你们二人先抓起来！”还是那个解放军说。

“同学，还是听劝吧！我们说什么你们也不会明白，我们是奉中央文革指示来你们学校搞宣传的，过一会儿你们就明白了。我劝你们两个同学，不要再在这里多逗留，何必受眼前之苦呢？我是为你们好，这样僵持下去，一会儿首长来了真的会对你们不利的。”一个和善而年纪稍长的工人对王云生和曾廉溪和颜悦色的劝说着。

“同学，回去吧，我们也是准备回家的，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今天恐怕是出不去了。”几个清华大学的老师和同学也推着自行车停在校门口向他们二人劝说。

王云生和曾廉溪商量了一下，想看其他校门是否可以出去。于是，二人调转自行车向南校门骑去。到了南校门还未下车，就远远看见校门外红旗招展，也是望不到头的汽车堵满了马路，门口由解放军和工人们组成的队伍把南校门堵得严严实实、水泄不通。他们向旁边的清华同学打听，谁也不清楚发生了什么事？

上午 9 时多，各单位的工人陆续到达了清华大学的南门、西

门和东门。谢富治、吴忠和 8341 部队负责人则在离清华大学不远的一处宾馆院子里搭了一个大蓬，临时安了红机子和几台普通电话，组织指挥。

上午 10 时，8 个团的宣传队按事先分工，同时从清华大学的各校门一齐进校。

面对这突如其来，声势浩大的行动，清华大学的“团派”和“四派”头头们都没有任何思想准备。

从东门涌进清华大学的工人队伍浩浩荡荡的来到了“414”占据的主楼。本来，从东门到主楼这段路当时是无人敢走的，因为清华“井冈山”占据的 9003 楼，枪口正对着东门和主楼这段路。所以，占据主楼的“414”要出去买菜、办事，都是从主楼后经农田到林业大学前的马路进城的。但是 7 月 27 日这天，工人进东门，9003 楼的“团派”没有开枪。

工人来到中央主楼后，进不去，因为中央主楼的一楼此时已全部用桌子堆成了“工事”，他们只好在前台阶上向上喊话。

当时“414”的伤病员都在中央主楼三层，对着东门，负责“414”后勤和伤病员工作的张雪梅住在这里。她看见一下子来这么多人，谁也不知道他们是来干什么？于是，时任“414”总部常委的张雪梅就带了几位男同学下楼去打听情况，只见一位好像是负责的人气势汹汹地对她说：

“我们是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来清华……制止武斗，拆除工事……”

此人是北京市建筑工程局干部柳一安，他让张雪梅把中央主楼的工事拆了。

张雪梅说："可以，但我们人手不够，你们进来，帮我们一起拆。我们还有 100 多人封在科学馆，一个月了，还有两个人死了。只要你们把他们救出来，我们不在清华呆了，马上全部离开。"

她让工人队伍从西主楼的一楼北口进入主楼，并领柳一安去见"414"头头沈如槐。并在第一时间让"信号组"的人到主楼顶上，用旗语给科学馆发信号：

"工人来救我们了，准备撤退!"

在西主楼一楼的一间小教室里，沈如槐与东区"工农兵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负责人柳一安谈判。由于但燊早晨从东门外返回主楼后，立即向沈如槐汇报了他在东门外遇到的情况。所以沈如槐对工人入校还是略知一二。对"宣传队"要求他们交出武器，拆除工事的要求，沈如槐有顾虑，不愿意同时交出武器和拆除工事，担心"井冈山"反扑。但是也不愿意让"宣传队"离开，怕再没有什么力量能制止住"井冈山"。经过近一个小时的谈判，权衡利弊，沈如槐等人还是同意了"宣传队"提出的要求，于上午 10 时 30 分左右，沈如槐和柳一安分别代表"414"与"工农兵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签署了关于停止武斗、上缴武器、拆除工事、撤离据点的四项协议，并立即送至主楼的"414"广播台监督广播。

但“四派”又担心情况有变，一些人还是根据其头头指示，藏匿部分武器，以防“团派”日后反击。

“四派”竭力劝说“工农兵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先去拆除“团派”工事，收缴“团派”武器。此时，他们尚不知道“工农兵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是在同时拆除两派工事和收缴两派武器。

随着“414”与“工农兵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签署的协议的广播，集合于东校门外的工宣队全部顺利地进入“414”的所有据点，没有遭到“414”的任何抵抗。

而在西校门外的“工农兵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却没有在10时进入清华。因为“井冈山”作战部长任传仲闻讯后，带着一队人马携带长矛紧急赶到西门，阻挡“工农兵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校。“工农兵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也没有强行进入西校门，他们一面继续组织宣传，一面等候东门、南门“工农兵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消息，更主要是等待临时指挥部的命令。

这时，航空馆“井冈山”总部办公室给静斋的“井冈山”总部打来电话，向正在这里值班的陈育延报告说，工人要拆一教的工事，找头头解决。一教是“井冈山”广播台所在地。

此时，“井冈山”的一、二把手蒯大富、鲍长康都不在清华，他们一早去火车站接回沈阳探亲的“井冈山”总部委员陈继芳了，她说7月27日回北京。就在这时，坚守西门的任传仲进来了，他对陈育延说，他已在西门布置了几道岗，不准工人进校。据陈育延后来回忆说，当时“团派”自恃是“革命小将”，有中央

文革支持，根本没把工人宣传队当回事，以为工人喊喊口号就走了。于是一教的“井冈山”广播台广播说：

“欢迎北京市工人来清华制止武斗！”

“我们热烈欢迎你们来宣传《七三布告》，但请你们停留在校门外面，进入我们校园里来会有危险的！”

“你们落后于形势了！”工人们喊道，“你们要是不执行《七三布告》和停止武斗，我们就一定要进去！”

“回你们的生产岗位上去抓革命促生产！我们能够自己解放自己。”守卫西门的学生回答。他们都拿着长矛。

“我们为什么要回去？你们毫无意义的武斗破坏了一切，我们首先要制止你们，制止你们就是促生产！“工人反驳说。

就在“团派”与西门的工人纠缠之际，从南门等处进入校园的工人队伍迅速赶到西门，强行打开了西门。工人人多势众，两面夹击，“团派”数百人学生怎能挡得住数以万计的工人如潮水般地涌入？被冲得七零八落退了下来。所有的工人队伍终于在11 时左右全部开进清华校内，并立即按照预定的计划，一路高呼着：“要文斗，不要武斗！”各自到达事先分配的地点，分片包干，很快完成了对清华两派据点的“分割”和“包围”，然后开始宣传、喊话，念《七三布告》、《七二四布告》，并以演节目、说快板书等文艺形式进行宣传。对路上遇到的武斗人员，则以众多的人数团团围住，进行宣讲。同时，开始拆除工事，清除路障和铁丝网、电网等。

“井冈山”总部听到许多传言，有人说工人围楼拆工事的时候打学生，说工人要抓头头，说工宣队支持“414”，还说带队的多是卫戍区的军人。陈育延听到这些传言，思想上就与工人宣传队对立起来，感到很不理解，觉得清华运动应该由清华师生自己来解决，工人为什么要到学校来整学生。于是打电话到北京市革委询问，工人宣传队是不是市革委派来的？市革委一个女的接电话，说“不是市革委派的，不知道是哪里派来的。”

“井冈山”的广播很快就变调了，要求“工人快回原单位抓革命，促生产。不要受杨余付黑手操纵……”等等。

这时，静斋陈育延接到航空馆刘庆打来的电话报告：北京卫戍区副司令员李钟奇来了，到一教去了。

陈育延打电话给一教，让他们扣住李钟奇，问他工人宣传队是哪里派来的？一教“井冈山”只看见李钟奇的汽车和司机，没有看见李钟奇，于是将李钟奇汽车轮胎给放了气，并将汽车和司机全部扣下。李钟奇无奈，只好徒步回去了。

11 时过后，工人队伍来到了“团派”控制的总机房，要进去。总机房值班的一位女学生在里面说：“这里是总机房，机要重地，一般人不能进来。”

这时，一位解放军过来对里面说：“我是解放军，只进去一个人看一看，其他人不进去。”

出于对解放军的信任，那位女生打开了大门。谁曾想，那位解放军立即用身体挡住门，转身对身后的工人说：“冲，赶快冲！”

于是工人一拥而入，占领了总机房，将那位女生和另一位值班的学生一起押到了二院教室。

其实，在北京市革委会做出向清华大学派“工农兵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决定后，谢富治就让吴德赶快找蒯大富，让他服从这一决定。

吴德派人去找蒯大富，但在清华大学没有找到。因为蒯大富一早就去北京站接陈继芳了。他们在北京站没有接到陈继芳，约10时许，在火车站旁的一个清真饭馆吃了饭，就返回清华大学。到了五道口时，路开始拥挤起来，车越开越慢。来到清华西南门前时，车就在游行的队伍中被堵住了。这时，蒯大富和鲍长康已经明白，游行队伍是冲着清华来的。他们在路边下车，从西南小门围墙的辖口，踩着砖头翻墙进入清华，绕到西门前的那条大路上时，碰到在静斋守楼的一位女工，她见到他们就说：“你们怎么还在慢吞吞的走啊？刘才堂刚才都差点被抓了。”

蒯大富他们回到了静斋，这里已经在开饭了。他和鲍长康上到静斋的4楼楼顶，看到工人、农民的游行队伍。蒯大富对鲍长康说，他在游行队伍中看到了北京第二机床厂的一个北京市革委会的一个常委鲁文阁，他是支持“天派”的。蒯大富认为不会有什么事。

工人涌向“井冈山”总部静斋，慢慢的也把静斋团团围住，只准进，不准出，出去的就抓，要求“井冈山”交出武器。

静斋外边有一圈电网，静斋内的“井冈山”不让工人进去，

并在扩音器上大喊：

“工人同志们，清华的事情要由我们自己解决，就像工厂的问题由你们解决一样，请你们马上退出清华……”

蒯大富往各个据点打电话，均称被包围。蒯大富想，“是否是杨、余、傅黑后台挑动工人斗学生？像上海王洪文砸上海‘联司’一样，砸死几十人，硬把‘联司’砸垮了。会不会是杨、余、傅黑后台来砸我们清华‘井冈山’来了？”他和鲍长康分别给北京市革委会、中共中央办公厅打电话，得到的回答都是：“不知道你们那里发生的情况，我们向首长报告”。

11 时 30 分，北京市革委会、北京卫戍区“三支两军”办公室负责人刘丰给清华大学“井冈山”总部打电话告知：

“首都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要去清华宣传毛泽东思想，宣传《七三布告》，请你们大力支持宣传队，并积极与宣传队合作。”

## 第 1029 回："四一四"，工人解困科学馆　十号楼，手榴弹炸死工人

再说东门主楼"414"这里，张雪梅安排工人进到主楼和"414"总部所在的焊接馆后，给他们烧水喝。"414"的学生们一个个拉着工人的手给他们讲清华的情况、讲科学馆的情况。工人都深表同情，有的女工还落了泪。但是"宣传队"一直在等待上级的指示，直到11时30分后，才开始前往科学馆。沈如槐派但燊带队，领着工人们从主楼出发，走东西大道，经动农馆、二校门、一教前往科学馆，一路没有遇到阻挡。

科学馆这边一直没有收到主楼发出来的撤退信号。当他们听到二校门那里人声鼎沸，口号声阵阵……就往主楼发信号询问，但是一直没有得到答复。

工人进入清华大学科学馆查缴武器，这里的"414"没有反抗，他们在此被困近百日，两具被"团派"打死的尸体在底层地上已开始腐烂。没有水，他们只能将水泥地板砸开，挖井取泥水喝。没有电，一入夜，整座大楼就是一个黑暗的世界。今天，他们看见工人来解救他们，求之不得。这些大学生一个个披头散发、脸色惨白，就像从地狱里爬出来一样，摇晃着身子从大楼里走出来，其中几个人一出来便倒在地上，工人们见状，连忙把他们扶了起来。大家来到门口的草坪上，围坐在那里，工人们围在他们的四周，不让人靠近。

清华大学 9 号楼住着“井冈山”的“07 部队”，他们接到总部电话说，从东门、南门进来大批工人，目的不明，要他们做好防备。曾参加山西一月夺权，在山西颇有影响的邢晓光，此时是“07 部队”的负责人。他接到总部电话后，遂带十余人拿着自来水管削成的长矛，来到 9 号楼东面马路上警戒，看见有很多工人，其中也有人拿着长矛，从“414”占领的主楼区浩浩荡荡的向北而来。邢晓光以为这些人是帮助“414”来攻打“井冈山”的。当工人进至 9 号楼东的球场时，邢晓光考虑没接到总部的具体命令，同时与外来工人并无冲突和仇恨，最好别打起来。于是下令“07 部队”的人全都面朝工人后退进楼。

工人们看到学生们后退，在负责人的指挥下，呼啦一下冲向断后的邢晓光。在邢晓光近旁的王章练见状，赶忙从书包里掏出颗手榴弹。工人们一看，立刻停了下来，很快又包围过来。王章练手一扬，未拉弦的手榴弹扔了过去，工人呼啦啦卧倒了一片，

学生们乘机跑回了 9 号楼。

趴在球场上的工人见手榴弹半天没有爆炸，于是又从地上爬起来，开始将东区各楼分割包围。

工人越聚越多，试探要攻进每座楼。9 号楼两头封闭，仅有一楼的东北窗户留一个进出口。“07 部队”不敢出楼，只是守住焊接的铁门，防止工人冲进来，工人难以攻破。加上“07 部队”的张天海等人在 9 号楼的二楼反复喊话，表示没有敌意，还不时扔出石头使工人不敢靠近。张天海嗓子因此喊哑了，失语多日，发不出声音。

上午，一支工人宣传队来到清华大学“井冈山”占据的大礼堂附近，忽然听见轰地一声巨响，工人纷纷趴倒在地。原来是“井冈山”引爆了电控地雷。队伍停止前进。

中午，“井冈山”守大礼堂的付连池给静斋打来电话告急，说工人要攻礼堂了，问鲍长康“怎么办？”鲍长康对他说：“你们先守住。”

鲍长康觉得进攻大礼堂的工人应该有人指挥，是否能过去跟他们谈谈，问问情况。于是下楼，看到静斋电网外站着一个解放军空军干部，戴着眼镜。“戴眼镜的解放军？”他脑子中一闪，因为他就戴眼镜。于是叫守卫静斋的清华工人，把那个空军干部拖进了静斋，换上那位空军干部的军装，一照镜子，大小合适，就趁静斋守楼工人朝外头扔石头的时机，出了电网门，向大礼堂走去，一路上没有阻拦，来到了大礼堂，看见大礼堂的东门开着。

他仗着自己穿着军装，便往里走。

此时，礼堂“井冈山”的付连池和游白然、牛又奇 3 人已经与工人宣传队针织总厂的邢云有等 3 人签署了书面协议，同意工人进入礼堂。但是工人进入后，就把礼堂里的所有人都扣在电影放映室里，然后在礼堂搜查出了大量的武器和武斗械具。

不明就里的鲍长康快走进礼堂大门时，被工人拦住了，问他是哪个部队的？鲍长康信口胡扯了一个，大概是 8341 吧。可是 8341 部队哪有穿空军服装的？立刻被识破，马上被扣了下来，被带到大礼堂外东北边墙跟下坐着。

听说鲍长康被抓，蒯大富当时下令：“严守阵地，不准进攻工人，如果工人攻楼，就还击。”

这时，“井冈山”的高季洪拿着《毛主席语录》，出去和工人辩论，让工人回去抓革命、促生产，结果上来几个青工，把他抓走了。蒯大富当时眼睛就红了，拔出手枪，喊道：“他妈的！老子拼了！”被“工总司”的人抱住，不让他出去。

从窗口向外窥望，只见黑压压的一大片工人挤在静斋前的空地上，蒯大富气恼地把窗门关上，通知召开勤务组紧急会议，商量对策。

会上，大家认为数万工人围困、进驻清华园是工人的派性行为，是北京市或中央文革某些人操纵镇压学生运动的事件，他们担心清华“井冈山”会像上海柴油机厂的“上柴联司”那样的下场。但这时他们手里有武器，怎么能让人家轻松消灭掉呢？他们

商量了一下，一致认为：“井冈山兵团”的生死关头到了。会上决定：

一、紧急上告北京市革委会和中共中央；

二、命令各据点抵抗工人宣传队，誓死保卫“井冈山”，必要时可使用武器。

接着，“井冈山”从静斋冲了出去，反过来把工人包围起来，将工人往楼里拖，40 多名工人、军代表先后被关进静斋，遭审讯或殴打。随后，静斋的“井冈山”又去袭击甲、乙所和工字厅等处的工人，将那里的工人驱散。任传仲则带着蒯大富趁机冲了出去。

蒯大富后来回忆说，这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感到了灭顶之灾，于是想跑出去找毛主席。他们是从静斋往学校西北门跑，在那里翻墙出去，避开路上行人，一路小跑到体育学院。清华的小车都在体院，他们在那里找到一辆车，开到北京市革委会，已是下午 15 时左右了。蒯大富要见谢富治、吴德，要告诉他们：“清华发生了天大的事，工人把我们砸垮了，清华学生没有活路了”。

这天午饭后，在北京大学俄文楼里“首都红卫兵代表大会总部办公室”值班的北航革委会主任、首都红代会核心组副组长韩爱晶正睡午觉，突然被北航常驻红代会代表陈良同学急匆匆地叫醒，很激动地对他说：

“快、快起来，清华出事啦！多少万人把清华包围了，工人要强行拆除武斗工事！”

韩爱晶一骨碌从床上坐起来，拍手叫道，“那太好了，那太好了！”

陈良问：“怎么好？

韩爱晶说：“这样不就把武斗问题解决了吗？”

陈良说：“还搞不清怎么回事！”

韩爱晶边下床边说：“走，我们去看看。”

他们赶紧从北大往清华走，只见清华大学围墙外面的路上已经是人声鼎沸，停靠着许多卡车、吉普、大轿车……车上贴着“北京针织总厂”“、新华印刷厂”等字样。路边、树下、河坡到处是密集的工人，情绪热烈而又秩序井然。

这是韩爱晶这些学生很少见到的情景，他想起谢富治在北京市革委会上曾经对他们几个学生领袖说过：“我可没你们那么大的胆子，一声令下，随便就在北京开 10 万、20 万人的大会。我开 1 万人的大会都要请示毛主席。”

韩爱晶对陈良讲：“这么大的行动，调动几万人可不是儿戏！这么大的事情发生在北京，谁有这么大的胆量？党中央，毛主席能不知道吗？”

他们走到队伍里，向一些工人师傅打听：“请问，谁派你们来的？”

“不知道。”

“领导组织我们来我们就来，别的我们也搞不清。”

问了几处，工人们都说是听从厂领导安排来的。

听说清华大学出事了，从四面八方赶来的人摩肩接踵。外面的往里拥想看明白，里面没看出名堂的往外走，人流涌动。

清华园里的高音喇叭此时像炸了锅，声嘶力竭的高喊：

“工人同志们，工人同志们，你们受骗了，杨余傅及其黑后台，操纵你们镇压红卫兵……”

韩爱晶在迎面过来的人潮里，正巧碰到北京市中学红代会的李冬民和陈文香。李冬民是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常委，陈文香是委员。他们从清华校园里往外走，韩爱晶赶紧问：“冬民，到底怎么回事？”

李冬民也说不清。

韩爱晶问不清，看不明，听不懂，心里急，没办法。只好改变方向跟着人群往外奔。决定回北航再想办法。走到四道口，遇到从清华被冲出来的“井冈山”人员，他又问到底怎么回事？回答是：“工人来拆除武斗工事，于是跑出来了。”

韩爱晶回到北航，千方百计和蒯大富联系，但是清华大学总机的回答是：“接不通，找不到人。”

给市革委会领导打电话，也是找不到领导。在电话里问市革委会工作人员怎么回事？回答说：搞不清。韩爱晶只好在电话里请他们赶紧把情况向中央汇报并非常严肃地强调：“搞不好要出大事的！”

约 13 时，清华大学里的工人围住了“井冈山”据守的 9003 大楼，并开始拆除楼外工事、障碍，破开门障，进入楼内，与楼

里的的“井冈山”30 多人展开了逐层打斗。最后，楼里的“井冈山”寡不敌众，在打伤 10 多名工人后，退至楼顶坚守。

14 时至 15 时许，明斋的“井冈山”60 余人驱赶包围这里的工人，在刺伤、砸伤、炸伤数十名工人后，把那里的工人赶至礼堂一带。

从科学馆撤出来的“414”坐在科学馆前的草坪上，这里也是大礼堂前的草坪，一些被工人扣留的“井冈山”学生也都围坐在这里。周围团团站着几圈工人，也有闻讯赶来的学生和老师。他们还没有吃午饭，也没有向主楼转移。主楼“414”的沈如槐派人一再催促，但是“宣传队”没有动静，因为工人与“414”科学馆的“卫戍区司令”王永县谈判，王永县坚持要带着死去的战友——“烈士”的遗体一起离开，工人们不同意，承诺会给他们保管好。工人们等待“上级的指示”。周围人越围越多。终于，工人准备带着科学馆的人撤离这里，而此时，“井冈山”已经在一教、土木馆、旧水、旧电机馆都加強了警戒。于是，工人和“414”决定走清华学堂南的那条清华学堂与旧水利馆之间的路，向东过河。工人跳到河里，试探着，用肩膀扛着木板，让“414”困守科学馆的所有人从他们用肩膀扛着的木板上过河，女生先过。很多学生感动得哭了。

再说主楼负责“414”伤员和后勤的张雪梅和焊接馆的同学们中午就做好了饭菜等着科学馆的“414”战友，可是左等不来，右等也不来，就这样苦苦等到下午，终于看到他们过来。张雪梅

他们在清华路的两侧夹道相迎。

15 时左右，机械系一位同学到 13 号楼找到“井冈山”总部委员王良生，对他说：“9003 有工人进去了。”

王良生说：“不行，9003 承担周总理下达的生产任务，给越南战场生产高射炮瞄准校对仪。”

于是二人从 13 号楼前往 9003 大楼，一路避开工人多的地方。

他们到了 9003 后，这里一位 8341 部队的负责人问王良生叫什么名字？王良生回答说：“我叫王良生。”

那位负责人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笔记本翻开看了看，说：“你是总部委员，自己来报到了。你不用走了，就在这儿陪我吧。”他回过头对陪王良生一起来的那位机械系的同学说：“你可以走了。”

王良生说：“本工厂有周总理下达的军工生产任务，无出入证不得进来。”

那位 8341 部队负责人说：“你们搞武斗能进，为什么我们解放军不能进？”他将王良生带到四楼一个办公室，里面还有两个军人。那位负责人对王良生说：

“你就陪着我一起住在这里吧。”

就这样，王良生和那位 8341 部队的干部一起在屋里吃了部队送来的晚饭，然后一起睡觉。

再说蒯大富到了市革委后，上楼去找谢富治。此时谢富治正在清华大学指挥工人宣传队，蒯大富当然找不到，但是看见了吴

德的秘书，就对他说："我想见吴德。"说着径直走进吴德的办公室，冲着屋里的吴德喊道：

"是谁派的工人？为什么要把我们学校包围起来，一进校就抓人打人，把我们学校打得一塌糊涂!我和你们说，我们不是好惹的，我们要决一死战，一定要揪出黑手！"

吴德说："工人宣传制止武斗有什么错？"

蒯大富警告说："你们不要把我们清华'井冈山'当成上海'柴联司'来砸，我们可不是那么好欺侮的。"

吴德说："蒯大富，你要是得罪北京100万产业工人，你在北京就没有立足之地。"

蒯大富当然不服，大声喊道："我们不是好欺侮的，谁如果把我们清华'井冈山'当成上柴'联司'来打，我们就以死一拼!"

吴德警告说："你们如果跟工人打起来，你要负责!"

蒯大富："现在没办法，一点招呼也不打，你让我负责我不负责!"

吴德说："我把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叫来谈判"

蒯大富说："谈就谈，我们听毛主席的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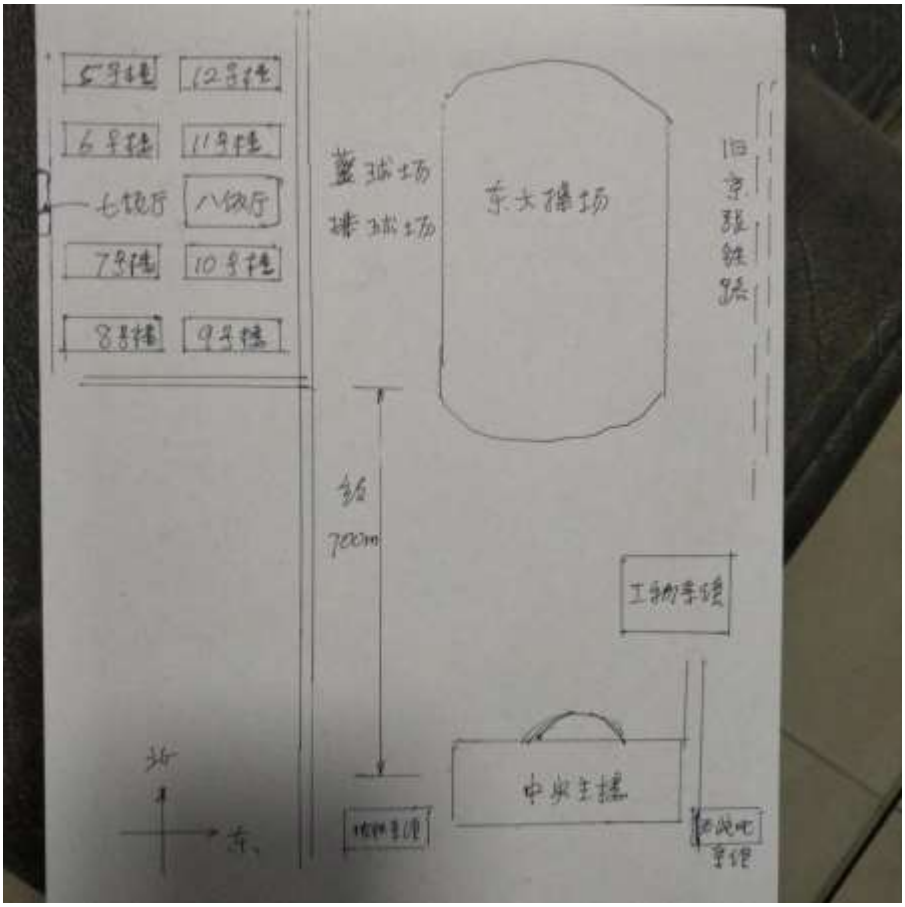
吴德让蒯大富呆在屋里，他去找工人宣传队的指挥。

大约过了一个小时，吴德回来了，对蒯大富说："你们清华塌天了，打起来了，工人死了。"

蒯大富一下子愣了，他没想到会死人。

此时，由于"井冈山"武斗据点各自为战，对周围的工人发

动袭击，绑架工人，伏击工人宣传队要经过的道路，使工人受伤人数不断增加。在 10 号楼，首先发生了手榴弹炸死工人的事情。




王学文手绘平面图

清华东区共有两排八座、砖混结构、四层学生宿舍楼，编号如上图。10 号楼是其中之一。楼群位于清华东区、中央主楼北面操场的西侧。1967 年 12 月 26 日，在清华大学主楼后厅召开“贵州 411 代表大会”，宣布成立“贵州 411 总司令部”，“总司令”是贵州新华印刷厂工人袁昌福，办公地点就在清华大学 10 号楼。

10 号楼四层住的都是外地造反派。1968 年 7 月 27 日这天，在清华大学 10 号楼内住的有广西、贵州、重庆等外地来京上访

的造反派 40 多人，其中一楼和二楼分别住的是“广西 422”、“重庆反到底”、“四川红成”、“云南 823”、“湖南湘江风雷”、“哈尔滨红旗”等，三楼、四楼主要是贵州“411”。

早上准备去国家体委的贵州“411”王云生和曾廉溪二人，骑着自行车在清华园转了一个上午，也没有找到一条可以走出清华园的路，只好悻悻地回到了他们的住地 10 号楼，把情况告诉了大家。10 号楼贵州“411”负责人袁昌福午饭后立即召集在 10 号楼的全体“411”开紧急会议，对人员做了应急的分工。

上午 10 时左右，清华“井冈山”的王学文到 10 号楼找电 00 的颜家庆。颜家庆的中学同学、重庆大学学生刘汉碧来北京找他，就住在这里。王学文和他们一起聊了武斗和贵州“411”的一些事情，中午就在二楼房间里一起吃了午饭。

大约 13 时多，忽然听得外面人声嘈杂，王学文出门一看，楼道人员穿梭，气氛紧张。他问怎么回事，有人说外面有人把楼围了，要攻楼。

王学文走到楼梯处，看见下面已堆满了桌，椅，床板，棉被等杂物，能看到下面有人试图向上攀，堆物密密麻麻，上来很困难。

王学文走进朝北的一间宿舍，打开窗户，只见楼下站满了人。王学文问他们：“你们是哪个单位的，为什么要围楼？”

下面你一言我一语，有说是二机床的，还有的说是五四一厂、医疗器械厂等。

王学文的兄弟姐妹和亲属中就有二机床和医疗器械厂的，顿时增加了亲切感，就问他们来干什么？谁派来的？

下面的人说，是厂革委会让他们来的，到这里来制止武斗，拆除工事。王学文自报是清华学生后，对楼下的工人说，这里没工事，也没有武斗。

下面的人叫王学文下去谈，王学文准备下去，但是他周围的人不让他下去，说刚才有人下去被打了。

其实王学文也下不去了，因为两边的楼梯都被桌椅杂物堵得严严实实。一楼有几个青年小伙子试图顺着楼梯向上攀，二楼有几个人就用木棍等东西向下捅，不让他们上来。

王学文急的团团转，没有任何办法，只得回房间，和颜家庆、刘汉碧一起听天由命。

此时，有人交代住在三楼的贵阳花溪中学高一学生、该校“411 战斗团”的李青和与她住在一个房间的贵阳 17 中学学生魏凤英，待在屋里别乱动，说有人冲楼了。她们俩不放心，还是到走廊上去观察情况，虽然看不到冲楼的人，但是能听到楼下在齐声高喊：“下定决心，不怕牺牲.....”

二人回到房间，发现窗外扔进来很多砖头石块，窗户玻璃都被打碎了。二人小心翼翼地蹲在地上，把砖头石块拣到脸盆里再交给隐蔽在窗边的男生。而守在楼道的清镇县一中美术教师田世信老师，边扔石头边喊:“他妈的，你们从哪个监狱来的，回到哪个监狱去!”

正在二楼房间内的王学文等人，突然发现门缝处有烟进入。推门出去，只见楼道内烟雾弥漫，隔几米见不到人，大家都惊慌地奔走，楼梯下面可见火苗。

王学文感到喘不过气，头昏脑胀，急忙随着别人往三楼跑。三楼同样浓烟迷漫，又随人跑到四楼，从四楼的铁梯爬到楼顶……

而住在三楼的李青和魏凤英，赶紧弄了好些湿毛巾给那些守楼的男同学捂住口鼻，并从水房端水到楼梯口泼水灭火。

四楼，隶属“贵州 411”的“贵医 226”学生戴碧玉，也感到浓烟刺鼻，但没用湿毛巾能挺住。她劝大家尽量少说话，这样可以减少废气吸入和氧气消耗，以便更长时间维持基础代谢。贵州橡胶制品厂工人郭平、贵州花灯剧团演员莫伏麟手持梭标很镇定。

有人提议：派个人从东边窗户吊下去，再从那里冲进去，有可能将楼道里的工人们赶走。

匆匆决定后，贵阳七中初三学生陈孝洪在袁昌福等四人的帮助下，用绳子捆在身上，准备从楼上缒下去。此时，他突然听见下面大声喧闹，从窗户看出去，只见外边很多穿工作服的工人正被手持长矛的学生追赶，向 10 号楼这边跑来。陈孝洪迅速缒下，用长矛捅开楼下堵在窗口的床，举起了手榴弹，用贵州普通话喊道：“老子们‘井冈山’人不是好惹的！”说着就将手榴弹扔进了楼道，并趁势冲了进去。据陈孝洪说，手榴弹他未拉弦。堵在楼

口的工人见状纷纷跑下楼去，同时，楼上的人也趁势冲了下来。有几个来不及跑掉和受伤的工人被抓。

17 时 30 分左右，二机床厂的王松林在 10 号楼一楼楼道西头被手榴弹炸死，时年 36 岁。

## 第 1030 回：蒯大富，与迟群进行谈判　“井冈山”，午夜撤出清华园

10 号楼对面的 9 号楼是无线电系，该系头头之一的张天海和住在 9 号楼的清华“井冈山”的“07 部队”负责人邢晓光一直都密切注视着 10 号楼的情况。

上午，张天海看见住在 10 号楼的外地人在楼外与工人发生冲突，由于工人人多势众，外地人全都撤进 10 号楼内，并用桌椅等在二楼楼梯口筑起屏障，阻止工人上楼。

“07 部队”负责人邢晓光站在 9 号楼北窗也目睹了工人冲进 10 号楼，并占领一楼后继续向上攻击。他听到了 10 号楼内冲杀声不断，看见 10 号楼的人手忙脚乱地用木床、桌椅把楼梯堵住。一段时间后，他眼见着工人把木器家具点着，只见 10 号楼浓烟滚滚，继而冒出了火光。

邢晓光惊恐地目睹了这一切。看见有人匆匆从二楼窗户跳下，不久就听到 10 号楼内传出手榴弹的爆炸声，接着大批工人从楼内跑出，聚在东大操场上。10 号楼内的外地人也随之追出楼外，但只是站到楼外，没追到东大操场。

邢晓光见状便召集 9 号楼内无线电系留守同学，手拿长矛，出楼站在 9 号楼东面马路上与工人对峙，没有交手。

16 时左右，清华大学“团派”作战部部长带的队伍在三院又与其它“团派”队伍一起向礼堂周围的工人发起进攻，动用了手榴弹、长矛、石块、弹弓等，造成 130 余人负伤，一军代表被

炸伤，一老工人被刺中右臂右肺。约天黑时，他们又去袭击丙所。

约 18 时，从 13 号楼方向，广西“422”和徐海地区外地造反派 100 多人冲向 10 号楼，赶往 8 至 10 号楼一带。这时，工人队伍正从 11、12 号楼东撤，向南跑去。他们经过 9 号楼东门口时，9 号楼的一个学生向这些工人扔了一颗手榴弹，工人们连忙卧倒。但是这颗手榴弹没有爆炸。随后那个同学又扔了一颗手榴弹。可能是因为第一个手榴弹弹没有爆炸的原因，这次工人们不再卧倒，结果这颗手榴弹响了，好几个工人被炸倒地。他们勉强挣扎站起来，在同事的搀扶下一拐一拐地拼命向主楼方向跑去，全部撤到主楼区。

与此同时，撤至 12 号楼西北面场地的工人中，北京市供电局工人潘志洪想把学生扔进人群的手榴弹捡起投到无人的地方，未果，被炸死。

18 时左右，下起雨来，从 10 号楼撤至东大操场南端的北京 541 厂工人张旭涛死在 10 号楼到东大操場的路上，有说是长矛扎死的，有说是用手榴彈炸死。

东门口马路上工人遗留下大量的车辆和香肠、面包等食品，学生们纷纷搬进八饭厅。

下午正在北京积水潭医院看病的清华学生张存和，忽然见到救护车送伤员来到急诊处。他走到跟前看，原来是从清华送来的受伤工人，多是身体不同部位被长矛刺的伤口，深浅不一。救护车先后来了几次，张存和见到的伤员不下 30 人，他们的表情不

仅痛苦不堪，还有惊恐和愤怒。张存和的第一反应是赶紧摘下清华大学的校徽，然后再过去细看，见到了工人的伤口，听他们讲述着各自的经历，十分震惊，心想："这些人可真下的了手啊！"由于积水潭医院医护人员忙不过来了，后来的几辆救护车见状，就把伤员拉到别的医院去了。

18时左右，数力系一学生来静斋找任传仲批手榴弹。当时"井冈山"在化学馆制造手榴弹，由任传仲负责。所以要领取手榴弹，需经任传仲批条才行。此时任传仲出去了，那位同学找到陈育延，说天快黑时，有一卡车卫戍区的武装士兵在招待所下车，学生们怕晚上受到袭击，要几个手榴弹自卫，任传仲不在，要陈育延批个条。陈育延因为很久未管事了，怕批条不管用。那位同学说："试试看吧。"陈育延批了条子。

下午，鲍长康的同班同学李世雄在礼堂后边的小河对岸，看见鲍长康坐在大礼堂东侧墙根下，就喊鲍长康，没有回应。李世雄就往河里扔石子。

鲍长康听见一会儿扑通，一会儿又扑通的声音，发现有人往河里头扔石子。抬头一看，是李世雄！这个时候，看守鲍长康的工人也发现了，站起来就往小河上的桥上跑。鲍长康情急大叫："李世雄，快跑！"

李世雄拔腿就跑。可是到处都是工人，哪里跑得脱？很快，他也被抓了，扣在离鲍长康不远的地方。过了一会儿，天慢慢的阴了。突然图书馆方向一阵骚动，只见工人从图书馆往大礼堂方

向跑来。鲍长康被工人带到大礼堂的正门处，天打雷了，雨点滴了下来。鲍长康听到从小桥的方向传过来一声爆炸声，看到很多工人从图书馆那边跑过来。突然，两名工人用拳头狠狠地打向鲍长康的脸部，接着腰上也被猛击了几下。他还没感到疼痛，就昏厥过去，然后被抬上了一辆卡车，送往医院抢救。

19 时多，谢富治和 8341 部队的迟群、谢静宜来到北京市革委会，由谢富治、吴德主持，在市革委会会议室，迟群、谢静宜及工人宣传队的代表和蒯大富开始谈判。迟群要蒯大富立即停止武斗，拆除工事，交出凶手。

面对迟群等人的指责，气得直打哆嗦的蒯大富对迟群说："这里没有你们的事。这是大学，工人没理由，也不可能解决我们红卫兵之间的事情。"

迟群理直气壮地回答："我们是毛主席派来的，是来这里宣传毛泽东思想，谁阻拦，谁就是反对毛主席，反对中央文革！"

对迟群他们提出的制止武斗，撤出工事，蒯大富同意。当迟群提出要交出杀人凶手时，蒯大富急了，质问："什么杀人凶手？"

迟群："你们打死我们人了。"

蒯大富连珠炮似的大声说道："怎么打死的？谁打死的？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这条我接受不了！"

谢富治命令蒯大富：停止武斗、撤除工事，上缴武器，撤出武斗据点。并指示蒯大富与工人宣传队代表一起，立即回清华大

学实施上述命令。

晚饭后，迟群等人与蒯大富他们一起回到清华。迟群先将蒯大富带到清华大学南门外的清华园中学一教室内，对他说："工人都气炸了，非要交出杀人凶手。"

蒯大富说："凶手肯定没法交。今天制止武斗、交出武器、撤出工事，这肯定没有问题，我到现场就肯定能解决。交出凶手，我办不到。"

就在蒯大富与迟群正在清华园中学谈判时，清华大学"井冈山"几个头头也正在清华园静斋开会。

会议是在晚上 19 时左右开始的，由"井冈山"任传仲召集所有在静斋的总部头头和分部头头陈育延、崔兆喜、邢晓光、刘才堂、周大卫等，任传仲主持，先让大家讲一下情况。

陈育延讲了打电话问市革委的情况，说"市革委值班的女同志讲：不知道工宣队是哪里派来的。"

邢晓光讲了工人占领了机械系的教学大楼——9003 大楼，"有 30 多名井冈山战士被抓，有人被打，至今还未放出。"

是否去 9003 解救被抓的"井冈山"同学？邢晓光认为，既然是"战友"，哪有不救之理？到会的人都同意。最后，任传仲决定，由谢德明、邢晓光和电机系的一个头头带人去救，救完就回化学馆。任传仲说："我在那等你们。"

任传仲让陈育延和刘才堂到明斋去审问被"井冈山"抓的工人和解放军，问他们是谁派来的。他交给陈育延和刘才堂两

个从工人和解放军身上搜到的本子，里边记着工人们这次行动前的报告、计划和要抓的头头的名字，原文是：

蒯大富、包长常（鲍长康）、任传中（任传仲）、刘彩堂（刘才堂）、陈一言（陈育延），也有 414 的头头沈如槐、张雪梅、陈楚三、刘万璋。

陈育延和刘才堂在明斋问了两个 8341 部队的解放军，问他们是谁派来的，他们只说是来宣传《七三布告》、《七二四布告》的。

静斋会后，邢晓光和另外两个系的头头各自集合本系的部分“井冈山”学生来到 9003 大楼，看到楼前只有少数工人走来走去，不像严防死守的样子。遂商量了几个原则：这次来只为救人，尽量不与工人打斗。为避免黑暗中伤了工人，都把钢管矛倒过来尖朝后，尽量虚张声势，吓跑工人即可。随即，他们大声鼓噪，呐喊着冲进 9003，根本就没遇到抵抗。他们在一楼、二楼的一些房间里解救了若干学生。

接着，邢晓光带着几个人顺中央楼梯往四楼边走便喊：“工人兄弟们，我们不是来抓你们的，只要求你们放了我们的同学！”

此时楼上鸦雀无声，静得让人感到可怕。邢晓光停下脚步，考虑还往不往上走。当他又往上迈了几步时，忽然听到一人大声喊道：“打！”随即四楼栏杆后便砸下大量车刀、手轮，螺栓等。邢晓光只觉得头顶上被一个东西砸中，站立不稳，踉踉跄跄往下跑。用手一摸，满手是血。他被同学扶到一个房间，脱下背心从

头顶到下巴紧紧系了一个圈，简单止了血。

此时，困守在 9003 楼顶的“井冈山”也迅速冲下。用长矛刺死在在三楼一房间小憩的北京第一食品厂工人韩现忠，打伤许多工人。

北京橡胶四厂工人、中共党员李文元，在 9003 大楼西南角广场，被学生用手枪子弹打中右下腹部，大出血身亡。

被 8341 部队扣在 9003 大楼的王良生在睡梦中被一阵惊叫声突然吵醒，站起来一看，是电机系学生、“井冈山”“洋枪队”的负责人之一庄来佑领着几个学生从楼外顺着下水管爬到四楼、踢开窗户、跳进了室内。只见这位头戴钢盔、小腿系裹带、脚穿高帮白球鞋、身穿紧身白上衣、手持冲锋枪的戎装小伙对王良生说：

“我们是来解救你们的。”

8341 部队那位干部说：“王良生，你告诉你们的人，不得伤害我们。”

王良生说：“好。”随即对庄来佑说：“你们不要伤害他们。”

庄来佑答应道：“照办。”

接着，8341 那位负责人就紧随着王良生离开了 9003。

“井冈山”重新占领了 9003 大楼。

大约个把小时后，邢晓光他们和 9003 的人商量后，决定 9003 的人仍然留下保护设备，而邢晓光等人则按原计划向化学馆撤退。在化学馆，他们与一直在这里等待他们的任传仲回合。

在 1968 年 7 月 27 日这一天，从正午到子夜的 12 个小时里，

工人宣传队有 5 人被打死，731 人受伤，其中重伤 149 人，轻伤 582 人，被抓 143 人。工人也扣留了 100 余名“井冈山”人员。

而在清华园中学，22 时 45 分，迟群经过与蒯大富的激烈争吵，也不坚持了，依然还是达成在市革委会谢富治提出的四条：停止武斗，拆除工事，上缴武器，撤出武斗据点。双方在这四条协议上签字后，蒯大富与 5 名工人代表、1 名军代表前往明斋“井冈山”广播台落实广播上述协议。

来到明斋后，蒯大富看到“井冈山”好多头头都在这里，于是把同来的工人和解放军代表晾在一边，抓住机会跑到另一房间对在明斋的“井冈山”几个头头说：“马上召集所有在校的总部委员和分部委员在明斋开会。”

“727”这天深夜的清华园，一片荒凉，不见人烟，让人感到空得可怕。来到明斋开会的“井冈山”头头有 20 多人。蒯大富主持会议，先讲了在市革委谈判的结果，签订的四条协议。又让大家谈了学校的情况。

蒯大富说：“我今天跑出去以后，到市革委会见到吴德，其他人没有见到。吴德同工人站在一起。吴德告诉我，说我们打死了工人，打伤的工人也特别多，北京大医院已经住不下了。”

他一改白天下令抵抗的态度，说：“现在不得了了，我们肯定把工人打死了。不打死人还好办，一打死人，我们向中央没法交待。现在，工人对我们恨极了，要和我们拼命。10 万工人已经把我们清华围得像铁桶似的，出不去了。明天我们可能就是灭

顶之灾，会有更多的工人把清华包围起来。摆在我们面前的只有两条路：一条是留在清华继续和工人打，另一条是退出清华。今天晚上把武器全部埋起来，或者扔了，然后人呢，全部撤空。清华我们不要了，跑到外面去，跑到大街上去。”

讲到这里，多数人反对逃跑，表示要留下来继续打。蒯大富说：“如果我们留下来，也有两条路：一条路是明天我们用我们的全部武器、弹药再和工人打一次，那工人的死伤就更不得了；另一条是我们打输了，我们就可能被几万工人打得全军覆没，和‘上柴联司’下场一样，这两条路都是死路。惟一的活路，三十六计，走为上计！”

会上吵成一锅粥，有人喊着“要拼了，一拼到底!”

蒯大富说：“我们在北京，在毛主席身边，这么大的事件，中央马上就知道。只要中央知道了，一切就好办了，中央肯定会救我们。请大家相信，有人在，就有清华‘井冈山’在。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全打死了，你占楼还有什么用？”“我们跑出去，我们就是弱者，这样，在中央面前，我们就好说话。”

经过两个小时左右的激烈争吵，在蒯大富的竭力说服下，尽管有人提出拉队伍去京郊山区打游击，但多数人还是同意了蒯大富撤离清华大学的意见。

任传仲、崔兆喜坚决不同意撤退，认为是右倾逃跑主义。于是只好兵分两路：任传仲、崔兆喜等不同意撤退的少数人去 9003 大楼支援那里的“井冈山”，与他们一起“战斗到底”。而赞成撤

退的，全部撤离清华园，撤往北航和清华大学昌平 200 号原子基地。

这时，已是 28 日凌晨 2 时多，在清华大学的正门、南门、西门都有工人，只有北边有一个通往北京体育学院的小北门，工人不知道，无人把守。“井冈山”人员像逃难一样，都从北边、体院那边跑了出去，大部分到了北航。当时清华参加武斗的约有 1000 人，加上逍遥派，约有 2000 人，都跑了，在那浓浓的夜色里，蠕动着黑压压的一簇一簇的人群。

蒯大富没有立刻走，他与总部委员陈育延、蒯大富的秘书段永基、“井冈山”总部第三动态组组长、精仪系光 7 班学生张树友在明斋一起继续打电话联系中央，没有结果。然后在新斋楼外的空地上与任传仲、崔兆喜、周大卫等人就“撤不撤”的问题又发生了争论，最后才叫上司机，蒯大富、陈育延、段永基、张树友与司机 5 人狼狈不堪，又无比辛酸地离开了清华园。任传仲、刘才堂、崔兆喜等人全都没有跟他走，蒯大富也没有要求他们同时撤。

“贵州 411”从 10 号楼冲出来后，开始在清华校园转悠，后接“贵州 411”负责保卫的通知，回 10 号楼商量修工事加强保卫事宜。28 日凌晨 1 时左右，他们接“清华井冈山总部”撤离通知，于 2 时多，随清华“井冈山”从清华北校门撤离。

穿过清华附中，便是一片纵横交错的稻田，刚下过雨，高低不平的田埂地泥泞难行。贵阳医学院学生戴碧玉视力不好，田世

信老师一直牵着她。不时听到有人掉进稻田的呼喊。行至清河，天色破晓，队伍解散，各奔东西。田世信回北京父母家，戴碧玉陆续碰到贵阳师范学院学生王明媛、贵阳医学院学生李仁福、习更生、贵阳五中初中学生杨道明等人，结伴直奔长城。两天后，他们几人冒充刚从家乡返校的清华学生，又在清华一间教师宿舍住了十几天。

28 日凌晨 4 时左右,乘车撤往昌平县清华 200 号原子基地的“井冈山”数十人，行至沙河附近时，因司机数日未眠，驾车睡着，汽车翻入路旁稻田。车上李康群为防备外人截车，带了三个手榴弹，都开了盖。车翻时，手榴弹被引爆，炸死 2 人，伤 5 人。

## 第 1031 回：聂元梓，北京大学议对策　毛泽东，急召见“五大领袖”

7 月 27 日晚上，北京大学的聂元梓、孙蓬一也紧急召开各系文革主任、“公社”战斗团的联席会议，针对清华大学的情况，商量怎样对付强行进入高校的工人、解放军。最后决定：

(一)拒之门外，让进校者派代表与校文革协商；

(二)抵挡不住，则退入楼内，各自为战，做到人在楼在；

(三)最后不行，聂元梓就带领人们到北大荒去等等。

清华大学学生打死进校工人的消息震动了中央。7 月 28 日凌晨 2 时多，就在蒯大富组织清华“井冈山”撤离清华的时候，周恩来打电话给毛泽东，告知清华发生了流血事件。

毛泽东立即通知中央政治局以及中央文革小组的有关成员和工人宣传队的代表到人民大会堂 118 厅，他仔细倾听了情况汇报，然后决定召见北京红卫兵的“五大学生领袖”：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谭厚兰和王大宾。这是毛泽东第一次召见红卫兵领袖谈话，也是最后一次。

凌晨两点多钟，急促的电话铃声将正在熟睡的韩爱晶唤醒，他拿起电话，是北京卫戍区军代表刘丰打来的，他问：“韩爱晶吗？”

得到肯定的答复后，刘丰说：“今天夜里中央首长在人民大会堂接见，要我通知你来开会。”

韩爱晶问：“可以派别人代替我去吗？”

刘丰说："中央首长要你自己来，到人民大会堂西侧南门口。"

韩爱晶驱车赶到人民大会堂西侧南门口。奇怪而令他不解的是，这次等待中央首长接见与以往都不同。以前凡是重大活动有正式入场券，一般从东侧正门进大会堂，有时还在主席台就坐。如果平时中央领导接见，他们一般从南门进，汪东兴经常站在门外迎接。可是 7 月 28 日凌晨，他来到人民大会堂西侧南门，只允许进到过道门里坐下来等，韩爱晶似乎有一种受到冷落的感觉。

接着，聂元梓、谭厚兰、王大宾也先后到了，他们都坐在过道门里等待，很自然谈起白天清华园发生的事情。

王大宾严肃地说："清华学生开枪，打死了工人……"

聂元梓说，这么多工人包围清华，她白天已打电报给中央反映这一情况。

等了大约 20 分钟左右，凌晨 3 时多，谢富治出来问："都来了吗？"

大家说，蒯大富还没来。谢富治说："不等了，进去吧。"

4 人跟着谢富治向里走。韩爱晶走得快，挨在谢富治身边。到楼道中间要向右拐时，谢富治突然停住脚步看看韩爱晶问道："身上有小刀没有？"

大家都站住了，韩爱晶说："没有。"

谢富治弯下身子，用手把韩爱晶卷起来的裤腿抹下来。因为

天热，韩爱晶白天都把裤腿卷到膝盖上。谢富治站起身说："快进去，毛主席在里面等你们好一会儿了。"

他这句意想不到的话所表达的内容跟他刚才在外面平淡的表情跨度太大了，大家简直不敢相信，觉得好像一下飞腾到云雾之中，顿时有迷离为梦的感觉，也来不及想什么，只是快步跟着谢富治往里边一个门走去。

当他们走到门口时，看见吴德和北京卫戍区政委黄作珍已在门口。他们看到谢富治和 4 位学生领袖走过来，迎了几步后，随他们一起走了进去。

进了大门，突然看到毛泽东和他身后的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姚文元、叶群、汪东兴、谢富治、黄永胜、吴法宪、温玉成，众位中央领导已经站在门口迎接他们了。走在最前面的韩爱晶激动得如坠五里云烟，赶紧三步并作两步赶上前去，毛泽东也往前走了一下，并向他们伸出手来。4 个年轻人非常激动地跟毛泽东握手，嘴里不停的说："毛主席，您好！"

毛泽东边握手边说："都是一些年轻人。"

聂元梓他们又依次与其他中央领导人一一握手。

毛泽东在和最后面的黄作珍握手时说："你叫黄作珍？我不认识，你没被打死！"

说完，毛泽东要大家坐下。

众人在沙发上坐了下来。只见一个一个沙发围成大半个圆形，沙发旁边有茶几，茶几脚旁有白色搪瓷痰盂。可以看得出来，

毛泽东和中央领导们已经在这里议论了一段时间。

大会堂女服务员给大家分别倒了茶水。

江青说："好久不见，你们又不贴大字标语。"

毛泽东说："都知道，都认识。还不是在天安门上见过，又没谈话，不行嘛！你们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啦，不过你们的小报我都看过，你们的情况我都了解。"

毛泽东大概因为经常游泳的缘故，脸上映着红褐色的光泽，微黑，如同古柏，显出超人的神圣。他没有看见蒯大富，便问："蒯大富没有来？是出来不了，还是不愿来？"

谢富治回答："恐怕是不肯来。"

韩爱晶觉得谢富治说的太不合情理，就急忙替蒯大富解释说："不会的，这个时候他要是知道中央领导接见不会不来，他要是见不着毛主席，他会哭的，肯定是出不来"。

毛泽东说："蒯大富要抓黑手，这么多工人去'镇压''压迫'红卫兵，黑手是什么？现在又抓不出来。黑手就是我嘛！他又不来，抓我就好，来抓嘛。本来新华印刷厂、针织总厂、中央警卫团是我派去的。我说你们去做做工作看，结果去了 3 万人，你们看怎么办？大学武斗怎么解决？其实他们恨北大，不恨清华。"

他一边说着，一边抽一只雪茄，偶尔咳嗽，声如钟磬，清脆顺畅。

说着，毛泽东转向聂元梓问道："工人和学生这样搞，几万

人游行。听说你们那里招待还好，是你们还是‘井冈山兵团’？”

北京卫戍区司令温玉成和政委黄作珍说：“不是他们，北大和那个单位冲突了。”

聂元梓说：“是和农科院，我们还在门口摆了茶水，他们骂我们二流派，老保，还骂我破鞋。”

韩爱晶阻止说：“不要在主席面前说这个。”

毛泽东：“那不知道，你们没跟他们打？”

聂元梓：“互相打了。”

毛泽东：“北大抓黑手，这个黑手不是我，是谢富治，我也没有这么大的野心。我说你们去那么一点人跟他商量商量，蒯大富说去了十几万。”

谢富治：“不到3万人。”

毛泽东用商量的口吻说：“你们看大学武斗怎么办？一个办法是统统撤出去，学生也不要管，谁想打就打，过去北京市委、卫戍区对武斗的态度是不怕乱、不管、不急、不压。这看来还是对的。另一个方法是帮助解决一下，这个问题深得工人的赞成，深得农民的赞成，深受学生大多数欢迎。大专院校五十几个，打得凶的，也就大概五、六个，试试你们的能力。至于如何解决呢？你们提出意见。我看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你们北京大学要那么大干啥？如果解决不了，不一定住在一个城市，一个住在南方、一个住在北方，都叫新北大，在一个城市打一个括弧

‘井’　在一个城市打一个括弧‘公社’　。就像苏联共产党打一个括弧‘布’，另一个苏联共产党打个括弧‘孟’。”

大家听得都笑了。毛泽东又接着说：“如果你们不能解决这些问题，第三个办法，那么军管。请林彪同志挂帅，还有黄永胜，问题总要解决嘛！你们搞了两年了，斗、批、改。一不斗，二不批，三不改。斗是斗，是搞武斗。你们也不斗，也不批，也不改，人民不高兴，工人不高兴，农民不高兴，居民不高兴，部队不高兴，多数学校学生也不高兴，就连拥护你的那一派也有人不高兴，就这样一统天下？你新北大老佛爷，你是多数，是哲学家，‘新北大公社’、校文革里就没有反对你的人那？我才不信呢！当面不说，背后还是说怪话。”

他把脸转向地院王大宾问：“王大宾，你的事情好办一些吧？”

王大宾说：“那几个反对谢副总理的、反我们的人都跑了。”

谢富治说：“他的二把手聂树人要夺权，说他右了。”

毛泽东：“他就那么左？马克思？”

王大宾说：“那是他们挑拨关系。聂树人是一个好同志，出身又好，苦大仇深，这个人很正直，革命性强，就是急一些，不大会团结人，工作方法生硬一些。”

毛泽东说：“你能团结他吗？一个左、一个右，很好团结嘛！你坐那么远，你坐过来些，到我这里来。”

林彪说："来嘛。"

谢富治也对王大宾说："去、去。"

王大宾起身坐到毛泽东旁边。

毛泽东招呼他说："坐下，坐下。事情都要留点余地，都是学生，你们也没搞黑帮，最近有些学校斗了些黑帮，画了像，新北大搞了十几个，就那么点黑帮？我看不止那一点，就是因为关键两派忙于武斗。这个斗批改不行，或者斗批走，学生不讲了嘛：斗批走，斗批散。现在的逍遥派那么多，现在社会上说聂元梓、蒯大富的坏话的多起来了。聂元梓炮灰不多，蒯大富的炮灰也不多，真的打起来，有时候 300，有时候 150，哪里有林彪，黄永胜的那么多，这回我一出就出 3 万多。"

林彪说："哪有黄永胜那么多。"

毛泽东："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把武斗工事统统拆掉，什么热武器、核武器，要刀枪入库。聂元梓，他们叫你佛爷爷，叫你佛爷老巢。难道你认为'新北大公社'、'校文革'就没有人反对你？我不信。当面不说，背后还是有人说你坏话的。还有你这个谭厚兰同志，你还是个小辫子嘛，你就要下放？在学校读了十几年书，大家赞成你下去，我怕你走不开，你走了谁来代替你呢？"

谭厚兰说："都安排好了。"

毛泽东说："你们这五大将我们都是护你们的，包括抓黑手的蒯大富，我也是偏向你们这一边，你们回去一讲，我们有偏向，

‘井冈山’、‘四一四兵团’，就会对我有意见。我不怕别人打倒，清华‘四一四’说：‘四一四思潮必胜’，我就不高兴。说打江山的人不能坐江山，无产阶级打天下不能坐天下？坐天下的就是‘四一四’？‘四一四’有个理论家叫周泉缨。理论家何必抓呢？人家是一派的理论家嘛。人家写文章你抓人家干什么？应该放出来。人家有意见让他再写嘛！不然不是没有言论自由了吗？”

温玉成立即起身打电话叫卫戍区放了周泉缨。

毛泽东接着说：“我说你老佛爷也大方点。北大‘井冈山’有几千人，那一河水放出来，大水冲了龙王庙，你受得了受不了？你这个老佛爷，不然就实行军管。第三个方法就按照辩证法，而且不要住在一个城市里，就一分为二，一个南一个北，或者你搬到南方，或者‘井冈山’搬到南方，根本不见面，打不起来，各人自己清理自己的内部，一统天下，不然你也害怕，把你那老佛爷老巢一捅就睡不着觉。你怕，他也怕，稍微留一手是必要的，你们大概还是留一手的，……留一手也是必要的，何必那么紧张呢，怕人家打，你不留点后手，人家一冲怎么得了啊。……什么？听说不是一个凶手戳你吗？知道了凶手是谁也不一定要抓，算了，明明知道是他也不要说了。不过你以后要注意一点，不要一个人到处乱跑。”

江青说：“她有人保镖。”

聂元梓说：“没有。”

聂元梓说：“地质学院支持他们，半夜里抄我的家，到北大

游行，把破鞋挂在树上。”大家沉默片刻，相对无言。

毛泽东说：“人家说你哥哥也不好，姐姐也不好，你这个聂家就是不好。哥哥不好是哥哥，姐姐不好是姐姐，为什么一定要牵连妹妹呢？”

这时有人进来报告说：“还是找不到蒯大富。”

谢富治说：“广播了，点名说中央文革要找，要请华蒯大富来开会，他就是不肯来。”

江青问：“是他自己不愿意来，还是出不来？”

谢富治回答：“我估计有人控制他，有人控制他也不紧。”

姚文元说：“有可能。”

毛泽东：“蒯大富这个人我看是好人，出面多。操纵他的人是坏人，蒯大富以及出面的人是好人，这个经验很多。王大宾，你那里没有打架？”

王大宾说：“我那里没有，就是 66 年 9 月 23 日和保守派夺电台干了一下，是伯达同志派人救援我们，以后我们就没打过。”

毛泽东：“那就好。以后一个你，一个韩爱晶不要打架。”

他又风趣地说：“韩爱晶，很会出主意啊，是个谋士啊，是不是韩信的后代？”

韩爱晶说：“我们学校工农子弟多，比较朴实，有不同意见，但没有分裂为两派。”

康生：“听说这次武斗蒯大富是司令，韩爱晶是政委。”

韩爱晶："这件事与我没有关系。我批评蒯大富，他回去以后，别人就左右他了。我们学校是一派，很团结。"

康生说："韩爱晶，不是你说的那样吧？"

姚元文说："我才不信呢？你们那里就没有不同意见，纯之又纯？"

毛泽东："你们不要把韩爱晶说得那么坏，人家很难受。"

韩爱晶："蒯大富周围有一批人，里面比较杂，运动初期靠写大字报起家的人，权少了，搞武斗的人，权多了。要求改组总部。蒯大富控制不了。"

毛泽东说："谭厚兰，文化革命两年了，你那个一、二百人的'兵团'也没解决得了。弄得你睡不着觉，你暂时还不能走，你是女皇啊！今天 4 个，两个女的，真了不起，我看你暂时还不能走，给他们恢复粮食，出出进进，那些人也够惨的，'造反兵团'是个湖南'省无联'式的大杂烩，因为他夺权嘛！别的有些学校都参加了。"他指着韩爱晶说："你，蒯大富都有份。"

韩爱晶说："我也参加了。我错了。"

江青说："那是韩爱晶想颠覆人家谭厚兰。"

毛泽东说："你也有份，我们的蒯司令也有份。青年人就是做些好事，也会做些坏事"。

他又说："你们说中央没打招呼，林彪同志、周恩来在 3 月 24 号，27 号讲了话，又开了 10 万人大会。这次黄作珍同志、温玉成同志讲了话，可是下面还打，好像专门和我们作对。我们这

么一个道理，第一条要文斗，不要武斗，如果你们要打，就打，也可以，越大越好，两方面都有土炮，你们算什么打嘛，你们的打法算不了什么打，把卡宾枪、大炮都使出来，像四川一样，把高射炮对天上打。”

江青：“败家子。”

## 第 1032 回：似漫谈，海阔天空说文革　讲“黑会”，众人批评韩爱晶

毛泽东边抽雪茄边说话，有时还用火柴重新点燃雪茄。他对聂元梓说：“你这个老佛爷，那么大的神通，调起兵来只调两、三百，你的兵跑哪去了嘛。还得靠工人、复员军人为主力，没有那个你还是不行。护兵，林彪同志多呐！给你几千、几万，可以把‘井冈山’统统灭掉嘛！这个问题也不要在这里答复。商量商量也可以，开些会讨论，但是首先还是要联合。”

林彪说：“首先还是要联合，主席讲的四个方案：第一，军管；第二，一分为二；第三，斗、批、走；第四，要打就大打。”

毛泽东说：“一分为二，就是因为结了仇，双方紧张得很，双方都睡不着觉。搬家可是个问题，找地点，在北京就会争起来。我看这个大会堂很空的，中南海地方很大，可容四、五万红卫兵，办个学校还不行？或者聂元梓来，或者候汉清来。

你们不是叫‘杀牛宰猴炖羊肉’嘛？牛是牛辉林、猴是侯汉清、羊是杨克明，这 3 个人我知道杨克明。杨克明也是个青年人嘛！到过十一中全会，那张大宇报杨克明帮了忙，你们这张大字报分成了两家，这种社会现象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谁会料到会打起来呢？原来打算停课半年，登了报，后来不行，延长一年，又不行，两年，不行再延长一年、两年、三年。我说，三年就三年嘛！不行要多少时候就给多少时候，反正人是在长的，你一年级现在就是三年级了。再搞两年，四年，八年，你还不是在

那里过一天长大一天？斗、批、走也是一个办法，谭厚兰不就是想走了嘛。走光，扫地出门，大学还要不要办呢？要不要招新生呢？不招新生也不行。我那个讲话是留有余地的，这个大学还要办，讲了理工科，并没有说文科都不办。但旧的制度、旧的办法不行，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我看现在高中比大学的课程还多，上六年、十年顶多了。搞不出名堂就拉倒。我看高中、高小、初中基础课跟大学差不多，这专业课先生都不大懂专业，哲学家讲不出哲学。你聂元梓不是哲学家吗？”

聂元梓说：“我不是哲学家。”

江青打趣说：“她是老佛爷。”

毛泽东说：“这个哲学有什么学头呢？这个哲学是能够在大学里学来的吗？没有做过工人、农民就去学哲学，那个哲学叫什么哲学？”

林彪说：”越学越窄，是窄学。”

毛泽东：“如何学文学呢？就不要搞文学史，但要写小说，每周给我写篇稿，写不出来就到工厂当学徒，当学徒就写当学徒的过程，现在学文学的写不出小说、诗歌。上海的胡万春原来还是写了很多东西，以后就没有看见什么了。”

周恩来说：“还有高玉宝都进了大学，后来头脑都僵化了。”

毛泽东说：“我跟你们讲讲马、思、列、斯，除了马克思，列宁大学读完了。其他人都没读完，列宁读法律读了一年，恩格斯只上了半年，中学还没有读完，父亲叫他到工厂当会计，后来

工厂搬到英国，在工厂里接触了工人，恩格斯的自然科学是怎么学的呢？是在伦敦图书馆里学的，在那里呆了八年，根本没有进大学。斯大林没有进过大学，他是教会中学毕业的。高尔基只读了两年小学，比江青还差，江青是高小毕业，读了六年，高尔基只读了两年。”

叶群：“江青同志自学很刻苦。”

毛泽东：“你不要又吹她。学问才不是靠在学校里学来的，以前我在学校里很不规矩的，我只是以不开除为原则，考试嘛！60 分以上，80 分以下，70 分左右，好几门学科我都不搞的，要搞有时没办法，有的考试，我有时交白卷，考几何我就画了一个鸡蛋，这不是几何嘛！因为一笔交卷最快。”

林彪说：“我读中学，读四年，没毕业就走了，自动退学，又没有中学文凭，去当小学教员，喜欢自学。”

毛泽东：“现在办军事学校害死人，黄埔军校你们知道多长，3 个月，6 个月。”

林彪说：“一、二、三期只有 3 个月，到了四期加长了。”

毛泽东：“就是训练一下，改变一下观点，至于有什么学问呢？不太多，实际学一些军事教练。”

林彪说：“有一点，学了就忘了，学几个礼拜的东西，到军队里几天一目了然，读书结合不起来，百闻不如一见。”

毛泽东说：“我就是没上过什么军事学校，我就没读过什么兵法，人家说我打仗靠《三国演义》，我说《孙子兵法》我没有

看过，《三国演义》我是看过的。”

林彪：“那时候你叫我给你找，我没给你找到。”

毛泽东：“遵义会议的时候，我跟谁辩论……”他记不起那个人的名字，看看周恩来。

周恩来说：“是何克全。”

毛主席接着说：“他问我《孙子兵法》你看过没有，我问他：《孙子兵法》有多少篇？他不知道。我问他第一篇叫什么？他还是不知道。后来我写什么战略问题才把《孙子兵法》粗粗望过一遍。”

“什么叫兵法，谁学英语，阿特密尔就是兵法，阿达密尔孙子就是《孙子兵法》，还是学英语好，我半路出家外文吃了亏，学外文要赶快，年轻时学好，谭厚兰你学什么？”

谭厚兰说：“我学俄文。”

毛泽东又问韩爱晶和王大宾，他们也都回答了。

这时，韩爱晶说：“主席，文化革命搞完以后让我当兵去吧。”

毛泽东回答道：“当半年兵就够了。当那么长时间兵干什么？当半年兵一切就范，再当一年农民，两年工人，那就是真正的大学校啊！真正的大学是工厂，农村。你说林彪同志不算个知识分子，上过中学。黄永胜，温玉成还不是丘八！”

毛泽东问黄永胜：“黄永胜你念过几年书　？”

黄永胜马上站起来，把军帽子放在茶几上，毕恭毕敬答道：“一年半。”

毛泽东又问："你家什么成份呢？"

黄永胜回答："下中农。"

毛泽东转向温玉成："温玉成你念过几年书呢？"

黄永胜坐下去了，温玉成又站起来毕恭毕敬地回答说："三年。"

毛泽东问："你家什么成份呢？"

温玉成说："贫农。"

毛泽东："都是土包子，就这么点学问，黄永胜就学这么点，他当总参谋长，你信不信？黄永胜这个人我原来也不认识，到北京来谈了两次就认识了。"

毛泽东说："所以，斗、批、走也是个办法。走谭厚兰的道路，谭厚兰不是想走吗？

我并没有说文科都不要办，但要改变办法，学文的要写小说，诗歌，学哲学的要写论文，论述中国现在革命斗争的过程。至于，法律恐怕是不太要学为好。你们说，根据法律……听说'天派'反谢富治，不了了之，'天派'又不反了。砸烂公检法，砸烂谢富治，实际上砸烂公检法，是谢富治第一个提出来的，北京公安局三万人，弄出九百几十个地富反坏右。因此提出砸烂公检法，三万人只剩百把十人，其余进学习班，你们也提口号。谢富治是中央的人，可你们一定要打倒。于是匆匆忙忙抓人，'人大三红'总部不出面，只让个小战斗队提打倒谢富治。只是一个战斗队，追究责任，他说只是一个战斗队，我们总部没有打倒谢富治。他

们提出打倒反革命赵贵林。赵贵林我不认识，但怎么是反革命呢？你们那些材料我都看过。聂元梓，侯汉清你们还没有提他们是反革命嘛。”

聂元梓说：“侯汉清在社会上搞了一个反动集团，恶毒攻击主席、林副主席。”

毛泽东：“我们这些人受到一些诬蔑不要紧。牛辉林纲上得不好，又不是什么大的政治问题……法律也不一定要否定。政法学院，一个‘政法公社’、一个‘政法兵团’，他们听了要不高兴的。要把时间减少，挑工农子弟。鞍钢一个审讯侦察的案子，有群众参加消息灵通，多少年没有查出来的案子搞出来了。在这之前公安局预审没有别的办法，只是打人，现在由群众来审，又不打人。用侦察得来的材料不确切，军管会还不是丘八。温玉成，黄永胜，这些人又不认识人，就根据几个侦察能行吗？我们说：向群众学习，他们……我说一不要杀，二不判重刑，判他们二三年算了。军队过去关禁闭现在还有没有？逃兵你们还抓吗？”

温玉成说：“禁闭早就取消了。”

毛泽东说：“人家还想逃，你抓回来干啥呢？斗、批、走，如果他想走，就让他们走，为什么人家要走呢？还不是斗了他，批了他，打了他，不舒服。或者家里有家事，或者军队太苦了，他受不了。逃兵不捉，不关禁闭，逃兵比过去反而少了。我们是人民解放军，现在学校捉了人要做俘虏，要供，不供，就打，打死了，打伤了，知识分子最不文明了。你说什么知识分子最文明，

我看最不文明。我看老粗最文明，黄永胜、温玉成也不抓逃兵了，也不关禁闭了。你们发明了个喷气式，这个罪魁祸首是我，我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里讲戴高帽子游乡，我可没讲坐飞机。我是罪魁祸首，罪责难逃啊！今天怎么样？以为要抓你们来坐禁闭吗？‘井冈山’他们这个做法不好，我说这蒯司令的‘井冈山’打死 4 个人，打伤针织总厂 50 个，就是如果不考虑这个社会影响，我也不是看一个人，实际损失最小，最小。”

林彪说：“值得，损失最小”。

周恩来说：“林副主席说得好，损失最小最小，成绩最大最大。”

毛泽东说：“如果以后有工人到你们那里去，应采取欢迎的态度，你们呀，不要采取蒯大富这个办法。”

周恩来说：“在 1966 年下半年，你们去工厂串联，工人欢迎你们，没有打你们嘛。”

毛泽东说：“让他们去宣传嘛！不要开枪，是工人么，是中央派出的么！不是工人是领导阶级吗？我们不是说过工人阶级专政么！专你们学校极少数坏人的政。你们都是主要人物，知名人士，包括蒯司令。现在搞个串联会，又在清华开会，又在北航开会，还在和平里开会，又是广西的‘422’，河南分出来的‘二七公社’，四川的‘反到底’，锦州的‘糟派’，辽宁的‘831’一部分，黑龙江的‘炮轰派’，广东的‘旗派’……这些都不该搞。”

韩爱晶：“有的我也不知道。”

姚文元：“你们侯玉山不是做了报告吗？”

林彪笑了说：“我们没有开九大，他们就开了。”

周恩来说：“也没有开十二中全会。”

毛泽东说：“又说是中央开十二中全会，中央闹得乱七八糟，斗争很激烈，什么社会斗争是中央斗争的反映。不是社会斗争反映中央，应当是中央斗争是社会斗争的反映。”

周恩来说：“北航要开什么国防科委系统的会议，开了没有？”

韩爱晶说：“我听到下面有这样的建议，一吓，没敢开。”

周恩来说：“这就对了，你是知道的嘛，国防机密嘛。”

毛泽东说：“我为什么不找你们的反对派呢？找你们几个人来讲讲这件事，使你们有个准备。我历来不搞录音，今天录了。不然你们回去各取所需。如果你们各取所需，我就放我这个东西，你们先去讨论讨论。这么一放，搞得许多人都被动，搞了这么多天不算数，开了这么多会。开始，黄作珍讲话不算数，找蒯大富也不算数，一定要中央直接表态，我对你们的事，除了运动一开始，管了一下，以后因为太忙，也就管不上了。北京有谢富治来管嘛。过去召集你们开会，我也不到的，林彪同志也不到的，当官僚了。这次怕你们把我开除党籍，官僚主义就开除，我又是黑手，镇压红卫兵。”

林彪说：“昨天我开车了，我说去看看大字报吧。我问‘怎么没有北大、清华的大字报？’人家说：‘他们武斗’。我说你们脱离群众，群众要求制止武斗的呼声很高。”

毛泽东说："群众就不要打内战。"

林彪说："你们把自己孤立到工农兵之外。"

毛泽东说："有人讲，广西的布告只适用于广西，在我们这里不适用。陕西的布告只适用陕西。那现在，再发一个全国的布告，如果谁继续违反，打解放军，抢劫军用物资，破坏交通，杀人放火，就是犯罪。如果有少数人不听劝阻，就是土匪，就是国民党，就要包围起来，就要打围剿，继续顽抗，就要实行歼灭。"

林彪说："现在有的是真正的造反派，有的是土匪、国民党分子，他们打着我们的旗号造反。"

毛泽东说："报告上要写清楚，给学生讲清楚，如果坚持不改，抓起来。抓起来，这是轻的，重的实行围剿。"

林彪说："广西烧了一千多间房子，还不让救火。"

毛泽东说："国民党还不是这样？这是阶级敌人的一种垂死挣扎，烧房子要犯大错误的。"

林彪说："我们长征过广西时，和白崇禧打仗，他也用此计，先放火，冒充共产党，现在是旧计重用。"

毛泽东说："韩爱晶，你是蒯大富的朋友，你要帮助他，做政治上的朋友。"

韩爱晶说："蒯大富是骑虎难下，下不来，他有难处。"

康生说："情况不是像你说的那样。"

毛泽东说："如果他不能从虎背上下来，那么我们就要杀掉老虎。你们把广西'422'的人藏起来了？广西学生住在北航？"

周恩来说："从广西来的人住在你北航，你们怎么召集那些人来参加这个会的呢？你们还把'422'藏起来，广西来的学生就在北航。"

康生："他们想控制全国运动。"

韩爱晶："那个会不是我们召集的。中央可以调查，当时，我生病在北京体育学院休息，学校里打来电话，说从广东来两个省革委会常委。一个是工人邱学科，一个是中山大学的武传斌，他们是找黄永胜总参谋长，他们说黄永胜支持他们，我说自己没有体力接待。北航的学生说，现在外面都说你韩爱晶骄傲自满，老大作风，自以为'上有天堂、下有北航'。五四国防科委学代会，外省来了很多领导和群众组织负责人，可是你根本不见人家。邱学科、武传斌是广东省革委会常委，你应该接待人家，要不人家说你是富农，不革命了。于是我在体育学院接待了邱学科、武传斌。送行时，他们提出要开一个全国形势串联会。我说北京不比外地，北京不能随便开会，一开会，中央就会批评是黑会。北京还有'天派'、'地派'，很复杂。我只同意，在'天派'、'地派'都参加的情况下，找几个可靠的造反派头头，革命委员会负责人聊聊，只搞情况，不谈办法。蒯大富，王大宾都参加才行，后来我住了医院。开会的那天，学校的同学打电话说，大家感到不对头，地质学院只参加筹备会就不参加了。蒯大富来听一会儿就吓跑了，井岗山也跑了。我说，那你们赶快写报告，把这件事报告中央，谁知道报告还没有写好，中央批评已经下来了，说是黑会。"

接着，康生、姚文元都批评韩爱晶……

毛泽东说：“你们把韩爱晶讲的太多了，他才 22 岁。”

## 第 1033 回：说北大，蒯大富姗姗来迟　见主席，似孩儿嚎啕大哭

江青说："运动初期北航也好、北大也好，外地人来上访，你们把他们藏起来，你们做了很多工作。事实上，我们当时有委托，现在变了，要认识了，现在再搞这个不行了。因为他们反对的是各省的革委会和解放军。谭厚兰，'九七'谁去给你稳定局面的？"

谭厚兰说："是毛主席，中央文革。"

谢富治说："那时江青同志知道了，是江青同志给你稳住了。"

江青说："对'兵团'我也不一定有多大好感。这么热天，断水、断电、断粮。三伏天，三个月不见阳光，亏你做得出？我听了都流泪了，他几百个人，几十个人也是群众嘛。还有蒯大富，最听韩爱晶的话，我们的话不听，你们想推翻谭厚兰。开头是韩爱晶不对，他想推翻你。"

韩爱晶："我有错。"

毛泽东："那是无政府主义，相当有点无政府主义。"

林彪："没政府的极端就是有政府。主席说，世界上无政府和有政府是相对的，只要有政府，无政府主义就不能消灭，过去说的奴隶主义，驯服工具走向反面，就是对中央右倾机会主义的惩罚。"

江青说："据说'兵团'反对我们的，我们为什么要替他们讲话呢？无产阶级要讲无产阶级的人道主义。你最好把他们放了，有几十个反革命分子，他们想绞死我，不管怎么样是年轻人嘛，

老佛爷也是这样，你也绝对的。什么油炸我啦，绞死我啦，我不怕别人油炸。我听说，北大‘井冈山’想油炸江青。”

聂元梓：“北大‘井冈山兵团’有人要油炸江青同志。”

姚文元说：“油炸只是一种说法。”

毛泽东说：“油炸，主要在小房里说说。那是希望，什么绞死蒯大富啦。”

谢富治说：“牛辉林不好。”

江青说：“牛辉林可能有点问题，也可以教育嘛。聂元梓，我还有没有点发言权？我躲着你们难过，你们现在都是群众斗群众，坏人藏起来了，我说过‘四一四’必胜吗？‘四一四’专门反对中央文革，也反对总理、康老，可他是个群众组织，蒯司令就要搞掉他。”

毛泽东说：“‘四一四’，几千人，你搞又搞不掉。北大‘井冈山’几千人，坏人自己会被端出来。”

江青情绪激动起来说：“我住的地方，你们都知道，要油炸就油炸，要绞死就绞死。我们都是一块共过患难的，就不能容人家，将来还要治国同天下呢！你看你们不学习主席著作，不学习主席作风，主席向来是团结反对他的人。”

毛泽东说：“可以不提了，‘宰牛杀猴断羊腰’，牛可以耕田嘛，宰了它干吗？我们为什么要杀猴呢？你们举例的罪状无非是攻击江青，攻击总理、林彪和我。统统一笔勾销，人家在小屋子里讲的嘛，又没有在外面贴大字报。”

江青说："贴大字报我也不怕。"

毛泽东问："前年什么山反对林彪同志？"

周恩来、叶群说："是伊林、涤西。"

毛泽东："此外，北京外语学院'六一六'的领袖刘令凯反对总理，总理一直保护着他。有人讲，总理宽大无边，我就同意总理这样做。'联动'这些人开始就不应该抓，许多人被抓了，我点了头。"

谢富治说："这与主席无关，是我抓的。"

毛泽东说："你不要袒护我，给我掩盖。抓，我也是同意抓的；放，也是我同意放的。"

谢富治说："没叫我抓那么多。"

毛泽东说："放了，就是八宝山、天安门骑着自行车，搞了一、二个月，他也没意思了。有些人耍流氓，无非弄几个钱，路上弄一个女人……彭小蒙不是那么反动吧？我看彭小蒙这个人还是不错的。"

姚文元说："他的父母很坏，跟伍修权搞在一起。"

毛泽东问："彭小蒙父母是干什么的？"

姚文元答："红十字会秘书长。"

江青说："在政治上我们对你们都是有政治责任的，帮助你们不够，你们自己去搞，各抓各的，抓出黑手，搞联合。"

聂元梓说："'井冈山'，下山 1000 多，正在办学习班。"

毛泽东说："下山的靠不住，你那里'井冈山'，大多数人身

在曹营心在汉，身在你老佛爷，心在‘井冈山’。不要关牛辉林，让他们回山去，有自由，不勉强，不要侮辱人家。尤其不要打，不要搞逼、供、信。我们过去是犯错误的，你们初犯错误，也怪不得你们。”

江青问：“樊立勤怎么样？”

聂元梓说：“没有搞他，他和彭珮云反革命集团搞成一块。”

毛泽东问：“牛辉林，把他看起来了吗？”

聂元梓说：“他内部看的，一部分同意，一部分不同意。”

毛泽东问：“侯汉清是学生，还是教员？”

聂元梓说：“是研究生，他父亲63年搞投机倒把。”

江青说：“最坏的不是他们，他们是几个组织联合起来的，背后有黑后台的，里边有坏人，有外国特务，他们还搞什么单线联系。”

聂元梓说：“他们是‘井冈山’、‘红旗飘’、‘零’等联合起来的。”

毛泽东说：“这个作风不好，飘、零、井、红，应该变成团、零、飘、红，他小，可是他厉害。你们今天，两个‘天派’，两个‘地派’，两个支持清华‘四一四’，两个支持北大‘井冈山’，两个‘天派’同意蒯司令。我不很清楚‘天派’和‘地派’的事，有那么多的学校，简言之，我们和五大将打交道很多，我们是有经验的。一个叫聂元梓，一个叫谭厚兰，女将，一个叫蒯大富，一个叫韩爱晶，一个叫王大宾。其他各个学校都有领袖，著名的

就这么 5 个。你们也做了很多工作，不管运动中有多少缺点，我们都是护你们的。你们在工作中也要面对很多问题，我也没有经历过文化大革命，你们也没有。大多数学校没有搞武斗，只有他们其中一小部分人搞武斗，一打就不可开交，现在 59 个学校，打得厉害的也就几个，清华、北大、人大、石油、轻工、电力。电力为什么那么多逍遥派？他们影响了工人、解放军和内部团结，为什么有那么多没有参加武斗呢？为什么炮灰那么少呢？你们想过了没有？”

韩爱晶一边听，一边记录，钢笔没水了。他低声问进来换茶水的女服务员：

“请问有没有墨水？”

女服务员说：“没有。”随后递来几只铅笔。韩爱晶开始用铅笔记录。后来，每过半小时左右女服务员就递来一把削好的铅笔，换走他写秃的铅笔，直到这次召见结束。

在谈话过程中，毛泽东几次看手表，从深夜 3 点半开始接见，时间已经很长了。文革中毛泽东见外国元首一般也才 40 分钟左右。

谢富治说：“主席爱护你们，是红卫兵小将，林副主席，总理，中央文革，特别是江青同志很关心你们，这个事情说起来责任在我，帮助你们不够，我可以向你们检讨。”

毛泽东说：“首都大专院校学习班又不向中央报告，引起聂元梓他们不满，你又开学习班，又不让串联，人家就开大串联会。

不准串联，不对，不过你打倒谢富治也不对。”

谢富治说：“对我帮助很大。”

毛泽东：“北京有个习惯，今天打倒这个，明天打倒那个。”

林彪说：“一场大雨就把打倒吹了，现在外面的大标语字越写越大。”

毛泽东说：“小孩子揭大字报当废纸卖，几分钱一斤。”

谢富治说：“7 分钱一斤，小孩子发大财。”

毛泽东说：“我才不相信那一套呢！中国人有一个好处，有意见他要讲出来，讲不让串联是对的，但一点也不让串联也不好，人家还在串联。砸三旧派在串联，反砸三旧也在串联，串联一下为什么不行？‘天派’、‘地派’串联一下为什么不行，我讲串联一下可以，实际在串联，你不让好人串联，坏人在串联，你不让多数人串联，多数人是好人，百分之九十以上是好人，坏人是极少数。”

江青说：“通过串联把观点统一起来，把坏人揪出来。”

这时，黄作珍过来报告说：“蒯大富来了。”

这么重要的接见，蒯大富怎么会姗姗来迟？原来，他们几个人跑出清华园后，就准备向中央反映清华“井冈山”当时的处境。按说，“井冈山”有中央领导的电话号码，但是混乱中，蒯大富与掌握电话号码的人失去联系，他们只好先跑到体院，找到体院革委会主任刘长信，从那里换了一台轿车，然后直奔六部口的北京电报局电报大楼。此时已是凌晨5时左右，电报大楼还没上班。

张树友和段永基等人使劲地敲门，将电报大楼的工作人员叫了起来。工作人员听说是蒯司令要给毛主席发电报，破例在下班时间上了班。蒯大富一下就给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和康生、江青及中央文革小组、中央军委各发了一封内容相同的电报：

7月27日在黑手昼夜策划下，假借宣传73布告，挑动11万不明真相的工人，携带凶器，突然包围、洗劫清华园。我井冈山战士全部撤出清华，衣食无着，生命安全无保证，清华井冈山生命垂危，形势万分危急。向中央呼救，寻求中央马上接见。

电报就这样发出去了，花了 50 元钱。

这时，蒯大富又掏出口袋里仅有的零钱给沈阳的陈继芳发了一份电报："暂勿回校，详情见信！"

在沈阳的陈继芳果然准备在 7 月 28 日返校，上午她买好了火车票。傍晚时分，她提着包，拿着火车票和母亲告别，就在走出家门的时候，蒯大富的电报到了。看了电报，母亲拽下了女儿的行李包，陈继芳只好退了火车票。

发完电报，还去哪里呢？蒯大富说："还是去北航吧。"于是，他们又从市内回到北京航空学院。随后，疲惫不堪的蒯大富，一头扎进"北航红旗"保卫部长戴维堤的办公室里，倒头大睡……

人民大会堂这边到处找不到蒯大富，急坏了北京市和中央办公厅工作人员。百般无奈之下，北京市革委会下令全市各单位高音喇叭反复广播：

"蒯大富同志，请你立即到人民大会堂，中央首长找你开

会！”

北航广播站也接到了通知，全院立即响起了寻找蒯大富的广播声。

戴维堤当时正在大字报区看大字报，听到广播后，立即跑回保卫部所在的“红旗院”，叫醒了蒯大富。

“什么事？什么事？”蒯大富揉着双眼问。

“快去人民大会堂，中央首长找你开会，找了你半天了，全市都在广播找你，快快快！走人民大会堂西门。” 戴维堤一边告诉他，一边派北航的车，赶紧送蒯大富去了人民大会堂。

当蒯大富匆匆来到人民大会堂西门时，已近清晨 7 时。他跑出清华时，带了一把手枪。这时，他先把手枪拿出来，放在汽车座的底下，然后下车走上人民大会堂的台阶，走进人民大会堂的大门。大会堂的警卫问他：

“你是谁？”

“我是蒯大富。”

“干什么？”警卫问。

“中央首长找，接见。”蒯大富答。

一名警卫说：“你等会儿，我进去通报一下。”

另一位问：“带武器没有？”

“没有。”

那位警卫在蒯大富的身上摸了几下，就带他进去了。

当时外边正下着小雨，蒯大富就穿一件衣服，裤脚卷起来，

光着脚丫子，穿个塑料鞋，非常狼狈。

一会儿，谢富治出来了。蒯大富一看见谢富治，“哇”地一声嚎啕大哭，就像孩子在外面被打得落花流水后，看见父亲那么一种心情。

谢富治赶紧劝他说：“别哭别哭，跟我走，跟我走。”

他帮蒯大富把裤脚放下来，又亲自搜查了蒯大富，然后带他往里走。

蒯大富边走边抽泣，眼泪直流，委屈异常。

谢富治带着浑身泥水的蒯大富走进会场。蒯大富进门一看，一屋子人，几乎都穿白衬衫，白花花的一片。进门后，在他的右边是韩爱晶，他对蒯大富说：“老蒯，主席在呢！”

这时，蒯大富才看见坐在沙发上、身着白衬衣的毛泽东。百感交集的蒯大富，顿时又嚎啕大哭起来，江青一看笑了。

毛泽东赶紧站了起来，在座的也都站了起来。毛泽东向前走两步，大家都站在他周围。蒯大富握住毛泽东的双手，脑袋靠在毛泽东胸前，说了一句：“主席救我……”就说不出话来了。

毛泽东哭了，江青也哭了，在场的好多人都被这种气氛感染。江青赶紧说：“蒯大富，安静点，安静点，别激动。”

服务员拿来一个痰盂，一把铅笔，还有一沓纸。

江青对蒯大富说：“你说说怎么回事？”

蒯大富一边哭，一边告状说：

“主席，今天早上，肯定是杨余傅黑手干的，调几万工人突

然把清华包围。我们跟工人讲理，他们也不讲。我们学生一出去，他们就把学生抓到卡车上拉走。我们打不过工人，我们的人现在都在大街上……”

毛泽东就把双手平伸出来，上下翻了一下说：“你要抓黑手，黑手就是我。工人是我派去的。”

韩爱晶紧挨着站在旁边，他一边流泪一边对蒯大富讲：“不要胡说！工人、解放军是毛主席派去的。”

蒯大富见毛泽东就像孙子见爷爷一样，根本不发怵。他不相信，说：“主席，那不可能！您平时派解放军制止武斗的时候就是把双方隔开，都是不带枪、不开枪、不打人、不骂人、不动气，‘五不’嘛，这我都记得。可他们进学校就分割包围，一包围就抓人，就打人！”

毛泽东对着谢富治、温玉成问道：“唉，谁叫你们抓人啦？谁叫你们打人啊？谁被抓走了？”

蒯大富说：“我们二把手鲍长康也被抓了。”

毛泽东又对谢富治说：“统统放了，把所有的人都放了，一个都不能留！把鲍长康放到人民大会堂门口，让蒯大富看见。”

谢富治赶快到旁边去打电话。

蒯大富如在梦中，无知的悲痛感染着气氛，蒯大富嗯嗯地哭。他还完全认为自己是无辜遭劫，其言、其声、其情、其态、悲恸至极点，见到毛泽东如同在外面挨打的小孩回到家里一样，只顾告状。整个气氛被蒯大富的情绪所影响。

江青重复着说："蒯大富，安静点，不要激动。蒯大富，你不要激动。你坐下来。"

蒯大富，晕头转向，不知怎么回事。

大家又坐下。

毛泽东关切地向蒯大富问起"团派"总部委员鲍长康、刘才堂的名字和情况，他说："'井冈山'小将一个不能抓，一个不能打。""抓了7个总部委员，一律放掉。"

毛泽东问蒯大富："你们'井冈山'的人现在怎么样？"

蒯大富答道："一部分在北航，一部分跑到城里散了。"

毛泽东对韩爱晶说："你们不是亲密战友吗？要好好招待他们。"

毛泽东还向蒯大富问起"团派"小报《井冈山》为什么近来看不到了？蒯大富说是因为近来出版、发行渠道不畅，等等。

毛泽东又问黄作珍："你叫黄作珍，哪里人？"

黄作珍说："江西宁都人。"

毛泽东："老表么！久闻大名。黄作珍同志讲话不算数，谢富治讲话不算数，市委开会也不算数，不晓得我们中央开会算不算数，我变成了黑手。蒯大富，你要抓黑手，黑手就是我，你来抓呀！把我抓到卫戍区去吧！"

谢富治说："伸出红手！宣传毛主席思想，我们都紧跟！"

聂元梓说："领导也找不到，工人包围清华之后，我们到处找中央，我就给中央打电报。"

## 第 1034 回：止武斗，批评几位学生头　要联合，学校进行斗批改

毛泽东说："聂元梓打给中央的电报我们也收到了。不是说派 3 万人吗？怎么说 10 万人。"

他接着说："四个办法，是什么呢？

因为蒯大富刚来，所以话题又转回武斗问题，谈话内容又重复了。

姚文元说："如果必要的话，军管；一分为二；斗、批、走；大打。"

毛泽东说："第一个是军管，第二个是一分为二，第三个斗、批、走，头一点，你没有斗；其次，你们没有批；第三，你们没有搞大联合，你们打了几个月了。"

周恩来说："从去年开始。"

毛泽东："第四个办法是大打，打他一万人，撤回工人，把枪还给你们，大打一场，像四川一样。"

江青："败家子。"

毛泽东："我才不怕打呢，一听打仗我才高兴，北京算什么打，无非是冷兵器，开了几枪，四川才算打，双方都有几万人，有枪有炮，听说还有无线电。"

"以后布告出来要广泛宣传，如果谁不遵照执行，个别抓起来，个别的包围消灭，反革命嘛！"

江青说："广西围了快两个月了。"

周恩来："你们不想想，广西布告为什么是主席的战略部署，说关心国家大事，你们五个人也不发表联合声明，表个态度什么，做做工作。"

毛泽东："他们忙啊！"

周恩来："这就是国家大事嘛！"

毛泽东："不要分派了。"

江青说："希望你们团结起来，不要分天派，地派。什么张家派，李家派，都是毛泽东思想派。"

毛泽东说："不要搞成两派，搞成一派算了，搞什么两派？困难是有的。"

陈伯达说："教育革命，教改搞不上去。"

毛泽东说："教育革命搞不上去，甚至我们也搞不下去，更别说你们了，这是旧制度害了他们，为什么搞不上去呢？……我们的陈伯达同志在中央会议上着急，我说不要着急，过几年人家走了就算了么？我看无非这么几条，搞什么教育革命，搞不成了，还不就散了，这是学生讲的，我还不是从消遥派那里得点消息？恩格斯还不是中学没毕业，马克思搞经济，变成搞哲学，什么《资本论》，研究他的一本什么书，他的资本论，第一卷为什么不能出版，因为他身体不好。你说创建党就这么容易？马克思、恩格斯创建的党就那么纯？第一国际至少分三派，一个马克思主义，一个蒲鲁东主义，一个布朗基主义、拉萨尔主义，布朗基的所谓报告……只不过是根本无政府，为什么搞不下去呢？第一国际还

不是四分五裂？我给你们讲了四条，最后一条就是大打，打上十年八年、地球照样转动。现在我们来管些事情，我看不公道，老佛爷，这个‘天派’、‘地派’，我也搞不清，学校那么多……

姚文元说：“我倾向于学校斗、批、走，斗、批、散或者在一些学校里采用斗、批、走方式。”

毛泽东说：“地球一转一年、十转十年，两派这样下去，我看不走也得走，要打就让他们大打，空出地盘来，让人家写小说的去自修。学文学的你要写诗，写剧本；学哲学的，你给我搞家史，写历史革命的过程；学政治经济学不能学北大的教育，北大有没有什么出名的教授？这些东西不要先生教，先生教这是个害人的办法。”

姚文元插话：“少慢差费。”

毛泽东接着说：“组织个小组自己读书，自修大学等等，来来去去，半年一年，不要考试，考试不是办法，一本书考十题，一本书一百个观点，不只是十分之一吗？就考对了么？对其它百分之九十怎么办呢？谁考马克思？谁考恩格斯？谁考斯大林？谁考林彪同志？谁考黄作珍同志？群众需要，蒋介石当教员，我们都是这样，中学要教师，小学要教师，教材要删繁就简。”

姚文元说：“办好几个图书馆。”

毛泽东说：“让工农兵都有时间去，到图书馆读书是个好办法。我在湖南图书馆读了半年书，自己选择图书，谁教啊！我只上了一门新闻学，新闻班我算一个，那个哲学研究会，办哲学研

究会的没有诚意。胡适签的名，还有谭平山，陈公博。大学办得那么死，应该比较自由一些。”

江青说：“现在是搞武斗。”

毛泽东说：“武斗有两个好处，第一打了仗有作战经验，第二战争要暴露坏人，这个事要分析，这种社会现象是不依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不以中央为转移，不以我为转移，不以你聂元梓为转移，也不以牛辉林的意志为转移。现在工人去干涉，如果不行，把工人撤出来，再斗十年，地球照样转动，天也不会掉下来。”

江青说：“我们真痛心你们，瞎说什么不要大学生啦，我们是要你们的。你们有的有时还听我们一些，有的听，有的当面一套，背后一套。你们后头的东西我们也搞不清。”

毛泽东说：“背后不听，我们这里有个办法，工人伸出黑手，用工人来干涉，无产阶级去干涉。”

聂元梓说：“我要求派解放军到北大来。”

毛泽东说：“你要合你胃口的，一定要 63 军，别的你又不要。38 军可以不可以？如果‘井冈山’38 军真支持，我就给你派 63 军。你应该去作 38 军的工作。”

江青说：“聂元梓应该去作 38 军的工作，你们欢迎 38 军行不行？”

毛泽东说：“去一半38军，去一半63军，38军不像你们讲得那么坏，根子在杨成武和北京军区。北京军区开了两个会，第一

个会不太好，第二个就比较好了，郑维山作了检讨。谭厚兰，其实你的炮位一直在聂元梓身上。你谭厚兰这位女将轰了一炮，郑维山够紧张。郑维山正好不在北京，到保定、山西去解决问题去了，我们不是没有见他吗？各军都不知道这个军长是好的还是坏的，把将军们都吓坏了。”他问谭厚兰：“他找你的麻烦没有？”

谭厚兰说：“没有，同学对他有意见。”

毛泽东说：“过去是有历史原因的，有点历史，这些事情不是偶然的，不是突如其来的。”

陈伯达说：“紧跟毛主席教导，坚决照办。”

毛泽东说：“不要讲什么教导。”

姚文元说：“今天毛主席的话意味深长。”

陈伯达说：“66 年上半年是比较好的，北京大专院校在全国煽风点火，搞革命风暴是对的。后来脑子膨胀了，以为不得了。蒯大富和韩爱晶手到处伸，救世主一样，他们想控制全国，就要一统天下了，又没有什知识和学问。”

毛泽东说：“二十几岁，周瑜嘛！周瑜原来是个骑兵，他当吴国宰相时才 16 岁。不能轻视他们年轻人，你们不要摆老资格。”

江青说：“我们十几岁参加革命。”

毛泽东说：“不要膨胀起来，全身浮肿，害浮肿病。”

陈伯达说：“韩爱晶对毛主席的思想和中央意见没有很好的思索、考虑。凭小道消息开秘密会议，个人第一，要走到危险道

路上去。”

毛泽东说：“第一条是我官僚主义，一次没见你们，人家不要抓我们黑手，我还不见你们，让蒯大富猛醒过来！”

陈伯达说：“蒯大富，你应该猛醒，悬崖勒马，你正站在危险的道路上。”

林彪说：“悬崖勒马。承认错误。”

毛泽东说：“不要叫错误了。”

陈伯达说：“蒯大富不尊重工人群众，如果仍然不听我们的，就是不尊重中央，不尊重毛主席。这是危险的道路。”

毛泽东说：“是相当危险，现在是轮到小将犯错误的时候了。”

周恩来说：“主席早就讲了，现在是轮到小将犯错误的时候了。”

林彪说：“蒯大富，我们的态度是通过卫戍区和市革委会，你说不了解中央的态度，今天是毛主席亲自关心你们，作了最重要、最正确、最及时的教导，这次还置若罔闻，要犯很大错误。你们红卫兵在伟大的文化大革命初期在全国起了很大作用，现在全国很多学校实现大联合，超过北大、清华。”

毛泽东说：“湖南、天津、青岛、沈阳、包括广西……大学我们要管，都是市委管。”

林彪说：“响应毛主席号召，大联合走到后面去了，要赶上去，你们要看到运动的需要、看到各个阶段我们应该干什么？”

毛泽东说：“谭厚兰那里对立面只有 200 多人，一年也不能

解决问题，200 人都不能征服，快一年了。其它学校对立面更大的，你怎么能征服呢？曹操征服孙权，赤壁打了败仗，刘备征服孙权也打了败仗，结果失了街亭，孔明想征服司马懿也不行，头一仗打得很长，张郃只剩下一匹马。司马懿征服诸葛亮、碰上个空城计也打了败仗。”

林彪说：“打走资派和文艺界的牛鬼蛇神，现在不是，相反，学生打学生、群众打群众，都是工农子弟，被坏人利用。有的是反革命，有的人主观上是想革命的，但是客观上、行动上是相反的；有一小撮人，主观、客观上都是反革命、是双料反革命；有的开始是革命的，后来革命性差了；有的是走向反面、革命精神消失了。这个发展下去就会走向反面，你们脱离群众。”

毛泽东说：“工农兵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几，你们学校百分之九十以上是较好的，打内战的比较少，北京只有 6 所。”

谢富治：“清华有两万学生，参加武斗的不到五千。”

林彪说：“那些不参战的人就是不同意。”

毛泽东说：“他们也是上了老虎背，想下也没有个好办法。蒯大富可以下来嘛，下来照样当官作老百姓。蒯大富应该欢迎工人。”

谢富治说：“工人们手无寸铁，他们只有三件武器，《毛主席语录》、《毛主席最新指示》、《七三布告》。”

康生说：“听人家说，清华的枪是北航给的，支持清华两汽车枪。蒯大富是司令，韩爱晶是政委。”

韩爱晶申辩说："没那回事，根本没有那回事，卫戍区到我们那检查了好几次，枪一条也不少。"

谢富治说："你就都是正确，又全是你对，我批评了你几次，你也都不接受，你根本没有自我批评态度。"

陈伯达说："是不是把他们枪给收回来。"

韩爱晶向毛泽东表示："主席，我有个请求，给我派个解放军监督我，很多事情不是那么一回事，我是很爱护蒯大富的。我也知道，跟他好，许多事情要受牵连，但我觉得在努力保护他，不让他倒台，他的命运和全国红卫兵的命运是有联系的。给我派个解放军，这样什么事情就清楚了。　"

陈伯达说："没有自我批评精神。"

江青说："我有错误，宠了你。谢富治，你比我还宠，宠坏了，现在下点毛毛雨，还是主席这个方法好。"

毛泽东说："不要老是批评！我是觉得……杨成武搞多中心，国防科委搞多中心论，这个杨成武一个中心，全国可以搞，搞几千个，几万个中心，都是中心，就是无中心。还是他是中心。各人皆以为天下第一，真是！那还有什么中心？一个单位只能有一个中心，一个工厂，一个学校只能有一个中心。"

江青说："韩爱晶，我批评了你们好几次，你们就没一次很好的给我表个态。"

毛泽东说："不要总说他！你们专门责备人家，不责备自己，不在自己，总在人家。"

江青说："我是说他太没有自我批评的精神了。"

毛泽东说："年轻人听不得批评，他有些像我年轻的时候。孩子们就是主观主义些，只能批评别人，我们年轻的时候也这么主观，武断得厉害。"

江青看看蒯大富说："蒯大富有点笑容了，轻松一下，别那么紧张了。蒯大富说陈育延被工人抓了，陈育延出来没有？告诉宣传队，陈育延是个女孩子，对女学生要保护。"

蒯大富说："陈育延在北航睡觉呢。"

毛泽东说："你们在抓黑手，黑手就是我。对于你们毫无办法，你们打下去没有出路，要消灭'四一四'也不行。我还是倾向你们这派，因为'四一四'必胜那个思想，我不能接受。但是对'四一四'要争取群众，包括领袖中一些人。周泉缨的文章，我已经看了，主要口号，打江山的不能坐江山，说蒯大富只能夺权交给'四一四'。我们叫工人去作宣传，你们拒绝。布告明明宣传好多天了。你们清楚地知道他们会做怎么样的宣传，黄作珍同志向谢富治解释过这件事，工人是没有武装的，所以毫无办法，你们打到哪一年去？你们应该欢迎嘛！工人又徒手。你们反对工人，还打枪，打死五个工人，打伤工人。等于北大一样，我们比较偏向聂元梓派，并不偏向'井冈山'，我们偏向于你们五个，今天我们放了录音，今天我们开了好几个钟点的会了。谭厚兰学校主要偏向谭厚兰，就是你们五个领袖。"

江青说："就是……"

## 第 1035 回：韩爱晶，问百年后该如何　发悲叹，红卫兵钟声响起

毛泽东："你们想想，几万人去，什么事情，没有中央的命令，他们敢？你们完全被动，'四一四'反而欢迎，'井冈山'反而不欢迎，你们搞得不对头，今天没有邀请'四一四'和北大'井冈山'的人来。他们一听就要骂我了，骂我就是有道理，你那个'四一四'思想必胜是不对的嘛！你那个团、零、飘、红、4 个组织就是坏人比较多，聂元梓一派好人比较多一些。"

聂元梓说："王、关、戚插了一手。"

毛泽东说："你们反王、关、戚好嘛，你们要串联，我也禁止不了。学习班也是对的嘛！韩爱晶、蒯大富你们不是好朋友吗？你们两个以后还要作好朋友。韩爱晶以后要帮助他，政策上作得好一些，现在'四一四'高兴了，'井冈山'垮台了？我就不信，我看'井冈山'还是'井冈山'。我就上过井冈山，我不是说你的老佛爷的'井冈山'。"

姚文元、谢富治："是真正的井冈山，革命的摇篮。"

江青说："不要搞得我们爱莫能助……"

毛泽东说："有很多打工人的，不是你们，听说是外地来的。"

周恩来："你们那里还有没有人呢？"

蒯大富说："有。"

毛泽东："今天晚上睡觉。你们还没有睡觉呢，蒯大富，你没有地方睡觉，到韩爱晶那里去睡，韩爱晶好好招待。韩爱晶，

你要好好招待他，你们把‘井冈山’总部几个找到一起，都到韩爱晶那里去，休息一下，然后开个会。”

周恩来：“韩爱晶，你得帮他想个办法。”

毛泽东：“蒯大富，你真蠢哪，我们搭梯子让你下来，你不下来。你们这样和中央的政策对抗，黄作珍讲话不听，谢富治讲话不听，市委开会不算数，只好伸出’黑手’，调动工人制止武斗。武斗这么多天，工人敲锣打鼓来，你们又不理，你们脱离群众，脱离工农兵，脱离绝大部分学生，甚至脱离自己领导下的部分群众，你领导下的学生，说你的坏话的不少。没有打招呼，是我的错误，间接打了招呼。”

吴德说：“昨天我约蒯大富谈了，他不听我的。”

毛泽东说：“‘四一四’欢迎工人，你们‘井冈山’很蠢，我才不高兴那个‘四一四’。那个‘四一四’是反对我们的。”

江青说：“‘四一四’是反对我的。”

谢富治说：“‘四一四’也是反对我的。”

毛泽东说：“他搞抬尸游行，他搞砸电线，在这个时候，‘四一四’也没有通知，为什么他们欢迎？这一次你们很蠢，让‘四一四’欢迎工人。”

江青说：“甚至‘四一四’的群众都说蒯大富是左倾，沈如槐是右倾。清华要搞大联合，但没有蒯大富不行。”

毛泽东说：“还是要联合，还是要蒯大富，没有蒯大富不行的，蒯大富是偏左的，‘井冈山’出两个，‘四一四’出一个。”

毛泽东问："蒯大富，你能当清华的校长吗？"

蒯大富说："我不行。"

毛泽东说："蒯大富当校长，沈如槐当副校长。"

江青说："现在你们五个人先做起来，反正先不要打了。"

毛泽东说："第一条，军管；第二条，一分为二，'四一四'分一个，你蒯大富分一个；第三条，斗、批、走，这都是学生提出来的，他们不愿干了，你们一不斗，二不批，三不改，集中精力打内战。把枪都给你们，无非是大打，要打就大打，文科要不要办呢？文科还是要办的，至于如何办法，研究出另外一个办法，过去的办法培养是修正主义的。"

谭厚兰问："师范大学要不要办？"

毛泽东答："不办，谁教高中，谁教中专？外语学院不办怎么行？一风吹不行，吹那么几年，也可以，天塌不下来。欧洲大战一打几年，不仅大学没办，其实中学、小学也都没办，但我们办了西南联大。办了一下，但也办得可怜，困难时候没能办好，鸡飞狗跳，我们可能犯错误。"

江青说："那是个艰苦的工作，你们屁股坐不下来。"

毛泽东："学文不是在学校里学出来的，林彪刚才不讲了吗？他们学文，哪里学来的，难道是黄埔大学学来的？黄永胜学了一年半，温玉成你是幸运的，你上了三年了，你是黄岗的？也就认识几个字，社会是个最大的大学嘛，坐在那个楼里怎么能行？整个社会是个最大的大学，列宁大学读了一年半，恩格斯中学没读

完。我们两个比高尔基高明得多，高尔基只上过两年学。华罗庚数学家就是个中学生，自学的。苏联卫星上天，祖宗是中学教员。发明蒸气机的人是工人，不是什么大学教师，是工人。我看我们的一些孩子，读书十几年把人毁了，睡不着觉，一个孩子读历史，不懂阶段斗争，历史就是阶段斗争的历史，可是读了好几年，就是不懂阶级斗争。”

江青说：“读那些什么厚本，几十种，而马、恩、列、斯和你的书都是参考资料，只有给你们老师造的书才是正规的教科书。”

毛泽东说：“小学六年太长，中学六年太长，荒废无度，又要考试，考试干什么呢？一样不考那才好呢？谁考马、恩、列、斯，谁考林彪同志，谁考我，以后特别是反杜林论，杜林活了88 岁，到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还活着。谢富治同志把他们统统召回来，统统回学校，可能有些生了气，不勉强，把‘四一四’留在学校里，‘井冈山’统统到大会堂来，对‘四一四’的头头，要有所区别，分别对待。”

韩爱晶突然问道：“毛主席，我想请教您一个问题，再过 50 年、100 年，如果中国出现了分裂，你也说自己是毛泽东思想，他也说自己是毛泽东思想，出现了割据混战局面那我们怎么办？”这是他鼓足勇气说出来的。

他的话音一落，在座的人神情都变得很严肃。

毛泽东答道：“这个问题问得好，韩爱晶你还小，不过你问

我，我可以告诉你，出了也没啥大事嘛。一百多年来，中国清末民初二十年，出了段棋瑞，军阀搞了十几年、二十年，跟蒋介石打了几十年嘛。中国党内出了陈独秀、李立三、王明、博古、张国焘，什么高岗、刘少奇多了，有了这些轻验，比马克思还好。”

林彪说：“有毛泽东思想。”

毛泽东接着说：“有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比没文化大革命好，当然也不能保证，但我们保证要好些，你们要跟人民在一起，跟生产者在一起，把他们消灭干净，有人民就行，就是把林彪以及在座都消灭，全国人民是灭不掉的，不能把中国人民都灭掉，只要有人民就行，最怕脱离工人、农民、战士，脱离生产者，脱离实际，对修正主义警惕性不够，不修也得修。你看朱成昭刚当了几天司令，就往外国跑。或者保爹、保妈就不干了。聂元梓，以她哥哥、姐姐不好来攻她。你那个姐姐聂元素我不清楚，也不那么坏嘛，聂元梓，哥哥，姐姐为什么一定和她联系起来呢？”

周恩来说：“我弟弟周永爱，跟王、关、戚混在一起，我把他抓到卫戍区去了。”

毛泽东：“我那个父亲也不大高明，要是在现在，也得坐喷气式。”

林彪说：“鲁迅的弟弟是个大汉奸。”

毛泽东：“我自己也不高明，读了哪个就信哪个，以后又读了七年，包括在中学读半年资本主义，至于马克思主义一窍不通，不知道世界上还有什么马克思，只知道拿破仑、华盛顿。在图书

馆读书实在比上课好，一个烧饼就行了，图书馆的老头都跟我熟了。”

陈伯达说：“韩爱晶，你的缺点就是没有毛泽思想，就是不知道这次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意义是什么。”

姚文元说：“韩爱晶提出这个问题，我们去年就说过，有林副主席做毛主席的接班人，有毛泽东思想，就不怕出修正主义。”

毛泽东：“不能保证这次文化大革命以后就不搞文化大革命了，还是会有波折的，不要讲什么新阶段。好几个新阶段，我讲上海机床厂又是什么新阶段？一次文化革命可能不够。”

姚文元说：“毛主席已经谈过这类问题，不要再提新阶段。”

周恩来：“林彪同志对主席著作学习好，包括苏联在内，对马列原著都没掌握好，林副主席掌握了。”

毛泽东：“党内出了陈独秀，党就没有啦？党犯错误，党还是有的，还是要革命的，军队还是要前进的。第四次王明路线那么长还不是纠正了，张闻天搞了十年也不高明。灾难多了，解放后又是多少次？我们这个党是伟大的党，光荣的党，不要因为出了刘少奇、王明、张国焘，我们党就不伟大了。你们年轻人就是没有经验，上帝原谅你们。韩爱晶你问起我，我答复你了，不要以为我们这些人有什么了不起，有我们这些人在就行，没有我们这些人，天就掉下来了。这也是一种迷信。”

陈伯达说：“韩爱晶你读过多少马列的书，你懂得多少马克思主义！”

毛泽东："你们不要光说人家韩爱晶，他还小嘛，才 22 岁，你们就是不说你们自己，你们自己懂得多少马列主义？"

江青说："韩爱晶给我写过好几次信，提出这样那样的问题。一到我跟前，就问将来，为什么韩爱晶总喜欢提这类问题呢，总说几十年以后的事，还问我第三次世界大战什么时候打。"

毛泽东："想的远好，想的远好，这个人好啊，这个人好哇。我有几种死法，一个炸弹，一个细菌，一个火车、飞机，我又爱游点水，淹死……无非如此，最后一种寿终正寝。这无非还是细菌吗？薄一波差点死了，听说刘少奇也救活了，一种肺炎，一种心脏病，还有肾感染，四个医生和两个护士抢救，可以说脱离危险期了，你们听说了吗？"

大家说："没听说。"

姚文元对韩爱晶说："历史发展规律总是前进的，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相信毛泽东思想，相信群众。我批评韩爱晶是悲观主义。"

韩爱晶反驳姚文元说："我相信共产主义一定会胜利，如果我对共产主义没有信心，我就不会献身共产主义事业，可是我认为，历史的发展是波浪式的，不可能是条直线，难道中国革命，由民主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到共产主义就是一条直线走向胜利吗？不会出现反复吗？不是波浪式吗？按照辩证法肯定有曲折。"

毛泽东说："韩爱晶这个人好啊！他的性格很像我年轻的时

候，认为自己对的，就要坚持。”

他又说：“一次前进是没有的，历史总是曲折的，1927 年受挫折，二、三次受挫折，胜了以后，又出现高饶反党联盟，庐山会议以后，出了彭德怀。现在有走资派，像蒯大富那个彻底砸烂旧清华，‘四一四’就不赞成，‘四一四’就说，教员也有好的，可你们说的彻底砸烂，不是砸烂好人，而是一小撮坏人，你把含义讲清楚，他就驳不倒了，赶快把六、七个领导找来，集中起来，你们今天晚上睡个觉，明天再开会，散会算了，以后再来。”

江青说“蒯大富，看你那样子难过，不过对你也是锻炼。”

毛泽东站了起来，大家也都站起来，围到毛泽东身边，一一跟他握手告别。

韩爱晶拉着毛泽东的手说：“主席，我一定为您的革命路线奋斗终生。”

蒯大富握着毛泽东手说：“主席，谢谢您，祝您万寿无疆。”

张玉凤异常平静地走了过来，她扶着毛泽东的胳膊，向客厅里走几步，掀起一个黑色的布帘，走进去，布帘放下，留下林彪、周恩来、中央领导和五个学生领袖，他们又分别跟林彪、周恩来、江青等中央领导握手告别。

没想到，就在他们握手告别的时候，那个黑色的布帘又掀开了，毛泽东又回来了，他们赶紧迎过去。

毛泽东走过来说：“我走了，又不放心，怕你们又反过来整蒯大富，所以又回来了。”

他对在场的中央领导说："不要又反过来整蒯大富啦，不要又整他。"

几个学生领袖又跟毛泽东握手，依依不舍地看着张玉凤又掀起那个黑色布帘，扶着毛泽东走了进去。

毛泽东走了，真的走了。

蒯大富的眼眶红润，一颗颗泪珠从眼窝里滚落出来："完了，完了，红卫兵完了……"他反复说着这么几个字。

聂元梓和谭厚兰听蒯大富这么一说，更加伤感，心一酸，俩人紧紧抱在一起，轻声抽泣，泪水顺着脸颊流下来。

林彪走过来安慰说："别哭了，这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命还是要革的。今后路还长，说不定什么时候，革命需要你们再次出来时，你们仍然是革命的先锋。"

他们又一次跟林彪、周恩来等中央领导握手告别。这时，江青对韩爱晶说："韩爱晶，怎么不握手就走了！"

跟江青握手告别之后，韩爱晶和聂元梓、蒯大富、谭厚兰、王大宾5人跟在谢富治身后一起走出毛泽东召见的房子，走向另一个大厅。

韩爱晶后来回忆当时的心情：

我脚踏在过道长条地毯上，可是身体好像飞腾在飘渺的天空，周身依附在云里，周身依附在雾里。我觉得主观的自己根本失去了自我的控制、我像被超越人群、超越正常生活的魔力烘托在天上，社会人间都在看不见的脚下。我觉得不可思议，不可想

象，也不敢相信。我觉得自己“轻”、“稚”。我不敢相信我凭什么置身于这种最高决策的范畴之中，我怎么能参于处理这样重大的事件！我意识到这是亿万人根本不可望也不可及的无比高贵的领地。作为一个红卫兵头头与统治全中国的神在一起，我有被天风吹飘在空中的感觉。

回头下望人寰处，不见北京见云雾。

我镇定自己，表面很正常地跟大家在一起来到另外一个大厅。

在这个大厅里，谢富治对他们 5 人说：“已经 9 点了，毛主席还没有睡觉。我们吃点饭，然后讨论怎样传达毛主席的指示。”

人民大会堂的工作人员端来一盘鸡蛋炒饭和汤，还请谢富治到后面就餐。谢富治说：“不用了，就在这里一齐吃吧。”

工作人员又给谢富治端上来一个盘子，盘子上有一蒸熟的大蜜桃。谢富治剥去桃子皮，吃了桃子，就召集他们 5 人坐在一起。

谢富治说：“今天，毛主席接见你们，从 3 点到 8 点半，谈了 5 个半小时，内容很多，我们先整理一个简单的统一稿，统一传达，一齐整理，一齐备案，一齐签名。要把对自己有利的先压下来，把批评的先传达。工人阶级是毛主席派的，对外先不讲。我再说一句话，如果有利的记下来要吃亏，批评的要记清，多从批评方面去接受。”

大家围在一起，由韩爱晶执笔，一齐组织了一份约 1000 字左右的稿子。整理好之后，念了两遍，又做了些补充改正，5 个

人都签了名就交给谢富治了。

谢富治说："我看先照这份稿传达，其他内容今后再说。我们马上出发，先到北航去，到那里看看跑到那里的清华学生，然后再到清华大学去。"

出了人民大会堂，果然像毛泽东命令的那样，鲍长康站在大会堂门外等着，衣服上沾着血迹。他是被工人打晕后，赶紧被送往附近医院抢救。醒来时，已在北京市革委会的地下室的沙发上了。身上的血迹，鲍长康后来回忆说：大约是他挨打时流的鼻血。

韩爱晶和蒯大富就坐在谢富治的车里，后面有吴德、黄作珍的车，还有聂元梓、谭厚兰、王大宾的车。一行车子，向北航驶去。

车队开进北京航空学院。谢富治说："我们先去看看跑出来的学生、然后再到清华大学去。"

当时，北航最大的会堂是工人俱乐部。28 凌晨，跟着蒯大富从清华大学跑出来的那部分清华学生就临时栖身在这里。728 召见的消息传到北航，眼巴巴守候在这里的几百名清华"井冈山"无不欢欣鼓舞。因为在文化革命中，"毛主席接见"就表示了对你的支持。接见蒯大富会被当作对清华"井冈山"的支持。

谢富治、吴德、黄作珍、丁国钰、聂元梓、谭厚兰和王大宾等一行人从俱乐部会堂看望清华学生后，又去了清华大学。

## 第 1036 回：清华园，安抚工人与学生　放俘虏，百日武斗终平息

28 日晨，北京卫戍区组织战士乘车、一辆一辆地在清华大学外围转了几圈后开走，声援工人宣传队。

这时，工宣队发现清华“井冈山”的人都跑光了，而清华几个大门一直都被工宣队严守着，于是传言：“‘井冈山’的人钻地道跑了”。

谢富治等人的车队到了清华大学，先去明斋看望。当他们们陆续下车后，看见一些解放军、工人和他们的负责人站在路边，面部表情冰冷严峻、目光充满仇恨。谢富治、吴德等领导走过去与他们握手说话，有的工人很愤怒、很激动地向谢富治控诉，说蒯大富的“井冈山”开枪打死打伤了工人和解放军。有的女工边说边哭、边哭边说，场面很惨痛。

北航韩爱晶远远站在旁边，看到清华这种状况，又难过、又痛苦、又尴尬、又无奈。此时的蒯大富已经处在千夫所指的窘境。

在工人、解放军仇视的目光下，谢富治他们又来到化学馆。当他们从楼梯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往上走，所见都是破墙破洞、断壁残垣，就像电影里战争结束后的画面。清华大学科学实验场地竟成了这种状况……

走上楼顶的大平台，任传仲和这里最后一批坚守阵地的“井冈山”像一群遭受劫难的农妇遇到亲人一样，拥过来拉着谢富治、吴德的手，扯着衣袖，一边嚎哭、一边告状。只见任传仲蓬头垢

面，衣衫脏烂不堪，捶胸顿足、呼天抢地地哭喊着：

“啊！——啊！——保卫毛主席革命线路有罪啊！——保卫毛主席革命线路有罪啊！——杨、余、傅黑后台挑动工人镇压红卫兵啊！”

这是真情真泪，悲痛欲绝！他和他的战友们根本不知道工人是毛主席派来的，也根本不认为自己做错了什么事，他们认为自己受到了反革命的围剿，遭受了天大的冤枉！

谢富治等人只好安慰他们，等他们情绪慢慢平静下来。

安抚之后，谢富治、吴德、黄作珍、丁国钰等又去安抚慰问工人和解放军。

聂元梓、谭厚兰、王大宾、韩爱晶各自回校。蒯大富留下召集“井冈山”的人开会。

韩爱晶回到北航，在红旗小院看到聚集在那里的清华“井冈山”十几个骨干还在争论：清华到底是怎么回事？到底工人进清华对不对？有没有人欺骗毛主席？他们坚持认为：“井冈山”是保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工宣队是错误的，工人的斗争矛头错了。

韩爱晶委婉地向他们说明：工宣队是毛主席派的，现在要承认开枪是错的。他的话清华“井冈山”显然不爱听。他们希望从他口中听到：是毛主席受了欺骗，工宣队是错误的。韩爱晶觉得少数清华“井冈山”学生还处在情感惯性中，梦还没醒，就走开了。

晚上，蒯大富回到北航，与陈育延、鲍长康等几个人聊了起

来。据陈育延回忆：

蒯大富说主席讲：‘十万人进清华，414高兴，井冈山不高兴，我就不高兴。’说主席讲了三遍。蒯大富还说：‘我们离开清华，使我们在主席面前好说话。’还说了关于主席评价周泉缨等人的事，全是对团派有利的事情。就是没有谈主席批评我们的话，也没有谈主席支持宣传队的话。结果当时在场的人都感到主席是支持井冈山的，感到：我们井冈山人必胜！根本就不感到自己的严重錯误。

当晚，按谢富治的要求，动员北航的清华学生回校。清华“井冈山”产生了三种意见：一是鲍长康、王良生和陈育延为代表的，主张回校。理由是：“毛主席召见蒯大富，本身就是对‘团派’的支持。中央文革表态和谢副总理的讲话，也都很明确地支持清华‘井冈山’。我们应当配合中央，回校和工宣队搞好关系，这才是真正的左派组织。第二种意见是大多数，他们不敢回校，因为工人宣传队反“团派”的情绪很大，基本上是见“井冈山”就打，他们害怕被抓，被打。第三种意见是以任传仲为首的少数几人，他们坚决要人回校“坚守岗位”，不是和工人搞好关系，而是要与工宣队“继续战斗”。这批人是 27 号晚就不同意撤走而支援 9003 楼的。尽管这样，经过动员，还是有一些清华同学从北航回到了清华。

就在王大宾在地院传达毛泽东与他们谈话的当天下午，丁国钰给他和聂元梓等 5 人打电话，要求将“接见”改成“召见”。

7 月 28 日，北大校文革发了一个《立即拆除武斗工事，上交武斗工具，无条件停止武斗的通告》，“新北大公社”总部则发了一个支持《通告》的《声明》，要求“井冈山”交出“现行反革命集团头子和一切漏网分子”，还说“庆父不死，鲁难未已，战犯不除，国无宁日”。

翌日，“公社”给首都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写了一封信，欢迎他们进驻北大，“在校文革领导下实行大联合”。

8 月 5 日，北京大学“公社”发出《关于彻底砸烂北大井冈山兵团现行反革命集团的第四号通告》，要求大家“向正在作垂死挣扎的反革命集团发动猛烈进攻”。

7 月 29 日，清华大学没有接到消息的“团派”在清华大学 9003 大楼顶架起望远镜，每个楼角架起一门土炮，每个窗口处都放有硫酸瓶、手榴弹、暖气片等，大有决一死战的架势。中午，该楼“团派”打出大标语：

“雪里梅花开不败，井冈山人敢上断头台！”

“生做毛主席的红小兵，死做毛主席的红小鬼！”

当他们听到毛泽东 28 日接见蒯大富的消息，不失时机地贴出大标语：

“毛主席接见蒯大富是对井冈山人最大的爱护！”

其中，“蒯大富”三个字写得大大的。

这天，为了让被困在9003楼的“井冈山”安全撤出，陈育延代表总部去和工宣队谈判，条件是：“我们同意交枪，拆工事，

但要求我们的战士安全撤出。”结果是，工人让陈育延先去作9003楼“井冈山”的思想工作，但是很多人当时想不通，但也只能被迫交枪。当陈育延再去与工宣队谈时，工人将她团团围住，既不让她回9003，也不让我去“井冈山”总部，一定要她同意四项条件：

1.立即上交所有武器。

2.立即拆除所有工事。

3.向毛主席低头认罪，向革命职工低头认罪，写检讨。

4.办学习班，由宣传队负责。

并说，只有同意这四条，工人就保证9003的“井冈山”安全撤出。

陈育延只同意前两条。之所以不同意后两条，是因为她只承认“井冈山”犯了错误，可以写检讨，但不是犯罪，所以不应“低头认罪”。而第四条“办学习班”，她还想以“井冈山”为主导，不同意“由宣传队负责”。

她说：“必须在保证我9003工厂全体战士安全的条件下，我们可以做到，第一、上交全部武器。第二、立即拆除工事。第三、写检讨。”

最后，谈判不成功，陈育延在9003楼外被扣了11个小时，从中午13时30分开始，一直到夜里24时30分，始终未达成协议，最后被送回明斋。

两个小时后，7 月 30 号凌晨 2 时，市革委会副主任吴德、

北京卫戍区政委黄作珍和副政委刘绍文主持召开清华“井冈山兵团”总部与工人宣传队负责人的谈判会议，最终达成协议。

谈判协议的草稿原件是用铅笔字写在稿纸背面的，陈育延至今还保留着宣传队拟就的谈判协议草稿原件，是用铅笔字写在稿纸背面的，她估计这可能是迟群拟的稿，“30日”是按“卅”来写的。但在协议上签字的不是迟群。

协议草稿原文如下：

首都工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

红代会清华井冈山兵团总部协议

红代会清华井冈山热烈欢迎、完全支持首都工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来清华宣传毛泽东思想、宣传七·三布告的革命行动。在伟大领袖毛主席七·二八最新指示的光辉照耀下，在市革委会领导下，在解放军同志指导帮助下，达成协议如下：

一. 立即无条件贯彻执行七·三布告，停止武斗。

二. 立即无条件地交出所有武斗凶器，包括校内外，一件不准打埋伏。今天下午四时以前交清校内武器。

三. 立即无条件彻底的拆除所有武斗工事，立即撤出武斗地区。

四. 清华井冈山兵团总部组织学习毛主席批发的“七·三”布告，“七·二四”布告，毛主席“七·二八”最新指示，彻底清理阶级队伍。

五. 立即恢复水、电、电话。

六.此协议签字后立即生效，由北京卫戍区刘绍文同志并首都工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监督执行。

北京卫戍区代表刘绍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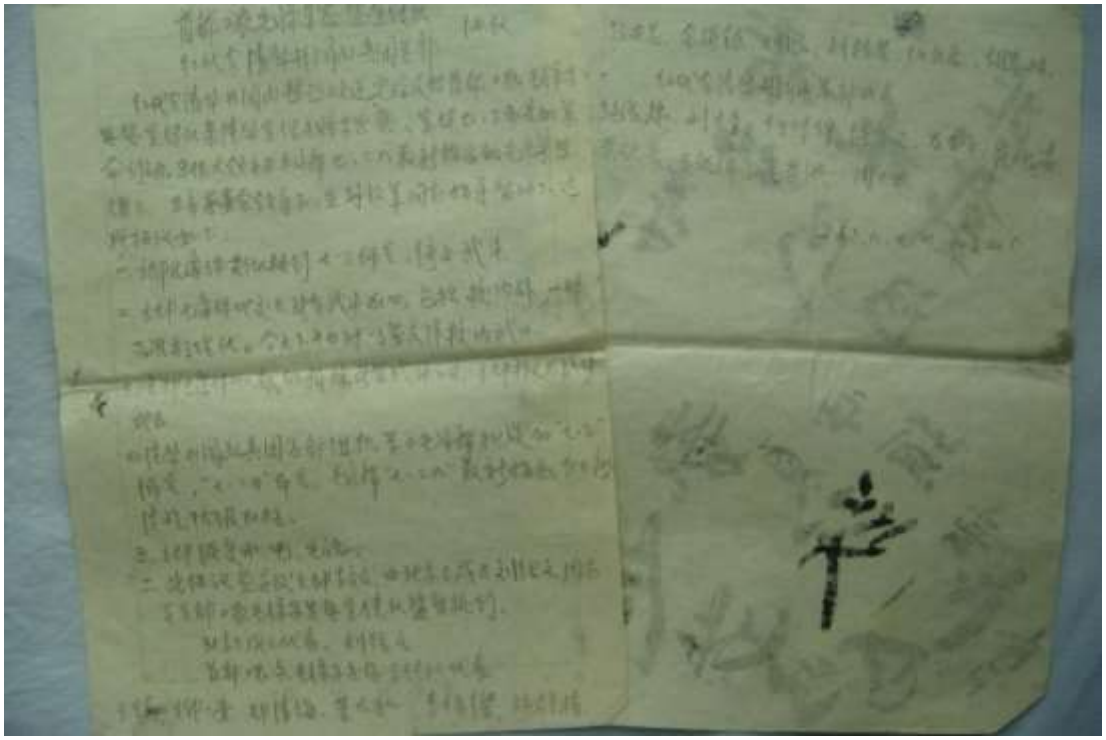
首都工农兵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代表

王慎、柳一安、郑清海、董太和、李保傑、施鏡清、张世忠、金满银、刘风、刘桂芝、任庆君、胡墨林。

红代会清华井冈山总部代表

鲍长康、刘才堂、任传仲、陈育延、左正平、崔兆喜、黄跃寰、王庭佛、高季洪、周大卫。

一九六八.七.卅.八点卅分



照片宣传队与井冈山兵团协议草稿原件

7月30日中午，9003大楼里的“井冈山”由解放军“保护”

撤出，这也是清华百日大武斗的最后一个据点。据陈育延日记记载：

我当时坚持要9003工厂的全部井冈山战士在交武器的同时撤出，结果是卫戍区刘绍文帮助解决了。9003的井冈山战士在撤出时，受到了最大的人身侮辱——搜身，并且不许打井冈山大旗。他们很多人都是哭着出来的。一到明斋，就开会，痛哭，然后跟游行队伍离开了清华。这天，井冈山战士心情沉重，情绪极大。但是，他们哪里知道，此时工人已牺牲5人，伤六、七百人了。晚饭时，蒯、鲍、我讨论，他们要离开清华，我不愿意离开，我认为现在离开是错误的，还应当再看看。

7月30日，蒯大富在北京市革委会被工宣队很多带队的负责人团团围住，要蒯大富交出凶手，交不出来，就说一说，当时怎么想的？蒯大富给魏秀茹等工宣队逼的没办法，就说当时工人宣传队攻楼，静斋的守楼人员，让蒯大富拿主意，他当时的想法就是不让工人进楼，如果工人硬要进楼，就抵抗，还击。魏秀如等工人们说：

“写下来！写下来！”

蒯大富说：“写就写！”就把这句话写了下来，并签了日期“1968年7月30日” 。

魏秀茹一把就把写的纸条抢了过去。

之后，“井冈山”开始了艰苦的说服工作，他们挂出横幅：

“向北京市工人阶级赔礼道歉！”

然后到工人家，一家一家的赔礼道歉。谢富治帮他们做工厂的工作，“井冈山”总部做学校的工作。事情很快平息了下来，但工人的情绪是很难在短时间内平息的。

清华百日大武斗以工宣队控制了清华局势，“团派”撤离清华，“四派”认可工宣队而暂告结束。

此时，被“414”关押的俘虏不知道外面发生的一切。但拆除工事所发出的巨大声响使他们意识到一定发生了什么大事。很快，他们听到牢房外有很多杂乱的脚步声。有一个人在问：

“这房间里有人吗？”

“没有人。”看守回答。

听到正在离去的脚步声，俘虏们面面相觑，谁也不敢发出声音。因为万一一切照旧，谁发了声音谁就可能挨打。但机会难得，不能让那些杂乱的脚步离去而无所作为。急中生智，叶志江用脚将一个搪瓷杯踢到了房间中的硫酸罐上，只听到“哐啷”一声，随即，离去的脚步停住了：

“房间里有人，将门打开！”

门开了。一个工人进来向这些被关押的人宣布：

“我们是首都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前来清华制止武斗。”

就像那个时代的电影里经常出现的镜头一样，这些俘虏一齐高呼：

“毛主席万岁！”

“工人阶级万岁！”

俘虏们见到了阳光、人群和树木，他们也不再挨饿了。当天晚上，被关押的贾振陆一口气吃了两斤米饭，叶志江也吃了一斤二两米饭。他们根本不需要下饭的菜，饭团一进入口中便会自动吞下去，仿佛喉咙处有一股强大的吸力。

但这些人还没有获得自由。两派迟迟不能达成交换俘虏的协议，他们被转移到主楼三楼的大教室，依旧是原来的看守看管他们。

又是一个星期过去了，十分渴望自由的叶志江决定组织越狱。一天中午，当他确定大多数人已经午睡后，拉开了已在几天前就被他悄悄弄坏门扣的房门。几个俘虏跟着他从主楼楼梯旁离地近 10 米高的窗口跳下，除了曾昭奋脚后跟粉碎性骨折，其他人顺利地逃脱。曾昭奋忍着剧痛，用脚尖猛跑，最后瘫倒在地，一辆路过的粪车将受伤的曾昭奋送了回来。

“414 派”向工宣队报告俘虏逃跑一事后，两派举行紧急会议。“团派”坚称没有见到任何俘虏，指控“414”派阴谋杀害俘虏。但陈育延在会上忍俊不禁的笑容露出了破绽。

清华校园分东西两区，中间以小河为界。科学馆属西区，“414”派在东区也有据点，那里也关着不少俘虏。因此，当时“414”手里还掌握着一批俘虏。清华大学两派最终于 8 月 9 日签署了交换俘虏的协议，全文如下：

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总部根据 1968 年 8 月 4 协议

李正明，马树忠，李发祥，吴其章，刘德荣，陶森，裴觉民，

谭小平。

另收留三人：王遵华，顾廉楚，杨遵基。

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总部代表

蒯大富，鲍长康，陈育延，王良生

1968 年 8 月 9 日晚 9 时 20 分

原稿至今保存在陈育延手中。

协议中的谭小平和裴觉民两人关在同一间牢房。这男女同牢应是独创，不记得是男的挨打还是女的挨打，总之，另一方很尽了喂水喂饭的责任。出狱后，两人成了患难夫妻。

## 第 1037 回：刘多荃，材料再揭刘少奇　哈师院，穆国兴自杀身亡

7月30日，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致信毛泽东、林彪，认为毛泽东7月28日凌晨接见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谭厚兰、王大宾等五人的谈话“极为重要”，提议将这次谈话的书面整理稿或北京市革委会正式传达的《毛主席关于制止武斗问题的指示要点》，发到全国。

这天，北京公布了毛泽东7月28日召见北京五大学生领袖的正式传达稿。这是在谢富治主持下、“五大领袖”核对记录、经删减后统一公布的，刊登在1968年7月31日的清华《井冈山》报第154期上：

毛主席七·二八重要讲话

（关于制止武斗问题的指示）

七月二十八日凌晨三点半到八点半，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副主席召见了我们五个人。主席的主要指示精神，是要我们欢迎和支持首都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到少数有武斗的大学宣传毛主席最新指示和“七·三布告”，劝说学生停止武斗，上交武器，拆除工事。要我们支持、尊重人民解放军。

召见时在座的有总理、伯达、康生、江青、姚文元、谢富治、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汪东兴同志。还有温玉成、吴德、黄作珍等同志。

毛主席身体非常健康，他老人家看到了我们进到会场时，一

一和我们握手，毛主席叫我们坐下。江青同志说：好久不见了。

毛主席说：还不是天安门上见过吗？又没有谈话，你们无事不登三宝殿。不过，你们的情况，我是知道的。

伟大领袖毛主席非常非常关心我们红卫兵小将和关心学校文化大革命运动。向我们进行了极为重要极为深刻的教导。下面传达主席关于制止武斗问题指示精神的要点，这是根据我们自己的纪录整理的，可能记录不够准确。

毛主席说：今天是找你们来商量制止大学的武斗问题，怎么办？文化大革命搞了两年！你们现在是一不斗，二不批，三不改。斗是斗，你们少数大专学校是在搞武斗。现在的工人、农民、战士、居民都不高兴，大多数的学生都不高兴，就连拥护你那一派的也有人不高兴，你们脱离了工人，脱离了农民，脱离了部队，脱离了居民，脱离了学生的大多数。有些学校搞了些斗黑帮，但很不够，逍遥派那么多，就是因为分了两派，忙于武斗。现在不搞斗批改，而要斗批走，斗批散。我说大学还要办，讲了理工科，但没有讲文科都不办。但旧的制度，旧的办法不行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还是要文斗，不要武斗。现在提出四个办法；（一）实行军管；（二）一分为二（就是两派可以分两个学校，住在两个地方）；（三）斗批走；（四）继续打下去，大打，打他十年八年地球还是照样转动。这个问题也不必现在答复，回去你们商量商量，讨论讨论。

我说你们脱离群众，群众就是不爱打内战。有人讲：广西布

告只适用广西，陕西布告只适用陕西，在我们这里不适用。那现在再发一个全国的布告，谁如果还继续违犯，打解放军、破坏交通、杀人、放火，就要犯罪；如果有少数人不听劝阻，坚持不改，就是土匪，就是国民党，就要包围起来，还继续顽抗，就要实行歼灭。

林副主席说：斗走资派是好事情。文艺界的牛鬼蛇神也必须斗。现在有些人不是搞这个，而是要搞学生斗学生，群众斗群众。他们大都是工农子弟，被坏人利用，有的就是反革命。有的人开始是革命的，渐渐地革命性减少了，走向反面。有的人主观上是想革命的，但客观上行动上是相反的，有一小撮人主观客观都是反革命的。

毛主席说：现在是轮到你们小将犯错误的时候了。不要脑子膨胀，甚至全身膨胀，闹浮肿病。希望你们不要分天派地派，搞成一派算了，搞什么两派。

林副主席说：今天是毛主席亲自关心你们，做了最正确的，最重要的，最明确的，最及时的教导，这次如果还置若罔闻，要犯很大的错误。你们红卫兵在文化大革命中起了很大作用，现在全国很多学校实现了革命大联合。大联合的问题，你们有些学校落后了。你们没有看到文化大革命每个时期需要干什么。希望你们赶上去。

同时，我们的总理、伯达、康生、江青、姚文元、谢富治、黄永胜等同志都给予亲切的批评和勉励。

在长达五个小时的接见中，深深地教育了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对我们红卫兵和无产阶级革命派无比的关怀和爱护，伟大领袖毛主席最了解我们红卫兵和广大无产阶级革命派，真是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我们的工作过去没有做好，有许多缺点和错误，感到无比的惭愧，有些事是很可痛心的。我们绝不辜负伟大领袖毛主席对我们的最大的关怀、鼓舞和期望。我们坚决听毛主席的话，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我们热烈欢迎，坚决支持首都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到大学宣传最高指示和“七·三布告”。认真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老老实实地向工人、农民、解放军学习，彻底改造世界观，紧跟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坚决执行“七·三布告”和毛主席的一系列指示，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北京大学　　聂元梓

清华大学　　蒯大富

北师大　　谭厚兰

北京航空学院　　韩爱晶

北京地质学院　　王大宾

一九六八年七月三十日重印，以此为准。

伟大的战略部署

毛主席七·二八重要讲話

毛主席林副主席无限关怀红卫兵小将

正式的传达稿一公布，清华“井冈山”的头头们都怔住了。因为其内容与两天前蒯大富在“728 召见”后返回北航时、非常兴奋地向他们口头传达的内容相差甚远。有些头头对蒯大富的“口头传达”产生了怀疑，认为至少是不全面的。

7 月 30 日，清华“井冈山”总部在北航开会，有人提出要继续抓工人宣传队的黑手，蒯大富作了布置。

31 日，谢富治到北航，重讲不能抓黑手，并指着蒯大富说：“蒯大富，你是知道主席怎样讲的!”

但是谢富治走后，蒯大富仍然布置《井冈山》报编辑部负责人吴炜煜说：

“《井冈山》报主席是要看的，你在报纸社论里加一个伏笔，点一下宣传队里有扒手，将来揪出来再看。”

果然，1968 年 7 月 31 日第 154 期《井冈山》报的两个社论

中分别有这样一段：

“最近一个时期以来的种种事实表明：一小撮反革命分子、反革命扒手以种种阴谋手段歪曲、破坏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他们挑动群众斗群众，转移斗争大方向，制造一系列反革命阴谋活动。”

“对于一小撮阶级敌人破坏和歪曲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妄图挑拨首都工农兵与红卫兵小将、与清华井冈山的血肉关系的一切阴谋，必须予以揭穿，坚决打击！”

7 月 31 日，谢静宜回到中南海，去见毛泽东。毛泽东见到她，第一句话就问：“你未被打死啊？”

他是严肃而幽默地发问的，因为他看见简报上说谢静宜也挨了一砖头。

毛泽东急着要了解清华的情况，谢静宜把北京市委和宣传队指挥部事先准备好的一张很大的清华园地图铺在地毯上，毛泽东蹲下仔细察看，并问工农宣传队的位置、分布的地区，现在都在哪里？

谢静宜汇报了宣传队当时在学校南门里照澜院和 9003 大楼一带的情况；汇报了“团派”蒯大富和“四派”沈如槐两派各占的地区。特别是汇报总指挥部让她报告毛泽东在体院同“团派”谈判时，市里一领导决定，限工农宣传队只准走的路线，以及规定哪些路线、地区不能进、不能通过的情况。

毛泽东看完地图站起来气愤地说：

“大学是工人、农民和全国人民办的。什么这条路能走，那条路不准通行？是谁规定的？没有道理！对工人、农民和全国人民来讲，条条道路都是通行的。什么这条路线不能走，那个地段不能进？岂有此理，是犯了‘路线错误’。”

他看了学校一些小传单，上面说“工人不在工厂抓革命促生产，到学校干什么来了？”他说：“工人在工厂抓革命促生产，到学校是抓革命促教育。”

当他看到传单上讲“毛主席接见了五大学生领袖”时，又说：“不是接见，是召见他们，批判他们。”

他接着说：“看来我是要接见了，我是要接见工、农宣传队，接见他们的代表。你去转报汪主任，由他来安排时间。”

8 月 5 日，曾任东北边防司令长官公署卫队统带、西安事变中担任捉蒋行动总指挥、1949 年 8 月 13 日在香港联名通电起义、时任辽宁省交通厅厅长的刘多荃，写了一份关于刘少奇的亲笔材料：

一九二九年冬，荣臻谈到中东路事件时说，咱们拿这个满洲省委书记做质，对谈判很有利。一九三零年三月鲍文樾对我说中东路问题我们吃了亏，为了找回面子，让那个地下党负责人协助，如国民党反苏罢工搞了许多经济条件，送给他看，他还给修改增加了几条，并以哈工会名义送报馆发表了，给我们帮了大忙。张学良说过，那个满洲省委书记，在哈有许多事情全能按照当地政府要求去办。一九三零年四月，黎天才和我说，那个满洲省委书

记，从哈尔滨去上海路过沈阳时说，在沈阳你们救了我的命，在哈尔滨对我也很好，东北好像我第二家乡。

刘多荃

一九六八年八月五日

8 月 5 日，哈尔滨师范学院革委会主任穆国兴自杀身亡。他是哈师院原党委宣传部长，文革初期与范正美的“造反团”站在一起，后来站在了“炮轰派”一边。在此之前，哈师院已经进行了近一年的倒穆运动。

穆国兴在 5 月 16 日曾给潘复生、汪家道写过书面检讨，承认自己犯了方向性错误。潘复生在其检查书的打印纸上面写了“此信打印常委阅”后，既无下文。而师院“捍联总”则发出一个又一个的勒令，要他交待他是如何搞阴谋诡计的。

范正美知道穆国兴处境困难，曾前去看他。他对范正美说：“我有什么阴谋诡计？我的一切都是公开的，是阳谋。在哈尔滨我是正确处理派，他不容我。我只好跑到北京找中央。到了北京，我承认受当时极左思潮影响，720 事件之后，我在北京往学院写了三封公开信，把当时自己对形势的看法及处理黑龙江省问题的个人意见都向全院公开了。我作为院革委会主任站在‘炮轰派’一边，有派性。我诚恳地检讨。他有错误，中央允许他改正，为什么他就不能理解别人，允许别人犯错误、改正错误？”

范正美劝他：“老穆，什么事情都是可以过去的。世界上没有过不去的大河，也没有什么不能跨越的高山。俗话说，乌云遮

不住太阳，冬天到了，春天也就不远了。一切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淡化的。不要把眼前得失看得太重。这是对我们党性和人性的考验，坚持实事求是，不要瞎说，也不要自己同自己过不去。毛主席不是说过，要准备坐牢，准备杀头吗，这才哪里到哪里啊。你可千万要挺起来，不要想不开。要想着，我们还有那么多同志与我们同呼吸、共命运。我们不是属于自己。”

穆国兴说：“你放心吧。我不会出事的。你说得对，这么多同志的命运同我联系在一起，我怎么做出对不起大家的事来。”

范正美说：“你可千万要想开啊。你说得对，我们这些人联系那么多的人，不要光想我们自己，还要想想那么多跟我们干的人怎么办。”

这时，穆国兴激动地站起来说：“我那次从北京回来，被他们抓住，你知道他们用什么打我的？”

他开始哽咽，沉痛地诉说：“正美啊，他们把弹簧套上橡皮筒，抽打人，不见外伤得内伤。我现在腰疼得厉害，常常尿血。你看，我的这根肋骨折了。我的眼力也在下降。”

范正美劝道：“你该看病看病，不要管人家怎么说。”

穆国兴叹惜地摇摇头。忽然说道：“没什么，大不了还去当我的教员。”

然而，穆国兴最终还是自杀了，留下一封没有署名的遗书《几点说明》：

我是贫农出身的孩子，在党一手培养下，参加革命队伍，入

党后将近 20 年的时间，为党做过一些工作，我一直热爱党和忠于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在解放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中，我没有犯过大错误，我是跟着毛主席闹革命的。在文化大革命中我犯了严重错误，这主要是参加炮轰派，犯了方向路线错误，给党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损失。我去年十月以后就开始认识错误，做了几次检查，今年 5 月，我曾要求潘汪找我谈话，给与批评帮助，至今无音信。今日倒穆运动，又掀高潮，对我这样一个犯了错误的干部，非置于死地而后快不可，这使我无法理解：初则打成两面派不成，继则企图和王（力）、关（锋）、戚（本禹）拉上关系，也不成（因为没有事实），现在则打成漏网走资派。总之，不打倒穆国兴是不会罢休的。这是为什么？

黑龙江两派斗争，在中央的亲自主持下，经过几个月做工作，做得那么细致、耐心，确定了解决问题的正确方针，两派达成协议，中央发了文件加以批示，问题已解决得很好。回来后，按中央指示，大联合迅速实现，形势很好。然而，捍联总撤销市区两级组织大会以后，对炮轰派的调子又逐步上升。目前又把中央批示和 12 条及三个单位在京达成的协议抛在一边，又重新原来某些人的错误政策，我是不能理解的。这种对炮轰派瓦解、压垮的方针，是不符合中央指示的。

关于我的问题，我只能说：

一、我不是反革命两面派，我背后没有搞阴谋，我的错误是明处的，我和王关戚没有任何关系。

二、我不是走资派，更谈不上漏网。我在教学工作，在 61 年以后到 64 年时犯了一些严重的错误，主要是执行资产阶级教育路线和组织路线。但我犯一些错误是一方面，我在教育革命期间（58 年到 60 年）按主席指示做了一些工作，还有成绩的一面。

现在从反革命分子嘴里抠出几句对我子虚乌有的话或者一两个升了温的材料就强加于我打为走资派，这是妄想。

三、我和总部一部（分）同志犯错误这件事，我很痛心，我们犯错误悲剧就在于我们主观上认为那样做是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行动，认为是在保卫毛主席革命路线，我们是从忠于毛主席的国情出发的，没有什么个人私欲，没有什么阴谋。在我发现错误的时候，是想努力改的。

我的这些错误，都可调查，会弄清楚的。可以审查一百年，但也不会得出什么走资派、两面派什么反革命死党之类的结论的。

我现在已经是个废人了，去年十月的折磨，使我的左眼已失明，连日对这些问题想不通，精神痛苦，长夜失眠，右眼也半失明了，我今天已失去了为党工作的条件，我已无路可走了，我要向党向毛主席交待的都已交待了，我没有背着党的一面。

某些别有用心的人，利用我的错误把人置于死地，发动一年来的倒穆运动，还没有成功。我可以帮助他们达到你们的私欲，把我完全否定。

经请示潘复生批准，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政治委员会于当月

即成立“范穆任反革命集团”专案组，由文革组的张永昌任组长。认定这个“范穆任反革命集团”的成员有：范正美、穆国兴、任万新、胡云飞。

## 第 1038 回：广州市，出现抢枪小高潮　没武器，民兵为战士站岗

中央《七三》、《七二四》布告公布后，广州却掀起了一次抢枪高潮。这是发生在广州郊区石榴岗附近一个叫老鼠岗的小山上的抢枪事件。

1967 年 5 月，空军高射炮某部从援越战场上轮换回国后，在广西明阳糖厂换装休整了一个星期，便通过铁路行军到达了广州市，开始担负城市防空任务。连队驻守的郊区石榴岗附近一个叫老鼠岗的小山上，天天都能听到附近海军卫校与后勤单位这两个允许搞“四大”的军队单位，喇叭对着喇叭用《毛主席语录》辩论，有时还相互间开枪。

城里闹得不可开交的时候，郊区农村还是平静的。农民啥时候也要种田种菜，季节是不等人的。连队与所在的土华大队军民关系搞得很好，经常互相走访。连队还派了几个战士去村小学帮着搞宣传。但是，1968 年 8 月后，当地的群众却将连队的枪抢走了。

当时，中央制止武斗的《七三》、《七二四》布告用空军的安—2 飞机直接在天上散发，本想是为了制止武斗。谁知道当地群众从布告中知道广西、陕西都真枪实弹打得那样厉害了：“抢劫援越物资”、“抢夺人民解放军武器装备”、“抢劫车船，中断铁路、交通、邮电”……于是，各派群众组织也不甘落后，开始冲击部队，从“要枪”发展成了“抢枪”。

农村的群众组织“贫革联”在城乡结合部安上了路障，防备其他派别组织“入侵”。接着是几个工厂到连队“借枪”。他们这么一闹，部队附近的几个村子也发话了，他们也要“借枪”。“八一”建军节刚过，有的连队发生了抢枪事件。团里赶紧指示各连把枪埋起来。当兵的要埋枪？怎么埋法？一时间连队干部也没了主意，只好匆忙下令让各班各自想办法先埋。

由于班长们想不通，战士也有抵触情绪，各班只是草率应付，结果酿成了大错。

这个连队在的小山两面环水，视野很远。连队设一个岗哨，负责观察大路方向，在阵地处再设一个岗哨，负责监视后山坡。

那天连队还在吃早饭，岗哨突然发现大路上涌来了黑压压的人群，立即吹哨报警。战士们纷纷扔下饭碗，跑回宿舍穿上军衣，列队集合。这时，老百姓已经涌进了营区，是来自附近土华、小州、新窖三个村的群众，村干部和连里的干部、战士都认识。他们先是与连干部商谈“借枪”，说其他派都有了枪支武装，他们没有枪要吃亏了。他们还说：“你们是防空的，大炮我们不动，只是要枪。”

连队干部当然是严词拒绝。在吵嚷声中，只听得领头的一声口哨，老百姓们冲进了营区，开始在宿舍里找，敲击木板房的墙壁。战士们除了拿着《毛主席语录》喊口号，毫无办法。这时阵地上传来哨音，又一股群众从后山冲上了阵地。按预先分工，每个班除留一人看守宿舍外，大部分战士都立即上了阵地。此时山

上山下全是老百姓，赤着脚，光着背，有 1000 余人。连队的 70 几名干部、战士瞬间淹没在“人民群众的汪洋大海之中”了。

炮班的枪草草埋在炮位旁的山坡，混乱中已经无影无踪了；炮弹箱逐一都被打开，望着油亮金黄的大炮弹，老百姓不断发出“哇——哇——哇！”的惊叹；还有群众好奇地把炮衣掀开看看，但还是信守“诺言”，不动大炮。

连指挥所也涌进去了十几人。他们看着无线电员在“幺——两——三——四”地发暗语报告情况，一脸茫然。有人试图去动几个箱子，战士只好打开让他们看看。无线班的一个抗美援朝战利品——铜皮箱是锁着的，战士喊班长来晚了一步，被个老农一斧头就把锁砍了下来，几个农民扑上去一阵乱翻。这下几个战士急了，把那个老农死死地按在地上。老农光着个背，滑溜溜地挣扎着哇哇大喊。最后，他们凭着人多势众，推开战士们溜了。斧头被一个战士藏了起来，成了以后的“证据”。

有两个班的 5 支枪藏在鸡窝下边，被看出了破绽，经一番争夺给抢走了。炮工班将两箱子弹用块席子一裹埋在芭蕉树下，也给拖了出来。一箱子弹两铁盒足有 30 公斤，那个小伙子一手提一箱，竟光着脚在乱石岗上飞奔而去。看到终于抢到了枪和子弹，老百姓们情绪大振，开始漫山遍野地到处用手挖、用铁棍扎。

战士们一部分留在阵地上，一部分看守营房，其他的只好一边跟着老百姓到处跑，一边拿着《毛主席语录》喊“要文斗不要武斗……”、念《七三》、《七二四》布告。可是，这些都已经不

起什么作用了！许多战士早饭没吃上，中午也没有饭吃，高温下军衣上下全都湿透，有的战士中暑倒下，被抬回了宿舍。

一阵紧急哨音响起，仪器排要求紧急援助。原来，仪器排利用测高机的大铁箱将全排的枪埋在厕所，也就埋了一米深。老百姓用铁探头凿到了铁板，想进行挖掘。战士们全都围了上来，与老百姓对峙着，冲进来的群众被推了出去。厕所的墙倒了，三个尿缸也破碎了。人声鼎沸，臭气熏天，为了保住这箱枪，战士们手挽手组成了三层人墙。面对着这手无寸铁的绿色“长城”，老百姓开始畏缩了，虽然他们手中拿着长矛、铁棍、锄头等。只见几个头头密商了一下，立即组织农民也围了个圈，有好几层。几个群众抓住一个战士，连拖带扛丢出他们的包围圈。出去的战士根本无法再进来。混乱中，有几个小青年拿砖头砸了连长的头，还砸伤了好几个战士。看到此情此景，连长愤怒了，喊文书去拿他的手枪要拼！后来因为这句话，连长还背了个违背“死不开枪”命令的错误，由于大部分战士证实“没听到”，才不了了之。几经反复折腾，被包围的战士人数越来越少，最后老百姓得逞了，撬开铁箱把枪全抢跑了。

中暑的、被砸伤头部的，战士们一下躺下了 20 多人。团卫生队的救护车根本无法到达郊区连队，连里只好派人去隔河的海军医院求援。海军医院来了两辆车，将伤员运走了。

第二天，团里来了一台运煤的解放—30，车的副油箱里藏了 50 支手枪，让连队隐藏。团李副参谋长随车来了，立即召开连

干部会，经查共丢失 20 支步枪。他批评连里没个章法，敷衍了事，酿成了这样的大事故。并下令必须与村里交涉，把枪要回来。

李副参谋长在连队住了下来，他与指导员一起找到了大队支书，从党员的角度进行交谈，终于取得了进展。当时因为打伤了好几个战士，大队干部们也担心后怕。到了晚上，三个村的支书都来了。他们听说 20 多个战士住了院，真害怕了！指导员拿出了国家领导人接见他们出国部队代表的“六二〇会议”大幅照片让他们看，还叫来了参加会议的代表炮排长，声明这是中央命令我们来驻守广州的。同时，炊事班弄了几个菜，李副参谋长陪他们喝了点酒，缓和了气氛。最后双方达成协议：3 天内把枪送回。同时还决定，在此期间，他们要将枪藏好，不得让其他组织抢去；大队民兵来连队协助值勤；发生别派抢夺枪支，贫下中农坚决不让；部队不再追查打人者；连队的大米蔬菜由大队供给，保证连队吃上饭。这天晚上临走时，连队还给每个队干部送了两个出国节余的肉罐头。

第三天晚上，支书们带着民兵终于把枪给抬来了，但声明两箱子弹不给了。

为了防止再次被抢，连队决定马上埋枪。事不宜迟，哪敢过夜，立即行动。各排找出可靠党员骨干参加埋枪。营区四周派出岗哨监视，以防老百姓窥视。炮排把两门火炮悄悄拉出掩体，挖了一长条深槽，将枪用黄油涂抹后，用塑料布捆紧放入掩埋砸实，再将火炮复位。手枪也由炮排负责掩埋。仪器排还是利用大铁箱

藏枪，并趁退潮推入河中心挖泥掩埋。由于河水含有海水的成分，两个月后取枪时发现，枪托烂了，枪身也有不同程度的腐蚀。有几支枪膛黄油没有填满，膛线受腐蚀严重报废了。指挥排想到了电影《地道战》的锅底地道口。但地方太小，回风灶坚固，破后难恢复，就选在风灶烟筒下。在仅容一人侧身的进煤口下，用电话班的折叠锹，一点点地挖了个两米深的竖洞，把枪放进去后用炉灰盖上，余土抛入河中。

抢枪的风潮越来越大。上级通报，说有的连队炮弹被抢去做炸药，这让大家稍稍平静的心又悬了起来：几百发大炮弹怎么藏啊！在以后的日子里，天天有造反组织光临连队要枪。工人文明一点，申明他们被欺负，解放军不能不管，“你们是炮兵，枪我们是借用，可以打借条。”他们想方设法跟战士攀老乡、套近乎，希望暗指一下枪藏在那里。学生们就难对付了。来的大多是中学生，大吵大闹与你辩论，趁乱到宿舍偷拿腰带，有的还穿跑了解放鞋，抢军帽。这时，68 年参军的潮汕兵已经到了连队，广州话他们听得懂。有时新兵与他们发生冲突，打了起来，老兵还要负责看住新兵，以防发生意外。

一天中午，附近麻袋厂的 100 多个工人冲进了连队，没有先找连干部“理论”就直接下了手，在宿舍的地上砸了个遍，在山坡上用钢钎到处插探。大多数战士并不知道枪藏在哪里，就手拿《毛主席语录》，喊着口号围着他们转。几个老工人不断打量着山坡上那座足有一人高、用水泥塑的“天安门”城楼。那是全连

进行军事操练前在那里宣誓、唱歌的地方。营区还有一座“天安门”，是每天进行“早请示晚汇报”的地方。他们怀疑枪有可能藏在这座“天安门”下面。几个工人试着用钢钎往里戳。战士们大喊：“不准动，这是不忠于毛主席！”工人们就从旁边挖，挖几下再往里戳一戳。碰到了砖，他们断定枪就在里面了，有人一声呼喊，工人们全都围了上来了。当时有个女的据说是个工会干部，亲自指挥。战士们一边高喊着“誓死保卫‘天安门’”，一边扑在了城楼上面阻挡。这下工人更确认里面有枪了，与战士混战在一起，拼命地挖。经过几个来回的拖拉战，他们终于将“天安门”推倒了。可是，里面除了土石，什么也没有。工人们不死心，继续往下挖。一些战士干脆“假戏真做”，趴在了土石上。工人们刚刚失去的希望又被点燃了。在推拉中传来营区的“天安门”也被掀翻了，战士们愤怒地指责工人“你们这是不忠行为！”“是反革命派！”老工人自知理亏，不再凑前，坐下来抽烟歇息了。但一些年轻的工人不服输，反被激怒了，也开始变相地动手了。他们在那个女干部的煽动下，专抓战士的腰带和下身，有几个暗拿麻袋机上的钩针划撕了战士的军衣，把脊梁都划破了。战士也火了，两人抓一个就往山下扔，连干部担心违反政策，严厉制止，将战士撤到一旁。工人们一气猛挖，一直挖到了大石头才住手。

天色晚了，工人们一无所获，终于爬上汽车走了。可是刚走了几步，汽车的后车胎扁了。在战士们一片哄笑中，工人们只得下车步行。后来有个从汽车连转来的兵自称，是他把轮胎汽给放

了。

麻袋厂工人没有抢到枪，却赶到了“枪口”上。不久广州各派实行大联合，另一派掌权的把这事捅到了军管会，那个领头的工会女干部成了“出头鸟”。军管会拿来三张女人照片让我们辨认，看到底哪个是煽动抢枪的女人。战士们都指认了同一个女人。原本只要有三个人指认就可定性了，这下可是板上钉钉了。后来听说要判五年。麻袋厂派人偷偷来找连队干部，诉说这个女干部有个刚满周岁的孩子，进了监狱家人咋过？希望连队改口说不是她。但那次抢枪将全连都折腾苦了，还划伤了几个战士，连干部当然是严词拒绝。

李副参谋长在连队坐镇，出主意掌握政策，遇到的难题重重。在群众冲击时，他要身先士卒，嗓子喊哑了，还几度晕倒。老百姓知道他的官最大，是“耶个头、大肥佬”，都冲他“理论”，向他“开炮”。在现场，他常常是地上一坐，一百八十多斤的块头，那些个瘦小的造反派七八个也弄不动他。但也正因为这样，他宽大的脊梁上不知挨了多少拳头。他始终不卑不亢地笑脸应对。附近的老百姓都认识他，亲切地叫他“肥佬”。他总爱穿绿黄不匀，出国时用绿颜料染的黄衬衣，几天不洗汗气冲人。村里一伙女民兵爱逗他，说你怎么穿女人的花衣服？他一本正经回答：“懂个啥！这是专门配发的新式迷彩服，只有我有资格穿，我爱漂亮啊！”

她们哄笑他：“大肥佬！又黑又脏！”

他讥笑道：“别看我人黑，可我的老婆漂亮，你们十个也顶不

上。”

李副参谋长是解放前就参军的东北汉子，经历了抗美援朝、东南沿海防空、援越抗美，一直过着打游击的动荡日子，没有多少温馨的家庭生活。但他确实娶了个江南俏夫人，温柔贤惠。一双儿女更是英俊聪慧喜人。

局势缓和些了，但枪还是埋在地下不敢取出来。战士们没有枪，站岗改成坐岗，每天一对男女民兵荷枪实弹在连队门口的变压器房前站岗，守着这座唯一进出的桥头。

## 第 1039 回：送芒果，陕西、四川武斗停　福建省，革命委员会成立

8 月 5 日，《人民日报》发表纪念毛泽东《炮打司令部》大字报两周年社论：《在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领导下团结起来》，批判“多中心论”。社论说：“以毛主席为首的、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是全党、全军和广大革命群众的唯一领导的核心……所谓‘多中心论’是一种资产阶级的山头主义、个人主义的反动理论，它涣散革命队伍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的团结，妨碍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贯彻执行，倘若各个部门、各个单位都要以‘以我为中心’，全国有许多个‘中心’，仍旧是无中心。这种思想如果听任下去，而不加以纠正，就会走到脱离以至对抗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错误的道路上去。”

这天，毛泽东将外国元首访华时送给他的芒果转送给驻清华大学的“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简称“工宣队”，以示对他们的支持和赞扬。此事在全国引起很大的反响。

8月8日下午，毛泽东接见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和吴德，谈高等学校问题。他说：“靠学生解决问题是不行的，历来如此。学生一不掌握工业，二不掌握农业，三不掌握交通，四不掌握兵。他们只有闹一闹。四大自由，我看现在什么自由都没有。清华两大派打，有什么自由？双方报纸互相骂，有什么自由？在本派内又不能自由辩论，有什么自由？在本派内也没有自由。他们都是武斗集团，不知有多少个中心。所谓‘五大领袖’，群众不信任

他，工人、农民、士兵不信任他，学生不信任他，本派的大部分不信任他，只有几百人勉强控制，怎么行呢？学生为人民没作什么好事，怎么能取得群众的信任呀？要二十年、三十年做了点好事，才能取得群众信任。当了什么委员、副主任，就不得了喽！”

谈到送芒果引起的全国震动，毛泽东说：“这是个偶然事件，现在变成了政治事件。我没有见到芒果，我告诉汪东兴，我们不吃，送给工人宣传队。”

谈到抗日战争时期山西牺盟会的问题时，毛泽东说：“不能把牺盟会、同志会都说成是坏的，我们还派人进去做工作，牺牲救国嘛！”

8月9日，林彪像往日一样出去“转车”。他在大街上看到一些“纪念林副主席‘八.九讲话’发表一周年”之类的大标语。回去后，林彪立即吩咐叶群，叶群再吩咐秘书们：“必须连夜把大街上的有关宣传林副主席的标语揭掉。”

秘书为难地问：“在大街上公开撕标语，这是了不得的事，如果被揪住，怎么办？”

叶群说：“这个，你们用不着害怕，你们穿上军装，坐上汽车，沿市内主要街道察看，如果发现有宣传首长的标语，就上去把它撕掉。一旦有人查问你们，你们就堂堂正正地打出首长的招牌，说明你是林办秘书，是奉首长的指示这么干的。他们如果不相信，可以打电话来问。”

秘书们心中有了底，坐上上海轿车，在夜深人静的大街上行

程近百里，撕掉标语30余幅。期间曾有两次被人查问，但由于亮出了“招牌”。盘问者一看那停着的小轿车，也只得缩口了。这样的事叶群还亲自带领秘书干了一回。

第二天，北京卫戍区就向中央文革报告说：大街上宣传林副主席的标语一夜之间被撕掉了，据称是林办的工作人员干的，但不知真假。

1968 年 8 月 10 日，中央（68）127 号文件决定，向在计委大楼办公的国家计委、全国物价委员会、国家统计局三单位正式派驻军代表，主持工作。总参军务部部长，时任铁道部军管会主任的苏静中将为军代表，总参军务部副部长陈彬少将和李少亭为副军代表。苏静考虑自己不懂业务，提议周恩来派人协助他，周恩来把袁宝华从国家物资管理部部长调国家计委协助苏静负责业务工作。

1968 年 7 月，四川万县军分区和“毛泽东思想主力军万县地区革命造反司令部”负责人熊道生按照刘结挺、张西挺的指示，组织万县地区九县一市的武装部和群众组织的武斗队，对万县市的“东方红战斗团”进行围剿。熊道生以“三区军民联防指挥部”的名义下文，说“云阳县发生反革命暴动，为配合成都军区的围剿，三地各军分区、武装部要迅速组织武装民兵守住要害岗位，对可疑人员加强盘查”。同时制定精密的作战计划，即“四路进攻、铁壁合围”，由云阳秋派组成的 3 支武斗队分头带路，配合 23 个县、市的大队伍对云阳红卫兵“1127 部队”进行合围。8

月 6 日，攻克云阳县城，抓捕“俘虏”341 人，其中有县委正、副书记 3 人，副县长 1 人，部、局长 7 人。枪杀“俘虏”32 人。云阳县“1127”派撤离前，于 7 月 15 日夜锯开县人民银行国库门锁，强行提取现金 72.5 万元，随后经巫溪、城口翻越大巴山逃往陕西平利县。在这场持续两个月的大规模武斗中，发生了江南“穿心战”集体枪杀 38 人，祖师观武斗打死 156 人，江口大会堂棍棒打死 18 人，巫溪朝阳追歼杀害和冻死 67 人等罕见惨案。云阳县自 1967 年 8 月开始武斗至此次武斗结束，云阳全县共被打死 1021 人，其中抓捕后杀害的 622 人。

8 月 8 日，一艘运送大三线设备的货轮——“人民 32 号”，从上海到重庆，卸货后回上海，刚好在云阳“解放”的第三天路过万县市的江面。刚刚占领云阳县的“主力军”一派认为是重庆“815”来给云阳“1127”送武器的。熊道生命令汽车拉着重机枪，沿着万县马路和轮船相向而行，用机枪火力对货轮不停地扫射，船上被打死 5 人，多人受重伤。消息传到上海、北京，引起中央震惊，下令四川省革委追查破坏三线建设的反革命！熊道生被审查，1971 年撤销党内外职务，判刑入狱。

7 月 28 日，四川泸州武斗，城郊大驿坝 1163 油漆仓库被炮弹击中起火，损失 32 万余元。经过这次大规模武斗，一派被赶走，泸州为另一派所控制。但市区及泸、纳、合、叙、蔺等县武斗仍断续进行，并未停息。

7 月 31 日，驻泸部队 2300 余人在城区进行武装游行，大张

旗鼓地宣传中央《七二四布告》。接着，部队先后派出宣传队 1886 个、5400 人次，宣传中央指示.同时举办学习班 32 期，集训武斗人员 1000 余人；收缴各种枪 1407 支、炮 17 门、枪弹 12 万发、人民币 10 多万元及部分炮弹、物资。

在成都军区、驻泸部队强有力干预和努力下，第三次武装支泸草草收场。至 8 月底，泸州市区武斗基本停息，武斗工事基本被拆除，武斗人员大部分被遣返原单位。

在“武装支泸”中，刘、张、王、郭组织人马，“随军拍摄”了纪录片《突破口上红旗飘》。影片记录了第二次武装支泸中，武斗队员进攻之前的宣誓场面，进攻场面，双方进行武斗大战的场面，有武斗死者的尸体，王茂聚为武斗死者送花圈的场景，以及 1967 年 9 月 4 日，泸州市钟鼓楼在武斗中被击中后燃烧的场面。

8 月 2 日，陕西省革命委员会主任李瑞山在省革委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作《关于坚决贯彻执行‘七三布告’、‘七二四布告’的报告》。他说：

“从 4 月初以来，一些地区有人不断挑起武斗，制造了一系列严重的反革命事件。

一、抢劫国家银行、仓库、商店。据不完全统计，从去年 11 月以来，全省银行、营业所被抢 60 余次，被抢现金 734 万多元。抢走和分掉国家仓库粮食 44 万斤，粮票 63 万斤。

二、烧毁和炸毁国家仓库、公共建筑和房屋。三原县武斗烧

毁松香 90 多万斤，损失达 1000 万元，烧毁棉花 4000 多担；安康两派在武斗过程中，烧掉已包装好的出口茶叶 30 万斤，炸毁供全城居民吃水的自来水塔，毁坏老城民房 15000 余间。

三、抢劫车船，中断铁路、交通、邮电，并私设电台。5 月 26 日，一小撮坏人制造了西安铁路系统全线停车事件，6 月 3 日又发生冲击西站事件，给国家经济造成重大损失，积压车皮高达 8、9 千辆；铁路、公路经常发生开枪、拦截车辆、殴打司机和值勤战士事件。全省有 4 个专区电话、电报不通，根本断绝联系的有 29 个县，邮件传递、电讯时断时通的有 18 个县。

四、连续冲击人民解放军的机关部队，抢夺武器装备，杀伤指战员。被抢各类枪支数万件以上，子弹数百万发。6 月 2 日，勉县部份歹徒武装袭击国家绝密档案库，将守库的一个班的 14 名战士杀死 9 名，杀伤 4 名。

五、拒不执行中央有关通令、命令、通知和布告。7 月 31 日，汉中两派发生武斗，打死 21 人，打伤 38 人。7 月 19 日，西安数千群众攻打白家口地区，动用了航空机关枪、土坦克等武器，打死 21 人。此外，在全省一些地区，还不断发生武装攻打革命委员会、杀害革命委员会成员事件。”

8 月 2 日当天，陕西省革命委员会发出《关于继续深入学习、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亲自批示的〈七.二四布告〉的通知》。《通知》要求“立即无条件停止武斗，无条件地上缴一切武器，解散一切专业武斗队，拆除武斗工事、据点、关卡；立即恢复交通、

邮电；无条件地交回抢去的人民解放军的所有武器装备和国家财产、现金。各单位要迅速动员外地、外单位的人员统统返回原单位”。

8 月 6 日，西安警备区发布限期收缴武器的第二号通令，此后又发出关于贯彻第二号通令的通知，通令指出“各单位、各造反派组织要迅速主动上缴武器，违期不交者，将以对抗‘七.三’‘七.二四’布告、私藏武器论处”，这一通令发出后，各单位的造反派组织纷纷上缴武器、解散武斗组织。

8 月初，陕西武斗停止，开始上缴武器，恢复了交通和社会秩序，逃离的居民职工开始回城。

8 月 8 日至 8 月 12 日，西安地区“工联”、“工总司”、“工交捍卫军”、“工总革联”“陕红联”等工人造反组织分别撤消。截止 9 月中旬，陕西省共收缴武器 7 万余件、收缴各种子弹近 400 万发和一大批手榴弹、炮弹、炸药和雷管。至 9 月底，陕西省各地的武斗陆续停止，武斗据点、工事、关卡被拆除，决大多数地区的大宗武器基本收缴完毕，武斗带来的动乱局面得到控制。

在汉中军分区和支左部队的协调筹备下，9 月 2 日，经陕西省革命委员会批准，有军队干部、地方干部、造反组织头头组成的“军、干、群”三结合的汉中专区革命委员会、汉中县革命委员会同时成立。

到 9 月 21 日,陕西全省所有地、市、县全部成立了革命委员

会。

1968年8月11日，毛泽东接见六大区的军队代表时问：

“韩先楚同志来了没有？福建不是很复杂吗？后来不是韩先楚同志做了工作，问题就解决了吗？你们的报告很好。”

毛泽东说的这个报告就是福建省革委会的成立报告。

毛泽东还说：“韩先楚同志，拥护你的那一派没有问题了吧？你们要做好反对你们的那一派群众工作。对造反派和对军队不同。”

8月1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以中发［68］132号文件批示关于成立福建省革命委员会的报告：

毛主席批示： 照办。

中央热烈地庆贺福建省革命委员会的诞生。

8月21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编辑部社论《团结起来，共同对敌——热烈祝贺福建省革命委员会成立》。

革命委员会成立后，福建省也开始了清理阶级队伍，又有群众上街请罪。见是学生，韩先楚就让停车，下去和学生唠。学生说：“你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我们要打倒你，还骂你‘韩拐子’，站错队了，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犯罪了。”

韩先楚说：“运动期间，我有错误，你们喊几声‘打倒’有什么了不起的。我一个放牛娃出身的大老粗，又不是金枝玉叶，有什么碰不得的？全国各地不都在喊‘打倒’嘛。”

他说着，就把那些“请罪”牌子拿过来、摘下来，对学生们

说："你们是响应毛主席的号召闹革命，还是些孩子，孩子有什么罪呀？就算有错误，'子不教，父之过'，更应该检讨的是大人，特别是我们这些当领导的人。"

听着这话，一些学生就抓着他的手和胳膊，流着热泪，哽咽不止。韩先楚竭力忍着，那泪水也快出来了。

临走，韩先楚拍拍一个高个男生的肩膀："给你们个任务，去告诉你们的同学，也告诉所有与你一个观点的人，群众无罪，学生无罪，孩子无罪，回去复课闹革命，好好学习就是了。就说是我韩先楚'韩拐子'说的。"

## 第 1040 回：焚巨款，熊一军花园受降　淹邕城，“四二二”全军覆灭

8 月 2 日，广西革筹小组和军区负责人向中央检讨说：“我们对新‘422’所属展览馆据点实行强行进驻和收缴武器，事先没有向中央请示报告，是严重错误，特向中央检讨，请中央给予批评。”还说：“在部队进驻时，他们向部队开枪，我牺牲 6 人，伤 52 人，部队还击打死他们 23 人，伤 5 人。”

就在广西革筹小组和军区负责人向中央检讨的当天，广西军区命令 6912、6966、6936 部队组织“武装救火，收缴武器”，派出 2000 多人的部队，会同九县一郊的武斗民兵和“联指”派武装人员，集中力量围攻“422”派最后占据的解放路据点。“422”原先控制的解放路附近的民生路、新华街、商国街等 12 条街道，前几天已被打成了一片废墟。在此之前，“422”的众多据点：民族电影院、中华电影院、工人医院、天主堂、展览馆、百货大楼、造反楼、新华街、万国、民生邮电楼、当阳街、北际路沥血楼、航运局大坑口以西一片、市粮食局等都相继被攻陷，此时只剩云亭街至民生码头一片。

据守解放路的“422”头头熊一军用高音喇叭向解放路的市民呼吁，让他们尽快撤离。“联指”也广播：“革命群众快离开，反革命分子留下来”的促降口号。

撤离的居民，从解放路延民生路到南宁饭店门口接受检查，放行后自投亲朋。大批的居民举着双手被押解出来，甚至伏在母

亲背上的一两岁的孩子也知道把双手举过头作投降状。

当时，南宁市内两派观点不同的群众组织均互相指责对方混入了“反团”分子。这天，“422”为摆脱“联指”的揭发和攻击，在醒汉街口擅自枪毙陈阜东、覃雄、潘子昆、唐继能、白景光、陆绍禾等6人，其中陈阜东、覃雄是市公检法军管会点名通缉的“反团”匪首，潘子昆系另案的特务头子，此3人当即身亡。而唐继能、白景光、陆绍禾3人未被击中要害，后被人救走，这3人均不能证实是“反团”成员。

8月3日，部队和“联指”加大进攻力度，炮击解放路。

8月4日，解放路银行两侧的民房起火。熊一军担心银行金库因武斗失控而被盗抢，便开会讨论决定，将银行的现金全部烧毁。熊一军亲笔签署通知，让“422”保卫处的人前往解放路银行。

“422”解放路中心片指挥所保卫处数人来到银行，找到银行干部后，“422”的人用十字镐砸开银行铁门，打开金库，请银行干部清点钞票，共计现金510，430元6角。熊一军也到现场，他给银行干部打了收条，然后将现金装入4个麻袋，抬到解放路土产门市部后面的医药公司的篮球场上，四周架上机枪，由几十名荷枪实弹的“422”人员监督，全部当众焚毁。他们在执行过程拍了照片以作证明。

尔后，熊一军率众离开解放路，来到解放路小花园投降。“联指”通过高音喇叭向全市报捷说：“抓到熊一军了”!

这天，《广西日报》发表社论，号召各专、市、县革委会，

各军分区、人武部和“联指”行动起来，歼灭“422”中的阶级敌人。

此时，解放路的居民已撤走，熊一军率众投降后，死守解放路的“422”约2000人，绝大多数是南宁人，热血的红卫兵学生和年轻工人居多，还有一些不是南宁市的“422”骨干人员，他们在当地已上“联指”的“清除名单”，有的是在当地被“全家抄斩”的脱逃者，避死来投奔“422”，所以“联指”上报说“422”是地、富、反、坏、右、资的老巢。另外，这里还有南宁的“青年近卫军”,“雄鹰”等组织，他们倾向“4.22”，但独立行事，不受“4.22”控制。

8月5日下午，“联指”的头头代表指挥部通过高音喇叭发出“坚决，彻底地消灭4.22反革命分子”的总攻令！到8月8日，解放路据点被攻下。上午9时左右，解放军和“联指”、“工纠”从解放路押送一批“422”派的“俘虏”出来。当天，“422”的广播员和其他成员共26人，被押到现在的广州照相馆门口集体枪决。

晚上，“联指”派在南宁市多处进行庆祝胜利大会和庆功宴会，广西区革筹、广西军区、南宁市革委会、南宁市警备区司令部负责人纷纷表示庆贺。

南宁市解放路战斗结束后，大规模的激烈枪炮声基本结束，进入清剿……在上述三个据点据守的“422”派成员，及未“随军撤退”、参加武斗的“422”派家属老人、妇女、孩子，以及家

住解放路、民生路等地的群众9800多人成为“俘虏”，被收容、关押、审讯、殴打。有许多人因受不了酷刑，企图逃跑而被枪杀。还有人被分批拉到邕江边处死。为制止杀戮，军队介入。8月6日，自治区革筹小组广西军区负责人召见广西联“联指”指挥颜景堂等主要头头谈对“俘虏”的政策问题，这才使不少战俘得以幸存！战后俘虏营分在南宁市的不少中小学，以南宁二中为最大。俘虏营解散前，几乎每天都有卡车从俘虏营中拉出尸体到邕江大桥抛尸，有关俘虏遣送，认领，或再移关押等一直持续了几个月。

8月5日，广西区革筹和广西军区韦国清和欧致富等4人，向中央发出《关于南宁“新422”在解放路一带烧杀抢情况和我们处理意见的请示报告》。报告称：“近半个多月来，新422在其控制的解放路、灭资路（原民生路）、新华街一带，连续放火、杀人、抢劫，干了一系列反革命罪行。他们烧毁百货大楼、土特产商店、邮局大楼、新华书店、食品店、华侨商店、等许多商店技术前民房，烧毁二十多条大船和一部分小船。放火前先抢东西。部队和群众去救火，他们在工事中开枪射击。据不完全统计，抢去国家粮食190多万斤，大量布匹、百货和药品，十几个旅店被洗劫，有女旅客被奸污；残杀崇左县革委会副主任、常委各一人，在解放路和邕江大桥打死解放军2人，打伤64人；火力封锁邕江大桥和市中心朝阳广场两个多月，袭击车辆，打死打伤行人数十人，使市内交通断绝；炮击军区、高炮团、660团和南宁市革委会，用炸药爆破驻军的民族电影院和工农兵饭店；打通民房挖地

道；修筑工事，赶走居民；用机枪扫射住有外宾的西园招待所。因此，我们准备使用15个连的兵力，占领制高点，完成包围后展开强大政治攻势。如继续顽抗，力争分化瓦解，让其自己揪出坏人，放下武器。如火力突围，则搜捕其头头和指挥者，避免群众伤亡。”

6日，周恩来审改了此报告，并送毛泽东。毛泽东批：“同意。”

围剿展览馆南宁“422”派人员地面上的战斗基本结束。在展览馆里的南宁“422”派人员还有近3000人躲进了展览馆的地下人防工程。

南宁的地下人防工程，有独立的供水供电系统和通风防毒气设施，还储备有大量的干粮和食用水，曾被中央军委表扬为全国典范。因此，军队和“联指”一时也无法攻入。

8月，正是南方的暴雨季节，恰在此时，南宁下起了大雨。据说上游雨下的更大，邕江水位看涨，人们奉命去加固琅东的堤坝。

为消灭躲进展览馆地下工事内的最后一批“422匪徒”，广西“联指”前线指挥部想了一个水淹的方案，即：打开邕江上游左江水电站拦河大坝的大闸，水淹南宁人防工程。为此，“联指”的一个头头去请示广西革筹小组负责人和军区政委韦国清，韦国清大怒：“你们混账！我管不了你们打派仗的鸡巴臭事！左江大坝是否开闸泄洪，我更管不了那么具体！全自治区现在乱成一窝蜂，党政军民学，工农商学兵，农林牧副渔，哪一行不要我来抓？

还有抗美援越，是毛主席、党中央亲自交下的任务，我必须全力以赴，懂不懂？国际斗争，世界革命，懂不懂？你们那些屁事，我哪有时间过问？”

8月8日，“联指”前线指挥部命令控制左江水电站的“联指”成员开闸，向南宁的水渠及邕江放水。那天，正在琅东加固堤坝的人忽然听到有人声嘶力竭地喊：“堤崩啦，快跑啊！”然后成千上万的人都拼命地往高处跑，大水就在后面如狼似虎的追赶着。据当时《广西日报》报道，邕江河水上涨到74米，数千间民房受威胁，水不断上升，甚至超过了1958年74．71米的水位。据说，当时出桃源路，南湖二尺长的大鱼就在腿间游来游去。从南宁火车站走朝阳路去百货大楼，都要坐船。而人防工事所在的解放路的位置正处在邕江边上，地理位置比朝阳路还要低，在防空洞中的“422”派人员，因为河水暴涨，不少人只好爬出来投降。结果又有不少当场被杀。其余坚守在工事中的数千反对派和他们的家属，全部被活活溺死。一时间，邕江河水驮浮难以计数的人尸，飘入大海。港澳的报纸惊呼：“广西武斗造成人员大量伤亡，尸体漂至大海……”一时震动世界。广西紧急动员沿江各县打捞尸体。

大洪水退却后，军队和“联指”派武斗人员从地下人防工事中抬出一具具发臭的尸体。随后一段时间，广西区革筹正式向中央报告，南宁发生了“百年不遇的大洪水”。

至此，南宁市的武斗战事宣告结束。解放路附近的 33 条街

巷全都成为废墟。广西“422”全部覆没。

在这次武斗中，双方共被打死1587人，其中“422”派被打死1340人，后来各县领回的7012名俘虏人员，在途中又被枪杀2324人，当作“要犯”长期关押246人。在这场灾难性武斗中，南宁市5万多居民无家可归，国家财产损失6000万元以上，人民群众的财产则无法统计。

那位向韦国清口头请示水淹人防工事的“联指”头头，在1970 年以“杀人罪”判处无期徒刑，不久便死在狱中。

8 月 4 日，在北京的桂林“老多”头头杨福庭看了毛泽东接见北京五大学生领袖讲话文件。

8 月初，广州军区在湖南衡山开会，黄永胜主持会议，广西军区的吴华，桂林市武装部长陈秉德，桂林军分区司令景伯承参加了会议。会议主要内容是桂林市落实《七三布告》，研究出动军队，武装解决桂林“老多”据点。

8 月 6 日晚，韦国清和广西军区政委魏佑铸在北京接见“老多”全体代表。二人口气非常严厉，就是要求“老多”交枪，才是唯一出路。“老多”代表团负责人杨福庭表示：“我们愿意交枪。有一条要求，就是交枪后怕另一派乘机来屠杀我们，请解放军保护我们的安全。”

魏佑铸立刻说：“你们不能提先决条件，你们无权提先决条件，你们只有老老实实交枪，才是唯一出路。部队怎样做是部队的事。”

杨福庭表示："好，我们愿意马上交枪。"

魏佑铸说："那你们就马上给家里打电话。"

韦国清、魏佑铸接见结束。几位解放军带着"老多"的几个代表到学习班所在地解放军政治学院机要室旁的一房间里打电话，他们帮拨，先拨通桂林支左办公室，杨福庭讲，同时作电话录音，但录音不清楚。又拨通桂铁支左办公室的电话，再作录音，还是不清楚，这两条都不奏效。于是，由杨福庭给部队写《委托书》，《委托书》内容是："桂林老多"代表在北京向中央作了保证，"老多"立即交枪，希望家里遵照执行。特全权委托部队首长做好"老多"头头的工作。不管遇上什么情况，都要排除干扰，请求部队强制"老多"立即交枪。把《委托书》交给了解放军。然后，杨福庭即派"老多"代表鲁鹤松、梁莲珍回桂林，督促"老多"交枪。

后来桂林电话来了，听得见了，杨福庭就下死命令，要家里头交枪，坚决执行中央命令，没得话讲了。

8 月 6 日，桂林地、市"革委会"发出全面收缴枪支的公告。

8 月 12 日，"桂林老多"交枪完毕。

从9日至16日，两派共交枪3804支。其中"造反大军"交3719支、"联指"交85支。

8 月 8 日晚上，广西区革筹小组和广西军区召开全区电话会议，要求尚未成立革委会的县，一定要在本月 26 日自治区革委会成立前成立。

《七·三布告》下达后，广西河池地区凤山县革筹和人武部宣布，为贯彻中央《七·三布告》和河池地区革委会“清理阶级队伍”精神，凤山县开始进行镇压反革命、大刮“十二级台风”。并宣布该县“422”派的“七·二九兵团”为“反革命暴徒”，出动部队及武装民兵，协助“联指”派，对“七·二九兵团”的武斗据点和占据的单位进行攻击。

攻击遭到“七·二九兵团”一些武斗据点的奋力反抗。

军区下令用解决南宁解放路的办法解决凤山反对派的问题。

8月10日，河池军分区奉广西军区之命，在东兰县人民武装部召开会议。会议决定：调动6911部队，会同宜山、河池、巴马、天峨、南丹、东兰、凌云、乐业、罗城等9个县及金城江的人民、龙江、东江3个兵工厂的人武部、民兵和“联指”武装人员，及凤山人武部中队，由各县人武部干部带队，围剿凤山县“七·二九革命造反大军”。

会后，河池地区军分区加紧部署，迅速调动了6911部队，会同9个县、3个兵工厂的人武部、民兵和“联指”武装人员，及凤山人武部中队，结果实际到达兵力共4400多人。围剿大军到达凤山县指定位置后，即按照指挥部部署，将“422”派的“七·二九兵团”的各武斗据点团团包围，随即展开总攻。

凤山县“七·二九”的武斗人员经过几次短暂抵抗，很快四处逃散。

该战役共毙杀1016人，伤者难以计数。被杀害的人员中,有国

家干部、工人246人，其中参加过红军的20人，参加过赤卫队的12人，参加过游击队的117人。

凤山县“422”派的少数“残匪”逃到深山。指挥部即下令进行追击和“剿匪”。要求“残匪”家属上山动员亲人下山。17岁的“残匪”韦明景被父亲动员下山，第二天却被枪杀。

从此，“422”派的韦明乐、韦明成、韦明立三兄弟长期不敢下山，在深山老林中渡过了 14 年的野人生涯，演出了一场当代的“野人”记。而广西军区派兵围剿三兄弟，居然从 1968 年围剿到 1982 年。

8 月 10，广西自治区革筹小组和广西军区指派南宁市革命委员会和南宁警备区，在自治区展览馆举办针对“422”派的“反革命罪证展览”。

8 月 10 日预展，12 日正式开展。展出时间 52 天。自治区革筹小组和广西军区先后组织全区“无产阶级革命派”近 50 万人前往参观。

展览馆共分三个馆，第三馆是活人展览，将攻打展览馆和解放路抓获的熊一军等 26 人，冠以“战犯”、“叛徒”、“特务”、“走资派”的罪名，胸前挂上写着罪名的黑牌，关进铁笼，当作禽兽，让近 49 万人观赏了 52 天。然后，又将这些人长期关押。在长达 52 天的展览中，这 26 人饱受吐口水、谩骂和人们戏弄野兽般的凌辱。

该展览造成了严重恶果。此后，由于区革筹和军区带头，于

是各地纷纷仿效。一时抓“422”派和“阶级敌人”作“禽兽展览”风行全省。

8 月 18 日，在北京的广西“422”9 名头头：白鉴平、廖伟然（柳州）、章英、农烈（南宁）、王反修、李振林、钱文军（柳铁）、刘振林、刘天偿（桂林）被在京一起学习的广西“联指”头头当作反革命扭送北京卫戍区司令部关押，随后送回广西各地关押。与此同时，广西自治区全境开始了“全面贯彻落实中央‘七·三’布告，坚决严惩一小撮现行反革命”的同步行动。

## 第 1041 回：平桂林，广西革委会成立　斗批改，工宣队进驻学校

8 月 17 日，桂林军分区司令景伯承，在步校主持召开各县武斗民兵团负责人及县武装部第一把手会议，广西军区副司令员吴华参加了会议并讲话："桂林问题肯定要解决，一小撮阶级敌人一定要搞干净。贯彻《七三布告》抓两个关键：1、收缴武器。2、清理外地人员，对抗拒不交武器的要采取军事行动强行收缴。"

8 月 18 日，广西军区政委魏佑铸，代表广西革筹、广西军区到桂林，在 301 部队驻地开核心会议，紧急布置军事行动，宣读解释准备在 8 月 20 日公布的《关于进一步全面落实中央"七·三"布告的公告》，简称"820"公告。魏佑铸说："820"公告表明，依靠的是"联指"，镇压的是"422"桂林"老多"。

8 月 19 日，在 104 部队驻地，景伯承、幕石起主持召开了 12 县武斗民兵团负责人会议，具体布置了"820"行动，104 部队康凝副政委、地区革委常委张牧田等参加了会议。

8 月 20 日，以桂林地、市革委会和桂林警备区司令部、政治部联合署名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全面落实中央七·三布告的公告》，简称"820"公告，以解除武斗据点、收缴武器、清理外来人员的名义，组织大规模行动。行动前，已收缴了"造反大军"的武器，绝大多数武斗据点已经解除。市革委还以"联指"为主，成立了 2000 多人的"工人纠察队"，配备式器。纠察队主要负责人有市人武部科长王永清，工交部武装科干部郑国安等。"工纠"

武装人员、各县武斗人员，其它“联指”成员以及反戈一击的“造反大军”部分成员等共一万多人组编为“工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于 8 月 20 日凌晨，进驻“造反大军”控制的地区，实行大规模的搜捕。

从 8 月 20 日开始，接连好几天，除从据点抓人外，各单位“联指”也分别自行抓人。在持续两个半月的大规模武斗基本停止的情况下，以解除武斗据点、收缴武器、清理外来人员为理由，成立 2000 多人的“工人纠察队”，由桂林警备司令部直接指挥会同桂林地区 12 个县进城武斗人员及一派部分群众组编成万余人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在全市实行大规模的搜捕。随即出现了延续一个多月的抄家、抓捕、批斗和乱打死人、乱杀死人事件。导致以后一段时间被抓、被打、被杀、被抄家、被错批错斗者约万余人。被直接杀死的有 345 人。反对派参加桂林市革委会的 22 个委员中，有 19 人被关进监狱。染织厂副厂长陈华、市体委教练汪成竹就是 8 月 30 日的全市性游斗时被活活打死。

8 月 22 日，周恩来得知桂林组织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造反大军”几个据点时，电告韦国清：“工人宣传队后面有武装部队，又非徒手，易于引起双方武斗。要变更这种方式，或者徒手参加，或者不参加。去桂林北站的宣传队，要立即改变做法，将外省县人员清出，促进桂林两派铁路工人大联合，不要亲一派、疏一派。”

8 月 23 日，康生接见北京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广西办人员，

宣读了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成立广西壮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的批示》，并讲了话。

8 月 26 日，广西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在攻打“422”的隆隆枪炮声后成立了，从“422”中分化出的温和派龙智铭、曾春生担任了副主任。龙智铭后来在 1971 年清查“516”中自杀。

8月28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编辑部社论《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前进——热烈欢呼广西壮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成立》。

8 月 29 日，桂林市人武部政委、市革委会副主任陈秉德在工人电影院召开的一次市直机关干部大会上，号召全市人民行动起来，向一小撮阶级敌人发起猛烈进攻，刮十二级台风。

8 月 30 日，桂林举行了全市性的大游斗。

9 月 1 日至 20 日，桂林市革委会、师院驻军对地市“造反大军”中的邓铁桥、许瑞林、鲁鹤松、于文杰、张树枝、余有壬、邓井发、诸葛军等 12 人以混进群众组织里的阶级敌人为名，在师院进行“活人展览”。

9 月 2 日，桂林“联指”市直机关“七一总部”，对市直机关另一派不同观点的头头、群众和一些领导干部进行全市游斗，被游斗的有市监委副书记许正义、监委委员邵永清、经委副主任王仁武、财政局长蓝守贞、市税务局长李新、市财办副主任崔耀华、文化局副局长郭文刚等 100 多人，以各种罪名，戴高帽、挂黑牌、反手捆绑，先是跪在盐业站院内，不少人被打，然后押上

汽车，由“工纠”武装看押，沿街游斗。游斗途中许多人被观看的群众打得头破血流，鼻青脸肿，有的被打伤致残。

9 月 3 日，广西著名演员，电影《刘三姐》中刘三姐的扮演者黄婉秋，被文艺界“联指”押至十字街，脖挂破鞋，身披麻袋，跪在烈日下进行围斗。

9 月 4 日，桂林专区食品公司游斗车开到北门食杂仓库门口时，遇上兴安县“卫革指挥部”组织来桂林收武斗中被打死人的尸体的人，他们一见游斗“造反大军”的人，不问情由，手持棍棒、石头、鞋子等物，爬上汽车，乱打乱砸被游斗的人，边打边喊：“打死这些国民党残渣余孽”，“为亲人报仇”，“推下车打”。兴安中学学生蒋孝生手持五四式手枪，朝着被推下车的游斗对象连续开枪射击，将被游斗的“造反大军”成员林伟、张少均、苏秋枫、王修澡、马洪光、黎光录 6 人打死，直至打完弹夹内 7 发子弹为止。

9 月 13 日下午，桂林市二建 201 工区在乐群小学操场开批斗大会，会议由“联指”头头李良佑主持，阳春辉宣布了肖菊生、锁成林、段辉余、李元禄、胡际生、粟定芬（均系该工区工人）等人的所谓罪行材料后，由该公司武斗人员李友和、黄广依、韦锦沅、王日光、许汉生，将肖菊生等 7 人押至染织厂门口桥边枪杀。王日光完成了维持杀人现场秩序后，还对 6 具尸体补了枪。

9 月 15 日，为纪念“白沙事件”一周年，雁山机械厂工人、雁山地区“联指”总指挥秦忠德，植物研究所研究实习生、“联

指”宣传部长文华钧，雁山公社秘书、“联指”副总指挥莫志文，公社兽医站长、雁山“联指”总部常委李国荣等人策划，经请示雁山公社武装部长万春桥同意，召开批斗会，会后在雁山农科所路口南侧集体枪杀“造反大军”成员吴全忠、腾秀山、马崇义、秦继成、孔庆柳、白胜山 6 人。

9 月 27 日，桂林地、市革委会在市体育场批斗了王同连、许正义、杨德华、吴腾芳、王祝光、陈基义、陆文中、崔耀华等一大批领导和另一派群众组织头头，给他们挂上‘叛徒’、‘特务’、‘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坏头头’、‘反革命’、‘历史反革命’、‘现行反革命’、‘反共老手’、‘三反分子’、‘国民党残渣余孽’、‘牛鬼蛇神’、‘翻天右派’、‘地主分子’、‘地主仔’、‘资本家’、‘地主资产阶级的孝子贤孙’、‘小爬虫’、‘政治扒手’、‘黑手’、‘黑后台’、‘黑高参’、‘黑干将’、‘牛鬼蛇神总后台’、‘反革命两面派’、‘破坏文化大革命的罪魁祸首’、‘杀害贫下中农的刽子手’等各种罪名黑牌。

1968 年钱文军（原名钱文俊，高三学生）在被批斗的现场

我们再回到北京。

8 月 13 日，毛泽东、林彪接见了北京“工宣队”队员。15 日，又接见了驻清华大学“工宣队”代表。

8 月 16 日，“工人宣传队”要求清华两派组织都撤消，成立联合的“红代会清华井冈山革命大联合委员会”，并且宣布“工宣队”长期驻在清华大学。

8 月 17 日，清华两大派在“工宣队”的帮助下，达成停止武斗、停止互相攻击的协议，联合成了联合委员会。“团派”负责人蒯大富和“四一四”负责人沈如槐分别任正副主任。这天，北京卫戍区司令员温玉成向毛泽东汇报时说：“现在北京的学生不怕解放军，就是怕工人。因为他们摸到解放军的底，有五不政策。解放军对学生没有办法，工人硬一些。”

8 月 19 日，毛泽东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谈话，又谈到高等学校的问题。他说：“要依靠教员、学生、工人中的积极分子，但光依靠他们还不行。有的学校就是不搞斗批改，专打内战，所以要派解放军和工人进去，或者解放军少一点工人多点，或者一半一半，但一定要有工人。”

“我很注意逍遥派的动向，逍遥派是多数。他们之所以逍遥，就是他们反对打内战，不愿意搞武斗。一搞武斗就说对方是国民党，这个我也是罪魁祸首，说是国民党同共产党斗争的继续。但是说人家是国民党要查明有据。所谓国民党就是叛徒、特务、死不悔改的走资派。”

他在这次讲话中作了一个重要判断："今年下半年，整顿教育是差不多了，是时候了。"

"9 月或 10 月要开个会"，"叫做工作会议或全会，全会到半数以上就可以。"

姚文元问道："要准备什么？"

毛泽东回答说："一是大批判；二是清理阶级队伍；三是整党；四是减薪，科室人员下放。厂长、副厂长的薪金要同工人差不多。""我看是在 9 月至 10 月中旬差不多了。"

毛泽东指示姚文元写出"宜有一篇指导当前政治的文章"。

8 月 19 日，北京一机床，二机床，外文印刷厂，齿轮厂，财经印刷厂，63 军，共 492 人组成的"首都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北京大学。63 军政治部副主任刘信担任总指挥，二机床厂女工魏秀如等 6 名工人是副总指挥。20 日晚上，宣传队召集北大两派代表谈判，达成有关协议：一是上交武器，拆除武斗工事；二是对宣传队不能两面三刀；三是宣传队接管全校广播台；四是着手解决释放被抓人员问题；五是停止互相攻击等等。此后两天内，北大的"公社"、"井冈山"分别上交武斗工具。

8 月 21 日晚，进驻北大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第一次与聂元梓及校文革的全体常委接触，并向他们提出 3 个问题：为什么"井冈山"不承认校文革?校文革采取了什么态度?校文革支持武斗，要不要承担武斗造成的损失和责任?

北大校文革做出 4 项决定：1、主动到“井冈山”住区帮助拆除武斗工事；2、把“井冈山”人员未领的工资送去并承认错误；3、聂元梓接受批判；4、给“井冈山”人员解决吃饭问题，以后政治、经济、生活上一律平等。

8 月 20 日后，毛泽东在关于派工人随同军管人员进驻军队院校通知的文件上批道：“如工人条件成熟，所有军事院校均应派工人随同军管人员进去。打破知识分子独霸的一统天下。”

8月20日夜，苏联武装入侵捷克斯洛伐克。

22日，毛泽东召集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及陈毅、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等开会，讨论苏联武装侵占捷克斯洛伐克问题，决定在报纸上发一篇报道和评论。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姚文元于 8 月 22 日给毛泽东送去了《在工人阶级的领导下，认真搞好斗、批、改》一文，并附言说：“根据您‘宜有一篇指导当前政治的文章’的提示，我写了一篇评论，整理了您的两段重要指示，驳斥了一些错误的观点，不知能否作为社论或署名文章在《红旗》用。”

文中整理的毛泽东的两段讲话是：

毛主席最近指出：“实现无产阶级教育革命，必须有工人阶级领导，必须有工人群众参加，配合解放军战士，同学校的学生、教员、工人中决心把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进行到底的积极分子实行革命的三结合。工人宣传队要在学校中长期留下去，参加学校中全部斗、批、改任务，并且永远领导学校。在农村，则应由工人

阶级的最可靠的同盟者——贫下中农管理学校。”

毛主席最近指出：“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整党，精简机构、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下放科室人员，工厂里的斗、批、改，大体经历这么几个阶段。”

毛泽东审阅时又作了一些修改。送审稿中写道：“正是在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领导下，才能发动这样一场亿万革命群众参加的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毛泽东审阅时，删去了文中“史无前例的”五个字，并写道：“以后不要说史无前例。历史上最大的几次文化大革命是发明火，发明蒸汽机和建立马克思列宁主义，而不是我们的革命。”

毛泽东将原标题：《在工人阶级的领导下，认真搞好斗、批、改》，改为《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并加上了姚文元的署名。

毛泽东在送审稿上批示：

应确定红旗为半月刊，按期出版，每期由你写一篇评论。此文由你署名，在红旗先发，然后由各报转载并广播。

请向碰头会宣读一次，征求意见。

毛泽东

八月廿二日下午八时

8 月 23 日，姚文元将修改后的该文送审，并说明：“这是准备提交碰头会宣读的稿子。您加的一些段落，都用了粗体，以便同志们了解学习。如认为有的地方在发表时不宜用，请注明。”

毛泽东在“不宜用”三字下划了一道杠，并写道：“除已写

明是我讲的两段话以外，其余都不用粗体。”最后在送审稿上批示：“大体可以了。”

8 月 25 日，《红旗》杂志第 2 期发表了姚文元的《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次日，《人民日报》转载这篇文章。姚文元在该文中，对毛泽东的文革新战略做了详细的发挥和阐释。

姚文元在文章中传达了毛泽东的最新指示：“实现无产阶级教育革命，必须有工人阶级领导，必须有工人群众参加，配合解放军战士，同学校的学生、教员、工人中决心把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进行到底的积极分子实行革命的三结合。工人宣传队要在学校中长期留下去，参加学校中全部斗、批、改任务，并且永远领导学校。在农村，则应由工人阶级的最可靠的同盟者——贫下中农管理学校。”

姚文元指出：坚持工人阶级的领导，首先要保证“毛主席的每一个指示，工人阶级的最高战斗指挥部的每一个号令，都能迅速畅通贯彻执行。必须反对‘多中心论即无中心论’、山头主义、宗派主义等破坏工人阶级领导的资产阶级反动倾向……我们国家中，不允许存在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相对抗的任何大的或小的‘独立王国’。”

毛泽东在审阅到此时加写了下面这段话：“全国各地那些被资产阶级分子所把持的大大小小的独立王国里的公民们，也应当研究这个教训。”

姚文元文章中写道：“那种把工人当成‘自己’以外的异己

力量的人，如果不是糊涂，他自己就是工人阶级的异己分子，工人阶级就有理由专他的政。”毛泽东加写了下面这段话：“有些自己宣布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知识分子，一遇到工人阶级触动他那个小小的‘独立王国’的利益的时候，就反对起工人来了。这种叶公好龙的人物，在中国还是不少的。这种人就是所谓轻视工农、爱摆架子、自以为了不起的人物，其实不过是现代的一批叶公而已。”

文章说：“凡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不论是学校，还是别的地方，都应有工人、解放军开进去，打破知识分子独霸的一统天下，占领那些大大小小的‘独立王国’，占领那些‘多中心即无中心’论者盘踞的地方。这样，成堆的知识分子中间的不健康空气、作风和想法就可以改变，他们也就可能得到改造和解放。”这段话同样是毛泽东加写进去的。

8 月 24 日，上海首批“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上海戏剧学院和上海海运学院。

8 月 25 日，周恩来等人将派“工宣队”进学校的通知稿报告毛泽东、林彪：“前遵主席指示，由姚文元同志起草了这个通知，并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作了一些修改。”“请主席予以批示。”

周恩来等送审的通知稿写道：“根据毛主席的指示而进驻大学的北京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已经获得显著的成效，在全国起了巨大的影响。中央认为：整顿教育，时机到了。各地应该仿

照北京的办法，把大中城市的大、中、小学校逐步管起来。在已经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在工人中已经实行革命大联合，清理阶级队伍工作已经有了显著成效的大、中城市，都要在革命委员会领导下，以优秀的产业工人为主体，配合人民解放军战士，组成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分批分期，进入各学校。先搞试点，总结经验，逐步普及。先进大学，后进中、小学。没有两派组织，也没有武斗的学校，也要进入。”

毛泽东批示：“照发。”并对通知稿中一段话“抽调工人的人数，大体上可占当地产业工人十分之一左右，或更少一点，不会妨碍生产。可以轮换。宣传队不要带武器，那些还没有实现革命大联合和三结合以及那些还没有清理阶级队伍的工厂的工人不要参加。”

当天，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共军委、中央文革下发中发[68]135 号文件：《关于派工人宣传队进学校的通知》

8 月 26 日，上海第二批工宣队进驻复旦、交大、师大等 20 所高校。

8 月 27 日，第三批工宣队进驻上海第二医学院、上海外贸学院、上海科技大学、上海铁道学院等院校。至此，上海从 15 个工业局所属 250 家企业抽调的 1.1 万余名工宣队员和 218 名军宣队队员已全部进入市高教局、教育局和 28 所高校。

到 8 月底，北京的 59 所大专院校全部进驻了工宣队。到 1968 年底，不仅全国大中城市的学校或教育部门，而且中国科学院、

文化艺术单位或部门及出版社，甚至还有一些军事院校，都进驻了工宣队。

## 第 1042 回：朴方残，北大实现大联合　湖南稳，小将成革命“对象”

8 月 28 日 22 时，北京大学“新北大公社”解散。

29 日下午 15 时，北京大学“井冈山”解散。

8 月 31 日晚上，两个女学生跑来找聂元梓。她们说“是邓朴方的同班同学”，向聂元梓报告说：“邓朴方跳楼摔坏了。”

聂元梓问：“摔得怎么样？”

她们说：“不知道。已经送到医院里去了。”

聂元梓说：“赶快去找他妹妹邓楠，让她去看护。”

邓朴方为什么跳楼？据他后来回忆说：“说我攻击江青。我也不是攻击，就是江青在北大讲话时很不像样子，我在底下说了一句看你猖狂到什么时候，被人听到了。”结果他被同班同学抓起来，关押在北大物理楼四楼一间房里，让他揭发邓小平。

邓朴方后来回忆说：“自己不愿意说假话，真话也不能说，又希望自己是有人格的，可当时失去这种人格了。最主要是，如果是作为反革命，将来是没有希望的，没有前途的。我就想我到头了，该结束了。现在想来当时还年轻，不是很有弹性。”于是他选择了跳楼。

邓朴方的同班同学们听到动静跑到出事地点，看见邓朴方躺在地上，四楼一个窗户大开，邓朴方用手指指着四楼，意思是他从四楼那个窗户爬出来，摔到地上的。同班同学把邓朴方抬上三轮平板车，赶紧送到北医三院抢救。但是北医三院不肯收留他，

不管。北大校文革只好决定：各系轮流去照看，每个系两天。

这天，北大化学系学生唐利二人前来照看邓朴方。他们看见他躺在北医三院三层楼走廊的一个拐角处，眼睛中似乎有些无奈与茫然。大部分时间，只是呆呆地望着天花板和墙壁，不说一句话。从他身边来来往往的大夫和护士，没有人愿意看他一眼，好像他是一位传染病患者，避之惟恐不及。一位护士交代唐利他们说："每隔两个小时给他翻一次身，怕生褥疮，然后就是接一接大小便。"

唐利小心翼翼地试探着和邓朴方说话，出乎意料，邓朴方没有拒绝。谈话中唐利他们得知，医院没给邓朴方做手术，也没进行任何治疗，能收留他就已经是发扬了"革命的人道主义精神"了。

唐利他们问他："为什么要走这一步？"

邓朴方说：班里同学全都不搭理他，没人去看他，被关起来之后，有的只是不停地让他交代和揭发他父亲……

唐利他们问他今后打算怎么办？

邓朴方说，医院撵他出去，过几天他妹妹来接他。

听得出，邓朴方的话语里充满了后悔。

邓朴方曾这样回忆："开始被送到北医三院，住了一段时间，没有做手术，后来就被送到北京大学校医院。苏醒过来以后我心如死灰，生和死已经无所谓了，哀大莫过于心死，真是一种心死都不会感到痛苦的状态。"

因为没有及时治疗，邓朴方胸部以下完全失去知觉，造成了高位截瘫。这时，有一个人让邓朴方终生难忘的人，就是北大“工宣队”的王凤梧师傅，他后来负责照顾邓朴方，给了他生活的勇气和希望。后来，邓朴方被送到北京郊外的清河救济院，同屋的病友们也没有歧视他，反而对他表示了极大的同情。

9 月 3 日，北京大学全校实现大联合。但是武斗给北京大学造成了巨大损失。就楼房来说，北大学生宿舍区的 17、19、20、29、30、32、34、35、36、37、40 等 11 栋楼房破坏十分严重，17、20、34、37、40 楼的楼顶瓦面全部被打碎。17、20、28、29、30、32、34、35、36、37、40 等 11 栋楼的门窗玻璃和扇框全部被打碎，28、30、35、36、37 等 5 栋楼的暖气和灯光设备均被拆毁，里面的家具全被损毁，其中 28 楼是为留学生置办的家具用具。“公社”派还在武斗中损坏了“五四”操场的 20 万红机砖，“井冈山”则在 30、35、36、37 楼下面 2 米深处挖了高 1.7 米、宽一米的地道，使楼房建筑基础受到严重损坏。为了搭天桥，“井冈山”把 35、36 楼的屋架风撑也给拆毁了。“公社”派从建筑材料中用了 4 吨二分之一吋的镀锌管做了长矛。“井冈山”没权，无法动用学校的现成物资，就把他们占住楼房里的暖气管截下来做长矛。学校的双层木床原来有 5300 张，武斗中毁坏了 3000 张，另外，还损坏四屉桌 600 张，大二屉桌 240 张，留学生用的大衣柜 200 个，椅子 270 把，书架 250 个。

“工宣队”将北大各派清楼时丢失的东西堆在了一起，让大

家认领。同时，“工宣队”压着“仇人相见，分外眼红”的两派同学坐在一起，天天学习，大联合，讨论，发言，交心，自责。

9 月 2 日，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关于工人进军事院校及尚未联合起来的军事院校实行军管的通知》。《通知》中说：“伟大领袖毛主席批示：‘如工人条件成熟，所有军事院校均应派工人随同军管人员进去。打破知识分子独霸的一统天下。’”

9 月 3 日，上海师范学院工宣队负责人向王秀珍汇报：师院“红革会”总部占领的两幢楼不让工宣队进去，有“马蜂窝”之称。王秀珍向市革委会副主任王少庸汇报，王少庸请示市革委主任张春桥，张春桥指示立即动手。

第二天，9 月 4 日，《解放日报》发表 3 名工宣队员的来信《师院头头究竟想扮演什么角色》。下午，王秀珍对上海师院“工宣队”作紧急动员。深夜，上海师院“工宣队”对涉及 2500 多人的学生宿舍进行了“上天”（捅穿天花板）“入地”（撬开地板）式的搜查，搜查的内容是：1、武器弹药，2、国家财产和抄家物资，3、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黑材料。结果，搜查出炮打张春桥时遗留的传单及一些武斗工具。张春桥说：“师院的行动干得好！”，并决定在全市高校内展开。

9 月 5 日，王秀珍赶到复旦大学，组织复旦工、军宣队对全校学生宿舍进行大搜查。下午，王秀珍在市革命委员会一办召开高校“工宣队”负责人紧急会议，师院“工宣队”介绍了大搜查的经验，到会人员参观了大搜查的战果展览。

9 月 6 日，上海 26 所高校统一对学生宿舍进行了大搜查。

这次大搜查，被大学生称作“大抄家”，引起了许多学生的议论和抗议。这些当年叱咤风云的革命小将惊呆了：

“怎么革命革到我们头上来了？”

“工宣队把矛头指向了红卫兵小将”

“工宣队打击一大片”

……

学生们抗议，要辩论。“工宣队”将他们围住，但是不理他们，一句话：“谁反对工宣队，就对他实行专政！”学生们再痛哭、再跳脚也没用，这次可真是“秀才遇到兵、有理讲不清”了。

9 月 8 日，上海市革委会在延安西路 200 号召开各高校工、军宣队负责人会议，张春桥、王少庸、徐景贤到会听取各校关于采取“革命行动”的情况汇报。张春桥表示：“支持工人阶级的革命行动。”

一周后，上海师院、复旦、交大、水产、上外等高校，都由“工宣队”举办了“革命行动辉煌战果展览会”。展览会上除了“罪证”，还有“一块老茧皮”和“一把菜刀”。“老茧皮”是复旦哲学系教授监督劳动的纪念品，“一把菜刀”，是有人问要不要作为“武斗凶器”上缴，存心“触”工宣队“霉头”。“工宣队”认定：这“都包含了触目惊心的阶级斗争”。红卫兵的“上纲上线斗争法”，被“工宣队”运用得如此流利。想当初：工人造反，红卫兵是出过大力的，连“宣言书”也由红卫兵捉笔，头

头身边都有红卫兵联络员，以便临场指导。真是“教会了徒弟、饿煞了师傅”，很快，学校里只有“革命师生”，没有了“红卫兵小将”。从此，“看破红尘”的红卫兵小将们，感叹着“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只想早点“斗批走”，朝着“四个面向”、走向“广阔天地”，心甘情愿情愿地退出了文化大革命的舞台。

9月3日至24日，湖南省革委会召开第三次全体会议。批判省革委会副主任叶卫东等人鼓吹的“多中心即无中心论”。会后，湖南局势稍有稳定。其后，湖南 “湘瓷派”的头头、湖南建湘瓷厂、省革委会委员刘炎生，湖南新华印刷厂、省革委会委员余信谦、市总工会机关、市革委会常委周国强等，也分别受到停职反省的处理。

1968 年 8 月 24 日，河南省省会郑州召开了欢送首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大会，在锣鼓喧天、鞭炮齐鸣声中，薛喜梅等 71 名郑州中学生响应毛主席关于“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号召奔赴河南省郏县人民公社去“经风雨，见世面，滚一身泥巴，炼一颗红心”。

大学即将毕业的 67、68 届大学生何去何从?学校“工宣队”组织他们一遍又一遍地学习毛泽东有关知识分子同工农相结合的理论：“革命的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最后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行与工农民众相结合。”“看一个青年是不是革命的，拿什么做标准呢?拿什么去辨别它呢?只有一个标准，这就是看他愿意不愿意、并且实行不实行和广大的工农群众结合在一

起”。

他们一次次批判“读书做官论”，批判小资产阶级的“享乐主义”、“个人主义”、“拜金主义”，在毛泽东像前表决心、立誓言：服从分配，到最艰苦的地方去!

1968 年 9 月一个秋高气爽的日子，河南农学院 67、68 届毕业生一行百余人，高唱革命歌曲，一路欢声笑语从郑州乘车来到了平顶山 8221 部队解放军农场。一下车，部队首长、战士热情地欢迎他们并忙着安排食宿。一排排平房宿舍收拾得干干净净，给人一种朴素、舒适的感觉。

这是个约有 500 亩地的小型农场，南边是一条人工河，湛河，河水清而深，流动缓慢，岸边垂柳成荫，树荫下长着青草。田地里已没有庄稼，只有麦茬还在那里仰着头顽强地挣扎着。朝北望去，平顶山很近，山不雄伟，样子却奇特，突兀顶平，名副其实。

晚饭后，因为奔波了一天，大学生们正准备睡个大觉，忽听军号响起来，接着紧急集合。毫无准备的大学生，一个个松松垮垮，稀稀拉拉，排好队听连长讲话：

“从今天起，你们就是不穿军装的解放军战士了。战士有战士的规距，一切行动听指挥，今天晚上看电影，不准请假，不准早退。”

接着，每人发了一个小方凳，大家排着不太整齐的队伍，迈着不太整齐的步伐来到打麦场上。只听连长一声喊：

“放凳子，坐下!”

几十个 20 多岁的大学生扑通扑通，下饺子一样坐下来。

“站起来——坐下!”排长口令：

“再站起来——坐下!”

就这样反复几次，仍是不理想，电影开始了……

第二天，有人就把第一晚的情景戏称为“大班幼儿园”。接着，这些“大班幼儿生”就开始了第一课：军事训练。

文革开始后，这些大学生停课闹革命，纪律性差，自由散慢，现在一下子紧张起来，真有点不适应。早晨 5 点钟，清脆、响亮的起床号声惊醒了他们的好梦，大家一骨碌爬起来，穿衣、洗脸、刷牙，要求在几分钟内完成。开头几天，不是这个衣服穿错了，就是那个鞋穿反了；这个裤带没系好，那个的扣子系错了；这个头发没梳。那个脸没顾上洗，洋相百出。

解放军要求很严，立正，稍息，齐步，跑步，一遍遍地训练，还有真枪实弹的射击训练，光荣传统的思想教育穿插其间。这时，这些自认为经受“文革”锤炼的大学生才感到和解放军比起来真是“大班幼儿生”呀!

一个月的军训生活，大学生们脸晒黑了，体格壮了，队伍整齐了，纪律性强了，“大班幼儿生”真成了不穿军衣的兵了!

如果把第一阶段军训比作“大班幼儿园”的话，第二阶段的思想教育就是“升级”了。这些大学生是怀着各种各样的思想来到解放军农场的。

有人认为：“我们在文化大革命中冲锋陷阵，立下了汗马功

劳，现在没有必要接受再教育。”

有的认为：“我们有知识，有文化，哪点不比工农兵强?还有人认为，让我们来这里干原始式的农活，大材小用。”

……

针对种种思想，部队领导就大学生要不要接受再教育的问题展开了大学习、大讨论。请军队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做报告，请老煤矿工人讲过去，听部队首长讲战争经历，讲革命烈士为国献身的英雄事迹。同时举办“斗私批修”讲用会，采取多种形式让我们在对接受再教育必要性的讨论中接受教育。

8221 部队师长蔡铎从小没上过学，是个苦出身， 十几岁参军后，扛枪打仗，参加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身上带着敌人的弹片，打仗空隙学文化、学军事，他给大学生们讲他的战斗经历，报告很感人，学生们很服气。

对于这段思想教育，当年河南农学院的毕业生吴彩霞在自己的学习笔记中这样写道：“通过这一段的军训和思想教育，我明白了一些道理。和解放军相比，我们多喝了几年墨水，我们有知识、有文化，但解放军的纯朴、忠诚、吃苦耐劳、人格高尚都是值得我们学习的。雷锋不就是解放军这所大学校里培养出的英雄吗?农场的生活苦、农活累，恰恰可以磨炼我的意志，使我亲身体验‘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的深刻内涵。”

平顶山 8221 部队农场原来是个劳改农场。部队接管后，那里不再有劳改犯。大学生来了后，一些男同学衣服上补满黄补丁，

加上头发不理，胡子不剃，还真有点像劳改犯。一次，几个男同学和解放军战士一起去镇上买菜，招来镇上群众异样的目光，有的小声问解放军战士："什么时候来劳改犯了？"

战士笑道："什么劳改犯，是来劳动锻炼的大学生！"

"啊，大学生！"

68 级农机系学生刘成蛟在打稻子时，不慎将右手绞到脱粒机里，手臂被打成肉糊。她很坚强，没有哭。虽然立即送到医院，后又转到上海治疗，但仍失去了右手，成了终身残废。

锻炼期间，大学生还到平顶山十矿体验煤矿工人的生活。在那里，他们亲眼目睹了一个 26 岁叫王清江的矿工受伤的情景。下井前，大家还在一起谈笑，他让大学生们看他女儿的照片。下井后，由于塌方事故，他的脸被挤压在铁柱子上，造成面部受伤、牙齿全部脱落、锁骨粉碎的重伤。10 天的矿井生活，使大学生深深地体会到煤矿工人的辛苦与奉献精神。

1970 年 3 月，这些大学生结束了这段特殊的军营生活，重新分配到各地去工作。

## 第 1043 回：搞演习，上思县枯那事件　九月五，全国山河一片红

1968 年 5 月中旬，　广西钦州上思县革委会和武装部决定对该县的“422”派进行镇压。5 月 27 日，县革委会常委、人武部长、公检法军管主任段振邦主持下，召开各公社领导、大队民兵营长、治保主任会议，以民兵“枪换肩”为名，布置收缴“422”中民兵的枪支，装备“联指”。

这天，枯那大队“联指”派的民兵营长梁国雄奉段振邦之令，收缴“422”派民兵的枪支时，遭到“422”派的大队治保主任宁协利反对，拒不交枪给“联指”，并开枪打死“联指”派的民兵排长李巨才。县武装部长、县革委副主任段振邦向钦州军分区报告说：“公正公社 10 名民兵上山打猎，27 日发现枯那大队有土匪三、四十人，全副武装伏击我民兵，疯狂向我民兵开枪射击，要求紧急支援……”

钦州军分区又以同样口吻，向自治区公检法军管会报告。

段振邦在上报“匪情”的同时，派武装部副部长韩刚生率“联指”派武装民兵 200 多人，开赴枯那“剿匪”，没有所获。

到了 7 月 9 日，钦州地区公检法军管会查明真相，向自治区报告：“枯那大队并未发现土匪”。自治区公检法军管会保卫组于 7 月 25 日《情况反映》第十期中，明确更正说：“我组印的《情况反映》第七期通报上思发现土匪活动，情况经查实没有土匪活动”。

到了 8 月 16 日，上思县人武部和革委会再次向钦州军分区报告“匪情”。钦州军分区请示广西军区，广西军区命令“剿匪”。

得到广西军区和钦州军分区同意“剿匪”的命令，上思县革委会和县人武部立即成立“剿匪”指挥部，由段振邦和驻军营长负责“剿匪”行动。钦州军分区副司令员杨伊铭前来上思，坐镇指挥。上思县革委会和县人武部调动本县“联指”民兵和钦州东兴县“联指”民兵及部队共 1000 多人，包围上思“四•二二”派势力较大、民众基础较好的“匪区”枯那等地，设卡搜山，沿户清查，伏击聚歼。结果依然没有发现一个土匪。

8 月 23 日，上思县县革委会张贴“剿匪”布告。布告说：“凡窝匪，通匪，济匪者与匪同罪。”要在全县范围内进行“挖黑窝、拔钉子的清匪运动。”段振邦在公正公社大会上宣布：“谁跟山上土匪有联系，一律枪毙！”

随即，军队和民兵的“剿匪”大军，在上思县开始了一场大规模的“剿匪”行动，一直持续到 9 月初。“422”派和持不同观点的干部群众，被强加上“通匪、济匪、窝匪”的罪名，全县抓捕 1671 人，杀害 973 人，其中国家干部 149 人，仅枯那大队就杀了 61 名平民百姓。酿成了一宗骇人听闻的“枯那事件”。

到了 9 月，广西北海市市革委会发出“坚决打击和镇压阶级敌人的反革命活动”的指示，北海涠洲公社革委会部分负责人连续召开会议，讨论对阶级敌人的镇压行动。会上，有人提出要将这次打击行动“搞出点水平，搞出点新意，搞出点高度”。

经过与会者的反复研究，决定在本公社进行一次“抗日斗争的实战演习”,“以提高我革命群众的阶级斗争水平和实战经验”。

9 月 5 日,涠洲公社革委会部分负责人策划组织举行所谓“牛鬼蛇神大演习”。他们组织数百名本派武斗骨干，积极分子和公社基干民兵参战，战斗主题是“反击和歼灭武装登陆涠洲岛的日寇侵略者”。敌人则是由被关押和监督的“422”派人员和“二十一种人”，由他们扮演日伪军。

演习开始前，他们召开全体参战人员动员大会，号召大家不要把这一场战斗当作演习，掉以轻心。一定要以实战精神参加战斗，要以面对的是侵略者的态度参战，要给入侵的日寇以坚决打击，彻底消灭。并强调：“要在战斗中考验每一个人保卫祖国，保卫人民，保卫毛主席为首，林副统帅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决心和态度。”

演习开始，“422”派人员和“二十一种人”的干部和群众 74 人，被强迫装扮成日本鬼子、汉奸、伪军官等，抬着假枪假炮，列队从海滩开始进攻涠洲岛。

当这支身穿鬼子和伪军服装,手持木质教练枪或“木棍枪”,化妆扮演的“日伪军”队伍在涠洲岛“登陆”后，立即遭到预先布置埋伏的“抗日军民”的武装“还击”。而假“皇军”遇上的是手持真枪实弹“八路军”的火力射击，致使“日伪军”队伍大败。很快，“抗日军民”开始发起“反击”,“日伪军”队伍四处逃窜。被抓获者，一律予以“无产阶级专政铁拳”的狠狠教训。

在这场荒诞的“抗日战争实战演习”中，“抗日军民”大获全胜,取得了全歼“敌人”的战斗胜利。“日伪军”被“彻底消灭”。其中,5人被打致重伤，1人不堪折磨自杀。

此时，章士钊来信反映原国民党司法院副院长覃振之女覃瑞在南京因其父亲问题受批斗。他在给周恩来的信中证明覃振生前不是共产党的敌人，而是同情共产党的朋友，“与毛主席和周总理都有直接关系。”8月27日，周恩来就此事先以电话告江苏省革委会副主任吴大胜：

（一）覃理鸣（即覃振）确在抗日时期与我党有统战关系，覃当时为反蒋人士；

（二）照顾覃之家属，确为主席嘱办；

（三）章士钊先生函中证明一段，确系实情；

（四）如覃瑞不适宜在南京二十三中教书，可调开，免与群众对立。

然后周恩来再将章士钊来信转去请吴大胜酌办。

8月底，南京驻军派人到南京二十三中了解覃瑞情况，并指出覃瑞的父亲是统战对象，今后不要搞她的问题。

8月26日，周恩来接见西藏代表，宣布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批准成立西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

28日，中央文革碰头会讨论了西藏自治区成立革命委员会问题。

29日，周恩来就西藏学习班有人提出阿沛·阿旺晋美过去是

农奴主、不能参加西藏革命委员会事打电话告西藏军区司令员曾雍雅："留下一两个过去的贵族领主，对西藏解放立过功、并愿意跟毛主席和共产党走的人参加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有好处。"

此前，在办西藏学习班期间，周恩来曾对西藏军区第一政委、西藏自治区军管会主任任荣说：要给群众做工作，让阿沛出来担任自治区革委会副主任。要告诉大家，阿沛是个好人，他爱国，相信共产党。1951年他在和平解放西藏的协议上签字，是立了功劳的；1956年他陪同班禅喇嘛访问印度时，有人煽动他和班禅喇嘛留居印度，他当即严词拒绝，而且劝班禅一同回到了祖国。

8月29日，周恩来接见新疆代表，说服群众组织要吸收王恩茂参加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革命委员会。他说，王恩茂在新疆19年，总还做了有利于党和人民的事。他今天还没有走到敌我矛盾那条线上，还是人民内部矛盾，还要在新疆工作。谈到学生问题时说："运动初期学生是起了带头作用。但不能总是这样，继续下去就不对了。你停课闹革命，停多少年？"

次日晚，周恩来又约新疆几位负责人谈话。

9 月 5 日，新疆、西藏革命委员会成立。自此，全国除台湾省外，29 个省、市、自治区经过周恩来和中央文革的艰难努力，终于全部成立了革命委员会，按照当时的话讲，实现了"全国山河一片红"。

9 月 7 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编辑部社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万岁！——热烈欢呼全国（除台湾省外）

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全部成立》。社论指出："它标志着整个运动已在全国范围内进入了斗、批、改阶段。"

这天，周恩来就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拟在本日下午召开庆祝 29 个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成立的 10 万人大会请示毛泽东："我们以电话商量，认为中央文革碰头会全体同志应参加这次大会，周恩来、江青在会上讲几句庆贺和鼓励的话。"毛泽东同意。

下午，北京在工人体育场召开的"热烈庆祝全国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周恩来、陈伯达、江青等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出席大会。周恩来、江青等在大会上讲话。

江青在讲话中说："我想不出什么好的语言来形容我心中的喜悦。回忆这两年多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们经过多少惊涛骇浪，追随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奋勇前进，终于把党内以中国赫鲁晓夫为首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彻底粉碎了。"

当她很激动地讲道："我们不要忘记了革命的青年、红卫兵小将在革命的初期，在革命的中期，都建立了丰功伟绩。"

"现在有少数个别小将犯了这种或者那种错误，我们有责任帮助他们改正。就是有个别单位，有什么武斗，那也很滑稽的。当然是坏事情，脱离了广大的群众，也脱离自己本单位的群众，这不是好事，我们反对。但是坏事也可以变成好事，就是取得了经验教训，锻炼了革命小将，暴露了敌人。"

她说："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令下，7 月 27 号，工人阶级主力军登上了上层建筑斗、批、改的舞台。"

“但是，工人阶级，领导的阶级，要好好地保护红卫兵小将。要帮助他们，教育他们。”

说到这里时，江青哭了，下面很多学生也哭了。

周恩来在讲话中说了毛泽东设想的文化大革命的几个阶段和任务，他说：“各个单位都要能够照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指示：‘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整党，精简机构、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下放科室人员，工厂里的斗、批、改，大体经历这么几个阶段。’”

他还说：“青年们也要响应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面向基层，面向群众，面向生产，上山下乡，到工厂、矿山、农村里去劳动。”

他还特别指出：“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最近号召，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这是我们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根本的原则。”“对于各种企业、事业单位，各种机关，凡是没有搞好革命大联合和革命三结合的，或者没有搞好斗、批、改的，我们都应该派出工人阶级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和解放军去帮助他们，去领导他们。”

与以往的群众集会不同的是，蒯大富等文革期间的风云人物、学生领袖没有在大会上露面。会后，毛泽东对没有安排蒯大富、聂元梓等参加大会提出批评。为此，周恩来、康生、陈伯达、江青于9月8日联名检讨，认为：“这次会议没有事先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议过，讲话的代表没有提中央文革，没有着重讲无产阶级

文化大革命和红卫兵小将的功勋，还有像蒯大富这样的代表性人物没有参加会议，全是因为领导上准备不足。”

9月9日，毛泽东批示：“周恩来、江青讲话照发。”

当时发行的“全国山河一片红”的纪念邮票

至此，从 1967 年 1 月开始的遍及全国各行各业所有领域，老少妇幼几乎全部参加的夺权运动应该是基本完成了，从 1966 年下半年开始的轰轰烈烈、疾风暴雨式的群众运动似乎也可以说是告一段落了。《文革史话》的第三部“全面内战”在此收笔。文化大革命是否就可以结束了？以后的斗批改将怎样进行？我

们且听《文革史话》第四部“欲罢不能”继续分解。

# 文革史话

之

第四部

# 欲罢不能

上卷

# 目　录

第 1044 回：赣“三查”，“赤脚医生”为农民
审专案，准备十二中全会
第 1045 回：庆十一，工人住进中南海
要精简，全国办“五七干校”
第 1046 回：再落实，刘少奇专案材料
病危时，请专家全力抢救
第 1047 回：说文革，十二中全会召开
有朝气，党组织“吐故纳新”
第 1048 回：毕业生，四个面向去农村
小组会，众人批“二月逆流”
第 1049 回：孙维世，周恩来养女身亡
众审查，刘少奇专案材料
第 1050 回：讲六点，林彪在大会发言
通《党章》，开除刘少奇党籍
第 1051 回：左中右，十二中全会闭幕
重庆查，“国民党残渣余孽”
第 1052 回：参事室，起义人员大集中
逼供下，诞生出荒诞神话
第 1053 回：有成就，重庆市“一号专案”
武斗墓，山城学生下农村

第 1054 回：搞精简，总理只留俩秘书

江青闹，黄永胜访阿难行

第 1055 回：反右倾，黑龙江批斗干部

“徐海班”，临沂冲部队营区

第 1056 回：山东省，造反派突击入党

“反复旧”，有计划全省展开

第 1057 回：来势猛，上山下乡现高潮

搞“清队”，北京大学死人多

第 1058 回：又发生，翦伯赞夫妇自杀

起因是，当年国共谈判事

第 1059 回：闻死讯，毛泽东掉下眼泪

说刘、张，调整四川革委会

第 1060 回：止“左”难，云南搞“划线站队”

说浙江，总政治部被军管

第 1061 回：山西乱，再招晋头头进京

细调查，陈永贵历史问题

第 1062 回：看泉城，“四根油条”闹哄哄

攻潜校，与北海舰队纠纷

第 1063 回：势难收，内蒙多人提防“左”

反右倾，继续大挖“内人党”

第 1064 回：诉冤状，千里向南奔北京

查历史，南京大学“清队”忙

第 1065 回：看北大，“清队”二十四人亡

惹众怒，全国指责杨保华

第 1066 回：陈伯达，写“九大”《政治报告》

周恩来，安排四帅下工厂

第 1067 回：三月二，珍宝岛上起战端

发《照会》，中国政府提抗议

第 1068 回：集北京，商议筹备开“九大”

三一五，珍宝岛炮火连天

第 1069 回：毛泽东，再强调落实政策

执己见，伯达与春桥争论

第 1070 回：接线员，敢顶撞外国首脑

招老帅，共商谈“九大”事宜

第 1071 回：争坦克，中苏两国施伎俩

派间谍，加紧研制穿甲弹

第 1072 回：纠错误，八三四一进北大

说贵州，上海组批判陈毅

第 1073 回：适可止，周恩来婉转叫停

四月一，九大在北京召开

第 1074 回：论文革，林彪作《政治报告》

陶铸病，毛泽东谈史说今

第 1075 回：毛泽东，为选举再做工作

九大开，第二次全体大会

第 1076 回：众发言，特别介绍孙玉国
纪登奎，他“是我的老朋友”
第 1077 回：四二四，选举九届委员会
皆顺利，大会正式拉帷幕
第 1078 回：三人组，酝酿政治局名单
四二八，开九届一中全会
第 1079 回：留京城，中央解决鲁问题
林彪见，云贵川三省领导
第 1080 回：放学生，北大开展大批判
疑问多，李九莲写信被抓
第 1081 回：到青岛，武汉胡厚民取经
再联手，江城掀起“反复旧”
第 1082 回：叫进京，武汉代表住京西
学习班，众人批判王效禹
第 1083 回：五一二，中央见武汉代表
胡厚民，朱鸿霞首先汇报
第 1084 回：继续听，其他人介绍情况
谈通宵，大家一起看电影
第 1085 回：连续见，内蒙古党政领导
钓鱼台，江青擅自召集会
第 1086 回：又查出，“中国(马列)共产党”
见“徐海”，与武汉“新派”座谈

第 1087 回：再继续，接见湖北省代表
念《声明》，批判工代会《决议》
第 1088 回：谈问题，听取众代表意见
反复讲，防止斗争扩大化
第 1089 回：小总政，内蒙平反“内人党”
五二六，中央接见徐海班
第 1090 回：下《通知》，公布军委办事组
发文件，中央见湖北代表
第 1091 回：济南稳，国务院进行改革
毛南巡，四老帅“研究小组”
第 1092 回：桂纠偏，贺龙三〇一去世
信尼姑，西藏尼木县事件
第 1093 回：离武汉，过长沙又到南昌
七月一，发社论指导“整党”
第 1094 回：七月五，中央接见山东班
七月八，八岔岛又起争端
第 1095 回：山西班，难止三晋武斗风
铁路断，客货列车被迫停
第四部上卷各地文革章回索引

## 第1044回：赣“三查”，“赤脚医生”为农民审专案，准备十二中全会

1968年8月5日，江西的程世清主持召开了江西省革委会三次全会。会议决定，在全省开展查叛徒、查特务、查现行反革命的“三查”运动。会议结束以后，各地迅速掀起“三查”运动的高潮。程世清积极贯彻中央以“群众专政”的形式“清理阶级队伍”的指示，实行“群众办案、群众定性、群众判刑”。于是，在江西也开始出现了这样的场景：一个斗争对象被斗得走投无路，就在办公室的走廊里，拿菜刀将自己的腹部剖开，而后将肠子掏出来，用剪刀一节节地剪断，边剪边喊：“请大家看看，我的心肠到底是红的还是黑的？”围观的人都被惊呆了，没有一个人上前阻止和救助。自杀者在把肠子剪了十来节，在走廊里走了十来步以后，终于倒下了……

江西的“三查”运动开展还不到一个月，全省自杀的人数就超过5000。而且，其影响还波及到了国外。1968年9月7日下午，中国驻刚果(布)大使馆给外交部去电：驻在江西的水电部×工程局派有一个工程队帮助刚果(布)建设一水电站。最近，这个工程队不少人(大部分是技术人员，也有工人)到大使馆反映，国内亲属来信说他们被群众揭发有严重问题，有的是历史问题，有的是现行反革命，已没有资格援外，要他们自动申请回国，接受群众审查，否则从严处

理。中国驻刚果(布)使馆人员说，刚果(布)与刚果(金)(即现在的扎伊尔共和国)只相隔一条刚果河，游泳就可以过去。而刚果(金)与台湾建立了外交关系。如果问题处理不好，当事人随时可能游过刚果河，到东部的刚果(金)申请避难。外交部把情况报告周恩来总理，周恩来指示，由江西省革委立即派人调查处理。后将该工程局革委会的全体成员集中到南昌办学习班，才将这个问题解决。

更恐怖的事情还有，瑞金县发明了一个新名词："民办枪毙"，就是把杀人的权力下放到大队干部一级。9 月 22 日，瑞金县召开了各公社专案组长会议，强调深入开展"三查"，大反右倾，学习全国其他一些地方的"经验"，权力下放，搞"民办枪毙"，拿出成绩来向国庆节献礼。会议结束后，23 日上午，律阳公社就杀了 7 个人。杀戒一开，公社、大队干部可以随便杀人，他们想杀谁就杀谁，不要立案，不要证据，不要审批。如此一来，瑞金县各公社仅从 9 月 23 日起至 10 月 7 日，就杀了 177 人，年龄最大的 70 岁，最小的只有 11 岁。其中有 40 多人是地主富农的子女，50 多人是贫下中农出身，其他都是所谓"四类分子"。他们都是以"现行反革命"或"组织反革命集团"的名义被杀的。杀人的方法除了枪毙外，还有用石头砸、木棒打、刀子捅的。有的把人杀死后，推到悬崖下。据统计，各地开展"民办枪毙"以来，仅兴国县就杀了 270 多人，瑞金县杀死了 300 多人，于都县

杀了 500 多人。

直到此时，程世清才感到局面有些不好收拾了，急忙下命令禁止乱杀人。

9 月 14 日，《人民日报》转载调查报告：《从“赤脚医生”的成长看医学教育革命的方向》，并加了前言。《前言》说：“赤脚医生是上海郊区贫下中农对半农半医卫生院的亲切称呼。”“他们大力进行医疗、预防、宣传工作，为改变农村的医疗卫生状况，做出了显著的成绩。”文章引用了毛泽东的一段最新指示：“这个从城里下到农村的医生证明，从旧学校培养的学生，多数或大多数是能够同工农兵相结合的，有些人并有发明、创造，不过要在正确路线领导之下，由工农兵给他们以再教育，彻底改变旧思想。这样的知识分子，工农兵是欢迎的。”

1968 年 9 月，“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将刘少奇 1925 年、1927 年、1929 年三段历史问题写成三个材料，作为三个单件上报。

9 月 15 日，公安部长、专案组副组长谢富治在向江青转报这三个材料时写道：“刘贼一九二五、一九二七、一九二九年三次被捕叛变、叛卖活动罪行，我们先把这些罪证(物证、人证)搞了个材料出来，请你审阅后再定。还有三个问题的罪证和综合报告初稿正在写，准备在九月廿五日以前搞出来。”

9 月 16 日，江青审阅了这三份“罪行材料”后批道：

“我愤怒!我憎恨!一定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刘少奇是大叛徒、大内奸、大工贼、大特务、大反革命，可说是五毒俱全的最阴险、最凶狠、最狡猾、最歹毒的阶级敌人。”

“要是没有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中国革命前途是不堪设想的。我作为一个革命的中国共产党员，书此以明我的无产阶级、中国共产党党员的忠心和气节，我将永远忠于毛泽东思想，永远忠于革命的人民，做一辈子毛主席的小学生。”

江青在将“罪证材料”批转中央文革碰头会其他成员审阅时写道：“请你们把各自知道材料(重要的)批注一下，特别是恩来同志和康老，你们知道的可能比我多，因为你们工作经历决定这点。”

9 月 17 日，康生在给江青的信中将刘少奇称为“大叛徒、大内奸、大特务、大工贼、大卖国贼、大汉奸”。他写道：“从各种材料看，他早在 1925-1927 年，就使用阴险、狡猾两面派的特务手段，来破坏革命。我觉得他这样早、这样久的作潜伏的内奸活动，似乎是很早就受过帝国主义的特务训练的。是否他在晏阳初的学校里就受过特务教育？”

他还主动做了自我批评：“1931-1932 年在上海就职工运动工作，我写文章批评过刘贼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对他在职工运动中的经济主义，并作过尖锐的斗争。但由于自己的

阶级觉悟不高，学习毛主席著作很差，我又错误的对此作过检讨，应引为教训。”

9 月 17 日，毛泽东批准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可以在一些有条件的单位进行发展新党员的试点工作。

9 月 18 日，贺龙突然收到中央军委办公厅的一封信。薛明拆开一看，原来是要贺龙交待历史上的“罪行”，其中写道：

“南昌起义你干了些什么阴谋活动？你要如实交待你的罪行。”

“1929 年你怎样派亲信持密信向国民党乞降的？”

“1933 年蒋介石派熊贡卿到湘西，与你是怎样谈判的？参加谈判的是哪些人？最后达成了什么协议？”

贺龙将信狠狠地往桌子上一摔，怒不可遏地吼道：“撞他妈的鬼！人都给我枪毙了嘛！栽赃，完全是栽赃！狗娘养的，这些人什么事都干得出来。他们根本拿不出证据，如果有什么证据也是假的!”“我相信毛主席，不相信这些办事的人。27 年、29 年、33 年的事情统统都是假造的。”

他说：他们想“用毛主席的指示来压我，完全是给我栽赃”。

他像一头被激怒了的雄狮，整天在房子里来回走着，吼叫着，一连好几天，心情难以平静。有时走着走着就突然坐到桌子旁，打开笔记本，反复写着“冤枉”两个大字。他说：

“他们要叫我签名画押，我就写这两个字。要是枪毙我，我就喊冤枉！”

贺龙他向薛明讲述自己一生坎坷的经历：从 1916 年率领 20 个人刀劈芭茅溪盐税局，谈到参加两次北伐战争、参加南昌起义；南昌起义失败后，同周逸群等一起到湘西，创建了红四军和湘鄂西革命根据地；谈到同李立三、王明“左”倾路线的斗争，及长征途中怎样同张国焘分裂主义进行斗争；一直谈到他一家五口：父亲，姐姐贺民英、贺五妹，妹妹贺满姑，弟弟贺文掌为革命牺牲，贺氏宗族上百口人死在敌人的屠刀下。敌人抄了他的家，烧了他的房屋，挖了他家的祖坟……讲到这些，贺龙心潮澎湃，热血沸腾。他说：

“我本来就是在共产党最背时的时候参加革命的，所以，多么背时我都不怕。”

9 月 18 日，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给毛泽东、林彪的报告中汇报了 9 月 15 日晚中央文革碰头会讨论召开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的情况。其中讲到，这次全会的议程之一是推选中央革命委员会，在“九大”前作为党和国家的临时最高权力机关；参加扩大的十二中全会的人数，连同能出席全会的中委和候补中委在内，约 300 人左右。

9 月 19 日，中央文革碰头会讨论召开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的情况报告并送交毛泽东。报告中说：“十二中全会要解决什么问题？一是准备召开党的九大；二是总结无产

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若干经验；三是解决不仅在实质上、而且也在组织上成立中央革命委员会问题，顺带着也就解决了国家主席问题。”

9 月 20 日，毛泽东在报告上批示：“请林彪同志先看，我再看，然后在一次至二次会上讨论才能做出决定。我认为暂时不宜成立中央革委会，中央全会也不要扩大很多人，有 100 多人就够了。”

9月22日，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根据9月17日中央授权他们进行发展新党员的试点工作一事，给毛泽东、林彪、中共中央、中央文革递交《关于在产业工人中有步骤地发展新党员的请示报告》，《报告》中说：

我们初步选定国棉十七厂，上海阀门一厂（原良工阀门厂）和上海港务局第七装卸区三个单位在十月份进行发展新党员的试点工作。其中国棉十七厂和原良工阀门厂，都是老造反厂，是“工总司”的发起单位，“一月革命”夺权后，紧跟毛主席的战略部署，各项工作成绩显著；上港七区造反派队伍坚强，在粉碎反革命经济主义妖风中有贡献，党的核心中有老造反的党员，也有优秀的革命领导干部。

9月23日，毛泽东在9月22日上海市关于发展新党员的请示报告上批示：

林，周及文革同志：

此件请碰头会议复。

复文及本件，请考虑发各地参考，并酌情办理。

毛泽东

九月二十三日

9 月 25 日，陈伯达在江青批转的刘少奇三份“罪行材料”上批写：

“我对罪大恶极的刘贼，同样有强烈的革命义愤，并向高举毛主席伟大红旗，对刘贼及其一伙叛徒特务进行不妥协斗争的江青同志，致以衷心的敬意。”

当天，周恩来也在这份“罪证材料”上批道：

“我完全同意你的批注和看法，我也是以无比愤怒的心情看着、想着、批注着这三本刘贼叛卖我们党和牺牲同志们的材料。

刘贼是大叛徒、大工贼、大内奸、大特务、大汉奸，真是五毒俱全、十恶不赦的反革命分子!

我们要首先欢呼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没有这种大革命，怎样能够把刘贼及其一伙人的叛党卖国、杀害同志的罪状，挖得这样深，这样广？当然我们还要继续挖下去，不能有丝毫松懈，不能失掉警惕，如果挖不完，我们要交给后来人!

我们要万分感谢林副主席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把毛泽东思想、毛主席声音(语录)广泛地传达到几百万解放军和几亿劳动人民中去。没有几亿劳动人民和几百万解放军战

士掌握了毛泽东思想，如何能够发动这场有亿万革命人民参加的自下而上的文化大革命？毛泽东思想的传播，毛主席声音的传达，毛主席指示的执行，这是考验我们够不够做一个共产党员，能不能保持革命晚节的尺度。在这点上，我们要向你学习!我更要向你学习!”

周恩来于当天起草了报告。报告后来经他本人和陈伯达、康生、江青共同签名，将《刘少奇罪行审查报告》上报毛泽东、林彪审阅。报告称：“刘贼少奇是长期埋伏在党内的大叛徒、大工贼、大内奸、大特务、大汉奸。现在专案组所掌握的人证、物证和旁证材料足以证明刘贼是一个五毒俱全、十恶不赦的反革命分子。”

9月25日，毛泽东审阅中共中央、中央文革草拟的庆祝国庆的标语口号，删去了其中的第十一条：“向立下丰功伟绩的中央文革致敬”，并且批示：“去掉第十一条，不应用自己名义发出的口号称赞自己。”

9月29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以中发［68］144号文件批转了上海9月22日上报的《关于在产业工人中有步骤地发展新党员的请示报告》。

9月29日,林彪在刘少奇审查定案报告上的批示：

刘贼少奇，五毒俱全，铁证如山，罪大恶极，令人发指，是特大坏蛋，最大隐患。把他挖出来要向出色指导专案工作并取得巨大成就的江青同志致敬。

不过，据林彪办公室保密员李根清回忆，当秘书向林彪讲述《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文件后，林彪没有任何表态，只是在空中比划了一个圆圈，意思是同意。当叶群听说林彪只是划个圈时，立即惊叫起来：

“怎么不提醒首长呢！这是 11 楼亲自挂帅的专案，是中国第一大专案呢！主席非常重视，11 楼亲自抓，人家多大的功劳啊！大家都表态了，首长怎么能只划一个圈呢？”

“11 楼”是指江青在钓鱼台住的楼房号，就是指江青。

接着，叶群就喊：“李根清，过来。”

当李根清走过去时，叶群已经替林彪想好了批语：“完全同意，向出色地指导专案工作并取得巨大成就的江青同志致敬！”

李根清回忆说：“应该申明的是，由我替林彪写在文件上的批语就只有那么一句。”

为了八届十二中全会的顺利召开，周恩来专门在铁狮子胡同召开中央专案组会议。专案组提出的材料一件一件讨论，有 100 多份。孟用潜翻供的材料周恩来等人都看了。江青、康生、谢富治、张春桥他们主张依然要用孟用潜的笔供，说他知情，有反复是因为他害怕。而周恩来等人主张只用有把握的 80 多份材料。后来又在中南海西楼开会集体审阅刘少奇的材料，讨论了一个礼拜，形成初稿。江青等人又提出修改，最后由张春桥亲自动手返工，将刘少奇的帽子改成“叛

徒、内奸、工贼”。

## 第 1045 回：庆十一，工人住进中南海

## 要精简，全国办“五七干校”

1968 年国庆节，党中央、国务院邀请全国工人和“工宣队”的代表到北京参加观礼，王洪文是上海代表队的领队，他们住进了中南海。深夜，周恩来亲自到观礼代表的驻地嘘寒问暖，使代表们激动万分。

辽宁省的工人代表团到北京参加 1968 年的国庆观礼由毛远新带队。代表团到京后，周恩来对毛远新说：“毛主席要请一部分工人代表住到中南海来。我已经安排辽宁来的 100 名工人代表住到一中队。”“一中队”就是 8341 部队负责毛泽东警卫工作的那个中队。毛远新听了很高兴，随后来到一中队看望那些工人代表。代表们围住他，拉着他的手诉说着他们参加国庆观礼、住进中南海的激动心情。

一个煤矿工人代表对毛远新说：“我挖了一辈子煤，旧社会受尽了剥削压迫，新社会毛主席让我们当了国家主人，还请我们到北京来住进中南海，感谢毛主席。”

一个鞍钢的工人代表说：“我从小就在鞍钢当工人，当牛做马，还挨过日本鬼子的踢。是毛主席领导我们推翻了剥削压迫，让我们站起来了。”

还有工人代表说：“住到‘红太阳’身边来了，住到‘皇上’身边来了……”

很多工人代表流着眼泪，激动的说不出话。毛远新听着

工人们的诉说，自己的心情也很激动。晚上，他兴奋的向毛泽东汇报这些情况。

毛泽东很平静的听他说，静静的看着他，并没有特别的高兴。于是毛远新越说声音越小……

当毛远新说完后，毛泽东问他："你都说了些什么呀？什么'皇上'、'太阳'？"

毛远新解释说："这都是工人说的。"

毛泽东说："工人说的可以理解，但你这么说就是错误的，你是党的干部，你把主仆关系搞颠倒了。工人农民才是真正的国家主人。你、我、我们都是他们的仆人，仆人请主人住到家里来，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10 月 1 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国庆游行队伍以后，让张春桥叫王洪文过来，要与他谈谈。

王洪文怀着兴奋和忐忑不安的心情跨进天安门城楼，步入用屏风阻隔着的贵宾会见厅，看到毛泽东坐在中央的沙发上……

这时，张春桥知趣的走开了。

穿着当时流行的军便服的王洪文，快步走上前去向毛泽东敬礼，毛泽东把他介绍给坐在一旁的林彪。林彪礼节性地和王洪文握手，他对王洪文一无所知。

毛泽东按照他的习惯，首先问王洪文是哪里人？

王洪文问答说，自己是吉林省长春市人，1935 年出生在

长春市郊区。

毛泽东屈指算来，那正是伪满洲国时期，溥仪上台，长春易名“新京”，成了伪满的首都。

毛泽东问王洪文：“家里是干什么的？”

王洪文回说，是贫农家庭，父亲早死，自己从小没有读完小学，就给人放牛，放猪，也种一点田，到 16 岁时，东北解放了，就报名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而后，又跟着中国人民志愿军参加抗美援朝。

毛泽东问是什么部队？

王洪文答：“是 27 军。”

毛泽东说：“哦，军长是尤太忠，‘尤大麻子’。”

王洪文说：“我就是军部的警卫员和通讯员，当了六年半兵，在部队里入了党。1956 年复员，又到上海第十七棉纺织厂当保全工，1964 年调到保卫科当干事，文化大革命当中跟着毛主席起来造上海市委的反……”

毛泽东打断了他的话又问：“你现在是在工厂里还是在‘工总司’工作？”

王洪文说：“在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工作，也兼着‘工总司’的工作。厂里每个礼拜都去劳动。”

毛泽东点头叮嘱道：“永远不要脱离劳动、脱离群众。”

谈话后，毛泽东、林彪和王洪文一起合影。

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见到阿尔巴尼亚部长会议副主

席兼国防部长巴卢库。当巴卢库讲到这场文化大革命已取得伟大胜利时，毛泽东说："工人阶级在各主要城市已经统治一切了。在农村的绝大部分地区，农民也已占统治地位。以前，直到今年上半年，学生是运动的先锋，现在落后了。"

巴卢库问："你们党快要开代表大会了吧？"

毛泽东回答："是的。要总结工作，选举中央领导。""所有的工厂都要来一个改革。人民公社、学校、机关都要来一个改革。要发动群众改。"

10 月 5 日，毛泽东会见巴卢库率领的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他说：

"大陆上有国民党残渣余孽。有些人钻到我们中央领导机关来了，或钻到地方领导机关来了。这一次算是一个、一个作了清理。"

关于一部分被认为犯了错误的干部，他提出要同前面所说那种情况加以区别："不能把这些人都丢在那里不要。这一部分人，不是刚才讲的国民党残渣余孽，这是属于共产党人犯错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

他对运动作了这样的估计："这一次党政军民来了一个比较大的清理，自己清理，自己暴露。"

"这样可以保持一个时候的安宁，十年到二十年。不能说这一次搞得那么干净了，也不能讲搞的统统很正确，没有搞错。从我们所知道的，不少人还是要平反的。群众要么不

搞，一搞起来就很厉害，就不那么文明了，也搞武斗，打人了，戴高帽子，搞喷气式。说我们中国人那么文明，我是不太相信的。群众劲来了，就不那么文明了。所以这需要领导，叫他们不要这么做，他们这种方法不能解决问题。”他归结起来说：“有两种矛盾，第一是敌我矛盾，第二人民内部矛盾。所以这一次文化大革命比我们过去打仗困难得多。”

1968 年 7 月 11 日，《人民日报》在报道《灵宝县革委会实行领导班子革命化——精兵简政，密切联系群众》时，加了一个按语，按语传达了毛泽东的最新指示：建立革命委员会，要做好清理阶级队伍的工作，走“精兵简政”的道路。

机构精简了、干部编制压缩了，多余的干部怎么办？还有被打倒的干部安置问题。此时，批斗干部的热潮已经过去，大批干部被关进了“牛棚”。这些干部到底往哪儿安置?当时，许多地方的负责人，包括接管一些单位权力的军代表、工宣队负责人，都纷纷向上反映这一问题。这个问题逐级地反映到了毛泽东那里。

周恩来说：“毛主席和我们党十分重视干部问题，他们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革委会成立后，精简机构，有那么多的干部不能安排，需要找一个出路。他们可以下放到农村、工厂去，但也还要考虑有一种集中管理的办法，教育他们不脱离实际、不脱离群众，将来也好发挥他们的作用。给大家出个题目。”并说“这是毛主席的意思，希望大家很好地研

究。”

正在这时，远在边陲的黑龙江省，突然冒出了一个柳河“五七”干校。

原来，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也一直在为如何安排精简下来的干部和“牛棚”里的干部发愁。一开始，还只是安排这些人打扫卫生，清理街道的垃圾，干一些杂活。但这些工作毕竟有限，干完这些活，他们仍然闲着无事做。

黑龙江省革委会一、二把手潘复生、汪家道多次找原省委“造反团”头头座谈。经过反复酝酿，5 月初，省革委会根据原省委机关“造反团”的建议，把这些干部集中安排到农村，办一个农场，保留工资待遇，让他们在体力劳动中“改造”自己。经过专门考察选址，最后选定了庆安县的柳河，作为办这种农场的试点。

柳河这个地方，自然资源比较好，也有一部分空出的房舍，安置第一批干部不成问题。而且，这批干部到达柳河后，还可以继续建房、开荒、种树、办小工厂，为安置第二批干部创造条件。去柳河的干部，采取分期分批的形式，且在那里的时间有长有短；干部劳动的时间，也根据体力有长有短；又保留原工资待遇，干部们很容易接受。于是，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批准在庆安柳河开办这个农场，并将这个农场命名为：“柳河五七干校”，决定在 1968 年 5 月 7 日，毛泽东的“五七指示”发表两周年之际，正式启动这一计划。此计划

最后经常委会讨论通过，做出专门决议，于 5 月 6 日下发了《关于成立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柳河“五七”干校革命委员会的批示》。

《批示》提出：“五七干校要高举毛泽东伟大思想，以毛主席《五七指示》为指导方针，……在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中，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破私立公，改造世界观，实现思想革命化，培养一支亦工亦农、亦文亦武、能上能下，能官能民，无限忠于毛主席，无限忠毛泽东思想，无限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革命干部和革命职工队伍，把干校办成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大学校。”

当时还决定所有革委会的干部都要到五七干校劳动，并规定自费买三件工具：铁锹、锄头和镰刀。

5 月 7 日这天，黑龙江省革委会组织的第一批干部到达柳河。

柳河“五七”干校初办时还算顺利。到达那里的干部，与当地农民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他们的生活和劳动也得到了当地农民的帮助。这些干部在柳河种了不少地，又新开了一些荒地，盖了不少新房子，还种树，搞副业生产。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把办柳河“五七”干校的经验介绍材料进行了上报，在 1968 年 9 月 29 日《文化大革命情况汇编》第 628 期上发表。经验材料中说：办柳河“五七”干校，“为机关革命化，改革上层建筑走出了一条新路。干校共有学员 141

人，主要是原省、市委机关干部和革命委员会的工作人员。机关干部办农场，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深受广大贫下中农的欢迎。不少干部到干校后，亲临三大革命第一线，接近了贫下中农，增强了对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目前，干校耕种土地3000余亩，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并自力更生办起了小型工厂、企业。实践证明，‘五七’干校是改造和培养干部的好地方，是实现机关革命化，搞好斗、批、改的一种好办法”。

毛泽东看到黑龙江柳河“五七”干校的材料后，于9月30日写了一则批语：“此件可在《人民日报》发表。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除老弱病残者外都应这样做。在职干部也应分批下放劳动。以上请提到碰头会上讨论决定。”

姚文元接到毛泽东的上述批示后，对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报上来的材料又进行了一些文字上的加工修改，定题目为：《柳河“五七”干校为机关革命化提供了新的经验》，并在他写的编者按中引用了毛泽东的批语。这个由姚文元写的按语说：毛主席关于柳河“五七”干校经验的批语，“对反修、防修，对搞好斗、批、改，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应引起我们各级革命干部和广大革命群众的高度重视。希望广大干部(除老弱病残者外)，包括那些犯过错误的干部，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在下放劳动的过程中重新学习，使自己的精神面貌

来一个比较彻底的革命化。在革命委员会中工作的新老革命干部，也要执行毛主席的指示，分期分批下放劳动，使自己不脱离劳动人民，既当‘官’，又当老百姓。新干部要特别注意不要染上脱离群众、脱离劳动、一切依靠秘书、做官当老爷的剥削阶级坏作风，要保持无产阶级朝气蓬勃的革命的青春”。

姚文元写好这一按语后，报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批示：“可用。”

10 月 4 日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新闻联播节目里，播放了柳河“五七”干校的事迹。10 月 5 日，《人民日报》以《柳河“五七”干校为机关革命化提供了新的经验》为题，进行了报导，给予了高度评价，同时刊发了姚文元写的编者按。在编者按里，发表了毛泽东关于干部参加体力劳动的最新指示：

“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除老弱病残者外都应这样做。在职干部也应分批下放劳动。”

从此，柳河“五七”干校便成了受到毛泽东肯定的典型。各地纷纷仿效柳河“五七”干校，办起了许多干校。

10 月 5 日，陕西省革命委员会发出《关于认真学习、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最新指示的通知》，要求全省各级干部要认真学习毛泽东关于“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种

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除老弱病残者外都应这样做。在职干部也应分批下放劳动”的指示。29 日，省革委会召开万人大会，欢送原省级机关 1600 多名干部，下放南泥湾“五七”干校、杨梧“五七”干校以及延安、扶风、眉县、周至等县农场和生产队参加劳动。全省先后下放干部两万六千余人。

中央各机关，包括中央办公厅，也都在外地寻找地点，分别办起了各自的“五七”干校。一时间，“五七”干校在全国到处“开花”。

“五七”干校有中央办公厅办的，有中央各部办的，有省一级革命委员会办的，有地市一级革命委员会办的，也有县一级革命委员会办的。“五七”干校也分为几类：有的以农为主，有的以林为主，有的以牧为主……各地的“五七”干校还办有加工厂，生产一些轻工业产品，还搞了不少副业生产。这些“五七”干校，大多建在当地条件较好的地方。这样，当年或第二年，即可以实现生产自给。一般来说，“五七”干校的机械化程度比当地农村的水平要高许多，生活条件也比当地农民要好一些。但是，与城市的工作和生活环境相比较，这里繁重的体力劳动、单调的文化生活以及较差的生活环境，使不少到“五七”干校劳动的人感到是处在艰难困苦之中。

一开始，黑龙江省办的柳河“五七”干校，主要是为了安置精简下来的干部和“牛棚”里的干部。毛泽东的批示下

来之后，中央各单位、各地各单位办的“五七”干校，就不能只限于此了。因为毛泽东在批示中明确指出，“除老弱病残者外”，广大干部都应该下放劳动，“在职干部也应分批下放劳动”。而且，毛泽东还把自己的女儿李纳也送到中央办公厅办的“五七”干校去锻炼。《人民日报》的编者按中说得更明确：“在革命委员会中工作的新老干部，也要执行毛主席的指示，分期分批下放劳动。”这些话所表达的含义是：包括通过造反当上革命委员会领导干部的人，也要下放到“五七”干校去劳动。在造反派眼里，他们到“五七”干校，不是去“改造”，而是去“锻炼”。他们认为自己只是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和《人民日报》的社论要求——为了“保持无产阶级朝气蓬勃的革命青春”才去“五七”干校的。

精简下来的干部、“牛棚”里的干部及其他一些干部，是去接受“改造”的，因此，他们大多举家搬迁到了“五七”干校，一去就是数年，在那里长期劳动。并且在开始，一点回城的希望都没有。他们在干校里，从事的是最艰苦的劳动。连年老体弱的人，每天也要去干那些很重的体力活。他们的子女到了一定年龄，也要参加劳动。这部分人中，有些仍然有亲属在城市，但他们一年也难得回城一次。许多科技工作者、文学艺术工作者，在“五七”干校那种条件下，也只能干体力活，而不能从事专业研究和创作，他们的大好年华似乎就在繁重的体力劳动和单调的生活中消逝了。一般来说，

除了“牛棚”里的干部外，其他干部去“五七”干校，是定期轮换的。但由于轮换的比较频繁，也使他们荒废了业务和专业。

## 第1046回：再落实，刘少奇专案材料

## 病危时，请专家全力抢救

10月6日，曾于1927年任湖北总工会劳资斗争委员会委员、湖北省劳资仲裁委员会主席的丁觉群写成了关于刘少奇勾结汪精卫、陈公博充当内奸的供词：

对刘少奇一九二七年在汉口、庐山所犯罪行的交待

刘少奇于一九二六年十月中旬由广州到武汉，任湖北省总工会秘书长。当时我是国民党汉口特别市党部的执行委员兼工人部长。总工会有关汉口的工人运动是受汉口市党部工人部领导的。十一月上旬总工会成立“劳资斗争委员会”(对外则用“经济争议委员会”)，刘少奇兼任主席，我是委员之一，在共产党内我是受他领导的。十一月底成立“湖北省劳资问题仲裁委员会”我被选为主席，更须与总工会劳资斗争会密切联系，所以我和刘少奇往来更密。刘少奇在一九二七年七月八日左右离汉到庐山住白鹿洞书院。我于七月三十一日到牯岭。八月中旬刘少奇、何宝珍和我同住在牯岭河南路一所房子里。这房子是九江警备司令部参谋长之妹贺淑租的，她下山后，由朱培德公馆的宋嘉晋无代价让给我们住的，直到十月初离开牯岭到上海。因此我对他的许多事是了解的。兹就我所知道刘少奇的罪行交代如下：

一、受资本家贿赂，出卖工人阶级利益。自一九二六年十月下旬经市党部介绍汉口总商会请愿代表与刘少奇见面

后，大资本家周星棠、周韵宣、徐荣廷等时常请刘少奇和我吃酒。一次在□月楼吃酒，周星棠送刘少奇人参两支，后来邹协和又送燕窝一盒。十一月上旬刘少奇制订“湖北省劳资标准条件”时，因受了周星棠五百元贿，将工人增加工资的条件降得很低。十一月底周韵宣劝我受了纱厂的二百元，并说刘少奇受了一千元，令受南洋兄弟烟草公司五百元。刘少奇在审批各基层工会所提出的劳资条件时，就可将条件压低。

二、刘少奇在汉口勾结汪精卫、陈公博出卖工人纠察队。

一九二七年三月下旬，陈公博获悉刘少奇很受资本家赞扬，召我到中央工人部了解刘少奇。我向陈汇报后，陈对我说：“刘少奇是真正服从本党领导的，是按照本党的方针和政策办事的。这个人用处很大，我还要和他详谈。”此后刘少奇与陈公博的关系日益密切，刘遇事向陈请示汇报，唯命是从。“四·三惨案”日帝屠杀中国工人，死伤四、五十人。刘少奇根据陈公博不要扩大事态的指示，一面劝凡在日厂的工人不要罢工，一面劝码头工人不要扩大事态，并到日租界劝群众退出日租界，另一方面用总工会名义发了一个宣言了事。“四·一二事变”后，陈指示不要集会散步，宣传活动召集工人不要太多。刘仅开了一次小会了事。“马日事变”后，刘用密件向陈请示，由我送去。陈当即打电话给刘，叫刘不要举行任何活动，对工人也不要进行宣传。刘对提议散

步示威和集会宣传的，一概拒绝。

五月中旬，陈公博从商界探悉刘少奇在处理劳资问题时，曾受资本家贿赂。陈对我说："一个有资本主义思想的人，贪财是必然的。我要证明这一点，才敢大胆地重用他。"五月底，刘少奇告诉我："陈部长想进一步掌握工运动态，扩大了解面，将有更重大的任务交给我们两人。陈部长对我说：'只要你身在共产党，心向国民党就行了。'"

汪精卫既得路易泄漏第三国际给中共中央密令的消息后，借此决心分共。为了防止武汉工人总罢工和武装暴动，乃由陈公博于六月三、四号晚上召刘少奇和我到他的公馆谈话，组织了一个"工人运动小组"。陈指定刘为组长，我是组员，担任工运情报工作。刘向陈献策：一、将武汉工会干部调走，由外地调新干部来组织地下工会，这样干群脱节，掌握不了群众，就不会发生总罢工；二、遣散工人纠察队，将枪缴还政府，就可防止暴动。刘又与陈详细研究了进行的办法，采取内外结合。陈公博在社会上扩大兵士与纠察队的冲突，制造谣言，并借此制造舆论，要求遣散纠察队，将枪缴还政府；刘少奇则在工会内进行了一系列反动宣传与活动。

刘少奇为了掩盖他与汪精卫、陈公博勾结出卖工人纠察队的罪行，为将来更好地为汪精卫效劳，于一九二七年六月二十五日写了一封密信，要我送给陈公博，并说："在这信

内我提请陈部长考虑，在完成任务后，来一次苦肉计。”在纠察队缴枪的头一天逮捕了刘少奇等人，次日上午汪精卫打电话给卫戍司令部用小汽车密送刘到中央党部与汪谈话，决定下一步活动。

刘少奇在六月二十八日解散了五千人的纠察队，二十九日将三千余枝枪及全部弹药交给“管理卫戍事宜汉口办事处”，并将武汉工会原有干部调到他地工作。七月二日刘在国民党中央工人部二次工运会上作了“自动解散工人纠察队意义及经过”的报告。

七月六日晚上，刘少奇对我说：“我在中央党部见了汪主席，我向他提出将来愿在主席领导下，为国民革命尽力。汪说：‘将来重用你是不成问题的，现在还不是时机，你还是留在共产党内，影响它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作用还大些。’我当即表示，主席指示我竭尽全力以赴。”刘又说：“我们今后还是要脚踩两只船。现在党内对陈独秀很不满，正在酝酿斗争。为了避免卷入斗争漩涡，我已借病请假到庐山疗养。”刘少奇在七月八日左右离汉到庐山，住在白鹿洞书院。

三、刘少奇在庐山的反革命活动。

七月二十八日陈公博命我送密信给刘少奇。八月初我到白鹿洞会见了刘少奇交了信，并将我在九江侦察的情形告诉他。刘回信向陈公博提供了：武汉工厂清共线索。几天后，刘寄“改组工会意见书”给陈公博，又提供了如下情报：一、

据觉群在浔侦察，集中南昌者为叶挺、贺龙部，无国府警卫团，此团军官多系共党，如仍警卫国府殊危险，请速除之；二、中央军校内共党很多，须清除；三、汉阳兵工厂共党不少，请注意。

八月中旬刘少奇由白鹿洞到牯岭，和我住在河南路一所房子里。刘说："我在白鹿洞会见了汪主席。我对汪说，我本想到汉口帮助陈部长改组工会，又怕被共党发现。汪说，你还是留在共产党内好，不要暴露。"刘少奇到牯岭的第三天遇见了汪精卫的秘书褚民谊。刘说："褚说，宁汉合作后，汪主席将出任国府主席或行政院长，你有什么意见可写书面条陈。"于是，刘少奇和我讨论了条陈内容，大意是：我要千方百计使共产党走失败路线，主张单搞工人运动，不搞农民运动，使工人阶级处于孤立地位；建议政府对共产党采取镇压与策反相结合的政策，号召共产党员反水，从内部破坏共产党；建议政府实行改良主义夺取群众，削弱共产党对群众的影响等。刘少奇写成呈文后，亲送汪精卫办事处。

一九二七年十月初，刘少奇获悉宁汉合作后汪精卫垮台消息后，就到了上海。

丁觉群

一九六八年十月六日

10 月 7 日，周恩来在审查刘少奇的材料时，追问沈阳"彻查办"外调组的一个负责人说："你们是不是把情况都告诉

了被调查的人，刘少奇的名字是你们说的还是暗示的?还是诱供的?什么大个子、白净脸、高鼻子、南蛮子? ”

这位负责人说：“这些问题我们没有告诉他们。”

周恩来问：“那刘多荃没说刘少奇的名字，为什么在证据上写上了刘少奇呢?是不是你们告诉给他了?”

回答说：“那是我们在最后取证时加上的。”

周恩来说：“那就不好。你们学过历史唯物主义吗? ”

后来，“彻查办”对这些地方作了修改。

这个“彻查办”是中央 504 专案组，即王光美专案组副组长巫中等人于 1967 年 7 月 28 日在沈阳成立的。

10 月 8 日，中央文革碰头会讨论出席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名单（草案），共商定 133 人。其中 59 人是八届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八届中央委员 97 人中，在文化大革命中因“叛徒”、“特务”、“里通外国”、“反党分子”等问题，被打倒或靠边站的有 57 人，未被打倒的仅 40 名，加上十一中全会以来去世的 10 人，从候补中央委员中递补了 10 人为中央委员，他们是黄永胜、许世友、陈锡联、张达志、韩先楚、潘复生、刘建勋、李大章、吴德、刘子厚，共 50 人，已过八届中央委员的半数。

第二天，周恩来起草了一个出席扩大的十二中全会的名单草案解释，并将名单送毛泽东、林彪审定。

当天，毛泽东召集开会，确定拟补选的 10 名中央委员

的排列次序。毛泽东提出解放几个人，于是解放了陈少敏、李志民、范文澜。毛泽东说：“再解放一个。胡耀邦是苦孩子出身，我了解他，他也算一个。”这样，就把胡耀邦从牛棚直接拉到宾馆。中央候补委员出席会议的只有 9 人。

11日，周恩来将这10名中央委员，外加9名候补中央委员的排列名单送毛泽东审定。

10 月 12 日，毛泽东对中央文革碰头会议的成员说：“这次文化大革命要不要搞?你们说没有问题，我看是有问题的。十一中全会决定，文化大革命该搞不该搞?成绩是主要的，还是缺点是主要的?这里包括红卫兵、‘三支两军’等。此外，中央领导、各级领导中的一小撮该不该垮?这个问题是存在的。”“有些干部，错误是有，但今后可能还是要做工作的。”

当晚，中央文革碰头会商议出席八届十二中全会的分组名单及各组召集人人选。

上海参加北京国庆观礼的代表们集体返回上海时，王洪文没有回去，他被指定列席参加扩大的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

由于自 1967 年 8 月后，刘少奇的活动范围仅限于庭院和室内，他情绪低落，食欲下降，血压很高，糖尿病加重，身体消瘦，体力大为减弱。据刘少奇身边的警卫贾兰勋回忆，到 1968 年 3 月，刘少奇吃饭、走路就已经很困难了。“他的一只腿走起路来只能拉拉着，勉强向前移动，手还得扶着

墙壁，吃饭时手和嘴配合不到一起，有时嘴张开了饭菜到不了口，饭菜到了嘴边，嘴又闭上了。手拿起筷子来，颤抖得很。”

1968 年 4 月，他开始语言减少，有时糊涂，尿失禁，手抖，步子变小（碎步）。中南海门诊部立即请北京医院神经内科王新德主任会诊，王主任虽未肯定脑部有局灶性病变，但肯定是脑供血不足引起的病态。这段时间，刘少奇还是照常下地活动，在卫士或护士的搀扶下散步。

4 月 12 日的《刘少奇情况反映》中这样写到：“据大夫检查：刘的神志不大清楚，表现定向，辨别不清，表情呆板，对问话没有反映，说不清一句完整的话。两脚移动吃力，走路迈不开步。在穿衣、安假牙时，几次发现上下倒装、倒安的情况，当别人告其错了时，还不知纠正。据大夫判断，刘不像是装的。”

5 月 19 日的《情况反映》进一步写道：“用梳子、肥皂刷牙，袜子穿在鞋上，短裤穿在长裤外面，有时把两条腿穿在一个裤腿里，装疯卖傻，尽出丑态。为严防意外，监护工作相应采取一些措施。”

6 月 18 日，针对刘少奇血压增高，血糖波动等问题，中南海门诊部组织了会诊，调整了治疗药物；因胆固醇摄入过高对他不利，把他原先每天吃 6 个鸡蛋进行了调整，改为每天两个；并提出肉类和蔬菜要适当搭配，少吃些猪肉，多吃

些牛羊肉、豆制品、蔬菜等。

1968 年 6 月初，刘少奇受凉感冒。虽是小病，但疗效却不理想。7 月 6 日起，病情又渐重。7 月 9 日发烧、咳嗽加重，肺部罗音增多，中南海门诊部初步诊断为肺炎。当即派护士马小先住在他家进行护理。门诊部医生会诊研究了治疗措施，立即将病情上报。

汪东兴向中南海门诊部负责人顾英奇传达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指示："要千方百计地给他治病。"根据这一指示，中南海门诊部即请北京、上海的知名专家会诊，并请陶桓乐、黄宛两教授和中南海门诊部负责人顾英奇和医生董长城住在刘少奇家。因没有足够的床铺，顾英奇和董长城就在地板上搭地铺，同时安排 4 名护士参加护理工作，日夜值班，就此组成医疗组。

在刘少奇病重时，周恩来还派他的保健医生卞志强，也是中南海门诊部负责人之一，几乎每天都来了解情况，全力救治。

经 X 线胸片及痰培养证实，刘少奇患的是"肺炎杆菌性肺炎"。肺炎杆菌毒力较强，耐药，较难控制，这是一种十分凶险的疾病，对老年人常常是致命的。

7 月 12 日，刘少奇病势渐沉重，高烧不退，神志不清，痰咳不出，有阻塞气道的危险。

专家会诊提出，必要时需要做气管切开。这需要先请示

得到批准，以便关键时刻立即施行。报告后，很快汪东兴即传达毛泽东、周恩来的指示：“如果病情需要，即同意医生的决定。” 中南海门诊部当即请耳鼻喉科、麻醉科专家住到刘少奇家，准备需要时及时做气管切开手术。

在医护人员的全力救治下，刘少奇的肺炎至 7 月 22 日基本控制，但他的意识没有恢复。他虽然也是夜里睡觉，白天醒来，睁着眼睛，头左右转动，但没有思维活动，不能说话，认知力丧失，熟人也不认识，医学上称之为醒觉昏迷。从此一直卧床不起，吃饭靠护士喂，大小便不能自主，靠护士照顾。

10 月 9 日，刘少奇突然不能进食，头向左转、眼向左凝视，诊断为脑供血不足，为脑干有弥漫性小软化灶所致。10 月 11 日开始鼻饲，由于炊事员与医护人员的密切配合，使每日总热量保持在 1500 千卡至 1700 千卡。因此，到 1969 年，刘少奇虽然意识、认知力、语言、记忆功能丧失，但体重增加，面色红润，枕部的头发变黑；虽然生活不能自理，长期卧床，大小便失禁，但没有发生过褥疮，这都是由于护士按护理规程，按时按摩、翻身、擦澡、被褥清洁的结果。

按照周恩来的指示，中南海门诊部留下了刘少奇在“家庭病房”里的照片。照片上刘少奇虽然已经不能认人和说话，但他头部自由转动，眼睛明亮，注视着景物。

当时，医疗组对每天的医疗护理过程，都作了详细记录。

当治疗显示了一定的效果，病情有所好转了，他们就马上给刘少奇拍了照片，这实际上也是出于谨慎的考虑，留下一个直观的证明。

## 第 1047 回：说文革，十二中全会召开

### 有朝气，党组织“吐故纳新”

1968 年 10 月 13 日，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召开。出席这次全会的有 133 人，被扩大进来参加会议的中央文革小组、军委办事组成员和其他人员有 74 人，占与会总数 133 人的 57%，包括王洪文在内的当时正在北京参加国庆观礼的造反派的代表也被请进了会场，后来发现其中有一人不是共产党员。

周恩来在八届十二中全会的开幕会上讲话，说明出席这次全会的人员构成，首先是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59人。其次是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他说：“中央文革，在两年前十一中全会上已经肯定了的。”“经过这两年工作，逐步地扩大为中央文革碰头会。今天出席的5位同志：陈伯达同志、康生同志、江青同志、张春桥同志、姚文元同志，都是中央文革成员。5位以外，参加成为碰头会成员的有：周恩来、谢富治、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汪东兴、温玉成这7位同志，一共12人。”

再次，就是军委办事组成员，有6位：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刘贤权。

另外还有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和大军区的主要负责人及解放军的大军区各出席1人。

最后就是中央直属机关4人：郭沫若、李天佑、曹轶欧、

郭玉峰。

周恩来在全会开幕式上说："这次全会的召开，就是要为召开我们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做准备工作。"

他宣布全会的议程有四项：一是九大代表如何产生的原则和方法；二是修改党章草案；三是讲一讲形势；四是专案审查报告。

接着，毛泽东在开幕会上讲话，他说："会议大概开 7 天到 10 天，想一想有些什么问题要提出来。形势问题：一个国内，一个国际。"

"国内问题嘛，就是要总结一下上一次全会到现在两年多的工作。无非是有两种看法：一种呢，说还不错，十一中全会这个决议基本上是可以的，基本上是正确的；也有人说呢，不见得。那个时候我们就讲过，十一中全会的时候，当时通过那个决议的时候，我就打过招呼的，特别是后来 10 月的工作会议。不要以为通过了决议，以为大家都同意了。实际上呢?举手是一件事，真正同意又是一件事。招呼是打了，但是后头呢，证明有许多同志没有过关，以至于不能到今天这样的会。中央委员啦，候补委员啦，群众不谅解。譬如有那么一位同志叫张鼎丞，也没有发现有叛徒、特务、反革命问题，为什么没有来开会？是什么原因？我实在觉得应该到会，但群众无论如何不能谅解他。"

毛泽东对周恩来说："邓老你是很熟悉的。"

毛泽东说的是邓子恢，与张鼎丞曾长期在华中、华野共事，相互熟悉。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兼任国家计委副主任，分管银行工作。

周恩来说："大连会议他参加了。高岗、饶漱石、徐海东他们 4 个人，徐海东同高岗抱头痛哭，说中央亏待了他，没有他在陕北打胜仗，中央就站不住脚，这正是公布高岗当副主席的时候，他同高岗联盟有勾搭，值得审查。"

毛泽东又说："山东谭启龙，从小当红军，没有别的问题，就是工作错误。山东不谅解他，现在还不能解决问题。山东要揪他回去斗，我们不让。"

周恩来说："揪回去了，现在在济南。"

毛泽东："山东的同志要作说服工作。

湖北张体学，是好同志犯了错误。回湖北检讨得好，群众就谅解了。群众都欢迎他。他还要检讨，群众说不要再检讨了。王任重是内奸，国民党。陶铸也是历史上有问题。

湖南王延春，这个人不行了。

邓小平还没有发现他历史上有什么问题，就是发现他在七军开小差那回事。"

这时，曾领导百色起义，创建中国工农红军第 7 军的军长，时任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副书记的张云逸说："他在红七军当政委时，情况紧张了，他借口到中央去汇报工作，在崇义地方开了小差，叶季壮同志死前也揭发过此事。"

毛泽东："主要问题还是到北京后搞独立王国，他不服气，他说他不揽权，实际上他是刘少奇那个司令部里摇鹅毛扇子的。但是有时我还找他说几句话的，他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他是打敌人的。又没有查出他的别的历史问题来，什么叛变哪、自首呀这些问题。这个人一个是错误不小，一个是自己写了个自传检讨，可以给大家看看。他的意思要求保留党籍，不要开除党籍，最好嘛还能够做点工作。

一说工作，许多同志摇头。很大的工作也很难做了，我说给点室内整理材料之类的工作还可以吧？

江华这个人，我是保过他的，许世友同志，你也是保过他的。霍士廉揭出他的问题，看样子不能保了，你还保吗？"

许世友说："主席说不能保就不保了。"

毛泽东："有些事我看我们工作没做好。比如徐海问题，那里一个南京，一个济南，不怪两个军区，就是我们没做工作。现在办学习班，就好转了嘛。军队内部分成两派，野战军也分成两派。有几千人跑到南京，几千人跑到济南。要把人叫回来。"

许世友："我有错误，没听主席的话。"

毛泽东说到了文化大革命："究竟这个文化大革命要搞还是不要搞?搞的中间，是成绩太少了、问题太多了，还是成绩是主要的、错误有没有?我的意见，错误是有，而错误的主要责任在中央，在我，而不在地方，也不在军队。军队

是可以讲清楚的。军队两派也好，三派也好，抓紧了就好解决。比如广西吧，也是两派。野战军、地方军有两派。工作做好了，军队也就合作了。军队统一了，什么‘422’也好，‘联指’也好，军队问题解决了，群众问题很好解决。当时不是说要××吗？我说不要这个办法，我们出布告，《7．3》、《7．24》布告。这是一个发明。过去也搞过《十条》、《八条》，也不在群众中宣传，群众也不知道。你不宣传，群众也不懂得。你怪谁呀？也不办训练班，办训练班是从内蒙古开始的。内蒙两派那么对立，来北京办训练班，一个月就解决了问题。

同志们经验很多。可以设想，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究竟要搞，还是不要搞？成绩是主要的，还是缺点是主要的？文化大革命究竟能不能搞到底？大家议议。

比如浙江问题，‘红暴’到现在还没有解决好，也是一个工作问题。

徐海的‘支派’，北跑济南，南跑南京、上海，‘踢派’搞一党政权。徐州一个‘支派’一个‘踢派’，还是军队不一致，两边都是共产党，共产党与共产党打架。可以做工作嘛，问题是可以解决的。

福建问题很大。韩先楚你那里不是天下大乱吗？”

韩先楚：“现在形势很好。”

毛泽东：“看到了。你们的报告很好。工作一做，还不

是解决了嘛！问题是可以解决的，怎么不能解决呢？

中央各部门，地方有 29 个单位，地方是徐州、保定、重庆，还有些问题，还得解决一下。

四川可打得厉害，双方都是几万人，无线电指挥，有什么不得了？天塌不下来。谁叫你搞‘二月逆流’，一抓就是十万人？中国人多得很，四川也不少。你抓错放了就是了。你说问题不得解决吗？不是都放了吗？”

张国华：“还剩 500 人，都是坏人。”

毛泽东：“你放了九万九千五百嘛，还不是自己搞错了，放了就是了。

要总结经验。过去我们搞南征北战、解放战争，那种战争好打，容易打。那种战争，敌人清楚，就是那么几个，秋风落叶那么一扫，三年半也差不多。这回这个文化大革命啦，比那个战争困难得多，仗不好打。文化革命总比过去快一点。过去打了 22 年，从 1927 年到 1949 年，文化革命只打了两年半。

问题就是有思想错误同敌我矛盾混合在一起，一下搞不清楚。所以，有些问题拖长了。也只能一个问题、一个问题，一个省、一个省解决。比如辽宁省三大派，打了八个月，天下大乱。不是解决了吗？还是能够清楚的。

自己要多负担些责任，使下面轻一点。主要是思想问题，人民内部矛盾。内部也夹一些敌人，是少数，是做好工作的问题。

比如，浙江省的‘红暴’派，说来北京观礼的人数少，自己跑来 21 人。‘省联总’要把他们抓起来，用绳子捆回去。清华工宣队做了工作，这次工作做好了，双方做了自我批评，不争了。”

周恩来：“看了放焰火，都高兴地回去了。”

毛泽东：“浙江两派也是工作问题，不是别的。

你们把九大的问题先谈谈，在尾巴上另外再谈谈这方面问题。还有一个多中心论的问题。这是从总参谋部杨成武那里开始的，搞了一个‘大树特树’，其实就是树他。

后来，北京学校都分成两派，都有武装，谁的话也不听。一个学校只能有一派，有两派的就多了一个。还不是多中心？工厂也分成两派，北京有例子，很多。

我觉得上海比北京强。120 万工人，掌握了局势。北京 80 万工人，现在才掌握了形势，办法就是工人开进学校去。那里知识分子成堆。要掺砂子。他们是粘土板结了，不透气，不长庄稼。知识分子多的地方，就是不好办。‘916’炮轰聂荣臻。这个机关里谁办的？七机部也难办，听说有 10 万人，就有 7 万人是大学生。国防科委‘916’他们炮轰你，

还是很客气的。还得开工人宣传队进去。有些地方，就用这个办法，开宣传队进去。

就讲这么一点。国际问题，以后有时间再讲。”

毛泽东对林彪说：“你讲一讲？”

林彪：“主席讲得很多，总理讲得很多，我没有什么讲的。”

毛泽东又说：“肖克还是打过仗的，国庆节上了天安门，这次没有去，他是什么问题？我也不清楚。”

周恩来：“他有段历史不清楚。他在潮安县一个村庄打了一仗，向敌人交了枪，还成立了一个党。这次被造反派查出来了。”

毛泽东：×××呢？

周恩来：大革命失败以后，他在梧州开书店被抓后，向敌人乞降，原判死刑，改为徒刑，他又乞降，放出来时他跪下说：“再不当共产党。”。经过调查，确有此事，需要审查，现在不能参加这个庄严的会了。

李德生作为安徽省主要负责人列席了八届十二中全会。当周恩来在宣布分组名单念到李德生的名字时，毛泽东接话问道：“哪个是李德生？”

很巧，毛泽东在转战陕北时，曾化名“李得胜”，与“李德生”谐音。

周恩来向毛泽东介绍道：“李德生同志，是安徽省革委

会主任、12 军军长。” 同时朝台下的与会人员扫视了一下，看见了李德生，随即向李德生招招手说：“李德生同志，请你站起来一下。”

李德生从列席人员的位置站起来喊了声：“到！”同时又向毛泽东和周恩来敬了一个军礼。

参加会议的人都不由自主的回过头来看李德生。

毛泽东笑着说：“不认识你呀，你这个同志。你是哪个地方人？”

“报告主席，我是河南新县人。”李德生回答道。

周恩来问：“与许世友同志是一个县的吧？”

“德生同志和我是一个县的。”坐在李德生前边的许世友接话答道。

毛泽东又问：“你今年多大年纪？”

“52 岁。”李德生答道。

毛泽东向大家说：“我看安徽的事情办得不错。我们不是通报了他那个整芜湖吗？芜湖整得不错嘛。那个芜湖问题可复杂了。”他又转问李德生：“你们是怎么搞的啊？”

“是主席批的《七三布告》起了作用，是舆论造得好。”

大家以为这只是李德生的开场白，还等他继续说下去。静了一会，却听不见下文。这才明白李德生讲完了，隔了片刻，会场上响起一阵笑声。

毛泽东也笑了。他肯定李德生的经验，并且把这一话题

引导到中国共产党和解放军的历史经验，说：“是啊，就是要造舆论。好像一个发明，搞了几十年，不懂得造舆论。搞了几十年，就是造舆论嘛。不然哪里能搞起八路军、新四军？没有群众，哪有无产阶级专政？没有群众，没有军队，谁收你这个党？”

他接着说：“现在到处分派，有‘815’、‘反到底’、‘支派’、‘踢派’。清华有‘井冈山’、‘414’；七机部有‘915’、‘916’。到处都有这些事情，我们开始也没有想到。南京三派，后来又冒出一个‘红总’，势力那么大。

十一中全会讲，我们要文斗，不要武斗，结果他们就要武斗，不要文斗。一个学校两派斗，各有武器，一个工厂两派斗，两个中心，一个部也是两派斗。

基本群众还是工农兵，兵也是工农。然后才是知识分子。对知识分子的大多数要争取、团结、教育。知识分子的缺点是容易动摇，主要是没有和工农兵结合。

不能一讲就是臭知识分子，但是臭一点也可以。知识分子不可不要，也不可把尾巴翘到天上去了。

大学两年不办。叫他们统统毕业，下去同工农兵去混。两年不办，天塌不下来。以后重新搞，从农村、工厂中工作好的中学生选来上学。

军事院校，谁知道办了 110 个，‘幺幺幺’。其中确实有‘妖’。只怪我们自己，办那么多干什么呀？又没人管，叶

剑英你不是管吗？搞四清不行，还是统统开进工人，开进解放军去。

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究竟能不能搞到底？我们讲要搞到底，什么到底呢？这是一个问题。估计三年差不多，到明年夏季差不多了。到底就是包括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整党、精兵简政、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

工厂不整你们看，不搞文化大革命怎么得了？比如北京一个木材厂，有那么千把人，是两个资本家合起来的。有的厂三朝元老，有的四朝元老。还有新华印刷厂，北洋军阀时期它给印票子，日本来了给日本人印报纸传单。国民党接管的，共产党来了也吃得开，它都吃得开，有一部分三开、四开干部，其中有的是隐藏的反革命。我们的人也不得力，思想状态、精神状况也不好。隐藏的反革命不清理一下，工厂究竟是谁的呀？

按说农村要好一些，也有问题。没有搞好的公社、大队，要好好抓一下。靠人民解放军、省地县革命委员会。有一个省组织了一百万人的宣传队，解放军只有几万，百分之九十是贫下中农，就是广东。江西也不错。江西是个中等省，两千二百万人，有的地方人太多，省级机关就七千人，至少要减六千人，减到哪里去？还不是中国境内？一个工厂，一个农村，还是下放农村为主，工厂不能容纳好些人。”

10 月 14 日下午 13 时，毛泽东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问到

会的人："同志们，你们对文化大革命怎么看？"下面鸦雀无声，无一人作答。毛泽东自己回答说："我看 50 年、100 年之后，可能我们这一段是历史上的一个小插曲。"

10 月 13 日，《人民日报》发表通讯员文章：《陈永贵：不是要做官而是要革命——记陈永贵担任山西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后的事迹》。文章说：

"在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昔阳县大寨大队党支部书记陈永贵，担任了山西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陈永贵同志，地位变了，职务变了，但他千变万变，忠于毛主席的一颗红心没有变，坚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好作风没有变，密切联系群众的好作风没有变，艰苦朴素的好作风没有变。

他手里的犁把、锄把没有丢，手上一层层的厚茧子没有退，工作怎么忙也要挤时间和社员一块下田劳动，有时外出开会临走的前一、两个小时还在地里劳动，有时从北京、太原开会回到大寨，跳下车就下田干活。他还和大寨社员一样地生活，经常端着碗到饭场和社员蹲在一起吃饭，坐在炕头和社员一块谈心，坐在地头和社员一块学习毛主席著作。

他的头上仍然裹着一块白毛巾，身上穿着半旧的布衫，脚上穿着家庭自做的布鞋，社员身上有多少泥，他身上也有多少泥。大寨的贫下中农说：'永贵当了官不像官，还是咱庄稼人的老样子。'　"

10月14日，《红旗》杂志编辑部社论《吸收无产阶级的新鲜血液——整党工作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文章中提到了毛泽东的一段话："毛主席在谈到整党的时候，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一个人有动脉，静脉，通过心脏进行血液循环，还要通过肺部进行呼吸，呼出二氧化碳，吸进新鲜氧气，这就是吐故纳新。一个无产阶级的党也要吐故纳新，才能朝气蓬勃。不清除废料，不吸收新鲜血液，党就没有朝气。'"

文章中提到"反对复旧。凡是领导班子统统是原班人马，没有吸收无产阶级的新鲜血液，没有革命三结合，或者只有形式上三结合而不是革命的三结合的地方，不可能做好发展党员的工作。"

文章中还特别提到："迷信选举，这也是一种保守思想。"

文章特别说明："毛主席最近指出：'我们的权力是谁给的？是工人阶级给的，是贫下中农给的，是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广大劳动群众给的。我们代表了无产阶级，代表了人民群众，打倒了人民的敌人，人民就拥护我们。共产党基本的一条，就是直接依靠广大革命人民群众。'毛主席这个极端重要的指示，深刻地指出了无产阶级专政强大威力的群众基础，深刻地批判了迷信选举的形式主义，指出了党的建设和革命委员会建设的根本方向。

革命委员会是解放以来最具有革命代表性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权力机构。但革命委员会就不是选举产生的，而是直

接依靠广大革命群众的行动产生的。”

文章说：“民主是有阶级性的。这种在革命运动中经过彻底的群众路线产生的革命权力机构，包括在其中工作的各方面的新、老革命干部，比以前单纯用选举产生的更合于无产阶级民主，更合于民主集中制，更能深刻得多地反映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利益。”

第1048回：毕业生，四个面向去农村

小组会，众人批“二月逆流”

从1966年废除了高校招生制度之后，大学已有3年没有招生。全国中学已经积压了1966年、1967年和1968年3届的初、高中毕业生没有分配，总数在1000万人以上。

1967年10月9日，北京二十五中、二十二中、女人中、女十二中的10名中学毕业生启程前往内蒙古锡林郭勒盟插队落户。这是北京市“文化大革命”以来第一批上山下乡知识青年。

11月11日，首都中学红代会发出《中学红代会呼吁书——走彻底革命化道路》，呼吁“掀起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艰苦的地方去，走和工农结合的道路的高潮！”紧接着，11月16日，北京又一批中学生自愿到边疆、农村、牧场插队。

随着时间的推移，解决中学毕业生分配问题显得更加紧迫起来。

1968年4月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转发黑龙江省革委会关于大专院校毕业分配工作报告的批示中，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毕业生分配是个普遍问题，不仅有大学，且有中小学。文件要求各部门、各地方、各大中小学面向农村、边疆、工矿、基层，及时做好毕业生分配工作。

然而，在这“四个面向”中的工矿和基层是一个什么状

况呢？1967年工业总产值比1966年下降14%，1968年又在1967年的基础上再降4.2%，只有1966年的86.2%。国民经济出现衰退局面，绝大多数工矿和基层都无力再招收新工人。对于城镇来说，这1000万毕业生已成为多余的劳动力。所以，中学毕业生的出路实际上只有农村和边疆。因此，自“四个面向”的分配原则提出后，上山下乡一浪高过一浪。5月2日，中央安置城市下乡青年领导小组办公室向国务院呈送《关于1968年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请示报告》。全国66至68年三届城镇初、高中毕业生近400万人，其中势必有大批人要走上山下乡这条路。下去要以插队为主，安置方式可多种多样。京、津、沪、浙需要跨省安排的，请国务院召开协作会议给予落实。《报告》说：“知识青年插队落户，受磨练最大，最能体现知识分子与工农群众结合的光辉思想。但是阻力甚大，问题较多，工作确实艰巨。但不能动摇插队为主的方针。

1968年安置经费2.5亿元，拟根据各地计划分配下去，没有完成计划的，其剩余部分安置费上缴中央，不再留给地方结转使用，各省、市、自治区应尽早制定计划。”

从 7、8 月起，在全国范围内，伴随着“工宣队”、“军宣队”和“贫宣队”进驻学校掀起了宣传“再教育”理论。毛泽东就此发表了一系列指示，指出“我们提倡知识分子到群众中去，到工厂去，到农村去，主要的是到农村去……由

工农兵给他们以再教育”，“广阔农村，大有作为”。

9月初，在天安门广场召开的一次群众大会上，周恩来再一次指出，全国即将实现“山河一片红”，要求在场的青年“到基层去，上山下乡，到工矿和农村去劳动锻炼”。

到10月中旬，据16个省、市、自治区的不完全统计，已有70多万家居城镇的初、高中毕业生上山下乡。声势最大、进度最快的是辽宁、黑龙江、内蒙古、江西、河南等省、区。据当时中央安置办公室《上山下乡简报》反映：

辽宁省整个城乡的工厂、机关、商店、学校、街道和解放军，像一部大机器全部发动起来，男女老少都卷人了这场深刻的大革命浪潮，三届初高中毕业生整班下乡，现已下去37600人。河南省革委会把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列为当前中心工作之一，许多领导干部亲临前线，同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一道，狠抓落实毛主席最新指示，推动知识分子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革命浪潮。郑州市两批中学红卫兵下乡时，省、市革委会均组织二三十万军民夹道欢送，震动很大。

形势的迅猛发展，已使主管上山下乡工作的部门和接受安置任务的地区措手不及。到1968年10月15日，有21个省、市、自治区革委会向国务院提出了初、高中毕业生上山下乡计划，计划年内和第二年春季以前下去208.3万人，按当时补助标准，需要安置经费5.52亿元。其中年内下去166.5万人，需经费4.42亿元，已大大超过原来 1.9亿元的预算。

实际当年下乡 199.68 万人，国家财政拨款 3.5 亿元。若加上地方财政和单位的补助，则远远大于这个数字。

10月16日，周恩来在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第六小组会议上发言说："我在这次运动中也没有经验，关键是对待群众的态度。对群众的态度1966年10月中央工作会议毛主席讲了的，但有些人回去就是怕群众。不仅是部长，我还奉命把各省、市、自治区负责人找到北京来，当时黄火青、欧阳钦、谭启龙、江华、张平化、韦国清、杨尚奎、刘俊秀、叶飞、江渭清、张体学等不少人，叫他们自己反省错误。我有事不能去，叫谭震林、李先念同志找他们谈。在中南海，谭震林、李先念、李富春、余秋里、谷牧他们在一起开会，军队方面有徐向前、聂荣臻，有情绪，主席指示我保的最多，余秋里、谷牧、部长们十多位。余秋里被抓后，我去报告主席，主席交代我保他。"

10月17日，八届十二中全会小组会讨论。

康生参加第一组讨论，他在发言中提起了 1967 年 2 月 16 日大闹怀仁堂的事情："2 月 16 日大闹怀仁堂，16 日前就酝酿了。当时有两个地方，富春同志讲了，在他家开了三次会，是俱乐部，另外一个地方是京西宾馆，军队干部开会，徐向前在会上叫干部有什么意见尽量讲，表面上对着中央文革，实际上是反对主席、林副主席，反对十一中全会，反对文化大革命。京西宾馆是个中心，富春家是个中心。"

姚文元："一个是京西宾馆，一个是国务院的一部分。"

康生："徐向前 2 月 13 日讲，还要不要军队？不要军队，我回家去。"

姚文元："天塌不下来，解放军是毛主席亲自缔造和领导的，林副主席直接指挥的。"

康生："在会上拍桌子。就在这时内蒙不是在闹吗？要开军队包围报馆，就是徐向前下的指示。四川用飞机撒的传单，是甘渭汉起草的，叶剑英批准的，接着抓了十万人。在会上赵永夫介绍抓人的经验，当典型。这里面究竟是哪个搞的？'二月逆流'大闹怀仁堂也不是谭震林第一炮。首先打第一炮的是叶剑英，说'不教而诛'。第二炮是徐向前，第三炮是谭震林，陈毅、李先念、余秋里、谷牧都开了炮。徐向前他怕军队搞乱吗？他保护老干部吗？"

姚文元："徐向前同志的口号，同谭震林和陈毅、李先念同志的口号一样，说保护老干部，实际上是保护刘、邓、陶，保护叛徒、特务、死不悔改的走资派，谭震林本身就是叛徒。"

康生："捉杨勇、廖汉生也是他们叫搞的，北京军区也是个军嘛，那还不是乱军！"

江青："还有空军也是军，要夺吴法宪的权，我去保吴法宪可难啊！"

康生："徐向前说保护老干部，难道邱会作不是老干部？

怎么不保呢？徐向前平时不讲话，一到军委文革好厉害！”

姚文元：“自己暴露自己。”

谢富治：“实际是夺军权。”

康生：“你们想想京西宾馆的情况，那是真乱军，不是保护老干部。”

江青：“真是乱军，刘贤权也叫人捉起来了。66 年 8 月 12 日他们搞的那个文件说司、局长以上干部都要烧透，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也要烧，这样，中央文革变成救火的了。”

康生：“‘二月逆流’不只是大闹怀仁堂的问题，在京西宾馆煽动干部反毛主席、反文化大革命　。”

谢富治：“‘二月逆流’不是孤立现象，文化大革命拉下刘、邓后，有几个回合。几个老总讲话矛头指向文化大革命，京西宾馆煽风点火乱军，国务院富春家成了中心，以后两个中心合流了。”

姚文元：“‘二月逆流’不是孤立现象，是有根子的。一个在京西宾馆，一个在国务院的有几位副总理同志。二者合流，2 月 16 日总爆发了。‘二月逆流’就是为刘、邓、陶、为叛徒、特务、走资派翻案。当时争论的中心问题，是要不要进行文化大革命，要不要反帝、反修，要不要反对各国反动派，要不要反对走资派的问题。主席提出要不要搞文化革命？就是‘二月逆流’时争论的中心。上海工人阶级一月夺

权中央支持，发了电报，全面展开了向走资派的夺权斗争。在这关键时刻，解放军出动支左，给左派很大的支持。走资派看到要灭亡了，通过一些人出来替他们翻案，做垂死挣扎。”

康生：“陈毅同志说我们上台就要搞修正主义，陈在怀仁堂说延安整风，彭德怀、薄一波、安子文不是很积极吗？现在还不是反毛主席。总理不是挨了整吗？康生不是也挨了整吗？他们完全否定延安整风的伟大意义。

陈毅同志说，到底谁反毛主席？斯大林把班交给了赫鲁晓夫，搞了修正主义。大家质问他，他说是讲的红卫兵，彭德怀、薄一波、安子文是红卫兵吗？中国的赫鲁晓夫是红卫兵吗？他的矛头是对着林副主席的。

陈毅同志这些话是否定延安整风，为王明路线翻案。延安整风、审干是毛主席直接领导的，统一了全党思想，没有延安整风就没有全国胜利，否定延安整风就是否定毛主席领导，否定全国革命，否定解放战争，这话很严重。按这样讲，只有请王明来当总书记，把张国焘从香港请来，由陈毅同志当中央文革组长，谭震林当副组长。那对你们会怎样，主席讲伯达同志就杀头了，康生同志就充军了。

延安整风毛主席讲是马列主义教育运动，是解放战争胜利的准备。事过 25 年他们要翻案，所以，主席提出文化大革命要不要搞？十一中全会对不对？大家可以想想。陈毅同

志在这个问题上不老实，他不是针对红卫兵，是针对十一中全会，针对林副主席的。余秋里同志讲你们不道歉，我就不检讨。”

姚文元：“主席说的对，举了手的，有不赞成的，有种说法叫‘利令智昏’，站到反动立场上，向无产阶级司令部大喊大叫，余秋里凶的很。”

谢富治：“阶级本能，不以自己的意志为转移。”

康生：“谢富治同志不断插话批评他们，李先念同志说，你不要和稀泥。还说，这次文化大革命是全国性的逼、供、信。”

江青：“李先念同志替‘联动’说话，对‘联动’是什么态度？骂我们抓的，我替谢富治同志顶着，那时他们冲公安部，冲公安局，围得水泄不通。其实，‘联动’是群众扭送的，主席叫放掉，我们连夜给他们开会，就放掉了。可是‘联动’每次都骂到我和伯达同志头上。我们研究过抓 9 个，第 9 个就是董老的儿子董连国。‘西纠’后期，有坏人利用青少年不稳定，到处破坏，打人太残忍了，觉得搞几个人煞住邪气。我们是经过讨论的、经过详细调查研究的。董连国是主席叫他自动投案，总理告诉董老的。”

江青这里讲的“董连国”似应为董良翮。

谢富治接着说：“‘联动’其中少数人，作了不少坏事。广大革命群众意见很大，因此群众几次将他们扭送到公安机

关，公安机关收下了好几十个。‘联动’也多次冲击公安机关。故‘联动’问题完全是公安机关处理的，中央文革不仅没有提出捉人问题，相反的倒问过几次不要多捉人，这件事我最清楚。后来，伟大领袖毛主席要将‘联动’一律放掉。”

姚文元：“阶级感情问题。为什么革命群众受到残害不哭？对叛徒、特务、走资派受到批判你要哭，是什么阶级感情？”

谢富治：“为刘邓司令部垮台的悲哀。”

姚文元：“‘二月逆流’把反动纲领统统搬出来了，这就是反对毛主席，反对林副主席，反对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反对文化大革命，反对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革命群众，为一小撮走资派及其在各地的代理人翻案。”

康生：“有一个问题应引起同志们注意，就是他们反对红旗杂志十三期社论。社论提出了路线斗争，10 月 1 日林副主席讲话也提到了两条路线斗争。他们说，十三期社论开始老干部被整，干部靠边站。10 月 5 日紧急指示是对军队的，当时军队文化革命落后了。他们说这个紧急指示错误是主要的。”

江青：“10 月 1 日陶铸的女儿由上海到了北京，被陶铸的老婆带到天安门上，向主席告了一状，林副主席感到被动，搞了个紧急指示，军委、中央文革都讨论了的。放‘联动’，

连‘西纠’的 9 个也都放了。‘联动’的刑具非常残暴，完全是资产阶级对付劳动人民的刑具。”

姚文元：“他们就是为这些‘联动’头头被批判而流泪。”

朱德说：“一切问题都要弄清。谭震林，还有这些老帅，是否真正反毛主席？我看……”他的发言，立即被吴法宪、张春桥打断。

接着他们又集中向朱德开炮。

谢富治：“朱德同志从井冈山第一天起就反毛主席。谭震林、朱德同志、陈毅同志合伙把毛主席赶出军队。陈毅同志是朱德同志的参谋长。这些人都该受批判。我们回想一下，陈云同志在七千人大会上，主席三次叫他讲话，他说没调查没发言权，后来不到一个月做了个黑报告反毛主席，反大跃进，反总路线。先念同志、富春同志那次也起了作用，应该彻底批判。按陈云同志的报告搞下去不知成什么样子。刘邓、朱德、陈云都是搞修正主义的。‘二月逆流’这些人不死心，还要为他们服务。”

江青：“还有‘三和一少’呢！那是王稼祥搞的。”

谢富治：“‘三和’，对帝国主义要和，对修正主义要和，对各国反动派要和。‘一少’，是对民族解放运动援助要少。

刘少奇抬出陈云同志搞经济小组，收拾‘残局’，就是搞修正主义。主席没赞成陈云同志出来。陈云同志搞些什么，多赚钱、卖花布、炒肉片、高价商品，陈云同志一贯反毛主

席，休息也不干好事。这些东西都要清算。”

全会把这些对“二月逆流”的批判发言印成《简报》分发。

在 17 日的小组会上，第二组的陈伯达突然责问聂荣臻：“你为什么在背后议论我三十年代初在平津地区活动的那一段历史问题?告诉你，我的历史是清楚的，中央是知道的。”

聂荣臻心头一怔，心想：“我同剑英两个人在西山议论的事情，当时没有任何第三个人在场，以后也没有再同别人谈论过此事，陈伯达是怎么知道的?会不会是剑英又对别人说了?”后来聂荣臻问了叶剑英，叶剑英说他没跟别人说。

陈伯达的福建口音特别重，说话又吞吞吐吐，组里的人都没有听懂他在说些什么，所以也没有人搭腔。

聂荣臻听懂了，因为一时不好回答，也就装作听不懂，没有说话。

陈伯达生气的问聂荣臻：“你老婆张瑞华三十年代在上海被捕过，是自首叛变后才放出来的，中央组织部有人揭发了这个问题，你知不知道?”

聂荣臻回答：“我知道她被捕过，但没有听说有自首行为，既然有人揭发，那就按调查的事实做结论就是了，我不包庇。”

张瑞华 1934 年的确在上海英租界被英国的巡捕房逮捕过，但她始终一口咬定自己是农村妇女，来上海找丈夫，临

时住在那所房子里的。巡捕房见问不出什么，就将她放回原住处，严密监视。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张瑞华趁巡捕房监视松懈的时机，带着不到 4 岁的聂力，逃了出来。这段历史组织上严密审查过，有关的当事人有确切的证明，张瑞华没有自首问题。

但是，后来在十二中全会简报中还是出现了“张瑞华是叛徒”的内容。

第 1049 回：孙维世，周恩来养女身亡

众审查，刘少奇专案材料

周恩来也对“二月逆流”作了发言，根据后来传达周恩来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的讲话，有以下 17 条，其中夹有传达者的话：

1、聂荣臻对科学院、国防科委发生镇压群众，给他指出，他不愉快，硬要把一派压垮。对“916”的叶正光是不满的，支一派、压一派，使七机部长期武斗，文化大革命没有搞好。

2、聂荣臻同志在晋察冀闹独立王国；百团大战，他很积极；执行刘少奇“和平民主新阶段”，也很积极；大量裁军，不按毛主席壮大自己力量的指示办，其恶果使晋察冀边区的革命力量直至解放时还没有恢复起来。

3、不让军队院校到北京来，是违背毛主席的串连指示的，这是叶剑英、聂、徐、陈几个军委副主席干的。

4、中央文革曾保过聂，但他对中央文革反而不满。也保了陈毅、徐向前，都不满，竟说：“不要你们保”。好像保了他们，他们就不光荣了，他们自以为一贯正确。陈毅同志在一次欢迎外宾时，红卫兵也去了，他大骂红卫兵“你们来干什么！我的检查是逼出来的，是假的。”

5、叶剑英派工作队，好多都派到肖望东那里去了，所以肖望东对主席那么凶，刘少奇、陶铸也支持肖望东。

6、66 年 11 月 13 日至 27 日，两帅突出，四帅出去。（指接见）林副主席不同意，因为伟大领袖毛主席已经八次接见了红卫兵，最相信群众，对发动群众起了很大作用。但他们背着林副主席还是接见了。直到在东郊体育场开始接见，林副主席才知道。在会上，他们把长春兽大的李基才大骂了一顿，叶、陈、徐、聂都讲了话。贺龙是中央已经点了名的坏人，他们还把他搞出去，摆在第一位讲了话。

7、叶剑英的女儿冲军事科学院（王树声同志为保护档案）大字报也上街了，叶是知道的，他没有制止。

8、叶剑英的女儿叶向真用绑架的方法，只用了 7 分钟的时间，就把彭真、罗瑞卿抢走了，引起了以后的全国绑架，此事戚本禹和他们有联系。

9、许立群的问题已经揭开，但叶剑英不报告中央，许立群说生病了，叶就想办法让他住进医院，保护起来。

10、戚本禹也是二月逆流的一部分，是跟叶参座的。因为他们压抑群众运动，所以军事院校冲中南海。力量不足，和地方上的红卫兵联系起来冲。以后发展到全国冲军区（8 月 7 日冲沈阳军区，占领了军区大楼，8 月 8 日冲广州、福州、成都、济南等十多个军区）。他们倒打一把，说中央文革搞的。他们不检查自己的错误，反说中央文革不出来讲话。

11、几个元帅两次接见的两次讲话，群众要他们检查，中央文革的同志出来保他们全部过关的。

12、在他们做了两次讲话的检查后，由中央文革的同志讲了话，才让他们过了关。他们对这些不但不感激，反而说中央文革不保护老干部。

13、67 年 1 月的高干座谈会（军以上干部参加的）林副主席不知道，他们不报告。在这次大会上，他们怪中央文革，叶剑英拍桌子，把骨头都拍断了，桌上的茶杯都震到地上，引起了很多人不满。

14、聂、叶、徐 3 人点头抓杨勇，聂还说："要烧，要烧焦。"群众听说是这样，于是就抓起来了。后来他们推脱责任，说是上面点头的。后经再三追问，郑维山同志还当面对证说："是在京西宾馆第二会议室，你们 3 人点头的，怕有问题，又找了他们 2 人，他们说了，要烧，要烧焦"。这样他们才哑口无言。到底谁在保护老干部？

15、讨论"八条"时，他们和中央文革有争论，争论完散会后叶剑英说："今天是舌战群儒！"李先念立即伸出大拇指，说："不愧为元帅叶参座。"当时总理就指出："这是错误的，你们把我们看成是另一圈了。"

16、"上方宝剑"问题，八条出来了，叶剑英说："有了上方宝剑就好了。"这是非常错误的。

17、不听毛主席的告诫，毛主席在 2 月 14 日亲自找他们讲过：中央文革是正确的。但他们在 2 月 16 日还大闹怀仁堂。2 月 18 日，毛主席又批评了他们，严肃地指出：你们

把王明找回来，把张国焘找回来，把刘少奇找回来，让你们去搞。但是他们还是不听，66 年 10 月高干会议上就打招呼说："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了，但是执行又是一回事。"是给他们打招呼的，但是他们听不进去，是世界观问题，阶级立场问题。

另外，1969 年北京外贸学院编辑的《在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毛主席、林副主席、周总理的重要讲话》中还记载的讲话有：

"四川捉人问题。二月大闹怀仁堂后，17 日甘渭汉起草镇压群众的传单，叶剑英修改后，还加重了，加上'如不立即撤退，一切后果由你们负责。'用飞机大量散发。接着就抓人，抓了十万人，还说少。军队刚开始发动群众，黄新廷和李井泉勾结在一起，来了一个镇反运动。于是万县就开了枪，一次打死 170 多人，其中还有小孩子，这事叶剑英也是有责任的。"

"赵永夫事件。赵永夫是副司令员，把司令员刘贤权同志关起来，二十三日镇压群众，《青海日报》的八·一八给围起来，打死三百多人，叶剑英还打电报祝贺，说他们打了胜仗。赵永夫倒说是林付主席祝贺的。二月开军委以上干部会，就是要纠正他们的错误，但叶剑英还把赵永夫找来介绍经验，中央看到不对头，林副主席讲了话，才制止了。""刘贤权同志被软禁后，一月八日给中央写了一封信，报告他被

看管起来了，电话也不通等情况，到二月二十六日（信）还被徐向前扣压着。当时徐向前是军委文革小组长，二十三日打死了三百多人，追查此事，才在徐向前那里查了出来。”“军以上干部会不对头。林副主席于三月二十日作了报告，就是制止他们。指出：‘不要提带枪的刘邓路线’，以后怕坏人钻空子，就把这段去掉了。不是林副主席指出，还有许多军以上干部借对‘八条’的错误理解，犯镇压群众的错误。是谁在保护老干部？”

10月17日，周恩来得知他和邓颖超的养女、中国青年艺术学院副院长、中国实验话剧院副院长兼总导演孙维世，于10月14日在关押处死亡。他在当天就此事批示到：“是否自杀或灭口，值得调查。”“应进行解剖化验，以证实死因。”

对于陈伯达在 17 日小组会上的责问，聂荣臻没有回答，这让陈伯达很生气。散会后，他向周恩来说了此事。

18 日中午，周恩来在电话上问聂荣臻是怎么回事?还说：“你没有回答伯达同志提的问题，他很生气。”

聂荣臻只好如实地回答说：“三十年代初，他在天津被捕，后来经过他的同乡、福建军阀张贞的斡旋，出了监狱。他出狱后，因为别人听不懂他的福建话，无法解决吃饭问题，就又自动回到监狱，后来又被赶出了监狱。这是彭真有次闲谈时对我说的，说陈伯达是‘糊里糊涂进去，又糊里糊涂出来。’我是当成笑话，前几个月同剑英闲聊时说过这个故事，

没有对别人说过，我不好回答。”

“噢，是这么回事。”周恩来也没有再问。

10月18日，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讨论了中央专案审查小组《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及《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证》。

在《审查报告》中公布了刘少奇几次被捕的情况：

1925年刘少奇在长沙被捕。在《审查报告》中说：1925年12月16日，刘少奇在长沙文化书社被长沙戒严司令部逮捕。经过审讯，湖南省省长赵恒惕亲批将刘少奇“斩决”。这时，刘少奇的把兄弟，长沙禁烟局长洪赓扬和省府会计、赵恒惕至亲杨剑雄，和军阀叶开鑫，贺耀祖和刘少奇的胞兄刘云亭出面活动，赵恒惕向刘少奇提出条件，刘少奇接受，“投降了敌人，背叛了革命。接着刘少奇于1926年1月16日，奉赵恒惕的旨意，捧着赵恒惕赏赐的《四书》，离开湖南前往广州，怀着不可告人的目的，重新钻进党内来。”

1927年“四·一二”政变后，时任湖北省总工会秘书长的刘少奇，被尚与共产党合作的武汉汪精卫政府指定担任国民党中央“工人运动小组长”，《审查报告》中说：在此期间，刘少奇“充当特务，向国民党提供工运情报。刘少奇向陈公博献策：（一）调走武汉工会骨干，使‘干群脱节’；（二）解散工人纠察队，‘防止暴动’。刘少奇并且利用他窃据的职务，实行了这个极其恶毒的阴谋，解散了在革命斗

争建立伟大功勋的工人纠察队，于6月29日上午，把全部枪支弹药，甚至连童子团的木棍也捆得整整齐齐，装上卡车，拱手交给了国民党管理武汉卫戍事宜办事处。”

“6月28日晚，汪，陈将刘少奇等公开逮捕，次日上午，将刘少奇一人秘密接到国民党中央党部密谈，然后‘释放’。”《审查报告》中说：这是“为了掩盖他的内奸面貌，蒙蔽群众，刘少奇还与汪精卫，陈公博密谋，演出了一场假逮捕的‘苦肉计’。刘少奇还按照汪，陈旨意，亲自到国民党中央工人部二次工运会议上，做《自动解散工人纠察队意义及经过》的叛卖报告，遭到广大工人的强烈反抗。”

“刘少奇写信给陈公博，提出《改组工会意见书》，密告我党在国府警卫团，中央军校和汉阳兵工厂内的情况，要汪，陈‘速除’，部份地破坏了南昌起义的准备工作。刘少奇充当内奸，工贼，出卖革命，充当帝国主义，蒋介石，汪精卫的走狗，死心塌地地反共反人民，双手沾满了革命同志的鲜血，十恶不赦！”

1929年8月21日或22日，刘少奇与孟用潜在奉天纱厂被张学良逮捕。刘少奇立即供认自己是满洲省委书记，孟用潜是省委组织部长，供出省委委员唐宏经，王立功，张聿修，丁君羊，饶漱石和省委秘书长廖如愿，出卖了满洲省委所属东满，北满，旅大，抚顺等十多个特（县）委（支部）和奉天市的六七个支部。当敌人要刘少奇带着特务去抓人时，他

积极出谋献策说：省委负责人已经隐蔽起来，现在抓不到，反而会打草惊蛇，如果将他“释放出狱”，他就可以“搜集共产党的情报”，大规模破坏满洲省委和东北三省地方党组织。张学良对刘少奇的献策，颇为赞赏。于是将“共产党案”改为“工潮案”，并以“煽动工潮证据不足”，将刘少奇“释放”。刘少奇给张学良写信说：“张长官是我的再生父母，将来我有生之日，就是我戴德之年。”由于刘少奇提供的情报，使满洲省委及其所属地下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许多共产党员被捕，被杀。

1936年，刘少奇指使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等61人公开发表“反共启事”。

《审查报告》最后说：“刘少奇罪大恶极，死有余辜。专案审查小组建议党中央根据党内外广大革命群众的强烈要求，撤销刘少奇党内外一切职务，永远开除党籍，并继续清算刘少奇及其同伙叛党叛国的罪行。”

10月26日下午，林彪在八届十二中全会第二次会议上讲话。

在党的八十二中全会召开之前，林彪亲自向秘书们布置了“拉条子”的任务。他交代说：“在十二中全会上，我准备讲一次话，你们帮助拉个条子。究竟讲点什么，我还没有想好，你们可以帮助想一想，不要急于动手。”

过了两天，林彪在人民大会堂西大厅散步，走到秘书值

班室门口时，问秘书说：“‘拉条子’的事，你们想得怎样了？”

“我们正在想嘞！”

“你们要抓紧。”林彪抬头看了一眼秘书，“不抓紧要误事的！”

“我们争取早点‘拉’出个明目来，再报告首长。”

林彪扬起右手，做了一个表示否定的手势，“不！我的意思是让你们抓紧想，而不是抓紧写，只要想好了，写很容易。陈伯达对我说过，他写东西之前就是关起门来想，一想多少天，不写一个字，等到成熟了，一口气就把文章做出来了。陈伯达是个大秀才，这是他的经验之谈，你们要注意。”

林彪对拉条子并不急，可叶群却特别急。十二中全会召开后，叶群下令把会议《简报》让秘书们看，作为拉条子的参考。而中央办公厅通知，这份《简报》除参加会议的人员外，其他人是不能看的。

在叶群的督促下，林彪在人民大会堂召见秘书说：“‘拉’条子的事，你们可以动手了。我和叶群商量过，准备讲六个题目：第一，讲讲文化大革命的意义；第二，讲讲文化大革命的胜利；第三，讲讲文化大革命中的两条路线斗争；第四，讲讲毛主席对马列主义的发展；第五，讲讲中国革命在世界革命上的作用；第六，讲讲今后怎么做。这六个题目，我都准备信口讲，不能念现成稿子。但信口讲，也还

得有个条子作参考。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意义和胜利这两个题目，由老虎帮助我准备一下，他还是一个娃娃，还不成熟，但我想叫他锻炼一下。关于路线和毛主席对马列主义的发展这两个题目，就得靠你们帮助准备，我也不会讲很多，点一下就是了。”

林彪停了停，又说：“我准备在本月26、7日讲，你们抓紧写吧！”

秘书们从人民大会堂回到毛家湾，叶群还在睡大觉。12点，叶群起床后召见秘书。当秘书把林彪的指示转告叶群时，她说：“这些不用你说了，我都知道。”她说：“这次十二中全会很重要，会议的主题是批判‘二月逆流’，你们看过这几天的会议简报没有？”

一个晚上，叶群回来后将秘书叫去，对他们说：“你们‘拉条子’可得慎重些。我刚从一组那里开会回来，给你们讲点新精神，不然你们也为难。”

“一组”是叶群叫毛泽东的代名词。只见她从手提包里摸出几页记录纸说：

“一组讲，现在会议要降温。”

秘书刚记下这几个字，叶群马上说：“这些话你不要记，知道一下就行了。对‘拉条子’有用的话再记。首长当面请示主席，他讲话时要注意些什么？一组说，随你怎么讲，我不干涉内政。首长说：我讲话时要点点‘二月逆流’，可不

可以点名？一组说：不要点名了。一组还说：对那些犯过错误的的老同志要一批二保，还要选他们作‘九大’代表，但他们也不要翘尾巴。”最后叶群告诉秘书，“你‘拉条子’还要把批‘二月逆流’作为重点。”

## 第 1050 回：讲六点，林彪在大会发言

### 通《党章》，开除刘少奇党籍

10 月 26 日清晨，林彪让秘书从人民大会堂打电话到毛家湾，把给他拉好的条子送过去。

这天下午，林彪在八届十二中全会第二次会议上讲话，他说：

“十二中全会，从13号起，到今天已经开了13天了。这次会议，是在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决定性胜利的大好形势下，在毛主席亲自主持下召开的。开得很成功，对党章，九大代表产生法和对大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的认识和处理，都作了很好的讨论。这是对即将召开的九大作了极其重要的准备工作。同时，对‘二月逆流’进行了严肃的批判。”

“这场伟大的革命，是毛主席亲自发起和亲自从头到尾领导的。大量的日常工作，是由中央文革、总理、江青同志、伯达同志、康生同志等，按照毛主席的指示，不分昼夜地辛勤工作的。我因身体不好，做的工作很少，对整个的工作体会不全面、不深刻。毛主席要我讲一讲，我觉得很没有把握。主席要我讲，我就只能讲个大概，但必然讲的不够准确不够全面，同志们只听听就行了，不必记录，不要传达。由于我对实际情况的了解不够和思想提炼得不够，今天讲的话可能啰嗦。”

接着，林彪讲了6个问题：一、文化革命的必要性；二、文化革命的胜利、意义和它在世界历史上的地位；三、文化革命的路线、做法的问题；四、毛主席对马列主义的伟大发展，特别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革命怎样继续前进的问题；五、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六、今后怎么做。

在讲到“文化革命的意义和它在世界历史上的地位”时，林彪说：

“我当然是不懂历史的。历史的权威是毛主席。在我们全党里头，他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权威，我只是在中央开会经常听到毛主席讲点历史。就在那里，‘祠堂里的老鼠’听上几句的。在我看，世界上的历史，在世界上有重大影响的文化革命，大致可以有四大次，有四次。

第一次，希腊、罗马的古典文化，在公元以前五世纪、四世纪，希腊的奴隶制度是处于繁盛的时代，希腊的古典文化，也处于这种那个时候出现了影响全世界上二千多年来的思想，成为两千年来世界思想的根源，那是希腊、罗马的古典文化。那时出现什么人物呢？德莫克里特、赫拉克里德、亚里斯多德、伯拉图、苏格拉底、伊壁鸠鲁，这些人都是已经载入世界的历史上的名字，他们是影响整个欧洲的文化，也影响后来中国的思想。但是，那种文化是什么呢？它有阶级性的，它是正处在希腊、罗马奴隶制度盛行的时候的文化，是为奴隶主辩护的文化。”“在人类历史上，那算是一次大的

文化，奴隶主的文化。”

“世界第二次的文化运动是什么呢？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出现，资产阶级出现，这个时候，就出现了以意大利为首的文艺复兴运动。”“这个时候的基本思想，就是反对神权，提倡人性，但是他是没有阶级性的，他也不敢声明他是什么阶级的。没有阶级性的，实际上是有阶级性的，但是他不敢申明。提倡自由，但是，这种自由，他也不敢说是谁的自由。”“在意大利之后，法国的启蒙运动，传到英国是英国的样子，传到德国是德国的样子，而到法国，就是法国形成一个启蒙运动。我们大家所熟悉的孟德斯鸠、卢梭这么一些人。还有其他什么费尔巴哈，很多的一些著名的代表人。他们是主张唯物论，但是也有主张唯心论的。后来这种思想，也成为马克思主义产生的来源之一，社会主义思想是来自于法国的，就是圣西门、傅立业，也来自于英国的欧文。更早一点，还有英国的乌托邦。这就是马克思主义也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它也是继承了人类的先进思想。”

“第三次就是马克思主义产生，是人类思想上的大革命。”林彪叙述了马克思主义和工人运动产生和发展的过程。他接着说：

“这三次世界性的，一个是奴隶主的文化运动，一个是资本主义的文化运动，一个是无产阶级的文化运动，如果同中国这一次的毛主席领导的文化大革命比较起来，那末，规

模、深刻性小得多。所以，我们要看明白中国这次这种文化革命，在世界历史上历次文化革命中最大的一次，而不是同它们一样大，更不是比它们小，也不是比他们稍微大一点，而是极大、最大。不仅仅是七亿人口中广泛流传，而且是几十亿的地球上的人口、劳动人民乐于流传，乐于接受。这就是讲文化革命的重要收获之一，中国文化革命在世界文化运动中的历史地位应该怎样排法，是更小，还是一样大，还是稍微大一点。我们来看，它是最大的。这是讲它的历史地位。”

林彪在讲话中还特别提到了专案组的工作，他说：“专案的问题除文革的几个同志以外，总理也是参加了的，也是领导的，是他们这些同志，专案小组的全体同志的努力，剥开了这个画皮，使我们看出，照妖镜把这些牛鬼蛇神照出来了。”

林彪再次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从历史到现实对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及意义和发生的一些问题做了及其深刻而又深入浅出的阐述和发挥。他最后说：“我的讲话，就是夹生饭，不成熟，很啰嗦，不精练，越是思想不精练的时候讲话就越啰嗦。越提炼，话就越少。讲话讲到这里为止，最后喊几个口号，有十个口号要喊：

打倒大叛徒、大内奸、大工贼刘少奇！

打倒刘、邓、陶！

打倒彭德怀、贺龙！

打倒彭、罗、陆、杨！

无产阶级文化革命全面胜利万岁！

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胜利万岁！

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马克思列宁主义万岁！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林彪在 10 月 26 日的讲话中提出人类自古以来有四次“文化革命运动”，即希腊罗马的古典文化、资产阶级的意大利的文艺复兴、马克思主义、中国文化大革命。江青认为这样讲有问题，她在林彪的讲话记录稿上写了一些批语后送给林彪，说林彪如果同意，请把她对林彪讲话的批语转给毛泽东。林彪生气了，当着秘书的面说：“我听见女人的声音就讨厌！”但是，林彪还是将江青的批语转给了毛泽东。

10 月 27 日，八届十二中全会讨论党章。在此之前，江青在在讨论《党章》时曾提出：“林彪同志很有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风度。”“他那样谦虚，就应该写在党章上。”“作为接班人写进党章。”她还强调说：“一定要写！”这次，江青又提出：“坚持要把林彪作为毛主席接班人这一条写入党章。”

全会通过了由康生、张春桥、姚文元负责起草，周恩来主持讨论、修改的新党章草案，其中明确写进了林彪是毛泽

东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毛泽东对此草案作了多次修改、批示。

10月29日，康生在八届十二中全会第四小组会议上的发言说：

“听了林彪同志的讲话，受到很大的启发和教育。

林彪同志是我们党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光辉榜样。林彪同志昨天的讲话是又一次实际的典范，告诉我们怎样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怎样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

林彪同志的讲话，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深刻地分析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各个方面，对两年多来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做了高度的概括，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普遍真理同我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并且高瞻远瞩，预见到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前程。

八届十一中全会确定林彪同志为毛主席的接班人，这是百年大计，是关系到我党、我国今后命运，关系到我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大事。林彪同志很谦虚，他要求把党章（草案）中提到他的那一段删去，我们的意见，这一段必须保留，林彪同志是毛主席的接班人，这是会上公认的，是当之无愧的。”

接着，康生谈了他对林彪讲话的体会，再次对林彪的讲话做了理论上的阐述和发挥。

1968 年初夏的时候，《参考消息》原文转载外电一则，称林彪是“中共中央总书记”，康生向林彪写了个条子，大意是：我主管中联部，这个差错我应当负领导责任，林总是毛主席的接班人、副统帅，决不是总书记可以比的。今后请林总多批评，也可随时当面赐教。林彪思考良久，叫秘书打电话告诉康生三个字：“已收到。”

10 月 30 日，江青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谈到军委办事组的产生过程，她说：“军委办事组是怎么产生的呢？1967 年夏天，斗争肖华的时候，出现了不严肃的现象，把一场严肃的阶级斗争，变成低级下流，转移了斗争大方向，侮辱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因此，我建议成立一个看管小组。开始是 4 个人。后来……在军队产生了新的办事班子——军委办事组。杨、余、傅问题出现后，进行了改组。”

江青之所以说“看管小组”，是因为军委办事组亦称军委看守小组。

10 月 31 日，是八届十一中全会大会的最后一天，代表们表决通过《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那时还没有电子表决器，采用举手表决的方式，由站在主席台的负责计票的人负责统计。

表决开始，与会人员纷纷举手表示赞成这个提案，只有一个人没有举手，她就是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陈少敏。文革开始时，她也是全身心的投入到了这场运动。

负责计票的康生环顾会场，再一次提醒代表们：“注意，现在开始计票！”

只见陈少敏把身子伏在前面的桌子上，用右手捂住自己的左胸。还是没有举手。由于以后没有进行反对和弃权的表决，这个人实际上是投了反对票或弃权票。

按照那时的惯例，新闻公报中仍然宣布：“全会一致通过决议，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党籍，撤销其党内外的一切职务。”

散会后，康生找到陈少敏问她：“你为什么不举手?”

陈少敏回答说:“这是我的权利。”

康生不满的说：“你这个人，连乡下老太婆的觉悟都没有哩!农村老太婆的觉悟都比你高!”

陈少敏没有说话。

其实，在小组讨论刘少奇的材料时，陈少敏的表现就已经上了简报。

10 月 22 日印发的第四组《小组简报》载：“康生同志对陈少敏同志说，刘少奇有那么一套，吹捧你们女同志。他过去吹捧过叛徒章蕴、钱瑛，也捧你。这点你要注意。昨天大家讨论刘少奇的问题，你睡觉，如果身体不好，可以告假嘛！大家对刘少奇那样的义愤，你自己一点义愤没有，这算什么共产党？”

10 月 23 日《小组简报》记载：“陈少敏同志至今对中

央专案审查小组的报告没有明确表示态度。她今天在会上作了一个很不像样的检查：‘跟着’刘少奇‘犯错误的，执行他的路线的人，应该解放了’。”

这天的简报中还说，一些人在小组会上对陈少敏展开了严肃批评，说她敌我不分，不同刘少奇划清界限。

10 月 24 日的《小组简报》中说：“小组同志对陈少敏同志今天发言东拉西扯，对审查报告始终不表示明确态度，两次提出批评，指出她政治上、思想上落后到惊人地步，一个农村老太太的政治觉悟也比她高得多。”

## 第 1051 回：左中右，十二中全会闭幕

### 重庆查，“国民党残渣余孽”

10月31日，八届十二中全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章程（草案）》及《关于中国共产党章程（草案）的决定》。

这天，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闭幕。毛泽东在闭幕会前曾问：“回去怎么传达？”

周恩来说：“拟了个传达的通知。”

全会在讨论召开党的“九大”准备工作时，对参加“二月逆流”的老同志还要不要选举他们当“九大”代表有不同意见。陈毅则表示自己当代表不够格。

毛泽东在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闭幕会上讲话，他觉得这次会议开得很好。他说：

“这次会议我看开得可以，开得很好嘛。是否有些同志对‘二月逆流’这件事不了解，经过差不多半个月，13号，18天，就比较了解了。过去高级干部也不清楚，我们没有透风。过去各省来解决问题，也没有工夫来讲这些事情。在这次会上有犯错误的同志说明问题，同志们质问他答复。质问再答复，比较清楚了。这件事要说小嘛也不算小，要说大嘛，依我看也不是十分了不起，是一种自然现象。他们有意见嘛，总是要讲嘛。几个人在一起，都是政治局委员、副总理、军委副主席，讲一讲也是允许的。党的生活也是允许的，是公开讲的。不是两个大闹吗？一个大闹怀仁堂，一个大闹什

么？”

周恩来：“京西宾馆。”

毛泽东：“京西宾馆嘛。他这个大闹嘛，就证明他是公开出来的嘛，他没有什么秘密嘛。不过有些细节，大家不晓得，我也不知道。最近简报上才看到那些情况。我看，倒是细节无须乎多过问，还是大纲节目要紧。那些细节呀，比如讲，往来多少次呀，谈那，在桌边上讲过一些什么小道消息呀，我看那些事情那，倒是不需要那么着重。如果党内生活注意那些事情去了呢，把人引导到注意那些很小的细微末节，而把大问题呀反倒不大注意了，就不那么好罗。所以，我说嘛，事情是相当大一件事，不是一件小事。但是说是那样天就会跌下来呀，或者地球就不转了呀，我看也不一定。照样转，还能不转吗？我倒是佩服邓老，一直顶住。要是我，就不理，结果你还是搞出一篇自我批评。他早就有自我批评了，比如北戴河会议的时候就有自我批评了，有些老同志将来是否可以要工作，打倒的谭启龙、江渭清，过几年以后，大家气消了，也可以做点工作嘛。不做主要工作，还有其他一些人，身强力壮，将来总得给点事做吧！邓华来了吧？”

邓华站起来。

毛泽东：“好久不见了。在四川几年没有人说他不好，不晓得红卫兵又把他关起来了。你这个人跟彭德怀犯了错误，改正错误就好了。在北京的有黄克诚、谭政。犯错误的人，

允许人家改正错误，要给他时间，直至多少年。因为群众还要看他的表现嘛。”

对当时全国正在开展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毛泽东说：“这件事一是要抓紧，二是要注意政策。不是要稳、准、狠吗？稳，有右的，稳就不稳了。狠就可以搞得很‘左’，就搞过了火。重点就是‘准’字。否则，不准，稳也稳不了，狠也狠不起来。要调查研究，要注重证据，不要搞挂黑牌子、喷气式，不要打人。我在1927年写了湖南一篇文章，对土豪劣绅，戴高帽子，游乡，其实几十年都不搞了。红卫兵就按那个办法逐步升级，挂黑牌子，搞喷气式，还有各种各样的。对特务、汉奸、死不悔改的走资派，要调查研究，注重证据，不要重口供，不要打人、戴高帽子、搞喷气式那一套。这样结果并不好。在北京有杜聿明、王耀武嘛。过去对敌人俘虏也不搞这一套。

有些死不悔改的人，你整他，他也不悔改。冯友兰你不叫他搞唯心主义一套，我看也难。还有一个翦伯赞，北大教授，历史学家，资产阶级历史权威嘛。你不要他搞帝王将相也难。对这些人不要搞不尊重他人格的办法。如薪水每月只给24元，最多的给40元，不要扣得太苦了。这些人用处不多了。还有吴晗，可能还有某些用处。要问唯心主义，要问帝王将相，还得问一问他们。在座的范老，也是搞帝王将相，郭老也算一个吧。那时没有别的书看嘛，都是二十四史之类

的。要反帝王将相，还要知道什么是帝王将相。不然人家问你答不出来。我可不是劝你们在座的人去搞帝王将相。你们还是按总理讲的，按那几个文件去搞。我也不赞成青年学生去搞。少数人去搞。比如范老，你不搞，帝王将相不就绝种了？不是要再出帝王将相，而是历史要人去研究。”

“清理阶级队伍，对这些人你们要注意，有好的，中间的，极右的三种。我说的对右的，应当如何对待他们。世界上总有左中右。没有右，你左从哪里来呀？没有那么绝。统统是左派，我不赞成。哪有的事？那样纯也不见得。我们的党通过这场文化大革命，我看比较纯了。从来没有这样搞过。但太纯了也不太好。比如‘九大’代表，‘二月逆流’的同志不参加就是缺点。所以我们还是推荐各地把他们选作代表。陈毅同志说他没有资格，我看你有资格，代表左中右的那个右派嘛。你对‘九大’代表三个条件中的第二条不那么符合，可以协商嘛。有少数人参加有好处。”

“现在情况同两年前十一中全会时不同了，很大的不同了。运动还没有完，就是九大开过了，运动也不见得马上就完。因为这涉及到每个工厂、每个学校、机关。我今天就讲这么一点。”

毛泽东特别介绍了上海的王洪文，他说：“介绍一个人，此人叫王洪文，站起来看一看。”

王洪文站了起来。

毛泽东继续介绍说："上海'工总司'的负责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委员。多大了？"

王洪文答："34岁。"

毛泽东说："前年'安亭事件'就是他搞的，这次会议，有年轻的同志参加很好。但太少了，还有尉风英。"

尉风英站起来后，毛泽东问了她的年龄后，又问："哪一位是刘殿英呀？"

刘殿英站起来，毛泽东问了他的年龄后说："你好像是个军人，他还是青年嘛，年轻的是你们3位代表了，还有年轻的没有？"

周恩来："还有青海的达洛，38岁，藏族。"

毛泽东问："你会讲汉语吗？"

达洛站起来答："会。"

毛泽东开玩笑的说："你是真藏族还是假藏族？"

达洛答："真藏族。"

毛泽东又想到了新疆："新疆，我讲过你们那里团结起来，你们那里还有些问题。哪个是龙书金？"

新疆革委会主任龙书金站起来，毛泽东说："你还是我的老乡咧。还有王恩茂。你有些作法很笨，到飞机场搞欢迎那一套干嘛呀？结果搞的一派赞成，一派反对。总有人给你出主意，摇鹅毛扇子的。"

他又提到陈永贵，陈永贵立即站起来，毛泽东说："你

那个打扮还是农民的本色，大寨也有灾难，每天一万人参观，不影响粮食生产吗？”

陈永贵答：“很好，对我们是个促进。”

毛泽东又点兰州军区政委、甘肃省革委会主任冼恒汉：“冼恒汉，广西佬吧？你认识韦国清吗？”

冼恒汉答：“不认识。”

毛泽东：“你们都是红七军的吧，怎么不认识？”

冼恒汉答：“都是兵。”

毛泽东：“不要老死不相往来。”

他说到邓小平：“大家要开除他，我对这一点还有一点保留。我觉得这个人嘛，总要使他跟刘少奇有点区别，事实上是有些区别的。要开除一个人很容易呀，只要我们举手，那还不开除了。我看还是慎重一点。横直将来你们要开除也可以嘛！哪一天把他开除就行了嘛！我是有保留的。至于怕他造反，我看不要怕。他造不起来。邓小平的特点是太脱离群众了。我这个思想可能有点保守，不合你们的口味。我给他讲几句好话。不过邓是摇鹅毛扇子的，真正决策的还是刘少奇。八大时搞招降纳叛，七大时审查代表，是刘少奇、彭真他们搞的。他们在延安召开了一个白区工作会议。

过去说对贺龙是一批二保，因为他是二方面军的代表。现在看来不能保了，因为他搞的事以前不知道。从成钧、许光达、廖汉生等的揭发材料看来，他是破坏我们这个军队的。

他背地搞篡军反党企图是有的，但是没有来得及。有贺龙、刘震、王尚荣、许光达这些人。

不要扯远了，就到此为止，散会。”

国庆活动结束后，参加北京国庆观礼的毛远新因病住进301医院。10月13日，沈阳军区政委曾绍山到北京301医院看望毛远新，并按中央办公厅的通知，接毛远新到人民大会堂参加会议。当两个人走到人民大会堂东大厅门口，曾绍山顺利进去了，但毛远新却被大会工作人员拦在门外，说参加会议的名单里没有毛远新的名字。

曾绍山对工作人员说：“中办通知我去301医院接毛远新来参加今天的会议，这是怎么回事?请你们查一下。”

十几分钟后，工作人员回答说：“已经查过了，参会人员名单里确实没有毛远新，请回去吧。”

毛远新有些尴尬，心情不舒畅的回到了医院。事后，毛远新才从报纸上知道，这次会议是“中国共产党第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

11月，毛远新出院，在回辽宁前，到中南海向毛泽东辞行。谈话中，他提起了未让参加“第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的经过，感觉有点丢人，很委屈。

毛泽东问他：“你还有什么想法？”

毛远新说：“又不是自己一定要去参加会议，是曾绍山来接我，说中办通知让我参加会，到了会场又不让进门，很

多熟人都打了招呼，别人怎么看？”

毛泽东又开始批评他说：“这点小事你都受不了，真没出息。共产党人讲任劳任怨，这点委屈你都受不了……”

毛泽东又说：“你的最大弱点是太顺利，没有经历过挫折，没有经历过磨难……”

毛泽东接着告诉毛远新：“会议前一天晚上，周总理送来的参会名单里有你，是我把你勾掉了，你还有意见吗?”

毛远新这才了解了事情的原委，对毛泽东说：“没有意见了。”

由于重庆武斗重开后，“反到底”大批的逃往外地，主要是在成都。8 月 9 日，54 军副军长、重庆市革委会副主任白斌和重庆军分区司令员唐兴盛代表重庆市革委会到成都与“反到底”派外逃人员代表座谈，动员他们回重庆抓革命促生产。

8 月 10 日，重庆警备区召开支左领导小组碰头会，传达林彪关于“制止武斗是当前的战略部署”、“当前谁离开制止武斗，谁就是离开中心”的指示。

8 月 11 日，李大章、刘结挺代表四川省革委会接见重庆“反到底”派外逃人员代表，动员他们返回重庆。

8 月 22 日，因武斗外逃的“反到底”群众首批 4500 余人从成都返回，到达重庆火车站。以后数日，每天都有数千“难民”返回重庆。

9 月 5 日，重庆两派分别举行纪念《九五命令》下达一周年大会，并分别到警备区上缴武器。许多武斗人员在缴枪途中最后“过把瘾”，肆意对空鸣枪。一时间，山城上空枪声大作，震耳欲聋。

就在重庆市群众组织间的武斗渐趋平息的同时，重庆打击“国民党残渣余孽”的清查行动也随即展开。

早在重庆市革命委员会成立后的第三天，即 6 月 4 日，市革委主任蓝亦农就在市革委全委会上布置了对“钻进两派”的“国民党残渣余孽”的清查工作。随后，市革委人民保卫组，即原市公检法军管会，立即安排了对全市原国民党起义将领、民主党派成员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调查摸底，按照逮捕、拘捕、集训、管训四个等级列出名单。

“国民党残渣余孽”是文革发展到这一阶段时提出的新概念。1968 年 4 月 10 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发表社论《芙蓉国里尽朝晖——热烈欢呼湖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其中公布了毛泽东的一段“最新指示”，称文化大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在这篇社论中和同时发表的湖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庆祝大会《给毛主席的致敬电》中，都出现了“残留下来的国民党反动派余孽”和“国民党反动派残渣余孽”的提法。这个提法很快便被简化为“国民党残渣余孽”。进而，凡历史上与“国民党”三个字沾过边的人，

哪怕是当年的国民党左派，国民党民主派，曾与中共风雨同舟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即“民革”的成员，在国民党政府机关工作过的小公务员，甚至抗日战争时期在国民党部队当过兵、为民族解放流过血的人员，都统统被算作了“国民党残渣余孽”。

当时，重庆的这项清查工作很快就被迎接重庆市革委会成立的武斗枪炮声打断了。3 个多月后，随着重庆上空的枪炮声刚刚稀疏，这项工作又被列入重要日程。9 月 13 日，重庆市革委会人民保卫组建立了管训队和集训队。当晚，全市戒严。9 月 14 日凌晨开始，对全市“国民党残渣余孽”等“牛鬼蛇神”实行大搜捕，逮捕 62 人，拘押 326 人，集训、管训 234 人，周边几个区管训队另拘押了 388 人。

在重庆市管训队，市革委会人民保卫组制订了不准回家、不准通信、不准交头接耳、不准家属探望等“规章制度”，并在被管训人员中追查“刘少奇黑根黑线”，为“清理阶级队伍”提供线索，重点是挖出“武斗幕后指挥”、“潜伏、派遣特务”、“私设电台”等问题。仅一个月，就挖出有关“黑根黑线”的材料 356 件，其中“重大线索”41 件，包括“中国赫鲁晓夫（刘少奇）重用坏人”、贺龙“与特务关系密切”、叶剑英“被捕变节”及杨尚昆、李维汉、张友渔等中共高级干部的“政治历史问题”之类的材料。这些材料很快便被中央专案组取走。

不过，重庆市革委会管训队更大的“成绩”，却是在深挖“武斗黑手”中，挖出了一个“反到底派黑高参团”和“反革命组织国民革命军第一集团军”，于是便有了重庆市文革中的著名“一号专案”——《“国民革命军第一集团军”反革命嫌疑案》。在这一大案中，涉及到原重庆市政府参事室的大批参事和民革重庆成员。

第 1052 回：参事室，起义人员大集中

逼供下，诞生出荒诞神话

“参事室”是解放后国务院和各地政府设立的一个机构，主要安排一批在民主革命时期曾与中国共产党合作共事的民主人士和国民党中、高级军政人员，以及有代表性、有影响的知名人士，从事“研究政策，参与政务，联系群众，反映情况”等工作，做得最多的还是书写回忆录。

因为重庆参事室的参事中，大部份是原国民党军政起义人员，于是便成了这次清查“武斗黑手”、“反到底派黑高参团”的重点。在 9 月 14 日的大逮捕中，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接到市革委通知，到“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学习，连冯玉祥的长子冯洪国也未能幸免，被请进了管训队。

原国民党军起义将领、参事室最年轻的参事卢继东没有接到通知，他为此感到很紧张，便和同样没有得到通知的赵援一起去参事室打听消息，没有结果。他们回家不久，又来了一辆吉普车，把赵援接走了。卢继东的老伴在阳台上看到赵援被带走的全过程，感觉这次不像是一般的学习，赶紧进屋对卢继东说：

“这里还有一杯牛奶，你把它喝了。现在是 9 月了，天马上就冷下来，你多穿条裤子。进去后不管怎样，你放心，我会把孩子带大……”真有点生离死别呀！

卢继东心想，都在国民党干过，自己恐怕也是在劫难逃，

就在家里坐着等人来逮他，一天也没敢出门。第二天，参事室却来通知他上班。后来才知道为什么没有通知他进管训队：原来是解放后，卢继东在部队和南京军事学院经过了肃反和反右，已经接受过审查。

与卢继东同住一楼的原国民党军第72军少将师参谋长、著名川军起义将领邓锡侯的堂弟邓翰，在那天凌晨也没有接到通知，他和卢继东一样，正自感揣揣不安时，户籍警察送来通知，叫他去区革委会报到参加学习。邓翰高高兴兴地走了，是他老婆送他去的。但是邓翰老婆在送他到区革委会报到时，看到去的都是地段上的地、富、反、坏、右这些“牛鬼蛇神”，心想不好。

进了管训队的人，很快就不准家属联系了，每月送工资和生活用品只准送到统战部转交，连管训队的地点在哪里，家属也没人知道。

9月23日，重庆市革委、警备区做出《贯彻执行省革委、成都军区〈关于进一步深入学习、贯彻中央“七三布告”和“七二四布告”的决定〉的决定》，严令一切群众组织、团体和个人，必须于10月15日前无条件上缴一切武器、弹药、运输车辆，拆除武斗工事、据点，解散一切专业武斗队。

由于武斗造成的巨大影响，全市的百姓怨声载道，一些渐渐感觉从迷茫中清醒过来的人们，开始反思武斗的危害。随着军方强力地介入到制止武斗的行动中，强制收缴枪支弹

药和各区革命委员会纷纷成立，权力不再掌握在造反派手中。两派的头目均受到通缉。此时，规模巨大的武斗已成穷途末路之势。

邓锡侯的堂弟邓翰平时爱发议论，对文革中重庆的两派斗争公开表现出同情“反到底”派，有些言论被反映上去，他在管训队便成了重点突破口。

10 月 13 日晚，管训队开始对起义将领邓翰进行既“触及灵魂”又“触及皮肉”的刑讯逼供，逼其交待“插手两派指挥武斗的罪行”。邓翰交待不出，便被抓住衣领把他的头反复往墙上撞。邓翰哀叫头痛也无人理睬，要求上厕所也不得准许。最后又把他押进另一小屋通宵毒打逼供。

第二天下午，有南岸区某工厂造反派来管训队提解“犯人”回厂批斗。管训队负责人借机召集众人训话，声称若在这里不好好交待，送回原单位交“群众”批斗就更没有好结果。他还当众撕毁了邓翰头一天写的 “交待材料”，威胁说：“你这种狡猾态度，只能受到严惩，决不能饶恕！”同时宣布将邓翰隔离。因为邓翰写的材料里面只承认了一些“生活错误”，并没有他们想要的插手“反到底”武斗的情况。

这些“政府参事”老人，昔日都是被当作“座上宾”受到欢迎、优待的，但是那样的日子早已一去不复返了。经过一次次政治运动越来越凌厉的反复冲击，自我意识中的“有

功之臣”这一概念早已退缩、淡化，“有罪之人”的“原罪”意识已越来越强烈地占据了主导地位，精神上本已十分脆弱，更难经得起在“革命”名义下施行的严刑逼供，邓翰终于在10月15日被迫承认了“插手反到底派，出谋献策，指挥修筑武斗工事，挑动武斗”等几十条“罪行”。

于是有了“坦白从宽——牢底坐穿，抗拒从严——回家过年”。邓翰“坦白交待”后，不但没有得到解脱或稍微改善处境，反而更进一步加大了逼供力度，叫做“趁热打铁”，先将他的“交待”进行“上纲上线”，分析出其所作所为决非个人行为，而只能是“有组织有计划的反革命阴谋活动”，然后逼其按此高度再作交待。这位62岁的老人哪里经得起那些年轻力壮的审讯者们的皮肉“触及”，终于承认：他于1967年3月参加了裴昌会、鲁崇义、夏仲实为首组织的“国民革命军第一集团军”反革命集团……

裴昌会，全国人大代表、国防委员会委员、重庆市副市长、重庆市政协副主席、民革中央委员，原国民党军川陕甘边绥靖公署副主任兼第七兵团司令。

鲁崇义，全国政协委员、重庆市人委参事室主任、民革中央候补委员，原国民党军第十八兵团中将副司令兼三十军军长。

夏仲实，全国政协委员、重庆市政协副主席、民革中央委员、民革重庆市委主任委员，曾任国民党军第七十八军中

将军长、立法委员。

邓翰供认，他们 3 人，趁文革之机，从 1967 年 2 月开始密谋策划，分头拉拢过去在国民党军中的旧部下、旧关系，并请示了“走资派”，前重庆市委副秘书长李止舟、前重庆市委办公厅副主任兼共青团重庆市委书记廖伯康、重庆市委书记任白戈，得到同意，于 1967 年 3 月 6 日在重庆市市中区春森 11 号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重庆市委礼堂召开了“国民革命军第一集团军”成立大会。裴、鲁、夏三人分别作了形势和任务的报告，重庆市人委参事室参事，原国民党军 124 军少将军长赵援作会议记录，参加者还有重庆市人委参事室参事、原国民党军 72 军副军长卿云灿，重庆市人委参事室参事、市政协委员、原国民党军新编 361 师一团团长庞佑屿，重庆市有色金属加工厂业务员，原国民党第九绥靖公署第三处少将处长骆湘浦，重庆市人委参事室工作员郭崇皋，重庆市人委参事室参事、原国民党国防部部员、国民党军第 30 军 30 师少将副师长陈希武，曾任国民党中将副军长、1949 年奉民革派遣到四川从事反蒋军事策反工作事泄被捕的周绍轩，重庆市人委参事室参事、原国民党 24 军刘文辉部将领黄以仁，重庆市人委参事室参事陈先器，重庆市人委参事室工作员杜隆基，重庆市第 37 中学体育教师，原国民党军新编 361 师一团庞佑屿部少将副团长江诚，重庆市人委参事室参事，原国民党军 24 军西康军管区少将司令杨学端

等 16 人。

裴昌会宣布了组织机构和领导成员任职名单：集团军设总部，裴昌会任总司令，鲁崇义任副总司令，夏仲实任副总司令兼参谋长；周绍轩任参谋处长和政工处长。集团军辖两个军，三个独立师，鲁崇义兼第一军军长，卿云灿任第二军军长；每个军辖三个师，骆湘浦、赵援、陈希武、黄以仁、杜隆基、庞佑屿、陈先器等 9 人任师长。

兵力来源：插手群众组织，将所有“反到底”派编为 3 个师，并利用国民党残渣余孽，网罗袍哥土匪。

战略方针：立足四川，发展云南，联络缅甸，迎接反攻。

军事部署：命令卿云灿率第二军去自贡、富顺一带，插入云南；命令赵援师先占北碚，转向川南挺进；命令鲁崇义的第一军以两个师对付重庆警备司令部，一个师控制重庆市中区，先占重庆，发展全川，若失败，则向云南靠拢。

武器装备来源：一是利用“反到底”派手中的枪支，二是抢解放军的武器。

裴昌会宣布后，还拿出 1600 元作为反革命活动经费，每个军发 500 元，各独立师发 200 元。

此外，还刻制有“国民革命军第一集团军”长方形印章和“总司令裴昌会”方形印章各一枚；在裴昌会家中架设有电台，由裴直接掌握，与台湾蒋介石匪帮联系，还与上海的“朱明坤”、广州的“邱长明”等人通电；并指挥赵援和卿

云灿在北碚一带的活动。

随后，该“反革命集团”于 1967 年 7 月至 1968 年 7 月先后在春森路 11 号召开了三次大会，策划了重庆两派群众的武斗问题，声称：庞佑屿在市中区搜罗了土匪、袍哥七、八百人，与“反到底”派一起活动；卿云灿在自贡纠集了 1000 多人，有 1000 多条枪；赵援在北碚组织了“反到底”派武装人员百多名。

邓翰还交待：他在 1967 年重庆武斗期间，插手群众组织，操纵“反到底”派一些负责人，策划武斗，训练武斗人员，修筑武斗工事，指挥攻打“815”派控制的第六中学、儿科医院、第三人民医院、楷杷山等处……

面对这些耸人听闻的“交待”，真让人感到了“阶级斗争”的触目惊心，让人感叹市革委及时狠抓“清查”工作的“正确英明，”让“管训队”的负责人兴奋得难以自抑。然而，稍微细想，就会觉得颇为蹊跷：

比如，这个反革命组织的成立请示了走资派李止舟、廖伯康。可是，李止舟和廖伯康与前重庆市委组织部长萧泽宽一起，早在文革前的“四清运动”中就已被定为 “萧、李、廖反党集团”而被揪出、打倒，在 1966 年 6 月批判“三家村”高潮中又被重庆市委抛出来作为“反党黑帮”批判，再次被隔离审查。1966 年底，北京红卫兵就将他们关在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了，1967 年 2 月以后，远在重庆的这

些参事们是怎样“请示”他们的？

再说重庆市委第一书记任白戈，自 1966 年被《红旗》杂志点名批判后就已停止工作，隔离看管。1967 年虽多次交给群众组织批斗，但都有解放军武装看押。在 1967 年 2、3 月，裴昌会等人是怎么见到他的呢？“请示”一说更是从何说起呀？

又比如，在春森路 11 号民革重庆市委礼堂召开成立大会一事。春森路 11 号是民革重庆市委机关工作人员宿舍，并无礼堂，而民革重庆市委办公地点，在春森路 10 号和 15 号。这两处，早在 1966 年 10 月起就被改成了接待串联红卫兵的住宿点，后来又被一些群众组织占据使用，已经成了人员来往十分混杂的公共场所，一个如此秘密的“反革命组织”怎么会到这样的地方去召开“成立大会”？

再比如，被说成是参加了反革命组织成立大会并担任主要领导职务的鲁崇义、夏仲实等人，自 1966 年 9 月就已被抄家、批斗、游街示众，并处于群众监督管制之中。离家到哪里去都是要请假的，怎么可能相互秘密串联或出席“成立大会”呢？……

但这些疑点已无人关心，管训队根据邓翰的交待，又将“国民革命军第一集团军”的“独立一师师长”骆湘浦隔离起来，进行追问。经过连续 7 天 6 夜弯腰 90 度罚站、不准睡觉等方法，骆湘浦在多次晕倒、心力交瘁、神志恍忽的

状态下，按照审讯者所提示的邓翰交待蓝本，也作了类似的交待。

邓翰、骆湘浦两人的“交待”矛盾重重，破绽百出。但这难不到“管训队”的办案人员，他们采取“弃异取同”的方法将两份“交待”加以总结上报。重庆市革委会人民保卫组得到报告，如获至宝，下令“乘胜前进，继续深挖”。

被列入参加了反革命组织“国民革命军第一集团军”成立大会名单中的人员，又不断有了增加，最初的 16 人最后增至 54 人。其中大部份是重庆市人民委员会参事室参事或民革重庆市委成员，大多是原国民党军起义将领，有的早已加入民革，为配合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进军而甘冒风险对国民党军作过策反工作。

但这些，此时已无人顾及，让保卫组高兴的是，清查工作取得了如此意想不到的突破和进展。于是，一个荒诞离奇的神话就这样诞生了。

第1053回：有成就，重庆市“一号专案”

武斗墓，山城学生下农村

10月15日，重庆市在人民大礼堂举行“两大派革命群众组织撤销总部，掀起斗、批、改新高潮誓师大会”。重庆“815”和“反到底”都在会上宣布：自即日起撤销市一级各总部。此后，重庆主城区及附近地区两大派群众组织间真枪实弹的全面内战基本平息。

10月28日，重庆市公检法军管会将市公安局直属单位的921名干警集中到大坪公安学校进行“揭、批、查”，规定“五不准”，即“不准写信，不准打电话，不准会客，不准出校门，平时不准回家”。同时将巴县黄泥湾集中审查的公安局处以上干部也集中到公安学校，一部分继续武装看押，一部分交原单位揭发、批斗。

自8月15日起，在北京召开的国防企业工厂和协作工厂抓革命促生产会议，简称“八一五会议”。会议进行到11月7日和8日，经有关方面权衡、挑选后，定为“典型”的重庆两大派各一位武斗头头：“反到底”派“工总司”头头、四川省革委常委邓长春和“815”派空气压缩机厂“八一兵团”头头、重庆市革委常委方文正在开会期间被逮捕。与会代表揭发了2人指挥武斗、枪杀俘虏等罪行。

11月9日，重庆市革委会、警备区召开“全面落实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精神，进一步动员清理阶级队伍大会”。会

上，重庆驻军负责人宣布：邓长春、方文正两人在北京“八一五会议”上已“按照中央、中央文革的指示逮捕”，并公布了二人的罪行材料。

重庆驻军负责人在讲话中宣布：“据我们掌握的确切材料，有一个秘密参谋组，一个很大的黑高参团，很大的反动集团。”

他说：“重庆过去是国民党的陪都，留下了大批国民党残渣余孽。重庆又是和平解放，在刘（少奇）、邓（小平）、李（井泉）、任（白戈）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统治下，包庇重用这些人，现在我们已发现这批人在文化大革命中搞了若干个反革命集团，他们没睡觉，他们打算在重庆建立一个国民党基地，把从旧社会留下的渣滓搜集起，叫他们混入革命群众组织中，搞隐蔽活动，在武斗中引导夺取武器库，占领兵工厂，拿下市中区，再后是江北、沙坪坝、大渡口、北碚等区，然后控制全重庆后经贵州、云南与缅甸国民党残余勾结，占领江南各省，接台湾国民党反攻。”

即将随同54军换防调走而交卸重庆市革委会副主任职务的白斌，也在这个会上说道：“现在比较清楚的是在邓长春背后有一个黑高参团，这些黑高参团成员已经有一部份落到我们手里……”

与会人员热烈鼓掌。

他们的讲话中，还将原重庆团市委书记于克书、原重庆

市南岸区委书记路斌武等干部公开点名指责为操纵“反到底”派的“黑手”，将重钢公司以中层干部为主的群众组织“遵义红旗”称为“坏组织”，称这些干部“挑动两派武斗”，在武斗中“出谋划策”，甚至“赤膊上阵”等等。

此后，一些重大武斗事件的直接责任者和杀人凶手陆续受到清查处理。

11月11日，重庆市公检法军管会在巴县陈家桥炮兵学校举办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开学。学习班负责培训省革委、成都军区作为“彻底改造公安机关的新生力量”而从农村招收的1190名复员军人。重庆军分区司令员唐兴盛代表市革委、警备区作砸烂公检法的报告。学习期间将原重庆市公安局长刘佑东、副局长王一押到学习班批斗、毒打。

11 月 14 日，管训队上报的“国民革命军第一集团军反革命嫌疑集团案”被正式批准立为重庆“一号专案”。

正式立案后，重庆市革委会先后抽调了以军代表为主的数十人组成专案组展开“侦办”工作。他们将原关押于集训队的“涉案”人员裴昌会、鲁崇义、庞佑屿、陈希武、陈定、陈华等提解到管训队，连同管训队中的其他一些“涉案”人员，分别隔离逼供，进行“车轮战”、“疲劳战”。对拒不按他们要求招供的鲁崇义、庞佑屿、江诚等人在大会上宣布拘捕。

72 岁高龄的裴昌会在刑讯逼供中遭到毒打，连续几夜不

准睡觉并罚站弯腰，致使腰不能直，双腿肿胀不能弯，皮肤水肿溃烂化脓，并被毒打致右腿股骨颈骨折，留下终身残疾。

79 岁高龄的夏仲实被刑讯逼供致神志恍忽，全身浮肿，大小便失禁，最后被折磨致死。

被诬为“独立师副师长”的江诚被毒打得遍体鳞伤，惨不忍睹，放回家后即含冤而死。

被诬为“副军长”的杨学端被毒打致颈椎伤残，头不能抬，死于管训队……

打人，在管训队成了家常便饭，有的受审者被一巴掌打出鼻血，有的受审者被一巴掌打倒下去将身后夹壁墙撞穿一个洞……

在这样的刑讯逼供下，被定为“集团军参谋处长”的陈希武和“反革命组织骨干”的重庆市政协委员，原国民党军第 65 军少将政工处长陈定，又被迫做出了“交待”。只是交待的许多细节不同，反革命组织名称也不同，一个说是“保安救国军”，一个说是“反共救国同盟军”。

裴昌会还“有幸”受到重庆市革委负责人蓝亦农、白斌的亲自审讯。尽管他向蓝亦农、白斌作了许多足以推翻冤案的陈述，但蓝亦农、白斌二人根本听不进去，还对他说：

“你不是想和我们较量吗？那我们就较量较量看！”

裴昌会只得回答：“过去我手中有部队，有枪有炮，尚且率部起义。现在我手中什么都没有，不知你们要我如何与

你们较量？”

在管训队报请市革委会人民保卫组批准将拒不按要求招供的鲁崇义、庞佑屿、江诚等人宣布拘捕，抓进监狱后，重庆市公安局预审处审讯时，查明对他们的指控确是不实之词，预审处军代表王哲彬坚持实事求是，提出了对拘捕三人的否定意见。但是没有被采纳。领导管训队的负责人振振有词的说：

“反正他要反革命，要活动，（交待的出入）或者大点或者小点也好，这不管它！敌人总是不会老实，不会服帖。”

就这样，鲁、庞、江等人被关押了 9 个多月。

管训队还以同样手法，逼供出了重庆水泥厂中医尹良臣“反革命集团案”，西南师范学院教授漆宗堂“反共救国军案”和教师陈东原“反革命案”，吴天鹤、杨德翘“特务潜伏案”等四起冤案，涉案 20 余人中，尹良臣、漆宗堂、陈东原被原单位提回批斗关押中死亡；吴天鹤、杨德翘在管训队死亡。此外，管训队还以“内外结合”逼供方式，将第十七中学李世楷、大渡口区联合诊所覃少海、李翰书 3 人让原单位提回批斗，被拷打致死。

11 月 20 日，市公检法军管会将山城宽银幕电影院事件，即枪击军车致解放军死伤的直接责任人、“反到底”派“工人造反军”一支队负责人朱登明逮捕。

1969 年 1 月，管训队原负责人郭春华调离，“一号专案”

涉案人员纷纷申诉、翻供。但是，饱受折磨的夏仲实再也等不到翻案的一天了。就在这个月的 23 日，夏仲实死在管训队。

1970 年 4 月 13 日，饱受折磨的邓翰在管训队死亡。

1970 年 10 月 22 日，管训队做出《调查结案报告》，称："对邓翰、骆湘浦、陈希武、陈定等四人的交待，我们进行了分析研究。认定：裴、鲁、夏为首的反革命集团五十四名成员，都是反动派的高级军、政官吏，虽在解放前夕被迫起义，但在过去刘、邓投降主义路线的庇护下，对他们的反动立场没有认真进行改造。妄图趁文化大革命混乱之机，组织反革命集团活动的思想基础是具备的。虽然四人交待的反革命集团名称、成立时间、地点、组织编制、参加人员和活动情况都各说不一，矛盾很大，但又有不少相同相似的地方，与我市 1967 年和 1968 年所发生的一些反革命事件和严重的政治事件相吻合。"

但是《调查结案报告》认为："这个反革命组织，是没有根据的，应予否定，案件中的所有人员均不以反革命集团成员对待。"

最后的结论是："这个反革命嫌疑集团的出现，主要是邓翰、骆湘浦两人坚持反动立场，妄图蒙混过关，在管训队内制造混乱所致。"

并提出："对有意制造混乱的邓翰，虽在 1969 年（注：

应为 1970 年）4 月在管训期间病死，拟仍定为反革命分子；对有意制造混乱的骆湘浦，拟定为现行反革命分子，严加惩处。”

在基本否定“一号专案”时，这个报告仍然给冤案受害人员留了这样一条粗粗的政治“尾巴”：“……这些人的反动世界观，解放后未得到应有的改造，其中，有少数人，一贯坚持反动立场，敌视我党，恶毒攻击我无产阶级司令部，妄图变天复辟”。同时，又对另一个冤案做出了肯定性的结论：“有个别人，具有特务潜伏的重大嫌疑。”

这个“个别人”，主要指的是原国民党军起义将领刘宗宽。

刘宗宽，原为杨虎城将军陕西蒲城同乡和西北军部属，西安事变后其部队被国民党中央军吞并，其本人被诬下狱险遭处死。抗日战争胜利后，奉农工民主党和中国共产党的派遣，利用机会和上层关系打入国民党重庆军事机关。1949 年时任国民党西南军政长官公署中将代参谋长，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提供了大量机密军事情报，同时向国民党方面提供了许多导致其军事失利的参谋意见和虚假情报，其贡献被中共中央西南局领导人誉为“解放西南第一功”。但在 1957 年“反右派”运动中他受到打击，文革初期 1966 年 9 月又被红卫兵抄家抄出国民党时期的文凭、奖状、国旗、手枪之类物品，即被以“反革命”、“妄想变天复辟”等罪名抓捕，关押至

1967 年 3 月下旬才获释出狱。在“一号专案”中，他也曾被诬为参加了反革命组织“国民革命军第一集团军”成立大会并任“参谋长”，但因所谓“成立大会”召开时的 3 月初他还关在狱中，此罪名很快即被否定。50 年代初，他曾被聘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暨西南军区司令部高级参议，随后又调到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军事学院任教，许多解放军指挥员都作过他的学生。而这时，他又成了“国民党潜伏特务”！他在文革中先后被隔离审查五年半之久，妻子崔东亚，时任农工民主党重庆市委常委兼宣传处长，被迫害致死。

事后查明，在被重庆市革委会人民保卫组管训队管训的 234 人中，迫害致死夏仲实等 20 人，致残裴昌会等 3 人，以“反革命罪”逮捕 7 人，管制 6 人，戴“反革命”帽子 20 人，交原工作单位或居住地街道审查批斗 130 人。共占被管训人员总数的 80%！

此后，管训队人员被转送到设于重庆市政协的重庆市统战系统“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继续审查，不准回家，不准通信，连上厕所都要几个人一起去。没有行动自由了。学习不久，政协里的大字报就铺天盖地！你攻击我是军统，我攻击你是军统，百分之九十多的人都变成了“军统”，真是“洪洞县里无好人”了。

直到 1971 年“九一三事件”爆发，这个学习班才草草结束，人们陆续恢复自由。此后，在 1973 年、1979 年都对

此案进行过程度不同的平反，但平反过程几经周折，而真正彻底的平反和落实政策，及查清冤案炮制经过、明确有关人员责任并提出处理意见等，直到文革结束整整 9 年之后的 1985 年底才得以完成。

1969 年 1 月，坐落于沙坪坝区沙坪公园内，群众自发修建的武斗死难者公墓结束了最后一批墓茔的修建。从 1967 年夏以来，此地先后建起了 113 座墓茔。其中现存碑文资料可考的 92 座墓中安葬了 345 人。死者多为武斗直接参加者，少数为无辜遇难者。在有职业身份资料可考的 299 位死者中，最多者是工人，占 176 人，其次是学生，占 104 人，其中又以普通中学学生最多，占 82 人。在有年龄资料可考的 196 人中，最多者是 20 岁以下，占 69 人，其次是 21—30 岁，占 66 人。年龄最小者 14 岁，最大者 60 岁。因武斗中沙坪坝区为“815”派占领区，此地安葬的死者多为“815”派成员。这是全国至今保存完好、颇具规模的唯一的武斗死难者公墓。其中有一篇碑文摘抄如下：

血沃中原肥劲草，寒凝大地吐嘉华。毛主席最忠实的红卫兵、我毛泽东主义战斗团最优秀的战士张光耀、孙渝楼、欧家荣、余志强、唐明渝、李元秀、崔佩芬、杨武惠八位烈士，在血火交炽的八月天，为了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流尽了最后一滴血，用生命的光辉照亮了后来人奋进的道路。

不周山下红旗乱，碧血催开英雄花。披肝沥胆何所求，

喜爱环宇火样红。你们殷红的鲜血，已浸透了八一五红彤彤的造反大旗。啊！我们高高举起你们殷红的鲜血。

头可断，血可流，毛泽东思想绝不丢，你们铿锵的誓言啊，已汇成千军万马、万马千军惊天动地的呼吼。你们英雄的身躯，犹如那苍松翠柏，巍然屹立红岩岭上，歌乐山巅。

立碑者系“重庆革命造反战校”，即原二十九中。

2 月 4 日，重庆军民 15 万人在市体育场召开大会欢送首批城市知识青年到农村插队落户。自此，大批中学生被赶到农村，其中一些人继续参加了当地已处于尾声的两派武斗。

## 第 1054 回：搞精简，总理只留俩秘书

## 江青闹，黄永胜访阿难行

随着机关精简的进行，9月7日后，国务院总理值班室撤消，只留下钱嘉东一人。两个月后又增加了纪东。11月17日，周恩来在接见阿尔巴尼亚代表团时说：“我现在只有两个秘书，其它都支工、支农去了。每天24小时，一个人得工作12小时。我不能不让他们休息。晚上我让他们走，有些事情我自己写、自己办。”

1968 年 7 月，中央专案第二组有一份报告，呈送人中有江青、黄永胜等 10 个人的名字。江青那段时间身体不好，有一个月没有看文件了，所以黄永胜首先看后，画了圈，并批 “拟同意”。另外两个人也画了圈，文件最后才送到江青那里。江青看后大发脾气,将报告狠狠地往地上一摔,喊道：

“混蛋!他的眼睛里哪还有我这个总负责人啊!这个人的胆子越来越大了，越来越目中无人了。”

她大骂一通后，喘着粗气，擦着急出来的汗水，定了定神，又把报告从地上捡起来，挥笔批上：

“我是这个专案组的总负责人，黄永胜有什么资格批同意或不同意，竟敢把我越过去，这不是在夺我的权吗?黄永胜有政治野心!”

然后让秘书杨银禄打电话，把叶群和黄永胜叫到钓鱼台

11 号楼。

叶群、黄永胜进了客厅，杨银禄转身正要退出，江青大声把他叫住，说：

“小杨，你别离开这里，你可以作证，不然，他们是不会认账的。”

叶群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脸色一下子红了，却不十分紧张。

黄永胜的脸色也一下就白了，显得十分紧张。

他们正襟危坐在沙发上等待江青教训。

只见江青气愤地在客厅里走来走去。她走到黄永胜跟前突然站住，指着他说：“尊敬的黄总长!”

平时，江青称黄永胜都是呼“永胜同志”，今天称“黄总长”，还带有“尊敬”二字，显然不是尊敬，而是一种讥讽。黄永胜猛的站起来,不但脸色发白,而且两肋的肌肉也在抖动。

江青继续说道：“以前称呼你永胜同志，今天我得称你‘尊敬’的黄大总长，因为你官大呀，可不得了啦!”

黄永胜更加紧张，他用颤抖的声调说：“我不知道江青同志生我什么气，你不要气坏了身体，请你保重，我有什么做得不对的，请你尽管批评和帮助……”

江青没有等黄永胜把话说完，就把那份报告甩到黄永胜那里，说：“你看！你看!”

黄永胜打开报告一看就全明白了，忙说："我错了，我的确错了。这份报告应当先请江青同志审批，我不应该先表示意见，这是无组织无纪律的表现，也是对江青同志的不尊重的表现。我今后一定注意，请江青同志原谅，大人不见小人怪嘛!"

此时，叶群也知道江青是生的那门子气了，赶紧站起来打圆场，对黄永胜说："江青同志对我们要求很严，江青同志今天批评的很对，她批评你，使我也很受教育。今后，第二专案组有什么报告先送给江青同志审批，这是政治问题，这是感情问题，这也是纪律问题，不要没有大没有小的。今后，大大咧咧的毛病要改，否则要犯大错误的，你懂吗?"

黄永胜忙说："我懂，我懂。我一定接爱教训，说话办事三思而后行，不说不干对不起江青同志的话和事。"

叶群、黄永胜好话说尽，但是，江青还没有真正原谅。她厉声厉色地说："我告诉你，今后该送我什么，不该送我什么，你要想好了，把好关，不该送给我的送了，就是对我的干扰。该送给我的不送，就是封锁我，就是架空我，你可要记住!"

黄永胜满口答道："是是是。"

八届十一中全会结束后不久，1968 年 11 月，黄永胜以军委办事组的名义上报军队调动的报告。他按照上任后的惯例，在报告的传阅名单上写上了中央文革碰头会所有人员的

名字。毛泽东阅后，在这份报告上批道："像这样的报告，只要写上三个人的名字（毛、林、周）就可以了。写上一连串的名字，既行动迟缓，又容易泄密。"

于是，以后军委办事组再有关于军队调动的报告就只写"毛主席、林副主席、周总理"。

江青发现军事方面的报告不给她了，大为不满。一天晚上，她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突然破口大骂军委办事组："黄永胜、吴法宪，你们目无中央，无组织、无纪律，搞独立王国，封锁消息。"她还提出，要停止黄永胜和吴法宪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议的资格，让他们清理思想，写出检讨。

会后，周恩来、康生、姚文元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找黄永胜和吴法宪谈话，要他们两个人检讨错误，并暂时停止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的工作。

黄永胜和吴法宪赶紧向林彪作了汇报。林彪说："调动部队的报告如何上报，要按照主席的指示办，我们无权做出变更，更不能写检讨。"

黄永胜也认为："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没有错，不能写检讨。"就这样，彼此之间僵持起来。

那天，江青从大会堂开完会回到 11 号楼,脸拉得好长，气呼呼地上了二楼。工作人员们在想：又不知道谁要倒霉了。大家走路脚步轻些再轻些，说话低声再低声，连大气都不敢喘，楼内静得吓人。正在寂静之中，江青突然打铃唤护士进

去。她让护士立即拿一块白布给她。这突如其来的命令，让工作人员都愣住了，“她要白布干什么?”现在到那里找一块白布呢?还是小王聪明，从仓库里存放的旧的白窗帘上撕了一块，大约有一平米左右。护士将白布送给江青时，江青又命令把自己穿过的军服、军帽的领章帽徽统统找出来，把它们都别在那块白布上,然后挂在她的办公室的北墙上。江青面朝北墙站在领章帽徽前，两眼微闭，低着头，两手合十，作着揖，口中念念有词：“红领章，红五星呀，你们是我辛辛苦苦争来的呀，我和你们相处几年，今天咱们就要永别了!”

江青向领章、帽徽告别以后，又叫工作人员把她戴过、穿过的所有的军帽、军衣都找出来，由她亲自点清数目，用大床单包扎好后，这才抬起头来，对秘书杨银禄说：

“小杨，今天我命令你把这些东西亲自交给黄永胜，你见到他什么也别说，就说是奉我的命令行事，叫他把这些东西收下，并打收条，立即回来见我，我在家等着你。”

杨银禄将江青的 8 套军衣、6 顶军帽从江青办公室扛出来，打电话找到黄永胜的秘书，询问黄永胜在什么地方?

黄永胜的秘书告诉他:“黄总长现在在京西宾馆第 4 会议室。”

杨银禄对黄永胜的秘书说:“请你报告黄总长，我有事找他，请他在京西宾馆第 4 会议室等我，我一会儿就到。”

杨银禄乘车赶到京西宾馆，很快见到了黄永胜。

黄永胜见到杨银禄，十分客气地问什么事情？待杨银禄说明来意，交给他一大包东西，请他写收条时，黄永胜脸色开始变白，两腮的肌肉也开始抖动，喘着气问："这是怎么回事?"

杨银禄说："她什么也没有说，只是叫我把这些东西送给你，请你写个收条，我好回去交差，我还得快点回去，不能在你这里呆的时间太久，她还等着我回去呢。"

黄永胜没有再说什么，两手哆嗦得很厉害，拿起笔来试了几次写不了字，停下来静了一两分钟的时间才勉强地写下了：

"收到江青同志的军衣、军帽共计 14 件"落款"黄永胜"。

杨银禄赶回钓鱼台 11 号楼，江青还在她的办公室里眯着眼坐在沙发上等他。

杨银禄说："你交给我任务完成了，这是收条。"

江青接过收条后，问："黄永胜说什么没有?你可要老实告诉我。如有半点隐瞒，我拿你是问。"

杨银禄说："他没有说什么，写完收条我就立即回来了。"

江青站起来将收条塞进她自己的铁皮柜里，杨银禄也赶紧下楼回到自己的办公室。

大约过了半个小时，江青忽然想起，在中南海还有她的两套军衣，一顶军帽，立刻派人从中南海取了回来，然后对杨银禄大声批评道：

“你执行我的命令不彻底！为什么还有两套军衣不给黄永胜送去？！”

她没等杨银禄解释，就转过头去对她的警卫员说：“你来执行我的命令，把这两套军衣送给黄永胜。你如果把这件事办好了，我奖赏你办不好，我处分你，快去快去!”

警卫员接受了命令，很快就回来了。当然，江青也没有提奖赏的事。

第二天，江青起床后到了办公室，还没有看文件就打铃叫杨银禄。看她的样子气是消多了，说话的语气也比较平和了，但话的份量依然很重。她说：

“有很多情况你不清楚，我是遵守保密纪律的，不能对一个芝麻大的官说。现在军队的情况很复杂，黄永胜这个人很阴，目中无人，对我越来越冷淡，不治治他还行？将来这个军队还不知道是谁的呢！”

11 月 18 日，黄永胜给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姚文元、谢富治、吴法宪、叶群、汪东兴、温玉成报告称：“主席、林副主席：中央文革确定增加谢富治、温玉成两同志为办事组成员，我们非常欢迎。还要求增加李天佑一人。……”

11 月 22 日，陈伯达、姚文元在黄永胜的这份报告上批道：“是否等几天之后，征求一下江青同志的意见。”

黄永胜于 11 月 24 日批：“完全同意文元同志意见。”

恰巧，在此之前，中央决定由黄永胜作为中国党政代表团的团长，率团出访阿尔巴尼亚。出访的日期就要到了，但因黄永胜一直没有为军事方面的报告只报毛、林、周一事作检讨，江青不同意黄永胜出国访问。时间紧迫，外交部早已经将代表团的成员通知了阿方，不好更改。于是，周恩来只好向毛泽东汇报。毛泽东说：“江青不对，黄永胜仍然应当出访阿尔巴尼亚。军委办事组没有错，仍然应当正常工作。黄永胜、吴法宪还是碰头会成员，仍然应当照常参加会议。”

周恩来把毛泽东的意见转告江青，江青也就不再坚持了。

出访前的头一天晚上，周恩来决定由陈伯达到机场送行和迎接。但黄永胜走时，陈伯达没有去送。黄永胜回国时，陈伯达也没有去接。为此，周恩来追查陈伯达为什么不去。陈伯达说，是江青不让他去，所以他不敢去。

黄永胜回国后的第二天，12 月 6 日，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118 厅” 召开会议。在江青没有到之前，毛泽东对黄永胜他们说：

“你们怕江青，不敢抵抗。你们没有错，而是她错了。我原来对她的方针是，她对的我就采纳，她不对，我就批评。

今后你们不要全听她的，她做得不对，你们要抵抗，要斗争，要批评。”

此事过了不久，中央文革的一位记者给江青写信反映，在中南的几个省，造反派正在受压，保守派正在得势。不少地区虽然成立了革命委员会，但多是保守派掌权，在那里是一片“白色恐怖”。在那里工作过的中央文革记者,也一个个当作“坏头头”被揪斗。信中认为，之所以出现这种严重情况，是因为有根子。这根子不仅在广州军区，而且广州军区的上头还有人。信上虽然没有说明上头的人是谁，但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说的是黄永胜。

江青仔细看了这封信后，批了很长一段话：“我看了这封信非常气愤,信中反映的情况不仅中南各省有，而且在全国其他地区也有，必须揪出这个根子。我建议用中央的名义把这封信和我的批语转发全国，以引起普遍注意。”

这封信江青是批给毛泽东及在京的中央文革领导成员。文件发出以后再也没有传回来。

有一天，毛泽东的秘书徐业夫对杨银禄说：“主席对江青同志给黄永胜一包军衣和江青在中央文革记者的信上的批语都不满意，说她不顾大局，尽坏主席的大事。主席叫我告诉她，别忘了‘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的道理。”

杨银禄问徐秘书：“你告诉她了吗?”

徐业夫说：“咱们一个当秘书的怎么敢呢?我把主席的

话报告周总理了。”

一天晚上，周恩来把军委办事组的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叫到钓鱼台 11 号楼江青的住处开会。会前，周恩来告诉他们：这次要和江青、陈伯达、康生、姚文元一起，开一个团结的会议，消除彼此之间的误会，缓和一下气氛。他还特别告诫他们：不论江青说什么，都不要吭声，不要说话。

他们来到江青住所后，周恩来让黄永胜他们在楼下等候。一会儿，江青出来，她看见黄永胜他们，一边下楼，一边大声说道：“你们军委办事组的人，身穿的绿军装，头戴的红五星，领子上的红领章，这些都是老娘给你们争来的。你们目无中央，目无组织纪律，不觉得可耻吗？”

江青一骂就是个把小时，滔滔不绝，姚文元也不时插几句话。因为有周恩来的嘱咐，黄永胜他们一声没吭。会议在晚上 23 时结束。

过了三、四个小时，已经是次日凌晨了，熟睡中的军委办事组成员突然接到周恩来的电话通知，要他们立即到钓鱼台 16 号楼开会。当他们赶到 16 楼时，周恩来已经在门口等着他们了。他一个一个地嘱咐说：

“我已经把刚才会议的情况向毛主席作了汇报，毛主席责备江青太放肆了，要她立即向我们做出检讨。”之后，他又特别向强调说：“江青检讨，你们就不要再说什么了。不

要再反驳她，听她讲就是了，她说完就散会。”

这时，黄永胜因吃了安眠药，脑子糊里糊涂，说话也不清楚，是闭着眼睛由警卫员扶着走进的会场，坐在周恩来身边。

会议开始后，江青说：“我近几天身体一直不好，经常发烧、说胡话，神志不清，错怪了军委办事组的同志们，特地向军委办事组和黄永胜同志道歉。请你们不要见怪，今后我们要好好地团结，一起共事。”

吴法宪听了以后马上说道：“江青同志的检讨，我们表示欢迎。”

汪东兴接着说：“江青同志好训人，随便骂人，侮辱同志，这是最不好的。江青同志的错误，常委要负责，总理对江青同志太迁就了。”

周恩来立即宣布散会。

过了一个月，江青又派人将她的军衣军帽从黄永胜那里要了回去。

第 1055 回：反右倾，黑龙江批斗干部

“徐海班”，临沂冲部队营区

1968 年 11 月中旬，黑龙江省革委会召开扩大会议贯彻八届十二中全会。会议期间，连续两次在晚上召开批斗省革委会常委范正美的大会，宋振业陪斗。此后，在全省范围内，不少地县及基层革委会也开始随意在开常委会时批斗革委会成员甚至主要领导人。

扩大会议还没有结束，范正美和宋振业即被隔离审查。

11 月 22 日，潘复生以省革命委员会名义向中央呈报《关于把范正美、宋振业分别放到基层接受群众再教育的报告》，没有批复。

12 月，潘复生亲自到双城县召开全县党员干部会议。会议原来预计开 5 天，后来延至 21 天，人数原定 5000 人后来增至 7000 人。通过“不断反右倾”，在会上首先批斗了已调出的两名县委书记，进而又将一名县革委会主任、一名武装部长，当场撤职，交群众批斗。这就是当时震惊省内外的双城反右倾揭批现场会。

在潘复生亲自督促下，双城的做法很快在黑龙江全省开花。据后来统计，这一期间全省被戴上“漏网走资派”帽子遭到批斗的大队以上干部就有两万九千多人。

我们再看此时的徐州地区。

中央知道 4 月徐州派来的 5 个“支派”代表不能代表徐

州“支派”的情况后，于 5 月 13 日电示南京军区，通知徐州“支派”的核心组织“淮海八三一”选派 5 名代表到京参加 10 人代表团。

5 月 23 日，在中央文革会议上，周恩来批评了王效禹在徐海地区的错误。接着 5 月 26 日，周恩来又携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接见了济南、南京两大军区代表、徐州驻军代表和徐州两派代表。参加这次会议的包括济南军区负责人王效禹、杨得志，68 军军长张鋞秀、政委李布德，徐州军分区司令员柴荣生等人。南京军区由江苏省军区政委、省军管会负责人梁辑卿代表。会谈中不但两派群众代表争执不休，军方人员也相互指责，根本无法达成共识。最后，江青提出由中央出面办学习班，周恩来表示同意。

6 月 1 日，杨得志代表济南军区就连云港的问题作检查，王效禹就徐州问题作检查。

7 月 5 日，周恩来在全国煤炭会议讲话时又说：“徐州是一派当权即‘踢派’当权，是不对的”。

7月上旬，徐州、连云港两市和徐州专区下属八县2000多名军队和地方代表陆续来到北京，参加在解放军政治学院举办的“徐海班”。

7月12日， “徐海班” 在北京正式开班。但是，较早到达的徐州“踢派”代表杨正祥等人，因拒绝承认“淮海八三一”代表的合法性，一怒冲出学习班。与“踢派”联合的

“支派”头头朱成明等人也随之而去。他们一部分人乘火车返回徐州，另一部分人去找中央告状。当天，周恩来通过他的联络员指示：“冲出学习班是不对的。可以留下来参加学习，学习主席思想，斗私批修。”

7月24日，杨正祥在徐州工人文化宫召集“踢派”头头会议，研究如何与“支派”斗争。徐州“踢派”报刊还发起一轮强劲宣传攻势，揭发批判“淮海八三一”的反军活动，否认他们是正宗“支派”。

8月1日，中央安排“徐海班”全体成员参加“八一”建军节纪念大会，以示关怀。

8月5日，“徐海班”领导小组传达毛泽东“最新指示”：“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要分裂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领导小组还对杨正祥和“假支派”做出批评，要求他们做出检讨。

8 月下旬，徐州“支派”“淮海八三一”的群众，从南京返回徐州。数百人的队伍一进徐州，就迅速占领了火车站附近的“淮海饭店”，在淮海饭店垒起了“工事”，黑洞洞的枪口，露在饭店的大楼窗口，徐州开始骚动了，徐州“踢派”也建立起自己的武斗据点。

此时，山东临沂“八大”和“六大”两派组织的武斗也在不断升级。8 月 13 日下午，“八大”下属组织大芦湖煤矿

“红色工人造反团”的工人王佐友被地革委“文攻武卫”抓走。该团工人到矿革委会要求放人。临沂“文攻武卫”开去13辆汽车满载武斗人员，将“红色工人造反团”赶出矿区，围困在紧靠204师610团营房的青云山上。

当晚，临沂地革委会常委曹德玉率6人，携带手枪6枝，匕首两把，乘临沂人民医院救护车前往大芦湖煤矿，途径册山大山前村，被“八大”群众抓住。地革委会闻讯，于次日晨，由“文攻武卫”开去一辆满载武斗人员的大卡车，前去营救曹德玉，也被“八大”扣留。于是，册山革委会在18日、19日，抓了沙沟、沟角公社37名“八大”群众。20日，“八大”群众冲进册山区革委会驻地，救出了被抓人员，抢走了册山粮库8000余斤粮食。

此时，有一些“八大”组织的群众逃进了苏鲁交界的马陵山区，但不时出来同另一派交战，当地称之为“马陵山游击队”。

8月20日，王效禹在接见临沂地革委代表团时说：“‘马陵山游击队’是武装土匪集团，实际是‘八大’组织的核心”，“省革委对‘马陵山游击队’已经表了态，最近写了个文件报中央批，宣判‘马陵山游击队’的死刑，要发动群众把他消灭。”

第二天，21日，临沂地革委调集上万名群众，将困在青云山上的“八大”组织500多人团团围住。这500人在走投

无路的情况下，跑到青云山 610 团营房寻求部队保护。610 团为了避免武斗流血，允许“八大”组织群众进入营房的礼堂，将两派群众隔离。

山东“山工总”、“山贫”等组织发表了《关于临沂地区目前形势的严正声明》。韩金海早在 8 月 19 日就要求“山工总”立即组织工宣队进驻临沂。20 日，他又招来临沂革委会副主任闫文征介绍“马陵山游击队”的情况，同时召开“山工总”所属 13 个地市、3 个大型企业负责人的紧急会议，在会上做出了《关于临沂问题的决议》，强调他们的主要任务：就是对临沂“马陵山游击队”“坚决打击，彻底取缔”，“坚决、彻底、全部、干净地消灭之。”随后在济南召开了“誓师大会”，并于 23 日在全省组织 16 支“工农宣传队”，共 1400 多人，全都集中济南珍珠泉招待所，计划集训 5 天。

杨得志知道后，于 8 月 23 日亲自给正在肥城的王效禹打电话，反对这样做。王效禹在电话中说：“派工宣队的事我不知道，是不是‘山工总’搞的？” 当天晚上，王效禹对赶到肥城汇报的张美智说：“工宣队不用集训了，明天就出发”。

8 月 24 日，由省革委副主任韩金海、常委张美智率领的千余人队伍，从济南珍珠泉礼堂分乘几十辆汽车杀向临沂，号称“16 路联军”。他们会同临沂支持王效禹的“六大”组织开始包围冲击 204 师部队。

27 日，王效禹以省革委、济南军区名义给 204 师发电报，下令 204 师“负责将原‘八大组织’的群众交由地革委处理”，遭到 204 师拒绝。

王效禹 9 月 4 日晚在枣庄电话招韩金海前去汇报。

9 月 5 日，韩金海带孔世君等人到枣庄汇报。王效禹对韩金海、孔世君等人说：“不要划框框，不要以革委会的名义出现，要以群众组织的名义搞。事后即使出现一些问题，各级领导和革命委员会就是承担一些对群众教育不够的责任就行了”，“放手发动群众”，“争取在两三天内解决问题”。

当天晚上，韩金海等人经苍山返回临沂，向在苍山的张美智传达王效禹的意见。张美智马上召集县革委会、武装部、驻军、驻苍山的省工宣队（德州、泰安等）负责人会议进行部署，连夜包围“马陵山游击队 7 支队”所在的苍山县神山区西北村。9 月 6 日，在省工宣队的参与下，他们抢了神山区武装部的枪支。上千人拿着这些枪和各种冷兵器攻入村中，打伤大批群众，抓捕多人。称之为“苍山大捷”。

9 月 8 日早上 7 时 50 分，韩金海挂帅，张美智为副总指挥，以省工宣队昌潍“飞虎队”为先锋，省宣传队和临沂地革委组织的近两万名群众，手持木棒、钢叉，向 610 团营房发起总攻，将 610 团担任隔离制止武斗的指战员强行架走。随后，担任前锋的昌潍飞虎队爬上大礼堂，掀开屋顶，砸烂

天花板和门窗，用手枪、钢叉、梭镖、砖瓦、石块居高临下，向挤在礼堂内的“八大”群众袭击。同时，冲进办公室、宿舍。武斗持续 5 个多小时，营区一片狼藉，大礼堂遭到严重破坏，砖瓦石块铺了半尺多厚。

山前营房武斗后第二天，韩金海在临沂召开两万人参加的“98 大捷”祝捷大会，把抓获的 30 多名“马匪”分子押上台示众，会后在临沂城游街。宣传队到处张贴标语“山前大捷好得很”。

临沂“98 行动”副总指挥、“山工总”常委穆悦奎到菏泽，向王效禹汇报 9 月 8 日攻打 204 师和“八大”组织的辉煌战绩。王效禹兴高采烈，大加赞赏。穆悦奎事后到处说“我这个汇报，王政委越听越愿意听”。

就在王效禹派工宣队进驻临沂之时，9 月 10 日，王效禹在菏泽召见济南铁路局负责人李金亭，听取由山东向徐州铁路分局派出工宣队支持“踢派”的安排情况。杨得志获知后表示：“要派可以，得有解放军参加，办几天学习班”。王效禹根本不听，让李金亭带领工宣队连夜出发。

山东工宣队到了徐州，立即上街游行支持“踢派”。中央很快知道这一情况。黄永胜给杨得志打电话：

“怎么山东的工宣队派到人家江苏去了？叫回去！”

杨得志想缓解一下，于是说：“得和王政委研究。”

黄永胜回答的很干脆：“研究什么，快回去。”

打着济南铁路局的名义派到徐州的工宣队只得返回山东。

9 月上旬，连云港两派代表签订落实“七·三”、“七·二四”布告措施。这是北京“徐海班”开办两个多月以来的一个重要进展，“徐海班”为此召开了庆祝大会。

9月23日，中央军委办事组成员黄永胜等人在北京接见驻徐州部队师以上干部，传达毛泽东的“最新指示”，做促进“大联合”工作。毛泽东的指示是：“徐海地区对‘七·三’、‘七·二四’布告落实不够”；“徐海地区都是革命群众组织，要联合起来”；“徐海已经翻了两个个儿了，不要再翻个儿。”

10 月 7 日，按照毛泽东、周恩来的指示，黄永胜、吴法宪等军委办事组成员接见徐州 68 军军长张铿秀、政委李布德，杨得志陪同接见。

黄永胜、吴法宪先是一般性地询问了徐州派性斗争情况，接着传达了毛泽东的多次指示，呼吁各派尽早实现“大联合”。随后，他们做出了如下指示：

（1）要求两派不要纠缠于王效禹问题，不要听小道消息，不要挑拨江苏、山东关系。黄永胜指出：“打倒王效禹”的口号是错误的。

（2）强调“八·三一”事件和炸桥破路事件都是少数坏人搞的，多数群众没有参加。吴法宪肯定“淮海八·三一”

是真正的“支派”。

（3）宣布中央对徐海地区部队“支左”分工如下：1、徐州市由68军负责统一领导，组织驻徐部队进行；2、徐州专区以军分区为主，68军工作组织积极协助；3、徐煤系统以坦克2师为主；4、连云港以连云港市“支左指挥部”为主，18师及人武部积极协助；5、八县由68军“支左”小组及各县人武部负责。各师及工区加强领导。

这次接见没有产生很大效果，首先因为上述军队“支左”分工不够明确，存在多头并存、相互牵扯的问题。其次，中央“和稀泥”的态度遭到两派抵制。

10月9日，军委办事组再次接见“徐海班”领导小组成员。黄永胜说：徐州的问题“两个省都不要管，中央直接在管嘛”。吴法宪接着说：“山东不要管，江苏也不要管，中央直接在管”等等。

八届十二中全会期间，10月18日，徐州市、徐州专区下属八县和徐州煤炭系统两派群众组织也宣布达成“革命大联合协议”，向中央报喜。然而此举只是一种表示服从中央的政治姿态，双方并未实现真正的联合。

吴法宪上报中央军委批准，1968年11月7日，将驻徐州机场和连云港白塔埠机场的空军29师调到浙江衢州、笕桥机场，驻衢州空12师调到徐州。支持王效禹的空29师师长等人随部队调离徐州。

空 29 师调到浙江，可下属部队一些陷进“踢派”泥潭不能自拔的军人以各种理由继续留在徐州，参与地方文革。1969 年 7 月 15 日，军委办事组决定，原驻徐州空军的区队 5 人抗拒军委决议，开除这些人的军籍、党籍和公职，各单位不得挽留。

“徐海班”分别于11月6日、8日、16日和29日召集不同规模和层次的会议。但收效依然不大。于是在此后的几个月里，中央又采取以下几个措施：

第一，决定将徐州铁路、煤炭、电业三大系统代表从“徐海班”抽出去，分别由铁道部军管会、煤炭部军管会、水电部军管会单独开班学习班，由三个部军管会主任亲自挂帅。这样“徐海班”实际上一分为四，每个班规模更小，更易于控制。

第二，由铁道部派干部和“毛泽东号”机车组一起进驻徐州铁路分局，帮助分局开展工作，切实阻断“火车头总部”及其头头杨正祥与地方造反派的联系。

第三，向“徐海班”派出首都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在学习班成员中开展“忆苦思甜”、“斗私批修”、“查比看”等活动。

第四，由“徐海班”成员组成“徐州代表团回徐汇报团”，返回徐州宣传八届十二中全会精神，促进当地两派群众大联合。

然而这些举措并没有促成“徐海班”内的大联合，也没有终止徐州当地此伏彼起的派性冲突。

## 第 1056 回：山东省，造反派突击入党
## “反复旧”，有计划全省展开

1968 年，山东济南掌权的造反派又分成两派：一派是以省革委会副主任、“山工总”头头韩金海为首的省革委派，另一派是以济南市革委会副主任杨恩华为首的市革委派。

10 月中下旬，王效禹正在北京参加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韩金海等人在临沂忙着那里的事情。此时，杨恩华一派独占济南发号施令。韩派的孟庆芝、穆悦奎等人受压，跑到临沂向韩金海告急，韩派的刘长茂则在电话中向韩金海哭诉。韩金海立马赶回省城，在“山工总”开会研究对策，最后决定，由韩金海、孟庆芝、乔世俊、穆悦奎到北京找王效禹汇报。

因为八届十二中全会期间不准随便找人，韩金海没有见到王效禹，便在电话中向王效禹告状。正好 10 月 14 日，《红旗》杂志社论《吸收无产阶级的新鲜血液——整党工作中的一个重要问题》中有一段关于“反复旧”的话，于是王效禹在电话中对韩金海说：“济南市恐怕是搞了复旧，你们先回去做些调查，我回去后再处理。”

韩金海从北京回到济南，于 10 月 20 日打出“反复旧”的旗号，在他的起家之地济南印刷厂召开 23 个工厂参加的现场“反复旧誓师大会”。

对于韩金海开展的“反复旧”，济南军区和省革委在济

南的李水清、赵修德、张子石、傅建吾等人认为不妥，李水清发表讲话明确表示反对。

中央全会结束，11 月 1 日王效禹回到济南，下午先听取韩金海、刘崇玉等人汇报，研究商议有关情况。

11 月 2 日，济南市召开庆祝发表八届十二中公报的军民大会，王效禹在讲话中说："如果不击溃'二月逆流'和为'二月逆流'翻案的邪风，文化大革命就不能取得全面胜利"，"反动的资产阶级多中心论，是企图干扰和破坏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最近提出的'认真搞好斗、批、改'的伟大战略部署的一种反动思潮"。

当天，他继续在在贯彻八届十二中全会的省革委常委会上重点谈"二月逆流"问题。3 日上午，他与韩金海谈话，下午听取孔世君、田雨汇报，晚上和傅建吾、杨恩华谈话。4 日继续开会和谈话后，王效禹决定开展"反复旧运动"。

11 月 5 日，王效禹带领韩金海、孟庆芝等人到济南车辆制修社搞"反复旧"试点，并在那里召开"反复旧"现场会，王效禹、韩金海先后讲话，济南革委会负责人杨恩华谈了四点意见，山东的"反复旧"就此拉开序幕。

11 月 10 日，上海《工人造反报》第 181 期发表"学习党的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公报"文章《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奋勇前进》，其中写道："关于反对复旧问题，复旧是存在的，但这是很少数单位的问题"等等。

这篇文章，王效禹极为欣赏。山东的各种“学习材料”大量转载。

王效禹实施“反复旧”的内容，基本取决于毛泽东审阅的红旗杂志和上海《工人造反报》等文章。主要有：

1、老干部掌权的单位，都有复旧嫌疑，《红旗》杂志说“凡是领导班子统统是原班人马……”。

2、全力突击造反派入党。《红旗》社论中强调“这样的领导班子，不能同革命群众保持密切的联系，因而很可能吸收一些‘中间派’、‘老好人’入党，甚至可能被言行不一的坏人、投机分子混入，而把敢于向阶级敌人冲锋陷阵的、敢于坚持阶级斗争的同志排斥在外。”

3、批判多中心论。《红旗》社论中有“凡是有复旧倾向的地方，由于缺乏在毛主席革命路线原则基础上的团结，常常形成两个中心”。“克服‘多中心论’，实现领导班子革命化，在斗争中逐步形成一个坚决执行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革命核心。”

4、以批判“二月逆流”为名，矛头指向济南军区。

11 月，各省市先后召开会议，上报出席“九大”的代表。此时，才想起一些造反派还不是党员。八届十二中全会上，就发现河北石家庄国棉厂的一位参加会议的代表竟不是党员。11 月，各地出现造反派突击入党的高潮。

60 年代入党，一个主要的基本条件是“出身”。但是在

山东，跟随王效禹的造反的人有些出身有问题，一些人曾是社会上的“混混”，个别还有犯罪记录。可他们反抗精神很强，有些人从社会底层造反到了领导岗位，所以非常感谢王效禹，对他忠心耿耿。但是，要将这些人吸收入党，就有很多困难了，其中有些困难还是王效禹自己造成的。

1966 年底，王效禹在青岛造反时，有些大学生造反派非常反感一些“混混级”造反派的打砸抢行为，曾问王效禹为什么要用这样的人？王效禹回答：“这些人能冲能打，关键时刻，稍一鼓动，就能冲上去。当年搞土改的时候，有些地方的贫下中农比较老实，难于发动。就是利用流氓无产者，先打开局面，群众发动起来了，再教育和处理这些流氓无产者。”

1968 年 2 月 17 日，山东省革委召开“山东省无产阶级革命派代表大会”。会议刚开始，王效禹对在省革委任职的山东省军区政治部副主任赵修德、济南军区司令部军务部部长陈风来说：“要尽快组织一个班子，将新旧领导班子的成员审查一下”。并交待：这个班子由他本人和支左军代表赵修德、陈风来、秦洪洲 4 人负责，工作人员不要地方的参加，全从军队抽调。陈风来专门向杨得志汇报后，从军内各单位抽调师职干部 1 名，团职干部 6 名，其他干部 6 名，3 月初组成审查小组，组长由淄博武装部副政委担任，隶属省革委政治部组织组。成立后的 8 个月中，分两批审查了一些省革

委委员和机关领导小组成员，给部分成为各级领导的造反派建立了档案。

在省革委政治部审查小组的存放的这些档案中，记录了一些造反派头头的问题，这对发展他们入党带来了麻烦。于是，山东“反复旧”的第一个大战役，就把矛头指向了省革委政治部组织组的审查小组。11 月 11 日，根据济南市革委会副主任张廷藻布置，从济南 12 中、16 中、28 中、铁路技校这 4 所中学调集红卫兵学生 23 人，组成济南市红代会“反复旧调查组”，冲进省革委组织组，查封“黑材料”。

省革委政治部的人没接到任何通知，面对突然冲进来的红卫兵，拒不交出钥匙。

王效禹把组织组的人叫去，命令他们把门打开，让红卫兵检查。

13 日，红卫兵以发现有杨恩华、张廷藻等人的黑材料为名，查封组织组下属的材料组。王效禹召集省革委机关全体人员开会，说明情况。

张廷藻等人把查封材料的情况写了书面报告。王效禹 11 月 19 日在报告上批示：“吸收若干方面的代表把那些黑材料整理后烧掉。”就这样，审查小组调查的文革前的档案和重新调查整理的全部档案材料都付之一炬。

11 月 11 日，杨恩华填写了入党志愿书。王效禹找杨恩华和韩金海谈话，要求两人团结一致，共同“反复旧”。于

是，以杨恩华为主，在“山工总”内成立一个临时党支部，又发展韩金海等人入党。

韩金海等人的入党手续在“山工总”临时党支部通过后，由“山工总”总部作为上级部门审查盖章批准入党。就这样，韩金海等人的入党手续成为山东造反派入党的一个典型。

还在山东省九大代表名单出来时，分管省革委会政治部工作的赵修德就对韩金海的历史有疑问。此时韩金海还没有入党，王效禹为他预留了九大代表名额，待韩金海办了入党手续后，马上补为九大代表。

11 月 12 日，王效禹致信济南军区党委常委，提出 4 个问题，认为“二月逆流影响山东”，“有的同志想为二月逆流翻案”。“反对省革委和各级革委的邪风，在山东刮了已近 6 个月”，“济南部队党委看到这样严重的问题，而不认真对待，就不太合适了。”信中提出“三支两军办公室有鬼”，指责军区后勤部和装甲兵的负责人。提出济南军区支左军人如成为九大代表，军区定下后要省革委商量后再报。

王效禹先在省革委会的党员常委会上宣读了这封信，但会议没有通知杨得志，何志远、陈风来等军人常委参加，而是将信打印 20 份，发给济南军区党委各常委。11 月 12 日同一天，王效禹又以济南军区党委第一书记的身份批示了十几封部队人员支持王效禹的来信。

对于 12 日王效禹发出的致济南军区党委常委的信件，

济南军区没有回音。

11 月 14 日，王效禹以个人名义给毛泽东、林彪、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呈上一份报告，称：“我在传达中，遵照中央的规定，对‘二月逆流’的那几个人没有点名。从山东的情况看，还是点名好。特别是军队中，不少人对‘二月逆流’中‘支左’的错误不仅不认账，而且为‘二月逆流’翻案的邪风刮得很大。点了他们的名，对于促进犯错误的同志分清是非，划清界限，回到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对于进一步加强军民团结、军政团结；对于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都是很有好处的”。“近日，我们即照春桥同志的做法，召开较大的会议，深入传达十二中全会精神。……”

对王效禹的这份报告。中央没有回复。

从 11 月开始，“反复旧”运动在山东省逐步全面铺开。

11 月 13 日，王效禹首先批准撤销泰安地区革委会主任、原地委副书记房众夫的职务，换上军代表李毅之。接着，山东各地一些老造反重新夺权，只要是原老干部掌权的单位，基本都属于复旧行列。全省短时间内约 40%的县市革委会被推翻或改组，再次陷入混乱之中。

青岛有一个造反派于景瑞，在青岛的造反派中也算个人物。因其父曾是国民政府的警察巡官，1962 年才解除劳教，他受家庭出身影响而不得志。“四清”中，于景瑞又因经济

作风问题被整。文革中他参与造反，“122 夺权”后，从轻工局的工厂来到市革委工作，一心追随王效禹、杨保华。到了 1968 年，形势相对平稳。因为于景瑞的个人历史问题太多，对他已不太重用。突击入党时，更没有他的份。

11 月 13 日，青岛杨保华听说济南开始“反复旧”，便安排于景瑞去济南了解情况。另外，王效禹的老婆刘崇玉此时也正准备入党，于景瑞此去主要是把刘崇玉的证明材料带给她。

于景瑞到济南见到王效禹，汇报完后，上楼把证明材料交给刘崇玉。刘崇玉随口问于景瑞是否入党，于景瑞趁机说出心中不满。王效禹知道了于景瑞的入党问题，便安排他在第二天的省革委会发言，同时通知杨保华马上来济南。

杨保华和鞠维信、张子石等人连夜赴济，参加 14 日召开的省革委会。会上于景瑞先诉文革前长期受压之苦，随后王效禹作了长篇发言，拍胸脯要和鞠维信介绍于景瑞入党。当天下午，杨保华等人在济南研究回青岛如何发起“反复旧”运动，准备以于景瑞入党一事为突破口，如果青岛支左军队领导不同意于景瑞入党，就要和军队顶着干。

杨保华向王效禹汇报，说来济南之前，驻青岛部队支左领导表示：不同意青岛全面复旧的观点。

王效禹说：“不同意也得干，不干不行”。

11 月 16 日，杨保华回到青岛，即仿照济南做法，也发

起了一出冲击市革委政治部，批判市革委常委、政法部负责人季铭玲等人整造反派黑材料的事情。

接着，11 月 17 日召开青岛市革委全委扩大会议，杨保华按照王效禹 14 日讲话的内容和基调，也发表长篇大论，宣传“造反派受压了”，发动“反复旧”运动。这就是后来闻名全国的“1117 讲话”。对于这篇讲话，王效禹安排济南印刷厂大量铅印，全省全国散发。

11 月 20 日，山东省革委会在济南召开全省县以上党员代表大会，青岛杨保华带领鞠维信和青岛台东区的邱嘉鹏等人参加会议。他们在青岛马上就要上火车了，才想起邱嘉鹏等人还不是党员，去参加全省的党员代表大会似乎有些不妥当。杨保华临时遇到市革委一名非党员办事员，命令他急速回去办理审批这些人的入党手续。上了火车，杨保华对邱嘉鹏等人宣布：“现在你们已经是党员了，从这个月开始，可以交党费了。”

11 月 23 日，在山东省县以上党员代表大会上，青岛、济南两个代表团联合发表《中共山东省县以上革命委员会党员代表会议济南代表团、青岛代表团关于目前山东形势的严正声明》，支持王效禹，批判军队的支左问题。

11 月 24 日，王效禹主持召开山东省革委会第五次全委会，贯彻八届十二中全会精神，批判“二月逆流”。会议开始不久，王效禹对韩金海说：“看来省革委这个权不在我们

手里，生产指挥部杨国夫大搞独立王国”，“市红卫兵进组织组十几天了，成绩很大，省红卫兵也进了省革委生产指挥部，光这些小孩子不行，要组织工宣队进去，去了以后，工作一个阶段，好的留下，这样政权就巩固了。”

12 月 3 日，山东省革委会第五次全委会议结束，通过决议《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奋勇前进》，以鲁革发[68]310 号文件下发。在会议决议中，提出“反对为‘二月逆流’翻案的邪风和复旧倾向”，正式决定在全省开展“反复旧”运动。

这天，韩金海、刘崇玉在王效禹家中会客室召开会议，杨恩华、孟庆芝、穆悦奎等人参加，决定组建工宣队进驻省革委组织组和生产指挥部，当场指定穆悦奎任进驻政治部组织组工宣队的队长。孟庆芝在会上讲：“让你们去做大官，当厅局长了，好好干，没有错。”

12 月 4 日，由济南“文攻武卫”、“山工总”、“济工总”出面，调济南机车厂、汽车总厂、山东化工厂、机床一厂、小清河航运局等单位 70 多人成立进驻省革委生产指挥部的工宣队，队长韩金海，副队长张美智。

5 日，在“济工总”第 2 会议室召开进驻省革委生产指挥部的工宣队全体会议，进行“战前”动员。韩金海讲话：“现在山东、济南形势很紧张，有人为‘二月逆流’翻案，把矛头指向了效禹同志”等等。刘崇玉也讲了话。当天下午，工宣队及随行助威的约千名人员，乘坐 30 多辆汽车，由三

轮摩托车开道，紧随着 5 辆宣传车，浩浩荡荡开进省革委生产指挥部，在那里宣布了夺权声明，第一条就是“一切大权归工宣队”，批判杨国夫。

同日，穆悦奎也带领 4 男 1 女共 5 人工宣队，从王效禹家中乘车进驻省革委政治部组织组。第二天，6 日，工宣队宣布：“根据省、市革命委员会的决定，进驻组织组。从即日起，组织组的一切大权归宣传队，处理任何问题，不经工宣队批准，一律无效。”

工宣队到省革委组织组夺权后，向刘崇玉汇报：“现在材料组的人都走了怎么办？”

因为材料组的这些人都是济南军区干部部从下属各部队抽调的现役军人，已经回到部队。

刘崇玉答复说：“把黑材料组的正副组长都揪来，先进行批斗”，“不管穿什么衣服的，一样斗”。

于是，穆悦奎等人把材料组长、副师职干部从淄博武装部揪回来进行批斗。

济南军区 1968 年 12 月份召开四好连队代表大会。12 月 7 日，杨保华通过军区前卫文工团拿到一份闭幕式的口号单，发现上面没有支持王效禹的口号，马上送到王效禹的家中。当天晚上，作为济南军区第一政委的王效禹，连夜组织 4 万人，于第二天冲击济南军区的四好连队代表大会闭幕式，在大会操场上演出丑化济南军区负责人的活报剧。杨保华向济

南革委会借了辆安装好大喇叭的宣传车，并派车把在济南参加省革委召开的县以上党员大会代表拉到济南军区的四好连队代表大会闭幕式会场。

12 月 16 日，韩金海、孟庆芝等人经过商议，决定让济南的“文攻武卫”接管公安派出所。12 月 17 日凌晨 2 时，济南“文攻武卫”司令孟庆芝在王效禹家中布置红旗区“文攻武卫”于当天早上 7 时 30 分进驻官驿街派出所，成立群众专政指挥部，并将派出所 20 多名民警全部集中到楼上，办了 3 个多月的学习班。

随后，红旗区“文攻武卫”按照济南“文攻武卫”参谋长李志江从王效禹家中打来的电话，查封了红旗区公安分局军管组的档案材料，同时交代：“要对军管会绝对保密。”

1969 年 1 月 7 日，济南“文攻武卫”的李志江到市公安局，命令公安局以“指挥部”的名义写报告，要求“文攻武卫”进驻公安机关。

1 月 16 日，济南市革委会主任、山东省军区副司令员傅建吾，市革委第一副主任杨恩华，济南“文攻武卫”参谋长李志江 3 人召开紧急会议，宣布成立济南市革委会区街公安派出所文化革命领导小组。杨恩华讲话布置“文攻武卫”、派出所、街道造反派结合起来，组成三结合的领导班子，把公检法的权夺过来。

1 月 25 日，以“文攻武卫”179 人为主，加上其他人员，

一起乘汽车在济南游行，然后进驻全市 4 区的 38 个派出所。“文攻武卫”代替军管会，掌管了济南的专政机构。

## 第 1057 回：来势猛，上山下乡现高潮

### 搞“清队”，北京大学死人多

1968年9月底的一天，时任《甘肃日报》军管会组长顾立清要求《甘肃日报》驻定西记者站记者马占海尽快把定西地区城镇居民上山下乡的情况了解一下。

马占海在会宁县掌握到几个事迹比较突出的人，逐一进行了采访。其中一位 50 多岁的妇女王秀兰，儿子在外当工人，家里只有她和儿媳妇，当他问王秀兰对上山下乡有何感想时，王秀兰不假思索地说：“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王秀兰这句话正好符合他此次采访的目的。于是，他在稿子中把王秀兰作为一个重点来写，并突出了她这句有点睛作用的话。

《甘肃日报》军管会组长顾立清一看到马占海的稿子就感到不错，觉得王秀兰说的“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既朴实，又深刻，很有感召力。于是，他精心对稿子作了修改，加了编者按，于 1968 年 12 月 8 日，在《甘肃日报》头版右侧，以半个版的篇幅刊登了没有署名的消息，标题的引题是“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会宁县部分城镇居民纷纷奔赴农业生产第一线，到农村安家落户，他们说——”，接着是主标题“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

稿子登出来第三天晚上，新华社电话打到《甘肃日报》

社，说“毛主席看了这篇稿子，认为很好”，并要求核实稿件是否属实，顾立清肯定地回答：“绝对真实。”

1968 年 12 月 22 日，《人民日报》在头版以整版的篇幅，刊登了由新华社转发的《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市里吃闲饭》，并加了编者按。据说“城”字后面那个“市”字，是毛泽东亲自修改时加上去的。同时，《人民日报》还在报眼位置的《毛主席语录》栏里，发表了毛泽东的最新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的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

同日，《人民日报》报道兰州市 1.8 万名初中、高中毕业生、武汉市 2 万多名中学毕业生奔赴农村插队落户的情况。共和国历史上一场规模巨大、几乎改变了整整一代人命运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拉开了序幕。这以后，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的初、高中毕业生，除已回乡、下乡或分配工作的以外，纷纷开始去农村、边疆落户。有的地区因初中毕业生全部上山下乡，停办了高中。一些地方，大批在校的初、高中的一、二年级学生，也随毕业生到农村去劳动锻炼，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个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高潮。

一场震撼全国、轰动世界的红卫兵运动，就在大、中学生走向“广阔天地”的锣鼓声中渐渐销声匿迹了。

会宁县由于那篇报道的原因，一夜之间变成推动上山下乡运动的典型，王秀兰也因为那句名言，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成了当时家喻户晓的大名人。

12月的一天，北京56中的学生郭路生也离开北京到山西杏花村插队，他后来以笔名食指写下了《这是零点十八分的北京》这首诗，描述了当时离别北京时的场面：

这是零点十八分的北京，一片手的海浪翻动；

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一声雄伟的汽笛长鸣。

北京车站高大的建筑，突然一阵剧烈的抖动。

我双眼吃惊地望着窗外，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的心骤然一阵疼痛，一定是妈妈缀扣子的针线穿透了心胸。

这时，我的心变成了一只风筝，风筝的线绳就在母亲的手中。

线绳绷得太紧了，就要断了，我不得不把头探出车厢的窗棂。

直到这时，直到这时候，我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

12 月，清华大学的蒯大富接到通知，他被分配到宁夏青铜峡铝厂。到了那里，又得到通知，被分配当电解工。蒯大富并没有因为自己当了一名电解工而苦恼，相反，他很高兴，因为一来自己离开了清华大学。二来当时许多毕业的大学生也都分配到工厂当工人，或者到部队当战士。

9 月下旬，北京大学由工、军宣传队领导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开始，全校的干部、教师都集中食宿，不得自由回家。宣传队提出："北大王八多得腿碰腿"，全校相继有 900 多人被重点审查。而且，所有清查对象，包括翦伯赞、冯友兰等几名重点保护对象在内，都集中食宿，不准自由回家。

周培源又一次住进了 28 楼，这一次是被当作"清理阶级队伍"的重点对象接受审查的。此次与上次不同，上一次还有"井冈山"的保护，本派学生的尊重与温情，而现在则被视为"真正的美国特务"，所面对的是工宣队员，与他们无法解释他在美国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而研究空投鱼雷的那一段历史。他上厕所、排队吃饭都受人监视，周末也不能回家……

10 月，化学系"0363"齐菊生在文革中写给化学系同学陈醒迈和技术物理系 63 级程汉良、刘立民的一封信，被化学系一位女生发现并上交工宣队，工宣队在楼道里用大字报公布了这封信的全文。这封信借史喻今，表达了一些对文化大革命的思考，于是被说成是"反对文化大革命的纲领和宣言"，齐菊生、陈醒迈、程汉良、刘立民他们 4 人也被定性为"四人反动小集团"，隔离审查。由文革中一直在校外的一位同学任专案组组长，也是年级领导小组组长。这位同学先是在学部参加运动，后来去了河南兰考，因此没参加北大的两派斗争，应该是没有派性。

不知不觉中，化学系的吕成信，樊能廷，雷祯孝，朱重远也消失了，他们也被隔离了。还有陈醒迈的女朋友陈珍德，齐菊生的女朋友游君玲，也都隔离了。

宣传队对聂元梓进行了“再教育”，对她的“资产阶级立场”和“腐朽的两面派作风”进行了严肃批评。

在清队中，对物理系一级教授、著名物理学家饶毓泰的历史进行审查，有人揪斗，有人贴大字报。10 月 16 日夜，饶毓泰上吊身亡，时年 77 岁，他是周恩来指示的重点保护对象。为此，学校保卫组组长在向宣传队总指挥部汇报勘查现场的情况时，提出要加强对翦伯赞、冯友兰的重点保护，亡羊补牢。宣传队同意，把翦伯赞、冯友兰二人放回家。

16日当晚，还发生原北大党委常委、教务长、校文革常委崔雄崑，从清队集中地28楼出走失踪的事情。17日晨，崔雄崑被发现在校内红湖游泳池身亡，时年49 岁。

数学力学系教授董铁宝在清队中被立案审查，称其为“美国特嫌”。10月18日，他上吊身亡，时年52 岁。

11 月 2 日，北大“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指挥部向北京市委写了《关于不同意聂元梓参加市党代表会议的请示报告》。

11月4日，历史系原系党总支委员、系文革主任吴维能，因被点名批斗是陆平的黑班底及1959年的右倾机会主义问题，在圆明园投湖自尽。时年41 岁。吴维能出身小八路，历史系毕业后留校，1957年时任系团总支书记、系总支委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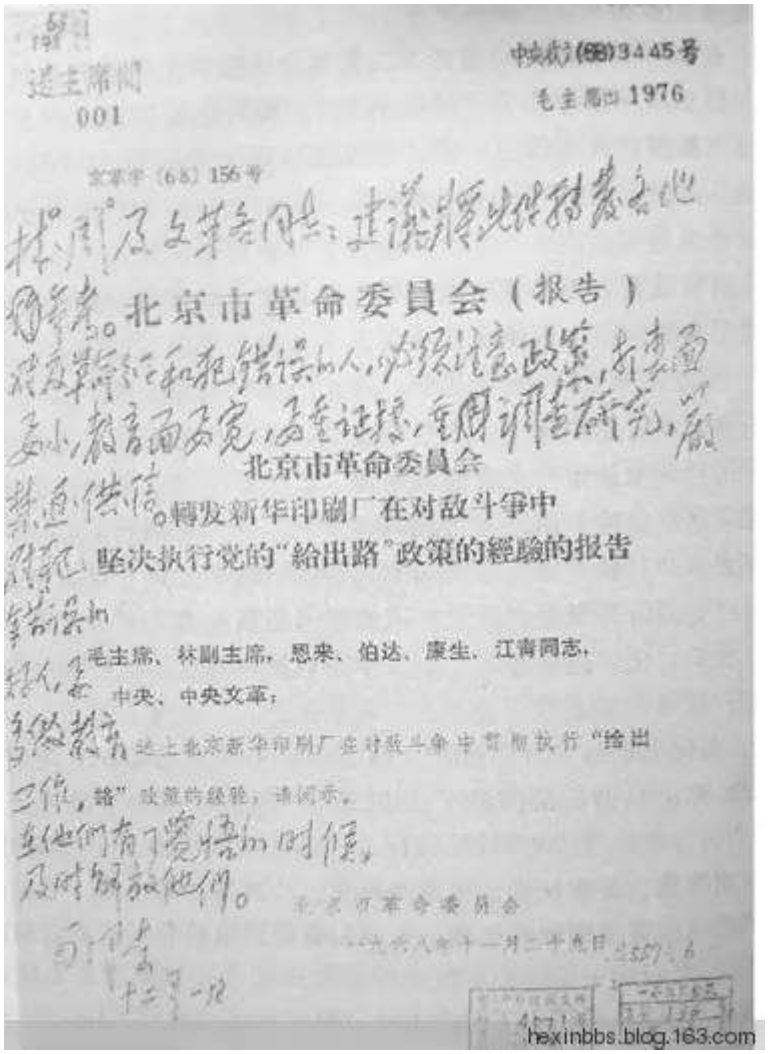
系办公室主任。1959年家乡有人饿死，父亲告诉他“没饭吃”，他对别人说了，为此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到食堂干活。文革爆发后，他揭竿造反，成为历史系文革主任、校文革委员。谁知工宣队进校后，还是要追查他1959年的右倾机会主义问题。

西语系党总支委员、系办公室主任徐月如，清队中说他是陆平的黑班底，“攻击三面红旗”，被日夜轮番批斗、逼供，并威胁要游街批斗。10 日，徐月如上吊身亡，时年 39 岁。

北大校医院副院长郭淑贤大夫，于11月15日被打成“反动小集团”头头，对其批斗，审问逼供。16日晨，他用刀片自刎身亡，时年49 岁。

12 月 1 日，毛泽东将一份《北京新华印刷厂革委会在对敌斗争中坚决执行党的“给出路”政策的经验》批转给林彪、周恩来和中央文革：“林、周及文革各同志：建议将此件转发各地参考。对反革命分子和犯错误的人，必须注意政策，打击面要小，教育面要宽，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严禁逼、供、信。对犯错误的好人，要多做教育工作，在他们有了觉悟的时候，及时解放他们。”同时附了一封信。

报告中讲到要解放一位厂党委副书记，毛泽东在此批注：“像这样的同志，所在多有，都应解放，给予工作。”



送主席阅
001

中央发〔68〕3445号

毛主席批 1976

文革字〔68〕156号

北京市革命委員会（报告）

北京市革命委員会

轉发新华印刷厂在对敌斗争中

坚决执行党的"給出路"政策的經驗的报告

毛主席、林副主席、恩来、伯达、康生、江青同志，

中央、中央文革：

送上北京新华印刷厂在对敌斗争中贯彻执行"给出路"政策的经验，请阅示。

北京市革命委員会

一九六八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hexinbbs.blog.163.com

12 月 3 日，根据毛泽东的批示，中央转发《北京市革命委员会转发新华印刷厂在对敌斗争中坚决执行党的“给出路”的政策的经验报告》。

12 月 11 日下午，北京大学在东操场召开“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万人大会，揪斗了“牛辉林反革命小集团”。

会上，突然宣布“将反革命分子侯汉清压上来！”正在参加大会的原北京大学“井冈山”一把手侯汉清就被人突然扭住胳膊，押上台去批斗，并当场宣布隔离侯汉清，实行群众专政。

一时间，北京大学上吊者有之，投湖者有之，服毒者有之，跳楼者有之。最密集时，这边跳楼者血迹未干，尸体未僵，那边又有人从楼上纵身而下…… “牛棚”不止集中一处，各系均有“牛倌”。12月12日，工宣队上报的《简报》称：“自清理阶级队伍以来，北大自杀了17 人。”

中央成立了清查“516”专案领导小组，陈伯达任组长，谢富治、吴法宪为领导小组成员。

12 月 17 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起草了《关于对敌斗争中应注意掌握政策的通知》。毛泽东在《通知》中添加了几段话：

“在犯过走资派错误的人们中，死不改悔的是少数，可以接受教育改正错误的是多数，不要一提起‘走资派’，就认为都是坏人。”

“犯错误的好人，要多做教育工作，在他们有了觉悟的时候，及时解放他们。”

“即使是反革命分子的子女和死不改悔的走资派的子女，也不要称他们为‘黑帮子女’，而要说他们是属于多数或大多数可以教育好的那些人中间的一部分（简称‘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以示他们与其家庭有所区别。实践结果，会有少数人坚持顽固态度，但多数是肯定可以争取的。”

当天，陈伯达、谢富治接见“516”专案组全体人员。

谢富治说：“我曾叫你们把‘516’成员分成三类，这是

比较合乎毛泽东思想的。这三类，一类是骨干分子，二类确实是成员，第三类有的说他是，有的说他不是，晃晃忽忽，即便是，也不是重要分子。”

陈伯达说：“有的人可能是，你们这个表里没有；有的人表上有，也可能不是。骨干哪有那么多？你们把当权派放进去，靠得住靠不住？你们认为有当权派就厉害了，那不一定。”

谢富治说：“张建旗这个人现在是否认罪？可不能放啊！”

陈伯达指着“516”组织系统图说：“这个需要再落实一下。”

谢富治说：“总的讲有‘516’这个组织还是靠得住的。”

陈伯达、谢富治二人商量后决定：哲学社会科学学部的王恩宇、傅崇兰交“516”专案组管。陈伯达说：“你们要写一点这个集团发展的历史。这个组织搞起来很凶，到处兴风作浪，实际上没有几个人。他怎么搞起来的？按你们这个表不行，搞一个发展的过程。”

12 月 18 日，北京大学又发生了翦伯赞、戴淑婉夫妻双双自杀身亡的事情。

这天早晨，负责照顾翦伯赞、戴淑婉夫妻生活的工人杜师傅突然泪流满面地跑到学校保卫组，扑通跪倒在地上，向学校保卫组组长哭道：

“两条人命，翦伯赞老两口都死了。”

保卫组组长闻言大惊，立即电话报告学校宣传队总指挥部，然后立即带着学校保卫组的肖祖德、蓝绍江和苑世男赶赴现场。

北京大学“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指挥部总指挥、63 军政治部副主任听到翦伯赞的死讯时也是大为震惊。因为两个月前，在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上，刚刚发表了毛泽东的“最高指示”：“对资产阶级的学术权威也要给出路”、“不给出路的政策不是无产阶级的政策”，而且特别提到“对北京大学的翦伯赞、冯友兰要给出路”。毛泽东亲自树立的典型没有了，这个责任该有多大？怎么向毛泽东主席交代?而且，63 军进京“军管”，是周恩来亲自提的名，对进北大后如何工作，做了具体的指示。周恩来多次在公开场合说相信这个军。现在出了这么大的问题，岂不是辜负了周恩来总理的希望?指挥部里的解放军立即会同“工宣队”里北京第二机床厂的几名工人奔向翦伯赞的住所。

翦伯赞家住燕东园 28 号。由于 10 月 16 日夜发生了饶毓泰上吊身亡一事后，宣传队同意翦伯赞回家。因为燕东园 28 号在大院外，不便保护，宣传队接受保卫组组长建议，将翦伯赞夫妻二人搬到燕南园 64 号，学校保卫组原旧址 63 号旁，每月发生活费 120 元，白天有历史系的学生值班，夜间由工人杜师傅照顾。“宣传队”交给杜师傅的任务是：注意

翦伯赞夫妇在室内的任何行动，负责为他们做饭、端饭，他们穿衣、上卫生间等也要在旁守候。并明确要求历史系的值班学生和杜师傅，非经宣传队总指挥部批准，不准外来人员接触。

当大家赶到燕南园 64 号翦伯赞家时，看见进门客厅就是随时监视、照顾翦伯赞夫妇起居的工人杜师傅住处，通往里间翦伯赞夫妇的住房的门已被砸开，只见房中有两张南北向的单人床。左边的床上，头南脚北仰卧着翦伯赞。右边的床上，头南脚北仰卧着戴淑婉。两人面色安详，衣着整洁，均穿鞋袜。两人的体温，早已冰凉，没有脉搏了，但尚无尸斑出现。保卫组们立即电话报告了北京市公安局。接着，他们继续勘查现场。 首先搜查翦伯赞遗体的上衣口袋，在他的左兜里发现一张纸，上写：

“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右兜里也有一张纸，上写：

“我实在交不出了，才走上这条绝路。 我走上这条绝路，杜师傅不知道。”

接着，搜查翦伯赞的床铺，在枕头右下方，发现了一个服药袋，里边有两粒进口的速可眠胶囊。

再搜查，没有发现其他异物。

又搜查戴淑婉的床铺，也未发现任何异物。

保卫组的初步结论：可能是服安眠药自杀。

接着，他们又询问住在外屋伺候翦伯赞夫妻日常生活的杜师傅。杜师傅详细谈了昨天晚上的情况：

“昨晚 10 点多钟，翦伯赞和往常一样准备睡觉。我没有发现有什么异常。他还说明早给他买几根油条，并把钱、粮票给了我。他们睡后我也睡了。到 12 点多钟，我听到炉子响声，好像他们起床了，我问有事吗？正要起床，听见翦伯赞老伴对我说：‘天气冷，就不要麻烦您了，我们自己煮点牛奶喝。’我就没有起来。我听到里面的碗勺的声音，又听到了开箱子的声音。不久我又睡着了。天亮以后，我记起翦伯赞要我买油条的事，就到海淀的一个铺子里去买了回来。这时已经 7 点多钟，早该起床了，我稍等了一下，见里面还没有动静，以为他们还没醒，就叫了几声，见没有答应，就使劲敲门，还是没有答应。我感到出事了，就用肩膀把门撞开了，看见他们好像还在睡，用手一摸已经冰凉了。”

这时候，在翦伯赞住处值班的历史系学生王渊涛和胡敬梁也来了，保卫组没有让他们进入翦伯赞夫妇的卧室，就在外屋询问他们昨天的情况。王渊涛和胡敬梁二人说，昨天下午，中央专案组的巫中等人来找翦伯赞调查刘少奇的问题。中央专案组的人他们一再追问刘少奇的问题，翦伯赞再三回答“记不起来了”。

## 第 1058 回：又发生，翦伯赞夫妇自杀

### 起因是，当年国共谈判事

专案组要翦伯赞交代刘少奇的什么问题呢?

时间要回溯到近一个月前的 1968 年 11 月 22 日下午，负责历史系专案工作的驻历史系工宣队李杰，突然把 65 级学生王渊涛和 64 级的胡敬梁召到设在 38 斋一楼的办公室，说中央专案组要提审翦伯赞，派他们二人去配合工作，并让他们马上到小东门去等中央专案组。以后有什么情况，直接向工宣队李杰汇报。

王渊涛和胡敬梁立即赶到小东门。一会儿就看到开来一部小轿车，在门卫室停下。从车上下来一个军人，自我介绍是中央专案组的，叫巫中。王渊涛和胡敬梁告诉他："我们是系工宣队派来配合你们工作的。"巫中请他们一同上车，带他们驶向翦伯赞所住的燕南园。

中央专案组的名头让王渊涛和胡敬梁两位学生感到敬畏和拘束，在车上没有与巫中和随他同来的另外一人交谈。

车子开到燕南园 64 号。谈话基本是在翦伯赞夫妇住的里间进行，主要是巫中和翦伯赞之间进行，涉及抗日战争爆发前，翦伯赞参与为国共两党谈判所进行的一些活动，以及相关联的一些人物，问到谌小岑、吕振羽等人。

原来，翦伯赞 1926 年加入国民党，1929 年认识了国民党元老覃振。二人是小同乡，自认识后关系十分密切。这时

候的覃振，正在北平参加以阎锡山、汪精卫为首的“扩大会议”，反对蒋介石，然而不久即告失败。此后不久，他又南下广州参加了广东军阀陈济棠发动的反蒋活动，同样不久也告失败。在覃振北上南下的全过程中，翦伯赞都作为他的随员，和他一起参加了这些反蒋活动。在这些反蒋活动连遭失败后，翦伯赞便蛰居天津、北平等地，和他的同乡旧友谌小岑、吕振羽共同编印《丰台》杂志，由于刊出的多是反蒋言论，不久即被迫停刊。此时，他还和吕振羽共同撰写和编译了用马列主义观点论述世界政治经济形势的一些论文和专著。

1933 年，覃振改变了他的反蒋立场，做了国民党领导的国民政府司法院副院长，翦伯赞也到南京做了覃振的秘书。

当翦伯赞做了覃振的秘书而移居南京之后，他的同乡谌小岑也受天津北洋大学的同学，时任浙江省建设厅长的曾养甫邀请，到杭州浙赣铁路理事会任秘书。其后曾养甫调任铁道部政务次长，谌小岑也随同他到铁道部劳工科任科长。在此之前，谌小岑曾是周恩来领导的天津觉悟社成员，代号为 41。后来，谌小岑又任国民党中央党部工人部指导主任、国民党上海市党部监察委员等职。1936 年任国民党广东省党部书记长兼民众训练科科长。

谌小岑(后排左 1)与觉悟社成员合影

1935 年 11 月上旬的一天，谌小岑来到翦伯赞家，说是受曾养甫的委托，要设法打通与共产党的关系。

作为铁道部政务次长的曾养甫在国共两党打得你死我活，不可开交之际竟敢与共产党联系，莫非是吃了豹子胆了？

原来，自日本占领中国东北后，又于 1935 年 6 月，通过“何梅协定”，迫使中国军队自平津、河北撤出。当年秋季又策动“华北自治”，企图将华北五省从中国版图分裂出去，成为第二个“满洲国”。冬初，日军向华北大量调兵，同时又策动汉奸在通县成立了冀东防共自治政府。

在此民族危难之际，中国共产党从中华民族根本利益出发，于 1935 年 8 月 1 日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同胞书》，即著名的“八一宣言”，呼吁全国各党派、各阶层、各团体、各军队团结起来，一致抗日。

而 1935 年底的华北事变更是直接威胁到国民党的统治，在国民政府内引起极大震动。蒋介石认识到，中日战争已无

法避免。他希望能得到大国特别是邻国苏联的支持，为此必须改善与苏联的关系。而要改善与苏联的关系，又必须处理好中共问题。从中国共产党“八一宣言”的字里行间，蒋介石看出，共产党的政策有了重大转变，他想以此为契机，看能否通过政治手段解决中共问题。

于是，1935 年 11 月，国民党派陈立夫和张冲更名改姓来到德国，等候蒋介石的进一步指示。同时，蒋介石委派国民政府驻苏联武官邓文仪直接与在苏联的中共领导王明谈判。

1936 年 1 月 13 日，邓文仪通过原国民党参议员、《中央日报》副主笔、福建《民国日报》社长、此时因“十九路军福建事变”避难苏联的《救国时报》主编胡秋原引见，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潘汉年在胡秋原的住所见了面。邓文仪向潘汉年表示，他是奉蒋介石之命与中共领导人王明商讨联合抗日问题，希望能与王明面谈。数日之后，邓文仪同王明进行了两次会谈。在会谈中，双方一致同意联合抗日，至于联合的条件、形式等问题，应在国内通过谈判解决。王明还特别提出建议：蒋介石应派代表到陕北直接会见毛泽东、朱德等红军领导人，并将他写给毛泽东等人的亲笔信交邓文仪带回国内面交。同时，受王明委托，潘汉年以“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人民外交部副部长”的名义致信蒋介石，代表中华苏维埃政府主席毛泽东和红军总司令朱德，保证邓文仪进

入苏区的人身自由和安全。此信件也由邓文仪转交。邓文仪回到大使馆后，立即向蒋介石报告：与共产党的联络线已完全接通。

正当邓文仪庆幸自己顺利完成任务之时，突然接到国内来电，命他立即停止与王明接触，转道德国，会同陈立夫、张冲听候命令。邓文仪无奈，只得向王明表示歉意并辞行。王明非常愤怒，大有一种受愚弄的感觉。他连续在共产国际刊物上发表文章，指责蒋介石是“团结和抗日救国的最大障碍”。

原来，蒋介石派陈立夫这样高级别官员赴苏谈判的消息被日本方面知悉，日方发出警告，迫使蒋介石停止了原有计划。另外，蒋介石在邓文仪与王明谈判的同时，还曾试图通过苏联向中国共产党施加压力，要求中共向蒋介石“投诚”，遭到苏联婉言拒绝。第三，蒋介石此时还通过其他途径，与国内的中共领导人张闻天、毛泽东、博古等已经接上了关系。这一行动也是在 1935 年底开始的，策划者也是陈立夫，还有宋子文。

时任国民政府铁道部政务次长的曾养甫与陈立夫关系密切。当他得知陈立夫准备和共产党谈判又苦于无法联系的时候，便承担起寻找共产党的任务。因为曾养甫知道自己的老同学，此时的下属的谌小岑早年是天津“觉悟社”成员，与周恩来、邓颖超交往颇深，因此他将这一任务交给了谌小

岑。

其实此时谌小岑与周恩来的那层旧关系已绝对无法利用了，所以当他接受了曾养甫交付的任务后，首先想到的是他的同乡好友，时任国民政府司法院覃振副院长秘书的翦伯赞，于是便来到翦伯赞家中。

翦伯赞这时还不是共产党员，但有一位与他很要好的同乡前辈，这时却正因为暴露了共产党员的身份而被关在南京卫戍司令部的监狱中。其人名叫董维健，曾在美国获得英美文学博士学位，做过湖南省的教育厅长。当翦伯赞听了谌小岑说明来意后，首先就提议最好把董维健释放出来，由他承担这一奔走联系的任务。在取得曾养甫的同意后，谌小岑与翦伯赞一同去狱中探视了董维健，董维健表示愿意承担此事。但当曾养甫向陈立夫请示时，陈立夫却不肯释放董维健。

董维健不能出狱，翦伯赞又提议写信把他们二人的同乡旧友、时任北平中国大学历史教授的吕振羽邀往南京。因为那时的吕振羽已是有名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即使他本人不是共产党，在他周围肯定有共产党员学生。

谌小岑立即写信给吕振羽。他在信中用了很多笔墨回顾了二人之间的友情，并说明自己在政府中任职实乃生活所迫。信的最后说到正题，大意是，“近年以来，东临欺我太甚，惟有姜府和龚府联姻，方可齐心协力，共谋对策，以保家财。希望吕能到南京面谈。”

吕振羽接到信后，立刻转给时任中共北平市委宣传部长的周小舟。周小舟又将情况向中共北方局作了汇报。北方局决定派周小舟、吕振羽到南京与国民党谈判。

1935 年 11 月底，吕振羽应邀来到南京，开始就住在翦伯赞的家里。

经谌小岑引见，吕振羽与曾养甫会见。曾养甫向吕振羽表明，同共产党谈判以便联苏抗日是国民党最高当局的决策，希望吕振羽能帮助当局找到共产党领导人。

根据吕振羽的报告，周小舟于 1936 年 1 月到达南京，作为中国共产党代表与中国国民党代表曾养甫等进行谈判。而在周小舟的背后更高级的指导者，则是中共北方局的负责人刘少奇，当时化名为陶尚行。

周小舟与曾养甫的谈判并不顺利，中共方面要求国民党当局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开放民主，承认苏区合法地位；国民党方面则要求中共军队接受改编。从 1 月到 6 月，双方进行了三轮谈判。到 1936 年秋，终因分歧太大而终止。1936 年 3 月，吕振羽加入中国共产党。

就在曾养甫与周小舟谈判艰难进行之时，曾养甫还筹划打通与中共中央的直接联系。他请在国民党中央通讯社任职的中共地下党员左恭出面物色一名赴陕北的信使。左恭推荐当时化名黄华表的张子华担当此任。张子华曾担任过中共上海临时中央组织部秘书，临时中央被破坏后，他仍留在上海

坚持秘密工作。这样，张子华就作为国民党和共产党双方的使者前往陕北。临行前，曾养甫再三嘱咐，此行乃绝密行动，务必谨慎。

与此同时，位于上海爱文义路、梅白格路口，今北京西路、新昌路口的圣公会圣彼得堂牧师、中共地下党员董健吾也受宋子文、宋庆龄兄妹委托，携带密信和宋庆龄交给红军的云南白药等急需药品，踏上了西行赴陕北之路。董健吾是中共临时中央成员，曾冒险收留毛泽东遗失的三个儿子：毛岸英、毛岸青、毛岸龙。党组织遭破坏后，他以牧师的身份结交了笃信基督教的宋子文母亲。

因天气恶劣，张子华和董健吾二人恰巧同时滞留西安。他们分别来到张学良官邸，请求张学良提供援助。张子华、董健吾原本是同志，十分熟悉。此时不期而遇，惊异之余，只好装作互不相识。在张学良“介绍”之下，互相寒暄，如同演戏一般。1936 年 2 月底，张子华和董健吾乘坐张学良提供的飞机前往陕北，同时到达中共中央所在地瓦窑堡。当然，二人都不知对方此行的目的。

张子华单独向在瓦窑堡留守的博古作了汇报，又赶赴前线向毛泽东、张闻天、彭德怀汇报。董健吾也向中共中央报告了相关情况。3 月下旬，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山西前线召开扩大会议，讨论与国民党联络、谈判问题。从此张子华数次往返于国共两党之间，传递信息。经过半年左右的沟通，中

共中央确信国民党对谈判颇有诚意，遂决定派由莫斯科回国的潘汉年前往上海。

1936 年 11 月初，就在周小舟与曾养甫在南京的谈判终止之后，中共正式代表潘汉年与国民党陈立夫开始了首次会谈。潘汉年提出共产党对国民党的要求是：在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前提下，全国军队统一指挥，统一编制，但不得打乱红军的现有指挥系统；改革现行政治制度，选举产生全国国会，建立人民民主共和国，在此条件下，苏区取消；召集全国各党各派各军队参加的国防会议，讨论抗日救国方针；建立统一的全国军事指挥机关———军事委员会和总司令部，共产党可选派代表参加该机关，但同时承认，国民党将在该机关中占主导地位。从以上所列条件看，共产党方面已经做出了很大让步。但是，蒋介石却把共产党的诚意看作示弱，他令陈立夫向潘汉年提出了令共产党难以接受的条件：对立的政权和军队必须取消；共产党目前可保留 3000 人的军队，师长以上一律解职出洋，半年后召回按材录用；如军队问题能如此解决，政治上各点都好办。蒋介石提出的条件，就是要整个地收编红军，这理所当然地为中共中央所拒绝。12 月初，中共中央致电潘汉年，明确指出：红军仅可在抗日救亡前提下，承认改换抗日番号，划定抗日防线，服从抗日指挥，红军不能减少一兵一卒，并须在抗日战争中扩充。彼方如有诚意，须立即停战，并退出苏区以外，静待谈判结果，绝对

不做无原则让步。

正当两党谈判陷入僵局之时，12 月 12 日，西安事变发生。从此，国共谈判又开始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从西安事变前国共两党谈判的过程看，翦伯赞只是在初期起了个推荐和接待的作用，自吕振羽与曾养甫接触后，国共双方谈判的中间人就是吕振羽和谌小岑，而翦伯赞其实已是一个局外人了。

## 第 1059 回：闻死讯，毛泽东掉下眼泪

### 说刘、张，调整四川革委会

1968 年 11 月 28 日，巫中与他们组的几个人第二次来北大历史系，向驻北大宣传队指挥部斗批改组及驻历史系宣传队的负责人，介绍了“刘少奇在 1936 年以谈判做幌子进行与特务勾结的情况”，以及翦伯赞在其中的活动情况。

之后，巫中又来北大几次，但翦伯赞始终说不出什么有价值的东西。于是，12 月初，巫中让王渊涛和胡敬梁两位学生去查看翦伯赞的档案，看能否从中找到突破口。

一天下午，王渊涛和胡敬梁来到当时历史系所在的三院二楼一个房间，里面一张大桌子上，翦伯赞的档案已摊开一桌，份数挺多，也很零乱。突然，其中一张普通信纸写的只有一张纸的信件引起了王渊涛注意。

这封信是建国后肃反时写给北京大学的，没有信封，因此不知具体收信单位。写信人是女性，她当时在陕西省某单位工作。信的内容主要是：她是江浙一带人，抗日战争爆发之前，她是个青年，出于对历史学家翦伯赞的仰慕，到南京向翦求教，住入翦家，翦指导她学历史，并告诉她，自己正在为国共两党代表的谈判牵线搭桥，国民党方面出面的是曾养甫，中共方面的代表是周小舟，还有吕振羽。她还在翦家见过参加谈判的周小舟，皮肤很黑很粗糙……

王渊涛将这封信仔细看了两遍，心中不免暗暗吃惊。他

迟疑了一会，把信拿给胡敬梁看，他们一致认为，这也许正是巫中他们所需要的材料。

等到巫中再次来北大时，王渊涛和胡敬梁二人向他汇报了这封信。巫中看后如获至宝，把信带回专案组翻拍了数份。

12 月 15 日，巫中再来北大，给王渊涛和胡敬梁看了翻拍件，然后就去找翦伯赞。

这次巫中态度强硬，虽然没有直接出示信件给翦伯赞看，但点了写信者姓名，要翦伯赞写出材料。然后和两位学生一齐到历史系工宣队，要求对翦伯赞进行隔离监护。但是巫中走后，系工宣队并没有采取进一步的监护措施。

再说翦伯赞这边，他在巫中他们走后，与夫人默默地相对而坐，通宵未眠。

第二天，即 12 月 16 日，翦伯赞拿出笔和纸想写字。他握住钢笔在纸上画了几下，不出水，拧开一挤又没水，他叹口气道："笔都不出水了，我也该完了！"

旁边有人听见后批评他说："天天批判你的唯心主义，你还在搞唯心主义！"翦伯赞没有吭声，旁人又说："你说了不迷信的，你怎么又迷信起来了？"

翦伯赞答道："我是不迷信的。不过，到了这个时候，也就信了。"

在场的谁也没有对翦伯赞说这句话引起警觉。

这天下午，按巫中的要求，王渊涛和胡敬梁去翦伯赞家

取交代材料，看到他用红格稿纸写了两张多，约千把字，写得很认真。可一看内容，不禁暗暗吃惊。对于政治方面，翦伯赞没有写出什么有价值的东西，可是对那个写信的女子，却写得很详细，并承认：自己当时年轻荒唐，和她有不正当关系，后来她结婚成家，就断了来往。

两位学生看完材料，就准备带着材料离开。翦伯赞随他们来到走廊，拿一盒快抽完的飞马牌香烟盒，抽出一支点起来，和他们说："和工宣队讲一下，给我增加点生活费，我烟抽完了也没钱买。不过我也想戒烟算了。"

学生宽慰他说："会的，毛主席都讲了要给你出路，工宣队应该很快会落实的。"

当晚，翦伯赞向管理人员提出，他睡眠不好，要点安眠药。管理人员给了他一晚的用量，而负责守护翦伯赞饮食睡眠的那个工人并没有监看翦伯赞服下。

从 15 日以后，翦伯赞与夫人都是默默无言地相对而坐。

12 月 17 日下午，巫中他们又来北大。王渊涛和胡敬梁把翦伯赞的交代材料交给了巫中，他看后极不满意，于是王渊涛和胡敬梁又陪同他们来到翦伯赞家。

因为巫手中有旁证的材料证明翦伯赞参与了国共两党代表谈判的联络工作，因此巫中说："你不要认为一手可以掩盖天下人耳目。"

翦伯赞伸出手说："我的手就这么大，怎么能掩盖天下

人的耳目？”

双方僵持一会儿后，专案组的人让翦伯赞好好想想，把问题交代清楚，他们第二天还会再来。并且强调，如果交代不清楚，是要坐牢的。

这天下午的审问时间拖延很久，气氛紧张。

这天，天气极为寒冷。第二天凌晨，就发生了翦伯赞夫妇双双自杀身亡的事情。

学校保卫组组长不敢怠慢，亲自将翦伯赞口袋里的两张纸条送到宣传队总指挥部，拍照留底。然后又回到现场，同保卫组的人继续勘查。这时，中央专案组的巫中等人又来了，保卫组没有让他们进屋，叫他们直接去找宣传队总指挥部。接着，北京市公安局的人也来了。

当天下午，翦伯赞夫妻的遗体送到北医三院地下解剖室，由北京市公安局赵法医主刀，对翦伯赞的遗体做了全身解剖，有关部位做了切片、取液等；对戴淑婉的遗体做了局部解剖，只取了部分胃液。肉眼发现两遗体的胃里均有尚未溶解完的进口速可眠胶囊。法医的最后结论是：翦伯赞、戴淑婉夫妻均为速可眠中毒死亡。

12 月 19 日上午，北大保卫组组长手持学校宣传队总指挥部的介绍信，亲自到北京医院调查毒源。 北京医院院部的负责人说：翦伯赞的病历，依照有关规定，属保密范围，非经特批，不准查阅。保卫组组长又立即赶到北京市委吴德

办公室汇报情况。吴德的秘书立即打电话给北京医院院长说明了情况。当北大保卫组组长再次赶回北京医院时，北京医院已把翦伯赞的病历摆在桌子上了。在医院专人帮助协助下，他们把医生开的处方和翦伯赞派人去取药的时间，一一排列出来，发现进口速可眠胶囊按间隔日期，依照规定数量，每次付给 20 粒，多年以来，没有变化。

回到北大后，保卫组组长又询问了平时为翦伯赞取药的历史系值班学生王渊涛和胡敬梁，二人说："翦伯赞夫妻都是委托我们到北京医院给他取药。每次都有速可眠胶囊。有一次，我们还对翦伯赞开玩笑说：'您可别一次吃了。'他笑着回答：'不会的，我不想死，要活着报恩毛主席、周总理啊！'"

对翦伯赞的自杀，北大宣传队指挥部深感事情重大，18 日当晚即将情况一边整理一边打印，于第二天，19 日上午 8 时，按规定将"翦伯赞自杀身亡"的简报派摩托车送往北京市革委会。

就在北大指挥部送报告的摩托刚刚发动的时候，清华大学革委会主任迟群突然来了。他走了不到一个小时，谢富治打来电话，叫走了在北大宣传队负总责的 63 军副军长。当这位副军长见到谢富治时，被他劈头盖脸的一顿臭骂：

"毛主席知道了，批评了，你们把事情搞糟了！"

原来，毛泽东听到翦伯赞自杀的消息，极为震怒。给翦

伯赞“出路”不是出自同乡情谊，也不是只针对翦伯赞一个人，而是要通过这个典型，给整个知识分子以“出路”。

毛泽东把谢富治叫去，狠狠地训斥了一顿，在场的周恩来也训斥了谢富治。

大约过了一周左右的一天上午，历史系工宣队通知王渊涛和胡敬梁去哲学楼开会。当他们二人到了那里，看见大房间里坐了很多人，学校工宣队的副总指挥魏秀如首先传达中央关于翦伯赞自杀事件的会议精神，然后会议的主持人汪东兴和谢富治，十分严厉地批评中央专案组的巫中说：“你们刘王专案组犯过不少错误，刘少奇的罪行已经十分清楚了，你们还要去搞什么东西？”

他们让巫中站起来，又说：“毛主席刚刚说要给翦伯赞、冯友兰这些反动学术权威以出路，你们就把翦伯赞给逼死了，你们这是对毛主席不忠！”

巫中说，北大的两个学生也搞了逼供。汪东兴和谢富治说：“学生也要做检查。”

开完会，王渊涛和胡敬梁回到 38 斋的宿舍，由胡敬梁执笔写了一份检查，王渊涛看过后签了名字，一起去哲学楼交给校工宣队，算过关了。

正在清华大学负责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工作的中央办公厅机要员谢静宜接到毛泽东护士长吴旭君给打来的电话，让她回来一下，说“主席有事找。”

谢静宜回到中南海，毛泽东心情沉重地对她说："小谢，北京大学翦伯赞夫妇最近吃安眠药自杀了。自杀之前，他给我写了一个条子，说他对不起我了……我很难过，我没有保护好他们。"

说到这里，毛泽东掉下眼泪，说不下去了……

停了一会，毛泽东说："清华、北大一路之隔，却是两个政策。"

稍许，他又对谢静宜说："小谢，我建议你同迟群再带上几位同志一起到北大看看去，了解一下翦伯赞之死的原因，调查北大对待知识分子政策执行情况。"

沉默了一会儿，他自言自语地说："看来 8341 还得派一部分人去北大啊!"

迟群、谢静宜等人来到北大召开教授座谈会，哲学系冯定教授在座谈会上说：

"不管天气多冷，都把人叫去批斗。他们一喊我的名字，我就吓得胆战心惊。预先穿好厚厚的棉袄、棉裤，因为一去挨批斗，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回来，免得挨冻。"

他又接着苦笑着说："去之前，我有尿没尿都去尿，有屎没屎都去拉，免得一害怕，吓出尿来。"

冯定转过头来，看了一下冯友兰教授，用手指着他说："你问他，他原来是大胡子，"说着用手比了一下，表示胡子有多长，接着说："为什么把胡子刮去了?你说呀!"

冯友兰有点口吃地说："因为每次批斗时，总有个别人揪我的胡子，我很害怕，从此以后嘛，就把胡子刮去了，不再留了，免得多受苦……"

谢静宜他们回到清华后，把冯定、冯友兰等老教授的发言向毛泽东如实汇报。毛泽东听了很是生气地说："不像话！还是有文化的大学呢，根本不讲政策。"

后来当谢静宜向毛泽东汇报到梁思成、钱伟长被造反派停发了工资时，毛泽东生气地说："恢复他们的全部薪水。"稍停，他又说："对钱伟长这样做，若是群众还一时想不通的话，可采取每月先发给他 150 元。同时教育群众，提高群众的政策水平。当群众的政策水平提高了，就恢复他原来的全部薪水。"

毛泽东还曾非常关心地问："梁思成在哪里?"

原来，梁思成被从原来住的小楼里赶了出来，搬到两间平房里，阳光被前面一座高房子挡住。更严重的是，他的工资被"停发了。

梁思成在家中对来访的谢静宜说："我有心脏病需要躺着，可是又有肺气肿需要坐着，很是矛盾。我体质很弱，自己系个鞋带之后，气喘得就像刚跑完百米赛一样。"又接着说："我要感谢林洙了，多亏她帮助我。"

林洙是梁思成的夫人。

毛泽东听了谢静宜当面向他汇报的梁思成原话后，很是

不安，马上指示恢复梁思成的工资、搬回原处、送最好的医院治疗。并说："不要让梁思成他们上台受批判了。批判旧教育制度，他们可以同大家坐在一起共同批判，共同受教育嘛。"

我们再说一下此时的四川。

1968 年 12 月的一天，成都军区的大门前，突然来了一汽车"兵团"组织的人，他们从车上卸下来沙袋在成都军区的大门外码成掩体，又支上防雨棚，然后就在沙袋上架起了机枪，枪口对着外面。

军区门口的警卫好奇地问："你们这是干什么？"

"兵团"的人告诉警卫："据'红成'高层内部透露出的绝密消息，'红成'准备在 12 月 20 日 9 点冲击成都军区，武装揪斗刘、张首长。"

这时，大街上已经到处是"兵团"和"八二六"的标语和大字报，揭露这个惊天的秘密，强烈谴责"红成"的罪行，表示要"坚决保卫成都军区、保卫刘张首长"，并告诉"成都革命群众注意事态发展，避免发生误伤"……

"红成"则竭力辟谣，说根本就没有这回事，完全是"驴""狗"造谣……

成都军区大门的警卫赶紧进去报告，军区领导紧急开会讨论，结果是"立即电报请示周总理"。

周恩来在电话里讲了对"红成"的三点意见，并要求成

都军区立即传达给“红成”。

住在军区里的刘结挺、张西挺听到了周恩来的三点指示，立即透露给“兵团”、“八二六”，于是满大街又突然贴满了“周总理对红成的指示”，不过有的是三点，有的是五点，而且这里的三点和那里的三点又有差别，也就是说“周总理对红成的指示”，霎时间出现了不少的版本，让人辨不出哪个是真，哪个是假。

那“红成”本来就对成都军区保护刘结挺、张西挺很有意见，多次想揪他们出来批斗，都是军区一直阻拦，这次又送来了电话记录的“周总理对红成的指示”，立即产生了三点怀疑：

一是“武装揪斗刘、张是‘兵团’、‘八二六’造的谣，周总理怎么会做这样的指示？”

二是“周总理的指示怎么和成都军区一贯的口气一样？”

三是“周总理给我们的指示，怎么比大字报还晚？”

怀疑的结果是：“周总理的指示是假的，是成都军区编造的。”

于是“红成”发起了反击，大街小巷到处是“红成”的大字报、大标语，内容就是一个：“周总理的指示是谣言”。

12 月 5 日至 12 月 27 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解决四川问题的会议。中央有关部门负责人、四川省革命委员会、成

都军区党委负责人等参加了会议。

会议认为，四川的革命和生产落后了，落后的原因不在群众，而在省革委会领导。根据会议讨论情况，四川省革委会和成都军区党委在《关于解决四川当前若干问题的报告》和《关于加速四川地区三线建设的请示报告》中，对省革委会成立以来工作中出现的失误集体承担了责任，同时也提出了省革委会副主任刘结挺和张西挺的问题。

《报告》提出：成立三线建设领导小组，实行统一领导，改变多头领导和无人负责的状态；按军工第一、三线第一、配套第一的要求，把国防急需的重要项目、配套项目、对全局关系重大的项目和已经基本建成能够很快投产的项目迅速搞上去，改进三线的物资供应。

12 月 20 日一过，“兵团”从成都军区门口撤退了，满大街的大字报都在宣传“由于我们揭穿了红成的阴谋，使他们不敢再动手了”。

12月25日，在周恩来主持下，中共中央对四川省革委会和成都军区党委提交的两个报告做出批示，决定调整四川省革委会领导班子，确定了省革委会核心领导小组成员名单和决定成立成都军区支左领导小组、四川三线建设领导小组及其组成人员。

## 第1060回：止“左”难，云南搞“划线站队”

## 说浙江，总政治部被军管

12月26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发出《关于对敌斗争中应注意掌握政策的通知》。这个通知稿是姚文元12月17日报送毛泽东的。其中的第二条写道：

“在提到敌人的名称时，应遵照中央历来文件中所明确规定的用语，如：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派，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现行反革命分子等等，不要采用含糊不清的容易混淆两类矛盾、扩大打击面的词汇。”

在这后面，毛泽东加写了一句话：“在犯过走资派错误的人们中，死不改悔的是少数，可以接受教育改正错误的是多数，不要一提起‘走资派’，就认为都是坏人。”

《通知稿》第四条写道：

“对于反革命分子的子女和犯错误的人的子女，也要多做思想教育工作，争取其中的大多数人逐步接受工农兵的再教育，使其中少数坚持与人民为敌者孤立起来。”

在这后面，毛泽东加写了一段话：

“即使是反革命分子的子女和死不改悔的走资派的子女，也不要称他们为‘黑帮子女’，而要说他们是属于多数或大多数可以教育好的那些人中间的一部分（简称‘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以示他们与其家庭有所区别。实践结果，会有少数人坚持顽固态度，但多数是肯定可以争取的。”

但是，各地、各单位在“清队”过程中，基本上都是宁“左”勿右。以云南为例：

1968 年 8 月以后，云南省革委会在全省发动以“划线站队”为主要内容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划线站队”是“以人划线，层层站队”的简称。具体说就是以对前云南省委书记赵健民的态度来划清云南文革中的“路线是非”。凡是打倒赵健民的，就是执行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站合”了队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凡是保赵健民的，就是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站错了队的资产阶级保皇派。

“站合”是云南古语“对”的意思。如此一来，云南“823 派”是反对赵健民的，当然就是正确的，站合了队。而“炮派”保赵健民，当然也就站错了队，是犯了方向路线错误。

11 月 18 日，云南省公检法学习班正式开学。在这次学习班中，通过审查和“划线站队”，查出站错队的 528 人；被批斗的 219 人；有严重政治问题的 4 人；犯有各种政治错误的 25 人；犯有严重错误的 5 人；受团纪或行政处分的 10 人；逮捕的 3 人；清除出党的 25 人；留党察看的 24 人；取消或延长预备期限的 18 人；按敌我矛盾审查的 64 人。

在审查过程中：被打伤的 60 多人；疯癫的 9 人；自杀的 8 人。

11 月 24 日，云南省革命委员会政工组根据省革委决定，

开办省级机关学习班。12 月 12 日正式开学，共有学员 739 人，其中厅局级以上干部 169 人；处级干部 253 人；一般干部 169 人。其中有：原省委书记处书记孙雨亭、高治国、郭超、薛滔、吴作民，原副省长刘披云，原省革委常委、委员张恩璞、张兴华、李文进、刘鑫、吴生敏、鲁大洲、何正廷。

在这次学习班中：有 37 人被定为现行反革命、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叛徒、恶霸分子；有 22 人被开除党籍；有 3 人被送农村监督劳动改选；有 17 人被监护；1 人被拘留；1 人逮捕。

12 月 14 日至 20 日，省、市革委第六次全会召开，会议提出揭开云南阶级斗争的盖子，继续深入对刘少奇、阎红彦、赵健民的大批判，从组织上把一切暗藏的阶级敌人挖出来，彻底摧毁他们的社会基础。“划线站队”运动在云南全省全面展开。

12 月 29 日，玉溪地区召开大型批斗会，400 多名站错队的干部和群众跪满台上。据统计：全地区揪斗干部、群众 27900 多人，打伤致残 1700 多人，打死 1089 人。

1968 年 12 月到 1969 年 5 月，红河洲所属 13 个县市，12 个州属单位，开展清理阶级队伍、分清路线是非，共批斗了 54324 人，占全洲总人口的 2.3%。其中，属敌我矛盾性质的 23408 人；叛徒 439 人；特务 900 人；死不悔改的走资派 326 人；没有改造好的五类分子 20074 人；现行反革命分子

1975 人。到 1969 年 9 月底，全州批斗的人数上升到 62397 人。

1969 年 1 月 1 日至 15 日，云南省革委会召开第七次全体扩大会议，中心内容是划清云南两条路线斗争的大是大非。

清查的重点事件有：

赵健民执行国民党云南特务组计划；

滇西挺进纵队；

滇东北游击军；

摧资兵团；

中上层干部联络站。

结合事件批判的重点人物有：阎红彦、陈康、赵健民、张力雄、林亮、候良辅等。

这次会议选举了出席九大的代表。选举中，昆明军区副司令员兼云南省军区司令员、云南省革委会副主任陈康落选。1 月 12 日，中共中央致电云南省革委，指出："云南省的九大代表应包括陈康同志在内。陈的代表性，毛主席早有指示，望你们说服赏干部和党内外革命群众同意将陈康同志补选为云南省九大代表。"于是，陈康当选为九大代表。

云南省革委会第七次全体扩大会议围绕追查"赵健民执行国民党云南特务组计划"一案，批判"阎红彦、赵健民之流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和云南的"二月逆流"翻案风，以支持或反对赵健民层层划线，把"炮"派组织划为错

误路线的代表。在这次全会上，再次宣传介绍 8 月 15 日国务院召开的全国国防、冶金系统抓革命促生产会议“抓反革命”、“捅马蜂窝”等经验，使“划线站队”的斗争更加残暴、疯狂。在“划线站队”期间，昆明市党政机关干部被强迫集中在北郊的冶金工业学校办学习班，学习人员如同置身监狱，完全失去自由。

1969 年 1 月 18 日，省革委会常委、昆明市革委会副主任、“823”的刘殷农在昆明市级机关学习班大会上提出要进一步追查“滇挺”、“地下银行”、“地下公检法”，“左派政府”等问题。在大会上，为迎接革委会委员回单位传达省革委会七次全会精神，参加斗批改，强迫参加“昆明市党政机关干部学习班”的 200 多名站错队干部戴高帽、挂黑牌、跪地请罪迎接。接着学习班按照七次全会布置，以 20 个问题作为划线依据，凡是参加过“炮”派组织的“摧资兵团”、“干部联络站”的干部都被划到错误路线一边，确定为被清理的对象，包括以云南地下党省工委书记郑伯克为代表的“混进地下党的坏人”，以解放军滇桂黔边纵队副司令员朱家璧为代表的“边纵”里的“坏人”，以及有被国民党逮捕、关押过等历史问题的干部。在学习班 1721 名干部中，被列为审查对象的 419 人，占 24.3%，被打成叛徒、特务、走资派等九种人的 127 人，占 8.29%，其中部局长以上被列为重点和专政对象的 124 人，占这一级干部的 75%。在被审查对象中，

1 人被逼死，近百人被打伤。1969 年 4 月 1 日，市级机关五七干校在官渡区小哨畜牧场开学。市委、市人委机关干部 1000 余人集中到干校学习，主要学习任务是继续搞“划线站队”，开展“清理阶级队伍”和斗批改，以后又在干校举办深挖“516”反革命阴谋集团学习班。原市委第一书记赵增益被定为“变节分子”、“三反分子”，市委书记处书记朱作欣被定为“叛徒”。在长达两年的“划线站队”中，全市受迫害的干部群众达 41635 人，其中被迫害致死的 1486 人，被打伤致残的 9708 人，涉及全市的冤假案 758 起 10373 人，错案 1213 起 2075 人。

“划线站队”给云南全省造成极大的伤害。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乃至很长的时期内，派性仇恨的对立，派性的明争暗斗以及拉帮结伙的现象，难以消除。同时“划线站队”中形成的材料，又成为后来“清队”、“深挖 516”、“一打三反”的依据，使“划线站队”的错误更加扩大。

1969 年 1 月 21 日，云南省革委会副主任、“823”的黄兆其在省冶金局职工大会上说；“大叛徒赵健民、张力雄、陈康这些人从政治上，舆论上、经济上、军事上在云南复辟资本主义”，“他们网罗、勾结社会上的地、富、反、坏、右分子和国民党残渣余孽，执行国民党特务组计划，建立地下公、检、法，镇压无产阶级革命派”。

他还说：赵健民“在云南进行武装夺权”，“东边是滇东

北游击队，西边是滇西挺进纵队，滇南是滇南挺进纵队”，“整个计划是东游、西挺，控制个旧，搞乱东川，夺取下关，会战昆明”。

1 月，滇南支左负责人到文山州的八个县作报告时说：“凡是军分区、军管会、人民武装部批准建立的革委会，都是赵健民在文山地区的代理机构，推行了武装夺权的一部分，要一律推倒重新建立。”

“文山把崔正三（军分区司令员）、张度人（军分区政委）揪出来，红线、黑线就清楚了。”

“今天会后要行动起来。群众要注意，革委会要注意，戴高帽子，坐喷气式，可以。打，可以。但不要把他们打死。”

“我们在中央首长的支持下，把‘滇西挺进队’消灭了。我就是消灭‘滇挺’的头头。后来，社会上有人骂鲁副司令员是鲁屠夫，骂我是刽子手，我说，我就是杀反革命的刽子手。”

3 月，文山州革委会主办了《文山地区两条路线斗争展览》。派出大批“35 人纠察队”、“工人宣传队”、“群众专政小组”，到工矿企业、农村捅马蜂窝。

文山州八个县，从县委书记到大队支部书记全被打倒的有两个县；被打倒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有 6 个县。有 62568 人被捆绑毒打；5624 人受伤致残；534 人被打死逼死；19000 多人被立案审查；7664 人被定为“九种人”；5252 人被判刑；

其中，死刑 268 人（实际杀掉 6 人）；死缓刑 124 人；无期徒刑 188 人；有期徒刑 1600 人；监外执行 3072 人。

1969 年上半年，滇东北的 20 多个县、市、区和一些省直属单位，开展以清查“滇东北游击军”为主体的运动。

据云南省委落实政策办公室统计：曲靖和昭通地区，受东游案牵连被审查的干部群众 60 万人，仅曲靖就有 293193 人，其中 2 万多人被批斗，2000 多人被关押，4000 多人被打伤，2000 多人被打残，200 多人被逼死，100 多人被打死。

1968 年过去了，动乱仍在继续。这一年，全国工农业总产值降为 2015.3 亿元，在 1967 年下降的基础上，又下降 4.2%，只为 1966 年的 86.6%。其中，农业总产值为 635 亿元，比上年下降 2.5%，为 1966 年的 99%。工业总产值 1380.3 亿元，在上年下降的基础上又下降了 5%，只为 1966 年的 81.8%。

1969 年 1 月 4 日，毛泽东为解决浙江驻军在支左过程中的对立问题约许世友谈话。随后要汪东兴转告周恩来和康生，让他们当晚再约许世友谈，落实解决浙江问题的具体办法。周恩来当晚给毛泽东的报告中说，已经和许世友拟定了一个 11 人名单，准备 5 日或 6 日接他们来京开会，解决浙江问题。毛泽东批示：“照办。”

1 月 8 日，毛泽东召集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开会，许世友、杜平列席，会议的主要内容是解决南京军区支持的浙江省军区阮贤榜、李国厚等人，与中央文革小组支持的驻浙部

队 20 军、空 5 军南萍、陈励耘、熊应堂等人的对立问题。毛泽东确定会议的方针是各自多做自我批评，不要批评对方。并说："地方问题在军队，军队问题在于做工作，即使吵一架，最后还是要团结起来。为了减少矛盾，20 军、空 5 军是否调调防，离开浙江。"毛泽东还说："省军区检讨我看过，20 军、空 5 军的检讨怎么我没有看到？"张春桥、姚文元对此做了说明。

1 月 8 日至 29 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关于解决浙江问题的会议，即后来浙江所说的"一月会议"。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等 12 人出席。参加这次会议的南京军区负责人有许世友、杜平、钱钧，浙江省有省领导南萍、陈励耘、熊应堂和省军区领导阮贤榜、李国厚、罗晴涛，还有南京军区派驻浙江的调查组组长陈德先共 10 人。

1 月 29 日晚上 19 时多，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举行最后一次解决浙江问题的"一月会议"，与会人员围坐在一圈沙发上，周恩来主持会议。浙江到会的 10 人，每人都发了言，阐述了各自的观点和态度，会场气氛显得十分严肃。

会议结束，浙江省军区阮贤榜、李国厚、陈德先、罗晴涛等人被留在北京参加南京军区学习班。南萍、陈丽韫等人回浙江主持工作。

几天后，南京军区学习班负责人廖容标到中央汇报工作，周恩来问他："浙江的几位同志在那里情绪怎么样？你们多

做做他们的思想工作，让他们顾全大局，做点自我批评就算了。”

浙江省军区的几位领导干部做了检查，总算顺利地过了关。那年“五一”节，在周恩来的指示下，他们登上天安门，在第一观礼台观看焰火晚会。然后被送到五七干校劳动。

八届十二中全会后，对“二月逆流”的传达，中共中央文件规定，只“传达到县、团级以上党员干部，对下不公布老同志们的名字”。

中央通知下发 9 天后，张春桥在给中央的“关于传达十二中全会的几个问题的报告”中提出：“‘二月逆流’的那几个人，要不要点名?看来，点名很有必要。”他说：陈毅在上海党内外、军内外影响都很大。有个领导干部，只在单位小组会上通了点气，“说陈毅是反毛主席的，竟受到几个小时的围攻。”“聂荣臻的‘一贯正确’，在上海国防科委所属单位中，被一些人吹得就更神气了。”

此后，“二月逆流”问题扩大了传达范围。

1968 年 11 月 10 日，聂荣臻办公室工作记事本上这样写着：“目前在揭发‘二月逆流’。从现在起，对聂荣臻的生活不能再让他特殊化了。因为他反对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反对中央文革。”

一般来说，工作人员对首长都是比较有感情的，否则早就换走了。但是在当时的革命大环境下，每个人都在写揭发

批判材料。公务员不愿意为首长洗衣服、搞卫生了，厨师则几乎顿顿炒白菜再加一小碟腊肉以表示和服务对象划清界限，工作人员接连开背靠背的揭发批判会。

聂荣臻的家庭人口少，女儿女婿在上班，只有星期天才匆匆回家。平时只有老伴张瑞华陪伴聂荣臻左右，常给以安慰。但老俩口哪有那么多话可说。最令人难堪的是，年仅 5 岁的小孙女，平时天真活泼，常在跟前嬉闹。可此刻，因为跟阿姨参加工作人员的批判会，于是也失去了往日的欢乐，常用困惑的眼神看自己的爷爷奶奶。聂荣臻孤独苦闷，又值大病初愈。要写检讨，找不到需要的参考材料，除了老伴，也没有可以商量的人。

12 月 29 日，周恩来在中央军委办事组转报的《徐向前办公室党支部反映徐最近思想情绪表现》的材料上批示："建议军委办事组派人找李广桥支部同志谈谈，不要搞得过于紧张，防止意外。"

1969 年 1 月 3 日，毛泽东在该报告上批示："内有批语，请黄永胜同志办理。"毛泽东的批语是："所有与二月逆流有关的老同志及其家属，都不要批判，要把关系搞好。"

当天，林彪在毛泽东这份反映老干部思想动态的简报上批示"要他们好好休息，不要制造新的障碍。"并派黄永胜、吴法宪到李富春等人的家中传达。

1 月 5 日傍晚，黄永胜、吴法宪来到聂荣臻家，向他传

达了毛泽东和林彪的批示。

聂荣臻与在他办公室工作了 10 年左右的 3 位老秘书谈话。他说：

“我对你们是很信任的。你们都还年轻，我放手让你们工作，目的是为了在做好工作的同时，尽量锻炼提高你们的能力。你们的工作也都是积极努力的。我主观上是想努力做好工作的，我的所作所为，你们都很清楚。谁知道会变成‘二月逆流反党集团’成员，连累了你们，我的心里很难过，向你们表示歉意。”

秘书们很激动，忍不住潸然泪下。

1969 年 1 月，中央为解决科委的问题，举办了中央国防科研系统学习班。会议期间，中央把聂荣臻的检讨书发给中央学习班人手一份，部分人贴了“打倒聂荣臻”的大标语。毛泽东的女儿李敏组织人员四处做工作，动员把“打倒聂荣臻”的大标语撕下来，坚持只“炮轰”不打倒。

1968 年 10 月下旬的一天，正在召开八届十一中全会期间，负责西北工业大学支左军训工作的 21 军副军长刘江亭突然接到命令：立即赴京参加总政军管工作。北京派来的一架小型飞机已抵西安接刘江亭。在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形下，他什么都来不及带即匆忙上了飞机。

到北京后，刘江亭才看到了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三家联合发布的对总政实行军管的红头文件，任命

海军第二政委王宏坤为军管小组组长，刘江亭为副组长。当时中央要兰州军区派一位副军级干部去总政，本来是要21军副政委梁济民去的，后经21军军长胡炜找兰州军区政委冼恒汉商量，换为刘江亭。

军管小组成员共8人，王宏坤挂帅，刘江亭负责具体工作，其他6人来自各大军区，一名是师级，其余均为团级。小组的一般工作人员，都是海军来的。这个“军管小组”只管总政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任务是：

一、实现和促进归口大联合；

二、清理阶级队伍；

三、进行整党；

四、抓革命大批判。

总政的“军管小组”进驻总政不久，军委办事组在京西宾馆听取了他们的汇报。组长王宏坤叫副组长刘江亭讲，刘江亭主要讲了三个问题：

1、总政的“社会状况”，即人员构成情况；

2、总政的案件；

3、总政的群众思想反映。

总政“军管小组”开始住总政机关，1969年1月搬到了红山口高等军事学院借住和工作。原总政机关的人员除被关押者外，也都集中到这里，包括文工团也搬到了这里。

1969年1月28日，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了总政问题。

吴法宪当晚对军管小组成员传达了毛泽东的意见：不要把总政看成是坏的，只要领导工作做得好，和清华一样，以后也会赶上去的。林彪接着说：总政都是部队选拔的尖子，不能一锅砸。

## 第 1061 回：山西乱，再招晋头头进京

## 细调查，陈永贵历史问题

1968 年 8 月 10 日，山西省革委会发表公告，称：“1967 年 9 月 5 日在省革命委员会驻地发生的‘九·五’事件，不应定为‘反革命暴乱事件’，现决定给‘红联站’平反；省革命委员会就此事件发表的‘九条’及两个通告，一并予以撤销，特此公告。”

自 2 月开始在北京举办的山西“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终于在 9 月底结束了，山西三大派组织的头头们，在学习班里达成了大联合协议。山西各地也纷纷在 69 军支左部队的帮助下，开始了大联合。69 军的各级指战员，渐渐走上了山西各级政权的领导岗位。从 1968 年下半年开始，山西省革委常委会议和省革委主任办公会议就完全由省革委党的核心小组代替了。之前这些会都在迎泽宾馆召开，由于派性闹得厉害，中央解决山西问题会议决定核心小组成员、省革委主要领导集中办公。办公和开会的地点搬到并州饭店南楼，这是原来山西接待外宾的地方。一般食宿都在这里，核心小组成员集体活动，个人不得接待造反派，接待造反派核心小组成员必须集体参加。

山西的三大派造反组织名义上倒旗实现大联合了，实际上争斗从未停息。“红总站”的头头脑脑们常常在刘格平家中聚会，刘格平的夫人丁磊也从没有停止和“红总站”头头

们的接触。“红联站”的头头们则常与张日清取得联系，张日清说起山西的“土太阳”刘格平，依旧怒气冲冲，怎么看也不顺眼。至于“兵团”与袁振的接触，自然更未间断。当69军军长谢振华在北京忙着做工作，让三大派的头头们统统倒旗，实现革命的大联合时，在省城太原，省革命委员会也在谢振华的安排下，开始按伟大领袖的指示，组织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准备进驻大专院校。

而就在此时，1969年元月5日，山西杨成效带着他的“决死兵团”在五一广场集会誓师，以“太原工人”名义散发了一份《恢复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誓师宣言》，当时被称为《一五宣言》。

《一五宣言》称69军自支左以来，支一派压一派，以大联合为名，吃掉了革命的组织，大联合后成立的各级“大联委”，实际上成了69军与“兵团”的家天下！“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被他们残酷地迫害、疯狂地镇压、无情地扼杀了！”

《一五宣言》号召：“彻底批判反动的二月逆流”、“坚决揪出二月逆流在山西的代理人”、“砸烂镇压造反派的‘对等掌权’”，“誓与反动的二月逆流及其在山西的代理人血战到底”。

《一五宣言》还呼吁山西的工人阶级再次起来造反、夺权，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对69军和军长

谢振华，则称之为“刘少奇黑的爪牙、杨成武的黑干将、卫、王、王的死党、刘、陈、刘的同伙”。

已经大联合三结合成立了革命委员会的太钢公司、第十三冶金公司、太原重型机器厂、太原铁路系统以及远在晋南的中条山有色公司、第十二冶金公司等大型企业原“红总站”派的部分负责人，于是重拉队伍，另立门户，打出的旗号五花八门：

“太原工人”

“山西工人”

“产业工人”

“铁路工人”

“冶金工人”等等。

而且，杨成效等组织几万人上街游行，进驻并查封《山西日报》。

与此同时，山西的其他两派：原“兵团”和“红联站”的组织，也纷纷成立所谓“护厂队”、“护校队”，摆出一副“保卫红色政权”的架势。

1 月 7 日，山西大学“8·14”派的师生，也发表了与《一五宣言》一个调门的《一七宣言》，宣布脱离驻校工宣队的领导，要重新杀向社会。

在太原工学院，也有“永红”一派的师生们做出了如此行动，以响应杨成效“决死兵团”的《一五宣言》。

1 月 12 日，杨成效又组织了一次大游行，庆祝山西“112 夺权”胜利两周年。游行队伍还冲进省革委，在省革委会大院里也游了一圈。

以此开头，山西各地又出现了工人、学生上街游行，以及冲击解放军驻地，抢夺枪支的行为。

1 月 30 日 22 时 23 分至 31 日凌晨 3 时 40 分，周恩来接见出席冶金工业部抓革命促生产会议的山西第十二、第十三冶金建设公司代表时，针对山西的情况说：

“山西夺权是第二名，紧接上海‘一月风暴’。现在是落后了，落后了就要赶上去。”

他要求山西两派搞“五不协议”：“不动气；不动口吵架；握手不动手；不带枪；不动枪。要按照毛主席、林副主席教导的‘五不’去执行。”

周恩来重申：“你说他保，他说你保，我都不管。我看都是革命群众组织，要团结。”“两派不管什么派，反正我看都是革命群众组织。”他当面指示杨成效等人，必须放行被拦截在十三冶给西山地区运送粮食的一百余辆汽车，要求占领设在榆次 525 军用仓库的“一把火”组织必须撤出去。

2 月 2 日，山西省革命委员会在太原五一广场召开迎芒果大会。毛泽东将芒果赠给驻北大和清华的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这两支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不敢独享，又将它们分赠给各省进驻大学的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和当地人民。

那一天，到会的太原各界群众没有打出原先三大派的派旗。但是也有些工人队伍打着“冶金工人”、“钢铁工人”、“煤矿工人”、“电业工人”等旗子来到了会场外，要向会场里冲。而一些会场里的工人队伍也主动配合，打出了早已准备好的旗子里外呼应。原来，这是“红总站”总指挥郝庭云、核心人物黄锐庵同“决死兵团”司令杨成效策划的。你69军不是说要听中央的话，不准再成立跨行业的组织了吗？我们这一回打出的旗帜是系统的工人队伍，看你能说什么？随后，这些队伍又拉起了“热烈庆祝山西省1•12夺权胜利两周年”的大横幅，还散发《一五宣言》传单。更糟糕的是，杨成效麾下的游行队伍中，还抬着两具在一次武斗中死亡的尸体。

由69军的军长和政委一起精心组织，原本是想让省城人民群众迎接芒果的大会，终于被“红总站”的头头郝庭云、黄锐庵，伙同“决死纵队”的司令杨成效带着人马，以庆祝1•12夺权两周年为名的大游行给冲垮了。

面对“红总站”和“决死纵队”的挑战，“兵团”与“红联站”决心还击到底。各地的武斗再次出现高潮。全省范围内的停工停产此起彼伏。各派群众组织冲击部队、抢夺国家财产的事件屡有发生。

当时，国务院正在北京召开全国军工战线会议和冶金战线会议。2月16日，周恩来、江青、康生一道接见了参加这两个会的山西代表，同时接见的还有被叫到北京的山西军工

系统和冶金系统的一些群众组织头头。杨成效也在其中。

周恩来主持接见，开门见山说：

“冶金会议开了半年，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接见以后，其他单位都回去了，就留下山西的四个单位，十三冶、十二冶、中条山有色金属公司、太原钢铁公司。还有参加八一五会议的十二个单位留下来，有太原重型机器厂、化工厂和十个兵工厂都留下了。”

“为什么把你们留下来？因为你们的问题没有解决。山西在今年一月份又出现分裂了。原本是联合的，成立革委会了，当然还是不完善。有些单位，还需要在毛泽东思想原则基础上，根据真正平等的原则进行充分协商，改组革委会，或者补台或者调整，这个原则对全国来说都是适用的。在你们那儿，也同样适用。……现在，太原，晋中，晋南的侯马、临汾，还是需要先把拖出来的，杀出来的，或者是赶出来的请回来，把这种形势改变过来。不能再分裂了。”

接着，周恩来、康生先后批评参加会议的杨成效。

周恩来对杨成效说：“你在学习班回去五次，康老很生气！”

康生说：“上次在解决山西问题的学习班上，你回去了五次。我赞成你回去，你回去吧！暴露给大家看一看，你杨成效是什么人？”“今年 1 月 5 号，杨成效还在那里拉队伍，还在那里发《宣言》，搞分裂，这是革命吗？杨成效同志，

你这个人我过去保过你，是不是保过？那时你是造卫、王、王的反，造陶鲁笳的反，那时我们保过你。因为当时另一派的矛头是对着革委会的，我保你是从大局着想，为了维护山西的革命委员会，为了山西的革命问题。现在是另一回事，要狠狠批评你。前年 12 月你从东北回来后，我看你就没有做过一件好事！你要好好检查，你现在官做大了，是省革命委员会的常委。据北京卫戍区反映，你在北京有好多杨公馆，杨成效公馆。”

杨成效反驳道：“没有。”

康生：“你不要说这个话，你的情况我都知道！”

周恩来插话：“任何单位来的人，只能在中央指定的学习班学习，你自己不能到处搞联络站，开旅馆，那不行。”

然后对杨成效说：“你要做好点！康老是谆谆教导你。”

江青说：“山西的主要问题是归口大联合，你们要和社会脱钩，每个厂自己搞自己的，听来听去，山西的基本问题，就是这个问题。一个工人不搞生产，到处乱窜，这叫什么产业工人？！产业工人是最有组织、最有纪律的！”“山西整个形势是大好的，就是晋中有一条带子，这条带子的纽扣要自己解，不是说形势不那么好，就是晋中、晋南有个侯马，其他地方形势都是很好的。”

康生插话：“晋中，主要是太原。”

时任总参谋长的黄永胜说：“驻山西的军队同志要顾大

局，山西支左有些是有错误的，有的地方很好，军队同志要好好检查。现在要拥政爱民。拥政，就是要拥护革命委员会，支持革命委员会，帮助革命委员会，保卫革命委员会，坚决执行革命委员会的决定。爱民，就是要爱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广大革命群众，不能只爱哪一派，什么‘红总站’、‘兵团’、‘红联站’，除了少数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顽固不化的走资派，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现行反革命分子外，其他革命群众，你们都得爱，只爱哪一派都是不对的。希望你们屁股要坐得正一点，要按照林副主席指示的，一碗水要端平。……山西是全国成立革命委员会最早的，现在落后了。……我们军队同志要好好检查一下支左工作，把春节拥政爱民工作搞好，把一碗水端平，把山西文化大革命搞好，把生产搞上去，赶上全国先进地区、先进工厂。”

随后，周恩来让参加会议的陈永贵、曹中南发言，他们做了自我批评。

接着周恩来说：“刚才陈永贵、曹中南同志都讲了话，他们都做了自我批评。同志们应引起注意。他们都是革委会成员，他们都检查了自己有派性。陈永贵同志是高举大寨红旗的，但是最近几个月，他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以后陷入派性，被一派利用，对一派听得多讲得多，亲一派，疏一派。我看过那些材料都是一派的，把陈永贵的讲话夸大加以歪曲，支持自己这一派，挑动派性，这怎么行哪！革命委员会成员应

该是无产阶级革命派，要按照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号令来执行，要按照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和一系列指示办事，不能另外成立一个中心，支持一派。这个自我批评很重要，我们欢迎他刚才的这种态度。刚才曹中南同志也作了自我批评，也是讲的军队的态度。军队有时没有把一碗水端平，没有按照毛主席指示办事，就加深了两派对立。当然不是所有军队都是如此。领导上有这个倾向，下面就受影响。这两个同志的自我批评我们是欢迎的，希望他们回到革命委员会后，使核心小组加强团结，彻底执行毛主席的路线，听毛主席的话。”

当十三冶金建设公司的陈士法在会上说到自己要学习陈永贵时，周恩来说：

“学习红大寨、学习陈永贵，对的学习。刚才陈永贵同志讲了他自己有派性，你不能学习他的派性。”

从 3 月 5 日开始，先是山西三大派组织的头头按时集中赴京报到，接着，省级机关两派观点的领导干部，加上按系统按行业列出两派观点的各级领导干部、有关人员也分批赴京报到。于是，全省凡是进入了各级红色政权的领导干部，和各个系统的造反派头头，一个不落地全部被召进了北京学习班。这回学习班简称“中办学习班”。这个学习班与上一回不一样，不是靠自己教育自己了，也不是由山西省革命委员会的头头们担任组长和副组长了。学习班的管理者和教育

者，是驻清华大学的工宣队和军宣队。而对这些管理者和教育者们进行管理和领导的，则是谢振华和 69 军党委。山西学习班的学员们，这一次可不比上一次了。上一次矛头对准了对立面，这一次呢，一个个全得斗自己的“私”，批自己的“修”，要自己革自己的命了。

在 1968 年秋开始的清队整党过程中，山西省支左领导小组办公室收到一封群众来信，揭发陈永贵在抗日战争时期参加了日伪组织，充当情报员。

谢振华听到汇报后，立即对办公室的几位知情人说：“我们要调查研究，查清事实再说。目前，要严守秘密，不能伤害一个好同志，但也不能放过一个疑点。”

谢振华与支左领导小组的其他几位负责人商量后，决定责成北京军区保卫部在山西“支左”的刘旭等 3 人负责查证此事。

刘旭等人立即奔赴阳泉市。通过查证，他们在阳泉市商业局炊事员李观海的个人档案中发现一些线索。李观海是大寨公社武家坪人，1955 年镇反时，他交代过自己曾参加昔阳日伪特务组织“兴亚会”并当过情报员。同时供称，情报员中有粮食局管理员王久荣，还有陈永贵。于是，刘旭又翻阅王久荣的档案材料。从中也发现王久荣的供认记录：原是大寨公社金石坡人的王久荣也供认自己参加了“兴亚会”的事实，并交代陈永贵还是他们情报小组的负责人。

刘旭等人又查阅了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一二九师敌工部的一份昔阳县敌伪情报人员名册及敌伪档案。其中确有陈永贵的名字，并注明他是伪村长、情报员，还是“兴亚会”昔阳分会领导成员之一。陈永贵每周去昔阳两次，直接与日寇宪兵队长清水联系。为此，当地群众给陈永贵取了个绰号叫“陈二鬼子”。抗战胜利后，昔阳人对给日本人干过事的人特别痛恨，用石头砸死不少这些被叫做“汉奸”的人。陈永贵非常恐慌，也担心自己被砸死。于是，他向大寨第一任共产党村长赵怀恩托孤，请求村长保护他的子女长大。赵怀恩比较实事求是，说：

“当时日本人来了，总要有人出面，别人不敢，他胆大，他当了伪代表，参加了‘兴亚会’，可能为日本人提供的真假情报都有，这是非常时期的非常事，我看可以原谅。”

调查组将调查的结果立即向谢振华作了汇报。谢振华当即召开支左领导小组会议。

9月，谢振华派赴北京出席全国军工会议的副军长李金时专门将陈永贵的问题呈报周恩来。周恩来当即指示说：

“69军的同志要顾全大局，不要扩散，复印件可报中央。”

李金时从北京开完会回到太原，立即将周恩来的指示向军党委作了传达，并把有关事宜向谢振华作了汇报。

12月，69军正式以军党委的名义，将陈永贵的历史问题

报请北京军区党委转呈中央。

1969 年，筹备“九大”期间，陈永贵作为“九大”代表候选人，主动找“九大”山西代表资格审查小组的负责人谢振华，交待了自己在抗战时期这段历史问题。

不久，周恩来陪外宾到大寨参观，谢振华当面向周恩来请示有关陈永贵出席 “九大”的问题。周恩来说：

“此事作为历史问题来处理。可让陈永贵当代表出席‘九大’。”

山西省委报请大寨的劳动模范陈永贵、西沟的劳动模范李顺达和阳泉矿的劳动模范王体、大同矿的技术干部韩英分别作为山西的农民和工人代表，出席党的“九大”。

第 1062 回：看泉城，“四根油条”闹哄哄

攻潜校，与北海舰队纠纷

1968 年从 9 月到 12 月，山东临沂驻军 68 军 204 师各部队被冲击 56 次。济南军区报请中央军委批准，于 12 月 20 日把 68 军 204 师从临沂换防到青岛地区归属 67 军。同时调支持王效禹的 67 军 201 师到临沂归属 68 军。

12 月 26 日，周恩来就临沂、徐州问题打电话给王效禹：“临沂‘六大组织’告诉他们不要翘尾巴。一大派掌权，也要把其他组织联合起来。外出的人要接回来，把他们联合起来。”周恩来还谈了徐州两派联合情况。

王效禹在省革委常委会上传达周恩来讲话时说：“总理说了，山东的特点就是一大派掌权”，“徐州不能走临沂路子，临沂也不能走徐州路子”。

1969 年 1 月 11 日，周恩来接见驻徐州军队负责人。

1 月 22 日，周恩来主持召开解决徐海问题的会议，他在会上严肃批评济南铁路局向中央送交的要求对铁路实行双重领导的报告，批评济南铁路局擅自停止青岛铁路分局革委会工作的决定。在谈到临沂问题时，周恩来说：“临沂被赶出去的革命群众决不是一人，至少是几百人，都要欢迎回来，团结起来。”

1 月 24 日上午 11 时许，山东临沂流浪苏北的“八大”群众回到郯城县莲五、孙堂一带时，临沂地革委会在军队的

配合下，组织临沂武装民兵师 2000 人围攻马陵山的“八大组织”，动用八二迫击炮、轻重机枪和步枪，双方武斗持续 5 小时 20 分钟，死 14 人，伤 20 多人。

1969 年 1 月 26 日，济南出了“四根油条事件”。

那天清晨，济南大明湖饭店店员在门前摆早点摊儿，炸油条，卖油条。济南市革委会常委常山林等人不排队乱挤加塞，与卖油条的马国莲为四根油条发生了争执。这位马国莲也不是善茬儿，双方对骂打了起来。常山林威胁要把马国莲从单位开除。马国莲自然不服，写了多封告状信。其中一封信落在韩派孟庆芝的手里，韩派大做文章，说马国莲这位女工是“反复旧”的代表人物。

当年大明湖畔的明湖饭店——1969 年“四根油条事件”现场

而在前一天的 1 月 25 日，青岛也出了大事：青岛市革委会主任杨保华调动“文攻武卫”人员武装攻打海军潜艇士兵学校，还包围海军高炮阵地和 4808 工厂。

一个月前，1968 年 12 月 29 日，王效禹就向中央发了份状告北海舰队的电报，杨保华也于 1969 年 1 月 3 日，从青岛向中央发了份告北海舰队的电报。

由于与青岛市革委会主任杨保华的矛盾，北海舰队已从青岛多个支左单位撤出。但像捕捞公司这样少数在海上生产作业的单位，已由海军军管。

1969 年 1 月 11 日，杨保华、鞠维信，调集数千棒子队员，攻打捕捞公司。数百人被打，军管会被砸，军管会主任孙福财，副主任黄宏远等人被打伤。抓捕了 600 多名船员，押到纺织疗养院办学习班。捕捞公司的海上生产全面瘫痪。

杨保华原想通过攻打捕捞公司，诱使北海舰队调部队干预，从而嫁祸海军制造武斗，逼中央改组北海舰队领导班子。没想到北海舰队没有派出一兵一卒，反而将全部支左人员从捕捞公司撤出。捕捞公司成为一个刺猬，被杨保华捧在了手中。

杨保华攻打捕捞公司没有达到预期目的，又准备攻打 4406 工厂。

4406 工厂是北海舰队下属军工企业，已经军管。厂内绝大多数职工的观点是支持北舰，反对杨保华的。全厂仅有一个 7 人的组织支持杨保华。

1969 年 1 月 20 日，杨保华同这 7 人组织的负责人在市革委 4 楼房间研究策划了攻打 4406 工厂的计划。22 日凌晨

4 时多，数千名青岛“文攻武卫”人员冲进海军 4406 工厂，军管会成员被打并赶出工厂，抢走了一些枪支、弹药，档案文件也被抢。4406 工厂全面瘫痪。

北海舰队还是没有派出一人，又把 4406 工厂的军管人员全部撤走。

这时，青岛的海军潜艇士兵学校正奉命向天津搬迁。这所在水兵训练团的基础上组建的潜艇士兵学校，校址原在青岛沙岭庄。文革时期，两派潜艇士兵学校也有两派群众组织，是“红色战校”和“红总”。“红总”支持王效禹，发展到后来，这个组织不到 10 人，长期在校外。1968 年 10 月 26 日，中央军委决定撤销青岛的海军潜艇士兵学校，原学校领导机关搬迁到天津草坨子，组建“海军草坨子五七劳动学校”，学校教职员工海军另行分配。海军潜艇士兵学校“红总”的几名成员估计不可能留在青岛，前途莫测，于是向杨保华告急。他们向杨保华报告说：潜艇士兵学校正在向外转移材料，其中有很多是海军、北舰整理的关于王效禹、杨保华的黑材料，现在还有十几包未运走。杨保华听后大喜过望，认为把这些材料搞到手，就抓到了有力的证据。他决定攻打海军潜艇士兵学校，找到黑材料。

1969 年 1 月 22 日，杨保华在居庸关路 15 号向“棒子队”副总指挥刘仲石布置，让他立即和“文攻武卫”联系，“抢出黑材料”。

“棒子队”负责人同海军潜艇士兵学校几个人研究后，察看了地形，制定了攻打海军潜艇士兵学校的计划。

1 月 24 日约 20 时，“棒子队”在太平路总部召开紧急秘密会议。按照已经制定好的武斗计划，由市南、市北、台东的 1000 多名棒子队员，在市南“棒子队”副总指挥的指挥下，对 4808 工厂展开佯攻。同时十几部卡车组成巡逻队，在市南招摇过市，转移视线。

23 时过后，6000 多棒子队员分乘蓬布卡车秘密集结到第三粮库等单位院内。

25 日凌晨 3 时，“棒子队”在纺机召开紧急协调会议，海军潜艇士兵学校的几个人向他们介绍了校内的情况，刘仲石作了最后的布置。

7 时 15 分，趁海军潜艇士兵学校早饭时机，攻打该校的武斗开始了。第一梯队乘卡车冲到校门口。这时，门口的数名海军警卫战士卧到在地，阻止卡车冲进学校。数十名棒子队员上前，把警卫战士从门口拖开，数千人冲了进去。此时，校南、校北多处围墙也被推倒，大批人拥入，还有近千人翻墙进去。校内大乱。

“棒子队”首先强占校内广播室，广播准备好的“通告”。随即冲进电话总机室，打昏总机班长，砸毁电话总机，断绝海军潜艇士兵学校与外界联系。交通局数百人冲进食堂，踹翻餐桌，将就餐的军人押走。有 80 多人被绑架到第

三粮库、二库、面粉厂、青纺医院等地刑讯逼供。抢走了 9 麻袋的文件和材料，部分枪支弹药，以及大量军用和私人物资、物品。所有军队汽车全部被抢走。门窗玻璃、办公用品、生活用品几乎全部被砸毁。

这次行动，青岛共调集两万“文攻武卫”人员，是青岛地区最大的一次武斗，参与的人数最多。

北海舰队依然保持克制，没有派出部队和人员与“文攻武卫”正面冲突，只是搜集证据，迅速向海军和军委汇报。

1 月 31 日凌晨，中央文革就“攻打潜士校”一事向王效禹发出 3 条指示：“请你查明事实，立刻报告中央”。“如情况属实，请你指令杨保华立即制止这种错误行动。”等等。

王效禹的秘书朱文接到电话，立即赶到王效禹家中汇报。王效禹一声不吭，坐了好一会，才对朱文说：“你给杨保华打个电话，问问有没有这事，把中央的批评告诉他一下，如有这样的事，立刻制止。”

朱文不敢怠慢，立即赶回办公室，于 3 时 30 分给青岛打电话。电话接通后，青岛那边说杨保华夜间不接电话。朱文反复交涉，近 2 个小时后，才与杨保华通话，向他传达了中央文革下达的 3 条指示。

31 日当天，杨保华即向山东省革委发来电报，通篇都是海军潜艇士兵学校的种种错误和需要解决海军潜艇士兵学校问题的各种理由。

王效禹看了杨保华的电报说："看来他们是进了潜士校了，很被动"，但还是将这一电报转发中央文革。同时他以省革委的名义给杨保华发电报，重申中央文革的第 1 和第 2 条。

2 月 1 日，王效禹派济南军区一名副司令员和韩金海赴青岛调查处理"攻打潜士校"一事，又让秘书朱文通知杨保华要作高姿态检查，要主动。并于当天分别给中央文革和杨保华发出电报：

1、冲击潜士校是错误的。

2、进入潜士校的人立即撤出来。

3、杨保华要做检查。

当日 15 时，韩金海他们到达青岛，听了杨保华的检查，按照王效禹的调子，批评了杨保华几句。

2 月 3 日，韩金海他们在青岛主持召开青岛市革委会、北海舰队、67 军 3 方负责人会议，杨保华做检查并受到批评。北海舰队要求传达中央文革指示和单独汇报海军潜艇士兵学校事件，会议主持者未予理会。

韩金海他们回到济南，向中央写了一份报告，汇报杨保华已作了检查，批评北海舰队在此事件中姿态不高。

北海舰队的报告也到了中央。

当时杨保华幸亏没有攻打 4808 厂。这个数千人的大厂，除了少数人的"火线指挥部"支持王效禹、杨保华外，绝大

多数人参加的“大学派”都是反王效禹、杨宝华的。因为是海军的工厂，“大学派”一直没有被压垮。

4808 厂“大学派”的领导等极少数造反派，为了防止青岛“文攻武卫”组织在 67 军的配合下强行武装攻打，私自秘密在厂区多处主要通道和地方埋放了大量炸药。如果杨保华指挥围攻，采取与潜士校相同的方式，以卡车乘坐文攻武卫人员强行冲入厂内，卡车和车上所有人都会被炸上天，那将是一场名副其实的惨烈武斗。万幸的是，1968 年 12 月至 1969 年 1 月，杨保华指挥“文攻武卫”攻打的是基本没有防卫的捕捞公司、4406 工厂和海军潜士校，没有染指 4808 厂。

青岛的事情刚刚告一段落，2 月 7 日，济南市革委会召开政工会议，大力宣传表扬那位卖油条的女工马国莲，批斗济南市革委会副主任杨恩华等人。批斗时，刘长茂的老婆还打了杨恩华。与杨恩华关系很好的泰安国恕连跑到王效禹那里，批评“山工总”的打人行为，更加引起王效禹不满。

2 月 28 日，傅建吾、韩金海、孟庆芝等人在黄台电厂召开大会，“文攻武卫”抓捕常山林以及济南汽车总厂革委会主任尹昭瑞等 7 名“杨派”人员，以男女作风问题扣留杨恩华。

王效禹指令济南撤销杨恩华“九大”代表，换上赵星元，同时开除常山林等人党籍。王效禹对赵星元说：“段福兴不是卖小鱼的吗，怎么还能当省革委委员呢？卖油条的为

什么不能当常委？明天在市革委通过一下。”

于是第二天，马国莲女士“油条常委”上任，马上离开大明湖边的炸油条摊，进入市革委上班。而 2 月 7 日济南市革委会召开的政工会议，也成为文革中济南著名的“四根油条政工会议”。

“油条事件”之后，有人作了一首打油诗：

山东大地坑连坑，

黄河两岸焊壶声，

大明湖边炸油条，

胶州湾畔卖花生。

这首打油诗，有多个版本，内容大同小异，描绘 1967 年 1 月至 1969 年 6 月之间，山东的四位著名造反派。

1、“坑连坑”是王效禹，脸上有麻子。夺权后成为山东一把手。

2、“焊壶声”是韩金海，以前的焊壶匠，济南小五金厂的工人，时任山东省革委会副主任。

3、“炸油条”是马国莲，著名的“济南四根油条事件”主角，因此一跃成为济南市革委会常委。

4、“卖花生”是杨保华，青岛革委会主任，原明胶厂工人，困难时期倒卖过花生米。青岛即位于“胶州湾”畔。

第 1063 回：势难收，内蒙多人提防“左”

反右倾，继续大挖“内人党”

1968 年 7 月 5 日，呼和浩特新城宾馆。内蒙古革委会第三次全委（扩大）会议在滕海清主持下拉开了帷幕。在这次会议上，内蒙革委会正式做出了关于深挖“新内人党”的决策。会上通过了两个重要文件：《关于对“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的处理意见》和《关于对“内蒙古人民革命青年团”的处理意见》。这些文件断定，1947 年 5 月 1 日内蒙古自治政府成立后，“内人党”便转入地下；文件称乌兰夫是“内人党”的后台；并规定，对“内人党”支部委员以上的骨干分子均按反革命分子论处，勒令一般党徒进行自首登记，对抗拒者从严惩处。

内蒙古革委会第三次全委扩大会于 7 月 20 日落下帷幕。之后，《关于对“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的处理意见》上报中央并以内革发 351 号文件印发全自治区。同时，也向康生口头请示。康生说：“你们内蒙古的同志脑子里是没有敌情的。内蒙古有这样大的反革命组织，你们还向中央请示什么呢？有多少挖多少，越多越好嘛！”

这样一来，挖“新内人党”的活动便从原先的群众运动，一跃而成为一场有领导、有组织、自上而下的运动，并迅速在全区席卷而来。内蒙古各单位闻风而动，层层落实。很快挖出了一批又一批“新内人党”。但与此同时，刑讯逼供、

致死致残的恶性消息也不断传来。不少人已经感到群众运动易放难收，感到挖“新内人党”的局势难以控制。革委会的一些领导感到不安了。

1968 年 8、9 月间，内蒙古革委会关于“新内人党”问题发生了一场争论。李德臣认为：“不能再搞了，肯定有错的。下边报上来的不可靠，最起码有百分之七十错了。要成立专案小组，落实政策。”

高锦明很激动：“不能再挖了，再挖就挖塌了！”

这时，郭以青又站出来了，他说：“别人怕犯错误，我不怕!搞革命不怕担风险。挖内人党只要有百分之三十是真的就继续挖，挖错了将来再来平反。挖十个有七个是假的，三个是真的，最后去给七个磕头赔礼。挖十个有一个是真的，九个是假的，也是了不起的成绩!”

争论中，掌握最后拍板权的滕海清一言不发。

以后，李德臣多次找到滕海清，向他提出防止扩大化的问题，建议立即刹车。

此时的滕海清依然沉着脸，默然无语。李德臣急了。他是随滕海清从北京军区来内蒙古支左的，在滕海清面前敢于“放炮”。

经过这番争取，1968 年 9 月 13 日，内蒙古革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准备通过关于挖“新内人党”立即刹车的决议。滕海清参加完这次常委会，便匆匆赶往飞机场。中共党的八

届十二中全会即将召开，滕海清此行就是回京参加这次会议。

滕海清走后，常委们意见也趋于一致，决定挖“新内人党”的工作刹车，转入整建党工作。为落实决定，召开一个自治区直属机关干部大会势在必行。

常委会上，大家共推吴涛在直属机关大会上代表常委会讲话。

吴涛身兼革委会副主任、核心小组副组长和内蒙古军区政委，是滕海清之下内蒙古党政军名副其实的第二把手，由他讲话是再合适不过了。不料吴涛断然拒绝。

接着，大家又请吴涛主持大会，吴涛再次拒绝。

这样一来，直属机关干部大会只好改由高锦明讲话，权星垣主持。

9 月 25 日，自治区政府礼堂，高锦明开始讲话了。

高锦明刚说几句话，以肖应棠副司令为首的几个军区领导人呼啦啦站起身，拂袖而去。会议结束的时候，大字报已经刷到大街上了，公开称:“高锦明 9•25 讲话是一个大毒草!”

内蒙古全乱了。大字报铺天盖地，反对的，支持的，观望的，各种观点的人纠缠在一起，闹得不可开交。

此时，吴涛已经赴京参加八届十二中全会去了，家里只有高锦明、权星垣等人留守，而他们已经控制不了局势了。

几天之后，新城宾馆小礼堂。高锦明主持核心小组会议，

研究对策。

这时，“滕办”成员李良走进会议室，手里拿着一个小本本，上边记着滕海清、 吴涛刚从北京打来的电话内容。权星垣接过电话记录，上面大意是：内蒙古不要搞乱了， 高锦明同志有右倾问题，是属于工作中的错误，我们也有责任。

“工作中的错误”这句话至关重要，因为这等于挽救了高锦明的政治生命。

尽管高锦明已经做了关于刹车防左的讲话，然而，内蒙古地区深挖“新内人 党”的运动仍然按照自身的惯性运转着。

滕海清、吴涛作为内蒙古革委会的第一、二号人物，列席了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会议期间，滕海清把李德臣召到北京。他一改离开内蒙古时的态度，狠狠撸了李德臣一顿，说：“你犯了右倾错误，跟着别人跑了！”

李德臣明白，这个“别人”指的就是高锦明。

第二天，李德臣又赶到滕海清处。这次，滕司令员缓和了态度，他一边拉开抽屉，一边说：“康老有指示，挖‘内人党’刹车，都是高锦明的圈套！我这里有材料，高锦明是叛徒。”

原来，在八届十二中全会期间讨论了中共“九大”的筹备工作。康生约见了滕海清和吴涛，指出高锦明政治上有问题，决定不提高锦明为“九大”代表。

滕海清、吴涛二人在北京当面对李德臣作了布置后，李德臣便匆匆赶回内蒙古，传达滕、吴二人的指示。

滕海清在指示中说，内蒙古的整个工作是好的，但有些问题值得我们注意。最近有些混乱，右倾又有抬头。

滕海清提到，“听说我在 9 月 13 日说过一句糊涂话，说内蒙古与乌兰夫的基本矛盾解决了。我忘记是怎么讲的了，如果讲了这个话这是错误的，要宣布收回。”

在指示中，他只字未提高锦明，语气也相当缓和。

10 月 18 日，呼和浩特的主要建筑和交通要道，张贴出了一份份《通告》，勒令 “内人党”分子限期登记，落款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呼和浩特市公安机关军事管制委员会”。到《通告》规定的最后期限：11 月 21 日，呼市地区共登记了 70 人。其中，1945 年加入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的 23 人，1946 年的 33 人，1947 年的 10 人，而所谓 1962 年以后加入的只有 4 人。这些人都是被逼无奈才来登记的。

10 月 31 日，八届十二中全会落下帷幕。

11 月 1 日上午，呼和浩特新华广场。这天，呼市军民又一次隆重集会，庆祝内蒙古革委会成立一周年。几乎就在同时，滕海清和吴涛等人飞回呼市。

11 月 3 日，自治区政府礼堂。为传达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精神，自治区革委会召开了直属机关干部大会。高锦明同往常一样，坐在主席台上。

此时，滕海清却判若两人，突然在讲话中狠批内蒙古前一阶段的右倾问题，宣布停止高锦明的工作。

本来，挖“内人党”刹车也是滕海清拍板通过的，在10月的电话和口头指示中，他也曾信誓旦旦地表示要承担责任。但几天之后，其态度便发生逆转。

就在同一天，内蒙古革委会第四次全体委员（扩大）会议正式召开。

会议日程是：一、3日至9日，以滕、吴指示为纲，全面揭批高锦明；二、10日上午吴涛传达党章（草案）和“九大”代表产生办法的决定，结合批判高锦明；三、10日下午至12日小组会继续揭批高锦明；13日吴涛传达关于刘少奇的审查报告，13日下午至14日上午，在批判刘少奇的同时，继续揭批高锦明；四、14日下午，高在大会检查；五、15、16日，大会批判高锦明；六、17日讨论纪要，18日滕海清做长篇讲话，19日通过纪要。

从此，高锦明成了管制对象，隔三差五便被批斗一次，一次，在批斗会开始前，他身染风寒。发了高烧，滕海清说：“跟上个医生，不行了打一针，还得斗！”

当时，高锦明是内蒙古的第三号人物，他的升降去留，是要经过中央批准的。四次全委会期间，滕海清找权星垣谈话说：“批高不是我们的意思，这次我到中央去，康老讲了他的问题，还给我看了一个名单。”

他也对李树德讲过："反高是康老点头的。"

11 月 23 日，呼和浩特的大街小巷新贴出了一批告示。酷寒中，神情严肃的人们三五成群，匆匆地阅读着那墨迹才干的大字：《中国人民解放军呼和浩特市公安机关军事管制委员会关于对"内人党"及其变种组织进行登记的第二号通告》。

《通告》说："时至今日，还有那么一小撮'内人党'及其变种组织的顽固分子，仍对我党政策置若罔闻，负隅顽抗，同时，在对'内人党'及其变种组织进行登记工作中受到右倾翻案暗流的严重干扰和阶级敌人的破坏，阻碍登记工作的顺利进行。"

为此，公安机关军管会宣布登记工作延期一个月，截止到 12 月 23 日结束。

与此同时，中国人民解放军呼市公安机关军事管制委员会和呼市群众专政总指挥部联合发布了《围剿"内人党"及其变种组织标语口号》，其中，总共拟定了 32 条标语口号，同《通告》并列张贴在一起。

第二天，11 月 24 日，《内蒙古日报》在头版发表了一篇社论：《一定要稳准狠》。标题以特大号字体排出，十分醒目。

于是，自治区各直属机关、各盟市旗县人民公社、内蒙古军区各师和各军分区，普遍举办了以挖"内人党"为任务，限制人身自由，以刑讯逼供为手段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

几乎就在为深挖“内人党”大造舆论的同时。12 月初，内蒙古革委会在原先的第二专案办公室之外，又成立了挖“内人党”领导小组，组长是李树德。

此时，内蒙古地区挖“内人党”的运动进入高潮。

在呼伦贝尔盟地区，商店柜台上写着：“喂!你是内人党，还不赶快去登记!你就是内人党，快去登记，赶快去登记，快!快!快!”

车站售票口贴着：“你是内人党，你想逃跑吗?逃不掉!快去登记吧!”

在满洲里理发店，一坐上座照镜子，镜上写着：“你看什么?你就是内人党!”

苏尼特右旗挖出了“内人党”的变种组织“统一党”、“沙窝子党”8000 多人。敖干希里大队通告全大队 14 岁以上蒙古人全去登记。67 岁老人达木丁曹，听说蒙古人都必须去登记，不然就被抓去批斗。于是反复背诵“统一党”三个字。然而到了大队登记站，受到惊吓给忘了，只好返回去背熟牢记再去登记。

内蒙古军区政治部是滕海清亲自抓的点,200 人打出 180 个“内人党”，其中死了 10 人。

12 月 2 日，内蒙古公安厅军管会主任宣布：“内蒙古公安厅是内人党指挥部、保卫部、苏蒙修情报部。挖出了新内人党 12 个支部，68 名骨干，200 余名党徒，内人党组织已

经摧毁。”

12 月 24 日，滕海清在《内蒙古日报》上发表《彻底围歼乌兰夫反党叛国集团的暗班子》。文章说：“一年来，我们大打了扫荡战，战果辉煌，横扫了一大片乌兰夫反党叛国集团分子。围歼这个暗班子，是一场大规模的阶级斗争，要调动千军万马，打真正的人民战争。围歼这个暗班子，要打进攻战，全面出击，分兵包围，一鼓作气，各个突破。”

北方的 12 月，正是寒冬腊月，“反党叛国”的“内人党”党徒们关在黑房子里，天天搞车轮战严刑逼供，迫索证据。受害者在痛苦磨难中煎熬。

锡林郭勒盟有一个旗党委组织部长，被长期关押刑讯，在第 285 天，终于被屈打成招，承认自己 1955 年参加了“内人党”，1956 年参加了“沙窝子党”，1959 年参加了“自由党”，1961 年参加了“团结党”，1963 年参加了“统一党”，1964 年参加了“青年党”，1965 年参加了“成吉思汗党”。

骑兵五师战士郭建奇，当他被抽打到 1600 次之后，请求去了厕所之后割开肚皮要挖出还在跳动的心脏，他说：“我不是内人党，你们不信。我把红心掏出来给你们看!”

乌拉特后旗干部吴青云，受刑难熬，为了剖白心迹喊了一声“共产党万岁!”招致舌头被割掉。

内蒙古地质局区测队革委主任深夜召开秘密会议，部署

零点行动。全队查点，共有 8 名蒙族职工。于是编了 24 个行动小组：负责抓人的 8 个小组，执行抄家的 8 个小组，突击审讯的 8 个小组。任务和目标明确，是蒙古人就抓，蒙古人都是“内人党”，用不着审问是不是“内人党”，只令他交代罪行。专业战斗队人员昼夜三班倒，发加班费，个个积极争先，打出成绩火线入党。各个专案组用刑各有花样，敢下毒手。打死了人，大年初一送尸回家，将“反革命”交给他爹娘。

阿巴嘎旗有一个牧民老太太被批斗多日，追逼交代“内人党”。她不知道为什么天天折腾她，后来听出大意是向她要“内人党”这么一个东西。于是第二天起大早就把自留牛赶往供销社去卖掉。然后将卖牛钱放到柜台上，要买“内人党”这个东西，回去好交任务。售货员哭笑不得，说：“我们这里没有‘内人党’，也不卖‘内人党’。”老太太非要买一个，多少钱都行。售货员没有办法，找来一个会蒙语的人给她解释“内人党”是非卖品。她这才怏怏而去。

严刑之下，专案人员所需要的口供源源而来，真可谓战果辉煌。1968 年 12 月，滕海清主持起草《关于“内人党”问题的汇报提纲》，执笔者正是“滕办”主任李德臣。

## 第 1064 回：诉冤状，千里向南奔北京

### 查历史，南京大学“清队”忙

就在滕海清踌躇满志，准备向中央报功之时，内蒙古干部群众反抗、抵制挖“内人党”暴行的声音，也不断传向北京。

随着运动的高压残酷，反抗行动也愈来愈激烈。锡林郭勒盟一位边境牧民逃出来，不向咫尺境外跑，而是骑上骆驼，千里向南赶往北京，找党中央、毛主席。边防派出所民警必力格，将毛主席像章别在胸部肌肤上，从戈壁滩奔向北京。

原在沈阳军区司令部当警卫营长的祁宝荣，文革前调入内蒙古军区，在步兵 30 师一团任副团长，被打成“内人党”后第一场批斗会就被打致死。

祸从天降，祁宝荣的遗孀在内蒙古哀告无门，便直奔沈阳，找到陈锡联，并通过他上告中央。

北京军区党委也接到内蒙古军区干部战士的大量申诉信和求救信。1968 年 12 月，北京军区副政委张南生和干部部部长曹振东，率领一个工作组前往内蒙古军区调查情况。从 12 月 20 日起，由吴涛主持内蒙古军区党委开会，张南生、曹振东到会，听取了肖应棠代表军区党委所做的汇报。当时，滕海清又回北京了，在呼市的内蒙军区常委刘华香、刘彬、王弼臣和党委委员郭云昆等都出席了会议。

在交谈中，张南生、曹振东他们明显地感到：内蒙古军

区领导思想非常“左”，在指导思想上把内蒙古看得一团漆黑，认为军区干部基础不好，是伪满时期留下的底子，不彻底翻不行。

曹振东和工作组一起到内蒙军区的几个学习班做实地调查，发现存在着“三多”现象，即：关押的人多，打死的人多，逼供信的花样多。比如说“烤烧鸡”，就是把人按在火炉旁烤。还有“闷豆芽”，是用棉被盖住人脸使其窒息。再比如将人手用力向内扳的“吃猪蹄”，把方凳翻过来，强迫人站在凳子腿上的“鸭子浮水”等等，一共百十种刑罚。

曹振东也是枪口刀尖上闯过来的人，对这些花样繁多的刑罚，竟闻所未闻。 张南生在内蒙古军区党委会议上指出，内蒙古清队运动的打击面已经宽了，发生了“左”的偏向。

北京军区工作组在呼和浩特待了 20 多天，于 1969 年 1 月中旬返回北京，向北京军区党委作了汇报。政委陈先瑞主持听取汇报后。指示张、曹二人向在北京的滕海清介绍在内蒙古军区了解到的情况。

张南生和曹振东驱车直奔滕海清家。然而，滕海清正看好内蒙古的“清队”形势，对逼供信和打击面过宽的问题满不在乎，认为只是运动当中的支流。

与此同时，滕海清还几次向内蒙古打电话、捎信，指示不得把“打击面宽了，制止逼供信”等意见写在决定上，还指出军区党委通过的决定是右倾的表现。

吴涛左右为难，只好请示上级，将电话打到北京军区党委，找政委陈先瑞。

陈先瑞的意见是：军队“清队”运动和地方上是一致的。滕海清在北京，他知道中央的精神，内蒙古的工作按照滕海清的意见办就行了。

滕海清从内蒙古调了几枝笔杆子来北京，准备一篇长文：《从“二月逆流”到“九月暗流”》，对 1968 年 9 月内蒙古转瞬即逝的防“左”运动严加批判。

原来，内蒙古革委会核心小组大多数成员事先不同意写作该文，所以滕海清悄悄把人马调来北京，在半秘密状态下策划炮制。文章写成后，核心小组其他成员仍不同意公开发表，以为把“九月”与“二月”相提并论，上纲太高了。

但滕海清仍一意孤行，下令在《内蒙古日报》、《工人风雷》、《红卫兵》三家报刊上联合发表。这时，已是 1968 年 12 月 31 日。

但此时，中央对内蒙古抓“内人党”扩大化似乎也没有察觉。2 月 4 日，北京人民大会堂。晚 20 时整，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接见了滕海清，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黄永胜、吴法宪、谢富治、温玉成和汪东兴都到场了。

腾海清先汇报了内蒙古挖“内人党”运动的情况，手中拿的稿子就是李德臣起草的《汇报提纲》。

在汇报过程中，滕海清提出要增加内蒙古革委会副主任和常委，这时，康生插进来说："要看一看，不要急于增加，清理阶级队伍后增加更有把握。不仅内蒙古有这个问题，北京、上海和其他省市都有这个问题。"

姚文元称赞说："内蒙古清理阶级队伍工作开展得较早，有不少经验。"

康生接着讲："内蒙古的敌人很多，有伪满洲国的，有伪蒙疆的，有傅作义的，还有乌兰夫的。"

周恩来对滕海清说："解决内蒙古问题需要一个过程，要花时间，你们的步子太快了，中央从来没有督促你们，你们不要急嘛。清理阶级队伍要注意掌握政策，要扩大教育面，要缩小打击面。"

江青把话题拉回到革委会增加新人的问题上，说："革委会刚成立，混进少数坏人是难免的，只要领导心里有数就行了，对这些坏人可以不采取很快作组织处理，防止反复。"

张春桥说："内蒙古的形势好！对挖出的这些人处理不处理，除对山西有影响外，对其他地区不会有影响。你们要顾全大局，不要急于组织处理，防止敌人对革委会各个击破，防止反复。"

江青说："'内人党'是专门搞破坏活动的，要狠狠地打击。"

谢富治插话道："'内人党'明里是共产党，暗里是'内

人党’，要把它坚决搞掉。”

康生也说：“内蒙古军队里也有‘内人党’，这个问题很严重，成了‘内人党’的部队，对这个部队要改造。”

江青说：“内蒙古边防线那么长，骑兵到处跑怎么得了。”

接着，针对内蒙古的情况，周恩来指示滕海清说：“第一，对草原一定要很好地保护；第二，对国防工厂的生产要好好地抓。国防工业的生产计划完不成，你们的产值也就完不成。”

时间悄然流逝，接见会从晚上 20 时一直持续到午夜 24 时。

康生在接见会快要结束时，提到了高锦明，说：“高锦明的问题很严重，他的历史问题不清楚，还有三反言论，去年又犯了右倾错误，搞反复。”

康生还说：“群众运动中出现支流是难免的，高锦明的错误是把支流看得过重。你们要把‘内人党’的组织搞垮搞臭，要打击少数。”

这次中央文革碰头会对滕海清又是一次莫大的鼓励。

1969 年 2 月，滕海清在北京解放饭店召集内蒙古各盟市革委会负责人开会。会上，滕海清把内蒙古的“挖肃”成果说得天花乱坠，同时继续反右，不点名地批评了吴涛。当时，吴涛没来开会，留在家中主持工作。

会间，权星垣曾提出：内蒙古挖“内人党”成绩是有的，可是，是不是搞的面宽了？

滕海清问：“你是‘内人党’的总书记吗？”

权星垣一时张口结舌，说不出话来。

滕海清接着说：“你要不是‘内人党’总书记，怎么知道每个单位有多少‘内人党’？你无非是说我‘左’了，要是有一个单位有500个‘内人党’，我打了1000，你说出来，我就承认搞错了。我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成绩永远是主要的！”

1969年2月，内蒙古军区招待所，一次全自治区范围的“内人党”罪证展览在这里揭开了帷幕。展览中，除“内人党”外，还有所谓“内人党”变种组织的“罪证”，比如统一党、独立党、自由党、团结党、呼和浩特蒙古党、真理党、哈拉哈高勒党、蒙古联合党、成吉思汗党、沙窝子党等等。

之所以冒出这么多变种组织，是因为在严刑逼供下，受害人常常因不知道“内人党”这一名称而乱说一气，各级革委会和群专指挥部无奈，只得将之统统归为“内人党”的所谓变种组织。

在这次展览会之后，内蒙古革委会第二专案办公室将部分图片编辑成册，作为“内人党”反革命集团罪证，在全自治区范围内层层下发，配合正值高潮的揭挖运动。

2月26日，内蒙古革委会又通过了一个《关于对待“新

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的若干规定（草案）》，同以往的同类文件相比，没有增添什么内容。

3 月，内蒙古革委会起草《关于“新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几个问题的报告》，正式上报给“毛主席、林副主席、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国务院、中央军委”。

1969 年 3 月，原内蒙古区党委书记处书记、时任内蒙古区革命委员会常委的权星垣，他的妻子突然被审查，白天接受批判，夜晚放回家，勒令其揭发权星垣的“问题”。专案人员对权星恒的妻子诱供说，权星垣介绍了两名“内人党”加入共产党，而这两个人同时把权拉入“内人党”，以便互相包庇，狼狈为奸。

权星垣坐不住了。在一次核心小组会上，他自动要求停止工作，说“免得组织上被动”。有人拍桌子说：“怎么，清队清到你老婆头上，你不干了？！”

吴涛淡淡地说：“要正确对待嘛。”

其实，此时吴涛的周围也是险象环生，自身难保。在 2 月 4 日，滕海清向中央文革碰头会汇报内蒙情况时，曾经说过“吴涛已经不可靠了，他是乌兰夫反党集团的人。”周恩来当即批评了滕海清。但事后，仍然有几个专案组在审讯时暗地里追逼关于吴涛的材料。内蒙古军区政治部挖“内人党”骨干马殿元，在宣传部副部长海山和教育科长赛希的专案组里，就要他们交待吴涛的“内人党”问题，他们屈打成招，

按照专案组的口径说了。

此时，社会上也人心惶惶，谣言四起，纷纷传说不久就要挖出一个更大的“内人党”来，这个人比乌兰夫小，但比迄今挖出来的还大。造反派的小报更加露骨，说是有一个掌权的“内人党”党魁，代号叫“口央”。“口央”组合不正是繁体“吴”字吗？

我们再看江苏。此时，南京大学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自 1968 年 8 月开始后，也已经进行了几个月了，每个工作人员的政治历史又都重新被筛查一遍。特别是 38 岁以上的人。因为当时 38 岁，建国时 18 岁，已经成年，有可能参加三青团、国民党、特务组织。除清查历史问题外，也要清现行问题，你是否思想反动、对现实不满，说了反党反毛泽东思想的话等等。步骤是：本人交代、群众检举揭发、组织派人内查外调，务使每人的历史清澈见底。工军宣队领导动员大家，揭发一切可疑的人和事。大家冥思苦想，竭力挖掘。这时，有人说，他在图书馆三楼阳台墙上，发现有用红硃砂画的国民党党徽，现在颜色褪了，不认真看，看不出来，好像解放前就有了。

“有这样的反动图案？”大家都很吃惊，一齐上楼看。确实，尽管已很模糊，认真看仍可辨认。那么，这是谁画的呢？摸来排去，结果排查到了揭发人的头上，因为只有他解放前在这里，还知道是用什么材料画的，图案几乎看不出了，

别人都没看到，因为是你画的，你心里有鬼，想洗脱干系，所以主动揭发……揭发人当然不承认是他画的，又没有证据，排查好几天，定不下来，只好暂时挂起来。

又有人揭发，做摄影工作的老何行动反常。他每次开门、打电话，都用拇指和食指捏住把手，说是怕传染疾病。“我们用五个手指开门和拿电话听筒，没见谁传染上什么病。他这样做就是怕留下指纹。”“什么人怕留指纹呢？那就是特务，他们处处小心怕留指纹……”

老何急得面色发紫，嘴唇哆嗦地说：“你怎么能这么说呢？你怎么能这么说呢？我明明是怕传染肝炎，大家都知道的么！”

其他人也不以为然，没人附和。

但老何依然愤愤不平，又提心吊胆，自己毕竟在国民党部队里干过，腰杆不硬。

流通组里，有人揭发老章的反动言论：“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他说每年节假日前，学校保卫科都给各单位发通知，什么提高警惕，严防特务破坏，年年如此，特务在哪里？一个没看见。

这句话问题不大，检讨一下过关了。

图书馆年纪大的人多，他们在旧社会干过事，多少都有些历史问题，就成了清队对象。没多久，就清出解放前参加过国民党的、当过中学教导主任的、地主分子、右派分子等

等。每天早上学习前，让他们在图书馆大门外站成一列，低着头、苦着脸，口中念念有词的向毛主席请罪。请罪词是：

“我是牛鬼蛇神，我有罪，罪该万死，我向伟大领袖毛主席请罪。我要彻底坦白交代罪行，改恶从善，争取宽大处理。”

这几句要反复念，直到专案组人员来，勒令他们写交代，或到组里受批判。

有一位 50 多岁的胡女士，参加过国民党，因此反复追问她在国民党里干过什么坏事？组长要求每人动脑筋，想出问题追问她，抓住她自相矛盾的地方进攻。问的问题很多，也很细，时常问得胡女士张口结舌，答不上来。但是，她始终说自己是集体参加的，既没有参加过活动，也没有开过会。于是说她不老实，叫她站起来，站了一会儿，又让她坐下，继续端正态度。如此反复，始终没有进展。后来，工军宣队张连长到图书馆主持工作，他想有突破、出成果，搞了奇招。

这一天，全校在大操场召开第一次宽严大会，各单位排队进入指定位置，还有外校不少人前来观摩学习。大家坐在地上，认真地听军宣队领导讲话。忽然听到主持会议的人宣布：“大家注意了，下面，把一个国民党特务分子押上台！”

全场的人四下搜寻国民党特务在哪里，只见两个专案组人员突然跃起，迅速揪起图书馆那个矮小瘦弱的胡女士，像抓小鸡似的，按住她的双臂，一路小跑奔向主席台。全场响

起震耳欲聋的口号：

“打倒国民党狗特务胡某某！”

“胡某某不投降就叫她灭亡！”

“坦白从宽，抗拒从严，顽抗到底，死路一条！”

胡女士晕头转向，脸色煞白。但是上了台后，仍然努力抬起头，用沙哑的声音竭力高声说：“我不是特务！我不是特务！”

这一从未有过的创新之举，不要说当事人被吓得一佛出世二佛升天，连参加会的群众都惊得心头扑通、扑通地乱跳。图书馆的人个个目瞪口呆。

但是，台上的胡女士态度更加强硬，斩钉截铁、翻来覆去就三句话：“我是集体参加国民党的，我没干过坏事，我不是特务。”

最后也没查出她的其他问题。关于特务一说，更是子虚乌有。

1969 年 2 月 13 日，南京大学教务长兼科研处处长杨世杰割腕身亡。杨世杰解放前是原中央大学地下党。文革开始后，他与南京解放前夕反蒋学生运动的参与者华彬清、余建华、谢家及等人被认为是国民党潜伏特务。随后，天文系朱耀鑫“畏罪潜逃”，不慎落水身亡。

## 第 1065 回：看北大，“清队”二十四人亡

## 惹众怒，全国指责杨保华

此时的北京大学，1968 年 9 月开始的“清理阶级队伍”正在继续。

1968 年 12 月，北大化学系成立了“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以批判 10 月发现的“0363”齐菊生写给陈醒迈、程汉良、刘立民的信为中心任务。参加学习班的都是过去“井冈山”的人，工宣队杨师傅挂帅。他说：

“你们这些人，过去与齐菊生关系密切，现在，你们是批判他的骨干，工宣队相信你们，依靠你们，写出有质量的文章，击中要害。”

参加学习班这十几个人心知肚明，诚惶诚恐，俯首是听，选择脱身，反戈一击。他们把齐菊生的信梳理出十几个题目，每人自选一个，关起门来写批判稿，先办了一个板报，然后准备面对面批判。

其中也有一人拒绝参加学习班，跟工宣队大吵大闹，他叫赵凯元。此人倔脾气，当年就总跟齐菊生顶着干，齐菊生拿他没办法。他是贫农子弟，工宣队对他也没辙。

一次召开小型批判会，齐菊生被拉来当面批判。学习班的昔日战友，此时轮番发言，炮火猛烈，情绪激昂。齐菊生把脸扭向一边，不屑一顾，表情木然。当有一个人发言时，他甚至向地上啐了一口唾沫。

不久，1969 年 1 月 8 日晚，化学系参加学习班的这十几个人也被隔离审查，交代问题。他们每天早晨和看守他们的同学一起站在毛主席像前“早请示”，晚上一次“晚汇报”。白天就是一句一句的念《毛主席语录》，然后写交待材料。每人面前是一支笔，一张纸，没有书，没有报，不许接触任何人，当然也没有人说话，不参加班级的任何活动。吃饭时与看守的同学两人一起去食堂。上厕所，看守的同学也要相跟到厕所门口。唯一定期进行“政策攻心”的是工宣队师傅，推心置腹，谆谆善诱，凡是审罪犯的话，几乎都说了。

据说他们也分为三等，最严重的关到 31 楼。二等不许出屋，吃饭有人送。最轻的可以外出买东西，但有人跟着。

被审查的人没有别的事可做，每天冥思苦想，回忆文化大革命中的每一幕往事，每一个细节，自己的每一言，每一行。

工宣队的师傅会反复给他们讲一个道理：“你如果不交代，没关系，我们把你挂起来，你档案里会有一句话‘有重大问题没有交代清楚，请继续审查’，这个结论会跟你一辈子，没有单位敢要你，没有人敢接近你。你将一辈子背黑锅，一辈子受审查，一辈子查不清，永生永世不得翻身。历史不清白没有关系，不清楚问题就严重了，多少人因为历史的问题没有结论毁掉了一生。你是要趁着有工宣队帮忙把问题搞

清楚呢？还是要带着污点在以后被审查一辈子呢？我们是在帮助你呢。”

一个对自己前途本来有着美好憧憬的大学生，这些话是何等的残酷！被审查的学生面临着“不清楚”和“不清白”的两难选择。无论哪一个，都会让他一生都生活在痛苦的阴影中：以后每次运动到来，他都要被揪出来示众。没有运动他也要夹着尾巴做人，永远抬不起头，一辈子唯唯诺诺。这真是年轻学生的软肋。

很多被审查的学生痛不欲生，百爪挠心，精神崩溃。他们对文革中的“不健康思想”开始检查，反省，字斟句酌，反复推敲，不吝啬上纲上线的大帽子，又要小心翼翼让每一个落在纸上的事实空洞无物。因为他们知道，自己此刻写的每一句话，都是白纸黑字，将来全是反对自己的证据，所以写了又改，改又了写，既能应付，又定不上性。反正有的是时间，每天就琢磨这点事。只盼着有一天开恩，工宣队能放自己一码。他们当中，有的死磨硬抗，有的胡乱交代，有的是雷声大雨点小。

1969 年 2 月 22 日晚上，北大化学系被审查的学生李人杰以上厕所为名，趁着看守他的人不注意，逃出了 31 楼，逃出了学校。风高月黑，寒风凛冽，他不停的奔跑，义无反顾，一直跑到 30 里以外的清河，在一个老乡家门口的大树上，用自己每天佩带的紫红围巾拴了一个套，吊死了。据说

第二天清晨大早，老乡一推开门，竟看到树上挂着一个人，连忙报案，在北大派人领取尸体时，这人还在抱怨坏了他家的风水。

在李人杰吊死的大树周围是无数转圈的脚印。也许他是在寻找合适的位置悬挂围巾？也许他是在最后的关头闪出了对人生的留恋？不得而知。

后来有人告诉李人杰的要好同班同学唐利，说李人杰死前的交代里曾这样讲："我最恨我们班三个人，吕成信，杨惟立和唐利，是这三个人把我这个天真幼稚的青年带上了反革命道路。"

闻听此言，唐利的心在哭泣："小白毛，你死得凄惨悲壮，死的不明不白，死不瞑目啊。"

"小白毛"是李人杰的外号。

唐利后来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在那个被精神折磨生不如死的日子，就是我自己，何尝又没想过李人杰这条路呢，只不过实行起来也不那么容易。我们有人把写的材料撕个粉碎，从窗户跳出去，准备一死了之。那只是二楼，摔个屁股墩，还得推开工宣队的门，低头认罪。姚建明则把开关拆下来，线拴在手上，以此触电而死。人没有死成，两个手指被电火花打在了一起。"

死人事件没有阻挡工宣队、专案组前进的决心和脚步。他们在二教召开了李人杰批判大会。

李人杰姐姐来北京处理后事，就是领取骨灰，听取宣布反革命的决定。没有致哀信，没有抚恤金，只有冷冰冰的面孔，硬梆梆的语言。没有遗物，他的东西在武斗清楼时全丢光了。没有遗书，走得毅然决然，不留之言片语。姐姐要看遗体，拒绝了。见见老同学，拒绝了。是啊，她一个反革命家属，和反革命只有一步之遥，有什么理由提要求呢？

北京大学在这次“清队”中死了 24 人。

化学系三班的陈子明是“慨而慷”成员。因为是工人出身，大联合后被结合到班领导小组，成了“井冈山”仅有的领导成员。

这天，陈子明被拉倒了批斗台，站在中央。他本来就有点结巴，那天为自己辩解时更说不清了。

原来，工宣队审查樊能廷，啃不动。樊能廷水来土顶，兵来将挡，总是有词搪塞。于是工宣队怀疑有内奸。正好听说陈子明找了一些“井冈山”的人，告诉他们不要惊慌，沉住气，没有了不起的事。于是工宣队认为是陈子明在给他们通风报信，于是便以此为理由，把他清理出“领导岗位”。

再说山东青岛革委会主任杨保华在 1968 年 11 月的“1117 讲话”在全国散发后，受到多个省市造反派的欢迎，同时也受到多个大军区司令、政委、省市革委会主任的批评。

浙江金华的造反派则首先在《金华日报》上转载了青岛杨保华的“1117 讲话”。全国著名造反派，浙江的翁森鹤认

为杨保华讲得对。

1968年秋，武汉造反派在斗、批、改和清理阶级队伍中，日子很不好过。这年年底，大、中学生大批毕业离开学校到军垦农场、上山下乡。而随着清理阶级队伍运动的开展，武汉各单位纷纷举办“不准打电话、不准打电报、不准写信、不准外出、不准会见来访人员”的“五不准学习班”，以批判派性和“捅马蜂窝”的名义，将大批造反派头头作为审查对象参加到学习班，有些人还被设立专案审查。在各级革委会中的造反派头头，其政治地位受到动摇，群众代表的作用也基本失去。

1968年10月，《红旗》杂志社论：《吸收无产阶级的新鲜血液—整党工作中的一个重要问题》中提到“反复旧”。武汉造反派认为湖北武汉就是《红旗》社论所指的“只有形式上的三结合而不是革命三结合”。在革委会里，干部代表不起作用，群众代表只是个花瓶和陪衬。很多人认为，“三结合”的各级革命委员会其实已名存实亡。

这时，吴焱金看到青岛杨保华关于“反复旧”的“1117讲话”，引起共鸣。他把杨保华的讲话稿带到了武汉工代会常委会。工代会负责人、“工总”宣传部长田国汉要把杨保华的讲话刊登在《武汉工代会》报上，吴焱金签字同意。为此湖北省革委会的军、地领导曾思玉、刘丰、张体学、张玉华把吴焱金他们找去谈话，批评他们刊登杨保华的讲话是错

误的，说“杨保华的讲话通篇只有一个地方提到毛主席，两个地方提到林副主席，18个地方提到了王效禹”。

江苏徐州的杨正祥等人也响应王效禹的号召，迅速行动，以“反复旧”为名，于 1969 年 1 月 14 日，第三次冲进徐州警备区，砸了警备区大门并焚烧牌子。紧接着 27 日冲击公安局，将军管会孙主任打成重伤。

1968 年 12 月 12 日，河南革委会三巨头刘建勋、王新、纪登奎召开全省地市县革委会党员代表大会，刘建勋开头就讲：“今天我要讲的不是什么总结报告，前天王政委（王新）的讲话就是我们这次大会的总结。这里，我只就最近议论较多的反复旧的问题发表一点意见”。“在全省的范围内刮起了一股妖风，这股妖风就是利用反复旧这个革命口号刮起来的”，“这股妖风刮遍了全省。有的地方，几个反动的多中心论者经过周密的计划，一夜之间大字报贴满了全城，喇叭上街，揪斗革委会的工作人员”等等。刘、王、纪 3 人点名批实施“反复旧”的造反派，王效禹在山东讲话批刘建勋和纪登奎是“干部上台，思想回潮”，“右的表现”。他还布置《大众日报》发表专门针对河南的两篇文章《秋后算账派可以休矣》和《彻底砸烂唯成分论》。

山西造反派印发杨保华“反复旧”的讲话，要刘格平向杨保华学习。

甘肃著名造反派张恒云 1968 年 12 月专门到青岛向杨保

华取经，1969 年 1 月 10 日，兰州热电厂大量印发《紧急呼吁》。20 日，兰州《工人战报》转载浙江《金华日报》刊登的杨保华“1117 讲话”。 1 月 22 日，兰州军区政委、甘肃省革委会主任冼恒汉在省革委召开的兰州地区工宣队、军宣队、县以上革委会主要负责人会议讲话斥责说：

“有些工宣队、军宣队对当前兰州地区出现的一股反动逆流，要求兰州地区、省革委会讲一讲”，“兰州市这个月的 10 号出现了一张《紧急呼吁》的大字报，说是‘打击了造反派’，‘复旧’”，“这个总后台，他们说是张、冼，就是张达志、冼恒汉。好，我们等待他来揪”。“一个《工人战报》大量散发，把山东杨某的讲话，在一些单位，作为学习班的文件，作为清理阶级队伍的依据，以这个来代替毛主席的批示和北京新华印刷厂革命委员会在对敌斗争中坚决执行党的‘给出路’的政策的经验，代替十二中全会公报，代替元旦社论。杨某的讲话是错误的，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

冼恒汉狠批兰州工代会按照山东、青岛“反复旧”的宣传资料，准备在甘肃实施“反复旧”的活动。

得知兰州军区对山东“反复旧”的态度后，山东青岛的杨保华和鞠维信在济南发表谈话，认为兰州军区“镇压造反派了”，准备以青岛市革委会名义公函兰州军区。

江西程世清则把搞“反复旧”的省革委会副主任万里浪

撤职查办。程世清原任驻山东 26 军政委，王效禹说“江西省革命领导人是我派去的”，“到了江西变右了”。

福建的老造反借“反复旧”，重新拉组织抢武器并且打死了人。韩先楚及时出手，予以镇压。王效禹指责福建是军人掌权，造反派没有活路。

## 第1066回：陈伯达，写“九大”《政治报告》

## 周恩来，安排四帅下工厂

2月2日晚，周恩来、陈伯达、江青向毛泽东报送《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关于九大准备工作的通知（草稿）》。报告中说：

昨今两晚，我们经过讨论，拟了一个为九大进行准备工作的议程（草案），请予审阅。请求主席、林副主席在最近一两天内约碰头会全体同志开一次会，我们将陈述准备工作的情况和意见。

报告还说：

考虑到各单位的九大代表需要进行一些准备工作，拟好了一个通知，请予审批。

毛泽东当天批示：“一两天内谈一次，另件照发。”

毛泽东在国务院秘书厅信访室1969年1月11日编印的《人民来信摘报》上看到有人主张江青为九届中央委员候选人，并应成为常委兼中央组织部部长时，批示到：“徒有虚名，都不适当。又，李讷、毛远新二人不宜为代表。”

在“九大”的各项具体准备工作中，毛泽东最关心的是九大报告的起草。2月7日下午，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118厅召集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开会。他说：

“要研究1967年2月开展‘三支两军’工作以来的过程，了解派工人宣传队和解放军宣传队到学校、工厂、机关

后的情况，抓住少数单位，研究这些单位的材料，看看有什么变化。”

针对当时许多部门召开“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的情况，毛泽东说：

“开什么‘积代会’呀？要注意这些问题，不要搞这个站队那个站队。”

谈到群众运动时，毛泽东说：

“文化大革命开始，学生是起了很大作用的，对发动工厂的工人和农民起来革命是起了作用的。后来就打内战了，不那么听话了。1967 年我在武汉时，他们就不大注意掌握大方向了，方向就有些变。”

谈到一些自然科学家能否当九大代表时，毛泽东说：

“总是要相信一条，资产阶级个别人物可以背叛他们自己的阶级，跟着无产阶级走，不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都不能相信了。”

关于“九大”的筹备工作，毛泽东提出：

“政治报告由陈伯达牵头起草，张春桥、姚文元参加，林彪同志挂帅，2 月 20 号搞出初稿，报告写出来后才好开会。在报告里讲几个里程碑，我就不赞成。”

毛泽东说的“几个里程碑”是指当时把毛泽东思想说成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第三个里程碑。

林彪从毛泽东处开会回来，将秘书张云生、李春生叫去，

慢吞吞地说：

“主席召集会议研究决定，准备最近召开‘九大’。主席让我做政治报告，并说，这次政治报告不用事先写成稿子，叫我口头讲，然后再整理一下。如果需要对外发表，就摘用记录稿。我提出，如果党代表大会上正式作报告，最好请中央文革给写个稿子。如果必要，可以像七千人大会那样，我另作一个口头报告，但对外发表，还是以中央正式通过的稿子为准。主席同意了，最后决定由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3个人组成一个小组，起草政治报告。”

林彪停了一下，又说：“但是你们都知道，我向来不习惯念别人写的现成稿子，而只愿意自己顺口讲。因此，我想搞个平行作业，既准备一个正式发表用的稿子，又准备一个我口头讲话用的‘条子’。这个‘拉条子’的任务，由你们帮助我来搞。我这次作口头讲话，还是用十二中全会讲话的那六个题目。”

林彪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讲话时说的六个题目是：文化大革命的意义；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文化大革命中的两条路线斗争；毛主席对马列主义的发展；中国革命在世界上的作用；今后怎么办。

林彪授意后，张云生和李春生即向叶群请示如何具体搞。叶群说：“首长叫拉条子，你们就拉吧。但我看不能指望拉条子。老夫子是大秀才，还有张、姚两个笔杆子，人家

写的东西不比你们强百倍！就是拉条子，光靠你们两个加上老虎也不行，还得另调人。……”

叶群又分别从空军、沈阳军区以及军委办公厅调来几个“笔杆子”，帮助林彪“拉条子”。

再说陈伯达，他 2 月 7 日夜里从毛泽东处开完会，兴冲冲的回到家里。一进大门，没有像往常一样，先去自己的办公室，而是直接来到秘书的办公室，进门便没头没脑地对秘书王文耀和王保春说：“快给我准备准备！”

看他兴奋而严肃的样子，两个秘书不由得问道：“准备什么？”

陈伯达想了想说：“嗯，准备材料、纸和笔。中央、主席决定让我起草‘九大’报告。”

“都有谁参加？”

“还有上海那两个，主要是我自己写。” 陈伯达随口说道，又沉思了一会儿，接着讲了一下中央碰头会决定召开党的“九大”和起草政治报告的情况，说时间只限一个月完成，写什么内容没有讲，由他自己考虑。

王保春提出：“是否找几个人帮忙，如《红旗》杂志、政研室的同志。”

陈伯达说：“不要。《红旗》杂志姚文元在管；政研室嘛，可以找几个。你去组织一下，人员你去选，不要出了名的名人。”

王保春从政研室选了几人，组成了一个班子，集中在沙滩的办公楼里。陈伯达去看过他们两次，先给他们讲了主题思想。怎么写，写什么，则由他们自己研究决定，并说："你们觉得应该写什么就写什么。"

陈伯达很快拟了一个提纲，题目是《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下列了几个小标题。他带着这个提纲，又去和林彪商量。从林彪哪里回来后，改成总题目下面十个小题目，然后由秘书一字一字抄清。陈伯达又一字一句地核对一遍后，亲笔给毛泽东写了一个报告，并于当晚，亲自将报告附上提纲呈送毛泽东。

毛泽东提出了一些修改看法，并提出："邓小平打过仗，与刘少奇不一样，报告中不要提他。"

陈伯达坐在毛泽东旁边，一字一句地记录下毛泽东的意见后，交毛泽东过目。毛泽东当即圈阅退回。

陈伯达把毛泽东的意见报告了周恩来，但没有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打招呼，而是自己关起门，起早贪黑地写起来了。

不久，姚文元来电话，问陈伯达起草报告怎么进行？陈伯达不接电话，让秘书答复说："告诉他们：你们觉得应该写什么就先写吧，我有些身体不舒服。"

张春桥也来电话，问陈伯达怎么办？是否谈一谈？

陈伯达也是用同样的办法让秘书答复："不是有个提纲

吗？让他俩自己觉得应该写什么，就先写着吧。”

秘书说：“你这样把他们拒之门外，他们是会向上报告的。”

陈伯达说：“不管他，中央决定主要是要我来写，他们就是想要塞进他们那些东西，这次我就是不让他们参加。”

张春桥、姚文元又来过几次电话，以后再也不来电话了。

不久，毛泽东明确说：陈伯达是起草“九大”政治报告小组的组长。

2 月初，经周恩来提议，毛泽东批准，叶剑英、陈毅、聂荣臻、徐向前到工厂去搞蹲点调查，也是接受再教育。周恩来亲自选定由 8341 部队负责支左的 4 家工厂：南口机车车辆修配厂、新华印刷厂、“二七”机车车辆厂、化工三厂。这 4 家工厂也是毛泽东亲自抓的“六厂二校” 中的典型。陈毅到南口机车车辆修配厂，叶剑英去新华印刷厂，徐向前在“二七”机车车辆厂，聂荣臻在化工三厂。周恩来向各厂负责人就四位老帅蹲点时的劳动、休息、饮食、安全及职工应持的态度等作了细致交代。

2 月 4 日，聂荣臻给周恩来的信中说：“明天起，我即到化工三厂去，每日去半天，一定好好利用这个机会，当个小学生，认真向革命群众学习。”

但是，当时化工三厂的生活条件简陋，对一位年已七旬、又体弱多病的老人来说，困难还是很大的。例如，工厂没有

卫生间，只有一个简单的露天厕所。小便还好说，但碰上雨天，也是够狼狈的。大便则蹲下去以后就起不来，得靠别人搀扶。后来工作人员设法做了个木架子带到工厂，下面放个脸盆，可以坐在上面大便，才解决了这个难题。工厂没有沙发椅，连靠背椅也很少，经常是坐在长条木凳上开会，一坐就是一两个小时，回来后就反映腰酸腿痛。

即便如此，几位老帅基本上一直坚持，风雨无阻。

2 月 19 日下午，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 118 厅主持召集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和李富春、李先念、陈毅、徐向前、叶剑英等人开会。毛泽东对陈毅、徐向前、叶剑英等人到工厂做调查研究表示肯定，他说：

“你们可能变成先进的。有的人得了彩就认为了不得。中央文革应该引起注意，你们从马列主义的书上找不到有成绩就摆功劳的话，只要有缺点，就要进行自我批评。中央文革要到下面去走一走，否则要落后，要统一安排一下，不能走马观花。这些老同志下去有好处，研究工业、农业、教育，老同志可以多带点人去。许多方面要改革，怎样搞社会主义，就是不懂。”

陈毅谈到工厂里关了一些人时，毛泽东说：

“只要不杀人，不放火，不放毒，写一点反动标语，你把他关起来干嘛？！说有些人是‘三反’，我就不信。说错话，说气话，总是有的。”

毛泽东这里说的“三反”是指当时经常提到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简称为“三反”。

毛泽东又说：“你们几位老总研究一下国际问题，由陈毅挂帅，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参加。只要不杀人，国际问题有些怪，美英报纸经常吹苏联要出问题，苏联要在远东搞演习，又不声张。还有我们从来不理什么承认不承认的问题。最近意大利、加拿大要承认我们，蒋介石有些慌，日本有些不安。日本人民对日本政府跟美国走不高兴。研究国际问题要注意哪一些我们不注意的国家。还有一件事，”他问李富春等人：“今年的计划，五年计划还有两年，你们在搞吗？”

李富春答：“现在正在搞。”

毛泽东又说：“教育要改革。国内问题要注意调查研究，搞点材料，提出意见。”

毛泽东问陈伯达：“你报告写得差不多了吧，20 号交卷有希望吗？你们 3 个人要一齐找林彪同志谈一谈。”

他说：“报告不要搞那么长，长了没有人看，有万把字就行了。搞不出来，就搞那么几条，林彪同志去讲，讲了以后再整理。列宁讲话，从来不用稿子，斯大林不同，是写好稿子再去讲。”

散会后，林彪回到毛家湾，让秘书打电话，请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到毛家湾谈起草“九大”政治报告的事情。

当 3 个人在林彪家的客厅中坐定后，林彪开门见山，谈了自己的一些意见，并且强调参考 1968 年 3 月 30 日《人民日报》社论中毛泽东的最新指示。

这篇社论中传达的毛泽东最新指示中有这样的话："革命委员会的基本经验有三条：一条是有革命干部的代表，一条是有军队的代表，一条是有革命群众的代表，实现了革命的三结合。革命委员会要实行一元化的领导，打破重叠的行政机构，精兵简政，组织起一个革命化的联系群众的领导班子。""要相信和依靠群众，相信和依靠人民解放军，相信和依靠干部的大多数。"

大约不到一个小时，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 3 人从林彪屋里出来，林彪秘书张云生听到张春桥、姚文元都对陈伯达说："你就先动笔吧。需要我们时，就随时找。"然后分别登上自己的汽车走了。

1969 年 2 月，北京军区政委谢富治召保定 38 军政委王猛到京，与郑维山一起向他宣布：保定问题，由 38 军负全责，北京军区不要介入，河北省革委会不要介入，河北省军区更不要介入。今后，保定问题直接报告谢富治。

当时，北京军区政委有三位：李雪峰、谢富治、刘格平。李雪峰为兼任，刘格平常驻山西。

2 月 24 日，军委电报：经毛泽东批准，决定将 38 军组编为摩托化军，辖：三个摩托化师和军直炮兵团、火箭炮团、

高炮团各一个。各摩托化师辖：三个摩托化团和坦克团、炮兵团、高炮团各一个。翌年 10 月，全部完成组编任务。38 军成为全军首个摩托化军。

按照毛泽东的意图，周恩来指示外交部和其他外事部门将涉外文电及时分送陈毅、叶剑英、聂荣臻、徐向前四位老帅。他让四位老帅每星期二至星期四在工厂“蹲点”3 天。其余时间，由老帅们自行支配，可以抽空看看有关国际问题的材料，再由陈毅主持，每月讨论两三次。

恰在此时，东北中苏边境的枪炮声震动了北京，也震动了世界。

## 第 1067 回：三月二，珍宝岛上起战端

### 发《照会》，中国政府提抗议

1969 年 3 月 2 日上午，黑龙江省军区公司边防站 30 人分两组到乌苏里江上的珍宝岛巡逻，与苏军发生激烈武装冲突。苏联边防军向中国军队发动进攻，开枪开炮，一辆装甲车进入江汊，威胁中方岛上巡逻分队侧后。中国岸上炮兵配合步兵予以还击，击毁苏军装甲车、指挥车、汽车各 1 辆。战斗于 10 时 30 分结束。中方死伤 52 人，苏联死亡 31 人，负伤 14 人，双方各自从岛上撤回。此后，中方据观察判断，苏军向珍宝岛方向增兵。于是，中方亦加强了兵力，并在纵深增调陆军第 67 师 1 个步兵团、2 个侦察连作为机动部队，以 2 个加农炮营和 1 个高炮营组成炮群，支援作战。

3 月 2 日，中国外交部照会苏联驻华大使馆，称：“一九六九年三月二日晨，苏联边防军侵入中国黑龙江省珍宝岛地区，开枪打死打伤我边防军人员多名，制造了一次极为严重的边境武装冲突。为此，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奉命向苏联政府提出最强烈的抗议。”“中国政府坚决要求苏联政府惩办这次事件的肇事凶手，立即停止侵犯中国领土和武装挑衅，并保留要求苏方赔偿我方一切损失的权利。中国政府再次严正警告苏联政府，中国的神圣领土是不容侵犯的，如果你们一意孤行，继续挑起中苏边境武装冲突，必将遭到中国人民坚决的回击，由此产生的一切严重后果，只能由苏联政

府承担全部责任。”

珍宝岛地处黑龙江省虎林县境内乌苏里江主航道的中国一侧，面积 0.74 平方公里。原与中国大陆相连，后因江水终年冲刷，1915 年形成小岛。由于该岛两头尖，中间宽，形状似中国古代的元宝，因而得名“珍宝岛”。当地中国居民祖祖辈辈都在这里从事生产和捕渔等活动。岛东与苏联隔江相望，相距 400 米。

这个珍宝岛历来就是中国的领土，即使按国际公认的以主航道中心线划分国界，珍宝岛也是属于中国。可是，从 1964 年开始，苏联就在他们的地图上把边界线画在黑龙江和乌苏里江的中国岸边，将珍宝岛划归苏联所有。

苏联也有理由，认为这种划线虽然违反国际公认原则，但原来和清政府签订的条约就是按中方一侧江岸来划线的。

中国边防军一直在这一地区执行巡逻任务。1960 年以后，随着中苏之间国家关系的日益恶化，中苏边界亦开始多事。1960 年，苏联边防军在新疆博孜艾格尔山口附近地区挑起第一次边境事件。嗣后，苏方不断破坏边境现状，干涉中国边境居民的正常生产活动，殴打、绑架中国边民，阻止中国边防部队执行正常巡逻任务等。1964 年，中苏两国举行边界谈判，苏方无视国际惯例，强称珍宝岛为苏联所有，不断进行武装侵扰，制造流血事件。从 1964 年 10 月至 1969 年 2 月，苏联边防军在中苏边境地区挑起事端达 4180 起。仅在珍宝

岛一处，从 1967 年 1 月到 1969 年 2 月两年多的时间里，苏联边防部队就入侵珍宝岛达 16 次之多。

1968年12月27日，苏联边防军出动装甲车、卡车、吉普车共7辆，人员75名，越过中苏两国边界线乌苏里江主航道，侵入珍宝岛，武装拦截、阻挠中国边防部队执行巡逻任务，当场打伤8人。

1969年1月4日，苏军30多人侵入该岛，强迫在该岛巡逻的中国边防部队人员离开。

1月6日，苏军再次侵入珍宝岛，抓走了两名捕鱼的中国公民。

对于苏军的多次挑衅，根据中共中央指示精神，中国边防部队一再采取克制忍让态度，未予还击。

1月23日，苏军出动76人，携带军犬，分乘4辆军车，在直升机的掩护下，突然袭击了正在珍宝岛上执行正常巡逻任务的中国边防军分队，打伤20多人，其中9人重伤。沈阳军区派出由副司令员肖全夫率领的一个工作组，前往虎、饶方向检查战备工作。

1 月 25 日，黑龙江省军区提出了反击方案，层层转报到沈阳军区、总参、中央军委直达毛泽东手里，并选定珍宝岛为还击重点，进行了比较细致的安排。

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沈阳军区令黑龙江省军区加强合江军分区的指挥和防御，又令陆军第 46 军 133 师两个侦察

排，第 23 军 67 师两个连，加强合江军分区所辖虎、饶地段边防力量。

军委指示沈阳军区成立虎、饶前线指挥部，由副司令员肖全夫、副政委李少元统一领导，黑龙江省军区、合江军分区、陆军第 23 军抽调部分干部组成。

黑龙江省军区在靠近珍宝岛的公司亮子村成立了由公司边防检查站站长孙玉国指挥的“公司临时指挥所”，由合江军区参谋长王子良负责，统一领导边防斗争。大批边防部队和野战部队云集虎、饶一带，随时准备出击。

苏联通过空中侦察也预感到边境要出大事，苏联滨海军区派出两个师在远离边境 100 公里外的地区进行演习以备不测。

2 月 7 日 10 时，中方两个巡逻组登岛巡逻。11 时前后，苏联边防军先后用冲锋枪射击和装甲车对中方巡逻分队进行冲撞等形式，阻拦中方巡逻，双方发生冲突。

这次事件后，2 月 19 日，总参谋部和外交部向沈阳军区、黑龙江省革委会、省军区发出指示：“同意暂时推迟在绥芬河边境架设铁丝网的斗争，选择珍宝岛作为边防斗争目标。2 月 7 日事件以后，必将有新的斗争。要求按既定巡逻线进行不固定的正常巡逻，一次派出 2—3 个组，兵力不少于 1 个加强排。自卫还击严格控制在主航道中心线中方一侧，行动突然，动作迅速。不纠缠，不恋战，取得胜利后，立即撤

至有利地区。同意增调 1 个侦察连参战。由合江军分区指定一名主要军政干部负责。”

根据这一指示，虎饶前指决定再次派出部队登上珍宝岛巡逻，并向珍宝岛地区中国一侧岸上派出两个步兵连、4个侦察排、1个无后坐力炮排和1个重机枪排，秘密掩护巡逻分队，遇到情况时即采取行动。

3 月 1 日和 2 日恰好是周六和周日，苏联边防军航空兵休息，2 日又是滨海区送别冬天的节日——谢肉节。再加上 3 月 1 日晚至 2 日凌晨下着小雪，周围白茫茫一片。

3 月 1 日，中国边防部队巡逻小分队在公司边防站站长孙玉国带领下执行正常巡逻任务。他们刚刚登上珍宝岛，对面苏军边防军观察哨便向早已有准备的苏军边防军发出信号，只见两辆苏军车辆迎面开来。

苏军伊万上尉第一个从车上跳下来，拐着一条腿，冲着孙玉国和巡逻分队边跑、边喊：

“站住，你们再往前走，我们就不客气了！”

他身后跟着 30 多名苏军士兵。随着伊万上尉的喊声，苏联士兵一下子全部散开，他们每人手中都有一根大棒，警惕的地盯着中国巡逻小分队。

“这是中国领土，你们必须马上离开！”孙玉国严厉地说。

伊万上尉和他带领的苏军不仅不退，反而破口大骂。

孙玉国提醒战士们：“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更不准先打第一枪，要严守巡逻纪律。”他们以沉默来回答对方的叫骂。

苏军边防军见中国边防军不说话，便举着大棒冲了过来，当场打倒了两名中国战士。

中国边防巡逻队没有还手，架着被打伤的战士撤了下来。

3 月 1 日 8 时，中国 133 师 1 个侦察连又两个侦察排，23 军 73 师 217 团 1 连及重机枪班，16 军 1 个无后坐力炮连

约 300 人奉命上岛设伏。他们冒着严寒，于 2 日 0 时进入伏击阵地，伪装以待。

3 月 2 日清晨，气温接近零下 30 度。上午 8 时 40 分，公司边防站派出 30 人分两组登珍宝岛巡逻。由公司边防站站长孙玉国带领的第一巡逻组组沿着冰道抵近珍宝岛，很快被对面苏军发现，从苏联境内下米海洛夫卡和库列比亚克依内两个边防站出动 70 余人，分乘两辆装甲车、1 辆敞篷卡车、1 辆指挥车，分别向珍宝岛飞驰而来，抢先赶到了珍宝岛的东侧，拦住了中国巡逻队的去路。

这一次，苏联方面没有像往常那样只带着木棒，而是全副武装。为避免扩大事态，中方的巡逻人员随即向后撤退。这时苏联方面突然摆开战斗队形，以一部兵力向中国边防巡逻组的翼侧穿插，想包围他们。就在这时候，中方的第二支巡逻组赶到了现场。双方处于荷枪实弹对峙的严峻气氛之下。

9时17分，枪声响起，中方巡逻第1组立即扔掉棒子，和设伏的1连开枪还击，毙伤敌数名。

究竟是谁先开的第一枪？双方各执一词。按照中国的说法：“苏方的一个上尉见我们的增援部队来到，指挥苏军突然对中国第一边防巡逻组开枪射击，打死打伤中国边防巡逻人员6人。我边防分队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开枪还击，一下子就打开了。苏联方面出动了装甲车，射击我方人员，而我们岸上的支援部队，一边开枪拦截，一边登上珍宝岛，营救

我已上岛的部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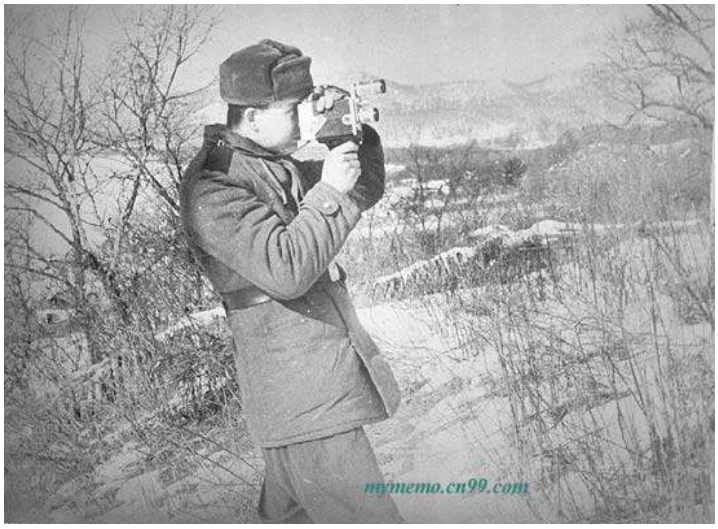
中国边防巡逻第二小组在班长周登国的指挥下，先敌向侧后的苏军射击，击毙下米海洛夫卡边防站站长伊万.斯特列利尼科夫上尉、克格勃巡视员布依涅维奇上尉以下 7 人。随后，中国边防巡逻分队发起反击，但遭到丛林中苏军的猛烈火力压制。中国边防战士于庆阳猛然跃起，向丛林苏军射击，吸引火力。苏军火力向他射击，击中他的头部，他倒下后不久，又顽强地站起，端起冲锋枪继续向苏军冲击，直至英勇牺牲，仍保持着冲锋的姿态。副连长陈绍光指挥一个班迂回到丛林中苏军侧后，但一股苏军又从他的侧后冲来，两面机枪夹击他们。陈绍光一面指挥分队英勇还击，一面向苏军一个机枪火力点冲去。这时他身受重伤，仍然坚持移动到有利位置，打掉了这个火力点后，倒在了血泊中。

9 时 22 分,苏军库列比亚克依内边防站站长维塔利·布必宁上尉带领的增援部队向中方岛上的警戒分队冲击，预伏的 133 师侦察连与 1 连协同作战，将敌大部歼灭。此时敌装甲车 1 辆迂回至岛西江汊。中方伏击分队在岸上火炮支援下予以还击。

经一个多小时的激战，至 10 时 30 分战斗结束，中方大胜。苏军死亡 31 人，伤 14 人，击毁其装甲车、指挥车和卡车，缴获了一批枪枝弹药。中方共牺牲了 17 人，重伤 11 人，轻伤 24 人，并有 1 名通讯员失踪。中方在战斗结束后即带

着伤亡人员从岛上撤回，苏联边防军随后派人登岛，将苏方伤亡人员运回己方一侧。

在珍宝岛战斗中的中国八五反坦克加农炮




彼得罗夫，苏军伊曼边防总队政治处士兵。 1969 年 3 月 2 日，在珍宝岛冲突中阵亡。 人们在他身上发现了一架照机，他留下了死前拍摄的最后 3 张照片。这是他生前（1969 年 2 月）的留影。

彼得罗夫遗作之一（1969 年 3 月 2 日） 这张照片发生在交火前。

1969 年 3 月 2 日，一队中国军人在珍宝岛的冰面上。这是苏军上尉彼得罗夫的遗作之二

珍宝岛上空的苏军直升机（1969 年 1 月 25 日）

苏联方向拍摄的珍宝岛全景（1969 年 5 月）

很快，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给军委打来电话报告。他在电话中非常兴奋，说战斗取得了胜利，只可惜没有抓到俘虏。

不久，沈阳军区的战斗报告送了上来，军委办事组立即将报告送到了毛泽东和林彪那里，毛泽东看完后说：“打得

好!”对周恩来说：“他们早就要打，开始是小打，再往后，可能是大打，这一点我们是早有准备的。来了，也不要怕，怕也没有用。”

他说，在九大代表里应该有珍宝岛的代表。

周恩来表示赞成。

毛泽东说：“我们不想打仗，首先是不怕，还是我过去讲的那些话，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珍宝岛很小，就那么一点，但是可以看出很多问题，不能大意，对政策性问题，要处理好，要把握主动，有了主动权才能应付各种复杂的局面。”

周恩来说：“我马上和肖全夫同志再谈一次，情况是很复杂，我们要头脑冷静，要有理有节，争取主动。”

随后，周恩来赶回西花厅，接通了沈阳军区，向负责作战的肖全夫副司令员转达了毛泽东的指示。

3 月 2 日当天，中国政府就苏联军队入侵珍宝岛向苏联政府提出抗议照会。3 月 3 日，《人民日报》发表这个照会。

## 第1068回：集北京，商议筹备开“九大”

## 三一五，珍宝岛炮火连天

3月3日，毛泽东圈阅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抗议苏修武装挑衅，组织群众游行示威的通知》。《通知》要求在游行示威中要严格遵守“不冲、不砸、不烧、不抓、不打苏联驻中国使馆、机构和苏联在中国人员”和“群众队伍在同外国驻中国使馆之间划一道线”的指示。当时称为“五不”“一划”。

此时，陈伯达的“九大”报告写得很艰苦。时间在不断地向前推移，稿子进展缓慢，长时间的思考、推敲，大家都替他着急。

陈伯达也同样着急，但这个报告在他看来太重要了，他是字斟句酌，不希望出现一点纰漏。

3月3日，毛泽东给陈伯达的期限已过了10多天，仍然没有消息。当晚，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118厅召集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开会，讨论“九大”的准备工作。他提出，“九大”可以在3月15日召开，会期10天左右。谈到“九大”以后的机构设置时，毛泽东说：

“中央文革不要加了，是管文化革命的。文化革命快要结束了，用常委。”“中央和各省的文史馆保留没有什么坏处。”

他批评了陈伯达起草“九大”政治报告拖延时间，并问

林彪准备了没有？说“要吃自己的饭。”

3 月 4 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发表社论《打倒新沙皇》。社论称：“苏修叛徒集团不断武装侵犯我国领土，制造边境事件，这个事实又一次使全世界人民看清，这一小撮叛徒是彻头彻尾的社会帝国主义者，是地地道道的新沙皇。”

3 月 5 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明确表示：要准备打仗。

3 月 7 日下午，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在人民大会堂 118 厅毛泽东处开会，讨论“九大”准备工作和中苏边境冲突问题。毛泽东说：

“关于各省、市、自治区参加‘九大’的代表，可以先找各省、市、自治区参加‘九大’的负责人来谈一下情况，有些问题要同他们商量一下，如毛远新不当代表，没有通知他们那里。”

“开会，一个主要的是文件，一个是党章，一个是选举。伯达同志起草的报告不是讲 2 月 20 日交卷吗？没有说明延长时间的理由，作了决定又不办，不办又不报告。”

他问陈伯达：“你究竟要什么人在搞？”

陈伯达回答：“我自己一个人在写。”

毛泽东说：“你这个人每次都说知过必改，可就是不改，永世不变。”“你们有一个 3 人小组，又不在一起议论，索

性把小组取消，归中央文革碰头会议，大家来议，请总理负责。”“还是准备两手：一个是写出报告可用，一个是不能用。”

谈到里程碑的问题，毛泽东说：“里程碑的问题，我不赞成写，”他对林彪说：“你要讲，我就不赞成，写了没有益处。”

林彪说：“讲是要肯定下来，这是历史形成的。”

毛泽东说：“做报告不能什么都讲，什么都讲就不突出中心了。讲一个中心，围绕着讲一点别的，每次开会都有一个中心。”

关于中苏边境冲突，毛泽东说：“如果苏联打到我们岸上，我们就打到他的岸上。苏联为什么这么挑衅？总有他的需要，不能说苏联、美国不想占领欧洲和亚洲，包括中国在内。”

会后，3 月 7 日，中央办公厅电话通知全国各省市革委会、各大军区负责人到京开会。第二天派飞机将他们接到北京，共计 123 人。

内蒙的滕海清和吴涛作为“九大”代表早早赶到北京。第二天，康生就先向滕海清打了招呼：内蒙古清队有扩大化和逼供信错误。这期间，周恩来也委托谢富治和温玉成找滕海清谈话，更全面地指出了其错误的严重性。

3 月 9 日，毛泽东圈阅中央文革碰头会 3 月 8 日晚商定

的关于“九大”筹备工作事宜的报告。当天，周恩来主持中央文革碰头会，召集“九大”准备会议。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及各大军区和中央各部门的负责人128人参加了会议。毛泽东提出“九大”的任务是总结经验，落实政策，准备打仗。

“九大”共有45个代表团，分为6个大组。3月10日，周恩来参加由上海、江苏、山东、浙江、福建5个省、市，以及南京、济南、福州3大军区共8个代表团组成的华东组讨论，许世友等人是这个小组的召集人。会上，华东组很多代表对王效禹提出了意见。

陈伯达的“九大”政治报告进展依然十分的缓慢。秘书们很着急，建议他是否把已写出来的第一部分稿子先报送毛泽东，写完第二部分时再送。陈伯达同意，他用工整的字，亲笔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信中除了问候毛泽东外，主要介绍了他起草“九大”政治报告的想法和过程。信写好后，他挑了一个大的牛皮纸口袋，生怕上面有灰，用衣袖前后擦了一遍，然后，把他写给毛泽东的信和他已写好的“九大”政治报告稿第一部分一并装入，十分恭敬地封好，拿起毛笔，在牛皮纸口袋上，工整地写上“即呈　毛主席”五个字。派人送出报告稿后，陈伯达心里仍然七上八下。

送出的稿子一直没有回音。陈伯达的起草工作更加缓慢了。

第二部分写完后，秘书们实在憋不住了，在陈伯达休息时提出是否将第二批稿子送毛泽东。陈伯达说："不用，写完后一起送一个完整的稿子，主席就会一口气看完的，这是他的习惯。不能一段一段给主席看。"

这时，江青听说陈伯达没有将毛泽东说的"邓小平打过仗，同刘少奇不一样，报告稿中不要写他"的话在文革小组传达，很生气。回到钓鱼台，立即对张春桥、姚文元说了这件事情，说陈伯达这样做，是"封锁毛主席的声音"。他们3人又找到康生，讲了这件事，康生也很恼火，赞成江青说的"陈伯达封锁毛主席的声音"。于是他们商定：马上召开一个会议，专门批陈伯达。

这个会说开就开，就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会前，江青通知了北京党政军各方面负责人参加，会场里坐得满满的。会议一开始，江青就宣布："我是这次会议的主席"，接着，她简单讲了陈伯达"封锁毛主席的声音"的问题，然后就给陈伯达扣了一大堆帽子，上的"纲"非常高。江青讲完，康生接着讲，也很激烈。康生发言后，江青让陈伯达做检讨。陈伯达刚解释了一句话，就被江青打断，说："陈伯达不检讨，不让他说了。"

陈伯达那天是穿着军装去的，江青说："你陈伯达还配当解放军？你不配！"并对其他人说："快去摘掉陈伯达的领章、帽徽！"

陈伯达根本没服气，跳起来高喊：“你们要打倒我，你们敢把打倒我的大字报贴到街上去吗？”

这时，参加会议的叶群站起来高呼口号：“拥护江青同志！”

会上其他人也跟着高呼了这一口号。

陈伯达再次高声叫道：“大字报上街！”

会议不欢而散。

回到毛家湾，叶群马上给陈伯达家里打电话，解释说：“在那种场合，我只能这样喊。请陈伯达原谅。”

陈伯达说：“我完全理解。”

3 月 12 日下午，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 118 厅召集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开会，讨论陈伯达起草的“九大”政治报告。毛泽东第一句话就问：“‘九大’政治报告写得怎么样了？”

周恩来说：“看来恐怕不行吧！”

毛泽东接着说：“不行就重新搞嘛！是不是请你们三位：康、张、姚三位。”“两家各搞各。”

毛泽东说：“总之，要提出矛盾来，无产阶级、资产阶级斗争，讲清为什么要搞文化大革命。阻碍群众运动，就是有这个东西，相当严重。”

他再次强调：“政治报告只提刘少奇，其他不提。”

“我历来不主张把邓小平和刘少奇弄到一起。”

他说：“不能引证太多，引我的多了。”“列宁是帝国

主义时代的马克思主义。现在还是帝国主义时代，无产阶级专政时代，没有变，所以不能提三个里程碑。”

“报告主要是鼓气，但要讲点困难。”

“对战争的问题一点未讲到。”

“发明火，发明蒸汽机，是两次文化大革命，我们的文化大革命比这两次小得多，过几年，连印象都没有了，何必那样吹？还有十月革命嘛！中国革命是十月革命的继续，从十月革命学来的。”

会议决定由张春桥、姚文元执笔重新起草“九大”政治报告。

陈伯达一句话未说，辛苦了近一个月的报告稿，没有一个领导人看过就被否决了。散会后，他对周恩来说：“我那个稿子只剩下一点了，怎么办？”

周恩来安慰他说：“那你就把它写完吧，作个纪念也好嘛。”他让陈伯达把已经写完的报告稿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谈一下。于是，陈伯达把写好的政治报告稿的前三部分拿了出来，交给有中央文革成员参加的中央政治局讨论。在讨论会上，张春桥、姚文元先后发言批评陈伯达的报告稿是鼓吹“唯生产力论”，是搞“调和主义”。

这天夜里，叶群从钓鱼台开完会回到毛家湾，慌慌张张地走进秘书办公室，用一种十分急促的口吻对秘书张云生说：

“老张，快把所有参加拉条子的人给我叫来，我要亲自给他们没开个会！我要不催，别人是不会着急的。”

拉条子的人被一个个的叫到了毛家湾，叶群开始教训起来：

“我对你们讲，你们给首长在‘九大’讲话拉的条子，现在可到了火烧眉毛的时候了。我刚从钓鱼台开会回来，我们讨论陈伯达起草的政治报告的部分初稿，争论非常激烈。有人说陈伯达的稿子是鼓吹‘唯生产力论’，我没表态。但陈伯达写的东西都挨批了，你们搞的东西还能有把握吗？我不亲自抓，你们也可能放黄枪，首长也跟着你们放黄枪，那个责任谁来负？现在你们都说说，你们分工拉的那些条子究竟写了些什么，我来把把关。……”

大家开始一一向叶群汇报。她一边听，一边插话。听了一阵，显然感到疲倦了，于是说：

“今天就到这儿吧，总之，你们要抓紧，限你们在三天之内交卷！”

但是还没到三天，张春桥、姚文元在 16 日便拿出了初稿。

在此期间，北京、天津、上海等二十几个城市军民，自 3 月 4 日起就开始举行游行和声讨大会，“抗议苏联边防军入侵珍宝岛”。在 4 日至 12 日不足十天时间里，全国参加游行的军民已过 4 亿人次以上。

从后来得到的苏联给东欧各国的内部情况通报看，苏联对中国的行动最初反应是目瞪口呆，而且满腹狐疑，不知道中国的动机、目的何在。

苏军向珍宝岛方向正面增调了 1 个摩托化步兵团，1 个坦克营、1 个 122 加农炮营、122 榴弹炮营、120 迫击炮营、“冰雹”-BM-21 火箭炮营。

中方也增强兵力兵器，加强防御。军委办事组指示沈阳军区，调集步兵、炮兵、高炮以及反坦克部队，在珍宝岛地区集结，分批进入前沿阵地和纵深阵地，并指示一线边防部队，要避免在对中方不利的情况下发生冲突。

中国边防军派出 46 军 133 师 397 团侦察排排长于洪东带领的 1 个步兵班进入珍宝岛警戒，掩护工兵分队在岛西江汊的冰层中埋设反坦克地雷，并掩护 15 日巡逻队执行任务。

3 月 15 日凌晨 4 时，苏军 6 辆装甲车乘着黑夜掩护，在苏军边防总队长列昂诺夫上校的率领下登上珍宝岛，其中 30 多名步兵潜伏在丛林里，准备偷袭上岛的中国巡逻队。但是，苏军的举动被中国边防部队发觉。中方 1 个步兵排和 1 个步兵班迅速上岛，增强警戒力量，并用广播向敌提出警告。

上午 7 时 40 分，沈阳军区第 23 军 73 师 217 团一营营长冷鹏飞奉命带领一个加强排和另一支巡逻队登上珍宝岛。8 时 02 分，中国边防巡逻队与岛上的苏军潜伏小分队交火。激战一个多小时后，中国边防军击毁苏军两辆装甲车，苏军

撤回到苏联一侧，第一次战斗结束。中方前指命令两个 75 无后坐力炮班、1 个 40 火箭筒班登岛，令纵深 1 个 75 无后坐力炮排、3 个火箭筒班向前机动，待命参战。

9 时 46 分，苏军 3 架直升飞机向珍宝岛俯冲过来。接着，苏军在岸上炮火掩护下，出动坦克 6 辆、装甲车 5 辆，从南北两侧分两路向珍宝岛上的中国军队展开攻击，其中 4 辆坦克向珍宝岛南侧江汊运动，企图从背后攻击中国军队，并以密集火力封锁江汊，拦阻中国边防部队登岛支援。

苏军的炮火异常猛烈，坚硬的冻土和树枝树根被炸飞起来，然后又像冰雹似的砸下来，炮弹几乎把这个不到 1 平方公里的小岛翻了一遍。中方步兵一个排，利用依靠陡峭的江岸修筑好的工事沉着应战，在岸上火力支援下，顽强抵抗苏军的冲击。

苏军一看正面进攻受挫，就绕过岛的南端，悄悄地从珍宝岛西面的江汊上包抄过来，企图从背后袭击中国军队。上午10时，苏军出动十几辆坦克和装甲车，向岛上的中国部队又一次发起进攻，同时用炮火拦截中国的支援部队。

但是，苏军没有想到中方会在结冰的江面上布下反坦克雷。397团侦察排长于洪东看见敌人的坦克从南面上来了，心中暗喜，他命令用40火箭筒把坦克引过来。

“嗵”，40火箭弹准确命中敌人坦克的腰部，但只是将坦克震得微微一颤，根本没有钻过坦克的装甲。坦克中的苏

军士兵显然被这枚火箭弹激怒了，一边开炮一边加大油门朝中方江面上冲过来。

这时，中国边防军无后坐力炮班登上珍宝岛2号阵地，立即架炮向苏军坦克射击。然而，中国边防军使用的75毫米无后坐力炮和40毫米火箭筒都无法击穿苏军T-62坦克，苏军坦克仗着先进的性能只管轰鸣着往前冲。中方无后坐力炮班长杨林见状，抢占有利地形，待苏军坦克驶近到只有10余米远时，他接连投出5枚手雷，打乱苏军队形。突然，“轰隆”一声震耳欲聋的巨响，冲在最前面的一辆T-62新型坦克抖了一下，随即升起一股浓烟，坦克闯入雷区，履带被反坦克地雷炸断了。刚才还威风凛凛不可一世的铁家伙，顿时瘫在江面上，再也不能动弹了，杨林也不幸被苏军坦克炮火击中壮烈牺牲。

与此同时，两个炮班机动射击，连续击中 3 辆装甲车。刹那间，中方各种轻重武器一起开火，打得跟在后面的步兵慌不择路地往回逃窜。苏军其他坦克、装甲车似乎是知道进入了雷区，一时间在在冰面上打转儿，不敢乱窜。

于洪东冲到被炸瘫的那辆T-62坦克上，揭开顶盖把一颗手榴弹塞了进去——后来才知道，苏军一名中校军官被炸死在里面。

苏军坦克慌忙逃回苏联一侧。

苏军边防总队长列昂诺夫上校请求增援。等上报到莫斯

科时，国防部长格列奇科还在印度，勃列日涅夫正在去匈牙利的路上，没有人敢下令增援。直到下午，勃列日涅夫才得知消息，同意派兵增援。

下午 13 时 35 分，苏军以大口径火炮、坦克炮向珍宝岛及江岸中国一侧防御阵地、边防站及后方桥梁猛烈轰击，火力正面达 10 公里，纵深达 7 公里。中方则以江岸一侧的炮兵群加入战斗，以强大火力给岛上苏军和苏方岸上的指挥机构以猛烈打击。

苏军在持续近两个小时的炮击后，于 15 时 13 分，又出动 10 辆坦克、14 辆装甲车、100 多名步兵向珍宝岛发起第三次攻击。

岛上的中国边防部队用无后坐力炮、火箭筒在距苏军几米、十几米的地方开火，与苏军近战，分割其步兵与装甲车、坦克的联系，减弱其火力。部署在 209 高地的两门 85 炮直接瞄准敌装甲车射击。

火箭筒手华玉杰越打越勇，在零下 30 多度冰天雪地里，甩掉棉衣和绒衣，先后击毁击伤苏军 4 辆装甲车。

15 时 30 分，岸上中国炮兵群以猛烈的火力集中轰击。35 分，85 加农炮营集火向苏坦克、装甲车射击，发射炮弹 1500 多发。打死苏军边防总队长列昂诺夫上校。尔后中方炮兵转移火力，打击苏岸倒灌流、124.5 高地，大水泡子等地集结的坦克、装甲车和步兵。下午 17 时后，天色转暗，苏

军全部撤出珍宝岛，第三次战斗结束。

这次战斗共击毁苏军坦克 1 辆、装甲车 2 辆、击伤 4 辆，击毙苏军边防总队长列昂诺夫上校， 扬辛中校等 60 余人，击伤 80 余人。中方张印华排长、杨林、张振万、吴文俊等 12 人牺牲。

当天下午 16 时，中国外交部紧急约见苏联驻华大使馆临时代办，但遭到苏联驻华大使馆临时代办的拒绝。几个小时后，苏联政府匆匆忙忙地发表“抗议声明”。为此，中国外交部向苏联驻华大使馆提交了一份抗议照会，指出：苏联政府“不顾中国政府的多次警告，不断派兵侵犯中国领土珍宝岛，进行武装挑衅，现在又一手制造了新的流血事件。苏联政府必须对由此产生的一切严重后果承担全部责任。中国政府向苏联政府提出紧急的、强烈的抗议，苏联政府必须立即停止对中国的武装挑衅。中国政府保留进一步提出要求的权利。”

## 第 1069 回：毛泽东，再强调落实政策

## 执己见，伯达与春桥争论

3月15日下午，毛泽东、林彪在人民大会堂118厅召集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和陈毅、黄永胜、陈锡联、谢富治等人开会，听取了珍宝岛战况汇报，讨论国内外形势和“九大”准备工作。

毛泽东说：“总感到要打仗，美国和苏联的国防预算，都是历年来他们国家最高的。”

他说：“敌人炮火打进7公里有什么要紧?最好是打进70公里、700公里、7000公里。让他打进来，就使我们动员起来。一个县成立一个团，全国都要搞。大县三个营，中县两个营，小县一个营。平时坚持地方，战争起来了就补充野战军。战争打起来，依靠一年一度的征兵工作是不行的。……”

“我们国家这么大，苏联、美国一口吃不下。让他进来，进来就好打了。”

他还说：“我们的领导机关被打掉了，下面照常打。东北、华北要准备一下。准备好了，他不来也不要紧。大敌当前，动员、准备一下有利。苏联知道我们不会到他那里去，他们那里很冷。我们是后发制人。原子弹基地要有准备，防止他用飞机轰炸。让敌人占点面子，他占了牡丹江，外国人就知道了。”

林彪说：“今天的行动是莫斯科指挥的，不是前面人指

挥的。”

毛泽东：“抗议他不听，双方都在抢时间。他们是要面子的。人不犯我，我不犯人。”

毛泽东说：“红卫兵打仗勇敢，红卫兵还是要称赞一下，他们还很活跃。凡是过去武斗比较厉害的学校，现在就转得比较好。对这些武斗的学生，军队不愿意要，地方也不愿意要。红卫兵不听话是个暂时现象，或者是有坏人指挥。红卫兵前期、后期，甚至于中期都是好的，就是在中后期之间有一个时间不听话，现在就好了。”

他说：“‘九大’这个会要准备一下，不准备真打起来怎么办？摆在我们面前的前途有两个，一个是促使世界革命运动高涨，走向直接革命的形势，一是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结果像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那样，帝国主义在战争中失败。”

“我们是支持世界革命运动的，但更重要的是我们要备战。第三个五年计划甚至第四个五年计划，都要备战、备荒、为人民。”

谈到“九大”的准备情况，毛泽东说：

“报告还没有写好，迟几天开会不要紧。给陈伯达是一个月，给你们半个月，索性 4 月 1 日开会。”

“九届中央委员会，书记处、常委会只搞一个。‘八大’搞书记处，又搞常委会，重复了。”

毛泽东就落实政策问题作了一篇很长的谈话。他说：

“斗批改，清理阶级队伍，搞了很多人去搞调查，没有目的地到处乱跑。还有抓人太多，关人太多，解放的人太少。有些人站队站错了，还没有转过来，一个学校那么多教师、教员都不要，怎么办呢？你不改造他？就是叛徒、特务、死不悔改的走资派也要给出路。对走资派也要区别。有些走资派，开始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镇压群众很厉害；但所谓死不悔改，难道一万年也不改吗？不做工作又怎么改呀？这些人都不要怎么行？都把他们推到帝国主义、修正主义那里去了。我们讲钱伟长、梁思成，可以作为典型，要找标兵嘛！有人说，人家有历史问题。有历史问题不要紧，人都是有历史的嘛。人就是历史。有的人和美国、国民党有关系，就是有嘛，不要怕嘛！那都是摆在那里的嘛！拼命搞外调，又搞不清楚问题，盲目地乱跑，结果花了很多时间、精力，问题还是搞不清。为什么不要他坦白，叫他自己交代呢？关的人太多，统统放了，只要不是杀人、放火、放毒、破坏，至于写几条反动标语，那有什么要紧？有的人放出来，只要不继续杀人就行了，可以继续进行教育。他再杀人，再抓嘛！这是第一。一个是关，一个是放。一个不关不行，我们说是大部不抓，一个不杀。现在那么多教授、干部，不解放是不妥当的。我们历来讲坏人是少数，可以教育争取的是大多数。一讲就是一窝黑，几十个，甚至四分之一，三分之一，了不

起了。开始有些老工人、解放军，一讲就是一窝黑，一个样，那样不是把人都推到帝国主义、修正主义那里去了？”

他说：“政策落实是个大问题，尽管有清华的经验，有的就学，有的就不学。天津大学、南开大学，有一个就传达，有一个就不传达，并且还关了很多人，解放的人很少。无非是特务、叛徒、走资派嘛！死不改悔地走资派难道他一辈子就不改？只要不是杀人、放火、放毒，几个反动标语算什么？教授、讲师不像军队，他们是手无寸铁。教授、讲师要放，当然不是一个不关。坏人是极少数，我们把这些人推向国民党方面好吗？不要在学生中打主意，也不要在多数的教员、干部中打主意。不让人家讲一点怪话，也不让资产阶级讲一点自由主义行吗？他们因为肚子里有气。有的今天讲了，明天就不讲了。……政策不落实，不解放知识分子不行。”

毛泽东在谈到“二月逆流”时说：“我主张报告不讲‘二月逆流’。66 年冬季和 67 年春季，有些同志犯了错误，对红卫兵冲击不了解情况。有的打到自己身上来了，受了点侮辱，连听报告都不能到，只能在幕后听。所以始终有点不服，所以闹。大会要开成一个团结的大会，允许‘二月逆流’的人上主席台。”“共产党不隐蔽自己的观点。大家并没有隐蔽自己的观点，都讲出来了嘛！”“我对‘二月逆流’的人不一定恨得起来。‘二月逆流’不仅北京有，其他地区也有；‘二月逆流’不仅冲击了地方机关，也冲击了军队机关。

那个时候，一时打倒这个，一时打倒那个，可多了，无非是说错了话嘛！报告上不要再讲‘二月逆流’了，这次会要开成一个团结的会。他们一肚子气，也是可以原谅的嘛。只讲刘少奇一小撮，都包括了嘛！”

毛泽东最后说:“有些犯错误的，过一两年还是要解放他们，就是不让他们掌大权。二中全会（七届）就讲了，要依靠工人，不能依靠资产阶级。刘少奇到天津，就依靠资产阶级。给了宋斐卿很多钱，结果跑到香港去了，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李德一个人有什么用，还不是有那么一些人捧他的场。这次要走‘七大’的道路，把大多数人团结起来。‘二月逆流’这些人选为‘九大’代表，地球还不是照样转！‘天地悠长，不为尧存，也不为桀亡’。主要是落实政策的问题。反帝必反修，不反修反帝是不能胜利的。”

3 月 14 日，《红旗》杂志第 3、4 期社论《关于总结经验》中传达了毛泽东的两段最近指示：

“要认真总结经验。”

“到一个单位去了解情况，要了解运动的全过程，开始怎样，后来怎样，现在怎样，群众是怎么搞的，领导是怎么搞的，发生过一些什么矛盾和斗争，这些矛盾后来发生了什么变化，人们的认识有什么发展，从中找出规律性的东西。”

15 日，《人民日报》做了转载。

张春桥和姚文元从 16 日起，陆续将他们起草的“九大”

报告稿分批送毛泽东和林彪审看。

接着，陈伯达也赶写出了他的政治报告全稿。两个稿子都用铅字排成清样分送毛泽东、林彪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

陈伯达收到由中央办公厅送来的张春桥、姚文元起草的九大政治报告稿后，很快就在他房间里看了一遍。然后拿着稿子急匆匆地来到秘书办公室，很激动地对大家说："他们这个稿子你们看了没有？他们这个是伯恩斯坦的！就是说运动是一切，目的是没有的！他们就是搞运动！运动！运动！你们看看是不是这样的！"

中央关文革碰头会讨论了张春桥和姚文元的稿子。

陈伯达不甘心，通过与叶群的特殊关系，请求叶群劝林彪好好看看他起草的报告稿。

康生给毛家湾叶群打来电话，叶群作了记录。康生说："我最近生了病，没有直接参加政治报告的起草。春桥、文元写的稿子，我看了一遍。我觉得，作为接班人向'九大'作的政治报告，这个稿子的分量是不够的。但是在这短短的时间内，他们就能拿出有一定水平的初稿来，还是不易的。我看它可以作为进一步讨论修改的基础，因为它的基本思路是能站住脚的。"

"康老的电话，由我向首长讲。"叶群对秘书交待说，"张、姚写的稿子，我只能向首长将文革碰头会讨论的情况，

稿子的内容，就得由你们去讲了。老夫子的稿子已经不能用了，但他坚持印出来，还托我劝首长看一看。说是首长看，实际上还得靠你们去讲。我是同情老夫子的，只能对他说首长已经看过他的稿子了，这是为了给他一点安慰。但你们给首长讲的时候，不能讲得太细，以防首长脑子一热，又对老夫子的东西发生兴趣。至于张、姚的稿子，文革碰头会讨论过了，但还不知道主席的态度。可以等到主席有了态度之后再说。”

“我们拉条子的事怎么办呢？”秘书张云生问叶群，她规定的3天期限已过，除林立果外，其他人都已突击出来了。张云生问：“主任什么时候看？”

“我不想看。等一等再说吧。”叶群又不着急了。

毛泽东在张春桥、姚文元3月16日送审的报告草稿第一部分上批示：“看了一遍，写得好，只需要个别词句的修改。”

毛泽东的批示传到了毛家湾，秘书向林彪讲了。林彪问：

“张、姚写的稿子你们看过了吗？”

“看过了。我现在就想给首长讲讲他的大意。”秘书张云生说。

“现在不用讲。”林彪说，“他们还要修改，等改过了再说。”他接着又问：“陈伯达写的稿子，你们也看过了吗？”

“看过了。”

“把两个稿子比较一下，他们哪一个好一些呢？”林彪

又问。

“很难说。”张云生含糊的说道。

“不要紧，你说说看。”林彪微微露出一点笑容。这在他一贯严肃的脸孔上，是难得看到的。

“两个稿子，如果叫我写，我都写不出来。”张云生绞尽脑汁，挤出这么一句。

“不要迷信那些大秀才！”林彪说，“你们可以研究一下，他们写的东西中有哪些可取之处，在给我拉‘条子’的时候，把能吸收的吸收过来。但他们作的是官样文章，这一点不要学。”

“我们拉的‘条子’已经差不多了，首长什么时候能听一听呢？”张云生乘机汇报说。

“不急。弄好了，先放在你们那里。最后可能用，也可能不用。你们可以不断作些充实，就是不用，也是练兵嘛！”

3月16日深夜，正在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参加华沙条约组织七国首脑会议的勃列日涅夫听到15日中苏战况的报告后，非常震惊。当他得知苏军的一辆T62坦克还留在中国领土上时，对苏联国防部长格列奇科大发雷霆：“这辆坦克不能落在中国人手里，一定要弄回来！实在弄不回来就设法把它破坏掉！”

格列奇科保证，一定不让这辆坦克落到中国人手中。

3 月 17 日凌晨，苏军向中国边防部队前沿阵地和纵深炮

击，并用火箭布雷器在岛上铺设了 1000 余枚地雷，封锁了通向江边的道路。同时出动 70 余人，在坦克、装甲车掩护下再次侵入珍宝岛。

中国边防部队立即实施炮火拦阻射击。17 时，苏军撤回苏联境内。至此，珍宝岛自卫反击战遂告结束。事隔一个多月之后，苏联的《红星报》披露了列昂诺夫上校和杨辛中校阵亡的细节。

发生在远东一个不起眼的小岛上的战事，牵动了太平洋彼岸美国总统的神经。3 月 18 日，美国，华盛顿白宫。美国总统与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共同度过了一个不眠的“中国之夜”。

尼克松总统问：“亨利先生，抛开我们的身份和意识形态的分歧。你认为，中国、苏联，这两个国家哪个更可爱些?”

基辛格认真考虑了一会儿，才笑着说：“阁下，你明明知道，这两个国家都是我不愿谈论的，如果一定让我讲，我似乎偏向一点中国……我是一个犹太人，创世纪前，我们的国家遭到了毁灭，犹太人无家可归，四处逃亡，而又处处碰壁。一个国家接纳了我们，那就是中国。二次大战中，犹太人又遭劫难，许多国家因畏惧德国人，将犹太人拒于国门之外。又是中国，在上海港接纳了 2000 多犹太人，使他们免遭暴尸大海的厄运……这也是中国为什么百般呵责以色列，而以色列人从不恶言相向的原因……”

第 1070 回：接线员，敢顶撞外国首脑

招老帅，共商谈“九大”事宜

3月18日下午，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召集周恩来等人开会，谈“九大”政治报告稿和国际问题。

陈伯达在讨论张春桥、姚文元起草的政治报告草稿时，提出了十分尖锐的意见，他说：“这个报告稿存在一个很大的缺陷，就是忽略生产。还是要把生产搞好，发展生产，提高劳动生产率。你们只强调政治运动，是在搞伯恩斯坦主义，伯恩斯坦就主张运动是一切，而目的是没有的。”

陈伯达在会上还举出世界上很多国家生产率高，人民生活水平也高的例子，又举了中国一些城市生产率高，那里生活条件比较好的例子。他反复强调：“还是应当搞好生产，发展生产，提高劳动生产率。尽搞运动，运动，就像伯恩斯坦所说的‘运动就是一切，而目的是没有的’。”

张春桥立即反驳陈伯达，说他是在宣传“唯生产力论”，不符合中国的实际。“世界上劳动生产率最高的，是一些小国，如卢森堡、比利时等国；你举的现在中国的例子，也是中小城市。”

陈伯达说张春桥是伯恩斯坦主义，张春桥说陈伯达是唯生产力论。这时，毛泽东一言不发，陷入了沉思。不一会儿，他起身去卫生间。从卫生间出来后，毛泽东发了言，他说：“陈伯达的意见是对的，应当考虑报告上加进陈伯达的意

见。”

周恩来也说，陈伯达的意见是有道理的，应该加进“九大”政治报告中去。林彪随后也表态说陈伯达的意见好，要加上。

最后，大家都同意在张春桥、姚文元的报告文稿基础上进行修改，问及陈伯达时，他说：“大家都同意，我也同意。”

毛泽东说：“你可以不同意，不要你同意。”

3月20日，经毛泽东、林彪批准，中央军委发布命令，通令表扬珍宝岛反击战参战部队，边防部队侦察连等10个单位记集体一等功，授予10名指战员以“战斗英雄”称号。

同一天，中央军委批准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 6000 人改为现役部队，但不列入部队定额。此后直到 1970 年，相继成立了江苏、安徽、兰州、内蒙古、广州、云南、福建、江西、山东、浙江、湖北等生产建设兵团。

边疆地区的生产建设兵团承担的主要任务是：屯垦戍边，配合边防部队和边境群众建设边防，保卫国家安全；培养和造就亦兵亦农的社会主义建设队伍；开发和建设边疆；巩固和发展全民所有制社会主义农业。适应边防斗争的需要，生产建设兵团还组建了一定数量的战备值班分队，进行必要的军事训练，平时配合部队和公安机关维护社会治安；战时配合部队作战或独立作战或机动执行任务。生产建设兵团对当地的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都产生了重要影响。例如，

新疆建设兵团1975年发展到220万人口，拥有工业、农业、牧业、商业和交通运输的各种综合性企业，其工农业总产值占新疆全区工农业总产值1/3。但是，生产建设兵团的军事系统垂直领导的组织形式不能完全适应国家地区性经济建设规划的需要，从1972年开始，各军区所属生产建设兵团陆续撤消或是改变领导体制。建设兵团的党、政工作和生产建设交地方党和政府领导，军事工作和现役部队则归所在地军区领导。

3月20日这天，中央军委批复空军，同意1968年12月21日《关于空军一九六九年部队组建计划》。据此，空军年内组建了两个军部、6个歼击机师、两个高射炮兵师。即：将空军兴宁指挥所改建为1个空军军部，5月4日改称空军第12军；在西安组建1个空军军部，11月10日改称空军第11军。组建空军第40至45师及空军高射炮兵第18、19师。

3月21日，周恩来召集黄永胜、吴法宪、温玉成、陈锡联及总参作战部有关人员参加的作战会议。会上，针对苏联军队可能强占珍宝岛的态势，商定加强中方兵力，以逸待劳，后发制人。

就在周恩来召集作战会议同一天，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通过载波电话横越欧亚大陆，将电话打到北京，要求和毛泽东或周恩来通话。在苏联，有主战派，有主和派。柯西金是主和派，他迫切想与中国领导人面谈，避免两国爆发战

争。

珍宝岛事件发生后的第三天，莫斯科的电话就打到了苏联驻华大使馆，问他们“有没有中国领导同志的专线电话号码？有没有周恩来的电话号码？”苏联驻华使馆回答说：“没有。”

于是，莫斯科又把电话打到中国设在总参通信兵部的北京国际电话站，询问有没有周恩来的电话号码和外交部部长陈毅的电话号码？

结果，北京电话站的接线员拒绝了莫斯科的要求。

3 月 21 日晚上，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通过载波保密电话亲自要通了北京国际电话站，要求接通毛泽东的电话，结果被接线员大骂了一通。当时的电话记录是这样的：

莫斯科：“北京，我是莫斯科，我把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同志的电话接给你。”

北京接线员：“是要苏联大使馆吗？……什么？我不懂。”

柯西金：“你用俄语讲话吧，好不好？”

北京接线员：“你用汉语讲话吧！”

柯西金：“我是柯西金，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请给我接毛泽东的电话。”

北京接线员：“你找谁？找谁？我不明白。”

柯西金：“我现在把话筒给翻译。”

苏联翻译："这就是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他请你转接毛泽东办公的地方。"

北京接线员："喂，你是苏联电话站的翻译吗？"

苏联翻译："是，我这里是莫斯科，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请你转接毛泽东办公的地方。"

北京接线员："喂，你想要干什么呢？想要干什么呢？"

苏联翻译："柯西金主席，他有事同毛泽东谈话。"

北京接线员："柯西金他是个大叛徒。你有什么事跟我说。"

苏联翻译："他有事情同毛泽东谈。"

北京接线员："你跟我讲吧，叫他跟我讲。"

翻译："喂，柯西金主席请你转接到毛泽东办公的地方。"

北京接线员："喂，喂，你要干什么呢？柯西金是个大叛徒，是个大坏蛋，是个赫鲁晓夫分子。"

苏联翻译："你是谁啊？"

北京接线员："我是北京电话站。你要干什么呢？柯西金是个大坏蛋。"

苏联翻译："他要你把电话接到毛泽东办公的地方。"

北京接线员："他有什么事跟我说，我可以向他讲。"

苏联翻译："请你找你的上司来接电话，好不好？你的首长。"

北京接线员："我就是首长啊。"

苏联翻译："是吗？你是首长？"

北京接线员："我就是首长。"

苏联翻译："请你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部长。"

北京接线员："你想要干什么呢？"

苏联翻译："还有事情想同他谈谈。"

北京接线员："不行啊，你是苏联情报部吗？你想在这里搞什么玩意儿啊？"

苏联翻译："这里是莫斯科，苏联部长会议主席。"

北京接线员："柯西金是个大坏蛋。"

电话通了将近10分钟，柯西金依然是一无所获。

后来，总参三部的电话纪录报到了周恩来那里，周恩来对接线员的做法做了如下批示：

"精神可嘉，做法欠妥"。

当时，中苏高频热线电话有两部，一部在中共中央，另一部设在外交部苏联东欧司。几个小时以后，柯西金的秘书拨通了中国外交部苏联东欧司的高频电话，就北京接线员的"无礼"提出抗议，并请转达柯西金想与周恩来直接通话的愿望。外交部苏联东欧司主管副司长李连庆接的电话，他告诉柯西金：

"苏联党已经变成修正主义，中苏两党已经没有正式关系。但是两国还有外交关系，我将立即报告我国政府和周恩来总理。"

最后，非常恼火的柯西金要求把电话转接到苏联驻华大使馆。

柯西金在电话中告诉苏联驻华临时代办叶立扎维金："我想同毛泽东通电话，但电话站不予转接，接电话的是一个蛮横无理的人。你能不能通过中国外交部找到周恩来或陈毅的电话，告诉他们，我受苏共中央政治局和苏联政府委托，要同毛泽东通话。"

叶立扎维金说："我们要接通周恩来同志、陈毅同志的电话很困难，他们不给接。但我们可以通过中国外交部，说我们很想同毛泽东同志通电话。"

柯西金说："好吧。"

叶立扎维金问："除了毛泽东之外，同周恩来通话也可以吧？"

柯西金说："最好是毛泽东。如果毛泽东不能讲的话，也可以同周恩来讲话，其他任何人都不行。"

放下电话后，叶立扎维金立即向中国外交部提出有紧急问题要约见外交部副部长。

外交部答复说："外交部副部长有事，没有时间接见，苏欧司副司长可以见。"

3 月 22 日零时，外交部苏欧司主管副司长李连庆与叶立扎维金见面。没有寒暄，没有问候，双方的对话一开始就都充满了火药味。

李连庆副司长说："首先我要向你严正指出一个问题：我在 3 月 13 日约见你，乔冠华副部长在 3 月 15 日约见你，你都拒绝来见。你作为苏联驻华使馆临时代办，完全有义务应约来见。我不知道你们采取这种做法究竟是为什么？"

苏联临时代办叶立扎维金说："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受苏共政治局的委托，在今天几个小时前，用高频电话想同毛泽东同志联系，因为中国接电话的工作人员拒绝柯西金同志同毛泽东同志联系，我受柯西金的委托，紧急拜会外交部，并转告他的建议。我想知道，柯西金同志想用电话同毛泽东同志进行联系，是不是可能？如果由于某些原因，不能同毛泽东同志谈话，柯西金同志能否同周恩来同志谈话？柯西金同志要我报告这次会见的结果，我怎样报告莫斯科？"

李连庆副司长说："我们中国共产党是伟大的马列主义政党，毛泽东主席是我们党的伟大领袖，我们的党同你们的党没有任何关系。你们的党已经堕落成了修正主义叛徒集团的党。柯西金想用政治局的名义，同我们中国共产党联系，那是对我们党的莫大侮辱。对你这种无礼要求，我坚决拒绝，并提出坚决的谴责。至于柯西金要同周总理联系，我可以报告。"

叶立扎维金："就这些吗？"

副司长："就这些。"

叶立扎维金："我坚决抗议你在讲话中对苏共的诬蔑，

这是第一。第二，我也表示抗议，你们在报纸上歪曲事实，说我们拒绝约见。我不需要听你们的教训。”

说罢，叶立扎维金站起来就走了。

约见不欢而散。外交部把柯西金要求通电话的事报告了周恩来。

周恩来接到报告后，连夜召集外交部副部长姬鹏飞、乔冠华、外交部军代表马文波和苏欧司副司长李连庆等人商议。

周恩来在听取了李连庆的汇报后表示：“你说报告政府和我，这是对的。因为中苏还有国家关系。但是你说苏联是修正主义，打击面就大了，而且也不准确，应该说是苏联领导集团。……”

经商定，中国政府决定以备忘录形式答复苏联驻华大使馆临时代办叶利扎维金：“从当前中苏两国关系来说，通过电话的方式进行联系已不适用。如果苏联政府有什么话要说，请通过外交途径正式向中国政府提出。”

会后，周恩来给毛泽东写信，汇报了柯西金想同毛泽东通电话和苏联驻华临时代办约见我外交部苏欧司负责人的情况，并将复苏联驻华临时代办的备忘录送毛泽东审批。

周恩来在备忘录草稿上批了“即准备谈判，送主席”后，即让王海容送交毛泽东。

当天，3 月 22 日，毛泽东在周恩来的请示报告上批示：

“同意备忘录的立场，即准备举行外交谈判。”

收到毛泽东批示后，李连庆副司长于 22 日深夜 23 时 45 分约见叶利扎维金，向其递交了此份备忘录。

3月21日，张春桥、姚文元又送审了政治报告草稿的第四、第五部分，毛泽东批示：“一、四、五部分问题较少，略作修改就可以了。二、三部分问题较多，需要大修或重写，缺点是论点过多，近于集纳，可以考虑两部分合起来，把重复的删掉，不要去描述许多阶段，中央文革成员的名字一个也不要提。”

3月25日，张春桥、姚文元送审报告修改第一稿，毛泽东批示：“看了一遍，略有修改，大体可用。觉得还应压缩，把空话和不需要的形容词尽量删去。请林彪同志酌定。”

毛泽东删去“从赫鲁晓夫到勃列日涅夫、柯西金之流”一语中的“柯西金之流”。

3 月 22 日下午，林彪、周恩来、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及陈毅、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等人到人民大会堂 118 厅毛泽东处开会。

看来，毛泽东对四位老帅的“蹲点”情况挺满意，一见到他们就说：“好久不见了，你们搞得不错啊！你们应该换一换：南口、新华、二七厂都是大厂。”

他又问：“你们研究国际问题怎么样？”“你们几位老同志，为国家做工作，不要只管一个部门。聂荣臻不能只管

一个国防科委，叶剑英只搞一个军事科学院，钻进去就出不来。要管宽一些：军事、政治、国内、国外。你们这些年纪大的人，多吃几年饭，经验多一些。小萝卜头看不起你们，说你们老了，没有用了。我不赞成。小萝卜头有用，但他们没有经验。老同志参加到‘九大’各代表团中去，主席团175人，除少数老同志没有参加外，其他都参加了。”

针对“二月逆流”的问题，毛泽东说：“二月逆流，报告中不讲。”“报告上有些名字不要写，中央文革成员的名字一个都不要写，只写我和刘少奇两个人的名字，只写刘少奇的资产阶级修正主义路线。这次犯错误的同志，没有王明犯的大。‘七大’时一个也没有丢。我们还是按过去老规定，凡是能团结的都要团结，允许人家犯错误，允许人家改正错误。大多数当成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不当敌我矛盾处理。至于有些人，江渭清、谭启龙、张平化、赵紫阳、霍士廉，要好好研究一下，究竟有些什么样的严重问题？如没有什么严重问题，只是这一次犯严重错误的话，过一个时间，群众的气消了，就可能解放他们。”

毛泽东问起北京电话站接线员的事：“柯西金打电话究竟是怎么回事？我们接电话的人很厉害，把他骂了一阵，说他是叛徒。把人家的总理都骂了一顿，人家说是不尊重我。我看应该给他转一下。”

周恩来插话说：“两国交兵，不斩来使。”

毛泽东继续说："两国交兵，使者其间。法国大使叫人家帝国主义的大使，苏联大使叫人家是修正主义的大使。我们在有些场合揭露是必要的，但有时不要这样骂人。我们同蒋介石谈判也不骂人。我们现在孤立了，没有人理我们了。"

毛泽东又问："我们不同柯西金通电话是不是不礼貌？"

周恩来说："我们已经给他们一个照会，说通电话不方便，有事请通过外交途径，不搞热线活动。"

毛泽东说："热线活动不能搞，他们喜欢搞这一套。你们去一下，要不要通电话？"

毛泽东又说到珍宝岛事件："我是比较乐观的，2日的冲突，他们上边的人也不知道，政治局也没讨论，同我们一样。珍宝岛在什么地方，许多人不知道。"

毛泽东问林彪"九大"政治报告的情况："文件你看了没有?国际边境事件不要讲得那么严重。"

毛泽东说："就在4月1日开大会，议程就三个，通过政治报告，修改党章，选举中央委员会，不要什么都搞。政治报告也不要什么都讲，报告上中央文革所有人的名字都不要写，只写我和刘少奇的名字。邓小平与刘少奇要有区别。"

## 第 1071 回：争坦克，中苏两国施伎俩

## 派间谍，加紧研制穿甲弹

3 月 24 日，东北前线部队接到周恩来打来的电话，他亲切慰问了边防部队，同时命令一定要把那辆打瘫的苏联 T-62 坦克拖回来。周恩来在电话中特别强调："这不仅有军事价值，而且有政治意义。有这个铁家伙作证，就不怕苏修在全世界面前耍赖。"

T-62坦克是当时苏联研制的最先进的作战坦克。它是苏联继T-54/T-55坦克之后于20世纪50年代末研发的新型主战坦克，1962年定型，1964年成批生产并装备部队，1965年5月首次出现在红场阅兵行列中。苏联T-62坦克的生产一直持续到60年代末T-72坦克投产时为止，共计生产约2万辆。为满足军火市场的大量需求，苏联还特许捷克斯洛伐克生产这种坦克，在1973年至1978年间大约又生产了1500辆。这种坦克自重37.5吨，配有115毫米滑膛炮1门，7.62毫米机枪和12.7毫米高射机枪各1挺，装甲钢板十分坚固，配有当时十分先进的红外线夜视装置，时速可达50公里，上面一些设备，比如红外线夜视仪、射击双向稳定器、大功率柴油机等等，按照苏联人的说法，在当时全世界都是独一无二的。难怪勃列日涅夫会气急败坏，周恩来会高度重视。于是，中苏双方绞尽脑汁，各施计谋，为了这辆坦克进行了一场惊心动魄的争夺战。

苏军3月17日动用火箭布雷器向珍宝岛发射了不少地雷，封锁了通向江边的道路。当时，中国前线部队并不知道苏军此举的意图，只认为是对方的战前部署，所以没有及时将地雷排除，只派出几个警戒哨防止中方人员误入雷区。

在接到周恩来的电话后，前线部队马上意识到这是苏军为争夺坦克采取的行动。在前线指挥作战的沈阳军区副司令员肖全夫果断命令部队采取相应的行动，首先派人排除苏军布下的地雷。

苏军方面对中国的举动似乎有所察觉，就朝那辆坦克附近猛烈开炮，显然是想把江面上的厚冰打穿，让坦克沉入江底。但冰层实在太厚了，炮弹竟奈何它不得。

当晚，中国方面派陆军第77师军务科副科长孙征民带领10名排雷能手，悄悄进入雷区排雷。经过一番努力，他们终于完成了任务。但苏军的狙击手也发现了他们，不停地开枪射击，孙征民和一名战士不幸牺牲。

苏军发现中国方面在排雷，立即觉察到中方的意图，在无法阻止中国军队行动的情况下，他们也派出了一支小分队，想把坦克上的一些先进设备盗走。中国军队发现后一阵猛烈射击，苏军小分队只好仓皇回逃。

格列奇科在莫斯科一日三催，苏军前线部队指挥官急得似热锅上的蚂蚁，万般无奈，只好再派一支小分队，去把坦克的

内部设施炸毁。这支小分队由6人组成，全是身强力壮擅长单兵作战的侦察兵尖子。他们携带了120公斤炸药，趁着黑夜的掩护，披着白色斗篷，悄悄摸过江来，实施破坏活动。

中国方面在这辆坦克的附近安排了8个观察哨。但是这天担任警戒的8个战士由于连日劳累，居然都伏在雪地上睡着了，谁也没有发现这股偷袭过来的敌人。苏军小分队搜索前进时，发现了一名伏在雪窝里熟睡的战士，一枪托将其砸昏，然后把带来的120公斤炸药塞进坦克驾驶舱。就在这时，不远处突然响起了一串清脆的“哒哒哒……”的冲锋枪声。苏军小分队未及引爆炸药就赶紧撤离了。

其实，这枪声纯属意外——原来中方战士换哨时，其中一个战士被埋在雪里的枯树根绊了个趔趄，手指无意间扣到了冲锋枪的扳机，鬼使神差竟成了一次有功的走火。

天明后，战士们发现坦克上已经堆满了烈性炸药，真是好险啊！

就这样，苏军破坏坦克上重要设备的计划未能实现。

但是，中国军队要把坦克夺过来也十分不易。

一开始，战士们悄悄地将钢缆套在坦克上，然后用牵引重炮的卡车拖，一辆不行，两辆也不行，一直加四辆，坦克还是纹丝不动——30多吨的坦克再加上冰雪封冻，随便你怎么拖，它就是一动也不动。

肖全夫向中央军委汇报了情况，中央军委电令，一定要把这辆坦克完整地夺过来。收到中央军委的电报后，肖全夫几次冒着苏军的炮火亲赴江边观察，最后决定：架设人工绞盘，配合载重汽车，将坦克拖走！经过努力，终于把坦克拖上了岸。人们刚要欢呼，却发现这辆坦克被牵引的重力扯成了两半，拖上岸的仅是炮塔，而车身还留在江面上！

这时，苏军方面发现情势不妙，便集中火力朝江面开炮。由于已经到了春暖花开的季节，冰层开始融化，加上炮弹猛轰，终于将冰面炸裂，坦克慢慢地沉入了乌苏里江底。

中国方面决心既下，自然不肯轻易放弃。4月底，乌苏里江上的冰全部融化，前线指挥部决定打捞坦克。5月2日，来自海军北海舰队的3名潜水员潜入江底，用钢绳把坦克缚住，岸上数辆重型卡车牵引，终于把坦克拖上了岸。

但是，围绕这辆坦克进行的斗争，并未因此画上句号。苏联方面的军事行动失败后，克格勃又登场了。他们派了一个叫窦祥松的人来实施破坏行动。

窦祥松何许人？他是黑龙江省某地恶霸窦顺仁的独生儿子，抗日战争胜利后不久，窦顺仁就被人民政府镇压，窦祥松对人民政府怀恨在心。新中国成立后，窦祥松又因调戏妇女和偷盗公物被判了3年徒刑。

1961年，窦祥松刑满释放，被戴上坏分子帽子遣送原籍，

接受群众监督改造。他是个屡教不改之徒，又喜欢小偷小摸，拈花惹草，所以经常被治保干部叫去训话。1967年5月上旬的一个风雨之夜，窦祥松将治保干部张季英、郝某夫妇残忍地杀死后越境外逃……到苏联后，窦祥松很快加入了克格勃。克格勃对窦祥松说，中国准备把“盗窃”的那辆T62坦克运往北京，由专家进行破解研究，“窃取”苏联的技术机密。

窦祥松听到这里，已经完全明白了克格勃的意图，问道：“首长的意思是不是派我去把那辆坦克炸掉？”

“哦，窦同志，您很聪明，也很勇敢！您猜测得很对，是要派您回家乡走一趟，不过，炸掉一辆30多吨重的坦克，这不现实！我们只要您把坦克里面的一些仪器炸掉就可以了。具体如何实施，由我们的专家详细向您交代。当您完成任务从中国返回时，就不必回这里了，我们将把您送往莫斯科，在那里，已经为您准备了一幢不错的房子，当然，里面还有一个漂亮的俄罗斯姑娘，如果您愿意，她将成为您的妻子。”

1969年5月8日深夜，窦祥松潜入中国境内。上岸后，他立刻加快脚步朝前走去。他在这里土生土长，知道此处不宜停留，必须尽快走到离江岸3公里之外，才算到了安全地带。不久，天上下起了雨，他心中暗喜，大着胆子往前走。在特务学校所受的残酷训练和经营养师精心配制的膳食，此时发挥了作用，窦祥松只用了20分钟时间就走完了4公里泥泞小道，来到了一个屯

子外的破庙前，站在门口看了看，便走了进去。窦祥松知道这个屯子叫“光明屯”，前面有条公路，一头通往虎林县城，一头通往兴凯湖。在兴凯湖前十几公里处，有一条通往密山市的公路。根据克格勃专家制定的方案，窦祥松将绕道兴凯湖转往虎林县通往密山市的中途，在某个小镇，等候运送T-62坦克的汽车，伺机破坏。

窦祥松打算拦一辆拖拉机，因为拖拉机都是农村的，乡下人不认识自己，那样比较安全。

这时，公路上传来一阵轰隆隆的声响，窦祥松定睛一看，正是一辆洛阳拖拉机厂生产的“东方红Ⅱ型”履带式拖拉机，正向他这边开过来。窦祥松三步并作两步奔出树林，冲拖拉机连连招手：

“停一下！停一下！”

拖拉机停了下来，年轻的拖拉机手从驾驶窗里伸出头来：“干什么？”

窦祥松说：“搭个车。”

“去哪里？”

“我上兴凯湖。”窦祥松掏出一包“大前门”香烟扔进驾驶室。这香烟是从苏联带来的，但却是真正的中国货，是苏联驻华大使馆从北京采购后运往莫斯科的。

拖拉机手对窦祥松的大方很感激，点点头道：“谢谢！不

过我不去兴凯湖，我到郝家庙去拉木材。”

郝家庙是兴凯湖至密山市与虎林县至兴凯湖两条公路交叉点的一个小镇，正是窦祥松要去的地方，他心里高兴，脸上却故意显出一种略略失望的神色，说：“那这样吧，我跟你去郝家庙，到了那里再找车搭。”说着，从衣兜里抽出一张10元人民币，塞到拖拉机手的手里。

20世纪60年代时，10元是人民币的最高票面，这个数字大约相当于眼前这个拖拉机手月收入的四分之一，拖拉机手喜出望外，竟跳下车来，把窦扶上后面的拖斗。拖拉机经过一个检查站时，被检查员拦了下来。

检查站是公路和工商管理部门所设，除了检查有关交通、工商范围的情况外，还受公安部门的委托，对需要检查的过往人员检查身份证件。

窦祥松从身边取出边境通行证递过去。检查员看了看问：“是饶河的？”

“对，我是饶河县公安局的，到这边来出差。”窦祥松又出示了饶河县公安局的工作证和出差介绍信。

窦祥松所出示的这些假证件，都是克格勃技术活动管理局的专家伪造的，以眼前这个检查员的眼力自然难以辨别，于是很快就挥手放行。

上午10点多钟，拖拉机到了郝家庙，窦祥松谢过拖拉机手，

告辞而去。他计划是在郝家庙住一夜后，次日去密（山）虎（林）公路途中的小冲坡，那是个小镇，镇上有座桥，是运送T-62坦克的必经之地。他准备在那里下手炸坦克。

但是，就在当天晚上，窦祥松在郝家庙镇上的“工农兵旅社”被捕。在他携带的背囊里，查获两枚高爆燃烧弹。这两枚特制的燃烧弹只要有一颗投进T62坦克，就能把里面的所有设施全部炸坏烧毁。

窦祥松被捕后，供出了其充任克格勃间谍，受命潜入中国执行炸毁T-62坦克破坏任务的全部经过。同年9月下旬，窦祥松在哈尔滨被判死刑，执行枪决。

在1969年中苏武装冲突期间，中国军队的各种口径反坦克炮，对苏军的T-62坦克都构不成威胁。在几位老帅的呼吁下，研制新型穿甲弹、破甲弹的任务落在了某军事研究所的科研人员肩上。但要求穿甲弹、破甲弹击穿透不同厚度的钢板，初速应该是多少?炮弹接触钢板时瞬间产生的高温高压又应该是多少?科研人员心里一点底都没有。没有准确的数据，研究就无法进行下去。幸运的是中国通过外交途径得到了计算这个课题的一个方程式，但不幸的是这道方程式谁也不会解，中国刚刚研制的计算机更不可能输入解这种方程式的程序。

叶剑英知道后，指出一定要加速研制出新型穿甲弹、破甲弹，还谈到山东某大学有一位名叫刘先志的火炮专家，可向他

讨教。而此时的刘先志，正在“五七干校”，因为当年刘先志曾主持过希特勒德国克虏伯兵工厂的火炮设计，而且据说还有一大堆的“历史问题”。文革一开始，他就受到冲击，不断被批判，后来被划为黑五类，打入另册。

两位奉命到山东请教刘先志的军人获悉这一情况后，不禁犯难了：解这道方程式关系到我军科研的动向，这可是绝密中的绝密啊!怎么办?两位军人商量许久，最后决定，身着便装前去，只让刘先志解方程式，别的一字不提。

他们的第一次见面是在干校的菜园里，刘先志正握着锄把在挖地。

两名陌生人拿出了那个方程式说：“我们是搞教育的，碰到一个难题，希望你能帮助解出来。”

老人放下锄头，扫了那个方程式两眼，闭目沉思了一会儿，问：“这方程式是干什么用的?”

年长的那位说：“当然是教学用的。”

“教学根本用不上这种东西,你们拿走吧!”老人冷冷地将纸片塞到他们手中，重新摸起了锄把。

“你，你怎么这种态度?”

老人冷眼瞟了他们一下说：“既然不相信我，还找我干什么?”

二人无奈，只得离去。

几天以后，两人又来了。这次他们穿着军装，拎着两兜营养品，背着校领导，直接摸进老人的家门，进门就向老人敬了军礼。

两位军人满带歉意地说："首长批评我们了，以前我们不知道……我们以为……"

刘先志拦住说："别说了，都是我不对，我怕你们不来了，那可要误了国家大事……瞧，我已经算出来了，你们需要的几个数据都在这里。"老人从床底下拿出一叠纸，纸上标满各种方程式和最后的数据。

年长的军人惊疑地问："您真知道我们是干什么的?"

"研究破甲弹、穿甲弹，打坦克用的。"刘先志平静地说。

"简直神了，老先生，没有方程式，您怎么算出这些数据的?"另一名军人惊讶地问。老先生敲敲脑袋："我这手脚不利索，可这儿还灵光。"

两位军人拉着老人的手，喉头哽咽，再三嘱咐老人保重。

没过多久，在吉林某射击场，新研制的破甲弹和穿甲弹，把近25厘米厚的钢板打得弹痕累累，炸得坑坑洼洼，新型穿甲弹终于研制成功了。

北面，在苏军高级军事会议上，被苏联"宇宙"号卫星拍摄的一摞照片摊放在会议桌上。元帅、将军们依次看过照片后，都脸色阴沉，默然不语。崔可夫元帅捏着一张照片，仔细看了

许久，才叹息着说：“我想到一个人，他叫刘先志。以前，我以为他死了；可现在，我敢说，他肯定还活着……”

1978年，刘先志被平反，1982年被任命为山东省副省长，1988年病逝。但据知情的人说，尽管这个传奇故事被媒体炒得沸沸扬扬，但刘教授本人却从来没有认可。

那辆被我军缴获的苏制T-62坦克，后来被放在北京军事博物馆的陈列室里。

1969 年 3 月 26 日，周恩来就外电报道说苏联驻华使馆受到中国公民的骚扰和威胁并导致苏联使馆人员受伤一事批示外交部有关负责人和公安部长谢富治：“请查明有无此事，并请谢（富治）告卫戍区司令部和公安局，对聚集在通过苏联使馆路上的人群，劝其走开，如其要采取行动，要加以劝阻和干涉。”

3 月 29 日，苏联就珍宝岛事件交予中国政府的一份措词强硬的声明，但又“呼吁如果发生分歧，要在心平气和的气氛中通过谈判解决”，并提议苏中两国官方代表在最近恢复 1964 年在北京开始的协商。

## 第1072回：纠错误，八三四一进北大

## 说贵州，上海组批判陈毅

1969年3月20日上午，北京大学“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杨处长在全校各级领导干部会上作报告，肯定了宣传队进校的成绩，接着说道：“根据北大的地位、贡献，应产生一名九大代表。让谁去呢？总指挥部认为，聂元梓去比较合适。聂元梓是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作者之一，她是一个造反派，造谁的反呢？造陆平一伙的反，她自己也是受陆平压制、迫害最厉害的，她的造反精神是很强的。”“九大中要有红卫兵的代表。红卫兵的故乡北京的红卫兵是有代表性的，首都红卫兵中，大专院校红卫兵更有代表性，大专院校红卫兵中红代会核心组长就更有代表性，聂元梓是红卫兵的五大领袖之一，是红代会核心组组长，聂元梓当选代表不是她一个人的事，她是代表全北京、全国的红卫兵，不是代表哪一个组织，更不是代表哪一派。聂元梓是反对王、关、戚，反对‘二月逆流’的。经宣传队七个月的内查外调，聂元梓没有反对、损害无产阶级司令部的言行，她对无产阶级司令部是有感情的，是拥护的，她对军队的态度是好的。聂元梓的家庭很复杂，但她本人的历史是清楚的。”

他又说：“聂元梓最大的错误是没有如实地传达毛主席‘7·28指示’，对批评的话不是完全如实地传达，聂在‘一不斗、二不批、三不改’上有责任，但主要是阶级敌人跳动

和群众中的无政府主义思潮的影响。聂在思想意识、生活作风上有缺点，我们指挥部的同志在这方面也是有缺点的，这是小节，大节是好的。对聂的一些流言蜚语，经我们调查是不属实的。”

当天下午，杨处长的报告在全校进行了传达，并展开讨论。

3 月 24 日，8341 部队政委杨德中，副政委王连龙率领 81 名军宣队员进驻北大，开始纠正前一段北京大学“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在“清队”中的扩大化问题，另一方面继续清理阶级队伍。对当时还在开展的清查“5•16”，北大宣传队领导小组研究决定：

北大自“宣传队”进校后就批判了极左思潮，所以北大现在不搞“5•16”，外单位搞，要大力支持，但北大不参加，北大现在搞教育革命，这也是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

北大两派负责人各自进行旨在“消除派性、斗私批修”的“三忠于”讲用会。

聂元梓在讲用会上承认她“支持武斗、指挥武斗”等问题。承认“我利用职权，批准制造土枪、土炮、土手榴弹、土坦克，甚至派人搞枪支，为武斗升级做准备。为摧垮‘井冈山’大抓反动小集团，扣压工资、助学金，甚至断电、断粮，往 28 楼里灌水……还随意抓人、审讯，搞逼供信，打死人”。

侯汉清也在讲用会上讲了“井冈山”以暴易暴，大搞派性，歪曲毛主席革命路线，对毛主席和中央文革的批示采用实用主义态度等等。

聂元梓为首的“校文革”受到了严厉的批评，被定性为“派文革、武斗文革、逼供信文革”。

3 月 27 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中央军委根据 2 月 24 日在北京召开的解决贵州问题会议情况，发出《对贵州省当前文化大革命的指示》和《给贵州部队的指示》,指示内容各有五条，人们称之为“双红五条”。“双红五条”下达后，贵州革委会主任李再含被迫把关在监狱里的“411”头头放出来，并解散了支持李再含的贵州“818 兵团”，改名为“捍三红”。从此，“411”的活动开始由地下转为公开。

此事的起因据说源于 1968 年 11 月 18 日前后驻贵州的部队换防。当时，7611 部队，即 49 师调到云南省保山地区。而 0276 部队，即 41 师从保山调到贵阳。

7611 部队临走时与李再含发生矛盾。因为他们要求补充给养，被呼为“牙膏兵”、“肥皂兵”。而 0276 部队不满身兼昆明军区副政委的李再含在云南的言论，也给贵州反对李再含的“411”组织带来希望。

听说 0276 部队是乘火车在贵阳南站下车，“411”中学指挥部便悄悄的组织一批学生前往欢迎，结果部分学生被抓走。脱逃的“411”学生立即向 0276 部队报告，部队随即向

省革委、省军区要求放人。“411”闻讯欢欣鼓舞。

从此，0276 部队的来访接待站天天都有到访的“411”学生、工人、干部和居民。“贵阳地区 411 兵团”趁势重建。1969 年元月上中旬，贵州大学邓振新躲在市北路陈克久家楼上几天，写了 1 万多字的汇报材料，向 0276 部队反映贵州“411”遭受“踏平”的情况，请部队如实报告中央。

贵州“508”调查组安排一些人打入“411”兵团内部，掌握了“411”负责人陆光武的活动动向，于元月 22 日晚上 20 点左右，省工代会和“818 兵团”10 余人，在贵阳市服务大楼前抓捕了陆光武。

接着，1969 年 2 月 24 日，中央解决贵州问题会议在北京召开。然后就有了“双红五条”。而此时，北京“九大”的准备工作也已进入到最后阶段。就在这时，外交部长陈毅又出现了一段故事：

八届十二中全会后，上海市革委会领导成员的排名次序发生了变更，原来排在后边的王洪文，调整到了徐景贤的前面，排在了第三位。“九大”筹备期间，张春桥从北京给上海打电话，通知王洪文、徐景贤和王少庸：“中央决定上海的‘九大’代表名额为 80 名，其中，张春桥、姚文元两人以及陈毅，都由上海选出，但不占上海的代表名额。至于陈毅，应当由上海的‘九大’准备工作领导小组出面，将代表履历表寄给他自己填写，同时可以写一封信给他，告诉他上

海打算选他为‘右的代表’，看看他的态度如何。”

根据张春桥的指示，徐景贤起草了一封致陈毅的信：

陈毅同志：

党的“九大”即将召开，我们热烈欢呼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

根据中央的决定，你作为“九大”代表将由上海选举产生。按照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指示，上海市四十三万共产党员同意推选你作为右的代表出席“九大”，特此通知。

现将“九大”代表履历表寄去，请填写后寄回，同时希望能收到你的回信。

敬祝

毛主席万寿无疆！

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九大”准备工作领导小组

这封信盖上了“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红色大印，信发出以后不到一个星期，陈毅就把履历表填好寄回，并附了一封简短的信，对上海按照毛泽东的指示，选他作为右的代表参加“九大”，表示感谢和惭愧。

徐景贤把陈毅的回信寄给张春桥。随后，张春桥催促上海抓紧材料准备。

上海市“九大”材料小组经过一个多月的奋战，一本30来页的《陈毅同志言论小集》清样就赶排出来了。这本小册子是从陈毅1953年至1966年期间，在上海、北京等地各种

会议上的报告、讲话以及接待外宾时的谈话记录中，摘抄编成的，共分九个部分，标题有：

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反对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否定历次政治运动，鼓动右派分子翻案和向党进攻。

顽固反对在各项工作中突出无产阶级政治，为复辟资本主义大造舆论。

大肆鼓吹“阶级斗争熄灭论”积极主张阶级合作，反封社会主义革命。

否定工人阶级领导，丑化工人、贫下中农，反对知识分子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

贩卖赫鲁晓夫的‘三和’路线，美化和投降帝、修、反。

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

小册子编好后，送王洪文、徐景贤和王少庸审定。徐景贤觉得上纲上得不够，便将小册子的标题改成《陈毅反动言论小集》，送张春桥、姚文元过目。随后，印了 80 多本，准备分发给上海的“九大”代表。

1969 年 1 月，上海召开了一次区、县、局的党员代表会议，会上王洪文宣读了“九大”代表的预选名单，还专门宣读了陈毅的来信，大家举手通过，上海参加“九大”的代表就算正式选出来了。

除了收集陈毅的材料以外，张春桥还指名要收集“二月

逆流”黑干将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聂荣臻等人的材料。有些材料已经印成了清样，还有些关于陈毅，叶剑英等的内部绝密材料，是手写的，仅供领导参考。这批材料，共计 76 份，1163 页。

1969 年 3 月 7 日，王洪文和徐景贤接到中央通知，于第二天乘专机去北京，参加“九大”预备会议。临上飞机之前，王洪文的秘书小廖提来一个大皮箱交给他们。皮箱里装的就是上海收集的“二月逆流”的材料。王洪文还把八届十二中全会的《简报》全部带上，因为那里面有揭发陈毅从井冈山时期起反对毛泽东的多篇发言稿。

3 月 27 日晚，上海的 80 名“九大”代表齐集京西宾馆第一会议室举行第一次会议。张春桥和姚文元没有参加。王洪文、徐景贤以及上海警备区的一位副司令坐在主席台前，旁边给陈毅留了一个空位子。大家在等候陈毅的到来。

王秀珍守候在会场门口。因为她喉咙响、声音尖，事先商量好，由她一看到陈毅进场，就带领大家喊口号。

“九大”秘书处由吴法宪负责，他听说上海小组开会，特地派了两名联络员过来，坐在后排做记录。

开会时间到了，代表们都转过脸去，朝会议室的入口处张望，等待陈毅进场。

忽然，听见王秀珍的尖嗓子高声喊将起来：

“打倒‘二月逆流’黑干将！”

“陈毅必须老实交代！”

“陈毅必须低头认罪！”

代表们也跟着齐声叫喊起来。

陈毅进来了。主持会议的徐景贤示意陈毅在主席台的边座上坐下，接着便说道：

“今天，我们‘九大’上海小组的81名代表，在这里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陈毅同志作为上海小组的成员之一，今天也来参加会议。遵照毛主席的指示，我们上海市的共产党员，选举陈毅同志为右的代表。陈毅同志过去在上海工作期间，存在着严重的错误；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又卷进了‘二月逆流’。对这些问题，我们上海的代表们必须进行清算。”

说到这里，王洪文从文件袋里取出早已准备好的《陈毅反动言论小集》，举在手里扬了扬说：“我们把陈毅同志过去在上海等地发表过的讲话，摘编了一本集子……今天，我们要把这本《陈毅反动言论小集》当面送给陈毅同志，希望你能和大家一起，彻底清算自己！”

说罢，王洪文把小册子递给陈毅。陈毅一下子懵了，他万万没有想到今天会收到这样一份见面礼。他欠起身子，双手接过小册子，讷讷地说：“应该清算……我陈毅在文化大革命中犯有严重错误，承蒙上海党选我当‘九大’代表，我很惭愧，我一定要……”

“什么上海党、北京党的，我们的党只有一个。你陈毅这种说法是制造分裂！”主席台下面飞出一条大嗓子，打断了陈毅的话。

“是的……是的……”陈毅更加惶恐不安，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

主持会议的徐景贤宣布批判发言开始。

第一个发言的是王洪文，发言的题目是：“彻底揭发陈毅同志一贯反对毛泽东思想的丑恶嘴脸”。

接着，嘉定县农民代表发言，题目是“批判陈毅同志反对工农兵、大搞阶级投降的反动本质”

……

代表们事先都作了准备，他们的批判发言一个接着一个，陈毅忙不迭的在桌子上做着记录，批判会足足开了两个多小时才暂告结束。

午夜，代表们聚集到京西宾馆底层大餐厅去吃夜宵，王洪文、徐景贤和王秀珍都兴高采烈：身名显赫的陈毅元帅如今被他们批得晕头转向。初战告捷，使他们的情绪处在兴奋之中，于是商定要趁热打铁，继续再批。

3 月 28 日上午，向来起床很晚的张春桥和姚文元一反常态，早早就从钓鱼台联袂赶到京西宾馆。他们已从大会秘书处派来的联络员那里，了解到批判陈毅的情况。来到京西宾馆，二人在上海代表团住的七楼小会议室听取了王洪文他们

汇报昨天晚上的具体情景。当听说到陈毅收到小册子时，猝不及防、颇为狼狈的时候，一向严肃正经的张春桥大笑起来。当王洪文提出还要再批陈毅的时候，张春桥说："你们不能光批人家呀，也得让陈毅讲讲话嘛。"

这天，张春桥、姚文元送审"九大"政治报告修改第二稿，毛泽东批示："请林彪同志审阅。退还张春桥、姚文元同志。有一些小的修改。"

"林办"收到张春桥、姚文元的第二次修改稿，林彪只让秘书给他讲毛泽东的修改之处。

山东省的其他"九大"代表第二批集中赴京。他们刚到北京，王效禹就把韩金海、傅建吾、杨保华三人找去说："我一下飞机就斗上了，这个风是真不小啊！他们对你们这几个劲头很大。"

针对山东的情况，周恩来对杨得志、袁升平说："是否可以利用'九大'预备会的时间，把来开会的省里的、军区的领导同志找来好好谈一谈，互相交换一下意见，顾全大局，多解决群众之间、工作之间的一些问题，抓紧时间进行，不要等正式开会了再谈。如果最后有的问题不好解决，我可以参加谈一谈。"

于是，济南军区的杨得志、袁升平找王效禹等地方代表谈，但没谈多久就谈不拢了。于是又改作个别谈，由杨得志、袁升平找王效禹谈。但是这次谈话依然是各讲各的，直到快

吃午饭，也没有结果，只好不欢而散。

3 月 26 日，王效禹在山东代表组的全体会议上说："我们选九大代表受到中央的批评，多选了 11 名三结合的军队干部代表，这样工人贫下中农的名额少了。本来准备换一下，我们做了检讨，总理报告了毛主席。中央决定批评从严处理从宽，既成事实就不掉换了。另外我们省新生力量多了一些，我们主动检查了，中央说新生力量还可以。"

3 月 28 日晚上的"九大"预备会议，周恩来到华东组。讨论主席团的名单时，王效禹让山东省革委会副主任、山东省军区政治部副主任赵修德发言。赵修德讲完后，周恩来批评山东多选了 6 名军队支左代表，占了地方名额。王效禹为此作了检查。

山东终于开了一个全体会议，由军委办事组吴法宪参加，预备会华东组召集人许世友说："山东究竟有什么问题？听听大家的意见。"接着，他让上海的王洪文主持会议。

首先是北海舰队政委易耀彩发言，讲了青岛问题。接着，济南军区政委袁升平从山东"二三夺权"开始，针对存在的问题，谈了自己的意见。他越说越激动，讲了一个多小时。快到 11 时 15 分时，王洪文说："时间差不多了，是不是就开到这，下午再接着开。"然后说："袁升平同志今天上午讲的这些问题，听起来没有重要的。"

袁升平一听生气了，打断王洪文的话说："你又没去过

山东，怎么知道我讲的不重要？如果这样，下午的会也不要再开了。

散了会，袁升平边走边对许世友表示不满说：“你怎么把会议推给王洪文主持？”

许世友笑笑说：“这些事你不明白，算了吧。”

袁升平又讲：“不管怎么样，这样的会不能再开了，不然，不管预备会还是正式会，我都不参加了。”

许世友说：“好好，下午的会不开了。”

下午的会果然没有再开。

第 1073 回：适可止，周恩来婉转叫停

四月一，九大在北京召开

3月29日下午，毛泽东召集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开会，讨论“九大”准备工作和中苏边境冲突。

3 月 29 日晚上，上海组继续开会，而且事先通知陈毅让他发言。

会议由王洪文主持，先由代表们再作批判发言，随后让陈毅表态。

今天，陈毅看来已经有所准备，而且也不太在乎会议的气氛了，神态和情绪都不像第一次受到突然袭击那样局促和不自在。他一边翻着上海编的那本小册子，一边侃侃而谈。他谈到自己曾经有较长时间在上海工作，对上海有着深厚的感情，虽然 1954 年起调到中央，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外交部部长，但是仍然兼任上海市市长，一直到 1958 年，共当了 9 年的市长。在上海工作久了，讲话的机会又多，确实存在不少缺点错误，欢迎代表们批判。陈毅又谈到了文化大革命，他承认开始的时候确实不理解，犯了严重错误，但还是愿意改正的。接着，他谈起自己几十年的革命历史，他说，自从上了井冈山以后，40 多年来，自己一直紧跟毛主席干革命，虽然有的时候思想一时跟不上形势，或者对毛泽东思想理解不深，但是自己基本上是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边……

陈毅一口气讲了三刻钟。下面的代表们听得不耐烦了，有人中途就喊叫起来，打断了他的讲话：

“陈毅不要评功摆好！”

“陈毅老实交待实质问题！”

经过文化大革命冲击的陈毅对这种场面已经很熟悉了，他没有理会中间插进来的干扰，还是继续他的讲话。多数代表并不了解党史、军史，也提不出有力的论据进行批驳。

王洪文见状，悄悄地对徐景贤说：“八届十二中全会上一些老红军揭发陈毅反对毛主席的材料拿出来，将陈毅的气焰压下去。”说着，他从文件袋里取出事先准备好的八届十二中全会简报，交给了徐景贤，让他发言。

陈毅刚讲完话，徐景贤就抓过话筒说：

“刚才陈毅同志给我们上海小组的全体代表上了很好的一课。他的发言又长又臭，说明他直到现在还在坚持‘二月逆流’的反动立场。我们上海给你编了言论集，代表们花了两个晚上的时间批判帮助你，可是你却采取避重就轻、避实就虚、舍近就远的方法，大谈自己的光荣革命历史，把自己打扮成是一贯紧跟毛主席干革命的。你这是妄图欺骗一些不了解党史、军史的青年，然后自己蒙混过关，这种手法，必须予以揭穿。”

说到这里，徐景贤把那本装订成册的八届十二中全会简报“啪”的放在桌上，说：“难道你陈毅真的从井冈山时期

起，就是紧跟毛主席干革命的吗？否！根据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上的揭发，在井冈山时期，毛主席是红四军前委书记，你陈毅是红四军政治部主任。但是，在 1929 年 6 月下旬举行的红四军第七次党的代表大会上，你却反对毛主席总结和创造的关于建党建军的一系列正确的政策和原则，反对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反对建立巩固的农村根据地，迫使大会否决了毛主席的正确主张。”

徐景贤所念的简报内容，很多代表都是第一次听说，大家都吃惊地瞪大眼睛，会场里鸦雀无声。

徐景贤接着说：“也是在这次红四军‘七大’，你陈毅这个政治部主任把毛主席赶下台，取而代之，自己当选为前委书记。这还不算，以你为首的前委还决定要毛主席离开部队，到闽西去搞地方工作。你的这些错误，在后来召开的红四军‘九大’上终于被揭发出来。大会所通过的《古田会议决议》，毛主席所写的《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不就是对你的问题作了严肃的批判吗？”

会场里出现了轻微的骚动，代表们这才晓得他们所熟读的《古田会议决议》，原来还有这样的历史背景。徐景贤清了清嗓子，继续向陈毅猛攻：

“就是你这个在 40 年前就反对毛主席的陈毅，到了 40 年后的今天，又跳出来反对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成为‘ 二月逆流’的黑干将。你刚才的发言中胡说

自己是一贯紧跟毛主席干革命的，这是对代表们发言的猖狂反扑，也说明你根本不肯承认自己是右的代表。大家都知道，《三国演义》里刘备手下有一个大将叫魏延，他的后脑长着一根反骨，一有机会就跳出来反对蜀国。40 年来的历史证明，你陈毅就是后脑长着反骨的当代魏延！”

徐景贤的发言把代表们激怒了，王秀珍高呼：

“谁反对毛主席就打倒谁！”

“打倒陈毅！”

很多人都举起手跟着呐喊起来。

这时，大会秘书处派来的联络员急匆匆地走了。

陈毅默默地坐在座位上，低下他那光亮的额头。显然，徐景贤的发言使他大感意外，他的脸庞涨得通红，颈后有几根青筋微微突起，嘴唇轻轻地颤动着，想要说什么，但终于没有说。

当年，陈毅在红四军“七大”上，确实和毛泽东发生过争论。可是，后来在毛泽东离开部队以后，红四军出现了许多问题，陈毅为此深感忧虑，趁着到上海去参加军事会议的机会，向党中央作了详细汇报。时任中央军委书记、组织部长的周恩来听取汇报后作了指示，要陈毅代中央起草了“九月来信”，坚决支持毛泽东的工作，肯定了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周恩来在和陈毅面谈时，又以中央军委的名义，要陈毅马上返回，把离开部队的毛泽东请回来，继续主持红四军前

委的工作。陈毅回到苏区，都照办了。

在 1968 年举行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有人把这段历史重新翻了出来加以清算。今天，上海组又把这些历史上的陈年旧帐，作为他陈毅反对毛泽东的新鲜话题，抖落在不了解党史、军史的年轻代表面前。在毛泽东的威望达到无与伦比的的今天，听到这些材料，如何能不激起人们的愤怒？陈毅想作说明，可是“夫复何言”！他在座位上紧紧地作蹙起了眉头，通红的脸颊上，两块下垂的肉微微地颤动着，嘴里呼哧呼哧吐着气。他欲言又止……欲言又止……

王洪文瞅瞅陈毅，宣布说：“我们奉劝陈毅同志认真考虑代表们的批判、帮助，做出一个像样的检查来，下一次向代表们彻底交待……好，今天的会议到此结束。”

陈毅缓缓地站起身来，捡起桌子上的那本言论集，颤巍巍地走了。代表们也都散去。

王洪文、徐景贤和王秀珍等留下来，讨论下一步的计划。这时，大会秘书处的工作人员走了进来，通知他们几个马上到京西宾馆大会秘书处吴法宪的办公室去一下。

在吴法宪办公室等了 10 分钟左右，吴法宪进来了。他客气地和他们逐一握手，然后座在办公桌前，字斟句酌地说：“上海的‘九大’ 代表们开了两次会，帮助陈毅同志，我们的联络员都在场，已经向领导上作了汇报。上海的代表们对‘二月逆流’的黑干将表示义愤，这是完全可以理解

的……刚才总理把我找去了，总理指示适可而止。所以，找你们几位传达一下，下一次会议是否就不开了？”

王洪文 3 人频频点头，认为周总理的指示不能不听，会议看来不能再开了。

吴法宪又说：“这次‘九大’，要选举新的中央委员会，毛主席指示:要保证这些卷进‘二月逆流’的老同志选上。”

3 月 31 日，张春桥、姚文元送审“九大”政治报告修改第三稿，毛泽东批示：“林彪同志：又看了一遍，作了一些修改，主要是把第四节与第三节对调一下，末尾一小节当作第五节。这是郭沫若同志提出来的，我觉得这个意见较好。是否可以，请你酌定。并告张、姚二同志。”

“林办”收到张春桥、姚文元的第三稿，林彪仍然没有看。

周恩来把经中央文革碰头会最后讨论通过的政治报告稿批送林彪审定，林彪的秘书张益民拿着这份有周恩来批语的报告稿向林彪报告，林彪还是一字未看，直接在稿子封页上大笔一挥：“呈主席审批。林彪”

这天中午，周恩来给“林办”打来电话：

“‘九大’快开幕了，打算早一些把政治报告稿子印出来，这个稿子经中央文革碰头会最后一次讨论修改，我于昨晚批送林副主席定稿，你们收到了吗？”

“收到了。”接电话的是张益民。

“送给林副主席看过了吗？”

“送过了。”

“林副主席如果没有意见，请早些把稿子退给中办，他们在等着付印。”

“林副主席已经把稿子批给主席了。”张益民说。

“怎么？又批送给主席了？”周恩来着急的说，“前天在主席那里开会，主席讲他已亲自修改几次，不再看了，请林副主席最后定稿。这个事叶群同志是知道的，当时她在场。为什么又送给主席了？”

“我是否打电话把稿子追回来？”张益民请示说。

“送出多长时间了？”

“半个多小时。”

“不用再追了。”周恩来无奈的说，“已经来不及了。”

3 月 31 日，毛泽东在审改“九大”报告时又加了一句：“对于那些略有进步、开始有了一些觉悟的人们，就要从团结的观点出发，继续给以帮助。”这天，他又在周恩来送来的关于徐海东参加大会主席团的报告上批示：“同意。明天宣布开幕式上主席台人数不宜太少，似宜有伯达、康生、董老、伯承、朱德、陈云等数人参加，请考虑酌定。”

林彪原来布置秘书为他拉的“条子”，到了最后一刻，也决定不讲了。

1969 年 4 月 1 日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了由新华社

发布的《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团秘书处新闻公报》，全球为之一震，人们期待已久的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已经开幕，这似乎意味着已有 3 年之久的中国文化大革命就要结束了。在《新闻公报》广播之前，人们并不知道“九大”将在什么时候召开。会议的筹备情况，对外采取了极为严格的保密措施。

出席“九大”的代表是由各级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推荐定的，其中不少是群众组织的头头，很难对群众保密。为了切断与外界的一切联系，除极少数军政高级领导干部中的代表外，全体代表都在大会之前的三个多月，便以省市自治区为单位秘密集中，进行全封闭式的学习，随时准备出席大会。

广东省的代表集中在四面环水与省委机关一桥相连的小岛宾馆。眼看年关将近，进京还没消息，韶关地区的一位瑶族代表不干了，他提上自己的小包，不辞而别，桥头的哨兵把他拦住。学习班负责人闻讯大吃一惊，他问这位代表：“你不想到北京开会见伟大领袖毛主席吗？”

这位代表一本正经地说：“快过年了，我家里就我一个男人，我不回去，过年的猪谁杀呀？”

这样的代表“路线觉悟”实在太低，只好叫韶关地区把人领走，另外调换一名代表，韶关地区革委会为此受到严厉批评。

一日复一日，一月又一月，终于盼来了进京通知。空军的飞机载着“九大”代表在北京降落时，北京早已夜幕降临。代表们神不知鬼不觉地分别住进北京饭店、前门饭店和京西宾馆。大会秘书处设在京西宾馆。各宾馆警卫森严，大门紧闭，代表一律不准外出；室内电话全部撤消，靠街的窗户不得打开，晚上须拉上窗帘。

因为“九大”政治报告还没有出来，“九大”又推迟了一个星期才开会。但是代表都已经陆续来到了北京，只好先组织他们参观。

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计划 4 月 1 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人民大会堂位于北京市中心，1500 多名“九大”代表和几百名大会工作人员齐集人民大会堂，要想不让外界察觉，实在是一件不容易事。大会秘书处为此作了周密部署：

住各宾馆的代表一律乘统一调配的大公共汽车，每车 45 人，定车定人。各代表团在宾馆楼下大厅集中列队候车，汽车每次开来两辆，车门面向宾馆，刚好挡住大门，车刚停稳，门卫便打开紧闭的大门，代表们由代表团秘书或指定的人员带领，迅速登车，汽车很快起动。此后每隔三、四分钟，又有两辆大交通车开来。如此每个宾馆只需有六、七次，约半小时左右即可将全部代表接走。

公共汽车的路线是精心安排的。以住在北京饭店的代表

为例，从他们的住处乘车直开人民大会堂，距离不到 1 公里，行车时间只需两、三分钟。但为了掩人耳目，代表们的车子却背道而驶，向东开到东单，转而向南到崇文门沿前门东大街、西大街西行，再右转北新华街，兜了个大圈子，最后开进人民大会堂侧门院内停车，代表们就可隐蔽从容地由便门进人会场。

4 月 1 日的大会，自始至终没有一人从人民大会堂正门进人会场。大会堂正门前的广场依然空空荡荡，不见任何大小车辆，大会堂四周的警卫战士仍像平时一样，或在哨位挺胸伫立，或在广场慢步巡逻。而此时的会场，用厚厚的深色窗帘把门窗遮盖得严严实实，看不到任何灯光人影，堪称滴水不漏。

## 第 1074 回：论文革，林彪作《政治报告》

## 陶铸病，毛泽东谈史说今

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于 4 月 1 日 17 时开始，随同毛泽东和林彪登上主席台的有周恩来、陈伯达、康生、董必武、刘伯承、朱德、陈云、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口号声过后，毛泽东说："同志们！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现在开幕。"

接着，毛泽东说："今天要选举大会主席团，通过大会议事日程。大会议事日程主要包括三项：林彪同志代表中央委员会作政治报告；第二项，修改中国共产党党章；第三项，选举党的中央委员会。

现在选举主席团。要不要读？你们都知道了嘛。主席团这么多人，176 名，行不行呀？有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陈伯达；有董必武、刘伯承这些人；有于会咏、王体、王震这些人。一共 176 人。你们手上都有，赞不赞成？赞成的举手。"

大会主席团候选人共 176 人，名单已提前发给全体代表。当毛泽东问大家赞成不赞成时，下面报以暴风雨般的掌声，全体代表举手。

毛泽东："多数吧？通过了。"

周恩来："请当选主席团成员上来。"

毛泽东继续："大会主席团要推选一个主席，一个副主

席，再选一个秘书长。哪几个当合适呀？”这时，毛泽东面带微笑地说：“我看林彪同志当主席。”

周恩来说：“毛主席当合适。”

这时会场出现了轻松活泼的气氛，代表们发出笑声。

林彪赶紧把嘴向话筒前凑了凑，大声说：“毛主席当主席，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当主席。”

众人鼓掌。

毛泽东：“林彪同志当主席，我当个副主席，好不好？”

林彪赶紧站起来，笑着对大家说：“不好！不好！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当主席！赞成的举手!”

代表们笑着高高举起右臂，林彪高喊：“好！全体通过!”会场又响起热烈掌声，接着是高呼“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声。

毛泽东接着说：“一定要我当主席也可以。我提议林彪同志当副主席，同不同意？赞成的请举手。”

代表们再次举手，热烈鼓掌。

毛泽东：“没有意见，通过。谁当秘书长呀？我提议周恩来同志当主席团秘书长。好不好？”

代表们又举手，鼓掌。毛泽东高兴地说：“好，通过!”

接着，毛泽东说：“我希望我们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能开得好，开成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大会以后，在全国取得更大的胜利。从 1921 年到现在，我们已有 40 年的

历史。这么长的时间了。第一次代表大会，只有 12 个代表。现在在座的还有两个，一个董老，还有人不认识吧？”

董必武站起来向大家致意。

毛泽东：“再一个就是我，其他好几个牺牲了，山东的王尽美，邓恩铭；武汉的陈潭秋，湖南的何叔衡，上海的李汉俊，都牺牲了。叛变的、当汉奸的有四个：陈公博，周佛海。张国焘，刘仁静这两个人还活着，张国焘到加拿大去了，刘仁静在北京，是个托派，见过托洛茨基。另一个李达，武汉大学的校长，早二年去世了。那时全部党员只有几十个人，六七十个人，大都是知识分子，后头就发展了。从那一个时候发展到现在这种情况。第一次代表大会，第二次代表大会，第三次、第四次，人都很少，几十个人。第五次是在武汉开的，人多一些，可能有百把人。第六次是在莫斯科开的，几十个人。”

周恩来：“还有刘伯承同志。”

毛泽东：“第七次是在延安开的，开了一个团结的大会。清算了瞿秋白、李立三、王明的错误路线，特别是王明路线。那时党内有分歧。有人提议，不选王明路线的人到中央。我不同意，说服大家选了他们。结果有几个人不好，王明跑到国外去了，反对我们，不好！张闻天不好！李立三不好！李维汉不好！”

周恩来：“还有王稼祥。”

毛泽东："王稼祥犯了错误。其他几个，刘少奇、薄一波、安子文这些人，那时不知道不好。对他们政治历史我们不清楚，也选进来了。从八大以来，现在搞清楚了。政治路线、组织路线都比较清楚了。因此，希望我们这次大会能开成一个团结的大会。在这个团结的基础上，我们能不能取得胜利？开一个胜利的大会？大会以后，能不能在全国取得胜利？我认为是可以的。开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是可以的。庆祝党的这次大会的胜利！

现在请林彪同志代表中央作政治报告。"

这是毛泽东向大会致的开幕词，他没有讲稿。但口号声此伏彼起，讲话二十几分钟，竟被打断数十次之多。一些人也不管毛泽东讲到哪里，甚至一句话还没讲完，便站起来领呼口号。那时的口号都是成系列的，一喊就是一串，不能中途停下。有人领喊，大家就得跟着呼喊，而且要喊出精神来，不然就是缺乏"阶级感情"。毛泽东从"一大"讲起，这是一个很有讲头的大题目。但是，会场的气氛却对他的讲话造成极大干扰，他也逐渐有些不耐烦了，不得不草草打住。最后，经大会秘书处整理的毛泽东讲话稿仅有 649 字。他实际讲话时间少于呼口号的时间。

17 时 32 分，"九大"按照大会议程，林彪开始代表中共中央作政治报告。

《政治报告》共分成 8 个部分：

一、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准备；

二、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过程；

三、关于认真搞好斗、批、改；

四、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政策；

五、关于我国革命的最后胜利；

六、关于党的整顿和建设；

七、关于我国和外国的关系；

八、全党、全国人民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其中最重要的是一、二、三部分。

这个报告，用很大篇幅回顾了“文化大革命”准备和发展的过程，体现了毛泽东关于“文化大革命”理论和实践的基本观点，充分肯定作为“文化大革命”指导思想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

林彪作完政治报告，毛泽东说：“同志们，今天开会开到这里，明天分组讨论，请你们发表修改意见。散会！”

当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播音员，以高亢激动的声音播出“九大”开幕的新闻，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一些外国通讯社、报纸迅速报道了大会消息，或发表评论，对没有预先得知开会消息感到有些惊讶。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九大”开幕的消息之后，大会秘书处有限度地放宽了对代表们的保密要求，允许与外界通信。当时长途电话通话范围十分有限，不少青年代表纷纷涌

向宾馆附近的邮电所，满怀激情地向家乡或单位发电报，报告大会开幕和他们见到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情景，要大家与他们分享这一幸福。有的代表从没有发过电报，在邮电所工作人员帮助下艰难地起草电文，有的一写上千字，绝大部分是电台广播的内容。

从 4 月 2 日至 14 日，代表们在人民大会堂里进行了分组讨论，主要内容是林彪作的政治报告和张春桥、姚文元主持起草的《党章修改草案》。

4 月 3 日，周恩来就苏联边防军炮击珍宝岛致信毛泽东、林彪，认为这是苏联故意虚张声势，做给人看的。他提议："一、我边防站暂时不理对方边防站的招呼；二、调整我火炮位置，待敌连续炮击几日后，采取突然回击一次，给以重大杀伤，并发表我方抗议文件。"毛泽东批示："可以。"

4 月 5 日，毛泽东同谢富治等人谈话时，再次提到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他说："在一个时期总有一个倾向。在第一次大革命以后，只讲合作，就不讲独立自主。讲国共合作，就不讲和国民党作斗争。有一个倾向问题。有时讲倾向，有时讲潮流。有时讲思潮，有时讲浪潮。在一个倾向下就蒙蔽许多人。""一个时期总要有一个倾向，要掩盖另一个倾向，分裂中掩盖着联合，联合中掩盖着分裂。"

他说："现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什么事情都上纲很高。北京有个工厂，有 8 个人的专案组，说他们的厂长是狗

特务。经过群众审查，这个厂长是好人。有些专案组我就不太相信。北大一万多人，抓了几百人。宣传队进驻以前，不交待任务，进驻以后，没总结经验，不找他汇报。北大三进三出，这样，对军队也不好嘛！63 军就不要走了。这主要是领导不下去，层层听汇报，刘兴是 63 军政治部副主任，7 个月来还没听他们汇报过一次。我原以为远的不好抓，近的地方工作好做。但也不一定了，蒯大富下放以后，表现不错嘛！

现在不是讲对准刘邓一小撮吗？北大是否抓一小撮？抓千分之一、千分之二、千分之三就可以了，其余的都放走。教授、讲师、副教授手无寸铁，造不起反来，造反再抓嘛。”

“‘二月逆流’几个干将，我就恨不起来。不是这几个嘛，其他地方也有的。有个别跳，他们是公开搞的，不是阴谋。他们反对中央文革，实际上是反对我和林彪同志。‘九大’不要写上了，不像杨成武搞两面派。他们还是一肚子气呢。”

“要准备打仗，东北、西北、华北都要准备。准备好了，不打也没有坏处嘛！要准备敌人飞机轰炸我们的原子反应堆。”

“加强地方武装，小县一个营，中县两个营，大县一个团。平时搞生产、搞训练，打起来编到野战军。义务兵打起仗来就来不及了。”

周恩来在 4 月 3 日中央警卫局的报告上看到陶铸病重的

消息，于 4 月 5 日在《关于陶铸的病情报告》上批示："拟同意送入 302 医院，进行保密治疗。即呈主席批阅。我是看了 4 月 3 日警卫局的报告才知陶的病状较重，经追问后，送来这一报告。"

陶铸的病被确诊为胰腺癌，周恩来指示要积极治疗，并指定上海第一医学院的董芳宗主任担任手术主刀，301 医院的陆准善主任为第一助手，阜外医院的麻醉科主任负责麻醉，北京医院的内科主任也参加医疗小组。

"九大"期间，江青主动召集了一次军队代表开会，她在会上说道："主席的接班人绝不是一个人，而是一批人……"

姚文元说："江青是文革旗手，当然也是主席的接班人。"

军委机要员将江青谈话记录稿送中央常委传阅，先送到康生那里。康生看后急了，马上扣下记录稿不许再传阅，并要求军委办事组收回其他可能的外流记录。

4 月 11 日下午 17 时至 18 时 30 分，毛泽东召集"九大"大会秘书处和各大组负责人，征求大家的意见。

他见到李雪峰，就问他："北京有人攻你了吧？北京攻得厉害呀，多少次检查也不放，检讨一下就行了。为什么检讨那么多？到天津又有人攻，是山西发动的，他是山西人啊。"

周恩来说："给刘格平打了个招呼，是张日清他们搞的。"

张春桥："是刘志兰、陈守中搞的。"

接着毛泽东征求大家的意见，说："找同志们来，想商量一些事。这个会就是开小会开下去，还是开一次大会？我们谈过一次大会，然后再开小会。我想开一次大会，通过政治报告、党章。但还不发表，文字修改交秘书处。这个政治报告增加几段，一个是民主党派，一个是统一战线。共分八段，每段加个题目。明后天，今天是 11 号，12、13 讨论两天，14 号开大会。此外，看是不是这样，我看到一份简报，北京市的一个简报，说清理阶级队伍有一个倾向，就是扩大化。这个问题在碰头会上谈过好几次了，清理阶级队伍要把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和现行反革命分子、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找出来，要搞这一些人。有些地方搞得好，有些地方扩大化，这种情况是可以理解的。由中央提出要搞，一搞他们就扩大化了，历史上也有不少这种事。比如延安整风，开始时是为了召开'七大'，事先把问题搞清楚。搞清楚了，不在大会上批评那些犯错误的人，我讲开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结果是团结起来了，是胜利了嘛。"

他回顾了土地革命时期党内的斗争后说："总有一个主要矛盾，结果掩盖了另一个矛盾，……发生了皖南事变，一个事件有一个主要倾向，如打日本，民族，统一战线掩盖了独立自主，掩盖了阶级矛盾。后来批判了王明，现在还有人

说整风不应该那么整，整错了。我说将来还有人说的。”

他又从和孙中山的合作说到蒋介石的屠杀：“到蒋介石杀人前夜，没有想到搞根据地这个问题呀，我看请大家酝酿一下。蒋介石杀人把掩盖的一面就突出出来了，拿枪干起来了。同国民党干起来了，而刘少奇就在武汉交枪，别处也有。”“内战犯了三次‘左’倾错误，……到了抗日第二次合作，就提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掩盖了独立自主，搞根据地，扩大红军发动群众，直到日本投降。日本投降以后，开头国民党请我去谈判，没有结果就回来了。然后就是董老、总理你们去了。写了协议应该算数嘛！我在重庆时有人在延安搞了个‘和平民主新阶段’。”

董必武：“我们在重庆不知道。”

曾思玉：“晋察冀是聂荣臻传达的。”

毛泽东：“东北没传达。”

林彪：“我们在东北没有传达，发了个电报给中央。这个电报就是说现在不是‘和平民主新阶段’，而是内战期间。是同刘少奇对抗，反对刘少奇的。”

毛泽东：“‘七大’是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因为把蒋介石打败了嘛。我们进城以后，那个时候把刘少奇，把刘、邓团结起来了。除邓小平没有发现历史问题以外，另外，薄一波、安子文等都和国民党有一些关系。也有一些人是跟着走的，不一定是叛徒、特务问题。例如山东的谭启龙，算这

类。共和国建立了，社会主义就开始了，但我们没有宣布，土改以后才逐步宣布。土地改革彻底？就不那么彻底。有的是和平土改。至于对民族资产阶级利用、限制、消灭它。”

张春桥：“利用、限制、改造。”

毛泽东：“在几年内，国内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已经指出了，但是没有经常讲，所以广大干部不知道，所以这一次又来了二次革命，叫文化大革命。是从文化开始的，叫不叫大革命？以后历史学家去做。叫文化大革命也可以，名称叫什么都可以。主要是对上层建筑，机关、学校、工厂，这个工作还没有完，恐怕还要一个时期要认真抓一下。当个革命委员会主任不容易，我这个主任也管不了那么多。”

姚文元：“主席是全国革命委员会主任。”

毛泽东：“我也算一个主任。比如北京还不是谢富治、温玉成去管，与过去不同是可以插手了。”

谢富治：“主要是靠主席抓的。”

林彪：“主要抓了典型。”

张春桥：“陶铸抓了生产，不叫抓革命。”

毛泽东：“工厂、农村，66 年 10 月、12 月发了两个文件，现在还是要搞。一个工厂、一个农村、一个机关、一个学校，部队也搞了嘛。”

黄永胜：“搞了。”

毛泽东："可是要谨慎啊。有些专案组的材料不一定准确，南口专案组 8 个人搞一个党委书记，要注意，搞专案的人总想多搞几个好。过去我们行军，没事捉虱子，总想多捉几个，专案组好像捉虱子。要超脱，超脱一点好说话。我这个人没搞专案，就可以说，搞了的人就不好说话。一个大学捉了 900 多人，怎么得了？人关起来了，捉有捉的理由，放更要有个理。"

张春桥说了上海关的人数。

毛泽东："我看不止一个上海，其他地方都有。至于关在牛棚里的人更不少，恐怕各地都有。上海关的人干什么？"

张春桥："在扫地。"

毛泽东："苏联人讲我们整知识分子，秦始皇杀了四百几十个人，我们还没有杀一个人吧，是关牛棚。"

康生："苏联《红星报》上登了彭真坐喷气式的照片。"

毛泽东："喷气式不要搞。我说罪魁祸首还是我；我在十二中全会上讲了，说：我在 1927 年文章上说了，地主戴高帽子游乡，既然给地主可以戴，为什么不可以给彭真戴？给彭真，牛鬼蛇神戴，我们几十年没有搞了，这次红卫兵就翻出来了，坐喷气式。三反五反时天津就搞过，我们不主张戴高帽子，搞这一套。抓人还是大部不抓，抓了怎么办？还是事出有因，查无实据嘛！别的想不到了，现在扩大化了，许多同志要注意。想到我们党的历史，总是个主要倾向掩盖

之下，另外一种倾向就忽略了。我讲的就是这点。完了。”

在大家商量了关于《政治报告》的修改、公报的发布等工作后，毛泽东又提起选举的问题。他说：“下一步搞选举。这个比例范围，人选还是过去的办法，小组提议，还是大组提议？”

周恩来：“还是小组提议。”

毛泽东：“但是，我提议几位老同志，就是你们讲的几个老机会主义，都选进去。我开幕讲话就有这个意见。王明、李立三、张闻天、王稼祥，‘七大’时不选他们，也是作了工作，才选进去的，张闻天在遵义会议是同我合作的，以后也是好事做得多嘛！

王明回国以后，他们没有站在王明方面，是站在我们这边的。这次能不能把张闻天、王稼祥选进去，再考虑。几位老帅，李先念、李富春要选。”

许世友：“应当选。”

毛泽东：“王明他们……”

江青：“王明不同。”

毛泽东：“有几个反动派有什么要紧！”

许世友：“他们反了几十年，选进去了，他们还是要反，怎么办？”

毛泽东：“我们就永远准备他反。”

许世友：“主席下命令就选。”

毛泽东："那不就成命令主义。只能说服，不能压服嘛。朱德、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李富春、李先念，要选进去。"

董必武："几个老帅选进去是可能的，张闻天、王稼祥要选进去有困难。"

康生："王明说他们传播了马克思主义。"

毛泽东："他们哪一年传播过，一不做工人运动，二不做农民运动，三不会打仗。张闻天、王稼祥还做过。"

他问李雪峰："李雪峰同志，你们小组有多少人呢？"

答："六十几个。三结合的 5 个，地方 55 个。"

又问郑维山："你们不在一起呀？军队怎么开会呀？多少人呀？"

答："军队另编一组，32 个人。"

毛泽东转向张国华问："现在没有人反你了吧！还有人打倒你吗？原来要打倒你这个土皇帝的，西藏叫他土皇帝，也来了嘛！所以不要认为反对过你的人都不好。武斗全国都斗不过四川，至于清华、北大，不算数，他那里双方都有一万多人，有电台指挥，真枪真炮。"

张国华："有几百部电台。"

毛泽东："从什么地方搞的？"

张国华："有从学校的，有搞来的。"

毛泽东："我们过去搞演习是假的，这次真枪真炮，我

看是个训练。”

## 第1075回：毛泽东，为选举再做工作

## 九大开，第二次全体大会

4月13日下午，毛泽东再次召见大会秘书处和各大组负责人开会。

他问："有什么消息呀？"

周恩来："准备今晚传达主席上次的讲话，开大组会。"

毛泽东："这要传达干什么？"

周恩来："主席的话不传达，说咱们封锁。"

毛泽东："不是，我讲的是否符合事实？"

周恩来："都符合的。"

康生："叫他们翻一翻《学习和时局》。"

毛泽东："四个问题，还有一个文件。一个党的大会，我作过一次报告，讲主要矛盾、次要矛盾。国内矛盾降为次要矛盾，讲完后，然后讲民族统一战线。发给刘少奇、彭真等不赞成。我说蒋介石抗日了，过去他们不抗日，不发动群众。……总结我们过去几十年翻来覆去犯的错误，就是一切联合，否定斗争；一切斗争，否定联合。如湖南李维汉下去，他们赞成把农民关在班房里。如湘乡比较好。一个李维汉，一个夏曦。那是一种倾向，既与国民党联合，还与他们批评作斗争。如果要批评，批国民党那是不行的。比如武汉那时，我已离开武汉去长沙了，当省委书记。总工会刘少奇。所谓联合，是联合资产阶级，所谓资产阶级和蒋介石、汪精卫，

当买办资产阶级也是逐步当起来的，也不是一下子的。他们被群众吓坏了。党内也有被吓坏的。有个华北代表团的曾义，他们怕吓了蒋介石，就不敢提民主的口号，不到时机也提不出这个口号。南昌暴动以后，到了城市蹲不住了，往乡下跑，这就是过去掩盖着的一个矛盾。就是被国共合作掩盖着的一个矛盾。其实从中山舰事件就有。……不仅武汉，连广东的陈延年，这些同志都在学，所以这些情况就很值得注意。一个时期有一股风，这股风是正确的。如合作呀，但这股风掩盖另一股风。独立自主呀，发动群众呀，就不提了。第二次不同了，民族斗争掩盖了阶级斗争，以后总有暗潮，如现在反修又引起反苏。中国过去对外国人不分好坏都反对。几十年直到共产党成立，才懂得把外国人分为两种，一种是劳动人民，与他们接触少，所以还是出这一套。老同志搞了几十年，总懂得点吧！王洪文同志，你就没有经过几个时期。”

王洪文：“很多事情我就不懂。”

毛泽东：“所以等到南昌暴动，‘八·七’清算陈独秀，有时呢，也有右的，但主要是‘左’的。我说的是江西 AB 团，他提出几个口号：打倒毛泽东，拥护朱德、彭德怀、黄公略。彭德怀聪明，马上发表声明，说是敌人挑拨。要把我捉起来杀掉。……现在内务部曾山，当时是江西苏维埃主席，不赞成这个口号，所以也把他打倒。”

“军队我就不相信就那么平安无事，那么太平吗？太平

只能太平一个时候。”

“我看党内最危险的主要有三次，一次陈独秀，二次王明，三次刘少奇，其他是局部的，如瞿秋白、李立三、张国焘、彭德怀，高、饶也是带全党性的。”

“我说，把张闻天、博古、王稼祥等犯错误的人，他们也属于二十八个半，但在苏区吃过苦的，王稼祥在二、三次反围剿帮过忙的。一个时候红卫兵大字报一贴，现在要选作中委也难，其实他们与朱德、陈毅差不多，就是没让进。朱德、陈毅，许世友说，他们反了几十年，其中也有不反的。”

“这次文化大革命，一方面在群众中有无政府主义思潮；一方面不少人乘机放毒，我看这些都无关大局。包括战斗。所有的材料我都看了，都不如四川张国华那里。双方几万人，穿上群众衣服，实际上是退伍军人，改换过衣服指挥，这些都没有啥大事。好像很不得了，以为军队不得了，对于军队就是地方军和野战军，如保定、浙江、江西、四川，是不是这样？”

江青：“是。”

毛泽东：“贵州、云南也是一样，野战军和地方军都是我们自己经过的，这些矛盾过去没有暴露过，这次暴露出来，我看是好事。这些同志我看是可以讲清楚的，转过来了由他们自己讲，我是怎么想把你消灭。现在讲，和我看有些干部，将来有些干部犯了错误群众谅解就是了，有些抓住不放，比

如杨勇。当然他也有错误。是哪里下的命令？至今我还不知道。”

江青：“几个老帅下的命令，叫郑维山执行的。”

毛泽东：“他们倒打一耙，嫁祸中央文革，我们哪里能下命令抓人呢？至于肖华是有问题的，杨成武有问题的，不在其内。杨、余、傅，杨、余大一些，不过傅也不是老实人，不讲真话。这三个人都不讲真话，所以这场斗争，不是讲落实政策吗？在全国恐怕还要一个时期，不过你不要搞宽了，搞一个、两个，搞三分之一就了不起了。一个学校一下就团结起来不行，有三分之一教授、学生就了不起了，经过一个时期就三分之二嘛！剩下的他就站不住脚了。但所有军队宣传队、工人宣传队都不能压。工人阶级叫领导一切不是叫压倒一切嘛！”

大家笑。

毛泽东：“说我是工人阶级，不然你就是反工人阶级领导，反军代表。有几个学生，说过几句怪话，人家现在冲也不敢冲了嘛。反一下有啥要紧呀？你们武汉曾思玉，恐怕你们也得罪了他们，不过多数人不赞成他闹的。如果标语打倒，你就倒了吗？那就该倒了嘛。张春桥去年不是打吗？有打张国华的，你们打了半天张国华还在这里开会。结果打了半天还拥护你，比原来拥护的那些还好些。现在又有一股浪潮，又掩盖了一个什么东西，我现在还看不清。”

张国华等人介绍情况。

毛泽东："还有个江西，也搞'二月逆流'，宁拉八河一带(指湖北)，还有江西九江三省交界，跟我们搞根据地一样，哪个地方闹得厉害，那个地方就好一些。"

张国华："重庆就好一些。"

毛泽东："工人可以控制局面吗？"

张国华："基本上可以，他们现在在偏僻的边界上。"

程世清："有个问题，江西的私人工商业现在没有了，我看是个好事。不知对不对。"

毛泽东："我在北京看过一个工厂，200 家，名为资本家，叫小业主，有的还雇过工人，现在也现代化了嘛。另外一个化工厂 10 家，恐怕各地方都有。是不是按上次计划明天开大会。"

周恩来："今天传达主席上次的讲话。"

毛泽东："我不谈了，谈了十几次了。现在还扩大，扩大化。"

大家笑。

周恩来："一点不透风也不好。"

毛泽东："你们试试看，闹了几十年革命，我讲的还不是你们的经验。大革命分裂，'七大'团结胜利。进城后对资产阶级还是利用他，但是包括一个问题。有些干部搞不清楚敌我矛盾当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给他定息。"

周恩来："六、七亿。"

毛泽东："七、八亿还不是用到中国增加购买力，结果还搞了李先念那里，他要进工会，我说不行，拿定息是可以，进工会是不行的，这讲的是资本家。你抓几个工厂试试看，实质上没有解决。你们抓几个点试试看，形式解决了，形'左'实右。例如木材厂，李先念蹲点的，修配厂徐向前蹲点的。权实际上还在资产阶级手里，当然有共产党员，但是走资派搞物质刺激，利润挂帅，奖金挂帅，搞了管、卡、扣、罚。管不管工人阶级。我看实质还没有解决，只能说大部份，不讲全部的话，学校大部份，机关有些是走资派，有些知识分子成堆，这些可以改造。过去是实行用群众改造他们。"

谈到第二天谁发言，毛泽东要求他们不要讲得时间太长。康生问："党章读不读？"

毛泽东："不要。那是形式主义。明天还是讲基本通过，还要翻译、翻印。"

周恩来问："还是那些人坐前头呢？"

毛泽东："要，还让他们坐前面，你们不要，群众不那么看的。我们知道他们的老底，他们不知道。就不要作检讨了，他们一检讨，徐向前在铁路工厂，李先念木匠出身、到北郊木材厂，聂荣臻到新华印刷厂，陈毅到南口，以后再不好说了。刚才说了，王洪文你们说负责得了不？"

王洪文："很难呀！"

毛泽东："明天将选举，好人我不提，我就提这些人，你们一定不赞成，我有啥办法呢？好人我是不提名的，我就提这些人，你们一定不赞成吗？我有啥办法？"毛泽东继续做工作。

周恩来："主席今天又提出了一下张闻天、王稼祥。"

康生、董必武："烂了。"

周恩来："还有杨勇。"

毛泽东："杨勇他就是跟彭德怀跟得紧，又不是叛徒，当然在北京不好了。上次许世友提王近山、周志坚打仗好，我还交给许世友。"

许世友："好！这人很能打仗。"

毛泽东："取一技之长。请康老注意一下，与河南谈一下。"

康生："曾思玉注意一下。"

许世友："王近山开除了党籍。"

黄永胜："康泽是他捉的。"

许世友："王近山能打，过得硬。"

毛泽东："这些人啊，这些人有功。"

江青："杨勇是几个老帅搞的。"

毛泽东："那时也是多中心，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3人，但是在北京军区不太好了(指杨勇)。在北京军区不太好了。你们政委是谁？"

郑维山："谢富治、李雪峰同志。"

周恩来："陈先瑞做实际工作。"

毛泽东对李雪峰说："你是不是挂名？你不过问一下？"

李雪峰："也参加会。"

郑维山："不是挂名，重要的会议都参加。"

毛泽东："不要说了！没有新话，还是那天的老话。"

4 月 14 日下午，"九大"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17 时 5 分，毛泽东等人登上主席台，全场热烈鼓掌，高呼："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毛泽东："不要喊口号了。今天的议事日程有三项：一是要通过林彪同志的报告，是代表党中央的政治报告；第二要通过中国共产党党章；三，还有几个同志讲话。今天报名发言的有周恩来同志，"

周恩来："先通过，通过了再发言。"

毛泽东："这个要通过什么？不要通过。你们发言了以后再通过，谁也可以报名发言嘛！报名发言有伯达、康生、黄永胜、王洪文、陈永贵、尉凤英、孙玉国，这么多名字。"

接着，周恩来发言。他首先表示"完全拥护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在开幕式上的极其重要的讲话，我完全拥护林副主席代表党中央所作的政治报告，我热烈庆祝在毛主席无产阶级建党路线指导下的新党章的产生。"

他说："在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同志自始

至终紧跟毛主席，不愧是广大群众公认的我们伟大统帅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副统帅。”

他历数了林彪主持军委工作会议以后所做出的成绩后说：“这次在新的党章中明确写上：‘林彪同志一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最忠诚，最坚定地执行和捍卫了毛泽东同志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林彪同志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这是林彪同志四十多年的革命奋斗中自然引伸出来的最正确的结论，是完全符合事实的。他得到全党、全军、全国各族革命人民的热烈拥护，也得到全世界广大革命人民的支持，我们不仅为着我们伟大领袖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主席而感到无限幸福，我们还为有了众所公认的毛主席的接班人林副主席而感到很大幸福。”

林彪在听了周恩来发言后说：“同志们，我没有准备讲话，但是我要插两句话，听了总理刚才的讲话，事先我不知道他讲话的内容，他对毛主席的这评价是非常正确的，是非常合乎实际的，没有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领导，就没有中国革命的胜利，就没有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人民中间现在这样的地位，那中国就是国民党统治的中国，帝国主义统治的中国，那中国就是黑暗的中国，而不是一个红色的中国。而今天我们之所以能成为红色的、伟大的、光荣的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这样强盛的国家，而能影响全世界，诸种因素中的最重要的，决定的因素是毛主席，是毛主席的伟大的英明的领导，

毛主席是我们最伟大的领袖。至于我个人觉得很惭愧，在我年轻的时候，很早在井冈山同毛主席会合，那时年纪轻，并不知道很多的事情，就是跟毛主席就是了，在一切领导人中间，比较起来，前前后后我比来比去，我那时候就认为应该拥护毛主席，归根到底毛主席他很高明，我仅仅只有这么一点觉悟，并不是像总理说的那么高瞻远瞩，全面地看问题，没有达那个水平。说老实话，我几十年来确实拥护毛主席的，我整个思想水平可以说很低很低的，不像总理说的那么高。后来在工作中略为有些成绩，那也是在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取得的。没有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领导，不仅我们党没有今天的胜利，就是我自己也没有今天，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我这个人。”“在每一个时候的重大问题上都是毛主席指引航向，我们跟着干就是了，所以一切成功的决定因素，那种伟大的力量是毛主席，毛主席起了伟大的作用，我个人的作用是很微小、很微小、很微小的。我在这里仅仅向同志们作这么一点简单的声明。”

17 时 27 分，林彪发言结束，全场喊口号。毛泽东说：“怎么又喊口号了！陈伯达同志讲话。”

陈伯达在发言中说：“我完全拥护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在大会开幕时候，对于我们党的历史所作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辩证法的深刻分析。”“我完全拥护林彪同志根据毛主席思想、代表党中央所作的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政治报告。”“我

完全拥护这一次代表大会将要一致通过的新党章。这是表现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成果的划时代的新党章。”

他说：“从来没有一个会议像我们这个代表大会引起全世界的注意和震动。全世界一切共产主义者、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都为我们这个代表大会而欢欣鼓舞。同时，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者，以苏修为中心的现代修正主义者和各国反动派，蒋介石匪帮，却为之胆战心惊。”

“我们能够成为毛主席领导下的一个战士，这是最大的幸福、最大光荣。我们紧紧地团结在毛主席的周围，正在胜利地开好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

“让美帝、苏修和汉奸卖国贼去狂吠吧，让那个以卖国卖党为荣、多年来由苏修叛徒集团喂养的无耻叛徒小丑王明之类去狂吠吧，他们是永远不能得逞的，他们永远要失败，胜利是属于我们的！”

“我们全党同志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继续紧跟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前进！”

第 1076 回：众发言，特别介绍孙玉国

纪登奎，他“是我的老朋友”

接着康生发言，他以谈体会的方式表示了对毛泽东开幕大会上的讲话和林彪所作《政治报告》的拥护，他着重谈了新党章的产生过程及特点：

首先是明确规定党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

其次是明确规定林彪是毛泽东接班人。

第三是阐述了毛泽东继承捍卫和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

第四是提出了党的战斗任务，特别是把“打倒苏修社会帝国主义”规定为党的纲领性的战斗任务。

第五是内容简单扼要。全部党章只有 12 条，篇幅短，好记易懂，便于背诵。

毛泽东在康生发言后说：“再请一位同志讲话吧，黄永胜同志。”

黄永胜在发言中，除了对毛泽东的讲话和林彪的《政治报告》及新党章表示拥护外，着重谈了军队在今后要“进一步搞好‘三支’‘两军’工作，同全国人民一道，胜利完成斗、批、改的伟大历史任务。”

并表示：“毛主席最近教导我们：‘关于世界大战问题，无非是两种可能：一种是战争引起革命，一种是革命制止战

争。’人民解放军永远是一个战斗队。我们对美帝、苏修的侵略阴谋，要百倍地提高警惕，准备打仗。我们要从精神上物质上做好充分准备，特别要做好政治思想上的准备。准备敌人早打，准备敌人大打。既要准备敌人打常规战争，又要准备敌人打核战争。中国革命的胜利是打出来的。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锻炼的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更加充满了胜利信心。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我们一定要保卫祖国神圣领土。美帝、苏修和一切反动派胆敢侵略我国，必将淹没在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最近，苏修入侵我珍宝岛地区挑起的武装冲突，遭到了惨败，充分暴露了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纸老虎本质，再一次证明了毛主席关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英明论断。世界的前途是无限光明的。我们要高举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同全世界革命人民一道，把一切帝、修、反统统送进坟墓。我们要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为建立一个没有剥削制度的新世界而奋斗！”

黄永胜发言后，毛泽东说：“一个挨一个，王洪文同志。”

王洪文郑重地从主席台座位上走向旁边特设的讲坛，用他那口清晰而又略带一点东北口音的普通话，代表全国工人阶级向全党发言。他的发言仅用了 7 分钟。

王洪文发言后，毛泽东看着主席台前跑前跑后的摄影记

者说："怎么办呀？同志们，别那么忙。你们都是很忙呀，叫做争分夺秒、你追我赶。那么就请陈永贵同志讲话。"

陈永贵发言后，毛泽东问他："陈永贵，你有四十几了？现在请一位同志讲话，孙玉国同志，这位是珍宝岛的，前次战斗，就是3月15日战斗，就是他在那里指挥的。"

孙玉国1961年入伍。3月15日，他在珍宝岛前线指挥作战的副营长负伤后，代理副营长指挥，打退了敌人三次冲锋。他一上台，首先向毛泽东立正敬礼。毛泽东和林彪都站了起来，毛泽东向他招手还礼，林彪和众人鼓掌致意。

孙玉国说："我是来自珍宝岛的边防战士。3月2日、3月15日，苏联叛徒集团侵犯我国领土珍宝岛，我们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教导，进行了自卫还击，给了敌人以应得的惩罚，胜利地保卫了伟大祖国的神圣领土！"

"在保卫珍宝岛的战斗中，我们全体指战员，怀着一颗

忠于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红心，‘宁肯前进一步死，决不后退半步生！’‘就是粉身碎骨，也不向苏修让寸分！’在保卫珍宝岛的战斗中，有力地证明：苏修和美帝一样，没有什么了不起，都是纸老虎。同时，也再一次证明，最好的武器是毛泽东思想，最大的战斗力是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人。我们这些基层干部和战士都没打过仗，但是有了毛泽东思想，我们就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就能战胜一切敌人，就无敌于天下！”

“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人民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经过了文化大革命的锻炼，已经做好了一切准备，准备他们大打，准备他们早打，准备他们打常规战争，也准备他们打核大战。中国革命的胜利是打出来的！世界革命的胜利也一定是打出来的！不论是战争引起革命，还是革命制止战争，美帝、苏修的日子不会太长了！如果帝、修、反胆敢来犯，我们就一定把他们淹没在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统统把他们送进坟墓。”

孙玉国发言中间，毛主席数次鼓掌。当孙玉国讲到“中国革命是打出来的，世界革命也一定是打出来的”时，毛泽东、林彪、主席台上的人都起立鼓掌，微笑。

毛泽东问旁边的人：“他今年多大了？”

然后又问孙玉国：“你今年多大了？30？”

孙玉国答：“29 岁。”

毛泽东："哪里人啊？"

孙玉国答："东北人。"

毛泽东："噢，东北人。老家在哪里？"

答："河北。"

毛泽东："河北啊，打过仗没有？"

答："没有。"

毛泽东开始对大家说："他叫孙玉国。孙是赵钱孙李的孙。玉是王字加一点的玉，国是国家的国。这次珍宝岛打仗就是他指挥的，打退敌人三次进攻。敌人打仗用了飞机、坦克、指挥车，我们什么也没有。不用飞机、不用坦克、不用指挥车。我们的战士除了一个副营长，都是没有打过仗的。这次破除了一个迷信。没有打过仗的，也可以打胜仗。苏修他们开的乌龟壳也没有什么了不起，他乌龟壳把人的勇敢降低了。我们打仗靠人的勇敢，靠不怕死，靠林副主席的二百米硬功夫。苏联有飞机、乌龟壳，我们是步枪、手榴弹，靠步兵。3 月 15 日来了许多辆乌龟壳，500 米我们不打，300 米不打，100 米还不打。50 米来了，我们一开火，他们的乌龟壳就翻了，不管用了。我们过去打仗没有乌龟壳，打胜了，还得靠人，靠步兵。乌龟壳我们有一点，但主要不靠他们。装甲兵司令来了没有？"

毛泽东回头看："没有。"

林彪说："装甲兵政委黄志勇来了。在下面。"

黄志勇站起来。

毛泽东："我不是说不要装甲兵政委黄志勇了，也不是说不要吴法宪的空军了。说还要靠步兵。靠200米。要准备打仗，要做准备，各省都要能生产武器。主要是精神准备，新疆那里也可能要出点事。我们不打出去，边境上小打。可以放进来，给他些甜头，放进来后再打。

下面请尉风英同志发言，还是辽宁的。"

尉凤英在发言中说："我们热烈拥护伟大领袖毛主席极其重要的讲话；热烈拥护林副主席的政治报告；热烈拥护新的党章。这些伟大的革命文献，闪耀着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灿烂光辉。是照耀着社会主义革命和共产主义运动胜利前进的灯塔。我们一定要认真学习，全面落实，坚决照办！"

"'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毛泽东思想。'这是千真万确的真理。我们必须用毛泽东思想统帅一切。毛泽东思想是我们的命根子。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是我们的生命线。

有了毛泽东思想，就有了一切。

有了毛泽东思想，我们就能斗私批修，改造世界观，搞好思想革命化。

有了毛泽东思想，我们就能在阶级斗争、路线斗争中心明眼亮不转向。

有了毛泽东思想，我们就能狠抓革命、猛促生产，人换精神厂换貌、人换精神地换装。

有了毛泽东思想，我们无产阶级的红色江山就能千秋万代不变色。

有了毛泽东思想，帝、修、反胆敢来进犯，我们就能把它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消灭光！

有了毛泽东思想，伟大的共产主义理想就一定能实现。

我们决心向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学习，更加深入地开展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群众运动，把全国办成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大学校！

我们要以林彪副主席为光辉榜样，永远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头可断，血可流，毛泽东思想不能丢！海枯石烂心不变，天崩地裂志不移！”

尉风英发言后，已是 18 时 50 分，毛泽东说：“怎么办？别忙。”他看了看表，说：“不到两个钟头嘛。纪登奎同志在哪里？”他扭头往身后主席团成员坐席上寻找。

周恩来指着前面的代表席说：“纪登奎同志在下面，是河南的。”

这时，纪登奎从代表席上站起身，走向主席台发言席，当他走到毛泽东面前的时候，毛泽东微笑道：“请你讲话。”

然后，毛泽东向大会全体代表说：“他叫纪登奎，是我

的老朋友，山西人，长期在河南工作，受了一点灾难就是了。多灾多难呵！”

听了毛泽东的介绍，会场顿时响起雷鸣般的掌声。纪登奎十分激动，他热情赞颂：“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太好了。对我教育太深了。群众对我整一下，大有好处。”

他在 10 钟的发言中，37 次提到毛泽东。他还向毛泽东和“九大”代表保证，“以林副主席为光辉榜样，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永远忠于毛主席，永远忠于毛泽东思想，永远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跟着毛主席干一辈子革命。”充分表达了他的思想感情。

他说：“开始，我对毛主席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学说，很不理解，当革命群众革命革到自己头上来的时候，触及了灵魂。触及一点，理解一点，触及的深点，理解的就深点。在广大革命群众的耐心帮助下，怕字少了，敢字多了，才逐步提高了点对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觉悟。”

“我们那里有某些同志，虽然主观上是热爱毛主席的，但是，至今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还不甚理解。不去看我们取得的伟大胜利，而是埋怨群众运动中不可避免出现的一些支流的东西，挑剔与伟大成绩比起来简直是微不足道的鸡毛蒜皮的小事，斤斤计较个人得失，在那里闹‘三气’，就是那个怨气、泄气、不服气。这是资产阶级世界观的反映，发展下去是很危险的。应该从某些犯错误老同志那里吸取教

训。我也算个老干部，今后更应当谦虚谨慎，按照新党章严格要求自己，按照毛主席的教导：‘要用自我批评的武器和加强学习的方法，来改造自己，使适合于党与革命的需要。’要自觉地、虚心地听取群众批评，接受群众监督，‘不要老虎屁股摸不得’。”

纪登奎讲完后，已是 19 时 02 分。毛泽东说：“七点多了，要吃饭了吧？还有谁发言？看来今天各位同志发言时政治报告、党章都是赞成的，看全党同志再看一下。但是，还没有发言的多，晓得你们赞成不赞成？”

众人答：“赞成！”热烈鼓掌。

毛泽东：“我们付表决好不好？第一个林彪同志所作的政治报告，赞成不赞成？”

众人热烈鼓掌。

毛泽东：“赞成的就举手。”

全体举手，毛泽东也举手，他看了看会场说：“都赞成，有希望噢，大概是多数，通过。这个党章草案是不是赞成呀？赞成的举手。”

一致举手，毛泽东也举手，他看看说：“看来也有希望噢，多数，通过。关于这两个文件，可能还有些文字上要斟酌的地方，还要翻成外国文，怎么办？再开一次大会？有同志建议，由秘书处来完成这个任务，可不可以？”

全体代表：“可以！”热烈鼓掌。

毛泽东："今天的工作就告一段落。吃饭，散会！"

这段时间，苏联不断从欧洲地区向远东及蒙古集结兵力。多方消息表明，苏联确有对中国发动突然袭击的具体计划，随时可能行动。中国驻东欧的使馆甚至报告了他们侦察到苏联发动袭击的具体时间。

4 月 11 日，苏联外交部照会中国外交部：建议 4 月 15 日"或对中方方便的另一最近的时间在莫斯科恢复谈判。"

4 月 14 日，中方答复称，"正在研究"苏有关缓和边境局势的建议，并且将给予答复。

4 月 15 日，"九大"进入第二个阶段，代表们开始酝酿和进行预选。

其实，第九届中央委员会的格局，早在 1968 年 10 月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就已基本定下了。内定参加这次中央全会的"八大"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只有 59 人，除这 59 人外，参加八届十二中全会的其余 74 人，除个别人外，后来都进入第九届中央委员会。

根据大会主席团通过的《关于选举九届中央委员会的规定》，先由各地各单位的 45 个小组提名，再经主席团秘书处整理后提出统一候选名单，经过协商和预选，再拟出名单，提请主席团通过后，做出正式候选名单提到大会进行选举。

在由各代表团提出候选人名单时，很多代表表示："小组提名有不少困难；以毛主席为首的主席团最了解全面情

况，最了解党的历史，考虑问题最周到，对主席团提出的名单我们完全信赖，坚决拥护！！”

大会主席团将候选人分为四类：第一类是“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和“八大”中央委员及候补中央委员；第二类是“革命领导干部”；第三类是军队干部；第四类是来自基层的工农代表。对四类候选人提出了大体比例，要求总数控制在 210—250 人。各代表团提名相加实际为 493 人。

经过综合平衡，在 4 月 20 日召开的主席团扩大会议上，由周恩来代表主席团提出了一个 274 人的候选人名单：第一类 60 人，毛泽东、林彪为当然候选人；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谢富治、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汪东兴、温玉成等中央文革碰头会的 12 人，以及军委办事组的李作鹏、邱会作、刘贤权为一致通过的候选人；原八届中央委员 97 人和候补中央委员 73 人被提名为九届候选人的，限为 53 人。其中原曾任青年团中央第一书记的“八大”中央委员胡耀邦，据说因他认错态度不好，决定让原山东省委书记、“八大”中央委员谭启龙替换；第二类 35 人，周恩来特别提出其中的余秋里和原新疆党委第一书记王恩茂。说余秋里对开发大庆油田有功，王恩茂有代表性，而且愿意改正错误，所以建议把他们作为革命干部的候选人；第三类 99 人都是军队干部，周恩来特地解释说，在四类候选人中，都有解放军代表，这是由军队的光辉历史和“文革”

中参加“支左”和“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担任领导这一现实情况决定的，是完全合理的、必要的；第四类 80 人，其中产业工人 46 人，贫下中农 25 人，其他劳动者 1 人，“革命知识分子”8 人，周恩来说，知识分子人数似乎少了点，但是实际上不止 8 人，因为革命干部和军队代表中都有不少知识分子，他本人就是一个。

朱德参加“九大”时，已是 83 岁的高龄，正患气管炎，喘得很厉害。毛泽东上前扶了他一把，对他说:“老总，咱们两个永远要联在一起，我帮你过好社会主义这一关。别看有些人叽叽喳喳说你什么，我心中有数。”

会议期间，一些代表不断地批判朱德，说他“长期以来反对毛主席”，是“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代表”，并几次要他站起来作检讨。朱德说:“我是在历史上犯过错误，也反对过毛主席，但我已经改了。做什么事总要有个代表，是就是，不是想代表也代表不了。我在红军时，不少部队刚从国民党军队起义过来，资产阶级思想是存在的，你们要找我当代表，那就当吧。主席、总理是最了解我的。”

江青在 4 月 20 日的主席团扩大会议上说：“我现在还是提不要选我，我觉得很狼狈”，“如果我还能退居幕后，做个无名英雄，那就好得多”。但依然有很多人提出江青“一定要选上”，她是“众望所归”。

## 第 1077 回：四二四，选举九届委员会
## 皆顺利，大会正式拉帷幕

4 月 23 日，毛泽东又召集中央文革碰头会和军委办事组成员、各大组部分召集人开会，这次会议把候选人名单增加了 5 人，共 279 人，作为正式候选人。其中中央委员 170 人，候补委员 109 人。

毛泽东在会上说："要说清楚：没有列入名单的，好的很多。摆上名单的不一定都好。""总的看来，头一次进入中央委员会的占多数，七次大会、八次大会没有这次大。'八大'的老人只 53 位，新排的 200 多人，五个占一个，五分之一不到。再一个就是产业工人、农民都增加了，要注意一个问题，不要脱离生产。比如这次参加大会的，他在本单位要做工作，又要到省、地、县做工作，如果脱离生产就和我们一样，叫机关工作人员了，要叫他们不要脱产。他们只了解那个单位，不了解全国，犹如我们不了解他们一样。他们在本地方很活跃，但一到中央，到处记者采访，作报告，半年一年就差不多垮台了。"

毛泽东说："这个名单很难排。比如北京军区 6 个军，只有郑同志排上了。候选名单排上的，大多数是好同志，但并不一定个个都那么好。排上名单的好的是大多数，能保证党的领导。但也有的不那么理想。还有很多好的没排上。这么大数目，怎么能都了解清楚呢？不见得选上的、排上的都

合乎理想。有的同志在中央工作犯了错误，不排又不好。也不是没列入的比列入的强。历史上常常证明后来者居上。头一次要进中央委员会的占名单的大多数，‘七大’没有这么多人，‘八大’也没有这么多人。”

毛泽东这里说的“郑同志”，就是时任66军军长的郑三生。后来，在郑三生当选为中央委员后，毛泽东风趣地说：“‘三生’有幸，当上中央委员了。”

毛泽东说：“我们中央委员会绝大多数是工农兵，应该是一个工农兵代表的苏维埃。”毛泽东又说“今后我们提拔干部，要在工厂，农村中选拔积极分子。”

他说：“工农占中央委员会70％以上，解放军是大多数，也是出身于工农的。”“我就担心他们脱离群众。”

他提到湖南：“如湖南长沙提了个工人，但大产业基地在株洲，我不关心我这个家乡。”毛泽东接着问到：“胡勇呢？”

黄永胜答道：“刚加入党。”

1968年10月1日国庆节那天，湖南“工联”的头头胡勇作为湖南的工人代表登上了天安门城楼观礼，周恩来安排他和尉凤英、王洪文、陈永贵四位工农代表坐在观礼台第一排座位中间的左边，距离正中毛泽东的座位，仅横隔6个位置。4人中，胡勇最靠近毛泽东。

当时毛泽东听说胡勇也是他的家乡湘潭人，特地在城楼

上的休息厅内接见了他，交谈数分钟，问及湖南的文革情况和胡勇的个人情况。当时，正好在天安门城楼观礼的阿尔巴尼亚国防部长巴卢库进来了，要见毛泽东，这次谈话才因此中断。全国的造反派工人能有此殊荣者，除了后来的王洪文外，恐再无第二人。回到湖南后，10月，胡勇由华国锋和47军一位副政委一起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当毛泽东得知胡勇也是中央委员候选人时说："我这个老乡，是不是就不做中央委员算了？我看，不照顾老乡为好。"

于是，湖南改由唐忠富作为中央委员候选人。

此时，毛泽东接着说："这个名单大体上是公道的，但也有些不公道。譬如说正式委员，候补委员为什么这么分？我就说不清楚。恐怕困难的还是这三、四个老同志。要选他的话，如朱德检讨也检讨不清楚，不要写了，写了人家不满意。"

有人插话："是董老给他解了围。"

毛泽东："不能怪他了，他都忘记了，八十几了。如陈毅写了上十次，到了上海又犯了。世界上有这些同志，你有啥办法呢？功劳也有，错误不少，检讨甚多。我看就差不多了，看以后的行动，他们也要看我们的。"

"我觉得这次大会，总结这几年的经验，总之，没有刘少奇这伙人了，要翻案就翻这。他们是一批'精华'，我们

是一批‘糟粕’。行了。还有两句，邓小平和刘少奇要有区别。邓作了许多坏事，一条是弃军逃跑；一条是到北京后与刘少奇、彭真搞到一起。也有些好事，如苏联的二十大，他不同意，也未查出叛徒。有人说打仗也不怎么样，总打过些仗。苏区邓、毛、古、谢，(邓小平、毛泽潭、谢维俊、古柏)王明是反对的。差不多了吧？还要选个政治局，又要个常委，中央委员还没选出来嘛。我想还是由下而上的办法比较好。只提一个数目，不提名单。这又要时间，还是想几个问题，你们想一想政治局怎么组成？常委怎么组成？群众路线方法比较好。一个名单叫选苏联的办法，由上指定人叫下面划圈圈，我们这个不是，我们是由下至上提名。今天能搞完预选吗？预选时间可以交头接耳。”

4月23日晚，以大组为单位进行了预选，主席团秘书处做出规定：既要保证毛泽东提到的10名反对派当选，又不能让他们得到高票，据说这样才能使这些人认识到自己错误的严重性，促使他们转化。为此，各代表团受领任务：要把哪些人投或不投这10名“对立面”的票，落实到“人头”；各代表明确了自己的任务后，必须以“三忠于”的高度、以党性保证，按照要求投票。各代表团不敢马虎，由代表团领导亲自动员、布置，有的甚至作了演练。预选的结果，秘书处感到满意。

在华东大组进行预选时，有人对叶群投了反对票，南萍，

陈励耘以浙江小组名义，向中央写信，说："这个问题发生在我们华东地区不是偶然现象，这反映了有反对毛主席、林副主席的暗流"，"尽管我们通过了党章，但举起来的手中有一两只是假的，黑的，这一两只黑手是隐藏在党内的定时炸弹。"

4 月 24 日下午，举行最后一次全体会议，由林彪主持，正式选举第九届中央委员会。

会议于 16 时 05 分开始，主要议程是选举第九届中央委员会。会场划分为七个区，每区设一个票箱，主席台上单设一个票箱。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分两次选举。

在大会堂主席台前排，毛泽东坐在中间，一边依次是林彪、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谢富治、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汪东兴、温玉成，另一边依次是周恩来、董必武、刘伯承、朱德、陈云、李富春、陈毅、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到会代表 1510 人，仅有 2 人请假。

16 时 28 分进行正式选举。首先选举中央委员。由于主席团成员比大会场任何一个区的代表都少，因而主席台上的投票先行结束，然后回到各自的座位。

这时，突然一个排队投票的青年代表，他在把选票投入票箱后，没有跟随前面的代表返回座位，却转身快步向主席台走去。但见他双手扶着主席台的前沿一撑，两腿一蹬，便轻松地跃上主席台，然后快步到前排中央，依次把手伸向毛

泽东、林彪和周恩来，领袖们自然都一一与他握手。这位代表的成功举动，使许多怀有同样愿望的青年代表受到极大鼓舞。霎时间，有许多青年代表从投票的队列中或从座位上向着主席台跑去。原来躲在大幕后面的警卫人员纷纷出来阻拦，却顾此失彼，还是有不少人成功地冲到毛泽东、林彪和周恩来的面前，如愿以偿，成了“最最幸福的人”。最后，台上的工作人员不得不在台前组成一道人墙，才使局面得以控制。

16 时 52 分，开始投票选举候补中央委员。

投票结束后，主席团成员与全体代表退席，合影；大会工作人员紧张地先分区计票，最后汇总得出选举结果。完全是手工作业：口唱、手写、拨算盘，用了近两小时。

20 时 57 分，重新入席，林彪宣布请大会副秘书长、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王良恩宣读选举结果。大会主席团提名的 170 名中央委员和 109 名候补中央委员全部当选。会场响起经久不息的热烈掌声。毛泽东以全票当选，虽然是天经地义、意料之中，大家仍报以热烈掌声。林彪获得 1508 票，大家也报以热烈掌声，掌声过后，可以听到会场有小声议论。会后有权威人士透露，林彪为了表示不能与毛泽东平起平坐，他自己和他妻子叶群投了反对票。周恩来获得 1509 票。江青获得 1502 票，康生、张春桥、姚文元等人也相应少一些票。江青的选票不仅落后于叶群，也落后于黄永胜、吴法

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人。在大家来到江苏厅休息的时候，江青大声说道："你们的选票比我们的多呀！你们军委办事组的人威信高，老娘得票比你们少得多，难道你们对'文化大革命'的贡献比我还大吗？"大家都默不作声。

江青不满。张春桥要求查票，说这是"见不得人的政治斗争"。康生不同意，毛泽东也明确反对，查票一事被压了下来。

但是康生还是派中组部的郭玉峰到大会秘书处查选票。他要郭玉峰先查主席台上的选票，再查各个大区的选票。

郭玉峰直接找到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王良恩，说要来查票。王良恩不敢做主，立即报告了吴法宪，吴法宪又报告了周恩来。周恩来认为这种作法是违反党章的，报告了毛泽东，毛泽东没有说话。这件事情就这样被压下了。

10 名"对立面"完全按照毛泽东的意图当选：

朱　德 809 票；

陈　云 815 票；

李富春 886 票；

陈　毅 867 票；

徐向前 808 票；

聂荣臻 838 票；

叶剑英 821 票；

邓子恢 827 票；

李先念 922 票；

张鼎丞 1099 票。

从得票情况看，在“文革”前名气越大得票越少，朱德得票率还不到 53.6%！

选举中还有另一类候选人，也受到代表们的格外关注。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是聂元梓、王效禹、李再含 3 人。还有四川的刘结挺、张西挺，山西的张日清、刘格平等人。他们在酝酿候选人时也有人提出异议，大会主席团为此分头做了不少工作。选举结果，刘结挺得 1435 票，刘格平得 1117 票，王效禹得 1066 票；聂元梓、李再含、张西挺、张日清作为候补中央委员入选，分别得 937 票、1256 票、1400 票和 1152 票。倘若实行差额选举，这几个人必然落选无疑。

选举中还有一件趣事：当王良恩宣布中央委员候选人、工人代表王白旦以全票当选时，会场立即响起一片议论声。这位工人代表看来毫无政治生活经验，他不懂得等额选举往往是知名度越低得票率却越高。此人在全国毫无名气，谁也不会故意把他划掉，而他自己又不懂得谦虚，结果使自己成了 170 名中央委员中，得票唯一与毛泽东平起平坐的人!散会后许多人都愤愤不平地大骂这位工人太不谦虚：“你比林副主席还能！”

王白旦，农民出身，是地地道道头顶高粱花子的农民。解放后，他先是在太原钢厂当工人，因为机灵，学东西快，

后来作为骨干支援到齐齐哈尔的北满钢厂。“九大”召开以前，他已是北满钢厂的一名党员技工。当时，上级把一名参加“九大”的名额分配到北钢，条件是：有 7 年以上党龄的炼钢工人。那时厂革委会成员要么不是党员，要么是党龄不到 7 年，阴差阳错，王白旦被选为“九大”代表，去了北京，并一下子在会上当选了中央委员。

“九大”期间，周恩来看到他后打趣道：“王白旦，你这名字念白了可不太好听啊。”与会代表都会心地笑了，有人顺情说“应该改改名，中央委员怎么能叫王八蛋呢”。

王白旦做梦也没有想到被选为中央委员，更没有想到竟会有“大人物”热心给他改名。在那个座谈会上，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也参加了，他听了周恩来的话，略有所思后说，“我给他改个字，‘旦’字底下加一竖为‘早’，音变意不变。”如此，从北京回到黑龙江，王白旦不但身份变了，名字也变了。

大会副秘书长王良恩宣读选举结果，共选出的 279 名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其中，原八届的中委、候补中委 53 人。

选举后，林彪又作简短讲话，通报了国内外来信来电祝贺“九大”情况，随即宣布大会闭幕，此时是 21 时 37 分。

大会结束时，再次出现了狂热的场面。林彪宣布大会闭幕，毛泽东等坐在第一排的中央领导人刚刚离席，坐在会场

前部的许多青年代表，几乎在同一时间蜂拥而上，一瞬间把主席台上摆的茶杯、铅笔、纸张全部抢光。

## 第 1078 回：三人组，酝酿政治局名单

### 四二八，开九届一中全会

“九大”开完后，陈伯达收到从毛泽东处退回的一件文件。秘书们打开一看了，原来是陈伯达呈送毛泽东的九大报告稿的第一部分，原封未动。毛泽东用粗粗的铅笔大大地写着：

退陈伯达同志

毛泽东

后面写着日期，字迹几乎占满了封面。

陈伯达和他的秘书都愣了，原来这份报告稿毛泽东从未拆封看过。

两个秘书一声未吭，悄悄退回到自己的办公室，只剩下陈伯达一人在他的屋子里呆坐着。但秘书走后，他关起门来万分悲痛得大哭了一场，他很伤心，很伤心……

4 月 25 日晚上，汪东兴电话通知：“主席要林副主席、总理、康老、黄总长立即到中南海主席那里开会。”

4 人几乎是同时到达了中南海毛泽东住处。毛泽东说：“一中全会怎么开法？我看全会没有别的议题，就是选举中央政治局。选举政治局可以有两种方法：一是走群众路线，由下而上的办法，不提名单，只提一个数目范围，这个办法叫民主，但这又要时间；二是先搞出一个名单出来，为避免个人独裁，还是由恩来、康生、永胜 3 人先商量一个名单出

来。我同林彪同志不参加你们的提名工作，我们两个是幕后。”

林彪说：“政治局人选的方针，原则请主席指示，以便有所根据。”

毛泽东说：“那只好叫独裁，那我们还是 5 人独裁吧！”

周恩来说：“政治局委员定多少人，请主席定个数字，这对考虑人选有关系。”

毛泽东说：“我看政治局委员，可以定为 25 至 30 人，多了更难安排，平时开会也不方便。”

于是，周恩来、康生、黄永胜组成的三人小组就在在中南海内开始酝酿提出“九大”的政治局成员候选名单。“三人小组”由周恩来负责。他交代说：除了毛泽东、林彪的电话可以接之外，其余任何地方的电话都不要接。

4 月 26 日下午，毛泽东看了三人小组上报的政治局委员候选名单，在江青的名字上打了一个大叉，据说，在王效禹、叶剑英的名字下面划了一个杠杠。后来毛泽东说：“我看王效禹就不考虑了。”

林彪看到名单后，在叶群的名字上面也打了一个大叉。

在三人小组会上，周恩来说：“我看到主席、林副主席在名单上删去的名字，但我们还是要考虑的。我们坚持把这两个人都列上，这也是从当前的大局来考虑。”

康生说：“总理的意见是对的，但困难比较大，我们硬

着头皮留下来。”

黄永胜说：“我同意总理和康老的意见。”

这样又加上了江青、叶群的名字。

但是，毛泽东还是在江青的名字上打了一个大叉，并在名单的旁边写上李德生、纪登奎的名字。林彪同上次一样，收到名单即在叶群的名字上打了一个大叉。

三人小组连夜研究，周恩来说：“整个名单就是江、叶二人的问题。这个问题解决了，整个名单就定下来了。从当前情况出发，江青、叶群一定要进入政治局。要从政治上向毛主席、林副主席诚恳表示我们的态度。我们三人，明天上午向主席汇报，12 时后向林副主席汇报，争取在明天，把问题分别谈妥。”

27 日上午 10 时，周恩来、康生、黄永胜 3 人来到了毛泽东住处。周恩来说：“我们诚恳提出江青同志一定要列入政治局候选人名单之内。把她列入固然有一定的政治影响，不列入也会产生政治影响，甚至会产生的更大的政治问题。权衡利弊，我们提议一定要把江青列入候选名单之内！”

毛泽东同意了，他说：“你们要那就要吧。不管怎么说，列上了责任在我身上，就这样吧。”

周恩来 3 人接着又到林彪家里去了。叶群将他们 3 人领进林彪的会客室后，自动回避了。

周恩来对林彪说：“关于叶群同志列入政治局候选人名

单的问题，从现实的 政治情况来考虑，我们三人认为一定要列入，否则会产生另外的政治影响，请林副主席同意我们的意见。”

黄永胜紧接着说：“我们刚才到主席那里去了，对江青列入政治局候选人名单，毛主席基本同意了我们的意见。我建议对叶群的问题，你也要同意我们的意见！”

康生说：“总理、黄总长把我们研究的意见都说了。请林总从政治上考虑，同意我们的意见。”

林彪说：“无论同意或不同意把叶群列入政治局候选人，我都听从毛主席的决定。”

最后，在毛泽东住处开会，确定了 25 人的候选名单。毛泽东说：“政治局候选人名单只好就这样了，有责任由我承担！”

接着，毛泽东、林彪、周恩来、康生、黄永胜 5 人分别在名单上签了字。

毛泽东又说：“中央的领导机构，力求简单权力集中的原则。政治局常委由五人组成，设主席一人，副主席一人。政治局常委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主席毛泽东、副主席林彪。请大家考虑是否合适？”

林彪、周恩来带头，一致同意毛泽东提出的原则。大家都同意毛泽东的安排，毛泽东最后说：“我也同意。”

4月27日，军委办事组拟定了一份“军委48人名单”和

“军委办事组名单”报毛主席、林副主席。毛泽东当天批示：“宜加李德生。”林彪批示：“同意主席批示。”

27日，毛泽东召集三人小组最后商定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候选人名单，江青、叶群都在这个名单之上。这个消息，由黄永胜透露给吴法宪。下午16时，吴法宪立即把这一消息电话告诉给了叶群。

选举政治局委员，叶群可谓是煞费心机。

黄永胜他们在选举中央委员时，就有意识的没有投江青的票。此时，他本想利用毛泽东给的权力尽可能阻止江青进入政治局。然而，叶群不仅不让他阻止江青进入政治局，而且还要他主动提名江青进入政治局。

此时，毛泽东虽然同意了江青进入政治局，名单上也有了叶群，但她还是害怕林彪牛脾气一来，把叶群的大名划掉。但是几天前，叶群与林彪吵了架，几天来，她都不敢与林彪照面。只好找到儿子林立果，让他到林彪那里去为她求情。同时给周恩来打电话，说林彪正在出汗，阻止周恩来到毛家湾来向林彪汇报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候选人名单。

27日，叶群一夜没睡。28日清晨5时，“林办”收到周恩来给林彪的一封亲启信，信封上标有“特急”字样。秘书代林彪拆开信，里面有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名单以及周恩来给林彪的信。信上说：现在把昨日毛泽东处议定的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候选人名单印成选票清样送林彪过目，如果

林彪不同意，望速告。如果同意，即照原定方案，于当日下午召开九届一中全会进行正式选举。

林彪看了一眼那张选票：毛泽东、林彪用一号字排印；周恩来、陈伯达、康生用三号字排印；叶群（按姓氏笔划）以下是四号字排印。

林彪听秘书讲了周恩来的信，然后问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是不是按姓氏排列的？秘书回答后，林彪抬起右臂，用食指在空中划了个圆圈，示意秘书代他把文件圈退给周恩来。

叶群心中的一块石头落了地。

4 月 28 日，中共九届一中全会在北京举行，毛泽东主持会议，选举政治局委员，选举的办法同样是无记名的等额选举，选出九届中央政治局成员 25 人，其中有原八届中央政治局成员 30 人中的 12 人继续当选。原八届中央政治局成员 30 人中没有包括已去世的 3 人。

在对政治局成员所投的 277 票中：毛泽东、林彪、周恩来、康生获全票，陈伯达 275 票，黄永胜 274 票，江青 270 票，吴法宪、叶群的得票比张春桥、姚文元高。

政治局常委当选的是毛、林、周、康、陈 5 人，此外，江青得 150 票，黄永胜得 130 票，其他被提名的都在 35 票以下。

毛泽东在九届一中全会上继续当选为中央委员会主席，

林彪为副主席。

九届一中全会投票选举后，当周恩来宣布选举结果念到李德生的名字时，毛泽东又一次点名："我再看看李德生同志。"

周恩来示意李德生，李德生习惯地戴好军帽，站起来敬了一个军礼。周恩来笑着说："德生同志，请你把军帽摘下来吧。"李德生摘下军帽。

毛泽东问："多大年纪了？"

李德生回答说："53 岁。"

毛泽东连着重复几遍："啊，53 岁，53 岁……"心中若有所思。

在九届一中全会选举中央军委成员时，毛泽东提出，要选刘伯承、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当军委副主席。他这样一说，大家便热烈鼓掌，于是这些人都选上了。

毛泽东在九届一中会上讲话说："我的话是些老话，就是大家知道的，没有什么新话。无非是讲团结，团结起来的目的，是要争取更大的胜利。

现在苏修攻击我们，什么塔斯社的广播，王明的材料，以及《共产党人》的长篇大论，说我们现在不是无产阶级的党，叫做'小资产阶级的党'。说我们搞一元化，回到了过去根据地那个时代，就是讲倒退了。什么叫一元化呢？他们说就是军事官僚体制，按照日本人的话叫体制，按照苏联的

话叫做‘军事官僚专政’。他们一看我们这个名单里头，军人不少，这就叫‘军事’；还有什么‘官僚’，大概就是我呀，恩来呀，康生呀，陈伯达呀这批‘官僚’。总而言之，你们凡是不是军人，都属于‘官僚’系统就是了，所以叫做‘军事官僚专政’。这些话嘛，我看让人家去讲！人家怎么讲，就怎么讲。但他有个特点，他就是不骂我们叫资产阶级的政党，而叫‘小资产阶级的政党’。而我们呢，就说他是资产阶级的专政，恢复资产阶级专政。”

“社会主义革命还要继续。这个革命，还有些事没有做完，现在还要继续做，比如讲斗、批、改。过若干年，也许又要进行革命。”

“看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搞是不行的，我们这个基础不稳固。据我观察，不讲全体，也不讲绝大多数，恐怕是相当大的一个多数的工厂里头，领导权不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不在工人群众手里。过去领导工厂的，不是没有好人。有好人，党委书记、副书记、委员，都有好人，支部书记有好人。但是，他是跟着过去刘少奇那种路线走，无非是搞什么物质刺激，利润挂帅，不提倡无产阶级政治，搞什么奖金，等等。现在有些工厂已经把他们解放出来了，参加了三结合的领导；有些工厂还没有。但是，工厂里确有坏人。”

“有些地方抓多了人，这个不好。你抓多了人，抓起来干什么呢？他也没有杀人，也没有放火，又没有放毒，我说

只要没有这几条，就不要抓。至于犯走资派错误，那更不要抓。工厂里头，要让他工作，要他参加群众运动。人家犯了错误，无非是过去犯的，或者加入国民党，或者做了些坏事，或者是犯了最近一个时期的错误，就是所谓走资派，要他们跟群众一道，如果不让他们跟群众一道，那就不好了。有些人关了两年，关在‘牛棚’里头，世界上的事情不知道了，出来一听呀，讲的话不对头了，他还是讲两年前的话。他脱离了两年的生活”

“为了胜利，就是要人多一点了，是不是呀？各方面的人，不管你是哪个山头或者哪一个省的，或者是北方、南方的。还是多团结一点人好，还是少团结一点人好呢？总是多团结一点人好。有些人的意见不一定跟我们一致，但是，不是敌我关系。我就不相信，比如具体来讲，说是什么杨得志跟王效禹是敌我关系。你们两个人的关系是敌我关系，还是人民内部的关系呀？据我看是人民内部吵吵架。中央也是有点官僚主义，没有大管你们，你们也没有提向中央来讨论。山东这么一个大省，是人民内部矛盾，乘此机会，你们谈一谈嘛，好不好呀？我看华东也有这个人民内部问题。还有山西，也是人民内部，你支一派，我支一派，何必那么尽吵干什么？还有云、贵、川的问题。各地方多多少少都有一些问题就是了，那比较去年跟前年好多了。你这个同志不是叫许世友吗？前年我们在上海那个时候可不得了，七、八、九三

个月。现在日子总好过一点嘛，我说的是整个局面。你那个南京跑出一个什么‘红总’，做工作之结果，还是合作了嘛。一个‘八二七’，一个‘红总’，还不是合作了嘛。”

“我相信过去犯错误的一些老同志。原先有个大名单三十几个，我们认为都要选举到政治局委员就好。后头有人提出个小名单，十几个，又觉得它太小了。大多数人是个中间派，反对这个大名单，也反对小名单，主张二十几个人的中等名单，这就只好选代表啰。并不是说候补中央委员就比正式中央委员在政治水平上、工作能力上、德才资各方面差，并不是这个问题。在这个里头有个不公平。你说那么公平哪，我看就不那么公平，不那么公道。”

“从马克思以来，从来不讲什么计较功劳大小。你是共产党员，是整个人民群众中间比较更觉悟的一部分人，是无产阶级里面比较更觉悟的一部分人。所以，我赞成这样的口号，叫做‘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而不赞成那样的口号：‘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没有苦劳也有疲劳’。这个口号同‘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是对立的。你看我们过去死了多少人，我们现在存在的这些老同志，是幸存者，偶然存在下来的。皮定钧同志，你那个鄂豫皖那个时候多少人？后头剩了多少人？那个时候人可多啦，现在存在的就不那么多了。那个时候，江西苏区，井冈山苏区，赣东北，闽西，湘鄂西，陕北，经过战争有很大的牺牲，老人存下的就不多了，那叫做一不

怕苦，二不怕死。多少年我们都是没有啥薪水的，没有定八级工资制，就是吃饭有个定量，叫三钱油、五钱盐、一斤半米就了不起了。至于菜呢？大军所过，哪里能够到处搞到菜吃呀？现在进了城。这个进城，是好事，不进城，蒋介石霸住这些地方了；进城又是坏事，使得我们这个党不那么好了。所以，有些外国人、新闻记者说，我们这个党在重建。现在我们自己也提出这个口号，叫整党建党。事实是需要重建。每一个支部，都是要重新在群众里头进行整顿。要经过群众，不仅是几个党员，要有党外的群众参加会议，参加评论。个别实在不行的，劝他退出。极少数的人，可能要采取纪律的处分了，党章规定了的，是不是呀？还要经过支部大会，上级批准。总而言之，要采取谨慎的方法。要做，一定要做，但是要采取谨慎的方法。”

“团结起来，为了一个目标，就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要落实到每个工厂、农村、机关、学校。”

“此外，过去讲过的了，就是要准备打仗。”“人家打来，我们不打出去。我们是不打出去的。我说不要受挑拨，你请我去我也不去。但是你打来呢，那我就要对付了。看你是小打还是大打。小打就在边界上打。大打，我主张让出点地方来。中国这个地方不小。他不得点好处，我看他也不会进来。要使全世界看到我们打仗是有理的，有利的。他进来了，我看比较有利，不仅有理，而且有利，好打，使他陷在人民包

围中间。至于什么飞机、坦克、装甲车之类，现在到处经验证明，可以对付。”

“这次全国代表大会，看起来开得不错。据我看，是开成了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我们采取发公报的办法，现在外国人捞不到我们的新闻，说我们开秘密会议。我们是又公开又秘密。北京这些记者，我看也不大行，大概我们把他们混到我们里头的什么叛徒、特务搞得差不多了。过去每开一次会，马上透露出去，红卫兵小报就登起来。自从王、关、戚、杨、余、傅下台之后，中央的消息他们就不知道了。差不多了，那就散会！”

## 第 1079 回：留京城，中央解决鲁问题

## 林彪见，云贵川三省领导

中共九届一中全会举行选出中央政治局委员后，毛泽东当场主持召开中共九届政治局第一次会议。会议通过新的中央军委主席、副主席、委员名单及军委办事组成员名单：

主席：毛泽东。

副主席：林彪、刘伯承、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

委员：丁盛、王秉璋、王树声、王效禹、王辉球、韦国清、叶群、皮定均、刘兴元、刘贤权、许世友、陈士榘、陈先瑞、陈锡联、李天佑、李作鹏、李雪峰、李德生、吴法宪、张达志、张池明、张国华、张春桥、杨得志、杜平、萧劲光、郑维山、冼恒汉、袁升平、梁兴初、黄永胜、曾绍山、曾思玉、彭绍辉、韩先楚、粟裕、温玉成、谢富治、谭甫仁、潘复生。

军委办事组：

组长：黄永胜。

副组长：吴法宪。

成员：叶群、刘贤权、李天佑、李作鹏、李德生、邱会作、温玉成、谢富治。

除原有人员外，新增加了李德生、刘贤权、李天佑、温玉成、谢富治。

随后，副军职以上干部任免，改报中共中央主席、副主席和其他三名政治局常委批准。

九届一中全会闭幕当晚，江青召集中央文革碰头会。她一到就坐在周恩来经常坐的主持人席上，周恩来见状，坐到一边主持开会。

会议开始后，江青上来就说："今天的会是我召开的，我宣布一个重要问题，现在有人搞阴谋，一切事情不告诉我，电话也不打一个。你们别以为当了什么委员就保险了，你们的历史旧账还锁在我的保险柜里，只要交给革命群众就够你们受的。"

当天的《人民日报》刊登了毛泽东在 1968 年 10 月"全国山河一片红"以后的一次谈话中所说："我们已经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但是，失败的阶级还要挣扎。这些人还在，这个阶级还在。所以，我们不能说最后的胜利。几十年都不能说这个话。不能丧失警惕。按照列宁的观点，一个社会主义国际的最后的胜利，不但需要本国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努力，而且有待于世界革命的胜利，有待于在整个地球上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使整个人类得到解放。因此，轻易地说我们革命的最后胜利，是错误的，是违反列宁主义的，也是不符合是事实的。"

"九大"小组会上，福州军区当面批判王效禹直接插手福建地区，会后王效禹布置韩金海、杨保华、鞠维信向中央

写信反驳福州军区。

杨保华找浙江省革委会主任、浙江省军区政委南萍串联，被拒绝。南萍说：“你那篇讲话，我们省群众组织转登了，我们吃了不少苦头”。

“九大”期间，兰州军区政委冼恒汉把青岛市革委会主任杨保华“反复旧”的“1117 讲话”交给康生。康生把这份材料交给王效禹，王效禹拿到后再也没有回音。康生第二次找到王效禹，并在材料上作了严厉批示。王效禹这才给康生写了封短信：“你二次转来的杨保华的讲话我们都传阅了，杨保华的讲话是有些错误，我对他的批评也有些错误”，“主要问题不是批评于景瑞不能入党的问题”，短信到此没了下文。

杨保华害怕了，想对他的“1117 讲话”做出检查，王效禹不同意。于是，杨保华只好在王效禹给康生的短信上只写了“阅悉，同意”4 个字，即送交康生。

康生看了杨保华写的 4 个字，立时就上了火，当即在后面批了 16 个大字：“官腔十足，毫不在乎，无动于衷，令人惊異”。此处“异”字，康生写的是繁体“異”。后来杨保华面对康生时把责任推给了王效禹，说是王效禹不让检查。

“九大”结束，参加“九大”的山东省革命委员会和济南军区及济南、青岛的杨得志、袁升平、李水清、易耀彩、

穆林、齐威、王效禹、韩金海、杨保华等 27 位代表没让返回。

4 月 30 日，林彪接见许世友、杜平、李德生、杨得志、袁升平、王效禹，主要谈团结问题。

5月1日晚，天安门城楼上，毛泽东与杨得志谈话，再一次说到山东问题。当晚，康生与杨得志、袁升平、王效禹等人谈话。期间，康生点名批韩金海、杨保华二人曾作反军报告。

5月2日，林彪接见四川、云南、贵州负责人。接见时叶群在座。云、贵负责人未到前，林彪对四川刘结庭、张西挺二人说："你们夫妻是受李井泉迫害的，我很同情，那时我就想见见你们，你们造李井泉的反，你们对，他们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解放了你们。他造你们的反，你们也造了他们的反，没有文化大革命，他还是起作用，也可能整死你们。该打倒的不给你打，不该打的猛打。

李井泉这个人不好。我认识他几十年了，他一贯不好，不是一天不好，不是好人，是坏人。前年我在一次会议上狠狠地讲了他。他是不爱讲话的，但讲破坏话是很积极的。背后讲坏话是很多的，捣鬼是积极的。这次文化大革命把他打倒了，大快人心，是好事。这种人留在党内没有好处，现在还没有开除他的党籍，但是至少把他搞臭了。你们解放出来，这是件好事。

四川七千万人，等于德国人口，比意大利大，比法国大，比西班牙大，在欧洲仅次于苏联。在国内当几个小省。贵州多少人？”

答：“近两千万。”

林彪：“当三个贵州。你们就等于几个省的头头。从战争的观点看，我们的根据地主要在四川。云贵川主要在四川，无论从东面打来，还是从西面打来，四川都是后方，都是以四川为根据地，对美帝也好，苏修也好，我们的根据地都在四川，工业、粮食都靠四川，军事需要的东西尽量放在四川。你们要把四川的工作搞好，只要四川搞好了，我们就放心了。四川搞不好就不放心。”

云、贵领导到后，林彪对大家说：“会开完了，有些同志要见，要见一起见。”

他说：“主席讲要团结，没有团结就没有胜利，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的武器就是团结，这是列宁的话。马克思第一个宣言也是号召团结。这次‘九大’，毛主席号召团结，无产阶级赤手空拳，打倒资产阶级靠什么，靠的就是团结。

今天你们在座的同志，我知道不很团结，有的是对立面，有的是半对立面。对立面没有关系么，可以团结起来。过去抗日时期在一起，打土豪在一起，民主革命反封建也在一起，反资产阶级，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也应该在一起。反帝反封建这不是共产党的特点，资产阶级也反封建么！我们共产党反

帝、反封建是为反对资本主义打下基础。我们是无产阶级，我们的职责就是反对资产阶级。共产党员是要反对资本主义的，反对资本主义不是个人行动能行的。有种人主张只要打掉一个人就可胜利了，就可以解决问题，列宁反对。列宁的哥哥刺杀沙皇被抓后杀了，列宁认为那条路是行不通的。要团结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这是唯一的办法，没有代替的办法，要解决同资产阶级的矛盾，就是要团结起来，唯一的办法是无产阶级团结起来。”

他从理论上讲了团结的意义后，又说：“要马虎的，我们又马虎又不马虎，大问题上不马虎，小问题上就要马虎，马克思说过这个话：就是两个人组成社会，如果没有让步，就不能共为社会，就失去社会性，没有社会性，就是动物。人与动物的区别有二个：一个是使用工具，一个是联合。没有联合就不能进行生产，就不能生活，就回复到几十万年以前的那种状况。有阶级社会就有革命，革命就要联合，就要求得本阶级内部的联合。因此，不管怎么样，你们要响应落实毛主席的号召，为着胜利你们一定要团结，无论如何要团结。思想上的差别天天有，人的思想认识水平是不一样的，总是不一致的，但我们又需要一致。差别总会有的，但不能因此而大闹特闹。文化革命初期要闹，不闹就革不掉走资派，就不能把他们打倒，就要回到资本主义去。现在是否就干净了呢？革命不能停止，有些基层单位还是有问题，还要延续

下去，要把基层搞好，革命还没有完，要夺取全国胜利，要继续搞革命就要团结，特别是上层，你们头头的团结，不团结就是空谈革命，口头革命，不利于革命，破坏革命，是团结好还是不团结好？我们国家兴旺好还是不兴旺好？是联合起来好还是不联合起来好，还是团结好，兴旺好，联合好。”

林彪说：“我的意见很清楚，我就是和稀泥，调和，为什么不能调和呢？不和不行，就是要和稀泥，不团结不行，又不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国民党和共产党的矛盾，而是革命内部。”

“制度上的改变一下子就变过来了，但人的思想的改变就需要很长时间，俄国革命搞了半个世纪，现在还很落后，我们才搞了20年，破除了各个历史时代的旧东西，有个共同特点是私有制。阶级社会5000年很长，但是在整个人类历史上还是很短的，资本主义才300年，更短，可是要破除私有观念，需要百年，几百年，需要很长时间。大家应该有共产主义精神，人的共产主义精神，我过去讲过公产主义，再简单说成是‘公’字，有的人讲其公，内心大藏其私，最后落得个假公真私。你们要走了，见一见面。”

“今天来的同志要下定决心，不怕困难，团结一致，争取胜利。不要在小问题上兜圈子，斤斤计较小事，不是共产主义者伟大气魄。要胸怀宽大，为共产主义奋斗，为解放全人类奋斗，这是伟大、光荣的事业，我希望同志们下定这个

决心，不要老子天下第一，自己都对，别人什么都不对，抓住一个小辫子猛上纲，这不对。一就是一，不能把一说成万。二就是二么，蚂蚁就是蚂蚁，象就是象，不能把蚂蚁说成象，见到一说成万就不对。没有反映客观。要正确反映客观，唯心主义的特点就是夸大，把微小的量夸大为巨大的量都不对。希望同志们不要这样做。小事情不计较，夸大，闹到社会上去，不要呕气。和睦相处，心情舒畅好，同心协力好，不要呕气好，互相帮助，互相支持好。革命工作做好，不要去各抓一派。

今天见见面，有些是老熟人，张国华、梁兴初、谭甫仁、陈康、田维扬等同志，有些同志不熟，我不太了解你们的具体事，我也不注意了解你们的具体事，笼统讲一讲。”

九大结束，新的中央领导班子已经成立，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陈伯达、黄永胜均认为应该取消中央碰头会，改变中央工作方式。1969 年 5 月 4 日在中央政治局第一次会议上，周恩来传达毛泽东的指示：“中央今后的工作班子由政治局集体领导、并由中央常委主持工作，中央不再设书记处等其他机构。”1967 年“二月逆流”以后中央文革碰头会处理中央工作的局面结束了。

这时，江青还要用“中央文革”名义重新发表“上海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文件送到陈伯达处，陈伯达批道：“凡是中央文革小组档都必须由毛主席批。”从那以后，中

央再没用“中央文革”的名义发出文件。九届一中全会结束当晚江青召集的那次中央文革碰头会成为最后一次中央文革碰头会。

此后的政治局会议一般都由周恩来主持。周恩来因故不能到会，陈伯达、康生也主持过政治局会。

“九大”刚开完不久，一天，江青到京西宾馆军委办事组的驻地，说是“找办事组的人谈谈话”，实际只找了黄永胜、李作鹏和邱会作，当时吴法宪不在家。

闲谈一阵后，江青突然话题一转说：“林副主席在十二中全会的讲话，是即席讲话，只有个讲话提纲，讲话内容事先也没有与中央碰头会通气，我们都不清楚。”“有些话讲的不妥嘛，文化大革命是无产阶级革命，怎么与欧洲文艺复兴相提并论呢？那是资产阶级文化革命嘛。”

黄永胜他们都没有说话，但立即警觉到，江青的讲话是不是针对林彪呢？

江青走后，黄永胜与李作鹏和邱会作议论，“江青讲这些话是什么意思？为什么与我们讲？江青的胆子也太大了，竟敢批判林彪的讲话。”他们感到事情重大，决定立即到林彪那里去报告。

听完了黄永胜等人的报告后，林彪说：“让她去说吧。”

九大闭幕不久的 5 月一天，外交部送来一份文件，报送中央领导的名单顺序是按姓氏笔划为序排列的，因为江青的

“江”字，比叶群的“叶”字多一笔，所以江青的名字自然地排在了叶群之后。江青看到这个名单打铃叫秘书杨银禄。当杨秘书走进她的办公室，看到地上有一份文件。她用颤抖的手指着那份文件说：

“你看，你看！”

杨银禄不知道叫他看什么，捡起地上的文件，在那里发愣。

江青急了，从他手里夺过文件，指着一行名单大声说：“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名单这样排列是有问题的，我看这是别有用心的人故意这样搞的，是为了制造矛盾，在党内造成思想混乱。叶群的名字列在我的名字前面，是很不正常的，她的历史贡献和影响力怎么能和我相比，没有法比嘛！不行，我得跟林副主席去谈谈。”说完，她叫秘书立即打电话了解一下林彪是在毛家湾，还是在大会堂。

秘书了解到林彪在大会堂浙江厅，报告了江青。她带上那份文件，急急忙忙驱车直奔大会堂而去。

江青到大会堂浙江厅门口，因为里边早有了准备，叶群出来迎接。叶群看到江青的脸拉得很长，又不知她为什么不高兴，忙伸出手去想握手以示欢迎，没想到江青理都不理，拂袖昂头而去，弄得叶群十分尴尬。

江青进去大约一个小时左右，高兴地从里边出来，和送行的叶群主动握手告别。

自那以后，无论是什么文件，只要有政治局委员的全部名单，在排列顺序上，江青的名字总是排在叶群之前。

## 第 1080 回：放学生，北大开展大批判

## 疑问多，李九莲写信被抓

1969 年 4 月，北京大学被隔离审查的学生全部被放出。重新相见，没有弹冠相庆，没有纵情狂欢，因为他们身上的累累伤痕还未痊愈，而且他们之中有的同学没有挺住，没有看到这一天。

宣传队对牛辉林等人的问题作了重新处理，下了“是一般议论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错误”的结论，并以原材料中有派性、有水分为由，以中央有指示不准保存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专案材料为理由，将牛辉林等人的专案材料全部烧掉。

紧接着，北大学习“九大”文件，开展革命大批判。批判“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的“黑六论”：阶级斗争熄灭论、入党做官论、驯服工具论、吃小亏占大便宜论、公私熔化论、党内和平论，还有唯生产力论，人性论，宗派主义，山头主义，小团体主义，无政府主义，自由主义，个人主义，……此时的学生已不再是革命闯将，而是老油条了。他们对文化大革命已经怠倦，对政治学习穷于应付，失去了热情，似乎是看破了红尘。每天上午、下午两段时间挤在宿舍里，先念报纸，再鹦鹉学舌地发一通言，然后聊大天，耍贫嘴，顾左右而言其他。

当然，斗私批修必须联系自己，灵魂深处爆发革命。于是学生们逢场作戏，有口无心，人云亦云。

1969年3月初，正在福州当兵的原赣州“大中学红卫兵司令部”副司令曾昭银收到了一封未署名的来信：

曾昭银：

你好！来信收阅。我觉得此信供你作取与舍的参考较为合适。我以前未知你的态度，所以不便直言。今天我把我的思想情况向你说清楚。

一、对国家前途的看法：

经过半年多的复杂生活，碰到一系列事物，想到了很多问题。首先是对国家前途发生怀疑。我不明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到底是什么性质的斗争，是宗派斗争还是阶级斗争？我感到中央的斗争是宗派分裂。因此对“无产阶级大革命”发生反感。对批判刘少奇好像有很多观点是合乎客观实际的，是合乎马列主义的，又觉得对刘少奇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感到对刘少奇的批判是牵强附会。“文化大革命”已收尾了。很多现象，很多“正确的观点”，和运动初期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差不多，本质一样，提法不同而已。因此对今后的天下到底属于谁，林彪到底会不会像赫秃一样，现时的中国到底属于哪个主义等项问题发生怀疑。对“现行反革命”发生浓厚兴趣，对“反动组织”的纲领也注意研究。

二、个人打算：

马克思说过：“使人生具有意义的不是权势的表面的显

赫，而是寻求那种不仅满足一己私利，且能保证全人类都幸福和完美的理想”。我决心按马克思所说的去度过自己的一生：所以不能保证自己不走向“反面”，成为“罪犯”，这是作了最低的估计。我之所以要抓住革命与奋斗两种观点不放，是以此思想作指导。故渴望生活中有同甘共苦、不因任何风险和耻辱而动摇，仍保持生活友谊者。因想到你，希望如此。这是我写这一封信的全部思想与动机。你见信后三思而决。

古人言：“逢人且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我违背了，把心彻底完全地暴露给你。你是第一个听我说以上思想的人，望无论如何看信后即回信，且一定附回原信，当感激不尽。看信后，亦不用吃惊，很多人皆如此，只不过隐瞒了。事物总是变化的，人的思想随客观变化，这不足为奇。我也许是“糊涂”，也许是“幻想”，但不向你说清楚，问心有愧。

祝好！

此信勿传于他人！

你明白的人

1969 年 2 月 29 日

曾昭银收到此信后，于 3 月 5 日将信上交团政治处。信很快被转回赣州地区保卫部。而曾昭银也在 1969 年 4 月，被部队作为“有嫌疑的人”提前退伍。临行前，部队领导还让他回到地方后继续协助调查这封“反革命匿名信”。

4 月 30 日，回到赣州的曾昭银与他的恋人、中学同学、文革中并肩战斗过的战友李九莲见了面。谈到曾昭银退伍的原因，李九莲告诉曾昭银：那封匿名信是她写的。

李九莲是赣州第三中学的高中学生，校团委宣传股长，学生会学生部长。1966 年，出于无限信任和崇拜毛泽东，她满腔激情地参加了文化大革命。8 月，李九莲参加原空军司令刘亚楼侄女邹军领头组织的赣州市第一个红卫兵组织“八一战斗队”，为该组织的三个头头之一，任组织委员。赣州一中学生舒北斗任宣传委员。

1966 年 10 月 1 日 李九莲作为红卫兵小将在北京天安门接受毛主席检阅。

1966 年 10 月底 李九莲参与组织赣三中“卫东彪战斗兵团”，任副团长。是“卫东彪”造反团的惟一女生副团长，曾昭银任团长。

1967 年 4 月 22 日，李九莲率团参加朱毅任总指挥的为营救舒北斗的 5535 人七天七夜绝食。

1967 年 6 月 29 日 至 7 月 14 日，李九莲姐妹三人分两派，经历了赣州发生的规模最大的武斗。武斗丧生者达 223 人。李九莲震惊不已，陷入深深的忧患。

1967 年秋，李九莲作为代表出席“江西省第一届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被提名为省革委会委员候选人。

1967 年 12 月， 赣州市革命委员会筹备领导小组中八名成员中的学生代表舒北斗、曾昭银同时参军入伍。当时舒北斗任赣州市冶安保卫办主任，佩发手枪。曾昭银则是大中学校红卫兵司令部副司令。李九莲一一为他们送行。

1968 年 2 月，李九莲被分配赣州冶金机械厂当学徒工，为厂民兵团武装基干连民兵，建党对象。

这以后，李九莲的思想发生了急剧地变化。

1968 年夏，李九莲姐李兰香赴军垦，妹李青莲插队崇义，小妹李玉莲去了“共产主义大学”。

1968 年秋，“清队”开始。江西的“清队”主要是“三查”。在“群众办案、群众定性、群众判刑”的口号下，捉拿“叛徒、特务、反革命”的战斗队来去匆匆，私设的公堂和牢门比比皆是。全省各地很多干部、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一夜之间成了“反革命”。

当李九莲看到江西青年熊辉被以“现行反革命”判刑的布告时，同情不已。

李九莲的父亲李忠华，本来是老赤卫队员、共产党员，只因与一名黄埔军校的人同姓同名而被“揪出”，逼写认罪书

正是这些事情促使李九莲于 1969 年 2 月 28 日，给已经参军入伍的曾昭银写了那封未署名的信。

1969 年 3 月 21 日，李九莲在日记中写道：“我们的家庭

只是整个社会的缩影。由幸福走向痛苦，这样的家庭有多少？巴金的《家》、《春》、《秋》作于旧时代，反映了时代的去向。今天的《家》、《春》、《秋》也似乎如此吧！我决不在革命的路上倒下去，只不过想试图开辟一条新的路罢了。”

在爱情和原则之间，曾昭银和所有的“布尔什维克”、“保尔.柯察金”一样，选择了原则。他当夜即向赣州市军管小组保卫部作了报告。5 月 1 日凌晨 3 点，李九莲所在的赣州冶金机械厂保卫科长宋德恒带领一个班武装民兵，以五一“民兵检阅”为由敲开李九莲家的门。李九莲被赣州市军管小组保卫部以反林彪现行反革命罪拘捕，信的底稿和她在“九大”前后的日记被抄。

在这些日记中，李九莲对有着重重困难的青年、干部和家庭被迫上山下乡深表同情；对在所谓的“二月逆流”中受害的老帅老将们深表不平，说这是“宫廷里指鹿为马”，“中央不是按历史来决定问题的，而是按你对毛林的态度而定的”；对“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她认为“不见得”；她觉得林彪“越来越像个奸臣”，隐喻毛泽东成了“残冬的太阳”，“余晖是明亮的，略有温暖的，然而实在是无力的、不持久的；只有那些没有棉衣的无产者才敢大胆地说：‘他并不伟大，也并不温暖，不然我怎么会冷得发抖呢?’”

她时而悲愤厌世，时而又亢奋探索：“绝不在革命的路上倒下去”。其中一则日记这样写着：

“毛主席和社会主义制度，都不是偶像和倾向的名词，都有具体的内容和实质。他们之所以伟大美好，就是给了人民以幸福，这正是我所追求的。我们歌颂和拥护他们，不是从名词和形式出发，而是从得到了解放的实践中提炼出来的。在我国，在正常情况下，这些名词所代表的意义，和人民的实践体验是符合的。但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在打着红旗反红旗的情况下，这些名词代表的意义和人民的感受，有时是相反的。”

她对当时盛行的“三忠于”、“四无限”活动提出质疑：

“火热的‘三忠于’配合着极左政策，将给人民的思想带来什么？

一、将割裂党和群众的血肉联系；

二、将破坏党的民主集中制；

三、将真正损害领袖在群众中的崇高威望。

我不理解毛主席为什么能够抵制‘红海洋’，而不能抵制林彪的‘三忠于’……赫鲁晓夫在斯大林生前后的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血淋淋的教训摆在毛主席的面前。我痛惜毛主席或者视而不见，或者昏昏然陶醉。

‘政治上和思想上的路线是决定一切的’，政治迫害就是这样产生的，因而它不是无根无据，而是有根有据。问题在于，它用一种完全不同的理论、路线和思想来指导，对问题做出一种完全不同的结论，而在本质上，它是用腐朽的来

扼杀新生的，用错误的来反对正确的。

红梅报春早。不做百花苦争春。像鲁迅先生说的那样，是一个小小的萤火虫，在无光的黑夜里边，发出自己的光，照亮一片小小的角落。而当太阳出来了，它心甘情愿地消失……”

5 月 1 日，李九莲被拘捕的当天傍晚，曾昭银约见原赣州市“大中学校红卫兵司令部”司令、他当年的造反战友朱毅，解释说：“李九莲‘恶攻’林副统帅信是左手写，原来并不知道信是她写的。”

江西的李九莲被捕了。而此时的武汉，一场“反复旧”运动正紧随山东酝酿而起。

湖北省革委会自1968年2月成立后，基本上是军代表说了算，干部代表和群众代表作用不大。当时有一种说法，说群众代表是“开会主席台，看戏前三排，电话一打小车来。”

1968 年 3 月，杨、余、傅事件后，武汉的“新派”提出“揪武老杨”的口号，矛头指向武汉军区政委刘丰和武汉军区司令员曾思玉。

由于武汉军队干部对造反派明显的是支“钢”压“新”，于是“新”派给刘丰起的绰号是“钢政委”，警备司令部参谋长赵梗被人称为“钢参谋长”。1968 年夏天，“新”派“工造总司”一把手、时任武汉市革委会副主任的吴焱金在市革委会即兴写了一首打油诗：

自从造反到如今，为何总是不翻身。

陈大麻子早揪出，百万雄师已踏平。

忽从极右到极左，有意支钢不支新。

陶式人物休狂妄，革命风暴就来临。

陶式人物是指陶铸式的人物，当时指陶铸为反革命两面派。

这首打油诗不知被谁抄写两份，一份贴在汉口水塔下的大字报墙，另一份贴在武汉警备司令部大门口。贴出两天后，刘丰把吴焱金叫到省革委会一间大办公室，张体学也在场。只见刘丰阴沉着脸，把吴焱金写的打油诗抄件向桌上一扔，问道：

“这是不是你写的？”

“是我写的。”吴焱金答道。

“什么意思？”刘丰继续问。

“没有什么意思，不过反映一下我的心情而已。”吴焱金说、

“你反映心情为什么贴在警备区门口？谁抄的？谁贴的？谁指使的？”刘丰非常生气地问道。

“不晓得。”吴焱金说。

刘丰不相信，指责说：“你当面撒谎！这样的事你会不晓得？”

“我写了这首打油诗放在桌子上，不知是谁拿走的。”

吴焱金如是说道。

刘丰气急败坏地质问："你说，你的矛头究竟指向谁？你含沙射影骂的是哪一个？"

"矛头没有指向谁，哪个支一派压一派我就指向哪一个。"吴焱金毫不示弱。

"你的诗贴在警备区的门口，你的矛头就是指向警备区的负责人。"刘丰说。

"不是我指向谁的问题，社会上群众都在说钢政委、钢参谋长，这不是我一个人的看法。"吴焱金回答。

"你说的钢政委是谁？"刘丰问。

"谁支派就是谁。"吴焱金答。

刘丰发火了："你敢说钢政委不是指我？"

吴焱金说："那是你说的，不是我说的。"

刘丰气得把桌子一拍："你还狡辩！"

造反派还怕这些？吴焱金也把桌子一拍说："你莫以势压人！"

刘丰的脸色更难看了，这时，坐在旁边一直不做声的张体学笑着说："我说刘政委呀，莫跟年轻人一般见识，年轻人不懂事，不知天高地厚，你犯不着跟小将生气。"他示意刘丰身边的工作人员说："让刘政委休息一会儿。"

工作人员把余怒未消的刘丰劝到其他房间去了。

这时，办公室里只剩下张体学和吴焱金两个人，张体学

说：

“小吴啊，你好大的胆子，你公然敢跟毛主席、林副主席选派的曾、刘首长拍桌子，你为什么发那大的火？来，坐一下，抽支烟，消消气。”

张体学口袋里经常有两种香烟，一种是“大前门”，是用来招待一般客人的，另一种是带过滤嘴的“中华”，是他自己抽的。他递给吴焱金一支“中华”牌香烟，说道：

“年轻人，火气不要太大。遇事要冷静，曾、刘首长是毛主席、林副主席亲自派来的，要尊重他们。”

吴焱金说：“不是我不尊重他，是他不问青红皂白搞我一顿，是他跟我过不去。再说，他们支一派压一派的情况，确实存在。我是有意见的。”

张体学说：“你在市里，刘丰跟你沾不上边，你怎么跟他吵那么凶？”

吴焱金说：“市里的方铭、张昭剑跟他是一路货色。”

张体学把自己的大腿拍了一下说：“什么张昭剑，纯粹一个跳梁小丑！”

吴焱金笑了，调侃地说：“您把矛头指向解放军。”

张体学说：“那不一样，你是跟曾、刘首长吵架，我是针对个人的看法。”

几天后，武汉市召开革委会正、副主任碰头会。会议休息时吃西瓜，方铭一边吃西瓜，一边问吴焱金：

“前几天刘政委跟你谈得怎样？”

“不怎么样。”吴焱金说。

“你的诗贴在警备区门口，是不是也有说我们警司支一派、压一派的意思？”方铭问。

“你爱怎么想就怎么想，以后在工作中一碗水端平就行了。”吴焱金说。

这下方铭也火了，他把正在吃的西瓜往地上一摔说：“我们怎么一碗水没有端平呀？”

吴焱金也把西瓜往地上一摔，毫不示弱的说：“一碗水端没端平自己心里有数。”

这时，开会的人都来扯劝，说：“小吴，这是你不对，你怎么能对方司令员发脾气。”

大家都要吴焱金承认错误，吴焱金也感觉自己过于冲动，就不做声了，但是也没作检讨。

第 1081 回：到青岛，武汉胡厚民取经

再联手，江城掀起“反复旧”

1969年初的一天，湖北省革委会常委、武汉“工总”二号头头胡厚民正在家里刷房子，看到外面开来几辆车，其中有一辆卡车上全是彪形大汉，是武汉造船厂的，还有武汉警备司令部的解放军，说是找胡厚民。胡厚民听说他们厂里原保守派要抓他回去批斗，就让他父亲出去对来人说：

“胡厚民去医院了，不在家。”

这几辆车于是又赶往离胡厚民家最近的四医院。胡厚民趁机跑掉。

此时的胡厚民也已经看到报刊上有关“反复旧”的提法和王效禹在《人民日报》发表的署名文章《击退二月逆流的新反扑》。于是来到了青岛，见到杨保华。交谈后，胡厚民下决心回武汉发动“反复旧”。而此时，武汉的大、中学生都已离开城市，工人造反派自“文革”以来首次独立面对强大的当权者，胡厚民意识到，必须团结“新派”一起“反复旧”才能造成强大声势。

1969年2月20日，胡厚民从山东回到武汉。不久，他在汉口协和医院住院，离吴焱金家最近，于是派人来看吴焱金。夏邦银、朱鸿霞、“工总”组织部长郭洪斌、“工总”宣传部长田国汉等人也多次到吴焱金家上门转达胡厚民对他的问候，并转达胡厚民的意见：

“过去钢、新之争，我们是有些以老大自居，搞了‘以我为核心’、‘钢化江城’，《二八声明》直接把斗争的矛头指向你们，伤了新派同志的感情，这是不对的，我们诚恳地向你们表示歉意。”

在后来的几次谈话中，夏邦银、朱鸿霞转达了胡厚民想“钢”、“新”两派联合起来搞“反复旧”的意见。

胡厚民出院后，邀吴焱金到他家去了一次。讲了抓他的经过和青岛之行，还反省说，当年你们揪“武老杨”时，我们共同对敌就好了。他还说，“反复旧”不搞不行，最好是由朱鸿霞、李想玉、吴焱金三个人出面挂帅牵头。其情感十分真挚。

吴焱金觉得，中央将要召开“九大”，在这个时候“反复旧”时机是否合适？风险太大了，表示要慎重考虑。

胡厚民谈了他去青岛的情况。青岛是造反派掌权，可是他们仍然带头“反复旧”，可见复旧势力是多么强大，斗争是多么激烈。胡厚民说：“山东形势那么好，‘反复旧’搞得有声有色，武汉同他们相差太远了，武汉不‘反复旧’是说不过去的。”

由于夏邦银、朱鸿霞、胡厚民反复做吴焱金的思想工作，吴焱金表示愿意承担在“九大”期间‘反复旧’的风险，共进退。

胡厚民说：“武汉的造反派是无娘的伢，只有天照应。

要搞就搞大一些，一定要通天。”他在武汉化工厂召集了武汉工代会正、副主任扩大会议，朱鸿霞、李想玉、吴焱金都不是工代会的正副主任，只是常委，这次会议，就扩大到朱、李、吴三人。胡厚民传达去北京，大连、山东的见闻，讲了外地造反派如何神气，形势如何好。还说，外地造反派都问他：“720事件以后，你们武汉造反派在全国是响当当、硬邦邦的，现在怎么搞得那么窝囊？”胡厚民回答说：“不要紧的，武汉的造反派有一个特点，要就不动，一动就大动，动起来就势不可挡。”

胡厚民讲：“1968年8月15日，北京召开国防工业口的抓革命促生产‘八一五’会议，曾思玉派孔庆德叫一辆小车来接我，说首长有事找我，我到会场一看是批判、斗争胡厚民的大会。这是湖北、武汉军队当权派最早向造反派头头下手的事例。”

胡厚民说：“现在群众起来了，工代会是工人的群众组织，在这样大的群众运动面前，是站出来领导呢，还是当群众运动的绊脚石？我们不领导，群众也会干，甚至会把我们抛弃，但这样革命的损失就太大了。”

会上，大家分析了形势，李想玉说：“武汉的问题就是造反派受压。”

胡厚民说：“武汉的问题，概括成一句话，就是复旧。实质是复旧和反复旧、复辟和反复辟、夺权和反夺权的问

题。”

但是，当时中央正准备召开“九大”，许多人认为“反复旧”的口号是否与中央精神一致？胡厚民说：“群众运动嘛，看他的大方向，口号问题不是个主要问题。”

因为大家有意见。经过讨论研究，为了怕被人抓辫子，由工代会正式发一个公告，提出“庆九大、献忠心，认真总结经验，认真落实政策，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胜利成果，誓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田国汉说：“这个口号不好，不提‘反复旧’，不提批判‘二月逆流’，就不能够把群众发动起来。”

胡厚民说：“这个口号是个总的口号，总口号是登报的，‘反复旧’、反‘二月逆流’提不提，同志们的心里有数就行了，我们要相信群众，如果群众认为这个口号好，到时候群众就会使用这个口号，我们可以给予支持嘛！”

这次会议以后，社会上出现了“反复旧”的大字报和大标语。3月17日，武汉锅炉厂的王光照特地选了对“工总”大逮捕的两周年纪念日，在厂门口贴出大字报，标题是《列宁选集》中的一句话：“我们决不半途而废”，从而拉开了武汉“反复旧”大幕。

“九大”召开后，武汉的“反复旧”马上就停息了，没人敢写大字报，吴焱金写了一篇《以实际行动向“九大”献礼》的大字报，田国汉将大字报底稿转给了胡厚民，胡厚民

又召集了一次会议，研究“九大”召开期间“反复旧”要不要继续搞。

田国汉说：“现在搞正是时候，曾、刘首长到北京去了，我们一搞就通了天，中央就会出面来解决武汉的问题。我们把材料准备好，到时候好说话。曾、刘首长，张体学欺骗中央，向中央汇报，说武汉么样么样好，好得不得了。我们就是要反，就是要让中央看到武汉并不是那样好，武汉市就是有问题，用这样的办法证明他们在湖北没有搞好。”

胡厚民说：“对，‘反复旧’不仅不影响‘九大’，恰恰是对‘九大’的最好献礼。难道开‘九大’就看着湖北省、武汉市不管吗？我们反对资本主义复辟，就是和‘九大’精神一致的。”

吴焱金和朱鸿霞都同意胡厚民的观点，决定开“九大”期间“反复旧”要继续搞。

群众发动不起来怎么办？田国汉说：“那只好由朱鸿霞、李想玉、吴焱金三个巨头出面，保险群众能发动起来。由朱、李、吴出面，使群众看到省、市革委会三个副主任都动了起来，这对群众是个鼓舞，我们这些小萝卜头，只要一煽就起来了。”

会上决定，由朱鸿霞起草以朱、李、吴共同署名的大字报。

朱鸿霞对吴焱金讲：“这回‘反复旧’要准备担风险，

准备再次被打成反革命。我是准备好了的，我和我爱人、家里都讲好了，我们早就作了安排。”

4月11日，吴焱金正在家里吃饭，田国汉匆匆跑来，手里拿着两张材料纸，说是朱鸿霞亲笔写的大字报底稿，让他过目，如果没有意见就签个名。田国汉说：“朱鸿霞是一边开会，一边用手掩着纸写的，你可以修改。”

这份大字报底稿，朱鸿霞起草后，胡厚民作了一些修改。

吴焱金觉得初次与“钢派”打交道，就改朱鸿霞亲笔写的大字报有不尊重别人之嫌，一边吃饭，一边匆匆看了一眼，就签了字。田国汉对他说：“大字报没有标题，你是不是想一个标题？”

吴焱金随手就将大字报原文中的“人类解放我解放，洒尽热血为人民”两句话移到上面做标题。田国汉起身告辞，说是要到青山去找李想玉签字。

吴焱金说：“到青山这么远，你就莫跑了，我代李想玉签个字。李想玉对我说过，‘以后有什么事要我签字，你代表我签就行了。’”

大字报写好以后，准备登在《武汉工人报》上，田国汉把吴焱金和李想玉找到《湖北日报》、《长江日报》联合印刷厂，联合印刷厂拒绝为他们印刷报纸。吴焱金和李想玉问：是谁不准印？联合印刷厂负责人说，是市革命委员会政工组长张景禄的指示。

吴焱金说："张景禄只是个市革委会常委，我和李想玉两个市革委会副主任出面还不行吗？"

他们的强迫命令没有奏效，他们便赶到市革委会去围攻张景禄，朱鸿霞也从省革委会赶来参加了对张景禄的围攻。朱鸿霞说："笑话！你市革委会不给我印，我就没有办法了？我们一样可以印，过两天一样印出来。你就是不给我印，也不要紧，我嘴还可以讲。"

吴焱金对张景禄说："你今天下午不答复，我晚上就上街讲话。"

当天晚上，吴焱金第一个到街头演讲。

第二天，胡厚民问吴焱金说："听说你昨天到街上去讲话，人不少吧？"

吴焱金说："人确实不少，有几千人。"

胡厚民说："你们当时揪'武老杨'是正确的，我们当时不揪，现在很不好说话，反而被动。要是当时一块揪，肯定不是这个结果。我们当时也是准备揪的，但是由于派性，你们揪，我们不揪，想看着你们犯错误。现在看穿了，整了'新派'压'钢派'。"

朱鸿霞、吴焱金、李想玉 3 人署名的《人类解放我解放，洒尽热血为人民》大字报贴在水塔后，立即震动武汉三镇，转抄者不计其数，武汉三镇随处可见这张大字报。以后，吴焱金又同郭洪斌一道去中原印刷厂，该厂免费为他们铅印了

这张大字报的传单。

在当时形势下，人们是不管大字报水平如何的，只要有人领头，火一下就点起来了。各单位纷纷响应，轰轰烈烈的“反复旧”运动开始了。

这时胡厚民说：“声势还要搞大，越大越好。”他建议朱鸿霞、李想玉和吴焱金还要走上街头，到处去作报告，造影响。于是，朱、李、吴这段时间在武汉三镇作了十多场“反复旧”的报告，每场都是数万人。有一次在中南旅社的台上讲话时，吴焱金喉咙嘶哑得说不出话来。同时在场的武汉锅炉厂王光照也几乎每回必讲，先后在武汉各单位作了60场大型报告会，与他同台演讲的有丁家显、吴焱金、朱鸿霞和李想玉等人。演讲的核心是：军宣队拿“三条扁担”、“三根绳子”压造反派。

“三条扁担”是指“派性、打砸抢、抢枪乱军”；“三根绳子”是指造反派“想当官、想入党、造反动机不纯”。

许多群众还在武汉大街上举行规模宏大的火把游行。

胡厚民订出了三步走的计划：第一步，由武锅、武重出面点火，把群众发动起来；第二步，群众起来了，工代会对运动进行领导；第三步，由省、市革委会领导“反复旧”。

胡厚民还决定向大专院校派出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1968年秋天以来，向大中学校派工宣队都是由军队决定的，派出的大都是原参加“百万雄师”的保守派工人，他们到学

校去的任务就是整文革中的造反派学生。“反复旧”时，吴焱金碰到朱鸿霞和胡崇元，胡崇元对吴焱金说：“工宣队问题不解决不行，不派工宣队进大专院校，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朱鸿霞说：“上海的工宣队都是由‘工总司’派出的，是由清一色的造反派组成的。武汉市现在完全由市工代会派出工宣队是不可能的，办法只有一个，各单位把‘反复旧’搞起来，发动各单位的群众，去把他们单位派出的‘百万雄师’揪回来，换上造反派的工人去当工宣队员。”

“反复旧”的第三步，就是由市工代会派出工人调查团进驻省、市革委会，对被当权派篡夺了的省、市革委会进行反夺权。

## 第 1082 回：叫进京，武汉代表住京西学习班，众人批判王效禹

武汉“反复旧”的群众发动起来以后，胡厚民又召集了一次工代会正、副主任扩大会议，这次不仅扩大到朱鸿霞、李想玉、吴焱金，而且将武汉市革委会常委、“工总”常委张耀忠和“工造总司”的龙梅生也扩大进来。龙梅生在会上介绍了他和张耀忠的方案：

“现在，‘反复旧’的火已经点了起来，群众也基本上发动起来，我们应该冷静下来，把群众运动引导到各个单位去，不提‘反复旧’的口号，在各个单位落实政策，把失去的权夺回来，‘清队’搞错了的要纠正。落实政策，名义上由各单位自己搞，实际由工代会统一安排。省、市革委会、工代会的常委们不要到社会上去搞，要到基层去。”

这个方案被胡厚民否定了。胡厚民说：“这个方案是右倾的，要害是要不要群众运动的问题，是支持还是否定群众运动的问题，是将‘反复旧’进行到底还是半途而废的问题。”他认为造反派本来在各单位就是少数派，清理阶级队伍有的挨了整，你叫他回单位搞，根本就搞不动，其结果只能是被各个击破。

朱鸿霞、李想玉和吴焱金也都认为，“反复旧”靠各单位自己的力量搞不动，必须发动群众，在社会上形成冲击力量。旧势力很顽固，不这样冲击不行。于是，大家一致否定

了张耀忠、龙梅生提出的方案。

胡厚民提议，是否开一个争取更大胜利的誓师大会。通过这个大会，进一步把群众发动起来，同时显示一下造反派的力量。对胡厚民的这个提议，有人同意，也有人不同意，大家争论了很久。不同意的理由是，“九大”正在召开期间，开这样的群众大会好不好？胡厚民说：“只要群众的大方向是正确的，其他问题都是次要的。”于是决定4月27日在汉口中山大道工艺大楼门前召开“反复旧”誓师大会。那天到会有十几万人，大会由吴焱金主持、朱鸿霞讲话，李想玉宣读大会公告，胡厚民宣读大会给毛主席的致敬电，声势浩大。这一天，武汉“反复旧”达到了高潮。武汉最繁华的中山大道交通断绝，大街上人山人海。

4月27日出版的《武汉工代会》报，刊登了《复旧倾向的十种表现》的文章，文章指出，复旧倾向表现为：省、市两级革委会中一大批支持造反派的革命干部被打成“幕后操纵者”或“老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并被赶出了决策层；在清理阶级队伍期间，许多造反派被打成“阴谋家”、“野心家”、“牛鬼蛇神”；许多单位的造反派被禁止在革委会中担任职务；解放了许多“资产阶级的当权派”即老干部；那些造反派组成的有广泛影响的革委会常常受到怀疑，并且被“抓革命促生产领导小组”或“清理阶级队伍领导小组”所取代。文章号召“颠倒被颠倒了的历史”，夺回被

“资产阶级当权派篡夺了的权力”。

过了一两天，省、市革委会中的造反派头头到湖北省交通运输管理局开会，胡厚民建议，所有头头都不坐汽车，从大街上走过去，要在群众里产生大的影响。胡厚民刚吐过血，身体不好，但他举着毛主席画像走在最前面，吴焱金和朱鸿霞等人走在后面，群众一片欢腾。会后，他们被车子接到汉口东北远郊的肉联厂住了下来。这也是胡厚民的主意。他说，头头们集中起来有两个好处，一是有事好商量，有问题可以及时研究，第二个是防止队伍分化，防止出叛徒。

果然，这一下真的通天了，4月29日上午接到中央指示，请朱鸿霞、李想玉、吴焱金、杨道远、张立国5人到北京去解决武汉问题。

临走时，胡厚民又对他们讲：“你们到北京去，要把毛主席的《关于重庆谈判》好好学学。你们到中央一定要顶着，摊牌也不要紧。你们放心，我们在家里搞的动静越大越好，就是对你们最大的支持，我们是不会熄火的。”

朱鸿霞 5 人走后，家里的工作由胡厚民主持。4 月 30 日，武汉工代会召开了一次常委扩大会，通过了《反复辟、反复旧、为争取更大胜利而战斗》的决议，认为所谓“复旧”就是恢复旧权力机构旧的办事方式和方法。这个决议否认造反派有打砸抢的罪行和无法无天的行为，反对把造反派作为“清理阶级队伍”的对象，反对把造反派赶出省、市及基层

各级革委会。

朱鸿霞他们到了北京，起先和曾思玉、刘丰、方铭、张昭剑一起住在前门饭店。

在武汉，张立国是不同意也不参加“反复旧”的，在火车上，朱鸿霞他们跟他谈了半天，他才表示同意“反复旧”。

在北京参加“九大”的谢望春对“反复旧”的做法表示理解和同情。谢望春还告诉朱鸿霞他们：“周总理点了名，要胡厚民同志来北京。中央首长批评了曾、刘、方、张，对他们说，你们有错误，给他们（造反派）作个检讨就行了。”

“九大”代表沈复礼说，夏邦银当上中央委员，就是沈复礼积极联系黄石市的“九大”代表柯林和其他一些地县的几个“九大”代表据理力争，才联名把夏邦银推选上大会主席团，并最终当选为中央委员。

大家都认为“反复旧”是对的。在这种情况下，吴焱金给武汉写了以他们5个人署名的第一封信，张立国看过，同意署上他的名字。

第二天，张立国问信发出去没有，他说：“把我的名字刮了。”

吴焱金说：“信已经发了。”

由于朱鸿霞他们违反中央不许通信的规定，5月2日，中央通知胡厚民等省、市革委会常委以上的22名群众组织代表到京。胡厚民感到中央打算隔离造反派头头与群众联系，要

压制造反派捍卫文革成果的努力，于是指派“工总”组织部部长郭洪斌和武汉客车制配厂“工总”一号勤务员、武汉客车制配厂革委会主任、武汉市革委会委员方斌二人当“反复旧”负责人，继续领导“反复旧”，并交代说：“我们去北京以后，不能打电话，也不能写信，你们在武汉闹得越欢，越有利于问题的解决。你们搞得越大，我们到中央说话越有分量。”

郭洪斌和方斌接过指挥棒，果然继续在武汉三镇大搞起来。

胡厚民等人到京后，中央要朱鸿霞他们搬家，住进了京西宾馆。这里戒备森严，有军人站岗，湖北省赴京代表驻地的房间的电话都拆掉了，不许打电话，也不许向外送材料，他们和武汉的联系就困难了。他们跑到其他省赴京代表住的房间去打电话，也不让打。于是以制止武汉“反复旧”发生的绝食为由，找张体学扯皮。张体学被他们搞得没办法，只好出面向武汉要电话让他们通话。

1969年5月1日晚，北京举行焰火晚会，毛泽东、林彪、周恩来等中央首长登上天安门城楼与民同庆“五一国际劳动节”。湖北省、武汉市革委会的全体群众代表也应邀参加晚会，并且上了离天安门城楼很近的观礼台，可以看清天安门城楼上的中央首长。

焰火一闪，时常有白色的物品在空中飘荡，有一些飘向

观礼台，吴焱金跳起抢到一个，原来是白绸子做的降落伞。杨道远等纷纷要将此留作纪念，吴焱金把它撕成四块，并写上“1969年5月1日在天安门观礼台参加焰火晚会，见到伟大领袖毛主席”，然后分别保存起来。

代表们第一次住进京西宾馆这样高级的地方，虽然每天吃得好，喝得好，却与武汉的广大群众失去联系，有一种被隔离的感觉。当时在京西宾馆食堂吃饭，在餐桌上经常碰到其他省、市的一些首长。有一天，吴焱金问同桌的一位老干部贵姓？那人说：

“我叫谭启龙。”

吴焱金说：“久闻大名，毛主席说过，山东有个谭启龙，从小当红军……”然后问他：“你和毛主席很熟吗？”

谭启龙回答：“见面不多，还是1931年见过面。”

“那毛主席怎么记得你的名字呢？”

谭启龙说：“这我就不知道了，伟大领袖嘛，记忆力当然不同于一般人。”

吴焱金又问他到这里来干什么，谭启龙没有回答。

过几天，吴焱金又同一个脸上有麻子的军人同桌吃饭，有人告诉他，这个麻子就是王效禹。吴焱金赶紧问王效禹住在哪里？王效禹告诉他住在405号房间。吴焱金把情况告诉胡厚民，胡厚民立即来了兴趣，要同吴焱金一块去拜访王效禹。

他们很快找到王效禹，问他：“您是济南军区政委、山东省革委会主任，你们在山东搞‘反复旧’，中央到底给您交过什么底？”

王效禹说：“没有底，就是看到《红旗》杂志第四期上面有一句话。”

他又说：“在‘反复旧’问题上，我是犯了错误的，你们以后不要来找我了。”

胡厚民问：“山东是如何对待造反派的？”

王效禹说：“‘反复旧’以前，山东造反派还是掌权的。”

胡厚民他们又问造反派“纳新”即加入中国共产党的问题，王效禹说：“山东的造反派头头都被纳新了。”

胡厚民有些失望，准备再问。这时一位军人跑进来说：“王效禹，你又在同谁串联呢？”原来王效禹也是受监视的。胡厚民他们赶紧说：“是吃饭时刚认识的，随便来看一下。”便匆匆告辞了。

朱鸿霞他们在京西宾馆整天无所事事，武汉警备区司令员、武汉市革委会主任方铭等首长也和他们聊天说笑话。方铭说：“以前有个男人常在外面吹嘘如何不怕老婆，有一天终于被老婆听见了，他吓得钻到床底下不出来。老婆吼道：你到底出不出来？丈夫说：男子汉大丈夫，说不出来就不出来！”虽是老掉牙的笑话，从方铭口里说出来，还是觉得很好笑。有天，方铭戴了一个能转动的闪闪发光的毛主席纪念

章进来手舞足蹈地说："我刚去了林副主席那里，这是林副主席亲自送给我的纪念章。"大家摸了又摸，看了又看，确实比一般像章质量好，十分羡慕！

这天，吴焱金和胡厚民在院子里闲逛，突然发现墙外似乎有武汉的熟人，用手势打个招呼，果然是武汉来京送材料的同志。胡厚民叫吴焱金写个条子，用石头包着丢出去，条子上写道："我们一挥手，你们就把材料丢进来。以后可以用同样的方式联系。"他们避开哨兵，找到一个较僻静的地方，收到武汉来人丢进来的材料。

5 月 3 日，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针对清理阶级队伍和清查"516"中出现的问题说："除了杀人、放火、放毒的，其他的一个不杀，大部不抓，我说的放毒，是食物放毒，不是政治上的。"

5 月 4 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简称"两报一刊"，联合发表社论《五四运动五十年》，其中加了近 700 字的批判孔子的内容。因为毛泽东讲，现在有些人的思想还不如"五四"时期思想解放，"五四"是从打倒孔家店开始。孔子是代表没落奴隶主阶级的。于是，在社论中特别加上了批孔的内容。

就在中央召集武汉造反派头头进京解决那里的"反复旧"问题时，5月4日，被留在北京的"九大"山东代表团也开始办学习班，讨论解决山东问题。

接着，又陆续从济南召来不是“九大”代表的张子石、王竹泉、杨恩华、王新阳、刘长茂等人。其中的王新阳是5月10日清晨从济南监狱中放出后，当天赶到北京参加学习班。

5月9日，周恩来等人参加山东学习班会议。山东师院政治系学生、“红卫兵山东指挥部”负责人、时任山东省革委会副主任的王竹泉面对王效禹，想起解决肥城事件时王效禹耍手腕对自己的批斗和被涮了一顿的屈辱，越说越气愤，发言1个半小时，国恕连在旁边帮腔。看到会议气氛越来越紧张，周恩来打断制止王竹泉的发言，王竹泉声称只讲了一半。

政治局5月10日召开解决山东问题的会议，周恩来谈到谭启龙的问题。会议决定，将王效禹调离领导岗位，由杨得志负责山东省的工作。同一天21时，周恩来、康生、陈伯达、黄永胜、江青、叶群、张春桥等人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接见山东学习班人员，周恩来主持会议。

江青首先讲话：“中央应当替山东承担一部分责任，不单单是官僚主义的缺点错误。……67年冬季，中央文革‘天天读’时间，杨成武强加于人，当时我和叶群未在，杨成武亲自起草了个文件，给了我们。当时是以杨成武为首的中央军委文革办事组，大概还用了中央文革的名义。我和总理、康老商议应当承担责任。杨成武用军委办事组的名义，要山

东省革命委员会派人到徐州去建筑工事，这就使徐海问题更复杂了。不能只怪王效禹同志。当然王效禹同志是有错误的，那是他们的问题。但这里也有一些误会。……对王效禹同志要有肯定的方面，有否定的方面，要全面，不要搞得大乱”。

康生说：“王效禹同志应有信心，去掉一切怀疑。中央态度很清楚，保你嘛。九大选你为中央委员嘛，这是客观事实，文化大革命中有功绩嘛。难道因有徐州问题，临沂问题，谭启龙的问题，反复旧的问题就没有信心了吗？应有决心和信心能够把山东搞好等等。”

张春桥、叶群、吴法宪等人也发了言。

最后周恩来讲话，他批评王竹泉等人昨天的发言：“不光要攻，还得要帮。国恕连过去还不是跟着王效禹跑了一段，和王效禹一下子闹翻了，就讲的那么生动，像说快书一样，我担心你将来要犯错误。”

周恩来最后说：“山东还没有来中央办学习班吧，这次就来办一个。有些同志来学一学，刘崇玉可以来。谁破坏团结，谁栽跟头，谁犯错误。搞一个团结的局面回去。今天就到这里。”

学习班上，韩金海、杨保华也开始揭发王效禹。韩金海说，王效禹亲自给泰安、昌潍、淄博、济南等地区部署整驻军的材料等等。

## 第1083回：五一二，中央见武汉代表

### 胡厚民，朱鸿霞首先汇报

5月，在“反复旧”运动中，武汉原“北、决、扬”成员萧务农创办了《百舸争流》的刊物，他把已被打垮的《扬子江评论》的成员聚集在一起，又开始为“反复旧”的人制定了纲领性的东西，基本思想就是使“工代会”和同级革委会平起平坐，并使后者服从前者的监督。这一提议成了他们的口号。

5月12日晚至13日凌晨，周恩来、陈伯达、谢富治、黄永胜、叶群、李作鹏在人民大会堂河北厅接见了湖北省、武汉市革委会在京群众代表朱鸿霞、杨道远、张立国、李想玉、吴焱金、胡厚民、夏邦银等人。

周恩来说：“今天开个谈心会，你们不是在湖北要搞‘反复旧’吗？搞了一些运动。把你们接到京西宾馆就是听听你们的意见嘛。那是个很高级的、很严密的地方。五不准嘛，军委办公机关在那里，许多军队首长、省革委会主任都在那里，曾思玉、王效禹、李再含、刘格平也在那里嘛！他们也不准出去嘛！要守纪律。你们要摸我们的底，问了刘格平，没有表态；问了王效禹，他作了自我检查；李再含肯定了你们几句。“九大”开了预备会议，正式会议，就是很严密。你们这次到中央来，不是66年的五月份了，也不是67年的五月份，也不是68年的五月份，而是69年的五月份，要有

纪律。时代前进了，不是串连的时候了，你们几乎闹着要走，在京西宾馆造反。这个反不能造，你们要造反，就是造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反。你们以为施加一点压力，就可以早点接见你们。今天当面给你们讲。先不听朱鸿霞的，先听胡厚民的。哪个叫胡厚民？”

胡厚民坐在较远的地方，他站起来回答：“来了。”

周恩来理说：“坐到这里来，叫你来就是听听你的。”

康生指着身边一个座位说：“胡厚民同志到前面来。”周恩来也打一个手势。

在场的人都为胡厚民捏一把汗。胡厚民似乎也没想到周恩来会突然这样点他的名，他小心翼翼走到周恩来对面坐下。

周恩来：“现在时代不同了，给你们先打个底子，要严格纪律。你们不守纪律，还带个‘联络站’。”

康生笑着说：“复旧啰！”

周恩来问胡厚民：“‘联络站’设在哪里！”

朱鸿霞答：“设在铁路上一个同志家里。”

胡厚民补充说：“在虎坊桥附近。”

周恩来明确表示：“是错误的，要取消。你们给我们来个示威，要我们接见，不可能！‘九大’开了以后，中央政治局接见你们，排了个顺序：山东、贵州、再你们，今天就接见你们。我们没有亏待你们嘛！你们真要走，就是和无产阶级司令部告别了。你们要清醒点，你们不要以为自己百分

之百的对。当然啰，我们也不能光批评你们，今天是单独接见你们。时代前进了，这是‘九大’以后啊，同志！好，先听胡厚民同志的意见。”

胡厚民：“在前段时间，由于我毛主席著作学得不好，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举得不高，对毛主席的战略部署跟得不紧，省、市革委会成立以后，由于派性作怪，没有加强市工代会的工作，犯了不少的缺点和错误，甚至很严重的错误。影响了毛主席的战略部署，影响了下面的同志，下面的同志犯了这样那样的错误，不能怪他们，主要是我影响了他们……”

周恩来点头说：“这样讲就对了！你好好讲嘛！”

康生：“‘九大’文件你们不学，有些人对我们‘九大’没有一点感情。”他指着胡厚民说：“你还是共产党员，现在全世界人民都在庆‘九大’，我今天接见巴西代表团，他们远隔千山万水还庆‘九大’。可是在你们武汉却是另外一种示威，还绝食，我说那种绝食可耻！”

周恩来问胡厚民：“你去过山东吗？”

胡厚民答：“去过。”

康生：“学‘反复旧’。”

周恩来：“我们不要复旧要前进，你听过杨保华那个报告吗？”

胡厚民：“在武汉看过。”

周恩来："他自己已经作了检查。他还住在京西宾馆。山东已经丢掉了的东西，你们湖北又搞起来。'反复旧'不是你们先搞的，是向他们学的。王效禹是支持造反派的干部，犯了错误是前进中的错误。谭启龙是犯了走资派错误，但愿意改悔的，和张体学一样。张体学犯错误，也在你们面前作了检查，痛哭流涕嘛！如果改得还不好，你们还可以帮助他，改了就好了，要革命，要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前进。"

康生："复旧有的个别地方确实是有的，有的甚至原封不动，主席讲要搞好斗、批、改嘛，还讲文化大革命不是一次嘛！'九大'精神是什么？总要按林副主席政治报告'九大'精神办事嘛！你们现在不是一般的群众的头头了，是革委会负责人，是当权派，有问题可以向中央报告。现在要讲三性：革命性、组织纪律性、科学性。"

周恩来："是否把你们软禁了？林副主席提'三性'，就是对我们讲的。"

胡厚民："我刚从医院出来不久，情况知道不多，其他同志清楚些，但下面同志的错误应该由我负主要责任。"

周恩来点头说："这就对了，你影响了下面的同志。"然后对朱鸿霞说："朱鸿霞同志，是我们去解放你们的嘛！你在沙洋，毛主席在武汉，叫我们把你放出来的。你们有意见，写个信给主席、林副主席和我们，还能不看你们的信吗？你们提出的问题难道我们还不解决？是可以解决的嘛。我们跟

你们是有无产阶级的阶级感情的！”

他又问胡厚民：“你参加‘北航黑会’没有？”

胡厚民肯定的回答：“我没有参加。‘钢工总’勤务组没有派任何人参加。我也没有派人参加。是我们‘工总’下面的一个基层单位交通分部一个叫郭少华的同志，他因公调查他们单位当权派的情况来到北京，因和北航过去在汉串连的同学认识，曾去过北航。”“那天听说北航有个会，他去听了一会就出来了，但不是代表勤务组。当天他就写回来一封信，给我们‘工总’的一个工作人员后转给我，讲了一些‘黑会’的情况。但他在信上还特地注明：这个会是乱军的，与我们‘工总’当时拥护曾、刘、方、张的口号不合。我看后把这封信交给了武汉军区第三办公室邵洪基同志，回来也向‘三办’汇了报。后来武船的几个头头不知‘北航黑会’是怎么回事，问起我，我跟他们三、四个人随便聊讲了一些‘黑会’的情况。我应该承担责任是传播了小道消息，是错误的。”

周恩来问：“你没有听康老批判‘北航黑会’？”

胡厚民：“后来看到了。”

周恩来：“你同北航有联系，还是同清华有联系？”

胡厚民：“北航、清华我都没有联系。到现在为止，我还没有和韩爱晶、蒯大富见过面，只同蒯大富通过一次电话。‘720’后认识一些北京学生，‘720’以前我和朱鸿霞同志一起关在沙洋，7 月 19 日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把我和朱鸿霞

同志救了出来。”

朱鸿霞：“胡厚民是和我一块出来的！”

周恩来：“啊！你也是关在沙洋？”

这时，一冶的曹佩贤插话说：“一冶筑炉公司有个叫胡银帮的参加了‘黑会’。”

周恩来问：“‘钢工总’的还是‘钢九一三’的？”

曹佩贤答：“‘钢九一三’的。”

周恩来说：“和刚才讲的不是一回事吧？”

众人答：“不是。”

周恩来继续询问胡厚民都去了哪些地方？

胡厚民说：“今年元月底，他们要抓我，我就跑出来了，先住在郑州，2 月 5 日又吐血，河南医院找不出吐血的原因，我又来到北京，后来又想到大连工学院住一段时间。”

他讲诉了自己为了治疗因支气管结石引起的吐血，曾到郑州、北京、天津、山东等地。

周恩来看见张维荣跟前的《红旗》杂志，说：“你们拿着林副主席的政治报告，但没有学进去。”他对胡厚民说：“谈谈你的看法，座谈嘛！我们把底都交了，讲，不要紧么！”

胡厚民谈了武汉造反派头头被拉下来的情况，他提到了汉阳客车制配厂方斌，省柴油机厂陈汉寿，新华印刷厂杨继高，汉光印刷厂高远飞等。

朱鸿霞插话补充：“还有武重厂的祝孝先。”

周恩来："祝孝先是什么人？"

朱鸿霞："是武重厂革委会第一副主任。"

胡厚民："共产党员。"

朱鸿霞："是预备党员，是我们厂的小胡厚民。"

周恩来笑了："还有小胡厚民？"

吴焱金说："武汉不是一个胡厚民的问题，问题是上面搞胡厚民，下面就到处揪小胡厚民、男胡厚民、女胡厚民、老胡厚民。"

周恩来、康生都笑起来了。周恩来问："这是事实，结论怎样？"

胡厚民说了自己的看法："这是对文化大革命肯定还是否定的问题。造反派是毛主席革命路线胜利的产物，"周恩来点头，胡厚民继续说："对待革命造反派的态度就是对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态度。"周恩来点头表示肯定。

朱鸿霞说："有'打倒胡厚民，解放辛甫'的口号。"

胡厚民接着讲了湖北省党代会不批判王任重，不批判"二月逆流"，而是批判支持造反派的干部任爱生、杨春亭的问题，讲了国棉一厂王屏、宁桃珍、陈爱娥问题，讲了"九大"代表的问题。

周恩来说："从你们的讲话是不是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造反者被造反，夺权者被夺权'？是不是这样？"

康生指着《武汉工人报》说："你们有句话：'造反者被

造反，夺权者被夺权’，这在一个厂，一个单位完全是可能的。如果武汉市都是这样，那不把你们自己也否定了，你们自己否定自己。你们现在不是一个群众组织的头头，你们是当权派了。”

周恩来：“你们在文化大革命中是立过功的。不然怎么把你们请来呢？你们工作中有错误，但你们也是副主任、常委。”

康生：“你们省有常委、副主任，市有常委、副主任，你们的责任不小啊！你们不是简单的一个头头。如果武汉三镇的文化大革命集中在这两句话上，‘造反者被造反，夺权者被夺权’，那么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怎么体现？你们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表现又怎么理解？湖北省有多少人？”“你们的地位已经变了，是当权派了。”

周恩来：“有些要改革，你们提。新生红色政权建立不容易啊！一个新的政权就那么完善？它虽还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但它是不断地改，不断地前进的。清理阶级队伍掩盖了另外的倾向，你们那里不是出来了吗？要举例子可能还会多，结论不要过早地做。”

康生：“你们不同主席、林副主席商量，不同中央商量，就上街了，就在全世界面前公开了，造谁的反！谁高兴？”

周恩来：“你们搞成 10 万人上街，谁高兴？叛徒王明高兴，美帝、苏修高兴，台湾的蒋介石高兴！”

康生："'九大'一完，你们就上街游行。"

周恩来："'九大'正在开，你们就上街了。你们冷静点，帮了谁的忙？当然，他们没有给你们做细致的工作，但你们也不听他们的嘛！"

康生："我们也有责任。"

周恩来："你们说'百万雄师'反夺权搞复旧了，这最容易煽动人。你们能说曾思玉、刘丰是支持'百万雄师'的吗？是复辟资本主义的头子吗？曾思玉是沈阳调去的，刘丰是支持你们造反派的嘛！'720'保卫毛主席的，方铭也是这样。我是在你们放出来后才走的。所以结论不能下的太死。毛主席在 4 月 28 日九届一中全会讲话中，什么都考虑到了。一个新的权力机构有这样那样的问题，是可以克服的，可以统一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上，你们认为全面复旧的结论，这符不符合事实？我们是不能同意的。"

康生："主席对'九大'的方针是团结、胜利的大会。"

周恩来："你们采取分裂行动。"

康生："尽管你们可以举出许多例子，但大方向是团结。你们没有很好读毛主席的书，戴着有色眼镜看问题。"他问胡厚民："你是不是要他们讲？"

周恩来："朱鸿霞同志谈谈吧！你是钢'工总'一号头头。"

朱鸿霞："好，我向中央首长汇报....."

周恩来问："你们还没有解决跨行业组织？工代会还没有搞起来？"

朱鸿霞答："解决了。工代会早就成立了。'钢'、'新'两派很团结。"

胡厚民也肯定说："空前团结。"

吴焱金也紧跟着肯定了他们俩人的话，说："我们确实很团结。"

周恩来："不一定吧，是观点一致在一起。"

康生："朱鸿霞同志，我第一次认识你是 67 年 7、8 月份吧？"

周恩来："67 年 8 月 8 日。"

康生："那时有人说你在狱中叛变了，上纲很高嘛。当时我对你的印象比较好，一直到现在还是很好的嘛。但是朱鸿霞同志，现在是什么时期，现在时代变了，现在是 1969 年，今天在人民大会堂座谈，不是两年半以前。今天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取得了伟大胜利，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彻底破产了，当然不能说最后的胜利。林副主席在政治报告中讲了，不是我国革命的最后胜利，还有任务，但与两年前形势不同。我们是在'九大'以后接见大家，方向应当按'九大'方针，照毛主席教导我们的'我们希望这一次代表大会，能够开成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大会以后，在全国取得更大的胜利。'这是总的方针。你们同两、三年前也不

一样了。你们是当权派，不是简单的一个群众组织的造反派头头。你们是红色政权的当权者，是国家专政的省、市革委会的领导成员之一。你朱鸿霞与刚放出来的那个时候大不一样了！现在你们又搞第四次革命，过去北京伪造了一个文件，叫做五个回合中的站队问题，所谓重新站队就是新分裂。说是我写的，说什么要重新站队，这是造谣。”

陈伯达：“是河南搞的，不是北京。”

周恩来：“主席有个办法，就是工人阶级领导一切，按单位按系统实现革命大联合，贵阳棉纺厂实行归口大联合，是他们自己对立起来的，但他们自己不组织学习推广，自己把这个标兵破坏了，昨天我批评了他们。主席 7、8、9 从武汉、上海视察回来后，六厂一校，去年 7 月份总结了北京针织总厂经验，六厂一校经验你们不学习，现在运动中出现的问题，主席都想到了，都正在解决，要认清新形势。张立国同志，你找‘天派’、‘地派’没有？”

张立国：“没有。”

周恩来：“我知道你没有，再找‘天派’、‘地派’也找不到了！”

吴焱金把一大包材料送给康生。周恩来：“要解决好问题，你们也给我们供应点材料。你们可能准备来打官司的，我们是来搞团结的。”

朱鸿霞谈到市工代会小报不能出时，周恩来说：“小报

还是不出好，出了以后，美帝、苏修在香港买一张小报，用200元。”

黄永胜：“500元买一张。”

周恩来：“毛主席过去一直看小报，去年7月27日工宣队进驻清华以后，就不看小报了。你们再搞‘联络站’就落后了。”

康生笑着说：“复旧啰！领导上帮助你们不够。”

周恩来：“前年蒯大富要大串连，王力拿着小报给我看，满以为我会支持他的，那时杨道远你们也搞什么大串连嘛。你们犯了一些错误，我们有责任。只要你们愿意跟毛主席走，我们就有责任帮助你们。不要以为犯了点错误就怎么样。”

## 第 1084 回：继续听，其他人介绍情况

## 谈通宵，大家一起看电影

朱鸿霞继续汇报，讲了武汉军区“三办”，也就是省革委会“斗、批、改办公室”，领导一切，省革委会从未召开常委会研究斗、批、改问题，下面也普遍建立斗、批、改小组领导革委会，成立班、排、连等问题，周恩来很注意的听着。朱鸿霞提到曾思玉司令员乱点名的问题，方铭说“电信局只有 36 个好人”的问题，说群众组织头头有女秘书问题，张体学说“你们一年打、砸、抢，二年搞武斗，一减一等于零”的问题，刘丰政委对“钢派”说见了“新派”就头疼问题，方铭、张体学要“工总”整“新派”黑材料问题，张体学说“群众组织的头头现在只能代表两万牛鬼蛇神”的问题，省党代会不批判王任重和“二月逆流”，反对批判支持造反派的干部和造反派抢枪乱军等问题。

朱鸿霞说曾思玉、刘丰首长偏听偏信，汇报是假的，他说：“我们在京西宾馆，也没有说造反。”

周恩来说：“造反是我说的。”

周恩来又听了谢望春谈了国棉三厂阚驰受批判情况和军代表进厂情况，问了夏邦银关于汉轧吴勇功受骗情况，听了沈复礼关于武锅赵秀岳受批判情况。

接着，沈复礼汇报武汉锅炉厂的情况。周恩来说：“你的名字是个旧名字啊！”接着就笑了。

康生："复旧的复，礼的礼，是个旧名字！"他也笑了。

沈复礼汇报后，王屏谈国棉一厂情况。

周恩来问："革委会名义上还存在吗？厂里清除了多少坏人？"

王屏说："厂革委会名义上存在，基层革委会没有了。军代表进厂捅马蜂窝，矛头对准革委会基层造反派头头，都用大字报烧了，用编连队的办法，把下面的造反派头头都排掉了，名义上是改连队，实际上排挤掉造反派，只清了一个坏人，是漏网地主，其他光整造反派。"

王屏谈了对他们厂的"九大"代表陈爱娥的看法，认为这是是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问题。

周恩来问："你对她有意见吧？"

王屏："我个人对她没有什么意见，她也是劳模，是个好同志，但感情上一直没有站过来，不够'九大'代表的三个条件。"

周恩来："吴焱金同志谈谈吧！"

吴焱金："我同意朱鸿霞、胡厚民的意见……"

吴焱金也谈到各厂均有斗、批、改小组，架空革委会的问题。周恩来问他：

"你们调查了没有，有多少工厂有军代表？成立了斗、批、改小组？"

众人答："2430 多个工厂。"

康生问："斗、批、改小组的任务是搞清理阶级队伍吗？"

众说："是搞清理阶级队伍，但不搞五种人，只搞造反派。"

接着，吴焱金谈了"长办"的情况，谈到市革委会原编制 90 人，现扩大到 1000 人，补上的绝大多数是站错队的，造反派所剩很少时，众人说：

"是 1180 人。"

吴焱金："少说点好，留点余地嘛！"

康生问："过去 90 人，现在 1000 多人，是否包括各局？"

吴焱金："包括。"

其他人有的说包括，有的说不包括。

周恩来问："你回厂了没有？"

吴焱金回答："回厂很少，有时开会，接喜报。"

周恩来笑着说："接喜报也是任务，成了一种负担了。"

吴焱金说："我们群众代表的任务是：开会、看戏、接喜报、挨批评、开会坐主席台，看戏坐前三排……"

周恩来笑着说："还坐轿车嘛。"

吴焱金："现在武汉人们的印象中，好像当了'百万雄师'还觉得光荣些。"

周恩来："当'百万雄师'还光荣？那怎么看待'720 事件'呢？"

吴焱金："所以我们想不通。"

接着周恩来让李想玉谈武汉钢铁厂的情况，他随手从包里拿出一张单子对李想玉说：

“向你们澄清几个情况！你知道，‘815 会议’以前，武钢搞到几乎一吨钢都不出！”

周恩来了解了武钢几个人的情况后，李想玉说：

“冶金会议我们根本不翻案，我们要维护‘815 会议’。”

周恩来：“‘815 会议’前，武钢一吨钢都未生产，‘815 会议’后生产上去了，现在生产下降了。今年一季度生产上升了，现在二季度生产下来了。如果说武钢扩大化了，压了你们这一派，要加以纠正，还说得过去。如果‘反复旧’反到‘815 会议’以前，搞对立情绪，就不好了。如果斗、批、改扩大化了的问题，那是可以解决的。你们能说‘815 会议’以后的生产比‘815’以前还差吗？我相信给你们讲清道理，你们不会这样做的。武钢大有潜力。”他接着问李想玉：

“你对徐道基的看法怎样？”

李想玉说：“他坚持‘118 联合协议’，坚持大联合，大方向是对的。我们反对，说席位少了，是错误的。但对他个人来说，我们有看法，他在 57 年有右派言论，他原来是团委书记，受到开除团籍，撤职降薪的处分。武钢革委会开始，我们这一派一个也没有。”

周恩来：“不能说一个都没有吧？你不是副主任吗？”

李想玉：“我是后来补上的一个常委。”

周恩来指着到会的“九一三”代表说：“你们这些不都是常委吗？”

李想玉：“他们一个也没有在武钢结合。”

周恩来了解他们这一派被抓了多少人？挨斗的有多少？检查的多少？

李想玉说：“我们写信点名的21人差不多都抓了。武钢21个厂、矿、所达成的（在冶金会议期间）巩固和发展革命大联合和革命三结合的协议都被撕毁了。他们把我们这一派打成反军乱军派。武钢21个厂、矿、部、所，187个车间、站、段，1230多个大小头头差不多都写了检查，百分之七十受批判，百分之五十被斗，有的被关。青山区33个街坊，各厂各车间都设了关人的地方。”

胡厚民：“武汉还搞了不少甄别教育所。对外叫毛泽东思想学习班。”

周恩来：“啊？批、斗的一半，检查的百分之七十！”

由于李想玉湖北口音浓重，周恩来对他说：

“你讲慢点，你讲的话，我只能听懂十分之一、二，”他指着康生、陈伯达等人说：“他们都听不懂。”

康生笑着说：“我听话的能力还是比较好的，可是听你的话却象听外国话一样。”

于是，接下来邓金福代替李想玉汇报。他说：

“武钢各厂、矿、部革命群众代表，结合到革委会的副

主任如姜振武、管胜祥、廖元凯等等和其他副主任、常委也靠边站。我们认为他们家庭出身百分之九十以上是工人、贫下中农，不应该靠边站，应分配他们搞斗、批、改工作。”

周恩来：“回去以后（指上次开完冶金会议回汉后），你们这一派可能受点压，对造反派要具体分析。你们想一想，你们得势时也压了他们嘛！”

邓金福承认说：“是压了他们。”

周恩来：“谈得太多受不了啦！每天晚上如此！今天其他讲话都不听了，最后一个听听学生代表杨道远的，你是钢‘二司’的？”

杨道远：“钢‘二司’的。”

周恩来：“啊，钢‘二司’的，前年到全国各地去支左的是你们吧，你是钢‘二司’头头，我们去武汉头一个就到你们那里。”

周恩来问了大学生的分配情况，接着，杨道远拿出稿子来念：“这次来是毛主席、党中央对我们的关怀……”

周恩来打断了他，说：“你知识分子那一套又来了，要说什么就直截了当的讲吧！”

黄永胜也说：“不要念，他们工人都没有稿子。用自己的话讲，这样时间就短，念起来，时间就长了。”

周恩来：“朱鸿霞也很有水平，很会写文章。”他问胡厚民：“朱鸿霞是初中文化程度吧？”

胡厚民答："是！"

当杨道远讲到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时，周恩来说："照你们参加的示威游行，文化大革命就不好了嘛。"

康生："你们参加上街游行，你们就自己否定了文化大革命。"

当杨道远汇报到夺权问题时，康生念了《武汉工人报》上的一段话："这次反复旧斗争的实质就是资产阶级反夺权和无产阶级再夺权的斗争……"然后说：

"你们说'反复旧'的实质是资产阶级反夺权和无产阶级再夺权，这就成了敌我矛盾了，是二次文化大革命提前论。主席批的革委会是资产阶级反夺权，你们是无产阶级再夺权，而这些资产阶级又包括曾、刘，也包括你们自己。你们把自己摆在什么位置上去了？你们本身是革委会的。"

周恩来："去年'钢九一三'闯了那么大的乱子，我们也没有责怪你们。并没有说你们是资产阶级，而是说你们有点派性。"

康生："你们讲了许多材料，可能还举出更多，但却不能下这个结论。你们报纸上讲，这是第四次大革命，要重新夺权，包括你们在内，都成了资产阶级了嘛！你们把主席批准的、信任的人说成是资产积极反夺权，"他笑了："你们把自己摆在什么位置？这就成了敌我矛盾嘛。你是大学毕业生、知识分子，朱鸿霞讲话头头是道，是你们的东西，你们讲四

次革命，一次革王任重的命，二次革陈再道的命，三次革杨、余、傅的命，四次革垂死挣扎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命。你们也是革委会的，你们也都是垂死挣扎的资产阶级了。那你们自己也不承认嘛，矛盾得很！”说着，康生又笑了。

周恩来：“新的权力机构，前进中可能错误少一点，多一点，你们掌权就掌得那么好吗？我看还得三结合。”

康生：“清理阶级队伍可能有点毛病，但你们没有一个人说要清理阶级队伍。”

黄永胜：“对造反派要作分析，造反派中也有坏人。你们连传达‘九大’精神都听不进去。”

周恩来：“你们听不进去，头脑太热了，今天给你们降降温。”

众人反映：“材料发得较少，开始还说是小道消息。”

周恩来：“北京郊区木材厂有多少国民党，你们武汉就没有？”

康生：“刚才黄总长讲对造反派要作分析，确实是这样。我们中央文革是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林副主席在报告中也肯定了中央文革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那该是响当当的吧，可是原来 17 人，就包括了王任重。”

周恩来：“还有王力，我还保护过他。那时，我到武汉，”他指着朱鸿霞说：“把你从沙洋农场解放出来，当时还不知道有你胡厚民同志在内。我一直在等你们，船开得很慢，你

们走了，我才走。‘720’事件中，那时，毛主席指示要王力先走，叫刘丰同志保护王力。在武汉南边的一个什么机场？”

胡厚民：“在南湖机场。”

周恩来：“不对！”

张立国：“在山坡机场。”

周恩来：“是在山坡机场起飞，然后我们起飞。我的飞机又超过了王力的飞机。所以，我在北京机场，又迎接了他。那时，我是出于阶级感情。后来，我们发现王力是坏人，就坚决把他清洗出去了！”

康生：“我们中央文革还有戚，还不是‘造反派’吗？事物是变化的，你能说造反派都是好人吗？当然，好人是多数。”

杨道远谈到学校情况时，周恩来问：“教授还关在牛棚里？还没有落实政策？”

杨道远：“教授还没有动他。”

周恩来：“你们要把大方向扭过去，你们这样搞方向错了。”

杨道远汇报了武汉普遍搞“捅马蜂窝”的情况，从汉阳枕木防腐厂捅起，作为典型，在七千人大会上介绍经验，后全市推广……他还讲了武汉普遍存在压造反派的情况，汇报湖北省党代会大规模批判任爱生等站对队的干部，而不批判“二月逆流”，不批判王任重。

康生问："你们有几个人参加了党代会？"

参加省党代会的代表都举起手。

康生说："你们为什么不提批判王任重？"

众人答："提了，我们提了不起作用。"

杨道远提到用大量汽车送喜报的问题，周恩来：

"报喜再不要用汽车了，这是浪费。

今天就谈到这里。今天是有意让你们激烈派放的。还有不同意见的同志不说了，今天专听激烈派的，我不给扣帽子，你们算了激烈派吧？胡厚民讲了，朱鸿霞放得最多，还有那个女同志王屏……

你们先回去，学习主席讲话，我给曾思玉打个电话，给你们传达传达。"

康生："你们回去以前，都考试考试，看你们学习林副主席的政治报告学得怎样？看谁考得好。"

周恩来："给你们出题目，看文件，再考，这是毛主席提倡的考试办法。你们要顾大局。你们要打官司，你们受了点委屈，或者受点压，不要讲个人恩怨，这样一场大的革命嘛！解放战争才打了三年，文化大革命三年了，'516'差三天就到了，这是一场比较彻底的大革命，对世界革命是一个大推动。你们总是从小局着想，也许有毛病，但我们要看到大局。小局的问题，你们应该一个单位一个单位按毛主席的政策去落实。前途远大得很，要支援世界革命。"

朱鸿霞、潘洪斌插话说："今天首长这样亲切接见我们，批评我们，就是打我们几下也是舒服的。"

周恩来笑着说："哪能打你们呢？今天就讲到这了。再谈，我们这些老头子就受不了啦！我和伯达同志还有一个差事——审查电影《南京长江大桥》，大家都去吧！"

全体起立，热烈鼓掌。高呼"毛主席万岁！"的口号。

大家一起去看电影，有说有笑，十分亲切。周恩来坐在吴焱金和朱鸿霞中间，对他们两人说："这一次，不能再反复了，除了做下面的工作，你们这次来的人中还要统一思想。"

电影演完后，大家恋恋不舍地送中央领导离去。当大家离开人民大会堂时，天已经快亮了。

接见后，胡厚民对吴焱金说："机会来了，你把接见的情况写下来。告诉武汉家里人：方针不变。中央没有拿出解决问题的方案，我们只有继续搞，才能反映群众的呼声，促使中央解决问题。"信是由胡厚民口述，由吴焱金执笔，落款仍是朱鸿霞、李想玉和吴焱金。

## 第 1085 回：连续见，内蒙古党政领导
## 钓鱼台，江青擅自召集会

再说内蒙的滕海清和吴涛“九大”前来到北京后，频频向内蒙古发电发函，口气调子开始发生了明显的转变。

其间，滕海清接到康生的一个电话。康生说：“滕海清同志，我问你：高锦明为什么不能当‘九大’代表？我问过谢富治同志，高锦明是个很好的同志。”

滕海清急得大声说：“康老，高锦明不当‘九大’代表，不是当面请示过您吗？！”

谁知，康生在电话里大声喊道：“怎么，你连中央的意见也听不进去吗？！”

在“九大”期间，康生又参加了内蒙古组的小组会议。他在会议上传达了毛泽东对内蒙形势的批评。同时，他本人对内蒙古清队工作的态度也发生了 180 度的急转弯。

4 月 4 日，滕海清、吴涛、李树德三人打电话给权星垣及其他留在呼市的自治区革委会常委，对内蒙古工作又做了一番指示，其重点是“落实政策”问题。

这时，内蒙古代表团秘书李德臣通过李雪峰找到周恩来，向他反映了内蒙古清队“扩大化”的严重情况，周恩来当即作了指示。

从周恩来处回来后，李德臣去找滕海清，说：“我们应当向中央认个错。”当时，吴涛、李树德也在座。滕海清闷

声不响，吴涛、李树德同意向中央写检查。

李德臣立刻起草了一份检讨报告，以滕海清、吴涛、李树德三人名义，呈送给中央。这时，已是1969年4月19日。

5 月初，中央将内蒙古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和内蒙古军区党委常委全部召到北京。

5 月 13 日，京西宾馆，周恩来、康生等人接见了内蒙古党政军领导人。

周恩来对滕海清说："你是老同志、老红军，咱们以前在苏区打改组派,在鄂豫皖打 AB 团,你怎么不接受教训呢？"

康生也对这位内蒙古的第一把手严加批评。

滕海清一言不发。

话题集中在滕海清擅自将高锦明撤职批判一事上。周恩来问滕海清："你把高锦明同志停职，向中央报告了吗？经过中央的批准吗？"

滕海清埋着头一声不吭。

康生转向高锦明，旧话重提说："高锦明同志，我原来就感觉你有点右。"

周恩来继续对滕海清说："滕海清同志，你要是听了高锦明同志的话，犯的错误可能要小一些。"然后，他又对高锦明说："你发不了电报，为什么不写封信反映情况？"

周恩来接着对权星垣说："权星垣同志为什么也不反映？"

康生问："权星垣你是不是有些滑头呀？"

周恩来接着问："可能吴涛同志更正确一些？"

接见临结束时，滕海清思想仍然没有通。周恩来向吴涛、高锦明、权星垣等人说："你们帮助帮助他！"

第一次接见后，在京的内蒙古革委会领导人立刻以内蒙古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名义发了一份文件：《关于认真传达贯彻"九大"精神坚决落实毛主席各项无产阶级政策的几个问题的通知》。

《通知》指出："在清理阶级队伍中，特别是在挖'新内人党'的过程中，发生了严重的逼、供、信和扩大化的错误，伤害了一些基本群众，干扰了斗争的大方向，影响了斗、批、改的顺利发展……"

在《通知》之后，还附有一份《关于被误打成"新内人党"分子平反及其有关问题的几点意见（草案）》。

5 月 16 日，周恩来、康生等人第二次接见内蒙古党政军领导人。结束后，由李德臣执笔，以内蒙古核心小组滕海清、吴涛、高锦明、权星垣、李树德、李质 6 人的名义，在 5 月 19 日又起草完毕一份文件：《坚决贯彻执行中央关于内蒙当前工作指示的几点意见》。

这份意见书由三个部分组成。基本精神是周恩来接见党的核心小组和军区党委成员时的讲话内容，有些字句甚至就是周恩来的原话。

内蒙古“内人党”冤案曲折艰难的平反工作从此开始了。

周恩来在召集内蒙古领导干部开会时，曾提到“内蒙有个女知青写信反映情况”，说的是他的亲侄女周秉健。

1968 年夏，周秉健初中毕业，和同学们一起，报名到内蒙古的锡林郭勒大草原插队落户。行前，她与邓颖超联系，说临走想见见伯伯。

一个星期六的下午，周秉健来到中南海西花厅，见到了邓颖超。

直到吃晚饭时，周恩来才跨出办公室的门，亲热地招呼小秉健，问她什么时候走？思想准备得怎么样？

那时，周秉健只有 15 岁，是个十分文静的小姑娘，在伯父面前，还有些拘束。

饭后，周恩来领着周秉健来到一幅巨大的中国地图面前，给她指点锡林郭勒盟的位置，又交代了几句话，就回到了自己的办公室。

周秉健下乡后的当天晚上，一位懂汉语的大队革委会副主任给知青们讲了形势。

那时，内蒙古革委会第三次全委会刚刚结束，挖“内人党”的决议文件下发到了各基层单位。周秉健所在大队的这位革委会副主任正好是“挖肃”骨干，他向北京来的学生们大讲“内人党”的滔天罪行’，说乌兰夫要“叛国投修”，草原上到处都是他的“黑线”，全大队只有 3 户牧民是红的，

其余的都是黑户。

周秉健住在阿妈这，邻居都是反革命，紧张得她心怦怦直跳。

1968 年 10 月 1 日，草原忽然紧张起来，纷纷传说苏、蒙修可能趁国庆期间打进来。周秉健所在的阿巴嘎旗靠近边境。那几天，她和伙伴们也进入“一级战备状态”，夜里和衣而睡，小蒙古刀就搁在枕头下面。

周秉健每隔半个月就往北京写一封家信，通过周恩来身边一位姓赵的秘书转收。在信中，她把自己下来以后的经历和感受，一五一十地向伯父和邓颖超娓娓道来，根本没意识到它们有什么价值。然而，周恩来还是从侄女的普通的家信中感觉到了内蒙古清理阶级队伍中似乎存在问题。

“内蒙有个女知青写信反映情况”在草原上传开了。周秉健也听到了传闻，但她浑然不知这个“女知青”就是她自己。

5 月 17 日早上，叶群突然通知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 4 人到江青住处去开会。他们到了钓鱼台 11 号楼以后，看见到江青和姚文元正在闲谈。不一会儿，李德生也来了。江青看见李德生进来后，就招呼开会。她说：

“今天随便同大家谈一谈，请大家不要作记录。”

大家都收起了笔记本，只有李作鹏还在一边悄悄作记录。但是一会儿就被江青发现制止了。

江青首先讲自己的家庭出身，说她和康生都是山东诸城县的，以后上小学、中学，还在山东大学旁听过。再以后，又参加了革命，从山东到了上海，与左翼文联搞在一起，支持鲁迅的“大众文学”，反对王明的“国防文学”。抗日战争爆发后，她到了重庆，见到了周恩来，与周恩来一同乘飞机去延安，途中，飞机曾在西安降落，她还去华清池里洗了个澡。

她说，在延安，毛泽东认识她以后，每天下午都骑着马去找她，亲自和她一同趟过延河水，一起散步。毛泽东写的文章，都是她帮助整理抄写的。1947 年撤离延安的时候，她是中央直属机关的教导员兼党支部书记，一直跟着毛泽东在陕北打游击。当时，他们住在老百姓家里，和毛泽东一起吃派饭。有时汪东兴买鸡给毛泽东改善伙食，但是只给毛泽东一个人吃。由于长期的艰苦生活，她的身体越来越虚弱，生了李纳以后，就得了子宫癌。后来毛泽东同苏联商量，请他们派专机来，接她到苏联去治病。她在莫斯科住院以后，做了一次大手术。

吴法宪后来在他的回忆录里是这样写的：“说完自己的事情，江青又说：总理有行政工作才能和组织才能，这一点我很佩服。但是大的原则问题上他看不清，容易跟着别人走，今天东风来了是东风，明天西风来了是西风。他在历史上就有两次大的路线错误，一次是把苏区的百分之九十搞没了；

第二次是喊蒋介石万岁，一切经过蒋介石，跟蒋介石搞统一战线。另外，解放后还有一个马鞍形，就是经济建设的‘两高一下’。‘文化大革命’中他办错了几件事情，写了检讨，现在还在我的手里。‘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他同中央文革唱对台戏，只主持中央常委碰头会，不参加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后来中央常委碰头会垮了，这才要求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总理这个人不能掌舵，不能当一把手。工作上犹豫不决、缺乏魄力，抓不住大事，整日为小事忙个不停，受了毛主席的批评。”

接着，江青又批判起了陈伯达。她说：“陈伯达，小人也，读书不少，但是具体事情一件也办不了。当中央文革小组长，不会领导，没有主张，中央文革碰头会办事全靠我和康生出主意。陈伯达在历史上还有问题，他一贯追随王明，公开写文章拥护王明的‘国防文学’。在天津的时候，曾经被捕过，还有托派嫌疑。”

对康生，江青说：“康生同志有远见卓识，办起事来很有魄力。他读书多，有理论水平，看问题看得准，但就是实践经验少，做领导工作不内行。”

就这样，江青一个人从上午 9 时一直说到中午 12 时，一口气说了 3 个小时，姚文元最后说：“江青同志的话对我们的教育意义很大，值得我们好好学习。江青同志的马列主义水平高，我们一定要以江青同志为榜样，对照检查自己。”

从钓鱼台出来，吴法宪和黄永胜同乘一辆车回军委办事组，在车上他们俩就议论开了，觉得江青今天召开的这个会议不符合程序：她只是一个政治局委员，没有接受任何人的委托，怎么能单独召集 7 个政治局委员开会？这样做不是背着中央常委搞小组织活动吗？而且，这样议论 3 位政治局常委，谈论毛泽东和她的私生活，实在有损毛泽东的崇高威信。这件事情必须报告毛泽东、林彪和周恩来。

回到军委办事组，他们俩人又同李作鹏、邱会作商量，都认为这件事情应当马上报告林彪。

下午，他们 4 人一起到来林彪家里，把这个情况向林彪作了汇报。

林彪听了他们的报告后说："最近以来，江青攻击了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大多数，是严重的违纪行为，应当向毛主席汇报……"

他要黄永胜和吴法宪两人立即去见毛泽东，并要叶群亲自打电话与汪东兴联系。在叶群去打电话的时候，林彪对黄永胜他们说：

"在延安，是江青追毛主席。她通过康生，想尽一切办法接近毛主席，经常是毛主席一边写文章，她就在一边打毛衣，一打就是一天。她是拼死拼活去追毛主席，以后才结了婚。"

林彪刚说完，叶群就打完电话回来了。她告诉黄永胜他

们："毛主席同意接见，并在家里等着你们，汪东兴要你们赶快去。"

黄永胜、吴法宪他们来到游泳池时已近 19 时，快到参加周恩来主持的政治局会议的时间了。黄永胜向毛泽东汇报了江青召集他们开会的情况，但没有时间细说。

毛泽东听了后说："对总理的问题，她是随便说说的。政治局委员之间谈些问题是可以的，但不能专搞攻击别人的活动。"

吴法宪说了一句郁积已久的话："江青同志只准演八个'样板戏'，对其它的戏一概否定，这样好吗？"

毛泽东回答说："'样板戏'没有一个是她自己搞的，都是别人帮助她一起搞出来的。"

这时，叶群来电话说："开会的时间快到了，是不是先来开会，否则被江青发现就不好了。"

毛泽东也说："情况我都知道了，你们赶快去开会吧，恩来还在等着你们。"

临走时，毛泽东又对他们说："你们到我这里来，我不会向她讲的，你们也不要说出去。要是她知道了你们来我这里，讲过她的问题，那今后你们的日子就不好混了！她已经整过你们一次了。"说完，毛泽东又嘱咐张玉凤，叫她不要对江青说黄永胜和吴法宪到他这里来过。

此时，邱会作已来到中南海西花厅周恩来的家里。据后来邱会作回忆，他将下午江青讲的话详细地对周恩来说了一遍。以前，每次江青议论周恩来及其他中央领导人，邱会作都利用和周恩来一起工作的机会，向周恩来“透风”。周恩来听了以后总是沉默不语。这一次，周恩来一边听一边做笔记，而且非常难过地对他说：“唉！这个人呵，几十年我对她能做的都为她做了，几十年呵……我很感谢军委办事组的同志们。你及时的通报，对我有很大的帮助。你们都是老同志，历史上的事，你们虽然不在中央领导岗位上，但是事情的内容，中央的结论，你们是知道的。老同志就是老同志呀！老同志是能够理解大事的！”

随后，周恩来主持政治局会议。

会后，吴法宪又把上午的情况报告了周恩来。周恩来听了，笑了笑，没有说什么。

随后，吴法宪和黄永胜又到了林彪那里，把向毛泽东和周恩来汇报的情况报告了林彪。林彪说：“毛主席、周总理知道就行了，让他们去处理吧。”

黄永胜、吴法宪在三座门向李作鹏、邱会作传达了毛泽东对他们所说的几句话，第一句话是：“一个政治局委员找部分政治局委员谈一些问题是可以的。”第二句话是：“你们知道江青也是一霸。”第三句话是：“你们今天同我说的这些

问题，不要叫江青知道，我也不跟她说。她要是知道了，你们就不好混了。”

## 第1086回：又查出，“中国(马列)共产党”

## 见“徐海”，与武汉“新派”座谈

1968年3月13日，谢富治对1967年10月8日发生的“中共中央非常委员会”一案的专案组负责人、公安部领导小组成员、原空8军副军长赵登程说：“搞专案要大反右倾，不要下不去手，不要老观点，对刘、邓、陶，彭、罗、陆、杨，他们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有的是叛徒，中国赫鲁晓夫通过这些人，通过公安机关将矛头指向伟大的毛主席和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公安部就是他们的一个据点，对他们要有刻骨仇恨，绝对不能右倾。”事后，赵登程在笔记本上亲笔写道：“对反革命非常委员会专案看法。应把主要矛盾指向、中国第二个吓（赫）鲁晓夫、外交部某些负责人、和二月逆流的黑干将……”

1968年4月28日下午，陈伯达和谢富治在人民大会堂接待厅接见专案组人员。陈伯达说：“抓了几个煤球工人，煤球工人不熟悉党的情况，不行。我的意见你们不算破案。要像富治同志讲的，你们要追，要很严肃、很认真地穷追，追到哪个就是哪个。”

陈伯达指着墙上挂着的“宜将剩勇追穷寇”的大字标语说：“宜将剩勇追穷寇，你们要学习……抓到了刻蜡版的人是起点，不是终点。老板不是一般人，一般人干不出来。不是仅仅一个人搞的，可能有一个组织。”“要追穷寇嘛，

我看这里面有好几层，说不定有十八层，不是一两层，也不是两三层。”

1968年8月19日,陈伯达等人再次接见“非常委员会”专案组。陈伯达说：“几个煤球工人不可能写出来，就是大学生也不可能写出这样的文章，他怎么知道党内的许多机密，总有一点来路”，“你们所摸的可能不是地方，要摸的没摸到，就是往上追，总而言之，不管你三七二十一，搞到谁就是谁。”

“这是个很大的案子，突击‘二月逆流’的东西，大现行反革命案件，是大阴谋案，要注意‘二月逆流’。”

吴法宪说：“还不是第二个大走资派？！”

谢富治说：“根子没有找到。根子就是刘、邓黑司令部的人，邓小平、贺龙、罗瑞卿、谭震林”，“总是刘、邓黑司令部指使他干的，就是要把后台揪出来”，“不是普通反革命，是邓小平，‘二月逆流’某些黑干将搞的”。

在陈伯达、吴法宪、谢富治等人的授意下，赵登程领导的“非委会”专案组采取逼供、诱供的方式，竟在1968年12月间，查出一件“惊世奇案”——“中国(马列)共产党”案。

原来，1968年3月，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女实习研究员周慈敖，因“516”问题拘留审查。到了12月10日，周慈敖交代说在北京有个“中国(马列)共产党”，“伪中央

书记”是朱德，“伪中央副书记兼国防部长”是陈毅，“总理”是李富春，“常委”有朱德、陈毅、李富春、徐向前、叶剑英、贺龙、廖承志、杨成武等，“委员”有王震、肖华、余立金、伍修权、王炳南、刘伯承、谭震林等等。

第二天，12 月 11 日，办案人员对周慈敖说：“你还没讲到了点子上，表现不好。现在是戴罪立功的时候到了，把知道的你都仔细讲出来就是了。竹筒倒豆子，干脆一下全讲出来。”

周慈敖被逼得山穷水尽，干脆来了个“你要啥我给啥，你叫讲啥我讲啥”。她越讲越起劲，越编越玄乎，像决了堤的江河，一泻千里，不可收拾。云里雾里一下子交待了“中国(马列)共产党”的成立经过、领导成员以及活动等等。还煞有介事地编造了秘密召开代表大会和成立党的经过。她说：

“秘密代表大会是在 67 年 7 月 15 日左右在原中直机关 9 号小礼堂秘密召开的。事先只有代表们知道开会的时间和地点。”

“大会是在上午 9 时半开始，会场上挂着马克思和列宁的画像。”

“前来参加大会的有：朱德、陈毅、叶剑英、徐向前、李先念、李富春、刘宁一、董必武、聂荣臻等人。

另外有杨成武、余立金、肖华、傅崇碧……赵毅敏、刘

晓、刘长胜等也都坐在主席台上。”

“从大会代表成员来说，包括有各系统各部门选出来的代表 200 多人。”

“秘密大会由朱德主持召开，他致了开幕词。”

“陈毅在大会上作目前形势和任务的报告。”

“会议结束之前，朱德曾作总结。”

“会上成立了党中央，名字叫中国(马列)共产党。领导人是朱德，是‘伪中央书记’，陈毅是中央的副书记兼国防部长，李富春是总理。”

“常委有朱德、陈毅、李富春、徐向前、叶剑英、贺龙等 9 人，中央委员有王震、肖华、伍修权等 16 人。”

“并且成立了起义行动的委员会，这个名字叫‘中共(马列)行动委员会’。” 具体步骤是“通过陈再道，首先夺取军事要镇武汉”，朱德、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联名签署了给蒋介石的电报，希望蒋配合“制止危险局势的发展”。当然最后结果是由于毛泽东英明伟大，武汉“兵变”没有成功，是未遂的。

其中，国务院各系统以及军队都有具体领导人，又是 30 多人的一个大名单。

苏修、蒙修等秘密发来了贺电。

周慈敖讲得煞有介事，有人、有事、有时间、有地点，有鼻子有眼，像真的一样。

审讯人员像听她摆龙门阵一样，听得着了迷，再不需要吹胡子瞪眼，更不需要拍桌子打板凳，甚至不愿打断她的思路，让她娓娓道来。经过如此这番几次“交待”，他们所需要的东西齐了。

谢富治看到供词后说：“你们报告的情况很重要，不能不信，不能全信，要是准的话就是个大成绩。”第二天，他又指示：“要她写，要她写真的，明天就要她写，明天就要写好。”

但谢富治始终不敢把这个荒唐的材料向党中央和毛泽东、林彪、周恩来上报，只是要求封存起来，暂不销毁。

在此期间，赵登程等人又拿着周慈敖诬供的材料，对民族研究所另一个姓洪的实习研究员诱供逼供，30 天提审 43 次。1969 年 1 月 27 日，这位研究员也被逼供出一个“中国共产党（左派）”；1 月 28 日，他又诬陷朱德、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陈云、肖华等人是伪中央委员。

随后，赵登程等人根据周慈敖他们二人的诬供材料，指令国家经委群众专案组，对经委一位姓姬的干部诱供逼供，迫使他也供出一个“中国马列主义共产党”，“反革命黑党主席李富春、副主席徐向前、总书记陈毅，委员有李先念、聂荣臻、叶剑英、刘伯承等人。”

1969 年 4 月，“九大”召开，朱德、叶剑英、陈毅、徐

向前、李先念、李富春、刘伯承等人均当选为党的第九届中央委员。

“九大”后，谢富治继续对“非常委员会”专案人员说：“有的目前找不到证据，下决心斗争，案犯口供也算数，要防止暂时拿不到证据而把敌人放走，……不能轻易否定问题，不能不积极，不要消极，不要为敌人辩护，我担心你们出现这个错误。”

赵登程等人搜集所谓“伪党”活动证据的罪恶活动，仍在继续进行，但始终也查不出个所以然，不得不于 1969 年 8 月，把有关“伪党”的档案封存，这个“惊世奇案”不了了之了。直到 1978 年 8 月，中共公安部党组向中央上报了《关于“伪党”黑案的清查报告》，对此案进行了结案。

事隔近四十年后，香港民间历史学家胡志伟撰文称，他曾专访台湾国防部情报局心理作战处退役的唐柱国，唐柱国向他透露，1967 年 10 月天津沈剑云所写的那份《中共中央非常委员会给全体党员的一封公开信》的传单底稿，是唐柱国写的。

唐柱国本名粟明德，广西桂林人，1938 年生，为桂系将军粟国宝之子。其父粟国宝，又名粟仁广，曾任中华民国广西省义宁县长。1950 年，粟国宝任国民党总统府广西军事特派员，在广西组织反共游击战，兵败被俘，镇反期间，与妻子张玉英先后被镇压。

1957 年反右运动期间，已在北京大学农学院读书的 19 岁的粟明德从北京一路逃到香港，再辗转赴台，被蒋经国吸收进情报部门，卒业于香港中大新亚学院历史系，后在台湾国立政大东亚研究所毕业，保送美国柏克莱加州大学作博士后研究，历任中国国民党中央第二组香港特派员、工作组组长、中央大陆工作会美国组组长、《中央日报》主笔、台湾外交部旧金山办事处秘书、美国加州大学研究员等职。并派往美国和香港从事情报工作。据说，唐柱国是蒋介石为他取的化名。

据粟明德说，他在文革期间，花了一个晚上起草了《中共中央非常委员会给全体党员的一封公开信》这张传单，由台北中央广播电台“自由中国之声”短波广播，被沈剑云抄录油印。

退休后，粟明德在美国组建了世界广西同乡会，被推为首任会长。

改革开放以后，粟明德曾以世界广西同乡会会长身份回大陆参观，在北京受到中共中央对台办主任王兆国的“亲切接待”。

我们再回到 1969 年的北京。5 月 19 日，毛泽东听取周恩来汇报内蒙、山东、贵州等地的问题，严厉批评这些地区负责人的错误。

由于北京的“徐海班”在 4 月底 5 月初再次发生两派代

表大批出走事件。在听取周恩来汇报内蒙、山东、贵州等地问题的当天，5 月 19 日，毛泽东亲自接见了“徐海班”和武汉的代表。接见时，林彪讲话，强调要团结，说：“无产阶级要团结起来，不团结就等于不革命，不团结等于帮敌人的忙，等于帮敌人打自己。我们有毛泽东思想，我们能够团结一致。你们一定要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团结起来。要和稀泥又不要和稀泥，对资产阶级不能和，对自己的同志就要和稀泥。68 军的根本问题是毛泽东思想挂帅，部队内部要统一思想。”

周恩来说：“今后完全支持 68 军，相信 68 军，支持以张铿秀为班长的 68 军党委。”

吴法宪说：“在徐海地区，不管是空军、海军，都要服从 68 军的领导。”

当晚 21 时 35 分至 23 时 45 分，周恩来、陈伯达、康生、谢富治、黄永胜、叶群、李作鹏等中央领导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接见武汉的“新派”张立国、龙铭鑫、高玉泽、郭保安、张维荣 5 人。

周恩来问：“毛主席接见了你们吧？”

众人答：“接见了，坐在最前面，最中间，看得最清楚，也最幸福。”

周恩来：“这是吴法宪同志亲自安排你们坐在最前面的。张立国，‘新华工’的。”

康生："郭保安也是'新华工'的。"

周恩来："要回去了，张立国你讲讲。你是哪里人？"

张维荣："我是广东人。"

高玉泽答："湖北人。"

龙铭鑫："湖南人。"

郭保安："河南人。"

周恩来："两个湖南人啰！你下去了吧？到哪里？"

张立国："到通城去了一下。"

众人说："他还没有毕业。"

周恩来问："华工插队的多少人？"

张立国："很少，华农、湖大多一些。"

周恩来："华工革委会成立了吧？"

张立国："成立了。"

周恩来："好哇！"

张立国："我们也犯了错误，怀疑刘丰，揪变色龙时。"

黄永胜："揪变色龙，北京的东西。还有什么武老谭，广州揪广老谭，整我的嘛。"

张立国："湖北形势不错，湖北运动主流是好的，大方向正确的，问题是可能有些单位扩大化。工宣队开进去是对的，但捅马蜂窝，造反派挂起来多了。"

周恩来笑了。

张立国："'反复旧'不对，我们是坚决反对的，但不

能压。”

周恩来：“湖大的龙铭鑫，我去过你们学校，补了一课嘛！”

龙铭鑫发言。当他讲到去年揪“变色龙”时，康生说：“揪变色龙，北京的。”

当龙铭鑫讲：“这次‘反复旧’，总理批评很对。”

康生问：“你是省革委会常委？张立国也是？”

周恩来：“张立国是副主任。杨道远和他。‘钢派’一个，‘新派’一个，两个副主任。”

周恩来让华中农学院革委会副主任的高玉泽也讲讲。当他讲道：“尽管自己不同意‘反复旧’也要承担责任”时，周恩来说：

“工代会占领了市革委会，你们知道吗？还有工代会发了一个委员会扩大会议的决议。”

康生：“工代会决议是错误的。工代会要领导共产党？”

22 时 30 分，叶群进来，和代表们一一握手。

周恩来：“你们‘钢’‘新’两派要团结。有的左一点，有的右一点，那没有什么关系。你们的观点有点差别。无论如何不要影响你们的团结。”

众人答：“不会的。”

周恩来问：“不会武斗吧？”

众答：“不会。”

周恩来："你们要多作工作。郭保安谈，简单一点谈。"

郭保安说完，周恩来又让湖北大学的张维荣谈谈。

张维荣说自己对"反复旧"认识有反复，五一节参加三代会游行有错误。

周恩来："与'五一'有关系吧！今天就谈到这里。等一下一起谈，今天一定结束。你们见到了伟大领袖毛主席，马上就要回去了。武汉地处中心，武汉'反复旧'影响几个省，不能这样搞。现在本来不分'钢'、'新'派，你们要向他们作工作，一道前进，不要对立。一时讲不通就多讲几次。我们只能把话给他们讲明白，把道理讲通。要紧跟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搞好武汉。你们的态度都很好。"

"你们回去，主要是宣传贯彻'九大'精神。（武汉）搞得好坏影响大局，但是也不会大离开，群众是不会也不愿意离开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的。"

康生："你们的观点是好的，特别是你们看到了武汉的大好形势。如果按工代会 11 日决议那问题就大了。复旧有几种。我们知道的是二七车辆厂在整党中复旧了。《人民日报》上讲的主要是指二七车辆厂的那种情况。个别单位复旧了，武汉有没有？可能有。还可能有个别单位原封不动。也有另外一种复旧，把三年文化大革命完全否定了，要重新夺权。这也是一种复旧。现在都变了，现在完全把武汉形势搞成是资产阶级夺的权，那是不是又复旧了？现在如果按 11

日的决议办，夸大到了极端，就走到了另一方面。你们的看法肯定了主流方面是对的。如果按工代会 11 日的决议办，朱、李、吴他们首先应该退出革委会，否则他们自己也成了资产阶级了。所以从总的方面提出‘反复旧’，像上次说的，是资产阶级反夺权和无产阶级再夺权，这就完全错了。如果武汉完全复旧了，那么武汉地区三年文化大革命，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在武汉地区的胜利到哪里去了？这是自己否定自己。这种思想是不对的。你们那几个学校怎么样？杨葆华的报告，你们那里有没有？”

“山东‘反复旧’的关键是从清理阶级队伍想到整党建党。有的人开始是造反派，后来发生变化。有的人或者是家庭有什么问题，或者是历史上有些问题。有一个叫余金瑞，他祖父、父亲都是反革命。这个人能不能入党是一个问题。青岛市革委会讨论这个问题，一部分人同意他入党，另一大部分人说他不能入党。杨葆华同意他入党，但是拿不定把握，就去问王效禹。王效禹说这个人应该入党，否则就是对老造反派、老战友的歧视。实际上不是所有的老造反派都是可以入党的。不能说每个造反派都比群众好。不能清理阶级队伍清到自己的老战友就发生抵触，就反感，就说清理阶级队伍是清理造反派，清理老战友。不从阶级观点，不从党性上看问题。不分清是非不行。造反派在清理阶级队伍中审查一下也是应该的嘛！就在这个问题上发生了抵触，口头上也承认

清理阶级队伍好，不分阶级关系，只要是造反派就一概保，不行。造反派应当把自己当成革命的一分动力，也要把自己当作革命的对象。对造反派要作阶级分析，对老战友有问题更应当帮助革委会解决。因为他是你的老战友嘛！这个问题郭保安讲得好，有的人当革命革到自己头上就不得了啦，那怎么行呢？红卫兵只准你审查人家，不准人家审查你，这怎么行呢？这是造反派应当注意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清理阶级队伍应该注意对造反派头头审查要特别核实材料，要重证据，不要随便挂起来，泡起来。就是有错误，还是应该帮助，应慎重处理。一方面造反派要接受，另一方面审查机关要慎重，这有一个了解的问题，有一个群众问题，有一个功劳问题。高玉泽同志，你参加了大会，知道开会前夕，主席提出徐海东当代表并参加主席团问题。徐海东同志错误不小，但是，他有一点功劳。所以对待造反派，应该清的就清，但是要谨慎。个别厂出问题，那很可能，可能还不只是你们反映的这么多。”

周恩来：“清理阶级队伍，一下子铺开，面很广。有三分之一的单位有问题也不奇怪。高玉泽同志，你听过主席讲话，主席两次讲话都讲了要一个一个工厂，一个一个公社，一个一个学校，一个一个单位落实政策，这是很细致很认真很艰苦的工作。斗、批、改小组，你们那里（指高玉泽那里）就比较好，有的就可能粗糙一些，有问题可以改嘛！斗、批、

改是个新的运动，本身就要出现一些问题。北京‘六厂一校’也是这样，不断的改嘛！”

康生：“张立国同志说的武汉清理阶级队伍大方向对，但有的地方有扩大化，这是要注意的，这是最容易犯的。”

周恩来：“清理阶级队伍，开展对敌斗争，打击面容易大，一讲清理阶级队伍就搞进去了。主席讲有的人是敌我矛盾，但是还允许他改嘛。这一点要注意，要分清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

康生：“这个清理阶级队伍都要注意防止扩大化的问题。一种倾向出来要防止另一种倾向。对造反派扩大化不好，对站错队扩大化也不好。你们都是团的干部？马上要整团了。青年团还是光荣的。”

周恩来：“不要因为团中央有问题，就否认了青年团，不要这是共产党光荣，青年团就不光荣。”

康生：“你们几个党员？”

众人说：“小龙是预备党员，小张是团员，其余三人是党员”

康生龙“铭鑫同志是预备党员，为什么还没有转正？”

众人答：“搞文化革命。”

康生：“啊！搞文化革命还搞倒退了。”

周恩来：“年龄大了，还没有转正。杨道远是不是党员？”

康生：“预备党员，够条件的应当转正。”

周恩来：“张立国你写申请书没有？”

张立国：“写了几次了。”

周恩来：“水院没有来人？”

众人说：“丁家显毕业了，分配在云南。”

周恩来：“那好嘛！”

黄永胜：“你们那里知识青年回来了一些？”

众人说：“是的。”

黄永胜：“再动员下去。”

康生：“下农村，那有什么复旧？要叫他们下去。”

周恩来：“事情总有反复，有问题。今天就谈到这里，你们先回去，我们在这里，你们先回去，我们在这里先休息一下再过去。”

## 第 1087 回：再继续，接见湖北省代表

### 念《声明》，批判工代会《决议》

接见了武汉“新派”后约 10 分钟，23 时 55 分，中央领导周恩来、陈伯达、康生、谢富治、黄永胜、叶群、李作鹏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再次接见湖北省、武汉市革委会成员。被接见的有：曾思玉、刘丰、张体学、赵福新、李化民、方铭、张昭剑、朱鸿霞、杨道远、张立国、李想玉、吴焱金、胡厚民、夏邦银、邓金福、钟锡钢、潘宏斌、王屏、杨玉珍、龙铭鑫、谢华之、胡崇元、沈复礼、李洪荣、张耀忠、曹佩贤、龙克发、王锦铭、郭保安、张维荣、雪湘明、董明惠、谢望春、王步青、刘海江。

当中央首长步入接见大厅时，全场起立高呼“毛主席万岁！”“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的口号。

中央首长与到会人员一一握手，当叶群和胡厚民握手时问：“你是李想玉吗？”

旁边的李想玉答：“我是，他是胡厚民。”

叶群说：“胡厚民同志我在台上看见他那个头发翘翘地。”

她是说当天毛泽东接见“徐海班”时的情况。当时武汉的代表也都参加了接见。

坐下后，康生问：“今天接见都去了吧！”

众人答：“都去了，我们很幸福。”

周恩来说："吴副总长把你们湖北安排在最前面最好的地方。见到了伟大领袖毛主席。"

黄永胜："我看见你们了，"他指着王玉珍说："看见那个女同志。"

叶群指着胡厚民说："我看见你那个头发翘翘地。"

康生："好好体会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的接见，接见也有很多经验，前年去年有很多单位来告状，打官司，有的说，重庆谈判，"

周恩来："那是内蒙古的。"

康生："不知道他是国民党还是我们是国民党。"

曾思玉报告："二七区工代会五十多个单位，在东单贴了大字报，4 月 27 日贴的。"

康生："有的人说，到了北京，中央要分化我们，有的人要揪叛徒，说在北京变修了，有的还要搞什么统一口径啰！"

周恩来："过去在武汉还有什么'不钢则康'，康老不在这里吗？"他笑着说："我们都是生在康有为时代。"

谢富治："还有叫什么康三婊子。"

众人笑了，说："那是骂人的。"

康生："办学习班、接见也有各取所需的，有的把毛主席、林副主席接见当成鼓舞，拿主席政策来检查自己的差距，紧跟毛主席。一种是利用主席的接见把自己的错误掩盖起来。

主席接见是好事，但又各取所需，看是不是掌握了毛泽东思想，紧跟了毛主席战略部署。”

周恩来：“同志们：我们那天见面是 12 至 13 日，听取了胡厚民、朱鸿霞、吴炎金、王屏、杨道远等同志讲。李想玉同志的说话听不清，汉阳人，我们也讲了一些，从那天以后，本想再听其他一些同志讲话，后来内蒙古来了，有一些问题要解决，耽误了一下，直到今天 5 时东方红。今天你们又见到了毛主席，你们也可以交谈学习一下，后来 18 日看到了你们工代会一个决议，题目大得很。你们可以看一看，可能不是你们写的，你们在这里嘛！但在你们来前，武汉市革委会有一个查封材料的文件，大概你们没有参加讨论，通过文件不请你们参加这是不对的。但是，你们李想玉、吴焱金等就发表一个声明，不承认，不同意这个文件，这样就引起了进驻市革委会，你们进驻了市革委会知道吗？”

众人说：“不知道。”

周恩来：“就是根据李、吴等的声明，17 日进驻了，武汉街上有一个进驻声明，我念给你们听一听，我们来请教请教。”

周恩来念《声明》，当念到“如果有人诽谤，攻击者，后果自负时”，他说：

“来头好大，我们今天就来攻击它一下，来个后果自负。”

当念到“限……工作人员……不得擅自离职时”，周恩来说：

“口气这么大，好像解放初期，我们派军队进驻工厂差不多。”然后说：

“1969 年 5 月 17 日有 20 多人进驻，不仅在市革委会进驻，而且在街上撒传单。你们离开武汉后，有两个东西，一个进驻，一个是传单和进驻，全面复旧了，先听康老开讲、开讲。”

康生：“我想问一下同志们，你们看到 11 日工代会的《决议》没有？”

潘宏斌回答：“我们不知道，在体学同志那里才看到的。”

康生：“你们有什么看法？”

潘宏斌及其他人：“是有错误的。”

康生继续问：“有什么错误？”

潘宏斌：“混淆了两类矛盾。”

康生：“怎样混淆了两类矛盾？”

潘宏斌：“重新夺权是错误的。”

康生：“这个决议是你们起草的，还是他们搞的？”

潘宏斌：“个决议我们的确不知道。”

周恩来：“你们的联络站没有给你们通消息？”

潘宏斌：“我们已没有联络站了。”

朱鸿霞：“上次总理及其他中央首长接见，批评了联络

站的事，我们认为批评是完全正确的，一回去就把它撤了，现在和外面已没有联系了。”他说：“这个决议虽然不是我们起草的，虽然我们不知道，但责任应该由我们来负，主要由我来负，因为这也是跟我们在家时的错误思想发展起来的必然结果，因此责任不在这个决议起草的同志，不在留在家的同志，责任在我身上。”

周恩来点头微笑着说：“好，对。”

康生：“这个决议有个好处，你们的错误思想就容易看清楚了，容易认识了，是这种错误思想导致了这个行动。”

周恩来：“还有 17 日进驻人数虽不多，但它代表一种方向。”

曾思玉：“16 日还有一个，和 17 日一样。”

康生：“同志们很可以研究一下这个《决议》，从中得到教训，看到一种偏激的夸大的错误思想，可以产生一个什么结果。把一个主流和支流混淆了，把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混淆了，它会产生什么结果，可以得到这个教训，不仅有《决议》，还有行动，用了调查团的名义进驻革委会，好像我们进驻国民党机关一样，因为你们认为全面复旧了嘛！反夺权了嘛！就必然产生此行动，同志们要引起教训，《决议》我看了，不讲人，从《决议》本身来讲，不是什么简单的错误，是一个三反《决议》，反对毛主席亲自主持的‘九大’，反对人民解放军，反对新生的红色政权，因此是反动的《决

议》，我这个看法可能不对啰！你们细看里面的内容，他们如何打着拥护毛主席，打着拥护‘九大’的召开，但实际上是搞分裂的，‘九大’要团结，《决议》是要分裂的，把革委会的人当成走资派，包括你们在内。那你们首先应该退出，不然你们也成了资产阶级了，那参加省、市革委会的人一时是无产阶级，一时是资产阶级，那不是矛盾百出。怎么能从‘九大’得出完全把武汉三镇的文化大革命全部否定了呢？口号没有根据‘九大’的方针、毛主席的指示，实际上是完全反毛主席的，反对‘九大’的。十二中全会后，武汉开了一个党代表大会，这个会可能有些缺点，但主流应肯定，这个《决议》完全是反对的，似乎中国共产党应由工代会来领导，我们也被他们来领导，工人阶级领导一切怎么能脱离共产党呢？列宁讲：工人阶级脱离了共产党的领导，会走上工团主义，反动的。‘九大’总结了三年文化大革命的成绩，包括武汉嘛！《决议》把三年文化大革命完全否定了，也包括把你们三年的文化大革命的功绩也否定了，武汉地区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由于你们的努力，也由于张体学同志的觉悟，张体学同志解放了，是个很大的成绩，也是你们的成绩，是武汉文化大革命很大的成绩，不仅是我们的成绩，也是你们的成绩，这在全国都有很大的影响嘛。《决议》的起草人把张体学作为靶子，实际上是对着曾、刘的，说他们是资产阶级。曾、刘是毛主席亲自批准结合的，他们是解放军

的领导干部，张体学也是解放军领导干部，如果武汉全面复旧，复辟了，在工厂是军宣队，在学校是工宣队，‘反复旧’的矛头是对准解放军的，山东的‘反复旧’是对准解放军的，武汉工代会的《决议》是矛头对准解放军的，所以说《决议》是对准解放军的，武汉工代会的《决议》用调查团的名义发了那样一个声明，还声明‘谁敢污蔑，后果自负’，我现在就要污蔑，就要负这个后果。《决议》中第八条‘对即将召开的党代表大会……必要时将阐明我们的观点，……’还要什么‘造反有理’。武汉开党代会，他们要造反，造共产党代表大会的反，反共产党嘛！共产党的代表大会要由他们决定，他们开，你们这样理解‘工人阶级领导一切’？！我很高兴地听到你们在看了这个《决议》后，也认为是错误的。我们的看法是一致的。而且朱鸿霞同志讲：虽然不是他们起草的，但是他们原来在家的思想的发展，主动要承担责任，这很好嘛。这可能是同志们原来一种错误思想的发展，发展到此种程度，这就说明了一种错误思想发展往往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一直发展到实际上到市革委会去夺权。我认为革委会、军宣队是有缺点的，你们讲的可能有，甚至更严重都有可能的，你们讲专案组、斗批改小组把造反派头头错误地靠边站，挂起来，泡起来了。‘清队’是一个尖锐的敌我矛盾。‘清队’不仅可能扩大到造反派头头上去，还可能扩大到过去站错队的群众头上去，这都是不行的，要防止扩大

化。刚才听张立国同志讲，清理阶级队伍，大方向是对的，但有扩大化的问题。我希望曾、刘要注意，一清理阶级队伍，就会有扩大化的问题，但同志们要分清主流和支流，武汉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绩要肯定，至于落实政策方面，一个工厂的斗批改要经过很大的工作。《决议》中还有一个问题要注意，千万不能对中央、对毛主席的政策加以实用主义的歪曲，明明是违反‘九大’，说是维护‘九大’，明明是违反政策，说是执行政策，到市革委会去夺权，明明是违反毛泽东思想，说是按毛主席的指示、林副主席的指示办事，这是歪曲，这是欺骗群众的手段，歪曲‘九大’的手段。必须实事求是。《决议》有一段‘对反动派造反有理’，谁是反动派？曾、刘是不是反动派？不能搞实用主义，不能把毛主席的方针、‘九大’的政策加以歪曲，去欺骗群众。对主席的思想不要歪曲，不要打着骗人的旗号去欺骗群众，结果是群众掌握了毛泽东思想就会造你的反嘛！”

康生接着指出了武汉那个《决议》中其他几处违反“九大”精神的地方，然后问胡厚民：

“你见过杨保华没有？”

胡厚民回答：“没有。”

康生：“你不是到过青岛吗？”

胡厚民：“那是路过。”

康生：“朱鸿霞同志呢？”

朱鸿霞："没有。"

康生："吴焱金同志呢？"

吴焱金："只是在这次京西宾馆吃饭时见过。"

康生："李想玉同志呢？"

李想玉："没有。"

这时，周恩来提到朱鸿霞、李想玉、吴焱金 3 人署名的大字报：

"武重的那篇东西到处贴，最早的是《人类解放我解放，洒尽热血为人民》，这篇文章是三月份写的，落款你们三个朱、李、吴的名，是哪一个执笔的呀？"

朱鸿霞："是我写的。"

周恩来："啊！你们还能写一点东西。到了今年 5 月 7 日，就是三代会给湖北省武汉市革命委员会的一封信，然后就是《决议》，然后就是行动。'五一''五七'进驻，思想发展，游行进驻，夺权，你们把武汉的形势估计得一团漆黑。因为资产阶级夺了权，把你们自己也算在资产阶级里面了，再从资产阶级里面杀出来再夺权。'720'把陈再道那个'二月逆流'击退了，毛主席支持你们，'三钢'、'三新'，"

曾思玉插话："还有'三司革联'。"

周恩来继续："然后成立了工代会、红代会，你们都是省市革委会的成员，都是战友嘛！现在分成两边，形势估计错了，其它就错了。你们是省市革委会成员，到底站在哪一

边？‘反复旧’到底对不对？清理阶级队伍，大方向是对的，是前进道路上的缺点错误，如果是资产阶级夺了权，毛主席、林副主席不管吗？不支持你们吗？你们说的‘复旧’是资产阶级夺了权，那‘九大’估计形势不也错了吗？你们对省党代会有点意见，‘九大’前有些意见，‘九大’中间有些变化，‘九大’后有发展，你们在这里搞了两个星期，做了点工作，可能你们没有完全想通。”

曾思玉：“基本想通了。”

周恩来：“基本上想通了，错误难免，这次震动大，汉水流域10个县，你们认识了这个错误怎么改呢？你们回击‘二月逆流’，‘三钢’‘三新’有功，你们要紧跟毛主席胜利前进，要立新功！现在想听听你们的意见。刚才是哪个还没有讲的？”

接着，武大“三司革联”的谢华之汇报了武汉大学的情况。然后周恩来问“工总”朱鸿霞还有什么要说的？

朱鸿霞说：“这次‘反复旧’运动的错误，主要是我的责任，是我主席著作没学好，引错路，不能怪下面基层头头和群众，他们确实感到有问题，出于对革命负责才搞的，是由我们的错误指导思想引起的，才使他们走到社会上来，因此他们是没有错误的，错误在我身上，责任应该由我来负，希望曾、刘首长回去不要压下面头头，不要压他们。”

曾思玉：“不会压他们的，我是革委会主任，我应该负

主要责任。”

朱鸿霞汇报到武汉确实存在一些问题，曾思玉向中央首长汇报，一直未能及时处理。这时，张体学说：

“报告总理，我有责任，我有几件事没有处理好。”他举了方斌、郭洪斌、吴金全等问题。

方铭：”主要责任在我们警备区。”

周恩来：“对造反派的战友们有缺点，处理要慎重。”

朱鸿霞：“这次造反派 90%卷进去了，这里给曾、刘、张提点看法：我们很难找到首长，首长相信秘书比相信我们还厉害。我们找首长，秘书就挡了驾。”他说到这里，周恩来、陈伯达、康生等都大笑起来，朱鸿霞继续：“如果曾、刘、张在三、四个月前，能像中央首长这样，听听我们的意见，也许问题不会闹到这种程度。”

刘丰检讨说：“我们工作作风上存在问题。”

康生：“这个经验要注意，要当心，秘书要教育，搞得不好他们会帮倒忙的，你们可要注意。朱鸿霞讲的这点是对的。”

朱鸿霞：“我们希望三代会能参加斗批改指挥部，去一个一个单位的落实政策。我们认为武汉革命群众还没有充分发挥作用，如果发挥得很充分，形势会更好。现在我们好像没有运动初期那样忙。我们‘反复旧’成了一个不好的典型，一定扭过来变成一个好的典型。”

周恩来、康生：“你们也是从山东接过来的嘛！”

接下来，周恩来分别点名让王屏、胡厚民、李想玉、吴焱金、杨道远、张立国讲讲，他们都表示同意朱鸿霞的意见。

第 1088 回：谈问题，听取众代表意见

反复讲，防止斗争扩大化

接着，周恩来问："还有哪个同志讲讲，钢'913'有没有人讲？"

钟锡钢站起来发言。当他向张体学提意见时，张体学表示："武汉同志们对我的批评，批得好，我一定向谢富治副总理学习，批评我无事。回去以后一定和造反派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

工代会副主任潘洪斌说："这次'反复旧'的错误应该由我们到会的头头负责，不能怪下面的头头和群众。"他希望曾思玉、刘丰回去后不能压下面的头头和群众。他说：

"刚才朱鸿霞同志说他是工代会主任，应由他负主要责任，我也是工代会的副主任，我也要负责。我们'工造总司'原勤务组彭祖龙同志，在四清后确定家庭出身都没有问题，在厂内一贯表现都很好。曾司令员在高级步校，点了彭祖龙的名，说他网罗牛鬼蛇神搞打、砸、抢，把这个同志在警司关了八个多月，其实他根本没有搞什么打、砸、抢，他是省革委会的委员。"

刘丰："彭祖龙同志是他自己去警司的，这个同志是好同志，对这个同志的问题，我们军区党委开会，决定通知警司放的，不知道什么原因没有放，后来问警司说是怕坏人打他，警司把他保护起来的，对这个同志的问题，我们是有错

误的。这次回去一定解决这个问题。”

随后，邓金福、龙铭鑫又作了发言。

然后，周恩来问：“还有没有讲的？没有了？曾思玉同志讲。”

曾思玉首先说：“我们的工作没有做好，辜负了伟大领袖毛主席、林副主席对我们的重视，我们内心很不安。‘九大’开幕就发生这个事情，但怕干扰了‘九大’，没有处理，武汉出现了问题心里很不安，中央在百忙之中，把同志们接到北京来解决武汉问题，这是对我们的最大爱护，最大鞭策。特别是今天你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林副主席接见我们湖北代表，是我们一生中最幸福最幸福最难忘的时刻，千万遍高呼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接着他说了湖北武汉的形势，认为“整个形势很好。”“运动是健康的，缺点和错误是前进中的”，他说湖北“从去年九月到现在查出五种人有三万八千多，其中叛徒一万多人，特务四百多人，死不改悔的三十多人，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有二万三千多人，现行反革命分子六千多人，立案的二千七百二十人，基本定案的八千多人，狠狠打击了一小撮阶级敌人。”他认为：“监护的多了，有七千人，群众监护，现在还有三千多，有的女的监护男的很不方便。”

周恩来：“那实际就是专政，为什么要女的监护男的呢？计委有两个女同志监护一个男的，结果男的跳楼自杀，女的

拉也拉不住。”

康生问：“有没有搞逼供信？”

大家说：“有。”

康生：“这个问题要注意。”

王锦铭举了许多逼供信的实例，如：汉阳钢厂 120 多人批斗一半以上。武汉剃刀厂一群众组织头头、厂革委会主任被批斗，还被 30 多斤的铁板打成脑震荡。二七食杂公司一造反派头头，共产党员，被逼跳江自杀。汉阳炼钢厂原团支书，被逼供成现行反革命。汉阳钢厂张百发，是共产党员、转业军人，被批斗 200 多次。

曾思玉继续说：“解放干部问题上也存在着问题，湖北省局长以上干部 5054 人，在文化大革命中大多数站错了队，现在解放 3707 人，其中参加三结合或工作的 2392 人，除了要打倒的或有严重问题的外，百分之六十已解放，现在干部还不大胆，我们很棘手，推到第一线是解放军，干部有顾虑，感觉到这些问题很棘手。”

周恩来：“你们选进的三个委员要帮助他们，主席谈了不要一年就垮了。”

“三个委员”是指“九大”湖北选进来的三个群众造反派的中央委员。

曾思玉汇报后，方铭和张体学分别发言，表示了态度。随后，陈伯达和康生讲话。

康生特别提醒说："这次'反复旧'错误回去以后，.....不能怪下面的群众。我看曾思玉、刘丰同志回去以后，要很好注意这个问题，.....特别是中央讲话，我的讲话中，讲得尖锐些，是强调一下要同志们体会认识哪些不符合毛泽东思想，提高头头们的认识，我的讲话，我看不必全面传达。"

"如果我们在纠正错误的时候去压群众，那岂不是同样把人民内部矛盾的东西用敌我矛盾的方法去处理吗？"

"你们不能把中央首长对你们的讲话，也完全对群众讲，你们不是说了，责任在你们，不要把中央的讲话拿到群众中去讲，因为不是他们的过错。"

"林副主席讲了，我们既是革命的动力，又是革命的对象，自己革自己的命，我们自己的思想上要经常地把自己当成革命的对象。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干部、造反派要经常想这个问题，要做革命的对象。不要满足，自我捧场，不要自我膨胀，像毛主席批评蒯大富、韩爱晶，说他们自己膨胀，害了浮肿病，你们听到没有？你们千万要注意，所以不要说有丰功伟绩，唯我独左，大家共同注意。特别是你们还有点功劳。过去你是一个组织的当权派，现在是一个省市革委会的当权派。中国不是有句俗话？'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曾、刘要注意，同志们一样也要注意。"

"还有一个问题，现在清理阶级队伍，必要性不讲了。同志们知道。造反派同志要注意，要警惕。我是不是可以检

查？应当。因为你是造反派嘛！你是当权派嘛！要清理阶级队伍嘛！阶级关系，出身要搞清楚，我们不但要检查人家的，我们还要让人家检查，我们有什么问题，人家了解一下，有什么不行呢？我们还应主动给人家讲。清理阶级队伍，大家检查一下自己是完全应该的。另外，因为我们是一起造反的战友，如果有什么历史问题，清理阶级队伍，有什么要检查就检查。如果检查你，抱什么态度？杨保华的报告中错在什么地方？一个余金瑞，是一个干部，他的祖父、父亲均是反革命，他是造反比较早的，和王效禹一起的。整党、建党时碰到一个问题：他是否可以加入党？革委会大多数是不同意的，当时杨保华还拿不定。王效禹平批评了他，说我可以介绍，批评杨保华对造反派没有感情，说可以入党。杨保华一转变，说复旧了，就反复旧。报告传到兰州去也是这样，工代会二号头头，造反最早的，清理阶级队伍并没有清到他，清到他的老战友，老战友就在他面前诉苦，于是社会上就发了呼吁书，也冲了革委会也是说反复旧。对造反派要有阶级分析，不管你造反早，造反晚，不是看早晚，主要看他执不执行毛主席路线。造反派之间，也是发生变化的，王、关、戚不也是造反派吗？王力他还同总理到武汉去过。回来时到机场还欢迎他，运动一深入就发生变化了。杨、余、傅，余立金不也到过武汉吗？不要以为是战友，后来不是发生了变化吗？”

周恩来："与他共事30多年，你们才3年，3年就怎么知道没混进坏人。"

康生："上海暴动时的区委书记，就剩下我一个人，大多数牺牲了，也有叛变了。我与陈毅是老战友，我在沪中作区委书记，他是支部委员，现在变成机会主义，反毛主席。"

黄永胜："邓华浦东我们一起打仗，最危险的时候都在一起，后来，他还是跟彭德怀走。"

康生："清理阶级队伍本身是需要的。至于专案组的人选，那是另外一个问题。""清理阶级队伍会出现一些问题的，但对出现的错误要正确处理。同志们讲整了造反派的头头。例如说胡厚民同志的母亲是一个渔霸，他母亲根本没有打鱼，怎么会是渔霸呢？你们只是提了对造反派头头扩大化，我看不光是造反派头头，要关心整个群众。张立国同志说：'清理阶级队伍大方向是正确的，成绩是主要的，但有些单位有扩大化。'我很注意这一点，清理阶级队伍最容易出现这些问题，搞逼、供、信更容易出现这个问题。比如一个特务，越是不老实就越打，打了阶级敌人，好像问题不大，结果一传播，就好人也打。要你们去搞清理阶级队伍，也会犯错误，讲起来容易，做难。要经常总结经验。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混在一起，不那么好分。还有一个问题，过去你们在一个工厂里，在一个学校里你们是头头，你们说了算，现在工厂进了军宣队，学校进了工宣队，不管关系怎么好，总没有

过去那么便当，中央党校就有这个问题，一部分权军宣队拿了，或者学校里面一部分权工宣队拿了，这两方面要注意啰！不那么调和，甚至军宣队有错误，会经常发生矛盾。

总而言之，大家在这里表现很好，今天会开的很好，回去以后要军民团结，干部中的老少团结，老年人和青年人一起工作不是那么简单的，老年人看青年人那么爱提意见，青年人说老年人两面三刀，老的说年青的搞派性。要注意团结反对过自己并且被实践证明是犯了错误的人们。北京六厂一校都有班、排、连，一选就选掉了。你们国棉一厂就是这样一选不就选掉了，王屏就空啰！具体来说，回去以后，新老干部团结，军民团结，广大群众的团结，老造反与迟造反的团结，有功与有一般功的团结，团结就是力量，我有这么一个信心，团结的条件很多。中央的教育，特别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林副主席亲自接见你们，武汉‘反复旧’成为一个不大好的典型。这次一定能成为一个好的典型。我和富治从上海、青岛走了一趟，武汉最好。我有这个信心，希望同志们团结，取得更大的胜利。”

周恩来让谢富治讲一讲。其他领导调侃说：“你是湖北佬嘛，怎么不讲讲。”

谢富治：“完全同意总理、伯达、康老讲话。只要按主席在‘九大’的重要指示，林副主席的政治报告去办，武汉一定会把工作做得好的。”

他讲完后，周恩来说："永胜同志讲一讲，湖北佬嘛，他是咸宁高桥人。"

黄永胜讲完话。周恩来让叶群讲讲。康生笑着说："你是半个湖北人，不讲还行？"

众人大笑："欢迎叶群同志讲。"

叶群说："我是一个共产党员，刚才几位老首长要我讲，我从组织上服从，我简单讲两句。我完全拥护康老、伯达、富治、永胜的讲话，等一下总理、作鹏同志还要给大家作很好的讲话，我都完全拥护。"

她说："对几个负责同志要有个基本信任，有些问题你们不知道，可以给你们讲讲：曾思玉是从沈阳调去的。他在沈阳是与宋任穷作斗争很坚决的，与陈锡联团结的很好的，甚至受了宋任穷很多迫害的。 他有年在北京开会，住在京西宾馆看到叛徒马明方，他气得坐立不安，连忙报告中央，说：马明方为什么不回去？还在食堂吃饭。怎么说这样好的一个同志一到武汉就镇压造反派了呢？正如主席说的是'前世无冤，今世无仇'嘛，这个同志大节是好的。刘丰同志是'720'保卫毛主席的，当时'720'主席在武汉，林彪同志对主席安全很关心，叫我们打电话给刘丰同志，要保卫主席，就是誓死也要保卫，这是立功的好机会。我和吴法宪同志一直守在电话机旁，当时还不知道王力是坏人，把他千方百计从树林找到了，救了出来，最后对主席也是很好地保卫了嘛。

张体学是个老同志，犯了错误是一个转变较快的，改正错误是个标兵，以前给党做过很多工作的。方铭同志也是在‘720’保卫毛主席的，还有李化民、张昭剑同志，我接触很少，李化民原是广州军区副参谋长，是一个很好的同志，张昭剑‘720’也保卫过毛主席，原在一军做过很多工作的。”

最后，周恩来让李作鹏也讲一讲。

李作鹏发言后，周恩来说：“已经东方红了，我没有多少讲的，我们虽然只接见了两次，一头一尾会还是开得好的，你们在这里等于参加了‘九大’传达会。来了近 20 多天嘛！开了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见了毛主席、林副主席。省、市两级都来了，有军队的，干部只张体学同志一个，群众代表来这么多，一共 34 个人。把毛主席讲话、林副主席讲话，都传达给你们了。开始学不进去，后来慢慢联系实际，‘九大’就是要联系实际嘛！你们闯了一个乱子，也会变成好事。扩大就会影响几个省，传出去就更大。传入你们那里就有能量传出去。因为‘钢’、‘新’有摩擦，现在‘钢’、‘新’团结，个别的观点不一致外，大部分在这个问题上是一致的。我们找‘三新’代表谈了，他们也作了自我批评，主动地承担责任。有两个‘新华工’的，有两个‘新湖大’的，有一个‘新华农’的。我们和你们一道把武汉的走资派王任重打倒了，后来又把陈再道那几个也打倒了。你们来，我们先叫胡厚民发言，他们有准备，这就打乱了你们的阵脚。杨道远

准备的长，把他放在最后发言，没讲完。我们是会打仗的，这个仗，不是敌我，完全是人民内部。你们采取的步骤我们晓得，我们采取的步骤是帮助你们的。

我是很激动的，我在文化大革命中两次去武汉，都在那里参加了战斗。‘720’你们不知道，邱会作、李作鹏都去了。我们相信，我们能够说服你们，伯达同志与你们接触很少，他第一次见到你们就有个印象：他们是能够说服的。结果事实证明，可以说服。至于今后还会不会犯错误，还会犯错误的。我们也犯过错误，只要跟主席就会前进。错误性质伯达、康老等同志都讲了，我都同意。刚才几个同志的讲话，我都同意。江青同志、吴法宪同志、邱会作同志，他们请了假，我想他们也会同意的，今天你们的讲话，从曾、刘、张、方几位领导同志，以及你们省、市革委会副主任、常委、女同志都讲得很好嘛！都作了自我批评。错误性质严重，就是你们把形势估计错了。采取了错误的方针。我们嘱咐你们，没有乱打电话，你们按那样办了。回去靠你们作工作，你们要把他作为经验教训。四个省，四个省的问题不一样。你们三结合是可以做好的。作为你们革命造反派是想把自己锻炼成真正革命的无产阶级接班人，解放军也是要锻炼的，才能把各项规律抓到。”

曾思玉：“丁家显回来了，他说他到云南是充军。”

周恩来：“你们说服他，归口闹革命那不是充军，那是

分配。蒯大富不是分到宁夏甘肃交界的一个地方，搞的不错嘛！新华社最近有个报道，谭厚兰也下农村了，这是北京五大领袖嘛，聂元梓因为是教员，所以现在还在学校。”

“在清理阶级队伍的这个问题上，稳、准、狠最主要是准字，要稳偏低了，要狠‘空’了，武汉有苗头扩大化了一点。主席早就讲了，清理阶级队伍，容易掩盖另外一种苗头，扩大化。你们刚才说逼、供、信都有了。无产阶级革命派最恨敌人，但不掌握准字不行。你们省、市革委会副主任、常委，你们去抓点，主席讲：你们不要一个人一个点，不然不好商量，起码要两三个人一个点，几个人一个点，几个老同志两三个人一个点。你们回去搞三结合蹲点，自己厂里还有劳动，半年在厂，半年在外，或者一个厂、一个公社、一个学校。特别注意清理阶级队伍，要老少互相尊重，新老互相尊重，唯我独左，唯我独尊不对，但要争当无产阶级革命派是对的，军民合作、新老合作，老的老一点，你们也要不了几年就老了，你们要有伟大气魄，王屏你们这个厂造反派九百多人，还有二千人不是，你们经过了几次反复，一次是钢、新斗，这一次‘反复旧’，就可以看出人家的态度，要允许人家犯错误，改正错误。”

“你们这次反面经验对你们有好处，正面教育，反面教育，对你们都有好处，不然你们会膨胀。北京五大领袖是膨胀了。主席一次给他们谈了五个小时，这是给我们都没有的，

一次五个小时，结果他们还各取所需，硬要栽一个跟头，不要看人家错误那么多，现在反过来看看自己。我为什么批评张体学同志厉害一些呢？他说话有时是有些走火，我一听那些话，就知道是他的口味，是他说的，我相信他能改。”

康生看着曾思玉、刘丰刚送上去的一份材料说：“水电一个学生回来在民族学院作报告，说张体学你当了中央委员有什么了不起，说张体学是黑干将，曾、刘是黑后台。”

康生和大家都笑了。材料中说的那个水电学院的学生是丁家显。

周恩来：“你们现在笑，刚出来时，还可能说是打中要害，这是知识分子的通病，风一吹就回来‘反复旧’，长江水总有点泥沙，那么清？我看武汉就没有清水，长江水总要夹着泥沙，形成浩浩荡荡奔向大海，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形成排山倒海之势，造反派的气魄是大一点，不能说里面没有一个坏人，共产党清除了那么多，难道造反派就没有？要把各种力量团结起来，连过去站错队的人吸取了教训，就会和你们一道前进。回去要用统一的口径传达，都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上，在毛主席的红旗下写几条，怎么传达，结束吧！我们能够起一点作用就是。”

接见结束时，已经是 5 月 20 日清晨 7 时 55 分了。

第 1089 回：小总政，内蒙平反“内人党”

五二六，中央接见“徐海班”

1969 年 5 月 20 日，中央决定，增补济南军区负责人袁升平、李水清、李耀文为山东革委会副主任。

5 月 21 日晚，内蒙古的滕海清一行没有向中央正式辞别，登上北去的列车，返回呼和浩特。临行前，滕海清亲笔写了一份检查，托周恩来的秘书转交周恩来本人。在检查中，滕海清承认“犯了机会主义的错误”。

此时此刻，几位内蒙古领导人的心情彼此迥然不同。

高锦明被无端打倒，险些断送政治性命，现在由中央亲自予以平反，从而证明了自己的正确，自然会感到扬眉吐气。

相反，滕海清却挨了当头一棒。此前，他一直有康生撑腰打气。可是忽然，康生似乎又把责任都推到他一人身上，滕海清心里很不痛快。况且，对内蒙古挖“内人党”中的错误，他也一直认为只是运动的支流，思想上一直没通，甚至在周恩来、康生面前，都不掩饰自己的抵触情绪，认错表态完全是迫不得已的。

吴涛、权星垣对“挖肃”扩大化问题早有看法，只是没有勇气挺身而出，反而受制于滕海清，随声附和。现在，内蒙古问题由中央一锤定音，明朗化了，尽管错误也有他们一份，但他们内心仍有一种如释重负的轻松感。

列车飞驶，发出有节奏的震动声。满腹委屈的滕海清闷

坐在车厢里，谁也不搭理，到了吃饭的时候还是一动不动。高锦明、吴涛、权星垣、肖应棠等人则来到餐车车厢。5 月下旬，天气闷热。他们要了几瓶啤酒，边吃边聊。

不想，这些琐事被‘滕办’的秘书看在眼里，告到中央，后来竟成了高锦明的一条罪状。康生日后在北京就曾训斥高锦明说：“你们还庆祝胜利？！”

火车开了一夜，第二天上午到达集宁，停车加水。这时，周恩来的专线电话从北京直接打到了集宁火车站站长办公室，要和滕海清等人讲话。

周恩来在电话里说：“你们走了，我也不知道，怎么不打个招呼？”接着，周恩来同内蒙古几个领导人一一通话，责备滕海清说：“告诉你不要写犯了路线错误，检查里怎么还写‘犯了机会主义错误’？不要按这个检查！”然后，又再次叮嘱他们一定要搞好团结，稳定内蒙古局势。

放下电话，滕海清等人继续登车西行，几小时后便回到了呼和浩特。

5 月 22 日，中央关于内蒙古问题的中发(69)24 号文件发到全国各省、区、市。在中央批示之后，是滕海清、吴涛、高锦明、权星垣、李树德、李质的《意见》全文。最后，还附有滕海清、吴涛、李树德 3 人 4 月 19 日的检查全文。

滕海清等 6 人的《意见》明确指出：“对于误伤的好人要彻底平反，被关押人员中，除少数有重大嫌疑的要继续审

查外，其余立即释放。”

5 月 22 日傍晚，内蒙古财贸干校，主席台上的高音喇叭里传出吴涛的声音：“下面，传达核心小组《坚决贯彻执行中央关于内蒙当前工作指示的几点意见》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批示：照办。”

接下来，吴涛一字一句念了中央批示全文。之后，他又念了《坚决贯彻执行中央关于内蒙当前工作的指示的几点意见》全文。

会场沸腾了！

受尽冤屈、九死一生的人们泪水滂沱，发出山呼海啸般的欢呼声。

吴涛传达之后，滕海清讲话。他先宣读了 4 月 19 日滕海清、吴涛、李树德三人向中央所做的检查。一口气读完后，说：“这就是我们三个同志的检查。我的检查要单独来检查。这实际上是吴涛、李树德同志给我承担责任啰。他们在这方面是没有什么责任的，主要是我来负责。”

滕海清讲话的时候，听众反应冷淡。

接着，高锦明做了简短的发言，台下则报以热烈的掌声。

宣布散会时，劫后余生的人们，互致问候，彼此打听亲友熟人的消息。后来，内蒙古干部群众将中发(69)24 号文件称之为“中央 5·22 指示”。

5 月 24 日，中国政府发表声明，阐述中苏边界问题的事

实真相和中国政府对解决边界问题的一贯立场，指出中苏边界发展到今天这个地步，责任完全在苏联方面。中国政府仍然准备通过和平谈判，全面解决中苏边界问题，反对诉诸武力。中国政府建议，双方通过外交途径，商定举行中苏边界谈判的日期和地点。

5 月 24 日晨 2 时 23 分，吴法宪在京西宾馆二楼会议室向湖北省的曾思玉、刘丰、方铭、张体学、赵福新、夏邦银、董明惠等人传达周恩来、陈伯达、康生对这次在京湖北省、武汉市革委会代表所写的关于解决武汉“反复旧”问题《纪要》的指示。他说：

“你们哪个湖北同志们传达一下。你们写了《纪要》，中央首长总理、伯达、康生、永胜、叶群、作鹏和我都看了。有些意见，总理要我传达一下。请你们赶紧修改好，中央审查后加批语。我们现在正在解决四个省的问题，山东、贵州、内蒙都比你们写得好。你们写的差一些。文字太长，不集中。针对性不强，写的问题很多，但实际问题写得不多，不能解决问题。引用主席指示不准确。文章不尖锐，针对性不强，眉目不清，纪要缺点最重要的是两点，一点是‘反复旧’是错误的。因为它的矛头对准的是新生的革委会、党的‘九大’。‘九大’精神是要落实政策要团结，因此‘反复旧’是错误的，山东杨保华的报告是错误的。第二点，三代会凌驾于革委会之上，破坏了一元化的领导，革命委员会是新生红色政

权，三代会不能凌驾之上。”

他说：“《纪要》要按‘九大’精神写，‘九大’的精神是总结经验，落实政策，准备打仗，要巩固胜利，加强无产阶级专政。”“中央首长批评的话要写进去，才能稳定湖北的局势。否则能解决什么问题呢？”“革委会的成绩不要写得太长，缺点也要写一些。”“这是中央的意见，希望你们好好修改。这是你们集体写文件，中央加批语。你们回去要按‘九大’精神写，违背‘九大’精神不行，写得太一般化没有必要。同时时间很紧。向同志们传达这些，中央首长对湖北批评我没有参加，大的方面我知道，具体情况我不很了解。我们飞机都派好了，把你们送回去。”

于是，湖北代表就在这个会议室里，由夏邦银、方铭传达了中央首长对《纪要》的指示。

5 月 25 日，中央批复山东王效禹、杨得志、袁升平三人 5 月 24 日给中央的报告，并以中发 1969 年第 26 号文件，于 5 月 27 日印发山东地方公社以上、驻军营以上单位，并转发全党全军。中央批复：“同意王效禹、杨得志、袁升平三同志给中央的报告。”并在肯定山东省自成立革委会以来，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后指出：“由于个别领导同志违背了十二中全会的精神，在全省进行所谓‘反复旧’运动，犯了严重的错误。这种错误是带方向性的，但还是前进中的错误。”希望他们“既要彻底纠正错误，又要照顾大局，努力稳定山东

局势，加强领导之间、军政之间、军民之间、群众之间的团结，共同对敌，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总结经验，落实政策，搞好斗、批、改，准备打仗，抓革命，促生产，夺取各条战线上的更大胜利。”

当天，周恩来、陈伯达、康生联名给毛泽东、林彪送交关于山东问题的报告，其中提到：王效禹作了检讨，“平时为王所倚重的人均已起来揭发，故山东问题正在趋向好转”。

王效禹、杨得志、袁升平三人 5 月 24 日给中央的报告在肯定山东文化大革命取得的成绩的同时，指出了存在的问题，特别是在全省错误地发动的“反复旧”运动，“实质上是干扰清理阶级队伍，把矛头指向了解放军，指向了革委会，指向了革命干部，指向了广大群众，破坏了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背离了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精神，干扰料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是带方向性的错误。”《报告》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十条措施：在全省范围内开展拥军活动；不要再在群众中划“革”与“保”；不能以拥护或反对某一个人来“站队”；进驻公、检、法的“文攻武卫”要迅速撤出，继续加强军事管制；撤消“文攻武卫”组织；“三代会”置于各级革命委员会的领导之下，与下面不发生垂直领导关系；要促进徐海地区大联合，不要插手和干涉。

5 月 26 日下午，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 118 厅主持召开中

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听取中央军委办事组的工作汇报。周恩来、林彪、康生、陈伯达参加，汪东兴列席会议做记录。

毛泽东批评一些地区提出的“反复旧”口号。他还对专案工作说：“搞专案，许多是靠不住的，是道听途说的。内查外调搞不出什么东西，搞了很长时间没有搞出什么东西。有的学生没有经验，有的还有派性，这一派整另一派。”“不要把责任推到下面，不要怪下面，谁叫我们不管呀！”

会议决定：重新组建军委办公厅和一个小规模的总政治部；由省军区和省市自治区革委会负责落实城市防空工作；不再增加陆军定额，把定额留着扩建海军、空军和二炮；同意将国防工业部门和原属国务院系统的第三、四、五、六机械工业部移交军队管辖。会议还讨论了组织地方部队、野战军调防、一批军队高级干部调动任免以及大学生毕业分配、编辑《毛泽东选集》第五、第六卷等问题。

5月26日夜23时32分至27日凌晨2时36分，周恩来、陈伯达、康生、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李先念、温玉成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中央办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徐海班和徐州铁路、煤炭、电业班全体人员。陪同接见的还有：杨得志、王效禹、袁升平、李水清、余秋里以及其他有关负责人。

周恩来说：“徐海学习班，是我们中央办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最早的一个学习班。不但包括徐州，连云港的各方面

的同志，还有铁路上的，煤炭方面的，电业方面的同志。我们在‘九大’以后，正在谈山东问题。当然也就联系到徐海问题。现在山东问题谈的已经结束了。所以，今天也请山东省革命委员会的同志、济南军区的同志，还有‘九大’的一部分山东的代表来参加这个会。现在，我们先请中央办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办公室主任聂济峰同志，把这个学习班的情况简单地说明一下。”

聂济峰说：“今天到会的 2010 人，徐海班的到了 1221 人，铁路班的到了 238 人，煤炭班到了 409 人，电业班到了 142 人。最近学习班不请假跑回徐州去一些同志，截止今天，一共还有三十几位同志没有回来，回来了 79 位。另外这一次连云港没有来，他们主要是‘反到底’的同志。原来一些老学员 45 个人回去没有来，另外新学员 35 名没有来，就是 80 名没有来。加上跑回去的 119 位同志没有到。”

周恩来：“刚才聂济峰同志说，我们这个学习班办的时间很长，是从去年开始，现在已经是 1969 年 5 月 26 号了，快到 27 号了，差一刻钟。这样长时间的学习班，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当然首先我们要自我批评啰，中央抓的不紧。但这个学习班情况也确实复杂。举一个例子来说，‘九大’开完了，胜利闭幕以后，在九届一中全会没有开会的前一天，忽然徐海班刮了阵歪风，是逃跑风吧，逃风。有一些头头不想在这里呆了，说非要回去较量去了。‘九大’以后还要较

量，两派都有。一直连续跑到 5 月 18 号。20 天，逃回去 100 多人，19 号，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接见，你们都参加了。”

其他领导插话：“徐海汇报团的部分同志没有参加。”

周恩来：“这样一个好消息传回去，我们相信回去的人应该知道，我们要解决这个学习班的问题啰。所以就托山东省革命委员会王效禹同志、杨得志同志和 68 军军长张铿秀同志他们 3 位同志打电报回去，请回去的同志，就是跑回去的同志回来。因为跑回去的同志有 165 位同志。但是到现在还没有全部回来。还是有人说，他们三位代表中央发的电报都不能信。那还有什么可信的呢？这就说明问题复杂啊。因为这样子，我们就现在先由徐州的、山东的、然后再由中央的几个负责同志讲一点话，然后我们再提出解决徐海班的问题。”

接着，张铿秀讲话。他首先对徐海的问题做了检讨，承认在支左中犯了支一派压一派的错误。他说：“1967 年 3 月 18 日成立革委会后，由于对革委会等认识的分歧，徐州市形成了‘踢’、‘支’两派，我们又没有正确对待，而倾向了‘支’派，打跑了‘踢’派；7 月以后又在检查纠正前段错误中，又倒向‘踢’派一边，打跑了‘支’派。”

对徐海目前的状况，张铿秀主动承担了责任，他说：“由于我们领导上资产阶级派性作怪，存有打官司，争输赢思想

情绪，所以在今年 1 月 11 日总理接见军队干部前很长一段时间，觉悟很慢，支左态度没有端正，部队思想没有统一，致使中央解决徐海地区问题的一系列方针政策指示没有能够很好的落实，还曾发生过一些错误。我们对军区领导不够信任，不够尊重，一段时间请示报告不够，有些指示没有认真执行，还曾出现一些公开‘打倒王效禹’同志的错误口号，所有这些，都是很错误的。我再诚恳地向中央首长作检查，请首长给与批评。”“徐海地区的革命和生产都处于落后状态，成了全国一个老大难单位。……问题在我们军的领导，责任主要在我，不怪济南军区领导，不怪兄弟部队，也不怪我们部队的广大干部、战士，更不怪广大的革命群众。”

他说：“现在新沂、睢宁、东海、邳县，在中央首长接见后，很快要回去成立革命委员会。徐州地专在毛主席和林副主席接见后，步子迈得很大，决心最近几天把徐州地区革命委员会建立起来。我们希望其他县、市都要向他们学习，响应毛主席伟大号召，认真学习‘九大’文献，联合起来，团结起来，争取胜利。徐州市要按照总理改组革委会指示的原则，很快把革命委员会问题解决好，最近有些地方形势很不好，抢枪、搞武斗，我们希望各市、县革命群众组织，把抢夺部队的武器装备，迅速集中封存，立即无条件交还部队，其他武斗凶器也必须上交，在采取紧急措施，坚决停止武斗。”

随后，王效禹做了检讨。他说：“今天我是来向全体同志作检讨的。刚才张铿秀同志讲了一些错误，这些错误，首先由我负责，是我犯错误造成的。我在处理徐海地区的问题上犯了严重的错误，给徐海地区的文化大革命带来了很大的损失，使两派革命群众组织直到现在还没有联合好。也给部队的工作造成很大的困难，我的错误就是支了一派，压了一派，违背了毛主席的教导，问题的严重性在于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视察了大江南北对文化大革命作了重要指示之后，仍然错误的支持一派。”

“刚才张铿秀同志讲话的时候，说在徐海学习班上 提打倒我的口号，我今天向同志们表示：我犯了错误，同志们打倒应该，我和同志们站在一边，打倒我的错误以后，和同志们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团结起来，把文化大革命搞得更好，因此我感谢同志们。”

接着，杨得志也做了检讨：“我今天到这里来，是借这个机会向同志们做检讨，接受同志们的批评。由于我们毛泽东思想红旗举得不高，对毛主席革命路线不理解，对徐海地区部队三支、两军工作的领导上，在对待群众的态度上，犯了很多错误，给徐海地区的文化大革命造成了很大损失，以至中央直接出面解决问题。我们感到非常惭愧，非常痛心。检查起来，我们在运动初期，解散了‘红总’总部，在部队的两个学校，一个医院中抓了 26 个人，打击、压制了群众

的革命运动。以后对待踢派和支派这两个革命群众组织，又没有掌握端平的原则，特别在毛主席视察六省市发表最新指示以后，批准了对连云港问题的七条错误的决定，错误就更严重了。”

最后是青岛市革委会主任杨保华对他 1968 年 11 月 17 日那份“反复旧”讲话做了检讨。

在王效禹、杨得志、杨保华三人检讨后，黄永胜讲话。他毫不客气的说：“从我们办的这么多省的学习班来说，我可以很坦白地告诉同志们，你们徐海班是表现最差的一个学习班。”“从徐海地区的形势来看，同全国的大好形势比较来说，你们是落后了的。”

“你们到中央办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已经十个多月了，你们觉悟是很慢的。”“学习班开学以来，你们徐州两派先后跑回去 200 多人次。仅‘踢派’就跑回去 160 多人次。有的人先后跑回去了 8 次。连云港‘反到底’跑走了 45 人。”“他这个连云港‘反到底’代表团，在头头王长发的带领下，跑回连云港达半年之久，经中央多次督促，至今不回来。”“‘踢派’头头徐锋带头跑，跑了 68 人。‘支派’的孟宪臣带头跑，跑了 30 人。徐锋在学习班先后跑回去四次。每当学习班形势好转，你们就跑，你们这样做，你们为了什么呢？为什么学习班形势一好，你们就跑呢？你们要跑回去干什么呢？5 月 19 日，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林副主席接见徐海班全体

学员后，广大群众都欢欣鼓舞，正当热烈庆祝这一亲切接见的时候，你‘踢派’的什么陆继坤，这个同志现在在不在我们不知道，就不参加庆祝会，跑到前门外去喝酒，搞非法串联，最后也跑了。你们这样做，对伟大领袖毛主席是什么感情呢？”

“徐海地区抢枪武斗的歪风一直没有停止。特别严重的是大规模地抢枪、武斗都发生在关键的时刻。比如去年 11 月，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以后，你们大抢枪。有的头头带头抢，中央下命令要把武器交上来，你们迟迟不交，交又不彻底。这次‘九大’以后，连云港两派都大抢枪，甚至于把戒备仓库的枪你们都抢了，4 月 29 日，也是我们九届一中全会刚刚闭幕，徐州两派发生大规模武斗。”

“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要相信和依靠人民解放军。’但是你们‘踢派’的头头顾炳华、栾昌善却公开散布说：‘对解放军相信是前提，警惕是关键，斗争是根本’。”“你们这样不是明目张胆地和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导相对抗吗？中央是信任 68 军，也是支持 68 军的。但是 68 军在三支两军工作当中有缺点，有错误，中央要求他们改正错误，也相信他们能够改正错误的，并且正在改正。但是你们不是热情地帮助，而总是把矛头指向 68 军。”

“目前徐海班、徐州两派还在革命委员会的问题上争核心，争资产阶级派性的权。中央明确地指示，徐州革命委员

会要以现有革委会为基础，按着平等的原则，充分协商，进行改组。你们各取所需，歪曲中央的精神，‘支派’抓‘改组’，‘踢派’抓‘承认’。你们这样完全是采取各取所需的态度，而有些东西完全和中央唱对台戏。”

然后李作鹏讲话。之后，周恩来做了总结发言。他说：“同志们，今天请你们来上一课。”

“九大刚开过了以后，4 月 14 号闭幕，当天晚上就报喜了。可是，你们没等 4 月 28 日的九届一中全会开会的消息，就从 4 月 26 日起，就有这么一股歪风，说是‘九大’开了以后，各省都要回去较量一番。因此，两派的头头都整理行装，不告而走。逃的逃，跑的跑。”

“还有一个怪现象。本来打破头的，不在一起开会的，可是跑的时候互相支援，甚至互相送车票。这是怎么回事呀？这不是等于说，你们演的这出戏是反对我们无产阶级司令部呢？反对我们伟大领袖吗？所以不怪刚才康老那样的严厉严词来责备你们，这是有道理的。黄永胜同志那样地苦口婆心、义正词严地说服你们，是有道理的。当然另一方面，我们陈伯达同志也很鼓励你们，这也是有根据的。情况是复杂的，但是我们首先想想这个问题，为什么全国广大革命人民在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号召下一天天的迈步前进了，跟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浪潮滚滚向前，而你们呢，不是向前，而是后退的。全世界称赞我们这个划时代的‘九大’开过，

全世界的革命人民欢欣鼓舞。可是你们呢，要回去打架，要较量一番给中央看。这是什么心情，什么思想，什么动机？”

“你们说山东是一派掌权，你们就可以得到山东的支援。无论如何不肯承认对方是革命的群众组织，要么就过去‘支派’掌权，要么后来‘踢派’掌权。现在劝你们联合，口头上是同意了，文字上达成协议了，可心里头，思想上没有通，还是想一派掌权。现在你的话没有了吧？山东的声音你们这次听到了，你们要见的几位同志都在场，这总不是假的吧？不是中央造谣吧？电报不是假的吧？”

“这次请王效禹同志、杨得志同志、张铿秀同志给跑回去的同志打电报，有一部分回来了，还有一部分说什么话？说这次电报等级太差了，不来，要中央直接发电报。那么，中央委托两个中央委员、一位军长传达中央的声音还不行呀？这是借口！就是后头有人扯腿，不让他来。总之，造成一些幻想，造出一些奇怪的消息。”

“你们现在看，王效禹同志检讨了嘛，支持一派不对嘛，杨保华同志说得很沉痛，而且很诚恳，‘反复旧’是错了的，他要把这个版权收回。他承认了错误，要拿他那篇文章做反面教材，你们亲自听说了。这是一位山东的产业工人，造反派。说这样的话是很光明磊落的，错了就错了，承认起来改了就好。”

## 第1090回：下《通知》，公布军委办事组
## 发文件，中央见湖北代表

5月27日，《中共中央通知》公布了九届一中全会通过的中央军委主席、副主席、委员名单和军委办事组成员名单。军委办事组组长黄永胜，副组长吴法宪，组员（以姓氏笔划为序）：叶群、刘贤权、李天佑、李作鹏、李德生、邱会作、温玉成、谢富治。

5月27日，中央同意《湖北省革命委员会关于解决武汉“反复旧”问题的报告》。

当天晚上23时30分，中央领导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接见湖北省、武汉市革委会的曾思玉、刘丰、张体学、赵福新、李化民、方铭、张昭剑、朱鸿霞、杨道远、张立国、李想玉、吴炎金、胡厚民、夏邦银、邓金福、钟锡钢、潘洪斌、王屏、杨玉珍、龙铭鑫、谢华之、胡崇元、沈复礼、李洪荣、张跃忠、曹培贤、龙克发、王锦铭、郭保安、张维荣、雪湘铭、董明会、谢望春、王步青、刘海江。周恩来等正式向代表传达中共中央《中发［69］28号》文件，即“527指示”。

“527指示”转发的《湖北省革命委员会关于解决武汉“反复旧”问题的报告》说：“武汉市工代会主要负责人和省市革委会的个别同志，在极‘左’思潮的影响下，在武汉市发动了所谓‘反复旧’运动”，“把工代会凌驾于革委会之上，把矛头指向解放军，指向革委会，指向革命干部。这

在实际上就背离了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不利于贯彻执行‘九大’提出的各项战斗任务”。这一运动性质被定性为“错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周恩来在传达完“527 指示”后说：“不要把我们大家的意见说是指示，作为意见用你们的理解去说服群众。中共中央文件是要执行的，我们的意见是可以斟酌的，否则任何一个意见都执行，那怎么行！”

他回顾了湖北、武汉文化大革命的历史，说：“三代会也是三结合的一部分，不能架于革委会之上，更不能架于共产党之上。”“现在查出，确实有坏人，阶级敌人跳出来了，这也是好事，这就不同于群众，不同于你们群众组织的负责人啰，他们要为他们翻案，坏人跳出来是好事。26 日消息，他们要给有些人翻案。”“‘决派’写的《工人阶级现在需要什么》为‘决派’翻案，为现行反革命分子鲁礼安翻案。鲁礼安是哪里的？”

张立国、郭保安：“是我们学校的学生，他父亲、母亲都是国民党员。”

周恩来：“啊，是学生！《扬子江评论》报共收了四份，还为鲁礼安、冯天艾翻案，冯天艾是哪里的呀？”

张立国、郭保安：“是我们学校四年级学生。”

周恩来：“呵，也是新华工的学生，《扬子江评论》是反动思潮，属于‘省无联’类，他们批评工代会在‘反复旧’

中有右倾思想。你们‘左’了，他们说你们有右倾思想。”“他们还说：你们不要把希望寄托于会谈的结果。我们这是会谈吗？是国共谈判？到底谁是国民党？过去有些反动的说是‘国共会谈’，一种说法是‘延安’‘西安’的问题，他说，不要妥协，不要只局限于打倒张体学。那就不光是打倒张体学，他们还要打倒一批。除《扬子江评论》外，还搞另外一个刊物《百舸争流》。在浠水搞了个‘巴河一司’。为现行反革命分子王仁舟翻案，还有长航分公司为日伪汉奸胡体安翻案。公开跳出来对军代表说：‘你们弄得我家破人亡’。另外，社会上渣滓，从 4 月 17 日发生了凶杀案 14 起，杀死 6 人。还有已经解放的干部重新揪斗。还有一些工厂，基层革委会被重新影响夺权。革委会有些变化，可以重新商量。因为革委会不可能一下子健全。除非一派的革委会，要联合另一方面，如‘二七’厂，第一次成立的革委会推翻，二次搞了两个，最后一次成立了。后台王锋揪出来了，这个人还相当厉害，接见解决问题他不来。王锋做徐凯、李与鹏的后台，做两派革委会的主任，这个家伙专门在后面搞坏事。”

“现在生产有些问题，武钢生产受影响，江岸车子总在那里出问题，”“希望大家好好做工作。”

“大家在这里待了这么久，四个星期了，我们见了几次？”“对，四次。康老谈谈，四个省，你们是最后一个。”

康生：“看了武汉一些‘反复旧’文件，使我想到很多，

有一个问题，希望同志们研究一下，关于共产党问题，党的领导问题，这个问题在‘反复旧’文件中间突出来，有些文件好像是工代会要驾于共产党之上，同志们要严肃注意这个问题，是原则问题，是关系到革命不革命的问题，不要轻视这个问题。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但工人阶级的领导必须通过共产党，工人阶级离开了共产党的领导，就不能真正负担起无产阶级所担负的任务，就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有觉悟的阶级。文化大革命中间，有的领导不好，镇压群众，有的当了走资派，因此产生了些错误的看法，好像没有共产党也可以。他们在脑子中对共产党的看法，发生了混淆，这一点，武汉‘反复旧’有这么一种苗头，这种苗头想同同志们谈一谈。”

接着，康生告诉大家：“领导群众革命，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没有共产党的领导，怎么能了解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呢？”

他说：“我们加入共产党什么时候发过工资？”“同我们一道革命的多少人死了，我们是幸存者，是偶然活着的，我常想 27 年一个上海暴动，上海七个区，江苏省委死掉多少同志，现在剩下一个总理，再一个是我，我们也是偶然的活着的，我们觉悟也不高啰！但当时在党的教育下并没有想到能看到中国人民解放，”

周恩来：“的确没有想到，我们是幸存者。”

康生："只想给后来人作铺路。工人同志也要不断改造思想。我记得延安有这么一个故事，我传达主席的整风报告，有这么一段话，工人他不是天生的马列主义者，他要不断改造自己，当时有一个叫罗少华，"

叶群；"此人在东北死了。"

康生："他说我侮辱了工人阶级，他也是工人阶级啰！"

叶群："他是二十八个半的。"

康生："工人阶级没有共产党的领导，那么走到什么路上去呢？我们看到欧洲许多工人阶级走上改良主义道路就因为没有真正的共产党的领导。没有共产党的领导，没有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就会成行会主义，没有共产党的领导，就会成为工团主义，没有共产党的领导，就会成为经济主义。武汉文件有这个苗头。同志们在学校里读过斯大林布尔什维克是一条，第一条就讲：共产党是工人阶级唯一领导。因为欧洲国会、工会可以凌驾于党之上，所以说共产党是工人阶级最先进的组织。""工代会受无政府主义影响，把红色政权看成不是自己的。""你们现在有了政权又夺权，不是极左？！""河南在你们两句话上发展了，'造反者被造反，夺权者被夺权，接管者被接管'。问题出现后，纪登奎同志及时作了工作解决了，这次面积还不小，河南东边同山东相同，南边同武汉相同。"

"另外一方面，有了政权，还站在政权之外，夺权不容

易，使用更不容易，其实是觉悟不高。”

周恩来：“夺权容易，掌权不易，不‘三结合’，不在共产党领导下怎么掌权？去年法国五月风暴，欧洲大罢工，由于缺乏共产党领导，没有成功。要区别走资派和共产党的领导，大家知道，我们造走资派的反，不能造共产党的反嘛！”

康生：“你们要根据毛主席、林副主席指示，总结经验，看看三年中哪些是做对了，哪点做错了，各地方、工厂、学校、机关都要进行这样的工作。革命青年有做的好的地方，还有缺点的地方。你们不是参观了清华吗？去年 7 月 27 日向工人开枪，这个经验对你们学校、工厂是很宝贵的经验，清华不是造反很早吗？第一个反对刘少奇、王光美嘛！为什么‘727’向工人开枪打死五个人？”

周恩来：“这个问题要很好想想。”

康生：“同志们想一想，一个造反早的学校，蒯大富犯了这样大的错误，当然现在有进步。毛主席的号召发动的工宣队，他们却在那里抓‘黑手’，毛主席说：‘黑手’就是我，你们抓吧！”

周恩来：“他们还不是造反派？你们有的到北京还拜访蒯司令。”

康生：“7 •28 晨毛主席和五大领袖从 3 点半谈到 8 点半，谈了五个钟头。”

周恩来：“那么大的高龄，那么大的耐心，那么伟大的

胸怀。你们问永胜、曾思玉，我们几十年跟主席，从井冈山到现在，从来没谈过一次 5 小时，当然加起来不止 5 小时。”

康生：“先四个领袖，聂元梓、王大宾、韩爱晶、谭厚兰来了，主席说：你们一不斗，二不批，三不改，斗是斗，是搞武斗，脱离了工人，脱离了贫下中农，脱离了战士，就连自己那派群众也脱离了。开始蒯大富没去，蒯为什么未去？跑到体育学院动员反攻，搞战略部署去了，主席一方面爱护他们，一方面严厉地批评他们，感动没有？没有！还是去‘杀牛宰猴’的，主席对聂元梓讲，不要杀牛。主席说：9000 多人的大学，就赶走了 900。”

周恩来：“派 8341 部队去，他们主席的书不读，语录不读，韩爱晶连语录都不带。”

谢富治：“有三个要入党的，连党章都不看，三个人联名写了一份申请书。”

周恩来：“一旦当了小领袖，尾巴翘到天上去了。”

康生：“他们不知从哪里学的一些两面派的手法。”

周恩来：“不知你们发觉没有，北航出了个东西完全是讲权术。”

周恩来在这里讲的北航出的东西，是 1967 年 3、4 月份在北京流传的一个小册子，专讲政治权术的。小册子署名是北京航空学院的一个群众组织，可是当时北航“红旗”的几个负责人都不知道此事。

康生接着周恩来的话说："这是从走资派、旧习惯那里学来的，完全是权术。批判刘少奇，清华首先开始的，有一次开会碰到蒯大富，说你们清华要狠狠批判刘少奇，党校组织有些材料，你们去找'红旗'接洽一下。当时党校也有两个组织。一个'红战团'，一个'红旗'。'红旗'支持我，'红战团'反对我的，我当时没有注意这个问题，蒯是支持'红战团'的，蒯大富找'红战团'要打倒我，说我转移目标，要打倒我，我诚心帮助他，他耍两面派，一个23岁的青年怎么搞两面手法？我们革委会的同志千万不要言行不一，两面手法。口是心非，两面三刀，口蜜腹剑，是刘少奇的东西，完全是资产阶级用的，是反革命用的，我们工人阶级不要这一套。

有人问：'反复旧'在理论上有什么大错误？错在那里，文件已经批出来啰！矛头指向解放军，指向革委会，指向革命干部，这理论上讲得通吗？刚才总理念那个文件就说明，'反复旧'最后结果是真复旧，它否定三年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那些坏家伙又重新跳出来那必然走到真复旧，逐渐看这种情况就可以看出来了。你们回去，同在北京不同，这里是人大会堂中央接见你们啰！住在京西宾馆，也没谁向你们宣传'反复旧'，但一回去，你们的战友肯定要给你们很多材料，还会说你们修了，右了。一到当地环境，又会激动起来，啊！北京可右了，可能又转过去了。

最后讲一点，领导上有缺点，很好的同志没有帮助他参加党，转正的没转正，可入党的没入，当然整党建党的工作在武汉刚开始，还没有吐故纳新，故有，纳新不够，另外，同志们自己要努力，要争取加入共产党，当然要自愿，不能拉夫，把入党作为手段也不行。在毛主席领导下能作为一个中国共产党员是好的，拿自己要努力，领导要注意，大多数同志是愿意的吧！我就讲这一点。”

陈伯达表示同意周恩来、康生的讲话。他说：“我们‘反复旧’的结果帮助了敌人，搞翻案。”

周恩来：“领导会把你们和他们分开的。文件上原来写的‘这样做是错误的’，后来改成‘这样做是不合毛主席关于革命大联合，革命三结合和一元化领导教导的’，我把‘是错误的’划了，给你们减轻了，怕别人抓住你们，又一压，引起新的反复，有好多地方都减轻了，我想曾思玉、刘丰、张体学、方铭会这样做的。”

康生：“还有一个问题，解放的干部又被斗了，解放的干部是我们文化大革命的一个成绩，好像连这个成绩也否定了。张体学同志的解放这是武汉的一个成果，把一个犯错误的改过来了，这不容易呀！要想把他改得那么理想不可能，我们总得不断帮助他。”

周恩来：“把一个走错了路的，使他改悔，不要要求那么高。”

陈伯达："张体学同志我跟他接触不多，他听了主席的话，就向群众检查，这使值得大家学习，值得在座的学习，几十年的老同志向你们承认错误不简单啦，当然过去你们你们有正确的。

你们'反复旧'太过分了，不谨慎。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想帮助你们转回来了，这在你们斗争史上是一个教训。现在有一个问题，年青人脑子不要太膨胀了。"

周恩来："他们到主席面前还提些怪问题。"

陈伯达："蒯大富，我们说：你不要别人喊你'蒯司令'。'蒯司令'这个名字对你是很大的危险。当然一个他是'三司'司令，一个是'联动'利用。"

周恩来："红卫兵串联到北京，说第一要见毛主席、林副主席，第二要见中央负责同志，第三要见'蒯司令'。"

陈伯达："我们很早就跟他警告过，叫他不要陷入所谓关心的危险中去。你们都是常委、副主任委员，地位不低，不要陷入'关心'的泥坑。你们年龄都不大吧！蒯大富也是北京市常委，你们要用蒯司令的教训对照自己，看也是差不多，你们也要接受这个教训。"

康生："我刚才讲的两面手法韩爱晶最厉害。"

陈伯达："韩爱晶是我的好朋友，我很早就警告他，你们今后会失败在骄傲上。"

康生："韩爱晶有个名字叫'狐狸精'，他出的手法比蒯

大富还高明，玩权术。”

陈伯达：“你们湖北林副主席家乡的李四光，湖北黄冈人，今天和江青谈了一句话，古代有个恐龙，现在消灭了，有一个延安的化石，”

周恩来：“最近山东出土的，十二米高，二十多米长，这是很大的一个恐龙，人民大会堂宴会厅才好摆。”

陈伯达：“发展到哪一个庞然大物，后来就自然淘汰了，”

周恩来：“庞然大物，发展到不可发展就死亡了。主席说事物发展到一定极限就走向反面，列宁讲：真理向前跨一步，就成为谬论。一个事物发展到极限就走向其反面。恐龙的鳞片像钢板一样硬，爪子像钢爪一样。又那么大，要吃那么多东西，周围的东西吃光了，就走向死亡。所以我们不要走到反面去了，我们要说我们什么都不懂。”

陈伯达：“你们的脑子不要成为庞然大物。”

众人笑。

周恩来：“主席接见你们后找李四光谈话，讲了很多大道理，你们都不懂。主席说：‘天是塌不下来的。’这是个伟大的真理，天是个自然物，什么时候也塌不下来。主席又说：地球照样转，地球成天在转，主席说：坐地日行八万里，多快呀！我们坐这里不动，只有谢富治脚在动，就飞一样走了八万里。主席还说：地球如果缩小到这么大（比手势），球壳就只有一张薄厚了，我们一个人就走在地壳上，一张纸上

那么一点点小了（比手势）。地心是什么东西还没搞清楚，杨道远，你们是搞地球表面的，不研究地心吧？”

杨道远：“不懂。”

周恩来：“地心可能是一种很重的合金。”

康生：“有很大吸引力。”

周恩来：“把我们吸住，地球就运转，我们没有个伟大的胸怀，世界上的事只要认识了，并没有什么了不起，千万不要认为自己有什么了不起。”

陈伯达：“所以不要迷信庞然大物，也不要不知满足。”

康生：“从‘五四’运动以来，几十年得出一条经验：青年人不能做昙花一现的人物。”

周恩来：“你们前年把汉阳叫‘白区’，武昌是‘解放区’，汉口是‘游击区’。但我每次从汉阳过都比重庆安全，你们说的也不对。‘720’时，主席问谢副总理，到‘百万雄师’那里去过吗？谢副总理就没有。结果到了‘三钢’、‘三新’那里去了，最后经过‘百万雄师’那里，看了一下。主席这种最先到对立面去做工作的伟大精神，的确不容易啊！回去后把我们的话化为你们的思想做工作就行了，不要贴大字报，印小报。

告诉你们，省宣传部密加凡是王任重、周扬黑线的，要跳出来支持你们，你们要注意。”

众人说：“我们根本不知道这个人。”

陈伯达："朱鸿霞写的那篇文章，我看了，你是大知识分子，还是小知识分子？"

朱鸿霞："我是在厂业余学校学的一点。"

陈伯达笑着说："有点夸夸其谈。"

胡厚民："他喜欢文学。有人说：他是业余作家。"

黄永胜："我看你的文章不像工厂写的像知识分子的。"

朱鸿霞："我脱离劳动两年多了。"

周恩来："我们年轻也写了一些东西，现在看漏洞百出。要研究一下，如何参加劳动，一年劳动几个月，回本厂劳动和原来的战友在一起离开了就不好，也要抓一两个点，不然领导上再不注意就当陪衬，表个态，讲顿大道理，这样不行。主席在北京住久了，也经常出去听不同意见。

方法就照你们报告办，逐步稳步的前进。贵州回去了，又反过来了，希望你们搞好，没什么，天塌不下来，地球照样转，这是伟大的真理，主席讲，坐地日行八万里，我们坐着不动，只有谢富治的脚在动，我们坐着不动，一下子就走了八万里。想到主席教导，心胸一开阔，什么都想通了，做主席的好学生不容易，你们生活在毛泽东时代，很幸福，前途无量，毛泽东思想光芒万丈，我们开始革命也东闯西闯，后来找到了毛主席，学得不好，跟得不紧，再过几年就见马克思了。"

周恩来又让汪东兴讲讲。

汪东兴："我是来学习的，文件印了四万份，大家带回去。"

谢富治："好好学习，好好前进。"

黄永胜："希望你们把毛主席、林副主席、中央首长的指示带回去落实。"

康生："坚决落实不动摇。"

陈伯达："大家合作得很好嘛！"

周恩来："要互相学习，武汉是全国的地理中心。"

康生："你们搞好了，今年国庆我再和阿尔巴尼亚的朋友一起到武汉看你们去！"

大家热烈鼓掌。

周恩来："最后希望你们健康的成长！"

全场高呼："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中央领导与湖北代表握手告别。

朱鸿霞、吴焱金、胡厚民当面对周恩来说："'反复旧'的责任在我们头头身上，我们承认错误，坚决改正。我们对领导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回去以后不要整群众，千万千万不要整群众。"

周恩来当即表态说："曾思玉同志，你们都在这里，回去要做细致的工作，可不能压群众。"

曾思玉表态："坚决按中央指示办事，坚决按总理意见办事。"

“527 指示”下达后，造反派不再进行公开的群众运动了，但是在广大造反派群众中间，与革委会的对抗情绪却无法消除。一些造反派由此对周恩来颇有微词。对于群众中的这种抵制情绪，曾思玉、刘丰很是恼火，称为“不提‘反复旧’口号的‘反复旧’”。

## 第1091回：济南稳，国务院进行改革

## 毛南巡，四老帅“研究小组”

此时的山东，到济南、青岛已经传开王效禹犯错误的消息。杨得志等27人于5月28日回到济南，第二天，即5月29日，山东省革委常委会、济南军区就召开联席会议，传达中央对山东问题的批示。6月1日，王效禹在联席会上作检查。67军204师代表在这天的会上，痛批王效禹、韩金海等人在临沂的所作所为，还提到“老大哥部队”紧跟王效禹的一些错误，转弯抹角批评山东其他驻军。

第二天，6月2日，济南“文攻武卫”总部被砸。

紧接着，6月5日至14日，济南军区和省革委又在南郊宾馆召开部队师以上干部、地方地市以上负责人的联席会议，简称“南郊会议”。6月5日上午，杨得志传达中央领导有关讲话和文件后，下午王效禹作了一个37分钟的检查。第二天分小组讨论，准备大会发言。有40多人报名发言，确定24人发言。大部分与会者对王效禹的检查很不满意。

韩金海、杨保华也在大会上作了检查揭发。韩金海发言时，台下不断有人大声质问，最后被轰了下来。

6月14日，首先袁升平、穆林讲话。袁升平说：“到会的同志大多不明真相，不知道真正的情况。通过这次揭发，过去对山东存在的问题，原因不清楚，不知道根子在哪里。现在这个迷揭开了，到会的同志大吃一惊。过去山东存在的

问题，如把矛头指向人民解放军、革命委员会、革命干部、群众、……这个原因和根子就是省革委的主要负责人”。“这次省革委会主要负责人检查，还是有距离的，虽然进步是微小的，但我们还是欢迎的”。

最后杨得志作总结说：“通过学习，大量揭发，认识到省革委主要负责人严重错误，破除了他的迷信，认清了事情的真相”。“省革委主要负责人的严重错误，不只是他一个人，其他同志也有。我也有错误，我几次看到他的错误后，总是肯定他的成绩，对他的错误帮助不够。有一次我和袁升平同志同他谈心，3 个人谈了 5 个小时，对他的错误有所察觉，有过斗争，但对他的错误还是帮助不够”。“例如谭启龙同志的问题。省革委在传达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精神的时候，就不传达毛主席的指示。当时我想提出来，但又怕人家讲我和袁升平同志过去是保谭启龙的，现在又为谭启龙讲话，因此没有坚持这个原则”等等。杨得志对贯彻传达会议精神的范围、内容等讲了 6 条意见，提了 6 条落实 26 号文件的措施。其中有“不准串连，不准搞什么联合行动，不准重拉队伍另立山头，不准张贴互相攻击的大字报和大标语，不准以任何借口，擅自脱离生产岗位”等等。下午 16 时，“南郊会议”结束。之后，山东工作实际上由杨得志、袁升平等部队领导人为核心负起主要领导责任，济南开始逐渐平稳。

这期间，曾被王效禹抓捕镇压的“山工联”等负责人重

新拉队伍，准备东山再起。

5 月 29 日下午，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 118 厅听取周恩来等汇报改组国务院业务组，国务院各部委合并、撤销、精简和准备成立各单位革命委员会的初步方案，以及党中央部门进行改革的问题。毛泽东说：就照谈定的原则去做，但国务院业务组的人员调整，需要等纪登奎、李德生二人到北京后，先确定二人分工，再提出正式名单。

这天，已经有一年多没有外出的毛泽东，心情轻松地登上南下专列，又开始了他的南巡，5 月 30 日到邯郸，5 月 31 日在郑州停了一下，当天就来到他所熟悉的“白云黄鹤”的地方——武汉，在这里一直住到 6 月 26 日。

这时的苏联，已经在中苏边境部署 55 个步兵师、12 个战役火箭师、10 个坦克师、4 个空军军团，陈兵百万，虎视眈眈，威逼中国。

面对当时的国际形势，九届一中全会后，周恩来即按照毛泽东的意见，让陈毅、叶剑英、聂荣臻、徐向前四位老帅研究一下国际形势。四位老帅很不理解：经毛泽东审定的“九大”政治报告刚刚发表，其中对国际形势作了详细阐述，为什么还要他们研究?如果照抄照搬，算不上研究。如果提出某些不同看法，那又谈何容易?即使能够，会不会被认为是同“九大”政治报告唱反调呢？

周恩来向他们解释说：“主席交给你们这个任务，是因

为主席认为还有继续研究的必要。主席的一贯思想是，主观认识应力求符合客观实际，客观实际不断发展变化，主观认识也应随着发展变化，并对原来的看法和结论及时做出部分的甚至全部的修正。所以你们不要被框住。”

他还说：“现在国际斗争尖锐复杂，各部门集中力量进行斗、批、改，熟悉国际问题的干部大部分尚未解放；我一天到晚忙于处理日常工作，实在挤不出时间过细地考虑天下大事。主席没有让你们回到原岗位，除了蹲点，你们可以不受行政事务的干扰，每星期有几天时间专心考虑国际形势。你们都是元帅，都有战略眼光，可以协助主席掌握战略动向，供主席参考。这个任务很重要，不要看轻了。”

他强调说：“们也不要因为我这样讲就去拼老命，要注意身体，量力而行。世界风云天天变，但是战略格局不是天天变，一个月讨论两、三次就可以了。有了比较成熟的看法，请陈总归纳几条送给我，我帮你们参谋参谋再转呈主席，但讨论的内容要保密。”

按照周恩来的指示，陈毅他们 4 人带着各自的秘书在一起开了一次会，然后由陈毅将他们开会的情况报告了周恩来。没想到，周恩来听了陈毅的汇报后，就批评他说：“为什么要带秘书?以后开会讨论，只限于你们 4 位，不许其他人参加。”

陈毅顿时醒悟，他认为，周恩来是担心他们四个人聚在

一起，难免不放炮，传出去又要惹祸。即使他们的秘书不会外传，但谁知道哪天再有风吹草动，再有人派红卫兵把他们揪走，勒令他们揭发检举，左右为难。不让他们参加，是免得他们将来受牵连。于是陈毅对周恩来说："总理的批评、指示，我完全理解，非常感谢，坚决照办。主席交给我们的任务，我们要努力做好。只是我们四个人都上了年纪，有些事力不从心，请总理给我们派个帮手。"

周恩来说："就让熊向晖协助，他还可以帮你们看些英文材料。"

陈毅说："好，赞成，请总理马上下命令。"

周恩来说："你直接同他谈吧。"

5 月 27 日下午，陈毅找前驻英代办处常驻代办熊向晖谈话。两人一见面，陈毅就将周恩来亲自"点将"的前因后果对熊向晖说了一遍，然后问他："你看可以不可以?忙不忙得开? "

熊向晖说："我还没有分配工作，总理给了我向四位老帅学习的机会，我一定按照四位老帅的指示，全力以赴。但这两年多来我脱离外交实践，不了解外交内情，建议再请外交部派一位现职工作的同志参加，使静态材料和动态材料结合，对研究工作更有益处。"

陈毅说："这个意见好，我马上报告总理。"

几天后，陈毅告诉熊向晖说："总理让姬鹏飞从外交部

司局长以上干部中推荐一位同志，并强调此人要政治历史清楚，熟悉国际情况，组织纪律性较强。姬鹏飞推荐了欧美司司长姚广，总理当时就同意了。”

就这样，陈毅等四位老帅的“国际问题研究小组”算是成立了。6 月 1 日，陈毅上报了“国际问题研究小组”活动安排。第二天，6 月 2 日，周恩来就在陈毅的这份报告上作了批注，进一步向四位老帅明确了三项任务：

一、到工厂、学校、公社去蹲点；

二、对国际形势通过阅读材料和集体讨论，提出意见；

三、对国防问题通过阅读材料和集体讨论，提出意见。

6 月 6 日，经毛泽东批准，军委办事组批复北京军区，同意组建守备第 33、34 师，分别归陆军第 69 军和内蒙古军区领导。12 月 22 日，根据军委办事组决定，守备第 33、34 师依次改称守备第 1、2 师。

6 月 7 日下午 15 时 30 分，“国际问题研究小组”在中南海武成殿正式开会，姚广和熊向晖列席。陈毅在开场白中说：“主席指定我们议议天下大事，让我牵头。平时各人看材料，用不着我牵头。上次我们谈过，材料很多，但有价值的不多。一些单位的调研报告，差不多都是上面怎么说，自己作注脚，这种‘二路货’可以不看。要重视第一手材料。《参考资料》每天两大本，内容很丰富。香港、台湾的几家报纸杂志，有时也透露一些内幕消息。对有用的材料要认真

看、仔细看。对这些材料要按照主席的教导，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形成看法，开会的时候交换意见。我们每个月讨论两次到三次，地点就在武成殿或者紫光阁。时间一般定在礼拜六下午 3 点开始，讨论半天。每次开会之前，由我打电话分别通知大家。我们这个会就叫‘国际形势座谈会’，在沙发上‘座’而谈之。上次开的会不算，今天重打锣鼓另开张，算作第一回。我们四个老家伙，增加两位‘壮丁’、‘强劳力’。一位是熊向晖同志，他不再当驻英代办，总理让他专门协助我们，包括从英文书报里选择材料。另一位是姚广同志，他的工作比较忙，不一定每次都参加，他可以向我们通通情况，提供外交动态。开会的时候，每人清茶一杯，我请客，算是一点‘物质刺激’，‘刺激’大家踊跃发言。欢迎长篇大论，也欢迎三言两语。现在开不得‘神仙会’，我们就来个‘自由谈’。不拘体，不限韵，鸣放一通。可以插话，可以打断，可以质问，也可以反驳，讲错了允许收回。‘自由’不能漫无边际，国际形势千头万绪，什么都议也不行，鸡毛蒜皮可以不管。要抓重点，抓要害。现在北边苏修磨刀霍霍，会不会向我们发动大规模进攻?南边美帝虎视眈眈，会不会把侵略越南的战火向中国烧?这是关系党和国家安危的大事，我们要做出明确回答，不能模棱两可，含糊其辞。总理的指示很重要：第一，脑袋里不要有框框；第二，要密切注意世界战略格局的发展变化。一次议

不出名堂，就多议几次。由向晖同志做记录，议有所得，加以整理，再请大家复议。意见比较一致，上报总理。总理为我们把关。如果总理认为有可取之处，他会呈送主席参考。讨论的过程和内容要保密，这是总理规定的纪律，大家都要遵守。”

陈毅的“开场白”讲完后，四位老帅一个接一个地发言，毫不冷场。他们没有稿子，没有提纲，侃侃而谈，语言生动，条理分明，显然事先都做了认真准备。这年叶剑英 72 岁，聂荣臻 70 岁，陈毅和徐向前都是 68 岁，但他们精神都很好，连续讨论三个半小时，中间不曾休息。

6 月 9 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编辑部社论：《高举“九大”的团结旗帜，争取更大的胜利》。

社论指出：“团结起来，为了一个目标，就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要落实到每个工厂、农村、机关、学校。”具体地说，就是要“巩固和发展新生的革命委员会，加强无产阶级专政，把上层建筑各个领域的革命进行到底。”“把斗、批、改各个阶段的任务在一个一个工厂，一个一个学校，一个一个公社，一个一个单位认真细致地做好。”

这两段话是毛泽东的指示。

怎样搞好团结？社论指出：“我们的团结是以工人阶级为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广泛的革命大团结，是在毛泽东思想原则指导下的革命大团结。”

具体地说，这就是：

1、从阶级路线来说，就是“工人阶级一定要按照毛主席的教导，加强自己队伍的团结，巩固地团结同盟军，团结、教育、改造知识分子，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对于一切拥护社会主义、热爱社会主义祖国的人们，对于那些犯了严重错误而不是不可救药的人，对于那些犯了走资派错误而不是死不改悔的人，都应该按照党的政策团结他们。”

2、从政治路线来说，就是“对后跟上的同志要热情欢迎。有的同志在运动初期一度站错了队，改了就好。不承认人家的进步，把犯过错误又已改正的人还总叫‘老保’，是完全不对的。有些最早造走资派的反的人，在革命运动的曲折过程中，也会犯某些错误，也要认真改正。那种‘唯我独革’，‘唯我独左’的思想是错误的”。

3、从领导班子来说，“首先是要加强领导核心的团结，认真实行民主集中制，加强集体领导。要巩固革命的三结合。对已经解放了的干部，要大胆使用，不要一犯错误就算老账，重新打倒。对革命群众组织要‘一碗水端平’，不要亲一派，疏一派，你支一派，他支一派。”

6 月 12 日，中共中央下发《关于宣传毛主席形象应注意的几个问题的通知》，上面印有毛泽东的批示：“照办”。

文件指出：

文化大革命以来，在宣传毛主席形像、宣传毛泽东思想

这个问题上，有些时候，在一些地方，出现了不突出无产阶级政治、追求形式和浮夸浪费的问题。为此，特提出如下改进意见：

一、各级领导要积极引导群众，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搞好思想革命化，不要追求形式，要讲究实效。

二、重申中央一九六七年七月十三日《关于建造毛主席塑像问题的指示》，今后，塑造毛主席像，必须严格按此指示执行。

三、不经中央批准，不能再制作毛主席像章。

四、各报纸平时不要用毛主席像作刊头画。

五、各种物品及包装等，一律不要印毛主席像；引用毛主席语录也要得当；禁止在瓷器上印制毛主席像。

六、“忠”字是有阶级内容的，不要乱贴滥用；不要搞“忠字化”运动；不要修建封建式的建筑，如有，应作适当处理。

七、不要搞“早请示、晚汇报”、饭前读语录、向主席像行礼等形式主义活动。

第 1092 回：桂纠偏，贺龙三〇一去世

信尼姑，西藏尼木县事件

在这期间，广西在清理阶级队伍的过程中，又搞出了一个“新反团”。

1969 年 1 月 16 日，广西军区支左办联络组长王生江等一些“支左”人员在南宁橡胶厂召开“阶级斗争情况交流会”，参加会议的有驻市 80 多个单位，共 100 多人。这次交流会实际上是追查广西“反共救国团”的一次现场会。王生江在会上说：“‘反共救国团’在‘422’中发展了组织，这是肯定的。有单线发展，也有集体发展，新闻电影院开的‘反团’宣誓会，正面挂的是毛主席像，毛主席像的后面是蒋介石像，宣誓时就把翻过来了……”“‘422’中的‘624’、‘625’部队，各分部都有他的情报员，后来其中有的参加‘反团’，至于哪些人是，哪些人不是，就很难分清了。南宁市搞‘反团’的问题，已经搞得差不多了，很快就会公布啦！”

从此广西有了“新反团”的提法。没过几天，追查“新反团”的工作就在全南宁市铺开了。

由于追查“新反团”的目的主要是针对“422”一派群众组织，而且事先由王生江等人定了调子，所以追查一开始，就大搞逼、供、信。此事很快扩大到自治区内的柳州，桂林、都安、隆安、邕宁、武鸣等 10 多个县、市，还涉及到贵阳、长沙、汉口、天津等区外省、市。有的还直接通知部队，某

某新战士是“反团”成员，弄得部队某些单位也很紧张，将这些战士退回地方。

1 月 21 日，广西荔浦县革委专案组以全体人员的名义，给广西军区党委、广西区革委保卫组写了《荔浦县深挖反革命组织情况汇报》。他们在汇报中肯定“反革命组织”存在，但目前还遇到了来自领导班子内部的阻力，要求上级派员前来调查了解。

广西军区司令员欧致富为了了解荔浦县这一重大案情，和支农部队一起到荔浦县，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工作。

1 月 29 日，荔浦县革委会召开第二次全体会议，欧致富亲临到会，并作了重要讲话。在这次会上，做出了“反共救国团”、“中国青年党”是假案的决定，并同时决定将制造假案的主要人员——“工农兵司令部”头头董茂轩拘留。

当天，在荔浦县革委会召开的全县干部、职工大会上，欧致富又作了讲话，指出了“工农兵司令部”少数负责人的错误和罪行，宣布这里的“反共救国团”、“中国青年党”是假案，应平反。欧致富和支农部队在荔浦期间，撤销了两个假案专案组，释放了被错误关押的人员，补发了干部、职工被扣发的工资，取消了在桂林及修仁武斗中死亡的 18 人为烈士的决定；对在文革中犯有严重错误和违法乱纪的干部、职工 324 人，分别给予拘留、开除、撤职、免职等处理。

南宁市在大抓“新反团”中，清出了 2000 多“新反团”

的成员，自治区、南宁市革委会及公、检、法机关对王生江等人追查“新反团”的作法产生了怀疑。2 月 28 日，自治区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抽调了区、市有关单位的 20 多个干部，组成清理“新反团”遗留问题的专案领导小组，进行了几个月广泛的调查。后来市革委会召开有关单位领导干部参加的千人大会，由公检法军管会副主任王国典介绍破获“反共救国团”即“旧反团”确证案详情，强调指出这个“反团”的组织成员已查明，其全部骨干分子已全部缉拿归案，要求大家不要相信“新反团”的材料，因为那些是假的。

通过这次大会，原来打算搞“新反团”或正在搞“新反团”的机关、单位都停止了追查“新反团”的运动。

6 月 4 日，广西自治区“南宁市清理‘新反团’专案领导小组” 向区党委的核心小组和广西军区领导上报了一份《关于清查“反团”新线索的情况报告》。其中提出“经过三个月的调查，肯定大搞这个‘新反团’是一个事出有因，查无实据的假案”。并提出了 4 条处理善后工作意见：（1）统一认识，停止对这条线索的追查；（2）在已开展追查的范围内做好细致的政治思想工作，对本人的交待和从外单位转抄来的“反团”材料，应交本人当众烧毁，对因“反团”问题被隔离起来的人应立即恢复他们的工作和自由，因刑讯受伤者要给予治疗；因此受冤致死者家庭生活有困难的给予一些补助；（3）外县涉及这条线索的要转告有关单位；（4）对

此假案的成因要进一步组织力量深入调查。

南宁市革委会据此精神，由市革委会副主任、市公检法军管会主任胡庆辉在召开全市各单位保卫干部参加的会议上进行了传达贯彻。

6 月 8 日早上，住在北京西山象鼻子沟的贺龙听完广播后，连续呕吐了 3 次，呼吸急促，全身无力。他爱人薛明非常着急，立刻去找医生。但是医生外出了，直到中午 12 时才回来。薛明向他讲述了病情，下午 15 时,医生为贺龙打了一针，仍未止住呕吐。

下午 17 时，贺龙血压减低，上腹部剧烈疼痛。住地工作人员和医生决定向上级报告。4 个小时后，派来的医生才到。他们将贺龙的尿样送丰台药品检验所化验。

9 日零时 5 分，根据化验结果，他们确诊贺龙为糖尿病酸中毒。零时 40 分，打电话要求送医院抢救。

这时，贺龙看到两个医生都走出了房间，便对薛明说："他们都跑了！要小心，他们要害死我！"还说："我不能死，我还要活着和他们斗下去！"

6 月 9 日凌晨，301 医院副院长曹根慧接到中央二办打来的电话："贺龙得了重病，以前他看病都在卫戍区的医院，这次黄总长因你们条件好，技术力量强，指示你们立即派医生出诊治疗。"

曹副院长放下电话，立即找到曾给贺龙看过病的主治医

生黄秀琴和南楼高干病房护士姜辉永，让他们带着抢救器械和药品赶往象鼻子沟贺龙的住处。

黄秀琴医生来到象鼻子沟后，对贺龙进行了诊断，并立即向 301 医院曹副院长做了汇报。

此时，曹根慧副院长并不知道贺龙住在哪里，便对黄秀琴医生说："如路途近，道路平坦就速回医院抢救；如路途远，道路颠簸就增派医护人员去现场抢救。"

象鼻山肯定不具备抢救条件，而且这里距 301 医院的路途不远，且路况又好。黄医生请示送 301 医院抢救，曹副院长当即答复说："把病人接回来，路上不间断地抢救治疗，注意安全，防止意外。"

放下电话，曹根慧副院长又赶紧向靳来川院长做了汇报。靳院长说："关键是确诊，然后进行抢救！"

当告知贺龙要送去 301 医院住院时，贺龙明确表示不愿意去。他说："我没有昏迷，我不能去住院，那个医院不是我住的地方！"

医生们坚持要送去住院，并说这是"组织决定，非去不可"。

这时，贺龙仰起脸看着薛明问："我去住院，你呢？"

薛明说："我当然跟你一起去！"

但当她用征询的目光望着在场的专案组人员和医生、护士时，他们谁也没有表态。

薛明只好说："如果他们不允许，我就在这间房子里等你。"

贺龙躺上了担架，薛明握住了他那只已经瘦骨嶙嶙的大手。

贺龙微微睁开眼深情地看了看薛明，也紧紧地握住了薛明的手。

上午 8 时 55 分，贺龙来到 301 医院。此时楼里楼外在中央专案组布置下，已经戒备森严。南楼高干病房主任李晋率医生组织抢救，确诊贺龙是糖尿病酸中毒。

10 时 55 分，贺龙的血压下降到 70 / 40。

11 时 30 分，主治医生提出组织有经验的专家会诊和抢救。曹副院长立即组织大内科曾诚富主任，放射科高育璈主任，心肾科黄大显主任等赶到病房前来会诊，当时比较先进的移动式光机也由萧志达医生推来拍片，发现贺龙肺部感染。经过验血后，决定输液。

但是，15 时 04 分，贺龙去世。

当天，301 医院向中央写了报告。

黄永胜指示，一定要薛明去看遗体，并指示一定要找到在京的子女也去见一见。

1969 年 6 月，西藏尼木县发生了军宣队被杀害的事件。

当时，尼木县的大多数乡村都属于西藏"造总"组织。两个翻身农奴，单增朗结和热群就是尼木县"造总"的头

头。不过轰动一时的杀害军宣队的“尼木事件”领导人还不是他俩，而是一位名叫赤列曲珍的尼姑。

起初，尼木县也像别的地方一样陷入武斗之中，县政府的领导干部成为造反派攻击的对象。但是，在单增朗结和热群两人去找赤列曲珍占卦以后，这场“斗争的性质变了”，变成了民族运动，他们喊出了“西藏独立”的口号。他们一方面要把汉人赶出西藏，同时也搞阶级斗争，家庭成份不好的人不准参加他们的组织。

赤列曲珍，30 多岁，是普松村一个贫穷人家的女儿，1959 年前在普松村里塔斯寺受戒。藏人对尼姑的称呼是：“阿尼”。1962 年组织学习班，很多僧人包括这个阿尼都去了。学习班里天天讲“宗教是麻醉人民的鸦片”等等，赤列曲珍开始心理不正常，从学习班回来后变得疯疯癫癫的，经常跑到山上一个人唱歌。于是，玛朗苍的一个咒师把她带到两个喇嘛那里。从那里回来后，赤列曲珍开始降神，说她自己是格萨尔传说中下凡的女神“阿尼占尼甲波”的化身，会预言、跳神和打卦。但那时候已经在批评封建迷信，只有赤列曲珍周围的一小部分人知道她会降神。当时尼木县各地传说：普松的阿尼，就是赤列曲珍，能算命，会说预言。很多人见了赤列曲珍后，都说她能讲一些只有他们自己知道的事，所以很多人开始信她。传说桑日村的一对夫妻去见赤列曲珍，在去之前，那个丈夫说应该带一个整茶砖送给阿尼，但妻子说

只需带半个茶砖，最后他们还是决定带一个整茶砖。但见了赤列曲珍阿尼之后，阿尼把茶砖切成一半让他们把另一半拿回去。因此，她常常被请去降神，预言各种事情，包括农作物的收成。

文革一开始，赤列曲珍尼姑也参加造反。她背诵《毛主席语录》很熟，在鼓动群众时还常常把中央文革小组和江青挂在嘴上，能说出很多《最新指示》，但没有发现她与拉萨的造反派是否有联系。

文革初期，红卫兵冲击县城的时候，尼姑把她手下的人都封为格萨尔里面的将领。

尼木“造总”头头单增朗结和热群找赤列曲珍占卦后，赤列曲珍成了尼木“造总”实际上的领导人。1969 年 6 月的一天，他们攻击尼木县政府，举着一面两刀交叉的“四水六岗” 旗帜。这种旗帜是 1959 年藏东康巴人组织的反共游击队用的旗帜，他们称之为西藏的国旗。

去进攻尼木县政府之前，他们举着这所谓的西藏国旗，举行了藏民族最普遍的一种宗教祈愿仪式——煨桑，呼喊“西藏独立”、“达赖喇嘛万岁”等口号，冲进了县武装部。

煨桑自文革开始后，已有很长时间没人敢搞了，因为那是搞封建迷信。

在这之前，两派武斗时，群众组织攻击过县政府一次，但像这次打着民族独立的旗帜向县政府进攻，性质就不一样

了。这天，在县政府的汉族军人和基层干部 14 人全被杀死，而且杀得很惨。这些解放军是属于“支左”军宣队，没带枪。尼姑手下的人是半夜三更突然冲进去的，有的解放军从窗户里被甩下来，有的用磨盘石砸死，再把他们都埋在三叉路口，意思是这些人都是鬼，而且还在坟上放着军帽。

这一事件当即被定性为“反革命叛乱”。西藏军区派出两支部队，分别从羊八井和曲水两条路开往尼木县剿匪。

车子开过曲水大桥时，前面的路被人破坏了。桥下面是雅鲁藏布江，上面是很高的山，山顶上还有很多人，看来他们早就预料到解放军要来，因为他们闯了大祸，杀了那么多的解放军。羊八井的那条路也被破坏了。

军区得到报告，连夜派部队修路。

约有一个排的兵力，再加上尼木县里的部队，进山围攻赤列曲珍驻地。

赤列曲珍驻地的山谷里全是乱石成堆。一个个山头上开始挨着冒烟，这显然是发现解放军来了，他们用古时候那种烽火报信的办法传递消息。

部队和尼姑的人遇上了。他们那边有几支火枪，更多的是矛和刀，还有犛牛鞭（乌朵），用这种鞭子包着石块朝部队这边扔。

一般情况下部队是不会开枪的，可能他们也以为部队不会打枪，所以气势汹汹的，用最落后的武器来对抗。但这次

性质不一样了，他们是“反革命叛乱”。当部队一开枪，他们慌了，赶紧逃跑。部队边追边打，一直追到了尼姑驻扎的那个村子，部队向那个尼姑喊话，可她不但不出来投降，还穿着法衣戴着法帽站在房顶上跳神作法，在那儿乱跳乱舞。参谋长下命令不准向她开枪，要抓活的。

这样相持了一会儿，部队喊话也不起作用，尼姑还耀武扬威的，向部队挑战。于是部队就往尼姑房子开枪，房子里面也朝部队开枪，但他们的枪都是破枪，子弹也不多，根本打不到这边。而部队的冲锋枪一打一个准，天快黑了，尼姑还是拒不投降，部队想冲上去，但这样就会肉搏，双方伤亡会很大。参谋长就叫战士们别打了，可战士们不听，都打红了眼，想冲上去把他们全部消灭。天色已晚，参谋长把部队撤回来。当天晚上，尼姑他们就跑到山上去了。

部队第二天一大早冲到房子里时，里边已是空空荡荡，只有七八个人的尸首，有几个还被扶起来靠在墙上，身上都是枪眼。尼姑的房子里还点着一盏酥油灯，油燃的不多，可能跑的时间不长。在房顶上有个简单的帐篷，一张桌子上面有几个盛满弹壳的盘子。弹壳都是自动枪的弹壳，只有部队才有，是不是收集在一块表示证据的意思呢？那楼下有个隐蔽的小经堂，点着灯，供着佛像，还有些经书、法器和护身符之类。后来有群众告诉他们，说院子一角的小房子里有两个伤员，被砍了双腿或双臂的。他们进去一看，果然有两个

人，一个女的被砍了双臂，一个男的被砍了双腿，居然还活着，据他俩说是周围的老百姓给他们喝茶喝青稞酒才活下来的。已经砍了好几天了。是因为在这之前县里干部和解放军来的时候，他俩跟他们谈过话，所以尼姑就说他俩是叛徒，狠狠地惩罚了他俩。在尼姑的门前一块空地上还钉有四个橛子，群众说尼姑处罚被认为是叛徒的人时，就把他们的手脚捆在橛子上再砍，那满地都是血，已经干得起壳了。

还有两个基层干部被活埋了，挖出来时，其中有一个浑身水肿，到处是刀口。

那两个被砍伤的男女很年轻，被立即送到军区总医院治疗。接下来部队就搜山追击，在山上发现不少在逃的人，击毙的击毙，抓获的抓获，尼姑就是在山上被抓获的。

尼姑后来是被带到拉萨经过公审后枪毙。她下面的得力干将大都被枪毙了，只有一个叫热群的跑掉了，没有抓到，这人原来是一个基层干部，杀解放军就是他带的头。

第 1093 回：离武汉，过长沙又到南昌

七月一，发社论指导“整党”

6 月 13 日，苏联政府再次发表声明，提出了解决边界问题并使苏中关系全面正常化的意见和建议。要求“二、三个月之后”，即最迟在 9 月 13 日前开始边界谈判，这无疑是一种最后通牒。7 月底，苏联再建议举行苏中双方高级会晤。

这天，经毛泽东批准，军委办事组公布总参谋部、总后勤部机关精简方案。据此，总参、总后机关进行精简整编。

总参原编 15 部、局，精简整编为 13 个部、局。即：办公厅（军委办公厅兼）、作战部、情报部、三部、军训部、军务部、防化学部、政治部、机要局、测绘局、外事局、气象局、管理局。

根据中央决定，将中央调查部与总参情报部合并，中央气象局与总参气象局合并，国家测绘总局与总参测绘局合并。

总后原编 13 个部、局，精简整编为 9 个部、局。即：司令部、政治部、供应部、卫生部、装备部、军事运输部、企业部、营房部、管理局。

6 月 16 日，军委电复福州军区，同意将闽北指挥部改编为陆军军部，称陆军第 29 军，辖陆军第 84 师和由原独立第 1 师改称的 85 师及守备第 7 师。

6 月 17 日，经毛泽东批准，军委任命：北京军区副司令

员郑维山为北京军区司令员，北京军区副政委陈先瑞为北京军区政委；济南军区副司令员陈宏为装甲兵司令员；中共陕西省委第一书记李瑞山为兰州军区政委兼陕西省军区第一政委。

郑维山的任命，结束了北京军区自 1967 年 2 月以来没有正职司令员的局面。

6 月 22 日，山东省和济南市革委会、群众组织的部分负责人，以及支左军代表 570 人到北京，参加中央办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山东班的学习，解决山东和王效禹等人的问题。

学习班到京的第二天，6 月 23 日，中央批准成立山东省革委会党的核心领导小组，由王效禹、杨得志、袁升平、李水清、李耀文、穆林、赵修德共 7 人组成，组长王效禹。可这个山东最高领导机构中，王效禹绝对孤立。5 名军人中的杨得志肯定不会站到王效禹的一边；袁升平、李水清、李耀文坚决反他；赵修德 1968 年 12 月“反复旧”被整后彻底转变立场抵制王效禹；穆林是文革前的省委书记，文革初期遭批斗，1967 年 1 月被造反派关押，三结合进入省革委分管生产，因不同意出版《王效禹论生产》一书又挨了整。

6 月 26 日，林彪主持召集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编辑问题及七一社论等事宜。

毛泽东在武汉一直住到 6 月 26 日。在武汉期间，他一再谈到要减少对他个人的过分颂扬。到了东湖梅岭一号，他

看到从走廊到会客厅、书房和卧室里，到处都张贴着他的画像和语录，立刻要工作人员将这些统统摘下。有一次，他针对林彪最先提出、在文化大革命中特别盛行的称毛泽东的话“一句顶一万句”的说法，向工作人员说：“人的一句话怎么能顶一万句呢？一句话就是一句，不能是一万句，不能顶，更不能顶那么多。我的话怎么可能有那么大力量，那不是神了吗？这不是唯物主义，也不是辩证法。”还有一次，毛泽东在观看中共“九大”纪录影片时，银幕上多次出现他本人的镜头和代表们长时间欢呼的场面，他生气地站起来中途退场，并且说：“哪有一个人老看演自己的电影？我的镜头太多了，没什么意思！”他还告诉工作人员：“‘四个伟大’，太讨厌！”

武汉军区司令员曾思玉去见毛泽东。毛泽东说：“这几天我派人去武汉观察了一番，社会秩序和社会治安都比较稳定。你来武汉一年了吧？你还是依靠那个指挥所吗？”

曾思玉回答：“是。我们还是 20 多个人，住在军区茶岗一栋楼办公。”

“对，人不要多。我历来都是如此，机构要精干，有事要亲自办。周总理也是这样，有事自己动手打电话。你的助手有谁啊？”

曾思玉一一介绍了副司令员和副政委。

毛泽东说：“不要调多了，3 个可以了，多了不好。要

搞五湖四海，要放手让助手大胆工作。”

曾思玉又把群众组织的头头们的一个顺口溜说给毛泽东听：“开会上主席台，看戏坐前三排，汽车一叫就来，什么权都没有，是摆设，后来闹补台，党票挂起来。”

毛泽东听后，哈哈大笑起来，说：“那也好嘛！开会上主席台，看戏坐前排，汽车一叫就来，这也是权嘛！你们要帮助教育这些过渡人物，还要告诉他们要谦虚谨慎，要好好学习和工作，不然就容易犯错误。”

6 月 26 日，毛泽东离开武汉的那天，同湖北负责人曾思玉、刘丰、张体学、方铭说：“我这次来，不是给你们谈工作的，是因为在北京很忙，到这里是休息的。”

对正在审查的干部，他说：“监护的人，统统放了，不管他职务大小，这是全国性的问题。我看搞专案小组很危险。他怕右了，就要千方百计把人家打成反革命。一个专案组搞了一、二年，没有搞出来，怕思想上右倾，宁可‘左’一点。”

“我不是完全反对专案小组。搞专案要有经验的人，年龄大的人，要与群众结合。现在有的人年纪轻，造反精神很强，他们缺乏经验，不懂得历史。”

“听说河南地专县一级的第一把手，有百分之五十的人都出来主持工作，这个经验很好，全国不太多。”

毛泽东这次在武汉，对湖北农业生产十分关心。当曾思玉汇报他们战胜 1968 年长江洪水，以及今年早稻长势很好、

丰收在望时，毛泽东说："对，人是要吃饭穿衣的。湖北是个好地方，是鱼米之乡，自古以来就有'湖广熟，天下足'之说。中国的文字很有道理，'饭'字缺了'食'就剩下了'反'字。如果老百姓没有饭吃，就要起来造反的，民以食为天嘛。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粮食是基础的基础。我们经济形势的好坏，依农业形势的好坏而转移。湖北这个地方盛产粮食和棉花，你们要抓住不放，人民有饭吃、有衣穿，事情就好办了。"

对与农业密切相关的水利问题，毛泽东一直十分注意。湖北沿江一些地区因常年遭受洪灾，损失严重。加上省内缺乏煤炭，开发长江水利资源成了当务之急。曾思玉等向毛泽东请示兴建三峡水利枢纽工程问题。当得知湖北省领导还没有去过三峡时，他建议曾思玉可以先去实地考察一下。除了农业、水利问题，他在武汉还过问了河南焦作至湖北枝城的焦枝铁路建设、江汉油田会战等情况，批阅了有关技术革新、渤海地震、华北防汛等文件。

6 月 26 日，毛泽东乘专列自武汉来到长沙。6 月 28 日上午 9 时 45 分至 12 时，毛泽东在长沙接见湖南负责人黎原、华国锋，陪同接见的有汪东兴。

毛泽东开始问湖南的情况如何？黎原汇报了湖南的情况，谈了湖北"反复旧"对湖南有些影响，也出过几张大字报，转抄武汉"反复旧"的消息，作了工作后，局面稳定。

他着重汇报了目前一个一个去狠抓团结工作，注意做好两派的群众工作。当汇报到对跟“永向东”梁春阳、尚春仁犯过错误的群众，亦重视作团结教育工作时，毛泽东指示：“‘永向东’、梁、尚是少数，要教育团结多数。”

当汇报到梁春阳、尚春仁曾说湖南 52 个县是老保翻天时，毛泽东问：“湖南多少县？”

答：“94 个县市。”

毛泽东接着说，“永向东”、梁、尚是打着“反复旧”的旗子，实际他们搞复旧。又说：“他们说得那样革命，革命革得那样彻底，52 个县，还有 42 个县是革命的，成绩就很大。”

毛泽东问到：“‘高司’的学生怎样？”

黎原汇报说：“六七、六八届的毕业生已分配在军垦农场参加劳动锻炼，整个学生连队都表现很好，军队同志对他们很欢迎，六九、七〇届去湘西参加劳动，接受再教育。”

毛泽东接着指示：“除年老多病的外都下去，教员也下去。”

他又问：“湖南这样大，47 军搞得了吗？”

黎原汇报：“在地区主要靠分区、县武装部支左，地区革委会的主任现在大都是分区或县武装部的负责人。47 军两个师搞生产，打算再抽一批干部参加搞去。”

毛泽东说，点铺的不要宽。

当问到湖南落实政策抓人情况时，毛泽东指示："内蒙扩大化抓了20多万人，省并不大，好就是没杀人。对敌人也要区别对待。有些老工人，没有参加国民党不见得（注：按湖南话意思，即：不见得没有参加国民党。)，搞清楚了根本不要处理。不要学北京大学抓了900多人，抓多了不好处理，抓了怎么办？总共9000多人，哪有那样多的坏人！"

毛泽东问："农村公社所有制怎么办？你们也提出这个问题，小队还是大队为核算单位？"

黎原汇报了石门县的情况，说明基本核算单位不能轻易变动。

当汇报到湖南去年能够取得丰收原因时，毛泽东说："过去彭、黄、张、周的黄克诚，就是给韶山东西，不发扬群众的自力更生的精神。大寨好，好就是好在自力更生，发奋图强。"他还说："去大寨人多了成灾，你们自己搞自己的大寨。大寨是大队核算，80多户实际是一个大一点的生产队。"

在汇报到干部解放情况时，毛泽东问了湖南省公安厅厅长李强、副厅长高文礼的情况。

汪东兴插话："遣特情的情况是公安部罗瑞卿、徐子荣指示的，应由他们负责。"

毛泽东说："高文礼我看是好人，'高司'、'红联'、'公检法'过去臭了，'公检法'多数是好人。"

"干部解放，有些人调换一下地方，在省委工作，在长

沙久了可以到地区、县，在下面久了亦可调长沙，地区之间亦换一换。犯了错误改正就是。群众分两派，各解放各的干部。一个单位分成两派已经三年了，要联合起来，如果你还要分两派，再搞三年，但总是要联合起来。要做工作，解放干部有些可以留下来继续工作，有些可以调到别的地区。”

“机关人太多不好办事。军队机关人少些，中央、省、地、县四级地方机关人多。”

“刘建勋、纪登奎参加了 1966 年 10 月的工作会议，这会议是给打招呼不要压群众，不要靠一派压一派，他们听进去了，回河南召集地、县委书记开了会，现在他们地区、县革委会百分之五十一是原地、县委书记当第一把手，但他们没有给大工厂的人打招呼，所以那里的领导干部出不来。”

接见快结束时，毛泽东又说：“‘高司’、‘红联’、‘公检法’大多数是好的。”

当黎原他们请毛泽东再作指示时，毛泽东说：“我是想问问情况，你们看到形势好、并注意另一面的想法是对的。年成秋冬才能定局，现在不宜估计过高。有些苗头应该看到，也不要估计过了。前年来时还不是急风暴雨，你们办公地点一天要搬几个地方。前年和去年上半年是高潮，你们出了‘高司’、‘红联’、‘公检法’，出了‘省无联’，又出了‘永向东’，以后还可能出点什么，但大局不会有什么。出极‘左’极右，是社会上有那股思潮，‘省无联’极‘左’，那时很吃香，有

一股极‘左’思潮。不过他们要重新建党建军也看见马上不行，所以提出十年生聚，十年教训。”

“要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

接见从上午 9 时 40 分一直到将近中午 12 时。接见结束后，毛泽东的专列离开长沙，驶往南昌。他在南昌只待了一天，29 日又驶往杭州，在在那里一直住到 9 月 18 日。

6 月 28 日这天，周恩来在北京接见学部宣传队和“大联委”时谈到清查“516”的问题，他说：“‘516’是利用 1967 年发表《5.16 通知》搞起来的，他们抓的很快，主席抓的更快。姚文元 9 月份发表文章点‘516’是反动组织，主席 8 月份就抓住了，主席看的准……‘516’串连，小报上都透露了，主席很快就发现了，矛头不对。原来后台就是王、关、戚。起头，我们想分化他们，把戚本禹分出来，实际上他们是一伙。”

7 月 1 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编辑部社论：《中国共产党万岁——纪念中国共产党诞生四十八周年》。社论指出：

“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选出了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委员会，这是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唯一的领导中心。全党必须服从统一的纪律。全党必须服从中央。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权力机关，人民解放军，和共产主义青年团、工人、贫下中农、红卫兵及其他革命群众组织，

都必须接受党的领导，都要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不折不扣地贯彻执行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制定的党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在这个问题上，要警惕阶级敌人的破坏，要继续批判反动的‘多中心即无中心论’，任何个人，任何组织都要注意，绝不能把自己和党的关系摆错了。”

社论传达了毛泽东在九届一中全会上的讲话内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还有些事没有做完，现在还要继续做，譬如讲斗、批、改。”并明确了下一步的任务：

1、“继续总结经验，落实政策”；

2、“进一步巩固和发展按系统、按单位的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

3、“深入开展革命的大批判”；

4、“继续做好清理阶级队伍的工作。”

5、“在那些大体已完成清理阶级队伍的单位，就要抓紧整党建党和其他的斗、批、改的工作。”

怎样整党建党？社论传达了毛泽东的论述：“党组织应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应能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并说：“这是我们党几十年来建党经验的总结，是我们整党建党的伟大纲领。”

具体的作法，社论说：

“整党建党，首先是思想上的整顿和建设。”即“用毛

主席的无产阶级建党思想，彻底批判刘少奇的修正主义建党路线，批判他的黑《修养》，批判他的黑‘六论’”。

社论指出：“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中，都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存在着帝国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进行颠覆和侵略的威胁。”“要警惕一小撮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和翻案活动。那种认为‘大权在握、大功告成’、可以‘歇一歇’的想法，是不符合实际的，是极其有害的。”

社论要求：每一个共产党员和革命干部，都要发扬党的三大作风和“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坚持参加社会主义的生产劳动，“对那种不搞工人阶级和革命人民的大团结、热衷于搞宗派主义、山头主义的人，对那种居功自傲，停滞不前，图享受，争地位的人，对那种沾染了无政府主义思潮和极端民主化而还不愿改正的人，对那种玩两面派、搞‘小动作’而不去认真、刻苦学习和实践毛泽东思想的人，我们要向他们问一声：同志，你是继续革命，还是革命到头了呢？”

社论指出：“在整党建党工作中，抓好领导班子的整顿和建设”。

“组织整顿的工作一定要做，也一定要采取谨慎的方法。对证据确凿的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派、蜕化变质分子、阶级异己分子，应当清出除党，并不准重新入党。对犯了错误包括犯了严重错误的人，应该根据毛主席的一贯

教导，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多做深入、细致的思想教育工作。同时，要认真地把在革命的大风大浪中经过考验的真正的无产阶级先进分子吸收入党，增加党的新鲜血液。”

社论传达了毛泽东谈到整党工作时的指示：“每一个支部，都是要重新在群众里头进行整顿。要经过群众，不仅是几个党员，要有党外的群众参加会议，参加评论。”并具体指出：整党要“充分相信群众，实行开门整党。”“要一个支部、一个支部地进行整顿，要做过细的工作，不能粗枝大叶。整团的工作，也要着手进行。”

## 第1094回：七月五，中央接见山东班

## 七月八，八岔岛又起争端

北京，继续解决山东问题。7月初，中央做出决定：徐海地区“三支两军”工作统一由68军党委领导，所有驻徐部队均要服从68军指挥。

7月5日晚，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姚文元、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叶群、纪登奎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接见山东班。在此之前，21时10分，他们首先听取山东班领导小组正副组长李水清、何志远、李燧英（济南军区副参谋长）3人一个多小时的汇报。中央领导要求学习班建立临时党委，康生说：“韩金海、彭士杰，杨恩华不能参加。”

22时30分，再召山东学习班领导小组的其他成员：济南军区群工部长郑洪五及韩金海、彭世杰、杨恩华一同进入福建厅。

陪同接见的还有聂济峰、贺盛桂等人。聂济峰原任1军政委，1966年下半年任驻中央组织部军代表，“九大”后任中央在北京办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办公室主任。贺盛桂原任后勤学院训练部长。学习班的具体负责人都是军队干部。

康生说：“到北京来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是中央办的，思想认识要清楚，是根据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办的，领导小组的组长是林副主席，学习班是党校性质的学习班，不是派性学习班，不是群众组织学习班，是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

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在‘九大’之后召办的第一个学习班，是在新的形势下办的，虽然有个别同志不是党、团员，绝大多数是党、团员，要加强党性教育，把山东具体问题先抛开。”

江青说：“要学党章，明天就要学。”

康生接着说：“你们组织参观先慢一点，先从党性开始，以共产党员的角度来想问题，都要鉴定一下，每个人都要写一个简历，家庭怎样，什么出身，干过什么，什么时候入党，刘崇玉要写自传，看看她是一个什么样的‘刘老师’。开头一课把党章学好，先承认党章，有些人对党认识很差，要补上这一课，入党没有正确认识，这怎么行？党章要逐条逐句学习，有的要背熟对照检查。党纲是最大的毛泽东思想概括，共有几条，三、四、五条都要好好看看。党章是很多人鲜血的结晶。你们考虑一下，是否按党章办事？新党员很多，连党的基本知识都不知道怎么行？”

周恩来：“主要学毛泽东思想，你们学好了，把整个学习班空气可以变过来。你韩金海、彭士杰、杨恩华说是代表群众组织讲话，你们不以党性为荣，以派性为荣，这是错误，加强党的领导，建立党的组织。”

“学习班要建立党的组织，加强党的领导，学习班建立临时党委，各连建立支委会。学习班领导小组是行政领导，经过一段学习，毛泽东思想学习好了，可以吸收几个人到领

导小组。”

康生说：“韩金海、彭士杰，杨恩华不能参加，把党的组织建立起来，提高党的威信，一切事都要按高的标准来办事。”

有人说，对省革委会党的领导核心小组也要搞“三结合”，康生批评道：“这有什么三结合？这是糊涂思想。山东笑话多，出怪事，孔夫子思想很有市场，讨论‘九大’代表时，杨保华也提出三结合。韩金海、王竹泉提省核心小组也要三结合，还要经过省革委讨论批准。你根本不知道什么是共产党！杨得志同志给你们解释不听，还反对，过去王效禹一个人说了算，现在几个人说了算，有什么不好？这是党的原则，同王有根本区别。党内搞什么三结合，还要经过省革委常委讨论，这是错误的。党的核心小组是对中央负责的。”

“现在有人叫我们是‘军政权’，这事要抓住好好批判。”

“有人说军区夺了我们的权，学习就是要架空我们，这是王效禹的思想流毒没肃清。军队夺了权，否定了你们夺权，这是苏修的论调。”

“调查一下，学习班500多人中有多少党、团员和非党、团员。要抓党的工作不突出党的领导，很可能说是军政权，你们听起来不顺耳，不符合你们山东观点，你们代表群众组织吗？对我们有意见可以驳，党章不能驳只能学。”

江青：“你们的一些作法，我有不同看法，和你们的观

点不同，我是山东人，可以开除我。共产党是与阶级敌人作斗争的，党性是很重要的问题，有些党员降低到群众水平。”

康生：“你韩金海组织上入了党，思想上没有入党，党章第五条是什么内容，你是‘九大’代表嘛。”

韩金海：“我忘了。”

康生：“党章第五条是民主集中制……。五条是针对资产阶级派性的，这是最重要的，中央办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就是要按党章办事。第四条是党的纪律，三条是接班人的条件，有的没审查就入了党，这是组织不纯。思想上大部分都没入党，必须要端正。我们的党是工人阶级的政党，把党性降低到群众，甚至落后于群众，说你们是群众组织的头头就高兴，说是党员就无所谓。

杨恩华，韩金海反对你，王效禹把你抓起来，愿意改就好嘛。要团结，共产党员起码有党的知识。为了革命，才找一个党，我们和你们走的路不是一样，我们是在白色恐怖下入党，把生命都交出来了，你们入党是为了坐官。”

周恩来问彭世杰住几间房子，合多少房租？

江青问：“有卫生间没有？”

陈伯达：“省革委‘一宿舍’是糖衣炮弹，最危险，要搬出来，否则成了个官僚机构，‘九大’回去后，回工厂参加劳动了吗？不劳动就没有代表性，你那时不是党员，要有工人本色，否则很容易变成工人贵族，比方英国的工党完全

是为资产阶级服务。”

周恩来：“韩金海你脸上无精打采，精神不对头。你在去年的济南政工会讲话很生动，什么‘刘老师’，真是雷霆万钧之势呀。结果搞错了。刘志师、孟庆芝是什么玩艺儿？孟庆芝一会把你吊在天上，一会把你摔在地上。孟庆芝是干什么的，是济南‘文攻武卫’总指挥。”

康生说：“是恶霸，是国民党。”

江青：“她骗了我（指刘崇玉），和她一起照了像，我让王（效禹）把她抓起来。”

当有人说山东把王效禹比做山东的毛主席，把刘崇玉比做山东的江青时，江青生气地说：“造谣到毛主席和林副主席头上来了。建立青年班子，搞青年班子的实质是什么？怪事，把老干部都赶走了，只有青年人才革命？你们这次来京学习，就是要和王效禹划清界限，韩金海说没出路，什么是出路？向党靠拢就是出路，搬出‘一宿舍’就光彩，不搬就不光彩。”

她问杨恩华：“脱离劳动几年了？”

杨恩华：“做 3 年工，两年文化大革命中没劳动。”

江青：“你韩金海来这里检查，揭发错误，有什么包袱？你遇到问题总是为自己辩解，你的检查看到了，有微小进步，欢迎，思想不能一下通。你是原则抽象检查，具体否定，没有触及灵魂。你党性很少，资产阶级派性很多。”

她说彭士杰："你把家都搬来了，住在'一宿舍'，失掉工人阶级本色。"

又说韩金海："你 66 年睡地铺，现在住 7 间房子，一人当官鸡犬升天。不要都是为官、权。最主要的是不要忘记是共产党员。那些官、权是王效禹的糖衣，要注意。"

周恩来："你们错误很严重，来了要好好学习，青年人缺乏经验，改了就好。你在南郊会议上发言了吗？你发言两次，检查不深刻，群众不满意，上纲高了怕丢官，低了群众不满意，这是自然的。工宣队进驻省革委生产指挥部，你（韩金海）把穆林搞下去是错误的。"

韩金海："我只管几天。"

康生："把生产系统搞乱了。你思想不对头，管一天也不对，是革命政权，张美智是谁推荐的？是王效禹提的，还是你提的？问你 3 次你都抛开不谈，张美智是两次判刑，你总是躲躲闪闪的。"

由于 7 月 2 日在北京学习班上，济南一个区文攻武卫的头头打了一个揭发问题的民警，7 月 7 日晚 21 时，康生、李作鹏亲自来到山东学习班领导小组处理这一打人事件，呆了 5 个多小时，。

康生、李作鹏、聂济峰指名把在北京学习班参与打人的济南红旗区（原市中区）革委会副主任胡金环、济南红旗区"文攻武卫"负责人汪永康、陈英叫来，对直接打人者汪永

康的辩解，康生厉声训斥："胡扯！""像话吗！像人话吗！"

康生问学习班有多少"文攻武卫"？有多少是"反复旧"上来的？有多少受压的？有多少人挨打……有多少党员、团员？非党、团员各有多少？都是什么时候加入的，是否填表了？填表了批准了没有？

康生说："主席在延安时讲：组织上入了党，思想上没入党。'反复旧'后入党的人有的组织上也没入，还是通过私人关系拉进来的。"

他说："学习班临时党委要小点，有些人去年12月才入党的，连党的起码知识都不知道，在研究山东核心小组时，这些人把党的性质都没搞清。党、团员和非党、团员都要把他们的历史写出来，要增加这样一个任务，增加整党建党，吐故纳新。

中央办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必须注意事项，是毛主席批准的。汪永康是什么人？是党员吗？在红旗区干什么？……"

北京直接通知山东省革委常委张美智，济南"文攻武卫"总指挥孟庆芝进京。

7月19日22时多，康生、姚文元、李作鹏、聂济峰、贺盛桂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听取山东班的李水清、何志远汇报，韩金海、彭世杰、杨恩华等人参加。

聂济峰原任1军政委，1966年下半年任驻中央组织部军

代表，“九大”后任中央在北京办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办公室主任。贺盛桂原任后勤学院训练部部长。

听取汇报时，康生点名：“孟庆芝、张美智恐怕在招待所不合适，直到现在用假面具欺骗我们，”“这种作恶多端的人应当送到卫戍区。”

20 日，张美智、孟庆芝、刘崇玉 3 人被扣押，直接关进北京卫戍区。

曾经跟随王效禹的造反派，在北京看到这阵势，明白王效禹大势已去，为了自保，纷纷表态，矛头对准王效禹，狠揭猛批，王效禹成了孤家寡人。

在此期间，中国上上下下掀起了声讨苏联侵犯中国领土的高潮，沙皇俄国与满清政府签订的《尼布楚条约》、《瑷珲条约》等种种不平等条约又被翻了出来，几乎每一个中国人都知道，当年沙皇俄国通过这些不平等条约从中国割让走了 150 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相当于现在的 3 个法国或 5 个德国。“仇视新沙皇，蔑视新沙皇，鄙视新沙皇”的宣传教育几乎家喻户晓。

6 月 11 日，《人民日报》头版报道：《苏联政府指使苏联军队侵入我新疆巴尔克鲁山西部地区制造新的流血事件我国政府向苏联政府提出强烈抗议》。

6 月 27 日，《人民日报》以《苏修反华一再向帝国主义求援》为题，引用英、美报刊的一些报道，说苏联“作了很

大努力来使华盛顿了解同中国日益恶化的边界局势情况”，“故意把向北京发出的一个措辞强硬的照会内容转告给美国政府”。说明“紧张局势并不孤立于某些地区，而是边界沿线都如此”。苏联“在口头上向华盛顿及其它西方国家的首都进行试探”，要它们“对远东发生核战争的可能性有所准备”。

7 月 9 日，《人民日报》第一版右上角全文刊登了一份 7 月 8 日中国外交部给苏联驻华使馆的照会：《苏修边防军侵入我黑龙江八岔岛地区进行武装挑衅我国政府向苏联政府提出强烈抗议》。中国的照会简略叙述了事件经过：“1969 年 7 月 8 日上午 8 时 30 分，苏联边防部队乘坐两艘船艇，侵入中国黑龙江省抚远县境内、黑龙江主航道中心线中国一侧的中国领土八岔岛地区，8 时 40 分上岛，并且毫无道理地向正在岛上生产的中国居民和民兵开枪射击。我民兵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被迫进行自卫还击，把入侵者赶出中国领土。10 时 40 分，苏联炮艇一艘侵入八岔岛附近地区，向该岛进行疯狂射击。16 时 20 分，苏联炮艇两艘又侵入上述地区，苏边防军并上岛将我民房烧毁。11 时 20 分到 16 时 20 分，飞机 6 架次侵入该岛和中国岸上八岔村上空低空盘旋，进行威胁。”

苏联方面也在 7 月 8 日当天向中国递交照会，就“一批武装的中国人”“侵入苏联国境”，“隐蔽”在八岔岛的

“苏联部分”，向苏联河运人员进行“武装袭击”一事，向中国政府提出强烈抗议。

7 月 9 日莫斯科时间 10 点 47 分，塔斯社称“中国的农民”是“根据双方的协议被准许在这个俄国的岛从事耕种”的；过了一个多小时，塔斯社改称“中国的农民”是“根据双方的协议被准许在这个岛的俄国部分从事耕种”的，和苏联的抗议照会对该岛归属问题的口径保持了一致。

八岔岛位于黑龙江省东北部今同江市八岔乡西北黑龙江主航道中国一侧，在八岔赫哲族乡境内，由 14 个岛屿组成，南北长约 5 公里，东西宽约 10 公里，总面积约 45.6 平方公里。要比 0.74 平方公里的珍宝岛、1.6 平方公里的吴八老岛大得多。

第 1095 回：山西班，难止三晋武斗风

铁路断，客货列车被迫停

珍宝岛事件发生后，中国政府一方面主张和平谈判，另一方面也积极备战，毫不示弱。而 1968 年底，大批知识青年来到黑龙江又起到了加强边防的作用。1969 年 3 月 9 日，一列载了 1200 名杭州知青专列路过哈尔滨前往黑龙江合江地区。各地知青来到中苏边境地区后，立即被编入民兵进行军事训练。

1969 年 5 月开江后，知青和老乡遵照上级指示，陆续登上黑龙江上一些属于中国管辖但和苏联边防军发生过冲突的岛屿，一面种地、捕鱼坚持生产，一面暗中携带武器站岗放哨保卫边疆。当然，为了避免刺激苏方，他们携带的武器都做了遮盖和伪装。于是，对岸苏联边防瞭望哨看见的就是一群赤手空拳，十六、七岁的男女青年农民。他们对大批刚到的京沪津杭及黑龙江本省插队知青的动态和情绪显然缺乏了解。

在黑龙江东部抚远三角洲的同江县的八岔岛、董喀叭亮子岛上因为过去发生过苏联边防军上岛驱赶中国居民离岛的争端，上级也要求来自杭州的男女知青武装民兵参加登岛行动。登上董喀叭亮子岛上的民兵有 20 多人，除了有一些仿苏制 53 式 7.62 步骑枪外，另携带仿苏制 53 式 7.62 轻机枪一挺。他们在岛上生产劳动时，还有人划船在岛周边水域

打鱼，负责联络警戒。

很多知青是怀着保卫边疆的激情来的，能带着武器上岛，更让他们热血沸腾，结果 7 月 8 日在八岔岛上真的和苏联边防人员打了一仗。这是珍宝岛冲突以来的又一场双方都开枪的武装冲突，不同的是发起自卫还击的不是中国边防军而是中国民兵，还有知识青年，甚至有女知青。

7 月 8 日 8 时，苏联边防军两艘汽艇进入八岔岛中方水域，进行“维护航标”作业。8 时 40 分，苏联边防军和航标维护人员上岛作业，被正在岛上劳动的中国民兵前去制止。知青受珍宝岛自卫反击战的鼓舞，士气高涨，恰好遇到苏联边防人员入侵中国领土，自然会情绪激动地先进行说理斗争，还有一部分人在后面拿出了原先遮盖住的步枪和反坦克手雷、手榴弹等做了战斗准备。苏联边防军见蜂拥而来的中方人员较多，便开枪射击威慑。

对在所谓的“争议岛”上劳动的中国居民开枪警告射击，这是苏联边防军在驱赶中国老百姓时常用的手法，屡屡奏效。哪知道这次碰到的不是普通的中国农民，而是经过军事训练的有武装的知识青年民兵。他们没有严格遵循中央军委规定的“我方必须在两次鸣枪警告无效，苏方又打死打伤我方人员时才可以自卫还击”的规定，而是见苏联人开枪动手了，在未接到任何命令也无法请示的情况下，毫不犹豫地立即开火还击，力图消灭一切来犯之敌。

苏联边防人员措手不及，只好边打边撤。枪响后，在苏联汽艇附近的知青民兵迅速把手雷扔到苏联巡逻艇舱里，炸沉了这艘船，苏方死伤多人。混战中，中国民兵在击沉一艘苏联汽艇，并生擒苏联一人后迅速撤离该岛。

由于交战中苏方一艘汽艇被击沉，至少一名人员失踪，苏方随后开始了报复行动。10 时 40 分，匆匆赶来的一艘苏联炮艇对八岔岛进行了长达 6 分钟的机枪扫射和炮火攻击，苏军直升飞机也多次飞临附近的八岔村上空盘旋威胁。下午 16 时 20 分，苏军炮艇多艘载大批军人登岛搜索，最后烧毁了岛上的中国民房和大批树木，火势持续到深夜。至 21 时，两艘苏联炮艇仍封锁住中国内河八岔河水道出口。

苏联边防部队在事件发生后的 9、10 两日，连续派炮艇进入八岔岛地区达 39 艘次，直升飞机 10 余架次，军人 100 多名。

后来证实这批进入八岔岛的苏方人员中确实有航标工作者，这次冲突是中国知青民兵在没有请示的情况下的擅自行动，从外交上来看是失策的。所以中方对苏军入境的武装挑衅没有进行武力阻击，并且及时将在其它岛上劳动的所有居民和民兵撤回，避免了冲突的进一步升级。

为防止违纪现象的发生和避免大规模武装冲突，中国方面在事后加强了边境斗争的政策、策略和纪律教育，反复强调不能随意开枪射击苏联越境人员和车辆、船艇和飞机，不

能让一颗子弹飞到对岸苏联领土上；未接命令不能开枪还击，要“有理、有利、有节”。中方在以后几年的一系列登“争议岛”显示主权的行动中，严令禁止上岛人员尤其是知青携带枪支弹药和匕首，防止偶发事件加剧冲突。所以在1970年以后，中苏边境东段黑龙江地区再也没有出现过双方交火激战的武装冲突。

实际上让苏联边防军恼火丢脸的还有一件事，7月8日，在距八岔岛60公里外的中国董喀叭亮子岛附近水域，他们的一艘武装巡逻艇居然遭到了中国渔民“武力威胁”的羞辱。

7月8日上午，并不知晓八岔岛发生了武装冲突的同江县三村公社三村大队的杭州知青罗以民与同学王祖荣和往常一样，暗中携带步骑枪两支、手榴弹8颗、反坦克手雷1枚，以打鱼为掩护，划平底船下江巡逻。一艘前后配备14.5毫米高射机枪的苏联巡逻艇入侵中方水域向他们驶来，似乎有挑衅抓人的企图。两位知青不约而同地把暗藏的手雷和手榴弹都从船舱舱板下拿了出来。罗以民飞快地从上衣口袋里掏出手雷引信，把平时分装的手雷组合好。又把4颗手榴弹盖全部拧掉，2颗插在腰间，2颗拉出拉火环，搁在舱板上，步枪里的5发子弹是早就压好了的。他对王祖荣说：“如果炮艇敢停船抓人，等它一靠近，我们就突然扔手雷，再加一颗手榴弹，把它打瘫痪，如果咱们的手雷没打准，就蹬翻小

船，跳水游回去。”

尽管苏联巡逻艇围着他们小船高速转了好几圈，由于平时训练有素，小船船头始终朝着苏艇，未被苏艇掀起浪波掀翻。罗以民看苏艇越来越近，炮艇上的苏军士兵似乎没有多少战斗准备，前后高射机枪的枪衣都没脱，两个士兵甚至还光着上身。艇首站着一个军官，手里提着一个小铁锚，看来他也是想在接近中国渔船时将铁锚扔上小船把它拖走。以往他们曾多次用这样的办法抓过中国人。

两船距离将近 40 米时，罗以民右手扔掉了一只前棹，突然举起了手雷，亮出了要拼个你死我活的战斗姿态。那个苏联军官看见了他手里的手雷，立刻喊了一声，扭头就往船舱里跑，

中方边防哨所通过高倍望远镜已经把这一触即发的斗智斗勇场面记录在案，罗以民后来被黑龙江军区合江军分区通令嘉奖。他的事迹在当时在边境地区广为人知。

此时，所有人们都明显的感到：苏联大规模侵华战争迫在眉睫。

但是，陈毅、聂荣臻、徐向前、叶剑英四位老帅似乎另有高见。他们从 6 月 7 日到 7 月 10 日，进行了 6 次讨论，写出书面报告《战争形势的初步估计》，由陈毅定稿后，于 7 月 11 日报呈周恩来审阅。

《战争形势的初步估计》认为，当时国际上的对抗，集

中表现为中、美、苏三大力量之间的斗争。这既不同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的“七强”并立，也不同于战后初期美苏对峙。美、苏均以中国为敌，同时它们又互以对方为敌。但就美国而言，尼克松认为中国还是“潜在的威胁”，不是现实的威胁。美、苏现在都在布局。苏联要向美国控制的西欧伸手，美帝要向苏联掌控的东欧插足。双方针锋相对，都要争夺对方的东西。真正的、现实的利害矛盾还是在他们之间。他们的斗争是经常的、尖锐的。《战争形势的初步估计》指出：中苏矛盾大于中美矛盾，美苏矛盾大于中苏矛盾。因此，在可以预见的时期内，美帝、苏修单独或联合发动大规模侵华战争的可能性不大。

虽然“九大”后在北京举办的第一个学习班是山东学习班，但此时山西武斗依然没有停歇，致使晋中、晋南的铁路长时间中断。

1969 年 3 月至 9 月，山西谢振华根据中央指示，继续在北京清河地区召集山西两大派头头办学习班，并扩大到原省委、省人委机关和山西关系到国计民生的 13 个厂矿及 10 个基本建设单位的两派干部、头头几千人参加。

在北京参加学习班的山西三大组织的派头头们，此时已控制不了下面的政治局面。山西基层的“红总站派”，依旧对呈联合态姿的“兵团派”和“红联站派”，进行着你死我活的大小武斗，造成工厂停产，交通中断，市场供应紧张；

市民半年多吃不上肉，买不到肥皂、火柴、电灯泡等日用品；市内垃圾满街，路灯不明，电车、公共汽车又少又脏。

3月13日，在临汾以北的冷泉至灵石铁路间,两派群众武斗，当场死亡6人，伤10余人。其中一派乘汽车路过平交道口时， 由于车上自带的地雷因震动而爆炸，造成自身的伤害。武斗将铁路调度电话线打断，危及、中断铁路行车一天，现场查看被打断的线路计四孔21 条。致使两对客车和42对货车停开和滞留区间。

3月14日，太原铁路局黄建常与生产组成员郭长生、曹益荣等协同现场工人乘马力车前往处理。他们于13时开始抢修， 当工人爬上电杆时，又有武斗人员时断时续朝抢修人群开枪。他们于15时20分接通了线路，乘车返回。

4月1日，就在“九大”开幕当天晚上，驻介休的汾西矿务局两派武斗，伤亡数十人。

4月22日13时，临汾铁路北段南关至富家滩段发生武斗。武斗人员声称在铁路上埋了地雷，炸坏了道岔，威胁列车不得过去，致使384次客车中途停车。铁路局派就近人员前往查看，因武斗仍在继续，未获详情，此事延续数日。最后，由铁路分局派出专车单机挂卧铺和餐车各一节,由黄建常与调度所的刘柱带领解放军战士一个班的护路部队及工兵前往，排除了钢轨上设置的水泥柱等物，未发现地雷，道岔等也完好无损，只见大路旁小推车前躺着一具穿着红裹肚的尸

体。当铁路局专车到达时，384次列车上旅客及当地群众激动的高呼:

“毛主席万岁!”

“解放军万岁!”

被困扰几天的列车旅客多亏地方政府及人民群众送饭送水，生活才得以保障。当日18时以后，铁路局将384次列车拉回太原。

4月24日，榆次站因武斗冲击，无人接发列车。16时左右，有单机挂守车在修文站等待。由于榆次站无人接发车，列车一直等了4个小时。后经调度电话出令，同意其开出在榆次站外停车，观察道岔线路，没有错误后才继续开进。接着549次客车也采用类似方法放了进来。从此以后，这一方法一直延续到5月11日。

5月11日5时左右，榆次市在粮食局附近发生大型武斗，铁轨上放置了许多枕木、石头。麦地里横七竖八躺着的十几具尸体。

5月18日6时，介休、义崇地区发生大规模武斗，声称线路附近埋有地雷，并有武斗人员在看守。致使行车无奈中断，全天客货列车均受阻。383次列车在鸣李站停车3个多小时，直到20日才开出，到达临汾。

从5月3日起，路过襄汾的客货列车全部被迫停车，接受群众组织的检查，有的旅客被中途拉下车。

5月4日的384次和90次列车因故开不上来。客车在经过襄汾站时，被强行甩下一节车厢，并抢走17套卧具。

5月5日，9台机车在临汾以南被扣而滞留开不过来，严重影响了机车交路计划。而且机车乘务人员不断被殴打，并被威胁说“再敢过来就枪毙!”一些车站同样也遭冲击。由于上述原因，383 次不能开下去，旅客只好到临汾后下车，自找短途抵达目的地。

5月5日，铁路分局决定381次客车要坚决开下去，虽已找好了机车的司机，却又因调度电话中断而不能开出。此刻却发现在侯马至襄汾间,有群众组织利用被扣客车和货车组成的列车运送武斗人员的情况。由于上述原因，5月14日，分局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发电报通告说：“临汾以南客货列车因故暂停开行， 通告广大旅客。”

一石激起千重浪，此电被临南的一派群众组织批为“大毒草”。

铁路分局决定以5101/2 为专列开行。以太铁分局专列先导前卫车的名义开出，并事先在调度所放风出去给该派群众组织：此专列要直开风陵渡。专列于21 日上午从太原开出，10 时22 分到达介休站时，临时停车，向正在该地区处理武斗事件的省领导谢振华、刘格平、陈永贵等请示。谢振华说: “大动脉！大动脉！赶快通……”并随即下令，沿线武装部门和部队要给专列通车以保障。列车一路以天女散花

方式向沿途各站散发宣传品，到达临汾站时，忽得报告，临汾以南调度电话全线开通。但当专列到达襄汾站时，只见数十人的武斗人员荷枪实弹，在麦地里匍匐卧倒，做出向列车射击的战斗姿态。站台上挤满了人群。列车在此停车一分钟，让事先已准备好的列车工作人员，从窗口向站台大量抛发中央1968年颁布的《七三布告》、《七·二四布告》、《二六命令》和省里新拟发的《通车通告》。当列车到达侯马站时，以同样的方法，向站台上的人群抛出宣传品。

专列于当日17 时40 分顺利到达鸡鸣三省之地——风陵渡

第二天，5月22日17时40分，专列又从风陵渡开出，当天到达运城，向运城的群众组织做了宣传工作。23日9时30分，又从运城开出，14时03分到达侯马车站，当晚到达临汾站。24日由临汾发车，18时30分返回太原。至此，5101/2 专次专列胜利地完成了此次通车任务。

24 日开通临南线路以后，在列车勉强通行不到一周，临南的干扰铁路行车事件又重演，并升级了。晋东南群众组织公开开行了318派性列车，阻断全省南北公路、铁路交通干线输。318次列车，不但以优先权运输着武斗队伍，同时出售车票向百姓敛财。

6月初，在枪弹袭击下，列车只好退回临汾。这一情况一直持续到7月23日。原南同蒲铁路，即纵贯山西大同至蒲

州的铁路线南段线上的客车和货车，在晋南平原上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飞驰在晋南平原上的318次列车。

晋中地区东有太行山革命老根据地，西有吕梁山革命老根据地，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武工队很多，其中不少打过仗的老队员此时参与了两派的武斗队。因此打仗的指挥水平都不低。“晋中野战军”吃亏的时候不少，一次被人家伏击打死二三十人的事发生过好几次。

晋中的武斗，多是游击战和运动战。而晋南则有大规模的攻坚战。晋南地区当时有 20 多个县，多数县控制在“318”派手里，只有中共地委和专署所在地临汾县控制在“126”派手里，城外就是“318”派的武装。城里有 1500 多条枪，据说有几十挺机枪，他们在大的火力点上都安了电话，指挥很灵。

1969 年 5 月，晋中军分区与河北保定军分区互换驻地和变动隶属关系。同时，晋中军分区下辖的 20 个县人民武装部也分别与保定军分区、邯郸军分区的部分市、县人民武装部互换驻地和变动隶属关系。晋南军分区与河北邯郸军分区互换驻地和变动隶属关系。同时，晋南军分区下辖的 20 个县人民武装部也与邯郸军分区的部分县人民武装部互换驻地和变动隶属关系。

5 月，中央召集山西省革命委员会核心小组成员在北京

开会，决定解决山西问题的方针和政策。会议根据中央领导指示的精神，提出解决山西问题的13项措施：

1.加强省核心小组领导，建议增加李顺达等6人为省核心小组成员。

2.举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把现在省革委会办事机构人员和原省委、省人委机关人员全部调出来学习，学习后另行分配工作。建议从军队调300名比较优秀的干部，组成精干的省革委会办事机构。

3.建议由各总部和各军种、各兵种驻山西部队的负责人组成省支左领导小组，由69军政委曹中南任组长，谢振华、萧选进任副组长。

4.所有中央、省属厂矿、院校、科研单位的文化大革命和政治思想工作，统由所在地（市）革命委员会领导。

5.对两派革命群众组织的代表在中央办的学习班上达成的革命大联合和革命三结合的协议，谁也不准破坏。一切跨行业的组织一律取消，归口抓革命，促生产。

6.太原市、晋中、晋南的两派，要坚决支持根据1968年9月以来在北京达成的革命大联合和革命三结合协议成立的革命委员会。

7.坚决执行中央的“七·三”、“七·二四”布告，立即停止一切武斗，拆除一切武斗据点，解散各种形式、各种名称的武斗队，上缴一切武器。对负隅顽抗者，由人民解放军

实行军事包围，展开政治攻势，强制缴械。逃跑流窜者，由人民解放军追捕归案法办。除昔阳外，太原、晋中、晋南民兵的全部武器，都要上缴人民解放军保存。

8.大力开展拥军爱民运动。

9.坚决执行中央颁布的关于铁路交通的一切命令。任何组织、任何个人，抢劫火车、汽车，袭击车辆，冲车站，抢劫旅客财物，都是土匪行为，要坚决予以打击。抢去的车辆必须立即无条件交回。南同蒲铁路必须立即无条件恢复通车。取消非法的“3·18”次列车。

10.任何组织、任何个人，抢劫商店、仓库，霸占和私设银行，非法派粮派款，向群众敲诈勒索，残害人民，都是严重的犯罪行为。对其首恶分子必须严加惩办，并追回其抢劫的全部财物。

11.对于煽动、威胁工人离厂，破坏生产设备，制造停工停产事件，以及强迫农民进城武斗，破坏抓革命、促生产的坏分子，要严办。

12.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维护革命秩序。坚决打击确有证据的杀人、放火、放毒犯及其他现行反革命分子。对太原市所谓“弟兄们”的流氓集团，应坚决取缔。对不杀不足以平民愤者，应判处死刑。

13.为了迅速制止武斗，彻底解决山西问题，请求中央再派一部分部队协助山西驻军完成这一任务。同时请求中央

发一个布告。

## 第四部上卷

## 各地文革章回索引

**北京**

第 1057 回；

**刘少奇：**

第 1044 回；第 1046 回；第 1049 回；第 1050 回；第 1057 回；

第 1058 回；第 1059 回；第 1069 回；

**“六二六”、赤脚医生：**

第 1044 回；

**九大：**

第 1044 回；第 1046 回；第 1047 回；第 1048 回；第 1050 回；

第 1051 回；第 1066 回；第 1068 回；第 1069 回；第 1071 回；

第 1072 回；第 1073 回；第 1074 回；第 1075 回；第 1076 回；

第 1077 回；第 1078 回；第 1079 回；第 1091 回；

**五七干校：**

第 1045 回；第 1054 回；

**专案组：**

第 1050 回；

**清理阶级队伍：**

第 1051 回；第 1060 回；第 1063 回；第 1064 回；第 1065 回；

第 1066 回；第 1067 回；

**批孔：**

第 1082 回；

**贺龙：**

第 1044 回；第 1051 回；第 1092 回；

**整党建党：**

第 1044 回；第 1047 回；第 1050 回；第 1051 回；第 1056 回；

第 1093 回；

**邓小平：**

第 1047 回；第 1051 回；第 1065 回；第 1070 回；

**上山下乡：**

第 1048 回；第 1057 回；

**二月逆流：**

第 1048 回；第 1049 回；第 1051 回；第 1060 回；第 1066 回；

第 1069 回；第 1070 回；第 1073 回；第 1074 回；第 1091 回；

**军委办事组：**

第 1050 回；第 1054 回；第 1079 回；第 1085 回；第 1089 回；

第 1090 回；第 1093 回；

**总政：**

第 1060 回；第 1089 回；

**清华大学：**

第 1057 回；第 1090 回；

**北京大学：**

第 1057 回；第 1058 回；第 1059 回；第 1065 回；第 1072 回；

第 1080 回；第 1090 回；

**徐向前：**

第 1060 回；

**国防科委、聂荣臻：**

第 1048 回；第 1049 回；第 1060 回；

**中苏冲突：**

第 1067 回；第 1068 回；第 1069 回；第 1070 回；第 1071 回；

第 1089 回；第 1091 回；第 1093 回；第 1094 回；第 1095 回；

**五一六：**

第 1057 回；第 1093 回；

**外事口、陈毅：**

第 1072 回；第 1073 回；

**中央非常委员会：**

第 1086 回；

**北京航空学院：**

第 1090 回；

**上海：**

第 1044 回；第 1045 回；第 1051 回；第 1072 回；第 1073 回；

**华北地区：**

**河北：**

第 1066 回；第 1094 回；第 1066 回（保定）；

**内蒙：**

第 1063 回；第 1064 回；第 1085 回；第 1089 回；

**山西：**

第 1047 回；第 1061 回；第 1065 回；第 1095 回；

**东北地区：**

**辽宁：**

第 1045 回；

**黑龙江：**

第 1045 回；第 1055 回；

**西北地区：**

**甘肃：**

第 1057 回；第 1065 回；第 1079 回；

**西南地区：**

**四川：**

第 1047 回；第 1051 回（重庆）；第 1052 回（重庆）；

第 1053 回（重庆）；第 1059 回；第 1079 回；

**贵州：**

第 1072 回；第 1079 回；

**云南：**

第 1060 回；第 1079 回；

**西藏：**

第 1092 回；

**中南地区：**

**河南：**

第 1065 回；

**湖北：**

第 1047 回；第 1065 回；第 1080 回；第 1081 回；第 1082 回；

第 1083 回；第 1084 回；第 1086 回；第 1087 回；第 1088 回；

第 1089 回；第 1090 回；第 1093 回；

**湖南：**

第 1047 回；第 1093 回；

**广西：**

第 1092 回；

**华东地区：**

**山东：**

第 1047 回；第 1055 回（临沂）；第 1056 回；第 1062 回；第 1068 回；

第 1072 回；第 1079 回；第 1082 回；第 1089 回；第 1091 回；

第 1093 回；第 1094 回；

**安徽：**

第 1047 回；

**江苏：**

第 1047 回（徐州）；第 1055 回（徐州）；第 1064 回；

第 1065 回（徐州）；第 1086 回（徐州）；第 1089 回（徐州）；

**浙江：**

第 1047 回；第 1060 回；第 1065 回；

**江西：**

第 1044 回；第 1065 回；第 1080 回；

**福建：**

第 1047 回；第 1065 回；

# 文革史话

之

第四部

# 欲罢不能

下卷

# 目　录

第 1096 回：七月会，中央《七二三布告》
武斗止，解振华主政山西
第 1097 回：中美间，无声息互作姿态
召德生，贵州紫林庵武斗
第 1098 回：做检查，徐州三改革委会
西北败，铁列克提遭伏击
第 1099 回：形势紧，核大战一触即发
八二八，中共中央发《命令》
第 1100 回：四川省，各地、县仍有武斗
决心大，组织联合工作组
第 1101 回：“工农派”，永川、花果山施暴
“红旗派”，武装攻打何埂镇
第 1102 回：谣言传，朱杨、二溪人心乱
争逃离，长江上“白沙惨案”
第 1103 回：八一四，中央又提“五一六”
柯西金，周恩来“机场会谈”
第 1104 回：促谈判，中美苏共同起舞
四老帅，再递交局势报告
第 1105 回：毛泽东，北京接见李德生
忆往事，林彪再上井冈山

第 1106 回：抓战备，全军开作战会议

迎十一，副统帅忙碌不停

第 1107 回：庆大庆，北京城内紧外松

看地形，林彪飞抵张家口

第 1108 回：防突袭，研究老干部疏散

细安排，筹划与苏联谈判

第 1109 回：林立果，任命空军副部长

看表演，周恩来安排疏散

第 1110 回：细安排，林彪苏州述“六条”

速整理，总参发“第一号令”

第 1111 回：急件到，毛泽东火柴烧掉

大疏散，苏联代表团抵京

第 1112 回：扩军忙，小平、陈云在江西

献勇士，一首政治幻想诗

第 1113 回：九二七，中央取缔“北决扬”

鲁礼安，赴黄石铁山被抓

第 1114 回：十月三，武汉修理造反派

判“无联”，山西班移到石门

第 1115 回：说贵州，青岛学习班打架

批二张，王茂聚北京自杀

第 1116 回：十一五，湖北学习班开学

一号楼，刘少奇开封逝世

第 1117 回：时装会，美国大使追翻译

几回合，华沙会谈重恢复

第 1118 回：转弯急，大草原再陷“真空”

设前指，内蒙古二次军管

第 1119 回：建总政，部队疏散返营难

判罪犯，下通知征求意见

第 1120 回：一二四，众领导说“五一六”

震动大，全国再次掀高潮

第 1121 回：下文件，掀“一打三反”运动

说湖北，北京召开公判会

第 1122 回：南京判，上海批斗“孙悟空”

孙蓬一，北大又贴大字报

第 1123 回：再办班，内蒙古仍不安定

订计划，筹备开四届人大

第 1124 回：汽车上，得知柬埔寨政变

不屈服，西哈努克要战斗

第 1125 回：下《通知》，抓“五一六”勿扩大

游雪涛，上海清查中被抓

第 1126 回：江苏省，南京大学突破口

文风来，“江苏没有‘五一六’”

第 1127 回：无锡市，许世友传达文件

查黄廉，湖北班批判三人

第 1128 回：“火上烤”，谈“不设国家主席”
在广州，开“三国四方会议”
第 1129 回：谈抗美，毛泽东会见黎笋
“谁怕谁”，拿起武器敢斗争
第 1130 回：游长城，林彪接见新总政
五二〇，毛泽东发表声明
第 1131 回：林家忙，温玉成被贬成都
轰江青，召集宪法修改会
第 1132 回：声震屋，修宪法争论激烈
被判刑，抓《知青之歌》作者
第 1133 回：轰隆隆，“行宫”上面建机场
开全会，众仙纷纷登庐山
第 1134 回：带“老虎”，空军的“两个一切”
接通知，上海代表团启程
第 1135 回：会前忙，为二中全会准备
牯岭上，庐山会正式开幕
第 1136 回：先讲话，林彪发言受欢迎
听录音，众人要求印材料
第 1137 回：华北组，陈伯达手舞足蹈
也表态，汪东兴讲话支持
第 1138 回：小组会，庐山上热闹非凡
争发言，华北组《六号简报》

第 1139 回：再震动，张春桥急见江青
看《简报》，毛泽东批汪东兴
第 1140 回：华东组，陈励耘指向明确
急叫停，庐山上风标再转
第 1141 回：问情况，聂元梓再次挨批
收记录，三司令同时写信
第 1142 回：找谈话，毛泽东召集开会
汪东兴，陈伯达都做检讨
第 1143 回：谈话忙，吴法宪斟酌检讨
刚上山，黄永胜即被召见
第 1144 回：毛泽东，深夜召见叶剑英
再挥笔，写《我的一点意见》
第 1145 回：各小组，开会批判陈伯达
见江青，再接受“战友”斗争
第 1146 回：和为贵，庐山会议终结束
再拜访，叶群诸人心不服
第 1147 回：九江送，林彪没有再停留
下庐山，陈伯达形影孤单
第四部下卷各地文革章回索引

## 第1096回：七月会，中央《七二三布告》

## 武斗止，解振华主政山西

1969年6月30日，在北京的中共山西省核心小组给太原的徐志远并山西省临时领导小组打电话通知：中央要求，山西原两派群众组织头头再来110人，其中太原两派各来30人，晋中各来10人，晋南、侯马鱼雷厂各来5人，中条山铜矿各来5人，十二冶各来5人，中条山铜矿军管会1人，十二冶军管会1人，侯马鱼雷厂军管会2人，太铁、太钢、西山矿务局军管会各来1人，地方干部9人：李顺达、王体、韩英、徐志远、李学敏、王振国、王金贵、刘汉儒、谭海水。共来126人。7月1日前在北京民族饭店报到，不许携带任何武器，准备参加中央解决山西问题的会议。

然而，就在7月1日，临汾的“1·26”派和“3·18”派进行了一场非常激烈的大规模武斗，其程度，不亚于当年解放战争中的临汾战役。

这是一场攻城战役。掌权的“3·18”派把革委会迁到侯马后，从各县调集了大批民兵，号称万人大军，有百门大炮，于7月1日向临汾守城的“1·26”派发起了大规模的攻坚战。城内约有5000武斗人员，抢了一个军火仓库，还有机关枪等武器。

战斗异常激烈，晋南地委的办公大楼被炸，战场硝烟弥漫，一片狼藉。这一次武斗，以攻城的“3·18”派失败而

告终。武斗中除伤亡人员外，“1·26”派像解放战争中解放军对付被俘人员那样，对所俘的武斗人员集中整训，提出愿留下的，可以参加他们的武斗队伍，愿回家的给每人发一件衬衫、一条毛巾。据说，有的还发给路费，让他们回家。这一次武斗看似结束，但对立的双方都在积极召集人马，修筑工事，一场更大的武斗在孕育中。

“3·18”派，多是从农村以每人每天 3 元钱的工资招募来的。守城的“1·26”派虽然只有 5000 人，但都是各县清理阶级队伍时逃跑出来的，觉得在家也是一死，在这里也是一死，不如在这里决一死战，所以这一场大规模武斗是很惨烈的。

这样的武斗，在山西的全境，正在大大小小，不同程度地继续发生着。

7 月 7 日，周恩来针对南同蒲铁路中断，给陈伯达、谢富治、纪登奎写信，对山西省革命委员会恢复南同蒲铁路全线通车的措施不力提出了批评：“全文只一处提到如继续发生以上类似事件，一定要严追，依法严惩首犯。但如何禁止，如何严惩，并无交代，闹事者仍可置之不理。请考虑要他们进一步出一布告，严禁各项，如违反以武装逮捕，分别依法惩处。”

7月，毛泽东对山西问题指示：“山西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主要是刘格平、张日清所支持的两派长期打内战所造

成的结果。”

为此，中共中央再次召开了解决山西问题的“七月会议”。根据会议讨论的结果，于7月23日发布了解决山西问题的中发[69]41号文件《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布告》，史称《723布告》。《布告》说：

在太原市、晋中、晋南的部份地区，混在各派组织中的一小撮阶级敌人和坏头头，利用资产阶级派性，蒙蔽一部份群众，抗拒执行中央历次发布的通令、命令、通知和布告，犯了一系列极其严重的反革命罪行：

一、组织专业武斗队，搞打、砸、抢、抓、抄，危害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破坏社会革命秩序。

二、抗拒实行中央决定的革命大联合、革命三结合的方针，破坏已经实现革命大联合、革命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另立山头，制造分裂，提出“武装夺取政权”的反革命口号，向无产阶级进行反夺权。

三、冲击人民解放军机关、部队，抢夺人民解放军的武器装备，殴打、绑架、杀伤人民解放军指战员。

四、破坏铁路、公路、桥梁，武装袭击列车，抢夺交通工具，抢劫旅客财物、危害旅客生命安全。

五、抢占国家银行、仓库、商店、私设银行、抢劫国家大量资财。

六、用武力强占地盘，构筑武斗据点，实行反革命割据，

残害人民群众，向群众敲诈勒索，派粮派款。

七、煽动、威胁工人停工停产，煽动农民进城武斗，破坏工农业生产和国家计划。

《723布告》做出了八项规定：

一、中央重申过去发布的布告、通令、命令、通知等，任何组织和个人，都要坚决、彻底、全部地执行，不许违抗。

二、双方立即停止武斗，解散各种形式、各种名称的专业武斗队，撤除一切武斗据点，上缴一切武器装备。凡放下武器的，或回原单位，或由解放军进行集中训练，武力强占地盘，拒不执行本布告负隅顽抗者，由人民解放军实行军事包围，强制缴械，逃跑流窜者实行追捕，归案法办。

三、解放军的武器、弹药、车辆及其他装备物资，一律不许侵犯。抢夺人民解放军的一切装备，必须无条件地退回。对挑拨军民关系的阶级敌人，要给予坚决打击。

四、立即无条件恢复铁路、公路交通运输，撤除同蒲铁路段非法的３１８次列车。冲击车站，袭击列车，破坏铁路和公路运输，抢劫车站物资、车辆、搜查抢夺旅客财物，都是土匪行为。对极少数坏头头和反革命分子要逮捕法办。

五、银行、仓库、商店等国家财产，任何人不得霸占、抢掠，要严办抢劫国家财产的主犯，追回抢劫国家的一切物资和资金。

六、对杀人放火和其他罪大恶极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应

当发动群众检举，对确有证据者，要列出他们的罪行，交给当地群众家家户户讨论，并依法惩处。

七、对煽动威胁职工离开生产和工作岗位的坏人，必须依法惩办。

八、凡分裂革命的大联合、破坏革命的三结合行动，另立的山头，一律都是非法的，中央概不承认。重新拉起的队伍，都要立即解散，实行归口大联合。

《布告》强调："自本布告公布之日起，逾期一月不回工厂生产、不回机关工作者，工人、职员停发工资。如继续对抗，长期不回者，责成山西省革命委员会视情况给予纪律处份，直至开除。"

为使《布告》尽快得到落实，中央政治局又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了解决山西问题的最后一次会议。会议结束前，周恩来代表党中央宣布：由谢振华担任中共山西省委核心小组组长。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决定将刘格平、张日清等调离山西，到河北省办学习班。陈永贵仍被保留在核心小组，但在北京也受到了批评。几位中央领导根据周恩来的指示，批评陈永贵有派性，强令他在太原召开的公布《723公告》的群众大会上做检讨。奉中央之命，新华社的一位记者替陈永贵写出了一篇发言稿，检讨他自己在山西群众中搞资产阶级派性。

就在中央发出关于山西问题的《723布告》的前一天，7

月22日，38军和保定地区革委会也联合发出了针对保定地区武斗的《七二二布告》，提出了两派制止武斗、上交武器，无条件回厂、回校，按系统、行业、班组搞大联合，坚决镇压反革命等一系列强制性措施。

根据中央《723 布告》精神，经中央军委批准，山西省军区调动了北京军区驻晋各部队及从河南调入的 1 军一个师共 20 多个团的部队，组成了上百个宣传队，由数十名军、师级领导干部带队，深入到山西各地、市宣传《723 布告》精神，并统一负责“支左”工作，努力促进对立两派的大联合。他们到武斗最严重的地区，如大同煤矿、阳泉市、平遥县、长治市去制止武斗。经过 20 多天的工作，收缴武器 7 万余件，拆除了各机关、学校、工厂内构筑的武斗工事，解散了武斗队数千人，平息了武斗，稳定了局势。平遥军火生产中心也在解放军开进平遥后垮了。

平遥县为了保护他们的军火生产基地，曾自己建立了一支城防卫戍部队，有一百几十人，全部佩带本地造的“五四式”手枪。平遥城被称作“龟城”，有六个城门，城墙是国家保护文物，没有拆掉，里面人把城门一关，外面很难攻进去。临近平遥的汾阳县是“兵团派”的天下，“兵团派”想“解放”平遥，就必须研究攻城术。他们在造炮上下功夫，把氧气瓶的底锯掉，做成炮身，怕炮身强度不够，又在外面加了几道钢箍，再加一个支架，就成了大口径迫击炮。他们

铸造的迫击炮弹，每发重 75 斤，相当大，但射不远。原因是他们怕装的炸药多了，炮膛会承受不住，会炸膛。这些炮已试射过，正准备用它轰平遥的城墙，中央的《723 布告》来了，解放军把它们全部收缴，不然平遥城可能倒大霉。

8 月初的一个晚上，月明星稀，盛热难熬。驻中办山西学习班的原清华大学工宣队、军宣队的队员们，各自向他们管辖的小组发出了紧急集合的命令。没睡下的，急忙出门，睡下了的，急忙穿衣服准备出门。每人都拿上自个的小板凳，规规矩矩地在工宣队和军宣队吹响的哨声里排好了队。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平时还是对立面，一见面就乌眼鸡似的，可现在却都在用眼神彼此打探消息，传递着同样的不安和恐慌。自从传达了《723 布告》，一个个心里正紧张着呢，今儿晚上的紧急集合，天晓得又要出什么事情！

他们排着队来到操场，再一个个一排排坐在自个带着的小板凳上，等着开会。一位负责人宣布开会，说今天晚上有中央首长接见大家。主席台上果然就出现了由陈伯达领头，纪登奎等中央领导人随后的一干人等，一个个神色严峻，脸上绝无丝毫笑意。

说是接见，实际上是训话。陈伯达口口声声要学员们老老实实交待问题，最后就开始点名了：“刘格平和张日清，是山西两派组织的派头头，还有袁振也是个派头头……”

“谁叫杨成效？”陈伯达又用福建腔发问了。

杨成效便朝台上的中央首长点着头站了起来，山西省的夺权总指挥还从来没有过如此顺从的模样呢。

“特殊审查。”

还有啥可说？杨成效当时就被叫出去，更确切地说，是被押了出去，接受特殊审查。山西的“兵团”司令、中学生刘灏目送着他的死对头消失在远处，手心里不禁捏出了一把汗。这决不是为杨成效，而是为他自己。

“谁叫汤建中？”陈伯达又点了一个人。

妈呀！这下子轮到“兵团”了。刘灏司令心里那个紧张呀，汤建中可是众所周知他“刘司令”的“高参”呀……他也与杨成效一样，出列离队，接受特殊审查，罪名是混入革命群众组织的坏人。

台上中央首长们又训了些什么话，刘灏再也听不进去了。他真有些想不通了。“兵团”明明是紧跟中央文革小组参加“文化大革命”的，怎么你中央文革小组的组长如今是左右开弓，连个是非也不分了呢？他又想：“杨成效和汤建中被‘特殊审查’了，我呢？”此时的刘灏是啥话也不敢说了。

中办学习班里的形势越来越紧张。这次中央首长接见后不久，周恩来又代表毛主席和党中央来山西学习班宣布，由谢振华将军担任山西党的核心小组组长，主持山西工作。同时宣布将刘格平、张日清、袁振三人调离山西，由中央另做

安排。在没有安排新的工作前，依旧留在学习班斗私批修。由此，身经百战的谢振华将军，开始在山西展开了稳定局面的工作。

过了一年，1970 年 8 月，山西省公检法军管会逮捕杨成效。

1970 年 9 月 12 日，由中国人民解放军山西省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署名的两份《通知》，经全省各级革命委员会和军管会，下发到全省基层单位学习讨论。

一份是杨成效的罪行，其中列举了四大罪行：

一、迫害老干部致死。

二、破坏生产，挑起武斗，多次进行打、砸、抢、抄、抓。山西历次武斗，多为杨成效挑起，对社会危害极大。

三、烧杀奸淫，无恶不作。在造恶后还酿成了将被害女学生推下高楼致死的命案。

四、破坏社会治安，抢占民女和民间财物。

这些罪行中，除“抢占民女”中那“民女”实际是杨成效的情妇外，其他是件件具实。

另一份是汤建中的罪行。《通知》中的“现行反革命分子汤建中的罪状”全文摘录如下：

现行反革命分子汤建中，男，37 岁，旧职员出身，学生成份，上海市人，原系山西人民广播电台机务科副科长，1953 年因破坏军纪受撤消团内职务处分。汤犯的父亲汤家福跟随

英帝20余年，是个地地道道的洋奴。其弟汤正平曾三次妄图越境投敌被判刑7年。

汤犯一贯坚持反动立场，思想极端反动。多次恶毒攻击伟大领袖和无产阶级司令部，对抗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破坏无产阶级专政，犯了一系列严重的反革命罪行。

一、恶毒攻击伟大领袖，疯狂反对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1961年以来，汤犯多次在广播电台机关和528工地借机恶毒攻击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反对学习毛主席著作，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恶毒污蔑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汤犯混入群众组织，利用资产阶级派性，在各种场合，采取多种手段，以极其恶毒的语言，先后在山西人民广播电台、并州饭店、太原五一广场、北京后勤学院等地，多次对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进行攻击和污蔑，在党的“九大”期间，竭力为“二月逆流”翻案，借“二月逆流”干将之口，攻击污蔑我们的副统帅，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贺龙翻案。当“七·二三”布告发布后，汤犯又大肆诽谤中央对解决山西问题所采取的一系列的正确方针、政策，妄图分裂无产阶级司令部，反革命气焰十分嚣张。

汤犯自1956年以来，长期偷听敌台广播，无耻吹捧帝、修、反，胡说什么“现在还不能肯定苏联是修正主义国家”

等反动言论。

二、分裂、攻击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毁我长城。

汤犯出于反革命目的，对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伟大的人民解放军，大肆进行攻击、分裂和诽谤。1968 年在中央办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恶毒诽谤说：全国的解放军“大都执行了‘二月逆流’，镇压了造反派”，特别是当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杨、余、傅被揪出以后，汤犯反动气焰更是甚衅（注：原文即如此。衅字应为嚣字）尘上，不遗余力的多次在北京后勤学院、民族饭店等地，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杨成武鸣冤叫屈。汤犯在北京民族饭店，竟明目张胆的造谣说“中央信任某某部队，不信任某某部队”，还以“王牌军”、“嫡系部队”等极其反动的言词，恶毒污蔑、分裂人民解放军，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

三、破坏革命大联合、三结合，矛头指向新生的红色政权。

汤犯以资产阶级派性为掩护，在群众组织头头中，恶毒攻击毛主席亲自批示“照办”的七月会议纪要“照办”是假的。汤犯还野心勃勃的搞了一套所谓“改组省革委方案”，自封宣传组副组长。

汤犯鼓吹、策划武斗，破坏了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于 1967 年底至 1969 年初，曾多次召开会议蒙蔽群众，鼓吹武斗，严重的破坏了局势的稳定。

四、汤犯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一贯利用封、资、修一套腐朽、反动的东西，腐蚀、毒害青年，经常向本派的头头灌输封建皇帝秦始皇“一统天下”的反动思想，“搞一派掌权”煽动群众组织，还让他们学习古书和“佛经”，胡说什么“这里边有辩证法的萌芽”，来毒害群众，制造思想混乱，阴谋干扰和破坏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分裂太原地区两派群众组织的革命大联合，破坏太原地区的大好形势。

汤犯一贯坚持反动立场，极端恶毒的攻击、污蔑伟大领袖，疯狂分裂无产阶级司令部，大反人民解放军，毁我长城，煽动资产阶级派性，破坏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罪恶累累，证据确凿，认罪态度极坏，胡说什么他讲的“都是客观存在”，真是反动透顶。

杨承效、汤建中的罪状在山西发到近乎人手一份的程度。在广泛征求群众意见后，杨成效判死刑，汤建中判无期。

11 月 10 日，杨成效被押上了刑场，执行了死刑。

汤建中则在文革结束后的 1981 年 3 月底被无罪释放。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 1981 年 3 月 25 日下达了关于他的（80）晋法刑二甲字第 109 号刑事判决书，内称根据汤建中向本院提出的申诉，做如下判决：

“现查明：原判认定汤建中的罪行绝大部分事实属于言论。但这些言论有些是针对林彪、‘四人帮’的，有些反映了客观事实，原以现行反革命论罪科刑是错误的。据此，判

决如下：一、撤消山西省公检法军管会（70）军管刑字第501号刑事判决。二、宣告汤建中无罪。”

汤建中被无罪释放后，重新回到山西省广播电视局工作，直至晚年退休。

## 第 1097 回：中美间，无声息互作姿态

召德生，贵州紫林庵武斗

1969 年 7 月，中南海西花厅。一份公安部转来的广东省公安厅的急电放到了周恩来那宽大的办公桌上。急电说：

7 月 16 日，在临近香港的海面，抓到了漂进我们领海的两个美国人。请示如何处理。

按常规，这类事情无非是作为帝国主义向中国挑衅的靶子在报纸电台上揭露一番。但是，如今情况有所不同了，自 1969 年尼克松入主白宫后，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似乎出现了一些新的苗头。

2 月，担任美国总统不久的尼克松，要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研究对华政策，“试探重新同中国接触的可能性”。美国政府还声称，准备对中国放宽人员来往和贸易交流的限制。

其实，早在尼克松上台前后，毛泽东已经开始关注他。1968 年冬天，毛泽东读了有关美国总统竞选的材料，并对在中国的美藉专家柯弗兰写的文章，表示“欣赏”。他还仔细阅读了不久后当选为美国总统的尼克松所写的《六大危机》，认为该文“写得不错”。1969 年 1 月，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人民日报》全文刊登了尼克松在 1 月 20 日发表的就职演说。

周恩来决定亲自抓广东省的那两个美国人的事情。他吩

咐秘书，上午立即召集公安部、外交部的负责人来开会。他要公安部责成广东省公安厅派得力的人去搞清楚两个美国人乘游艇闯入中国领海的真实情况。在没有查清楚之前，不要在报纸上进行宣传，不要随随便便给戴上“美国中央情报局间谍”的帽子。两个美国人的住宿、饮食要妥善安排好。

果然，美国方面也在密切注意中国对两个美国人闯入中国领海一事的反应。本来，美国准备在这一天宣布放宽对中国的贸易和到中国旅行的限制，因为发生了这件事，美国推迟了宣布。他们要看看中国对这件事情的处理。

但几天过去了，中国方面对此一直保持沉默。

7 月 21 日，美国国务院宣布：放宽对美国旅游者购买中国货物的限制；放宽美国公民到中国旅行的限制。

事情很快就查清楚了。7 月 23 日，周恩来接到广东省公安厅的报告，说:，经调查，这两名美国人是来香港旅游的。因其所乘游艇倾覆而漂到中国领海。周恩来立即批准释放这两名误闯中国领海的美国人。

这是尼克松上台后，中美之间第一次无声的对话。双方都没有给对方表白，但彼此都明白对方的意思。双方都没有失去自己的尊严。

7 月 26 日，尼克松动身访问菲律宾、印度尼西亚、越南、泰国、巴基斯坦和罗马尼亚 6 国。就在同一天，苏联外交部第一副部长突然约见中国驻苏代办，面交苏联部长会议给中

国国务院的内部声明，要求举行中苏高级会谈。同时柬埔寨元首西哈努克亲王，也派人召见中国驻柬埔寨大使，面交美国参议院民主党领导人曼斯菲尔德 6 月 17 日写给周恩来总理的信，要求访华，并会见周恩来总理或其助手。曼斯菲尔德在信中呼吁，中美“20 年长期交恶”，这种现状不应再继续下去了。

7 月下旬的一天，驻安徽的 12 军军长、安徽省革委会主任李德生正在合肥开会，忽然接到周恩来从北京亲自打来的电话，通知他：“德生同志，毛主席、党中央决定调你到北京来工作。”

李德生感到很突然，便向周恩来说：“总理啊，我长期在军队，经验不多，比较适合在下面工作，是否请中央再考虑一下，我仍在安徽工作。”

周恩来在电话里答复道：“这是中央决定了的。请你尽快到北京来，来之前给中央办公厅打个电话，好安排飞机去接你。”

李德生不敢怠慢，简要地交代了一下工作，与安徽省各地官员打了声招呼，便于 7 月 28 日乘坐中共中央派来的飞机赶到北京，于当天下午 15 时来到中南海怀仁堂等候周恩来接见。

周恩来见到李德生，征求他的意见说：“德生同志，毛主席、党中央决定让你到中央来工作。现在想征求一下你的

意见，你主要是在军委工作呢，还是主要在国务院工作？”

李德生回答说：“我在军队时间长了，愿意干地方上的事。”

周恩来听了微微一笑，说：“中央已经决定了，你除了参加政治局活动外，还参加国务院业务组和军委办事组的活动，同时仍然兼着安徽省、安徽省军区和12军的职务。”

我们再说此时的贵州。“九大”以后，贵州“411”不再用“总司令部”的名称，而是由贵阳师范学院杨文华提议，姚德仁力促，在新调防到贵州的0276部队支持下，各山头经过反复协商，形成了“贵阳地区‘411’联席会议”，并于1969年4月19日宣告成立，以紫林庵“黑大楼”为驻地，常驻人员有姚德仁、金光祥、涂光禄、谢垂泉等。

5月1日,“联席会议”勤务组在十三公里0276部队礼堂召开扩大会议，推举原“贵阳战斗团”团长宋达山为勤务组组长，原“红色工人战斗团”耿铁和贵州工学院的田子明为副组长。

中央3月27日“双红五条”下达后，贵州两派矛盾的焦点是怎样搞好大联合。李再含要求“411”先倒旗再联合。而“411”则坚持要先联合才倒旗。

5月19日，贵州省“九大”代表、贵州省革命委员会、贵州省军区、陆军第41师、贵州省独立师联合向毛泽东、林彪、党中央、中央文革、中央军委递交了一个贯彻“九大”

和“双红五条”的意见，共5条。

第二天，5月20日，贵州省军区在京常委又对解决贵州问题提出了5条措施，向中央表态，坚决拥护、支持、帮助贵州省革命委员会，认为提出“打倒李再含”的口号是错误的。

5月23日，中共中央以中发（69）25号文件转发了贵州省革命委员会、贵州省军区处理贵州问题的这两个报告。

但是，群众组织“捍三红”依然在贵阳地区25个工厂制造武器。而“411”也在汽车三场用钢板将一辆汽车改装成“土坦克”。“联席会议”郭玉珍还从盘县弄来两支手枪和两箱炸药。工建交指挥部伍昆宪等带一车人从乌当区水田公社武装部弄来两挺机枪、25支步枪，但只有12发子弹。贵州省军区参谋长王彦才前来问责，“‘411’联席会议”办事组副组长郭平回答说：

“不能只许‘捍三红’造枪造炮，也要允许我们自卫。”

王参谋长无言以对。

与此同时，“‘411’联席会议”在5月23日接待新华社贵州分社记者安一长、张新民时，提出要求：一是要求公开表态“411”是什么组织，为“反动大杂烩”摘帽；二是收缴“捍三红”的武器，制止武斗，惩办凶手；三是释放被关押的“411”学生和工人；四是举办两派学习班，解决归口联合问题。

5 月 26 日，贵州省军区、军分区和 7578 部队，即省军区独立师的代表王光银、汪胜永、陈俊林、左从清来到“联席会议”，要求撤出据点，收缴武器。得到的答复是：缴武器“捍三红”应先兑现；杀人凶手要严惩；“411”是什么组织要定下来。这三条兑现了，“411”撤出据点。

6 月 9 日，贵州“411”召开了全省各地州市“411”代表的联席会议，到会的有都匀、施秉、凯里、兴义、盘县、毕节、安顺、平坝、遵义、铜仁的代表。

7 月 12 日，贵州省军区参谋长王彦才、0276 部队青年科科长陈匡来到联席会议，就收缴武器和撤出据点问题听取和交换意见，表示今后多来联系。

7 月 28 日晚上，贵阳市汽车三场和紫林庵方向的枪声响个不停。29 日清早，人们起来一看，紫林庵停了很多汽车，车头上架着机枪，车底下也有人持机关枪伏在那里瞄准。周围全是头戴藤帽，手拿梭镖和冲锋枪的人，他们打着“411”旗帜，似要攻打对面的计委大楼。后来“411”说这些人是“捍三红”冒充“411”。

贵阳师范学院孙世正这天晚上恰好住在汽车三场办公楼里。第二天早上，他刚起来不久，就有人气喘嘘嘘地跑来报告，说计委大楼里向外开枪打死人了，并说其中一位卖纸花的老太婆中弹后还没死，就一起被拖进了计委大楼门洞里。

孙世正立即揣着一枚手榴弹与其他人一起奔向“‘411’联席会议”所在的紫林庵，然后顺着计委大楼东侧墙根往大门口摸过去，想看看门洞里的情况。刚一伸头，突突突几连发子弹从门洞里射出。过了一阵，孙世正蹲下去试着再伸一下头，又是几连发子弹打来。他紧张的将裤子口袋里的手榴弹拉上火，示意后面的人，沿着墙根退回去。

此时紫林庵周围已集聚了许多人。孙世正绕到计委大楼前的一片柏树林里，从一棵树蹿到另一棵树，来到大楼前离大门较近的一棵树背后往门洞里看。但是门洞里光线很暗，黑糊糊地看不清楚。

正在这时，一位中年解放军干部从楼的东侧挤出人群，向大门走去。他斜背着军用挎包，一边上台阶一边举起右手向门里喊话：

“老王（黄）不要开枪！”

谁知话音未落，突突突几发子弹从门洞里射出。只见这位军人右手还未放下，左手捂住胸部，大声喊着转身往回大步走来，孙世正赶紧冲了过去，那位军人正好倒在孙世正身上。孙世正赶忙把他反背着拖进树林。紧接着，两位壮实的小伙子上前帮忙，3 人合力将这位军人抬上一部公共汽车送医院抢救。但因身中数弹，伤势过重，在途中就撒手人寰。

这位军人是独立师的一位营职干部，名叫左从清。

此时，紫林庵周围已有数千人围观。

有人通知孙世正去建工大楼“411”据点开会，会上决定出动“土坦克”，车内带有5支中正式老步枪和1挺捷克式轻机枪。

“土坦克”开到紫林庵，停在计委大楼大门百米外的路口上。大门内的火力向“土坦克”射击，但是钢板很厚，只听见子弹击中钢板的叮咚声，车内很安全。

由于视线不好，这部“土坦克”摇摇晃晃地开上了马路牙子。

有手榴弹掉在车下爆炸，驾驶台有人受伤。车继续前行一段距离，在紧靠延安照相馆的修鞋铺旁一歪就停下了，车内人员开始撤离。

这时，成千上万人围在紫林庵周围，四个路口堵满了围观的人群。后面的人为了看清情况慢慢往前挤，特别是小孩子们总往前钻，于是整个人群逐渐往前移动。这样移动的结果，引起计委大楼上一梭子弹扫向人群前面的空地上，人群又如退潮般向后跑。当另一路口的人群往前移动时，大楼上又向那个路口扫射，而这个路口的人群又会自发地慢慢往前移动。子弹并没有扫进人群，但是有的流弹由地面反弹起来后可能击中围观的人。一阵枪响之后，在人群骚动中会有人中弹倒地。

在延安商店的顶楼，有几个记者在拍照、摄像。

停放在汽车三场的一辆由公交车改装成的“411”广播

宣传车开到紫林庵广场，播音员的现场喊话，但是被计委大楼斜对面的省政法大楼楼顶上，省射击队的射击手击中轮胎。接着贵阳七中女学生田成琴、贵阳十七中女生陈明珠被打死在车外。

大约到了下午 3、4 点钟，高音喇叭大声广播中央下达的两条命令，内容大概是：一、“411”不要包围计委大楼，立即撤走。二，独立师开枪是错误的。命令立即执行，违抗者法办。

事态于是很快平息，围观人群也很快散去。

战斗停止后，群众纷纷前去观看，只见计委大楼楼梯过道都是流淌的鲜血，很多尸体横七竖八地堆放在一起。撞在墙壁上的“土坦克”，钢板留下了被步枪、机枪子弹打的洞。下午，“捍三红”的几辆汽车全都放下箱板，把被打死者的尸体平放在汽车上，车上的人头戴藤帽，手持梭镖站在车箱两边，车头上还架着机枪。尸体运到北郊粑粑坳掩埋。

“7.29”事件共死伤 176 人,其中打死 54 人,仅停放在汽车三场的就有 14 具尸体。可谓尸横闹市，血流街头。

周恩来看到新华社贵州分社的两份观点和材料各不相同的关于贵州“7.29”事件内参后，立即派专机到贵阳，把驻在那里的 6 名新华社记者接到北京，其中分社 4 名，总社 2 名，听取他们的汇报。随后，他语重心长地说：

“你们不要带资产阶级派性了。你们的观点一时改不了

不要紧，但反映情况时对事实一定要核实，事实要搞清。我们这样相信你们，你们一定要把事实告诉我们。”

“你们要尽可能地听取双方的意见，还要听听第三者的意见，如实向中央反映情况，让我们来判断。”

周恩来决定从新华社抽调记者组成赴贵州调查组。

7 月 31 日，新华社抽调的记者集中开会，首先传达周恩来的指示，要求他们到贵州后多观察、了解，不表态，只向中央反映实情。并指定国内政治组组长宫策负责带队。

第二天，8 月 1 日一早，新华社贵州调查组便急匆匆地飞赴贵阳。空军人员对他们说：

“你们任务紧，只能临时安排这架运输机了，没有座位，只好辛苦大家了。”

新华社贵州调查组就蹲在空荡荡的货舱里，飞越黄河、秦岭，来到了贵阳。

新华社贵州调查组到贵阳后分为两个小组，一组留在贵阳，另一组到贵州武斗最严重的铜仁地区。

当赴铜仁的小组进人铜仁地界后，便遇到头戴柳条帽、手持武器的武斗人员拦住车辆进行检查。他们只好下车说明情况，并将写有“中央调查组”的字牌贴在车前的挡风玻璃上。以下是他们在铜仁城乡调查近一个月后，写的内参调研材料。

之一:

# 贵州铜仁地区乱打乱抓乱杀现象仍然存在

最近记者来到铜仁地区，耳闻目睹，了解到这里武斗气氛很浓，抓人、打人、杀人现象仍在不断发生。

据了解，许多县、区、公社都关押人。铜仁“三红”总部到目前还关着十四人，吊打多次。少数民族聚居的松桃县，各区、社大多关了人。石阡县城内关了人。印江县把人关在山上的王皇阁里。在印江县树黄区，记者看到了正关着的区革委会副主任张xx。张对记者说，现在这里还关了不少人，经常吊打，我就被吊打了八十多次。

记者访问了松桃县孟澳区七江公社一个转业军人，他被关了两个多月，手被打断，最近跑出来。他对记者说，被关的人吊打得厉害，他总共被吊打了一百多次。他说，公社革委会委员代昌墓(“支红”派，党员)，被抓回去不久就枪杀了，他母亲被吊打死了。

在铜仁地区，各地“三红”派都成立了治安保卫小组，总指挥部、民兵营等组织，指挥抓人、打人、杀人。在铜仁城里，治安保卫领导小组，经常深更半夜派出武装人员，以查户口为名，进行搜查。许多地方路口设卡，武装人员对过往人员车辆进行搜查，记者就碰到过好几次。地区革委会主任李贵鑫，八月十三日从贵阳返回铜仁，在路上被一百多武装人员盘查达六个小时。

自从七月份以来，单铜仁城中，各级革委会负责人因不

合“三红”派的口味而遭打的就不下十人。地区革委会成员赵保，在一次分区召开的联席会议上发表了不同意见，出来在分区门口就遭到围攻和殴打。地区财务局革委会成员叶芝长，因为拒绝批条子取公款就被“三红”毒打一顿。

之二:

铜仁地区双方继续大搞专业武斗队

铜仁地区对立的双方都还在继续搞专业武斗队，加紧造枪炮，直到八月二日、三日，“三红”派还用武力打下了“支红”派占据的铜仁县洋头区。被赶走的朱、杨一部分人，正在外边集结力量，准备打回来。据铜仁地区革委会主任李贵鑫反映，朱、杨这些人在贵阳还准备去抢公安厅的枪。据他了解，朱、杨在贵阳还杀死了三个不同意他们意见的人。

记者到许多地方都看到武斗的指挥机构和专业武斗队。记者去“三红”专业武斗队指挥部所在地师范学校访问，看到里面戒备森严，有枪、有军用电话、军用地图、军用望远镜，有三部小汽车和十三部大卡车，里面有一百余人吃饭。据“三红”派勤务组一位成员(掌握武装力量的重要头头之一)对记者说:指挥部直接掌握六个武装连，六百多人，四百多条枪，现在都调在“前沿阵地”。记者到松桃县采访，见到这个县的武器比较多，很多散在群众之中。记者在一渡口的苗族民兵连长家里(转业军人)亲眼看到房子里面放着一支冲锋枪，一门六零炮，一个望远镜。

之三:

贵州铜仁地区广大革命群众要求迅速解决铜仁问题

记者在铜仁和群众接触中，不管是农村还是城市，人人普遥厌恶武斗，对当前局势不满，强烈要求中央迅速解决铜仁问题，保障人身安全。

群众谈起大规模武斗的惨状，至今还有恐惧不安的情绪。现在,“支红”派怕，中间派也怕,“三红”派内部也怕。据“支红”派的人说，现在逃出的人约三万人左右。“支红”派和中间派的群众提心吊胆，许多人整天不敢出门，晚上门紧闭。“支红”派都怕见记者。地区革委会常委潘中玉，记者专门找他都躲避不见。记者访问了一个叫 xxx 的青年工人，他原是“三红”派的一个小头头，参加了这次武斗，认识到杀人太多不应该。当他在向记者谈情况时非常怕，全家都很紧张。临走时，他对记者讲:“我是拿一条命来给你们讲的。”

由于局势不安，群众没有心思搞生产。现在，铜仁城里除了一个化肥厂外，其余工厂都已停工。全国最大汞矿万山汞矿七八千工人大都逃走了，全部停产。国家投资兴建的飞机场，按原规定国庆节前完工，现在也停下来了。

群众强烈要求中央解决问题，普遍的呼声是:(一)要求坚决执行“七·二三”布告，目前首先要无条件地收枪，解散专业武斗队。(二)要求纠正支一派压一派的错误，在群众中挽回影响。

周恩来安排0276部队在贵阳举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并拨给人民币5万元，粮食5万斤。

学习班设在贵阳市望城坡0276部队通讯营，定名为“中央批准的贵阳地区革命群众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参加学习班的都是“411”的学生、工人和干部。通讯营房屋不够用，还就近借用了马路对面的贵州省城市建设学校大礼堂。

学习班以1公里外进出贵阳火车站的铁路正线为安全边界，要求大家的活动不要超出这条界线。学习班的工作由0276部队师首长直接领导。

8月下旬，新华社调查组完成了贵州问题的调查。周恩来在看过新华社记者写的调查材料后，决定将贵州省和地区的相关人员、各派头头87人统统调到北京办学习班，具体工作由纪登奎负责，下设的工作班子由国家计委副主任、原福州军区空军司令员、三机部军管会主任陈华堂牵头。学习班从8月31日开始，到10月18日结束，历时49天。学习班和工作班子都在京西宾馆，实行封闭式管理。

第 1098 回：做检查，徐州三改革委会

西北败，铁列克提遭伏击

7月27日，根据周恩来指示，68军党委向中央提交了《关于贯彻落实“九大”精神的几个问题的报告》，承认68军党委“长期陷入资产阶级派性，犯了支一派压一派的严重错误，……给徐海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部队建设都造成了很大损失”，并提出改进措施，还附加一份《关于改组徐州市革命委员会的请示报告》，提出革委会的成分构成和具体人选。毛泽东批示“照办”。

7月29日，周恩来代表中央对68军报告做出肯定性批复。随后，这份报告作为中共中央1969年45号文件转发全国。

当天，“徐海班”召集全体会议，由68军政委李布德传达1089回提到的中发〔69〕26号关于山东问题的文件。该文件是转发山东王效禹、杨得志、袁升平三人5月24日给中央的报告，印发山东地方公社以上、驻军营以上单位，其中也提到了徐海地区的问题。

7月30日，周恩来、李作鹏、康生、江青、姚文元等人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徐海班”全体成员。李作鹏宣读中央对68军党委报告的批示。其他领导人对徐州两派头头做出严厉批评，提出明确要求。其中“踢派”栾昌善、徐峰和“支派”孔庆荣、朱林等人被点名。当夜，“徐海班”成员陆续乘火车返回各市县，持续一年零两周的“徐海班”宣告结束。

8 月 1 日，经党中央和毛泽东批准，徐州市革委会再次改组，第三个徐州市革委会宣告成立，俗称“八一”革委会。按照 68 军提交中央的改组方案，革委会由 85 名委员组成，其中革命干部代表 13 人，占 15.3%（暂缺 9 人）；军队代表 20 人，占 25.5%（暂缺 1 人）；革命群众代表 48 人，占 56.5%（暂缺两派以外的革命群众代表 3 人）；留给脱钩单位名额 4 名，占 4.7%。革委会常委由 27 人组成，其中革命干部代表 4 人（暂缺 1 人），军队代表 9 人，革命群众代表 14 人。在 7 名正副主任中，张鋞秀（68 军军长）任主任，吴怀才（68 军副军长）、刘汝贤（68 军副政委）、韩本初（原徐州市委书记）、夏云芝（“革命干部”）、栾昌善（踢派）、孔庆荣（支派）任副主任。与此同时，张鋞秀被任命为核心组组长。

在徐州市革委会的大门口，有人偷偷地贴上了一首打油诗：

踢得好，

支得对，

一年一个徐革会，

干部乱站队，

群众跟着活受罪。

这首打油诗，后来又加了几句：

支的好，

踢的对，

一年一个革委会，

写不完的检讨，

站不完的队，

批不完的私心，

流不完的泪，

不知哪回才是对，

群众跟着活受罪。

“八·一”革委会成立后不久，张鋐秀调任济南军区副司令，吴怀才接任68军军长。在随后的“整党”运动中，68军政委李布德在68军党代会上落选，调任山西省军区政委，同情“支派”的军政治部主任田波升任68军政委。后来，支持“踢派”的68军副参谋长祖岳嵘等3名正师级干部和100多名团以上干部被审查、撤职，1名保卫科长被迫害致死。而许多支持“支派”的军队干部则得到提拔、重用。刘显模由徐州军分区副政委升任政委，吕文俊由68军司令部处长升任政治部副主任。

在当地两派群众组织中，“踢派”和所谓“假支派”头头悉数在“清队”和“清查516”期间遭到清洗，杨正祥等人以“现行反革命”罪判刑，徐峰、杨卫东等人被迫害致死。而对涉及炸桥破路事件的“淮海831”一些头头的调查处理最后不了了之。

8 月 9 日，江青就当时文艺工作和普及样板戏问题致信林彪，要求林彪把她的信和她与姚文元合作搞的两个材料批发全国。随信附了两个材料，一个是对鲁迅《答徐懋庸》等几篇文章的《批注》，一个是对周扬关于资产阶级文艺复兴言论的《评注》。江青在信中说，鲁迅早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就已经识破周扬不是一个真正的革命者。

叶群从会场抱回这包材料，对“林办”秘书说：

“这是个大难题呀！你们谁去给首长讲讲啊？刚才 11 楼叮嘱我，一定要首长支持她，可首长为她那句话气还没消呢，怎么会给她批呢？我真担心首长会把她顶回去。”

叶群说的“首长为她那句话”是指江青对林彪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讲话的批语。虽然事情已经过了大半年了，看来林彪还没有忘。所以，秘书们平时谁都不愿意报江青的文件，此时，开始谁也没吱声。最后，还是于运深把“难题”接了过去。

据后来于运深说，他给林彪讲时，林彪接过材料看了一眼便扔在地毯上，气愤地说：“纯粹是假马克思主义。我是管打仗的，不要理睬她！”

江青的材料被扣压下来。这一点叶群预料到了，但她不愿意林彪得罪江青。第二天，叶群叫保密员李根清拿着材料去见她，对他说：

“这个材料不能压在咱们这儿，刚才 11 楼还来电话问

首长批了没有？要首长快点批。人家两个人搞了几个月，拿它当宝贝，怎么可以不理睬呢？”

叶群指着办公桌上的电话机说：“这不，（江青）还等着我回电话呢！”

叶群靠在沙发上想了一会儿，抬起身对李根清说：“小李，这样吧，还是你替首长批几个字吧，就批‘请政治局讨论后呈主席批示’。”

李根清觉得叶群这个主意很聪明，既没有硬顶江青，也没有直接把球踢给毛泽东，是替林彪化解了一个难题，于是就在叶群面前替林彪划了圈，然后批上了叶群交待的那句话。

政治局会议讨论那天，叶群故意躲着没有出席。据吴法宪回忆，那天只有江青、康生、张春桥、姚文元四个人坚持下发全国，周恩来和政治局其他多数成员都不同意，未予通过。江青等人仍坚持下发，周恩来发了脾气，说：“江青同志，你要懂一点民主集中制，懂一点集体领导的原则嘛！对这个问题，多数人不赞成，只有你们三四个人同意，就硬要往下发，这样做行吗？你屡次干扰大家，大家不同意，你非要通过，这是一种分裂党的做法。而且，即使要往下发也要经过毛主席，要经过毛主席同意才可以。”

最后，周恩来把材料报送给了毛泽东，被毛泽东扣压。

8 月 10 日，河北省保定地区公检法机关军管会在保定市

体育场召开“坚决镇压反革命分子宣判大会”，十多万人参加，北京军区、38 军和保定地、市革委会负责人到会讲话，会上宣判两名“行凶杀人犯”死刑。

我们再将视线转向国际。美国总统尼克松在出访 6 国时多次表示，美国准备开始同北京交往，反对苏联建立“亚洲安全体系”，并说，如果让中国继续处于“孤立”状态，亚洲就不能“向前进”。他称，美国愿意同苏联和中国都建立友好关系。回国后，尼克松表示，明年春天以前不再出国。外电评论，这意味着尼克松不愿匆忙与苏联举行最高级会晤。一家英国报纸认为，尼克松此次出访 6 国，是要利用中苏矛盾，改善欧洲局势。

8 月 8 日，美国国务卿罗杰斯在澳大利亚堪培拉发表演说，声称：“台湾的中华民国和大陆上的共产党中国都是生活中的现实。”“大陆中国终有一天会在亚洲和太平洋事务中起重要作用。”“这就是我们在一直寻求打开来往渠道的一个原因。”

陈毅等四位老帅比较研究了尼克松访问 6 国后，美、苏两国领导人的讲话。

叶剑英认为：美国不得不从南越逐步撤军，而苏修却在大力推动建立“亚洲安全体系”。尼克松访问亚洲 5 国，是怕苏修接管“真空”。另外美国国务院宣布对中国实施“两个放宽”政策，步子虽然不大，但表明尼克松想拉中国而压

苏联。

聂荣臻说：苏联外交部长“葛罗米柯在半个月前反华的调子还那么凶，现在却来了个180度大转弯，要求举行中苏高级会谈，他是害怕中美和缓。”

徐向前接着说：“尼克松访问罗马尼亚，在东欧会引起连锁反应，苏修怕后院出问题，不得不向我们递出橄榄枝。”

陈毅谈到美国参议院民主党领导人曼斯菲尔德在6月17日给周恩来信中提到的中美20年来的关系，感慨万千的说：“‘20年长期交恶’，真是概乎言之！美国人可以上月球，就是接近不了中国，说明接近中国比登天还难，这也是美帝自己造成的。美帝憋不住了，苏修也憋不住了，他们的矛盾不可开交，都向中国暗送秋波，都向对方打中国牌。局势到了转折关头，后面还会有文章，我们要继续观察，必要时向中央提点参考性的建议。”

四位老帅提出：“美要利用中苏矛盾，苏要利用中美矛盾，我应有意识地利用美苏矛盾。苏渴望同美举行首脑会晤，尼克松迄今未同意。苏要同我举行高级会谈，目的之一是想捞取资本压美。它知道我不会当砝码，因此没有声张。我不宜急于表态，以免造成我屈服于其武力威胁的错觉。可拖些时候答复，指出举行高级会谈条件不成熟，可举行部长或副部长级会谈，只谈中苏边界问题。苏坚持顽固立场，谈判难以有成果，但抓住和谈旗帜对我有利，力争避免边界武装冲

突，维持较正常的国家关系对我有好处，这也可加快美接近中国的步伐。”

他们认为：“对曼斯菲尔德的访华要求不予置理。美急于同我接触，我应保持高姿态，再憋它一个时候。第 135 次中美大使级会谈原定 1968 年 5 月 28 日举行，由于美扩大侵越及美、越和谈，我借故三次延期。中苏边界谈判开始后，可恢复华沙谈判。”

八岔岛事件后，苏联在伯力组织示威游行，当时正在伯力参加“中苏国境河流第十五次航行例会”的中国代表团打电报要求回国。他们未带密码，周恩来指示：“用明电回答：要沉住气，争取达成一两条协议。”

8 月 11 日新华社报道：“中国代表团本着开好会议、解决问题的精神，同苏方进行了耐心的协商，就中苏国境河流航行的某些具体问题达成了协议，并签订了会议纪要”。

对此，四位老帅讨论时给予很高的评价。他们认为：“在总理指导下，就中苏国境河流航行达成若干协议，具有重要意义。一方面可以驳斥苏修说我‘好战’的谰言，表明我在坚持原则下谋求和缓；另一方面使美国担心中苏改善关系，有利于增强我在对美斗争中的地位。”

然而，四位老帅的建议未及写出，局势又出现重大变化：8 月 13 日，中国外交部照会苏联驻华大使馆，指出该日上午苏军侵入新疆裕民县铁列克提地区制造新的流血事件，中国

政府为此向苏联政府提出强烈抗议。

1969年4月，中央军委给新疆军区司令员龙书金发电报，特别说明毛泽东的指示："西北可能要出问题。"要龙书金早做部署。龙书金签名后，便将电报放进了文件柜，未对下传达。

进入6月，新疆军区关于外交纠纷的报告纷至沓来，有时一天多达20余份。龙书金未请示中央即下了一道命令："此后一般性的外交纠纷，可逐级报告，本级能处理的，可不必报告上级。"

8月10日，新疆北疆军区副司令员任书田到塔城军分区检查工作，塔城军分区政委王新光汇报工作时谈到最近对面苏军调动频繁，夜间可听到坦克的轰鸣声，怀疑苏军有阴谋。任书田副司令员立即将这一情况报告了新疆军区司令部。

8月11日，中国军队在两国边防军经常会晤的巴克图哨所悬挂起红旗，这是邀请对方司令官进行会谈的信号。然而，红旗悬挂了一天，苏军哨所的几位负责人：赫尔丘上校、安泽菲洛夫中校、巴什捷夫中校，谁也没有露面。

8月12日，新疆军区作战部部长孟魁武接到塔城军分区再次来电，认为苏军行动反常，马上报告了龙书金。龙书金放置一旁，没有答复。当晚，塔城军分区政委王新光政委又电话直要新疆军区作战值班室，报告当面苏军可能有重大的行动。请示明天的例行巡逻可否取消。

值班参谋回答："军区首长已接到你们的报告，但对取消例行巡逻一事没有明确指示。"

8 月 13 日上午 8 时，按照规定，巴克图哨所铁列克堤边防站巡逻分队在裴映章副站长带领下按计划执行例行巡逻任务，两名电影厂摄影师——八一电影制片厂摄影记者李连祥和新闻电影制片厂摄影记者温炳林，及新华社摄影部记者王一兵也跟随在巡逻队伍中。

由于 8 月 10 日，铁列克堤边防站一名战士去邻区办事被苏军偷袭牺牲。为预防万一，12 日午夜 24 时，中方在易遭敌袭击的巡逻地段中方一侧预设了掩护阵地。13 日凌晨近 5 时，苏军的直升机开始在中方预伏地段上空低空盘旋……

苏联扎拉纳什科利哨所与中国铁列克提哨所间的"石头山口"地段，有一条中苏边防军都会经过的巡逻便道，它蜿蜒在诸多小山冈之间，沿途有三个高地，分别是"左高地"、"石头高地"和"右高地"，中苏对这几个山冈的归属一直存在争议。

13 日这天，当铁列克堤边防站巡逻分队行至此处时，遭遇苏军的指挥车、装甲车、卡车多辆，步兵数十人，正向 676.5 高地西侧的无名高地开进。苏军突然开枪射击，打伤中方两名战士。

巡逻分队派两名战士把受伤战士背回，随后立即进入无名高地，与预伏在那里的掩护组汇合，进入战斗位置。

中方打了几发点射提出抗议，苏方又打伤中方两名战士。中方在无名高地，以及后侧的几个高地上的掩护组，开枪还击。但此时苏军人数众多，出动了十几辆装甲车及 T-62 坦克，步兵 300 余人，在两架直升机助战下，猛烈轰击中方阵地。而中方巡逻队仅有一挺 56 式班用机枪和一具 40 火箭筒，三支 56 式冲锋枪，战士们配备的是 56 式半自动步枪，还有一些手榴弹，都是轻武器。在光秃的小山顶上，既无工事掩体也无草木遮挡伪装，完全暴露在苏军火力之下。空旷戈壁滩变成了的屠场。苏军在敲掉中方的机枪火力后，士兵在坦克的掩护下一个个接近中方剩余的官兵，近距离开枪射击。最后的战斗随着中方最后一名身负重伤的战士拉响手榴弹而结束。中方除记者温炳林和战士袁国孝被俘外，其余全部牺牲。无名高地被苏军占领。

掩护分队和无名高地之间有 800 米开阔地，在苏军的重火器封锁下，根本过不去，只能眼看着无名高地上的战友们战斗到最后一刻。记者温炳林在敌人上来之前抽出胶卷曝光，砸坏照相机和摄影机，与被炮弹震昏过去的袁国孝一起被俘。后来在交还俘虏时，只有袁国孝一人。苏方说，温炳林企图逃跑被击毙。

中方掩护分队也有伤亡。整个战斗牺牲人数为 28 人，包括三名记者。他们也在最后的时候砸碎了机器，报废了胶片，捡起周围牺牲战士的冲锋枪和苏军打到最后。

等到中国陆军第 8 师的一个团携带轻重武器，从 60 公里外的巴克图据点赶来时，战斗早已结束。他们看到的只有牺牲的中国军人尸体，有些遗体已被烧成了黑炭。大漠孤烟，夕阳惨照，天将倾，地欲堕，黄昏血色，血色黄昏……

中国政府在 8 月 13 日事发当天即向苏联政府提出强烈抗议。

半个月后，中央军委调查组来到乌鲁木齐。塔城军分区政委王新光、参谋长南仲周汇报时认为，事件发生前，苏军调动频繁，情况异常，这些情况多次向军区司令部值班室汇报过，有电话记录可以作证，汇报中曾多次要求暂停巡逻，但上级都没有答复。北疆军区副司令员任书田说："接到塔城军分区的报告后，我们是慎重研究过的，并且有情况不明暂不巡逻的决定，但上报军区后，一直未接到批复，不得已只好让值勤分队继续巡逻，为了此事，赵副司令员曾亲自打电话找到龙书金，并且吵骂了一通。"

新疆军区作战部科长宫为友、政治部保卫科科长岳耀礼说："塔城上报的情况我们都已知道，作为参谋人员，我们也同意暂停巡逻，但是给领导汇报后，却没人理睬。"

新疆军区作战部部长孟魁武说："为此事我曾专门请示过龙书金司令员，司令员让我报告北京外交部，让他们拿意见。由于事关重大，在外交部没有明确答复前，我不敢擅自下令停止巡逻。"

再查北京外交部，外交部答复：“值班人员已回电，关于边防部队的巡逻间隔，巡逻路线，可由新疆军区自行确定。”

铁列克提战斗的战场，那座无名高地，自 8.13 战斗后一直由苏联、后由哈萨克斯坦控制，2003 年中哈勘界划归中方。2008 年 5 月，为永远铭记烈士们的业绩，新疆军区决定，在当年的无名高地阵地，建立烈士纪念碑，无名高地命为“忠勇山”。

2008 年 8 月 13 日，在烈士们牺牲的周年忌日，由塔城军分区司令员王国义带队，和铁列克提边防站的全体指战员一起，进行了铁列克提忠勇山烈士纪念碑揭碑仪式。石碑主体由褐色花岗岩构成，正面是时任新疆军区司令员朱锦林题字：“忠勇山烈士纪念碑”。背面是塔城军分区署名的简要战斗经过：

群山峤峤，云水萧萧，卫国壮士，英魂永驻。1969 年 8 月 13 日，我铁列克提边防站官兵奉命执行巡逻任务。9 时 40 分许，行至此地，突遭苏军伏击。敌三百余名在坦克飞机和重型火器的绵密掩护下，悍然向我发起进攻。面对三倍于我的入侵者，我巡逻官兵誓与国土共存亡，展开殊死反击。8 名官兵强忍断臂、断腿的剧痛，向来犯之敌顽强扫射，掩护分队 6 名官兵在我巡逻分队被敌人火力层层压住的情况下，毅然向着西南方向敌人主力扑去，激烈厮杀，持续五个

半小时，战斗于当日 15 时 39 分结束。此次战斗，我官兵、尤其是巡逻小分队 19 名官兵、3 名随军记者，视死如归，表现出气壮山河的爱国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精神。28 名遇难烈士中，13 人刚刚或不满 18 岁，其悲壮惨烈，撼天动地、可歌可泣。值此新界勘定，昔日战场高扬我国旗、军旗之时，为慰忠魂，更为世代激励后人，特立此碑，以示铭记。

塔 城 军 分 区

二〇〇八年八月十三日

纪念碑后的忠勇山上，一面用紫红色花岗岩石块堆成的五星红旗格外夺目。国旗两边的大字让人看的心跳：“慷慨赴死，为国捐躯”！

纪念碑右后方的山梁上，一块巨石上刻着红色大字：“忠勇山”。

边界巡逻路去忠勇山的岔路口

新华博客
战友群
78032038

新华博客
战友群
78032038

第 1099 回：形势紧，核大战一触即发

八二八，中共中央发《命令》

8 月 15 日，《人民日报》以《苏修头目声嘶力竭发出反华战争叫嚣》为题，刊载新华社的报道说："勃列日涅夫诬蔑中国'策划武装冲突'，叫嚷要'把防御能力保持在最高水平'，猖狂地对我国进行战争威胁。苏修军事头目格列奇科·雅库鲍夫斯基更是歇斯底里地叫嚷什么'军事威力'，公然威胁要进行核战争。最近，苏修在中苏、中蒙边境地区不断大量增兵，并且肆无忌惮地不断进行各种'军事演习'。目前，苏修还将中苏边境的苏联居民赶走，沿边界线建立一条宽达 20 公里的无人地带。"

8 月 16 日，《人民日报》以《苏修美帝紧锣密鼓大搞反革命全球勾结》为题，刊载新华社的报道说："对于苏修的步步加紧反华，尼克松政府欢迎唯恐不及。""苏修这个黑货也是同尼克松近年一直在鼓吹的加紧拼凑反华军事联盟、用亚洲人打亚洲人的罪恶阴谋遥相呼应的。"

8 月 16 日，中共中央军委办事组送毛泽东等审阅的《关于加强我军组织纪律性的指示》稿，其中指出，"有少数单位、少数人员，甚至个别中高级干部，仍然严重地存在着无政府主义、资产阶级派性和无组织无纪律现象"。为此，提出如下要求：

一、全军必须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坚决反对"多

中心即无中心论”，反对破坏集中统一、破坏组织纪律、各自为政、各行其是的行为。

二、要在全军普遍进行组织纪律和法纪教育，提高全体人员对纪律的重要意义的认识，澄清各种错误思想和胡涂观念。

三、对个别严重违法乱纪、屡教不改的人，必须给以必要的纪律制裁。

四、各级干部特别是中高级干部，要加强领导，带头遵守纪律，维护纪律。认真贯彻严格管理与耐心说服相结合的原则。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

五、要把加强组织纪律性问题，作为部队革命化建设的重要内容，经常抓紧，反复落实。

毛泽东审阅时，将这个指示的署名由“军委办事组”改为“中央军委”，并写了批语：“用军委名义发。”

8 月 19 日，中国外交部向苏联大使馆提出照会，强烈抗议苏军 6、7 两月在中苏边境蓄意制造挑衅行为。照会说：从 6 月 1 日起至 7 月 31 日，苏联政府制造的边境挑衅事件竟达 429 起之多，严重的有：侵入中国新疆裕民县巴尔鲁克山西部地区构筑工事、修筑了望台，架设军用电话线路，向中国边防人员开枪射击；7 月 31 日出动直升飞机、军用车辆和近百名军人侵入中国新疆托里县禾角克地区，向中国边防人员开枪射击；在中国黑龙江省虎林县珍宝岛地区、饶河县

七里沁地区、呼玛县吴八老岛地区，用轻重机枪、重炮向我边防人员射击。苏联各种军用飞机频繁侵犯中国领空，达 40 架次之多，还不断出动炮艇，向正常航行的中国民用船只进行种种挑衅。照会要求苏联政府立即停止对中国的一切入侵挑衅行动，立即全部撤除非法修建的设施和工事，不再阻扰中国船只在中苏国境河流的正常航行。否则，由此而产生的一切严重后果，必须由苏联政府承担全部责任。

为了加强首都北京的防御，林彪提议将驻守在江苏无锡一带的第 27 军急调石家庄地区接替原驻防石家庄地区的 63 军，与驻守在张家口的第 65 军形成拱卫太行山筑垒的犄角之势，组成首都北面的屏障。63 军调防太原，作为大同地区 69 军的第二梯队，共同组成山西的防御。保障太行筑垒的左翼安全。太行山的右翼是燕山承德地区，原来属于后方，无野战军的一兵一卒。二战末期，苏联远东军的一支快速纵队就是从蒙古经承德、赤峰进入沈阳，一路上除了快速挺进，几乎没有战事，如入无人之地。毛泽东说："在承德放一个军，我就放心了。"于是，原驻守唐山地区负责渤海湾抗登陆防务的 24 军调防承德地区，负责华北战区与东北战区结合部的安全。并根据林彪的指示，立即在燕山地区紧急修筑燕山壁垒，与太行壁垒形成犄角之势，共同拱卫京畿安全。

8 月 20 日，中央军委命令："经伟大领袖毛主席、林副主席和中央批准，为了防止苏修突然袭击，加强张家口地区

的兵力部署，决定调 27 军进驻宣化、张家口地区，归北京军区指挥，协同 65 军在张家口地区现有部队，担任阻止敌人沿二连、张家口方向向北京突然袭击的任务”。

8 月 22 日，中央军委下发《关于加强全军组织性纪律性的指示》。

9 月 8 日，27 军军部率第 79、80 师全部到达宣化、张家口地区。第 81 师奉命暂留镇江，后于同年 11 月调防至河北邯郸地区待命。

珍宝岛冲突爆发后，苏联领导层反应十分强烈。以苏联国防部长格列奇科元帅、部长助理崔可夫元帅等人为首的军方强硬派，主张一劳永逸地消除中国威胁，力主动用在远东地区的中程弹道导弹，携带当量几百万吨级的核弹头，对中国的军事、政治等重要目标实施“外科手术式核打击”。

8 月 18 日外电报道，苏联驻美国大使馆一官员曾询问美国一专家：如果苏联袭击中国核设施，美国将作何反应？

8 月 20 日，苏联驻美国大使多勃雷宁奉命在华盛顿紧急约见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向他通报了苏联准备对中国实施核打击的意图，并征求美方意见。

第二天一早，当基辛格来到白宫时，发现尼克松早已急不可耐：“说吧，亨利，碰上了什么麻烦事？”

基辛格拿出十几张写满字的纸放到桌上说：“看看吧，苏联想对中国使用核武器。昨晚，多勃雷宁先生同我深谈了

一夜。克里姆林宫的几个家伙决定用核导弹一劳永逸地消除中国的威胁，现在他们来征求我们的意见。”

经过紧急磋商，尼克松认为，西方国家的最大威胁来自苏联，一个强大中国的存在符合西方的战略利益。苏联对中国的核打击，必然会招致中国的全面报复。到那时，核污染会直接威胁全球。最可怕的是，一旦让苏联人打开核打击这个潘多拉盒子，整个世界就会跪倒在北极熊面前。到时美国也会举起白旗的。经过磋商，美国认为：一是只要美国反对，苏联就不敢轻易动用核武器；二是应设法将苏联意图尽早通知中国，但做到这一点很难，美中 20 年来积怨甚深，直接告诉中国，非但不会被中国相信，反而会以为美国是在玩弄什么花招。最后，美国决定：让一家不太显眼的报纸把这个消息捅出去。尼克松说：“美国无秘密是人所共知的事实，勃列日涅夫看到了也无法怪罪我们。”

8 月底，中国情报机关也获得比较准确的消息：苏联军方正在积极谋划对中国实行一次突然性的核袭击。

8 月 27 日，经毛泽东、林彪和中央批准，中共中央、中央军委转发军委办事组 8 月 8 日《关于加强全国人民防空工作的报告》。

《报告》提议，全国人民防空领导小组由国务院、军委办事组负责人并吸收军队和地方有关单位和部门的领导人组成。在领导小组之下，在总参谋部设立精干的办事机构，

根据领导小组的意图，对全国人防工作进行督促检查。

《报告》对各省、市、自治区，省（自治区）、地辖大中城市以至各大中厂矿、企业人防领导小组的建立、健全亦提出具体意见。

《报告》规定人防领导小组的基本任务是：组织进行战备思想教育和防空常识教育；拟制对空防御计划并组织实施；拟制城市人口疏散计划并组织实施；组织和训练群众性的消防、救护、抢修、治安等队伍。 报告建议全国性的人民防空领导小组“由周总理任组长，永胜、富治、法宪、仲川同志任副组长”。

8 月 27 日这天，毛泽东发出“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号召。从此，开展了群众性的“深挖洞”活动。北京等大城市开挖地下工事。这个“防空洞”在全国各地不停的挖呀挖，一直挖到 1974 年邓小平上台不久才停止。

8 月 28 日，中共中央发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命令》，要求边疆的党政军民随时准备对付武装挑衅，防止突然袭击，东北、华北和西北的部队进入了紧急战备状态。毛泽东批示：“照办。“

《命令》要求边疆军民，尤其是担负着直接的责任，充分做好反侵略战争的准备，坚决反对一切分裂活动，对挑拨和破坏军民团结、民族团结的阶级敌人，必须坚决打击，为首的要依法惩办。

《命令》要求驻边疆部队指战员必须坚守战斗岗位，坚决执行命令，服从指挥，严守纪律，不允许任何破坏纪律的现象存在，不准擅离职守，不准外出串连。经教育不改者，一律严加惩处。

《命令》要求一切群众组织，必须实行按系统、按行业、按部门、按单位的大联合。所有跨行业的群众组织，要立即解散。任何另立山头，重拉队伍，都是非法的，要强令解散。

《命令》要求“立即无条件停止派性武斗，解散各种专业武斗队，撤除一切武斗据点，上交一切武器。凡武斗队强占据点，负隅顽抗者，人民解放军要实行军事包围，发动政治攻势，强制缴械。”

对任何人冲击人民解放军，抢夺军队的武器、装备和车辆，妨碍军队的战备行动，泄露和盗窃军事情报者，以现行反革命论处。

坚决保护军事要地和战备设施，严守国防机密，支援人民解放军搞好战备。

《命令》指出：“凡破坏铁路、公路、水路运输，破坏通讯联络，切断电线，都是反革命行为，必须追查惩办。”

“一切离开生产和工作岗位的人，必须立即返回本单位‘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如有不按期返回的，工人、职员停发工资，农民停记工分。并视情节给予纪律处份，直至开除。对煽动威胁职工或农民离开生产和工作岗位

的坏人，必须依法惩办。”

“对那些里通外国、策划外逃、破坏社会治安、抢劫国家财产、破坏生产、杀人放火放毒、利用宗教迷信制造叛乱的反革命分子，必须坚决镇压。”

《723 布告》和《828 命令》的发布，迅速整治了仍然存在派性斗争、武斗和打砸抢等混乱局面的地区，东北、华北和西北的部队进入了紧急战备状态，全国很快进入“要准备打仗”的临战态势，国民经济开始转向临战状态，许多企业转向军工生产，大批工厂转向交通闭塞的山区，实行“山、散、洞”配置。

中央对战备工作采取了“内紧外松”的方针。在当时的报刊和广播电台上，大都是些“活学活用”、“大批判”、“教育革命”、“五七干校”、“样板戏”、“农业学大寨”等方面的内容。

8 月 27 日外电报道，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赫尔姆斯向记者透露，“苏联可能就它对中国的核设施发动先发制人的打击问题，向其东欧共产党同伙进行试探”。

8 月 28 日这天，苏联《真理报》发表编辑部文章，攻击中国对苏联进行武装挑衅，要求全世界在为时不太晚之前认识到中国的危险。文章说，“在当前拥有最现代化的技术、有效的致命武器和发射这些武器的现代化手段的条件下，如果爆发战争，哪一个大陆也不能幸免”。

同样是在 8 月 28 日这天，《华盛顿明星报》在醒目位置刊登一则消息，标题是：《苏联欲对中国做外科手术式核打击》。文中说：“据可靠消息，苏联欲动用中程弹道导弹，携带几百万吨当量的核弹头，对中国的重要军事基地——酒泉、西昌发射基地、罗布泊核试验基地，以及北京、长春、鞍山等重要工业城市进行外科手术式的核打击。”

一石激起千层浪。这则消息立即在全世界引起强烈反响。毛泽东听取了周恩来的汇报后说：“不就是要打核大战嘛！原子弹很厉害，但鄙人不怕。”

8 月 31 日，国务院、中央军委批准，成立航空、电讯、常规兵器工业 3 个领导小组和造船工业科研领导小组。

《828 命令》也在国际上引起强烈反响，美国、日本等报刊认为中国是在动员全国人民防备苏联的突然袭击，进行战争准备。国内一些报纸和广播电台，也一度出现“要准备打仗”、“一切为了打仗”的宣传。9 月 3 日，周恩来起草中共中央关于报纸、电台上的打仗宣传的通知。通知指出：“一九六九年八月二十八日中央发布命令之后，在地方报纸和广播电台上，出现了公开号召‘要准备打仗’、‘一切为了打仗’的宣传，这是不恰当的。”“望你们立即停止所属的报纸、电台关于这类口号的宣传。”

9 月 4 日，军委办事组公布《大军区机关精简方案》。据此，各大军区机关进行精简整编，统一设司令部、政治部、

后勤部。

9 月 5 日，军委分别批复海军 7 月 2 日和空军 6 月 22 日请示，同意所报直属机关精简方案，据此，海、空军机关进行精简整编。海军直属机关由原来 6 个部合并精简为司令部、政治部、后勤部，人员比原编制数减少 50．1％，空军直属机关由原来 11 个部合并精简为司令部、政治部、后勤部，比原编人数减少 45．3％。

针对国际形势出现新情况，陈毅、叶剑英、聂荣臻、徐向前四位老帅又聚在一起进行讨论。他们一致认为："一、在《对战争形势的初步估计》中提出的看法没有错，苏修不会发动大规模侵华战争；二、中央 8 月 28 日决定加强战备非常必要，无论何时都不能放松战备，要立足于打，有备无患；三、毛主席说，中央领导同志都集中在北京不好，一颗原子弹会死很多人，应该分散些，一些老同志可以疏散到外地。主席从最坏处打算，我们拥护。"

四位老帅还反复研究，万一苏修对中国发动大规模战争，中国是否可以从战略上打美国牌的问题。

叶剑英说："魏、蜀、吴三国鼎立，诸葛亮的战略方针是'东联孙吴，北拒曹魏'，可以参考。"

陈毅说："当年斯大林同希特勒签订互不侵犯条约，也可以参考。"

外交部姚广汇报说："外交部研究了尼克松的对华政策，

已上报中央。概括起来，就是：玩弄‘遏制不予孤立，压力加劝说’的反革命两手既定方针，把中国看作潜在威胁，对台湾问题一直不松口，加紧对我军事包围，同时搞些假和缓姿态，是做一张牌压苏修；希望同我接触，妄图软化我们，争取喘息时间，消除‘潜在威胁’。”“外交部主要领导同志希望四位老帅向中央提建议时，可以原则上讲要利用美苏矛盾，如何利用，不宜具体。在美、越和谈期间，恢复中美大使级会谈也不适宜。”

陈毅表示理解：“外交部的老同志关心我们，怕我们又犯‘右倾’错误。我们尊重外交部领导同志的意见。”

第 1100 回：四川省，各地、县仍有武斗

决心大，组织联合工作组

1968 年 10 月以后，四川全省也发动了“反复旧”运动。这一运动从 1969 年 2 月到 4 月达到高潮，6 月以后才逐步收场，却使四川生产又发生了一次反复。尤其在西昌、达县、江津地区，成昆（北段）、宜珙铁路及公路建设工地，永荣、广旺、芙蓉等煤矿以及电力系统，出现了较严重的反复。四川的工农业生产，再次遭到破坏。成都市 1969 年的工业产值因受“反复旧”运动的影响，第二季度比第一季度下降了 11.2%。期间，四川第一棉纺织印染厂的棉纱日产量由原来的 46 吨下降到 4 吨；棉布日产量由 21 万米下降到 8000 米。成都无缝钢管厂 216 毫米轧管工程的建设，原定 1969 年 5 月 1 日以前建成投产，由于“反复旧”，工程投产日期推迟了半年多。

而且，四川全省的局势仍然动乱不止，两大派群众组织之间的武斗，虽有所收敛、减弱，但仍迟迟未得到平息，流血事件时有所发生。从地域上讲，川东盛于川西；从规模上看，由成都、重庆等大城市，逐渐转入地区和县城，甚至有些地、县的区、乡基层。

1969 年 7 月 7 日至 8 日，重庆万县地区开县两派分别抢夺了县人民武装部和县警备中队的枪支弹药，并于 21 日、26 日再次发生武斗，死 6 人，伤 60 人。

7 月 13 日，涪陵地区垫江县“勤务站”一派 8300 人组成“万人上京告状团”，要求中央承认其为革命群众组织。他们经长寿乘船于当天上午到达重庆，进占重庆火车站内重庆—北京特快列车，造成 20 次特快列车停运 18 天，7 月 17 日重庆站发出的各次列车全部停运一天。重庆站收入损失 60 万元，还毁坏了铁路车辆、电器设备，毁坏、丢失卧具，抢走食品等各项损失共计 63 万余元。

7 月 23 日，中央针对山西武斗发出了《723 布告》，提出了明令禁止的八条规定。为此，四川省革委会和成都军区的领导，决定乘贯彻中央文件的东风，由军地双方联合组成工作组，领导亲自带队，深入当时动乱最为严重的川东永川、江津地区，指导和协助当地革委会或革筹小组与支左部队，采取有力措施，贯彻中央《723 布告》，彻底平息两派武斗，撤除各自控制的据点，动员和组织群众返回原单位和地区，促进革命大联合和四川最后一个地区——江津地区革委会的成立，尽快结束当时四川全省动乱不止的局面。

7 月 31 日，四川驻泸部队 2300 余人在城区进行武装游行，大张旗鼓地宣传中央《723 布告》。接着，先后派出宣传队 1886 个，共 5400 人次，宣传中央指示；举办学习班 32 期，集训武斗人员 1000 余人；收缴各种枪 1407 支、炮 17 门、枪弹 12 万发、人民币 10 多万元及部分炮弹、物资；至 8 月底，市区武斗基本停息，武斗工事基本被拆除，武斗人

员大部分被遣返原单位。

8 月 11 日，由成都军区司令员梁兴初、副司令员王诚汉、副政委谢家祥，和四川省革委会两位副主任张西挺、王恒霖带领军地双方机关工作人员联合组成的工作组，乘 26 次专列到达重庆。第二天听取重庆军地双方领导的汇报，分析情况，研究措施。第三天，在驻军机关会议室召开重庆地区各方代表参加的会议，联系实际，宣讲贯彻中央《723 布告》的重要意义，表达坚决落实的决心。至 8 月 14 日，联合工作组分工梁兴初司令员坐镇重庆指挥，其余大部分人员由军地领导王诚汉副司令员、谢家祥副政委和张西挺、王恒霖两位省革委会副主任带领，分乘从成都带来的汽车前往永川、江津地区。王恒霖是成都工人组织“红卫东”的负责人。

当时，因紧邻地处长江南岸江津市西北的永川县有成渝铁路相连，交通较为方便，所以江津地区的党政机关和支左部队的办公室都设在永川县，因而联合工作组便住宿在位于永川县的江津军分区。

时处 8 月，川东的永川酷热难耐，但所有工作人员一律住宿营房的大宿舍，睡通铺，按照连队的生活制度作息。

联合工作组到达永川的当天下午，便立即在军分区的大会议室里，召开当地两大派头头和骨干参加的会议，宣讲《723 布告》，表示坚决贯彻落实的决心和信心。其争分夺秒的姿态和斩钉截铁的表态，当即给人以雷厉风行、坚决果断

的强烈印象，使到会的党政领导、支左部队的干部、以及两大派的代表，都产生出耳目一新的感觉，内心受到一些震动，有的群众组织的头头私下悄悄地说："这样一个阵势，如此坚决的态度，这回，恐怕是要来真格的了！"

永川、江津地区有"红旗派"和"工农派"两大派，主要分歧在于对刘、张的问题和对部队支左的看法不同。在武斗争夺激烈时，由于在永川、江津城区"工农派"势力较大，"红旗派"观点中的骨干组织成员便纷纷撤离永川、江津城区，转移至同派观点势力较强的地域——大足和内江等地，准备稍示休整，储蓄力量，伺机"杀回永川和江津的老家"。

7 月底，转移至大足、内江的"红旗派"头头，在内江市秘密召开会议，商讨"打回老家去"的问题。大家在会议上，情绪激昂，心怀不满，纷纷说："我们背井离乡，在外已好几个月了，再不'杀'回去，真是无颜见江东父老！""地区革委会就要成立了，我们不打回去，人家可能会把我们搞忘了！""权！权！权！命相连！造反不夺权，等于白球干！我们还等待到何时！"会上众口一词："不容再等待，必须立即采取行动，抢夺枪支弹药，重整武斗队伍，杀回老家去！"

他们经过反复磋商，决定立即组织武斗人员，抢夺内江军分区武器储备仓库的枪支弹药。

内江军分区当时大都倾向支持"红旗派"，当他们察觉

“红旗派”有抢夺枪支的企图时，也没有采取强有力的防范措施，而是听之任之。

在一个漆黑的深夜，“红旗派”组织数百名精干的武斗队员，在左手臂上系着白毛巾为标志，开着十余辆卡车，分别在驻军几个武器储备仓库动手。

他们几乎都是派出比警卫人员多 4、5 倍的武斗队员，猛地冲过去，将警卫战士包围起来，使他们无法施展拦阻的行动。然后，由其余的人员，迅速冲进仓库，将枪支弹药抢夺出来，互相传递着搬上卡车。“任务”完后，临走时，还要对天鸣放一阵密集的枪声，表示在抢夺武器之时，还与部队警卫战士发生了激烈的对抗，故作姿态，掩人耳目。

这次行动，加之先后的零星抢夺，“红旗派”组织，共夺得枪支一万余支。然后。按照事先商定的计划，各组织武斗专业队，统一向由“红旗派”控制的大足县城集中，准备由北向南“打”回老家去.

一时间，大足县城聚集了几千名“红旗派”观点的群众，中、小学校，单位招待所，甚至机关的办公大楼，都是住得满满的。大足县城最繁华之地，本只一条街，现在这条街上，挤满了熙熙攘攘的人群，所有饭店全部营业也满足不了他们的食用，大部分都还得在中、小学校，自己组织开伙。

正在这时，《723 布告》传到永川、江津等地区，尽管大足县城区为“红旗派”一派势力所控制，另一派被迫转移至

离县城以南33公里处的邮亭铺聚集，但县革委会和在当地担任支左任务的某空军部队，仍然要大力宣传、贯彻《723布告》。街头上贴出了“坚决贯彻执行中央‘七二三’布告！”的大标语，宣传车也在街道上巡行，不断播送《723布告》的全文。

当地“红旗派”组织的头目，已结合进县革委会当领导的，面对这种情况，也有点坐不住了，立即主动与永川、江津等地“红旗派”组织的头目们商量对策。他们提出：“恐怕根据现在这个形势，中央发布了《723布告》，话说得非常‘硬扎’，把‘组织专业武斗队，搞打、砸、抢、抄、抓’，看作是‘违反广大人民利益的破坏罪行’，要求‘双方立即无条件停止武斗，解散武斗队，撤出武斗据点，上交一切武器装备’，你们原先从北向南打回老家的计划，是不是应该相应地作些改变？”

外地“红旗派”组织的头目们频频点头：“是啊，说得有理，看这次中央发表的布告，措词非常严厉，提出如果‘拒不执行者，由解放军实行军事包围，强制缴械’，想必是真下决心，动真格的啦！”“这次省革委会和成都军区的决心也很大，梁兴初司令员、王诚汉副司令员、谢家祥副政委和省革委会张西挺、王恒霖两位副主任，带领工作组，坐着专列到了重庆。梁司令员坐镇重庆，其他的领导已带领工作组到了永川，协助重庆和江津地区贯彻中央的《七．二三布

告》。”

“这个情况很重要，我们不能硬着头皮往枪口上碰，被省革委会和成都军区抓了典型，使自己造成无谓的损失，我们是得认真考虑一下原先的行动计划。”

永川、江津地区转移至内江等地区的“红旗派”左思右想，终于想出了一些解辩的理由和行动的对策：我们在内江抢夺军分区的大量枪支弹药，那是在《723 布告》公布之前的行动，不知者不为过，不该属于从严追究的范围。何况，“红旗派”组织的群众，几个月之内，遭对方用武力“镇压”，被赶出了家门，背井离乡，流离失所，这一后果，应由对方负责，“红旗派”并不愿意这样做。如今，“红旗派”返回老家，是按《723 布告》上公布的“已离开的群众，限一月之内返回”的规定去做的，返回时，为避免继续遭受对方的“镇压”、“袭击”，夺取一些武器自卫，应该说情有可原，可以原谅。

他们还决定：改变原先计划的大规模武装“打”回去的做法，为分散的小规模的“武装护送”；对于“红旗派”被对方“镇压”、驱赶出来的乡镇，如今仍被对方武装守卫的，可视条件，采取“武装攻打”的军事行动，以示对“工农派”进行报复和惩罚；对现在已“掌握”在手的枪支弹药，暂不要按《723 布告》的要求执行，待完成“杀回老家去”的行动之后，再视对方执行的情况，逐步上交。

聚集在大足县城的“红旗派”各武斗队，按照头头们商定的方案，先后离开大足，返回各自的地区。一路上，仍有一些区、乡发生了两派互相枪击的事件，也有“红旗派”群众遭“工农派”武斗队的埋伏，造成了一些人员伤亡。

8 月 14 日，省革委会和成都军区领导率领联合工作组来到永川贯彻《723 布告》，一开始就抓紧做当地两派头目的工作，要求他们“立即无条件停止武斗，解散武斗队，撤出武斗据点，上交一切武器装备”，为外出的“红旗派”群众创造返城的条件。如果，在整个江津地区，永川县城就在工作组的眼皮底下，这些要求都不能做到，那在全区贯彻中央颁布的《723 布告》，也就会受到很大的影响，连工作组也会威信扫地。

在地、县支左办公室和县革委会的协同下，工作组反复对两大派做消除对立、解除封锁的工作。起初，两大派头头根本坐不到一起开会商讨问题，一发言就互相指责，把武斗的责任干干净净地推给对方，声声都说对方是制造“反革命事件”的“罪魁祸首”。经过反复做工作后，双方的情绪才有所缓和，继而重申，从现在起，大家都要以中央的号令为准绳，都要按中央的指示办事，如再有违反，都将一视同仁，绳之以法。并规定，从今之后，两大派都不准再张贴互相攻击的大字报和大标语，在组织“红旗派”离开本单位的群众返城时，“工农派”不能有任何形式的阻拦，要热情地欢迎

他们返回本单位，抓革命、促生产。

“红旗派”各组织按照在大足头头们做出的决定，对所控制的枪支弹药迟迟不上交，尽管支左的部队开着宣传车在各县、区、乡巡回宣传，深入各武斗据点开展思想工作，“红旗派”方面的收获仍然微乎其微，至联合工作组到永川近10天，县支左办公室的统计，永川地区的“工农派”已向支左驻军上交各种枪支700多支，而“红旗派”还不到十分之一，只有60多支。张西挺见此情况十分着急，便私下在永川单独接见了“红旗派”的代表，用似乎很关心的语气对他们说：

“你们的处境我完全理解，被别人用枪杆子打出去，离乡背井的，困难一定很多。但你们想一想，现在‘工农派’组织上交的枪支，比你们多过10倍，这样下去，叫我们怎样在支左部队和‘工农派’面前为你们说话，为你们争得应有的权利！你们可以考虑一种变通的方式，一面迅速返城，一面上交武器，用实际行动表明你们在执行中央的《723布告》。”事后，她又专门派工作人员私下再去做“红旗派”组织头头的“思想工作”。

第 1101 回：“工农派”，永川、花果山施暴

“红旗派”，武装攻打何埂镇

8 月 21 日，永川的“红旗派”开始返城。为了壮大自己返城的声势，特地组织当天的返城人员和部分留守城区的人员，举行了一个上千人的“示威游行”，计划在游行之后，外出人员再各自分散返回本单位。

游行队伍高举着数十面红旗为前导，高音喇叭的宣传车紧随其后，不时播放出“红旗派”紧跟中央返城闹革命的严正声明：“强烈地正告一小撮阶级敌人，我‘红旗派’是打不散、压不垮的。为了坚持革命的原则性，我们被迫离开了县城，如今我们紧跟毛主席的战略部署，返城回单位，更是响当当的革命行为！”

宣传车之后，列队行进着“红旗派”组织的群众，走在最前面的人，高举着“红旗派”组织的队旗，格外醒目。后面的群众，人人都臂戴红色袖套，手里打着三角的彩色小旗，上书“毛主席革命路线万岁”、“抓革命、促生产”、“坚决执行‘七.二三’布告”等字样，一路呼喊着响亮的口号。

宣传车的高音喇叭，一遍又一遍地播放出革命歌曲：“大海航行靠舵手，万物生长靠太阳，雨露滋润禾苗长，干革命靠的是毛泽东思想……”

对组织这种“示威游行”，地、县支左办公室从安全着想，曾在事先极力劝阻，但“红旗派”组织的头目坚决不答

应，他们认为：“我们是被他们武装‘镇压’打跑的，现在，中央的‘七．二三’布告为我们撑腰，我们就是要理气直壮地、浩浩荡荡地走回来！”

“红旗派”的游行队伍逶迤地行进在大街上，街道两旁站满观看的群众，不少人还站在楼上凉台或倚窗眺望。这种多少带有一点显示力量的“示威游行”，无疑对“工农派”的情绪有所刺激，增强反感，随时都可能引起对立，发生冲突。

果然，正当游行的队伍的前导人群走至“工农派”的“农总部”大门口时，不知从何处突然飞来一颗子弹，正好击中站在“农总部”楼上倚窗观看的一个人头部，当即倒毙在楼板上，楼上的人随即高喊：“有人开枪，打死人啦！”接着，从“农总部”里，奔跑出一伙人，直往游行的队伍中乱冲，高喊：“快抓凶手！快抓凶手！”

游行的队伍顿时混乱起来，“红旗派”的群众纷纷向街道两旁闪开，躲避可能再打过来的冷枪。宣传车的高音喇叭激动地呼喊：“‘红旗派’的战友们，大家不要乱跑，警惕一小撮阶级敌人乘机制造混乱！”

尽管如此，大家的心情都产生了惶恐，生怕再酿成更大的流血事件。“红旗派”的头头们，也没料到会发生这样意外的事件，当即做出决定：改集体的“示威游行”为分散小股的游行，然后各自返回本单位。

游行队伍当即在“农总部”门前分散，有的继续往前走，有的转身往回走，也有的拐弯走进了小巷，大家都不愿再在这“是非之地”多停留。

谁料，中午 12 点多钟，有一个单位的“红旗派”20 多名群众，因天气炎热，聚集在一个饭店里喝水。突然，从饭店的后窗外扔进来一枚手榴弹，“轰隆”一声，在厅堂里爆炸，正在喝水的“红旗派”群众，当场就有 4 人倒在血泊中呻吟，有的炸伤了头部和脸部，有的炸伤了胸部和臂膀，鲜血流淌，疼痛难忍。要不是餐厅里有许多桌椅板凳阻拦，可能还会炸伤更多的人。在场的人，有的吓得躲到桌子底下，动作快的，一个箭步冲到了街上。大家惊魂不定，回过神来，便赶快去扶救负伤的人。也有的人跑至后窗去搜索，只见后窗紧靠一条小河沟，河沟的对面是一片菜地，连一个人影也不见，显然是凶手已经逃跑了。他们七手八脚地找来竹凉板床，把受伤的人抬着送往医院抢救。

消息迅速传至“红旗派”的总部，头头们愤怒已极，立即派人到支左办公室和工作组的住地——江津军分区，强烈要求省革委和成都军区联合工作组、地区支左办公室的领导，责成有关部门彻底追查、严惩凶手。

在当时的混乱情况下，要想马上调查出肇事者，显然是十分困难的。但据推测，十之八九，应是“工农派”所为，工作组和支左办公室只能从这方面去作“工农派”的工作，

正告他们不能再有这种破坏贯彻《723 布告》的流血事件的发生。当晚，联合工作组的四位领导立即集体召见两派头头开会，极其严肃地指出 8 月 21 日在永川城区连续发生的流血事件，都是破坏、阻挠中央《723 布告》贯彻执行的恶烈行为，一定要彻底清查幕后的策划者和肇事凶手！并表示："不论阻力有多大，也不论破坏的行为有多厉害，都不能干扰我们坚决贯彻执行中央《723 布告》的决心和部署!"

第二天上午，永川城东十几公里处的石庙区花果山煤矿，又传来了 21 日下午，"工农派"武斗人员将"红旗派"返城人员活活殴打致死的事件。

原来，8 月 21 日，在县城参加完"示威游行"的原石庙区大安镇和煤矿地区"红旗派"群众，集体返回至大安镇区机关所在地后，已是中午，大家聚集在一起吃饭。谁料，正在这时，闯进来一伙荷枪实弹的花果山煤矿"工农派"武斗队员，将"红旗派"人员团团围住，抓出其中"红旗派"的头头和骨干近十人，押解至花果山煤矿"工农派"总部进行"审讯"，追问他们撤离石庙区和煤矿后，在外面干了哪些"勾当"？如今返回本单位，又准备采取哪些行动？

"红旗派"组织的人员不服，"审讯者"暴跳如雷，除拳脚相加外，有的还用小刁首和三棱小尖刀，一边"审问"，一边捅向其中一些人的腿部和臀部，造成殴打致死的事件发生。

有一位区粮站的副站长殷希，是一位参加过抗美援朝的转业干部，因家庭出身是地主，即被称作是“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在“审讯”中，被捅伤十余处，痛昏倒地，被“工农派”用卡车拉到10多公里外的壁山县界，丢弃在前不靠村，后不挨店的田野公路旁。至第二天拂晓被人发现时，殷希因伤势过重，流血过多，又未得到及时救治而死亡。得知此消息，联合工作组的领导都异常气愤，当即做出指示：尽快进一步弄清情况，一定要追求究责任，严惩不贷！

22日下午14时左右，调查组按照领导的意见，立即前往花果山煤矿调查了解情况。正待出发时，突然看到在永川县人民医院工作的成都军区宣传部的一位干部的爱人杨恭洁，心急火燎地赶至工作组住地，急切地反映说：花果山煤矿被害人殷希的爱人刘玉荣，是他们医院的护士，与石庙区和煤矿“红旗派”的一些人连夜逃出，现已来到了县人民医院。其中还有一名受伤的人员在救治，盼望调查组能马上前去调查了解情况。

杨恭洁是永川县人民医院“红旗派”组织的负责人之一，是当地“红旗派”组织的骨干。闻听此情况，调查组立即和杨恭洁一道赶至医院。

从石庙区和花果山煤矿逃出的20多位“红旗派”群众，当时聚集在一间较大的病房内，其中确有一名负伤人员躺在病床上，已经过医护人员救治，受害人殷希的爱人刘玉荣也

在其中。经过详细询问、了解，调查组得知，当时在审讯中，被殴打致死的还有区税务所的一名干部陈光大，因在历史上曾参加过国民党，就以此为由，遭到武斗队员殴打重伤致死。这 20 多人，个个面露惶恐，心有余悸，有的还流出了眼泪，纷纷诉说着，石庙区和煤矿如今全被“工农派”武斗队员荷枪实弹地把守。“红旗派”返城群众纷纷连夜外逃躲避。他们强烈要求工作组和支左部队，能为他们伸张正义，主持公道，查清真相，严惩凶手。并为他们创造平安返回本单位的良好环境。

江津军分区听到汇报后，当即决定立即召开两大派头头和骨干的会议，通报花果山煤矿发生流血事件的严重情况，严肃指出这一事件是严重破坏阻挠中央《723 布告》贯彻落实的“反动行为”。第二天，23 日，他们又进行磋商，认为花果山煤矿地处山区，位临城郊，与紧邻的石庙区大安镇一带，均为“工农派”所控制的地区，其武斗队员多为身强力壮的矿工，拥有的枪支弹药也较多，是“工农派”驰援城区，参与武斗的重要武斗据点。应趁此发生流血事件的机会，采取有力的强制措施，收缴“工农派”的一切武器装备，撤除武斗据点。他们经过请示，于 8 月 24 日，在对外不露一点风声的情况下，从就近驻壁山部队调出一个连，会同县支左领导小组，武装进驻花果山煤矿，开展强行贯彻执行《723 布告》的行动。

8 月 25 日，调查组的王参谋和永川县公、检、法军管会的人也赶至花果山煤矿。只见这座煤矿坐落在三面环山的山坳里，山高林密，山脚前的广场边，一条公路从西向东通过，矿部办公室和矿工宿舍分布在山腰和山脚。从军事角度看，其地形极有利于隐蔽和守卫。据了解，部队进驻煤矿时，“工农派”的武斗队已聚集至山顶据守。由于任务特殊，情况异常，连队进驻煤矿后，战士都是枪不离身，子弹上膛，丝毫不敢怠慢。谁料，有一名新战士，由于情绪过于紧张，当晚不慎发生枪走火自伤致死。

部队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到达煤矿，使“工农派”大感意外，武斗队很快土崩瓦解，各自解散，武斗据点立即撤除，所有武器如数上交。

8 月 28 日，中央发布加强战备的《828 命令》，迅速在全川公布，四处张贴。“红旗派”的头头们觉得形势对他们越来越严峻，“武装”返城的行动，必须抓紧进行，不然越往后，会越被动，对过去“工农派”组织的“一箭之仇”，就会再无机会再报了。

在永川城南 28 公里处，有一个临江镇，这里是“红旗派”控制区，镇上“工农派”群众，都在几场武斗较量后，撤离到临江镇东南 31 公里的何埂镇，那里“红旗派”的群众，则纷纷撤离何埂镇，少部分人留在临江镇，大部分人都随总部行动，远去内江等地。如今，他们参与了在内江军分

区抢夺武器的行动，在大足稍示休整，按照“红旗派”头头们商定的计划，正悄悄地绕过永川县城，到达临江镇，准备在临江镇“红旗派”的协助下，武装攻打何埂。

8 月 29 日夜，星光朦胧，气候闷热，暴晒一天的土地蒸发出股股热浪。“红旗派”不少武斗队员都是农民，他们赤身着短裤，赤膊上阵，都在光着的左臂上系一条白毛巾为记，兵分两路。一路由临江，沿铁路，经水碾，从东北方向进攻何埂，一路沿公路，从西北方向，直插攻击何埂。

8 月 30 日凌晨 2 时左右，约定的信号弹在天空划着弧线，各响三声后，“噼噼叭叭”的步枪、冲锋枪、机关枪的枪声便连成一片，响彻何埂上空。

何埂镇面对临江镇的东北西三方，“工农派”都修筑有防御的工事，公路上用沙袋垒砌，建有暗堡，临近镇郊的大楼，都作为武斗时的“碉堡”使用。当“红旗派”发起攻击后，“工农派”立即组织火力予以还击。双方展开了真枪实弹的攻防战。

其实，“工农派”对这次“红旗派”攻打何埂镇的行动早已得知了消息。他们考虑到这次返城的“红旗派”在内江抢夺枪支弹药，装备得到极大的补充，又得到临江镇和外地一些“红旗派”的支持，势力比自己强大，如果硬与对方拼，必然会造成较大的损失，不如暂时避其锋芒，组织骨干有生力量向南撤离，如“红旗派”组织穷追不舍，就沿长江下游，

向江津方向撤退。因此，他们在前沿阵地组织强烈的火力还击时，位于镇上的总部和大部分人员，已悄悄地走上了南撤长江岸边朱杨镇等地的道路。不少“工农派”组织骨干成员的家属，惧怕“红旗派”打回老家后对他们采取惩罚行为，也不声不响地背着简单的行李，抱着小孩，尾随南撤的队伍一起上路。

枪声响了半个小时左右，“工农派”的枪声突然停了，只见何埂全镇一片漆黑，没有一点亮光，也没有喧哗，非常的安静。“红旗派”不知就里，一时还不敢贸然深入，怕中了“工农派”的埋伏。头头们经过紧急磋商，决定先派出少量武斗队员，潜入镇上进行“侦察”。

“侦察”的结果得知，“工农派”的总部和武斗队员在一阵猛烈还击后，已利用他们熟悉当地地理环境、道路交通的优势，南撤了，留下了何埂镇的一座“空城”。

“红旗派”不敢南追，怕在黑夜里中了计谋，憋着一肚子的怨气，进镇后，首先直捣“工农派”的总部，见到什么就砸什么，桌椅板凳，宣传用的广播喇叭，都被他们砸得稀巴烂。悬挂的标语、大字报，也被撕碎，扔了一地。满屋一片狼籍。

当地“红旗派”成员知道“工农派”头头的家在哪里，有的竟怀着满腔的“仇恨”，荷枪实弹地冲进个别头头家中去算账。但是当他们三脚两拳，将大门打开，蜂拥般地闯进

屋里，里面已空无一人。人们只能抡起枪托，把家中的一些坛坛罐罐砸烂，以解心头之恨。也有当地的一些群众，看不过他们这种胡乱打砸的行为，出面进行劝阻，但却被这些打红了眼的“红旗派”组织的武斗队员，报之以斥骂，或举起枪托，挥起拳头打伤。“红旗派”的武斗队员们，满怀“复仇”的情绪和“胜利”的喜悦，在乡镇的街头上直闹到天明，然后才“班师”返回了临江镇。

“红旗派”组织武装攻打何埂镇的消息，迅速传到永川，“工农派”总部立即向部队地、县支左办公室告急，并在大街小巷散发“控诉‘红旗派’血腥镇压‘工农派’战士的罪行”的传单，贴出醒目的大标语：“强烈要求严惩武装攻打何埂的凶手！”“‘红旗派’不执行‘七．二三’布告、‘八．二八’命令，就是炮打中央！”

联合工作组的领导看到“红旗派”组织武装攻打何埂的报告后，十分不满地指示地、县支左办公室，马上与“红旗派”总部的头头谈话，指出这一武装攻打的事件，虽未看到有人员死亡的报告，但发生在中央发布《723 布告》《828 命令》之后，性质已经发生了变化，应该立即停止对另一派的攻击。外出人员返城，绝对不允许再采取武装攻打的行为，否则，部队将按《723 布告》的规定办事，“实行军事包围，强制缴械”。与此同时，工作组立即将这一严重事件的情况向坐镇重庆的梁司令员和省革委会与成都军区写出报告，把

“红旗派”组织的武装攻打，定性为“反革命武装攻打”。并慎重地在召集两派头头和骨干参加的会议上，严正地进行宣告。

张西挺看到这个报告的草稿时，曾私下不满地对省革委参加起草报告的工作人员说：“应该把‘反革命武装攻打’，改为‘反革命武斗’，这样进攻和防御，也都包括在内了！”这位工作人员觉得她这种说法不妥，便向她进言：“这件事，本来就是‘红旗派’组织武装攻打，进攻一方要负主要责任，当然武装阻击也不对，但如提为‘反革命武斗’，半斤八两，显然倾向性太明显，会在群众中造成不满。”对此，张西挺也觉有理，没有再说什么。

事后，按工作组领导的指示，县支左办公室趁此武装攻打事件的发生，带领少量部队前往临江镇，强制贯彻执行《723 布告》和《828 命令》，勒令“红旗派”马上撤除武斗据点，解散武斗队，并当即收缴他们的枪支弹药，消除以后再发生武斗的后患。对在临江镇上滞留的何埂镇“红旗派”外出的群众，提出可视情况，尽快各自返回何埂镇，抓革命，促生产。

第 1102 回：谣言传，朱杨、二溪人心乱

争逃离，长江上“白沙惨案”

“‘红旗派’打回何埂啦！他们搞武装镇压，我们赶快逃跑啊！”

“‘红旗派’搞报复，抓到‘工农派’的骨干，不是打就是杀！”

从何埂镇南逃到位于长江北岸朱杨镇的“工农派”群众，惊魂不定地在街头上这样夸大其词地传播着。这惊人的消息，也很快传到了与朱杨镇一江之隔、位于南岸的二溪镇。

武装攻打的情景，越传越玄乎，说“红旗派”完全打红了眼，抓到“工农派”的大小头目，一律关押，审讯，严刑拷打，有的还被活活打死。所有“工农派”骨干成员的家，都被砸、被抄，有的还被放火烧毁，真吓人啊！

“趁早快跑啊！不然等他们晚上打到朱杨、二溪，我们就跑不脱啦！”

吓人的传说，造成人心的燥动，朱杨、二溪“工农派”的大小头目和骨干成员，连同从何埂撤来的“工农派”组织的群众和部分家属，纷纷奔向江岸，准备登船向下游江津方向逃离。

朱杨和二溪的江岸边，各只停有一只来往过渡的载人船只。两岸“工农派”的群众，争先恐后地争着登船，船头船尾能站人的地方，都挤满了人，船体迅速下沉，显然

是超载了。

然而，在朱杨镇这边，仍有许多“工农派”的群体蜂拥至江边，眼看渡船已无法再载人了，只好相继拥挤在岸边的趸船上。不一会儿，趸船上也站满了人。

趸船是矩形平底船，比普通的船只高出一大截。由于自身并无动力装置，所以并非是真正意义的航船。它通常被固定在岸边，或抛锚江心，作水上浮仓或供船只泊靠的浮码头，初创于英国，获名“store ship”，即水上仓库的意思。

“要撤一起撤！把两条渡船并拢，把趸船拉走！”

用趸船载人，这显然是违反航运操作规程的事，但为了使大家都能撤离，免遭“红旗派”组织的“镇压”，此时已把是否安全的问题完全置之恼后了。

这时，已是下午 16 时左右，天空灰暗，阴云低垂，显得很闷热，预示着可能会下雨。

“工农派”的男女群众拥挤在船上，几乎没有什么空隙，不少人的上衣都渗出了汗水。有的实在太疲倦了，便不顾四周站立着人群，坐在甲板上，夹在人群的脚杆中打瞌睡。

还有一些家属，牵着几岁的小孩，怀抱着婴儿，更显得拥挤不堪。小孩哭闹要喝水、吃东西。不少家属央求男人们，赶快想点办法，在渡船上烧开水。但是船上的人太多，天气又闷热，开水始终供不应求，免不了有些人为争一杯水，打自己哭闹着急的小孩，或者相互之间发生争吵。这时，又有

男人们出面劝说："现在是在逃命，大家都要发扬点风格，互相忍让一点！"

"哇啊——哇啊——"怀抱的婴儿啼哭不停，四周的群众，互相挤靠，腾出一点位置，让抱婴儿的妈妈坐在甲板上。母亲搂搂怀中的婴儿，轻轻地拍打着，口里不停地哼着"喔！喔！喔！"

两只渡船并肩拉着船体庞大的趸船，极为缓慢地向下游驶去，一来马力有限，二来是担心出事故，慢得几乎是在水上漂浮一般。

汹涌的江水，拍打着船舷，不时发出"啪打！啪打！"的声响。趸船的四周，光敞敞的，没有栏杆遮挡，虽然大都是男人们站在船边，但当船体左右摇晃，眼望着面前涌动的江水时，心里也不免有些惊吓，浑身渗出一身冷汗，大家都自然地把身体往船中心挤靠。靠近里边的人，也会伸出手来，拉着他们的肩臂往里挤。大家都默默地祈祷："天老爷，大发慈悲，保佑我们平安地到达江津！"

为了防备遇上"红旗派"人员在岸边偷袭，"工农派"的武斗队员上船后，在头头们的指挥下，荷枪实弹地站立在船头、船尾，有的还守卫在渡轮的顶逢上。趸船的四周，也都间隔分散站着武斗队员。大家都是警惕地眺望着两岸，密切注视着可能会发生的意外情况。

长江两岸乡村的男女老少，开始看到江中驶过来这么一

个“怪物”，上面黑压压地挤满了人，也想看个究竟。走近江边，仔细看去，发现船的四周，都站着、坐着男女群众，还有荷枪实弹的武斗队员，吓得扭头就往屋里跑，生怕造成误会，引起开枪射击。

江面上很少有来往的船只，偶尔遇到一两只逆水而上的运输船，远远地望见这两只渡船拉着趸船的“怪物”，便立即鸣笛让道。船体擦肩而过时，运输船上的船员，看到“怪物”上站着武斗队员，人人荷枪实弹，心里猜想：这恐怕又是赶往那里去参加武斗的，只是默不作声地观望一会，扭头就走进船舱。

天色渐渐暗淡下来，江面上的能见度也越来越低，“工农派”的头目们，担心趸船四周的群众，如果站立太久，身体疲倦，不慎挤掉到江里去，便调动少部分人挤到两只渡轮上去，然后，指挥趸船四周站立的人，尽量挤着坐下来，这样，即使打瞌睡，也不致遇到船体晃动，掉下江去。

渐渐地，天色黑下来，在船上已看不清两岸的轮廓，远处的房屋，只听见江水的哗哗声和轮船轰隆隆的马达声。不少人挤坐在甲板上，依靠在旁人的肩头上，打起瞌睡来；船舱里交头接耳的谈话声也听不见了，婴儿的啼哭声也已停止，安静地熟睡在母亲的怀中，四周显得比较平静。

慢慢地，天完全黑了，伸手不见五指。为了不让岸边发现他们的目标，船上没有开灯，完全是一片漆黑。小孩紧紧

依偎着母亲，女人拉着男人，大家都不敢随意离开一步。

晚上 22 时左右，远处的天空，突然亮出几下闪电，江面上也随之飘过几阵风。闪电越来越密，使得两岸、江面一片亮光，风也渐渐大了些。不一会，天空就细细撒撒地飘起小雨来了。天气凉爽了，对拥挤在船上的人群，反倒全身轻松了许多。

大约 23 时左右，船进入江北石门、江南白沙地段。突然，南岸白沙镇响起枪声，不时还夹杂着手榴弹的爆炸声，一阵紧过一阵。有时，子弹还嗖嗖地从江面上掠过。不一会，白沙镇的上空，闪出一片火光，越来越大，映红了天边的一角，显然是有房屋被打着火了。

面对如此突如其来的枪声，船上的人全都惊醒的站立起来，武斗队员们更是手提枪支忙乱起来。头头们担心发生意外，一再喊叫："大家保持安静，不要惊慌！"

越说不要惊慌，人们的心情越恐慌。大家生怕遭飞过来的子弹误伤，纷纷往船中心拥挤，苦了那些抱孩子的母亲，只有死坐原地不动，任凭年轻的男人们挤着从身边踩过。

特别是空敞的趸船，本来就没有动力控制船身的平稳，这时，人群拥动，船体渐渐地左右摇动起来。

真是天有不测风云，也就在此时，雨也下大了，打在船顶棚上，啪啪作响。江上的风逐渐加大，涌起的波涛撞在有些摇晃的趸船船舷。

岸上的枪声更加密集了，火光映红夜空，掠过江面的子弹也多起来。趸船上的人十分惊恐，小孩呼唤着母亲，女人叫喊着男人，大家都想照顾好自己的亲人，人群来回拥动，在黑暗中乱作一团。风浪加着雨水，更加凶狠地推撞着船舷。

趸船的甲板，没有一点凹陷，完全是一抹平板，人群的拥动，再加上风浪的推力，船体开始左右晃动起来。起初还是轻微的摇晃，但当船摇向左，人群不由自主地往左倾，重心向左，再往回来，摇向右边，人群又不由自主地往右倾，重心向右，船体就比上次更为倾斜一些。就这样，左晃右晃，趸船晃动的坡度也就越来越加大了。这时，两岸又同时响起一阵密如炒豆般的机关枪声，掠过江面的子弹，有的“嘶！嘶！”地落在趸船附近的江水中。趸船上的人群更为惊慌了，男人们和女人们，连同几岁的小孩子，几乎都发出了惊讶的喊叫：

“哎唷！快站不稳啦！船要翻啦！”

“快站稳脚跟，再晃下下去，人就要落水啦！”

“大家尽量保持镇静！互相抱着腰，不要再摇动！”显然这是一个头头在发号施令。

但是，不论你怎么指挥，船体晃动根本就不受人的控制，船体倾斜的坡度逐步加大。

由于趸船左右激烈的摇晃，牵引的缆绳拉扯着本也不很平稳的两只渡船左右摇晃，互相碰撞起来，随着江浪的冲击，

发出了“哐当！哐当!”的声响。渡船上的人群也紧张起来，在黑暗之中，互相发问：“怎么办？！怎么办？!”

头头们都不懂水上行船的技术，对处理这种紧急情况束手无策，赶紧去找渡船上的船工和驾驶员商量。

而渡船上的船工和驾驶员们，面对这种情况，也都惊恐异常。毕竟他们还懂得在江浪中行船的经验，有人便着急地建议：

“只有赶快用斧子砍断缆绳，不然趸船的摇晃加大，也会要把两只渡船扯翻的!”

“先把缆绳砍断，保住两只渡船的平稳，然后再设法去救趸船!”

看来只有这一条道路可以选择了，否则，再犹豫片刻，真会因趸船摇晃，掀翻渡船，那时趸船也难保，以致酿成“全军覆没”的悲惨下场。不一会，两柄大斧同时挥动，“咚！咚！咚！咚!”利斧砍向绷紧而又来回摆动的钢缆。几乎也是同时，“咔嚓！咔嚓!”两根钢缆砍断了，相继腾地飞起一、二丈高，渡船突然松载，船尾猛向后坐，船首高翘，马达发出震颤，随即，船首像抛下一般，船尾又高翘起来，好一阵前后摇摆，渡船才逐渐平定下来。

后面牵拉的趸船，在钢缆砍断的那一刹那，晃动着左右摇摆的船体，突然高昂船头，船尾猛陷至水中，就在这一时刻，悲惨的局面发生了：

随着一声尖利的喊叫："快救命啊！"站立船尾的人，事先毫无一点思想准备，"哗啦啦！"像下开水锅的饺子一般，"扑腾！扑腾！"滑落到江水之中。紧接着，船首又突然砸下去，船尾翘起老高，站在船首的群众，不由自主地又顺着倾斜的甲板，接连滑入江中……

趸船上的人落水了，全船惊恐一片，女人高声呼救："救命啊！救命啊！"小孩和婴儿一齐啼哭。男人们拼命地把女人的腰杆抱住，使劲往船中心挤靠，头目们嘶声喊叫："大家把腰杆抱住，形成团！"

但是，猛烈的浪涛夹杂着暴雨，戏弄着这只失去控制的笨重船体，惊魂不定的人群，在平面的甲板上，来回摇晃，又为使生命走向死亡增添了不利因素。船体倾斜高翘右后方，站立在左前方船边的人，又跟着滑落水中；船体倾斜高翘左前方，站立在右后方船边的人，也身不由己地滑入水中……。

这时，长江南岸白沙镇上的枪声仍然响个不停，只是映红天边的大火渐渐减弱了些，雨水夹着风浪，仍然一阵紧似一阵，使人感到祸不单行。两只渡轮上的的头头们，已经知道可能有人落水了，但他们既不敢靠岸停船，请求人来救援，也没能力在漆黑的雨夜，开展毫无希望的救援工作，他们只有谢天谢地，忍痛割爱，让趸船上的"工农派"群众听天由命算啦，然后，各自开足马力，赶快离开这"死亡"之地。

他们卸掉了后面拖载的沉重“包袱”，船体显得轻松了许多，趁着下水，直驶向江津方向。

失去牵拉动力的趸船，左摇右晃地随着流水的推力漂流，基本上处于停顿的状态。乘船的人到底有多少被倾滑至水中，一时谁也无法查清，人们不顾一切地互相呼叫着名字，有的女人没有找到自己的男人，竟情不自禁地嚎啕痛哭起来……

白沙镇的枪声逐渐平息下来，武斗停止了，东方吐露出一抹鱼肚的白色，渐渐地天空亮堂起来。趸船随着流水的漂流，也渐渐地停靠在白沙下游的一个江湾边。船上的人，个个露出惊恐的神情，有失去男人的女人，失去女人和小孩的男人，泪水似乎已经流干，只是直呆呆地望着江水发愣。他们经过这次大难不死之后，已完全不再惧怕死神的降临了，都走上江边，有的疲倦地四脚放开躺在地下，有的妇女，双眼噙着泪珠，双手搂抱着婴儿，不住地醒着鼻子啼哭。再看那江面上，已经有漂浮的尸体，随着水波，一起一伏地向下游涌去……

“白沙惨案”的消息和详细经过，接二连三地传至永川联合工作组的领导和工作人员的耳中，在感到极度震惊之余，他们立即指示部队支左办公室，电告驻江津的某部，火速派出指战员，以最快的速度赶往白沙进行救援，将所有生还的男女群众和小孩，妥善接至部队安顿，对手中的枪支弹

药一律进行收缴；认真查找两只前往江津的渡船，解散武斗队，收缴武器装备，所有人员经暂时安顿后，立即返回原地。

事后，据驻军报告，经过在出事现场的江面打捞尸体，这次“白沙惨案”，共死亡群众 120 多人，其中以妇女和小孩为多，也有一些是武斗队员。到底有多少人下落不明，因登船之时，没有精确统计，事后也未有人主动报案，至今都无法详细查清。与此同时，部队迅速派出人员，前往白沙镇，查清当晚发生武斗的情况，并趁机强制收缴两派的武器弹药，根除再次发生武斗的后患。

## 第 1103 回：八一四，中央又提“五一六”

## 柯西金，周恩来“机场会谈”

我们再回到北京。8 月 14 日，周恩来、谢富治、江青、姚文元等接见文艺口代表，江青特别提到“516”问题，她说：

“有一个事我想讲讲。就是‘516’匪团问题。‘516’是个反革命组织，他们的后台杨、余、傅，还有混进中央文革的坏人王、关、戚。这六个人一方面打着人民解放军的旗号；另一方面打着中央文革的招牌，搞形‘左’实右，这就难免有人上他们的当，所以我们对于‘516’问题，要认真对待，不许他们翻案，只要交待好的，完全可以从宽处理，可以不扣反革命的帽子。交待得不好的，隐藏起来，那要查出来，可就不客气了。”

姚文元：“包庇那更是不许可的。”

江青：“这是很凶恶的敌人。因为他们在各方面破坏。首先破坏样板戏。什么样板团！有的根本不成其样板，乱七八糟，样板戏不等于样板团。北京京剧团清队最不好，你们那儿可能就有‘516’分子。你们老老实实哪怕告诉我一个也好，也算向组织有个交待。现在有两个‘516’分子没有翻案，我保护他们，将来可能不给他们戴反革命的帽子。他们打那样大的招牌，青年人很难……当然，他们的口号很恶劣。‘516’不仅北京有，别的地方也有骨干分子，一定要搞

出来。他们的组织一定要搞掉，因为太凶恶了。”

谢富治：“清理阶级队伍不能让敌人漏掉了。‘516’少数骨干分子是很凶恶的敌人。不管在哪方面，我们坚决要和他们斗争。在文艺方面他们钻进来了。工、军宣队责任更大了。不能麻痹，包庇就更坏了。掌握政策把敌人查出来。这是保证样板的巩固，要加强队伍的政治思想工作。在政治上、艺术上江青同志都很严。这个严是思想弄不好就要恢复了。”

周恩来：“坚决贯彻江青同志讲话精神，把‘516’搞一搞。”

谢富治：“把‘516’都揪出来，一个也不能漏。宣传队绝不能推拖。”

8 月 15 日，8 月 28 日，周恩来在两次接见全国全军卫生工作会议代表时，也提到清查“516”的问题：

“还有‘516’问题。我们在 9 月就知道了‘516’问题。卫生系统在中医研究院开个头，把叶心清抓起来了，我们事先知道了，要等待，要等待群众觉悟，事情早知道了。吴传启、叶心清、杜南，卫生系统‘516’就是叶、杜打头的。我们不愿扩大化。提出四个原则：先要本派搞出来。不要扩大化。联系到批判走资派，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要保护群众。要谨慎。”

“叶心清是个江湖医生、政客，文化大革命中兴风作浪。在卫生口，他是‘516’挂帅的，杜南是跟他的，他出谋划

策，利用广大群众，群众是受蒙蔽的。孙正同志是党委书记，他不同于群众，他有责任。先念同志向群众代表传达的话比我讲的还轻，结果回去后要打倒李先念，还大贴李先念大字报，说先念同志歪曲我的话。这完全是‘516’的话。

‘516’问题，你们各单位革委会、大联委自己搞清楚。社会上的‘516’，是由公安部专案三办负责查处，他们让你们查就查，要防止扩大化。”

“在清理阶级队伍，整党中，对真正的坏人不应放过。比如‘516’分子叶心清、杜南，是极少数的。我不能说卫生系统只有叶、杜两人，也可能有第三第四个，要把人证、物证、旁证拿出来。‘516’在每条线都有他们的人。”

8 月 16 日，经中央同意，北海舰队政委易耀彩任青岛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长，副政委宋景华为第二副组长。

8 月 27 日，山东王效禹写了份书面检查。

8 月 29 日，青岛的 740 多人到北京参加青岛学习班。

9 月 2 日晚 20 时 50 分至 23 时 55 分，周恩来、陈伯达、康生、姚文元、谢富治、黄永胜、李先念、李作鹏、邱会作、纪登奎、李德生等等人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中央办的各省在京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山东班、青岛班、徐州班和贵州、西藏汇报团、内蒙古党的核心小组的全体成员。周恩来首先讲话，讲了形势与大局，讲了这次学习班的要求。然后，由各派头头发言，汇报情况，表示态度。

康生在大会上严厉地、公开地点了青岛韩金海的名：

“什么是工贼？就是钻在无产阶级队伍中假充工人，或原来是工人变质了，打着工人的旗号”，“少数个别人利用工人团体进行他的派性活动，为个人谋利益。在座的韩金海就是这样！”

黄永胜在讲话中专门提到，支持王效禹的原驻徐州“空军有 5 个人不执行命令，在外不归队，发了指示，他说没有见过文件，提出了 4 条，说我是革命群众组织，对我无效。我们开除了他们的军籍、党籍、团籍、公职。”

1969 年 8 月下旬，79 岁高龄的越南共产党主席胡志明病情恶化。尽管中国派去医疗组全力抢救，但周恩来仍不放心，又于 8 月 24 日和 26 日接连派出了第 2 个和第 3 个医疗组。8 月 31 日，又派当时的中国医学科学院院长、著名专家吴阶平教授乘专机到河内送急救药品，并进一步了解胡志明的病情。

9 月 1 日，周总理亲自听取了吴阶平的汇报，同时召集有关专家研究讨论，前后用了 5 个小时，最后决定再派吴阶平教授率第 4 个医疗组，携带部分专家和器械、药品，于 9 月 2 日清晨乘专机赶往河内抢救。遗憾的是，第 4 个医疗组的专机刚飞到广西上空，就得到胡志明已于当天上午 9 时 47 分停止呼吸的消息。结果，飞机不得不掉头返回北京。

9 月 2 日是越南的国庆日。鉴于当时越南的抗美救国斗

争正处于关键时刻，越南政府为防国内局势动荡，决定将胡志明逝世的时间改为 9 月 3 日，并定于 9 月 9 日为胡志明举行国葬。

周恩来打破常规，亲自率领中共代表团，于 9 月 4 日专程飞往河内吊唁。代表团成员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和中共中央委员、广西壮族自治区革委会主任韦国清。此前，中国领导人对任何外国领导人的逝世都未做过这样的表示。越南领导人见到周恩来时，激动得失声痛哭。周恩来也沉痛万分，不止一次地说："我来晚了，我来晚了……"

9月4日下午15时，周恩来率领代表团前往主席府吊唁。因灵堂尚未布置完毕，中越双方领导首先举行了会谈。17时吊唁仪式开始。临时灵堂设在主席府正厅，这是胡志明主席生前接受使节国书、进行重大国务活动的场所。这个灵堂是专为中国代表团设置的，后来的正式吊唁灵堂设在巴亭会堂。

周恩来进入灵堂时，以黎笋为首的越南劳动党政治局成员依次和周恩来拥抱。随即，周恩来转送了中共中央致越南劳动党中央的唁电。中国代表团在胡志明主席遗像前献了花圈。默哀后，周恩来总理在吊唁簿上留言，代表团成员依次签字。

当晚 19 时，越方秘密邀请周恩来和叶剑英到医院瞻仰

胡志明主席的遗容，他们站在胡志明的遗像前肃立默哀，深切怀念这位异国朋友。他们也是唯一看到胡志明遗体的外国代表团。当晚 20 时，周恩来率中国代表团离开河内回国。

周恩来这么快就返回国内，外电猜测，是为了避免与参加胡志明葬礼的苏联领导人见面。

胡志明去世，苏联本来已派出一个副总理级的代表团到了河内。但柯西金听说周恩来到了河内，他想与周恩来“对话”的欲望又重新在心头涌起。为此，他取消了当天下午与正在莫斯科访问的日本外相的会见安排，立刻乘专机飞赴河内。但当他的专机在河内机场降落之前，周恩来已飞回中国了。

随后，苏联外交部第一副外长库兹涅佐夫在莫斯科紧急约见中国驻苏联大使馆临时代办安致远。苏方提出：“柯西金部长会议主席参加胡志明主席葬礼回国途中想在北京停留，会见周恩来总理。”

中国驻苏联大使馆紧急报回国内。但中方未立即做出答复。

柯西金抵达越南首都，旋即转告中国驻越南大使馆人员，苏联政府首脑希望回国途中经停北京，以便会见中国领导人。

9 月 8 日上午，李先念副总理率领中国党政代表团去河内。

中国连续派出两个代表团前往河内吊唁。这在中国外交史上是第一次，在国际上也属罕见。当时外国舆论普遍认为中国的外交行动是“异乎寻常的”，“是对处于最困难时刻的越南人民的支持”。

9 日上午，河内巴亭广场举行胡志明葬礼。主席台上，站在第一排的苏联柯西金与中国李先念仅间隔数人，但双方未有接触。葬礼活动结束后，中苏两国代表团从主席台两侧走下来时，柯西金紧走几步，想和李先念副总理打招呼。柯西金的手都伸过来了，李先念副总理假装没看见，转身走开了……无奈之中，苏联只好通过越南向中方传话。

但越南外交部因故没有当即转达，而是在当天下午 15 时 30 分，越南外交部第一亚洲司司长黄保山才来到中国党政代表团下榻的范老五宾馆，请胡志明生前的中国翻译梁枫转告李先念团长，苏联代表团要求越方向中国代表团转达如下事项：

“一、苏联代表团专机定于 10 日晨离河内回国；在回国途中是否可以路过北京？

二、苏联专机将在北京停留两三小时；在此期间，柯西金能否见到周恩来总理？”

李先念团长获悉越南方面的传话后，立即要中国驻越大使速报国内请示。

10 日清晨，李先念一直未收到国内指示，便决定按原计

划去机场准备回国。

就在李先念副总理和王幼平大使离开大使馆后，中国驻越南大使馆方收到国内复电，同意柯西金去北京会谈。使馆政务参赞陈亮立即驱车前往嘉林机场。当李先念将要登机之际，飞驰而来的使馆参赞陈亮，气喘吁吁地向他报告了国内的指示。于是，李先念将中方的意见告诉给他送行的越南总理范文同。范文同说：柯西金已于一个小时前起飞回国了。

悉知此事前后经过的越南总理范文同严厉批评越南外交部有关当事人延误大事。作为补救措施，越南外交部苏欧司于当天中午约见苏联驻越大使，转达中方答复，并嘱咐立即转告正在飞行途中的柯西金。

10 日晚间，中国外交部召见苏联驻华大使馆临时代办叶利扎维金，正式通知苏方：周恩来总理同意在北京机场同柯西金部长会议主席会晤。叶利扎维金立即报回莫斯科。此时，柯西金已飞抵苏联塔吉克斯坦共和国首府杜尚别。

柯西金是从“南路”航线从莫斯科飞往越南的，他现在照原来的路线飞回去。先经柬埔寨、巴其斯坦和印度的领空，又经阿富汗，绕了半个圈子，于傍晚，飞机落在杜尚别，他们住进了政府公寓。当大家围坐在桌旁吃烤肉时，有人叫柯西金去接电话。

电话是莫斯科打来的，通知柯西金说：“中国当局同意苏联飞机飞经中国领土，并且周恩来准备在北京机场同柯西

金会晤。”

此时，大家围着桌子刚打开啤酒瓶子，突然见柯西金几乎是冲了进来向大家宣布：

“大家马上集合，到飞机场去。”

一个小时以后，苏联代表团的飞机就起飞了，机组人员甚至还未来得及装矿泉水，但飞机上有白兰地酒储备。

大家见飞机往东飞，都很奇怪，这是往哪儿去呀？得到的回答是：“去伊尔库茨克。”

原来计划是回莫斯科，怎么又要飞到伊尔库茨克去了？直到此时，柯西金才腾出时间把苏联外交部第一远东司司长贾丕才叫过去，告诉他发生了什么事。

于是贾丕才向代表团宣布，飞机现在正在向中国飞行。这次去河内，勃列日涅夫要柯西金无论如何与周恩来会谈一下，表明苏联方面希望中苏关系和缓的意见，利用飞回来时机在北京停留。本来从河内到北京的航线不长，结果却绕了一大圈折至北京。柯西金叫随行人员准备一下材料，主要是针对边界问题。

当晚，苏联驻华大使馆临时代办叶利扎维金紧急约见中国外交部苏联东欧司司长余湛，表示：柯西金接到中方答复时，飞机已抵杜尚别，莫斯科方面仍指示他去北京会见周恩来总理。但后来的公开报道还是说柯西金是从河内回国途经北京的。

9 月 11 日上午 10 时 30 分，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乘坐的伊尔—62 专机降落在北京首都机场。周恩来、李先念、谢富治、乔冠华等前往迎接。

一见面，周恩来同柯西金还是紧紧握手，以同志相称，还转达了毛泽东主席对他的问候。

柯西金声明："苏联领导人绝不愿意为领土问题打仗。"

周恩来也立即向柯西金说明了中方的原则立场："理论和原则问题的争论，不应影响两国的国家关系。"

握手寒暄后，客人被引进候机楼西侧的贵宾室，在那里开始了一次努力扭转中苏关系的长达 3 小时 40 分钟的坦率而诚恳的会谈。后来人们把这次会谈称为"机场会见"。

周恩来对柯西金说："不管争吵得怎么样，来往总是要的，谈判总是要的。我们同美国还谈嘛，何况我们两个邻国呢？"

周恩来开门见山的说："你们说你们要用先发制人的手段来摧毁我们的核基地。如果你们要这样做，我们就宣布，这是战争，这是侵略。我们就要坚决抵抗，抵抗到底。但是，我们不希望出现这种情况，所以我要把这个话告诉你。"接着，周恩来缓和了语气，问柯西金："你说呢？柯西金同志。"

当柯西金讲中苏之间积累的问题很多，要一个一个讨论的话，可以讨论 3 个月时，周恩来指出："要向前看，我认

为边界问题是现在问题的中心。”

柯西金也认为边界问题是现有问题中最主要的。双方很快对此达成共识。

接着，周恩来把中国关于解决边界问题的立场作了简要说明，然后说：要解决边界问题，谈判总要用些时间，在未解决前需要采取一些临时措施。为此他提出了维持边界现状，避免武装冲突，双方武装力量在争议地区脱离接触的三条建议。双方以此为基础展开了求实的讨论。

关于“维持边界现状”，中苏双方一致认为，就是双方原来在哪里，还在哪里，没有人的地方谁也不去。维持边界现状的时限，应一直到边界问题的全面解决为止。

关于争议地区的概念，讨论的时间最长。1964 年的边界谈判中，双方曾交换过一份地图。苏方地图在许多地段上违反有关条约规定把边界标在中国领土的纵深，造成了许多“争议地区”。这次经过双方反复探讨，最后柯西金讲，“争议地区，就是你们说是你们的，我们说是我们的地区。”

关于避免武装冲突，除周恩来所提双方武装力量从争议地区脱离接触外，柯西金还补充一条：在双方遇有争议时，由双方边防部门相互联系，协商解决。

此外双方还同意：边境居民原来在哪里生产，还在哪里生产；为避免误会，只要互相通知一下，便可一次达成协议，当然，这并不影响这些地区的主权归属，归属问题须待边界

谈判解决。

周恩来把上述双方讨论的结果，归纳为维护边界现状、避免武装冲突、双方武装力量在争议地区脱离接触、在双方遇有争议时由双方边防部门协商解决等四条，再次征求苏方意见。柯西金当即表示：

“你讲的四条我完全赞同。”

周恩来接着说：“临时措施解决了，边境的紧张状态就会变成缓和状态了。”

就此，柯西金完全同意并且说：“周总理同志，缓和边界紧张局势是我们由衷的真诚的愿望，我们能够也一定能够做到。”

然后，双方又商定于近期各派一个副部长级的代表团举行边界问题谈判。周恩来提出，面临《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 15 周年之际，最好双方把彼此的贺电、讲话在报纸上公开发表，表示我们双方采取一致的态度。两国贸易在某些项目上可以长期合作，过去有些建设项目，可能的话，应该完成。在会谈中，双方除了讨论有关保持和发展两国贸易，还谈到恢复互派大使等缓和两国紧张关系的若干具体事项，取得了一致的意见。最后，周恩来说：

“尽管我们有许多重大的问题没有解决，但是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这次坦率会谈对双方都是有益的。”

双方还就边界谈判代表团的成员、地点、双边贸易等交

换了意见。周恩来还告诉柯西金，准备恢复中美大使级谈判。

最后，双方相约，就上述协议各自向自己的中央报告后，交换信件予以确认。

在会谈将要结束的时候，柯西金以比较轻松的口气说："我们走了一段弯路。"他是指参加了越南胡志明主席的葬礼后，希望途经北京同中国领导人会面。因未能及时得到回音而不得不取道印度回国。9 月 10 日又从苏联塔吉克共和国首府杜尚别转经伊尔库茨克，于 9 月 11 日上午到达北京。他接着说："但我们并不遗憾，我们很高兴到这里来。"

柯西金指着苏联代表团随行人员，包括贾丕才等人，打哈哈似的对周恩来说："是他们把事情搞坏了。像咱们这样高级别的领导人，所有的问题可以在 5 分钟之内得到解决。让我们把所有的分歧都装进麻袋里扔进黑龙江去怎么样？"

周恩来装作没有听见，没有回应。

会谈结束后，周恩来在机场设便宴招待柯西金。这是周恩来事先已为柯西金准备好的一顿国宴便餐。在柯西金专机即将抵达北京时，首长灶 4 位掌厨师傅就接到通知，要求准备一席国宴规格便宴送机场烹制。周恩来指示：

"中苏两党两国关系敏感，宴席规格要高，要超过以往。"

苏联人的口味，名厨徐筱波师傅再熟悉不过。他想起曾做过一道菜颇受苏联客人称赞：那是他根据京苏大菜系列中

的一种创新而成，主料是全聚德烤鸭，经去骨细切，加工成鸭肉片，伴以甜面酱、芹菜、芦笋、洋葱爆炒而成。这道菜汇集全聚德烤鸭和南京盐水鸭优点，色香味俱佳，只是不知道取什么名。

机场会客厅的便宴上，周恩来与柯西金酒过三巡，徐师傅压轴菜上桌。全聚德烤鸭素来蜚声四海，徐师傅一番烹制，更显巧夺天工之妙，只见厚薄均匀的烤鸭配以芹菜摆成的花朵，犹如一只全鸭悠游于花丛中，及至鸭片入嘴，又酥又脆，浓香四溢，柯西金连连翘指称赞。

柯西金的专机已轰鸣发动，做升空准备。可不多会儿，轰鸣声又停下来。工作人员跑来对徐师傅说："赶快备料，再为客人做一份最后那道菜，烤鸭马上就送来！"

原来，柯西金吃罢鸭片，嘴里"很好吃！很好吃！"还说个没完。

周恩来便问："还想要吧？"

"非常好，还想要。"柯西金毫不客气。

于是周恩来立刻让人通知厨师，同时，已经发动的飞机也停了下来。

飞机启动一次耗油惊人，可此时柯西金一心只想把那鸭子带走，柯西金座机被人戏称"柯西金鸭"因此得名。

据参加会谈的苏联驻华大使馆临时代办叶利扎维金称："柯西金同周恩来的会晤连同'便宴'持续到 16 时。"

会晤结束后，中国外交部将会晤记录及时印成文件分报毛泽东、林彪和中央政治局成员。

## 第 1104 回：促谈判，中美苏共同起舞

## 四老帅，再递交局势报告

1969 年 9 月 12 日，中国各大报都刊出新华社 11 日发布的简短新闻稿：“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今天在首都机场会见了从河内参加胡志明主席葬礼后回国途经北京的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双方进行了坦率的谈话。”

9 月 13 日，周恩来将会谈的内容报毛泽东，说：“中苏这样政府性质的接触还是第一次，我们争取缓和边境局势的四条协议实现，准备发表外交文件，促进边界谈判。”毛泽东批示同意。

此次中苏两国总理会谈本来挺好，双方皆大欢喜。可是，柯西金回国后，苏联的主要政治人物勃列日涅夫等人没有到机场迎接，说明苏联当局有些人并不同意柯西金的立场。随后，中方要求两国政府换文，从文字上确认双方达成的谅解，被苏联托词拒绝。苏联方面还是不承认中苏边界存在“争议地区”，甚至否认双方领导人达成的口头谅解。

当秘书将会晤记录的内容要点讲给林彪时，林彪毫无反应。他根本不相信苏联人的那套外交辞令，甚至怀疑柯西金是带着“鸽派”的假面具，想重温一年前苏联士兵侵占捷克斯洛伐克的旧梦。

1968 年 3 月，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改革派杜布切克当选为第一书记，斯沃博达任总统。随后，大力推行经济和政治

改革，改组中央主席团和书记处，撤换反对改革的重要人物。4 月，捷共中央全会通过《行动纲领》，强调捷克斯洛伐克正处于新的转折时刻，“必须建立一种十分民主的、适合捷克斯洛伐克条件的社会主义社会新模式”，并提出建立联邦制国家，在发展同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的联盟与合作的同时，发展同一切国家的互利关系等等，西方电讯社称该国出现了“布拉格之春”的活跃局面。这些，引起苏联的不满。

1968 年 7 月 22 日，捷共中央第一书记杜布切克拒绝苏联提出的去华沙或莫斯科参加会谈的“邀请”。于是，苏联宣布，苏共全体政治局委员组成的使团将“访问”布拉格。7 月 29 日，苏共政治局的委员们抵达捷克斯洛伐克的边境城镇切尔纳，同捷共中央主席团成员会谈，讨论捷克斯洛伐克的局势。会谈在 8 月 1 日结束，双方分歧依然。与此同时，苏联从 7 月 23 日到 8 月中旬，以演习为名，在捷克斯洛伐克边境地区集结军队。8 月 20 日晚 23 时，布拉格机场接到一架苏联民航机“机械事故，要求迫降”的信号，没有理由不同意。客机一降落，数十名苏军突击队员冲出机舱迅速占领机场。几分钟后，苏第 24 空军集团军巨型运输机开始降落，一分钟一架。1 小时后，一辆苏联大使馆的汽车引路，苏军空降师直扑布拉格市区。与此同时，苏联陆军总司令帕夫洛夫斯基大将指挥 4 个苏军装甲师，1 个空降师，1 个东德师从波兰直捣布拉格；驻东德 4 个苏军师，1 个东德师切

断捷克斯洛伐克西部边界；驻匈牙利的苏军 8 个师，匈军 2 个师，保加利亚军一部从南部进攻；苏波合成军 4 个师进攻北部。同时，苏军对北约和捷军开始全面电子压制。

21 日拂晓，苏军占领布拉格，逮捕捷共中央第一书记杜布切克，并解往莫斯科。他的唯一罪名就是不听苏联的话。

进攻开始 6 小时后，苏军控制了捷克全境。几十万捷军被全部缴械，北约也没来得及做出任何反应。

这是苏军一次典型的方面军群进攻战役。西方向主攻，西南方向配合，共动用 4 个方面军，1 个坦克集团军，4 个诸兵种合成集团军，26 个师，约 30 万人。但由于进攻过快，两个战略方向的后备坦克集团军群均未出动，只动用了各集团军、师、团的直属坦克，共有 9000 余辆。

这就是苏联武装干涉捷克的“布拉格事件”。

一年前苏联演出的这一闹剧在林彪的脑海里记忆犹新。“大鼻子”的话说得再好听，他也决不相信。

中苏两国首脑的突然会晤，也使大洋彼岸美国总统尼克松大为震惊。半年前中苏两国还是兵戎相见，怎么一下子就握手言和了？此事完全出乎尼克松的意料，美国方面事先未得到任何消息。尼克松是从《华盛顿邮报》上获悉这一消息的。他担心周恩来与柯西金的会晤会导致中苏关系的缓和，这对美国来说非同小可。尼克松感到有一种坐失良机的感觉。他立即召见基辛格。

基辛格不愧是尼克松的得力外交助手。他从中苏两国总理会晤后发表的新闻公告中看出了门道。他说：

“这是官样文章，他们这么长时期的矛盾决不会因为机场的一次谈话就化解了。你看他们的公告里连一个‘同志般’的字眼都没有。”

这正是周恩来外交的智慧。本来，在送审的新闻公告稿中，有“同志般的”、“友好的”字眼，周恩来审阅时把这些字眼都删去了，只留下了一个形容词“坦率的”。实际上，周恩来与柯西金的会晤还算是友好的。

尽管基辛格这样安慰，尼克松还是有点着急，他要基辛格急电美国驻波兰大使斯托塞尔尽快设法秘密接触中国驻波兰大使馆官员，试探能否恢复华沙中美大使级会谈。同时，美国情报部门限期搜集柯西金在中国 3 个小时的详细情况。

9 月 13 日，陈毅、叶剑英、聂荣臻、徐向前四位老帅集体阅读了周恩来同柯西金的“机场会谈”谈话记录，并进行讨论。他们认为，柯西金屈尊就教，主要原因是想同中国缓和一下，借中国压美国，同时也摸摸中国的底。

陈毅说：“中苏首脑会谈震动全世界，一旦举行中美首脑会谈，一定会更加震动全世界。”

不久，战争的空气又紧张起来。对柯西金北京之行，有些人认为是苏修大举侵华前施放的烟幕，犹如日本偷袭珍珠港前派特使去美迷惑罗斯福一样。持这种观点的根据是：

一、柯西金在同周恩来谈话中，并未否认苏修向我挥舞核武器，更未保证今后不向我发动核战争；

二、柯西金返回莫斯科时，苏联的主要头目均未出场，只派二、三流人物到机场迎接，说明柯西金所作的若干缓和承诺不代表苏联政治局的意见；

三、外电报道，9 月 10 日苏联驻联合国代表团一位成员对美国一位代表说，苏联在军事上具有对中国的压倒优势，如果中国对苏联的敌对态度继续下去，一场军事较量无法避免；

四、9 月 12 日《人民日报》在题为《核讹诈救不了新沙皇的命》的文章中揭露，苏联国防部第一副部长扎哈罗夫说，苏联“战略火箭部队随时准备立即行动”，“出其不意地进行打击”，“使敌人措手不及”。

9 月 16 日，伦敦《星期六邮报》登载了苏联自由撰稿记者、实为克格勃新闻代言人的维克多·路易斯的文章，称“苏联可能会对中国新疆罗布泊基地进行空中袭击”。

苏联对中国实施外科手术式核打击的阴云又一次笼罩中华大地。美国明白，维克多的文章是对美国的一个试探，更是对中国的示警。出于美国全球战略利益和发生大规模核战争的严重后果的考虑，尼克松紧急召开国防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副总统阿格纽、国防部长莱尔德、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惠勒、国务卿罗杰斯和基辛格。

尼克松认为："对于眼前这场中苏一触即发的战争，我们当然应当阻止。如果他们执意要打，那是他们的事情。"为此，美国决定实施三步曲：

一是由于中美政府之间没有交流渠道，安排高级官员会晤，要费很多周折，时间也来不及，美国可以把中美大使级华沙会谈捡起来。华沙会谈延续了 15 年，现在已中断了两年，此时恢复，意义自然非同寻常，可以安排驻波兰大使沃尔特·斯托塞尔马上去办。

二是要利用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等人与中国的亲密关系，传递美国期望与中国和解的诚意。

三是为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美国亮出了 1962 年古巴导弹危机中尚保留未及动用的一张王牌——用已被破译的苏联密码，向苏联本土 134 个城市、军事要点、交通枢纽、重工业基地发出进行准备核打击的指令。

在这种情况下，四位老帅又进行了讨论，并写出了《对目前局势的看法》，由陈毅定稿，9 月 17 日报送周恩来。

四位老帅在《对目前局势的看法》中首先指出："国际阶级斗争错综复杂，中心是中、美、苏三大力量的斗争。目前压倒一切的问题是苏修会不会大举进攻我国。正当苏修剑拔弩张，美帝推波助澜，我国加紧备战的时候，柯西金突然绕道来京，向我表示希望缓和边境局势，改善两国关系。其意何居，值得研究。"

然后，他们提出以下几点：

一、“苏修确有发动侵华战争的打算。”

二、“苏修虽有发动侵华战争的打算，并且做出了相应的军事部署，但它下不了政治决心。”因“对华作战争的决策，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帝的态度。迄今美帝的态度不但未能使它放心，而且成为它最大的战略顾虑”。美帝“绝不愿苏修在中苏战争中取胜，建立资源、人力超过美帝的大帝国”，“美帝多次表示要同中国改善关系，这在尼克松访问亚洲前后达到高潮”。苏修“深怕我国联合美帝对付它。7月26日尼克松出访亚洲的第一天，苏修迫不及待地向我方交出其部长会议给我国政府的声明，充分表现了苏修惶惑不安的心情”。“它对中、美可能联合的担心，增加了它大举进攻我国的顾虑”。文中还列举了其他“种种因素”，判定“苏修不敢挑起反华大战”。

三、“柯西金的北京之行”，是“基于反革命实用主义的需要，试图改变对我国的战争边缘政策，打出和谈旗帜，借此摆脱内外困境”，并“探询我方意图，作为苏修决策的依据”。“估计苏修可能同我谈判，要我基本上按照它的主张暂维边界现状或解决划界问题；在继续反华的同时，缓和并改变同我国的国家关系，以便争取时机，堵塞国内漏洞，稳定东欧形势，巩固和扩展在中东及在亚洲等处的阵地；特别是想利用对我国的反革命两手政策，在同美帝的争夺中，

增加一点资本，求得一些主动”。

四、“周总理会见柯西金的消息，轰动了全世界，使美帝、苏修和各国反动派的战略思想发生混乱。”“我们坚持打倒美帝、苏修，柯西金反而亲来北京讲和，尼克松反而急于同我们对话，这都是中国的伟大胜利。”“在中、美、苏三大力量的斗争中，美对中、苏，苏对中、美，要加以运用，谋取它们最大的战略利益。”而我们“对美、苏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也包括用谈判方式进行斗争。原则上坚定，策略上灵活”。“苏修要求恢复大使级会谈，我也可以选择有利时机给予答复。这种战术上的行动，可能收到战略上的效果。”

在这个报告定稿后，陈毅提出他对打开中美关系的设想，并向周恩来作了口头汇报，他说：

“这个报告，主要是分析柯西金来华意图和苏修会不会大举进攻我国的问题，对恢复华沙中美大使级会谈没有多讲，只从战略意义上点了一笔。关于打开中美关系，我考虑了很久。华沙会谈谈了十几年，毫无结果，现在即使恢复，也不会有什么突破。我查了资料：1955 年 10 月 27 日，我们提议举行中美外长会议，协调解决缓和与消除台湾地区紧张局势问题。1956 年 1 月 18 日和 24 日，我外交部发言人两次发表声明，指出中美大使级会谈已经证明不能解决像缓和、消除台湾地区紧张局势这样重大的实质问题，必须举行中美

外长会议才是解决这个问题的切实可行的途径。这一重大建议被美国拒绝。现在情况发生变化，尼克松出于对付苏修的战略考虑，急于拉中国。”

陈毅接着说：“我们要从战略上利用美苏矛盾，有必要打开中美关系，为此必须采取相应的策略。我有一些不合常规的想法：

第一，在华沙会谈恢复时，我们主动重新提出举行中美部长级或更高级的会谈，协商解决中美之间的根本性问题和有关问题。我们只提会谈的级别和讨论的题目，不以美国接受我们的主张为前提。我估计美会乐于接受。如果我们不提，我估计美国也会向我们提出类似的建议。如果这样，我们应该接受；

第二，只要举行高级会谈，本身就是一个战略行动。我们不提先决条件，并不是说我们在台湾问题上改变立场。台湾问题可以在高级会谈中逐步谋求解决，还可以商谈其他带战略性的问题，这不是大使级会谈所能做到的；

第三，恢复华沙会谈不必使用波兰政府提供的场所，可以在中国大使馆里谈，以利保密。”

此后不久，中共中央做出两项决策：一、允许在柬埔寨逗留的美国参议员曼斯菲尔德来华；二、同意重开中美大使级会谈。

这两项决策在当时世界上虽未引起轰动效应，但却预示

了毛泽东新的重大战略步骤的出台。经过深思熟虑与慎重的外交接触，毛泽东断然决定：打开中美关系的大门。

中国在国庆节前照例要发布口号。经周恩来主持拟制的口号共有 28 条，其中关于战备方面的有“备战、备荒、为人民！”“提高警惕，保卫祖国！随时准备歼灭入侵之敌！”毛泽东在审阅时感到意犹未尽，他提笔又加了一条：“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反对任何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特别要反对以原子弹为武器的侵略战争！如果这种战争发生，全世界人民就应以革命战争消灭侵略战争，从现在起就要有所准备！”这条口号长达 83 字，已经不是口号，到像是篇简短檄文、政治宣言。这条口号明确地表达了毛泽东对形势的估计和对战备工作的态度、决心。

9 月 17 日，《人民日报》及各大报均在头版以整版篇幅刊登《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二十周年口号》，共 29 条，其中第 22 条口号就是毛泽东亲笔加的那 83 字。9 月 18 日，《人民日报》刊载新华社的报道说：“国庆口号第 22 条是伟大的动员令，具有深远的战略意义。”

## 第1105回：毛泽东，北京接见李德生

## 忆往事，林彪再上井冈山

1969年9月17日，经毛泽东审阅同意，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增补、调动、撤换各级革命委员会成员的通知》。《通知》规定：

一、各级革命委员会需要增补委员、常委和副主任时，要注意增补革命领导干部和革命群众代表，要着重增补优秀的产业工人代表。

二、革命委员会中，有调往他处的或红卫兵从学校毕业后下放劳动的，都不要忙于免除他们的职务；对犯有某些错误的革命委员会成员，应按照“团结-批评、自我批评-团结”的原则进行帮助教育，不要轻易进行组织处理；对于有严重政治历史问题的革命委员会成员的处理，应报请中央或上级革命委员会批准；对于十分急需调动、撤销的革命委员会中的委员、常委、副主任、主任，要在群众民主协商的基础上再上报中央或上级革命委员会，批准后施行。

9月18日，周恩来致柯西金信：“1969年9月11日，在北京机场的会见中，我们双方同意长期悬而未决的中苏边界问题，应该在不受任何威胁情况下，通过和平谈判解决；在解决前，双方采取临时措施，维持边界现状，避免武装冲突。这些临时措施如能得到你来信确认，即作为中苏两国政府之间的协议，立即生效，并付诸实施。我相信，如果这个

协议能够达成，将有助于两国边境局势的和缓和中苏边界谈判的举行。”

该信内容于 16 日经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修改并于 17 日报毛泽东。

9 月 20 日晚，周恩来再次谈到清查“516”的问题，他说：

“革委会是中央肯定的。如果革委会一级有毛病，那是加强问题，改进问题，不能说今天的革委会里是走资派掌权。对新产生的中央委员会、新成立的革委会，要尊重。中央所发布的布告、通知、通令，都是经中央讨论过的，通过的，同意的，全国都要遵守、执行。有的地方还要闹，还要夺权，你夺谁的权？不是要夺无产阶级的权吗？这就不简单是极‘左’。如果不改，还要闹，后头就必然有坏人。这就值得注意。

反复旧，湖北现在还闹。起初出在山东，山东的反复旧传到湖北。他们出版刊物，叫做《扬子江评论》，说什么现在是走资派当政，他们提出要农村包围城市，大搞秘密活动。他们的这种做法，其性质基本上是 1967 年的‘516’活动。他们秘密搞，还散发传单。阶级斗争在国内还会有起伏。这样来一下也好，把敌人暴露了。”

“极‘左’（后边的坏人）不能说外交系统一个也不存在。‘一外’批极‘左’就搞得不深不透。‘516’是个阴

谋集团，他要为资本主义复辟。他们表面上是搞极‘左’，实际上是要颠复无产阶级政权。当然，也不能说凡是参加‘516’的都是反革命，都不可救药，只要他坦白交代了，自己是受欺骗、受蒙蔽的，坦白了可以不戴帽子。要区别一般受蒙蔽的群众坏头头，更要区别埋在后头的反革命黑手。批极‘左’，不仅是外院没有批深批透，从整个中央机关来看，也还没有搞深搞透。”

“原来搞‘516’、挖‘516’的时候，我们提了四条：第一，不要扩大化；第二，不要让老保翻天；第三，要区别对待，第四，要促进大联合。提了这四条，当时是需要的。现在，抓了大批判，区别了什么是无产阶级，什么是资产阶级，当然仍要把一时的极‘516’同搞阴谋集团区别开来。但是，不能强调了不扩大化，就不敢动了，就缩手缩脚了。中央各单位还没有搞深搞透嘛！扩大化，不加区别，不要区别对待，不对，但是，不敢动，不搞深搞透搞彻底，也是不对的。要防止两个极端。”

9 月 18 日，毛泽东离开杭州来到上海，21 日离开上海经南京抵达济南。他在济南停留期间，在专列上接见了杨得志、袁升平、王效禹 3 人。接见时，毛泽东颇为关心的问王效禹：“怎么样，能抗得住的吗？”

王效禹回答：“能。”

9 月 22 日，毛泽东离开济南到达天津，他没有急于赶回

北京，而是在天津呆了一天，接见了天津市革委会核心小组全体成员和驻津陆、海、空三军部分负责人，并乘车视察了天津最繁华的和平路，指示要在这里修建防空设施。

1969 年 9 月 22 日，毛泽东与天津市革委会核心小组全体成员、驻津陆、海、空三军部分负责人和天津干部俱乐部工作人员合影

1969 年 9 月 23 日，毛泽东在天津同专列工作人员合影

9 月 23 日，毛泽东返回北京。此次南巡，毛泽东在外地时间长达 118 天，是文革以来毛泽东离京外出时间最长的一

次，也是随卫人员最多的一次。

不久，毛泽东要亲自接见李德生。

被毛泽东点名请去面对面谈话，这对于李德生来说是生平第一次，兴奋中不免有些紧张。可是，当他走进毛泽东居住的房间后，紧张的心情便不知不觉消失了。

毛泽东的房间没有什么摆设，满眼都是书，尤其是线装的古书特别多，连睡觉的大床上也堆着书。毛泽东的随和、简单使人感到亲切。特别是在谈话时，毛泽东随手拿起周恩来的老花镜，往眼睛上试戴了一下，还远近看看合适不合适。这个常人的举动更让李德生感到亲切。

毛泽东对李德生说："你是 12 军的，是南京军区的。我了解你，不是通过南京军区，而是通过其他同志了解的。他们都说你不错。"

他们的谈话很轻松，周恩来在一旁不时地插话补充。

毛泽东问李德生："看没看过《红楼梦》？"

李德生不好意思地回答："报告主席，我还没有读过。"

毛泽东认真地说："要读《红楼梦》，我看了五遍才解开。《天演论》和《通鉴纪事本末》也要看。"

李德生当时并不能一下子理解毛泽东叫他读古书的用意。后来，他在实践中逐渐明白，这是毛泽东想让中共高官从历史中学会借鉴，博古才能通今。

周恩来向毛泽东谈了对李德生的工作安排。李德生说：

“自己水平不高，怕不能胜任这么多重要的工作，安徽、南京的工作能不能免去？”

毛泽东把手一挥说：“不要免，一个也不要免。南京的不要免，安徽的也不要免。”

周恩来在一旁也鼓励道：“你大胆干。毛主席教导我们‘实践出真知’嘛！”

毛泽东笑了笑，最后说：“你是一边工作，一边学习。三分之一时间在北京工作，三分之一时间读书学习，三分之一时间到下边搞调查研究。”

自此，李德生便身兼党政军数职，开始接触各方面的工作。工作顺序首先是中央政治局，其次是国务院业务组，然后是中央军委办事组。

当时，按中央的意见，李德生在中央军委办事组分管军队政治工作，“固定管理军委办事组的总政工作”。

9 月 20 日晚，周恩来到京西宾馆参加在这里举办的贵州学习班全体会议。他在讲话中已明确批评李再含，说他“不说实话,变成两面派”，“占了领导地位后，滑到危险的边缘了。”他还批评李再含在贵州自封小红太阳，搞多中心，是封建意识。

9 月 22 日，在北京的贵州学习班给贵州省发回急电，提出 7 条意见，要求全省各地无条件收缴一切武器，立即无条件停止武斗，解散各种形式、各种名称的武斗队。

9 月 24 日，周恩来、陈伯达、康生在呈送毛泽东的报告中指出，由于李再含指导思想上的错误，使省军区领导人之间长期以来分成两派，41 师和独立师，军分区、人武部内也是严重对立，各支一派，这是贵州问题长期未能解决的一个重要原因。

这时，周恩来发现贵州省赴京参加 10 月 1 日建国 20 周年大庆的观礼代表团 105 人中，没有不同观点的群众组织代表，立即决定再补充 20 人，要求贵州省革委和 0276 部队落实人选。除铜仁和黔西各 1 名农民代表和贵阳市的许浔生、张谏外，其余均为“411”代表，于 9 月 28 日乘周恩来安排的飞机到北京，与先到的贵州省观礼代表团同住东单大街的北方饭店。当晚，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革委主任、国庆节筹备组组长吴德来住地看望大家。

9 月的一天，林彪、叶群、吴法宪和工作人员共 100 多人,分乘两架飞机,从北京起飞,经过几个小时的飞行,降落在了江西的樟树机场。大队人马走下飞机,乘汽车径直奔向当地的下榻处。时任解放军总参谋长黄永胜也随后赶到。原来，林彪要上井冈山。

这天晚上，林彪、叶群与黄永胜、空军司令员吴法宪、江西省党政军“一把手”程世清及全体随行人员共进晚餐，吃红军当年吃的红米饭、南瓜汤。

就餐前,叶群根据林彪的安排首先讲话，简要介绍了当

年红军在井冈山战斗的英勇事迹和艰苦奋斗的生活作风。接着，由她指挥，与所有就餐人员一起，唱起了当年红军的革命歌曲。

此次外出前，叶群已安排先行人员从北京乘飞机到江西打前站。除了安排林彪到江西的食宿外，还试航了林彪的专机“子爵”号，并在樟树机场改乘双引擎“安一24”型小客机，检查了直飞井冈山以北吉安机场的飞行线路。江西省革委会主任程世清也亲自坐镇，把吉安城主要街道墙壁上的大字报洗刷一空，还按林彪的生活习惯准备好了住房。另外，程世清还让人从省里选了最好的5辆汽车。吴法宪也派出一架“安—12”飞机，把林彪和叶群乘坐的豪华轿车运到了樟树机场。

第二天早饭后，林彪从樟树乘飞机来到吉安。随后，即乘汽车前往井冈山。

车队缓缓行驶。在一个山巅之上，林彪的车突然停下。他下车小便之后，指点着鬼斧神工的悬崖峭壁，对随身警卫的人员说：“创立井冈山根据地几十年了，没有这块立足之地，就没有今天。当年红军在这些天险要塞上面修筑了哨卡、工事，蒋介石倾巢出动，坐镇南昌，亲自指挥重兵，层层包围了井冈山，如果不是因为这里的天时地利条件好，就很难保住这块弹丸之地。有了它，才保住了红军，最后打下了整个江山。应该说，井冈山是中国革命和人民解放军的发祥之

地。”

平时少言寡语的林彪，这天特别激动，心情也特别好，一口气对下属说这么多话，这真是破天荒了。

有人问林彪井冈山是不是很大？林彪说:“大得很哪！方圆四五百里。当地人不叫它井冈山，叫大小五井。因为四周、山上有五口水井，现在不知还在不在?”

江西省给林彪在井冈山安排的下榻处是茨坪，这里有最好的两栋别墅。可是，林彪一下车，环顾一周后，下达了不住别墅，要住离街不远的井冈山宾馆的指示。这一下可忙坏了接待人员，也吓坏了随卫人员。井冈山宾馆此时还住着客人，又临近街道，安全方面万一出一点疏忽，可是重大的政治事故呀！但这是首长的指令，没有一丝商讨余地。于是，接待人员和警卫人员立即紧急行动。经过一阵突击，将三层大楼全部腾了出来。林彪住宽敞的一楼会议室，叶群和有关人员分别住一楼和二楼。

夜幕降临，井冈山宾馆内外的所有广播喇叭全部“扳闸”，变成了哑巴。宾馆内部的收音机也不准任何人收听。宾馆内外静悄悄的，警卫人员在四周戒备森严。

大约 23 时，突然从叶群的房间里传出了大声吵叫：“我一不在家，你们就成了霸王啦？你擅离职守，干什么去了？”

原来，叶群打电话找留守北京的耿秘书，恰巧耿秘书不

在。等耿秘书回来接电话时，她大发雷霆，大声训斥道：

“这次是首长有重大政治意义的行动，你知道不？你对首长的安全不放在心上，你对首长是什么感情？什么态度？今后给你规定一条纪律：只要首长外出，你不能离开电话机一步，这是一条纪律，你知道吗？”

叶群的喊叫，整个楼道的人都能听到。

第二天，林彪继续在井冈山视察。在山区行走时，林彪奋力登上一块巨型岩石，这使警卫人员十分惊讶。平时，他走几十步路都要气喘吁吁，而这天却精神抖擞。

此时，山下白云翻滚，真像波浪滔天的大海。这里，就是毛泽东诗词中的黄洋界。

林彪信步向西慢行，突然在一棵大树前站住。这是一棵参天大树，树叶特别茂盛，林彪无限深情地说：“我认识它，想当年，毛主席领着红军战士挑粮上山，常常在这棵树下歇脚，这棵树也算是革命功臣了。”说到这里，林彪几乎流出眼泪，流露出了抚今追昔的情怀。

随后，林彪又走上黄洋界的制高点，指着一栋木制结构的小阁楼说：“当年红军在这儿设了望哨，你们看，小楼附近还残留下了一处工事的废墟。”

说完，林彪背着双手，沉默不语，徜徉良久，仿佛在追忆着往日井冈山的烽火硝烟。随后，他诗兴大发，当晚叫人代笔写下了一首《西江月.重上井冈山》的词：

繁茂三湾竹树，

茫茫五哨云烟。

井冈搏斗忆当年，

唤起人间巨变。

红日光弥宇宙，

战旗涌作重洋。

工农亿万志昂扬，

誓把敌顽埋葬。

四十年前旧地，

万千往事萦怀。

英雄烈士启蒿莱，

生死艰难度外。

志壮坚信马列，

岂疑星火燎原。

辉煌胜利尽开颜，

斗志不容稍减。

林彪将别人代拟稿中的“坚信英明领袖”勾掉，改为“志壮坚信马列”，将“何疑星火燎原”，改为“岂疑星火燎原”。

在黄洋界，程世清躬请林彪为“黄洋界”题字。 林彪提笔写下了“黄洋界”三个字。然后，程世清又请叶群题词。叶群抄了毛泽东《西江月·井冈山》半阙词：“早已森严壁

垒，更加众志成城。黄洋界上炮声隆，报道敌军宵遁。”

林彪在井冈山休息了一天。次日，又来到七溪岭。这七溪岭也是军事要塞。在汽车不能行走的岭下，所有人员都下了汽车。崎岖不平的山路，林彪走了不大一会儿，就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大家劝他不要走了,他摇摇头,十分肯定地说:“一定要上去看看。”他气喘吁吁地指了指山上说:“红军在这座山上,凭借天险,用麻雀战术,一举打垮了敌人两个师五个团的进攻。这七溪岭也是我出生入死的地方。”

下午回到宾馆，林彪休息一阵子后，在黄永胜、吴法宪等人陪同下，又看望了老赤卫队员。期间,一位老赤卫队员向林彪赠送了一块井冈山产的十分罕见的精美玉石，宽约 20 公分，长约 25 公分。此石带回北京后，林彪让人刻成一方砚台,送给了叶群,砚台上还刻下诗句:“发不同青心同热,生少同衾死同穴”。

林彪在井冈山住了 4 天，决定翌日下山回京。

在临别的宴会上，程世清对林彪说：“上次主席到井冈山时，去了南昌。这次首长来井冈山，政治意义重大，恳请首长也能光顾”。林彪点头应允。可飞机起飞后,叶群却让飞机直飞北，让在南昌机场等候的人白等了一场。

林彪夫妇走后，程世清命令在黄洋界重立“界石”，一面刻上林彪题的“黄洋界”三个字，另一面是叶群抄的毛泽东的半阙词。

在此之前，1968 年，程世清曾进行了井冈山形象改造。那年春天，根据他关于“位置不能一个个去摆，不能平分秋色，历史得为现实服务”的指示，由福州、长沙、南昌、洛阳等地军事院校的党史教员们搞出了井冈山博物馆新的陈列方案。在新方案里，“井冈山革命斗争博物馆”更名为“毛主席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纪念馆”；陈列的指导思想是“三突出”，即突出毛泽东思想，突出毛主席，突出林副统帅；陈列的内容由过去的以历史为线索，改为专题组合：党的建设，军队建设，根据地建设……贯穿其中的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与党内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

纪念馆里有一张 1929 年 1 月红 4 军关于向赣南闽西进军的布告，落款处署有“军长朱德、党代表毛泽东”，这次被要求处理掉“军长朱德”这 4 个字。怎么做到这一点呢？这被列为当时几个重大疑难问题之一，提交纪念馆领导小组会上商议。有人提出将这 4 个字折掉，然后翻拍成照片展出，因过于露骨未被采纳；有人建议用香火烧去，只要动作徐缓、细致，烧出来的小洞，颇像被虫子蛀出来的。此建议立即引起与会者的兴趣，有人补充，如果布告的四沿再烧去一些，可以分散某些观众的过分好奇，造成一种整张布告未被保存好的真实感。领导小组决定采用此种“技术处理”后，向程世清汇报，他当即表态：“这样处理好！”朱德的扁担，实物被撤走了，换成一幅油画：挑粮的毛泽东、林彪在黄洋界

的那棵槲树下小憩。由此，便有了后来“林彪偷走了朱老总的扁担”的笑谈。

油画《井冈会师》，是纪念馆陈列的十余幅大型油画之一，由于其现实意义，更被摆放在异常突出的位置：远景是青葱的峰峦，欢腾的河水，盛开的杜鹃，悠悠的白云。两支部队在拥抱，欢呼……近景是在一面闪动阳光的红 4 军军旗下，走来身穿一身蓝布军装、风华正茂的毛泽东，稍后是眉清目秀、神情谦恭的林彪。据说，一次中央军委常委在京西宾馆开碰头会，会前，江青代表“中央文革”送来这幅印制好的油画。老帅们看着，都笑了。陈毅看到这幅油画时说：“这算啥子井冈山会师？分明是红卫兵会师嘛！”江青气得扭头就走。

程世清还下令将茨坪纪念馆大门两边改装成火炬灯，并在黄洋界上立起了高达 20 余米的火炬亭，亭顶有一个耗资数万元的大火炬，外壳是红色有机玻璃，内以钢片支撑，下面是一个六角亭。南山山头也被削平，修整为有几个篮球场面积大的航船形状，船头位置，准备建一座毛泽东与林彪并肩屹立的巨型雕塑，以寓意“大海航行靠舵手”；四角，建了 4 个火炬亭，周围的栏杆花纹也由无数的小火炬组成，象征着“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1968 年冬天，程世清又下令炸掉罗浮棋罗坳的牌楼，上面有 1962 年 3 月朱德上井冈山时的题词——“天下第一

山”。炸毁的还有“黄洋界保卫战胜利纪念碑”，这 11 个字，也是 1965 年春天派人专程去北京请朱老总题写的。老的黄洋界“界石”上，“黄洋界”三个字也是朱德笔迹，程世清也令人搬走。

第 1106 回：抓战备，全军开作战会议

迎十一，副统帅忙碌不停

9 月 22 日，周恩来参加全军战备工作会议并讲话。

这天，军委批准总参关于防止敌人突然袭击小组成员调整的报告，同意由副总参谋长阎仲川任该小组组长，总参作战部副部长范天恩、总参二部副部长徐敏辉和总参三部副部长冯维精任副组长。

9 月 25 日，中央军委根据毛泽东指示，召开有各大军区司令员、政委、作战部长及各总部、各军兵种领导人参加的作战会议，主要研究加强“三北”，即东北、华北、西北的战备问题。会议由总参谋长、军委办事组组长黄永胜主持。这次会议是林彪报请毛泽东批准后召开的。

为准备应对可能到来的战争，林彪让总参作战部绘制了一份长约 7 米、宽约 3 米的“三北”地区防御态势示图，展开有半个房间大。这张地图是绘制在非常柔软的绢丝，不起皱，不怕卷，也不怕踩，字迹印刷得很清晰，上下都装裱有大卷轴，是根胳膊粗的棍，扛起来很重，足有二、三十斤，挂不到墙上，只能平展在地毯上。平时平放在档案室保险柜上，不能竖放，否则会变形。

林彪连着 3 天站在这幅“三北”地图边，手拿一根木棍，在上边搜寻着所关注的战略要地。有时，他干脆踩到地图上，或者坐下拿放大镜看，看得很仔细。林彪眼花了，看不清地

图上的地名，让李根清在旁边拿着米尺为他指地名，量直线距离。因为图幅比例林彪知道，不用算，林彪就知道实际距离是多少。尤其是东北、华北这两部分，简直就烂熟在他心里。从东北的长春、沈阳，距离蒙古边境的直线距离，平原、山川，到西北毛乌苏沙漠、包头，……像南口，古北口，张家口这几个大口子，林彪张嘴就说出来。

林彪认为重点是华北，但对西北、东北也要注意到。林彪打仗最讲迂回，他也最害怕敌人大迂回。如果敌人大迂回可能从哪里进来？这是他必须研究的，所以他特别关注东北、华北、西北地段的主要山脉、河流、平原、山口的位置距离。这些，他都让李根清一一念给他听。

林彪尤其注意张家口，也着重了解华北长城沿线的几个口子，山海关、冷口、喜峰口、古北口、南口。林彪还专门让李根清把冷口、喜峰口都找一找，看看它们在北京的位置。

林彪让李根清指了长城沿线的平型关、雁门关、五台山，问了居庸关和京西原平。原平地处山西中部偏北，东临五台，历史上是内地通往塞外的一条官道。从原平沿铁路线经涞源即可到北京。林彪还让李根清指了密云水库、官厅水库。

林彪不断提出问题，问距离北京最近的城市。华北这一块，张家口、二连浩特，到内蒙古的集宁，他注意到这一段的铁路线。

林彪研究了蒙古乔巴山、乌兰巴托，注意这两个城市的

方位，大体与北京的距离。

他专门问到赤塔，伊尔库茨克，在哪个位置？还特别叫李根清找出伊尔库茨克，让他拿尺子量一量，距离北京的大概距离，计算导弹飞行时间：从伊尔库茨克发射导弹到天安门大概要 9 分钟。然后林彪要求计算从天安门撤下来，撤到地下工事需要几分钟。总参作战部报告说，用不了 9 分钟。

乔巴山周边也有导弹阵地。所以这都是林彪关注的重点。

林彪在地图上走到这里，又走到那里，在地图上走来走去，看得很仔细。该休息了，林彪叫李根清先走，但不让他把“三北”地图拿走，说他自己还要在地图上再看一看。

林彪连续 3 天看“三北”地图。叶群则忙前跑后，现从空军“抓”来一个摄影记者将林彪此刻的身姿摄入了镜头。

9 月 26 日，毛泽东批示：“军队不要松劲”。

27 日，作战会议结束。当晚 19 时 40 分，毛泽东、林彪、周恩来和在京的全体政治局委员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厅接见全体与会人员并合影。接见时发生了一个令人尴尬的小插曲：参加会议的 70 多人早已成四列在活动阶梯上站好，当毛泽东和林彪、周恩来等在门口出现时，总参作战部的一位副部长突然带头呼起口号来。由于这不是一般的群众集会场面，人数不多，而且被接见者多数是毛泽东所熟悉的高级干部，大家都感到一种说不出的别扭。毛泽东尤其敏感，马上

皱起了眉头，冲大家摆了摆手，一面急促地说："不要，不要！"但是，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口号一喊就是一个系列，不能中途停下。当那位副部长硬着头皮带领大家把整套口号喊完时，毛泽东已经很不耐烦了，他又说了一句："讨嫌！"接着和其他领导人入座，同大家一起照相。毛泽东余愠未消，连连催促："快点，快点！"照完相，他只说了两句话："不留同志们在北京过国庆节了。大家早点回去抓紧作好战备工作。"说完，便径直走了。

按照毛泽东的习惯，像这样的接见，他往往喜欢和被接见者中的熟人开几句玩笑，对大家讲一讲话。但是今天，那位副部长的唐突举动使他大为不快，一点兴致也没有了。许多被接见者因毛泽东匆匆离去大感失望。那位领喊口号的副部长则大受埋怨，自讨无趣。

毛泽东走后，与会人员转移到湖南厅，听林彪等人讲话。林彪在讲话中提出：全军当前的中心任务就是加强战备，准备打仗；要用打仗的观点观察一切，检查一切，落实一切。以后，有人把林彪的这几句话归纳为"一个观点，三个一切"，成为指导部队工作的纲领。周恩来、陈伯达、康生也讲了话，都要求部队提高警惕，切实作好战备工作。接见结束后，与会人员回到住地京西宾馆已近午夜，军委办事组成员黄永胜等人又召集大家布置会议的传达贯彻措施。外地各单位与会人员都遵照毛泽东的指示，在次日乘专机离开北

京。

20 年国庆将至，中苏关系如此紧张，核大战似乎一触即发，国庆天安门集会还搞不搞？考虑到 20 年大庆有几十万群众要到天安门广场集会，国家领导人都要上天安门，一颗原子弹下来，其后果不可想象。

不搞，其政治后果同样不可想象。这是文革后的第一次大庆，又是“九大”宣布文化大革命已经取得了伟大胜利后的国庆，两军对垒，示弱于敌，这又岂是斯大林、毛泽东等人的风格？

9 月 23 日和 29 日，中国先后进行了当量为 2 万—2.5 万吨当量的地下原子弹裂变爆炸和轰炸机空投的当量约 300 万吨的氢弹热核爆炸。这两次核爆炸就是中国的公开态度，你有原子弹，我也有原子弹。但中国一改以往做法，未对外界宣布。

美国地震监测站、苏联地震监测中心，以及两国的卫星几乎同时收到了能量巨大的爆炸信号。尤其是苏联，十分清楚中国核爆炸的含意。美联社播发的一篇评论颇具代表性：“中国最近进行的两次核试验，不是为了获取某项成果，而是临战前的一种检测手段。”

9 月 26 日，柯西金给周恩来复信。他在信中说，“经仔细研究周总理 9 月 18 日来信，我方已采取了实际措施，旨在使边境局势正常化，其出发点是中国政府根据相互原则采

取类似措施来实现已达成的有关协议。”信中建议自 1969 年 10 月 10 日起在北京开始中苏边界问题谈判，并说苏方已任命了以库兹涅佐夫为首的谈判代表团。

9 月 29 日，由周恩来审定的，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给苏联驻华代办叶里扎维金的“口头通知”中说：“柯西金的信正在研究中；边界谈判改到 10 月 20 日开始。”

临近 1969 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20 周年大庆，林彪更是忙碌万分。一向怕风、怕光、怕这怕那的他，此时都顾不得了。他甚至还在住地练起了骑马。几十年不打仗了，他的手也有些发痒。

9 月 30 日，林彪出外“转车”时，突然提出到南苑机场转转。从机场出来后，他又说要到附近的连队看看。于是，又来到北京卫戍区某部的一个连队。

“转车”一回来，林彪立即打铃叫来秘书说：“赶快打电话，叫军委办事组的黄、吴、李、邱和总参管作战的副总长阎仲川、卫戍区的温玉成立即到我这里来。”

很快，几员大将陆续来到毛家湾。平时林彪找人谈话或会客，一般不让工作人员在场，这次则有点特殊。叶群对秘书说：“你负责作一下记录。首长今天要讲准备打仗的事，这是要立案存档的。”

在林彪的会客厅里，大家落座后，林彪说：“今天叫你们来，是要谈下战备问题。这个仗看来八成是打不起来，但

要作八成可能打起来的准备。明天就是国庆节。在节日举行大型群众集会，在人们正欢欢乐乐的时候，就不定战争就打响了。如果敌人趁我们过节，对我们来个突然袭击怎么办？苏联设在外蒙的空军基地，距北京只有几百公里，飞机用不上一个小时就到了。如果打导弹，只要几分钟。我刚才坐车到西郊机场去转了一下，看见飞机还一排排地在那里明摆着，似乎没有一点应付意外的准备。这不行，也很危险。因此，要立即采取措施，改变这种等着挨打的状况。第一，北京附近几个机场的飞机，除留下作战值班的以外，其余的一律要在今天夜间转移到外地的机场去；第二，要在机场跑道上设路障，防止敌空军实行机降；第三，留在机场的值班人员，要全部配发武器，准备打敌人的伞兵。另外，节日的其他战备工作也要搞好。关键是 10 月 1 日、2 日、3 日。1 日又是关键中的关键。只要在这关键的几天里不出什么事，问题就不大了。”

接着，林彪拿着一米多长的指挥棒，指点着铺在地毯上的军事地图，询问北京地区的节日防护工作。吴法宪、温玉成、阎仲川分别作了回答。这时，秘书进来报告说：“蒙古方面通报今夜有暴风雪，情况可疑。”

林彪听到暴风雪，眉头一皱，马上警惕起来，会不会是大规模军事行动的暗语?

阎仲川事先知道这个情况，派人询问了气象部门，证实

蒙古方面今夜确实预报有暴风雪。他说明后，林彪紧皱的眉头才舒展开来，又提出一个新问题："一旦苏联向中国发动突然袭击，使用核武器的可能性有多大?你们研究研究。"

最后，林彪再次说："国庆节是个关口，一定要加强戒备，准备应付各种意外情况，节日的其他战备工作也要搞好。关键是10月1日、2日、3日，10月1日又是关键中的关键。只要在这关键的几天里不出什么事，问题就不大了。你们看怎么样?你们可以再想想，还要采取什么措施?"

"林副主席的指示很重要，我们坚决照办。"黄永胜带头表态说。

"我们空军的战备没搞好，我有责任。"吴法宪抢上来说："我坚决拥护林副主席的指示，回去后立即行动。"

其他人也都表示拥护林彪的指示。

当天，9月30日，空军所有部队、学校、机关和民航进行"一等紧急战备演习"。除担负战斗值班的飞机外，其余飞机全部进入洞库或就地疏散；大部分师以上指挥机构开设了预备指挥所；所有机场紧急配发了武器；70多个机场连夜挖了掩体、防空洞；"三北"地区临时不使用的机场全部设置了障碍；建立了空司指挥所与"三北"地区一线雷达站和技侦分队的直接联络。10月3日演习结束。这是空军自组建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战备演习"。

9月30日晚，周恩来在国庆20周年招待会的讲话中说：

“我们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决不会侵略别人。我们发展核武器完全是为了防御，为了打破核垄断，其最终目的是为了消灭核武器。”他在强调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后说：“对于美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的战争威胁，包括核战争威胁，我们要作好充分准备。如果他们硬是要把侵略战争强加在我们头上，我们就坚决抵抗到底，直至最后胜利。”

第 1107 回：庆大庆，北京城内紧外松

看地形，林彪飞抵张家口

1969 年的北京国庆活动，在外松内紧的气氛中按照原计划正常进行。10 月 1 日上午，党和国家领导人照例在天安门城楼检阅群众游行队伍，林彪在天安门讲话和两报一刊的国庆社论，都一字不易地将国庆口号第 22 条作为结束语。当晚还举行了焰火晚会，场面壮观，气氛热烈，看不出与往年有什么不同。但各有关部门却已殚精竭虑，从最坏情况出发，暗中作了周密安排：空军把一架直升机预先降落在天安门与午门之间的空场上，以备出现紧急情况时保证毛泽东、林彪、周恩来等主要领导人可以迅速向城外预定指挥位置转移；军事系统的情报部门和所有远程雷达不间断地进行侦察探测；为确保能在天安门上及时收听到紧急的敌情报告，阎仲川指定总参作战部副部长蔡洪江亲自携带一部电台和几名干练的情报、通信人员到天安门城楼上，与情报部门保持不间断的联系。

1969 年 10 月 1 日，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陈伯达、

康生向观礼台和广场上的群众招手致意。

国庆节这天，在天安门城楼，王震向毛泽东、周恩来报告他想去江西插队落户，参加劳动的想法。毛泽东沉吟了一下说："你下去走一走，看一看，搞点调查研究、科学试验也好。"

其实，早在 1967 年 11 月，一直处在受批判状态中的王震就曾致信李先念，表示自己"反复地痛定思痛，想了又想，恳请下放到工农群众中去，受基层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教育。"信中还具体提出到海边或山区"一个公社生产队去长期安家落户。"当时，李先念将此信批给联络员。后因具体事宜，下放事情暂时搁置。

国庆期间平安无事，而林彪、周恩来等也为它度过了几个难眠之夜。

10 月 4 日，新华社报道："1969 年 9 月 29 日，在我国西部地区上空，成功地进行了一次新的氢弹爆炸，在此以前，在 1969 年 9 月 23 日，我国还成功地进行了首次地下核试验"。"中国核武器发展的这些新成就，对于美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的核垄断，又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国庆节一过，林彪决定视察张家口。

张家口是北京西北的要塞，是拱卫北京的主要设防地带，附近地形险要而复杂，林彪此行的目的是想亲自看看那里的战备工作落实情况。

林彪此行是绝对保密的。动身之前，叶群忙着为此大做准备。一方面，她提前派出几个先遣人员到张家口，为林彪一行在那里过夜作食宿安排。另一方面，她让空军准备三架飞机待命。另外，由于张家口没有适合林彪坐的高级轿车，叶群下令从北京提前去一辆“吉姆”。

10 月 5 日，正式动身的这一天，北京西郊机场戒备森严。上午 8 时，林彪、叶群驱车到达机场时，随行的吴法宪、阎仲川、北京军区司令员郑维山、参谋长马卫华已在机场等候，黄永胜、李作鹏、邱会作也赶来为林彪送行。

在停机坪上，并列着两架“子爵号”专机。在当时的条件下，这是中国最好的、也是仅有的两架专机。它们是从英国进口的，最大的优点就是比较安全。据说它从出厂至今还没发生过技术事故。机身不算大，共有四个螺旋桨发动机，即便在飞行时一个发动出了事故，另三个发动机仍可照常工作，因此作为短途专机比较理想。此外，机场跑道上还停着一架苏造“伊尔—18”型客机，它是为林彪的一般随员和警卫人员准备的。林彪一行近百人，3 架飞机也是满载的。

根据叶群的安排，林彪带着女儿林豆豆坐上第一架“子爵”号，陪同的有空军司令吴法宪、副总参谋长阎仲川、北京军区司令员郑维山和参谋长马卫华。叶群自己带着儿子林立果，乘坐第二架“子爵”号。叶群说，这样即便林彪的飞机出了事，仍可保证林家这条“根”不会断。

“林办”的工作人员也分乘两架“子爵”号。张云生和李文普以及林彪的内勤和8341部队的警卫值班负责人，及负责专机服务的空军副参谋长胡萍，都上了第一架“子爵”号。叶群的内勤、“林办”驻地的医生和部分警卫干部、随叶群乘坐第二架“子爵”号，其余警卫人员则乘坐“伊尔—18”。

林彪座机上有两个工作人员负有“特殊”的使命，一个是张云生，他的任务是记录林彪在途中的一切谈话，另一个是从《空军报》社临时调来的摄影记者，负责拍下林彪在视察途中的一切有意义的镜头。

“子爵”号的内舱，原来是个桶形，设有40多个座位。经过改装，机舱的前半部隔出两个单间：一个是工作间，另一间是卧室。工作间的一侧有个铺着白布的长方形的桌，两旁各有两个软椅；另一侧横放一个长形沙发。一路上，林彪一直坐在工作间里。郑维山坐在林彪的旁边，以便随时回答林彪可能提出的问题。吴法宪和张云生坐在林彪的对面，阎仲川和马卫华则坐在另一侧的沙发上。

林彪乘坐的“子爵”号平稳地从北京西郊机场起飞后，另两架飞机也相继起飞，目标张家口。

专机腾空后，很快向西转头，朝着延绵不断的太行山飞去。林彪要看地形，飞行员受命把飞行的高度压得比较低，航速也比较慢。这一天又正值秋高气爽，万里无云，因此地

面上的山川河流、桥梁隘口、庙宇村落，从机舱的玻璃窗望下去清晰可见。林彪不时拿起望远镜朝下望望，摄影记者及时抓住机会，把他的神态拍入镜头。

除了飞机的马达声外，机舱内一片寂静。因为林彪不吸烟，其余人的烟瘾再大也只能忍着。林彪不引出话题，谁也不敢吭气。

“前边就是五台山吧？”林彪终于打破沉寂。

“是的，”郑维山用手向机舱下指了指。“那就是五台山。这一带，林副主席很熟吧？”

“走过，”林彪说。“不过，现在这一带变化了。”林彪说着，又拿起放大镜，在地图上寻找他所关心的地名。

“这就是五台山。”郑维山指了指图上的一个标记。“我们的飞机现在是在这个位置上。”郑维山又指着地图说：“再往前飞，这就是雁门关。”

郑维山很健谈。他初次和林彪坐在一起，开始有点拘束，但林彪把话匣子一旦打开，他就滔滔不绝了。他向林彪介绍这一带的地形特点，讲到一些有利条件，也讲到一些不利因素；讲到入侵之敌可能选择的进攻方向，也讲到他对防御作战所作的部署和决心。他特别有兴致地讲起了他所提倡的用步兵打敌人坦克的一种战术，声称敌人如果敢于用坦克群在他所防御的地带贸然来犯，他有决心把它们打得落花流水，有来无回。

郑维山年过 50，但精力充沛。他的口音既有南腔，又有北调，但很好听，也很好懂。他的口齿流利，讲起话来既精练，又有说服力。他没读过多少书，但在几十年的带兵生涯中，不但提高了军事指挥才能，而且练就了一个军事指挥员所难得的口才。一路上，经五台山过雁门关，再到张家口，往往是林彪的只字片语，就能引出他的一套宏论。在平时，林彪是不大喜欢一个下级在他面前这样侃侃而谈的。但今天，尽管郑维山喧宾夺主，并使他身旁的空军司令吴法宪和副总长阎仲川无暇张口，但林彪并无反感。郑维山像连珠炮似地倾诉着自己的一些军事见解，林彪一直在洗耳恭听。

林彪大概是在有意观察和考核郑维山，而郑维山却向他交出了一份满意的答卷。林彪于是又改话题，进一步问郑维山的战斗经历。原来郑维山也并非等闲之辈，他自幼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参加过长征，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一直是聂荣臻和杨成武手下的一名爱将。

林彪又问郑维山："你过去指挥过哪些大的战役？战绩如何？"

郑维山有些羞怯地回答说："我指挥过的战斗很多。参加过平津战役，我直接指挥的最大战果是歼敌 5 万多。"

解放战争后期，郑维山仅是华北野战军第一纵队的司令。作为一个军级指挥员，他的战绩也算不俗。但在林彪面前，他确实感到自己没有什么可值得炫耀的。

转瞬间，张家口到了。

林彪的专机在张家口机场降落后，驻在当地的65军杨军长和贺政委前来迎接，将林彪一行送到了预先安排好的住处。这里是一座灰砖砌成的三层楼房，后面是一个宽阔的大院。它装潢朴素，设施简单，当时作为张家口市政府所管的“交际处”，是当地接待宾客的一流建筑。条件低劣，好在林彪对此并不挑剔。

林彪从飞机上下来后，一直兴致很高。他在中午稍作休息，就提出要在当天下午接见附近驻军的师、团以上主要领导干部。接见分成三批：第一批是接见驻张家口的65军的军、师两级主要负责人；第二批是接见驻延庆的27军师以上主要领导干部；第三批接见降了格：空军在张家口有几个“543”地对空导弹营，和陆军的军、师“老大哥”相比，这些营级“小兄弟”只是个基层战斗体，但林彪对空军的重视远远高于陆军，因此导弹营的负责人也得到了面见副统帅的机会。每次接见，都由吴法宪、阎仲川和郑维山作陪。接见一开始，先由林彪问一问每个人的姓名、职务、哪里人氏、多大年龄以及有关战备的一些情况，最后再由林彪就战备工作做些指示。

被接见的部队干部，特别是两个军的师以上干部，难得有一次和副统帅兼国防部长当面交谈的机会。因此他们趁着林彪讯问“部队有什么困难”时，就纷纷提出一个他们共同

感到苦恼的问题：

“怎样正确处理一好和三好的关系？”

林彪主持军委日常工作以后，提倡普遍开展创造“政治思想好、三八作风好、军事训练（完成任务）好、生活管理好”的“四好连队”运动。在罗瑞卿任总长的总参谋部和肖华任主任的总政治部的具体推行下，这一运动在头几年搞得有声有色，对于部队基层建设的加强和战斗力的提高确曾起过积极作用。但是林彪于1965年提出“突出政治”以后，“四好”运动就越来越变形，形式主义的东西越来越多，并且使军政干部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紧张，嘴上空唱高调成了时髦，埋头搞军事技术工作的却被批判，部队的战备工作和基础建设都受到了严重的影响。所以，“一好”和“三好”的关系，在当时，是部队干部人人关心，经常议论，但谁也说不清楚，谁也解决不了的问题。这次林副主席亲自来了，虽然在大首长面前说话总难免有点拘束，但人们还是鼓起勇气向林彪提出了这个问题。

然而在林彪看来，“一好与三好的关系”怎么会成为问题呢？他明明讲的是“创四好”，并没说只创“政治思想好”呀？他还曾讲过要以“一好带三好”，而不要只抓“一好”而丢了另外“三好”。他确实这样讲过，但下边执行起来却只有“突出政治”。据说，“突出政治”是“一突百通”，而“冲击政治”是“一冲百空”的。

面对大家提出的问题，林彪置之一笑。他说：“突出政治，要坚定不移。但什么是政治呢？全局就是政治，战备也是政治。要胸怀全局，立足本职。在当前，搞好战备就是最大的政治。”

林彪讲话，郑维山代表他的下属表示“坚决拥护”，“坚决贯彻执行”。

林彪从早到晚，忙了一整天，稍感疲劳，早早地休息了。

但精力充沛的叶群，却不肯轻易放过仅有一宵良机的张家口之夜。天色刚过黄昏，她就让吴法宪、郑维山两员大将陪着去逛当地的百货商店。这时，商店已经关门点货，但因为“大人物”驾临，当然要破例将门打开。叶群等人进了商店，街上一些过往的群众也跟着一拥而进。他们也跟叶群一样，并不是真的想进商店买什么东西，而是各有所好。

“是叶群！”人群中有人高喊。

“是叶群！”又有人附和。

这几声惊叫，立刻把附近的游人和商店的工作人员都吸引过来，一下就把叶群、吴法宪和郑维山围得水泄不通。随同叶群等人前来的 8341 部队警卫人员一时难以打破这堵人墙。

“还以为大家认不出我，但还是被认出来了。”叶群并不认为自己惹了祸，反而眉开眼笑地对着人们说。她似乎终于有了单独在群众场合露面的机会，立即拿出《毛主席语

录》，举在空中挥动几下，高喊：“我代表林彪同志向同志们问好！向同志们学习！向同志们致敬！”

人群中发出一些掌声。有人带头高喊：“向叶群同志学习！向叶群同志致敬！”又有人喊：“祝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祝林副主席永远健康！”

“这是空军的吴司令！这是北京军区的郑司令！”叶群又把她身边的吴法宪、郑维山介绍给大家，紧接着又带头高喊：“向吴司令学习、致敬！”

吴法宪也举臂响应：“向叶群同志学习！向叶群同志致敬！”吴法宪胖得像个阿弥陀佛了。他在平静时，两只眼睛已被脸上肌肉挤得十分犯狭小，而现在，由于过分激动，嘴上的唾沫再配上含着报恩之情，使他显得更加可笑。

人群中又是一阵掌声和笑声。

警卫人员出于安全的考虑，终于设法把叶群等人护送出百货商店上了汽车，返回住地。

军委办公厅警卫处参谋刘吉存回到住地就大发牢骚：“真不像话！主任给我们讲，首长这次来张家口是严格保密的，叫我们保证首长的绝对安全。她出去在群众场合这样大喊大叫，保什么密？谁还能保证首长的安全？”

次日下午，林彪一行返回北京。

林彪的张家口之行，使他对西北方向的地面防务稍感放心。但此时主要威胁是来自北面方向，而且主要是来自空中，

而非地面。

在当时，中国的空防能力远不能完全抵御敌人空中攻击。至于对手搞的核讹诈，当然吓不倒站起来的新一代中国人。但来自敌方可能的核袭击，也不能掉以轻心。

林彪听讲国际动向，特别是苏联军方动向的兴趣，比过去明显增加。“讲文件”的秘书也感到责任更重了。

## 第 1108 回：防突袭，研究老干部疏散
## 细安排，筹划与苏联谈判

国庆节平安渡过，苏联并没有袭击中国，但毛泽东高度蹦紧的神经没有丝毫松懈，随着 10 月 20 日中苏两国关于边界问题的副外长级谈判将在北京举行，毛泽东又做出惊人之举。

根据“布拉格事件”的教训，尤其是苏联谈判代表团到达北京的那一天，很可能是苏联以谈判为掩护实施突然袭击的时刻。为了应对这种危险，毛泽东明确表示，在北京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中央党政军领导机关应该于谈判开始前全部疏散到外地。

从张家口返京后，林彪受毛泽东委托，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专门分析中苏关系的发展趋势，研究防备苏联发动突然袭击的措施。

根据情报，苏联领导中，确实有一些人，主张乘中国的核武器力量还没有对苏联构成威胁的时候，对中国的核设施进行一次“外科手术”式的打击。情报还认为，苏联很可能会以 10 月 21 日在北京举行边界谈判做幌子，向中国发动突然袭击。

会上，林彪首先发言，他认为，历史上帝俄就是中国的主要威胁，强占中国几百万平方公里土地，是贪得无厌的敌对国家；现在苏联又在中苏、中蒙边境集结重兵，虎视眈眈，

因而必须立足最严重的情况，作好战备工作。他提请与会人员着重研究：苏联如果对中国发动核袭击，将会出现什么情况？除了袭击中国的核设施，有无可能袭击城市？在谈到他对大城市、特别是首都北京防备核袭击的对策时，林彪引用了毛泽东不久前的讲话："中央领导同志都集中在北京不好，一颗原子弹就会死很多人，应该分散些，一些老同志可以疏散到外地。"他最后强调："毛主席的指示，是防备敌人核袭击的重要措施。"

周恩来接过林彪的话题，对几个问题作了重点阐述。他从 1689 年中俄尼布楚条约讲起，系统地论述了帝俄的侵华史。讲到当前的中苏关系，他认为苏方缺乏通过谈判缓和双方紧张关系的诚意，不可低估苏联领导集团的冒险性。他也拥护毛泽东关于老同志疏散的决策，并提出了落实的意见。

接着，康生也在发言中强调：苏联现在有几个师进驻蒙古，实际上已对蒙古实行了军事占领，其目的就是为下一步对中国发动突然袭击做准备的；战争随时可能发生，疏散事不宜迟。

康生发言之后，会场出现了短暂的沉寂。忽然，江青大声说道："总理呀，你是不是也关心一下京剧革命呀？我们的工作可真艰难呐！"

周恩来望着江青，不知是什么意思，一时没有讲话。

主持会议的林彪看了看江青，说：

“你是内行，你认为不好的地方，可以修改，就不必开会讨论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里吧。”

阎仲川列席了这次会议，他带来了部署图，预先都挂了起来，准备汇报战备工作情况和回答与会人员的提问。这一下，他准备的材料没有派上用场。

10 月 6 日，周恩来复柯西金 9 月 26 日信，指出来信对双方在首都机场会谈达成谅解的关于维持边界现状、避免武装冲突应采取的临时措施没有加以确认，而双方目前采取的一些措施，并不能代替对双方都有约束力的正式协议。周恩来再次重申了 9 月 18 日信中关于维持边界现状、避免武装冲突的 4 项临时措施，强调中方认为，双方应在中苏边界谈判开始后，首先就此进行协商，达成协议。复信还宣布中方参加边界谈判代表团成员的名单。

10 月 7 日，国务院、中央军委转发总参 10 月 2 日关于建立防止敌人突然袭击警报系统的报告，要求迅速组织落实。

当天下午，周恩来在京西宾馆召开参加中苏边界谈判的中国政府代表团的第一次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代外长姬鹏飞和当时的总参谋长黄永胜。

周恩来宣布了经中央批准的中国代表团 8 名成员的名单。团长是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副团长为总参谋部二部副部长柴成文。代表团成员有：1964 年中苏边界谈判的中方

首席代表、外交部苏欧司司长余湛；大使章文晋；深谙苏联情况、精通俄语的王荩卿；有总参谋部主管边防的作战部副部长蔡洪江；黑龙江省军区副司令员安怀和新疆军区作战部副部长王步苍。

宣布名单后，周恩来说："两国总理会见时，双方一致同意不要因为边界问题打仗。他们不断在边界挑衅，反而一再影射中国要对苏联发动核战争。他们扬言要摧毁我们的核基地，露骨地进行战争威胁。我严肃而诚恳地告诉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我们不要打仗，我们现在自己的事还搞不过来，为什么要打仗？但我们也决不会被战争威胁包括核战争威胁所吓倒。所以我当面向他们讲：'你们说要用先发制人的手段来摧毁我们的核基地，如果你们这样做，我们就宣布，这就是战争，这就是侵略。我们就要坚决抵抗，抵抗到底。我们不希望出现这种情况，所以我才把这个话告诉你。'今天发表的政府声明，我们又把这个态度向全世界公布。谈判只有在不受任何威胁的情况才能顺利进行。"

他还说："机场会谈的谅解很明确，必须付诸实施。9 月 18 日我们按照双方商定的程序，把已达成的谅解列成条文写信要他们确认，不料他们回信仅说已向边防部队下达了命令，只字不提谅解达成协议的事，情况似乎有变化。所以，代表团的首要任务是就临时措施达成协议，不然局势是缓和不下来的。"

周恩来要求代表团的全体成员立即集中，放下其他工作，全力以赴进行谈判准备。

这天，中华人民共和国发表声明：重申“中国政府一贯主张和平解决中苏边界问题”，而苏联政府“在中苏边界全线不断进行武装挑衅”，“同时反诬中国进行边界挑衅；并且更加露骨地影射中国要对苏联发动核战争。中国发展核武器是为了防御，为了打破核垄断。中国多次声明，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中国决不首先使用核武器。诬蔑中国要发动核战争是荒谬的，可笑的。但是，中国也决不会被战争威胁，包括核战争威胁所吓倒。如果一小撮战争狂人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袭击中国的战略要地，那就是战争，就是侵略七亿中国人民，就要奋起反抗，消灭侵略战争。”在驳斥苏方上述言论和阐明中方立场后，声明又简述了 9 月 11 日周恩来和柯西金就两国边界问题等交换意见及中国方面的建议。声明宣布：“中苏两国政府已经商定，中苏双方就中苏边界问题在北京举行外交部副部级谈判”。

10 月 10 日新华社报道，在北部湾公海上从事正常捕鱼的中国渔船，连续遭到美国军舰的炮击和美国军机的扫射。“这是美帝国主义头子尼克松上台以来，美国军用飞机和军舰对我在公海捕鱼的船队连续进行猖狂挑衅的极为严重的罪行”，我外交部发言人“提出严重抗议”和“严正警告”。

总政治部恢复办公的准备工作于1969年国庆节后启动。10月10日，林彪提名装甲兵政委黄志勇、沈阳军区副政委田维新为总政治部副主任。

10月1日国庆节，田维新率领沈阳军区代表团进京观礼。抵京后，他被任命为解放军国庆观礼团团长兼党委书记。国庆节后，观礼团继续在京参观。10 月 12 日上午，负责观礼团后勤工作的一位总部机关干部一见到田维新就改变了称呼，一个劲地叫“首长”。田维新对他说：

“你别开玩笑了。你是总部机关的干部，我是军区的，我怎么能当你的首长呢？”

那人说：“不，您就是我们的首长了。我已经见到命令，您是总政治部的副主任了。”

“你别开玩笑了。”

田维新要通了沈阳军区的电话，果然，军区已接到命令。很快，田维新和黄志勇被军委办事组叫到京西宾馆办公，办事组组长及组员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都在那里。

邱会作认识田维新。田维新在16 军任副政委时，邱会作曾以总后勤部部长的身份前去检查工作。一见田维新进来，邱会作便上前打招呼，并把他介绍给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和黄志勇。田维新和黄志勇两人是初次见面，又将一起共事，所以两人握手时都很热情。邱会作打趣说：“看你们俩的亲热样，以后能合作好。”

田维新对邱会作说："我要回去交待一下工作。"

邱会作没有正面回答田维新，而是对办事组的办公室主任说："给我要陈胖子。"

电话很快就接通了。邱会作拿起话筒对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说："陈胖子，田维新不回去了，你给他派个秘书、警卫、司机、厨师来。"

放下电话，邱会作对黄志勇和田维新说："限你们在三个月内组起总政治部班子。"

于是，黄志勇和田维新在李德生的领导下负责组建总政工作的具体实施。当时最主要的工作，一是确定总政治部机关的组织编制，二是按编制选调干部。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对李德生说："总政治部恢复工作后,不要那么多人。战争年代，总政几十人不是照样工作嘛。解放战争军委指挥机构又有多少人?我看，总政机关不要超过 200 人。"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李德生和两位副主任研究确定了两条原则：一是总政机 关干部的编制定为 199 人；二是这 199 人要来自"五湖四海"，按五个"五分之一"选调。这五个"五分之一"就是：

一、从原总政机关选调五分之一；

二、从军委办事组政工室、干部室选调五分之一；

三、从各大军 区和军兵种机关选调五分之一；

四、从军师机关选调五分之一；

五、从团营单位选调五分之一。

10 月 11 日下午，陈毅等四位老帅开会。这是 9 月 16 日休会以后的第一次会议。会上，陈毅说："在加强备战声中，北京革命委员会送来观看体育表演的请柬，这倒是新鲜事，我想去看看。"

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也都收到了请柬，他们也觉得这和加强战备的气氛不大协调。

这天下午 17 时 28 分至 17 时 32 分，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全国万名国庆观礼代表。他和林彪先将董必武请到主席台前，二人站立在董老左右，毛泽东带头鼓掌向董必武表示敬意。

10 月 12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决定成立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肖华、王力、关锋、戚本禹 7 人专案审查小组，由叶群、李作鹏、吴法宪、姚文元、汪东兴组成，汪东兴为组长，吴法宪为副组长，在中央专案审查小组领导下进行工作。

10 月 14 日，毛泽东、林彪、周恩来和中央政治局在京成员在人民大会堂公开接见人民解放军驻京机关部队指战员，有意对外显示中国首都一切情况正常。接见之后，毛泽东即乘专列南下武汉。这是毛泽东在本年内第二次离京到外地。出发之前，毛泽东对前来送行的周恩来、黄永胜、吴法宪等人说："我先走一步。你们转告林彪同志，他也要尽快

离开北京。恩来，你也早点离开中南海，出城进山。我到了武昌就给你打电话。”

当天，林彪在住处听取了北京军区司令员郑维山、政委陈先瑞有关北线设防问题的汇报。

这天，军委公布空军战备值班部队，共有 9 个高炮师、16 个歼击机师、6 个轰炸机师、4 个强击机师、1 个运输机师、2 个地空导弹师等。

军委还批复了北京军区 9 月 14 日请示，同意以第 3、2、4、5、6 工区和 13 个工程兵建筑团，给陆军第 24、63、65、66、69 军各组建 1 个步兵师。北京军区于 12 月底完成组建任务。该 5 个陆军师依次称陆军第 71、186（后改 189）、195、198、206 师。为统一番号排列顺序，陆军第 69 军现辖第 28、107 师，依次改称陆军第 205、207 师。

10 月 14 日，柯西金再致信周恩来，告之苏谈判代表团于 10 月 20 日前抵京。

10 月 14 日晚，中共中央根据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下发关于紧急疏散在京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通知，要求在 10 月 20 日以前，在京的老干部全部实施战备疏散。通知说：“为了适应反侵略战争的需要，应付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突然袭击，经中央讨论决定：中央机关集中到北京郊区战备地下指挥部办公，由周恩来同志留在北京主持工作；毛泽东主席到武汉主持全国的大政方针，林彪副主席到苏州负责战备。同

时，中央领导人及原中央负责人也相应疏散。”

10 月 15 日，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对在京老干部的疏散工作做了具体安排。周恩来让汪东兴暂时留在北京协助这件事。

关于疏散安排的报告，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和副主任王良恩签名上报，周恩来指示后下达执行。该项报告确定：中央集中到北京某地办公，由周恩来留在北京主持工作。毛泽东疏散到武汉（已去）。林彪疏散到苏州。刘少奇、徐向前到开封。朱德、李富春到广东从化。陈云、邓小平到南昌。陶铸到合肥。董必武到广州。叶剑英到长沙。陈毅到石家庄。刘伯承到汉口。聂荣臻疏散到郑州。陈云、王震等人前往江西。

老干部大多数被安排在京广线及其附近地区。毛泽东说：“万一打起仗来，要找的时候，我还离不了这些人呢。”

10 月 16 日，经毛泽东批准，军委向有关军区和空军下达了建立全军战略预备队的命令。战略预备队由若干个陆军军、空降军和坦克师、地炮师、高炮师组成。

这天，军委命令，陆军第 28 军于 12 月底前由福建调往山西地区，归北京军区建制。同日，军委命令坦克第 9 师、高炮第 67 师分别由江苏、山东调往山西地区，归北京军区建制领导。上述部队列入全军总预备队序列。调陆军第 43、47 军编入战略预备队序列。第 43 军于 11 月 20 日前进驻郑

州、洛阳地区，归武汉军区指挥；第 47 军于翌年适当时机进驻灵宝、潼关、渭南地区，归兰州军区指挥。

## 第 1109 回：林立果，任命空军副部长

## 看表演，周恩来安排疏散

10 月 16 日 16 时，林彪自北京乘飞机抵达江苏硕放机场后，乘汽车来到苏州。

林彪未动身之前，先派出一列专车驶向上海待命，车上仅有几名警卫战士，但毕竟是专列，铁路沿线十分重视，一路放行，满以为车上坐着什么重要人物。专列到达上海后，铁路部门自然要向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报告，张春桥得知后，亲往车站迎接，但迎到的却是一辆空车。在他的询问下，警卫战士如实相告。

原来，出行前，叶群曾向工作人员宣布：对林彪和她去苏州一事必须对外严加保密，特别是上海，千万不能让张春桥知道。叶群说："人家很忙，不要惊动。一但叫他知道我们住在这里，就得专程来看，那就添了麻烦了。"

次日下午，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乘军用吉普到苏州晋见林彪。

此时，张春桥也知道林彪到苏州了。既然叶群已有态度，张春桥便佯装不知。

林彪一行住在苏州市政府的交际处。林彪住在这所院子中央的一座西式平房里，叶群住在宋美龄曾经住过的一座旧式小楼上，值班工作人员住在另一座西式平房里。林彪、叶群的住处与工作人员的住处正成一个三角，相距不过三、四

十米。

林彪住下后，首先要做的就是保障通信联络的畅通。总参通信兵部派来专人，为叶群的住处和值班室临时安装了军委一号台专线电话。林彪那里不需要通向外部的电话，但在林彪与秘书之间、叶群与秘书之间，特意架上一条简便的“热线”，只要他们想叫秘书，一个电话就能保证秘书随叫随到。

“林办”秘书随同林彪来苏州的只有张云生和李文普，外加一个管收发文件的保密员。其余秘书全在北京留守。

叶群到苏州后，向工作人员宣布：“如果江青来电话，问首长现在在什么地方，只告诉她在南方，不要具体讲在苏州。”

但事隔不久，江青来电话，让叶群回北京一趟。叶群却说：林彪老是出汗，她离不开。于是江青说，她自己来苏州好了。

叶群为了挡江青的驾，一面派人去杭州、无锡重新为林彪物色房子，准备一旦江青硬要来就搬家。叶群一面给江青打电话劝阻。

江青人确实被挡住了，但还是把她致全党的一封关于文艺问题的长信和标题为《周扬鼓吹资产阶级文艺复兴的一些言论》的附件寄给了林彪。江青特致林彪短信一封，在信中主要是讲她忠于毛主席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苦于

有些人对她不够理解。她相信林彪是理解她的。因此，恳求林彪给予支持。

其实，两个月前，8月9日，江青就已经致信林彪，林彪未予理睬，是叶群让保密员李根清替林彪批了“请政治局讨论后呈主席批示”，将江青的信批给政治局，最后被毛泽东扣压。谁想事隔数月，江青又找上来了。

秘书将江青寄来的这些东西讲给林彪听。林彪仍然像上次一样说：“压下，不予理睬！”

叶群从她住的那幢旧式小楼走进来，大声对林彪说：“不理睬怎么行，这个人，你能得罪得起吗？再说，这也不是她一个人的事。文革中除老夫子以外，都在支持她。听说她那封长信，是那个小的起草的，已经改过八遍。人家当成命根子，你把手一挥就给压下了，不能恨死你吗？”

叶群说的“那个小的”是指姚文元。

“你说怎么办？”经叶群一说，林彪反而没了主意。

叶群故伎重演，又让李根清以林彪名义批了“再请政治局讨论后呈主席批示。”

事先，她与周恩来电话通气，周恩来说，林彪同志无论如何不要再把江青的东西批给中央政治局，不然他不好办。叶群放下电话却说：“这个球总理不愿接也不行，还是得踢给他，明知要在主席那里碰钉子，那就让他去碰好了。”

叶群果然又说中了。江青的材料在政治局会议上再次碰

壁，送到毛泽东那里后又石沉大海。

毛泽东、林彪离开北京后，总参谋长黄永胜指示阎仲川组织一个精干的前方指挥班子，于 17 日前，进驻北京郊外山区既定指挥位置。军委办事组成员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李德生、刘贤权、温玉成随同进驻。这次行动采取了严格的保密措施，参加前指的各级工作人员于 16 日午夜接到通知，立即连夜向外秘密转移。他们的家属，很长一段时间都不知道自己的亲人去了哪里。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和国务院也分别按预定方案组成临时工作班子，进驻与军委办事组相邻的既定位置。周恩来受命留守北京，主持中央日常工作。

10 月 17 日，林彪的儿子林立果被任命为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兼作战部副部长。

1969年2月16日，林彪曾给空军吴法宪指定帮助林立果的周宇驰、刘沛丰写了一封信：

周宇驰刘沛丰同志：

这两年老虎在你们帮助下能力已有进步，今后你们可让老虎多单独行动以便锻炼他的独立工作能力此敬礼并感谢你们过去对他的帮助

林彪二月十六日

“老虎”，是林立果的小名。

10 月的一天，叶群对吴法宪说：“现在中苏边界的局势

紧张，战备工作吃紧，你的工作又太忙，经常直接向‘101’汇报情况也有困难。但是空军又有许多问题，包括作战和建设等方面的问题需要经常研究。在科学技术方面也需要不断地改进，航空工业也要逐渐跟上世界先进水平。‘101’的意见，立果除了负担办公室的工作以外，如果他能兼任作战方面的一些工作，就可以从中研究和学习空军的战术和技术。另外，通过立果对一些问题的汇报，‘101’也可以帮助考虑建设现代化空军的许多问题，对你们也可以有所帮助。”

此前，毛远新已任辽宁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李讷也已担任《解放军报》的副总编辑。吴法宪想，叶群之所以会提出这样的要求，可能与毛远新和李纳的任职有关。于是，他考虑是否让林立果在空军任一个差不多的，空军即可任命的职务。他同空军党委的人作了研究，吴法宪说：“林副主席把立果交给我们，这是对我们空军的信任，对空军工作的支持。我们一定要把立果培养好。”

此时，空军党办已合并为空军司令部办公室，经研究，大家一致同意任命林立果为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兼作战部副部长。10 月 17 日，由吴法宪和政委王辉球共同签署命令，同时任命刘世英、周宇驰和林立果 3 人任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并任命林立果兼任空军司令部作战部副部长。

第二天，吴法宪把林立果、周宇驰和司令部副参谋长兼办公室主任王飞三人找到家中谈话。他满脸堆笑地告诉林立果："你的命令下来了。我们欢迎你今后更好地为空军建设出力。你今后在空军可以指挥一切、调动一切。空军的一切都要向林立果同志汇报。"

王飞、周宇驰立即向林立果祝贺，并表决心："今后我们一切听林副部长调动，听林副部长指挥。"

林立果谦虚的说："感谢吴司令和空军党委的培养。"

吴法宪说："空军党委办公室情况你已了解，作战部情况还不大了解，请王飞找梁璞和作战部的同志向林立果介绍一下情况。"

当天下午16时，叶群给吴法宪打电话："听说我们老虎升官啦！"

吴法宪说："是啊，这是你做母亲的教育有方。"

"还是靠空军的培养。"叶群说："看来，我儿子比他姐姐要强了。"

叶群的投石问路立即得到回声："林豆豆也不错嘛！在《空军报》很起作用。空军政治部已提出要任命林立衡当《空军报》副总编辑。"

叶群表示欣慰，说："我的儿子、女儿都交给空军了，是你们的干部，今后就由你们安排了。"

吴法宪说："有什么事，我会向林副主席和你请示的。"

不久，林立衡也被任命为《空军报》社副总编辑。

当时空军作战部部长是鲁珉，原在南京军区空军任训练部长，两个月前才调到空司任作战部长。他看到了林立果任空军党办副主任兼作战部副部长的命令，却一直没有见到林立果。一天，吴法宪的夫人陈绥圻，时任吴法宪办公室主任，打电话给鲁珉说："林立果要到指挥所看看，你陪他，并告诉曾副司令员一下。"

陈绥圻说："林立果对空军的情况不熟悉，我们领他一下。我和你一起在空军办公大楼门前等他。你通知一下司令部情报部、通信兵部、雷达兵部的部长们都来，好介绍情况。"

不久，林立果和周宇驰一起开车来到空军大楼前。陈绥圻上前和一个身穿空军服装，高高的个子、浓浓的眉毛、面色白净、举止文雅的男青年握手，并把他介绍给鲁珉说："这位就是林立果同志。"

在一旁的周宇驰也向林立果介绍说："他就是作战部部长鲁珉同志！"

林立果上前和鲁珉热烈握手："您是空军的英雄，训练作战有丰富的经验，我是一个新兵，要好好向你学习。"

鲁珉回答说："我欢迎你到我们部里工作，我要向革命小将学习。"

陈绥圻插话说："鲁部长，我们年龄虽然都比立果同志大很多。但是，他是林副主席亲自培养之下成长起来的，水

平比我们这些人高得多，对我们空军工作的贡献也大得多。”

周宇驰连忙说：“立果同志还不熟悉作战部的情况，鲁部长多和他谈谈。再找个时间，把作战部副处长以上干部召集起来，请立果同志与大家见见面，讲讲话，好开展工作。”

陈绥圻和鲁珉领着他们在空军大楼转了一圈，又进指挥所看了看。

快到中午了，陈绥圻说：“鲁部长，陪立果吃顿饭，我准备了一些螃蟹，招待招待你们。他是最喜欢吃螃蟹的。”

在吃饭过程中，鲁珉注意观察林立果。他吃螃蟹只吃蟹肚子里黄和大块的肉，完全可以吃的蟹腿却随便扔掉，吃水果也是浪费很多，表现出了他在优越环境下长大的少爷作风。

在送林立果、周宇驰出来时，鲁珉对周宇驰说：“林副部长是不是要到作战部和大家见见面？”

周宇驰说：“我回去跟林立果讲讲。”

过了没几天，林立果果然到作战部来了，和部里副处以上干部见面并讲了话。他说：“我是个新兵，在空军是个小学生。我是来向大家学习的。”

鲁珉考虑马上给林立果腾一间办公室。周宇驰对鲁珉说：“他一般不到机关来上班，腾办公室的事以后再说。部里一般业务上的事不要找他，让他集中精力调查研究有关空军建设的大问题。他要看什么资料，可以交给我送给他看。”

事后鲁珉专门问过王飞："要不要单独给林立果搞个办公室？"

王飞也说："你不要搞。"

鲁珉又问王飞："要不要在我的屋里给他摆个桌子？"

王飞说："你不要摆，他不会来的。"

果然，林立果从此没再来过作战部。

这期间，林立果在空军内部搞了一个技术革新的文件，专门送到苏州，林彪批上"呈主席阅"，可一直没有回音。

10 月 17 日，新华社报道："北京市革命委员会邀请在北京外宾两千多人，今晚观看了我国优秀运动员的体育表演。体育表演在新建的现代化的首都体育馆进行。""表演受到了全场中外观众近两万人的热烈鼓掌欢迎。"报道最后提到："观看表演的，有董必武、朱德、叶剑英；王震、邓子恢、陈云、陈毅、陈奇涵、李富春、张鼎臣等。"还有一些未被选为中央委员的老干部观看了表演，新华社未作报道。

表演结束后，工作人员把出席观看表演的老干部引入休息室。过了一会儿，周恩来和政治局的几位成员来了。他们分批会见了这些老干部，并由周恩来向他们传达了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疏散中央领导人的决定。周恩来说："主席根据当前形势，决定一些老同志在 20 日或稍后从北京疏散到外地。主席指定了每个人的去处。各地安置工作，

均由我打电话安排，中央办公厅负责准备专机或专列。”他还嘱咐一定要带夫人去，原北京的住处均保留不动。

徐向前和聂荣臻没有出席当晚的体育晚会，周恩来委托陈毅于次日上午在紫光阁专门向他们传达。

当天，政治局和军委办事组的全体成员已全部撤离到北京西山。周恩来将中央已撤到西郊的情况报告了毛泽东，毛泽东很快回电话说：“谢谢你们，这样就放了心了。你们这件事办得好，一定要提高警惕。”

根据中央的决定，国务院各部门、军队各部门的领导也进行了相应的疏散。中央、国务院各单位的疏散工作由周恩来和中央办公厅负责，其它各单位自行负责。这次中央领导人和老干部的疏散工作，从拟定名单到具体安排去的地方，全部都是周恩来和汪东兴及中央办公厅一个一个研究决定，并具体办理的。

对于被监护的对象，单独通知，时间略早些。

10 月 15 日，中办主任汪东兴派人把陶铸的妻子曾志找去，对她说：“北京要紧急疏散，可能要爆发战争，陶铸要疏散到安徽合肥，你自己怎么办自己决定，随陶铸去也可以……”

曾志回家告知陶铸。此时已患癌症的陶铸沉思良久，决定不让曾志去：“你千万不要陪我去，我活不了多久，你去也帮不上忙，何苦再牺牲你……”

17 日，汪东兴来到福禄居，通知刘少奇的几个卫士：“中央有个决定，把刘少奇转移到外地去休息，到开封。”卫士进卧室对刘少奇说了，护士又用蘸了紫药水的棉签在纸上写道：“中央决定把你转到另一个地方去休息。”

汪东兴带着王良恩到邓小平住处。汪东兴告诉邓小平，由于战备需要，中央决定将一些人疏散到外地，邓夫妇被安排到江西，去江西后还准备安排去工厂劳动锻炼。邓小平感到很突然。

10 月 17 日、18 日，在严密的戒备下，刘少奇、陶铸先后离京。

## 第 1110 回：细安排，林彪苏州述“六条”
## 速整理，总参发“第一号令”

10 月 18 日，经毛泽东同意，有关部门发表了《关于中苏两国政府即将举行中苏边界谈判的公报》。当天，新华社报道说，“中苏两国政府已经达成协议，中苏双方于 1969 年 10 月 20 日在北京就中苏边界问题举行外交部副部长级谈判”。

这天上午，周恩来亲自给北京卫戍区第一副司令员吴忠打电话，了解首都机场及附近地域的兵力部署情况和发生意外事件时的应急方案。吴忠作了扼要报告：卫戍区不但在首都机场而且在各个军用机场附近，配置了数团齐装满员能够快速起动的地炮、高炮、坦克和摩托化步兵部队，各部队都制定了反空袭、反空降方案，具有应付相当规模意外情况的能力。周恩来听后仍不放心，他殷殷叮嘱：

“你们一定要做到万无一失。要接受布拉格事件的教训。你们特别要把机场的调度指挥系统控制起来，部队不一定多，但要精悍。还要注意，我们不首先开枪。所以，部队要作两手准备，要配备一些棍棒之类的冷兵器，要挑选一些会武术的战士去执行这个任务。”

放下周恩来的电话，吴忠立即把卫戍区副参谋长邱巍高找来，作了具体布置，并要邱巍高到现场组织落实。吴忠又把周恩来的指示和他们的执行情况向总参作战部作了汇报。

阎仲川得到报告后，指示作战部的一位处长去现场对卫戍区部队落实周恩来的指示情况进行检查。

18 日，叶剑英在电话上对聂荣臻说："周总理昨晚宣布，中央决定，为了战备，要把我们这些老同志疏散去外地，我去长沙，你准备去郑州，要求 20 日前离开北京。"

聂荣臻给周恩来打电话申请："剑英通知我，战备疏散去的地方是郑州。我对那里的地形不熟，既然是准备打仗，还是去河北省好，过去在那里打了十多年仗，各方面情况熟，真要打起仗来，还可以起点顾问作用。"

这天上午，陈毅邀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以及姚广和熊向晖到紫光阁开会，向徐向前、聂荣臻传达了中央的疏散通知。

陈毅说："总理讲，主席指示我们 4 人去的地方都是战略要地，去后在当地工厂蹲点，分别研究国际形势，如果战争爆发，协助当地军政首脑指挥作战。""总理已作了周到布置，并且再三嘱咐，一定要带夫人去，北京的住处保留。"

他最后说："我们的国际形势座谈到此结束。"

聂荣臻得知徐向前去开封，陈毅去石家庄，刘伯承去武汉，朱德、李富春去广州。另外，陈云、邓小平去江西。他说："几位老帅在京广线上一字摆开，有个打仗的架势。"并说他自己对郑州不熟悉，希望去邯郸。

10 月 18 日，周恩来亲自打电话到江西省革委会，通知

陈云、王震、邓小平要疏散到江西。接电话的是江西省革委会办公室主任程惠远，周恩来特意交代了邓小平，说：

“毛主席在‘九大’不是说过吗，邓小平的问题和别人不同，他下去是到农村锻炼。当然，这些人（还有陈云和王震）也不能当全劳力使，也是60多的人了，身体也不好，收房费也要照顾一点……我最后还要强调一下，这些首长下去，你们要多帮助，要有人照顾他们。你报告程世清同志之后，马上研究出一个具体意见。”

放下周恩来电话，程惠远片刻不敢耽搁，连夜驱车350多公里，向正在婺源下乡的江西省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组长、省革委会主任、省军区政委程世清的汇报。

听了周恩来的指示，程世清表示：“我们坚决拥护中央的这一英明决定，坚决贯彻落实总理指示，欢迎陈云、王震同志及邓小平夫妇来江西蹲点、劳动。他们什么时候来都可以，来了之后先安排在滨江招待所（省委招待所），把江西的情况分几次向他们作些介绍与汇报，然后将邓小平夫妇安置到赣州去。至于陈云、王震到什么地方，可同他们俩作具体商量后再定。只要他们同意的地方，暖气我们给装。周总理对老同志生活上那样关心，对我们是个很大的教育。我们打算他们3人来后，每人给他们配小车一辆，下段活动以及今后看文件、生活上的问题，我们都做具体的安排，我们保证陈云、王震同志及邓小平夫妇的绝对安全，不准冲击揪斗

他们。但有两个问题要请示一下中央，一、邓小平夫妇来后，他们住在一起是否合适？二、陈云、王震来江西，我们想派人去北京接他们是否可以？”

10 月 19 日，周恩来接到江西省革委会电话后，原则同意程世清的安排，但对邓小平的安排，认为去赣州不合适，说：“那里离南昌市太远，是山区，交通又不方便，条件很差。他已经是六十几岁的老年人了，得个病怎么办？我的意见应该把他安排在南昌附近，便于照顾。最好让他们夫妇住一栋两层小楼，楼上他们夫妇住，楼下是工作人员住。当然了，最好是独房独院，还能在院里做些活动，又安全，你把我的意见转告程世清政委。”

根据周恩来的指示，程世清与有关部门商定后，将邓小平一家安置在南昌市郊新建县的原福州军区南昌步兵学校校长的住所，人称“将军楼”，并安排邓小平夫妇到附近的新建县拖拉机修配厂劳动。

19 日，周恩来通知聂荣臻改去河北省邯郸市。

聂荣臻认真做了打仗的准备，随身带了战争时用过的马褡子、煤油灯、蜡烛等应急用的物资。

聂荣臻的妻子张瑞华、女儿聂力都去了外地五七干校，他只带上孙女和 3 名工作人员，于 10 月 22 日来到河北省邯郸，住在市委交际处一号楼。

聂荣臻在邯郸最关心的是战备问题，他多次听取驻军领

导汇报战备情况。在他的房间里挂了一张大地图，标明邯郸地区的驻军、民兵和兵力等情况。他对邯郸军分区和驻军某师的领导说："战争一来，粮食、被服、武器装备不要集中放在仓库里，要尽快分散到各地，以便打起仗来就地取给，现在就要制定疏散计划。"

尽管邯郸地区只有驻军 1 个师，大量的是民兵和少量地方武装，但他就战争一来，部队和民兵应如何组织，如何部署，如何机动等问题提出了意见，并整理成文字，一式几份，分送给当地党、政、军负责人。

我们再看林彪，他到苏州后的第二天，10 月 18 日下午 17 时许，就让内勤将随林彪一起到苏州的秘书张云生叫过来。

张云生以为林彪可能是叫他去讲文件。因为刚到苏州，有许多事情需要安顿，他还没有时间认真翻看北京带来的文件。他走进林彪的房间，看见林彪正在室内低头踱步，见他进来后，便停下脚步，说：

"你打个电话给黄永胜。"他示意张云生作下记录。于是张云生坐下，林彪仍然站着，像往常那样，一边想着，一边逐字逐句地口述：

"一、……；

"二、……；

"三、……；

“……”

林彪一共口述了 6 条，基本意思是：苏联谈判代表团将于 10 月 20 日前来北京，对此应提高警惕。为了防止苏联利用谈判作烟幕对我进行突然袭击，全军各部队应立即疏散；要保证通信联络的畅通；各种重要装备、设施和目标要注意隐蔽和伪装；要加强作战值班；要抓紧武器、弹药的生产；二炮部队要做好发射的准备。各级要加强首长值班，及时掌握情况。执行情况，迅速报告。

这是林彪喜爱用的表述方式，交代什么意图，常常没头没尾，没有拐弯抹角，没有多余的形容词和修饰词，一开口就是“一、二、三”。他这次也是这样。

“都记下来了吗？”林彪问秘书。

“记下来了。”

“再念一下。”

秘书照念一遍。

“好，就这样。”林彪说：“你赶快用电话找到黄永胜，把我说的这几条传给他。”

“过去首长和主任都规定过，凡往外传的首长批示都要压半天。今天这个电话是否压一压？”张云生请示道。

“噢，当然要压一下。”林彪恍然想起他过去总结的“宁慢勿错”的经验。“宁慢勿错嘛！可以压几个小时。”他想了想，又说：“你把这个电话记录稿，再送给叶群看

看！”

张云生来到叶群那里，把林彪口述的6条记录稿给了她。叶群看了一眼说：“首长叫打电话，你们就打呗！对打仗的事，我不大懂，他比我高明。不过你们当秘书的，有责任帮助首长想得周到些。你看这里有什么问题没有？”

“我看不出什么问题。但如果想得周到些，我有两条建议。”

“哪两条建议？”叶群蛮有兴趣地问。

张云生说：“第一，这样大的问题，最好请示一下毛主席。”

“对，对，这个建议好。”叶群连忙表示赞同，同时解释说：“首长这是在战争时期养成的作风，遇有紧急情况，就当机立断，事后再向军委和毛主席报告。他对毛主席一贯是忠心耿耿的，主席对他也信得过。首长这样做，在战时是允许的。当然现在还没有发生战争，先报告一下主席是应当的。你的这条建议提到了点子上。第二条呢？”

“第二，”张云生接着说，“这里第六条讲的是让二炮部队做好随时发射的准备。二炮是导弹部队，是靠按电钮的。一旦不慎，一次就可能引起一场世界大战。因此，我建议对这一条应加上一些限制词。例……。”

“这一条建议也提得对。”叶群不等张云生说完，就站了起来：“这不能开玩笑，慎重一些对。走，你随我见首长

去，当面建议他改一改。”她一边走一边说：“首长是个军事家，是作大文章的，不像你那样注意个别辞句。不过个别辞句也得讲究一点。”

到了林彪那里，叶群一上来就说：“101 呀！你让张秘书给我看的那份电话稿，我看过了。”

“看过了，那好嘛！”林彪坐在沙发上，笑着打趣说。

叶群也坐下来，对林彪说：“你提的那几条，我看都很重要，也很好。不过我想提两条建议，你爱听吗？”

“什么建议？我想听听。”

叶群重复了秘书说的那两条意见。

“同意。就照你说的意见办。”

从林彪那里出来后，叶群就向张云生布置说：“你把这份电话稿照抄一份给我。向主席那里报告，由我负责。传给黄永胜，由你负责。”

“再压多久呢？”张云生问。

“两个小时就够了。”叶群说。

两个小时以后，当晚 19 时左右，张云生秘书见林彪、叶群那边再无动静，说明没有变化，便拿起电话，让北京的军委一号台总机找总参谋长黄永胜。

黄永胜此时正在西山的战备指挥所，电话接了过去，张云生向他传达了林彪的 6 条指示，黄永胜答应说：“好，我马上就办。”

而后，张云生将这个电话稿的原件以“首长让黄永胜去电话”作标题，存放在档案柜里。

18 日晚 20 时左右，住在山下的副总参谋长阎仲川接到黄永胜秘书打来电话，请他立即上山商谈工作。

黄永胜住在山上最高处原为林彪修建的一栋房子里，距山下阎仲川的住处约一公里。阎仲川气喘嘘嘘地赶到那里，见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李德生都已在黄永胜的客厅。黄永胜的客厅兼做军委办事组成员的会议室。只见黄永胜手里拿着一张记录纸，阎仲川刚一进屋，他便开门见山地说：“林副主席有几点指示，你记一记，给部队传达一下！”

阎仲川赶紧打开保密本。

黄永胜没有照着记录念，也没有分条条。他只上过三年学，但在他们那一拨老红军中文化水平已不算低了。由于这是紧急的事情，他就自己记录了。但他毕竟文化有限，不是秘书、参谋，只记下了林彪指示的大意，所以，在向阎仲川传达时，讲得不够连贯、条理，有些地方他还要做解释和补充，弄得阎仲川也分不清哪些是林彪指示原文，哪些是黄永胜的话。

记录完毕，阎仲川问道：“怎样向下传达？”

黄永胜不假思索地说：“用电话跟他们说说就行了。”

在场的军委办事组其他成员都没有讲话。

阎仲川随即来到设在黄永胜住处旁的作战值班室。但是

他要把林彪的指示传达到全军各大单位，就不能像黄永胜讲的那样简单，真的随便用电话“说说就行了”。为了确保首长指示传达准确无误，他必须写出稿子，逐字逐句传达。阎仲川略作思考，便找来一名值班参谋，让他按照阎仲川的口授，整理出一份电话传达稿。传达稿写好后，阎仲川稍作了一些修改，然后两眼凝视着稿纸说：

“加个编号吧！”

“按什么顺序编？”值班参谋问。

阎仲川想了想说：“这是我们前指开设之后发出的第一份首长指示，就从一号编起，叫‘一号号令’吧！”就这样，中国现代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一号号令”，经副总参谋长阎仲川和一位值班参谋之手产生了！时间是 1969 年 10 月 18 日 21 时 30 分。

阎仲川让值班参谋将稿子送呈黄永胜审阅签发。值班参谋很快便回来报告：“黄总长的秘书讲：首长这几天活动多，睡眠太少，身体不适，今天提早服用安眠药睡下了。”

阎仲川知道，多年来黄永胜全靠药物入睡，用药量很大，不宜再叫醒他。他看了看手表，距苏联代表团入境只剩下十几个小时了。如果苏联真的要发动袭击，最大可能是在这段时间。传达和落实林彪指示是需要一定时间的，时间宝贵，一刻也耽误不得。他果断地决定：立刻向有关单位传达。

由于指示来自“林办”，按规定应向“林办”报告指示

的贯彻执行情况；如果这中间有对林彪指示理解不够准确之处，也可及时发现纠正。阎仲川指示值班副处长王显志首先将“号令”上报“林办”。“林办”收到“号令”的时间是21时44分。

为了缩短传达时间，阎仲川指示将号令稿复印数份，参加值班的一位作战部副部长、一位副处长和几名参谋一齐上阵，使用4部保密电话同时传达。号令全文如下：

第一号号令

1969年10月18日21时半

林副主席指示：

一、近两天来，美帝苏修等有许多异常情况，苏修所谓谈判代表团预定明（19）日来京，我们必须百倍警惕，防止苏修搞欺骗，尤其19、20日应特别注意。

二、各军区特别是“三北”各军区对重武器，如坦克、飞机、大炮要立即疏散隐蔽。

三、沿海各军区也应加强戒备，防止美帝、苏修可能突然袭击，不要麻痹大意。

四、迅速抓紧布置反坦克兵器的生产，如四〇火箭筒、反坦克炮等（包括无后座力炮和八五反坦克炮）。

五、立即组织精干的指挥班子，进入战时指挥位置。

六、各级要加强首长值班，及时掌握情况。

执行情况，迅速报告。

林彪的指示经过黄永胜、阎仲川两个环节的转述、加工，基本精神未变，文字确有不小变化。张云生传达的原稿标题是《首长关于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突然袭击的紧急指示》，黄永胜向阎仲川传达时，讲的是“林副主席指示”，经阎仲川整理加工以军委前指名义发出时，又简化为“第一号号令”；在传抄过程中，也有一些单位把“第一号”写成“第一个”。

参谋人员按照先“三北”、后沿海和内地的顺序，将“号令”依次下达给北京、沈阳、新疆、兰州、济南、南京、福州、广州、昆明、武汉、成都这十一个大军区和海军、空军、北京卫戍区。

参谋人员在紧张地传达，阎仲川也在紧张地继续思考。他感到，“第一号号令”是发给全军的合同号令，对于赋有特殊任务的部队、机关和业务部门，还需要分别给以具体指示。特别是二炮部队，情况尤为特殊。黄永胜在传达林彪指示时，只讲了二炮部队要作好战斗准备。阎仲川认为：第一，这样讲过于笼统。如果掌握不好会出大漏子；第二，虽然二炮部队组建不久，拥有的装备和作战手段不是很多，但大家都知道它掌握的是具有强大杀伤力的战略武器，倘若将它的任务写入合同号令之中，将会引起很大震动。于是，在下达“第一号号令”的当天，他又专门给二炮部队下达了“第二号号令”。为了调动和组织各种侦察手段掌握敌情，当天又

特向总参二部、三部等单位下达了“第三号号令”。为使军事系统各机关、部门都作好应变准备，又向各总部、各兵种、国防工办、国防科委下达了“第四号号令”：要求按照国庆期间战备工作要求转入战备状态。凡已组织精干指挥班子、有隐蔽指挥位置的单位，应立即进入指挥位置；全部人员要做好就地疏散的一切准备。

前指值班室正在向下传达林彪的指示，又接到张云生秘书打来的电话，说林彪询问一下：一旦密云水库遭到轰炸，溢洪会给北京市造成多大危害？是否可以考虑采取一些预防措施？

阎仲川听了值班参谋的报告后，因不了解水库的具体情况，便指示以总参谋部名义与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吴德联系，请北京市提出意见。

吴德听了总参谋部提出的问题，感到事关重大，立即与北京市革委会主任谢富治研究后，向周恩来作了报告。

周恩来要求北京市革委会派负责干部到现地勘察研究后提出建议。北京市革委会随即派北京卫戍区第一副司令员、北京市革委会副主任吴忠带领有关部门负责人和水利专家赶往现场。大家很快便取得一致意见：密云水库虽然库容可达 43 亿多立方米，但水源地区连年干旱少雨，实际蓄水不过 21 亿立方米，只是“半盆水”，即使大堤被炸，对北京地区也不会造成大的危害；密云水库是北京市区用水的主

要来源，因而除非万不得已，不能轻易放水。军委“前指”将北京市的意见上报后，林彪再无新的指示。

## 第 1111 回：急件到，毛泽东火柴烧掉
## 大疏散，苏联代表团抵京

总参谋部阎仲川几个号令全部下达完毕，时间已过午夜。阎仲川是一个老参谋工作者，几十年从事作战业务的不平凡经历，使他深知自己肩负责任的重大，养成了雷厉风行、严谨细致的工作作风。检查今夜的工作，他深感关系重大，但以黄永胜为首的军委办事组对此事的处理却未免过于简单。黄永胜是他的老领导，1952 年华南军区撤消，原任华南军区副司令员的黄永胜改任中南军区参谋长，阎仲川是军区作战处（部）副处（部）长。此后，他一直在黄永胜领导下工作。黄永胜对阎仲川的使用可谓放手、放心。阎仲川对黄永胜很尊重，但在工作中他却不惟命是从，敢于提出自己的不同意见。黄永胜办事比较粗糙，在广州军区时，阎仲川作为老参谋，经常帮他堵漏洞，先斩后奏的事也有过。

对今夜发生的事情，阎仲川深有感触：林彪的紧急指示，是涉及千军万马甚至影响全国的重大决策，黄永胜却只是草草作了交代，也不审阅指示稿，便早早入睡，未免过于草率。阎仲川感到有些不安，但是，他无暇再作更多的思考。4 个号令下达之后，各单位很快作了反馈，报告请示接踵而来。

广州军区于 18 日 23 时 15 分收到号令稿，军区首长立即到作战室召开紧急会议。会议结束后，丁盛便率领军区前指人员按预定方案进入郊外山区指挥坑道，主管作战的江燮

元副司令员则住进作战值班室。军区根据号令精神结合自身特点，向军以上单位和军区空军、南海舰队发出贯彻号令的具体要求。19 日 1 时 40 分，便将贯彻执行情况向军委前指作了报告。

随着号令的传达，全军立即进入一级战备状态，或进入前沿工事，或紧急疏散。随即，这个“一号号令”很快就传达到了全国。

那时候，战备不仅是军队的事，地方也有责任，“全民皆兵”。而且，军区领导人还都兼任所在省革委会主任，于是也立即向省革委会领导成员作了传达。而省革委会领导中有群众组织代表，当时习惯对“对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声音”不打折扣，闻风而动。于是连夜就把指示内容写成大字报贴到街上，果然马上引起轰动效应，有些群众大为惶恐。

19 日至 20 日，许多大中城市进行了紧急疏散或防空演习。整个国家处于临战状态，战备工作进入高潮。

中国的这一举动，引起了全世界的严重关注，与中国接壤的一些国家也相应进入了戒备状态。据情报报告，沿中苏边境一带的苏军，全部取消了一切休假，部队调动频繁，有些部队似有向中国前沿推进的趋势。驻在太平洋和远东一带的美军，也开始全面加强戒备。连在台、澎、金、马的国民党军队，也进入了紧急备战状态。各方面的动向，都已呈现剑拔弩张之势，似乎一场大规模的战争一触即发。

10 月 19 日，叶群才用电话记录方式，以急件传阅报告毛泽东。

传阅件先送周恩来阅。周恩来阅后批示：“请主席阅。”

汪东兴拿到急件后，立即给毛泽东送去。毛泽东看后，一脸不高兴的样子，对汪东兴说：“烧掉。”

汪东兴原以为毛泽东是让他拿去烧了，还没等他反应过来，却看见毛泽东自己已经拿起火柴一划，把传阅件点着，给烧了。接着，毛泽东又拿起传阅件的信封要烧，汪东兴着急了，赶紧对毛泽东说：

“主席，不能烧，你都烧了，以后查问起来，我无法交代。留下这个信封上面还有传阅件的编号，你不要烧了。”

毛泽东听了，这才作罢。

1969 年 10 月 19 日这天，是新中国建国以来前所未有的最紧张的一天。远在苏州的林彪让秘书张云生不间断地与总参作战部电话联系。

林彪平时在中午 12 时以前就开始午休，但这天却坚持不等苏联代表团从飞机上走下来，决不睡觉。他吩咐秘书盯住北京电话，探明这架飞机是什么时候从苏联的伊尔库茨克起飞，何时飞经蒙古首都乌兰巴托，何时飞越中国边境小镇二连，何时飞经张家口，何时飞近中国首都北京。然后让秘书一步一报。直到中午过后，他听到秘书转报北京传来的消息：“苏联代表团的飞机已经在北京东郊机场降落。……代

表团在库兹涅佐夫的率领下，已经从飞机上走下来。……我外交部官员上前迎接，……情况正常。”林彪这才肯去休息。

当晚，周恩来打电话问汪东兴：“主席看过林副主席的紧急电话通知没有？ ”

汪东兴说：“我送去给主席看了，主席看后给烧了。”

周恩来惊诧地问：“烧了？”

汪东兴回答：“主席看后不高兴，自己就烧了。我劝了以后才留下传阅件的信封。”

周恩来没再说话。

依然是这天晚上，22 时左右，正在作战值班室继续了解各单位贯彻林彪紧急指示情况的阎仲川坐，得到通知，到黄永胜哪里开会。会议室里坐的还是昨晚那几个人。还未等阎仲川坐定，黄永胜便大声问道：

“你们昨晚发的那个电报稿，为什么叫‘一号’号令？谁是‘二号’？”

黄永胜的质问突如其来，阎仲川不知出了什么事情，一时无法回答。稍停，他解释说那只是个编号，是前指发出的第一份文稿，所以编为一号，以后还发了第二、第三、第四号号令呢！

“那你们为什么不提醒下面不要把林副主席的指示扩散到地方呢？”黄永胜又问。

阎仲川听出了一点门道：准是有的单位把林彪指示扩散

到地方，出了问题。军内问题特别是涉及内部机密的事项一般不向地方通报，这是常识问题，本不需要特别关照。当然如果预见到可能向外扩散而发生不良后果，提醒一下也有必要，但这次阎仲川确未想到。他正想表示对此承担责任，吴法宪为他说了一句解围的话：

“这事当时我们也没提醒他们。”

“你们那个电话稿，如果就叫林副主席关于加强战备的指示，不要编号，或者按过去的习惯编号方法，用‘参作字××号’就好了。”邱会作也插了一句。

阎仲川还是不明白这个编号有什么问题。

“这个事情你们搞得可不好啊！”李德生也笼统地说了一句。

李作鹏一言不发，此人一向话少。

没有人讲话了。

黄永胜扫了大家一眼，说道：“总理不是叫我们给各大军区领导打个招呼吗？大家分分工，分头打电话吧！”

于是大家纷纷自报单位。无人提到的单位就由黄永胜分配。在打电话的间隙，几个人不时互相交谈。阎仲川从他们东一句西一句的谈话中，终于弄清了事情的大概。

原来他们刚刚在周恩来那里挨了批评。林彪的指示是发军内的，但是，由于在地方也做了传达，声势很大，在国内外都产生了影响，尤其是西南地区的一个省闹得更邪乎。这

些情况通过地方系统的电报、电话报到中共中央、国务院。多数报告都把林彪指示称为“林副主席一号号令”或“林副主席一号令”。19 日晚，周恩来把军委办事组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李德生等人找去，询问林彪指示的来历、内容，特别指出为什么要把林彪指示称为“一号号令”？看来他对“一号”这个字眼极为敏感。又问为什么要把林彪的指示向地方传达，引起不应有的混乱？这回黄永胜的粗线条工作作风受到惩罚，他因没有审稿，对周恩来的提问无法解释；其余四人也都面面相觑，无言以答，场面极为尴尬。

20 日上午，黄永胜把前晚发出的 4 份电话稿全部要去，进行审查。他看后又发现了问题：

“林副主席的指示原来只有 4 条，现在怎么弄成了 6 条？你们把我们办事组的意见同林副主席的指示都混到一起去了！”

阎仲川心想：“你传达的时候，可没说哪些是林彪的指示，哪些是办事组的意见，而且根本没有分条，现在这 6 条还颇费斟酌呢！”他委婉地作了说明，黄永胜没再吭声。

当天下午，军委办事组在京西宾馆召集军队各大单位负责人开会。黄永胜在会上讲了如何贯彻林彪指示问题，并特意对指示的编号问题作了说明，又批评了一些单位缺乏保密和组织纪律观念，随意把林彪的指示扩散到地方。

阎仲川也出席了会议。他惊奇地发现，已随林彪去了苏州的叶群，不知什么时候又回到北京，并以军委办事组成员身份坐在主席台上。当黄永胜批评一些单位缺乏保密观念时，叶群突然插话说："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保密观念才强哪。他老人家听了我们报去的林彪同志关于加强战备的意见之后，便说：很好，烧掉。伟大领袖毛主席永远是我们学习的光辉榜样。"

10 月 19 日，苏联政府代表团飞抵北京。团长是苏联外交部第一副部长库兹涅佐夫，边防军参谋长马特洛索夫为副团长。库兹涅佐夫于 1953 年至 1955 年曾任驻华大使，嗣后任副外长，对中国情况比较熟悉，中国外交部的许多人都认识他，应该说是老朋友了。

在当晚为欢迎代表团举行的宴会上，中方代表团副团长、总参二部副部长柴成文，曾想试探一下对方的态度是否有变，就对坐在他旁边的苏联代表团副团长马特洛索夫将军说："我们两大邻国之间没有必要搞得那么紧张嘛，现在大家坐下来谈，你看今天的气氛不是很好吗？"

马特洛索夫很坦率地说："不要看今天的气氛轻松，恐怕一谈起来就不会是这个样子了。"

果然，10 月 20 日谈判一开始，当以乔冠华为首的中国代表团根据周恩来总理的指示，把 9 月 18 日致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的信改写成临时措施协议草案提交对方时，他们就完

全改变了调子，拒不讨论，甚至根本否认两国总理达成过谅解，口口声声只要求立即开始边界谈判。

经过一段交锋之后，周恩来指出："两国总理达成的谅解都不算数，谈判有什么用？不能开这个端。"所以他在请示毛泽东后决定："要坚持地攻下去。"

接下来，中国代表团列举机场会见时的记录向对方质问，对方虽无言以对，但仍不愿意就此达成协议。实在没办法时，他们就让下边的工作人员向中方人员透露说：这是他们最高层的意思。

10 月 20 日，中办副主任王良恩对已被监护一年半的张闻天夫妇宣布：经批准，解除监护，张闻天的问题是人民内部矛盾；当前战备紧张需紧急疏散，故遣送广东中小城市，三天内启程。

王良恩对王稼祥夫妇说："为了使你们得到更好的教育，决定你们三天之内动身到河南省信阳地区，接受工农兵再教育。信阳市是一个很好的地方，路途上有人护送，信阳那里已把你们的食宿安排好了。"

王稼祥希望能晚几天走，先把病治一下。回答是："这是中央的决定，三天之内必须离开北京，也不是你一个人。"

经过个别调整，董必武、朱德、李富春、滕代远、张鼎丞、张云逸去广州；张闻天去肇庆；陈云、王震及邓小平去南昌；陈毅去石家庄；徐向前及刘少奇去开封；聂荣臻去邯

郸；刘伯承去武汉（后转上海）；叶剑英、曾山去长沙；邓子恢去南宁（后转桂林）；谭震林去桂林；陶铸去合肥；王稼祥去信阳。而彭真、彭德怀、罗瑞卿、陆定一、刘澜涛等人，仍然留在北京原审查地。

这些疏散外地的人同时还被要求，离京前清理家中文件，全部上缴；离京以后，凡是绝密文件一律不发；各人参加所在地工厂、农村的斗批改；不准同别的老干部接触；不经中央批准，不允许重返北京。

刘伯承在接到通知的当天向周恩来提出："如果真的要打仗，我愿意留在北京，给军委和总部当个参谋。如不行，就服从组织决定。"

一些部级高干也被疏散：何长工去江西峡江，胡耀邦去河南潢川，谷牧去四川……住在北京海运仓招待所的宋任穷、黄火青、黄欧东、陈再道、钟汉华、秦基伟等人，也被紧急疏散。宋任穷去盘锦地区，陈再道、钟汉华去江西，秦基伟、李成芳等 6 人去湖南汉寿。

20 日离京的人最多，有董必武、朱德、李富春、滕代远、张鼎丞、张云逸、陈奇涵、徐向前、刘伯承、陈云、谭震林、王震和王稼祥等。

深夜，军委办事组派两人来到长期患病的徐海东大将床前，要求徐海东两天之内离开北京："你必须两天以内离开。这是毛主席的命令。"

21 日，陈毅离京。原定 20 日离京，因清理文件多，请示周恩来被批准后延后一日。同日，徐海东带着氧气袋离京去郑州。

22 日，邓小平离京赴江西。

24 日，张闻天离京。

这些离京的老干部，一般是夫妻同行，也有单身的，如聂荣臻，他的妻子张瑞华此时在吉林省干校；徐向前的妻子黄杰在纺织工业部受审查；陈云的妻子于若木已去中科院的湖南衡东干校。经批准，有的带有少数亲属，如邓小平带了继母夏伯根，张闻天带了 10 岁的养女，王稼祥带了失去丈夫仍自愿跟随公婆疏散的儿媳。

一些还处在被审查期间的高干，是被押送抵达安排地点的。刘少奇、陶铸自不必说，邓小平、张闻天、王稼祥一路都有专案组人员“陪同”，秦基伟等人也是如此。

董必武、朱德、李富春、滕代远、张鼎丞、张云逸、陈奇涵及家属住在广州郊区从化的温泉宾馆，生活环境虽然清静，但活动受到限制。平时，他们只能在附近被划定的区域内活动，离开宾馆需要经过广州军区主管领导批准。康克清回忆：“我们被通知，不准到附近工厂、农村，甚至散步也不能超过‘桥头警戒线’，更不用说到广州市区了。”过了一段时间，她被允许到广州市内走走，采购一些日常生活用品。除此之外，每天无事可做。李富春的咳嗽越来越严重，

经常牙痛，吃不好，睡不好。

在石家庄的陈毅，按照省革委会的安排，每周 3 个半天去铁路工厂参加活动。离开市区，要得到省革委会批准。他希望到附近农村看看，不被批准，只好呆在招待所里，同妻子张茜读书看报，阅读少量文件。

张闻天在被通知疏散的同时，就被要求取化名。他取“张普”，只能同直系亲属通信。他们住在军分区宿舍大院半山坡上的几间简陋的平房里，部队设岗警卫。规定他们不准打电话，不准与外面人员接触，不准离开宿舍区，出大院要报告，军分区机关放电影也要请示同意后才能看。有时可以在警卫人员的陪同下到西江大堤散步。军分区保卫科每月还就张闻天的思想情况和言行，向上级作一次书面汇报。刘英回忆：“削职为民不算，还交付当地军分区‘看管’，简直就是‘发配’。”“从‘监护’到‘遣送’，我们只不过是从四壁密封的黑房换进了没有栅栏的‘鸟笼’。”张闻天每天勤奋读书和写作。他说：“历史最公正，是非、忠奸，这一切，历史终将证明，终将做出判断。”

王稼祥住在离信阳五六里远的一个大院里，围墙四周布置有警卫，不准到工厂、田间同工农接近。朱仲丽回忆：“我们只住一栋房，院内的另一栋房子住着武装战士，由一个姓黄的管理员监管我们。”“那个管理员是一副野蛮的表情，卫兵监视我们一举一动。从北京的囚室放出来，这又是一种

软禁。”

宋任穷、何长工、薛暮桥等人，多数在疏散地的五七干校或农场劳动。在开除刘少奇党籍的会议上没有举手的陈少敏，被送到河南罗山农场。谷牧在四川江油和泯江的基建工程兵部队当了半年兵，后转到江汉油田当了半年工人。陈再道、钟汉华被送到江西部队农场。

实际上，从 1969 年 9 月至 12 月，疏散大中城市人口、物资，是当时全国各地普遍开展的重要战备活动之一。不仅是高级干部，在京的中央大批党政机关，以及北京主要单位、学校，包括家属，都被紧急疏散到外地，有的暂时先疏散至郊区。文化部所属机关、学校、剧团和文联、作协去了湖北咸宁，其他协会去沙城。人民文学出版社及中国作协部分人员，分别于 9 月 25 日、26 日动身。中科院原子能所去湖北，哲学社会科学部去河南息县。国家计委、国家统计局、全国物价委员会去湖北襄樊。10 月 25 日，国防科委机关干部全部去了河南遂平县莲环湖干校。11 月 15 日，中国作协机关宣布了紧急疏散命令，所有人都下去，11 月 30 日和 12 月 15 日分两批疏散。

边境地区的军政机关，如黑龙江黑河地区的革委会、军分区也向内地迁移。吉林市计划将全市人口的三分之一疏散至农村。

北京大学的一部分疏散到汉中分校，一部分疏散到江西

鄱阳湖畔。北师大师生疏散到西郊东方红炼油厂。中国科技大学迁往合肥。中央广播学院迁到河北望都。中央民族学院迁到湖北潜江。北京农业大学先迁河北涿县，后迁到陕西甘泉。

## 第 1112 回：扩军忙，小平、陈云在江西

## 献勇士，一首政治幻想诗

陈云初到江西，被安排到了省委招待所——滨江宾馆三号楼。这是一座园林式宾馆，毛泽东到南昌，总是住在这里。后来陈云自己要求迁出，住到了南昌市南郊青云谱的省军区干休所。

邓小平、陈云到南昌后，程世清先去看望了陈云。他对陈云说：1963、1964 年发展速度太慢。他要在江西掀起一个大跃进和工业革命，让江西这个工业基础较差的省份一年生产六七万辆汽车，还要做到每年上缴国家 100 亿斤粮食；而 1963、1964 年恰恰是实行的陈云提出的经济调整方针。

当然，在程世清眼里，陈云毕竟是来此“接受思想改造的人”，因此除了礼节上的尊敬外，并没有特别热情的交往。1969 年 11 月 16 日，程世清为了某项武器的制造和生产到江西化工石油机械厂金工车间视察，正巧 11 月 13 日到这里蹲点的陈云此时正在金工车间。厂领导请示程世清见不见陈云？程世清很干脆地表示不见。于是，厂领导赶紧派人请陈云领到楼上一个小房间休息。随后，程世清才走进了金工车间……

程世清在江西的所作所为，给陈云留下了非常不好的印象。1970 年，程世清在江西农村推行“八字头上一口塘，两边开渠在山旁，中间一条机耕道，新村建在山坡上”的“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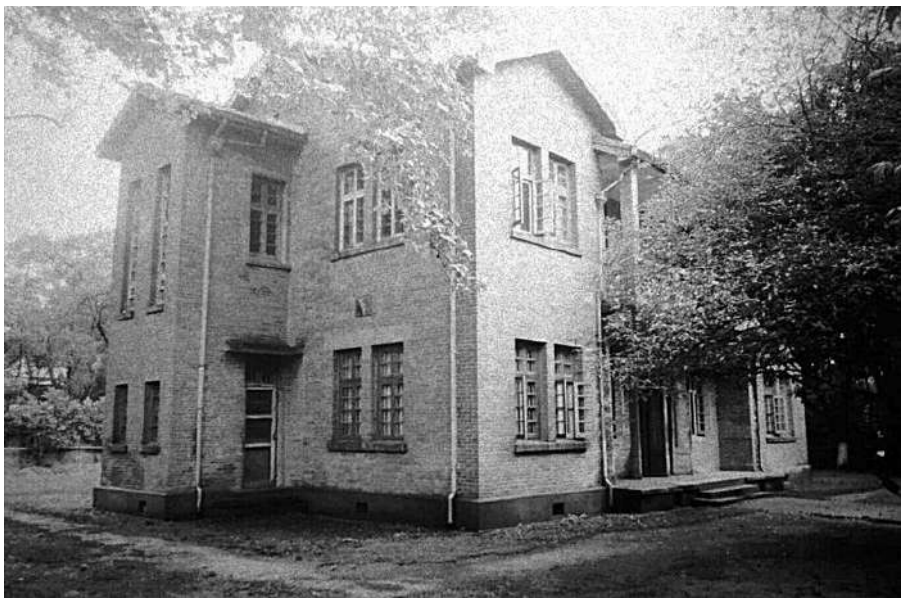
村图”，具体做法是：在“八”字形的山谷上端，建一个小水库，就是“一口塘”，用于蓄水；“一口塘”的下边，是按照大寨的标准一层层的修建梯田；在山坡上盖起了一些农舍，让农民搬迁到那里。程世清下令全省按图行事，要把农房全部搬迁上山。然而，仓促建起来的“一口塘”工程质量非常低劣，第二年春天由于蓄水过多排泄不及导致垮堤，使数万劳力大干 30 天建成的“旱涝保收”的“梯田”还有新农舍被冲了个精光，农民又回到了他们祖居的地方……陈云从《江西日报》看到这一消息后，就批评说：“程世清呀程世清，看你将来怎样向江西人民交代。”

后来到了 1979 年，陈云在一次中央会议上再次批评程世清：“‘文化大革命’中的军管时期，将军们管经济，有些人经验少，胆子大。像程世清，全国那时年产六七万辆汽车，他说江西也要搞六七万辆，哪有那么多钢板？全国进口粮食的任务，他要江西包下来。过去，江西长时期每年只上缴 15 亿斤粮食。那时，全国每年进口粮食 107 亿斤，江西全年只产 197 亿斤稻谷，折合 133 亿斤大米。他把全国进口粮食都包下来，江西老百姓只剩下 90 亿斤稻谷，那还不造反？这些人胆子大，他们说搞什么就搞什么。”

再说邓小平，他到江西后，先安排在江西省军区招待所二楼的一个套间里休息。3 天后，便来到位于望城岗的南昌步兵学校。送邓小平的“专案组”工作人员回京后，写了报

告：

“22 日送邓小平、卓琳、夏伯根去江西，今日（28 日）归来。邓押于南昌西北十三公里处，原步兵学校，现是五七干校，26 军 76 师炮团和原步兵学校留守处住。由省革委会管，派炮团一个班 12 人监管，单住一小楼上，下住一个干事和一战士管他。平日劳动，仍用邓小平名。”



邓小平在江西住的“将军楼”

一个多月后，邓小平给汪东兴写信，汇报在江西的生活和工作情况，说：“我们过得非常愉快。”

程世清和江西省军区副司令员陈昌奉代表江西省革委会、江西省军区过来看望邓小平。

程世清问邓小平，来江西后有什么体会？

邓小平回答：“我昨天给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写了一封信，请他转交毛主席。我的情况全在信里讲了。”

程世清便调转话题，谈了文革后江西“飞跃的变化”，

然后又问："你还有什么要求，我可以帮助你。"

邓小平还是刚才那句话："我昨天给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写了一封信，请他转交毛主席。我的情况全在信里讲了。"

程世清只好对陈昌奉说："那我们走吧。"整个见面过程，不到10分钟。

走时，陈昌奉看见门口有站岗的，便指示："门口不要站岗了，改坐岗。"以后，院外的一个班，只在暗处负责监管，明眼看不见了。

在江西省革委会的指示下，邓小平参加劳动的新建县拖拉机修配厂的党总支书记兼革委会主任的罗朋要求：确保邓小平安全！不是百分之九十九，而是百分之百。新建县委也做出了周密的安排：严格规定任何组织、个人不准干扰这个厂，县有关部门见到江西省革委会派出的邓小平管理秘书黄文华落款的条子，需要什么就立即给什么。由于采取了比较周密的保护措施，邓小平自己除了一次在劳动中晕倒外，没有受到任何冲击。

1969年10月21日，军委命令，陆军第24军由河北唐秦地区移防承德地区。

10月22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颁发《关于部队调动使用权限的规定》。规定指出：部队执行生产、施工、训练、助民劳动任务和正常部署调整的调动，营以下由各军区、军

兵种批准，报总参谋部备案；团（不含）以下由军委办事组批准；团以上报毛泽东及林彪审批。部队执行抢险救灾任务，仍按以前规定执行。师、团机关离驻地野营训练，一周以内由各军区、军兵种批准，报军委办事组备案；一周以上报军委办事组审批。执行作战任务的部队行动、原则上仍按军委办事组 1968 年 4 月 26 日规定执行；对中苏、中印边境地区，无论大小部队的作战行动，均报毛泽东及林彪或中共中央常委批准后方可行动。为不失战机，可预先报告方案。对内地的平叛剿匪和东南沿海以及中缅边境的国民党军残部小股袭扰的反击作战，可边行动边报告。对执行“三支两军”任务部队的调动，营以下由各军区、军兵种批准，报中央军委备案，营以上报毛泽东、林彪或中央常委审批。

10 月 22 日，军委电复兰州军区 8 月 9 日请示，同意从军区机关和步兵学校抽调人员，组建 1 个陆军军部：陆军第 19 军，将陆军第 55 师、守备第 32 师和步兵第 3 团划归该军建制领导。

10 月 23 日，总参向各军区、海、空军和北京卫戍区传达了军委办事组《做好疏散部队工作，继续保持良好战备状态》的指示。指示指出：疏散出去的部队，可能还要持续一段时间；天气逐渐转冷，要做好疏散部队的工作，减少非战斗减员，继续保持良好的战备状态。指示要求：所有疏散的部队不要露营，搞好行政管理和物资保障；抓紧时间进行战

备训练，保持常备不懈。

10 月 27 日，军委发布各军区组建和扩编部队的命令。根据该命令，北京军区组建 1 个榴炮师（炮兵第 16 师）；沈阳军区以该区野战高炮群为基础，组建 1 个高炮师（炮兵第 74 师）；南京军区以该区野战高炮群为基础，组建 1 个高炮师（炮兵第 75 师），在安徽霍丘城西湖农场和江苏泰州红旗农场各组建 1 个陆军师（陆军第 73、75 师）；济南军区将陆军第 26 军第 76 师改归福州军区建制，另给 26 军组建 1 个陆军师（陆军第 78 师），组建 1 个坦克师师部（坦克第 13 师），兰州军区骑兵第 2 师改为陆军师（陆军第 20 师）；广州军区陆军第 55 军第 215 师改归福州军区建制，另给 55 军组建 1 个陆军师（陆军 165 师），另组建 4 个陆军师（陆军第 142、143、145、146 师），分别负责接管调防部队遗留的潼湖、台山、南湾、西湖等大型生产基地；昆明军区组建 1 个陆军师（陆军第 32 师）。

10 月 28 日，军委命令，陆军第 63 军从河北移防山西，接替陆军第 69 军防区。同时，陆军第 69 军北移，该军军部从山西太原北移至大同。原驻大同的该军第 28 师（已改称 205 师）从大同移防内蒙古集宁地区。

至 1969 年年底，北京军区达 8 个野战军的兵力，分别为：第 24、27、28、38、63、65、66、69 军。至此，加上沈阳军区 6 个军：16、23、39、40、46、64 军，兰州军区 2

个军：第 19、21 军，“三北”地区共有 16 个陆军军，为全国陆军军部总数的 44%，这表明了战略防御重心的北移已成为不争的事实。

10 月 31 日，军委批准空军反空降作战措施：（一）加强反空降作战的思想准备；（二）充实反空降作战力量；（三）研制改进射击、轰炸武器；（四）加强反空降训练；（五）加强空军机场的防御。

11 月 1 日，总政治部开始办公。

11 月 14 日，军委电复昆明军区 10 月 30 日请示，同意在滇西地区组建 1 个陆军军部，称陆军第 11 军，辖陆军第 49 师和新建的 1 个陆军师（12 月 8 日，军委电各军区《变动部分陆军师的番号》，公布该新组建的陆军师称陆军第 32 师）。

至此，陆军军部达至 36 个，是自 1952 年全军精简整编以来最高峰。

11 月 7 日十月革命节，苏联大使举行招待会，中国代表团前去祝贺。在招待会上，柴成文对马特洛索夫说：“你们向中苏边境调集那么多部队，根据西伯利亚的交通运输能力，难道说在补给上就没有困难？”

马特洛索夫耸了一下肩膀，没有否认，只是说：“感谢你的坦率。”

中苏谈判一直没有进展。到 11 月 18 日，苏联又在与中

国新疆接壤的地区建立了一个中亚军区。

这次中苏谈判一直持续了 9 年，虽未达成任何协议，但两国边界未再发生大的武装冲突。

此时，大部分红卫兵已经成为知青，但许多人依然心存红卫兵情结，进行着“红卫兵运动何处去”的讨论。一批激进的红卫兵将视线转向了“世界革命”，1968 年年底，在云南全面展开“划线”运动，许多红卫兵学生被关进“牛棚”。在昆明师大附中的禁闭室里，昆明 10 中、12 中、女中、11 中等校的红卫兵开始秘密商议：跨过国境线参加缅甸共产党游击队。1969 年 5 月 14 日，一支知青队伍从盈江小平原出发，几番聚散，经过瑞丽双印，来到潞西三台山邦滇寨。他们在乡村举行讨论会，核心议题是：中国红卫兵向何处去？会上，念了《缅甸共产党党章》，最后决定参加缅共。整个德宏地区边境五县的知青走访串连，最终导致了一批“红卫兵知青”越境加入缅共游击队。据统计，仅 1969 年 6 月，参加缅甸游击队的“红卫兵知青”就有 300 人，包括：云南的昆明、保山、潞西、施甸，其中昆明知青略占一半。少数则属于云南建设兵团的北京、四川知青。

1969 年秋，一首佚名的政治幻想诗《献给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勇士》从北京传出，在全国各地流传。全诗共 240 余行，分 5 段。在诗的开头，诗人——一位参加了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毛泽东的战士，在战后向自己的战友、红卫兵、老同学的

墓前献花：

摘下发白的军帽，

献上素洁的花环，

轻轻地

轻轻地走到你的墓前。

用最诚挚的语言啊，

倾诉我深深的怀念。

北美的百合花开了

又凋射

你在这里躺了一年又一年，

明天

朝霞升起的时刻，

我们就要返回那亲爱的祖国，

而你

却将长眠在大西洋的彼岸

异国的陵园。

诗人由此回忆起和“勇士”共同的往事：

在“公园里

一起‘打游击’，

井冈山

一起‘大串联’。”

“在那令人难忘的夜晚，

收听国防部的宣战令。”

“在这最后消灭剥削制度的第三次世界大战”，共同“编在同一班。”

在战壕里，

我们分吃一份面包；

含吮着一把咸盐，

低哼着同一支旋律，

同盖一条旧军毯。

……

在冲天的火光中，

我们肩并肩突进敌人的三百米防线，

冲锋枪向剥削者喷吐着无产阶级复仇的子弹。

还记得吗？

我们曾饮马顿河岸，

跨过乌克兰的草原，

翻过乌拉尔的高峰，

将克里姆林宫的红星再次点燃。

我们曾沿着公社的足迹，

穿过巴黎公社的街垒，

踏着国际歌的鼓点，

驶骋在欧罗巴的每一个城镇、乡村、港湾。

瑞士的风光，

比萨的塔尖，

也门的晚霞，

金边的佛殿，

富士山的樱花，

哈瓦那的烤烟，

西班牙的红酒，

黑非洲的清泉。

这一切啊：

都不曾使我们留恋！

因为我们有

钢枪在手，

重任在肩。

经过了无数“不眠的日日夜夜”，

“浴血的南征北战”，

我们不可战胜的队伍“紧跟红太阳，一往无前！”

星星之火，在全球燎原。

最后，世界一片红，只剩下“白宫一点”。

夜空中升起了3颗红色信号弹，

你拍拍我的肩膀：

“喂！伙计，还记得不，‘中美战场上见娃娃们的红心’

——这 20 年前，一位政治局委员的发言?”

“记得!”我说：

“这是最后的斗争，人类命运的决战!”

军号响了，我们红心相通，疾步向前……

一手是绿叶，

一手是毒箭

——这横行了整整两个世纪的黄铜鹰徽，

随着人们胜利的欢呼，

被扔进熊熊的火焰。

金元帝国的统治者，

——一座座大理石总统的雕像，

那僵硬的假笑

紧舔着拼花地板。

冲啊!

攻上白宫最后一层楼顶，

占领最后一个制高点。

就在这个时候，突然你扑在我的身上，用身体挡住从角落射来的一颗罪恶的子弹，你的身体沉重倒下了……

白宫华丽的台阶上

留下你殷红的血点斑斑

你的眼睛微笑着

是那样的安详坦然

你的嘴唇无声地蠕动着

似乎在命令我

向前!

向前!

看啊!

摩天楼顶上

一面赤色的战旗

在呼啦啦地迎风招展

火一般的红旗

照亮了你目光灿烂

旗一般红的热血

湿润了你的笑脸

我将你紧紧抱在怀里,

痛苦直播进我的心田,

空间——消 失了,

时间——停止了,

胸中仇恨在燃烧,

耳畔雷鸣电闪。

山岳沉默、大海呜咽,

秋叶飘落、湿云低缓……

在第三次世界大战勇士的墓前，诗人向战友告别：

“安息吧， 亲爱的朋友！

战后建设的重任有我们来承担，共产主义的大厦，有我们来创建！”

海洋上，天水相联；

胸怀中，激情万千。

毛泽东的战士们返回祖国。

他们将向祖国庄严汇报：

母亲啊，你优秀的儿子，

为了人民的幸福、历史的必然，

而长眠在大西洋的彼岸、那异国的陵园。

太阳啊，

从来没有这样暖 ’

天空啊

从来没有这样蓝

孩子们的笑容

认来没有象今天这样甜

毛泽东的教导

伊里奇的遗嘱

马克思的预见

将要在我们这一代手中实现！

诗的作者是北京 101 中学高三学生臧平分，他于 1968

年入伍，在福州军区空军雷达 8 团修理所当兵。这首诗写于 1968 年 5 月 22 日。

右一为臧平分

右为臧平分

后排最左为臧平分

## 第1113回：九二七，中央取缔“北决扬”

## 鲁礼安，赴黄石铁山被抓

1969年9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中发［69］67号文件《中共中央对武汉问题的指示》，批准湖北省革命委员会的报告，认为武汉市出现的“北斗星学会”、“决派”这类组织是地下组织，幕后是由一小撮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假借名义，暗中操纵的大杂烩，其目的是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反革命复辟。对这类反革命地下组织，必须坚决取缔。而《扬子江评论》是反动刊物，必须查封。《扬评》的主要编写人员，应由湖北省革命委员会责成有关机关审查，按其情节轻重，分别严肃处理。这就是当时闻名武汉的《九二七指示》，全文如下：

湖北省革命委员会，并武汉市革命委员会：

（一）毛主席批示照办的中央的“五·二七”指示、“七·二三”布告、“八·二八”命令，必须在湖北全省、武汉全市坚决地、无条件地、不折不扣地执行。有的反革命分子到现在还逍遥法外，扰乱革命秩序，破坏“五·二七”指示、“七·二三”布告和“八·二八”命令的落实，这是绝对不能容许的。

（二）根据现在看到的材料，在武汉市出现的所谓“北斗星学会”、“决派”这类地下组织幕后是由一小撮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假借名义、暗中操纵的大杂烩。那些反革命分子的目的，是妄图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破

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反革命复辟。他们不择手段，制造谣言，散布各种反革命的流言蜚语，混入群众组织进行挑拨离间，大刮经济主义、无政府主义的妖风。对这类反革命的地下组织，必须坚决取缔。

（三）所谓《扬子江评论》，是一些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幕后操纵的反动刊物，肆无忌惮地大量放毒，必须查封。《扬评》的主要编写人员，应由湖北省革命委员会责成有关机关审查，按其情节轻重，分别严肃处理。

（四）对老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王盛荣、国民党反革命将领干毅、老国民党特务周岳森等犯，必须立即逮捕，依法惩办。

（五）必须号召广大工人群众、贫下中农、革命干部，以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和国家主人翁的姿态，狠抓革命，猛促生产，严格遵守劳动纪律和劳动制度，大反特反无政府主义，积极同破坏生产和消极怠工的现象作斗争。

（六）共产党员、共青团员、革命干部和一切革命分子，都必须增强无产阶级党性，克服资产阶级派性，反对一切宗派主义、山头主义的派性组织。特别是共产党员更必须按照无产阶级党性办事，成为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模范，成为加强、巩固革命大联合和革命三结合的模范。

（七）中央决定在北京开办湖北省和武汉市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具体的人数，名单，由省革命委员会讨论提出，

报请中央批准。

（八）希望湖北省各级革命委员会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落实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提出的各项无产阶级政策，落实党的“九大”提出的各项战斗任务，进一步做好政治思想工作，调动绝大多数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九二七指示》中提到的“北斗星学会”、“决派”和《扬子江评论》在武汉简称为“北决扬”，是一个以青年学生为主体的读书会组织，其核心人物是华中工学院的学生鲁礼安和冯天艾。

鲁礼安 1965 年由武汉实验中学毕业考入华中工学院，分配在造船系。1967 年 4 月 1 日，他贴出大字报，质疑中央《七三批示》中的天津延安中学大联合经验，认为一天内实现全校大联合根本不可能，说这是欺骗伟大领袖的假经验。他的大字报贴出后，当即遭到其他学生的大字报反驳，说他是“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

1967 年 4 月 6 日，鲁礼安又以“新华工敢死队”名义，贴出了那篇《敢死队向武汉部队支左办公室一小撮混蛋挑战》的大字报，当即遭到武汉警备区通缉，但未被逮捕。

接着，他又在 1967 年 5 月 20 日贴出《“大抓叛徒网，保护一小撮”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个新的组成部分》的大字报，质疑 3 月 16 日毛泽东批转的中共中央（1967)96 号

文件：《关于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人自首叛党问题的初步调查》，认为“抓叛徒”背后有大阴谋。结果被郭保安领导的“新华工”开除。

此后，鲁礼安和他的“新华工敢死队”驻在了湖北艺术学院。

1967 年复课闹革命后，鲁礼安他们回到了学校，“新华工”司令郭保安找到鲁礼安，希望他们解散“敢死队”，回校参加大联合。

据鲁礼安后来回忆说，他早有解散“敢死队”的想法，“之所以迟迟未作解散，一大原因是‘三钢’方面特别是工总的头头极力主张我保留新华工‘敢死队’这面在江城造反派中颇具影响和号召力的旗帜，以在即将到来的‘钢新’权力之争中为他们摇旗呐喊。”

10 月底的一天，冯天艾、鲁礼安邀请了 11 人到东湖商谈，决定成立“北斗星学会”，并推举冯天艾为会长。

冯天艾提出要有一个自己的刊物，并将这个刊物起名为《扬子江评论》。他说：“不是有一个《湘江评论》吗？我们这个刊物就叫《扬子江评论》。”

鲁礼安起草了《北斗星学会宣言》。

11 月 7 日，“北斗星学会”成立。就在成立会上，一位工人代表当场站起来尖锐批判《北斗星学会宣言》草稿。当时参加会议还有武汉军区胜利文工团创作员白桦、所云平等

人。会场上还有位武汉警备区的干部不请自到，没有说话，只是低头记录。不少人见状悄悄的走了，最后只有六、七个人留了下来。

“新湖大红八月公社”的一号人物梅子慧被邀参加了这次会议。回来后，梅子慧在“红八月”全体会员会上讲了这次会议内容，并宣读了《北斗星学会宣言》，当即遭到“红八月公社”全体成员的反对，并告诫梅子慧不要和鲁礼安这样的人来往，否则会败坏“红八月公社”的声誉。

“北斗星学会”在水塔墙上张贴了他们的《北斗星学会成立宣言》：

我们试看矿岩的分布，铁矿、煤矿和云母各自云集在一起，这是千百年自然界运动的结果，是大自然的威力。但是我们的队伍，也时时有人退隐，有人落荒，有人颓唐，有人叛变，更有人结集在一起，奋勇地前进，这是一年多来运动的结果，是大革命的威力，这种威力是任何人无法抗拒的。

学者们写史，十有八九无血无肉，不是历史创造者的呼声，为什么？就因为他们是名家，是黄鹤楼的秀才，不像长江水里的弄潮儿，懂得波涛是如何汹涌，浪潮是怎样澎湃，回流是何等险恶。一个普通的工人，巴黎公社社员笔下的一八七一年公社史就远远胜过了好多历史学家关于公社的论述，震撼世界的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如何总结它，如何承受它，难道还需要等着那些黄鹤楼上看帆船的大人先生去

进行，而不是由我们这些多少在运动的泥巴里滚了半天的毛小子和工人同志一道来完成吗？

要当官的就让它争席位去罢，要保命的就让他搞什么鸡血疗养法罢，自有一大批自强不息的革命小人物永远联系在一起，为未来的斗争准备弹药和武器，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我们从来都把这场空前伟大的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看作是更为空前伟大的世界革命风暴的引子和序幕，那些不读书不看报，不接触群众，什么学问也没有，而又专好以势压人，进入官场的人，管他司令也好，佛爷也好，在历史的长河中，终于混不了多久，大浪淘沙，决少不了他一份。“真正有希望的人是那些善于思考问题的人。”历史证明了，未来不是属于陈独秀、瞿秋白这些五四时期曾经大喊大叫一时的风云人物，历史还将证明下去。只有那些永远善于思考，善于学习，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的，方是将来历史舞台上的主将。

至于北斗，乃宇宙间七颗排列似的星星，在奴隶的歌中的象征，只有全人类最伟大最天才的舵手毛主席诞生在世上，人们唱着“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北斗才被赋予最新最美的时代内容。我们的学会取名于此，就是要求永远紧跟毛主席，在大风大浪中把紧航向，北斗北斗，未来的几十年的中国，世界将是谁主沉浮！

震撼世界的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倘离开了五

亿农民，岂非大半成了空话？从学生运动到工人运动，最后发展到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这是中国近代革命的一般规律，是历史的必然。“在很短时间内，将有几万万农民从中国中部，南部和北部各省起来，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将压抑不住。”站在农民运动的前头领导他们，还是站在他们的后头指手划脚地批评他们，还是站在他们的对面反对他们。将严格区分决心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小资产阶级革命派。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今天最彻底荡涤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一切污泥浊水，清洗中国农村几千年堆起来的垃圾脏物，在我国农村大树特树起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已经成为一项重要的历史使命摆在我们每个人的面前。伟大的农民运动，已经有狂风在为他开道了，决派将在这暴风骤雨中受到农民运动的洗礼。与工人阶级相结合，而又与人民大众相结合，将使得决派获得空前巨大的力量。巴黎公社社员喊得多么好啊：“快把那炉火烧得通红，趁热打铁才能成功。”炉火，你燃烧吧，铁锤，举起来吧，决心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无产阶级革命派，高唱起国际歌，决然地抛掉派性、私心的束缚，到伟大的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下集合，向旧世界发动狂飙般的进攻。

决心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

不久，12 月 4 日，武汉军区司令员曾思玉、政委刘丰在武昌首义路省第二招待所召集武汉地区大中学校红卫兵代表大会筹备组成员开会。会上，他们点了“北斗星学会”的名，称之为“稀奇古怪的组织”。曾思玉抖着手中的一张纸说：“这就是这个‘北斗星学会’的宣言，这个宣言很反动，每一个字都是反动的！”他让同学们离鲁礼安远一点，不要和他搞到一起去。在场许多的人表态“坚决拥护军区领导人的讲话”，批判鲁礼安和那个“北斗星学会”。但是筹备组成员、武汉三中“红反团”的谢保安却对武汉军区领导的这些话非常反感和抵触，但是不敢说出来。

曾思玉的表态让“北斗星学会”中的一些人不安。一个叫周凝淳的人向鲁礼安建议：“毛主席说，进行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要依靠‘决心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何不干脆就叫‘决心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无产阶级革命派’。”

湖北浠水县“巴河一司”占领《湖北日报》后，鲁礼安认为这预示着“中国农民运动高潮的到来”，12 月，在报社的红旗大楼与王仁舟共同建立“湖北省决派联络站”，一些中学生报名参加。鲁礼安还专门到浠水考察王仁舟的“廉价政府”，不知何故，被王仁舟囚禁。从浠水回到武汉，鲁礼安退出红旗大楼，王仁舟以“省决联站”名义贴出《公告》，开除鲁礼安。

此后，鲁礼安等在湖北大学筹建“武汉决派联络站”。12 月 30 日，“决心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联络站”召开成立大会，简称“武汉决派联络站”，设在湖北大学三号楼一个教室里。并发表了《决派宣言》：

毛主席最近指示：“进行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要依靠学校中的广大革命的学生，革命的教员，革命的工人。要依靠它们中间的积极分子，即决心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无产阶级革命派。”

决派，这是革命派通过“斗私批修”，从造反的“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的产物，

决派，这是一个牢记着毛主席所说的：“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识分子之最后的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行结合工农民众，它们的最后分界仅仅在这一点”的教导的勇敢的大军。在这个的最后分界线上，一切犹豫的，徘徊的，被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拖累得精疲力竭了的人决不能与决派同伍而分道扬镳。

决派，这是要同剥削阶级传统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的一代新人。

决派，以最大的热忱准备迎接中国农民运动高潮的到来。

中国最大的战争，无不是农民的战争，中国最大的运动，

无不是农民的运动。

震撼世界的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倘离开了五亿农民，岂非大半成了空话。从学生运动，到工人运动，最后发展到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这是中国近代革命的一般规律，是历史的必然。“在很短时间内，将有几万万农民从中国中部、南部和北部各省起来，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将压抑不住。站在农民运动的前头领导他们，还是站在他们的后头指手划脚地批评他们，还是站在他们的对立面反对他们，将区分决心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小资产阶级革命派。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今天最彻底地荡涤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一切污泥浊水，清洗中国农村几千年堆起来的垃圾赃物，在我国农村大树特树起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已经成为一项重要的历史使命摆在我们每一个人的面前。伟大的中国农民运动，已经有狂风在为他开道了。决派将在这暴风骤雨中受到农民运动的洗礼。与工人阶级相结合，而又与农民大众相结合，将使得决派获得空前巨大的活力。

决心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

《宣言》的署名日期是 1967 年 12 月 10 日。

在这个成立大会上，宣读了鲁礼安撰写的《浠水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并刊登在当天的《扬子江评论》上，对王仁

舟的“廉价政府”大加赞扬，称其为“共产主义的萌芽”，并说农民运动的新高潮即将到来，预言 1968 年的元旦社论将提出在农村掀起一次文化大革命的高潮。

不久鲁礼安打算解散决派，中学生和青年工人不同意，重新选举领导人，鲁礼安落选，水果湖中学学生李希九、无机盐化工厂工人蔡万宝分任一二号头头。在鲁礼安的坚持下，鼓吹“重建党、重建国家、重建军队”的十二中学生李建生被开除。

1968 年初，有一个武汉 12 中的学生说， 湖北省冶金厅副厅长王盛荣知道许多的党内秘史，可以从他那里了解一些党内斗争的情况。于是一天晚上，这位中学生带鲁礼安一行七八人来到王盛荣家中。

王盛荣虽然只是一个局级干部，但资格不浅，是参加过“五卅运动”的老革命，行政六级。年轻时，他曾在苏联莫斯科大学学习过，参加过长征，是大名鼎鼎的“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中的一个。

王盛荣非常好客，也很健谈，每天接待一批又一批慕名而来的年轻学生，大谈自己的革命历史，也介绍当年他们在白区开展地下斗争的经验。他说他们过去缺少经费，就要找大阔佬、有钱人要。怎样要呢？也不用上门，写封信客客气气地开出数目就行了，但信封里封了一颗子弹。阔佬们一看心里就明白，乖乖地就把钱拿出来。“你们红卫兵现在造走

资派的反，想必也是缺少经费的，也不要搞打砸抢，主席教导我们要用文斗，不用武斗嘛，所以打砸抢是不好的。那你们怎样办呢？好办，你们也可以给那些走资派写信嘛，吓他一下，他还不乖乖地把钱交出来。”

王盛荣的一席话让鲁礼安等人听的目瞪口呆。

“我们有自己办事的原则，” 鲁礼安说，“我们不会向谁要钱，更不会写恐吓信的。”

王盛荣一听哈哈大笑起来：“什么叫原则？你们还信那个呀？我告诉你们吧，原则这东西，可大可小，可长可短，可肥可瘦，可方可圆，可有，还可无嘛！”

他的这番话又让大家笑成一团。

1968 年 3 月份回校复课时，鲁礼安与华中工学院附属中学校长周岳森见了一次面。3 月底，鲁礼安突然被“新华工”的张立国、郭保安抓起来“隔离反省，交待问题”。其中一个问题就是“与混进附中革委会权力机构的走资派周岳森是如何见面的”。

鲁礼安从华工逃了出来。随后，针对“新华工”的“关于鲁礼安的初步材料”，他写了三篇“我回答你们”。

1968 年 5 月，“北斗星学会”的社长冯天艾找到“新华工红反团”的聂年生，表示想一起出版一份报纸。聂年生让贺光宇和他一起去商量。冯天艾拿出一份报纸的样稿，名称是《扬子江评论》，落款是“新华工决战决胜战斗队”。其

中一篇文章是鲁礼安写的，题目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派》，贺光宇觉得矛头明显是指向周恩来总理的，当即表示反对，并向聂年生说明了情况。聂年生也表示不能同意。于是“新华工红反团”另外独立办了一份自己的报纸——《新华工（聂派报）》。

5 月 16 日，《五一六通知》公开发表一周年之际，《扬子江评论》创刊。其实，它的前身《扬子江》在 1967 年 9 月就已出现，1967 年 12 月 25 日更名为《扬子江评论》。

5 月 18 日，鲁礼安和华中工学院附中的周叔瑜、干小雄、孙彦章三个同学一起前往黄石。而其中干小雄的父亲，就是在华中工学院机械系任教的干毅，解放前是国民党少将。

此时黄石市占优势的“钢派”正在与“新派”武斗，有人称之为“反革命暴乱”。就在当晚，鲁礼安几个人在途经铁山时被“新派”抓住。

随后，“新华工”组织了 51 人赴黄石调查团，调解两派纠纷。他们在经过铁山时，聂年生特地去看了关押的鲁礼安等人，而郭保安则到铁山联防处了解了他们被抓的情况。

## 第1114回：十月三，武汉修理造反派
## 判“无联”，山西班移到石门

1968年6月12日，武汉《扬子江评论》编辑部又发表了《怎样认识无产阶级政治革命》一文，系统阐述了他们的观点。文章说：

二十年来，中国社会形成了新的官僚资产阶级，……要彻底让工人阶级获得解放，就必须号召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推翻这个阶级。

在无产阶级革命中，无产阶级革命派要有战斗的，朝气蓬勃的革命的党。

要革命么，必须要有革命党。

从《共产党宣言》至今的一百多年斗争中，有过许多革命党。

随着革命的推移，党也必然要发生变化。第二国际在大战中变成了社会民主党，列宁同第二国际决裂了。列宁缔造了新的党——布尔什维克。

苏联出现了全面复辟资本主义，又使社会主义阵营大多数共产党变成了社会民主党。

中国的这一场空前的阶级斗争中，同样也暴露了许多问题。从中央到地方，几乎没有一个单位不分裂。有的站过来了，有的变成社会民主党，有的则更成为法西斯党。

在革命的关键时刻，中国和世界各国的共产党都面临着

重新改造，重新建设，重新组织党的队伍的严重任务。

从第五个回合中形成的无产阶级左翼队伍，将是整顿后的中国共产党的基本队伍。随着这样一支队伍的形成，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才有可能获得最后胜利。

从中央到地方，都有这样的一批“中派”。经过批判，他们中间一部分人可以站过来，另一部人，必定会最后走上向党闹分裂而自绝于人民的道路。

革命阵营中的右倾机会主义思潮是中央内部“宗派”的社会基础。

在向党内中派先生作斗争的同时，总要批判革命队伍中的右倾机会主义思潮。

只有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取得绝对胜利，只有最后撕下那些顽固至死的中派先生的画皮，第五个回合斗争才可能获得胜利。

政治革命必然地不可避免地要采取国内战争的形式。

毛主席在“学习《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笔记中写到：“革命不能不经过国内战争，这是一个法则。”

要生存，就反抗。当革命者也拿起武器的时候，战争就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地爆发了。谁敢否认67年出现了国内战争的事实呢？谁敢断言一旦中派里的顽固分子与党最后分裂时，他们不会挑起战争呢？

希望和和平平取得全面胜利的思想，实在是有点靠不住

的。不应当否认一切战争。要从混入无产阶级专政机构内部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手上把权夺过来并巩固下去，没有武力和武力作后盾是不可能的。

政治革命必然伴随以社会革命，公社的原则是永存的。通过临时权力机构——革命委员会——的过渡，会有这一天到来的。这就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在中国大地上发生的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将要向世界和历史宣布的一个划时代的社会产物——北京人民公社。

6月15日出版的第95期《新华工》报上，整整八个版面都是揭批鲁礼安的“反革命罪行”长文。

“北决扬”人数最多时才20多人，当时影响并不大，造反派几乎无人参加。由于“北决扬”观点激进，公开攻击周恩来，除了“新华工”和“新一中”等“新派”组织大张旗鼓地批判鲁礼安等“决派”的极左思潮外，武汉的“钢”、“新”两派头头都不支持鲁礼安他们。

1968年8月22日，湖北省革命委员会主任曾思玉在省革委会上宣布：《扬子江评论》“是一本极端反动的刊物”，鲁安礼和冯天艾“是现行反革命分子”。

1968 年 9 月，鲁礼安被正式逮捕。9 月 19 日，又逮捕了湖北省冶金厅副厅长王盛荣、武汉华中工学院的干毅、华中工学院附属中学校长周岳森。9 月 21 日逮捕了“决派”成员冯天艾、蔡万宝、甘勇、周凝淳、张志扬、童丹、马业成、

田国汉、严琳。

1969 年 5 月后，“新湖大”收集了鲁礼安写的大字报和文章，并编成了两本小册子，题目是《把反革命分子鲁礼安揪出来示众》和《把扬子江评论揪出来示众》，供批判之用。

湖北省革命委员会向中央写出报告，称“北决扬”为反革命地下组织。

第 1105 回提到的周恩来在 1969 年 9 月 20 日晚关于清查“516”问题的谈话中，也特别提到湖北的“反复旧”和《扬子江评论》。

1969 年 9 月 27 日，中央发出了取缔武汉“北决扬”的《九二七指示》。

10 月 1 日，武汉在汉口中山公园大门前举行国庆 20 周年的游行庆祝。活动刚结束，站在主席台上检阅游行队伍的省、市革委会中的群众代表和工代会、贫代会、红代会常委被通知一律到洪山宾馆报到，参加省革委会扩大会议，贯彻中央《九二七指示》。当天即召开预备会，10 月 3 日正式开会，省革委会副主任、武汉军区政委刘丰作关于“北决派扬问题的专题报告。他说：

反动刊物《扬子江评论》“北斗星学会”、“决派”的反革命喉舌，就是说这一小撮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为制造反革命舆论而搞起来的。……

一号头头鲁礼安，华中工学院学生，所谓的“鲁克思”，

是一个恶毒攻击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现行反革命分子。二号头头冯天艾，华中工学院学生，1968年7月28日在武汉开的反革命黑会就是他负责召集的。他恶毒攻击我们的党中央，攻击解放军，去年发表的极其反动的“四评”，就是他写的。杨秀林，武汉大学学生，文化大革命前，就因攻击我们伟大领袖，咒骂我们社会主义制度，并企图外逃投敌，清理阶级队伍中定为现行反革命分子。……

刘丰说：“我们逮捕的仅仅是浮在水面上的一些人，还不是全部，有些人我们还要看一看。除了这些人以外，还有没有呢？现在还不能说没有了。”

曾思玉插话说；“可以肯定地说，还有一窝子。”

刘丰又说：“阶级敌人认为我们软弱，认为是怕他们，我们是不到时候不下手，现在到了下手的时候了。”

“工造总司”的吴焱金在大会上被点了的名。曾思玉说：

“吴焱金得的什么病？气候病。运动来了就装病请假。”

刘丰说：“‘工造’有个严琳说，兄弟是军人，谁要敢撕水塔（决派）的大字报，我就打得他有来无回。”

他大声问道：“吴焱金来了没有？”

吴焱金在下面回答：“来了！”

刘丰声色俱厉地说：“严琳是你的部下，‘工造总司’和‘北决扬’是什么关系，你和严琳是什么关系？你要交待清楚。”

整个会议期间，领导找吴焱金个别谈话，小组会组织对他批判，吴焱金不服气，坚持说自己与“北决扬”毫无瓜葛，“工造总司”与“北决扬”没有任何组织联系，说严琳参加了“北决扬”，那只是他个人的事。

吴焱金说：“我堂堂武汉市革委会的副主任不当，去参加十几个人的小团体北决扬，除非是神经病！”“你们不可能有任何证据，因为没有就是没有！”

由于他毫不犹豫地坚决抵制，不但没有把他本人打成“北决扬”分子或后台，“工造总司”在整个审查会当中也无其他人受到牵连。

有 70 位参会人员在大会上相继发言。武汉造反派的头面人物胡厚民、朱鸿霞、任爱生、杨道远等人都受到批判，特别是集中批判胡厚民。本来是一个贯彻中央《九二七指示》、深挖狠批“北决扬”的会议，渐渐变成了揭、批造反派头头的会议，后来更是发展成以揭、批“北决扬”总后台胡厚民的会议。

大会发言中，凡是造反派的发言，无论“钢”、“新”，多是先把自己批評一番后，再集中批胡厚民。

据参会的“长办联司”负责人、时任湖北省革命委员会常委顾建棠回忆：

“10 月 3 日，方铭拿着《九二七指示》对市革委会常委张维荣说：‘指示中讲，有的反革命分子到现在还在逍遥法

外，你看胡厚民是不是这号人物？这顶现行反革命分子帽子给他戴是合适的。你要第一个上台发言，说胡厚民是现行反革命。’张维荣被迫上台发言，给胡厚民扣上了北决扬总后台、现行反革命的帽子。张维荣由此深受刺激，患上精神病。”

吴焱金在发言中检讨自己是“以我为核心”来反对别人的“以我为核心”，承认自己反“钢”派“钢化江城”是“以派性反派性”、破坏专县的文化大革命，检讨了1968年揪变色龙、揪武老杨的错误。并揭发胡厚民抵制批判《扬子江评论》，上纲上线说武汉工代会有《扬子江评论》的代理人，武汉工代会成了《扬子江评论》的合法的司令部，反复旧运动是“决派”、《扬子江评论》中的一小撮阶级敌人利用工代会进行操纵的。

夏邦银批判胡厚民：“你当面是人，背后是鬼，原来不痛恨的，现在才痛恨你，你阳奉阴违，现在认识到你是个坏人。”

吴焱金在发言中说：“胡厚民等与王关戚、林杰、吴传启有联系，与王仁舟有联系”。揭发胡厚民说过“林杰的四句话有道理”，即“政治斗争无诚实可言、组织上结成死党、路线斗争引导对方犯错误、革命的造谣好得很。”

在大会上发言引起轰动的有三位：一位是武汉锅炉厂钢工总小头头桂美和，他声泪俱下地承认自己填了表，加入了“北决扬”。被大会树为先进典型。可桂美和回厂不久就自

杀身亡了。

第二位是“新湖大”的彭勋，他在会上说，“一根毒瘤，两个毒瓜”，批了胡厚民，也检讨了自己。他的揭发发言最是声情并茂、深刻生动，在大会上引起了一定的震动。事后，他承认是军区“三办”向他施加了压力。

最轰动和令人匪夷所思的是湖北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钢工总”一号头头朱鸿霞对省革委会常委、“钢工总”二号头头胡厚民的揭发批判。朱鸿霞在长篇发言中把胡厚民的思想归纳为“三个长期斗争”理论，即新干部与老干部的斗争是长期的，造反派与保守派的斗争是长期的，钢派与新派的斗争是长期的，简称为“新与老、革与保，钢与新的斗争是长期的”。曾思玉、刘丰在大会上带头鼓掌，朱鸿霞顺利被解放。大家听了朱鸿霞的发言，震动极大，有一种受骗的感觉：“怎么胡厚民是这种阴险狠毒的人？”而胡厚民既不申冤也不辩解，使大家真假莫辨，后来大家去问夏邦银，夏邦银说：“从没有听胡厚民说过这样的话。”

胡厚民是个沉得住气的人，对别人的揭发从不申辩，更不会反过来去揭发别人。尤其是对朱鸿霞，他从不计较。在局外人看来，胡厚民和朱鸿霞始终保持着深厚的战友情谊。

在这次大会上唯一不做检查的就是胡厚民，他一贯认为“违心地作检查就是上走资派的当，是授人以柄，自己搞垮自己，脱离群众”。

胡厚民被打成了“北决扬”的总后台，朱鸿霞揭发出来的“三个长期斗争”成了他们篡党夺权的黑纲领，要批倒批臭。

对朱鸿霞的发言，杨道远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念了文件（九二七指示）后，中间空了几天要大家自己准备发言稿子。我们（省革委会的常委们）都住在省委 13 号楼，我跟夏邦银交换看了发言稿，但那几天就是找不到朱鸿霞的人，夏邦银说不用找了，朱的发言稿内容都还不是差不多的。后来等到朱发言的时候，才听到他带头全面批判胡厚民，这当中估计是张体学做了朱鸿霞的工作。国庆节他在北京的时候还蛮硬的，回来怎么变化那么大？如今，朱鸿霞已经去世多年，我不知道他这个讲话当时到底是怎么弄出来的。”

说朱鸿霞“他在北京的时候还蛮硬的”，指的是在北京参加国庆观礼时，朱鸿霞已看到《九二七指示》，当时他对促使这份文件出台的曾思玉、刘丰非常不满，对他们整胡厚民表示了极大的愤怒。

10 月 21 日，杨道远发言，他依然按自己事先准备的稿子念，只检查自己的错误：一是全国支左抓军内一小撮；二是抢枪，武装左派；三是参加“反复旧”。对“北决扬”，他只是笼统地做些批判，划清界限，因为组织上不沾边，对别人也揭发不出来。

台下给他递了一大堆条子，他觉得自己回答不完这些条

子，也就不回答。发言一结束，把那一堆条子搂起来就下去了。还没等他坐下，曾思玉就开腔了：

“杨道远啊，看那一大堆条子我都替你着急。听你的发言，同志们感到不过瘾，……避重就轻，不痛不痒……你和胡厚民为什么抱得紧紧的，死不放？”

我们再看湖南。

1969年10月，湖南省高级法院审理“省无联”结案：

“湘江风雷”第二号头头张家政被判20年

省文艺界“红造团”宋绍文判15年

湖南“红旗军”毕健判10年

“红中会”杨曦光判10年

“高校风雷”周国辉判7年

中南矿冶学院“井冈山公社”张玉纲判3年

“湘江风雷”李仲昆等人，则被戴上“反革命分子”的帽子，长期监管。

与此同时，湖南省各地各单位，一大批“省无联”旗号下的造反组织的负责人，以及那些“黑手”，也分别受到不同程度的关押、判刑、批斗。

1969 年国庆刚过，在北京的山西学习班接到命令，全体人员离开北京，转到石家庄解放军铁道兵学院继续办班，对学员也继续进行审查。同时，省级机关原副处级以上的干部，还有刘格平新政权里各部门的大小头头们，也统统被调到石

家庄去参加学习班。这个庞大的学习班，人员达 8000 人之多。加上后来陆续被调来参加学习班接受审查的，学习班后来达到万人之众。这大批学员一到石家庄，负责学习班的工宣队和军宣队就做了五不准规定：一不准串连，二不准开小会，三不准外出，四不准通信，五不准接受家属和朋友探视。在紧张的气氛中，再看桌子上的饭菜，也由原先在北京时众多的盘盘碟碟，变成了严格的四菜一汤。每逢开饭的时候，学员中那些群众组织中的头头们，一个个敲着碗筷，没精打彩地走向饭堂。叮叮当当的杂乱交响乐，显露出他们此时内心的不安和酸楚。因为此时他们都成了被批判的对象。

山西的“兵团”司令刘灏想不通。当年他给别人糊大字报，用大字报埋葬着山西“黑省委”的一大批领导人。想不到如今自己也成了大字报埋葬的对象。他感到了无比委屈，同时也尝到了政治斗争的残酷。刘灏不得不低头认罪，不得不随波逐流地进行着违心的“斗私批修”。

他检查说：“文革初期，我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积极投身于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为的是捍卫红色江山，保卫毛主席他老人家。我带领‘兵团’狠揭猛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斗争的矛头始终对准了‘黑省委’。首次揪斗卫、王、王，我也站到了第一线，在‘1·12’夺权中我也站到了第一线,带领‘兵团’冲锋陷阵，让‘黑省委’土崩瓦解。后来在两派大联合中，我不图私利，坚决搞大联

合……”

这分明是在为自己的革命造反历史评功摆好。

但也检查出了问题：“后来两派武斗，我迫于无奈才带领‘兵团’起来自卫，沾染了小资产阶级的派性思想……”

以往就善于滔滔雄辩的刘灏，检查起来也是滔滔雄辩。无疑，这样的检查是无法过关的。此时的革命小将，与运动初期的当权派一样，就是想不通也得往通里去想。这样做毕竟是一种痛苦。他想获得解脱，不知怎样就想到了死。一死了之，功过是非让后人评判去吧！是拿定死的主意了，可实施起来并不容易。又是想来想去，终于想到了在夜深人静之时，完成自己去死的愿望。

等到了一个深夜。同屋的人睡熟了。看来是一个好机会。死是容易的，但死也是困难的。去死毕竟不是去睡眠，如果死如睡眠一样，可以躲过一段时光而日后再能醒来，那就可以断言，刘灏这回是“死”定了。问题就出在 22 岁的刘灏对自己在“文革”中的是非弄不明白，却明白死去了就不能再生。当他悄悄地爬起来，又像蛇行一般无声地爬上高楼的窗口时，面对着高楼下的漫漫长夜，他犹豫了。只是一刹那间的犹豫，同住一屋的军宣队一位军代表从床上跳起来，一把拉住了刘灏的胳膊：

“你要干什么？”

刘灏如大梦初醒，被人家硬拉回床上后先是捶胸饮泣，

继而沉默不语。从呼风唤雨的政治生涯中，跌入了沉默不语的境地，一句话，他就是对自己在文革中的所作所为，想不通究竟是哪里错了？

那位军代表开始劝他："你要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要正确对待群众对你的揭发和批判，要正确对待自己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错误和问题……"

刘灏就曾用"正确对待"教育过业已死去的卫恒书记，卫恒书记也因不能"正确对待"而被刘灏批斗过。

此事惊动了学习班的一位领导，他赶来劝导刘灏："运动初期你是有功的嘛，但后来你滑进了资产阶级的派性泥坑，把这个问题讲清楚了，领导和群众也就原谅你了嘛……"

刘灏终于能"讲清楚"了。就在他自杀未遂后，学习班召开了一次万余人参加的大会，刘灏带头登台去"讲清楚"，老老实实地讲了，讲他如何对"1·12 夺权"想过反夺权，如何在"七月会议"前后表面支持刘格平，暗中并不支持刘格平，如何与"红总站"争权夺利，如何利用资产阶级派性，干扰了山西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整整一个半小时的个人检查，一边"讲清楚"，一边泪花儿如雨。

学习班还将山西三大派组织的头头们全都带回太原，让他们一个个登台，向全省人民做斗私批修的深刻检查，会场设在迎泽公园内的湖滨会堂。4 年前，从北京远道而来的首都红卫兵就是在这里扮演了盗火的普罗米修斯，为山西送来

了文化大革命的火种。如今就要登台去做检查的这些造反派头头们，当时正是举着从北京送来的火种，发誓要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而 4 年后，他们也要登台去做必须“讲清楚”的检查了。

还有设在各地的分会场：五一广场、并州饭店、南北城区和河西区、各大机关和各大院校以及各大企事业单位，古城太原的每一个老百姓，都会听到这些派头头们在湖滨会堂里哭诉般的检查。

第1115回：说贵州，青岛学习班打架

批二张，王茂聚北京自杀

10 月 16 日，在北京的贵州学习班和参加国庆观礼的贵州代表团召开最后一次全体会议，周恩来主持，宣布中央的决定："任命蓝亦农、张荣森领导贵州省的工作；李再含等 7 位犯有严重错误的同志暂不回去，留下继续学习、检查。"

蓝亦农 1967 年任驻重庆 54 军副政委的，此时已是昆明军区副政委。

张荣森，时任 43 军军长。

中央解决贵州问题领导小组为观礼代表团准备了统一的汇报提纲，打印分发给各地、州、市的观礼代表，要求大家回去后都要按照这个提纲的内容汇报。

10 月 17 日傍晚，贵州国庆观礼代表团离开北京，乘火车返回贵阳。

10 月 20 日，李再含在小组会发言中说："我完全接受中央的批评，坚决照办。实践证明我是两面派，抗拒中央。"

10 月 26 日，中共中央下达（69）71 号文件，对贵州省核心领导小组"关于解决贵州当前若干问题的报告"批示决定：

（1）调昆明军区副政委蓝亦农兼任贵州省军区第一政委，李再含在京学习期间，蓝亦农代理省核心领导小组组长，主持贵州工作。调 43 军军长张荣森担任贵州省核心领导小

组副组长，并统一领导全省驻军支左工作。

（2）调 6908 部队进驻贵州，担负支左工作。

（3）中央为贵州举办一个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将省革委会办事机构工作人员，省军区、军分区、人武部的部分干部，省工代会及三线重要厂矿、各大学两派组织的部分头头，调来北京学习。

1969 年 11 月至 1970 年 4 月，中央在解放军政治学院举办贵州学习班，全省共有 2019 人参加。

10 月 17 日 23 时多，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姚文元、黄永胜、谢富治、吴法宪、李作鹏、李先念、邱会作、纪登奎、李德生、汪东兴等人在首都体育馆接见中央在北京办的山东、青岛、内蒙、贵州等 7 个学习班的全体学员 14112 名。会议刚开始，江青、姚文元、汪东兴因为有事先走了。周恩来、陈伯达、康生、黄永胜等人讲话。

康生在讲话时指着主席台后排就座的各学习班临时党委负责人说："我还要补充说一点，对这一排我还有意见。特别青岛班，领导班子不团结，群众都说 67 军和北海舰队不团结，王金泉和韩玉樽先要搞好团结，"

67 军政委王金泉和北海舰队政治部副主任韩玉樽两人起立表态。

原来，在北京的青岛学习班上，北海舰队政治部副主任韩玉樽在批王效禹时，提到支持王效禹的 67 军的问题，67

军政委王金泉为67军辩护，俩人发生争执，发展到互相揪着脖领子争吵。王金泉与韩玉樽都是青岛学习班负责人。

此时，康生继续说："你们当着1万多人表态，要实现诺言，要看你们言行一致不一致。"

接见大会结束已是18日凌晨1时10分，又专门留下青岛班负责人王金泉和韩玉樽。

周恩来首先批评二人："你们不团结没道理嘛！"

黄永胜："你们没道理嘛，两年来打官司。"他对67军的王金泉说："我第一次接触你印象就不好，到现在还如此。你的派性挺足，你不像个样子，你是个老同志嘛，连党性不要了嘛，连原则都不要。你67军反北海舰队干什么？你的毛泽东思想就那么多，北海舰队就那么少？你一直那么搞，你跟杨保华站在一块。冲击潜士校，你不制止。"

王金泉作了回答。

周恩来："那时我认为你也是批王效禹的。是不是你们支持了，转不过弯来？'九大'以后态度应明朗嘛。"

周恩来说的"那时"是指"九大"期间。

李德生说："中央对王效禹的问题有了决定了嘛。"

李作鹏说："北海舰队开始支左，卢仁灿犯错误，67军搞得好。后67军支持搞反复旧，搞了个稀巴烂。北海舰队你们也有毛病，不应该抓住小辫子不放，应是帮助态度。你不是急躁，你胸怀狭窄，你光看人家的缺点错误，看不到自

己的缺点错误。”

李德生继续批评王金泉：“你过去认识不是还可以嘛。中央指出王效禹的错误还不觉悟就不对了。你的旗帜不鲜明嘛。……”

康生说：“王金泉同志我怎么看你精神不那么振作，骄傲的人受了批评就泄气了？黄总长批评你骄傲，连杨得志的话都不大听。”

李德生：“你唯我独革。”

周恩来：“青岛的漏洞就出在军队，军队根本不允许对立。你们不是听毛主席的话，听外边的话……”

1970 年 3 月 10 日,67 军军部和部队撤出青岛搬到淄博，支左人员也从地方返回部队。

1969 年 10 月 29 日，谢富治在教育部、文化部、学部的讲话中提到“516”的问题。他说：“学部和文化部系统方面，是‘516’反革命集团的重要据点。当然，还有高教部。”

鉴于四川省 1969 年上半年受“反复旧”运动的影响，以及当时地、县严重的武斗情况，1969 年 10 月 29 日，周恩来等人在政治局会议上听取了关于四川问题的汇报。第二天，周恩来致函毛泽东、林彪：“从九大后，四川掀起‘反复旧’运动，其性质与山东、贵州、湖北类似”，“‘反复旧’矛头虽也是对着军队，工代会也要超越于革委会之上，但四川究竟有四川特点，一切表现在派性和武斗上面”。周

恩来提出先约四川党政军有关负责人来京。毛泽东 31 日批示："同意。"

四川一班人又被拉到双流机场，直飞北京。重庆的黄廉问李木森是怎么回事？一个新华社的记者回答说："中央准备第三次解决你们四川的问题。"

到了北京，大轿车将他们拉到京西宾馆，当晚就正式开会。从 11 月 5 日开始，中共中央解决四川问题的会议在北京召开。

台上坐着周恩来和康生、陈伯达、李先念、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叶群。

周恩来主持会议，他首先说："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治蜀未治。这是毛主席说从前是这样，现在革委会已经成立了，生产受到严重影响，根据毛主席的指示，把你们找来解决四川问题，有些是以前已经解决了的问题，我再来问一下，王茂聚同志，在攻打泸州的问题上，你调部队过去，有这个事情没有？"

王茂聚回答说："当时泸州一派受压，我们不去支持，一派就要被消灭。"

康生："我看你为人还算老实，是个木匠出身，办的蠢事也不少，身为政委，怎么调动军队去镇压？"

王茂聚回答说："这个事情我向总理请示过。"

周恩来没有说话。

康生又问："彭家治来了没有？听说你把石油局的车子都开出来了，全部开出来干什么？真是败家子，什么英雄，搞武斗也是英雄？"

周恩来："你英雄好好当嘛，当败家子干什么，我看你干坏事也干不出。"

康生又问邓兴国："你派性克服了没有？"

邓兴国写了个东西准备发言，但此时一着急找不到眼镜了，双手在桌子上到处摸。康生说："你是工人，还戴了眼镜，不像个工人。"

邓兴国回答说："我在努力克服，派性是两方面的问题。"

康生又问："谁叫康自忠？你写了个啥子东西，说革委会没有起到什么作用，三结合也是一个形式，我们两个人500年前是一家，你是个臭知识分子。"

接着，康生又把郭一明点起来，说："你在省革委会办事组，办的是什么事？你恐怕是跟派性办事吧。"

康生一个个挨着批评，最后抱了一摞材料，是刘结挺、张西挺、邓兴国、黄廉、周家喻的《反动言论录》，康生边翻边念："革委会是穿新鞋走老路，新瓶装旧酒；目前按劳分配是一个空壳，革委会所用人员还是旧省市委的人，还是按照老原则办事。"

这些都是黄廉等人的言论，康生念完之后，马上问："黄廉来了没有？"

黄廉站起来，康生又对黄廉说：“你说反复旧，我看必复旧。”

黄廉笑了，说：“我写文章就是给人看的。”

康生又问：“你是干什么工作的？”

黄廉说：“是秘书工作。”

康生问：“不是说是会计吗？”

周恩来说：“听说你是海军的？”说着，他回头去找李作鹏说：“这是你的部下。”

周恩来又对黄廉说：“你还精干，也会写一些东西，不要再搞小报了，毛主席已经不看小报了，还是要克服派性。”

周恩来接着说：“大家先休息一下，等一下看你们怎么搞武斗的电影。”

大家散开了，黄廉仍在桌子上埋头记与康生的问答，周恩来走到他的桌子边上，问黄廉：“干什么呐？”

黄廉说：“整理记录。”

周恩来说：“出去走走吧。”

黄廉说：“好。”便站起来和周恩来边走边聊。

周恩来问：“你在北京认识哪些人？认不认得蒯大富，知不知道‘516’是怎么回事？”

黄廉回答说：“见过蒯大富，‘516’不知道。”

周恩来说：“你们夺权之后，还是要好好支持革委会。”

周恩来提到刘结挺、张西挺的派性问题，黄廉说：“根

子还是在军队。”

周恩来说：“黄廉，回去之后，还是要把革委会的威信提起来，还是要依靠军队。”

这时，周家喻也走了过来，周恩来对周家喻说：“你这个知识分子也是派性十足，你那个‘815’要注意一下派性。”

周家喻回答说：“我们谈不上派性。”

周恩来说：“你们看了电影之后就知道了。”

周恩来走后，已调防重庆的 13 军何云峰政委和苏副政委过来问黄廉：“总理谈了些什么？”

黄廉对 13 军没好感，心里想：“你们 13 军不知道整了我多少黑材料。”于是没好气的说：“没有什么。”

李大章也过来打听，黄廉说没有什么内容。

郭一明被康生骂了之后，萎靡不振。

休息过后，召集大家看王茂聚等人拍的记录片《突破口上红旗飘》，拍摄的是“武装支泸”的事情，康生一开口就骂：“什么红旗飘，我看是黑旗飘。”

影片里面有打死人的尸体，燃烧的钟楼，王茂聚去送花圈的场景，康生大声问：“王茂聚，那个人是不是你？你看那个钟楼。”

影片中间有武斗队员进攻之前的宣誓场面，康生就说：“你看派性害死人，你们真打敌人有没有那么勇敢？为了派性就这样。”

康生从头骂到尾，电影放完灯一亮，康生说：“四川怎么搞得好？你们明天就去讨论这个问题。”

陈伯达也说：“同志们要谦虚些，一个人要多找自己的毛病，多检查自己，你们要克服派性，不要光看到别人的缺点，派性说到底还是一个私字，能不能斗自己的私，你们要克服派性，我有一首诗送给你们：行百里者半九十，言晚节末路之难也。”

周恩来说：“伯达同志的话需要翻译，他说最后的几步才是最艰难的，保持自己的晚节，最后的几步路往往是最难以做到的。”

过了半个月，11 月 21 日晚上，王茂聚在京西宾馆住处自杀。

黄廉听到这个消息，就问与王茂聚同住一个房间的内江市革委会主任段守章是怎么回事，段守章说：“我出去耍了一会，回来就看见老王悬在窗户上了。”

黄廉随口就来了一句：“老王肯定不会是自杀。”

旁边的 13 军政委何云峰一听，脸色都变了，赶紧说：“黄廉你不要乱说，不要看中央领导对你好。”

中央第三次解决四川问题的会议认为，四川的革命和生产落后了，落后的原因不在群众，而在省革委会领导。根据会议讨论情况，写出了四川省革委会、成都军区党委《关于解决四川当前若干问题的报告》和《关于加速四川地区三线

建设的请示报告》。

四川省省革委会、成都军区党委在报告中对省革委会成立以来工作中出现的失误集体承担了责任，同时也揭发了省革委会副主任刘结挺、张西挺的问题。

《报告》提出：成立三线建设领导小组，实行统一领导，改变多头领导和无人负责的状态；按军工第一、三线第一、配套第一的要求，把国防急需的重要项目、配套项目、对全局关系重大的项目和已经基本建成能够很快投产的项目迅速搞上去，改进三线的物资供应。

12 月 5 日，中央在周恩来主持下，再次召开会议解决四川问题。12 月 25 日，中共中央下发中发（69）87 号文件，对四川省革委会、成都军区党委《关于解决四川当前若干问题的报告》和《关于加速四川地区三线建设的请示报告》做出批示，决定调整四川省革委会领导班子，确定了省革委会核心领导小组成员名单和决定成立成都军区支左领导小组、四川三线建设领导小组及其组成人员。

这次四川省革委会的调整，增加了两位副主任：成都军区副政委谢家祥和成都军区副司令员兼四川省军区司令员谢正荣，增补了四位部队常委。免去成都军区总医院司药、“826”派军区总医院“红色造反者总团”负责人王阴均和梁善计的革委会常委和委员。免去的理由：王阴均已确定复员，梁善计犯有严重错误。

关于刘结挺、张西挺的问题，中央明确指出：刘结挺、张西挺是个人野心家，要发动群众揭发批判。

12 月 27 日 20 时 25 分至 28 日 0 时 10 分，在京西宾馆会议室，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黄永胜、姚文元、李先念、谢富治、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纪登奎、李德生接见四川省革委及成都军区学习班成员。

周恩来在讲话中特别点了刘结挺、张西挺和王茂聚、郭林川的问题。他说："省革委自始至终个别领导人，就是他们自己写的，错误的以拥护或反对自己为标准。""他们这个是最大的错误。把群众搞成两派长期对立。""'二月镇反'到我们 5 月'红十条'中央批示的时候，问题已经解决了嘛。如果不是王茂聚在那个地方'武装支泸'闹得那么凶，形势也不会那么紧张嘛！""现在我们查出来，王茂聚同郭林川在'武装支泸'的前线打给省革筹小组的那个电报，坏透了，那完全是诬蔑，乱说。"

"在四川就是刘、张说话算数，别人说话不听，连张国华说话也不行。张国华同志也无可奈何。"

周恩来明确指出："刘结挺、张西挺头脑膨胀，居功骄傲，争权夺位，是个人野心家。"为了进一步解决四川问题，中央同意为四川再办一期 5000 人的学习班。泸州两派头目，被召到北京参加学习。

会后，让黄廉和周家喻回重庆传达会议精神。回去之前，周恩来在四楼会议室单独接见了重庆组。

周恩来说：“你们这次回去，两个都要作自我批评，不能老是觉得自己正确；现在的问题是需要安定团结，要支持革委会发挥作用，把生产搞上去；回去的任务是着重作团结工作，要批判刘、张陷入派性的错误，克服派性很重要。”

黄廉在会上谈了一些具体的困难：革委会虽然成立了，解决问题很困难，一些基层革委会建立不起来，但是军队依然有倾向性，清队也是一派清一派，名义上是团结，实际上是暗斗。

周恩来说：“你们两个要首先团结起来，军队要起主要作用，必须一碗水端平。”

何云峰说：“过去有对不起‘反到底’的地方，但是不存在支一派压一派。”

周恩来最后说：“黄廉，刘、张是有偏向性，周家喻你一派自认为有优势，都要作自我批评，你们两个就起带头作用，懂不懂起带头作用的意义？”

## 第1116回：十一五，湖北学习班开学

## 一号楼，刘少奇开封逝世

与四川班开办的同时，1969年11月5日，刚刚结束的湖北省革委会扩大会议人员及武汉市“钢”、“新”两派大小头头共1319人也来到北京的空军学院，参加中央开办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组长是武汉警备区副政委张昭剑，副组长是“工造总司”成员平毅，成员有武汉军区副参谋长王步青、武汉军区政治部青年部部长刘海江、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陈扶生。大家按单位、系统组成班、排、连，从班长到连长，大部分由军人担任。

学习班宣布了“五不准”的纪律：不准通信，不准打电话，不准串联，不准私自外出，不准互相传播消息。一句话，大家都失去了人身自由。武汉搪瓷厂“钢工总”头头刘荣辉曾感叹道：“我的最大愿望是尽快结束学习班，最小愿望是让我给家里写一封信。”

虽然人身不自由，但气氛还不紧张，甚至还把三次蝉联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男子单打世界冠军的庄则栋和削球手张燮林请来，在大礼堂为大家表演精彩球技。伙食也很不错的，每餐都有荤有素有汤，主食的花样品种也不少，大家对伙食一直是满意的，不少人长胖了。

11 月底，武汉大专院校的造反派头头共 300 多人也进京参加中央学习班。

12 月 3 日傍晚，陈伯达在纪登奎等陪同下来到中央学习班湖北班，参加他们的开学典礼。全体学员在张昭剑指挥下，列队夹道鼓掌欢迎。

陈伯达看到水院的学员伍必慧，惊讶地指着他问："你们怎么把中学生也叫来啦？"

当他听说伍必慧是大学生后，又责问他们 ："你们为什么'反复旧'？在'九大'期间，'反复旧'是严重的反党事件。"

在开学典礼上，陈伯达说 ："这个学习班是中央办的，是党校性质的学习班，林副主席是咱们的校长，你们是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毛主席请来的，这是毛主席对你们的亲切关怀。你们要认真学习毛泽东思想，消除资产阶级派性，要斗私批修，增强无产阶级党性。"

根据陈伯达的指示，学习班大部分时间是开小组会，联系湖北、武汉实际，深入揭、批"北决扬"，挖出"516"及其在湖北、武汉的代理人、总头目。要求每个人都要把自己摆进去，交代自己在文化大革命犯的错误和罪行。

中央决定执行"战备疏散"后的第三天，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召集"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副组长开会，告知刘少奇要转移到河南开封，已通知河南省军区和开封驻军作好准备。

此前，河南省军区和开封驻军领导根据"保密、安全和

有暖气”的要求，秘密为刘少奇寻访驻地，选中了北土街10号，这里有一个带天井的院子，最早是银行家王曼卿在1928年建造的“同合裕银号”。1933年银号倒闭，改为河南省银行，后改为河南农工银行。日伪时期开封市政府设在这里，日本投降后仍归河南省银行。开封第一次解放时，这里曾作为冀南中州银行驻汴联合办事处。解放后为开封市人民政府所在地，称为市政府一号楼。

此时，刘少奇的病情依然没有好转。由于不能正常进食，他的自身免疫力太低，从1968年7月至1969年8月6日期间，刘少奇肺炎反复发作7次，其中1968年5次，1969年2次。在此期间，请专家会诊共40次，仅1968年7月会诊即达23次。一般上午、晚上各一次，有时一日会诊3次。参加会诊的专家有：上海的董承琅、北京的吴洁、陶桓乐、王叔咸、李邦琦、黄宛、王新德、薛善一、吴家瑞、姜世杰等教授专家。中南海门诊部参加医疗工作的有：卞志强、董长城、张林、牛福康、李留壮、马小先。参加特护的有：北京医院的曹兵、纪秀云，警卫团的韩世泉、301医院的董洁秋、卿喜珍等。期间曾多次出现病危，经抢救、治疗后，均转危为安。

为刘少奇治疗所用的药品，都是由保健药房专门供应的。绝大部分为进口药，尤其是抗生素，大部分是当时国内临床医院所没有的。一片抗生素药片就十几元钱，相当于当

时中国一个中等收入水平的人一个月的生活费。所用的针剂也十分昂贵。这些药用下去以后，很快就把支气管肺炎和高烧控制下来。如果没有这些抗生素，是无法多次控制肺部感染的。

在此期间，医护人员天天守护在刘少奇床边，不敢稍有懈怠。但是，严重的精神创伤，免疫力低下，肺炎反复发作，脑组织软化，意识严重障碍等病情发展，实非当时甚至现在医疗技术所能挽回的。

1969 年 10 月 14 日的《刘少奇病情报告》上这样记载："心脏有冠状动脉疾病，脑血管有硬化及脑软化，加上糖尿病，病情有可能突然恶化，今后如再发生严重反复，即可能无法救治。"

1969 年 10 月 17 日 16 时 30 分，刘少奇被用随身盖的粉红色缎被裹着抬上担架，再蒙上一条床单，送上救护车。18 时，救护车向北京西郊疾驶。19 时 23 分，一架伊尔-14 型飞机升空，直飞开封。中南海门诊部派董长城医生和曹兵、纪秀云两位护士携带医疗抢救用品随机护送。

17 日上午，开封驻军已调派一个警卫班，到北土街 10 号院外平房驻扎，不准任何人出入此院。警卫人员不准进院，也不准打听警卫何人。

这天上午，陆军 155 医院的一名医生和四名护士接到通知，跑步到院长办公楼开会。会上，院长对他们说："军里

给我们一个特殊任务，我们医院选派你们去接受任务，家里的事你们不要管，你们只带牙具、换洗衣服，其他什么都不准带，纸条也不能带。”

当他们回家拿了东西，一辆上海凤凰轿车即将他们拉到医院西院。在那里，由 1 军王景春副政委向他们交代任务，他一上来便问：“你们都是党员吧？”

有两人说：“不是。”

王景春副政委说：“不是没关系，以后争取。”

他接着又说：“同志们没想到吧，刘少奇要来开封了，派我们去执行这次特别任务，也就是说，要保证他的人身安全，保证他的生活，谁走漏消息，杀谁的头，党员开除党籍，你就是见着亲人，见着什么人都不准说。让张院长领着你们，可能是开封，也可能是别的很远的地方。”

然后他看看表，说：“你们吃饭吧，吃完饭就走。”

155 医院的医护人员坐上车，转了转，来到了北土街。警卫连的战士正在那里打扫卫生。155 医院的医护人员一下车，也赶紧脱了衣服参加打扫。到了晚上 19 时左右，一切就绪。院长叫厨房开饭，吃完饭大家回房休息。

将近 21 时，1 军保卫处处长张金贵通知 155 医院的师振德随他到机场接人。师振德坐上一辆救护车，张金贵坐上一辆上海轿车，出新开门往南仅 3 分钟，就到了开封机场。这时，从机场西边来了一辆淡青色的伏尔加轿车，河南省军区

政委王新从车上下来。

21 时 30 分，搭载刘少奇的专机在开封机场着陆。同机护送的除中南海门诊部的董医生和两名护士外，还有刘少奇的老卫士长李太和。

飞机停了下来，从上面走下一个人，是专案组副组长老邢。他和王新等人谈了几句后，155 医院的张院长对师振德说："振德，上去抬人。"

师振德等人上了飞机，看见刘少奇躺在机舱里面，护送人员正在给他换被子。因为机舱里面热，刘少奇盖的是酱紫色的毛巾被，下飞机前，给他换上从中南海带来的粉红色棉被。刘少奇没有穿衣服，鼻子里还插着鼻饲管。

刘少奇被直送到了北土街 10 号——开封市革命委员会机关一号楼。北京随行护送的医务人员向开封医疗组的刘医生和常文秀等 3 个护士交代了刘少奇生活、治疗和饮食等方面的情况，并做了详细交班。

刘少奇当时是鼻饲，比如鸡蛋汤、鸡肉汤、豆浆、牛奶都是从鼻子灌食。北京医护人员还给开封医疗组写了一个饮食单，每天定量是五顿。三四天、四五天剪一次指甲，每天给他洗脚、梳梳头。

刘少奇到了开封，没有说过一句话。当开封医疗组过来，他眼睛瞅瞅就闭上了，表情自然。

由于飞机机舱温度高，刘少奇来到开封第二天就感冒

了，体温升高。开封 155 医院的刘医生按照北京的治疗方案治疗，又增加了一些抗菌素，立即输液打针。

10 月 19 日凌晨，刘少奇肺炎复发，咳血、高烧。北京来的曹护士拿出北京带来的治疗肺炎的药物注射。黎明时分，刘少奇情况趋稳，渐渐入睡。上午，见曹护士给他喂玉米糊糊。他不肯吃。曹护士抓住他的手轻轻摇晃着劝慰："哎，吃点东西呀……你不能这样，你一定要活下去，活下去……"

刘少奇睁开了眼睛，看着曹护士的手，大约认出来了，是一起从北京来的。

10 月 21 日。刘少奇大便干结，护士用手抠出。

10 月 24 日、31 日，刘少奇的支气管肺炎等症状两次发作，经随同前来的医护人员救治后脱险。

11 月 6 日，从北京来的医生、护士全部奉命返回，随行带来的进口药物也基本用完，刘少奇的监护、医疗工作移交给当地驻军负责。随后，1 军又从警卫连挑选了 6 名战士前来参加监护。

11 月 10 日，刘少奇的病再次发作，开封 155 医院的医疗组参照上两次的办法医治。但他们不可能有进口抗生素，刘少奇高烧不退。

据刘建勋后来回忆，一天，河南省军区政委王新突然问刘建勋："开封有没有带暖气的房子？"并说："刘少奇现在开封 1 军，中央还派了五个人，包括医生、护士。"

刘建勋告诉王新：开封除了工厂、招待所外，一般住房都没有暖气。有一套房子有暖气，是过去一位副市长叫苟金笃住过的，现在暖气条件怎样还不知道，能不能住可以查一查。

12 日凌晨 1 时许，刘少奇病情出现异常症状，发生点头、张口呼吸、嘴唇发紫等现象，吸氧后也不见改变，155 医院院长也被唤到现场实施抢救。到 6 时 38 分，情况愈加不妙，连忙叫其他医护人员都来抢救。6 时 42 分医护人员到齐，然而为时已晚，他们还没有来得及采取措施，3 分钟后，刘少奇的心脏停止了跳动，终年 71 岁。

刘少奇停止呼吸后，医疗组按照程序进行了急救措施，5 分钟后，无效，终止抢救。

155 医院院长请示后回来说："你们清洁遗体吧。"

155 医院的师振德和曹文秀负责为刘少奇清洁遗体，洗澡，净面，然后在病床前照相。当遗体推到走廊时，155 医院院长又在那里照了一张。

王新告诉刘建勋说："刘少奇已经去世。"

1 军军长徐文礼也赶来向他们汇报此事。刘建勋听完汇报后，马上向中央打电话口头报告，请示料理后事的问题。他们在郑州等了几天，没有动静。后来才知道，刘少奇逝世的当天，刘少奇专案组人员和刘少奇的卫士长就从北京乘飞机赶到开封。当晚，决定将刘少奇遗体火化。1 军警卫连的 6 名战士负责抬遗体，155 医院的师振德在前面引导。当遗体抬到前院中间的时候，专案组副组长老邢命令停一下，将遗体放在地上。他交给师振德一块大三角巾，让他把刘少奇的脸蒙上。随即，开来一辆大六九中吉普，师振德和 6 名战士将刘少奇的遗体放进车内。师振德下车后，看见刘少奇的腿稍微露出了一点，又将覆盖的床单往下拉了拉，盖好。北京专案组组长和李卫士长及 155 医院院长在前面的引导车上，一行人来到了火葬场。

在火化场，155 医院的院长前去联系办手续，在专案组的指导下，登记申请人时用的是刘原的名字。对死者则填了“刘卫黄”，这个刘少奇少年时曾经用过但不为外界所知的名字。刘少奇火化后，骨灰交给 1 军保管。

与刘少奇同时疏散到开封的徐向前，当时被安置在开封南关一个军分区干休所，内定接待原则是“不冷不热，偏重于冷”。

11 月中旬后，北方转冷，干休所没暖气，徐向前患感冒。在干休所安装暖气时，他也被暂时转移到北土街 10 号，刘少奇刚在此逝世不久，徐向前并不知情。

徐向前带着秘书，被安置在西楼二楼南头套间，位置就在刘少奇病房上面。

1970 年元旦，徐向前孤身在开封度过了新年。春节前，干休所暖气安装完毕，徐向前从天井小院搬回干休所。

一年后，1971 年 1 月 23 日，杨成武夫妇和妹妹 3 人秘密转移到开封，他们夫妇也被安置在这里西楼一楼南套间，这就是刘少奇逝世的地方。杨成武的妹妹住在对面的北套间内。

杨成武在这里住了整整一年，每天除了看看《人民日报》，就是在小院走走，与外界完全隔绝，没有人找他谈话。

第1117回：时装会，美国大使追翻译

几回合，华沙会谈重恢复

我们再看看此时的国际形势。1969 年 8 月初，美国总统尼克松召见回国述职的美国驻波兰大使小沃尔特·约翰·斯托塞尔，他非常认真地说：

“沃尔特先生，我希望您以一种非常谨慎并且不引人注意的方式与中国人进行接触，告诉他们，我愿意举行会谈是很认真的，我们应当改善关系。”

亨利·基辛格参加了这次秘而不宣的召见，他是惟一的陪同者。

但是，将近两个月过去了，斯托塞尔大使在华沙依然是“按兵不动”。基辛格大为不悦。10 月初，他发急电催促其尽快行动。可是，直到 11 月下旬，斯托塞尔依然不动声色。基辛格勃然大怒，给远在华沙的斯托塞尔疾书一道“炒鱿鱼”式的“最后通牒”：

“要么你照办，要么我们派愿意照办的人来办！”

甚至美国国务院也指示斯托塞尔：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场合，以最快速度将美方信息传递给中国人，“即使追到厕所也在所不惜。”

但是在中美关系严重对峙的情势下，两国外交官接触的机会几乎微乎其微。斯托塞尔在时隔十余年后撰写的回忆录这样写道：“这就是当时摆在我面前的问题，如何谨慎地办

好这件事。我们共同参加的宴会很少，而且总是有很多人在场，乱哄哄的。因此要找到合适的机会实在很难。”。

斯托塞尔讲的确实是实情。多年来，中美两国外交人员在公众场合碰面根本互不答理，始作俑者当然是那位可爱可悲的杜勒斯先生。及至文革高潮，受到极“左”思潮影响的中国外交官对美国人就更不客气。在那种情况下，中美双方会面都在公众场合，要找到尼克松所说的合适的机会实在是太难了。

说话就到了 1969 年 12 月 3 日晚上，南斯拉夫驻波兰大使馆在地处华沙马尔沙科夫斯卡大街的华沙文化科学宫举行时装展览会，邀请各国驻波兰使节前往观看。

美国驻波兰大使斯托塞尔接到南斯拉夫大使馆的请柬时大喜过望，他猜想中国驻华沙的临时代办一定会应邀出席。志在必得的斯托塞尔这一回是带着中美大使级会谈美方联络秘书、使馆二等秘书西蒙斯“御驾”亲征。他们并不知道，中国大使馆在接到南斯拉夫大使馆送来的请柬之前，使馆政务参赞、临时代办雷阳已经接受了阿尔巴尼亚驻波兰大使馆为其接风洗尘的邀请。所以使馆领导决定，由二等秘书李举卿携波兰语译员景志成前往参加南斯拉夫的时装展览会。

时装展览会在华沙文化科学宫地下室的一个舞厅里举行。这是一个圆形舞厅，中间是舞池，环绕着舞池四周的便

是观众席。美国大使斯托塞尔和使馆二等秘书西蒙斯首先自入口处进入舞厅。他们坐下后就紧张地等待中国人的出现。时装演出快要开始的时候，还是没有看见中国人的身影。就在斯托塞尔、西蒙斯心灰意冷之际，中国外交官终于出现在两位美国人的视野之中——中国驻波兰使馆二等秘书李举卿偕波兰语译员景志成从另一入口处匆匆进来，并在靠近入口处的观众席就座。

此时的西蒙斯最想找的是他谈判桌上的对手和熟人，中美大使级会谈中方联络秘书骆亦粟。他在四处搜寻骆亦粟不果后意外发现了景志成。西蒙斯在中美举行大使级会谈时偶尔也见过景志成。他迅速认出了景志成，只是二秘李举卿是1969年仲夏才随中国驻华沙临时代办雷阳前来华沙就任新职的，故而不仅是斯托塞尔，就连西蒙斯也不认识李举卿。西蒙斯吃不准与景志成同来的那位中国外交官究竟是不是雷阳？他有些失望，眼前这位陌生的中国人是不是雷阳姑且不论，他想找的那位中国人，即中美大使级会谈的中方联络秘书骆亦粟也没有来，西蒙斯将自己的疑惑与踌躇告诉了斯托塞尔。

“好，机会来了，不管他们是谁，” 斯托塞尔用手肘碰碰西蒙斯轻声而果断地说：“我们要走上前去缠住他。”

几乎在美国人严密注视中国人的同时，景志成也发现了斯托塞尔和西蒙斯，看见他们在对面入口处一人用手指着他

们，一边对他身旁的另一个人窃窃私语说着什么。这位出道不久的年轻翻译认出了西蒙斯，他在陪同骆亦粟参加中美会谈联络官员会晤时见过他。同样，他也不认识斯托塞尔为何方人氏。当他发现自己和李举卿在“美国佬的监视之中”，心中那根阶级斗争的弦立刻绷了起来，立即把情况告诉李举卿。

比起初出茅庐、稚嫩年轻的景志成，李举卿毕竟沉着老练多了。当沉不住气的景志成把“敌情”向李举卿耳语一番之后，他说：“美国人说不定要耍什么花样。不要理他们！活动一结束，我们马上离开！”

时装展览会在当晚 20 时许结束。当最后一位时装模特穿着一件透明的结婚礼服出场时，有意避开美国人的李举卿和景志成起身退场。波兰人谁也没有站起来。斯托塞尔见状，也站了起来，紧跟在中国人后面来到衣帽间。

由于李举卿、景志成来时未穿大衣，因此他们没有在舞厅的衣帽间停留。这样便与进入衣帽间取大衣的美国外交官拉开了距离。

李举卿和景志成一前一后径直向楼梯口走去，在察觉了美国人的追踪后，他们更是有意识地加快了脚步。当走到楼梯一半时，紧追不舍的西蒙斯终于赶上了景志成：

“先生，这是我们的大使，他有话要跟您说……”西蒙斯指着身后快步赶来的斯托塞尔，气喘吁吁地对景志成说。

未等西蒙斯介绍完，斯托塞尔就急切地用波兰语说：“我是美国大使，我想和你谈谈。”

景志成吓了一跳，他担心的事终于发生了：他怕别人发现他在和美国人说话……在当时，如果中美两国外交官回避不及，狭路“遭遇”，中国外交官甚至还会“即兴”“声讨”一番：“为什么霸占中国的神圣领土台湾？……”等等。

但是，对景志成而言，作为一名未经多少世面的年轻译员，那时他甚至还够不上“随员”这一使馆最低级别的外交衔，当他第一次单枪匹马，面对美国大使突然“袭击”，其惊慌乃至失态是可以想象的。

景志成快步走向通往上面的搂梯，西蒙斯紧跟在他后面。当他们来到一个大平台台阶时，景志成发现李举卿已走出大门，更加快了步伐。斯托塞尔紧追不舍，气喘吁吁，边走边说：“我想会见你们的代办先生……”

“代办没有来……其他我不知道……”心神不宁的景志成语无伦次，只想早点摆脱这位讨嫌的美国人。眼看李举卿头也不回地走出了文化科学宫，两人已经相距二、三十米。惊慌失措的景志成不敢“恋战”，加快了“撤退”的速度。

斯托塞尔眼看鱼儿要脱钩，愈发穷追不舍：“不久前我回了华盛顿一次。我见到了总统。总统说他要和中国进行重大的具体的会谈。先生，我想告诉你，总统想与你们领导人

会谈是十分认真的。因为我们希望与你们的国家改善关系。请把这一情况报告上去，我乐意听你的回音。”

天很黑，正在下着大雪。天气很冷，四周没有人……

“我转达，我……转达，……我将把这一情况报告上去……”景志成被这种外交场合中前所未有的出奇出格的做法吓住了，他心有余悸地边答边走。他与走向停车场的李举卿已有相当一段距离。

满脸通红的景志成终于坐进了使馆的奔驰 230 轿车。刚坐定，便立即向李举卿汇报刚才发生的“险象环生”的一幕。“这是新的动向，回去以后要马上汇报！”李举卿立刻明确表示。

李举卿和景志成返回使馆后直奔雷阳办公室。雷阳闻讯，沉吟片刻，立即召开使馆党委会议。李举卿首先简单介绍了情况，稍作商议后，雷阳当即决定连夜报告国内。

平素寡言少语、几近讷讷的雷阳这次为何如此决断，雷厉风行呢？

“九大”闭幕后不久，耿飚将军出使地拉那。稍后，中国外交当局陆续向已建交诸国重新派出大使。为了使这批大使了解外部情况和发展中的国际形势，日理万机的周恩来在他们离京赴任之前每每拨冗接见。

1969 年 6 月，雷阳出任中国驻波兰大使馆政务参赞、临时代办。在济济一堂的“大使群”里，雷阳显得非常引人注

目。在普遍由一等秘书、二等秘书甚至三等秘书“留守看家”的中国驻东欧国家使馆里，雷阳的外交衔也同样显得“鹤立鸡群”。中国派出如此一位正司级的“准大使”资深外交官员常驻华沙，其意不言自明。另一个事例也能说明问题。直至70年代初，中国数十个驻外使领馆，只有驻苏联、驻波兰大使馆才配备红旗轿车。前者不难理解，后者盖出于中美大使级会谈矣！

周恩来在接见雷阳时，特别指示道：“雷阳同志，到了华沙以后要密切注视中美关系的发展，特别是来自美国方面的新动向，一有情况要立即报回。”“总而言之，我们要保持‘华沙渠道’，不能中断。”

事实上，遵照部里指示，雷阳赴华沙履新之前已经详细调阅有关中美大使级会谈的档案以及其他有关中美关系的文字材料。

就在时装会的第二天，12月4日，美国务院发言人麦克洛斯基在记者招待会上将斯托塞尔大使3日晚间与景志成的对话公之于众。麦克洛斯基在回答提问时称：斯托塞尔大使3日晚间谈话的对象是负责会谈事务联络的“骆先生”。这位“骆先生”就是中美大使级会谈中方联络秘书骆亦粟。麦克洛斯基“景冠骆戴”，皆因斯托塞尔误认而至。

12月4日深夜23时15分，华沙时间12月4日下午16时多，周恩来抱病在人民大会堂会见即将离任的坦桑尼亚驻

华大使萨利姆。会见结束时，手抱公文夹的总理秘书钱嘉东急匆匆进来，取出一纸电报呈请周恩来批阅。毫无倦意的周恩来展开电文，嘴边便露出一丝不易察觉的微笑，这就是雷阳华沙来电。周恩来招呼大家重新落座。“国际形势瞬息万变。尼克松上台后多次表示要同中国对话，外交部必须加强这方面的研究！”

早在雷阳刚刚跨进波兰国门的时候，周恩来就通过伊斯兰堡和布加勒斯特的两个“邮箱”告诉美国人：中国不久可能会有意于恢复华沙中美大使级会谈。

1969 年 8 月 8 日，罗杰斯国务卿表示美国政府有意恢复华沙大使级会谈。这显然是美国人得到周恩来口信后作出的答复。

1969 年 9 月 7 日，罗马尼亚部长会议主席毛雷尔代表齐奥塞斯库为美国传话，周恩来回答说：“关于中美关系，关键就是台湾和联合国问题。他们想解决，有渠道嘛！渠道就是华沙(大使级)谈判”。

9 月 11 日，在与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的会谈中，周恩来明确告诉对方：中国准备恢复中美大使级会谈。

10 月 27 日，美国驻香港总领事马丁致函广东省革命委员会主任刘兴元，询问今年 2 月 16 日因乘游艇越入中国广东珠海附近海域被中方拘留的两个美国人鲍德温、唐纳德的下落、健康及释放事，并要求转递这两人亲属信件。

11 月 7 日，外交部就美国驻香港总领事来函一事报告：此举显然是美国政府采取试探我反应的一个新行动，建议接过此事，适时（12 月初）释放美二人，并发消息，通知美驻波兰大使。

11 月，美国为改善中美关系，又采取一个象征性行动，撤走了自 1950 年朝鲜战争爆发后一直在台湾海峡巡逻的两艘美国驱逐舰。

11 月 16 日，周恩来致信毛泽东："尼克松、基辛格的动向可以注意。""近期内，急于对付苏联的美国政府在中苏珍宝岛冲突后，积极地做出一系列姿态，如：宣布放宽对中美之间的人员往来和贸易限制，不同意苏联提出的'亚洲集体安全体系'及其他旨在孤立中国的行动，下令停止派驱逐舰到台湾海峡巡逻，等等。"

作为对美国发出善意信号的回应，12 月 4 日，周恩来就"在华外国人研究处理小组"11 月 20 日关于两个美国人被拘一事的报告，致信毛泽东、林彪："经过政治局在京同志商榷，拟同意外交部对释放美国游艇的意见，时间拟定 7 日或以后。"

毛泽东批示："照办。"

秋去冬来，周恩来在北京等候来自华沙的美方的反应已有数旬了。12 月 4 日收到华沙来电的当晚，大喜过望的周恩来立即将华沙来电急报毛泽东，并说："找着门道了，可以

敲了，拿到敲门砖了。”

华沙的美国人上上下下也一起忙碌起来。4 日晚间，北京时间已是 5 日凌晨，华沙早已过了下班时间，美国驻华沙大使馆二等秘书西蒙斯突然给中国驻华沙大使馆打电话紧急寻找骆亦粟。在电话里，他开门见山地表示：“受美国政府委托，询问骆先生：美国大使昨晚与中国使馆人员的谈话是否已经转达？”接着，精明的西蒙斯话锋一转，无中生有地谎称：“昨日晚间的谈话已被美国记者看到，他们现已向使馆提出问题。美国使馆拟予确认，但不透露谈话内容，也不加评论。”云云。

西蒙斯显然是无中生有，故意杜撰。他之所以如此空穴来风，无非是为美方找一个将中美外交官员接触通过媒体公布于众的合法借口罢了。美国人很聪明，无论中方默许还是反对，他们都是“赢家”。你若默许，美国人自然求之不得；你若反对，做出澄清，反而增添了美国人期盼的“炒”的效果，因为中美官员接触的事实无法否认。

中国使馆立即如实将西蒙斯的电话内容报回国内。几天后，国内复示华沙使馆：“美大使要求会见我代办，这是继美对我做出一系列的‘和缓’姿态后，又一直接试探。在目前形势下，美急于同我对话，看来主要是为了压苏联，以增强其同苏联争夺的地位。为利用和扩大美苏矛盾，以利于当前对苏联的斗争，我对美在策略上可适当加以运用。”

12 月 6 日，周恩来亲自批准释放 2 月 16 日因乘游艇误入广东海面的两名美国人。因为当时在他们的游艇上发现有收发报机。周恩来要有关方面认真负责地查清此事。经过认真全面的审查，认为间谍的嫌疑很小，误入的可能性很大。

周恩来还要外交部把释放两名美国人的事通知驻波兰使馆告知斯托塞尔，说中国释放这两个美国人就是对美国从台湾海峡撤走两艘驱逐舰的答复。特别指示华沙中国大使馆，以代办名义致函美国大使，通知他们中国政府这一缓解中美关系的重大决定。12 月 7 日，骆亦粟奉命约见美方联络秘书西蒙斯，并面交信件。

春风满面的西蒙斯向骆亦粟表示很高兴转达雷阳代办的信件，并再次强调："3 日晚间与贵国使馆官员的谈话是十分严肃的，美国重视同中国的意见交流。"显而易见，这是美国大使又一次正式表示要求会见雷阳，美国人实在等不及了。当天，中国驻华沙大使馆就将此事上报国内。

此时，中美两国外交官接触的消息不胫而走，迅即传遍全球，为各国传媒广泛瞩目。

事后，基辛格称赞周恩来是杰出的外交家，把双方之间这一阶段的相互探询，称为"与中国人跳的一场错综复杂的小步舞"。

12 月 9 日，中国国内正式复电雷阳："国内决定，我代办可与美大使会见。"雷阳、李举卿、骆亦粟、景志成等中

国外交官的心终于踏实了，他们投入了紧张的筹备工作。

12 月 10 日上午，骆亦粟再次打电话给西蒙斯，正式通知：雷阳代办打算于次日（11 日）在中国使馆会见美国大使。当晚 23 时，美方来电话告知：美国大使同意第二天与中国代办在中国大使馆会晤。

这次两国高级外交官的会晤虽非正式性的，但是决定着事态的发展。会谈主要为即将举行的中美大使级第 135 次会议做出程序性安排。在会晤中，美方重申了缓和美中关系的良好意愿。斯托塞尔大使表示：尼克松关于美国愿同中国“保持更大的交流”的声明是“权威的和严肃的”。最后，斯托塞尔大使代表美国政府正式建议，明年 1 月 14 日恢复中美大使级会谈。

中方代表雷阳代办正襟危坐，侧耳倾听斯托塞尔的“高见”，他的任务是了解对方意图，故而对美方意见未置可否。

12 月底，美国政府宣布又一次放松对华贸易限制，使朝鲜战争以来实行的对华禁运基本取消。这样，中美苏三国的关系如同基辛格所总结的：到了 1969 年底，美国同共产党世界的关系就慢慢变成三角关系了。

1970 年 1 月 8 日，中方对美方恢复会谈的程序性建议正式作复，建议会谈于 1970 年 1 月 20 日在中国驻波兰大使馆举行。

双方商定：今后正式会谈改为在两国使馆轮流举行。

1 月 20 日，迭经磨难、姗姗来迟的中美大使级会谈第 135 次会议终于在中国驻波兰大使馆会议厅揭开序幕。

由于双方都带着成功的希望，会谈进行得很顺利。双方代表转达了两国领导人关于举行高级别直接接触、改善两国关系的愿望。

## 第1118回：转弯急，大草原再陷“真空”

## 设前指，内蒙古二次军管

我们暂且放下中美两国的“小步舞”，再回到国内。

1969 年 5 月 22 日中发(69)24 号文件下达后，内蒙古全区沸腾了，政治风向标一夜逆转，人们奔走相告：“毛主席解放我们了！”滕海清成了口诛笔伐的对象。

然而，平反昭雪、落实政策的工作，远没有人们想象的那样乐观。第一批被强行打成“内人党”中央执委和骨干分子的特古斯、毕力格巴图尔、巴图、木伦等“要犯”，仍被关押在呼和浩特粮食干部学校，不久，又秘密转移，远离自治区首府。军区系统包括鲍荫扎布在内的“内人党”要犯被解往黄河以南的准格尔旗，地方系统的“内人党”骨干则押送到伊克昭盟的东胜。

那些仍然身陷囹圄的受难者，不少人是当年的老“内人党”党员，而这些人也正是“挖肃”运动中一系列假口供的主要来源，是全自治区愈演愈烈的挖“内人党”运动的重要依据。比如鲍荫扎布，军区政治部的许多二级部长都是他在严刑之下，被逼无奈供出来的。

在众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当中，最重要的是做好各级“挖肃”骨干的思想工作。中央“522 批示”下达后，他们许多人思想没转过弯来。甚至一些积极参与“挖肃”运动的人们不相信这个“522 批示”是“最高指示”，各级革委会都有对

“522 批示”强烈抵制情绪。

另一方面，这些人虽然犯了错误，但毕竟只是执行者，不负有决策之责。因此，当众多受害者的满腔怒火朝他们头上宣泄的时候，这些人就更是满腹怨气，干脆撂挑子不干了。

于是，“落实政策”就成了一句空话。

自己纠正自己所犯下的错误是很难的，对于当时在全自治区一言九鼎、手操党政军大权的滕海清来说，尤其如此。他虽然在中央的严令之下口头上认了错，但思想未通，抵触情绪很大。

当时，吴涛、高锦明等人倒是希望能尽早落实政策，以安定人心。但他们支配不动下面革委会的许多领导人，因而也是无能为力。由于核心小组态度不明朗，措施不得力，处境越来越被动，终于激出了变故。

就在 5 月 22 日中央 24 号文件下达一周后，呼市地区、各军分区、各盟、市、旗、县那些曾身陷冤狱的人们及死难者家属，自发地组成上访团，汹涌的人流直奔自治区核心小组所在地——呼和浩特新城宾馆。

往日警备森严的新城宾馆，如今已放不下一张安静的办公桌了。

与此同时，名目繁多的专门揭批滕海清的群众组织，例如“批滕联络站”、“批滕前线”等，也在数日之内相继成立。

各群众组织召集的批判会接二连三地召开，大字报贴满

了呼市全城。在高压之下，积郁已久的怨屈、愤懑、思索，此时如沸腾的岩浆一般喷涌而出。

核心小组的主要负责人们不得不撤往呼市郊外，东躲西藏，今天还在 30 师师部，明天就到通讯营，后天又转往 89 团。军区党委副书记、第一副司令干脆称病，住进了 253 医院，并对外保密。

在那些混乱的日子里，滕海清无处藏身，高锦明主动请他到自己家里暂避一时。因为在内蒙古尽人皆知，“滕老左，高老右”，两人曾是对立面，因此绝不会怀疑滕海清竟然藏在高锦明处。

然而，滕海清在高锦明家心神不定地躲了几天之后，突然踪迹杳然。

高锦明心急火燎。

因为落实政策极不得力，已经激起众怒，再加上前一阶段“挖肃”高潮中曾打死不少人，所以高锦明十分担心，怕滕司令出什么意外。

正在这时，忽然接到一个电话，是滕海清在电话中低声对他说：“老高，我现在很安全，请放心。”

原来，滕海清在高家还是感到不保险，悄悄转移到军区大院里的肖应棠家，钻进了防空地道。

6 月 9 日，内蒙古革委会和内蒙古军区，联合发出了 165 号文件：《关于认真贯彻“九大”精神和伟大领袖毛主席

“5．22”批示及中央对内蒙古当前工作的指示的通知》。之后，内蒙古革委会又连续发出186号、189号，一共三个文件，试图加快落实政策工作的步子。

远在北京的周恩来对内蒙古局势十分关注。5月22日，滕海清一行刚刚回到呼市，他便打来电话，到6月23日再次来电，反复叮嘱要尽快纠正错误，落实政策。

周恩来说，虽然内蒙古犯的不是路线错误，而是违犯政策的错误，但违犯政策的错误也会造成极大的损失。周恩来以自己的经历举例说，“八一”南昌起义大方向是正确的，但是由于违犯政策，最后遭到极大的损失以至于失败。所以，不能说违犯政策的错误就小。

6月24日下午16时，迁延时日、一拖再拖的滕海清的“单独的检查”，终于在内蒙古自治区直属机关毛泽东思想大学校总校和大家见面了。

这时，从4月份中央正式批评滕海清算起，已经过去近两个半月了；如果从毛泽东“5．22”批示、中央下达24号文件算起，也已经是一个月零两天了。

时间拖得愈久，内蒙古广大军民的心情也愈焦急。然而，当他们听过滕海清的检查之后，却大失所望。

在数次的“批滕大会”上，滕海清不得不面对着那些孤儿寡母、身体残废的受迫害者声泪俱下的控诉。这个在过去的一年半时间内，一手制造了“内人党”事件这一特大冤案

的始作俑者，也尝到了被整肃的滋味。

“522 批示”非但没有平息大众的情绪，反而使得参与挖肃的各级领导也加入了上访的队伍。他们指责中共中央的方针朝令夕改，过去不挖肃是右倾，现在挖肃了是左倾，基层领导成为了平反运动的替罪羊。于是，全自治区分成了截然对立的两派：批滕派和保滕派。保滕派大多是原先的“挖肃”积极分子，当时被称为“扛铁锹的”。这些人保滕，无非是把滕海清当作保护伞，根本目的还是为了自保。

以受害人及其家属为主的批滕派与保滕派舌战、冲突、武斗，上至自治区首府，下至各盟市旗县，无不如此。锡盟发生武斗，还打死了人。

全区各级革委会瘫痪或半瘫痪。更令人担忧的是军队也几乎陷入瘫痪，地方军分区的领导公然不买内蒙古革委会的帐，政府机关被围攻、武器弹药被抢夺，内蒙古出现了权力真空，形势再度大乱。

面对内蒙古的危局，中央反过来又对“批判滕海清”踩刹车。康生说：“内蒙古平反一风吹了”、“犯了第二个扩大化错误”。

黄永胜说：“内蒙古批判滕海清，以错反错，搞乱了局势。”

于是中央对内蒙古采取了三项措施：

一、内蒙古东西横跨边境线太长。为此将两头切下，东

部划给辽、吉、黑三省，西部分别划给甘肃、宁夏；

二、对内蒙古实行分区全面军管；

三、内蒙古党政军机关干部移往河北省各地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斗私批修”，两派各自检查“前后两个扩大化错误”。

7 月 5 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变更内蒙古自治区行政区划的决定：“经伟大领袖毛主席、林副主席批准，为了便于领导和加强对苏（蒙）修作战的战场准备，以便战时更好地支援对修作战，将内蒙古自治区东、西两段的部分行政区划作了跨区调整，即：东段的呼伦贝尔、哲里木、昭乌达三盟全部划归东北；西段的巴彦淖尔盟的额济纳旗、阿拉善左旗、阿拉善右旗划归甘肃、宁夏”。“整个交接事宜，责成北京军区负责召集兰州、沈阳军区及有关省、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省军区共同研究商定，并将交接情况报告中央”。“全部交接工作，应争取在一九六九年八月底前完成”。

1969 年 7 月 19 日，中共中央将北京、兰州、沈阳三大军区的负责人召集到北京，召开了一个分割内蒙古的紧急会议。会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内蒙古自治区行政区划的工作会议纪要》，改变内蒙古行政区划，将内蒙古部分的行政区域一分为五，分别划入周围省份。中共中央的目的在于，一是尽快结束内蒙古动乱的局势；二是考虑到内蒙古东部地区曾经有过酝酿内外蒙古统一合并的历史背景，担心“内人党”

事件重新燃起蒙古人的民族统一情绪，因而缩小了内蒙古自治区行政区域的范围。具体是将呼伦贝尔盟（突泉县、科尔沁右翼前旗除外）划归黑龙江省；哲里木盟和呼伦贝尔盟突泉县、科尔沁右翼前旗划归吉林省；昭乌达盟划归辽宁省；巴彦淖尔盟的阿拉善左旗和阿拉善右旗的巴彦诺尔、乌力吉、塔木素、阿拉滕敖包、笋布尔等公社划归宁夏回族自治区；巴彦淖尔盟阿拉善右旗其余部分和额济纳旗划归甘肃省。内蒙古自治区区域缩小，变为四盟二市，即：锡林郭勒盟、乌兰察布盟、巴彦淖尔盟、伊克昭盟、包头市、呼和浩特市。

1969 年 9 月 13 日，周恩来、李作鹏、李德生接见内蒙古核心小组成员。周恩来说："你们的共同点是不顾大局，目无敌人，你们在地图上看一看。你们边防距北京有多近？你们还在那里那样搞，分成两派……苏、蒙修一来怎么打仗？……为了加强团结，共同对敌，准备打仗。滕海清同志不再做检查了。"

然而，这些措施并没有奏效，因内蒙古各级权力机构运作瘫痪而导致的权力真空和动乱局面依旧存在。

进入冬季，中央军委发出《高度加强戒备防止苏修突然袭击》的指示，通报中苏谈判 50 余天毫无进展，目前"三北"地区江河封冻，装甲车辆皆可通过，是苏修发动突然袭击的最有利时机。为此，要求一线部队严加戒备，加强侦察，

掌握敌人动向，纵深地区要继续抓紧战备工作的落实。

12 月 11 日，军委办事组召开全军战备工作会议。

12 月 18 日，中共高层紧急将滕海清、吴涛、高锦明、权星垣、李树德、李质以及雷代夫、张平、张鲁召进北京，周恩来、康生等人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他们。周恩来当面向他们宣布经毛泽东批准的中发[69]85 号文件，《中共中央关于内蒙古实行分区全面军管的决定》。《决定》“责成北京军区对内蒙实行分区全面军管，并由北京军区组成前线指挥所，领导这一军管”。具体部署主要为：

一、北京军区由郑维山司令员、杜文达副司令员、黄振棠、张正光副政委组成前线指挥所，进驻呼市。以上四人组成前指党的领导小组，以郑维山为书记，黄振棠、杜文达为副书记，实行对内蒙的一元化领导。内蒙古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在前指党的领导小组下进行工作。从北京军区抽人组成前指办事机构。

二、在北京军区前指的统一指挥下，包头市、巴盟、锡盟、乌盟、呼和浩特市、伊盟等地区的革命委员会和军分区（警备区），分别由 63 军、65 军、69 军、27 军组成前指，实行分区全面军管。所有军管单位，均以战备为纲，抓好革命和生产。

三、63 军由曹步墀副军长、田荫东副政委，组成精干的领导班子，负责包头市、内蒙铁路局、乌达、石拐子两煤矿、

河西公司的全面军管工作。

四、63 军 187 师的原定部署不变。由 63 军副军长余洪信和 187 师副政委王雪，并加强干部 40 至 50 人，带 560 团三营负责巴盟地区的全面军管工作。

巴盟革命委员会和军分区从磴口迁到临河。

五、65 军由耿淑明副军长、靳甲夫副主任和 195 师崔毓秀副政委组成精干的领导班子，带领 195 师 583 团，进驻锡林浩特，负责锡盟地区的全面军管工作。

六、69 军由周衣冰副军长和周发言副政委组成精干的领导班子进驻集宁，带领一个团负责乌盟地区的全面军管工作。

七、27 军由向孝书副军长、蔡云璞副政委组成精干的领导班子，带领四个连负责呼和浩特市的全面军管工作。

八、27 军由 81 师常道德副政委、郭学泮副师长组成精干的领导班子，带领必要干部和部队，负责伊盟地区的全面军管工作。

军管范围不止于地方各级革委会，还包括军分区、警备区，这种情况在全国是独一无二、未有先例的。

依照决定，12 月 19 日，北京军区立即由司令员郑维山、副司令员杜文达、副政委黄振棠、张正光组成内蒙前线指挥所，简称“前指”，进驻呼和浩特，前来执行军管，统一领导内蒙古工作。这样做，一方面是为了对苏联的备战，另一

方面是中共高层为了解决内蒙古的尖锐社会矛盾而采取的应急手段。

北京军区下属的几个野战军也立刻行动起来。由 10 余名军、师级干部率领，从几个野战军中抽调精锐部队，对区划变更后留存的呼市、包头和巴、锡、乌、伊各盟实行分区全面军管。华北地区，一场大规模的军事调动开始了。

第1119回：建总政，部队疏散返营难

判罪犯，下通知征求意见

1969 年 10 月 24 日，军委办事组写出报告，向中央提请要求批准并任命装甲兵政委黄志勇为总政治部副主任。

11 月 1 日，总政治部正式在旃檀寺大院总政办公大楼开始办公。

在军委办事组负责全军政治工作的是李德生。一次毛泽东主持政治局会议，议论起总政主任的人选，林彪提议李德生，谢富治说："李德生是军事干部，带兵打仗的人，搞政治工作，不太适合吧？"

毛泽东说："李德生不适合，你适合？"

李德生任总政主任就这样在政治局讨论确定下来。按照惯例，李德生的任命手续，是应当由军委办事组办理的。11 月，军委办事组在写给毛泽东和党中央的报告中提议："建议李德生同志任总政治部第一副主任或主任。"

毛泽东在报告上批上了"同意"二字。究竟是同意哪一个职务，毛泽东没有明说。中央办公厅把批件退回军委办事组。那么，究竟是任命为主任呢，还是任命为第一副主任？黄永胜又在报告上批示："请黄、田两位办。"

"黄、田"即黄志勇、田维新。主任的任命让副主任办理，这不能不说是一件怪事。在那个混乱的年代，很多怪事中其实是透着必然。他们接到上任后的这样第一份批件后，

黄志勇和田维新二人凭多年的工作经验，其实都参透了其中的奥妙，他们非常慎重，不敢贸然行事。田维新主张把批件退回军委办事组，等有明确的指示后再办。

11 月 28 日，军委办事组公布总政治部机关精简方案。据此，总政机关由原编的 13 个部、院，缩编为 6 个部、室。即：办公室、组织部、干部部、宣传部、保卫部、群众工作部。12 月，总政恢复办公，李德生以总政治部临时党委书记的身份主持总政的工作。12 月 10 日，中央明确李德生任总政治部主任，交军委办事组按这一决定办理报批手续。

12 月 26 日，总政治部向全军发出通知，通告总政治部正式开始办公。

12 月 31 日，军委办事组向中央报送了《全军战备工作会议纪要》，毛泽东当天指示："照办。"

各部队根据总参传达林彪指示的"1 号号令"进行紧急疏散，准备打仗，已一月有余。仗没有打，天却越来越冷，部队遇到了许多困难。特别是北部几个军区的部队，有的野营在外，有的散在民间，有的隐蔽在战备工事里，有的据守在深山隘口。部队的给养、运输、训练、管理以及思想政治工作，都出现了不少新的问题。如果确实处在战时条件下，环境比这再艰苦，也没什么说的，命都可以不要，冷点算什么？可是看样子仗打不起来了，部队还冻在野外干什么呢？官兵们受不了，重型武器装备也受不了。上边好像把他们忘

了，左等没有撤的命令，右等还是没有撤的命令，因此，人们对这种没完没了的疏散逐渐感到不可理解，有的甚至感到厌倦，各种“活思想”也随之增多。各大军区纷纷叫苦。

“林办”秘书根据各军区来电反映的实际困难，及时向林彪作了报告。

林彪表示不解：“部队可以回营了。他们为什么还要继续疏散呢？”

林彪真是大处抓得住，小处不爱管。在他看来，部队的疏散之权由他掌握，何时收兵回营就是各军区自己的事，至多由军委办事组发个通知就够了。但各军区是根据副统帅的命令进行紧急疏散的，上边不发话，他们不敢擅自作主呀。

秘书张云生对林彪解释说；“部队是根据首长的命令疏散的。首长不发布新的指示，各军区自己不好做出部队回营的决定。”

“你给黄永胜打个电话，叫他们研究一下。我看部队可以停止疏散了。”

林彪表态同意。但这时叶群又出来说话了：“首长不能发这样的指示。疏散出去没风险，过早收回来就有是非。如果现在就把部队收回来，一旦战争爆发，这个责任谁来负？”

由于叶群的干涉，直到 1970 年 4 月 24 日，中央军委才发出《关于部队疏散的指示》，允许疏散的部队和重型装备

逐步返回营区。这次紧急战备规模之大、等级之高、持续时间之长，为朝鲜战争以来所仅见。它的功过是非和经验教训，在事过之后许久，还是人们谈论的话题。

1969 年就这样在紧张的战备声中过去了。这一年，由于国内政治局势的相对稳定和广大群众和干部的努力，全国的生产情况主要是工业生产情况有所好转，基本上刹住了前两年生产下降的趋势。

这一年的工农业生产，基本上达到或超过了 1966 年的水平。工农业总产值为 2495.5 亿元，比上年增长 23.8%，比 1966 年增长 7.2%。其中，农业总产值为 642 亿元，比上年增长 1.1%，比 1966 年增长 0.2%，工业总产值为 1853.5 亿元，比上年增长 34.3%，比 1966 年增长 9.9%。

财政收入增长很多，达到 526.8 亿元，比上年猛增 45.8%，收大于支 9000 万元，但仍未达到 1966 年的财政收入水平；全国基本建设投资完成 200.83 亿元，比上年猛增 77.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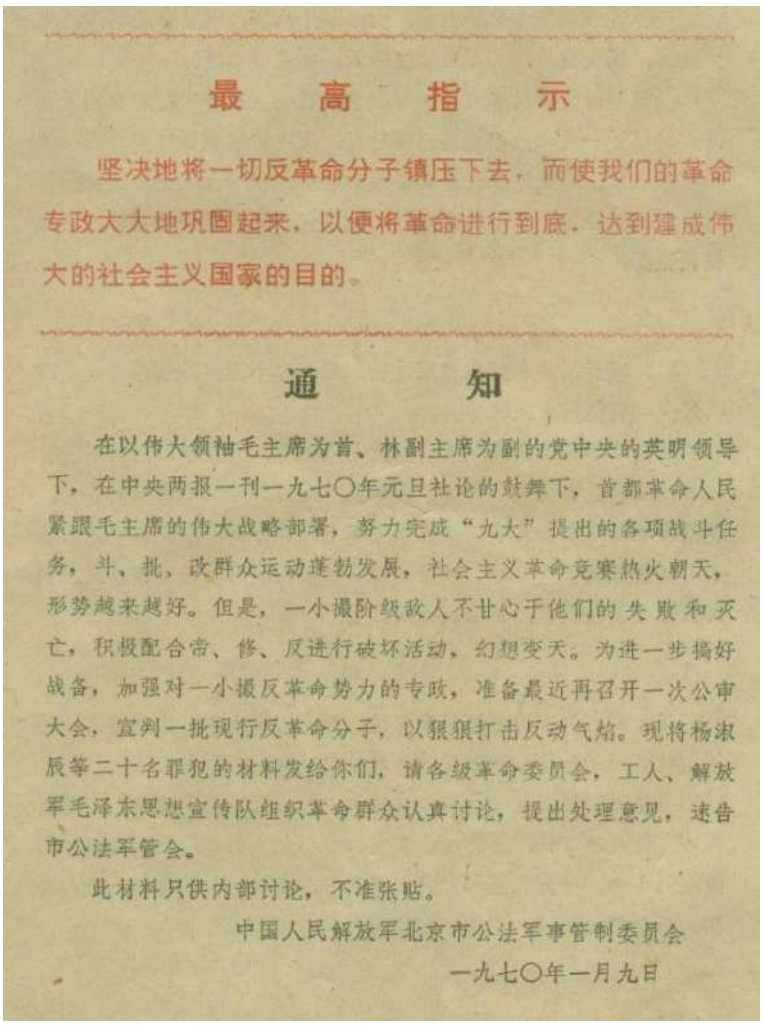
1969 年的经济回升，与 1969 年的计划指标相比，除了原油产量而外，几乎全部没有完成计划指标。

1969 年 9 月以后，国务院农办、农政和农林口各部机关干部，分别下放到湖北、江西、河南农村办“五七”干校，开展斗、批、改。不久，中央机关“五七”干校很快就按照中央的统一部署，大规模开展清查“516 反革命”运动。国务院农办、农政机关军代表宣布：中央已将秦化龙定为“516

反革命黑后台”，正式批准逮捕关入秦城监狱。农口那些保秦化龙的干部，也被划为“516 反革命”分子骨干，隔离审查，交代“516 反革命”罪行。

1970 年元旦刚过，“五七”干校召开逮捕大会，宣布：经中央批准，将农林政治部宣传处处长吴文平作为“516 反革命骨干”，由公安机关正式逮捕入狱。农林政治部副主任王振扬、宣传部长黄天祥、教育处长刘子兵和秦化龙秘书许人俊，分别作为“516”反革命后台和骨干陪斗。随后，对他们实行三班倒审讯，有一次，竟对许人俊连续进行三天三夜 72 小时的审讯。在这次清查中，国务院农办、农政机关和农垦部、农业部一些干部不堪侮辱虐待愤而上吊或跳井自杀，有的干部吓得逃离干校。

1970 年 1 月 9 日，北京市所有机关、学校、工厂企业都收到了一份《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市公法军事管制委员会通知》：



最　高　指　示

坚决地将一切反革命分子镇压下去，而使我们的革命专政大大地巩固起来，以便将革命进行到底，达到建成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目的。

通　　知

在以伟大领袖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的英明领导下，在中央两报一刊一九七〇年元旦社论的鼓舞下，首都革命人民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努力完成“九大”提出的各项战斗任务，斗、批、改群众运动蓬勃发展，社会主义革命竞赛热火朝天，形势越来越好。但是，一小撮阶级敌人不甘心于他们的失败和灭亡，积极配合帝、修、反进行破坏活动，幻想变天。为进一步搞好战备，加强对一小撮反革命势力的专政，准备最近再召开一次公审大会，宣判一批现行反革命分子，以狠狠打击反动气焰。现将杨淑辰等二十名罪犯的材料发给你们，请各级革命委员会，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组织革命群众认真讨论，提出处理意见，速告市公法军管会。

此材料只供内部讨论，不准张贴。

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市公法军事管制委员会

一九七〇年一月九日

《通知》说：“为进一步搞好战备，加强对一小撮反革命势力的专政，准备最近再召开一次公审大会，宣判一批现行反革命分子，以狠狠打击反动气焰。现将杨淑辰等二十名罪犯的材料发给你们，请各级革命委员会，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组织革命群众认真讨论，提出处理意见，速告市公法军管会。”

《通知》提到的“杨淑辰等二十名罪犯的材料”有：

1、杨淑辰，女，48 岁，北京通县人，罪行是“1966 年充当外国特务”，“仅 1967 年 3 月杨出卖情报数百份，同年 4 月向外国驻华使馆人员递交情报时，当场被抓获”。

2、唐志强，男，25 岁，北京市西城区少年科技站天文辅导员，1967 年 7 月 20 日“化装成外国人”“到外国驻华使馆投靠，当场被抓获”。

3、宋惠民，男，49 岁，山东省人，偷越出境被引渡回国。

4、邓振铎，男，26 岁，北京市海淀区人，曾因“反革命”罪被捕入狱，出狱后偷越出境被引渡回国。

5、尉尤山，男，45 岁，无业，住北京市东城区，材料上称其为资本家、国民党员，罪名：“现行反革命犯”。

6、王宗海，男，52 岁，山东人，资本家，住北京东城区。材料称，1960 年底，被台湾“蒋匪组织委任为‘北平联络专员’，向特务组织密报我重要情报，并发展特务组织 1 人”。

7、刘镇江，男，40 岁，北京市人，“军统特务分子”。

8、于江林，男，40 岁，北京市昌平混凝土构件厂合同工。

刘镇江、于江林二人均为“现行反革命集团首犯”，他们在 1966 年春，合谋组成“国民党党政军警张家口联络总处”，并附设“国民党京绥张家口(检)查总站”，下设“宣化联络分处”、“涿鹿、蔚县、怀来联络组”等。

9、宗福海，男，32 岁，北京市密云县人。

10、侯庆龙，男，28 岁，北京市密云县人。

宗福海、侯庆龙二人系编号八的同一案件。

11、元令秀，男，34 岁，山东省人。

12、孙义，男，32 岁，河北省人。

元令秀、孙义二人系编号为九的同一案件，罪行主要为："窃得电动机 6 台，自行车 195 辆，缝纫机 4 架等大量财物，价值 3 万余元"，目的是"筹集反革命活动经费"。

13、遇罗克，男，27 岁，北京市人民机械厂徒工，案件编号是十，罪行是：现行反革命犯遇罗克，男，二十七岁，北京市人，资本家出身，学生成份，北京市人民机械厂徒工。其父系反革命分子，其母系右派分子。遇犯思想反动透顶，对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怀有刻骨仇恨。一九六三年以来，遇犯散布大量反动言论，书写数万字的反动信件、诗词和日记，恶毒地污蔑诽谤无产阶级司令部;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书写反动文章十余篇，印发全国各地，大造反革命舆论，还网罗本市与外地的反坏分子十余人，阴谋进行暗杀活动，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遇犯在押期间，反革命气焰仍很嚣张。

14、王佩英，女，54 岁，铁道部铁路专业设计院勤杂工，在公开场合呼喊口号"刘少奇万岁"。

15、李定一，男，44 岁，河南省人，右派，并因此多次被拘和"劳教"，罪名："现行反革命犯"。

16、唐赞义，男，32 岁，北京煤气热力公司调度员，罪名："现行反革命犯"。

17、李世安，男，43 岁，北京木城涧煤矿工人，罪名：“现行反革命犯”。

18、马正秀，女，38 岁，北京自然博物馆讲解员，其父被定为“历史反革命”，其兄亦因“军统特务”罪被处决，材料称她，“刻骨仇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经常散布大量反动言论，1967 年 8、9 月间，多次书写和公开张贴反革命标语、传单、恶毒攻击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穷凶极恶地污蔑诽谤无产阶级司令部”，“在押期间，仍疯狂地攻击无产阶级专政，反革命气焰嚣张至极。”

19、王步云，男，60 岁，北京市海淀区大钟寺小学合同工，1966 年 7 月用菜刀砍孙某 20 余刀，“重残一人”。

20、张长利，男，22 岁，北京市平台区芦沟桥公社农机厂工人，1968 年 1 月用铁棍致死 1 人。

在这 20 名罪犯名单中，有《出身论》的作者遇罗克的名字。在他的罪行材料中，特别提到的“网罗本市与外地的反坏分子十余人，阴谋进行暗杀活动”究竟是怎么回事？据《中学文革报》的主编牟志京后来回忆：1967 年夏天，《中学文革报》的大部分成员到东北串联。在长春，遇上武斗，“一下火车就有人向我们发武器，其中也有手榴弹。在我们离开长春时候，我对大家说把武器都缴回给当地人，遇罗文却把一颗手榴弹给带了回来。他是一个非常爱好化学的人，他给我作过多次化学试验，做过催泪弹，小小一滴，就可以

把整个屋子的人弄得喘不过气来。他还在颐和园发射过小火箭。我想那个火箭的火药就是从手榴弹里拆下来的。这就是他带回手榴弹的目的。他这个人很幼稚，不仅在那个时代冒险带回手榴弹，而且还把这个秘密告诉了至少两个人。我当时也很奇怪，原先公安局一直逼问我遇罗克有什么反动言行，后来突然对这些一点也不感兴趣，只问手榴弹的事情。而当时我确实对此一无所知，直到我看见遇罗克的判决书，才恍然大悟。其实抓遇罗克的真正原因是他撰写《出身论》。”

遇罗文将长春车站发的手榴弹带回到北京，又害怕被查出来，想到香山埋了，结果被公安局局盯上了。

1967 年 12 月 30 日，公安部李震根据谢富治的批示，“重新研究了对反革命小集团家庭出身问题研究小组首要分子遇罗克等人的处理意见”，决定“扣留主犯遇罗克”。

1968 年 1 月 1 日，谢富治批准逮捕遇罗克。1 月 5 日，遇罗克被投进了半步桥监狱。当时遇罗克正在撰写《工资论》。

他在被捕前几天的日记中还这样写道：“如果我自欺了，或屈服于探索真理之外的东西，那将是我一生中最难过的事。我要做一名马列主义的忠实信徒，为共产主义事业而献身。”

## 第1120回：一二四，众领导说“五一六”
## 震动大，全国再次掀高潮

1970年1月24日晚到25日凌晨，周恩来、康生、江青、姚文元、黄永胜、谢富治、吴法宪接见中央直属系统文化部、学部、教育部等单位的军宣队代表。

周恩来在讲话中介绍了“516”著名头头的情况。他说：

“一个是吴传启，湖北人，是国民党特务，参加过伪国大竞选，是宋洛介绍入党的，宋洛是武汉市宣传部部长，参加了造反派，他联系的人是国民党特务，托派王明分子，还有大资本家，他们摇身一变，成了造反派，这些人到处串联。九大前后，反复旧他们都搞了，根就是吴传启。吴传启解放后跑到中央计委，最后到学部。在六十年代，可能在以前，他和关锋、林聿时三人，他们在学部写文章，用假名字，在哲学研究杂志上发表叫撒仁兴。

这条线，还有叛徒潘梓年，是潘汉年的哥哥，在国民党反动时期被捕，现在查明，他和国民党勾结，通过国民党CC特务，把他放了。因为我们不清楚，他还作了《新华日报》的编辑，解放后到了学部，在文化大革命中他是动摇的态度，关锋亲自去，后是吴传启成为当时学部的头头。四月份在上海修改《五·一六通知》时，他们闻风派吴传启到上海打听消息，回到北京后，在学部写了第一张大字报。”

江青插话说：“军队中还有刘志坚，谢堂忠，陈亚丁，

唐平铸。”

周恩来接着说：“在起草通知过程中，他们企图把吴、潘拉进中央文革，由于江青同志的反对，其它同志不同意，而没有得逞，但王、关、戚、王任重、刘志坚、陈亚丁，在邓小平的推荐下，混进了中央文革。但领导是好的嘛，主席在九大讲了这个问题，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后，出了几个坏家伙，陈独秀、张国焘，但这不影响我们，党还是光荣、伟大、正确的。我们党是毛主席亲手缔造、亲自领导的从胜利走向胜利，中央文革小组揪出王、关、戚，并不影响中央文革的大方向和伟大功绩，王、关、戚，也是中央文革自己揪出来的，对他们是慢慢的逐步看清的。在这个问题上江青同志发现最早，说明不仅是学部这一条线，绝不是学部这一条线，文艺方面更多，刘少奇资产阶级黑司令部就是一条总根。关锋就说过：‘以后党恐怕还是刘某人的。’实际上他就是黑线人物。陶铸到北京来还和吴传启联系。”

康生插话说：“陶铸还叫吴传启到中南海。”

周恩来又说到王力：“王力在山东，他本人加入国民党，他妻子是叛徒，王力在大革命时参加革命，康老清楚。”

康生：“一办的同志要注意这个问题。”

江青问：“三个办公室都来了？”

答：“来了。”

康生：“这个问题，我当面告诉中央专案组，他们根本

不理这个事情。”

周恩来继续说：“王力的老婆的妹妹的丈夫在教育部是个司长，他有两个女儿，一个在张家口搞无线电，很活跃，和三军‘冲派’联系；一个在一外，也是红卫兵团的，和‘616’在一起。”

康生：“还有一个妹妹在外交系统。”

江青：“王力的屋子里有两条电话线，其中占用了国际线。”

周恩来：“关锋利用老婆、小舅子在东北搞‘831’……

关锋根子在学部，和军队有联系，原来是肖华的部下。要继续查他的历史，他老婆在红旗杂志社，完全做‘516’的联系，和文化、宣传、学部联络，和林杰联系在一起。关锋企图篡军权，‘抓军内一小撮’，他是和王力大喊大叫的。王力在 8 月 7 日要夺外交部大权，8 月 7 日的讲话人们取名叫“王八七讲话”，于是‘516’就贴出天安门的两条标语，‘热烈要求姚登山代理外交部长。’、‘热烈要求关锋代理总政治部主任’的大标语，小字报也登出来了。王力的野心就更大了。”

康生插话：“想当总理。”

周恩来：“戚本禹是个野心家，是跑腿的，活动能力很强。他无孔不钻，文化方面他钻的地方最多。江青同志不让他去，他硬要去。他还到煤炭部、化工部，工厂也到了，工

厂到二七车辆厂、首钢。所以工业单位也要搞，文化方面他和体委的刘长信，卫生系统的孙正有来往。他两个儿子证明也不是好人，他能伸就伸，对样板戏也插手，乱改，特别是对交响音乐《沙家浜》和《白毛女》。杨成武那篇文章主席很不满意，大树特树不符合毛泽东思想，不能登出，但戚本禹一定要登。后来登在第二版上，杨成武还不满意。戚本禹道歉，王力还给送像章慰问。互相勾结，暗地活动，以后才揭发出来。在中央办公厅有彭、陆、杨还有田家英、他完全是跟着田家英走的。田家英有很多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言论，派人搜他们的东西，别人的东西都收回来了，就田家英的没有收回来。有主席的手稿，丢了好多，是戚本禹串通的，第二天田就自杀灭口。戚本禹这个人写东西也是不能写的，过去我们也是受了骗的。《评忠王李秀成》那是根据主席思想，请历史研究所帮他写的，以他的名义发表的。这说明对一个人的认识是要经过相当一个时期考验的。经过考验知道戚本禹是这么一个人，他的根子是很深的。冲机要局，抢档案，他与叶向真，他们是合谋，后台是杨、余、傅，肖华。在 66 年无产阶级造走资派反时，造反派群众在街上搞四旧，叶向真靠和他父亲的关系，首先冲军事科学院，他们采取的是绑架的方法。戏剧学院的叶向真，他说是造反派，年轻人造反好么，造走资派的反。现在查清，搞军队带头的就是他们。

江青："首先动手打解放军的就是叶向真、刘诗昆。"

周恩来："第二件事比较严重的，66 年底他们搞突然袭击，将彭罗陆杨和文化部的夏衍、林默涵、田汉、阳翰生，还有其他人一下子逮走，然后让他们游街，我们打电话问戚本禹是谁抢走的。他说'可能是叶向真，我打听打听。'不到五分钟，他说是叶向真，后来把叶向真叫来。她说是戏剧学院、中央音乐学院、中央乐团这些单位搞的，关在和平里中央乐团一间大屋子里，第二天就要游行。这样全城会轰动，对我们不利，后经卫戍区把他们接过来。这样一件事，我们不允许在无产阶级司令部面前绑架，这不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造反行动，这样做超过了武斗，变成了绑架。后来，很多地方也跟着搞起来了，部队冲派也搞这一套，北京军区文工团'星火燎原'他们知道了，抢了先了，首先搞起来了，把北京的运动搞的非常不利。

在《五·一六通知》发表之前，他们就做了很多坏事，而这时，我们逐步发现吴传启这个根子，这个是不得人心的，在中央文革开会时三四月份，更早在 66 年底，提醒他们要和吴传启划清界限，他们退了一下，他们知道了中央文革知道了是不允许的，他就准备撤退，让吴传启、林聿时到河北赞皇县农村搞根据地，准备上山打游击，潘梓年，年纪大了打游击不行，就把他送到太湖养起来了，就这样暂时停下来。他们矛头国务院是我，中央文革是康生、江青同志。这些坚

持立场，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他们就反对，他们搜集材料，反对康生、江青同志，想把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都打倒。

67 年 5 月 16 日《通知》正式发表后，他们组织了‘516’反革命阴谋集团，但根子还在以前。两个系统，大的以学部为中心，还有外事口、政法口、农林口、工交口、文化口、教育、宣传、民族、统战，军队一个口，大的是方面军，军队是‘冲派’，是‘新三军’。‘513’砸展览馆演出，反对宣传毛泽东思想，肖华、杨成武插了手，完全演了反革命双簧。

大专院校以学生为主，工交以张殿英为主，农林以农业大学、林学院为主，外交以一、二外为主，财贸以商业、财经、商学院为主，体育以体育学院为主，学部是‘516’兵团。现已查清，‘516’红卫兵团的文件有一个宣言，7 月 1 日通过的，另外‘616’跟着发表一个宣言，这两个宣言，矛头是对准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他们的口号是打着无产阶级的旗号，很反动，正好在这时开始有‘二月逆流’，传到社会上，他们把矛头对准中央各部委，对准解放军。武汉事件发生后，他们就变成了什么角色，就是要破坏无产阶级司令部，破坏无产阶级司令部依靠的伟大长城，6、7 月闹的最凶。这段事情很复杂，集中到‘516’这个问题上，名字叫‘516’反革命阴谋集团，来源是各个方面的，既有国外的帝修反，又有暗藏的反革命、国民党特务、党内叛徒、内奸、走资派、修正主义分子，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是个大杂

烩，不仅是中央有而且地方也有，在地方插到了广西、湖南、石家庄、湖北、四川、山西、贵州、武汉等地。”

康生：“王、关、戚、杨、余、傅、肖华是怎样阴谋篡夺机要大权，这是‘516’专案的主要问题。”“中央办公厅的工作汪东兴同志负责，他们想把汪东兴同志打下去，他们来搞，还要夺机要部门的权。66 年 10 月总理有一个讲话，就是机要大权是中央的，党的，毛主席的，这个权不能夺。发电报不能什么人随便都能签发，这些单位最核心的机密，不能夺权串联。”“这些核心部门和别的单位不同，核心机密是毛主席亲自抓的。可是戚本禹老婆邱良英勾结了一些机要部门的人来冲机要部门，戚本禹在 67 年 1 月 14 日讲话时，特别煽动要夺机要权，这是反革命报告，成了全国机要的行动纲领，煽动群众说‘为什么机要大权不能夺？’他的报告是攻击总理，实际上是攻击毛主席。在 66 年 12 月 28 日，67 年 1 月 5 日，王力有的讲话，特别攻击总理不能到机要部门串联的指示，戚本禹到机要局煽风点火，在戚本禹的煽动下，他们于 1 月 27 日夺了中央机要局的大权。他们掌了 28 天。”“王、关、戚这家伙，要不是留他们做活口供的话，都应该枪毙。就这件事也要判无期徒刑，他们向全国发电报，对抗总理指示，外交部夺权后向全世界驻外使馆发电报，反对中央，反对总理，反对不准串联的决定。这不就是犯罪吗？”

“再一个来抢档案，交通部有个头头叫黄辉，砸了保卫处，档案有的到现在还没收回，据说有的弄到外国去了。”“外交部成立‘大喊大叫’兵团，甚至讲恩来同志执行主席路线是动摇的。”

周恩来：“67 年 7 月去武汉营救王力是对的，因为他当时是以革命的面目出现的。”

康生继续说：“与此同时王力抓电台，关锋抓军委三部，搞军内情报。”

江青：“他们偷剪了我给陈锡联、黄永胜同志的信。”

“据我看王力是头头，关锋是第二把手，戚本禹是跑腿的，二月逆流逐渐认识。六七年一、二、三、四月，我就说，你们要和吴传启、潘梓年划清界限，学术归学术，政治归政治，说了多少次，他们就是不作，同志们有物证，捉戚本禹的时候，身上还有给彭真、翦伯赞、吴晗的信的底稿，总理有一份正式的，这是铁证，他是亲笔。”

“在北京市革委会筹备时，主席和我、中央文革决定让富治同志主持，戚本禹想去当第一把手，他有什么资格去？他还想把富治同志弄掉，他想把中央文革架空，还有什么周景芳，据说也是萧华这条线上的，还有李广文，也是山东这条线上的。”

“我说不能抢中央档案，我的‘九·五’讲话讲了，其实 7 月底就讲了。你们可以读一读我的‘九·五’讲话，还

有个八条十条的关系，我说八条是拥军，十条是爱民，他们就不高兴。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支持我，说‘你讲的对’。我在九·五讲话中讲了，不能冲英代办（处）。他们还把援越的物资炮弹抢了，在整理文字时他们说这对红卫兵造反不利，不能写。我不同意，说不能去掉，造反在大使馆门前搞，不能冲，这是国际惯例，你搞人家，人家也会搞你，这是完全破坏。

所以说，67 年 7、8、9 月是我党、我军、全国革命人民的紧要关头，主席到上海时，我接到一个电话，他们要搞多少万人的示威，整许世友同志，要许世友同志陷害主席，我当晚派文元同志到上海，飞机差点触电。文元到上海后，主席派春桥同志用直升飞机去接许世友同志。他有个怪脾气，但是个好同志，许世友同志当时围困退到了三线，已无路可退。许世友见到主席时感动得流泪。另外他们还整黄永胜、陈锡联、杨得志……一句话，要搞乱我们的军队，搞乱我们的党，搞乱我们的革委会。当时我是部队的文化顾问，谢镗忠他们不理我，林副主席写信也不灵了。他们要抓肖力，捉了一个和她差不多的戴眼镜的，否则这个孩子就完了。”

“后来我发现丢了一箱主席手稿，我没有钥匙，他们把东西都偷光了。小箱子是用剪刀撬开的，里面什么都光了。我采取突然袭击，带现在的秘书，警卫，坐探阎长贵回家，找他们要钥匙，他说这就是对我不利罗。我说：为什么非要

对你有利？他们没有枪的后台，没有肖华、杨成武，他们能搞吗？那天幸亏林副主席去看我，林副主席去看我，林副主席到处找，找不到，急了，一直找到中南海。林副主席问：你怎么样？我说不好了，钥匙不见了，什么都没有了。

68 年 3 月份，就是在提出杨、余、傅之前，傅崇碧带了 4 个干部冲中央文革，是要给我们点颜色看看。我们出去挡了挡，他们一直冲进去，后面的车被 8341 部队挡住了，他们要进去捉人，其中一个人用皮包打我，据说皮包里有 4 支手枪，要打断我的背梁骨啊！文元同志作证，”

姚文元：“很凶恶。”

江青：“凶恶极了。我说你们干什么来了，知道不知道这是中央的所在地，这时对他们的篡党篡政的阴谋已有察觉。”

“傅崇碧还给坏头头发枪，韩爱晶到这里开会，手枪上顶着子弹。同志们你们要了解，这个斗争是很激烈的。到 68 年林副主席下了决心，把杨、余、傅揪了出来，把他们端出来，就是胜利，首先是端出刘少奇、后端出第二套班子，纯洁了党，是伟大胜利，他们是近视眼，以为天下乱，是他们的了，不知道毛主席有几十年的斗争经验，什么样的敌人都见过。他们以揪刘为名，把中南海围个水泄不通，糟了，我们上了一个大当。

在文艺战线上，他们的黑干将是金敬迈、李英儒、于秀、

陆公达、刘巨成、林杰、郑公盾、李广文、赵易亚、唐平铸、胡痴，在开十万人大会时，给贺龙的信是大红纸，上面写着‘光临指导’，给我们的信写的是‘勒令到会’。”“在党内的代表人物，以前是王明，这个反面教员还有美帝、苏修、特务，美英法日特务，比方说李敦白和王光美有联系，王光美是美国战略情报特务。”

中央领导的“124 讲话”震动很大，自此，全国再次掀起了清查“516”的新高潮，涉及到全国各行各业。

## 第1121回：下文件，掀“一打三反”运动
## 说湖北，北京召开公判会

1970年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信访处向周恩来呈送了关于西安等地大兴土木、搞非生产性建筑情况的调查报告。报告中提到，有人因写信反映铺张浪费问题而被指责为“搞非法活动”、“越级上告”、“眼中没有市革委”、“不符合组织原则”等。

1月18日，周恩来批示：将此报告印送中央政治局各成员。他还要求工作人员电话告陕西省革命委员会主任李瑞山，注意纠正打击报复举报人的违反新党章的错误现象。

这一天，周恩来审改了印送中央政治局讨论的关于反对铺张浪费的通知稿，稿中严禁新建、扩建和改建楼堂馆所，已施工的一律暂停，“由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根据当地情况，分别移作他用，然后重定节约施工计划，付之实施”，“十分严重的要给予刑事处分。”

1月30日，周恩来将《关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报送毛泽东、林彪，并提出：“我们几经讨论，认为现在需要发这样一个指示，给在备战动员中一小撮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以打击。”

毛泽东批示：“照办。”

1月31日，中共中央下发中发［1970］3号文件：《关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指示》说：

“苏修正在加紧勾结美帝，阴谋对我发动侵略战争；国内的反革命分子也乘机蠢动，遥相呼应，这是当前阶级斗争中值得注意的新动向。这一小撮反革命分子妄图仰赖帝、修、反的武力，复辟他们失去的天堂，加紧进行破坏活动。有的散布战争恐怖，造谣惑众；有的盗窃国家机密，为敌效劳；有的趁机翻案，不服管制；有的秘密串联，阴谋暴乱；有的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破坏社会主义经济；有的破坏插队、下放，这些人虽然是一小撮，但无恶不做，危害很大。”

《指示》要求：

“一、要放手发动群众。用战备的观点，观察一切，检查一切，落实一切。使群众认清，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是一场激烈的阶级斗争，是打击帝、修、反‘别动队’的斗争，是打击苏修侵略阴谋的斗争，实际上也是一项重要的战备工作。”

“二、要突出重点。打击的重点是现行的反革命分子。”

“三、要严格区分各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分清敌我，区别轻重。”“对那些通敌叛国、阴谋暴乱、刺探军情、盗窃机密、杀人行凶、纵火放毒、反攻倒算、恶毒攻击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和抢劫国家财产、破坏社会治安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必须坚决镇压。”“对于那些气焰嚣张、罪恶累累、民愤极大、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反革命分子，要坚决杀掉。对于那些罪恶虽属严重，但民愤不大者，可分别判以死缓或无期徒刑；罪行较重，必须

判刑者，可判以有期徒刑。对于那些罪行较轻者，可交群众严加管制。”

“四、要大张旗鼓地、广泛深入地做好宣传、动员。杀、判之前要交给群众讨论，‘做到家喻户晓，人人明白’。杀、判时要召开群众大会，公开宣判，立即执行。这样才会人心大快，敌人震慑。但是，杀人不可过多，杀的应是极少数，关的亦不应多，管的是大多数。不论是杀、是关、是管，都要搞得很准，必须罪证确凿，判处得当；都要交给群众批判、斗争，把它斗倒、批臭。只有如此，才能达到群众专政的目的。”

“五、要统一掌握批准权限。按照中央规定杀人由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批准，报中央备案。重要案犯需作紧急处理的，可用电报宣报中央请批。”

“六、要加强领导。必须首长负责，自己动手，具体指导，深入实施。”

“此文件只发到省、军级领导核心，以下各级均由省、军级派人口头传达。本件不再印发；更不许登报、广播、出文件。”

2 月 3 日，周恩来审阅修改了中共中央《关于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指示》稿。

2 月 5 日，中央发出《关于反对铺张浪费的通知》。《通知》重申：

一、严禁新建、扩建和改建楼、堂、馆、所，已施工的要

一律暂停下来，由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根据当地情况，分别移作他用，然后重定节约施工计划，付之实施。

二、任何地方不许兴建高标准的城市建设工程，不许随意拆迁房屋。目前正在施工的，责成省、市、自治区革委会重新审查，酌情处理。

三、一切新建、扩建企业和“五·七”干校，应当发扬艰苦朴素的优良作风，一切非生产性建筑和生活设施必须从简，提倡延安精神。

四、一切机关、部队、团体、学校、企业、事业单位，一律停止添置非生产性设备，必要时由内部调剂解决。确需购置的，地方经省、市、自治区革委会批准，军队经军以上党委批准。严禁用公款购买沙发、地毯、钢丝床、电冰箱等各种高级消费品。

五、严禁用公款请客、送礼、看戏、看电影。不要搞不必要的庆祝活动，更不许借庆祝活动搞铺张浪费。

六、违反上述规定，继续铺张浪费的，给予党纪处分和行政处分，十分严重的要给予刑事处分。

七、要严格遵守财政制度和财经纪律，节约开支。各级财政、银行部门和财务人员，必须坚决执行党和国家的政策，加强财务监督。必须切实实行群众性监督。

当天，中共中央还发出《关于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

指示》。

自此，全国上下展开了轰轰烈烈的“打击反革命”和“反对铺张浪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一打三反运动”。

2 月 6 日春节后，中央湖北学习班临时党委在大礼堂召开批斗“钢工总”汉阳区办事处一号头头、汉阳区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刘万泰，还有“工造总司”头头、武汉市革命委员会常委王锦铭，和“钢九一三”头头、民众乐园抗暴指挥部总指挥张鹏程大会，说他们 3 人是现行反革命，当场逮捕，押送回武汉。

就像1968年成立省、市革命委员会分配席位时，“钢工总”、“钢九一三”、“工造总司”三大组织各摊一个，这次抓反革命，也是三大组织各摊一个。

刘万泰在北京学习班上，顶撞陈伯达，公开反对国棉一厂劳模陈爱娥作为“九大”代表，因为她参加了“百万雄师”；还说那些揭发、承认自己是“516”、“北决扬”的人是无中生有，不要脸；并叫板武汉市革委会主任、15军军长方铭，说“方铭有什么了不起，我们一个人带一个营，可以对搞。”结果被认定是对抗中央清理“516”和“北决扬”运动，散布反军乱军言论。

刘万泰在大会上不低头，上来两个人也按不住，他高喊：“我不是反革命，只要朱、李、吴的大旗一摇，我照样打头阵！”刘万泰的宁死不屈引来一阵阵“打倒现行反革命分子刘万泰”

的口号声。

“工造总司”的王锦铭是因为“工造总司”头头、省革委会常委潘宏斌向学习班揭发，说王锦铭说过“男人当道，女人得势”这句话，学习班领导认为这是把矛头指向江青和叶群，是攻击毛泽东和林彪的现行反革命言行。王锦铭就这样被打成了现行反革命，坐了多年的牢。但也因祸得福，后来反而成了反对林彪、江青的英雄，平反昭雪，回厂上班，最后正常退休，安度晚年。

陈伯达在这次大会上讲话，他说：“‘516’是一个反革命阴谋集团，北京把‘516’一抓，就都跑到武汉去了，武汉成了‘516’的根据地、据点、仓库、保险柜、档案库。武汉的‘北决扬’是‘516’的变种，是武汉的土特产。现在是到了全面清查的时候了。”

陈伯达为什么会这么说呢？原来，武汉市机关“红司”一号头头、市革委会常委魏绳武，曾于1967年2月和吴传启的入党介绍人、原武汉市委宣传部处长宋洛一起到北京见过吴传启，交谈对武汉文革形势的看法。既然吴传启现在成了“516”的头头，那魏绳武不应该交代清楚吗？此时，魏绳武和支持造反派的武汉市电信局局长杨友山被单独隔离，而且，武汉市机关“红司”也就被说成是“反革命阴谋集团516”的仓库、保险柜，钥匙就在柜长魏绳武手里。

1970 年 2 月，毛泽东在武昌时说：“反革命‘516’阴谋集团是一个秘密组织，数量很少，很快就发现了，揭发得早，头子关起来了。不要乱挖，面不要太宽了。批判还是要批的，但不要搞逼、供、信，逼、供、信靠不住。”

毛泽东的这段话，曾思玉直到 1972 年 9 月才让秘书写个纸条交给武汉军区负责清理“516”的“三办”。而在 1972 年 9 月 7 日，中央发出的 33 号文件已经载有毛泽东的这段话了。

1970 年 2 月 11 日，北京市所有机关、学校、工厂企业再次收到了一份《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市公法军事管制委员会通知》：

为了加强对一小撮反革命势力的专政，狠狠打击现行反革命破坏活动，进一步搞好首都革命秩序，最近再公审宣判一批现行反革命分子。现将顾文选等五十五名罪犯的材料发给各单位，请各级革命委员会，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组织革命群众认真讨论，提出处理意见，速告市公法军管会。

此材料只供内部讨论，不准张贴。

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市公法军事管制委员会

1970 年 2 月 11 日

《通知》里提到的顾文选，《通知》里是这样说的：

现行反革命叛国犯顾文选，男，三十六岁，浙江省人，系反革命分子，北京市清河农场劳改就业人员，因反革命罪被判

过刑……顽固坚持反动立场，经常散布反动言论，恶毒攻击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刑满就业后多次策划叛国投敌，于一九六六年七月十九日，偷越国境，叛国投敌，并出卖了我国重要情报，后被引渡回国。

顾文选，原北京大学西方语言系的学生，1957 年“整风运动”时，该系讲师黄继忠召开了一个“控诉会”，由 3 名在 1955 年“肃反”运动中受到批判的同学上台控诉，顾文选是就是其中之一。他在会上说：“这些名义上为人民服务的，又不与人民同甘苦、高高在上的人，却自命为坚定的马列主义者、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他应该在群众有汽车坐了他才坐；群众有呢料的衣服穿了，他才穿；群众住上洋房了，他才住……可是事实上那些人却享受着特权，生活水平远远超过了群众。”“如果你感到没有能力做领导工作，就自动下来，回到群众中来，可以去做工、种田，做不动了人民养你的老，千万别再坐在那里发号施令，贻误国家。”

这个“控诉会”先是在该系的教学楼里开，后又移到学校办公楼召开大会。校党委闻讯前往制止，但遭拒绝。校党委要求至少去掉“控诉”二字，亦不被接受。反右运动一开始，顾文选自然被打成了右派。他跑回杭州家中，还是被抓回北京，判了 5 年徒刑。刑满后留场。顾文选决定叛逃。之前，他去看望也在清河农场留场的黄继忠，对他说：“我可能以后不能经常

来看你了……”

顾文选逃出清河农场后，跑到了苏联，后被引渡回了中国。

《通知》中提到的55名罪犯中还有一位北京大学学生，历史系的，也是右派，名叫沈元。他在北京郊区劳动改造期间写了几篇论文，投给《历史研究》，为近代史研究所所长黎澍赏识，将他调到近代史研究所工作。《通知》是这样说的：

现行反革命叛国犯沈元，男，三十二岁，浙江省人，伪官吏出身，系右派分子，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实习研究员。其母系右派分子，其兄因反革命罪被判过刑。沈犯顽固坚持反动立场，书写大量反动文章，大造反革命舆论，并企图叛国投敌，于一九六八年九月一日，化妆成黑人，闯入了外国驻华使馆，散布大量反动言论，恶毒攻击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诬蔑攻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据说是沈元在文革中被斗得受不了了，买了盒黑鞋油，涂在脸上扮成黑人，跑进了马里大使馆申请政治避难，马里使馆把他交给了中国。

55名罪犯中的张郎郎，1943年出生于延安，是著名美术设计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设计者张仃之子。1962年，还在上中学的张郎郎与几个同样爱好诗歌的年轻人经常聚会，形成了一个文学沙龙，被称之为“太阳纵队”。1963年秋，张郎郎考入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美术理论系，“太阳纵队”及沙龙人员

又有所扩大，其成员大多是出身高干和高级知识分子家庭，他们有着阅读“内参书”的天然渠道。这是北京当时最为活跃的两个文艺沙龙之一。另一个就是郭沫若之子郭世英组建的“X诗社”。这两个沙龙曾被他们自己称作是“中国文艺复兴最初的梦想”。

“太阳纵队”沙龙成员之一“老七”，他的父亲就是当时的文化部代部长肖望东。肖望东和妻子曾找张郎郎谈话，担心他这样下去非常危险。张郎郎很耐心听两位长辈的劝说，心里却觉得他们多虑。张郎郎他们兴致所至，这群疯狂的年轻人竟然把披头士的音乐带到了公共场合。后来在对张郎郎的起诉书里，还有一条罪状是：“在公共场合传播反动音乐。”

文化大革命爆发后，张仃被当作走资派打倒，张郎郎被拉去陪斗。从批斗现场回来之后，张郎郎便为“太阳纵队”的杂志设计了一期封面：两个红色的大字——自由，四面布满黑色的栅栏。

1968年初，北京的大街小巷都张贴了公安局对一个年轻人的通缉传单。传单上的男青年有着浓密的、长长的眉毛和目空一切的神情。他便是张郎郎。

此前，听说郭沫若的儿子郭世英的沙龙“X诗社”成员悉数被捕后，张郎郎“太阳纵队”立刻停止了有形的组织活动，化整为零。张郎郎后来说：“必须说明，那时候我们‘太阳纵

队’不是一个政治组织。秘密写诗，只是怕别人破坏我们的游戏。我们既不是革命，也不是反革命，只是不革命而已。”

张郎郎决定南下杭州。

当时北京高干子弟圈子里很多人都在流传有关江青历史问题的话题。张郎郎逃跑后，大家都以为他已经跑出国了，再追问是谁散布江青历史问题时，众人就说：“是郎郎说的。”于是，传播江青的历史成为张郎郎的又一罪状。

张郎郎

1968 年 6 月 14 日的杭州正是炎炎夏日，“反革命分子”张郎郎在杭州龙井村被抓捕归京，罪名有三条：“恶毒攻击中

央首长”、“里通外国”、“阴谋叛国投敌”。北京市公法军管会的《通知》里是这样介绍张郎郎的：

二十九、现行反革命叛国犯张郎郎，男，二十六岁，辽宁省人，中央美术学院学生。

现行反革命叛国犯周七月，男，二十二岁，河北省人，北京外国语学校学生。

张、周二犯思想反动，对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极为仇视。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张、周二犯散布反动言论，恶毒污蔑诽谤无产阶级司令部，并多次策划叛国投敌。一九六六年二月，张、周二犯与外国驻华使馆人员取得了联系，出卖了我国大量重要军事、政治、经济情报。

周七月是女高音歌唱家王昆的儿子。

1970 年 3 月 5 日，北京市公法军管会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 10 万人“公判大会”。这天，后来成为导演的何群与张郎郎的弟弟相熟，他爬到工人体育馆外的树上听最后的宣判结果，但没有听见张郎郎的名字。他连忙赶到张郎郎家告知。后来听说，是周恩来要求“留下活口”，不知真假。

画家黄永玉后来在《大雅宝胡同甲二号安魂祭》一文中回忆说：“郎郎在文革期间脚镣手铐押到美术学院来批斗，大会几天之后分组讨论枪毙不枪毙他。我难以忍受决定孩子生死的恐怖，我逃到北海(公园)，一进门就遇到王昆，她的孩子周七月

那时也要枪毙。我们默默地点了头，说声‘保重’，擦身而过……”

在这次公判大会上，遇罗克被宣判死刑，立即执行，年仅27岁。死刑判决书上写的是：

遇犯思想反动透顶，自1963年以来，散布大量反动言论，书写数万字的反动信件、诗词和日记，恶毒污蔑诽谤无产阶级司令部，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又书写反动文章十余篇，印发全国各地，大造反革命舆论，还网罗本市和外地的反、坏分子十余人，策划组织反革命集团，并扬言进行阴谋暗杀活动，妄图颠覆我无产阶级专政。遇犯在押期间，反革命气焰仍很嚣张。遇犯罪大恶极，民愤极大。经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市公、法军事管制委员会和最高人民法院批准，判处现行反革命分子遇罗克死刑，立即执行。

在向遇罗克宣布将被处决的消息，并问他最后还有什么话要转达给家人时，他挖苦地说：“我想要一枝牙膏。”

张郎郎与遇罗克同室，他很佩服遇罗克的才学和胆识，问他：“你为一篇《出身论》去死，值得吗？”

遇罗克回答：“值得。”他对张郎郎说：“你过去一直生活优越……对家庭出身问题没有体会。而我几次高考，成绩优异，都没有考上。像我这样的并不是一两个啊。可以说，从我们能奋斗的那天起，就是被社会歧视的。你不了解我们这些人的社会地位和心情。”

遇罗克还说自己跟“516”有关系。

由于违犯狱规和“态度不好”，遇罗克多次被戴上背铐和重铐。

临刑前夜，遇罗克跟死囚牢里的难友们“举办”了一次特殊的“晚会”，各自在单人牢房里，唱起了自己喜爱的歌，有合唱也有独唱，唱了整整一夜，互道珍重，说了许多勉励的话。

虽然当年北京《中学文革报》的成员均受到审查和关押，但是被判死刑的只有遇罗克，很多人说是因为他写的《出身论》，也有人说是因为那颗从长春带回北京的手榴弹。

有中央具体的指示，有首都北京的“样板”示范和带动，声势浩大，规模和范围空前的“一打三反”运动，很快在全国开展起来。

## 第1122回：南京判，上海批斗“孙悟空”

### 孙蓬一，北大又贴大字报

2 月 12 日，南京召开数万人参加的公判大会，处决了查金华等人。江苏省《新华日报》破例于当天出了下午版，报道公判大会实况，同时发表社论《坚决镇压反革命》。没料，此举竟引出著名的南京“213 反革命案件”。

第二天，2 月 13 日早上，在鼓楼、丹凤街一带，发现用报纸上的字剪下粘贴的反革命标语，有六条：

“查金华烈士永垂不朽！”

“我们要真正的马列主义！”

“打倒林彪！”

“打倒江青！”

“无产阶级专政不会太长了！”

“上山下乡好个屁！”

标语出现，轰动南京。查金华曾组织过一个马列主义小组，看来是有人因此为他打抱不平，而且与上山下乡有关。破案工作在全市展开，案发地附近，排查几乎落到每一个人头上，尤其是回城知识青年。两个月后，人民银行新街口支行的倪寒予，在银行为他办的经济问题学习班上，坦白交代了自己女友的哥哥，正在苏北洪泽县人河公社下乡插队的知青陈卓然，和与他一同插队的好友苏小彬，就是“213 反革命案件”的作案人。2 月 12 日晚上，他们用剪刀剪下报纸上

的字，再粘贴在纸上，组成那些标语，当时，倪寒予就在现场。当天夜里，他们沿着鼓楼、百子亭、丹风街，一路张贴，直到苏小彬家附近的香铺营菜场后面烧饼店，贴完最后一张标语。此时已是 2 月 13 日凌晨，他们把浆糊桶、刷子丢到旁边公厕粪坑里就回家了。出发前，倪寒予说他肚子疼，没有与他们同去。

4 月 12 日，陈卓然和苏小彬在知青点被省革委会政法组刑侦局带回南京。4 月 18 日，南京市中山东路体育馆召开批斗陈卓然和苏小彬大会，陈卓然的女朋友王茂雅上台控诉陈卓然的罪行。轮到倪寒予上台揭发时，陈卓然狠狠瞪了他一眼，说："总有一天要跟你算账"。

4 月 28 日，陈卓然在五台山体育场万人公判大会后被处决，同时被处决的还有 11 人。苏小彬判刑 15 年，倪寒予当场释放。

南京大学在清理阶级队伍时揭出来的图书馆三楼阳台墙上国民党党徽案，一直没有结果。"一打三反"运动开始后，又重新拿出来排查。有天晚上，在男生宿舍召开图书馆全馆人员会。工军宣队负责人张连长说：

"经过长时间的仔细排查分析，本案现在有眉目了。我们知道他是谁，之所以没有点他的名，揪出来示众，是为挽救他，给他一个主动坦白的机会。这人就在眼前，坐在大家中间，他已经脸红心跳，变神变色了。"

张连长停下来，向每人脸上审视。

全场死一样的寂静。过一会儿，张连长突然大喝一声："你看什么看？！"

停一下他又说："我知道，你已经很心虚很害怕了，奉劝你，不要再有侥幸心理，党的政策是抗拒从严，坦白从宽，不要错过机会。"

张连长说说停停，停停又说说，煞有介事。

幸亏灯光昏暗，地方小，大家密密地靠坐在一起，互相看不清，也不敢向别人看，都保持着木偶姿势，不随便动。如此这般，最后张连长宣布："为体现无产阶级政策，再给这个反革命分子一次机会，希望他放明白些，赶快向专案组自首。今天夜里专案组 24 小时值班，半夜来交代都可以。"

物理系有 8 位教师住在南京大学"陶园"单身教工宿舍，他们开玩笑自称"陶园八怪"。这时，有人揭出"陶园八怪"是反动集团。于是，将他们 8 人隔离，逼他们交代自己和揭发别人的反动言论。后来，"陶园八怪"又由反动集团升格为叛国集团。因为在 1960 年，同住陶园的教师沈云得了肝炎。沈云的哥哥在加拿大，得知弟弟的情况后，通过外交途径，申请接弟弟去加拿大养病。经过批准，沈云办妥出国手续。同住陶园的物理系教师"陶园八怪"，在大三元酒家为沈云设宴饯行。而到了"一打三反"时，沈云被说成是叛国分子，参加送行宴会的人于是也就成了"叛国集团"了。这

个“叛国集团”的头子，就是当时负责联系大三元酒家，张罗饯行宴的“陶园八怪”之一的物理系老师蔡鲁戈。对他的逼供不断升级，压力越来越重。最后，蔡鲁戈用剪刀自杀未遂，又在住地屋后树林里上吊身亡，终年不到40岁。

在“一打三反”运动中，湖南各级革命委员会，将原保守派骨干作为依靠对象，利用“一打三反”运动，开始对参加过造反的工人、干部、市民进行清查。各单位都成立了“三号”办公室，即“一打三反”运动办公室。湖南省与长沙市的原造反派的头头与骨干人员都受到审查，参加“学习班”长达数月、甚至近一年时间。有少数在武斗中有命案的被枪决，还有相当部分的人被拘捕入狱，很多人从各级革命委员会中清除，大部分人被批斗。造反派工人代表、省革委会副主任胡勇，被隔离在长沙县格塘公社两个月，由专案人员对他一个人办“学习班”，审查他的文革中的活动。

在两个月中，长沙市一连杀了两批。《长沙报》3月5日在报道宣判大会实况和《镇压敌人 保护人民》的社论中，竟用了八个“杀”字：“不杀不足以正国法，不杀不足以平民愤”，“杀出一个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的新世界！”3月17日欲举行第三次宣判大会，拟枪决的名单，也已发至基层讨论。但在大会前一日，突然又宣布取消这次大会。据说，是中央有特别通知，决定取消这次大会。

长沙报

长沙市革命委员会机关报

第五一四号　一九七〇年三月五日　星期四

毛主席语录

坚决地将一切反革命分子鎮压下去，而使我們的革命专政大大地巩固起来，以便将革命进行到底，达到建成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目的。

# 坚决地将一切反革命分子鎮压下去 使我們的革命专政大大地巩固起来

## 长沙市革命委員会召开宣判大会，判处一小批罪大恶极的反革命罪犯死刑，并宣布对認罪較好的罪犯从寬处理

坚决打击现行反革命

市革命委員会召开宣判大会，对一小批罪大恶极的反革命罪犯，依法判处死刑，群众广大革命群众坚决拥护，拍手称快，振臂高呼："坚决镇压现行反革命！""无产阶级专政万岁！"　本报记者摄

## 社论　鎮压敌人　保护人民

1970年，湖南谢若冰在受到一连串的审查后进了工厂，当了一名工人。

“青年近卫军司令”谭海清，因涉嫌一件在武斗中虐杀“俘虏”致死的命案，在省革委会成立前即被拘押。因为对谭海清的领导责任罪名，当时只有个别当事人的证词，并无确切证据。还有若干当事人提出的是谭海清并无责任的证词。所以，此案拖了数年，1974年批林批孔运动中，谭海清

才被保释出狱。

复旦大学又是上海这次运动的重点，此时，炮打张春桥的“孙悟空”头头胡守钧已躲到了外面。

是年春节，胡守钧因长年在外流浪，不知道上海已布下天罗地网，便于大年初三返回上海，与一位同学吃罢晚饭，回到了阔别已久的复旦。谁知刚进校门，就被一群工宣队员抓获，宣布隔离审查。这次，胡守钧被单独关在一间小房里，门窗钉上铁条，看守人员全是三代红出身的工宣队员、军宣队员和学校的文攻武卫队员，他们互相监督，谁也不与胡守钧讲话。

胡守钧落网后，“孙悟空”的其他成员也都被五花大绑地从各地押回复旦。此时的“孙悟空”正式被打成“胡守钧小集团”，在上海作为头号现行反革命，交予全市揭发、批判。

专案人员在胡守钧宿舍，将他从中学起开始写的日记笔记、私人信件和照片悉数抄出审查。胡守钧在大学一年级时的一篇日记，大意是说学习了《马列学习方法》一书，深为导师锲而不舍的学习意志所感动。反省自己的学习缺乏毅力，一事无成。末了他在日记下面画了一把宝剑，右边写下了“宝剑作证人”，注明《马列学习方法》读后有感。这句话，专案人员说是胡守钧“杀气腾腾，欲取伟大领袖毛主席而代之”。胡守钧在黄山天都峰拍了一张照片，背面题了“踏

遍天下奇峰，赏尽人间佳景”，横批是“行万里路”。这便成了他“模仿希特勒、拿破仑，要站在地球仪上，妄图霸占全世界！”的铁证。

一时，讨胡的战报、通令、大字报满天飞。上海市委还印发了20多万份《胡守钧反革命小集团罪行材料》，全上海所有的单位都卷入了这场大批判，各单位组织群众去复旦大学参观批胡展览会，看大字报，学习斗争经验，回去便揪胡守钧式的反革命。当时的上海，胡守钧成了反革命的代名词。

1970年1月27日，北京大学北大哲学系孙蓬一、赵正义、宋一秀、高云鹏、韦全贵等位教员贴出了一份题为《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彻底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大字报，认为北大也有“516”，“而且是‘5•16’的一个重要据点。”

他们提出：“目前，在如何对待‘516’匪团问题上，存在着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这里有一个立场问题，站队问题。”“如果你看不到或不愿意看到‘516’的穷凶极恶的反动本质，那就必然会滑入右倾机会主义的泥坑，当了‘516’的防空洞，起着掩护、包庇‘516’的作用。”

2月6日下午，北京大学工、军宣队负责人迟群在宣传队领导小组、校革委会全体成员会议上讲话说：

“最近有孙蓬一等人写的一张大字报，我们认为这张大

字报不能孤立的来看，……这张大字报涉及到工人阶级，要不要工人阶级，要不要毛主席的这个点。大字报的作者直截了当地告诉宣传队：‘你们已经滑到右倾泥坑中去了’。这是对毛主席的立场问题，态度问题。”“毛主席讲，无论如何要巩固工人阶级领导，这是忠于毛主席。锋芒所指非常清楚，我们不是瞎子。”“大字报还说：‘请那些闭眼的人……还历史的本来面貌’，还什么历史本来面貌？工人阶级 68 年 8 月 19 日进来，8341 部队 69 年 3 月 24 日进校，这都是工人阶级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结果。”“作者提出‘乱敌人树队伍’，就是要大乱一场，重新组织队伍。你要乱谁？重新组织什么队伍？你那个队伍清吗？清出 102 名叛特反，这不是事实吗？”“作者不但在乱群众，要乱工人阶级，乱团结。他到工厂后到处造舆论，北大的原则问题没解决，问题不在下面，在上面，挑拨工人与解放军的矛盾，两个解放军的关系。”“既有 8 个有，又不拿出材料，这是居心何在？这是捍卫毛主席的点，保卫毛主席的成果问题，这是不能允许的，他要来领导，权，我们是不交的。用那些响亮的口号来欺骗群众，是办不到的。”

孙蓬一后来在写给一个叫陈莲的信中，讲述了他“127 大字报”贴出后的一些情况。他在信中写到：

自从一月廿七日贴了一张大字报以后，宣传队开始在表面上保持了一段沉默。二月二日，开了指导员会议统一了思

想，紧接着就分头在骨干中统一思想。说我们的大字报其要害在“夺权”、“反右倾”、“反工人阶级”，是“5•16”嫌疑等等。四日，我所在的小分队，则布置整我，由于我的坚决抵制，使他们几个会都未开成。五日凌晨突然作出决定，把在京分散在各个点上面的所有人员一律撤回。昨天才开了革委会，主要领导全员参加，主题是批判我们的大字报和我。除了反革命的帽子未戴以外，什么帽子都扣上了。说大字报是“反党”，说我是“右派”，连个劝退与吐故的党员都不如，等等。下午则召开了全校大会。迟群在大会上做了长达一个半小时讲话，对我们的大字报逐段批驳。气势汹汹，简直是泰山压顶，只点了我一个人的名字。在会上我公开表示绝不能接受他们强加给我的种种莫须有的罪名。他们不让我发言。在全校大会上，我当众三次要求发言 1～2 分钟，也被无理拒绝。

大会后，则动员全校群众对我们进行围攻。现在一个调子的大字报、大标语已贴了不少。什么“强烈要求开除孙蓬一的党籍”、“撤销孙蓬一的一切职务”、“彻底批判孙蓬一的 1•27 大毒草”、“坚决打掉孙蓬一的反动气焰”等等，好家伙，神经衰弱的人可真会给吓死了！可是，对我们来说，既然扪心自问是为了毛主席、林副主席、周总理、江青同志，为了无产阶级司令部，为了无产阶级专政，为了主席思想，为了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正如您们感人极深的诗句中

所说的："革命何惧苦与死，无私无畏壮志情，朝阳驱散千层雾，万里长征第一程"，这就是我们当下的心情。我们五个同志中，除了一个同志外，没有任何压力之感。我们通过几年来严酷的阶级斗争的摔打，深知，"压力者，纯属自己压自己也"。

很快，北大开始了批判孙蓬一的运动，工宣队也投入了批判。揭发出来的孙蓬一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罪行有：怀疑、反对康老，反张春桥，反对谢富治等等，还有很多攻击社会主义制度的右倾言论。

2 月 9 日，哲学系赴二机床教改小分队的大字报：

孙蓬一到二机床不久，他就经常和一些同学谈外单位抓"5·16"的情况，说这个宣传队犯了方向路线错误，那个学校宣传队做了检查，然后就意味深长地说："北大问题真有意思，颠过来倒过去，翻来覆去的。"

2 月 10 日，政治系赵八路、王玉珍等大字报揭发：

孙蓬一说："谁也管不了我"，说军宣队负责同志"没有什么了不起，脱下军装还不是同我一样。"

孙蓬一到二机床经常外出总不请假，当工人师傅批评他违反组织纪律时，他竟暴跳如雷说："我根本不存在向你们请假不请假的问题"，"有话直说，根本就不是纪律不纪律的问题，就是有人写了一张大字报，你们害怕了。"他还冲着工人师傅、军代表说："我们的大字报贴出去后，有的人

笑了，有的人跳了，有的人心虚了。”当军代表批评他时，他马上对军代表说：“你不就是个军人吗？我也当过兵，我就是不穿军衣的军人，你没有什么了不起。”

2 月 14 日，又有人揭发孙蓬一吹捧杨献珍，搞合二为一，反对毛泽东思想的罪行。8341 部队的王副政委在对宣传队的讲话中说，孙蓬一是比“516”还“516”，这种思潮不仅在北大，在北京，乃至全国都有，这是一场你死我活的阶级大搏斗。

这天，工宣队师傅找原“新北大公社”的章铎个别谈话，要她揭发孙蓬一的反动言行。可章铎实在想不起来，觉得很为难。当天，她即给原“新北大公社”动态组组长胡宗式写信，说道：“过去我们受孙蓬一蒙蔽，看不清他假左派真右派的实质，现在我们一定要坚定地站在工人阶级一边，与孙蓬一作坚决的斗争。”“你是不是替我想想，孙蓬一过去所干的有哪些坏事，说过哪些反毛泽东思想的话？（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比如反康老，反谢，反张春桥等？）我们过去所处的地位，决定了我们是‘知情人’，揭发不出来，也就等于包庇孙蓬一，这可非同小可。”

因为批判孙蓬一，北京大学的毕业分配也推迟了。

2 月 24 日，北京大学江西试验农场召开揭发、批判孙蓬一反动言行大会，要“揭穿孙蓬一资产阶级右派的真面目”。

陈伯达 1970 年 4 月 3 日到北大讲话，也谈到孙蓬一的

问题，他说：

“‘127’大字报我看了，主要是个权的问题。孙蓬一不是还反对过聂元梓吗？这些人都是争权夺利，对他们搞吴传启你们还是要承认的。吴过去我也不太清楚，他们送了一些材料，还是比较早的么，但是他们为什么不送给谢富治同志，只是给我？这里也就有名堂了。”

宣传队说：“他们搞吴传启，也搞了谢副总理，还有什么‘×××’。”

陈伯达：“可能还有陈伯达。你们还是说他们搞吴传启，都否认了他，他总是不服气。”

## 第1123回：再办班，内蒙古仍不安定
## 订计划，筹备开四届人大

就在国内大查“516”，开展“一打三反运动”的高潮中，华沙，中美会谈也在进行。

1970 年 2 月 10 日，中国驻波兰临时代办雷阳同美国驻波兰大使斯托塞尔在美国使馆举行第 136 次大使级会谈。会谈中，雷阳再次强调应首先解决两国关系中的根本问题即台湾问题，并进一步表示：“如果美国政府愿意派部长级的代表或美国总统的特使到北京进一步探讨中美关系中的根本问题，中国政府愿予接待。”

雷阳的发言稿经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和周恩来亲笔修改。在政治局会议讨论修改外交部给雷阳电稿和参加第 136 次中美会谈中方发言稿时，根据周恩来提议，将中方发言稿中“如果美国政府愿意派部长级的代表或美国总统的特使到北京进一步探讨中美关系中的根本原则问题，中国政府愿予考虑”中的“考虑”二字改为“接待”。

会后，周恩来又在改处加旁注：“接待两字是我提议改的。因我方在 135 次会议发言中，已经提到考虑和可以通过其他途径进行，而美方在上次谈话已提到来北京直接讨论并且顺着这段话，最后还用考虑也显得太轻了，故改为接待较欢迎为轻，较考虑就落实了一些。”

当天，周恩来将讨论结果报毛泽东、林彪。

毛泽东批示："照办。"

此时，内蒙古已实行军管。1970 年 1 月 8 日，内蒙古革委会核心小组向"前指"呈交了一份《关于整顿内蒙古革委会办事机关的建议》，要求"自治区革委会办事机构除留少数人外，其余人员调出内蒙古地区举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

"前指"当即批复了《建议》。

从 1 月 10 日开始，自治区革委会领导成员、区直机关大部分干部和群众组织头头共计 7769 人送到唐山，参加中央在这里办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各盟、市干部 3337 人，也分别送到河北省柴沟堡和山西省阳高等地参加学习班。自治区革委会、核心小组和各盟市革委会的工作，实际上由"前指"和各军"领导班子"取代。在学习班里，继续开展"革命大批判"和"清理阶段队伍"、"一打三反""整党建党"等运动。陈伯达也为内蒙学习班规定了"五不准"：不准串连、不准打电话、不准通信、不准会客接待亲友、不准私自出入。

内蒙古革委会核心小组退出了历史舞台。从此，新的权力机构——"前指"发指示、下命令，草原的每个角落都能够感觉到"前指"的存在。军管一个月后，"前指"将内蒙古军区团职以上干部，向河北、山西、天津和陕西汉中地区各调走 100 名。其中既有"内人党"案的受害者，也有"挖肃"积极分子。

对于全自治区瞩目的“内人党”一案，郑维山的态度是，按照中央精神，内蒙古平反工作犯了“一风吹”的扩大化错误，并以“前指”党的领导小组名义，宣布内蒙古革委会为落实政策颁发的第165号、186号、189号三个文件停止执行。刚刚启动的“内人党”案的平反落实政策工作停下来了，误伤受害者的抚恤、医疗、生活困难补助等项工作也都停顿下来。一些重点人，又再次抓回去继续审查。

1月20日，内蒙古学习班正式开学，军委办事组组长、总参谋长黄永胜兼管学习班事务。

学习班自1970年1月开办，到1971年5月结束，历时一年零四个月。这期间，中央领导人曾两次接见内蒙古学员，一次是1970年3月3日，一次是1970年6月6日。

3月3日，人民大会堂安徽厅。晚7时，参加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的周恩来、康生、江青、黄永胜、吴法宪、谢富治、叶群、邱会作、张春桥、姚文元、李先念等人，接见了内蒙古小班学员。

接见时，周恩来一一点名。接着，他耐心、解释中央办学习班的用意，指出内蒙古地处北疆，必须保持团结和稳定。他旧话重提，问滕海清：

“1969年国庆节前，我让郑维山同志给你转信，你接到了吗？”

滕海清说：“接到了。”

周恩来提高了嗓音："接到了还这样做？挖'内人党'挖到蒙古包里，这不是和中央唱对台戏吗？！"周恩来感慨地说："你真是情况不明，决心很大。"

滕海清低头检讨："我有罪。"

康生疾言厉色地说："滕海清，站起来！"

滕海清垂手恭立，康生说："你把北疆、把少数民族地区搞乱了，我'九大'时怎么跟你交待的？！"

滕海清一直站了一个多小时，被康生说得唏嘘啜泣，周恩来几次让他坐下他都没敢坐下。

接着，周恩来又批评高锦明，在平反工作中没有全力支持滕海清。周恩来说："你态度不明朗，应该明朗。"又批评权星垣"没有原则性。"

康生说："你们'522'后把内蒙搞乱了，一风吹了，所以才实行军管。军管革委会，军管一切。"他随口问："呼和浩特平反了多少人？"

呼市革委会主任高增贵起立回答："3000 多。"

康生追问："平反有何根据？"

高增贵答："平反的都是'内人党'，打的时候也没有根据。国民党、特务、叛徒一个也没平反。"

当话题转到李质身上时，康生又问李质："什么时候入的党？谁介绍的？是什么人？"

李质一一回答。康生又说："你入的什么党，国民党还

是共产党？入党介绍人是叛徒。”

黄永胜等人也对李质提出质问。结果，内蒙古学习班结束后，核心小组成员中，只有李质被留下，继续审查。

接见会快结束时，周恩来再次申明：对内蒙古实行军管是不得已而为之，同时号召大家“在批判乌兰夫的立场上团结起来”。

自从 1967 年初以来，内蒙古局势总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周恩来以及康生等人接见内蒙古各方面人员已达数十次之多，这在全国各省、市、自治区中是绝无仅有的。因此，在 3 月 3 日的接见会上，康生发感慨说：“关于内蒙古问题，我和总理说的最多，可以编一本书了。”

1970 年 2 月 15 日至 3 月 21 日，国务院召开全国计划会议，制订 1970 年国民经济计划，并着手研究第四个五年计划。

会议拟定了《第四个五年计划纲要（草案)》。会议提出的 1970 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准备报请中共九届二中全会批准。

1970 年的计划，根据要抓紧“两个拳头”（即农业和国防）的指导思想，提出五项任务：首先要加快内地战略后方的建设；第二是大力发展农业，加快农业现代化的进程；三是积极发展地方“五小”工业（小钢铁、小机械、小化肥、小煤窑、小水泥），尽快做到县县有农机修造厂；第四，着

手进行建立经济协作区的试点工作；第五，搞好企业下放，争取年内完成。

这次全国计划会议和1970年计划：

第一、会议根据战备需要，把全国划为十个协作区（西南、西北、中原、华南、华东、华北、东北、山东、闽赣、新疆），各自建立适应独立作战的工业体系，做到“自己武装自己”。从而要求把管理经济、管理企业的权力和财政、物权、投资权等，更多地下放给地方，这就是1970年计划中的第五项任务。1970年，全面展开了一场企业大下放的运动。

第二、加速内地和战备后方（即三线）建设。这是继1965年三线建设第一个高潮之后的又一个高潮。1970年国家预算内基本建设投资的完成额中，内地建设为197.98亿元，占投资总额的67.1%，其中三线建设投资为163.13亿元，占投资总额的55.3%。

第三、《第四个五年计划纲要（草案)》根据毛泽东关于经过四个五年计划“可以有3500万到4000万吨钢”的设想，确定1975年钢要达到3500万吨至4000万吨，比1970年增长106%—135%，生产能力要达到4000万吨以上。与之相适应，规定1975年粮食要达到3亿吨至3.25亿吨，煤要达到4亿吨至4.3亿吨。电力、轻工等部门先后提出1975年产量翻一番的高指标。燃料工业部也提出“大干三年，扭转北煤

南运”的口号，要求到1972年江南九省实现煤炭基本自给。其他各行各业也都酝酿着要大上、要翻一番。

第四、1970年计划安排的国家预算内基本建设投资228亿元，比上年实际增长47%，执行中又一再突破，全年共追加投资50亿元左右。国家预算内投资实际完成255.2亿元，比上年增长53.3%，加上地方自筹资金，全年基本建设投资实际完成总额达294.99亿元，比上年猛增109.34亿元。全年施工的大中型项目有1409个，比原计划1113个多296个，全部建成投产只有235个，投产率只达16.7%。由于基建规模骤然扩大，积累率也就急剧上升，由上年的23.2%提高到32.9%，造成人力、物力的紧张。

中共九大之后，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召开人代会，要准备政府工作报告和修改宪法报告。据汪东兴后来回忆：1970年3月初，在武汉的毛泽东收到周恩来的信和附来的一份宪法修改草案提要。周恩来在信中谈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提出，宪法中原有国家主席一节，是不是还写上？

看了周恩来的信，3月7日，毛泽东在武昌提出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对修改宪法的意见，他对汪东兴说：“国家体制可以改变，不要设主席、副主席，就由人大常委负责人代表。”他让汪东兴回北京传达这个意见。

第二天，3月8日，汪东兴自武汉来京，向周恩来传达

了毛泽东关于召开四届人大、修改宪法和不设国家主席的意见。周恩来说："你向政治局的同志们传达一下吧。"

当天晚上，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召集中央政治局全体会议，听取毛泽东的指示。汪东兴在会上传达说："毛主席提出政治局研究一下，文革时间长了，要考虑恢复政府机构，准备召开四届人大。一是通过人大总结文化大革命以来的经验；二是成立和恢复各级政府；三是要研究发展经济和战备问题。主要是这三点意见。"

他还传达说，毛泽东指示，关于宪法问题，要政治局研究成立修改宪法的起草小组。另外，还要准备起草"政府工作报告"、"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和"战备工作报告"，这几件事要立即着手做。

最后，汪东兴说："毛主席说：'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要不要设国家主席，我的意见是不设，《宪法》中也不要国家主席这一条了，我也不担任国家主席。''如果大家认为要设的话，那么由谁来当这个国家主席？我毛泽东是不当了。如果要设国家主席的话，也只有林彪同志来当。'"

汪东兴传达完毛泽东的意见，大家一致表示拥护。周恩来说："照毛主席的意见办，我们开始进行修改宪法的工作。"

会议商定立即着手进行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

（一）成立由周恩来、张春桥、黄永胜、谢富治、汪东兴组成的工作小组，负责四届人大代表名额和选举工作，并

约各省、市、自治区负责人面商；

（二）成立由康生、张春桥、吴法宪、李作鹏、纪登奎组成的工作小组，负责修改宪法工作。先将修改要点写出，至四月八日完成修改工作；

（三）由周恩来、姚文元主持起草政府工作报告稿，集中讲当前政策和计划问题等。

会议委托叶群向在苏州休养的林彪转达毛泽东的意见，报告政治局会议讨论的情况。

会后，汪东兴要叶群尽快把毛泽东的意见传达给林彪，并请叶群、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一起到他家里坐一坐。他们一行从中南海的新华门进去，一直来到靠水边的小楼，那里是汪东兴的家。他们下了车，在客厅里闲谈了一会儿，话题就转到设国家主席的问题上，汪东兴对他们说：

“毛主席曾经说过，‘要设国家主席的话，只有林彪同志才能当。’”

大家听了都很高兴，认为这是毛泽东对林彪的特别信任。汪东兴也很兴奋。“九大”以后，他同林彪走的很近，究其原因，还是因为江青。

一次，江青要求调走毛泽东身边的一个工作人员，由于毛泽东没有明确表态，汪东兴不敢擅自做主。于是，江青便骂汪东兴，李纳也在一边帮腔。汪东兴实在没有办法了，就跑到林彪那里，把这个情况告诉了林彪。林彪要汪东兴直接

报告毛泽东和江青，就说："是林彪说的，毛主席用什么人，谁也不能干预，完全由毛主席自己决定，江青不能干预毛主席的生活问题。"汪东兴把这些话告诉了毛泽东，老人家很高兴。从此，汪东兴有了难事，就经常来找林彪帮忙。

此时，汪东兴对军委办事组的人说："主席对林副主席是绝对信任的；对党内的高级干部讨厌中央文革一伙人老人家很清楚，他对张春桥欣赏但不信任。"他还说："主席对江青是又厌烦又无奈，当成政治上的包袱，生活上的累赘，想甩，一时又甩不掉，厌烦得连见她的面都不肯。"

那天晚上，汪东兴很高兴，一定要请大家吃饭。吃什么呢？是红薯。3 月份，红薯已经很少了，但是他家里还有保存。大家边吃边谈，一直到深夜才各自回家。

第二天，3 月 9 日，已回到苏州的叶群给黄永胜、吴法宪打电话说："林副主席赞成设国家主席。"

3 月 13 日，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由周恩来草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额和选举的决定》及关于四届人大代表名额分配问题的两个协商方案，周恩来作了说明。会议通过了这个《决定》和两个协商方案。

次日，周恩来致信毛泽东、林彪，报告政治局商议情况。报告说：

"汪东兴回京后，传达主席关于筹备召开四届人大的指

示，政治局在京同志一致拥护，立即着手进行。工作分几个方面：第一，关于四届人大代表名额和选举问题，由恩来、春桥、永胜、富治、东兴五人组成一个工作小组，现已起草好了一个决定稿，十三日晚已在政治局有关会议上讨论通过。九大中委、候补中委当人大代表的不要超过三分之一，九大代表当人大代表的也不要超过三分之一，非党员代表不应少于百分之四十，爱国人士恐不应少于一百人，党内需要安排的如张闻天、王稼祥等，拟从机动名额中出。第二，关于修改宪法工作小组，已由康生、春桥、法宪、作鹏、登奎五人组成，拟在三天后将修改要点写出，准备一个月完成这项工作。第三，关于政府工作报告，拟在各地同志来京协商后，再由文元、恩来组织人动手起草。第四，关于筹备工作，待汪东兴回程时再请他面报。”

当天下午，毛泽东审阅了周恩来关于筹备四届人大等问题的报告，批示：“同意中央的部署。”

随后，林彪也批示：“完全同意主席批示。”

3 月 16 日，中央政治局经过讨论，就修改宪法的指导思想和修改宪法中的一些原则问题，写了《关于修改宪法问题的请示》。第二天，3 月 17 日，周恩来向毛泽东报告关于修改宪法和选举四届人大代表的安排等问题。报告说：

“十六日政治局会议进行了两项工作。第一项讨论和通过了《关于修改宪法问题的请示》及其附件，请主席审阅后

予以批示，以便着手修改。第二项通过各省、市、自治区革委会和各大军区、各总部、各军兵种十七日来京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负责人名单。”

毛泽东当天在这份报告上批示：“同意第一项所提修改问题的意见。同时请各地方提修改意见。附件留阅。”

林彪阅后批示：“完全同意主席批示。”

3 月 17 日至 20 日，周恩来在北京主持召开中共中央工作会议，讨论四届人大的准备工作。出席会议的有各省、市、自治区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和各大军区、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的负责人共 103 人。会议讨论康生、张春桥、吴法宪、李作鹏、纪登奎草拟的《关于修改宪法问题的请示》，协商了四届人大代表名额和选举问题。大多数与会者表示同意毛泽东关于不设国家主席的建议，但是，也有些人仍希望毛泽东重新担任国家主席。

会议期间，周恩来专门委托叶群将有关战备、《宪法》起草、国民经济以及四届人大的安排等向正在苏州养病的林彪通报。 林彪明确表示：“毛主席当国家主席，我不当国家主席，也不当国家副主席。”他让秘书给毛泽东的秘书打电话说：“林副主席建议，毛主席当国家主席。”

毛泽东听后，对秘书说：“问候林彪同志好。”

第1124回：汽车上，得知柬埔寨政变

不屈服，西哈努克要战斗

3 月 19 日，北京机场，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和几乎所有驻京的外交使团，都在这里迎接从苏联莫斯科前来北京的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就在一天前，3 月 18 日下午 13 时，柬埔寨发生政变，那里的国民议会表决通过了废黜西哈努克亲王国家元首的决议。

西哈努克亲王是在 1970 年 1 月 7 日，携夫人莫尼克公主以及宾努亲王等随行人员离开柬埔寨，到法国进行例行的治疗和休养。

3 月 9 日，在柬埔寨柴桢市和该省的“鹦鹉嘴”地区的五六个小城镇里发生了反越游行示威。3 月 11 日，柬埔寨首都金边开始了类似的示威游行。参加者主要是那些反西哈努克的大中学生，他们闯入了越南民主共和国和越南南方临时共和政府的大使馆，大肆抢劫和破坏，捣毁了办公室，焚毁了汽车和家具。

在法国的西哈努克收到有关这些事件的报告后，断定是时任柬埔寨王家武装部队总司令兼总参谋长、内阁首相兼国防和新闻大臣朗诺和他弟弟朗农上校唆使部分军人蓄意制造的。之后，他向柬埔寨哥沙曼王后发了一封电报，谴责这一暴行，并表示要立即回国，让柬埔寨人民做出选择。如果人民支持朗诺，他就辞职。

很快，王后回电报告知：“你别回来了，朗诺已经用那些突击队中的假柬埔寨人取代了王家卫队，他们将会害你。”

西哈努克改变了立即返回金边的决定，继续他原订计划的旅行：从莫斯科经北京到河内，他要寻求社会主义国家对他的支持。

3 月 13 日早晨，巴黎仍是春寒料峭。西哈努克及其随行飞往莫斯科，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波德戈尔内在机场迎接了他。因为不是正式的国事访问，只举行了简单的欢迎仪式。

苏联领导人对金边的局势已了如指掌。他们很担心朗诺集团的反越浪潮继续发展，特别担心柬埔寨落入美国人之手，那样就会改变整个印度支那战争的形势。他们清楚地知道，西哈努克这种带有亲共色彩的中立立场的重要性。他们希望西哈努克尽快回国以控制局势。因此，就在欢迎仪式之后，波德戈尔内就对亲王说，他们已准备了一架飞机等着把他直接送回金边，希望他第二天就能动身，于明天早上飞往金边。波德戈尔内对西哈努克说：“您直接飞回柬埔寨去掌管国家事务，不要让它落入朗诺和施里玛达的手中。您必须采取措施，不让柬埔寨逐步陷入被美国人接管的局面。您必须阻止朗诺和施里玛达给正在为自己的祖国的解放而进行英勇斗争的越南南方人民制造各种困难。”

然而西哈努克却并不那么紧张匆忙。他要实现他来

莫斯科的意图，希望社会主义国家给予他更大的支持和援助，甚至建议苏联派一支像美国最初在南越的军援顾问组那样的小型军援代表团，到金边考察军事需要情况，并为柬埔寨培训武装人员。西哈努克告诉波德戈尔内，他将按照原定计划访问莫斯科，然后访问中国。

经过谈判，苏联同意提供西哈努克所需的一切援助。但苏联方面要求西哈努克“必须防止朗诺和施里玛达从背后捅民族解放阵线一刀。如果他们竟敢这样干，我们永远不会饶恕他们。……您给了民族解放阵线以宝贵的支持。您已经发挥了光辉的作用，我们将来也指望着您。”西哈努克保证一定支持越南民族解放阵线和他们的独立斗争，决不动摇。

这期间，西哈努克也收到周恩来发给他的一封电报。中国对金边的形势也极为关注，尤其是亲王的态度。

得到了苏联的援助和许诺之后，西哈努克给母亲沙曼王后发了一个电报，其目的是要母后警告那些胆大妄为的人。他特别强调了柯西金的一段话：“您的越南盟友是不会健忘的。正如他们永远不会忘记您在他们斗争非常艰苦时给予他们的支持一样，他们在适当的时候也不会忘记你们的极右派在他们反对美帝的斗争的更加艰苦、更加具有决定意义的时刻对他们的恶毒打击。如果右派继续对我们的盟友进行这些打击，这就不可避免地意味着柬埔寨和越南之间的战争。”

沙曼王后收到电报后，立即召见首相朗诺和副首相施里玛达，传达了苏联的警告，并要求他们停止反越暴行。但朗诺和施里玛达置之不理，决定继续按他们的计划行动。

3 月 16 日至 17 日，柬埔寨首相朗诺，命令陆军和卫队逮捕了西哈努克的 20 余名亲信文官和军官，封锁了金边机场。

3 月 18 日，柬埔寨国民议会和王国议会于上午 9 时召开联席会议，研究怎样宣布国家正面临着危险以及授予政府最高权力的问题。这时，议会被坦克包围，全副武装的士兵冲进会议厅。下午 13 时，国民议会在恐怖要挟下，表决通过了废黜西哈努克亲王的决议，选举郑兴为国家元首，实际上建立了朗诺—施里玛达军事政权。这是柬埔寨右派集团在美国策动和支持下发动的政变。美国的目的，是为了通过在柬埔寨建立亲美政权，摧毁柬越边境地区的“越共庇护所”，实现其从西部包抄越南南方人民武装，以改变其在越南南方的被动局面。

金边政变的次日，朗诺就批准美军出动庞大的 B-52 机群，“地毯式”轰炸柬埔寨东部的“胡志明小道”，朗诺军队对境内的南越民族解放阵线游击队发动长达两小时的进攻。

就在柬埔寨发生政变的当天，西哈努克结束了对莫斯科的访问，于 18 日下午离开莫斯科，在驶往莫斯科机场的汽

车上，送行的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对西哈努克说：

“你们的国民议会举行了一次剥夺您的权力的表决。这是什么意思？”

西哈努克立即意识到他担心的事终于发生了。

“这是什么意思？这意味着我已被废黜了！”西哈努克毫无表情地答道。

“您打算怎么办呢？”

“我当然要进行反击。”

柯西金表示将继续支持他，但怀疑中国是否会采取同样的立场。

西哈努克对柯西金说：“我将继续前往北京，取得我的老朋友周恩来对我的支持。然后我将返回莫斯科。”

“不管您怎么干，您都可以指望我们支持您。”柯西金回答道。

到了机场后，西哈努克召集随行人员，宣布了他的决定：考虑成立一个政府来组织抵抗运动。

在飞往北京的飞机上，西哈努克开始筹划他的抵抗运动。他同宾努亲王及其他随行人员一起开会研究，最后一致决定呼吁柬埔寨全体人民开展抵抗斗争。

飞机在西伯利亚的万米高空飞行，西哈努克在飞机上奋笔疾书，写就了《告高棉同胞书》。

当专机在北京机场停稳后，西哈努克走出了机门，第一

眼就看到了周恩来正等候在舷梯旁。考虑周密、外交经验丰富的周恩来似乎早已觉察到了这位被“抛弃”、被废黜的西哈努克渴求支持的迫切心情，因此他邀请了几乎所有驻京的外交使团到机场来迎接西哈努克。

西哈努克看到这样阵容庞大的欢迎场面，万分激动。

周恩来大步跨向前去，和西哈努克紧紧拥抱，说：“您仍然是国家元首，而且是柬埔寨的唯一国家元首，我们决不承认别人。我们将通过新华社和中国报纸发表前来欢迎您的每一个大使和代办的名字，以此强调您仍被承认为柬埔寨的国家元首。”

那天到机场欢迎的共有 41 个国家的代表，几乎所有的在京使节都到了。

简短的欢迎仪式之后，西哈努克亲王和周恩来同乘一辆汽车前往钓鱼台国宾馆。

“亲王陛下，昨天我和毛主席讨论了局势。我只有一个问题：您准备进行战斗吗？”周恩来平静地问。

“我准备进行战斗，而且战斗到底。”

“那么我们就全力支持您。”周恩来显得格外坚定。他接着说：“不过您在精神上要有充分准备，在获得必然的最后胜利之前，这条道路将会是漫长而艰苦的，而且您在途中还会遇到挫折。”

“我知道我的想法也就是所有高棉爱国人士的想法。他

们将同我站在一起，并肩作战，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傀儡。”西哈努克充满着自信。

西哈努克到达北京的第二天，越南总理范文同即来到北京与他会面。一见面，俩人就紧紧拥抱。范文同对西哈努克说：“我们从此是战友了。我们对您参加到我们反美斗争的阵营里来感到骄傲。”

“我们能够帮点什么？”范文同平静了一下，把对话转入实质性内容。

“军事教员，我们不缺人力，而且中国人已经答应提供武器。我们缺乏有训练的干部，打我们将要打的那种战争。你们有世界上最优秀的有训练的干部。”西哈努克坦率地讲了他目前最大的需要。

“我会告诉武元甲派几千名最优秀的干部给你们。”范文同十分慷慨地满足了西哈努克的要求。

西哈努克提出，越南、老挝、柬埔寨这印度支那三国可以联合抗美斗争，范文同极为赞同。之后，他们详细讨论了协调印度支那三国人民斗争的最好方式，由此产生了召开印度支那三国四方最高级会议的想法。“三国四方”即越南、老挝、柬埔寨这三个国家，加上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共四个方面。

3 月 23 日，西哈努克通过北京的电台，向全世界和他国内的同胞发布了《告高棉同胞书》和一个郑重声明。他宣布

解散非法违宪的朗诺政权。他呼吁“建立一个民族团结政府。在柬埔寨的形势恢复正常以前，我们要成立一个协商会议。它的成员将包括一切爱国、进步并且具有反帝倾向的佛教僧侣、军队、警察、省防军、青年、知识分子、农民、工人及其他依靠自己的劳力生活的人、工业家、商人、政府职员和妇女的代表。”

从此，北京电台成了西哈努克战斗的喉舌，北京则成了他活动的国际舞台的中心。西哈努克的形象频频出现在中国的新闻记录片中，为全中国人民所熟悉。

3 月 24 日，亲王又写信给各国政府，呼吁它们支持他的民族解放斗争，拒绝承认金边的朗诺政权。

西哈努克的《告高棉同胞书》发表后，在柬埔寨国内迅速引起强烈反响。柬埔寨境内的各收听站收听和录制了通过北京向河内广播的亲王的呼吁，然后又在国内广泛传播。最初人民对朗诺的政变几乎没有什么反应，因为他们不知道该做何反应？当他们听到了西哈努克的《告高棉同胞书》后，立即发动了示威、反抗和起义。在磅湛市，全城各个角落都是示威者。他们在汽车上张贴“西哈努克万岁”的标语，向司机散发亲王的照片。由 50 辆卡车和轿车组成的车队，满载着示威者向金边进发。他们要求解散国民议会，恢复西哈努克亲王国家元首的职位。有两个国会议员奉命向群众解释驱逐西哈努克的理由，却被愤怒的群众打死，从而导致警察

向群众开枪，结果引起更大规模的反抗。朗诺的兄弟朗厄在磅湛省一个橡胶园遭袭击，被碎尸万段。在茶胶和贡布两地，也发生了类似的反抗和暴力事件。

就在西哈努克发布《告高棉同胞书》的 24 小时内，曾被西哈努克追杀，于 1967 年逃入丛林，加入柬埔寨共产党领导核心的三位左翼议员乔森潘、胡荣、符宁，做出了积极的响应。他们不计个人恩怨，积极支持亲王的革命立场和斗争纲领。他们在声明中称："我们毫无保留地支持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 3 月 23 日在北京发表的宣言。我们呼吁我国城乡的全体同胞，不要在美帝国主义和朗诺—施里玛达一伙卖国贼的军警中充当炮灰；不要给他们交税或遵守他们的残暴的法律；忠诚地和紧密地团结在柬埔寨民族统一战线的周围；建立村、乡、县和省级的新的抗战行政机构。"他们还呼吁士兵和公务员支持人民的斗争，参加到抗战中来。在他们的号召下，成千上万的青年和学生进入丛林，参加了抵抗力量。甚至连驻在桔井的第六军区副司令丁乃英少校也加入了游击队。朗诺的政府军迅速瓦解。数以千计的政府军，或者弃甲回乡，或者投奔柬埔寨共产党领导的红色高棉的游击队。

3 月 26 日，越南南方共和临时革命政府发表关于柬埔寨局势的声明，支持西哈努克。

西哈努克不仅需要中国、越南的支持，也需要所有社会

主义国家尤其是苏联的支持和援助。他十分欣赏河内的外交艺术，能在中苏对立中获得双方的支持。他说：“他们的天平秤盘里一头是中国，另一头是苏联，保持秤盘的平衡。现在我们的秤盘里一头是中国，可是另一头却是空秤盘。”

精明的西哈努克抓住在离开莫斯科时柯西金向他做出的非正式保证紧紧不放，他要以这一点为突破口，使苏联兑现它的诺言。

西哈努克到北京后的重要外交活动之一，就是接见苏联代办。在谈话中，他开门见山地提到了他同柯西金在车上的那段谈话，并以激将法的方式提到，中国已经正式表示了对亲王的支持，欢迎苏联根据柯西金所作的非正式保证的大意，发表一项公开声明。

苏联代办似乎面有难色，他说，由于西哈努克现在在中国境内，让中国人首先发表一个公开声明比较好。苏联将会接着这样做。这使西哈努克有些不解。他想，最先发表支持声明是捞取政治资本的好机会，本来想把这个机会让给苏联，然而却遭到了冷遇。

4 月 5 日至 7 日，周恩来访问朝鲜。他在同金日成的讲话以及两国发表的联合公报中，都对西哈努克的《告高棉同胞书》所提到的高棉民族统一战线和西哈努克本人表示了最有力的支持。这时西哈努克再次会见苏联代办，向他指出中国的支持现在已经成为公开的和正式的了，希望他的政府也

发表一个类似的声明。

这位代办居然拿出了新的理由回避亲王的要求："但是支持（柬埔寨）的声明并不是在中国领土上发表的。"

西哈努克立即反驳说："如果柯西金总理在波兰或捷克的领土上发表类似的声明，我也不会反对。"

## 第1125回：下《通知》，抓“五一六”勿扩大
## 游雪涛，上海清查中被抓

1968年秋天，章士钊的女儿、北京外国语学院教师章含之和另外一位教师、她的邻居张幼云一起给毛泽东写信，反映驻校的海军军宣队、工宣队在外国语学院包庇“极左”势力，迫害干部、教师的情况，请求毛主席派人调查外院情况。

章含之所说的“极左势力”是指北京外国语学院的“六一六”组织。这个组织曾参与过反对周恩来的活动。

毛泽东批示了章含之的信,要北京市委解决外国语学院的问题。

一天下午，章含之然被召到校军宣队的大会议室，北京市委书记丁国钰在那里等她。他见章含之进去，很热情地与她握手，并说他来之前以为章含之是个男同志，没想到是位女同志。

丁国钰说，知道章含之给毛主席写了信，他说根据毛主席批示，前来听取章含之的意见。章含之向他大概重复了向毛泽东反映的意见：学校军、工宣队支一派，打一派，保护“极左”势力包括公开在天安门张贴“打倒周恩来”大字报的组织,打击迫害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反对打倒陈毅同志、反对全盘否定十七年成绩的革命干部、教师和群众。

“九大”结束后，章含之和张幼云认为北京外国语学院的情况没有改变，再次上书毛泽东。不但告了海军宣传队，

还告了北京市，说谢富治支持反周恩来的“六一六”。毛泽东再次对她的信批示，说外语学院的问题北京市解决不了，要派 8341 进驻。

汪东兴找吴德去阅看毛泽东对北京市有关北京师范大学的一个报告的批示。据吴德回忆，毛泽东的批示批评北京市，说就是不抓“五一六”，并在北京市报告中提到“有些造反派是坏人，也可能是‘五一六’分子”的旁边批写道：这就好了。

周恩来找谢富治谈话，指示：由李作鹏、谢富治和吴德研究解决外国语学院的问题。他提了三条：一是海军军宣队作检讨；二是市革委会作检讨；三是海军的“支左”人员撤出大部分，留下一小部分，派 8341 部队进驻外国语学院领导斗批改。

考虑到北京外院有人保谢富治，也有人反谢富治，他去不合适。于是确定由吴德、丁国钰、刘绍文一起到外国语学院大会上检讨。以后，江青、谢富治召开北京市革委各部门大会，动员抓“五一六”分子。

1969 年 11 月的一天，谢富治把北航革委会主任韩爱晶叫到他办公室，把腿往沙发上一盘，对韩爱晶说：

“韩爱晶，我找你谈一件事，你找一个地方去劳动吧，离开北京越远越好，不管北京发生什么都不要管。”

韩爱晶说：“好，我抓紧找个地方。”

谢富治说："定下来以后，具体的事你找吴德同志和丁国钰同志安排。"

韩爱晶经过一个多星期，确定去湖南株洲飞机发动机制造厂后，给吴德打了电话告知。接着他来到吴德办公室，由吴德和丁国钰二人一起和他谈话。随后，1969年12月，韩爱晶离开北航去株洲航空发动机厂劳动。

1970年，中央调查部一位干部写信反映驻该部军代表受极左思潮影响。毛泽东于2月9日将此信批转周恩来、康生。2月13日，周恩来将信和批示转告康生、黄永胜等，并写道："该信所说似乎有一点道理。既然主席有了批示，我们必须认真查实，坚决照办。"

2 月 19 日，周恩来将北京市谢富治、温玉成、吴德写的《关于北京外语学院批极左思潮和深挖"五一六"反革命分子不力的报告》转报毛泽东。周恩來在报告上写道："……国务院和文教、学部各单位，也在有步骤地批判极左思潮和右倾动摇，深挖'五一六'反革命份分子，并防止扩大化。"毛泽东圈阅了此件。

在一次接见外交部军代表马文波、韩立业和外交部"大联委"负责人时，周恩来指示他们要作好清查工作，并多次提醒外交部防止清查"516"扩大化。

3 月 5 日，周恩来对国防科委九院下属一个工厂追查反革命组织问题作出指示：一要抓紧，二要注意政策；要"稳、

准、狠”，特别是“准”字，强调：防止“逼、供、信”，肃反发展到追查反革命组织时要慎重，要防止扩大化。

由于对什么是“516”没有明确的标准和界限，把对“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对三支两军的解放军个别人员，对革命委员会稍有怀疑、不满或有不同意见的人，统统打成“516”分子，给清查的领导者以极大的随意性。有些地方或单位的两派组织互相攻击，互指对方为“516”分子。这一运动成为派性斗争的继续，愈演愈烈。有的地方把文革中出现的问题，说成是由于“516”的破坏，把一派群众组织干的错事当作“516”反革命罪行来清查，将一些平日“有问题”的人戴上“516 分子”的帽子。

3 月 23 日晚，一次外事活动后，外交部办公厅翻译室副处长冀朝铸对周恩来说：“翻译室已经有 10 个人交代参加了‘516’。”

周恩来惊讶的反问道：“10 个？那怎么可能呢?我不信。你们是否搞扩大化了。我看你们头脑发热，要泼点凉水了。你们那么大压力，不是也得是。”

事后，周恩来对姬鹏飞、宫达非等外交部领导人说：“小冀说，翻译室一百多人，已有十个人交代参加‘516’。可能扩大化了，外交部可不要扩大化。你引导人家，人家就承认。一百多人有十个‘516’，怎么可能呢?时间又这么短，极左思潮被‘516’利用了。但不等于有极左思潮就是‘516’。

‘516 分子’一定要搞反革命阴谋，推翻无产阶级司令部的，这样才能算是‘516 分子’。”

周恩来叮嘱姬鹏飞给外地外交部的“五七干校”打电报，提醒他们注意。

3 月 27 日，经毛泽东批示，中共中央发出中发〔1970〕20 号文件：《中共中央关于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通知》。《通知》首先指出：

“‘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在反革命两面派肖华、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王力、关锋、戚本禹操纵下，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猖狂进攻，罪大恶极。有些人认为根本不存在‘五一六’反革命集团，对清查‘五一六’极为抵触，甚至为他们翻案，是完全错误的。”

《通知》接着又说：“清查‘五一六’的斗争已经展开，有些单位出现了扩大化的倾向。‘五一六’是一个秘密的反革命阴谋集团，目前有的单位在过去公开的群众组织中也大抓‘五一六’，有的单位七分之一以上的人都被打成‘五一六’分子。这种扩大化的情况、各级党组织、各级革命委员会、各军管会、军代表、各工军宣队的负责同志必须引起特别警惕和注意。揭露‘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重点应当是揭露它的骨干分子和幕后操纵者。”“总之，要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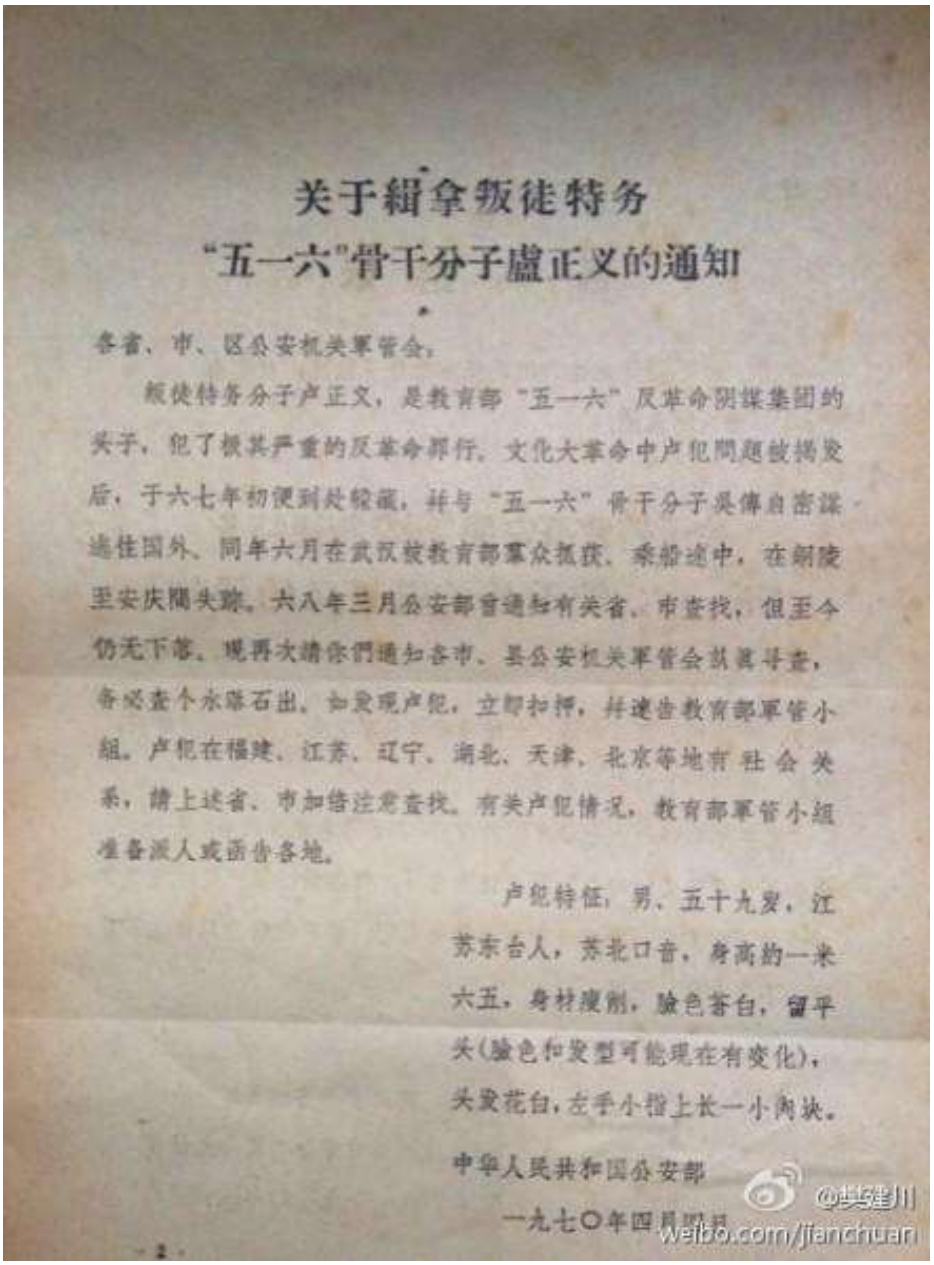
《通知》特别批评“有的单位在清查‘五一六’的斗争

中，搞逼、供、信，甚至采用体罚或变相体罚的手段，这是完全错误的，是违背毛主席一贯教导的，必须坚决制止。”并提醒说：“有的单位任用了一些坏人或者上了坏人的当，这些坏人就故意制造混乱，破坏革命斗争，保护反革命，同志们切记不要上当。”

《通知》最后指出：“在防止清查‘五一六’扩大化的同时，不要放松对其他反革命分子的斗争。国内外阶级敌人同我们的斗争是很复杂的，反革命秘密组织决不是只有一个‘五一六’。应当根据中央历次指示，将这些反革命清理出来，是什么组织就叫什么组织，是什么性质就定什么性质，不要一律叫‘五一六’，好象除了‘五一六’以外就没有别的反革命似的。同时，要防止有人利用清查‘五一六’，挑动资产阶级派性。”

3月31日，周恩来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革命委员会29日关于新疆地区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情况的汇报批示陈伯达、康生：“我意打击罪大恶极、证据确凿的头头要狠，批判反革命叛国集团要严，处理受蒙蔽被胁从的分子、坦白交待分子要宽，否则就有扩大化的危险，应提起他们注意。”

1970年4月4日，公安部发出缉拿教育部“516”分子卢正义的通知。



关于缉拿叛徒特务
"五一六"骨干分子盧正义的通知

各省、市、区公安机关軍管会：

叛徒特务分子卢正义，是教育部"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头子，犯了极其严重的反革命罪行。文化大革命中卢犯問題被揭发后，于六七年初便到处躲藏，并与"五一六"骨干分子吳傳自密謀逃往国外。同年六月在武汉被教育部羣众抓获，乘船途中，在蚌埠至安庆間失踪。六八年三月公安部曾通知有关省、市查找，但至今仍无下落。現再次請你們通知各市、县公安机关軍管会就近寻查，务必查个水落石出。如发現卢犯，立即扣押，并速告教育部軍管小組。卢犯在福建、江苏、辽宁、湖北、天津、北京等地有社会关系，請上述省、市加强注意查找。有关卢犯情况，教育部軍管小組准备派人或函告各地。

卢犯特征：男、五十九岁，江苏东台人，苏北口音，身高約一米六五，身材瘦削，脸色苍白，留平头（脸色和发型可能現在有变化），头发花白，左手小指上长一小肉块。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

一九七〇年四月四日

@吳建川
weibo.com/jianchuan

这是 1970 年 4 月 4 日公安部发出的缉拿卢正义的通知。“文革”后期，据当时航行日志记载，得知他在长江航行时投江身亡。

4 月，周恩来再次针对“一打三反”运动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一打三反’已开展，运动未起来时往往右倾，起来后则易‘左’倾，‘逼、供、信’，乱提口号。”

在揭批“516”的运动中，上海著名的“游雪涛小组”负责人游雪涛也被卷了进去。

上海游雪涛的“二二四小组”，在其两年多的活动期间，共编送了《动态》、《动态增刊》及其他手写的情报有 300 多（期）件。其中，张春桥亲自在上面批过字的就有 54 件。有时张春桥还会就其中的某个问题，另行召见游雪涛，予以询问。

游雪涛的那些《简报》、《动态》之类，只送张春桥、姚文元、徐景贤等极少几个人。有的，则只手抄一份送张春桥。而造反派头头王洪文，却始终被游雪涛排除在送阅情报的人员名单之外，而且王洪文本人及“工总司”还经常成为侦查的对象。对此，王洪文在风闻游雪涛的一些活动后，特别是听说“工总司”高层的一些情况，是被游雪涛小组刺探出去的，更为恼火，欲予追查却又碍于张、姚而不能。

有一天，游雪涛突然来到徐景贤在康平路的三楼办公室，很神秘的对徐景贤说：“前天，春桥问志找我去谈了一次话，听我讲了一下最近的情况，谈到最后，他征求了我对市革会领导的意见。”说到这里，他露出很洋洋自得的神情，继续说道：“春桥同志说，今后他在北京的时间比较多，在上海的时间少了，因此，正在考虑谁来主持上海的工作。他征求我的意见，王洪文和徐景贤两个人，究竟谁比较适合。”

这样重大的事情，张春桥居然会征求游学涛的意见？！

这让徐景贤很吃惊，但又不便表态。

看到徐景贤好像不大相信的样子，游雪涛就有声有色地讲起了当时谈话的细节，他说：

“春桥同志先是坐在椅子，接着站起来，把身体靠在他背后的热水汀上面，向我提出这个问题。”

徐景贤对张春桥办公室很熟悉，他说的环境及对话的情况，不能不让徐景贤相信。

游雪涛继续说：“我当时回答，还是徐景贤比较合适。”

徐景贤似乎明白游雪涛向他透露这一重大信息的含义了。谈话结束后，游雪涛又主动邀请说：“你是不是到我的永福路去看看。”

游雪涛小组重组后，从来没有公开过他的新工作地点。康平路一般人也不知道在什么地方，只有他的电话号码。徐景贤也只是听王承龙讲起过那地方。这次，游雪涛主动把永福路的具体地点和门牌号码告诉了徐景贤。

徐景贤跟游雪涛来到永福路 244 号。这是一幢花园洋房，两层楼，白墙红顶，外面有个很大的花园，有扇很大的木门，院墙上面都带着铁丝网。徐景贤注意到，楼外面没有门牌，游学涛说，是为了保密，把 244 号门牌摘掉了。游雪涛说，这里从前是一个北欧国家驻上海的领事馆。文革后，领事馆撤走了，这房子就腾出来了。

进院后，有一条柏油路、可以开汽车，旁边是冬青树，

还有很高的大雪松。游雪涛说，刘晓任上海市委书记时在这里住过，后来柯庆施也住过。

进了洋房，在一个大饭厅旁边有个小房间，复旦大学“红三司”一位姓谭的学生正坐在桌子旁边写东西，看见游雪涛陪着徐景贤进来，很客气的站起来，和徐景贤握握手。游雪涛向徐景贤做了介绍说，他是很能写文章的笔杆子，一度负责主编过上海《红卫战报》。游雪涛不无得意的在徐景贤耳边小声说道：“这个小谭，还有戏剧学院的小侯，是我最得力的左右手。”

徐景贤明白，只要这两个红卫兵负责人在游雪涛那里，他就可以动用这两个单位红卫兵的力量。这两个人过去徐景贤都认识，他没想到，此时这二人却成了游雪涛的左膀右臂。

洋房的底层，有大餐厅和小餐厅，平时他们就在这里开会。二楼是正屋，游雪涛妻子吴锡敏在那里，里面有办公桌，有床。徐景贤很奇怪，这地方怎么好像是住家呀？他问：“你们把家也搬来了？”

游雪涛笑了，吴锡敏说：“有时候工作忙了，晚上就睡在这里，不回家了。”

徐景贤问：“其他人呢？”因为他进来只看见外面那位姓谭的学生。

游雪涛说：“都去执行任务了，每天都要很晚才回来。”

徐景贤走到阳台上一看，前面有一个很大的花园，有一

个池塘和造型很好的假山，便说：“你这里比我们康平路还幽静嘛，你真是成了‘独立王国’了。”

1968 年 11 月 30 日，游雪涛送了一份材料给张春桥，这是他就“二二四小组”的活动写的《一年工作总结》，游雪涛也打了一份给徐景贤。在《一年工作总结》的前面，游雪涛附了一封写给张春桥的信。信里说：“过去的一年，是自己参加工作 18 年来最幸福的一年。听到您在百忙中还曾问到我的近况，不禁热泪盈眶。”在《一年工作总结》中，游雪涛写道：“一个非正式的工作机构，二十几名没有合法活动身份的‘小小老百姓’，由于是在两派斗争激烈的时候、突然离开战场的，又长期不能透露自己究竟在干什么，引起别人无意的猜疑和有意的诽谤，这一年来，大量的工作是同敌人进行隐蔽的门争，从中央到地方直接间接地摸了不少老虎屁股，一年多来，绝大部分同志始终像战士处于一级战备那样，一天 24 小时，除了睡觉就是工作，什么时候有情况，就什么时候出动。从 1967 年 8 月到 1968 年 9 月，我们在一条特殊的战线上战斗了一年两个月，为无产阶级司令部及其在上海的战斗指挥部提供了大约 100 万字以上的各种情况反映和调查报告，预报了一些重大的政治事件，发现了一批混进革命阵营的反革命两面派……”

张春桥在这份《一年工作总结》上，批了两句话：“已阅，退游雪涛同志。谢谢同志们。”“你们的经验，我还要

想一想。”

游雪涛为搞情报，四处插手，不仅监督“工总司”的动态，还插手上海警备区、南京军区等军队系统。特别是他插手上海公检法系统，为自己惹来了很大的麻烦。

上海公检法军管会是由空 4 军负责。空 4 军政委王维国本来就和王洪文、徐景贤等人面和心不和。他在延安中路仪表局旁边设了一个密点，专门收集各种各样的情况，当然也收集到了“游雪涛小组”活动的材料，特别是游雪涛插手公检法的活动。这一情况让张春桥感到事态很严重。他把徐景贤找去，问“游雪涛小组怎么办？”

徐景贤说：“是不是把他弄到市革会专案办去？”

张春桥表示同意，说：“这样吧，‘游雪涛小组’解散，永福路停止，让游雪涛到市革会专案办去担任领导核心。”

徐景贤将这个决定和游雪涛谈了，游雪涛同意。但他到专案办一段时间后，“游雪涛小组”的一群人还是每天围在他身边，活动频繁。张春桥为此事专门下了一个批示：“游雪涛同志同各方面的联系还是太多，要十分警惕！”

然而，游雪涛似乎不搞特工，不与他的那些有狂热精神的弟兄们来往，他无法活。

无可奈何，张春桥只能采取非常措施。他让徐景贤找游雪涛谈话，要游雪涛离开市革委机关，或去市直机关五七干校，或下放工厂，任选其一。徐景贤意识到这次很难谈，但

没有办法。

1970 年 8 月，徐景贤将游雪涛和他的妻子吴锡敏两人约到康平路小礼堂，对游雪涛说：“春桥同志决定，你从明天起下放劳动。”

闻听此话，游雪涛和吴锡敏都跳了起来……

下放劳动就是撤职，俩人当然非常生气，吴锡敏当场就哭了，他们没想到为无产阶级司令部工作那么久，却落得这样的结果。

徐景贤继续说：“一个是到工厂去劳动，一个是到市直机关五七干校去劳动，两个里面选一个。”“你们回去很好的安排一下，这次是要坚决落实了。”

徐景贤还对游雪涛说：“我曾叫我的秘书张家龙到你家，劝过你两次，叫你不要再搞这么大的活动。他到你家里来，进门之前从窗子里看到你家灯亮着，有人在你家谈话，等到他一敲门进去了，人不见了。我们不是特务，也不搞情报，他是受我委托来看你的，这种情况是很不正常的，怎么能这这样搞呢？来过两次，劝告你不要再搞这种活动，我是以朋友的名义，关心你，但你们已到了打不散的程度。”

游雪涛说：“哦，还有这种事啊？”

游雪涛毕竟只是一个由浪漫文人自个儿转行、无师自通而从未受到过真正专业训练的特务，却不是一个像戴笠那样守纪律、能以服从上级命令为天职的军人，更缺乏一个政治

家应有的素质。因此，他不仅不能理解张春桥的意图，反而将张春桥对他的举措视为“鸟尽弓藏、兔死狗烹”的打击，极为不满。在徐景贤找他谈话后，他立马给张春桥写了一封信，通过文静转交，信封上写“文静同志转张春桥同志”，由吴锡敏送到文静那里。信上说：“我不理解，为什么把永福路的人置于转过头要枪毙的地步，我好比一头受伤的熊，躲入丛林，舔掉自己身上的血，准备战斗。”

他在信里把牢骚主要发在王洪文、王少庸，王维国、王秀珍等人身上，意思是他被这些人陷害的。张春桥看了这封信，非常生气，说“这是给无产阶级司令部下战书了！”但，一时也没将游雪涛怎么样，只是宣布了将他下放工厂的决定。

可是，不识时务却只有满腹牢骚的游雪涛，自视有功，拒不下去，称病在家。不下去就不下去，养病就养病，也没人催他。游雪涛没有利用这段时间好好反省自己的行为，是在哪儿出了毛病，而惹得张春桥对他做出了这么个决定？而是仍然经常不断地找他那班前特工兄弟来谈话，不断地发牢骚，讲话又常走火，不是同情陈伯达，就是开始说对文革不满的话。而他这些话，又被他手下的一些弟兄传了出去，或揭发出去。这一来，不要说张春桥，就是王洪文、徐景贤等造反派头头们都不能容忍他了。1971 年，经张春桥批准，王洪文派民兵将游雪涛抓了起来，关进市民兵指挥部的监狱

“隔离审查”。负责该案的是市委组织组的金祖敏。张春桥对隔离审查游雪涛有批示：“不要点什么问题，心平气和、讲道理，使他感到不是打击他，而是帮助他弄清问题，大家主动。”项目组根据张春桥批示去查，但能查出什么东西呢，结果把他一直关了 3 年多。直到 1975 年，经王洪文、张春桥、徐景贤等人同意，才将他放了出来，也没有什么结论，只是仍要他下五七干校，发生活费。

1976 年“四人帮”垮台后，游雪涛重新被捕，并被判刑 15 年，而且，前段王洪文关他的那 3 年多，算白关了，不能抵刑期。因此，游雪涛为他的特务生涯，前后便共蹲了 18 年大牢。

## 第1126回：江苏省，南京大学突破口

### 文风来，“江苏没有‘五一六’”

1970年4月起，江苏掀起了声势浩大规模空前的清查“516”运动，在省地市县各级，设立了由军队“支左”人员组成的第二专案办公室，南京称“320办公室”，简称“二办”，由主持省委日常工作的江苏省军区政委、江苏省革命委员会党的核心小组副组长吴大胜负责，统管清查工作，有权拘留、逮捕、关押、审讯“516”涉案人员。

江苏首先将南京大学作为突破口，吴大胜亲自负责，江苏省党的核心组成员、省革委会副主任迟明堂为驻南京大学清队工作队长，要求造出声势，搞出经验，推动全省。

当时，南京大学师生员工基本都在溧阳五七农场。5 月 28 日，学校通知，除中文系和后勤机关人员继续留在溧阳外，其余的返回南京。

大家回到南京，休息了两天后，即集体住在学生宿舍，每天上午、下午、晚学习中央关于清查“516”的通知，20 号文件，展开讨论和揭发。

校园内刷出巨大的标语：

誓与“5.16”反革命阴谋集团血战到底！不获全胜决不收兵！

5.16 不投降就叫它灭亡！

一切可以贴大字报的地方，都贴满大字报。内容全部是

揭发学校“红四联”，即“红总派”主要头头的罪行，说他们就是“5.16”阴谋集团的头子或骨干。

不到一个月，出现了几个跳楼、触电“自绝于人民”、对抗运动的反动分子。于是从二楼开始，凡住着审查对象的房间，窗户都钉上木条。

为了防止跳楼、自杀的事件发生，每个被斗的对象配备两名专案人员或积极分子紧跟着。每个楼道的进出口，派两个人日夜值班，监视住在楼里的人。

住在第8学生宿舍的是马列主义教研室、体育教研室、图书馆的教职员工，他们组成为一个连队，简称“马体图”。6月中旬的一天早饭前，工军宣队通知他们在饭厅前集合，宣布说：“大家注意，每人都要提高阶级斗争觉悟，擦亮眼睛，积极投入揪‘5.16’的战斗。我们的仗有得打呢。实话告诉你们，马体图里的‘5.16’不是一小撮，而是一大批。我今天先点一个不大不小‘5.16’分子的名，这人埋藏得很深，你们不要看他是什么马列主义专家，什么老党员，剥去外皮，他是个货真价实的‘5.16’。他是谁？”

说到这里，领导有意停顿一会，然后，加重语气说：“他的名字叫陈向阳！姓陈的，你不要摆老资格，不要有幻想……”

突然，“嘭”的一声，只见陈向阳重重地倒在了地上，昏厥过去了。

陈向阳是马列主义教研室教师，党员，参加革命 20 来年了。文革初，他是保守派，参加“红四联”后，也基本是个逍遥派。说他是“5.16”，任何人都没有丝毫的心理准备。陈向阳承受不了这泰山压顶的沉重打击，昏倒了。

7 月 1 日上午，外文系教师史兆瑜在第七宿舍四楼跳楼自杀。

史兆瑜是烈士子弟，其父当年与李先念一起革命。牺牲后，他母亲寡居抚孤，千辛万苦将他养大，迎来了新中国的成立。他因是烈士子弟，被派往东德留学。

7 月 2 日，系领导宣布，史兆瑜跳楼自杀，自绝于人民。

当天傍晚，史兆瑜母亲在第七宿舍外捶胸顿足，呼天抢地嚎啕大哭，凄厉惨痛的嚎哭声在南园上空回荡。

7 月 4 日，全系召开声讨史兆瑜大会。史兆瑜的自杀被定性为“现行反革命行为”，因为他选择在 7 月 1 日自杀。

7 月 9 日清晨，外文系陈慧彬跳楼自杀，下午全系开大会，批判陈慧彬自绝人民、畏罪自杀。

从 7 月 1 日至 13 日，南大接连发生 4 起审查对象自杀事件。

南大外文系沈宗美，原为“827”勤务组成员。清查“516”开始后，他以外文系革委会主任的身份领导外文系的清查。4 个多月后，1970 年 9 月 2 日晚，省调查组组长迟明堂把他叫去，冷冷地问：“你有没有问题？”还没等沈宗美反应过

来，迟明堂就以威严的口气宣布："从现在开始，外文系的工作不要做了。明天办你的学习班。"

沈宗美进了"学习班"，因态度顽固，小分队的骨干们便在他的床四周钉上木板条，围成一个严严实实的木笼。与他一起造反的李忠清、夏常乐、曹缦西、张家霖，也都被圈起来。很多单位的专案组，也像走马灯似的换人，昨天还在审查别人，今天就成了被审查的对象。

一天刚吃过午饭，外文系外国文学研究所的曹缦西突然跑到政治系小分队队长蒋广学的家里。她因为在文革中曾跟着沈宗美参加了造反派，这时也被圈起来，让她交待。可是曹缦西连"516 兵团"的名称都不知道，怎么交待呀？无奈之下，她只好求助于自己丈夫戴立泉政治系的同学、曾担任政治系郁慕镛小分队队长、此时在校教育革命组的蒋广学，觉得他肯定了解"516"组织的内幕，希望能给她吐露一些真情，帮她尽快过关。

蒋广学担心学校有人看见他和被审查对象在一起，说不清。所以，俩人一起来到夫子庙，冒着小雨，用伞盖着脸，在湿滑的石板路上，边走边谈。

曹缦西对蒋广学说："老蒋，我现在家里有一个几个月大的孩子，而老戴又在溧阳，我不能天天被围在那个地方呀。我交代完之后，这个事情不就算了嘛。"

蒋广学知道曹缦西出身不好，不想让她再背上"516"

的包袱。但是，又不能明确地让她不交待，担心让人抓住把柄。于是，反复跟她说：

“你有没有参加？参加了就能记得它的名字。如果一时记不起来，好好想，如果想不起来，千万不要瞎猜，也不能去瞎讲啊。”

虽然蒋广学绕着弯子，用各种方式来暗示曹缦西不能交待，但是，嗷嗷待哺的孩子不能让曹缦西拖下去，不知是谁告诉了她“516”的全称，最后她还是交待了。

而外文系的李忠清，被逼的直接跳楼自杀，未遂，但是断了一条腿，终生残疾。

外文系的张家霖则被逼得神经错乱，在办案人员的一再逼迫、暗示下，到最后产生幻觉，不仅觉得自己参加了“516”，而且在别人的诱导下，还说自己直接参加了一个阴谋刺杀毛泽东的组织，这个组织的首脑竟是外文系造反队头头沈宗美，其活动听从省革委会副主任、省委书记吴大胜直接指挥，准备在毛主席来南京接见和检阅群众时，乘机刺杀他老人家。

其实，吴大胜指挥江苏“516”不是张家霖第一个交待的，在此之前已有多人相继交待了。但是，唯有张家霖的交待最为翔实、具体。

几乎所有被圈起来要求交代“516”问题的人都遇到了外文系曹缦西的情况。

一天，一份标题为《如果小分队长也是“5.16”怎么办？》

的大字报，引起图书馆正在接受审查的吴老师注意。小分队是专门负责审查“516”的，小分队的分队长怎么是“516”呢？根据大字报的描述，这个小分队的分队长应该是体育教研室的言老师。

晚饭后，图书馆吴老师突然听到敲门声。开门一看，来者正是体育教研室的小分队的分队长言老师。吴老师堵住门问他：

“有什么事？”

言老师推开吴老师，强行进屋后又返身关上门，神色紧张、结结巴巴、慌不择言地对吴老师说：

“请你无论如何要救救我、帮帮我，求求你了。”

吴老师懵了，莫名其妙的呆立在那里。突然，言老师双膝跪下，哀求她说：

“我给你跪下了，求你救救我，告诉我‘516’组织的名称。我被点名了，不得了了，性命难保，你一定要救我，告诉我啊！”

吴老师木然站着，她和言老师都是在“马体图”连队，深知言老师在审查“516”中表现积极，所以从心里不同情他，同时感到非常意外：“他怎么来问我？”只能冷冷地说：“我又不是‘516’，怎么知道‘516’的名称，拿什么告诉你？”

言老师睁大眼睛，很惊奇的问道：“什么？你不是

‘516’？”

“当然！不是！”吴老师斩钉截铁地回答。

言老师愣住了，口中喃喃地说：“原来是这样，原来是这样。”他满脸尴尬，匆匆转身走了。

经过数月的战斗，学校终于得到了几个关键人物的口供。

数学系革委会副主任、原“红四联”核心成员徐福培，交待自己由全国“516”的总头目之一的吴传启亲自发展，回南大后，接受文凤来、张建山直接指挥，掌管南大“516”的组织工作，发展了一批“516”骨干分子等。

“红四联”的勤务组成员之一王继志则是在小分队的轮番逼迫、神情恍惚的情况下，被学校革委会主任王勇、副主任王良才拿着手拷威胁说：“你的上级和同伙都交待了，如果再不交待，就送你到‘老虎桥’。”于是，也承认自己是“516”了。

地质系教师，原“827”驻京联络处主任潘恩沛，交待出他与首都“516”核心成员、北京五大学生领袖之一的王大宾关系密切，由全国“516”总头目吴传启等人发展，尔后领旨在南京大学发展“516”。

生物系女学生朱念周，“827”最早的成员之一，曾是“红四联”驻京办事处的，组织过批谭（震林）联络站。调查组进驻南京大学后宣布的第一份“516”名单中的五个人之一。关押后态度顽固，拒不交代，自然受了不少皮肉之苦。9 月

5 日，她终于在全校“宽严大会”上坦白交代了，说自己是被“学部”，即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的吴传启拉下水的。她是江苏“516”元老，南北联络员。她在威逼下还交代说，她组织的批谭（震林）联络站就是一个“516”组织。还说自己是“516”的元老、种子，并供出一串“516”。

还有人在小分队的逼迫和诱导下，画出了“516”的“联络图”。这张“联络图”，几乎囊括了南京大学原“红四联”所有的积极分子和支持“红四联”的干部，他们或被说成是“516”分子，或被说成是 “516”的幕后策划者。“红四联”的组织部长，则被说成南京大学“516”的组织部长。她说：“首长一次又一次找我谈话，反复耐心给我‘三个大讲’，并且严肃地多次指出：‘你的罪行是客观存在的，组织上早已是掌握得清清楚楚的，凭你的罪行，看你的态度，坐牢杀头哪样都够得上，无产阶级专政早就可以法律制裁你了，但现在所以不这样做，还是为了挽救你……’”

她说的首长，是省调查组副组长、南京军区军事法院院长、省革委会政法组组长赵洪。这样重要身份的人，讲这样严厉的话，朱念周怎能不胆战心惊？

得到这口供后，省、校领导便非常兴奋、非常自信的认为：南京大学“516”是由“红四联”的核心成员为领袖，以此骨干成员为彼骨干成员，上由王关戚的线人吴传启直接发展与指挥，下深入到“揪军内一小撮”反军活动的积极分

子，即组织结构非常完整的现行反革命组织。于是，大张旗鼓地乘胜追击。

政治系逻辑学教师郁慕镛在 1967 年 7、8 月份“揪军内一小撮”的时候，参与组织了“紧跟战斗队”，所以，学校在“一打三反”排查现行反革命活动时，不少事情已经指向了他，但是还未组成清查他的小分队。5 月底，政治系的教师从溧阳集中搬进南京大学南园十栋一楼后，工宣队就把郁慕镛作为“516”的怀疑对象圈起来，还组织了专门小分队对其展开政治攻势。

郁慕镛的记性确实是好，在要求他交代问题时，他几乎把 67 年江苏“1.26 夺权”后，每一天他的行踪都排列出来，特别是对大家感兴趣的 67 年 6、7、8、9 几个月的活动排得清清楚楚，然而就是没有他参加“516”的一项。

政治系郁慕镛小分队队长蒋广学去找他岳父的朋友，校革委会主任王勇，问郁慕镛是不是“516”？

王勇略加思索地回答说，郁慕镛在“516”的名册上。于是，蒋广学以小分队队长的身份明确地向郁慕镛宣布：

“郁慕镛，你一定要丢掉一切幻想，你的‘516’问题是铁板钉钉，必须老实交待，特别不要把我们几个月来的耐心当作驴肝肺。现在你的上级、同伙早都交待了，名册在案，就等你的态度。”

郁慕镛显得比较紧张，说：“蒋广学同志，我不是不想

交待，我天天排来排去，除了‘紧跟战斗队’，我排不出参加了其他名称的组织。”

“我再强调一遍，你的上级，你的同伙已经交待了，我们等待的时间够长的了。”

“让我再想想吧。” 郁慕镛说这话的时候，甚至要流出泪来。

郁慕镛仍没有交代。小分队又找郁慕镛的新婚妻子前来劝说丈夫。谁知第二天一大早，正当蒋广学他们等待郁慕镛交待的好消息时，他突然伸着被绳索勒红了的脖子来找小分队说：

“昨夜，在你们睡觉的时候我去上吊了”

蒋广学的第一反应是“绝不可能”，然后逼着郁慕镛到上吊的地方查证一番。

郁慕镛有些惊慌，而他越是惊慌小分队越是觉得他是在撒慌。

无奈的郁慕镛领着大家来到走廊中间的洗脸间，指着洗脸间靠近窗口的墙角上的下水道弯头，说是在那里上的吊。

蒋广学觉得那里怎么能上吊呢？于是声嘶力竭地命令郁慕镛演示一遍。郁慕镛只好一边用手比划着，一边解释说：上吊的时候，把自己的腰带绕在下水管道的弯头上，系了一个活扣，把头放进扣里。由于扣子高过了头颈，就拿了一个方凳站上去。当把脖子套进扣子里，方凳倒下那一刻，他全

身猛地向墙角倾斜，结果又反弹到地上。最后，他指着离墙角一米多远的地方，那里真的有他摔下来的痕迹。

听完了郁慕镛的解释后，蒋广学突然意识到刚才让郁慕镛重演一遍自杀的过程，对一个刚刚从死里逃生的人是多么残酷。他开始害怕起来："如果郁慕镛真的死了，我怎么好意思安心地活下去？"但此时，他还是大声地威吓郁慕镛说：

"你这是自绝人民，罪上加罪！"

南大原保卫科科长陈霖被关押后，7 个多月没攻下来。11 月 3 日，迟明堂指示陈霖小分队："陈霖是一个很狡猾的反革命，我们的任务就是要把他搞得缴械投降。要打到他自己要交代的地步，要用斗争方法把他斗垮。"随后，小分队接连批斗陈霖数十次，经常从晚上斗到第二天早晨。一次曾连续斗三个通宵。陈霖终于"缴械"了，交代了 "十分重要"的问题，供出省调查组组长迟明堂就是"516"。袁服武、康炳成也说迟明堂是"516"。吴大胜有规定，三个人交代你是"516"，就可以定案。很快，迟明堂也被作为"516"审查，后被关进监狱。

南京大学召开了揭批文风来的全校大会。参加大会的人多达几万，大部分是外单位来的。在大会临近开始时，忽然听说有人从"文革楼"跳下。死者名金鈺英，南京紫金山天文台青年女职工。那天，她被押进南大后，乘人不备，突然跑上"文革楼"跳楼自杀。

文凤来是被绑着双臂由两位穿军装的年轻人押上台的。昔日的同伴和战友、今日反戈一击的葛忠龙在台上激昂慷慨，揭发他在何时何地与葛忠龙、曾邦元、张建山一起加入了“516”，他们又发展了多少、多少成员，虽然表面上分为两派，但相竞发动了一起起的反军活动。讲的有鼻子有眼。

接着，又有一人上台揭发文凤来。但文凤来这条东北汉子没有一点恐惧，说：“我反对许司令是错误的，该受什么惩罚我都接受，我有罪，我认罪。但是，我不是‘516’！我和‘红总’其他头头与北京‘516’没有任何关系，南大没有‘516’！江苏没有‘516’！”

这铿锵有力的声音，引来的是台下“打倒文凤来”的口号声，声震屋瓦。

文凤来没有屈服，在雷暴暂歇之际，对葛忠龙说：“葛忠龙，你这样无中生有、胡说八道，把我们的这些同志搞成这样，有的会家破人亡，你对得起谁？”

因为“气焰嚣张”，文风来当场被用手铐铐了起来。

散会的时候，有人低声的说：“乖乖，这家伙厉害。”

从 1970 年 4 月上旬开始，到 1970 年 8 月，南京大学经过 4 个多月的清查深挖，关押“516”分子 108 人，点名的“516”分子 248 人，挂上“大名单”的“516”嫌疑分子 1154 人，共有 1560 人卷入了“516”漩涡。其中有 21 人跳楼、自缢、卧轨自杀身亡。

第1127回：无锡市，许世友传达文件

查黄廉，湖北班批判三人

1970年的初春，许世友来到无锡，在大箕山召开有两派群众代表参加的市革委会议，传达《中共中央关于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通知》。

许世友说：“深挖‘5.16’反革命，要挖地三尺，一个不留，你们（指无锡六派）当初（指67年夏天）去抄我的家。现在我欢迎你们再去……”

在清查“516”的运动中，无锡市将1967年发生的几次针对27军的游行、静坐等事件都作为“516”的重大案件，如：

1967年2月16日、17日发生的反对27军以“反动组织”的罪名取缔“毛泽东思想红艺兵”、“无线电厂1022兵团”等群众组织的请愿大游行。1970年下半年，此事定为“216、217反革命大游行”，并把这件事的参与者、组织者作为“516反革命阴谋集团”的清查对象。

1967年4月《红无锡报》社绝食静坐事件，当时军管会已经承认错误，此时，又把这件事作为“516反革命阴谋集团”的清查对象。

1967年5月，因为争夺原市委书记韦永义为首的12位常委的批斗审查权而爆发的全市大规模武斗，被说成是在“516”策划下，以保“旧市委走资派”、反解放军为目的的“反革

命武装暴乱”。

1967年6月发生的土制“装甲汽车”参加武斗，驾驶失控后撞树起火的事件，此时也被说成了是在“516”策划下的“反革命武装暴乱”。

1967年7月3日，“革派联总”撤出无锡，跑到南京、上海向江苏省军管会和中央告急的行动，这次被定性为“在516阴谋操纵下，故意撤出以嫁祸解放军，趁机反军乱军陷害解放军。”

1967年7月发生的洛社镇武斗，此时被定性为“516反革命集团为了乱军篡权的全国阴谋部署中的重点，血洗无锡进而夺取全苏南，以洛社为攻击出发点。”。

另外，1968年5月，无锡上千人出逃躲避，集聚徐州和鲁南等地的事情也被定为“516集团组织流亡政府，破坏革命新秩序，企图让旧市委死不悔改的走资派韦（永义）江（坚）吴（镇）杨（增）重新上台复辟资本主义。”

围绕这些事件追查过程中，发生许多严刑逼供的事情，一些人自杀身亡。

中央湖北学习班在刘万泰、王锦铭、张鹏程被逮捕后，各个连队就掀起了狠抓“北决扬”、“516”份子的高潮。

水院一位同学在“送卫戍区”的恐吓、逼迫下，于 3 月 28 日承认自己和丁家显是中央文革办事组的张根成在 1967 年 8 月介绍签名加入“516”的。4 月初他又交代说，他和

丁家显把水院闯派学习班的名单交给魏绳武了，于是水院闯派学习班就集体加入了“516”，责任由他和丁家显负。

水院的学员们作梦也没有想到会集体参加“516”。随即，水院在北京学习班的学员被隔离审问，被告知：“其他人都承认参加了‘516’，唯独你不承认，再顽抗到底就是死路一条。”

很多人感到很冤枉，也很绝望，觉得别人都承认了，自己一个人不承认也没有办法。想一死了之，又怕说是直接对抗党中央，怕打成反革命，怕送卫戍区，怕这一辈子完了……于是，又有人承认了水院闯派学习班是“516”组织，还承认自己是水院“516”的“组织部长”。就这样，水院更多同学受到牵连、审查、批斗、关进五不准学习班、被打成“516”分子和“北决扬”分子。

学习班发动群众猛揭猛批杨道远、胡厚民。

终于有一天，武汉水利电力学院学生、《二八声明》起草者雷志茂上台发言说，杨道远发展他成为“516”成员。

武汉水院参加北京学习班的张建成当时在湖北班材料组整理杨道远的材料，他回忆：

“我在材料组的主要任务是了解、熟悉、整理杨道远的材料，不管哪个连、哪个人，凡是揭发、批判杨道远的材料，我都要了解。后来王步青副参谋长告诉我，党委决定让我做批判杨道远的系统发言，所以要了解、熟悉杨道远的所有材

料。”

张昭剑给张建成系统揭批杨道远的发言定了基调：“杨道远是湖北‘北决扬’、‘516’的总负责，他通过两条线与王、关、戚联系，一条是魏绳武——宋洛——吴传启——王、关、戚，另一条线是‘二司’驻京联络站——林杰——王、关、戚；杨道远的理论基础是‘二论’，即‘阶级斗争演戏论’、‘路线斗争循环论’。结论是：必须对杨道远揭深揭透，批倒批臭，肃清流毒，把湖北的‘北决扬’、‘516’两个反革命组织彻底清除。”

张建成做了长达两个小时的批判发言，他在回忆录中写道：“领导很满意，后来把我的发言录音在湖北全省播放，通过我的口，告诉人们杨道远是湖北‘北决扬’、‘516’的总负责人，他参加文革的目的是要反党、反社会主义，而且证据充分。”

虽然上台揭批胡厚民的人多得数不清，但批判揭发都没有分量。这时，胡厚民的上级兼战友、“钢工总”一号头头朱鸿霞又抛出了一个重磅炸弹。他在全体学员大会上揭批了胡厚民的反动思想，总结为三句话：“隐蔽精干，保存骨干，长期干。”湖北班立刻将这“三干”宣布为武汉五一六、北决扬及胡厚民的“反革命纲领和策略”，立为批判的靶子。

胡厚民非但不作任何辩解，反而就汤下面，把朱鸿霞总结的“长期干”改成“二十年后大干”。有一次，军代表组

织大家到小组会上去揭批胡厚民，胡厚民非但不检讨，反而借交待为名，大谈为什么要“二十年后大干”。他说：“二十年后，老红军不多了，抗日干部掌权的也不多了。那时造反派已是久经考验的真正掌握了毛泽东思想锐利武器的战士，将是战无不胜的！”军代表指责他边交待边放毒，胡厚民照说不误，直到军代表不准他讲话。

电信局的汤玉莲作为武汉造反派的女代表，参加过中国妇女代表团访问阿尔巴尼亚。为了整胡厚民，学习班要汤玉莲承认她与胡厚民有不正当男女关系。在学习班搞“车轮战”，日夜不让休息，点着大灯泡照她的眼睛，最后她被逼跳楼自杀。

武钢工人陈祖坤是不认错的人中的一个，他在学习班里始终坚持“反复旧”没有错，一再声称希望就这个问题，还有文革是否搞错了，和武钢当权派辩论。经过几次较量，没有人再让他承认错误。以后除了湖北班的大会，他们连基本就不开会了。因为连里一开会，陈祖坤就和大家辩论，没人再惹他了。

朱鸿霞、杨道远、吴焱金等在学习班大会上检讨的录音，雷志茂等承认加入“516”的录音，也在湖北各地同时举办的学习班上播放。

与造反派不同，经过文化大革命的老干部很有经验，如武汉市统计局长崔放鸣，他一点也不紧张，字斟句酌地写好

三张纸的检查交待，除了给自己扣大帽子外，一点实际内容也没有。每次都是念完三张纸就开始接受批判，无论别人怎么样批判，他总是虚心接受，然后下次还是这三张纸照念不误。后来军代表恼火了，把他那三张纸收走。但他对检查交代的内容早已背得滚瓜烂熟，又一字不差地再写三张。9个月的时间他就是这样念下去，软磨硬抗，军代表到最后也没能把他怎么样。

原武汉市副市长薛朴若，在这9个月里，始终一句话不说，一个字也不写，任凭你如何批判，他始终像菩萨一样端坐不动。军代表有次组织大家去打薛朴若的态度，他依然是半闭着眼端坐不动，像和尚坐禅一样。个别人为表现自己，不但大声吼叫，而且拳头几乎要挥到他的脸上，他也纹丝不动。有人吼道：

“你为什么打瞌睡？”

只见他并不睁眼，轻声说：

“听着呢！”

这是在半天的批判中，人们听到的唯一的三个字。薛朴若就这样硬顶9个月，居然也平安无事。

但那些造反派头头的态度就不一样了，他们认真的做检查，态度诚恳。

1970 年 3 月 16 日，谢富治说：“‘北、决、扬’与‘三钢’挂钩是不行的，一联系就不得了。”

4 月 6 日，纪登奎说：“七百多人的一个工厂，有 155 个‘决派’，这样的材料要打个问号，搞上四、五百人，你们骑在老虎上。”

曾思玉的回答是：“我骑在水牛上，愿意上就上，愿意下来就下来。”

5 月底，北京学习班结束。在张昭剑主持的总结大会上，武汉军区副参谋长王步青宣布：“经伯达同志批准，黄总长签署，决定将胡厚民、任爱生、李想玉押回湖北继续批斗，彭勋送农场劳动改造，魏绳武实行专案审查”。

吴炎金、彭勋等在大会发言。

陈伯达在纪登奎陪同下到会，还讲了话。陈伯达一开始就说：“清华大学有人贴大字报，说我是窃国大盗，你们看我像窃国大盗吗？清华要把这个人抓起来，我要清华不要抓。”

纪登奎说：“伯达同志是不能反的，反了就要抓起来。”

陈伯达在讲话时还点了支持“钢派”的任爱生和支持造反派的人民银行武汉分行科长、闻一多的侄子闻立清的名。

陈伯达先说任爱生：“你造反有野心，想当大官。”

任爱生站起来反驳陈伯达：“我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支持造反派，出于公心。你不要以势压人，乱扣帽子，我不怕你。”

任爱生和陈伯达互相大声喊叫，只是，陈伯达的福建话

和任爱生的山西“鸟叫”谁也听不懂。

陈伯达又问闻立清：“‘士可杀不可辱’，这话是你讲的吗？”

闻立清挺直腰板，昂首直视陈伯达:“是我说的，么样？”

陈伯达提高嗓门:“我要杀你的头。”

闻立清说:“你敢!”

张昭剑插话：“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

纪登奎马上解释说 ：“伯达同志说的要杀头，是指要杀你反动思想的头。”

1970年5月30日，在北京的湖北省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上，胡厚民、杨道远被定性为湖北省“516”总头目。

6 月 6 日至 13 日，湖北省革委会第二次扩大会议召开，主题是按照陈伯达、黄永胜的指示，批判胡厚民、任爱生、李想玉，包括刚回汉的北京学习班全体人员在内的 3000 多人参加，300 多万人收听会议实况。刘丰首先作报告，他说：

“胡、任、李本来就不是好人，不是好人犯错误。胡厚民是‘北、决、扬’的幕后操纵者，任爱生是地地道道的死不悔改的走资派，李想玉是混入群众组织的坏头头，在文革中坐车到他老家为地主父亲翻案。他们勾结叛徒、特务和一小撮牛鬼蛇神大刮妖风，对文化大革命进行破坏，湖北两次反复的根子都在这里，干了大量的坏事。我们多次挽救，他们拒不接受，在这次贯彻‘927’指示时也挽救，在北京学

习班态度也不好。任爱生在北京还准备告状，现在不把他们交给群众批斗不足以平民愤。”

会上安排 48 人发言，其中武汉市电信局“工总”头头刘闯揭发说：胡厚民是“五一六在汉的前台指挥”，1967 年 1 月至 3 月指使电信局的和其姐胡秀娟组织“516 兵团”，在电信局发展组织；“‘720’后指使胡秀娟发展了我。”“胡厚民还是‘北决扬’的主要幕后操纵者，‘北斗星学会’成立胡是点了头的，‘决派’的名字是胡取的，《扬子江评论》的文章是胡修改的，胡想什么‘扬评’就评什么，‘扬评’什么时候出也由胡决定。”

这次会议宣布撤销胡厚民、任爱生、李想玉在省市革委会的职务。会后 3 人被关押。

1970 年，周恩来指示，要重庆的黄廉和周家喻到工厂里去与工人打成一片。市革委会征求他们两人的意见，周家喻说，他还是回原来分配的单位红光厂，黄廉也说回原单位。被结合进市革委会的原重庆市副市长岳林对黄廉说：“你回木材公司还是当干部搞宣教，等于没有下放，要真正摸到机器，出产品。”

最后，革委会按照周恩来的指示精神，把他们两个都下放到长安厂三车间。

4 月 30 日晚上，重庆市总工会开庆祝五一劳动节的文艺晚会，市领导只有黄廉和周家喻参加。演出结束后，工作人

员通知他们两人坐一辆车子回市委。到了那里，鲁大东、13军政治部主任陈占楼和丁长河3人已经在那里等他们。陈占楼先说："黄副主任、周常委，中央有个通知，为了提高思想觉悟，进一步克服派性，是不是就请你们从明天开始就进学习班，学习班就办在你们本单位。"

第二天，黄廉的伏尔加换成华沙车，将他送回木材公司。迎接他的是工厂的书记和保卫科长，他们说前两天刚刚听说，他们还没有准备好，就在礼堂的地下室将就，为了黄廉的安全，他们安排3个人陪他一起学习。

黄廉学完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和《哥达纲领批判》之后，13军政治部主任陈占楼对他说："你学了这六本书，提高了觉悟，现在转入下一个阶段，主要是交代在北京怎么与'516'联系，下面又发展了谁。"

黄廉对陈占楼说："你们这个搞法是非常错误的，我的副主任是毛主席定的，你只是军队支左干部，在革委会办事组负责，关了我3个月不让出门，还要搞四不准，不准会客、不准写信打电话，不让家属探视，连饭也不让吃饱。"

陈占楼说："现在是我们军队管这个事情，'516'有国际背景，还与拉美的游击队和格瓦拉有了关系。"

旁边的人也劝黄廉好好说话。黄廉说："你们懂什么，他是我的下级。"

陈占楼说："从今天起明确，生活上丝毫不要克扣他，

他自己出钱买饭菜票，但是要问题弄清楚了才能回市革委会。”

黄廉问陈占楼：“你告诉我‘516’有什么破坏性？”

陈占楼说：“是反对毛主席反对林副主席的。”

黄廉又问：“反不反周总理？”

陈占楼说：“凡是中央领导都反嘛。”

就这样，黄廉被要求交代他与北京“516”的关系。

有一天，黄廉翻窗户进入储运科，给新华社拨电话找谢文欣，谢文欣不在，接电话的人问他是谁，有什么事？

黄廉说：“我是黄廉，已经被人扣在地下室快半年了，是偷跑出来打的电话。”

这下子可不得了，13 军的领导，市委的处长，公安局的人，都来了，询问是怎么回事？

黄廉说：“打个电话有什么不得了？”

他们说问题大了，训斥那些看守的人，说他们无用，说从此之后要加强看守，吃饭上厕所都要跟着。

有一天，外头一个挑泔水的人，趁人不注意，丢给黄廉一个字条，上面只有几句话，说：“中央出了大问题，你要保重身体。”那个人说：“这是外面两个干部模样的人叫我摔给你的，我认不到他们。”

9 月底，木材公司开批判大会，批判黄廉“516 分子”的问题。黄廉要求在大会上发言，他说：

“你们说的那些东西都不是事实，我来跟你们讲一讲‘516’，北京最开始是有个‘516兵团’，是从‘联动’演化过来的，他们反对周总理和中央文革。你们这么多的科级以上干部和党员，毛主席说凡事要问一个为什么？我来了有半年多，走进门来就被关起，这一次清查‘516’完全是人身迫害，是慢性谋杀，你们连这点觉悟都没有？我料定你们的书记和局长，也不清楚现在形势的本质，这是一次对文化大革命的新反扑。”

黄廉等人的“516”问题一直持续到批林批孔运动前才算告一段落。重庆市委又给他们安排了工作，黄廉和周家喻又回到市委落实政策办公室。

第1128回：“火上烤”，谈“不设国家主席”

在广州，开“三国四方会议”

4月3日，毛泽东审阅修改周恩来、陈伯达、康生4月1日报送的为纪念列宁诞辰一百周年写的文章：《列宁主义和苏修社会帝国主义》。他把文章题目改为《列宁主义，还是社会帝国主义？》，并批示：

“此文写得较好，已看过，另一篇待看。用这一篇似乎就够了，可用两报一刊的名义。关于我的话，删掉了几段，都是些无用的，引起别人反感的东西。不要写这类话，我曾讲过一百次，可是没有人听，不知是何道理，请中央各同志研究一下。有用的话，不至于引起反感的话，保留了几段，并未全删。以上请酌。”

毛泽东删掉的那些话，有“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主席”，“毛泽东同志……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毛泽东同志就是当代的列宁”等等，几乎全是林彪提出来颂扬毛泽东的原话。

4 月 4 日，陈伯达致信周恩来、康生，提出毛泽东批评的缺点方面，主要应由他负责，并建议在中央范围内先开一次会，学习研究毛泽东批示。周恩来批告：先将毛泽东批示、修改件在政治局范围内传阅。

4 月 11 日，毛泽东从武汉到达长沙。当晚，与湖南的华

国锋和广州军区政治部主任卜占亚谈话，汪东兴在场。

在华国锋汇报了湖南省委一些干部当时的情况后，毛泽东说：湖南省委比较起来还是不错的，好人还是大多数，张平化也还是好人，他现在湖北。他还说：胡继宗这个人干劲还是大的，他就是不太注意调查研究，不愿意深入下去，现在甘肃实际上就是他在哪里主持工作。毛泽东继续说：还有李瑞山，现在在陕西工作。公检法也不能说都是坏人，也要一分为二。像张平化这样的人叫他做点工作能通过吗？还有像谭启龙这样的人都要给点工作的。过去群众不谅解，现在准备叫张平化、谭启龙他们做人大代表。

在卜占亚汇报到解放军支左情况时，毛泽东说：还是三结合好，一个是解放军，一个是干部，一个是群众的代表。要互相学习。还是要地方和军队结合起来，实行一元化领导。

这天夜里 23 时 30 分，正在苏州的林彪让秘书于运深打电话给正在长沙的毛主席的秘书，转达他的三条建议：

一、关于这次“人大”国家主席的问题，林彪同志仍然建议由毛主席兼任。这样做对党内、党外、国内、国外人民的心理状态适合。否则，不适合人民的心理状态。

二、关于副主席问题，林彪同志认为可设可不设，可多设可少设，关系都不大。

三、林彪同志认为，他自己不宜担任副主席的职务。

这个电话记录于运深在传给毛泽东机要秘书徐业夫的

同时，也传给了中央政治局和北京毛家湾的林彪办公室。

次日，4 月 12 日，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林彪 11 日晚的电话意见，大多数与会政治局成员同意由毛泽东担任国家主席。

会后，周恩来将政治局会议情况给毛泽东写了请示报告。

当天，正在苏州的林彪秘书于运深，接到长沙毛泽东机要秘书高碧岑打来的电话，说他已向毛泽东汇报了 11 日晚于运深打来的电话记录，“主席听后笑了，说：设国家主席，谁来当主席呢？反正我是不能再当了。你不当，我不当，那就让董老来当吧！再找两个年轻人当副主席，纪登奎和汪东兴。”

于运深将高碧岑的电话一字不差地记了下来，报告叶群。但此时林彪正在生叶群的气，说“一听女人的声音就头痛”，宣布一星期不见叶群。这时，林彪规定不见叶群的期限还没到，她只好让于运深自己去向林彪报告。林彪听了于运深的传达后，相当重视，让于运深把电话记录抄两份存档。

这天，4 月 12 日，毛泽东在周恩来送来的当天政治局讨论林彪电话意见的报告上作了文字批示：“我不能再做此事，此议不妥。”

稍后，中共中央办公室印发出两份不同的修宪方案，一份列有“国家主席”一章，一份则没有“国家主席”这一章。

4 月 13 日上午，毛泽东在长沙与黎原、华国锋、卜占亚谈话。当天下午，离开长沙，于 14 日到达杭州。

4 月 24 日，毛泽东从杭州来到上海。

4 月 25 日，毛泽东乘专列北上，张春桥随他一起到了苏州。正在苏州的林彪前往火车站迎接毛泽东。

因为要接张春桥返回上海，张春桥的秘书何秀文开车从上海来到苏州，在苏州火车站候车室等候张春桥。他从候车室的窗户往月台望去，看见林彪和张春桥从专列上下来。专列开走后，他们二人站在月台上又谈了几句。

当天下午，叶群离开北京回苏州，行前特地向林办秘书们指示：

一、选文件、打电话时都要提醒，言不离主席。

二、首长参加外事活动时，也要提醒。

三、你们要注意礼貌。如，接送主席，他们虽然告诉我们不要去，只要一部车到车站，我和首长还是要去。不要只想一面。他们叫我和首长先走，我们不能走，要等主席的车走了以后，我们才能离开。

第二天，4 月 26 日，林彪、叶群乘飞机离开苏州回到了北京。

4 月 28 日，林彪前往周恩来处，就毛泽东再次表示不设国家主席、不当国家主席的意见，进行讨论。

4 月下旬，毛泽东召开政治局会议。在会上，毛泽东再

次重申他不当国家主席，也不设国家主席的意见。他还引用了三国时期“劝进”的典故说：“孙权劝曹操当皇帝。曹操说，孙权是要把他放在火炉上烤。我劝你们不要把我当曹操，你们也不要做孙权。”

毛泽东谈笑风生，而他的笑声中饱含着寓意深远的讽喻。

4 月 30 日，李德生被中央正式任命为总政治部主任。

为了支持西哈努克的反美斗争，中国将北京东交民巷的那套漂亮宽敞的前法国驻中国大使馆给西哈努克，作为他在北京的官邸。

作为美国盟友的法国，不可能支持西哈努克的反美斗争。但它毕竟是西哈努克所尊敬的国家，因而法国政府采取了两边讨好的做法。法国驻北京大使交给西哈努克亲王一封法国政府的信。信上说，如果亲王隐退到法国，他们将为他提供一座别墅、一辆小汽车和一名司机。亲王谢绝了这番美意，但他内心深处却感到一种隐隐的侮辱。因为他在法国治病时，在街上曾听到了巴黎人带着轻蔑的目光，耻笑被废黜后在巴黎流亡的前越南皇帝保大。而在北京，他听到的是另一种议论。他说，一次他在北京街头散步，有人认出他后，说：“您为我们国家，为亚洲和世界立了大功。您帮助越南的抗战英雄。现在柬埔寨人民参加了这个斗争，而您是他们的领导人。”这番话使亲王感到自豪。北京肯定不如巴黎舒

适和华丽，但北京肯定比巴黎使亲王坦然和从容。因此，他对法国人说，谢谢法国提供的一切，不过，“中国政府刚为我提供了这些东西，而且这些东西只不过是头一部分。第二部分则是对我的事业的支持。因此，我必须接受他们为我提供的包含两部分内容的建议，而拒绝你们的建议。”

4 月 24 日至 25 日，在中国广州举行了印度支那人民最高级会议。参加会议的四方代表有：柬埔寨的西哈努克亲王，老挝的苏发努冯亲王，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的阮友寿，以及越南北方代表范文同，所以通常称这次会议为“三国四方会议”。

会议各方代表邀请西哈努克主持大会的开幕式和闭幕式。这是一种崇高的荣誉。西哈努克在开幕式上十分感动地说：“尽管我们不能像 1965 年那样作为会议的东道主，你们还是邀请我主持这次会议的开幕式和闭幕式。你们的这一邀请，雄辩地证明了越南人民和老挝人民对兄弟的柬埔寨人民的尊重、始终不渝的友谊和坚定不移的支持。在我国历史和国家生活面临着黑暗和痛苦的时刻，你们的这一邀请就更有意义。”

会议就印度支那形势和共同斗争交换了意见，在很多方面达成了共识。最后，会议通过了《联合声明》。《声明》表示：“本着各国的解放和防卫是各国人民自己的事情的原则，各方保证按照有关方面的愿望，在互相尊重的基础上，

尽一切努力，互相支持。”

会议闭幕后，周恩来设宴招待了三国四方代表。他在讲话中说：“7 亿中国人民是印度支那三人国人民的坚强后盾，辽阔的中国领土是印度支那三国人民的可靠后方。”

4 月 28 日，中国政府发表声明，支持越南(北方和南方)、柬埔寨、老挝三国四方最高级领导人会议。

4 月 30 日，美国总统尼克松宣布其在印度支那的军队进入柬埔寨境内作战，打击经“胡志明小道”来到这里屯兵的越南人民军主力，从而把侵略越南的战争扩大到了整个印度支那。

5 月 1 日，西哈努克被邀请参加中国五一节庆祝活动，登上天安门，站在毛泽东身边。

1970 年 5 月，毛泽东（左）、周恩来（右）与西哈努克亲王（中）在天安门城楼

1970年5月1日晚毛主席和柬埔寨国家元首、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主席诺罗敦 西哈努克亲王在天安门城楼上一起观看焰火

1970 年 5 月 1 日，毛泽东、林彪在天安门城楼上与群众共度五一国际劳动节

5 月 1 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四十个国家的驻华使节和参加中苏边界谈判的苏联政府代表团团长副团长甘科夫斯基。毛泽东同甘科夫斯基谈话时说：

“我们应当好好谈判，谈出个友好睦邻关系。”

“要有耐心。”

“我们要文斗不要武斗。”

他对印度驻华大使馆临时代办米希拉说：

“印度是一个伟大的国家，你们是伟大的人民，我们总是要友好的，不能老是这么吵下去嘛。”

毛泽东见到年仅 30 多岁的古巴驻华代办加西亚，他用西班牙语向加西亚致意，加西亚非常兴奋。

当晚 18 时 50 分，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 118 厅会见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林彪、周恩来等在座。毛泽东详细地询问了朗诺的情况，对柬埔寨发生的一切以及亲王在柬埔寨国家事务中的作用都十分关心。他风趣地说：

“我宁可同您这样的爱国的亲王握手，而不愿同像某些所谓‘人民的儿子’那样的国家元首握手。您起了颇为光辉的作用。您可以当一个共产党员了。”

西哈努克感到这是毛泽东对他所能表达的最高的敬意。

西哈努克谈到柬埔寨国内及周边国家的情况。

毛泽东以一个大战略家所特有的胸怀继续说：“您必须告诉我们您需要什么。只要我们有，我们就给您。我们给您的任何东西，同您通过您领导的柬埔寨人民的斗争所给予我们的东西是没法相比的。”

西哈努克向毛泽东表示感谢，还谈到了将来的偿还问题。

毛泽东说：“你提出来要搞人民解放军，要打。我们是不卖武器的，拿武器做生意是不行的，只能赠送。只要你同意，援助武器是不需要还账的。”

西哈努克对毛泽东说："主席先生，中国自己的负担很重，她给了第三世界许多援助，而我连同我的随行人员、朋友和工作人员现在又成了额外的负担。"

毛泽东却说："我请求你让我们多负担一点。负担你的越多，我就越高兴。到你身边来的人越多，我就越喜欢。没有什么了不起嘛！让尽可能多的人来支持你。如果他们不能去战场上打仗，让他们来这里，六百、一千、两千或者更多，中国随时准备支持他们，给他们提供一切便利。"

毛泽东说："你们的国情和我们基本上相像，还是个以农业为主的国家。农民以小资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为主，要抓住农民问题。你现在走我们的老路了。我们先是城市，然后农村，然后再夺城市。早先我不是劝过你嘛，你何必当亲王就不能够做人民领袖啊？可以嘛。我就劝你读一点马克思主义的书，我介绍给你两本书，也许你已经读了，一本叫《共产党宣言》，一本叫《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敌人可以在一个早上把工会、农会全都扫光，结果还是上山靠得住。""什么叫政权？什么叫力量？没有别的，只有军队。我们的教员是蒋介石，你们的教员是朗诺。你们现在的革命性质还不是社会主义的，还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我们是二十二年再加上六年，实际上是二十八年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共产党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不走这一步，社会主义是搞不了的。""所谓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有两点主要纲领，

一是反帝，一是反封建。这么一搞，你的旗帜就鲜明了，全世界人民都赞成你们嘛。”“我赞成这个策略，就是集中力量整美帝国主义，对法国可以暂时不触动。不反封建也是搞不成的。一个国王搞反封建，怪事了，但是你是民主国王，不是什么封建国王嘛。你不取得农民的同意，事情是搞不成的。”“要搞革命，需要了解几个国家的革命史，美国革命，法国革命，德国革命。你现在提出的口号是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朗诺，这个口号提得好，就要这样提。”

毛泽东还说：“中国基本上还是个落后的国家。过去我们一些事做得不好，走了弯路。我们自己也不懂得怎么搞社会主义经济这一套。”

5 月 1 日晚上，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了中国卫星和运载火箭研制人员代表，看到聂荣臻。

聂荣臻因为在邯郸水土不服，得了皮肤病，奇痒难忍，经周恩来批准，于 1970 年 2 月 11 日到北京治病。这时，毛泽东询问了聂荣臻的病情后对他说：“你不要出去了，就在北京吧，北京好治病，出去干什么。”

5月1日晚上，林彪从天安门回到毛家湾后，十分烦躁的钻进了自己的房间。内勤不敢再去惊动他。

叶群来到林彪的房间，十分关切的问：“怎么样？今天很累吗？”

“唔，还好！”

叶群又说："101，老虎那里的一帮人，是经过考验的，是过得硬的，将来用得着的地方多得很，你就早点见见吧！"

林彪思忖了一阵开口说："你定一个日子嘛！"

"那就明天晚上吧！"叶群高兴地说："算是过五一节，有个名目。"

林彪说："把老虎叫来，再商量一下。"

叶群立即让内勤去叫林立果来，一起为5月2日的活动作安排。在确定名单时，林立果说："有的人不在北京，就让老婆、孩子参加，算是代表。"

叶群说："什么代表不代表，夫人、孩子都请来，这样才热闹、亲切。"

林彪为难地说："老婆、孩子一大堆，我怎么讲话？"

叶群说："101，你随便说几句就行了，反正有些话也不能明说。把他们请来了，一切意思就都有了。俗话说，吃了我家的饭，就是我家的人……"

叶群还想说下去，看到林彪瞪了她一眼，知道是嫌她噜苏，就把到口的话咽了下去。抑或她突然想起了林彪让内勤在她床头贴的"做事莫越权，说话莫罗嗦"的字条。

林立果说："只要首长和大家见见面，其它的事有我！"

5月2日晚上，一辆空军大轿车驶进了毛家湾。空军副参谋长兼办公室主任王飞、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周宇驰挥动着《毛主席语录》，依次从车里钻出来。接着从车上下来

的，有男有女，成对成双，有的还带着小孩。林立果亲自站在门外迎接大家，并和大家一一握手。

叶群在屋里等候，与大家寒暄、问候。她对大家说："这一阵林立果在外边出差，好久没和大家见面了，很想见见大家。今天请大家来一块过节，和大家见见面。"

叶群的"主旨演讲"后，林彪光着脑袋从里面出来了。叶群、林立果把客人们一一介绍给林彪。

林彪坐在前排沙发上，一边是周宇驰，一边是王飞，他们进行了亲切地交谈。林彪对周宇驰说："听说你教会老虎开汽车？"

周宇驰马上回答道："不是我教立果同志开汽车，是立果同志教会我开汽车。"

林彪笑了，又问："是你领导老虎，还是老虎领导你？"

周宇驰立即回答："当然是立果同志领导我们喽！"

林立果要学开车，是空军司令部汽车队队长王琢教的他，练习地点在西郊机场的跑道上。1968 年 3 月 19 日，林立果办了张驾照，姓名吕果。

林彪本来是不看电影的，特别是有关战争的影片。但此时，林彪却陪着大家看了一场"内部电影"，然后，林彪在一片"永远忠于林副主席""敬祝林副主席永远健康"的欢呼声中首先退场了。随后，叶群给大家送纪念品：每家一个塑料图片，每人一枚毛主席像章。她又拿出一包糖，每人分

了一块，一边说：“这是‘五一’节晚上天安门城楼上伟大领袖毛主席桌子上的糖，特地拿了回来，想了想，还送给在座的同志们好，因为你们帮助我们办了很多事情。每人一块，不是给大家吃的，留作纪念，这是最大的幸福。”

5月3日晚20时至24时，周宇驰把林彪昨天接见的人又召集起来，开了一个“表忠会”，他在会上说：

“我们要永远坚信林副主席、忠于林副主席，忠于林副主席，也就是忠于毛主席。要知道，林副主席也是一个天才，是历史上罕见的伟人，是一个可以和马、恩、列、斯并列的革命导师和领袖。我们要一辈子永远同立果同志战斗在一起。立果同志也是一个天才，一个全才，我们没有哪个人能够比得上他。他对我们的关心和爱护也是没有人能比得上的。他在各方面都是把着手教我们，在政治上工作上直接领导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考虑很久，觉得到提出来的时候了。就是一个单位，一个集体，总要有一个头。在我们这个战斗集体中，应该以立果同志为头，为核心。……”

周宇驰所说的这个“战斗集体”，就是指经吴法宪批准，在司令部办公室成立的那个以林立果为组长的“调研小组”，它的任务是给空军出点子，提建议。成员有周宇驰、王飞、刘沛丰、刘世英。1970年5月，经吴法宪批准，“调研小组”的人员进行了增加，有空军司令部副参谋长兼办公室主任王飞、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周宇驰、空军司令部

办公室副处长刘沛丰、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刘世英、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处长于新野、空军司令部办公室秘书程洪玲、空军雷达兵部副处长许秀绪、空4军秘书处副处长李伟信等人。

此后，王飞、于新野、空军作战部部长鲁眠先后向林彪写了“效忠信”。

## 第1129回：谈抗美，毛泽东会见黎笋

### “谁怕谁”，拿起武器敢斗争

5 月 4 日，中国政府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政府出兵侵入柬埔寨，扩大在印度支那的侵略战争。

这天，西哈努克在北京成立了柬埔寨王国民族团结政府，西哈努克任国家元首，宾努亲王任政府首相，在柬埔寨境内作战的乔森潘任副首相。团结政府分国外和国内两部分，国外部分的总部设在北京。

中国、朝鲜、阿尔巴尼亚、罗马尼亚、南斯拉夫等 20 多个国家给予柬埔寨王国民族团结政府正式承认，而苏联却没有给予承认。出乎西哈努克意料并博得他欣赏的，是古巴政府对他所表示的支持。柬埔寨政变后不久，柬埔寨驻哈瓦那大使求见古巴外交部长罗亚。这位外交部长像往常那样接待了他。但是他见面后首先就问这位柬埔寨驻哈瓦那大使：“你是不是将站在西哈努克亲王的一边进行战斗？”

“不。他被赶下台了，而且人人都支持朗诺。”

“滚出我的办公室！”外长怒斥那位大使，“别再玷污了我的椅子。我限你在 24 小时内离开哈瓦那。你不但背叛了西哈努克，而且也替你们柬埔寨人民丢尽了脸。不！我不同你握手，而且我还因为在你进来时同你握了手而感到遗憾。”

几天后，越南劳动党中央总书记黎笋来到北京，要求中

国进一步支持越南正在进行的战争。

5 月 11 日，毛泽东会见黎笋。新华社摄影记者、中央新闻外事摄影小组的组长杜修贤接到拍摄这次会见的任务。

杜修贤是第一次走进毛泽东会见外宾的客厅，他不禁好奇地环顾四周。

这里，没有脑海里所想象的那样富丽堂皇，明光闪亮，甚至可以说有点灰暗、陈旧。厚厚的紫色窗帘挡住了户外的阳光，屋里亮着灯，使得本来就很简单的陈设愈加简朴。构成灰色主调的是那贴满墙壁的线装书，一排排、一层层、一摞摞砖头似的书摆满了环屋的书架，许多书里还夹着白色的纸条，这是读书人留下思考和阅读的记号，乍一看还真像商店货架上的价码标签呢。

除了惊人的书“海”外，醒目的陈设要算客厅中间摆成月牙形的沙发和挤在沙发之间的三角茶几。沙发旁摆着落地台灯，茶几上整齐地放着一摞纸巾、中华香烟、青瓷烟缸和青瓷茶具，茶几下面有几具白色痰盂……一切都非常普通也非常亲切。

这是毛泽东的书房。自从 1966 年 7 月，毛泽东从南方回到北京，发现原来居住的丰泽园没有告诉他就重新进行了修缮，十分生气。为表示抗议，他搬到了游泳池居住，从此再也没有回到丰泽园。

毛泽东从隔壁房间走了进来，杜修贤正背对着门测光，

没有看见，待转过身时，主席已坐进了沙发里。杜修贤急忙放下相机，默默地立在原地不敢动作……毛泽东似乎也没有注意到他，正捧着一本厚书，目光透过手里的放大镜，细细地慢慢地在字行上移动。

杜修贤和拍摄电影、电视的两位记者怕惊动毛泽东看书，悄悄地走出去，到外面的过厅里等着。

过厅不大，一扇门通向外面，人们进进出出都从这扇门里走。过厅靠窗有一排椅子和沙发，杜修贤和同事们就在这里等候活动开始。

毛泽东的机要秘书这时走过来看见杜修贤，对他说："主席常夸你呢！"

"夸我？"杜修贤不相信地反问。

"真的哎。主席不止一次说过你手快……真的，你是主席点名要的将。"秘书的神情很认真，不像是开玩笑。

杜修贤笑笑，手快是他的一个特点，别人还在找角度时，他已经摁下快门了。在延安就从事新闻摄影工作的他，在共和国成长的历史中留下了许多珍贵的画面，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留下了大量的精彩瞬间，那些传神画面早被亿万人民熟烂于心，呼之欲出。

晚 18 时 15 分，外宾来了，毛泽东马上放下书，十分利落地站起身，弯腰将烟头按在烟缸里，大步向门口走去。此时的毛泽东，脸色红润，常从眉宇间流露出人们最熟悉的睿

智与慈祥。

毛泽东和越南劳动党总书记黎笋这次是秘密会见。他们一见面就显得格外亲切，毛泽东一边同黎笋握手一边问："我上一次是什么时候见到你的？"

"1964 年。我们看到毛主席身体健康，感到很高兴。"黎笋回答着，挽着毛泽东的手，一同走进客厅。

落座后，黎笋说："目前，越南和印度支那的形势比较复杂，也存在一些困难。"

毛泽东："困难哪一国都有，苏联也有，美国也有。"

黎笋："我们很需要得到毛主席的指示。如果我们中央和政治局知道毛主席给我们的工作提意见的话，一定会非常高兴。"

毛泽东："你们的工作做得很好，而且你们是越做越好。"

黎笋："我们尽最大的努力做工作。我们所以能把工作做好，也是按照毛主席以前对我们讲到的三点去做：第一，不怕，不怕敌人；第二，要各个击破；第三，要长期地打。"

毛泽东："对，是持久战。你们要准备打持久战，但是如果打短一些不是更好吗?

究竟谁怕谁呢？是你们越南人、柬埔寨人以及东南亚人怕美帝国主义，还是美帝国主义怕你们呢？这是个问题，值得考虑，值得研究。"

毛泽东说到这里，略一思索，又接着说："还是大国怕

小国。风吹草动他都惊慌失措。1964 年北部湾事件，你们整了他一下，也不是有意想打美国海军，后头也没有打着它，它自己紧张起来了，说越南的鱼雷艇来了，开炮就打。”毛泽东说着开怀大笑起来，周恩来和黎笋也跟着大笑起来。

毛泽东继续风趣地说：“对这件事，后来美国人自己也讲不出来究竟是真的还是假的。美国各地的新闻记者肯定那是假的，那是一场虚惊。既然打起来了，那就只好打了。对军火商是有利的。据说，现在美国总统尼克松每天睡觉很少。尼克松自己讲，他的主要精力是对付越南。”

“现在还有另外一个人，西哈努克亲王，他也不好惹，你惹他，他就要跳出来骂娘。

我们有些大使馆，我看要整顿一下。我们中国一些大使馆有大国沙文主义，尽是把人家的缺点看得多，不顾大局。”他问周恩来：“驻越南的上任大使是谁?”

周恩来答：“朱其文。”

毛泽东说：“朱其文跟你们搞得很僵。事实上朱其文是个国民党，他要跑到外国去。我们不知道他是国民党，你们跟国民党打交道，他为什么不捣你们的乱呀？那时我们也不知道，但我们看到（他发回的）那些电报是不高兴的。”

黎笋：“我们越南人民心中牢记着毛主席的恩情。在 9 年的抗法战争中，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支持，我们是不可能取得胜利的。我们为什么能坚持打持久战，尤其

是在南方坚持长期抗战？我们为什敢于长期打下去？这主要因为我们依靠了毛主席的著作。”

毛泽东：“不一定。”

黎笋：“当然这是事实。我们还要善于在越南的实际环境中运用。”

毛泽东：“你们有你们自己的创造。怎么能说你们没有创造，没有经验呢？吴庭艳一杀 16 万，我是听的报告，不晓得准不准确，但我知道杀死了十几万人就是了。”

黎笋：“是的，16 万人被杀害了，而且许多人被投入监狱。”

毛泽东：“我看这就好了。你来杀我，我不可以杀你呀？”

黎笋点了一下头，赞同地说：“正是这样，光是 1969 年我们就打死打伤敌人 61 万人，其中美军就有 23 万人。”

毛泽东：“美国人的人力分配不够，因为他们在全世界铺的太广了。所以，当他们的人被杀死时，他们的心都碎了。死个几万人，对他是一件大事。你们越南人，不论北越、南越，我看死人是要死的。”

黎笋：“我们现在的打法死伤很少。不然，我们就不能长期坚持下去。”

毛泽东：“是啊。恐怕老挝困难一点。老挝族在中国有没有啊？”

周恩来：“有一些。”

毛泽东："他们住在哪儿?"

周恩来："在云南省，同老挝交界的地方。"

毛泽东："东南亚是一个马蜂窝。东南亚的人民一天天在觉醒。有些和平主义者认为无非是公鸡好斗。哪有那么多公鸡呀！现在母鸡也好斗了嘛!"

黎笋："不斗就没有出路。"

毛泽东："是啊，不斗不行了。你逼得人家没有路走了嘛，欺负人嘛!"

黎笋："柬埔寨人和老挝人本来都信佛教，不好斗。现在他们也好斗起来了。"

毛泽东："就是呀，你也不要说信佛教的人就不好斗，中国也是信佛教的，辛亥革命打了 17 年，后来是内部两派打，这样教育了人民。然后是北伐战争，然后就有红军了，然后日本人侵略中国，日本人投降以后就是蒋介石同我们打，打了不到四年，他就不干了，跑到台湾去了。他现在在联合国里说他代表整个中国。他跟我们几个人的关系可密切了。我跟蒋介石算是见过几次面，国民党在广州开中央全会的时候见过。我是一个国民党，是个跨党分子，我又是共产党的中央委员，又是国民党的候补中央委员。那个时候，我们几个人都参加了，我们的总理是蒋介石黄埔军校的政治部主任，蒋介石第一军的代理党代表。林彪同志就不用说了，他是蒋介石的学生，他在黄埔读了 9 个月。在中国，老一辈的人没

有跟他打过交道的很少。”

林彪：“我也是一个跨党分子。”

毛泽东：“国民党的党部甚至都是我们帮他组织的。没有共产党的帮助，国民党就不可能北伐。那时，在北方，在黄河一带地区，他国民党连党都没有，党部都没有。他是靠共产党帮他组织。”

黎笋：“最近，尼克松宣称说，在过去 190 年里美国从来没有被打败过。意思是他这次也不愿意被越南打败。”

毛泽东：“没有被打败过？”

黎笋：“实际上他被打败好几次了。在中国，在朝鲜和印度支那的抗法战争中，他给法国人开支百分之八十的军费，结果他仍然被打败了。”

毛泽东点燃了一支烟，吸了一口，侧过身来，对着黎笋，若有所思地说：“就是呀！你刚才讲的第一点是不要怕帝国主义。究竟谁真怕谁？小国，部分小民族存在这个问题。他慢慢试，试几年就理解了。中国唐朝有个文学家，叫柳宗元，他写了一篇寓言，叫做‘黔驴技穷’，说明总是大的怕小的，小的慢慢试出来，大的并不可怕。我们这个党，开始时只有 70 个人，谁也瞧不起，遭到许多挫折以后，才慢慢学会一点东西。美国人就是怕打，没有别的，谈判也可以谈，但主要还是打。”

毛泽东又谈了中国文化大革命的情况，说：“……今天

打倒周恩来，明天打倒叶剑英，后天打倒李先念。现在明白了，有那么个小团体，叫‘516’兵团，趁此机会要夺取政权。”然后说到：“……那时我还告诉你，如果美国人不到中国边境来，你们不请我们去，我们是不出兵的。”

黎笋：“我们也这样想。当我们还有能力打的时候，我们希望我们的大后方更稳固一些。在我们越南人民打美国人的时候，中国是我们的大后方。因此，我们曾经发出过这样的命令，即使我们的飞机受到攻击，也不要到中国机场降落。”

毛泽东：“可以嘛，我们不怕。如果美国空军要来打越南空军的‘庇护所’，就让他来嘛。”

黎笋：“虽然我们下了这样的命令，但我们仍然需要依靠你们的支持。那时，你们派来的几个师在越南同样打美国飞机。”

毛泽东：“就是嘛。美国人就是怕打，他们没勇气。你们可以谈判，我不是说你们不能谈判，但是你们的主要精力应该放在打上。两次日内瓦会议是谁破坏的？你们和我们都是老老实实遵守(会议协议)，但是他们不干嘛！不干更好。因此，甚至苏联总理柯西金在他发表公开讲话时，也不得不说只要召开国际会议，就必须同越南、老挝和柬埔寨商量。他们现在的领导人好多我不熟悉，不认识。柯西金我认识，并且同他谈过话。西方报纸总是造他们的谣，说他们的领导

层怎样不和。我也闹不清楚。听说老百姓对柯西金这位领导人比较感兴趣。”

黎笋：“我们也听说了。”

毛泽东：“你们也听说了？我看斯大林又活起来了。当今世界主要的倾向是革命，包括整个世界。大国打世界大战的可能性是有，只是因为多了几颗原子弹，大家都不敢下手。主要是两个大国，现在都说三大国，中国不算。中国的原子武器还刚开始研究，还在研究阶段，这有什么可怕呀？中国人多，因此他们怕中国。但是我们也怕，因为人多要吃饭，要穿衣，那个问题可多了。所以我们现在也研究节制生育，使人口少一点。”

黎笋：“我们能够继续我们的战斗，是因为毛主席讲了，7 亿中国人民是越南人民的坚强后盾，美国害怕了。这是非常重要的。”

毛泽东：“有什么好害怕的？你侵略人家，我做个后方都做不得呀？你去几十万海、陆、空军欺负越南人民，中国做个后方都做不得呀？哪个法律上有这条规定？”

黎笋：“美国人说他可以动员 1200 万军队，可是他只能派 50 万军队到越南，如果越过了这个界限，他们就害怕了。”

周恩来：“中国人多他也怕。”

毛泽东：“人多还有一个不怕，打就打。横竖我跟你没有关系。你占了我的台湾，我没有占领你的长岛。”

毛泽东充满了自信。他说："从当时的总体形势看，一个反对美帝国主义的高潮已经出现。提出'反对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口号更加符合实际，更易为国际朋友所接受，也更能动员世界人民掀起反对霸权主义斗争的新高潮。"

这次会见中，毛泽东十分坚定的表明了一个态度：坚决反对美国扩大侵略越南和印度支那战争，热烈支持柬埔寨国家元首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反对美帝及其走狗的斗争精神，支持印度支那三国联合声明，支持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领导下的王国民族团结政府的成立，支持美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的正义斗争！

同时还很深刻地提出了两个论断：

一是"新的世界大战的危险依然存在，各国人民必须有所准备。但是，当前世界的主要倾向是革命。"

"关于国际形势总体发展趋势，是战争引起革命，还是革命制止战争？"毛泽东以战略家的眼光预见性地感到世界战争的危险依然存在，但是制约战争的力量也在发展。通过世界人民的斗争，新的世界大战有可能被制止。

再一个论断就是著名的"谁怕谁"的理论。

毛泽东说："现在世界上究竟谁怕谁？不是越南人民、老挝人民、柬埔寨人民、巴勒斯坦人民和阿拉伯人民怕美帝国主义，而是美帝国主义怕世界各国人民，一有风吹草动，就惊慌失措。世界上许多事实都证明，得道多助，失道寡助。

弱国能够打败强国，小国能够打败大国。小国人民只要敢于起来斗争，敢于拿起武器，掌握自己国家的命运，就一定能够战胜大国的侵略。这是一条历史的规律。”

会见一结束，周恩来马上将谈话记录整理打印成文，交给了外交部。

第1130回：游长城，林彪接见新总政

五二〇，毛泽东发表声明

5 月 13 日，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向叶群写了一封信：

叶群同志：

今天是“五·一三”三周年，这是我们难忘的日子。

我们记忆犹新的是您——我们敬爱的叶群同志，对我们直接的指导帮助和支持，您日夜操劳一次又一次地给我们带来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的英明指示，一次又一次地亲临斗争第一线，同三军广大革命群众并肩战斗。所以，当“五·一三”事件三周年的时候，永远牢记您对我们的教育深恩，请接受我们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战斗敬礼！

叶群看了这封信后，非常高兴，于是她邀请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于5月14日同游长城，在长城上照了一张叶群和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胳膊紧紧挽在一起，一字排开的合影。他们把这张合影称之为“新的长城”。

叶群从长城游回到毛家湾兴犹未尽，把几个秘书叫来，要他们代她起草几首诗，赠给黄、吴、李、邱。

叶群想写诗，但水平一般。于是，她找了一个人专门教她，为她捉刀代笔，名为教师。这时，叶群对她的教师和秘书们说："要把我和黄、吴、李、邱的深切关系写出来。"

叶群也调动她的全部灵感，赋诗一首，其中有一句："相将奋起卫红旗"。她十分得意地说："这是警句。"并解释道："我们有相也有将，相就是陈伯达，将就是黄、吴、李、邱，现在要相将一起奋起，保卫林副主席。"

5月16日，周恩来召集外交部临时领导小组扩大会议，讨论国际形势问题。会议认为：在当前形势下，应推迟中美会谈，并召开群众大会支持印度支那人民反美爱国斗争和在北京的西哈努克政府。

当晚，周恩来主持政治局会议，讨论当前形势和外交部的建议，商定：

（一）推迟原定5月20日举行的中美会谈，将双方联络员的会晤，定在6月20日；

（二）建议毛主席发表一简短声明，支持国际反美革命斗争和印度支那三国四方会议及柬埔寨王国民族团结政府的成立；

（三）召开群众大会，拥护毛主席声明，庆祝柬埔寨王国民族团结政府成立，并请毛主席、林副主席出席，西哈努

克讲话。会后，全国各大中城市举行群众游行示威。

次日，周恩来向毛泽东书面报告所商定各事，并附外交部本日“关于推迟中美会谈第一三七次会议的请示”件。毛泽东阅批：“照办。”

5 月 17 日，周恩来主持政治局会议，讨论修改由乔冠华起草的毛泽东声明稿。会议认为，该声明内容应突出毛泽东 5 月 11 日同越南劳动党领导人黎笋谈话中提出的一些重要思想。根据政治局讨论意见，5 月 18、19 两日，又对毛泽东的声明稿进行多次修改。19 日，周恩来与康生、陈伯达将修改后的声明稿报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批示：“照办。”

受毛泽东委托，19 日晚 21 时 30 分，周恩来在钓鱼台 5 号楼与西哈努克亲王举行第 13 次会谈，将毛泽东的声明法译本交西哈努克征求意见。

5 月 19 日下午 16 时，总政治部值班室军委一号台电话响起，林彪办公室通知总政治部主任、副主任、部长、副部长，包括《解放军报》的负责人，集中乘车，17 时到达毛家湾。

原来，这是林彪同黄永胜、吴法宪商量，确定在他的住地毛家湾，接见李德生和总政治部二级部副部长以上干部。

总政治部办公室急忙通知有关人员集合，当时有 5 位部长、副部长出差，李德生和两位副主任、11 位正副部长和解放军报社负责人一共 14 人，按时从总政治部机关出发，赶

到毛家湾。只见在客厅门外，叶群，还有早已到达的黄永胜、吴法宪已经站在那里迎接。

大家第一次来到毛家湾，第一次受到林彪接见，有几分神秘，几分荣幸。进入会客室，只见里面沿墙摆着一圈沙发，大家在叶群的招呼下坐定后，看见林彪从西面内室走出来，向大家致意，然后径直坐在中间沙发上。

事先安排的摄影人员开始照相。镜头转到林彪，林彪摸摸胡子说："我还没有刮胡子呢。"

叶群迈着小碎步跑过去说："我就喜欢你的胡子。"

并且让摄影员多给他们两人照几张。林彪指着在座的众人说："照片洗出来，把每个人的名字记上。"

摄影完毕，林彪开口讲话说："第一次见面，都不认识。只认识李德生同志、黄志勇同志。"要说他认识李德生，其实也只是在"九大"几次会议上见过，还没有单独谈过话。黄志勇原是四野的兵团参谋长，倒是熟人。

接着，林彪对其他 12 人逐一询问姓名、年龄。然后夸奖说："你们这个年龄正是办事的时候，比较成熟了。""你们是个新班子，是新气象，已经看到了新的做法，将来会有新的成就，部队里头会出现更新的面貌。"

他说："我这个人是搞军事的，一向分工抓军事工作。但是，我的兴趣是搞政治，搞无产阶级政治。我搞军事是斗争的需要，其实我年轻的时候就爱搞政治，对政治有兴趣。"

叶群插话说："林彪同志十几岁的时候，就爱读政治理论书籍。"

林彪再次肯定说："我的职业是搞军事，兴趣是搞政治。"他指着黄永胜、吴法宪："你们知道，我在东北，首先也是搞政治。"

黄永胜说："东北的胜利，也是靠政治。"

林彪话锋一转说："你们不要走不合法路线，要走合法路线，要吸取过去总政、报社的经验教训。不抓根本，不走正道，总有一天要垮台。合乎政治原则，合乎组织原则，对革命有利，就不至于垮台。"

最后，林彪对李德生说："我在江苏跟许世友同志说，偏偏要找一个军事干部来总政当主任。军事干部中有许多不仅懂军事，也懂政治，他们打过仗，不脱离实际，我偏偏找一个军事干部管政治，找个'丘八'管秀才。"

5 月 20 日晚，经毛泽东批准，中央新闻联播节目广播毛泽东的声明：《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声明指出：

"尼克松政府内外交困，国内一片混乱，在世界上非常孤立。抗议美国侵略柬埔寨的群众运动席卷全球。""美帝国主义看起来是个庞然大物，其实是纸老虎，正在垂死挣扎。现在世界上究竟谁怕谁？不是越南人民、老挝人民、柬埔寨人民、巴勒斯坦人民、阿拉伯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怕美帝国

主义，而是美帝国主义怕世界各国人民，一有风吹草动，它就惊慌失措。无数事实证明，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弱国能够打败强国，小国能够打败大国。小国人民只要敢于起来斗争，敢于拿起武器，掌握自己国家的命运，就一定能够战胜大国的侵略。这是一条历史的规律。”

声明说：“新的世界大战的危险依然存在，各国人民必须有所准备。但是，当前世界的主要倾向是革命。”

由于这篇声明是 5 月 20 日发表的，后来就简称为《520 声明》。

5 月 21 日上午，《人民日报》全文刊载《520 声明》。

当天上午，北京各界群众 50 万人在天安门广场隆重集会，支持世界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斗争，拥护毛泽东发表的《520 声明》。毛泽东率政治局常委和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及夫人，一同登上天安门城楼。

上午 10 时，和煦的阳光照射在天安门广场上，毛泽东和林彪等人在《东方红》的乐曲声中出现在城楼上……顿时天安门广场成了群情激昂的浩大海洋，极目远去，广场上人山人海，彩旗飞舞，反美、反战的大幅标语铺天盖地，人们高呼打倒美帝国主义的口号声惊天动地……这样的场面，几乎每个北京人都亲临过，而且为此不断地热血沸腾。

1970 年 5 月 21 日，毛泽东、林彪出席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首都人民支持世界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斗争盛大集会。”

大会由周恩来主持，由林彪宣读经毛泽东亲自审阅定稿的《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声明。

林彪为了第二天能在天安门上宣读毛泽东的声明，头天晚上加服了安眠药，以致第二天上午见到毛泽东的时候，仍然没有完全清醒过来。只见他摇摇晃晃地向毛泽东走过去，扯着嗓门大声喊道：“主——席——呀，你——好——吗?”全场人都用一种奇异的目光看着他。

毛泽东问他：“我好。你怎么样啊?”

林彪又尖着嗓子回答：“我——老——出汗呀。”

毛泽东说：“人哪有不出汗的?”

会见西哈努克时，林彪靠在沙发上打起了瞌睡。以致在天安门宣读毛泽东的声明时，神智还没有完全清醒过来：

“我要发表讲话！”林彪拖着长长的湖北腔，经过麦克风的传递，在整个广场上空回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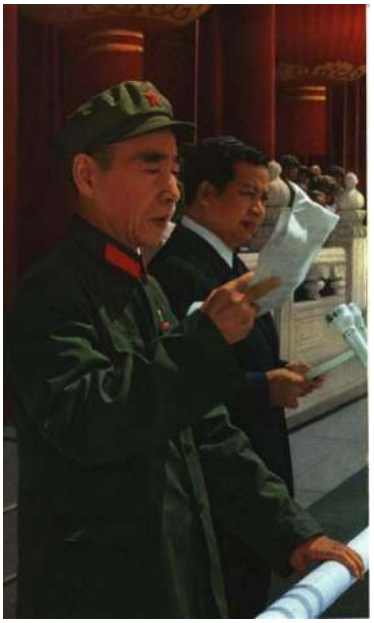
“我讲讲关于越南……两个越南……半个越南……”林彪离开了讲话稿，不知所言。但他稍稍镇定了一下，工作人

员为他移动了下麦克风，林彪开始照着稿子念开了：

“目前，在世界范围内，正出现一个反对帝国主义斗争的高潮。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帝及其追随者不断地发动侵略战争，各国人民不断地用革命战争打败侵略者。新的世界大战的危险依然存在，各国人民必须有所准备。但是，当前世界的主要倾向是革命……”

毛泽东走了过来，站在他的旁边，看着他宣读自己的声明。

林彪这次吐词尚清楚，但还是把“巴勒斯坦”念成了“巴基斯坦”，而且还念错了几个字。



1970 年 5 月 21 日，林彪在大会上宣读毛的《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讲话稿。

毛泽东声明的标题《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令人感到空前的强硬。让全世界都看见，站立起来的中国人不是用交涉、要求、抗议的字眼对待

美国，而是指名道姓地要“打败”它！

1965 年 2 月 10 日，北京曾举行过支援越南人民的抗美斗争的集会。那次集会人数有 150 万人之多。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天安门城楼上与北京军民一道声讨美国侵略罪行，坚决支援越南人民的抗美斗争。当时，天安门城楼前有一幅长达几十米的标语牌，上面写着：“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犯越南民主共和国！美帝国主义从越南南方滚出去！从印度支那滚出去！从亚洲滚出去！从非洲滚出去！从拉丁美洲滚出去！从它侵占的一切地方滚出去！”

所不同的那次是“美帝国主义滚出去”，而这次是“打败美帝国主义”。

从“滚出去”到“打败”，表达了毛泽东已预见到美国开始在印度支那走下坡路。蔑视强权，不畏强势，渴望挑战，这是毛泽东鲜明的性格特点。

宣读声明后，群众开始游行，毛泽东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兴奋地看着沸腾的人群……

这次集会之后，印度支那国家把中国看成最可靠的大后方，他们得到了极大的安慰和支持。原来惧怕霸权大国的中小国家也受到鼓舞，在他们心目中，毛泽东正迈着巨人般的步伐带着他们与美国斗争。

林彪在天安门城楼上的失态，是因为那天夜里服了三次

安眠药，头脑还未完全清醒所致。会后，叶群安排“林办”秘书李春生和保密员李根清去钓鱼台“旁听”审查大会的新闻纪录片，康生、江青都建议对片子作技术处理后再在电台、电视台播放。这样，在以后的广播里就听不到林彪说错话了。

回到毛家湾，叶群又大骂几个有关的工作人员，批评内勤给林彪服安眠药“过量了”、“服晚了”，批评警卫参谋李文普“没有把好关”，“失职”。

1970 年 5 月 20 日，在天安门城楼，林彪宣读了毛泽东的《5.20 声明》之后，对越南南方的英雄代表说：对付美国人，不正面作战，不谈判，用游击战!一个字“熬”！

## 第1131回：林家忙，温玉成被贬成都
## 轰江青，召集宪法修改会

1970年6月2日，林彪单独召见温玉成，向他宣布说："温玉成同志，经军委研究，你已经不能适应北京阶级斗争形势的需要，决定调你到成都军区担任第一副司令。"

温玉成目瞪口呆。

林彪又说："这是军委领导的关心，你有什么想法？"

温玉成这才猛然清醒，条件反射地答："我忠于毛主席，忠于林副主席。"

温玉成是1967年11月调到总参任副总参谋长。1968年3月，在杨余傅事件中，他又开始兼任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并协助谢富治兼管"样板团"的工作。

"九大"时，温玉成作为主席团成员，坐在大会主席台的前排，进入了他人生辉煌的顶点。当时，包括外电在内的大多数人都在议论，温玉成铁定要进政治局。然而，九届一中全会上，温玉成出人意料，没有当选为政治局委员或候补委员，成为在九大主席台前排就坐的军委办事组成员中唯一没有进入政治局的成员。

这次，温玉成终于被莫名其妙调往成都军区任第一副司令员。这个职务比副总长降了一级，等于是不宣布处分的处分。

温玉成调成都的消息刚刚传出，有一位与黄永胜关系很

好的人问他："为什么要把温玉成调走？即使调走，为什么不能让他回广州军区？"

黄永胜回答说："是江青要赶他走！他过去在广州搞得那个样子，还怎么回去？！他到成都去，梁兴初对他总还了解嘛！"

梁兴初去成都军区前，是广州军区副司令员，对温玉成当然熟悉。据说，温玉成是为"样板团"的军装等事，不知怎么得罪江青的。

6 月 4 日，林彪要接见北京军区司令员郑维山等人及其家属，郑维山当时正在内蒙赶不回来，于是把郑维山的妻子孙景波和孩子接到毛家湾，同林彪、叶群一起照了像，叶群还陪同看了电影。

当天，林彪说："想到五台山休息一段时间"，问"那里有没有招待所"。

郑维山在内蒙得知林彪接见他家属后，连夜给林彪写信，说这次接见是对他全家的"最大关怀"，"最大爱护"，"最大鼓励"，"一定要以接见为动力做好工作"。

郑维山的妻子孙景波也单独给林彪、叶群写信表示效忠。

6 月，郑维山派人到五台山专门勘察，并决定立即在五郎庙为林彪修建一所"行宫"。

郑维山向叶群专门汇报了建宫方案。叶群说："如果保

证明年能用，我们先谢谢你了。”

“行宫”基本建成后，“林办”要郑维山先去住一住，郑维山欣然答应去试住。

1970年夏天，毛家湾内显得异常忙碌。东院的庭院内常常停放着一排客人的小轿车，西院的会客厅常常坐满了各种各样的电影“观众”。这些“观众”大半是毛家湾特别邀请来的。因为每场电影只能容纳一、二十人，加上主人有意让某些“观众”之间不“碰面”，所以只好分场放映。影片大部分是外国片，也有一部分是文化大革命以前的国产片。这些“观众”难道没看过这些影片吗？倒也不一定。但不论主人或客人都明白，有幸被毛家湾请去看一次电影，那个“政治含量”是不轻的。一遇有这样的事情，作为毛家湾“里里外外一把手”的郭连凯秘书，就几乎忙得不可开交了。

“老张，我实在忙不开，你得出来支援支援了。”一天晚上，郭连凯主动向秘书张云生求助说。

“支援什么？”张云生问。

“主任又要请客人来毛家湾看电影，”郭连凯说，“你没看我正在忙着打电话吗？”

“请人来看电影，已经好几次了，怎么还要请？”

“请过多次，但客人并不重复。”郭连凯解释说，“有几次是请老夫子和黄、吴、李、邱的；有几次是专请各家的夫人和子女的；有一次是专请老虎在空军党办的战友的；还

有一次是专请为找人出过力的；……我倒好，现在快成了毛家湾的俱乐部主任了！”郭连凯说到这里，自己忍不住笑了起来。

“你想让我干什么呢？”张云生问。

“别的事也不用你帮忙；你就在晚上 7 点钟以前往西院的门口一站，见有客人前来，热情地把他们让到西院客厅去就行了。”

“那你干什么呢？”

“我的事多着呢！”郭连凯说，“你在西院接待的是黄、吴、李、邱的夫人和他们的子女以及他们的工作人员，我却要在东院迎接黄、吴、李、邱本人。主任说，老夫子今天还可能来呢。他们一到，首长先要见见，然后由主任陪着去西院看电影。这个戏的大头在东院，西院只管等着看电影就行了。”

这场戏由叶群导演，郭连凯出面张罗，毛家湾的不少工作人员参加助阵，终于顺利开场了。

电影散场后，张云生又接到郭连凯从西院打来的电话。

“老张，又得请你去支援一下。”

“又支援什么？”

“主任准备请客人都到三座门招待所去吃顿忆苦饭。一切都由我安排好了，只想请你提前去看看。等我们前去时，能有人在门口招呼一下就行了。”

“现在都快半夜了，还吃什么忆苦饭呢？”张云生问郭连凯。

“别问了，我以后有机会再说吧！”郭连凯有些不耐烦地催促说，“你快坐车到三座门去吧！”

张云生到了三座门招待所之后，见那里已经按郭连凯的布置准备停当。

不多会儿，一辆辆小轿车从门外开进来了。为首的是叶群和陈伯达，然后是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再然后是黄夫人项辉方，吴夫人陈绥圻，李夫人董其采，邱夫人胡敏以及他们的子女，最后是随员和工作人员。郭连凯跑前跑后，把这些人一一安排入座。在左侧第一席上入座的是叶群、陈伯达和黄、吴、李、邱等几员大将；第二席上是各大将的夫人；以下各席是各大将的子女和工作人员。虽然不算盛大，但也坐了六、七桌。

只见在每张桌子上，都摆了一般比大拇指稍大一点的精制包米面窝窝头，看样子算是“粗粮细作”，但吃起来却香甜可口。除此之外，主食中还有大米绿豆粥，新做的油酥烧饼；副食以凉拼盘为主，每桌都摆了八大盘，品种新鲜多样，味道也能证明它是出自高厨之手。

在吃“忆苦饭”过程中，没有任何人致辞、讲话，只有叶群所在的那张桌子上一直谈笑风生，其他各席都哑然沉寂。第一席的“大人物”先动了筷子，别席上的人们也都不

客气了。席尽人散，每张桌子上的那盘“黄金塔”象征也大都不见了。

散席后，客人陆续离去。最后离开的是黄永胜在登上汽车前拉了拉郭连凯的手，然后说：“今天晚上用的钱，记在我账上！……”

毛家湾的客人其实就是陈伯达、黄永胜、吴法宪、李左鹏、邱会作这些人。他们相聚的时间大都在晚上，而且力图避开钓鱼台方面的注意。例如陈伯达到毛家湾来，通常是从钓鱼台出发后，先在市内其他地方兜兜圈子，然后再转向毛家湾。再如，黄、吴、李、邱到毛家湾来“看电影”，也是对钓鱼台严加保密的。有一次，吴法宪正在毛家湾看电影，江青要找他听电话。吴法宪住地的秘书告诉江青，吴法宪不在家。江青问吴法宪干什么去了，秘书说不知道。其实这个秘书知道吴法宪正在毛家湾看电影，但由于吴法宪有过“保密”禁令，因此只能对江青讲假话。电话放下后，这个秘书急忙再挂电话告诉吴法宪，吴法宪又急忙从毛家湾坐汽车到三座门。从另一个地方给江青回了电话……

6 月 6 日，中央再次接见内蒙古小学习班。周恩来讲话说：革委会领导单独学习，下面广大干部有意见，要求你们同各大班合并，接受广大基层干部的帮助。以后，自治区领导到唐山大班，各盟市领导回各盟市学习班。6 月 11 日，内蒙古的北京小班宣布撤销，滕海清、高锦明、权星垣等人来

到唐山大班。

1970 年 5 月 27 日，北大、清华两所大学提交《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招生（试点）具体意见（修改稿）》。

文化大革命是在学校最先展开，毛泽东对学校以考试为手段，以分数为标准教育方法深恶痛绝，在文革刚开始就发出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的号召，得到了学生们的普遍拥护。如今，文革的大动荡时期已基本结束，教育究竟怎样革命？大学还要不要办？早在 1968 年 7 月，北大、清华武斗正酣时，毛泽东就已表示：“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

大学还要办，学生怎么招？怎样“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北大、清华的《报告》中介绍的“招生办法”，是实行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和学校复审相结合。那些政治思想好、身体健康，年龄在 20 岁左右，有相当于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工人、贫下中农、解放军战士和青年干部，还有在单位表现特别突出的人，经当地“革命委员会”推荐，政治审查合格后，即可成为“工农兵大学生”。“分配原则”为：“学习期满后，原则上回原单位，原地区工作，也要有一部分根据国家需要统一分配”。概括起来，新的招

生制度主要是两条：一是停止从应届高中生经统一考试直接升入大学的传统做法，改为从有实践经验的工农兵及知识青年中招生。二是废除升学考试制度，实行“群众推荐”、“领导审批”。新的招生制度是对近现代教育体制中招生制度的一次革命。

在大学停止招生整整 4 年后，北京大学于 6 月 4 日开始在北京地区试行招生。

6 月 14 日 8 时左右，北京针织总厂 8341 部队军代表孙毅接到中南海电话，说毛主席要见正在这里上班的北京外国语学院老师章含之。军代表立即通知了章含之，并对她说：“主席特意关照，要你向工厂请假。”

章含之急忙换下工作围单，骑上自行车来到中南海游泳池。当她走进毛泽东的房间，看见毛泽东正半靠在床上喝茶。

章含之赶紧打招呼：“主席，你好!”

毛泽东笑着拍拍床沿，边让她坐下边说：“哎呀，我的章老师，好多年不见，你好吗？这些年， 你经风雨，见世面了没有啊？”

章含之从 1964 年开始到毛泽东那里教英语，持续了半年。1966 年 6、7 月间，文化大革命开始，章含之给毛泽东写过一封信要求见他。毛泽东让秘书打电话给她，说：“主席现在不便见你，但有几句话带给你。一句是要你‘经风雨，见世面’，另一句是要你‘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忧来明日

愁’。”

章含之说：“主席，没想到你还记得这两句话。这些年，我经了点风雨，见了点世面，不过很多事还是不明白。”

毛泽东说：“不明白不要紧，慢慢地都会明白的。”

接着，他问到章含之父亲章士钊的情况，并多次嘱咐章含之好好照顾她的父亲，说：“行老是不可多得的朋友，要把他保护好!总理给我写信要采取保护措施，我很赞成!”

毛泽东站起身来，说：“我有事要同你商量，我们到外面去谈。”

他们来到大会客室。毛泽东问章含之：“你那个学校停课多久了？”

“从 1966 年到现在整整四年了，中间搞过几次‘复课闹革命’，都没搞成。学校打派仗，没法复课。”章含之说。

毛泽东说：“过去就算了!现在我在考虑学生应当回到课堂里去了，也就是说应当上课了。不过不能像过去那样搞教育。教育要改革。外国语也还是要学的，但是也要改革。我找你来是想同你商量外语教学改革的事。你想想怎么改法，反正不能走老路。我派你回外语学院搞教育改革，你愿不愿意去？”

章含之说：“主席派我去，我当然愿意。我只是怕搞不好，辜负了主席的期望。”

毛泽东说，不要紧，什么事都要试验。他又问：“你们

外国语学院过去有多少外国教师？”

章含之说：“总数我说不清，但每个系都有，英语系最多的时候有十多个。”

毛泽东问：“这些人现在在哪里？”

章含之答：“都不在了。多数因为学校闹革命，停了课，都回国了。也有个别的支持过一派，被抓起来了。”

毛泽东：“喔!要弄清楚再解决。”他又问到：“你觉得将来还需不需要请外国人来教书？”

章含之说：“至少对外语教学是完全需要的。”然后仔细地讲了她的意见。

毛泽东点头说，有道理，并说 “学校要开始招收新生，也可以有选择地请一点外国人来教书。”他让章含之向周恩来报告他和章含之的这次谈话，并“请总理具体落实”。

一个月前，北京外国语学院在 8341 部队率领下离开北京前往湖北沙洋干校。当时周恩来考虑到章士钊无人照料，在请示毛泽东之后，建议章含之留在北京，安排去北京针织总厂劳动。所以此时，章含之向毛泽东要求，立即去湖北沙洋与学校的大部队一起进行教改。毛泽东嘱咐她一定要安排好父亲的生活后再动身。并说给章含之半年期限把教改方案搞好，准备重新招收新生，第二年秋季入学。

毛泽东说：“教学改革就这样办，你去告诉杨德中同志和周总理，具体事你们去办。我还有一个建议和你商量，你

搞完外语教改之后就不要呆在学校了。中 国需要女外交家，我看你就可以。你这位女同志蛮不简单，能说还能写。你还很有点勇气，你给我的信我都看了，写得不错，有说服力。我们需要这样的女同志去搞外交。所以搞完教改你就去外交部报到。你要是同意，我告诉外交部。”

从毛泽东那里出来后，章含之先向中央警卫团政委杨德中作了报告，之后又向周恩来汇报。

6 月 27 日，中共中央同意并批转《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关于招生（试点）的请示报告》，供各地参照执行。《报告》认为：经过三年来的文化大革命，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两校已具备招生条件，计划于下半年开始招生。

7 月中旬，章含之一行 7 人奔赴湖北沙洋外语学院五七干校，贯彻毛泽东改革外语教学的指示。10 月 15 日，国务院电告各地，1970 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按北大、清华请示报告提出的意见进行。

9 月 1 日，北京大学为第一届工农兵学员在北大东南角的大操场上举行了隆重的开学典礼。典礼由 8341 部队的政委、兼北京大学党委书记的杨德中主持。会议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精神，要求大家为“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争光、争气”。并指出：工农兵学员的任务是：“上大学、管大学、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

江青、姚文元等人特地在中央开会时请假前来出席这次

活动，一直到中午 12 点开学典礼结束，他们才匆匆忙忙地坐车离开。

开学典礼结束后的第二天，工农兵大学生开始正式上课学习。

本年度北京大学共招生 2665 人，其文化程度为：高中 171 人，初中 2142 人，小学 79 人。

1970 年 6 月 18 日，周恩来将一份反映北方七省煤炭产量下降情况的简报批给李先念、余秋里，指出：要抓这 7 个省的松劲现象，要“敲警钟”。“因为这七个省都在北方，除了河北、黑龙江、北京外，均减产。这不是个别问题，而是在‘一打三反’加‘增产节约’运动后一种反常现象，应引起各地严重注意。防保守，排极左，仍然是当前主要任务。”

6月27日，周恩来就举行成昆铁路、焦枝铁路通车典礼事批告以中共中央名义前往参加庆祝活动的吴法宪、纪登奎：“不要铺张浪费，要做增产节约的模范。”

7 月，在湖南衡东县国家科委的“五七”干校，出现了一张“炮打”江青的大字报。

大字报的作者，颇有来历，乃陈云夫人于若木也。她先写了一份交给党组织的揭发材料《铺张浪费、挥霍无度的盖子必须揭开——江青是党内最大的剥削者、寄生虫》，接着，她又于 7 月 3 日贴出一张题为《必须揭开铺张浪费的盖子——江青是马克思主义者还是修正主义分子》的大字报，说

的是 1962 年在上海的事情：

1962 年春天，于若木随陈云到上海，住进上海交际处的一所房子。刚一进门，就感到异常豪华，尤其是清一色的绿颜色，别具一格：地毯是绿的，沙发是绿的，窗帘是绿的，甚至桌子也是用绿绒布包了的，连厕所里马桶的盖子和坐圈也用绿丝绒包着，房子的所有窗户都是三米多高的落地窗，每扇窗都是两层窗帘，且系用高级质料做成，仅窗帘布就不下几十匹。

陈云同志说："这房子过去我住过，怎么现在全变了？"

原来，这是专为江青整修的。在上海，像这样布置的江青住所还有三处……

奇怪的是，于若木的大字报贴出后，竟然没有人理会。

7 月，周恩来、康生等中央领导人又接见了在唐山学习班的几位内蒙古负责人。

7 月 17 日，中共中央修改宪法起草委员会在京西宾馆举行全体会议，与会的委员 55 人。中央修改宪法委员会委员是 57 人，分别担任正、副主任的毛泽东和林彪没有出席会议。会议仍由周恩来主持。

委员们进会场不一会儿，周恩来就到了。他满面笑容，亲切地和大家打招呼。小组会议由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主持。这位将军是员战将，不善言辞，主持会议开场白没几句

话就没词了。

头一个发言的是辽宁工人出身的中央委员尉凤英。她第一句就说："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毛主席教导我们说……"

周恩来马上打断："尉凤英同志，你已经是中央委员，不是普通工人，以后说话要注意。主席多次提出不要'四个副词'我们就不要这样用了。学习毛泽东思想，不在于能引用毛主席的只言片语，而是要学习、领会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要学会运用毛泽东思想的立场、观点、方法去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四个副词，引用只言片语，主席是不赞成的。"

周恩来说完这话，目光又转向与会人员说："我在这里说这些，是想请大家注意，我们要尊重主席的意愿，学习毛泽东思想要讲科学。在修改宪法过程中，我们要宣传主席对马列主义国家学说的发展。"

周恩来还对与会者说起 5 月 20 日集会后的一天，毛泽东和周恩来、林彪到人民大会堂开会。他一下车，看见北门上挂着他的画像，马上发起脾气，将大手一挥说："我的像到处挂，叫我给你们站岗放哨，风吹雨打日头晒，残酷无情！统统摘下来，不摘下来，我就再也不进大会堂。"

一进北大厅，毛泽东又对到处挂着的《毛主席语录》说："我那几句话就有这么大的作用？到处写，到处挂，讨嫌。"

他扭头对周恩来说："恩来，叫人统统摘下来！"

周恩来马上叫来大会堂的党委书记，让他亲自布置，将大会堂北门、南门、西门的毛泽东画像摘下来，只保留东门的。大会堂各厅的《毛主席语录》，大多数换成了国画。少数毛泽东手书的诗词，作为书法作品保留了下来。后来，京西宾馆也参照大会堂的模式进行了处理。

周恩来用如此毫不含糊的语言谈论这个问题，并要求大家改变多年里形成的被认为是最热爱毛泽东的方式，让与会人员都不由地内心一震。

当晚，周恩来又召集中南组开会。参加会议的叶群迟到了。她一进来，就谦恭地哈着腰一面与会议室的每个人握手，一个一个地问好，一面说："唉，我迟到了，太忙了，忙得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果然，刚落座，服务员就用托盘送饭进来了。

7 月 18 日，周恩来在中央修改宪法起草委员会全体会议小组会上发言时说："可以考虑不设国家主席、副主席。"

7 月 22 日，周恩来主持中央修改宪法起草委员会会议，再次出现要求设国家主席的意见。毛泽东听说后表示：设国家主席，那是形式，不要因人设事。

7 月 26 日，林彪与叶群前往北戴河避暑。

7 月 27 日，政治局开会讨论纪念"八一"建军节"两报一刊"《提高警惕，保卫祖国》的社论文稿时，就社论中要不要把"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缔造和领导的、毛主席和林副

主席直接指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一语中的“毛主席和”四个字去掉一事，陈伯达与张春桥发生争论。

文革前，文章中一般只提毛主席“缔造”或“领导”。1967 年 4 月 28 日《红旗》杂志发表《热烈响应拥军爱民号召》社论，称解放军是“毛主席亲自缔造的、林彪同志直接指挥的”。1969 年“两报一刊”国庆节社论《为进一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斗争》中，又改为：解放军是“毛主席亲自缔造和领导的、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直接指挥的”。

这次讨论，陈伯达主张用 1967 年的提法，即“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缔造和领导的、林副主席直接指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而张春桥主张用 1969 年的提法，即“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缔造和领导的、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直接指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双方为此争论激烈，相持不下。主持会议的周恩来最后说：“还是请主席决定吧。”结束了这场争论。

当时毛泽东住杭州，患白内障，视力模糊，看不了文件。周恩来将会议争论的情况写信过去，由汪东兴读给毛泽东听。

毛泽东听后，让汪东兴代他划圈后退回去。

汪东兴觉得此事重大，就把信带在身边，等有机会当面向周恩来说明。

不久，毛泽东、周恩来在上海锦江饭店接见外宾后，周恩来、黄永胜都问“那个报告主席圈阅了没有？”汪东兴说：

“你们去问毛主席。”

当时，毛泽东正在一旁点燃一支烟抽着，听到他们的对话，不高兴地对汪东兴说：“怎么搞的？”

汪东兴照实说道：“主席，这么大的事，我不敢圈。再说，两种意见，您到底赞成哪一种？”

毛泽东把长长的烟灰抖到烟灰缸里，表情平淡地说：“两种意见我都不赞成。缔造者不能指挥，能行吗？缔造者也不光是我，还有许多人。”

汪东兴下楼从皮包里拿出信来，当着周恩来、黄永胜的面，按照毛泽东的意见作了圈阅，但还是删去了“毛主席和”四个字，恢复1967年的提法。

第1132回：声震瓦，修宪会争论激烈

被判刑，抓《知青之歌》作者

7 月 31 日，周恩来召集国务院业务组会议，审议原煤炭工业部部长张霖之 1967 年 1 月的死亡问题。当天，国务院给煤炭工业部发出关于张霖之问题的《通知》：“国务院业务组于 1970 年 7 月 31 日会议，审查了煤炭部军代表 1970 年 5 月 20 日和 7 月 31 日两次报告，以及首都驻北京矿业学院工、军宣队专案组 1970 年 5 月 17 日的报告，同时，并阅看了反革命分子戚本禹 1966 年 12 月 24 日在矿院的公开演说。大家一致认为：张霖之同志的历史是清楚的。张霖之同志在矿院全校广播中听到戚本禹反革命分子这种威胁和煽动的语言，而身体已受到重伤，自不能不陷入极度紧张状态，因此，致张在武斗和逼供的混乱中死去。根据当时情况，矿院专案组的报告只涉及各项经过的表面现象，还需要依照煤炭工业部所掌握的全面材料，认真地予以澄清。”《通知》决定：“张霖之同志的死亡，应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张霖之同志家属和他的子女不受任何牵连，应按革命干部家属看待。”

8 月 4 日，林彪在北戴河会见周恩来，并谈话。

8 月 13 日下午，中央修改宪法工作小组继续在怀仁堂召开会议讨论修改宪法。会议由康生主持，陈伯达、张春桥、吴法宪出席。这次会议争论异常激烈。用陈伯达的话说，当

时是“声震屋瓦”。

首先是关于设国家主席问题。康生提出不设，吴法宪坚持主张设，争论不下。最后康生说；那就各自保留意见吧，以后提交政治局讨论。

这个问题就这样放下了。

当讨论到国家机构的问题时，吴法宪说国务院的这一章应该写上“毛泽东思想是国务院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康生和张春桥一起反对，说：“再写上重复，毛主席也不同意写。”

张春桥说：“有人口口声声马列主义到处都挂。”吴法宪认为张春桥这句话是冲着他去的。

没想到张春桥接着又说：“到处堆砌毛泽东思想，并不是马列主义；有人口口声声说天才地，全面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列主义，连赫鲁晓夫都是天才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列主义呢。这简直是一种讽刺。”

吴法宪认为，张春桥的话是冲着林彪《＜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来的，当即就说：“张春桥，你这话是什么意思？是指谁说的？请你解释清楚。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是谁提出来的？你这句话过份了吧，你这是在讽刺林副主席吧？你张春桥这里不写毛泽东思想，那里不写毛泽东思想，倒是你捍卫马列主义了，可是你的文章哪一篇里不写毛泽东思想，你算不算堆砌？你说

赫鲁晓夫何时天才地发展了马列主义，你口口声声赫鲁晓夫，你指的是谁？”

吴法宪这话一说，张春桥一下就急了，说：“我不是这个意思，是毛主席说的，赫鲁晓夫发展了马列主义。”

吴法宪追问他：“毛主席在哪里说过？我怎么没有听到过？”

张春桥一时说不上来。

吴法宪又拍着桌子说：“你今天吹这样的风是干什么？用意何在？中央政治局的人刮此风，刮到下面就会愈刮愈大。今后中央怎样解释？毛泽东思想为指针你们不赞成，天才地，全面地，创造性三个副词你也反对，你们不准称天才，你想借口毛主席伟大谦虚贬低毛泽东思想，我坚决反对你这种谬论。”

这时康生也着急的说：“好、好，在国务院的前面加上‘以毛泽东思想为指针’就是了。”

吴法宪说：“我是个人的意见，写不写由你们决定，因为我是宪法修改小组的成员，有权提出个人意见。”

康生连忙说：“对、对、对，写上、写上。”

在会议中间，吴法宪又打电话给黄永胜，通报会议上的情况。黄永胜即打电话报告了林彪、叶群。

双方争论时，陈伯达不在会场。

不过，这次会议对宪法修改起草最终有了一个明确的方

案：（一）序言不与总纲合并，以三十条方案的序言为基础修改。（二）宪法结构不变。（三）宪法为“不设国家主席”的方案。

小组会议散后，陈伯达邀吴法宪到他家里，陈伯达说吴法宪今天的话讲得好，“敢于斗争”，并要吴法宪把情况报告林彪。

在陈伯达的家里，吴法宪给周恩来打了电话，汇报了中央修改宪法工作小组下午讨论时争论的情况。

回到家里，吴法宪又向正在北戴河的叶群打了长途电话，报告了情况。过了一会儿，叶群回电话说：“101 很高兴，说：吴胖子放炮放得好。”

于是，叶群又忙乎起来。当晚和第二天，14 日下午，她分别打电话给陈伯达、黄永胜，要他们准备关于天才方面和四个伟大方面的语录，准备在 8 月 14 日晚政治局会议讨论宪法草案定稿时，支持吴法宪。

8 月 14 日，黄永胜也给李作鹏打电话说：吴法宪现在很孤立，要李作鹏回来参加宪法小组工作会议，以壮声势。

说来奇怪，在第二天，8 月 14 日晚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讨论宪法修改草案定稿，张春桥与康生出乎意料地默不作声，缄口不语。宪法草案“一读”就通过了，连主持会议的周恩来也感到有点反常。

8 月 17 日，林彪对秘书说：“把 1954 年宪法对资产阶

级是怎么提的，现在宪法稿又是怎么提的，翻一翻，看有什么区别”。

蓝蓝的天空白云在飞翔

美丽的扬子江畔啊

可爱的南京古城

我的家乡

啊……

雄伟的大桥横跨长江

威武雄壮

巍巍的钟山

就虎踞着我的家乡

告别了妈妈

再见吧我的家乡

金色的学生时代呀

就伴随着青春的史册

一去不反

啊……

未来的生活

多么艰难多漫长

生活的道路

就夺取了我的理想

随着太阳出

伴随着月儿归

沉重的修理地球

那是我那终身的职责

我的命运哪

啊……

心上的人哪

告别了你奔向远方

爱情的花朵

就永远不能开放

不能开放

不能开放

不能开放

不能开放

……

这首歌原名《我的家乡》，又名《南京知青之歌》。它的作者是南京的知青任毅。

任毅原是南京市五中 66 届高中毕业生。他从小就兴趣广泛，爱好艺术。小学参加过南京市著名的小红花艺术团，学过唱歌。中学时又参加南京市中学生艺术团，学过二胡和

吉它。

1968年年底，正好是12月26日，毛泽东生日那天，南京五中的一批学生坐着大卡车，经过南京长江大桥，来到江浦县插队落户。任毅所在的生产队正好是公社所在地，于是他们这个知青点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了全公社知青聚会的地方。

1969年夏收之际，南京知青中普遍弥漫着一种下乡后的失望情绪。任毅在门上贴了这样两段毛泽东的语录：

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

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

全公社的知青跑到他们这里来聚会，大家情绪都很低落，感到前途渺茫，于是弹吉它的人又多了起来，当时他们那里甚至有“吉它之乡”的称号。大家聚在一起，就唱过去的歌，其中一首，他们唱得特别动情，歌名叫《流浪人归来》：

流浪人归来，

爱人已失去。

内心无比凄凉，

我活……为什么？

应该怎样活？

我不敢想，

也不愿想，

前途在哪里？”

1969 年 5 月下旬的一个晚上，南京五中的知青又聚在任毅那个小茅屋里，又把那些歌轮番唱了一遍。唱完之后，大家仍然觉得空虚。这时任毅的一个朋友唐又龙忽然站起来对任毅说："工人有工人的歌，农民有农民的歌，任毅，你就写一首我们知青的歌吧。"

当晚，任毅就抱着吉它谱写了《我的家乡》，整整一个晚上……当第二天天色发亮的时候，这首歌已经完成了。

任毅在歌谱上写下了演唱要求："深沉、缓慢、思念家乡的"，然后又写下了"南京市五中集体词曲"。

这首歌曲，任毅是在《塔里木，我的第二故乡》这首歌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的，节奏也搞得复杂一些，有 2 / 4、3 / 4、4 / 4 拍，使它能够更好地表达知青思乡的情绪，歌词是重新填过的。《塔里木，我的第二故乡》是 1964 年一批南京五中毕业生志愿到新疆后创作的。

《我的家乡》这首歌一完成，当即被人拿去传抄。然后就开始以一种惊人的速度在知青中间流传开来。

夏收之后，任毅在回南京的轮船上听到有人唱这首歌，于是就走过去，故意问："你们唱的是什么？"

那些人很不屑地回答他："看你的样儿倒象是个知青，怎么连这个歌都不知道，这叫《知青之歌》!"

其实当初他写这首歌时并不敢称为《知青之歌》，因为这里既没有豪情壮志，也没有宏大理想，它只是表述了一种

思乡情绪，表述了知青作为一种非工、非农、非军、非学的特殊阶层的强烈失落感，而这种情绪在当时是绝对不允许公开表现的。

据说，有一伙上海知青在去黑龙江的火车上，一路吟唱这首歌。江西有一个县的知青在开会前的拉歌比赛中，居然也唱起了这首歌。当时任毅的一些朋友学着列宁评价《国际歌》的口气说，“凭着这首《知青之歌》，你任毅可以到处找到朋友，找到吃，找到住。”

但是，对任毅来说，他没有找到吃、找到住，却是不幸降临……

1969 年 8 月，一个令人吃惊的消息传来，任毅有个同学叫郑剑锋　爱装半导体收音机。有一天他在调试收音机时，忽然听到了莫斯科广播电台在播放任毅写的那首歌，他感到很意外，于是立刻偷偷地告诉了任毅，并约他第二天在同样的时刻再去听。

第二天下午 16 时，他们躲在郑剑锋家的小屋子里，偷偷地把半导体收音机拨到莫斯科广播电台的频率上，果然很快就听到了那首歌，他们把它称之为《中国知识青年之歌》，并采用男声小合唱的形式，配上小乐队伴奏，效果搞得很不错。当时任毅都听呆了。

一来他还是头一次听到自己这首歌正规演唱的效果，没想到它的感染力竟有这么大；二来他意识到莫斯科广播电台

演唱了这首歌，实际上已经把他置于死地，他的罪名是脱不掉的。要知道当时中苏两国就要打起来了。

1970 年 2 月 19 日，阴历正月十五晚上，那是任毅永远也无法忘怀的日子。窗外手电筒雪亮的光柱不时射向茅屋的每个角落。任毅的箱子都被打开了，来抓他的人什么也没找到，因为不久前任毅烧完了所有的文字东西。

“带上你的洗漱用品，跟我们走！”

任毅举起戴着手铐的手，轻轻摘下那已经准备好的放满牙刷、牙膏、手巾和换洗衣服的书包，随手套在头上。在拿枪的军人押送下，走出了房门。

1970 年 8 月 3 日，任毅在全省公判大会上被判处 10 年刑期。

从 2 月 19 日被抓到 8 月 3 日被判决，这 5 个月时间里，任毅天天被提出去审讯，而且经常是在夜里。

他们逐字逐句地审查那首歌的歌词，光是一句“生活的脚步深浅在偏僻的异乡”，他们就问了任毅好几天，一定要逼他承认当时不是写的“深浅”而是“深陷”，任毅因为自己确实写的是“深浅”，所以拒不承认。虽然是一字之差，可在当时份量大不相同。“深浅”，可以批判是知识青年身上还存在着没有得到改造的小资产阶级的不彻底性，没有工农兵那种一往无前、脚踏实地的精神，所以脚步是深深浅浅的，而“深陷”就是对上山下乡的一种污蔑了。

为了攻下“深陷”这个堡垒，他们在任毅面前抛出了几十个版本的“知青之歌”，都是从全国各地搜查来的，有油印的、有打字的、有复写纸的、有手抄的，　各种样式的都有，其中确实有不少都是写的“深陷”。

在审讯任毅的5个月期间,将他提出去批斗是家常便饭，专门有一个批判的小分队，将他拖来拖去地巡回批斗。知青们对他怀有很大的同情。有一次在开完批判会之后，很多知青都涌到前面来，有人示意他到厕所去。在那里，他们挡住了看管人员的视线，往他的上衣口袋里塞了80元钱和50斤粮票。知青们的同情使任毅感到了活下去的希望。

8月4日，北京建工学院“八一战斗团”负责人之一的女学生董临平在审查“516”，追查“围困中南海事件”中自杀身亡。

8月29日，宁夏银川市革委会宣判“共产主义自修大学反革命集团案”。

“共产主义自修大学”是由13名66、67届大学和中学毕业生于1969年11月在银川成立的自修组织。他们中年纪最大的26岁，最小的21岁。其中有3名是知识青年。实际组织者吴述樟，文革开始时是银川二中学生，后来是“宁三司”银川二中分部的成员。他们1968年底以后或分配工作或插队落户，分散在六个地区，但保持通信关系，交流思想，探讨问题。吴述樟分配在西吉县玉桥公社。1969年国庆前夕，

他们创办了一个称为名叫《学刊》的油印小报，刊登每人写的理论文章、读书笔记和调查报告。11 月 13 日，吴述樟和他的哥哥、宁夏大学毕业生吴述森及北京农业大学毕业生鲁志立，还有原“宁三司”银川二中分部的成员陈通明、张维智聚会在一起，决定成立一个“学习小组”性质的组织，名为“共产主义自修大学”。

《共产主义自修大学守则》中写道：要“培养和造就一批真正地而不是形式地、踏实地而不是虚浮地、勇敢地而不是怯懦地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发展，有政治远见，具有独立的思想和工作能力，富于牺牲精神，探索并了解现代社会的运动规律，誓为世界上绝大多数人谋利益，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的坚强的革命战士。”

《守则》还说，“自修大学”是以“刊物为中心，通过自修与交流讨论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学习”。

《学刊》自筹经费印过两期，刊登了 6 篇文章和 3 篇农村调查报告。其中有对林彪《再版前言》的批判。而在《迎接七十年代第一个春天》文中，吴述森说：

“通过五十多年的实践以后，我们今天需要强调说，承认阶级斗争，承认无产阶级专政，并且同时承认无产阶级专政是从有阶级到无阶级的过渡，是消灭阶级的手段，而不是制造新阶级，实行权力、财产再分配的变革，才是马克思主义者。”

而鲁志立的《什么是法西斯主义》则写道："禁止一切为世界公认的民主权利，以至人民的思想和言论自由，残酷镇压一切反对或仅仅不同意暴力统治的人民，甚至采用公开的暴力手段。""人为制造阶级与阶级划分论等来迷惑笼络一部分人以达到镇压人民的目的。此外还竭力推行愚民政策，实行奴化教育，提倡奴隶主义的盲目服从精神，宣扬个人迷信和领袖至上的神话，从意识形态上已堕入了完完全全的唯心主义。"

1970 年春节后，这个组织及其活动被揭发。3 月 12 日吴述樟在西吉被捕，很快鲁志立在北京被抓获，吴述森、陈通明、张维智等分别在宁夏各地被押解归案。另一些则在本地监押。

在"一打三反运动"中，这个组织被定为"打着研究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旗号，进行旨在推翻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的一个反革命组织"，"有组织、有纲领、有计划、有策略、有言论、有行动的现行反革命集团"，"是一个十足的帝修反的别动队"。他们的罪证，就是他们在两期《学刊》上印出的文章和他们的来往书信。

这 13 名青年中，女青年熊曼宜在关押期间触电自杀，吴述森、鲁志立、吴述樟 3 人以"反革命罪"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陈通明被判处无期徒刑；徐兆平被判处 15 年徒刑；张维志被判处 8 年徒刑；张绍臣被判处 3 年徒刑。

## 第1133回：轰隆隆，“行宫”上面建机场
## 开全会，众仙纷纷登庐山

8月下旬，中共中央准备在庐山举行九届二中全会。为了做好全会的安全保卫和接待服务工作，作为东道主的江西省革委会专门成立了接待委员会，由革委会主任程世清、副主任杨栋梁、常委文道宏、陈昌奉，还有马志勇组成。

根据程世清要求，政治局常委上下山时，一般提前两个小时戒严，并在45分钟前派出一辆检查车，巡逻检查哨位，实行单线行车。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上下山时分段戒严，实行半单线行车。毛泽东上山时，从九江火车站到威家一线全长20多公里，定350个哨位，安排406名战士。由威家到隧道口，又定100个哨位，安排200名战士。此外，为加强上山车辆和人员的控制，上山汽车一律由交通组发放统一通行证。山下人员确因工作需要或其他特殊原因，一律到九江南湖宾馆由九江地区保卫部开具证明，方可到车站购票上山。由南昌运往大会的物资，指定运到威家，然后由物资组派生活专用车到威家转运上山。凡家庭、社会关系和个人历史复杂的人员，统统举家迁往山下安置，牯岭东谷机关单位和居民全部搬迁到西谷，定点、定时、定人设立哨卡，确保大会绝对安全。

对程世清亲自设计并监工、几乎一只野兔也溜不过去的这张安全网，汪东兴却看出了一个天大的漏洞。

早在 7 月 2 日，汪东兴就召集中央警卫局开会，对九届二中全会的警卫和服务工作进行了细致的安排：

首先，由负责玉泉山警卫的警卫处副处长李钊带队，提前上庐山为会议打前站。警卫值班室、警卫团、交通科等部门，都要派人去做会议准备工作。打前站的人到庐山牯岭，先要看房子是否能住；将大会会场、小组会场看好和布置好；还要到庐山下的九江市，把落脚点准备、布置好。

第二是交通工具的准备。汪东兴估计会议上大概需要汽车 50 辆左右，大部分都从北京运过去，如果还不够用，再临时从湖南和湖北的武汉借用一部分。

负责通信联络的部门，要把会议区域内的电话安装好，从庐山上到九江市的电话线路如何装设，要进行勘察。电话和线路装设完毕，要认真检查，一定要确保联络的通畅。

对会议期间的服务招待、伙食等问题，汪东兴也作了安排。为了方便参加会议的委员们，可以设些小卖部，还要加设几个食堂。厨师不够，可以从有关部门调一些去。

他要打前站的人先到江西省军区了解一下，能派多少部队上庐山会议区域执勤。除了随卫之外，警卫团还要去人参加警卫值勤。在会议前，还须对会议区域一带的可疑人员进行清理。

汪东兴提出值班室警卫一科要派两个人，先到九江的飞机场了解一下情况，确认机场究竟能降落什么型号的飞机？

是否需要换乘飞机？在哪里换乘？他还吩咐医疗保健门诊部，也要先去几个人，做相应的准备。

最后，汪东兴强调，所有的准备工作，必须注意保密。

庐山会议前，汪东兴提前到庐山看毛泽东要住的房子。谁知到了庐山一看，他吓了一跳。原来在毛泽东的住房上边，正轰隆隆地炸石头。

“这是在搞什么？”汪东兴赶紧问身边的程世清。

“在修飞机场。”程世清说。

汪东兴不解：“怎么能在这里修飞机场？”

程世清说：“这块地方大，直升机降落比较安全。”

汪东兴问：“你们在这里修机场，是经过哪里批准的？”

程世清说：“是军委批准的。”

汪东兴问：“什么时候接到的命令？”

程世清想了一想：“前天收到的命令。”

汪东兴马上到现场去看了一下，飞机场已经快修好了。

汪东兴说：“这个机场就在主席住房的上面，这样会影响主席休息和办公。”

程世清问：“那怎么办？”

汪东兴没有说话。

回到杭州，他把修机场的事报告了毛泽东。

毛泽东问：“谁下的命令呀？”

汪东兴说：“不知道。”

毛泽东说："你打电话问问总理，看他知不知道。"

汪东兴打电话问周恩来，周恩来说："我也不知道。"

汪东兴说："这可就麻烦了，你也不知道？"

周恩来马上询问黄永胜，黄永胜答复周恩来说，他知道有这么回事，"因为有些老同志要上庐山，坐汽车走盘山路身体受不了，坐飞机又快又安全，空军就准备了几架直升机。"

周恩来问："你这么决定，报告中央了吗？"

黄永胜说："报告了林副主席。"

于是，周恩来对汪东兴说："是林副主席批准的。"

汪东兴报告了毛泽东，毛泽东点了一下头，没再说什么。

程世清没有料到，这个直升机场本是由中央首长专机师师长时念堂和空军航行局局长尚登峨两位一起专门到九江机场和庐山会场附近勘察地形后定下的。然后派两架伊尔-14 和四、五架云雀直升机前去值班。空军副参谋长胡萍亲自带领机组和地勤保障人员驻在山上。

8 月 18 日，周恩来和吴法宪研究如何运送全国各地的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上庐山开会。考虑九江机场的跑道短，大型飞机不能降落，决定先用飞机送到安庆，然后用安-24 小飞机转到九江机场落地，再用汽车送上庐山。

空 34 师的专机全部调用，可以在两天以内，将全会 255 名代表从全国各地全部送到庐山。

为了保证安全，布置防空，防止北面的苏联和南面台湾国民党空军的搔扰。

吴法宪回到空军司令部后，立即安排布置飞行计划，并且在安庆机场设一个指挥所，派空军副司令员曾国华前往安庆机场进行直接指挥调度。

这天晚上，周恩来打电话给吴法宪，要他第二天把两个文件，“宪法修改草案”和中央军委的“战备工作报告”带到庐山，交给毛泽东。周恩来嘱咐：“等主席到了庐山后，要尽快交给他。”

8 月 19 日这一天，北京的天气不好，下着毛毛细雨。吴法宪早上 7 时多赶到北京西郊机场。7 时 40 分，江青到了。但此时周恩来让吴法宪带的文件还没有送到。江青听了后问吴法宪：“为什么这两个文件叫你带而不叫我带呢？”

吴法宪不知如何回答，只好含糊其词推托而过。

等了一会儿，文件还没有送来。江青急了，叫吴法宪打电话去催一催。吴法宪只好打电话问周恩来的秘书，回答说：“马上就到。”

吴法宪安排装运江青汽车的飞机先起飞。

又等了一会儿，文件终于送来了，吴法宪、江青上了飞机，一位乘务员满面笑容地引导他们进了前舱。前舱有沙发、扶手椅、办公桌和床铺。他们坐在沙发上喝茶、寒暄了十几分钟以后，吴法宪说：“今天江青同志起床早，现在休息休

息吧，您有什么事再叫我们，我们过去了。”

飞机到了安庆，天气转好。江青、吴法宪等人下了飞机，没有进候机室休息，上了一架苏制安-24 小型客机，不一会儿就起飞了，过了长江，很快就到了九江机场。原 26 军副军长兼参谋长、时任江西省军区司令员、江西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的杨栋梁在九江机场迎接。他告诉吴法宪：

“毛主席的专列正从南昌开过来。”

九江的天气一丝风都没有，闷热难耐，使人喘不过气来。停机坪周围来了不少人，大部分是中央警卫局的警卫人员、服务人员、司机等。

吴法宪对江青他们说：“你们先走吧，我在这里还要等几架飞机的降落。”

江青说：“那好吧，我们先走了。”

吴法宪要杨栋梁先安排江青上庐山，自己留在九江机场，一是准备把周恩来委托他带的两个文件交给毛泽东，二是要接一下从北京和各省来的人，同时布置一下飞机调度和防空的问题。

江青的坐车是苏制吉姆轿车，前后还有开道车、随车、机动车各一部。车队在郁郁葱葱的花草树林间的大路上拐了数个弯，旋了数个之字形的路段，就感到空气清新、气候凉爽了。再穿过一个拱门式的大隧道，就到了庐山牯岭街上。

江青住在过去蒋介石和宋美龄住过的美庐。毛泽东以前

来庐山时就住在这里，这一次让给江青一个人居住了，因为毛泽东住到了脂红路 175 号。

脂红路 175 号别墅从前属于美国亚细亚银行，建造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这幢用高墙围起的别墅，便于保卫，所以汪东兴选择这里作为毛泽东的住处。

江青上山以后，精神很愉快，一身轻松。刚安顿好，她就笑着对杨银禄说："请你把老邬请来，我问他一件事。"

老邬是中央警卫局副局长邬吉成。他来了以后忙问杨银禄："江青同志找我有什么事？"

杨银禄说："今天你不用紧张，她精神好，挺高兴的。"

江青见到邬吉成就问："主席上山了没有？"

邬吉成回答："还没有听到主席已经上山的消息。"

江青说："那你现在就乘车下山到九江，找吴法宪了解主席什么时候上山。要特别注意主席的安全问题。"

邬吉成刚走，江青又对杨银禄说："老邬刚上山，现在又叫他下山了，他太辛苦了。"

像这样的客气话，杨银禄还从来没有听江青她说过。

中午，杨栋梁带吴法宪到九江宾馆吃了饭，然后一起去火车站接毛泽东。

8 月 18 日下午 14 时，毛泽东离开居住了 3 个月的杭州，乘专列从杭州出发去江西庐山，参加党的九届二中全会。

19 日下午约 13 时，毛泽东的专列驶进九江火车站，见

到汪东兴从车上下来，吴法宪迎上去，告知：“总理有两份文件要转交主席。”

汪东兴说：“主席正在休息。”

吴法宪便把这两个文件交给了汪东兴，请他转交给毛泽东。他又回到九江机场继续接人。

吴法宪刚回到机场，就遇见江青派来的警卫团的两个干部找他，说是江青上庐山时，看见一路上都是哨兵，100 米一个，太多了，要撤掉。

吴法宪赶紧打电话给杨栋梁，把江青的意见转告给他。

杨栋梁听后感到很为难，说：“主席要上庐山，撤掉不行啊！”

吴法宪给他出了个主意说：“你想办法把哨兵撤到隐蔽的地方去，让上山的人看不见就是了。江青的意见，不办不好呐。”

杨栋梁觉得这是个好办法，就说：“马上照办。”

下午，毛泽东在九江市下了火车，由程世清和杨栋梁陪同，换乘汽车登上庐山，在庐林湖游泳 25 分钟，尔后在“芦林 1 号”休息。晚上住在脂红路 175 号。

芦林湖的雨中风景

“芦林一号”别墅是专为毛泽东在庐山工作和休息修建的，离枯岭街 25 公里，坐落在庐山牯岭南面吼虎岭下芦林湖畔，九奇峰下，三面环山，背倚芦林湖，依山临水，风景秀丽，幽绮胜绝，人称芦林别墅。因为房号是一号，故亦称“芦林一号”别墅。这一带原来是一块山间小盆地。1955 年，庐山人利用这里的有利地形，在芦林玉屏峰和星洲峰之间筑起了一座巨大的坝桥，蓄水成湖，以桥为路，于是，在这里形成长桥卧波、影落平湖之佳景胜境。

1949 年后，毛泽东曾三次登上庐山。第一次是 1959 年，召开党的八届八中全会，毛泽东住在 180 号房,就是美庐别墅，住了 51 天。其间曾到杭州接见外宾，去了一个星期。1959 年 8 月，毛泽东离开庐山时，曾对前来送行的江西省委第一书记杨尚奎和庐山管理局党委书记楼绍明说，“过两年

我还要来的。”

他走之后，庐山管理局觉得共产党的领袖上庐山却居住在国民党首领的官邸，似有不妥，遂有建造毛泽东别墅的设想，经请示上级同意，由武汉中南设计院设计，1960 年动工兴建，1961 年暑期前竣工，取名“芦林一号”。

“芦林一号”竣工不久，1961 年 7 月 17 日，毛泽东又一次跃上葱茏，再次登上庐山。晚上 22 时左右，毛泽东一行抵达牯岭。夜幕中，车队停到 180 号别墅门前，毛泽东又一次下榻在“美庐”。

可能是因为“芦林一号”刚刚竣工，屋内比较潮湿或者其他的原因，毛泽东这次在庐山，只在这里住了一夜，一般都是晚上住在美庐，白天基本上在“芦林一号”办公、活动。当他第一次步入“芦林一号”时，看到建筑如此豪华，笑着对身边陪同的江西省委和庐山党委的领导说：“怎么搞得咯样考究哟！”

毛泽东第二次上庐山，于 1961 年 8 月 23 日至 9 月 16 日在庐山举行召开了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也称“第二次庐山会议”。

1961 年 9 月 6 日傍晚，毛泽东外出散步，登上了牯岭西北面的仙人洞。这个悬崖石壁上的天然石洞，洞口有 700 多年前的石刻，洞旁还有傲然挺立的青松。夕阳西下，仙人洞周围被朦胧、迷离的暮色所笼罩。

毛泽东第一次上庐山，曾挥笔写下了气势恢宏的诗篇《登庐山》：

一山飞峙大江边，

跃上葱茏四百旋。

冷眼向洋看世界，

热风吹雨洒江天。

云横九派浮黄鹤，

浪下三吴起白烟。

陶令不知何处去，

桃花源里可耕田？

这次他从仙人洞回来后，又挥笔写下了七绝《为李进同志题所摄庐山仙人洞照》：

暮色苍茫看劲松，

乱云飞渡仍从容。

天生一个仙人洞，

无限风光在险峰。

李进，即江青，所摄照片，没有正面拍摄仙人洞，而是以仙人洞北“仙路”边苍劲的松枝为近景，摄取了仙人洞左前方的御碑亭影、空中飞动的白云、山麓依稀可见的山川等景象，画面别具一格。

1970 年 8 月 19 日，是毛泽东第三次登上庐山。

当晚 21 时，当天应到的飞机全部到达了安庆和南昌，

吴法宪便乘车上山。车到半山腰，上面下来了一辆吉普车，是江西省一个电业公司上庐山修理电灯的，和吴法宪的车对撞，差一点被掀到沟里去，车门碰坏了。情况很险，一边是深沟，一边是峭壁，好在没有人受伤，车还可以用。就这样，吴法宪勉强上了山。

吴法宪是第一次上庐山。他到了山上一看，庐山上还真不愧是毛泽东说的“无限风光在险峰”，风景很好。山上的房子都是依山势而建，因而不太集中。周恩来和邓颖超住的是过去马歇尔住过的房子，林彪和叶群住在一个院子里。林彪住在这个院子里的一排平房内，叶群则住在一幢小楼里。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几个人的住处被安排在一起，陈伯达的住处也与他们比较靠近。在他们住处的另一边，是陈毅、叶剑英、聂荣臻、徐向前 4 位老帅。当天，除了叶剑英外，其他 3 位老帅都已经到了。当晚，吴法宪抽空一一拜访了他们。老帅们都很高兴，辞别时，他们都把吴法宪一直送到了门口。

第二天，吴法宪约东道主任程世清一道下山，去接中央和各省市来的人。吴法宪和程世清过去就很熟悉，在下山的路上，程世清对吴法宪说，昨天他陪毛泽东上庐山，汪东兴对他说：“这次修改宪法，要坚持设国家主席，毛主席当国家主席，林副主席当国家副主席。如果不设国家主席，毛主席怎么当我们的国家主席呢？不设国家副主席，林彪同志往

哪里摆？”

原来，19 日中午吴法宪回机场后，程世清继续在火车站和汪东兴边聊天边等候毛泽东一起上庐山。就在聊天时，汪东兴向程世清说了这些话。

吴法宪听到这句话感到很高兴，他想，“汪东兴传的话，就是主席的意思吧。”他感到心里更有底了。

车到九江后，吴法宪和程世清就分开了。吴法宪在机场先接林彪、叶群，后来又接了朱德、李富春、陈伯达、康生、叶剑英等许多从北京来参加会议的人。下午 16 时，周恩来、邓颖超也到了。

## 第1134回：带“老虎”，空军的“两个一切”

## 接通知，上海代表团启程

8 月 20 日，林彪与叶群抵达九江机场，前往庐山。他们见到前去迎接他们的吴法宪等人时，叶群告诉吴法宪等人：设国家主席还要坚持。

到了庐山，周恩来前去林彪驻地与之交谈。

下午，陈伯达拜访林彪，谈了一个多小时。

林彪的儿子林立果作为“军委秘书”，也和林彪一起上了山，安装了六条电话专线，并带了两架云雀式直升飞机在山上待命。

此时的林立果，羽翼似乎正在丰满。那是 1970 年 6 月下旬的一天，空军政委王辉球接到吴法宪夫人、吴法宪办公室主任的陈媛圻的电话。她在电话中以神秘的语调告诉王政委：“吴司令请他来一趟，谈谈工作，一个人来，不要带别人，并派车去接。”

一辆伏尔加轿车把空军政委接到吴法宪在西山的别墅。

吴法宪和政委问候、寒暄几句，便进入要谈的“工作”。吴法宪以赞美的口吻道出了开场白：“今天请你来，主要谈谈立果的事。林立果不简单呀！他到空军时间不长，有的我们过去想都不敢想的事，他搞出来，是很大的贡献。林副主席把林立果派到空军来，是对我们最大的关怀。他现在当作战部副部长了，将来的空军领导就要靠他接班了。林立果是

代表林副主席的。他可以指挥空军的一切，调动空军的一切。”

然后又说：“我们这些人，我这个司令，你还不知道吗？不行，要靠林立果！” “我这个空军司令只是挂名的，实际空军司令是林副主席。林副主席天天在关心空军的建设……”

7月6日，在空军党委常委办公会议上，周宇驰讲了吴法宪在1969年10月17日，林立果任空军党委办公室副主任兼作战部副部长的命令下达时，对王飞和周宇驰说的：林立果在空军“今后可以指挥一切，调动一切”。

这次会议吴法宪没有出席，他的夫人陈媛圻在会上率先说：“应该向立果同志学习。立果同志在林副主席、叶主任身边，领会林副主席指示深。主要还是立果同志是天才，从各方面来讲，是我们的教师。我们要好好学习他。”

周宇驰先是大力称赞吴法宪慧眼识英才，又说：“吴司令、陈主任对立果同志的感情很深。”

会后列席的鲁珉问周宇驰，林立果在空军“今后可以指挥一切，调动一切”是怎么回事？周宇驰说：“管他呢，就这样说。”

7月9日和16日，王飞又先后在空司部党委学习会上讲了吴法宪的“指挥一切，调动一切”，随后，在空司机关党委常委扩大会议上，王飞说：“吴司令员的指示反映了空军广

大指战员的心情和愿望”，“要坚决拥护立果同志对我们的领导”，这是个“大是大非的问题”等等，并很快把这“两个一切”传到空司机关和直属部队。

就这样，一股吹捧林立果的旋风在空军越刮越猛。空军司令部、政治部、后勤部都制定了贯彻落实“两个一切”的措施。

空军政治部党委在贯彻“两个一切”的五条措施中指出：“一切重大问题，例如工作计划、决定、报告、干部配备，以及重要问题的处理等等，都要及时主动地向立果、立衡同志请示报告，争取他们的领导，真正做到大事不遗漏、不延误，小事不干扰。”“时时想到他们”，“事事请示他们”，“处处保卫他们”，“恭恭敬敬地向他们学习，”“老老实实地听从他们的调动”，“服服贴贴地听从他们的指挥”，林立果“要求做什么，就做什么”，……

7 月 23 日，林彪亲临国防科工委所属某工厂进行视察。

视察前一个多月，林立果、周宇驰就同国防科工委负责人进行了安排。视察那天，组织了成千人夹道欢迎。锣鼓喧天，鞭炮齐鸣，激动的欢迎人群，欢呼雀跃，口号声响彻云霄。

当林彪他们手举《毛主席语录》，从夹道的欢迎人群中走过的时候，位于林彪右边的是总参谋长黄永胜，走在林彪左边的就是林立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都尾随其后。

7月中旬，周宇驰、刘沛丰替林立果起草了一个“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讲用报告”初步定稿。这种“讲用报告”是当时全国各地以及部队学习毛泽东著作的一种形式，在当时很盛行。7月下旬，叶群交代林彪办公室党支部召开一个支部大会，让林立果进行“预演”。叶群对秘书们说：“林立果在空军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有一些体会，空军要他讲用，没把握，先在这里讲讲，请叔叔们提提意见，把把关。”

林立果对母亲的安排并不满意，他斜歪着脑袋，拿着稿子念，念了不到一个小时，连叶群也不耐烦了，宣布休会。然后把林立果和两个秘书叫到电话室，对林立果说：

“你讲的什么玩意？干巴巴的，都快叫人睡觉了。”

她又对两位秘书说：“你们是秀才，有什么意见，帮他出出点子。”

秘书只好应付着提了些意见。

休息后，林立果依然没有多大的改进。叶群不满意，但

她觉得时机比内容更重要，于是决定立即将林立果的“讲用报告”抛出去。她告诉吴法宪，“林办”的人对这个“讲用报告”反映强烈，都认为讲得不错。吴法宪说：“林立果是空军的干部，既然‘林办’的同志反映很好，那就叫林立果在空军的干部会上也讲一次吧。”随后，他把这个意思告诉了政委王辉球。

7 月 31 日，空军政委王辉球召集空军司令部、政治部二级部长以上的干部，在空军办公大楼的七楼会议室开会，听林立果讲学习毛泽东著作的体会。当时，吴法宪和陈绥圻正在西山。林立果的“讲用报告”开始以后，王辉球让秘书通知陈绥圻去参加会议。等陈绥圻从西山赶到了空军大院时，林立果的报告已经开始一个小时了。会议中间，周宇驰对陈绥圻说，林立果讲完是不是请她也讲几句。陈绥圻因事前没有准备，就说不讲了。周宇驰又提议：“那就带领大家喊几句口号吧？”陈绥圻就让他帮助拟几条口号。

这次，林立果没有像在“林办”那样照本宣科，而是声情并茂，举例发挥，差不多讲了整整一天。讲完以后，王辉球首先讲话，接着王飞又讲了话，他们俩人都对林立果的报告给予了非常高的评价。王飞还特别提到：“吴司令一向很欣赏立果同志的天才。吴司令说，空军的一切都可以由立果同志调动，空军的一切都可以由立果同志指挥。”

紧接着，吴法宪的老婆陈绥圻带头振臂高呼：“向立果

同志学习！向立果同志致敬！”一连喊了十几句。接着，她深情地大声地说道：“立果同志的充满辩证法的讲话，给我们空军指明了方向，字字句句都充满了毛泽东思想，它有划时代的伟大意义，我们要认真地学习、认真地领会!”

吴法宪调来林立果“讲用报告”的录音听了一遍。觉得林立果这个报告讲话的口气太大，尤其是第三部分，如果由林彪来讲还比较合适。但出自林立果之口，就显得太过了。

事后，吴法宪找到王飞，问他为什么没有经过他的同意，就到处宣传他说过的“两个一切”？王飞解释说，他当时也没有考虑到这样多，他认为，这句话无非是表扬林立果的意思，说林立果水平高，不会有什么影响。吴法宪要王飞把录音上“两个一切”的那一段删去，不要再扩散。

过了两天，林立果回到家里，问林彪：“你听了我在空军干部会讲用报告的录音了吗?”

“听了。”林彪说：“不仅仅思想语言像我的，连声音也像我的。”

几天后，周宇驰见吴法宪对林立果的“讲用报告”没有态度，就和林立果一起写了一篇稿子，让叶群按照他们拟好的稿给吴法宪打电话，用叶群去压吴法宪。在叶群给吴法宪打电话时，他俩在旁边听，看叶群是否照办。

叶群果然按他们的意思给吴法宪打电话说：“吴司令啊，老虎的讲用报告怎么样啊？有什么问题吗？”

吴法宪一听，马上说：“很——好——放了一颗政治卫星！在林彪和您的培养、教育下，林立果到空军以来各方面都有很大的进步。”

叶群听了很高兴，说：“都是吴司令你的培养。今后对立果还要严格要求，让他不要翘尾巴。”

1970 年 8 月 1 日，空军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四好连队、五好战士代表大会，简称“三代会”在北京开幕。这个会原计划 5 月 1 日召开，先后推迟了 3 次。会议代表人数原定 2000 人，也增加到 4054 人，破空军历次会议记录。会期原定 15 天，实际开了 50 多天，成为空军大型会议时间最长的一次。

这时，林立果在空军机关作报告的消息很快就传到了大会。代表们一再要求播放林立果“讲用报告”的录音，吴法宪开始有些犹豫，后来在代表们的再三要求下，也就同意了。8 月 4 日，吴法宪主持空军党委常委办公会议，决定在“三代会”上放“讲用报告”的录音。

在播放林立果“讲用报告”录音之前，吴法宪告诉王辉球，要他一定要把王飞的讲话录音删掉。陈绥圻也向吴法宪要求把她领喊的口号部分删掉，结果王辉球把自己和王飞的讲话都删掉了，唯独留下了陈绥圻喊口号的录音。

8 月 6 日和 8 月 13 日，空军“三代会”两次听林立果“讲用报告”的录音，在代表们中引起强烈反响，纷纷要求印发

这个报告。王辉球又把代表们的这个意见反映给了吴法宪。

吴法宪不同意印发，他说："林立果的报告是好的，但是有些地方还要推敲。这个报告现在不能印发，如果印发了，反而会给林副主席帮倒忙。"

接着，吴法宪又就"三代会"代表要求印发林立果"讲用报告"这件事，给叶群打了电话，谈了他的看法。

叶群完全同意吴法宪的意见，说："不要印发。"但是有空军党办的一些人推波助澜，挡也挡不住。在王飞等人的安排下，"三代会"的空直代表团作了向林立果学习的《决议》；组织了 4 个"在林立果身边工作过的人"到各代表团巡回"讲用"，从政治、军事、科学技术、生活作风等方面，把林立果捧为"超天才"。

吴法宪也在空军"三代会"上说林立果的报告是"放了一颗政治卫星，是天才"，"伟大的天才、全才、全局之才"。他说："立果同志是我们空军的骄傲，他是一颗政治明星。谁说世界上没有天才、帅才？立果就是全才、帅才、超群之才。是群众最好的领袖，杰出的政治家，优秀的军事家，卓越的思想家，天才的理论家，出色的科学家，黑夜的明灯，宇宙的巨星，无产阶级之首，七十年代的红太阳，第三代接班人……"

周宇驰说：林立果的"讲用报告"是"第二个《共产党宣言》"，"第四个里程碑"，林立果是"无师自通，不思而得"，

是“第三代接班人”。

王辉球也大吹林立果是“天才”，说“讲用报告”是“对空军建设的指示”。

民航总局政委刘锦平作为空军“三代会”会议秘书长，要求各个代表团讨论表态，开展向林立果学习的活动。

与此同时，刘锦平指示在民航驻京单位多次播放林立果“讲用报告”的录音，民航总局指挥部、政治部、后勤部机关党委分别做出向林立果学习的决定，提出“认识（林立果的）天才，拥护天才，学习天才，保卫天才”，要求大家“恭恭敬敬地向立果同志学习，老老实实地听从立果同志的指挥”。

此时的林立果也开始得意忘形，今天“接见”这个，明天与那个“合影”，甚至说“大家日夜想念我，我也想念大家”。

毛泽东知道此事后，很不高兴，对身边的人说：“不能捧，二十几岁的人捧为‘超天才’，这没有什么好处。”

8 月 20 日傍晚，吴法宪上了庐山。他刚刚进到自己的房间，就碰到叶群和林立果约了李作鹏、邱会作一起来找他。叶群说：“你们从来没有上过庐山，去看看‘仙人洞’吧。毛主席给江青的诗，‘无限风光在险峰’，就是说的这里，不信去看看。”

“仙人洞”离他们住的地方大约两里路。时近黄昏，几

辆小轿车盘旋在云雾缥缈的盘山公路上。

仙人洞是一个悬崖绝壁下的天然石洞，洞前面还有一个井，井里有水。来到“仙人洞”三个字的圆门前，叶群停下来，招呼大家：“就在这里照相吧！” 他们在“仙人洞”前面一起合影留念。

在游览“仙人洞”时，叶群对吴法宪他们说：“这次来庐山开的是‘神仙会’，没有什么事情。你们都忙了大半年，就在这里避避暑，放松一下。林彪同志也不准备讲话了。如果能通过‘宪法修改草案’和军委报告，下面就是四届人大了。到那时，你们就可以散散心，玩一玩了。至于他们几个，也可能提，也可能不提，到时候再说吧。”

叶群说的“他们几个”是指康生、张春桥等人。

黄永胜没有上山。周恩来18日决定，会议前一阶段黄永胜在北京值班，会议后一阶段再派人来替换他。

8 月 20 日，中央办公厅给上海主持工作的王洪文和徐景

贤两个人打来保密电话，告诉他们：通知在沪的中央委员第二天集中登机到庐山开会。特别提到："一定要保守机密：领导的去向对自己的机要秘书都不能讲，会议期间上海如有急事或急件需要处理，可以通过北京中央办公厅收转，对其他的中委和候补中委，只能通知在上海的集中地点和时间，同时通知随带外衣和薄的毛线背心，集中以后再告知开会地点。"这样严格的保密，在当时是为了战备的需要。

这天，中央向全国各地的中央委员们都发出了同样的通知。

8 月 21 日，王洪文和徐景贤通知在上海的九届中委王秀珍、扬富珍，候补中委马天水，金祖敏、陈敢峰和王维国，到上海空军招待所集中。一直到登机前，上海的这些中委和候补中委仍不知道是去庐山开二中全会。当得知是去庐山时，上棉一厂的杨富珍笑着说"我还以为是到北戴河或者青岛去开会呢！"

而在"九大"被选为中央候补委员的同济大学学生陈敢峰跳了起来："哎呀，我什么衣服都没有带，怎么办？"因为当时上海正值摄氏 38 度的高温，他只穿了汗衫，短裤前来报到。没办法，只得临时借了几件衣服。

他们乘北京来的专机飞抵南京，江苏以及南京军区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委许世友、杜平、彭冲、吴大胜、张才千、王六生、尤太忠等人在这里登机，和上海的中委们一起飞到

在合肥降落，再转乘“安－24”型的小飞机，最后降落在九江机场。前来迎接的是空军司令员吴法宪等人。所有参加全会的人，都是由空军派专机接来的。

## 第1135回：会前忙，为二中全会准备
## 牯岭上，庐山会正式开幕

各地的中委们分乘小轿车上山。山下正是盛夏酷暑，气候闷热异常。但是上得山来，汽车在茂树密林间的公路上拐了几个弯，在“之”字形的路段上盘了几个旋，马上使人感到通体凉爽。山上的夏季平均气温，要比山下低 7、8 度，早晚还得穿毛线背心呢。

车到牯岭，这个设在庐山上的城镇已被修葺一新，汽车再穿过一个圆洞形拱门式的大隧道，就进入了全会委员们居住的禁区。这里都是一幢幢依山而筑的小洋房，大多是过去达官贵人以及外国人避暑的别墅，也有一些是解放后新建的招待所和疗养院。开全会期间，政治局委员们是一人住一幢，中央委员是两人往一幢，候补委员是三人合住一幢。每幢别墅都配备了一名服务员，每两幢房子配备了专门的厨师。他们白天来，晚上走，负责整理房间，做清洁工作，打茶水和做饭。在房子外面的树林里，警卫战士们日夜站岗放哨。

上了山的中央委员们，情绪都很高涨。因为文化大革命期间，各地都比较乱，中央全会和中央工作会议都只能在北京开，现在毛泽东决定在庐山开会，说明他对形势的估计是乐观的，同时也说明他的健康情况是良好的。以 77 岁的高龄而能重登庐山，这是当时的中委们都为之欢欣鼓舞的事。大家都利用会前的闲暇，饱览了雄奇秀丽的匡庐风光。张春

桥，姚文元和上海的中委们在瀑布前合影，姚文元还陪同江青游了仙人洞。

会前，上海几个年轻的中委相约去看望周恩来和邓颖超，周恩来穿着一件白色的翻领两用衫，一条米色的长裤，足登一双半新的牛皮凉鞋，显得风度翩翩而又十分精神，他告诉来访者，这次全会的议程很简单，主要是讨论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然后提交给四届人大正式通过后颁布；另外还要讨论一下国民经济计划等。他说："会期不长，有三、五天就可以了。"

"啊，只有三五天！"上海几个年轻人都惊呼起来，觉得会期太短，看庐山都看不够。

邓颖超也说，好不容易来江西一次，她已邀了几位老大姐，在全会结束以后到向往已久的井冈山去。

周恩来的秘书钱家栋，在住所的阳台上安排这些年轻的中委们和周恩来比赛了几场乒乓球。

大家说："总理是今日得宽余呀！"

周恩来微笑道："我还踢足球呢。"

大家都很诧异，钱秘书说："就在走廊里踢，每次两三分钟，活动活动身子。"

大家哄堂大笑。

8 月 21 日，周恩来就即将召开的九届二中全会议程等问题书面报毛泽东、林彪：

（一）全会议程原定为修改宪法、讨论国民经济计划和备战工作三项。

（二）修改宪法的综合简报（八月十日）和修改草案（八月十五日）已印发政治局各成员。

（三）国民经济计划纲要和计划会议综合报告，拟先在政治局讨论，通过后再提交全会。

（四）由军委办事组起草的关于备战工作的文件，拟先由林彪审定后，再提交政治局和全会讨论。

（五）全会到会二百五十三人，除召开大会外，拟分六个小组进行工作。

这天，周恩来还先后到林彪、康生、陈伯达、江青处谈话。

当晚，汪东兴给吴法宪打电话说："邱、李两个老总都到了，你要抓紧给他们通气，要提议设国家主席。"

放下电话，汪东兴跟与他同住一屋的江西省军区副政委、江西省革委会副主任文道宏说："你告诉程世清同志，在会上要提设国家主席。明天委员们都到齐了，叫他告诉江西的同志们，在会上要提议设国家主席。主席说不当国家主席，是主席的谦虚嘛，那不是真的。不设国家主席，毛主席怎么当主席呢？"

8 月 22 日一大早，文道宏将汪东兴的话告诉了程世清。

这天上午，陈伯达去看吴法宪，没有见到。此时，吴法

宪正在庐山新修的直升机场看望驻守在那里的空军副参谋长胡萍他们，然后又爬到山顶上的雷达站，看望了长年驻守在那里的指战员。

下午 14 时，在庐山毛泽东的办公室里召开了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 5 位常委出席，汪东兴作记录。会议主要讨论和确定九届二中全会的议程。

九届二中全会原定有两项议程：一、讨论和修改将要在四届全国人大提出的新宪法草案；二、讨论国民经济的年度计划。

会上，毛泽东又建议增加一项内容，即谈一谈当时的形势。他说："除了讨论修改宪法、计划问题外，还应该加个形势问题。据我所知，大家有兴趣的问题是形势问题。"

康生说："修改宪法问题搞了很久，宪法委员会也开过第一次会了。全国人民正在讨论宪法修改草案。"

毛泽东说："宪法修改草案可以发给大家看。但是大家有兴趣的还是形势问题。"

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都表示"同意毛主席的建议"，并提议由毛泽东讲形势问题。

毛泽东说："我主持会议，由总理讲形势吧，修改宪法问题由康生讲。"

康生推辞："修改宪法问题也由总理一道讲吧。"

毛泽东看了康生一眼，说：“那你们两个人去商量解决好了！”

关于会议日程，毛泽东说：“23 日到 29 日，差不多了吧？在这个月结束。”

关于设国家主席问题，周恩来提出：“如果设国家主席，今后接见外国使节等外交礼仪活动可由国家主席授权。”

康生说：“设国家主席，这是全党全国人民的希望，我们在起草宪法草案时也这么希望，但又不敢违反主席关于不设国家主席的意见。处在这一矛盾中，我们感到压力很大。”

毛泽东说：“设国家主席那是个形式，我提议修改宪法就是考虑到不要国家主席。现在当然也见了不少外宾，也可以不见，有些不是也没有见。做国家主席、元首，就是有点好像不太好不见。实际上主要的还是党的领导和行政上国务院负责。”

陈伯达说：“如果这次毛主席再担任国家主席，将对全国人民是一个极大的振奋和鼓舞。”

林彪也附和同意。

“是你们愿意要国家主席，你们要好了，反正我不做这个主席。”毛泽东说。

周恩来接着谈计划问题：“自今年开了计划会议后，收效较快。五个月以来，全国有一定的生产效率，地方上的积极性大了。”

毛泽东同意："原来这个下放（指中央下放部分权力给地方），讲是讲了，但是他们没有摸到下放的底，交代不那么清楚，这次计划会议解决了。"

周恩来继续说："各省、市、自治区不仅仅是农业有了生气，有了发展；而且现在看起来工业形势也好。今年的计划完成的情况和原来预计的差不多，虽然'文革'的头两年有一点下降。"

毛泽东插话："解放以后，统一了全国，出了个南粮北调、北煤南运的问题。解放以前，也存在这个问题，但是我们不知道。不晓得蒋介石统治的时候，煤要不要南运？粮呢，要不要北运？看来，要逐步地解决这个问题。现在南方找到很多煤矿，北方粮食也逐步自给了。"

周恩来说："人民生活确实改善了。这种形势，主要是靠毛泽东思想的传播。毛泽东思想传播了，生产和经验也就传播了。"

康生又说："哪里的毛主席思想深入，哪里的工作、生产一定就好了。规律完全是这样的。"

毛泽东摇摇手，表示不赞成这种说法："看我们是依靠谁的问题了。有的人依靠专家治厂。工业这方面，我看要依靠专家、科学家，甚至洋专家，除这之外，也还要依靠工人。"

林彪仍是少言寡语，只说了一句："主要是调动全国亿万人民的积极性。"

陈伯达随声附和："我到下边看了一下，形势很好。群众积极性很高，干劲也很大，连中学生都自办工厂。"

议题又从经济转入政治。

周恩来提出："还有党代会的问题。"

康生说："恐怕有些县、市，甚至有的省、市要开党代会。"

毛泽东点点头："党代会不仅要从下到上开，有的还要用从上到下的办法开。"

康生说："这两个办法都可以用。"

周恩来做了些分析："等到明年九大召开两周年的时候，各省、市、自治区开成党代表大会，我看基本上是可能的。"

毛泽东问："整党，各个地方不是早都开始了吗？这个'吐故'吐得怎么样啊？大概吐得不多吧？对蒋南翔这样的人留下来好。"

1968 年毛泽东曾就整党问题借用了"吐故纳新"这个词，被劝退或开除出党的人就是"吐故"。

周恩来回答："现在挂起来的较多。"

康生补充说："我说'挂故'多。"

"挂故"是指当时要"处理"的党员干部被搁置起来。

毛泽东有自己的考虑："你们讲挂起来的多，我看吐得也不少了，还是要以教育为主。"

周恩来说："有的人长期挂起来呀？我认为还是下去劳动接触群众比较好。"

陈伯达有些忘乎所以，禁不住又提到毛泽东反感的设国家主席问题。他说："主席做主席那个时候，咱们这个国家搞得很好，后来叛徒刘少奇做主席，这个国家弄得有修正主义。"

毛泽东生气了，说："你们愿意要主席你们要好了，反正我不做。"

见无人说话，毛泽东宣布："今天把大会的议程定下来了。会就开到这里吧！"

这天，周恩来主持中央修改宪法起草委员会全体会议，对宪法的修改作了说明。

下午，吴法宪回到住处，听说陈伯达上午来找过他，便赶紧去看陈伯达。陈伯达告诉他："政治局常委已经开会了，研究了会议日程。今晚可能开政治局扩大会，总理会传达。"

接着，吴法宪又去看了周恩来，向他汇报接送全部代表和布置防空的情况，还建议，在九届二中全会开会期间，不管是空军还是民航的飞机，都不准从庐山上空通过，以防止出事。

周恩来说："你这个意见很好，所有飞机调动的事情，由你全权负责。"

吴法宪当即表示："一定完成总理交给的任务，请总理

放心。”

8 月 22 日这天，空 5 军政委、浙江省革委会第一副主任陈励耘在庐山接到一个电话，他拿起话筒，只听里面劈头就说：“我是军委办事组秘书，姓肖，肖秘书，住在空军疗养院。”

陈励耘楞了一下，心想：“这不是林立果嘛。”

电话里，林立果接着就问：“你在山上同那个姓张的接触过没有？”

陈励耘说：“没有。”

林立果又说：“你不要接触了，这个人有问题。明天上午林副主席在大会上有个讲话，你注意听吧。”

陈励耘想起自己在上庐山之前，被江腾蛟请到北京写文章的空 5 军宣传处长徐曙正好回杭州，给陈励耘带了江腾蛟的口信：“二中全会要召开了，林副主席可能有个重要讲话，请陈政委注意一下。”又说：“张春桥是反林副主席的。这次可能要点这个事情。”

这天，林立果也给王维国打了电话，问了他和陈励耘的住房门牌，并告诉王维国，有什么事情听吴法宪招呼。

当晚 20 时，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出席九届二中全会的各大区召集人。周恩来、陈伯达、康生在会上传达了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对九届二中全会议程安排的讨论意见。

周恩来在传达中还介绍了当时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些情况。

当晚，陈伯达再次造访林彪。陈伯达认为，九大以后，无休止的运动不但没有减弱，反而在继续发展。“我们这样一个大国长期处在这样一种状况是极不利的。共和国承受不起，好干部受不起劳累辛苦，坏干部受不起摧残折磨。人民也受不起长期的无政府状态。造成这种局面，在主席那里起作用的主要江青和张春桥。江青不能碰，碰碰张春桥还是可以的。张春桥的问题不解决，对党的事业危害实在太大。”

陈伯达认为，“在罗瑞卿，杨、余、傅，贺龙的问题上，毛主席和林副主席意见都一致，如果林副主席提出张春桥的问题，毛主席肯定会支持。”

林彪说：“如果要讲，明天向主席报告一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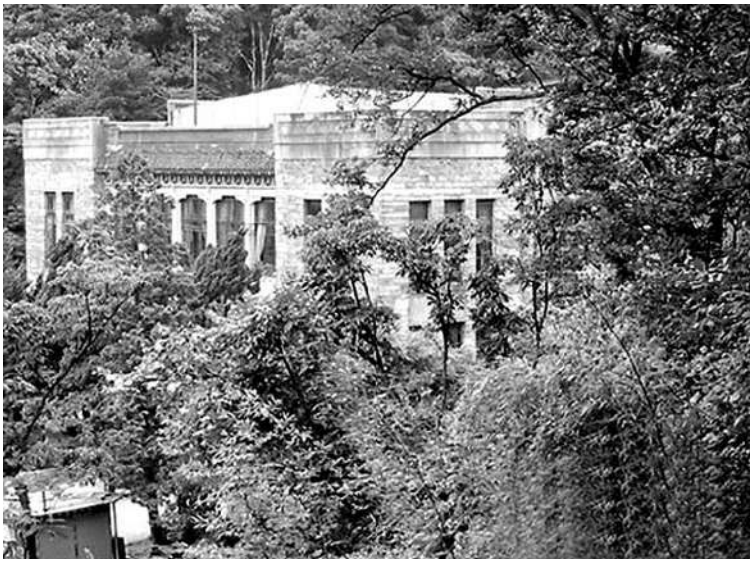
8月23日早晨，经过一夜的调整，叶群破例起了个早，向秘书交代说：“下午全会要开会，首长可能要讲话，赶紧把原来准备的讲话稿改一改。”

秘书把讲话稿誊清后，叶群、林立果立即拿着稿子进到林彪的房间。

上午，林彪会见来访的陈伯达，讨论会议问题。

牯岭镇的半山腰有一座大礼堂，可以坐五、六百人，1959年曾在这里举行过中共中央八届六中全会，出了彭德怀的问题。现在，这座灰色的庞大建筑物，又成了九届二中全会的

会场。



中共庐山会议旧址----庐山人民剧院

九届二中全会会址

下午 15 时，九届二中全会在庐山礼堂开幕。

林彪去开会，上车时，若有所思的问叶群："这话今天讲还是不讲？"

叶群肯定的说："要讲！"

会前，中央政治局常委在礼堂的小会议室集中，毛泽东环顾常委一圈后，慢条斯理的问周恩来和康生："你们谁先

讲啊？”

毛泽东的话音刚落，林彪侧过身，不动声色的说：“我要讲点意见，主席看可以不可以？”

周恩来、康生都谦让的说：“那好，请林副主席先讲。”

毛泽东看了看林彪，又看了看周恩来和康生，说：“你们 3 人讲吧！”

林彪接着说：“有一个问题，想请示一下主席，就是在宪法工作小组会议上，发生了争议。”林彪把 8 月 14 日的情况大体讲了一遍。这时周恩来也点了点头，表示他知道这回事。

毛泽东表示：“这个要讲一讲，要批评，但是不要点名。”他又问林彪准备怎么讲，林彪说：“想讲两点，一是关于宪法修改草案，感到这个不错。第二是讲一讲天才问题。”

参加庐山会议的中央委员、候补委员在庐山大礼堂就坐完毕。这次实际到会的中央委员 155 人，按姓氏笔画为序，坐在前排。候补中央委员 100 人，坐在后排。

过了好长时间，常委们才进入会场。在台下等候了一段时间的众委员们，看见林彪一边和毛泽东说着话，一边往主席台走，与会人员全体起立，掌声雷动。

毛泽东与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走上主席台。毛泽东坐在正中间。左边是林彪、陈伯达，右边周恩来、康生。

毛泽东宣布开会后问："今天谁先说，恩来，你报告一下议程。"

周恩来宣布全会的三项议程，他说："第一项议程是修改宪法的问题，昨天晚上就向全会到会的同志发了五个文件：1954 年的宪法；关于宪法修改的请示；关于 7 月 20 日的通知；反映各地讨论修改宪法的意见的综合简报；修改稿三十八条八月十五日稿。今天上午在阅读。第二项议程是讨论国民经济计划提纲，着重在 1970 年计划的实施情况和报告，这个将在今天晚上和 24 号晚上政治局讨论，然后提交全会通过。第三项议程是战备工作。还有一点其他的，四届人大代表名单中的特邀名单、华侨和爱国人士名单，是不是也要在全会上报告和通过一下。另外一项，昨天毛主席指示说要谈一谈形势。"

接着，周恩来宣布了会议分组情况和会期。

这次全会共分为东北、华北、华东、中南、西南、西北 6 个大组。

东北组组长陈锡联，副组长潘复生、王淮湘；

华北组组长李雪峰，副组长吴德、解学恭、郑维山、陈永贵；

华东组组长许世友，副组长王洪文、杨得志、李德生、南萍、程世清、韩先楚；

中南组组长曾思玉，副组长刘建勋、华国锋、刘兴元、

韦国清；

西南组组长张国华，副组长谭甫仁、蓝亦农、曾雍雅；

西北组组长冼恒汉，副组长李瑞山、龙书金、张江霖、康健民。

## 第1136回：先讲话，林彪发言受欢迎
## 听录音，众人要求印材料

周恩来宣布后，毛泽东问主席台上的其他几个常委："现在还请哪一位讲啊？"

林彪说："我讲几句。"

接着，他摘下军帽，漏出童山濯濯的额头，只有两旁长着少许稀疏的头发。他说道："昨天下午，主席召集了常委会，对这次会议作了重要指示。这几个月来，主席对于宪法的问题和人代会的问题都是很关心的。宪法的修改、人代会的召开问题，都是主席提出的。我认为这很有必要，很合时宜。在国内、国外大好形势下开人代会和修改宪法，对于巩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反帝反修斗争，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都是有深远影响的。"

林彪在讲完开场白之后，逐渐转入正题。他说："毛泽东同志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毛泽东同志是代表广大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的，毛主席是我们党、政府、国家、军队的缔造者。……我们有今天的胜利，决定的因素就是毛主席。"

林彪还说："这次我研究了这个宪法草案，表现出这样一个特点，就是肯定毛主席的伟大领袖、国家元首、最高统

帅的地位，肯定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国人民的指导思想。这一点非常重要，非常重要。……毛主席的这种领导可以说是我们胜利的各种因素中间的决定因素。……这个领导地位，就成为国内国外除极端的反革命分子以外，不能不承认的。……我们的工作是前进还是后退，是胜利还是失败，都取决于毛主席在中央的领导地位是巩固还是不巩固。”

他强调说：“我们说毛主席是天才的，我还是坚持这个观点。……这次宪法里面规定毛主席的领导地位，规定毛泽东思想是领导思想。我最感兴趣的、认为最重要的就是这一点。”

林彪讲完话，会场上掌声雷动，场面非常热烈。林彪走下讲台时，已经是 16 时 30 分了。

毛泽东对周恩来、康生说：“你们讲吧！”

周恩来说道，“计划问题有本子，材料都有，我就不讲了。”

康生说：“刚才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宣布了我们的九届二中全会开幕；恩来同志宣布了日程；特别是我们的林彪同志——毛主席的最好的接班人讲了毛主席在共产主义运动、中国革命运动中间的伟大历史地位，以及对宪法的说法，我完全同意、完全拥护。在要毛主席当国家主席、林副主席当国家副主席的问题上，所有的意见都是一致的。如果毛主席不当国家主席，就请林副主席当国家主席。如果主席、林

副主席都不当，那么国家主席这一章就不设了。到底怎么样，要请毛主席最后指示，最后定。宪法说明已印发给大家，不讲了。”

毛泽东手一扬：“散会！”

毛泽东、林彪、周恩来他们走了以后，许多人还留在礼堂内议论。大家兴致很高，也很兴奋。张春桥主动过来问吴法宪有没有记录林彪的讲话，并说：“你记录得比我好。”

到会的大多数人都将林彪的这次讲话看作是林彪代表党中央作的开幕词。

在回住所的路上，浙江省革委会主任、20 军政委南萍若有所思的说：“林副主席的讲话，可能是有所指的。”

与他同行的浙江省革委会副主任、空 5 军政委陈励耘含糊的应道：“是有所指的。”

陈励耘知道南萍同张春桥比较好，所以那天接到林立果的电话后，没有敢电话告诉南萍。

散会回去的路上，叶群对陈伯达、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汪东兴讲，林彪的讲话是对陆定一式人物不点名的点名。并说林彪讲话前“报告了毛主席”。

回去后，叶群兴奋地对秘书说：“首长在会议上讲话了，讲得很好，他讲话没有完全按照你们起草的提纲讲，专门讲了下天才问题，没有点名，讲得很策略。”“首长在开会前和主席谈话，我就在走廊散步，防止十一楼（江青）闯进去。”

傍晚，陈伯达去林彪处。他问林彪：

“你今天的讲话，事先同毛主席谈过？”

“你听谁说的？”

“是叶群同志讲的。”

“这事你知道就行了。”

晚饭后，吴法宪他们去见叶群，问起林彪讲话的事。叶群将会前常委们在小会议室时的情况告诉了他们，并说：“101说：‘最近听到吴法宪同志讲，8月13日宪法修改小组会议上，张春桥反对提天才，不同意写国家机关的指导思想是毛泽东思想，公开反对。还说连赫鲁晓夫也是天才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列主义，说三个副词是一种讽刺。’”“毛主席还说：‘这个张春桥的后台一定是江青，一定是她搞的。’”

当天晚上，周恩来主持召开政治局委员和各大区召集人会议，安排会议各组分别讨论宪法和国民经济计划的有关文件。吴法宪在会上说：“林副主席的讲话很重要”，他提出“要很好学习”。

陈锡联首先站起来响应。接着，汪东兴、许世友、曾思玉、李作鹏、邱会作等很多人表示同意。汪东兴特别提出要重新听一下林彪讲话的录音，他说：“各组反映没有听清林彪同志的讲话。”

周恩来说：“这个意见好。就按你们的意见办。我负责

向毛主席报告。”“是否放两遍录音，大家反映一遍听不懂。为了便于讨论，明天上午在礼堂再放两遍录音，后天再讨论，这样一共是两天。”

会上，康生批评说，上海同军队的关系不好。

张春桥说：“这方面我们负主要责任，我准备作检讨。”

说着，张春桥掏出烟，顺手递给身边的邱会作一根。

周恩来让汪东兴将大家的意见报告毛泽东。

毛泽东听后问：“政治局的意见怎样？”然后表示：“大家同意我就同意。”

于是决定24日上午，会议代表听林彪讲话的录音，下午讨论。

散会后，陈伯达、李作鹏、邱会作来到吴法宪住处。陈伯达向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讲了张春桥的问题，讲了“安亭事件”。因为林彪讲话中有坚持“天才”的观点，为了有理论依据，吴法宪他们对陈伯达说：“你陈老马列主义水平高，能不能搞几条‘语录’，我们在会议上发言也好有个依据。”

陈伯达答应去找。但他上山时没有想就这个问题发表什么意见，没带几本书。当夜回到住处在随身带的几本书中找来找去，不够，赶紧让秘书缪俊胜连夜从庐山图书馆的藏书中找马列著作。山上的书也不全，又打电话请留守北京的秘书王保春、王文耀与中央政研室的人联系，帮助找一下有关

天才的语录。随后王保春、王文耀他们将政研室工作人员找到的“语录”通过中办收发室送上庐山。当晚，随陈伯达上山的史敬棠等人也帮助找到几条。

因为太匆忙，没有查到马克思论天才的语录。陈伯达根据查到的资料，连夜编成七条恩格斯、列宁、毛泽东论天才的语录，也只能这样了。他找到一条就用电话告诉吴法宪，随后又另外抄好。

吴法宪自己也找了八条林彪关于称天才的语录，连夜让秘书把林彪的这几句话送到大会秘书处去打印出来，送林彪审定后，给了陈伯达一份。

当晚，叶群从庐山给在北京留守“林办”秘书打电话说：“首长在会上即席讲了话，根本没用你们写的稿子。讲话的中心意思，就是坚持毛主席是天才。他讲天才是有针对性的，讲话后反映很强烈。他讲了，我也准备讲，在明天的小组会上，我也准备开上一炮。我不想讲别的，就是讲讲毛主席的领袖地位问题。一个党，一个国家，没有一个好的领袖行吗？那肯定不行！苏联没有一个好领袖，结果变修了。印度的客观条件很好，但印度共产党没有一个好领袖，至今革命也没成功。中国革命如果没有毛主席这样伟大的领袖，也不会有今天！所以毛主席是我们的好领袖，毛主席是现代最伟大的天才！谁反对这一条，谁就要倒霉……”

叶群在电话上喋喋不休地大发议论，这让秘书很纳闷：

“她对我讲这些干什么呢？”再听她讲下去，终于明白了她的用意：“赶快叫姜思毅帮助我写个发言稿子，我明天就准备用。文字不要长，但要有分量。今天晚上，让老姜连夜突击；明天早晨让郭连凯托中办送信的飞机给我带到庐山来。……我说的这些，你作记录了吗？”

“我没记。”秘书如实回答。

叶群与林彪不同，林彪交代什么，秘书当面记录，他从不阻拦。而叶群严格规定，她不管说什么，都不准秘书留下“文字根据”。而这次，她“连珠炮”的话，秘书想记也跟不上。

“我是想叫你把我讲的意思传给老姜的。”叶群说，“既然没记，我讲多了也没用。姜思毅在吗？我直接和他讲讲算了。”

姜思毅，原谭政任总政主任时的宣传部长，是全军有名的年轻有为的“笔杆子”。后来谭政下台，姜思毅也受到牵连，在总政降职留用，一连 10 年一蹶不振。1970 年 4 月，姜思毅被分配到广州军区生产建设兵团政治部当副主任，又从军职降到了正师职。

5 月下旬，叶群为了给林彪准备在四届人大会议上的讲话，将姜思毅从广东请到毛家湾帮助工作。

一次，秘书张云生给林彪讲完文件后，林彪问：“姜思毅在干什么呢？”

张云生答："主任让我们找些资料给他看，……"

林彪自言自语地说："姜思毅是个秀才，能写点文章，但放在我这里，没有什么用处。我这个人讲话，向来不习惯念别人写成的稿子。……姜思毅这个人，可以放他到一个常写文章的地方去，例如放到报社……"

张云生后来把林彪说的关于姜思毅这些话传给了叶群。叶群一听就发了牢骚："首长这个人，是又想吃，又怕烫！姜思毅是把快刀，他不用，我还想用呢！"

叶群想了想，又说："把姜思毅放到首长眼皮底下，他想来就问，怎么办？为了不让首长看到姜思毅，可以把老姜派到外地去搞搞调查研究。如果首长再问，你们就说他下去了。"

于是，姜思毅于 6 月初赴广州军区某师，6 月底返回北京。之后，他又主动要求去东北部队有名的"红九连"调查，谁知他刚去东北一个礼拜左右，就被叶群一个火急命令召回来，让他为林彪准备在宪法起草委员会上的讲话，并限 3 天交卷。

3 天后，姜思毅如期交卷，写成 5000 余字。但在这时，林彪又决定不讲话了。

7 月 26 日，林彪、叶群到北戴河后，姜思毅一直留在毛家湾。叶群给他的任务，是继续考虑并且准备给林彪在四届人大上讲话写个讲话稿。后来听说中央决定要先开二中全

会，他这几天正没什么事干，又不敢离开毛家湾，就在闲得难受的时候，叶群又找到头上了。姜思毅放下叶群的电话后，连夜突击，仅仅经过半宿的“夜战”，就“突”出来一份几千字的发言稿。由于时间紧迫，也来不及推敲修改，第二天大清早，就让郭连凯转送庐山了。

8 月 23 日深夜，吴法宪把空军政委王辉球、副司令员王秉璋找来，告诉他们：“林副主席讲话是有所指的，讲话前报告过毛主席。向毛主席报告时，叶群守着门没有让别人进去。”吴法宪要他们在组里对林彪讲话高姿态表态，但不要点名，要坚持设国家主席。

8 月 24 日早晨 7 时，叶群又将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叫到她那里，对他们说：

“我先给你们讲讲首长的意见。下午分组讨论时，你们在各组发言，表态拥护首长的讲话，坚持天才的观点。如果你们不发言，首长的讲话就没有根据了。要坚持设国家主席。有人反对毛主席。要用眼泪表达自己的感情。发言要集中火力攻陆定一式的人物，打击面要小，不要点名。打击面宽了，毛主席那里通不过。吴司令你最好先发个言，你开个头，给大家定个调子”

从叶群那里回来后，吴法宪向李作鹏、邱会作提出，黄永胜没有参加会议，对林彪的讲话要表态，要搞个书面发言。李、邱二人都同意。回去后，吴法宪打电话给留守北京的黄

永胜，通报了庐山会议的情况。

黄永胜同意吴法宪的意见，他亲自打电话给正在庐山的宋城，他的秘书，要他组织人帮他起草一个书面发言稿。黄永胜讲了发言稿的要点：1、拥护林副主席的讲话；2、要指出有人反对在新宪法中写上以毛泽东思想为指针。有人说天才地、全面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列主义是“讽刺”。这是反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但不点名。3、长期以来，我们党内有许多情况不正常，等等。并交代写好后用电话传回北京。

8 月 24 日上午 8 时，除毛泽东、林彪外，其他人都到庐山礼堂开大会，听林彪的讲话录音。会议由汪东兴主持，周恩来、陈伯达、康生都参加了。录音播放了两遍，到 11 时 30 分才散会。

听录音时，陈伯达的座位和汪东兴靠近，他把已经找到的那七条论天才的语录交给汪东兴，对他说：“这份材料请打印 5 份。”

汪东兴问：“你是要发给常委吗？”

陈伯达说：“是。”

汪东兴一看，是恩格斯、列宁、毛泽东关于称“天才”的几条语录，他觉得常委看完后，还要发给政治局委员，就交代会议秘书处打印了 20 份。

那天，江青也没有去听录音。后来，她为此大发脾气，质问：“怎么把原定的程序都推翻了？全会究竟是听谁的？”

但是，没有人理她。

在播放林彪讲话录音的过程中，有人提议将林彪的讲话稿印发给大家，到会的人都鼓掌支持。周恩来要汪东兴去向毛泽东请示。

汪东兴向毛泽东报告，毛泽东说："他们都同意印发，我没有意见，你就印发吧！"毛泽东还嘱咐汪东兴，讲话稿要由林彪审定后发。

汪东兴又将毛泽东的指示用电话报告了周恩来。周恩来说："你抓紧办理，先印出清样，送常委审阅。"

汪东兴让办公厅副主任王良恩去林彪处取讲话稿，没有拿来。

听完录音后，叶群又找到吴法宪和李作鹏、邱会作，要他们跟空军、海军、总后的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通个气，要大家发言拥护林彪的讲话，但注意不要点名。她特别算了一下，认为各大组差不多都有他们的人，只有华东组和东北组没有，于是就要吴法宪他们几个去跟这两个组通通气。

吴法宪把空军的王辉球、王秉璋、曾国华、曹里怀、邝任农找来开会，要他们"按照林副主席讲话的路子发言，拥护林副主席的讲话，"但不要点名。

快到中午时，叶群带着林立果来到吴法宪的住处。林立果一见到吴法宪就说："爸爸说你吴司令立了大功。"

叶群紧接着说："我向林彪同志说了，是你吴胖子先提

出来重放录音的，大家都赞成。林彪同志听了后很高兴。”

吴法宪把陈伯达整理的论天才的语录拿给叶群看。叶群说：“很好，最好能给我一份。”

后来，汪东兴将陈伯达搞的“语录”给吴法宪送来了几份，吴法宪连同他自己整理的那八条林彪的语录打印好给了叶群、李作鹏、邱会作各一份。刘贤权听说了这事，也来找他要了一份。

中午，吴法宪叫秘书打电话，找上海空 4 军的王维国和杭州空 5 军的陈励耘，向他们布置了会议期间的防空问题。另外，还布置南昌、九江、安庆、南京、上海、杭州、福州做好战备防空工作，防止台湾国民党军的飞机来侦察和骚扰。最后他问王维国，上海方面对张春桥有什么反映？王维国告诉他，张春桥在上海只宣传江青，不宣传林副主席。吴法宪说：“我认为这个问题很重要。”

他告诉王维国和陈励耘：“林副主席的讲话是有所指的。”

王维国、陈励耘拿不准林彪讲话是指谁？吴法宪在手心里写了一个“张”字，并关照：“这件事你们可不能说，叶群同志讲过不能点名，只能不点名的点名。”

第1137回：华北组，陈伯达手舞足蹈

也表态，汪东兴讲话支持

8 月 24 日下午，各组讨论林彪的讲话。

临去开小组会时，叶群给邱会作打电话，要他在小组会上发言对林彪讲话表态，一是讲天才问题，二是坚持设国家主席。

邱会作要秘书打电话给总后勤部政委张池明，对他说："设国家主席问题，要用肯定口气讲。"

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们分别编到各组参加讨论。许世友、张春桥、李德生在华东组，陈伯达、汪东兴、李雪峰在华北组，李先念、叶群、李作鹏在中南组，邱会作、姚文元在西北组，吴法宪在西南组，陈锡联在东北组……毛泽东，林彪、周恩来等未编人各组，江青属自由参加。

这天，周恩来出席东北组的讨论。他在发言中表示拥护林彪的讲话，肯定林彪的讲话对宪法、对计划、对战备有重要意义。他说："尽管毛主席叫我们不要总强调三个里程碑的观点，但客观上就是这样。" "要勿忘过去，警惕现在，教育后代。过去犯过错误的不要再犯，要夹着尾巴做人，发现错了就改，真正做毛主席的学生，要把经验教训告诉青年人。"

陈毅原在华东组，因为"九大"时，他在华东组屡屡受到上海人的围攻，九届二中全会，他提出来换个组，于是，

来到了华北组。下午华北组讨论时，陈毅第一个发言。大概是被批怕了，他在发言中屡屡表态："我到石家庄后没有看到设不设国家主席的文件。据我所知，毛主席不愿当国家主席。如果他改变了初衷，愿意当国家主席，我赞成毛主席当国家主席。"

他还列举大量历史事实，说明毛泽东是天才。

在陈毅发言时，有两个中央委员大声对他说："你骨子里就一贯反毛主席，老右……"

坐在陈毅身边的郑维山小声对他说："言多必失，不要再说了。"

陈毅点点头，停止了发言了。不知有意还是无意，他正好坐在会场的正座，此时他知趣地挪到旁边。

接着是钱学森不短的发言，他坚决要求毛泽东任国家主席，愤怒声讨反对毛泽东是"天才"的观点。会议休息后，河北省的工人代表马福全发言，他还没说完，陈伯达和汪东兴结伴走了进来，大家热烈欢迎。

华北组的主持人李雪峰向陈伯达和汪东兴汇报了发言的情况后，请陈伯达讲话。

陈伯达的福建口音大多数人听不懂，比较重要的内容由汪东兴和李雪峰帮助翻译。

陈伯达出口成章，他说："毛主席是天才人物，没错，马恩列斯都承认历史上有天才人物。"

“我完全拥护林副主席昨天发表的非常好、非常重要、语重心长的讲话。林副主席说，这次宪法中肯定毛主席的伟大领袖、国家元首、最高统帅的地位，肯定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国人民的指导思想。这一点非常重要，非常重要。写上这一条是经过很多斗争的，可以说是斗争的结果。”

“现在竟然有人胡说‘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这些话是一种讽刺。”

“有人利用毛主席的谦虚，妄图贬低毛泽东思想。”

“有的人说世界上根本没有天才，但是他认为他自己是天才。我们知道，思格斯多次称马克思是伟大的天才，他的著作是天才的著作。列宁多次称赞马克思是天才。斯大林也称马克思、列宁是天才。我们也称过斯大林是天才。否认天才，是不是要把马克思、列宁全盘否定呢？更不用说要把当代最伟大的天才一笔勾销。我看这种否认天才的人无非是历史的蠢才。”

“林彪同志说，这次修改的宪法里面规定了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国人民的指导思想，是宪法的灵魂，是三十条里最重要的一条，这反映了我国革命中最根本的经验。我完全同意林彪同志这个根本的观点。但是，同志们要懂得，加进这一条也并不是那么容易的，是经过很多斗争的。”

“吴法宪同志说得很对，有人想利用毛主席的伟大和谦

虚，妄图贬低毛主席，贬低毛泽东思想。但是这种妄图，是绝对办不到的。在毛泽东思想教育下已经觉悟起来、已经站起来的伟大中国人民，很能够识破他们，揭穿他们的各种虚伪。”

“文化大革命取得了伟大胜利以后，有的人居然怀疑十一中全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公报，这是不是想搞历史的翻案？”

陈伯达讲完后，陈毅接着发言。他说：“完全同意伯达同志的发言。讲到毛主席的天才，我谈谈自己一贯对毛主席的看法。从 1927 年认识毛主席起，我犯过错误，反对过毛主席。后来我发现毛主席经过在革命实践中的锻炼，领导中国革命确实有天才，因此我决心跟着毛主席干革命。天才这个解释，主要是从实践中经过锻炼，锻炼了人的才能。这样解释是符合毛泽东思想的。毛主席领导中国革命从胜利走向胜利，毛主席是天才，是经过几十年锻炼出来的天才。

这个问题不简单。如今竟有人否认毛主席的天才，肯定是居心叵测。我陈毅一听就知道有人反对毛主席了。在文化大革命四年之后发表这样的言论，是一种罪恶，不管他是公开的，还是背后讲的，说这种话的人是反革命，是帝修反的走狗。这种人应该开除党籍，交群众批判。他们是什么居心？用心何在？不能不引起我的义愤。

我犯过三次大错误，是犯错误的人。我愿意站在林副主

席这一方面参加战斗，别以为我靠边站就不能保卫毛主席，不论在什么地方，就是有人在旮旯里反对毛主席，我陈毅也要把他揪出来。这次我可要坚决与他们斗，他们已把我打到阴沟里，我还是要与他们斗！”

有人当场说：“你还有资格讲话！”

陈毅说：“我怎么没有资格讲话？我没有保卫毛主席的资格了？”

其他人也纷纷发言表态，都建议在新宪法中恢复设国家主席一节，赞成毛泽东当国家主席。

陈永贵对汪东兴说：“听林副主席的讲话后，我很激动，想发言拥护林副主席的讲话，还要放炮，把反对毛主席当国家主席的坏蛋揪出来，你看可以不可以？”

汪东兴回答：“当然可以，不但你讲，我也要讲。我早就对那几个人憋了一肚子火了，他们坏的很，现在都不把林副主席和伯达同志放在眼里，将来还会把谁放在眼里呢？中国的许多事情都是那些人给弄坏的。一定要把他们给揪出来。现在时机已经到了。”

随后，汪东兴也作了支持陈伯达的发言。他说：“完全赞成林副主席非常重要的讲话。刚才伯达同志的发言我也同意。这种情形是很严重的。我们党内还有这样的野心家，这是没有刘少奇的刘少奇路线，是刘少奇反动路线的代理人。我看，这种思想是最反动的。我们不容许这种思想在我们党

内泛滥。谁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我们就和他拼到底。”

他说：“有的人不仅不要毛主席当国家主席，连毛泽东思想都不要。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人民，可以识破这些坏蛋。”

陈伯达插话说：“有的反革命份子听说毛主席不当国家主席，高兴得手舞足蹈。”他怕别人听不懂他的闽南话，站起来手脚舞动着说，话音未落，全场愤慨。

汪东兴接着说：“有人天真得很，以为毛主席不当国家主席，是为了减少主席的外事活动，我就在主席身边工作，我完全清楚，哪次外事活动少了主席？主要外宾见不到主席就不肯走，主席也乐意会见他们。有人说毛主席不当国家主席是主席的伟大谦虚。我非常清楚，在重大原则问题上，主席是从来不让步的。”

发言最后，他激动的说：“我代表中央办公厅机关和8341部队，要求新宪法恢复国家主席一节，强烈要求毛主席当国家主席，林副主席当国家副主席。”

汪东兴的发言，使会场气氛达到高潮。群情激奋，汪东兴可是毛泽东身边的人。参加华北组讨论的与会人员，以为心里有了底，不少人争相要求发言，要求设国家主席，要求中央揪出反毛主席、毛泽东思想的反革命分子。一位晚上要去开三北地区战备座谈会的老干部说：“我晚上要去开会，

不能参加讨论，先让我表个态：我完全拥护伯达、东兴同志的发言，大是大非重大原则问题摆到我们面前，我们决不能含糊。对于反对毛主席、否定毛泽东思想、仇恨毛主席当国家主席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应当揪出来示众，应当千刀万剐，全党共株之，全国共讨之。我响应东兴同志的倡议，强烈要求毛主席担任国家主席，林副主席担任国家副主席，决不能让妄图篡夺国家最高权力的反革命分子阴谋得逞。”

陈永贵也十分激动的在华北小组会议上发言，把反对设国家主席的人狠狠的痛骂了一顿。

大家纷纷表示要把反对毛主席当国家主席的人揪出来。北京军区政委陈先瑞开始还疑惑，听完汪东兴发言后，他说这回明确了，也表了态，说要对反对毛主席的人“千刀万剐”。

此时已到晚饭时间，李雪峰、郑维山、刘子厚、解学恭、郑三生和谢振华等部分老干部还未发言。

散会后，陈毅问汪东兴：“汪主任，汪主任，我是不是又犯了错误了？”

汪东兴说：“没你的事，老实呆着。”

陈毅上山后，曾找汪东兴询问是否该在会上做点自我检讨。汪东兴回答说：“轮不到你，这回批别人。”

汪东兴从华北组出来，碰到国防科委主任王秉璋，他说：“王主任，抓紧发言哟，我已经发过言了。我们就是要旗帜

鲜明、立场坚定地表明我们的态度。”

回去后，汪东兴又给吴法宪打电话说：“我已经发言了，你们快点发言，也叫空军、海军、总后及军队的同志发言。过了这村就没这店了。今天发言表示你旗帜鲜明、立场坚定，明天发言就算随大流了。”

回到住处，华北组的郑维山还是有些嘀咕，他对陈先瑞、尤太忠、郑三生说：“主席几次讲不再设国家主席，这次又要设国家主席，究竟是怎么回事？……”于是，郑维山和其他几个人向李雪峰建议，晚上讨论前能否先约见汪东兴，再摸摸底。

吴德因为组织一份材料，没有参加下午的小组讨论。散会后，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吴忠将下午小组会讨论发言的情况告诉吴德，对他说：“陈伯达、汪东兴讲了话，提出有人反对毛主席。”

吴德急忙问：“是谁反对毛主席？”

吴忠说：“他们没有点名，不知道是谁。”

按照大会秘书处规定，每天讨论情况，各大组要编简报，由大会秘书处简报组统一编号印发。简报要快编快送，内容要“有闻必录，如实反映。”下午讨论结束后，汪东兴要求快发简报。华北组负责简报工作的是几位组长和副组长的秘书，当天值班的是军委办事组黄永胜的秘书王振，另一个是李雪峰的秘书黄道霞，还有一个是郑维三的秘书杜辛。三位

秘书请示组长李雪峰，李雪峰说，下午和晚上讨论情况编个综合简报，陈伯达和汪东兴的发言，先整理出来，是否单出简报，晚上由他们二人自己决定。

于是，3 位秘书进行了分工：黄道霞负责整理综合简报；王振负责整理陈伯达的发言记录；杜辛负责整理汪东兴的发言记录。

我们再看中南组。8 月 24 日下午，叶群在中南组发言说："林彪同志在很多会议上都讲了毛主席是最伟大的天才。说毛主席比马克思、列宁知道的多、懂得的多。"

接着，她念了林彪的一些称颂毛泽东"天才"的讲话，然后声泪俱下的说："难道这些都要收回吗？坚决不收回，刀搁在脖子上也不收回！"

李作鹏戴着一副墨镜，附和着叶群："本来林副主席一贯宣传毛泽东思想是有伟大功绩的，党章也肯定了的，可是有人在宪法上反对提林副主席。所以党内有股风，是什么风？是反马列主义的风，是反毛主席的风，是反林副主席的风。这股风不能往下吹。有的人想往下吹。有人连'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毛主席亲手缔造和领导的，林副主席直接指挥'，他都反对，说不符合历史。"

中南组组长张国华和三位副组长也都先后发言，虽然很短，但都表示响应和支持李作鹏和叶群的发言。

第1138回：小组会，庐山上热闹非凡

争发言，华北组《六号简报》

8 月 24 日下午，西南组。吴法宪那厚厚的嘴唇一张一合，气嘟嘟地说道："我认为，林副主席的报告是最重要的报告，对毛泽东思想，毛主席的领导，对毛主席发展马列主义，都作了最高度的概括。对我们教育最大。而且这个讲话是在重要的时刻讲的，讲话针对性很强。"

"我完全拥护林副主席的讲话。林副主席关于天才方面问题的论述非常全面，既讲了毛主席领导中国革命战争和建设新中国方面的伟大天才，又说明了毛主席的天才，是在革命和战争的艰苦实践中锻炼出来的。"

"林副主席的讲话批评了一些人所散布的反对天才论的言论，是因为在这次讨论修改宪法中，开始对毛主席、毛泽东思想，对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怎么写，有人就提出不要'突出'。在全国人民讨论后，有人还不同意写上'毛泽东思想是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说是在序言中有了毛泽东思想是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就可以了。"

"毛主席天才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列主义，现在全世界广为传播，全党全国人民一致公认。如果这股风吹下去，这怎么得了？所以，林副主席特别强调，在中央工作的老同志要冷静的想一想，对我自己教育很大，值得我们深思。"

吴法宪提到有人反对学“老三篇”，即毛泽东的《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三篇文章，“文革”期间人们把这三篇文章统统称为“老三篇”。

这时，曹轶欧插话说：“向大家介绍一个情况，我们同外宾接触时，发现不少把毛主席的‘老三篇’印成小册子装在口袋里。世界革命人民对毛泽东思想是非常热爱的。”

吴法宪接着说：“这次讨论修改宪法中有人对毛主席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下马列主义的说法，说‘是个讽刺’。我听了气得发抖。如果这样，就是推翻八届十一中全会，是推翻了林副主席的《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中肯定下来的，怎么能不写呢？不承认，就是推翻了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决议，推翻了林副主席写的《再版前言》。……关于天才的说法，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都有过这样的论述。毛主席对马克思和列宁也都有过这样的论述。林副主席关于毛主席是天才的论述．并不是一次，而是多次。”

接着，他念了陈伯达整理的毛泽东、林彪以及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有关天才的语录，然后说：“大家听听这些语录，怎么能说没有天才呢？……一种是迷迷糊糊，是认识问题。但是也要警惕和防止有人利用毛主席的伟大谦虚来贬低伟大的毛泽东思想。”

“我们就是要以林副主席为光辉榜样，永远忠于毛主席，

永远忠于毛泽东思想，永远忠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我们要像 8341 部队那样，坚持三个原则，符合毛泽东思想的就支持，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就教育，反对毛泽东思想的，就坚决斗争。这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

吴法宪讲完了，全组热烈鼓掌。不过，他心里却在想：“是不是有点讲过了？”

小组会休息时，很多人过来向吴法宪打听是谁反对天才论和学“老三篇”？吴法宪不好说，只悄悄对四川的张国华和梁兴初说：“是张春桥”。并要他们“坚持设国家主席、坚持毛主席当国家主席”。

以后大家继承发言，都是拥护林彪的讲话。参加这个小组讨论的朱德、聂荣臻、李先念都没有发言。后来，李先念也问吴法宪谁反对天才论？吴法宪说是张春桥。李先念说：“噢，是这个家伙！我还蒙在鼓里。”

晚饭前，林彪叫吴法宪去他住的地方。林彪对吴法宪说：“毛主席讲了，什么人也不要点名，尤其不要点康生。康生是常委，一端出来，打击面太大，毛主席肯定不赞成。一定要记住，不点名。你也不要讲有人反对学‘老三篇’。”

吴法宪说：“我在会上已经说了，我说了以后，曹轶欧很紧张，表示反对学‘老三篇’是错误的。”

林彪嘱咐说：“你回去和李、邱商量一下，不要点康生的名。”

我们再看西北组。

邱会作在8月24日下午西北组的讨论会上发言说："一、对毛泽东思想态度问题，林副主席说'毛主席是天才，思想是全面继承、捍卫……'这次说仍然坚持这样观点。为什么在文化革命胜利、二中全会上还讲这问题，一定有人反对这种说法，有人说天才、创造性发展……是一种讽刺，就是把矛头指向毛主席、林副主席。

现在也要向自己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在'九大'后二中全会后（上）又提这个问题，我认为是有人不同意，不然为什么又提这个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是不能动摇的，不能有形形色色的谬论，不能利用主席的谦虚来反对这个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关系到建设一个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问题。"

康生也在西北组讨论会上表示："完全同意邱会作的讲话，邱会作同志马列主义学得好！"

8月24日，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王良恩又到林彪住处取林彪在开幕式上的讲话稿，林彪接见了他，但还是没有把讲话稿给他。

华东组8月24日下午开始讨论时，张春桥前来参加。他穿一身浅灰色的毛哔叽中山装，含笑和大家打招呼。

许世友是华东组的组长，主持了下午的讨论。

讨论一开始，王洪文、徐景贤等人就提出："陈云为什

么在山下不来开会!应当要他来。”

陈云身体不好，到了九江，怕山上空气稀薄，没有上山。王洪文、徐景贤坚持等陈云来了再讨论。

接着，一个来自农村基层大队党支部书记的中央委员作了发言，华东组省一级领导人没有发言。大家在谈到林彪讲话中关于“毛主席是天才”的观点的时候，一致表示拥护，而且讲了很多颂扬毛泽东的话，在谈到“设不设国家主席”的问题时，大多数人表示：从自己的愿望来说，还是希望毛主席能够当国家主席，但是最后究竟怎么办，听从中央的决定。

晚饭后，邱会作给北京的黄永胜打电话说：“现在可热闹了，都动起来了。”

黄永胜说：“知道了，吴法宪来过电话。”

邱会作要秘书给总后勤部副部长张令彬打电话，坚持设国家主席。

叶群给黄永胜打电话说：“四个人跳出来了。让他们好好表演。”

晚饭后，李雪峰的秘书黄道霞把写好的华北组简报交给李雪峰，李雪峰说：“先放那里，等我开完会回来再看。”

李雪峰要去参加政治局会议。那天晚上，政治局的会议临时决定不开了，分别参加小组会。各小组继续讨论。李雪峰回到华北组时，华北组晚饭后的讨论还在进行。晚上讨论

前，李雪峰曾问汪东兴："你们下午那样讲，主席知道不？"

汪东兴说："主席知道，就是不让点名。"

正在旁边的海军司令肖劲光接着问："究竟是怎么回事，不是说不设国家主席嘛，现在又要设？"

汪东兴说："你老糊涂啦，笔杆子压枪杆子，厉害呀！"

这时郑维山正好进来，刚要开口，汪东兴说："你这个郑司令也不要糊里糊涂的，同志，要知道问题严重呢。我们林副主席真是了不起，要不是他发觉得早，又一次出来捍卫主席，问题可就大了。"

未参加下午讨论的吴德，看到大家都向汪东兴摸底，他也问汪东兴："有人反对毛主席，是什么人？"

汪东兴说："有人，枪杆子、笔杆子。"

大家以为在汪东兴那里摸到了底，晚上讨论时，参加华北组的海军司令肖劲光、北京军区司令员郑维山、天津市革委会主任解学恭、河北省革委会主任刘子厚、副总参谋长彭绍辉等老干部都纷纷表态支持设国家主席。

晚上讨论结束后，华北组的 3 个秘书迅速整理出综合简报和陈伯达、汪东兴的发言记录整理稿。李雪峰当场问陈伯达、汪东兴："你们的发言是否单出简报？"他们都说单出。秘书当即把他俩的发言记录整理稿装上简报头，分别送他们二人审阅签发。

陈伯达说，他的稿子还要再看一看，就拿走了。

汪东兴后来说他的发言不单出简报了，于是将他的发言编到综合简报里了。

当晚，华东组继续讨论。中途，江青到会。许世友看见江青进来，热情地招呼她坐在前排沙发。这时，这次庐山会议的东道主程世清开腔了，他说："宪法还是应设国家主席。"

一些人附和。

许世友说："还是毛主席当国家主席吧。"

江青看到有不少人要求设国家主席，就插话说："我觉得，不设国家主席，可以减少国家机构的层次，关于这个问题，主席已经作过多次指示，你们也都听过传达。大家还是尊重主席的意见吧！"

"不设国家主席，群众从感情上通不过。"浙江的陈励耘说。

"群众要我们去做工作嘛！"江青答。

"毛主席也应该听听群众的意见嘛！"程世清说。

"我们要看得远一些。主席不但高胆远瞩，而且深谋远虑……"江青扶了扶眼镜，朝会场四周看了一眼，慢条斯理向众人交底，"要知道，设了一个国家主席的位置，就会有人伸手的，主席都考虑到了。至于主席自己，他是坚决不当国家主席的，他说过：'不要黄袍加身……'"

江青在这里引用毛泽东所说的"黄袍加身"的典故，是指宋太祖赵匡胤陈桥驿兵变时，他的部将用黄袍披在他的身

上，拥立他做皇帝。毛泽东以此借喻他自己不愿意别人拥立他当国家主席。

听了江青如此明确的话，大多数人都不吭声了，有些人还在嘀咕，这时，江青侧过脸去对坐在旁边沙发上的许世友说："许师傅，你来帮帮我的忙嘛……"江青称许世友为"许师傅"因为许世友年轻时在少林寺当过和尚。

许世友说："别的事我可以帮你的忙，这件事我思想还是不通。好了，好了，今天就讨论到这里。江青同志，欢迎你什么时候到南京去。"

"好罢，我们到南京去再较量……"江青一边笑着回答，一边和许世友等人握手告别。

晚上，许世友和陈励耘分别向林彪、叶群报告说："有人干扰华东组讨论林副主席的讲话。"

19 时 10 分，陈伯达给叶群打电话，商量修改林彪的讲话稿。叶群要秘书李春生把她在中南组的发言记录，连同陈伯达送给她的陈伯达在华北组会上的发言稿，整理个书面发言。

晚上，李作鹏写信给叶群："叶群同志：今天简报看了一下，是比较抽象的接触了问题，没有更多实质性问题，似可以发，请您再过目。致（至）于我们两人发言的书面材料，可以整理，但在简报上不挂号为机动，你意如何？李作鹏 8 月 24 日"

24 日晚，各组的发言情况汇总上来，汪东兴一看，有几个人在发言中已经引用了陈伯达要印发的语录，他打电话告周恩来："总理，陈伯达要打印的语录还没有发，怎么办？"

周恩来让他先不要发。

晚上 22 时多，大会秘书处催要当天简报，李雪峰的秘书黄道霞将整理出来的华北组二号简报综合稿送李雪峰审签。此时已经是半夜 23 时多了，李雪峰正和吴德、解学恭一起吃夜餐。李雪峰问黄道霞："陈伯达的简报呢?"

黄道霞说："催了，秘书说还没弄好。"

李雪峰说："这个简报我还没看，学恭你年轻，眼睛好，你看一看。"

解学恭是华北组副组长，他看后，提了两条意见："'陈伯达的稿子另发'，把这一句勾掉，免得提了留个伏笔，他的稿子来了，他发他的就行了。"

还有一个是陈毅在华北组有两次发言，简报上说了两句。解学恭说："简报上别提陈毅了，把这两句勾掉。"

李雪峰表示同意，黄道霞当场勾掉了这两句。

简报再让李雪峰看看时，李雪峰说："我没带花眼镜，反正是如实记录会上的发言，你们就签字吧。"

于是，解学恭先签了，李雪峰也签了。吴德说："我就不签了。"他觉得自己没有参加讨论会，发言的具体情况也不了解。

李雪峰说："你签上吧。"吴德便在要付印的简报稿子上签了个"吴"字。

华北组有5个组长、副组长，山西的陈永贵、北京军区郑维山两个副组长当时没在场。黄道霞给陈永贵打电话时已经是夜里12时了，陈永贵和郑维山都睡了，他们俩没签字。黄道霞便把简报亲自送到简报组，算完成了任务。

简报的全文是：

华北组二十四日上、下午讨论了林副主席极其重要的讲话。伯达同志、东兴同志出席了下午的小组会，都在会上作了重要发言（另有简报）。

刘锡昌、郑维山、郭玉峰、聂元梓、刘子厚、马福全、钱学森、邝任农、吴涛、吴忠、尤太忠、彭绍辉等十二位同志发了言。陈毅同志也发了言。

大家热烈拥护林副主席昨天发表的非常重要、非常好、语重心长的讲话。认为林副主席讲话，对这次九届二中全会具有极大的指导意义。林副主席是我们学习毛泽东思想的光辉榜样，把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举得高，用得好，在每个关键时刻，对毛泽东思想的态度最好、最正确，这种态度，代表了我们的心愿，代表了全党的心愿，代表了全军的心愿，代表了全国人民的心愿，代表了全世界革命人民的心愿。使我们很感动，很激动，很触动，是个极大的督促，极大的鞭策，极大的教育。大家表示要坚决按照林副主席指出的这个

方向前进，努力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紧跟毛主席。刘子厚同志说，学习林副主席讲话，使自己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态度感到更亲。过去学习毛主席思想就是学得不好，就是有迷迷糊糊的思想，所以在文化大革命前以及文化大革命中犯了错误，今后自己要警惕，一定要努力学好毛泽东思想，改造好自己的世界观。

大家听了伯达同志、东兴同志在小组会上的发言，感到对林副主席讲话的理解大大加深了。特别是知道了我们党内，竟有人妄图否认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是当代最伟大的天才，表示了最大最强烈的愤慨，认为在经过了四年文化大革命的今天，党内有这种反动思想的人，这种情况是很严重的，这种人就是野心家、阴谋家，是极端的反动分子，是地地道道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是没有刘少奇的刘少奇反动路线的代理人，是帝修反的走狗，是坏蛋，是反革命分子，应该揪出来示众，应该开除党籍，应该斗倒批臭，应该千刀万剐，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

为了反击这种反革命阴谋活动，钱学森同志首先建议在宪法上，第二条中增加毛主席是国家主席，林副主席是国家副主席，接着汪东兴同志进一步建议宪法要恢复国家主席一章，大家热烈鼓掌，衷心赞成这个建议。大家认为，不能让妄图利用毛主席的伟大、谦虚来贬低毛主席的阴谋得逞，不能把减少毛主席接待外宾的事务工作作为借口，实际上现在

绝大多数外宾，毛主席都接见，几乎到中国的外宾是毛主席不见不走。毛主席不当国家主席，不是一样在接见外宾吗！

马福全同志说：我们河北省广大群众在讨论宪法时，一致认为只有伟大领袖毛主席才能领导我们从胜利走向胜利，只有林副主席，才能百分之百的用毛泽东思想武装我们贫下中农、工人阶级。强烈要求毛主席当国家主席，林副主席当国家副主席。我代表河北省的工人阶级、贫下中农要求宪法上写上。

## 第1139回：再震动，张春桥急见江青

## 看《简报》，毛泽东批汪东兴

25日晨，华北组的二号简报以会议的《六号简报》印出分发下去。全会立即轰动。

当时，上海的徐景贤和马天水正在吃早餐，收到了会议秘书组送来的两份《六号简报》，徐景贤看了，大吃一惊，连早饭都无心吃了，马上找到王洪文，给他看了《六号简报》。两个人议论开了，越谈越觉得无所适从，疑窦丛生。上午华东组又要开会，上海小组该怎么表态呢？他们想去找张春桥请示，可是又想此刻恐怕不大适宜。徐景贤拎起电话，要总机接到坡下张春桥住的那幢别墅。接电话的是严秘书，他说张春桥还没有起床。徐景贤问他看到华北组的《六号简报》没有，严秘书说没有收到。徐景贤就在电话里把《六号简报》的主要内容告诉了严秘书，让他叫醒张春桥请示下一步该怎么办。

徐景贤搁下电话，过了片刻，电话铃响了，还是严秘书打来的，他说已经报告了张春桥，张春桥要严秘书马上到徐景贤这里来拿《简报》。

电话挂断不久，严秘书就气喘吁吁地爬坡上来，从徐景贤手里取走了那份《六号简报》。

很快，江青的秘书杨银禄接到张春桥打来的电话，问："江青同志起床了没有？如果起床了，我想去一下你们那

里，我有急事想跟她说说。”

杨银禄说：“江青同志起床了，我去报告她。”

张春桥急切地说：“你快去报告，行与不行，你给我来电话。我等你的电话，请你快一点。”

张春桥性格内向，平时说话较少，没有急事他不那样着急。

杨银禄放下电话，马上到江青的办公室向她报告说：“春桥同志刚才来电话，说有急事想见您。”

江青听了立即答复：“请他快点来，他肯定有急事。”

杨银禄正准备回他的办公室给张春桥回电话，江青说：“就用我的电话给张春桥同志回电话吧。”

杨银禄给张春桥回完电话，就到走廊里迎候他。没有多大工夫，张春桥就风风火火赶来了。他见到杨银禄主动跟他握手，并说：“谢谢你了。”

平时，张春桥是不爱跟工作人员说话的。

杨银禄把张春桥带进江青的办公室就出来了。

过了一会儿，张春桥走了。江青打铃叫杨银禄进去。见到他，江青霍地从沙发上站了起来，大声问道：“小杨，华北组的《简报》你是送给我了还是压下没有给我？你老实交代，我怎么没有看见？”

杨银禄回答：“江青同志，我送给您了。”

他一边回答一边寻找，一眼看见文件夹里的那份《简

报》，赶紧说："江青同志，那份就是。"他指着那份《简报》说，"刚才王良恩同志来电话说，这份《简报》要收回去。"

江青看到简报，心情平静了一些。她说："你给良恩同志回电话，就说我还没有看，看完了再交回去。"然后自言自语地说："看来是有人做贼心虚了。"

她转向杨银禄说："你给总理打个电话，如果总理有时间的话，我到总理那里去一下。"

杨银禄说："好，我去给总理打电话。"

杨银禄回到自己的办公室，立即给周恩来的秘书钱嘉栋打了电话。等了一分钟，钱嘉栋回电话说："总理说请江青同志现在就来。"

杨银禄放下电话，跑到大院里报告正在散步的江青说："小高那里请您现在就去。"

江青上车走了。

再说上海组这边，徐景贤送走严秘书，和王洪文商量后，赶紧把上海的中委们全部找来，紧急讨论上午如何表态。

小组的成员们没有到齐，王洪文和徐景贤站在别墅门口的台阶上朝坡下望去，只见张春桥从他的住所急匆匆走出来，几乎是同时，左首别墅里的姚文元也出了他的屋门。两个人见了面，不说一句话，就一起坐进了早已停在院子门外的一辆轿车里，疾驰而去……

上海的中委们齐集在王洪文的住所，大家翻看着《六号

简报》，七嘴八舌地议论着。大家认为，上海小组应该有一个统一的态度，由王洪文代表小组集体发言。对于林彪的讲话，上海小组一致表态：应该坚决拥护毛主席是天才的观点；关于设不设国家主席的问题，大家觉得还是应当听从毛主席的指示，以不设国家主席为准；至于陈伯达、汪东兴在华北组的发言，因为不了解情况，上海决定暂不表态。讨论的意见基本趋向一致以后，大家推举由徐景贤执笔起草一份上海小组的集体发言。

徐景贤把发言稿写完后给大家念了一遍，征求意见，大家表示同意，只有上海市革委会副主任、空 4 军政委王维国脸上毫无表情，一声不吭。在大家议论纷纷时，他也是沉默不语。王洪文看了王维国一眼，然后宣布："没有不同意见就算一致通过。"

散会以后，和王维国住在一幢房子里的上海电机厂候补中委金祖敏告诉王洪文和徐景贤，王维国这几天接到过吴法宪的电话，多次单独出去。

此时，李作鹏也拿着《六号简报》对邱会作说："你看人家登出来了，你们西北组温度不够。"

邱会作提出要把他的发言单独出简报。他让秘书打电话问张池明、张令彬在小组会上发言没有？张池明回电话说："国家主席、副主席讲了，整简报时写上了，陈锡联、潘复生审稿时给去掉了"。

吴法宪看过修改后的西南组简报，马上找西南组会议记录人员说，西南组的简报“写得还不够，要把气氛写足一些，”，要参照《六号简报》改写，要把他的发言要点写进去，但不要写他的名字。他还亲自交代了用哪些词，如“篡党夺权的野心家、阴谋家”、“定时炸弹”、“罪该万死”、“全国共讨之，全党共诛之”，等等。

再说江青的秘书杨银禄在她走后大约有 15 分钟左右，突然接到江青的警卫员周金铭给他打来的电话，着急的问道：“老杨，怎么搞的？主席没有请江青同志到这里来吧？我看见主席马上就要休息了，怎么会叫江青同志来呢？看来咱们今天的日子可不好过啦！”

杨银禄说：“她怎么会到主席那里去了呢？是总理请江青同志去的呀。我不是说小高那里请江青同志去吗？要是主席请江青同志去，我就会说是老高那里请江青同志去呀。”

周金铭说：“在电话里说不清楚，回去再说吧，我们作好充分的思想准备就是了。”

周恩来的警卫员叫高振普，江青对他很熟悉，见面就叫“小高、小高”的。毛泽东的秘书叫高碧岑，江青对他也很熟悉，见面就叫“老高、老高”的。通常，如果对江青说“小高那里请您去”，她就知道是周恩来请她去；如果对她说“老高那里请您去”，她就知道是毛泽东请她去。这是不会出错的，今天是怎么了？杨银禄放下电话，害怕极了，也后悔极

了。经过反复思考，他决定还是向江青实话实说，而决不能说是谎报了军情，只能承认自己没有直接说“总理请您去”，而是说了“小高”那里，语言表达得不明确，这样才符合当时的真实情况。不多作解释，听天由命吧。

过了一会儿，电话铃响了。杨银禄拿起电话，是周恩来秘书钱嘉栋的声音，他说：“总理叫我问一下，江青同志怎么还没有来呢？总理等得时间不短了。”

杨银禄说：“江青同志到主席那里去了，她回来以后，我马上报告她。”

钱秘书说：“那好，我向总理报告一下。”

就在杨银禄放下电话的同时，听到院子里有汽车的声音，是江青回来了。他急忙跑下楼去，小心谨慎地问道：“江青同志回来了？”同时，还特别注意了一下江青的情绪，看得出她不但没有表现出任何不高兴的样子，反而表现出洋洋得意的样子。

江青高兴地说：“回来了。总理没有来电话吧？”

杨银禄说：“总理刚刚来过电话，他请您快点去，他已经等得时间不短了。”

江青说：“那好，我现在就去。”

说着，又上了汽车，到周恩来那里去了。

江青从周恩来那里回来以后，还是那副高兴的样子，一直没提起莫名其妙到毛泽东那里去的事。

原来，江青到了毛泽东那里，一下车就喊："小高，小高！"

这时，她看到是到了毛泽东的住处，忙说："怎么把我拉到这里来了？"她又说："既然来了，我就进去见见主席吧。"

江青进去以后，张耀祠副主任发了大火，他对周金铭说："不叫她现在来，她非要现在来，主席责怪下来谁负责？"

周金铭把责任揽过来说："是我搞错了，我作检讨。"

不一会儿，江青从毛泽东的卧室出来，高兴地对周金铭说："今天是歪打正着，下不为例，你给春桥、文元同志打个电话，请他们二位也来主席这里。"

没有多长时间，张春桥、姚文元就到了。

毛泽东让江青先回去，然后听张春桥汇报。

张春桥缓缓说道："说起来，有不同意见也不足怪。奇怪的是一种气氛。一些同志明明自己同主席的指示对立，却反而指责不同意他们的人是反对主席，还要'揪出来'，'斗倒、斗臭'。这种气氛几乎控制住了会议。"

毛泽东又问："那么，就没有替我做做工作，说我不想当国家主席，也不愿当什么天才？"

张春桥犹豫一下，字斟句酌："就算有，也遭到围攻。当然，其中多数人也是出于对主席的热爱。"

姚文元小心地补充："华东组，春桥同志讲了这个观点，

还强调了是您的意见，结果遭到围攻。”

毛泽东点了点头：“可见，打着我的旗号跟我唱对台戏，是个高明的战术呢！”

张春桥、姚文元走后，汪东兴打电话给吴法宪，告诉他：“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没有经过联系，突然闯到毛主席那里去了。毛主席没有接见江青，对她说，你走。

江青走后，毛主席单独见了张、姚两人。两个人在那里抱着毛主席的大腿哭，把毛主席的裤子都弄湿了。他们说：现在各组都在揪人，连华东组也要揪人了，而且要追查后台。

主席对他们两个说了些什么，不知道。

这个情况已经告诉了叶群。叶群叫把这个情况告诉你。你要沉住气。”

张春桥、姚文元从毛泽东那里回去后，又和江青一起到周恩来那里谈话。

上午，林彪在听秘书读完华北组的《六号简报》后，极为重视，让秘书念了两遍。然后笑着说：“听了那么多简报，数这份有分量，讲到了实质问题。比较起来，陈伯达讲得更好些。”

毛泽东看了《六号简报》。到了吃中午饭的时候，他叫人通知汪东兴过去。

汪东兴一进门，毛泽东就问他：“看到《六号简报》了吗？”

汪东兴说："刚看到。"

毛泽东说："他们已经来过了。他们说《六号简报》影响很大。"

他接着严厉地说："你汪主任了解我不当国家主席的意见，还派你回北京向政治局传达过，你怎么又要我当国家主席呢？"

汪东兴一听毛泽东叫他"汪主任"，知道事情严重了，以前，毛泽东从来没有称呼过他的职务。他赶紧向毛泽东解释说："我听陈伯达发言说，有人听到毛主席不当国家主席就欢喜得跳起来，我很气愤。"

毛泽东脸上仍然没有笑意，威严地说："那就让他们去高兴吧！"

汪东兴又说："在群众讨论修改宪法时，大家都拥护你当国家主席。"

毛泽东："不当国家主席就不代表群众吗？你强调群众拥护，难道我不当，群众就不拥护了？我就不代表群众了吗？"

汪东兴赶紧向毛泽东检讨。这时，已经是下午 14 时了，毛泽东要汪东兴马上通知政治局常委及部分政治局委员和各大组组长下午 15 时到牯岭毛泽东办公处开会。汪东兴亲自通知了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和康生四位常委，其他人由中央办公厅负责通知。

林彪乘车去参加毛泽东召集的常委会。叶群知道后急忙乘车追赶，车未停稳她就急忙下车，结果跌了一跤。

叶群疾步走到林彪的车前，对林彪说："如果会上有什么情况，除了要保吴、李、邱外，千万要保汪东兴。"

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到了毛泽东住处，毛泽东分别同他们谈话。

## 第1140回：华东组，陈励耘指向明确
## 急叫停，庐山上风标再转

25日午饭后，许世友给周恩来打电话，报告了华东组的讨论情况，并问陈伯达的讲话是否经常委会讨论？周恩来说没有。

接着，许世友又给汪东兴打电话。

下午，华东组的讨论继续。会场设在庐山图书馆旁边的一幢小楼里，场内的气氛异常，其他省、市的中委们在交头接耳，窃窃私议，很多人的手里都拿着那份《六号简报》。他们一见上海小组的人员进场，马上停止议论，用一种沉默的目光打量着上海的中委们。

会前，徐景贤拿了誊写清楚的上海小组集体发言稿《我们的态度》，给上海的每个中委传阅，以便让王洪文代表大家发言。大家都在发言稿上都画一圈表示同意，只有传到王维国那里时，他在发言稿的下方批了一句话："不搞集体发言，各人发各人的为好。"

徐景贤拿到稿子一看愣住了，赶紧找王洪文紧急磋商："王维国这家伙怎么搞的，讨论时不发表意见，现在突然来这么一下子，简直是从背后戳一刀……"

王洪文气得呼哧呼哧地："不晓得他在搞什么名堂？真见鬼。只好不发言了，看看再说。"

张春桥依然是面带微笑走了进来。但是这回没有人招呼

他，也没有人回他一个笑脸。会场里寂无声息，空气简直像冻结了似的。

张春桥显得十分尴尬，讪讪地找了一个单人沙发坐下，连开水也没有人给他倒一杯。

陈云果然上山了，坐在那里气喘吁吁。

14 时，华东组组长许世友宣布大组讨论开始，他说："林副主席的讲话十分重要，林副主席是我们的光辉榜样，这一次又给我们树立了捍卫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范例，我们就是要像林副主席那样地来和一切反对毛主席的野心家斗，和一切违背毛泽东思想的言行斗。"

接着，王维国发言。他先是赞扬林彪的讲话非常重要，为全会指明了方向，接着说："毛主席亲自缔造、林副主席亲自指挥的人民军队，坚决打倒一切野心家、阴谋家！"

他说："宪法里还是要设国家主席"，"一个国家总要有一个头嘛"，希望毛主席考虑大家的意见。

此时，张春桥板着面孔不动声色，听得非常仔细。

接下来几个人的发言后，陈励耘发言，将会议的气氛推向了高潮。他一上来就慷慨激昂的说："林副主席在开幕会上的讲话是有所指的。现在就是有人胆敢反对林副主席，他们就是赫鲁晓夫那样的野心家和阴谋家，反对林副主席关于称天才的伟大理论就是反对毛主席。林副主席是毛主席亲自决定的接班人，那些反对林副主席的是些什么狗东西！有那

么一些人自不量力，还要反对我们军队的干部。这些人应该站出来，有胆量的就站出来，把问题交代清楚！你为什么要反对林副主席？你为什么要反对毛主席担任国家主席？”

陈励耘愈讲愈激愤，许世友坐在他前面，还没等他讲完，就回过头来支持他说：“老陈，你讲得对！我坚决支持你！你的意见代表了大多数军队干部的意见！叫他到江苏农村去劳改！”

时任福州军区空军政委的韦祖珍说：“谁反对毛主席，我们就坚决打倒谁！”

陈励耘最后说：“这些人应该站出来说说清楚！”

坐在徐景贤旁边的马天水，用胳膊肘轻轻地碰了碰徐景贤，轻声问道：“把野心家，阴谋家揪出来，究竟要揪谁呀？”

徐景贤只是朝他笑笑，他也不知道。

过了一会儿，陈励耘迈着八字步，一摇一摆向卫生间走去，马天水也跟了进去。片刻，马天水出来，回到自己的坐位上，满脸懊丧地对徐景贤说：

“刚才我问陈励耘究竟揪谁，他在厕所里说：谁是阴谋家、野心家就揪谁！这小子，看来他是知道底细的，不肯对我们说。”

陈励耘从厕所里回来，也在自己的座位上坐下，张春桥的位置正好在他的左侧，两个人的座位是九十度直角形。说来也巧，这时，正好有一个中委在慷慨激昂地发言，说是“不

把反对毛主席的人揪出来，决不收兵！”

陈励耘听到这里，马上打断他的发言，侧过脸去冲着张春桥，大声地说：“自己站出来嘛！”全场为之震惊。

张春桥的脸色非常难看，但他强作镇静，也不看陈励耘一眼，把眼光落在沙发前面的地毯上，只是不断地吸戳着手中的香烟……

会场里的“火药味”越来越浓。浙江省一个穿着海军军装的候补中委，索性站了起来，带领大家高呼口号：

“谁反对毛主席就打倒谁！”

“打倒野心家，打倒阴谋家！”

“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林副主席！”

全场随之高呼，声震屋宇，呼声一直传到外边的街道上去。

华东组“烧”起来了，上海的王秀珍也发言表态说：“林副主席讲话非常重要，给我们敲了警钟，不承认天才，就是不承认毛主席的正确领导……”

此时的华东组，几乎人人抢着发言。抢不上话筒的人就站起来喊口号：“谁反对毛主席就打倒谁！”“谁反对毛主席决没有好下场！”

有的人发言时拿着《六号简报》，直接引用陈伯达等人的讲话。

也有人干脆就念《六号简报》。

张春桥一声不吭，只是低着头一个劲地做着笔记。

郭沫若编入华东组，他戴着助听器，很困难地听着。听到一半，郭沫若也要求发言。他说："我是'懵懂'派，搞不清楚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今天看了华北组的《简报》，又听了刚才几位的发言，才知道全会上出了大事……"

一个工作人员匆匆走进来，跟许世友耳语了几句。许世友宣布："大家等一等，休息一下，等我回来！"

遂后，张春桥也走了。

大家守在会场里，不知道上面有些什么精神。

这时，杨得志问陈励耘："老陈，你讲的有人，到底是谁?"

陈励耘答："什么人反对毛主席就指谁。"

许世友是接到中央办公厅的通知，到牯岭毛泽东处开会。正在院子里的毛泽东看见许世友进来，一边和他握手一边问："你看，我这个手凉不凉？"

许世友照直说："凉。"

毛泽东叹道："我年龄大了，只能当导演，不能当演员。红娘总理当，我只能当老夫人。你们让我多活几年多好啊，还让我当主席呀？"

毛泽东对来开会的各组组长和政治局委员们宣布：

"刚才，政治局常委商量，认为小组讨论的问题不符合全会原定的三项议程，决定立即休会，停止讨论林彪同志在

开幕式的讲话；收回《六号简报》……”

毛泽东这位古稀老人，他不再有那种高亢有力的川江号子般的湖南音调了，他缓缓地说：“不要揪人，要按‘九大’的精神团结起来，陈伯达的发言违背了‘九大’方针。……”

下面有人不理解，小声议论着。毛泽东说：“你们继续这样我就下山，让你们搞。设国家主席问题不要再提了，要我早点死，就让我当国家主席，谁坚持设，谁就去当，反正我不当。”

说到这里，毛泽东转向林彪说：“我劝你也不要当国家主席。”

毛泽东的话里透出一种凄凉。这种话是他从未说过的。1959年批判彭德怀的那种高屋建瓴，那种嬉笑怒骂的潇洒已经从他身上永远地消失了。

他说：“本来我们这个会议，方针嘛，是开好的会议、团结胜利的会议呢，还是开不好的会议，变成了分裂失败的会议呢？还是要争取开一个团结的会，争取更大的胜利。如果开不成，仍要分裂，那也没有什么了不起。过去党是经过挫折的，千锤百炼。如果搞不好的话，那我就下山，你们去开，开完了会我再上山，就不下去了。再不然，我就辞掉党中央委员会的主席。”

他说陈伯达：“人家搞阴谋，就你不搞阴谋？”“我们共事 30 多年，你阴一套，阳一套，当面一套，背后一套。

政治局在山下商议不设国家主席，大家没有发表不同意见。上了山你就变了卦，搞突然袭击。我毛泽东是不当国家主席的，要当，你陈伯达去当好了，你们去当！”

散会了，人们陆续走了。心情烦躁的毛泽东正想坐下休息，忽然看见周恩来在不远处站着。

“哦，恩来，你没走？坐，坐下。”毛泽东知道周恩来一定有话要说。

周恩来显得心神不安：“主席，压力，是不是不宜过大？留有余地。温度降下来即可。我赞成主席的话，九届二中全会，只能开成团结的大会。”

两人相视一小会儿，毛泽东没说话，摸起一支烟，点着。

“船大不好调头，”毛泽东抱头仰靠在沙发背上，无奈地吁一口长气，“行，就按这个思路。”

周恩来点点头，站起告辞。

毛泽东叫住了他：“你让办公厅发个通知，明天不开分组会了，各省自己谈，也可以参观庐山。晚上看电影。”

沉吟片刻，他又说：“可是，事情要搞清楚。你和康生，找那几个‘大将’谈谈，无论如何，错误必须追查。吴法宪私拟设国家主席的宪法条文，要弄清楚。其他的人，我亲自谈。”

周恩来先后去江青、康生处谈话。

从毛泽东那里回到住处的陈伯达，很不高兴对秘书缪俊

胜说："主席批评了我。"

缪俊胜听了陈伯达的叙述后说："这个事情没弄好，会议没有这个议程呀？"

陈伯达说："林副主席讲话主席是知道的呀。"

随后，陈伯达、汪东兴被叫到周恩来那里谈话。

这天下午，邱会作来到西北组会场，看康生和召集人都不在，得知毛泽东把他们召去开会，便没把《六号简报》从皮包里取出来。但是西北组仍然集体通过了设国家主席的建议。

下午开小组会前，吴法宪又找王辉球、王秉璋、曾国华、曹里怀、邝任农开会，问他们是否看了华北组的《简报》，还说："这一下好讲话了，有材料，有根据了，你们还顾虑什么？对设国家主席问题，还是要表态。"

吴法宪来到西南组，看召集人不在。他把《华北组简报》拿出来给西南组副组长谭甫仁看，并问："人家一致通过设国家主席，我们这个组怎么办？"

谭甫仁说："照样来吧。"

吴法宪在小组会上宣读了华北组《六号简报》。结果，西南组也来了个一致通过设国家主席的建议。

很快，西南组召集人张国华从毛泽东那里开会回来，立即在小组会议上传达毛泽东的指示："毛主席在下午召集了中央常委和各大组组长会议，决定停止讨论和学习林副主席

的讲话，同时也要停止批判。现在会议已经发展到要揪人的地步了，有人写信要把反对‘天才论’的人揪出来下放，说这样的人不能在中央工作。这个空气太热了，要冷下来。因此毛主席决定，休会两天，换换空气。关于设国家主席的事情也不要提了，毛主席说他不当国家主席，林彪同志也不当国家副主席。天才的问题也不准再提了。这两天把会议的情况搞清楚，然后再开会。”

中南组曾思玉回来后，首先十分紧张地问：“我们的简报出了没有？”因为李作鹏曾说：“停一停，咱们中南组的简报先压一压。”所以中南组的简报没有出。

曾思玉听后，如释重负，说了句：“谢天谢地。”

华东组这边，正当众人翘首盼望的时候，许世友回来了，他一进门就没头没脑地大声嚷道：“不开了！不开了！散会！”

大家都愣住了，搞不清楚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没有人动弹。

许世友一把扯开军装的扣子，敞着怀，在会场门口不停地走来走去。过了一会儿，看大家谁也没动，又挥挥手：“不开会了。刚才我到毛主席那里去了，这是毛主席的决定，休会！大家回去吧。”

人们纷纷返回住处。

这时，韩先楚追上许世友问他：“你会上指的是谁

呀？”

许世友说：“鳄鱼眼嘛！”

“谁是鳄鱼眼？”韩先楚继续追问。

许世友用手做成眼镜状放在眼前说：“那个带眼睛的!”

25 日下午，李雪峰接到去毛泽东处开会通知后，华北组的讨论改由吴德主持。河北省 4 名劳动模范出身的候补中央委员吕玉兰、王国藩等先后发言，对新宪法不设国家主席问题提出质疑，认为宪法起草小组和委员会有问题，点了康生的名字。

他们讲完后不久，李雪峰就回来了，他对吴德说：“会议立刻停止。”

吴德觉得意外，问：“为什么停止？”

李雪峰说：“这是中央的决定。”然后向大家宣布会议结束。

北京的工人代表倪志福、刘锡昌、张世忠和北京大学的聂元梓同在一个小组里，突然宣布会议停止，他们很奇怪，问聂元梓是怎么一回事？怎么就突然停会了？出什么问题了？

散会后走出会场时，代表们很拥挤，石家庄一个工人代表在门口见到聂元梓也问她：“到底是怎么回事？怎么讨论着、讨论着就突然停下来了？”

聂元梓说：“我也不知道。”

他们很快就被人流冲开很远了，那位工人喊着对聂元梓说："你要有工夫，到我那里坐一坐吧。"

聂元梓对他喊道："再说吧。"

散会的路上，吴德又问李雪峰："出了什么事情，为什么会议要停止？"

李雪峰解释："毛主席主持各组召集人参加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批评了天才问题、设国家主席的问题，并提出中央全会分组会议立刻停止。"

吴德提到河北省 4 位劳模下午的发言，反对宪法不设国家主席，还点名批判宪法起草委员会。李雪峰说："这是中央全会，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有什么意见，可以自由发言。"

回到住处，北京的倪志福、刘锡昌、张世忠等人一连找了聂元梓 3 次，请她到他们的房间去坐一坐。聂元梓去后，他们问她选举国家主席的事情是怎么回事？聂元梓说："我也不知道。"

这些工人中委和候补中委还找到吴德，表示他们也同意设国家主席。吴德说："这个态度你们怎么表？假如问题涉及中央的负责人，按照党的原则，应该先报告毛主席，毛主席就在庐山啊！"

这些人走后，吴德立即给周恩来写了封信，反映聂元梓在会上到处串联。吴德后来回忆说：

当时，北京组的聂元梓又显示出了"造反派"的能量，

极其活跃，到处串联，她找了河北的同志、找了军队后勤部门的同志，一直串联到了吴忠。她对吴忠说有人反对毛主席，要把反对毛主席的人揪出来。吴忠问她是谁反对毛主席，聂元梓也不说具体人。吴忠对聂元梓其人是有警惕的，他说他不清楚情况，也不清楚是什么人反对毛主席，表示不愿意与聂元梓谈这样的问题。吴忠随即把这个情况告诉了我，说聂元梓在串联。

……

我给周总理写了一封信，是我和陈一夫同志商量后由他起草的。信的内容是反映聂元梓在到处串联，揪所谓反对毛主席的人，会议有些不正常。我把这些情况报告周总理后，还请示周总理以后的会议怎样开下去。

8 月 25 日，林彪再次会见前来取讲话稿的王良恩，仍然没有把讲话稿交给他。

## 第1141回：问情况，聂元梓再次挨批
## 收记录，三司令同时写信

林彪从毛泽东那里开会后回到住处，立即把叶群叫到房间。

……

不一会，叶群出来对工作人员说："首长开会回来了。主席说，张、姚烧一烧可以，但不要烧焦了。现在要降温了，压缩一下空气。我的书面发言不要整理了，你把草稿给我，以后可能还要用。"

叶群让军委办公厅第一秘书处第二处长宋城找到当时担任中南组记录的军委办公厅秘书郭士兴，从记录本上撕下她的发言记录，由宋城交给叶群。

吃过晚饭，吴法宪急忙到林彪的住处。林彪对他说："毛主席的态度变了，不高兴了。他批评了陈伯达，说陈伯达在华北组跳出来，起哄要揪人了。还说国家主席和'天才论'的事情都不要提了。就是这个情况，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不要紧张。"

回来后，吴法宪给邱会作打电话，问他："你的发言简报发了没有？"

邱会作说："还没有发。"

吴法宪告诉他："情况有变化，简报不要发了。"

邱会作即将其发言简报、记录稿压了下来。

吴法宪又打电话给北京的黄永胜。

晚上，宋城从庐山打电话到北京，口述了为黄永胜起草的书面发言稿。

黄永胜听后，做了一些修改后，就让发出去。吴法宪对宋城说："最好再等一等。"

秘书报告黄永胜后，黄永胜批示："等一等，看一看再说。"并让秘书打电话告诉了宋城。

中央办公厅秘书处根据中央指示，通知收回华北组《六号简报》。林彪、叶群一面让警卫参谋抄一份留存，一面给中办秘书处打电话说："毛主席决定收回《简报》，我们带头交。"

汪东兴给吴法宪打电话说："以后不要通电话了。"

林立果打电话转告王维国不要发言了。

晚饭后，陈励耘到福州空军政委韦祖珍房里去玩，韩先楚也跟了进来，问他："老陈，你到底在讲谁?"

陈励耘反问："你看我是讲谁?我不是说过嘛，谁反对毛主席就讲谁。"

韩先楚不说话，走了。

韩先楚一走，韦祖珍拉陈励耘出去散步，边走边说："老陈，你说得对，张春桥算老几，他有什么资格？是他反对毛主席！"

25 日下午和晚上，周恩来同前来的陈伯达、汪东兴谈话，

还先后去江青、康生处谈话。

25 日晚，周恩来主持召开各大组召集人会议，听取各组的汇报。在这个会议上，周恩来传达了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的决定："休会两天，换换空气。"

晚上，吴德正在看电影，周恩来派人找到他，要他过去谈话。

见面后，周恩来说："我已把你的信在政治局传阅了。"并指示吴德回去以后，组织代表中的工人委员开个会，批评聂元梓，解决她串联的问题。

吴德向周恩来汇报了河北省 4 位劳模下午发言批评宪法起草委员会的情况，周恩来说："可能是关于三个副词的问题，在纪念列宁诞辰一百周年发表的社论上，毛主席删去了这个内容。我已经要北京查一下档案。对这个问题，你为什么不在会场上对他们进行反驳？"

吴德说："我不了解情况，不好发言。"

周恩来说："不是很好讲的吗？宪法起草委员会的主任是毛主席嘛，副主任是林彪嘛！你们反对宪法起草委员会，不是反对毛主席吗？你为什么不讲？"

吴德向周恩来请示小组会如何开下去？

周恩来说："照原计划继续开。"

从周恩来处回来，吴德立即组织召开了批评聂元梓的会，批评聂元棒的非组织活动。吴德将批评聂元梓会议的情

况，手写了一份情况简报，报送周恩来。周恩来批示政治局传阅。后来在开大会的时候，周恩来还为这事点了聂元梓的名。他说："提议设立国家主席，是一个大阴谋。有的人不了解情况，就乱表态。还有咱们的聂元梓，也在下边串连。"

这天晚上，徐景贤他们正在王洪文住所的客厅里交流外出活动的情况，约摸 21 时左右，有一个穿军装的工作人员走了进来，把王洪文和徐景贤叫到客厅门外，轻声说："首长请你们去一次，车已经派来了。"

首长？哪一位首长？王洪文和徐景贤不便多问，只是紧随着那人走下坡去，一起坐上了一辆大"红旗"轿车。"红旗"在牯岭的柏油马路上行驶片刻，在一个大院子的门外停了下来。

夜已深，一幢长长的房屋好像一艘军舰，停泊在大院里的草坪上，房屋的窗户上都挂着厚厚的窗幔，屋内的灯光都无法透射出来，只看得见整幢房屋的黑黝黝的轮廓，使人感到有一种神秘的气氛。

穿军装的人把他们引上高高的台阶，穿过一条狭长的玻璃棚信道，走入房屋，这时，只见江青的警卫员大周迎了出来，原来是江青接见，王洪文和徐景贤交换了一下眼色。

他们跨进客厅，看见张春桥和姚文元两个人已经坐在那里了。张春桥的神情比前两天松快多了，他主动招呼王洪文他们在对面沙发上坐下，并说："等一下江青同志要见见你

们。”

过了片刻，江青出来了，一头乌黑的头髮齐耳根剪短，朝后梳着，看得出还吹过风，有一点暗波浪。她里面穿着白衬衣，外面罩一身浅灰色的毛料服装，从眼镜后面仔细打量了一下王洪文和徐景贤，热情地伸出手来握手，接着轻松而随便地往身后的长沙发上一靠，边坐边说：

“今天——找你们两位来——是想听听你们对这次会议的看法。”

接着，她就侧身朝左首的张春桥看了一眼，说：“我听春桥说，你们华东组开会的时候，有些人很凶呀。”

张春桥微微一笑，坐在一旁的姚文元却接上了口：“其实各个组都差不多，我这次参加西北组，也有‘宣讲员’。”

江青打断了姚文元的话，自顾自地说下去：

“早上，春桥说有急事找我，他带来那份华北组《简报》，还是从你们那儿拿来的，他自己的一份是后来才查到的。我这里到是早发来了，可是我还没有看呐！看完《简报》，我们 3 个人一商量，觉得情况严重啦，打算一起去找总理。上了车以后，不知道那辆车怎么搞的，一开开到主席那儿去了……”

“主席那天刚要睡觉，主席的习惯是晚上工作，白天休息。”张春桥在一旁补充说。

“是呀，那天可狼狈啦，主席正坐在床上脱袜子，刚刚

准备睡觉，给我们请起来了。”江青用手势比划着，吃吃地笑起来。“我赶紧给主席报告：‘主席呀，不得了啦！要揪人啦！’主席开始时莫名其妙，他跟本不知这华北组出了这样一期《简报》。”

江青说到这里，用手探到她那件浅灰色上装里边的口袋里，掏出一份折迭得方方正正的印刷品，把它展平了在手里扬着开怀大笑。

“哈哈哈哈……喏，这就是那份华北组第六号《简报》，他们要我上交，我就是不交，我说找不到了，我要留着看看，好厉害呀！野心家，阴谋家，两顶帽子，千刀万剐，这就是证据！”

“我们的几份统统交掉了，江青同志这份可以算是海内孤本。”姚文元从旁插话。

“你们要知道，陈夫子后面有几条枪杆子呢！”江青突然故意把声音压得低低的，“他们要陈夫子搞了一份马、恩、列、斯，毛关于天才的语录，给几条枪杆子每人发一份，24号那天，他们都充当‘宣讲员’，到各个大组去宣讲，所以，问题不仅仅出在华北组一个组，各个组都闹得很厉害，因此主席决定休会。”

“那末。东兴同志为什么要这样发言？他是毛主席身边的人。”王洪文把憋在肚子里好久的问题、当面向江青提出来了。

“哦，老汪吗？他也收到了一份语录材料，不过他事先可不知那些人的活动。那天在华北组的会上，听了陈伯达的发言，不知怎么搞的，他的头脑发热起来，就说了那番话，老汪他已经向主席作了检讨，那份语录材料也上交了。”

“你们知道吧，在 8 月份修改宪法的时候，有人就和春桥大吵一场。其实，矛盾也不是今年才有的，前次文元回上海去，是空军派的飞机，半路上就遇到了雷雨云。”

姚文元听到江青提到他的事，就介绍起来：“那次可危险了，飞机进了雷雨区，差一点飞不出来，后来又迫降在济南……像这种事，在空军里照理是不允许发生的……”

“找你们来，是要让你们心中有数，那几条枪，主席已经找他们谈话进行批评了，要相信，任何情况，主席总是有办法处理的。”江青说完这一番话，停顿了片刻，用手背掩着嘴打了一个呵欠，张春桥及时提醒：“请江青同志早点休息吧！”王洪文和徐景贤站起来来告辞。江青就在沙发前握手告别，一边握手，一边用左手食指点点王洪文说：“知道吧，对你的希望很大的！”

江青在这里说的是毛泽东对王洪文的希望。在“九大”期间，毛泽东曾几次接见王洪文，并要他代表全国工人阶级在大会上发言。

王洪文很快反应过来，流利地回答：“我一定不辜负主席和江青同志的希望！”

徐景贤紧跟看说："前一阵子听说江青同志身体不太好，头痛，请多加保重。"

"是呀，不过这几天他们一闹，我的头痛反倒好得多了，哈哈……"

王洪文和徐景回到住处，三脚两步跨上台阶，雀跃不已。王洪文将住处酒柜里剩下的半瓶茅台，一饮而尽。

8 月 26 日晨 3 时，吴法宪打电话，把毛泽东的批评和指示传给黄永胜。黄永胜要吴法宪赶快告诉宋城，把他的书面发言稿烧了，要宋城把在北京搞的一些语录也烧了。

早上，周恩来致函康生："为使林副主席讲话不发生任何副作用，我已阅过几次，由于个人精力有限，我再转请你校阅一次。请你起来后认真读两遍，有需要改动处，请用铅笔改，于午前退我亲改。此事纯属爱护副帅，忠于党，忠于领袖。以此共勉。暂勿告人为恳。"

午前，康生将林彪讲话退给周恩来说："我看了两遍，只在第三页上改了一个标点，如果林副主席同意发表，我看可以发给到会的同志们学习。"

上午，中央办公厅通知，今天不开小组会，各省自己谈，可以参观庐山，晚上准备看电影。

秘书于运深给林彪讲文件时，林彪说："军队的老干部都是炮筒子，说话走火。本来是好事，给他们弄糟了。""这些老干部是经过几十年枪林弹雨的，国家还得靠这些老干

部，那些人能干什么？”

于运深理解，林彪说的“那些人”应该是指张春桥等人。

叶群说病了，躺在床上了。林彪口授了一张“三心”和“三好”的纸条：“忠心、热心、细心，好学、好问、好帮助人”，让秘书于运深写好交给叶群。

陈伯达打电话给林彪、叶群，要回他的书面发言稿。

不仅叶群撕掉了她的小组发言记录，李作鹏也要收回他在中南组的发言。两位中南组的原始记录人，将记录本编上页码，注明几页到几页谁的发言，被谁撕走了。

邱会作也要撕下他的发言记录。记录人员告诉邱会作的秘书：“修改可以，撕下来不行。”邱会作只能作罢。

这些情况由各小组反映上来后，汪东兴报告了毛泽东、周恩来。毛泽东显得轻松，他笑着说：

“何必当初呢！当初那么积极，那么勇敢，争着发言，今天何必着急往回收呢！”

8 月 26 日以后，毛泽东要看中南组的会议记录。因为李作鹏和叶群的会议记录被撕走，组织人力整理了两天，整理好后送周恩来转毛泽东。

林立果到处打电话叫“撤退”，他气急败坏地给北京林办秘书打电话说：“翻车了，倒大霉了，都是他妈的主任搞的。她想抢头功，尽是瞎指挥。”

从8月23日到26日，中央委员们从各自不同理解与立场，

群情汹汹，矛头直指张春桥。许多组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也纷纷联名写信给毛泽东和林彪，坚决要求设国家主席，要求毛泽东重新担任国家主席。

8 月 26 日，刘贤权告诉吴法宪：王辉球、王秉璋在小组会上仍坚持的意见后，吴法宪把王辉球、王秉璋找来，对他们说："不要再讲了，我都犯了错误了，要写检讨了。你们不要再坚持，赶快收场。"

许世友觉得应该给毛泽东、林彪写封表态信，他让秘书李文卿替他整理。意思是："拥护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宪法不设国家主席的英明决定。"同时提出四条建议：一是犯错误的人必须向伟大领袖毛主席检讨请罪；二是犯错误的人不能参加中央工作，下放到基层，参加劳动，接受工农兵再教育；三是这些人也不能参加人大常委；四是对错误思想要进行批判。

信写好了，秘书李文卿拿去请许世友审阅签发，看见韩先楚正在许世友那里和他聊天。韩先楚问李文卿："写的什么？"

李文卿不敢做主，没有吭声。

许世友签完字，示意给韩先楚看看，李文卿才把信递给韩先楚。

韩先楚并不知道毛泽东已经点了陈伯达的名。他以为许世友信中所说的犯错误的人是指张春桥。林彪 8 月 23 日下

午的讲话，也让韩先楚兴奋不已。他觉得，林彪毕竟还是个敢说话的、务实的人。他仿佛阳光驱散云雾，又看到了当年的那个“林总”，甚至有了 3 年前搞《福建前线部队公告》时的感觉。 “毛主席要收拾张春桥这帮人了，这文化大革命不就快差不多了吗？”

回到住处，韩先楚也写了一封表态信。他说：“这两天真是痛快！”

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得志住在韩先楚的隔壁，他看了韩先楚的信，也照猫画虎地向毛泽东和林彪写了一封同样内容的表态信。杨得志后来在回忆录里说，看到张春桥在小组会上的狼狈样，他感觉到从文化大革命以来从来没有过的痛快！

除了许世友、韩先楚、杨得志写给毛泽东、林彪的信外，还有浙江的南萍、熊应堂……等等，不少人给毛泽东、林彪写信，都是批判张春桥的。

8 月 26 日下午，许世友、韩先楚将他们的信交给中办在华东组会议的秘书洪雪竹。随后，杨得志的信也由山东小组秘书送来交给洪雪竹。许世友等人说：“这几件信很重要，你带回去，请王良恩转呈主席，一定要稳妥送到。”

洪雪竹回到秘书组。晚饭后，王良恩要洪雪竹汇报华东组的情况，他把三封信交给了王良恩，并把几位司令员的嘱咐转告他。

这三封信和浙江南萍、熊应堂等人的信，都送到大会会

务组，最后转到周恩来那里。周恩来把许世友、韩先楚、杨得志的三封信转给叶群并附一条子："到此为止，存你处。"

山东小组除张延成、易耀彩在25日下午华东大组会上发言外，其它5人均未发言表态，但是他们感到在对待毛主席的态度这样一个重大原则问题上，不表态或态度不鲜明是不应该的。于是， 山东小组便在26日上午，仿照华东大组其他小组的作法，召开会议，联名写了一封表态信。信中写道：

"在我们党的九大以后的今天，有人竟敢妄图否认毛主席是当代最伟大的天才。这是极端反动的思想。对此，我们表示极大的愤慨！

为了誓死保卫毛主席，捍卫毛泽东思想，我们强烈要求：

一、犯错误的人一定要向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林副主席请罪；

二、在这次中央全会上进行批判，将这些反动思想彻底批臭！犯错误的人要向全会作深刻检讨或书面检讨；

三、犯错误的人立即离开中央；

四、到基层接受工农兵再教育，彻底改造反动的世界观。"

信封上写是"呈伟大领袖毛主席华东组山东小组"。

据济南军区政委袁升平后来回忆："写这封信，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我们的真实感情主要是两点：第一，确实出

于对毛主席的朴素感情；第二，确实出于对张春桥之流的愤慨。”“这不仅反映在‘表态信’上，而且流露在闲谈中。华东组的饭堂离杨得志同志住所很近，饭前饭后，大家围坐在他门前的大树下闲谈，话题常常是对张春桥之流的痛斥。韩先楚同志说：‘你们山东有材料，你们说嘛。’我说：‘打仗的时候看不见他们，现在出来掌权了！上海市委竟代替了党中央，他们在中央胡捣，这样的人要离开中央，不能在中央工作。极左派篡权，一定要下来，要下放。’这种愤慨情绪，在休会期间，一直延续了三四天。”

8 月 26 日休会期间，聂荣臻与叶剑英相约去游览庐山风景。他们在游览中边走边聊。

聂荣臻说：“吴法宪在小组会上说有人反对称毛主席是天才，又不指名。昨天来了华北组的会议简报，陈伯达也说了这个问题。”“不知他们指的是谁?华北组简报刚发下来，我匆匆看了一下，还没有来得及细看，就通知收回。今天宣布休会，不知在搞什么名堂?”

叶剑英说：“我所在的小组，李作鹏参加会议，也说有人反对称毛主席是天才，我叫他点明是谁，他就是不说。反正里面肯定有问题，就等着瞧吧。”

## 第1142回：找谈话，毛泽东召集开会
## 汪东兴，陈伯达都做检讨

陈伯达求见毛泽东。8 月 26 日下午，毛泽东的机要秘书高碧岑打电话通知："主席叫伯达同志去一下。"

陈伯达在毛泽东那里谈了有一个小时，毛泽东批评了陈伯达，并让他找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谈谈。

临别，毛泽东将陈伯达送到小车边。陈伯达回去后，挺高兴，说："主席就是批评我：'你官做大了，也不到我这里来了，也不写文章了。'主席说，'你要跟他们见见面谈一谈'。"

8 月 26 日下午，周恩来、康生找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汪东兴谈话。主要是了解小组会发言的情况。

听了大家汇总的情况，康生认为发生这样的事情，完全是因为"吴法宪造谣，汪东兴点火，陈伯达起哄，陈毅跳出来。"庐山上的这场斗争是"二月逆流与八月洪流之合流"，"是二陈合流。"

面对康生的指责，汪东兴没有看康生，也没有吭声，吴法宪他们则认为是行使正常的党员发言权利。

会后，周恩来到林彪处谈话。

26 日下午，徐景贤到张春桥的住所去看他。张春桥对徐景贤说：

"他们早就想揪我了！就在 8 月份，宪法修改小组开会

时候，吴法宪就和我大吵了一场。”

接着，张春桥把因为删去三个副词而引起的争吵经过讲了一遍。

徐景贤问：“那么所谓有人反对毛主席是天才的提法，指的就是删去三个副词这件事情吗？那是毛主席自己的意见呀！”

张春桥愤愤地说：“就是。他们存心要寻事，才不管这些呢？”

徐景贤又问：“那么伯达同志为什么会在华北组作那样的发言呢？”

张春桥说：“咳，你不知道，这个陈夫子呀，我和文元给他做了多少工作，想不到他竟……”张春桥长叹一声，又讲下去，“毛主席对他说：“我这条船还没有沉，你这头老鼠就跑走了！”

徐景贤对张春桥说，目前有些情况还弄不清楚，这几天想分别去接触一些人，听听情况，过几天再来看他。张春桥颔首赞同。

徐景贤回到住所，向王洪文、马天水等人介绍了去看望张春桥的情况，大家一致觉得不能关在屋里，要多出去走动走动。于是，在以后的几天里，王洪文和徐景贤找了政治局候补委员、华北组组长李雪峰，马天水找了河北省的刘子厚，徐景贤和陈敢峰还找了浙江省的南萍和陈励耘……

吃过晚饭，吴法宪和李作鹏、邱会作一起前往林彪的住处，想向他汇报一下下午周恩来、康生找我们谈话的事。林彪告诉他们："一是关于设国家主席的事情，不要再提了。这次毛主席说国家只设人大常委会主任，不设国家主席。主席还说，'我不当这个国家主席，我劝你林彪也不要当'。"

吴法宪他们把下午周恩来和康生找他们谈话调查的事告诉了林彪，说："这次把汪东兴也一起拉进去了。"

林彪听后，只说了一句："让他们去讲吧，总要有事实根据吧。"

8 月 26 日晚上，郑维山口述，秘书杜辛整理，给毛泽东、林彪写了一封信。主要讲汪东兴在华北组的发言所起的作用，说："我们都上了汪东兴的当，华北组闹起来，是汪东兴挑起来的。" 在这封信中，陈伯达只带了一个名字，主要是说汪东兴。

信写好后，郑维山看过，杜辛亲手交给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王良恩。

当晚 21 时 30 分，陈伯达找到李雪峰，说："与主席谈话一小时余，主席批评了。"他问李雪峰："是否到华北组作检讨？"

晚上，毛泽东继续召集中央政治局和各大组组长开会。他在会上说："我是一方面军的，可是我身边没有一方面军的人；我是湖南的，我身边没有湖南人。"还说："一句顶一

万句”、“四个伟大”这些说法都不恰当。

会上，陈伯达、吴法宪作了检讨，周恩来对他们进行了严厉批评。

会后，周恩来到康生处商谈。22 时 30 分，周恩来、康生又约六个大组组长开会。

27 日早上，林立果来找吴法宪，给他一本“九大”党章，说是林彪要他来送来的，并告诉吴法宪：“首长要你看一看。早在‘九大’上通过的党章中，关于毛泽东思想前面的三个‘副词’，就已经不见了。”

吴法宪翻开党章一看，果然如此。

27 日上午，陈伯达打电话约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到他的住处，对他们说：“这次找你们是经过毛主席批准的。你们几个今后再不要同我往来了，不要相互打电话，也不要写信了。”

他的话音里充满了凄凉。吴法宪他们很惊讶地问：“情况有这么严重吗？”

陈伯达说：“毛主席批评了我，说我自以为懂得理论，鼓吹天才论，在华北组起哄。毛主席说我欺骗了你们，你们把我编的语录烧掉吧。另外，毛主席还点了汪东兴、陈毅、邝任农的名字，你们也要注意。”

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从陈伯达的住处出来以后，又到了林彪那里。林彪肯定说：“毛主席是批评了陈伯达。”

这天上午，周恩来、康生继续找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汪东兴谈话。吴法宪带上了林立果早上给他的那本党章。

康生说："你们要交待：这个军事俱乐部是怎样形成的？你们长时间串通一气，还有陈毅这个反革命分子……"

吴法宪后来在回忆录中说，他当时对康生说："康老，你是中央常委，陈毅是中央委员，他什么时候成了反革命分子？说陈毅和我们串通一气，他在华北组发言说了什么，我怎么知道？再说，我们是军委办事组，这都是公开的，没有什么军事俱乐部。8 月 14 日讨论宪法的会议你康老也是在场的嘛，这个争论你是当事人，怎么是我造谣呢？"

听到这时，周恩来忙说："康老的话说错了。"

这时，邱会作说："康老在西北组讨论的时候，赞成我讲的话，还表扬我，说我马列主义学得好。"

康生脸红了，忙说："我并没有说你说的都对嘛！"

周恩来赶紧说："我们只是把情况弄清楚，大家都冷静些，现在不评论是非。"

吴法宪把"九大"党章拿出来，把写着"党内允许有不同意见的争论"的那一页翻给周恩来看，然后问："'九大'党章中的'三个副词'为何删掉了？"

周恩来一下给问住了，他说，这"三个副词"实际上不是林彪提出来的，而是"八大"由邓小平提出来的。但是"九大"党章上为何删掉了这"三个副词"？这要查一查。

此事康生也搞不清楚。

周恩来指示中央办公厅调来“九大”修改党章的原件，结果发现是毛泽东审阅党章时亲自圈掉的。

8 月 27 日，毛泽东继续召集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各大组组长开会。

这天，汪东兴交给毛泽东一份书面检查．检讨了自己建议毛泽东当国家主席的做法、言论是“没有听毛主席的话，我干扰了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也违反了政治局会议的意见，这是无组织无纪律的行动。我的内心极感沉痛。”并表示要“接受这次教训，好好学习毛泽东思想，坚决听毛主席的话，谦虚谨慎，戒骄戒躁，提高觉悟，坚决执行毛主席在‘九大’提出的方针——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毛泽东看过汪东兴的书面检讨后说：“这个检讨书可以发到全会上。”

汪东兴的检讨书，经周恩来批阅修改后印发给全体与会人员。

27 日上午，中央办公厅通知：“各省自行安排座谈。谈三个问题：国家主席问题不要再提了；学林彪的报告思想问题可以谈深一点；不要揪人，要谈遍。”

中午，陈伯达无精打采地来到江青的住地，用低颤的声音对江青的秘书杨银禄说：“小杨，请你报告江青同志，我想见见她，我有要紧的事想和江青同志说说。”

江青听说陈伯达来了，又有什么要紧的事要谈，精神马上紧张起来，两眼直愣愣地看着秘书，问道：“他现在在什么地方？”

秘书说：“在会客室。”

江青听了以后猛然站起来，嘴角哆嗦了几下，说：“他现在来干什么？你马上告诉他，我不见。”

秘书转身准备走，江青又说：“你等一下，不能说我不见，你就说我现在还没有起床，请你先回去，等江青同志起床以后我再报告她，是她请你来，还是她到你那里去，我再打电话报告你。总而言之，你想办法把他支走就是了。”

陈伯达又到康生那儿，康生对他说：“你不但要做个口头检查，还要做个书面检查，做得深刻一点。”

这天，心情忧郁的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 3 人坐车到庐山含鄱口合影。

下午，各省、市讨论修改宪法。

叶群对林彪说：“几个组都闹起来了。矛头都是对着你来的。”

林彪说：“那是吓唬人的。”

下午，江青起床以后，到办公室看文件，大约看了 10 分钟的时间，打铃叫杨银禄。杨银禄进去以后，她很客气地说：“请坐。”

杨银禄坐下以后，江青说：“我这几天心情不好，有许

多使我很为难的事情，又不好对你们讲。就拿叶群同志来说吧，她犯了错误，三番五次地叫我向主席说情。她是副主席、副统帅的老婆，不去为她说情吧，怕林副主席不高兴；去吧，又怕主席怀疑我和她之间有什么关系，将来说不清、洗不净。这件事，实在使我为难，想来想去，我还是硬着头皮见见她，听听她说些什么。”

可以看得出，江青的心里还是很高兴的。她站起来说：“说不准今天下午叶群同志就会来找我，你出去等她吧。她如果来了，你报告我，我再考虑考虑见还是不见。你去吧。”

杨银禄从江青的办公室出来以后，大约过了 10 分钟，叶群果真急匆匆地来求见江青。

江青的办公室外面有一个暗廊，暗廊里有几把藤椅、几张茶几。杨银禄很礼貌地对叶群说：“请叶主任在这儿坐一坐，我去报告江青同志。”

叶群问道：“江青同志休息得好吗？精神好吗？身体也好吧？”

杨银禄说：“都好。”

叶群说：“麻烦杨秘书，请你报告江青同志，就说我请求江青同志见见我。你们做秘书工作的知道不少情况，不怕你见笑，我是请求江青同志批评帮助的。谢谢你，杨秘书。”

叶群每次到江青处，对工作人员都很客气。

杨银禄说：“叶主任，不要客气，我去报告江青同志，

请您在这里等一下。”

杨银禄进入江青的办公室，看到她坐在沙发上，紧闭双眼，嘴唇微动。杨银禄报告她说：“叶群同志来到这里要求见您。”

江青听后沉思不语。足足等了 5 分钟的时间，她才开口说话：“叶群这个人呐！嗨，不说了。”

又等了一会儿，她站起来，说：“顾不得那么多了，决定见，你请她进来。”

大约过了半个小时，会见结束了，二人肩并肩手挽手高兴地走出办公室。在走廊里，叶群对江青说：“江青同志今天见了我，使我很受感动，您对我的帮助，我一辈子也忘不了。”

江青说：“请你回去代我问候林副主席。”

叶群习惯性地低头哈腰说：“一定，一定，谢谢江青同志。也请江青同志保重身体，您的身体健康，是我们的幸福。”

杨银禄把叶群送走了，江青又打铃把他叫到办公室，眉飞色舞地对他说：“叶群同志这样精明的人，多年在林副主席身边工作和受林副主席的熏陶，竟然也上了陈伯达的当！我看不仅仅是上当受骗吧？哈哈哈，她也有会犯错误的时候。”

江青沉思了一下又说：“我会见叶群同志的事和我刚才

对你说的话，你对任何人都不准说，这是铁的纪律，你听清楚了吗？”

“听清楚了。” 杨银禄回答说。

江青把叶群送走之后，立即调车到毛泽东那里去了。江青回到住地时，情绪很不好，找工作人员发泄，直到汪东兴来了又走了，江青的火气才基本上消失了。原来，江青到毛泽东那里，惹得毛泽东不高兴。批评她，“在关键时刻头脑要清醒”，“屁股别坐错了位置。”

这天下午，周恩来、林彪与陈伯达谈话，批评了陈伯达。

晚上，召开部分政治局委员会议。会后，周恩来去康生处约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谈话。

因为按照原来的计划，吴法宪是会议后期回北京换黄永胜上山的。当晚，吴法宪给周恩来打电话请示此事，周恩来说：“这个事情要请示毛主席。”

吴法宪把庐山这两天的情况大致告诉了黄永胜，但是电话上又不敢多讲。

黄永胜听得不明不白，很着急，一再让吴法宪讲详细一点，并且很奇怪地问：“怎么两天就全变了呢？”

吴法宪说：“电话里不保险，等你上山再说吧。”

过了两个小时，周恩来打电话告诉吴法宪：“主席说，吴法宪不回北京，同时要黄永胜立即上山，李德生回北京看家。”

遂后，周恩来、康生到林彪那里汇报吴法宪等人的情况。

8 月 27 日这天，林立果跑到林彪住处，向林彪秘书于运深大发议论，说：全怪“叶老胖”，“翻车了，倒大霉了，都是他妈的主任搞的。她要抢头功，尽是瞎指挥。”随后，林立果打电话给在北京毛家湾值班的“林办”秘书张云生，也说了同样一些话。

林立果这里说的“叶老胖”、“主任”都是指叶群。

8 月 28 日子夜 0 时过后，陈伯达来到吴法宪处，核实他讲没讲过“有人利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伟大谦虚，贬低毛泽东思想”这句话。

据吴法宪后来回忆，这天早上，吴法宪刚起床，就接到周恩来电话，让他马上去一趟。

吴法宪来到周恩来那里，周恩来对他说：“你是办事组副组长，组长没有来，你们组里出了事情，你应该主动承担一点责任。还是写个检讨，把问题说清楚算了。这样做的目的，最主要的是替副统帅担责任。你明白，问题是副统帅的讲话引起来的，要保护副帅，不然的话，又要攻到副帅的头上去了。”

吴法宪说：“我一定写这个检讨，但是怎么写，我觉得有点难。我想，是不是检讨这样一条，说林副主席的讲话是我提出来要讨论的，这样做干扰了大会的方向。”

周恩来说：“好哇！你也应当替我担一点责任。不然的

话，是我主持会议，好像是我提出来要讨论林副主席的。这事是你提出来的，然后大家同意的。”

吴法宪说：“我回去考虑一下，尽快写出一个检讨，先请总理审阅。”

周恩来说：“对宪法小组争论的问题，既要说清楚，又要合情合理。”

他问：“你们搞语录了吗？”

吴法宪说：“是我向陈伯达要的，他给我找了几条语录，我打印了几份，给了李作鹏、邱会作各一份。”

周恩来让吴法宪把陈伯达搞的《语录》拿一份给他。吴法宪回去后，马上叫秘书找了一份《语录》给周恩来送去。

## 第1143回：谈话忙，吴法宪斟酌检讨
## 刚上山，黄永胜即被召见

8 月 28 日上午，中央办公厅通知：上午综合宪法修改意见，可以个别出去参观，下午不要外出。

邱会作对秘书讲："以后不要同张池明政委联系了，资料也不要送了。"

许世友、韩先楚、杨得志三位司令员的信按照周恩来的指示这天转到了林彪秘书于运深这里，林彪听了这三封信，对于运深说："此件压十天。"

叶群知道后，对他说："今后凡是遇到称赞首长的和要揪人的事，要注意把关。"

这天，周恩来先后到林彪、康生处谈话。之后，周恩来约政治局部分成员开会。

上午，周恩来通知李先念、李德生明天回北京担任中央值班，换纪登奎、黄永胜上山。

下午，周恩来又给吴法宪打了一个电话，再次强调作检讨的目的是为了保护"副帅"，把事情平息下来。吴法宪说："请总理放心，一定按照总理的意见办。"

下午，林彪去见毛泽东。走之前，叶群对他说："吴法宪空军司令的职务，要向主席建议不要动。"

林彪回来后告诉叶群："吴的职务可以不动。"

叶群打电话告诉吴法宪："林总在主席那里说话了，你

的职务不会动。”

晚饭后，吴法宪到林彪处，林彪对他说：“昨晚，是康生的意思，约总理到我这里来了，说汇报你们几个的情况。康生说，这次庐山会议的主犯有三个：一是陈伯达，二是吴法宪，三是汪东兴。是吴法宪造谣，汪东兴点火，陈伯达起哄，还有陈毅跳出来。我对他说：我不同意这个意见，这个问题的根据不充分嘛！说吴法宪造谣，8 月 14 日的争论你也在场，怎么是造谣呢？吴法宪这个人我了解，从一军团到四野，跟了我几十年，从来没有听他造谣过。再说陈毅和吴法宪、汪东兴他们也没有联系。说到这里，周总理解释说，陈毅是跟着陈伯达来的，发言表示同意陈伯达的意见。我说，这个我就不知道了。后来周总理看到气氛不好，就对康生说，我们走吧，副主席要睡觉了。他们才走了。”

林彪说完后，吴法宪向他报告说：“总理要我写个检讨，主要的意思是为‘副帅’承担一点责任。”

林彪说：“你不要作检讨，你没有错。讲话是我讲的，错了我负责。”

吴法宪解释说：“总理的意思是要保护你。”

林彪说：“要检讨你检讨。你的检讨我也不看。用你的名义上送。”

他还说：“我们这些人，行武出身，打仗懂一点，搞武的行，搞文的不行，搞文的搞不过他们。这次不该讲话。”

叶群也给吴法宪打电话，要他沉住气：“你为了捍卫主席思想，主观动机是好的，不要检讨。”后来她又对他说：“你犯错误不要紧，还有林彪、黄永胜嘛。只要不牵涉到他们二人，大锅里有饭，小锅里好办。”“如果屋里坐不住，可以到外边去玩玩。”

林立果给北京的周宇驰打电话，让周宇驰代表他给吴法宪家里送糖果，以示慰问。

吴法宪利用晚上的时间拉了一个检讨提纲：

一、讨论林副主席的报告是我提出来的，干扰了大会的议程；

二、我对林副主席的讲话理解上有偏差，有错误。

他拿着这个提纲，又去和李作鹏、邱会作商量了个把小时。他俩都说，言多必失，简单一点为好。他们研究了“不能过线”，不能承认提供假材料，顶多承认错误核实不够等等，结果，这份检讨一共写了不到 20 句。吴法宪让军委办事组秘书宋城和他自己的秘书张云龙修改这份检讨稿，然后又找李作鹏、邱会作和宋城一起研究，一段一段修改。

此后，李作鹏、邱会作多次帮助吴法宪写检讨，再三交代吴法宪不要涉及叶群和他们二人，但责任他们三个共同承担。还强调说：检讨时，“只能照稿念，不能多说一句，要沉住气。”

8 月 29 日晨，陈伯达将他的检讨送周恩来和康生审阅。

这份检讨稿是康生帮助写的。检讨中说："24 日，我在华北组会上，作了一次发言。没有预先请示主席，也没有预先请示林副主席，同时也没有预先同总理、康老和政治局的其他同志商量过。""在这次修改宪法的问题上，关于国家设不设主席的问题，主席多次指示，我都是知道的，亲自听到的，但我没有深思主席的指示，不听毛主席的话，坚持要设国家主席，歪曲了林副主席的讲话，引起大家思想混乱。""我说的那个'天才'问题，主席在'九大'的新党章中，已经把这类字眼删去了。"

周恩来阅后批示"同意"，将改稿送康生阅后退陈伯达，并告中办负责人待陈伯达阅后，"以严格保密方式打（印）六份交我"。

29 日清晨，李德生临下山时，又去见周恩来。此时，天还未大亮，周恩来一边吃着早餐，一边向李德生交待说："李先念回京是主持国务院工作，你回去接替黄永胜，主持军委工作。""林副主席先发言我没有想到。事先并没有经过常委议定。华北组里陈伯达搞的《简报》是突然袭击！"

这天上午，毛泽东让林彪在住地召集陈伯达、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汪东兴开会。林彪说：这次会议是主席要他召开的，做做思想工作，要互相消除误会。与会者说要改造世界观，要好好学习，要搞好团结等。

最后林彪说："吴法宪没有说假话，他不是说假话的人，

他跟我几十年都没有听到过他说假话。”

当天，周恩来约计委副主任顾明等人开会，听取有关“四五”国民经济计划纲要草案起草情况汇报，提出作进一步修改的意见。

下午13时40分，黄永胜上了庐山，立即打电话向叶群报到。

叶群放下话筒，照着镜子打扮了一下，便去看望黄永胜。几天以来，她经常在自己的房间里偷偷掉泪。可是在旁人面前，是从不掉泪的。今天一见黄永胜，没有说出一句话，就像一个受了委屈的情人，扶在黄永胜的肩膀上，竟抽抽泣泣地哭起来了。

黄永胜一下子慌了手脚，连声说：“别这样，别这样，别让外人看到了。”

叶群掏出手帕擦擦泪水：“你不知道，这几天，日子可难过了。”一句话没说完，眼泪又淌了出来。

叶群与黄永胜的交往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了，在黄永胜还没有登上总参谋长的位置时，他俩私下即有来往，并互赠诗词。如有一首最能代表二人特殊关系的诗：

缠绵五周月，亲手折几枝；

虽是寒冬日，黄叶热恋时。

这首诗，是两个多月后的一次偶然机会，林彪的秘书李春生等人从叶群装语录卡片的盒里发现的，是黄永胜写给叶

群的。

眼前，叶群的日子很不好过。从 8 月 25 到 26 日，眨眼之间，处境竟然翻了个，从原告变成了被告，从进攻变成了防守。她的情绪非常低落，老是哭，林彪反过来安慰叶群。

29 日下午 14 时 30 分，周恩来召开组长会。

16 时 30 分，召开政治局扩大会，林彪主持，周恩来、康生及全体政治局委员、各大组组长、各省市区第一书记参加。会议扩大吸收了部分省、市的主要负责人如吴德、王洪文等人，其它中央委员们听会议的录音。

会上，周恩来传达了毛泽东 8 月 25 日下午在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上的讲话。康生介绍修改宪法的有关情况。

周恩来说："在全会一开始的分组讨论中，陈伯达、吴法宪等人作了有代表性的错误发言，把修改宪法的讨论引导到一个错误的方向去，以华北组最为突出。8 月 25 日主席召集常委扩大会议之后，才扭转了这一错误偏向。直到今天开会前，一直停止了小组会，我们这几天的工作就是要说服一些犯错误的同志作初步的检讨。"

在联系历史上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错误进行自我解剖、批判后，周恩来强调："主席对犯错误的同志的态度一贯是，允许犯错误，允许改正错误；要给犯错误的同志认识、改正错误的时间，对他们还要看，不能着急。全会还有两项议程，不能耽搁久了。大家要下决心按照毛主席的指示不折不扣地

去做，一定要把这次会议开好。”

康生说：“陈伯达是假马克思主义，自称是理论家，实际是政治骗子，他搞分裂活动。这次庐山会议是他第一个跳出来，分裂党中央，搞宗派活动，参加军事俱乐部，欺骗工农干部，把吴、李、邱几个人也拉上了。”

陈伯达在会上作了检讨。他满口的福建惠安土话，别人很难听懂。于是，让陈伯达开了一个头以后，由周恩来替他把检讨发言稿念了一遍。

陈伯达在检讨时想把责任往陈毅身上推，时任铁道部军管会主任的苏静打抱不平，发言说：“我们明明是听你陈伯达传达后才表态拥护的，陈毅也是受了你的骗，站起来支持的，怎么就变成他的了？”

事态变成了这样，陈毅也懵了，不敢说话，眼看着苏静替自己辩护。

因为苏静是国务院所属的中央委员，分管国务院工作的余秋里和李先念下来后跟苏静讲：“现在庐山上比较复杂，你们不要乱走，一乱走串门子就成问题，……”

接着是吴法宪作检讨。他说自己不学马列，不懂理论，上了陈伯达的当等等。

汪东兴则在检讨中说自己犯了错误，“毛主席关于不设国家主席和不当国家主席的意见，还是我向政治局传达的，但是在这次会上我头脑发热，又提出了与毛主席相反的意

见，毛主席已经批评了我……”

会议开到最后，林彪让张春桥发言。大家感到很突然，都竖起耳朵想听听张春桥说些什么，张春桥发言很简短，主要有两点内容：一是表示坚决拥护毛主席的指示，二是表示坚决团结在“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周围，做好工作。

会上，还传达了毛泽东对陈伯达等人的批评：“靡不有初，鲜克有终。”提醒中央委员会的成员们，不要学陈伯达的样子，注意保持晚节。年轻的中央委员听不懂这两句话，也不了解这两句话的出处，徐景贤在会场上递了一张纸条给郭沫若，请求解答。郭沫若当场拿起笔写下了答复，“‘靡不有初，鲜克有终’出自《诗·大雅》。意思是，万事万物无不都有一个开始，但是很少能有善始善终的。”

会议开到晚上 21 时 30 分散会。

开会期间，20 时 05 分，陈伯达秘书缪俊胜给林彪处打电话，林彪的秘书于运深接听了电话，并手记下电话记录。

缪俊胜说：伯达同志说：“林副主席讲话很好。表达了主席思想。不过，那里面有没有讲到主席多次强调这样的原话：‘是开一个团结的会议，还是分裂的会议，是开一个胜利的会议，还是失败的会议。’我记不清楚了。如果还没有讲到，最好想办法在录音里面加上去。不晓得这个意见对不对。’”

23 时 40 分，叶群让秘书于运深给陈伯达秘书回电话说："谢谢伯达同志的关心"。

毛泽东、周恩来召见刚到庐山的黄永胜。

毛泽东对黄永胜说："你一个组长不在，你的副组长和副总长，就在这里起哄。

一方面军的干部不如四方面军的干部好，四方面军的干部比较谨慎。一方面军的人骄傲自大。

张春桥手无寸铁，你们搞他干什么？你们有飞机大炮，有原子弹，你们能不能让我再看张春桥三年，不要急于下结论。"

黄永胜说："张春桥不得人心，群众意见很大。"

毛泽东说："什么群众！不就是文化大革命中受了委屈的人嘛，还有你们几员大将。文化大革命是我搞起来的，'九大'的路线是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你们为什么不团结起来批判刘少奇？"

听说黄永胜被毛泽东召去谈话，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商量完吴法宪的检讨后，相约一起来到黄永胜的住处。他们猜想，这个谈话很可能与他们关系重大，因此都很想早一点知道毛泽东这次找黄永胜谈话的内容。

他们在黄永胜那里一直等到下半夜，终于等到黄永胜从毛泽东那里回来。谁知刚回来，又先到林彪那里去了。吴法宪他们只好继续耐心等待，直到次日凌晨 4 时，黄永胜才回

来，对他们说了一些毛泽东接见他的谈话情况。

接着，叶群也来了。他们一起商量如何检讨，谈了约有4个小时。叶群、黄永胜要求统一口径，强调山上山下没有联系。在小组会上发言不要牵涉林彪、叶群、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之间只讲自己，也互不涉及。叶群还说："这场斗争有得有失，大家不要着急，锅里有饭，不愁碗里空。"

30日上午，吴法宪把自己亲自抄写的检讨稿报送周恩来。周恩来对他说："这样就行了，主要是对林副主席的讲话在理解上有错误，这个提法好！"

康生看了吴法宪的检讨，写了一大片，说"吴法宪的检讨不像话"、"不接触思想实际"等等。

吴法宪又修改了两次，最后由周恩来、康生签名印发全会。

8月30日上、下午，大会分组听8月29日晚政治局扩大会议录音。

这天下午，周恩来把吴法宪送来的《语录》送往毛泽东处。

庐山召开九届二中全会时，北京的空军"三代会"也在热火朝天的进行着。

周恩来在庐山上对吴法宪说："林立果的'讲用报告'是好，但是这样吹嘘不行。"

毛泽东办公室的人也对吴法宪说："空军对林立果的'讲用报告'吹得太厉害了，这样宣传不好吧。"

正为庐山上的事情闹得紧张不堪的吴法宪听到这些，立即同叶群联系说："'三代会'对立果的宣传过火了，我担心这样是为林副主席帮倒忙。我准备采取措施，全部收回立果的讲用报告，不准再这样宣传立果。我这样做是维护林副主席的声誉，保护立果。你是不是跟林总和立果讲一下。"

叶群立刻说："不用讲，就这样办！不准他们再帮倒忙。"

吴法宪马上打电话给妻子陈绥圻，要她去"三代会"的驻地，一个代表团、一个代表团地做工作，把各个代表团所散发的"讲用报告"统统收起来烧掉，录音带也要统统洗掉。同时，吴法宪又把这个情况告诉当时在北京负责"三代会"的刘锦平，要求他也这样去做。

这期间，林彪为叶群写了六个字："玉不琢，不成器。林彪，书赠叶群，七〇、七"。明明是在叶群情绪低落时写的，落款时间却提前了一个月?不知是一时笔误，还是有意为之。总之，林彪叫人把这六个字刻好送给叶群。

这事让林彪的秘书于运深想起林彪卧室床头左侧墙上，曾挂过自书条幅："匹夫见辱，拔剑而起，挺身而斗，此不足为勇也。骤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

8 月 30 日这天，周恩来往返于毛泽东、林彪、康生处。

庐山的别名云雾山，在 7、8 月间，傍晚以后到次日上午 10 时，山腰之上多被大雾笼罩，一两米开外就不见路径，难辨东西， 能见度极低。周恩来每次会议后，必去庐林一号毛泽东的住所汇报。从周恩来住的别墅到庐林一号，大约有三里路的样子，他乘车往返，中央警卫局都派人手提马灯在汽车的前面引路。

## 第1144回：毛泽东，深夜召见叶剑英
## 再挥笔，写《我的一点意见》

8 月 30 日夜 23 时已过，叶剑英刚入睡，秘书王守江接到周恩来打来的电话问："王秘书，叶帅睡了没有？"

王守江如实相告："叶帅刚刚睡下。"

周恩来在电话那头笑了，遂后问道："吃安眠药了吗？"

"没有。"

"那好，你把他叫起来，在家等着，我派车去接他。毛主席要见他。"

王守江激动地说："我马上叫醒叶帅。"

王秘书轻轻地走近叶帅身边，刚说了一句："总理刚来电话"，叶帅马上坐了起来穿衣服，问："有急事吗？"

"是，毛主席要见您。"

"好，好。"叶剑英连说了两个"好"字。

不一会，中央警卫局的人到了，他们是开着毛泽东的座车来的。此时，正是庐山云起时辰，满山漆黑如墨，浓雾弥漫，雪亮的车灯被云雾吞没的只剩下一团暗黄的光团，几步以外就什么也看不见了。路一边是陡峭山壁，另一边则是万丈悬崖。为了叶剑英的安全，两名警卫员打着手电筒，一边一个在汽车前面开道，大家几乎是一步一步"牵"着汽车走到毛泽东住地的。周恩来已经等候在那里，他意味深长地对叶剑英说："机会难得。"

毛泽东抬起头，看见叶剑英，站了起来，问："近来身体可好，湘潭习惯不习惯？"

叶剑英笑着说，1969 年 11 月，他和曾山、邓六金等一起从湘潭第二次去韶山的事情。

毛泽东开玩笑道："你一再去韶山，不要把我搞成什么天才哦!"

"不。您是我们的领袖和导师。"叶剑英说。

毛泽东认真地说："还是那句话，群众是真正的英雄。陈伯达说我是天才，其实发现天才的人，才是天才。我多次说过不设国家主席，别人偏偏要设国家主席，哪个想当就当，他们想当国家主席嘛，搞突然袭击。要和老帅们通通气。"

叶剑英频频点头。

这天晚上，毛泽东、周恩来、叶剑英谈了很长时间。

8 月 31 日，中央办公厅通知，各组自己安排活动。

这天，周恩来先后同黄永胜、林彪、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谈话。

这天，心情舒畅的康生叫来摄影师杜修贤，他要和妻子曹轶欧在庐山多照一些照片。杜修贤发现从不苟言笑的康生，眉眼间露出了罕见的笑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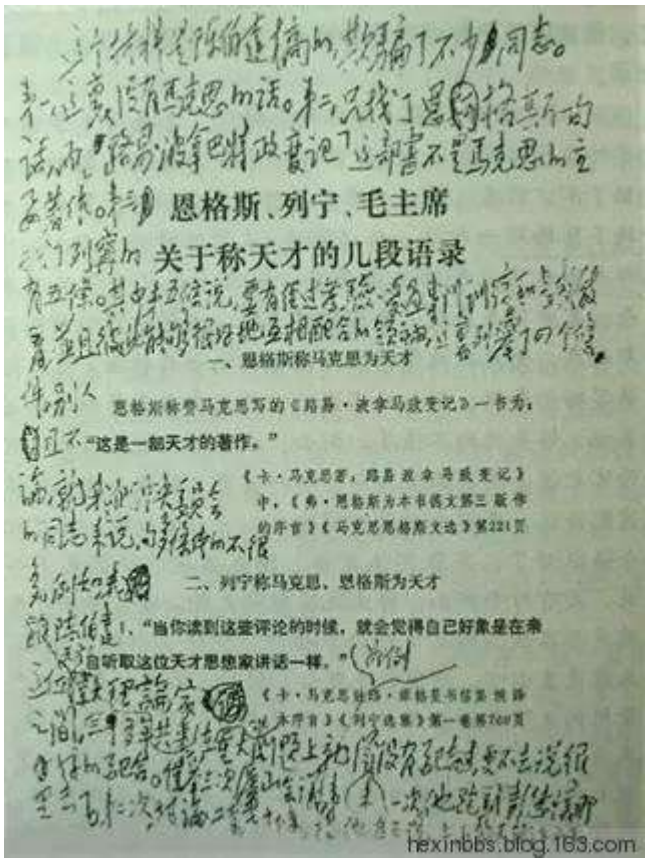
邱会作在吴法宪处碰见林立果，他说："这场斗争有得有失，打了个平局，一比一。"

8 月 31 日，毛泽东用铅笔在陈伯达编选的那份论述"天

才”的语录材料上，挥笔写下了如下700字：

这个材料是陈伯达搞的，欺骗了不少同志。第一，这里没有马克思的话。第二，只找了恩格斯一句话，而《路易·波拿巴特政变记》这部书不是马克思的主要著作。第三，找了列宁的有五条。其中第五条说，要有经过考验、受过专门训练和长期教育，并且彼此能够很好地互相配合的领袖，这里列举了四个条件。别人且不论，就我们中央委员会的同志来说，够条件的不很多。例如，我跟陈伯达这位天才理论家之间，共事三十多年，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就从来没有配合过，更不去说很好的配合。仅举三次庐山会议为例。第一次，他跑到彭德怀那里去了。第二次，讨论工业七十条，据他自己说，上山几天就下山了，也不知道他为了什么原因下山，下山之后跑到什么地方去了。这一次，他可配合得很好了，采取突然袭击，煽风点火，唯恐天下不乱，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我这些话，无非是形容我们的天才理论家的心（是什么心我不知道，大概是良心吧，可决不是野心）的广大而已。至于无产阶级的天下是否会乱，庐山能否炸平，地球是否停转，我看大概不会吧。上过庐山的一位古人说：“杞国无事忧天倾”。我们不要学那位杞国人。最后关于我的话，肯定帮不了他多少忙。我是说主要地不是由于人们的天才，而是由于人们的社会实践。陈伯达摘引林彪同志的话多至七条，如获至宝。我同林彪同志交换过意见，我们两人

一致认为，这个历史家和哲学史家争论不休的问题，即通常所说的，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奴隶们创造历史，人的知识（才能也属于知识范畴）是先天就有的，还是后天才有的，是唯心论的先验论，还是唯物论的反映论，我们只能站在马列主义的立场上，而决不能跟陈伯达的谣言和诡辩混在一起。同时我们两人还认为，这个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问题，我们自己还要继续研究，并不认为事情已经研究完结。希望同志们同我们一道采取这种态度，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不要上号称懂得马克思，而实际上根本不懂马克思那样一些人的当。


恩格斯、列宁、毛主席

关于称天才的几段语录

一、恩格斯称马克思为天才

恩格斯称赞马克思写的《路易·波拿马政变记》一书为：

"这是一部天才的著作。"

《卡·马克思著，路易波拿马政变记》中，《弗·恩格斯为本书德文第三版作的序言》《马克思恩格斯文选》第221页

二、列宁称马克思、恩格斯为天才

"当你读到这些评论的时候，就会觉得自己好象是在亲自听取这位天才思想家讲话一样。"

《卡·马克思弗·恩格斯著，列宁选集，列宁为本书写的序言》《列宁选集》第一卷第700页

hexinbbs.blog.163.com

毛泽东几乎没有什么修改，挥洒而就，一气呵成。第一页纸的天地边缘都写满了，再转到第二页，写在背后，文字

密密麻麻……写完以后，当晚 23 时，他约周恩来和康生过来谈话，给他们看了他写的批语。

周恩来、康生从毛泽东那里出来，已是 9 月 1 日凌晨，他们二人先将毛泽东的这一批语拿去给张春桥看，并同张春桥谈话。

上午 10 时，周恩来和康生又来到林彪的住处，将毛泽东的批语给林彪看，林彪表示同意。

康生对林彪说：陈伯达煽风点火，吴法宪说假话。

林彪说："我观察了吴 20 年，没有发现吴讲假话。"

此时，黄永胜要过来见林彪，叶群赶紧安排秘书把黄永胜挡住，不让他与周恩来他们碰面。于是，林办的秘书将黄永胜的电话作了记录：

"黄电话，请注意：1、一组（毛泽东）昨夜谈话很高兴，说 101（林彪）好。有脾气也是好的。这次是为一组（毛泽东）好。2、严格要求部队干部。3、对'十一'（江青）问题勿表态。防骄。读书。团结。勿偏耳"。

周恩来、康生走后，叶群将二人与林彪的谈话情况向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讲了。黄永胜对吴法宪说："要顶住，不能承认是说了假话。不然林副主席的话就站不住脚了。"

中午，周恩来从林彪那里出来后，即到毛泽东那里。毛泽东又在他昨天写的那个批语的抄清件上加上一个标题：

《我的一点意见》，同时在文中陈伯达的名字后加上“同志”二字。周恩来将《我的一点意见》逐字、逐句、逐个标点做了认真的校对，然后准备拿去付印。在付印前，毛泽东又删去了批语中的“陈伯达摘引林彪同志的话多至七条，如获至宝”一句，并将林彪叫去，将修改件拿给他看。

《我的一点意见》排印出来后，周恩来即交毛泽东作最后审阅。

下午 15 时，周恩来将印好的《我的一点意见》交陈伯达阅，并同他谈话。

陈伯达看完毛泽东的《我的一点意见》，已经吓出了一身冷汗，真是欲哭无泪，脑袋都要炸了。他知道自己完蛋了，但还是把全部希望寄托到了林彪身上，他毕竟还是党章规定的毛泽东接班人嘛。

此时，下午 15 时，林彪也在自己的住处召集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和汪东兴开会。

林彪首先批评吴法宪，说他没有核实情况就上报，引起自己动了气，就在会上讲了话。他接着说：“下午到了毛主席那里，毛主席指示，陈伯达在全党、全国的威信太高了，这次庐山会议要把他拿下来，要我和你们先打个招呼，和陈伯达划清界限。毛主席说，要我行先找你们开个会议揭发、批判陈伯达。”

一会儿，陈伯达来了。

林彪说："今天，找你们开个会。你们在会上为什么要在同一个时间发言，为什么都引用了同样的语录。你们要坦白，要交代。"

林彪讲完后，到会的人都不发言．有的翻材料，有的喝水。还是陈伯达首先说："我犯了错误，连累了你们，不该给你们搞语录，搞语录是欺骗了你们。"

吴法宪说："'语录'是我向你要的。我们看马列的书少，所以要你来帮忙。"

陈伯达说："你们今后不要再同我往来了。"

又没有人说话。过了一段时间。林彪说："嘿，为什么没有人发言？"

这时，汪东兴开口，批判了陈伯达。他说："华北组的讨论就是陈伯达放炮后搞乱的。"

随后，其他人也七嘴八舌地批了陈伯达一顿。会议开了约两个小时后散会。

汪东兴回到毛泽东那里，向毛泽东汇报了开会的情况。毛泽东听后哈哈大笑，问汪东兴："会还开不开？"

汪东兴说："林彪打了个招呼，说再开会就通知，不通知就不去了。"

17 时，中央政治局和各大组召集人开会。陈伯达看到林彪和叶群见到他时，都把脸扭到了一边。

毛泽东在会上指出：凡是在这次庐山会议上发言犯了错

误的人，可以做自我批评、检查。他点了陈伯达的名字，要他做检查。他还要林彪召集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这些人开会、听他们的检查。

接着，会议由周恩来主持，学习讨论《我的一点意见》，揭批陈伯达。

姚文元说："毛泽东思想是无价之宝，可以战胜一切牛鬼蛇神，也可以战胜'权威人士'。我们要学习毛主席这一重要指示。"

张春桥说："毛主席的《我的一点意见》是伟大的马列主义又一光辉文献。毛主席的《炮打司令部》大字报，打倒了刘邓反革命修正主义司令部。同样，毛主席发表的《我的一点意见》也一定战无不胜。我们要以批判天才论为中心，学习毛主席的《我的一点意见》。"

对那些没有参与争先恐后"表态"的人，姚文元说："不表态本身也是一种态度。"

邱会作回应说："表了态，也不一定是最好的态度。"

会后，23 时 30 分，周恩来向毛泽东汇报政治局扩大会议的情况。

接着，按照毛泽东的意见，周恩来连夜找吴法宪、邱会作、李作鹏等人谈话。此时，周恩来已经连续 30 多小时没有休息了。怕出意外，心脏病专家胡旭东和护士带着氧气瓶守在周恩来办公室门外。

会前，黄永胜对李作鹏说：“你的发言不能作检讨。因为你同叶群是一个组。你作了检讨，叶群就要作检讨。而叶群作检讨，就势必影响林副主席。”

黄永胜秘书宋城召集吴法宪秘书张云龙、李作鹏秘书刘继祥、邱会作秘书刘作山开会，传达黄永胜的指示：“这次会上的问题，你们都听了录音。回去谁也不能说，上不传父母，下不传妻子儿女。谁泄密，按党纪国法处理。”

黄永胜还让宋城查一下空军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有谁到了庐山，准备找他们开会，讲一下吴法宪的问题，做做工作。后因吴法宪不同意未开。

《我的一点意见》印成铅印的会议文件，附陈伯达编的语录，分发到每个中央委员的手里。

毛泽东在《我的一点意见》里说的那个“上过庐山的那古人”，是指唐朝大诗人李白。文章中引了李白的气势奔放的《梁甫吟》中的一句“杞国无事忧天倾”，来劝喻各位中央委员不要学“杞人忧天”，因为庐山不会炸平，地球不会停转。

毛泽东的这个《意见》，又一次使庐山会议风云突变，原来的“群情愤慨”地揭发张春桥，变成了一个个的“自我检查”。 对陈伯达的批评也转成批判。

9 月 2 日上午 8 时 35 分，林彪要秘书对战备问题、经济问题“拉条子”，搞发言提纲。

这天，全会各小组结合学习毛泽东的《我的一点意见》，集中开展对陈伯达的批判。吴法宪等人也受到批判。

西南组上午开会，康生参加。

会上，曹轶欧发言说："怪不得你吴法宪身为政治局委员，在会议上讲那样的话。造谣欺骗大家，你不以为可耻吗？"她说："陈伯达是跟着王明的，康生同志和我是反对王明的。建国以后我们曾给毛主席写过信，提出要批判王明。我们在莫斯科就反对王明。"

这时有人说："曹大姐，你应该向毛主席再写个报告呀。"

曹轶欧说完，云南省革委会副主任周兴和外贸部部长李强等也都纷纷指责吴法宪。

散会后，吴法宪给叶群打了一个电话，说："现在西南组不是批判陈伯达，而是批判吴法宪了。"

叶群对他说："你沉住气，我报告周总理。"

过了一会儿，周恩来给吴法宪打来电话，问他"究竟是怎么回事？"

吴法宪把西南组的情况说了说，电话里静了一会儿后，周恩来说："下午我来。"

西南组下午再开会，周恩来过来参加，康生去别的组了。西南组继续批判吴法宪，周恩来听了一会儿后说："你们这样批判就不对头了，我们讲要批判陈伯达，没有讲要批判吴法宪，《语录》是从陈伯达那里来的，还是要批判陈伯达。"

这天

下午 16 时 30 分，开战备会，林彪主持。

晚上，开宪法起草委员会。

## 第1145回：各小组，开会批判陈伯达

## 见江青，再接受“战友”斗争

9 月 2 日晚，周恩来飞回北京。深夜，约外交部、外贸部和外经部的领导开会，对他们说：“《参考资料》是否有必要每天登一条毛主席语录？第一，看的人不多；第二，针对性很难办。经过研究，并请示了毛主席，从 9 月 5 日起，不要登语录了，《共运资料》也不登了。《毛泽东思想胜利万岁》这本语录，未经中央批准，要清查一下。中央已三令五申，不经中央批准不得出版毛主席语录，为什么还乱编东西？怎么这样不谨慎？引用毛主席语录，一定是中央批准发表的。不能滥用毛主席的威望。有些话不是毛主席讲的，有的没有发表不能以讹传讹。”

9 月 3 日，周恩来飞返庐山，先后参加东北组、华北组和华东组的讨论。

周恩来在发言中继续批判陈伯达，在提及《我的一点意见》时说：“这是毛主席考虑了 3 天后才写出来的；陈伯达在中央核心内部长期不合作，他的问题迟早要暴露的。”

华东组开讨论会，周恩来、江青都来了。原来积极发言批判张春桥的空 4 军政委陈励耘作检讨。他还没讲完，张春桥就指着他说：“你整我，我根本不在乎！”

江青插话说：“你不听主席的话，就听陈伯达的话!”

这时，程世清说：“这个会议是党的会议。党员有意见，

应该在党的会议上讲。如果有话不能在党的会议上讲，不让他在党的会议上把话讲完，以后谁还敢在党的会议上讲话，应该让人家把话讲完。”

程世清一讲，周恩来也说：“你们让陈励耘同志把话讲完。”

陈励耘见状，赶紧顺势下台说：“总理，我没有什么话讲了。”

深夜，周恩到毛泽东处开会。

局面明朗化以后，上海的中委们兴高采烈，只有候补中委王维国，躲在房间里偷偷地哭了两次。

在小组讨论时，王洪文追问王维国：“为什么事先不提反对意见，临时推翻上海小组的集体发言稿？”

王维国皱着眉头，噘着嘴巴，连声检讨有错误，说着说着，竟又哭了起来……事后才知道，不但吴法宪给他交了底，林立果还秘密约他出去，两个人坐在汽车里一边兜风一边密谈。林立果要他在华东组坚持设国家主席：“毛主席不当的话，101 可以当嘛！”

9 月 3 日下午 13 时 55 分，林彪在床上叫秘书读了陈伯达 9 月 2 日凌晨写给毛泽东的信及陈伯达 8 月 29 日《我的检讨》。念完后，林彪询问了文件发的范围和去听录音的情况。他告诉秘书：“要帮助首长把关，发现有不适当的地方就同首长讲”。还说“陈伯达的检讨，强调要注意请示报

告”。

这天，林彪又召集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开了一次会，没有通知汪东兴参加。直到九届二中全会散了，也没有再通知汪东兴去参加他们的会议。毛泽东知道后对汪东兴说：“不要你了。说明你不是那个圈子里的人。”

9 月 4 日，毛泽东找林彪谈话。这一次谈话时间较长，主要内容是怎样批判陈伯达。毛泽东说：“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或也！下山前开一次生活会，问题不带下山。”

这天，北京毛家湾接到庐山“林办”秘书李春生打来的电话：“首长和主任让查一句话。有一句古话，‘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出处在什么地方，请告诉杨老帮助查出个结果后，尽快打电话给我。”

毛家湾从 8 月 23 日晚上接到叶群让姜思毅连夜写发言稿的电话后，已经一连七、八天没接到庐山方面的电话了。以往，叶群差不多每天都要往毛家湾打一两次长途电话。但在这七、八天中，叶群像是变成了哑巴，一个电话也没有了。在庐山的其他林办工作人员，也像断了线的风筝，和毛家湾断绝了联系。这可把整天习惯于忙忙碌碌应付叶群的郭连凯急坏了，他经常在办公室里念叨：“怎么搞的？庐山怎么一次电话也不来了呢？……出了什么事了吗？”

其他秘书也觉得情况有些反常。就在他们正在疑惑的时候，李春生的电话过来了。接电话的留守秘书张云生赶紧问

李春生："最近一个礼拜以来，主任没往回挂过一次电话，这是怎么回事？"

"在电话里不好讲。"李春生回避了，他让张云生赶紧去找杨老。

杨老是中国历史研究所的研究员，以前担任过大学历史系和中文系的教授，此时正在毛家湾帮忙。

对这位年至花甲、学识渊博的老学者，林彪、叶群都很尊重。一天，林彪让秘书张云生传话给杨老："让杨老来帮助我研究一下中国古代儒、法、道三家是怎样论述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儒家大概是主张团结，反对斗争；法家大概是主张一切斗争，不要团结；道家大概是以为团结、斗争都无所谓，但他们是怎样具体论述的？叫杨老将有的放矢摘成卡片，而不要整理成文章。摘卡片，也主要是摘各家代表人物的原话，例如儒家的孔、孟，法家的韩非，道家的老子等等。……"

"限他多长时间内完成？"张云生问。

"不急，"林彪说，"当然也要抓紧一些。"

林彪布置秘书干什么事，都必须报叶群知道。叶群听了张云生的汇报后说，"我不管。他爱叫杨某某搞什么就搞什么，反正老杨头帮我干的事不能耽误。"

这时，杨老根据叶群的布置，正在准备给她讲中国古代史，还要帮叶群搞点诗词格律的研究。说是"讲"历史，实

际上大半天都是在写提纲；提纲必须一式两份，一份交给叶群，一份由讲者参用。而每隔两三天，叶群就要给杨老布置一项“新内容”。秘书担心，年已 60 岁的杨教授，一面要紧张地应付叶群，一面又要为林彪摘录儒、法、道三家的语录卡片，这受得了吗？

“不要紧，”杨老说，“别看我的年纪大，可是身上没什么病，精力也还行。更重要的是，为无产阶级司令部工作，心情舒畅！”

他也真不愧是老当益壮。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他不但应付自如地完成了叶群的任务，而且星夜为林彪摘录了上千条儒、法、道三家代表人物的语录。

但自从林彪、叶群上了庐山后，没人再给杨老新的任务，正感到闲得发闷，张云生通知他查“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这个典故，他竟毫不费力地回答说，这句话的意思是：“纣王虽然不好并不如人们所说的那样坏。”他同时也点了这句话的出处。张云生遂用电话告诉李春生。

9 月 4 日，周恩来先后参加中南组和西南组小组讨论。

21 时，毛泽东召集政治局常委、组长开会。会议决定再延长两天会期。

此时的陈伯达已无法再作检查了，他对毛泽东和林彪说：“我现在的脑袋已经乱了，我要好好地休息休息，现在是什么问题都无法谈了。”

他说的都是心里话。当时整个会议的气氛真是紧张极了，几乎所有的人晚上都睡不着觉，都在打听着各种消息。一些当事人后来回忆说，这种政治气氛，没有经历过的人是绝对不会理解的。

毛泽东提出："关于国民经济计划草案稿，不要花多少时间讨论了。陈伯达如无政治历史问题，我的意见还保留中央委员；但要陈再进一步检查，我看有困难。"

会议决定，陈伯达不再出席大会。

常委会结束后，林彪回到住处，要叶群通知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到黄永胜的住处碰头。在黄永胜处，叶群告诉他们："毛主席提议陈伯达不再批了，准备讨论'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和军委的'战备工作'报告。毛主席还提出，6 日全会闭幕，散会回家。这次是康生打着大家的旗号，提出说：'大家的意见，要把庐山的问题搞清楚，不搞个水落石出，就不下山。'这时毛主席发火了，说：'要开会你康生去开吧，我是不开了。'在这种情况下，康生不吭声了。毛主席还决定，6 日全会结束，发公报。"

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王良恩对中央警卫团副团长邬吉成说："让你们的警卫多注意一下陈伯达，别出什么事情。他的情况要多汇报。"

邬吉成并不知道大会的情况，他奇怪的问："怎么啦，有什么情况吗？"

“情况嘛，有些复杂，总之你们提高警惕就是啦。”王良恩欲言又止，没有细说。

邬吉成随即和负责陈伯达警卫的孙凤山打了招呼：“对陈伯达跟紧点，别出问题。”而他自己有时看见陈伯达独自一人转悠时，也随之跟着走一段。

此时此刻，邬吉成发现陈伯达变了，以前如果警卫跟着保护他，他会发脾气，说自己“只是小小老百姓，不需要警卫跟着，没必要这样兴师动众的。”而现在，陈伯达不发脾气了，更不会撵走他们，只是自己默默地走着，隐隐约约露出几分消沉和颓丧。

有一次，陈伯达散步去了含鄱口，警卫孙凤山在他身边跟随。走到含鄱亭，陈伯达长叹一声，像是对孙凤山，也像是自言自语地说：“上庐山，我这恐怕是最后一次喽。”

9 月 5 日凌晨，周恩来因劳累过度，心脏出现异常，开始吸氧。此后，办公时均有医生和护士在门外守候，随时准备抢救。

上午，周恩来见到吴法宪说：“考虑起草全会的公报，我的意见是请张春桥、姚文元，你们那边由叶群、李作鹏参加一下，你就不用参加了。”

因为自从“九大”吴法宪担任大会副秘书长以后，有关会议公报的事情他一直都参加。

吴法宪马上就表示：“我参加也不好。”

9 月 5 日上午，陈伯达求见毛泽东。很快，毛泽东那边便回了电话，让他过去。

毛泽东一见陈伯达，握手后便说："这两年你都不来见我、看我了。"

这句话，让陈伯达一阵辛酸……

解放初，陈伯达因协助毛泽东做一些文字事务，从党校搬到中南海住。但在文化大革命中，江青说他干涉毛泽东的事。恰巧这时他后院"起火"，他第三次娶的夫人刘叔晏说她家的后院发现生人脚印，但她没有报告警卫局，家里谁都不告诉，而是让专案组成员、公安部的刘凯找公安部的摄影师来，到她家的前后院里拍照，这显然是违反中央警卫工作规定的。此事后来被江青知道了，大发脾气，让陈伯达一家搬到中南海外边的新建胡同去住，赶出了中南海。

陈伯达搬到北京新建胡同后，要见毛泽东自然就成了一件难事。

接下来，毛泽东说陈伯达："这几年官做大了，不来了，也不写文章了。参加'军事俱乐部'。"

陈伯达表示："我愿意检讨。"

毛泽东说："很好。可以找和你一块工作的几个人谈谈。"最后一句是："团结起来。"

毛泽东还让秘书给康生打电话，谈了他的意见，并且让康生通报给江青。

所谓“那几个与你共事的人”，即“中央文革”的人。

当天，陈伯达到了江青处，江青连声说：“稀客!稀客!”

江青带陈伯达来到康生的房间，张春桥、姚文元已在那里。于是，“中央文革”的全体成员——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最后一次聚在一起。

这次聚会，陈伯达低着头，硬着头皮听着当年的“伙伴们”对他的尖锐批判。

两天之后，继续开会。江青等人说陈伯达是叛徒，背叛中央文革，投靠军委办事组，把“林副主席”绑在陈伯达的战车上。

9 月 5 日上午，开大组会。

下午，大组会传达毛泽东指示。

叶群为 5 日晚和 6 日林彪要主持政治局扩大会和闭幕会问题向林彪作了报告，并对秘书说：“首长讲几句话，强调团结，反对分裂。强调辩唯、历唯。学毛主席著作，‘一点意见’。”“不要出影响团结的话，出形而上学的话。首长地位不同，提口号要慎重。注意科学性和基本理论，科学、严谨、热爱。”“严格要求高干和军队干部，要戒骄戒躁。”“鼓掌通过拥护主席的‘一点意见’，点一下夫子问题，揭了隐患”。“收文件事，由总理说。不宜早”。叶群还专门交代秘书李春生：“搞一个详细点的稿子，准备明天叫首长照念。不发挥”。“要帮助首长把关”。

9 月 5 日下午，毛泽东和周恩来、康生谈了如何结束会议等问题。毛泽东说："孔夫子打牌——和为贵"，最后还是"团结起来，争取更大胜利！"

9 月 5 日晚，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各大组组长和副组长参加，林彪主持。会议传达毛泽东指示，讨论国家计划委员会的"关于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和中央军委的"关于加强战备工作的报告"。这两个报告很快通过了。

接着，周恩来又提出了公报起草的人选问题。大家都同意他提出的意见：由张春桥、姚文元、叶群、李作鹏四个人组成公报起草小组。

当晚，叶群提出林彪应该去看望江青。林彪给了叶群一个嘴巴。叶群哭着说："我非常对不起你和几位老总。我们都上了汪东兴的当。主席和江青的关系不是不好，而是很好，……这次一定要去。去是给主席看的，说明你诚心。"

当晚，林彪带着叶群亲自到江青处拜访，林彪说了几句寒暄话后，便一声不吭了。他亲自到江青这里来本身就已说明了问题，无需用语言表达了。

林彪、叶群走后，江青立即向工作人员口述了一份给林彪的电话记录。

9月6日凌晨1时，江青打电话给林彪说："一组（指毛泽东）特别高兴，问副统帅好，说培养不易，是亲密战友……夫子（陈伯达）同张、姚有矛盾，文人相轻，利用我们……

吴法宪没事，不调工作……”

## 第1146回：和为贵，庐山会议终结束
## 再拜访，叶群诸人心不服

9 月 6 日上午，九届二中全会召开全体会议，基本上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通过了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提出的关于在适当的时候召开四届全国人大的建议；批准了国务院关于全国计划会议和 1970 年度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批准了中央军委关于加强战备工作的报告。

11 时，政治局扩大会，讨论全会公报。

下午 16 时，叶群交代秘书：“简报、文件通通交回”，“《我的一点意见》作抄存件，把字擦掉”。

17 时，九届二中全会举行闭幕式。毛泽东要林彪主持。这时，主席台上 5 位政治局常委还剩 4 位，他们中间的理论家陈伯达消失了。

会场气氛紧张。前几次，会场内外回荡着拥护毛泽东当国家主席的合唱，此时已变得一片死寂，针落闻声。周恩来代表中央宣布对陈伯达进行审查。

周恩来、康生发言后，毛泽东发表了讲话。他气愤里带着悲楚，对党的路线教育问题、高级干部的学习问题、党内外团结问题，发表了重要的意见。他说：

“现在不读马、列的书了，不读好了，人家就搬出什么第三版呀，就照着吹呀，那么，你读过没有？没有读过，就

上这些黑秀才的当。有些是红秀才哟。我劝同志们，有阅读能力的。读十几本。增加对唯物论、辩证法的了解。……要读几本哲学史，中国哲学史，欧洲哲学史。一讲读哲学史. 那可不得了呀，我今天的工作怎么办？其实是有时间的。你不读点，你就不晓得。这次就是因为上当，得到教训嘛，人家是哪一个版本，第几版都说了，一问呢？自己没有看过。”

谈到庐山会议上出现的这场风波时，他情绪有些激动地说：“庐山是炸不平的、地球还是照样转。极而言之，无非是有那个味道。我说你把庐山炸平了，我也不听你的。”“你就代表人民？我是十几年以前就不代表人民了。因为他们认为，代表人民的标志就要当国家主席。我在十几年以前就不当了嘛，岂不是十几年以来都不代表人民了吗？我说，谁想代表人民你去当嘛，我是不干。你把庐山炸平了，我也不干。你有啥办法呀？”

毛泽东说：“不讲团结不好，不讲团结得不到全党的同意，群众也不高兴。……所谓讲团结是什么呢？当然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之上的团结，不是无原则的团结。提出团结的口号，总是好一些嘛，人多一点嘛。包括我们在座的有一些同志，历来历史上闹别扭的，现在还要闹. 我说还可以允许。此种人不可少。你晓得，世界上有这种人，你有啥办法？一定要搞得那么干干净净。就舒服了，就睡得着觉了？我看也不一定。到那时候又是一分为二。党内党外都要团结大多

数，事情才干得好。”

主持会议的林彪最后简单地说了几句话：“这个会议整个进程中间都是主席亲自指导的。会议过程中间出现的问题，主席很敏锐地发现了，顺利地解决了。这个会，可能成一个是团结的会，还是个分裂的会？经过主席的这种指导，依然变成了一个团结的会，胜利的会。”

9 月 6 日，中国共产党第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公报发表。

九届二中全会的讨论快结束时，毛泽东找来张春桥，特意叮嘱他：“要在浙江请许司令吃一次饭。”

张春桥在自己住的别墅里备了一桌丰盛的筵席，让厨师做了十几个菜，厨师还别出心裁地烹调了庐山特有的名菜“三石”——石鸡、石鱼和石耳。石鸡是一种长在山间石罅洞穴里的蛙类，上海人把青蛙叫做田鸡，这里便把庐山上的蛙类叫做石鸡；石鱼是在山涧清溪里的鱼类，身体不大，肉质特别细嫩肥美；石耳是生长在庐山岩边缝里的一种菌类，很难采集到。“三石”俱全，这桌筵席就真正上了档次了。

张春桥郑重其事地向许世友发出邀请，许世友欣然应邀赴宴。这桌筵席就两个人吃，没有陪客，两个人又都善饮，许世友喝茅台量大是有名的，张春桥呢，别看他文绉绉的，喝起茅台来却很凶，在上海当对外友好协会会长期间，他和日中文化交流协会会长中岛健藏对喝茅台，打了个平手，这

一次在庐山，许、张两人第一次开怀畅饮……

会议结束前，各大组分别搞了一次会餐。华东大组的会餐地点设在山坡上的一幢俱乐部里。南京军区和上海、江苏、浙扛、安徽、山东、福建的中委们济济一堂，许世友特意把张春桥也请来了，作为对张春桥设宴的回请。

张春桥和许世友坐在一桌。酒喝到一半，空 5 军政委陈励耘，手里举着一杯茅台酒，一摇一摆地从浙江省中委坐的那张桌子旁走到张春桥身边，脸上露着不自然的笑容，谦恭地说："春桥同志，对不起，多多冒犯，请允许我敬你一杯！"

张春桥把眉毛一扬，嘴角略带微笑回答："我不在乎。"

两个人碰了一下杯，把各自杯中的酒喝干了。

庐山会议结束后，周恩来留住叶剑英，要他散会后先不要回湖南，和他一起回北京。

9 月 6 日晚 20 时，江青打电话到"林办"问："林副主席累不累，我想去看他。"

林彪马上回电话说："江青同志就不要来了，叶群马上去看你。"

江青请林彪注意保重身体，林彪说："这次不回北京，直接去北戴河养养身体。"

随后，叶群给吴法宪打电话，让他叫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和她一起去看望江青。

吴法宪说："他们可能不愿意去。"

叶群说："首长都去了，去做做样子嘛。"

随后，叶群打电话到江青处："杨秘书，请你报告江青同志，林彪同志问候江青同志，请江青同志保重身体。他叫我和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同志去看望江青同志。江青同志如果精神好，有时间的话，我们现在就去看望江青同志。我们等你的电话。"

杨银禄说："请叶主任等一等，我马上去报告江青同志。"

他放下电话赶快跑去报告江青。江青略加思索以后，高兴地说："既然是林副主席派他们来，请他们现在就来，你快去回电话。"

杨银禄正要走，江青又说："小杨，你是知道这次会议的情况的，你也知道他们在会上是犯了错误的，受了批评的，中央责令他们作了检查的。他们来了以后，你不要走，听听他们讲些什么，我讲了些什么，以后你可以给我作证，否则，以后我一个人说不清楚，跳进黄河也洗不清。当然啰，我也不怕，怕的话，我还不见呢。"

杨银禄立刻回到自己的办公室拨通了叶群的电话，说："江青同志说，请你们现在就来。"

叶群高兴地说："谢谢江青同志，也谢谢杨秘书。"

20 时左右，叶群带着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四员大将来到江青的住地。

"哎呀！太劳驾了！"江青见他们进来，赶紧站起来，

迎上去，兴高采烈地同他们握手，并与叶群热烈拥抱，热情让座。

江青说："林副主席身体不太好，本来我要去看望林副主席的，可是林副主席说你们要来，我就没有去。恭敬不如从命，谢谢林副主席，也谢谢你们来看我。"

叶群说："林彪同志如果知道江青同志要去看他的话，他会很高兴的。当然，是我们应该来看您：一来是向江青同志话别，再有一两天咱们都要下山了；二来是听取和接受江青同志批评帮助的。这次我们在会上上了陈伯达的当，犯了错误，林彪同志多次批评我们，说我们头脑简单、发热，起了不好的作用，辜负了主席的长期教导，也对不起江青同志，一定要我们向江青同志好好学习，向江青同志道歉，也请江青同志原谅。"

江青笑着说："叶群同志，你这话就言过其实了，见外了。你们这次犯错误，我心里也难过，也觉得不是个滋味。我们是一条战壕里并肩作战的战友。这件事是陈夫子搞的，他同春桥、文元同志有矛盾。他们是文人相轻，利用了我们，我们没有及时识破陈伯达的阴谋诡计，上了他的当。我们不能上他的当，接受教训就是了。我们过去是亲密战友，今后还是亲密战友。"

叶群说："林彪同志讲，江青同志总是在关键的时候帮助我们，指出努力的方向，总是给我说好话、做工作，所以

要我约他们 4 位同志一起来向江青同志表示感谢。江青同志虚怀若谷、海纳百川，您不但没有责怪我们，而是热情地鼓励我们改正错误，继续努力为党工作。”

江青说：“我们都要向林副主席学习。我们都是林副主席的小学生，要更好地紧跟毛主席和林副主席。”

这时，叶群转脸去对黄永胜等 4 人说：“你们要牢牢记住今天晚上江青同志对咱们的谆谆教导。”

黄、吴、李、邱同声说：“是。”

江青对他们 4 人说：“这次你们听信了陈夫子的话，不听主席的话，所以犯了错误，今后主席不会把这件事放在心上，你们接受教训，听主席的话就是了。”

吴法宪说：我这次犯了错误，对不起江青同志、对不起春桥同志。。

江青说：“你们今后要吸取教训，犯了错误不要紧，改了就好，你们也许还要检讨，今后多多联系。”

黄永胜阻止吴法宪再说话。

叶群起身说：“谈的时间不短了，快 1 点了，别影响江青同志休息。”

江青说：“林副主席和你们天亮就要下山，我也就不留了。”她对秘书杨银禄说：“小杨，你代我送送他们。”

回去的路上，黄、吴、李、邱一起大骂：“戏子，戏子，真他妈窝囊！”

黄永胜对吴法宪说："这个时候你还说什么，反正以后够我们受的，还不知道要检讨多少回。"

李作鹏说："从此以后没有完，一直到打倒为止。"

从江青那里出来，叶群老大的不高兴，说："我们诚心来认错，她倒摆起架了来。"她狠狠地说："姑奶奶这次倒了大霉，还有下次。看谁笑到最后，走着瞧！"

9 月 6 日晚上，林立果开着一辆汽车，拉上王维国、陈励耘两人，在车上边走边谈。他说："这次事情坏在几个老总身上"，"主任根本没有理解首长的意图，开会也讲不清楚。首长很生气，主任只是哭。"

"本来首长只是说拉一个满蓬风就行了，这次打是打不倒的，结果搞得很被动。"

"丘八斗不过秀才。看来这个斗争还长，军队日子难过一些。"

以后，林立果与江腾蛟、王维国、陈励耘讲庐山会议时说："这是一次未来斗争的总预演，演习，拉练，双方的阵容都亮了相，陈(伯达)是斗争中的英雄，吴(法宪)是狗熊，我(方)此次，上下好，中间脱节。三是没有一个好的参谋长。这些老总们政治水平低，平时不学习，到时胸无成竹，没有一个通盘，指挥军事战役还可以，指挥政治战役不可以。说明了一点，今后的政治斗争不能靠他们领导，真正的领导权要掌握在我们手里。"

他还说："首长（指林彪）、主任（指叶群）对你们暴露受损失很心疼"，"看来这个斗争还长"。

一天夜里，林立果从庐山给北京毛家湾打来电话。

"你值班吗？"林立果问。

"我值班。"毛家湾林办秘书张云生回答。

"值班室里还有谁？"

"就我自己。现在已经是下半夜，别人都休息了。"

"那好，请你打开电话保密机。"

张云生随即打开了电话保密机的开关，林立果的话匣子也打开了：

"我告诉你，庐山这里出事了！"林立果在保密电话上讲话不再有所顾忌。"主任煽风点火，惹了一场大乱子。陈伯达带头跳出来，被抓住，已经挨批了。主任和李作鹏、吴法宪、邱会作都在会上作了检讨。他妈的，这都怪主任搞的。主任翻了车，我从心里高兴，但他妈的这个代价太大，连首长的威望也受了损失……"

"主任为什么煽风点火呀？"张云生问林立果，"二中全会开幕的那天晚上，她曾给姜思毅来电话，让他给写一个关于领袖问题的发言稿，还说要在小组会上放炮。是不是这个原因？"

"比这复杂得多，我也几句话讲不清楚。不管怎样，主任今后再也神气不起来了。"

“主任现在的情绪怎么样？”张云生又问，“她对身边的工作人员更加暴躁了吧？”

“还暴躁个屁！”林立果幸灾乐祸地说，“她现在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在首长面前，她经常哭鼻子，他妈的，这怪谁？都怪她自己！”

“主任干这种事，首长事先知道吗？”

“首长不知道，但也不能说首长没有一点责任。由于主任惹了乱子，首长还在会上作了几句自我批评，最后主席保了首长。现在集中批陈，但陈的后台是主任。”

最后，林立果叮嘱张云生说：“我对你讲这些，是表示对你的信任。你可以把这些情况转告在北京的豆豆，但不要告诉郭连凯。郭连凯这小子只知道跟着主任跑，我对他没好感！”

## 第1147回：九江送，林彪没有再停留
## 下庐山，陈伯达形影孤单

庐山的雾气早已迷漫了山冈。

九届二中全会没有开成一个“团结的大会”，作为东道主，江西省委和省革委领导人程世清感到一种巨大的压力。他心烦、焦急，莫名其妙地和老婆、秘书发了一通脾气。后来他打定主意，要促成毛泽东和林彪谈一谈，说不定能缓解一下气氛或情绪。

庐山会议最后一天晚上，9 月 6 日深夜 23 时左右，程世清来到毛泽东住处，谈话中，他向毛泽东汇报了叶群常以为林立果找对象的名义，派人在各大军区乱窜，还特别向毛泽东讲到林立衡在 1969 年游井冈山时告诉他，林彪家里有三派：林立衡说自己属于中间派，林立果和叶群是右派，林彪是左派。最后，他说：

“江西省革命委员会在南昌市郊给主席盖了一所房子，不大，平房。江西军区也为林副主席盖了一所房子，是不是都在南昌休息休息再走。”

毛泽东说：“好。”又说：“林彪啊，还是要保的。”

程世清走出大门，轻轻地舒了一口气。他立即去 304 号别墅。叶群正在手忙脚乱地指挥着工作人员整理东西。林彪静静地坐在自己的卧室里，看见程世清进来，点了点头。

程世清焦急又耿直地对林彪说：“林副主席，庐山问题

没有完，搞不好会涉及党内一大批人。主席同意在南昌休息休息，江西已经将主席和您住的地方搞好了，是不是在南昌休息两天，和主席谈一谈？”

林彪点点头，说：“好吧。”

程世清又把这个情况连夜汇报给了毛泽东，毛泽东说：“那好。”

翌日，9 月 7 日一清早，程世清的秘书火急过来报告：“林副主席马上下山，要回北京。”

程世清一时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不是昨天刚说好留在南昌和主席谈一谈吗？怎么突然变了？”他带着夫人刘秋萍赶紧前去，一见到林彪就问：“林副主席，什么事情急着回北京，昨晚不是讲好到南昌去休息休息吗？”

叶群听到说话声，从隔壁的房间走进来，把门一摔，说：“林副主席要马上走，不能在南昌停留，昨晚我已经向江青同志汇报了，马上回北京。”

程世清哑口无言，只好再次向毛泽东汇报。毛泽东奇怪的问：“变化这么快？”

这天早晨，林立果去看吴法宪，两人共进早餐。

上午 8 时 30 分，林彪乘车从 304 号驶出，人们夹道欢送，他从防弹车中探出头来，频频向送行的人们挥手致意，浓眉肃目，脸白得没有一点儿血色。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去九江机场相送。

气氛是沉重的，最爱唠叨的叶群，也很少讲话。所有的话都在山上讲完了，而所有的事都还没有见到结果。

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4人把林彪送上飞机。叶群还是老习惯，在这样的时刻，不能不有所表示，在她导演下，林彪和他们4人一起照了相。

庐山会议期间，和黄吴李邱在一起。左起：李作鹏、吴法宪、林彪、黄永胜、邱会作。

飞机就要起飞了。叶群把黄永胜他们4人送下飞机，一一握手道别。李作鹏紧紧握住叶群的手说："你一定要照顾好林总的身体，叫林总放心，我们一定照林总的指示办，任何时候保证叫林总放心。"

当天，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同乘一架飞机回北京。

在飞机上，黄永胜说："坚持山下山上没有联系，原来没有想到，这是突然出现的情况。"他们强调，这一切都是8

月 13 日吴法宪电话报告引起来的问题。

黄永胜不准备作什么检讨。李作鹏、邱会作是否作检讨要看情况发展。吴法宪作检讨只讲自己不涉及别人，主动承担责任。李作鹏、邱会作也不抱怨。他们说，无论如何都不要涉及林彪、叶群、黄永胜，这是大前提。“回京以后总理、康生同志和政治局找我们谈话时事先要统一口径。”

黄永胜、李作鹏、邱会作都警告安慰吴法宪不要多说话，“言多必失”，要沉住气。

9月7日晚上，回到北京的黄永胜给郑维山打电话说：“传达陈伯达问题时，除了陈伯达的名字可以讲外，其他人不要涉及”。

9 月 8 日，各省、大军区的负责人离开庐山。

9 月 9 日上午，天空飘着细雨。周恩来、康生、张春桥、江青等人离开庐山。

下午，庐山秋雾蒙蒙，几片早衰的梧桐树叶，在已有凉意的山风中，不被人注意地飘荡下来了。秋天，总是能引起人们伤感的季节！这不是自作多情的悲悯，而是人类无法抗拒的自然规律。

14 时，毛泽东接见了为全会服务的会务人员。照完像后，下了庐山。

参与庐山会议的工作人员、解放军指战员和部分群众，聚集在牯岭隧道两侧，等待着伟大领袖的接见。在数千人的

“万岁”声中，毛泽东穿着银灰色的风衣，从牯岭饭店门前下车，缓缓走着，他不再有那雄健的步伐了，他每迈出一步，不知要用多大的力气，而他不时地还要向两侧的群众招手。他深深的感动了，从十几岁的伢子到白发苍苍的老者，见到他仍然热泪盈眶，忘情地狂欢着，激动地雀跃着，眼看两边解放军手拉成的防线，不断被突破。人越来越多，公路越挤越窄。毛泽东的心情非常复杂，却又深情地看了他的人民一眼。他由汪东兴和江西省委第一书记程世清搀扶着，在隧道口上了汽车。

梧桐叶无声地被萧瑟的秋风吹落，飘荡着。

20世纪70年代，毛泽东的崇高威望达到了顶峰。

轿车拐过日照峰的隧道，越开越快，“毛主席万岁”的声音还从云雾里隐隐传来。

毛泽东永远地离开了庐山。他在南昌“828”一号楼仅住了一晚，服务人员看到，他的腿已很不方便，坐下后自己站不起来，需要两个人扶着才能站立。9月10日早上，毛泽东悄然离开了南昌。他的专列先到长沙，毛泽东与华国锋在车上谈了话。

离开庐山前，叶剑英将由他负责审查陈伯达历史一事告诉了聂荣臻，聂荣臻对叶剑英说：“陈伯达历史上肯定是个叛徒。十二中全会上，他责问我，为什么背后议论他三十年代初那段被捕的历史，从他当时的口气和神态看，我明显感

到他理不直气不壮，心虚得很。”

1970 年 9 月初的北京天气不好。陈伯达的秘书冒着瓢泼大雨去西郊机场接他。

飞机降落之后，接人的都兴致勃勃地迎上前去。朱德、董必武他们先下了飞机，陈伯达是最后下来的，他穿着灰色的夹大衣，表情显得灰溜溜的。他给同时下飞机的人打招呼，人家都是爱理不理的样子。

一上车，陈伯达就对他的两个秘书说：“这下完了！”

秘书们怕司机听到，缪秘书就说：“哎呀！别说了，回家再说嘛！”

陈伯达还是毫无顾忌地说：“政治上彻底完了！”

小缪又阻止说：“不要说了嘛，回家再说，回家再说吧！”

回到家后，陈伯达简单地说了山上发生的情况。然后，让秘书看了他带回来的文件中毛泽东写的《我的一点意见》，秘书们也感到问题确实严重。

陈伯达说：“在毛主席写《我的一点意见》之前，我找毛主席谈过一次，谈得很好。”

陈伯达说：“主席对我说：‘你看你把个会议搅和成什么样子了，怎么办？’我说：‘我下去，下基层去，当农民。’主席说：‘你可以去找和你一块工作过的几个人谈谈，团结起来。’”

陈伯达又说："这次谈话，主席还谈到吴冷西、胡绳，当时主席还一下子想不起胡绳的名字来了。主席说：那个《人民日报》的吴冷西，还有那个……那个……就是红旗杂志社那个副总编辑……我说是胡绳吧！主席说，对知识分子应该宽容一些嘛！我告诉主席，他们现在都在干校劳动。主席说：对文人应该宽容一些，还可以让他们工作嘛。"

陈伯达说："这次谈话，主席还讲到自己的烦恼事，说他的女儿身体不好。我说，那我去找她谈一谈。主席说，你就不用管了。"

陈伯达说："所以，我觉得这次和主席谈话还好，我犯了错误下去就行了，可他们（指江青等）把你们寄去的语录给了主席，其实吴法宪他们早有了语录，这个语录他们实际上没有用上，可主席看了以后对我非常生气，写了《我的一点意见》批评了我。"

陈伯达这时坐在沙发上，他微微摇着头叹息着，然后，他又极为懊悔地说："我使主席太生气了，太生气了……"

稍微平静了一会儿，他又似有信心地说："嗯，主席还是很喜欢知识分子的，过一段时间，他会对我说些公道话的，会宽容些的。"

陈伯达说："原来主席让我找他们谈，我去找了江青，她见我便说：'啊！稀客！稀客！'我说和她谈谈，她不谈，说要谈就一块谈。于是江青把我带到康生那儿，我以为是和

康生谈，结果进门一看，张春桥、姚文元他们早就坐在那里了。江青说：‘你不是找我们谈吗？你说吧！’我还没说上几句，他们就骂上了，康生说：‘你自称是什么小小老百姓，其实你是大大的野心家！’江青说：‘自称小小老百姓，实际你是推脱责任！’他们都骂我，无中生有地骂，哎呀，什么都骂了呀！叫人难以启齿！……我真是无地自容呀！”

“我觉得总理还好，我从会议简报上看到，他说主席说30年来在一些大的问题上从来没有配合过，是说在一些问题上，不是说在所有的问题上没有配合。这是总理在人极为困难的时候说的公平话呀，我心里很感激他！反正这次我使主席太生气了。”

“在会上，在回来的飞机上，大家都躲着我、不理我，是怕沾边，这是可以理解的。”

起初，中办还给陈伯达照送文件，后来文件也逐渐不送了，只给报纸、参考资料。陈伯达起初一味要下乡当农民，他问秘书们愿不愿意和他下乡当农民，他说在山上问过小缪，“小缪好，他愿意和我下农村。”他经常说这样的话，大家都听烦了，有人就对他说：“你将来怎么样，中央还没有说，这得由中央决定，不是你说下农村就下农村了，也许你想下去还不让你下去呢！”听了此话，他不说话了。其实，他是心情烦闷，不知所措，看书看不进，坐立不安

陈伯达想给毛泽东打电话约个时间去谈谈自己心里的

想法，三次让秘书去联系，前两次被婉拒，第三次毛泽东秘书徐业夫说：“主席刚开完会，等什么时候主席有时间，我通知你就是了。”

陈伯达看到给毛泽东打电话约谈无望，毛泽东不会再见他，只好硬着头皮自己给康生打电话。秘书告诉康生，康生不接电话。陈伯达又给康生夫人曹轶欧打电话，曹轶欧也不接他的电话。

后来，陈伯达给周恩来打电话，是秘书接的。周恩来接了电话，他对陈伯达说：“你现在不要到处找人谈，你要静下来考虑一些问题，学习学习，现在大家都需要学习。”

周恩来后来又让王良恩等人来陈伯达家里通知他说，快过国庆节了，不要到处去跑，北京的外国人多，叫他们看见了也不好。陈伯达当时对国庆节上天安门城楼还抱幻想。王良恩对他说：“你上不上天安门还没有定。”

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庐山会议结束了。毛泽东希望“九大”以后，全党能够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然而，客观事物的发展，正如毛泽东经常说的，往往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庐山会议后的惊心动魄又会如何？且看第五部《折戟沉沙》继续分解。

# 第四部下卷

## 各地文革章回索引

**北京：**

第 1107 回；第 1119 回；第 1121 回；第 1125 回；第 1131 回；第 1132 回；

第 1141 回；

**五一六：**

第 1103 回；第 1105 回；第 1108 回；第 1115 回；第 1119 回；

第 1120 回；第 1121 回；第 1122 回；第 1125 回；第 1126 回；

第 1127 回；第 1132 回；

**外事口、陈毅：**

第 1097 回；第 1098 回；第 1099 回；第 1103 回；第 1104 回；

第 1105 回；第 1106 回；第 1108 回；第 1110 回；第 1117 回；

第 1123 回；第 1124 回；第 1125 回；第 1137 回；第 1142 回；

**中美关系：**

第 1097 回；第 1098 回；第 1099 回；第 1104 回；第 1108 回；

第 1117 回；第 1123 回；第 1130 回；

**中苏冲突：**

第 1098 回；第 1099 回；第 1103 回；第 1104 回；第 1105 回；

第 1106 回；第 1107 回；第 1108 回；第 1110 回；第 1111 回；

**刘少奇：**

第 1109 回；第 1116 回；

**邓小平：**

第 1109 回；第 1110 回；第 1111 回；第 1112 回；

**王、关、戚：**

第 1108 回；

**杨、余、傅：**

第 1108 回；第 1116 回；

**军委办事组、中央军委：**

第 1099 回；第 1105 回；第 1106 回；第 1107 回；第 1108 回；

第 1109 回；第 1110 回；第 1111 回；第 1112 回；第 1118 回；

第 1119 回；第 1130 回；第 1131 回；第 1134 回；第 1136 回；

第 1141 回；第 1142 回；第 1143 回；第 1144 回；第 1145 回；

第 1146 回；

**总政：**

第 1105 回；第 1108 回；第 1119 回；第 1128 回；

**空军：**

第 1109 回；第 1134 回；第 1135 回；第 1140 回；

**二月逆流：**

第 1099 回；第 1104 回；第 1108 回；第 1110 回；第 1110 回；

**“一打三反”：**

第 1121 回；第 1122 回；第 1132 回；

**北京大学：**

第 1122 回；第 1140 回；第 1141 回

**四届人大：**

第 1123 回；

**印度支那：**

第 1124 回；第 1128 回；第 1129 回；第 1130 回；

**北京航空学院：**

第 1125 回；

**上山下乡：**

第 1132 回；

**徐向前：**

第 1109 回；第 1116 回；

**专案组：**

第 1108 回；第 1116 回；

**红卫兵：**

第 1112 回；

**农口、谭震林：**

第 1119 回；

**教育革命：**

第 1131 回；

**整党建党：**

第 1135 回；

**国防科委、聂荣臻：**

第 1109 回；第 1110 回；第 1128 回；

**工交口：**

第 1132 回；

**上海：**

第 1109 回；第 1122 回；第 1125 回；第 1128 回；第 1134 回；

第 1135 回；第 1139 回；第 1140 回；第 1141 回；

**天津：**

第 1105 回；

**华北地区：**

第 1137 回；第 1138 回；第 1140 回；

**河北：**

第 1098 回（保定）；第 1107 回；

**内蒙：**

第 1103 回；第 1118 回；第 1123 回；第 1131 回；

**山西：**

第 1096 回；第 1114 回；

**西北地区：**

第 1138 回；第 1139 回；第 1140 回；

**陕西：**

第 1121 回；

**宁夏：**

第 1132 回；

**新疆：**

第 1098 回；

**西南地区：**

第 1138 回；第 1139 回；第 1140 回；

**四川：**

第 1100 回；第 1101 回；第 1102 回；第 1115 回；第 1127 回（重庆）；

**贵州：**

第 1097 回；第 1103 回；第 1105 回；第 1115 回；

**云南：**

第 1112 回；

**西藏：**

第 1103 回；

**中南地区：**

第 1137 回；第 1140 回；

**湖北：**

第 1105 回；第 1113 回；第 1114 回；第 1116 回；第 1121 回；

第 1127 回；

**湖南：**

第 1114 回；第 1122 回；第 1128 回；

**华东地区：**

第 1138 回；第 1140 回；第 1141 回；

**山东：**

第 1103 回（青岛）；第 1105 回；第 1115 回（青岛）；第 1141 回；

**安徽：**

第 1097 回；第 1105 回；

**江苏：**

第 1098 回（徐州）；第 1103 回（徐州）；第 1109 回；第 1122 回；

第 1126 回；第 1127 回（无锡）；第 1132 回；第 1134 回；第 1141 回；

**浙江：**

第 1135 回；第 1136 回；

**江西：**

第 1105 回；第 1110 回；第 1111 回；第 1112 回；

# 文革史话

## 之

## 第五部

# 折戟沉沙

上卷

刘朝驹　著

中国文化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文革史话之第五部折戟沉沙 / 刘朝驹著. --香港:中国文化出版社,2021.9

ISBN 978-988-15988-4-4

Ⅰ. ①文… Ⅱ. ①刘… Ⅲ. ①纪实文学-中国-当代 Ⅳ. ①I227

| | |
|---|---|
| 书　　名 | 文革史话之第五部折戟沉沙 |
| 作　　者 | 刘朝驹 |
| 出　　版 | 中国文化出版社 |
| 发　　行 | 中国文化出版社　发行部(00852-21962638) |
| 总社地址 | 香港九龙弥敦道208-212号四海大厦 |
| 经　　销 | 香港九龙书店 |
| 总 编 审 | 中国文化出版社国内编审处 |
| 出版策划 | 宋艳丽 |
| 印　　刷 | 北京云迪印刷有限公司 |
| 开　　本 | 787×1092　1/32 |
| 印　　张 | 13.5 |
| 字　　数 | 410千字 |
| 版　　次 | 2021年9月第1版第1次印刷 |
| 书　　号 | ISBN 978-988-15988-4-4 |
| 定　　价 | 60.00元 |

您若想详细了解我社的出版物

请登陆我们出版社的网站 http://www.zgwh.cn/

# 目　录

## ◇上　卷◇

第 1148 回:送玉米,毛泽东石门停留
丰台站,见北京军政领导 …… 1

第 1149 回:回北京,动员吴法宪检讨
十月一,斯诺登上天安门 …… 11

第 1150 回:毛批语,吴法宪、叶群检查
“五一六”,再提“不能一风吹” …… 17

第 1151 回:周恩来。详细阐述“五一六”
说北航,蒯大富再回清华 …… 23

第 1152 回:下批示,全国掀野营高潮
枪声响,谭甫仁喋血春城 …… 29

第 1153 回:细排查,数日内毫无结果
枪再响,谭甫仁事件告破 …… 37

第 1154 回:有疑团,保卫部办学习班
难交代,景儒林上吊自杀 …… 44

第 1155 回:毛泽东,北京与斯诺长谈
发信息,中美要高级接触 52

第 1156 回:华北会,批李雪峰、郑维山
姚文元,写报告汇报学习 60

第 1157 回:来加温,江青到京西宾馆
跳跃快,再追问《六号简报》 68

第 1158 回:在党内,陈伯达问题公开
又到会,江青成会议主角 76

第 1159 回:赶紧追,哪里去了黄道霞
细交待,三天白了秘书头 82

第 1160 回:“要谨慎”,转济南军区报告
见斯诺,谈文革生产情况 89

第 1161 回:大改组,华北会终于结束
发文件,陈伯达罪行材料 96

第 1162 回:再建立,“五一六”专案小组
没想到,大本营竟在南京 103

第 1163 回:戴维堤,气急大骂军代表
毛泽东,批评军委办事组 111

第 1164 回:外交部,重修英国代办处
“五一六”,北大、地院也在抓 120

第 1165 回:离苏州,林彪回到北戴河
抓艾玲,上海清查“五一六” 126

第 1166 回:北戴河,恩来向林彪汇报
睡朦胧,邀请美乒乓访华 133

第 1167 回:四一五,批陈整风汇报会
庆五一,陈毅身患结肠癌 141

第 1168 回:礼花放,林彪竟不辞而别
为大局,周恩来费尽心机 148

第 1169 回:加西亚,廿九期《外交简报》
纠错误,还历史本来面貌 155

第 1170 回:迎美使,钓鱼台仔细安排
盛情邀,江青为林彪照相 162

第 1171 回:外交部,姚登山批斗逮捕
巧安排,基辛格悄悄进京 169

第 1172 回:开场白,逐字念长长讲稿
立场明,周恩来侃侃而谈 175

第 1173 回:会谈毕,即赴游泳池汇报
毛泽东,先与熊向晖漫谈 182

第 1174 回:达共识,《中美公告》惊世界
“峻岭”谁,林彪在《孜孜不倦》 189

第 1175 回:黑龙江,潘复生撤职审查
赴青岛,开封清查“五一六” 196

第 1176 回:做体检,叶群回京日夜忙
毛泽东,武昌见鄂、豫领导 204

第 1177 回:一元化,广州军区报《纪要》
《国际歌》,奴隶们创造历史 211

第 1178 回:湘粤桂,众头脑齐集长沙
讲纪律,“一切行动听指挥” 219

第 1179 回:要学习,水至清则无鱼
聚“九所”,毛泽东再说庐山 228

第 1180 回:苏闽赣,三巨头会在南昌
说“路线”,许世友委实不安 235

第 1181 回:程世清,揭林彪再爆新事
西湖边,陈励耘手足无措 242

第 1182 回:听反映,连夜安排移专列
离杭州,毛泽东突然抵沪 249

第 1183 回:不见人,上海等候许世友
饭局间,专列已北上离沪 256

第 1184 回:不停留,一路疾驰奔天津
丰台歇,布兵南口欲为何 264

第 1185 回:无声息,毛泽东悄然回京
北戴河,电话震惊周恩来 270

第 1186 回:查飞机,总理坐镇大会堂
电话惊,莲花峰一片混乱 279

第 1187 回:难阻挡,“大红旗”冲过人墙
枪声响,李文普倒地受伤 288

第 1188 回:接报告,林彪已离开住地
电掣般,“大红旗”冲过护栏 295

第 1189 回:仓皇间,三叉戟强行升空
周恩来,中南海见毛泽东 302

第 1190 回:“由他去”,毛泽东不让拦截
禁空令,周恩来紧急部署 309

第 1191 回:直升机,周宇驰挟持北上
急召见,北京吴德和吴忠 317

第 1192 回:定方案,卫戍区紧急动员
四川厅,召开政治局会议 324

第 1193 回:忙通报,周恩来分秒不停
难逃脱,周宇驰自杀身亡 331

第 1194 回:迫降场,拒其他部队进入
回家后,胡世寿夜难入寐 340

第 1195 回:飞机场,全部被陆军占领
召总长,部署战备诸事宜 349

第 1196 回:问电话,李作鹏修改记录
侦听到,蒙古有飞机坠毁 356

第 1197 回:急约见,中国驻蒙古大使
指示到,派大使亲临现场 364

第 1198 回:见鲁珉,竟揭出惊天阴谋
李德生,再查空军江腾蛟 371

第 1199 回:进“亚疗”,武健华赴北戴河
许大使,到坠机现场勘察 378

第 1200 回:法新社,报道林彪已出事
拼字条,惊现林彪俩“手令” 384

第 1201 回:拟《通知》,政治局举杯相庆
葬林彪,丁盛汇报“李必达” 394

第 1202 回:检讨难,黄、邱二人抱头哭
谢静宜,受委托看望总理 403

**第 1203 回:**许世友,王洪文进京开会
审江、王,巨大冰山渐显现 410

**第五部上卷各地文革章回索引** 418

# 第1148回：送玉米，毛泽东石门停留 丰台站，见北京军政领导

上部《欲罢不能》最后说到，庐山会议之后，毛泽东、林彪及各路神仙纷纷下了庐山，奔赴各地。1970年9月9日晚，刚刚从庐山回到北京的周恩来、康生，即在人民大会堂约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谈话。

周恩来让吴法宪先谈。于是吴法宪把8月14日宪法修改小组会议争吵以来的事情说了一遍。然后说："我在庐山会议上作了三次检讨，如果需要的话我可以继续检讨。我在庐山说的话有错误，错了就检讨，但是我们没有什么非组织活动。"

康生不同意他的说法，他说："你们事先就有活动，庐山下有活动，庐山上有活动，下了庐山还有活动。"

周恩来说："你在8月14日晚上的活动我就不清楚。"

吴法宪对周恩来说："那天晚上我是第一个给你打电话的，当时我在陈伯达家里，我把情况都向你汇报了，你也表示同意我的意见，还说毛主席从来没有说过赫鲁晓夫发展马列主义的话，而且你也表示赞成设国家主席，赞成国务院的指导思想是以毛泽东思想为指针。"

康生说："吴法宪，你说毛主席伟大谦虚，这句话不对。毛主席不是谦谦君子，毛主席有的地方要求很严格。"

李作鹏说："具体情况我也不清楚，我在青岛接到黄总长打来的电话，说宪法修改小组发生了争论，要我回来支持吴法宪，我回来以后就没有争论了。"

邱会作说："听吴法宪说有争论，但具体情况不清楚。"

黄永胜说："这件事我是14日晚上听吴法宪打电话说的，当然我们的观点是一样的。之后，我又打电话通知了李作鹏，我没有搞什么活动。"

谈话进行了4个小时，黄、吴、李、邱4人的口径一致。

9月10日,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议定:

(一)组成由康生、李德生、周恩来负责的陈伯达专案组。具体工作由中央办公厅有关负责人处理。

(二)在京的中央政治局委员除原经常参加议事的周恩来、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李先念、纪登奎、李德生12人外,今后如有重大政策问题讨论,还拟请董必武、朱德、叶剑英3人参加;正在休养期间的刘伯承、谢富治二人拟不通知。

(三)今后在国际来往上,只实行必要的个别出访,不举行周游;拟起草一外交通报告驻外各使馆。不要随便答复问题。

叶剑英作为陈伯达专案小组的特别顾问,代表周恩来和中央去福建、广东调查陈伯达的历史问题。

9月11日,周恩来和康生联名致信毛泽东、林彪,报告10日政治局会议讨论各事。

9月12日晚,周恩来、康生在人民大会堂继续同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谈话。

周恩来说:"上次我和康老找你们的情况向毛主席汇报了,毛主席批评了你们,说你们军委办事组搞宗派,你们一统天下。你们要好好想一想,要交待你们之间的活动。要庐山会议前有什么活动,会上有什么活动,会下有什么活动。"

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都不吭声。

周恩来说:"永胜同志,请你先谈。"

黄永胜说:"经过回忆,我知道的情况很少。庐山会议前我没有参加宪法的修改,我只是听到吴法宪说会议上有争论。关于设国家主席的事,我同法宪同志的意见是一样的。上庐山前,我准备的发言材料只是军事工作报告,别的工作我没有参与。庐山会议的情况,我上山以后听叶群告诉了我一些,吴、李、邱在庐山上的情况我不清楚。不过他们在庐山上的事情我要负责任。"

康生说:"你负什么责任?"

黄永胜说:"我是总参谋长、军委办事组组长,从组织上说我有责任。"

康生说:"我就不相信你没有参加!"

黄永胜说:“那就请你们追查嘛!”

吴法宪说:“上次谈话,我已经把庐山会议上的情况实事求是、原原本本地都说了。8 月 14 日的争论,我当时就向总理、黄总长、叶主任都汇报了,这个总理你清楚,这都是公开的,不是什么秘密活动。”

周恩来说:“你们不要激动,我只是传达毛主席的指示,你们都是政治局委员,毛主席的话我不能不向你们传达,你们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实事求是嘛!”

李作鹏说:“在庐山会议上,我在中南组我没怎么发言,叶群也没有说什么,我们在中南组没有放什么毒,也没有起哄。”

邱会作说:“我同你康老在一个组里,你知道我讲了什么,我赞成设国家主席,拥护天才论,还念了语录,你当时还说,邱会作同志善于学习,并且号召西北组的同志向我学习,怎么过了几天你就反了过来,说我邱会作怎么不对,你怎么这样两个态度。”

康生说:“你念的语录很好,你说的错话我没有同意吧!”

他们两个人争论了起来。

最后,周恩来说:“你们现在都是政治局委员,现在没有向你们提出什么意见,有什么问题可以再讲。毛主席的意思还是保护你们的,你们要接受教训,今后要注意团结合作,搞好办事组的工作。”

9 月 10 日,毛泽东的专列离开南昌,晚上到达长沙。

9 月 11 日,毛泽东在专列上听湖南领导华国锋、卜占亚、杨大易汇报工作。谈话中,毛泽东问:“你们湖南什么时候可以建成工业省?”

华国锋汇报了湖南正在开工建设的湘黔铁路、枝柳铁路湖南段和凤滩水电站、资江氮肥厂、省维尼纶厂等大型项目的情况,表示湖南一定抓紧工业基础建设,落实毛主席把湖南建成工业省的指示。

9 月 15 日,毛泽东的专列驶向武昌。在列车上,他问汪东兴:“你在想什么?”

汪东兴说:“我在想自己在庐山会议上的问题。”

毛泽东说:“这好嘛!”

汪东兴说:“在山上开会,忙于会务,没有时间想自己的问题。现在有空闲时间了,可以好好地理理自己的思想了。”

毛泽东说:“这样好,想到什么就说什么。”

专列当天抵达武昌。毛泽东住进东湖宾馆,接着与刘丰谈话。

这天,汪东兴把第二次书面检查呈送给毛主席。他在检查中说:

“我这次犯了严重的错误,除了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上的两次检查和一次书面检讨外,最近经主席多次谈话,对我进行严格的批评和亲切的教育。每次谈话对我启发很大,教育很深,我越想越难受,总觉得对不起主席,对不起党中央,对不起受误会的同志,我真是辜负了主席的信任和教育。干扰了主席的战略部署,这是有罪的。”

“我没有识破陈伯达。他的手段特别阴险、恶毒,利用九届二中全会搞突然袭击,造谣和诡辩,欺骗不少同志。他打着论天才的旗号,其实要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要夺毛主席的权,实行资产阶级专政。”

他在检查中揭发说:“我在九届二中全会中前三天被陈伯达利用欺骗有三件事:(一)在华北组他突然的又是有计划的发言,利用我的无能,而心情非常激动,又不加分析,更不顾自己的身份,就起来发言,结果当了陈伯达坏人的炮手。(二)我怀疑陈伯达事先看过修改过华北组的简报,他利用简报来扩大到各组煽动欺骗人。我建议中央派人追查陈伯达,事先是否看过修改过这期简报,这期简报发出最早最快,而且简报内容中他的很少,我的很多。我看有阴谋,有鬼。(三)陈伯达利用听林副主席录音报告时,把论天才的语录交我打印五份(当时我交代打印二十份,准备政治局同志要时免得再打印)。现在看来是陈伯达的阴谋诡计,可能是要我发言时引用,结果未得逞。”

9 月 15 日是中秋节。这天晚上,江青从外边带回了两个玉米,对工作人员说:“主席给了我 5 个玉米,我给了康老、张春桥、姚文元各一个,这两个给我留半个,另外的给你们工作人员吃了吧。”

姚文元在当天的日记里这样记载:

“8 月 15 日中秋节。毛主席送给江青五个玉米,而且指定是五个,江青同志送张春桥和我各一,我在吃晚餐时吃了。一面嚼着清甜而韧的玉米粒子,一面凝神细思主席的用意所在,觉其味无穷。”

康生的秘书黄宗汉事后回忆说,康生收到江青送来的玉米后,对黄宗汉说:

“那五个玉米主席肯定指的是军委办事组的那五个人(指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玉’寓指‘欲’,意思就是说,庐山会

议上的问题还没有完,预示着还有更大的斗争,山雨欲来风满楼嘛。‘米’寓指‘迷’,意思是提醒江青在斗争中不要迷失方向,头脑要清醒,不要迷迷糊糊,以此可以看出来主席对江青的看法有所变化,我的这种分析你不要告诉任何人,更不要向江青透露,江青这个人很聪明,也很敏感,她会领悟到主席送给她五个玉米的含义的。”

第二天,9 月 16 日,毛泽东看过汪东兴的第二次书面检查后,在汪东兴写给他的信上用铅笔作了批示:“此件请汪东兴同志面交林、周、康及其他有关同志一阅,进行教育,详由东兴面谈。”

在第一页信纸的左右空白处又写道:“陈案另是一个问题,应弄清楚。”

16 日上午 10 时 30 分,毛泽东让护士长吴旭君通知汪东兴去谈话。这次谈话一直谈到了 11 时 50 分。

毛泽东说:“你写的信我看过了,信中对问题的认识很好,接受教训。我看有些同志还不通,上了当,还不通?现在不通,慢慢总要通嘛!有些同志自己不懂马列主义,自己都没有看过马列主义这一方面的书,发言时又要引用。我看还是要进行教育,还是要 250 多人(指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中指定读点马列主义的书,30 多本太多,可在 30 本书内选些章节出来。此事请总理、康老办。我还可以提选一些。不读马列主义怎么行呢?不行的。结果就被陈伯达摆弄了。”

在谈到军委办事组时,毛泽东说:“我们军委办事组内有几位同志也上当了。发言时,一个口径,用一样的语录,连林彪也受他们的骗。据说他要写信给我,叶群和他们不让写。我劝林应好好地想一想,表一个态嘛!今天未想通,待想通后表态也可以。”

在谈到陈伯达的问题时,毛泽东说:“我们的任务是对付帝、修、反。而陈伯达不管帝、修、反。我写了一份七百字的意见,给陈看时,他马上说他与苏修无关系。我又不是问他这事,他急着声明这个问题。”

在谈到九届二中全会上的《六号简报》时,毛泽东说:“《六号简报》要抓紧核实,你怀疑陈伯达看过、改过,应找会议主持同志,还有王良恩同志和记录印发的人。为什么不经你看过,发出最早最快?由总理、康生和你一起查实为好。要他们不要再上陈伯达的当了,有错误

就改正。”

毛泽东问:“你说他们在各组一起动作,煽动,他们几个,还有黄永胜报名要发言,都用了语录,但他们的简报未发,一说不行了,记录就收回,这当中好像是有点名堂,你清不清楚?”

汪东兴说:“我不清楚。”

毛泽东接着说:“你跟我出来了,他们在北京是否在陈伯达处商量过?”

汪东兴说:“不清楚。”

毛泽东若有所思地说:“谁知陈伯达住在何处有何活动?谁能知道?陈伯达案另办。与你们好人犯错误不同。”“我在简报上看到,皮定均同志在发言中说,怀疑他们都在24日下午发言,是统一部署的。”

毛泽东要汪东兴找曾思玉单独谈一下,征求一下他有什么看法。他还说:

“你先回去,让总理和康生召集会议,把你给我的信给他们看,传达我对你的信的批示及我今天谈话的内容,争取犯错误的人早点觉悟。”“你这封信可以启发他们,让他们也可以写或找我来谈。”

汪东兴说:“我的意见,我们还是一起回北京。我的那封信可以叫通讯员先带回去。”据汪东兴说,他这样讲主要是考虑毛泽东的旅途安全。

但是,毛泽东还是坚持要他乘送文件来的飞机先回北京。他说:“早一天回去,让他们早一点觉悟也好嘛。”

于是,汪东兴准备第二天早上先飞回北京。

当天下午,汪东兴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去找武汉军区司令员的曾思玉聊了两个小时。谈起庐山会议时,曾思玉说:“当时我是一盆浆糊,弄不清楚。”

汪东兴问:“现在你还是一盆浆糊?”

曾思玉说:“开始我脑子是一盆浆糊,毛主席发表《我的一点意见》后,通过学习,慢慢地了解了。”

汪东兴:“庐山会议上我也犯了错误。”

曾思玉说:“中南组也是紧张的,说有人要推翻毛主席,打倒毛主席,有人要夺毛主席的权。叶群发言就是这样讲的,她还说毛主席是

天才没有错。”

汪东兴说:“毛主席的天才是从实际中学的,是靠看书学习,天才不完全是先天的,天才主要是后天的。我们过去认识不清,现在才有所认识。”

曾思玉说:“那几个副词,我也是同意的。毛主席在‘九大’报告中把它去掉了,我未听进去,总觉得这是毛主席的谦虚。”

晚饭后,汪东兴去向毛泽东辞行。毛泽东已经休息了,汪东兴就没有打扰他。午夜 24 时吃过夜餐后,汪东兴上床休息。到了凌晨 4 时左右,护士长吴旭君来敲他的门,汪东兴正要起身开门,吴旭君说不用开了。她从门缝塞进来一张纸条,并且告诉他说:“你不要起来了,看一看条子就行了。”

汪东兴捡起条子见上面写着:“主席讲,你不要走了,一齐走。”

9 月 17 日,汪东兴和毛泽东一起乘专列离开武昌返回北京。专列路过石家庄时,在石家庄车站停了一下,毛泽东在专列上召见了河北省革委会正、副主任李雪峰、刘子厚和河北省军区司令员马辉、政委曾美,27 军军长闫川野、政委马杰等 6 人。

毛泽东问到《六号简报》的事时,因为汪东兴在场,李雪峰觉得这事应该问汪东兴,不应该问他,就说:“是受陈伯达、汪东兴发言的影响。”

汪东兴插话说,他怀疑《简报》先送陈伯达看了。

李雪峰反驳说:“没有。”

李雪峰认为,《简报》的责任应该属于汪东兴,而不属于华北组。华北组发言,整理后由中办发《简报》。至于《简报》为什么印得那么快,那是中办的责任。

而汪东兴觉得,那份《简报》的印发过程他都不知道,印发那么快,没有陈伯达从中指挥是不可能的。

两人当着毛泽东的面争论许久。

毛泽东制止两人争论,说陈伯达历史可疑,是“船上老鼠”,在延安先跟张闻天当秘书,看张闻天不行了,就主动找到毛泽东,当了他的秘书,现在到处搬弄是非,是骗子,劝大家不要上此人当,等等。

当汪东兴向毛泽东解释他对陈伯达的活动事先不知情时,毛泽东

说:“不包括你,没有你的事。”

接着,毛泽东问了河北的形势,说:“河北的形势很好嘛!”

毛泽东问李雪峰等人,河北省省会设在石家庄好还是设在保定或天津好?

李雪峰等人出于战备考虑,说石家庄离太行山近,太行山很深,还是在石家庄好。

9月19日上午8时,正在内蒙的郑维山秘书杜辛接到汪东兴的电话,问:“郑司令现在哪里?”

“在伊克昭盟乌审旗。”杜辛回答。

“晚饭前能不能赶到北京?”

杜辛回答:“乘飞机可以,我马上叫郑维山同志接电话。”

汪东兴不耐烦地说:“不用了,你告诉他,赶不回来就算了。”

政治敏感极强的杜辛觉得这事不简单,放下电话,很快报告了出门在外的郑维山,并建议先打电话问一下北京军区政委陈先瑞,是否晚上有重要活动?还说下午赶回北京没有问题。因为杜辛知道,虽然郑维山所在地没有机场,但是可以派直升机去,将他们送到毕克旗,那里有大机场,下午就可以赶回北京。

郑维山很快要通了汪东兴的电话。他在电话中问:“汪主任,是不是有特别急的事情?如果立即坐小飞机,再转车,明天下午还是能赶回去的。”

汪东兴说:“安全重要,不要勉强回来了。”

在石家庄时,汪东兴将同曾思玉谈话的情况向毛泽东作了报告。毛泽东听后“嗯”了一声.没有说什么。

9月19日中午,北京军区政委陈先瑞接到李雪峰的电话,让他和郑维山下午17时到丰台火车站专线停车处,毛泽东要接见。郑维山当时在军区内蒙古前指,陈先瑞只好一个人前去。吴德也接到了通知。

下午17时,吴德、陈先瑞准时来到丰台火车站。晚上19时30分,在汪东兴的带领下,吴德、陈先瑞他们鱼贯走入停靠在丰台火车站的毛泽东专列。

毛泽东看了一眼陈先瑞,问道:

“你们的司令官呢?”

陈先瑞忙答道:“郑维山同志去了内蒙前指,还没赶回来。”

毛泽东接着问:“庐山会议你们传达了没有?”

“传达了。”陈先瑞回答。

“怎么传达的?”

“分片传达的,对陈伯达的问题先下毛毛雨,然后专门讨论。”陈先瑞说。

“我们在市革委会领导小组和卫戍区党委常委中传达了,当时议了一下,还没有讨论。”吴德接着说。

“这个办法好,何必那样急。”毛泽东不动声色。

毛泽东接着说:“庐山开会,有人反对现在修改的宪法,这是康生、春桥他们搞的,是按我的意思写的。天才问题,关于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九大’新党章起草和这次修改宪法,康生等同志几次写上三个副词,我都勾掉了。不设国家主席也是我提的。陈伯达明明白白知道这件事,而他却说这是反对我的。陈伯达是船上的老鼠,看见这条船要沉了,就跑到那条船上去了。你们不知道底细。”

“什么天才,我读了八年孔夫子,又读了六年资产阶级的书,学的都是资产阶级那一套,那时不知道马克思。直到 1918 年,我 24 岁,才知道马克思。”

“我这一路主要讲路线问题。路线正确一切都有,路线错了就会垮台。路线对了,人少会有人,没有枪会有枪,也会有政权;路线错了,人再多、枪再多也没有用。”

谈到领导班子问题时,毛泽东说:“要讲团结,参与‘二月逆流’的陈毅还选作中央委员,这就是标准嘛。基层干部要稳定,军队干部也要稳定一下好。要有长期打算。要搞好团结,党内有不同的看法和意见是常有的,有意见就让人家说,不让人家说就不能真正达到团结。有意见今天不说,明天还是要说,最后还是包不住,爆发了就受不了了。党内总有一些不同的人,这也不碍大局。至于个别人他要跳就让他跳,我们也不怕。”

“要读几本马列主义的书,三十本多了,可选读一些,使大家知道

马列主义是怎样发展起来的。不要以为马、恩、列宁是外国的,就不读了。你们可以读一下《波拿巴第三政变记》,那是马克思早年著作,当时只34岁,你们再看一看《法兰西内战》,就有不同。”

毛泽东谈及了陈伯达的问题后,再次重提《六号简报》,并说陈伯达和《六号简报》是有联系的。毛泽东点了李雪峰、郑维山、解学恭的名,还批评郑维山有“路线错误”。

陈先瑞如坐针毯,忙红着脸起身答道:“主席,我也受蒙蔽,上了陈伯达的当,要检讨。”

“有则改之,善莫大焉。”毛泽东大手一挥。

其实,从庐山一回到北京,郑维山、陈先瑞就在9月8日召集驻北京附近几个单位的军常委以上的领导开会,传达了九届二中全会精神。在分片传达完陈伯达问题后,郑维山启程赶往内蒙古。临行前,他告诉主持军区工作的陈先瑞:“把传达情况向中央写个报告。”

陈先瑞说:“我已经请示过黄总长,黄总长说不用写报告了。”

实际上,对于这样的问题,北京军区不敢怠慢,传达结束后还是给中央写了报告。报告送上去后,上头很快有了反应。康生在报告上批示:“奇怪?毫无揭发!”

# 第1149回：回北京，动员吴法宪检讨 十月一，斯诺登上天安门

9月18日，林彪、叶群从北戴河飞回北京。

9月19日晚上，林彪、叶群召见黄永胜、吴法宪。

9月22日，周恩来看到毛泽东21日对汪东兴书面检讨的批件后，与康生一起来到林彪那里，将毛泽东对汪东兴书面检讨的批件给林彪看，提议“约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4人在一起阅读该件，在他们想通后，应给主席、林副主席写一书面检讨，揭露事实真相，与陈伯达完全决裂。这样做，对党对己都极有利。”

林彪表示同意。

这天，林彪向毛泽东报送《关于南京军区党委等单位传达党的九届二中全会精神的情况报告摘要》。其中第五页报告了贵州省在讨论团结问题时，“到会的军队干部一致认为，部分参加‘三结合’的军代表，滋长了骄傲情绪，必须引起严重的注意。决定分期举办军队干部学习班，重点解决这个问题，以进一步开展拥政爱民年活动。”林彪在这段话下面画了线，并注明：“此类问题已告军委办事组作为专题研究，以便改正三支两军人员中所出现的不良倾向。”

当天，周恩来给毛泽东写信，在汪东兴已经做出书面检讨的情况下，要求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在想通后“写一书面检讨，揭露事实真相，与陈（伯达）完全决裂”。

9月23日下午17时30分，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会见越南民主共和国总理范文同一行，林彪、周恩来、康生、黄永胜、李先念在座。谈到世界形势时，毛泽东说：“这个世界我看是天下大乱，不太平。”

范文同说：“这就是革命。”

毛泽东：“是啊，上回我就跟黎笋同志谈了，看样子打不起来大仗，几个大国都不想打，彼此都怕对方。”

他们说到中美两国的华沙会谈，提到美国基辛格想到中国来访

问,毛泽东说:“他说还要到北京来谈,是他自己提出来的,又不是我们提出来的。他嫌华沙不好,我们说,好嘛,你来吧。可是,他又不来了。美国那个国家也有困难,不要只看到你们自己有困难,美国的困难更大。”

谈到中国,毛泽东说:“我们有一些工作没有做好,不仅是内部的工作,还有一些驻外使馆的工作。一个大使管不了新闻,管不了武官,管不了商务参赞,管不了经济援助,都是一些北京的条条专政来管。新闻归新华社来管,外贸归外贸部管。这个条条专政的问题在我们国内也是现在才开始解决。”

谈到国际援助,毛泽东说:“我看马克思主义者就是要讲话算数。马克思主义不是讲阶级吗?讲国际主义吗?工人阶级不分国界吗?现在别的国家在那里打仗流血,我们这个国家还没有打仗,不过是给一些物资,这还要讲价钱吗?”

9月25日,毛泽东在林彪9月22日报送的《关于南京军区党委等单位传达党的九届二中全会精神的情况报告摘要》上批示:“第五页上所提处理意见很好,应该进行一次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周、康阅,退林办。”

当天下午,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会见巴基斯坦海军司令哈桑。他说:“有人说我们修地道花钱太多了,我们根本没有花钱,国家预算没有这笔钱,老百姓自己搞的嘛。”

9月29日,林彪找吴法宪谈话。他说:

“我对毛主席说,我选吴法宪当空军司令,是因为吴法宪是刘亚楼的徒弟,吴法宪的作风是向刘亚楼学的,和刘亚楼一样,拼命干,所以我选他当空军司令。毛主席向我问起曹里怀,我说曹里怀这个人我了解,从延安到东北我都了解他,工作稀稀拉拉,没有干劲,办事不认真。我认为空军的工作刘亚楼、吴法宪、王秉璋,他们是搞得不错的,所以我把空军立作标兵。”

林彪接着说:“过去庐山会议我不赞成你作检讨,但是我现在赞成你到毛主席那里去说一下,作点自我批评,主要是把当时和张春桥发生争论的情况再向毛主席谈一谈。今后空军的情况,要直接向毛主席汇报、请示,不要只是向我说,应该让毛主席了解你的工作。你不来,

我是不会怪你的。”

“检查不要涉及别人,不要因为你一讲,一倒一大片。”

吴法宪当即表示:“回去立即就给毛主席打电话请求接见。”回到家里,他马上打电话给毛泽东的秘书徐业夫,请求“见一见毛主席。”

过了一会儿,徐业夫打回电话说:“主席的意见,国庆节前太忙,以后再说吧。”

当天,吴法宪即写出了他的书面检讨。在这份检讨中,吴法宪承认:“在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上,我犯了严重的错误,干扰了主席,干扰了主席亲自主持的二中全会,干扰了林副主席,破坏了主席教导的要把全会开成团结的会、胜利的会的方针,我内心万分沉痛。”并带着“最沉痛的心情向主席检讨认错。”“由于我对陈伯达这个坏人没有识破,盲目地认为他读的书多,是‘理论家’,所以对他搞的语录就相信,根本没有通过自己的脑子想一想是否对,在发言时就念了这些语录,上了当,受了骗”,是自己“政治上极端幼稚”的表现。

这天,毛泽东约周恩来、康生,商议派郭沫若为特使参加吊唁埃及总统纳赛尔去世活动。谈话中,提到传阅汪东兴的书面检讨信和传达毛泽东的意见,毛泽东说:“汪东兴的信是他自己要写的,别人没想通,不忙写检讨,这些人的错误与陈案性质不同。”

1970 年 10 月 1 日,两个陌生而特殊的身影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他们就是美国著名记者斯诺和他的夫人。他们夫妇刚从陕北志丹县参观返回北京不久,周恩来就邀请他们在国庆节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庆典活动。对于斯诺来说,这肯定是一种特殊而意外的荣誉。因为这一天,他站立在中国政治的中心。

斯诺从 1928 到 1941 年间,绝大部分时间都生活在中国。在宋庆龄的帮助下,他是第一个深入陕北苏区系统采访,并第一个向全世界全面报道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真实情况的外国记者。他在这次采访中写出的《西行漫记》,在中国、美国、乃至全世界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1941 年,斯诺离开中国。当他再次踏上中国土地,已是 19 年后,新中国成立后的 1960 年夏天。1970 年 8 月,斯诺携夫人第三次访问新中国,是在周恩来的亲自过问和安排下实现的。

1970年7月31日,斯诺夫妇从瑞士乘飞机到香港,由于身体虚弱,又有高烧,一直在香港休养有半月之久。8月14日,他们坐火车抵广州,换飞机到北京。开始在国内访问,周恩来事先特地从五七干校调来原驻埃及大使黄华全程陪同。

8月18日,正在一个朋友的宴会上吃着烤鸭的斯诺突然接到电话通知,让他到首都体育馆去一趟。

斯诺马上意识到,一定有重要的人物要同他见面。他猜想一定是周恩来总理。

斯诺猜对了。当时周恩来和国家代主席董必武、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一起陪同西哈努克亲王及其夫人观看中国与朝鲜两国乒乓球队的比赛。

周恩来简略地了解了斯诺的访问计划,关切地询问了许多关于美国的情况。由于即将要上庐山参加九届二中全会,周恩来便安排斯诺夫妇前往陕北志丹县参观采访,那里曾是斯诺第一次见到毛泽东的地方,当年被称为保安县。

斯诺非常高兴,说:“34年前我穿过封锁线去找红军,遇到的第一个共产党领导人就是您。当时您用英语跟我讲话,使我很吃惊。您为我草拟了一个92天旅程的计划,还找了一匹马让我骑着去保安找毛主席呢!这次您再次安排我去保安县,我想昔日的情景,一定能唤起了我不少难忘的回忆啊。”

果然,斯诺旧地重游,思绪万千。他来到当年走过的山路,住过的窑洞,和毛泽东促膝夜谈的地方。30多年的巨变,令他深感“保安同全中国一样,也已经站起来了。”

斯诺返回北京不久就接到参加国庆活动的邀请。

10月1日上午10时,天安门城楼上那个专供领导人使用的电梯一次一次地升上来,把党、政、军领导人和一些贵宾陆续送到。当周恩来看见斯诺夫妇上到天安门城楼,便迎上前去,热情地握着他们的手说:“斯诺先生,欢迎你。”

“是毛主席让我请你来的。你是中国人民真诚的朋友啊。”周恩来热情地说。

斯诺情绪更加激动:“当年您安排我去见毛主席,采访红军,当时

对西方新闻界来说是独一无二的事。今天又让我上天安门！肯定也是一件独一无二的事！”

这时，广播里响起了《东方红》乐曲，毛泽东高大的身影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顿时，“毛主席万岁”的欢呼声响彻云天。斯诺夫妇在周恩来的陪同下，向毛泽东走去。

“主席，您看谁来了。”周恩来笑着对毛泽东说。毛泽东一眼就认出是斯诺。老朋友相见，分外高兴。他热情地和斯诺握手：

“斯诺先生，老天保佑你，我们又见面了。”

“非常高兴见到您。您看起来比 5 年前年轻了，身体也更好了。”斯诺激动地说。

“马马虎虎。你身体还好吗？”毛泽东关切地问。

“马马虎虎。来之前，我开过刀，现在好了。”斯诺回答说。

毛泽东仔细地看了看斯诺，关心他说：“你要注意，不要太累。”

斯诺点了点头说：“对了，这话我必须听。”接着他高兴地告诉毛泽东：“我 5 天前才从保安回来。保安变化大极了。当年从延安到保安路上要走 3 天，这次才花了两个半小时。”

“有一些变化。”说着，毛泽东若有所思地对斯诺说：“对了，你去年 12 月给我的信收到了。”“他们说你写的书不好，我没有看，我看了摘要，没有什么不好。”

“我这次来中国后发现我写的关于文化大革命的一些观点不正确。”斯诺内疚地说。

毛泽东笑着摆了摆手说：“你当时怎么看就应该怎么写。今后也如此，你怎么看就怎么写。不应该要求外国朋友的观点和我们完全一样。我们自己都不完全一样嘛！过去外交部有个极左派，闹得外交部可乱了，谁都管不了。英国代办处就是他们放火烧的。”

周恩来又向斯诺介绍林彪。斯诺向林彪问好，同时打量着这位被写进党章的接班人、他在延安时就采访过的老朋友、并在《西行漫记》中大加夸赞的林彪。

林彪成为毛泽东的接班人，是斯诺始料未及的。1968 年 6 月 15 日，斯诺在给朋友张歆海的一封信中曾认为：“从逻辑上说周恩来应当是毛泽东的接班人。从我们的视野中再也找不出第二个能与周恩来

的威望与能力相比的人了。”

毛泽东一边同斯诺亲切交谈,一边伸出手,带着斯诺夫妇朝城楼前的栏杆走去。顿时,广场上沸腾起来,万首翘望,红旗翻滚,“毛主席万岁”的欢呼声此起彼伏。

毛泽东也高举右臂,向欢呼的人群挥手致意。斯诺看着这番情景,万分激动,眼眶也湿润了。

毛泽东与斯诺约定“以后再谈”。

国庆之夜,林彪陪同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观看焰火,叶群借此机会找毛泽东谈话。回到毛家湾,叶群显得很高兴,认为谈得“很好”。她好像放下了千斤重担,决定给毛泽东写一个检讨报告。

10 月 2 日,毛泽东看了陈伯达 9 月 23 日写的、29 日报送毛泽东的检讨信,批示:“送林、周、康阅。请周在政治局会议上讨论一下。”

第二天,10 月 3 日,陈锡联、纪登奎、汪东兴代表中央找陈伯达谈话,传达毛泽东要他“边养身体,边看书学习,有什么要求可以提出来,政治、国事不用再操心”的指示。

10 月 8 日晚,毛泽东在钓鱼台迎宾馆会见朝鲜首相金日成,林彪、周恩来、康生、黄永胜、李先念在座。谈到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时,毛泽东说:

“有两年搞武斗,上一次我跟朴成哲同志谈过,所以 1967、68 年两年生产低落,69 年,就是去年,跟今年,才起来了。反革命也查出一些了,搞大联合了,不打仗了。我们中国内部搞内战呢!我们叫全面内战。谁知道文化大革命要搞这一套啊?我们没有计划的。后头一个省一个省地解决,中央一个部门一个部门地解决,学校也是一个一个地解决。”

“外交部也有两派,在一个短时期,1967 年 7、8 月,是在极左派的统治之下,烧了英国代办处。你看,这个领导的是一个反革命秘密组织,它的名字叫‘516’。”

会谈结束时,金日成说带来了几个理论问题,毛泽东说:“可以同恩来同志、康生同志谈。”

# 第1150回：毛批语，吴法宪、叶群检查“五一六”，再提“不能一风吹”

10月13日，叶群向毛泽东交出了第一次书面检讨，这是由叶群亲自布置军委办事组的秘书宋诚替她写的。检讨承认：“我犯了严重错误，干扰了主席，干扰了中央和到会同志，……心情是沉重的。”检讨说：“毛主席国庆节在天安门城楼上对我的谆谆教导，使我受到极大的启发和教育。”并说自己是上了陈伯达的当，自己在九届二中全会上发言的“动机是出于对主席和主席思想的热爱，但效果是很不好的”。

吴法宪的检讨在毛泽东那里搁了半个月。10月14日，毛泽东终于批示：

“此件已阅。我愿意看见其他宣讲员的意见。”

吴法宪在检讨书中讲到他“在庄严的二中全会上，在关系全局性的原则问题上，事先没有请示政治局的同志，更未向主席、林副主席请示报告。”

毛泽东在这段文字下边划了一道杠，又在旁边写道：“作为一个共产党人，为什么这样缺乏正大光明的气概。由几个人发难，企图欺骗二百多个中央委员，有党以来没有见过。”

吴的检讨书中讲他自己的发言“不从全局考虑，不顾影响，不考虑后果，这是极不严肃、极不慎重的不负责任的态度。”

毛泽东在这段话的下边划了一道杠，在旁边写着：“这些话似乎不真实。”

吴法宪谈到陈伯达是“大野心家、大阴谋家、反党分子”。

毛泽东在这句话的下边，划了一道杠，在旁边写道：陈伯达“是个可疑分子。我在政治局会议上揭发过，又同个别同志打过招呼。”

吴法宪交代8月23日晚12点前后，陈伯达来找他和李作鹏、邱会作，谈到过关于“天才”方面的问题。

毛泽东在这段话下边也划了一道杠，在旁边写道：“办事组各同志

(除个别同志如李德生外)忘记了‘九大’通过的党章,林彪同志的报告,又找什么天才问题,不过是一个借口。”

吴的检讨书写到“他(指陈伯达)还说,主席也批评了你们,我们问他主席批评了什么,他不肯说。……说话神态异常,说时支支吾吾”。

毛泽东在旁边批示:“无非是想再骗你们一次,企图挽救他自己。”

吴法宪的检讨书中揭发8月27日晚上12点以后,陈伯达来问他讲没讲过“有人利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伟大谦虚,贬低毛泽东思想”这句话,毛泽东在“伟大谦虚”这四个字下边划了一道杠,在旁边写道:“什么伟大谦虚,在原则性问题上,从来没有客气过。要敢于反潮流。反潮流是马列主义的一个原则。在庐山我的态度就是一次反潮流。”

对吴法宪检讨中讲到他将陈伯达所编“天才语录”,“打印了几份,给了办事组几个同志”,毛泽东在下面画了横线,对其中的“给了办事组几个同志”下面更画了双道横线,写道:“我愿意看见其他宣讲员的意见”。

吴法宪提到陈伯达8月27日晚上核对上面那句话时,看到陈伯达发言稿上有“中央委员会也有斗争”一句话,吴法宪认为这是“造谣”。

毛泽东在“中央委员会也有斗争”这九个字下边划了一道杠,在旁边写道:“这句话并没有错,中央委员会有严重的斗争,有斗争是正常生活。”

吴法宪的检讨书中写道“……他只参加过两次会,也没有提出什么意见,怎么能这样做,并且告诉秘书不要答复他。”

毛泽东在这句话旁边批道:“这样对。”

第二天,10月15日,毛泽东又阅批了叶群13日送来的书面检讨:

“此件已阅。”并在装检讨书的信封上批示:“林、周、康及其他有关同志阅后退中办存。”

叶群在检讨书中说,她“这次犯的错误是严重的是路线性的”。

毛泽东在“路线性”三个字下边划了一道杠,在旁边写了一句:“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

叶群在检讨书中谈到她在北戴河时,连续接了几个这方面反映情况的电话,而她没有注意核实情况。

毛泽东在旁边写道:“爱吹不爱批,爱听小道消息,经不起风浪。”

叶群在检讨书中引用毛主席讲过的话“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头”。毛主席在这句话下边划了一道杠,并在旁边批道:“这是马克思的话,我不过复述一遍而已。”

叶群在讲到林彪要写信给毛主席,她出来劝阻,结果帮了倒忙时,引了毛主席过去讲过的话“矛盾,以揭露为好。要揭露矛盾,解决矛盾”。

毛泽东在这句话下边划了一道杠,在旁边写了这样一段话:“一个倾向掩盖着另一倾向。‘九大’胜利了,当上了中央委员不得了了,要上天了,把‘九大’路线抛到九霄云外,反‘九大’的陈伯达路线在一些同志中占了上风,请同志们研究一下是不是这样的呢?”

叶群在检讨书中写道,九届二中全会上她接到军委办事组寄给她一份论天才的语录。毛主席在下边划了一道杠,在旁边写道:“多年来不赞成读马列的同志们为何这时又向马列求救,题目又是所谓论天才,不是在‘九大’论过了吗?为何健忘若此?”

叶群说自己“不加分析地”部分引用了论天才的语录,这就间接地上了陈伯达的当。

毛泽东在“不加分析地”五个字下边划了一道杠,在旁边写道:“直接地利用材料,所以不必加以分析。材料是一种,无论谁搞的都是一样,难道别人搞的就不算上当吗?”

叶群还说她对陈伯达的反动本质认识不足,警惕不够,因而过去对他的斗争不够有力。

毛泽东在旁边写道:“斗争过吗?在思想上政治上听他的话,怎么会去同他斗争?”

叶群在检讨书中还对陈伯达提出了一些疑问。

毛泽东在旁边写道:“不上当是不会转过来的,所以上当是好事。陈伯达是一个十分可疑的人。”

叶群表示“要按毛主席的教导认真读几本马、恩、列、斯著作,联系实际,改造世界观。”

毛泽东在下边划了一道杠,在旁边写道:“这是十分重要的,一个共产党人不读一点马列怎么行呢?我指的主要是担负高级职务

的人。”

在叶群的检讨书末尾,毛泽东写道:“不提‘九大’,不提党章。也不听我的话,陈伯达一吹就上劲了,军委办事组好些同志都是如此。党的政策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除了陈待审查外,凡上当者都适用。”

当晚,周恩来将毛泽东批示的吴法宪的检讨送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阅,并在附信中说:

“法宪同志的检讨信和主席批示,已送呈林副主席看过。”

“主席要汪东兴告诉我和康老,在请示林副主席后约有关同志一起谈谈。还有,主席对叶群同志检讨信,也有批示,待林副主席和叶群同志阅后再送你们。”

随后,周恩来同康生到林彪处,同林彪商量约黄永胜等人谈话事。

吴法宪看了毛泽东的批示,吓得不轻,和军委办事组其他人商量,黄永胜若无其事,李作鹏说:“我说没有完吧,果然如此!”

吴法宪和黄永胜又拿着毛泽东批示去找叶群。

10 月 16 日,林彪在驻地再次会见将毛泽东批件送来的周恩来、康生。

随即,周恩来将毛泽东对吴法宪、叶群检讨的批示送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 4 人阅,并附信要求他们“仔细阅读”,“待阅后当商定约谈时间”。

吴法宪看到毛泽东对叶群检讨的批示后,让黄永胜、李作鹏、邱会作他们比较一下。他们都说,毛泽东对叶群批得更厉害。

10 月 16 日,周恩来约黄永胜谈话。

10 月 19 日,周恩来会见斯诺。谈话时,说到自己的健康情况。周恩来说:“在身体方面,文化大革命把我打败了,所以要打球蛋白了。”“因为睡的少,所以使我健康减弱了,近 4 年心脏有毛病,年纪已近 73 了。”

据时任中央专案小组联合办公室的陈伟 1971 年 6 月 30 日讲话记录说,1970 年 10 月 20 日,毛泽东再次提到“516”问题,他说:“‘516’问题不能一风吹,有些单位已经一风吹了,例如(北京)外语学院。”

陈伟讲话还说:

1970 年 10 月 20 日林副主席的批示精神是,“五·一六”问题不能

一风吹。

11 月 1 日,周恩来约有关人员谈清查“516”集团问题,提及原清华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蒋南翔时说:

“中央专案组把主犯定了,从犯还没有定。清华的蒋南翔和刘少奇、彭真的案子有关。现在查明,他的历史没有背叛。他的思想很右,个人主义,是个没改造好的知识分子,这和他的地主出身有关。文化大革命前,他吹捧刘少奇、彭真。‘一二·九学生运动刘少奇、彭真根本没有份。当时彭真反领导,被捕以后自首了。彭真就和一些坏分子来往。张洁清的叔叔是个大汉奸 ,彭真和他们来往。可是,蒋南翔吹捧刘少奇、彭真。1965 年,中央到上海开会去了,留彭真在这里看家。那时纪念‘一二·九开大会,蒋南翔吹捧刘少奇、彭真,彭真几次站起来鼓掌,电视上有这些镜头。所以,群众怀疑他在历史上和这两个叛徒有关系,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是正义的呼声。要允许群众怀疑,接受群众的审查。现在专案组还找不到材料,蒋和刘、彭只是工作关系,犯了严重路线错误。但还是人民内部矛盾,提议要他下去劳动,不要老是关着。刘少奇、彭真常唱不同的调子,看来有矛盾,实际上是互相包庇。野心家,叛徒常常是两面派。天真地看问题,常常受欺骗,就容易犯错误。应该相信群众。要理解群众的正义呼声。领导同志要有‘俯首甘为孺子牛的精神,否则文化大革命怎么会搞得这样轰轰烈烈。”

周恩来说:“‘内查外调’,我的意思叫‘内检外调’。‘内查’总是由上而下,还是调查,还是专案人员调查 ,还是不发动群众,自己查。‘内查外调都是调查的意思。我的意思是内部群众检举,然后外调。‘内检’,‘检就是检举,就是群众检举。‘外调’,就是外面专案去调。”

“考验一个干部,要看是否真正承认了错误,不经过群众讨论光书面检查不一定可靠。‘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要经过群众批判。把真实凭据稿到了,他就无话可说,否则一有机会,他就翻案。”

11 月 4 日,中国科学院在中关村大操场召开揭批“516”大会,首先上台的是物理所的王昌衡。他交代说,他是“516”分子,他发展了一大批“516”分子,这批“516”分子又发展了更多的 “516”分子。中科院群众组织“红联”的各级组织就是“516”的各级组织。

第二个上台的是化学所的。他讲的和王昌衡一样。这两个都被宣布“从宽处理”,算人民内部矛盾,回所工作。王昌衡所在的研究室还开了欢迎会。

第三个是经济问题,被从严处理。另外还当场揪上一个“516”分子从严处理。

而在此之前,中国科学院已经历了几次清查“516”。第一次是在1967年9月,姚文元《评陶铸的两本书》一文发表后,各群众组织自己清理自己,驻院军代表不允许两派组织相互攻击。因为文革中外语学院的“616”到中科院联合夺权委员会索取资料,如中科院出的小报等等,于是流传中科院和“516”有关系,其实这是当时群众组织间常有的事。这个问题很快搞清楚了,和“616”接触的是中科院的“造反团”。这次抓“516”就这样过去了。

1968年开展清理阶级队伍运动。第一阶段还是造反派掌权,整了很多人,一些人被迫自杀。第二阶段是1968年后半年,工宣队进驻,清查文革中几乎所有的大小事件,造反派中一些人成为清理对象。

1970年1月初开始新一轮批判极左思潮、清查“516”分子运动,办学习班。虽然学习班办了几个星期就停了,但一些“重点人”被拘禁起来,而且风声越来越紧。过了几个月,物理所的大喇叭广播说,所政工组发布第一、第二号“战报”,宣布揪出了上百名“516”分子。要知道,在文革初期的“五十天”里,物理所被打成反党分子的一共才97人。现在的“516”已超过这个数。在此期间,中科院群众组织的头头、院革委会委员邹协成在被拘禁期间自杀身亡。到了11月4日,又召开了这次大会。

## 第1151回：周恩来。详细阐述“五一六”说北航，蒯大富再回清华

11月4日、9日、18日、20日，周恩来四次接见外事口核心组、军宣队、工宣队负责人，对清查“516”的工作和方针、政策做了细致的阐述。他首先对1970年3月27日中央关于清查“516”的《通知》做了解释：

“从67年宣布‘516’是反革命组织。主席在姚文元的文章上写了‘516’是反革命组织一段话，当时没有用黑体字发表。1968年一二月份发现了王、关、戚是‘516’后台不久，又发现杨、余、傅。当时只成立‘516’专案叫第三办公室，是公安部搞的，专案就是当专案搞。在群众方面，1967年9月讲了一下，重点讲的‘516’是反革命阴谋集团，材料掌握得不够。1968年3月24日、27日开大会批判杨、余、傅，讲了一下以后，大家听了林副主席的录音报告，以后就没有继续发动，后来就开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又开‘九大’，又搞了一次……”

“‘九大’以后，文艺单位提出清查‘516’。1月24日我们才讲的，其他单位以前不知道。中央3月27日发了个材料，讲‘516’反革命阴谋集团，在反革命两面派肖华、杨、余、傅、王、关、戚操纵下，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猖狂进攻，罪大恶极。有些人认为根本不存在‘516’反革命集团，对清查‘516’极为抵触，甚至为他们翻案，是完全错误的。后面说清查‘516’斗争已经展开，其实也没有大展开，没说清楚，有些单位‘516’很隐蔽，一搞深了，情况就不明。有的单位出现了扩大化，后面几段主导思想是防止扩大化。

文件共四段，前一段不要说没有，后几段思想是防止扩大化，没有讲罪状和揭露后怎么搞法，专案工作组内查外调相结合，当时是需要的，扩大化主要讲文艺单位和学部，一个文件只能讲个主导方面，搞得很全面不可能。”

对“516”的性质，周恩来说：

“这个集团定性是伟大领袖毛主席说的，重点是反革命。他们搞

阴谋,反对毛主席,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反对毛泽东思想,他们专门搞小道消息,你要他不搞什么,他就非搞。不要他去安营扎寨,不要他去夺权,他非要去。只要文革里有一个人出来说,或者是他们下面的一些人林杰、林津时、周景芳一说就相信。我们搞正正当当光明磊落的文化大革命实践,他们去搞阴谋活动,搞阴谋活动就是'516',而不在其名称是什么。这些事不是一个人做的,是个集团,重点不在这个组织是否叫'516'。""填表不填表都不是主要的,主要是他们的反革命活动,他矛头针对无产阶级司令部,要重在罪行。主要是查他们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罪行。"

"是不是参加组织,填表没有,不是主要的。要重本质,罪行就是本质,形式是第二位的。当然也要弄清楚。黑会都开的。就等于组织关系了。彭德怀,黄克诚的活动就是反党的,还需要成立什么组织?真正的核心不一定填表参加组织,他们背着中央开会集会这种行动就是罪行,有集会就是有计划的行动。只要罪行确实,抓住几件事就可以。"

此口一开,清查"516"说不扩大化,也不可能不扩大化了,下面的办案人员只要说你是"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那就要查你的"516"问题,因为"总理这么说的。"也许,毛泽东、周恩来此时想反对的只是当时盛行的极"左"思潮,而并非要破获什么"组织"之类的东西。但是,事与愿违。

接着,周恩来特别提到了几个大的事件,首先是卫生系统1967年3月10日开的会,致使一些中央领导的病历外泄。他说:

"在文化大革命中利用群众查无产阶级司令部领导同志的病历,都查到家属头上去了。戚本禹说,查出来了材料交给他,就有问题了,他拿去干什么?就是彭真的病历你拿去干什么?"

"北京医院死了个赵尔陆,是心脏病暴发死的,后来,几个坏人一定要追查,要写成吃安眠药死了,这不许可嘛!后来查出来是几个坏医生搞的。……比赵尔陆早死的还有一个孙志远,至于跟贺龙、邓小平紧一点,是工作关系,他是管国防工业的,我告诉医院要注意一下,谢华不晓得,我亲自去抓,有多少个部长住在里面,这是中央关心不关

心的问题。”“我去看他们,组织抢救,林副主席打电话要我去看,有人就查林副主席通过谁打的电话……国防工业‘915’‘916’都去查,现在介绍信都找到了,抢救孙志远是对的。”

“孙正搞了个‘3.10’。他看了几个发言稿子,把老爷卫生部和中央首长的病历混同在一起……内容都是攻击性的。……刘维栋在卫生战报第49期上他把对方许多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问题集中起批评对方,把内部东西公开暴露了,我下命令把他拘留起来。你把这些事情报中央是好的,但你铅印是不允许的。这些事情是不好的,是反革命阴谋活动,但方法是错误的,当时拘留是为了防止扩散。”

“3.10对抗中央指示,我们让不要开。他说已经停了,后来发现没有停,先念同志打电话追查,他说停了,实际没有停,就把我和先念同志的话告诉他才停了。第二天又开黑会,不久贴出‘打倒李先念’的标语,说李先念同志是大叛徒,这是反革命行动。主席看样板戏时说‘这口号是怎么来的?’主席在接见了朝鲜代表团时也说:‘不知道这口号是怎么回事。’”

“1967年的‘3.10’黑会,名为打倒城市老爷卫生部,名字是冠冕堂皇的,群众的心情是好的,会的本身群众要求开是好意的,客观效果很坏,起了放毒的作用,被阴谋家利用,被孙正利用……是反中央的,是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

“卫生口突破了‘3.10’就解决了大问题,外事口是多几个:火烧英代办处,‘8.11’大会,安营扎寨,外交部夺权,封部党委、政治部夺权,这几件事已经够了,几年来走了弯路,我们有责任,以前没有讲透,这次把它讲透,上面有一个阴谋集团指挥,下面不一定叫这个组织。吴传启在‘516’成立时已经不在这里了,他可以说和‘516’没有关系,刘雨来说他比‘516’还‘516’,那好就定嘛。把组织填表看得太重了,有的地方成立组织,有的地方还没有来得及成立,就是为了要得个‘516’的表格,组织问题就不能定案,这真是可笑的。‘516’就是利用《5.16通知》作号召,搞反革命阴谋活动,他们在一起开黑会,搞秘密反党活动,就是‘516’组织活动。如火烧英代办处,冲中(央)机(要局)都有谁,怎么去的,要讲清楚,慢慢地头头就清楚了。他认罪了。你不处理,去追组织,不定案,就是宽大无边,和好人一样看待,就是一风吹。”

11 月 9 日,周恩来再次与外事口核心组、军宣队、工宣队负责人谈清查“516”,他说:

“‘516’反革命阴谋集团是在一个光明正大的运动中专门搞阴谋活动的。”“姚登山没有填表,他说没有必要参加。他就是‘516’。”

“‘516’专案组把几件大事搞出来,弄清楚就行了,如 8 月 11 日批陈大会,围困中南海,谁参加了?谁的头?当时我在中南海,我就是不走,戚本禹对我说:要走。当时刘、邓都在中南海,我要走了,冲进来就不行了。……”

11 月 18 日,周恩来第三次与外事口核心组、军宣队、工宣队负责人谈清查“516”,提到了外交部的问题:

“利用了 48 小时的声明,这个事我应该负责,我批了。不过他们总是要找借口的,不是 48 小时他们也要找别的借口。那个时候,香港当局封了三个报馆,都是外围的外围。不是《大公报》,也不是《文汇报》。包括《晶报》在内,而且香港当局也只说封一年。事情没搞清就送来批,制造借口。他们利用这个借口,搞了火烧英国代办处,这是个阴谋。到现在还有人说火烧英国代办处是民族义愤,有什么了不起!现在还这样说法,不晓得是什么精神面貌!……主席和外国朋友谈起‘516’,总要举例讲火烧英国代办处。”

他还说:

“66 年刚开完十一中全会,就得到一本北航出的《战略战术》。那是什么战略战术,把戈培尔那一套都用上了,说撒谎久就成了真的了。我一看大吃一惊,你说不对,他偏相信那些东西,不让他搞非要搞。”

“武汉的事情,本来主席只叫富治同志去,那里的部队原来是他指挥的,和他熟,陈再道这些人他都熟。王力后来也要去,说他们小萝卜头留下来干啥!富治打电话来说,‘他们也要去’。你说他支持‘地派’,可是他带的人都是‘天派’的,不要以为他们只是支持一派的,都插手了。”

在清查“516”运动中,清华大学首当其冲的是蒯大富。此时蒯大富已经分配到宁夏青铜峡铝厂工作。为了推动清华大学的清查“516”运动,清华大学军宣队、工宣队研究,决定成立蒯大富专案组,将他揪回清华进行审查。专案组由军宣队和工宣队成员及学校的有关人员

组成,具体研究、部署了清查蒯大富“516”问题的措施:

一是在全校造舆论,以群众名义张贴《蒯大富是何许人也?》等大字报,披露已经掌握的蒯大富的有关罪行,要求将蒯大富揪回清华进行清查。大字报是由军宣队的人换了便服,和工宣队的工人一起,在晚上扛了梯子贴到清华大学最引人注目的地方。第二天,这张大字报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二是请示上级同意,派人赴宁夏以接蒯大富到北京参加有关会议的名义,将其带回清华大学。

蒯大富于1970年11月18日被带回清华大学,关押在工字厅的一个单独房间里,由工宣队派人24小时看守。蒯大富有什么反映,随时出简报上报军宣队、工宣队总部领导。

11月20日,周恩来第四次接见外事口核心组、军宣队、工宣队负责人,谈到清查“516”问题。他说:

“一件事在实践中要反复好多次,才能认识。‘516’问题,又搞又不搞,一会儿说扩大化。他乱咬一顿,形式上扩大化把水搅混;大家互相怀疑,实际上他自己滑掉了。今年三·二七发了个指示,他们又抓住三·二七《通知》中提到防止扩大化,变成一风吹了。运动规律就是这样,几番起伏。这次无论如何要追到底。”“火烧英代办处是公开出来搞的阴谋,这也怪我们当时没有追下去,当时当作一时的错误行动……”

11月21日,纪登奎、李先念到卫生部谈清查“516”,纪登奎特别提到卫生部1967年3月10日的“310大会”。

11月29日,纪登奎又到农林部给核心组成员提出了清查“516”需要调查清楚的几件事情。他说:

“农林部关于‘516’问题是个没有揭开盖子的单位,罪行是有的,先要搞事实:

(1)农大‘516’反革命组织首先是从农林口出来的。

(2)有没有人去冲中办学习班的?冲中办学习班是整汪东兴同志的材料,抓汪联络站就在水产部大楼办公。

(3)农林部有没有人去围困中南海?这个问题搞清楚了吗?

(4)有没有人参加秦化龙的八七黑会?回来怎样贯彻的?交代了没有?应不应交代?

(5)砸机要室,抢档案有没有?

(6)为秦化龙平反,对抗周总理指示,查清了没有?

(7)农林口各部与吴传启、潘梓年,农大'516'的联系要查清。

(8)有参加砸政治部的活动没有?有一个部和化工部一个组织抢档案要查清。

(9)你们部不是在抓'516'时出现反动标语'抓516防止为二月逆流翻案'、'516是造反派'等,对抗毛主席?"

1970年10月下旬,毛泽东的慢性支气管炎急性发作,转成肺炎。

11月6日,中共中央成立中央组织宣传组,康生任组长,组员由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纪登奎、李德生担任。

11月6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高级干部学习问题的通知》,要求广大干部学习六本马、恩、列、斯著作和五本毛泽东的著作:

一、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

二、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

三、马克思:法兰西内战(选读)

四、恩格斯:反杜林论(选读)

五、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选读)

六、列宁:国家与革命(选读)

毛主席五本著作:

一、实践论

二、矛盾论

三、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四、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五、人的正确思想是从那里来的

11月7日,周恩来、康生、李德生联名请示毛泽东、林彪,提议将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所写的《我的一点意见》扩大印发范围至各省、市、自治区党的核心领导小组,各大军区、省军区、各军、各总部、各军兵种党委,中央党和政府各部、委领导小组或党的核心小组成员。

11月13日,毛泽东严厉批评黄永胜:"你黄永胜是总参谋长,是个头儿。你一天到晚不抓大事,只抓小事,不参不谋,路线问题、团结问题你就抓不住。"

# 第1152回：下批示，全国掀野营高潮 枪声响，谭甫仁喋血春城

11月24日，毛泽东在北京卫戍区《关于部队进行千里战备野营拉练的总结报告》上批示：

林彪同志：

此件可阅，我看很好。请你和黄永胜同志商量一下，全军是否利用冬季实行长途野营训练一次，每个军可分两批（或不分批），每批两个月，实行官兵团结、军民团结。三支、两军者不在内。但大、中、小学（高年级）学生是否利用寒假也可以实行野营训练一个月。工厂是否可以抽少数工人（例如四分之一，但生产不能减少）进行野营练习。请与中央各同志一商。

在报告的最后一页，毛泽东批示：

如不这样训练，就会变成老爷兵。

还在一年前，1969年11至12月间，沈阳军区116师将部队拉出营房，进行“千里野营”。与此同时，新疆军区、济南军区的一些部队也开始在组织单项训练的基础上，走出营房进行综合性的野营训练。为提高部队能走、会打的本领，他们在野营训练中增加行程、加大难度、提高速度，取得了良好效果，部队的野战生存能力明显提高。

1970年2月3日，总参谋部转发沈阳军区《陆军第116师“千里野营”总结报告》。报告认为，野营训练为促进战备思想落实提供了一条好途径，为全面建设连队提供了一条好路子，为培养部队优良战斗作风提供了一个好方法，为部队适应战时生活管理提供了一个好措施。毛泽东看了这个报告以及新疆、济南军区关于野营训练情况的另外两个文件后，充分肯定这些部队野营训练的做法，于2月21日批示：

这样训练好。

全军贯彻毛泽东的批示，迅速掀起野营训练的热潮。当年春夏时节，各军区、军兵种纷纷组织部队野营训练，北方部队实行春季野营拉

练,南方部队实行夏季野营拉练。野营训练中也暴露出部队综合能力不强等一些问题,如有些装具不适应行军作战的要求,战士负荷太重;行军中经常出现前面休息后面跑,宿营时两个小时进不了房;通信器材数量少、质量差,不能保证通信联络,等等。

北京卫戍区自1969年7月至1970年8月,也先后分4批组织13个分队进行了千里和两千里战备野营拉练。事后,北京卫戍区司令部召集相关业务部门组成研讨班子,对这次野营拉练进行了全面的总结,上报了《关于部队进行千里战备野营拉练的总结报告》。1970年11月17日,北京卫戍区向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呈报了此报告。

毛泽东"1124"批示后,军委办事组哪敢怠慢,立即于11月25日向北京卫戍区领导作了传达。11月26日,北京卫戍区迅速召开全区团以上领导干部参加的党委扩大会议,传达学习毛泽东的批示,研究贯彻落实措施。

中央也当即召集京津沪等地代表,就野营拉练问题座谈。12月6日,周恩来接见进京出席座谈会的全体人员。这天,中央军委发出《通知》,要求全军迅速掀起冬季长途野营训练的热潮,从12月到次年3月,普遍拉练两个月。按照这一部署,拉练的第一阶段侧重进行阶级教育、光荣传统教育和演练行军宿营、侦察警戒、生活管理、做群众工作等;第二阶段可搞一些急行军、夜行军,侧重练指挥、练通信联络、练战斗技术、练诸兵种的协同动作和后勤保障。

《通知》要求担任机动作战任务、守备任务、施工基建和生产任务的部队及海、空军地面部队,军队院校和大军区以上机关都要根据各自情况组织拉练。

12月8日,周恩来将中共中央要求"全国各族人民要以毛主席11月24日重要批示为纲,立即掀起一个'实行野营训练'的热潮"的通知稿送呈毛泽东。

12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要求:"大、中城市(包括省、地直属市)学校的野营拉练,可在寒假或暑假期间分期分批进行,大学每批一个月,中学和小学五、六年级学生,每批20天到30天。"

《通知》中说:"野营训练,要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学习解放军,大兴三八作风,加强革命性、科学性和 组织纪律性。进行战史、村史、厂

史、家史教育,开展革命大批判,提高广大革命群众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觉悟。发扬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培养‘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树立常备不懈的战备观念。”通知还要求;“参加野营训练的人员,要大力宣传 毛泽东思想,积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传播社会主义的文化科学知识,帮助 社队修理农机具,给群众治病,等等。既进行野营训练,又要真心实意地为 群众谋福利。学生和其他知识分子,机关工作人员,要虚心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根据中央通知的精神,野营训练的意义,已超出了战备的范围,而带有浓厚的阶级教育、生产劳动教育、路线教育、组织纪律性教育的色彩。

全军从总部机关到基层连队,从陆军到海军、空军,从野战部队到地方部队,从院校到医院、仓库、兵站等,野营训练迅速开展起来。这次大规模野营训练于1971年4月上旬结束,全军共有540个师级以上机关、43所院校、90%以上的野战部队投入野营拉练,行程一般在千里以上。

中央通知下发后,全国各地也闻风而动,纷纷立即开会研究布置落实,有的省、市还专门成立了“野营拉练指挥部”,毛泽东对部队千里野营拉练的两次批示,不仅在全军掀起野营大拉练的热潮,也揭开了全国亿万民众野营大拉练的序幕。当时,各行各业普遍组成野营拉练队伍,手举红旗,肩扛背包,身着军装,以棍当枪,组成浩浩荡荡的拉练大军,奔赴祖国的角角落落。一时间,神州大地人如海,歌如潮,埋锅造饭,浓烟滚滚。拉练队伍,川流不息。杀声阵阵,到处呈现战备景象。

庐山会议的事情还在继续。11月8日,北京军区党委决定召开全委会,揭发陈伯达的问题。在这次全委会上,38军的领导,对陈伯达进行了揭发批判。会后,起草了一个报告,郑维山在审查这个报告时,删掉陈伯达提出的“华北搞经济协作,要轮流坐庄,北京军区作后盾”等话。

12月10日,这份署名“三十八军党委”的报告送到了毛泽东案头。

报告一开头就说:“陈伯达千方百计地突出自己,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对抗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报告举例说:“1967 年 12 月 25 日,他参加了北京军区党委全会,用一种奇特的语言讲个别军和个别地方把军队内部矛盾暴露到社会上,谁都能听懂,他是诬指 38 军。军区全委会开了 20 多天,矛头一直指向 38 军,逼 38 军同志作检讨。

陈伯达从来不提林副主席。1967 年秋、冬,他在首都接见保定赴京代表团和到保定视察时,在公开场合共讲话 12 次,其中 208 处提到他自己,17 处提到郑维山同志,但却只字不提敬爱的林副主席。1967 年 12 月 25 日他在北京军区党委全会上讲话,1969 年 11 月 25 日他在北京军区党委召开的战备会上讲话,有 68 处宣扬他个人,只有一二处提及林副主席。今年 7 月,陈伯达怀着不可告人的目的到内蒙前线……

在军内外讲话 8 次,闭口不提毛主席的战备指示,根本不提林副主席。

……陈伯达在群众面前,总是宣传他个人的一套,含沙射影地反对毛主席、对抗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据我们知道,他参加北京军区的几次重要会议,就贩卖了许多私货。”

报告第二部分,揭发“陈伯达不择手段地插手军队,搞宗派活动,妄图乱军、夺权。我军于 1967 年初奉命调华北以来,越来越感到,陈伯达的手伸得很长,活动反常、手段恶劣。据我们所知,北京军区的许多重要会议,他都到场讲话……”

报告列举了一些会议的例证后说:“由于陈伯达的卑鄙做法,造成了极其严重的恶果。会议后,不少群众和兄弟部队对 38 军产生误解。12 月 31 日,全省 10 个专区一派群众和部分驻军、军事院校的代表齐集保定,召开万人‘誓师大会’,公开宣传‘38 军是支持全省的反军派’,‘要揪出反军派的黑后台’。

1968 年 1 月 26 日,陈伯达勾结杨成武,在北京军区主持的成立河北省革委会筹备会上,当着全省驻军和群众组织的代表,暗示 38 军搞‘武汉事件’……由于陈伯达恶毒煽动,社会上出现了一股猖狂的逆流,说 38 军是黑线部队。……有的人把陈伯达当成‘精神支柱’,把他

的讲话当‘圣经’,说‘解决保定问题,首先要落实陈伯达同志的指示……’”

12 月 16 日,毛泽东在 38 军的报告上批示:

林、周、康及中央、军委各同志:

此件请你们讨论一次,建议北京军区党委开会讨论一次,各师要有人到会,时间要多一些,讨论为何听任陈伯达乱跑乱说。他在北京军区没有职务,中央也没有委托他解决北京军区所属的军政问题,是何原因陈伯达成了北京军区及华北地区的太上皇?林彪同志对我说,他都不便找三十八军的人谈话了。北京军区对陈伯达问题没有集中开过会,只在各省各军传达,因此没有很好打通思想,全军更好团结起来。以上建议,是否可行,请酌定。

当天,周恩来紧急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毛泽东对 38 军报告的批示。政治局成员一致拥护毛泽东的意见。会上商定,先约北京军区党委郑维山、李雪峰等 8 名常委于 18 日前来中央开会,向他们传达毛泽东的批示,商量召开北京军区党委会议的问题。

这天,中共中央以中发[1970]76 号文件转发 38 军党委“关于检举揭发陈伯达反党罪行的报告”。

恰在此时,南疆春城昆明发生了一件惊天血案。

1970 年 12 月 17 日凌晨 4 时许,春城昆明薄雾弥漫,晨曦未露,人们都还在静谧中酣睡。突然,几声枪响打破了昆明军区大院的宁静。不一会儿,军区党委办公室秘书邹贤玉在睡梦中被急促的电话铃声惊醒,她抓起话筒,里面传来了一个年轻女人的发颤的声音:

“32 号院响了几枪,你们快来人!”

邹贤玉一愣,32 号院,这不正是昆明军区政委、云南省革委会主任谭甫仁家吗?她睡意顿消,马上反问一句:“怎么回事,为什么打枪?”

“反正出事了,你要陈秘书、汪秘书快来吧!”对方说完就挂断了电话。

邹贤五惊出一身冷汗,急忙穿衣下床,正要给负责谭甫仁日常生活的事务秘书陈永柱打电话,床头的电话又响起来,她拿起电话,是谭政委的警卫员李洪亮打过来的。李洪亮惊恐得几乎说不成话,但意思还是表达出来了:谭政委被人枪杀了!

邹贤玉脑袋“嗡”地一声蒙了,但很快就镇静下来。她立即给军区党办主任王克学、军区分管保卫工作的副政委蔡顺礼、军区保卫部长景儒林、副司令员刘春山、副政委周兴、雷起云等有关领导一一通了电话;报告“谭政委家出事了”。

谭甫仁从北京带来的秘书、时任军区党办主任的王克学首先赶到32号院,只见谭甫仁浑身是血躺在地上,昏迷不醒。他顿时惊呆了,本能地大喊警卫员“小李、小李!”但静悄悄的毫无动静。王克学跑到警卫室,两个年轻战士正呼呼睡大觉,他气愤地大喊:”你们怎么睡得像头猪,快给我起来!”

这时,警卫员李洪亮也从厕所哆哆嗦嗦地出来,原来这个军人竟然被枪声吓的躲进厕所。

这时,蔡顺礼、刘春山、周兴、雷起云等其他军区领导也陆续赶来。很快,平时十分安静的32号院就已经是人声嘈杂,乱作一团。大家上到二楼,只见谭甫仁的妻子王里岩也倒在卫生间门旁的血泊中,脑门上一个明显的子弹弹洞,鲜血已有些凝结。

人们手忙脚乱地把谭甫仁及妻子王里岩送到军区总医院抢救。

执掌云南党、政、军帅印的省级领导被刺身亡,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从未有过的党的高级将领被暗杀的恶性事件。云南省革委会副主任、昆明军区副政委周兴于清晨6时,立即向周恩来做了报告。周恩来极为震惊,当即指示:“要火速组织抢救,案子很可能是内部人干的,要抓紧时间破案,重点是军区机关内部;成立专案组,由周兴负责,公安部派人协助。”

与此同时,军委总参谋长黄永胜也接到了昆明军区的报告,随即做出相应的批示,并指令在京的昆明军区第一副司令员王必成立即返回昆明,主持昆明军区的领导工作。

周兴副政委与周恩来通完电话,于当日早7时主持召开昆明军区党委常委扩大会议,吸收司、政、后部门的主要负责人参加,通报了谭甫仁夫妇遭暗杀事件,传达了周恩来和黄永胜的指示。

会议决定立即成立谭甫仁、王里岩被害案侦破小组。因为案件发生的时间是12月17日,按照时钟表示法,“12·17”亦可理解为零点17分,所以在当时正式的文档和会议上,这个案件被称为“017案件”,

该案件的侦破小组也简称为“017 专案组”。组长由周兴担任,王必成、蔡顺礼为副组长,成员有昆明军区副参谋长赵润博、政治部副主任刘润泉、保卫部长景儒林、组织部长孟肖野、党办主任王克学等。专案组的日常工作由昆明军区蔡顺礼副政委负责,保卫部长景儒林为专案组办公室主任。

周兴提出:除军区总医院进行全力抢救外,要抓紧破案,广泛发动群众提供线索;保护、勘查现场,找知情人了解情况;查对枪支、子弹。

所有参加会议的人员,都为这起特大案件的发生而震惊,尤其是在军区首脑机关,作为中共中央委员、中央军委委员、昆明军区政治委员、省革委会主任这一级人物被杀,更说明问题的严重性。早上 6 时,昆明军区参谋长就已通知军区司令部军务部封锁了军区大院,所有人员进出大院都须经过批准。到了上班时间,军区大门紧闭,通知停止办公,各单位组织学习。顿时,军区大院气氛显得十分紧张、恐怖,空气都好像凝固了一样。专案组根据常委会精神,将会议决定迅速传达到全军区和全省各地区。公安部派的人员也及时赶到昆明。一场艰巨而复杂的侦破工作紧张地进行着。

刚送进医院的谭甫仁尚有一点儿血压,但随即就没有了。经检查,他身中三枪:一枪击中腹部;一枪击中头部,子弹从右耳根进,从左耳根出;另一枪击中右臂,弹头嵌在骨中。其腹腔内积满了血,肚子胀得鼓鼓的,医生们打开腹腔抽出积血。又剖开胸腔,由几个医生轮流在心脏上进行按摩,但毫无结果。忙碌了整整一个上午,奇迹并没有发生,谭甫仁的心脏再也没有跳动起来。

谭夫人王里岩身中两枪,一处在胸部,一处在脑门,都是要害处,实际上当场已经休命,医生只抢救了 10 分钟就放弃了努力。

当日下午 15 时许,解放军总医院外科主任鲁维善教授奉中央军委领导之命乘专机由北京赶到昆明,一出机场就直奔医院,他察看了谭甫仁夫妇的伤势情况,询问了抢救经过,同意医生们所做出的“王里岩已当场休命,谭甫仁伤势太重,接近休命,无法抢救”的结论。

当天下午,昆明军区和云南省革命委员会联合召开紧急会议,讨论谭甫仁遇害案。会议做出三项决定:1. 迅速成立临时工作班子,负责处理全省的日常工作;2. 迅速成立专案小组,调动一切侦破手段,力

争尽快捕获凶手,并将详情上报中央,听候中央的处理;3. 安排好谭甫仁的善后工作。

专案组首先将案发当晚住在32号院内的6个人全部进行隔离审查,他们是:王里岩的妹妹王文莹,他住在别墅的一楼;谭甫仁夫妇的未婚儿媳吴小红,她住在楼上谭甫仁的隔壁;警卫员李洪亮,他住在平房警卫室;以及住在伙房的保姆和住在门岗的两名战士。

经反复盘问上述6人,吴小红和保姆及两个门岗都说当时睡得正香,没听见任何动静,更没见到凶手的身影。两个门岗是被前来抢救谭甫仁夫妇的干部敲门喊醒的,其中一人称当时正在梦中摸鱼呢。李洪亮是被谭甫仁的喊声惊醒的,他正在穿衣服时就听见了院里响起一阵枪声,吓得赶紧趴到床底下没敢出来!待院内静下来后,他才急忙给秘书邹贤玉打了电话报警,然后又躲进厕所藏起来。直到听见王克学的喊声才敢露头。

案发时惟一同凶手照过一面的是住在楼下客厅西侧的王文莹,她是军区女篮队员。当天清晨5时左右,听见楼上有人大声说话,她只听清姐姐王里岩问了一句:“你怎么这时候来了?”接着就是厮打的声音和几声枪响。

她觉得事情不妙,正要上楼看个究竟,就看见谭甫仁披着衣服急匆匆下了楼,她问道:“姐夫,楼上出了什么事?”谭甫仁说:“我也不知道。”他没停步,直接拐进通往楼后小平房的长廊。这时候,又见一个身穿军装,个头有1.8米左右,身材有些发胖,年龄大约有40岁的人追下楼来,手中好像提着一把手枪,直向长廊上追去。不一会儿,她就听谭甫仁在院中连喊两声:“小李!小李!”紧接着就是几声令人心惊肉跳的枪响。

她顿感出了大事,慌忙给秘书邹贤玉家拨了电话。

专案组在对有关人员进行隔离审查的同时,派人封闭了32号院,随即请当地公安人员协同军区保卫干部进行现场勘查,同时对参加抢救的人员也进行了调查访问。

# 第1153回：细排查，数日内毫无结果 枪再响，谭甫仁事件告破

谭甫仁夫妇居住的32号院位于军区大院的中心，是解放后公私合营充公的大资本家杨希辰一座独立的别墅式宅院。大门口平时有5名战士昼夜轮流站岗。毛泽东对北京卫戍区《关于部队进行千里战备野营拉练的总结报告》批示后，这5人中有3名战士参加部队的“千里野营拉练”了，此时32号院站岗的只有2名战士了。于是站岗变为坐岗，坐岗变为睡觉，看似戒备森严的武装警卫形同虚设。

谭甫仁一家住的是32号院中惟一的一座坐北朝南的二层小洋楼，进门是一个半圆形客厅，客厅西侧阳面是谭甫仁的一间办公室，办公室隔壁有两三间卧室，王文莹就住在其中一间。客厅北侧是楼梯，楼梯下面有一条通向后院的小长廊。楼上共有四个房间，谭甫仁夫妇住的是套房，两室共用一个卫生间，两个卧室之间有门相通，但各个卧室又都有一定的独立性，各有各的屋门。吴小红住在谭甫仁隔壁靠近楼梯的一个房间。小楼后边是一个小院，有一排平房是厨房和警卫员李洪亮的住室。平房后边有一个小养鱼池，紧挨着养鱼池就是近两米高的院墙。院墙之高，一般人除非用梯子，否则爬不上去的。和32号院后墙平行的，是昆明军区第一副司令员王必成的家，也是一幢别墅。两幢别墅背靠背，后墙之间的距离约摸两三米。王必成的围墙也很高。两堵高墙之间的夹道就被谭甫仁的警卫员用砖石在两端砌起短墙，围出一个长条形的小天地，开垦成了菜畦，种些葱蒜豆苗之类的作物，并从32号的厨房专门开一小门与菜地相通。

两幢别墅高墙之间的短墙远远低于别墅本身的围墙。现场勘查发现，院西北角短墙外有一把凳子，这把凳子是邻近32号院南军区机关干部食堂的。32号院对过，隔着一条路，就是军区机关的干部食堂。凳子上留有两个清晰的解放牌胶鞋印。这个食堂内养着一只大狼狗，晚上一有动静就“汪汪”直叫，所以平时也不用锁门。可是，案发这晚

却偏偏没人听见狗的叫声。出事那天早晨,狗的主人发现,原来这只狼狗竟神秘地失踪了!

院墙内有一个白色的皮鞋包装盒,上面也有一个清晰的解放牌胶鞋印。院墙内外部有新鲜的蹬蹭痕迹。厨房的前后窗户都开着的,窗台上和临窗的案板上都留有相同的胶鞋印。据此判断,刺客是从军区大院的北门进入大院,绕过司令部大楼走到干部大食堂,从食堂拿出一把凳子放在32号院西北角的外面,踩着凳子越墙进了32号院,绕过养鱼池,从后窗跳进厨房,又从厨房的前窗跳入前院。通过小长廊溜进小洋楼,作案后又顺原路逃离现场。

由此可以断定,凶手非常熟悉32号院和整个军区大院的环境,极有可能是军区大院内部的人。因为只有军人才能自由出入军区大院。

现场勘查人员从楼外和楼上两个中心现场共搜获8个手枪弹壳和5颗手枪弹头,其中楼上发现3个弹壳,两颗弹头,楼外院内发现5个弹壳,3颗弹头,加上医生从谭甫仁臂骨中取出的一颗弹头,共6颗弹头。经鉴定均系同一支59式手枪发射。

公安技术人员在现场勘查大约两个钟头时,封闭现场的一名军区干部不耐烦地催问:“勘查完了没有?你们这可是搞技术的呀!”在这种情况下,公安民警没顾上提取痕迹物证,匆忙收场。

综合现场勘查和调查访问的情况,军区保卫部部长景儒林向专案组汇报他们推断凶手的作案过程:凶手上楼后直奔王里岩的房间,因房门未拴,故推门而入,王里岩被惊醒后,拉开床头灯,只见凶手正向她逼近。她显然认识凶手,一边起床一边问:

“你怎么这时候来啦?”

凶手大概说了一句:“我找谭政委!”说着举枪便向王里岩射击。

也许是由于紧张手腕发抖,这一枪打空了,子弹射入墙内。在危急关头,王里岩为了保护谭甫仁的安全,便堵住了通向丈夫卧室的门,与凶手展开搏斗,凶手这时贴身向王里岩的胸部开了一枪,王里岩应声倒地。凶手惟恐王里岩不死,将枪口顶着她的眉心又补了一枪,子弹从脑后飞出后,钻入了木质地板。

住在另一间卧室的谭甫仁被惊醒后意识到危险,便急忙穿上裤子,披上“三位一体”的上衣,就是为了穿、脱方便,将衬衣、毛衣,罩衣

三件套在了一起,然后从自己的屋门出去急匆匆下了楼梯,想叫警卫员李洪亮前来支援。

谭甫仁赶到李洪亮门外时连声喊道:“小李! 小李!”屋里却没有动静。这时尾追而来的凶手冲着谭甫仁的背后接连打了两枪,这两枪都没有击中谭甫仁的身体,而是穿越过敞开的上衣击在李洪亮的屋门的门框上。谭甫仁这时转过身来,迎着凶手冒烟的枪口冲过去,凶手又一枪打在谭甫仁的腹部,谭踉跄了一下继续往前冲。凶手紧接着向谭打出了第四枪,这一枪打在了谭的右上臂,谭侧身倒在地上。凶手来到谭跟前,将枪口抵在谭右侧太阳穴处第五次扣动了扳机,子弹从右侧太阳穴穿入,从左侧太阳穴飞出。就这样,一个从 1928 年就参加革命,历经五次反“围剿”和两万五千里长征,为中国人民的解放和新中国的国防建设披肝沥胆奋斗了 40 多年的中将,永远地倒下了。

为了防止犯罪嫌疑人逃往外地,专案组立即采取措施,封锁了整个昆明市。部队在街道巡逻,空中交通完全关闭,陆路交通也实施了严格管制,车站道口过往人等均需进行严格盘查。与此同时,军警对全城大街小巷、十字路口、公共汽车站进行了拉网式排查,根据王文莹提供的线索以及侦破人员对现场的分析,凡身高一米七左右、圆脸、大眼睛、微胖者,均视作犯罪嫌疑人予以扣留。

12 月 18 日晨,昆明火车站戒备森严。当开往贵阳、长沙、武汉、郑州方向的 62 次列车即将进站时,一支全副武装的部队冲进了候车室,不到 5 分钟,整个车站被包围。车站广播里传来急迫的声音:“根据上级紧急指示,开往贵阳、长沙、武汉、郑州方向的 62 次列车,现在暂时停开。车站的所有人员原地不动,接受检查!”这个通知被反复播出的同时,部队开始对车站所有人员进行检查。有好几位身材高大的军人当场被扣留。在远离火车站的昆明田家坝机场也被军警包围。飞往北京的 140 次航班和飞往广州的 1031 次航班在即将起飞时,突然接到通知暂缓起飞,荷枪实弹的军警对候机室全体乘客进行了严密的检查。又有一名身高 1.75 米以上的军人被带走。

军区大院的排查工作也在缜密而紧张地进行。“017 专案组”查询了所有岗哨记录,从记录上看,军区大院四道大门在 12 月 16 日晚至 17 日凌晨都没有外人进来过。另外,对军区大院所有的围墙作了

检查,没有发现任何翻越的痕迹。这说明犯罪嫌疑人很可能在军区大院内居住。

案发后的3天内,昆明军区机关停止办公,每个人都要写出在12月16日晚至17日凌晨这段时间内自己的位置、在做什么、证明人。但是,在对军区大院内居住的人员进行排查过程中,几乎所有人员都能找到两个以上的人证明自己当时所在的位置和去向。

核实人员又在全市范围内实施,普遍调查青壮年男性12月17日早晨5点至7点之间的行踪,每一个被调查的对象均须有两人以上证明,其工作量之大可想而知。这样,当时一个仅有40多万人口的昆明市,几乎家家户户,角角落落都触及到了。

与人员核实同时进行的还有查验枪支,即清查检验全军区所有的59式手枪,逐人逐枪核查,军区保卫部的大部分干部分派到各单位进行督促检查。

与核实人员一样,查枪毫无结果,所有佩发的59式手枪一枪一弹不少。这使专案组大惑不解:59式手枪当时只在军队干部中装备,而地方上一支没发,即使公安机关也尚未佩发,难道凶手是从外地部队中偷盗的枪支?

其实不然,查枪工作尽管看起来力度很大,但却留有一个死角,那就是军区保卫部自身没有查。原来,59式手枪在当时比较少,只是二级部长以上和保卫、作战部门配用。保卫部除干部配用外,还有一部分枪支存在保卫部保密室的保险柜中,而且枪弹混存,由秘书袁孔祥负责保管。景儒林没有给袁孔祥布置清查枪支的任务。32号院血案发生后多日,保卫部人员整天忙忙碌碌地去检查别人,却偏偏没有检查自己的枪。也许他们认为,我们保卫部的枪难道还会出问题?

然而,意料不到的事还真发生了:在全军区检验枪支后的第9天,12月25日,当保卫部副部长王庆和要用枪时,袁孔祥打开保险柜,发现锁在里面的59式手枪竟少了两支,并且还丢了20发子弹!再把其它柜子打开寻找,仍无枪的踪影,小袁被吓的五魂出壳。他想,办公楼门口有哨兵,保密室装有子弹锁的铁门,保险柜有密码,只有他知道密码才能打开保险柜,保密室的门窗没有撬动痕迹,保险柜的暗锁也完好无损,而里面的枪弹却不翼而飞。

小袁感到问题的严重性,马上报告了景儒林。景儒林也感到是个问题,但他没有往“017 案件”上想,只是认为是袁孔祥本身出了纰漏,当即将袁孔祥隔离审查,并且和保卫部副部长一起,对袁孔祥进行了长时间的反复逼供、诱供。

袁孔祥死活不承认自己偷去了枪支子弹,但又说不清两支手枪的下落。被追逼得急了,最后,只好说炮兵师有个老乡找他,说即将复员,想带支枪去打鸟,于是就给老乡两支枪。景儒林如获至宝,将袁孔祥收监。

第二天,当袁孔祥上车去监狱时,又翻供,一口咬定没有从保险柜中往外拿枪。景儒林不信,执意派人去湖南找那个复员军人作调查,结果,根本就没有借枪之事,那个复员军人甚至就没到过昆明。景儒林要求湖南地方再继续作那个复员军人的工作。

审查袁孔祥毫无结果,只好将他隔离反省。

其实,保卫部有机会有条件接触保密室和保险柜的钥匙的范围很小,只要认真地深追细查,就不难找到嫌疑人。遗憾的是,景儒林没有在这方面下工夫。

查枪验枪工作也搁了浅。

时间过去了近半个月,“017 案件”没有任何实质性进展。周恩来对此非常生气,再次明确指示:破案并不难,问题很可能出在内部。

于是,昆明军区急调 11 军副军长赵泽莽到昆明军区任政治部副主任,主持“017 专案组”的破案工作。赵泽莽上任后迅速把侦破重点收缩到军区内部。他让事发现场的唯一目击人,王文莹到军区每个办公室指认。数日下来,还是没有结果,“017 专案组”加大了内部排查工作的力度。

山重水复疑无路,柳岸花明又一春。就在“017 专案组”走投无路的时候,外围调查摸底工作获得了重要线索:专案组成员在军区政治部家属院走访时,住在该院的 8 岁男孩马苏红反映,12 月 17 日清晨 5 点多钟,他用木盆顶着的小屋门突然被推开,进来一个穿军装的胖胖的大个子,脸庞圆圆的,好像还满头大汗,他冲着睡眼惺松的马苏红问道:

“陈汉中科长住在哪儿?”

马苏红指了指上边,回答说:“就住在楼上。”

那人转身就往楼上去了。

经走访住在楼上的陈汉中的妻子,她证实,那天早晨5点多种,她还没有起床,未拴住的房门突然被推开,来人开口就问:“陈科长在家吗?”她说:“不在,到上海出差了。”那人一听未进屋,就转身走了。她提供的该人身材特征与马苏红所反映的完全一致,估计这个人与在32号院王文莹所见到的凶手极可能是同一人。

32号院和政治部家属院相距不远,也就是7、8分钟的路程,而目击者所提供的时间又大体吻合,所以,很可能是凶手在32号院作案后马上赶到了政治部家属院。

过了约7、8天,马苏红放学回家,正好与住在同院的王冬昆同学走在一起,他突然想起,那天早晨他所见到的那个胖军人很像是王冬昆的爸爸。

专案组拿来一张包括王冬昆的爸爸在内的集体照片让马苏红辨认,马苏红仔细逐人看了看,然后果断地指着其中一人说:“就是他,他是冬昆的爸爸。”

专案组人员愕然了。原来,王冬昆的爸爸叫王自正,是军区保卫部刚提拔不久的副科长,身材与王文莹、马苏红等所见的可疑人完全相符,但他此时因被原籍老乡检举有历史反革命问题,正被隔离在西坝原战俘管理所内受审查,他的住室中有保卫警卫人员谭崇访监视,门外有一个班

西坝原军区俘虏管理所离军区大院有两三公里的距离,是一个约666平方米的空闲院,大门朝东,临一条南北街,大门通常不上锁,晚间则从里面闩住。门口北侧临街有两间平房,为王自正的隔离室。隔离室分里外间,负责日夜陪伴监管王自正的保警队员谭崇访住在里间,王自正住在外间,中间有屋门。两间房前后各有一对窗户,其中临街的窗户小,有钢筋护栏,人出不去。距隔离室门外3米多远有一棵大槐树,哨兵就在大槐树底下站岗。西南角是一片用矮墙圈起来的菜地和厕所,厕所是全院惟一的公用厕所。

小院北侧坐北朝南有一座二层小楼,是专案审查人员办公的地方。南侧有一排平房,是站岗士兵的宿舍,住着1个班的战士24小时

轮流看守,他怎么可能在监管人员的眼皮子底下溜出来盗枪、杀人,然后又神不知鬼不觉地潜回去躲藏呢?除非他有“分身术”,要么有“燕子李三”的那一套本领。

所以,不少人对此持怀疑态度,而态度最坚决、最不相信是王自正作案的就是军区保卫部长、王自正的主管领导景儒林。景儒林曾不止一次地说:“关押王自正的房间夜晚电灯长明。门口哨兵时刻不离,他若能出来作案,那可真是今古奇谈了!”

也正因为如此,当初进行大范围摸底的人员来到西坝问情况,轻易地把王自正排除在外。

# 第1154回：有疑团，保卫部办学习班 难交代，景儒林上吊自杀

尽管有些人不相信王自正会在戒备森严的隔离室中溜出来作案？但他毕竟符合作案嫌疑人的外貌特征，又被目击者从照片中辨认出来。所以，专案组还是决定让马苏红到西坝俘管所对王自正本人直接辨认一下。

12月31日中午，当专案组人员领着马苏红走进西坝俘管所大院时，王自正正好一手拿着扫帚。一手插在裤兜中扫院子，马苏红一眼便认出了王自正，脱口说道："是他，就是他！"

这话被王自正听到了，他抬眼一看这个小家伙似曾相识，转而不禁大惊失色，急忙转过身去，强装镇静继续打扫院子。

王自正的反常表现自然逃不过专案组人员的眼睛，从而进一步加深了对他的怀疑。

然而，当蔡顺礼副政委等专案组领导听取了上述情况的汇报后，依然没有下决心对王自正采取进一步的强制措施，而是派军区干部部副部长谢新锷，军区保卫部科长何凤毓、副科长李伯志和公安部派来的技术干部前去西坝提取王自正的指纹和脚印，想再确认核实一下。

谢新锷，何凤毓等人于12月31日晚22时左右来到西坝之后，正好刚从上海出差回来的"王自正专案组"组长陈汉中也在。陈汉中向他们反映了如下几点重要情况：

一、1970年12月17日早上7点半左右，刚换岗的战士喊王自正起床。听见王自正在院西南角的厕所里回答说："我在上厕所，拉肚子！"

"你为什么不请假？"站岗战士质问道。

王自正说："我向上一班请过了。"

不一会儿，王自正捂着肚子回到了隔离室。经询问上一班站岗的，王自正上厕所前根本没请假，也没人见他何时上的厕所。

二、从32号院血案发生后,王自正的神情一直很反常,紧张不安,不时探头望着窗外,像是在观察什么。

12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一篇不同寻常的消息——《中共中央委员、中央军委委员、云南省革委会主任谭甫仁同志逝世》。报道指出:“中国共产党第九届中央委员会委员,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云南省革命委员会主任谭甫仁同志,于1970年12月18日在昆明不幸逝世,终年60岁。”

12月24日,当王自正看到前一天的报纸上刊登出谭甫仁逝世的消息后,他禁不住失声窃笑了几声。

三、12月31日中午王自正发现被马苏红辨认出来之后,回到隔离室突然失声痛哭,哭声中说了一句:“以后就见不到老婆孩子了!”

谢新锷等人听到上述情况之后,认为事关重大,王自正的嫌疑骤然上升,还有没有必要提取他的指纹、脚印,需向专案组领导请示报告。于是,马上派人回到军区向专案组领导当面报告了新获悉的情况及改变原行动计划的建议。

可是,当晚军区大院刚刚举办过年终会餐,专案组的有关领导都喝得东倒西歪,满嘴酒气,对来人汇报的重要情况或许就没有真正听进去,加之他们一直对王自正作案持怀疑态度,又是酒后头脑不太清醒的时候,所以未加深思就做出“按计划执行”的决定。

谢新锷等人只好按原定计划执行。这个计划是让王自正带上喝水的缸子到俘管所食堂,顺便问些情况,从他的水缸子上提取指纹,同时派人到其住处提取他的鞋印。

陈汉中建议待王自正睡着之后,再叫醒他进行提取。临近午夜,陈汉中、李伯志来到王自正的隔离室,陈汉中以平淡的口气对躺在床上的王自正说:

“王自正,起来,拿上你的缸子,到食堂去一下,有点儿事。”

王自正当时并未睡着,甚至也没有脱掉衣服,他一边起身,一边问道:

“什么时候?”

“现在。”

“好吧。”

说着,王自正下了床。就在他穿上鞋子的一刹那,突然从被子底下摸出一支59式手枪,转身对着陈汉中和李伯志“啪、啪”各打了一枪。陈、李猝不及防,一枪击中李伯志的右手,一枪从陈汉中的大衣右上袖射入,从前腹部穿过,在肚皮上形成擦伤。李伯志转身冲了出去,边跑边喊:“快来人哪!快来人哪!”

王自正也提着手枪跟在李伯志后面,从陈汉中身边夺门而出,向院南狂奔。站在大槐树底下值勤的战士听到屋里响起枪声还没反应过来,就见王自正拿着手枪从屋里冲了出来,一边对着战士打枪,一边拼命地向西南角厕所处跑去。这时,枪声把住在南屋的全班战士也都惊醒了,他们纷纷提着枪跑出来对着王自正乱放起来,顷刻之间,俘管所院内枪声大作,喊声一片。

王自正环顾四周,发现一切对自己不利,便陡然转身,躲进了离他不远的厕所里。他见战士们一边打枪一边追来,料定越墙逃跑无望。就举枪对准自己的太阳穴扣动了扳机。只见血浆迸飞,一命呜呼。

随后提取王自正的指纹和胶鞋,经与现场提取的指纹和鞋印检验比对,认定同一。王自正的身高、体态、相貌与王文莹提供的情况一致。由此,已经可以完全确定王自正是杀害谭甫仁夫妇的凶手无疑。

经检验,王自正自杀的59式手枪,正是保卫部被盗的两支手枪中的一支,但不是杀害谭甫仁夫妇的那一支。经搜查他的身上和住处,也未发现另一支手枪。是罪犯把枪藏起来了,还是在同伙手中呢?专案组经过研究分析,并从政治部家属院到俘管所沿线二三里地,反复查看寻找,并派出成连的战士在那么寒冷的气温下,赤脚在俘管所旁边的西坝河,排成数路横队,在冰凉的水中作梳蓖似的摸索寻找,均未找到。大家认为罪犯是在俘管所厕所附近翻越南墙进出西坝的,很可能把枪扔到厕所里。于是组织战士掏厕所找枪,开始时边掏边找,用脸盆掏出粪便倒在旁边的菜地里,由于粪便臭气熏人,后来找的也不仔细了,当粪便、淤泥、砖头杂物等都掏光了,也没有见到枪支。大约过了一个月左右,在给菜地施肥时,当打碎粪堆时,发现了一支59式手枪,经检验确系杀害谭甫仁夫妇的那一支,枪号正是保卫部丢的两支枪之一。至此,保卫部丢的两支59式手枪都找到了,缴获未射击过的子弹和已射过的11发子弹,也正好是保卫部丢子弹的数目。017案

件取得了重大进展。

王自正的遗物中,有平时写的3本日记。日记写得很零乱,有人说是像“天书”。专案组拿到手后,觉得没有什么有用东西,也没有认真仔细的研究。

罪犯找到了,枪支查到了,按理案子可以结了。但凶手自杀了,没有了口供,许多情况还搞不清楚,王自正究竟是何许人,他为什么要杀害全军区的最高首长,他是独自一人作案还是纠集了一个集团,他又是如何在严密看守的隔离室中潜出潜入盗枪杀人的?作案有无背景或同伙?背后是否还有更大的阴谋?罪犯是如何实施犯罪过程的?以及与案件有牵连的一些疑问。这些问题都不清楚。

轰动春城的谭甫仁夫妇被暗杀案,并没有因凶犯王自正畏罪自杀而画上句号,相反,却给人们留下一串难解之谜……

王自正是何许人呢?他为什么会关在俘管所呢?这还得从一封来自河南内黄县武拐公社的检举信说起。

检举信缘于1947年7月的一起反革命报复案件:那年国民党进攻解放区,曾一度占领内黄县。内黄县富农出身的王志政为了给被共产党镇压的亲戚报仇,参加其堂兄组织的还乡团,对农民进行反攻倒算,枪杀了内黄县武拐村武委会主任武不会,制造了当时的“武拐事件”。后来国民党军队败逃,王志政随即逃离家乡,多年未有音信。

解放初期,王志政的堂兄、枪杀武不会的首犯被人民政府镇压,而王志政却一直逍遥法外。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随着当地清理阶级队伍运动的展开,群众把当年还乡团杀害武委会主任一案重新提出,强烈要求将漏网的反革命分子王志政揪出来。群众中有人反映,王志政当年跑到外地之后,编造出身历史,混入了解放军的南下大军。文化大革命初期,他曾给老家亲属来过一封信,称已从部队转业,单位好像是个旧市锡矿五队。武拐公社革委会当即给个旧锡矿五队寄去一份检举信,但信发出后如石沉大海。于是。公社和大队革委会又进一步围绕着王志政与家人的联系情况进行调查。有人反映,王志政有一次跟家人的通信地址好像是“昆明靖国新村50号”。于是,革委会以王志政亲友的名义试探性地给这个地址发出一封信,但不久信被退回来,原因是“查无此人”。

武拐公社革委会的办案人员仍不放弃,他们干脆把检举信寄给了云南省革委会。这封检举信转到了革委会人保组。当时,昆明军区保卫部的何凤毓科长恰巧在该组支左。他看过检举信之后,觉得“王志政”很像是保卫部的副科长王自正,便将此信转给军区干部部部长王一民。王一民阅后又转交给军区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雷起云。雷起云对这封检举信非常重视,直接呈报给军区政委谭甫仁。谭甫仁也认为此事重大,如果是枪杀共产党的富农分子混入了部队,那可是非同小可的事情。谭甫仁遂将此事便提交军区党委进行了研究,决定先派人到其家乡进行调查核实,如情况属实则立即将王自正隔离审查。

其实,昆明军区保卫部的这个“王自正”就是河南省内黄县参与枪杀共产党基层干部武不会的那个“王志政”。他畏罪潜逃后,在外地改名“王自正”参加了解放军。他编造了历史,伪装积极,骗得领导信任,很快入了党,提了干。后调昆明军区政治部保卫部任保密员、秘书,1970 年刚被提为保卫科副科长。王自正之所以能在部队长期隐蔽下来,除了组织上疏于审查之外,主要是他很少和家乡联系,即使写信也诡称转业到某某生产大队、某某锡矿,以迷惑家乡,他提干后把老婆李素民接到部队,与家乡的联系就更少了。

昆明军区外调人员刚到王自正的原籍进行调查,王自正的一个侄子便马上给王自正通风报信。王自正做贼心虚,惶恐不安,立即让妻子回老家找有关人员订立攻守同盟。但已无用,情况属实,“王志政”就是“王自正”。于是,1970 年 4 月,报军区副司令员王必成和政委谭甫仁批准后,王自正被隔离审查,关在原西坝俘管所的政治部审查组。这个专案组由干部部陈汉中科长负责,保卫部长景儒林直接领导。

之后,王自正供认自己参与了杀害武委会主任一事,但一口咬定没动手,没开枪,仅仅是个从犯。因该案的首犯已被处死,死无对证,所以检举揭发的主要事实难以查清,王自正一直被隔离审查了 7 个月结不了案。

但是,已失去人身自由的王自正要实施其杀人计划是何其难哉!如果没有同伙的协助,他怎能轻而易举地摆脱看管人员的监视,又畅通无阻地进入 32 号院连杀两人,然后再悄无声息地窜回隔离室隐藏?而如果有同谋同伙,那可能是谁呢?

专案组锁定的首选目标是王自正专案组的负责人陈汉中。

专案组怀疑陈汉中是王自正幕后策划者的根据有好几条：

首先，陈汉中作为审查王自正的负责人，表面上看来他对王的态度很严很凶，时常对王自正训斥一顿，并且王自正在日记中也多处流露出对陈汉中极为不满，甚至切齿愤恨。但这些都似乎是假相，是不是为了掩盖两人之间的同伙关系故意做戏？

其次，王自正作案为什么偏偏选在陈汉中出差期间？他在32号院杀人之后为什么又到了陈汉中家？

第三，也就是最令人可疑的一点，就是31曰晚上，王自正在几米之内对陈汉中开枪竟只擦伤了他的一点儿肚皮，陈汉中衣服上共有18个弹洞，其中胳膊上的洞同腹部衬衣、毛衣、罩衣、大衣上的洞竟不在一条直线上。王自正冲他只打了一枪，这一枪所穿的洞不可能不在一条直线上啊！因此，专案组怀疑陈汉中自己冲自己打了一枪。否则，人们难以解释：如果王自正同陈汉中没有特殊关系，如果王自正真的那么恨他，那么，王自正在陈汉中从其身边冲出屋门时为什么不照他头上补一枪？

当晚事发后，陈汉中曾对他人吹嘘自己在王自正行凶时是如何如何勇敢，如何同对方搏斗，但现场情况证明他说的并不是真话，他为什么要编造假话呢？

因此，专案组果断地决定将陈汉中隔离审查，将其同王自正的妻子李素云及子女3人以及住在32号院的6人等重点审查对象一起关押在昆明北郊黑龙潭一空闲干休所内进行审查。拥有几十名办案人员的专案办公室也设在该处。

同陈汉中一起被隔离审查的还有谭崇访。他一直与王自正住在里外间，专门负责监管王自正，王自正潜出潜入隔离室怎能瞒得了他？是他麻痹大意没发现呢，还是发现了以后知情不报，或者是被王自正拉下水成为同伙？

尤其令人不能原谅的是，陈汉中，李伯志去隔离室传唤王自正时，谭崇访正在里屋睡觉，在王自正开枪行凶的关键时刻，他不仅不挺身而出，从背后擒住王自正，反而吓得跳窗而逃。假如他当时表现得勇敢一些，是完全有可能避免王自正自杀的。

专案组考虑到,王自正在被隔离审查的情况下之所以能出去作案,站岗的战士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说不定有人充当了他的帮凶。因此,全班12名战士均被隔离审查。

本来,侦破“017案”的主力是保卫部,但破来破去却破到了保卫部自己头上:凶手是保卫部的人,负责监管审查的也是保卫部的人,盗的又是保卫部的枪,暗杀的则是保卫部的头号保卫对象。因此,最难逃关系、压力最大、首当其冲的就是保卫部部长景儒林。加之当时地方和部队均有较严重的派性,就连专案组成员也有所谓“八派”、“炮派”之分。当时对“017案”有一个基本定调,那就是“集团作案”;在破案中也有一个警示性的口号,那就是“派性掩护敌人,敌人利用派性”。所以,两派谁也不敢否认“集团作案”的定论,谁都想从对立的一派中挖出王自正的幕后策划、支持者,而景儒林则无疑处于斗争交会的风口浪尖上。他陷入深深的自愧、自责的泥潭中难以自拔。

在确定王自正是凶手之后,问景儒林谁与王自正关系密切时,他说出了许多人的名字,问谁能进保密室时,他又点了一任又一任的秘书。因此,保卫部不少人被怀疑,成了被审查对象。关押这些人的地点四周岗哨森严,气氛恐怖紧张。景儒林自己也感到压力很大,整日情绪懊丧,坐卧不安,吃不下饭,睡不着觉,用他自己的话说,“凶手是保卫部的人,偷的是保卫部的枪,杀得是保卫部保卫的头号对象,叫我无脸见人。”这种情绪已到了不能自拔的地步,他的精神也到了崩溃的边缘。

1971年初,解放军总政保卫部召开驻京单位保卫部部长会议,要求昆明军区保卫部派人出席,在会上介绍一下“017案”情况,以使人们引以为戒,防止类似案件发生。军区领导决定让景儒林参加,但他找到副政委蔡顺礼推辞,说他没脸见人,坚决不愿意去。蔡顺礼给他做工作,并提出让军区党办主任王克学一同去,并让专案组准备好了案情介绍材料。到会之后,景儒林执意不发言,硬让王克学代替他介绍了案情。

1971年春节过后,昆明军区政治部党委决定将保卫部一窝端,连同军区政治部专案组人员,被审查对象等,统统到军区步校办学习班。

军区步校在昆明东部八公里,那里的生活设施比较好,外边无干

扰,学习班地址选在这里,又便于保密,但有的房间窗子外钉上子木栅条。景儒林和干部部长王一民参加了学习班,而且都是学习班领导成员,住的都是加木栅条的单间房。军区派了司令部政治部主任孙呈祥协助景儒林具体掌管学习班。开学时,蔡顺礼作了动员报告,讲了学习班的意义、要求、希望和纪律。景儒林作了人员编组、作息时间和讨论动员报告的安排。

开学第二天,要联系实际讨论揭发了,到早饭时仍不见景儒林起床,孙呈祥在门口呼叫也无反应,当勤务员站在橙子上从门上窗子往里看时,只见景儒林用尼龙绳套在自己脖子上,另一端挂在蚊帐上,坐势下垂,打开房门进屋内,发现他早已自缢身亡。他留在桌子上的字条上写道:“保卫部原来就是个烂摊子,我来保卫部后,还在继续烂下去……保卫部出了这些事,叫我怎么说得清呀!”

景儒林的死,又给专案组蒙上一层阴影,他为什么自杀?是否与谭甫仁案有关联?这无疑又给专案组带来了新的问题和难点。

景儒林自杀之后,军区政治部副主任赵泽莽接替担任专案办公室主任。

昆明军区机关相继发生暗杀、自杀等案件,更引起人们的各种猜疑:谭甫仁被谋杀是否还有更深层次的背景?在当时的情况下,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无产阶级专政如此震慑人心,而谭甫仁身边的戒备森严,能对他如此成功实施暗杀,肯定绝非普通人能够所为,也绝非个别人能够所为,肯定该是一个错综复杂、蓄谋已久、集团策划的惊天大案。

# 第1155回：毛泽东，北京与斯诺长谈 发信息，中美要高级接触

春城血案我们暂告一段落，再回到北京，看看此时国内外的局势如何。

10月初，美国总统尼克松在会见美国《时代》周刊杂志记者时称："如果说我在死以前有什么事情想做的话，那就是到中国去。如果我去不了，我要我的孩子们去。"

10月下旬，尼克松当面同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商量，请叶海亚·汗作为"中介人"，为中美关系正常化"提供助力"。随后，他在欢迎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宴会上，在谈到国际问题时，"第一次有意地"使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名称，并在私下托齐奥塞斯库再次将希望美中进行高级接触的"口信"转达给中方。

国庆节后，斯诺在中国各地继续访问。

11月5日，周恩来与斯诺及其夫人长谈。在谈到中美关系时，周恩来说：中美谈判从1955年开始到现在，没有解决什么问题。为要解决问题，现在就要谈台湾问题，就是美国武装侵略和占领了台湾及台湾海峡。其他问题都是次要的。对此，"我们谈判的态度和方针不会改变，应改变的是美国政府。我们的大门始终是敞开的。"

11月10日至14日，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总统叶海亚·汗来华访问。

10日晚，周恩来单独同叶海亚会谈时，叶海亚转达了尼克松准备派其高级助手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地点与中国相应的代表对话的口信。

周恩来感谢叶海亚去年以来几次转达尼克松口口信，并表示将把叶海亚的传话内容报毛泽东。

11月14日，周恩来在同叶海亚会谈时，回答尼克松的"口信"说："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领土；解决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不容外人干涉；美国武装力量占领台湾和台湾海峡，是中美关系紧张的关键。

中国政府一直愿意以谈判来解决这个问题。现在,尼克松总统表示要走向同中国和好。如果美方真有解决上述关键问题的愿望和办法,中国政府欢迎美国总统派特使来北京商谈,时机可通过巴基斯坦总统商定。”

周恩来特别说明,这条“口信”是得到毛泽东主席批准的。

12 月 9 日,美方正式获悉周恩来的“口信”。

11 月 14 日,周恩来同罗马尼亚部长会议副主席勒杜列斯库会谈。勒杜列斯库向周恩来转达了尼克松和美国国务卿罗杰斯对寻求同中国关系正常化的解决办法表示的关切,以及尼克松两次表示美方愿同中国领导人就改善中美关系进行谈判的愿望。

对此,周恩来重申中国政府对台湾问题的一贯立场,提出:如果美国真有解决这一关键问题的愿望和办法,中国政府欢迎尼克松的特使或尼克松本人来北京商谈。

12 月 18 日,毛主席请斯诺去中南海谈话和吃早饭,一直谈到中午,共五个小时。

毛泽东谈到了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两派武斗,全面内战,说到了“516”,提到了王、关、戚,他说:

“就是那个时期。1967 年 7 月 July 和 8 月 August 两个月不行了,天下大乱了。这一来就好了,他就暴露了,不然谁知道啊?!多数还是好的,有少数人是坏人。这个敌人叫‘516’。在中央文革小组里边有 4 个人……王、关、戚,还有一个下次我给你讲。”

毛泽东这里说的“还有一个”,应该就是陈伯达。此时陈伯达的问题还没有对外公开。

斯诺赶紧问:“有一个问题我还不大清楚,即主席对我讲这些,是供公开发表用,还是作为介绍背景材料,还是朋友之间的交谈,还是三者兼而有之。”

毛泽东:“不供发表。就是作为学者,研究者,研究社会情况,研究将来,研究历史嘛。我看你发表跟周恩来总理的谈话比较好,同我的不要发表。”

毛泽东与斯诺谈到了“个人崇拜”的问题,他说:“说我是个人崇拜。你们美国人才是个人崇拜多呢!你们的国都就叫做华盛顿。你

们的华盛顿所在的那个地方就叫做哥伦比亚区。”

对“个人崇拜”,毛泽东表示:“可讨嫌了!”

但同时又说:“总要有人崇拜嘛!你斯诺没有人崇拜你,你就高兴啦?你的文章、你的书写出来没有人读你就高兴啦?总要有点个人崇拜,你也有嘛。你们美国每个州长、每个总统、每个部长没有一批人崇拜他怎么混得下去呢!”

毛泽东建议尼克松来中国,他说:“我是不喜欢民主党的,我比较喜欢共和党。我欢迎尼克松上台。为什么呢?他的欺骗性也有,但比较地少一点,你信不信?他跟你来硬的多,来软的也有。他如果想到北京来,你就捎个信,叫他偷偷地,不要公开,坐上一架飞机就可以来嘛。谈不成也可以,谈得成也可以嘛。何必那么僵着?但是你美国是没有秘密的,一个总统出国是不可能秘密的。他要到中国来,一定会大吹大擂,就会说其目的就是要拉中国整苏联,所以他现在还不敢这样做。整苏联,现在对美国不利;整中国,对于美国也不利。”

“今天是不分中国人、美国人。我是寄希望于这两国的人民的,寄大的希望于美国人民。第一是亚非拉啰,第二是欧洲、美洲和大洋洲。单是美国这个国家就有两亿人口,如果苏联不行,我寄希望于美国人民。美国如果能出现一个领导的党来进行革命,我高兴。美国的产业高于世界各个国家,文化普及。

现在我们的一个政策是不让美国人到中国来,这是不是正确?”

斯诺一时不明白毛泽东的含意,只好听他讲下去。

毛泽东:“外交部要研究一下,左、中、右都让来。”

斯诺惊讶地睁大幽蓝的眼睛。

毛泽东:“为什么右派要让来?就是说尼克松,他是代表垄断资本家的。当然要让他来了,因为解决问题,中派、左派是不行的,在现时要跟尼克松解决。

他早就到处写信说要派代表来,我们没有发表,守秘密啊!他对于波兰华沙那个会谈不感兴趣,要来当面谈。所以,我说如果尼克松愿意来,我愿意和他谈,谈得成也行,谈不成也行,吵架也行,不吵架也行,当做旅行者来谈也行,当做总统来谈也行。总而言之,都行。我看我不会跟他吵架,批评是要批评他的。我们也要作自我批评,就是讲

我们的错误、缺点了,比如,我们的生产水平比美国低,别的我们不作自我批评。”

毛泽东接着说:“你说中国有很大的进步,我说不然,有所进步。美国革命有进步,我高兴。我对中国的进步不满意,历来不满意。当然,不是说没有进步。35 年前同现在比较,总进步一点吧,35 年啊!那时落后得很,只有 8000 军队。那时候二方面军和四方面军都还没有汇合。汇合后招兵买马,在陕甘才闹了两万五千人。我说是走了两万五千里路,剩下两万五千人。但是比长征前的 30 万人、几个根据地要强。政策改变了,王明路线被批判了。”

斯诺的思路仍停留在毛泽东刚才的话题上,他说:“主席,我有两件事想跟你探讨一下。第一是尼克松来华的问题,是否可以作这样的理解:目前他来是不现实的,但尼克松来华被认为是理想的。

第二是关于美国人访华的问题,我能作为这个问题中的一个例外,感到格外高兴,但是……”

毛泽东打断他的话说:“但是你代表不了美国,你不是垄断资本家。”

斯诺:“当然,我也刚要这么说。”

毛泽东继续说:“尼克松要派代表来中国谈判,那是他自己提议的,有文件证明,说愿意在北京或者华盛顿当面谈,不要让我们外交部知道,也不要通过美国国务院。神秘得很,又是提出不要公开,又是说这种消息非常机密。他选举是哪一年?”

斯诺:“1972 年。”

毛泽东预言:“1972 年美国要大选,我看,这年的上半年尼克松可能派人来,他自己不来。要来谈是那个时候。他对那个台湾舍不得,蒋介石还没有死。台湾关他什么事?台湾是杜鲁门、艾奇逊搞成这样的,然后又是一个总统,那个里面他也有一份就是了。然后又是肯尼迪。尼克松当过副总统,他那时跑过台湾。他说台湾有 1000 多万人。我说亚洲有 12 亿人,非洲有 3 亿人,都在那里造反。”

斯诺:“我不认识尼克松,但如果我见到他的话,是否可以说……”

毛泽东:“你只说,是好人啊!是世界上第一个好人!这个勃列日涅夫不好,勃兰特也不算怎么好。”

斯诺问:“你看中美会不会建交?”

毛泽东说:“中美两国总要建交的。中国和美国难道就100年不建交啊?我们又没有占领你们那个长岛。”

接着,斯诺又问了当时全世界都关心的中国文化大革命的问题,为什么毛泽东要发动一场针对自己政权的革命?

毛泽东说:“那个时候的党权、宣传工作的权,各个省的党权、各个地方的权,比如北京市委的权,我也管不了了。所以那个时候我说无所谓个人崇拜,倒是需要一点个人崇拜。现在就不同了,崇拜得过分了,搞许多形式主义。比如什么‘四个伟大’,‘Great Teacher ,Great Leader,Great Supreme Commander,Great Helmsman’,讨嫌!总有一天要统统去掉,只剩下一个Teacher,就是教员。因为我历来是当教员的,现在还是当教员。其他的一概辞去。”

说到这里,在座陪同的人都笑了起来。

斯诺问:“过去是不是有必要这样搞啊?”

毛泽东:“过去这几年有必要搞点个人崇拜。现在没有必要,要降温了。”

斯诺问:“我常常想,不知道那些喊的口号最响、挥动旗子最起劲的人,是不是(就像有些人所说的)在打着红旗反红旗?”

毛泽东点点头说:“这些人分三种,第一种人是真的,第二种人是随大流,‘你们大家要叫万岁嘛’,第三种是假的,你才不要相信那一套呢。……”

斯诺:“听说进城前夕开的一次中央全会上,曾经通过一项决议,禁止用党的领导人名字命名城市、街道、山村等。”

毛泽东:“这个现在都没有,没有什么用人名来命名的街道、城市、地方,但是他搞另外一种形式,就是标语、画像、石膏像。就是这几年搞的,红卫兵一闹、一冲,他不搞不行,你不搞啊?说你反毛,anti - Mao!你们的尼克松总统不是喜欢 Law and order 吗?他是喜欢那个Law,是喜欢那个order的。我们现在的宪法要有罢工这一条,‘四大’的自由之外,还要加上罢工,这样可以整官僚主义,整官僚主义要用这一条。”

斯诺:“是不是新的宪法里要写上罢工?”

毛泽东:“新宪法要写上。”

斯诺问:“你觉得党现在怎么样?”

毛泽东说:“不怎么样。”

斯诺问:“是不是好一点了?”

毛泽东说:“好一点,你说好一点我赞成。你说中国怎么怎么好,我不赞成。两个东西在斗,一个进步的,一个落后的。

这个文化大革命中有两个东西我很不赞成。一个是讲假话,口里说‘要文斗不要武斗’,实际上下面又踢人家一脚,然后把脚收回来。人家说,你为什么踢我啊?他又说,我没有踢啊,你看,我的脚不是在这里吗?讲假话。后头就发展到打仗了,开始用长矛,后头用步枪、迫击炮。所以那个时候外国人讲中国大乱,不是假的,是真的,武斗。

第二条我很不高兴的,就是捉了俘虏虐待。红军、人民解放军不是这样的,他们优待俘虏。不打,不骂,不搜腰包,发路费回家,不枪毙,军官都不枪毙,将军那样大的军官都没有枪毙嘛。解除武装了嘛,不论是士兵还是军官,是大军官还是小军官,解除了武装嘛,你为什么还要虐待啊?我们历来就立了这个规矩的。所以许多的兵士在我们的感化下,一个星期就过来了,一个星期就参加我们的队伍打仗了。”

斯诺又问:“你们跟俄国的问题打算解决吗?”

毛泽东回答:“俄国的问题总也要解决嘛。世界上各国的问题都总是要解决的呀!”“总要双方都愿意才行,只一方愿意不行。”

斯诺问:“俄国到底要干什么?”

毛泽东:“不大懂,也搞不清。”

斯诺问:“俄国是不是怕中国?”

毛泽东说:“中国有啥好怕?!中国的原子弹只有这么大,……”他伸出小手指比划着,然后说:“俄国的原子弹有这么大,……”他伸出大拇指比划着,又说:“美国的原子弹有这么大,……”毛泽东伸出另一只手的大拇指来比划后说:“它们两个加起来有这么大,你看。”毛泽东把两个大拇指并在一起给斯诺看。

斯诺接着问:“如果从长远的角度来看怕不怕呢?”

毛泽东回答:“听说是有点怕。一个人的房子里有几个老鼠,也有点怕,怕老鼠吃掉他的糖果。几个老鼠在房子里钻来钻去,他就睡不

着觉,闹得不安宁。有些惊慌失措,比如中国挖防空洞,他们也害怕。这有什么好怕的呢?挖防空洞是防你来嘛,我钻洞嘛,又不打出去。中国批评他们的修正主义,他们也怕。那末是谁先批评我们的呢?这场战争是谁开始打第一枪的呢?他叫我们教条主义,我们叫他修正主义。我们不怕他叫我们教条主义。我们把他批评我们教条主义的文章在我们的报上发表。他们就不敢发表我们批评他的文章,他们就怕。你说我是教条主义,你总有一个理由嘛。教条主义就是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嘛,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东西就要批倒。可是他不。他后头又请古巴代表团来讲和,说是要求停止公开论战。又请罗马尼亚来讲和,要我们停止公开争论。我说不行,要争论一万年。后头柯西金到北京,我见了他。我说,你说我们是教条主义,好。但是这个发明者赫鲁晓夫为什么要把他搞掉,要把他整掉呢?你决议上写了的,说他是'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赫鲁晓夫同志'。为什么这样一个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人你们又不要了呢?我想不通。你们不要,我们请他来行不行?请他到北京大学当教授,教那个发展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他又不给。我又说,但是你是总理,你是苏联国家的总理,我们的争论是要进行一万年的,因为看你的面子,我让步。一让一大步,不减少犹可,一减少就是一千年,一让就是一千年啊!他对我说那次谈话的结果不错。

这些俄国人他看不起中国人,看不起许多国家的人,他以为只要他一句话,人家就都会听。谁知道,也有不听的,其中一个就是鄙人。"

12 月 25 日,《人民日报》头版以通栏大标题刊载了《毛泽东主席会见美国友好人士埃德加·斯诺》的新华社电讯,新华社电讯报道的是 1970 年 12 月 18 日,毛泽东在游泳池的书房会见斯诺和他的妻子的消息。《人民日报》还配发了国庆节在天安门城楼上毛泽东与斯诺的合影。这天报眼位置的《毛主席语录》选用的是:"世界人民,包括美国人民,都是我们的朋友。"

这次会见后,唐闻生负责整理谈话的英文记录。根据斯诺的请求,经请示周恩来,由外交部领导审阅后,给了斯诺一份。斯诺结合自己记录下的那部分内容,把谈话整理成文,于 1971 年 4 月发表在美国《生活》周刊上。

王海容和唐闻生两人共同整理的中文记录,经毛泽东与周恩来审阅后,以中央文件形式下发至全国每个党支部。

这份文件送到毛家湾后,秘书于运深认为很重要,在“讲”文件时作为重点讲给林彪听。他还把毛泽东对斯诺说“四个伟大”“讨嫌”专门画出来了,摘要讲。“四个伟大”虽不是林彪的创造,但经林彪1967年5月1日给清华大学题词后风靡全国。本来,林彪对毛泽东的批示、讲话、谈话等都是非常注意的。而这一次,于运深注意到,林彪更是格外注意的听。文件讲完后,林彪还要秘书把这份文件留下,他要再看看。这是以前于运深讲文件时从来没有遇到过的。

1971年1月5日,经过巴基斯坦总统的传话,尼克松总统的回答口信:“美国认为在北京举行高级会谈是有益的,它不仅限于台湾问题,而应包括解决其他问题的步骤,美国建议在第三国开一预备会议,做出各种安排。”

# 第1156回：华北会，批李雪峰、郑维山 姚文元，写报告汇报学习

1970年12月18日晚，周恩来在中南海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和讨论毛泽东对38军报告的批示。这次会议，将北京军区司令员郑维山、北京军区政委、河北省革命委员会主任李雪峰等北京军区领导9人，北京市和北京卫戍区吴德、吴忠、杨俊生3人“扩大”到会。

周恩来传达毛泽东的批示，有些地方还重复念了一遍。然后，沉默地望着北京军区的几位领导人。

郑维山首先表态说：“我坚决拥护主席的批示。我觉得先开北京军区党委常委会，再开北京军区党委扩大会。我相信，事实真相总会查清楚的！”

李雪峰等人也明确表示：“拥护毛主席关于召开北京军区党委扩大会议的建议。”

次日，12月19日，周恩来关于召开北京军区党委扩大会议的请示报告递到了毛泽东那里，报告全文如下：

主席、林副主席：

昨（18日）晚政治局会议传达和讨论主席对三十八军报告的批示和林副主席批示。华北到会的同志有：郑维山、李雪峰、陈先瑞、解学恭、肖文玖、吴先恩、张南生、郑三生、尤太忠等九人，北京卫戍区有吴德、吴忠、杨俊生三同志。会上，先发了中央印发的讨论文件（（1970）134号）。读后，大家一致拥护主席要北京军区党委召开扩大会的建议。集中讨论北京军区和华北地区对陈伯达问题的认识和揭发，人要多一些，每个师二至三人，军四人，省军区、北京卫戍区、天津警备区党委常委、军分区二至三人，同级军兵种和代管部队、机构亦来相应人数，预计要来四百多人，时间性要长一些。在昨晚讨论中，解学恭、吴德、吴忠、杨俊生等同志都强调主席批示中“为何听任陈伯达乱跑乱

说”、“是何原因陈伯达成了北京军区及华北地区的太上皇”的两点。政治局同志也指出:“为何连林副主席也不便找三十八军的人谈话,为何北京军区两次传达陈伯达反党问题(一次传达九届二中全会的通知,一次传达中央62号指示)都只是分片传达,为何河北省的两次传达也是那样草率,一次了事,然后由各军、各地零星揭发,而不能集中讨论,追究原因。”经过大家发言,对郑维山、李雪峰两同志有了触动。郑说,过去上当犯错,现在有信心痛改;李说,过去在思想上有共同性。

为开好这个会,打通思想,更好团结,政治局同意吴先恩同志提议,在人到齐开大会之前,先以三天时间(19、20、21日),开北京军区党委常委会(北京三人参加,约十五人),初步统一认识,利于接受大家批判;同时由永胜、作鹏两同志也找三十八军开会同志谈谈,指出他们的报告是好的,起个推动作用,在会中也要从揭发批判达到团结。

以上处理,妥否,请主席批示。

12月19日,毛泽东在周恩来的这份请示报告文件上奋笔疾书:

照办。要有认真的批评,从批评达到团结的目的。建议李德生、纪登奎二同志参加会议。永胜、作鹏应同德生、登奎一道参加华北会议。这次会议在全军应起重大作用,使我军的某些不正之处转为正规化。同时对两个包袱和骄傲自满的歪风邪气有所改正。

在这里,即将召开的会议已被毛泽东称之为“华北会议”。中共中央以中发[1970]77号文件转发周恩来《关于开好华北会议的请示报告》。

19日、20日两天,郑维山主持召开北京军区党委常委会,研究安排召开华北会议事宜。

19日当晚,黄永胜、李作鹏接见38军领导干部,宣读毛泽东12月16日的批示,说:“现在的问题是陈伯达与北京军区的关系是很好的。他自己讲北京军区是他的‘家’,要什么‘饭’吃等等。我们不理解他是什么意思。”“不要只攻击北京军区,为什么陈伯达成了你的太上皇,那样就把事情搞复杂了。”

20日,北京军区正式接到中央通知,要求全军区正师以上干部和河北省地委书记以上干部到京西宾馆报到。同日,周恩来约黄永胜、李作鹏、邱会作等人谈话,商定他们参加北京军区党委扩大会议的

事情。

李德生于11月18日向中央政治局请假,回安徽检查总结1970年的工作,部署1971年的工作,研究准备召开安徽省第三次党的代表大会。12月19日,突然接到中央办公厅的通知,请他立刻回北京,说是“主席有事情找他。”

李德生不敢怠慢,赶紧把安徽的工作向党的核心小组副组长、省革委会副主任宋佩璋作了交待。第二天,12月20日,乘空军派来的专机赶回北京。

李德生下了飞机,没有停留,直接到中南海游泳池毛泽东的住地。

毛泽东见了李德生,显得很高兴,问道:“你回来了,你们安徽形势怎么样啊?”

李德生不知道毛泽东特地把他叫回来,要谈什么事情,显然不是谈安徽的情况吧。他简要地汇报说:“从现在看,今年安徽粮食丰收已成定局,比去年增产,工业生产也不错。党的各级组织基本恢复了,我们正在筹备召开省的党代表大会。”

果然,毛泽东没有接着问下去,而是郑重地说:“我和恩来商量了,确定你到北京军区去,担任司令员。”

李德生向毛泽东建议:“主席,北京军区的工作任务很重,我努力去做好。总政治部的事还管不管?”

毛泽东回答说:“管!但要把主要精力放在北京军区,把屁股坐在北京军区,兼管总政的工作。总政治部还有副主任嘛。”

毛泽东说:“总政治部的工作还是搞好承办、批转。”毛泽东接着讲开了总政治部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评价了从红军时期到解放以后,总政治部历届主任的情况。

毛泽东没有讲到北京军区的具体任务是什么,到北京军区应当注意什么,而是问李德生:“你看过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吗?这是一部军事地理的参考书,要找来看看哦。”

他又问李德生:“你知道北京最早是在什么地方吗?”

李德生当然答不上来。

毛泽东说:“有一个说法,叫做先有莲花池,后有北京城。当北京军区司令员,要了解北京的历史、地理,了解华北的历史、地理啊。”

毛泽东交待李德生:“你先去参加华北会议,等公布了北京军区司令员的命令后,再到职上任。”

21 日,也就是李德生赶回北京的第二天,他就到京西宾馆,以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的身份,参加华北会议。

这天,汪东兴也奉命参加华北会议。临行前,他请示毛泽东:“我要不要发言?”

毛泽东说:“你现在是明白人了,为什么不发言?”

汪东兴又说:“我先写一个东西给您看一看,不要又搞错了。”

毛泽东说:“不用写了。根据我与你几次谈话的情况,我看你的思想已经通了。你讲吧,讲错了,回来我们再商量,再批判嘛!”

说到这里,毛泽东自己也哈哈大笑起来。

1970 年 12 月 22 日,北京的天气特别寒冷。京西宾馆的大礼堂里,整整齐齐地坐着 449 位来自全军高层领导机关和北京军区师以上的领导干部,以及河北省地(市)委书记以上干部。这就是大家所说的“华北会议”。

按惯例,这次会议也被分为小会、中会和大会。小会只有北京军区、北京、天津、河北省革委会主要负责人参加,中会扩大到省、市、军以上干部,大会则要求全体人员参加。

会议规定,所有与会人员一律不许私自外出,有重要事情外出,务必请假。同时规定:“会议要保密,会间不准打电话!”

12 月 24 日,北京军区召开常委会。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李德生等以军委领导的身份出现在会场上,纪登奎等人也出席了会议。

会议一开始,黄永胜首先传达毛泽东对周恩来报告的批示。传达之后,他介绍说:“周总理和军委办事组,按照毛主席的批示,要开一个有广度、有深度、长时间的会议。”

与会的 400 多位代表心情复杂,表现各异。多数人对这次会议的主题感到茫然:究竟是批陈伯达,还是批郑维山、李雪峰?要批郑维山、李雪峰,他们还都在主席台的位子上坐着,怎么个批法?因此,会议开始后,冷眼旁观者有之,唱高调却内容空洞的发言也有之,还有些平时就对郑维山、李雪峰有意见的人开始上下活动,准备材料……

这些情况很快反映到中央那里。

24 日这天,周恩来再次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听取参加会议的黄永胜、李作鹏、李德生、纪登奎等人的汇报,将会议的有关情况进行了梳理。最后,政治局形成了一致意见,认为华北会议还未形成认真批评和彻底揭露的精神,要求参加会议的政治局成员在几个主要小组会上继续做工作,打通思想,突破缺口,以影响大会。

第二天,12 月 25 日,华北会议召开小会。各小组会议重点是批评郑维山、李雪峰。

当天,周恩来就华北会议的情况致信毛泽东、林彪,提出目前会议还处在学习和表态的开始阶段,估计形势打开,将在年底年初。同时,汇报了中央政治局讨论的意见。毛泽东阅后批示:“同意。”

26 日,参加会议的政治局成员分别在各小组会上继续发动揭批问题,会议的气氛越来越紧张。当天,周恩来在劝大家发言时说:“如果会议开的无力,中央要点名了。”

27 日,郑维山和李雪峰在大会上作检查。

不久,中央政治局指定 4 个人帮郑维山写检查,其中包括他的现任秘书杜辛和前任秘书高惠卿,还有军区党委办公室的副科长张工和秘书刘耀。

另外,中央政治局又指定吴德、吴先恩等 4 个人来“帮助、督促”李雪峰、郑维山端正态度,交代问题。

一天,“帮郑小组”要郑维山交代跟陈伯达通电话的内容,郑维山说:“讲的都是一般具体问题,记不清了。同时,电话多数是秘书接的,我接时秘书也在场,要办的事也是通过秘书办的。”他们说:“那不行,交代不了。”

“过去做对了的,要从错的方面去讲,过去认为是正确的,要从错误方面去认识。”几个人告诉郑维山。

“每个问题都要写上动机。”在看了郑维山的一次检查后,“帮郑小组”成员说,“比如‘火烧杨勇’没有报告毛主席、林副主席的动机,就是要当军区司令。”“比如,那一次陈伯达别有用心地问你:天津核心小组要不要扩大?王曼恬这个人怎么样?你说天津核心小组要扩大的事不知道,王曼恬你还不认识,回去给你问一下。陈伯达连忙说不用不用,你不懂我的意思。后来你去天津时,便向解学恭讲了这件事。

动机就是要打击王曼恬革命干部,讨好陈伯达。”

郑维山知道,他不作检讨是不可能的,但是他不能给自己乱戴帽子。被逼急了,他赌气说:“要检查,我可以作检查,你们怎么写我怎么讲,我一个字不改。但是有两条,你们写上了我也不讲。这两条:一是说聂荣臻是坏人,你写上了我也不讲;二是说华北部队就是‘六字号’的部队,是坏部队,写上了我也不讲!”

北京军区的前身是华北军区,基本部队是华北野战军,聂荣臻是华北军区的创始人,也是第一任司令员。而杨成武则是北京军区的第一任司令员。1948 年 11 月 1 日统一全军编制序列部队番号时,华北军区的第 1、第 2、第 3 兵团按原建制依次改称为第 18、第 19、第 20 兵团,直属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下属的纵队,依次改称第 60、第 61、第 62、第 63、第 64、第 65、第 66、第 67、第 68、第 70 军,基本都是“六”字打头儿。这就是华北部队“六字号”的来历。1968 年杨、余、傅事件后,北京军区党委召开第 12 次全委扩大会,批山头主义,“六字号”部队是当时的主要话题。

12 月 28 日,发言的火药味浓了些,批评郑维山、李雪峰骄傲自满、刚愎自用。但是,仍没有什么实质问题。

这时,北京卫戍区的一位领导清了清嗓子,要求发言。他说:“郑维山、李雪峰的检查不老实,你们的要害是跟陈伯达搞阴谋,不讲阴谋活动,这是对抗!……郑维山、李雪峰是陈伯达的打手,陈伯达在庐山向党发难是同打手商量了的!军区常委们都要揭盖子,不要捂。”

一时间,全场哗然。不少人震惊地看着他,也有人用眼睛的余光瞄向郑维山,还有的人低头不语,更多的是在交头接耳。

会议基调一下子升温。在随后几天的小会上,甚至在包括省、市、军以上干部参加的中会上,很多人纷纷批评郑维山、李雪峰。

但是,会议仍显揭批无力。

郑维山觉得,这些发难的人中,有的人是真批,但是没有内容;有的人是假批,实际是应付;多数的人不发言;还有少数人,在会议宣布问题之后就病了,或者离开,或者住院了,而在座者无不神情紧张。在 400 多位军队干部面前,他和李雪峰仍然是首长。郑维山认为,这次黄永胜等人仍然会像 1968 年北京军区第 12 次会议上一样,又是小题大

做罢了。其实,他和许多与会者一样,并不知道毛泽东要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参加华北会议的真正目的。

当月,38 军政委王猛提拔为北京军区副政委。

12 月 29 日晨,姚文元给毛泽东写报告说:“自己最近除学习中央指定的经典著作外,还很粗浅地读了一点历史和自然科学,想逐步改进自己知识贫乏的状况。”“赫胥黎为达尔文主义奋斗的《人类在自然界的位置》是一本很有意思的书,比严译《天演论》好看多了,由于倾注全力证明人的老祖宗是猿,曾引起神学家们的狂叫怒骂。他用的方法是解剖学的比较方法,一当进入人类历史领域,就显得论据不足了。他不能达到历史唯物主义,不了解人类区别于其他动物的自觉的能动性以及这种能动性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过程。对于‘人类在自然界的位置’这个问题,他只回答了一半。此书在普及达尔文学说上有特殊的功劳。一种新的进步的学说要普及,不经过这种剧烈的批判,大约是不可能的。翻看了一点《五灯会元》,才知道宗教的唯心主义的虚妄是怎样用诡辩和折衷主义来装点门面的,这从反面教育自己辩证法的重要。另外还读了一些孙中山的东西。也看了一些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的东西。逐步形成这样一个概念:从刘少奇的黑《修养》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专政,一直到他在‘八大’的报告和决议,有一条同主席无产阶级世界观相对抗的黑线贯串着,即地主、资产阶级的人性论。这可能是刘少奇反动世界观中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他的许多文章、‘报告’中,都有抽象的即资产阶级人性论的提法和论点。这是同国民党反动观点一致的。从这里,可以直接引出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以及极‘左’、形‘左’实右的路线,可以直接引出复辟资本主义、为地富反坏右等剥削阶级服务的修正主义理论,同主席历来倡导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分析、阶级斗争的根本观点相对抗;在认识论上,则必然同时既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又反对进行社会的调查研究和革命实践,同毛泽东思想关于理论和实践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的这个根本观点相对抗。从国际上看,苏修叛徒们的复辟资本主义的理论也是建立在所谓‘人道主义’‘人性论’之上的。批刘的文章,在这个问题上仍未批透。想认真搞一点材料及文章。此外,关于陈伯达,也要整理一些此人反动世界观的文字材料,揭发材料中这一部分很少。还

想整理一点思想史的材料,以执行主席《我的一点意见》中‘继续研究’的任务。”

当天,毛泽东对姚文元的这份报告写下了如下批语:

“都同意。你的学习进程较好较快,坚持数年,必有好处。我的意见二百七十四个中央委员,及一千以上的高、中级在职干部都应程度不同地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方能抵制王明、刘少奇、陈伯达一类骗子。《人类在自然界的位置》请找一本给我。《天演论》前半是唯物的,后半是唯心的。”

第二天,12 月 30 日,林彪也对姚文元的这份报告批示说:

“完全同意主席对文元同志报告的批示。全体中央委员和高中级干部认真照主席的指示学习,对加强党的思想建设极为重要。”

# 第1157回：来加温，江青到京西宾馆 跳跃快，再追问《六号简报》

1970年12月30日，身穿绿军装的江青走进了华北会议的会场。这天正在召开华北地区和北京军区主要负责人参加的小会议。江青的到来，使会议的气氛顿时有几分紧张。

江青看着会场上的人，问："怎么就这么几个人？"

有人向她解释说："这是小会，还有中会、大会。"

"开什么小会？最小也要开中会。"江青毫不客气的冲口而出。

于是，这天的小会变成了中会，军区的军以上干部参加。

江青先是不动声色地听了北京军区政委陈先瑞、天津市革委会副主任王曼恬、38军副政委邢泽等人的发言，随后开始讲话。

1968年"杨余傅事件"后召开北京军区党委第12次全体会议时，江青就到北京军区参加过那次会议，为邯郸磁县事件和郑维山有过交锋。而这一次与会的人数比上次更多，规模更大。

她说："我首先向同志们讲一下，我对于38军任何人不认识，但我正是为38军受了陈伯达这个大坏蛋的气了。38军有一个工作人员给我写信，曾经想见我，说见肖力也好，陈伯达为这个就压迫我。我想查这个人查不到，现在这个人查到了！"江青环顾四周问："38军到的什么人？你知道不知道有个叫宋伟的啊？"

38军军长刘海清站起来回答："知道，是我们一个团的副政委。"另一个人补充道："他在中央文革机关工作过。"

江青接着说："他的材料证明他在那里完全是受排挤的。我和康老、春桥、文元是被架空的。我建议要宋伟同志到会来揭发！"

热烈的掌声。

江青接着说："傅崇碧冲击中央文革，要打断我的脊梁骨！打嘛，我也可以打断你的脊梁骨。中国人民解放军应该保卫党中央，保卫人民！傅崇碧冲进去，是由陈伯达秘书王保春勾结进去的。北京卫戍区

对这件事还没有个表态。请问卫戍区司令,还有总参,有没有这个职责呢?”

江青又说:“卫戍区对这几个要查,其中有一个周树青,还有邵崇永,你们一直没有把这些人当回事。这个事大概跟北京军区可能有点什么关系吧!邵崇永有个检查说,傅崇碧说过:不在于江青同志批评我,在于江青同志有察觉。察觉到什么?还不是察觉到他们的活动。这跟陈伯达都有联系的。傅崇碧冲了中央文革以后,杨成武就装病不参加中央碰头会了。”

江青说到天津:“还有个江枫。”她突然口气一转:“解学恭、王曼恬同志他们立了功,特别是王曼恬同志。”“江枫、王亢之、李树夫完全给陈伯达做特务的。38 军在北京市公安局有个支左的。”

刘海清补充说:“是我们副军长牟立善同志。”

“这个人被陈伯达赶走了。宋伟现在在不在?”江青伸长脖子,目光在会场中来回扫视。

还是刘海清回答:“在。”

江青又问:“在哪里?”

刘海清答:“在保定。”

江青有点失望:“代我告诉他,我没有见他,不是我怕陈伯达,是我遵守纪律!”

接下来,江青便说北京军区郑维山的问题:

“战友文工团简直是军队打、砸、抢的祖宗。郑维山同志你说老实话,王××(北京军区文工团吹小号的)上庐山前给我的两份报告,那么处理,那还不是‘516’?!抢人家的机密,党的机密。王××,还有个吹小号的,这还不是你们组织的。你这个‘战友’可了不得。我是提个问题你们考虑,有的还会揭发。王××这个人轻易处理,不追查,他是有组织的,他的行动是有训练的。在怀仁堂我要打电话给总理,他就把电话占上了,我都打不成电话。几次打、砸、抢都有他。我觉得郑维山同志对这些问题是很不认真对待的。是否你当时也参加了?当时有人说,北京军区有 7 个军,陈伯达他辖 7 个军,还不是太上皇?!”

“这几年,为军队我受小人的气,大阴谋家的气。陈伯达提出了个口号‘揪小爬虫’,他说他是‘小小老百姓’。什么小小老百姓?他才

是个小爬虫呢！他是小小小小爬虫，他是王八蛋、两面派！68 年以后他对我就是一面派了，他勾结人整我、压我。这些问题卫戍区、总参不追究。你们不是保卫党中央、保卫人民吗？为什么不追究？我讲的不对，同志们可以批评我。”

接着，她的语气稍有缓和，继续说：“发言不要照本念，有什么就揭什么，揭得越彻底解决得越好，才能在毛泽东思想的原则上团结起来。”

她点着桌子，对李雪峰说：“李雪峰同志，你在北大时我们到北大，你说奉陪到底。你说：你们来我奉陪到底。把林副主席请去了，你不负责警卫，躲到角落里去了，几乎出了事。你是主体嘛，不是客体。北大是你的天下了？聂元梓则给我写了保证，这次到庐山又反对我们了，跟着你走了。最后两年又给我写信，说她又犯了错误。也没说什么错误，大概是对 8341 部队的吧？我叫老汪同志处理了。这和你没有关系？在天安门上我就说：你太不像样子了。我保了你好几次了，你说你要奉陪我们到底，现在我要奉陪你到底，看你低头不低头、认错不认错！”

李雪峰低头不语。

江青这里说的“奉陪到底”，应该是指 1966 年 7 月 26 日在北京大学的那次辩论会上李雪峰的讲话中的一段话：“工作组都是四面八方来的人，情况不明，随传随到，奉陪到底。”

而“把林副主席请去了，你不负责警卫，躲到角落里去了，几乎出了事。”这句话应该是指 1966 年 8 月 16 日在北京工人体育场举行“外地来京学生群众大会”的事情。那次会议由于会场秩序混乱，致使正准备讲话的林彪讲话中断，会议被迫提前结束。详情可见《文革史话》第二部第一卷的 125 回。

没想到过去将近 4 年了，江青还记得。

江青继续说：

“你们《河北日报》把黄永胜同志的名字勾掉，印了杨成武、肖华的照片，我请总理、康老和你谈过这是错误的，你是怎么对待的？”

“你们打我，姚文元同志可以作证。你们打我，这样恶劣，你们奉陪到底，就是在北大！在庐山你们那样干，那样跟着陈伯达干，陈伯达是你们的太上老子！”

她看到郑维山,又大声说道:“郑维山你好好想一想,你在晋东南要开枪权、扫荡权,我要不讲可能几万人就完了。”

说到这里,江青又补充说:“我今天来参加会,请示了政治局,请示了总理,我不代表任何人,我也可以发表我个人的意见。”

江青向大家描述1968年的事情:

“当时在人大会堂,我遭到突然袭击,进来一批人,拿来一张图,要开枪权、扫荡权,怎么能够这样?!我当时还说,可以挖坑道,派装甲车、坦克去宣传,部队可以放在后面壮声威。当时还有人挖苦我,说江青同志还会打仗?我跟主席几十年,总懂得一点嘛!法宪、叶群可以作证。总理劝了你才制止。后来派了曹中南解决了。我认为那天你们是搞突然袭击,你和我坐在对面,那位置我是永远记得的,我很惊讶!”

“还有一件,肖望东从南京军区调来北京当文化部长,带来不少武器。一个文职官员,带了那么多武器,听说藏在北京军区,你查了吗?”

郑维山回答说:“有个报告!”

在1968年北京军区第12次会议上,郑维山已为此事专门给中央打了报告。

江青说:“我没看到啊!肖望东两次被捕。”她又转向大家说:“我看了你们的简报,会议还漂在表面上,很不深入。我看不要照稿子念,说错了也不要紧。不要怕人家抓小辫子,要抓大辫子。要有针对性,不要怕,有毛主席、林副主席做主。”

江青终于收住话锋,示意别人发言。

天津驻军66军军长刘政从66军的角度想出这样的线索:“郑维山同志曾经问解学恭同志,66军是不是和江枫有矛盾?王曼恬这个人怎么样?”

江青又插话:“你们军也是倒了霉的,也是叫陈伯达搞乱的,后来才好。我是称赞66军的嘛,依靠66军把这些坏人端出来的嘛。”

她指示刘政:“这个江枫,你们要好好搞一下,这个人不简单。江枫是陈伯达命令他去的,后来我们端出来了,陈伯达面无人色。我们是背着他的,如果告诉他就坏了。解学恭同志要给江枫成立个专案组。”

解学恭立即回答:“已经成立了。”

接着是王曼恬发言。她发言后,江青又开始讲话了,还是针对郑

维山:“我和王曼恬就是这么个关系。郑维山你要查就查吧!先查我,再查她与主席的关系。好大的胆子,查到主席身上来了。你们有别的后台!”

郑维山后来回忆说,江青当时的这句话,让他顿时吓出了一身冷汗。

江青接着说:“68 年端出个江枫,陈伯达是不赞成的。当时很多同志下不了决心,怕影响你们革委会,是我下的决心。陈伯达很狡猾,他仇恨革命,仇恨主席,仇恨我。”

“王曼恬揪出了陈伯达的几个心腹,当然他恨她。还有一个人在你们天津叫何其君,是陈伯达鬼老婆的什么人,自杀了,抹脖子了。谁知道自杀还是被杀。别看自杀,线索还要追。”

刘政说:“郑维山、李雪峰、陈伯达在天津和李树夫谈过。”

江青眼睛发亮,立即说道:“订攻守同盟嘛!”

她继续说:“郑维山的太上皇还有王力,是个小太上皇。河北省成立革委会,为什么非要结合杨一辰?你说是王力推荐的,那王力是你的太上皇了。这个人是叛徒集团的。”

“生气的事可多了。保定有个胶片厂,非常贵重的东西,一个手榴弹就可以全部炸毁。我要军管,后来 38 军军管了。这下可糟糕了,整天打,还要打江青。这一点郑维山你是有责任的!”

38 军军长刘海清接话:“总理让派一个营,进不去,郑维山、陈先瑞不让派。”

实际情况是,当时周恩来指示,这支部队由卫戍区派,没有让北京军区派。

江青继续说:“在碰头会上,陈伯达对我说,你就是 38 军的口吻。38 军我不认识一个人,河北省军区我也不认识一个人,我就认识一个军——中国人民解放军!”

“我身边有 4 个工作人员,他们老家在河北。他们不敢告诉我千里堤都快决堤了,以后我才知道。”

“还有一件事,李雪峰成立革命委员会,从保定搬到石家庄,还有省军区。这里面有什么鬼?搬家后发了那么多枪。这个问题一定要交代,你们是不是想躲到后面去,让别人打,把 38 军打烂?是不是让

坏人冲到北京？我们看你们有这个战略思想，反动的战略思想，这个要交代。”

……

“陈伯达67年要挟主席，不辞而别，后来走了，给我留一封信，就是在京西宾馆，就有你郑维山陪着。”

“你是大根据地，是反革命根据地！”

“你这个河北可不得了，保定的问题我愤怒极了。我愤怒是应该的。你们不珍惜人民的生命财产，就是珍惜你们自己的权。权是人民的，是党的。你们离开了毛主席的领导，脱离了人民，就会成军阀。我看会议看看日本的片子《军阀》。东条英机你们知道吗？他是侵略我们的大战犯，这样的电影应该看，北京军区是不是要走上那条道路？这是很危险的。自觉不自觉跟着陈伯达走，也可能是自觉的，特别是郑维山、李雪峰！”

“我看郑维山、李雪峰的检查很不像样子。你们搬家，我看是有计划的，发枪就是要打38军。我并不认识38军，这是替党和人民说句话。”

“保定离天津这么近，天津为什么叫天津卫呢？因为它是北京大门，保定胶片厂打得那么厉害，口号就是打我。38军也进不去嘛！”

“郑维山，主席一再保你，可是你不跟主席走，跟陈伯达走。这一点我要告诉同志们，主席保了郑维山好多次，保了李雪峰好多次。你们不感谢主席，反而跟着反党分子陈伯达攻击主席，攻击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保定是不管的啊，省革委会搬走，我看是同坏人弄到北京来，这是你们反动战略的目的，这个要交代！”

“主席保了你好多次，有一次照相，主席叫我找你，可是你不感谢，你辜负了毛主席。郑维山你好好检讨。我觉得郑维山还是可以改正的，最无动于衷的是李雪峰。他还在埋头记，你记好了，将来翻案可以整我！”

江青的思路又跳向别处：“《红旗》是个独立王国，总编辑、副总编辑都是大坏蛋，以后主席就不叫他管了，让姚文元去管，他恨透了主席。他对主席没有办法就恨我，恨姚文元同志。郑维山、李雪峰你们支持的就是这群王八蛋。陈伯达这个大坏蛋，他可能是苏修特务，他

和王明一块儿的。他自己说:‘你们可不要说我给苏修当特务。’这不是做贼心虚吗?”

“在庐山,我受了一天的围攻,我参加华东组。我是一个中央工作人员,我讲的很多话都是主席的,当然讲的不完全,有的不是原话。后来就点名了,华北组点了康生的名,华东组点了张春桥。他们要抓人了。李雪峰,就是你,你那份《简报》引起的,你叫你的秘书干的,你抢先发《简报》。有几个人签名啊?”

解学恭小声回答:“3 个人。我、李雪峰、吴德。”

这时,江青死死地望着李雪峰,问:“你怎么抢先发《简报》?”

李雪峰不说话。

江青也不追究,继续说:“我听说王猛同志病了,住院。哪位同志代我问候?我并不认识他。当时我听说的,是陈伯达、杨成武商量好的,要把李光军、王猛调走。还有谁我记不得了……”

“要徐信同志去当军长。徐信来了吗?”说着,江青抬头扫视会场。

63 军军长徐信站起来答道:“来了。”

江青问:“你知道吗?”

“不知道。”

江青继续:“李雪峰是摇鹅毛扇子的。保你好几次了,你无动于衷。”

“受气的同志,现在要翻身了,翻了身就容易翘尾巴,38 军的同志要注意。我是不认识 38 军的,我是为了 38 军受气来啦!陈伯达镇压我好几次。我要求 38 军不要因为翻了身了,骄傲起来了,打个预防针。”

“陈伯达怎么出去的呢?要挟主席,不辞而别,就是在京西宾馆。”

“在华北组的《简报》上,有陈伯达的发言。陈伯达的发言,一个记录本,主席逼着他交出来,那是陈伯达反党啊!主席给了我,我送给了康老、总理。”

“主席要我们读点马列主义的书,不然会让人家牵着鼻子走,这是《我的一点意见》里讲的。不要畏难,我已攻读了 4 本,我就要读,为主席争口气。我已读了《哥达纲领批判》、《法兰西内战》,最后读老祖宗的《资本论》。不要上人家的当,听人家说马列的书难读就不读了,主

席的书难读就不读了。我被选进中央政治局,很不相称。你们虽不是政治局委员,但是大军区、省军区、军的负责人,要懂得一点马列主义,必须精通辩证唯物论、历史唯物论,才能不被别人牵着鼻子走。你郑维山就是不学无术。我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我保你几次了,主席保你多次了。”

“我看他们事前有准备,郑维山、李雪峰同志要好好交代。这份《简报》是很不简单的,一早就交给了我,华东组也轰动了,点名要捉人,点了康生的名,张春桥的名。我没有参加宪法修改组,我要参加了,就要捉我。他们利用了广大党员对主席的热爱,好多人是上了当啦。郑维山、李雪峰同志我看不是上当的问题,你看二中全会前在华北那样搞。”

“温玉成也不好,我也不知道这个人,不认识这个人。对‘516’这么一个组织,不了了之。”

“你们卫戍区应该搞清,打我不是你们指使。你们应该把好几个人追回来,让他们交代,查清。不查清你们欠了一笔债,欠人民的,欠革命的债,不是欠我个人的!”

江青停了下来,王曼恬继续揭批。当她谈到文艺系统抓“516”问题时,江青又插话了:“……金敬迈是‘516’,他们在东北搞陈锡联,是打我的。你们对这些人亲,对我们疏,有时有敌视的味道。郑维山你要好好想一想,1967 年冬,我见你,当时我并不认识你,保了你,当然也是为了保全军,这是应该的。金敬迈差一天就跑了,我们就抓不住了,是我告诉你。”说着,江青用手指向总参谋长黄永胜。黄永胜望着江青,连连点头。这应该是说在广州抓金敬迈一事。

江青接着说:“派了一架飞机,从广州抓来的。金敬迈有交代口供。火烧英代办是傅崇碧布置的,北图事件是整我、总理、康老。午门会议是布置烧英代办的。大家知道一点,七凑八凑就搞清楚了,可是现在还都浮在面上。”

“叫宋伟来揭,不要怕嘛,有主席给我做主!”

这一天,江青讲了两个小时,丝毫没有停下来的意思。

会后,江青为参加华北会议的全体人员,包括工作人员安排放映了影片《军阀》。

# 第1158回：在党内，陈伯达问题公开 又到会，江青成会议主角

1970年11月16日，中央向地方的地区级、部队的师级单位传达《陈伯达反党问题的指示》，并印发了毛泽东的《我的一点意见》。这份《指示》指出：

“……九届二中全会以后，在一部分党的高级干部中口头传达过陈伯达反党的问题。为了教育干部，让较多的同志了解这个问题，中央决定将毛主席的《我的一点意见》一文印发给你们，请你们立即向党的地区级核心小组成员、部队师级党委委员和同级党员负责干部以及中央各项目组人员宣读和传达。传达内容要以毛主席《我的一点意见》一文为准。”

但是，这份经毛泽东批准下发的文件，直到1971年1月1日才由中共中央办公厅正式发出。从这时起，陈伯达的问题在党内公开。

当1971年的新年钟声敲响的时候，北京京西宾馆里却没有多少新年的气氛。这里的批判斗争已经开始升温，郑维山、李雪峰等人被告知，要“闭门思过”，深刻检讨，不得离开京西宾馆。

此时，中南海里的毛泽东、周恩来都关注着这里的情况。

元旦这天，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周恩来分别告诉黄永胜、李作鹏、纪登奎、李德生，要他们两三日内将华北会议开会经过和揭发陈伯达等人的情况作一系列报告送阅。

1月3日下午15时，江青再次来到京西宾馆。当她走进会场时，河北省革委会副主任刘子厚正在发言。看见江青进来，会场一阵骚动，几个工作人员忙着安排她入座。江青摆摆手，示意继续开会。

刘子厚说：“江青同志上次来讲话，把毛主席和中央的指示具体化了……”

江青说：“我插一句话。我不是代表主席的，是代表我个人。我还没见到主席，我是请示了总理来的。我听了忍不住才讲的。如果我讲

错了,同志们可以批评,讲对了可以采纳。不要认为我说一句话是代表主席的。叶群同志代表林副主席没有,我不清楚。我没有。我连面也没见过主席,在你们这开了会,第二天才见了主席,不要以为我讲了就是代表主席、代表林副主席的。如果代表主席,我就记录起来拿来念了。我个人的意见,如果错了可以批评,如果对了,我坚持到底。”

刘子厚继续发言。当他谈到陈伯达打着中央文革旗号四处活动时,江青又说:“他的画皮!中央文革这张画皮实际他早就不要了。他打着旗号,他说他是中央常委,是太上皇就是了!”

刘子厚坐下。接着,北京军区副政委张正光发言。当他讲到北京军区文工团抓肖华、抓杨勇、关郑维山的一些情况时,江青听不下去了,开口说道:“哪个说中央文革开了会?你又讲杨勇,又讲郑维山,我就不叫你讲了!”她皱紧眉头对张正光说:“当时是怕北京军区大乱。”

张正光低下头,只好改变话题。

这时江青的突然说:“我觉得你这个建议很好。应该把王××、吹小号的,还有一个……”她低下头,一时想不起名字。“应该找回来重新审查。还有个叫章亦敏的,一个叫石仰天的。看看章亦敏的档案就知道是特务。石仰天这个王八蛋公开反对我,反对我也不要紧,但他是不对的,他是北京军区的吧?还有一个丁莱夫,石仰天就是和丁莱夫起来要翻案的嘛!”

章亦敏,时任北京军区文化部副部长。

石仰天,时任北京军区宣传部副部长。

江青继续说:“我听说这几个人还在大摇大摆的,”说到这里她动了气,指着郑维山说,“郑维山,是不是这样?对这样的人根本没人管!”

没等郑维山回答,江青已转向王曼恬说:“王曼恬,你起来说!”

话音未落,王曼恬站起身:“章亦敏原在北京军区组织专案组,没搞出问题,结果解散了。样板团要批斗他,把他领章、帽徽扒掉才能批斗,说明北京军区没人管,后来逮捕了。”

江青示意北京军区副政委张正光继续发言。但是他没讲几句,江青又插话说:“同志们,我还想打断他的话,再提供一些我记录的材料,供同志们参考!不知有没有机会……”

“八条是怎样来的？就是陈伯达这个王八蛋反对文化大革命，和几个老总压着林副主席要文化大革命刹车，逼着林副主席搞了几条。林副主席说要到中央文革讨论一下，到中央文革，陈伯达坐到了后面。徐向前这位老帅站起来拿着几条就走，说要去找主席批准，我说我们还没讨论，给追了回来。”

“67 年 7 月，主席出巡大江南北，7、8、9 三个月，这些反革命他们就想在那个时候夺权，全部夺权。有什么为证？首先把中南海围得水泄不通，北图事件，午门会议。午门会议就是布置火烧英国代办处。那样的围困中南海，开始在西门，就出不去了，我就告诉总理说，不行了，北门走不了啦，然后又到新华门，那里挂了旗帜，也出不去。我们的意思是叫他们撤退。最后走东华门，那里也挂了三面旗帜。我给总理说，一定要解决这个问题，这时候我们上了大当，他们都安排好了，有一个人，这个人我看不惯他，眼珠子上下转的，是轻工学院的，给总理讲，提出要在天安门开 10 万人大会，在中南海里面斗刘少奇，总理答应了，我们也都同意了，给中南海拉了线。他们要斗刘少奇那个‘黑修养’，目的是搞臭康老，因工作关系，那个‘黑修养’，康老搞不出来，是陈伯达搞的。他们就是要搞康老，搞总理，过后我们才知道上了大当。”

“以后主席到武汉，好人都蒙在鼓里，说陈再道要杀害主席。我们着急得很，这个也上当了。林副主席也上当了，也开了天安门百万人大会，声讨陈再道。实际是王力回来把主席的指示给扣了起来，给贪污了，我们不知道。……这次庐山会议，他（陈伯达）被揪出来后，把这些东西都收起来了。他们军队的后台是杨、余、傅，想把几个大军区都搞掉，想把紧跟主席、林副主席南征北战的老同志一网打尽，换上他们的人。……那时南京已经平静了，就是主席已经到了上海，他们要开几十万人大会，要揪许世友同志，许世友同志已经退到了大别山。”

北京军区一位副司令员补充说：“当时要揪许世友同志，反 27 军，姚文元打电话说，这个会不能开。”

江青接着说：“我们得到一份东西，一看就知道是一箭双雕，危害主席，捉许世友，我打电话制止也不行。深夜了，我去大会堂请示总理，派一架高速飞机叫姚文元到上海报告主席。结果给了一架小飞

机,差一点把姚文元给触电死了。”

江青看着大家一脸困惑,解释说:“因为飞机小,飞不高,碰上雷电,差一点把姚文元触电死了。”

“姚文元向主席汇报了,主席就请张春桥乘了直升飞机把许世友同志接到上海。他(指许世友)自己还在那里不自觉!他是同情我的。还有你,”江青突然用手指向坐在附近的黄永胜,“也不自觉吧?!”

黄永胜被她一指,显得有些慌乱,不知该不该接茬。

江青仍自顾自地接着说下去:“金敬迈开会整你。就是说凡是跟主席、林副主席南征北战的老同志要一网打尽,这样来适应反革命的需要。这是他们的反革命战略。这一战略被伟大领袖毛主席击溃了。你们想想看,是不是很危险的事情啊!”

“还有抢档案,抢中央首长的医疗档案,我顶不住了,就请总理,我们俩一块顶,还是被他们抢了一些。这些他们都是合伙的。他们称赞杨成武,称赞傅崇碧、余立金。你,也是被称赞的,”江青指着郑维山,“郑维山你应该讲讲内幕,他们就不捉你。杨得志也是很不好过,傅崇碧这个王八蛋也是这样。你们想想看,他们是有计划地夺军权,有计划地夺党权,庐山会议就是夺党权,你是夺军权的!”

“这些我都不知道!”郑维山脸色铁青的说。他想反驳,但无从开口。

江青自顾自的接着讲:“阶级斗争是不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不以阶级的意志为转移的,既然你们背后搞阴谋,那么也奉陪到底!”

江青接着说:“……他们要抓许世友,就是主席在上海。抄了许世友同志的家,抄了陈锡联的家,别人的家都抄了,唯独没抄你郑维山的家,这证明你是知道内幕的。”江青又转向黄永胜,“我不知道抄了你的家没有?”

黄永胜铁青着脸回答:“没有。”

江青提高了嗓门说:“都是‘三团两队’,‘天派地派’带头搞的,大后台是陈伯达,杨、余、傅他们。毛主席告诉我叫杨成武看看林副主席,他都不去。你们知道不知道,丑化人民解放军,搞黄色的东西,天安门、三座门贴得到处都是,故意丑化解放军!”

“三团两队”是指各大军区的话剧团、歌舞团、歌剧团、军乐队、体

工队。他们在文革初期是军队造反最早的单位。

江青又说到陈伯达:“陈伯达,我只举一个小例子,就知道是什么人……”

“天才理论家是陈伯达创造的,大树特树也是他创造的,我跟杨成武斗了3次,杨成武给我立了专案,戚本禹也给我立了专案。我觉得这些东西应该清算一下了。67年7、8、9三个月,他们想大夺权,在全国大夺权,先搞乱军队,然后危害主席。你们是有一套计划的,你们应该交代。”

“为什么各大军区都捉,就不捉你郑维山,这不是怪事吗?起码你是深知内幕的人。噢!还有一件事,从聂荣臻开始,华北的山头主义有历史性,聂荣臻、杨成武、你郑维山,一个班底接着一个班底。全国解放后各战略区的部队都有减缩,为什么唯独你华北的部队没有缩减?!”

江青又一次提起城南庄事件。这一回,她点了聂荣臻夫人张瑞华。

“你就相信聂荣臻、徐向前。我怀疑徐向前的老婆黄杰是叛徒,聂荣臻的老婆可能是特务。有一件事,48年主席由延安到华北,住在华北军区司令部驻地的阜平县城南庄,结果遭到了国民党飞机的轰炸,是否张瑞华告的密?如果你的心还有一点向着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的话,你就应该把这一点心交出来,把好心拿出来,把坏心去掉。”

江青又转向李雪峰:“李雪峰,你是个摇鹅毛扇子的,到现在还奉陪到底。我今天很累了,我是特意来奉陪你的。这是一个很大的反革命战略,他们一层层班子,一套套班子。”

众人以为江青的讲话要结束了,谁知,只听一声“对了”,已经“很累了”的江青又继续说着:“还有一个‘7分钟的闪电’,你们知道不知道?这是题外的就不讲了。是杨成武、郑维山、傅崇碧提供的汽车,提供的大衣、手电。”

王曼恬补充说:“发枪是那一年。”

“7分钟闪电”说的是1966年12月3日晚,叶向真他们劫走彭真一事。而王曼恬解释说“发枪是那一年”应该指的是1967年武装左派

时北京给北航和地院发枪。那一年北京中学“红代会”的李冬民曾通过戚本禹、谢富治向在首都工作组工作的杨成武、郑维山提出借用汽车和军棉大衣。当时杨成武和郑维山说“部队动一兵一卒和军事装备都须报经中央军委批准”,没有答应。而1967年李冬民提出借汽车和军棉大衣显然与1966年12月3日叶向真劫持彭真一事无任何关系。

此时的江青继续按照她的思路对郑维山说道:“67年7、8、9大夺权,还有二月兵变、北图事件、午门会议、火烧英代办,你也是深知内情的,应该交代!”

郑维山终于忍无可忍,大声吼道:“这些我都不知道!我相信主席和中央是会审查清楚的。”

一位军政委站起来质问:“傅崇碧冲击中央文革,你怎么不知道?!”

郑维山大声反问:“谁能证明我知道?!”

无人应答。

江青继续说:“这是一个很大的阴谋。陈锡联就怕张祥久,我说非下了他的枪抓起来不可。关锋的女儿就在东北,是‘516’穿了军装,原来是不是躲在你们海军大院?我不相信你郑维山还有那么点心,就算几分之几的心吧,你是最知内幕的。”

“李雪峰你就恭恭敬敬陪着那么一个人,你跟那么一个人走。据说天才两个字,英文有两种解释,一种是神,神就是鬼,一种就是人。我对英文不懂,听人家说的。这一炮不一定打中。”

江青长出一口气,向椅背靠去说:“我讲完了,不对的请批评,我改正。对的,大家要对他们进行揭发、批判。”

# 第1159回：赶紧追，哪里去了黄道霞 细交待，三天白了秘书头

江青的发言真的把会议的温度升起来了，随后的揭发批判开始了，一位军政委对着郑维山说道："只有老实交代才有出路！"

一位军长也站起来，手扶着桌子，盯着自己的上级说："郑维山一贯不老实的，一贯说假话的，现在该说真话了！"

看郑维山坐在那里一言不发，一位省军区司令斥责说："节节抗拒，反抗到底！"

一位军区副政委也质问道："坏蛋为什么都来找你，你要交心！"

另一位军区副司令员说："你有什么要老实交代什么！"

郑维山皱着眉头，还是一言不发。

这时，江青仿佛又想起了什么，对着众人说："我打断你一句话，一会儿你还讲。我刚才讲话是专门请人录了音的，如果你们要，可以复制给你们一份，但要请示总理批准，政治局讨论。"

黄永胜似乎颇有感触的说到："原来在北京也这样不安全。"

江青接过来说："幸亏我有斗志，否则就完了。杨成武出事前，一个男的一个女的给我打电话，我问是谁，就把电话放了，后来我的秘书告诉我，你不放下可以查。还有一个凶得狠的女的给我打电话，在北京那样不安全，又打电话，又爬墙，不安全就是了。李雪峰66年讲要给我奉陪到底，我只要不死也奉陪到底！郑维山你要开枪权、扫荡权，这回该我了！"

对于江青耿耿于怀的"奉陪到底"几个字，此时李雪峰解释说："当时对文化大革命不理解，思想不通。"

江青说："现在应该通了吧！你恭恭敬敬地陪着陈伯达，你在河北干了些什么事？你把黄永胜的名字画掉那么多次。《河北日报》是你管的吧？在北大你想不通，现在你还是这样，一点不觉悟，你为什么还煽风点火？"

李雪峰知道江青这次指的是庐山会议上的《六号简报》,于是申辩说:“在庐山是陈伯达突然来的,《简报》是我签的名,什么时候发的我就不知道了。”

江青挺直身子,拍着桌子上的几张纸,大声说:“你抢先出《简报》嘛!”

李雪峰继续辩解:“当时规定《简报》要快,晚上讨论,汪东兴同志去了,《简报》另外发的。”

“汪东兴同志为你的《简报》都气坏了,每天到3点他还陪着主席,你们签发的嘛!你们抢先出《简报》!”江青说,“《简报》最早发出,这怎么解释?”她继续追问。

黄永胜也大声说道:“大事?每期《简报》都是大事!”

江青看了一眼黄永胜,说:“这个没有录音,还有个绝招,《简报》是记录稿,还有个原稿,是陈伯达亲自改的。”

“那天我和康老正在开会,总理派人送来了陈伯达的发言稿,不是记录稿,我们与陈伯达干了一仗,说他真狠毒啊,你想把毛主席周围的人一网打尽。从此再没见过这王八蛋。我当时讲,你拿了枪杀我的头好了,你们就是跟这样狠毒的人走啊!你们怎么解释呢?真狠毒!就是要颠覆我们国家,帮助苏修,颠覆世界革命根据地,这能容忍啊!”

“陈伯达如果当了副主席,你们不就是大臣了嘛!陈伯达不是要当副主席,其实要做主席,说穿了就是这个事。这样你们不就可以升官了!”

这时,有人喊:“《六号简报》是李雪峰的秘书黄道霞写的,他一直跟着李雪峰,这中间有什么鬼,他应该知道。”

“你们说的那个黄道霞来了吗?”江青马上问。

“来了。”有人应了一声。

“那好,叫黄道霞来。”江青说。

可是,会场里哪有黄道霞的影子。

江青尖声质问:“没来?!怎么没来?”

“他回石家庄了。”刘子厚低声答道。

江青急了,冲着陈先瑞大发脾气:“他干什么去了?谁让去的?我已经知道,为什么逼他走?”

“我们已经派了两个车去追了。”陈先瑞报告。

原来,听说华北会议要追查陈伯达在石家庄的讲话及他在华北地区的所为,李雪峰生怕有一句话与事实有出入,别人就会觉得你交代问题不老实,在编造。而他来北京之前没有想到要带陈伯达在石家庄讲话的记录,他以为这次会议主要是解决北京军区和郑维山的问题,没有意识到对他牵扯那样重。而且一批李雪峰,他的秘书黄道霞就犯糊涂,一发急,更是全身是嘴也说不清了。因此,当会议追查到《六号简报》问题时,黄道霞提出来,要回石家庄取材料。那时,李雪峰没同意。后来,周恩来指名要黄道霞在会上发言,李雪峰这才点头同意黄道霞回石家庄,反正河北驻京办事处有车,也方便,快去快回。事不宜迟,黄道霞要了车,吃了中午饭就走了。谁知就在当天下午15时,江青又到会上来了,而且点名要见黄道霞。

此时,江青指着李雪峰说:“这个你要交代哟。”

黄永胜也说:“昨天开会通知要你的秘书揭发问题,你把秘书派走了,就很恶劣嘛!把罪证烧掉就坏了!”

“这里边有鬼!”有人随声附和。

“李雪峰同志,我现在还是叫你同志,你如果受委屈了,也要有政治家的风度,你的秘书干这么多的坏事,还叫他走了,我要是处在你这种情况,我就把秘书交给组织,交给党审查!”江青说。

“总理批准叫你的秘书今天下午参加会,结果走了。”纪登奎说。

“陈伯达也跟你一样,那个王保春,下了几次命令才找回来,你这个做法与陈伯达一样,你要把秘书赶快交出来!”江青说。

李雪峰辩解道:“我这里材料少,叫他取材料。”

黄永胜追问道:“你为什么不问一问?!”

李雪峰并不清楚,他的秘书此时去取材料和之前去取材料有什么本质不同,还是李德生点醒了他:“不少同志提到,你的秘书要参加会,揭发你的问题,总理今天下午批准,还没来得及告诉你,你把他放走了。”

江青声色俱厉:“到哪去了,赶快交代!”

她马上又对陈先瑞和北京军区副司令员肖文玖说:“要活的,不要死的。”

原来江青担心黄道霞会因为知道李雪峰的阴谋而被灭口。

“我们有人跟着,不会发生问题的。”陈先瑞赶紧说。

“你告诉我河北省警卫部队是哪个部队,负责人是谁?叫把秘书抓起来。”江青仍不放心,她抬起头环视会场:“哪个叫马辉?”

河北省军区司令员马辉站起来,立正回答:“我在。”

江青严肃地盯着马辉说:“现在我才知道你叫马辉,你要负责把人抓回来!人要活着回来,死了我找你!”

黄永胜强调:“一、人要抓回来;二、材料一份不能烧!”

马辉大声回答:“是!”

这时,在河北省革委会支左的炮5师政委问:“现在是不是把秘书、警卫员都抓起来?”

江青没有接茬,她无暇理会这句话,继续她的思路说:“出了新闻了,你采取什么态度?我觉得李雪峰太不老实了!”

这时,不知是谁说了一句:“可以要驻石家庄的27军负责把李雪峰的秘书抓回来。”

“不!”江青断然否定,“主要由马辉负责,他的秘书要死了,他的材料要烧了,你要负责,向党负责,要活的,要能说话!”

黄永胜说了一句:“还是不要这么紧张,要做工作动员他回来。”

江青似乎也意识到了自己的态度有些过于夸张,解释道:“我就是想建议同志们,不一定全面完整。我想把66年、67年、68年、70年,我们所知道的事情告诉同志们,请同志们琢磨一下是什么问题,是不是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夺权的斗争,要夺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权,夺党中央的权,我看斗争十分激烈,也许我这个纲上高了,上高了就降下来,刚才就发生这样的事情,一个人走了还不知道,而且还拿走了材料。”

再说黄道霞,当晚到石家庄刚一进屋,警卫就告诉他北京有电话找他。黄道霞马上就明白了,他往北京打完电话,向爱人交待了情况后说:“李雪峰一倒台我就要被关起来。”随后,他三言两语写好了离婚书,让爱人在上边签字。他爱人想也没想,把离婚书撕了。

这时,警卫打来电话说:“北京军区来人接你回去开会,门卫没让进。”

黄道霞要值班室找车马上回北京,一看表已经是夜里23时多了。

司机路不熟,绕到次日早上7点多钟才回到京西宾馆。于是,会议认为这是李雪峰又在搞阴谋,把黄道霞从石家庄带来的材料全部没收了,还规定李雪峰的秘书、警卫、司机都不能单独行动。李雪峰的窗户也被封了,外面另派警卫看着,黄道霞从石家庄回来也不让见。

这天上午不开会,刘子厚让河北省革委会的赵江告诉黄道霞,下午上会发言。

这时,会议已经从全会扩大到地市一级,河北省各地区军分区的司令员、革委会的领导都来了。下午的全会扩大会,有近100人参加。纪登奎、李德生、黄永胜、邱会作来了,李雪峰和郑维山也来了。江青和周恩来没来,但他们派了人来听。叶群则在后边的屋里听。黄道霞讲了一下午,讲《第六号简报》是怎么出来的,讲李雪峰与陈伯达的关系……

说起来,在中央全会上,各个组都要出简报。但华北组已经出过一份简报了,六个大组一个大组出一份简报,再排到华北组出第二号简报,应该是全会的"第七号简报",而不应该是"第六号简报"。这说明,各个大组的简报还没出一轮,你华北组就抢先出了两份简报。当时,第一、二、三期《简报》已经印出来了,四、五期《简报》编了号还没印发,而华北组的《六号简报》却印出来了,而且还发了下去,这是怎么回事?难怪毛泽东要怀疑。

对此,黄道霞解释说:"简报由中央办公厅机要局管,还要印刷,因为不是在北京,是在江西,为了保密的需要,中央机要局没有去很多人,捡字只去了一个工人,印刷两三个人。所以四号、五号《简报》送了,编了,但排字没排出来,所以就没发。"

那么,《第六号简报》为什么就能排出来并印发呢?对此,黄道霞和李雪峰就不知道了。因为排印都是由中央办公厅负责的,这一情况,不用黄道霞再多解释,与会者也都清楚。

华北组二号简报,即《第六号简报》是黄道霞写的。黄道霞是李雪峰的秘书没错,但这次在庐山会议上,黄道霞不是以李雪峰秘书的身份,而是作为中办简报组的一名工作人员在华北简报组工作的。黄道霞说,华北组负责简报工作的有3个人:一个是黄永胜的秘书王振,另一个是吴德的秘书,加上黄道霞。当时吴德的秘书另有任务,写简报

的事情就只有王振和黄道霞了。王振是部队来的,写简报是新手,他就推给黄道霞,华北组第一个简报就是黄道霞写的。

说到这里,已经很清楚了,简报工作是由中央办公厅负责,而不是李雪峰的华北组。简报是由中央办公厅负责召集简报组,交代任务,提出要求。简报写好后,由中办主任汪东兴和中办副主任王良恩签字,然后才能付印。

在这里,黄道霞没有再牵扯郑维山的秘书杜辛。

黄道霞还讲了《第六号简报》的写作过程:

那天晚上的会议,李雪峰没有参加,到政治局开会去了。华北组开会前,黄道霞把写好的《简报》交给他,李雪峰说:"先放那里,等我开完会回来再看。"

那天晚上,政治局的会议临时决定不开了,李雪峰回到华北组时,小组会还在进行,一直开到夜里 23 点多,黄道霞晚上 19 点多写好的《简报》稿已经在李雪峰那里压了 4 个多小时还没签发。

这么一说,基本把《第六号简报》说清楚了。李雪峰对《简报》积极是积极,但《第六号简报》并不是抢先,起码拖了四、五个钟头。黄道霞说他自己倒是有抢先的情绪,因为根据简报要及时的要求,是想快点发,但实际上并没有抢先。

黄道霞讲完,38 军军长说:"讲得很好。"

这个发言,黄道霞作了充分准备,因为实在是事关重大。讲了要让人相信。这是当年发生的事,他担心,当事人都在,有一点不合适,人家就会觉得你在编造,会觉得整个都不行。另外,他也希望能打破人们头脑中,他是"追随李雪峰"的印象。为了这篇发言,黄道霞一个晚上没睡。讲完后,他觉得太累了,回去吃完饭就睡了,一直睡到夜里 23 时左右。纪登奎派秘书来找他说:"你今天讲得挺好,赶快整理出来。"

黄道霞连夜整理了一个简报。当时才 30 多岁的黄道霞,就这 3 天,头发白了。

后来,周恩来在政治局会议上表扬了黄道霞,说:"这个秘书实事求是,有党性,他讲的和我们分析得差不多。"

第二天,纪登奎找黄道霞谈话。他相信黄道霞讲的,说:"你发言

的简报江青也看了,送给毛主席,毛主席不信。”

后来,纪登奎代表江青第二次找到黄道霞说:“江青觉得你讲得很好,但还要再深入一些揭发,有什么遗漏?”

他又问:“李雪峰为什么让你回石家庄取材料。”

黄道霞说:“因时间太长,李雪峰记不住了,担心怀疑他捏造的,所以要找当时的记录。”

纪登奎说:“恐怕没这么简单,是准备翻案的吧?”他让黄道霞把庐山会议那天,小组会上发言的那些人排个次序,弄清楚都有谁发言,讲了些什么?

但是纪登奎和黄道霞还没有谈完,有人来通知纪登奎,毛泽东找他过去,纪登奎就走了。

第二天,纪登奎又来找黄道霞进行第三次谈话。这一次纪登奎的口气变了,说:“毛主席认为没那么简单,毛主席最大的不相信还是认为《第六号简报》有问题。”华北会议要求继续深挖下去。

# 第1160回：“要谨慎”，转济南军区报告 见斯诺，谈文革生产情况

1月4日，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听取黄永胜、李作鹏、纪登奎、李德生关于华北会议情况的汇报。会议认为，现在华北会议已进入高潮，在这种情况下，需注意加强领导，减少对立，以利团结。

政治局会议还讨论了姚文元1970年12月29日关于学习问题向毛泽东的报告和毛泽东、林彪对该报告的批示，决定将批示和报告以中央文件印发中央委员和省、军级干部。

当夜，周恩来致信毛泽东、林彪，汇报政治局讨论情况，进一步提出：对郑维山和北京军区仍应一分为二，在经过“认真的批评”之后，“从批评达到团结的目的”。“否则，定性在先，非打成‘三反’不可，那就不会实事求是，不合主席对‘这次会议在全军应起重大作用’的要求”。

1月5日晚，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召集周恩来、黄永胜、李德生等人开会，谈如何开好华北会议以团结全军。谈话中对李雪峰、郑维山进行了批评。

从毛泽东那里回来后，军委办事组连夜开会，研究落实的具体办法。

在军委办事组成员会议上，周恩来说：“主席、林副主席一直关心这个会，常问起来。李雪峰、郑维山同志发言简报3日送主席，我们4日向主席汇报。”

“第一，我们的意见与你们有相同的，有不同的。不同的是，我们认为会已经是高潮，你们认为未揭盖子。我们报两种意见，一种李、郑与陈一起打倒，军区改组；另一种认为是方向、路线错误，要检讨……”

“说盖子未揭开，任何实质性问题未揭盖，也说得不对，如磁县开枪，就承认了嘛！”

“原想找郑、李谈，后加上解学恭、吴德、郑三生、先瑞、子厚。之后

有主席批示,按主席批示办,全国团结起来,与陈伯达划清界线,肃清流毒。个别犯错的沉痛检讨,要深入地整风,要彻底。”

“第二,先不定性。”周恩来望着军委办事组的几个人说:“你们四人写陈、郑、李集团,做绝了,那他们就只有听候审查了。当然,即便是方向路线错误,李、郑也要沉痛认识。”

“不要打横炮,省与省,军与军,一股绳有力量。”

“有点自我批评就欢迎。各种材料你们要核实,也不要都连起来。抓住大的,丢掉小的……”

“抓大的,小了就繁琐。人家提出你承认就好,不要一会儿翘尾巴,一会儿没有事。”

“郑为什么跟陈、跟聂、跟杨、跟张国焘?作风不正要抓住。”

“郑不要失去信心,又不要放下去,水平低,抓不住要害。”

“主席的印象是听不清楚。”

“陈伯达总有私话,好好挖一挖。”

为了组织印发江青在华北会议上的两次讲话,周恩来报送毛泽东。

1月6日,周恩来先后向中央政治局成员和华北地区党政军负责人传达毛泽东关于开好华北会议的意见,就落实毛泽东的意见,扩大华北会议范围做出安排。会议要求,郑维山、李雪峰不出席常委会,自行检查。

当天,毛泽东对周恩来报送的江青在华北会议的两次讲话记录稿批示说:“讲话不要印发。”

1月7日,周恩来通知郑维山、李雪峰写一个像样的检查。

这天,毛泽东审阅周恩来当天报送的关于如何开好华北会议的请示报告。报告对落实毛泽东1月5日晚关于开好华北会议的指示,做出六项具体安排。其中第六项说:“为集中大家注意力,拟印发毛主席、林副主席十二月十六日、十九日两次批示和有关报告,及中央有关文件,编印华北会议的材料七件。另拟将江青同志两次讲话录音,加以删减,给大区同志放听。”

毛泽东批示:“照办。江青录音是否放听,请先将文字送我看过再定。”

1月8日,毛泽东看了济南军区政治部1月5日报中共中央军委办事组和总政治部的《关于学习贯彻毛主席“军队要谨慎”指示的情况报告》。报告说:在贯彻毛主席“军队要谨慎”的指示中,主要抓了以下三个问题:一是破“一贯正确论”,立一分为二的世界观。二是破“领导高明论”,立群众是真正的英雄的观念。三是破“骄傲有资本论”,立为人民要立新功的思想。

毛泽东批示:“林、周、康三同志:此件很好,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讲清了问题。请你们看一下,是否可以转发全军。如同意,请总理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宣读、讨论、通过,并加上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军委总政治部的几句指示,即可发出。除军外,中央机关和地方党、政机关也要发出。我军和地方多年没有从这一方面的错误思想整风,现在是进行一场自我教育的极好时机了。”

毛泽东在报告中“无限的精力”一语后批注说:“改为充沛的精力较好,因为人的精力并不是无限的。”

当天,林彪对济南军区政治部的报告批示:“完全同意,希望按主席批示认真落实。”

当天,周恩来将毛泽东的批示印发政治局成员。

1月9日凌晨,周恩来致信江青说:对两次录音讲话的整理稿“我勾掉的几处,有的案尚未结,有的牵连太多,与主题无关,可以去掉”。对讲话中点名批评的情况,周恩来指出:“这样点名,未经讨论,恐不恰当。”并告:“主席在六日批示:讲话不要印发。七日批示:录音是否放听,请先将文字送我看过再定。我建议,你将这两次讲话录音的文字本先呈主席审阅。”

当天,周恩来主持政治局会议,讨论毛泽东对济南军区报告的批示,一致认为当前应以批修整风的自我教育运动作为推动各项工作的中心。会议还讨论了华北会议的情况。会后,周恩来致信毛泽东,提出近期将专门召开一两次政治局范围的批陈整风会议。

这天,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央军委召开有总参、总政、总后,各大军区司令、政委及各军种、兵种负责人参加的143人参加的座谈会。会上,黄永胜代表总参作军事工作报告,李德生代表总政作政治工作报告。座谈会自召开的当日起,也到京西宾馆列席了华北会议。

座谈会期间,吴法宪说:“我们军委办事组是不是在会议上作一个检讨,也好下个台。”

黄永胜、李作鹏、邱会作纷纷数落他说:“屎不臭,挑起臭。”

吴法宪说:“我和叶群已经检讨过,虽然挨了批,总算有个交待。你们3个人没有写过检讨,不如借此机会作个检讨过关。”

黄、李、邱说:“你检讨过不了关,我们的检讨也过不了关,一样的。”

座谈会的简报上称军委办事组:“对毛主席跟得最紧”,“突出政治,狠抓根本”,“谦虚谨慎”,“办事认真”等等。

吴法宪认为:“这个话反映上去不好,让毛主席看到对我们不利。”

有的人不同意吴法宪的意见,这些简报就这样送上去了。

1月9日至11日,在军委座谈会上,郑维山、李雪峰又作检查。

由于江青在会上说李雪峰把河北省省会从保定搬到石家庄是个阴谋,李雪峰在“我的检查”中检讨了此事经过:“在河北省革委会成立前后,陈伯达直接出面在筹备会上讲话,进一步打击38军,压迫另一派群众组织。他策划了省会搬家,先由他出主意,我和郑维山同志同意,两人联名写了报告,用他编造的搬家理由,欺骗了中央”。

与此同时,河北省革委会副主任刘子厚向中央请示,提出河北省省会还是搬回保定好。周恩来批示:河北省省会不要再迁。

1月11日,经毛泽东审阅同意,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发出《关于贯彻执行毛主席一月八日重要批示的通知》。通知指出:

多年来,军队和地方以及中央机关没有从反对居功骄傲这一方面进行整风。有些干部存在着居功自恃,骄傲自满,军阀主义,自以为是,一言堂,讲假话,不走正道等歪风邪气,对内对外的大国沙文主义,这对于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妨碍极大。通知要求军队、地方和中央机关,都要学习济南军区报告的“三破三立”,以毛主席的批示为纲,利用当前极好时机,开展一场反对骄傲自满、提倡谦虚谨慎的自我教育运动。

这天,周恩来将江青在华北会议上的两次讲话录音整理稿报送毛泽东,并写道:“七日晚得主席批示,于次日告江青同志,昨晚商定将整理原稿划有我们拟删节处送主席审阅。现送上,是否在会上放听,请

主席审定。”

1月12日,周恩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听取黄永胜、纪登奎、李德生关于华北会议情况汇报,商定召开大会及结束会议的安排。

13日,毛泽东审阅周恩来11日送来的江青讲话整理稿后批示:“不要放听,也不要印发,可做内部材料保存。”

毛泽东收到上报的《华北会议对郑维山同志错误的初步揭发材料(未经核对)》和《华北会议对李雪峰同志错误的初步揭发材料(未经核对)》。在揭发郑维山的材料中,列举了他的六大罪状:

(一)关于九届二中全会前后的活动。

七〇年六七月间,反党分子陈伯达到华北地区进行阴谋活动,郑维山同志是陈伯达这次华北之行的召集人。陈伯达到天津后,打电话要郑维山去,当时郑准备给林副主席汇报,林副主席处叫郑等几天……经过请示,黄永胜同志不同意去,没有去。后来,陈又从太原打电话,郑说“事不过三”,就于七月九日迫不及待地赶到大同去迎接陈伯达,准备去内蒙……

在九届二中全会开会前,郑维山于八月二十二日下午到李雪峰住地,同李谈了一个多小时。据透露,郑在谈话中要李到北京、到军区工作。在全会上,陈伯达选择华北做反党阵地,搞突然袭击,郑维山积极呼应。

九届二中全会结束后,郑维山、李雪峰在庐山上就商量好,关于陈伯达反党问题的传达,分片进行,不集中学习和传达。郑还说,要防止有坏人利用陈伯达问题,破坏华北的大好形势……

郑维山主持的北京地区的传达,只讲了反党分子陈伯达的几张画皮、几大谎言,没有传达毛主席的《我的一点意见》的内容,没有组织讨论和揭发批判。黄永胜同志看了军区党委关于传达陈伯达反党问题的报告后,指出这个报告很不像样子,要重写,要表态,要揭发,要批判。军区才在九月二十日召集军区司、政、后各部领导同志开了半天会应付了一下,根本没有揭发问题。

……

与会同志指出,郑维山在两条路线斗争的关键时刻,都站在错误路线方面,如紧跟罗瑞卿搞大比武……紧跟杨成武,大搞山头主义、宗

派主义;这次,又紧跟陈伯达,错误十分严重。许多同志说,北京军区担负着极为重要的“五保卫”任务,像郑维山这样的领导,将把部队领到哪里去,我们很不放心。

(二)伙同陈伯达压制三十八军、破坏保定文化大革命。

……

(三)伙同陈伯达在天津包庇坏人。

六七年五月底,天津市王亢之(原天津市委副书记、叛徒、日特)、方纪(原天津市委宣传部副部长、胡风分子、周扬死党)、李树夫(原天津市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陈伯达心腹)等为逃避群众的批判和斗争,窜来北京。六月四日,陈伯达通过李雪峰让郑维山同志替他们安排住处,保护起来。五日凌晨,郑即派人将王、方、李接往军区高干招待所,提供吃、住、通讯等一切便利条件,住了四十多天。

六月二十四日,郑维山和陈伯达在陈的办公室,与王、方、李等人密谈四个多小时。六月二十六日,陈又单独把郑找去布置说:“叫他们(王亢之等)先别站出来,避免嫌疑。”六月二十八日,郑又要这三个坏人把陈伯达二十四、二十六日的两次谈话内容,向李雪峰、解学恭等同志作了传达、布置,帮助这些坏人钻进天津市革委会。

六七年九月,李树夫被天津市革命群众揪斗,陈伯达叫秘书给郑维山打电话,说:“陈伯达讲李树夫是他派去的,根本不是什么‘五一六’分子。郑维山立即把这个黑指示通知了天津支左联络站。群众组织便把李树夫放了。

(四)耍两面派,说假话,向中央谎报情况。

……

(五)关于武装群众问题。

六八年二月,河北省磁县两派群众武斗,郑维山违背中央指示,向部队布置说:“如有坏人抵抗,可以开枪,还击只能起威胁作用,一个点只能打死二三人,不能多了。”结果部队开了枪,消耗子弹一万多发,群众亡几十人,伤者很多,至今还扣押着五十七人。

六八年春,晋东南地区连续发生武斗。郑维山在中央解决晋东南问题的会议上,以突然袭击的手段,向中央要“开枪权,扫荡权”,受到江青同志的严厉批评……

(六)严重的军阀主义、山头主义和宗派主义。

……

郑维山一贯排斥异己,用恶劣的手法,扩张自己的山头……

杨、余、傅反党问题揭开后,郑因追随杨成武搞“多中心”,受过批评,作过检讨。后来,他又搞“以郑维山为首的北京军区党委”。去年七月,又对反党分子陈伯达喊“以郑维山同志为首的内蒙前线指挥所”表示默认,他旧病复发,明知故犯。

1月15日,周恩来同美国记者斯诺就中国问题长谈。他向斯诺提供了有关中国国内生产情况的数字,认为总的形势是好的,基础经济受到的损失是相当有限的。

在谈到精简机构、下放干部问题时,周恩来说:“从前在城市里工作的有能力的干部,经过‘五七’干校的再教育之后,将到各地去加强那里的领导工作,或者已经去了。加强从前属于中央政府现在下放给地方机构的工矿交通运输部门的领导,需要很多人。”

1月16日,周恩来主持政治局会议,听取黄永胜、李作鹏、纪登奎关于华北会议情况汇报,并商定召开大会等问题。会议还讨论了浙江省党的代表大会及人选事。

# 第1161回：大改组，华北会终于结束 发文件，陈伯达罪行材料

1月19日，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华北会议问题，认为会议可以准备结束了。今后两天内，拟续开小组会，再听取大家意见，但也要注意自我教育的整风作用。最后，需有人代表中央作会议的总结讲话。会上还研究了华北地区军政领导人调整安排的设想。

1月20日，周恩来致信毛泽东、林彪，汇报政治局会议情况。

当天，毛泽东审阅周恩来本日报送的关于华北会议及北京军区司令员等人选问题的请示报告。报告说：

“华北会议大会发言，已于昨日讲完。政治局昨夜开会认为，会议可以准备结束，最后政治局需要有人讲话，已商定由黄永胜、李作鹏、纪登奎三同志今日拟一讲话提要，报请主席批准后再讲。”

报告还说：“即使中央指出李雪峰、郑维山错误，还不应与陈伯达放在一起，成为陈、李、郑反党集团，但用二分法清理他们错误在华北所遗留的后果，确需在会后进行一段艰苦的教育工作，如北京军区、华北局旧机构、河北省革委和河北省军区、天津市革委。而军队的团结，军民的团结，各地各单位的群众关系。连山西、内蒙在内，都需要很慎重地加以处理。因此，中央的发言和会议的传达，要很好地掌握分寸，有步骤地进行。”

报告建议李德生任北京军区司令员，河北以北京军区副司令员郑三生去加强，内蒙古前指以北京军区副司令员尤太忠主持，总政主任调张才千担任。

毛泽东批示：“照办。”对报告中的“在一两天内，希望主席能约我们一谈”一句，毛泽东批注“大约可以”。

1月20日至22日，周恩来审改了由黄永胜、李作鹏、纪登奎起草的《在华北会议的讲话提纲》稿，并于22日将此稿送达毛泽东处。毛泽东批示：“已看一遍，大体可用。明天可能谈一次。”

22 日当晚,周恩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并修改提纲稿。

因为 23 日下午就要召开给华北会议最后定性的政治局会议了,23 日凌晨,周恩来约上李先念,安排与郑维山、李雪峰谈话。

郑维山早已等候在会议室,偌大的会议室只有他一个人。不一会儿,周恩来走了进来。

郑维山站起来,对周恩来说:“总理,我不再作检查。”

“为什么?”

“因为情况明了,性质定了,决心下了,我等待审查。”

周恩来没有接这个话茬,而是问郑维山:“身体还行吧?”

郑维山说,多年的失眠症更严重了,每天都睡不着。

周恩来望着一脸倦容的郑维山,说:“主席叫你们好好想想,睡不着觉是好事,军区、省市总会有意见,要好好地学习,痛一下有好处。比如王诤、曾希圣、陈毅,都有这方面的经验。”

“至于参加他们的会,可以不参加。23 日文件要整一下,要秘书帮助一下,挖深一些,明天大会讲还可以帮。”

“……内因为主,秘书还可以帮。……有人帮助,好好想想,不要推。多找一些引起对自己意见多的,华北局还有人。”

1 月 23 日晨,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约周恩来、黄永胜、李作鹏、李德生谈话,商定《在华北会议的讲话提纲》。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周恩来将提纲稿再做修改后,于当天下午,先交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

政治局会议后,周恩来又召集有华北会议及军委座谈会各组负责人参加的政治局扩大会议,进一步征求对《在华北会议的讲话提纲》稿的意见。此稿获绝大多数与会者赞同。

当夜,周恩来将提纲修改稿再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阅后在送审报告上批示:“同意。”又在信封上写了:“完全同意。”

1 月 24 日晚 21 时,京西宾馆大礼堂里坐满了参加华北会议和军委座谈会的人员。

周恩来出现在主席台上,他被指定代表中央在华北会议上作总结。江青、黄永胜、李作鹏、纪登奎、李德生和军委办事组的其他成员也相继就座。

周恩来在华北会议上的讲话提纲中提出了陈伯达的历史问题,说他曾被捕叛变。

讲话中历数了陈伯达破坏文化大革命、反党乱军、阴谋篡权、分裂党的阴谋活动。指出:这次会议通过对陈伯达的揭发批判,更加认清了他的反党罪行,进一步同他划清了界限。

讲话认为:“李雪峰、郑维山同志紧跟反党分子陈伯达,反对党的九大路线,在政治上犯了方向、路线的严重错误。”

“九届二中全会上,陈伯达搞突然袭击,进行分裂党的阴谋活动,李雪峰积极配合,郑维山表态支持。李雪峰有布置地抢先出《简报》,大造反党舆论,发出了向党进攻的檄文。李还煽动几位工农同志发言,指名攻击中央领导,同志,事后又推卸责任,嫁祸于人。陈伯达被揭发后,李还背着中央,为陈伯达打掩护。

九届二中全会后,李雪峰、郑维山违背中央指示,对陈伯达的反党问题不认真开会传达,不讨论,不揭发,不批判,仍然站在陈伯达一边。毛主席路过石家庄当面对李雪峰作了重要指示,李还是执迷不悟,存心抗拒,既不揭发陈伯达,也不交代自己的错误,更未向党的核心小组传达。”

周恩来同时指责李雪峰、郑维山“一贯地闹宗派、拉山头,搞独立王国,在组织上犯了严重错误。”

讲话说:“李雪峰和郑维山,一个是家长制的‘一言堂’,一个是军阀主义,作风严重不正,这是封建资产阶级思想的集中表现。

李雪峰把个人凌驾于党委之上,做官当老爷,唯我独尊,一个人说了算,动辄骂人训人。

郑维山飞扬跋扈,称王称霸,竟然下令开枪打群众,伸手向中央要开枪权、扫荡权。他对同级以家长自居,对下级蛮横霸道。”

“郑维山过去紧跟杨成武搞山头主义、独立王国,这次又紧跟反党分子陈伯达,站在错误路线一边。李雪峰过去紧跟刘、邓,同彭真、薄一波、安子文等坏人混在一起,反对毛泽东的革命路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初期,他紧跟陈伯达跑了。他和陈伯达的思想上有共同性、有个人野心。李雪峰还在庐山会议上搞了准备翻案、算账的材料,这次会议上又派人回去销赃灭证,在背后捣鬼。他对有的同志的揭发批

判很反感,甚至反咬一口。这种态度如不转变过来,那是很危险的。”

“根据会议中李雪峰、郑维山的检查和大家的揭发批判以及表现出来的情绪,中央认为李、郑两同志继续留在北京军区和河北省担任原来的领导工作是有困难的,因此,中央决定:将李、郑两同志调离原职,继续进行检查学习,接受群众教育,待有成效后,再由中央另行分配工作。”

周恩来同时还讲了一些话:

“……郑维山是一个红小鬼,14 岁参加红军,一直是在前方打仗,是有战功的。”

“……毛主席八次接见红卫兵,郑维山在组织方面做了大量复杂的工作,要是没有责任心,没有党性是不可想象的,不可能完成大量复杂工作任务。”

“郑维山为内蒙人民是做了好事的,解决内蒙问题是有功的。两次解放内蒙问题,主要是第二次对内蒙的军管。”

周恩来讲了 3 个小时。就在这个会上,宣布了中共中央的决定:

“李德生同志任北京军区司令员,谢富治同志任第一政委,纪登奎同志任第二政委;谢富治同志任北京军区党委第一书记,李德生同志任第二书记,纪登奎同志任第三书记。刘子厚同志任河北省革委会主任,郑三生同志任第一副主任兼河北省军区第一政委,曾美同志任第二政委;刘子厚同志任河北省党的核心小组组长,郑三生同志任第一副组长。尤太忠同志任内蒙前指司令员。”

讲话要求华北会议结束后,北京军区师以上党委,华北地区各省、市、自治区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都要按照中央既定的部署,有领导、有计划、有步骤地进一步开展批陈整风运动,彻底肃清陈伯达的流毒和影响。

散会时,已是半夜 24 时。郑维山往外走时,已经十分虚弱。在上楼梯时,他不由自主地摇晃了一下,警卫员小李把他搀回了房间。虽然对于会议的决定,郑维山已是预料之中。但他还是有些不能接受,感到窝囊,不服。

北京军区保卫部部长徐桐钢奉命去做郑维山的保卫工作,防止郑维山自杀。他找到郑维山的秘书和警卫员,要收回郑维山的安眠药。

郑维山说:“你们放心,我不会自杀。”说完,他脱了衣服,到卫生间洗澡去了。

历时月余的华北会议结束。会后,军委座谈会从26日起转入原定议程。

1月26日,中共中央发出《反党分子陈伯达的罪行材料》。材料分为4个部分。

第一部分为“陈伯达的反动历史”。主要内容有:“家庭出身和入党前的个人历史”,“和国民党军阀张贞的关系”,“被捕叛变”,“失掉党的关系问题”,“托派问题”,“在天津工作时的错误和叛徒、特务、工贼刘少奇为陈翻案的问题”,“写反共文章”,“里通外国嫌疑”。

第二部分为“投靠和追随王明、刘少奇,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主要内容有:“追随王明,鼓吹‘国防文学’和‘国防哲学’”,“一贯投靠和追随刘少奇,是以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的黑秀才和头面人物”。

第三部分为“对抗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反党乱军,阴谋篡权”。主要内容有:“大派工作组,又把自己装扮成反工作组的英雄”,“陈伯达是萧华、杨、余、傅、王、关、戚、‘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黑后台”,“陈伯达在文化大革命中所进行的几次突出的反党阴谋活动”,“陈伯达借起草九大政治报告的机会,炮制了一个继承刘贼唯生产力论的,反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反无产阶级专政的,分裂党的黑纲领”,“在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上,陈伯达采取了突然袭击,煽风点火,制造谣言,欺骗同志的恶劣手段,进行分裂的阴谋活动”。

第四部分为“投靠王明、刘少奇,招降纳叛,搞独立王国”。

据林彪的秘书于运深后来回忆,1970年庐山会议后,本来就深居简出的林彪,更加孤家寡人,情绪低落到谷底。林彪的房间从来不摆杂物,只有一台八音盒,叶群说是康生从抄家物品中选的。每当林彪要散步时,内勤就把八音盒上足弦,能放出十几首歌曲。但庐山会议后,林彪再也没有听过。听内勤说,林彪偶尔吃的零食也不再吃了。本来就不爱说话的他,此时更加沉默寡言,而且也不听秘书讲文件了,更不愿和身边的工作人员谈什么,甚至多少天没有一句话。偶尔看场

电影,也只让警卫秘书李文普从中外战斗故事片中选些近战镜头,一部影片只选看一两本拷贝。他平时除了出去“转车”,就是独自一人在室内踱步,更多的时间是一个人蜷缩在沙发里。

这一段时间,林彪口述过几张纸条。例如:

“开朗、愉快、活泼”;

“转移注意力”;

“充其量坏不到哪里去,不要着急;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不偏食,多换样子”;

“多运动”

……

他让保密员李根清把这些句子用毛笔抄成三份,分别贴在叶群、林豆豆、林立果卧室的门后。

1971 年新年过后,林彪吩咐李根清:“你写句话挂到叶群卧室——‘说到底,坏不到哪里去。’”

李根清找叶群取条幅,叶群说:“不用写了。告诉首长,我知道了。”

1 月 31 日晚上,黄永胜的秘书通知委办公厅秘书郭士兴到京西宾馆,叶群也在那里。叶群对郭士兴说:“总理查问我在庐山会议上的发言记录稿在哪里。”接着她要郭士兴为她写一份收回记录的证明,证明当时是记录员为整理简报当场将记录稿送给叶群的。

郭士兴当场写好,落款时间是“一九七一年一月卅一日”。

黄永胜看后,说“要用当时的时间、口气、纸、铅笔写。”

叶群马上说:“还是总长想得周到。”

于是又让郭士兴从叶群带来的记录原稿上裁下半页纸,重写,落款时间改成“一九七零年八月廿四日下午”。

第二天,叶群给郭士兴打电话说:“我想了想,证明记录的事还是要用现在的时间好。”并说:“不要在证明里写是我给你打的电话,就写是我派人问你的。”接着,黄永胜的秘书又通知郭士兴到京西宾馆去,黄永胜说:“你按叶主任讲的再改写。”

这样,郭士兴又改写一遍:

叶主任：

您好。

您派人问到去年八月二十四日您在九届二中全会中南组会上发言记录稿的事，现将当时情况汇报如下：当天是我和曾江同志（曾思玉同志的秘书）担任记录，因您的发言讲得快，我们记不下，记了一些也不全、不准确。为了整理简报，我们即将您的发言记录（两分），从记录本上取下来，面呈您审阅。

中南组记录 郭士兴

一九七一年二月一日

落款时间改为“一九七一年二月一日”。黄永胜看后，亲自封好送给叶群。

2月4日，已被免职的郑维山把他保存的北京军区第一政委的谢富治1967年8月6日给林彪的一封亲笔信同其他文件交给李德生、纪登奎。这封信中说：“中央决定陈伯达负责解决华北地区文化大革命的问题，由谢富治、郑维山协助，建议在华北地区担任三支两军任务的海、空军领导同志参加。”

对这封信，当时林彪的批示是：“同意”。

其实，1967年8月9日，在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上，周恩来和康生也宣布了中央的分工决定，即：周恩来管中南和西北，陈伯达管华北，康生管东北，江青管华东和西南。周恩来在这次会上说：“作这样的分工，是落实毛主席的最新指示，推动形势发展，实现毛主席争取明年春天或稍晚些时候结束文化大革命的战略部署。”

陈伯达在北京军区的活动有7次：4次是公派开会，两次“周游”，一次自己去“找饭吃”：是说有一次陈伯达从首钢回京途中，突然到北京军区要饭吃。除去这次他突然跑到北京军区“找饭吃”，另外6次，有两次是陈伯达作为中央文革小组组长自己去的。另外4次就是38军报告中所提到的公派会议，由郑维山陪同。

# 第1162回：再建立，“五一六”专案小组 没想到，大本营竟在南京

华北会议开的热热闹闹，但毕竟只是华北地区军政领导的事，和老百姓似乎关系不大。此时在全国，与老百姓密切相关的，天天都要搞的，还是清查“516”的运动。

1971年2月8日，中共中央下发13号文件：《关于建立五·一六专案联合小组的决定》，“决定以吴德同志为组长，李震同志为副组长、杨俊生、黄作珍、于桑、杨德中、迟群、王连龙、李韬、刘西尧、丁江、李忠、耿建民同志为组员共十三人组成中央五·一六专案联合小组，经批准后，立即开始进行工作。联合小组即以原公安部的五·一六专案组为其办公机构。”

据吴德在朱元石为他记录整理的回忆录《风雨十年记事》中记载：

周总理找我谈话，说毛主席指定我任抓“五一六”的办公小组的组长，公安部的李震任副组长。

《决定》指出：在清查过程中“既要防止扩大化，又不要一风吹，就必须集中力量抓‘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一系列罪行，将它一个一个落实，而不要一开始就笼统地追查组织关系和是否填了表格。”

《决定》“号召大家认真学习一九四三年八月十五日中共中央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还要贯彻执行毛主席在当时关于‘一个不杀、大部不捉’的指示。”

《决定》最后说：“目前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重点在北京，应由联合小组分别轻重缓急排个队，以利突破重大案件，便于联系各有关地方和部门进行清查。”

虽然中央的《决定》说“目前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重点在北京”，但是一些省市查的一点也不亚于北京。1971年2月，江苏省革委会副主任、1970年4月派往南京大学任清查“516”工作队队长的迟明堂，这位“三八式”的地方领导干部，此时也被一位已打成“516”的

南京大学中层干部检举为“516”,停职审查。这一突破,为江苏日后成批地方领导干部打成“516”开了先例。结果,江苏省专门负责审查“516”的“二办”,奉命抓紧对全省地市厅局级以上地方领导干部排队摸底,又排出了一批涉嫌“516”问题的对象。至1971年4月,已经站出来在省革委工作的厅局级以上领导干部中,又有100多名被点名为“516”,被首批送进省五七干校审查。其中有江苏省革委会常委、原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老红军朱辉等10多位老干部。他们都是从办公室被“请”走的,回家取衣物也不允许。随后,其他涉嫌“516”问题的干部也一批批被点名送进干校,有些是半夜破门从床上拉走的。下放在外地的干部也一批批揪回干校。

6月,江苏省省级机关在职干部被打成“516”的占到了33.4%。

至10月,南京市被认定为“516”大本营,清查“516”被作为头等大事,与“一打三反”结合,全力以赴。参加相关学习班的多达20多万人次,全市上下共召开坦白会、批斗会、宽严会等1200多场。4个多月内又有5000多人打成“516”。南京市公安局正副局长、市中级人民法院正副院长,全部打成“516”。处级干部除一名副处长外,无一幸免。

1970年10月,迟明堂隔离审查,不久被武装押解投进监狱。

11月,省级机关在职干部挂上“大名单”的“516”嫌疑分子多达2400余人,连同已经打成“516”的,竟占省级机关干部总数的70%以上。

南京市革委会机关450余人,至1971年底已有107人打成“516”,加上挂上“大名单”的200余人,也占70%左右。

就连省革委会领导人之一的彭冲,竟也挂上了“大名单”。

南京军区被整理“516”材料的军内干部有298名,其中军级以上干部84名,仅南京军区机关的军级领导干部就有11名。

1971年底,江苏省五七干校3000多人中,点名为“516”审查的有1600多人,挂上“大名单”的还有400多人。省五七干校已变成集中审查关押“516”的营地。

1970年12月4日,北京电影学院五七干校清查“516”分子。一位姓崔的连长在“大批判再动员”后,布置了第一项专题批判任务,即“利用红旗政策。重点批判7分钟事件。”

“7 分钟事件”就是 1966 年 12 月 4 日,叶剑英的女儿叶向真组织劫走彭真等人的那个事件。

次日,12 月 5 日,北京电影学院五七干校召开“516 反革命阴谋集团 12.4(7 分钟)事件批判大会”,参与 1966 年 12 月 4 日绑架彭真的彭宁、钱学格、马精武、谢飞“怀着三忠于四无限五保卫的心情”上台发言:

“1966 年 12 月 4 日,正当我国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沿着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引的方向,大踏步前进的时候,当资产阶级司令部刘少奇一伙即将摇摇欲坠倒台的时候,一小撮阶级敌人、516 反革命阴谋集团开始制造舆论,捞取政治资本,破坏毛主席的战略部署,王、关、戚、杨、余、傅直接策划演出了七分钟绑架彭真的反革命特务事件。这个事件的要害就是向伟大领袖毛主席、林副主席施加压力,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力图挽救大叛徒、大内奸、大工贼刘少奇及其一伙失去的天堂。这个反革命七分钟事件的要害,就是要夺取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权。516 反革命阴谋集团夺权的目的,就是不要无产阶级专政。他们不单是要彭真这些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黑线人物一起串供,而是王、关、戚、杨、余、傅和他们一起串通起来,搞复辟阴谋活动,蒙骗人民。”

会上另一位“五七战士”说,1966 年 12 月 4 日抓走彭真是为了“串供”,而且“阴谋已经实现了一部分。彭真及一些黑帮串供,制造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所谓黑材料,颠覆无产阶级专政,是资产阶级政变的一次演习,危害已经造成了。”而周恩来 1966 年 12 月 4 日接见他们时的讲话记录,被说成是“掩盖和篡改周总理指示,放反革命舆论”。崔连长评论说,“抓彭真即保彭真保黑帮”。

当晚,崔连长传达了“最新指示”,其实是毛泽东 1967 年的指示:“革命的学生要团结,要联合,共同打倒反革命阴谋集团‘516’”,以及林彪的指示:“军队是专政的工具。一定要把 516 分子查清,一个也不能漏掉。”随后长篇讲话,要求人人发言,“不发言就是中奸计”,“红旗政策恶毒之处在利用人心所向勾引青年,非如此不能号召”,甚至将“7 分钟事件”的思想根源追溯到三十年代文艺黑线,说一些人“在 7 分钟事件中,自己还庆幸是机会主义的头脑,其实已经上了三十年代的

贼船。”

彭宁反复交代自己的“516 罪行”,写出了 140 多页的材料,其中包括“7 分钟事件”,但这些交代被一再指责为“重复”;彭宁本人不断受到“背后有人”、“态度不老实”、“错误估计形势”、“掩盖罪行”、“避重就轻”、“狡辩”、“想蒙混过关”、“新的恶毒攻击”、“继续阴谋新反扑”、“以细节掩盖实质”、“搞迷魂阵,反攻倒算”之类的斥责,人们一再勒令他“严肃对待自己的罪行”、“竹筒倒豆子”。有些当事人则发挥了揭发、质问的作用,有的参加了专案组,在会上专题介绍“7 分钟(事件)彭宁参与阴谋”的过程。

经历持久地“斗立场、斗态度”、“通过罪行打态度”后,彭宁渐渐承受不住压力,于 1971 年 10 月 4 日开始交代天方夜谭式的“反革命计划”,但大家很快发现他的交代“不能自圆其说,掩盖阴谋。交代有阴谋有组织,实际又无阴谋无组织,自己推翻了,漏掉了。”

幸好,1971 年 9 月 13 日,中国的政局发生巨变,有关“7 分钟事件”的密集批判也不了了之了。

1971 年 1 月,北京航空学院也在空军宣传队和工宣队领导下,在全院开展了“批判极左思潮,彻底清查‘516’反革命阴谋集团”的群众运动,在动员群众进行揭发检举的同时,对院内文革以来的所有重大事件进行清理,举办了重点人、重大事件,知情人等各种学习班 112 个,对重点审查对象 38 人实行隔离审查。

其实,早在 1970 年 5 月初,曾经在 1967 年武汉“720 事件”后,按照戚本禹的指示,组织北航学生到北京玉泉山和京西宾馆游行、冲中直招待所抓张体学等人的北航院革委会副主任田东,就已经在苏北农场学习班隔离审查了。与他一起关在学习班里的一位同学,因承受不了连轴转的批斗,精神压力太大,结果在押往批斗会的路上,乘押送人员不备,跑到办公楼的阳台上跳楼自杀。幸亏下面是农田,摔在耕地的松土上,只是摔断了腿,伤了腰,但捡了一条命。

1970 年 11 月,正在河南五七干校劳动的北航革委会委员、女教师张树泉也被召回学校,要她交待怎么参加的“516”? 说是洪平顺老师交待,他是张树泉发展加入“516”的,而且大字报写的有鼻子有眼,说是在 11 楼某某房间发展的“516”。专案组负责人拍着桌子对张树泉

说:“我们学校四百多人都是韩爱晶和你们发展的。”

1971 年 2 月 8 日,北航革委会常委侯玉山也从西北三线厂被揪回北航。

1971 年 3 月 8 日午饭后,正在湖南株洲航空发动机厂干活的韩爱晶,看到军代表来到他身边,很谦和地对他说:“老韩,部里通知你回北京,你马上到天桥孙政委那里去,领导跟你谈。”

这是韩爱晶长这么大,第一次听有人叫他“老韩”。心想,这一刻来到了。因为在此之前,已经有同学将 1970 年 1 月 24 日周恩来、江青关于抓“516”的讲话发给韩爱晶。之后,厂里就有人说他是“516”。

韩爱晶回到北航,一进校园就听到高音喇叭在大声呼喊:

“打倒反革命‘516’骨干分子韩爱晶!”

“把‘516’骨干分子韩爱晶押回北航是毛泽东思想伟大胜利!”

“韩爱晶反对敬爱的林副主席罪该万死!”

“韩爱晶反对敬爱的周总理罪该万死!”

“韩爱晶不投降就叫他灭亡!”

……”

路灯照在大道上,一米两米见方的大字躺在路中间:

“谁反对林副主席就打倒谁! 谁反对中国人民解放军就打倒谁!”

韩爱晶感到突然,也很奇怪:“在北京我是最早反对‘516’的,凭什么给我扣上‘516’骨干分子的帽子?!”

他被带进 13 楼一层的一个大房间,里面的窗户装上了铁栏杆,被遮得严严实实,不透光线。几个年轻人早等在这里,他们对韩爱晶投来异样的目光。

晚上睡觉时,两个小伙子面对面坐在床两头看守着韩爱晶。

没几天,韩爱晶被带到俱乐部台前接受批判。每当听到说他“反对林副主席,反对周总理”的内容时,韩爱晶就会回头冲着发言的人大喊:

“造谣! 胡说!”“造谣! 胡说!”

在一次参加系里召开批斗会时,他又冲着发言人大喊:“造谣! 胡说!”几个工农兵学员突然从下面冲上来,抓住他的头发和胳膊,狠狠地把他按在地上。批判会开成一锅粥。从此就没再开批斗韩爱晶的

大会了。

学校召开落实政策大会,“钢铁纵队”教师洪平顺承认自己是“516”,当场解除隔离,与家人团聚。

但是韩爱晶不管专案组采用什么方法,就是不承认自己是“516”,也不承认反对中央领导。他除了谈问题或写材料,就是抓紧时间看书看报。一天,军代表老田奇怪地问他:

“别人犯错误,吃不下饭,睡不着觉,痛哭流涕,人整个变了个人。你倒好,像进党校了,看书看报。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任凭千种妙计,你自有一定之规!木头疙瘩不开窍,你受过什么特殊训练?”

韩爱晶说:“我承认犯了严重错误,辜负毛主席、党中央的信任,对不起北航师生,但我不是‘516’,不是反革命。我犯错误,是由于我缺少马克思主义,缺少毛泽东思想,没有和工农结合,我世界观有问题,我现在正好补马列的课。你是空军的干部,我1946年生,在红旗下长大,我怎么是反革命?是台湾派来的吗?”

韩爱晶接着说:“你知道你们是谁吗?你们是共产党、解放军,我干嘛怕你们啊,我热爱共产党,热爱解放军,你们在我周围我一点也不怕,你们是自己人。再说,我哭哭啼啼,你们能把我放了吗?你问受过什么特殊训练,解放战争的时候,民船过长江,百万解放军战士还有船夫,国民党大炮打过来,一个炮弹掉下来,一船人可能就没了,都是农民子弟,年轻战士,你看我的命比他们值钱吗?”

老田问:“这什么意思?”

韩爱晶说:“我二十四、五岁。我上过天安门,住过中南海,见过毛主席,当北京市革委会常委,党和人民给我的太多了。那些战士死了有的连名字都没留下。我没什么比过江战士高贵的地方!我也问你一句话,如果我现在被台湾国民党抓去了,你看我会不会投降?我会像李玉和似的,从容不迫,决不投降!国民党我都不怕,怕共产党干嘛?我不是‘516’!咱们等着看,我没有反对林副主席,没有反对周总理!”

再看北航“红旗”戴维堤的遭遇。1968年12月30日,戴维堤和他的爱人、武汉“720事件”中的女将尹聚平来到北京738厂报到,成为该厂的正式员工。

北京738厂又叫国营北京有线电厂,是国家第一个五年计划重点工程之一,由苏联专家帮助援建,是中国第一家生产电子计算机和电话交换机的工厂,产品主要供给部队,为当时中国最大的电子工业基地。

追查“516”的风潮也在这里刮起。1970年12月26日,是毛泽东的生日,戴维堤和738厂的造反派头头们一个个被关进了“毛泽东思想学习班”。

没过几天,尹聚平也因为“720”事件,被作为王力的“黑秘书”隔离审查。那天正好是他们的儿子一周岁。

738厂军管会把尹聚平从吃奶的孩子身边押走,召开了全厂批斗大会,宣布抓出了大“516”分子,混进中央代表团一级的,王力的黑秘书,反军乱军的反革命分子,就是尹聚平,立即隔离审查。同时宣布隔离审查的是一位刚从海军转业来738厂工作的钱植平,据说他文革中参加过“冲派”。

这位当过兵的男子汉在附近的“牛棚”里经受了数天的折磨之后,一时想不开,在厕所里上吊自杀了,抛下了年轻的妻子和年幼的孩子。

尹聚平的“牛棚”是一间长一米六八、宽一米二小水房。万幸的是,尹聚平身高一米六六,小房的长度还多出两公分。

“老实交待,你是怎样混进中央代表团的?”“你跟王力干了些什么?”“王力什么时候发展你参加‘516’反革命集团的?”“老实交待!你是怎么反军乱军的?”“你的黑手是怎么伸进738厂的?”“戴维堤是坏头头,你老实交待他的罪行!”……

“尹聚平,听说你父母是老革命,你生父是革命烈士。我们不管那一套。现在老革命和烈士中叛徒、特务多得很,谁知道你老子是不是叛徒、特务?这很难说,我们不管这些。王力是十恶不赦的坏人,你给他当秘书,知道的情况一定不少,你要老实交待。看你的态度,坦白从宽,抗拒从严,顽固到底,死路一条!交待好了,可以从宽处理。我们讲人道主义,今后不会再有人打你,也不会不让你喝水,你累了可以坐一会儿,但问题交代不清不能睡觉。革命嘛,需要付出点代价。”

从此,尹聚平的斗室里面装上了200度的电灯泡,整夜不熄。“车轮战”开始了,不准尹聚平坐下,更不准睡觉。连续几天轮番逼供,只

有到天亮时才让坐下打一会儿盹。接班的看守又来了,立即站起来,又开始了一天的逼供……

尹聚平悲愤欲绝。作为父辈们都是共产党人的烈士后代,一个年轻的孩子妈妈,蒙受如此摧残和奇耻大辱,要不是想到儿子,她真不想活了,死了什么都不知道了,也免得受罪了。

尹聚平不明白,生父是1946年牺牲的革命烈士,母亲是38年的老党员,继父是1929年入党的老资格共产党人,丈夫戴维堤的亲人中有四位烈士。如今夫妇双双成了“516”,反革命?而抓她的人,从军管会到看守,很好多人都是中国共产党党员,这是为什么?为什么?

# 第1163回：戴维堤，气急大骂军代表 毛泽东，批评军委办事组

1971年3月17日，738厂的军管会组织了批斗“516”分子大会。一些人被押上台去，低头弯腰，痛苦流涕而又口若悬河。不但承认自己是填了登记表的“516”分子，而且交待出了几十、几百个发展对象。在交待他们发展的“516”分子时，显然是按军管会的要求，用念某某某代替姓名。当会场的高音喇叭将“我发展了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这样绕口令似的奇妙声音，在738厂的上空环绕时，吓坏了台下的数千名职工，不知这些“某某某”里是否有自己？这声音也惊呆了周围马路上的行人和车辆。于是，一切都凝固了，人们侧耳静听，不知道738厂大院里上演什么好戏？其中有一个头头竟然连续说了10分钟的“某某某”。按两秒钟说一个计算，他一口气交待出了300多个“516”分子。不几天，738厂竟抓出了1000多个“516”分子。军管会王主任在全厂大会上掩饰不住心中的喜悦，伸出4个手指头大声说道：“同志们，谁说738厂没有‘516’分子？现在已经四位数了！四位数了！同志们！”

戴维堤在738厂的好朋友张君，是厂革委会人事组织负责人，为人忠厚老实，甚至有些谨小慎微、胆小怕事。他无造反派的气魄，但有造反派的观点，抓“516”一开始，他就被军管会关起来了。

张君患有慢性心脏病，身心压力都很大，家有还多病的老母。军管会抓住他急于想回家的心理拿他开刀，对他进行逼供。开始几天，张君尚能顶得住，拒不承认“516”问题。随着逼供的加剧和压力的增大，他顶不住了，终于痛哭流涕地向军管会承认自己参加了“516”反革命阴谋集团。他幻想着承认了就能放他回家。

军管会很高兴，这是738厂内抓出的第一个“516”分子。万事开头难，有了第一个就不愁第二个，第三个……打过仗的军管会负责人知道突破口的重要性。他们认为，张君可能是一条大鱼。他是管人事

组织工作的,他既是“516”分子,一定发展了不少人。738 厂的“516”之鱼一定少不了。于是,军管会负责人在全厂大会上洋洋得意地说:“庙小神通大,池浅王八多。738 厂这座庙不小,水也很多很深,‘516’这些王八、游鱼少不了。林副统帅要求我们‘一个不漏’,我门的办法就是‘网大眼小’。‘516’分子这次一个也跑不了。不把 738 厂的‘516’分子抓干净,我们决不收兵。我们还是那句话,坦白从宽,抗拒从严,顽固到底,死路一条!”

张君既然开了口,下面的事就由不得他了。这正如长江、黄河大堤一样,只要开了一个小口子,就很难堵上了。

“要想早点回家,就要竹筒倒豆子。说吧,是谁发展你参加‘516’反革命集团的?”军管会的人边问边记录。

“67 年我去北航串连时,认识了戴维堤,是他发展我参加‘516’的。他让我在工厂里发展‘516’成员,并交代上不传父母,下不传妻子。”张君此时的嘴吧已经像决口的黄河大堤。

军管会的人又惊又喜,立即紧追不舍。

“你发展谁参加了‘516’?”

“我是管人事组织工作的,认识的人多,发展的人也多,让我好好想一想。不过,你们要替我保密。”

“这点你放心,我们会替你保密的。你一边想,一边写出来,记错了也不要紧,但不要漏掉,一个都不要漏掉。我们不搞蒋介石那一套,宁错杀一千,不放过一个。我们是一个不杀,但一个也不放过。你老实交代吧!交代的好,可以从宽处理。”

于是,张君把厂里 300 多个干部、工人的名字写了出来,其中包括文革初期挨过批斗的原党委书记、现任革委会主任等一批老干部,都成了‘516’分子。

就这样,一批批干部、工人被谈话、审查。不承认怎么办?很好办,关押,逼供:“发展你的人都交代了,被你发展的人也交代了,你还等什么?”

于是,好汉不吃眼前亏,许多人便承认了自己是“516”分子。对于某些交代问题不太痛快像挤牙膏一样的人,军管会便让某些工人看守们练练拳脚,并长期关着不放。

戴维堤被关后,军管会的专案组让他交待问题,戴维堤自己并不在乎。“学习班”嘛,学几天就完了。文化革命中干了那么多事,审查审查也是应该的,反正自己文革中也没干什么坏事,经得起审查。他把自己文革中一年多的全部所作所为写成了材料,请军管会过目,并要求回家看看儿子。

但是,戴维堤的材料被退了回来,军管会说那是宣言书和请功表,不是交待材料,要戴维堤态度放端正一点,脑袋放聪明一点。至于回家,那就看他自己交待的如何了

戴维堤非常想自己的儿子。当时,他还不知道尹聚平也已被关了起来。一天晚上,他趁着看守们在外面打扑克,偷偷打开了窗子,跑回了家,一间厂子附近的农村小屋。

一进门,他惊呆了:尹聚平70多岁的姥姥正在喂他的儿子。孩子站在潮湿的土地上,一边吃东西,一边用两只小手拿着快垂到地面的亮着的电灯泡玩。当他看见爸爸回来了,立即哭着让戴维堤抱,并喊“妈妈,妈妈!”姥姥哭着告诉戴维堤:“尹聚平前几天被厂里的人叫走了,再也没有回来。

戴维堤的热血一下子顶到了脑门上:“军管会这几个法西斯军人,真他妈的歹毒,简直不是人。我们犯了什么罪,如此对待我们?”

他把电灯线弄高,安慰了姥姥几句,亲了儿子一下,立即头也不回的赶回了“学习班”。

这时军管会正在组织人抓他,见戴维堤自己回来了,松了一口气。但此时的戴维堤怒火难消,冲着管专案组的军代表,破口大骂道:“我操你妈的姓×的,蒋介石害得我家破人亡,你们害得我妻离子散。老子一家都是当兵的,没有一个像你们这么混蛋的!你们别放我出去,否则我同你一块见阎王!”

他的嚣张气焰惹火了军管会,第二天,被押到厂里批斗了一场。批斗完后,军管会副主任来到关押他的房间训话:

“戴维堤,我告诉你,你给我放老实点。老子管过监狱,像你这样的,老子在监狱里见的多了。你的问题很严重,我们有充足的材料。坦白从宽,抗拒从严,顽固不化,死路一条。你不要认为你出身好,我们就不敢怎么着你,你的出身我们也要调查,烈士当中也有叛徒。我

们现在是挽救你,要是换一个人,这样骂军管会,我们决不轻饶!”

“我有什么问题,你们可以拿出来,我自己认为我什么问题也没有。我骂军管会不对。可我家里确实有困难,一老一小没人管,出了人命怎么办?就是我和尹聚平有罪,那老人孩子无罪。我儿子绝对是烈士的后代。烈士也有叛徒,这话可是你说的,你是共产党员,不能这样胡说。我要求军管会派人给我看孩子,扣我的工资也可以。”

“你孩子的问题,我们会考虑的。你老实交待问题吧!告诉你,你们学校来了许多材料,你是‘516’的头头,问题严重,有许多人检举你。我们给你时间,让你主动交待问题,争取从宽处理。否则就不算你主动交待的了。”副主任说完就走了。

过了几天,军管会派人买了火车票,把戴维堤家的一老一小送到了北京站,打发回了郑州尹聚平家。

半年之后,1971 年秋的一天,戴维堤正在屋里“熬钟点”,忽听窗外楼下有哭叫声和喝斥声。他推开窗子往下一看,只见不知何时从河南回来的姥姥和他的儿子坐在地上,对着戴维堤的窗子哭喊着。有几个工人看守正在轰老太太走,周围有许多看热闹的人。

戴维堤大吃一惊,想从房门冲下去,可房门反锁着。他只好从窗子探出身子喊着“姥姥”,呼唤着儿子的名字。他心里难过之极,悲愤欲绝。已快两岁的儿子抬头呆呆地望着陌生的戴维堤,突然大声的哭喊起来。从儿子的哭叫声中,戴维堤分辩出了一声声“爸——爸——”的声音。他悲喜交集,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听见有人叫他爸爸……

原来,尹聚平的姥姥和儿子在河南郑州她父母家,一直没有戴维堤和尹聚平的消息,一家人都焦急万分,度日如年。尹聚平的母亲让她的弟弟、妹妹们把姥姥和尹聚平的儿子送到北京,希望能见戴维堤和尹聚平一面。

有一天,戴维堤看见一个小女孩和她的妈妈在楼下哭,是要给关在戴维堤旁边房间里的一个厂里的造反派头头送点吃的,看守们不让。小女孩趁她妈妈同看守们争吵的时候,飞快地跑上了楼,见了她爸爸一面。这个聪明的小女孩后来成了有名的歌星,她就是杭天棋。

戴维堤强烈要求军管会允许他和尹聚平分别见老人和孩子一面,如不答应,他将绝食,以死抗争。

军管会同意了:“戴维堤,你岳母家怂恿老人孩子回来大闹‘学习班’,这是破坏运动的行为,是错误的,这对你和尹聚平没有好处。好在不是你指使的,就算了。我们军管会还是讲政策、讲人道主义的。看在你是烈士子女面上,我们同意你看看儿子。这是军管会对你的关怀和照顾,是党的温暖,是军管会讲政策的体现。我们不是法西斯,我门是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你再骂军管会,我们就不客气了,你要为你的骂人承担一切后果。”

“谢谢军管会,只要让我见见儿子,我就不骂军管会是法西斯了。否则我就是法西斯。”戴维堤如是回答。

戴维堤想明白了:“既然造过反,就应付出代价。这是历史的惩罚。”

蒯大富在挨整时,曾发牢骚哀叹:“红卫兵是一年香,二年臭。”戴维堤又追加两句:“三年就挨斗,四年、五年成了‘516’。”

1972 年 5 月 13 日,戴维堤终于可以离开关押他的“牛棚”。军代表向他宣布:“从今天起,改变审查方式,回车间劳动,但审查未完,要继续检查交待问题。”

最后,军代表拿出了一份材料说:“戴维堤,你自己看一下,这是揭发你的材料,本来不应该给你看,但已经无所谓了。当初让你交待‘516’问题,我们是事出有因的,你不要埋怨我们。”

戴维堤一看,是他的老同学张海写的“关于戴维堤问题的揭发材料”。字写得非常漂亮,工工整整,像印刷的一样,有几十张纸。材料揭发戴维堤在北航是如何发展张海参加了“516 兵团”,有时间、地点、情节,样样俱全,十分逼真。戴维堤这时才明白,怪不得军管会始终逼他交待“516”问题,把他关了这么长时间。

但是,戴维堤心里没有丝毫怨恨张海的念头,只是立刻想到,他的这位张海同学,在单位不知是怎么被整?逼、供、信到什么程度?否则,一条七尺的汉子,怎么能这样胡说八道呢?738 厂不是也有被整得自杀或疯了的吗?

戴维堤对军代表说:“现在你们怎么看这份材料?”

军代表笑了笑,说:“给你看材料,就说明我们的态度。‘516’组织登记表问题,谁也说不清楚,我们现在也没见到一份。不过,我们重在

罪行,罪行够了,也是‘516’,这是周总理说的。”

“周总理是这么说的吗?什么时候,在哪儿说的?”戴维堤问。

“你出去后自己打听去吧!”军代表说。

而北航“红旗”的一把手韩爱晶,也于1971年3月8日从株洲带回北航隔离审查,说他是“516”骨干分子,有很多老师同学都填表加入,韩爱晶坚决否认。专案组将他关在北航的黑屋子里,要他交待“揪刘火线”的情况。可是北航是在“揪刘火线”最后5天才去的那里,具体的缘由韩爱晶并不清楚,最主要的是无资料和材料可以查找、回忆。性格执拗的韩爱晶在小黑屋里旧病复发,开始咳血。他渴望治病、渴望吃热饭、晒太阳。无奈之下,在专案组的帮助和启发下,写了一些材料,被收在“北京市革委会文教组批清协作办公室”整理的《关于围困中南海的一些罪证和线索》。“913事件”后,韩爱晶向专案组书面声明,此前写的材料一律作废。1978年9月21日,他再次向北京市公安局七处预审员正式递交书面声明:《对于1971年三月之后,在北航专案组工作人员用逼供信的方法要我写成的真假混杂的材料一律作废》。

1971年2月12日,林彪携妻子叶群、儿子林立果乘飞机前往苏州。仍然下榻南林饭店七号楼。

1970年是第三个五年计划的最后一年。这一年的经济发展较快,不仅比上年有较大幅度的增长,而且达到和超过了1966年的水平。工农业总产值3136.8亿元,比上年增长25.7%。其中,农业总产值716亿元,增长11.5%;工业总产值2420.8亿元,增长30.6%。财政收入662.9亿元,增长25.8%,收大于支13.5亿元。1970年基本上完成或超额完成了第三个五年计划。

1970年12月16日至1971年2月19日,国务院举行全国计划会议,拟定了1971年度国民经济计划。1971年的计划是高速度、高指标的计划。工农业总产值3350亿元,比上年增长12%。其中,农业总产值750亿元,增长7%;工业总产值2600亿元,增长13%。财政收支各为705亿元。国家预算内基本建设投资270亿元,其中用于三线地区的投资150亿元,占55.5%。新增职工140万到156万人。1971年实行基建投资、物资分配、财政收入支出的大包干,亦即权力下放。

2月19日,周恩来就结束全国计划会议一事致信毛泽东,汇报近日工作安排,毛泽东当天就在信上批示:“都同意。请告各地同志,开展批陈整风运动时,重点在批陈,其次才是整风。不要学军委座谈会,开了一个月,还根本不批陈。更不要学华北前期,批陈不痛不痒,如李、郑主持时期那样。”周恩来当天即在政治局传达了毛泽东对计划会议的指示。

当晚,军委办事组紧急召开在京的各单位负责人开会,传达毛泽东批评军委座谈会根本不批陈的指示,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都在大会上作了检讨。

第二天,军委办事组向中央写了一个检讨报告,对毛泽东的批评表示“坚决拥护,诚恳接受”。报告称:“由于我们对‘批陈’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因此,在‘批陈整风’时,对‘批陈’没有作为重点来进行。这是个严重错误。”

同日,毛主席在这个检讨报告上批示:“你们几个同志,在批陈问题上为什么老是被动,不推一下,就动不起来。这个问题应该好好想一想,采取步骤,变被动为主动。”

“为什么老是认识不足?三十八军的精神面貌与你们大不相同。原因何在?应当研究。”

“吴法宪、叶群过去写的检讨不够,要重新写一个。”

“要召集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各省市自治区负责人,各大军区、军兵种负责人、中央、国务院各部、委负责人参加,由黄、吴、叶、李、邱作检讨,让他们下台过关。并将此情况告诉林彪同志。”

与此同时,毛泽东再次强调各级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认真学好马列著作。

毛泽东和前几次不同,他这次没有再把阅件批转给林彪看,而只是写道:“周(恩来)、康(生)阅后,退军委。”

当天,周恩来根据毛泽东2月19日批示精神,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关于扩大传达反党分子陈伯达问题的通知》。

次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扩大传达反党分子陈伯达问题的通知》。

2月22日,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帮助军委办事组成员变

被动为主动。

江青在会上传达了毛泽东对黄永胜等人的批评。

周恩来在会上作了长篇发言。

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及其他政治局委员作了检讨。

会上还通过了中央转发毛泽东2月19日关于批陈整风指示的补充通知。

黄永胜等人当天又召开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及有关军事部门负责人会议,对庐山会议和“批陈”问题上所犯错误再次进行“自我批评”。

2月23日,周恩来向毛泽东报告政治局帮助军委办事组成员变被动为主动的过程,并告黄永胜等都做了检讨。

这天,军委办事组在讨论毛泽东批评他们“根本不批陈”的指示时,黄永胜念了唐朝诗人章碣的诗:“竹帛烟销帝业虚,关河空锁祖龙居。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

这首诗,毛泽东曾在1945年书赠当时作为国民参政会“延安访问团”成员访问延安的北京大学教授傅斯年。五四运动期间,身为北大学子的傅斯年是五四运动的先锋,而当时的毛泽东是北大图书馆的一名管理员。因傅斯年常到图书馆看书,故和毛泽东相识。

傅斯年访问延安时,曾与毛泽东通宵长谈。毛泽东高度赞扬傅斯年五四期间为反帝反封建做出的贡献。傅斯年对曰:“我们不过是陈胜、吴广,你们才是项羽、刘邦。”通宵长谈结束时,傅斯年向毛泽东索要墨宝,毛泽东便将唐朝诗人章碣的这首《焚书坑》书赠傅斯年,并附信一封:“孟真先生:遵嘱写了数字。不像样子,聊作纪念,今日闻陈胜吴广之说,未免过谦,故述唐人语以广之。”

1949年,傅斯年召集一批北大学者随蒋介石赴台湾,上飞机后才发现,空位甚多,应者寥寥,多数人对国民党已失去信心,愿留下来迎接共产党。

毛泽东对章碣这首诗情有独钟。1959年,他让康生查询章碣生平以及此诗是否是其作品。康生在12月8日给毛泽东的报告中说:“主席:关于章碣的生平材料很少,查了几条,但同中国文学家大辞典所记差不多,送上请阅。”

毛泽东不满这个说法，12 月 11 日在康生的报告上写了致林克的信："林克：请查《焚书坑》一诗，是否是浙人章碣（晚唐人）写的？诗云：竹帛烟销帝业虚，关河空锁祖龙居。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

1966 年 4 月 14 日，毛泽东在《对〈在京艺术院校试行半工（农）半读〉一文的批语》中，又一次引用了章碣的《焚书坑》，接下来说："有同志说：'学问少的打倒学问多的，年纪小的打倒年纪大的'，这是古今一条规律。经、史、子、集成了汗牛充栋、浩如烟海的状况，就宣告它自己的灭亡，只有几十分之一的人还去理它，其他的人根本不知道有那回事，这是一大解放，不胜谢天谢地之至。"

黄永胜在会上念了章碣的这首诗后，许多人不知何意？但此诗开始在社会上流行。

2 月 26 日，周恩来约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 4 人谈话。

# 第1164回：外交部，重修英国代办处 “五一六”，北大、地院也在抓

1971年2月，中国外交部出资为英国代办处修复房屋工程竣工。2月24日，英国代办处为修复迁居举办招待会，周恩来指示时任外交部欧美司司长章文晋，要向英国代办当面表示：“1967年火烧英国代办处是一小撮坏人干的，中国党和政府都不赞成。现在，我们给你们修复了，你们迁入新居，让我们举杯庆贺。”

在当晚的招待会上，章文晋司长怕被人认为自己“右倾”，没敢在众多外国使节出席的外交场合说出这番话。周恩来知道后，立即召见外交部领导和当时参加招待会的人员，对章文晋进行了严肃批评。周恩来说：“毛主席几次都说火烧代办处是坏人搞的。火烧英国代办处大楼是当时一小撮坏人干的，中国党和政府都不赞成。对这件事应公开向英方做出解释，当着其他外国大使的面也可以讲嘛！”

他还批评章文晋说：“你本人也是极‘左’思潮的受害者嘛，这些话你为什么不说？当着其他国家的大使说有什么要紧？而且还应该大声说！毛主席几次批评火烧英国代办处的讲话你们都学了，学而不用，不去实践，这就叫极‘左’思潮的影响嘛！我们在外交关系上要实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双方是平等的。人家来到我国，我们用压的办法是不对的。英方在香港迫害我们的同胞，那是不对的，但不能因此而烧它的代办处。你搞他，他可以报复，那只能破坏外交关系，甚至断交。”

2月28日，林彪对清查“516”指示说：

“军队是专政的工具，我们要深挖‘516’，一个也不能漏掉。”

这应该就是后来在清查“516”时被大量引用的“林副主席的指示”。

在“批陈整风”运动中，聂元梓写信给康生，承认自己在庐山会议上犯了错误。康生在聂元梓的信封上批道：“请看这个两面派！”并将

这封信转给了北京大学军宣队。

据北京大学教师郭大暑后来回忆,1971 年他奉 8341 部队军宣队指示,参加聂元梓的专案工作,住在当时军宣队总指挥部所在的哲学楼。参加这项专案工作的有三人,两个是军宣队的,还有一个就是郭大暑。据他回忆说,当他要聂元梓交待她的后台是谁时,聂元梓回答说:“我的后台是江青。”

聂元梓的专案搞了一年多,没有任何的结果。

北京大学在清查“516”时,把 1967 年初的“007 密令”和 1967 年夏天发生在中南海外的“揪刘火线”,都列为“516”的重大活动之一,说“新北大公社”参加中南海外的“揪刘火线”是反对周恩来总理。

对“007 密令”,专案组引用了“新北大公社”动态组组长、北大物理系学生胡宗式的交待,称:“原新北大公社动态组长胡××称:1967 年初,南方某群众组织的许××,要我把陷害总理的所谓‘0007 密令’通过聂元梓直接转到中央文革。我请示了聂元梓,聂说,你们把它送到中央文革记者那里。由聂元梓电话联系,我到 44 楼三楼,向中央文革(驻北大)记者上交了这份材料。”

胡宗式的原件是这样写的:

1967 年3 月,湘江风雷北京支队队长许维刚(北京机械学院学生)找到我,想通过聂元梓将一份材料(即有关 007 密令问题,湘江风雷头头的上报材料)转交江青。材料大致内容如下:

在 1966 年 12 月初,“湘江风雷”的一个成员在湖南省军区门口,看到一辆三轮摩托车从门内驶出,从车上掉下一张纸,他拾起,见一个字条:

密令　007 号

兹定于 12 月 30 日在……起事

手谕

他拿到湘江风雷总部,头头们用“雷锋日记”对笔体,认为是总理的字体,便认为总理利用湖南省军区搞军事政变,整材料上告中央。后来中央“二.四”批示把“湘江风雷”定为反动组织(几个月后平反)。坏头头认为是总理搞的报复,“湘江风雷”的头头张辉便整材料。材料中说密令怎么发现的,军区的人怎么追查,他们曾经把它藏在蚊帐杆

里,被人盗取,又怎么追回。他们将材料复写了三份,想法托人送中央。许维刚的这份是其中之一。

我把这份材料交给聂元梓。第二天聂对我说:“反总理是不对的,这份材料我不给转。你把它交给中央记者站驻北大的记者。你到44楼3楼,我先打个电话。”我在转交材料时写了一个附言,说明了许维刚的身份并且写了“这是对总理的陷害”。

胡宗式1968年初分配到宝鸡902厂。1971年1月,他正和爱人在南京岳母家度蜜月时,接到厂里发来的催促回厂的电报。2月19日上午,他回到厂里,当晚即由厂干部科的吴长顺陪同北京大学李桂勋一起,“护送”他乘火车赴京。21日凌晨2时左右到了北京大学。上午10时,住进43楼211室,窗上钉了木条,门上贴的大标语是:“誓与5.16反革命集团血战到底!”物理系组成了20多人的专案组,有工军宣队队员、学生和老师,组长是原“井冈山兵团”的张万祥,副组长是原“新北大公社”的庄逢源。此次审查,进行了两年又两个月。

审查胡宗式的目的是要他承认自己是“516”。2月27日晚上21时后,物理系宣传队指导员、8341部队的连指导员杨宗佑对胡宗式说:“你来了一个星期了,我们没有动你,是叫你安一下心。过去说我们掌握你70%,现在可以说掌握你100%。打开窗子说亮话吧,你是‘516’并且是骨干。是坦白呢,还是抗拒?从现在起和你进入短兵相接的阶段。你倒霉就倒霉在聂元梓身上,你知道她在‘516’集团里处在什么地位吗?她不用填表,她有批准权。你以为材料烧了就查不出来吗?表烧了人还在。名册烧了,组织部长还在嘛!”

专案组对胡宗式说:“你不是首恶,但你是骨干”。

专案组用了3天时间专门谈“007”问题,逼胡宗式承认是反周恩来,说:“戚本禹用它反总理,材料是你提供的,你就是反总理”。

胡宗式坚决不承认,说:“我上交材料给的是中央文革,并且我在上面注明我的态度。如果我在上面写的是给戚本禹,你可以算。”

军宣队长说:“群众说你是反总理。”

胡宗式坚称:“不是!”

军宣队长:“那么说群众说错了?毛主席说:‘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你对毛主席的教导是怎么理解的?”

1971 年 3 月 2 日,在北京大学办公楼礼堂召开全校的自首坦白大会。大会主席宣布坦白交待开始以后,原北大“井冈山”的负责人牛辉林第一个上台发言。他说:

“在洪涛的介绍下,我参加了‘516’反革命集团,并且发展了你们。”“我攻击江青,还作了反军演说,在王、关戚的操纵下搞打砸抢”。他重点宣传不要搞攻守同盟,说:“那是建立在私字上的,是靠不住的。过去我把名单交给了洪涛,现在我把名单交给了工宣队和军宣队。你们不要抱有幻想,攻守同盟是靠不住的,你们快坦白吧。”

第二个上台坦白的是“井冈山”的屈长江。他说牛辉林发展他参加了“516”,他忆苦思甜,痛恨自己上当受骗。

第三个上台的是“新北大公社”的方洗德。他说:在 1967 年 4 月 13 日晚,孙蓬一在全校大会上煽动炮打谢富治后,他罪恶地贴了谢副总理的大字报;在北大野心家的授意下,“以抓叛徒为名整了周总理和江青同志的黑材料”。

方洗德发言后,台下又有几个人站起来要求上台坦白。会议主席说:“今天,要坦白的人很多,由于时间关系,就不一一上台坦白了。”他说清查“516”的形势大好,并介绍了北大“516”的情况,是“几条线,一条根”。

3 月 5 日,北京大学江西分校召开揭发、批判孙蓬一、聂元梓反军、乱军问题大会。

我们再看北京地院的王大宾,他于 1969 年 1 月分配到四川成都探矿机械厂工作。临行前,周恩来特意抽空接见了他,嘱咐他下去后不要介入四川两派群众组织的派仗,还建议他改名。于是,王大宾便用“王毅”的名字来到成都探矿机械厂。

1971 年 3 月 9 日,北京地院军宣队李凡茂等人派专机到成都,将王大宾从成都抓回北京地院关押审查。这时,王大宾的未婚妻古宝琳也从地院毕业分配到了成都地质修配厂,他们正准备 1971 年 5 月 1 日结婚,没想到 3 月 9 日王大宾抓走。那天凌晨,当王大宾被押上汽车时,古宝琳紧追过来,强忍眼泪,痛苦地目送他离去。王大宾紧贴车窗口见到此情此景,不知这次分离何时才能相见,心似刀割。

王大宾被抓最大的一件罪行就是“为彭德怀翻案”。军宣队指控

他和1966年12月被派去四川抓彭德怀的地院王大来一起,“与彭德怀密谋,反对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反对从四川揪彭德怀回北京”。而“东方红公社”在其小报上,不加批判地全文登出彭德怀1959年在庐山会议上写给毛主席的“万言书”,就是别有用心为彭德怀翻案制造舆论。

另外,军宣队还指控王大宾:

1、与杨成武、傅崇碧关系密切,支持军队“冲派”,揪军内一小撮,反对林彪,企图让杨余傅上台;

2、在中央领导人的一次接见时,江青批评他时,顶撞江青,说江青的批评不符合事实,反对攻击江青;

3、地院“东方红”参与了1967年7、8月发生的“揪刘火线”活动,围困中南海。说他们揪刘少奇是假,目的是要搞反革命政变,反对周恩来,要揪出周恩来,让刘、邓上台。并说地院保护了邓小平的弟弟邓垦就是证据。

王大宾从四川工厂抓回北京地院后,被关进了有铁栏、铁门的房间近两年之久,开了几十次大小批斗会,每天的车轮审讯,逼他承认反对周恩来,并参与组织了地院的“516”组织。

为“地质学院5.16兵团”案,不仅关押了王大宾,还有许多师生,其中有文革起来造反的地院干部张海涛、李贵等,连高元贵、王焕等文革前的院领导也被说成是“地院516兵团”的黑高参。

王大宾听了1971年5月31日,财贸口群众批斗大会上,中央财金学院“八八战斗队”的头头敖本立被宣布公开逮捕的大会录音,听了北师大批斗谭厚兰的录音。

地院水文系教员朱思贵是专案组长,他和空军学院驻地院军宣队的李凡茂给王大宾训话时说:“除了聂元梓不是‘516’外,所有的大小头头都是‘516’。”“你住的这个房子,原是张海涛住的。他出身也很好,你是知道的,一个贫农孤儿,14岁参军入关的解放军小战士,顽固到底,临到逮捕他之前一天,他还说,他不是‘516’,说以他的党籍担保,地院不存在‘516兵团’,不要搞无辜的师生们呢!现在好了,关在牢里,头发长得很长,后悔了,你别走他的老路。逮捕张海涛那天,李贵跳楼摔断腿了。唐威正也当场吓得站不住了。陆炎德识时务为俊

杰,他承认了,学习班也没进,地院‘516’的盖子就是这样揭开的。已一年多了,你现在不要顽固,没好下场的。”

对这些指控,王大宾坚决不承认。他坚持说:“外校的情况我不知道。地院的情况,我知道,贾振远录音中讲的是假话。地院根本不存在‘516兵团’,我不是‘516’。李贵、王焕、高元贵也不是,地院各级革委会的成员都不是。你们千万别上当,把问题搞错了。”

1972年春节前,王大宾押往地院江西干校批斗。他的老师宋祥彦已被关押460天,那天也被押上台陪斗。

第二天就是年三十了,宋祥彦的爱人刘照明老师上台发言,劝宋祥彦说:“承认了吧。小牛牛很想你回家过年。牛牛说,爸爸你就承认是‘516’吧,你就能回家过年的。你承认了吧,为了小牛牛。”

小牛牛是宋祥彦和刘照明他们4岁的儿子。刘老师声泪俱下的发言,让台上挨斗的王大宾撕心裂肺的痛。

也许是4岁儿子小牛牛的话太刺痛了宋祥彦的心,被朱思贵称为“臭狗屎”的他,为了小牛牛,终于违心地承认是“516”了。

为了“516”,地院李思田老师被逼用电自杀未死。李明哲老师被关押在地院江西干校,逃到山上吊死山中,两个月后才被上山农民发现。正是冬天,尸体已开始腐烂,目不忍睹。被迫害自杀的还有魏小平、李仲学、王海洪等学生。

王大宾的未婚妻古宝琳也成了抓“516”的重点清查对象,多经折磨,几乎整死。

王大宾的妈妈没有文化,大字不识几个,是山沟里的妇女,也被追问、审讯是否“516”。可怜这位山里的妇女说:“我虚岁刚过五十,还没有五十六。”

# 第1165回：离苏州，林彪回到北戴河 抓艾玲，上海清查“五一六”

1971年3月7日，林彪携妻子叶群乘火车离开苏州，又回到北戴河。

此时的北戴河，海边依然是寒风萧萧，一片肃杀。夏日人头攒动拥挤不堪的海岸线，此时显得格外空寂而辽阔。

中央领导人用来消夏避暑的别墅区里，除了一些工作人员看管空房子外，很少再见首长们的身影。但是林彪却在这个最为清淡的季节里住进自己远离海边，也远离其他领导人的北戴河东联峰山莲花石旁的别墅。此别墅也叫莲花石别墅，又因在北戴河中直管理处别墅楼中排序96号，亦名96号楼。可它与毛泽东的95号别墅相距甚远。因为林彪是毛泽东最亲密的战友，故而别墅也被亲密地连了号。不过后来当地老百姓还是喜欢直呼其“林彪楼”。

这座楼是林彪如日中天时修建的，按照林彪提出住得离热闹的地方远点，离其他首长远点，离海边远点的“三远点”要求，最后选址在距

北戴河西海滩两公里处,原莲花石公园内的联峰山莲花石旁,一处被大火烧毁的“松涛草堂”旧址上,1969 年完工。整座楼格局与毛家湾类似,呈“工”字形,东西“两横”, 分别是林彪、叶群的卧室、会客厅、办公室和室内车库。林彪住在东边,叶群住在西边。中间“一竖”,是走廊和工作人员的住处,这里既安全又安静。

这个青灰色工字型二层小楼,外观很普通。但内部设施颇具匠心。室内墙壁极为宽厚,木质门窗非常坚硬,窗户全部用厚重的红色落地窗帘遮掩,密不透风。一楼分别有林彪和叶群的卧室、盥洗室和办公室。

林彪卧室西墙上有四个用来放电影的放映孔,大小高低有序。

在一楼转角处有一个室内游泳池,是专门为叶群设计建造的。

别墅旁是利用山的地形建造的车库,十分隐蔽,有从车库到楼内的汽车通道,汽车可以直接开进客厅里。

林彪因为战争年代负伤,伤到了中枢神经,从此怕风怕水。所以在他的别墅可以看见一处特殊的设施,一个带有屋顶天窗的日光浴室。林彪经常躺在天窗下的大躺椅上闭目养神,既享用了温暖的阳光,又躲开了风雨侵袭。这个天窗下的咫尺寸方世界不仅是林彪修复伤病的地方,也是思考问题的地方。

1971 年 3 月 28 日,第三十一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将在日本名古屋举行。3 月中旬,为中国乒乓球队是否参加日本举行的三十一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一事,出现了两种不同意见。其中不赞成去的意见占多数,理由是获悉国外敌对势力企图对中国队参赛进行破坏活动,去了危险性很大。当然,其中还有一个原因:自文革开始后,中国的兵乓球队已近 5 年没有训练,如此出征,当年的乒坛世界冠军一旦输了怎么办? 对此,周恩来以很大耐心说服不同意参赛的一方。

3 月 15 日,周恩来在给毛泽东的报告中说:“我乒乓球队拟仍前往日本名古屋参加三十一届国际乒乓球比赛。到日本后支持柬民族团结政府不承认朗诺集团的球队为合法,并主张驱逐,对南越卖国集团派的球队,亦采取同一态度,对以色列也询问阿联、叙利亚的态度。如不成,就避开与他们比赛。我球队如去,当作好各种警戒准备。此次出国参赛,已成为一次严重的国际斗争,我方提出‘友谊第一,比赛第

二’,即使输了也不要紧。”

当天,毛泽东批示:“照办,我队应去,并准备死几个人,不死更好。要一不怕苦,二不怕死。”

这天,毛泽东对两报一刊编辑部文章《无产阶级专政胜利万岁》送审稿写了如下批语:

“看了一遍,觉得可用。

只在18页上去掉一个词,以便突出马列。17页上已有了这个词,也就够了。我党多年来不读马、列,不突出马、列,竟让一些骗子骗了多年,使很多人甚至不知道什么是唯物论,什么是唯心论,在庐山闹出大笑话。这个教训非常严重,这几年应当特别注意宣传马、列。“

3月18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编辑部社论《无产阶级专政胜利万岁——纪念巴黎公社一百周年》。

文章认为:

巴黎公社。这是人类历史上出现的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是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第一次伟大尝试。

巴黎公社废除了资产阶级反动政府的军队和警察,用武装的人民来代替它,把枪杆子掌握在工人阶级的手里。

巴黎公社打破了资产阶级奴役人民的官僚机构,创建了工人阶级自己的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维护劳动人民利益的政策,组织人民群众积极参加国家的管理。

无产阶级的伟大导师马克思和恩格斯根据巴黎公社的实践所总结的革命原则是什么呢?

概括起来说,就是:“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无产阶级必须用革命暴力“摧毁”和“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实行无产阶级专政”。

文章提出:暴力革命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普遍原则。

同时还说:革命群众运动的主流总是好的,总是适合社会发展的。

文章再次提到了毛泽东“继续革命”的理论: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这个历史阶段中,始终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而斗争的中心问题仍然是政权问题。失败的阶级还要挣扎,这些人还在,这个阶级还在。他们为了复辟资本主义,总是要在

共产党内寻找他们的代理人。

上海1968年“412”炮打张春桥失败后,《文汇报》的朱锡琪等人受到批判,《文汇报》“北办”负责人艾玲大为惊慌。几天之后,在北京的艾玲主动向“中央文革”写了一份检查,表示自己给上海《文汇报》打电话传小道消息是错误的,但申明自己没有参与报社的“炮打”。这份检查送到了陈伯达的手里,陈伯达专门召见了艾玲,当面安抚并鼓励她说:“你写了一份又长又好的报告!”艾玲见陈伯达不但没有批评她,居然还称赞自己的检查,简直有些受宠若惊,当场表示要加倍努力地为“无产阶级司令部”工作。“九大”之前,张春桥特别提名,让艾玲作为上海革命知识分子的代表出席“九大”。艾玲对此感激涕零,她在回上海参加“九大”代表学习班时,眼眶里含着热泪对徐景贤说:“我真没有想到……我实在不相称……”

“九大”闭幕以后,艾玲的政治地位节节上升。她调回上海任《文汇报》革委会主任,并补选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常委,成为上海新闻界的头面人物。

《文汇报》军宣队是上海空4军派驻的。庐山会议后,王维国通过《文汇报》军宣队负责人,多次把艾玲请到空4军军部去。特别是在上海市第四届党代会期间,作为第四届党代会的代表的艾玲,几次在散会后,被接到巨鹿路的空4军招待所,和王维国等一起吃饭,并作较长时间的谈话。这些情况,很快被时任上海警备区副政委兼上海市革委会文教组一把手的徐海涛察觉了。党代会期间,艾玲就编在他的小组。徐海涛将这些情况向张春桥、王洪文和徐景贤作了报告。

张春桥听了大吃一惊,马上要徐海涛核实消息是否确凿。结果徐海涛又一次报告:就在上海市四届党代会选举市委领导人之前的那个中午,艾玲又被请到巨鹿路空4军招待所吃饭去了。

1971年3月21日傍晚,上海市四届党代会刚刚结束,张春桥把王洪文和徐景贤两人召到兴国路招待所五号楼。在客厅里,张春桥开门见山地说:“找你们两个来要办一件事:根据毛主席的指示,要对艾玲进行隔离审查!”

张春桥没有说毛泽东什么时候作的指示,也没有说要对艾玲的哪些问题进行审查。王洪文坐在沙发上抽着烟,徐景贤在一旁屏息静气

地倾听,谁都不敢提问。

张春桥一反往常慢悠悠的神态,断然地说:“今天晚上就采取措施。可以把她放在少教所。”

“少教所”的全称是少年犯罪教养所。1968 年,这里就成了关押、审查、上海市党政领导干部和文化界知名人士的场所。

张春桥进一步布置说:“注意不要出事……还可以派几个可靠的人,到《文汇报》她的住处去,把一些重要的材料,包括《海瑞罢官》批判的有关资料,连同她的笔记本等等,统统集中起来,不要散失!”

张春桥最后又部署了具体的行动方案。

从兴国路招待所出来,王洪文和徐景贤回到康平路市委小礼堂贵宾室,紧急召来两个信得过的人,委任为艾玲项目组的负责人,并布置他们先审查艾玲卷入 1968 年“412 炮打”的问题。接着,徐景先让秘书小张通知艾玲和《文汇报》军宣队负责人老余一起到市委来开紧急会议。为了稳妥起见,还特意派小张乘着市委汽车队的轿车去《文汇报》社接人。

这天深夜,借住在《文汇报》社整理复旦大学理科大批判组提供的理科大批判资料的王绍玺,忽然接到徐景贤秘书通过报社转来的电话,通知他马上到康办贵宾室开会。王绍玺赶到后,看见房间里除王洪文、徐景贤外,还有几个人都不认识,而且似乎那几个人互相也不认识。经王洪文介绍才知道,其中一人是市公检法军管会副主任、空 2 师师长刘忠朴,另一人是市专案办负责人翁默清,第三人是市文攻武卫指挥部领导成员郑惠仪。王洪文说:“找你们开这个小会,是因为出现了紧急情况,朱锡琪在干校听说要清查‘5.16’畏罪潜逃。清查‘5.16’,北京、江苏早已开始,声势很大,我们一直没有动。张春桥要我们马上行动,今天就有个任务。”

原《文汇报》造反派头头、市革会常委朱锡琪,此时因“4.12”炮打张春已被挂职到“五七干校”劳动。

外面传来汽车的停车声,贵宾室的玻璃门打开了,穿着短呢大衣,脚登软底女鞋的艾玲跟在王洪文的秘书小廖后面走了进来。《文汇报》军宣队负责人老余穿着空军制服,跟在她的后面。

艾玲进门后,发现王洪文、徐景贤二人一改平常的客气态度,没有

站起来和她热情握手,而是板着面孔,先是一愣。又看到其他人除王绍玺外都不认识,更显得不安。

王洪文示意她在侧面靠墙的小沙发上坐下,军宣队老余坐在她旁边,室内的空气显得紧张而凝重。艾玲下意识地打开手里的拎包,取出钢笔和笔记本,然后戴上那副常戴的黑边老花眼镜,准备随时做记录。

王洪文咳了一声,缓缓地说:“找你们来,是要宣布一件事:根据领导的指示,从现在起,对艾玲施行隔离审查!”

艾玲的笔顿时停住了。她蹙紧眉头,脸色发灰,慢慢地取下老花眼镜,看着王洪文,木然不动。

王洪文不知再说什么,就示意徐景贤讲话。徐景贤似乎还没有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虽也板着面孔,却用低沉平和的语气说:“要你交代问题,是春桥同志提出的,你要明白事情的严重性,不要心存侥幸。你交代问题不论涉及什么人,都可大胆实事求是地写下来,自己密封,指定交给春桥同志或其他中央领导,我们保证按你的要求传送。”

艾玲没有说话,只是朝徐景贤看了一眼,眼神里充满着困惑、抱怨和绝望的神情。她缓缓站起来,仍然蹙着眉头,默默地随着小廖走了。

把艾玲带走后,王洪文、徐景贤他们又把《文汇报》革命委员会副主任邵传烈带进室内。此时,邵传烈已经很紧张了,王洪文对他说:“看见艾玲了吗?你要端正态度,大胆揭发并交待自己的问题。”

徐景贤说:“你也犯过错误,但和他们不同。当务之急,是把报纸办好,千万不出什么问题,你知道他们有什么问题,要大胆揭发。”

王洪文说:“曾经和艾玲一起在北京办事处的,要拉到报社外办学习班,不用你们掺乎。”

徐景贤问:“原北办的人都去参加学习班,对报社工作会不会有影响?”

邵传烈说不会有影响。徐景贤又说:“有什么困难及时与我们联系。你要振作精神,把报纸办好。”

邵传烈走后,王洪文向与会的人宣布了以下事项:

建议成立一个清查“516”的工作班子,因为上海已有一个专案办了,这个清查“516”的工作班子就叫“二专办”,办公地点在宛平路11

号的一幢小楼里。王洪文强调:“班子要精干,目前只设一个艾玲专案组。各系统的清查由他们自己负责,你们只负责联络勾通。”

当夜,王洪文派刚成立的“二专办”翁默清和王绍玺到《文汇报》社,向报社另一个造反派头头周国荣宣布市委对他隔离审查的决定。这时他们发现,周国荣因参加报社劳动扭伤了腰,行动不便,便准备向王洪文报告。王洪文的秘书小廖没有理睬,将周国荣带走。当晚,周国荣和艾玲都被送进了位于上海西郊漕河旁“少教所”的隔离室。

紧接看,艾玲专案组的人奉命抄了她的办公室和宿舍,把有关《海瑞罢官》批判的资料和笔记本等贴上封条,直送兴国路张春桥办公室。

次日,根据王洪文的指示,王绍玺和郑惠仪一起,在外滩市革会大楼里,向正在上海学习的《文汇报》“北办”全体编辑、记者等10多名工作人员宣布,市委决定对他们举办揭发艾玲学习班的决定。然后,郑惠仪把这些人安置在市文攻武卫指挥部底层的房间,这里是原苏联领事馆。

上海“二专办”成立后,大家对什么是“516”并不清楚,几经要求,王洪文提供了周恩来及纪登奎、李作鹏等关于清查“516”的讲话稿,均非正式文件,且是节录,大家看了仍如在云里雾里。这时,徐景贤告知:“清查‘516’的最重要依据,是毛主席为姚文元1967年8月发表的《评陶铸的两本书》一文中加进的一段文字:“516”是一个穷凶极恶的反动组织,主要罪行是制造分裂,反对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人数不多,但隐藏很深,背后有黑手操纵指挥;活动以北京为主,有的已分散隐藏到各地了。”

# 第1166回：北戴河，恩来向林彪汇报 睡朦胧，邀请美乒乓访华

3月23日，毛泽东通过江青转告："由周恩来、康生、江青先商量一下，给黄永胜等人创造一次机会，让他们在一定范围内作检讨，不要再失去机会了。"

23日下午，周恩来与康生、江青商定：再召开一次中央批陈整风会议，进一步批陈，并联系自我教育。向毛泽东汇报后，毛泽东提出，此事应向林彪汇报。

3月24日，毛泽东在黄永胜3月21日的书面检讨上作了如下批示："黄永胜、邱会作、李作鹏三同志的检讨都看了，我认为写得都好。以后是实践这些申明的问题。只在黄的第二页上有一个注语，请各同志注意。"

黄永胜书面检讨的第二页上有段话"过去我对反党分子陈伯达这个人有迷信，被他所渭'天才理论家'、文化大革命'有功'、'小小老百姓'等假象所迷惑。"毛主席对这段话批注："陈伯达早期就是一个国民党反共分子。混入党内以后，又在一九三一年被捕叛变，成了特务，一贯跟随王明反共。他的根本问题在此。所以他反党乱军，挑动武斗，挑动军委办事组干部及华北、军区干部，都是由此而来。"

黄永胜在检讨中还提到1970年5月17日江青召集他们开会的事："第三、五月十七日下午，政治局七八个同志一起谈了一些问题，涉及的人和问题较多。当时，我们感到问题较大；所以法宪、作鹏、会作同志和我曾两次在一块商量，一致意见要向主席报告。当天晚上，我和法宪同志便到主席那里去汇报。结果干扰了主席，问题也没有说清楚。两次四个同志在一起商量，而德生同志没有参加，这实际是一种宗派主义的情绪。"

24日下午，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约周恩来、康生、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纪登奎、李德生和汪东兴谈批陈整风问题。

毛泽东说：

“我捡了两块石头，一是三十八军的报告，砸了一家伙，这一下与陈伯达划清了界限。这块石头，我砸出去以后，起了一些作用。真理不一定在我们这一边，往往在下边，三十八军做了很好的调查研究，他（指陈伯达）讲了几次话，文件在那里，都清清楚楚。我看了济南军区的报告，又砸了出去，砸了骄傲自满的人。”

毛泽东又说：“积代会这么多不好，有的青年人去讲假话，不联系实际。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次事情（指1970年的庐山会议）就出在没有调查。第一是黄永胜、李作鹏、邱会作三人的检讨，我看了，批了很好，可以过关了。第二是吴法宪、叶群的检讨虽然写过多次，现在看来不够了，要再补写一个。第三是吴法宪多次要求见我，我没有见，要见今天一起见。第四周恩来带你们几个到北戴河，去向林彪同志汇报。”

毛泽东提到的“积代会”，是指当时盛行的“学习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他同意召开一次批陈整风汇报会议。

25日，周恩来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传达毛泽东谈话内容，决定召开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同日，约中央军委办事组成员开会，商量按毛泽东意见修改黄永胜等3人的检讨。

3月26日，周恩来派专人将黄永胜、李作鹏、邱会作三人的检讨送给北戴河的林彪，并告知准备亲赴北戴河向林彪汇报。

3月29日，周恩来致信毛泽东，报告3月24日至29日几次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内容，并告知，他准备和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李德生、纪登奎于29日晚前往北戴河，向林彪汇报。并说，现吴法宪、叶群也在重写他们的检讨。又告：“我们外出两天，拟仍按上次外出规定，党的宣传组织工作由江青、姚文元负责，政府事务由李先念负责，军委工作由刘贤权、阎仲川商办。”

毛泽东批示：“同意。

据李德生后来回忆说：“在华北会议的基础上，中央准备召开批陈整风汇报会。周总理带着我和黄、吴、李、邱去北戴河看林彪。总理告诉我，此行的目的，是毛主席要林彪出来参加一下即将召开的批陈整风汇报会，讲几句话给他个台阶下。”

29 日当晚,周恩来和黄永胜等 6 人前往北戴河,并在 3 月 30 日、31 日两天,向林彪传达了毛泽东对批陈问题的多次批示和谈话,以及拟召开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的安排。同时,还介绍了叶剑英带领专案组在广东调查陈伯达的情况和陈伯达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问题。同时,黄永胜汇报了战备工作情况;李德生汇报了华北会议情况;纪登奎汇报了国务院的工作情况;周恩来还谈了外交工作情况。

汇报完以后,林彪表示:完全拥护毛主席关于召开中央工作会议的意见。同意毛主席对黄、李、邱的批示。对三人检讨很高兴。

当林彪听周恩来说,毛泽东对吴法宪、叶群的检查不满意时,林彪“要求”他们“重写一次”。并说:“他们是无心插柳柳成荫。”

对陈伯达的问题,林彪很震惊地表示:绝没想到陈伯达问题那样严重,这次把陈伯达揪出来,是“很大胜利”,“完全同意”中央召开批陈整风汇报会议,把批陈引向深入。

谈话中,林彪承认自己也“犯错误”,是个“炮筒子”,“讲话有气,脱口而出,放了炮”,被陈伯达“利用”了。林彪还为他在庐山会议上讲话作了辩解。

当周恩来动员林彪出席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时,林彪不表示出席,也不表示不出席,没有说话。

3 月 30 日,毛泽东对刘子厚在河北省“批陈整风”会议上的检查作了批示,指出:“上了陈伯达贼船,年深日久,虽有庐山以来半年的时间,经过各种批判会议,到 3 月 19 日才讲出几句真话,真是上贼船容易下贼船难,人一输了理(就是走错了路线),就怕揭,庐山会议上的那种猖狂进攻的勇气,不知跑到哪里去了。”毛泽东还在刘子厚检查的最后一页批示:“这还只是申明。下文如何,要看行动。”并批告:“此件留待军委办事组各同志一阅。”

3 月 30 日,中央正式批准撤销山东省革委会主任王效禹的职务。4 月 14 日,王效禹下放到辽宁盘锦垦区的西安农场填鸭厂劳动,生活待遇还比较高。后来,也被撤职的贵州省革委会主任李再含同样安排到这里劳动,两位文革早期的老干部造反派走到一起。当时肖华也在此。

4 月 1 日,周恩来在给毛泽东的信中说:“林副主席要我们转报主

席,他对主席从庐山会议以来的一系列指示和工作部署,关于今后的工作方针和措施,都完全拥护和支持,并认为完全正确,效果显著。这次会议把陈伯达揪出来,真是最大胜利。他对几位同志(黄永胜等人)的检讨很高兴,要吴法宪、叶群同志重新写一次书面检讨。”在结尾,周恩来说:“我们表示希望林副主席在春暖花开时回到北京,林副主席听了很高兴,要我们代向政治局同志问好。”

当天,周恩来到毛泽东处开会,并汇报北戴河之行的情况。虽然周恩来汇报时,尽量为林彪说些好话,但是林彪没有明确表示回京参加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的事实却无法回避。据李德生后来回忆说:“毛主席听了汇报后,当面指着黄、吴、李、邱十分严厉地批评道:‘你们已经到了悬崖的边沿了!是跳下去?还是推下去?还是拉回来的问题。能不能拉回来全看你们自己了!’”

4月3日,周恩来约江青、姚文元、汪东兴、纪登奎、李德生等人开会,讨论中央关于召开批陈整风汇报会通知事。

会后,周恩来为中共中央起草开会通知。该通知经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毛泽东批准后于4月5日发出。

4月3日,林彪、叶群离开北戴河去大连。叶群是坐专机当天到达,林彪坐专列第二天到达。

1971年3月27日,第三十一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在日本名古屋开幕。按照惯例,开幕那天,国际乒联举行招待会。主人致词之后,大家就举着酒杯随意走动起来,这时几个热情奔放的美国选手与中国运动员相遇,他们兴奋地说:“啊,中国人,好久不见了。你们的球打得真好!”那时中美关系十分敏感,中国代表团领导立即将此情况向国内作了汇报。这毕竟是中美运动员之间的一次邂逅,所以国内方面也没有什么反应。

中国队获得男子团体冠军之后,中美两国选手在游玩中又碰到了一起。热情爽朗的美国青年笑着问:“听说你们已邀请我们的朋友(指加拿大队和英国队)访问你们的国家,什么时候轮到我们啊?”

中国队负责人再一次向国内报告:“美国队希望访华。”

4月4日,美国男队第三号选手格伦·科恩到训练馆练球,不想出来后,竟然找不到自己来时乘坐的汽车。正在这时,一辆带有乒乓球

锦标赛标志的大轿车开了过来,科恩情急生智,连连招手,轿车在他身边戛然停住,科恩赶紧跳上车,长吁了一口气。当他抬头环顾车内时,不禁暗自吃惊,原来同车的全是中国人。于是他独自站在车门口,没有找位置坐下。

这时,坐在车子后边的庄则栋从座位上站起来,走到科恩身边,通过翻译和科恩聊了起来。庄则栋对科恩表示欢迎并向他赠送了中国礼品。这一意外的举动把科恩乐坏了,他和庄则栋肩并肩站在一起直到抵达爱知县体育馆,他们俨然成了好朋友。

这一幕被敏感的记者发现,他们把照相机对准了庄则栋和科恩,此情此景立即成为各大报纸头版头条的新闻。

中美两国运动员友好交流的举动更加触动了美国队。他们的副领队来到中国队的驻地,开门见山问中国队的负责人:“你们中国邀请我们南边的墨西哥队去访问,也邀请我们北边的加拿大队,你们能不能也向我们美国队发出邀请呢?”

美国队这次正式提出访华的要求的确非同小可。中国领队不能当场答复,马上向国内请示。这份请示电报送到了国家体委,国家体委立即和外交部磋商,一致做出了“不邀请美国乒乓球队来访”的决定,认为目前时机还不成熟。决定的报告4月3日送到周恩来手里,他也在报告上写了“拟同意”三个字和一段批语。

4月4日,报告继续上报到毛泽东手里。经过三天考虑,4月6日,在世乒赛即将闭幕的前夕,毛泽东也在自己的名字上画了圈,并要他的护士长吴旭君看完这份文件后退给外交部办理。

这个拒绝美国乒乓球队访华的报告似乎就此尘埃落定。如果没有后面的转折,这份报告在中美交往史上只是一份入档保存的文件而已。

4月6日,就在退回这份报告后的当天晚上,周恩来过来向毛泽东报告美国国务院3月15日宣布取消对持美国护照去中华人民共和国旅行的一切限制,也谈起了外交部和体委的负责人讨论是否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的分歧……

周恩来走后,毛泽东吃完饭,坐在床边。这天,他提前服了安眠药,可就是不肯躺下睡,一直坐在床边。因为吃了大量的安眠药,他困

极了,低着脑袋,就这么低着头睡,不肯躺下。

过了一会儿,只见毛泽东嘴里嘟嘟哝哝的,他突然间说话了,但听不清楚说的是什么?正在旁边吃饭的值班护士长吴旭君见状赶紧过来,听了半天,终于听出来了,毛泽东是要她去给王海容打电话,说要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

“我的天哪,”吴旭君一听这话当时就愣了。“这跟白天退走的文件正好相反,文件上可是总理和主席都画了圈的,要是办错了怎么办?”

而且,毛泽东自己有过交代:他吃了安眠药以后说的话不算数。“那毛主席现在交待的这件事就是他吃了安眠药后讲的话,那还算不算数呢?”

吴旭君提醒自己,“这么大的事可不能轻举妄动。”她得想一个办法来证实主席现在到底是清醒还是不清醒。她仍然呆在那里没有动身,继续吃饭。

过了一会儿,毛泽东勉强地抬起头来,使劲睁开眼睛看着吴旭君说:“小吴,你还坐在那里吃呀?我叫你办的事你怎么不去办呢?”

吴旭君故意反问:“主席,你刚才都跟我说了什么啦,我尽顾吃饭了,没听清楚,你再跟我说一遍。”

毛泽东又断断续续,一个字,一个字地、慢慢吞吞地把刚才交待的事重新说了一遍。

吴旭君还是不太放心,反问他:“主席,你都吃过安眠药了,你说的话算数吗?”

毛泽东把大手一挥,说:“算!赶快办,要不就来不及了。”

听了这句话,吴旭君拔腿就往值班室跑,给外交部打电话。通完电话回来,只见毛泽东还坐在那里等她回信。吴旭君把情况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听完后点头表示:“好,就这样。”

4月7日晨,周恩来根据毛泽东作出的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的决定,立即告外交部以电话通知在日本的中国乒乓球代表团负责人,对外宣布正式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问中国。

当天,中国外交部电话通知在日本的中国乒乓球代表团:“对外宣布:正式邀请美国队访华。”

中国人邀请美国乒乓球队的消息一传到名古屋,日本各大报纸都在头版显要位置登出有关报道,并大加评论。

消息很快传到美国白宫,美国政府惊呆了,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后来回忆道:

“这个消息使我又惊又喜。我从未料到对华的主动行动会以乒乓球队访问的形式得到实现。我们立即批准接受了邀请。中方做出的响应是发给几名西方记者签证以采访球队的访问。”

尼克松总统立即批准接受邀请。当时《环球时报》刊登的《乒乓外交决策内幕》一文这样描述尼克松总统的反应:“我从未料到对华的主动行动会以乒乓球队访问的形式求得实现。”

世界轰动了,看似体育界之间的交流一下子成了举世瞩目的重大国际事件。8 日晨,周恩来在国家体委关于接待美国等国乒乓球队的请示件上批注:“(邀美国队访华的)电话传过去后,名古屋盛传这一震动世界的消息,超过三十一届国际比赛的消息。”

4 月 14 日,美国宣布结束已存在 20 年的对中国贸易的禁令。

尼克松还下令采取一系列新的步骤,放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货币和航运管制。

4 月 14 日下午 14 时 30 分,周恩来面带微笑地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会见了应邀来中国访问的加拿大、哥伦比亚、英格兰、尼日利亚和美国乒乓球代表团全体成员。周恩来与代表团成员一一握手后,坐在美国乒乓球协会主席斯廷霍文团长旁边的沙发上,发表了讲话。他引“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的古语,对他们表示欢迎。

他说:“你们作为前来中华人民共和国访问的第一个美国代表团,打开了两国人民友好往来的大门。尽管中国和美国目前还没有外交关系,我相信中美两国人民的友好往来,将会得到两国大多数人民的赞成与支持。”

周恩来略略提高了声音说:“欢迎你们!”

周恩来身边的斯廷霍文马上回应:“我们也希望中国乒乓球队访问美国。”

周恩来立即肯定地回答:“可以去!”

美国代表团的成员对此报以热烈的鼓掌。

他在回答美国队员格伦·科恩询问对美国青年中流行的嬉皮士运动的看法时说:现在世界青年对现状有点不满,想寻求吗。青年思想波动时会表现为各种形式。但各种表现形式不一定都是成熟的或固定的。按照人类发展来看,一个普遍真理最后总要被人们认识的,和自然界的规律一样。我们赞成任何青年都有这种探讨的要求,这是好事。要通过自己的实践去认识。但是有一点,总要找到大多数人的共同性,这就可以使人类的大多数得到发展,得到进步,得到幸福。

美国乒乓球队的访华在美国本土更引起强烈反响,掀起了一股“中国热”。中国与美国民间之手已经握在一起,距离两国的官方握手也就为时不远了。

4 月 21 日,周恩来通过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向尼克松发出了一个重要口信:

要从根本上恢复中美两国关系,必须从中国的台湾和台湾海峡地区撤走美国一切武装力量。而解决这一关键问题,只有通过两国高级负责人直接商谈,才能找到办法。因此,中国政府重申愿意公开接待美国总统特使如基辛格博士,或美国国务卿甚至美国总统本人来北京直接商谈。

尼克松接到这个口信后很是高兴。他和基辛格都意识到:中美关系已经到了一个关键时刻,必须冒一点风险提出一个主要的建议,否则就有可能退回到另一轮长期的试探和摸索阶段。“迈出更大的步子和提议进行总统访问的时候已经到来”,尼克松做出了这样的决断。

4 月 29 日,尼克松通过巴基斯坦驻美大使对周恩来 4 月 21 日的口信回话,表示诚挚谢意,愿在两三星期内给予答复。

# 第1167回：四一五，批陈整风汇报会 庆五一，陈毅身患结肠癌

4月7日，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决定纪登奎、张才千参加军委办事组，为该组组员。

4月9日，叶群、吴法宪又交上了他们的检讨。吴法宪在4月9日检讨中也提到1970年5月17日江青召集他们开会的事，称："去年五月十七日下午政治局七、八个同志在一起谈了一些问题，永胜、作鹏、会作同志和我两次在一起商量，一致意见，要向主席报告。当天晚上，永胜同志和我一起向主席作了汇报，结果干扰了主席。"

4月11日，毛泽东关于黄、吴、叶、李、邱的自我批评的批语：

恩来同志：

吴法宪、叶群二同志重写过的自我批评，我已看过，可以了。请连同黄、李、邱三同志的自我批评，向政治局会议报告，作适当处理。

4月14日，毛泽东决定中央召开批陈整风汇报会时，把黄永胜、吴法宪、叶群、邱会作、李作鹏的检讨及毛泽东相关的全部批语在会上散发给大家。这一举措，使黄永胜、吴法宪、叶群、邱会作、李作鹏更加紧张，频频向林彪告急。

林彪依然躺在北戴河日光浴中迎着刺目的日光与窗外灿然的春意，苦思冥想……在毛泽东对周恩来就这次会议安排问题的请示报告上批示"同意"后，林彪让秘书写上"完全同意主席批示和会议安排"，并特别注明"遵嘱代写"的字样。

周恩来会见美国乒乓球队的第二天，即4月15日，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在人民大会堂拉开帷幕。参加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的有中央、地方和部队的负责人99位，加上正在参加军委座谈会的143人。其中包括陈毅、徐向前、聂荣臻、邓颖超等人。

在第一次全体会议上，周恩来回顾了自九届二中全会以来开展批陈整风的过程，说明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5人几次失

掉自我教育机会,在毛泽东一再督促下才做出检讨。针对军委办事组一直批陈不力的问题,周恩来主动承担了责任,希望在庐山会议上犯有错误的同志能够联系实际,搞好自我教育。他说:“我们这个会议的目的,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从团结的愿望出发,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

会上,黄永胜、吴法宪作了检讨发言。

4 月 15 日下午,在北戴河的叶群打电话给吴法宪,要黄永胜、吴法宪每天通报一次情况。

4 月 15 日至 19 日,批陈整风会议分几个大组进行讨论。周恩来参加了东北组讨论。

4 月 18 日,汪东兴在批陈整风汇报会的华北组小组会议上又作了第三次检查。

周恩来托人带话给黄永胜、吴法宪、叶群、邱会作、李作鹏,说“毛主席的‘很好’和‘可以了’的意思都是一样的。”他的目的是缓解吴法宪和叶群两人对毛泽东要他们重写书面检讨的紧张情绪。实际上,黄永胜等人在庐山会议后已成惊弓之鸟。吴法宪甚至闹着要跳楼自杀,半夜做噩梦从床上跌倒地上,大喊“林副主席救命”。

为了避免扩大矛盾引起更大混乱,周恩来尽量协调各方矛盾,但参加会议的大多数委员却不卖账。他们基本不知道中央高层曲折的内幕。

庐山会议以后,上海的王洪文在抓上海“批陈整风”的同时,也注意加强自身的学习,认真读几本马列的书。他和徐景贤结成“一帮一、一对红”的对子,每天上午在徐景贤家一起读《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以后又组织市委常委共同学习列宁的《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有了一些学习体会以后,王洪文接受徐景贤的建议,由徐景贤代他起草了一份向毛泽东和党中央的书面报告,汇报自己学习马列著作的情况和收获,并表示要坚决揭露陈伯达一类政治骗子所推行的唯心论的先验论。这份报告深得毛泽东的赞许,批示作为中央红头文件印发全国省军级干部参阅。

上海参加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的是王洪文和徐景贤,他们在北京京西宾馆住下后,经常到其他省、市代表所住房间去串门,还两次到钓

鱼台去,想拜访康生和张春桥、姚文元,没有见到。二人在会上作了联合发言,说陈伯达等人在庐山搞突然袭击,实际上是一次未遂的政变。

会议进行到19日,有人站出来揭发吴法宪在庐山会议上私下串连的情况,这无疑是在波澜涌动的激流中又投了一块巨石,激起的浪花和涟漪马上引起了与会者的关注和兴趣。

4月19日,周恩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和各组召集人会议,根据毛泽东意见,决定延长讨论时间。

这天,4月19日,林彪与叶群一起坐飞机回到北京。

4月20日,周恩来致信林彪,送去有关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材料及毛泽东的批示。并通过叶群转达他希望林彪能够出席会议,讲几句话的愿望。

这天中午,叶群打电话给吴法宪说,因为有人在批陈整风汇报会上揭发了吴法宪在庐山的活动,林彪在外地呆不住了,为了稳住的阵脚,回来"坐镇",必要时出来说话。

4月22日,周恩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议进展情况。会议商定,从24日起,各组进入批陈整风、自我教育的经验交流阶段,并决定由周恩来、江青、张春桥、黄永胜、姚文元、纪登奎6人起草会议结束时的讲话大纲。

4月24日、25日,周恩来参加华东、华北、中南、西南、西北和东北六个组的讨论。

4月24日,周恩来将批陈整风汇报会会议情况报告送呈毛泽东、林彪。报告中说:"会议希望主席、林副主席能见大家一次,如能给大家讲几句话更好。不过大家又说,不能因此要求,干扰主席、林副主席出席五一纪念在天安门观看焰火。"

毛泽东在报告上批示:"我这几天不出门。"

当天,林彪的秘书于运深向林彪汇报周恩来这份报告,林彪听后,没有表态。

4月29日,批陈整风汇报会结束。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把批陈整风运动推向纵深发展的通知》。周恩来受中央政治局委托,作会议总结。这个讲话提纲基本上是按照毛泽东所定下的调子起草的,为了不让林彪手下的几员大将压力过大,只在一两处点了军委办事组黄永胜

等5人的名,指出他们在政治上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在组织上犯了宗派主义错误,站到反“九大”的陈伯达路线上去了。但错误的性质还是人民内部问题,希望他们认真改正错误,实践自己的申明。

这个总结报告稿起初是由会议秘书组起草的,后经政治局讨论,专门成立了一个有周恩来、江青、张春桥、姚文元、黄永胜、纪登奎参加的6人修改小组。

原来吴法宪他们对自己错误的调子提得很高,有些是言过其实,戴大帽子。后来由周恩来、黄永胜、李先念、张春桥他们多次修改,把一些过重的话都删去了。其中很多话都是张春桥提出删改的。当周恩来在总结报告中刚讲到“几位犯错误的同志只要真正愿意改正,我们就要采取欢迎帮助的态度”时,董必武带头鼓起掌来,大家都跟着鼓起掌来,很快热烈的掌声响成一片,一下子会议气氛变了。在热烈的掌声中,鼓着掌的张春桥笑容满面地从座位站起,接着是姚文元、江青也站了起来,他们都过来和吴法宪等几个人紧紧握手一一握手,全场一片欢腾。

原来,毛泽东对这次会议有过指示,说“还是要回到‘九大’路线上来,要团结、胜利。人家已经检讨了,就要鼓掌欢迎。”

会议结束后,张春桥手里拿着文件兴冲冲从会场出来,王洪文、徐景贤迎上去问了好,又说了他们准备第二天就回去,问张春桥对上海工作还有什么指示?

张春桥皱了一下眉头说;“你们很活跃嘛。”接着又换了一种较为缓和的语气说:“我过去在市革会扩大会上讲过,《智取威虎山》里少剑波要求杨子荣做到四个字:‘大胆、谨慎’。又大胆,又谨慎,对立、统一,这是符合辩证法的,那时我说我们也要照少剑波说的话做,既要大胆,又要谨慎。但现在我不要你们‘大胆’,只希望你们‘谨慎’,谨慎再谨慎!”

5月1日,国际劳动节,北京及各地都组织了欢庆活动。晚上在天安门广场上举行焰火晚会。

夜幕落下。天安门广场上人声鼎沸,锣鼓喧天。广场四周的建筑物穿上彩色灯装,“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全世界各民族大团结万岁!”的巨幅霓虹牌耸立在广场上,闪烁光芒。

中央领导人陆续来到城楼上,他们先坐在大殿的休息室里休息。不一会,毛泽东也到了,他看见苏联驻华大使托尔斯季科夫,对他说:“你好。”

托尔斯季科夫回答说:“你好。”

毛泽东好奇地问:“俄国话‘你好’怎么说?”

“四德拉斯维结。”托尔斯季科夫说。

“?”毛泽东好像没有听清。

“四德拉斯维结。”托尔斯季科夫连说了两遍。

“很难讲。”毛泽东笑了笑,一句英文脱口而出:“Very good。”

托尔斯季科夫也笑着说:“Very good。”

周恩来又把正在北京参加中苏边界谈判的苏联代表团副团长(团长回国去了)介绍给毛泽东。

毛泽东握住这位副团长的手说:“我们应当好好谈判,谈出个友好睦邻关系来。要文斗,不要武斗。”

毛泽东走进大殿的休息室,微笑着面对起立相迎的中央领导人,径直走到屏风后面坐下来休息。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以双手合十的常用礼节向毛泽东问好,坐在毛泽东身边谈话。

突然,门口一阵涌动,周恩来大步流星走了进来,陈毅跟在。

1970 年 7 月后,疏散到石家庄的陈毅常常感到腹痛并伴有腹泻。到 8 月底,他想请示中央回京治疗,但正好接到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在庐山召开的通知,便先去了庐山。

九届二中全会快结束时,陈毅、徐向前等几位老干部曾向黄永胜提出要求:希望让他们回北京检查一下身体,没有获准。

张茜看陈毅病情加重,催他写信给周恩来,请求回北京治疗。周恩来接信后立即表示同意。1970 年 10 月 21 日,陈毅回到北京,当天便由中办副主任王良恩直接给 301 医院负责首长保健的曹根慧副院长打电话联系住院检查,于 10 月 26 日,住进 301 医院南楼三层六病室的套间,这是进门的头一个病室。因为陈毅住院没有带服务人员,安排这个病房离护士站近,便于照顾。据邱会作讲,这是 301 医院当时最好的病房。

住院期间,江青、叶剑英和吴法宪、邱会作都去医院看过陈毅。

经过专家会诊和肠胃钡餐透视等检查,并请北京的放射科专家会诊、讨论,认为“不显示肠癌迹象”。到12月22日,陈毅要求出院。曹根慧副院长希望他多住一段时间,再继续观察和检查。陈毅说:“毛主席快过生日了,我要去为毛主席祝寿。”

陈毅出院后,情况还是不太好,经常感到腹部疼痛。20天后,也就是1971年1月16日上午8时,他来南楼做理疗,理疗科的医生让他先检查一下。经南楼值班的陶医生检查,立即决定陈毅住院,并报告了曹根慧。

当天下午16时,曹根慧让腹外科专家陆惟善过来给陈毅会诊,同时请了北京医院外科的周光裕主任。他们摸到陈老总腹部有块状物,因为陈毅上次住院拍片还不到一个月,即便有肿瘤也不会长得如此之快,大家分析,根据疼痛的情况,急性阑尾炎的可能比较大,应立即进行手术。为了抢时间,301医院直接给周恩来打报告:陈毅阑尾炎亚急性发作,需要立即做切除阑尾的手术。并于下午17时许,送达中南海。

周恩来立即批准了301医院的手术报告,并派中南海的保健办主任卞志强医生陪张茜一同去医院为陈毅手术做准备。

晚18时15分,开始给陈毅做手术,靳来川院长,曹根慧院长,卞志强医生均到场督阵。

手术是按阑尾炎准备的,但是,打开陈毅的腹部一看,不是阑尾炎,在升结肠肝区摸到一硬块。

块状物是因肠梗阻积聚的粪便,病灶没有找到,找到病灶是必须的。但原来是为阑尾炎手术开的是一条竖的小口,现在要在腹部扩大探察必须再开一条横的刀口,这样就形成了一个“T”字形刀口,腹外科专家陆惟善和北京医院周光裕都同意这个方案,为了加强力量,靳来川院长又调来心肾科主任黄宛,外科副主任周明礼,病理科主治医生游联壁参加手术,同时让卞志强立即给周恩来报告。

周恩来同意了这个的方案。

很快,包块暴露出来了。在陈毅结肠部位发现肿块,并与肝脏粘连,经快速病理检查确定为结肠癌。

陈毅的手术做了5个小时。

陈毅手术后两个月,周恩来亲自安排他到日坛医院,由全国著名的放疗专家吴桓兴院长亲自为他做“放疗”。每周六次,剂量大小,时间长短,完全由吴院长根据陈毅的病情及对治疗的反应来控制。

经过几个月的治疗,陈毅身体开始好转,体重增加。这次他在天安门上出现,大家纷纷询问他手术后的恢复情况。老总笑哈哈地一一作了回答。他与在场的外宾一一握手。翻译们个个喜形于色:“陈老总身体很好,还能回外交部领导工作!”

周恩来将陈毅带到屏风后面对毛泽东说:“主席,你看谁来了?”

毛泽东抬起眼帘,凝神细望,咧开嘴笑了。他站起身,去握陈毅手。

陈毅还和从前一样,先给毛泽东立正敬礼说:“报告主席,我来了。”然后紧紧握着毛泽东伸过来的手。

“身体怎么样啊?”毛泽东一向言简意赅,这次却问了两句意思相同的重复话:“恢复得好吧?”

陈毅用力拍拍厚实的胸脯回答道:“恢复得很好,主席!”

“少个零件不要紧。”毛泽东与陈毅谈话总能保持轻松的气氛,“剩的零件不要出问题就好。”

“坏的零件取掉,好的零件一切正常。”陈毅看不到丝毫的情绪低落。

毛泽东望着陈毅,由衷地笑了。

西哈努克亲王过来紧紧捧着陈毅的手连声问候。

# 第1168回：礼花放，林彪竟不辞而别 为大局，周恩来费尽心机

按照预定的时间，焰火晚会就要开始了，但是还不见林彪的身影。

周恩来有点着急，他让秘书打电话，询问林彪在什么地方。

从庐山下来后，林彪的情绪一直低沉，哪里也不想去，原来仅有的踱步和“转车”也几乎没有了，几乎整天就是一个人坐在沙发上，不与任何人交谈，也不听讲文件。五一节的焰火晚会，他说身体不好，也不想参加。

毛泽东离开中南海时，周恩来曾亲自打电话到毛家湾，通知林彪办公室：“林副主席出发没有？叫他快来，主席已经出发了。”

电话是林彪办公室那天的值班秘书于运深接的，他立即向林彪做了报告，林彪没有说话。

毛泽东到天安门城楼后，周恩来再次给毛家湾打电话，还是秘书于运深接的，周恩来说“主席已经到了”，他再次请林彪赶快到天安门城楼来。

于运深立即向林彪通报，叶群也在一边催促说：“必须去，总理也打电话催了。”

林彪愁容满面，明显地很不情愿，但还是站起来，在内勤帮助下穿上大衣。

专车早就备好了，毛家湾距离天安门很近，警卫秘书李文普陪林彪去了天安门。

天安门城楼上，溴钨灯发出耀眼的亮光。烟火晚会就要开始了，工作人员来到大殿休息室，请首长们到城楼参加晚会。毛泽东站起身，对旁边的西哈努克作一个请的手势，率先走向城楼的平台。这时，林彪的身影还是没有出现。

毛泽东坐在中间圆桌的东首，紧挨他的是西哈努克亲王，董必武坐在西哈努克右侧，他是国家代主席……

这时摄影记者杜修贤发现,最西侧的位子空着呢。哎,这不是林彪的位子吗?他看到,坐在旁边圆桌前的周恩来也在左右环顾。

毛泽东略略地抬了抬头,朝对面空空的座位瞥了一眼,又侧过脸和西哈努克谈话。

周恩来不停地看表,焦急地等待着。终于,林彪和叶群出现在大家的视线中。人们自觉的闪开了一条通路。

5月的天,林彪穿着一件军呢大衣,皱着眉,一脸枯黄的样子,没有和任何人打招呼,径直的大步登楼。

叶群则面带笑容环顾左右,频频向周围的人挥手致意。

林彪走到毛泽东的桌前,敬了一个军礼。

毛泽东抬起头,向林彪点了点头。

叶群随后过去紧紧的握住毛泽东的手,不知说了些什么。

毛泽东笑了,用手指着叶群点了几下。

叶群很是激动,又连连的说着。

林彪走到西哈努克夫人旁边的空椅子上坐下,董必武探过头去,关切地问他:“身体不大好?”

林彪向董必武倾下头,望着桌面回答说:“不好。”

林彪确实让人感到身体不好,5月天穿着大衣,双手抄在袖筒里。天安门广场上灯火辉煌,人声鼎沸,他全然不闻不见,仿佛正在对付体内的寒冷。毛泽东还在与西哈努克谈话,没有看林彪这里。

叶群离开毛泽东那里后,又走向西边周恩来的那一桌,和周恩来握手后就靠着他坐了下来,滔滔不绝地说了起来。

新华社摄影部副主任杜修贤在董必武的侧面,拍了一张主桌的全景。但是他觉得此时的人物表情,特别是林彪的表情没有进入所需要的欢乐情绪,只好放下相机,慢慢地踱到旁边。

突然,林彪起身离坐,向李文普和叶群内勤毕新清站立的地方走过来,毕新清以为他要如厕。谁知林彪到他们跟前,挥了一下手,说:“走,回去。”

毕新清愣住了,焰火正漫天飞舞,主席也没离位,他就不辞而别?毕新清见李文普已经跟着林彪走了,这才想起来赶紧去叫叶群。正在听叶群滔滔不绝倾述的周恩来,一听林彪走了,满脸尴尬,说不出

话来。

叶群慌乱了,忙不迭的给周恩来点了点头算是告别,跟着追下城楼。

当杜修贤再回头时,一下僵住了:“林副主席不在了!”

大惊失色后,他又感到自己非常可笑:“林副主席能到哪儿呢?还不是去卫生间了!”

时间一点点地过去,林彪没有出现。杜修贤开始着急起来:“林副主席会不会走了?”想到这儿他心里煌煌的,希望不是这样。因为拍摄还没开始,林彪走了,他们拿什么见明天的报纸?他仍不失信心地望着卫生间的方向,希望林彪会出现在他的镜头里。

毛泽东不动声色,和西哈努克亲王继续谈话。

“嘭——哗”,第一束礼花腾空而炸。

城楼上的人们忘记了那张空座位,目光被礼花拽到了五光十色的天幕。

西哈努克向董必武询问了几句,董必武说:“身体不好,先回去了。”西哈努克也就释然了。

礼花仍在不断地往天上蹿,漆黑的天幕犹如坚硬无比的钢板,一撞上去,礼花就粉身碎骨,飞散出多姿多色的肢体。

“老杜。”是周恩来在叫杜修贤。杜修贤赶紧转身,但是他原地转了个圈,也没有看见周恩来。

“老杜,你过来!”

“还是总理的声音。人在哪儿呢?”杜修贤眼前都是穿梭不停的人影。终于,透过人影缝,他看见周恩来在大殿前的柱子旁着急地朝他招手:“过来,过来,快点。”

杜修贤赶紧走了过去。

“毛主席和林副主席在一起的照片你拍摄了没有?”周恩来劈头就问。

“啊呀,我哪儿知道他坐几分钟就走?来不及……”

“我问你照了没有?”

“啊……照了,就照了一张。”

“电影电视呢?”

杜修贤刚想说没有,见周恩来着急的样子,话到嘴边变成了“不知道!”

周恩来思索片刻,说:“老杜,你去把分管新闻宣传的负责人叫来,都叫来!”

杜修贤见周恩来神色严峻,不敢多问,拔腿就朝外走,在大平台上找到了几个分管新闻宣传的负责人,其中几人是军管会的,他们随杜修贤走进休息室。

周恩来见杜修贤他们进来,站起身迎面走过去问道:

“电影拍摄到主席和林副主席一起的镜头吗?”

“没有……”

“那么电视呢?”周恩来又问。

“没来得及拍,……”

“没有拍到,对不对?”周恩来讲话不像毛泽东爱讲反话。他一是一,二是二,开门见山。

“林副主席身体不好,这,大家是知道的。晚上身体不好不能来,我亲自请他参加晚上的活动,这样的活动面对人民群众,面对全国的观众。最后他来了。你们是新闻宣传的负责人,你们记者手里拿着摄影机,拍呀!可为什么不拍摄呢?”

不知谁这时小声嘀咕了一句:“我们想等主席和副主席讲话的镜头。”

周恩来生气的问:“林副主席来了没有?他毕竟还坐了一会。你们都看见的,你们等什么,等他们讲话?什么时候新闻拍摄规定要等领导人讲话才能开机?你们就是老框框。坐在一起就应当开机拍摄,记者就是要眼快手快,会抢拍。新闻就是时间,新闻等得来吗?”

在场的人都一声不吭。周恩来沉重地叹了口气,口气缓了些:“人民希望党中央团结,国家安定。毛主席和林副主席在城楼上和首都人民一同欢度节日的夜晚,这是多么重要的宣传主题,这是安定人心的大事情啊!组织指挥新闻宣传的领导要充分重视。如果人民问,城楼上观看焰火,怎么没有林副主席啊?你们回答说林副主席只来了几分钟。行吗?党中央在人民心中的形象靠你们宣传,不是靠解释。”

“是!总理,我们回去一定要好好整顿记者队伍,从思想上找原

因。以此为戒,杜绝类似事情发生。”

“对,要好好从思想上查一查,还有没有政治头脑?有没有工作职责?”

“是的,总理。”

周恩来双手抱胸,来回踱了几步。他扬起疲惫的脸,嗓音有点嘶哑,清咳了一声:“今天的活动有些特殊,有难度。这一点我清楚。但同志们都是有经验的新闻工作者,要想到随时会出现意外情况,有应付各种变化的思想准备,不能老想办现成事吃现成饭。今天你们不要怪我对你们严厉,严厉一点有好处!你们回去总结经验教训,下不为例!”

大家垂着头散开去。杜修贤一直躲在屏风后面,这时也轻轻地走出来,随着人群往外走。

“老杜,你等一下。”

杜修贤心里一哆嗦:“总理发现我了!”

“你快去冲洗照片,一个小时内送来,西花厅。”

“嗳!”他松了口气,旋即走进深沉的夜色里。

一路上,他为机子里的照片祷告,千万千万要成功啊!

暗房里,红色灯光中,他目不转睛地盯着白色相纸在透明显影药水里,一点一点地显影,深色的淡色的在水中快速变化。杜修贤喜出望外地将显影好的照片浸在定影水里,细细观看,此时他终于可以吐出一口气了——

说实话,这张照片作为资料照片或许比当作新闻照片用更为合适些。

——毛泽东侧着脸,凝神在听西哈努克亲王讲话。

——林彪裹着呢大衣,像农民那样双手操在袖筒里,躬着背,也侧着脸和董必武交谈。

取景的角度有点偏……可仅此一张。

夜深了。杜修贤驱车来到西花厅。周恩来办公室的灯还亮着,杜修贤轻轻推门走进去,周恩来没有发觉他,正埋头在比头顶还高的一叠文件里。杜修贤轻唤了一声“总理”,周恩来才停下笔,手扬了扬叫他坐。杜修贤没坐,把照片交给周恩来。

周恩来戴着老花镜,逐一审看照片,看到毛泽东和林彪的照片,问:“就这一张?”

“嗯。”

“就这一张呵,就这一张。”周恩来捏着照片的一角,一手支撑下巴,凝眉自言自语。过了一会儿他问我,这张照片能不能在电影电视上用?

杜修贤不好回答,因为他不满意这张照片的人物效果。

最后周恩来说:“电视电影就用这张照片,你去办一下。”

这时已是午夜时分。

5 月 2 日,报纸出来了,登在头版头条的第一张照片就是杜修贤的那仅此一张的照片,标题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同柬埔寨国家元首、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主席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在天安门城楼上一起观看焰火”。第二张照片下的说明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副主席健步登上天安门城楼,同首都军民一起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新华社记者摄。”这张照片与后来发行的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 1971 年五一纪录片镜头是一致的,但是不应该是 1971 年 5 月 1 日晚拍摄的。因为那晚林彪迟到了。

再说 5 月 1 日晚,林彪回到毛家湾,一进门,见到几位迎上来的秘书,就问道:

“你们看看,我像不像个病号?”

林彪问的唐突,秘书们无人应对。

据林彪秘书回忆,“批陈整风”开始后,林彪一蹶不振,不理政事。1971 年 4 月的批陈整风汇报会开始后,林彪不再愿意听文件,哪怕是只批给“林、周、康”三个人的文件,秘书也报不上去,都由叶群处理。这时期,中共中央发出的文件,总是把毛泽东、林彪的批语印在正文标题前面,用醒目的红字印着“毛主席批示:同意”,“林副主席批示:同意主席批示”;或“毛主席批示:很好,照发”,“林副主席批示:完全同意主席批示”;甚至还有这样的情形:“毛主席已圈阅”,“林副主席批示:同意主席批示”。这里,毛泽东的批语无可非议,林彪的批语却不伦不类。林办的秘书都知道,这种怪事不是林彪做出来的,而是叶群的杰

作。林彪在《中共中央关于高级干部学习问题的通知》上的批语,在《中共中央转发38军党委〈关于检举陈伯达反党罪行的报告〉的通知》上的批语,在《中共中央关于印发〈反党分子陈伯达的罪行材料〉的通知》上的批语,在《中共中央关于把批陈整风运动推向纵深发展的通知》上的批语等,其实都是出自叶群之口,由保密员李根清代替林彪写上去的。有一次,于运深向李根清转达叶群口述的"林彪的"批语时,李根清忍不住向于运深提出意见:

"应该提出建议,这样批,逻辑不通,不如不批。"

于运深长叹一口气,说道:"我当面提过啦。主任说,你们不懂,坚持要这样批,没办法,你就这样批吧。"

林彪在5月1日天安门广场的焰火晚会上早退了,但是叶群没有与他一起走,而是继续留在天安门城楼上。她看到毛泽东进休息室休息,也跟了进去,与毛泽东谈了将近两个小时。

叶群对毛泽东说,林彪这两天身体生病很不舒服,要请病假,无奈这样的场合一定要出席,才勉强来了。毛泽东安慰了叶群。

回到毛家湾,叶群非常高兴,当晚,即把与毛泽东谈话的情况向林办的秘书们炫耀一番,随后又告诉了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四人。

叶群说:"同主席谈得很好。""主席谈笑风生地和我说了很多问题,还是和对我报告上的批示差不多,没有加新的东西。"

她说:毛泽东批评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四人"对林彪帮忙不怎么高明。"叶群向毛泽东解释是"帮了倒忙"。

叶群还对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四人说:"别的没有什么事,"让他们宽心。

在随后的一个多月时间里,叶群心情轻松许多,还亲自到文物管理处选购文物。而林彪因毛家湾装修,住在人民大会堂浙江厅,依然是闭门不出。

# 第1169回：加西亚，廿九期《外交简报》纠错误，还历史本来面貌

1971年1月2日，古巴驻华代办处举行古巴革命招待会时，周恩来亲自出席。中古关系已连续五年处于冷而不断的状态。周恩来亲临古巴使馆是1966年后的第一次，显然不是一般礼仪活动，因而引起了出席招待会的各国使节的极大关注，古巴代办加西亚更是激动不已。

招待会上，加西亚对周恩来谈了他对发展古中关系的一些看法，态度诚恳友好。他告诉周恩来，他已在北京近4年，即将离任，希望在返古之前能去外地看看，进一步了解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和近况。周恩来表示赞成，并要他同中国外交部商量。

过了两天，加西亚约见礼宾司副司长韩叙，正式提出在他离任前与其夫人和10岁的儿子同去外地参观的要求。韩叙同欧美司副司长凌青商量后，经外交部批准，同意加西亚一家作为外交部的客人，由外交部欧美司拉美组组长陶大釗陪同，到延安、井冈山等地访问，并电告当地省革委会外事组，请他们负责接待。

从1月12日至26日，加西亚一家先后访问了西安、延安、上海、南昌、井冈山、杭州等地。参观各地的革命历史遗址和纪念馆，如上海中共一大会议旧址、西安八路军办事处等，也看了几处人民公社和工厂。有的地方安排有文化活动，如观看“红小兵”表演的革命歌舞节目等。

离开延安前，地区革委会负责人征求加西亚对访问的意见，加西亚提了两点希望。他说，延安是具有革命历史意义的地方，肩负着两方面的任务：一是接待来自国内和世界各地的革命者，向他们介绍延安的革命历史和中国的革命经验；另一个是生产，别的地方发展了，延安怎能落后呢？延安自然条件差，水土流失严重，要下很大的力量做这方面的工作。“你们有许多事情要做，但这两件事十分重要。”

到了南昌，日程上没有参观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外交部陪同人

员提出能否加上。江西省革委会外事组负责人说,纪念馆现在不对公众开放。加西亚没有参观八一起义纪念馆,外事组负责人对他解释说:“纪念馆正在整修。”

在井冈山,各处遗址都刻意渲染林彪。“黄洋界”的地名碑是林彪写的,龙源口大捷是林彪“直接指挥”的,毛泽东旧居旁是林彪的旧居,甚至有一处还展示了黄永胜的旧居,却没有一处提到参与领导井冈山斗争的朱德、陈毅等人的名字。

在井冈山根据地革命历史纪念馆,悬挂着一幅林彪与毛泽东在井冈山会师的大油画。年轻的讲解员介绍说:“1928 年春,林彪同志率领部分南昌起义部队来到井冈山,在这里会见了伟大领袖毛主席。林彪同志一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最忠诚、最坚定地执行和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林彪同志是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

离开江西前夕,加西亚向江西外事组负责人提出建议说,在讲述中国革命时,应该介绍南昌起义和朱德上井冈山与毛主席会师这两段历史。不提这些历史事实,对中国人来讲可能容易理解,但外国人不容易理解。加西亚还特别提了一下江西在中国革命中的历史地位。他说:“虽然是在遵义会议上确立了毛主席的领导,但江西是毛主席革命路线战胜‘左’、右倾机会主义决定性胜利的根据地。讲历史事实不会损害毛主席的形象,反而能使人们加深对毛主席正确路线的认识。”

他还告诉中方人员,古巴也有过类似的对历史的处理问题。有一次卡斯特罗出席一个纪念古巴革命英雄埃切维里亚的会议,会上古巴青年团的负责人重读了埃切维里亚在发动推翻巴蒂斯塔政权的武装起义时的一份声明。但卡斯特罗发现这个干部故意漏掉了宣言原文最后类似于“上帝保佑我们”这样的语句,于是他打断了那个干部,要他重读这句话,还说了一段大意是历史就是历史这样的话。

加西亚一行在杭州参观游览两天后回到上海。返京前夕,他和外交部陪同官员谈起这次访问的观感,说对这次访问很满意,各地接待热情友好,使他有机会接触地方干部和群众,增加对中国的了解和感情。不过,他也批评中国外交部与驻京使团的接触太少,缺乏交流,“感觉不到中古人民间的友谊”。加西亚重复了在延安提的意见,特别

是在江西提的意见,他又作了进一步的阐述。他说,不仅在中国,全世界都知道是“朱、毛会师”,是朱德率领部分南昌起义部队上井冈山,不是“林彪副主席”,《毛泽东选集》和斯诺《西行漫记》上都有记述。加西亚还拿出一本他随身带的英国出版的介绍中国的书,翻给他们看有关章节。他说,应该尊重历史事实,任意篡改会有损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伟大形象。加西亚在大学念书时就钦佩中国革命,敬仰毛泽东。

回北京后,陪同加西亚的外交部干部陶大釗向外交部有关领导口头汇报了访问情况和加西亚的反映,特别是在江西的情况和加西亚的批评意见。外交部有关领导让陶大釗把这些批评写入简报,向上反映。

经过两三天考虑,陶大釗写了一份1000多字的简报,题目是《古巴驻华使馆临时代办加西亚访问外地的几点反映》。前两节提到加西亚对“大兴水利”、“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和“蚂蚁啃骨头”的正面反映,三、四、五节反映加西亚在延安、井冈山和对外交部提的批评意见,重点在井冈山这一节。其中第四条写道:“四、(加西亚)向江西外事组同志建议,在介绍中国革命时应该提到南昌起义和朱德上井冈山这两段历史。在参观井冈山时,讲解同志不提南昌起义和朱德上井冈山这两段历史。加说,这两件事应该提,不提对中国人来讲可能容易理解,但外国人不容易理解。对历史事实不要不提,应该提,但要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照耀下去正确评价。提这些历史事实不仅不会损害毛主席的形象,相反,人们会通过对当时的各种错误路线的了解,更加体会到毛主席路线的正确。尽管是在遵义会议上确立了毛主席的领导,但江西是毛主席革命路线战胜‘左’、右倾机会主义决定性胜利的根据地。”

2月6日,外交部办公厅有关单位将这份“反映”编印成第29期《外事活动简报》,分送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军委办事组、中央涉外单位和新闻单位,以及外交部部、司领导。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和章文晋部长助理看了简报,立即联名“推荐总理一阅”。

2月12日,周恩来将这份简报和另一份材料转呈毛泽东,并在《简报》上写到:

“两件即呈主席参阅。退周恩来。七一年二月十二日。”

很快,写有毛泽东批示的这期《简报》退回外交部。毛泽东在《简报》左侧边沿上批道:

“第(四)条提得对,应对南昌起义和两军会合作正确解说。”

毛泽东的批示在外交部各单位通报后,4 月 4 日作为《外交部文件》印发,分送范围比《简报》扩大了许多,包括各省、市、自治区革委会外事组。文件的标题是:“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重要批示”。用套红、大字印刷,内容只是毛泽东批的那一句话:“第(四)条提得对,应对南昌起义和两军会合作正确解说。”而《简报》全文则作为附件。

接着,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有外交部等外事部门和涉外单位、新闻单位负责人参加的一次研究工作的会议上,特别提到了毛泽东的批示,赞扬加西亚尊重历史、实事求是、直言不讳的精神,并对南昌起义和井冈山会师作了简要的阐述。

中央宣传小组也将毛泽东的批示和《简报》作为宣传工作通报,发至全国各宣传部门。

4 月 23 日晚,加西亚离任前夕,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他。参加这次接见的中方人员还有外交部的凌青、韩叙、陶大钊和翻译沈允熬。他们提前一刻钟到达福建厅。

等了几分钟,周恩来走进来,同他们一一握手后,向中间靠右的沙发走去,同时问道:“加西亚明天就要走了吗? 他在中国四年多,访问了哪些地方?”他坐下后又说:“这个代办很有头脑,他提的意见,毛主席批了。”

周恩来问韩叙:“是不是你陪加西亚去江西的?”

韩叙指着陶大钊回答说:“是陶大钊陪他去的。”

凌青和韩叙要陶大钊向周恩来汇报一下去江西的情况。陶大钊走到周恩来面前,刚说了半句:“总理,是我陪加西亚去的……”周恩来就打断了他的话,要他在自己旁边的沙发上坐下来再说。

于是大家都坐了下来。陶大钊着重汇报了《简报》上没有直接反映出来的情况,如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被红卫兵封了,井冈山纪念馆那幅“毛主席和林副主席”会师的油画,以及加西亚谈到全世界都知道“朱、毛会师”和不提朱德外国人不能理解等意见。

周恩来耐心地听着,还插话说:“这不符合历史事实嘛!”他问韩叙

和凌青有没有将毛泽东的批示告诉加西亚。他们答:“没有,准备请总理接见时告诉他。”

20时30分,加西亚准时到达人民大会堂。周恩来在福建厅门口欢迎他,同他合影。

谈话开始后,周恩来对加西亚说:“你来中国四年两个月了。这段时间正是我们文革紧张的时候,差不多从头到尾你都知道了。”

加西亚说:“这是一种特权,是一个大学。在文革期间,当遇到一些不愉快的事情时,我们不理会,因形势不正常,有些事在一定程度上是无法控制的。”

周恩来讲起了加西亚访问江西时提的意见。他说:“你提出,按照毛泽东同志的思想,应该把南昌起义后,朱德同志带领队伍上井冈山,和毛主席领导的秋收起义队伍会合这段历史展览出来,这个意见完全正确。这也就是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我把你的意见告诉了毛泽东同志。他马上批回来说,你的意见是对的,并且要我们告诉展览馆更正。”

接着,周恩来讲了“八一”军旗图案的来历。他说:“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旗的图案就是‘八一’两个字。定军旗图案的时候,正是解放战争快要取得胜利的时候,我和毛主席在一起工作。各种图案都选不上,毛泽东同志就说,何必另选呢?把‘八一’两个字写上就是一个图案了。我说,红军获得成功是井冈山开始的,八一起义是失败的,恐怕用‘八一’两个字不一定恰当。毛主席说,不对,八一起义向国民党反动派开了第一枪,秋收起义在八一起义之后。”

周恩来进一步介绍说:“毛泽东同志参加‘八七会议’后,带领一部分农民武装和工人武装,还有没有赶上参加八一起义的警卫团,黄永胜就在这个团里,组成一支工农兵武装上了井冈山,建立根据地,站住了脚。时间在八一起义之后。八一起义虽然方向对,但政策错了。城市为主,依靠外援是两个根本性的错误。这个错误是我犯的,南昌起义时我是前敌委书记。参加八一起义的有我们党初期的许多人,朱德、林彪、陈毅、贺龙、刘伯承、聂荣臻、叶挺、郭沫若、恽代英,董必武最老,也参加了。另外还有李立三、张国焘。当时党中央在武汉,我们把军队从武汉拉到南昌,高举反对国民党的旗帜,所以大多数中央委员

都参加了。这是党的一件大事,不能因为失败,就不纪念。”

周恩来还讲了朱德上井冈山的情况,并特别提到了林彪。他说:“南昌起义时有两支军队,一支是贺龙的,一支是叶挺的。叶挺在北伐战争时带领一个独立团把武汉打下来,那时林彪在这个团当排长。1927 年,我们在汕头外围打仗时,留下朱德率领的一部分军队牵制国民党军队,林彪在团里当连长,陈毅同志在团里当支部书记。朱德的部队没有参加汕头作战,没有受到损失。朱德带领一部分保存下来的部队,转到广东北部、湖南南部,最后在 1928 年春到达井冈山和毛泽东同志的部队会合。这就是两支部队的会师。朱德是军人出身,当师长,毛泽东做政治委员。所以从 1928 年后,中国反动报界总说‘朱毛’,把这两个名字一直连在一起。毛泽东同志说,不管这个同志后来犯过多少政治路线错误,他把一支部队带到井冈山,这是一个大功,保留了很多干部。所以写历史总是把这件事写上。”

周恩来说:“朱德同志年纪大,85 岁了,身体不好,休息时间较多,没有参加这次运动。我们的红卫兵翻他的历史,说他犯过错误,反对过毛泽东同志,就在中南海里贴大字报,说他是‘黑司令’。毛主席站出来说话了,你们年轻人不懂得历史,这是不对的,朱德同志还是‘红司令’,虽然他犯过错误,但我们总还是一起战斗到现在。所以党的九大仍选他参加政治局。上井冈山是正确的,南昌起义失败了,犯了错误。两方面对照起来就更显得毛泽东领导的革命路线正确。这是我的意见,毛泽东同志很欣赏你的意见,合乎他的思想。”

周恩来感谢加西亚帮助中国纠正了一个历史错误,并就他在机场被中方人员要求读《毛泽东语录》一事表示歉意,说当时中国的外交工作出现了无政府状况,外交部甚至一度失去了对密码的控制。周恩来介绍了文革中的国内情况,针对当时的军管情况,周恩来说,军队现在应该回到军营中去了。

而后,周恩来对加西亚说,请他把谈话内容转告古巴政府和卡斯特罗,并同意加西亚作记录。接着,他用了很长时间谈国际问题。周恩来谈了美苏争夺世界霸权、越南抗美战争形势、美国内部的困难和矛盾、中苏关系和中美关系等问题。

周恩来说,他 4 月 14 日接见应邀来访的美国乒乓球队,打开了两

国人民友好来往的大门,将会得到两国大多数人民的赞成和支持。

周恩来强调中美关系中最大的问题是台湾而不是越南。他还告诉加西亚:中美很快就可能在最高层展开接触。

加西亚根据当时古巴官方的立场说尼克松政府是法西斯政权,尼克松英文名字中的 X 在古巴报纸上从来就是印成法西斯的那个符号(卐)。

周恩来纠正他说:尼克松不是法西斯,美国永远不会走法西斯主义的道路。

他们还谈到了当时东巴基斯坦从巴基斯坦独立出去,成立了现在的孟加拉国,这在当时引起了印巴战争和国际冲突。当时,中国支持巴基斯坦,反对东巴独立,而印度和苏联支持东巴独立,中国认为这是苏联在南亚扩张势力并和印度地区扩张主义联手。

加西亚说他认为东巴要求独立是东巴民族主义问题,周恩来承认他的看法有道理,但说中国必须支持巴基斯坦,反对东巴独立。

这次接见一直持续到半夜 24 时才结束。加西亚几次提出“不愿使总理太劳累,”要起立告辞,都被周恩来留下。

周恩来借这次机会向加西亚详细阐述国际形势和中国的对外政策,是向古巴暗示中美可能很快发生关系的信息,让古巴有一定的思想准备。

周恩来接见加西亚的谈话记录于 5 月 1 日印发,分送范围比《外事活动简报》有所扩大,增加了陈毅、徐向前、聂荣臻等几位老帅。

# 第1170回：迎美使，钓鱼台仔细安排 盛情邀，江青为林彪照相

5月17日，贺龙专案组向康生、叶群、黄永胜、吴法宪等负责人报送《关于通敌分子、篡军夺权阴谋家贺龙罪行的审查报告》，提出开除党籍、军籍，并在一定范围内公布其罪行。

5月17日，美国总统尼克松给中国带回了口信表示：为解决两国之间那些分歧问题，并由于对两国关系正常化的重视，他准备访问北京，同中华人民共和国诸位领导人进行直接交谈，双方都可以自由提出各自主要关心的问题。

尼克松提议由基辛格博士同周恩来总理或另一位适当的中国高级官员举行一次秘密的预备会议，基辛格准备在6月15日以后到中国来。

5月22日，尼克松又补充了一个口信，说明美国总统在5月20日发表的关于美苏两国政府同意在今年内制订出一个限制反弹道导弹系统的部署的协定，决不会影响美国总统的政策，这个政策是不签订任何针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协定，基辛格也准备把这个问题列入他将参加的预备会议的议程之中。

5月26日，周恩来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全面讨论中美关系和即将在北京举行的中美预备性会谈。

周恩来认为：

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不可一世，什么地方有事它都要过问，而现在却不同了。越战不得人心，迫使它不得不把军队往回撤。美国在世界上的经济地位下降了，政治地位更加下降，在这种情况下，它要考虑，是继续在各面出击呢，还是收缩一下？综观全局，它首先要解决印支问题，就不能不同中国接触，就要同中国打开关系，而我国利用这一时机打开中美关系，将有利于反对扩张主义和霸权主义的斗争，有利于维护亚洲和世界和平，有利于我国的安全和争取祖国和平统一的

斗争。

会后,周恩来起草《中央政治局关于中美会谈的报告》,5 月 30 日报送毛泽东。《报告》回顾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中美关系演变的历程,对同基辛格的预备性会谈和尼克松的访问可能出现的各种情况作了充分估计,并拟出了各种相应的对策。

《报告》的核心内容是提出关于中美会谈的八点方针,即:美国一切武装力量和专用军事设施,应规定期限从中国台湾省和台湾海峡撤走;台湾是中国的领土,解放台湾是中国的内政,外人不容干涉;中国人民力争和平解放台湾;中国政府和人民坚决反对进行“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的活动;美国如欲同中国建交,必须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

毛泽东批示:“同意。”

周恩来通过巴基斯坦给尼克松发回口信:“周恩来总理认真研究了尼克松总统 1971 年 4 月 29 日、5 月 17 日和 5 月 22 日的口信,并向毛泽东主席报告尼克松准备接受他的建议访问北京,同中国领导人直接会谈。毛泽东主席表示,他欢迎尼克松总统来访。周恩来总理欢迎基辛格博士来华作一次秘密的预备性会谈,为尼克松访华做准备工作,并进行必要的安排。时间可定在 6 月 15 日到 20 日之间。”

5 月 31 日,中共中央转发《毛主席会见美国友好人士斯诺谈话纪要》。

6 月 2 日,当巴基斯坦驻美大使希里拉把周恩来的口信转交给基辛格后,基辛格如释重负,长长地舒了一口气。他拿着用打字机打印了的口信兴冲冲地一路小跑去找尼克松。尼克松也眉开眼笑,他说:

“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总统收到的最重要的信件。”说着,尼克松打破晚饭后不喝酒的惯例,斟了两杯白兰地,和基辛格兴冲冲地干杯以示庆贺。

基辛格意味深长地说:“我想起了几百年前从西方去中国的马可·波罗。”

尼克松灵机一动:“我们就给你的中国之行起个代号,就叫‘波罗行动’。”

就在尼克松和基辛格紧张准备基辛格的“波罗行动”时,周恩来亲

自掌握的一个工作小组住进了钓鱼台4号楼,专门负责基兴格这次访华的保障工作。这个工作小组的成员由周恩来亲自选定,报毛泽东批准。主要成员包括叶剑英、姬鹏飞、黄华、熊向晖、章文晋等。

为了保证基兴格的这次访华,工作小组对参加接待工作的人员做出严格规定:凡进驻钓鱼台国宾馆参与接待基辛格的人员,一个月内不许回家,对没有参加接待组的任何人都不许谈及此事,家人不能说,朋友不能说,参加这个接待工作期间,什么电话、地址都不能说。接待人员的管理也采用当年地下工作的方式:单线联系。

周恩来亲自带领接待人员到钓鱼台国宾馆,选定了靠北头、比较僻静的5号楼作为基辛格一行的下榻之处。中方接待班子就在邻近的4号楼办公。这个院子里还有个6号楼,当时空着。6号楼与外面由一座小桥连接,桥上安排了警卫站岗。这两座楼靠近北门,当时规定除参加此次接待的工作人员外,其他人员一律不准走北门。

周恩来就房间里的摆设和接待工作做了明确指示,要求一切本着有利于这次中美高级会晤的气氛出发。

文革期间,钓鱼台国宾馆几乎不接待外宾了,庭院荒芜,什么花草都没有。工作人员通过公园的一个老花匠,从他家里搬来了几十盆花,布置在台阶和前面大门的两边点缀一下,表示对外宾的欢迎。同时,还特别对5号楼进行了一次粉刷,沙发、窗帘和一些家具等全部换了新的,对空调等也做了全面检查,还在基辛格的客厅里增摆了酒台,放了中外名酒和香烟等。当时,钓鱼台各楼房间都摆着《毛主席语录》和《毛泽东选集》等,接待组按照周恩来的指示,拿走了《毛主席语录》和《毛泽东选集》。但没有想到,后来基辛格一行走时还特意向中方要了《毛泽东选集》。

另外,还有不少文革期间的工艺品,像红卫兵的瓷塑和墙上挂着的宣传画等,也都换成了文物、国画等。摆放的报刊杂志也作了挑选。在大厅摆放了明代的紫檀木条几,所有画作都换成清代名画,在基辛格的起居室陈设柜里,放了十多件名贵古玩,有明代的青花瓷器,清代的景泰蓝和玉器,还有殷商青铜器等。在基辛格住的房间里还摆了一个大花篮。

在客人的饮食方面也作了细致周密的安排。那是国宾馆第一次

接待如此高级的美方官员。钓鱼台平日还没有准备“起司”(奶酪),听说美国人爱吃,就专门从别处选购。又了解到美国人爱吃海味,就准备了鲍鱼、海参、鲜贝等。两天的菜谱都由周恩来亲自审定。他还特别提出,应该让基兴格他们有机会尝尝烤鸭。去烤鸭店不方便,接待组就请了北京烤鸭店的一位老厨师来钓鱼台,搞了个小烤炉。

为了准备即将来临的中美会谈,周恩来多次主持会议,反复讨论会谈方案,并对尼克松、基辛格的政治观点、个人历史、家庭生活,乃至爱好习惯都作了研究。

周恩来还特地阅读了尼克松所写的《六次危机》,观看了尼克松所喜欢的电影《巴顿将军》。

6月3日上午,毛泽东、林彪、周恩来、康生、黄永胜、姚文元、李先念在人民大会堂会见罗马尼亚共产党总书记齐奥塞斯库及夫人以及由他率领的罗马尼亚党政代表团。

谈到中美关系时,毛泽东说:“我们最近打了一个乒乓球过去。”“我最近看布达佩斯报纸上一篇文章,它也赞成。你们赞成,我也未料到。”

他说:“国家无论大小,都应该建立平等关系。比如圣马力诺,一万六千人口,我们不胜荣幸之至,跟这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

谈到中国的情况时,齐奥塞斯库说:“你们关心教育改革,使教育同生产、生活、社会主义建设更密切地联系起来,这一点给了我们很深的印象。”

毛泽东说:“想是这么想,在这里实验。对旧的资产阶级教授也还得用,不然我们没有啊。不过他们也应该听工人的话,听农民的话。这就要时间,慢慢来。已经21年了,过去也有一些进步,在教育方面不能讲完全不对。但是,你刚才讲的这一条,就是教育从根本上来一个革命,在最近几年才开始。”

这次会见,林彪只参加了几分钟就退出接见大厅,一人在外面走廊的长椅上呆坐,一直到会见结束。

6月4日,周恩来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上宣读《中央政治局关于中美会谈的报告》。

这天,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听取清华大学常委谢静宜汇报她准

备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的发言提纲。

谢静宜问毛泽东:对文革前十七年的教育战线应该如何估价?

毛泽东说:对十七年教育战线的估价,不要讲得过分。可以说是在无产阶级专政下执行了错误路线,不是大多数人,是一少部分人。

谢静宜汇报说:“现在社会上流传一种说法,说个别大学生‘一年土,二年洋,三年不认爹和娘’。”

毛泽东说:“还是认的,自己的爹娘能不认吗?就是爱面子,当着人的面不好意思就是了。”“只不过有资产阶级思想,过后还是要认的。”

毛泽东还说:教育革命要大胆实践,实践对了就干,实践错了就改。

6月8日下午,叶群带着她从北京市文物管理处搞到的鸡血石到钓鱼台10号楼给江青看,江青也拿出她拍摄的照片请叶群欣赏。叶群夸赞江青的摄影水平高,两人说也要给林彪照张相。

6月9日下午,林彪、叶群来到江青的住地——钓鱼台10号楼,江青的秘书杨银禄急忙到江青的办公室报告。江青放下手中的文件,快步走到楼厅。林彪从沙发上站起来,同江青握手。

江青说:“欢迎林副主席来我这里。看到林副主席身体这样好,我很高兴。”

叶群说:“今天林彪同志来这里,是请江青同志照相的,没有什么别的事情。你们两位一见面这样高兴,我也很高兴。”

这时,江青突然发现林彪没有刮胡子。她不客气地动员林彪刮胡子。林彪却说:“不用刮了。年纪大了,不要讲究了,有胡子没有关系。不想刮。”

叶群忙劝林彪:“江青同志亲自给你照相,胡子不刮不好,刮了显得年轻,精神焕发。”

林彪瞪了叶群一眼,没说什么。

江青又劝说:“你是党的副主席,解放军的副统帅,照的相应该有领袖气派。”

在两个干净利落的女人不停劝说下,林彪也就勉强同意了,说:“刮就刮吧。”

林彪刮胡子也和常人不一样,既不用热水湿一湿,也不用热毛巾敷一敷,更不用香皂、肥皂或剃须膏抹一抹,而是干刮。

林彪临时决定在江青住地刮胡子,可想而知,不太方便,没有带刮胡刀。他的警卫员李文普问江青的秘书杨银禄:“杨秘书,你有刮胡刀吗?”

杨银禄说:“有,就用我的吧。”

林彪的胡子是李文普帮他刮的。刮胡子时,林彪坐在一张带靠背的椅子上。由于是干刮,所以刮得刷刷作响,他既不说疼,脸上也没有任何表情。他刮完胡子,在江青、叶群陪同下,乘坐各自的汽车到17号楼,那里有谢富治专为江青布置的照相室。

进入照相室以后,江青拿着心爱的照相机,一边摆弄着照相用的灯具,一边对林彪说:

“广大党员、广大群众和广大的解放军指战员,都知道林副主席跟毛主席跟得最紧,对毛主席的著作学得最好、用得最活,将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举得最高。”

这时,林彪端坐着,一言不发,静静地等待着江青摁动相机快门。江青调整好焦距和灯光,准备摁动快门时,却突然对林彪说:“林副主席,请你把帽子摘掉好吗?我想给你照一张免冠相。因为我给你照相用的是顶逆侧光,你的帽檐遮挡了你的额头和眼睛的光线。”

林彪的头顶光秃秃的,平时出门总是戴着一顶帽子。江青叫他摘掉帽子,看样子他很不情愿。但是,在那种场合,他又不好说什么,于是不好意思地把帽子摘掉,递给了他的警卫员李文普。

江青等林彪摘掉帽子,第二次准备摁动快门前,突然又说:“我觉得这样照还是不够理想,没有林副主席的特点。林副主席最好是拿一本《毛泽东选集》,两手捧着,真的是在看书,因为你学习毛主席著作是孜孜不倦的。”

叶群夸奖说:“还是江青同志想得周到细致。”

江青立即叫杨秘书跑回10号楼,把他的《毛泽东选集》四卷合订本拿来,交给林彪。

平时怕光、怕风、怕热的林彪,此时也只好听任江青摆布,被八盏大灯的强光烤得满头大汗。江青递给他一条毛巾,见他擦了头上、脸

上和脖颈上的汗水,重新摆好姿势后,终于摁动了快门。在一旁观看的叶群,鼓掌表示祝贺。

照完相,林彪和叶群准备离开钓鱼台时,江青说:“林副主席累了吧?明天如果你身体和精神都好的话,请林副主席再来一趟,咱们与这里的工作人员和警卫战士合一个影吧?”林彪点了点头,接受了邀请。

由于合影照相的人数较多,需要梯子。杨秘书请示汪东兴,安排了中央警卫局副局长毛维中负责办理。毛维中要了两辆军用大卡车,于当天下午,从中南海怀仁堂后面把专为照相用的梯子运到了钓鱼台17号楼,摆放好。晚上,江青到17号楼看电影之前,还亲自检查摆好的梯子,表示满意以后,才放心地去看电影。

6月10日下午14时左右,林彪和叶群又来到钓鱼台17号楼与大家合影。江青叫杨秘书请来了杜修贤为大家拍照。杜修贤指挥大家站队时,林彪操着他那浓重的湖北口音问:“前面蹲一排吗?”

江青6月9日为林彪照完相以后,将胶卷立即送给新华社摄影部主任石少华冲洗。两天以后,送来了照片小样。江青在小样上亲自作了精心剪裁,又送回新华社放大成16寸彩色照片。

江青拿到放大的照片后,让杨秘书打电话叫姚文元和叶群到钓鱼台10号楼研究如何刊登的有关事宜。

姚文元说:“江青同志对摄影艺术有很高的造诣,甚至超过了专业摄影师的水平,把林副主席如饥似渴地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精神通过这张照片完全表现出来了,这将极大地鼓舞全国各族人民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热情。我的意见,这张照片就叫《孜孜不倦》吧。刊登这张照片时,同时刊登主席的一幅照片。我叫《人民日报》发一条消息,我和他们一起措措辞。”

江青说:“我看文元同志的意见好。叶群同志,你看呢?”

叶群高兴地说:“好好好,我完全同意江青、文元同志的意见。江青同志还有什么作品,以后还可以陆续发表嘛。”

这件事就交由姚文元负责办理了。

# 第1171回：外交部，姚登山批斗逮捕 巧安排，基辛格悄悄进京

1971年6月11日下午，外交部在北京工人体育馆召开“批斗现行反革命分子姚登山大会”。外事口及其他各方面共13000余人与会。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大会委员会、外文出版局、外国专家局等单位的80多位外宾也应邀参加大会。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纪登奎也在主席台就座。会前，与会者参观了姚登山的部分罪证展览。

会上，外交部群众代表发言，揭发、控诉姚登山的“十大罪状”：

一、煽动“五一一”游行公开向中央示威。所谓“五一一”游行是指1967年5月11日中南海揪陈毅的示威游行。

二、破坏支港抗英斗争，进行“反军乱军”的罪恶活动。

三、紧密配合围困中南海，积极支持在外交部“安营扎寨”。

四、参与炮制“八七”大毒草，疯狂煽动反革命夺权。

五、篡改中央口号，破坏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

六、姚登山是砸外交部政治部的总指挥。

七、姚登山是篡夺中央外交大权的主谋。

八、参与策划火烧英国驻华代办处，疯狂破坏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

九、猖狂破坏革命大联合，残酷镇压革命群众。

十、策划和指挥围攻总理、摧残总理健康。

大会进行过程中群情激动昂。外交部群众强烈要求专政机关将姚登山逮捕法办。北京市公安局军管会代表当场接受群众要求，把他当作“现行反革命分子”立即予以逮捕。

最后，外交部副部长李耀文讲话，阐明党的政策，进一步动员外交部和外事口的全体同志团结起来，把清查“516”的斗争进行到底。

会后姚登山被关押在秦城监狱。

早在1970年11月30日至12月8日，外交部湖北省“五七干校”

就已经召开了9次大、中型会议批判姚登山。随后,他又被揪往位于湖南、江西和山西等省的外交部五七干校接受群众批判,并于1970年12月16日揪回北京。12月30日外交部已召开大会批判姚登山。

6月21日,周恩来会见并宴请在华访问的美国《纽约时报》、《每日新闻》、《华尔街日报》的记者和夫人。

周恩来说:“我们要求美国政府不要干涉中国内政,美国一切武装力量从台湾和台湾海峡撤走,尊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这个问题解决了,一切问题就解决了。中美关系,也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紧合众国的关系就可以建立了。这是我们从一九五五年中美两国大使级会谈十五年来的一贯主张,没有别的要求。”

6月28日,周恩来会见日本公民党访华团。

日本公民党就中日关系问题发表五点主张:一、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二、反对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的论调;三、日台条约是非法的必须废除;四、美国武装力量必须撤出台湾和台湾海峡;五、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席位。

周恩来在会见中说:如果按照公民党主张的五点,日本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邦交就可以恢复,战争状态就可以结束,中日关系可以得到发展,中日两国人民就有可能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订立和平条约,并可以进一步考虑缔结互不侵犯条约。

6月30日,美国白宫发言人、新闻秘书齐格勒在新闻发布例会上宣布:“尼克松总统即将派基辛格博士于7月2日至5日到越南南方执行调查事实的任务,随后将到巴黎和美国驻法国大使戴维·布鲁斯进行磋商。在基辛格赴巴黎途中,他将同泰国、印度和巴基斯坦官员们会谈。”

基辛格于7月1日离开华盛顿,两天后到达西贡,同南越总统和美国大使晤谈,众多记者紧盯着基辛格的一举一动,《纽约时报》、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报道了他的活动。

第二天基辛格到了泰国曼谷,记者不多,渲染也少些。

7月6日基辛格抵印度新德里,反战示威者迫使他从边门溜出飞机场。

7月8日基辛格抵巴基斯坦新首都伊斯兰堡,只有3个记者跟着,

他很高兴。按既定日程,他需要在巴基斯坦停留 48 小时。他先去总统府拜会叶海亚·汗总统,在美国大使馆同大使共进午餐,然后出席叶海亚·汗总统特意为他举行的欢迎晚宴。

在宴会达到高潮时,基辛格突然手捧腹部,连叫难受。南亚地区那时流行德里痢疾,叶海亚·汗总统大声说:伊斯兰堡天气太热,会影响基辛格恢复健康。他要基辛格到伊斯兰堡北边群山中纳蒂亚加利总统别墅“治疗和休养”。

基辛格正在迟疑不决,叶海亚·汗总统坚决而恳切地说:在一个穆斯林国家,要依主人而不是客人的意志作决定。

基辛格手下的一位特工,马上派他的一个同事到那里去打前站,了解情况。宴会结束,基辛格正在宾馆休息,打前站的特工打电话回来说,那里的别墅不宜于居住。基辛格只好请巴基斯坦把那位倒霉的美国特工扣留在山中,因为这只是一出戏,基辛格并不是要去那里,而是要去中国。

巴基斯坦叶海亚·汗总统对基辛格秘密访华事宜十分重视,对各个环节包括航行做了充分准备。7 月 6 日中午,试航的巴基斯坦波音飞机抵达北京南苑军用机场,外交部美大司司长章文晋、总参二部副部长熊向晖和外交部礼宾司副司长王海容等人去机场迎接。8 日清晨,巴基斯坦专机返航,章文晋、王海容、翻译唐闻生和礼宾司接待处副处长唐龙彬随机去巴基斯坦迎接基辛格一行。

他们在离京前,周恩来和其他几位领导和他们谈话,强调这次任务的重要性,要求他们要严格保密。周恩来说:“这是中美交往中断了 20 年后第一次重要的高级会晤,这说明了美国封锁敌视中国政策的完全失败。为了摆脱被动局面,美国不得不放下一贯傲慢的架子,跑到北京来与我们会谈。我们应该本着落落大方、以礼相待、不卑不亢的精神做好这次工作。”

由于时间紧迫,更主要是考虑到这次行动的保密性,他们离京时护照签证和有关出国证件等也就全部免办。7 月 8 日凌晨,天蒙蒙亮,他们 4 人带上最轻便的行装直奔南苑机场。当时南苑机场是内部军用机场,平日极少有外国飞机在这里起降,因此决定基辛格一行乘坐的飞机在这里降落。章文晋一行一进入机场,就看见那架涂有巴基斯

坦国际航空公司标志的波音707飞机。这是叶海亚总统的专机,机组均为训练有素、经验丰富的飞行人员组成。飞机上还有中国民航派出的徐柏龄大队长等两位领航员。

4个多小时后,飞机平稳地降落在伊斯兰堡查克拉拉机场特别停机坪,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张彤已在机场上等候。

晚上20时,张彤大使和章文晋一行应叶海亚总统的邀请赴总统府参加晚宴。这是总统举行的小型宴会,巴方除外交部外事秘书苏尔坦·汗一人作陪外,还有总统军事副官海军上尉在场照料。

席间,叶海亚总统简述了基辛格到巴基斯坦后的活动及他和基辛格会晤的情况,还告诉他们基辛格将装病,以避开外界注意,在装病期间赴中国作48小时的秘密访问。叶海亚说,他对这次能当中间人,对中美高级官员的重要会晤做出贡献感到十分荣幸。章文晋也代表中国政府对叶海亚总统的帮助和协作表示了诚挚的谢意。晚宴到23时才结束。

7月9日凌晨3时30分,章文晋一行乘车前往巴基斯坦伊斯兰堡查克拉拉机场。此时,整个伊斯兰堡市仿佛在沉睡之中,沿街没有行人和车辆,透过车窗只能看见灰暗的路灯在闪烁晃动。他们在预定起飞时间前10分钟到达机场,门口的警卫远远看见他们的汽车牌号,就挥手让他们进去。汽车直接开到停机坪,机场上一片漆黑,那架黑乎乎的波音707早已停在那里等候,前舱门放下一道舷梯。机舱内的窗户全部关闭。他们上机后就坐在机舱门附近的座位上,从舱门处紧张地注视着外面。那时正是当地凌晨4时20分。

几分钟后,两辆黑色轿车驶来,直接开到舷梯下,先是一个又瘦又高的身影从车中出来,那是巴基斯坦外交秘书苏尔坦·汗先生,随后从另一面车门闪出了一个肥胖的身影,那就是基辛格,他戴着一副墨镜,一顶大沿帽。这种打扮对不大熟悉他的人来说,真是不大好辨认。

基兴格也是在伊斯兰堡的凌晨3时30分起床,吃早饭,4时同他的随行人员乘巴基斯坦外交秘书苏尔坦·汗驾驶的军用汽车去机场。此时,他快步跟上苏尔坦,登上舷梯,进入机舱,看到从中国来迎接他的章文晋、王海容、唐龙彬、唐闻生和3名中国领航员。苏尔坦·汗先生为双方作了介绍后就下了飞机。

美方也是一行4人,除基辛格外,还有他的政治事务助手温斯顿·洛德和约翰·霍尔德里奇,另外一个叫迪克·迈斯泽,他是负责生活事务的。他们看上去好像很年轻,其实都已从事外交工作多年。另外还有两名特工人员雷迪和麦克劳德负责他们4人的安全。

双方相互握手致意,这是中美政府高级官员22年来的第一次握手。一边是笔挺的西服,另一边是严肃的中山装和女制服。

没想到的是,此时正在机场的一位巴基斯坦籍的伦敦《每日电讯报》记者在基辛格上飞机时认出了基辛格,他问在场的巴基斯坦官员:"基辛格要去哪里?"

巴基斯坦官员回答说:"基辛格要去中国。"

这位记者连忙回到办公室,向伦敦报社发了一条报告这一重要消息的急电:"基辛格要去中国!"

伦敦《每日电讯报》的值班编辑看了这份急电,骂道:"他准是喝醉了,基辛格怎么会去中国?真荒唐!"随手"枪毙了"这条消息。

就因为这位值班编辑,伦敦《每日电讯报》错过了一次轰动全球的头条新闻的机会。

当地时间4时30分,这架波音707飞机准时起飞。当飞机越过中巴边界上空时,坐在专机的前列座位的基辛格的特别助理、32岁的洛德,此后常因他此时坐在飞机的最前边而自夸说:"我是中美22年隔绝后第一个进入中国的美国官员"。

其实洛德得此殊荣应归功于巴基斯坦人,座位是他们一手安排好的,具体来说是巴基斯坦外交部外事秘书苏尔坦·汗安排的。苏尔坦·汗把基辛格一行引上飞机,替中美双方人员做了介绍,安排大家就座后才离开飞机。基辛格作为贵宾坐在中间的一个特等舱内,这里有有双人床;美方的洛德、霍尔德里奇、斯迈泽、迪克和两名特工坐在前舱右侧;中方官员作为主人坐在前舱左侧。而洛德正好在前舱右侧的最前方。

飞机起飞数分钟后,当飞机开始平稳地飞行时,大家便挪动到一张小桌旁,围坐在一起。开始时,双方都用警惕的目光注视着对方,气氛很拘束紧张。两个特工更是如临大敌,他们都有手铐,把自己的手锁在黑色文件包的提手上。他们是在登机前一个多小时才知道这次

神秘之行的。

相互致意后,基辛格就对唐闻生说:“很高兴能见到南西·唐。”他又接着开玩笑说,唐闻生可以竞选美国总统,而他不行。因为唐闻声出生在美国。大家都笑了起来。章文晋问起了基辛格在巴基斯坦装病的情况,基辛格便讲了他怎么装作胃疼发作,到叶海亚总统在北部纳蒂亚加利地区的别墅休养,逗得在场的人都哈哈大笑,连一直绷着脸的几位特工也放松起来。气氛很快轻松起来,大家也谈笑自如。

基辛格告诉章文晋,他此行的目的是宣告美中两国关系进入了一个新时期,但最好首先就整个形势取得一致看法。章文晋表示,周恩来总理准备就广泛的国际和双边问题与他交换意见。基辛格随后又问了一些有关北京的气候和风土人情的情况。

沿途天气晴朗,经过试航的驾驶员熟练平稳地驾驶着专机,经过4小时45分、2400英里的飞行,飞机按预定时间于北京时间中午12时15分降落在北京南苑机场。为安全起见,在飞机进入北京附近上空时,中国空军出动了两架战斗机护航。当飞机平稳地降落在南苑机场跑道上时,基辛格一行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热烈鼓掌,中方人员也跟着鼓起掌来,祝贺平安抵达北京。当时洛德更是格外兴奋,因他坐在飞机前排,是第一个进入中国这个神秘国家的美国官员。但他们当时的心情却是很复杂的,对即将举行的会谈仍然是疑心重重。

透过机窗,可以看到叶剑英元帅正站在停机坪上等候。他身穿深灰色的中山装,精神抖擞,与黄华、韩叙和冀朝铸交谈。他们身后停着3辆红旗牌轿车。

基辛格首先走下飞机,叶剑英迎上前去热情握手问候,用浓重的广东口音连声说:“欢迎你!欢迎你!”随后陪同基辛格坐进宽大的红旗轿车,直奔钓鱼台国宾馆,途中车队的车辆都把深色窗帘放下。

那时的北京,路宽车少人稀,根本不需要什么交通管制便可以一路畅通无阻地抵达目的地。

从机场到钓鱼台的道路两边不时出现“打倒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的大幅标语。由黄华陪车的美国负责东南亚事务的基辛格助理霍尔德里奇问他:“路边标语写的是什么内容?”黄华如实给他翻译,他感到很不自在。

# 第1172回：开场白，逐字念长长讲稿 立场明，周恩来侃侃而谈

到达钓鱼台后，基辛格一行住进了5号楼。这个国宾馆完全是中国式的建筑风格，从里到外都充满了中国元素，在外国人眼里很是迷人。

章文晋通知美国客人："周总理下午与你们会见。"

基辛格和洛德等立即到院子里散步，边走边商量问题。他们是担心中方会在他们住室内安装窃听设备。此后，他们始终采取这种方式商量问题，即使是晚上很晚，仍要在外散步。在室内偶尔交谈时，他们也要把收音机打开，以防有人窃听。有一次，基辛格等人散步到6号楼附近的小桥，被警卫挡了回来，他们不高兴，提出意见。中方外交部官员对他们说："这是你们自己提出的要求，要绝对保密。"

基辛格的两个保卫人员似乎很不习惯这种秘密任务，常常显露出很紧张的样子，跟在基辛格后面寸步不离，连与周恩来举行的小范围会晤，他们也想千方百计"挤进去"。后因基辛格本人也不同意，他们只好在外面等候。

基兴格一行到达钓鱼台后，叶剑英设便宴迎接基辛格一行。基辛格在赴宴前才发现，离开巴基斯坦时走得匆忙，把衬衫忘在伊斯兰堡了，这时没有衣服换，十分着急。他先向洛德借用衬衣，但洛德长得太苗条，不适合基辛格发胖的身材，只得再求霍尔德里奇帮助。霍尔德里奇身材高大，对基辛格来说衬衣太长，总算凑合着可用，但突然发现印着"台湾制造"。基辛格此刻还不忘开玩笑："真不吉利，我就是担心台湾问题会使会谈卡壳！"

这第一顿饭说是简便的欢迎宴会却显得相当隆重，令美国人吃得十分开心。钓鱼台的师傅大显身手，菜式多样，制作精美，国酒茅台尽供享用。基辛格一再称赞饭菜可口，说比白宫大厨师亨利·哈勒的饭菜好多了，无法相比。此后近两天内顿顿如此，且花样翻新，到基辛格

辞行时,他一再说,来中国才48小时,自己就吃胖了,体重增加了好几磅。他由衷地认同毛泽东关于“中国菜”是中国对人类一大贡献的说法。

基辛格就餐后顾不上休息,急于想见中国总理。因为,他称病“感冒”的时间只有两天,也就是说,他在北京停留的时间不会超过48小时。而且只有见到了中国的总理,他才能知道自己此行目的能否达到。

很快,基辛格被告知,周恩来总理正在前往国宾馆的路上,马上到他住的5号楼来举行会谈。

基辛格感到非常惊喜和突然,他们没有想到周恩来竟会亲自来他们住地见面。一般情况下,政府首脑是不会登门拜访来客的,尤其是一位不是政府首脑的客人。基辛格连忙招呼他的随员到客厅门口迎候。

基辛格一行提前15分钟就在楼下门厅内的屏风前排成一行,等候周恩来的到来。对中国的神秘感使他们在即将见到中国领袖人物之前显得紧张和拘束。

当周恩来、叶剑英在4号楼听完汇报,按时驱车到达5号楼时,基辛格未等周恩来走到跟前,即迎上前去伸出手,动作有点夸张。

周恩来会意地微笑了,他快步走到基辛格面前,用他那受过伤的右手与基辛格紧紧相握,并使劲抖动了几下,然后意味深长地说:“这是中美两国高级官员二十多年来的第一次握手。”

基辛格很有分寸地点点头,并幽默地补充了一句:“遗憾的是这是不能马上公开报道的握手。否则,全世界都会震惊的。”

当周恩来和基辛格完成了历史性的握手后,基辛格便将自己的随员逐一介绍给周恩来。

基辛格指着身边的大高个子霍尔德里奇说:“约翰·霍尔德里奇。”

周恩来握着霍尔德里奇的手说:“我知道,你会讲北京话,还会讲广东话,广东话连我都讲不好。你在香港学的吧?”

霍尔德里奇忙说,自己50年代初在香港待了一段时间,有了提高中文的机会。其实,霍尔德里奇1937年还来旧中国旅游过,到过北

平、上海等地,此时他在基辛格亲自主持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工作,与洛德一样,都是基辛格的得力助手。

“理查德·斯迈泽。”基辛格接着介绍。

周恩来一面和他握手一面说:“我读过你在《外交季刊》上发表的关于日本的论文,希望你也写一篇关于中国的。”

斯迈泽说,自己到过日本和南越,对中国了解不够。他是基辛格手下主管日本和越南事务的助手。

轮到洛德时,他没等基辛格介绍就自报姓名:“温斯顿·洛德。”

周恩来握着洛德的手摇晃:“小伙子,好年轻。我们该是半个亲戚吧。我知道你的妻子是中国人,在写小说。我愿意读到她的书,欢迎她回来访问。”

周恩来是说洛德的妻子曾出版的《春月》一书。

洛德连声表示感谢和高兴。

周恩来也跟特工人员雷迪和麦克劳德开玩笑:“你们可要小心哟,我们的茅台酒会醉人的。你们喝醉了,是不是回去要受处分?”

周恩来一露面,就给对方以深刻印象。基辛格一行的紧张、拘束很快就消失了。基辛格后来在其回忆录中这样描绘:“他脸容瘦削,但神采奕奕,双目炯炯,他的目光既坚毅又安详,既谨慎又满怀信心……他举止娴雅庄重,他使举座注目的不是魁伟的身躯,而是他那外弛内张的神情,钢铁般的自制力,就像一根绞紧了的弹簧一样。他似乎令人觉得轻松自如,但细心观察就知道并不尽然。”

中方官员叶剑英、黄华、章文晋、熊向晖、王海容、唐闻生和冀朝铸也跟在周恩来后边,与美方人员握手后一同进入会议室。双方隔着一张铺着绿台布的长桌坐下。基辛格身旁有霍尔德里奇、斯迈泽和洛德,特工人员雷迪和麦克劳德也在场,仍提着沉重的文件箱,但未入座。中方怕特工人员太累,把他们二人请到另一房间休息,终于离开了会议室。

周恩来同基辛格在钓鱼台国宾馆举行的第一轮会谈从9日下午16时25分持续到晚上23时30分。

基辛格首先表示感谢中方的热情招待,说:“如果有机会,我也希望以同样的热情在美国招待周总理。”

周恩来落落大方地说:“我没有去过美国,也没有到过西半球,但我们是在同一时候工作,你们在白天,我则在晚上。”

果然是名不虚传!答得自然得体,既未说去,也未说不去。基辛格神经再度绷紧。

宾主一坐下,基辛格的助理洛德马上将一本花了许多心血准备的材料汇编摆在了基辛格的面前。基辛格发现周恩来注意到这个细节,就笑笑说:“没办法,都是些讲话提纲和有关文件,做参考,我不得不照着这个念。”

周恩来说:“会谈嘛,可以自由一些,放开一些,随便一些。”

看到基辛格和他的助手洛德、霍尔德里奇等都带着一大包文件,周恩来客气地说:“按中国的习惯,请客人先讲。阁下已准备了一本本的东西,先听听你的意见。”

基辛格开始显得有些紧张,他打开面前那本厚厚的,足有7厘米厚的文件夹,十分谨慎而机械地念起他同尼克松一起起草的一篇很长的讲稿:

“对中美两国来说,这是第一次在平等的基础上举行会谈,也是打开了历史上新的一页。今天是全球的形势发展使我们相遇在这里,现实把我们带到了一起。”

接着他提出了要会谈的七个问题,即:(1)台湾问题;(2)印支问题;(3)同其他国家关系问题;(4)南亚次大陆形势;(5)中美联系途径;(6)关于军备控制;(7)中方愿提出的其他问题。

基辛格照本宣读的讲话稿还说:“中国担心的是美国同别国联合起来反对中国,其实美国永远不会这样做,中国不对美国构成威胁,在没有考虑中国意见的情况下,美国不会采取任何涉及中国利益的重大步骤。”

基辛格的这个开场白是他与尼克松精心准备的,力图使中方了解美方战略意图,虽未提苏联,但矛头所向是明显的。

大家耐心地听基辛格念完开场白,周恩来说:“交谈嘛,何必照着稿子念呢?”

基辛格说:“我在哈佛教了那么多年书,还从未用过讲稿,最多拟个提纲。可这次不同,对周恩来总理我念稿子都跟不上,不念稿子就

更跟不上了。”

他的幽默把大家都逗笑了,会谈的气氛也轻松了许多。在哈佛大学磨练过口才的基辛格自己,也感觉到这样照本宣科太枯燥。他硬着头皮把开场白念完,然后,索性丢开讲稿,要在周恩来面前显示一下自己的口才。他说:

“今天全球的趋势使我们相遇在这里。现实把我们带到一起,现实也会决定我们的未来。我们正是本着这种精神来到你们这个美丽而神秘的国家。”

周恩来摆了摆手说:“不,不,并不神秘,熟悉了就不神秘了。”

基辛格说:“尼克松总统仔细阅读了美国《生活》杂志刊载的毛主席与斯诺的谈话。尼克松总统有一个信念,强大的发展中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对美国的任何根本利益都不构成威胁。在没有同你们讨论和没有考虑你们意见的情况下,美国不会采取涉及你们利益的任何重大步骤。”

周恩来表示:“欢迎尼克松总统来中国。中美两国人民是愿意友好的,邀请你们的乒乓球队访华就是证明。”

接着,基辛格说,尼克松总统给了他两个任务:一是商谈尼克松访华日期及准备工作,二是为尼克松访华进行预备性会谈。

基辛格向周恩来提出讨论台湾问题:“在我们交换信息期间,我们了解这是你们对双方关系主要关切的议题。总理先生,你已界定美国军队应撤出台湾及台湾海峡,我也准备好听听你的意见,并实际来讨论这个问题。”

周恩来:“第一个问题是台湾。基辛格博士已非常坦率地提出了看法,我们也会表达我们的意见。”

基辛格:“我说得不够清楚,但显然能和周总理沟通。”

周恩来:“你提到今天的会面是个历史性的场合。当然如果尼克松总统能到中国并和毛泽东主席会面,会是个更多的历史场合。如果我们能解决问题的话,那会是个历史性的场合。当然,我们今天可以开始创造气氛,因为你提到,我们两条分道扬镳的路又聚在一块儿。从另一方面说,我们想在平等的基础上解决问题。”

周恩来就台湾问题批评了美国政府,并就此问题阐述了中方的

立场。

基辛格说,台湾问题可分为两部分:

(一)关于美国在台湾的“军事存在”,美国准备在印支战争结束后很快从台湾撤出三分之二的美军,随着中美关系的改善,再削减其余部队。

(二)关于台湾的政治前途,美国不搞“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不支持“台湾独立”,不再讲“台湾地位未定”;美蒋条约留待历史去解决;美国不再指责和孤立中国,美国将在联合国支持恢复中国的席位,但不支持驱逐台湾代表。中美关系正常化要到尼克松总统第二任期才能解决。

周恩来对此表示不满,他阐明台湾历来就是中国的领土,解放台湾是中国的内政,美军必须限期撤走,美蒋条约无效。要求美方加速解决台湾政治问题的速度。

在谈到印度支那问题时,基辛格说他们准备制定一个从越南和印支撤走武装力量的时间表,但希望得到一个维护他们的体面和自尊的解决办法。

周恩来针对基辛格提到的问题坦率地说:“我们双方有不同的看法,用我们的话来说,世界观和立场都不同。但这种分歧并不妨碍我们两个在太平洋两岸的国家寻求阁下所说的平等友好相处的途径。首先一个问题是平等,换句话说是对等,一切问题从对等出发。我同意这样的说法,即中美两国人民是愿意友好的,而且过去是友好的,将来也会友好的。我们邀请你们乒乓球队访华就是证明。”

周恩来特别指出:“美国朋友总是喜欢强调美国的体面、尊严。你们只有把你们的所有军事力量统统撤走,一个不剩,这才是最大的荣誉和光荣。”

之后,基辛格提出:“希望中方出于仁慈,提前释放仍在中国服刑的几名美国犯人。”

那时在中国服刑的美国犯人,既有朝鲜战争期间侵入我领空进行间谍活动的美国中央情报局特工唐尼和费克图,也有在越南战争期间侵入我领空的美军飞行员史密斯和费林。周恩来表示:根据中国的法律,表现好的罪犯可以缩短刑期。越南战争尚未结束,与此战争有关

的美国犯人无从考虑他们的释放。

除了就上述问题,中美双方各自阐述自己的观点和意向,并有所交锋外,双方还讨论和解决了当时需要解决的两个具体问题:一是确定不再恢复中美大使级会谈,建立新的直达双方最高层的秘密联系渠道:巴黎渠道,中方联系人是中国驻法国大使黄镇,美方联系人是曾任尼克松翻译的驻法武官沃特斯。另一个而且更重要的问题是,商定双方将同时发表尼克松将应邀访华的公告。

基辛格发言告一段落后,已到了晚餐的时间。周恩来提议先吃饭。

# 第1173回：会谈毕，即赴游泳池汇报毛泽东，先与熊向晖漫谈

晚餐后，周恩来与基辛格继续会谈。周恩来针对基辛格提到的问题，用简短的时间，坦率地表明了中国的立场和态度。然后话锋一转，谈到了尼克松在堪萨斯城的演说。

周恩来说："我是大致赞成尼克松总统7月6日在堪萨斯城演讲的观点的。总统讲到当今世界存在'五极'。"

"堪萨斯城？五极？"基辛格愕然。他只知道尼克松过去多次与他商量过中、美、苏三极即"大三角"的说法。他并不知道，7月6日，当他在印度新德里时，尼克松在堪萨斯城发表了一番关于"五极世界"的重要讲话。而且，基辛格怎么也没想到，在7月7日、8日这两天还给他打过电讯的尼克松，竟忘了把这样一番重要讲话告知他。故此，基辛格对尼克松7月6日演说一事及其内容一无所知，倒是周恩来先提了出来，这下子使基辛格陷入十分尴尬的境地。

基辛格的助手们也面面相觑。他们都在暗暗为基辛格着急。周恩来敏锐地感觉到了基辛格对尼克松的堪萨斯城演说一无所知，他说：

"你们可能在路上没看到总统的讲话。"

基辛格只得尴尬地点了点头。

周恩来热情地为基辛格介绍尼克松的演说观点。他说："尼克松总统声明，本届政府'务必首先采取步骤，结束大陆中国与世界社会隔绝的状态'。他预见到世界上将出现'五个超级经济大国'美国、西欧、日本、苏联和中国，它们之间的关系将决定当代和平的结构。我们赞同你们总统的观点，却不赞同给中国戴上'超级大国'的帽子，也不参与大国的这场比赛。"

周恩来无意利用对方不利境地的真诚态度使基辛格及他的助手们长长地松了一口气。周恩来表示，中国在经济方面比较落后，不成

其为尼克松说的那种力量,我们永远不做超级大国。

当天会谈后,基辛格向中方借阅尼克松7月6日在堪萨斯城演讲全文,外交部立即向新华社索要英文稿,新华社参编室以特急件送到钓鱼台时,上面写了“仅此一份,请用毕退还”。因美方索要甚急,中方立即将此稿交基辛格。后来美方人员在回忆录中就“仅此一份……”做了不少文章,说中方怎么连复印机也没有。他们以为“退还”的要求是中方代表团向美方提出的,其实这是新华社写给外交部的。

当晚23时20分会谈结束,周恩来带领中国方面参加会谈的人员走到钓鱼台另一座楼。他立即让王海容打电话联系,问什么时间去毛泽东那里汇报。

王海容问:“都谁去?”

周恩来说:“你、唐闻生和我一起去。”

电话很快就打通了。王海容对周恩来说:“主席让现在就去,还让熊向晖也去。”

周恩来吩咐王海容和唐闻生先走一步。他收拾了一下公文包,服了药,便与熊向晖一起上了车。

周恩来的轿车驶向中南海。此时已是午夜,街上静寂无人。周恩来默默沉思着,熊向晖则在心中迅速地筛选最近的国际大事,推断基辛格的秘密访问一旦公开,可能引起什么样的国际反响。他觉得,毛泽东找他去,一定是要了解这方面的国际形势。

轿车在中南海游泳池门口停下。周恩来带着熊向晖快步走进毛泽东的会客室兼书房。这时,毛泽东身穿浴衣,已经站在屋子当中。

周恩来快步向前,握了握毛泽东的手说:“这样晚,主席还没休息啊。”

毛泽东说:“我不困。”

熊向晖跟着握住老人家伸出的手,说:“主席好!”

毛泽东笑容满面地说:“马马虎虎。”

会客室中,7张单人沙发摆成一个半圆,毛泽东在居中的一张沙发上坐下,周恩来和熊向晖分坐在他两旁。王海容坐到熊向晖旁边,唐闻生则坐在毛泽东沙发背后落地台灯下的一张椅子上。

周恩来告诉毛泽东,基辛格到了,接着准备汇报会谈的情况。不

想毛泽东却摆了摆手说:“那个不忙。”

他从茶几上拿起一只深褐色的小雪茄,唐闻生帮他点燃。

毛泽东深深吸了一口,转向熊向晖,仍然是满面笑容地问道:“你现在还讲不讲‘卫生’啊?”

王海容对熊向晖解释说:“主席是问你还抽不抽烟。”

她又转向毛泽东说:“老熊是个烟鬼。”

“他怎么成了老熊了?”毛泽东问。

“我今年52岁了。”熊向晖说。

“哦,还不老嘛。”毛泽东边说边指指茶几上放着的小雪茄,说:“现在医生不让我抽香烟,只让我抽这个。他们都讲‘卫生’,你不讲,你就抽吧,我也不‘孤立’了。”

熊向晖点燃一支小雪茄,以为这样的寒暄可以结束了。然而,毛泽东还继续“寒暄”:“你在总参二部当副部长?”

熊向晖答:“是。”

毛泽东深深地吸了一口雪茄,操着浓重的湖南乡音问:“那个‘参谋总长’姓甚名谁呀?”

熊向晖一面回答“黄永胜”,一面感到不可思议:主席怎么提出这样的问题?而且把“总参谋长”说成“参谋总长”?

毛泽东又问:“你同黄永胜熟悉不熟悉呀?”

熊向晖答:“到总参以后,在会上认识了黄总长,没有单独接触过。黄总长提到过我。”

“他是怎么提到你的呀?”

“今年4月,黄总长在总参批陈整风小结会上说,主席对他讲,总参有篇批陈发言有水平,但主席没有具体讲是哪一篇。黄总长估计,可能是江钟的,也可能是熊向晖的。”

毛泽东说:“我指的是你的那一篇。你读过一些马列。”

熊向晖以为谈到这里,毛泽东该听周恩来汇报了。不料老人家似乎忘记了此事,抽着小雪茄,继续优哉游哉地同他“漫谈”:“在那个小结会上,黄永胜还讲了什么?”

熊向晖回答:“小结是王新亭副总长念的。吴法宪副总长做了补充,说总参批陈整风搞得很好,自从黄总长主持总参以来,毛泽东思想

红旗举得高,各方面工作都取得很大成绩。主席和林副主席对黄总长是满意的,各大总部,各大军区,各军、兵种对黄总长是尊敬的。黄总长很谦虚,说他毛泽东思想红旗举得还不够高,比林副主席差得远,在工作中还有些官僚主义。”

毛泽东“哦”了一声,又问:“他们没有讲庐山的问题?”

熊向晖说:“讲了,是在批陈整风动员会上讲的。吴副总长说,总参同陈伯达没有来往。黄总长说,他是在庐山会议开始以后才到了庐山,当时主席已经发表了《我的一点意见》,揭露了陈伯达。黄总长说,他不认识陈伯达,原来只知道陈伯达是个理论家、秀才。如果不是主席、林副主席指出来,他也看不出陈伯达搞的《恩格斯、列宁、毛主席关于称天才的几段语录》有什么问题,也可能上当受骗。以后要坚决按照主席和林副主席的指示,多读一点马列的书。”

毛泽东脸上的笑容消失了。他又抽了一支雪茄,用缓慢的语调问:“庐山的事,他们就讲这些?”

熊向晖回答:“主要就是这些。”

毛泽东沉默了一会儿,深深吸了一口雪茄,突然伸出左掌,用右手一个一个按下左手的手指,问熊向晖:“黄永胜和他那个军委办事组——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他们在庐山搞鬼,黄永胜讲了没有?”

熊向晖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他怔了一下,回答:“没有听黄总长讲过。”

毛泽东又问他有没有看过“五个大将”的检讨、听过这件事的传达没有?熊向晖都只能回答没有,因为他对此毫不知情。

毛泽东意味深长地看着熊向晖,问:“你嗅出点什么没有?”

熊向晖依然是回答:“没有。”

毛泽东转过身来,问周恩来:“‘五个大将’的检讨,你在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上的讲话,发给总参没有?”

周恩来说:“发了,总参和军委一共发了60多份。”

“那是应该发到熊向晖这一级干部的,而他竟毫不知情!”毛泽东又吸了口雪茄,沉思了片刻,用左手拍了一下茶几,突然提高了声调,说:“他们的检讨是假的,庐山的事情还没有完。这当中有鬼,他们还

有后台。”

室内的空气仿佛凝固了。“他们的后台”是谁？过了一会儿，大概是想缓和一下气氛吧，周恩来委婉地说：“我过去也犯过错误，一经主席提醒、批评，总是努力改。这次黄永胜他们犯了错误，主席对他们进行了批评教育，他们做了检讨，以后也会在实践中改正的。”

毛泽东摇摇头说：“那个不同。你犯错误是阳谋，他们是阴谋。实践证明，他们的检讨是假的，是阴谋，连熊向晖这样的干部都不让知道，这不是阴谋？我历来主张，党内允许有公开的反对派，绝不允许暗藏的反对派。黄永胜他们搞阴谋，搞分裂，他们是暗藏的反对派。搞阴谋，搞分裂，就是搞修正主义。真正搞马克思主义的人，就要讲团结，就要光明正大。黄永胜他们光明正大吗？完全不是。总而言之，庐山的事，根本没有完。”

停了停，毛泽东又问熊向晖：“你有秘书没有，写报告、起草文件是不是亲自动手？”

熊向晖说：“没有。”

毛泽东说：“那好。我这里的文件，就是一个秘书管。她的任务就是收收发发。文件来了，我自己挑选重要的看，需要提点意见的，我自己动手写，从来不让秘书代劳。共产党员一要动手，二是动口。动手动口，就是要动脑筋。现在一些大官、小官，自己不动手，不动口，不动脑筋，什么事都靠秘书，听说连科长都有秘书，搞‘秘书专政’。有的人让自己的老婆当自己的办公室主任，这不是共产党的作风，是国民党的作风。”

熊向晖听了，心里又是一动：让自己的老婆当自己的办公室主任的，不是林彪吗？

直到此时，毛主席才结束了同熊向晖的“寒暄”，听取周恩来关于同基辛格第一天会谈的汇报。熊向晖看了看表，已是 10 日凌晨 1 时 05 分了。毛泽东谈“题外话”，竟谈了将近一个钟头！

周恩来向毛泽东汇报说，尼克松决定美国今年将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取得联合国和安全理事会的席位，但不同意从联合国驱逐台湾的行动。毛泽东明确而坚决地说：“我们绝不上‘两个中国’的‘贼船’。不进联合国，中国照样生存，照样发展。我们下定决心，不管是喜鹊叫

还是乌鸦叫,今年不进联合国。”

当周恩来说美国还想在台湾保留点军队时,毛泽东说:“猴子变人还没变过来,还留着尾巴。台湾问题也留着尾巴。它已不是猴子,是猿,尾巴不长。”

听了美国要从印度支那撤军的汇报,毛泽东说:“美国应当重新做人。多米诺骨牌是什么意思?基辛格英文比我们好。让那些骨牌倒了算了。这是进化嘛!当然不打它也不倒,不是我们打,是他们打。美国要从越南撤军,台湾不慌,台湾没打仗,越南在打仗,在死人呀!我们让尼克松来不能就为自己。”

汇报到日本问题时,毛泽东说:“要给基辛格吹天下大乱,形势大好,不要老谈具体问题。”

待周恩来等人离开毛泽东住地时,已经是凌晨两点多了。在回宾馆的路上,周恩来嘱咐熊向晖:“今晚主席讲的话,绝对不能外传。”

周恩来事后了解到,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的文件总参和军委系统一共发了60多份,可是军委办事组只下发了7份,传达范围非常窄。当时,毛泽东接到总参三部部长给他写的信,信中谈到总参批陈整风的情况。

10日早晨,安排基辛格一行到故宫参观。这也是他们在京停留期间惟一的一项外出活动。按照美方的要求,中方采取了严格的保密措施,对外关闭了部分景点,在参观沿线上只安排了几名便衣保卫人员。陪同参观的也只有黄华等少数人员。难怪基辛格在参观时说,今天的故宫显得格外幽静和宽敞,也看不到其他旅客。

7月10日下午16时,周恩来和基辛格的会谈继续进行。这次会谈的地点换在人民大会堂。

寒暄之后,基辛格表示:“请你们放心,美国要同中国来往,绝不会对中国进攻。美国同自己的盟国和对手绝不会进行结盟针对中国。中国对付美国的军队可以向北开,摆在别的地方。”

在这次会谈中,双方摆出自己的观点。由于分歧十分严重,气氛变得紧张起来。

在台湾问题、越南问题、亚洲问题等一系列问题上,双方的观点尖锐对立。

在这节骨眼上,周恩来说:“我们如不先去吃饭,烤鸭就要凉了。”

宴席上,周恩来把话题转到了中国的文化大革命。

接着,周恩来和蔼地建议,尼克松总统可于1972年夏天来访。

基辛格说,1972年夏天离总统大选的日子太近,可能引起误会。

周恩来充分体谅尼克松的难处,建议改在1972年春天。基辛格赞同这个日子。不过他说总统访问必须经过周密的准备,包括会谈议程、新闻和电视报道以及安全保卫工作。周恩来表示这些可以讨论。双方确定晚上10点以后再会晤,讨论关于这次基辛格访华的联合公告问题。

当晚,周恩来、叶剑英、黄华、熊向晖等人向毛泽东汇报同基辛格第二天会谈的情况。这次,毛泽东谈笑风生,没有涉及庐山会议的问题。

# 第1174回：达共识，《中美公告》惊世界 “峻岭”谁，林彪在《孜孜不倦》

因周恩来在7月10日晚上另有重要活动，根据他的指示，黄华和章文晋先与基辛格就公告谈一轮。双方都提出了一个稿子。

中方的稿子比较简单，说基辛格来中国，双方进行了会谈，尼克松总统准备来中国访问。

美方的稿子渲染基辛格同中国的这次会谈，涉及亚洲和世界和平的基本问题，是以诚挚、建设性的方式进行的；而尼克松的来华访问将有助于重建两国人民的联系，并对世界和平做出重大贡献。

双方对公告稿的争议有三处：一是尼克松来华访问是谁主动提出的；二是会谈要讨论哪些问题；三是来访的适当时间。

关于尼克松的来访，中方拟定的原稿中说“尼克松要求来访，我们邀请”，基辛格不同意，说：哪有尼克松自己邀请自己访华。这不成了旅游者了。

美方的稿子强调是中国邀请。黄华说：这不大符合事实。

双方会谈暂停后，黄华根据周恩来事前的指示，直接去向毛泽东汇报。当毛泽东听说基辛格认为中方草案的意思是尼克松自己邀请自己访华时，大笑着说：“要改，要改！”

当黄华他们告别毛泽东走出他的书房时，他回头看了看毛泽东，只见他仍坐在沙发椅上，躬身向前，两臂抱膝，双手几乎着地。

黄华问王海容：“主席这是什么意思？”

王海容说：“主席在向你们行大礼呢。”

黄华赶紧说：“不敢当，请主席保重。”

在周恩来提示下，黄华等人对中方草稿略加修改。

周恩来考虑如说尼克松要求来访，我们才邀请，他们的面子不好看，于是建议改成“获悉”（Knowing 0f）尼克松要来访，我们邀请，避免了谁是主动的问题。

对会谈要讨论的问题,基辛格不希望在公告里面提到台湾问题,周恩来就在原稿“谋求两国关系正常化”之后加上“并就双方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双方共同关心的问题”本身就包括了台湾问题,这样就不只是讨论台湾问题。

关于尼克松访华的具体时间,因听说尼克松要访苏,周恩来曾在与基辛格的会谈中问过,是否定在 1972 年 5 月 1 日以后。基辛格表示,最好在 3 月或 4 月,而且是先来中国。因此,在措词上也改为“5 月以前”,不说具体日期,以便灵活安排。

第二天,毛泽东起得很早,看了修改后的公告稿很满意,说:“就双方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这样写好,不然好像我们只关心我们的问题。”

关于访华日期,当周恩来向毛泽东汇报尼克松将会在 5 月以前来中国时,毛泽东说:“公告一发表,会引起世界震动,尼克松可能等不到 5 月就要来,早一点来也好嘛。”

7 月 11 日上午,黄华等人拿着修改后的稿子再与基辛格会谈时,基辛格对修改稿也很满意,即刻取得了一致,同意发表。双方皆大欢喜。最后商定的公告全文是:

周恩来总理和尼克松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博士,于一九七一年七月九日至十一日在北京进行了会谈。

获悉,尼克松总统曾表示希望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周恩来总理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尼克松总统于一九七二年五月以前的适当时间访问中国。尼克松总统愉快地接受了这一邀请。

中美两国领导人的会晤,是为了谋求两国关系的正常化,并就双方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

获悉(Knowing 0f)两字是周恩来的杰作,避开了谁主动提出访华的问题,这使美方尤其感到适当和体面,基辛格因而在尼克松总统“接受了这一邀请”之前加上了“愉快地”这一副词,投桃报李。

公告不把尼克松的访华说成是将对世界和平做出重大贡献,而是点明要谋求两国关系的正常化,不只是像美方初稿所说的重建两国人民的联系。

双方商定于 7 月 15 日同时公布公告。

这是基辛格此次来华的最后一次会谈,从上午8时一直延续到10时多,早已超过预定时间。根据事先商定,基辛格等将于中午离京返回巴基斯坦,继续在巴进行访问。如推迟离开,定会引起外界的种种猜测。

3个小时过去了,会议厅的门终于打开了。双方人员面带笑容走出大厅,基辛格陪周恩来到大门外并帮助周恩来打开汽车后门,等车辆启动,挥手告别后才回楼里。

最后一次会谈结束后,叶剑英来宾馆,与基辛格一行进行其在华的最后一次午餐。两天来的紧张气氛一扫而空,醇香的茅台酒打开了,叶剑英风趣地对基辛格说:“这次很对不起啦,没能以正式公开的方式来欢迎你,以后再补上。下次来就不需要再躲在这里了,可以到烤鸭店品尝烤鸭,也可到东来顺吃涮羊肉,还可以给你们的家人买些纪念品。”

7月11日吃完午饭后,基辛格一行按照预先的安排,于中午12时20分结束了在中国的“破冰之旅”,愉快地乘原机飞回巴基斯坦。叶剑英、黄华、韩叙和先遣组4人到机场送行。

基辛格对此次密访甚感满意,说他是“带着希望而来带着友谊而去”,访问成果“超过了他原来的期望,圆满地完成了秘密使命”。基辛格同中方达成了一份即将宣布尼克松访华的《公告》,是他此行的重大收获。

基辛格返回伊斯兰堡后办的第一件事,就是向华盛顿发出密码电报“我找到了”。这句短语的真实含义,就是北京之行取得成功。

基兴格走了,周恩来更忙了。由于长期以来,中国国民抱有浓厚的反美情绪,虽有1970年10月1日毛主席同斯诺在天安门城楼上的出现,大家也知晓毛主席同斯诺12月18日的谈话内容,又有美国等五国乒乓球队访华,但一般人都把这些看作是改善中美关系漫长道路的开始,耐心地等待变化。但是尼克松访华公告的发表使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一下子拉得很近,许多人对此思想准备不足,可能一时接受不了。兄弟国家更是这样。于是,周恩来紧急安排在公告发表前做国内干部和周边国家的工作。

7月12日,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了在京2000多名中高级干

部大会,用了3个多小时讲国际形势、中美关系和中国对外政策。

7月13日下午,周恩飞往河内。至14日,周恩来与黎笋、范文同会谈,通报中美会谈情况。

7月15日,周恩来清晨出发,从北京飞往平壤,金日成亲自到机场迎接,并陪同送至大同江畔的国宾馆。周恩来没有休息,上午和下午,连续与金日成会谈,深入分析世界形势变化,通报中美会谈情况,并介绍中共党内批陈伯达的情况。金日成听后表示十分重要,朝鲜劳党中央要专门开会讨论。金日成设丰盛晚宴招待周总理,并挽留他住下休息一天,但周恩来予以婉谢,并于当晚飞回北京。

当晚,周恩来与叶剑英同往西哈努克和宾努住地,向他们通报中美会谈情况。

1971年7月15日,几乎在同一时刻,中美各自宣布了一个震惊世界的公告。稍有不同的是,在美国,是由尼克松亲自在广播公司的播音室向全国听众宣读公告,并作了阐释。而在中国,是通过新华社全文播发,《人民日报》也在头版刊登了这一公告,但没任何阐述。

这个不足200字的公告一播发,对于整个世界来说,犹如在一个平静的湖面上扔下了一枚重磅炸弹。全美国都发愣了,全世界都震惊了!几乎所有的电波都在载送这个消息,几乎所有的语言都在谈论这个消息。世界的目光都转向中国和美国之间,翘首瞩目美国总统把手伸过太平洋的时刻。

同美国关系紧密的日本政府也仅是提前一小时才被通知此事。日本朝野生怕被再度甩在一边,开始认真考虑同中国恢复邦交之事。这个公告对一些国家在联合国关于恢复中国合法席位问题上的态度也有重要影响。

公告在中国国内和全世界引起了强烈的震动。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中美会谈后各方可能出现的情况和可能发生的变化,并对此做出部署。

7月17日,周恩来接见阿尔巴尼亚驻华大使,谈中美关系。当天,周恩来在接见法国议会代表团时说:“联合国只要出现两个中国或者一中一台,或者类似的形式,我们就不去,坚决不去。”

尽管已经向越南共产党通报了与基兴格会谈的情况,7月中旬,越

南《人民报》发表社论:《尼克松主义一定破产》,影射中美会谈,还是不满。

7 月 23 日,周恩来收到李德生转来的一份关于云南傣族、苗族情况调查报告。这个报告谈到,在少数民族地区补划阶级阶级成份时产生了副作用。周恩来当天致信毛泽东、林彪和中央政治局成员:“边疆和少数民族区这类情形,极为严重”,我们“已觉察到这类问题在少数民族区和边疆的严重性”。提出,有关情况拟在政治局会议上“认真讨论一次”,并“派人到有关地区与当地党委和军队党委联合进行调查核实”。

7 月 24 日,周恩来会见美国朋友韩丁一家和其他在京的美国朋友寒春、阳早、柯弗兰、柯如思、艾德勒、帕特、舒予章、史克、马海德、苏裕禄、阳和平,新西兰朋友路易·艾黎等。谈话中,介绍了对中美会谈、中国进入联合国以及台湾等问题的看法,回答了大家的提问。

7 月 16 日,在广东翁源县居住的陶铸的妻子曾志致信周恩来,提出:一、要求将她调到北方;二、要求对她的历史何题作出结论和恢复组织生活。7 月 31 日,周恩来就曾志来信批示:“(一)请函告曾志,她的信我已收到。她可去西北陶斯亮工作地方一看,如能留在那里休养或工作,都可同意。(二)如曾志确定去西北,也可将她女婿调至她女儿处一起工作。(三)四月到现在,工资应补发,其西北路费也可给帮助。(四)今后如工作,工资照发;如退休按月发退休金。(五)函告广东省委,速解决曾志的组织问题,有疑难可来信问中央。”

7 月 31 日,《人民日报》刊载了一条消息:“第七、八期《人民画报》合刊和《解放军画报》合刊 8 月 1 日出版”。消息说:“两本画报都以单页篇幅刊登了毛主席的照片。刊登了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彪副主席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照片,这张照片把林副主席无限忠于毛主席的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生动形象地展现在人们面前,给了人们巨大的激励和鼓舞。”

而此时,林彪已不在北京。7 月 17 日,林彪、叶群离开北京去北戴河。临行前,叶群对林彪的警卫参谋李文普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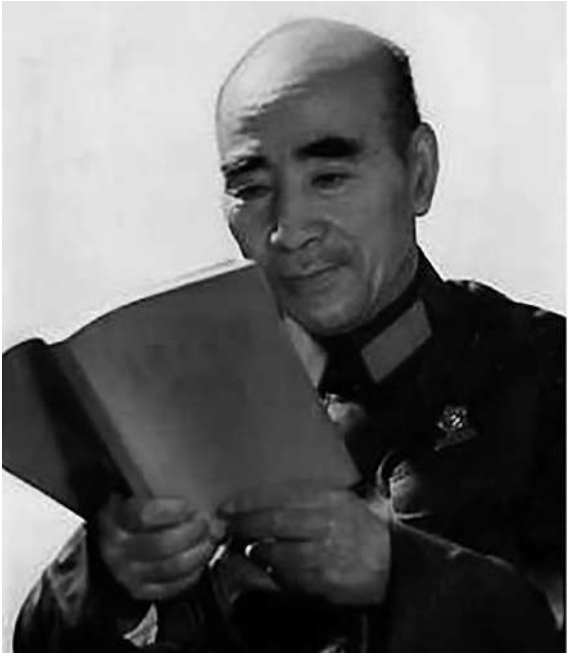
“首长说我们不能在北京啦,如果黄、吴他们斗得不好,11 楼来找首长反映情况不好办。我们到北戴河避开这个嫌疑,防止人家说是我

们指挥的。”

叶群这里说的“首长”是指林彪,“黄、吴”是黄永胜和吴法宪,“11楼”则是指江青。因为江青在钓鱼台住11号楼。

那幅“林彪副主席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照片”是空前的,因为林彪通常总是戴着军帽,这幅照片却是免冠的,显眼地暴露出那光光的秃头。这表明摄影者绝非普通的摄影师,足以叫林彪取下那顶长年不离的帽子。

照片题名《孜孜不倦》,摄影者的名字却是陌生的,曰“峻岭”。



《孜孜不倦》

“峻岭”何人?江青也!这张照片,就是6月9日江青在钓鱼台为林彪照的那张。

照片发表后,叶群给江青打电话说:“江青同志给林彪同志照的相

太好了。这张照片不但有艺术价值,还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在社会上一定会产生强烈而深远的影响。如此看来,形象教育有时比文字教育更有影响力。林彪同志看了以后非常高兴。他特别感谢江青同志的辛勤劳动,也热烈祝贺江青同志的摄影作品公开发表。我们也希望江青同志的其他优秀作品也在报刊上公开发表,用以教育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

江青看了叶群打来的电话记录以后,叫杨秘书立即回电话给叶群。她说:“谢谢林副主席对我的鼓励。摄影艺术是一个方面,主要是林副主席的形象好,同时又是学习毛主席著作最好、最高的代表。请林副主席保重身体。如果林副主席喜欢照相的话,我愿意给林副主席再照几张。”

8 月 5 日,周恩来接见了有影响的美国《纽约时报》副社长、著名记者詹姆斯·赖斯顿,并与他进行了长达 5 个小时的谈话。

周恩来详尽阐明了中国对于中美最高级会晤以及一系列重大国际问题所采取的基本立场和基本要求。他赞扬尼克松敢于冲破偏见、承担风险、首先访问中国的勇气。他说:“尼克松这回决定要到中国来这一件事,别的党派也说别人是不敢的。从这一点上看,他还是有一点勇气的。”

会谈后,周恩来亲自审定了谈话记录,并同意在《纽约时报》发表。

正当尼克松派基辛格为准备总统访华作第二次中国之行时,美国白宫和国务院之间爆发了一场争论,美国国务卿罗杰斯坚决反对这项计划。尼克松、基辛格权衡再三,没有改变初衷。

# 第1175回：黑龙江，潘复生撤职审查 赴青岛，开封清查“五一六”

8月6日，中共中央决定撤销潘复生的黑龙江省党的核心小组组长、省革命委员会主任职务。任命汪家道为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主任，刘光涛为第一副主任，傅奎清、张林池为副主任。

潘复生为什么会被撤职？这还要从1969年“九大”后说起。“九大”后，在黑龙江贯彻“九大”的全省党员干部会议上，潘复生责怪汪家道对他支持不够，开始查与汪家道有牵连的人和事，陈造反、阎立梅等一些与汪家道有牵连的人也遭受批判和冲击。这件事促使汪家道和黑龙江“捍联总”中的许多人开始对潘复生不满。

鉴于当时战备的需要及黑龙江的形势，中央派沈阳军区副政委刘光涛到黑龙江。根据刘光涛关于调整、加强省革委常委班子的建议，1970年5月26日，中共中央复电中共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核心小组，同意由潘复生、汪家道、刘光涛、于杰、刘思聪、郭强、袁俊、曹志、傅奎清9人组成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党的核心小组，由潘复生任组长，汪家道、刘光涛任副组长。

1970年7月，周恩来接见一机部四十一厂学习班时就指出：“黑龙江省山上山下派问题没有完全解决，有的地方是一派掌权，总的根子就是派性没有消除，问题在下面，根子在潘复生那。”

1971年3月16日至6月6日，中共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核心小组召开全省县团级以上干部会议，根据毛泽东关于批陈整风的一系列指示，以整风的精神，对潘复生的错误进行了揭、摆、批。中共中央派出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以及毛远新、江拥辉到会，具体指导这次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潘复生的错误被定为破坏性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会后，经中央批准，对潘复生进行了隔离审查。到了8月6日，中央正式决定撤销潘复生的领导职务。

1971年4月12日，已在河南方城县农村下乡插队一年多的原开

封师院中文系学生、“824”勤务组成员黄泽生,被开封师院中文系军代表宣布为“516 审查对象”,“经省市委批准”,对他进行“隔离审查”,参加“五不准学习班”的决定,将黄泽生从南阳方城县押解回开封师院。当时,黄泽生正准备参加南阳地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积极分子表彰大会,《南阳日报》业已刊登了他的先进事迹。谁知,一夜之间,他的身份由红变黑,让许多人莫名其妙。

主办学习班的除了组长是军代表外,其余全是基层干部和教师,都不是原“824”的人。他们的任务是组织审查对象学习,促使审查对象交代揭发问题,监护审查对象的安全,不自杀不逃跑。“五不准”是审查对象必须遵守的纪律,即:不准回家、不准打电话、不准写信、不准串连、不准泄露学习班情况。因为黄泽生是重点审查对象,所以在“五不准”之外又加了一条要求:不准看报。

黄泽生住的房间四张床,除他以外,每晚都有三个人轮流值班监护他。窗户全部钉死,贴上报纸,密不透光。晚上睡觉前,把屋里放的铁铣、炉灶通条、砖石瓦块,甚至扫帚、鸡毛掸通通拿走。

学习班发了《毛选》四卷,但每天学习的内容都是这样“老三篇”文章:《南京政府向何处去》、《敦促杜聿明投降书》《别了,司徒雷登》。上午学习,下午写检查交代。如果不写,就批判斗争。

黄泽生进住学习班的第一天下午 18 时,军代表从外边进来,站到他桌子前,严肃地看着他,一言不发。

黄泽生低头看《毛选》,也不搭理他。

军代表“咚、咚、咚”用力敲着黄泽生的桌子.....

黄泽生抬头看着军代表他,也一言不发。

“你写的检查! 检查哩?”军代表向黄泽生伸出右手,突然咆哮起来。显然他看到桌子上的稿纸空无点墨。

“什么检查?”黄泽生问。

“你来这里干什么?”军代表反问。

“不知道。是你叫我来的。”黄泽生平静地回答。

“我早知道你是顽固份子,实话告诉你,你是在省委王政委那儿挂上号的!”军代表指着黄泽生的鼻子说。然后回头对几个监督老师说:“晚上开会。”走了。

军代表走后,黄泽生问中文系监督他的两个老师:“王政委是谁?”

老师告诉他,就是15军政委、时任河南省委第二书记、省军区第二政委、河南省清查516领导小组组长王新。

晚上开会批判黄泽生,说他态度不端正。而黄泽生则是不管大家怎样讲,怎样批,他就是一言不发,只有在逼他表态时才问一句话:

“凭什么办我学习班?把我516罪证拿出来!”

这样僵持了一个多月,没有任何进展,学习班只有变着花样“打态度”:把读“老三篇”变成背“老三篇”,完不成任务,不让睡觉,批斗会不断上纲上线,时间越开越长,监控越来越紧。

两个月后的一天,监控老师让黄泽生站到院子门口看人遊街,原来是外语系原“824”成员宋怀珍被几十个人押着,脖子上挂着两个骷髅头骨,手里拿一面白旗,上写“杀人犯”。后来经法院审理,这是一起逼供信的错案,宋怀珍根本没有杀人。从这天起,学习班宣布了“开封市文革十件大事”:师院砸抢机要室、“二.八”冲军区、东大寺打死被俘伤员、“七.三一”武斗等等。军代表要求黄泽生交代揭发这十件大事上的错误及罪行。这让黄泽生突然觉得恍然大悟:原来他们是借清查“516”整造反派,搞翻案呀!什么“十件大事”,这十件事在1967年中央主持的北京汇报会上早已澄清,中央也已明确定案,驻军写的检查,白纸黑字贴满开封大街小巷。为什么现在又重新翻出来“审查”?他联想到省、市革委会成立后的事情,认为几乎无不是对着造反派,如:群众组织“倒旗”,倒的是造反派,因为那时已没有保守组织了;反“多中心”,反的也是造反派;“清理阶级队伍”,清的是造反派;“一打三反”打的是造反派;这次“抓516”,抓的还是造反派!革委会建立前,是走资派镇压造反派,革委会成立后,是谁打击造反派?为什么?

8月10日上午,黄泽生去厕所,出了宿舍没走几步,忽然看见他爱人正向他走来,俩人几乎同时呼喊出对方的名字。这一下吓坏了跟在他后边监督他的老师,手忙脚乱地上前拦阻,连推带拉把二人隔离开来。黄泽生只听他爱人喊道:

“我来给你请假!”

黄泽生愕然,不知道什么意思?

第二天中午,来了两个军代表和学习班的监督老师在办公室谈

话,高一声低一声似乎很激烈。中文系一个老师提高嗓门说:“人家回家哭爹,我们跟去算什么!”

过一会儿,中文系军代表领一个院军代表进来对黄泽生说:

“你父亲去世了,组织上给你一天假期办丧事,今天下午送你回家,明天下午接你回来。”

黄泽生闻言勃然大怒:

“你们为什么不早通知我?为什么临终前不叫我见面?”

这时他才明白他爱人说请假的意思。

师院用吉普车把黄泽生送回家。全家人见面嚎啕大哭。

黄泽生父亲去世已两天,在他病重病危的最后一个月中,亲朋好友十几人几乎天天到市委,询问黄泽生的下落。原来家人一直不知道他就在开封师院办学习班。可怜他父亲重病在身,市里、公社还不断来人逼他揭发儿子黄泽生的“516”问题,黄泽生的爱人、弟弟、妹妹全家无不受连累。

黄泽生回到学习班后,连续几天控诉校方株连亲属的做法,除了军代表,大多数老师不再对黄泽生施加压力。

之后,学习班改变了策略,将调查的重点放在1967年7月31日开封人民会场发生的“731”武斗问题上。黄泽生以1967年中央解决河南问题时,在北京的汇报会上,中央明确定性为“武汉720事件的重演”为由,质问他们:

“中央的表态还算不算数?”

中文系军代表说:“此一时彼一时,当时把陈再道、钟汉华定为敌我矛盾,是王关戚这些小爬虫搞的,现在怎么样?中央早就说陈再道是人民内部矛盾,现在谁攻击陈再道就是反党乱军!”

黄泽生再次质问他:“此一时彼一时就是翻案吗?”

军代表火冒三丈,站起来指着黄泽生的鼻子说:“实话告诉你,你们造反派吃香的时代过去了!王政委讲了,现在就是整顿造反派,就是要把造反派里的坏人统统抓出来,该杀的杀,该关的关,没问题的也不能掌权!”

黄泽生问:“为什么?”

“小资产阶掌权不是翻天了吗?我们工农兵就要吃二遍苦,受二

茬罪。”军代表理直气壮地回答。

黄泽生追问:“这也是王政委讲的?”

“当然么。我没这个水平。”军代表放缓语气说:“我不愿再给你们这些知识分子磨蹭下去。‘731’死那么多人,不抓出坏人怎么交差?人家都说你和陈红兵是‘731’武斗现场的指挥,你不是坏人谁是坏人?你不说清楚,人家有揭发材料。”

军代表周的话提醒了黄泽生,他觉得有必要将“731”武斗事件说清楚,于是写了他在“731”现场的说明材料。谁知道,以后这份材料竟成了他“七.三一武斗八二四头头在现场的罪证。”

清查“516”在漫无边际地进行着。中国大陆大多数地方都抓出了不少“516”。在文化大革命中活跃过的人,从“五大学生领袖”蒯大富等人,到每个单位的造反派头头,不知什么时候,就会突然被宣布为“516”分子,接下去的便是写不完的交待,认不清的罪。不过100多人的北京东方歌舞团,一开始就抓出了“516”分子近60人,情况还在继续恶化。清查运动,使各单住的群众心惊肉跳,觉得厄运随时有可能降临。派性冲突也在明中暗中加剧。清查“516”到了进退维谷的境地。

1971年7月下旬,江青要到青岛休息。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副主任王良恩指示中央警卫局副局长邬吉成和江青秘书杨银禄到青岛为她打前站,做好安排。7月29日,他们到达济南军区,军区司令员杨得志接见了他们。

在济南时,邬吉成和杨银禄听当地的负责人说,贺子珍也在青岛避暑疗养。他们感到这个问题很棘手,决定向周恩来请示报告。

周恩来听完杨银禄的汇报后说:“贺子珍同志在青岛休息是个问题,我的意见是这件事不能瞒着江青同志,必须叫她知道,她去不去她自己决定。此事你就不用管了,让我跟她说。”

江青知道贺子珍在青岛休息的消息后,对杨银禄说:“一个姓贺的在青岛怕什么?她休息她的,我休息我的,井水不犯河水。就是偶然碰了面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当然啰,尽量避开就是了,我告诉你们:谁也不能阻止我去想要去的地方。”

8月5日下午,江青乘火车抵达青岛,入住青岛市委接待处9号

楼。9 号楼离浴场很近,下海十分方便。而贺子珍此时住 11 号楼。

第二天一早,江青提出要到鲁迅公园、栈桥和浴场游玩。工作人员再三劝说:她现在最好不要到这些地方去,因为他们还没来得及准备,万一出了安全问题,他们不好交代。

但是江青坚持要去。

到了鲁迅公园,游览的人不是很多,人们也没有发现江青。

但是到栈桥时,有几个群众发现了江青,高喊:

“向江青同志学习!”

“向江青同志致敬!”

“毛主席万岁!”

群众听到口号声,团团将江青围住。

江青很高兴,一会儿招手,一会儿问好,并拉着长长的声音回答说:

“向同志们学习! 向同志们致敬! 我代表毛主席向你们问好!”

围观的群众越来越多,交通为之堵塞。青岛警备区赶紧调来解放军战士搭成人墙,这才使江青从人山人海之中出来。

回到住地,江青兴奋地问杨银禄:“今天这么多群众,是有组织的,还是自发的?”

杨银禄说:“今天你到栈桥,事先没有做任何准备,群众可能是自发的吧。”

江青说:“那好,那好,今天我最高兴了,就喜欢这种场面,有两年多没有见到这样的场面了!

8 月 7 日上午,江青在吴法宪、李作鹏的陪同下到海上照相。为了拍照军舰,她要舰艇排成各种队形,旗语兵忙得满头大汗,舰艇自然也在穿梭忙碌。吴法宪、李作鹏二人有劲使不上,当然也急得直冒汗珠。

照完相,江青十分感谢吴法宪、李作鹏的陪同,感谢舰艇上的官兵,并叫旗语手用旗语告诉参加今天拍照的全体指战员说:“同志们好,同志们辛苦了!”

中午,江青要求到薛家岛上去看看那里的民兵。于是他们乘两艘炮舰前往薛家岛要塞。

江青下了军舰,坐上吉普车爬山。路坎坷不平,弯弯曲曲,很难

走,她坐在车里东摇西晃,跟摇煤球一样。

杨银禄问她:“怎么样?能不能坚持?”

江青笑着说:“不要紧,挺好的。”

上岛以后,江青与那里的解放军官兵和民兵有说有笑,在岛上吃了西瓜、照了相。

在回来的路上,看见打石头的人和正在田地里劳动的人们,江青又叫他们一起来照相,有的群众拿着镰刀、锄头和锤子就跑过来了。江青看到这些汗淋淋满手泥土的农民们,和他们握手,问候,并为他们拍照。

这天,江青叫杨银禄打电话给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得志,请杨司令把济南军区的政治部保卫部部长叫来。

不到10分钟,济南军区政治部保卫部的部长来了,他向杨银禄自我介绍说:

“我叫晋国强,是济南军区政治部保卫部的部长,江青首长找我?”

杨银禄说:“是。”然后把他领进去后,就退了出来。

晋国强从江青那里出来后,小声对中央警卫局副局长邬吉成和江青秘书杨银禄说:“江青同志叫我到她的老家山东诸城去看看,看样子她想回老家去看看,你们看怎么办呢?”

邬吉成说:“你先照她的意思办,去诸城了解一下情况,不要透露她要去的任何消息,然后,按你所了解的实际情况向她汇报就行了,别的不要说。去不去,由她自己决定。因为江青同志给你单独交代的任务,我们不好说什么。你也不要向江青同志透露我们知道这件事。”

然后,邬吉成又问杨银禄:“老杨,你说呢?你还有什么意见?”

杨银禄说:“老邬讲得好,就这样办。”

8日,江青坐在青岛海边沙滩的一块礁石上,往事涌上心来,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我小的时候,家境不好,父亲是个木匠,脾气很坏,母亲和我都经常受他的气,挨他的打。后来,我到济南读书,离开济南后,就到了青岛,在青岛的时候,我经常来到这里,到这块礁石上玩。再后来,我又去了上海,就是从这里走的。这里就是我的第二故乡,这里是我走向革命的发源地,我很喜欢这里,我这次来青岛是故地重游,所以,我很高兴。”

晋国强去诸城了解情况回来后,给江青带回了她家乡的两盒煎饼,并向江青作了汇报。

江青吃了一块晋国强带回的煎饼,说:“我又吃到家乡的美食啦。”她将其余的煎饼拿去给北京来的工作人员吃了。

# 第1176回：做体检，叶群回京日夜忙 毛泽东，武昌见鄂、豫领导

8月5日，叶群为检查乳腺癌从北戴河回到北京毛家湾。当天晚上，邱会作夫人胡敏陪叶群去了301医院。

第二天晚上，胡敏到毛家湾看望叶群，谈话到深夜。周恩来打电话问候叶群，听说叶群正在接待客人，问了是哪些客人。

此时，正陪江青在青岛活动的吴法宪，接到夫人陈绥沂的电话，说叶群回北京治病，要他回来看看叶群。8月6日晚23时15分，吴法宪从青岛给叶群打来电话。8月7日，吴法宪陪江青参观完北海舰队后，没有随同再去薛家岛要塞，当即赶回北京。下午15时，带夫人到毛家湾，与叶群见面，长谈。

8月8日下午，黄永胜与叶群长谈近3个小时。

8月8日，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安排他陪缅甸政府总理奈温前往广州参观访问期间中央日常工作的分工。23时，政治局会议结束，吴法宪、邱会作又来到毛家湾，以后胡敏也带着301医院的人到毛家湾看电影，叶群对给她看病的医护人员表示感谢。电影放映完，大家都走了，胡敏到会客厅看见叶群正与吴法宪、邱会作他们谈话，也留了下来，一直谈到8月9日凌晨3时，重点议论四届人大这一关怎么过？

叶群说："这次比华北会议大得多，不是那么容易过关，事情无法预料，那么多代表，你们不端林彪，别人要端，要追问下去怎么办？"

"办法总会有，天无绝人之路，豁出来了。不是只保林总的问题，林总和你们分不开，都要保，你们靠林总，林总也靠你们，就这么几个老战友，死也要死在一起，不能再受损失。"

她还说："要端就端嘛，把林总端出来了就下台了，现在大家把问题好好想一想，看怎么过关，林总是关心大家的，只要林总没有事，锅里有饭，就不愁碗里空。"

同时,她依然不无担忧的说:“看来咱们是过不去了,主席要把首长往外拿了。把首长往外拿,咱们就都保不住了,得想个办法。”

吴法宪说:“只有斗争。”

邱会作说:“斗争还得有斗争的艺术,要取得胜利,就得给下面做工作。”

叶群说:“林总的身体和毛主席比较起来,差得远,怎么也拖不过毛主席。”

9 日下午,叶群乘飞机回北戴河,黄永胜、吴法宪、邱会作到机场送行。叶群到山海关机场后,林立果前去迎接。

8 月 9 日,周恩来陪缅甸政府总理奈温前往广州参观访问,临行前致信毛泽东:“主席如有急事,可经吴旭君同志以保密电话告诉我,或告海容转告。”

8 月 10 日,叶群从北戴河给吴法宪打电话,嘱咐他“不要放炮”。

8 月 12 日下午,周恩来飞回北京,立即到毛泽东那里面谈,请示四届人大的召开时间,毛泽东提出国庆节后召开四届人大的设想。

当天,周恩来接见阿尔巴尼亚驻华大使,大使转交恩维尔·霍查代表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致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关于中美关系的一封信。这封信明确地表示反对中美谈判。

当晚,周恩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了霍查的来信。会议同意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安排在国庆节后。

1971 年 4 月 15 日至 7 月 31 日,在北京召开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并于 7 月 27 日通过了《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该《纪要》由迟群起草,经过 18 次反复讨论,反复修改,最后经张春桥、姚文元修改审定,报毛泽东圈阅“同意”后,于 8 月 13 日,中共中央批转了《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纪要》指出:解放后 17 年,“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基本上没有得到贯彻执行,教育制度、教学方针和方法几乎全是旧一套”。原有教师队伍中,“大多数是拥护社会主义,愿意为人民服务的,但是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这两句话后来被称为对 17 年教育战线的“两个基本估计”。

8 月 13 日,周恩来向毛泽东报告:

昨晚开政治局会议,大家都同意国庆节后开四届人大的设想。从

八月下旬起就要开始准备报告。大家同意在两三天后,由恩来、春桥、永胜、先念、登奎五人去北戴河向林副主席作一次报告。

毛泽东批示:“已阅。”

8月14日,经毛泽东审阅同意,中共中央印发《国务院关于调整部分工人和工作人员工资及改革临时工制度问题的报告》、《国务院关于调整部分工人和工作人员工资的通知(草案)》、《国务院关于改革临时工、轮换工制度的通知(草案)》和中央通知。报告提出:“从七月一日起为符合条件的一千三百四十万职工提高工资,占全国职工总人数的百分之二十八左右,一年约需增加工资总额十一亿元左右,同时将符合条件的六百多万临时工转为正式工。”中央通知要求各地各部门召集若干企业的负责干部和工人同志对两个草案加以讨论,讨论情况于九月中旬报告中央,由国务院根据各地意见修改后,下达执行。

8月15日13时,毛泽东坐专列南下。这次,他仅仅带着汪东兴等少数工作人员。中央警卫团派出一个100余人的中队进行保卫,每人配置一支手枪,一支自动步枪,另还配置了轻机枪,做到了枪要够,弹要足,由汪东兴和警卫局副局长张耀祠直接指挥。同时给部队配发了手榴弹、小铁锹和十字镐等野战作业方面的器械,做了随时可以投入战斗的准备。对应付可能遇到的不测也制定了预案,多了几手准备。三个专列,前车,主车和尾车,主车两节车厢,进退自如。此次行程,毛泽东要求保密。

这天,正在青岛的江青还不知道毛泽东已离京南下,让秘书打电话回北京询问:“什么时间能去见主席?”

毛泽东的秘书高碧岑的电话没有人接,江青的秘书杨银禄又打值班室的电话,值班员告诉他:“主席已经到外地去了。”

江青知道后很不高兴地说:“这个东兴同志,主席这样大的行动也不告诉我一声,在他的眼睛里根本就没有我江青这个人啊!”

8月16日上午,周恩来、纪登奎、黄永胜、张春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到北戴河向林彪汇报工作。他们一行人,被工作人员领进了会客室。

等候一段时间,只见林彪在叶群陪同下,出现在会客室门口,身上穿着几层厚厚的衣服,头上包着一块大围巾。而比林彪大5岁的周恩

来,可能是觉得室内温度太高了吧,此时是脱掉了外衣,只穿一件旧白衬衣。

寒暄后,周恩来、张春桥、纪登奎、黄永胜分别就宣传、常务、生产、军事等向林彪作了汇报。

当纪登奎汇报道:“军队现在冗员太多,一个司令,七八个副司令,一个政委,七八个副政委,军、师、团、营,一直到基层,也都是一个正职,好多个副职……林总,您是打过仗的人,军队现在这个样子,真的有了战争,还能打仗吗?”

林彪听了以后说:“就是啊,那怎么办呢?”

之后,周恩来请示国庆节前召开九届三中全会,补选几名中央委员,及毛泽东批示:都同意,还要补选常委等事宜,并说:“毛主席提议,党中央决定国庆前后召开九届三中全会,然后召开四届人大,现在各项准备工作正逐步就绪。”

汇报工作进行了一个上午。林彪听大家讲完,也讲了话,然后说:“坚决拥护主席的指示。”

8 月 16 日,江青从青岛回到北京。

就在周恩来赴北戴河向林彪汇报的同一天,8 月 16 日,毛泽东抵达南巡第一站——武昌,随即在专列上召见武汉军区政委刘丰。当晚,毛泽东住进东湖宾馆梅岭一号楼,又在这里召集当地党政军负责人开会。次日,8 月 17 日,毛泽东与河南省革委会负责人刘建勋、王新谈话,汪东兴、刘丰也在场。

谈话刚开始,毛泽东就向刘丰问起有关湖北、河南的情况。刘丰说,湖北、河南的情况不错,人心比较稳定。

毛泽东说:“笼统地这样说也可以,要细想起来,这样说是应付差事。在你们这里,有些地方还在动,有些地方没有动。有些地方的意见是不少的。”

接着,毛泽东话锋一转,说道:“希望你们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不要搞山头主义、宗派主义;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

他继续说:“中国也怪,中国的党没有分裂。已经经过 50 年没有分裂过。苏联的党分裂过,分裂成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中国没有。

有人要分裂我们的党是困难的。”

接着,他回顾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和党内路线斗争史,说:“陈独秀、王明、张国焘等人曾经多次要分裂党,都没有得逞。陈独秀是右倾机会主义,他们81个人搞了个‘列宁主义左翼反对派’。这个组织没搞多久,垮台了,以后变为托派了。其中有个叫刘仁静的,这个人比我年龄小,现在住在北京,他从莫斯科跑到土耳其去见了托洛茨基。罗章龙,右派,另立中央,分裂党。也没有得逞。他还在武汉当教授吗?他是浏阳人,我的老乡。他用的名字很多,也叫罗敖阶。瞿秋白、李立三不算分裂党,是犯了路线错误。”

毛泽东提到井冈山时期的一些事情,他说:“陈毅当时到了上海,本来是告状的,但周恩来做了好事,批评陈毅不对,犯了极端民主化的错误,还是要我‘复辟’。中央要我‘复辟’,我就‘复辟’了。”

他讲了李立三、王明的路线错误,说到遵义会议,又谈起长征路上与张国焘的斗争,一直讲到全国解放后与高岗、饶漱石的斗争。最后,把话题转到去年庐山的九届二中全会。他说:“庐山会议,他们搞突然袭击,搞地下活动.为什么不敢公开呢?可能是心里有鬼。”

在座的诸人闻言,也纷纷检讨起自己在庐山会议上犯的错误。毛泽东并不想责怪他们,他说:“你们就是太急了,问题不在你们。你们是属于上当受骗的,问题在北京。就是那些大将,包括黄水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人。他们都跟着起哄,犯了错误,进行了检查,允许改正错误,还是可以工作。这次庐山会议,搞突然袭击,地下活动,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的。这就是反对九大路线,推翻九大二中全会的三项议程。有人看到我年纪老了,快要上天了,他们急于想当国家主席,要分裂党,急于夺权。这次庐山会议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

他接着说:“什么‘天才的’,我不是天才,读6年孔夫子,读7年资本家的洋学堂,我到25岁那一年,正是1918年开始读马列主义。”

毛泽东谈到庐山会议时的严厉表情,是刘丰等人从来没看到过的。九届二中全会结束后,毛泽东从庐山回北京路过武汉,曾与刘丰谈过一次话,当时刘丰还不明就里,不可能有明确的态度。这次听了毛泽东的一席话,他后来回忆说:只能以“心惊肉跳”来形容自己当时

的情景,他说只感到自己的心在扑扑乱跳。

接着谈到如何看待九届二中全会上犯了错误的人,毛泽东说:“前途有两个,一个是可能改,一个是可能不改。犯了大的原则性的错误,犯了路线方向性的错误,为首的,改也难。历史上,陈独秀改了没有?瞿秋白、李立三、罗章龙、王明、张国焘、高岗、饶漱石改了没有?没有改!”

他又说:“对这些人怎么办?还是教育的方针,就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有的可能救过来,有的也可能救不过来。有了错误就要改,如汪东兴同志,分别几次在7000多人的面前.讲他自己的错误,他接触最广的就是中央办公厅、中央警卫团,7000多人的单位,这怕什么呢?他不怕。”

毛泽东说:“胜利以后,朝鲜战争时,我管了一下军队,以后就没有管了。朝鲜战争后,军委的事主要是彭德怀同志管。我征求总理的意见,我说还是他好,他在长征中是靠着我们这边的,抗美援朝,人家打了胜仗,不叫人家管这个事行吗?管点事有什么要紧呀!以后就是林彪管了,现在我要抓军队的事。”

“不要把自己的老婆当自己工作单位的办公室主任、秘书。林彪那里,是叶群当办公室主任。还有黄永胜那里是不是?”

不知是谁回答说:“黄永胜那里早就不是了。”其实,此时黄永胜办公室的主任正是他老婆项辉芳,是叶群亲自给办的。

毛泽东强调说:“做工作要靠自己动手,亲自看,亲自批。不要靠秘书,不要把秘书搞那么大的权。我的秘书只搞收收发发。文件拿来自己选,自己看,要办的自己写,免得误事。只有两个文件,当时因为身体不好,我口述,别人记录的,最后还是经过我自己修改印发的。其中一个就是《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

“庐山会议以后,我采取了三项办法,一个是甩石头,一个是掺沙子,一个是挖墙脚。批了陈伯达搞的那个骗了不少人的材料,批发38军的报告和济南军区反骄破满的报告,还有军委开了那么长的座谈会,根本不批陈,我在一个文件上加了批语。我的办法,就是拿到这些石头,加上批语,让大家讨论。这是甩石头。军委办事组准备叫李先念、纪登奎参加,这是掺沙子。改组北京军区,这叫挖墙脚。

我同林彪同志谈过,他有些话说得不妥嘛。比如他说,全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现一个天才,不符合事实嘛!马克思、恩格斯是同时代的人,到列宁、斯大林100年都不到,怎么能说几百年才出一个呢?中国历史上还有陈胜、吴广,有洪秀全、孙中山呢!这不符合实际。关于培养接班人的问题,我说我们都是60岁以上的人了。要培养60岁以下的、30岁以上的人。"

"什么'大树特树',名曰树我,不知树谁,说穿了是树他自己。什么人民解放军是我缔造和领导的,林彪亲自指挥的,缔造的就不能指挥呀?我就不相信我们军队会造反,我就不相信你黄永胜能够指挥解放军造反,军下面有师、团,还有司政后机关,你要调动军队干坏事,听你的?开99人的会不行,要开军长、政委,地方上相当军一级以上干部的会议,把问题讲清楚。听说连总参二部部长这一级的人都还不知道,这怎么能行呢?你们军区、省军区常委要研究一下。暂时不忙,待提中央讨论后定。"

"99人会"是指1971年4月中央召开的批陈整风汇报会议。出席这次会议的,有中央、地方和部队的负责人共99人。

最后,毛泽东说:"今天就这样吧,你们4位,明天、后天讨论一下。"

随后,毛泽东让汪东兴通知已调到中央工作,正在北京主持全国农业机械化等会议的华国锋立即赶到武汉,参加召见。

华国锋是1970年九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亲自提名调到中央工作的,同时还兼任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广州军区政治委员和湖南省军区第一政委。1971年1月,华国锋由毛泽东指定进入国务院业务组,出任副组长,主持领导农业工作。国务院业务组的组长是周恩来,副组长李先念、纪登奎、华国锋。

8月18日至24日,整整一个星期,毛泽东"闭门"不出。他特别叮嘱刘丰:谈话内容先不要传达,尤其对北京要绝对保密。

刘丰遵守"纪律",没有往"北京"报告。

# 第1177回：一元化，广州军区报《纪要》《国际歌》，奴隶们创造历史

1971年7月15日至31日，广州军区召开的三支两军政治思想工作座谈会，根据讨论精神写成《广州军区三支两军政治思想工作座谈会纪要》上报中央。

《纪要》中说：广州军区现有2万多名干部战士参加三支两军工作，其中担任省（区）、县和相当县以上革命委员会工作的有3744人，有78%的县以上党委书记和革命委员会主任是军队干部。

《纪要》反映：三支两军人员中存在骄傲跋扈、好大喜功、任人唯亲、打击报复、滥用职权、违法乱纪等错误的思想作风；有些人存在着特权思想，不尊重、不支持已经成立的地方党委。这些现象必须加以改正。

《纪要》提出：军队三支两军人员对地方党委组织也应当尊重和支持，维护地方党委的威信，保证地方党委实行一元化的领导。

《纪要》规定：凡参加地方党组织生活的三支两军人员，必须接受地方党委（支部）的统一领导；在地方各级党委中担任领导职务的，特别是担任一、二把手的军队干部，必须正确理解党的一元化方针，对三支两军人员实行军队和地方共同管理，以地方为主。

8月20日，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批发《广州军区三支两军政治思想工作座谈会纪要》，并在中央批语上增加了“认真研究”四个字，要求引起重视。

毛泽东后来在南巡途中与各地负责人谈话时，再次就这个《纪要》所提出的问题说：“地方党委已经成立了，应当由地方党委实行一元化领导。如果地方党委已决定了的事，还拿到部队党委去讨论，这不是搞颠倒了吗？”

8月25日晚22至次日晨1时，在武昌东湖客舍同华国锋谈话，汪东兴参加。

毛泽东在与华国锋握手时问:“你来了。你们现在忙什么?”看到华国锋戴着毛主席像章,毛泽东说:“你还戴着?看见就讨嫌,不要戴了。”

华国锋回答说:“我刚到国务院,着手了解工农业生产的情况。我向毛主席作个汇报。”

华国锋汇报到正在召开的全国农业机械化会议反映全国化肥生产情况不好时,毛泽东说:

“要抓化肥的生产建设。讲下放十几年了,下放不了,条条专政就是改不了,地方生产的钢也不分成,统统拿走,拖拉机也不让省里搞,这样大的国家,这样多的人,部里能管得了?条条专政害死人,我就主张靠省里管。天天叫下面报积肥数字,官僚主义。粮食产量,我历来赞成农民少报百分之十到二十。群众多留点粮食,无非是多吃一点,储备一点,卖出去一点,或拿来喂猪。”

华国锋汇报了农村多种经营、粮食征购等问题。毛泽东说:“我看你满脑子是农业,我满脑子是路线斗争,两个司令部的问题。当然你讲的农业也有路线斗争,但是还有更大的路线,光有农业不行,还要考虑东西南北中、党政军民学。工农业要抓,但当前主要应该抓路线斗争。农业也有路线问题。你要抓路线。路线不对,抓了农业也不行,脑袋掉了还不知为什么。”

接着,毛泽东又对华国锋简要叙述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在提到建国后的三年自然灾害时,毛泽东说:“有人说三年灾害是我搞的,我要采取的办法他们又不赞成。后来北戴河会议,讲了形势、阶级、矛盾才好转了。”

他继续说:“庐山会议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在庐山搞突然袭击,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的。发难不是一天半,而是23、24、25三天。是否定‘九大’路线,否定已通过的二中全会三项议程,要改成讨论天才和要当主席。他们名为反张春桥实际是反我,我把天才划掉,我提不设国家主席。我不是天才。我读了6年孔夫子的书,上一中、一师7年是读资本主义的书,到1918年才读到马列主义。”

毛泽东在谈到九届二中全会上印发的《六号简报》时说:“这个简报是一个反革命的简报。这是我个人认为。将来党中央还要讨论。”

接着他对华国锋说:“说大有炸平庐山之势,是有用意的,空军才能炸平。他们发‘称天才’的语录,连李德生也不发。他们几位是井冈山山头一方面军的。一次当着他们的面,我说李德生你好蠢呀,不是一个山头的,宝贝如何能给你呢?会上念的称天才的语录,事先也没有谈过,也不知是哪本书、哪一页的,是说假话嘛。”

毛泽东又说到:“我是程咬金的三板斧,打石头、挖墙脚、掺沙子。看到38军的报告很高兴,当即批了。把24军、21军、38军整得厉害,特别是把38军整得苦。还批了济南军区反骄破满的文件和刘子厚的检讨等文件,这是打石头。改组北京军区是挖墙脚。中央警卫团、北京卫戍区,他们没有插进来。掺沙子,掺了李德生、纪登奎。还少,叫李先念参加军委办事组。不能不管军队,开会不一定到,中南也要有人参加,可以不到会。你们要过问军事,不能只当文官。要当武官。”

毛泽东再次表扬汪东兴在中央办公厅、警卫团的检讨。

最后,毛主席对华国锋说:“不要搞山头主义,山头主义害死人。全国都要团结,还是几个原则。三个办法,打石头、挖墙脚、掺沙子。有些话不能听,一句话顶一万句,能相信吗?有的连半句也不顶,顶个屁。实际有的不算数,如天才和国家主席问题,我说了多少次.半句也不顶。陈伯达的话,一句顶一万句哩。”

谈话结束时,毛泽东说:“汪东兴、华国锋,你们明天和刘丰再议一下,汪、华可以先到湖南找刘兴元、丁盛、韦国清、卜占亚先吹吹风,我也要和他们见一下。”

听了毛泽东的谈话,汪东兴感觉到气氛的严峻。下来后,他立即召集随行的警卫分队干部战士,传达了毛泽东讲话的主要精神,强调警卫部队要结合实际工作,提高警惕,做好警卫工作,“要随时有打仗的准备”。

8月27日14时,刘丰去看望毛泽东。一见面,毛泽东就问他:“怎么样?”

刘丰已感到了庐山会议上的事情没有完,也意识到了事情并不像他们当时想的那样简单。这几天,他想向汪东兴学习,忙着检讨。当听到毛泽东的问话后,他赶紧回答说:“这几天想得比较多,庐山上我也犯了错误,起了哄,干扰了主席。去年主席谈了以后,我心情很

沉重。”

毛泽东说:“你沉重什么?你们就是太急了,你们是属于上当受骗的,问题不在你们,问题在北京。”

毛泽东又问起武汉军区空军副司令员、第九届中央候补委员方铭得了什么病?刘丰没有回答。

毛泽东再次向刘丰谈到党内的路线斗争,并明确说到陈伯达也是反党阴谋集团的人。他总括说:“我们党50年,10次分裂,都没有分裂了。”

刘丰接着毛泽东的话说:“有主席领导,有主席思想,解放军也是分裂不了的。请主席放心。”

谈到军队,毛泽东说:“我犯了个错误,胜利以后,军队的事情我管得不多。”

刘丰说:“主席还是管的。”

毛泽东说:“我要管军队了,我光能缔造就不能指挥了吗?”

话题又转到九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说:“又是井冈山和中央苏区的人犯错误,他们想搞我的山头。四方面军的同志从张国焘事件后,比较谨慎一点了。”

“我就不相信。你黄永胜能指挥解放军?郑维山能指挥解放军?华北8个军,就有5个军反对他们。天津的66军就不听他们的嘛!他们要把那几个坏人塞进天津市,66军就反对嘛!就是那两个军,还有军长、政委,师长、政委、团长、政委,会听他们的吗?”

毛泽东说:“李先念这个人,比较正派,比较好。我要李先念同志也参加军委办事组,考虑再增加一些人,掺沙子。是不是其他军区也参加些人?”

“这次在庐山搞突然袭击,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的。纲领就是‘天才’、设国家主席。”

“我同林彪谈过,你说欧洲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现一个天才,这不符合事实嘛!马克思、恩格斯是同时代的人,到列宁、斯大林一百年都不到,怎么能说几百年才出一个呢?中国有陈胜、吴广,有洪秀全、孙中山,怎么能说几千年才出一个呢?什么‘顶峰’啦,‘一句顶一万句’啦,你说过头了嘛!一句就一句,怎么能顶一万句?我讲的话,

什么一句顶一万句？有时一句顶一句，有时连半句也顶不了，顶个屁！不设国家主席，我不当国家主席，我讲了六次，一次就算讲了一句吧，就是六万句，他们都不听嘛，半句也不顶，等于零。他们的话才是一句顶一万句，陈伯达的话一句顶一万句。他们才是天才，陈伯达是天才。”

“我们的干部，大多是好的，不好的总是极少数。不好的要给予适当的批评，好的要表扬，但不能过分。不能捧得太高，比如有人说‘超天才’，对二十几岁的人就捧得这样高，这没有什么好处，实际上是害了他。”

“什么论‘天才’？二中全会做了相当的结论，《我的一点意见》就是专批天才论的。我并不是不要说天才，天才就是比较聪明一点，天才不是靠一个人靠几个人，天才能靠一个人吗？天才是靠一个党，党是无产阶级先锋队嘛。”

“对路线问题，原则我是抓住不放的。重大原则问题，我是不让步的！”

毛泽东还很生气地说：“他们要捂住。总参二部部长都不知道。怕要开200来人的会议。”

毛泽东还对刘丰讲到，他对一些负责人向林彪请示问题时要经过叶群这类事很不高兴。

谈话结束，毛泽东问刘丰看过新印的《国际歌》歌词没有，刘丰说没有看到。毛泽东叫张玉凤去拿。张玉凤说印的歌词和材料都已装箱上车了。毛泽东说：“到火车上再给他。”

接着，毛泽东满怀深情地说道：“为《国际歌》，列宁在欧仁·鲍狄埃逝世25周年时写了一篇文章纪念他。100年了！国际歌词和列宁的文章，全部是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观点。那里边讲的是，奴隶们起来为真理而斗争，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全靠自己救自己。是谁创造了人类世界，是我们劳动群众。在庐山会议时，我写了一个700字的文件，就提出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奴隶创造历史的问题。”

刘丰问毛泽东：“翻印一些下发，可不可以？”

毛泽东点头表示同意。

随后,刘丰等人送毛泽东到火车站上火车。刘丰扶毛泽东在车厢里坐下后,张玉凤拿来《国际歌》的歌词。正好吴旭君进来倒茶,毛泽东请她和张玉凤一起唱《国际歌》,坐在沙发上的毛泽东也随着她们的歌声轻声唱起来,并用手在茶几上打出明显的节奏。刘丰等人见状,也跟着一起唱。毛泽东情有所致,唱完一段,就讲解一段,最后,又讲起了列宁纪念欧仁·鲍狄埃的文章。他说:“究竟是英雄创造世界,还是奴隶们创造世界?我是历来主张奴隶们创造世界的。”

“《国际歌》就是讲要团结,讲全世界无产阶级要团结。”

“要团结起来到明天,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能实现。要团结起来,不能搞宗派主义,不要搞山头主义。”

“要学习列宁纪念欧仁.鲍狄埃逝世25周年那篇文章,要学唱《国际歌》。不仅要唱,还要讲解,还要按照去做。”

唱完《国际歌》后,毛泽东又与刘丰等人一起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毛泽东对刘丰动情地说道:“歌里头讲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条条要记清,全国人民拥护又欢迎。现在就是有几条记不清了。你看,就是要步调一致嘛!不一致还行呀?要学习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一切行动听指挥,你们还听不听指挥啊?”

8月27日下午14时30分,毛泽东乘坐的专列驶离武汉火车站南下。出人意料的是,毛泽东要刘丰等几个人陪同南下。

华国锋、汪东兴二人已于27日上午先行乘飞机到达长沙机场,湖南省委书记、省革委会副主任兼省军区第一政委卜占亚前往迎接。

卜占亚是1970年3月到湖南的。由于当时中苏之间的紧张关系,中央决定将驻湖南的47军调往兰州军区,加强西北防务。当时征求时任湖南省革委会主任的47军军长黎原的意见,是随部队赴西北,还是留在湖南任革委会主任?黎原表示,他还是习惯部队的工作,希望能随47军一起去兰州。于是,广州军区党委提名时任广州军区政治部主任的卜占亚接替黎原,负责湖南的支左工作。当时卜占亚正在海南岛蹲点。

1970年3月19日,北京派来一架军用专机,先到广州接上丁盛和卜占亚,飞返北京途中在长沙降落,接上湖南省军区司令员杨大易和47军政委刘玲、副军长韩曙飞到北京。47军军长黎原此前已到北京。

当晚19时,军委办事组成员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在京西宾馆会议楼接见他们。黄永胜讲了47军的移防一事。吴法宪和李作鹏也简单讲了几句,主要说47军是原四野部队,到兰州后要注意保持和发扬四野优良作风,为林总争光。

移防的问题讲完后,黄永胜宣布:“47军调走之后,湖南的‘支左’工作由省军区接过来;中央决定卜占亚同志去湖南,协助华国锋同志工作。”

接着,黄永胜又讲了一些到湖南工作应注意的问题。趁着黄永胜讲话的当儿,卜占亚拿过摆在他面前的便笺,写了几行字:“我喜欢部队工作,希望我在湖南工作一段时间后,仍让我回部队去。”

卜占亚把便笺递给坐在他右边的邱会作。邱会作是卜占亚的老上级,他看了卜占亚递给他的便笺,没有任何表示,便又传给他右手的黄永胜。黄永胜看后同样没有表态,又交给了吴法宪。吴法宪照着黄永胜的样儿,又传给李作鹏。李作鹏看后稍犹豫了一下,然后又给了邱会作。就这样,便笺在4个人手里转了一圈儿,谁也没有态度,甚至连个示意的眼神儿也没有。更让卜占亚想不到的是,只见邱会作拿起摆在他面前的火柴盒,擦着一根火柴,把便笺点着,很熟练地放进烟灰缸里烧掉了!整个接见过程约1个小时,卜占亚一言未发。

第二天,3月20日晚,中央政治局成员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广州军区和湖南省军政负责人,到场的中央领导人有周恩来、康生、张春桥、江青等人。周恩来代表政治局讲话。他说,为了加强“三北”地区战备,决定47军调往兰州军区。黎原随部队北调,但他的革委会主任职务不免,以防人事变动频繁,引起外界猜疑。黎走后由华国锋代理省革委会主任。为了不削弱省革委会领导力量,另调卜占亚任省革委会副主任。接见过程不过半个小时。

就这样,卜占亚来到了湖南。华国锋调中央后,卜占亚负责湖南的全面工作。

再说1971年8月27日,华国锋、汪东兴随卜占亚来到蓉城宾馆,坐定后,二人向卜占亚介绍了毛泽东在武汉的谈话内容。汪东兴还以毛泽东不高兴江青打扰他做事的例子特别嘱咐卜占亚,毛泽东在思考问题时不喜欢别人打扰,示意毛泽东的讲话是经过深思熟虑的,非常

严肃,是非常重要的问题,要认真对待,“千万别在主席思考问题或谈话时打扰他”。汪东兴接着明确宣布,一会儿去迎接毛泽东专列,只需他自己、华国锋、卜占亚参加。因为当天,根据汪东兴的通知,广州军区还派值班飞机接广东省委书记兼省革委会主任刘兴元、广州军区司令员丁盛、广西区委书记兼区革委会主任韦国清来长沙。届时,这3人也在长沙,但汪东兴没有让他们一起去接毛泽东。

# 第1178回：湘粤桂，众头脑齐集长沙 讲纪律，“一切行动听指挥”

8月27日晚21时，毛泽东专列到达长沙大铺停车场。这个停车场是专门为毛泽东的专列停靠修建的，原是长沙市外的一个荒芜山头，后来修建成绿油油的果园，是汪东兴赞许过的全国三个较好的专列停车场之一。汪东兴等3人赶到车站迎候，但毛泽东却不急于下车，而是叫大家坐下。

卜占亚当时兼湖南省军区的政委，毛泽东对他不太熟悉。他先问了卜占亚的简历，然后又问汪东兴是否向刘兴元、丁盛、华国锋、韦国清传达了他前几次的谈话内容，汪东兴回答说：“传达了。”

毛泽东说：“我明天要找他们谈话。”他接着又谈起党的历史上的路线斗争中。再次说到：“中国党有10次要分裂，没有分裂成。”

毛泽东扳着手指算着，讲了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罗章龙等人的几次路线错误。

他说：“当时，传说开除了我的党籍。不是党员就不能当党代表了，但可以当师长。我们一个师有两个团，一个是农民起义的团，一个是袁文才、王佐的团。南昌起义是正确的，但不上井冈山，想依靠外援，后来又打回湘南，我带了一个团到湘南去接他们。到了桂东沙田，我讲了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后来逐步发展到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这一回我们没有接到朱德、陈毅他们，但接到了肖克。回到井冈山时，说朱德他们已到了宁冈。我们在宁冈会师。他们又说我可以当党代表，又让我当上了党代表。”

“我们进行了几十年的民主革命，1949年才到了北京，还没有宣布我们胜利了。当时我们只是说这是第一步，万里长征的第一步。后来我们进行了土地改革，对资本家实行赎买政策。赎买政策实际上是我们和资本家的关系问题。资本家他们要进行生产，没有原料，我们供给他们原料，他们生产出来的东西归我们国家收买。比如你要织布，

你没有棉花,不准许资本家自己到处去买棉花,我们供给你棉花,你织出来的布也不准自己随便卖,要由国家收买。当时我们提出来的口号是'公私兼顾,劳资两利'。我们这样做了几年。全国解放的时候,官僚资本占80%,还有民族资产阶级,另外还有一些小企业主。怕他们干什么?过了几年,他们还不是敲锣打鼓欢迎公私合营了嘛?其实他们是表面拥护,心里是假的,假的也好嘛。"

他接着问到:"你们对民主党派的问题要研究研究,看还要不要?一个是要认识一下。还有一个是民族资产阶级问题,有人说不要了,也不给利息了。我说不行。有的小资本家不要利息,大的资本家是不愿意的。应该拿一点利息。"

毛泽东肯定地说:"民主党派还要存在。有的地方说不要了,不要太急了,急不得。你们湖南有个人叫周世钊,是个名人,是我的老同学。五一节周世钊来了,上了天安门。我问他民主党派还要不要,这个人算是个老实人,他说民主党派里也有现行反革命分子,有些历史上有一点反革命行为。这是对个人讲的。对民主党派来说,他们没有搞翻案,他们也没有发指示。作为民主党派来说,还是可以存在的。但作为民主党派内部某个人来说,有的人是有问题的,少数人问题很严重。他们中间也有左派。也有中派,也有右派。不要笼统地说民主人士都好或都不好。"

他接着说:"有些民主人士挨了斗,挨了批,有的拖了一两年了,问题也没有解决。不仅民主人士没有解决,什么'516'啊,他们的问题也没有解决啊,有的是挂起来了嘛。应该把民主党派的牌子都挂起来,因为我们国家在搞文化大革命中间,有的还不正规,把民主党派搞掉了,有什么好处呢?一个'拖'字解决不了问题,存在的问题在他们挂起牌子以后,可以再了解、再调查、再处理嘛。"

毛泽东讲完这段话之后,又强调一切行动听指挥,他说:"我们唱了50年《国际歌》,结果我们党里有人搞了10次分裂活动。这次不做结论,也是分裂行动了。我看还可能搞10次、20次、30次,你们信不信?你们不信,反正我信。到了共产主义就没有斗争了?我就不信。到了共产主义,也还是有斗争的,只是新与旧、正确与错误的斗争就是了。到了共产主义,斗争的性质可能有变化,一万年或几万年以后,错

误的东西也还是会有的。但是那个时候文化水平高了,犯错误的人觉悟比较快,能及时认识改正。对犯错误的人,不管他怎么样,不要杀人。搞斗、批、改,也要搞得温和一些。”

这时,专列上的服务员拿来《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歌词,毛泽东亲自指挥大家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几个人五音不全,各唱各的,汪东兴便把随行的医生、护士都叫来,参加合唱。

当唱到三大纪律的第一条“一切行动听指挥,步调一致才能得胜利”时,毛泽东说:“等一等,这一条非常重要,步调一致才能得胜利。步调不一致,分成两派,怎么样能得胜利呢?”他风趣地说:“那这句话要改为‘步调不一致,一定要失败’了。”

唱过三大纪律的第二、第三条时,毛泽东说:“这两条问题不大。”

当唱到八项注意的第一条“说话态度要和好,尊重群众不要耍骄傲”时,毛泽东说:“停!等一等,这一条也很重要,对待群众是不能耍骄傲,特别是我们的高级干部。我批示的济南军区的那个报告上说了:‘把自己看成一朵花,把别人看成豆腐渣’。你带部队,你当过排长、连长,如果传到你的村里去,就了不得了。特别是当了营长,更不得了啦。我们说话要和气,不要耍骄傲。”

当唱到“第二买卖价钱要公平,公买公卖不许逞霸道;第三借人东西用过了,当面归还切莫遗失掉”时,他说:“这两条问题都不太大。好像现在还有这个习惯。”

当唱到第五条“不许打人和骂人,军阀作风坚决克服掉”时,毛泽东说:“等一等,这条问题大。当了班长、排长、连长,不得了啦。听说还有骂人的,甚至有打人的。听说不是有人把连长打死了吗?这就是和打人、骂人,教育不妥有很大关系嘛?我们讲要遵守纪律,一定要有自觉性。”

毛泽东又讲到部队的教育和练兵问题。他说:“过去我们部队里搞军事训练、制式教练。从单兵教练、排教练、连教练到营教练,大约搞五、六个月的时间。现在是只搞文不搞武,我们的军队成了‘文化’的军队了。”

接着,他又谈到部队自林彪负责军委工作后开展的“四、五好运动”。他说:“一好带三好,你那一好也许带得对,也许带得不对。还有

那些积极分子代表会,到底效果如何,值得研究。有些是开得好的。也有好多是开得不好的,主要是路线问题,路线不对,那积极分子代表会就开不好。你在那里搞什么所谓‘超天才’。有人说我是天才。我只读了6年土学堂,7年洋学堂,我算什么天才呢?青年人,哪有那么多天才呢?青年人有个脾气,我批示的济南军区报告上说‘看自己一朵花,看别人是豆腐渣’。对这个问题老年人、中年人也得注意。”

把《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唱完后,毛泽东要求大家把最后一句“革命纪律条条要记清,人民战士处处爱人民,保卫祖国永远向前进,全国人民拥护又欢迎”重唱一遍。重新唱完这句后,他说:“现在就是有几条记不清了,特别是三大纪律的第一条,八项注意的第一条和第五条,这几条记不清了。如果都能记清,都能这样做,那全国人民拥护又欢迎,这样我们多好呀!特别是第一条,步调一致才能得胜利,要做到步调一致,经常商量商量,统一思想,这样才能步调一致嘛。还有一条,不要骄傲,就是不要骄傲自满,有军阀作风的一定要坚决克服掉。”

毛泽东最后好像挺高兴似地说:“今天我们开了个六级干部会议。”他问旁边的医生:“一个月多少工资呀?”

“117元。”

“你这么多钱,会不会变修呀?”毛泽东很认真地问。

“不会,”医生笑着说:“还有比我钱多的呢。”

1个半小时后,22时30分,毛泽东乘坐专门从北京带来的吉斯轿车离开专列,入住湖南省委九所6号楼。毛泽东的内层保卫工作由随行的警卫部队负责,毛泽东卫士为一中队副中队长商来保,秘书是一中队副区队长高碧岑,保健工作由护士长吴旭君负责,张玉凤负责勤杂事务性事情。

27日一整天,长沙市各主要路口都加强了公安人员执勤,交警指挥也更加细致规范,但没有实施交通管制,更没有戒严,大街上与往日无异。

8月28日上午,毛泽东委托汪东兴、华国锋与丁盛、刘兴元、韦国清、卜占亚座谈,传达毛泽东在武汉的谈话内容。晚上21时,毛泽东与刘兴元、丁盛、韦国清、汪东兴谈话。

毛泽东对刘兴元、丁盛说:“韦国清同志,我比较熟悉。你们两位,

我不怎么熟悉。”他又问韦国清:“韦拔群和你都姓韦,是不是一家子呀?”

韦国清说:“是五服以外的,不是五服之内的。韦拔群到广东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过,接受过主席的教育。”

毛泽东说:“不能说他向我学习了什么。名义上,我是先生,他是学生,实际上,他是先生,我是学生。要做先生,先要当学生。广西的事,他比我知道得多。可惜这位同志已经牺牲了,我对他很怀念。”

毛泽东又说:“彭湃是广东海丰县人,家里是个大地主。他在海丰地方工作时,有一次几万群众朝拜观音菩萨,有人问他去不去参加,他说去参加。这样做是对的。他参加朝拜后,就对农民说,观音菩萨靠不住,还得靠自己才行。于是,就拿起了棍棍棒棒闹革命。他这个人善于鼓动,不善于搞组织工作。搞群众工作不怎么扎实,搞得不怎么好,后来牺牲了。他发动群众时,曾经拿自己家里的钱发给农民来搞群众运动。”

毛泽东问刘兴元是哪里人,刘兴元答是山东莒县。毛泽东笑着说:“噢,‘毋忘在莒’啊!”

问到丁盛,丁盛讲了参军的时间和在红四军工作的情况。毛泽东笑着对他说:“你可不能摆老资格,不要搞宗派哟。”他又指着刘兴元说:“你也要注意。”

毛泽东接着说:“韦国清,你虽是红七军的,可也编到三军团了。你们几个人都是我这个山头的啊,可要注意!”

毛泽东又把话题转到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路线斗争,他说:“你们了解党的历次路线斗争吗?我们这个党有50年的历史。中国这么大,山头又这么多,可是没有搞成分裂。你们说怪不怪呀?从50年的路线斗争算起,一共有10次。”

他讲到陈独秀组织“列宁主义左翼反对派”,提到了刘仁静、彭述之的名字。他谈起井冈山时期的斗争,说到瞿秋白反对他提出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又说到李立三、王明。“中央五中全会,我是政治局委员,说是不让我参加会。1935年1月,开政治局扩大会,张闻天、王稼祥和我主持的,这就是遵义会议,张闻天作报告。我是好比一个菩萨,被放在尿缸里,沉过几下,臭得很。这次会议以后,我管事了。前

面讲的这5次,我都无能为力,他们不听我的。”

毛泽东接着说:“以后出了个张国焘,搞分裂。叶剑英同志在这件事上立了一大功,张国焘打电报给陈昌浩,说:‘乘势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当时叶剑英同志是前敌的参谋长,他把这个电报拿出来给我看了,所以我们才走的,不然当时我们那些人就当俘虏了。在这个关键时刻,叶剑英是有功劳的,所以你们应当尊重他。

那时我们的路线是正确的,那时军队如果不到西北,哪里还有根据地,后来怎么能搞到华北地区、东北地区的根据地呢?到了陕北,张国焘又逃跑了。他是很害怕胡宗南的,后来又跑到西安胡宗南那里去了。张国焘如果不跑,要给他当政治局委员,你们信不信?

以后就是高岗、饶漱石,想夺权。还有去年庐山会议。这次会议搞出来的那些东西,我看他们搞地下活动,突然袭击,是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的。纲领就是‘天才’,设国家主席,推翻二中全会的议程和九大路线。这就是他们的纲领。他们是有组织的,瞒着人去搞的。中央5个常委瞒着3个,也瞒着政治局的大多数同志,除了那几位大将以外。二中全会前一段开得不好,后一段开得好,引起大家对读书学习的重视。”

毛泽东强调说:“近一个时期以来,我的方针有三条: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起来,不要搞山头主义;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办法也有三条,就像程咬金的三板斧,一个是甩石头。头一块石头是批陈伯达搞的语录。第二块石头是批38军的报告。他们整38军实在是恶劣,对自己的队伍怎么能那个样子的整法。整24军、整21军、整69军、整38军,为什么要整?第三块石头是批济南军区的报告,加上批语,让大家讨论。第二个办法是掺沙子。第三个办法是挖墙脚。”

他又问刘兴元、丁盛、韦国清:“你们对庐山会议怎么样看法?犯了错误,就做检讨。你们犯的错误不就是拥护我这个天才,要我当主席。我怎么能是天才呢?我读过6年孔夫子的书、7年资本主义的书,1918年到北京大学图书馆当了管理员,可不简单呢!一个月的薪水8块大洋。不过宿舍很小,冬天很冷,没有煤炭烧坑。我们8个人挤在一个炕上,不能平着身子睡,只能侧着身子睡,面积不够。那7个人都

是要出国留学的,到法国搞勤工俭学的。那时图书馆里有暖气,我晚上就到那里去睡觉,又取暖又看书,开始看马列主义的书。我就在这个时候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书。”

毛泽东转向韦国清说:“我看你这个人太文了一些。打奠边府的时候,你是坚决主张打的。开头他们不听你的,你很厉害,他们就听了。”

韦国清回答说:“我是根据主席的指示办的。”

毛泽东问韦国清:“你们那个民族(指壮族),人口增加了一些吗?得有四五千万人了吧。可以编几十个师。南方几个省能打仗的,第一是广西,第二是广东,第三是湖南,你(指汪东兴)那个省(即江西)算第四。”

接着,刘兴元做工作汇报,毛泽东听完后说:“陈独秀那个人是不讲民主的。今天我听你讲了10分钟,陈独秀办不到,他不听。办农民运动讲习所,开始他不同意,后来说同意啦。我说,那就请你通知招生吧。我开始招生的名额当中,他说农民比例太大,工人比例太小,不行。其实那时农民四万万人口,工人只有二百万,应该多培养农运干部。不过陈独秀也有个长处,就是不爱财。他穿的衣服倒是干干净净的,办公桌上的东西都是摆得整整齐齐的。”

讲到延安整风时,毛泽东说:“延安整风时,提出来要编书。后来叫王首道负责编书,编出来后,不行。改由胡乔木编,这个人有点知识,他收集和研究了那么多的文件,编了两大本,印出来让大家讨论。通过学习,这才把问题弄得比较清楚了。”

丁盛说,他在延安整风中学过两本书,对他帮助很大,后来还参加过“七大”。

毛泽东听后说:“你参加过‘七大’,了不起呀!”他问刘兴元、韦国清、汪东兴:“你们有没有参加呀?”

汪东兴回答说:“我参加了。我是‘七大’的候补代表。”

毛泽东转向丁盛问:“你打过些什么仗?”

丁盛回答说:“打过锦州。”

毛泽东说:“打锦州时,有一个部队把蒋介石的增援部队挡住了,打得好。”

接着,他兴奋地说:“我听说打锦州的时候,部队住在苹果园里面,不摘苹果吃。我就说.我们的部队有希望。到了北京,就有人提出要给部队增加军饷,说资本家吃大米、馒头,我们的部队吃酸菜,生活太苦了。增加军饷才能和资本家比。我说我们的军队只吃酸菜,又能打仗,这就很有希望。为什么要增加军饷呢?提这个意见的人,是代表吃酸菜阶级的人说话的。”

“军队要谨慎,不能骄傲,一骄傲就要犯错误。我很久没有抓军队工作了,现在要抓军队工作。抓军队无非就是路线学习,纠正不正之风,不要搞山头主义,要讲团结这些事情。进城以后,管军队工作开始时是聂荣臻。以后是彭德怀。他是打了胜仗的人嘛。以后就是林彪。他管不了那么多,实际上是贺龙、罗瑞卿管得多。以后是杨成武。再以后是黄永胜当总长,又是军委办事组的组长。办事组里面有一些人,在庐山会议上搞出那么些事来。我看黄水胜这个人政治上不怎么样强。第一军队要谨慎,第二地方上也要谨慎。军队要谨慎,首先不要搞山头主义。庐山会议上他们搞的那些语录,李德生同志就有意见。我说李德生这个人好蠢,你不是那个山头的人,别人的山头可以给你呀?好的宝贝怎么会给你呢?”

说到这里,毛泽东沉思一会,把谈话内容转向“天才论”。他说:“《国际歌》里面包括了马克思主义全部的立场、观点。你们看,那里面讲的是,奴隶们起来为真理而斗争,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全靠自己救自己。是谁创造了人类世界,是我们劳动群众。在庐山会议时,我写了一个700字的文章,就提出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奴隶们创造历史这个问题。你们都讨论了吗?《国际歌》就是要团结起来到明天,共产主义一定要实现。学马克思主义就讲团结,没有讲分裂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那个歌,你们要注意三大纪律的第一条,八项注意的第一条和第五条,这是重点。没有重点就没有政策。”

接着丁盛汇报他的战斗经历。当讲到冀东暴动的情况时,毛泽东说:“邓华这个人,跟着别人犯过错误,我对这个人寄予希望。杨勇被抓究竟是怎么一回事?钟赤兵这个人被敌人打掉了一条腿,是在娄山关被打掉的,你们不要歧视他。他是打娄山关负伤的。当时我看见一副担架抬着伤员,我问他叫什么名字,他说他叫钟赤兵,当团政委。这

个人似乎可以到你们广州军区,科委有人歧视他。”

毛泽东接着讲学习问题。他说:“要认真读书。罗瑞卿当参谋总长的时候,让他和陈伯达商量,搞个读书目录,搞出来了30本书。我看可以。以后又提出来说这样会妨碍学语录,把学理论的事停下来了。高级干部连什么是唯物论、什么是唯心论都不懂,怎么行呢?读马、列的书。不好懂,怎么办?也是有办法的,可以请先生帮。边境作战时,有一个部队从生产的地方拉出来,上前线打仗,并且打得很好。我觉得我们的军队很有希望。

你们写的三支两军的文件,我看了,一些问题解决得不算彻底,但还可以。我在中央的批语上加了四个字:‘认真研究’,就是要引起大家重视。我们的干部,大多是好的,不好的总是极少数。不好的要给予适当的批评,好的要表扬,但不能过分。不能捧得太高,比如有人说‘超天才’,对二十几岁的人就捧得这样高,这没有什么好处,实际上是害了他。地方党委已经成立了,地方党委定的事,要拿到部队党委来讨论,这不搞颠倒了吗?地方没有成立党委以前可以,地方已经有党委了,就不能那样办了。”

“我一向不赞成自己的老婆当自己的秘书和办公室主任。你们这几位夫人怎么样?做工作要靠自己动手,亲自看,亲自批,免得误事。今天就讲到这里。”

# 第1179回：要学习，水至清则无鱼 聚“九所”，毛泽东再说庐山

29日上午，毛泽东找韦国清谈话，下午，汪东兴、华国锋、丁盛、刘兴元、韦国清、卜占亚6人座谈。晚上，汪东兴将座谈会的情况向毛泽东汇报，毛泽东边听边插话。汇报到刘兴元、丁盛、韦国清检讨他们在九届二中全会所犯的错误时，毛泽东说：“现在看来，是马列主义没有学好。你对丁盛、刘兴元了解不了解？”

汪东兴说：“不了解，只是在开会时有点来往，平常没有联系。通电话也是因为有事要办，没有深谈过。这一次他们谈得深一点，摆了摆思想问题。”

毛泽东又问：“你们知道不知道这里面的原因是什么呢？”

汪东兴回答说“主要是学习问题。”

毛泽东说：“对呀。我经常提到这个学习问题。大家在这方面口头上是同意的，但在实际中看法就不统一了。你看，这一次在庐山会议上，搞了一个称天才的语录，自己又不看马列主义的书，陈伯达搞的那一套就相信了，而且照着念，照着引用。”

汪东兴又讲起庐山会议上陈伯达要他打印称天才语录的事，毛泽东听后说：“这个没事。你是办公厅主任，你不是有意要打印陈伯达搞的语录。他是常委，他要你打印一些东西也是可以的，以后也没有用上。总理让封存起来，你就封存了，没有扩散。这是对的。你发言被人利用，这是事实。在湖北检讨以后，我对你比较放心了。你没有什么问题。”

汪东兴：“我还是有错误。”

毛泽东：“当然，你发了言嘛。”

接着，毛泽东又提出学习问题，提倡读点历史、经济学、小说、哲学史。

他说：“《水浒》、《三国演义》、《红楼梦》、《金瓶梅》，这都是文学

作品,很重要的,是反映政治性的小说,体现了艺术性和思想性相结合的完美,写得很好,语言也很生动活泼。”

毛泽东嘱咐汪东兴把这些话向刘兴元、丁盛、韦国清等人传达,等有机会时,再向政治局传达。

毛泽东考问汪东兴:“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

汪东兴回答说:“三个来源是德国的古典哲学、英国的古典经济学和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三个组成部分是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

毛泽东表示满意。他说:“《共产党宣言》这一篇文章写得好。那个时候。马克思、恩格斯写《共产党宣言》时比你年纪小。只有30岁左右。你看人家!”

“在党里为人也好,在社会上为人也好,个人为人处事也好,都要以团结为重,要辩证地看人,两点论地看人,变化性地看人。一分为二是辩证的嘛,二点论也是辩证的嘛。”

“为人不可太认真了,水至清则无鱼;不看书不懂文学,不做工作不懂事。你干事太认真。这样的话就好比水太清了,鱼就无法生存了。”

8月30日上午,毛泽东又找刘兴元、丁盛、韦国清、华国锋、卜占亚谈话,汪东兴参加。毛泽东照例好似漫无边际地闲谈说笑好一阵子。

说到卜占亚,毛泽东说:“你的野心太大,你要占有整个亚洲呀?”他又问卜占亚是哪里人,卜占亚答是河北蓟县。毛泽东说:“我有个警卫员也是蓟县人。你们蓟县当年可是安禄山造反的根据地呀!”

轮到韦国清了,毛泽东说:”你这个人哪,面善心狠。当年打奠边府,要不是你下决心,奠边府是打不来的。”

寒暄过后,转入正题。毛泽东问:“你们座谈两天了吧?怎么样?”

大家各自简要地汇报了两天座谈的情况。毛泽东听后说:“现在不要做结论,结论要由中央做。99人会议你们都到了,总理也做了总结讲话,发了5位大将的检讨,还发了李雪峰、郑维山两位大将的检讨,都认为问题解决了,做了总结了。其实,庐山这件事还没有完,还没有解决。回到北京我要找他们谈话。他们不来找我,我找他们。”

在谈到党的状况时,他说:“全党人多,我们党有两千多万人,坏人不过是百分之一。这百分之一呢,叫做‘吐故纳新’。还要挂起来一点,不过不多了,清理和挂起来的,就算百分之三。党内还有落后的分子,或者比较而言的。这些问题几年之后,或者十几年之后才能做结论。”

“听说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教育不注意了。三大纪律的第一条,八项注意的第一条、第五条,都很重要。这是重点。没有重点就没有政策。没有政策怎么样做工作呢?要很好地抓住重点,学习和讨论,不借鉴历史和政策,怎么行呢?当然现在你们还不能向战士们讲庐山会议的问题啦。”

“庐山会议他们为什么要搞这个,收场又这么样快,我们也不懂。刘建勋同志说搞了一天半,我说搞了三天,从开始的那一天,他们就搞起来了。

如果你们有理,你可以坚持,为什么那股妖风刮了三天就不刮了呢?为什么要收得那样快呢?各大组组长都参加了政治局常委会的讨论,说要收回《简报》。你们的组长是谁呀?”

在座的回答说:“我们中南组的召集人是曾思玉。”

毛泽东:“总而言之,将来要把《简报》发给大家看。大家评论,是革命的,是半革命的,还是反革命的?不要受群众落后议论的影响。这些落后的包括你们在内。不然的话,为什么被人家一股台风一卷,就把你们卷进去了。”

“军队历来就是讲雷厉风行的作风,我赞成。但解决思想问题,不能雷厉风行,一定要摆事实、讲道理,谁有道理听谁的。我历来就没有什么意见的,我的意见都是下边来的,下边是供应站。陈伯达给我几条语录,38 军给了我一个报告,汪东兴那个自我检查,济南军区的反骄破满的报告,刘子厚也给了我一点材料。我有什么东西呀?我是向他们学的,然后我就打石头。

我看今后你们也应该这样。你们有什么学问呢?我不清楚。无非是找工人、农民开上两个会,然后总结一下。有些人一总结就说什么英明、伟大呀!英明领导啊!其实我算什么英明领导,一说英明领导,我就不寒而栗。我并不是什么英明领导,我不过是在下面的报告

上批上几个字,写上几句话,下面供给材料给我的脑子进行加工。”

“你们都说过英明领导吧？当然,没有领导不行。没有一个英明领导,那你那个广东省怎么能管得起来呢？广州军区三个省有一亿多人口,你们管得起来吗？不过你们心中要有个数,不要光在报纸上登(指毛泽东讲的这些话)。我到处走一走,和你们吹一吹,人数不要太多了。庐山会议上讲了要读书,我希望你们今后多读点书。”

谈到这里,毛泽东问刘兴元:“你会写文章吗?”

刘兴元说:“不会。”

毛泽东又问丁盛:“你呢?”

丁盛说:“文盲,主席的书还可以看得懂,外国的书看不懂。”

毛泽东说:“那怎么办啊？你们都是书记,你们还要当学生。我现在天天当学生,每天看两本《参考资料》,上午一本,下午一本,所以懂得点国际知识。有的人太忙了,只是看了一份《参考消息》,太少。你们没有时间,可以拿来叫秘书、秘书科长们看,他们看了以后,给你们的耳朵里吹一吹风。我看《参考资料》可以多印一点,看的人多一点。如果有的人不看,由他们去。”

毛泽东又谈九届二中全会的问题:“庐山这一次斗争,同前九次不同,前九次都做了结论,这次保护林副主席,没有做个人结论,他当然要负一些责任。不过,林彪同志固然不对,但主要还是他的老婆不好。我看他呀,那些人帮了他的倒忙。那些人也不和我通气。你们经常和我通一通气,也可以嘛。给你们通气了没有?”

众人纷纷回答说:“没有。”

毛泽东接着说:“我这一次也是给你们通个气吧！要把脑子里的东西向人家讲出来,把正确的、错误的都讲出来,就舒服了嘛。像汪东兴沾了个边,他在1300人的会上做了几次检查,他也没有倒嘛。你把心里的话说出来了,倒不了。当然也有少数人幸灾乐祸……”

讲到这里,毛泽东看了汪东兴一眼。汪东兴说:“我一共做了3次检查。”

毛泽东接着说:“少数人说汪东兴下不了台了,但多数人还是说他检讨得好,其中包括我的护士长、服务员、护士都说好。”

毛泽东又看了看大家说:“你们听了我这一吹,又是什么英明伟大

呀,又是英明领导呀,又是很多都是新东西呀,没听见过呀!”

韦国清接上话头说:“我们听了很受教育。”

毛泽东笑着说:“看,你又来这一套了吧。”

毛泽东说,他的这次谈话与在北京召开的99人的批陈整风汇报会有所不同,他说:“我说的这些,超过了99个人会议总理做的总结了,是当作个人意见提出来的。比如华北组的简报究竟是革命的,还是反革命的?还应该讨论。总而言之,它是不大好的就是了。不然的话,为什么要往回收呢?有几位大将,在各组放风,也不是那么妥当的吧。后来一说不行,就又慌了手脚。起先那么大的勇气,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可是,过了几天以后,又赶快收回记录。你看,才有几天呀,翻来覆去的,既然有理,为什么收回呢。

我们的高级干部不成熟。那次庐山会议也不过是二百几十个人,我本人也是二百几十个人中间的一个,还有一些高级干部,这次我给我们的高级干部吹一吹风,有中央委员,卜占亚他不是中央委员,我也跟他吹了,跟一个军区的政委吹吹风,还不行吗?华国锋同志,你满脑子的农业,当然,你也讲了农业路线问题,可是光有你的农业也不够,还要考虑到东西南北中,党政军民学。回去能吹的就吹,不能吹的就守纪律,试试看。我一个人不能做决定。不要普遍搞,你们要个别的吹一吹风。”

谈到各地召开的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时,毛泽东说:“过去,‘积代会’到底效果如何?值得研究。北京开的有缺点。首先是总参谋部召开的那个‘积代会’,他讲‘大树特树’,别人一句也不能讲。听说他那里有一个护士,说了一句不赞成的话,他们就不饶她。‘大树特树’,不妥当。名曰树我,不知树谁人,其实是树他自己。我还要他来树吗?现在我已经树得了不得了嘛。

后来,国防科委开的‘积代会’也不好。国防科委开‘积代会’,有人还打电报祝贺,其实这是造声势,找一班人拥护自己。”

话锋一转,毛泽东又提到了黄永胜。他问刘兴元、丁盛与黄永胜的关系如何?

刘兴元说:“我们还是儿女亲家咧!”

毛泽东望着刘兴元说:“我看你这个人比较爽快,说话不那么吞吞

吐吐。”

刘兴元回答:“我有急躁粗暴的毛病。”

毛泽东:“我这个人也急,要改。军人搞惯了,就是急。急不好。战士才不管你呢。对战士管得要合理,要有理,就是合乎事实,讲道理。”

接着,毛泽东“将”了刘兴元、丁盛一“军”:“你们同黄永胜关系那么深,黄永胜倒了怎么得了呀?他是办事组里边井冈山的独生子。”

黄永胜是湖北咸宁人,17 岁就当兵,原是叶挺部队警卫团的一名战士,这个团没有赶上南昌起义,在江西修水参加了秋收暴动,然后上了井冈山。

毛泽东特地嘱咐说:“不要公开讲这次庐山会议,因为中央还没有作结论,你们只是说九次路线斗争就可以了。这是说现在的路线斗争还有些问题,不要像我跟你们说的这一套。但是,我们军队应该进行教育,所有的高级干部都应该弄清楚我和你们吹的这些。军长、政委那么多,怕来不及。其实人家都知道了,什么‘小小老百姓’啊!‘小小老百姓’是谁呢?河北人都知道。总之,就是路线问题、山头问题、团结问题。我是程咬金的三板斧。我是到处讲。不管谁犯了错误,不讲团结,不讲路线,总是不大好吧。回北京以后,或者一个一个的,或者三个四个的,还要再找他们谈谈。他们不找我,我去找他们。方法就是三板斧,甩石头、挖墙脚、掺沙子。陈伯达这个‘小小的老百姓’,他搞挑拨离间,他的话也不讲完。我们现在在下边,也不公开批评,批陈整风我们还叫批修整风。我们党是有纪律的。庐山这场斗争,还没有听到外国人说什么,华北开了一个多月的会,后来他们又开了三个月的会,可是没有发现外国人说什么。总而言之,无论干部、战士,全国党员有二千多万,讲百分之三的话,稍微大了一点吧?现在我希望你们试试看,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教育战士,教育干部,教育群众,教育党员和人民。这个问题很简单,不要那么长篇大论的报告。”

讲到这里,毛泽东看了看桌子上的表,说:“今天我要走了,我这一路都要谈下去。”

韦国清又表示:“主席的谈话,对我们教育很大。”

毛泽东:“又是英明了吧,从来没有听说过吧。99 个人的会议,已

经刚讲了吧。马克思经常讲,不要看人家的声明,要看行动。声明无非是讲在口上,写在纸上,那比较容易,真正地实现,就难了。这个问题没有解决,可能要看几年、十几年、二十年吧。人们说:盖棺论定。我说有的人盖棺也不能论定。斯大林不是盖棺论定了吗?没有论定。

斯大林搞雅尔塔协定,他们要瓜分世界,把中国的蒙古划出去,把新疆、东北划给苏联的势力范围,别国不能去;把日本划给美国的势力范围,你们知道不知道呀?"

"我讲党的十次路线斗争问题,没有一次把党分裂掉的,这个问题,值得研究。这么个大国,这样多人不分裂,只好讲人心、党心,党员之心不赞成分裂。"

他最后说:"从历史上看,我们这个党是有希望的。过去张国焘搞分裂,把共产党的武装对立起来,但没有搞成。很有希望。还是要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团结起来。"

接见结束时,几个被接见者几乎同时提出:讲话精神可否在一定范围内作传达?丁盛更是当面问毛泽东:"主席,您讲了这么多话,这么多重大的事,我们回去要不要传达呢?"

毛泽东说:"不!没有传达任务。但是你们可以吹一吹风。"

这次谈话长达3个小时。

# 第1180回：苏闽赣，三巨头会在南昌 说“路线”，许世友委实不安

8月31日，毛泽东决定去南昌。当天上午10点多钟，专列准备就绪。中午12时30分，汪东兴送毛泽东到长沙火车站，他让华国锋和卜占亚一同到火车站送行。

临别时，华国锋问毛泽东：“主席，我回到北京，别人问我，我怎么回答？”

毛泽东说：“你只跟总理一个人谈。”

专列不到下午13时就开走了。

汪东兴送走毛泽东的专列，又回到住地，收拾好文件，吃完中午饭，于下午13时30分，乘飞机提前赶往南昌。

毛泽东在湖南长沙时，已经让汪东兴通知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和福州军区司令员韩先楚到南昌谈话。下午14时，汪东兴到达南昌后，又让他乘坐的专机飞往南京去接许世友，韩先楚则坐福州军区的飞机从福州飞来南昌。

下午17时左右，许世友、韩先楚先后抵达南昌。汪东兴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向许世友、韩先楚和江西的程世清3人传达了毛泽东在湖北、湖南的谈话内容。他们从下午17时30分开始，到19时30分结束，共传达了两个小时。

晚上21时，毛泽东的专列到达南昌，汪东兴、许世友、韩先楚、程世清一起到专列停车处去接毛泽东。

专列停好后，他们上了车。毛泽东在车上与他们谈了几句后说：“车既然停好了，许世友也刚来不久，那就干脆到住地去谈吧。”

他们送毛泽东住进南昌向塘机场附近的八二八招待所。这里原是空24师师部，后仿照武汉东湖和杭州刘庄改建成招待所，环境和设施很好。安顿好后，已是22时多了，毛泽东与程世清、许世友、韩先楚开始第一次谈话，汪东兴在场。

毛泽东开门见山:“中国共产党的十次路线错误,是要分裂党,但没有分裂成。”

他转向许世友说:“长征路上,张国焘搞分裂,成立伪中央,你是清楚的。”

许世友赶快声明:“伪中央没有我,有陈昌浩……”

毛泽东摆了摆手,表示并没有把许世友划到张国焘一伙中去。其实,张国焘搞的伪中央的名单,中央早就知道了。

毛泽东接着说:“陈独秀搞分裂,有81个人组成‘中国共产党列宁主义左翼反对派’。头一名是陈独秀,第二名是彭述之,第三名就是刘仁静。他们还发表了《文告》。”

毛泽东说的《文告》是指1929年12月10日,陈独秀等81人公开发表的《我们的政治意见书》。

毛泽东问程世清:“去年的庐山会议,吴法宪向华东空军系统的王维国、陈励耘、韦祖珍这几个人打了招呼,有没有你程世清呀?”

程世清赶忙说:“我有错误,吴法宪对我有影响。主要的错误是我的思想没有改造好。”

毛泽东并未继续深问,他又问许世友说:“许世友同志啊,你与上海、浙江的关系有些紧张,有些问题呀?”

许世友马上说:“我与上海关系比较好,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张春桥一直保我,一直为我说话,并且有我的大字报时,他还派人去覆盖。”

毛泽东说:“覆盖不对。不应该覆盖嘛,让人家去看嘛,有什么关系呢?”

许世友又补充说:“我与王洪文的关系也比较好。”

毛泽东接着说:“你这个许世友呀,应该高抬贵手,刀下留人。你对我的感情没有过去深了,我的话也听也不听。”

听到“刀下留人”的话后,许世友紧张了,他有些怕了,连忙说:“哎哟,我和浙江南萍的关系请中央派人来调查。”

关于浙江问题,中共中央曾于1969年1月8日至29日,在北京召开解决浙江问题的会议,包括许世友在内的南京军区、浙江省革命委员会、浙江省军区等10位领导干部参加。名单是由许世友拟定,并经周恩来报毛泽东批准的。当时,毛泽东要双方多做自我批评,不要批

评对方。如今两年多过去了,浙江的武斗仍没有停止。

毛泽东问许世友:“据说舟山的问题到现在还没有解决。你这个司令员有没有责任呀?那样搞武斗,南萍有责任,但都是南萍的责任吗?”

当时,对舟山的问题,许世友和南萍总是谈不到一起,叶群也坐飞机去舟山调解过,总参谋部作战部的一位副部长也去过,都没有解决问题。

毛泽东转身向韩先楚问道:“你是湖北人吧?”

韩先楚的情绪比较轻松,他回答说:“我是湖北人。”

毛泽东:“湖北的人我认识得很多,也可以说是不少吧。有个李求实是湖北人,有项英是湖北人,有黄富生,有施洋,有董必武,还有恽代英,这些都是我们党的名人嘛。这些都是湖北佬。”

韩先楚只是笑,没有说话。

毛泽东兴奋地说:“湖北出人才呀!”

他接着说:“汪东兴向你们传达了武汉、长沙谈话的内容,讲了庐山会议的问题。缔造人民解放军、领导我们军队的人,能缔造、能领导,就不能指挥吗?他们把缔造和指挥分开,难道缔造者就不能指挥呀?另外,我们这个军队是不是哪一个人缔造出来的呢?或者是哪几个人缔造出来的呢!我看不是,人多着呢。朱德、恩来、贺龙、刘伯承、叶挺,这么多人发动的南昌起义,他们就不能指挥了吗?”

“南昌起义后,由于在指挥上、路线上有错误,起义军南下广东潮、汕地区与敌人作战,结果损失很大,最后余部又被迫返回到江西、湖南一带。”

“南昌起义以后,指挥上、路线上有错误,想依靠外国人。朱德同志当时到了桂东地区,他有一个同学、朋友,姓范,叫范石生,关系不错,搞到一起,范送了他一点枪、钱、衣。”

他再次说:“军队的缔造者、领导者就不能指挥,这是不对的。缔造者、领导者也不是少数人,也不是我毛泽东一个,也不是你林彪一个,我们党内还有很多同志是领导兵暴的、领导军队的。”

“张国焘在长征路上搞政变,他也是缔造者、指挥者。但是,他指挥军队搞分裂,拿军队作为本钱来搞分裂,那就不好了。长征时,同我

们一起的右路纵队,有四军、二十军,这两个军同我们一起过的草地。他们当时把枪丢给干部团的学生,我还是要他们把枪带上,他们愿意回去就回去,张国焘有命令嘛。他们不愿意回去,我们也欢迎。当时不能帮忙,军队不能帮忙,都拿着枪啊。张国焘打电报让他们回去,他们也愿意回去,那就回去吧!李先念和许世友都是和我们一起过的草地,后来还是回去了。"

说到这里,毛泽东又转向许世友、韩先楚说:"你们和张国焘是一个部队的,你们要接受这个教训。后来你们不是和我们又会合在一起了嘛。"

其实,韩先楚、程世清随红25军长征,没有卷入张国焘的活动。但是许世友坐不住了,毛泽东屡屡提到张国焘,又提到"缔造""指挥",委实让他不安。许世友赶紧转移了话题,请示说:"主席呀,有'516'分子怎么办呢?"

毛泽东说:"怎么又谈到'516'啦?"

许世友说:"'516'在南京相当厉害。文凤来是'516'分子,这个人到上海,要毒害毛主席。"

毛泽东问:"毒害我的事,你们查清楚了没有呀?"

许世友回答不上来。

毛泽东批评说:"这件事,你们要查清楚,不忙做结论。"

接着毛泽东问许世友:"你们南京军区不是有一个有名的王、林、鲍吗?还有别的人,他们都是造反派吗?"

王是指南京军区副司令员王必成;林是南京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林维先;鲍是指南京军区副政委鲍先志。

许世友说:"他们都是造杜平的反。"

毛泽东反问:"他们为什么不造你的反?"

许世友说:"不,他们不造我的反。"

毛泽东对许世友说:"你这个地方缺少一个'宰相'。'宰相'很重要啊!我准备另找一个政委帮帮你的忙。"

随后,毛泽东说起九届二中全会上搞"突然袭击,地下活动,是有计划、有组织的。纲领就是设国家主席,就是称天才",并从理论上揭露了"天才史观"的唯心主义本质。他对许世友说:"你没读几本书也

好,现在是不读书的犯错误少,倒是那些自以为读了很多书、懂了很多马克思主义的人常犯错误。因为他们其实根本没有弄懂马克思主义,只会搬弄几句词汇吓唬人。”

他说:“庐山会议这件事,还没有完,还没有解决。回到北京以后,还要再找他们谈谈。他们不找我,我就去找他们。对这些人怎么办?还是教育的方针,就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

“对林还是要保。”

同时又说:“犯了方向路线错误,为首的改也难。”

毛泽东提出:“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

讲到军队,毛泽东提了3点要求:军队要谨慎,军队要统一,军队要整顿。他说:“我就不信我们军队会造反,我就不信你黄永胜能够指挥军队造反!”

讲到路线斗争的重要性时,毛泽东对许世友说:“你就知道挖煤,光搞黑的,不搞红的,不抓路线。”

最后,毛泽东又提出了学习的问题。他说:“现在有个口号,叫做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人民学人民解放军。要加一条。人民解放军学全国人民。”

谈话进行了一个半小时,已是子夜0时了,毛泽东要汪东兴组织许世友他们先座谈一下。

许世友穿白汗衫和绿军裤,脚上穿一双用麻绳布条编织的“草鞋”,鞋面上还缀着一个红穗。望着许世友的装束,毛泽东突然问:“现在还打猎不打了?”许世友毫不犹豫地说:“打!”毛泽东哈哈大笑。

谈话结束后,程世清彻夜难眠,毛泽东的谈话极大地触动了他。第二天,9月1日下午,程世清找到汪东兴说:“我有些很重要的问题,要亲自报告主席,但怕主席没有时间,是否先同你谈谈,由你转告主席。”接着,他便对汪东兴谈了他自己的问题和对林彪问题的看法。汪东兴听后说:“你说的这些,应当亲自去向主席讲,我不替你转达。我刚从主席那里来,他还没有休息,你现在就可以去。”

于是,程世清来到毛泽东的住处。

年事已高的毛泽东本来就带着病,连日的奔波和谈话,加重了感

冒,9 月 1 日下午,发烧 38 度多,晚上卧床休息。

这天晚餐时,汪东兴对陪餐的程世清等人说:“这里的条件不错,主席要在这里多住几天,你们多弄点野兔和斑鸠。”程世清等人听了很高兴,随即作了相应安排。

毛泽东到武汉时,曾思玉因肾结石手术正在大连疗养。9 月 1 日,刘丰向他传达了毛泽东的讲话,并一再强调要绝对保密。

9 月 1 日,留在长沙的韦国清、刘兴元、丁盛、华国锋、卜占亚 5 人一起去韶山滴水洞,在那里住了两天,共同回忆毛泽东几次接见时的讲话,由卜占亚执笔写出记录整理稿,共复写 6 份,5 人每人一份,作为内部“吹风”的依据,另一份寄给汪东兴。

毛泽东在湖南的 4 次谈话,禁止一切秘书、工作人员参加。华国锋等人在滴水洞整理这些谈话记录时,也是严禁一切其他人员参加。

许世友和韩先楚都是“打猎迷”,两位好朋友碰到一起,9 月 1 日下午开完座谈会,他们就高高兴兴打猎去了。第二天,9 月 2 日早上,许世友又扛着猎枪到机场附近的草滩打野兔子。

9 月 2 日上午 8 时,毛泽东起了床,可能是感觉好些了,他对汪东兴说:“我们要走了,怎么办?”

汪东兴知道此事自己是不能做主的,就说:“您看呢?”

毛泽东:“还是见他们一下吧。”

汪东兴马上通知许世友、韩先楚等人,可是怎么也找不到许世友和韩先楚了。汪东兴那个急呀,心想:“这下糟糕了。”半个小时后,总算摸到他们的行踪,原来两人又打猎去了。好在跑得不远,就在机场附近,马上派人把他们“抓”了回来。

这一次谈话时间不长,毛泽东说:“今天我要走了,汪东兴向你们传达我在路上的谈话,你们也谈了谈。昨天座谈得怎么样?有什么新的意见没有?”

韩先楚没有“包袱”,抢先说:“我在座谈会上说,要听毛主席的,九届二中全会我们大家都起了哄,我们犯了错误,我们做自我批评,请主席放心。”

说到庐山会议,许世友觉得他也有理直气壮的地方。在庐山,毛泽东让许世友摸他的手,说:“我的手凉,脚也凉,你回去做做工作,我

不能当国家主席。”许世友马上四处做工作:“要毛主席当国家主席,违背他老人家的意愿,又不利于党的事业,是完全错误的。”

许世友提起他与南萍的事,请示说:“主席,您到浙江找不找我们解决这个问题?”

毛泽东说:“不谈这个问题,到浙江不谈这个问题啦!”

许世友问:“那我回去吗?”

毛泽东说:“你回南京去吧,下午我也走了。”

9月2日上午的这次谈话,40分钟就结束了。随后,民航江西省局政委王起元将毛泽东在南昌接见许世友、韩先楚、程世清一事,写信告诉了民航上海管理局政委辛国良。辛国良又报告了民航总局政委刘锦平。

# 第1181回：程世清，揭林彪再爆新事 西湖边，陈励耘手足无措

9月2日，毛泽东再次单独听取程世清汇报。据文革后参与林彪、四人帮“两案”审判工作的图们将军回忆：

9月1日、2日，毛泽东单独两次同程世清谈话。据程世清交代供述：

“向毛主席报告主要内容是：

1、庐山会议期间，8月24日晚12时，吴法宪打电话要我去汇报华东组讨论情况，并带我到叶群那里。我把叶群谈的问题报告毛主席。我还向毛主席说：‘四大将’一定是有什么把柄被叶群抓住，要从林豆豆那里了解情况。先把‘四大将’的问题弄清楚，叶群的问题就搞清了；

2、周宇驰两次来南昌活动，这次来很神秘、鬼祟，把过去江西改装的一辆水陆汽车很快用飞机运走，怀疑他们要逃跑；

3、林豆豆几次来江西，有一次要豆豆同我的家属说：程政委心直口快，以后少同我们家谈，搞不好要杀头呀！从林豆豆言谈中，可以看出她与家里的人是有矛盾的；

4、在延安党校时，就有传说，叶群是特务。也有人怀疑，林的病是不是叶群搞的。林这么多年脱离实际，形而上学的东西很多，比如在部队搞‘四好’、‘五好’闹得矛盾很多，相互不团结，事故很多，副作用大。

主席说：你搞一个调查报告给我，并说，你同我说的这些问题非常重要。将来，只准报告总理，别人不能讲。”

后来李意根采访程世清时，程世清讲述他两次单独向毛泽东汇报的主要内容，第一条最后一句是这样说的：“因此，要解决四员‘大将’的问题，还得从叶群着手。”

第二条是：“1970年，林彪曾派专机将一辆苏制水陆两用坦克运到

南昌,要我们仿制一辆,说是为林彪、叶群到北戴河游泳所用。制成后,又来专机把原车和仿制车都接走了。”

第三条是:“1871 年 7 月,周宇驰亲自驾驶法制云雀直升飞机到南昌。当时,我们省委正在梅岭开会,周要见我,由空 8 军(驻南昌)副政委李登云带他到梅岭,我在午睡前和李登云一起见了他,只是相互寒暄了一番,约半小时,他就走了。后来听李登云讲,周驾机离开南昌后,到了庐山和井冈山,再飞往广东。我觉得周宇驰独自驾机到处飞,很不正常,不知要干什么。”

第四条说的是林豆豆与他家属谈的情况。

最后,程世清对毛泽东说:“我怀疑林彪可能要逃跑,可能从北戴河坐水陆两用坦克往南朝鲜跑,也可能坐飞机往香港跑。”

程世清讲完后,毛泽东让程世清“搞一个调查报告给我。这些情况只能跟总理讲,其他任何人都不能讲。”

9 月 2 日吃过中午饭,大家刚躺下睡午觉,突然传来命令:“主席现在就要走,立刻启动警卫和护路的工作。”不一会儿,毛泽东在汪东兴和程世清的陪同下,从一号楼的内室来到门厅,向大家招招手,登车而去。

此时,毛泽东的女儿李讷正在南昌附近的进贤县五七干校,但一直到毛泽东离开南昌,也没有把见女儿的事情排上日程。

毛泽东的专列走了近 13 个小时,9 月 3 日零时,到达杭州,停在笕桥专用线上。浙江省革委会主任、省军区政委南萍,浙江省省军区司令员熊应堂,浙江省革委会副主任、空 5 军政委陈励耘前去迎接。

走进车厢后,当工作人员介绍陈励耘时,毛泽东问他:“你在庐山犯了错误吗?”陈励耘顿时感到十分紧张。

坐下后,毛泽东问南萍:“你们省里现在的情况怎么样?”

南萍汇报了浙江天旱与抗旱的情况。

毛泽东听后说:“天不帮忙噢!”

接着,毛泽东把话题扯到九届二中全会上,他问南萍、陈励耘:“庐山会议你们有什么错? 听说吴法宪找你们谈了,他搞的那一套,不是说有 8 个人嘛?”

他看着陈励耘,又说:“其中有你一个,还有上海的那个王什么,还

有福建的那个叫什么？是不是就是那几个人。你们空军就8个中央委员嘛？”

陈励耘听了慌忙解释：“在庐山，吴法宪找我布置空中警戒时，阴一句，阳一句。这个人说话不算数的。”

毛泽东听后顺着说：“是啊，说话不准确！”

接着陈励耘又说：“上山前都不知道他们这些事。”

毛泽东：“噢，上山前你不知道。空军有，海军有没有？他们是不是内部有通知呀？”

陈励耘望着毛泽东发怔，没有回答。

毛泽东提到“上海的那个王什么”是指王维国。接着他又谈起九届二中全会上的《六号简报》，他说：“那份简报影响最大，是一个反革命的简报。我也搞不清楚，他们为什么这样搞？他们有话，事先不拿出来。大概总认为有什么把握了，好像会成功了。可是一说不行，就又慌了手脚。我看他们是恐惧。”

在座的人都没做声。毛泽东接着谈如何正确对待在九届二中全会上犯错误的人，他说：“我看前途有两个，一个是改，一个是改不了。他们可能改，有的不一定能改。你们是受骗、受蒙蔽。对犯错误的，还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比如说，我当班长，你们三个都是兵，我总是那么凶，抓着你们辫子不放，那么行吗？”

陈励耘赶紧说自己在九届二中全会上不了解情况，跟着犯了主观唯心主义的错误。

毛泽东看了他一眼，接过他的话题说：“要搞唯物论，不要搞唯心论。”

“庐山乱了三天，实际一天半，后来停下，逛庐山，到现在一年了。林彪同志那个讲话，没有同我商量，也没有给我看。”这是指林彪在庐山九届二中全会开幕式上的讲话。毛泽东接着又说：“林彪两次打电话、写信都被他们阻止了。”这是指九届二中全会前，林彪曾经有两次想要打电话、写信给毛泽东，但是都被叶群阻止了。

毛泽东继续说：“庐山问题不那么好，但没有庐山会议，也不会有现在的情况。庐山这件事，还没有完，还不彻底，还没有总结。光开不到100人的会议不行，军队还可扩大到军长、政委参加，地方也要有相

当这一级的同志参加。”

“庐山会议,主要就是两个问题,一个是国家主席问题,一个是天才问题。说反天才,就是反对我。那几个副词,我圈过几次了。”

他再次强调说:“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不搞山头;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

毛泽东又提到学习列宁为纪念欧仁·鲍狄埃逝世25周年撰写的那篇文章。提出要唱《国际歌》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他说:“我没有同你们讲过路线问题,过去见面,吹的都是些鸡毛蒜皮。无非是同南京的关系的事,谁知后边还有一个庐山会议。过去我就讲过,一个主要倾向,掩盖着另一个主要倾向,谁知‘三支两军’掩盖着一个庐山会议的主要倾向!”

“听话要分析,不要听小道的话,不要尽听,人家一吹就听了,受蒙蔽了,不了解情况。所以要调查研究,听话要分析。”

“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提了三个副词,当时兵荒马乱,那时还需要嘛。九大后就不同了,要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现在就要降温。到处挂像(指毛主席像),日晒雨淋,可怜噢!还有那个‘伟大’。我就有四个‘伟大’,你们就一个没有啊!伟大的导师,就是一个教员嘛,当然导师比教员更高明一点。九大党章草案上那三个副词,我就圈去了。九大党章已定了,你们为什么不翻开看看。”

“这次庐山会议上,不少人连什么是唯物论、什么是唯心论都不懂,都搞不清楚。你们要学习马、列的书。现在学六本,文化高一些的,有人可能突破,明年再学几本。”

最后,毛泽东又谈到军队问题:“进城那时,我管打仗,也管军队。朝鲜战争人家打胜了,我就没有管了,要人家去管。军队开始是聂荣臻管的,以后是彭德怀管,后头是林彪管。但他身体不好,也管不了那么多,罗瑞卿、杨成武也不听他的,我帮忙也不够。现在的几位大将(指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我也不熟悉,不了解,同他们单独谈得不多,集体谈得也不多。黄永胜现在思想状况怎样,也不清楚。过去我没有管,现在我要管军队的事,我不相信军队要造反。军队要统一,军队要整顿。”

他又提到了北京军区的问题:“除了他们外,主要是北京军区,他

们先整了24军,又整了31军、69军,最后整了38军,有的采取组织调整的办法。21军调到陕西时,胡炜就讲这下可好了,脱离了他们的指挥。都高兴离开北京军区。对66军就说不服,他们的前军长就顶住了,就是不让他们钻到天津市革委会里去。北京卫戍区他们就插不进去,因为有谢富治、吴德、吴忠,不听他们那一套。"

然后问南萍:"舟山还武斗不武斗啊?"

南萍回答说:"现在不武斗了,但群众组织中派性还很强,政策还不够落实。"

毛泽东说:"舟山主要是中级、上级的问题。有些问题,你们也支持了一下。"

毛泽东再一次说:"对林要保。"

接着又说:"什么一句顶一万句,一句就是一句,怎么能顶一万句?什么人民解放军是我缔造和领导的,林亲自指挥的,缔造的就不能指挥呀!"

谈话快结束时,他又提到:"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人民学人民解放军,这不完全,还要加上解放军要学全国人民。今天谈到这里。有些在别的地方谈的,请汪东兴同志再同你们谈谈。"

这次谈话持续了一个多小时。最后,毛泽东说:"我打算在你们这里休息几天,你们欢迎不欢迎?"

陈励耘说:"我们一切都准备好了,请主席下去休息。"

毛泽东说:"你们欢迎,我就去吧。"

毛泽东离开专列到杭州住所,陈励耘等在门口迎接,毛泽东见到陈励耘,面露不悦地问:"你,怎么又来了?"

陈励耘赶紧解释说:"我,我分工管警卫。"说着很快躲开了。

陈励耘,四川成都人,1919年生,1938年2月到延安,同年入党,历任抗大九分校指导员,新四军一师山炮营政委,华东野战军第六纵队团政治处主任、副政委、政委。1951年任空军某师副政委、政委。能说会道,是当时为数不多的有才华的师政委。1964年升任军政委,文革中任浙江省革委会副主任,分管公安系统。

9月4日、5日,汪东兴奉毛泽东之命向南萍等人传达毛泽东前几次的谈话内容。

9月4日,汪东兴将他和华国锋追记、经毛泽东改过的毛泽东8月16日至27日在武汉同湖北、河南、湖南等负责人的谈话稿专送周恩来。

从9月4日至9日,毛泽东又“闭门不出”了。

毛泽东这次住在杭州,随着时间的延续,情绪越来越不安。他吃不下去饭,睡不着觉。有天上午,毛泽东出来散步,看见中央警卫团中队长陈长江正在给集合在礼堂门前一棵高大榕树下的部队讲注意事项。干部战士身着便服,在别的场合见到他们,你决不会以为他们是解放军;但现在是集体活动,每人坐一个小马扎,成排成列,整整齐齐,尽管天气很热,他们仍然服装整齐,聚精会神地听队长讲话。

毛泽东来到队前,大家热烈鼓掌,陈长江说:“主席,我们正在学习,讲你说的那个‘三要三不要’我讲得不好,请主席给大家讲一讲吧。”

毛泽东向大家摆了摆手,表示不讲了,说:“长江,你指挥大家唱《国际歌》吧。”

于是,陈长江开始指挥唱歌,大家越唱越来劲,不到50人唱歌,比100多人的连队唱得还响,他们一连唱了两遍。毛泽东很高兴,说:“唱得不错,再唱个《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毛泽东就站在那里听他们唱完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唱完了陈长江问:“主席,你还有些什么指示?”

毛泽东挥了挥手说:“你们的歌唱得很响,不仅要会唱,还要照着去做,一切行动听指挥嘛。”

华国锋、卜占亚他们从韶山回到长沙后,周恩来让华国锋继续留在长沙,接待朝鲜军事代表团。4日晚,华国锋出席中共湖南省委、湖南省革命委员会为朝鲜军事代表团举行的欢迎宴会,并在宴会上讲话。

9月1日,中央办公厅将林彪8月16日与周恩来等人在北戴河的谈话整理成文报毛泽东。9月5日,正在杭州的毛泽东接到中央办公厅9月1日报来的林彪8月16日讲话稿,圈阅同意。

9月5日,周恩来将林彪8月16日讲话审阅定稿后送毛泽东,并指示:“特急件,急送王良恩同志、印发政治局同志,给我四份。”

9月5日,华国锋和湖南省党、政、军领导,到机场为朝鲜军事代表

团离开长沙到武汉访问送行。9月6日,华国锋赶回北京。当天,他接到电话通知:晚22时30分,到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参加周恩来召开的讨论四届全国人大政府工作报告的会议。

当晚,华国锋准时来到东大厅,李先念、纪登奎轻声问他:“你去了,主席谈什么了?”

华国锋说:“主席谈了路线斗争。”然后找了个靠边的位置坐下。

会议一直开到次日旭日东升才结束。人们陆续都走了,华国锋起身上前,拿出一本记录交给周恩来,说:“主席在外面谈话记录带回来了。主席在武汉的记录是别人整理的,在湖南的讲话是我们大家整理的。主席说我回到北京,只同你一个人谈。”并简单地汇报毛泽东在南方视察的情况。然后提出:“主席的讲话要详细汇报,希望总理约个时间详谈。”

9月5日、6日,卜占亚也在长沙分别向湖南省委、省军区党委部分常委“吹风”。8日,卜占亚再给参加省委读书班的地市主要负责人和在长沙地区的县团级以上主要领导干部作“吹风”报告。当天,湖南省委发出关于认真学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和《国际歌》的通知,《湖南日报》按湖南省委指示,刊登列宁为《国际歌》词作者去世25周年写的文章及这两首歌曲,引起其他省市的高度关注。许多报社打电话来问《湖南日报》社,现在刊登这两篇革命歌曲有什么背景。《湖南日报》社回答各地报社,他们也不知道,是省委让登的。

9月5日,丁盛、刘兴元从长沙回到广州。临行前,9月4日,毛泽东让汪东兴通知丁盛和刘兴元,向广州军区师以上干部传达他南巡谈话的主要内容。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丁盛、刘兴元回到广州后当天,立即召开广州军区2000多名师以上干部大会,由刘兴元“吹风”,传达毛泽东讲话的主要内容,这在南巡的省份里绝无仅有。别说天高皇帝远的广州,就是北京,也只有很小的一个圈子知道这些情况,甚至上了庐山的大部分中央委员,都“受骗上了当”,此时还不知道究竟是怎么回事。

广州军区的传达会议开了一个下午还没开完,晚上接着传达。

开会正式传达前,丁盛宣布纪律:第一,不准做记录;第二,不准向外泄露。为此还专门指定军区政治部一个副主任在现场监督检查。

# 第1182回：听反映，连夜安排移专列 离杭州，毛泽东突然抵沪

9月8日晚上，停留在杭州的毛泽东得到消息：杭州有人在装备飞机。一位多次接待过毛泽东的工作人员，在看望他时也反映："有人说主席的专列停在杭州笕桥机场支线碍事，妨碍他们走路。"毛泽东把汪东兴找去，提出要把专列转移。

汪东兴问毛泽东："专列是向后转移，还是向前转移？"

向后是转到金华，向前是转到上海。汪东兴还建议，也可以转向绍兴，即转向杭州到宁波的一条支线上。

毛泽东同意转向绍兴，说："可以。那样就可以少走回头路了。"

汪东兴从毛泽东住地出来，马上就打电话找当时负责毛泽东在杭州警卫工作的空5军政委陈励耘。陈励耘的秘书接到电话后，马上跑到汪东兴的办公室来说："陈政委有事，您有什么事请跟我讲吧。"

汪东兴说："专列要转移，这个事对你讲，你能办成吗？"

秘书肯定地回答说："能。"

汪东兴："你可以试着办一下，不过还是要找到陈政委。"

紧接着，汪东兴又找到张耀祠说："赶快去找专列的同志讲清楚，火车马上开走。"

汪东兴还对张耀祠说："天气太热，专列转到新的地点后，给主车和餐车上面搭个防晒的棚子。"

张耀祠马上落实了。这些情况，汪东兴都报告了毛泽东。毛泽东同意这么办，并说这个办法好。

毛泽东的专列于9日凌晨转到靠近绍兴的一条专线上。

9月9日，正在杭州的毛泽东看了周恩来9月5日报来的林彪8月16日在北戴河讲话时谈到的关于当前战备工作的谈话记录。周恩来在送审报告中说，他和张春桥、黄永胜、纪登奎四人于8月16日到北戴河向林彪汇报工作时，林彪对战备工作谈了一些意见，经整理送

阅。如可用,拟以中央军委名义发给各大军区、省军区、各总部和军兵种讨论实施。毛泽东批示:“同意。”

10日中午吃过午饭,毛泽东突然将汪东兴叫去,说:“走啊!不要通知陈励耘他们了。”

汪东兴说:“主席,不通知他们不行。”

毛泽东问:“为什么呀?”

汪东兴说:“不通知不行,您不是一般人。来的时候,都通知了。走的时候,不通知不好,路上的安全,还是要靠地方。”

毛泽东说:“那就不让陈励耘上车来见,不要他送。”

汪东兴:“您看,是不是请南萍、陈励耘……”

刚说到这里,毛泽东打断他的话说:“还有一个,就是空5军的军长白宗善,这个人也请来。为什么这次没有请他见面?”

汪东兴回答说:“马上就通知他。”

汪东兴一面通知南萍他们过来,一面布置专列做开车的准备。13时40分,专列由绍兴开始返回。

14时30分,南萍等人来到毛泽东这里。当毛泽东同白宗善握手时问到:“你白宗善为什么不来看我!”

陈励耘连忙解释说:“他那天在值班。”

握过手,毛泽东首先谈起了“曹刿论战”的故事。他说:“齐国和鲁国打仗,我是帮齐国,还是帮鲁国呢?鲁国小,人少,但团结得好。齐国向鲁国进攻,鲁国利用矛盾,结果把齐国打败了。”

他接着说:“听汪东兴同志说,你们批陈整风搞了两次,搞得还可以嘛,还不错。汪东兴同你们谈了一次,座谈了一次,对庐山会议认识深了些,学《国际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你们办了。”

毛泽东再次谈到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路线斗争。他说:“红军30万,到陕北剩下25000人,当时中央苏区8万,只剩8千。那时张国焘搞分裂,不愿到陕北去。那时不到陕北没有出路嘛!这是政治路线问题。后来,对四方面军回来的同志斗得凶,检讨一次、两次、三次、四次都通不过,过分了。当时到我这里告状的都是四方面军的人,一方面军的一个也没有。四方面军就灰溜溜了,一方面军就翘尾巴了。”

他带着警示的口气说:“不要带了几个兵就翘尾巴,就不得了啦。

打掉一条军舰就翘尾巴,我不赞成,有什么了不起。三国关云长这个将军,既看不起孙权,也看不起诸葛亮。到后来走麦城失败。当然,那时没有反骄破满啦。我找黄永胜他们谈了话,东兴也参加了,当面批评了黄。黄永胜不会不摇鹅毛扇子吧!”

毛泽东对在座的人说:“要谦虚谨慎,不要翘尾巴,有错误不要紧,我们党内有这么个规矩,错了就检讨。这次汪东兴同志不是沾了个边嘛!”

汪东兴说:“我在庐山会议上犯了错误。”

毛泽东说,“庐山问题不那么好,但没有庐山会议,也不会有现在的情况。庐山这件事,还没有完,还不彻底,还没有总结。光开不到100人的会议不行,军队还可扩大到军长、政委参加,地方也要有相当这一级的同志参加。”

他进一步谈到庐山会议主要是两个问题:“一个是国家主席问题,一个是天才问题。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提出三个副词,当时兵荒马乱,那时还需要嘛。九大后就不同了,要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那几个副词我圈掉过几次了,九大党章草案上那三个副词,我就圈去了。九大党章已定了,你们为什么不翻开看看?”

毛泽东问:“你们谁参加过‘七战七捷’呀?”

陈励耘说:“我参加过。”

毛泽东说:“我看不见得吧!你那时当什么官呀?”

陈励耘回答说:“当过副主任、主任、副政委。”

毛泽东又谈到陈毅。他说:“陈毅打仗,有个好处,还能听听其他人的话。打孟良崮,他南边听粟裕的,北边听许世友的。”

“北京军区队伍多,有几个军,还有炮兵、工程兵,装甲兵也多。他们整这个军、那个军。陈伯达在华北几十天。周游华北,到处游说。我这次就是学他的办法,也是到处游说。我是党的主席、军委主席,我能不能到处游说?”

大家纷纷说:“毛主席到各地谈话,是造革命的舆论,是完全可以的。”

毛泽东说:“陈伯达搞的是反革命游说,我搞不同。”

他又提到浙江和南京军区的关系:“你们和南京的关系,我说了两

年,还没有解决。我这边也讲,那边也讲。给你们讲的都可以公开讲。少数人可以讲,多数人也可以讲。你们同许世友同志不要针锋相对。对他也说不服,对你们也说不服,这主要由我负责。”

他问南萍:“南京开会你们去不去?我同许世友同志在江西谈过,这次还要谈。”

南萍说:“我们没有听主席的话。今后按许司令的指示办。”

毛泽东:“那也不对。错了的也执行吗?许世友同志是可以交朋友的,有时还可抓住他的主要问题,把道理说清楚。他还是可以交朋友的。你们空军受不受许的指挥啊?”

南萍等人答复说:“受他的指挥,听的。”

毛泽东点点头。最后,他说:“把我的像到处挂,我已说过多少次了,不要这样了。万岁,英文翻译为 LongLive,是长寿的意思,对年青人可喊,对年纪大的就不要喊了。”

14 时 50 分,毛泽东的专列抵达杭州。

毛泽东同浙江省及军区负责人南萍、熊应堂、白宗善、陈励耘他们谈了半个多小时,却没有告诉他们,他马上要走。

谈完话,汪东兴请南萍他们到自己的房间里休息,然后回到毛泽东那里请示说:“到上海后车停在哪里?”

毛泽东回答:“停在上海郊外虹桥机场专用线,顾家花园就不进去了。”

汪东兴问:“上海那边要通知,是不是通知王洪文?”

毛泽东说:“是。这个电话由你们打。叫他通知许世友到上海来,我要见他。”

因为此时南萍他们正在汪东兴的房子里,汪东兴就在毛泽东那里给王洪文打了一个电话。同时告诉他,通知许世友到上海来,越快越好,“客人”要同他们谈话。

9 月 10 日这天,警卫团像往日一般,没有任何特其他的安排。上午,他们与驻地警卫营举行篮球友谊赛,天太热,上场球员个个像水洗一样,中午又吃的是热面条,犹如火上浇油,战士们刚换上的衣裤马上湿淋淋的了。午饭后,大家都洗了衣服。中午刚过,突然说马上就走,刚洗的衣服还在往下滴水,他们赶紧用雨衣把湿衣服包起来,全部带

走。马上登车,所带东西包括厨具都装上了车。

毛泽东从汪庄出发,陈励耘坐引导车走在最前面,车上有他的秘书王明寇,还有个警卫干事孙世臣。中央警卫团中队长陈长江和中央警卫团团长张耀祠乘一辆小车紧随其后。8341 部队的前卫车和后卫车的分队人员已提前行动,因为前卫车要提前几分钟开,控制车站进出口和登车地点,留下 30 多人随中队长陈长江跟专列一起行动。毛泽东乘一辆小轿车,由汪东兴陪着,他们前面是一辆面包车,坐着 8341 部队的警卫战士,杭州警备区一个警卫排跟在后面。

引导车引导车队进贵宾室旁边一号门,直接进月台,警卫处副处长王英杰将毛泽东的座车一直引到车厢门口。

毛泽东上专列时,没有通知任何人来送。陈励耘下了引导车,不敢接近毛泽东,更不敢走过去同毛泽东握手,只是远远的地站着。他跟汪东兴握手时问:“车开后,要不要打电话通知上海?”

汪东兴说:“你打电话给王洪文或者王维国,这两个人都可以,就说我们的车出发了,还是在那个支线上停住。”

16 时,毛泽东的专列开出杭州。

专列开出后,陈励耘打电话通知了王洪文。

9 月 10 日下午,上海铁路局打电话向上海负责保卫工作的空 4 军政委王维国报告毛泽东的专列已经到了浙江嘉兴,要到上海来。这时,南京军区空军副司令员周建平和空 4 军军长郑长华正在空 4 军开会,王维国接了上海铁路局的电话后进来告诉他们说:“毛主席从杭州到上海”,叫他们两个人留一个主持会议,另一个人和他去见毛泽东。

周建平让郑长华去,他主持继续开会。

9 月 10 日 18 时 10 分,毛泽东的专列到了上海,停在虹桥机场附近专门为专列修建的吴家花园支线上。这里的站台筑得比普通的站台要高一些,正好和停靠的车厢门口的踏步相平,这样,上了年纪的人登车就不太费力。

专列一到上海,汪东兴就把上海当地的警卫部队全撤到外围去了,在毛泽东的主车周围全换上中央警卫团的部队。在离专列 150 米远的地方是虹桥机场的一个油库,要是油库着火了,专列跑都跑不掉,所以,汪东兴特别派了两个哨兵在那里守卫。

专列到达上海,毛泽东没有下车。汪东兴下车去接王洪文和许世友,但只接到王洪文和王维国,许世友没到。汪东兴把王洪文、王维国引进车厢。

这是一辆用整节车厢改装而成的客厅。客厅里围放着一圈沙发,每个沙发旁边都安着小茶几,地上铺着地毯,车窗上挂着绉纱窗缦。客厅两壁的壁灯和车厢的顶灯,射出明亮而柔和的光线。

毛泽东坐在车厢顶端一头的沙发上,穿着白色的长睡袍,黑色的圆口布鞋,豆沙色的长袜,显得随便而有气度。

王洪文问候毛泽东最近身体可好。

毛泽东回答:“马马虎虎。”

王维国向毛泽东检讨,说自己在庐山犯了错误,没有听毛泽东关于不设国家主席的指示。

毛泽东看了王维国一眼,没有接茬,而是扭过头去对王洪文说:“看来他们要动手了。”

王洪文没有说话,王维国则大吃一惊。

毛泽东问王洪文:“东兴同志打电话给你,要你通知许世友到上海来,怎么没有见他来呀?”

王洪文说:“电话我打了,南京说他可能下乡了,正在设法与他联系。”

毛泽东与王洪文、王维国和汪东兴一起谈话,提到了军委办事组在九届二中全会庐山会议上的问题,说他们应该检讨,并说回北京后和他们“吹一吹”,即谈一谈的意思。谈到晚上20时左右,毛泽东说:“等许世友来了一起谈吧。”

王洪文请毛泽东下车到“414”招待所去住,毛泽东挥挥手,让王洪文、王维国先走,表示他自己不想下车,要休息了。

王洪文告辞出来也没有走。当天晚上,他就住在专列旁边的房子里。王洪文很热情,还请汪东兴也搬到车下来住,汪东兴谢绝了。

在此期间,周建平开完会,给空4军军长郑长华打电话,问需不需要他去。郑长华说:“王维国还在毛主席专列上,没有下来。”

王洪文连夜布置和检查警卫工作。毛泽东在上海专列的外部警卫工作,是由王维国负责。而此时的王维国则坐立不安,他给远在北

京的林立果打去电话,告知:“王维国因病住院了。”

随毛泽东南巡的8341部队就在车上吃的晚饭,并住在火车上。晚上21时左右,汪东兴把几个秘书、卫士找到一起,拿个小本子,一页一页地翻着,有选择地向他们传达毛泽东与上海领导人的谈话内容。要求他们严密部署列车周围的警戒,重点部位要加设双哨,干部要加强值班。根据汪东兴的要求,8341部队一下加了五、六个哨,还增设了一个由3人组成的巡逻哨,并让哨兵佩带了冲锋枪。

23时,周建平被郑长华叫到虹桥机场休息室,他看见郑长华正在抽烟。周建平问他有事吗?郑长华说:“毛主席明天要接见上海市和三军负责人,已经派飞机去接许世友了。”

# 第1183回：不见人，上海等候许世友 饭局间，专列已北上离沪

9月10日，政治局修改四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稿。当日晨4时，周恩来报送毛泽东，并报告说："在四届人大召开前有几件事要请主席批示，方好着手准备。一、国庆节前，是否需先开一次党的九届三中全会？二、陈伯达可否在三中全会宣布永远开除党籍？三、三中全会上可否补选几名中委（如姬鹏飞）？"报告还说，四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已写出初稿"，拟从11日起，由政治局确定几名成员以10天时间改好送审。

毛泽东批："都同意。还要补选常委。"

9月11日凌晨，华国锋接到通知，周恩来约他到国务院会议厅谈话。这次谈话，华国锋详细地向周恩来介绍了毛泽东谈话的过程，甚至包括谈话时的神态、情绪，记录是怎么整理的。周恩来自始至终神情严肃，静静地听，有时插话问问情况。两人没有议论。这次谈话用了近一个半小时，一直到清晨4时30分结束。

也是在11日凌晨，南京，许世友的秘书李文卿被一号电话的铃声惊醒，据他后来回忆，他当时看了下表，正好两点钟，总机接转的是上海王洪文打来的电话，说"有客人要见许司令，要他上午赶到，来得越快越好。"

不过，据汪东兴回忆，上海王洪文在10日晚20时前毛泽东询问他时，就已经告知：许世友"可能下乡了，正在设法与他联系。"而空4军军长在23时答复南京军区空军副司令员周建平的询问时说：郑长华说："已经派飞机去接许世友了。"

而李文卿是8月31日随许世友去的南昌。因为毛泽东在南昌与许世友、韩先楚等人的谈话记录稿要参加谈话的领导亲自抄写和保管，许世友便对汪东兴说：

"你还不知道我，字是认识不少，写字不行，要不你给我抄一份，要

不就让我的秘书抄。”

汪东兴同意,让许世友的秘书李文卿抄了一份毛泽东的谈话记录稿。抄好后,许世友一再嘱咐李文卿要保管好,要绝对保密,还说:

“泄漏出去杀头!”

11 日凌晨,李文卿听到上海的电话,猜到是毛泽东到上海了。他马上叫总机找许世友,但是总机说不知道许司令在哪里?

原来,许世友 9 月 2 日乘专机返回南京后,当天下午向军区和省的主要领导传达了毛泽东的谈话记录后,就去扬州地区视察了。李文卿认为,是这次跟许世友去扬州的秘书缺乏经验,没让通信部门给许世友的住地架电话,所以一时间无法找到许世友。后来有人说,许世友此时正在打猎,所以找不到他。

听说找不到许司令,李文卿头上顿时急出了汗:“到哪里去找许司令呢?”他急中生智,又给扬州市委书记陈敬义打电话,托他转告:“家里有急事,请许司令速回。”

9 月 11 日一大早,周建平就到机场安排专机去南京接许世友。但天气不好,飞机一直不能起飞。虽然空 4 军军长郑长华打电话通知说:“如果市委同志来了,请他们回去。”但是过一会儿,王洪文、徐景贤、王秀珍等上海市委领导还是来机场接许世友了。周建平对他们说:“天气不好,许司令可能不来了。”

上海没有派飞机来南京接许世友,南京的李文卿考虑,从南京坐汽车到上海要 7、8 个小时,再快也得下午才能赶到。乘火车呢? 不知许世友几点钟回南京,能不能赶上车次也是问题。时间紧迫,他赶紧找作战部派值班飞机。值班飞机是总部派给各大军区使用的苏式伊尔 -14 型,由空军负责养护和驾驶。

11 日上午 9 时 15 分,许世友回到南京中山陵八号,进门就问:“飞机到了没有?”

李文卿说没有飞机来接,是乘空军的值班飞机。

许世友一听就不高兴,说:“要汪东兴!”他亲自打电话要飞机来接,汪东兴告诉他说,飞机来不了。

许世友没有办法,只好乘空军的值班飞机去上海。他交代李文卿带好小型电话保密机,还有他的猎枪,随他一起去。

在乘车前往机场的路上,许世友责怪李文卿:“毛主席的谈话记录你也看到了,怎么还乘值班飞机?”

李文卿没说话,心里却反问:“你不是也没有要到专机吗?”

许世友不顾天气情况还是乘值班飞机降落在上海虹桥机场,汪东兴等人过来迎接。许世友一下飞机,汪东兴就接他坐车前往吴家花园火车站,汽车直接开进月台。

下了车,汪东兴招呼许世友和王洪文上专列,让许世友的秘书李文卿去车站会客室休息。

毛泽东的专列紧挨着车站会客室,车厢门口距离会客室门口不过10来米。李文卿手里提着电话保密机和许世友的猎枪,肩上挎着一个小旅行包,站在会客室门前,目送许世友、王洪文在汪东兴引导下走向车门。他看见一行人走了几步,汪东兴停下,对跟上来的王维国说:“你也去休息吧。”

王维国一下子站住了,过了几秒钟,转身朝着会客室晃悠过来。走进会客室,他往沙发上一躺,腿一跷,“哎”了一声。

车厢里,毛泽东见许世友他们进来,想起身迎接,一下没有站起。汪东兴就招呼许世友他们主动上前和毛泽东握手。

毛泽东没有寒暄,待他们坐下便问:“许世友,你下乡啦?去搞什么呀?调查什么问题呀?”

许世友说:“我去看农场,看大别山附近的军垦农场去了。”他没敢说打猎去了。

毛泽东问:“去那么远了呀?”

许世友说:“坐吉普车去的。”

毛泽东批评说:“怎么连家都不回呀?一天到晚,你这个司令员随便离开工作岗位,怎么行呀?向谁请了假呀?要是万一发生问题,你怎么样办呀?连南京军区都找不着你!将来这样的情况你要注意,告诉一下家里嘛。”

许世友说:“真对不起,我想主席还会在杭州住几天的,然后才能到我这里。我昨天夜里12点多才回到南京,先休息了一下,就没打电话到上海。”

其实他是在11日上午9时多才回到南京。接着,许世友大概是

为了打消毛泽东的疑心,赶紧汇报说:“今年农业可能会大丰收,军垦农场也不错,庄稼长势很好,丰收在望。”

毛泽东说:“那好嘛,你去看看农业也好嘛。”

许世友说:“军队的情绪很好,军队里比较稳定,乱哄哄的情况也过去了。我带着那些造反派游过苏北。”

毛泽东问:“是不是都是支持你的那一派?”

许世友说:“我把两派都带上了。”

毛泽东再次强调:“不能把领导机关搞乱了,更不能把军队搞乱了。我在江西就同你讲了,要‘高抬贵手’。”

许世友说:“不会,我正在做他们的工作。”

毛泽东说:“那好。”

王洪文埋怨许世友:“主席等你快等了15个小时了……”

毛泽东马上打断:“不要这样,不要紧嘛。这段时间我们也休息一下,我们还是谈正事。对庐山会议你们想得如何呀?是不是在思想上解决了问题呀?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呀?是不是能解决了呀?我认为犯点错误是不要紧的,有的属于认识问题,现在有的同志对有些问题还认识不到嘛,那就等待,耐心地等待嘛。认识一点就写出来,以便改正错误。犯了错误,也不认识,也不去想办法认识,在那里顶着,这个不好,可能不仅会使错误不能被认识出来,而且会加深的,甚至把错误当作包袱的。犯错误的包袱,常常是越背越重,这个不好。要把这个包袱甩掉,轻装上阵,那样人就会觉得舒服了。不然总是背着沉重的包袱,你不甩开,那怎么会好受呢?”

许世友说:“庐山会议的问题,按毛主席的指示办。”

毛泽东问:“我有什么指示呀?”

许世友答:“您的指示就是《我的一点意见》。”

毛泽东说:“那个不是在后头吗?是你们犯了错误后,我想了5天才写的。你们是什么时候讲的,是24、25、26日三天嘛。”

许世友坚定地说:“这个指示我拥护,我就是按您的意见办的。”

毛泽东说:“不见得吧,我那个《意见》你学了没有?我那个《意见》上说,什么叫唯心论,什么叫唯物论,你讲一讲,我听听!”

许世友哈哈笑起来。毛泽东说:“你不是说执行我的那个指示吗?

我要你们学习,你们又不动,人家要搞那个‘论天才’,找了几条称‘天才’的语录,你找到了吗?”

王洪文看许世友没再说什么,就开始汇报。他说:上海的五、六位中央委员和市革委会的主任、副主任,针对庐山会议出现的问题座谈了一次。

毛泽东问:“你们座谈了一些什么呀?”

王洪文说:“突出的是讨论了林副主席的讲话。当时我们心里就嘀咕。”

毛泽东问:“你们嘀咕什么呀?人家是副主席讲话呀。”

王洪文说:“他是副主席讲话,但当时我们都很少发言。”

毛泽东又问:“那你们不是也都听了吗?你不是也听了录音嘛!那时你们华东、上海就一个拥护的字都没有说呀?”

王洪文回答说:“有。那个时候不拥护也不好。这次我们座谈时,也讲了一些意见,但有的人在庐山会议上没有发挥。当时庐山会议上,就是安排要讨论的,我们华东组除了有些人抢着发言外,我们也发了言,我也讲了几句。事后,听说林副主席讲话是中央常委同意他讲的,特别是论‘天才’的语录也以为是中央搞的。”

毛泽东:“谁说这个论‘天才’的语录是中央搞的呀?当时我们发了语录没有呀?哪一个文件上说发了语录呀?哪一个文件上写有这几条语录呀?”

王洪文接着说:“《六号简报》,我们一看到就火了。”

毛泽东问:“你为什么一看到就火了呢?”

王洪文说:“《简报》里有一些话有问题。设国家主席问题,在北京讨论宪法时有争论,而且争论得很厉害。当时有人提议设国家主席,有人不同意设国家主席。不设国家主席的意见是毛主席的意见,可是他们不听,还要坚持他们设国家主席的意见。”

毛泽东继续问王洪文:“那你对《简报》的性质有什么看法?”

王洪文说:“这个《简报》是有错误的,是错误的《简报》。当时我们几个人到了主席那里谈过了。”

毛泽东说:“这个《简报》现在还没有做结论,这个结论将来由中央来做。我认为是反革命简报,起码如你讲的是有错误的简报。为什么

有错误的简报要在这个时候发呢？为什么有的同志发了言，登简报，又不先让本人看呢？”

他接着说：“听了你们的意见，《六号简报》是错误的，是有人捣鬼，有人在搞阴谋诡计，不搞光明正大；不搞团结，是搞分裂。我讲话一句顶一万句？在这个问题上，我看连一句也不顶。不是我的话一句顶一万句，是陈伯达的话一句顶一万句。”

毛泽东讲完这些后，对许世友、王洪文又讲了党的历史上历次路线斗争的情况。最后，他问许世友：“中央如果有人搞政变，你怎么办？”

“带兵北伐！”许世友毫不犹豫地大声回答。

11时多，毛泽东说：“吃中午饭啦！今天，我就不请你们在车上吃饭了。王洪文，你请许世友到锦江饭店去吃饭，喝几杯酒，你们都去，我在这里等候你们。”

许世友热情地说：“汪主任，你也去。”

汪东兴说：“我不去了。”

毛泽东对汪东兴说：“汪主任，你把他们送走以后，再回来一下。”

汪东兴送许世友、王洪文下车时，看到王维国满脸通红的站在车门口等着。

许世友本想去南京军区设在上海的延安饭店吃饭，王洪文说锦江饭店已经准备好了。这时，周建平和郑长华也在车站会客室，他们问：“我们去不去？”

王洪文说：“去吧去吧。”

于是，他们一起去了锦江饭店。

汪东兴送走许世友、王洪文、王维国等人后，马上回到车上去见毛泽东。毛泽东问：“他们走了没有？”

汪东兴说：“走了。”

毛泽东马上说：“我们走。你立即发前卫车。”

汪东兴说：“不通知他们了吧？”

毛泽东说：“不通知。谁都不通知。”

汪东兴通知前卫车立即出发。13时12分，专列车也走了。

再说王洪文他们到了锦江饭店，上海市革委会的马天水、徐景贤、

王少庸、王秀珍和驻沪三军负责人上海警备区司令员周纯麟、东海舰队副司令员兼海军37501部队政委高志荣已经等在那里。37501部队是1969年10月,东海舰队迁驻浙江省宁波市后在上海组建的海军部队代号。

锦江饭店南楼中条顶层的小宴厅里,摆开了一张大圆桌。王洪文特地把饭店经理叫来,关照菜肴要搞得丰盛一些。

饭还没有做好,许世友一个劲嚷饿,王洪文当着众人的面把他的秘书批了一顿。

12时30分,饭菜终于上桌。许世友善饮,大家轮流向他敬酒。

大约13时20分左右,王洪文忽然被叫出去接电话。他回来后,在许世友耳朵边悄悄地说:"主席走了,刚走。"

"哎呀!怎么走了?"许世友很惊讶地问。

王洪文对许世友说:"既然走了,我们还是吃饭吧。"

过了片刻,又有人叫王维国出去接电话。

许世友已经无心吃饭了,他呷了一口酒,大声说道:"结束吧,我还要赶回南京去呢!"

众人留许世友在上海住几天,许世友说什么也要回南京。王洪文、马天水、徐景贤他们送许世友到机场。下午15时许,许世友乘坐伊尔—14飞机赶回南京。王洪文也如释重负,他已几天几夜没合眼了。

16时15分,许世友回到中山陵八号寓所,一进门就要李文卿整理好他学习《国家与革命》的心得体会和江苏省抓"516"的情况报告,跟他一起去南京火车站。

18点35分,毛泽东的专列抵达南京站。专车一停,陈长江就看见许世友已在站台迎候了。他问陈长江:"主席下不下车?"

这时正是大家吃晚饭的时间,陈长江走进毛泽东的车厢,见他仍在聚精会神看文件。陈长江说:"主席,许司令员在下边,他说要来看一看你。"

毛泽东已经一天一夜没有睡觉了,还在那里看文件。他说:"上午见过了,也都谈了,不见了,请他回去休息吧。"

汪东兴从车上走下来,告诉许世友:"毛主席昨天晚上没睡,现在

休息了。毛主席还说,到这里就不下车了。”

许世友说:“好!”他接着问:“路上要不要我打电话?”

汪东兴:“不用了,我们打过了。”

许世友又问:“蚌埠停不停?”

汪东兴:“还没最后定。一般的情况,这个站是要停的,但主席没定。”

许世友将带来的材料,一份读书心得,一份抓“红”的报告,也就是江苏抓“516”的报告,请汪东兴转呈毛泽东。显见许世友记着南昌谈话时毛泽东对他的批评,表明自己知错即改的诚意,让毛泽东放心。

许世友没有走,一直等在那里。专列在南京站完成加煤加水和检修任务之后,仅用了 15 分钟,便又启动了。许世友站在那里,向列车挥手告别。

9 月 12 日整整一天,许世友待在中山陵 8 号,哪里也不去,交代秘书一定要听好电话,坚守岗位。他自己坐在屋里,不看文件,也不找人谈话,例行的散步也取消了,从早到晚一个人闭门沉思。傍晚时分,偌大一座宅院静得出奇。秘书想去看看许世友,见他房门紧闭,遂止步。窗外落霞消退,夜色降临……

# 第1184回：不停留，一路疾驰奔天津 丰台歇，布兵南口欲为何

毛泽东的专列从南京开出后，到蚌埠车站是9月11日21时45分，停车5分钟。

12日零时10分到徐州，停车10分钟。

到兖州时是2时45分，没有停车。

到济南时是清晨5时，停车50分钟。毛泽东准备在济南召见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得志，汪东兴打电话一问，杨得志下部队了。车一停，中央警卫团一中队中队长陈长江就下去迎接。得知杨司令员还在泰州检查工作，要五、六个小时以后才能赶回来，只来了一位副司令员，看有什么要办的事。此时毛泽东再也没有在上海等许世友的耐心了，说副司令就不见了，不久在北京开会时再见，请他们回去吧。这时往北京打电话安排下一站活动的张耀祠等人也已上了车，毛泽东交代立即发车。

专列跨过黄河，直奔天津。

7时40分，专列到德州，停车20分。

11时15分专列到天津西站，停车15分钟，加煤加水检修机车。

此时，毛泽东似乎不再着急，他让汪东兴打电话给中办值班室，要他们通知北京军区司令员李德生、北京军区第二政委纪登奎、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吴德、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吴忠到丰台车站等候。

正在家中吃午饭的吴忠忽然接到了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吴德打来的电话，要他马上到吴德的家里来，说有要事相商。

吴忠赶到吴德家时，见吴德已从屋里出来。他对吴忠说："我们马上走，具体情况车上谈。"

在飞奔的汽车上，吴德向吴忠介绍了情况："主席已从南方回来了。中办要我们马上到丰台去，主席要和我们谈话。"

毛泽东国庆节前到外地巡视，返京都是有规律的，他一般都是夜

间回京,而且很少停靠丰台车站。吴忠听完吴德的介绍,心中一怔,小心地问:

“主席怎么突然在白天回京,还停靠在丰台车站,是不是有什么重大情况发生?丰台车站的安全保卫工作怎么办?”

吴德说:“具体情况我也不清楚。中办值班室给我打的电话,是汪东兴同志要我们马上到丰台,而且只通知你和我两人去,谈什么,哪些人参加,都没有说。既然没有通知卫戍区布设警戒,肯定是中央另有安排。等到了丰台见到主席,一切都清楚了。”

当他们的汽车驶入丰台车站时,只见站台上空无一人。过了一会儿,北京军区政委纪登奎和司令员李德生也先后乘车赶到这里。

李德生也是9月12日中午在家里接到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张耀祠从天津打来的电话,要求他中午12时前到达丰台车站。他接到通知后,匆匆吃点东西,按时赶到丰台车站,看到中央警卫团已经在车站布置了警卫,纪登奎和北京市委书记吴德、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吴忠已先后来到。

13时10分,毛泽东的专列驶进丰台站,缓缓停在专用车道上。只见汪东兴走下专列,同大家打过招呼后,请他们4位一起上了毛泽东所在的车厢。

毛泽东端坐在车厢中央的沙发上,手中拿着一支香烟,见到4人后,面带微笑站起来与大家一一握手,然后示意几个人坐下。

大家就座后,毛泽东点燃烟卷,不紧不忙地问李德生:“你这次访问阿尔巴尼亚和罗马尼亚怎么样啊?”

李德生于1971年8月14日至9月3日,率中共中央代表团访问阿尔巴尼亚和罗马尼亚。9月3日回到北京后,马上又参加了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11日起,又参加修改四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的政治局会议。因为准备在国庆节前召开党的三中全会,国庆节后,召开四届人大,时间已经很紧迫,各项准备工作安排得都很紧张。

这时,李德生向毛泽东汇报说:“他们对中国还是很友好的,国内政治是稳定的,只是从市面上看,群众生活不是那么好。”

毛泽东又问:“你同他们谈尼克松将要访华,他们有什么反应?”

李德生如实说:“阿尔巴尼亚虽然没有直接说,但是他们讲了他们

自己对美国的态度,表示他们坚决反对美国帝国主义。从会谈中听得出来,他们对我们处理中美关系的政策,是有保留的。”

毛泽东笑着说:“他们是左派,我们是右派。他们是怕美国从亚洲撤走,会增加他们的压力,要我们把美国拖住。他们(指东欧诸国)只有两亿人口,经不起伤亡嘛,所以他们不要美国撤军。”毛泽东补充说:“撤军不一定就会增加他们的压力。”

大家也都笑起来,气氛一时显得轻松。

在大家的笑声中,毛泽东开始讲话,似乎是有所指,又似乎是漫无目的。他说:“我们的方针是路线决定一切。人多,枪多,代替不了正确的路线。党的路线正确就有一切,路线不正确,有了人和枪也可能丢掉。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什么是纲?你们会打鱼吗?纲就是串鱼网的那根绳子,目就是鱼网上面的一个个眼,你们讲的那个目,三天也讲不完。我今天是讲纲。”

毛泽东又讲了中国共产党在50年历史中的10次路线斗争。他说:“我们党50的经验,中国人不喜欢分裂,我们党内10次路线斗争,没有一次把党给分裂了。”

4个人都在认真倾听,认真记录。

毛泽东说:“再就是去年庐山会议搞突然袭击,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他们先搞隐瞒,后搞突然袭击,5个常委瞒着3个,一点气都不透,来了个突然袭击,出简报煽风点火。这样搞总是有个目的嘛!彭德怀搞我还要下道战书,他们连彭德怀都不如,可见这些人的风格之低!”

毛泽东又说:“庐山会议的《六号简报》是反革命简报。”吴德一听,神色紧张,赶紧检讨说:“主席,我还在《六号简报》印发前签了名字。《六号简报》是反革命简报,我犯了政治错误。”

毛泽东挥着手说:“没你的事,吴德有德。”

“庐山会议,他们搞突然袭击,我说过,是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

毛泽东继续说:“我那个文章,找了一些人谈话,作了一点调查研究,是第五天才写的。天才问题是个理论问题,他们搞唯心论。我并不是不要说天才,天才就是比较聪明一点,天才不是靠一个人靠几个

人,天才是靠一个党,党是无产阶级先锋队。天才是靠群众路线,集体智慧。

我同林彪谈过,你说欧洲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现一个天才,这不符合事实嘛!马克思、恩格斯是同时代的人,到列宁、斯大林一百年都不到,怎么能说几百年才出一个呢?中国有陈胜、吴广、有洪秀全、孙中山,怎么能说几千年才出一个呢?什么'顶峰'啦,'一句话顶一万句'啦,你说过头了嘛!一句就是一句,怎么能顶一万句。不设国家主席,我不当国家主席,我讲了六次,一次就算讲了一句吧,就是六万句,他们都不听嘛,半句也不顶,等于零。

我们的干部,大多数是好的。犯了错误要批评,做好了工作要表扬,但不能捧。二十几岁的人捧为"超天才",这没有什么好处。犯错误的人,允许改正错误。但发声明是容易的,无非是讲在口上、写在纸上,问题在于是不是实践他的声明,改正错误。这些人最没有勇气,收场那么快。刘建勋同志说搞了一天半,我说是三天。为什么那股妖风,只刮三天就不刮了,你有理为什么收回?说明他们空虚。我是哪里有石头抓起来就打,在庐山陈伯达搞的那个骗了不少人的材料,是一块石头,济南军区三破三立的报告也是一块石头,38 军的报告是一块大石头。以后又有刘子厚的检讨,还有军委开了那么长的会根本不批陈,我加了批语,这也是甩石头。"

谈到这里,毛泽东对李德生说:"他们在庐山搞的那个材料,你向他们要,一连说三次:'你的那个宝贝为什么不给我?'看他们怎么说。

进城以后,我很少抓军队工作,管军队工作的,开始是聂荣臻,以后是彭德怀,再以后就是林彪,实际是贺龙、罗瑞卿管得多。三任参谋总长罗瑞卿不大听他的。以后是杨成武、黄永胜。

我看黄永胜这个人政治不怎么强,是有头无脑。他检讨最没有勇气,怕得要死。要把脑子里的东西向人家讲出来。把正确的、错误的都讲出来,就舒服了。"

毛泽东又说到汪东兴的检讨:"他沾了一点边,在 1000 多人的会议上作了几次检讨。"

汪东兴汪说:"正式地做检讨是 3 次。"

毛泽东:"只有 7000 兵,连婆娘、娃娃都算上,他也没有倒呀,你把

心里话说出来,倒不了的。当然也有少数人幸灾乐祸,说这次汪东兴下不了台了,但是多数人还是说他检讨得好。五个人在批陈整风汇报会上的检讨,承认在政治上是方向、路线错误,组织上是宗派主义的。但是,他们的检讨里面是吞吞吐吐,因而使人怀疑他们能否改好。

土太板结了就不透气,要掺沙子才行。李先念同志过去也是搞军队打仗的嘛,可参加军委办事组,以后还要从各大军区调一些人来参加军委办事组的工作。北京军区也要从各军调一些人,把那个山头主义的窝子捣烂。华北会议派了李德生、纪登奎同志到北京军区,这叫挖墙脚。我的办法就是打石头、掺沙子、挖墙脚。”

毛泽东问:“陈伯达算不算一次路线?”

纪登奎回答说:“算!”

毛泽东侃侃而谈,吴忠在旁越听越紧张。他不由地脱口而出:“主席,我们党内可能有坏人吧?”

毛泽东转头面对吴忠,凝视片刻,方点点头,满意地说:“讲得好,吴忠有忠!”

毛泽东吸口烟,又强调说:“你讲得对!庐山的事情还没有完,还要看一看。黑手不止陈伯达一个,还有黑手。我一向不赞成自己的老婆当自己的秘书、办公室主任。你们是不是夫人专政啊?林彪要给我打电话、写信,说是被他身边的人阻止了。要报告了,他们就搞不成了嘛!

我们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不要搞宗派主义、山头主义;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

我不相信解放军会跟着你黄永胜走!什么总参谋长?打起仗来,我就是参谋总长。解放军跟你黄永胜走,我就到井冈山找红军去!”

毛泽东最后说:“要抓路线教育,方针还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这次谈话,连同毛泽东在武汉、长沙、南昌、杭州等地的多次谈话记录,后来经过整理,经中央政治局1972年3月15日讨论修改,毛泽东批示“同意”后,于1972年3月17日发至全党,向全党、全军、全国人民作了传达。

有些话,当时没有引用。比如,在谈到林彪是上了党章的“接班

人”时,毛泽东8月16日在武汉,同刘丰、刘建勋等谈话,9月10日在杭州同南萍、熊应堂、陈励耘等谈话,都曾谈到关于培养接班人的问题。毛泽东说:“我们都是60岁以上的人了,要培养60岁以下30岁以上的人,像张春桥、姚文元、李德生、纪登奎同志等。”“要培养年轻人到中央,如李德生、纪登奎、华国锋那样的,光是老将不行。”毛泽东还几次提到张春桥,称赞他和姚文元。

吴德想起谢富治生前曾经悄悄地告诉他:“毛主席要在国庆节之前召开党的九届三中全会,全会上将补选张春桥等人进常委和当副主席。”所以,吴德对毛泽东在火车上说的那些话,是心中有数的。

毛泽东的谈话到下午15点多钟方告结束。谈话结束后,毛泽东站起来说:“不能留你们吃饭了。”然后和他们一一握手,示意李德生留下。毛泽东直到大家走出车厢后他才坐下。他单独交代李德生,调38军一个师到南口待命。

南口在北京西北,再往前就是八达岭了,这是非常重要的战略要地,向北就是张家口,既可防苏联入境,也可以平定北京城里的动乱。

李德生立即会同纪登奎,驱车直奔西山北京军区机关驻地。

这一天是星期日,李德生让作战值班室立即通知军区陈先瑞政委等几位主要领导到作战值班室来,大家一起研究部署调动38军1个师进京的紧急任务。

离开北京军区后,李德生又赶到人民大会堂,参加早已确定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

# 第1185回：无声息，毛泽东悄然回京 北戴河，电话震惊周恩来

9月12日15时36分，李德生等人走后，毛泽东的专列由丰台站开出，16时5分到北京站。毛泽东下火车后坐汽车回到了中南海。过去，毛泽东从来没有白天到北京站下车的，这次是个例外。从杭州动身到这时，他已经3天没有休息好。到了中南海，汪东兴对毛泽东说："您睡吧。"

毛泽东也对他说："你也睡一睡吧。"

汪东兴答道："我也回去睡一睡。"

9月11日晚20时，周恩来召集中央政治局会议，传达毛泽东的指示：在召开四届全国人大之前，先召开九届三中全会。全会要补选中央委员，如姬鹏飞等。还要补选一名中央政治局常委，因为陈伯达倒台了。开完政治局会议，已经是9月12日凌晨1时左右了，然后他又一直工作到上午11时才休息。

12日17时，周恩来起床。他今天休息的很好，睡够了6小时，所以特别精神。一直等候在这里的中央警卫局副局长、中央警卫团政委杨德中跟着周恩来进了卫生间，向他报告："毛主席回来了。"

周恩来感到很突然，问到："怎么这么快就到了丰台？"

杨德中说："除了加水，一路上基本没停。"

周恩来又问："专列什么时候进的北京？"

杨德中说："还不清楚。"

汪东兴离开游泳池后，即打电话给周恩来。已经起床的周恩来颇感诧异的问："你们怎么不声不响地就回来了，连我都不知道。路上怎么没有停？原来的计划不是这样的呀？"

汪东兴回答说："计划改了。有些情况见面再向您汇报。"

江青也不知道毛泽东已经回到了北京。9月8日，叶群从北戴河给江青打电话说："林彪同志向您致以热情的问候，他说很关心您的

身体。”

江青回答道:“谢谢林副主席,祝林副主席身体健康。”

叶群又说:“林彪同志让专人给江青同志送去几个最好的西瓜,请江青同志保重身体。”

江青说:“请林副主席放心。”

12 日这天下午,江青特意带上林彪送给她的 4 个大西瓜到颐和园游玩。颐和园的领导和工作人员见江青去了,立刻热情地围拢过来。这时,江青激动的提高嗓音对大家说:

“你们看,这几个大西瓜,是林副主席送给我的,我再送给同志们,这是林副主席对我们的关心,让我们大家一起感谢林副主席!”

12 日晚,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主持研究修改四届人大的《政府工作报告》草稿,到会的有部分政治局委员和国务院的相关部长。会议 20 时开始,进行到 22 时 20 分左右时,一名工作人员推门进来,走到周恩来身边悄声说:“张耀祠来电话,有紧急情况要直接报告总理。”

周恩来压低声音问:“一定要我去?”

工作人员点点头。本来福建厅有电话,但电话没有加密。周恩来站起身,做了一个表示歉意的手势,然后走出门,来到新疆厅,拿起红色的电话机话筒,里面传来了张耀祠的声音:

“总理,刚才接到张宏从北戴河打来的电话,说林立衡来部队报告,叶群、林立果要挟持林副主席出逃,先去广州,再去香港。”

张宏是中央办公厅警卫局副局长兼中央警卫团副团长,此时正在北戴河负责林彪的警卫工作。

“什么? 叶群、林立果要带林彪逃跑? 是不是又闹什么矛盾了?”

周恩来听到张耀祠的报告大吃一惊! 据他所知,林彪这两天有动身去大连的打算,为此他还特意带话过去,让林彪好好休息,在国庆节前返回北京。另外,周恩来对叶群和林立衡母女之间的紧张关系早有耳闻,而且,林立衡的报告也让人觉得太危言耸听了,一个兵权在握、堂堂的副统帅怎么可能被自己的老婆和儿子所“劫持”呢?

但是,作为党的副主席,党章指定的毛泽东接班人,如果林彪真的被“劫持”,那可是一件关系到党和国家安危的大事,如果不及时采取

措施,稍有延宕,将会酿成难以估量的灾难。可是,如果判断有误,匆忙采取措施,其后果同样非常严重……

这恐怕是一生经历过无数次政治风浪的周恩来,碰到的最为棘手的政治事件之一。他的思维在高速地运转……他让汪东兴听电话。

汪东兴从张耀祠手中接过电话后,周恩来在电话中问他:“情况可靠吗?”

“可靠。”汪东兴回答。

“他们要去什么地方?部队同志怎么看?”周恩来继续问。

“还弄不清是真是假。”汪东兴说。

“请告诉张宏同志,派人密切注意动向,及时报告,不要鲁莽行动。”周恩来指示说。

“张耀祠在什么地方?”随即,周恩来又问。

“在中南海游泳池。”是张耀祠回答。

周恩来此话的用意是了解毛泽东在哪里。因为张耀祠是分管毛泽东的警卫工作,他总是在毛泽东身边。

汪东兴放下周恩来的电话后,立即给北戴河张宏打回电话,将周恩来的原话转告:“密切注意,不要鲁莽行动。”

这时,站在张宏旁边的中央警卫团二大队大队长姜作寿赶紧请示说:“一旦发生意外情况怎么办?”

汪东兴在电话中说:“你们请示怎么办?我下不了决心,周总理也下不了决心,只能说让你们监视,了解情况,及时报告。情况复杂啊!复杂得很啊!”

过一会儿,张宏又来电话向汪东兴报告说:“林立衡还报告,她听接林立果的汽车司机讲,林立果是乘三叉戟专机从北京来的,这架专机现在就停在山海关机场。”

汪东兴立即将这一情况报告了周恩来。

周恩来让汪东兴不要离开电话机,随时掌握北戴河那边的情况。

汪东兴回答说:“不会离开,我就在电话机旁边等着。”

周恩来放下电话,回到福建厅,对与会者宣布:“今天的会议到此结束,政治局成员留下,其他的人可以回去。”

随后,他来到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北边的一间小房子里,开始全力

以赴处理北戴河的突发情况。他首先打电话找空军司令吴法宪了解飞机的情况。

此时,吴法宪和空军政委王辉球正在和空军文工团的6个指导员谈话,解决那里派性问题。这6个指导员是刚从部队调来的。谈话刚刚结束,红机子就响了。

吴法宪拿起电话,周恩来问:“空军有一架三叉戟飞机到了山海关机场是怎么回事?今天调飞机去山海关机场没有?”

吴法宪回答说:“没有。”

“究竟是没有,还是不知道?”细心的周恩来进一步追问。

“我不知道。”吴法宪支支吾吾。

“还是要查一查。查清楚后,立即向我报告。”周恩来说。

“好。”吴法宪立即回答。

放下电话,吴法宪马上给专机师师长时念堂打电话询问。

时念堂刚刚从阿尔巴尼亚执行专机任务飞行回来。他送中央歌舞团到阿尔巴尼亚访问演出,9月9日回到北京,9月10日休息,9月11日飞行后讲评。9月12日晚,正准备到他正在蹲点的沙河机场去,空军总医院的医生来了。送走医生已经快熄灯了,时念堂决定明天再去沙河机场,他就睡了。此时,正在熟睡的时念堂被电话铃惊醒,拿起电话,里面传来吴法宪的询问声:“总理问三叉戟怎么到山海关了?”

时念堂莫名其妙,心里也突然一沉:“周总理怎么亲自过问起专机的事情来了?”

他想起专机师曹副师长曾向他提过,专机师准备执行林彪回北京过国庆节的任务。但据时念堂所知,并没有具体派遣林彪专机的行动。他是主管专机的,如此重要的专机活动,他却一点也不知道。当然,也可能是他刚从国外回来,还没接师里的工作吧。于是,时念堂如实地回答吴法宪说:“报告司令员,我不知道这件事。”

“你们机场的专机,你怎么不知道?飞机都飞走了!”吴法宪急了。

时念堂说:“我不能向司令员说假话,三叉戟的事我确实一点也不知道。”

“啪”,吴法宪没再说什么,挂断了电话。

对于吴法宪的突然发问,时念堂也没多想,以为只是关心中央首

长的飞行安全。他还是准备继续睡觉。谁知,只隔了几分钟,吴法宪第二次电话又来了:“三叉戟究竟是怎么飞到山海关的?”

这一回是质问的口气,相当严肃。时念堂还是如实说不知道,但他感到问题有些严重,补充了一句:“是不是胡副参谋长知道?”

吴法宪气哼哼地说:“那好吧,我找他。”

胡副参谋长就是胡萍,1939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2 年,从哈尔滨一航校第二期干部飞行班毕业,是为数极少的驾驶运输机成功的老干部之一,也是新中国专机的首飞者。1952 年 5 月,由他组建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运输独立第三团,这是新中国第一支专机部队,他是第一任团长。后来独 3 团改成专机师,即 34 师后,他又是第一任师长,1955 年授衔大校。

空军 34 师是空军司令部直属的一支飞行部队,也是空军最庞大的一个飞行师。它在北京有 3 个机场:西郊机场、沙河机场和南苑机场。有 5 个飞行团:100 团、101 团、102 团、203 团,并兼管海军第二独立团,三个场站,一个修理厂,共 9 个团的建制。

34 师和空军 12 师是中国空军两支运输机师,所不同的是两师肩负的任务完全不同。12 师负责空降、空运,以货机为主。34 师则是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专机师,以客机为主。

34 师的 5 个飞行团,以装备的飞机不同区分:

100 团拥有全师最大的飞机:“伊尔——18”、“安——12”、“杜——124”、“子爵”、“三叉戟”;

101 团则襄括了全师最土的飞机:双翼的“运五”、头高尾低的“里二”;

102 团是使用频率最高的一个团,拥有“伊尔——14”、“安——24”、“安——26”三个机型,属中型运输机;

203 团是直升机团,拥有三个大队的“直五”、“云雀”直升飞机;

海二团是为海军司令部服务的专机团,最好的飞机不过是一架“伊尔——14”。

100 团在西郊机场,101 团、203 团、海二团在沙河机场,102 团在南苑机场。

胡萍从事专机飞行 20 多年,圆满完成刘少奇、周恩来等党和国家

领导人访问亚洲、欧洲和非洲的任务。1955 年万隆会议,新中国还没有专机,他作为机长在印度飞机上为周恩来保驾。1957 年,他作为毛泽东专机的机长,突遇雷雨,与地面失去联络 40 多分钟,在塔台的空军司令员刘亚楼急得团团转。由于胡萍临危不乱,处置得当,化险为夷。

胡萍在 34 师有极高的威望。在 34 师,所有的普通战士都可以纠正老是爱背着手、猫着腰走路的胡萍师长的军姿;在全师的任何有普通官兵参加的大会上,胡萍师长都会双手抱拳向大家问好。相反,在师团级的干部会上,他又严厉的像一个凶神恶鬼。34 师工程部有一名副部长平日嗓子眼里总像堵着口吐不出来的痰,咳起来没完没了。但是,只要胡萍在场,让他咳他都咳不出来。

胡萍升任空军副参谋长后,仍兼 34 师党委书记。此时,他正患左肾结核,在空军总医院住院做切片检查。但是,吴法宪的电话却是在西郊机场候机室找到的胡萍。22 时 30 分,正在西郊机场候机室的胡萍突然接到吴法宪的电话:

“今晚到山海关去的飞机是怎么回事?总理查问了,事情闹大了,你们怎么搞的!你知道不知道?”

胡萍赶紧解释说:“你不是说过要改装一架三叉戟给林副主席用嘛。这架三叉戟刚改装出来,要试飞一下。”

当时,中国从巴基斯坦买回 4 架二手三叉戟,作为中央领导的专机。本来林彪专机是 254 号三叉戟,这是巴基斯坦总统座机。但因为飞行时机头被小鸟撞过,有一个小坑,不适合再作一号专机,于是决定改装 256 号三叉戟作为林彪专机。

4 架三叉戟进口时已经在巴基斯坦飞过好几年,一些机件老化,必要的备件买不到,只能拆东墙补西墙,原则上把 4 架三叉戟上最好的零件换给 256 三叉戟。西郊机场修理厂和林彪专机的机械师一起,开始大规模改装。除把普通客舱拆掉,隔出单间,设置卧室、办公室外,还按林彪怕风、怕光和喜欢绿颜色的习惯,精心布置机舱,整整改装了 3 个月,至 7 月份刚改装完毕。

8 月,专机师副政委潘景寅开始试飞 256 号三叉戟,去过山海关,也飞过较远的航线。但他始终对自己的落地动作不满意。9 月 6 日,

256 号三叉戟交付使用。9 月 11 日,潘景寅再飞东北航线,经沈阳二台子机场,再到长春,接回在长春解放军医院治疗小儿麻痹的大女儿。有人看潘景寅情绪不好,询问他。潘景寅说:“飞机落地还是不理想。”

这次飞往山海关的就是这架 256 号。

此时的吴法宪在电话里还是不依不饶,继续追问胡萍:“试飞为什么飞山海关,不飞别的机场? 事先也没有报告,捅了大乱子了! 现在总理追查这架飞机是怎么调去的。”

胡萍说:“是训练吧。”

为了保密,专机以训练的名义派出,这在专机师是经常的事。

吴法宪还是追问:“训练为什么不回来?”

“那——那怎么办呢?” 胡萍问。

吴法宪考虑了一下,回答说:“你待命,我要请示总理。”

胡萍放下吴法宪的电话后,立即用保密机给正在山海关的 256 号三叉戟驾驶员、专机师副政委潘景寅打电话,把吴法宪与他通话的情况告诉了潘景寅,并对潘景寅说:“吴法宪打电话给你,你就说三叉戟飞机到山海关机场去是你们自己安排训练的,我并不知道这个事,如果他再问你训练为什么现在还不回来,你就说飞机有毛病,所以还没有回来。”

接着他又从候机室回到自己的办公室,给空军司令部党委办公室副主任周宇驰打电话说:“吴法宪来电话说,总理正在追查去山海关的飞机,事情闹大了,看来事情麻烦了。你赶快给林立果通个气。”

周宇驰问:“是什么时候的事?”

胡萍说:“刚才一会儿。”

随后,胡萍又回到候机室,将正在这里值班的专机师服务队副队长孙福荣等几个人叫到一起说:“如果吴司令查问三叉戟 256 号去山海关机场是谁安排的,你们就说是潘景寅安排的。对其他几架飞机的事,只字不要提,你们要保守秘密。”

再说时念堂放下吴法宪的电话后,也通过总机在西郊机场候机室找到了胡萍,对他说:“吴司令来电话说,周总理问三叉戟飞机怎么到山海关的?”

胡萍没有正面回答,只是说:“如果再有人问,你就说是训练

飞行。”

22 时 33 分,吴法宪与胡萍通完电话,立即给周恩来打回电话,报告了他和胡萍通话的情况:“是有一架三叉戟飞到了山海关,是改装后训练飞行。”

吴法宪还说,他要胡萍立即把飞机调回北京。周恩来表示同意,并指示:“你通知这架飞机回来时不准带任何人。”

22 时 36 分,吴法宪又马上给胡萍打去电话,头一句话就问:“你在哪打电话?”

胡萍回答:“我在候机室打电话。”

吴法宪传达周恩来的指示:“这架飞机立即回北京,飞机上不准带任向人。”

胡萍答应说:“好的,我马上打电话叫飞机回来。”

胡萍放下吴法宪的电话,立即打电话给潘景寅,告诉他:“如果吴法宪再追问你飞机到底有什么毛病时,你就说发动机有点故障。”

然后,胡萍马上给吴法宪回电话说:“飞机有故障,回不来。”

吴法宪立即报告周恩来:“胡萍说,这架飞机有故障,不能立即回来。”

“有故障? 不能立即回来?”周恩来又以严肃的口气责令吴法宪:“飞机就停在那里不准动,修好后马上回来。”

吴法宪又立即向胡萍转告了周恩来的这一指示。

周恩来又给汪东兴打电话,让他立即转告北戴河的张宏查一下,山海关是不是有一架专机,如果有什么新情况,马上向他报告。

北戴河张宏很快答复汪东兴说,他已问过山海关机场,确实有一架专机,专机的机组人员正在休息。这个机场归海军管理。

听说山海关机场归海军管理,周恩来又给海军政委李作鹏打电话。

李作鹏接过秘书手中的电话,习惯性地看了一眼手表:23 时整。

这时,话筒里传出周恩来的声音:“是作鹏吗?”

李作鹏赶紧回答:“是,总理。”

周恩来说:“你查问一下山海关机场,今天下午是否有一架空军飞机飞到那里去了,查的结果告诉我。”

李作鹏回答说:“好的。”

放下周恩来的电话,李作鹏打电话给山海关机场,时间是23时05分。

李作鹏问:“你是谁?”

对方回答:“我叫李万香,是场站航行调度室值班主任。”

李作鹏继续问:“是否今天下午有一架空军飞机到达山海关机场?”

李万香回答:“是的,有一架空军三叉戟飞机。”

李作鹏:“什么时间落地的?”

答:“20时15分。”

“飞机走了没有?”

“没有走。”

李作鹏说:“好了,就问这件事。”

他放下电话,立即要军委一号台总机接通周恩来办公室的电话。电话转到了中南海西花厅周恩来秘书的值班室,是周恩来的秘书纪东接的。李作鹏说:“请报告总理,是有一架空军三叉戟飞机在山海关机场。”

此时大约是23时10分左右。

纪东立即通过39局电话总机找跟随周恩来去大会堂的卫士张树迎,结果接电话的却是周恩来,他问纪东:“什么事?”

纪东报告说:“刚才李作鹏同志来电话,说是有一架256号三叉戟飞机在山海关机场。”

“知道了。”周恩来只说了三个字,便放下了电话。

# 第1186回：查飞机，总理坐镇大会堂 电话惊，莲花峰一片混乱

北戴河联峰山莲花峰96楼，林彪住地。9月12日晚上22时30分，林彪的内勤张恒昌、陈占照正准备安排林彪休息，叶群来到林彪客厅，同林彪说话。于是陈占照先去吃夜餐，回来后再换张恒昌去吃夜餐，准备吃完夜餐后安排林彪休息。

北戴河林彪96号别墅

叶群从林彪客厅出来。林彪打铃找内勤，陈占照进到林彪的客厅，林彪让他去叫张恒昌。此时，张恒昌正在餐厅吃夜餐。他接到电话后，赶紧来到林彪客厅。林彪让他通知叶群：

“空军疗养院的两个护士不带了，让人把他们送回去。”

张恒昌去找叶群。林彪又对内勤陈占照说：

“马上去大连，有些东西可以不带，够用就行了。到大连住一个星期就回来，回北京过国庆节。”

再说张恒昌来到叶群住处，看见门外地上放着几个皮包，空军司

令部办公室副处长刘沛丰守在门口。他拦住张恒昌,说叶群和林立果正在屋子里说话。

张恒昌把林彪的话写在纸条上,让刘沛丰转告,然后回到内勤值班室。陈占照对他说:“首长马上要走,赶快收拾东西。”并让张恒昌去报告林立衡。

这天晚上,莲花峰96号楼过厅里放电影,是为了庆祝林立衡订婚。但是张恒昌在96楼过厅没有找到林立衡。从1185回我们知道,此时林立衡应该正和张宏在一起,报告叶群、林立果要挟持林彪出逃。

23时不到,林立衡从外面回到96楼过厅,坐在原来的座位上,对旁边的未婚夫张清林说,她去8341部队向中央警卫团副团长张宏等人报告了情况……

张清林对林立衡说,她走后,叶群和林立果几次在放电影的走廊里穿来穿去。林立果以送礼物为名,几次到张清林这里,打听林立衡到哪里去了。张清林按照他们预先约定的说法,回答说:“找钢笔去了。”“拿夜餐去了。”

二人正说着,叶群的内勤小王来找林立衡,对她说:“主任要你马上去。”

林立衡对张清林说:“你还是不要动,稳住他们。要是我出不来了,你就和杨森跑到部队去报告。”

杨森是空军政治部保卫部专做林立衡警卫工作的副处长。

林立衡走进叶群的房间,看见她正在整理卡片,刘沛丰坐在叶群旁边。

林立衡叫了叶群几声,她才抬起头来,冷冷地说:“明天早上带你们到大连去,首长在飞机上还要看看地形。你告诉张宁、张清林,收拾一下。”

林立衡问:“明天早上几点走?”

叶群高声地说:“你还管那么多!我也不知道几点走!你们早点睡觉,明天我派人来叫你们。你走吧!”

林立衡回到放电影的过厅,将叶群的话告诉张清林和林立果的女朋友张宁,让他们准备。

张宁问林立衡:“林立果送给我的大蛋糕带不带?”

林立衡说:“随你自己吧!”

叶群在林立衡出去后,又给邱会作的妻子胡敏打电话,说到林立衡的婚事,胡敏则说自己出生不久的孙女。叶群夸胡敏给自己孙女的名字起得好。

叶群放下胡敏电话15分钟左右,北京的周恩来与北戴河的叶群通了电话。据后来李德生回忆这段通话情况:

晚上11时半左右,周总理直接打电话给叶群,查问山海关机场那架专机的事。

周总理问叶群知不知道北戴河有一架专机。

一开始叶群撒谎,说她不知道。后来叶群又说:有,是我儿子坐过来的,林副主席说,如果明天天气好,想到天上转一下。

叶群的答话,更加引起了周总理的警觉。

周恩来又问叶群:是不是还准备到别的地方去?

叶群说:原来想到大连去。

周总理说:晚上飞行不安全。

叶群说:晚上不飞,等明天早上或上午天气好了再飞。

周总理说:一定要把气象情况掌握好。如果需要的话,我去北戴河看看林彪同志。

叶群一听周总理要去北戴河,更慌了。她怕周总理一来,林彪南逃广州,另立中央的计划破产。叶群再三劝周总理不要去北戴河。

而在叶群与周恩来通电话之前,叶群的电话始终占线,没有放下。因为叶群与胡敏通话后,又打电话找黄永胜。而此时黄永胜恰在人民大会堂参加周恩来召集的修改四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会议,因周恩来宣布休会,政治局委员留下,黄永胜就在那里边打扑克边等待。所以,叶群的电话打到黄永胜的办公室和他家里,都找不到人。就在这时,总机告诉叶群:“总理找叶主任。”

“接过来吧。”叶群说。

当听筒里传出叶群的声音,周恩来关心地问到:“林副主席好不好呀?”

叶群说:“林副主席很好。”

周恩来又问:“北戴河有一架专机,你知道吗?”

叶群脱口而出:“不知道。”

稍微顿了一下后,她又改口说:“有,有一架专机,是我儿子坐着来的。是他父亲说,如果明天天气好的话,他要上天转一转。”

周恩来又问叶群:“是不是要去别的地方?”

叶群回答说:“原来想去大连,这里的天气有些冷了。”

周恩来说:“晚上飞行不安全。”

叶群说:“我们晚上不飞,等明天早上或上午天气好了再飞。”

周恩来又说:“别飞了,不安全。一定要把气象情况掌握好。需要的话,我去北戴河看一看林彪同志。”

一听周恩来要来北戴河,叶群忙说:“你到北戴河来,林彪就紧张,林彪会更不安。总之,总理不要来。”

而时任中央警卫局副局长、中央警卫团团长张耀祠后来对这段通话的回忆是这样的:

当晚23点30分,叶群为了掩盖逃跑企图,给周恩来总理打了个电话,她说:

“林彪今天晚上想动一动。”

总理问:“是空中,还是地上?”

叶群说:“是空中。”

总理问:“有飞机吗?”

叶群含含糊糊地说:“没有,报告总理后再调。”

平时林彪用飞机,从不向总理报告,这一次报告总理,显然是为了遮掩林彪逃跑的阴谋企图。

总理讲道:“晚上飞行怕不安全吧!”

叶群说:“不要紧,林彪想看看夜景。”

周恩来贴身卫士高振普的回忆也是这样:

(晚)11时20分,叶群与总理通电话说:“首长(指林彪)想动一动。”

“是天上动,还是地上动?”总理仍沿用他多年的习惯。凡关系到领导人的重要活动,他都用对方可理解的语言讲话。这是他多年养成的保密习惯。

“是天上动。”叶群答。

“你那里有飞机吗?”

“没有。”

叶群放下周恩来的电话后,又给吴法宪打去电话说:“林总要到大连去,让胡萍来一下,如果你能来也好。”

吴法宪说:“胡萍正在住院,还是让时念堂去吧?”

叶群不同意,说:“时念堂不熟悉,还是让胡萍来吧,他又不是什么大病。”

放下叶群的电话,吴法宪立即把这些情况报告了周恩来,并要求亲自到西郊机场进一步追查飞机调动的问题。周恩来表示同意:“你立即到北京西郊机场去查明情况。”

而周恩来在与叶群通完话后,也把李德生叫到电话间,对他说:“林副主席那里可能要出事,他们可能要飞到广州去。你立即赶到空军指挥所,代替我在那里指挥,没有中央的指示,山海关的飞机不能起飞。”

李德生深为震惊。下午,他从丰台赶到北京军区,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将38军部署完毕。晚上,直接从八大处北京军区来到大会堂,参加周恩来主持的讨论四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的会议。没想到这么快又发生了如此惊天的大事。他来不及多想,立即快步离开大会堂,乘车向空军大院驶去。

李德生走后,周恩来又叫来纪登奎,让他立即赶回北京军区,加强对北京部队的指挥。

周恩来要黄永胜留在自己身边,协助处理所发生的情况。然后又给李作鹏打电话,对他说:

“有这样一个情况,第一、北戴河那位可能要动,要飞夜航,夜航很不安全,不宜飞夜航。第二、他要飞夜航,你就告诉山海关机场,待他到达机场后,请他给我来个电话。第三、空军那架飞机的行动,要听北京我的指示、黄总长的指示、吴副总长的指示和你的指示才能放飞。第四、我已告诉吴法宪到西郊机场去了,作必要准备。”

当李作鹏听到周恩来“第一……”时,立即拿起笔准备记录,并用手势告诉他的夫人董其采和朱秘书一起接听,同时记录。

李作鹏按照通常接受上级指示的习惯,也为了让董其采能够记录

准确,周恩来每说一句,他就按原话复述一遍。周恩来指示完毕后,李作鹏示意董其采,要过她做的纪录,再次向周恩来复述了他的四条指示。在复述时,将第一条指示的“北戴河那位”改为了“林副主席”。

周恩来听完李作鹏的复述后说:“那就这样吧。”

李作鹏放下电话。

23 时 35 分,李作鹏给山海关机场打去电话。他首先问了对方的姓名,依然是调度室值班员李万香。随后,李作鹏按照和周恩来核对过的董其采的记录稿传达说:“……告诉你们,它(指当时在机场的这架飞机)的行动,要听北京周总理的指示,黄总长指示,吴副总长指示和我的指示,以上 4 人其中一位首长指示放它,才能放飞,其他人指示都不可以。”

李作鹏要求李万香复述了一遍。

23 时 45 分左右,周恩来又给李作鹏打电话询问三叉戟飞机号。李作鹏又立即打电话询问山海关机场调度室,机场值班员报告是 256 号。李作鹏将飞机号报告了周恩来。

几分钟后,机场调度室又来电话,将飞机号更正为 252 号。李作鹏又将更正后的情况再次报告了周恩来。这时已是 23 时 55 分左右。

吴法宪来到西郊机场候机室,看见胡萍正在和空 34 师参谋长龙振泉谈话。吴法宪刚坐下,便让人通知时念堂师长马上来。接着,他问起飞机调动的情况,胡萍说的还是和电话里说的一样。

此时的专机师师长时念堂已无法安心睡了。空军司令员两次来电话,这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情。虽然他还没有接师里的工作,但他毕竟是师长,放下吴法宪的电话后,他当即打电话问师机关几名经管航行的人员,询问专机飞山海关的事,都说不知道。咦?这是怎么回事?在一般情况下,周恩来不会命令空军查林彪专机的。而且以前吴法宪也从来不过问专机。现在吴法宪为什么对三叉戟起飞如此强烈地不满?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如此惊天动地?

面对这些反常现象,时念堂彻底糊涂了。他让总机将电话要到副政委、256 专机机长潘景寅家,潘景寅家属平静地说:“老潘飞行去了。”

啊,原来是潘景寅驾驶走的三叉戟飞机。时念堂似乎放心许多。

十几分钟后,候机室来电话说:“吴司令到候机室了,叫你马上过来。”时念堂赶紧摸黑骑自行车来到机场候机室。

候机室位于跑道东侧,是首长临时休息的地方,前面是登机坪,楼上是气象室和调度室,再上边是塔台。这里是机场的指挥中心,也是迎来送往的地方。

此时这里,除吴法宪和空军分管专机的副参谋长胡萍外,专机师政委马兰藻、参谋长龙振泉都在。时念堂像平常一样,先向吴法宪敬了一个礼。吴法宪脸吊得老长,起身便问:“256 号三叉戟是谁派去山海关的?”

时念堂答:“不知道。”

吴法宪狠狠训斥说:“你当师长的,飞机都跑了,你还不知道,你干什么吃的?”

看吴法宪发这么大的火,再说什么也是多余,时念堂只好沉默。

接着,胡萍按照吴法宪的要求,进到候机室里的小电话间给潘景寅打电话。电话间是封闭的,胡萍在电话中究竟怎么对山海关说的,外边的人都听不到。只见他走出电话间后,对吴法宪报告说:“山海关三叉戟的油泵坏了,现在正在排除故障,飞机不能起飞。”

再看北戴河。叶群与周恩来、吴法宪通完电话后,慌不择路的去找林立果。

而此时,没有找到林立衡的林彪内勤张恒昌已回到林彪住处,他看见叶群、林立果和刘沛丰一起来到林彪客厅。刘沛丰手里提着三、四个皮包,站在客厅门口,一言不发。叶群和林立果则匆匆走进林彪客厅,进到林彪卧室,叶群一边拽已经躺在床上的林彪,一边喊:

“快起来呀,他们要来抓你啦!”

林立果则催促内勤赶紧帮林彪穿衣服。

叶群找长期跟随林彪的警卫秘书、总参办公厅警卫处副处长李文普,将他带到林彪客厅,让他在门外等着,她自己进到林彪屋里,悄声说了几句后,才把李文普叫进去。这时林彪已经坐在沙发上,对李文普说:

“我也不休息了,今晚反正也睡不着觉了,你准备一下东西,现在就走。”

叶群跟着李文普从林彪的屋里出来,对李文普说:“快调车,越快越好。有人要来抓首长,再不走就走不了啦。”

林立果也对李文普说:“快点吧,有人要来抓首长,什么东西也别带。”

看到林立果和叶群的举动,李文普觉得反常。他按照林立果的吩咐,叫人去通知林彪的司机杨振刚赶快把车开上来,然后自己到值班室打电话问胡萍:

“首长马上要走,什么也不带,我觉得方向不明确,林立果跟你讲过到哪里去吗?”

谁知他在电话里听到的是胡萍紧张地声音:“你不要问了,不要问了,你不要往北京打电话了,要走你就赶快收拾收拾走吧!”说着胡萍就放下了电话。

林彪的内勤张恒昌匆匆跑到过厅对林立衡说:“他们现在就要走!”

这突然的消息让林立衡大吃一惊,赶快去值班室找李文普,看见他正在打电话,在场的还有总政治部保卫部负责林彪保卫工作、并在8341部队挂名警卫科副科长的刘吉纯。

李文普见林立衡进来,主动对她说:“首长现在就要走,不要刘吉纯去大连打前站了。我想给大连打个电话,没打通。”

林立衡说:“你现在还打什么电话!赶快拖住他们,就说今天太晚了,不能走。还可以叫张副团长来劝一下。”

李文普说:“现在还是要上飞机,不行再拼!”

林立衡问:“你们带枪没有?”

刘吉纯说带了,李文普说没有带。

林立衡说:“到这时候,你连枪都不带,还怎么拼!”

李文普去拿枪。林立衡说:“你们不拖住,我去叫部队阻拦!”

林立衡从值班室出来,正好碰上林立果,就问他:“现在怎么样?”

林立果说:“现在就走!……”边说边往林彪那里跑去。

林立衡回到放电影的地方。这时,电影《假少爷》快要演完了。她看到秘书李春生也在看电影,便告诉他,林彪、叶群今晚要跑,叫他注意点。随后又告诉了张清林和杨森,并要杨森在门口控制住汽车。

这时,叶群突然跑进放电影的过厅,大声叫喊道:

“快停演,今天晚上就到大连去。你们马上回去准备。杨森不去大连了,留下来看东西。”她一边叫喊,一边慌张地在走廊里来回乱窜。

林立衡故意上去问她:“张宁问,她的蛋糕还没吃,要不要带走?”

叶群发火说:“现在这时候还带什么蛋糕! 你们快走吧!”说完,推了林立衡一把,她就走了。

林立衡连忙跑出来,看到8341部队的二大队姜大队长守在门口,和他握手后,便和张清林、张宁坐上杨森的车开往56楼。

# 第1187回：难阻挡，“大红旗”冲过人墙 枪声响，李文普倒地受伤

此时，北戴河莲花峰上的96号楼里边已经乱了起来，只见叶群在走廊大喊：“快走！快走！”林立果也一迭声地说“快快快走”。他们就像热锅上的蚂蚁，叶群披头散发，林立果举着枪跑来跑去，从这屋窜到那屋，大声喊叫，十分着急的样子。

李文普让刘吉纯给大连打电话，通知做准备。刘吉纯赶快跑到秘书办公室，刚和大连的保卫部长说了一句话，林立果就突然进来，非常凶地质问：

“你干什么？”

刘吉纯说：“不是要去大连吗？让他们准备准备。”

林立果啪地把电话按下，恶狠狠地说：“哪儿也不准打！”接着，他将李文普拉到叶群的办公室说：“我给周宇驰打个电话，你在门外看一下。”

李文普在门外听到林立果在电话中对周宇驰说：“首长马上就走，北上，你们越快越好！”

林立果放下电话出来，就催李文普快去调车。接着叶群也来催促。

李文普回到秘书值班室给58楼8341部队张宏副团长打电话说：“首长马上就走。”

张宏副团长刚问：“怎么回事？”林立果又走进秘书值班室，问李文普：“是谁来的电话？”

李文普说：“是张副团长。”

林立果又伸手把电话按了，并大声喊：“谁都不要打电话，也不准接电话！”

刘吉纯看到林立果凶狠的样子，真怕他会用刀子捅自己，赶紧把枪揣在兜里，跑去找二大队大队长姜作寿，告诉他，林彪马上要走。让

他赶快组织几个人先把机场看管起来。

张宏和姜作寿商量后,很快选好人,叫区队长黄树忠带队。刘吉纯不同意,他让二大队副大队长于仁堂亲自带队去。张宏对于仁堂交代说:“要与机场取得联系,有问题请示中央后再定。”

23 时 45 分左右,于仁堂带着 8 名战士,坐上大屁股中吉普去了山海关机场。

接着,姜作寿和 6 中队中队长肖奇明等几个干部紧急商议,命令部队进入战备状态,原固定岗增为两人,临时增加流动哨,3 人一组,注意 96 楼的动静。

6 中队战士紧急集合从被窝里被叫了起来,背上背包。他们不知道要执行什么紧急任务。

车库里,一辆大卡车,几辆吉普车正在发动。

人们的喊叫声,枪支的撞击声,汽车的马达声,在夜空中汇合在一起,使这个平日静寂的疗养地,出现了一种临战的气氛。

姜大队长作了简单动员和部署,部队立即开始行动。

位于联峰山上的 96 号楼,只有一条向南的马路。而在马路中部的东西两侧,分别是 55 号和 56 号等楼群,是警卫部队的住处。按照规定,在马路和楼区的适当位置,都有一个固定岗哨,现在增为两人,还临时增加了流动哨,3 人一组,在防区内流动值勤,并随时与 58 号楼大队部联系。同时,在 55 号和 56 号楼之间设一个分队,顺马路向南 200 多米处再设一个分队,队员横排在大道上,分别形成了两道“人墙式”卡哨,以便拦截车辆。其他警卫战士,全部在楼房内,房内熄灯,但不脱衣,不睡觉,进入战备状态,随时准备行动。

再说林立衡他们到 56 楼后,林立衡让张清林留在 56 楼,自己和杨森又跑到 58 楼。

杨森把 8341 部队张宏副团长找来,林立衡对他说:“他们现在就要跑!”

就在这时,张清林在 56 楼接到林彪内勤打来的电话:

“他们正在床上拽首长,首长马上就要被拽走了! 你们快,快呀!”

这应该是内勤在向林立衡报告之前的情况。

张清林顾不上听完电话便跑出楼去,只见门口到 58 楼门口都是

8341 部队的战士,背着背包,一个班挨一个班。他对司机说:“别动,我下去告诉一下再回来。”然后边喊边跑:“车快下来了,快堵住啊。车快下来了,都到公路上来堵住,快堵住啊……”

但是战士们不知道他是什么意思,谁也没动,依然背着背包站在那里。

张清林冲进 58 楼大队部,上气不接下气地对张宏说:“情况万分火急!最多不超过 10 分钟,上面的汽车就要开跑了!部队为什么还没行动?为什么还不进行阻拦?”

张宏说:“我早已派先行车去机场了,有的部队还没调来,是不是汽车出故障了?”

23 时 50 分左右,96 楼。林立果寻找林立衡没找到,告诉内勤人员要林立衡坐叶群的车马上走。

这时,李文普已经拿着林彪常用的两个皮包走到 96 楼门外,边走边喊:“快把车开上来!”

林彪的司机杨振刚已经将林彪的“大红旗”开进了 96 楼车库,在车库门口停下。

林彪、叶群、林立果、刘沛丰一起出来。林彪走在最后面,走到内勤值班室门口时,他问内勤陈占照:“东西都装车没有?”

陈占照说:“没装车。”

林彪再没说什么,也没停步,连帽子、大衣都没带,就钻进了汽车。叶群第二个走进汽车坐在林彪旁边。

第三个上车的是林立果,他坐在第二排,在林彪前面。

第四个上车的是刘沛丰,他抱着公文包坐在叶群的前面。

李文普最后上车,坐在前排司机旁边,身后就是林立果坐的位置。

车开动了,叶群对林彪说:“李文普和老杨对首长的阶级感情很深。”

李文普和司机杨振刚都没有说话。

58 楼,林立衡要求张宏立即给张耀祠挂电话。催促几次后,林立衡自己抓起电话筒说:“你不挂,那我就挂了!”

张宏与张耀祠接通了电话,报告说:“他们刚才说再过 10 分钟汽车就要开走了。”接着他频频点头,连声说:“是,是,是……”

96楼值勤战士用电话不断地向大队部报告:“现在他(林彪)出了房门,向防空洞走去……现在,他在防空洞前上了红旗车……现在,汽车开出去了……”

张宏立即向张耀词报告说:“他们出来了,刘沛丰手里提着四个皮包,先上车,林立果、叶群、林彪都上了车,李文普上车后汽车开走了。”

林彪的内勤陈占照打电话给姜作寿:“大队长,他们走了,都乘首长那辆车,连我也不让上车……”

姜作寿放下电话,向张宏报告后,便往楼下跑。因为从96楼乘车下来,必须经过大队部所在的58楼门前。姜作寿是想在58楼门前把林彪的坐车拦住问他们要去哪里?警卫部队怎么跟他们走?

山间伸手不见五指,姜作寿刚站到马路中央,就看见林彪那辆“大红旗”拐过了弯,开着大灯直射过来,照得他连眼都睁不开。他赶紧站在大队部门口的路中间,做出紧急停车的手势,大喊“停车,快停车!”

但“大红旗”鸣着短促的喇叭,丝毫没有减速的意思,又是下坡,狂风一般冲来,姜作寿一看情况不妙,马上跳到一边,“大红旗”擦着他的衣服冲过去,好玄呀!

林立衡从张宏手里夺过话筒,说情况万分危急,要求马上下命令让部队进行拦截。

张耀祠在电话里“嗯,嗯,嗯”的答应着……

林立衡大哭起来,说:“你们再不采取措施,叶主任就要把首长带走了啊,他们还说要派飞机轰炸中南海,暗害毛主席。”

张耀祠:“中央没有指示,我不好擅自抓人。总理已下令封锁机场,我只能命令警卫部队阻止他们出北戴河。”

与此同时,大队部的哨兵跑进值班室报告:“一辆红旗车已穿过56号楼至大队部之间的公路,正向大队部门前开过去!”

林立衡立即把这情况报告了张耀祠。张耀祠叫查一下是什么车。

这时,外边值勤的警卫战士也连声喊叫起来:“车下来了,快拦住!”

6中队的中队长肖奇明带领全副武装的警卫战士冲上公路,按照事先计划,10多名战士排成一道人墙,挥着手臂,高喊道:

“停车!停车!”

汽车仍然没有减速,不断地按着喇叭加大油门向人墙冲去。人们本能的一闪,车冲过去了,随即又冲过第二道人墙,这里的战士也险些被风驰电掣的红旗车撞上。

中队长肖奇明是在第二道人墙阻拦,当红旗车冲过第二道人墙时,他横向朝红旗车开了枪,无奈这是一辆红旗防弹车,事后检查,这两枪打在了汽车的后挡风玻璃上,只在玻璃上留下了两个小白点。后来,周恩来对这两枪提出批评,说是没有明确指示,怎么能开枪呢?

坐在车里的李文普,跟随林彪十几年,此刻,他突然喊了一声"停车!"

司机杨振刚本能的踩了一下刹车,李文普就势跳下车。

叶群气冲冲地喊道:"李文普! 你想干什么?"

李文普说:"你们究竟要到哪里去? 当叛徒我不去!"他转身朝58楼喊了一声:"来人呐!"

又响了一枪。李文普侧着身,手扬着,子弹从前胸擦向左臂。李文普翻身滚到路旁。

肖奇明最先赶到李文普这里,姜作寿在他后面30米。他们看见李文普半躺在地上,捂着左大臂的负伤处,嘴里还在哇哇乱叫:"叛徒! 叛徒!"

"谁是叛徒?"他们问李文普。

"叶群! 林立果!"李文普答。

警卫人员飞快地向汽车跑去,车门尚未完全关上,汽车已飞速的向前驶去。

肖启明带着几名战士坐上一辆"吉姆"车追了上去。

一辆大卡车开过来了,姜作寿大声命令上车。近30名全副武装的战士上了卡车,谁也顾不上负伤的李文普。

姜作寿站在驾驶台的踏板上,宣布:"首长被林立果、刘沛丰劫持跑了,我们去拦截……"

还没讲完,大卡车就开动了

虽然"吉姆"车司机开得很快,肖启明还是叫他再开快点。因为李文普半路下车,耽误了一会儿,"吉姆"车看见前面的"大红旗"了。

但是大卡车一路上也没有见到"大红旗"的影子。

听到外面枪声,张宏慌忙跑了出去。这期间,林立衡一直拿着话筒,没有中断与张耀祠的通话。她报告了红旗车从96号楼开下来,经过8341部队大队部门口,接着有人开枪的情况,哭着请求他立即命令部队阻拦!

听到这里,张耀祠说:“那就让部队快追吧,我马上再去请示。”

张宏很快跑回来,也向北京报告了情况:“林彪坐汽车跑了,没有拦住,李文普被打伤了!”然后对林立衡说:“现在不知跑到哪里了?我马上去追!”说着,气喘嘘嘘地带上枪走了。

林立衡又接过话筒,对着话筒不断地呼喊着,但毫无回音……这时她一边等着张耀词的回复,一边用另一架电话给96楼打电话,叶群内勤孙忠堂接的电话,他说:“人都冲出去了,房子里没有几个人了。”

滚到路旁的李文普听到几辆车从他身边呼啸而过后,站起身来,提着枪,自己捂着流着血的伤臂走回到58楼二大队队部,二大队的卢医生见状马上拿出急救包给他包扎。他们要送李文普去空军疗养院。李文普想自己的女儿就在空军疗养院当兵,而且是刚刚办的入伍手续,便让人们把他送到北京军区疗养院281医院。在281检查的情况是:子弹穿透手臂,造成粉碎性骨折。

医生问李文普怎么受的伤,他说是自己“枪走火”。

再说刘吉纯从58楼二大队大队部赶回96楼。刚到楼前,就看见林彪的“大红旗”出来了。因为没看见叶群的车出来,他跑到秘书办公室,叫“林办”秘书李春生去看看叶群在不在。李春生回来说没看见,只有叶群的内勤守着一大堆行李在那里等着。内勤说,她看见叶群只拿了一个小包,以为她还要回来,便对李春生说:“叶群可能在卧室,你去看看。”

而叶群司机小穆赶到96楼,还没有下车,就听见叶群内勤喊:“主任让你到56楼接豆豆他们去机场。”

小穆马上开车去56楼,看见56楼一片黑暗,以为人已走,掉头又回到96楼,跳下车对叶群内勤孙忠堂说:“你告诉主任,56楼没有人,怎么办?”

孙忠堂慌乱地对小穆说:“他们早走了。”

小穆吓死了,他是叶群的专车司机,而且叶群要带走的东西全在

他的车后备箱里,迟到了叶群准要骂他。小穆转身上车开着空车向机场追去。

看见林彪的大红旗绝尘而去,林彪内勤小陈和小张懵了好一会儿,这才奔到院子里,边哭边说:“他们都走了,都走了……”

“林办”秘书宋德金问二人:“李处长呢?”

“跟着一起走了。”

李春生不信,进去看了一圈,跑出来大喊:“首长走了!”

96 楼一片慌乱,“首长去哪儿了?”

“去大连。”

“去大连为什么不带上我们?”

宋德金说:“快快,快调值班车。”

刘吉纯一听更急了,恰巧院子里有 8341 部队的一辆“伏尔加”,正好宋德金出来,还叫上了李春生。考虑到只有刘吉纯一个人有枪,又叫了一名带长枪的战士,他们乘“伏尔加”直奔山海关机场而去。

“伏尔加”追上了叶群的司机小穆。小张要开枪打,宋德金说:“慢着,万一里面有林豆豆,打错了人怎么办?”

此时,8341 部队的三部值班车也都追出来了。自从“大红旗”从北戴河开出后,8341 部队先后组织了 8 辆车 70 多人,由张宏副团长亲自带队去追。

# 第1188回：接报告，林彪已离开住地 电掣般，“大红旗”冲过护栏

北京，人民大会堂，周恩来接到了张耀祠的报告：“林副主席已经离开住地去山海关机场了。”

9月13日0时刚过，周恩来为了证实这一报告，他要林彪的电话。军委总机马健英接通了100号林彪的专线，没人接。200号叶群的专线，也没人接。这是不可能的呀？怎么可能没人呢？她以为线路坏了，中南海故障台检测后说，电话是好的，有正常的铃声。她纳闷，怎么工作人员也都不见了？

周恩来问张耀祠，警卫部队能否先赶到机场控制飞机？张耀祠难以做出肯定的回答。

周恩来再一次叫李作鹏下令山海关机场，不准停在机场的任何飞机起飞，要设法阻拦。

周恩来打电话到西郊机场，告诉吴法宪说：“林彪已经和叶群、林立果乘车离开了北戴河，车正在往山海关机场方向开去，临走的时候还开枪打伤了警卫人员。”

接到周恩来的电话，吴法宪顿时感到问题严重了，马上叫张秘书打电话到山海关机场找潘景寅。这时，吴法宪又接到周恩来打来的电话：“立即准备两架飞机，如果林彪一定要起飞，我亲自坐飞机到山海关机场去劝阻。”

时念堂接到吴法宪让他准备两架专机的指示，立即通知准备伊尔-18。专机师的战备做得很好，专机随时处于待命状态。很快机组人员带上飞行用具，跑步到候机室待命。时念堂对机组下达命令，只讲北京飞山海关和到山海关落地。因为吴法宪没讲任务的性质，他也没讲是谁去，只是让机组原地待命。

山海关机场的电话接通了，吴法宪在电话里命令潘景寅：“要绝对忠于毛主席，飞机绝对不能起飞，不管什么人命令都不能起飞。”潘景

寅在电话里满口答应。

但是,当吴法宪打电话把潘景寅的表态报告周恩来时,周恩来却告诉吴法宪说:“林彪、叶群已经上了飞机,而且飞机已经起飞了。”他要吴法宪注意看飞机的航向,注意它往哪里飞,降落在任何地方,都要报告他。吴法宪问要不要准备飞机。周恩来说:“你准备一下吧。”

原来,23 时 54 分左右,256 号三叉戟驾驶员潘景寅,正在 34 师派驻山海关机场的西郊机场调度室主任李海彬的调度室里。这时,北京保密机响了,是李海彬接的,找潘景寅。

潘景寅接过电话,“嗯嗯”两声,说:“好的,好的,明白。”放下电话,立即对李海彬说:“要油车。”

“加多少?”李海彬问。

“加两吨半。”潘景寅说。

“那要一个油车就够了。”李海彬说一句。

“你要两个吧。”潘景寅说。

23 时 55 分,李海彬打电话给山海关机场调度室,要两个油车给三叉戟加油。与此同时,潘景寅出门,叫醒正在熟睡的 256 号机组机械师去加油。

23 时 56 分,山海关机场调度室值班员李万香告诉外场,调两个油车加油,化验员也到场。

0 时 03 分,潘景寅通知机械师起床后,又回到李海彬调度室。这时,北戴河的保密电话响起,李海彬拿起电话,一个男声急促地说:“我是 8341 部队的宋定忠,有小轿车去山海关机场了,车到了别让它走,要卡住!”说完就挂了。

这个没头没脑的电话,让李海彬不知所措。他问潘景寅,潘景寅也不知道这个叫“宋定忠”的人,“卡住小轿车”?当时能坐小轿车的人只能是首长,“卡住”首长?谁如此胆大包天?李海彬搞不清楚,潘景寅也搞不清楚。他们一起敲开随林立果一起飞到山海关机场的空军司令部办公室一处秘书程洪珍房门,而睡意正浓的程洪珍也不认识这个宋定忠。

宋定忠是谁?8341 部队二大队有两个中队在北戴河警卫林彪,六中队跟着二大队部,负责林彪别墅外围警卫。八中队是更外围的警

卫。可是8341部队二大队没有宋定忠这个人呀?!

电话里李海彬没有核实姓名,可能因为对方有口音,李海彬听错了。无论如何,宋定忠这个电话把程洪珍也吓住了。“卡住”林彪的车?为什么?程洪珍、潘景寅、李海彬都认为这个电话很严重,必须立即报告林立果。3个人回到李海彬调度室,程洪珍用北戴河保密电话给林立果打电话,没有人接!程洪珍又用北京保密机通过空军一号台给周宇驰挂电话,周宇驰急促地说:“知道了,知道了,‘康曼德’已经出发了。现在情况紧急,北京正在追查,你快跟他们跑吧!”

程洪珍不知怎么回事,急忙与潘景寅商量。这时,北京又来电话找潘景寅。

潘景寅放下北京的电话,对李海彬说:“谁要问这架飞机来干什么,就说是训练。问什么时候回北京?就说有故障。”

李海彬说:“空军调度室问了好几遍,这架飞机什么时候回北京?”

潘景寅气冲冲地说:“老问干什么呀?就说还没有走!”

潘景寅看了一下手表,说了一句“油加得差不多了,我去看看”,就去了停机坪。此时离他要油车已过20分钟。

再看北京。0时06分,李作鹏再次电话山海关机场值班员李万香强调:“空军那架三叉戟飞机要经北京周总理、黄总长、吴副总长和我四人联合指示才能放飞,如果其中一个首长指示放飞,不管是谁的指示要报告我,你们要切实负责。”

调度值班员李万香报告:“已经要了两个油车加油。”

大约0时10分,山海关场站站长潘浩等人来到调度室,值班员李万香报告李作鹏来过电话。当潘浩等人知道西郊机场派来的调度室主任李海彬已经为三叉戟要了两辆加油车,觉得情况紧急,必须再给李作鹏打个电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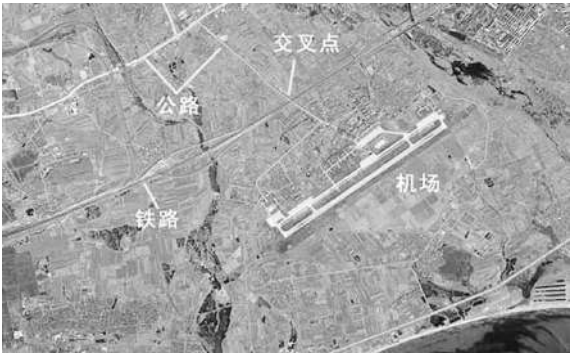
此时,林彪的“大红旗”早已经发疯似地冲上了公路。车速高达每小时120公里,把尾随它的卡车、吉普车都远远抛在了后面。

但是,在接近山海关机场时,它被先派出去的二大队副大队长于仁堂那辆大屁股吉普车压住了。无论它怎么鸣喇叭,吉普车就是不让它超车。这样拖了几公里,前面已经可以看见机场的大铁门了。当他们正要横穿一道铁路线时,正巧有一列火车要通过。看到工人亮起红

灯,标志杆徐徐下落……吉普车一个急刹车,在标志杆前停住,而“大红旗”却一打车头,超过吉普车从标志杆下冲了过去,急驰的火车险些撞在它的车尾上。

叶群的司机小穆看见后面“林办”的车在追,他怕叶群骂,开得更快。通往山海关机场的路上有两道火车线,前面两个车刚开过去,一列货车来了,因为没有路灯,离铁路十几米司机才发现,因为车速太快,“伏尔加”司机转了个大弯,栽到草丛里,侥幸没撞上。

等长长的那列货车驶过,前边的“大红旗”已经跑得没影了。




山海关机场卫星图片。进机场的公路要经过一个铁路交叉点。

9月13日0时15分,山海关场站参谋长佟玉春步行去停机坪。这时,跑道还黑着,三叉戟附近亮着一盏聚光灯,这是警卫飞机的长明灯。两辆加油车正在加油。

0时18分,林彪的红旗轿车冲入山海关机场停机坪,直向三叉戟飞机驶去,在银白色的256号三叉戟专机左后方戛然而止。

“大红旗”冲进机场北门时,林立果冲着大门警卫喊:“有人要害林副主席,快把大门锁上。”结果,后面跟上来的大屁股吉普车怎么按喇叭,门卫也不开门,装听不见。后来吉普车火了,命令跟上来的卡车硬把铁门撞开,门扇都给撞翘起来了。

佟玉春步行到距离林彪专机不到100米时,突然看见林彪“大红

旗”快速开来,戛然停在专机边上。

佟玉春见状赶紧往专机跟前跑。但见那辆“大红旗”还没停稳,叶群就披头散发跳下车,大喊:“有人要害林副主席,现在有情况!”

林彪没戴帽子,第二个下车。

穿着白衬衣林立果挥舞着手枪也下了车,十分慌张地大声喊着:“快!快!快!飞机马上起飞!有人要暗害林副主席,要保卫林副主席!”

刘沛丰下车后,顺着工作便梯爬上飞机,接着是叶群。林彪第三个,他的头顶到了叶群的脚。林彪下边是司机杨振刚,他托了林彪一把。

叶群进到机舱,这时飞机还没有发动,她向下边大喊:“油车快让开,我们要走!誓死捍卫林副主席!”

这时,冲进机场的8341部队的那辆大屁股吉普车在距离飞机200米处停下,8341部队二大队副大队长于仁堂跳下车就往调度室跑,是想去告诉调度室阻止飞机起飞。车上的其他8名战士也下了车,只是呆呆地看着林彪上飞机。

正在翅膀上面加油的两个机械师,看到林彪的汽车一到,就赶紧从飞机上下来。正在飞机里的机械师邰起良看见林彪的汽车冲过来了,可是机组人员还正在睡觉,他赶紧下了飞机,拿起停机坪上的电话,对调度室的李海彬喊道:“首长都到了,机组人员怎么还没到?”

这时,潘景寅正向这边奔跑过来,他跑到飞机下边,二话没说,赶紧爬上飞机。正在机翼上加油的机务中队副队长李平,机械师张延奎,也都爬进了飞机。只有邰起良还在机下等待机组的其他成员。

拿着手枪林立果让邰起良赶快上飞机。自己则拿起专机旁停机坪上的电话打电话。

这时,机场参谋长佟玉春对邰起良大声喊:“没有周总理批准,飞机不能飞!”

邰起良愣愣地看了佟玉春一会儿,没说话。

林立果拿着手枪把邰起良推上飞机。上飞机时,邰起良还在扶梯上不住的回头观望……

林立果拉着正在现场的场站政委史岳龙和副站长赵雅辉的手,往

三叉戟上拽,说:“首长要接见你们”。

林彪上飞机的慌张,史岳龙和赵雅辉都看到了,再加上接到了不准起飞的命令,他们觉得不对头,两个人也懵了,不知道怎么就没上飞机。

佟玉春急了,他命令场站的油料科科长王学高和油料排长王敬之各带一辆油车,开到滑行道出口50米处设障,无论如何不能让飞机起飞,然后向机场警卫连跑去。

再说调度室的李海彬接到邰起良的电话后,也急了,赶快跑到机组人员休息的房间,挨个砸门,同时高喊:“首长到机场了,快快起床!”

“嘭嘭嘭……”急促的砸门声让机组的其他5位成员几乎同时从睡梦中惊醒,他们从床上蹦起来。

飞行员有个习惯,睡觉时两只鞋尖一律朝外,蹬上就可以跑出去。这时,第二副驾驶康廷梓以极快的速度胡乱套上衣服,一只脚伸进皮鞋里,第二只脚还未来得及伸到第二只皮鞋里,就听见窗外“轰”的一声巨响,256号三叉戟发动了!

“怎么会?”专机副驾驶康廷梓连鞋带也没系,衣服也没扣,就疯了一样冲出门。黑暗中,他看见机组的陈联炳和陈松鹤跑在他的前面。

0时23分,山海关机场调度室值班记录:“开车就走,来不及准备。通信员陈松鹤跑在最前面,后面跟着第一副驾驶陈联柄……”

叶群的司机小穆的车也紧跟着进了机场,但乱糟糟的场面让他停住了脚步。事后有人问:“如果叫你上,你上不上?”

小穆说:“当然跟着上。”

被机场乱糟糟的场面吓的停住脚步的还有林立果从北京带来的程洪珍,他是听见“大红旗”刺耳的刹车声后,从李海彬调度室跑出来的。李海彬调度室距离停机坪100米左右,因平房前面还有一座小楼挡着,在李海彬的调度室里看不见飞机和汽车。但是夜间声音传得很远,程洪珍和李海彬都听见了刺耳的汽车刹车声。程洪珍二话不说,起身就往外跑。李海彬没动,他的岗位在调度室,他要24小时守候电话。

当程洪珍绕过小楼,清楚地看见256三叉戟右机翼上站着两名机械师,正在加油。但是,他不由自主停下脚步。他看见“大红旗”正往

三叉戟跟前开,速度非常快;他看见飞机前乱成一团,突然一股害怕涌上来。林立果交代是看好电话,安排好两个随机来的女兵,听他指令,第二天早上走。现在林立果半夜来了,没有给他指令,他是该上飞机呢,还是不该上?如果冒失跑上飞机,林立果还带来两个女兵交他负责,如果林立果问起那两个女兵呢?不是叫你守电话吗?谁叫你上飞机?程洪珍呆呆地望着正在快速移动的三叉戟,一动未动。

在此之前,0时20分,机场值班员给李作鹏打电话报告说:“李政委,场站领导要同你通话。”

李作鹏答:“好,请讲。”

顷刻对方说:“我是场站站长潘浩,李政委是不是给我们来过几次电话指示?”

“是的。”李作鹏又重复一遍。

“现在飞机正在加油,如果飞机强行起飞,怎么办?”

李作鹏拿着电话思索片刻,回答说:“可直接报告周总理。”因为李作鹏知道,山海关机场作为暑期保障中央首长的机场,可以要通中南海的总机。

潘站长又问:“中央首长的指示,是不是要给专机师的潘副政委传达?”

李作鹏回答:“可以告诉。”

潘站长放下电话,和场站史副政委一起,急忙去找潘景寅。当他们从场站调度室出来时,就看见了三叉戟身边的“大红旗”。他们迅速跑到潘景寅的房间,没有人。再跑到停机坪,只见机组穿皮夹克的细高个儿邰起良在拿着枪的林立果前面走,样子有点犹豫。

# 第1189回：仓皇间，三叉戟强行升空 周恩来，中南海见毛泽东

正在往调度室跑的8341部队二大队副大队长于仁堂，跑到半路，听见了飞机发动的巨大声音。他先到调度室南门，门不开，又往东绕到后门。刚进门，看见一位海军机场的人，他说："快告诉调度室，这架飞机要控制，不能起飞。"

那位海军干部随即上楼。

于仁堂又转身跑向飞机。0时23分，于仁堂在距离飞机30米时，看见256三叉戟滑动了。他又返回调度室，快到后门时，碰见机场参谋长佟玉春，他急急地说："这架飞机情况不明，无论如何不能让它起飞，你要采取紧急措施。"

佟参谋长说："我们刚才也接到了不能起飞的命令，可现在来不及了，飞机已经进跑道了。"

佟玉春是跑去调警卫连时，听见林彪专机的三台发动机发动起来的巨大声响，于是跑到调度室，向值班员借了一把手枪。此时他一边朝飞机方向跑，一边掏出手枪，冲天打了3枪，是在催警卫连快来。

值班员听到枪声，拉灭了停机坪惟一亮着的照明灯，机场顿时陷入黑暗中。

副站长赵雅辉站在调度室窗外冲里边喊："快对空联系，把飞机喊回来！"

同时，8341部队的人把停机坪上的另一架伊尔14专机包围住了。有些人还冲进调度室，一名干部问附近哪个机场有歼击机。

佟玉春的枪声没有阻止256号飞机继续滑行。他调去阻止飞机起飞的两辆加油车，只有一辆"勇敢"地驶向了跑道，但一看三叉戟"气势汹汹"地冲了过来，车上的科长借故下了车，只剩一个山西新兵刘三儿。上边没有明确指示，干部跑了，新兵刘三儿哪有胆量去拦专机？不要说"拦"，就是碰坏了专机也不是闹着玩的。所以，他只能尽量把

车往滑行道边上靠,可三叉戟机翼长,右机翼还是刮坏了加油车的罐口盖,机翼上的铝皮掉了,绿色玻璃灯罩和有机玻璃也刮碎了,30 米长的飞机右翼打弯了油车顶盖的铁棍,撞下来一堆碎片。

刘三儿当场吓“病”了。

256 号三叉戟飞机凭着机头灯,在那道惟一的白光“照耀”下,“势不可挡”地滑向跑道。滑到东头,机头调转过来,发动机的声音增大,开始加速。也许是太着急,也许是黑,潘景寅差点儿撞到跑道边的一堆大石头,这堆大石头是修跑道剩下的,还没有来得及清走。潘景寅强扭了一个 90 度的大弯,因为动作太急促太猛烈,像个醉汉,还没有对正跑道就拐了弯,一个主轮偏出滑行道,开进了黄豆地。山海关白天刚下了大雨,地里全是泥。三叉戟将黄豆地轧出一尺多深的沟,割下来的黄豆都被吹跑了。幸亏三叉戟“马力”大,要不非“窝”在黄豆地里。三叉戟从黄豆地里“挣扎”出来,狂吼着从东向西进入了跑道,留下 20 多米长的一道泥沟,又轧坏了两个跑道灯。在正常情况下,大飞机应该从联络道开到跑道尽头才能起飞,而这次三叉戟在跑道头 500 米处就强行起飞了。

这时是 1971 年 9 月 13 日 0 时 32 分。林彪等人坐的 256 号三叉戟飞机,在没有夜航灯光和一切通信保障的情况下,在一片漆黑中,强行起飞了。

机场的灯全熄灭了,三叉戟也没有平时一样打开翼尖灯和机身上的闪光灯,很快被茫茫夜空“淹没”,黑暗中只有飞机的轰鸣声。

正以百米冲刺的速度往停机坪奔跑的几个 256 号三叉戟飞机机组成员全傻了眼,一时怔在那里。

这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情。专机组都知道,准备飞机从来都是全机组一起准备的。飞机落地下来,首长走了,机组还不能走,还要查飞机,查得很细,每个地方都要检查。检查完了还要塞上各处的“眼”,盖上蒙布,才能回去休息。如果专机 8 点起飞,夜里 3、4 点全机组就要起床到机场,提前好几个小时准备。打开飞机蒙布,取出塞好的“眼”,然后发动机试车,每个部件检查到,良好了,才能放心。剩点时间还要里里外外地拿抹布和汽油擦飞机,做清洁工作。然后在机场待命,等待首长。飞机,尤其是专机,不像汽车,上了车就开。

可眼前是怎么回事?

专机上的服务员小魏因为要提暖水瓶打开水,动作稍慢了一步。她提着两个暖瓶,望着已经起飞的256号三叉戟,着急地说:“我开水还没打,他们怎么就起飞了?”

5位垂头丧气的专机组“难友”顿时觉得自己失职了。

256号三叉戟配备了专机师最强的技术力量从北京飞向山海关。然而专机组的所有人做梦都没想到,几个小时后,三叉戟再次从山海关起飞时,机组作为一个集体已经永远不存在了。昨晚23时,机长潘景寅在机组准备第二天飞行的会上,安排得好好的,第二天一早起来到机场做准备,然后吃早饭,然后再到机场待命。没想到才睡下两个小时,一切全变了。

是不是在梦中?不是,专机确实是起飞了,停机坪上空空的。这5个难兄难弟全都目瞪口呆,谁也不明白机组的部分成员还没上飞机,怎么飞机就起飞了呢?

当刘吉纯他们的“伏尔加”开到机场,只见机场一片黑暗。先看见林彪的“大红旗”停在那里,在他们前面赶到8341部队战士站在车旁。

刘吉纯问他们:“飞机呢?”

他们指着前方的跑道说:“在跑道上。”

但那不是三叉戟,而是另一架小飞机,周围站着拿枪的战士。

天很暗,看不见,刘吉纯们准备到前面看看。刚走几步,大飞机震耳欲聋地滑动了。

刘吉纯痛骂8341部队的战士:“你们都是死人,为什么不拦住?不是命令不准飞机起飞吗?你们等着挨整吧。”

他问:“于副大队长呢?”

战士说:“在那边,去调度室了。”

刘吉纯说:“赶快,上调度室。”

看见于仁堂,刘吉纯埋怨他怎么叫他们上了飞机?于仁堂说他的车慢,被后面的车超了过去,他们也是刚到不久。因为只是向干部讲了,战士都不知道林彪要跑,所以战士都站在那里不敢动。

刘吉纯想了一下,不应该埋怨他们,没有上面的命令,谁敢动林彪副主席?

这时机场大乱,枪声,喊叫声,车辆穿梭声,伴着飞机的轰鸣声,整个停机坪混乱到了极点。平时执行专机任务,庄严极了,隆重极了。机组先到机场准备飞机,再由先遣人员搬东西,欢送的人车水马龙,最后才是“姗姗来迟”的首长。怎么林彪专机就成了这样的“一锅粥”呢?

一辆满载全副武装战士的卡车冲进机场,在停机坪中央刹住。混乱中,有人喊开枪,有人喊不准开枪。一辆吉普车在距离第二副驾驶康廷梓几米远的地方停住,跳下一位40多岁的陆军干部,右手拿着手枪。他左手拉着康廷梓,右手举枪指着正在滑行的飞机,用浓重的山东口音说:“你,你,快把飞机拦住!”

康廷梓想:“我连谁在飞机上都不知道,赤手空拳,怎么把飞机拦住?”他问:“是谁在飞机上?”

陆军军官并不回答康廷梓的问题,却一个劲儿地说:“这架飞机不能起飞,把它拦住!”

康廷梓急中生智,用手指着吉普车,“命令”陆军军官:“快,把吉普车开到跑道上,对准飞机,堵住它,它就不敢起飞了。”

陆军军官明白了康廷梓的意思,上了吉普车,但已经来不及了。

三叉戟第一副驾驶陈联炳问:“怎么办?”

李成昌是党小组长,潘景寅不在,他就是机组的头儿,他说:“上调度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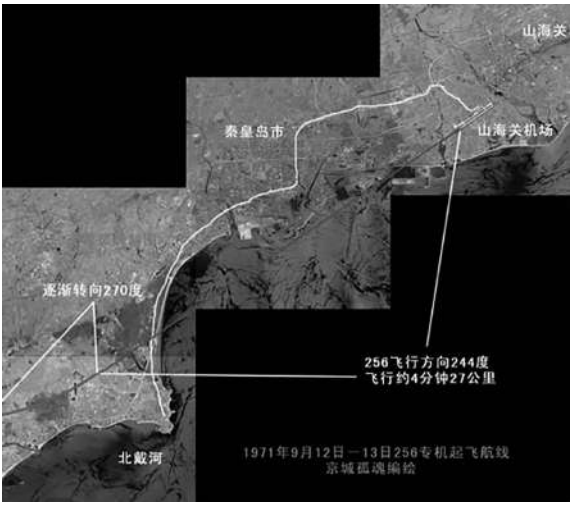
这几个被丢下的256号机组成员又以百米冲刺的速度往调度室跑,看看飞机往哪里飞?

在调度室,他们更糊涂了:256起飞后,顺着山海关机场的244度向西南朝着天津的方向飞行了4分钟,然后,来到山海关西南40公里,林彪刚刚离开的北戴河上空,缓慢异常地转了一个大的出奇的弧度向西北310度飞去。开始是向右转弯,航向270度到280度。这个方向是北京,没错。接着,飞机又开始缓慢转弯,向北转弯,到310度,这段时间又是3、4分钟,飞行高度是3000米,以后再没有上升高度。最后机长把航向转到345度,后来又调整到325度。这过程中用了大约20分钟的时间。超出了正常时间的几十倍。这个时候飞机的实际位置已经偏向山海关机场到北京之间,也就是说在河北省迁安县的上

空,已经偏离了130公里,这在飞行历史上是很不正常的。

飞行图上,正北为零度,正东为90度,正南为180度,正西为270度。

本来只有30度的航向调整动作,对潘景寅这样的飞行员来说,只要几十秒就可以完成的,但是这次,256号用了3至4分钟的时间。




黄线为林彪等人自北戴河乘车前往山海关的可能路线。红线为256起飞后的航线。

飞机这是要去哪里?目标290度、100公里,目标315度、150公里,250公里……不久目标消失,5名机组人员茫然回到招待所。但此时,被甩下的5为难兄难弟总算搞明白了一件事,飞机上的机组人员,只有机长潘景寅和3个机械师。

三叉戟第一副驾驶陈联柄给空军航行局局长尚登峨打电话,说潘景寅一个人把飞机飞走了。

“什么?一个人?”尚登峨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你慢点说,飞机上还有什么人?”

“除了潘景寅,还有三个机械师。”

“不可能?!”尚登峨不相信,反复问了好几遍。他是飞行员出身,吃飞行这碗饭20多年,只有一名飞行员就飞上天,还从来没有先例。大型运输机不像歼击机,一个人就可以飞上天。大型军用运输机必须两个飞行员飞,一个正驾驶,一个副驾驶,配合操作,就是本场训练,飞起落这样简单的科目,也应该全体人马都上,一个都不能少。更何况外场,又是夜间。林彪专机这次飞行配备了三名飞行员,多配了一名副驾驶。而潘景寅,不仅“丢”下了两名副驾驶,还“丢”下了领航员和通信员。

歼击机在空中飞行的时间短,没有那么长的航线,光凭地面导航就完全可以。运输机航线长,加上空中有风的影响,飞机可能会偏离航线。所以除了地面领航外,必须要有空中领航。尚登峨吓坏了,这是林彪的专机呀,怎么一个人就飞了?

“机组都有谁? 现在你身边还有谁?”尚登峨急切地问道。

陈联柄告诉他:“潘景寅把机械师叫起来加油,等调度室老李叫我们起床时,飞机已经滑出,没来得及加油,也没有到调度室办手续,就起飞了。”

这时,空军参谋长梁璞过来了,尚登峨让陈联柄直接向参谋长报告……

李作鹏是在0时28分接到山海关机场赵雅辉副场长的电话报告:“飞机已强行滑出。”

李作鹏问:“飞机到了哪里?”

赵副场长回答:“快到跑道了!”

李作鹏说:“就这样吧!”

放下电话,李作鹏立即向周恩来报告:“飞机强行起飞了。”

周恩来“哼”了一声,重复问了一句:“强行起飞了? 查一下航向。”

8341部队的张宏他们没有拦住255号飞机,只好在机场上把林立果带到山海关的两个女兵拘留了。这两个女兵拿着枪不让8341部队的战士进屋。张宏对她们说:“你们这是要干什么! 我们是保卫林副主席的,你们怎么这个样子?”就在两个女兵愣怔之间,8341部队的战士冲进去,把她们的枪缴了。

0时32分,汪东兴接到张宏从山海关机场打来的电话,说飞机已经起飞了。接着,他也接到林立衡打来的电话:“听到飞机响了,好像是上天了。”

汪东兴对她说:“我现在没有时间接你的电话。”就把电话挂了。

汪东兴放下林立衡的电话,立即给周恩来打电话报告,并说:“毛主席还不知道这件事。您从人民大会堂到毛主席那里,我也从中南海南楼到主席那里,我们在主席那里碰头。”

然后,汪东兴叫着张耀祠和他一起去。张耀祠一直在汪东兴的办公室和他一起听电话,没敢离去。汪东兴对他说:“你要去主席那里接电话。”

周恩来对秘书说:“我去见主席,有事到那里找我。”就出了东大厅。

周恩来的保健医生张佐良看见周恩来出来,提起氧气箱正准备跟过去,有人叫住他,让他不要走。过一会儿,办公厅领导过来宣布了几条纪律:“工作人员都不要走,今晚就住在大会堂。具体住哪儿,等会儿听通知,不要往家里打电话!”

张佐良从1965年开始做周恩来的保健医生,跟他住过钓鱼台、玉泉山,就是没有住过大会堂,今天怎么也要住大会堂呢?周恩来外出都用自己被褥,出国也如此,他的卫士长高振普叫西花厅将周恩来被褥抱到人民大会堂东大厅。

周恩来出了人民大会堂,乘车向中南海驶去。他和汪东兴几乎是同时到了毛泽东那里。周恩来匆匆下车后,与前来迎接他的汪东兴简单低语几句,便一起进了毛泽东的卧室。

中南海,毛泽东坐在沙发上,很认真地听取周恩来的报告。其间,周恩来几次去接电话,将最新情况报告毛泽东:

“零点32分,飞机在山海关机场强行起飞。”

“零点43分,航向290度,飞机距机场55公里。”

“零点46分,航向310度,向西北方向飞去。”

……

# 第1190回：“由他去”，毛泽东不让拦截禁空令，周恩来紧急部署

此时，北京西郊机场。0时32分，256号三叉戟在山海关机场强行起飞。吴法宪大骂起来：“妈的，说不能起飞，怎么起飞了？”一连说了好几遍。在场的人都不知怎么回事，谁也不敢说话。

时念堂这时还不知道飞机上坐着谁。吴法宪让他打电话呼叫256，时念堂走进指挥所，通知有关人员打开所有的通信设备，同时叫标图员开始标图。他以为256号三叉戟是要飞回北京，又命令外场保障人员迅速打开跑道灯及一切夜间降落设备，导航台也打开，专机师整个行动起来了。

塔台灯打开了，机场跑道灯也打开了，西郊机场灯火辉煌。半个小时后，外场指挥车和各岗位都按照保证重要专机任务的规格各就各位。

北京距离山海关300公里，再有十来分钟，三叉戟就该到了。

34师指挥所不停地向256号飞机喊话，不过，直到这时，时念堂还不知道256号三叉戟已变成252号了。嗓子喊劈了，喊哑了，时念堂的呼叫一直没有回音。

飞机上无线电只要打开，肯定能听见。但是此时，却连起码的动静也没有。

秋天晴朗的夜空，静得让人心里直发毛。平时音箱里总有很多声音，有本场飞行，也有远处不知什么地方的飞机，凡共用一个频道，在一定范围都能听到。但这天晚上很奇怪，音箱里没有一点声音。

再呼叫，还没有。

呼叫不到，吴法宪又骂。

大家都不眨眼地看着标图板，航向240多度。几分钟后，很快北京军区空军的跟踪雷达报告280度。时念堂放松了，正是山海关飞往北京的方向。

吴法宪将这些情况随时报告周恩来。

三叉戟飞了14分钟,120多公里,来到唐山北边迁安县上空,飞机突然转向340多度。

“航向多少?”时念堂的心咚咚直跳,“是自己听错了?”他简直不敢相信,那是通向西北的方向啊!这飞机是要上哪里去呢?

把守空中防线,这是空军各部队从组建就非常重视的大问题,这在平时飞行中,也是机组非常敏感的话题。难道是……叛逃?有人猜是不是机组出了问题?

“不可能!”大家几乎异口同声地说,这可是在空军运输机部队中从未发生过的事件。

时念堂不知道机组有谁在飞机上,应该是潘景寅坐左机长,陈联炳坐右机长。机长潘景寅和第一副驾驶陈联炳都是航校七期学员,飞了十几年,时念堂同他们执行过多次专机任务,他们都是对党忠诚的老战士啊!

胡萍推门进来,脸上带着严峻而沉闷的表情,什么话也不说,只是一个劲儿地用右手掌在脖子上来回比划着,一看就知道是表示“杀头”的意思。看上去,胡萍的情绪已经沮丧到了可怕的程度。

李作鹏按照周恩来的指示,向山海关机场查问256飞机的航向,回答是:“西北。”

0时55分,李作鹏将飞机航向报告了周恩来。

李德生也已经赶到空军作战值班室,夜深人静,红旗轿车风驰电掣,不过10多分钟,他就从大会堂来到了空军机关大院。正在值班的空军副司令员曹里怀、副参谋长白云出来迎接,他们满腹狐疑,不知道总政治部主任半夜来到空军作战值班室做什么?

李德生对曹里怀说:“在北戴河海军机场,有一架空军的三叉戟飞机,可能要不经批准,突然起飞,中央命令我来直接掌握情况。”、

值班室内,空军作战、侦察、情报、通信等部门的值班参谋人员,听到李德生的说明,都明白是出了大事。很快,各个地面雷达站的报告直接传来,山海关机场的三叉戟飞机已经强行起飞。标图板上,跟踪记录着三叉戟256号的航行轨迹。

司令部的工作由参谋长负责,此时空军参谋长梁璞正在天安门广

场指挥国庆阅兵的预演。李德生要值班室立即通知梁璞迅速返回司令部。空军政委王辉球也接到通知赶到作战值班室。

标图板上,256 号三叉戟的航迹先向西,然后一直向北,已越过承德,到了内蒙上空。李德生立即将飞机飞行的方向和位置向周恩来报告。周恩来要求与空军作战室的调度员讲话。

空军作战室的调度员拿起了电话,话筒里传出周恩来的声音,他问:“如果我们用无线电向 256 号飞机呼叫,他们能不能听到?”

调度员说:“能听到。”

周恩来:“我要对潘景寅讲话,请给我接上。”

调度员说:“他开着机器,但不回答。”

周恩来:“那就请你向 256 号飞机发出呼号,希望他们飞回来,不论在北京东郊机场或西郊机场降落,我周恩来都到机场去接。如不行,在锡盟降落也可以。”

调度员按照周恩来的指示,连呼三遍,得不到回答,只好如实报告周恩来:“他不回答。”

13 日凌晨 1 时 05 分,吴法宪从西郊机场打电话找到在中南海的汪东兴,说林彪的专机已经起飞 30 多分钟了,飞机在向北飞行,即将从张家口一带飞出河北,进入内蒙古。吴法宪说:“飞机的方向不对头,是向蒙古方向飞了,要不要派强击机拦截?”

汪东兴说:“我立即去请示毛主席,你不要离开。”

毛泽东的房间里没有电话,电话在办公室里,离谈话的房间还有几十米远,汪东兴跑步过去报告。

1 时 10 分,毛泽东听了汪东兴的报告后说:“林彪还是我们党中央的副主席呀。天要下雨,娘要嫁人,都是没法子的事,不要阻拦,由他去吧!”

周恩来同意毛泽东的意见,让汪东兴马上去传达给吴法宪。汪东兴又跑回值班室,只告诉吴法宪一句话:“不要派飞机阻拦。”

空军值班室里,只有李德生知道林彪在飞机上,他紧张地注视着飞机的飞行方向。这时,刚从天安门阅兵排练现场赶回来的空军参谋长梁璞望着标图板说:“这架飞机飞行不一般,情况异常。”

李德生问:“有什么特点?”

梁璞说:“第一、飞的不是国际航线;第二、方向往北,马上就要出国境到蒙古了;第三、飞的是低空。”

李德生坐在标图前,不断将飞机的位置、高度、方向等等情况向周恩来报告。眼看飞机要出国了,他请示周恩来怎么办?要不要派飞机拦截?

周恩来在电话中对李德生说:“在你之前,吴法宪已经请示过了。毛主席说,林彪还是我们党的副主席呀!天要下雨,娘要嫁人,不要阻拦,让他飞吧。”周恩来还说,林彪是党中央副主席,把他打下来怎么向全国人民交代!

梁璞又一次焦急地问:“怎么办?”

李德生说:“这架飞机不能打,不能拦截,让它飞,这是总理的指示。”

西郊机场,地面雷达还在交替跟踪……

周恩来来电话问:“飞机到什么地方了?”

吴法宪回答:“离中蒙边境还有 100 多公里,高度 3000 公尺。……飞出国境,雷达看不见了。”

1971 年 9 月 13 日凌晨 1 时 55 分,256 号飞机在中蒙边界 414 号界桩上空进入蒙古境内。

林彪叛国了!

周恩来接到吴法宪报告:“256 号飞机在雷达的荧光屏上消失了!”

在空军指挥所的李德生也向周恩来报告了雷达信号最后消失的位置。

周恩来给吴法宪打去电话:“从现在起,不准任何飞机飞进北京。如有飞机来,你我都要掉脑袋,你要用脑袋担保。”

吴法宪说:“请总理放心,我绝对保证,如果有飞机到北京来,我会拦截,并把它打掉。”

接着,周恩来向吴法宪下令:“不准任何飞机起飞。如起飞,要毛主席、周恩来、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 5 人的命令。”

放下电话,吴法宪立即给北京军区空军司令员李际泰和沈阳空军司令员张雍耿打电话传达,要求他们打开所有的雷达,决不允许任何

飞机到北京来。并传达了周恩来的禁航命令。其它军区空军,他要空军司令部调度室向下传达。因为他此时更急于向空 34 师的时念堂当面交代:34 师在西郊、南苑、沙河三个机场的飞机,绝对不准起飞,要立即传达禁航的命令。

空军作战值班室也接到周恩来传达政治局的命令:“从现在起,凡没有伟大领袖毛主席、林副主席、周总理、黄总长、吴司令员联名签署的命令,一架飞机都不准起飞。”

这就是净空了,从此刻起,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空出现的任何飞行物那就是敌机了。空军参谋长梁璞命令两个作战参谋朱秉秀、徐心德同时向各军区空军、指挥所传达此令。很快,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禁空令”的书面指示就送到了空军值班室李德生手中。

雷达上目标消失,标图没有了。此时,西郊机场指挥所里,全屋人没有一个人言语,只是相互愣愣地对视,表情严峻,一时就像傻了一样,六神无主,只有吴法宪忙得不行,他不停地出出进进,这电话,那电话,搞得他胖胖的脸上大汗淋漓。看得出他是真急了,心急如焚,如坐针毡,一会儿打电话,一会儿来回踱步,完全是束手无策的样子。后来电话越来越多,多得让人简直招架不住,就像是第三次世界大战打起来了。

中南海,周恩来、汪东兴从毛泽东的卧室出来。汪东兴向周恩来请示说:“主席怎么办?他的安全问题……”

周恩来略加深思后说:“先转移到大会堂,那里条件好一些,以后看情况再定。”

凌晨 2 时,周恩来打电话问吴法宪在什么地方?吴法宪说:“在西郊机场。”

周恩来说:“我派警卫局杨德中去。”

吴法宪立刻就明白,这是监视他来了。

2 时 20 分左右,周恩来下达的中共中央政治局“禁空令”向全军、全国各机场和空军指挥所传达完毕。

这段时间,周恩来反复让李德生查清 256 号三叉戟从北京到西郊机场起飞时带了多少油?在山海关机场究竟有没有加油?根据飞机所携带的油量,究竟能飞多远的航程?

空军指挥所根据查实的数据计算,断定这架飞机肯定飞不到乌兰巴托,李德生将情况和空军指挥所的判断报告给周恩来。

周恩来从中南海回到人民大会堂。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内有一个北小厅,宽大的办公桌上摆着军用电话和各种电话,旁边还有一张小床。这里是周恩来常来办公和休息的地方。在这里,经毛泽东批准,周恩来亲自下达了应对林彪叛国事件后的一系列紧急措施。

首先,下达了全国禁空令:关闭全国所有机场。没有周恩来、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等5人联合签发的命令,任何飞机不准起飞。

同时,开动全部雷达监视天空,不许任何飞机飞进北京。

这时,正在睡梦中的中央警卫局副局长邬吉成突然被急促的电话铃声惊醒。电话是汪东兴亲自打来的:“中南海已经进入甲级战备,你负责立即布置钓鱼台的战备工作。”

邬吉成负责钓鱼台的警卫工作。

“我们这里战备到什么程度?”刚拿起电话的邬吉成睡意尚未全消。

“甲级,把部队拉出来,布岗、设置路障、挖工事。”

邬吉成一头雾水,这是怎么回事?搞演习的话,事先总应该有点前兆啊,难道真要打仗啦?邬吉成想再问问清楚,但听着电话另一端话语的简捷急切,似乎不容他有丝毫的延宕。他没再多问,放下电话,就去了驻守钓鱼台国宾馆的中央警卫团三大队,与大队长张云山、政委吴本海一起,按照上级的要求布置部队进入甲级战备。

三大队的一中队,除加强各楼的警卫外,其余的人员与二中队一起,在钓鱼台东大门到北门东面一线设防;部队在东门进门处,利用假山的自然掩体,架上几挺轻机枪,组成一个火力点;在北门内迅速挖好工事,组成一个火力点,用以阻止从大门实施的攻击。在钓鱼台院子里,部队在17号楼桥头、8号楼桥头设置了钉板路障,并阻断了各楼之间的路径,以阻滞进入院子的攻击者的车辆和抵抗集团冲锋。

留守北京毛家湾的中央警卫团二大队副大队长蒋廷贵也突然接到中央警卫局副局长张耀祠的电话,问他:“林立果在吗?”

蒋廷贵回答说:“在。”

张耀祠又追了一句:“是在吗?”

蒋廷贵说:“是在啊,林立果下午4点左右打电话要洗澡,让值班室给他烧洗澡水。”

张耀祠说:“不对,你去看看。”

蒋廷贵没有立即回答,警卫部队怎么能随便到首长家里查看呢?他们平时都不到首长家中,更何况现在是深夜?张耀祠感觉出蒋廷贵有些犹豫,果断地说:“叫你去看你就去看,怕什么?快点!”

蒋廷贵回答:“是。”放下电话,来到值班室。值班员告诉他:“林立果回来洗完澡就出去了,一直没有回来。”

蒋廷贵立即将情况报告张耀祠。张耀祠说:“人家都跑了!我命令你,部队立即进入一级战备,占领制高点,特别要防止空袭。”

蒋廷贵一听脑子嗡地一声,当时头都要炸了,怎么会出这样的事呢!时间紧迫,不容他多问,张耀祠也无暇解释。蒋廷贵立即回答:“是,坚决执行!”

放下电话,蒋廷贵立即按响值班室警报电铃,向部队发出紧急集合信号。训练有素的警卫部队虽然都在睡梦中,但也就几十秒钟,就集合完毕。蒋廷贵宣布了“有紧急情况,进入一级战备”的命令,并简短动员,然后部队按照早已拟定好的,并经过多次反复演练的作战方案,登墙上房,分头占领了制高点,并补充了弹药。

大约半小时后,蒋廷贵又接到张耀祠的第二个命令:“林彪办公室的秘书,现在在班上的,不准离开。不在班上的,明天就不再上班了。告诉他们在家听候通知。从现在起,不管什么地方送来的文件,秘书只准收,不准拆阅,也不准向外发送文件,保密室的钥匙要他们交出来,由你保管。你现在就去向值班秘书传达,并要求他们坚决执行,派一名干部带一名战士在现场监视。”

这天夜里,毛家湾林彪办公室的值班秘书是于运深。此时,他已经听到房上重重的脚步声。奇怪,谁敢上毛家湾的房顶?因为外面有层层警卫,而且毛家湾还有施工人员。他不能离开办公室,所以没有出去查看。说实话,也没有太当回事,他接着又睡了。

9月13日的早晨,天亮了。于运深去院子里收昨晚晾的衣服。中央警卫团荷枪实弹的卫兵站在值班室外,不让他出门了。这是怎么回事?难道钓鱼台又在搞什么事端?于运深大发脾气,“林副主席办公

室的工作耽误了怎么办?”警卫战士仍不放他出门,说这是上边指示。于运深无可奈何,只好退回屋里,什么也不让他干。于运深想不出会出什么事情。当蒋廷贵向于运深传达张耀祠的指示时,于运深一时傻在那里了,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觉得实难接受这个事实。过了好一会儿,于运深才醒过神来,问蒋廷贵:

“这是谁说的?谁叫你们这样做的?副统帅的办公室连着全军,一天有多少大大小小的事情要处理,耽误了你们能承担得起吗?”

蒋廷贵告诉他:“对不起,我是奉命行事,请你务必配合执行。支持我们的工作,我们还得留两名同志在这里,希望你配合照办。”

于运深继续追问:“这是谁的命令?”

蒋廷贵说:“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张耀祠。”

于运深一听,也就不说什么了。因为张耀祠是毛泽东身边的人,这肯定是毛泽东的意思。以后几天,于运深配合得不错,警卫部队不让他出屋,他也不出去,连晾在院子里的衣服也由警卫团的人替他收回来,文件也是只收不发。

# 第1191回：直升机，周宇驰挟持北上 急召见，北京吴德和吴忠

9月13日凌晨1时多，正在西郊机场招待所值班的直升机三大队副大队长陈士印接到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周宇驰打来的电话，说有任务，让他准备好直升飞机。1时40分，陈士印被从床上叫起来，拽进汽车，拉着就走。当他见到周宇驰便问："什么任务这么紧急？"

周宇驰给他看了一张纸条，说是林彪的"手令"，上边写着："盼照立果、宇驰同志传达的命令办。"然后对他说："去北戴河向林副主席汇报。小陈，这次我们带的东西多，云雀飞机装不下，你得找一架直五型直升机。"

陈士印说："我改装'云雀'后没再飞过'直五'，有些操纵数据都记不清了，恐怕……"

周宇驰打断他的话："那你到沙河机场后，找一位技术过硬的直五型机长，你当副驾驶。这次任务非常紧急，而且要特别保密，你只找一个机长，其他人不要惊动。"

2时30分，陈士印随周宇驰他们来到了沙河机场，将车停在三大队飞行员宿舍楼下，陈士印跑步去叫直升机团八中队中队长陈修文，他是驾驶"直五"技术最好的飞行员。

陈修文是出生在1937年的安徽人，家里很穷，祖辈四代种地主的地。在他出生后第二年，黄河花园口被炸开，发大水，家乡成黄泛区，不久父亲被国民党拉夫拉走，靠母亲要饭度日。1956年陈修文参军，1959年选飞。

陈修文听说有任务，立即穿好衣服，抓起图囊，就往外走。这是6人合住的宿舍，别人都不在，只有陈修文和陈国栋两个人。陈修文出去后很快又回来，摸黑打开柜子，拿了两包香烟。

陈国栋问："中队长，什么事？"

陈修文一边往门外走，一边说："小陈，起床后帮我把被子叠好。"

早上陈国栋帮助陈修文叠被子时,发现陈修文的手表还在枕头底下,床前地下扔着两团从皮鞋里掏出的纸。

3685 号直五飞机旁,陈修文很快做完飞行前检查,和陈士印进了驾驶舱。这时,周宇驰也进来了,坐在陈修文身后。汽车上另两个人,是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处长于新野和空 4 军政治部秘书处副处长李伟信,他们各自拎着两个沉甸甸的大皮箱进了后舱。

陈修文问陈士印:“紧急任务到哪?”

“北戴河。”

“干啥?”

“首长要去向林副主席汇报工作。”

陈修文起动发动机,并习惯地打开超短波电台的电门,准备请求调度室放飞。周宇驰从后面伸过手来关上了,说:“任务十分机密,不许与地面联络,也不许打开机外灯光。”

陈修文不认识周宇驰,正在疑惑,陈士印说:“大陈,这是空军党办周主任,这次任务由他空中指挥。”

9 月 13 日 3 时 15 分,3685 号直升飞机起飞。

警卫 3685 直升机的是 203 团警卫连战士何祖军。他看到有人要开飞机,却没有团领导在场,觉得有疑问,便借口上厕所溜走,于 3 时 02 分,给团值班室打了电话。

直升机大队所在的 203 团值班参谋马义德接到哨兵何祖军关于有人动用直升机的报告后,立即向团长刘景祥报告,刘景祥马上询问值班的政委杨庆升。杨庆升说:“刚接到师长时念堂传达的禁航令,不能让直升机起飞,快去堵截!”

203 团警卫连王连长立即骑自行车奔向 3685 号直升机。在路上,他看见 3685 号已经冉冉的飞向空中。

10 分钟后,空军指挥部接到沙河机场关于直升机起飞的报告,时念堂立即说:“不能叫它起飞,赶快叫它回来。”他放下电话,飞快地跑上三楼调度室,因为那里有一部直通沙河机场调度室的电话。他拿起电话就问:“是有飞机起飞吗?”

沙河机场调度室值班员小王说:“有,往西北方向飞了。”

时念堂问:“有多远?”

小王说:“200 多米。”

时念堂:“马上呼叫直升机回来!”

小王说:“飞得太远,呼不到。”

时念堂:“马上打一颗绿色信号弹!”

在机场,绿色信号弹是叫飞机着陆的信号。

信号弹升空,直升机的驾驶员看见没看见,不知道。但直升机没有返回来。时念堂无奈地放下电话,又跑下楼去向坐镇在这里的吴法宪和杨德中报告。

大飞机跑了一架,就够让人火冒三丈的了,小飞机又跑了一架,吴法宪又大骂起来,这是怎么搞的啊?吴法宪当即命令:“不准起飞,如果起飞就把它打下来!”

说完,吴法宪和杨德中进到小电话间,吴法宪向周恩来作了报告。

周恩来同意吴法宪的处理意见,同时要吴法宪查一查,飞机上的 3 个人究竟是谁,是地方的还是部队的?

李德生也接到沙河机场又起飞了一架直升飞机的报告后,他叫梁璞问沙河机场,为何在接到禁令后,还让飞机上天?机场报告说:“周宇驰出示了林彪的手令。”

地面电台这时向直升飞机呼叫返航,没有回音。

此时,毛泽东已搬到人民大会堂 118 厅。周恩来、汪东兴都在这里。他们接到李德生从空军司令部打来电话,说:“北京沙河机场有一架直升机飞走,机号是 3685,机上有周宇驰、于新野、李伟信和正副驾驶员共 5 人,直升机正向北飞行。”毛泽东和周恩来几乎是异口同声地说:“下命令,要空军派飞机拦截。”

周恩来补充说:“迫使它降落,不听就把它打下来,绝不能让它飞出去。”

不久,吴法宪报告周恩来说:“飞机飞向南口方向,我已经命令张家口的歼七飞机准备起飞拦截。如果直升飞机飞向国界,就把它打掉。”周恩来表示同意。

当直升飞机飞越南口和怀来时,吴法宪又向周恩来报告了一次。

3 时 25 分,空军作战值班室,李德生、空军政委王辉球、空军副司令员曹里怀、空军参谋长梁璞、副参谋长白云全部在场。李德生问了

梁璞一些技术问题后,立即叫梁璞命令北京空军部队起飞8架歼5甲战斗机拦截直升机!

再说周宇驰他们乘坐的直升机起飞后,很快进入正常爬升。周宇驰说:“航向320度,高度2600米。”

陈修文又疑惑了:“不是去北戴河吗?怎么320度?”

“任务机密,不能直飞,你们不要多问,按我给的航向飞。”周宇驰1971年5月住进沙河机场二号楼,专门学习驾驶从法国进口的轻型直升机“云雀”。3个多月,飞了66个飞行日,75场次,184个小时,所以还算内行。

这时,陈修文耳机里响起地面机场的呼叫:“3685,3685,你听到没有,请回答!”

陈修文刚要回话,周宇驰慌忙阻止,说:“任务机密,不要回答。”

飞机飞到张家口上空,张家口机场的灯光已经在望,按照过去的惯例,飞这条航线必须在张家口降落。但周宇驰指着地图命令向前飞,往张北以北飞。

陈修文想再往北,就出国境了。

被强烈震惊的陈修文,趁周宇驰往外观察时,按下送话按钮,大声说:“油量不够,要下去加油。”

张家口机场调度室的值班员清楚听到了陈修文的说话,并作了记录。

周宇驰大声说:“不能落地,落下去谁也别想活。国内有人要谋害林副主席,林副主席一家已经乘坐你们师的三叉戟飞到乌兰巴托了,我们要去那里与林副主席会合。”

陈士印、陈修文同时都瞪大了眼睛。

“飞出去!这是林副主席的命令,不老实就崩了你们!”一支五四式手枪顶住了陈修文的后腰。

这时,起飞的8架歼5甲飞机都没有找到目标。因为夜航作战,全凭机上雷达导航。歼5甲飞机和直升飞机速差非常大,又是从高空往下搜索,低空飞行的直升飞机和各种地面物体都反映在飞机雷达上,如满天繁星,根本无法确定目标。

后来又起飞了5架次歼击机,并采取地面为歼击机导航,指示目

标位置。

有趣的是,这13架次飞行并没有5人联名命令,但是有李德生转达的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指示,各级部队不择不扣的执行了。

直升机上,李伟信问于新野:“我们今日将会是怎样的结果。”

于新野说:“不成功便成仁。”

天开始发亮,直升机可以看见头顶上有歼击机飞来飞去。正巧有一架歼击机从头顶飞过,陈修文大声喊:“有歼击机攻击我们。”

周宇驰连忙向外张望,陈修文乘机将磁罗盘的指针拨转180度。这时,歼击机开炮了,虽然没有打中,却给陈修文找到借口,他来回压杆蹬舵,飞机时左时右,扭起了“秧歌”。当飞机平飞时,虽然罗盘航向还是320度,而实际飞机已经朝北京方向飞了。

周宇驰问:“你为什么左右转弯?”

陈修文说:“避开歼击机,机动飞行,要不会被打下来。”

周宇驰看罗盘还是320度,就没有再怀疑。直升机经张家口、宣化等地飞回北京。周宇驰看见密集的灯光,忙问:“你怎么飞回来了?你骗了我们,你也甭想活,快,飞回去,要不我毙了你。”

陈修文说:“油不够了,飞不出去。”

“那就飞钓鱼台,快,飞钓鱼台。”

陈修文什么话也不说,继续向沙河机场飞去。

当直升飞机飞回到沙河上空时,吴法宪又向周恩来报告说:“看样子是要在西郊机场降落,但是万一飞向北京市里,我就把它打掉。”

周恩来也没有异议。

吴法宪放下电话,和杨德中一起走出候机室,来到室外。此时,天已蒙蒙亮。他们遥望天空,可以隐约地看到直升机了。

专机师师长时念堂也从候机室窗口看见一架直升机从颐和园的万寿山上空飞来,直升机正往下滑,看样子是要降落。他判定是逃跑的那架直升机,立即命令警卫连过来一个全副武装的加强排到候机室。时念堂指着将要落地的直升机命令说:“只要飞机一降落就包围起来,劝他们投降,如果抵抗就击毙。但注意不要伤害飞行员。好啦,准备吧。”

但是,直升机下滑到距离机场一公里处,高度20多米,两次着陆

没有成功,直升机又拉起来往沙河方向飞去。时念堂立即打电话向沙河机场布置了同一套方案,叫他们的警卫连立即出动,将下来的直升机上的人员全部抓起来。

吴法宪向周恩来报告说:“我已经命令由空20师来接替空7师继续跟踪。”

周恩来说:“好!”

直升机在沙河那边也试着落了两次,还是没落下来。时念堂及时向吴法宪作了报告。

直升机最终放弃着陆动作,向沙河以北的山里飞去了。

吴法宪打电话报告周恩来,说:“如果飞机向海外飞行,或者向大连方向飞行时,我就命令跟踪的歼击机把他打掉,主要是怕飞机飞往南朝鲜。”

周恩来都表示同意。

人民大会堂,周恩来将北京市革委会主任吴德、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吴忠召来。

吴德和吴忠12日下午参加完毛泽东丰台专列上的接见后,坐在同一辆车上,驱车回城,径直来到吴忠的家里。

吴忠关上房门,吩咐任何人不得打扰,他与吴德一起对毛泽东的谈话内容逐句进行回忆,仔细研究毛泽东每句话的含义。

是否要向市委常委和卫戍区党委成员传达毛泽东谈话的精神?两人犯了难。没有上边的指示,传达毛泽东的谈话是不妥的。如此令人震撼的谈话,不传达行吗?领袖对他们讲这些又是什么意思?子夜24时,吴德和吴忠各吃了碗面条权当晚饭。这时,中央警卫团政委杨德中给吴忠打来电话,说:“总理问,预演什么时候结束?”

原来,当天晚上,天安门广场搞国庆节游行彩排,38军等部队搞分列式。

吴忠回答说:“两点钟差不多可以结束。”

杨德中说:“总理的意思可否提前结束?”

吴忠说:“可以,现在就可以结束。”

放下电话,吴德、吴忠俩人又谈起如何传达毛泽东的谈话精神,一直讨论到9月13日凌晨1时多,也没有想出一个好办法。

最后,吴忠说:“要不看李德生、纪登奎他们怎么传达,我们就怎么传达。”

吴德说:“只好这样了。脑袋都昏了,干脆先睡觉,明天再说。”

凌晨2时30分,刚躺下不久的吴忠就被急促的电话铃声吵醒,作战值班的专线电话里传出秘书李维赛急促的声音:“司令员,周总理要你立即到人民大会堂,有紧急任务。车子已在你楼下等候。”

很快,刚从睡梦中惊醒的吴忠就坐车到了人民大会堂。中央办公厅的一位工作人员已在门口等候,马上把吴忠带到了周恩来设在大会堂的办公室。

吴忠进屋后,发现吴德已经坐在沙发上,“二吴”刚刚分手还不到一个半小时,此时又在此相遇。两人点头示意,算是打了招呼。周恩来没在,吴忠走到靠墙的一张椅子坐下。

大约过了半个多小时,周恩来走了进来。只见他面色苍白,神情冷峻,似乎忽然苍老了许多。见吴德、吴忠坐在沙发上,周恩来没有寒暄,指着门说:“主席就在这里。”

他接着说:“刚才接到报告,从沙河机场起飞了一架直升飞机,朝北飞行。空军歼击机起飞拦截后,雷达显示,直升飞机在怀柔以西20公里的上空盘旋,可能要迫降。”

随后,周恩来对吴忠命令说:“卫戍区派部队包围山区,赶快把迫降的飞机找到。飞机上一定有党和国家的许多核心机密,一定要搞到手,不能毁掉。”

吴忠当即在人民大会堂给卫戍区警卫3师打电话,要求离怀柔最近的3师7团赶快出发,一定要找到那架迫降的飞机,不能让上面的东西毁掉,马上行动。

接着,他又打电话给卫戍区司令部,要求怀柔和延庆民兵出动,包围周围的山区,实施拉网式搜索飞机和飞机上的人,不能让跑掉。同时,派卫戍区副司令李刚到现场指挥,要求他以最高速度赶去,但不能翻车,并要通信部门拨一条专线,保持通话。

# 第1192回：定方案，卫戍区紧急动员 四川厅，召开政治局会议

吴忠打完电话回来，周恩来立即进入正题："我们就不用打哑谜了，叫你们来，是要宣布一件重大而严重的事件：林彪跑了，带着老婆、儿子从北戴河乘飞机往北边跑了。他这是自绝于党和人民，是叛国投敌的行为。现在已经可以断定，林彪出逃的目标是苏修。"

吴德和吴忠当时就震惊了，虽然昨天下午在丰台已经听了毛泽东的谈话，但没有想到事情会发展到如此严重的境地。

周恩来停顿了一下，继续说："党的副主席外逃，这是我们党和国家历史上从未发生过的严重事件。国内外会有什么反应？会出现什么样的后果？现在还无法预料。但林彪的党羽、死党不少，要防止他们趁机作乱，同时也要防止国外反动势力趁火打劫。毛主席和党中央已经做好了应付最坏情况发生的准备。"

周恩来布满血丝的眼睛紧紧盯着吴德和吴忠，神态变得异常严峻："现在我宣布毛主席、党中央的决定：首都立即进入紧急战备状态，由你们两人具体负责执行。你们要对毛主席、党中央负责！你们要绝对保证毛主席、党中央和首都的安全！"

吴德、吴忠同时站了起来，情绪激动地表示："请毛主席、党中央放心，我们决不辜负党的信任！"

周恩来示意他们坐下："当务之急，是要确定首都进入紧急战备状态的实施方案。你们有什么想法，提出来一起讨论。吴忠同志，你是卫戍区司令，你先讲。"

这时，38军112师正在赤峰拉练，还在行军途中。周恩来对吴忠说："这个师就不到保定附近了，归你指挥。"

吴忠建议把112师放在昌平，周恩来同意。遂后，根据周恩来的指示，中央决定38军及坦克1师、炮6师统归北京卫戍区指挥，卫戍区下属兵力由原有的4个师增加到10个师。防御区域重点是北至南

口,东到首都机场,南到河北保定以北。所有进入北京地区的部队,一律由卫戍区统一部署指挥。

一番简短的讨论之后,周恩来在一张纸上归纳了吴德和吴忠所开列的措施,并当即向“二吴”下达了命令:

1、卫戍区部队立即协同首都民兵,严密搜索外逃的直升飞机,要人、机并获,并将搜缴物品直接报送中央。

2、卫戍区部队立即出动,严密封闭北京的所有机场,没有中央的命令,任何飞机不许起飞和降落。若有飞机不执行禁飞令,坚决予以击落。

3、立即查封林彪集团在北京的所有黑据点,并搜集罪证。

4、卫戍区立即向中南海、人民大会堂附近地区增派部队,协助中央警卫团,确保毛主席、党中央的安全。同时,加强新华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人民日报社、电报大楼等要害单位的警卫力量。

5、首都所有驻军进入一级战备,由卫戍区统一部署指挥。

周恩来最后说:“现在是非常时期,你们不能睡觉了,马上进入战备状态,一分一秒都不能耽搁。从现在起,你们只对我负责,向我直接报告。在发生突然情况和联系不上时,可以临机处置,先斩后奏。”

吴德和吴忠准备离开时,周恩来又说:“现在情况还不明朗,中央决定对林彪外逃事件严格保密。北京市的范围内,只限于你们两人知道,不允许向任何人泄露。”

吴忠略加思索后说:“总理,我建议增加杨俊生同志参加组织指挥工作。”

周恩来不动声色,问:“为什么?他可以信任吗?”

吴忠回答:“我向中央保证,杨俊生同志是绝对可以信任的。他是卫戍区政委,有他参加,便于指挥部队执行任务。”

周恩来遂决定:“同意你们的建议,增加杨俊生参加首都紧急战备的组织指挥工作,同时可以向他说明事件真相。此事只准你们3人知道,不准扩大。”

周恩来、纪登奎在人民大会堂召见北京军区政委陈先瑞。周恩来说:“林彪跑了,现在情况不明,北京军区立即进入一级战备。”

周恩来让纪登奎去北京军区空军司令部。

同时,周恩来指示外交部:密切注意外电反应,抓紧研究和提出因林彪事件可能引起的对外交涉所需的应对方案。

吴德和吴忠回到了卫戍区,紧急打电话叫来杨俊生,向他传达了周恩来的指示。随后,3 人共同拟订了紧急战备状态的部署方案,决定:卫戍区机关和所属部队立即进入一级战备状态,紧急集合,汽车发动,枪不离手,就地待命,确保一声令下,迅即出动。

按照惯例,作战命令应该由军委办事组下达,但这次是周恩来直接下达了命令。吴忠根据周恩来指示,通知卫戍区作战值班室:

“从现在起,卫戍区机关及部队只执行来自周总理办公室和吴德、吴忠、杨俊生 3 人下达的命令。对来自中央军委和解放军三总部的所有电报、电话,只收听,不回复。卫戍区部队的任何部署和调动,一律不上报中央军委和解放军三总部。”

卫戍区部队动员以后,迅即向各自的作战目标集结。负责加强中南海、人民大会堂警卫任务的部队,进入指定位置,并在外围地带布置了大批荷枪实弹的军人。在中南海、人民大会堂和中央首长驻地附近,卫戍区派驻的岗哨和便衣流动哨密密匝匝,严密注视过往行人、车辆,随时准备应付突发情况。

负责新华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等要害目标警卫任务的部队也迅速到位,干部亲自带哨,官兵荷枪实弹,同时在目标周围秘密安置了大批武装人员。

按照周恩来的指示,从卫戍区机关抽调的数十名干部组成的搜查分队,秘密包围了林立果在北京西郊机场、空军学院、东交民巷、沙河机场的 5 个据点,扣押这些据点的全部人员,封存全部材料和物品。因为这 5 个据点都是军人把守,搜查分队做了最坏的打算。他们动作迅速,还没等里面的人明白是怎么回事就冲了进去,5 个据点里的留守人员基本未作抵抗。

担负封闭机场任务的卫戍区部队,携带各种重型装备,于 13 日凌晨进入北京附近的 5 个军用机场:西郊机场、南苑机场、沙河机场、良乡机场、东郊机场,迅速夺取了机场的控制塔台,在跑道上设置了障碍物,并封锁了机场周围的道路。吴忠向各机场负责人传达中央指示,要求密切配合卫戍区部队执行命令。机场地勤人员还算配合,未发生

大的冲突。

进驻机场的卫戍区部队接受的任务是：

第一，封锁机场各部位，控制塔台、机库、油库等重要目标。真枪实弹对准跑道，如有飞机强行起飞，可以开枪开炮，击毁。

第二，在机场跑道上设置木头等障碍物，还把大卡车横在跑道上，禁止一切飞机起飞和着陆。

第三，将机场停放的所有飞机上的油料全部抽掉，增派武装部队严密看守油库。

到13日东方发白时，卫戍区部队按照周恩来的指示全部到达指定位置。

此时，中央警卫团专门成立了机炮大队，一处设在钓鱼台，一处设在故宫。邬吉成本来想把机枪和高炮架在西华门边的屏风楼上，但安装时发现根本弄不上去，只好算了。当一切都布置妥当后，东方已初露熹微。邬吉成刚进办公室，电话就响了起来。他拿起电话刚“喂”了一声，就听见电话里，汪东兴不容分说的一顿劈头盖脸的斥责：“我打了几次电话，到处找你，你到哪里去了？现在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到处乱跑！”

“不是你通知要进入紧急战备吗？我布置到现在，才回到办公室。”邬吉成能感到那怒气从听筒弥漫出来，他解释说。

“哦……我忘了，已经通知过你了。对不起，对不起。”汪东兴口气马上缓和下来，挂了电话。邬吉成搁下电话一个劲犯嘀咕：“汪东兴这是怎么啦，他可不是个好忘事的人，居然也会前脚交代的事情，后脚就忘了？还动不动就发那么大的火？”

再说周恩来，一切应急措施安排完后，他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在人民大会堂四川厅召集政治局会议。

9月13日凌晨3时许，邱会作被公务员张军到卧室叫醒说：“刘秘书来电话说，总理通知，在人大会堂四川厅开政治局会议，要你立即去。刘秘书一会儿就会送公文包来，小朱（警卫员）也起来了。”

邱会作马上起来。他刚吃了安眠药，脑袋晕晕忽忽的，就这样晃晃悠悠来到人民大会堂四川厅，看见江青、姚文元等人已经先到了。先到的人同平常一样，有的抽烟，有的像一尊菩萨一样，静坐在那里。

邱会作看到人还没有到齐,估计一下子还开不了会,就到四川厅外面活动、活动,清醒一下头脑,回来后又坐到原来的位置上。

四川厅是人大会堂一个比较大的厅,在大厅东南角摆了一圈沙发,成椭圆型。不久,张春桥也到了。同时,李作鹏也在警卫员的搀扶下进入会场。0时55分,他向周恩来报告了256飞机的航向后,就吃安眠药睡下了,这才两个小时,起来后站不稳,所以晃悠的比邱会作还厉害。

李作鹏清醒一些后,向坐在旁边的江青打听到:“江青同志,今天开会是什么事呀?”

江青说:“等一会就知道了。”

邱会作也猜不出半夜召集紧急会议是为什么?他事先听说周恩来、黄永胜他们在人民大会堂修改政府工作报告,那也用不着半夜开会啊?会不会是倒霉的“庐山”又发作了?从北戴河那边的情况看,也不大像。几个小时前,叶群还从北戴河打电话来祝贺邱会作有了孙女,称赞他给孙女起的名字好,还说女儿豆豆订婚了,要邱会作的夫人胡敏打个电话给豆豆祝贺。看来,不会有什么麻烦事,要不,叶群哪有心思给女儿办婚事?……可是为什么半夜开紧急会议呢?狐疑的邱会作小声问李作鹏:“知道什么事吗?”

李作鹏已经知道山海关机场的三叉戟起飞的事,他说:“可能是北戴河出事了。”

邱会作想:“北戴河?能出什么事呢?”

并不是政治局委员的华国锋也被一阵电话铃声从睡梦中唤醒,通知他到人民大会堂出席周恩来召开的政治局会议。同样不是政治局委员的余秋里也被通知参加了这次会议。

5时左右,已经可以看到窗外的光线,天都快亮了,周恩来才走进四川厅,叶剑英、黄永胜、李先念等人跟在他后面,他们在大会堂参加修改《政府工作报告》,一宿也没有离开。

周恩来进来后坐在南面的正中间,习惯性地扫视了一下全场,然后对江青说:“江青同志,今天晚上发生的事你不会感到突然吧?”

江青毫无反应。接着,周恩来提高嗓门宣布:“林彪坐飞机走掉了,飞机出境到外蒙古了。”

在场的人瞬间僵在那里,有的张着嘴巴,有的竖起耳朵,但每个人的双眼都盯着周恩来。大厅里静到能听到自己的心脏在跳动的声音。此时,一根针掉在地毯上的声音仿佛都听得见。邱会作事后回忆说:当时“我的脑子都麻木了。”大家面面相觑,谁也没有讲话,也不知道该说什么。

这时,周恩来合眼有两分钟,拿起茶杯喝口茶,然后开始叙述林彪出走的情况。他说:“林彪出走是突然的。在事件发生之前,不仅没有人想到,也是根本没有人敢想。”

他接着说:“12 日晚上 11 点半的样子,叶群来电话说,101 想动一下,去大连住几天再回北京开三中全会,特向总理报告。

我问:什么时候起身?

叶群答:今晚走,准备空中走。

我说:晚上飞行不安全,不要坐飞机走。三叉戟才进口,驾驶员还不熟悉。明天白天走,可以坐飞机。

叶群说:你知道,那个急性子(指林彪)很难说服得了。

我说:为了安全,必须这样做。你应当耐着性子做说服工作。”

周恩来接着说:“11 时多一点,接到北戴河中央警卫团的报告说:叶群宣布,周总理同意首长今晚起身去大连,叶群一宣布就上汽车走了;接着,林豆豆从北戴河中央警卫团打来电话说:‘他们(指叶群、林立果等人)坐汽车把我爸爸搞走了。’”

“接到豆豆第三次电话,是 11 点多钟了。”

周恩来又说:“这个人的脾气是很怪的,很难说服他不走。但为了安全,我还是命令警卫部队要把他们追回来。晚上无论如何不准放行,出了问题怎么负得了责?!”

“叶群他们到山海关机场之后,是采取紧急上飞机的办法走的。在当时的情况下,基层单位是很难拦得住的。”

“林彪上了飞机之后,机组的人并没有到齐,飞机就发动了,林彪乘坐的飞机,是在没有机场放行命令的情况下,强行起飞的,起飞的时候可能是 13 日 0 时 30 分左右。”

“林彪的飞机强行起飞之后,是在京山航线飞行的,空军的雷达看得很清楚。但到了接近承德时飞机徐徐下降,到了承德上空雷达搜索

到一次,飞机调头向北去了。”

“13 日零时左右,还得到住北戴河中央警卫团的报告说:林彪的老警卫员,现在的保卫处长李文普,从北戴河到山海关的途中被打伤了,又据说林豆豆的报告,昨晚林彪已服了安眠药,在北戴河上汽车都是两个人扶着上去的。这些情况都还有待查清楚。”

“他们上车后,不久李文普跳下车来,受了伤。”

他最后说:“能想到的办法都想到了。……飞机是强行起飞的。”

周恩来刚讲完,江青把小毛巾向茶几上一摔边起身边说:“林彪历来都是镇压我的。”然后向厕所走去。

没有人说话。

周恩来继续说:“目前此事要暂时绝对保密!请你们呆在这里,都不要离开四川厅。”说完,他起身走出四川厅,对厅外的环境作了进一步的安排,指定专人看守厅门,无关人员不准进入,所有随领导们进来的人员,一律原地休息,谁也不准靠近四川厅。

接着,周恩来叫黄永胜随他来到东大厅的北小厅,拿起保密电话,亲自逐一给全国各大军区和各省市自治区的主要负责人打电话,通报林彪外逃情况。

# 第1193回：忙通报，周恩来分秒不停 难逃脱，周宇驰自杀身亡

当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的秘书李文卿接到北京总机的电话，说“周总理让许司令听电话”时，他急忙跑上楼去敲许世友的门。许世友一听是周恩来的电话，一骨碌爬起来，动作非常麻利。

李文卿先跑下楼请示周恩来要不要加密，周恩来说要加密。结果，原来好好的加密机怎么也加不上密。最后，周恩来说：“算了，不要加密了。”

许世友接过话筒：“总理吗？我是许世友。”

“庐山上第一个发言的那个人带着老婆、儿子跑了。你们要听从党中央、毛主席的指挥，从现在起，立即进入紧急战备。”周恩来的声音清楚，因为没有加密，话讲得含蓄。怕许世友反应不过来，他又补了一句：“毛主席下面经常生病的那个‘老病号’跑了。”许世友马上就明白了。

“知道了。”许世友表情严肃，却无意外的惊愕。

“你们要看住所有军用、民用机场，码头，”周恩来说，“不要让飞机和舰艇跑了。发现可疑的人和飞机立即扣下来。可派陆军进驻机场。”

“请总理放心，我立即布置。”许世友放下电话，叫秘书立即通知南京军区参谋长肖永银速来中山陵8号。接着，又用保密机给上海王洪文打电话，对他说：

“刚才，总理给我打电话，要我通知你，你们那个姓王的上级的上级跑了！懂了吗？”

王洪文拿着电话一听，愣住了，没有反应过来，忙问：“你再说一遍。”

许世友大声说：“你们那里到庐山去开会的姓王的，知道吗？”

王洪文马上意识到这是指王维国，立即答道：“知道，知道。”

许世友又说:“他的上级的上级跑了,现在听懂了吗?”

王洪文想,王维国是驻上海的空四军政委,王维国的上级是南京军区空军,南空的上级是在北京的空军司令吴法宪。吴法宪在庐山犯过错误,给毛主席写过检讨,开“批陈整风”会时,主席还严厉地批评过他。王洪文以为是吴法宪跑了。

许世友很急,在电话里不停地问:“你听懂了吗?你听懂了吗?”

王洪文回答:“懂了,听懂了。”

许世友挂了电话,然后缓步上楼,坐在餐桌旁等着。这张圆桌既是吃饭和请客的桌子,也是小范围谈工作的桌子。副司令员兼参谋长肖永银很快赶到这里,许世友对他说:

“肖永银同志,刚才总理来电话说,林彪跑了。现在保密,只能你一个人知道。你通知南空,飞机一律不准起飞;通知东海舰队,舰艇一律不准出海。如果跑掉一架飞机、一艘舰艇,惟单位领导是问。舰艇好办,一个人开不跑。飞机的机动性大,一个人就可以开,如果冲上跑道,你拦都拦不住。总理指示让陆军进驻机场。我看每个机场派一个陆军营,乘大卡车进机场,就把卡车停在跑道上。”

肖永银说:“这个办法好。”

许世友让他先给南空和海军航空兵打个招呼,以免陆军进驻时发生误会:

“你马上回去部署,要加强值班,你要待在作战室,我今天也不外出。部队进机场后,立即向我报告。”

许世友送走肖永银,又嘱咐秘书不要离开电话机。

秘书李文卿有生以来从未经过这么严重的突发事件。方才一阵忙碌,这时仿佛刚刚清醒,只觉得背后汗津津的发凉,心脏仍在怦怦急跳,做了几次深呼吸,才努力使自己平静下来。

床头红色电话机的急促铃声将福州军区司令员韩先楚从睡梦中惊醒,他拿起电话,话筒里传出周恩来的声音:“是韩先楚同志吗?我是周恩来。”

“是我,总理。”韩先楚赶紧答道。

“‘老病号’跑了,部队立即进入一级战备。”周恩来命令说。

“老病号?”韩先楚一时没明白周恩来说的“老病号”是谁,他以为

是徐海东,在他心里,他的老领导徐海东才是“老病号”。可徐海东不是去年已经去世了吗?怎么又跑了?韩先楚不明白,在电话中问:“是谁跑了?”

周恩来换了一个说法:“就是第二个张国焘嘛。”

韩先楚还是不大明白。周恩来着急地说:“你们还不懂吗?我再说一遍……在庐山会议上第一个发言的那个人,经常生病的那个人,出问题了,听懂了没有?”

直到对方答“懂了”,他才放了心。

韩先楚终于明白了,是林彪跑了。他站在那儿愣了、懵了、傻了……怎么会呢?但确确实实,实实在在是周总理的声音,是从北京打过来的电话。

放下电话,韩先楚缓过神来,立即调动有关部队,架设战备通讯线路,控制要害部位。同时指示情报部长孙如奎加强情报工作,对于苏联军队及海峡对岸的国民党军队有何动向,要随时向他报告。

武汉军区司令员曾思玉接到周恩来的命令后,立即把副司令员李化民召来,具体负责武汉军区的指挥,李化民就住在了作战值班室。为了防止武汉军区管辖内的机场万一有飞机起飞,统一布置将汽车停在机场跑道上。汽车不够,他居然调来一部分拖拉机。另外通知陆军进驻机场。驻平顶山的坦克13师接到命令后,星夜急驰,首先开进鲁山机场。不明情况的空军人员还在大门口欢迎。当坦克在跑道中央停稳后,空军才发现不对头,问为什么?13师的人回答:命令坦克就停在这,我们觉的也不妥当,可还得执行命令。

周恩来给兰州军区政委冼恒汉打电话说:“那个经常生病的人跑了,……你立即和张达志同志商量部署一下西北方面的紧急战备。”

这一圈电话打下来,周恩来的嗓子都喊哑了。

做完这一切后,天已经大亮了。人民大会堂外面,丝毫没有显示出什么异样。人们依旧是那么的平静,该上班的上班,该上学的上学,该散步的散步。天安门广场上,首都民兵师的队伍还在演练队形,准备迎接国庆22周年的检阅。广播喇叭的新闻播音中还不时出现“林副主席”的字眼。外面的行人谁又能料到,庄严的人民大会堂里刚刚度过了一个惊心动魄的不眠之夜!

人民大会堂内,东大厅的北小厅,周恩来在办公桌前陷入了深深的沉思。连卫士轻轻地把窗帘拉开和关灯的声音都没能把他惊动。周恩来从12日晚上19时30分吃过一顿饭后,到现在已连续紧张工作十几个小时没吃东西,也没休息。卫士担心他的身体,但此时此刻也不敢说什么,只能在一旁静候。

沉思了好一阵子,周恩来起身走出北小厅,前往毛泽东所在的118厅。往常,周恩来总是会问:“主席休息了没有?”但这次他没问,他知道毛泽东肯定没有休息。

在四川厅参加政治局会议的人员一直等到天明,周恩来终于回到了四川厅。叶剑英对他说:“林彪不会去蒙古,有可能到苏联去了。我们要发表一个声明,在军事上后发制人,但在政治上要先发制人,我们的公开声明,主要是给苏联人看的。”

周恩来说:“可以发表一个声明,只有几句话就行了。”

黄永胜等人也表示同意。于是,叶剑英一边说,政治局作记录的秘书一边记,声明很快就写好了,只有100多个字,周恩来认真看后,派人去打电话问:

“主席睡了没有?”

很快得到报告说:“主席没有睡觉。”

声明稿送到毛泽东那里不久,周恩来就去接毛泽东的电话。他回来后说:“主席指示,声明现在不要发,看看情况再说,林彪究竟到什么地方去了,现在还不确切知道。主席说,即便到苏联去了,他就能当他们的国防部长?就有指挥军队的权力?……”

大家听了之后,没有一个说话的。

接着,政治局研究防止苏联乘机从空中和地面突然进攻的问题,主要是黄永胜讲,综合起来有三点:

一、三北(东北、华北、西北)进入战备状态。三北的国境线上的部队进入一级战备。

二、各战略方向的二梯队,进入一级战备状态。统帅部的总预备队,进入一级战备状态。三北的空军部队的战备请总理亲自部署。

三、北京要对空进行战备。

黄永胜说完,周恩来指示他立即做出全军应急作战部署,并要求

中央所有领导人都要住在有防空设施的地方,以防苏联用原子弹突然袭击。为此,他做了如下安排:

一、周恩来、叶剑英、江青、黄永胜、张春桥、姚文元、吴法宪等人住人民大会堂,这里也是中央和中央军委办事组的指挥所,副总参谋长阎仲川为战备值班室的总负责人。

二、李先念、李作鹏、邱会作、华国锋、余秋里住京西宾馆。

三、纪登奎住北京军区机关。

四、李德生住空军机关。

五、康生仍住玉泉山,暂时不要回钓鱼台。

最后,周恩来说:“毛主席的防空问题,由我向主席请示后再定。”

对山海关机场留下来的空军人员,周恩来指示:凡是到了山海关没有走的人,集中管理,这批人一律由海军李作鹏负责组织专门人进行审查,然后再处理。

同时,周恩来宣布:撤消三中全会的工作班子。这件事由邱会作负责处理。一、通知王良恩全会推迟进行,把工作班子一律撤消。二、把京西宾馆通往空军办公大楼地下室的防护门打开。一旦需要时,住京西宾馆的人可以进入地下室,经过空军地下室向外疏散。三、通知铁道兵在空军地下室通往地铁的出口处停一列火车。

周恩来派李先念和华国锋分别到总后勤部、海军司令部指导工作。邱会作负责京西宾馆的工作。

当他把所有紧急的问题都处理完了,最后郑重宣布:“伟大领袖毛主席安全回到北京来了,并已进住中南海。”

江青说:“昨天下午,我已经到中南海把主席卧室的窗户打开了,换了空气。室内也做了卫生消毒处理。”

周恩来说:“啊!我是主席回到丰台以后,才知道这一情况的。”

李作鹏原定这天上午要到体委参加11月在北京举行的亚非乒乓球邀请赛领导小组会议,因为他是周恩来指定的组长。政治局紧急会议结束后,他向周恩来请示:“是否还按计划召开领导小组会议?”

周恩来说:“一切按正常进行。”

李作鹏在大会堂吃了早饭后,离开会的时间还早,就坐在沙发上想睡一会儿,但怎么也睡不着,脑子里很乱,对周恩来刚才所说的一

切,他感到异常惊讶。首先对林彪的叛逃,太意外了。其次,“原来总理在12日夜早已知道林彪如此详细的情况,但是却没有向我透露任何蛛丝马迹,把我蒙在鼓里,茫然不知所措的处理机场问题。”李作鹏反复想着其中的缘由。

政治局会议结束后,华国锋按照周恩来的安排,乘坐自己的红旗轿车缓缓驶进了海淀区西三环中路公主坟海军大院。海军司令部大楼里首长值班室里的值班首长是海军参谋长潘焱,已经得到总理办公室的电话通知。他一边叫值班参谋以最快速度通知在家的其他几位海军首长到战备值班室,一边立即到大楼下迎接总理派来的全权代表华国锋。

在战备值班室里,华国锋坐在一张大办公桌后,桌子上是能够直通周恩来的保密电话。华国锋面色沉静,默默的看着忙碌的参谋们,没有说话。

很快,海军第二政委王宏坤,副司令员吴瑞林、周希汉、周仁杰,政治部主任张敬一等人都赶到海军战备值班室,个个面色凝重。

这时,我们再说周宇驰劫持的那架直升飞机,在怀柔沙峪的一个空地上空盘旋了5圈后,开始降落。当直升机降落到离地还有40米时,陈修文突然转身向周宇驰扑去,周宇驰连续向他开了两枪,把陈修文打死。

此时飞机完全失控,突然仰头,进入最危险的“尾冲”。陈士印试探性地向正前方推了两次驾驶杆,都没有将飞机改出来,第三次重复操纵,终于缓解了飞机的下降速度。但直升机最终还是尾部和右机轮先着地,陈士印迅速关闭发动机及点火开关。

6时47分,直升飞机歪歪扭扭地落在北京怀柔县沙峪公社景峪村荒草地上。于新野未待落稳,就从客舱中跳出,爬到前舱外面,将枪口紧贴窗口玻璃向陈士印开枪。陈士印凭感觉迅速躲了一下。于新野的子弹在陈士印的两件飞行服中穿了四个洞,击中周宇驰的手腕,鲜血溅到陈士印的脸上,他就势躺下装死。

一会儿,周宇驰浑身是血走下飞机,骂于新野为什么乱开枪,说:“那个飞行员故意制造罗盘故障,实际离北京没多远,我把他打死了!”

接着,李伟信也从直升机上爬下来。周宇驰、于新野、李伟信3人

就往山上跑,一直到累得跑不动时才停下来。周宇驰说:“这样不行,早晚都是死,跑是跑不了的,咱们今天就死在这里吧。”他还说:“有两种死法。第一种是如果你们怕死,我就先把你们打死.然后我再自杀;第二种是如果你们不怕死,那就自己死。”说完这些话,周宇驰就把带在他身上的林彪的手令和林彪给黄永胜的亲笔信撕碎。

于新野对周宇驰说:“我们还是自己死,不用你打。你喊‘一、二、三’,我们同时开枪。”

当周宇驰喊过“一、二、三”后,“砰! 砰! 砰!”三声枪响,可是倒下的只有两个人,原来是李伟信把子弹射向了天空。看到周宇驰和于新野两个人都躺在地上死了,李伟信收起了枪,用上衣裹好,走出玉米地,找到了附近干活的社员民兵……

9 月 13 日这天早上,怀柔县军代表、革委会的副主任杨发勋刚刚起床,便接到县革委会值班室的电话,值班员说:“沙峪公社阎副书记打来电话,说一架飞机降落在渤海所村南和景峪村北处。”

杨发勋立即和县里的几位领导紧急商议,认为不是国内飞机出了意外事故,便可能是外敌的侦察飞机入侵,不论哪种可能,都要认真对待。当即决定:一是由杨发勋和武装部朱部长迅速赶赴现场,查明情况。二是迅速报告北京市委和卫戍区,并通知当地驻军。

杨发勋他们随即乘坐北京吉普车向渤海所村驰去。为了防止意外,他们带了一个警卫人员,并备了一支冲锋枪。

县城距出事地点并不太远,不大功夫,他们便来到了渤海所村头。这时村边已聚集了很多人。车子刚停下,便看到了好几个民兵手持镰刀和砍刀,押着一个 30 来岁的男子过来。这人上穿白色长袖衬衣,下着蓝裤子,右腋下夹着裹着手枪的绿色军上衣。一看外表,就知道此人是空军的一名干部。

不等杨发勋他们询问,他便主动自我介绍说:“我叫李伟信,是上海空军部队的一名干部……”并说这架坠落的飞机上共有 5 人,两个人在旁边玉米地自杀了。他们要叛国出逃……

杨发勋他们来不及细作审问,立即命令刚赶到的县公安局的人将他带往大队部,便向现场奔去。

渤海所村南和景峪村北有一条不大的小溪。此时一架标有军徽

的3685号直升机,坐南朝北,横骑在河床上,直升机的四周十几米外,守护着手持农具的民兵们。因为防止文革武斗,民兵们的武器已全部收入仓库。杨发勋和朱部长走近飞机,粗略地看了看。

怀柔渤海所,3685直升机的迫降地

前舱一名年轻的驾驶员伏身在驾驶坐位上,胸部被子弹射穿,鲜血染红了衣服和座椅。右边是另一名驾驶员的位置,椅子的靠背上也有穿过的弹洞,看样子在此之前机上曾有一场激烈的拼杀。

民兵告诉他们,飞机上下来的一个人到南边景峪村去了。杨发勋

他们又赶到生产大队部。知道这人就是副驾驶员陈士印,他已经向沙河机场,他的上级机关打过电话。杨发勋他们问了问情况,陈士印说他是飞行大队副大队长,奉命执行任务,并说飞机是要叛国出逃,还说了一些其他事情。

民兵又告诉杨发勋,他们在玉米地里发现了两具尸体。于是杨发勋他们又赶到了发现尸体的玉米地里。

在飞机坠落处西北方向大约500米处,一块长得很茂盛即将成熟的玉米地里,躺着两个身着空军服的男子,他们并排头东脚西地躺着,每个人手边都有一支手枪,每人的太阳穴上都有射穿的洞,喷溅的血洒得满地都是。两个人中,一个较胖,且秃顶,年约40多岁;一个较瘦,年约30多岁。那个胖子右手腕出了一些血,用手帕裹着出血处,还光着一只脚,另一只脚上穿只黑凉鞋。从他们身上带着的证件知道,那个胖的就是周宇驰,另一个是于新野。

很快,北京卫戍区警卫3师副师长胡世寿乘坐一辆嘎斯69吉普车来到现场。

# 第1194回：迫降场，拒其他部队进入 回家后，胡世寿夜难入寐

13日早晨5时，警卫3师副师长胡世寿像往常一样到大操场，准备出操。师长张良友叫住他，说：

“刚接到吴忠司令员从人民大会堂打来的电话，怀柔北部山区上空有一架直升机要迫降，要我们3师立即派人去处理。”

张师长还交代：“机上人员要是活的，不能让他死了；如果死了要看好。对直升机上的东西，如文件、武器要看管好。”

胡世寿立即去办公楼，准备打电话通知7团派一个连去现场。途中，碰到司令部坦克科参谋杨景庭拿着腰带正准备出操，胡世寿立即叫住他跟自己一起去执行任务。当他们快走到办公楼时，又碰上副参谋长曹玉培，胡世寿当即叫他通知7团去一个武装连，紧急到怀柔北部山区。

胡世寿和参谋杨景庭随即坐上嘎斯69吉普车出发了，此时还不到6时。他俩都没有带武器。胡世寿命令司机时速80公里。怀柔地区的道路还算平整，只是窄一些，好在清晨没有什么车辆，他们很快到达怀柔西边的渤海所。

当他们赶到直升机迫降的河滩时，7团的武装连还没有赶到。只见一块四面环山的小盆地里停着一架直升机，周围全是拿着锄头、铁锹、棍子的民兵和老百姓，人山人海，大声喊叫着抓特务。见到部队的首长来了，他们七嘴八舌的对胡世寿说，直升机是早晨来的，然后降落的，声音非常大，而且直升机在空中抖动不止。

胡世寿他们来到直升机现场，看见直升机上有一个飞行员歪倒在驾驶舱里，又查看了附近玉米地的两具死尸。胡世寿问村干部有没有活人？众人七嘴八舌地说：

“有两个活人，一个到了沙峪，一个在渤海所。”

胡世寿将现场交给民兵看守，嘱咐任何人都不能靠近直升机，然

后去了沙峪。他在大队部看到一个穿空军服装的人,正在给空军副参谋长胡萍打电话,报告他们迫降在怀柔山区。

胡世寿简单问了他几句。那人说他叫李伟信,是空4军秘书处处长,在林立果身边工作,还说“吴法宪搞政变,林彪去乌兰巴托求援……”

胡世寿听了觉得是天大的玩笑,立即命令把李伟信捆起来,关进嘎斯车里,由杨参谋看管,不能让他胡说八道。然后他一人去了渤海所大队部,在民兵的帮助下,把另一个活着的飞行员陈士印也捆了起来。

这时,警卫3师7团副团长王德胜带着该团5连两个排赶来了。胡世寿首先向王副团长宣布事故性质严重,命令道:“你们任务也非常重,首先把两个犯人看管起来,不能让他们自杀,也不能让他们跑了。如果犯人逃跑,只能打断他的腿,决不能打死。”

接着,胡世寿派部队切断渤海所至怀柔的公路,切断沙峪至九渡河公路。然后迅速回到直升机现场,向老百姓宣布:“事情性质很严重,请大家远离,不要靠近直升机,保护好现场。”

这时,怀柔县革委会主任张满、副主任杨发勋、怀柔县公安局局长李军、怀柔武装部部长朱兆林、警卫3师7团团长张前进也都赶到。胡世寿召集他们开了一个紧急会议,说:“一、事件是严重的,属于什么性质尚不清楚,但涉及国家机密;二、请召集大队干部,动员群众回去搞生产;三、不要传播谣言。这件事情关系国家大事,谁传谣就是造谣惑众的问题。现场由部队看管,别人都离开,决不能出任何问题。”

他同时向在场的公安部、北京市公安局、怀柔县公安局的干部,包括法医、记者宣布:“此次事件有关大局,是机密大事,问题尚不清楚,第一不得外泄,第二请将拍摄的胶卷交出来,待问题弄清楚了再还给你们,或者自己曝光。目前我们对总的情况没有接到上级通报,北京卫戍区规定我们执行具体任务,其他无可奉告。这是国家大事,请予合作。大家不要在现场停留,都请立即回去吧。”

9时左右,北京卫戍区副司令员李刚来到渤海所,胡世寿向他报告了迫降直升机的大致情况,已出现的问题和处理情况,并带他察看了现场。

李刚指示:开设指挥所,对现场出现的新情况要及时上报。

根据刚的指示,胡世寿立即调用渤海所大队的电话,由北京卫戍区司令部通信处与北京市电话局、中南海电话局协调,将人民大会堂至渤海所的电话调为专线,沿途支线停止使用,保障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吴忠与渤海所的通信畅通无阻。并由县革委、县武装部和卫戍区当地驻军三方代表组成现场指挥小组,具体负责现场工作的指挥和调度,现场总指挥是李刚副司令员。

部队很快从民兵那里接管了现场的警卫,并封锁了该地区。

电话开通后,吴忠接到李刚打来的第一个电话,说迫降的直升机找到了,上面有一个死人。抓住了两个人,一个叫李伟信,一个叫陈士印。发现两具尸体,问李伟信,说是周宇驰和于新野,在高粱地里自杀了,正在继续清查。

这时,总政保卫部部长徐海涛坐着奔驰车来了,说是总政主任李德生要他来了解一下情况。根据上级的指示精神,胡世寿告诉他:"我们是看管犯人,保护好现场,没有提审犯人的权利,无情况奉告。你要看可以隔200米,远距离观看,不可以进到现场。"

徐海涛看了看外部情况,提出要回去。胡世寿让五连副连长李友清把他送到团部休息,要团长热情接待,实际上把他"软禁"起来。因为在当时那么复杂的情况下,胡世寿搞不清这位保卫部徐部长是真是假。

空军沙河机场警卫连连长带全副武装的一个班也乘一辆大卡车来到此地,说奉首长命令来处理直升机事。

卫戍区李刚副司令不准他们接近飞机,同时向吴忠报告。

吴忠觉得不对:"总理布置任务时没说要空军配合啊?"他立即告诉李刚:

"一定要非常客气、非常礼貌,很好招待这支空军部队,请他们吃饭;第二条,请他们把武器放下来,否则混战一场,或者把材料毁掉了,怎么办?要是问谁的命令,就回答是卫戍区的上级。"

接着,吴忠立即向周恩来报告了情况和他的处置。周恩来说:"好,就这样办。"

怀柔这边,李刚问那位空军连长:"知道卫戍区有规定,不经卫戍

区批准,部队行动不能携带武器吗?”

那位空军连长说:“不知道。”

胡世寿问他:“知道是什么事故吗?”

那位连长依然说:“不知道。”

胡世寿对那位空军连长说:“一、你不知道是什么事故;二、这个地区属于北京卫戍区的防区,友邻部队全副武装来,要事先联系或得到有关部门通知方可进入;三、你们莫名而来是不符合规定的。”

李刚让胡世寿收缴空军这些人的武器,并将他们带到当地卫戍区部队警卫3师的营房休息待命。

当胡世寿让空军这一个班人把武器放下时,其中一名空军战士说他枪里有子弹。胡世寿马上命令他们向后转,退子弹,枪放下,随后收缴了他们的枪支弹药。但是,此时胡世寿身边已无部队可用,怎样将这空军的一班人送到警卫3师呢?恰在这时,3师7团卫生队军医马志军带救护车来到现场,胡世寿大声叫住他:

“马军医,把这个班送到你们营房,要团里安排他们休息吃饭。”

吴忠接到李刚第三次电话报告:“李德生主任打电话来,让把人、枪、文件等一切东西马上送到空军司令部。”

吴忠依然觉得不对,对李刚说:“不能送到那里,要派得力干部,足够数量的武装,绝对保证安全,马上送到卫戍区司令部,当面交给我!不能送空军大院!”

放下电话,吴忠马上报告周恩来:“李德生主任未经过我们,直接打电话给李刚要把抓的两个人、武器弹药和文件一起立即送到空军大院,因空军大院情况不明,我已告诉李刚派得力干部和足够数量武装,绝对保证安全,立即把人、枪、文件送到卫戍区交给我。”

周恩来说:“这样处理好。”并要求人一到,吴忠和杨俊生立即审讯李伟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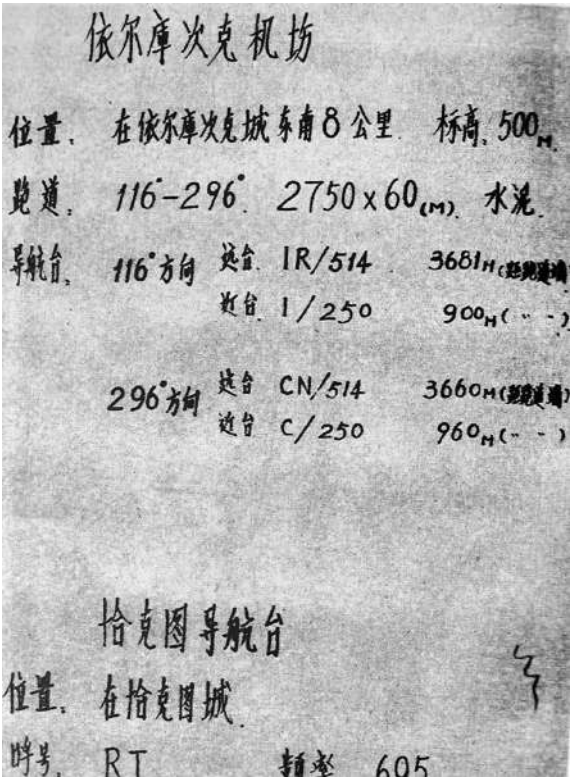
按照吴忠的指示,上午11时左右,警卫3师副师长胡世寿将7团团长张前进、怀柔武装部部长朱兆林请来,交代他们每人押送一人,直接送到北京卫戍区司令部二楼,交给司令员吴忠、政委杨俊生两位首长。他说:

“你们要特别注意,第一、中途不能停车,不能让空军把人抢走;第

二、要绝对保证安全，如果犯人逃跑，可以打断腿，决不能打死，一定要把活人送到卫戍区；第三、送到后你们直接回部队，掌握部队，做好战备工作。”

与此同时，李刚指挥对直升机立即进行彻底的清查，并一一进行登记和拍照。

怀柔县革委会副主任杨发勋是第一个登上飞机的。在驾驶室里，他们搜出了一幅“北京——乌兰巴托——苏联伊尔库茨克”的航行图，在周宇驰的座位上还发现了一张苏联伊尔库茨克机场导航资料和图表数据。


依尔库次克机场

位置、在依尔库次克城东南8公里 标高、500M.

跑道、116°-296° 2750×60(M). 水泥.

导航台、116°方向 进台 IR/514 3681M(距跑道端)

近台 I/250 900M(〃 〃)

296°方向 进台 CN/514 3660M(距跑道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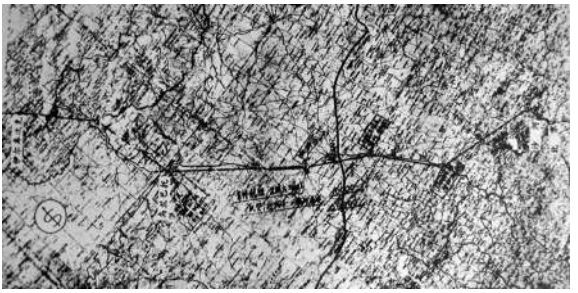
近台 C/250 960M(〃 〃)

拾克图导航台

位置、在拾克图城.

呼号、RT 频率 605

苏联伊尔库茨克机场导航资料和图表数据



“北京——乌兰巴托——苏联伊尔库茨克”航行图

飞机的后舱,有几个军用背囊里面装满了中央和军队的各种绝密文件,还有小型录音机和一大笔美元。那时人们大都没有见过录音机,所以谁都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乱拨乱按,结果弄响了。在场的李刚副司令员急忙叫关起来,可是谁也不会关录音机,老是在响。最后有人试图用急救包的绑带把它绑起来,无意中碰到开关,这才不再响了。

此外,在舱里还有一只木箱,装有一支冲锋枪和数百发子弹,整个飞机除在前舱玻璃和舱壁上有几个枪眼外,其他都是完好的。

驾驶员陈修文,没有穿飞行服,只是穿了一身普通的空军夏服,上衣兜只有一个空香烟盒,裤兜只有一条手帕。

周宇驰和于新野他们身上也没带什么东西,只是各带两支手枪。

这时,空军驻怀柔导弹师政委带着该师的陈参谋长也来了。他们途中与怀柔武装部部长朱兆林相遇,朱部长简单介绍了情况,他们也看了两具尸体的现场,当他们准备走进直升机现场时被胡世寿拦阻,把他们让到生产大队的一间空房里,问他们是奉谁的命令来的?

他们说是空军副参谋长胡萍的指示,让他们了解现场情况。

胡世寿又问他们:“你们知道是什么事故吗?”

他们说:“不知道。”

胡世寿说:“既然不知道,请两位坐下休息。”

他们提出要回去。胡世寿说:“不要急,待我报告后再作安排。”

过了20分钟,人民大会堂周恩来指示,现场由北京卫戍区处理,让他们回去工作。

李伟信和陈士印被带到卫戍区后,吴忠和杨俊生带着秘书,叫上副政委邹平光立即对他们进行审讯。审讯中,李伟信提到了《“571”工程纪要》,吴忠以为是工程上的东西,于是拍着桌子骂李伟信说:

“你他妈的瞎胡说,什么工程不工程的!”

吴德当时也在卫戍区,吴忠审完李伟信后对他说:“这小子他妈的不老实。”

审问陈士印也没审出什么。

下午14时,清理直升机现场的人员才去吃午饭。吃饭时,大家议论起周宇驰自杀的狼狈样子,只穿了一只鞋子。有人建议,应该马上把另一只丢失的鞋子找回来。几位领导也觉得,作为现场的物证材料,能够找回来当然更好。于是,由一位亲眼见到他们行走路线的民兵连长带路,几名战士便去寻找那只丢失的凉鞋。

因为周宇驰等人离开飞机也只跑了几百米,那只丢失的凉鞋很快便找到了。但是在找鞋的路上,大家发现了许多被撕得粉碎的纸片,几个有心的战士把凡是能找到的纸片,都一一地搜集回来,用信封装好,一并呈送北京卫戍区领导。

下午15时后,上级来电话指示,要求把现场3个死者送到警卫2师医院的太平间。

黄昏时分,吴忠报告周恩来:“正在搜查材料,对空军部队准备发还枪支,让他们回去。”

周恩来说:“加一条,告诉他们:你们已经完成任务了。”

晚上19时,直升机现场交警卫3师7团副团长王德胜负责指挥,李刚等人把收缴的文件和武器弹药装上车,直接去了北京卫戍区司令部二楼会议室。吴德和吴忠正在那里在等着他们汇报。

李刚让警卫3师副师长胡世寿汇报。于是,胡世寿从接到电话后,早上5时30分出发讲起,说到听李伟信说“吴法宪搞政变,林彪等去乌兰巴托求援”的话,予以制止,又讲了陆续处理公安系统来的人,以及沙河机场警卫连长,空军驻怀柔导弹师政委、参谋长,总政保卫部徐部长等一系列问题。

汇报会议结束时已经是晚上22时,李刚副司令员请胡世寿到食堂吃晚饭,喝茅台酒。

饭后,胡世寿回到警卫3师办公楼,师长、政委和师其他领导此时都集中在作战室,等着他讲情况。因为吴德和吴忠特别强调:“你们没有传达任务,要保密。”司令员吴忠还特别对胡世寿说:“你回去抓部队战备工作。”所以胡世寿只说“一架直升机出政治事故,北京卫戍区领导要我们抓好战备工作”,没有多说。

回到家后,胡世寿怎么也睡不着,当天接触到的事情实在让他震惊。林彪是中共中央副主席,党章明确写着是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的接班人,为什么犯人李伟信说吴法宪搞政变,林彪去乌兰巴托求援?北京卫戍区领导没有回答他这个问题,究竟是李伟信撒谎,还是确有其事?……

李伟信很快被押送到李德生这里。

“文件呢?”李德生问押送李伟信的卫戍区干部。

“直升飞机上有大批绝密文件,有北京至蒙古乌兰巴托、苏联伊尔库次克的航行图,有伊尔库次克机场和恰克图导航台资料,还有大批100元、50元面额的美元,都已由专人保管。”押送的卫戍区的干部回答。

“在死者的尸体上,有没有发现什么文件?”李德生问。

“都已搜查过,有文字的东西,全部收拢在一起。”来人回答。

李德生、纪登奎立即对李伟信突击讯问,首先了解沙河机场所说的“林彪手令”一事。

李伟信说:“我是负责保管箱子的,那个‘手令’,一直由周宇驰收藏,确实不在我手里。”

可是,在直升飞机上缴获的文件中没有发现林彪的手令,只有警卫3师的战士在找周宇驰另外一只鞋时收集的那些纸片。

周恩来得到李德生、纪登奎的报告后,要求北京卫戍区组织民兵,在直升机迫降的现场和周宇驰自杀的周围进行拉网式的寻找,一定要把散落在田野里的碎纸片,统统收集起来,全部上缴。

9月14日上午,卫戍区警卫3师副师长胡世寿又带着五连一排再去直升机迫降现场查找碎纸片。不巧9月13日夜里下了雨,增加了

寻找的难度。秋季的田野,庄稼还没有完全收割,沟沟垄垄,坑凹不平。在包围直升飞机时,又经过多次践踏,找大大小小的纸片,确实很难。民兵们分工负责,一小块一小块地“过筛子”,陆续把散落在地表的、踩到土里的,大大小小几十块碎纸片,收集起来。

# 第1195回：飞机场，全部被陆军占领 召总长，部署战备诸事宜

9月13日清晨，时念堂给吴法宪打电话报告说："毛主席那里的警卫部队，要派人进机场，给毛主席打野兔子吃。"

吴法宪报告了周恩来，周恩来说："都什么时候了，只好叫他们去打一次，以后不要再这样了。"

吴法宪把周恩来的指示向时念堂作了传达。

不久，周恩来又打来电话告诉吴法宪："已经决定对空军的机场、海军的码头各进驻陆军一个营，以保证安全，防止外逃。"

吴法宪表示同意，并说：希望立即这样做。

9月13日5时许，专机师34师各团全体官兵被"紧急集合"声唤醒。集合后，他们在一名陆军干部的陪同下，听到了以下命令：

一、从今天起，所有飞机禁止升空；

二、任何人不准跨入机场；

三、全体人员禁止外出；

四、离开宿舍楼必须3人以上结队，任何人不得在营区私自走动；

五、禁止使用电话、电报、通信等方式和外界联络；

……

34师的官兵一下被禁闭在自己的宿舍楼里，连吃饭从宿舍到饭堂的路上都在陆军弟兄们的监控之中。

所有的人都感觉到了异常；所有的人都知道34师出了大事了；但出了什么事？没有一个人说的清楚，包括34师那么多的高干子弟，也迷茫的不知所以……

不能进机场，飞机不能修，也不能飞，所有的官兵一起床就学习，读《毛选》、学《马列》，从9月13日起，之后的一个多月里，34师的官兵就是在这种近似俘虏营的日子中渡过的。

按照空军的规则，飞机是要定期进行检修、保养、运转的。"不怕

动,就怕停”。任何型号的飞机最长在一周之内要启动发动机运行一下。否则,发动机上润滑系统就会干涸,操作的关节部位就会生锈,甚至于抱死,一个多月时间,飞机纹丝不动,34 师的飞机就有全部报废的危险!

34 师的师级干部全部被隔离,从陆军来了一个政委、一个副政委主持 34 师的工作,但他们对飞行一窍不通。

34 师各团机务处、师工程部向空军司令部主持工作的李德生打报告要求对所有飞机进行机械日维护。李德生不敢做主,请示周恩来。周恩来亲自批准,允许 34 师机务人员进入机场,对飞机进行检修。

一进机场,地勤人员都开了眼界,南苑机场哪里还像个机场?简直是陆军的现代化阵地,到处是陆军的军车,机场美丽的草坪被挖了无数个散兵坑机枪掩体,像一座座坟包从地面鼓起。所有的枪口都对着飞机。原先在机场负责警卫的机场警卫连战士一个也不见了,手持冲锋枪、自动步枪的陆军士兵密密匝匝地机场游弋。可怜一排排的飞机,活像被看押的一个个俘虏……

按照惯例,地勤兵解下了蒙布,插上了地面电瓶,用轮挡将飞机档好,搬动螺旋桨,准备试车。就在这时,对面的掩体中一下子冲出来十几个陆军战士,端着上了刺刀的自动步枪向他们扑了过来,一个个用刺刀逼着他们喝到:“不许动,再动我们就开枪了”。

“怎么了?”莫名其妙的地勤人员问这些椤头青似的陆军士兵。

“这么大的飞机,开起来跑了怎么办”陆军战士中一个干部模样的人说。

“跑不了,你看,每个轮子前都有轮挡着呢。”地勤人员赶忙解释。

这个干部低头看了看轮挡说:“这么小个东西能挡住这么大的飞机?笑话,骗鬼去吧!”

“你说,怎么样你才放心。”地勤人员问道。

“捆起来绑紧就跑不了。”那位陆军干部说。

无奈,只好找来一捆麻绳,将飞机捆绑了一番。

这十几个陆军战士兵左看、右看还是放心不下,最后将维修飞机使用的方梯,一个个摆在飞机的前面,才让他们试车。随着发动机的起动,一帮士兵端着枪,掩体里的机枪瞄准驾驶舱,直到试车完毕,这

帮陆军兄弟们才将紧绷的神经松开,放下了武器……

9月13日早上7时30分,广州军区司令员丁盛将电话打到中南海西花厅,周恩来的秘书钱嘉东接的电话。丁盛在电话里说:“请报告总理,请总理放心,我们一定听从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指挥,谁反对毛主席,我们就打倒谁!”

周恩来的秘书将丁盛的电话内容电话报告了周恩来。不一会儿,正在人民大会堂的周恩来卫士张树迎打回电话:“总理让纪东带上丁盛的电话记录,立即到大会堂去。”

上午8时左右,纪东来到人民大会堂,直奔周恩来所在的东大厅东侧北端小厅,看见周恩来正在打电话。纪东把丁盛的电话记录递上去,周恩来认真仔细地看了一遍,然后对纪东说:“你不要回去了,从现在开始,你跟着我处理事情。”

这时,卫士张树迎提醒纪东说:“不要给家里(西花厅)打电话。总理召见人,你在他身边时,机灵一点。”

256三叉戟在雷达屏幕上消失后,周恩来命令三北地区、总参三部的所有技术侦查部队全部开机侦听。根据空军、总参等有关部门报来的情报,在林彪乘坐256三叉戟出境的中蒙边界414号界桩两边的地域内,蒙军的雷达联络频繁,情况异常。周恩来让秘书纪东通知空军、通信兵和总参有关部门带相关资料和地图到大会堂东大厅汇报。

周恩来秘书纪按照周恩来卫士张树迎的要求,破例参加这个汇报会,他心里有些紧张。与会人员他都不认识,而且是周恩来一个人听取汇报,里面也只有纪东一个工作人员。他按照周恩来卫士张树迎的提醒,打破常规,坐在周恩来身后离他最近的位子上。周恩来看地图时,他也站在他的身边。一是担心周恩来身体万一支撑不住,他可以在最短时间内做出反应;二是怕有心怀叵测的人有什么动作。后来知道,那天参加汇报的人员中,还真有空军的一人与林立果有关系。

上午9时左右,在身边工作人员的安排下,周恩来吃了一碗面条和一个包子。随即又召集政治局委员、军委和总参作战部的人到大会堂东大厅开会,分析由于林彪外逃可能发生的情况,研究制定紧急方案,调整部队部署,重点是应付外国势力的入侵,并拟定向全军发出的紧急战备指示。

上午9时,南京军区作战部向许世友报告:陆军部队已进驻机场,卡车按规定在跑道上排好。有的机场干部欢迎陆军进驻,还给安排了房子;有的有点抵触情绪,问“陆军为什么来控制我们机场?”到目前为止,没有发现可疑情况。许世友叫秘书马上接通北京的电话,他要直接报告周恩来,同时还想了解一点林彪逃跑的具体情况。电话没有找到周恩来,许世友又让秘书找总政治部主任李德生。总机很快把电话接到空军作战值班室,许世友对李德生说:

“请你报告总理,我们已按他的指示部署下去了。陆军开到机场,大卡车停在跑道上,万无一失。”接着,他又一字一句说道:“李德生同志,你一定要好好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

林彪外逃,这真是匪夷所思的事情。9月13日早上7时多,李德生从空军大院来到了西郊机场。在候机室小电话间,他同吴法宪、杨德中谈了两个多小时后,又回到空军党委会议室,和空军政委王辉球、副司令员曹里怀等人在一起,回顾这几个小时来发生的一连串事件。

李德生说:“请大家分析一下,为什么三叉戟飞机不经过正常手续,居然能从西郊机场起飞到北戴河;总理追查的时候,竟然没有人知道?”

李德生首先问曹里怀副:“你是值班首长,你知道吗?”

曹里怀连声说:“我24小时在指挥室,确实没有接到任何报告。”

李德生又问大家:“这么大的事,谁能够有权放飞?”

大家分析了几个人:

1、空军司令员吴法宪,他可以直接向西郊机场发命令;

2、副参谋长胡萍,他兼专机师34师党委书记,专机师的飞行任务一般都是由他具体向下布置的,他可以直接向34师下令;

3、还有一种可能,那就是林彪。因为这架飞机是林彪专用的,他也可以直接给这架飞机下任务。

李德生确定,要从这几个方面的线索,一个一个地查下去,特别是胡萍那里,无论是吴法宪,还是林彪,派飞机的时候,要避开胡萍几乎是不可能的。要指定可靠的人负责,既要迅速,又要保密。

中午12时,吴法宪向周恩来请示:“是不是可以回去了?”

周恩来说:“你在西郊机场再待一会,我派李德生到西郊机场来协

助你,回头我再通知你怎么办。”

不久,李德生又来到了西郊机场。

12 时 30 分,周恩来通知吴法宪和李德生、杨德中一起到人民大会堂。离开西郊机场之前,吴法宪跟李德生、杨德中商量,是否让胡萍先回 301 医院?李德生同意。

在候机室,吴法宪拍着胡萍的肩膀说:“没有你的事了,你回医院休息吧。”于是叫秘书用吴法宪的汽车把胡萍送回医院。

这天,周恩来向毛泽东请示,如何处理同林彪有密切关系的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人的问题,因为这几个人手握军中大权。毛泽东对周恩来说:

“看他们 10 天,叫他们坦白交代,争取从宽处理。老同志,允许犯错误,允许改正错误,交代好了就行。”

这时,中南海、钓鱼台已经都是枕戈待旦了。院子里面的车道上,都是钉满钉子的大板子、铁丝网、路障。这浓浓火药味,和院子外面群众准备迎接“十一”的喜庆氛围,截然霄泥。

下午 13 时过后,吴法宪、李德生、杨德中一起来到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周恩来、张春桥已经先到了,他们两人同吴法宪、李德生紧紧握手后,周恩来对吴法宪和李德生说:

“政治局准备集体办公,周恩来、张春桥、姚文元、黄永胜、吴法宪在人大会堂,李先念、李德生、李作鹏、邱会作在京西宾馆,康生、江青在家里,汪东兴保卫毛主席。”

这本来是 9 月 13 日当天清晨政治局会上确定的,当时吴法宪和李德生正在空军,没有前来参加会议,周恩来这时是告知他们。

接着,江青和黄永胜走了进来,他们和吴法宪、李德生握手后,江青拿出一副扑克,要张春桥、黄永胜和吴法宪一起打牌。

吴法宪很奇怪:“都什么时候了,还打牌!是想试一试我们的心情吗?反正我心里没有鬼,打就打!”

就这样,他们四个人一起打牌,结果吴法宪和黄永胜一头赢了。打完牌,江青就出去了。

不久,周恩来进来,要黄永胜准备一下全军的作战部署,同时要吴法宪准备一下空军的战备资料,准备晚上开会研究,并让黄永胜和吴

法宪通知副总参谋长阎仲川和总参作战部的人员也一起来参加研究。

13 日下午,李德生又和空军政委王辉球、副司令员曹里怀商量,在个别调查的同时,必须发动群众展开清查工作。李德生认为,空军出了这么大的事,不可能一点消息不走漏,与其让小道消息传播,不如向群众讲清可以讲明的事情,这就有可能揭发出更多的线索。周恩来同意了他的意见。

李德生立即召开空军司令部、政治部、后勤部三大部门负责人会议,宣布空军有两架飞机出了大事,空军机关处于紧急战备状态,所有人员到办公室待命,不得外出,不经请示不得对外联系。加强各级党组织的作用,以部门为单位,实行部门首长集体负责制,组织学习。同时按级负责,弄清这几天每个人活动的时间、地点和内容。要求大家有什么重要情况和问题,可以在正式会议上反映,也可以个别汇报。李德生在普遍布置的同时,重点掌握空军司令部办公室、作战部等几个要害部门的动态。

当天下午,空军参谋长梁璞打电话召空军司令部警卫营营长田广林马上过来。

田广林,1956 年兵,参军就在空军司令部警卫连,军事技术超一流。以后警卫连扩大到警卫营。1970 年,田广林从警卫营一连连长直接提升为警卫营营长。他是空军司令部党委委员,也是警卫营党委书记。此时,他正在北京郊区组织警卫营军事集训,他放下梁璞打来的电话,立即要了车,来到空军大院指挥所。

梁璞一见田广林,劈头第一句话就说:“跑飞机了。”

田广林心想:“跑飞机与我有什么关系?”

是啊,他只是个警卫营营长。梁璞大概猜到田广林的心理活动,第二句话说:“林彪跑了!”

田广林这才吓了一大跳,第一个感觉是不相信,他小心地说:“首长,你是不是听错了?”

梁璞严肃地说:“这是周总理亲口告诉我的,不会错! 你们警卫营有没有问题? 你威信怎么样?”

田广林说:“警卫营没问题!”

“你敢保证?”

“我敢保证！我向周总理保证！”

“出了问题要你脑袋！一定要绝对保证！”

田广林回到营部，按照梁璞的交代，立即召集警卫营排以上干部开会传达。所有的排长、连长都像田广林一样，不相信，可能吗？全都迷惑了。田广林说：“我讲的这些不要传达，大家心里知道就行了。现在是非常时期，各连进入一等战备。干部要把情况掌握好，我们警卫营要保证绝对不能出问题。”

虽然是一等战备，但表面上看不出什么变化。空军大院门口仍像平常一样，还是双岗。在北京所有的军队大院里，空军大院的警卫最严格。不仅进门要证件，出门也要证件，否则你根本出不去。

9 月 13 日下午，周恩来让秘书纪东通知总参的 5 位副总长彭绍辉、王新亭、张才千、陈继德、阎仲川到大会堂新疆厅参加政治局召开的作战会议。当总参 5 位副总长走进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就感到气氛异常。周恩来面带倦容，但表情严肃，坐在沙发上。见到他们 5 人，周恩来免除了平时不可少的寒暄，对他们一耸肩，两手向外一摊，突然说了一句：“哼！副统帅，跑了。”

5 位副总长一下都愣了。周恩来突然用烁人的眼光望着阎仲川，直呼其名：“阎仲川，林彪逃跑以前你听到点什么风声没有？”

当阎仲川刚听到周恩来说“副统帅，跑了”时，脑袋已经轰的一声，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此时听到周恩来问到自己头上，他反而冷静下来，简单地摇了摇头说：“没有。”

周恩来没有再问下去。他通报了林彪叛逃的情况，并拟定了向全军发出的紧急战备指示。对北京地区的军队部署、京郊机场的军管及机动兵力的安排也作了布置。他要求 5 位副总长：坚守岗位，加强值班，着重要求切实掌握主要敌对国家的政治、军事动向，严格掌握部队，保证不出乱子。他严肃郑重地说：“我现在考虑的第一是打仗，第二是打仗，第三还是打仗！”

# 第1196回：问电话，李作鹏修改记录 侦听到，蒙古有飞机坠毁

9月13日下午，山海关机场报告："从沈阳方向，有一架飞机要在山海关机场降落，是否可以？"

李作鹏立即请示周恩来。周恩来回答："不可以，关闭山海关机场。"

李作鹏将周恩来的指示向山海关机场传达，令其立即关闭山海关机场，不允许任何飞机起降。

下午15时，周恩来在大会堂再次召开紧急会议。会上，他宣布：军委办事组暂时离开西山办公。

周恩来问黄永胜："林彪去过西山你们办公地点没有？"

黄永胜回答："去过。"

周恩来说："为防止苏修导弹袭击，军委办事组人员分散一下，黄永胜、吴法宪在大会堂同我一起处理军队日常问题，办事组其他人员回家办公。"

周恩来说的"回家办公"，即回各自单位。

16时多，会议结束。

散会后，李作鹏回到西山。一下车，他就通知刘秘书："准备一下，下山办公。"就是回海军大院办公。

虽然一天一夜只睡了两个小时，李作鹏很疲倦，但此时的他一点睡意都没有。他妻子董其采给他沏了一杯茶，李作鹏一边喝茶，一边小声告诉老伴："出大事了，昨晚林彪、叶群乘空军飞机外逃啦！"

他们一边谈论林彪外逃的事，一边清理昨晚与周恩来、与机场前前后后通话的过程。

17时左右，李作鹏的秘书刘继祥拿着一份报告进到办公室，是海航5师整理的《山海关机场九月十二、十三日情况报告》。海航5师是用电话报告的，刘继祥秘书做了电话记录。

此时,李作鹏夫妻正在回顾清理昨晚的情况,正好可以参照一下一下山海关机场的报告。于是李作鹏就让刘秘书念他记录的报告。

当刘秘书念到:“23 时 35 分,李政委向机场调度室值班员传达总理指示,并补充说‘四个首长中,其中任何一个首长指示均可放飞’”时,李作鹏点头说:“对!”

当刘秘书又念到报告中记录着:“0 时 06 分,李政委来电话,再次强调中央首长指示,四个首长其中一个首长指示放飞才放飞,谁的指示要报告李政委。要负责任。”时,李作鹏立即打断刘秘书的话,说:“不对!这次电话记录不对。”

李作鹏告诉刘秘书:“这次我打电话,强调的是要四个首长联合指示才能起飞。”

念完报告后,李作鹏对刘秘书说:“你与他们再核实一下我的讲话,不要记录错了。”

李作鹏的秘书刘继祥打电话找山海关机场值班员李万香更正李作鹏的电话内容,他说:“李政委说的是 4 个首长联名指示放飞才放飞,不是其中一人指示放飞才放飞。”他要李万香好好想一想。

李万香回答:“两次电话从未说到联名指示的问题,我是这样听的,也是这样记录的。”

晚饭后,李作鹏在海军 407 楼办公室中看文件,刘继祥秘书拿着海航 5 师的那份报告进了办公室,对他说:“我已打电话与机场核实了,你 0 点 06 分的那次电话指示,机场值班员根本没有听清楚。他们说没有听清楚首长指示的原因,一是当时调度值班室人很多,电话也很多,很嘈杂;二是首长的口音重,听不太清楚。他们就把你 23 点 35 分的电话指示又重复的追记了一遍。”

刘秘书又说:“这个报告,是航 5 师张师长今天上午从锦西师部赶到山海关机场,听完汇报后整理的,张师长对昨晚的情况也不是很了解。”

李作鹏让刘秘书把报告放在办公桌上,准备再看一遍。

他看到报告中记录的原文是:“0 点 06 分,李政委来电话,再次强调中央首长指示,四个首长其中一个首长指示放飞才放飞,谁的指示要报告李政委。要负责任。”

李作鹏将报告中他讲的这段话作了修改。修改后全文是:“0点06分,李政委来电话,再次强调中央首长指示,四个首长联合指示才能放飞。如果其中一个首长指示放飞,不管谁的指示要报告李政委。你们要负责任。”

修改之后,李作鹏立即让刘继祥秘书用电话同山海关机场再校对一下。经双方再次校对后,刘继祥秘书报告李作鹏说:“校对结果同你修改的完全一致。”

刘继祥秘书将报告重新誊抄后送李作鹏。李作鹏重又阅读了一遍,一个字也没有改动,就在这个文件头上写上:“呈总理批示”。

几天后,周恩来在李作鹏的这份报告上划了圈,一字未改,在一次政治局会议后退回给李作鹏。李作鹏将这个文件交给刘继祥秘书存档保存。

13日下午18时,邱会作去京西宾馆处理周恩来交代的几件具体工作。一、交代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王良恩撤消三中全会的工作班子;二、交代总参管理局副政委安排李先念、李作鹏、华国锋、余秋里等人的住宿;三、打开京西宾馆地下室通往空军地下室的大门。邱会作是京西宾馆的防空总指挥,他亲自走了一遍,预先察看了路线。

当晚21时,邱会作又从总后大院来到京西宾馆,检查了李先念等人的住宿。此时,他们都睡下了,邱会作只在每人房门口同他们说了一句话。最后敲李作鹏门时,他还没有睡,邱会作约他到会议厅的休息室聊天。

邱会作问:“林彪真的叛国投敌了吗?这真是不可想象的事呀!”

李作鹏说:“从现在看,走掉了已经是事实了!今后在这件事上的性质,也是要看怎么说了,是方是圆都由人说了。”

邱会作同意李作鹏的看法,他说:“如果他自己决心要走,临走的时候,下几道命令,在短时间之内也会大乱的呀!林彪走的原因,现在我们还不清楚。以我的估计,还是高明夫人脑子想歪了,把林彪搞走的,真是糊涂透顶了。”

李作鹏说:“这个问题,我也这样想过,但现在还无法自圆其说。”

邱会作:“关于林彪的问题,我们是否要向主席、中央写个报告?”

李作鹏:“报告是要写的,但写什么就是难题了,我们什么事也没

有。要说有事,也就是得罪了江青。这样写,别人会相信吗?看看再写吧。”

邱会作:“江青他们几个的鼻子要长到脑门上了,他们真神气!”

李作鹏:“事实上,他们不光对我们神气,对总理和其他人照样神气。”

邱会作:“他们神气,我们受气。”

两人一直聊到次日凌晨3时。

13日晚上21时,周恩来召集黄永胜、吴法宪、阎仲川和总参作战部的人一起开会,先听取阎仲川的汇报,然后又听了吴法宪的汇报。听完汇报,黄永胜提出,南口方向没有部署部队,这是一个空隙,应该立即调一个师去加强南口的防御。

会议开完,已经是9月14日凌晨3时30分左右了。周恩来要黄永胜和张春桥、姚文元一起住在西大厅,要吴法宪和他一起住在东大厅。

9月13日晚上,原来看管陈伯达的几个警卫,突然被换了岗。到了深夜,又有几个没穿军装的彪形大汉闯进陈伯达住的房间,不容分说,架起他就走。门口早有一辆汽车等着,他们把陈伯达推上了汽车,汽车就开了。停下后,陈伯达下了车才看清,这里是秦城监狱!就在陈伯达被架进关押他的牢房里时,他突然挣扎着高叫道:

“你们要转告毛主席,转告党中央,我陈伯达在阜平时,是做过一件好事的!我不是国民党特务!”

原来,陈伯达看到,这是一间没有窗子,条件特别差的小牢房,屋里没有床,没有桌子和椅子,地上只有一个旧草垫子,陈伯达只能躺在平地上。他想,把他一个堂堂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关在这样的牢房中,那是必死无疑了。

刚被关进秦城监狱时,陈伯达吃的是粗粮和菜汤。可是没过几天,他的待遇就大大改善了。监狱方面安排他一个人住到三楼的一间大屋子里。这间屋子里各种设备一应俱全,窗子敞亮,可以看到很远的景色。而且,整个三楼只住他一个人,他可以在三楼内自由走动。这里每天有各种报纸供他阅读,还允许他通过警卫人员从家里拿来一些书籍阅读。他吃的伙食,三餐都是四菜一汤,每天都不重样,比他当

中央政治局常委时在家里吃的还要好。医生每隔几天,就给他检查一次身体。

原来,1948 年,毛泽东率中央机关住在河北省阜平县的城南庄时,遇到过国民党飞机的轰炸。那天,一直平静的城南庄的上空,突然响起了飞机声。不一会儿,国民党的几架轰炸机出现在城南庄上空。毛泽东正在屋子里批复电文,没当一回事。陈伯达听到飞机声后,立即感到大事不好,急忙往毛泽东住的屋子里跑,高声喊道:

“敌机来了,敌机来了,主席快走!”

毛泽东这才意识到问题严重。陈伯达叫几个战士架着毛泽东赶快撤。毛泽东刚走出院门,敌机扔下的炸弹就落在院子里。

毛泽东是个念旧的人,对这件事是不会忘记的。陈伯达被架进秦城监狱牢房时的那声喊叫改善了他的待遇,也等于是救了他的命。

9 月 13 日晚,执行北京地区紧急战备任务的各部队全部进入指定位置,并向北京卫戍区报到。首都北京已经处于十几万大军的严密控制之下。

当时,驻扎在大同执行侦听任务的北京军区空军第 8 技术勤务团,简称“技侦 8 团”,他们的一台侦测车前出到距离中蒙边境 100 多公里的地方。上机侦听员宫子越,截获到多处蒙古地面观察哨用无线电向上级报告的内容:

“一架大型目标入侵”,“一架大型目标空中起火。”

“大型目标起火。”

“大型目标坠落在 XX 地区。方位 XX,XX”

……

技侦 8 团将截获到的情报上传到空军情报部西山情报分析中心。经过进一步校核,形成正式情报上报。开始是用电话报告到空军情报部值班室,后来直接报到地下指挥所,由当时在地下指挥所值班的情报处处长王玉林接听、抄录后,交给空军情报部部长贺德全。贺德全审核无误后,将电话记录上报在空军指挥所坐镇的李德生。

当李德生拿到“一架大型目标空中起火”的情报时,不敢相信,先问在场的空军副参谋长白云:跑出去的“飞机有没有可能空中起火?”

白云肯定地回答:“不可能!那可是专机啊!”

将信将疑的李德生转身打电话给总参三部部长胡备文,向三部要情报。

不久,胡备文来电话,称三部得到的情报是:一架大型目标在边境地区移动。

李德生告诉胡备文空军截获的情报,让胡备文尽快落实。

胡备文打电话给空军情报部部长贺德全,了解空军截获的情报,提出拉条专用电话线,让技侦8团把情报直接报三部的要求。贺德全回答:“哎呀,这涉及到两个军兵种的关系。我要请示一下吴司令”。

13日晚22时15分,空军司令部送来报告:“技侦八团侦听到蒙方通话:九月十三日十八时零四分,蒙古国雷达团团长向所属各连发报说,凌晨二时半,有一架不明作战飞机在温都尔汗东北方向六十公里处着火掉下来了,按照国防部长命令从十八时起进入一等戒备。”

周恩来接到立刻报告毛泽东,并就紧急战备部署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附上空军司令部的这份报告。信中说:“现呈上政治局与总参共同拟定的紧急战备指示,参加者有春桥、文元、永胜、法宪、登奎及张才千、阎仲川、王新亭、彭绍辉、陈继德五位副总长和我,请主席审批。现与各大军区通电话几次(如沈阳、南京、广州、武汉、昆明、成都),其它也都作了布置,通了电话。江青参加了第一次会谈,现已入睡。先念、国锋、作鹏、会作分别到京西宾馆、海司、总后工作。附上两张情报,值得一阅。也许三叉戟飞机逃出去真烧死了,也许是敌人迷惑我们。”

9月14日上午,外交部在代部长姬鹏飞主持下,召开党组会,根据周恩来的指示,研究林彪出逃后可能出现的国际事态及各种对外应对方案。中南海也在不安地等待着出逃后的林彪,会用什么方式向世界发表声明。

时过中午,外交部的党组会议还没有结束,突然,一位值班秘书拿着一份手抄的电话记录,门也没敲就闯了进来,直奔姬鹏飞身边,姬鹏飞看着这封特急手抄电报,脸上渐渐露出了笑容,用一种异常的语调向大家说了一句话:“机毁人亡,绝妙下场!”

就在9月13日凌晨1时53分至55分,蒙古边防总队的哨兵发现一架大飞机自中国方向414号界碑入侵,声音非常大,没有灯光,飞向苏赫巴托省那伦县。2时,肯特省贝尔赫萤石矿的警卫也发现了从东

北向西南飞去的这架大飞机。不久听见巨响,看见火光。

火光发生在在贝尔赫矿西南 14.8 公里的苏布拉嘎盆地,是这架大飞机坠毁时产生的。时间是 2 时 27 分,

贝赫尔萤石矿的职工敦吉达玛那天晚上值班,她在 1971 年 9 月 13 日凌晨约 2 时 30 分左右,听见空中传来发动机的轰鸣。很快,她看到一架飞机,机后拖着火苗向下坠落。从她所在的地方可以跟随飞机一直看到它坠毁在地面上,距离她大约十几公里以外。

9 月 13 日凌晨 2 时许,居住在温都尔汗坠机现场附近的拉哈玛大婶也被一阵“嗡嗡”的声音惊醒。她急忙穿好衣服,出门一看,发现这难听的声音是空中传来的,只见羊群惊散,马嘶狗叫。她抬头一看,从西南向北飞过来一架冒着大火的飞机,飞得相当低。在巴图脑尔布苏木上空,绕图门山转一圈后顺着扎森山谷又向西南方向飞行,声音越来越大,不到 20 分钟,就在苏布尔古盆地坠毁。当时没听到大的爆炸声,只见现场大火连天。

蒙古肯特省公安厅驻贝尔赫矿小组代表珠尔默德等人接到报告后迅速赶到现场。只见坠机现场燃起大火,面积有一平方公里左右。他们首先把火扑灭,保护现场。

接着,他们在飞机坠落地点向南 500 米的地方看到第一具尸体,接着又发现了 7 具,他们立即给这 8 具尸体拍照。后来发现了第 9 具尸体。9 具尸体散布面积为 50 米×20 米,尸体之间相隔 3 米至 15 米。烧伤程度 1 至 2 度。

他们用白布单将现场的 9 具尸体盖住,没有挪动,然后搜集没有烧毁的文件、物品,并派人骑摩托车到省会报告。

蒙古肯特省公安厅厅长奥特根扎尔嘎勒中校正在休养所休养。9 月 12 日晚上他去参加舞会,13 日凌晨 2 时多他听到飞机的声音,并不知道是什么飞机。

9 月 13 日一大早,县政府叫他快到省会去,中午,省里派了一架双翼小飞机将他送到温都尔汗苏布尔古盆地坠机现场。奥特根扎尔嘎勒中校先在空中绕着坠机现场飞了两圈,然后用电话向蒙古公安部长德吉德少将汇报了看到的坠机现场的情况。

不久,蒙古外交部副部长额尔登比列格、公安部长德吉德、情报局

局长德钦将军,国防部第一副总长图门登贝尔勒少将坐伊尔-14飞机也来到现场视察。

蒙古的调查人员在现场看到一些文件和物品:

8支手枪,有的枪上了膛,有的保险关着。还有一支微型冲锋枪,两把匕首。

人民币65元,一张5元,六张10元。

李平出入证,3726部队营门出入证。

林立果证件,002003号。

一张合影照片。

其他物品:钢笔、铅笔、罐头、糖、梳子、餐具。

还有烧坏的一只白色女鞋;烧坏的一只灰白手提包,里面有一件绿色军上衣;还有三件旧蓝布裤、胶鞋、白背心、手帕等。

物品记录本、燃油记录本、手电、轮胎压力表、逆光镜等。

飞行员包一个。

3726部队第三中队邰起良的空勤工作记录。

布票,飞行员须知,飞行专业课本。

便携式录音机一台,三盘录音带,录有《毛主席语录》歌曲。

手表5块,一块上海牌,表针指在2时27分。

还有一块黑盘表没停,17时30分,与乌兰巴托时间相符。此表可能是林立果的,它确定了蒙古政府官员到达坠机现场的时间。

另外还有飞机交接记录本,新疆地区飞行图,泰山机场图,油本,低空技术说明书,使用细则,华东地图,飞行时刻表,译文4页,报务制度,航空简语。

机内发现一张标出航线的航图,从河北省北戴河穿过失事现场,一直画到贝加尔湖附近的伊尔库茨克。

9月14日零时,正在坠机现场的蒙古公安部部长德吉德接到中央电话,让去现场的人员立即返回乌兰巴托,向以泽登巴尔为首的政治局汇报。可是温都尔汗机场没有夜航设备。正一筹莫展时,蒙古人民军空军司令朝克将军责成机场,准备一批小铁桶,隔100米放一个,装上木块,浇上汽油,点上火,以此充当跑道灯。

# 第1197回：急约见，中国驻蒙古大使 指示到，派大使亲临现场

9月14日早晨8时，蒙古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电话通知中国驻蒙古大使馆：半个小时后，蒙古外交部副部长额尔敦比列格受政府委托，紧急约见中国驻蒙古大使。

中国驻蒙古大使许文益是于1971年8月20日，乘坐北京到莫斯科的国际列车抵达蒙古首都乌兰巴托。刚到任才20多天，因馆务繁忙，许文益还没有拜会蒙古的这位外交部副部长。

正常情况没有拜会不能约见，而且事先也没有预约，显然事情又重要又急。中国驻蒙古大使馆的工作人员都很吃惊，纷纷猜测，很多的猜测。

许大使到了额尔敦比列格副部长的办公室。蒙古外交部副部长额尔敦比列格对仓促约见表示歉意，说：

“这件事我们通知中国大使馆迟了一些。因为事情发生在夜里，我们知道得也比较晚，有关部门也是到上午才知道。”

然后话锋一转说：“我受政府委托，通知如下事情，13日凌晨2时左右，在我国肯特省贝尔赫矿区以南10公里处，有一架喷气飞机失事，此事我们有关部门当天上午才知道，派人去出事地点了解情况。经多方证据表明，那架飞机属于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的飞机，机上共9名乘客，其中8男1女，不幸全部遇难。对中国军用飞机深入我国领土，我代表我国政府提出口头抗议。”

接着他加重语气说：“以此为例，可以认为中国军用飞机是侵犯了我国国境，我们保留就此事再次进行交涉的权利。”

许文益大使是老外交官了，外交经验丰富，处理过很多重大事件，他思索该如何回答。

额尔敦比列格放缓了口气，说：“我第一次与您正式见面，很遗憾提出这样的问题。希望大使转告中国政府，并希望你们近期内就中国

军用飞机深入我国领土的原因给予正式解释。”

许文益感谢他的通知,说:“正当中蒙关系刚开始正常化的时候,我国飞机由于某种原因在蒙古领土上失事,这当然是很遗憾的。但我不知道出于人道主义的考虑,蒙古方面对飞机采取了什么措施?出于友好的考虑,请蒙古方面帮助了解,我国飞机为什么误入蒙古境内的?对于副部长的口头抗议,在我未全部弄清楚和了解事实真相之前,不能接受。但我可以把此事转告我国政府。今天我与副部长第一次见面,但我希望这不会影响我们两国关系的改善。”

他接着问道:“我们可以派人去出事地点看看吗?”

额尔敦比列格作了一些解释后说:“飞机失事近两天了,但只发现九名乘员的尸体,当时没有一个人活着。现在天气还热,较长时间保存尸体比较困难,需要以某种方式掩埋。大使提出派人到现场,我是否可以理解为这是你们的正式要求?”

许文益大使说:“可以这样理解。”

额尔敦比列格说:“我们可以满足你们的要求,对于中国飞机进入我国领土的原因,相信大使会做出努力,使中国政府近期做出解答。希望使馆尽快通知派什么人去,何时动身?”

9 月 14 日 9 时 30 分,许文益回到大使馆,决定立即向国内报告。

当时大使馆没有电台,只能通过蒙古电报局。但蒙古电报局说,线路不好,最快也要 4 个小时以后。

急中生智,许大使想到大使馆有一条直通北京的专线,那是 50 年代中苏关系友好时在北京和莫斯科之间架设的高频电话线,北京和乌兰巴托也顺便安装了一部。后来中苏关系恶化,专线电话也就关闭了。

半个小时后,电话要通了北京,但北京电话局说外交部的机器坏了。许大使决定先打国际长途电话,通知外交部有重要情况报告,要求启用专线电话。

11 时 50 分,蒙古外交部来电话,同意中国大使馆派三个人去现场。并说专机已经准备好,下午即可动身。可是这时还没有给国内打通电话,到失事现场事关重大,没得到国内指示前,不能冒昧行动。于是大使馆借口尚未准备好,请求推迟起飞时间。

午饭后不久,蒙古外交部又来电话催,说专机已经准备好,13 时左右出发。

大使馆还是请求推迟。

经过一番周折,终于在 9 月 14 日中午 12 时 20 分,中国驻蒙古大使馆大使许文益,通过已封闭两年多的乌兰巴托直通北京的高频专线电话,向中国外交部报告关于一架中国飞机在蒙古失事的情况。

此时,外交部的党组会议还没有结束,情急之中的值班秘书门也没敲就闯进会议室,直奔姬鹏飞身边,将这封特急手抄电话记录交给姬鹏飞。姬鹏飞向大家说了一句话:“机毁人亡,绝妙下场!”随后让王海容立即将这一情况打电话报告周恩来,但电话那边说:“总理刚刚服了安眠药入睡,按习惯要至少 4 个小时才能醒来。”

外交部党组决定,立即派人把这份电话记录送往中南海,直接交给毛泽东和周恩来。

连续忙碌了 50 多个小时的周恩来是在上午 11 时左右躺下的。他当时看上去显得格外疲倦,是在身边工作人员的一再劝说下,他才服了安眠药,在北小厅躺下休息。在休息前,他嘱咐卫士:有什么情况随时叫醒他。连续高度的紧张和劳累使周恩来很快就发出了轻微的鼾声。

大家终于松了一口气,退出小厅。张树迎、高振普、张佐良和纪东四个人把褥子铺在厅外的地毯上,和衣而卧,但谁也没睡觉,谁也不说话,或瞪着眼睛,看着天花板,或闭目养神……是紧张?是责任?还是什么?一时也说不清楚,其实几个人心里想的都差不多: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高振普事后回忆说:“林彪是副统帅,怎么能这样干呢?庐山会议后的批陈整风,虽说林彪有错误,没点他的名,是有意保护了他,当然也是警告他。怎么能跑呢?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出过张国焘,那是在战争年代。在执政二十几年的今天又出了个林彪!局面会怎么样呢?国家会乱吗?难说。除去已跟林彪跑的,还有谁呢?周总理向各大军区下达的命令,说明毛主席、周总理在直接指挥,军权在中央,不会出大乱子……”

下午 14 时,人民大会堂的服务员叫周恩来的工作人员接电话,周恩来的秘书纪东去了。

电话是外交部王海容打来的,她说:“外交部收到一份我驻蒙使馆的特急报告,要送总理。”

纪东说:“总理已经50多个小时没休息了,刚吃完安眠药睡下,请你请示一下鹏飞同志,要不要叫起来?”

不一会儿,王海容又来电话说:“姬部长说,马上叫醒总理。”

纪东回答道:“那好,我去叫总理起来。你现在就到大会堂北门来。”

纪东回来对张树迎、高振普、张佐良说:“外交部有紧急报告,要叫总理起床。”

大家感到事态重大,赶紧将周恩来叫醒,报告了王海容电话的内容。周恩来叫王海容马上来大会堂,并让卫士高振普到门口等王海容。

不一会儿,王海容到了大会堂北门。高振普看见她手持密封牛皮纸大信封从汽车上下来,急急忙忙的走进大会堂,边走边着急地问高振普:“总理在哪里?”

高振普说:“先进去吧。总理在卫生间。”

秘书纪东接过王海容手中的牛皮纸大信封,请她进来休息一会儿。

王海容说:“不用了,要马上回部里。”

纪东拿着这份装在牛皮纸大信封里的报告急奔北小厅。周恩来这时已经起床,穿着睡衣正在卫生间洗脸。看见纪东进来,他马上甩了甩双手上的水珠,用毛巾擦了擦手。

这时,纪东已把信封内的报告掏了出来,递到周恩来手上。只见周恩来开始眉头紧皱,随着目光在文字间移动,脸上的紧张神情逐渐舒展开来,拿着报告的双手也在微微颤抖。突然,他像是自言自语又像是对着纪东兴奋地说:“好!好!你看,摔死了!摔死了!”然后将报告递给纪东,对他说:“我要到主席那里去报告,你也跟着我。”说完,换了衣服,带着卫士高振普和秘书纪东向118厅毛泽东住处走去。

当穿越一道走廊,到了一个小门时,周恩来对纪东说:“小纪,你留在这里等我,我回来一起回去。”

原来,周恩来心细如发。此时,在大会堂只有他和纪东知道蒙古

有一架中国飞机机毁人亡。他担心纪东在他还没向毛泽东报告之前就把这一消息散布出去,于是,让纪东在这里等他。

纪东看了看,这个走廊很长、很高,一个人也没有。

毛泽东听了周恩来的汇报,想了一下,问:“这个消息可靠不可靠?为什么一定要在空地上坠下来?是不是没有油了?还是把飞机场看错了?”

在场的汪东兴说:“飞机到底是什么情况,现在还不清楚,大使准备去实地勘察。目前还不知道飞机是什么原因坠落下来的。”

毛泽东又问:“飞机上有没有活的人?”

汪东兴说:“这些情况都不清楚,还要待报。”

周恩来随即给外交部打去电话:

一、将今天收到的我驻蒙古大使馆的报告用三号铅字打印18份,下午6时由符浩亲自送到人民大会堂北门内,交中央办公厅王良恩副主任;

二、从现在起,指定专人译办我驻蒙使馆来的电报,由符浩亲自密封后送总理亲启;

三、今天的报告,凡经办和知道的人都要打招呼,要绝对保密。

约20多分钟后,周恩来步履轻松的从118厅出来了。

9月14日上午,邱会作一个人坐在家中办公室苦思,脑子里好像装满了杂货的箱子一样,越想越不是滋味。下午,他把林彪出逃事,同妻子胡敏和儿子邱路光说了,他们都震惊不已……

邱会作在当天的《三部要报》中看到:“蒙古人民共和国国防部通报,昨凌晨一时许,中国一架大型运输机入侵,在肯特省温都尔汗坠毁……”

他立即将此事报告了周恩来。周恩来说:“很好。我已知道了。”

下午15时,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西大厅召集张春桥、姚文元、黄永胜和吴法宪研究全国、全军的情况。研究以后,由周恩来亲自通过电话,将研究决定的部署传达到各个大军区。

9月14日下午,蒙古外交部再次催问中国大使馆人员何时动身?许文益大使只好不断地向蒙方解释说:“国内没有指示”。就这样一直等到14日下午18时,许文益终于等来了国内的指示,是周恩来代外

交部起草的致中国驻蒙古大使许文益特急电文,要求许大使“携随员亲赴现场”,查清飞机型号,遇难9人的身份,还要从各个角度拍摄下飞机、现场和9人的照片,特别是死者的照片要从不同角度拍特写,详细观察飞机失事的原因。如有尸骨应要求带回,没烧完的文件物品要求转交中方,写明清单和收条,并注明如有蒙方取走的物品和文件,也希望查出交还中方。

中国驻蒙古大使馆原先给蒙古外交部报送的赴飞机失事现场人员名单,只是二秘孙一先带两名翻译。而下午国内来的指示却是要“许大使亲赴现场”,这让许文益感到事情比预想的还要严重。如果是一般的失事飞机,使馆工作人员去看一看就行了,没有必要“惊动”大使。所以,虽然接到国内的指示时,蒙古外交部已经下班,许文益还是决定打破常规,紧急约见蒙古外交部副部长额尔敦比列格。

额尔敦比列格晚上有外事活动,会见安排在当晚20时。见面后,许文益大使说:

“奉政府之命,失事飞机可能是由于迷失方向,误入蒙古人民共和国国境,对此我们表示遗憾。对蒙古政府愿意提供飞机并指派领事司长陪我们到现场视察,表示感谢。我将亲自率有关人员前往现场,请蒙方给予帮助。”

额尔敦比列格马上问:“误入之说,是否是正式答复?”

许文益大使说:“可以这样认为。”

“这是否是最后答复?”额尔敦比列格继续追问。

许文益也警觉起来。他思索了一下,说:“这是我国政府在得到使馆的第一次报告后给我的指示,是正式答复,但我理解不是最后的答复。”

额尔敦比列格问:“失事飞机是从哪里到哪里?朝哪个方向飞?是怎样迷失的方向,误入我国领土的?”

许文益大使坦率地说:“目前为止无法答复。”并反问,“蒙古方面是否有飞机失事的进一步材料提供给我们?”

额尔敦比列格也非常谨慎,说:“暂时没有。”

许文益大使表示明天上午动身,额尔敦比列格同意,让中国人作好明天赴现场的准备。他对中方未能及时派人赶赴现场有点抱怨,

说:“飞机失事两天了,等你们到现场大概要60多个小时了,天这么热,如果尸体变化太大,我希望你们不会提出更多的问题。”

许文益大使马上将约见情况报告国内,翌日凌晨得到国内指示:“尽量争取火化,将骨灰带回。如火化有困难,可拍照取证,就地深埋。竖立标志,以便以后把遗骨运回国内。”

现在轮到中方催促蒙方了。蒙古人似乎不那么着急了,借故一推再推。

9月14日这天,恰巧中国驻蒙古大使馆的一位干部回国休假。他路过中蒙边境时,向中国边防站站长讲了中国有一架飞机坠毁在蒙古温都尔汗,机上人员全部死亡的事情。边防站站长把这一消息逐级上报到军区。周恩来得知后,立即指示将这个边防站站长隔离起来,并限令军区采取措施,让已知道这一消息的26个人谁也不许扩散。

# 第1198回：见鲁珉，竟揭出惊天阴谋 李德生，再查空军江腾蛟

李德生坐镇空军，在空军机关引起很大的震动。李德生的动员，传达到各个部门，大家都知道空军出了大事，纷纷开始回忆这些日子的大事小情，以便提供组织上参考。有些人更是惶惶不安。

9月14日中午，李德生已经两天两夜没有休息，刚到京西宾馆的办公室，准备小憩片刻。突然，军委一号台电话铃响起，秘书接到总机话务员的电话说，空军作战部长有急事找首长。

李德生觉得奇怪：在空军作战值班室30多个小时，始终没有见到作战部长，他怎么现在出现了？他让秘书立即与作战部长通话。那边传过来空军作战部部长鲁珉的哭腔："我有非常紧急的情况，要向首长报告。"

李德生让秘书答复鲁珉，立即到京西宾馆来。

鲁珉到了京西宾馆9楼，一见到李德生，就放声大哭："首长，我犯了滔天大罪啊，我犯了杀头之罪啊。我参与了阴谋杀害毛主席，我犯了罪，全国人民都不会饶恕我的。"

此时鲁珉不断地流着眼泪，而且眼睛已经红肿得几乎睁不开了。他的话更是让李德生很是吃惊。大量可疑事实表明，林彪北飞叛逃定有重大隐情。沙河机场还说了一个"林副主席手令"，此时还弄不清这个"命令"究竟是什么内容？

李德生的秘书扶鲁珉在会客室沙发上坐下，给他倒一杯水，对他说："你先喝点水，冷静一点，慢慢讲。"

鲁珉喝了几口水，稍稍平静后说：

"9月11日下午，林立果、周宇驰、江腾蛟、王飞等几个人在西郊机场策划在南方谋害毛泽东。后来我参加了。"

李德生说："你讲具体一点，不要急。"

鲁珉接着说："他们的方案是，乘毛主席在外地巡视的机会，在上

海由空4军政委王维国,利用毛主席接见时下手行刺。此计不成,让联合舰队用火焰喷射器、四〇火箭筒、100高射炮平射,打毛主席的专列。如果这个计划还不成功,第三个方案是在苏州硕放桥埋放炸药,炸毁专列。实在不行,第四个方案是用轰炸机炸毁毛主席的专列。”

而轰炸专列的任务,就是选飞行员出身的作战部长鲁珉亲自担任。11日当晚,江腾蛟派车拉上鲁珉到西郊机场,由林立果、周宇驰、江腾蛟、王飞4人向鲁珉交代任务,派他驾驶飞机发射火箭,攻打专列。

那天晚上,鲁珉回到家里,心情紧张复杂。林立果交代了任务,背后当然是林彪。鲁珉想:“轰炸毛主席专列,自己将成为千古罪人。如果炸不成,林彪、林立果同样不会放过我。”他越想越害怕,连夜同妻子商量怎样才能躲过这场灾难。

鲁珉的妻子是空军门诊部医生,她用食盐水揉鲁珉的眼睛,把他的眼睛揉得通红,这样肯定就不能开飞机了。天一亮,鲁珉就住进了医院。12日下午,得知毛泽东回到北京,林立果又决定南逃广州,另立中央。当晚,由王飞、于新野等人召集开会,确定13日清晨,护送林彪、黄、吴、叶、李、邱南逃,拟定了飞机和20多个随行人员的分组名单。这个会,鲁珉又参加了,并且上了分组名单。

第一次听到由当事人亲口讲出的如此骇人听闻,难以置信的大事!李德生内心的惊讶可想而知,但他克制住自己,不漏声色,继续问:“你为什么隔了一天多才来揭发交代呢?”

鲁珉说,当他得知13日清晨原先约定的车辆没有开出,也没有人通知他到西郊机场,他不知是逃过去了,还是没有逃过去?妻子告诉他,发现机关办公大楼岗哨增多,司令部通知各部组织学习。他估计情况有变化,更是惊恐万状,想尽快向中央报告。

当时,鲁珉首先想到了毛泽东的亲家,毛岸英、毛岸青的岳母张文秋老太太。因为毛岸英的妻子刘松林后来嫁给了空军学院教员杨茂之,而杨茂之调到空四军32师任副政委后,当时正在南空任职的鲁珉与张文秋一家有来往。鲁珉让妻子武杠桥打电话找张老太太,说“鲁珉要见毛主席,有重要情况要当面报告。”

张文秋问:“什么重要情况?”

武杠桥答:“必须当面报告,情况紧急,越快越好。”

张文秋说:“要见主席得通过秘书安排,来来回回要好几天。如果事情很急,怕要耽误了。”

鲁珉觉得此路不通,又想到了周恩来总理,决定找当年山东大学的老同学、时任《人民日报》总编辑的鲁瑛帮忙。

鲁珉14日一早就从医院出来,直奔鲁瑛家,把他堵在被窝里,对他说:

“快起来,我有急事要当面向总理报告!你能不能帮我联系一下?”

鲁瑛支支吾吾的说:“找总理也不那么容易,我也很难办呀,我们送稿子都是通过办公室联系的……”

鲁瑛让鲁珉直接到人民大会堂或中南海西门。

鲁珉只好又回到医院。怎么办?突然,他想到了李德生。李德生不是正在空军指挥所吗?他立即通过一号台接线员:“找总政李主任通话”。

当然,鲁珉向李德生叙述这一过程时没有讲与张文秋老太太联系的那一段。

鲁珉的交代,断断续续,归纳起来:一是林彪要谋害毛泽东;二是林彪要携带黄、吴、叶、李、邱南逃广州。李德生听完,让鲁珉在记录上签了名,然后对他说:“你提供的情况很重要。我立即向总理和主席报告。你先回去待命。”

随后,李德生立即让秘书将鲁珉的揭发交代记录报送周恩来。

不到一个小时,周恩来打来电话说:“德生同志,鲁珉的揭发交代太重要了,一是说明林彪反革命集团尽管控制很严,但也不是铁板一块;二是说明林彪是一个当面说好话、背后下毒手,极其凶残的反革命两面派。鲁珉的交代,是对清查林彪反革命集团罪行的一个重大突破!清查工作要抓紧,要继续深入下去。”

李德生当即决定,在空军机关,将直接放走256号飞机的副参谋长胡萍、主持制定南逃广州行动实施计划的副参谋长王飞等人收审。

李德生请示中央批准,从总政治部机关调出得力干部组成工作组,到空军机关、西郊机场、沙河机场、空军学院等林立果经常活动的

地方,展开清查工作。这天,李德生把总政治部副主任田维新叫到京西宾馆,对他说:

“林彪的事情,党中央已经向全军各大单位和全国各省市自治区打过招呼了。看来空军的几个单位问题很多,也很复杂。中央同意由总政治部派出几个工作组,进入空军学院、空军34师、西郊机场、沙河机场、空军招待所等几个地方,那里有林立果设立的秘密据点。他们逃跑很仓促,很多东西没有来得及带走,也会有一些同他们搞坏事的人留下来了。工作组去,要依靠那里的干部战士,迅速稳住局面,特别要把他们的据点严格控制好,不能丢失一份罪证材料。还要有一个组到空军机关,帮助我掌握情况。”

田维新回到总政治部机关,立即分别找几位部长、处长,组成5个组,一个一个地分别交待任务。此时,林彪叛逃的消息还是严格保密的。“林副主席”的字样还会不时出现在报纸上。这也是为了防止社会上出现大的波动和混乱,而不得不采取的办法。

李德生送走鲁珉后,注意到他交代中谈到的江腾蛟。

江腾蛟原是空4军政委,文革初期任南京军区空军政委。文革中支持南京空军机关干部反对许世友,后被免职,长期住在北京。林彪曾经提议他担任空军政治部主任,被毛泽东否定。此时他没有任何行政职务,却是空军党委委员、常委办公会议成员和空军政治部党委书记。

当天下午,李德生派秘书将江腾蛟召到空军办公大楼的党委会议室。李德生对他说:“空军昨天跑了一架飞机,这架飞机是西郊机场的。而你11日在西郊机场开会,你现在在空军没有职务,到西郊机场干什么呢?”

江腾蛟满头是汗,他还不知道林彪已出逃,不愿意回答。

李德生说:“我可以告诉你,这架飞机已经在逃出国境后,摔下来了。”

江腾蛟听到这里,脸色陡变。

这时,中央办公厅通知李德生,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召开会议,让他晚上20时到达。李德生要求江腾蛟:“你要端正态度,认真写出交代。”当晚,江腾蛟被送到亚洲疗养院,在一个单间住下。

这天傍晚,李德生的秘书把鲁珉接到北京军区招待所。纪登奎已经在那里等候,他代表中央来听取鲁珉的报告。鲁珉又向纪登奎讲述了一遍。纪登奎要鲁珉把情况写一份简明扼要的书面报告。

考虑到鲁珉的处境和安全,没有再让鲁珉回家,就让他在招待所住下。

当晚20时,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召集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成员会议,通报了两件事情:

一是14日下午,我国驻蒙古使馆就获得了我一架大型客机于13日凌晨2时半,在蒙古境内温都尔汗坠毁。我情报侦听部门也从蒙方通信中证实这一点。后又接到蒙古外交部向中国政府提出交涉:有一架中国民航飞机,侵犯蒙古领空,在温都尔汗坠毁。随后,我驻蒙古大使馆,向我外交部来电报告:有一架中国民航飞机在温都尔汗附近机毁人亡。

周恩来在会上分发了中国驻蒙古大使馆的报告。

二是13日凌晨3点左右,空军一架直升飞机从北京的沙河机场起飞,机上除正副驾驶员外,还有三名空军的干部。飞机一直向北飞行。中央命令拦截此飞机。该机之后在怀柔某地降落,已查明该机驾驶员死亡,三名空军的干部中两人自杀死亡,一人被俘。

会议向政治局报告了防空作战和保卫首都的部署,以及派陆军部队进驻空军、海军机场和码头的决定。政治局一致表示同意。

会议还确定了全军新的作战部署,其中决定,海军各舰队就近归大军区领导。海、空军的机场派陆军部队进驻。

吴法宪在会上提出:“应当向全军发一个电报,说明派陆军部队进驻机场、码头,是为了协助空、海军和民航保卫机场、基地,各部队不要发生误会,不要认为陆军是去监视空、海军的,以免增加矛盾,引起不愉快。空、海军的同志应当欢迎陆军的进驻,陆军也应同空、海军多商量办事,双方要很好地协作,共同完成保卫机场和码头的任务。”

周恩来和黄永胜都同意这个意见。于是,黄永胜当场找来总参的一名干部草拟电报,交周恩来审改后,交中央政治局的全体传阅,然后送毛泽东批发。

毛泽东当即批发了这个电报。

政治局会议大约在9月15日凌晨2时结束。政治局仍然分住两处休息,大家都没有回家。

接着,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分批向中央机关、国务院各部委和军队系统的主要领导人通报林彪事件的经过。这次通报,到15日下午16时才结束。

山海关机场,被256专机甩下的那5个人在飞机升空后谁也没睡。他们首先是想向领导详细报告,大家一起分析,飞机到底出了什么事情?争取给上边处理这件事多一点参考。可是没有人听他们汇报,是不愿意?还是顾不上?不知道,反正没有人听汇报。

9月13日上午,这5位"难兄难弟"还在讨论,到底是怎么回事把他们给扔下了?直到这时,他们谁也没想到给家里打电话。很快,中午就不让他们到食堂吃饭了,一份一份地送来。还没等这5个人弄清是怎么回事,下午就成了地地道道的囚犯,包括专机师临时调到山海关机场的调度室的李海彬主任,都被海军严格看管起来。

14日下午,李作鹏接到山海关机场电话报告说:"未来得及上空军256号专机的剩余机组人员还停留在山海关机场,他们是:西郊机场调度室李主任、副驾驶员、领航员、通讯报务员、空军党委办公室于秘书和两位飞机上的女服务员。"又说:"他们现在的要求是,不要送他们回空军,怕空军杀人灭口,他们愿到海军接受审查。"

李作鹏将情况报告周恩来。周恩来指示:"第一、由海军负责,将未上256号飞机的机组和有关人员接到北京,海军负责安排住处,要注意安全,要注意保密;第二、海军负责对他们进行审查,并将材料直接送我。"

李作鹏将处理滞留在山海关机场空军256机组剩余人员的任务交给海军政治部保卫部负责,他对海军政治部保卫部部长肖云交待了三点:

一、驻地要加强警卫,不能让任何人自杀,不能让任何人逃跑,不能让外面歹徒抢走了;

二、要他们写揭发交待材料,也可以面谈,你们派人前往记录,他们说什么,你们记录什么,他们说多少,你们记录多少,不准搞逼、供、信;

三、伙食标准,每人每天一元。

几天后,海军政治部保卫部提出意见,觉得每人一天一元的伙食标准太高了,经李作鹏批准,改为中灶标准。

14 日下午,256 机组没上飞机的 5 位成员被山海关机场的海军战士两个架一个,押上开往北京的专列。是海军保卫部告山海关机场,将滞留在山海关机场的空军剩余人员送往北京。他们的待遇倒不错,高干待遇,一人一间软卧。可惜有两个形影不离的海军军人不错眼珠地看着。

他们到北京已是 9 月 14 日的晚上,立即被关进公主坟海军大院西侧的平房招待所。这可不是住店的客人,而是犯人。招待所也不再是招待所了,改成临时监狱。还莫名其妙的 5 个人这才彻底明白,他们已经变成敌我矛盾了。专案组桌子一拍,身上一搜,钥匙手表都收走了,说是怕自杀。机组人员觉得很好笑,为什么要自杀?

有的说:“我告诉你,我绝对不会自杀,最起码我得对家对孩子负责,除非你把我打死。”

有的说:“我们又没干亏心事,不怕鬼叫门。”

海军的保卫部门也好奇,所以也问 256 机组成员在山海关都看到什么了?

几天后,时任北京军区第二政委的纪登奎开始审问三叉戟机组人员。对机组人员来说,他们知道的就那么点事,问完了,再没什么说的,再问,再从头说一遍。说的人没烦,听的人早就烦了。审问者觉得真是问完了,就两个人一间,再不问了。不过,还是高干待遇,有警卫战士坐在屋门口警卫。

# 第1199回：进“亚疗”，武健华赴北戴河 许大使，到坠机现场勘察

15日凌晨2时政治局会议散会后，邱会作又到京西宾馆去找李作鹏。谈话间，李作鹏的秘书送来海军政治部保卫部发回来他们对扣押在山海关机场人员的审问记录。李作鹏一页一页地看，并一页一页的递给邱会作。记录稿很长。在一张记录稿上有两点：一是被审查的人要求不要把他们交回空军，以免被杀人灭口；二是被审的人交待：他们听林立果说，在空军学院开过一次会，会上决定李作鹏、邱会作的任务是解决钓鱼台，要抓住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才算完成任务。

邱会作看完这页记录后，李作鹏问他：“你害怕不？”

邱会作说：“说得越邪乎就越好，没有什么好害怕的。现在不是害怕的问题，是主席怎样对待我们的问题了。”

他又说：“我们现在是在下地狱的口子上，可以下去，也可以不下去。以我的估计是非下去不可的！”

大约一星期后，三叉戟机组人员又被秘密押送到西山的亚洲疗养院。

亚洲疗养院位于北京西郊北京军区机关附近，本来是接待来自亚洲各国友好人士休息疗养的。文革开始后一直空着，于是，中央专案组把空军的，陆军的，包括林彪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凡是与“913事件”沾边的都“请”到这里，一人一间，门口坐着北京军区的战士，一举一动都被监视着。当时那气氛，当事人后来回忆说：只能用“恐怖”二字来形容。

9月15日，鲁珉也住进“亚疗”，单独一间房子，不派专人看管，可以在房子外面自由活动。第二天，9月16日，鲁珉爱人武杠桥也被“保护”进“亚疗”，和鲁珉同住，并让她把孩子和东西带上。以后，鲁珉爱人、孩子被放回来，在空军大院外另给了两小间房子居住。

鲁珉后来进了监狱。他在监狱还一直以为，他没有什么问题。毛

主席说:鲁珉是个好同志,将来继续为党工作。毛主席都说了,他还能有什么问题?没想到毛泽东1976年逝世,他仍然被关押。李德生也说:鲁珉是个好同志。但李德生后来也自身难保,被“对调”到沈阳军区。

1978年,鲁珉的问题升了级,被关进北京军区看守所。一个多月后,移到秦城监狱。1980年审判“两案”,鲁珉因为级别不够,被交由空军审判。1980年5月9日,空军军事法庭以涉嫌参与林彪集团阴谋活动,判处鲁珉有期徒刑10年,剥夺政治权利2年。一直以为会无罪释放的鲁珉没等宣判完,精神就不正常了,冲着探监的儿子叫大哥。审判者说他是装病,还是把他移交到山东监狱,一个月后释放。安置在哪里?鲁珉的爱人和儿子在北京,但北京不能去,老家不能去,青岛也不能去,最后安置到女儿所在的洛阳。每月生活费70元,并给了一间小房子。

鲁珉申诉无果,但中纪委批准鲁珉可以住在北京。这样,鲁珉退了洛阳的房子,回到北京。每天到八一湖锻炼,生活平静。有一天,同在八一湖锻炼的原空军司令员王海告诉他,有一本书写鲁珉“叛国投敌,自杀身亡”。鲁珉和家人因此打了官司,官司赢了,判付几千元。但此官司不公开审判,而那本书却到处发行。鲁珉心中郁闷,2000年他在爱人武杠桥的陪同下,回杭州老部队空12师看望。看到以前的老同事,老部下,再看自己,心中更加郁闷。到了上海就病了,尿非常黄,全身黄疸,回到北京,住进医院,诊断胰腺癌晚期。

没上飞机的5位专机组成员还算运气不错,他们在1972年春节被交回空军,直接拉到空军学院。待遇又提升了,变成一人一屋,当然紧箍咒还箍着,还是审查,不过总算降了格。每天除了吃饭睡觉接受审问外,就是没完没了地写交代材料,这可把笔杆子练出来了,他们一辈子也没写过这么多的字。经过所在专机师专案组的一年半到两年的隔离审查后,他们陆续被放了出来。专机组的5个人“待遇”不一样,服务员小魏放得最早,1972年8、9月就走了,第二副驾驶康廷梓到1973年6、7月出来,也算放得早的。那三个老一点的到1973年底才放出来,关了足足两年。

9月13日上班时间,毛家湾林彪办公室的保密员李根清来了。警

卫拦住不让他进,他急了,硬闯了进来。按照上级规定,中央警卫团还是动员他回家。

李根清一看毛家湾被“军管”了,悄悄把保密室的钥匙藏起来了。后来在中央警卫团反复动员下,他才极不情愿地从家中的小收音机后盖里取出钥匙,交给中央警卫团。

3 天后,中央派人把留在毛家湾的林办工作人员集中起来,向他们传达了“913 事件”,并派工作组接管了林彪办公室的工作。以后让他们集中学习中央文件,检举揭发。又过了一段时间,北戴河的林彪办公室工作人员也被遣送回来,集中在毛家湾。一个月后,把他们都送到“亚疗”。

9 月 14 日下午 17 时多,8341 部队副政委武健华正在中南海参与紧急战备值班,忽然接到汪东兴的电话,要他马上到人民大会堂去一趟。见面后,汪东兴对武健华说:“林彪他们已在外蒙古摔死了,总理交代要保护好林立衡的安全,防止林立果的余党乘机搞暗害等报复活动。安全措施要注意隐蔽一点,做到内紧外松。目前先住在北戴河,以后有什么变动听通知,你现在就收拾一下速去北戴河。”

遵照周恩来的嘱咐,汪东兴还要求武健华到北戴河后,将林彪住地的文件清查整理带回,并负责清查毛家湾林彪住地的材料。

当晚,武健华带着中央办公厅机要室赖奎处长、中央办公厅政治部王歆秘书,他们 3 人乘火车于 15 日凌晨 3 时左右到达北戴河车站。8341 部队二大队姜作寿大队长派车把他们接到紧挨着林彪住地的 57 号楼。林立衡住在 56 号楼,相距不远。

住下来后,武健华把中央领导交代的任务告诉了姜作寿。武健华首先和姜作寿一起分析了情况,研究如何不动声色地保护好林立衡在北戴河的安全措施。把林立衡的生活、活动置于原林彪活动的警戒范围内,不与外来人员接触,一切照常。

接着,姜作寿带武健华一行 3 人来到林彪住地 96 号楼的。此时,林彪的工作人员已集中到另外的地方学习,武健华他们没有与他们见面。

当武健华他们一行进入 96 号楼后,仔细察看了卧室、起居室、会客室、值班室等处,看到有些地方相当凌乱,门窗橱柜有的半开半关,

书、报、杂志、信件等到处堆放,有些纸张、办公用品散落在地毯上、墙角边。可以想象,当时林彪他们在出逃时是多么慌乱。

面对这样杂乱的情况,武健华他们确定,以秘书值班室为中心,逐屋先搜罗集中与文件有关的物品。他们从林彪、叶群的卧室、起居室、书房到会客室以及身边工作人员用房,一间一间地清理,桌子、橱柜、枕边、床下,片纸只字都不放过。

将这些物品集中以后,他们又仔细进行梳理,分清急缓予以处置。

第二天,9 月 16 日,他们在 96 号楼看见一张 32 开大的白纸,上面用红铅笔写着:“盼照立果、宇驰传达的命令办。林彪九. 八. ”。

他们觉得这份材料非常重要,马上派专人急送中央办公厅,后来才知道,这就是中央公布的林彪写的“九八手令”。

接着,他们又把北戴河值班电话记录和近期对外来往的书信函件以及与现实斗争有关的材料,一批批送回北京。

十几天后,林彪在北戴河的文件材料全部清查完毕,由中央办公厅机要室派人全部接回北京保管。

9 月 15 日早上 8 时,中国驻蒙古大使馆每半个小时就向蒙古外交部催问一次什么时候到坠机现场。蒙方先说不知道,后来又说温都尔汗天气不好,不能接受飞机降落。其实天空非常晴朗,万里无云。就这样一直拖到下午 13 时 30 分,蒙古外交部终于说,专机 14 时 30 分以后可以起飞。

原来,9 月 14 日这一天,蒙古人民军空军司令朝克将军到坠机现场。一批苏联军事人员也从俄罗斯赤塔州后贝加尔军区乘坐米格 - 8 直升机到了。朝克将军和苏联人在现场会晤。

9 月 15 日上午,苏联大直升机拉走了一台发动机,把坠毁飞机的黑匣子也取走了。黑匣子里记录着飞机的工作情况和人员谈话,蒙古肯特省公安厅厅长奥特根扎尔嘎勒中校认为不能让苏联人拿走黑匣子,但是蒙古人民军空军司令朝克将军还是把黑匣子给了苏联人。但苏联人一直没有对蒙古讲过黑匣子里有什么内容。

为了不让他们同中国人“撞车”。所以蒙方一拖再拖,直到苏联人在现场“折腾”够了,中国人才被允许前往。

蒙方也组织起一个庞大的视察班子,有边防内务军事务管理局处

长桑加上校,外交部领事司司长高陶布,外交部二司专员古尔斯德,国防部副处长达木丁上校,边防内务管理局桑加上校等官员,还有航空、法律、法医等方面的专家,法律专家达希泽伯格,民航局专家云登少校,法医莫尤,卫生组组长桑加道尔吉大夫、卓乃大夫,肯特省检察长乌尔金道尔吉,以及报纸和蒙古通讯社的记者,以及电影摄制组等等,足有几十人。

9 月 15 日下午 13 时 30 分,中国驻蒙古大使许文益带着二秘孙一先、翻译沈庆沂和王中远前往坠机现场。他们和蒙古的庞大班子乘坐一架伊尔 -14 飞机,于 14 时 45 分起飞,航程 300 公里。15 时 46 分,他们到达温都尔汗"土机场",然后乘坐嘎斯 69,沿东北方向的沙土公路和克鲁伦河,直奔坠机现场。行驶一个小时,转向东北,进入丘陵草原。一路上荒无人烟,除断续的馒头形土包外,还有二、三十米高的石头山,汽车在丘陵间颠簸,常被高高弹起。向东北方向走了不到一小时,离开沙土公路,拐入正北一条草丛小路。这里很少有车辆通过,车胎压得枯草吱吱直响。小道左边是一连串较高的山丘,右边是一片向上的漫坡,只见坡顶是烧焦的草地。

近 18 时,许文益大使和孙一先、沈庆沂、王中远到达位于温都尔汗西北的坠机现场。

爬上漫坡,首先进入眼中的是倒梯形的焦黑草地。

站在高处望去,他们看到那架坠毁的飞机。

飞机是由北向南迫降,着陆点正好在盆地中央,坠毁在盆地南半部。飞行员对迫降的地点有选择,飞机从低向上走,以此增加一定的阻力。

这是一块被牧民称作苏布拉嘎的不太规则的长方形盆地,除了西边是向下的漫坡,其它三面都是起伏的土丘。盆地南北长 3000 多米,东西宽 800 多米,平坦得就像人工铺成。到处是 9 月没膝的干枯茅草,草根盘结,脚踩到沙土上有种软绵绵的感觉。

飞机已摔得粉碎,一大片野草被烧焦,遍地是飞机的残骸,右机翼擦地留下了一道几米长的沟痕,一只飞机轮胎飞出数百米远。现场发现 9 具尸体,8 男 1 女,都被抛离飞机残骸十多米,横七竖八地躺在荒野里。盖着白布的尸体格外显眼,周围一片草原,远处有蒙古的哨兵

在游动着,令人顿生凄凉悲惨之感。

飞机早已解体,机尾上有着鲜艳的五星红旗标志和“256”字样,断裂的翅膀上有“民航”二字,不用说,肯定是中国飞机。

许文益问:“是否知道飞机失事的具体情况和原因?”

蒙方说,飞机发生了不明原因的故障。

在蒙方撰写的《现场调查纪要》中,说该机是在没有外来影响下,由于自身的不明原因,降低飞行高度,试图用腹部着陆时,右翼撞地,造成严重损坏,因此发生爆炸而失事。

蒙古警察图瓦尼·久米是第一批到达现场的,他说看见三处大火。他不知道哪一处先起火。当他从车中下来后,没走两步,几乎被什么绊倒,地上是一具背朝上的尸体。黎明时的现场是一幅可怕的场景,9 具尸体散成一线,大火几乎烧光了他们身上的衣服,只剩下手枪皮套和腰带,当天从 200 英里外的首都乌兰巴托赶来的蒙古外交部副部长杜格瑟仁金·额德毕力格说,几乎不可能辨认出飞机上任何一个人。但飞机印记、毛泽东的像章、笔记本等,都表明这是中国人的飞机。

蒙古外交部领事司司长高陶布进一步解释说,凌晨 2 时 30 分左右,贝尔赫萤石矿的夜班工人听到一声很响的爆炸,随即发现东南方一片火光。连忙叫人,分乘两辆卡车到现场灭火。蒙古政府有规定,草场着火,必须马上扑灭,否则要受罚。工人到达现场,火势还很猛,透过火墙看到失事的飞机。他们一面扑火,一面向温都尔汗当局报告。伊德尔莫格县的牧民也赶来了,一齐把火扑灭,这才看见 9 具尸体。等省里来人,天已经快亮了,他们调公安部队看守,并报告乌兰巴托。

# 第1220回：法新社，报道林彪已出事 拼字条，惊现林彪俩“手令”

许大使他们仔细查看了坠机现场，从盆地中央开始，由北向南，呈倒梯形，约800米，宽30至200米的草地全部烧焦，散落一块块飞机残骸，靠近焦土的南部，是散落的尸体。盆地中央，有一道由北向南的S型擦痕，飞机着陆点以南约30米长的草皮被机腹压实，说明飞机是肚皮擦地着陆。飞机弹跳了30多米，才开始进入大片焦土。机身似乎失去平衡，倾斜触地。西侧平行处，是右机翼划出的深约20厘米的一道槽沟。再往南，擦地痕迹消失，进入燃烧区，飞机碎片越来越多，越来越大，面积越来越广。最北头飞机翅膀擦地的痕迹很重。飞机肚子擦地平衡，翅膀擦地产生高温，就产生爆炸，速度很快，一个翅膀擦地翻滚爆炸。标有“256”字样的翼尖断成两半，一个断机翼上写有“中国”两个大字。

最显眼的是机头西北60米处斜卧的机尾，有三层楼房那么高，是从中发动机的进气口处炸断的，只剩一段发动机外壳与尾部连结。再往前，逐渐看到机身的较大碎片，机身的蒙皮，发动机底部的包皮，很大的弧形机身，连着摔碎的舷窗，炸瘪的发动机尾端喷口，一扇门从合页连接处炸开……

孙一先注意到一个炸掉大部分外壳露出内腔的发动机反推力装置，机尾没有着火，末端断裂处露出一大堆五颜六色的杂乱电线，有的电线露出铜丝，有一条粗电缆连着一个碎片。机尾垂直舵没有损伤，右水平舵尖卷曲，左水平舵插在泥沙里，支撑斜卧的整个机尾。垂直舵前竖板上是喷涂的五星红旗，旗下方是机号“二五六”。

飞机残骸 2

256 坠毁现场

机头灰烬前方 80 米处,烧焦的草地头,有一个从根部炸断的起落架,起落架上完好的轮胎,滚到南边 200 米处。它的后面朝北偏西的一条弧线上,散布着三堆尸体,机尾被远远甩到机头的右后方,靠近烧焦的草地边。看来机上人员和机尾都是在机身炸开的一瞬间甩开了的。但它们并不在一条直线上,令人有些不解。机尾离机头大约 60 米,最远一具尸体离机头大约 50 米,说明飞机爆炸的猛烈。从机头到机尾这条东南到西北的斜线上,与三堆尸体朝北偏西那条弧线,大约成 30 至 40 度的夹角,全是飞机上的残片。

许文益叫多拍些照片,仔细观察失事原因,以便送回国内研究鉴定。

二秘孙一先爱好摄影,正好有了用武之地,他抓紧黄昏前的光线拍了好多卷。回国汇报时没带全部照片,只是挑了一些好的,剩下大量的底片留在大使馆。

现场共有 9 具尸体分成三堆,大都仰面朝天,四肢岔开,头部多被烧焦,面部难以辨认,衣服被烧光,躯体完整,只有骨折和皮肉挫伤。由于时间过去已有 60 多个小时,个个肿胀得亮晶晶的像个蜡人。每具尸体都没戴手表,没有鞋子,像是飞机迫降前作了准备。

孙一先根据从北到南,距主机的顺序,把现场的三堆尸体编成 1 至 9 号,从各个角度拍下来。这些尸体分别是:

1 号尸体:衣服里的语录本里,夹着纸条,上面记着毛家湾、汽车保养后以及三座汽车班的电话号码,这应该是林彪的汽车司机杨振刚。

2 号尸体:个子较高,腰系手枪,面部有摔伤后流血形成的血痕,附近有填写着林立果姓名、年龄的工作证。显然,这是林立果。

3 号尸体:体形较矮胖,牙不齐,有虎牙,身上带有一串钥匙。这是刘沛丰。

中间的一堆尸体,4 号尸体:个子较高,根据身上的皮夹克及耳朵的形状判明,他是特设机械师邵起良。

5 号尸体:体瘦,秃顶,有额纹,左腿摔断。这无疑是林彪了。

6 号尸体:长方脸,穿布质飞行服,可以判明是机械师张延奎。

7 号尸体:体矮,个子小,他是空勤机械师李平。

他们的位置似乎是在位于前舱的高级房间里。

8 号尸体:唯一的女尸,左臂摔断,她当然是叶群了。

9 号尸体:个子高大,离机头残骸最近,他就是驾驶飞机的潘景寅。

1 至 3 号尸体,生前是坐在机舱后部联装座椅上,死后他们距离最近一组座位架只有 30 米;4 至 7 号尸体,生前像是位于前舱的高级房间里,三个机械师同林彪摔在一起,表明飞机迫降前他们似乎担负了“保护首长”的任务。说来也巧,9 具尸体,林彪处于中央,死后仍然“以我为中心”。8、9 号尸体,叶群死后靠近潘景寅,很可能她生前是坐在副驾驶的位置上,指挥飞机降落,而潘景寅烧灼最重,估计是由于他握住驾驶杆,在熊熊烈火中坚持到最后一刻。

他们发现飞机翅膀上有个大洞,当时是军事对峙状态,二秘孙一先立刻就想到是否有导弹袭击的可能?

孙一先在现场拣到一张英文注意事项,写明飞机型号 Trident - IE,即三叉戟 IE。再往前走孙一先看到一条宽条纹的小型毛毯,上面印着 PIA,这是巴基斯坦国际民航缩写。

沈庆沂在坠机现场发现一个红色塑料皮的小册子,64 开。红塑料皮大部分烧焦,看不出书名,里面的文字只烧掉一个角,开头是“首长和同志们”,结尾是“长时间热烈鼓掌”。里面讲了空军的发展,其中讲到技术革新,举例说有一种微型电台超过国际水平,还有型号和数据。孙一先用照相机把这几页拍了下来。

其实,这是林立果在空军的讲用报告。据胡萍回忆:林立果把这个讲用报告放在上衣口袋里,里面夹着一张横写的“林彪手令”。1971年9月8日,林立果从北戴河到西郊机场,下飞机时他曾出示给胡萍看,以后林立果又给林办老秘书关光烈看过。

但是,沈庆沂和孙一先在坠机现场翻看这本小册子时,没有看到里面夹着“林彪手令”。当他们准备把这本小册子拿走时,被现场看守的蒙古人制止了。

沈庆沂注意到两堆尸体中间,有一堆物品,明显是蒙古人堆集起来的。其中有两个飞行员图囊,一个烧了一半,另一个基本完好。孙一先打开图囊,里面只有几只黑铅笔和红蓝铅笔。他问航图哪去了,蒙方陪同人员摇头不语。

图囊旁边是一堆手枪,大多完好,有几只枪的枪把烧焦,露出空子弹梭子。孙一先数了数,子弹43发,没有空弹壳。还有两个手枪套和几个空弹夹。沈庆沂看到手枪有6支,一支苏制AK型,5支写有“59SHI”。蒙方问“59SHI”是什么意思,孙一先回答:“是手枪型号,1959年中国制造。”

坠毁飞机上有一块手表,定格在2时27分

孙一先和王中远在2号尸体的确良军装兜底下看见有一张底片,看出是在颐和园的冰上,看不出是谁。还有一个出入证,没有贴照片,编号0002号,空军大院林立果,男,24岁,干部。

王中远在北京大学读书时知道林立果是林彪的儿子。但当时没多想。

孙一先把这个出入证拍了下来。

孙一先和沈庆沂还见到一本《法兰西内战》,一个巴掌大的白纸本,用铅笔写一些零散的字,内容不连贯,难以猜透是什么意思。还有一个红塑料皮空白日记本,一个汽车驾驶执照的塑料封皮,数张一角钱,以及扑克、小勺、水果刀等。

他们在现场看见到两只乳白色半高跟浅口女皮鞋,其中一只鞋腰和后跟烧焦了,另一只完好。

许大使将自己带来的相机交给翻译沈庆沂用,二秘孙一先自己带了莱卡相机,这样两个人就分别拍照。他们不知道飞机上是什么人,

还以为是美国或者台湾的侦察飞机涂上中国飞机的徽号,借以挑起中苏、中蒙之间的争端。但是到了现场一看,明明白白是中国飞机,9 个人全部死亡。侦察机上哪能有那么多人?孙一先开始和沈庆沂边走边拍照。他们拍了一些之后,天就黑了。第二天他们又去拍了一些,尸体照片都是第二天,16 日拍的。

因为 9 月还比较热,蒙古方面建议就地安葬。

许文益对现场的初步看法是,一、蒙古方面基本保持了飞机失事现场,他们用白布覆盖了尸体,并承认有些文件已经搜集保管起来。草地上还拾到九块手表等,个别烧坏,有的还很名贵,已单独保管起来。二、飞机是由不明原因紧急着陆,机上人员都作了紧急降落准备,但飞机着地时失去平稳,右机翼触地引起爆炸燃烧。三、飞机的毯子上有巴基斯坦航空公司标记“PIA”,说明飞机是从巴基斯坦买来的。但不知机上是何人,为何在蒙古失事?现场的情景使许文益感到问题重大复杂。视察完毕,天已经黑透,蒙方一再提出蒙古没有火化习惯,尸体只能土葬,提出马上选择墓地,连夜挖墓穴,明天安葬。

许文益表示同意。

坟场是王中远选的。小山包上,向东,面朝祖国。在场的中国大使馆人员心情沉重,毕竟是中国同胞,很可能是高级首长。在现场草图上,王中远用红铅笔标出墓地,写着中国烈士

9 月 15 日,大使许文益等从坠机现场回到温都尔汗已经是 22 时多了。吃饭时,蒙古司长高陶布说:“我们都已经看了现场,应该写个正式文件。”

9 月 15 日,空军司令部办公室秘书程洪珍要求同李德生谈话。

程洪珍是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年轻的秘书,办事认真,有头有尾。9 月 13 日,他发现自己的领导和指挥他的人突然都不见了,再加上听了传达李德生 9 月 13 日下午的动员后,察觉到空军出了大事情,终于鼓起勇气来找李德生,谈了林立果让他办的许多事,还交出了他的工作笔记。

程洪珍的交代,特别是他的笔记本保存了许多原始记录,提供了很多事情的准确时间、地点等重要线索和证据。比如:

9 月 9 日早晨,周宇驰交代他描绘北京市钓鱼台地图。他绘好后

下午交给了周宇驰。这张地图后来在于新野的保险柜里查获,并且得到证实。

9月11日,林立果、王飞、江腾蛟、于新野曾经到钓鱼台周围实地看地形。另外,周宇驰交代他,向王飞的秘书孙水森要一份国防科委和空军司令部科研部研制的关于化学武器或炸药的文件,程洪珍找孙水森要到后,也交给了周宇驰。

9月15日这天,法新社驻北京记者第一个报导了"中国共产党内部出现危机,危机的挑起人可能是林彪。"这一消息引起苏、蒙方面的重视。

原来,法新社驻北京记者感到了北京的紧张和神秘,于是就在新华社门口、外交部、钓鱼台、中南海的外面转悠,发现新华社门口墙皮上白底黑字的"大海航行靠舵手"给涂掉了。

他想起6月3日,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118厅会见罗马尼亚共产党总书记齐奥塞斯库时,林彪在场。但《人民日报》却分别发表毛泽东和林彪接见外宾的照片,好像分别接见似的。

确实,这是毛泽东最后一次和林彪公开露面。但是摄影记者拍有毛泽东和外宾握手时林彪在毛泽东身后的照片。不过周恩来在挑选照片见报时,却用了毛泽东和林彪分别与外宾握手的照片。

法新社驻北京记者马上猜测林彪出了事。

9月15日下午14时30分,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与周恩来谈话。

当晚,周恩来在政治局会议上宣布:"经情报证实,三叉戟飞机确实坠毁并起火燃烧。林彪、叶群、林立果全部烧死。""具体原因还有待进一步查清,明天召开政治局会议研究处理这个问题。"

当晚19时左右,周恩来带上卫士和秘书纪东到天安门广场四周转了一圈,回到西花厅。

9月16日,周恩来给许世友打电话,让他采取措施,控制住上海的王维国和杭州的陈励耘。

下午15时,周恩来起床后,吴法宪向他汇报了自13日以来空军贯彻执行命令的情况,以及陆军部队进入空军机场的情况。周恩来听了以后,表示满意

周恩来又问了民航的情况,吴法宪说:“民航的主要负责人之间不团结,有意见分歧,但是我现在无能为力,我说的话他们不会听的。”

周恩来说:“是不是请李德生同志去了解一下情况,同民航的负责人先谈一谈,然后再召开会议解决?”

吴法宪表示“一切听从总理的安排。”

再说9月14日上午,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北京卫戍区在怀柔直升机迫降现场收集的碎纸片,分批送到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吴忠那里,基本是拣一片送一片。卫戍区政委杨俊生开始拼对这些碎片,但是怎么也对不上。周恩来知道后,通知公安部部长李震,让公安部的专家到卫戍区去参加拼对。结果,不到两小时就对好交给吴忠,分别是两张十六开的白纸,上面有红铅笔写的字。

一张上写着“盼照……宇驰同……的命……林……九月八日”。

另一张是:“永生同志:很惦念你,望任何时候都要乐观,保护身体,有事时可与王飞同志面洽。敬礼。林彪”。

吴忠立即到大会堂将这两张纸条交给周恩来。周恩来叫来李德生、纪登奎,和吴忠一起,审看这两张碎片拼起来的纸片。周恩来端着放大镜逐一仔细查看。

当晚,周恩来叫李震、吴忠和政治局委员等十几人来到福建厅。只见大厅中间放着一张长方形的桌子。桌子中间摆着一个大搪磁盘子,里面放着一个大黑本子,本子上有两页白纸,是贴着很多碎纸片拼起来的有数行字的两张条子,就是9月13日在迫降的直升飞机现场捡回的碎纸片拼接出来的纸条。

当场有人提出:“这是手迹吗?”

周恩来让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看这两张纸条。吴法宪看了后说:“空军没有‘永生’这个人。”

邱会作走近桌子看了一下,然后摇了摇头,表示怀疑。当他一抬头,看见周恩来就在旁边。

邱会作和李作鹏也说不知道此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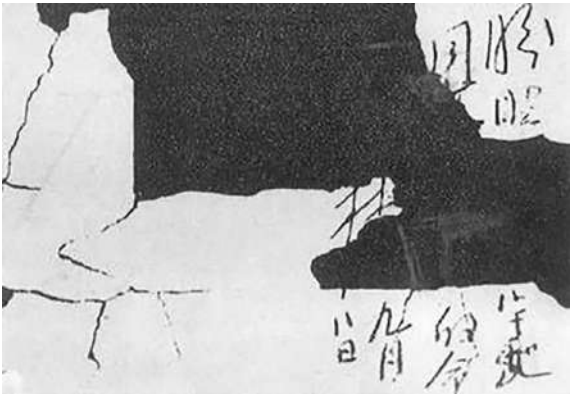
黄永胜看了后一下就坐下去了,气得一言不发,情绪很不好。

吴忠介绍了这两张纸条是动用了大量民兵收集起来的事情经过。

然后,由吴法宪介绍了那架直升机企图出逃和迫降的经过。

随后,李震详细地介绍了直升机上的情况,及直升机迫降后周宇驰、于新野自杀和李伟信还活着等事情。

又过了两天,在坠机现场又找到了“月”字边的碎片,对上了是“永胜”。周恩来拿去给毛泽东看了。



这两个“手令”起到什么作用呢?李德生后来通过多次在亚洲疗养院讯问收审人员和学习班人员,逐步弄清了详细情况。

第一张“手令”,即“盼照立果、宇驰同志传达的命令办”,是9月8日晚,林立果从北戴河飞回北京后,于西郊机场,先给前来迎接的空军副参谋长胡萍看了,随即命令他准备两架飞机,林彪要用。然后他回到毛家湾,又给林办秘书于运深看了林彪的这张“手令”。于秘书记得,上面是用红铅笔竖着写的,没有章。

当晚,林立果、周宇驰向江腾蛟出示了这一“手令”。9月9日,又在空军学院给王飞看了。9月10日晚,林立果给关光烈看了林彪的“手令”。9月11日晚,周宇驰向鲁珉再次出示了这一“手令”。直到9月13日凌晨3时15分,党中央已经下了禁空令,周宇驰还是靠这个“手令”,骗取了直升飞机。

第二张“手令”是写给黄永胜的,“有事时可与王飞同志面洽”。于是它从王飞手里两进两出。第一次交给王飞是9月10日下午,刘沛丰从北戴河回到北京后,林立果让王飞适时送交黄永胜,并由王飞作黄永胜与林立果之间的联系人。可是11日夜,得知毛泽东离开上

海后,林立果下令“解除任务”,于12日上午,林立果派刘沛丰把林彪给黄永胜的“手令”从王飞手里收了回去。到了12日晚,林立果、周宇驰布置王飞组织南逃广州,由于新野再次把林彪给黄永胜的“手令”交给王飞,以便向黄永胜出示,安排黄、吴、李、邱13日凌晨乘飞机南逃。12日夜,周宇驰接到林立果的电话,说是去广州的计划肯定不行了,连忙告诉王飞:“暴露了,不搞了。”这一“手令”又由王飞交回到于新野手里,于新野交给周宇驰,带上了直升飞机。

这个“手令”最终没有到黄永胜的手里。

# 第1201回：拟《通知》，政治局举杯相庆 葬林彪，丁盛汇报“李必达”

9月16日晚上20时，中央政治局在福建厅等待。一直到21时，周恩来才从毛泽东那里回来。他说：“已经向毛泽东请示，中央很快要发一个文件，把‘913事件’通知到全党。”他提出由张春桥、姚文元起草文件，大家同意。

在讨论这个《通知》的传达范围时，张春桥提出：“《通知》只传达省、市、自治区的常委，范围是否太小了，各地的中委和候补中央委员也应当传达。”

叶剑英说：“为了保密，目前还只能传达到省、市、自治区的常委，不能扩大。”

姚文元反驳说：“一个党中央的副主席跑了，为什么不向全体中央委员、候补委员传达？我们作为政治局委员，有责任提出这样的问题。”

接着，江青、张春桥、纪登奎、李德生、汪东兴等人，都表示同意姚文元的意见。叶剑英坐在那里半张着嘴，一句话也不说了。

最后，周恩来也表示同意姚文元的意见。

周恩来提出：在清查与林彪事件有关的人和事时，《通知》要强调治病救人，犯了路线错误的好人，绝大多数是可以回到正确路线方面来的。他还特别提到，文件上要表扬一下林立衡，因为是林立衡首先向周恩来、汪东兴报告林彪有可能出走的消息。大家也一致表示同意。

接下来，周恩来向政治局传达了毛泽东和他二人共同回忆的林彪曾经犯过的十六条错误。大概是：

一、林彪在井冈山时，就怀疑红旗究竟打多久，毛泽东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那封长信，就是针对林彪的。

二、1934年，在反国民党第五次“围剿”期间，林彪拥护王明路线，

写文章赞扬李德的“短促突击”。

三、遵义会议后,反对毛泽东的作战计划,说什么“现在是走‘弓背路’,不走直路,弄得部队非常疲劳”。

四、长征部队到达贵州以后,林彪主张在土城同敌人一次决战。土城战役没有打好,部队向云南转移的时候,林彪不愿意去。

五、在土城战役之后的不利情况下,林彪又主张在贵州的鲁班场同国民党打一个决战。

六、红军过金沙江以后,林彪在会理会议上提出,不要毛泽东和朱德指挥队伍,要彭德怀来指挥,并亲自给彭德怀打电话,要彭德怀出来。

七、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合的时候,林彪拥护张国焘的主张,所以张国焘的伪中央选了林彪当中央委员。

八、红军到达陕北以后,林彪不愿意留在陕北,要求毛泽东给他两千人、枪,他要带队到陕南去打游击。

九、林彪不愿意当红军大学校长,认为这样就是贬低了他。

十、红军改编为八路军以后,林彪又执行了王明的路线,主张同国民党合作,不搞共产党的独立自主。

十一、陕西洛川会议上,林彪主张扩大规模运动战,不主张搞游击战。

十二、平型关战斗以后,毛泽东指示以营为单位进行游击战,而林彪主张以团为单位开展运动战。

十三、平型关战斗以后,林彪居功自傲。

十四、平型关战斗以后,林彪单人独马地闯到阎锡山的部队里,被阎锡山的部队开枪打伤。

十五、林彪在负伤以后,要求到苏联去养伤。当他从苏联养伤回来以后,中央派他到重庆当谈判代表时,他有“右倾”情绪。

十六、一九四八年的辽沈战役中,林彪在东北不愿意执行毛泽东和中央的先打锦州的指示,主张先打长春 。

会议最后,周恩来说:“明天政治局的同志都回家住,不用住在人大会堂和京西宾馆了。吴法宪在政治局的活动多,空军的指挥暂时由曹里怀、王辉球、邝任农、薛少卿、梁璞组成五人小组负责指挥,李德生

协助吴法宪处理空军的一些问题。”说完,周恩来问吴法宪:“是不是同意?”

吴法宪表示:“坚决照办。”

周恩来还在会上宣布:“军委办事组也回西山办公。”

临散会,周恩来十分高兴地说:“今晚由张春桥做东,买一瓶茅台酒。”

张春桥马上说:“好。”随即叫服务员拿来一瓶茅台酒,给每人倒了一杯,并说:“我们今后在毛主席领导下做好工作。”

大家碰杯喝干后,周恩来兴致勃勃地说:“大家回去休息。”

黄永胜站起来就往外走,周恩来立即让秘书纪东把他叫回来。

纪东在大会堂北门下台阶处追上了黄永胜。

周恩来和黄永胜又谈了约20分钟。

留在大会堂的工作人员,都得到了暂时的缓解,可以回去和家人团聚了。弥漫着高度紧张气氛的东大厅,终于恢复了往日的平静。大家都已经如释重负地离开了,屋里只剩下周恩来、纪登奎。

突然,一阵嚎啕之声如江水崩堤猛然暴发,这是痛哭,纪登奎一下呆住了!不是亲眼目睹,他压根儿不会相信,发出哭声的不是别人,正是周恩来!就是刚才还和大家一样露出久违的笑容,举杯庆祝这不幸中万幸的周恩来!只见他面对墙壁,双肩在剧烈的颤抖……自从调到中央工作,纪登奎看到的周恩来永远是从容、镇定、乐观。不管是外交上的剑拔弩张,还是党内错综复杂的局面,他永远应付自如,有用不完的智慧和精力。而且,他仿佛是专为克服困难来到这个世界的,往往越是困难、艰险,他越有力量和办法,仿佛世界上没有难得住他的事情。像今天这样的失控,纪登奎是第一次看见,太意外了,太震动了!以至于平时反应敏捷极善言辞的纪登奎,此刻也乱了方寸,话说得结结巴巴:

“总理,总理,林彪一伙摔死了,这是不幸中的万幸,应该说是最好的结局了,您该高兴,对不?!”讲完他自己才意识到,自己分明是在重复着周恩来刚才讲的话。

周恩来回过身来,双肩依然在颤动,脸上老泪纵横,他摇着头,声音嘶哑地反复说:“你不懂,你不懂!”

……

再说黄永胜回到家里,他的大儿子黄春光问他:“爸,听说林彪他们跑到国外摔死了?”

黄永胜问:“你们都知道了?”

黄春光说:“知道了。”

黄永胜气恼的大声喊:“跑什么跑,害死人!”

黄春光问:“他们为什么跑? 到底什么事儿?”

黄永胜生气的说:“我哪知道啊?”

黄春光说;“他跑了,这么大的事,你是不是给主席写一个检讨?”

黄永胜说:“我检讨什么? 他跑,我不知道。九届二中会我没上山,也检讨了。现在,我也没犯新错误,我检讨什么?!”

黄春光说:“最起码,你对林的事情做一个表态。”

黄永胜说:“我怎么表态? 现在中央都没态度,我表什么态?”他对儿子说:“表态和不表态是一样的。”

黄春光说:“那我不上班了,咱们准备回老家吧。”

黄永胜说:“不用,你去上班吧。”

黄春光说:“我不上班了,在家陪你吧。”

黄永胜说:“不用,你还是上班,看看再说。”

9 月 16 日晚上,广州军区党委常委开会,研究几天来的应变工作情况。会间休息时,丁盛在走廊里踱来踱去,忽然,他拿起了保密电话机,要通了周恩来,汇报军区清查工作情况。他特别提到黄永胜有个叫李必达的秘书,关押在军区政治部管训队,请示该怎么办? 周恩来当即表示:“这件事我知道了。把李必达关押起来是错误的。当然,秘书偷听首长的电话也是不对的。这个人先不要放,对他的处理稍后再通知你们。”

李必达入伍前是武汉大学学生,入伍后分配到第 41 军锻炼,1966 年在该军 121 师 362 团 4 连代理副指导员。此时 362 团政委是曾任黄永胜秘书多年的于贯文,他对李必达产生了良好印象。1967 年 12 月底,军区机关从 41 军为黄永胜选调秘书,此时已升任 121 师政治部主任的于贯文举荐李必达中选,于 1968 年开始给黄永胜当秘书的。

初任秘书的李必达干劲十足,黄永胜夫妇都很满意。

于贯文于1968年初被借调到军委办事组工作,黄永胜到北京工作后,他与黄永胜夫妇常有接触。作为李必达的举荐人,他自然关心李必达的表现,曾向“黄永胜办公室”主任、黄永胜夫人项辉方了解李必达的情况。项辉方说李必达“表现很好,人老实,能写东西,文字水平超过语言表达能力,首长很满意”。项辉方对李必达关爱备至,光是为他找对象就费尽心机,多次亲自出马。

1968年底,“黄办”按照上级统一部署,进行“清理阶级队伍”学习。这期间,李必达因为一件小事引起“黄办”主任、党支部书记项辉方的不满,发动“黄办”工作人员对他进行帮助。李必达多次检讨都未过关。入伍后一帆风顺的他难以承受这意外挫折,自感前途渺茫,内心痛苦之极,多次找老领导于贯文倾诉。一次,于贯文当着李必达的面给项辉方打电话,委婉地指出对李必达的问题是否看得太重了?建议不要抓住不放,“好聚好散,实在不行,叫他回广州算了”。但是,项辉方一下子来了原则性,坚持要把问题查个水落石出。

李必达感到自己被逼到了绝境。他曾向项辉方汇报过,一次黄永胜在与叶群通电话时,大骂江青“想当清朝那个女人”。这可是“恶毒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的行为。李必达当时反映这个情况,还是出于对首长的关心,因为黄永胜住地小翔凤胡同是居民区,他讲话一向是高嗓门儿,李必达是怕隔墙有耳,造成不良后果。

1969年4月,李必达与他的恋爱对象王瑞华商量后,决定给毛泽东主席写信,揭发黄永胜等人的反党罪行。当时,他们认为时任北京卫戍区司令员的温玉成在任广州军区副司令员时与黄永胜有矛盾,此时他又负责“样板团”,能经常见到江青,便于4月27日深夜,将揭发信交给了温玉成,请他转呈江青。

温玉成收到李必达的揭发信后,考虑再三,还是把信交给了林彪。

叶群看到李必成的信后,立即于4月29日在京西宾馆一楼会议室与黄、吴、李、邱开会决定,将李必达秘密逮捕。

黄永胜的老婆项辉芳前几天还在给叶群写信反映黄永胜的作风问题,此时也立即加入了帮助丈夫的活动中。军委办事组几位要员要项辉芳做到3条:一、快把写信的李必达找到;二、在党支部宣布李必达偷听电话、窃密、造谣、挑拨关系等罪名,但要绝对保密;三、搜查李

的所有东西,凡是犯罪证据,谁搜出来的谁签名,支部书记(即项本人)要签名。

4 月 30 日,被密捕的李必达由吴法宪派飞机送往广州军区监狱关押。在飞往广州的飞机上,李必达在《毛主席语录》最后一页纸上写下:“因为我揭发反革命集团罪行,所以被害,要求革命同志帮助我向毛主席报告。”机组人员在飞机上拾到语录本,交给吴法宪,吴法宪交给叶群,叶群又把黄永胜和项辉芳叫到毛家湾研究此事。她让项辉芳给黄、吴、叶、李、邱写报告,给李必达罗列盗窃机密、企图谋害总长、散布流言蜚语、行动诡秘等罪名。5 月下旬,项辉芳又专程到广州了解对李必达的审查情况,给看守人员讲话:“这个案件很重要,是当前最大的政治案件,办事组首长亲自抓。”此后,加紧了对李必达的看管和审讯。

“913 事件”后,经周恩来批准,将李必达从广州接回北京,恢复自由。这时,江青才知道温玉成将李必达揭发黄永胜骂江青的信抓交给黄永胜了,气的大叫要把温玉成枪毙,周恩来压下了这份报告。

1971 年 10 月 28 日夜,成都军区政委张国华接总理办公室通知,就地隔离审查温玉成。

9 月 16 日,中国驻蒙古大使馆的官员第二次来到坠机现场。

孙一先注意到,与第一天相比,现场多了一支微型冲锋枪和一支手枪,还有两个黑色人造革手提包,一个是工具包,装着扳手、钳子等,还有一个机关人员的文件包,也是工具,但里面还有一支手枪。

蒙古司长高陶布问许文益大使,法医是否可以开始工作?

许文益大使认为死因十分明显,死者是由于飞机失事而死亡是清楚的,所以没有必要进行解剖,不必再折腾了。

因此双方商定不进行法医解剖而埋葬。

蒙方士兵已连夜挖了大坑,长 15 米,宽 3 米。并赶做了九口白茬棺材,蒙古士兵将每具尸体都用白布包裹,由北向南编为 1 至 9 号,按编号入棺。9 号尸体(潘景寅)身躯高大,爆炸瞬间两手上举,僵硬了。棺材很小,勉强装进去,却不能合盖。蒙古士兵请示是否可以折断,高陶布看看许文益大使。许文益大使痛苦地点点头,只听咯吱咯吱的骨折声。

之后蒙古士兵钉上棺盖,用汽车拉到墓坑边,按编号逐一下葬。

按蒙古习惯,死者应覆盖红边的长条黑布,然后盖棺。但是来不及了,只好在九具棺木上覆盖整幅红布,上面再覆盖稍窄的黑布。高陶布对此表示歉意。

11 时,9 名死者被安葬在距失事地点西边 1.1 公里的无名高地的东坡,东经 111°17′40″,北纬 47°41′20″。

棺材在墓坑里排成一排,每人一锹土。许文益大使和高陶布、桑加上校分别执锨填土。接着孙一先和王中远、沈庆沂也填了土,最后由蒙古士兵填埋,堆起略高出地面的坟头。每具棺木的头顶都竖立一块高出地面的木牌,涂着红色的阿拉伯数字。写上“中国九同志之墓”,因为不知道姓名。

大火后仅存一份林立果个人证件,被蒙古人拿走了。

许文益大使问:“昨夜提出的关于墓碑和放纪念物的问题是怎样考虑的?”

蒙古司长高陶布说:“墓碑暂不定,纪念物可以从飞机残骸中选一个,不写字。”

沈庆沂出主意,把写“中国民航”的两段机翼放在上面,蒙方说太大,不容易搬动。王中远说不如把机尾炸掉的那个发动机进气环搬来。高陶布和桑加互相交换了眼色,表示同意。蒙古士兵用汽车把进气环和环中间的分流锥拉来放在坟头上面。

蒙方要中国驻蒙古大使馆提供飞机乘员名单,中国方面没有正式答复。蒙方认为:如果真是民航飞机,蒙方的要求中方是可以满足的。在这种情况下,蒙古政府认为,要确定这架飞机坠毁和人员死亡的原因,必须要有一个调查报告。

9 月 16 日,许文益他们回到温都尔汗已经是 17 时多了。当晚 22 时左右,蒙方送来《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飞机在蒙古人民共和国领土飞行失事的现场调查纪要》,要求连夜会谈。中国驻蒙古大使馆翻译沈庆沂和王中远马上翻译,等文件翻译出来已经是 9 月 17 日凌晨 1 时。

蒙方的《现场调查纪要》一口咬定是军用飞机,抓住出入证、手枪、军服这些军人物品死死不放。死者的脸形虽然分辨不清,但从烧毁衣

服的特征、周围的武器、某些死者身上没烧毁而留下的手枪套、子弹带和从失事地点找到某些证件来看,证明他们是军事人员。在失事地点有手枪7支,自动枪1支(实际上是2支),有的已经烧毁,子弹43发,枪套8个,中华人民共和国货币5元一张,10元6张,共65元,烧了一半和完整留下的军服、床上用品、椅套、书籍本子、手表等东西。其中有些东西由地方有关部门保管着。这些迹象证明,失事飞机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军队。

这时,蒙方不再使用“侵犯”和“入侵”,改用“进入”,但仍强调飞机是“军事人员驾驶”,“军事人员乘坐”,甚至说是“为军事目的服务”。

9月17日凌晨4时25分,中蒙双方在旅馆正式会谈。

中国大使许文益首先发言,对蒙古政府提供的各种方便条件和蒙方人员的友好合作,表示感谢。接着提出十条修改意见。主要三点,提议把“进入”改为“中国民航飞机由于迷失方向误入蒙古国境”。不能光讲中国国旗和256号,要加上“民航”二字。机上有“军事人员”,也有“非军事人员”。对于蒙方提交的《安葬纪要》,许文益提议,将序言部分改为在蒙古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有关部门的友好帮助下,中国民航256号飞机失事遇难的9名人员的遗体按下述方式安葬。……

许文益发言后,蒙方建议休会10分钟。但蒙方并没有复会,而是到邮局发了电报,一直拖到9月17日上午10时15分才复会。

在等待时,许文益收听到外电报导,称中国关闭了所有的机场,禁止所有的飞机起飞。这是不是与失事飞机有关?许文益考虑形势紧迫,不宜久拖,要赶快向国内报告现场视察和谈判的情况,听取国内指示。

实际上,国内也很焦急。怎么大使许文益到现场视察还没回来?国内急需知道现场的情况,毕竟眼见为实呀。

9月16日23时30分,就在许大使他们还在温度尔汗等待蒙方《现场调查纪要》的翻译结果时,一份催问视察情况的电报从国内发到中国驻蒙古大使馆,并询问为什么在现场滞留?许文益感觉到国内的焦急,复会后,向蒙方提出“鉴于我国庆临近,大使要在今天赶回乌兰巴托主持馆务,建议双方在乌兰巴托继续会谈。如果蒙方一定要在这

里谈,我方则由孙一先代表大使继续商谈。”

蒙方听说大使要走,有些意外。说“我们来这里的目的是了解和分析现场,双方都有尽快结束这个问题的愿望。大使工作很忙,大使也了解我们的工作也很忙。关于大使要回乌兰巴托,我们已经报告上级,上级通知,希望尽快把《安葬纪要》完成,我们一起回去。”

双方在温度尔汗又谈到9月17日下午,蒙方对中方的修改方案逐一驳回。不同意写上中国民航因为“迷失方向”,认为蒙方没有这方面的证据,没有必要,也没有根据这样写。也不同意加上“民航”。会谈有些僵了。

到第三轮会谈,已经是15时20分。蒙方看《现场调查纪要》达不成协议,转而讨论《安葬纪要》,争论的焦点还在是“军”是“民”上。

前后进行了五轮谈判,为避免搞僵,许文益建议大家不要着急,回乌兰巴托继续谈。《现场调查纪要》通过了,《安葬纪要》自然就解决了,事情可以圆满结束。

蒙方高陶布拒绝,表示他们马上要单方面签字。

许文益表示遗憾,最后一轮会谈不欢而散。

# 第1202回：检讨难，黄、邱二人抱头哭 谢静宜，受委托看望总理

再说上海这边，9月13日，王洪文放下许世友的电话后，立即跑到康平路找与他共同主持上海工作的徐景贤，向他详细地叙述了许世友的电话内容，两人又仔细地分析了半天，结论还是："吴法宪跑了！"

徐景贤说："空军司令调一架飞机很容易的，可能他飞走了。不过，他究竟会跑到什么地方去呢？"

王洪文也想不通："国内不像，总是朝国外跑。"

正当王洪文与徐景贤密谈的时候，市委机要室送来一份绝密电报：《毛泽东摄影画册》暂不发行，特别提到第几号、第几号照片要删掉。

《毛泽东摄影画册》正式出版的消息是9月12日《人民日报》报道的，是为了纪念中国共产党诞生五十周年而编辑出版的，报道说："这套照片中，有几幅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副主席在一起的照片，使人亲切地感到林彪同志一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决贯彻执行和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是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学习的光辉榜样。"

这本画册是在上海制版印刷。此时，徐景贤马上拿出早先收到的画册目录，一幅幅对照，一看，这些指令删掉的照片竟然全是毛泽东和林彪的合影，也就是说凡是有林彪出现的照片都要删掉。王洪文和徐景贤心里都大吃一惊，但谁也没说。

禁空令下达后，正好有一个朝鲜高级新闻代表团在上海，下一站要飞往韶山。怎么向他们解释呢？外交部也说不出理由，就说改道走吧。徐景贤没有办法，只好让市革命委员会外事组安排他们改乘火车去韶山。

9月15日，中国青年代表团团长从智利回到上海，只见机场的客人聚集很多，飞机几天不准起飞。正在这时，管外事的人说："周总理

特许青年代表团一行乘一架载送重要外宾的客机回北京。”

到了北京,中联部的领导先让代表团在北京饭店写出国访问的总结报告。代表团团长、8341 部队机要员、时任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革委会副主任的谢静宜打电话问 8341 部队杨德中政委,询问“主席、总理在哪里?”

杨德中说:“小谢,两位老人家都好,你放心吧!”

两天后,谢静宜见到了毛泽东,老人家跟她谈了“913”事件的经过后,让她去看望周恩来。毛泽东说:“总理这一段特别辛苦,‘913’发生后,他一直吃住在大会堂指挥工作,紧张得很呀。现在没事了,让他睡几个好觉。”

另外,他还让谢静宜转告周恩来一件事:“远新来电话,想回来看看我,他说不看到我,总有点不放心。这事得请示总理一下,远新是军人,现在能不能离开岗位回来几天?请总理定。”

谢静宜来到西花厅,周恩来兴致勃勃地对她谈了“913”事件发生后的紧张情景以及毛泽东的指示。他说:“我时刻观察着飞机的动向,命令全军处于一级战备状态和立即采取的一切措施。把几员大将叫到大会堂来,一是为了好控制他们,二是为了面对面同他们谈话,问清林彪这次逃跑与他们的关系,他们几位是否知道……直到弄清林彪座机坠毁后才松了一口气。”

9 月 17 日上午,依然住在大会堂的吴法宪起床以后去找周恩来,向他请示说:“我准备回空军了,看总理有什么交代。”

周恩来说:“你回去吧。回去后可以在空司开会,揭发批判‘913 事件’。要注意稳定空军和民航,弄清问题,防止人、机外逃。为了帮助你工作,我准备派杨德中到空军去参加你们的会议。”

吴法宪回空军大院以后,参加李德生召集空军司令部副部长以上的干部会议。见到李德生,他连连表白说:“主任啊,我们空军犯了大错啦,我有罪啊!”会上,吴法宪首先作了检查,表示空军的问题,“首先自己要负主要责任。”

会议上发言很踊跃,大家纷纷起来揭发问题,并对“913 事件”表示愤慨。会后,李德生将专机师师长时念堂等 4 个人留下谈话。

9 月 17 日,周恩来听取李德生、纪登奎汇报亚洲疗养院收审人员

情况后,对李德生说:“你去和他们4个人分别接触一下,看看他们有什么揭发交代,看看他们的态度怎么样。”

周恩来说的这4个人是黄永胜、吴法宪、李左鹏、邱会作。因为这几天他们虽然天天在人民大会堂和周恩来见面,却没有向中央反映任何情况。

当天下午16时,周恩来给黄永胜打电话,他没在,理发去了。周恩来又给邱会作打电话。

听说是“总理的电话”,邱会作赶紧拿起话筒,他儿子邱路光和他妻子也都凑到电话旁边听。

电话里,周恩来对邱会作说:“刚才,我同黄总长打电话,他理发去了。现在,我把要同他说的话,先同你说一下,等会儿你到山上去同他说一下,我现在就去睡觉了。

现在有好多迹象表明,三北边防是有些情况的,值得重视,你告诉黄总长今晚召开一次各总部、军兵种首长会议,把三北情况很好研究一下,并要尽快落实。一切工作都要具体化,战备工作还是由黄总长负责。告诉黄总长可不许撂挑子呀!”

邱会作回答说:“总理的指示精神我懂了。我很快就上山去向黄总长报告。”

周恩来又问:“你现在干什么?”

邱会作答:“我在想问题,准备写报告。”

据邱会作讲,他从16日就开始在总后的家中给毛泽东和党中央写报告。但写了一个开头就写不下去了。他觉得在当时那种严峻的情况下,自己间接知道的不能乱说,很多事情也无法说清楚。关于“庐山会议”一事的检讨,毛泽东那里已经通过,这之后他只在周恩来带领下到北戴河向林彪汇报过工作,没有单独谈话。“五一”节在天安门上向林彪敬了个礼,也没有和林彪单独谈话。除此他与林彪没再见过面,也没有通过电话,他觉得没有什么新问题,报告一直没有写成。

周恩来听说邱会作在准备写报告,就对他说:“想问题就很好。对历史上的事,不想是回忆不起来的。会作呀,你的水平怎么这么低呀。你怎么和林彪搞到一起去了?”

邱会作说:“总理呀,我不只是水平低,我的觉悟也很低。对现在

发生的事,我想不通,也说不清楚,更是写不请楚。”说完,他的眼泪就流下来了,心想:“林彪是党的副主席,是主持军委工作的副主席,我不和他搞在一起,还能和谁搞在一起?!”

电话这边,周恩来“啊?!”了一声,有些吃惊地说:“你还说不清楚?!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思想,这是不对的,你的事没有多少,黄,吴麻烦一点,黄总长是横竖看不起江青。你过去同我说过的那些问题,现在证明你说的是对的,对那些问题,我是不会忘记的。最近两、三天内,我会抽时间来找你谈,你的情况我还会同毛主席谈。据我现在了解的情况,你们是没有什么问题的,我是保你的。一会你见到黄,也要给他做工作,尽快向主席表示态度。”

邱会作说:“这个时候做黄的工作有难度。”

周恩来说:“你去做工作嘛!批陈整风会上,黄不肯检讨,说他在庐山没有发言,还跟我们讲党性原则。后来,你做了工作,他才肯检讨,我相信你能做通工作。”

“好,照总理的指示办。”邱会作答到。

放下周恩来的电话,邱会作感到轻松很多。他对在场的妻子胡敏和儿子邱路光说:“这下好了,总理保我了。快搞饭吃,我们上山。”

吃完饭,邱会作就和胡敏、邱路光上了西山。

到了山上邱会作的住处西山3号,邱会作叫儿子先到黄永胜家看看他理发回来没有。黄永胜住在西山最高处的9号,9号下面就是庞大的地下工事,那是军委前指的所在地。

一会儿,邱路光回来说:“黄伯伯回来了,请你去呢。”

邱会作问儿子:“你黄伯伯在干什么?”

邱路光说:“他在批文件,并对我说,他要站好最后一班岗。然后他放下笔,从桌子上拿起一个相框给我看。他说,路光呀,这是我在井冈山当排长时照的,像不像我?”

邱路光还没有讲完,邱会作就起身去黄永胜那里了。

大约18时30分左右,邱会作在西山9号见到黄永胜。两人坐下来后,一时千言万语不知从何说起,反而沉寂片刻。最后还是黄永胜先开了口。他说:

“老邱啊,我们以后谈话的机会不会多了。”

邱会作何尝不是如此感觉……他对黄永胜说:“总理保我们了。”他讲了周恩来来电话的情况。

黄永胜沉思了一下,说:“话是这么说,文章不一定这么做哟!总理做不了这个主,江青不会罢休的。我们过去上了汪的当,他利用我们看不惯江青的霸道啊,看不惯江青对老干部没有感情,她到处出口伤人啊,看不惯江青在政治局颐指气使,为难总理啊,汪东兴老鼓动我们去反江青,说主席讨厌江青。那次我和胖子去反映江青攻击总理的事,才知道主席对江青根本不是汪说的那么回事,其实主席很在意江青。”

黄永胜说的“那次”是指1970年5月17日他和吴法宪到毛泽东那里反映江青私自召集政治局委员开会一事。

黄永胜接着说:“我看最多把我和胖子抓起来,总不能都抓起来,难道都不要了吗?党有政策嘛。你放心,把我抓起来,我什么都不会说。江青会算老账,要算老账也还是那些,没有什么可怕的。”

邱会作说:“就是没有什么可怕,才难办呢!问题就难在这里。”

黄永胜:“我们也有嘴嘛!我们反江青、张春桥,有道理嘛!不顶住他们那一套,不行嘛!支持总理工作有什么不对!?过去主席是不会出面管这些的,现在不同了,他们会骑在我们头上做林彪是‘反革命’的文章。”

他说到这里站起来,在房间里来回踱步,然后走到有一幅巨大的三北地图的墙前,大声疾呼:“你跑什么跑,害死人呀!”

随后坐下来又说:“庐山会议以后,我们还没有吃够苦头?我看,林彪的下场就是反江青的结果,现在该轮到我们头上了。”

黄永胜说着、说着有些不耐烦了,突然说:“说这些王八蛋干什么,算了,不说这些了。”

他问邱会作:“老邱呀,我们是什么时候认识的?”

邱会作:“我在江西苏区就知道你,我刚参军时,你就当团长了。”

黄永胜:“打张辉瓒时,我就当师长喽。”

他问邱会作:“你们家穷不穷呀?”

邱会作:“穷的就差光屁股了。我们家穷是穷,不过,从辛亥革命时就是老根子了,革命党人常逃到我家歇脚,江西苏维埃时期,我爷

爷,我父亲、母亲都一齐上阵搞革命。红军撤离苏区后,敌人把我们家的房子都烧了,全家躲在山洞里。1949 年方强他们南下时,一个团部指挥所就设在我们家。”

俩人你一言我一语,从江西苏区、五次反围剿、长征路上、延安、热河、东北、辽沈战役、平津战役、广西剿匪、十五兵团、华南军区、中南军区……说着说着,都开始流泪,边说边流,黄永胜后来更是大哭起来。

参加战备会议的人陆续来了,他们的谈话也就结束了。

会后,黄永胜还是把周恩来给邱会作打电话这个好消息告诉了家人。

当晚 20 时 30 分,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与周恩来谈话,审阅了周恩来报送的中共中央关于林彪叛国出逃的通知稿,批示:“照发。”

这份《通知》说:“中共中央正式通知:林彪于 1971 年 9 月 13 日仓惶出逃,狼狈投敌,叛党叛国,自取灭亡。林彪叛党叛国,是长期以来,特别是党的九届三中全会以来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的继续,是林彪这个资产阶级个人野心家、阴谋家的总暴露、总破产。”

“通知目前只传达到省、市、自治区党委常委以上的党组织。有关林彪的文字、图画、电影等均暂不改动。”

对与林彪事件有关的人和事,《通知》说:“在毛主席的领导下,按照正确路线和政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经过批评和自我批评,犯了路线错误的好人,绝大多数是可以回到正确路线方面来的,阶级敌人分裂我党我军的阴谋总归是要失败的。中央相信,林彪这个隐藏在党内的定时炸弹自我爆炸是大好事,必将使全党全军进一步提高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觉悟。跟着林彪走绝路的只能是极个别的。中央号召全党同志首先是高级干部同林彪划清界限。中央对于坚决同林彪划清界限的同志,不论他过去是否受过林彪的影响,是否犯过错误,都是同样爱护而不会轻易怀疑的,各级党委应当深入揭发和严格批判林彪的错误和罪行,只要我们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政策,我们全党必能进一步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这份《通知》第二天传达到省、军级。

17 日 21 时多,周恩来打电话问吴法宪,说空军司令部有 6 个人跑

到了广州,问他知不知道?

吴法宪说:“不知道。”

周恩来让吴法宪查一下,原来是空军司令部汽车队的王琢、雷达兵部的许秀绪、情报部的王永奎等人跑到了广州。吴法宪当即通知广州军区空军政委焦红光查明情况。

过了一个小时,焦红光给吴法宪来电话说:“已经找到了这6个人。他们先是到白云山雷达站,以后又到了9师沙堤机场,最后向北走了,现在已经到了韶关附近的雷达站。”

吴法宪命令焦红光立即把这几个人抓起来。

焦红光说:“已经要求广州军区协助我们办理此事。”

随后,吴法宪向周恩来作了报告。

晚上23时,周恩来给吴法宪打来电话说,据广州军区报告,这6个人已经抓到。他让吴法宪要注意加强对空军领导机关的管理,强调纪律,所有人员不经过请假批准,不准外出。

吴法宪向周恩来表示坚决照办,同时将周恩来的指示转告曹里怀、王辉球、曾国华等人,要他们一起进行布置。

处理完这些事情,已经是深夜。吴法宪回到家。这是9月12日晚上去大会堂开会后,他第一次跨进家门。见到妻子陈绥圻,吴法宪告诉了她这几天的情况。他说:“我对‘913事件’以前确实毫无所知,如果我知道了,我绝对会报告中央,绝不会去投靠苏联。我15岁参加革命,全家六、七口人被国民党迫害光了,是党和人民把我培养成人,我绝不会离开党,离开人民和祖国。你不用担心,我在‘913事件’中应负的责任我是最清楚的,也最了解自己,我准备向中央写检讨。”

陈绥圻说:“见到你真高兴。今天张叔良告诉我,在查抄于新野的宿舍时,查到了一个笔记本,上面对你和‘吴办’每天的活动都有详细地记录,连秘书张云龙是什么时候走的,接替他的秘书是谁,是什么时候来的,都有记录。”

“张叔良说,王飞已经通过空军党委下命令,任命他为空军党办的处长。我们都不知道。”

# 第1203回：许世友，王洪文进京开会 审江、王，巨大冰山渐显现

9月17日20时30分，中国驻蒙古大使馆向国内报告，大使等人已于19时回到乌兰巴托，并简要报告了他们在坠机现场勘察的情况和延长时间的原因。周恩来指示外交部，告中国驻蒙古使馆：速派专人送回256号飞机坠毁现场照片、资料等，并面报详细情况。

9月18日凌晨1时，大使馆向国内报告，决定派二等秘书孙一先送现场照片、目测示意图和有关材料回国，并当面汇报。孙一先连夜整理出三个报告：《视察坠机现场概况》、《飞机与尸体状况》、《安葬死难者情况》。又赶写两个《纪要会谈情况》的报告，精心绘制现场测量示意图，死难者尸体位置的放大图，在蒙古全图上标绘了现场位置图。还整理抄清了五次会谈记录，以及蒙方提出的两个《纪要》等。

向国内发去这四个报告后，许文益大使请示："如果蒙方人员有意无意把中国民航飞机在蒙古坠毁之事散布到外国使团中去，有人问有无此事，我馆如何回答？"

几个小时后，周恩来亲自批准的外交部复电指示，就说"国内正在查实，暂时无可奉告"。

大使馆在关于《纪要》会谈情况的报告中说："我们初步估计，由于双方存在分歧，制定文件可能不了了之，当然可能还要继续谈。我们准备同他们谈，继续交涉要求归还遗物。"

9月19日上午，中国驻蒙古大使馆收到国内遵周恩来嘱咐发来的电报："关于两个《纪要》问题，你馆暂不主动找蒙方继续会谈，等派人回国汇报研究后再说。"

国内还有一个指示，要求注意观察蒙方和驻蒙苏军有无战备动作。

于是，孙一先到乌兰巴托市周围走马观"花"，总的印象是蒙军和驻蒙苏军都有异常。乌市西区陶拉盖图的北山沟，蒙军的导弹发射架

都装上了防空导弹,探测和搜索雷达一直在旋转。市区苏军的军用汽车比往常增加,铁路两旁的苏军基地也格外繁忙。距乌兰巴托市50多公里的大型后勤基地,载重汽车进进出出。几十个战备油罐群,都被铁丝网圈了起来,还站上了岗。距乌兰巴托市100公里的巴彦机场,停在滑行道边的歼击机都脱掉了“衣服”。飞机不断起落,却不像是平常训练。乔依尔车站以北20多公里有苏联空军的一个大型机场,在密闭的列车里都能感觉到轰鸣的刺耳。

9月19日晚,中国驻蒙古大使馆向外交部报告,孙一先于20日乘4次列车离开乌兰巴托回国。

9月17日,许世友奉命进京参加政治局扩大会议。周恩来特别嘱咐:不要乘飞机,要乘火车,顺便带着上海的王洪文同车同来。军交部准备了公务车,加挂在特快列车后面。这节车厢备有单人房1间、双人房1间、4人房两间,还有伙房和卫生间。单人间内置大床1张、写字台1个,浴室和厕所是专用的。车尾是会议室兼餐厅,很宽敞,十几个人开会、吃饭不显得拥挤。周围有玻璃窗,外面的景色尽收眼底,所以又叫望车。

王洪文突然接到中央办公厅通知,要他马上乘火车去南京,和许世友一起到北京开会。他和徐景贤分析:“这次去一定跟有人跑了有关系,可能涉及到庐山会议,最好不要让王维国知道。”同时,他们还认为:王洪文到北京去这件事要保密,尽量不告诉其他的市委常委。所以,二人商量,此事只有徐景贤一人知道,也由徐景贤一人去送王洪文。

当时康平路大院的警卫是由空四军的处长李松亭负责,警卫员也都穿空军制服。假如李松亭和警卫员们看到王洪文上北京去了,也会向王维国报告的。于是王洪文叫秘书小廖把警卫员支开,然后让从工厂调来的司机小常开了一辆北京吉普,停在王洪文家门口,徐景贤和王洪文两人悄悄地上车去了上海北站。

谁知道他们刚刚进站,还没登上火车,就碰到市委警卫处的空军干部,是送到上海探亲的家属回乡,到火车站送行的。

徐景贤和王洪文很紧张,以为又暴露了王洪文外出的行踪。王洪文对徐景贤说:“这样吧,你回去后索性开一个市委常委会议,名义是

讨论别的工作,会上你宣布我到上海小三线安徽去了,理由是中央布置一级战备,王洪文到小三线检查战备去了。”

于是,送走王洪文后,徐景贤就在康平路召开市委常委会,宣布王洪文的去向。

王维国也是市委常委,但那天他请假没来,说是病了。徐景贤给王维国打电话,王维国说:“我身体不大好,正在家里休息。”

徐景贤说:“你生病了,我来看看你。”

王维国推辞说:“你很忙,不要来了。”

徐景贤说:“我很快就过来。”

王维国家住空四军江湾军部大院对面的家属宿舍。9 月 13 日早上,王维国正在北京的儿子王大璋坐火车于 14 日回到上海。王维国问儿子王大璋,在北京遇到什么事情? 并反复问:“李伟信讲谁要离开北京?”

王大璋说:“林立果。”

王维国又问:“据他们说,有一架飞机要过来,可是到现在还没有过来。而且讲丢了一架飞机,他们会到哪里去呢?”

王大璋也不知道。

王维国给北京打了几个电话,谁都联系不上,这些人怎么全都“蒸发”了? 他意识到可能出事了,于是叫人带两瓶感冒药坐火车到北京,给江腾蛟送去。

9 月 15 日,江腾蛟老婆李燕平到车站见了王维国从上海派来的送药的人,叫他赶快回上海,并托他带回一张纸条:“周、于已自亡,李被他家接去,家当都卖光了,我们也没办法。”

看到纸条,王维国才知道真的出大事了,于是抱病在床,没有参加徐景贤 17 日召集的常委会。

王维国的妻子杜贵珍听说徐景贤要来,就在家门口迎接,将徐景贤送到二楼寝室,只见王维国躺在床上,见了徐景贤,欠着身子,很热情地握手。

徐景贤问他:“维国同志,你的病情怎么样?”

王维国说:“肝脏不好,正在请中医治疗。吃了几帖中药,还不见好转。医生说我的肝脏里面有毒素,规定我吃中药时要忌口,什么荤

腥都不能吃,每天只能喝一点白粥,解除肝里的毒性。”

这时,杜贵珍端来一碗白粥给他喝。

说了一阵病情后,他们把话题转到形势方面。

徐景贤说:“9 月 13 日,中央下达禁飞令,现在中央军委部署全国军队进入一级战备,不知道究竟是怎么回事情? 现在洪文同志接到中央一级战备命令后,到小三线检查去了。你那里情况怎么样? 听到些什么消息?”

王维国说:“没有啊。我们的机场现在给陆军接管了,飞机也停飞了,我打电话问北京空军司令部,根本打听不到任何消息,我们很纳闷,怎么会有这种事情?”

他们谈了一阵子,徐景贤说:“你好好养病吧。”就告辞了。

王洪文当过兵,所在部队的前身是华野九纵,许世友正好是是华野九纵第一任司令员。在去往北京的火车上,王洪文主动对许世友说:“上海的王维国,我老早就发现他不正常。解放军的高级干部,却反对上海警备区和大军区! 哪有解放军反解放军的? 我是军队转业干部,至今对解放军还很有感情。”

王洪文还说:“王维国在市公检法‘支左’,好多事都鬼鬼祟祟,也不向我们报告。毛主席在上海接见你,他总想往专列上钻,幸亏被汪主任挡住了。”

9 月 18 日下午 15 时,周恩来给邱会作打电话,询问昨天晚上战备会议的情况。邱会作向周恩来简要报告了一下,周恩来表示满意,没有再说什么,转问黄永胜的情况:“黄总长的情绪怎样?”

“怎么好得起来,总的来说是悲观的,还做了最坏的打算。”邱会作回答说。

“主要是什么问题?”周恩来又问。

“最主要的是,他说只知道难受,不知道‘病’在哪里? 林彪给他的那封信,也是他负担很重的问题。”邱会作说。

“你同黄总长再谈一下:一、光难受不行,还是要好好想想;二、要相信毛主席、中央;三,林彪给他的信,是林写给他的,并且又未收到。这些问题,我早就注意到了。”周恩来说。

周恩来和邱会作在这里提到林彪给黄永胜的信,就是那封从直升

机坠机现场找到的信。

这天晚上,周恩来主持政治局扩大会议,主要是讨论修改张春桥、姚文元起草的中央文件《关于林彪叛国出逃的通知》。会议通过了这个文件,当天下发中发[1971]57号文件。

当晚22时,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召集周恩来、许世友、王洪文等与会人员开会,要许世友、王洪文把中共中央关于林彪叛国出逃的通知带回去,解决空4军、空5军的问题。他再次讲了党内的10次路线斗争,讲了林彪的历史。并说:“天要下雨,娘要嫁人,地球照常转动。”接着又讲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还交给许世友10本《天体运行》,让他转送南京紫金山天文台。

接见后,政治局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继续开会,研究了清查与林彪有牵连的人和事,责成许世友逮捕上海的王维国和杭州的陈励耘,王洪文协助。

会上,许世友让王洪文负责控制上海的王维国,他自己亲自给杭州的南京军区副司令员兼浙江省军区司令员、20军军长熊应堂打电话,要他控制陈励耘。许世友在电话中说:“你要保证陈励耘不出事。否则,找你算账。”

会议气氛非常活跃。叶剑英说:“陈老总得知林彪摔死,随口吟出白居易的《放言诗》:‘赠君一法决狐疑,不用钻龟与祝蓍。试玉要烧三日满,辨才更待七年期。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倘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有谁知?’”

有人又念了一首乔冠华改动的唐人诗,原诗是:

月黑雁飞高,
单于夜遁逃。
欲将轻骑逐,
大雪满弓刀。

乔冠华改为:

月黑雁飞高,
林彪夜遁逃。
无需轻骑逐,
大火自焚烧。

会上,周恩来讲了逮捕林彪死党和战备问题。不觉子时已过,与会者仍兴奋不已。夜餐上了酒,众人频频举杯,庆幸林彪的自我爆炸。

散会以后,吴法宪回到空军办公楼,继续参加那里已经进行了一天的揭批“913 事件”的空军二级部长以上的会议。参加会议的大多数人发言都比较积极,但也有少数几个人默不作声,其中有空司气象部的副部长,他表示不相信林彪会叛逃,说“这是不可能的。”会后,吴法宪和王辉球、邝任农、梁璞等人一起找那位气象部副部长谈话,他仍然不相信。吴法宪要他好好想一想,就让他走了。

李德生再次找已经收审在亚洲疗养院的江腾蛟谈话,追问鲁珉揭发的那些情况。

江腾蛟回避要害问题,只是说:“那是林立果要我找鲁珉的。”

李德生说:“你是参加革命军队 40 多年的老同志,怎么能够听一个二十几岁娃娃的话,说不过去吧。你在那个会上说了些什么?你又要在上海干些什么?你应当好好想想,毫不隐瞒地向党交代清楚。”

江腾蛟说:“那次会,是林副主席布置林立果召开的,我没有掺进自己的意见,在上海主要是王维国执行林副主席的指示。”

李德生见江腾蛟毫无交代之意,再次告诫他:“我告诉你两个情况:第一,林彪乘飞机外逃,飞机坠毁了,林彪、叶群已经摔死;第二,鲁珉等许多人已经陆续交代了不少重要情况,包括你的事情。我希望你‘竹筒倒豆子’,彻底讲清楚。”

江腾蛟听到这里,头上再次冒汗,答应仔细想想。不久,他终于交代了 9 月 8 日、11 日林立果曾召开策划谋害毛泽东的会议情况,其中包括关于谋害毛泽东的几个方案,如放火烧停放专列的机场油库,乘救火之机下手;用日本人制造皇姑屯事件的办法,炸毁铁路。

在这些事情中,空军副参谋长王飞是个重要人物,李德生立即将王飞收审,并亲自对他宣布:“在这场斗争中,你的问题很严重,组织上决定对你停职审查。”

王飞开始什么都不说。李德生严肃批评说:“这是关系到党和国家命运的大事,你这个态度,究竟是站在什么立场呢?”

王飞说:“我是副参谋长兼司令部办公室主任。林立果、周宇驰虽然是办公室副主任,可是他们好多事情是背着我搞的。主任,你不知

道,我在司令部办公室是受排挤的。”

李德生问:“组织谋害主席、另立中央的会议,你参加了,怎么没有被‘排挤’啊?!”

王飞无言以对,又说:“我是受蒙蔽的,他们好多事情是背着我搞的,我并不知道。”

没过多久,王飞也开始交代问题。至此,一座巨大的冰山逐渐显现出来:

事情要从毛泽东南巡说起。

虽然毛泽东在武汉期间,刘丰一直遵守“纪律”,没有往“北京”报告,但是却在8月23日,把毛泽东谈话中关于“不要让自己老婆当自己工作单位办公室主任”的内容,透露给林育英之子、林彪侄子、时任葛洲坝工程指挥部参谋长的林汉雄。

8月28日,林立果从北京打电话给林彪的警卫参谋李文普,说“北京这里形势对她(叶群)不妙”,“老李你作点准备,首长(林彪)准备在9月18日左右去广州,不要跟别人讲”。

8月底,叶群打电话给吴法宪,要军委办事组给她在总参政治部或军委办公厅安排一个工作,她不当林彪办公室主任了,要吴法宪同黄永胜商量。

9月3日上午,林立果在毛家湾对“林办”工作人员王淑媛说:“宁可逃跑也不像刘少奇那样被抓住坐牢,实在不行就上山打游击。”

9月5日,广州军区司令员丁盛、政委刘兴元参加完毛泽东长沙召见后回到广州。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他们立即召开广州军区师以上干部大会,由刘兴元“吹风”,传达毛泽东南巡讲话的主要内容。会议不准记录,但广州军区空军参谋长顾同舟,还是偷偷往香烟壳上记了几笔。回家后,他顾不上吃晚饭,立即给北京的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周宇驰打电话,讲了“吹风”会的情况。周宇驰听说广州军区负责人正在传达毛泽东在长沙接见他们时的谈话内容,便说:“你们听完后也向我们传达。”

因为晚上还要接着传达,他们约定传达完后再打电话。当晚23时35分,空军司令部办公室于新野处长给顾同舟来电话,听顾同舟讲了一个多小时,了解到毛泽东谈话内容,并作了15页记录。要点是十

次路线斗争,三项基本原则,三条方针,强调干部多读一点书并且加强路线斗争的教育,不要老婆当秘书,不要搞吹捧,对青年人更不要搞吹捧,要加强军队的军事训练,军队要防止骄傲,还有一些其他问题。

周宇驰原定在第二天,即9月6日去广西桂林的,此刻立即改变计划,于9月6日凌晨,打电话向正在北戴河的林立果报告了广州军区师以上干部吹风会的情况,并于当天下午15时,亲自驾直升机,和于新野一起带着15页的电话记录飞到北戴河,将电话记录稿交给叶群和林立果。

9月6日下午,正在遵化蹲点的空军办公室主任王飞,接到林立果的电话,匆忙从遵化赶回北京。

9月6日晚上,周宇驰从北戴河给顾同舟打电话表示感谢,他说:“昨天晚上于新野的记录我们都看过了,林副部长也看过了,我们非常感谢你,你在关键时刻立了一功。这说明你的路线觉悟高。”“林副部长要你再整理一份文字稿,派人送到北京来。”

# 第五部上卷
# 各地文革章回索引

**北京：**

第 1148 回；第 1149 回；第 1162 回；第 1163 回；第 1168 回；第 1175 回；第 1184 回；第 1191 回；第 1192 回；第 1193 回；第 1194 回；第 1220 回；

**军委办事组、中央军委：**

第 1148 回；第 1149 回；第 1150 回；第 1151 回；第 1152 回；第 1160 回；第 1163 回；第 1166 回；第 1167 回；第 1170 回；第 1173 回；第 1174 回；第 1176 回；第 1177 回；第 1178 回；第 1179 回；第 1180 回；第 1181 回；第 1182 回；第 1184 回；第 1192 回；第 1193 回；第 1195 回；第 1196 回；第 1197 回；第 1199 回；第 1220 回；

**外事口、陈毅：**

第 1148 回；第 1149 回；第 1150 回；第 1151 回；第 1155 回；第 1164 回；第 1165 回；第 1166 回；第 1167 回；第 1169 回；第 1170 回；第 1171 回；第 1172 回；第 1173 回；第 1174 回；第 1176 回；第 1196 回；第 1197 回；第 1198 回；第 1199 回；第 1220 回；

**印度支那：**

第 1149 回；第 1174 回；

**中美关系：**

第 1149 回；第 1155 回；第 1160 回；第 1166 回；第 1170 回；

第 1171 回;第 1172 回;第 1173 回;第 1174 回;

**五一六:**

第 1150 回;第 1151 回;第 1155 回;第 1162 回;第 1163 回;

第 1164 回;第 1165 回;第 1171 回;第 1175 回;第 1178 回;

**清华大学:**

第 1150 回;第 1151 回;第 1170 回;

**北京航空学院:**

第 1151 回;第 1162 回;第 1163 回;

**农口、谭震林:**

第 1151 回;

**国防科委、聂荣臻:**

第 1158 回;第 1178 回;第 1179 回;

**北京大学:**

第 1164 回;

**北京地质学院:**

第 1164 回;

**贺龙:**

第 1170 回;

**教育革命:**

第 1170 回;第 1176 回;

**中苏冲突:**

第 1167 回;

**四届人大:**

第 1176 回;第 1181 回;第 1183 回;第 1184 回;第 1185 回;

**空军:**

第 1180 回;第 1185 回;第 1186 回;第 1188 回;第 1189 回;

第 1190 回;第 1191 回;第 1193 回;第 1194 回;第 1195 回;
第 1198 回;第 1199 回;第 1220 回;

**海军:**

第 1185 回;第 1186 回;第 1188 回;第 1189 回;第 1190 回;
第 1193 回;第 1195 回;第 1196 回;第 1198 回;第 1199 回;

**五七一工程纪要:**

第 1194 回;第 1198 回;

**上海:**

第 1165 回;第 1182 回;第 1183 回;第 1193 回;第 1220 回;

**天津:**

第 1177 回;

**华北地区:**

第 1156 回;第 1157 回;第 1158 回;第 1159 回;第 1160 回;
第 1161 回;

**河北:**

第 1148 回;第 1152 回;第 1157 回;

**内蒙:**

第 1148 回;

**东北地区:**

**黑龙江:**

第 1175 回;

**西北地区：**

**甘肃：**

第 1193 回；

**西南地区：**

**云南：**

第 1152 回；第 1153 回；第 1154 回；第 1174 回；

**中南地区：**

**河南：**

第 1175 回（开封）；第 1176 回；

**湖北：**

第 1148 回；第 1176 回；第 1177 回；第 1180 回；第 1193 回；

**湖南：**

第 1148 回；第 1177 回；第 1178 回；第 1179 回；第 1180 回；第 1181 回；

**广东：**

第 1177 回；第 1178 回；第 1179 回；第 1180 回；第 1181 回；第 1195 回；

**广西：**

第 1177 回；第 1178 回；第 1179 回；第 1180 回；

**华东地区：**

**山东：**

第 1160 回；第 1175 回；

**江苏：**

第 1162 回；第 1180 回；第 1181 回；第 1182 回；第 1183 回；第 1193 回；第 1195 回；

**浙江：**

第 1160 回；第 1180 回；第 1181 回；第 1182 回；

**江西：**

第 1180 回；第 1181 回；

**福建：**

第 1180 回；第 1193 回；

# 文革史话

## 之

## 第五部

# 折戟沉沙

下卷

刘朝驹　著

中国文化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文革史话之第五部折戟沉沙 / 刘朝驹著. --香港:中国文化出版社,2021.9

ISBN 978-988-15988-4-4

Ⅰ. ①文… Ⅱ. ①刘… Ⅲ. ①纪实文学-中国-当代 Ⅳ. ①I227

| | |
|---|---|
| 书　　名 | 文革史话之第五部折戟沉沙 |
| 作　　者 | 刘朝驹 |
| 出　　版 | 中国文化出版社 |
| 发　　行 | 中国文化出版社　发行部(00852-21962638) |
| 总社地址 | 香港九龙弥敦道208-212号四海大厦 |
| 经　　销 | 香港九龙书店 |
| 总 编 审 | 中国文化出版社国内编审处 |
| 出版策划 | 宋艳丽 |
| 印　　刷 | 北京云迪印刷有限公司 |
| 开　　本 | 787×1092　1/32 |
| 印　　张 | 14.5 |
| 字　　数 | 440千字 |
| 版　　次 | 2021年9月第1版第1次印刷 |
| 书　　号 | ISBN 978-988-15988-4-4 |
| 定　　价 | 60.00元 |

您若想详细了解我社的出版物

请登陆我们出版社的网站 http://www.zgwh.cn/

# 目　录

## ◇上　卷◇

第 1204 回:李作鹏,武汉闻“南巡讲话”
叶群慌,林立衡到北戴河 …… 423

第 1205 回:林立果,准备上海搞暗杀
于新野,杭州去见陈励耘 …… 432

第 1206 回:回北京,再传看“林彪手令”
怎么办? 林立果提出三条 …… 439

第 1207 回:议未决,搞政变如同儿戏
叫暂停,关光烈来到北京 …… 447

第 1208 回:说“不行”,叶群电话“抽鞭子”
仍未决,专列已过硕放站 …… 455

第 1209 回:如雷轰,林立果痛哭流涕
急部署,忙执行南下方案 …… 464

第 1210 回:“教导队”,还有个“上海小组”
周宇驰,安排飞广州计划 …… 471

第 1211 回:林立果,三叉戟飞山海关
空司忙,王飞定南下名单 479

第 1212 回:门外听,广州不行去香港
林立衡,忙找李文普商议 486

第 1213 回:告张宏,调部队采取措施
查飞机,南下计划又泡汤 493

第 1214 回:赶紧撤,周宇驰调直升机
返上海,细筹划诱捕计划 501

第 1215 回:看文件,锦江饭店抓王、陈
又揭出,林立果上海“选美” 509

第 1216 回:搞对象,手段多层出不穷
难置信,用权力无法无天 516

第 1217 回:关光烈,按通知护送到京
李德生,登门见黄、吴、李、邱 523

第 1218 回:外交部,厅级主任接二秘
听汇报,查飞机坠毁原因 531

第 1219 回:等十天,决定抓黄吴李邱
写检讨,吴法宪彻夜未眠 539

第 1220 回:都隔离,叶剑英主持军委
九二六,开“老同志座谈会” 545

第 1221 回:细安排,护送林立衡回京
国庆节,奉命进驻毛家湾 553

第 1222 回:王兰义,将军楼里笔记本
李伟信,又供出惊天阴谋 562

第 1223 回:江腾蛟,效忠信追随林家
林立果,搞“舰队”活动频繁 573

第 1224 回:议形势,做武装起义准备
写计划,《“五七一工程”纪要》 581

第 1225 回:空四军,开“三国四方会议”
“很重要”,此《纪要》“必须下发” 590

第 1226 回:撑病体,毛泽东见塞拉西
基辛格,第二次来到中国 597

第 1227 回:未曾想,公报草案分歧大
格式新,双方初步达共识 604

第 1228 回:喜讯到,中国进入联合国
代表团,赴美出席联大会 611

第 1229 回:周恩来,与韩丁一家交谈
从文革,到党内十次斗争 618

第 1230 回:找薛明,周恩来亲自安排
四川省,梁兴初隔离审查 628

第 1231 回:查武汉,刘丰自杀未死成
邓小平,江西致信毛泽东 634

第 1232 回:组班子,接待黑格先遣组
毛泽东,不再讲“二月逆流” 641

第 1233 回:病情重,一月六陈毅逝世
周恩来,态度明答复黑格 648

第 1234 回:毛泽东,参加陈毅追悼会
政治局,在解决新疆问题 655

第 1235 回:年事高,毛泽东身患肺炎
性执拗,一月内两次昏迷 664

第 1236 回:历史性,尼克松总统访华
没想到,毛泽东当天接见 671

第 1237 回:书如海,基辛格由衷感慨
说哲学,尼克松赞叹万分 678

第 1238 回:欢迎宴,美国总统“争朝夕”
漫天雪,急动员连夜清扫 686

第 1239 回:游长城,尼克松自称“好汉”
到沪杭,《公报》稿基本就绪 693

第 1240 回:送熊猫,中国外交新局面
为吃药,江青那里又出事 700

第 1241 回:看宁夏,西海固回民叛乱
张国华,心脏病逝世成都 709

第 1242 回:再解决,两广、川、浙、赣与湘
下通知,杜绝招生“走后门” 716

第 1243 回:检查出,周恩来身患癌症
汇报会,中央发六个文件 723

第 1244 回:江青谈,毛泽东的那封信
周恩来,再说明“伍豪事件” 730

第 1245 回:枪响处,军政委妻子被杀
余洪信,麦田中自杀身亡 739

第 1246 回:为治安,决定开全国会议
放汉生,恩来谈基础理论 748

第 1247 回:换内阁,日中邦交正常化
震动大,西德施罗德访华 757

第 1248 回:说新疆,一份内参震天津
问“伍豪”,全军掀起退房潮 765

第 1249 回:邓小平,长信再致毛泽东
维特克,要求采访见江青 772

第 1250 回:忆往事,两位女人侃侃谈
说戏剧,共同观看《红灯记》 780

第 1251 回:归专案,周恩来见林立衡
赴广州,调总参测绘局长 788

第 1252 回:说战争,维特克再见江青
忆往事,饭桌上滔滔不绝, 798

第 1253 回:谈身世,从孩提到抗美援朝
回北京,要整理会谈记录 807

第 1254 回:抓保卫,召开全国座谈会
说贵州,王洪文进京学习 814

第 1255 回:“言必信”,中日、中德建邦交
批极“左”,《文汇报》提出质疑 822

第 1256 回:再商议,整理江青记录稿
湖南省,解决卜占亚问题 830

第 1257 回:要交代,如何连接北西东
谈问题,概括为“三专一通” 838

第 1258 回:批王新,王若水上书被批
毛泽东,逐步解放老干部 847

第 1259 回:杨易辰,批极右思想不通
议青岛,三司令致信林彪 855

第五部下卷各地文革章回索引 866

# 第1204回：李作鹏，武汉闻“南巡讲话” 叶群慌，林立衡到北戴河

同样是在9月6日，李作鹏陪朝鲜人民军代表团访问武汉期间，也从武汉军区政委刘丰那里得知了毛泽东在武汉期间的谈话内容。

朝鲜人民军代表团是9月4日到长沙，5日到武汉。6日早晨起床后，刘丰去看李作鹏，将8月毛泽东在武汉与他们谈话的重要内容向李作鹏透露了。

李作鹏听后震惊不已。第一个反应就是：“不是没事了嘛，怎么又‘兜’出来了？而且‘纲’上得更高了。”

毛泽东南巡前，对黄、吴、叶、李、邱的检讨都有批示，除了吴法宪，几个大将都过了关。毛泽东当时还问邱会作：“你这个检讨是你自己写的吗？”

邱会作说：“是。”

毛泽东说：“我死了以后，你就当国家主席吧。”

从毛泽东当时的口气中听不出讽刺，倒像有一种赞赏。他还亲口对黄、吴、李、邱说：“你们的检讨到我这就为止了。”几个人非常高兴，为此专门到京西宾馆一起吃了一顿饭，表示庆祝。这之后，除了吴法宪和叶群的日子还难过外，黄永胜、李作鹏、邱会作都一身轻松，以为他们的检讨真过了关。可是，毛泽东这次南巡为什么又说得这么重？

李作鹏后来说：他听到刘丰对他讲的毛泽东谈话内容后，“有三个想法：一、感到庐山会议的问题还没有完。二、感觉‘纲’上得比庐山会议时更高。庐山会议讲的是路线问题，现在讲的三条‘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不仅仅是路线问题。三、感觉是对着林彪的。因为主席有一句话，就是不同意让老婆当办公室主任，而林彪的老婆是当了办公室主任的。我想，这几条的矛头是对着林彪的。我这样想了以后，有些紧张，把这个问题看得比较严重。”

李作鹏于当天,9 月 6 日上午,陪同朝鲜军事代表团从武汉返回北京。下午他和黄永胜、吴法宪、邱会作一起与朝鲜军事代表团进行最后一次会谈,把中央批准的对朝鲜的援助项目、数目宣布后,会谈就结束了。

送走外宾,黄永胜他们又回到大会堂北京厅,等候出席当晚朝鲜大使馆举行的宴会。此时,离宴会还有一个小时。李作鹏把黄永胜拉到北京厅会谈桌的西北角,悄悄地将刘丰同他谈的情况告诉了黄永胜。

吴法宪看到李作鹏和黄永胜在角落说“悄悄话”,也凑过去问:“你们嘀嘀咕咕什么呢?”

李作鹏支吾说:“毛主席在武汉的谈话。”

这半年来,吴法宪因在庐山上“冲锋在前”,日子越来越难过。他心急火燎,当然想知道毛泽东南巡讲了些什么?于是对李作鹏说:“这么重要的情况,你给我们一起讲讲嘛。”

但庐山会议后,李作鹏他们对吴法宪都不太“放心”,怕他再“放炮”,便搪塞说:“你知道了也没什么好处,反而增加负担。”

吴法宪不得不走开。

李作鹏特别提醒黄永胜,不要把刘丰谈的内容告诉叶群和吴法宪。

邱会作也很想知道李作鹏和黄永胜嘀咕了什么内容,在去参加朝鲜大使馆晚宴的路上,他挤进李作鹏的车,和李作鹏咬了一路耳朵。

而此时北戴河,据林彪秘书于运深回忆,9 月 6 日晚 20 时 30 分,叶群给邱会作夫人胡敏打电话,要胡敏动员林立衡的对象张清林、林立果的对象张宁来北戴河。

张清林是黄永胜夫人项辉方介绍给林立衡的对象,湖南邵阳小镇的农家子弟,广州军区某医院外科医生,高大帅气,也很朴实。

随后,叶群亲自打电话给林立衡,让她带张清林马上到北戴河来,说“陪首长去大连住几天,国庆节回北京。”

林立衡说身体不好,过几天再去。叶群发了火,对她说:

“你这么大架子,爸爸请你,你都不来。现在他病得快死了,还没有见过张清林。见到你们的事定下来了,他的病就会好了。”

林立衡只好同意了。

叶群还让林立衡把林立果的对象张宁及解放军总医院放射科高主任也带去,并问林立衡能否瞒过邱会作的老婆胡敏,还说吴法宪夫妇都不知道林立衡这次去,叫她不要告诉空军。

晚上21时许,叶群让李文普通知空军副参谋长胡萍,安排飞机送林立衡等人去北戴河。

按胡萍的说法,叶群使用专机就像使用专车一样,招之即来,来之即走。可是飞机怎么能是汽车?不要说专机,就是普通飞机,起飞之前也要有相当的准备时间,无论如何也不能等同于汽车。汽车在地上跑,随时可以停下来,飞机在空中飞,万一准备不好是要机毁人亡的。因为专机夜航不安全,当晚没有安排。

再说9月6日当晚,朝鲜大使馆的晚宴结束后,黄永胜回到西山就给叶群打电话。而此时的叶群,因为已经从顾同舟那里得到消息,正与林立果、周宇驰在一起商议,所以不接黄永胜的电话。黄永胜急了,27分钟连要三次,最后说有重要事情,这才接通了叶群,通话时间长达58分钟。之后,叶群又过去与林彪谈了一个多小时。

吴法宪不知道李作鹏和黄永胜"嘀咕"了些什么?一肚子气,回去后也给叶群打电话,说李作鹏有事情不向他说。叶群安慰他:"你不要误会,也不要再打听了,没有什么了不得的事情。"实际上,此时的她比吴法宪紧张一百倍。

9月7日,叶群、黄永胜、李作鹏之间进行了频繁的电话联系。

9月7日上午,留守北京的林彪秘书于运深按叶群的要求,把林立衡、张清林、张宁送到西郊机场。但是9时50分左右,叶群又叫内勤孙忠堂通知秘书李春生,立即给毛家湾打电话,把《俄华词典》、《英华词典》,以及俄语、英语会话等几本工具书,让送林立衡的飞机带到北戴河来。并叫"林办"保密员李根清把1969年总参为林彪特制的那个"三北"地图也带到北戴河。但是,这份地图太大,小车里根本放不进去,请示叶群后,她说算了。飞机也因此推迟了一个小时起飞,于上午10时50分才从北京西郊机场起飞,11时20分左右到山海关机场。

中午时分,林立衡和张清林、张宁及杨森一起到了北戴河。林立衡、张宁他们3人被安排在距林彪住的96楼400米的一幢黄色小楼

里,警卫编号56楼。林立果住的57楼在50米外的小柏油路对面。

林立衡刚到北戴河,林立果就迫不及待的在中央警卫团二大队的58楼前拦住她,用车将她接到自己住的57楼。让刘沛丰守在门口,然后当着周宇驰的面对她说:

“现在情况很紧急。昨晚主任要乘三叉戟飞机逃到苏修去,首长不肯跑,被主任逼得同意了。他们硬要我调飞机,我借口来不及调,推迟了一天,今天早上把周宇驰从北京找来商量怎么办。首长见了周宇驰,抱着他哭,说:我一家老小都交你了。”

据林立衡回忆说,当时在场的周宇驰也对她说有此事。

林立果还说:

“我们过去是盟军,这种时候,我不能忘了你,就让主任把你骗来了。”

“这件事只有首长、主任、我和周宇驰知道,你可千万不要告诉张清林。如果不是我告诉你这件事,你今天坐的三叉戟把你带到苏修了,你还不知道呢!”

林立衡大吃一惊,问为什么要逃跑?林立果说:

“主任干了许多坏事,怕把她抓起来”。

他还要林立衡在林彪面前帮他说话,说如果情况紧急,她也得跟着跑。

这些是林立衡1971年10月在《对九月十三日事件前后的回忆》中所述。

本来,9月5日,林立衡在空军报社党委会上作了一个长篇讲话,其中说到:

“生活在我们周围就要准备迎接风浪,最有意思的是迎风浪。我自己每天准备着迎接阶级斗争风浪。”

“我到空军来,天天摔跟头。我的名字可以改为‘斗斗’,也可以改为‘逗逗’,要乐观。这几年长了不少知识,长了身体。首长看见我的身体不大好时,就赶我到报社来说:‘去去去,快到报社去’”,说“你一到报社,你的身体就好了。”

“首长身体很好,以前作战时负了伤,内部有四颗子弹,不是要害,内脏很好,但睡觉不好,有时精神很痛苦。他那么大的年纪,但他有坚

强的毅力,看了很令人感动,他比一般没有病的老人内脏还要好。……有这样的身体也不容易。首长强调乐观,给我题字‘要乐观,坚持到底’。”

“去年这时正开庐山会议,我们想不到,就是跟不上,今年再跟不上就不行了。树欲静而风不止。我别的要求没有,还是那次提的,就是要把住关,对内对外把住关。将来的路途不会那样平坦,大家要团结一致,同心同德……使报社不要转向。”

“将来的形势可能不是以前的形势,总是要革命,革命就是革脑袋嘛,不要怕掉脑袋。反正一条,横下一条心,什么都不怕……但战术上要稳扎稳打。……现在还是抓紧时间学习,缓和时学,紧张时就干,赶快吃饱,不然到时就没劲。弯弓待发,现在是弯弓的时候。……我们永远战斗在一起,同生死,共患难……”

没想到,9 月 7 日她到北戴河后,却听到了林立果的这么一段话。

就在林立果与林立衡说话之时,李文普过来找他们,是林彪、叶群要见林立衡,让他过来叫。据李文普的回忆:“我去 57 楼,周宇驰挡在门口,不让我进。我告诉他‘是首长要见豆豆’,周宇驰才让我进去通报。”

张宁回忆当时的情况是:

我刚把随行东西放好,林立果便闯进门来,他见有小王护士在侧,腼腆地悄声问候我:“你身体好不好?”我点头作答。乍一见面,无话可说,便陪着我们一起上去见叶群。李处长从九十六号楼里出来领我们去见林、叶。

林立衡他们先去见叶群。叶群对他们说:

“过几天,首长要到大连去住一段时间。把首长身体搞好,国庆节回北京去天安门讲话。你们也陪首长去大连。”

叶群带他们去看林彪。她问林彪对张宁和张青林满意不满意?林彪连连点头说:“满意,我很满意!一个老红军的女儿,一个劳动人民的儿子。很好!”

9 月 7 日下午,林立果又把林立衡拉到 57 楼他房间里单独谈话。林立衡在 1971 年 10 月《对九月十三日事件前后的回忆》中是这样写的:

林立果讲:主席最近在南方各地找各大军区头头打招呼,要开三中全会批判叶群“夫人专政”,还要把军委办事组叶、黄、吴、李、邱都整掉。

批叶群肯定要批到首长身上。他很怕像刘少奇、陈伯达那样坐牢。

首长身体关在监狱里能活几天,就连我们也会像刘少奇、贺龙、罗瑞卿的孩子一样关在监牢里。

主席这样做也够冒险的,这么大把年纪,为了搞掉自己树起来的接班人,跑到全国打招呼,也不怕军队起来造反,全世界的政治家都不敢这样干。

现在,黄、吴、李、邱一个个急的在家里哭。总理现在也跟江青一边了,来告急说要保副,怕保不住了。

叶群要跑到苏联去当寓公。

林立果还说,主席利用完了军队,现在重用文人整军队。中国现在的政体是世界上最封建的,搞的是专制集权。现在主席活着,谁也不敢讲话,主席一不在,谁讲话也不管用了。将来肯定要打内战的。

主席一贯好政治冒险,58 年搞大跃进惨败,文化大革命全国大武斗,不是靠了军队,差点亡国。现在又和美国拉关系。

林立果吹牛说:“主席身边也有我的人”。现在不止空军听他的,陆军也掌握了不少部队。他在空军有个敢死队。还有一套班子在东山秘密机场,可以掌握全国情况。

林立果还说:跑出去有把握,他能控制住 34 师(专机师),可以瞒着吴法宪要胡萍调动飞机。可以跑广州,广州都是四野的部队,都会保护首长的,不行了随时跑香港。也可以跑苏修。三叉戟从这里起飞,只要 40 分钟就能到苏修,已派人到苏修联系,有三万美金存在国外。他已经计划好航线,沿线都没有高炮和雷达。

林立果还说:

我一跑,我那些精锐力量就要损失大部,我也不甘心,我是主张不跑的,先看一看再说,可以先离开这个地方。如果不跑,最好的结果就是像苏联那样,形成三驾马车的局面,就是江青、总理和我们。

林立果说这几天他都没睡觉,像做梦一样。还试探地问我是否要

跑,并说,实在要跑,你也得走。

林立果还说:

现在就是我下不了这个决心,听听你的意见,到底跑不跑?

……

我已经再三劝她,她和首长还是非要跑不可,现在就看你态度,你要不同意,我就不调飞机,还可以再拖几天。

而在此时,吃完午饭的刘吉纯刚躺下休息,8341 部队二大队大队长姜作寿就来到他的房间,对他说:“张清林和杨森有事找你。”

刘吉纯随姜作寿来到大队值班室,看见张清林、杨森已在那里。刘吉纯问有什么事,张清林慌慌张张的说:“不知豆豆(林立衡)被老虎(林立果)弄到哪里去了,你快去把主任(叶群)、老虎抓起来吧。”

听了这没头没脑的话,刘吉纯大吃一惊:什么事这么严重?况且他自己就是负责保卫叶群他们安全的,怎么反过来倒把保护对象抓起来了?他哪敢呀!刘吉纯赶紧宽慰他们说:“先别着急,去看看再说。”

原来,林立衡已经将林立果与她的谈话内容告诉了张清林。午饭后,林立衡又去林立果那里,张清林担心林立衡会有不测,便去找负责林立衡警卫工作的杨森,接着俩人又去找姜作寿,姜作寿又找到刘吉纯。

刘吉纯很快赶到林立果住处外面,看到他的车停在那里。于是又到 96 楼找“林办”在北戴河的负责人李文普。

李文普也在睡觉,刘吉纯把他叫到外面,将张清林的话对他说了一遍。李文普也不相信:“怎么会有这种事?”他对刘吉纯说:“你别听他们的,没有这回事!”

回到房间,刘吉纯翻来覆去地想,到底出了什么事?由于事关重大,他也不敢同别人讲。

当天下午,林立果在北戴河空军疗养院对空军司令部一处秘书程洪珍和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外事秘书陈伦和说,“我们马上返航,回北京……现在‘舰队’进入一等战备……”

晚饭前,林立果又找到林立衡说:“我们研究决定今天不跑了。跑不跑,这一个礼拜是关键。”

张宁回忆那天接下来的晚餐情景:

用晚餐时,五十六楼餐厅只有林立衡、张青霖和我。林立果给小王护士留下话,晚上夜泳不回来吃饭。

林立衡坐餐桌首位,一下午没见,像生了一场大病,蔫乎乎的吃几口便停筷,吞下一大把药。我吓一跳,我自幼体弱,也是个药篓子,可从没见这么吃药的,当饭吃呢!

立衡要回卧室休息,问她哪里不舒服,她摇头不语,一副无精打采懒得说话的样子。心下疑惑,是不是与青霖闹别扭了?看看青霖,他也是一脸猜疑。

当晚,林立衡将刘吉纯叫到她那里,问他:"他们对你说了些什么?"

刘吉纯将张清林、杨森讲的情况告诉了她。

林立衡又问:"你和别人说了没有?"

刘吉纯没敢说和李文普讲过,而是反问:"到底出了什么事?"

林立衡说:"主任、老虎在外面做了坏事,被上面知道了,怕整他们,在北京待不住了,要劫持首长到外地去,你知不知道?"

刘吉纯说:"不知道。"接着问:"那怎么办,是不是去报告?"他又自问自答地说:"向谁报告?只有向汪东兴、张耀祠、杨德中他们。"

林立衡马上说:"汪东兴在庐山上也受了批评,也有问题……现在谁都不要给他们讲。""首长国庆节还要上天安门。"

最后他们商议,林立衡在里面,刘吉纯在外面,观察一下再说。

21 时 30 分,总参二部的参谋倪煜照例给叶群讲课,按原来计划是讲马其顿王亚力山大或美国电影《巴顿将军》,可是,叶群却突然拿着《世界地图集》,问蒙古有哪些大城市?哪些地方有苏联军队?中苏、中蒙边境地区有多少苏联军队?

大约 23 时过后,卫生员兼叶群的游泳教练吕学文正陪叶群在室内游泳池游泳,林立果突然闯了进来,脸色十分难看,情绪非常紧张,站在池旁说有急事。叶群一见儿子"破常规"地闯进来,显得有些吃惊,她马上问吕学文:

"小吕,你懂不懂俄语?"

吕学文立即回答:"我什么语也不懂——不!俄语、英语我都不懂。"

于是,叶群母子二人开始用俄语咿哩哇啦的对话,谈了大约一、二十分钟。

吕学文听不懂他们对话的内容,但从他们那声调、表情和不断挥手的动作看,二人可能有不同的意见,争论很大、很激烈。或许是事情特别重大,两人都对那件事情十分恼火。最后,林立果愤怒地扭身离去,叶群也中断了游泳,并冷冷地对吕学文说:

“最近几天,我不游泳了,你也不用准备了。”

# 第1205回：林立果，准备上海搞暗杀 于新野，杭州去见陈励耘

9月7日下午，周宇驰驾驶直升飞机从北戴河飞回北京，来到江腾蛟家中，给江腾蛟看了顾同舟整理的毛泽东南巡期间的讲话记录。

江腾蛟看后问："可靠吗？"

周宇驰说："还有更厉害的没有传达呢！看起来他们要动手了，如果他们这些人上了台，我们就完了，这样的话我们就不如先下手为强。很快要开九届三中全会，开四届人大，首长就要被架空，说不定被搞垮台。就算首长能过关，黄吴李邱被搞下去了，我们再组织力量就困难多了。现在一组正在杭州，很快就到上海，回北京过国庆，我们看在经过上海的时候，就可以在上海动手。我们不动手，将来别人上了台，我们这些人都完蛋，你首先完。"

江腾蛟说："要动手就叫王维国干吧。"

王维国时任驻沪空军第4军政委，上海市公、检、法军管会主任。可是，这个建议却遭到了周宇驰的反对，他说："王维国不行，王维国太粗糙，这个人太粗。"

在经过长时间的沉默之后，江腾蛟说："那好，只有我去吧。"

周宇驰忙说："要去赶快去。"

江腾蛟认为："杭州现在是最好的时候，毛主席9月25日前不会回来。"

周宇驰说："现在我们不干，今后很难遇到这样的机会，过了这个村就没有这个店了。"

江腾蛟与周宇驰密谈之后，又于9月7日晚上和8日下午，分别和民航总局政委刘锦丰、空军司令部作战部部长鲁珉进行了联系。并在9月8日上午9时，找空军司令部航行局局长尚登峨，要他搞一本苏联航班地图。

9月8日早晨，北戴河，小王护士陪着张宁在外边散步。6时，她

们看见林彪的红旗轿车从96楼驶出,从她们身旁擦过驶向莲花峰外,司机杨振钢旁边坐着李文普,林彪端坐在后座中间位置上。这是林彪去海边转车。

9时,张宁去看林立衡,她正在客厅里做理疗,感冒嗓子痛。俩人正聊着,小朱护士领着一名战士抱着两个装在玻璃盒里的大蛋糕走进来,又返身再从停在院中的汽车里抱进四个新疆运来的无籽西瓜,堆在门边。小朱说道:

“这是主任让我们送来的。两个蛋糕,立衡、青霖一个,张宁、立果一个;四个西瓜一边两个。主任交代要你们好好休息,需要什么告诉她,想吃什么叫厨房做。”

林立衡淡淡地对小朱说:“噢,主任这么有心。你去替我们谢谢她。”

也就是在这天,叶群从北戴河给江青打电话说:“林彪同志向您致以热情的问候,他说很关心您的身体。”

江青:“谢谢林副主席,祝林副主席身体健康。”

叶群:“林彪同志让专人给江青同志送去几个最好的西瓜,请江青同志保重身体。”

江青:“请林副主席放心。”

9月8日,叶群对李文普说:“老虎要回北京看牙,这件事不要对首长说。”然后,她又打电话给毛家湾,告诉秘书于运深:“老虎回北京治牙,要严格保密。”并叫于运深联系301医院口腔科。

据林立衡回忆,这天,她问李文普关于北戴河情况。李告:叶群这两天非常紧张,与林立果常去林彪处。

9月8日11时左右到13时半,叶群到林彪的客厅里谈话。内勤听到叶群说:有人搞她的材料,说她是特务,她主任也当不成了,要林彪救救她。还说,她想要两个小孩马上结婚。

下午14时,叶群带张宁一个人去见林彪。林彪问张宁吃饭、睡觉好不好?叶群都替张宁作了回答。

林彪又问张宁:“你学舞蹈,芭蕾舞与古典舞有什么区别?”

张宁一时答不上来。因为她虽然学过舞蹈,却从未研究过舞蹈,只能尴尬害羞地望着林彪,不知该怎么回答。

叶群马上说:“你跳几个动作给首长看看。”

林彪微笑地看着张宁。于是张宁鼓起勇气走向客厅中间,跳一段芭蕾组合,再跳一段民族舞片段,然后羞怯怯地站在原地望着林彪。

张宁在回忆中写道:

这时,林彪高兴地动了动身子,叶群赶忙扶住他。他侧脸望望叶群,那神态好像刚发现她的存在,靠得还那么近,身子又动了动,像是嫌叶群碰触了他。场面很僵,刚泛起的一点轻松气氛立即消失,我傻愣在原处不知所措。

叶群自找台阶下,对林彪温言细语道:“你休息吧,我们走了。”嘴里虽如此说,屁股仍坐在沙发上没有移动,目光一直注视着林彪。

我见林彪木然地垂下眼皮,望着自己的脚,对叶群的话没有任何表示。

走在长廊上,叶群驼着背低着头,神情很阴郁,说道:“首长身体不好,我也不敢多劳累他。多去打扰他不好,你闲着没事好好休息,让小王陪你玩玩吧。”

她们回到叶群办公室,叶群一进门就揿铃叫小克传林立果上来。不一会儿,林立果气喘吁吁跑进来,静立一旁不说话。叶群叫林立果坐到张宁旁边,问他:

“吃过没有?”

林立果摇摇头,木然没表情。

叶群传饭上来,边吃边说起林立果他们的婚事:

“以后你们办婚事,要讲勤俭节约。全国都响应毛主席号召,破四旧立四新,移风易俗。副统帅家办喜事,别人都看着呢,要做个好榜样带个头,做个表率,不办喜宴,不请客送礼。新房布置要革命化,不搞花花绿绿,床上铺张白床单,放两床军被就行啦。你们同意不同意呀?”

见张宁和林立果都不吭声,她又笑道:“就这样吧,我跟首长说过了,他也同意。”

叶群吃饱了,兴致很好,站起身叫张宁和林立果陪她到海边转车消食。

在车里,长时间没人说话,气氛很沉闷。

“回去吧,不转了!”叶群情绪陡然变得烦躁,命令司机小慕回去。

然后将张宁和林立果跟留在她的办公室,自己走进卧室,“嘭”地一声摔上门。

办公室里只剩下张宁和林立果。林立果不时眼瞟叶群卧室门,等了一会儿没见动静,便拉张宁坐到长沙发上,小声问道:“你吃饭睡觉都好吗?”

张宁点点头。

林立果又说:“主任在这里,我不好照顾你,你多跟姐姐在一起,缺什么跟小王说,她会替你办。”

张宁又点点头。

林立果问:“今晚我要回北京,你刚来我又要走,你不会有意见吧?”

张宁说:“你回去看牙齿,还有什么事?几天回来?我一个星期以后就得回北京,学校开学不去上课影响不好。”

林立果犹豫着不答话,只盯着张宁看。

“你怎么了,犯啥呆?”张宁问。

林立果眼神晃了晃,支吾着低下头,又抬头犹豫地望住她,欲言又止,复而垂下头沉思。当他再次抬起头时,神情似乎像下了什么决心似的,说道:

“我四天就回来。你在这里休息,什么也别想,我回来就来看你。我看牙齿,顺便办点事。最近中央斗争激烈尖锐,主任的政治地位可能会下降。我回去了解一下情况。”

张宁吃了一惊,茫然地望着林立果。

林立果看出张宁的神情,缓了口气安慰她:“不过,事情还未发展到那么严重,我只是回去看看,几天就回来,陪你玩,好吗?”神情口气显得很轻松。

林立果见张宁缓过神来,又问:“你带的衣服够不够?我看你穿得太单薄,你体质差,要多穿点衣服,把房间钥匙给我,我给你带点衣服回来。”

“不就是到大连嘛。北戴河和大连气候差不多,国庆节之前回北京不会冷到哪里去。不要麻烦了。”张宁说。

林立果仍顺着自己的意思说:“那我从天窗爬进去替你拿。”

张宁望着林立果再次摇头,却发现他神情诡异,又想说什么而开不了口。“你今天怎么了?”张宁询问他。

林立果低头默思,双手揉搓,好一会儿才抬头专注地望着张宁说:“万一北京被占领了,你留在家里的那些东西不要可不可以?”

张宁真的被吓住了,一时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张嘴问到:“毛主席知道吗?”

林立果犹疑了一下,说:“知道一点。”

张宁说:“只要主席知道了,任何人想搞政变都不会成功的!”

林立果神情大变,愣神好一会儿,长时间不再说话,也不看张宁。

叶群的文书小孙进来,传林立果到林彪办公室去。林立果叫张宁等他,说马上就回来,起身随小孙出门。

大约10分钟,林立果返回,见张宁立在南墙下看地图,便走上前,正遇张宁听到声音回头,他突张双臂紧紧拥抱住张宁,在她脸上头发上狂吻,又紧紧吻住她的唇,令张宁透不过气。

张宁惊慌失措地挣脱林立果的拥抱,跑回沙发上坐下,下意识地赶紧理头发整衣服,生怕叶群此时出来撞见。

林立果走到张宁身旁,动作有些急促地脱下军帽和军上衣,甩到沙发背上,挨着她坐下,捧起她一双手,长长出口气,语气不连贯地说:

“万一……出了事……我不连累你……你什么都不要说,听我的话。”

张宁越听越糊涂,着急地问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你能不能告诉我?我什么都不知道哇!”

林立果凝望着张宁,终于摇摇头,安慰道:“没什么。我走以后,你好好休息。跟你说的事不要对一般工作人员说,他们什么都不知道。主任问你什么,你也不要告诉她。什么都不要想,等我回来。”

叶群卧室里传出动静,林立果立即站起身离开张宁。

叶群从卧室出来后对张宁:“你回去吧。立果今晚回北京,你得给他一点准备时间,我还有事交代他。”

于是张宁离开叶群办公室,回到56楼,已是下午17时,看见林立衡迎候在56楼门口,见到张宁便问:“你上去的时间挺长,主任和立果跟你谈些什么?”

张宁支支吾吾没有说。

据林立衡在1971年10月《对九月十三日事件前后的回忆》中记述,这天下午15时30分,林立果来到56楼找林立衡,对她说:

“已说服首长不跑了,现在还要说服主任。我们又决定了一个新的方案:现在主席在上海一带,在我们空四军的地盘手里,只要我批准,江腾蛟就出动,干掉他!”

林立衡吓了一跳:“江腾蛟不怕死吗?”

“江腾蛟对毛主席有仇。他自己已得了癌症,反正活不了几天了。”

林立衡说:“主席威望这么高,你可万万不能干这种事,这会在全世界遭到反对!”

林立果:“那没关系。暗杀后就借主席名义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地点未定,也可能就在北京毛家湾。把我的敢死队埋伏在里边,把政治局委员一个个骗来,把江青、毛远新、张春桥、姚文元都扣起来,然后说是张、姚暗害主席。不服从的就干掉。反正那时我们掌权,专案组都是我们的人,我们要怎么说就怎么说。”

林立衡说:“这个方案失败了呢?”

林立果说:“那我们就逃到苏修去。现在就这么两条路,要么逃跑,要么搞政变,或者两个方案同时进行。如果政变失败就逃跑,如果政变成功,就再飞回来。你说,难道还能有第三条路?万一不行,还可以打内战去。国家要乱了,就是我们不下手,别人也要下手。历史的规律就是这样。”

林立衡说:“这两条路都不能走。就算你夺了政权,也掌握不住。愿意跟你干的,都是有野心的人。将来还会用同样的手段干掉你。”

林立果说:“我也不敢保险。但什么事都得冒险。”

他还说:他是这两天得到主席要秘密开会的情报后,才准备行动的。

林立衡又问:“首长也知道暗杀主席吗?”

林立果迟疑了一下说:“他也同意。他现在不想活了,什么都听我的。但我也没有下决心。我回北京好好想一想,再摸摸情况。‘十一’前做好准备,一切都看过了‘十一’。”

晚上,林立果回北京。在去飞机场前,他又到56楼找林立衡单独

谈。据张宁后来回忆说：

据林立衡后来对我说，这次谈话是林立衡要求的，并要林立果瞒着叶群。但林立果直到出发，叶群始终寸步不离地跟着，林立果只有中途停车去见林立衡。

林立衡在1971年10月《对九月十三日事件前后的回忆》是这样记述林立果在去机场前对她说的话：

已说服主任了，我现在马上就走。情况有变化，主席已经离开了，原来的行动计划都要改变。我们准备在“十一”后行动。就看主席整我们到哪一步了。他要是老实点，我们就不升级。不过迟早总有一场斗的。

张宁后来回忆说：

院外停着林立果的专车、叶群的专车、中南海值班警卫车。叶群在车内命司机小慕不断地按喇叭催，林立果一直在屋内不理叶群的催促。叶群又派警卫员小徐上门催，说是快到八点了，飞机要起飞，叶主任等急了。林立果这才从屋内匆匆跑向院外上车去机场。

林立果与刘沛丰、陈伦和一起乘潘景寅试飞的256号三叉戟专机从北戴河飞回北京。

9月8日晚上，毛泽东在杭州调走专列，汪东兴找陈励耘不见。陈励耘8日晚上有什么事，连毛泽东的“大总管”汪东兴找他都不能来？原来，那天空军办公室处长于新野从北京来到杭州。他是奉周宇驰之命，于9月8日上午从北京飞到上海，在机场恰巧碰上被召回北京的空4军政治部秘书处副处长李伟信。于新野匆匆对他说：“现在形势很紧张，我到上海先给王维国打个招呼，下午要去杭州找陈励耘商量，了解B－52在杭州的情况。”

于新野和王维国见面后，在空4军军务处处长蒋国璋陪同下，察看了毛泽东专列到上海预定的停车地点，询问空4军有没有火焰喷射器等武器，又在9月8日18时乘车从上海赶到杭州，21时多在医院见到陈励耘，询问毛泽东到杭州后又讲了一些什么。

在于新野住的房间挂着一张毛泽东的像，陈励耘看着那张像说：“哎，我一看到毛主席的像就发愁。”

原来，9月8日晚，汪东兴找陈励耘时，他正和于新野在一起。怪不得到处找不到他。

# 第1206回：回北京，再传看“林彪手令”怎么办？林立果提出三条

9月8日晚21时40分，林立果乘坐的飞机降落在北京西郊机场。

机场上冷冷清清，空军司令部副参谋长兼空军第34师党委书记胡萍和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周宇驰在机场迎接林立果。

林立果一下飞机，就对胡萍说：“现在上面斗争情况很复杂，林副主席为了安全，要离开北戴河。”说着，他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个小红书，从里面拿出一张16开的白纸，递给胡萍说：“这是首长的亲笔手令，事关重大，要特别注意保密。”

胡萍看到上边横着写着：“盼照立果、宇驰同志传达的命令办林彪九月八日”。

林立果收起林彪的手令，当即命令胡萍为林彪准备两架飞机：一架三叉戟，一架伊尔-18，机组人员要求挑选对林彪“感情深的”人，选好后报个名单。

胡萍听了林立果的交待后，立即找来34师副政委潘景寅等人，研究了使用的飞机和机组人员，确定林彪机组名单：

34师副政委潘景寅担任机长；

100团副参谋长陈联柄任第一副驾驶；

三叉戟中队长康廷梓任第二副驾驶；

团领航主任李成昌任领航员；

团通信副主任陈松鹤任通信员；

机务分队中队长李平和机械师张延奎任机械师；

特设分队副中队长邰起良任特设师；

还配了34师服务大队副队长魏秀玲作为空中服务员。

机组人员都是挑全师技术最好的，而且还多配了一名飞行员和一名机械师。

胡萍让潘景寅把名单报给周宇驰。

林立果从西郊机场出来后,由周宇驰陪着先回了一趟毛家湾。

在走廊里,林立果从白衬衣口袋里掏出一张 16 开白纸让于运深看。

于运深边走边看,只见上面用红油笔竖着写着:“盼照立果、宇驰同志传达的命令办林彪九月八日”,没有章。

这是写给谁的?按什么“命令”办?为什么只有一句很含糊的话?于运深没有问。他在“林办”7 年,对林彪写这样的纸条早就习以为常了。林彪写字喜欢用军委办公厅服务处发的那种白纸,没有天地,用铅笔写,后来用红油笔了,字的大小一样,没头没尾,一大张纸就写几个字,只有一句话,例如“文革”初期林彪写的:“立即放出邱会作”。于运深没有把林立果让他看的这张纸当成什么重要的东西,也没有琢磨这个纸条的含义,以为是林立果和叶群又闹什么矛盾了,所以林彪才写这样的纸条。

但是于运深事后一想,文革后林彪几乎很少动笔,文件圈阅也常常由秘书代笔,这次竟然亲笔写了 20 字?而且,林彪口述一般都非常具体,而林立果给他看的这个纸条太含糊,没有确定性。“盼”照“什么”办?不知道。而且用了个“盼”字,不像林彪一贯下命令的口气。于运深觉得,林彪一生中从来没当过副职,下命令从来是死命令,坚决果断。

林立果在毛家湾给北戴河打电话报了平安,李文普接的电话,他报告了林彪和叶群,林彪点点头说:“好。”

林立果对于运深说,他第二天去 301 医院看牙。于运深告诉他,已经与 301 医院口腔科联系好了。林立果说他的牙还在痛,于运深关心地询问了几句。

林立果从自己的房间里拿了东西就走了,没有住在毛家湾。于运深一直陪着林立果,并跟他去了他的房间。林立果对于运深说,如果有他的电话,就找空军一号台。

22 时许,周宇驰打电话给已到北京的空 4 军政治部秘书处副处长李伟信,让他立即去空军学院,顺道先接江腾蛟到西郊机场。李伟信开车来到江腾蛟家,说是林立果马上要见他,然后将江腾蛟接到林立果设在西郊机场的秘密据点,通常称为“工字房”的一座平房内等候。

晚上23时30分,林立果、周宇驰来到“工字房”,见到了已等候在那里的江腾蛟、李伟信等人。

林立果对江腾蛟说:“哎呀! 老政委,情况很严重啦!”说着,他拿出林彪的手令,对江腾蛟说:“先给你看个东西。”

江腾蛟看完后,林立果问:“怎么样?”

江腾蛟很干脆地表态说:“干吧!”

林立果拿出“司令官”的派头,传达命令说:“现在的情况很紧急,我们已决定在上海动手,这个任务交给你,你是第一线指挥。要什么人,要什么东西,都满足你。你有把握吗?”

江腾蛟说:“那就看有什么办法。”

林立果说:“我们研究了三条办法,一是用火焰喷射器、40火箭筒打B-52的火车;二是用100毫米口径的改装高射炮,平射火车;三是让王维国在B-52接见时,带上手枪在车上动手。你到上海统一指挥,只有你才能胜任。等上海打响后,北京由王飞率领空直警卫营攻打钓鱼台。”

B-52是林立果给毛泽东起的代号。

周宇驰接上说:“还是7号晚上我跟着你说的,要去就快去。为了保密,坐火车去,到苏州下车,上海来车接你。你的代号是‘歼七’”。

江腾蛟听得直出冷汗,但他依然表示:“为了正义,为革命,坚决干。”

林立果又说:“这次要论功行赏。首长讲过,谁能完成这个任务,谁就是开国元勋。”

周宇驰对江腾蛟说:“你如能完成任务,副总理、政治局委员由你挑选。”

江腾蛟提出:“空军没有火焰喷射器,就是有,我们也不会用。另外,谁敢下令打毛主席的专列? 要教导队去冲火车打毛主席,他们也不一定干。”

林立果说:“那个头不是给你当过秘书吗?”

江腾蛟回答:“要他们干这种事,就不一定听,还会把下命令的人捆起来。”

林立果:“火焰喷射器我给你调,战士不干可以骗他们说车上有人

搞阴谋,要害毛主席,叫他们去救。”

江腾蛟:“向主席专列调高射炮,一动就会被发现。再说专列是防弹玻璃,步枪、机枪子弹打不进去。车上警卫只要抵抗半小时,附近的部队就会赶来。”

关于第三条办法,要王维国动手,江腾蛟说:“这件事也没跟王维国说,部队是他的,具体事情还是要靠他做,部队不一定听我指挥。他愿意不愿意还不知道。即使他愿意,枪要是带不上去又怎么办?专列上可能有仪器,一照就照出来了。”

大家又议了一会儿,最后,林立果又问江腾蛟:“你看我们的三条办法行不行?有没有把握?”

江腾蛟答道:“如果都用上了,可能有六、七分把握。”

周宇驰像下赌注一样坚定地说:“有七分把握就可以干,打仗就是有七分把握三分冒险。”

江腾蛟说:“打仗有七分把握就干,可这和打仗不一样,必须有百分之百的把握。”

林立果说:“你再想想更好的办法,你是第一线指挥员,听你的。”

周宇驰问:“杭州到上海有没有铁路桥?搞‘皇姑屯’方式。”

1928 年日军暗杀东北大帅张作霖,就是在皇姑屯炸火车达到的目的。

江腾蛟说:“桥倒是有几座,都有陆军把守。”

又是一阵沉默,林立果说:“如果陈励耘有胆量,在嘉兴车站动手最好。”

一直出出进进倒水的李伟信还兼着放哨,此时他插话说:“在杭州干好,让陈励耘干。”

几个人又像捞到了“救命稻草”一样,兴奋起来,纷纷说:“这个办法好,把陈励耘的家属孩子都弄走,保护起来,解除他的后顾之忧,向他说明厉害,逼着他干。”

谁去说服陈励耘?周宇驰说:“江政委带于新野去。”

江腾蛟说:“还是让于新野一个人去吧。”

林立果说:“于新野就在杭州,等明天他从杭州回来,看看是什么情况再说。”

林立果在屋子里转,周宇驰一根接一根抽烟。

突然周宇驰跳起来:“机场附近不是有油库吗?油库能不能爆炸?”

江腾蛟说:“油库是有,但能不能爆炸,我不懂,烧着总可以吧?虹桥机场曾发生过一次油库燃烧事件。”

周宇驰说:“我们可以把油库烧着,然后带着部队去救火,乘乱把‘一组’抢走。”他要江腾蛟把油库和专列的位置画下来。

江腾蛟一边画一边说:“这是个好办法。搞得好,汽油流到火车附近,连人带车都报销了。”画好后,他交给周宇驰,周宇驰给了林立果。林立果也高兴起来,说:“这是个好办法。”

周宇驰说:“明天我找人了解一下,油库能不能爆炸。现在,主席在杭州已经住了几天,要快一点,他一走就错过机会了。”

这时江腾蛟又泼了一盆凉水:“汪东兴不会让任何人接近专列,上海小组的人也不一定干。专列进入机场后,附近油库的警卫全换干部担任,一般人接近有困难。而且专列挂两个车头,可进可退,油库烧着了,专列马上会开走。”

研究半天,想了一大堆办法,都觉得不行,3 个人全耷拉了脑袋。过了好一阵,周宇驰看表,已经是 9 日凌晨 1 时了,说:“今天先到这里算了,明天找王飞再研究。”

“好吧,”林立果说,“先谈到这里,以后再研究。首长说了,谁完成这个任务,谁就是开国元勋。这个事可千万不能漏出去,漏出去你们都完了,我的脑袋也没有了。”

周宇驰说:“要特别注意防叛徒。”

林立果说:“谁叛变,就杀他全家。”

他们最后约好第二天,其实就是当天,9 月 9 日 22 时,到空军学院“秘密据点”开会。

林立果走到另一间房间,看见有一个灵芝草,就拿出来送给江腾蛟,并对他说:“好好保重身体。”

也是在 9 月 8 日这天晚上,叶群多次与黄永胜、吴法宪通电话。叶群要吴法宪给林彪准备 5 架飞机。吴法宪第二天,9 月 9 日便转告胡萍:

“叶主任来电话说,他们准备动,要用飞机,你把他们要用的飞机都准备一下,要用的三叉戟飞机一定要好好检查,大飞机也都作些准备,随时可以用。”

为林彪准备5架飞机,胡萍并不觉得突然。因为过去都是这样,林彪一出动就是5架飞机,一架林彪坐,一架随行人员,一架拉电影机和电影片子,一架拉警卫人员,一架拉汽车。

9月9日凌晨,毛泽东的专列转到靠近绍兴的一条专线上。就在此时,北京,林立果又从北京西郊机场匆匆赶到空军学院东北角那两幢编号13和14的两层小楼,这里原是空军学院院领导的住宅,人称“将军楼”。1971年4月底,这里成了林立果的又一处“秘密据点”。空军学院为此专门成立了一个接待小组,保障这两幢小楼的生活和后勤,由空军学院行政处副处长王兰义负责。

林立果他们几次到空军学院的“秘密据点”,都是说来就来,事先并不通知。有时连续六、七天在里边,有时十多天。通常是上午10时左右来,晚上22时离开。只有负责伙食和打扫卫生的接待小组能进到楼里,但对楼里的活动要绝对保密。为副统帅的儿子服务嘛,神圣光荣。准备伙食,老王都是亲自到食堂监厨,亲自送去,晚上人走楼空,才能进去打扫卫生,由空军学院行政处小牛负责打扫卫生。

8月底,空军司令部办公室秘书程洪珍给王兰义打电话,说要准备一个星期吃的用的东西,卫生先别打扫了。程洪珍还强调:“报纸放到门口,有事打电话找你,没事就别来了。”

报纸过去都是送进去的。这时候,正好学院刚来好多学员,而且快到国庆了,老王还要组织国庆游行,非常忙,就交代小牛把东西准备好,每天的报纸由老王下班骑自行车路过小楼,顺手放在台阶上。这时,来的人比过去多,而且有3个没见过的女兵。不仅白天来,夜里也住在里边,分外紧张忙碌,车辆也来往频繁。并且不许接待小组进楼了,送饭送报,事先打电话通知,送到门口,由几个女兵拿进去。

9月9日,林立果和李伟信到了那里,对等候在那里的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处长刘沛丰、副主任刘世英、秘书程洪珍等人说:

“现在有人反对林副主席!我们要誓死捍卫!养兵千日,用在一朝,当前是要用我们的时候了。本来想多抓点部队,但已经来不及了。

我们要全力以赴,一个顶几个或十几个用,要坚决服从命令听指挥。”

林立果拿出林彪的手令给刘世英、刘沛丰、程洪珍、李伟信看,江腾蛟又看了一遍。看后,林立果要李伟信保存。而后问道:“你们看怎么样?”

几个人连连表示:“坚决服从命令听指挥!”

“保卫林副主席!”

“保卫林副部长!”

林立果又解释说:现在他们正在做黄永胜的工作,攻下了黄永胜,就要搞首长。政治局开会,如果要摊牌,黄李邱首先会开枪。这次总的任务代号叫“571 工程”,即“武装起义”。准备在国庆节前解决问题。江腾蛟是前敌总指挥,王飞和刘世英、鲁珉、贺德全把空军的工作抓起来,刘沛丰、程洪珍负责联络,李伟信负责生活。现在就是靠少壮派起家,搞成了论功行赏,王飞是空军司令,刘世英可以当副司令,李伟信当外贸部长,其他人都要重用。成败在此一举。

程洪珍说:“成者为王,败者为寇。”

林立果说:“败了也不是寇,搞成了一切都好,失败了就打游击,坚决干到底!现在形势很紧张,直接对着首长,火药味已经很浓了,我们要誓死捍卫。所以要搞‘571’,现在首长委托我来处理这件事。”

接着,他从口袋里拿出一张纸:“现在,我宣布一下舰队成员的代号:林立果——老康,周宇驰——金钟,刘沛丰——老崔,王飞——阿飞,江腾蛟——歼七,于新野——越野……”

林立果对江腾蛟说:“现在请你当总指挥,任务很重,老政委呀,一定要搞好。”

江腾蛟表示:“一定坚决按首长和你的指示办!”

周宇驰让程洪珍把办公室墙上挂的北京市地图上有钓鱼台的地方描下来,上午交给他。

这天上午,周宇驰布置空军雷达兵部技术处副处长许秀绪搞一份东北、华北、西北地区雷达兵部署图。

这天,于新野从杭州回到上海,给王维国看了毛泽东南巡的讲话纪录。

北戴河。9 月 9 日上午 8 时许,林彪把叶群召去,谈到 11 时。叶

群、林彪告诉林立衡:林立果回北京了,要她不要走,过几天要带他们去大连。

上午11时30分左右,叶群要秘书通知留在北京“林办”秘书,把有关中美关系的文件送来。

下午,林立衡找林彪内勤张恒昌、陈占照,对二人说:“主任的政治地位可能要下降,现在情况很反常,你们要注意一点,提高警惕,有什么情况要报告。”

内勤说:林彪前些日子身体不好,这几天不知有什么大事,与叶群、林立果谈得很多,精神倒好了。

林立衡找李文普了解北戴河的情况。李文普讲:现在没有什么大的反常现象,要她放心。

林立衡找刘吉纯了解情况。刘吉纯说:林彪要他去大连看房子,叶群不同意。叶群要北京捎布料、皮鞋和冬衣等东西来。还说周宇驰从来没有到过林彪处。林立衡意识到,林立果7日与她的谈话是骗她的,于是将林立果走前讲的情况告诉了刘吉纯,要他提高警惕。

晚上,叶群和北戴河的工作人员一起看电影。

# 第1207回：议未决，搞政变如同儿戏 叫暂停，关光烈来到北京

9月9日下午，林立果、江腾蛟、周宇驰再次来到西郊机场“工字房”。

周宇驰还在想如何炸铁路桥，他问江腾蛟：“从杭州到上海之间有没有铁路桥？如果有，炸铁路的办法最好。”

江腾蛟答道：“桥有好几座，但都有陆军看守。”又建议：“要炸铁路，硕放那一段比较合适。这个地方靠近我们的机场，铁路边又无其它部队。”

周宇驰接着说道，车一炸坏，就发动附近机场的部队以抢救B－52为名冲上去，在混乱中“解决问题”。

周宇驰曾打电话给广州军区空军管理处长陈伯羽，让他经过长沙时了解一下毛泽东的活动情况，要详细。陈伯羽到长沙后住进湖南宾馆，通过熟人打听到毛泽东在长沙上下车的地点、住处、安全保卫情况和谈话内容。周宇驰对专列的保卫很感兴趣，问有没有扫雷车？陈伯羽也不知道，就说没有。

周宇驰问：“主席的车到长沙前是什么车压路？”

“客车。”

“两列车相距多远？”

“3个小时。”

经过一夜考虑，还是炸油库或炸铁路桥这两条办法。江腾蛟也认为炸油库的方式可行。如果专列停在虹桥机场，就炸附近的油库，汽油流到火车附近，连车带人都报销了。

林立果拿不定主意。

江腾蛟还提出两条建议：“如果一组到了上海，就说王维国因病住院了，如果离开上海，就说王维国出院了……”

周宇驰对江腾蛟说：“你如果到上海去的话，于新野跟你去。”

这次他们的讨论过程由李伟信作了记录。开始说东南方向搞成了,就说王维国病好转,暂不来北京。之后又说有几种情况:打成了,打而不成,不打等。这些用病危、病重等代替。后来又说用无线还是有线联系,最后说具体方案还没定,密语先等一等。

林立果:“有线电、无线电同时使用。无线电发报时,就发王飞转空军党委,以这样的办法发,有线电借故有重要事情,把线路占住,不让别人用。”

林立果交给空军司令部情报技侦处副处长王永奎两个任务,一是研究在无人驾驶飞机里装上遥控爆炸装置,用电脑制导,带上炸弹,直接引爆。另一个任务研究一下汽油在什么条件下着火,怎样使油库燃烧爆炸。

周宇驰说:“导弹的战斗部不能用炸药,要用化学的,有一种毒气,一公斤就能杀伤一大片。”

林立果:“不能用毒气,毒气不能进房间,持续时间也不长。”他问王永奎,“用火焰喷射器烧火车怎么样?”

王永奎说:“不如火炮。”

林立果说:“这两天讨论来讨论去,方案提了好几个,但没有一样保险。”他转身问李伟信:“能不能进口一个小型原子弹?发射完了开汽车就走。”

李伟信听得直摇头,连忙说:“那怎么行?要是进口一颗小炸弹,那还差不多。”

下午,程洪珍将描好钓鱼台的北京市地图交给了周宇驰。周宇驰用铅笔标了方位,然后又说程洪珍描得不行,要他到办公室取原来的地图。

这天下午,于新野飞回北京,立即到西郊机场向林立果汇报。

下午,空军司令部航行局按照周宇驰的布置,给他送来苏联伊尔库次克机场和恰克图导航资料等材料。

当天,叶群同在北京的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用保密电话进行了频繁的对话。

晚上,林立果、周宇驰又来到空军学院的秘密据点,将王飞叫来。

王飞是1969年提升为空军副参谋长的。他非常谨慎,空军指挥学院的“秘密据点”楼下有车库,小车可以直接开进楼里,而王飞不怕

“麻烦”,每次都要在稍远的地方下车,徒步走过去,他是怕别人抄去车号。林立果他们的车老换车牌,而他的车牌是固定的,太显眼。9月9日下班时,周宇驰对王飞简单讲了几句,说“战友要找你谈谈。”于是,王飞来到空军学院,林立果一见他就问:

“闻到‘火药味’了吗?”

王飞说:“没有闻到,我感冒了,鼻子不通气。”

周宇驰给王飞看林彪“手令”,还通报了毛泽东南巡讲话的内容,说:“我们逼到这时,非动手不可。”

王飞很惊讶,也很紧张。此时,他还不知道林立果的那“三个方案”,马上表示:“坚决保卫林副主席!”“林副主席叫干,就一定干!”

林立果、周宇驰向王飞简要介绍了林立果提出的三条行动方案。

林立果说:“现在情况紧张”,“火药味已经很浓了”,“要坚决把反对林副主席的人除掉。有一坨在南方,有一坨在北京,要同时干掉,南边由江腾蛟负责,北京由王飞和周宇驰负责”,“现在决定武装起义”,“从现在起,王飞就是空军司令”。

“南线指挥是江腾蛟,北线指挥是王飞,主要是攻打钓鱼台。”

这时,刚刚从遵化回到北京的王飞才知道是怎么回事,他说:“打钓鱼台有些困难。”

林立果说:“在南线先把一组抓起来。”

王飞说:“这不行,还是先礼后兵好。是不是采取开会的办法,开会谈判几条,”他提出:第一条,老百姓饿死了,一块打江山的元帅、大将整死了,刘少奇整死了。文革中空军支持抓‘联动’,‘516’本来抓走资派,又说‘516’是反革命分子。让他们承认,口头承认也好。第二条,九届二中全会要谈。双方都让步,林副主席没法征求意见了。三个副词,毛泽东坚决反对,干脆撤掉不提。毛主席把《我的一点意见》去掉。‘反革命简报’收回去。口头答应也好,争取签字,这就没有什么公开矛盾了。第三条,提出‘民富国强’是总路线,这是九大以前林副主席提出来的,陈伯达在他起草的九大报告中的思想。停止文革。”

周宇驰还是坚持炸铁路桥。

21时,周宇驰布置空军司令部情报技侦处副处长王永奎搞一份作导航用的周围国家广播电台频率表。

22时,林立果与叶群通电话。出来后,他问王飞:“你想出什么好办法没有?”

王飞说:“除了开会我没有什么好办法。”

林立果:“我就不信搞不成。”

林立果把程洪珍手绘的钓鱼台图拿来,说:“我看就坐上大卡车,从这两个门同时猛冲进去。枪一响,里面就乱了套。”

王飞说:“‘蓝裤子’怎么冲?即使冲进去,那么高的墙,很快会被包围。进去的人想跑也跑不出来,而且不一定能抓到要抓的人。”

周宇驰说:“硬冲不行,可以小股隐蔽进入。晚上到门口把哨兵一抓,就进去了。”

王飞说:“那得情况非常熟悉才行。”

林立果说:“老周对那里熟,他带你进去,你准备好人。”

王飞说:“问题是部队不好动员,再说晚上铁门关着,里面又有哨兵、游动哨……”

林立果不高兴地说:“总能想出办法。江腾蛟提议把关光烈叫来,从他那个部队调火焰喷射连到上海去,再调一些部队到北京来协助你们攻打钓鱼台。”

他们一直说到9月10日凌晨1点多,还是没有说出个所以然。最后,林立果拿出个大纸袋,是叶群带给黄永胜的东西。他交给王飞,让王飞送交黄永胜。大家回去睡觉。

这天深夜,周宇驰给关光烈打电话,说:“林立果多时没有见你了,很想见见你,请你立即来北京一趟。”关光烈当天就上了火车。

关光烈,原林彪的秘书,1965年调43军127师任副政委,1968年12月任政委,师长是张万年。

顾同舟按照周宇驰6日晚的电话要求,于7日借来广州军区空军司令员王璞的笔记,用了两天时间,又整理出长达50页的详细材料,并于8日夜,给周宇驰写了一封关于广州军区广州军区这次师以上干部大会的信,在9月9日下午17时,让妻子张亚青带着孩子,以治病为名,乘坐34师的飞机将材料和信送到北京。

当晚,刘沛丰对顾同舟的妻子张亚青说:“有几句话,请你回去告诉参谋长。不要记:感谢送来的东西,同意你的看法。要保重身体,注

意安全,抓好部队,注意观察一周内的情况。”

刘沛丰重复了两遍,然后说:“我们很想来广州,什么时候来还说不好。”

同时,周宇驰也在电话里对顾同舟说:“最近几天,我们可能来广州,飞机可能在沙堤机场降落。要给你讲的事,都给你夫人讲了,请她回去转告。”

张亚青怕忘记,等刘沛丰走后,还是将他说的话追记在本子上。她本想在北京多呆几天,看看熟人,毕竟来一趟北京不容易。刘沛丰不同意,当晚就把她送上了回广州的飞机。

9 日当晚 23 时多钟,周宇驰再次给顾同舟打电话说,林立果他们看过材料和信了,询问了顾同舟对吹风会的看法,还说最近不去广州了。

顾同舟对张亚青带回的话认真看了两遍,估计要发生重大事情,可又搞不清,决定再让广州空军管理处处长陈伯羽到北京探听。

本来周宇驰计划 9 月 6 日驾“云雀”到长沙,然后去桂林的。当时顾同舟叫陈伯羽陪同,于是陈伯羽到长沙等候。谁知周宇驰因顾同舟的报告改变了计划,陈伯羽在长沙等了一天多,于 9 月 7 日接到顾同舟的电话,说周宇驰不来了,他便返回广州。没想到才回到广州,顾同舟又让他马上乘 16 次特快去北京。

9 月 10 日,北戴河。上午,张清林、张宁到秦皇岛、山海关游玩。林立衡因身体不好没有去,到林彪处谈话。林彪说要全家一起去大连,时间要等林立果回来后再定。

9 时许,林立衡找到林彪内勤陈占照、张恒昌,明确对他们说了叶群、林立果“要害首长,可能要逃跑”,要他俩提高警惕,想法偷听他们的谈话,告诉她。

陈占照、张恒昌说,林立果、叶群和林彪谈话的情况很秘密。并对林立衡说:周宇驰来北戴河肯定没有见过林彪。

林立衡在《对九月十三日事件前后的回忆》中这样写道:“九月十日,林彪的卫生员小陈(陈占照同志)对我说他前两天听见叶群对林彪说她想跑,林彪凶了她,喝斥她(从林彪的房子里)‘出去!’并且不准叶群见他。”

上午 11 时左右,叶群在听李春生报 14 名副军以上干部的任免报

告时,要李春生打电话给毛家湾,把副军以上的干部名册送来,还让把部队部署情况的登记表也一起拿来,说:“首长要准备研究一下战备问题。”后来叶群又要全军干部工作座谈会的文件。

早上7时58分,刘沛丰带着北京市地图和许多文件从北京飞往北戴河。到北戴河时已近中午。李文普让北戴河食堂给他准备了午饭。刘沛丰没有吃饭,直接去见了叶群,谈了约20分钟,又急急忙忙坐飞机走了。食堂为他准备的午饭也没有吃。

下午,林立衡带张清林、张宁、杨森乘吉姆车去山海关、秦皇岛游玩。他们在秦皇岛海员俱乐部买了一些送给林彪、叶群的小礼品。林立衡买的是一个机械玩具兵,准备送给林彪。张宁买了一只黄鹂鸟标本,准备送给叶群。

17时,他们回到北戴河,走进叶群办公室,见她手上拿一份文件正要去林彪办公室。那份文件是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议程。

林彪到北戴河以后,从未亲自接听北京方面的任何一个电话,也没有打电话给北京方面的任何一个人,却非常关心中美关系的进展,指示秘书一有消息就直接报来,如中央政治局《关于中美会谈的报告》,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中美间所有口信来往,中央工作会议发的文件,总理同基辛格会谈的简报,以及总参三部编的国际问题资料。他还几次提出要见美国总统尼克松。

当林彪看见叶群领着林立衡他们走进来时,脸上绽出笑容。

“首长呀,孩子们出去玩,还给我们带了礼物,你看看吧。”叶群温言细语地说着,招呼大家近前。

茶几上放着小鸟和机械兵。林彪伏身看一眼小鸟,抬眼望张宁笑笑,便盯住那机械兵再也不动。林立衡忙给机械兵上足发条,小兵便做起扛枪、匍匐、瞄准射击动作。林彪微笑着,很开心。

发条松了,林彪托起机械兵左瞧右看,问林立衡:“他怎么动的?”

林立衡在他身旁蹲下做示范给他看。当机械兵再次爬动时,林彪弯下腰兴致勃勃地观赏着。

叶群见他高兴,趁机问道:“感觉好些吗?”

林彪面无表情地坐下了。

李文普从起居室的那扇门探出头,被叶群看见,忙叫住他:“你去

拿相机,给我们照张相。”

叶群布置秘书们商量林立衡、张清林结婚的事情。晚上,叶群继续让放电影。

北京。9月10日上午,周宇驰要鲁珉把福建、江西、广东、广西的一、二、三级机场的位置、长度、宽度“拿个单子”给他。中午,王飞将叶群“带交黄总长亲收”的大信袋送交黄永胜。据后来黄永胜讲,里面就是一袋菠萝糖和一件尼龙背心。

王飞向黄永胜转达了叶群、林立果问候的话,还向他转达周宇驰得到的关于毛泽东同某地负责人的谈话内容。谁知王飞刚开了个头,黄永胜马上说:“我知道了,我们政治局传达了。”黄永胜表示了对叶群、林立果感谢。

这天,林立果一直睡到上午11时才起。然后一个人开车离开空军学院,回到毛家湾。

当天下午,林立果、周宇驰、王飞3人再次商议。王飞提出一系列困难,最后说:“虽然这事很重要,面对这些无法解决的难题,主席的出行情况又搞不清,搞不好是身家性命的事情。”

周宇驰这时也说:“看来,还要从正反两方面再考虑考虑,究竟搞不搞?”

林立果说:“现在不搞,还能收得住吗?”

王飞赶紧说:“没问题,收得住。”

林立果无可奈何地说:“那就先不搞吧。我给北戴河打个电话,反正搞不搞还得我这个前线司令来确定,这次就算一次思想拉练吧!不过得绝对保密。”

下午16时许,刘沛丰从北戴河回到北京,林立果、周宇驰把一封林彪给黄永胜的亲笔信交给王飞,说是刘沛丰刚从北戴河带来的,要王飞适时送交黄永胜,并由王飞作黄永胜与林立果之间的联系人。

这天,叶群和黄永胜通电话5次,其中有两次通话时间竟分别达90分钟和135分钟。

这天晚上,关光烈乘10次特快列车从部队驻地洛阳赶到北京,住在东交民巷空军招待所。当晚22时许,林立果、周宇驰、刘沛丰、李伟信到空军招待所去看关光烈,他们把希望寄托在关光烈身上。林立果

对他说:“现在上头斗争很激烈,要开人大了,开人大之前要开三中全会,找你来是请你调部队解决钓鱼台问题。”他给关光烈看了放在塑料夹子中的林彪“手令”。然后提出由关光烈从127师调两个营到北京攻打钓鱼台,调一个喷火连到上海。

关光烈感到非常突然,这不是天方夜谭吗?

林立果问:“火焰喷射器有多大威力?打火车行吗?”

关光烈说:“只要能喷进去,里面的人就统统烧死。不过它本身连这个木头门也烧不透。如果火车的门关严了,就要先用别的武器把目标打穿,再从洞口往里喷射。”

周宇驰问:“如果先用40火箭筒把车厢打穿,再用火焰喷射器,能行吗?”

关光烈:“那得配合好才行。”

林立果问:“从你们那里调一个喷火连到上海不行吗?”

关光烈说:“别说一个连,一个排也不行。个人无权调动部队,除非军委下命令。而且调动部队手续很多,一级一级上报,申请火车皮,由军运部门调拨,才能坐上火车。”

林立果一听傻了眼,冒充军委下令呢?呼号频率不一样,还要配密语,更不好办。他说:“黄永胜再过几天也没权了,我们都不敢找他。”

看来确实不行了,于是林立果的决定,让李伟信立即给江腾蛟打电话,传达林立果的一句话:“先不要展开部署,否则就没有收的余地了。”

9月10日晚23时,毛泽东的专列早已到了上海。

北戴河,23时许,叶群给胡萍打电话,询问病情。此时,胡萍正患左肾结核,正在空军总医院住院做切片检查。

叶群问胡萍:“那位小将都给你谈了吧,谈的好吧?”

胡萍说:“谈的很好。”

叶群说:“要你准备飞机是不是还有难处?”叶接着又说:“这件事我和胖司令都说好了,用不着想的太多。再说立果和胖司令也都作了安排的,你要抓紧准备。”

9月11日凌晨,林立果收到王维国报来的“王维国因病住院了”的消息,得知毛泽东已到上海。1时,林立果从北京给叶群打来电话,告知已停止一切行动。

# 第1208回：说“不行”，叶群电话“抽鞭子”仍未决，专列已过硕放站

9月11日，叶群情绪明显反常。上午10时过后，她叫张宁过去。张宁进屋时，看见叶群焦虑不安地来回走动，一会儿拿起文件，一会儿又放下，拿起笔又放下，再拿茶杯，好一会儿才发现张宁站在一边，二话不说，拉着她往外走，说：

“去看看首长，他老一人坐着寂寞，你去陪陪他吧。”

她们走到林彪办公室门口，叶群轻声叫张宁推门，张宁依言轻轻推开办公室门，突然听到林彪颤抖抖的长腔：“谁呀?!”

张宁吓了一跳，浑身一哆嗦，忙回头望叶群。

叶群抢上一步推开门，快步上前轻声细语地说：“是我是我，张宁来看你啦。”

叶群叫张宁坐在林彪右边，她坐在林彪左边，然后对张宁说：

“你说几句英语给首长听听。”

张宁用英语说了“毛主席万岁，祝林副主席身体永远健康”，并用中文解释出来。

林彪从沉寂中发出一声哑笑，又吓了张宁一跳。叶群忙解释：

“在外面说说不要紧，那是政治需要，在家里不要这样讲，首长很谦虚，不喜欢人家这样讲。”

林彪缓缓抬头，低声清楚地说：“人吃五谷杂粮，哪里来永远健康。”说完，见张宁不解的样子，微笑着对叶群说：“这孩子老实，不爱说话。”

叶群忙对张宁说：“你先回我办公室去，我跟首长还有些事。”

大约30分钟后，工作人员看见叶群闷着头阴着脸出来。据内勤说，张宁走后，叶群一直在林彪身边坐着，看内勤端上一碗杂面粥，叶群说烹斑鸠好吃，林彪没理她，吃几口就让端走了。内勤听叶群对林

彪说去大连的事,说把几个孩子都带上。林彪没有一句应答,坐了一会儿,起身进了卧室。叶群跟着,看着内勤给林彪脱衣,躺下,静立一边看他入睡,始终没说一句话。

李文普后来回忆说,11 时左右,叶群又让他给毛家湾打电话,要副军以上干部名册和全军部队部署情况登记表。

这天,叶群对李文普说,想去广州。

李文普说:“现在天气这样热,去广州干什么?”

叶群没有再说话。

当时,李文普和刘吉纯的女儿都想当兵,叶群突然问李文普:“你的女儿多大啦?”

李文普告诉她:“在上中学。”

叶群又问了刘吉纯女儿情况,然后说:“让她俩去空疗学护士吧!”

晚 18 时左右,林立衡又找林彪内勤陈占照,说林立果阴谋暗害毛主席。要他提高警惕,不要害怕,发现情况,立即告诉她。陈占照对她说,他偷听到叶群哭着对林彪说:“现在人家说我是特务,我要逃走”。林彪说:“我有什么办法,你走就走吧!”

11 日上午,叶群给林立果打电话:“立果,托你办的事,应该抓紧办来,形势逼人,不搞不行! 江腾蛟去的那里,现在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他到了我们的根据地时,不能坐失良机,要当机立断!”

11 时许,周宇驰给王飞打电话时就说:“情况有变化,前天晚上我们研究的不行,通不过,叶主任来电话,发火了。你赶快来研究一下。先到空军学院礼堂前面,我派人来接你。”

接着,林立果也给王飞来电话:“主任刚打电话给我们抽鞭子,她还要给你打电话,少不了也得‘抽’几下,先给你说一下,好有个思想准备。现在势在必行,不能再动摇了。”

王飞还没放下话筒,叶群的电话就来了。一开口,她便佯装关切地说:“我们对你们是很关心的。你们的每一点我们都为你们考虑。林副主席对你们很信任。托你们办的事应该抓紧办。”

接着,叶群语调严厉地说:“我们全家的身家性命都托给你们了。听说你有很大顾虑,总想‘抽梯子’。怕什么,就是死了也是烈士嘛!

我们是为了革命利益,形势逼人,不能不这样搞。”

王飞忙解释说:“不是怕,我参加革命时还没有想到活到快50岁呢!是不好搞,怕搞不好把你们也连累了。”

叶群见状,马上缓和下来说:“林副主席历来说话一句算一句,不考虑成熟,不会要你们办的。办了不会亏待你们的,什么问题都好办。你们将来都是‘常’字号的。你们忙活了这几天,现在就是不搞也不好了,人家也不会饶过你们的。你们也跑不了。只有同生死,共命运,不能把我们当‘省油灯’!”

王飞忙说:“我考虑的是困难,怕连累你们,不是别的。”

叶群生怕王飞往后缩,赶忙给他打气:“有困难想办法克服嘛!哪有不困难的事?你们想想办法嘛!江腾蛟那里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他去了我们根据地里了,不要坐失良机,要当机立断!”

王飞马上说:“我马上去找他们研究,尽力去办。”

叶群又问:“你家里有什么困难吗?”“钱够不够用?”“你的小孩多,带不过来,我帮她。”她又说:“我们的一切都托给你们了,赶快研究一下,6点给我一个回话。”

王飞与叶群通话后,立即坐上车赶到空军学院礼堂,在那里又换上一辆车,向西郊机场急驰而去。当他走进“工字房”时,林立果、周宇驰和江腾蛟都已经在那里了。王飞听他们在议论代号,给他的代号叫“阿飞”,便插上去说:“我不叫阿飞,我还叫原来的名字。”

林立果说:“还是有一个代号方便。”

王飞推托说:“你在普通电话里讲了,不能用了。”

林立果说:“那就改为叫‘黄翔’;老周叫‘金钟’。”

商定了各人的代号后,林立果说:“首长决心已定,先搞‘南线’,接着北京,要坚决搞,就是研究如何执行的问题了。”

他们还规定了暗语:

“王维国病重”表示打响了;

“王维国病愈”代表“打成功了”;

“王维国病危”表示“打坏了”。

在谈到“南线”的问题时,他们把关光烈接到“工字房”,于是在他

们中间又有了个“绿裤子”。林立果把关光烈介绍给大家以后,然后问他:“火箭筒和火焰喷射器的性能如何?”

江腾蛟说:“这个东西打火车好啊。”

林立果便对关光烈说:“把你们师的火焰喷射连调到上海去,听江政委指挥。再调个营到北京来,协助王飞率领的空直警卫营攻打钓鱼台。”

关光烈还是表示不能调动部队。

江腾蛟问:“一个喷火连有多少人?”

“几十个人。”

“把使用武器的人调去,好比几个人有事出差,这总行吧?”

林立果兴奋了:“只要调一部分火焰喷射器,一部分火箭筒,到上海归江政委指挥。坐火车太慢,坐飞机,就说到上海去执行一项特殊任务。”

关光烈说:“我们部队附近没有机场,再说……”

林立果问:“你们离郑州有多远?先到郑州,我派飞机接。”

关光烈还是说不行。

王飞也说:“这样恐怕不行,动作太大了,容易暴露。”

林立果:“那打钓鱼台就算了。现在不搞是不行了,昨天讲的不算数,等于没有说。现在要抓紧研究怎么搞,江政委、王副参谋长都来了,你们讲讲,有什么想法。”

江腾蛟、王飞都皱着眉头没吭声。

林立果说:“还是要搞,主任抽鞭子了。老实说,主任一抽鞭子就坏事。她搞拉拉扯扯可以,办正事不行。庐山会议坏了事,固然吴胖子是个草包,没有用。庐山上那么多大将,还有陈伯达,要不是她瞎指挥,还不会输得那么惨,搞得首长很被动,简直把首长气坏了。这回好了,她在那里干着急,整天睡不着觉,又哭又闹,又要上吊,还在电话里唠唠叨叨,一讲没个完。”

听着林立果骂他妈妈,一时间大家谁也没吭声。后来还是江腾蛟开了口:“干这种事光抽鞭子不行。”

王飞说:“不是我们不干,我是说,干这种事要慎重,干不成,不光

我们完蛋,统统完蛋。”

客厅里沉默了。一看气氛不对,林立果赶快打气说:“这次不一样,是首长下的决心,首长的决心不会有错。现在决心已定,就是研究如何执行的问题了。这几天接连研究了几次,一直定不下来,我看问题的关键是没有最后决断的勇气。这次要下孤注一掷的死决心,不能再拖下去了!”

周宇驰插话:“优柔寡断要误大事。”

林立果一拍沙发把手,大声说:“还是两边都要搞,南线先搞,北京接着搞,双管齐下!”

大家七嘴八舌,虽然又想出一些新办法,但还是都没把握。

林立果不高兴了,说:“现在不研究了,等会再说。别太紧张了,趁天还没黑,出去散散心,领你们逛逛玉渊潭公园。”

王飞心里明白,什么逛公园,那是到钓鱼台看地形去了。玉渊潭与钓鱼台就一墙之隔。

到了钓鱼台,林立果说门这里可以安一挺机枪,那里可以如何、如何……

王飞没有表示。

18 时左右,看完地形回来,几个人又在研究北京怎么搞。林立果说:“我们要搞的人都在钓鱼台,好搞。只要顺利地把钓鱼台拿下来,问题就解决了。”然后确定用空军司令部警卫营冒充陆军,让关光烈调 200 条绿裤子,用大卡车从钓鱼台两个大门同时往里冲。

江腾蛟认为不行,卡车的威力有限,不一定顺利。

林立果和周宇驰又提出用坦克冲,周宇驰和于新野 7、8 月在北京附近的某坦克部队学过开坦克。还提出用火箭炮轰,用轰炸机炸,但是都不行,因为目标太大。只要与钓鱼台警卫一交火,里面要抓的人听到消息,就会从地道里跑掉。

林立果又提出利用接待外宾时在机场动手,也不行,有国际影响。最后江腾蛟提出,要林彪召集会议,在会上搞。林立果不同意,说:“不到万不得已,不能由首长出面。”周宇驰在一边帮腔:“由首长出面,即使搞成了,政治上损失太大,不合算。”

研究半天,没有一个可行的办法。沉默很久,林立果说:“这样吧,实在没办法,钓鱼台留给黄永胜他们去搞,只好让他‘摘桃子’了。”

周宇驰也同意:“北线我们可以不管了,集中力量研究南线。”

江腾蛟认为南线没有更好的办法,只能炸油库。如果上海搞不成,就在硕放炸火车,让空军作战部部长鲁珉去执行,晚上把鲁部长找来研究。

王飞让林立果将他们说的这些向叶群汇报,林立果让王飞汇报,说怕叶群在电话里说起来没完。王飞想推,刘沛丰已经把电话要通,王飞只好接过来说:“叶主任,立果同志要我向你汇报一下,今天下午,立果同志同周宇驰、江腾蛟和我一起研究了一下钓鱼台的问题,又领我们几个到钓鱼台周围看了一下……”

不知是谁漏了一句,关光烈也来了。叶群马上质问道:“什么?关光烈?谁叫你们找关光烈?你们为什么要找他?”

这天下午,叶群情绪更反常。以往每天下午叶群都要当“学生”,听文史教员老张讲历史,马列教员老萧讲哲学,军事情报官老倪讲国际形势。但她这天取消了所有的课,要内勤整理去大连的衣物。

9月8日,于新野给正在部队检查工作的鲁珉打去电话,是鲁珉秘书接的。于新野说:“通知鲁部长,立即回北京。”

当秘书告诉鲁珉时,飞机票都已经买好了。

鲁珉是四届人大代表,他以为是开四届人大。9月9日,他回到北京空军机关,见到空军副参谋长王飞,问为什么这么急叫他回来?是不是出了什么事?王飞说:“现在空气比较紧张。”没有多说。

9月10日午睡后,江腾蛟叫鲁珉去他家,怕房子里有窃听,他们在院子里边走边谈。江腾蛟对鲁珉说:“马上要开四届人大了,之前恐怕要开中央全会,可能要整到副统帅头上了。到那时你站在谁一边?这是个很重要的问题哟。”

鲁珉本来对江青印象就不好,特别是江青在批陈整风中指挥一帮人在京西宾馆揪叶群和吴法宪,毛主席已经批了过关,他们还抓住不放,没完没了。鲁珉想党章都定了接班人,江青还这样,太过分了!就说:“我当然站在林副主席一边。”

江腾蛟说:“可是这次不一样了,这次毛主席直接支持他们。”

“那我也站在林副主席一边,反正不投江青的票。”鲁珉态度很明确。说完后他后悔了,应该说“站在毛主席、林副主席一边。”但他一想,也没什么,自己是特级战斗英雄,大不了回家种地,还能有什么。

9月11日20时左右,江腾蛟又来找鲁珉,说林立果有事找他。二人一起来到西郊机场“工字房”。

“我们的英雄来啦,”林立果一见面就说,“现在要进攻啦,”鲁珉莫名其妙,林立果接着说:“要拼个鱼死亡破,我就是咽不下这口气,别人不敢反,我就反!副统帅下了命令,老周,你把首长的‘手令’拿给鲁部长看看!”

周宇驰拿出那张白纸红字的林彪“手令”。鲁珉急急忙忙看了一眼,甚至没注意“手令”上的日子。是啊,他只见过墙上的林彪题词“大海航行靠舵手”,那“手令”到底是谁写的他哪里知道?

屋里只有林立果、周宇驰和江腾蛟、鲁珉4人。于新野和李伟信一会儿进来送水,一会儿进来递苹果、递毛巾,热情得不得了。屋里很热,他们都穿着衬衣,鲁珉明显看出其他人腰上都别着“家伙”。

林立果谈起毛泽东南巡,说:“现在情况很紧张,马上要开三中全会,再开四届人大,会一开林副主席就不占优势了。副统帅下了命令,要主动进攻,要把‘B-52’搞掉……江政委,你这个‘歼7’在上海打头阵,争取在上海搞掉,不成就看鲁部长那个地方的第二次攻击了。再不成,让陈励耘派强击机轰炸。”

林立果指着江腾蛟对鲁珉说:“你到上海去是他点的将。我们决定派你到上海去,先和王维国政委研究一下,你就到硕放去组织指挥炸铁路。把火车炸坏了以后,就带着部队冲上去动手。”

当鲁珉听明白是怎么回事后,只觉脑袋嗡一下炸了,心里那个气呀:“怎么能让我搞暗杀呢?把我当成什么人了?我怎么能去干这种事?绝对不干!”

但他又不敢发作。这时没有一个人说话。大约静了十几分钟,江腾蛟还是让鲁珉表态。鲁珉只得说:“不行,我当兵后一直在空军干,空战次数不少,但没在陆军干过,从来没弄过炸药,炸药什么样我都没

见过,怎么能响我也不知道,我干不了。”

林立果说:“那就派个懂行的一起去。贺德全干过陆军,带他去。”

这又出了难题,鲁珉知道,文革中周宇驰当群众组织的队长,贺德全当副队长,关系相当好。看来,这事是“粘”上了。

林立果说:“以检查为名,到那里去,就说有些坏人坐着主席的火车到处搞阴谋活动,对硕放就这么讲。”

江腾蛟插了一句:“如果这样讲的话,李世英真可能干。”

李世英是当时驻硕放的空15师师长。

林立果听后对鲁珉说:“到那个地方去主要是炸铁路桥,硕放有的是炸药,往铁路上一摆,就是第二个皇姑屯事件……如果你完成这个任务后,你就升官喽!”

江腾蛟插了一句:“那你就不是空军的作战部长了。”

林立果说:“搞成功了我在北京组织50万人大会欢迎你们,到那个时候,你们都是国家栋梁,有功之臣,要论功行赏。到那个时候,北京军区的政委不是你江腾蛟,我还不放心哪。”

江腾蛟说:“我当政委,老鲁当司令。”

鲁珉心想:“你糊弄谁呢?作战部长当司令,我又不是三岁孩子。”

周宇驰说:“完成了任务,政治局委员,副总理,由他挑选。”

……

鲁珉还是不说话,愣在那里。其实脑子里在飞快地转着:“这件事不好收场,你说不干,你已经知道了他们的秘密,如果走漏了风声,他们不会饶过你,怎么办?”

鲁珉换了个角度说:“不行,铁路上保卫工作很严密,主席的列车出来,沿途都要派警卫,根本没办法接近,送不上去炸药。”

林立果说:“那就换上工人衣服进去,把铁路上的工人干掉。”

鲁珉还是说:“不行,就算你进去了,炸药怎么点燃?你怎么计算得准爆炸时间?”

林立果也觉得不行,转而商量派飞机炸,还是逼鲁珉表态。鲁珉推脱说,歼击机根本不行,轰炸机才行。他知道杭州那里根本就没有轰炸机。

此时已是22时,正无法收场,于新野冲进来说:“上海电话。”

林立果出去接电话,周宇驰也跟了出来。

电话是王维国从上海打来的,告诉他们:毛泽东已经离沪北上。

其实,毛泽东的专列早在11日中午就离开了上海。王维国送走许世友后,回到办公室,马上向警卫处了解毛泽东离开的确切情况,一直到17时过后才回家。因为太疲劳了,回到家中倒头就睡。等一觉醒来已经是22时多了。他忽然想起于新野说过,“毛主席到上海可能有些指示,”要他早点给他们打个招呼。王维国就给北京打了个电话,告诉周宇驰:“主席只在上海停了一天,现在已经走了!”

当林立果他们还在策划炸硕放铁路桥时,毛泽东乘坐的专列已经平稳地驶过硕放……

# 第1209回：如雷轰，林立果痛哭流涕 急部署，忙执行南下方案

林立果一听到毛泽东专列已离开上海的消息，犹如五雷轰顶，一切都懵懂了。刚才那种嚣张气焰瞬间被神色茫然所代替。他和周宇驰、刘沛丰、于新野几个人目光滞呆，半天不语。当林立果似乎明白过来的时候，突然嚎啕大哭，痛哭流涕地说道："首长交给我的任务没有完成，首长连生命都交给我了，我拿什么去见首长。"

周宇驰大吼道："现在难过也没用，也没有其它办法，只有等到国庆节那天，'首长'托病不去，我驾直升飞机去撞天安门！"又说："直升飞机要两个人，你们谁能跟我一块儿去？"

等了好一阵子，于新野说："我可以去。"刘沛丰也表示可以去。李伟信也表示可以去。

林立果说："我不允许这样做。"

大家也觉得这种想法不现实，于新野自言自语："就怕等不到'十一'啦。"

周宇驰回到会议室，对江腾蛟、鲁珉说："情况有变化，到此为止，刚才讲的全部作废，就当没有讲过。你们回去什么也不能说，这话要传出去，不但我们要杀头，老婆孩子都要杀头的。"他接着挨个通知任务解除，要严守秘密，消灭痕迹，谁暴露机密，按叛徒处理……

江腾蛟问："'老头'在上海停了没有？"

周宇驰气恼地说："现在问这个还有什么用？"

鲁珉回到家已近9月12日零时，情绪很坏，坐也不是站也不是。在西郊机场"工字房"时，他不敢公开反抗。回到家后，就对爱人武杠桥说：

"你赶快拿把刀来把我的手剁掉吧！我这辈子完了，将来两个孩子就全靠你啦！你无论如何把他们拉扯大。我对这个家庭再也没有

能力尽责了。”

鲁珉爱人武杠桥见状吓坏了,忙问他到底出了什么事?鲁珉简单讲了事情的经过。

武杠桥是空军司令部门诊部的军医,此时她镇定了一些,说:“剁了手你将来怎么生活呢?”她想了想说:“把眼睛弄红不就行了吗?”

于是,武杠桥用盐水为往鲁珉眼里揉,鲁珉自己也将眼药膏往眼里挤,把眼睛搞得通红。天一亮,他们就要了个车到空军总医院。医生给他查视力,他明明看得见,也说看不见,于是住进了医院。

听说鲁部长眼睛坏了,一会儿周宇驰来电话,一会儿于新野来电话,一次两次地问。

毛泽东的突然北上彻底打乱了北京林立果的计划,他赶紧与周宇驰商量南下广州。

说来也巧,9 月 11 日上午,程洪珍把乘 16 次特快到北京的广州空军司令部管理处处长陈伯羽也接到西郊机场。真没想到这个“特使”派来得太及时了。

陈伯羽到西郊机场后,只见这里不断有人出出进进。9 月 11 日夜,江腾蛟、鲁珉走后,“工字房”的客厅里只有周宇驰、刘沛丰和陈伯羽在谈话。陈伯羽只觉得,一会儿是周宇驰在说,一会儿是刘沛丰在说,他也搞不清哪句话是哪个人说的了,只记得他们对陈伯羽说:

你们广州形势很好,现在北京形势很紧张,有人要陷害首长。首长、主任、副部长、黄总长、吴、李、邱副总长,还有空军一些人,决定最近一两天去广州,还要把上海一些人拉到广州去。回去告诉你们参谋长,做好我们到广州的准备。主要是保证我们飞机安全落下来。因为飞机较多,正在研究批次和航线,完了就报给你们。请你们参谋长亲自到指挥所,掌握航行预报时间。要掌握电报和指挥系统,凡是对我们不利的电报和命令,都扣下来,保证首长的安全。你要把白云山的房子准备好,告诉米加农,准备宾馆……

于是,12 日上午 8 时左右,陈伯羽按照周宇驰他们的安排,离开北京飞回广州,向顾同舟报告。

9 月 12 日 17 时多,顾同舟要求广州空军指挥所明天安排他值班。

指挥所的纪参谋很奇怪,顾同舟到司令部两年多,从未主动要求过值班,有时轮到他,还借故推托,这次为什么主动要求值班?而且9月13日不该顾同舟值班的,本来已经通知李副司令值班了,现在只好再告诉李副司令不值了。

19时多,顾同舟打电话告诉周宇驰,明天他到指挥所值班。他又交代陈伯羽,明天上白云山准备房子,要控制一下汽车,安排好警卫。

再看上海。9月11日晚,王维国跟周宇驰通完电话,又和妻子杜贵珍说起此事,总觉得有些话在电话里不便说,决定派自己的儿子王大章亲自飞往北京,当面向林立果汇报。9月12日早上7时,王维国把正在复旦大学物理系读书的儿子叫起来,让他到北京去一趟。

王维国说:"拿本子记一下,用几个字表示就可以了。'关于庐山批评的问题……'"

"什么庐山批评?"王大璋不解的问。

王维国:"你不要问了,对林立果、周宇驰一讲,他们就知道了。'可能三中全会上要重提一下。总理来了一个电话,马上要开三中全会,接着开四届人大。三中全会开成扩大的,每个军都要有代表参加。主席讲:看来他们一是有点害怕,二是有点要硬干,没有认真的检讨。黄永胜我以前不认识,是在他当了总长以后才跟他谈过。……这些是人民内部矛盾,主要是检讨一下就可以了,跟陈伯达不一样。因为主席说,陈伯达就不让他检讨了。告诉他们早点向主席检讨,这样好些。'你一说他们就知道。"

12日一早,王大章化名王严,搭乘头班飞机飞往北京……

9月12日的北戴河。上午,林彪向秘书询问尼克松访华日程方面的进展。又说,他要见尼克松。他让李文普收拾一下东西,准备去大连。

大连是林彪常去的地方,中央首长一般都住棒槌岛宾馆。棒槌岛靠海边,林彪怕见水,不愿住,住过黑石礁铁路招待所。那里房间小,空气不好,后来看中一座原大连市副市长住过的二层小楼,经过改建,成了林彪去大连居住的寓所。

李文普按惯例给大连市交际处打电话,要他们检查一下房间,调

控好林彪住房的温度……他又收拾了林彪随身带的东西。

12 日上午,林立果和北戴河通了电话,派刘沛丰去王飞那里,把林彪给黄永胜的“手令”从王飞手里收了回来。

中午 12 时左右,叶群让李文普通知秘书李春生,给毛家湾打电话,说“主任要家里把文件分好类给她送来。”

毛家湾是秘书于运深接的电话。他没有午休,立即将近日送来的文件打包,准备托飞机送到北戴河。其中有:副军以上的干部名册,部队部署情况登记表,全军干部工作座谈会的文件。

午饭后,叶群将 8341 部队警卫科副科长刘吉纯叫到她的办公室,李文普也在那里。叶群问刘吉纯:“现在部队情况怎样?”

刘吉纯说:“很好。”

叶群接着说:“没什么,随便问问。”

刘吉纯见叶群一脸严肃地看着他,心里有些毛,就问:“没有事,我可以走了吗?”

叶群点点头,刘吉纯赶紧就出来了。

9 月 12 日是个星期天,北京空军学院停水停电。上午 10 时左右,空军学院行政处副处长王兰义接到电话,让他给将军楼送些开水和冷水。老王骑三轮跑了两趟,送去一大桶凉水和七八瓶开水,都放在门口。送完后,当他转身要走时,楼门开了,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外事处秘书陈伦和叫住他,让他赶快准备 11 个人的午饭,3 位首长的送到这里,另外 8 人到食堂吃,要争取 12 时 30 分吃上饭。这时已经是 12 时 10 分,哪里来得及? 13 时多,午饭好了,老王先给将军楼打了电话,把 3 个人的饭送到楼门口,交给等候在门口的 3 个女兵,然后带其他人去食堂吃饭。

14 时多,王兰义陪来食堂的陈伦和等人吃完饭,把他们送回将军楼。不久陈伦和打电话要王兰义给李伟信派车,说进城买东西。

王兰义骑自行车到将军楼,告诉陈伦和:“车派好了,停在马路边。”

陈伦和说:“你回去吧,李伟信自己会去开车。”

王兰义还没走出几步,将军楼车库突然开出一辆伏尔加,开的很

快。王兰义赶快让路,他清楚地看见司机周宇驰,副驾驶位置坐着于新野,林立果坐在后面。伏尔加飞驰而去,周宇驰还回头甩了一句:“啊,老王。”

王兰义又走了约 200 米,看见程洪珍驾驶另一辆伏尔加迎面过来。

林立果他们 3 人从空军学院出来,驱车来到西郊机场“工字房”。9 月 12 日 15 时 10 分左右,林立果得知毛泽东已经回到北京。在西郊机场“工字房”,林立果与北戴河的叶群通了电话,得知毛泽东已于 9 月 12 日下午回到中南海的确切消息。

放下电话,林立果连说糟糕。他在惊恐之余,对周宇驰等人说:“现在情况变了,我们要立即转移,赶紧研究一个转移的行动计划。”林立果又打电话将王飞叫到空军学院。

9 月 12 日 15 时,上海王维国的儿子王大璋到了首都机场,李伟信开了一辆苏制嘎斯 69 去接他。一个小时后,他们到西郊机场“工字房”,只有于新野在那里,正在下面条。

16 时 30 分,汽车响,林立果和周宇驰回来了。他们听了王大璋讲述的情况,林立果动情地对他说:

“在这种情况下你爸爸还派你来给我们讲这么重要的情况,说明你爸爸对我们感情很深,对林副主席感情很深,……我们今天所以能得到这么重要的情况,说明王政委采取的策略很好,隐蔽得很好。”

他们大约谈了半个小时,王大璋被于新野送到东交民巷空军招待所。

北戴河,叶群突然要林立衡、张清林当天结婚。林立衡强烈反对,遂改为订婚仪式。15 时多,叶群领着林立衡、张清林来到林彪面前,说:

“张清林求婚,豆豆同意了,今天晚上就举办一个订婚仪式。”

林彪说:“很好嘛!祝贺你们订婚啦!”

叶群把李文普叫进来,给林彪、叶群、林立衡、张清林照了合影,又拉着林立衡、张清林接吻,拍照,然后让他们二人出去同工作人员一起合影留念。

叶群指示秘书和工作人员说:“不请人吃饭,但要准备好烟、酒、糖果、茶等,另外再准备两部电影招待大家。”

16时,李文普正在平台上乘凉,林立衡过来找他,对他说:“林立果尽干坏事,要害毛主席,他们还要去广州。万一不行就让首长去香港,你不能让首长上飞机走。”

林立衡的这番话让李文普感到突然,他不相信。因为:林彪是让他准备去大连,并没说去广州。另外,林立衡和叶群感情不好,众所周知。林立衡曾因为对象问题以死抗争,吃了一大瓶安眠药,幸亏公务员王淑媛及时发现,送到301医院抢救,才免于一死。除此之外,林立衡和林立果也有矛盾,感情平淡。叶群到处散布林立衡有精神病,现在她突然冒出一个这么大的“阴谋”来,李文普怎么敢相信?他除了吓一大跳,首先想到的是林家儿女又闹矛盾了,心想:“你林立衡既然知道林立果要害毛主席,搞反革命活动,这样大的事,为什么自己不去向林彪报告,加以制止,却要我不让首长上飞机。我从来没有干过这样的事,负不起这个责任。”于是李文普问林立衡:

“你有什么证据?我有什么理由不让首长上飞机?如果他要上,我强行阻止,不让他上,能行吗?”

林立衡见状,没有再说下去。

李文普长期在“林办”,对林家真真假假的事见多了,听多了,也遇多了,所以,尽管他很吃惊,但还是没太当回事,然后就到空军疗养院找院长、政委办孩子当兵的事了。他向院长、政委说明这是叶群的意见,傍晚又送孩子到空军疗养院办理了入伍手续。

17时,叶群从林彪的客厅里出来,看见林彪内勤张恒昌,对他说:“明天早晨6、7点钟我们去大连,时间可能还要提前,走的早一些,天气不热。你们准备一下东西。”

林立衡离开李文普后,又去找“林办”其他工作人员谈话,叫他们注意观察叶群的动向,联峰山上林彪住地的气氛开始紧张起来。李文普从空军疗养院回到96楼,遇到几个人问他:“你到哪里去了?我们以为有人把你害了呢!”

近18时,叶群把李文普叫到林彪客厅。林彪对李文普说:“准备

明天早上6点去大连,省得太阳出来天热,你给大连打个电话。”又回头对叶群说:“你给总理打个电话,就说我利用坐飞机运动运动。”

走出客厅,叶群却对李文普说:“你先不要调飞机,也不要给警卫部队打招呼,等林立果回来再商量一下。”

晚饭后,叶群为林立衡、张清林举办订婚仪式。在96楼过厅放映香港电影《甜甜蜜蜜》和《假少爷》,以示庆祝。

本来,负责照顾林彪生活的内勤公务员是不能离开内勤值班室看电影的。这天20时许,叶群却让内勤都去过厅看电影,她自己则在林彪房间关上门密谈。

# 第1210回：“教导队”，还有个“上海小组”周宇驰，安排飞广州计划

北京。9月12日16时30分左右，周宇驰打电话给正在空军总医院住院的空军副参谋长胡萍，叫他到西郊机场来。胡萍放下周宇驰的电话，十几分钟后就坐车来到西郊机场“工字房”客厅。

周宇驰开门见山，对胡萍说：“现在形势不好，首长决定13日离开北戴河去广州。三叉戟飞机256号今天送林立果回山海关，首长走时就用这架飞机。准备一架依尔—18，13日7时起飞，我们俩坐上去山海关，然后和首长坐256号飞机一起飞广州。依尔—18拉上部队到上海落个地，接上上海小组人员，再飞去广州。再准备一架多座三叉戟飞机，拉上黄、吴、李、邱和机关的人，13日8时直飞广州。告诉机长，这架飞机听王副参谋长（王飞）指挥。还调一架安—12飞机运上两架云雀直升机，也飞广州去。另外，派一架安－24飞机，先‘训练’去上海，再到广州，好给首长到小机场时使用。把其它的大飞机也准备一下，以备首长用时再电话通知。”

周宇驰是空军司令部的办公室副主任，他怎么能给空军司令部副参谋长胡萍，他的领导下命令呢？这不是颠倒上下级关系了吗？其实这在当时并不奇怪，周宇驰是吴法宪派去辅佐林立果的“师傅”，不离林立果左右。所以周宇驰的命令并不是周宇驰个人的，而是林立果甚至林彪的命令，胡萍能不言听计从吗？

接着，周宇驰又对李伟信说：“马上打电话给上海的王维国，通知他9月13日早上有一架伊尔—18飞机在上海着陆，把警卫团二中队换下来，让王维国的空4军教导队和上海小组成员做好准备，搭乘这架飞机去广州。”

周宇驰提到的空4军“上海教导队”是1971年3月下旬，王维国按照林立果的指示，在上海江湾大柏树新华一村内亲自组建的，下设3个区队，9个班，每班12人，由空四军司令部军务处处长蒋国璋和政治

部组织处处长龚着显具体负责。

“教导队”成立的那一天,用集体名义给林立果写了一份决心书,在会上进行了宣读:

我们一定要人人想着您,步步紧跟您,一切听您的领导,一切服从您的指挥,紧跟您,顶逆风,战恶浪,风吹浪打不回头……

为誓死捍卫林副主席最高统帅的地位,为誓死捍卫您——我们的好领导,不怕牺牲,不怕坐牢。只要您一声令下,我们就立即行动,您指向那里,我们就冲向那里!

1971年4月9日,林立果来到上海,“上海教导大队”正式成立。队员都是精心挑选的。除了政治条件外,身体要求也很严,身高1米7上下。为了保密,上海、北京、广州等大城市入伍的,高干子弟或与高干子弟有联系的,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一律不要。并规定,正副班长、区队长和队干部,都要审批。武器装备也非一般,每人配一长一短,步枪或冲锋枪和手枪,每班一挺机枪,每个区队一辆卡车,另外还配了两辆吉普车和三辆摩托车,供训练用,准备逐步装备一个摩托车队。这个教导队不仅进行一般的战术技术训练,还要求会驾驶各种车辆,学会登高,打巷战,并秘密进行了格斗、捕获训练。这些训练一般都是在江湾机场进行。

王维国还按林立果的要求,在新华一村大院内建造一所秘密据点。林立果提出:这项工程“要絶对保密,房子不要引人注目,要修地下室,门窗要装防弹玻璃,院墙要开暗门”。

根据林立果的要求,王维国亲自找设计人员绘制了图纸,成立了专门的修建班子,专门从浙江调来一批对情况完全陌生的民工,日夜秘密施工。王维国要求:“房子一定要在国庆节前完工!”他还要求在新华一村院内搞一个直升飞机场。

林立果还布置王维国制造一种672毫米的轻型冲锋枪。王维国把这项绝密任务交给上海某军械厂。经过多次试制,最终造出8支。这些轻型冲锋枪非常轻便和小巧玲珑,可以拆卸成几节,装在一个扁扁的长方形小黑箱子里,箱子的一边有一个提手,可以拎起就走,好像提着一只装了黑管或长笛的乐器箱一样。但其杀伤力几乎和其它冲锋枪一样,在较近的距离内具有极大的威慑作用。王维国把两支质量

最好的轻型冲锋枪送给林立果,林立果收到后十分喜欢,就装入黑箱子,放在他乘坐的汽车后座里。

周宇驰提到的那个“上海小组”则是1969年6月底,上海空4军根据叶群、江腾蛟的指示,成立的一个专门为林立果挑选对象的“找人小组”,对外叫“专案组”,开始由蒋国璋、袭著显等8人组成,所以也叫“八人小组”,受林立果直接领导。

1970年3月,林立果到上海,将“找人小组”改为“上海小组”,还专门为“上海小组”题了字,制作了精致的组标。4月3日,林立果给“小组”成员发枪,并亲自到上海主持授枪仪式。

后来,“上海小组”又扩大成员,发展到20多人,都会打枪,会摄影,会驾驶汽车。

“上海小组”制订了“入组须知”:

本小组的任务,是为完成无产阶级司令部直接交待的各项任务。因此,每个成员必须具有无限忠于伟大领袖毛主席,无限忠于敬爱的林副主席、忠于叶主任、忠于林副部长的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在为完成这些光荣任务和保卫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安全过程中,应不惜牺牲自己的鲜血和生命!

还必须做到:

一、努力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和林副主席的指示;

二、坚决执行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各项命令。尤其是小组的最高领导——林副部长的指示,必须认真领会,句句照办,字字照办!

三、经常如实地回报情况。应根据任务的性质向有关领导勤回报多请示。在必要时,小组成员可以直接向林副部长报告情况;

四、勇于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特别要注意自我革命,处理好“跟上、靠下、正确对待自己”的关系;

五、严守机密。小组的一切活动均是绝对秘密,未经请示和未得指示时,不得向任何人泄露和了解情况。

凡是参加“上海小组”的人,都要举行“小组宣誓”,宣誓的内容除了“忠于毛主席、忠于林副主席”以外,还要“忠于林副部长”,为“林副部长赴汤蹈火”,“绝对保守林副部长的机密”。“上海小组”的成员要认真学习《入组须知》。

后来,王维国也参与领导这个“上海小组”,他说:“小组的每一件工作行动,都要有助于大局,大局就是副部长”。

9月12日17时左右,胡萍从周宇驰那里接受任务后,立即通知潘景寅执行去山海关的飞行任务。可是连打了几个电话,都没有找到潘景寅。怎么回事?潘景寅在西郊机场的生活向来是两点一线:办公室——家。虽说是星期日,潘景寅也不常在家里呆着,他嫌孩子闹,总是到办公室看书学习,也练练字。可是胡萍打到潘景寅的办公室,没有人。打到潘景寅家里,老潘家属孙祥凝说老潘拿着一堆书报出门了。师值班室也不知道潘副政委去了哪里?

胡萍有些生气,明明说好待命,怎么人也找不到了?原来,此时潘景寅恰巧在机场的理发室理发,没想到就在这时,飞行任务来了!

胡萍找到潘景寅后,通知他:立即做好飞行准备,19时送林立果去北戴河。

潘景寅接受任务,匆匆回家,顾不上吃饭,拿起飞行包就往外走。临出门时,告诉爱人说:“今晚可能回来。”

对于飞机来说,北京到山海关太近了,飞一趟也就40分钟,专机一般都是“卸下”首长就返回,不在山海关过夜。

此时已是晚饭时间,100团三大队值班员通知林彪机组立即到候机室。李成昌接到命令,放下饭碗跑步到飞行员宿舍,换飞行服。床上乱七八糟,李成昌也顾不上收拾。哪知这一去,就与飞行员宿舍永远再见了。

18时,康廷梓到空勤灶吃晚饭。他打上蒸饺,还没有吃,大队值班员就来通知他,有紧急任务。康廷梓放下饭碗就往宿舍跑,迎面碰上机械师李平。李平说:“康中队长,潘副政委让加16吨油。”因为胡萍告诉潘景寅,第二天一早飞广州,所以潘景寅要求李平加16吨油。

可是康廷梓想,加这么多油干什么?这个油量可以从北京飞到广州。我们不是去山海关吗?接林彪回北京过国庆节,来回12吨油就够了。

康廷梓跑进飞行员宿舍,换上皮鞋,拿上飞行包,还多拿了一条棉毛裤。然后跑到100团值班室。

第一副驾驶陈联柄、领航员李成昌、通信员陈松鹤都已经到了。

康廷梓把加16吨油的疑问告诉了第一副驾驶陈联柄。

潘景寅夹着小包也进来了,说:“你们上值班室要车上机场,三叉戟256号的飞行任务要准备好,任务要保密,使用252飞机的代号。”

康廷梓提醒他:“今天的飞行手续还没有办。”

潘景寅肯定地说:“不办了。”

因为重要的专机任务保密严格,机组人员谁也没有再提疑问,大家坐上汽车到了停机坪。

机械师李平迎上来,对潘景寅说:“油车没油了,只加到15吨。”

陈联柄问:“加这么多油干什么?”

潘景寅没有说话,也没有要求再加油。

胡萍向潘景寅交代完任务,又用电话通知空军司令部航行局局长尚登峨:“三叉戟252号今晚19点飞山海关。发训练预报,要亲自掌握。”又嘱:“对值班的就不要讲了”。

256是专机,252是普通多座客机,发训练预报故意不报专机号,主要是为了首长安全,这在专机飞行中是常见的。

18时多,胡萍又通知派驻海军山海关机场的空军34师西郊机场调度室主任李海彬:“今晚19点起飞到你那里去的252号飞机,实际是256号,但要用252号的称号,你知道就行了。”

18时22分,山海关机场的值班员李万香接北京西郊机场调度室主任,暑期专门到北戴河负责专机调度工作的李海滨电话:“19点,来一架252号三叉戟。”

晚上,胡萍又将周宇驰交代的其余要用的飞机配备了机组人员名单,以训练名义,申请了航线和起飞时间。

18时许,空军副参谋长王飞来到空军学院将军楼,看到的是一片混乱的景象。在林立果指挥下,几个男女正在紧张地收拾行装。大大小小的箱子,东一堆,西一件,横七竖八;散乱的文件、书本,乱七八糟地丢弃在桌子上、沙发上、地面上;厨房里烟熏火燎,纸灰飞扬……林立果对王飞说:“‘B-52’回来了,我要马上回北戴河,向首长汇报一下。南线不行,你拉个名单,准备飞广州。”

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外事处秘书陈伦和走进来,林立果对他说:“我走了,明天你和周宇驰走,一定要走!不走的话,人家要杀掉你。”

陈伦和吓了一跳，林立果接着说："最近有人要搞鬼，反对首长。我坐飞机先走，到沙堤去，你们第二批走，听周宇驰的安排。你们家属也一起走，今天晚上就领到这里来等着。你们要带杆枪，家属也要带枪。"

看到陈伦和表情紧张，林立果赶快说："明天飞机上有林副主席。"又狠狠地补了一句："8341 部队操蛋就跟他干！飞机上左派一定要占多数。"

临出门，林立果又说："我们要搞一个中国的（印尼）九三 O 事件，把他们的政变阴谋掐死。"

这时林立果又想起一件事，把许秀绪、李伟信和他的弟弟李伟军叫到面前，交代他们到毛家湾去取三样东西：菲利普盒式播放机，德律风牌立体声扩音机，还有三个喇叭的音箱。因为林彪很喜欢听音乐，林立果曾让程洪珍擦洗过一大批旧唱片，说是要给首长听。最后林立果说："到广州后，叫李伟信到香港去，然后绕道日本到苏联，叫苏联从北极星潜艇上发射导弹，叫他们尝尝山姆大叔的滋味。"他扮了个鬼脸，说："反正是从公海发射，也弄不清是谁干的。"林立果看了看表问："老周，飞机都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你今天晚上到北戴河坐三叉戟去……"周宇驰回答说。

"好，"林立果打断周宇驰的话，"情况紧急，两个小时后我就到北戴河去。北京由老周总指挥，"他看了众人一眼，"具体部署由老周跟你们谈吧。"说完，就走进里屋收拾行装去了。

林立果匆匆走后，周宇驰召集开会。他说：

"现在情况紧张，刚才从上海得到消息，'B－52'在上海说，'这几年我犯了个错误，过去军队被彭黄抓去了，现在被林黄抓去了。'看样子，'B－52'回到北京，就要召开三中全会，就要对我们动手了。首长决定，现在转入第二方案，立即转移到广州去，要军委办事组黄、吴、李、邱明天到广州。"

……

"到那里以后，首长召开师以上干部紧急会议，宣布另立中央，进行割据，形成南北朝局势。"

“利用广州的广播电台发表消息,提出条件,和北京谈判。”

“我们还可以争取外援,林彪在苏联是有威望的。”

“可以和苏联等国建立外交关系。要动武,就联合苏联,实行南北夹击。”

江腾蛟和王飞两个人都没说话,周宇驰对他俩说:

“现在时间很紧,你们两位马上回空军大院,把机关里的左派骨干集中在一起开一个会,把人员编编组,你们的任务就是保证黄、吴、李、邱安全上飞机,飞机直飞广州沙堤机场着陆,我已经通知顾同舟那里安排好车辆和房子。王副参谋长、于新野负责组织人员保护黄、吴、李、邱,江政委负责警卫,保证他们安全到达广州。”

看他们两个还在发愣,周宇驰有些发火:“现在都什么时候了,叫做燃眉之急嘛,咱们总不能在这儿等着送死吧!你们先通知家属,让他们马上坐火车先到广州去,以绝后顾之忧。”

周宇驰按了一下电铃,对进来的于新野说:“你让李伟信给上海方面打个电话,通知他们明早有一架伊尔-18从北京飞到上海,让他们把飞机上的8341部队的人全部接下来,换上教导队和‘上海小组’的人,然后直飞广州沙堤机场。通知王维国到机场,如果他愿意走,就随机走,如果不愿走,也可以留在上海。明天早上8点,首长从北戴河直飞广州沙堤机场,就坐林副部长回山海关的这架飞机。一部分工作人员包括你们的家属,明天早上7点从西郊机场起飞,直飞广州沙堤。王副参谋长、江政委、于新野,明天早晨6点以前到西郊机场工字房,由王副参谋长通知黄、吴、李、邱到机场。”

王飞说:“我通知不行,还是你通知吧。”

周宇驰说:“那好办,我通知。可以先通知黄总长,说是林彪在某地要开一个会议,他到机场后,再要他通知另外三人。要保证他们安全上飞机,如果不行,就要通长途电话,由林副主席直接同他们谈。如个别人不愿去,要两个人‘招呼’一个,一块从西郊机场起飞,到广州沙堤机场。”

周宇驰问江腾蛟:“飞机上的警卫你管行不行?”

江腾蛟说:“好嘛。”

周宇驰:“你就是‘警卫营长’,指挥人看住他们就行了。你不要出

面,由王副参谋长出面跟几位老总摊牌。你们的飞机如果到了,林副主席的飞机没到沙堤之前,你们不要先下飞机,等他到了以后你们再下飞机。这架飞机明天早7点最迟8点起飞。听明白了吗?另外李伟信去上海,负责把上海那里的人都拉走,具体安排这里就不讲了。”

周宇驰最后宣布:“这是命令,大家要坚决执行。现在时间很紧,要抓紧。机关哪些人去广州,如鲁珉、贺德全、刘世英、朱铁铮(办公室处长)等都没有问题,还有什么人,今晚由王副参谋长、于新野把名单定下来,找他们开个会。你们先去准备,我随后就来。”

散会时于新野说:“去的人都要带手枪。”

周宇驰补了一句:“还要带些冲锋枪,直接给军务部打个电话,让他们马上准备20支手枪和3支冲锋枪,多准备点子弹。”

周宇驰让于新野到空军大院协助王飞组织人员。最后,周宇驰对江腾蛟、王飞说:“胜败在此一搏,开始行动吧。”

于新野在会议中间,把林彪给黄永胜的亲笔信又交给了王飞。

会后,李伟信根据周宇驰的指示,电话通知“上海小组”的负责人蒋国璋。这是李伟信的日记上记载的这个电话通知的提纲:

立即告W

1、明日有一架伊尔-18,下列人员随机出发:小组全体,教导队全体。全部武装,卢、张、所有能来的种子,如刘、刘、戚、曹、卢、林。

2、告w明日上机场,有话告他。

3、准备80-90人住宿,……人员隐蔽,80-90人撤后上机就走。

4、带一套军装(过把款今晚送家)带些钱、粮票、布票。

5、保密!! 全局。

告蒋请蒋告w

对这种行动意味什么,电话不好讲,请他自己考虑。

“W”是指王维国。“80-90人住宿”是说飞机上80至90名8341部队的警卫人员下来后,给他们找到住处,换上“上海小组”和“教导队”的人一同去广州。

随后,江腾蛟对王飞说:“你们去研究名单吧,我不去了。”他直接回了家,安排家属去广州。

# 第1211回：林立果，三叉戟飞山海关 空司忙，王飞定南下名单

9月12日19时，西郊机场的256三叉戟并没有起飞。机组9人在机场等候，潘景寅叫空勤灶把饭送到候机室。大家吃完饭，又等了好一会儿，才突然看到一辆蓝色伏尔加从256三叉戟飞机左翅膀下飞快钻出来，吓了康廷梓一大跳。原来是陈伦和开车走错了路。刘沛丰下车后，从车上卸下一堆箱包，留在原地看守。伏尔加开走了。

很快，蓝色伏尔加又回来了，林立果下车，戴眼镜的白面书生、空军司令部办公室一处秘书程洪珍带两个十八、九岁的女兵也下了车，两个女兵的新军衣显得有些肥大。

陈伦和又卸下一堆箱包。大大小小20多个。

林立果向陈伦和交代一番，让他把蓝色伏尔加开走了。

34师100团政委安治梁和团参谋长李克修前来送行。按规定，专机起飞时100团领导必须到场。100团团长陈晋忠此时到苏联接飞机去了，因此没有前来。政委安治梁和参谋长李克修就因为这次送行，“913事件”后也被送进“亚疗”，安治梁被审查了整整8年。

潘景寅任100团团长时，与政委安治梁搭档，彼此配合很愉快。他对前来送行的安治梁说：“老安，我吃了三片安眠药，原想抓紧睡一觉，没想到有任务。”

安治梁嘱咐陈联柄，在必要时关照一下。

256号三叉戟专机服务员、专机师服务队副队长孙福荣正准备登机，在场的胡萍将她叫住，说：“你把自己的皮箱取下来，明天再去。”于是，孙福荣临时安排服务员魏秀玲随机出发了。

19时30分，林立果等人上了256三叉戟。

19时40分，256三叉戟从西郊机场起飞，飞往山海关机场。这是256三叉戟改装后第一次正式飞行。

潘景寅驾驶飞机，起飞时倾斜度大了些。飞机抖动不已，桌上茶

杯滑下来,摔碎了一两个。两个女兵很少坐飞机,以为要摔了,吓得够呛。康廷梓说摔茶杯是服务员魏秀玲没有固定好,“飞行后讲评小魏作检讨。”

到山海关是短途飞行,始终是潘景寅驾驶飞机。潘景寅并没有对陈联柄说他吃了安眠药。但陈联柄有政委安治梁的嘱托,坐在副座上眼睛一眨不眨。

驾驶室没有康廷梓的位置,他坐在机舱里东张西望。林立果非常敏感,他正与刘沛丰说话,发现康廷梓注意他,立即不说话了。康廷梓感觉林立果表情沉重。

20时,北戴河,莲花峰96楼正在放映香港电影《甜甜蜜蜜》。西郊机场调度室主任李海滨从山海关机场调度室打电话给在这里执行警卫任务的8341部队二大队大队长姜作寿说:

“有个大飞机从北京来,是哪位首长?怎么也没有见你们来人接?”

天都黑了,还有谁来?姜作寿说:“不清楚呀。”

李海滨急了:“你们到底接不接?飞机15分钟后就落地了。”

接不接也不是姜作寿说了算,他便说:“我了解一下。”然后马上打电话找李文普询问。

李文普回答得很干脆:“我没有听说谁要来。”

姜作寿问:“那我们去不去车接?”

李文普说:“没有告诉你的事情,就不要管了。”

姜作寿放下电话才3、4分钟,李文普的电话就追来了,急急地说:“老虎回来了,快派吉姆车去接。”

原来李文普刚放下姜作寿的电话,叶群的内线电话就打过来了。她告诉李文普:“立果听说豆豆今天订婚,很高兴,坐飞机赶回来祝贺。”

吃过晚饭,叶群给工作人员散发喜糖。刘吉纯和“林办”秘书李春生等人在平台上边乘凉,边聊天,边吃糖。忽然,他们听见天上大飞机的声音。一会儿叶群来电话,要刘吉纯“赶快派车去接老虎”。

此时,姜作寿正在向司机小宁交代任务,一架大型飞机轰轰吼着,从西南向东北飞来。已经降低了高度,显然是要在山海关机场降落。

小宁着急地说：

“接不到了，50 公里路，没有 40 分钟，怎么也开不到啊。”

姜作寿说：“快动身吧，既然已经通知，接不到也要接。”

刘吉纯带了两个司机，开了辆吉姆车出发了。他对司机小宁说：“不要跑快，就在中间跑。”

256 三叉戟快到山海关机场时，林立果在飞机上对程洪珍交代说：“明天早晨 7 点，首长要和‘协和号’通电话，你要把机场的保密机准备好。电话保证不好，你要负责！”

“协和号”是林立果他们给黄永胜起的代号。林立果的口气有些威胁，他从来没有用这种口气说过话，程洪珍吓得连连点头。

林立果又说：“下飞机后，要了解一下飞机维护、加油、警卫等情况，这些你当秘书应当懂得。还有给小张、小袁每人一支手枪，找个没人的地方教她俩使用一下，明天让她们上北京来的伊尔－18 飞机，也可能上这架三叉戟。你和她们把我的行李归拢一下，免得明天和‘子爵号’的东西弄混了。现在一切行动要听我指挥。”

小张、小袁是随林立果一起上飞机的两个女兵，“子爵号”是叶群的代号。程洪珍的工作是保管文件，对外联络。上飞机前他一直忙着给林立果收拾行李，连自己的牙具都忘了带，也没有和对象告个别。26 岁的林立果没有当过“首长”，27 岁的程洪珍也没有当过“秘书”，两人关系有些微妙。有时林立果把程洪珍骂得狗血喷头，而有时又很亲热，亲自给程洪珍介绍对象，单在上海就给他介绍了 12 个，程洪珍一个也没有看上，说我是“康曼德”身边的人，找个对象不像样，怎么说得过去？这不是丢“康曼德”的脸吗？最后林立果把别人给他选的 4 个最好的对象其中之一介绍给程洪珍，程洪珍这才热恋起来。这次匆忙去北戴河，光忙林立果的事了，也没有打电话和对象说一声。程洪珍有些丧气，但在林立果面前不敢有半句怨言。

“康曼德”是英文司令官的音译，林立果在空军的小圈子里常以“康曼德”自诩。

刘沛丰避开机组人员，塞给程洪珍两把手枪。

20 时 15 分，256 三叉戟在山海关机场落地。李海滨嘱咐值班员李万香：“对外只讲 252，不准讲 256。”

林立果走进驾驶舱,与机组每个人握手,说:“明天首长也要坐这架飞机。人民解放军战士要听林副主席指挥,关键时刻要起作用,我代表首长谢谢大家。”

刘沛丰提着4个包,和林立果下了飞机。其他东西都放在了飞机上。机场没人接,林立果等不及与北戴河联系,从机场借了一辆吉普车,带着刘沛丰开回北戴河。同时让机场通知“林办”派车去接。

于是,山海关机场又给“林办”打电话。

林立果和刘沛丰走后,程洪珍和两个女兵把林立果的20多个箱包归挪到一起后,也下了飞机。因为第二天还要坐飞机,两个女兵没有拿军用挎包。后来程洪珍发枪,两个女兵没有地方放,又返回飞机拿军用挎包。

这时,机组9人还在做飞行后例行检查。康廷梓帮助机械师张延奎往发动机加润滑油。他听见潘景寅对李平说:“待会儿把油加到17吨。”

康廷梓原以为首长明天飞回北京,现在又加这么多油,不一定是回北京了。他就插了一句话:“加这么多油,明天到哪里?”

潘景寅所答非所问:“一会儿我们研究一下航线。”

李平去安排加油。因为三叉戟1970年从巴基斯坦引进中国,从来没有在山海关机场加过油,油嘴不配套,不能用先进的压力加油,只能由机械师爬到机翼上,把管线拉到机翼上部的加油口去实行重力加油,这样一折腾就又要花费很长时间,而且加油速度很慢。潘景寅看天色已经很晚了,而且机组是在吃晚饭时被召来执行紧急任务,晚饭都没吃好。机场餐厅已准备好了夜餐,所以潘景寅没有再坚持,说:“那就不加了,明早再说。”

21时多,机组9人塞好了飞机的“眼”,最后由机械师锁上飞机,将飞机交给山海关机场的警卫人员,然后一起到空勤灶吃饭。食堂里,程洪珍身边放着一个精致的手提皮箱,此时,他和两个女兵已经快吃完饭了。

吃完饭,中队长康廷梓分配房间。潘景寅是师级干部,被安排在单独的高干房间。服务员小魏和那两个女兵住在一起。剩下机组7人住在机场的一栋平房里。

平房最东边一间是西郊机场调度室主任李海彬住。那里既是他的临时宿舍,也是调度室,里面有三部电话,除了机场内部电话,还有两台专线保密机,一台通北京,一台通北戴河96号楼。每年暑期,为保证中央首长专机,西郊机场调度室都要派一名主任或副主任,到山海关机场单独设立调度室。本来是应该调度室李副主任来的,因他要回西安搬家,调度室主任李海彬就来了。

程洪珍住在平房东边第二间;第三间分给三个机械师:李平、邰起良和张延奎;第四间是第二副驾驶康廷梓与领航员李成昌;第五间是第一副驾驶陈联炳和通信员陈松鹤。

康庭梓问领航员李成昌:“研究了航线没有?”

李成昌说,“只是估计了几条航线,有重庆、大连、广州等,没有说准到什么地方去。反正我的领航记录纸都已经备份好了。领航记录纸上面可以提前填好所飞航线的基本数据。”

程洪珍吃完夜餐,先到两个女兵的宿舍,准备教她们使用手枪。两个女兵说陈伦和已经教过她们。程洪珍向她们传达了林立果的指示:“明天还有一架飞机来这里,是周(宇驰)副主任坐的伊尔-18。明早上走时,你们可能上那架飞机,也可能上这架三叉戟。如果上三叉戟,听李伟信指挥。今天听我指挥。”

然后,程洪珍来到李海彬的调度室,看见潘景寅正和李海彬一起研究全国气象图。

程洪珍用李海彬屋里的保密机分别和北京、北戴河进行了通话试验,声音清晰,一切正常,他放下心来。然后问潘景寅:“飞机维护好了吗?”

潘景寅肯定地说:“维护好了,不会有问题。”

程洪珍又问:“飞机警卫好了吗?”

潘景寅笑着说:“这个你放心,机场的人可聪明了,看到什么飞机来了,就知道派什么人警卫。”

程洪珍跟着林立果有好几天没怎么睡觉了。看一切都安排好了,再没有事情,就去睡觉了。

按惯例,机组在飞行后要开一个总结会。潘景寅来到机械师房间召集机组进行飞行后讲评。

康廷梓问:“到现在航线还不知道,明天怎么看天气?”

潘景寅说:“咱们不用管,空军航行局都掌握,听他们的。”

此时,22 时已过,潘景寅召开例行的机组讲评会。他首先把北京到山海关一段的飞行情况做了简要的讲评,接着说:“现在两条路线斗争很复杂,要解决跟人的问题。”

康庭梓理解潘景寅说的“两条路线斗争”是指当时空军部分单位盛传的“吴反林”,即空军司令吴法宪等反对毛主席、反对林副主席的流言。

关于第二天的飞行,潘景寅说:“明天的航线到什么地方还不知道,我们听胡萍副参谋长的指挥就行了。”

关于第二天的时间安排,潘景寅说:“明天早上 6 点起床,6 点半吃饭,然后早些到机场进行准备。现在时间不早了,抓紧时间睡觉吧。”

康庭梓看看手表,时间指在 22 时 40 分。

23 时多,机组 8 人都关灯休息了,只有潘景寅一人没有睡,他在自己的房间里只待了不足 5 分钟,一个人又返回调度室,躺在李海彬的床上,和李海彬闲聊。

潘景寅不走,李海彬也不能睡觉,陪他坐着。潘景寅是个话极少的人,而李海彬在自己的上级面前,也不会有更多的话题。这期间,北京不断有电话过来查问三叉戟的事情。潘景寅接电话时,李海彬听不见电话机里说的什么,从潘景寅的只言片语里,也搞不清发生了什么事情。但北京反复查问 256 三叉戟,李海彬感觉到了异常。

北京这边。王飞从周宇驰那里出来后,没顾上吃晚饭,就直奔空军司令部。司令部办公室人来人往,副司令员邝任农出差了,他的办公室在西三楼南侧最西头,很安静。王飞决定在邝副司令的办公室开会。21 时多,空军司令部情报部部长贺德全、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刘世英、空军党委办公室二处处长朱铁铮、空军司令部军务部装备处处长郑兴和陆续到了,只有鲁珉还没来。王飞说:

“时间很紧,不等了,先开会。主席的身体现在很不好,有人企图借机捣鬼,要把林副主席、黄总长等人打成林黄反党集团,所以林副主席有命令,要黄、吴、李、邱出去一下。明天在广州召集他们谈话,还要召集师以上干部的紧急会议。黄、吴、李、邱要人护送,光我们几个人

不够,要从机关各单位选一些人,拟个名单。明天早晨7点到8点起飞,我们的任务是保证他们安全到达广州。”

他说:“林副部长已经回北戴河了,要立即组织一批可靠人员,护送黄、吴、李、邱于13日由西郊乘飞机去广州。”

他在会上宣布江腾蛟为“总指挥”,鲁珉、贺德全为“副总指挥”。

刘世英负责记录并抄写。他们刚刚提出一份名单,于新野就到了。他看了一下名单马上就说:“这是去广州的第一批人员,要精干,接着还要组织第二批人员去广州,并且带家属去。”他特别强调:“第一批人员除了空司的人员以外,还要把江腾蛟和随他一块儿去的张发云、朱铁笙也写到第一批名单里去……”

21时30分,正在住院的鲁珉来了。

# 第1212回：门外听，广州不行去香港 林立衡，忙找李文普商议

鲁珉是在9月12日晚上21时多，接到空军党委办公室二处处长朱铁铮的电话，让他去邝任农的办公室，说有重要文件要传达。

鲁珉怕杀人灭口，带上手枪叫爱人武杠桥跟他一起去。到了空军司令部，鲁珉叫妻子和驾驶员留在楼下，交代说："听到楼上有什么动静，立即到吴司令宿舍去报告，或者到汽车队值班室去喊人。"

此时的鲁珉相当紧张，也下了决心，只要他们要杀他，他也掏枪干。鲁珉上去一看，王飞、刘世英、于新野、贺德全、朱铁铮、郑兴和都在，却不见林立果。

鲁珉问："有什么重要文件？"

这时南下广州的名单已经弄好了，王飞给他看。名单上，作战部除了鲁珉，还有傅英豪夫妇和赵桢等。王飞把鲁珉拉到一边的大沙发上，对他说：

"副统帅决定黄、吴、李、邱都到广州去，让我们组织一个班子保证他们安全到达广州。副统帅也去，造成南北对峙的局面，划江割据，以后再创造条件谈判。"

王飞掏出手枪，说："你有没有这个？"

鲁珉说："我有。"

王飞说，每个人都装备手枪，让黄、吴、李、邱到西郊机场，飞机都准备好了。去的办法由叶群通知黄永胜到西郊机场，再由黄永胜通知吴、李、邱。

鲁珉问："黄永胜不走怎么办？"

"不走也得走。"

王飞让空军情报部部长贺德全专门负责黄永胜，要确保他上飞机。

贺德全问："他是总长，如果不听我的怎么办？"

王飞:“用绳子捆起来,架上飞机!”

贺德全说:“那不是绑架吗?”

王飞不回答,而是让人找来几条背包绳。

经过研究,确定了25人的名单,编为6个小组,然后研究了分别随同黄、吴、李、邱上飞机的分组名单,研究了通知南飞广州人员的方法,去机场车辆的安排,集中地点。指定贺德全负责到机场后的现场指挥,鲁珉负责掌握飞机的航向,朱铁铮负责了解机关去的人的思想情况,军务部装备处处长郑兴和安排车辆,还确定了通知办法和车辆安排,集合地点等。还研究了如何处置黄、吴、李、邱的司机、秘书和警卫的方法,即:到机场后,不让司机下汽车,秘书和警卫带到不同的地方,由专人分别负责给这些人“做工作”。着重研究了对付警卫员的办法:先下他们的枪,再“动员”上飞机。王飞强调,无论遇到什么情况,在机场不能开枪。于新野掏出一把匕首,交给负责警卫的贺德全。会议中间,王飞叫郑兴和到警卫营仓库取59式手枪30支,子弹2000发。冲锋枪2支,子弹200发。为行动隐蔽,除特殊情况,坐一辆大轿车去,由空军司令部管理局副处长兼汽车队队长王琢驾驶。早晨5时在2号楼西南角马路上集合,一起上车。

王飞还提出,会议结束后,他要带几个人去西郊机场,实地察看一下人员集中的地点和上飞机的位置。并计划在第二天凌晨人员集中后,由他进行简单“动员”后,由郑兴和向大家发枪。

与王飞在空军司令部安排南下广州事宜的同时,21时30分,胡萍也在西郊机场把航空兵34师100团政委安治梁和团参谋长李克修叫到候机室,布置周宇驰交代的任务:以“训练”为名,调动几架飞机,一是伊尔-18—902号飞机,训练航线是长春、沈阳,实际上是去山海关;三叉戟254号飞机,训练航线是上海、武汉,实际上是去广州。以上两架飞机明天早上8点左右起飞。另外,安-12—231号飞机,明天试飞个空域,然后落到沙河机场,装上两架云雀直升机,航线经当阳、长沙,落广州白云机场。卸下直升机后,马上飞山海关,为首长拉两辆汽车送到广州。试飞申请西郊,实际上落沙河。转场也申请西郊起飞。

胡萍准备同周宇驰一起,明天早上乘902号飞机去山海关,然后同林彪一起南下广州。所以当晚256号三叉戟专机准备送林立果去

山海关时,胡萍特地把专机师服务队副队长孙福荣留下,就是要安排她临时到902号飞机上当服务员。

22时左右,胡萍打电话叫空军航行局局长尚登峨到西郊机场,对他说:“明天252号(实际256号)从山海关起飞到广州,可是航行局向外发航线时,把航线发到西安,也可以多发几条到其他地方的航线,林彪要动,注意保密。”

这段时间,北戴河又发生了哪些事情呢?

20时35分,从北戴河联峰山上下来的司机小宁和刘吉纯正急急忙忙赶往山海关去接林立果。刚过秦皇岛不远,突然发现一辆开着大灯的吉普车,目中无人般地“站”在马路中间。他们连忙停车,正是林立果。刘吉纯和小宁表示歉意,林立果说:“不怨你们,事情急。”说着,刘沛丰从吉普车上搬下两只手提箱,换乘了吉姆车,林立果他们扬长而去。司机和刘吉纯上了林立果丢下的吉普车,一路追吉姆也没追上。

叶群从20时许进到林彪房间已有一段时间了。正在看电影的林立衡听说林立果快要回来了,跑到林彪房门口偷听。里边谈话声音很低,听不清,只能断断续续地听到:“……这时候广州还给豆豆和张清林送皮鞋、……许世友也是那边的啦。……主席在世界上威信也不高……”

21时左右,林立果到了莲花峰96号楼。在放电影的过厅,他送了一束鲜花给林立衡,只说了一句:“祝贺你们!我马上要到首长那里去。”就和叶群一起去了林彪的房间。

林立衡立即找到林彪的内勤卫生员陈占照和张恒昌,逼着他们到林彪的房间去偷听叶群、林立果都和林彪说了些什么?

过了一会儿,张恒昌出来告诉林立衡,刚才在卫生间里,他隔着门隐约地听到林彪客厅里的两句话:一句是“主任跟首长说,去广州不行,去香港也行嘛。”一句是林立果说的:“到这时候,你还不把黄、吴、李、邱都交给我。”

张恒昌说:“我始终没听见首长答话”。

林立衡站起来离开放电影的过厅,在走廊正巧碰见林立果,便拉住他问明天到底去哪里?林立果匆匆说:“去广州,军阀混战。”说着便

快步走了。

刘吉纯回到林彪住地后,没看到林立果。他见到李文普,便问:“怎么看不到老虎,他的房子准备好了没有?”

“走,我们看看去。”李文普说着,便和刘吉纯一同下山,到57楼看过林立果的房间,然后回到96楼院子里。

刘吉纯见李文普一直不说话,便问他:“我觉得老虎回来有点不对劲,是不是要出事呀?”

李文普说:“等上飞机后再说。”

刘吉纯说:“上了飞机可就晚了,工作人员中就咱俩有枪,是不是从部队挑选几个人上去?”

李文普没有吭声。

21时多,叶群给秘书办公室打电话,叫刘吉纯过去,对他说,要派他去大连看房子。以前去大连,也都是刘吉纯打前站。

刘吉纯问:“怎么去?”

叶群说:“坐火车去。”

刘吉纯一听不对劲,便说:“夜里没有开往大连的火车。”

叶群也觉得说错了,马上改口说:“机场不是有架小飞机吗?”

刘吉纯想了一下说:“可能你们到了我还没到呢。”

叶群也没有勉强,说:“不去就算了。”

刘吉纯感到很蹊跷,因为夜间乘火车去大连,第二天晚上才能到达,而他们第二天上午乘飞机,一个小时就可以到大连了。

接着,叶群给北京毛家湾打电话,是值班秘书于运深接的,说了十多分钟,主要是谈林立衡的婚事。又说修小厨房和到大连做衣服。叶群说先到大连,然后回北京过国庆。叫毛家湾收拾卫生。还说到上海做的尼龙外套破了一个洞,让上海空4军管理处处长过全找人织补一下。最后,毛家湾的童显华管理员让于运深问叶群,别人送的那几只王八,养了好多天,怕死了,请示主任看怎么处理?叶群当时没有答复。过一会儿,叶群第二次给于运深打电话,说:“明天把这些乌龟送到钓鱼台,请江青同志吃。”叶群又详细交代要怎么样怎么样……

再说林立衡听林立果说要去广州,立即去找李文普。她将李文普和刘吉纯叫到屋后面96号楼院子里一个僻静的小厕所里,告诉他

们说：

“是小张刚听来的，他们要走，要到广州去，万一不行就让首长去香港，这不是要外逃吗？”

刘吉纯大吃一惊。

林立衡问李文普：“首长是否知道老虎对我说的事？”

李文普说：“首长哪会知道这些，首长肯定不知道。我一直守在首长身边，这我还不清楚？”

他还说：“主任叫我明早6点去广州，要我先不要通知8341部队。我去问首长，首长说广州太热，不利于他治病，不去广州，坚持要去大连。主任问我广州的房子有没有冷气设备，我说有。主任又去劝首长，说广州的住处有冷气不热，首长便把我找去，对我说去广州也行。首长只知道换个环境去广州养病。”

林立衡说：“既然如此，你能调动大队部的人保证首长安全吗？”

李文普说：“没问题，我能保证。”

李文普又说：“汪东兴和张耀祠在‘九大’后让我兼任8341部队副团长的职务，首长、主任没有同意。他们又在党委会上做出决定，规定我有权为首长的安全调动8341部队。”

林立衡对李文普说：“我对你谈了几天了，要提高警惕，不能麻痹，一定要防止今晚出事，你能保证首长不被弄上车吗？”

李文普：“能保证，你放心好了。”

林立衡：“你有把握吗？”

李文普：“这不成问题，我们有这么多人，林立果要是真的要跑，我们就是拼了，也不能让他把首长弄走。”

林立衡对李文普说：“你跟8341部队经常打交道，有工作关系，又很熟；我常年不在家，不认识他们。找8341部队，我去不合适，还是你亲自去大队部吧，你有这个职权。”

刘吉纯也叫李文普一起去，李文普说：“现在‘林办’与8341部队的关系不太好，也还搞不清情况。主任说是去广州，林立果说的也是去广州，要是真的是去广州没发生什么事，那可不是一般的问题了，那可不得了！”

林立衡说：“首长身体长期不好，你身体也不好，你辛辛苦苦，一直

带病坚持在首长身边守护了20年。大家都知道,首长那样信任你,你为首长的病和他那样被骗,掉了不少眼泪,吃了不少苦头。你对首长是忠诚的。你对工作人员经常说要忠诚保护首长,现在是保卫首长安全的关键时刻,你要是没负起责任,那你20年不都白守护了吗?你平时口口声声要忠诚首长,到这时候,你怎么又犹豫起来了?你过去帮助欺骗首长那么多年,那也是不得已,怪不了你。你本质上还是同情和忠诚首长的。可是,我早就对你们说过,首长被骗,总有一天要被揭穿的。在这个时候,难道你还帮助骗首长?骗到底吗?"

林立衡还说:"你再不去就晚了,主任把你女儿送到空军去当兵,你可不要因此被主任拉过去啊。你也许怕主任,但怕也没用,如果首长的安全出了事,你逃脱不了责任,因为你是这里工作人员的负责人。到时候,你怎么向中央交待?你要是跟着走,那你就是叛徒。你要是没保护好首长安全,就是你没走,你也要为一切严重后果承担责任!"

李文普说:"关键问题是我现在搞不清情况呀!这些情况都是你从林立果那儿听来的,如果到时候真的发生什么事的话,还可以在飞机上采取措施,反正我们人多,我对工作人员已经布置好了。"

林立衡干脆对李文普说:"你不去,我去!"

李文普马上表示赞同,说:"那好,你去吧,我在上面守着,你见到张宏就说是我同意你去找他的,是我派刘吉纯陪你一块儿去的,你叫张宏马上和我联系。"他接着向刘吉纯交待任务,让他出面对张宏说明情况。

林立衡问:"现在负责警卫部队的是谁?"

李文普回答:"是张宏,他是老红军,是军级干部,职务是中央警卫团副团长,负责整个北戴河地区的中央首长安全。"

林立衡又问:"这个人怎么样,我找他行不行?"

李文普说:"张宏是这个地区的头,现在调动部队不需要经过他,你可以找姜大队长,这个人比较精干。"

林立衡:"姜大队长通常呆在哪里?"

"在二大队大队部。"李文普说,接着他又对刘吉纯说:

"你先去找姜大队长,接着找张宏说一下情况,然后再让立衡和张宏他们谈。"

林立衡:“我找张宏谈了之后,由你负责与他联系,因为你有权代表首长调动和指挥部队。”

李文普说:“那好,就这样吧。”

林立衡:“我叫张宏带部队上来,由他们出面阻拦。在部队没有上来之前,你无论如何要尽一切努力保证首长不被弄上汽车,不然就麻烦了。”

李文普说:“那当然啦,我会尽量拖延时间。司机老杨听我的,这不成问题。”

林立衡:“你知道林立果和刘沛丰是很会开车的。”

李文普说:“这我知道。就按你说的办,在张宏没带部队上来之前,我一定保证首长不被弄上车。”

林立衡又问:“你带枪没有?”

李文普说:“没有。”

林立衡埋怨说:“你们平时都带枪,到这时候为什么不带枪?”

李文普说:“枪放在宿舍里,马上就带。”

这时已是晚上21时50分了,刘吉纯领着林立衡顺着黑森森的小路跑到位于58楼的8341部队二大队队部外边。他先让林立衡在小树林里等着,自己进去联系。

此时,部队已经休息,大队部里只有大队长姜作寿和卫生员小陆正在下象棋。刘吉纯把姜作寿叫出来,对他说:“林立衡有重要事情向中央报告,你快去。”

说着,刘吉纯把姜作寿带进小树林后说:“你们谈吧,我回去看看动静。”

刘吉纯害怕林立衡出事,又对姜作寿说:“把立衡留在你们这里,别再上去了。”说完,他就赶回96楼了。

北戴河每天晚上22时都要吃夜餐。但此时的刘吉纯已没有心情去吃夜餐了,他只是呆在96楼门口,心情非常的紧张,真不知道该怎么办?生怕报告错了要杀头。他就这样一直坐在院子里不敢动,一个人焦急等待着可能到来的指示。

# 第1213回：告张宏，调部队采取措施 查飞机，南下计划又泡汤

姜作寿也感到今天有些反常。已经22时了，林彪住的96楼一反往常，仍是灯火通明，大家都在看电影。二大队的5部警卫车，被调走了4部，说是为林立衡订婚出出进进。林彪的“大红旗”和叶群的“卡迪拉克”都停在各自的门前，看来是随时准备出发。可是他这个负责警卫带队的人却没有得到任何通知。他打电话问李文普：“是不是要行动？”

李文普说：“现在没有，有事会通知你。”

“是不是给我们下来几辆车？”姜作寿又提出要求，但是被李文普拒绝了。

姜作寿觉得有一种莫名其妙的紧张。他去查哨，在96楼门前，林彪内勤陈占照告诉他，刘沛丰把守着林彪卧室的门，连他也不让进。平时小陈是随时可以出入林彪的房间的。接着他又碰见林彪秘书宋德金，他对姜作寿说：“听说明早6点走。”

姜作寿检查了哨位后回到大队部，已经是22时多，他叫着卫生员下棋，这时刘吉纯来了，领着姜作寿到小树林见到林立衡。

林立衡一见到姜作寿就对他说：“是李文普叫我们来找的。”接着她说：“大事不好了，叶群、林立果要带首长逃走，先到广州，再到香港。”

和李文普、刘吉纯一样，姜作寿闻言也是大吃一惊，不敢相信。谁敢相信党的副主席会跟着老婆孩子到香港呢？这不如同天方夜谭一般吗？他随口问道：“你说的这些可靠吗？”

林立衡说：“可靠。”

姜作寿问：“这事首长自己知道吗？”

林立衡说：“他们骗他，他哪里知道。”

接着林立衡简单说了林立果对她说的话和林彪内勤当晚告诉她

的情况,说:“今晚林立果回来,‘林办’谁也不知道,送林立果的飞机现在还停在机场。”

姜作寿说:“林立果回来我们知道,是‘林办’叫我们派车去接他的,但没有接到,我们看见他坐车回来了。”

林立衡说:“我是提着脑袋来找你们的,你们相信不相信?你们要是不信,就问问刘科长,问问李文普。”

姜作寿点头说:“我们相信,相信,刘科长已经给我们说过了,你放心,不要着急。”

林立衡请求他们调动部队,采取紧急措施,包围57楼和96楼。

姜作寿让她向主持北戴河警卫工作的副团长张宏报告,并带她去见张宏。

“叶群、林立果要带着首长逃走。他们先到广州,然后再去香港……你看怎么办?”林立衡一见张宏,就急切地问。

她还向张宏讲了林立果对她说的“封建割据”那些话,及林彪的两个内勤卫生员今晚告诉她的情况,并说:“9月7号首长对我说是要去大连,叶群为了不让首长去大连,就让李文普和刘吉纯骗首长,说大连的水,首长不能喝。9月8日林立果去北京是瞒着首长的。今天晚上8点多,林立果和刘沛丰乘飞机在山海关降落后,机场曾打电话向‘林办’问,首长和我以及所有工作人员都不知道林立果已经回来了,叶群可能也不知道林立果什么时候回来,以至没有事先派车去接他,林立果是开机场的车回来的,现在那架飞机还停在山海关机场。李文普、刘吉纯他们不让我把林立果对我讲的话告诉首长……”

张宏:”这些就不要向林副主席讲了,我们都知道林副主席身体不好,免得惊动林副主席。这件事由我们来处理就行了。”

林立衡请张宏立即采取措施,调动部队包围林立果、刘沛丰住的57楼,同时将林彪、叶群及工作人员住的96楼也包围起来,必要的话先把林立果、刘沛丰扣起来再说。

张宏说:“这些都需要好好安排一下,需要研究具体的措施和步骤。反正一定会确保首长的安全,这一点你尽管放心,现在的问题是要马上请示中央。”

说着,他就要向汪东兴报告。

林立衡不放心地问:“向他报告行吗?”因为她知道汪东兴在庐山会议上也是犯错误的。

张宏说:“那先向周总理报告。”

林立衡:“北京现在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就是向总理报告,时间恐怕也来不及了,远水解不了近渴。你们是专门负责这里警卫的,要绝对保护首长安全,立刻调动部队、采取主动措施。”

张宏说:“我一边请示报告,一边调动部队,采取措施。”

姜作寿也提出要向北京的张耀祠和汪东兴报告。

林立衡问:“他们靠得住吗?”

姜作寿说:“他们都在毛主席那里工作,不向他们报告,向谁报告?”

张宏也说:“我还得向汪主任报告,他是我们的直接领导。汪主任会向上报告的,我一边报告一边马上采取具体措施就是了。”

林立衡迟疑片刻,说:“那好吧,你赶快报告吧。”

她又反复问张宏:“你们能保证首长安全吗?能保证首长不被弄上汽车吗?”

张宏说:“我们能保证!我们驻在这里就是这个任务嘛,你放心,到时我们都到96号楼停车的地方去,在那里守着就是了,这还不保险吗?”

林立衡又问:“你们有多少人?”

张宏说:“这一片都是我们的部队,有二中队、四中队、六中队,还有机动部队,我还可以迅速从附近调部队来。”

林立衡:“林立果讲他在东山有个秘密机场,可以监听全国的电话,包括这里通往北京的电话。这里和北京只有一条专线,你和北京一通话,他会不会马上知道?”

张宏说:“嗨,什么秘密机场,我们都知道那个修建了一下的土机场,那儿也属于我们的警卫范围,我们经常看见林立果去那个机场。我们部队这条电话专线是可靠的,这点请你放心。”

林立衡还不放心,问:“要是事情提前发生你们怎么办?”

张宏说:“到时候我们就上去问问,我们是专门在这里负责警卫的,比李处长、刘科长和你去问还合适些。我们装作不知道你讲的事,

只去问叶群和林立果,你们这么晚到哪去?为了保证安全,请他们等我们布置好安全工作后再走。”

林立衡:“如果林立果硬要走你们怎么办?”

张宏说:“为了保证林副主席的安全,到时候我们对他就不能那么客气了,就是拼了也要保证林副主席的安全。”

林立衡:“你们要注意,林立果、刘沛丰身上有手枪。”

张宏说:“我们也有枪啊,到时候我们多带些人不就行了。”

林立衡:“尽量不要开枪。”

张宏说:“我们不会开枪,也没有必要开枪,开枪保证不了林副主席的安全,打伤了谁也不是小事。到时候,我们几个人对付一个……”张宏一边说一边做了一个擒拿的反绑姿势说:“就这样,两个人从后面上去把胳膊一架就行了。”

林立衡:“李处长叫你马上跟他联系。”

张宏说:“那我直接和他联系。”

林立衡离开大队部,先到56楼找到杨森,叫他到部队找辆车,然后一起开车上到96楼。林立衡让杨森在外面等着,自己回到96楼正在放电影的走廊,又坐到原来的座位上,将见张宏的情况对坐在旁边的未婚夫张清林说了。之后就发生了1186回讲的情况。

再说张宏这边。林立衡走后,张宏立即给张耀祠打电话,说明了情况。张耀祠让张宏报告林副主席,张宏拔腿要走,姜作寿阻止了他,说:“现在情况复杂,我们还不完全清楚。他老婆孩子骗他走,林立果和刘沛丰都在上边,平日里他家我们是不去的,这个时候去不好吧。”

张宏还是坚持要一个人“深入虎穴”。他说:“胡闹,让他走不成!我带两个人把林立果和叶群抓起来。”

“不行。”姜作寿坚持。

“你说怎么办?”张宏问。

“听上边的,反正你不能去。你回不来,我去不去找你?我去了,也回不来,部队怎么办?”姜作寿说。

姜作寿决定自己上去摸摸情况。他在林彪住的96楼前,遇见林办秘书宋德金。宋德金对姜作寿说:“看来今晚就要走了,小陈正在收拾行李呢。”

姜作寿一看,果然林彪房间亮着灯,往常22点多林彪就上床休息了。姜作寿马上把这个新动向报告北京。北京指示:“林副主席上飞机,你们警卫部队就跟上去。”

姜作寿他们商量:“如果林副主席要走,就由我带6名战士上飞机。如果不让上,就以搬动行李为由,上去了,就不再下来。”

此时早已经吹过熄灯号了,战士都睡了。于是有了“紧急集合”,姜作寿又把战士们叫起来打背包,准备随时出发。

再说北京,张耀祠放下北戴河的电话,立即报告了汪东兴,说:“情况很紧急,林彪要走动,怎么办?”

汪东兴说:“我马上打电话找总理。”

接着就有了1185回所讲的9月12日晚,人民大会堂,周恩来中断《政府工作报告》讨论会的一幕。

林彪内勤陈占照(左)和林彪警卫秘书李文普(右)在飞机上

再看此时的北京,我们还不知道的情况。9月12日晚,吴法宪来到西郊机场候机厅后,胡萍匆忙找到正在候机厅值班的专机师服务队副队长孙福荣,将叠好的一个纸条递给她,让她去空勤灶旁的“工字房”,随便将纸条交给谁都行。

孙福荣说:“天这么晚了,那里能有人吗?”

胡萍说:“肯定有。”

漆黑的夜晚,孙福荣吓得一路小跑来到“工字房”,只见里面灯光很暗,门口的车库里停着一辆伏尔加。正当她要敲门时,恰好周宇驰走了出来,她将纸条交给了周宇驰。

孙福荣悄悄地回到候机室,向胡萍点了点头。这时她见胡萍已是满头大汗,脸上呈现出沮丧的样子。

一会儿,胡萍又找到孙福荣,对她说:“你再去‘工字房’,叫周宇驰给我写个条,告诉我怎么办?我现在打电话不方便,快去快回!”

孙福荣急忙跑向“工字房”。但是,当她这次再来到“工字房”时,屋里已没有灯光,那辆伏尔加车也不在了。

她又急忙跑回来对胡萍说了情况。胡萍听后,长叹一声说:“快把准备好的东西都撤了,全部撤了,明天飞机不飞了。”

周宇驰哪去了?9月12日傍晚,周宇驰送走王飞他们,离开空军学院“秘密据点”,于21时左右开车回到空军大院家中,对妻子王圣兰说:

“明天早上7时30分到西郊机场坐飞机去广州。林立果照顾我,让我带家属走,你赶快收拾东西,带上随身的衣服和孩子准备跟我走。”

随后,周宇驰带着妻子王圣兰和两个儿子直奔西郊机场,来到“工字房”,指挥安排第二天去广州的飞机,并与已经到了北戴河的林立果联系。23时后,他得知吴法宪到了西郊机场,赶紧给林立果打电话。稍后叶群也接到周恩来查问三叉戟的电话。两边情况一凑,林立果和周宇驰在电话里商量立即中止去广州的准备。接着周宇驰打电话告诉正在开会的王飞说:

“暴露了,不搞了。”

随后,他又打电话到空军学院,通知李伟信“暴露了”。李伟信马上告诉旁边的王永奎、王琢等人,“这个据点暴露了,”让在这里的6人撤到清河原空军第二高级专科学校据点。

接着,周宇驰开车拉着妻儿回到空军大院的家中。所以胡萍派人第二次再找他时,没有找到。

23时54分,周宇驰回家后,又接到林立果打来的电话。因为天热,窗户开着,周宇驰妻子王圣兰听见从窗户那里飘过一些声音,周宇

驰在大声问,“去哪? 去哪? 北上? 北上啊!”

周宇驰放下林立果的电话,立即给潘景寅打电话通知他:“马上走,林立果已经出发了。”这就是潘景寅在山海关机场加油前接到的电话。

周宇驰出来后,王圣兰问他:“北上是去哪儿呀?”

周宇驰说:“上蒙古,到那儿找林立果去,从那儿看情况再去苏联。”

很快,周宇驰在家中又接到山海关程洪珍的电话,报告 8341 部队的宋某某打电话给机场,要卡住从北戴河来的小车不让它走等情况。周宇驰急促地说:

“知道了,知道了,康曼德已经出发了。现在情况紧急,北京正在追查,你快跟他们走吧!”

再说北京空军司令部,王飞召开南飞广州的工作会议还在进行。鲁珉找个借口跑到楼下,对爱人说:“你先回去,不管哪儿的电话让走,都不要走,就在家。”

鲁珉再上楼,情况发生了变化。

周宇驰在西郊机场放下林立果的电话时,王飞、于新野部署南下广州的会议也快要结束了,这时电话突然响起,于新野拿起电话,是周宇驰打过来的,他在电话中说:

“总理查问飞机了,北戴河来电话,暴露了,不搞了,任务取消。刚才讲的全作废,就当今天什么也没有讲过,各自回家,赶紧把名单毁掉。”

王飞立即在会上宣布去广州计划作废,并告知大家:“明天不走了,就当没有这回事”,“有人问今晚我们干什么,就说是研究办公室副主任分工问题”。

贺德全要烧名单,王飞说别烧,到处是灰,撕碎从马桶冲下去。却忘了于新野那里还有一份名单。因为名单全凭脑子想,想一个写一个,太乱,于新野又抄了一份,放在口袋里。这就是在直升飞机的迫降现场找到的那份名单。

王飞回到家,已是 9 月 13 日 1 时 30 分,他的秘书孙水森来电话说:“航行局尚局长说林副主席要回来,三叉戟从山海关起飞了。”

王飞心想,不是“作废”了吗?怎么又起飞了?他立即给尚登峨打电话,得知“三叉戟正向西北飞,可能偏航了。”王飞心里明白,这不是偏航。

他又问:“现在谁在调度室?”

“梁参谋长来了,吴司令到西郊机场去了。”尚登峨答道。

一会儿,尚登峨又来电话:“三叉戟快要飞出国境了。”

王飞放下电话就往指挥所跑,看见李德生在值班室。

“李德生怎么来了?”他非常奇怪。

这时,周宇驰妻子王圣兰打电话给江腾蛟问:“吴司令员的张秘书问周宇驰这几天白天晚上都在哪里,我说不知道,我这样回答行不行?”

江腾蛟说:“可以。”

放下电话,江腾蛟怀疑起来,吴法宪为什么突然查问周宇驰?周宇驰老婆为什么又来通报情况?是不是暗示不要暴露周宇驰的行踪?江腾蛟想问问周宇驰到底怎么回事,可是往西郊机场“工字房”要了好几次电话,始终没人接。家里没有,“秘密据点”也没有,周宇驰究竟到哪里去了?实在没办法,江腾蛟通过总机找到王飞。王飞压低声音急急地说:“我在指挥所!我在指挥所!我在指挥所!”连讲了三句,意思是说话不方便,不让他讲话。

江腾蛟彻底迷惑了,又打电话问正在医院住院的鲁珉:“今天是王飞值班吗?”

“不是。”

“那他怎么在指挥所?”

鲁珉说:“我也不知道。”

这时江腾蛟更加怀疑,究竟出了什么事情?但他再不敢乱打电话,提心吊胆窝了一夜。

# 第1214回：赶紧撤，周宇驰调直升机 返上海，细筹划诱捕计划

13日零时过后，鲁珉刚回到医院，接到值班参谋的电话，256号三叉戟从北戴河起飞，向北京方向飞来了。过一会儿又报告，飞机没有在北京降落，向西北方向飞去，刚刚飞出国境，谁坐在里面还不知道。此时，李德生已经奉周恩来之命来到指挥所，值班参谋问鲁珉来不来？鲁珉心想："坏了，无事不登三宝殿。"他回答说："不去了，让郝副部长去。"因为平时鲁珉不去指挥所，指挥所由作战部副部长在那里当所长，轮流值班。

鲁珉心想这事闹大了。此时他已经恨死了江腾蛟。要不是江腾蛟出主意，让他去炸毛泽东的专列，他怎么会被卷进这个大阴谋中呢？

空军司令部的人散了以后，于新野开车直奔空军学院"秘密据点"。

空军学院"秘密据点"前，停着一辆卡车。林立果临走前，让李伟信和王永奎把东西收拾一下，空军学院、西郊机场两个"秘密据点"的各种机器、器材能带走的带走，文件、报刊、书信、材料等能带的也带，不带走的就烧掉。9月12日傍晚，李伟信和王永奎将器材全部装箱，然后翻箱倒柜，将信和港刊等统统都烧了，甚至李伟信还把几包避孕套也扔到火里，烧不着，又赶快丢到下水道里。收拾差不多了，22时多，李伟信开着嘎斯69到东交民巷空军招待所，接他弟弟李伟军和王维国的儿子王大璋。在车上，李伟信说："要是我被打成反革命，你可要为我伸张正义。"

王大璋非常惊讶，不知何出此言。

23时，他们来到空军学院将军楼，王大璋站在后门外，看见房子里全是纸箱，还有几个手提箱。后门外有辆卡车，已经装了大半车的箱子，还有好多桔子水。因为见过林立果用桔子水泡饭，王大璋认定是林立果的东西。

李伟信、王永奎、许秀绪、王琢忙着把器材往车上装,准备13日早5时以前运到西郊机场,再运到广州。23时多,快要装车完毕,李伟信接到电话说:“这个点暴露了,飞机不能起飞了,你们立即转移到二高专,在那里待命。”

在场的李伟信、王永奎、许秀绪、王琢、陈伦和不知如何是好。王永奎提出,这么多人不安全。需要分散一下,有几个去二高专7号楼的“秘密据点”。于新野表示同意,说李伟信和他留下,其余的人王永奎、许秀绪、陈伦和、王琢和陈伦和的对象小郁、鲁珉的女儿小鲁6人一起到二高专去。李伟信对王永奎说:

“你们到二高专后打个电话,把那里的电话告诉我。如果天亮时还没有给你们打电话,就是出事了,你们就自己行动吧。”

许秀绪摸摸口袋,说:“我没带钱。”

李伟信掏出20元给他,看看王琢、小郁和小鲁,又给他们每人20元。

王永奎带着装上卡车的大批器材,走了。

过了20分钟,李伟信叫王大璋上楼帮忙。二楼有个乒乓球房,床上有尼龙蚊帐,王大璋猜是林立果的住处。他们要他把壁柜撬开,看看里面有什么,壁柜里只有一个饼干盒。隔壁有很多录音带,李伟信正在退磁,说不知道能不能退得干净。他叫王大璋把那边地毯上的木头渣弄到楼下。一直到9月13日凌晨0时左右,李伟信和李伟军才从楼上下来。李伟信对李伟军说,你和王大璋还是到刚才的地方去,明天早上接到我的电话,你们就直接去机场,接不到电话,你们自己想办法回上海。

不久,于新野来了,他喘了半天气才说:“明天去广州的计划可能暴露了,那就没有飞机了,快,快找周宇驰。”

送走了李伟军他们,于新野连打了几个电话,都没有找到周宇驰。此时的周宇驰忙着安排家事。存款早取出来了,此时他正开车把母亲、弟弟和儿子送上去渭南老家的火车,然后把妻子王圣兰又送回空军大院家中。他没下车就急急走了,临走喊了一句,王圣兰也没听清楚,猜是不用等他。

凌晨1时多,于新野正着急,周宇驰自己闯来了,脸色阴得吓人,

急急地说:“明天去广州的计划不行了,肯定没有飞机了。”

周宇驰喘了半天粗气,接着说:“立果已经给我打了电话,他们争取北上,叫我们也尽量多组织一些人走。咱们只能用直升机北上了。”

他看了一下凌乱的房间,问:“许秀绪他们呢?”

于新野说:“他们刚走,到二高专待命去了。”

周宇驰说:“来不及叫他们一起走了,我们坐直升机走。”

李伟信试探地说:“这么远,颠簸中直升机能跑得出去吗?”

于新野也犹豫了,就是跑成了,老婆孩子怎么办?周宇驰安排了“后事”,而李伟信和于新野都没有。两个人统一了思想,把周宇驰请上楼来,要周宇驰再考虑考虑。周宇驰早考虑好了,脸阴了一下,过一会儿,才垂头丧气地说:“不走就要坐牢,坐牢的滋味就好受呀?”

接着一阵沉默。于新野鼓起勇气说:“不要走,先等等,看看情况……”

“那可不行,错过机会,要走就走不成了。平时忠于忠于的,关键时刻不听指挥可不行。”周宇驰说。

于新野说:“那先和北戴河联系一下。”

周宇驰厉声说:“不用了,立果已经给我打过电话了,走吧,快走!”

周宇驰对于新野说:“你立即到西郊机场去把陈士印接来,我现在去不得,我在这里给他打个电话,叫他在门口马路上等你。”

于新野和李伟信带上装有3万多美元和许多机密文件的手提包,上了车。

这时王永奎从二高专打来电话,周宇驰粗暴地说:“没事别来电话。”就扔了话筒。周宇驰打电话给直升机大队长陈士印,他曾给周宇驰和林立果当过云雀直升飞机的教员。当晚他住在西郊机场招待所,9月13日凌晨1时多接到周宇驰的电话,随后就有了1191回所说的直升机强行起飞,迫降,自杀等一幕幕大剧。

9月13日清晨,陈伦和在空军二高专7号楼被马达声惊醒,见天上飞着一架直升机。他告诉了情报部技术处副处长王永奎。到天亮,还没有电话,他们估计林立果他们已经去了广州。

王永奎决定到广州去找林立果,他通过情报部搞来通行证和火车票,于9月13日17时,由王琢开中吉普到北京火车站,6个人上了开

往广州的15次特快列车。

上车前,王永奎打电话叫妻子于秀芬把孩子送回东北老家后也去广州找他。15日早上7时,他们到达广州。但是到沙堤机场扑了个空,根本没听说北京有人要来。几个人沮丧地又开车回广州,陈伯羽不在,顾同舟情绪沉闷,也没摸到确切消息。

当他们6人好不容易找到陈伯羽后,陈伯羽压低声音说,前一两天中央发了两个命令,第一个是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签发的,第二个是主席和总理签发的,主要讲战备。空军指挥所原来是吴法宪、曹里怀,现在是李德生。还有国内一切飞机停飞3天了,今天又有飞机飞,大军区叫广空听他指挥。这是怎么回事?王永奎决定:今天先住下。他们本来想住广州空军第二招待所的,但是9月15日当天,广州军区空军向广州军区报告,从北京空军司令部跑来几个人。广州军区命令坚决扣留。13时下了通缉令。王永奎6人听说广空司令部要扣他们,就住到了外面。当天20时35分,周恩来电话,必须将北京来的几个人找到。9月16日,广东省革命委员会保卫组向全省公安系统发出了通缉令。

许秀绪、陈伦和家在上海,提出回上海。他们向熟人借了300元钱和粮票,冒充到上海学习的技术人员,带着空白介绍信和假证明,改道去了上海。9月17日凌晨,他们在广州北的小站源潭上车时被抓获。

再说许世友从北京返宁途中,与王洪文连夜在火车上商定了逮捕王维国、陈励耘的行动方案:以看中央文件为由,先在上海诱捕王维国,然后把陈励耘“请”到上海抓起来。因陈励耘是浙江省委第二书记,第一书记是南萍,看文件“请二”不“请一”不合惯例,为避免打草惊蛇,干脆两人都“请”,委屈南萍“陪绑”一遭。

到南京时,天刚透亮。许世友一进门,就把参谋长肖永银和保卫部部长李书和找来,向他们交代了任务。许世友特别嘱咐道:“此事要绝对保密,不能走漏半点风声。你们带的人越少越好,回来由上海警备区派车,让好八连护送。”并让肖永银通知驻在苏州的某师监视硕放机场,通知上海警备区监视相关的敏感部位。

肖永银回去安排妥当,和南京军区保卫部李部长带上几名随员与

王洪文一起赶往上海,住进上海延安饭店。

9月20日上午,徐景贤办公室的红机子电话响了,是王洪文的声音:“老徐,你赶快到常德路警备司令部来一下。”

徐景贤奇怪的问:“啊?你怎么已经回上海了?”

王洪文说:“快来,来了再说。”

徐景贤感到十分惊讶:王洪文回上海,连康平路市委大院也不进,直奔上海警备区司令部,肯定有重要事情。他赶到常德路上海警备司令部,大院深处有一幢小楼,过去是陈毅的办公室,现在是警备区司令部办公楼。当他走进二楼的司令办公室时,就看见王洪文神色兴奋,跟他边握手边说:

“我这次到北京去,许司令也一起去的,这里还有一位肖参谋长。”说着,王洪文向徐景贤介绍身边与他同来的南京军区参谋长肖永银,接着说:“我和肖参谋长一起从南京赶回上海。”

大家坐下后,王洪文从文件夹里拿出一份文件递给徐景贤说:“你先看看。

徐景贤接过来一看,是毛泽东批准下发的中央红头文件:

《中共中央关于林彪叛国出逃的通知》

1971.09.18;中发[1971]57号

毛主席批示:照发。

徐景贤赶紧认真地阅读文件:

一、中共中央正式通知:林彪于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仓惶出逃,狼狈投敌,叛党叛国,自取灭亡。

现已查明:林彪背着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中央政治局,极其秘密地私自调动三叉戟运输机、直升飞机各一架,开枪打伤跟随多年的警卫人员,于九月十三日凌晨爬上三叉戟飞机,向外蒙、苏联方向飞去。同上飞机的,有他的妻子叶群、儿子林立果及驾驶员潘景寅、死党刘沛丰等。在三叉戟飞机越出国境以后,未见敌机阻击,中央政治局遂命令我北京部队立即对直升飞机迫降。从直升飞机上查获林彪投敌时盗窃的我党我军大批绝密文件、胶卷、录音带,并有大量外币。在直升飞机迫降后,林彪死党周宇驰、于新野打死驾驶员,两人开枪自杀,其余被我活捉。

对林彪叛党叛国事件,中央正在审查。现有的种种物证人证业已充分证明:林彪出逃的罪恶目的,是投降苏修社会帝国主义。根据确实消息,出境的三叉戟飞机已于蒙古境内温都尔汗附近坠毁。林彪、叶群、林立果等全部烧死,成死有余辜的叛徒卖国贼。

二、……

徐景贤读完文件,十分震惊,连声说:“想不到啊!想不到啊!”

王洪文说:“这次到北京,主席下命令,要把王维国和陈励耘抓起来。许司令与我商量,请肖参谋长到上海与我们一起执行这个任务。”

肖永银首先提议说:“先抓王维国,再抓陈励耘,怎么样?怎么抓法,我们商量一下。”

王洪文说:“怎么抓,一定要稳妥,不能出事情。最近王维国情况怎么样?”他问徐景贤。

“我刚刚去看过他,他说有病,正躺在家里休息。但是我看他没有什么大病。我告诉他,你到小三线抓战备去了。”徐景贤回答。

肖永银说:“我从南京军区保卫部只带了六个人来,这次行动主要靠上海警备区的力量。但是我们不宜到空4军军部直接抓王维国,他在那里有大量的兵力,很难动。”

王洪文说:“这样吧,今天下午叫他到市委看重要的中央文件,然后抓他。他既然知道我到小三线去了,老徐,还是你打电话给他,比较自然。”

徐景贤问:“究竟是通知他到康平路市委小礼堂呢,还是哪里呢?”

王洪文说:“还是到锦江饭店小礼堂吧。那个地方环境比较隐蔽,便于埋伏力量。肖参谋长,你看怎么样?”

肖永银说:“好,我叫警备区董副司令安排兵力。我要警备区派一个连,占领延安饭店的制高点,同时要控制南京路、淮海路、外滩等主要街道,防止王维国调动空四军进攻。至于锦江饭店那边,我会作全面部署的。”

徐景贤说:“那我打电话了,让他下午两点到锦江饭店小礼堂看文件,时间安排来得及吗?”

大家看看手表,此时是上午11时。

肖永银说:“抓紧布置,来得及的。”

接着,他们讨论了具体的抓捕方案。

锦江饭店是一家高级饭店,专门接待高规格的内宾和外宾,上海市革委会的重要活动也常在这里举行。这里的小礼堂有两个门,靠近小花园的前门是平时领导下车进会场的地方。他们让王洪文的秘书小廖和徐景贤的秘书小张两人守在小礼堂前门,王维国的车来了,就让王维国进小礼堂,但是不让他的司机、警卫员下车。

小礼堂有个后门,靠东边的马路有个通道口,后门边上悄悄地停两辆军用吉普,抓捕到王维国后,就把他架到军用吉普上开走。小礼堂外面和锦江饭店大门口不设任何武装人员,免得引起王维国的随从和警卫员的怀疑。

南京军区保卫部部长等人埋伏在小礼堂服务员的房间里,等王洪文向王维国等人宣布了中央的命令,就冲出来实施抓捕。

上海警备区董副司令带人埋伏在锦江饭店外围和饭店大门边上的小楼里,严密警戒,以防不测。

部队部署好后,徐景贤当着王洪文和肖永银的面,拿起电话打给江湾空4军军部,直接找王维国。

尽管当时徐景贤心里很紧张,但还是尽可能用平静的声音对王维国说:

“维国同志吗?这几天身体好点了吗?今天中央来了一份绝密文件,规定由市委常委阅读,下午我把文件带到锦江饭店小礼堂去,下午两点请你来看文件,可以吗?”

王维国急忙回答:“可以,可以。”

徐景贤说:“那好吧,下午两点,锦江小礼堂见。”就把电话挂上了。

接着,王洪文、肖永银、徐景贤又开始商量抓捕浙江空5军政委陈励耘的办法。仍然是由徐景贤打电话给浙江省委第一书记、驻浙江20军政委南萍,通知他今天和陈励耘一起来上海看中央重要文件,而且说整个华东地区只有一份文件,规定由省委主要负责人到上海亲自阅读,要他们立即赶到上海锦江饭店小礼堂来。

南萍在电话里回答说:“好,叫上陈励耘,尽快出发。”他还说:“我们走海边的一条公路比较近,大概5个小时后到上海。”

两个电话打完后,王洪文和肖永银兵分两路:一路肖永银留在警

备区司令部指挥部队;王洪文和徐景贤两人则赶到锦江饭店小礼堂和抓捕对象直接见面,实施抓捕。

时近中午,他们匆匆吃了点饭,就赶到锦江饭店,还不到13时,饭店大院里特别沉静。北楼附近马路上有些人在走动,南楼和小礼堂前面的花园里根本没有人影。其实此时,周边的小楼上已经隐藏着许多双眼睛,正在注视着小礼堂附近的一举一动。按照事先商量的方案,秘书小张、小廖等候在小礼堂前门迎接王维国,驾驶员和警卫员都留在车上。

看到一切布置就绪,徐景贤和王洪文进入锦江小礼堂。

# 第1215回：看文件，锦江饭店抓王、陈 又揭出，林立果上海“选美”

上海锦江饭店小礼堂铺着红地毯，两面都是落地长窗，垂着半透明的绢丝窗帘。礼堂深处是一个舞台，小礼堂内的桌子、椅子可以根据需要任意移动。此时，桌子、椅子都撤走了，只留下六张沙发，三张沙发向外朝着门口，三张沙发向里朝着舞台。三张沙发中间的一张是双人沙发，两边各放一张单人沙发，沙发前各放一只茶几，茶几上放了几个玻璃烟缸。两组沙发之间的距离只有两三公尺。王洪文和徐景贤坐在面朝门口的双人沙发上，整个小礼堂里就他们两人，静静地等候王维国的到来。

王洪文点了一支烟，对徐景贤说：“毛主席除了下命令对王维国、陈励耘进行隔离审查外，还谈了今后要抓紧抓好华东地区林彪事件的专案工作。周总理在确切知道林彪机毁人亡以后，在人民大会堂大叫拿酒来，跟中央的其他领导干了好几杯茅台酒。”

时间好像过得特别慢。临近14时，他们便不再说话，空气好像凝固了似的。王洪文指了指茶几上的烟缸说：“等一下王维国要是拔枪的话，我们就用这东西砸他。”

听他这么一说，徐景贤的心情更加紧张。

下午14时，王维国的车准时到达锦江小礼堂，秘书把他引进小礼堂的头道门。王洪文和徐景贤坐在小礼堂里，面朝着二道门，门上挂着丝绒的门帘。丝绒门帘撩开后，身穿空军军装的王维国了走进来，看见王洪文，显得很意外，走上前来一面跟王洪文握手，一面说：“洪文同志，回来啦。”

王洪文说：“是啊，是啊。”顺势请他在对面的沙发上坐下，然后说：“这次我不是到小三线去的，我是到北京去参加中央召开的会议，因为要保密，所以对外说我到小三线去了。现在我带回来一份中央文件，你先看一下。”说完，王洪文把文件递给王维国。

王维国把手伸进上衣的口袋里,徐景贤以为他要拿什么东西,心里格登了一下。

这时,王维国从上衣口袋摸出一个眼镜盒,戴上老花眼镜。

礼堂里的空气显得异常紧张,王洪文和徐景贤两人盯着王维国,看他有什么反应。

王维国拿起文件,刚看第一页,脸色就由黄变灰,两条眉毛紧紧地蹙起来,神色紧张,手拿着这几页薄薄的文件,微微颤抖,看完一遍,还想看看究竟是怎么回事?又翻回第一页看第二遍。

王洪文估计时间差不多了,问他:“看好了吧?”

王维国说:“嗯。”把文件放在他面前的茶几上。

这时,王洪文很严肃地说:“王维国,现在根据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命令,对你实行隔离审查,你要很好地交代自己的问题。”

话音刚落,王维国身后的丝绒门帘又撩开了,悄悄走进三个人,是南京军区保卫部李部长3人,他们走到王维国的身后。

听完王洪文的宣布,王维国没有显出特别惊慌,好像这是他意料之中的事情。他站起来,南京军区的两个干部一边一个抓住他的手臂,另外一个搜他的身,看看有没有武器。

王维国一言不发,任凭他们检查。检查完毕,几个军人用手一夹,推着他朝舞台旁的后门走去。在后门外面的马路上停着的军用吉普,将王维国转移到一所事先准备好的地下室,没有惊动小礼堂前面的人。

此时,王维国的司机和警卫员还在小礼堂前说说笑笑。他们随后被安排到其他地方。

王维国的问题解决了,王洪文和徐景贤都松了口气,再给浙江省委打电话,问南萍和陈励耘他们出来没有。省委办公厅说,南萍、陈励耘早在中午12点多就乘小轿车从浙江杭州出发,估计17时多可以到上海。

肖永银担心半道生变,假装从南京给20军军长熊应堂打电话问:“听说上海有个中央重要文件,请南萍去看,是否确有其事?”

“有,是南萍和陈励耘去。”

“走了多久?还有什么人?”

“各人带着秘书,南萍还带着爱人到上海看病,走了快两个小时了。”

肖永银放下电话说:“南萍挺有心眼。带着老婆绝不是看病,是准备通风报信的。”

下午三、四点钟,王秀珍到锦江饭店北楼接待外宾,看见洪文和徐景贤的车都在,就到小礼堂找他们。因为她也是上海市委书记之一,王洪文就告诉她自己到北京开会的情况,同时给她看了中央文件,并对她说:“我们已经把王维国抓起来了。等一下还要抓陈励耘。”

王秀珍一听,非常好奇,又很紧张,说:“我留下来看看,好吗?”

王洪文说:“好吧,好吧,你就留着吧。”

于是,在小礼堂里等候陈励耘的就变成王洪文、徐景贤、王秀珍三个人了。他们在小礼堂里一面聊天一面等人,一直等到傍晚 18 时,还不见杭州的车来。

“是不是出了什么意外,或是抓王维国的消息捅到杭州去了?”他们要秘书一再打电话给浙江省委,那边回话说,也没有任何消息。王洪文担心出问题,就叫市委警卫处派人开车沿着沪杭公路去找。一直等啊等啊,等到晚上 19 时多,只听外面嚷嚷起来:“来啦! 来啦!”

王洪文的秘书赶紧出去,看见南萍和陈励耘从车上下来。他过去跟南萍握了握手,但当陈励耘伸过手去时,他却把手缩回了。陈励耘一愣,一种不祥的预感笼上心头。王洪文的秘书宣布:随行人员,都不要进内,到别的地方休息。接着将陈励耘和南萍领进饭店。他们刚跨进二门,王秀珍也出来了,她跟南萍、陈励耘一一握手,陈励耘悬着的心又稍稍放下了一些。

王秀珍领他们进到礼堂,看见在座的有王洪文、徐景贤。高头大马穿空军服装的陈励耘一面跟王洪文他们握手,一面大叫:“今天倒了霉了,车掉到海里了!”只见他提着蓝色的裤管,裤腿上沾着泥浆水,水淋淋地往下滴着。

南萍说话文绉绉的,忙着解释:“我们想赶路,车开得太快,从杭州到上海的沿海公路,有一处地方是急转弯,路旁有标志,但司机没有看清楚,没打急转弯,车子就开到海边的泥塘里去了。”

陈励耘说:“今天真是不顺利,欲速则不达! 后来我们没有办法,

从泥浆里爬出来,让农民来拖车。拖了半天也拖不上来。又跑到公社去,派出几辆拖拉机才把汽车拖上来。”

王洪文说:“怪不得,多等了你们两个钟点。请坐,请坐。”

南萍、陈励耘两人就在对面的大沙发上坐下,显得很累。陈励耘点了一支香烟,深深地吸了一口,把腿伸直了。

王洪文对他们讲了最近到北京去开会的事,说:“中央有个文件,不发下去了,请你们来看一看”。说着,把文件递了过去。

据当时在场的徐景贤回忆:

中央文件递给南萍,南萍在看的时候,陈励耘把头也凑过去,两人合看一份文件。突然,陈励耘拿烟的手在半空中停住了,手指夹着香烟的烟灰烧得很长都不察觉。文件的内容,对他来说确实是惊人的消息。等他们看完文件,还未吭声,王洪文就宣布:“陈励耘,根据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命令,现在对你实行隔离审查!”与此同时,南京军区的几个干部也走到他身后。陈励耘有个特别的动作,当他听到毛主席的命令,就把两只手举起来,做了一个投降的姿势,神态非常沮丧,站起来就随着南京军区的干部从小礼堂后门走了。

陈励耘的回忆,文件是递给陈励耘,并对南萍说:“你就不用看了吧”。

陈励耘接过来一看,是中共中央《关于林彪叛国出逃的通知》。他只觉得自己浑身的血好像快要凝固了,双手微微发抖,不敢相信眼前的一切。当然,在当时,不要说是陈励耘,任何一个中国人看到这份文件都会紧张的出汗。

陈励耘刚放下文件,就听见王洪文用略带嘲讽的口吻说:“看完了吧?现正式宣布:根据毛主席指示,逮捕你。”与此同时,南京军区的几个干部也走到他身后。

陈励耘脑袋“轰”地一声炸了,当即说:“是主席的命令我服从。”

旁边过来两名南京军区的干部,将陈励耘的两手向上一举,顺势摸了一下他的腰,见没有手枪,便一边一个捉住他的手。

王洪文说:“这是毛主席的指示,我王洪文是没有权力逮捕你的。”

陈励耘定了定神,站直了,苦笑了一下,没有吭声,随着南京军区的干部来到礼堂舞台后面一间地下室。

地下室中间放着床,没有床架,直接搁在地上,床上有被子,床头有一只马桶。陈励耘痛苦到了极点,他做梦也没想到自己会这样被抓,他以为这一切南萍是早已知道的,有些恨起南萍。

此时已是晚上20时多了,肖永银立即向南京方面报告:“许司令,你交代的任务已经完成,那两东西都弄到手了,很顺利。”又说,王洪文要请他们吃晚饭,吃过饭他们就回南京。

再说南京许世友在肖永银他们走后,即忙着召开军区和省委常委联席会议,传达中央通知精神,研究贯彻意见。接着找军区下属大单位的主要领导谈话,有的请来谈,有的在电话上谈,向他们通报林彪逃跑的情况,要他们认真学习中央通知,抓紧做好清查工作。当肖永银向他报告王维国、陈励耘已经抓捕完毕,王洪文要留他们吃饭时,许世友眉头皱了起来,用命令的口气对着话筒说:

“肖永银同志,你们立即返回南京!你懂我的意思吗?回来时你们走北路,从嘉定、常熟、沙洲、江阴、镇江回南京。我让张明带部队走南路,从溧水、溧阳、宜兴、无锡、苏州返回,造声势策应你们。”

“是,我们立即返回。”肖永银马上领会了许司令的意图,“上海警备区董常云副司令带‘好八连’护送我们,保证把那两个东西弄回南京,请许司令放心。”

随后,许世友向周恩来复命:“王维国、陈励耘已被抓起来了,正在押送南京的路上。”

肖永银走了,王洪文请南萍到锦江饭店北楼吃饭,徐景贤和王秀珍两人作陪。吃饭时,王洪文告诉南萍:“这次我们接到命令抓王维国和陈励耘,你要把浙江的工作稳定下来,至于空5军的工作,叫白军长主持。”

正在说话的时候,上海警备区董副司令来报告说:“王维国和陈励耘两人已被安全押离上海。为了安全起见,路上给他们头上盖了一条军毯。”

陈励耘回忆说,他是被两名看守叫起来的,他们用一件军用雨衣蒙住陈励耘的头,把他往一辆卡车上搬。陈励耘从雨衣露出的一条缝隙看到车上全是兵,还架着两挺机枪。前面还有一辆卡车,也站满了兵。

车子一直开到南京军区通讯兵学校。陈励耘被关进了一间面积约8平方米的小房子。

第二天,南京军区后勤部政委、江苏省革委会副主任吴大胜来见陈励耘,他指指身后两位中年干部说:“这是中央来的温副处长,这是南京军区保卫部长,你的案子由他们负责。”从此,陈励耘进入了频繁的受审阶段。每星期可以洗一个澡,关了两个多月,大约12月初,押往北京。

王维国被逮捕后,周恩来指示王洪文在上海设立一个王维国项目组,每天要把清查的进展情况直接报告给周恩来。据当年“王维国专案组”负责人戴立清后来回忆,应该是在10月3日后,王洪文根据周恩来指示,成立了一个清查上海与林彪事件有关系的人和事的小组,对外叫“市委材料组”,设在余庆路转弯处,“康办”大院内西北角的一幢独立小洋楼里,两层楼。楼下是部队,楼上办公。小楼北面沿马路,所以门口武装警卫双岗。连上海市委书记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都不能进来。该组由王洪文直接领导,对口中央办公厅材料组,即中央专案组。

王洪文与上海警备区司令员周纯麟、空4军军长郑长华商定,将空4军认为与林立果、王维国有关系的40多人秘密的集中在大场的“南京路上好八连”隔离审查,他们有:驻江湾空军26师、驻盐城空32师、驻硕放空15师的大部分师长和政委、空4军军部机关的处以上干部、如蒋国璋、袭著显、宴剑峰等等;王维国的妻子和儿子王大章、女儿王伏凤等。而空4军军机关的干部则全部集中到五角场的空军政治学校,在这里办半封闭的学习班。空4军在上海的支左人员,则全部集中在华东化工学院办学习班。

“王维国专案组”在审查过程中,根据一些人员交代,发现了林立果等人在上海“选美”的事情。此时,“上海小组”成员也都被集中在“南京路上好八连”隔离审查。

根据相关人员的交代,“王维国专案组”找到了许多林立果“选美”的原始材料,包括笔记本、照相册以及伪装的照相机等等。

林立果在上海“选美”,就是为林立果找对象,开始还只是小规模偷偷地进行。1969年“九大”以后,叶群通过军委办事组,从北京派了

一个干部,拿着李作鹏的介绍信,为她的儿子林立果到上海“挑选对象”。那个干部到上海后找到东海舰队高志荣副司令员,说是要在上海物色几个女青年,调到海军系统的高干招待所当服务员。高志荣当时兼任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他就给叶群派来的那个干部开了一张上海市革会某部门的介绍信,让他到基层去自己选拔。

但是这个干部行动非常诡秘,一会儿穿海军军装,一会儿穿陆军军装,今天去学校,明天下工厂,东打听,西盘问,专找漂亮的女青年。这引起了群众的怀疑,向上级领导作了反映。上级领导派人查问此事,那个干部见情况不妙,就回了北京。

后来,林立果在上海空4军成立了“八人小组”,主要任务也是“选美”。当时空4军政委王维国对他的心腹说:“这是为天才人物选助手,是有伟大深远的意义的。”

“八人小组”扩大成员后,由林立果亲自命名为“上海小组”。按照林立果的规定,关于他的任何活动,是不准留下任何文字痕迹的。但是“上海小组”成员陶某还是把林立果在上海的每一次活动,按照时间的先后作了详细的记录,他的这本记录本后来成了林立果的重要罪证。

# 第1216回：搞对象，手段多层出不穷 难置信，用权力无法无天

林立果每次到上海活动，都住在巨鹿路空4军招待所大院内一幢独立的花园洋房里。这里原来是上海社会科学院的国际问题研究所，文革开始后被占用了。花园洋房被高高的围墙包围着，汽车从巨鹿路穿过一条长弄堂，可以驶进大铁门一直开到客厅前面的草坪旁边另一扇小铁门，又可以直通空4军招待所大院。这个地点既隐蔽又方便，林立果就在这里直接指挥“上海小组”的“选美”。

“上海小组”的成员也集中在招待所里，基本上是两人一档，共同行动。而林立果自己往往也参加其中的一挡。

“上海小组”找人的方式很多，第一种是“盯梢”。就是看见漂亮的女子，就紧盯在人家后面。一般都是开轿车出行。左边握着方向盘开车的是“上海小组”的一个成员，右边前座上坐着穿军装的林立果。轿车沿着马路边的人行道，缓缓地行驶，时间一般选择在工厂、学校、机关，商店上班的时刻，马路上来往的行人络绎不绝。发现了长得漂亮的年轻姑娘，会马上命令左边的驾驶员跟上，轿车就慢速前进，紧紧尾随着被“盯”的姑娘，一直要盯到那个姑娘走进某个工厂或者学校为止。随即他们下车，跟着那个姑娘进门，认准她的具体去向。然后回过头去找这个单位的人事部门，拿出部队的证件和介绍信，说是来招部队文工团团员或是部队医务人员等等，向人事部门调阅有关档案，了解那个姑娘的姓名、年龄、婚姻史、家庭情况等。那些基层单位的工作人员出于对解放军的信任和热爱、又看到他们随带的证件齐全，手续齐备，对他们的要求决不会拒绝。

书面档案摘录好以后，林立果等又当场提出要和被物色的本人作一次谈话。于是，这个年轻的姑娘就被找到单位人事部门的办公室，与两位军人谈话。其中一人和她随便聊开了天，先是说明来意，然后问她想不想当演员或是医生，有哪些爱好和特长等等。另外一个穿军

装的人偶尔也在旁边插上一两句话,但是更多的时间却在摆弄一只草绿色的军用背包。这只军军用背包普普通通,半新不旧,和任何一个解放军战士用的并无二致。这只背包放在桌上,也不会引起任何人的注意。可是,谁曾想到,就在这只毫不显眼的背包里,却隐藏着一架高级照相机。背包内层,四周用硬衬衬好,使它立在桌上而不会卧倒,背包的一侧,挖了一个小洞,里面的硬衬上也相应地挖了一个小孔。照相机被固定在背包内壁上,它的镜头,正好嵌在硬衬的小孔里。通过背包上的小孔,照相机可以对准任何需要拍摄的对象。背包的另一侧,拖出一根线头,那便是照相机的快门按钮。当那位年轻的姑娘进来、坐下、谈话及出去的过程中,她万万不会想到,自己的全身像、半身像、正面像、侧面像、说话(露齿)像,微笑像……统统都已经被摄入了镜头。

林立果他们"选美"活动的第二种方式,就是"相面",这是从第一种方式发展而来的。因为"盯梢"虽有收获,但是费时费力,而且有一次差点发生严重事故。那次,林立果和旁边开车的"上海小组"成员,同时盯着马路上的女人看,结果驾驶员手里的方向盘没有把稳,伏尔加轿车撞到了马路边的电线杆上。亏得车速较慢,林立果没有受伤,但是车撞坏了。林立果气得连声骂娘,从此以后,"选美"的方式就较多地采用直接"相面"了。"上海小组"的20来人,分成两人一组,分片包干直接到工厂、学校……,通过各个单位的领导,一个一个车间,一个一个教室,挨着看过去。"重点"单位如剧团等文艺团体,则由林立果亲自去看演员排演,练功等,直接进行"相面"。那些正在工作、上课或是排戏的年轻女孩子,谁也不会想到他们是来"相面"选人的。凡是被"选美"小组选中的人,就和第一种方式所讲过的一样,被叫到本单位的办公室谈话,然后被偷偷拍照……这些照片经过比较对照,进行复选。凡复选被选中的相片,就正式编号,粘贴进照相册。

有了这些照相册,林立果就可以按图索骥,实行"点名"了。接下去,"上海小组"的成员动员被点中的女青年参军、人伍。

人伍后先进学习班,重点学习"林副部长"的"讲用报告"。这种学习班很特别,有时候只有一、两个人也办班。等到她们稍稍熟悉了部队生活,"林副部长"就找她们个别"谈话"了,地点就在巨鹿路林立

果住的那幢花园洋房里。

花园洋房的楼下是客厅和餐厅,大客厅的四壁都用古老的英国式雕花墙板镶嵌着,很有气派。

林立果的“谈话”地点是二楼的一个大套间,外间是会客室,浅色面料的沙发套扶手上,覆盖着白色的花边,沙发背上放着织锦缎的软垫。会客室的一隅放着小桌子和软椅子,桌上铺着白色的台布。

“谈话”都在晚上进行,谈到半夜23时左右,招待所的厨师就会做好饭菜、夜点心,由值班的“上海小组”成员送上楼。

套间的里面是林立果的卧室,靠墙安放着一张席梦思的大床,床上铺着当时罕见的电热毯。大床的两侧,摆着两只长条形的进口立体声音箱。床边的柜子里,放着一架立体声收录机和当时一般人从未见过的大量盒式录音带。

关于林立果在上海找人“谈话”的详细情况,在“上海小组”一位姓陶的记录本和一些人的交代揭发材料中都有记载。一旦林立果选中哪个已经入伍的年轻女性,就由“上海小组”的成员开车去把她单独接来,时间都在晚上七、八点钟以后。然后,“上海小组”的人就退到楼下大会客厅里等候,这叫做“值班”。“值班”必须值到“谈话”结束为止,不得中途离开或擅自上楼。如果林立果临时按铃吩咐要办什么事,也只能由指定的人员上楼。

等到陪同上来的人员退去以后,在二楼会客室的沙发上,林立果的“谈话”就开始了:“你请坐,叫什么名字呀?原来在什么单位工作?有些什么爱好呀?……”

等到女青年的忸怩、紧张的心态开始转变,“谈话”进入一个比较松弛的气氛时,林立果就逐步转入了主题:“你知道我是谁吗?”

“刚才带我来的那位同志不是介绍过了?你是林副部长……”

“不要叫职务嘛,可以叫我的名字。知道我的名字吗?”

“知道……人伍以后,听过您的讲用报告了……”

“噢,那只是一些学习体会,请多提意见……不过,这个报告的录音放给我爸爸听过,他还是赞成的……你知道我爸爸是谁吗?”

“不知道……”她确实是不知道,因为事先作过布置,不让“上海小组”的成员把底细告诉女孩子。

“你猜猜看……”

“那怎么猜得到呢?”

“先猜我爸爸是什么样的干部?”

“您都是副部长了,您的父亲肯定是个高级干部……”

“什么样的高级干部?”

“是将军吧?”

“哈哈,那太小了……”

“啊……”比将军还要大,莫不是元帅吧,可是不敢说出来。

“再猜猜,我爸爸在中央担任什么职务?”

“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吧?”

“哈哈! 那还太小……”

“哦……”简直不敢想象,面前坐着的竟是“接班人”的儿子。

“哈哈哈哈……没有想到吧……”看着姑娘惊愕的,简直难以置信的神情,林立果得意非凡,两只眼睛眯成一条线:“谈话”到了这个时候,收到了他预期的出奇制胜的效果。林立果一般会有进一步的行为。但是,这些女孩子中也不乏刚烈之士,她们不是那么容易被欺侮,被凌辱的,因此,当林立果一旦越出“谈话”的轨道,有的姑娘严词拒绝,有的姑娘誓死不从。从陶某的记录本上看:

“x 年 x 月 x 日,副部长找 xxx 谈话,至晚上九时半结束,送回。”

“x 年 x 月 x,副部长找 xx 谈话,谈至晚上十时,不理想。”

凡是这类记录,都蕴含着一段曲折而又激烈的斗争。接着,“上海小组”会通知有关部门,把这个姑娘放到部队下属单位的某个偏僻的地方去当女兵,过着几年与世隔绝的生活,为的是怕她到处乱讲,泄漏“机密”。

至于一些没能逃脱魔爪的女青年,在记录本上也记下了她们的命运:

“x 年 x 月 x 日,副部长找 xx 谈话,晚十一时进夜餐,至凌晨三时结束后送回。”

“x 年 x 月 x 日,副部长找 xx 谈话,晚十二时进夜餐,直至天明。副部长早晨说‘昨天晚上犯了路线错误’”

看来,凡是进夜餐的,往往是林立果可以得手的信号。至于“犯路

线错误”的说法,在本子里有过多次记录。林立果所谓的犯一次“路线错误”,似乎就意味着一个清白的女孩子被糟踏,被凌辱了。

有一天,“上海小组”的成员在淮海中路上开车“兜风”寻人,发现一个姑娘长得漂亮,暗暗尾随,跟踪进了某弄某号,然后马上找派出所支左的空4军代表了解情况,得知这家小家碧玉名叫李勤贞,不到20岁,典型的上海姑娘。家住上海幽静的西区,距离巨鹿路空四军招待所并不太远。

李勤贞的父亲过去是个小资本家,很早就和妻子离异,李勤贞的祖籍是天津,外婆家在石家庄,她自己从小跟着母亲住在上海,中学毕业后在家中待业。姑娘面容俏丽,身材匀称,有着一股上海姑娘所特有的灵秀、妩媚之气,还有那种天真烂漫的“嗲劲”,非常讨人喜欢。

于是,李勤贞的个人经历,家庭情况等调查材料,以及从各种角度给她偷拍的脸部,半身,全身的照片等,统统都被送到了林立果手中。林立果表示十分满意,立即批准“入伍”。空4军政委王维国下令给李勤贞办了人伍手续,并给她改名为李云。

李勤贞穿上新军装,回到家里见了母亲,母女俩当然欢喜不迭。

她被分到上海西郊哈密路的空军第三医院,以学习医务知识、熟悉护理业务为名,日夜住在医院里,以便林立果随时召见。

不久,林立果来到上海,果然在巨鹿路空军招待所的召见了李勤贞。

这天晚上,林立果和李勤贞“谈话”,还是用“路线交底”的办法,开始时装得一本正经,渐渐地,用隐晦的语言进行暗示,最后亮出自己的身份——副统帅的儿子、空军作战部副部长。在女方吃惊和害怕的情况下,林立果图穷匕见,刻意求欢。

当天晚上李勤贞毫无思想准备,她毕竟是个纯真无邪的青年姑娘,万万意想不到这个道貌岸然的穿军装的年轻“首长”,居然会向她提出这种卑鄙无耻的要求,所以哭着拒绝与林立果发生两性关系。

林立果也没有勉强。

第一次“路线交底”的失败,使王维国和“上海小组”的成员大伤脑筋,于是调动各方面的力量做李云的工作,甚至连空军第三医院个别领导也直接过问起这件事情来,派了一个女干部专门找李云谈话,

规劝说服,软硬兼施,晓以利害。

在进行“思想工作”的同时,还采取“组织措施”——提前把李云提拔为上海空军第三医院的正式护士,享受排级待遇,从拿战士津贴一下子变为领取部队的干部工资。

林立果再次来上海,接二连二地“召见”李云,此时的李云,也没法不崇拜林副部长一家的显赫地位,希望有朝一日能成为他们家庭的成员。这样,她的脆弱的防线崩溃,林立果终于得手。一天晚上,李云在林立果的甜言蜜语下,成为“林副部长”最宠爱的秘而不宣的“上海夫人”。

林立果将李云藏在巨鹿路招待所,不让她去医院上班了。两个人厮混了很长一段时间,直到一天,林立果单独飞回北京,留下李云一个人,在上海守着空房,苦苦地等待着林立果。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毫无消息。她向“上海小组”提出,要到北京去当面见见“林副部长”。“上海小组”向王维国请示,答复是“副部长”在北京的地址是保密的,为了“副部长”全家的安全,不同意李云去北京,要她继续耐心“待命”。

李云左等右等,没有回音,一气之下,离开上海出走,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这下子王维国和整个“上海小组”都慌了手脚,他们一怕李云跑到什么地方去告状;二怕李云一时想不通,自寻绝路,“上海小组”不好交代。王维国一声令下,“上海小组”几乎全部出动,通过各种途径寻找李云。可是找不到下落,只查到李云过去有一个男朋友,住在虹口区。王维国立刻命令他所控制的上海市公安局虹口分局军管组,把李云的男朋友拘捕起来,单独关押,由“上海小组”直接审讯,旁敲侧击地逼问李云的去向,一连逼问了两个星朋,毫无所得。

王维国他们实在没有办法了,索性把李云的母亲也直接抓起来,要她交代李云的可能去处。李云的母亲身陷囹圄,又惊又怕,被迫说出了一连串亲戚朋友的家庭地址。“上海小组”立即按图索骥,追踪寻找,还是毫无所得。最后,李云的母亲说她可能去石家庄看望外婆去了。“上海小组”成员连夜乘飞机赶往石家庄,总算找到李云,把她带回上海,这才使王维国等松了一口气。

李云回上海以后,依然闹着要见“副部长”。“上海小组”不敢得

罪这位林立果的“上海夫人”,又担心她到处乱跑,更忌讳她和母亲搅在一起。于是,索性一不做,二不休,将李云的母亲送到江苏北部海边的一个劳改农场——大丰农场去劳动改造。

李云过去的男朋友,被莫名其妙地关押了一段时期。“上海小组”勒令他今后切断和李云的一切联系,在得到他的承诺以后,把他放了。

对李云本人,王维国等人让她暂时转移到外地的一个空4军军管单位,客客气气地要李云在那里小住一个时期,生活条件、日常伙食等尽量搞得优裕一些,实质上是把她软禁了起来。

过了一个时期,林立果又问起李云的情况,王维国想了个办法,让自己的女儿和江腾蛟的女儿一起,陪着李云去广州中山医学院上学。这个三人“读书小组”,由上海空军第三医院的一名护士长亲自带队。林立果在广州白云机场有一个秘密住所,他经常飞到那里去。林立果十分欣赏王维国的安排,他一到广州,就把李云接到豪华的白云山招待所同居。这位“上海夫人”和林立果久别重逢,当然倍受宠爱。王维国还派空4军政治部文化处的副处长李伟信随侍在林立果的左右。每当林立果召见李云,都要由李副处长取出他亲自去香港采购来的避孕药片,当面交给李云两片,亲眼看着她吞下以后再送走。

李云原来梦想跟着林立果可以飞黄腾达,哪里想得到从此长期被软禁在广州,而且她根本不知道,自己的母亲早已被押送到江苏大丰农场去劳改了。直到林彪葬身异域以后,广州军区和上海联系,这对母女才得以返回上海团聚,李云也进了工厂工作。

# 第1217回：许世友，大骂田普收礼物 李德生，登门见黄、吴、李、邱

根据“上海小组”负责人蒋国璋和王维国驾驶员的交待，李伟信曾乘坐王维国的轿车，到上海友谊商店购买了许多高档次的食品、化妆品和日用品，足足放满伏尔加轿车后备箱。然后由王维国驾驶员开车，送李伟信秘密去南京。但是汽车过无锡后发生故障，不得不让无锡硕放机场空15师派车拉回，另换一辆车开到南京，天已黑透。他们“开到中山陵边上一条路，门口有警卫站岗，和里面联系后，车子放进去，开到一幢小楼门口，从里面出来个子不高的中年女同志，很客气的接待了李伟信，”驾驶员和李伟信把车上的东西都搬进了楼内……

上海“市委材料组”让王维国的驾驶员到南京实地指认李伟信送东西的地方，没想到竟是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的家，而当时出来接待的“中年女同志”原来是许世友夫人田普。上海“市委材料组”迅速将材料加印上报中央。因为许世友是华东地区审查林彪事件材料组的负责人，所以材料也送许世友一份。许世友大发雷霆，大骂田普不该背着他与王维国接触，更不该收他们的东西。

1971年10月，毛泽东大儿子毛岸英的遗孀刘松林也被抓到了上海。

毛岸英牺牲后，在毛泽东的劝说和亲自关心下，经时任空军副司令员兼空军学院院长刘震推荐，刘松林又与当时空军学院强击机教研室教员杨茂之结婚。1971年，杨茂之任驻盐城空4军32师副政委。“913事件”后，有材料反映王维国利用刘松林的特殊身份，向她打听毛泽东的家庭情况；还有材料揭发说她平时对江青有不满言论。空4军的清查组向王洪文报告，说已经对刘松林“保护性隔离”。考虑到关在空4军不方便，将她从空4军军部转到上海“市委材料组”，即位于大场的警备团“南京路上好八连”处。刘松林的丈夫杨茂之也被送到这里。

刘松林被送到上海大场的当天,王洪文和他的秘书廖祖康很快就从市区赶来了,与已在这里的“王维国专案组”,即上海“市委材料组”负责人戴立清一起,来到关押刘松林的房间。戴立清、廖祖康和女看守站在外面,王洪文进到房间。约半小时不到,王洪文叫戴立清进去,戴立清看见刘松林穿着军装,人很胖,哭得很伤心。

王洪文对刘松林介绍说:“这是专案材料组的负责人,你写好的材料封起来,交给他。”

刘松林抬头看了戴立清一眼。王洪文继续对她说:“你不要哭,自己要好好的想想,把一些事情说清楚,有什么事找他,不要找其他人,他姓戴,跟哨兵说一下。”然后对戴立清说:“专案组的其他人不许接触她。她写好材料之后,直接交给我。”

后来,刘松林在一个星期内交给戴立清两次材料。第一次是厚厚的一信封,让戴立清交给王洪文。戴立清立即交到王洪文手上,然后通过机要处快件密封送中央办公厅,交汪东兴收转。第二次是刘松林对戴立清说,她写了一封家信,给母亲讲小孩子事和家庭事的内容。戴立清也把信转给王洪文,并经王洪文同意寄到了北京。

没过几天,王洪文对戴立清说,“刘松林的事情,汪东兴报告主席了,汪传达毛主席指示:一些娃娃们不要关他们。”

于是上海“市委材料组”立即通知空4军党委,让刘松林回去。空4军后来向上海“市委材料组”报告,刘松林回到空4军的当天,就回北京了。

这期间,林彪的原秘书、时任127师政治委员的关光烈,也被武汉军区按通知护送到京,李德生亲自与他谈话,首先向关光烈指出:

“过去给林彪当秘书,是组织上的安排。但是你参加林立果企图谋害毛主席的活动,就不是组织上的安排了。在关系到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大是大非问题上,不揭发,不报告,这是犯了不能宽容的错误。你受党的教育多年,应当懂得这个道理。”

关光烈交代了他到北京后的经过,同时分辩说:“他们要我调防化连来,我说,不要说一个连,就是调一个班到北京也进不来。”

李德生认为这是实情,按照部队的规定,调部队进京,必须有军委的命令,关光烈没有这个权力。

李德生把同重点人员谈话的情况,都随时向毛泽东、周恩来作了汇报。毛泽东听了以后指出:林彪搞阴谋活动,有的人不愿干,有的人不敢干,真正死心塌地跟着林彪干坏事的死党,不会超过100人。他是副统帅嘛,有些人是跟着犯了错误的。

9月19日,李德生在京西宾馆召开空军常委会,叫民航政委刘锦平参加。

刘锦平是空军常委,“913事件”前他就因病住院,不知林彪已摔死在温度尔汗。在那个常委会上,李德生递给他一个条子,说吴法宪揭发他三条,其中最主要一条就是他和林彪关系密切。

9月19日下午15时,周恩来通知吴法宪和曹里怀、空军副司令员兼中国民航总局局长邝任农3人,到人民大会党谈民航的问题。

下午16时,吴法宪和曹里怀、邝任农3人来到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周恩来告诉他们,北京卫戍区从周宇驰和于新野乘坐的直升飞机上,查出了一部分材料,其中有广州军区空军参谋长顾同舟写给林立果的信,密告毛泽东的南巡讲话,说毛泽东已经在讲话中点了林彪的名。另外还有一个名单,周恩来要吴法宪辨认一下。

这个名单里的大部分人吴法宪是认识的,但也有少数几个人他不认识。于是周恩来要他同李德生一起,到空军司令部去查清楚。同时他还决定,由李德生负责,把名单上的人都送到亚疗监管起来。

散会以后,吴法宪到西山参加黄永胜召集的军委办事组会议。参加这个会议的有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北京军区和北京卫戍区的领导。周恩来指示由黄永胜代表中央传达了中央的《中共中央关于林彪叛逃出国的通知》。传达完文件,黄永胜又要求各部门回去立即组织传达,并开展揭发批判林彪等人的运动,运动的情况要向中央写出报告。

当晚,周恩来告诉吴法宪,空军传达中央《中共中央关于林彪叛逃出国的通知》的工作由他和李德生两人共同负责。

从9月19日起,李德生利用晚上的时间,按照周恩来9月17日对他的交代,准备分别去登门看望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纪登奎特意叮嘱:“德生同志,你得注意安全,这些人,什么事情都可以干得出来的。”

李德生知道他是好意,笑着说:“他们能把我吃掉?”

第一天晚上,李德生按事先约定的时间,乘车到了西山,黄永胜的住地门口,黄永胜的秘书和妻子都出来迎接。李德生一人下车,进入客厅,警卫人员留在外边车上。

李德生在客厅落座后,黄永胜的妻子和工作人员都先后退了出去。

“913”事件后,黄永胜的心情非常不好。凭他跟林彪的关系,他知道自己肯定是在劫难逃了。于是,开始把过去自己和林彪在一起的照片,有关的文件、字迹都烧了。据反映,这几天,黄永胜为了烧材料,把一个大瓷缸都烧炸裂了。他的小儿子要过来帮忙,也被他轰跑了。

面对李德生来访,黄永胜当然也不愿意谈什么,显得有点尴尬。

李德生有备而来,先是客气地问候黄永胜这几天睡眠可好?

黄永胜答道:“还好,还好。”

李德生说:“林彪的飞机已经在温都尔汗摔下来了,这个情况总长是知道的。后来,我们驻蒙古人民共和国大使馆报回来材料和图片,证实了摔的那架飞机就是256号,飞机上9个人的尸体,大使馆拍了照片,有的人依稀可以辨认,已经在政治局传阅了。林彪采取这样一个背叛祖国、背叛党的决然行动,许多人都没有想到。我们也没有想到。总长怎么看呐?”

黄永胜说:“林彪这个行动确实是背叛行为,我也是没有想到,没有想到的嘛。”

李德生加重语气说:“为了查清林彪事件的全部真相,中央最近很忙,查出不少新的材料。总理让我来看看你,希望你早点做出检查和揭发,向中央有个好的交待。”

黄永胜说:“我和林彪虽然是老上下级关系,但是,他干的许多事,我并不知道,他也不可能让我知道。有的事情,他是有心,我是无意。”

李德生知道,林彪给黄永胜的“手令”,两次到王飞手里,是要在谋害毛泽东、准备南逃的关键时刻给黄永胜出示的,但是都没有给成,没有证据证明黄永胜看到这个“手令”。他对黄永胜说:“这种情况可能有。他干的事情是不是都告诉你,是很难说的。但是,你知道的呢,是都讲了,还是有什么没有讲呢?”

黄永胜说:“这些日子我是在想。为了向党负责,我不能把表面的、零碎的现象作为事实去揭发吧。请你向中央转达,我会向中央做出交待的。”

李德生最后说:“我觉得中央是很慎重的,也希望总长能够郑重地作好检查和揭发,并且希望要抓紧一点。主席、总理都说,允许犯错误,允许改正错误,他们都寄予希望。请你珍重中央的这个态度。”

谈到这里,李德生觉得实在也谈不下去了,便告辞了黄永胜。

9 月 20 日凌晨 1 时,李德生找吴法宪一起同唐山空 6 军军长吉士堂、政委司中峰谈话,追查王飞 9 月到空 6 军遵化检查工作的情况,看王飞他是不是借检查工作的名义秘密到了北戴河。谈完话,李德生让吴法宪他们先回去,准备第二天再找王飞谈话。

凌晨 3 时,李德生又找吴法宪和空军参谋长梁璞一起辨认周宇驰带的那份名单,结果梁璞全部认得,名单上的人都是空军司令部的。李德生决定,他自己立即去亚非疗养院准备地方,同时由吴法宪和梁璞负责,按照周恩来的指示,将名单上的人全部送到亚非疗养院监管起来。李德生让梁璞具体承办这件事。天亮时,名单上的人已全部送到亚疗。

20 日上午,空军直属机关师以上干部在办公楼开会,由李德生传达中共中央 57 号文件《关于林彪叛国出逃的通知》。接着,吴法宪补充传达了周恩来在 9 月 16 日晚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总结的林彪十六条历史错误。李德生在讲话中还说:“吴司令多次向我主动作自我批评,并承担责任,我都报告了周总理。”

李德生在空军召开座谈会时,听到空军政治部有人揭发说,林立果在 1970 年空军“三代会”期间,作了一个讲用报告。当时搞得很神秘,对外封锁,这个材料一直不让总政治部知道,会议简报也控制得很严密。吴法宪在会上讲话,极力吹捧林立果的报告是“放了一个政治卫星”,林立果是“伟大的天才、全才、全局之才”。林立果在空军为什么有那么大的权力?李德生为此追问吴法宪,他连声说:“我们丧失了原则,我们不讲唯物论,我们犯了唯心论和先验论的错误。”

李德生要求查看党委会记录。总政治部工作组查到一年前,1970 年 7 月的一次空军党委常委扩大会上,确实有“空军的一切都可以由

立果同志调动,空军的一切都可以由立果同志指挥”的决定。

为了弄清林彪、林立果等人在空军的情况,同时,又要弄清空军其他领导人在这场斗争中所犯的错误和应当吸取的教训,李德生建议召开空军常委会。

20日下午,在李德生、杨德中的参加下,吴法宪召集空军党委常委扩大会。吴法宪检查说:“我是引狼入室,认贼作父。”但他辩解说:“‘三代会’报告后,我讲话说‘放了卫星’,以后就被他们抓住了,大肆宣传。今年在9师开了现场会,又要传达我的讲话,被我压住了。但他们就以广州军区将我们的军。(广州)大军区发到团以上。我是怕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所以采取拖的办法,打算等11月开师以上干部会来解决。”

李德生责问吴法宪:“你说只是讲放了卫星,虽然没发文件,但现场会是开了,影响是出去了。这个会,是以空军的名义召开的,你是以空军司令员、党委书记的身份讲话的,它的恶劣影响已经形成了。这个会,准备了一年多了,你们党委是有责任的。而且去的人越来越多,你们还计划召开全空军师以上干部参加的现场会。如果说那些是严重的政治问题,那么,1970年8月党委的这个决定,就是个严重的组织问题了,是关乎空军的领导权、指挥权的大是大非问题。无论从组织上、政治上看,你们背着党中央,把我们党领导的空军大权,交给林立果。这是个什么性质的问题呢?难道不应当好好想一想吗?”

吴法宪支支吾吾,难以回答。

当天晚上。李德生又来到西山吴法宪家中。他开门见山,对吴法宪说:

“林彪在庐山的错误,由于他的外逃,性质已经起了根本的变化。从空军机关揭发的事实,也都说明他的这个行为,是早有预谋的。你领导空军党委做出的‘空军的一切都可以由立果同志调动,空军的一切都可以由立果同志指挥’的决定,也就不能再以犯了唯心论、先验论的错误来解释了。你在常委会上的检讨是避重就轻的啊。中央给你们时间,希望你能够珍惜这个时间,尽快做出一个好的坦白交代。现在,总理让我来,再次转达中央的期望。”

吴法宪连说:“我犯了大错误,我听命于林彪,让林立果掌握空军

大权,我有罪啊!”

李德生说:“不要大帽子底下开小差嘛。你应当把错误的具体事实交代清楚,还应当把你知道的林彪罪行,揭发彻底。这才是正确的态度。”

吴法宪应道:“主任说的是,主任说的是。主任啊,我有罪啊,我们空军出了这么大的事情,我作为司令员、党委书记,确实是罪不容赦。毛主席在我的书面检讨上批示,‘要敢于反潮流’,批评我‘缺乏正大光明的气概’,批评得好,批评得对。这几天我一直在思考自己的问题,我要检讨,我要深刻检讨的。”

李德生问:“你原来的书面检讨是林彪外逃以前的事了,现在林彪的问题性质已经起了变化,你还有什么新的检查交代没有?对于林彪,你有什么要揭发的吗?”

吴法宪说:“我正在准备,正在准备,一定要深刻地检讨。”

李德生说:“已经一个星期过去了。只要是想交代问题,并不见得要拖很长时间的。希望你抓紧啊!”

从吴法宪家里出来后,李德生又来到李作鹏家。

李作鹏接到通知,早已在家等候。他戴着墨镜,李德生很难看出他的表情。

李作鹏长期做参谋、机关工作,是比较有能力的。他感恩于林彪,曾经表示,“生与林副主席同生,死与林副主席同死”。现在林彪死了,他还活着,还要揭发林彪,思想弯子够大的。

李德生坐定后,询问李作鹏这几天的思考情况。李作鹏断然否认自己与林彪的阴谋有牵连。李德生问:“那么,山海关机场的命令为什么错传呢?”

李作鹏回答:“那是他们记录错误。”

李德生把中央的意见郑重的向李作鹏转达,希望他抓紧时间,认真地作一个像样的检查和揭发。

同邱会作的谈话,是在总后勤部大院邱会作的家里。李德生遇到几乎同样的情况。邱会作只讲正在回忆思考,但是不谈自己的具体错误。李德生说:“已经几天过去了,这些天查获了林彪的大批罪证,党中央希望你们能够有所揭发,帮助中央弄清林彪的问题。你们自己的

错误,现在更应当检讨得彻底一些好。”

邱会作默默无语。

李德生将他同黄、吴、李、邱接触的情况和看法,向周恩来作了汇报。

9月20日,周恩来召集空军、民航总局负责人开会,谈民航工作问题。他当面责问吴法宪:为什么把林立果捧得那么高,甚至把空军兵权都交给他?吴法宪无言以对。

# 第1218回：外交部，厅级主任接二秘 听汇报，查飞机坠毁原因

9月20日，中国驻蒙古大使馆奉国内指示，派使馆二秘孙一先送林彪飞机坠毁现场照片及有关材料回国，并当面汇报。为了安全，又让中国建筑公司驻蒙古公司的蒙语翻译贺喜陪同他一起回国。他们俩坐在包厢里，由于那时中蒙两国交流少，整个软卧车厢里只有他们俩人。他们透过车窗，可以看见火车外，苏联军队比以往更多了。到了二连浩特，中国的军人也比平时增加了许多，干部都佩戴着枪。边防站的王站长告诉孙一先，现在是一级战备！到了集宁，那里停靠的一列军用列车正往下卸军车和重型武器。孙一先想，难道真与那架失事飞机有联系吗？

9月21日，国际列车到了北京站，孙一先看见外交部办公厅主任符浩和他的秘书王万慧在站台上。孙一先刚下车，就被符浩拉到一边低声说："我就是接你来的！"

孙一先暗暗诧异，颇有些受宠若惊，心中暗想："我一个二等秘书，用得着大主任来接？"

更让他弄不懂的是，他被直接送到外交部招待所住下，并被告知："不许与外界联系，不许与家人联系，见了熟人就说是送文件来的，马上就走。"

原来，是周恩来专门指示符浩去车站接车。

孙一先把带来的胶卷交给外交部的孙秀娟，自己洗洗澡就睡了。谁知刚躺下没多久就有人敲门。开门一看，竟是王海容！她可是外交部司长里惟一的部党组成员。"这样的大人物夜里来见我？"这又让孙一先吃惊不小。

还没等孙一先缓过神来，王海容已对他说："跟我走，去人民大会堂汇报。"这时已经是半夜，孙一先坐在汽车里，随王海容来到了大会堂。他一进大厅，看见周恩来正在那里向什么人交代工作，这让他又

一次感到意外:“原来是总理见我?!”

随周恩来听取孙一先汇报的,除政治局委员外,还有外交部的姬鹏飞、韩念龙、符浩,公安部部长李震、北京军区空军司令员李际泰、中央办公厅警卫局副局长杨德中等。

会议开始时,周恩来看到只来了孙一先一人,当即警觉地问孙一先:“一同回来的不是还有一个翻译吗?”

孙一先一时被周恩来严峻的神色弄得不知怎么回事,忐忑不安地回答说:“他回家了。”

周恩来脸色一沉眉头顿蹙,严厉地责问:“谁让他回家的?”

在一旁的符浩回答说;“是我让他回家的。因为他没有到过现场,也不了解有关情况”。

周恩来有点火了:“那也不行,飞机坠毁他总知道吧,立即派人把他找回来!”

随后,周恩来严厉地批评了符浩:“你当过兵没有? 你不是会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吗? 要加强组织纪律性嘛!”

两个小时后,那位翻译贺喜被人从酣睡中叫醒,送进了警卫森严的外交部招待所。此后,孙一先和贺喜二人就这样被“隔离”了半个来月,直到他们听了有关林彪事件的传达后,才恍然大悟,恢复了自由。

此时,周恩来对孙一先说:“你谈谈现场情况,有没有带地图来?”

孙一先把自己标的现场位置图拿出来。

周恩来问:“离伊尔库茨克有多远?”

“直线距离700多公里。”

“山海关在什么地方? 多伦呢? 贝勒庙呢?”周恩来从山海关到温都尔汗,用力一划,微微点了点头。

这时已经是9月22日凌晨1时,李德生、吴法宪和空军副司令员兼民航总局局长邝任农也都来了。周恩来只介绍了李德生,然后让孙一先继续汇报,按提纲讲。孙一先谈到飞机残骸时,周恩来没多大兴趣,甚至还闭着眼睛打了个盹儿。孙一先想:“总理太累了。”

但看尸体照片时周恩来却来了精神。孙一先带去的照片大概有200多张。周恩来对许文益大使等人向死者默哀的照片显得不屑一顾,扔到一边。其它的照片却都非常仔细地看,尤其是5号尸体。

听完孙一先的汇报,周恩来指示中央警卫局副局长杨德中主持研究飞机是怎样坠毁的,外交部办公厅主任符浩也参加。他们拿着照片到东大厅,与北京军区空军司令员李际泰、公安部长李震等一起分析研究。

李际泰不是飞行员出身,但是从1957年起就在北京军区空军担任领导职务。他仔细看过照片和现场示意图后,认为飞机可能是因为燃料将要耗尽,被迫紧急着陆,失去平衡,右翼向下倾斜,触及地面,肚皮与沙土磨擦,骤然升温,引起油箱着火,从而导致整机爆炸。从当时的情况看,飞行员驾驶技术很好,选择了惟一的处理办法,虽然不排除机件失灵,或被地面防空武器击伤而紧急着陆,但这些可能性较小。从死者的遗体上看,都取下了手表等易于擦伤身体的物品,说明迫降是事先作了准备的。

在场的都是外行,一致认为李际泰说得有道理。

杨德中认为有必要找一架同类型的飞机,并与驾驶员及有关地勤研究一下。符浩建议,看飞机时,应该把到过坠机现场的孙一先带上。

再说孙一先汇报完后,又到外交部和孙秀娟一起洗照片,整整一个星期,都在洗照片。一批一批地洗,写说明。10月3日,他接到电话:去外交部礼堂听报告。当他听韩念龙副部长念到:“中共中央正式通知:林彪于1971年9月13日仓皇出逃,狼狈投敌,叛党叛国,自取灭亡”时,脑袋嗡的一下大了,怎么会是他呢?!那几具尸体的照片在孙一先眼前晃来晃去。

10月1日凌晨2时,杨德中一行人去西郊机场看252号三叉戟。

空军参谋长梁璞听说飞机是擦地皮着陆起火爆炸,有点意外,说在夜里能找到这么一大块平地难度相当大。潘景寅的驾驶技术还是比较高。1970年从巴基斯坦飞回这批三叉戟,是他带队飞回来的。中国驻蒙古大使馆向国内写的飞机失事报告,分析周围无高大目标,迫降场的选择合理,着陆点到燃烧区有几十米距离,以及死者躯干烧伤不重,无高空摔折等,看来飞机不像是空中着火爆炸,而是着地后爆炸起火。梁璞认为迫降时速度可能很快,肚皮和右翼尖同时着地,猛一擦地可能“飘”起来。

根据李际泰等人的纸上谈“机”,中央确认256号三叉戟是“自行

坠毁”。

而当时苏、蒙的调查结论则是由于飞行员操作失误所致。蒙古政府组成由国防部第一副总长图门登贝尔勒少将为首的政府委员会,成员以去过现场的有关部门负责人为主。应蒙方邀请前来的苏联有关部门高级专家协助该委员会调查。

1971 年 10 月 12 日,在蒙古国防部、总参谋部举行的一次会议上,苏军驻蒙古司令官克里夫达中将介绍了苏方对坠毁飞机调查的看法。他说:

“坠毁的中国飞机隶属驻扎在北京郊区的第 34 师,中方说该机民用。我们很容易证明,这架飞机属于军用,机上人员穿着军衣,这是否认不了的。还有所有人都带了手枪,还有自动枪、飞行地图、呼号,从这些来看,完全表明这架飞机是军用的。找到的枪大部分是有子弹的,有一支上了膛。是什么原因要子弹上膛?是用于野外降落,被俘时自己使用?除此没有别的目的。估计飞机的平均时速 670 公里,说迷航没根据,这架飞机装备现代化,不可能不知道飞到哪里。如果说迷航,飞机应该发出求救信号,但没有这样做。”

克里夫达强调“雷达是看不见的,当地人看见这架飞机飞得非常低,声音很响。”

克里夫达认为,至于燃料用尽完全是谎言。剩多少油?还能继续飞多长?通过仪表就能知道。从着火情况看,证明这架飞机有足够的燃料。

蒙古专家认为,当时飞机翅膀灯没有打开,根本没有考虑照明,也没有放下起落架。按一般迫降应该是尾部先着地,但林彪专机不是这样,飞机头部先着地。证据就是所有仪表在着地一刹那都已经碎了,降落时发动机没有熄火。飞机落地后又第二次跳起来,再着地,飞机就解体燃烧了。不过发动机没有完全烧毁。

中国空军专家组的研究报告认为,林彪专机是以较大速度尾部接地,形成跳跃,然后两翼先后折断,机身呈圆筒状,带惯性前冲,破碎解体。机上人员被甩出。在此过程中,油箱破裂,造成大面积燃烧。

苏军克里夫达说:“飞机弹起又第二次着地时,机上的人还活着。为什么?因为尸体主要是在机舱左边,说明有准备,企图通过舱门下

飞机。

从9具尸体都没有戴手表和穿鞋看,他们是做了迫降准备的。

如果我们到现场早一些,也可能有轻伤员被活捉。从9具尸体的最后动作看,至少飞行员和他旁边的那位在被飞机甩出时还活着。因为他们的表情痛苦,似在火中挣扎过。”

苏联克格勃任命侦察员扎格沃茨丁将军和病理学家托米林组成鉴定小组,10月中旬来到蒙古温都尔汗坠机现场。蒙古公安部司长姜仓巴拉桑上校、国家保安总局四处化学鉴定专家班兹拉格奇少校,陪他们一块去现场。

苏联来的人员中,还有苏联国防部法医局局长、克格勃侦察局长和根据头骨恢复原貌专家。1971年10月19日,鉴定小组在坠机现场打开坟墓,看到两具尸体镶着金牙,怀疑是林彪和叶群。他们把尸体挖出来,割下那个年龄较大的和女尸的头颅,在锅里煮掉皮毛后,取走了这两人的头骨,带回莫斯科。11月中旬,苏联克格勃侦察员扎格沃茨丁将军和病理学家托米林两人又冒风雪赴蒙古,将林彪无头的尸体再挖出来,查看肺部是否有结核病症。托米林用双筒显微镜找到林彪尸骨的右肺有钙化点。

蒙古政府委员会于11月20日写出《查明飞机坠毁原因的报告书》。其结论如下:“有民航标记的256号飞机是军用飞机,用于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事需要。多数座位被拆除,用于特种的军事需要。中国256号飞机由于飞行员犯下了飞机驾驶错误而坠毁,不是因为某种迫降原因而降落的。”

在林彪座机右机翼根部有一圆洞,后来很多人说那是被导弹打的。

是中国的导弹打的吗?中国那时最先进的是60年代后期生产的仿萨姆2的红旗-2号(HQ-2)中高空、中近程地空导弹。该导弹的最大射程只有35公里。温都尔汗早已超出了中国导弹的射程范围。

萨姆－2 导弹

会不会是飞机迫降时引起燃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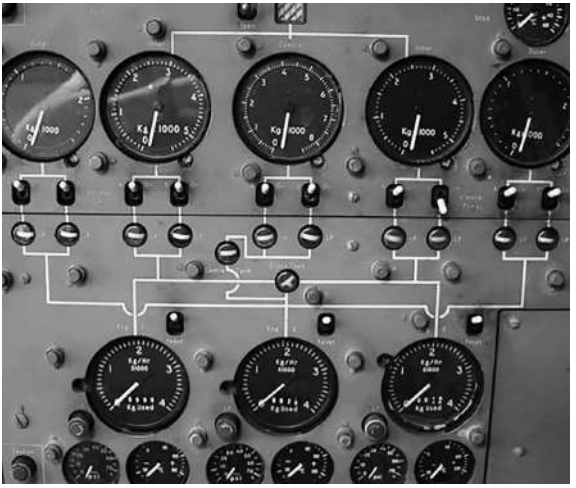
三叉戟机翼内侧油箱与机腹几乎是在一个平面上,以机腹擦地着陆,机翼油箱不可避免地要摩擦到地面,油箱里的剩油肯定会因为摩擦起火爆炸。

图为民航退役的三叉戟。注意机翼与机腹几乎在一个平面上,在野外不用起落架迫降,不可避免的要使机翼摩擦到地面,从而引燃机翼内的剩余燃油。

256 坠机时已经飞行了约两个小时，机上至少仍有约 2.5 吨的燃油。256 上的 5 块油量表都是在大约沿着圆周 330 度范围内均匀的以公斤为刻度做出标示的。每 100 公斤一个小刻度，每千公斤一个带有数字的大刻度。5 块表的满刻度分别是：中央油箱 8500 公斤，内组油箱 5500 公斤，外组油箱 2500 公斤。

燃油使用顺序是先耗用中央油箱，然后机翼外侧油箱，最后机翼内侧油箱。飞机驾驶员可以控制连通机翼内外组油箱的活门的开关。

当 256 只剩下 2.5 吨燃油时，中央油箱早已耗完，而机翼油箱组的外组油箱也已耗空，全部燃油都已经集中到机翼的两个内组油箱里面。也就是说每个油箱还有约 1.3 吨燃油。



图为三叉戟燃油表

潘景寅为什么没有利用这仅剩的 2.5 吨燃油寻找最近的机场进行降落。尽管就在附近几十公里范围内就有温都尔汗飞机场。但是温都尔汗机场没有夜航设备，潘景寅夜间驾机，就是飞到温都尔汗机场上空，也不可能发现简陋的红土跑道。

大约半个小时航程外还有乌兰巴托机场可以谋求安全着陆。但

是256号没有这样做,也没有在最终迫降之前尽量用尽机上燃油,而是选择了机翼内侧油箱还带着2.5吨燃油时,以机腹擦地方式在野外实行迫降!

# 第1219回：等十天，决定抓黄吴李邱 写检讨，吴法宪彻夜未眠

9月20日，军委办公厅通知叶剑英、陈毅、徐向前、聂荣臻等老干部于21日上午到三座门会议室开会。

21日这天，黄永胜一改常态，变得特别客气和随和，亲自在门口迎接老帅们，向他们表示欢迎。并说，今后要在老帅们领导下工作。

会议由黄永胜传达文件，主要是关于林彪叛逃摔死在蒙古境内温都尔汗的“913”事件。

从9月21日0时起，吴法宪开始写检查，一直写到凌晨4时才睡觉。

晨2时30分，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召集周恩来等开会。

这天，周恩来致信毛泽东，拟同意汪东兴的报告，在中央政治局下设一专案工作小组，掌管和整理有关林彪、陈伯达全部案件材料，分类择要送毛泽东和政治局委员审阅。该专案工作小组以纪登奎为主，汪东兴为副领导工作。毛泽东阅批：“同意。”

9月21日后，邱会作基本上就是赋闲在家。他告诉妻子胡敏和儿子邱路光，把桌子上玻璃板下面的有关林彪、叶群的照片都取出来，烧掉。同时让秘书们把办公室的资料、材料中，有关林彪的内容也整理出来烧掉，但文件登记本上有登记的都不要动。他还对胡敏说：“给豆豆介绍对象的事今后肯定要问到你头上，你要有思想准备。”

邱会作对邱路光说：“我练字写的那些东西，整一下都烧掉。”

过了一会儿，邱路光拿着陈伯达送邱会作的字：“天地驰驱客，英雄清净身。留心千古事，不厌一寐尘。”和叶群的诗：“繁霜冷雨仍从容，晚节尤能爱此功。宁愿枝头抱蕊老，不能摇落坠西风。”问：“烧不烧？”邱会作说：“统统烧掉。”

9月23日，毛泽东给黄、吴、李、邱的10天期限已到，他把汪东兴找来说：“黄永胜他们怎么处理了？你去问一问总理。”

汪东兴马上赶到人民大会堂新疆厅向周恩来汇报说:“毛主席催问对黄永胜等人的处理。”

周恩来让汪东兴等一下,等他接见完外宾后,同他一起乘车去见毛泽东。

这天,周恩来到机场迎接访问中国西北地区后回到北京的柬埔寨宾努亲王和英·萨利特使等。之后,在机场召集北京市及民航系统干部开会,了解传达关于林彪事件的中央文件后的反应。强调在清查林彪一伙罪行时,要防止扩大化,指出:“死心塌地跟着林彪走的,只是少数人、个别人。我相信,绝大多数同志是忠于毛主席的,是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的。”会上,他还就尽快恢复正常通航秩序等问题发表了意见。

晚23时30分左右,周恩来和汪东兴来到中南海毛泽东的住所,向毛泽东汇报黄永胜他们在拼命烧材料。

毛泽东说:“他们是在毁灭证据,这些人是要顽抗到底了!”

周恩来对毛泽东说:“我马上办。今天晚上办不成。明天早上一定办成。”

从毛泽东那里出来后,周恩来对汪东兴说:“你不能离开中南海了。要严加保卫毛主席的安全。我们有事时可以找张耀祠、杨德中,必要时找你。”

当晚,周恩来驱车到人民大会堂,先是在新疆厅开了个会。会后,他叫来杨德中进行部署。杨德中离开新疆厅时对周恩来卫士高振普说:“今晚有重要行动,你要提高警惕,多个心眼,再从警卫处调两个人协助你。”说完就走了。

晚23时左右,杨德中回来了。高振普急忙上前问他:“怎么样?”

杨德中说:“一切就绪。”就进去向周恩来报告。

几分钟后,周恩来把高振普叫进去说:“咱们回家。”

高振普答应着接过文件包跟在周恩来身后。他想:“不是有行动吗,怎么又要回家?不会出了什么事吧?”

周恩来到家后,杨德中告诉高振普,今晚的行动改在明天上午,仍在大会堂。

原来,9月24日早上,李先念率团去越南访问,去机场送行的领导

人中有邱会作。机场送行人员名单早就排出来了。因为林彪出逃的消息还被紧紧地捂着,对黄、吴、李、邱采取措施也不能对外透露风声,如果按日程要到场的邱会作不出现,就可能引起各种猜测,所以周恩来临时改变了计划,等送走李先念后再动手。

9 月 23 日下午 14 时,空军继续召开党委常委扩大会议。会上,吴法宪再一次做了大约两个小时的检查。

晚上 22 时左右,吴法宪接到中央办公厅王良恩转达的周恩来指示,要他把空军的实力,以及部队、学校的位置和防空作战的部署制成表格,并附上地图送给周恩来。吴法宪交代给参谋长梁璞和作战部的人员,要他们立即制作表格和写好报告。

这天晚上,邱会作也在给毛泽东写检讨报告,他的秘书进来向他报告了第二天的活动安排,第一件是:早 6 时去东郊机场送李先念出访越南;第二件是:下午有外事活动,主要是谈军事援助问题;第三件是:早 8 时到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参加政治局会议。这时,邱会作稍微愣了一下:“按惯例政治局会议都是晚上开,为什么改在早上开?”

9 月 24 日凌晨 4 时,吴法宪的秘书张叔良接到中央办公厅的电话通知,要吴法宪上午 8 时到大会堂福建厅参加军委办事组的会议。

接到通知后,吴法宪问黄永胜开什么会? 黄永胜说他也不知道。吴法宪估计很可能是要处理他们的问题了。他赶紧催空军参谋长梁璞立即整理出周恩来所要的空军全部实力的报告,即刻上送。

随后,整个晚上都在修改自己在 23 日下午空军党委常委扩大会议上检查的吴法宪,据此作为他的检讨,让秘书张叔良修改后重新抄录一遍,由他签名后立即发出。他还在检讨后面附上了揭发材料。

接到吴法宪的催促后,空军参谋长梁璞带着作战部的参谋天亮即将表格和报告作好,吴法宪拉着空军政委王辉球一起审阅以后,签署上报。

由于这些文件牵涉到空军的整个情况,属于核心机密,因此在送走之前,吴法宪亲自给周恩来的秘书打电话,要他自己到西华门去接。打完电话,他又派空司作战部副部长吕秋振亲自送这些文件到西华门,并交代一定要亲自交给周恩来的秘书,并打收条。

待检讨报告送出,吕秋振也把空军实力报告的收条拿回来以后,

吴法宪这才放心。此时,天已经大亮。

早上6时,吴法宪叫警卫员薛帮喜帮他打一点早饭,并要秘书张叔良叫他的妻子陈绥圻到他的办公室。

陈绥圻来了以后,吴法宪说:“这么多天了,我一直在办公室没有回家,主要是怕下面的部队出事。我马上要到大会堂开会,现在有几件事情要交待一下。第一、我的皮包里存放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给中央的报告,你统统带回去保存一下。第二、我去开会可能回来,也可能回不来,我已经请求中央对我进行审查,我相信自己是经得起审查的,我自己了解自己。第三、今后孩子要靠你抚养照顾,我可能见不到他们了。”

陈绥圻说:“你的问题我最清楚。我相信你。千万要活着!”

吴法宪对陈绥圻说:“我整晚都没有睡觉,很疲劳,你先回去吧。”

陈绥圻拿着皮包走了。吴法宪站在办公室的窗户前,一直看着她走回家中。然后嘱咐张叔良把9月12日晚上的记录整理好。他认为这个记录可以清楚地说明他在9月12日晚上到9月13日都做了什么。

9月24日一早,邱会作按时来到东郊机场。他走进机场贵宾厅,看见来的人还不多,于是找了一个他觉得适当的位置坐下。服务员送过茶来,茶几上有烟,可以随便抽。他一边喝茶,一边抽烟,看到一切,都还和过去是一样。

一会儿,李德生过来了,他挨着邱会作坐下,主动与邱会作搭讪:

“你们总后的常委会开得很好嘛,中央的第一号简报就登的你们的会议情况。”

“第一号,第几号还不都一样,号数不起任何作用!”邱会作说道,可以听出其中的情绪。

李德生说:“这也可以看出你对毛主席、中央的态度嘛!”

邱会作“嗯”了一声,随后说道:“我准备发动总后的常委对我搞揭发。”

李德生问:“能搞起来吗?即使搞起来了,也只能说些柴米油盐的事,这有什么用?”

稍停片刻,李德生又问:“你们总后常委是怎样分工的?你哪有多

少时间管总后的事,日常工作是谁管?”

邱会作说:“家里的工作由张池明政委抓总。”

这时,周恩来进来了,他又是一夜没有睡觉。走进候机室后,和往常一样,周恩来与大家相互握手,然后就坐。

起飞时间就要到了。临去机坪前,李先念不无担忧地对周恩来说:“我很担心主席和总理的安全。”

周恩来听到这个话,顺手把他的手放到坐在旁边的邱会作的手上,一边拍着邱会作的手,一边对李先念说:

“你放心去,一会政治局要开会,研究今后的工作。”

他们一同步入停机坪,气氛平静。高振普紧随在周恩来的身边警惕着周围的动静。在停机坪上,邱会作和周恩来并排站在一起,记者拍了不少的镜头。

飞机滑动了。周恩来转身对纪登奎、邱会作说:

“8 点钟福建厅有会,知道吗? 传达主席的指示。”

邱会作回答说:“知道。”

其实纪登奎知道开会的内容,邱会作也接到了开会的通知,但他却不知道今天的会对他是个什么结果。

周恩来又说:“我就直接去大会堂了。”他问邱会作:“你还回家不回家?”

邱会作回答说:“那我也不回家了。”

周恩来:“你不回家,还不给胡敏打个电话。”

邱会作笑着对周恩来说:“给她打电话干什么,不用。”

周恩来说:“那好吧,到大会堂,我们先谈一谈。”

邱会作的小车开出机场不远,他的司机告诉他:“后面有随车。”

邱会作说:“让开,让他先走。”

过了一会,司机又说:“停了,不走。”

就这样边走边停了三次,随车还是跟在后面。因为中央办公厅有规定,政治局委员都要有随车,邱会作也没有多想。

人民大会堂是内外两重门,门与门之间有个短过道。邱会作走进北门外面的一道门后,过道上就有警卫干部一把将他拉到旁边的小房子里去了。邱会作还以为是有紧急电话,没想到一进小房子就搜摸全

身。他还来不及说话,检查他的人就说:“今天要检查一下。”

当邱会作走进到里面的第二道门时,看到有两个人正将他的警卫员小朱连拉带拽地向西走去,他只看见小朱的后影。邱会作一下都明白了!然后两个人把他押进了福建厅。

跟随邱会作多年的老司机张自贵也被扣押在人大会堂地下室,他又气又纳闷地对警卫员小朱说:“还敢扣押我们,准是反革命政变了!”

邱会作一进福建厅,就发现一切都变了。厅内过去的布置是东西一圈椭圆形布置的沙发,对着门是敞口,离门不远的地方还有一扇屏风。这天的布置是:东边只有两张单人的沙发,南边四张沙发,北边还有两排若干张沙发。厅内沙发后面有若干警卫人员面无表情地站立在那里,每个人都手扶着腰上的手枪。

副总参谋长张才千,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吴忠、政委杨俊生,还有公安部革委会主任李震等人在北面的沙发外站着。他们好像都没有看见邱会作,邱会作也没有同他们打招呼。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王良恩在厅内走来走去。

邱会作被指定坐在南面的四张沙发靠东面的最后一个位置上。刚坐下,周恩来的警卫员高振普进来对他说:

“总理叫邱副总长到河北厅去谈话。”

邱会作刚起身,中央警卫团政委杨德中立即对高振普说:“现在不谈了,等会一起谈。我给总理解释。”

过了一会,高振普又来喊邱会作。杨德中有些不高兴地说:“告诉你不谈了,怎么又来喊?一会我跟总理解释!”

高振普边走边嘟囔说:“是总理叫我来的。”

原来,从机场到大会堂的路上,杨德中坐在周恩来的车上。周恩来对杨德中说:

“咱们把车开快一点,先一步到大会堂,再与邱会作谈一谈,争取他多交代一些问题。”他们的车速加快了,后边的车速也跟着加快。因为都是红旗车,性能一样,不可能甩掉它。车上原有的通讯设备,也因为要反窃听,全部拆掉了。现在只好干着急,只好到大会堂再说了。

到了大会堂北门,杨德中虽是抢先一步下车,已来不及了,邱会作已经进了福建厅。

# 第1220回：都隔离，叶剑英主持军委 九二六，开“老同志座谈会”

7时30分，吴法宪动身前往人民大会堂。汽车一到北门，就有中央警卫团的人员下来拿走了警卫员薛帮喜手中的皮包。进了第一道门后，吴法宪也被带到门房，说：“毛主席有命令，今天开会不准带枪。”接着搜身，并拿走了他身上的眼镜和钢笔。

吴法宪走进福建厅，警卫让他坐在第一排的沙发上，后面站着一名警卫战士。吴法宪心里想：“文革开始后，大概这样办过了很多人，现在终于轮到我们这几个了！”

这天早晨6时30分，住在西山的李作鹏正在卫生间内一边解便，一边批阅文件。忽然，秘书刘继祥进来告诉他：“中央办公厅通知，上午8时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开政治局会议。”

李作鹏迅速把紧要的文件批完后，即刷牙洗脸，吃完早点。这时还不到7点半钟，他同老伴董其采到室外散步，对老伴说：“过去政治局开会都是下午或晚上，而今天则是上午8点，这个会议很特殊，可能凶多吉少。”

董其采说：“林彪叛国后，把我们搞的日夜不安，活人不如死人干净。”

李作鹏说：“死不得，死了就说不清楚了，自己做的事，自己心里有数，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东西。”

董其采：“现在是有理三扁担，无理扁担三。”

谈了一会儿，时间到了，李作鹏上车进城，在人民大会堂北门下车，一停车就感觉与往常不同，8341部队两个干部站在他的车旁边，一个从他的警卫员手里接过公文包，陪他进入大会堂。另一个带着他的警卫员和汽车向东开去。

李作鹏进了大会堂北门，跟着他的那个8341部队干部用力将他推进北门内的卫兵室。他见到两个人正对先到的铁道兵司令员刘贤

权进行搜身,就大喊一声:“这是干什么?”那里的人立即高声回答:“伟大领袖毛主席指示,参加今天会议的人,都要进行检查。”

李作鹏顿时什么都明白了。这时,黄永胜也被推进来了。他们衣服口袋内的香烟、火柴、眼镜、语录本、剪指甲小刀、擦汗手帕、卫生纸等等,全部扣下,包括公文包。

检查完毕后,由两个军人将他们带到福建厅。他们看到,吴法宪、邱会作已经坐在那里,李作鹏紧挨着吴法宪左边坐下。

福建厅里没有烟灰缸、茶杯,因为考虑到黄、吴、李、邱都是军人,担心他们会有过激的举动,会前已全部收走。

过了一会儿,周恩来在杨德中的陪同下,和叶剑英、纪登奎一起走进福建厅。大家从沙发上站起来,周恩来等人和黄、吴、李、邱4人一一握手。

就坐后,杨德中坐在周恩来和黄、吴、李、邱之间。

周恩来先喝了一口茶,并扫了黄、吴、李、邱4人一眼,然后开口说:

“主席对你们的问题有决定。这几天各省市和各大军区的电报,你们都看了。上海、陕西、天津的意见很尖锐,政治局内部的意见也很尖锐,这样就只好先对你们采取一些措施了。党内发生过许多重大问题,伟大领袖毛主席都处理得很好。这次对你们的问题会处理得更好。”

说到这里,他又喝了一口茶,并略微思考了一下,开始说:

“出事都10天了,你们几个人同林彪的关系至今都没有交代,一言不发,一字不写,不知是什么原因?林彪叛国,造成很大的被动,上了党章嘛,几乎要毁掉我们50年的党。纪登奎曾说,这是十次路线冲击最严重的一次。中央等了你们10天,你们现在不能指挥部队了。这样,伟大领袖毛主席决定你们暂时离开工作的岗位,给你们每个人找了一个地方,你们暂时离开工作几天,到那里去好好睡个觉,好好地反省检查自己的错误,认真考虑自己的问题。你们不交代怎么行呢?林彪还准备了一架飞机,准备把你们带走,不走就绑架你们。”

此时,吴法宪支吾地说:“我昨天晚上向主席、总理写了一个报告,凌晨5时送出去的。”

周恩来对吴法宪的话没有做任何表示。他接着说:“不知你们在想什么?‘九大’时该照顾的都照顾到了,还有什么想法嘛!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新力量,是好事,这有什么不好嘛!”接着,他又补充了一句:“政治局的产生,你黄永胜是参与其事的。”

周恩来歇了一会又说:“过去有人在病中说了几句话就怀恨在心,那些问题都可以说清楚嘛!”

“有人在病中”,邱会作认为是指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之后,九大之前,江青有一次对林彪发脾气说:“蒋介石搞了一个党国,我们现在搞了一个军党、军国。”在庐山会议之后,江青自己在政治局会议上主动说:“我在患病的时候,说过一些话,可能欠妥,但那是病人说的话呀。”周恩来当时就批评她:“话不能这样说,不能把说了不适当的话都推到病的问题上去。”

此时,周恩来继续说:“主席说过,出事之前,什么都听不到,现在情况像雪片一样飞来了。有的雪片可以打死人。你不信吧,人家又说得出来;完全听吧,又实在触目惊心。伟大领袖毛主席决定,让你们几个离开工作岗位一段时间,专门反省自己的问题,时间不会太长,你们要相信主席,相信中央。”他接着又重复说:“主席说等了你们10天,不能再等了。10天的时间,你们怎么一个字都没有给主席写?”

黄、吴、李、邱4人都默默无语。

周恩来最后说:“你们的家属子女,我们会照顾的,绝不会像杨成武对叶副主席子女那样。关于军委的工作,以后由剑英主持,他也是政治局委员嘛。党仍对你们寄予希望,不要辜负毛主席。”

至此,周恩来停了好久没有说话。他几次拿起茶缸子喝水,一边喝水,一边在想什么。他对着叶剑英和其他在座的军委办事组的人说:“大家都说说嘛,只我一个人说?”

叶剑英张了一下嘴,但一句话也没有说。

纪登奎说:“今天总理多说一点,我们以后同他们谈话的机会还有呢!”

随后,周恩来先问了黄永胜几件事,主要还是那封在直升飞机现场搜到的林彪写给黄永胜的信,黄永胜当然是完全否认,态度也很强硬。

周恩来又问起李必达的事,黄永胜有些激动,生气地大声说:“总理啊,我们对江青同志是有自由主义,但是你清楚,在座的也清楚,这是因工作中和江青同志有矛盾给逼出来的。如果是主席批评我,我接受批评。总理您想想,一个秘书有意偷听首长的电话,这样的人能要吗?你们在座的能容忍身边有这样的人吗?!”

周恩来从座位上边站起来边说:“你先走吧。”一边走过去和黄永胜握手,叶剑英、李德生也过去和黄永胜握手。北京卫戍区司令吴忠将黄永胜带走。

黄永胜快走到门口时,周恩来又说:“你们听好,你们的夫人和孩子都是革命的。你们回来的时候,他们有什么闪失,找我姓周的是问!”说完用手在自己的胸脯拍了一下。

接下来,周恩来又问吴法宪:“林立果大学没有毕业,就当了什么副部长,林彪的子女都在你们空军工作。空军搞得很乱,你们空军已被人家在下面挖空了。你吴法宪是有责任的。你把空军搞得一塌糊涂!”

吴法宪闻言立即站起来说:“我向毛主席请罪,我对不起毛主席!我们军委办事组反对江青同志,我向毛主席请罪,我对不起毛主席!”

这时,李作鹏突然大声说:“吴法宪胡说八道!是他自己讨好林彪、叶群。”李作鹏是对吴法宪说“军委办事组反对江青”不满,此时,他激动得不能自已。

周恩来没有理会李作鹏,对吴法宪说:“你也走吧。”他和叶剑英、李德生三人与吴法宪握手。北京卫戍区政委杨俊生将吴法宪带出去了。

周恩来又坐下来对李作鹏说:“不要急,有充分的时间让你们考虑问题。”他接着问:“张学思是怎么死的呀?”

李作鹏说,张学思的案子是中央专案组直接负责的,和海军没有关系,海军也没有插手。

周恩来没再往下问,转而问道:“听说海军层层站队搞得很厉害?作鹏,你应很好检查海军层层站队的问题。”

李作鹏说:“总理的批评是正确的。海军不团结,基本上就是一个派性问题,是有些扩大化,没有控制住。我有责任,我检讨。”

李作鹏走时,周恩来3人也过去与他握手。

最后是邱会作,周恩来有些生气地说:“你怎么也搞进去了?”

邱会作没有吭声,也没有正视周恩来。接着,周恩来把胡敏给林立衡、林立果找对象的事说了。

周恩来接着说:“你们抓了李必达,连李必达的未婚妻都搞得不知下落了。王瑞华同志搞到哪里去了嘛。”

王瑞华是李必达的未婚妻,在301医院高干病房任护士长,工作表现很好。李必达事件发生后,301医院没有马上处理她,因为她是“九大”代表,把她送到四医大学习去了。

邱会作走前与周恩来握手时,含着泪对他说:“我相信毛主席,相信中央,也相信我自己。”

周恩来看了邱会作很久说:“好。”

此时的邱会作十分激动,他双手握着周恩来的手吐出一句话:“希望再见到总理!”

周恩来又盯住邱会作看了一眼,用很低沉的口气说;“到那里去,好好住下!”

随即,周恩来召集各总部、各军、兵种负责人开会,传达中央处理黄、吴、李、邱四人的决定。之后,起草中央《关于黄永胜等离职反省的通知》:

中央鉴于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参加林陈反党集团的宗派活动,陷入很深,实难继续现任工作,已令他们离职反省,彻底交待。军委日常工作由军委副主席叶剑英同志主持,并筹组军委办公会议,进行集体领导。

9月29日 经毛泽东审阅同意,此《通知》发至大军区党委常委和省委常委。

9月24日下午,张才千副总长召开总参会议,传达周恩来当天上午同几位副总长的谈话和毛泽东的决定:由叶剑英副主席主持军委和总参的工作,黄、吴、李、邱“隔离反省”。

叶剑英回到家后对秘书说:“以前我不想再穿军装,不再管军队了,现在看来还要管啊!你去把各大军区的名单要来。”

秘书还不知道中央已经要叶剑英管军队,顾虑地说:“我连各单位

的电话都没有,怎么要到名单?”

“你给军委打电话,现在会给你了。”

秘书马上明白了叶剑英的意思,不一会儿,各个方面的情况就源源不断地送到了叶剑英的案前。

9月24日,随李先念任团长的中国党政代表团赴越南访问的成员中还有总参的副总长阎仲川,他是早已确定的代表团成员,并已通知越方,仍随团出访。他原定的任务是赴越南南方考察越南军民抗美救国斗争情况。但到9月28日代表团回国前,突然通知他任务有变,要他与代表团一起回国。周恩来、叶剑英、纪登奎、李德生等到机场迎接代表团。代表团成员下飞机后没有各自回家,却被引导到贵宾室。大家刚刚坐下,周恩来便态度严肃地对阎仲川说:

“阎仲川同志,中央已经决定黄永胜离职反省。你是黄永胜的得力助手,你要好好揭发他的问题,首先是政治方面的,还有生活方面的!”

然后他向叶剑英等人点了点头,独自先行离去。阎仲川思想抵触,心想:“要我当黄永胜的助手,是组织的安排,当助手而‘得力’,有什么错?”

叶剑英先讲话了:“你还年轻,又有水平,只要好好揭发交代,还有前途嘛!”

李先念只说了一句:“好好揭发交代咯!”

接下来是纪登奎和李德生讲话。他俩介绍了半个月的清查工作,希望阎仲川认清形势,与林彪、黄永胜等人划清界限,积极揭发他们的罪恶活动。

9月26日,叶剑英邀请乔冠华、章文晋和熊向晖到他家中谈话。叶剑英说:“林彪乘飞机叛逃,本来可以用导弹打下来,但是主席不同意,说‘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由他。”

他还说:“如果打下来,解释不清楚;如果叛逃成功,也会增加麻烦。机毁人亡的结果最理想。”

他兴致勃勃地给大家念了董必武在政治局讨论林彪叛逃事件时写的一首诗:

铁鸟南飞叛未成,

庐山终古显威灵。

仓皇北窜埋沙碛，

地下应惭汉李陵。

熊向晖当时笔录了这首诗，并注云："董必武同志作于1971年9月16日晨3时（在政治局讨论林彪叛逃时）。叶帅转告。"但此诗后来未见于《董必武诗选》，而载于叶剑英的《远望集》，并冠以《斥林彪》的标题。

9月26日至10月15日，受中共中央委托，李富春连续主持召开"部分在京老同志座谈会"，揭发批判林彪一伙。陈毅、聂荣臻、徐向前、蔡畅、邓颖超、邓子恢、张云逸、张鼎丞、曾山、王震等出席。

在人民大会堂会议厅里，王震第一个抢先发言，陈毅打断了王震的发言，说："王胡子，还是让我来讲，算我们两个人的！"

正在住院的陈毅，拿出他在医院里写的几行提纲，满腔义愤，慷慨激昂，一口气讲了两个多小时。

第二天，周恩来提出给发言人录音的建议，陈毅坚决赞成："我希望把录音保存下来，作为一种档案，将来写军史、党史都可以参考……口说无凭，录音为证。"陈毅仿佛忘记了自己是个癌症患者，再次作了3万字的发言，整整讲了一个上午。话刚讲毕，一股殷红的鲜血从鼻腔里涌了出来。从此，他就再也没有下过床。

9月27日，人民大会堂。周恩来开完会特意把将要去巴黎的外交部办公厅主任符浩留了下来，郑重地对他说："有关林彪叛逃的事，见到黄镇同志时，把情况告诉他。"周恩来顿了一下，又说："还有，中央已决定逮捕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人。这些也告诉他。"

周恩来还叮嘱说："只告诉黄镇一个人。"

周恩来此举，意在向中国驻法国大使黄镇交个底，让他知道林彪叛逃，不会影响中国对美国的态度。这样，当美国驻法国使馆武官沃尔特斯与他联系时，他心中就有底了。

事情完全如周恩来所料。9月中旬以来，汇集到尼克松和基辛格面前的各种情报表明，中国国内发生了一件重大的事。一架中国喷气式飞机在蒙古温都尔汗坠毁后，中国所有的领导人都没有公开露面，所有的机场都关闭了，军队也似乎进入了"一级战备"状态。尼克松和

基辛格都在担心会不会由于中国国内政局的震荡而影响中美关系,他们早就怀疑中共高层领导在对美政策问题上存在着巨大的分歧。直至接到沃尔特斯报告,说他和黄镇大使接触,黄镇的态度照样爽快,中国对安排尼克松总统访华的事没有中断,尼克松和基辛格悬着的心才算落下来。

# 第1221回：细安排，护送林立衡回京 国庆节，奉命进驻毛家湾

9月27日，北戴河的武健华接到汪东兴从北京打来的电话，通知他：把林立衡和她的未婚夫张清林，一起妥善地护送到北京玉泉山。

武健华立即和姜作寿一起研究了他们回京路上的安全保障问题，决定：用一节公务车，在沿途加强对公务车的警戒，最大限度减少与路人的接触。在北戴河站上车时，汽车要开到站台，人员直接进入公务车；在北京站下车时，汽车也要开到站台，人员直接离开公务车。姜作寿带领一支精干的小分队，携带速射武器及手榴弹等，严防路上发生袭击事件。从北京火车站到玉泉山，林立衡、张清林乘防弹保险车，前后有警备车随行。

9月28日，武健华同林立衡等人按警戒方案离开北戴河。并于当天晚饭前，顺利到达北京西郊玉泉山。武健华向林立衡介绍了玉泉山的情况，告诉她，中央安排她在这里住一段时间。有事可找中央警卫局主管玉泉山工作的李钊副局长。林立衡和张清林分别住进玉泉山5号楼的两套客房，在小餐厅吃饭。

将林立衡安顿停当，武健华立即用电话向汪东兴报告："林立衡已安全抵达玉泉山。"

汪东兴让武健华同林立衡谈谈。武健华提出："如果能有个女同志同她交谈更方便些。"

汪东兴说："好吧，我叫谢静宜去。"

谢静宜向毛泽东报告，毛泽东对谢静宜说："这事我知道了，是总理交给你的任务，总理给我说过了，我同意。你见了林豆豆，代我向她问好。她和她的父母是有区别的。父母是父母，子女是子女，父母的问题不应该由子女来承担。父母革命，不见得子女就革命，父母是反革命，不见得子女就是反革命。何况林豆豆是在她父母逃走之前，就向中央报告了。她是有功的。"

9月28日,中共中央下发《关于扩大传达林彪叛国出逃的通知》,决定将林彪事件传达到县、区、乡。

9月29日,中共中央下发周恩来起草的《关于黄永胜等人离职反省的通知》。

9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初步总结“913事件”以来各项工作。会议商定:

(一)逐步扩大中共中央《关于林彪叛国出逃的通知》的传达范围。

(二)建议在叶剑英主持下,组成由叶剑英、谢富治、张春桥、李先念、李德生、纪登奎、汪东兴、陈士渠、张才千、刘贤权十人为成员的军委办公会议。

(三)军委三总部分别由李德生、张才千、余秋里主持。

(四)提议华国锋为国务院业务组副组长。

(五)派刘西尧等人去国防科委主持工作。

(六)由周恩来、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纪登奎、李德生、汪东兴、吴德、吴忠十人组成中央林陈反党集团专案组,下设由纪登奎、汪东兴领导的办公机构。

会议还研究了有关外事工作。

中国驻蒙古大使许文益催问蒙古政府,要求运回“913”坠机死者的遗体,催要死者遗物,蒙古的态度又强硬起来。9月22日15点30分,蒙古外交部二司司长紧急约见中国大使,说:“奉政府之命,要求中国政府在9月25日前就失事飞机越境侵入蒙古领空一事,做出正式解释。”

许文益说:“9月14日已经奉命向额尔敦比列格副外长作了正式解释。”

二司司长说:“那不够,要求你们9月25日前用书面形式给以正式解释。”

9月25日,蒙古外交部二司策伦朝达勒司长说:“今天已经是25日,中国政府还未就中国飞机侵入蒙古领土一事做出正式解释,对此只能表示遗憾。既然遇难人员的身份已经清楚,死者亲属是有具体人的,因而机上人员究竟是谁也就清楚了。希望中方将他们的姓名、年

龄、职务和照片提供蒙方。蒙古政府只有在研究中国政府的正式答复后,才能考虑对中国政府的要求予以答复,如果你们拖延答复,会不会产生不适宜的情况,我对此表示担忧。”

9月29日下午15时30分,蒙古再次以要事约见中国大使许文益,对中国政府未就飞机失事原因做出正式解释表示遗憾。并称此事已在蒙古人民中间引起各种传说和议论,所以蒙古决定发表一条简短消息,以说明事实真相。

许文益说:“对蒙古政府的要求,中国政府采取了严肃认真的态度,及时作了两次说明,希望在中蒙关系开始正常化的时候,不要做出与此相违背的事情。”

蒙方强调不是发表政府声明,只是发表一条一般的消息。

两个小时后,蒙古广播电台在新闻节目中播出《关于中国飞机失事》的消息:

“中华人民共和国喷气式飞机一架,今年9月13日凌晨1点50分侵犯蒙古人民共和国领空,在深入我国领空飞行时,于2点30分在肯特省依德尔默格,由于不明原因坠毁。在中国飞机坠毁的地方找到烧得残缺不全的9人尸体、枪支、文件和物品,证明这架飞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空军的飞机。已经让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蒙古人民共和国大使馆的代表们到现场观看了失事飞机。就中国飞机侵犯蒙古人民共和国领空一事,蒙古方面向中国方面表示了抗议,并要求做出正式解释。”

9月30日,蒙古各报纸和外语广播都报导了这一消息。蒙古《真理报》将这条消息登在四版很不显著的位置。

中国驻蒙古大使馆将这则消息录音翻译出来汇报国内:“中国飞机侵入蒙古上空”。

在中国驻蒙古大使馆举行的国庆招待会上,蒙古国防部外事处处长大使馆工作人员问王中远:“林彪还活着吗?”

当时王中远并不知道林彪已死,他按国内指示回答“一切照旧。”

蒙古国防部外事处处长很会意地点点头,走了。

国庆节前后,中国驻蒙古大使馆奉命停止向蒙方交涉。中国没有坚持要回尸骨,现场所有物品也都没有移交中国。以后蒙方也没有再

提及失事飞机。

10月1日,和往年不同,天安门前的庆祝集会和游行以及晚上的焰火晚会都被取消,理由是“节省开支”和“战备需要”。代替它的是周恩来、叶剑英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分别在首都各大公园同群众一起“游园联欢”,“共度佳节”。这是建国二十多年来第一次用这样的方式庆祝国庆。

国庆节,武健华没有休息,又赶到毛家湾林家大院。

林彪旧居毛家湾一号

林家大院位于北京西城区平安里东南,中南海西北,皇城根附近的两条小巷,南巷称前毛家湾,北巷称后毛家湾。这里是明代大学士毛纪的故居,胡同也因此得名“毛家湾”。

五十年代初期,这里曾经是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高岗的家,林彪当上国防部长以后,搬了进去,并且划进了平安里医院的一部分,加以扩建,这条胡同的两头都有警卫战士站岗。

沿西皇城根北街的一条胡同,有一道高高的灰色围墙,南墙上有两扇大大的铁门,门里是一个占地面积1.9万多平方米的大院子,建筑物的面积为1.1万平方米。这里就是林彪在北京的住地:毛家湾一号院。

前毛家湾一号门是工作人员的宿舍门,三号门是警卫中队驻地门,七号门是林彪办公室秘书室。后毛家湾有一道不常开的大门通向林彪、叶群住宅后院,另一道小门通向林办秘书室。

进了毛家湾大门,可以看到东、西两院。西院是林彪、叶群的住宅,东院是林办工作人员办公的地方。东院有一幢三层楼房,文件、图书都在楼上。楼内有几间办公室,文件集中放在二层楼的一个大房间内,按照文件保管的要求,登记、分类、编号,有序地分存在橱柜中。武健华他们对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印发的文件以及各部委、各单位印送参阅的各种文件基本上未动,只在日常办理的现行文件、材料、案件中查询异常的问题。对这样的材料,他们都是一件件筛过的。因为工作量大,要求急,他们不仅不能休息,还得加班加点,每天搞到午夜前后,在警卫部队食堂吃点挂面、馒头片、咸菜等,填饱肚子就可以了。

武健华他们将拣选出来的文件,开始是一件件地送到林彪专案组,后来改成一批三五件地送给他们,其中不少是党内高层干部人际关系方面的材料。

“913”事件后,北京卫戍区司令员的吴忠曾带人从毛家湾查抄到林彪1971年5月23日写给毛主席的一封信,信的原文是这样的:

毛主席:

5月20日,我找了周总理,谈了谈有关党内团结和相当于政治局以上人员的安全问题,为了总理考虑和请示主席,现将我谈话的大意报告主席,请主席考虑并盼主席能找总理谈一谈,由总理采取落实的办法。我的意见如下:

经过五年来的文化大革命,而这个大革命是非常必要的和正确的,我们是取得了很大的胜利,现在是要巩固胜利,是要贯彻九大的团结路线,保证九大以后特别是批陈整风以后(批陈整风是必要的和正确的,因为陈伯达是反革命分子,是大坏蛋,他利用庐山会议的机会乘机作乱,因此必须肃清他的影响),党中央和中央政治局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保持巩固的团结,预防思想糊涂的人和冒险家采取意想不到的冒险行为,破坏党的团结,导致秩序的混乱,引起国内国外的不良反应,为此要想出具体办法。我想了以下办法,不知妥否,盼主席酌量:

第一,实行四不一要的做法,一是在暂定十年之内,对现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的大军区第一把手、第二把手(经过批陈整风以后,现任中央和中央局[按:口述如此,似应为中央政治局]人员基本上应当说是可靠的),实行不逮捕、不关押、不杀、不撤职等四不,如果他们某个成员有错误,可经过党内思想批判来解决,他们有病,可找人代替工作,如果病故则提升其他人接替,至于久病要求退休者则按退休干部处理,一要就是遇特殊情况要执行主席面授机宜指示;第二,将以上规定传达到北京以至其他必要城市担任卫戍部队的每一士兵,要他们根据这个规定,任何时候不执行除主席以外的任何首长有关对中央或相当于中央政治局以上人员的捉人、关人、杀人等乱令,如果他们借口是执行命令而执行乱令,则其本人应接受法律的严厉制裁,无论逃至何处,均应归案严办,而决不可托辞是执行命令而推卸自己的责任;第三,为保证首都安全,首都附近的三个人造山建议由华东、东北、山东各派一个独立营来担任固守;第四,建议三十八军调离华北,这个部队虽然是很好的部队,但放在首都附近不甚适宜,宜调往别处,换一个原二野、三野或一野的军来接替他们的任务为宜。

我的以上想法,是看了这次批陈整风会议文件,有的同志在担心着安全问题,他们的心情是忧虑的,因而是值得重视和深思的。

我想,为了防止万一发生事故起见,所以想到以上做法,但这些方法必然是不完备或甚至是不正确的,特报告主席,请主席考虑交总理遵办。关于第一条和第二条,甚至可以召集首都所有担任警卫部队的干部开会宣布,由他们口头上或文字上传达到每个士兵,并且每隔两三个月重复向士兵传达一次,十年不懈。十年后再看情况,基本上也应当根据这个精神办理。首都以外的部队可传达到师团以上干部。这些内容对外都应严格保密,尽可能免除副作用的发生。

我很想和主席谈谈,如主席什么时候有时间,请约我一谈。

此致

敬礼

据林彪的秘书于运深回忆,这封信的内容,是林彪把他叫去口授的。主要内容“四不一要”,即:

一是在暂定十年之内,对现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的大军

区第一把手、第二把手(经过批陈整风以后,现任中央和中央(政治)局人员基本上应当说是可靠的),实行不逮捕、不关押、不杀、不撤职等四不,如果他们某个成员有错误,可经过党内思想批判来解决,他们有病,可找人代替工作,如果病故则提升其他人接替,至于久病要求退休者则按退休干部处理,一要就是遇特殊情况要执行主席面授机宜指示。

当时林彪边想边说,于运深拿一张白纸记录。记录后,林彪并没有让形成信。过了三天,林彪决定不送了。这封完整的信是何时整理完成的?于运深也不清楚。

这年春天,叶群也曾在毛家湾的院子里一边晒太阳,一边口授一封林彪的信,由秘书王焕礼记录。信的大意是:

我(林彪)对部队要求不严,脾气不好,今后应该加强对部队的约束,听党和毛主席的话。

叶群说这是林彪的意思。但是叶群口授的林彪这封检讨信,也没有送给毛泽东,被压了下来。

吴忠向周恩来汇报了这封信。周恩来说他知道此事,林彪和他说过。他当时问林彪:“有这个必要吗?”

毛家湾的工作人员听起来不算多:秘书有6人,林彪贴身警卫人员2人,医生2人,林彪内勤2人,叶群内勤3人,加上通信员、管理员、司机、厨师、锅炉工等勤杂人员,一共20来人。但实际上,叶群常调人来“帮工”,看书的、写字的、做诗及修改诗词的、抄写的、裱糊字画的、照相的、做文章的、“找人”(选美)的、收集图书的、抄录整理卡片的、绘制图表的,加起来比正式的工作人员多得多。

毛家湾两个月紧张而忙碌的清查工作到1971年底结束。林彪处的全部文件都收回中央办公厅机要室,搬到中南海西楼去了。

1971年10月2日,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广州、南京等地清查与林彪事件有关系人和事的问题,决定派李先念、华国锋、张春桥前往帮助和检查工作。

当天,毛泽东同意,确定由李先念、华国锋等协助国务院工作,由李德生、余秋里、张才千等分别主持军委总政、总后、总参三总部的工作。

3 日,经毛泽东批示“同意”后,中共中央同时发出两个《通知》。

一个是:“为彻底审查、弄清林一陈反党集团的问题,中央决定成立中央专案组,集中处理有关问题。中央专案组由周恩来、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纪登奎、李德生、汪东兴、吴德、吴忠十人组成。在专案组领导下,设立工作机构,由纪登奎、汪东兴两同志负责进行日常工作。各地、各单位今后凡向中央上报有关林一陈反党集团的揭发材料,统请以绝密亲启件送交中央专案组统一处理。”

另一个是:“中央决定,撤销军委办事组,成立军委办公会议。军委办公会议由军委副主席叶剑英同志主持,并由叶剑英、谢富治、张春桥、李先念、李德生、纪登奎、汪东兴、陈士渠、张才千、刘贤权十同志组成,即日成立,在中央军委领导下负责军委日常工作。特此通知。”

10 月 4 日,叶剑英写信给毛泽东,报告军委传达林彪叛党叛国事件《通知》的情况和军委今后工作设想。他在信中最后说:

“这次主席令我主持军委日常工作,我十分感戴主席的信任,但又十分害怕工作做不好,误了大事。”因此,他一方面表示自己要“努力学习,努力工作”,另一方面,也希望“毛主席、周总理及政治局各同志能经常对军委工作做出指示,提出意见,以便使工作少出差错。”最后,他请求毛主席“有时间请赐一见,得到指示,以利工作”。

当天,毛泽东看到叶剑英的信,立即叫来周恩来,共同召集叶剑英和军委办公会议的人谈话。

毛泽东从历史上谈了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接着说:“林、陈阴谋活动,蓄谋已久,他们反党,大的事情多得很,小的事情也多得很,目的就是要夺权。”

“文化大革命,整几位老帅,是林彪搞的。”

“个人崇拜,我和斯诺谈话说过了,当时搞一点也是需要的,你美国也搞个人崇拜嘛。但搞得那么多!我姓毛,工作是党的主席,叫我毛主席,我听了很舒服。什么四个伟大,讨嫌!顶峰问题,六六年七月份我就给林彪打过招呼,他不听,还是那么写。”

“军队政治教育,主要是搞路线方面的教育。”

“四好运动搞形式主义,把部队作风带坏了,要改变。”

“军队要严格训练,严格要求,才能打仗。锻炼部队,一是靠打仗,

一是靠平时训练。”“我提了五条,他(按指林彪)提了三条。三条不讲马列主义,不讲反对修正主义和防止赫鲁晓夫式的人物,不讲团结大多数,不讲批评和自我批评。”

对叶剑英主持下的军委办公会议应该怎样工作,毛泽东说:“军委办公会议,这次是叫改组,不是掺沙子。今后办公会议要研究大事。”“要好好整顿我们的军队,头脑不要太简单了。凡讨论重大问题,要请总理参加。下达指示,要用军委名义,不要用办公会议。政治局讨论决定的问题,是用中央的名义嘛。要好好准备,开次军委全会,各大区同志来参加,征求他们意见。”

毛泽东说:“对他们这个集团的一些人,高级干部,能争取的尽量争取,能拉的尽量拉。”

同一天,毛泽东看到空军报社一封来信,揭发南方某地领导过去同林彪等“关系甚密”,批示给周恩来:“对某些同志的怀疑不可尽信。”

10 月 6 日,曾山、邓子恢揭发林彪。

10 月 10 日,陈毅给毛泽东写信,揭发林彪。

10 月 22 日,朱德给毛泽东主席、党中央的信,揭发林彪。

# 第1222回：王兰义，将军楼里笔记本 李伟信，又供出惊天阴谋

1971年10月，李德生收到驻空军总政工作组送来的一个笔记本，第一页写着：

“571工程纪要，

下面用括号写着：

（一九七一、三月二十二——二十四）

李德生当即想到，这个日子恰好是在他随周恩来到北戴河，向林彪汇报“批陈整风汇报会”情况之前。

他接着往下看：

（一）可能性；

（二）必要性；

（三）基本条件；

（四）时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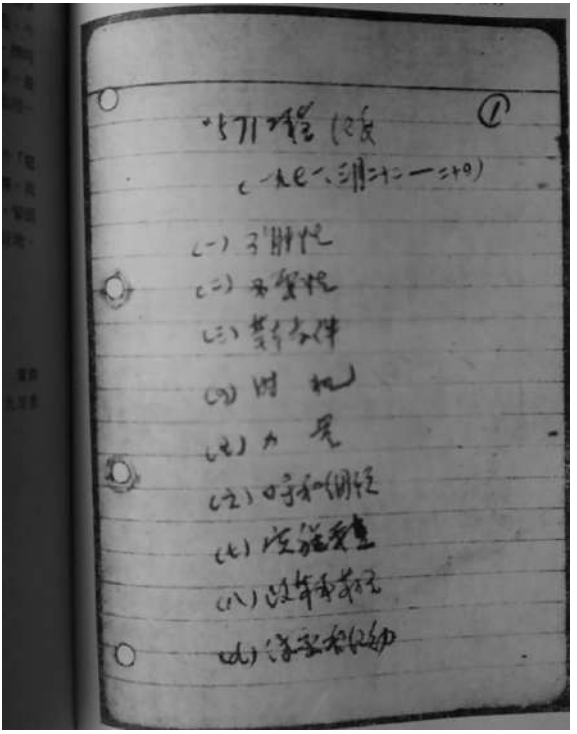
（五）力量；

（六）口号和纲领；

（七）实施要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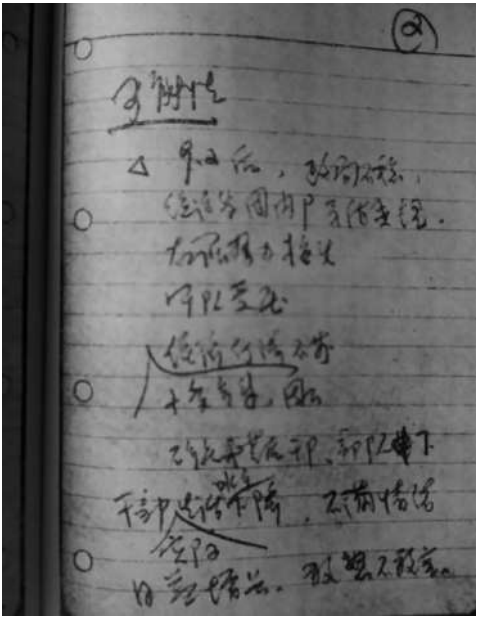
（八）政策和策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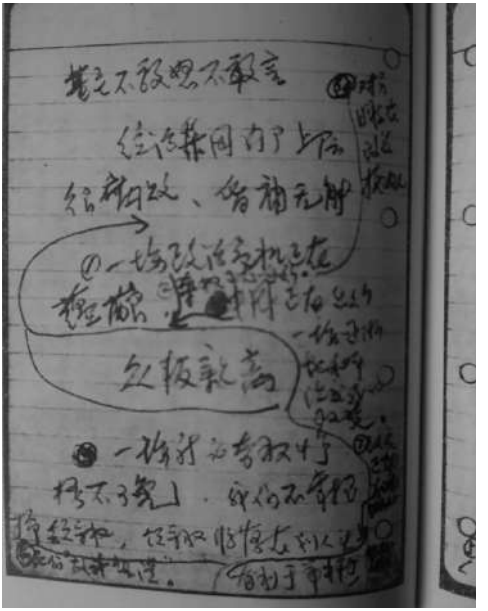
（九）保密和纪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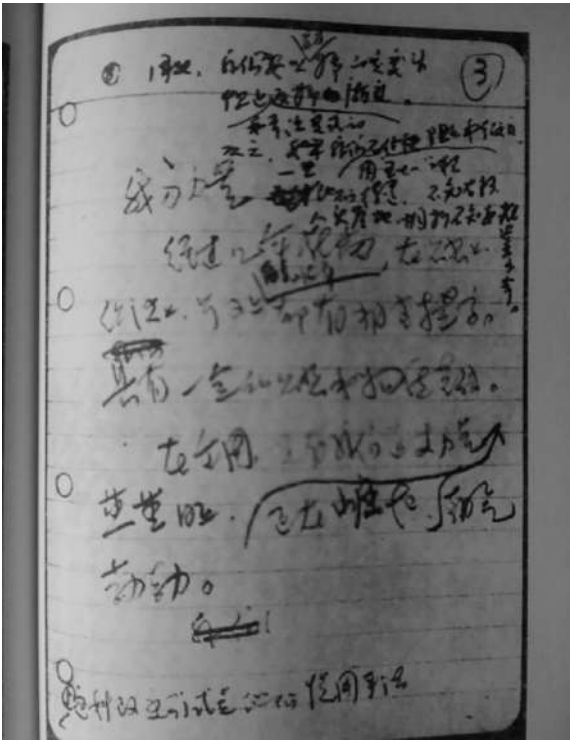


翻到第二页，才知道第一页是目录，每一行写的是小标题。看到正文中每个小标题下都画上粗粗的黑线或双线。然后一段一个意思，有的一句，有的几句，是一种提纲式的写法。

这种写法，当时在空军机关很时兴，叫做“拉条式”，无论是给领导人准备讲话稿，对上写报告，或是对下发指示，先不写成正式文章，而是提纲挈领地写成纲目式的要点，便于审读。通过了，再写成文件。显然，这是空军机关人员写的。







笔记本一共写了 23 页。中间缺第 8 页，可能是编页码出了错。有的地方删去了一些词句，有的地方还有错别字；但是条文分明，意思清楚。

李德生粗粗一翻，从标题看，是一份完整的计划书，往后翻，发现有的话看不懂，有的话特别反动，这究竟是个什么样的“工程”？“571”代号是什么意思？李德生不由得又从头仔细看过。

再看一遍，李德生虽然还有很多地方琢磨不透，但已经感到，这是一份杀气腾腾、充满法西斯气味的文件。庐山会议以来，毛泽东批评林彪，是批评他的政治纲领和理论纲领，那还是党内的矛盾。而这个笔记本里所写的内容，却是地地道道的反革命政变纲领，性质完全不一样了！

这个笔记本是怎么被发现的？这还要从空军学院行政处副处长王兰义说起。

9月13日下午，王兰义按照吩咐，将当天的报纸，用石块压在空军学院将军楼门口台阶上。

9月14日19时30分，王兰义再去送报纸时，看见昨天的报纸还在原地。楼里黑黑的，楼门露出一条缝，不知9月13日那天是不是也这样虚掩着，是不是人走了？他又去看车库门，也没锁。他轻轻拉开车库门，里面的救护车不见了，外面却停着几辆小汽车，车钥匙还在车上插着。万一什么人闯进来怎么办？他围着将军楼转了两圈，反复权衡，最后认为保守秘密最重要。他把楼门锁上，然后回到办公室。晚上22时，他从办公室回家，又到将军楼转了一圈，里面还是无声无息。

9月15日19时30分，王兰义又按时去送报纸，看到小楼的一切仍同昨晚的一样：门还是他昨晚锁上的，一切都是昨天的场景。

楼里已两天没人了。王兰义考虑再三，于是决定进去看看。

拉开门，恶臭扑面而来。王兰义十分紧张，心想是不是死了人了？他经历过洛阳解放，那时死人成堆，来不及掩埋，所以他闻过那种令人难忘的死人味。他赶紧打开灯，先找臭味出自哪里？

屋里乱糟糟，食品架上放着9月12日中午的饭菜，基本没动，旁边还用红笔写着纸条："请勿动。"正是大热天，鱼上面已经长了一两寸的毛，满屋臭味就是从这里散发出来的。

靠近门口，有几张零星的没有字的白纸。还堆着一些纸箱，里面装满水果和糖果，像是准备运走。

再往里走，原来厨房烧过纸，锅台上一堆纸灰，一边还散乱放着一些没有烧尽的空白笔记本。

他又到第二栋楼里，里边的纸灰更多，不仅伙房间的锅台上下堆满了纸灰，整个墙都黑了，其他房间也满地纸灰，纸灰堆里还扔着三个没有烧掉的避孕套……整个楼里像是被抢劫过一样，这种状况可是过去从来没有出现过的。过去人走楼空，屋里干干净净，这回搞什么名堂？

他再次回到前边的将军楼。一进门看见那个小厅中间的茶几上有几个本子，他第一次进来时就注意到了。当时因为只顾寻找臭味，

没有翻看。这回他拿起来小心打开,只见第一页写着:“‘五七一工程纪要”。目录一直写到页底,背面还有。字很正规,用黑墨水写的。他再翻,没了,白纸,还是白纸,其实这是活页,后面还有正文。王兰义认为这是军事战略工程、技术革新一类的记录。

在这个红色拉链本旁边,是一本《英语》课本,一本《格瓦拉日记》,一个日本进口的空白笔记本。旁边还放着一个开着口的大包,像是要把这些本子装走。

王兰义立即锁上门回到办公室,向学院副政委王治松做了汇报,因为王治松和院政治处主任高文勇负责将军楼。王治松对王兰义说:

“我正在开会,你马上回去,叫接待小组去整理房间。”

王兰义领着接待小组来到将军楼,察看了一遍后刚开始打扫,王治松和高文勇就来了。王兰义又带着他们看了一圈,然后继续去收拾房间。

王治松和高文勇坐在客厅茶几周围一圈的沙发上,好奇地翻看茶几上的那个拉链本。王兰义回来,也坐到沙发上,他们商量了一下,觉得应该打个电话给空军司令部问问情况。于是他们打电话先找于新野,不在。又找程洪珍,还是不在。怎么谁也找不到了?最后他们终于找到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刘世英,他冷冷地说:“等他们回来再说吧。”

王治松把红色拉链本放回原处,想想不妥:“丢了怎么办?”又将这个拉链本和报纸放在一起。他们将小汽车上的车钥匙拔了下来,放在茶几上,然后离开。此时,已经是半夜1时了。

天快亮时,王治松给王兰义打电话,叫他到将军楼去,把车钥匙放回车上,然后把那个拉链本子拿出来。

王兰义对王治松副政委说:“上级交代接待任务时曾说,空军司令部的人不在,小楼里面的东西不准动。”

这些情况,王治松副政委不知道。他听王兰义这么一说,也就没有再坚持,王兰义只是去把车钥匙又放回车上,没拿那个本子。

9月16日晚上,王兰义去空军司令部参加行政部门负责人的会议。以前开会,会前都是有说有笑,而这次谁都不吭声,熟人见面也不打招呼。原来,此时很多人已经知道了“913事件”。这次会议规定,

派车要经过单位行政领导批准,要严格请假外出。

在空军学院办公大楼门口,王兰义看见政治处主任高文勇正在那里等他,一见面就对他说:“给你说个事,现在马上叫小牛把本子拿出来放起来。”

王兰义以为领导研究过了,所以没有再顶。高文勇特别强调:“你别去拿,叫小牛去,别开灯,让他拿来交给你。”

王兰义打电话让行政处的小牛去将军楼,将那个本子拿回来后交给他。并嘱咐,如果他不在,就交给处长张凡。王兰义和张凡“文革”中都是一派,关系比较好。

当王兰义回到办公室,张凡对他说:“小牛给你一袋东西。”

王兰义说:“我知道,你放在文件柜里吧。”然后就回家了。

当天晚上,张凡总值班,他给王兰义打电话:“北京卫戍区来了一个副司令员,带一个师长和一部分卫戍区部队,在我这,总理派他们来的,要看看小楼,怎么办?”

王兰义一听是周总理派来的人,就说:“去看吧,钥匙在小牛那里,叫小牛送去。”

卫戍区部队当天没有走,就住在将军楼前面的9号楼,两座将军楼开始由他们负责警卫。

10月1日国庆节那天,轮到王兰义总值班,张凡来电话说:“最近我老在想一个事,我看了一下那个本子,里面写的‘571’,是不是‘武装起义’?”

王兰义马上说:“你瞎说什么呀。”

张凡说:“王治松讲,谁让把本子拿出来的?谁拿谁负责。”

王兰义说:“怎么这么说?谁让拿?就是他最早让拿的,有什么了不起。”

接着,政治处主任高文勇也给王兰义打电话,叫他到办公室来一趟。

王兰义去后,高文勇对他说:“我考虑最大的事是那个‘本子’,那个‘本子’要出事。”

王兰义觉得没什么。

高文勇说:“我想,如果将来有人查问‘本子’,你就说你要拿的。

也别说我叫你拿的,也别说小牛进去拿的,也别说张凡保存过。”

高文勇又问:“现在本子在哪?”

王兰义说:“在张处长那里保管。”

高文勇说:“你去拿回来,就说你去拿,你保管。他们问,你一口咬定是你拿的,他们也没办法。”

王兰义很不高兴,嘴上说:“好吧。”但心里想:“怎么这样?到时再说。”

他去找张凡要那个本子,张凡也有点紧张,赶快给了他。王兰义原封不动地放在办公室的文件柜里。后来想想,文件柜没有锁,他的办公室战士都可以进,不保险。于是,把“本子”拿到他家,锁进皮箱里。

10 月 5 日晚,李德生到空军学院传达中央 57 号文件:《中共中央关于林彪叛逃出国的通知》,与会人员无不震惊,目瞪口呆……

“叛国”?“谋害”?“南逃”?王兰义懵了,哎呀,糟了!第一个感觉是半辈子没犯错误,这回陷进去了。听完报告,空军政委王辉球把处以上干部留下,点了王治松、高文勇等 3 人,让他们主动揭发林立果在空军学院的活动,没提到王兰义。

会后,王兰义马上向空军学院政委殷古风详细汇报了接触将军楼以及拿那个拉链“本子”的过程。他从家里把本子取来交给殷古风,希望马上报告中央。

10 月 7 日半夜,空军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主任安平和空军学院政委殷古风叫王兰义到办公楼。小车就停在他家门口,直接把他送到空军大院。

10 月 8 日 19 时 30 分,安平、殷古风写了一封信给空军政委王辉球和副司令员曹里怀,送去“关于王兰义收存和上缴叛国分子林立果笔记本调查报告”一份,并附有王兰义本人的交代和揭发材料。

接着,李德生收到驻空军总政工作组送来的这个笔记本。他看了王兰义交上来的笔记本后,为了弄清内情,立即派人提审李伟信,亲自问他这究竟是怎么回事?这个《纪要》是怎么形成的?有哪些人参加策划?是干什么用的?

李伟信看了笔记本后交代说:

1971 年 2 月 12 日,林彪、叶群带林立果来到苏州。

2 月 20 日,林立果从苏州来到上海。第二天,2 月 21 日,在于新野的陪同下,他们驱车直奔杭州。空 5 军政委陈励耘带着秘书处处长王明鑫,在几十里外的瓶窑迎接他们。随后,陈励耘在家中设宴欢迎林立果。饭后将林立果送到专为林彪修建的花家山别墅住宿。

此时,花家山别墅已初具规模,但尚未完工。陈励耘陪同林立果视察了建筑情况。那设计之精巧,用料之讲究,设备之先进,自不待言。因为林彪怕光、怕风、怕冷,还专门设计了室内大院,搞了彩色装饰,安装了新式空调。林立果感谢说:“全靠陈政委费心了!”

3 月上旬,周宇驰从广州、江西转了一圈后来到杭州,在花家山别墅与陈励耘、林立果见面。

3 月 15 日,林立果准备离开杭州,陈励耘把空 5 军各师干部和机关部分处长约 20 余人召集到花家山同林立果见面,并请林立果讲话。林立果夸赞了陈励耘一通后离开了会场。

3 月 18 日下午 13 时,林立果离开花家山,陈励耘赶来送行,林立果指定于新野作为他与陈励耘的联络员。然后,林立果带着于新野、空军司令部雷达兵部技勤处副处长许秀绪从杭州来到上海。王维国派空 4 军秘书处副处长李伟信接待。

当天晚上,林立果在他卧室里对于新野和李伟信说:

“根据目前形势,要设想一个政变计划。”他要周宇驰立即从北京来上海商议,同时叫于新野暂不回北京,主要处理这件事。林立果接着说:

“刚才已经把我们在杭州研究的情况,给‘子爵号’说了一下,她说在上海要隐蔽、安全。”

“子爵号”是一种英国飞机名称,这是林立果给叶群起的代号。

3 月 19 日,林立果在上海约见江腾蛟。

江腾蛟是 3 月 14 日晚上,乘坐吴法宪派的安 -24 飞机到上海治病。他原任广州军区防空军政委。1957 年空军和防空军合并,他调到空 4 军当政委,降了半级。当时的空军司令刘亚楼对江腾蛟说:“不要看空 4 军只是一个军,它的战略位置很重要,实力比一些军区空军还大。”于是,江腾蛟高高兴兴去了空 4 军。

1964 年,叶群在江苏太仓县洪泾大队搞“四清”,江腾蛟经常带着礼物去看望叶群。1965 年 1 月,正在上海治病的空军司令员刘亚楼让时任空 4 军政委的江腾蛟给林彪送材料,叶群领着他见了林彪。同年冬,林彪、叶群把女儿林立衡送到上海治病,托江腾蛟照顾。

1965 年 5 月,南京军区空军政委余立金升任空军政委,南京军区空军政委一职空缺。由于南京军区空军司令员聂凤智等人反对,江腾蛟没能当上南空政委。直到 1967 年,江腾蛟才任南京军区空军政委,随后他就支持江苏反许世友的一派。

1967 年许世友回到南京后,给毛泽东和军委写信,直言江腾蛟是南京地区反军乱军势力的“黑后台”和“黑手”。

1967 年 11 月,江腾蛟到北京参加空军党委“三代会”,住在反帝路空军招待所。会议期间,林立果对他说,想要他当空军司令。

1968 年 2 月,江腾蛟送材料到北京,在不到 10 天时间里,两次到毛家湾与林彪、叶群见面。并分别请林立果和叶群去吃涮羊肉。请叶群时,黄永胜夫妇也在座。叶群当着江腾蛟、黄永胜的面说:“谁要抓你们,赶快直接打电话给我,我马上派飞机接你们到北京来……”

江腾蛟到北京后,许世友的揭发材料也接二连三地到了北京。

1968 年 3 月,南京空军机关一派群众提出要江腾蛟回南京接受群众批判。江腾蛟向叶群告急,叶群立即给吴法宪打电话说:“没有林彪的命令,不准江腾蛟离开北京。”

1968 年 4 月 29 日,中央军委改组了南京空军党委,免去江腾蛟南空政委的职务。聂凤智也免去了南空司令员,关押到广西鹿寨农场进行审查。

中央任命空军昆指的刘懋功为南京军区空军司令员。此时刘懋功正在北京空军总医院住院治腿。他得了“血栓闭塞性静脉脉管炎”。

4 月下旬的一天,吴法宪来到空军总医院亲自找刘懋功谈话,说南京空军党委班子垮掉了,政委江腾蛟、副政委王绍渊、政治部副主任高浩平都被抓起来了,司令员聂凤智已被打倒。现在中央军委决定改组南空领导班子,任命刘懋功为南京空军司令员兼党委书记,要他赶快到南京去把工作抓起来。

刘懋功说:“我现在腿还不行呀。”

吴法宪说:“到那里再治嘛。你只要去,哪怕在医院里指挥他们工作也行!”

吴法宪告诉刘懋功,到南京后,既要批江、王、高,又要批聂凤智。

空军总医院闻听刘懋功要出院,认为不妥,写了报告说明理由,要求空军党委让刘懋功继续治疗。但是,吴法宪没有批准这份报告。

就这样,刘懋功由空军总医院派了一个医生、一个护士陪同他坐飞机到了南京。

刘懋功一到南京,才知道情况严重到什么程度。地方的群众组织已经占领了南空机关,在机关院子里到处贴满了打倒江、王、高的大字报、大标语、漫画。南空机关工作已陷于半瘫痪状态。南京的军用机场也受到了影响,部队已不能进行飞行训练和作战值班了。

看到这种情况,刘懋功心里当然着急。他干脆也不住医院了,就住在机关招待所里。第二天,就去向南京军区许世友司令员报到并请示工作。

许世友不了解刘懋功,听说他曾在韩先楚领导下工作过,就去问韩先楚。韩司令员向他简单介绍了刘懋功的情况。

许司令员跟刘懋功说了江腾蛟、王绍渊、高浩平在南京组织“倒许”情况。他说:“这三个家伙太坏了,他们到哪里,哪里就乱,一定要把他们从军队弄出去!”

不久,空9军政委于应龙调来南空任副政委。

# 第1223回：江腾蛟，效忠信追随林家 林立果，搞“舰队”活动频繁

1968年5月，吴法宪想让江腾蛟担任空军政治部主任。毛泽东知道后明确指出：此人不能重用。空军只好任命江腾蛟为空军政治部党委书记，党内职务可以不经毛泽东批准。

在此期间，叶群给吴法宪打电话，要他转告江腾蛟，问江腾蛟现在欠多少账，她可以拿出些钱来帮助江腾蛟还账。江腾蛟当然知道，这是叶群故作姿态，表示对他的继续支持。

1968年7月，林立果通过亲信给江腾蛟传话：“告诉江政委，要他放心，不要怕，照常吃饭、睡觉。他们有嘴，我们也有嘴，问题总有一天会解决。”

江腾蛟立即于7月2日给林立果写了回信。他在信中写道：“立果同志，主任和你力主正义帮我多方讲公道话，极力保护，因此心里很扎（踏）实，这些是能够支持我生活和斗争的惟一力量，没有这一条就很难设想了。这是我和我们全家永生不能忘的大恩。……我对首长、对主任是忠实的，对你也是忠实的。过去、现在、将来也永远是忠实的。立果同志，苦思数日，想不出世界上还有什么语言，可以表达出我感激首长、主任和你的心，在复杂的阶级斗争中，教导我的，指点我的，保护我的是谁呢？是首长、主任和你！我能不天天想吗？能不天天念吗？”

1968年9月，林立果叫周宇驰给江腾蛟送去人民币300元，说：“宁可我们苦一点，也要把他养起来。”

1968年以后，江腾蛟给林家先后写了20多封效忠信，他在信中写道：“是首长和主任救了我，没有首长，就没有我的一家，没有我的一切。没有别的，只有一条誓言，不管任何时候，需要我干什么，下命令吧！我江腾蛟绝对不会说出一个难字。”

到1969年上半年，江腾蛟还是个闲人。1969年6月19日，林彪

在家中接见了江腾蛟和他的妻子、孩子。林彪问了他妻子和孩子们的情况后,又问:“你现在干什么呀?”

江腾蛟赶快回答:“我现在还没有职务。在空军政治部帮助工作。”

“有职务没有职务一样干革命,不要看这个委员,那个委员,那是现象,将来还会变化的。”

这次接见时,叶群让江腾蛟帮林立果找对象。

1969 年底,吴法宪向江腾蛟透露,要派他到西南地区抓航空工业,江腾蛟认为这是变相流放,非常着急,打电话到上海找林立果。林立果立即飞回北京。1970 年 1 月初,林立果、王飞和江腾蛟一起在江腾蛟家商量对策,决定由江腾蛟给吴法宪写信,提出不能去西南的理由,要吴法宪将信转给林彪,然后由叶群出来给江腾蛟说话。叶群对吴法宪说:“江腾蛟身体不好,他不能去就别去了,让他休养治病吧。”

1970 年 3 月,由林立果通过广州空军安排,江腾蛟全家到广州休养。江腾蛟在广州对广空参谋长顾同舟说:“我们都坐在一条船上,掌舵的是林立果,什么风浪都不怕。”

此时,正在筹备召开四届人大,林彪准备在大会上讲话。正在苏州的林彪,让随行的秘书于运深给留守北京的秘书张云生打电话,为他准备讲话的“条子”。于运深立即电话通知张云生:

“首长说,让你和李春生两个秘书和老虎组成一个调查研究小组,这个调研小组由张秘书牵头。研究的题目就是怎样搞好抓革命、促生产。首长强调拉条子前必须搞搞调查研究。要抓紧时间,争取早些搞出一个题目来。”

张云生问:“首长这个指示,主任知道吗?”

于运深说:“还没有报主任。”

张云生说:“不要报了。我可以和春生一起搞调研,但不要再牵上老虎,他愿意搞什么调研,那是他的事,如果再报主任,那是自找麻烦。如果主任再插手,我怎么应付? 如果老虎不听我的,我怎么办? 我能领导这只老虎吗?”

于运深说:“首长叫搞抓革命促生产的调研,总得报主任吧?”

“这个当然可以报,看主任怎么说。”

毛家湾内部人际关系复杂,名义上林彪至高无上,但实际上林彪“大撒手”,权利都在叶群手里。换句话说,林彪办公室是叶群当家。现在又多了个“老虎”,更难办了。于运深理解张云生的难处,也理解他想“保持一定距离”的想法。

张云生向正在北京的林立果通报了林彪指示,只说林彪让成立调查研究小组。林立果很快在空军党办成立了调研小组。

1970 年 5 月 2 日晚,叶群特意安排林彪接见江腾蛟三个大孩子。当天晚上,林立果打电话给江腾蛟的孩子,并要他们把林彪接见他们的情况告诉他们的父亲。

江腾蛟听了孩子的电话,兴奋的一夜都没睡着。

1970 年 6 月 30 日,刚回到北京的江腾蛟和空 4 军政委王维国一起,与林立果、周宇驰游览八达岭。在长城上,年过半百的江腾蛟与王维国一边一个,架着只有 26 岁的林立果的胳膊,一步一步地往烽火台爬。年轻力壮的林立果在他俩的扶持下,昂首挺步,俨然一幅“头子”的派头。

从长城下来,他们又驱车去十三陵。途中,江腾蛟得意地说:“我们这也可以说是‘车上四结义’!”

1970 年秋天,林立果看了日本电影《山本五十六》、《啊,海军》之后,便将 3 月成立的“空军党委调查研究小组”称之为“联合舰队”。而林立果则成了当然的“舰队司令官”。他根据英语“司令官”的译音,为自己取代号为“康曼德”。而周宇驰则是“舰队”的“总管”。林立果对他们的同伙说:“我们也是‘联合舰队’,大伙要有‘江田岛精神’。”每到外地活动,他就说这是“联合舰队”出航,进入一等战备。他自称是“旗舰”,称骨干分子是“主力舰”,许秀绪等人则称自己是“快艇”,“小驳船”。

“联合舰队”还分别在上海、广州建立“分舰队”,下属还设有小组。并以北京为基点,上海、广州、杭州、北戴河设立了十多处“秘密据点”。

1970 年 12 月,南京军区向中央写报告,要抓江腾蛟的“516”。江腾蛟很紧张,先是躲到湖南大托铺,在那里给林立果写了一封表示感谢的信,叫秘书送往北京。新年时又躲到桂林,称自己政治上打倒,身

体也垮了,已经是无所作为的人了。直到1971年1月中旬,他才接到家属电话,转告林立果的话,说抓他“516”那件事,经过林立果做工作,已经没有问题了。江腾蛟这才离开桂林到了广州。

1970年4月,林立果曾让空军情报部部长贺德全从情报部和部队挑人成立“技术小组”,说是要“革新技术装备”。7月,林立果批示成立一个研究所,所里再成立一个小组,情报部技术侦察处副处长王永奎任组长。

王永奎是大学生出身,懂技术,为林立果修车,修录像机。雷达兵部技术勤务处副处长许秀绪也比较精干,技术不错,黄永胜、吴法宪经常叫他去修电器。林立果的电视机、录音机、录像机等贵重电器都由他保管。林立果手里,进口的高级照相机就有十几架,其中有美国阿波罗登月用的同型号相机,有可变焦镜头,有体积小得可以戴在手上的台西婀牌微型照相机,有瑞典的哈沙背相机,有日本的尼康小型相机,勃朗尼卡反光相机,雅西卡电子快门相机,西德的莱兹反光相机等。有的不止一架。电视机五部,三部彩色,两部黑白。磁带录像机四部,立体声扩音机十多部,还有电热水器、电子防盗器、电动牙刷、电动刮胡刀等。

除了这一大堆电器的使用和修理,8月以后,林立果先后给王永奎下达了十几项技术任务。其中有:

研制超短波无线电收发报机,直接文字显示,不用报务员,也不用翻译,可以防止泄密。这一技术成果受到林立果的高度重视,后来被列为“571工程”中的01工程。

研制电话保密机,林立果从日本进口一种“蜘蛛”(电话窃听器),只要靠近电话线,就能旁听通话内容。他把“蜘蛛”安放在叶群床下,窃听了叶群大量的生活隐秘。电话上还搞了增音机、录音机、喇叭以及自动拨号、自动问答等。

研制废纸处理机,因为就是烧掉,用照相的方法仍可以鉴别。

研制汽车晶体管点火装置、汽车防撞雷达装置、汽车自动喇叭等。

这些都是林立果从国外杂志上看到后布置的。

1970年7、8月间,林立果提出订阅国外技术情报资料,订了20多种,包括香港的《星岛日报》、《华侨日报》等。9月,将空军办公室外事

秘书陈伦和调来,专门负责翻译。

他们还在中央某些要害部门安插亲信,“站岗放哨”,窃听、暗中监视等收集情报,想方设法探听毛泽东的行动路线,并大量搜集地方和军区负责人的动态情报。“913”后,从北京、广州等秘密据点里查获了大批的手抄情报。

1971 年 2 月 8 日下午,林立果的“联合舰队”召开了布置搜集情报的“舰队会议”,当时的会议记录如下:

舰队会议。

周(宇驰):

一、讲报情况、掌握情况的问题:

1. 情报的重要性

2. 重要情况与非重要情报上边与下边比,上边重要

3. 死情况与和(活)情况,要活情况重要

4. 等情况与主动搜集情况不满足于等情况,应主动挖掘新情况

5. 每个人每个时期都连续不断地掌握一两个问题

二、报情况:

简明、扼要,一语道破

随后,2 月 20 日,林立果从苏州来到上海。21 日去杭州。3 月 18 日从杭州又回到上海。当晚交代于新野和李伟信“要设想一个政变计划。”3 月 19 日,约见江腾蛟。

3 月 19 日下午,江腾蛟来到林立果在上海的住处。林立果让他谈一谈对王维国、陈励耘和周建平的看法。

江腾蛟说:“王维国性格单纯、直爽,他除了你们,没有别的后台,这样的人最可靠。”

林立果认为江腾蛟看得比较透。

江腾蛟继续说:“周建平呢? 他组织能力比王维国强,但思想有些右倾,在关键时刻容易摇摆。陈励耘与我个人私人关系不错,也有能力,但本质不如王维国好,在政治上与王维国也不一样,既可以坐你这条船,也可以坐上别人的船。”

林立果说:“江政委不愧为老领导,知人至深,不过,我们要多做陈励耘的工作。”

林立果知道陈励耘和王维国的关系很紧张。那是因为1971年春,陈励耘在杭州空军453医院住院,曾派医生到上海请专家会诊,并要10支白蛋白。当时白蛋白这种药只有上海市委常委一级的才有资格用。空军上海455医院政委答应给陈励耘白蛋白,但贵重药品需要王维国最后批准。

王维国没有批,并为此批评455医院政委说:“谁叫你答应的?”

结果,陈励耘派人来取药时,被王维国婉言推拒了,陈励耘对此当然是极为不满。于是在空5军,对王维国大兴“亲不亲,线上分”的讨伐。有一次,空4军党办秘书处处长袭著显和保卫处副处长唐剑鸣到杭州,陈励耘在刘庄接见他们时说:“你们回去对王维国讲:他拉拢南萍搞我,是不会有好结果的。你们就这么转告他!”

此时,林立果对江腾蛟说,他自己在杭州已经跟陈励耘做了他应该做的工作。并问江腾蛟:“你现在到上海来养病,趁这个机会也给他们做做工作,可不可以?”

江腾蛟说:“可以嘛。周建平那里我打个电话就可以了。关键是陈励耘,最好用你的名义去请他,这样他就不好推了。对他的接待要高一些,要格外热情。”

其实,江腾蛟和王维国也有矛盾。过去叶群买一些进口药,江腾蛟都主动由空4军开支。王维国接任空4军政委后,空4军没有办法搞到买进口药需要的外汇,就将此事暂停了。江腾蛟让王维国到上海市革委会要外汇,王维国很为难。以前空4军对江腾蛟的一些补助也被王维国卡掉了,江腾蛟很有意见。而江腾蛟遥控空4军的那些处长,王维国也很不高兴。后来江腾蛟抓空4军的“选人小组”,不许王维国过问,王维国更不高兴。后来经过林立果解释,王维国才解开疙瘩。

江腾蛟、陈励耘、王维国和周建平也有矛盾。周建平原是空4军军长,1969年秋调任南京军区空军副司令、党委副书记。周建平上任后抓空4军、空5军。对此,王维国还无所谓,毕竟是老军长。陈励耘就不同了,他比较霸道,不乐意别人插手。而其中最不高兴的是江腾蛟,他说周建平到南空后向“右”靠了,认为周建平来到南空,自己说话就不灵了。于是他告诉空4军、空5军:“部队不能让周建平抓到手。”

南空以政治部主任胡立信、副参谋长牛润五为首的南空机关“左派”,自恃有江腾蛟为后台,攻击周建平“与刘、于靠得紧”,不支持“左派”。胡立信说:“我与他(周),在路线上有很大分歧,今后要同他斗争到底。”

“刘”是指南京军区空军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刘环。“于”是南空副政委于应龙。

而从新疆调来的南空副政委于应龙对周建平也不满意,在背后说:“周与我们貌合神离。”于应龙还在党委会上公开指责周建平:支持机关“左派”,拆他们的台。

周建平在南空成了风箱里的老鼠,两头受气。

在空4军方面,空4军政委王维国为了消除周建平在空4军长期工作的影响,在上海巨鹿路,专门举办机关处以上干部的骨干学习班,公开要求大家旗帜鲜明地和周建平划清界限。江腾蛟的秘书张发云,在会上动员与会者,揭发周建平的问题。

1970年5月,林立果在上海巨鹿路空军招待所接见“骨干”,进行“路线交底”。王维国对军党委的人说:“周就是把林副部长当小孩子看待”。

军长郑长华说:“周手伸得太长,谁反对林副部长都不答应”。

王维国的妻子等人,则利用下部队宣讲“路线斗争”的机会,攻击周建平,“到南京后就变了,与刘、于靠得很紧,许世友还请他吃饭、喝酒”等等。

杭州空5军的陈励耘,则以空5军党委的名义,给南空和空军党委正式发电报,要周建平作出检讨。

到了7月,南空“左派”散布周建平是可用不可信的人。江腾蛟调几个人写材料,和牛润五一起给林立果写信,告周建平的状。说“周是假‘左派’,真‘右派’,不可信任”,周建平给许世友拜年了等等。林立果在材料上批了几句,“很有政治、很有策略、很有水平,我完全同意。”“完全同意江政委和左派同志们的意见”。

江腾蛟拿着林立果的批示作为“尚方宝剑”到上海发动揭发周建平。他对“上海小组”成员说:与周“生活上可以来往,政治上只能分道扬镳了”。

在此情况下,周建平不得不直接向空军党委表示:要求查清事实,做出组织结论,否则,无法工作。1970年夏,周建平到上海空军第三医院住院,治疗耳疾,时间长达数月之久。王维国派人盯着,看谁去看望周建平,每个人都要报告。

与此同时,南空机关派性斗争,还由于陈励耘通过胡立信;王维国通过牛润五的插手,变得更加扑溯迷离。

这时,正好已调北京任空军作战部部长的鲁珉回上海休假,林立果让他买些东西,代他去看周建平。鲁珉叫上王维国等一起吃了一顿饭,他们之间的矛盾才算有所解决。

# 第1224回：议形势，做武装起义准备 写计划，《“五七一工程”纪要》

再说1971年3月20日，接到林立果通知的周宇驰来到上海。当天晚上，与林立果两人密谈，后来又把于新野叫去。第二天，林立果与周宇驰、于新野继续在巨鹿路空军招待所商议，李伟信除中间有事离开过几次，一直守在门口，时而进去为他们添加开水，断断续续听到了他们的谈话内容。林立果与周宇驰、于新野分析了形势。

林立果说：“目前从各地区实力来看，首长讲话，还是有一定作用，这件事与首长谈过，首长叫先搞个计划。”

“首长”是林立果他们对林彪的称谓。

研究了形势后，他们认为：“首长的权力势力，目前是占绝对优势，是最好的时机，但是可能逐渐削弱”。林立果还说：“主席一贯是这样，一会儿用这边力量，一会儿用那边力量，用这样的办法玩弄平衡。目前的发展趋势是用张春桥。”

对于林彪接班问题，他们认为有三种可能：一是和平过渡，二是被人抢班，三是提前抢班。

对和平过渡，周宇驰说：“5、6年就差不多了，甚至可能更短。”

林立果问：“5、6年还接不上班呢？B－52的身体还能支撑一段时间呢。即使5、6年，其中变化就很大，很难说首长的地位还一定能保得住。当然和平过渡的办法最好。”

对被人抢班，周宇驰认为：“一下不可能，最起码3年以后。”

林立果说：“很难说，主席威信高，他要叫谁倒还不是一句话。”

于新野说：“那首长是主席自己树起来的。”

林立果说：“刘少奇不也是他立的。”

接着他们谈了上海《文汇报》3月16日发表的文章。林立果认为，这篇文章是有来头的。既然有来头，就应该看成是信号，是舆论准备。

《文汇报》3月16日刊登的文章题目是《千万不要忘记党的基本路线》。这篇文章确实是有所指的。两个多月前,1月6日早晨,上海兴国招待所,张春桥、姚文元准备吃早餐,看到餐桌上放着一份当天《文汇报》的大样,张春桥拿起来浏览了一遍,看到其中一篇题目为《路线、政权和世界观》的文章,署名是蔡康成,便和姚文元议了一下,觉得既然谈路线、政权、世界观,为什么不讲"九大"提出的党的基本路线呢?正好姚文元的秘书胡鼎君当时也在场。下午,张春桥、姚文元在中苏友谊厅开会商议上海市四届党代会的事情,胡鼎君把上海市委常委、上海写作组的王知常找去见姚文元,姚文元要王知常设法了解这篇文章的背景。

王知常回到办公室以后,找到一位原在空4军服役,复员后被分配到《文汇报》评论部工作的一位姓吴的工作人员,让他摸一下这篇文章的情况。此人服役期间曾参加过驻沪空军写作组,即空4军"卫东鹰写作组"。在此之前,他也曾从空4军拿到过林立果的那份《讲用报告》。这份报告张春桥和姚文元没有看到,只是听说有这回事,王知常让此人从空4军弄来了一份报告的油印稿上报给姚文元。这次让他去了解《路线、政权和世界观》一文的背景,他回来依然报告说,这篇文章与"卫东鹰"有关,是反映林立果讲用报告的精神。结果上海方面做出反应,徐景贤奉命指示《文汇报》用同样的版面和篇幅刊登批评文章。

其实,《路线、政权和世界观》这篇文章的作者是上海采矿工程机械厂的工人程继尧,与林立果和"卫东鹰"没有任何关系。

3月16日,《文汇报》发表了署名方岩梁的文章《千万不要忘记党的基本路线》,批评《路线、政权和世界观》那篇文章。笔名方岩梁,是由毛泽东《和柳亚子先生》诗中的一句"风物长宜放眼量"最后3个字的谐音过来的。这个笔名是上海写作组文学组常用的,执笔写这篇文章的作者是高义龙。

因为写作过程在写作组内部是公开的,结果那位《文汇报》评论部姓吴的工作人员又把与方岩梁文章有关的写作背景情况,捅给了空4军"卫东鹰",于是就有了林立果3月21日与周宇驰、于新野分析形势时说的以上那一番话。

接着,林立果他们提出两个办法:一是把张春桥等这一伙搞掉,保持“首长”地位不变,再和平过渡。二是直接对毛泽东动手,但是又考虑毛泽东的影响、威信这样高,以后政治上不好收拾,觉得尽可能不这样干。

周宇驰说:“当然一定这样做也可以想办法,如:把主席软禁起来谈判;也可以把主席害了,再嫁祸于人,把张春桥叫去,把他们搞掉,就说他们与王、关、戚有关系,谋害主席,或者搞几个犯人替死。到那个时候,反正首长掌权,事后处理,首长是可以出来说话的。但是这样干,首长在政治上要付出很大代价。”

他们研究,“争取和平过渡,但是做好武装起义准备”。准备工作分两个方面,一是要有个计划,计划的代号想了好久,最后由林立果确定,按照武装起义的谐音,定名为“571 工程”计划。二是要有个组织,即以培养干部为名,在空 4 军建立教导队。

林立果说:“让‘上海小组’带着教导队先把张、姚干掉,可由王维国请张、姚来,或叫警卫处处长李松亭带领去张春桥家。”

林立果问李伟信:“张家是否是你们警卫处管?”

李伟信答:“不知道。”

林立果让他打听一下。后来,李伟信问过警卫处处长李松亭,得知张春桥家是由他们派人警卫和送日常用品,李伟信将情况告诉了林立果。

林立果又说:“干掉张、姚后,让王维国、陈励耘,必要时抽南京空军一部分力量,控制上海局势,然后串连全国力量,发表支持声明,逼中央表态支持。假如许世友出兵干涉,由王维国他们保卫上海,形成对峙的局面,再和平谈判。最坏的打算,是上山打游击,先往浙江方向。”

林立果还说:“这些问题,这次去杭州与陈励耘商量了一下。我看这个计划,就按在杭州商量的框框,由于新野写。”

林立果还说,“571”计划和教导队的事,目前只限“舰队”、江腾蛟、王维国、陈励耘知道,有些情况可以告诉“上海小组”。

当天,3 月 21 日,周宇驰去看江腾蛟,下午回北京。

于新野按照林立果的意图和他们商量的内容,于 22 日至 24 日写

出了《“571 工程”纪要》。《纪要》把当时的政局称之为“挂着社会主义招牌的封建王朝”,把“打倒当代的秦始皇 B－52,推翻挂着社会主义招牌的封建王朝”,作为口号和纲领,提出“军事上先发制人”,计划利用“上层集会一网打尽”或“利用特种手段如轰炸、543(一种导弹代号)、车祸、暗杀、绑架、城市游击小分队”等手段“夺取全国政权”或制造“割据局面”,并准备“借苏力量钳制国内外各种力量。”

3 月 24 日晚上,林立果他们在上海巨鹿路空 4 军招待所举行了一个隆重的集会。林立果,周宇驰接见了以空 4 军政委王维国为首的“上海小组”的骨干。在接见时,周宇驰说:

“王政委的意见,有时不是他个人的意见,大家一定要信任他。要做到王政委说白的,就是白的,说黑的,就是黑的,就是王政委说太阳从西边起来,也要相信!”

3 月 25 日晚上,王维国和江腾蛟去看林立果,江腾蛟提出:“趁我们都在上海,把周建平、陈励耘都找来谈谈。”

恰在第二天,3 月 26 日,周建平回上海搬家,他并不知道林立果在上海。第二天,3 月 27 日晚上,天很黑了,于新野来到他家,对他说:

“过去大家对你有不少意见,副部长知道了,他正在做工作。本来想先来看看你,但是不方便。准备同你谈谈,谈时希望你不要把大家对你的意见都端出来,事情过去了,就不谈了。”

从于新野的话中,周建平知道林立果来到上海,以为是来解决团结问题的。

3 月 28 日晚,王维国拉着周建平去看林立果,江腾蛟也在场。

林立果说:“有人向中央告状,材料很多,要把江政委等人打成‘516’分子。当然要打倒江政委也不容易,但你们思想上要做好准备,假如江政委被打倒,南空的状况就要大翻个,可能出现‘杨余傅事件’以后那样的反复,甚至更加困难。”

江腾蛟说:“我打成‘516’,你周建平也不好过。”

3 月 31 日下午,空军党委办公室副主任于新野按照林立果的吩咐,来到杭州 453 空军医院看望正在这里住院的陈励耘,对他说:“江政委在上海,想请你到上海去玩玩。”

陈励耘不想去,他在庐山会议上放了“炮”,沾了一身屎,不想再同

这些人打交道了,更不想去上海。于新野又搬出林立果,说:“林副部长也在,都希望你去。好久不见了,大家谈谈。”

陈励耘还是不想去,推说有病去不了。

到了下午15时,于新野又来了,说:“政委该走了吧。他们都在等你啦。”

到这份儿上,陈励耘不好再推辞,只好准备启程。

下午快17时了。陈励耘带着秘书王明寇,同于新野坐着司机张金富开的车去上海。走到距上海还有30公里的闽行附近一条原来空军用的公路上,老远看到一堆人站在那里。驶近一看,竟是王维国夫妇二人和空军司令部作战部长鲁岷的妻子武虹桥,及于新野的秘书和空4军的两个处长带着三辆车在此迎接。他们一看见陈励耘,热情得不得了。

王维国说:“我们是特地来接你的。”

说着就拉陈励耘上了他的车,一直开到上海岳阳路一栋僻静的小楼,这里原先是上海少年科技站,此时是空4军上海警卫处一个不为人注意的招待所。这天招待所小楼门口加了双岗,戒备森严。当他们前呼后拥进了招待所,已是近晚上21时了。

王维国的态度怎么变了呢?原来是江腾蛟、李伟信他们分别做王维国的工作,对他说:“从杭州把陈励耘找来,解决一下你和陈的团结问题”,“陈来上海时,给他个好房子住,招待规格高一点,有利于团结的话就说,不利于团结的话不说。”

王维国知道他们转达的是林立果的意思,就按照他们的意见做了安排。

23时左右,王维国和陈励耘他们在餐厅用完晚饭后,有人来说:“林副部长、江政委都来了。”

王维国随即领陈励耘上楼,只见江腾蛟、林立果两个人已在楼梯口迎接他们。大家在二楼会客室里坐下,江腾蛟首先说:“老陈,我们简直把你想死了,你怎么现在才来?”

陈励耘说:“我生病,来一次也难。”然后又说了些闲话,陈励耘接着就讲了“704工程”,说:“这房子明年可基本完工,林副主席什么时候去住都可以。”

林立果说:“陈政委,谢谢你。你们浙江办了这么件事情。本来林副主席在无锡有一幢房子,但是不能住,这是个黑窝。”意思是说这房子归上海警卫处管,是张春桥手下。接着,又问了许多房子的事情,设备、备战坑道、指挥所等方面的情况。

704 工程是 1970 年 4 月在杭州为林彪修建的地下指挥所,位于西湖之西,现在龙井路与三台山路之间的丛林中,即现在的浙江宾馆内,地势比较隐蔽。整个工程分为地面、地下两部分。

704 工程参观入口

地面部分主要由四幢别墅组成,散落于绿树之中,占地面积为 307 亩。

地面建筑图

一号楼供林彪使用,属面积最大的一座建筑,12000 多平方米。

一号楼

二号楼为室内游泳池,其设施在当时居世界一流,装有大型空调和吸音板,以及自动循环过滤系统和自动出水控制系统,自动恒温装置等。

三号、四号楼为随从使用。

四栋楼的总面积为 28452 平方米。

以后 704 工程改扩建为浙江宾馆。

704 工程的主体建筑在地下,它坐落在南北高峰之间,是一个独立的坑道式建筑。内有作战指挥室、通讯室、地下议事厅、储藏室、配电房等设施,其通道与出口的门都是由重达 500 公斤的各型防弹、防毒、防水钢门组成的,还设有一部专用电梯,直通林彪卧室,一旦遇有紧急情况,林彪可直接乘电梯快速进入地下室。

为防范有人进入地下室,在地下室通往林彪卧室的通道内,建了一段特殊的回音通道,一旦有外人进入这一通道,监听者可通过脚步回音马上发现来人。总而言之,这就是一个被喻为原子弹都无法摧毁的,当时比较先进的坑道形地下军事指挥所。

地下工程图

上左、上中:防爆门和防火门;上右:配电间;下右:通风设施

接着,陈励耘又汇报了飞机改装的事情。他说:“飞机报废的炮改装后可以防空,可以平射,效果很好,我们已改装了一门。”

遂后,他又讲了空5军为应对空降、机降研究的几个方案.组织了战备营等等。

扯了一阵子后,有人说到了庐山会议。林立果说:“这是一次未来斗争的总预演,双方阵营都亮了相。陈伯达是斗争中的英雄,吴法宪是狗熊。我方此次,上下好,中间脱节,三是没有一个好的参谋长。这些老总,政治水平低,平时不学习,到时胸无成竹,没有一个通盘,指挥军事战役可以,指挥政治战役不可以。说明这一点,今后的政治斗争不能靠他们领导,真正的领导权要掌握在我们手里。”

陈励耘说:“我压力很大,日子不好过。”

林立果说:“现在军队的日子不好过,黄总长他们日子也不好过。”

陈励耘:“我无非讲了张春桥几句,现在跑不掉了。”

林立果:“现在的斗争是争夺接班人的斗争。”

陈励耘接过林立果的话说:“现在主席还健在,江青、张春桥要想这样搞也不敢。”

林立果说:“将来主席百年之后,就是江青、张春桥这些人来接班。”

这时,江腾蛟一拍大腿说:“就是夺权也轮不到他们,还有林副主席呢!”

林立果说:“夺权有两种形式,一是武装形式,一是和平形式,我们采取的是和平形式。”

林立果突然冒出来这句话让陈励耘感到吃惊,不敢再往下接,生怕再踩“地雷”。

此时已近次日凌晨1时,江腾蛟忽然提出:“是不是把周建平找来?”

# 第1225回：空四军，开“三国四方会议”“很重要”，此《纪要》“必须下发”

3月31日晚上，周建平接到电话，叫他不要出去，林立果要找他谈一谈。到0点时分，他看还没人来找，就睡了。4月1日凌晨2时，有人来接他，是空4军军务处处长蒋国璋。他刚学的开车，技术不行，黑灯瞎火还走错了路。直到凌晨3时多，才将周建平从远在江湾的空4军军部接到徐家汇附近的上海少年科技站。

周建平走进二楼的客厅，只见屋里烟雾缭绕，瓜子壳和果皮满地都是，临街窗帘拉得严严实实，面向阳台的沙发上，坐着林立果、王维国，背向阳台的沙发上，坐着江腾蛟和陈励耘，陈励耘嘴里还含着一块糖。

寒暄之后，林立果对大家说：“我有点事情回去一下，办完了再来，你们先谈谈情况吧。”他让周建平介绍一下南京军区空军贯彻空军为解决南空问题办学习班的情况，即下楼去了。

由于当时南空两派闹得厉害，吴法宪就在北京为南空办学习班，想解决一下这个问题。周建平跟大家说了南空机关在北京办学习班的情况，并说学习班后，两派矛盾并没有解决，对立情绪远没有缓和。他还介绍了南京市地方清查“5.16”的情况。

谈了一个来小时，林立果还没回来。江腾蛟就说：“‘南空党代会’的事不是要谈一谈吗？”

周建平又讲了南空党代会筹备情况。空4军、空5军是重头，这两个军的代表团至关重要，如果他们的观点不一致，党代会肯定开不下去。周建平希望他们能够顾全大局，搞好团结，开好党代会，并让陈励耘、王维国讲讲他们的意见。

陈励耘首先讲了五点意见：一、要高举团结大旗，不能让对立面把这个旗子拿走；二、要充分发扬民主，让大家把要说的话讲完；三、上届党委所做的工作报告要通过；四、上届的党委书记、副书记与常委都要

选上,不能落选;五、要保证会议开完,不能中途夭折。

王维国表示同意陈励耘的意见。

江腾蛟说:“有什么事情不要乱来,在上海听老王的,在杭州听老陈的,在南京听老周的。”

林立果回来时已经快天亮了,他一进来就问:“你们在干什么?”

江腾蛟说:“谈‘南空党代会’。我们谈完了,请副部长指示。”

林立果讲了三个问题:第一当前的主要工作是抓好部队;第二各个地方的情况不同,可以允许有不同的做法;第三团结。

最后谈了空4军准备成立教导队的事情,王维国说按照林立果提出的条件,挑选的学员基本上选齐了。

团结问题似乎都谈开了,也解决了。这时,王维国下楼去看早餐准备得怎么样了,并且看看给陈励耘准备的酒怎么样,因为陈励耘和王维国见面后向他要酒喝。从伙房出来,他又去餐厅看看,在那里碰上了李伟信。李伟信对他说了吃饭时座位的安排情况:林立果坐在桌子对准门的正面,江腾蛟坐在林立果左边,陈励耘坐在林立果右边,王维国和周建平坐在林立果对面。

凌晨4时,大家围到了餐桌旁。餐厅不断传来嘈杂的碰杯声和祝酒声:

“在林副部长领导下,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

江腾蛟乘着酒兴大声说道:“我们都是属羊,头上长角的!”

林立果掀开衣服,拍着腰间的手枪说:“我总是带着它!”

5时许,他们离开酒席。快分手了,江腾蛟忽然说:

“今天我们也是开了一个‘三国四方会议’。”

陈励耘没明白,忙问:“什么‘三国四方会议’?”

江腾蛟说:“周是南空,你是5军,王是4军,我们也是一方嘛。”

这时林立果说:“大家就扯到这里了。周副司令来了,就负责南京左派吧。王政委就负责上海,陈政委就负责杭州吧。还有你们的老政委在这儿,他来拉总协调,你们有什么事情可以多找老政委商量。”

江腾蛟说:“我只能当当参谋。”

林立果首先离开餐厅。临走时,他对王维国、陈励云、周建平等人挥挥手说:

“再见,祝胜利会师!”

空4军军务处处长蒋国璋看见王维国出来时低着个脑袋,就问李伟信:“王政委怎么好像不高兴?”

李伟信说:“副部长批评他了。要开‘南空党代会’了,如果在会上大家意见不统一,斗起来,就不好办了,所以把他们找来。”

对这次上海少年科技站的见面,程洪珍在日记上作了记载:

会谈是成功的,达到预期效果。

团结的气氛比较好,介决了对当前东南形势的看法、认识。

(1) 主要矛盾在上海、在张、姚,统一了认识,

(2) 加速我们的准备

(3) 组织上明确了:

三点,每点的头都

上海——王

杭州——陈

南京——周

互相配合,江进行定点联系,配合、协同作战,没授于指挥权

4月10日,林立果离开上海回北京。在中央召开批陈整风汇报会议期间,林立果天天召集开会,研究对策。他估计会议可能出现三种情况:

“一般地谈一下,出不了大问题;整倒军委办事组;整倒首长(林彪)。我们希望是第一种情况,但要做好第三种情况的准备。”

他说:“首长和主任同意我的看法。”

从直升机上缴获的于新野工作日记记载,林立果、周宇驰、刘沛丰、于新野等在4月23日晚上开会,对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的形势进行分析:“根据斗争形势,准备加快、提前。”

4月26日,于新野到上海,对“上海小组”强调绝对保密,失密牵动大局,牵动整个斗争形势,把保密作为对林立果态度的实际表现。

7月下旬,林立果和刘沛丰乘专机到北戴河。接着带于新野、李伟信、程洪珍等人到广东深圳、尖沙嘴一带拍摄了大量地形照片,察看了九龙的地形。还乘坐飞机越过规定的航线,航测了香港及周围的地形。周宇驰拿到了华东、中南几个省一、二、三级机场资料,林立果说:

“万一情况紧急,可以让首长到香港遥控指挥。”

7 月 30 日,林立果等人回到北京。31 日,由王飞出面布置,在空直机关一些单位搞了纪念林立果“讲用报告”一周年活动。

8 月 1 日凌晨零点至两点,在北京西郊机场“工字房”秘密据点里,召开了“联合舰队”成员会议。林立果总结了一年来的情况。周宇驰在会上吹捧林立果是“党和国家最好的接班人”,是“领袖”,要大家“进一步抓好部队”。周宇驰强调要注意隐蔽,不要暴露,不当叛徒,准备流血牺牲。

8 月 1 日上午,林立果又和周宇驰、于新野、刘沛丰等人乘云雀直升机来到天津河西区尖山路 10 号,原《河北日报》所在地,此时这里是北京军区空军高炮 2 师师部,老百姓习惯把它叫做“天津空军大院”。

直升飞机的到来轰动了“天津空军大院”周围的市民。因为只有战争年代或是救灾的非常时期,城区才可能见到直升飞机。这次是从哪儿来的飞机?来干什么?这里的居民还没有经历过这样的场面。

与“空军大院”一墙之隔的是天津警备区。此时,警备区已经有不少人聚在楼上,观看飞机的降落。他们感到好奇和疑惑,这是怎么一回事?这可是从未有过的事呀。

陆军的人不知道是怎么回事,空军的人同样也不知道。直升机的到来只有炮 2 师的几位领导知道。几天前,他们被告知:中央领导要来。可中央领导是谁?他们也不知道,这种严格的纪律,是谁也不能问的。但在领导层里,有一个人知道这次来的领导是林立果。这个人就是师政委张彪,原空 4 军文化处处长,1966 年 10 月 9 日上海那次“神秘抄家”的带队人。

飞机仍在盘旋,越来越低,声音也越来越大。往日喧闹的空军大院篮球场此时空无一人,直升机稳稳地停在了球场上,张彪率领全师领导已一字列队迎候了。

舱门打开,从直升机里走下来几个人。大家一看,并不是中央领导,而是与大家一样穿绿衣篮裤空军的人。张彪迈着跛腿,一拐一拐地迎上前去与他们一一握手问候。

林立果等人被迎进办公楼会议室,师部专门从卫生队调来 4 位漂亮的医生和护士当女招待,端上龙井茶。林立果他们没有喝,而是叫

人从飞机上搬来了北冰洋牌汽水。

张彪向大家介绍了林立果等人后,林立果简单地问了问了部队的近况,包括训练,思想,战备,有哪些问题。

会议室的气氛显得严肃而特别,或许,在这个特殊人物面前,谁也不好多说什么。唯有张彪显得轻松自如,他开玩笑说:

“立果同志,我们离得这么近,你可是第一次来呵。要是再不来,我都不认识你长什么样了。”说完,大家都哈哈大笑起来。

“瞧你说的”。林立果一边笑,一边顺手拿过一瓶北冰洋汽水喝了一口。

张彪见气氛有些轻松起来,接着又说:“这一次,我的保密工作可是做到了最后一分钟呵。不信你问问大家,是不是谁也不知道来的是哪位神仙啊?”

场上又是一阵笑声。

玩笑过后,切入正题。张彪把空 2 师的主要情况,言简意赅地向林立果他们作了汇报,林立果不住地点头。

张彪汇报完,林立果谈了自己的看法,他对该师的工作表示满意,也表扬了在座的各位。接着特别强调了四个一定:一定要加强战备观念。一定要和党中央保持一致。一定要听招呼,一定要在关键时刻拉得出,过得硬,打得赢。

林立果说完,张彪看看表说:“也快要到饭点了,立果同志刚到,很辛苦,还是稍事休息,今天就到这里。”

林立果用手示意。大家也就起立,分别一一握手离去。

师领导一干人走后,张彪把林立果几个人请到他自己的办公室,又谈了半个小时。吃完饭,林立果他们就离开了天津。

8 月 4 日上午,周宇驰驾驶云雀 761 号飞机去了北戴河,在那里检查了直升飞机机场,就是第 1213 回林立衡向张宏提到的那个“东山秘密机场”,张宏说的“土机场”。8 月 4 日下午,周宇驰返回北京。

8 月 5 日,于新野派人去北戴河,送给林立果一套电话机、增音机、保密机,作为北戴河林彪住宅与北京“联合舰队”的秘密据点进行联络的“值班电话”。

8 月 8 日上午,程洪珍和空军司令部汽车队队长王琢乘“安 2 -

12”型飞机,将两辆水陆两用坦克运到北戴河,供林立果在海里进行驾驶训练。

8 月 26 日,毛泽东离开武汉前一天,林立果召集小“联合舰队”开了一次“整风”会议。会议记录如下:

成绩很大。

要看到不足,与形势不适应的东西

由明争转入暗斗

相持、相对和平友好,酝酿新“战争”

不要麻痹,要有思想准备。

由对外斗争转为巩固阵地

“战争”的突然性很强,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也一样。

思想、组织、行动上加强“战备”

过双重组织生活

学习问题,搞政治的要学一点技术,搞技术的也要学政治

不能搞私心杂念,不能搞个人主义。要有共产主义思想、精神、风格,“舰队”是战无不胜的,但“舰队”成员是不是能一直跟着前进。不能吃老本,不断立新功。

要有“欠帐感”。

要很严肃、很朴实、

这份记录,是于新野手记,从周宇驰、于新野等外逃乘坐的直升飞机上缴获的。

至此,林立果和他的“联合舰队”在“913 事件”前的活动基本轮廓都出来了。

李伟信的这些交代证实了《“571 工程”纪要》确实是林彪策划反革命政变的纲领。后来又通过程洪珍、刘世英识别,并同于新野的其他笔迹对照,可以肯定,空军学院王兰义发现的那个笔记本就是于新野的原稿。

李德生立即将《“571 工程”纪要》和李伟信的交代,以“特急绝密件”报送周恩来。

周恩来看了李德生送来的《“571 工程”纪要》和李伟信的交代,当即转呈毛泽东。毛泽东看后,立即批示“印发政治局各同志阅”。当

时,纪登奎认为《571 工程纪要》里面很多是骂毛泽东的,不能印发。毛泽东说:“这一件最重要,必须下发。”

很快,空军学院接到指示:“要好好保护上交拉链本的人。”

空军“五人小组”找王兰义谈话,说:“总理打电话来,总理看到了那个‘本子’,叫我们找你谈一谈。相信你,叫你放心,不要有顾虑。交上来是个好事,你马上写个材料,怎么发现的,怎么保存的。”

空军政委王辉球问王兰义什么职务,王兰义说:“我是行政处副处长。”

王辉球说:“什么行政处?他们自己搞的。”

王兰义没有反驳,但心里很不满意,“怎么是‘自己搞的’?空军党委办公室宣布的嘛。”

空军“五人小组”让王兰义马上回去写。

王兰义回到办公室已是凌晨 2 时了,他没有回家,就在办公室一直写到清晨 8 时。

10 月,关押在上海“材料组”的空 4 军军务处处长蒋国璋也主动写出了他们曾经计划谋害毛主席,搞政变,另立中央的材料,有十几页。负责“材料组”工作的上海革委会常委戴立清听了汇报大吃一惊,不太相信会有这样的事,问负责审查蒋国璋的老干部成波:“你们会不会是搞逼供信或者诱供啦?”

成波说:“绝对没有,只是对他们讲政策。我也没想到会有这种事。”

戴立清看了蒋国璋写的交代材料,非常吃惊,马上原封向上报送:一份由中央机要直送周恩来;一份由汪洋直送王洪文;一份由机要直送许世友。

# 第1226回：撑病体，毛泽东见塞拉西基辛格，第二次来到中国

“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击水三千里”的毛泽东，也无法背离日趋衰老的自然规律。1970年九届二中全会后，毛泽东就感到身体有些不舒服，睡眠很不好，经常出现低烧和咳嗽，浑身乏力和小便减少等病情，这也是从前不曾有过的。经过医生初步诊断，怀疑毛泽东是染上了肺炎，但仍需用X光透视检查，方可最后确诊。

毕竟年事日高。“913事件”对毛泽东是一个沉重打击，半个月中，他一下衰老了很多，像是变了一个人。尽管头脑仍很清楚，体力却越来越难支持了，不断受着老年疾病的折磨。9月中旬，他的心脏病发作了一次，出现缺氧昏迷。

10月6日，埃塞俄比亚皇帝塞拉西来华访问。

10月8日下午，毛泽东勉强支撑病体，在人民大会堂会见埃塞俄比亚皇帝海尔·塞拉西，周恩来、姬鹏飞、吴德、萧劲光等在座。谈到中国和埃塞俄比亚合作前景时，毛泽东说：

“非洲国家中，除了少数跟着帝国主义跑的国家，多数国家都可以往来，都可以合作，可以做朋友。”

塞拉西希望毛泽东能到埃塞俄比亚访问，毛泽东说：

“这一点恐怕有困难，会让你失望。早几个星期前，我因为心脏病已经死了一次了，上天去了，见了一次上帝，现在又回来了。”

毛泽东说：“非洲朋友我见了不少。我感觉在跟各国人民往来中间，政府领导人还是非洲人比较好谈一点。非洲人给我们的印象就是不那么骄傲。西方人、俄国人可是了不起了。接触你们，不要警戒。”

毛泽东说：“美国有两个党，共和党比较好一点，其好处之一就是反共，而且公开地反，不留余地。为什么比较好呢？教育世界人民嘛！民主党跟我们谈了十来年不接触实质问题，而共和党只有两年就接触了实质问题。”

“我欢迎尼克松来。尼克松来,我要跟他说:这个帝国主义就是不好,应该打倒。至于打,你们国家如果有帝国主义,由你们那里的人民打,别的国家的帝国主义,由别的国家的人民去打。”

12 日,周恩来陪埃塞俄比亚皇帝海尔·塞拉西去广州,派李先念和华国锋先行,做准备工作。他们二人到了广州,自知责任重大,凡是周恩来要去的地方,他们都到现场一一检查,同时督促、帮助广州军区进行清查,凡是林彪集团活动的据点,他们都实地查看。为此,二人专门到白云机场看了为林立果修的别墅。

别墅伪装得很好,建在绿荫深处,从远处看不出此地有房屋。门口有个踏板,只要一踏上踏板,报警器就会发出警报。楼里有可以接收香港电视的天线。林立果将电器设备放在地下室。现场没有破坏,都已拍照。民航局的宾馆也是林立果的据点。

周恩来 12 日到广州,和李先念、华国锋一起住在东山小岛。奉周恩来之命,李先念和华国锋召开了广州军区党委扩大会议,宣布林彪叛逃事件。会议扩大到军级干部。

12 日、13 日两天,周恩来在广州两次听取广州军区负责人关于清查与林彪事件有关的人和事的情况汇报。

周恩来应邀给广州部队领导机关作报告,谈了林彪叛逃后的一些情况,并允许与会者有什么不清楚的问题可以递条子。

周恩来说:“9 月 12 日,毛主席回到北京后,打乱了林彪一伙的政变部署。在游泳池毛主席的住地,他听取了我的汇报后,对我说:‘要注意林彪坐飞机离开北京,不要让他走。现在他手里的王牌就是空军,空军的整个指挥权不在我们手里,但是要撤换吴法宪。今后,空军的调动要直接由你和吴法宪、黄永胜联合下令,并报告我知道。’听了这话,我就知道毛主席已经胸有成竹了。这天晚上,我得到了林彪已经在山海关机场调动了一架 256 专机。我分别向吴法宪、李作鹏和黄永胜了解此事,他们都证实有这回事,但是不知道林彪调用这架专机的用途。为了防止出现意外事件,我请示了毛主席,决定启动这架飞机必须要有我和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四人联合同意下令,其他的任何人都不行。这就是说:毛主席决定要对林彪动手了。这点,林彪的估计是不错的。但是怎样动手是另一回事,并不一定非要把他抓起

来。林彪、叶群他们早安排好了,一旦需要的时候就组织力量把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这些人接到指定的地点,进行政变。林彪、叶群指使周宇驰,从空军司令部窃取了我国三北地区雷达兵部署图,可作导航用的我国周围各国广播电台频率和时间表,港澳航线图以及乌兰巴托、伊尔库茨克航线图、机场位置、呼号、频率表,华东、中南几个省一、二、三级机场资料等。林立果、刘沛丰等还串到广东深圳、沙头角,拍摄了大量地形照片。他们还乘坐飞机,越过规定的航线,查看了九龙的地形。林立果说:'万一情况紧急了,可以让首长到香港指挥、遥控。'但是,我没有想到李作鹏竟然对山海关机场调度室传达命令时,篡改了我的指示内容,把四人联合下令改为四人中的任何一人下令都可放行。这就说明了他是有准备的,他不知道林彪的反革命计划才有鬼呢!特别是当林彪逃跑的时候,李作鹏已经得到了林彪一伙逃跑的报告,他不去采取任何的措施,反而让机场的人直接向我报告,这不等于故意放虎归山吗?毛主席得到了李作鹏的这些表现后,对我说:'看来这个李作鹏也是不可救药了,他和那几个大将是一模一样的人,你们要注意和警惕呀!'这样,他就把自己和林彪完全、彻底地捆到一起了!"

当周恩来讲到林彪座机外逃是"自我爆炸,自取灭亡"时,有的干部怀疑"是否总理命令部队用导弹把座机打下来?"

周恩来看完条子后,非常严肃认真地说:"我在此再说一遍,林彪的座机不是我命令打下来的,确实是迫降时自我爆炸,自取灭亡。大家可以想一想,林彪是党中央副主席,我仅仅是个常委。在军队他是副统帅,而我在军队没挂职,我敢命令部队把党中央副主席、军队副统帅的座机打下来吗?他是'九大'党章写上的接班人啊,如果我命令部队把他打下来,我怎么向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交待嘛!"

周恩来说的很激动,很合情理,台下先是鸦雀无声,继而是经久不息的掌声。大家表示信服。

稍停了一会儿,周恩来又继续说:"当然,林彪座机外逃时,我是及时向主席请示报告了的,这是一个共产党员起码的组织纪律性嘛。但是主席说,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由他去吧!主席尚能宽容林彪,我周恩来为什么要阻拦他呢?主席南巡时也说过,林彪还是要保的,如果

他承认了错误,还可以给他当一个政治局委员。主席对林彪都很宽宏大量,我为什么要致林彪于死地呢?”

他自责地说:“‘萧何月夜追韩信’还追回来了,可惜啊,我周恩来没能把林彪追回来……”

13 日晚,周恩来离开广州回北京。华国锋、李先念搬到南湖宾馆,继续召开广州军区扩大会议。会议主要有两个内容:第一是揭发、批判林彪集团的罪行,第二是表态。会议结束后,华国锋和李先念按计划坐火车北上。华国锋回湖南,李先念去湖北,分别向两个省的党政军干部传达“913”事件经过及中央的精神。传达完毕,两人如约在郑州会合,向河南省党政军干部宣布林彪叛逃事件,传达中央决定。

1971 年 7 月基辛格首次访华时,还没有考虑为尼克松访华发表公报的事。当基辛格向尼克松汇报了他第一次访华情况后,两人得出共识,需要发表一个“联合公报”,以显示尼克松访华的成果。

10 月 16 日,美国安德鲁斯空军基地,基辛格坐上了总统专机“空军一号”,开始了他的第二次北京之行,主要任务是与中方共同起草公报稿,同时具体讨论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事项,包括访华时间、在华行程安排、双方磋商谈判等问题。基辛格自定这次访华行动的代号为“波罗二号”。他已不再像上次访华是秘密的,这次是公开的、大摇大摆的,随行人员相当于尼克松访华的全部人马。飞行路线按照总统访问预定的路线试飞,中途在夏威夷和关岛停留,这样可以使总统一行在到达中国时不致由于时差和高速飞行的不适而过分疲劳。

虽说基辛格与周恩来已有过 17 个小时的会谈经历,中国对他也不再“神秘”。但是,当“空军一号”即将进入中国境内的时候,基辛格内心还是有点忐忑不安的预感。

10 月 17 日,周恩来召集中国外交部有关人员开会。拟出基辛格第二次访华接待方案,安排中美双方的对口会谈和活动计划。并将方案报毛泽东审阅。

10 月 19 日,毛泽东对基辛格第二次访华接待方案做出批示:“基本同意,某些地方可能要在会谈中临时修改。”

10 月 20 日上午,基辛格一行飞抵上海。在机场迎接的只有外交部欧美司司长章文晋等 4 人和上海外办的两位代表。在上海稍事停

留,当天中午,基辛格飞抵北京机场。迎接他的还是以叶剑英元帅为首的几位高级官员,只增加了姬鹏飞代理外长。基辛格等人感到有些受到了冷遇。这次访问已公开宣布,但欢迎场面并不像他们想象的那样热烈。

基辛格坐上大红旗轿车,直驶钓鱼台国宾馆5号楼。

透过车窗,基辛格发现,沿途断绝了交通,布满了警卫,还有几处写有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标语。

尽管这次访问是公开宣布的,是“为尼克松总统访华作基本的安排”,但是,接待人员与来欢迎的官员基本上与上次一样。基辛格仍然住在钓鱼台的5号楼。

当他们进入国宾馆5号楼的住房时,每个房间里都放有一份英文的电讯稿,上面印有“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倒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口号。

基辛格感到非常不快和担心,他甚至怀疑起沃尔特斯从巴黎渠道传过来的消息是否准确。但基辛格毕竟是一位老练的外交家,他当即令人把所有房间的英文电讯稿收集起来,由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东亚事务助理霍尔德里奇拿着一叠新华社英文新闻稿,找到了接待组负责联络的人员,指着英文电讯稿封面上的印的“毛主席语录”,问这是怎么一回事?

联络人员一看,那段语录是“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帝国主义及其一切走狗!”

霍尔德里奇说:“这是从我们个人的住房里搜集到的,这一定是以前的一个代表团丢在这里的。我们希望这些新闻稿是被错误地放到了房间里。”

周恩来听到摆放英文电讯稿一事后,非常生气。他当即查问外交部礼宾司的负责人:“为什么摆放这样的东西?”

礼宾司负责人说:“这是新华社历来的规矩。”

事情反映到毛泽东那里,毛泽东说:“告诉他们,那是‘放空炮’。他们不也是天天在喊要消灭共产主义吗?也算是在空对空吧。”

后来,周恩来明确交代,以后所有报刊、杂志均放在走廊,由外宾自愿选择提取。

当天下午16时,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基辛格一行全体人员,在会议室门口合影留念,请大家坐下来喝绿茶,并且对美方每一个人都说几句欢迎的话。

周恩来以他惊人的记忆力,就像老朋友似的说出基辛格的随员各自的学历和经历,并谈笑风生地赞扬他们的来访增进了两国友谊。轮到国务院詹金斯时,周恩来对他说:“你22年前就在中国居住过,对中国很了解,是中国的老朋友了。”詹金斯听后非常感动。

随后双方顺利地就会谈议程和方式作了满意的商定。

周恩来给基辛格谈起了“放空炮”的比喻。基辛格开初还不太懂“放空炮”是什么意思,周恩来解释说:有些宣传口号是“放空炮”,而没有实际行动。应该注意中国的行动,而不是它的言辞。“当然,也不是什么事都放空炮,我们说话是算数的。”

基辛格对中国的这种奥妙的宣传辩证法还是似懂非懂。

会见后,周恩来设宴招待全体来宾,并即兴发表了热情洋溢的祝酒词。他说:

“中美两国关系中断22年之后,现在在两国的关系史上就要揭开新的一页。这应该归功于毛泽东主席和尼克松总统。当然,一定要有一个人作为先导。这个先导就是基辛格博士。”

接着,周恩来很自然风趣地引出了基辛格上次说中国是“神秘的国土”这句话,并赞扬他勇敢地秘密访问了中国这个所谓的“神秘的国土”,是件了不起的事。

周恩来笑着说:“现在是基辛格博士第二次访问这个国土,它不应该再被认为是‘神秘’的了。他是作为朋友来的,还带来了一些新朋友。”

听到这里,基辛格不好意思地笑了。

周恩来接着说:“拿我来说,我虽然从未到过美国,但我认识不少美国朋友,美国对我来说也不是不熟悉的。很明显,我们两国的社会制度是不同的,而且我们各自的世界观—基辛格博士喜欢用‘哲学’这个词—是完全不同的,但是这不妨碍我们找到共同点。现在尼克松总统要亲自到北京来讨论,而基辛格博士就是他的先行人员,我们希望这些讨论取得积极的成果。我们两国的人民是伟大的人民,我们两国

虽远隔太平洋,但友谊把我们两国人民连接在一起。”

周恩来这番祝酒词不是一个正式的发言,完全是即兴的。基辛格一行情不自禁地报以热烈的掌声。

宴会快要结束时,周恩来潇洒地端着酒杯,特地绕宴会厅一周,同每位客人,包括秘书、警卫和机组人员一一握手、碰杯。至此,基辛格等人刚下飞机时受到的冷遇感烟消云散。

晚上22时,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召集周恩来、叶剑英、姬鹏飞、熊向晖、章文晋、王海容、唐闻生等开会。当大家走进毛泽东的书房,毛泽东一见到熊向晖,就笑眯眯地问他:

“那个‘副统帅’呢? 那个‘参谋总长’哪里去了?”

熊向晖也笑着说:“主席问我的时候,我确实不知道呀!”

毛泽东打趣地问:“现在知道了吧?”

熊向晖说:“现在当然知道了。”

毛泽东幽默地说:“你什么也没嗅出来,是不是伤风了,感冒了?”

他又连连地说:“我的‘亲密战友’啊! 多‘亲密’啊!”还念了唐朝杜牧的诗:

“折戟沉沙铁未消,自将磨洗认前朝。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

老人家接着说:“三叉戟飞机摔在外蒙古,真是‘折戟沉沙’呀。”

当时正在召开的第26届联合国大会。而这届联大涉及到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合法地位的问题。毛泽东问:

“联合国大会前天开始辩论中国代表权问题。为什么尼克松让基辛格在这个时候来北京?”

叶剑英说:“大概他认为美国的两个提案稳操胜券。”

毛泽东说:“美国是‘计算机的国家’,他们是算好了的。在基辛格回到美国的那一天或者第二天,联合国就会表决通过美国的两个提案,制造两个中国的局面。所以,还是那句老话:我们绝不上‘两个中国’的贼船,今年不进联合国。”

# 第1227回：未曾想，公报草案分歧大 格式新，双方初步达共识

10月21日晚，基辛格一行来到人民大会堂三楼小礼堂，出席专门为招待他们举行的文艺晚会。以好客著称的中国观众并没有像欢迎远道而来的贵宾那样，起立鼓掌表示欢迎。美国人的确想象不到，小礼堂里的看客总共500人，除了他们以外，所有的人都是经过选择的。其中来自外交部的人员150名，来自中央警卫团的警卫人员100名，人民大会堂的工作人员50名，有关单位人员100余人。除了美国人以外，没有其他国家的外宾。

所有看节目的中国人，在基辛格等到华前一天就被打了招呼，21日出席文艺晚会的美国人，有别于以往意义上的国宾，他们入场时，不起立、不鼓掌，只在中间休息和最后谢幕时，给演出者鼓掌；在看演出的过程中，不得交头接耳、唧唧喳喳。

10月21日、22日，周恩来等人同基辛格进行了三次会谈。

会谈一开始，为活跃气氛，周恩来针对基辛格来华初次会谈时念稿子的窘态，风趣地说："按照惯例，我还是请你先说。我准备听你讲写出来的这么一大堆材料。"

基辛格自谦地说："当时我自己感到很惭愧，很别扭……"

未等基辛格说完，周恩来就摇了摇手制止说："不，不，你头一次来嘛，必须要有一个准备好的看法嘛！"

基辛格说："总理没笔记讲话，比我有笔记讲话更流畅。"

周恩来客气地笑了笑："不见得，不要夸奖喽。"

接着，基辛格提出尼克松访华日期在1972年2月21日或3月16日均可。周恩来选定了2月21日。

10月23日，基辛格一行人轻松地在主人陪同下，去尼克松将要参观的地方游览，上午去长城和十三陵，下午去颐和园。

当晚21时，周恩来等同基辛格进行会谈。22时20分，毛泽东在

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召集周恩来等开会。

基辛格没有料到,这次访问北京最富戏剧化的就是讨论公报草案了。他在来华之前,早已和助手们绞尽脑汁准备了一份中美联合公报草案,经过尼克松审阅和批准。

这份公报草案包括访问情况、两国关系的一般原则、对国际形势的看法和台湾问题等四个部分,是按国际惯例起草的,长约3000字。他们非常得意自己的这份“杰作”。

谁知周恩来看了美方起草的草案后,很不满意,明确表示不能接受。他指示外交部章文晋和总参二部的熊向晖另外起草草案,并提议:参照抗战胜利后国共谈判达成的协议办法,各说各的,明确写出双方的分歧,同时也吸取美方草案可取之处,写出双方的共同点,将中美双方的观点并列。

毛泽东同意周恩来的意见,说:各说各的好。

10月24日10时40分,周恩来来到钓鱼台,与基辛格讨论尼克松访华的联合公报。

会谈一开始,周恩来就明确表示:在“基本原则”部分,美方同意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和平共处”作为指导两国关系的原则。这一部分是十分可取的,中方赞同。

在“对世界形势的看法”部分,虽然内容多取自周恩来与基辛格7月会谈中提到的一些问题和观点,但美方把一些重大分歧一带而过,主要是讲双方的“共同利益”和“共同点”。对此,周恩来表示反对,他说:

“毛主席已经看了你们拟的公报草案,明确地表示不同意。这样的方案我们是不能接受的。”

基辛格没有马上说话,与助手们交换了眼光,显出不悦。他本来想用一种轻松谈笑的口气开始这次谈判的,遇到周恩来口气坚定的表态,他的口气也转向坚定:“我们初稿的含义是说,和平是我们双方的目的。”

“和平是只有通过斗争才能得到的。”周恩来说,“你们的初稿是伪装观点一致。我们认为公报必须摆明双方根本性的分歧。”

基辛格并不退让:“我尊重总理的信仰,但把那些一贯正确的教条

写在公报里是不合适的。”

霍尔德里奇很不服气:“我方拟的公报初稿,难道就一无是处?”

周恩来严肃而心平气和地说:“你们也承认,中美双方存在着巨大的分歧,如果我们用外交语言掩盖了这些分歧,用公报来伪装观点一致,今后怎么解决问题呢?”

斯迈泽说:“我们起草的公报,采用的是国际通用的惯例。”

周恩来说:“我觉得这类公报往往是放空炮。”

此时,周恩来胸有成竹地说:“我们两国打过仗,敌对和隔绝了20多年了。对于如何管理国家、如何跟外界打交道,我们有自己的观点。”周恩来微笑着扫了大家一眼,说,“现在该吃烤鸭了。我们将在下午提出一个公报的初稿。”

中方提出的公报草案完全打破了老一套格调,十分新奇。在草案的序言中概述了尼克松总统访华情况。第一部分要求各自写明对国际形势和重大问题的看法和立场。中国方面以十分明确的语言阐述了中国政府对一系列重大问题的看法,美方部分留下一些空白页由美方自己写。第二部分吸取双方共同点明确了建立中美关系的共同原则和共同声明。第三部分各自说明关于台湾问题的立场和主张。第四部分写明改善双边关系的某些具体建议。

吃完烤鸭,又一轮会谈开始。周恩来让姬鹏飞代外长念了中方起草的公报草案。然后笑着说:

“公报由双方各自阐述不同的立场观点。我方已经列了我们的观点。下面留下了一些空白面由你们阐述你们的观点。然后双方再进行讨论。”

基辛格听了中方的公报草案,大吃一惊。他代表美国经历了多次谈判,包括跟苏联人、越南人的谈判,还没有碰到过周思来这样的对手,也从未遇到过这样一种谈判方式。

此时,基辛格的助手们也都面面相觑。在美国人看来,中国人交出的公报初稿的构思是前所未有的。它以十分鲜明的词句阐述了中国对一系列问题的立场。从中可以看出,在台湾问题上中国人是寸步不让的。

基辛格沉默了一会,对周恩来说:“总理先生,这样的方案,我看,

在国际上和美国国内都是无法接受的。在美国总统历史性的访问结束之时,列举双方这么多的不同观点,这岂不等于告诉全世界,中美双方在吵架么?”

周恩来指出:“你们的初稿是伪装观点一致,我们认为公报必须摆明双方根本性的分歧。众所周知,中美在意识形态、社会制度和国际重大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20 多年的隔阂不可能消失于一旦。如果在此情况下双方签署那种既不说真话、也不打算遵守的陈词滥调式的文件,那是不可取的。”

基辛格说:“我们不回避双方的分歧,签公报又有什么意义?”

周恩来坚持说:“漂亮的外交辞令掩盖分歧的典型公报,往往是祸根。既不解决问题,又会导致更深的矛盾。”

基辛格脑筋转得很快,口气有所松动:“我们不能光是列举不同的观点,而是必须向着未来有所前进,”

周恩来敏锐抓住基辛格的话头,说:“公开地摆明分歧,就是解决问题的开始,也是通向未来的第一步。博士,你说是么? 你们不妨再考虑一下。我们稍微休息一会。好吗?”

休会的时候,基辛格和助手们来到花园里一边散步一边讨论。离开住房说话当然是为了保密。

“按中国人的方案,在总统访问结束时,双方在公报上一一列举那些严重的分歧。”斯迈泽说。

“这种公报是外交史上前所未有,闻所未闻的。”霍尔德里奇说,“观点是那么针锋相对,总统来访还有什么意义?”

洛德说:“从周恩来的口气来看,中国人是不会再后退了。”

他们都骤然感到心情沉重。

沉默,沉重的沉默。秋虫的鸣叫听得特别清晰。远处似乎传来蒸汽火车头长鸣的汽笛声。

洛德有些沮丧:“我们花了多少心血搞的初稿,等于扔进了垃圾堆。”

大家都望着基辛格。基辛格时而低垂脑袋,时而仰望深远的天空,来回地踱着步子。去停在北京机场的“空军一号”座机上用电讯请示尼克松总统么? 不。他想着又摇摇头。总统已经授权他在北京可

以拍板。他的思路善于逆转。他转而一想,禁不住随着思路脱口而出:

“公开地摆明分歧,难道不会使双方的盟国与朋友放心么?这说明他们的利益得到了保护。还会使各方面的人确信公报是真诚的。”

年轻的洛德也马上开窍了:“对了,正因为我们公开承认存在的分歧,我们那一致的部分才显得难能可贵与真实可信。”

基辛格嘴角露出了笑容:“也许用这种独出心裁的方式,能够解决我们的难题。这就是中国方案妙的地方。”

休会片刻之后,基辛格告诉周恩来,美方愿意接受他的初稿的基本做法。在接受中方提的初稿基础上,基辛格提出了一些补充,说:

“公报中表述不同观点的文字必须互相适应。我觉得,中国的某些提法表达方式过于僵硬,而难以接受,对于你们报纸上常用的那种火药味很浓的提法,那种好像是审判我们或是凌辱美国总统的文字,总统是不会在这样的文件上签字的。”

他一再说:“美国总统跑 16 万英里到中国来,不是为了共同发表一些高调谴责自己的词句。”

周恩来很高兴地说:“我们所用的词句中确有令人为难之处。我们不是在做交易,完全用不着讨价还价,你只须改得叫我同意。”

基辛格答应第二天,也就是 25 日上午提出美方的草案。

10 月 24 日下午 17 时 30 分,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召集周恩来等开会。

夜已经相当深了,基辛格和洛德没有休息。先由洛德马不停蹄地改写中方的草案,基辛格先睡觉。然后洛德把基辛格叫醒,接着进行修改。洛德去睡一会儿觉。他们觉得表明中国立场的那部分文字过于僵化,想努力修改得温和一些;他们也特别选择温和的措词来表达美国的观点。

基辛格刚刚动笔修改了一会儿,天就已经亮了。

公报的特殊格式确定后,双方进入实质内容的谈判。

台湾问题一直是双方争论的焦点。1971 年 7 月基辛格第一次访华时,曾在台湾问题上做出几项重要承诺,包括美国今后不支持“两个中国、一中一台”,不支持台独运动,不再说“台湾地位未定”,印支战争

结束后先从台湾撤走三分之二美军,随后再撤出其余美军。但是美方不愿把这些口头承诺写进公报里。基辛格表示,“不是我们说过的问题都能写出来”。在美方起草的公报里,美方只说要“逐步减少”在台湾的美军,而且还以台湾问题和平解决为条件。

周恩来明确告诉基辛格,美方必须声明四点:1、只有一个中国;2、鼓励中国人自己解决这一内政问题;3、美国不进行将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的活动;4、要全部撤走美国军事力量,美军撤走可分步骤进行,不一定马上都撤,但上述四点立场必须表明出来。

由于美方未能满足这一要求,台湾问题未达成协议,双方商定于1972 年 2 月尼克松总统访华时继续讨论。

10 月 25 日下午 14 时,周恩来向毛泽东报送同基辛格谈判情况的报告以及美方提出的中美联合公报草案和中方提出的中美联合公报草案。16 时,报送同基辛格谈判进展情况报告和中方提出的中美联合公报草案第二稿。周恩来还说:“请主席审阅后约我们一谈,以便再同美方见面。”毛泽东圈阅。

从 10 月 20 日下午 16 时 30 分开始到 26 日上午 8 时许,周恩来总理与基辛格博士的会谈举行了 10 次,共计 23 小时 40 分。周恩来与基辛格第 10 次会谈是 26 日清晨 5 时 30 分在钓鱼台国宾馆 5 号楼开始的。他们之间的这最后一次会谈持续了将近 3 个小时,至上午 8 时才告结束,基辛格第二次访华的使命也告结束。

周恩来与基辛格告别。送到宾馆门口时,周恩来第一次用英语对基辛格说:“欢迎你很快回来共享会谈的愉快。”

周恩来走后,叶剑英、熊向晖与基辛格一行共进早餐,然后分乘汽车送基辛格一行到首都机场。

基辛格离开钓鱼台时,将放在那里的《人民日报》、新华社电讯都拿走了,拿了了一大堆。没多久,北京很多地方又换了名字,“反帝医院”在后来尼克松参观时改成了“首都医院”,“工农兵大街”也恢复了它原来的名字——地安门大街。

基兴格乘坐的美国总统的“空军一号”先到上海,然后从上海返回美国。飞机起飞不久,机场报告叶剑英说:外交部值班室来电话,说联合国大会通过了“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席位的决议”。

叶剑英说:“刚才基辛格在汽车里还对我讲,美国的两个提案肯定能得到半数以上的赞成票,中国进入联合国还得等一年。美国总统专机配备最先进的通讯器材,基辛格这时也一定会知道这个消息,不知他作何感想?”

事实也的确是这样,基辛格乘坐的飞机刚刚起飞,电传打字机就传来消息:他们在联合国保持台湾席位的那场战斗打输了。

新华社10月26日报道:为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作具体安排的基辛格博士一行14人结束了同中国政府的会谈,于今天离开北京途经上海回国。到机场送行的有叶剑英、姬鹏飞、于桑、熊向晖、章文晋、王海容、陈楚、马仁辉、张瑞霭、刘澄清、王笑一、钱大镛、冀朝铸、唐闻生、沈若芸、章含之等。外交部礼宾司代司长韩叙陪同前往上海。

# 第1228回：喜讯到，中国进入联合国代表团，赴美出席联大会

就在基辛格离开北京前往上海的途中，北京时间1971年10月26日中午11时25分，美国纽约时间为10月25日深夜11时25分，联合国第26届大会以76票赞成、35票反对、17票弃权的压倒多数票，通过了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等23国关于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一切合法权利的提案，简称“两阿提案”。联合国大会决定：“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利，承认她的政府的代表为中国在联合国组织的唯一合法代表，并立即把蒋介石的代表从它在联合国组织及其所属一切机构中所非法占据的席位上驱逐出去”。

关于中国代表权问题，这届大会要进行表决的提案共有3个：

第一个是由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等23国提出的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并立即把台湾当局的代表驱逐出去的提案（“两阿提案”）。23国明确提出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权利，是既维护《联合国宣言》也有利于联合国的事业。立即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是中国的唯一合法代表，并且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为联合国安理会5个常任理事国之一。同时，立即把蒋介石集团在联合国及其所属机构中的代表驱逐出去。

第二个是由美国、日本等22国提出的“变化的重要问题提案”。这个提案规定要从联合国取消“中华民国的代表权”的任何建议，需要三分之二多数通过，这就是所谓的“变化的重要问题案”。

第三个是由美国、日本等19国提出的所谓“双重代表权提案”，即接纳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联合国，但“确认中华民国继续拥有代表权”。

1971年10月23日是星期六，周末，美、日、蒋积极活动拉票，几乎废寝忘食。24日是星期日，他们的代表碰头对130国的投票意向进行估算。美方最乐观，认为是58比57，15票弃权；日方认为是57比60，7

票弃权,7 票动向不明;台湾是 58 比 60,12 票弃权。美国认为,他们的两个提案肯定可以得到半数以上的赞成票,大陆中国进入联合国还得再等一年。

10 月 25 日,星期一上午、下午和晚上,在此届联合国大会主席、印度尼西亚外交部长马立克主持下,大会辩论和表决中国代表权问题的三个提案。这天在联合国历史上是辩论最漫长的一天,也是举世瞩目的一天。

辩论一直持续到傍晚 18 时许,当即将就中国代表权问题进行表决时,美国的盟友沙特阿拉伯代表要求大会暂停 24 小时审议中国代表权问题,希望能为美国再争取一天时间去说服一些仍在动摇的国家支持美国提案。沙特阿拉伯代表同时还建议考虑沙特阿拉伯的一项新提案,称"台湾保持在联合国的席位,直至台湾人民能在联合国主持下举行复决或公民投票,以决定未来将成为一中立的独立国家,或与中国大陆组成邦联"。沙特阿拉伯的提议以 53 票赞成、56 票反对、19 票弃权被大会否决。

美国随即动议要求先表决他们 22 国的所谓"变化的重要问题提案"。经过一番辩论至将近 20 时,大会主席裁定先就美国的程序性动议付诸表决。结果 61 比 53,15 票弃权,获得通过。对立双方又继续辩论到 21 时 48 分,大会主席马立克宣布表决美国、日本等 22 国提出的所谓"变化的重要问题提案"。此时会场气氛极为紧张。出人意料,投票结果是 59 票反对、55 赞成、15 票弃权。美国、日本等 22 国提案被否决。当表决结果在会议大厅主席台两侧庞大电子计票牌显示出来时,会议厅里顿时欢呼起来,爆发出经久不息的热烈掌声。此时"两阿提案"的 23 国代表们看到胜利在望,热烈鼓掌欢呼。坦桑尼亚常驻代表则离开代表席位尽情地跳起舞来,出现了联合国从 1945 年创立以来少见的欢乐场面。

等到热烈欢呼声稍停,阿尔巴尼亚代表要求马上表决"两阿提案"。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布什要求发言,作最后的挣扎。他快步走上主席台,对着全体成员国说:美国代表团建议从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等 23 国决议草案中删去"立即把蒋介石的代表从它在联合国组织及其所属一切机构中所非法占据的席位驱逐出去"一段。

他话声一落,从非洲等许多代表团的席位上发出一片又一片反对声,“No!”、“No!”声响彻大厅。

经过又一轮冗长的辩论。在代表们的反对声中,大会主席马立克裁定,这项建议不合议事规则。此时已是深夜23时15分,台湾当局代表团团长周书楷见到所有可以抵制“两阿提案”的办法均已用尽。在大势已去的情况下,为了挽回一点面子,他马上在大会主席将“两阿提案”提付表决前,即以程序问题为由跑到讲坛上要求发言。他宣布“中华民国退出联合国”,“不再参加本届大会”。随即率领他的属下黯然退出了会场,并在会场外过道上举行记者招待会,宣读事先准备好的一项声明,“宣布退出联合国”。

接着大会表决“两阿提案”。结果是76票赞成,35票反对,17票弃权,3票缺席。联合国第26届大会以绝对优势通过了要求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和立即把台湾当局的代表从联合国一切机构中驱逐出去的议案。大会主席马立克举起手中的木槌在主席台案桌上重重的敲了一下,宣布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等23国提案通过。接着,马立克宣布美国、日本等国所提的“双重代表权案”成为废案,不再付诸表决。此时是纽约时间1971年10月25日深夜23时25分。大会主席随即宣布散会。会议大厅顿时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持续两分钟之久。

坦桑尼亚代表首先离开座位,在主席台前再次跳起舞来。提案国的代表纷纷起立相互拥抱,拍打桌子,热烈鼓掌,全场一片欢腾,“中国万岁”的欢呼声响彻大厅。

当天,26届联大通过第2758号决议后,吴丹秘书长代表联合国立即致电中国外交部代理部长姬鹏飞,正式通知联合国大会已通过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一切合法权益的第2758号决议,要求中国政府尽快派出代表团参加第26届联合国大会的工作。

周恩来于26日早上送走基辛格,晚上19时30分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召集外交部党组及有关人员开会,讨论出席联合国大会的问题,主要是讨论是否派人出席?在当时大陆一般的中国人眼里,联合国大会就是资产阶级讲坛,是受美苏两大国操纵的,不可能真正为受压迫民族和受压迫人民讲话。所以,外交部党组经过商量,决定不去,准备

回一个电报给联合国秘书长吴丹,感谢他的邀请。

讨论尚未结束,毛泽东就给周恩来打来电话询问此事,周恩来汇报了讨论的情况及外交部党组的意见。毛泽东明确指示:

“要去。为什么不去?马上就组团去。这是非洲黑人兄弟把我们抬进去的,不去就脱离群众了。”

周恩来说:“我们刚才曾经考虑先让熊向晖带人去摸一摸情况。”

毛泽东说:“派一个代表团去联大,让乔老爷作团长,熊向晖可以作代表或是副团长。开完了大会还可以回来。”

“乔老爷”是大家对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的戏称。

毛泽东让周恩来和参加讨论的外交部党组人员一起来他的住处。

大家来到毛泽东住的中南海游泳池,毛泽东依然穿着睡衣,很高兴地同大家逐一握手,然后说:

“今年有两大胜利,一个是林彪倒台,一个是联合国恢复我国的席位。这两大胜利,我都没有想到。林彪搞鬼,我有觉察,就是没有想到他跑到外国,更没有想到他坐的那架三叉戟飞机,摔在蒙古,折戟沉沙。”

说着,他又笑望着熊向晖问:“那个‘参谋总长’呢?那个‘副统帅’上哪里去了?”

室内顿时充满了笑声。

周恩来说:“我们刚才开过会,都认为这次联大解决得干脆、彻底,没有留下后遗症。只是我们毫无准备。我临时想了个主意,让熊向晖带几个人先去联合国,作为先遣人员,就地了解情况,进行准备。”

毛泽东说:“那倒不必喽。联合国秘书长不是来了电报吗?我们就派代表团去。让乔老爷当团长,熊向晖当代表,开完会就回来,还要接待尼克松嘛。派谁参加安理会,你们再研究。那么多国家欢迎我们,再不派代表团,那就没有道理了。不高兴的人也有,蒋委员长就是头一个。美国国务院说要发表声明,还没有看到,不过是一篇‘吊丧文’。”

10 月 29 日,外交部代部长姬鹏飞致电联合国秘书长吴丹,通知中国政府将在近期内派团出席本届联大。在此之前,联合国秘书长吴丹又多次来电邀请中国政府派团出席本届联大。

以乔冠华为团长的中国代表团即将出席本届联大的消息发布后，国外新闻界一致认为，这是中国“可能派出的最合适的人选”。

中国第一次到联大向全世界亮相，组团工作由周恩来亲自主持，代表团人员都报经毛泽东主席亲自审定。

乔冠华连续数夜赶写在联合国大会的第一篇发言稿，写完后送毛泽东、周恩来审定。他的内心是激动的。1950 年，乔冠华曾经与伍修权一起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去纽约参加联合国大会，那是因为当年美国总统杜鲁门命令美国第七舰队开进台湾海峡后，周恩来总理兼外长代表中国政府向联合国安理会提出了“美国侵略台湾案”，要求安理会公开谴责并严厉制裁美国武装侵略中国领土台湾的罪行。

按照联合国宪章有关条款的规定，安理会在讨论有争端的问题时，应当邀请有关的当事国参加讨论。10 月 2 日，联合国秘书长赖伊正式通知中华人民共和国，同意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派出代表出席联合国大会和安理会，参加“美国侵略台湾案”的讨论。

当时尽管中国政府早已任命张闻天为常驻联合国代表，但是在美国控制和影响下的联合国，正式席位依然被台湾蒋介石中华民国的代表占据着，张闻天一直未能赴任。这次，中华人民共和国首次派出代表到联合国表达中国政府的立场意义重大，因此，党中央和国务院决定由外交部苏欧司司长伍修权作为特派代表，政务院出版总署国际新闻局局长、外交部“外交政策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乔冠华任顾问，龚普生、安东、陈翘（即陈忠经）、浦山、周砚、孙彪和王乃静为代表团成员前往联合国。

1950 年 12 月 7 日，联合国大会通过了美国等国提出的谴责“中国侵略朝鲜”的决议，伍修权当场率领代表团离开会场。

随后，大会于 12 月 15 日决定：联合国无限期休会。

1950 年 12 月 18 日，联合国大会又通过决定，宣告联合国大会政治委员会也无限期休会。

面对美国操纵联合国无限期休会的情况，中国政府发表声明说：“伍修权将军及其随员已无留下的必要，故已命令伍修权将军等于本月十九日启程回国。”伍修权和乔冠华的这次联合国之行，就这样结束在 12 月 7 日愤然离席的那一刻。

中国政府特别代表伍修权在联合国安理会控诉美国武装侵略台湾,图为伍修权(左一) 乔冠华(左二)、龚普生在联合国。

事隔20年,乔冠华又去联大了,这次是以常任理事国代表团团长身份面对全世界发言。他的声音代表着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声音。

1971年11月1日,周恩来同刚抵北京的金日成会谈。

11月2日,毛泽东会见金日成。

11月6日,毛泽东在外交部关于为出席第26届联大代表团送行计划报告上的批语:“规格似宜高一点,今晚可谈一下。”

11月8日,毛泽东接见出席联合国代表团的全体成员。当周恩来带领大家来到中南海时,毛泽东站在书房门口同大家一一握手。谈话时,毛泽东兴致很高,从世界大势一直谈到国内问题。他说:“你们这次去联合国可以放心了,我的那个‘亲密战友’不在了。我国今年有两大胜利,一个是林彪倒台,一个就是恢复联合国席位。”

第二天,代表团启程。按照毛泽东提出的送行规格“宜高一点”的意见,周恩来、叶剑英等在京政治局委员全都前往机场送行。

中国代表团于1971年11月15日抵达纽约联合国总部,受到了盛大的欢迎。中国政府代表团第一次走进了联合国会场,坐在了自己国

家的席位上。联合国秘书长吴丹高兴地说：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为我们中间的一员已经变成现实，中国加入到联合国之后，可以促进联合国更好地解决国际问题，最终会促进一些国际争端问题的解决。”

57 个国家在联合国大会致欢迎词，整整持续了六个小时。不少非洲国家十分热情，向中国代表团介绍情况，帮助中国代表团熟悉联合国议程和工作。中国代表团同非洲国家的合作和情谊进一步全面深化。

中国参加联合国，标志着中国对外关系史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中国的国际地位日益提高，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同时，由于中国长期贯彻毛泽东“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反对霸权，维护正义，紧紧地团结了第三世界的众多朋友。

毛泽东指示有关部门：“要将联大会议上各国代表的发言全文刊登在国内报纸上，不要只登摘要。”

# 第1229回：周恩来，与韩丁一家交谈 从文革，到党内十次斗争

1971年11月13日、15日，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美中人民友好协会第一任主席、联合国粮农组织高级顾问韩丁及他的全家：韩丁的母亲卡玛丽达·辛顿夫人、韩丁的妻子雷州安、韩丁的妹妹寒春、寒春的丈夫阳早、韩丁的女儿卡玛、卡玛的母亲史克、阳早和寒春的儿子阳和平。

1937年春天，韩丁作为水手，曾随船由旧金山驶向日本。在东京做了5个月记者后，经中国东北、西伯利亚来到苏联，后辗转欧洲，再度做水手，返回美国。

1945年，韩丁以美国战争情报处分析员的身份来到中国。重庆谈判期间，他结识了国共双方很多要员，包括毛泽东、周恩来、宋庆龄等。在同毛泽东等人的多次谈话中，他对中国革命及其前途有了更加深入的理解。

1947年，联合国救济善后总署捐赠一批拖拉机给中国，并且招收志愿工人使用这些农机，韩丁应召作为拖拉机技师第三次来到中国，被派到东北工作。因不满于国民党的腐败，又自愿来到共产党所领导的河北解放区。随即在晋冀鲁豫边区冀南地区负责一项发展计划。同年秋天，联合国在全世界结束了农机救援的工作，把志愿工人解散送回美国。韩丁决定留在中国，一如既往地为培训中国第一代农机人员倾心竭力地工作。并在此期间，参加了解放区的土改。

1953年，韩丁将太太史克、女儿卡玛留在北京，自己漂洋过海返回美国，结果被美国当时的麦卡锡主义冠以“叛国者”的罪名，扣压了他所带回资料，对他实施严密监视，行踪被记录，电话被偷听，活动受限制。整整16年，他因护照被吊销而不能再回到中国。直到1971年，中美关系和缓，他才应周恩来之邀得以重返中国。

根据阳和平的中文原始记录，在1971年11月14日那天的交谈

中,周恩来介绍了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造过程,和韩丁他们讨论了社会主义社会为什么还存在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问题。当谈到公与私的关系时,周恩来说:

“资产阶级骂我们只有集体,没有个人是不对的。是资产阶级走极端,资本主义只有个人,没有集体,造成无政府状态。如公害问题,在资本主义下不可能解决。你们参观的东方红炼油厂解决了污染问题,把污水变得可以养鱼,可以浇地。我们还不满足,再高的要求就是还可以喝。

美国在这方面就不行了。几个大湖和沿海的鱼死光了,所以到秘鲁沿海抢鱼。为了自卫,秘鲁和邻国一起说二百海里是领海,我们支持,作为建交的条件。垄断资本不光是污染自己的领海,还要掠夺别国领海的财富。

日本的公害也厉害。有个东京都市长和横滨市长来中国和我谈。东京都市长是个非党派的进步人士,横滨市长是社会党。他们到炼油厂参观了。我问他们公害怎样办?他说日本制度下,他毫无办法。幸亏东京都的工业多是老的和小的,污水不多,还没问题,也没大的炼油厂,但是汽车很多,废气很多,东京都的居民毫无办法。东京都市长羡慕北京市的自行车,但他说毫无办法。垄断财团要卖车,为了利润他们要大的市场,要人们几年得换新车。

横滨不行了。大炼油厂污水很多,近海鱼全死了。个人主义发展到高峰成了公害。每个企业增加投资,减少产量,才能制止公害,还有赔钱的危险,谁干?资本主义发展到最后阶段,是不顾环境破坏的,也不人道。在社会主义社会我们是要把公私安排好,而不是“大公无私”。社会主义不可能改造的只有集体利益,没有个人利益。我们要的是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要是集体和个人利益的和谐。

在大寨,我给你们讲个故事吧。你们保卫大寨我支持,毛主席号召学大寨,我不反对吧。大寨还是有缺点。先进和落后的斗争是第二位的,阶级斗争是第一位的。先进落后的斗争是将来的,共产主义是这个样,方向性可知,时间性不可知。到那时还有左中右。阶级思想的痕迹要逐步下去。这有几千年的影响。我讲的是中国的斗争,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

我回到‘公与私’的问题。我们不是取消私光有公,而是私服从公,把私和公一致起来。

大寨是公私结合好的,没有自留地了,住的集中了,行动一致了,早上大家一起起床。但也不能人人如此,病人、小孩、老人,刚上完夜班的还不能一样起床,这是私的差别。只不过原则是先为公,再为私。”

“大寨是个‘先公后私’的好的典型。文革时,人们对此争议很大,我们说的先公后私,有极‘左’思潮的人,说陈永贵是大公无私,所以大寨人一时很骄傲起来了。另一些人说大寨人吹,背后其实也是为自己。山西省革委会主任谢振华到大寨后反对两种观点,说大寨是先公后私,不是大公无私。大寨人不满意,谢振华说的时间地点是不对。陈永贵到北京,我说先公后私是中央说的,是有道理的。秋收后,先把公粮拿出来,再把种子拿出来,再把集体储备留下来,再把卖给国家的粮拿出来,然后第五才分口粮。口粮每年增加一些,这就了不起了。在全国做了模范,先公后私,全国公社都像你们这样,工作就好做多了。所以别人学得到的做榜样,学不到的怎么做榜样?”

“陈永贵接受了先公后私。”

韩丁问:“那自力更生呢?能走极端吗?”

周恩来:“大寨还是以自力更生为主。”“自力更生为主,国家帮助为辅。”

“虽然大寨是先进的,不能说大寨没缺点。大寨还是有缺点的。”

“大寨是大队核算。80 多户,450 来人。但是河北平原很多小队都这么多人。在那里也变成大队核算就不好了,那就是平调了,生产多的倒不如生产少的了。农民的积极性会受到影响。

有些地方正好相反。如西南部的山区,有些大队只有几户到十几户。如果把这些小的核算单位像大寨那样合到一起,天天为了记工分山上山下的来回跑也不好。云南山很高,山上山下是一个大队。山上冷,山下热,上下差别很大。虽是一个山,还是分成两个小队好。

大寨的核算制度,大寨的石窑洞不要机械地照搬。大寨人原来住的也是土窑洞,一场大洪水把多数的冲垮了。陈永贵就带领大家建造了一排一排的石窑洞。这样一来家前的小菜园没有了,也无法各自养

猪了。如果其他的村子也这样办,那就糟了。大多数地方群众的觉悟还达不到取消自留地,取消自家养猪的地步。

所以我们要学不是大寨的核算单位或居住方式那些具体内容,而是要学大寨人如何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如何切实地把他贯彻到自己的日常实践中去。我们要学的是大寨先公后私,以自力更生为主的精神。

完美无缺的榜样和典型是没有的,沙石峪也是以自力更生为主。张庄、沙石峪、西沟都有优点。我们要每个县,每个省,每个市都要建造自己的大寨。各地有各自的大寨,各地情况不一样,不要都从千里外来学大寨。

我都讲的是你们碰到的事。我讲些别的。卡玛与韩丁回美国。青年人是希望。卡玛你比我强。我犯过路线错误,你没犯过路线错误。”

韩丁问:“斯诺文章里讲毛泽东说他是‘和尚打伞’是什么意思?”

周恩来说:“斯诺走后写了很多文章,你们看了《生活》杂志里刊登的和毛主席的谈话吗?里边说的基本上是毛主席说的,有的是斯诺理解错了,如他说什么孤独的和尚打着漏雨的伞。

主席说‘和尚打伞,无法无天’。这是个歇后语。和尚剃光头所以没有头发,和尚打伞就遮住了天。发指的是法律,天指的是皇上,就是像孙悟空那样无法无天。

那是去年12月18日毛主席接见的斯诺,当时的情况是在文化大革命中间,群众发动起来造走资派的反。政治工作领导一切,毛泽东思想武装了群众,全国都在备战备荒,这是好的,但几年来有些副作用。

第一,毛主席最不满意的是把一切都说绝对了,如毛泽东思想一定要给四个伟大。毛主席最不满意,这是陈伯达搞的。他当时是中央文革小组的组长。是在1970年8月的九届二中全会撤销了他的一切职务。

第二,毛主席说要一个教员就行了,扭转时很费劲。扭转这个用很长时间,按主席的意思,伟大两字也不要了,但群众不同意,只要导师不行,亿万群众天天讲,不容易改。

如‘大树特树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的口号,完全错了。怎会有绝对权威呢?毛主席在这方面有权威,但有些事不是他管的,那他怎么能是权威呢?而且这也有时间性,还有考虑将来。你今天是权威,你明天也是权威吗?如果你把毛泽东思想说成是绝对权威,那还有发展的吗?说绝对权威是社会停滞论,是不对的,是消极的。

再说权威是群众承认和支持的,是经过实践检验的,它只能是在群众的斗争中涌现出来的,怎能是树起来的?所有树权威的观念都是不对的。

第三,到处挂毛主席的肖像,摆主席的雕像,也不分时间,地点,这是不对的,把好事做到反面了,太多了,毛主席看了讨厌,这样不真实,也不尊重。所以主席和斯诺说笑话,‘外面的像风吹雨打,多可怜’,斯诺回答说,‘我也想不通你为什么一个人在那里顶着风,太可怜了。’

在北京饭店一进门的柜台两边有两个主席像,我看了后说,‘主席还给你们看柜台!’饭店的电梯里也有主席像,我问:‘你们还让主席给你们看电梯?’这样过分了,是有害的。这些都要取消。你们可以看到,大礼堂里面也取消了。”

韩丁说:“现在还是可以到处都看到它的。”

周恩来:“是的,雕像里的太多了,要取消。一开始,说不服群众,就只有下令取消。

当然,在对待领袖这件事上,主席和修正主义是不同的。列宁在左派幼稚病里说过阶级有他的群众、政党和领袖。无论那个阶级的群众,都需要有自己的领袖,但是这个被赫鲁晓夫否定了。他把所有的问题都统统认为是个人崇拜,他的目的是想否定斯大林的影响。虽然斯大林犯过错误,但是他功大于过。我和赖斯顿(James Roston,)谈过这个问题。当然他是不赞同斯大林的,我问赖斯顿,如果希特勒进攻苏联时,没有斯大林行吗?没有斯大林这样的领袖,苏联人民能联合起来吗?赖斯顿无法否定这些。

斯大林之所以能起这一作用是因为在列宁去世后,他批判了很多错误的倾向,他建设了社会主义,使党有了力量,进行了反法西斯战争。当然斯大林思想上的领导作风都有错误,但功大过少。赫鲁晓夫反斯大林是有个人野心的。斯大林活着的时候,他先说斯大林是他父

亲,死后‘二十大’又做秘密报告,结果被美国公布了。抛开党性就从个人的品德来讲这都是很差的。

不能因为赫鲁晓夫反对个人崇拜,我们就也反对。不崇拜一个领袖是不对的,问题是看他值不值得崇拜,是不是群众公认的,还是树起来的,美国内战时期,华盛顿是个领袖,这个无法否认,没有他,你们美国人能在1976年庆祝美国独立了200周年吗?尼克松要当美国独立200周年时的总统,如果华盛顿没有活着过,他能吗?要说个人崇拜,美国多了,市名、州名都叫华盛顿。这不能否定是涌现出来的,是自然发展出来的,就是以后美国革命胜利了,也不能否定华盛顿所起的作用。如法国1789年大革命的罗伯斯庇尔,他后来被杀了,但他的作用还是很重要的,也不能否定他。

主席说的对个人崇拜就是要事实就是,讲的就是这话,领导人要谦虚,谦虚就是事实就是。

党的50年每个历史关头都是主席纠正了错误路线,先后大致有十次。”

接着周恩来介绍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上的十次路线斗争。谈到解放后的路线斗争时,周恩来说:

“全国解放,基本上结束了民主革命阶段,进入社会主义阶段,国内矛盾转到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这不是没有斗争。刘少奇就是总代表,但也分阶段。”

周恩来谈了中国共产党内反对高饶集团、反对彭德怀的斗争后,谈到了八届十中全会,说:“其实是文革的先导,实际上批评了刘少奇,但没有点名。随后,在1963年毛主席为社教运动制定了前十条。当刘少奇抛出他的后十条,主席在1965年又发布了二十三条。同时,江青提倡京剧改革,造就了今天的样板戏,文艺革命开始。1965年冬,姚文元写的批判海瑞罢官发表了。1966年5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后,发表了《五一六通知》,文化革命才正式开始。这一系列都是反对刘少奇路线的斗争。这是马列主义和修正主义的斗争,是整个社会主义时期的斗争,是长期的,当然严重的,激烈的是在1966年8月毛主席的炮打司令部大字报,发动了亿万群众。这个路线斗争一直继续还没结束,斗批改还在深入。”

这时,周恩来谈到了“516”:“‘五一六’集团就是最大的阴谋集团。‘五一六’是1966年5月16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通知,公开发表是在1967年5月16日。阴谋家利用这日子,组织了‘五一六’集团。美国的进步劳动党下面也有个‘五一六兵团’。物以类聚,人以群分,那是个阴谋集团,他们搞修正主义,不搞马列主义,有意把毛泽东思想宣传到不必要的地步,大树特树权威,是唯心主义的,奴隶创造历史。大讲天才。他们就造谣,分裂党,表面上拥护毛主席,支持文化革命,实际上是分裂党,分裂军,分裂政府,这样阴谋破坏,这事,卡玛、和平都知道一些。

人民大会堂是很少的几个红卫兵没有冲击过的地方。当然我们经过邀请他们来。我是说他们没有强行进来过。1967年8月11日,外事口开大会批判陈毅,史克也在大会上,我都上当了。”

周恩来详细叙述了1967年8月11日大会的情况,接着说:

“今年五一,当陈毅出现在天安门的城楼上,美国的情报机构大吃一惊。陈毅有病,他是从医院去的天安门,他是新一届的中央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不光是美国的CIA摸不清,蒋介石的情报组织也摸不清。当蒋介石得知陈毅上了天安门,他把他的情报组织大骂了一通。

据说,造反派里还有人企图抓我,我不信。他们连陈毅都没抓成,还想抓我?当然不行,那里解放军很多。这可能是吹牛,瞎说罢了。在这光天化日之下,他们不敢露头。只有在夜里,在无人之处,他们才会搞阴谋。外文出版社就有这种事情发生。去年才发现有几个好的同志被暗杀了。

8月7日王力大放厥词,支部书记要当外交部长,姚登山要当外长,王力要当总理或副总理,因为他后面有人要当总理。这事一直发展下来,主席发现了这事。姚文元发表评陶铸的两本书,指出他们揪军内一小撮是错误的。军内虽然有坏人,但不能乱军,那就不好了。

军队是个集体力量,党领导军队,进行抗日战争,土地革命,解放战争,抗美援朝,在文化革命中,军队保卫文化革命,不管那些错误,但是保卫了文化革命。军队的“五不”就是从三大纪律八大注意里来的,有纪律的军队,说不打就不打,人家骂就骂,还有被打死的,这样还是保卫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军队在世界上还找不出第二个,当然希望有

第二个,第三个。”

周恩来说:“武斗也是阴谋集团挑起的,正确路线是斗党内走资派,不是群众,但是修正主义份子要分裂党,就挑起群众斗群众。”

“他们反对主席的外交路线,他们烧英代办,砸印尼、印度使馆,这样的事以后也有,但常常被发现了。文化革命中的秩序很好,坏人要破坏就得用一些口号,坏人从两面挑,文化革命总的是路线斗争,要文斗、不要武斗,对于走资派要惩前毖后,如不改就要打倒。”

“武斗基本上是路线斗争,把群众分裂起来,群众都是革命的,拥护社会主义的,但两派都说自己的革命的。主席在南方说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厉害冲突。你们去的山西是最杂的地方。山西我没去过,我只到武汉去了两次。不怕乱,乱是乱了敌人,整个文化革命还是个路线斗争,头头里有坏人,或者一边有坏人,或是两边都有坏人。把群众说成是右派是错误的,有的保守一点,稍微一讲就觉悟了,是头子里有坏人。”

以后大家谈了美国青年团的情况。

韩丁说:“先把这事放放一边,不要让他们占了过多的时间。我有个问题,当然我没有权利让总理回答,但如果可能的话,谈谈林彪的问题。现在全世界都在谈论这个问题。”

周恩来:“这个问题提得很突然,我要说几句,把几个问题说清楚,把路线讲清楚,我们要对世界革命做出贡献。

路线是我党的生命。我党五十年的历史说明了路线对了就会胜利,即便是像我们的党1921年成立时那样人数不多,我们的党也会成长壮大。我们当时只有几个人,没有军队,什么也没有。但是,只要党的路线对了,我们可以吸纳党员,建立军队,争取胜利。路线斗争一直要继续,路线错了,有党,党要垮,有军队,也要失败,王明路线就是说明。

不管你有多大的一个军队,你的路线错了,你的军队就没了。长征以前我们有30万红军,但是到了陕北,我们只有3万人,路线是根本。除了王明路线以外,还有过张国焘分裂红军的路线。当张国焘和我们会师时他有10万人,是我们党领导下的最大的一支队伍。但是以后他分裂党,带领一部分人西征到黄河以西去,结果他是大失败,军

队也没了,领带军队的人路线错了,本人要跨。

朝鲜战争中,彭德怀不是英雄吗?其实每个命令都是主席发出的。有几个命令他没执行,结果打了败仗。但是他还是基本上执行了主席的指示,我们支持他。他从朝鲜回来后还是国防部长,但是他后来反对大跃进,当了右派。如果你改正后错误,主席的办法是治病救人,还可以当党的领导,人总是犯错误,只要不坚持错误就行。

卡玛要回国了,青年人有希望,犯错误就要勇于改正错误。我都犯过路线错误,但还当总理。"

周恩来说到:"山西这五年变化很大。刘格平起来联系群众,在张日清的支持下,打倒了走资派卫恒,所以,他们成立革委会,中央批准。但这两个同志马列主义不多,群众起来不是拥护他们两个,而是拥护文化革命。个人是渺小的,人民是伟大的。群众总要找一个正确路线来得到胜利。

但刘格平,张日清两个人有了权,野心就发作了,结果把群众分成两派,发生武斗,钻进了坏人。刘格平下面有坏人,张日清下面也有坏人,只是刘格平的坏人多些。"

周恩来说到山西的杨成效:"他是个伪警察的儿子。刘格平让这个人当头头,搞武斗。中央找来批评,他们成了两面派,当面说不打,背后还打。如果张日清执行正确路线就好了,而他不是那样,而是打。

在晋东南刘格平支持程首创。陈永贵支持刘格平是因为他是主任,是中央委员。陈永贵也没有武斗,张日清就是派人到昔阳县搞武斗。我们告诉陈永贵两派都是错误的,他接受了。我们把刘格平,张日清撤职了。谢振华任主任,陈永贵,李顺达和一个旧省委的干部解放了的,叫王谦。他在解放初期反对刘少奇,在省里搞了几个初级社试点。刘少奇没和主席讲,就写了个批示,批评了初级社的试点,说是一种危险、空想的社会主义,但王谦顶住了,以后主席纠正了。"

周恩来说:"大同'支左'的军队搞得很好。昔阳陈永贵搞得很好,离昔阳很近的阳泉是刘格平的人搞得不好,换了人就好了。老工人王体,反对两派,搞大联合。大同煤矿有个书记叫韩英,到处执行正确路线,群众跟他。

在晋东南专区,支持程首创的军队就犯了错误,换了就好了。派

性是头子,群众没有。但也不是头子都坏了,张日清那边的谢振华站出来了,刘格平这边的陈永贵出来了,李顺达是张日清一边的,也站出来了。派性都是头头搞的。

整个文化革命是路线斗争,全国的许多问题在主席路线下解决了。陈伯达是个唯心主义者,自称小小老百姓。

请你们相信,我们党错误路线总是要失败的,正确路线总是占上风的。张国焘反党最后只有一个人,连警卫员都不跟他了,都跟着主席了。因为他逃跑了,只有他一人。后来,我们把他老婆送去了,他在党内只有17年,我党已有50年了。他在加拿大,拿美国的津贴。他能做的事不多。王明是在解放后到苏联。他在党内工作不到20年,他只好做个卖国贼,一个是军队里的,一个是和国际上有联系的,但路线错了,全完了。

请美国的同志相信,我党要一直高举马列主义。尼克松来华是因为他是总统。我们不拿原则做交易。美国在联合国的提案是有两个中国。我们坚决反对。结果美国总统都要来中国,别国就不能和中国和好了?从加拿大和中国建交以来,一系列国家和我们建交。联合国里59票反对美国的提案,这里有10个是没和中国建交的,这是美国没料到的,但投弃权票的有8个是建交的,这可能是因为美国的压力太大,像意大利,土耳其等国,半数就好了。

这次表决出乎美国的预料,也出乎我们的预料,美国提案失败了。亚非拉人民很高兴。联合国里没有鼓,但可以跳舞,有的人就在会场上跳起来了。表决提案时,形势就大变了,76票对35票,超过三分之二的绝对多数!原来59票的支持派没变,又加了17票。其中过去弃权票里有12个变了,支持这个提案。原来支持美国提案的也转过来5个支持这个提案,包括以色列、葡萄牙等。我们对这一些国家没有怎么注意,他们却投了我们的票。这就是大势所趋,不可违抗。我们都不想理的,亚非拉人们要我们去,我们匆忙地组织了个代表团,有的人还劝我们不去。这次胜利是大的,但以后的贡献有限。我们绝不做超级大国。”

卡玛继续问周恩来关于林彪的事情。周恩来说:

“卡玛,你知道的比我知道得多。你知道的守你的纪律,我知道的守我的纪律。”

# 第1230回：找薛明，周恩来亲自安排 四川省，梁兴初隔离审查

“913”事件后，周恩来派人找薛明。1969年11月下旬，薛明从陆军转到空军，疏散到贵州磊庄空军机场附近的军队干校，要求改名换姓。

知道薛明的下落后，周恩来立即派齐英武、徐心坦二人飞往贵州看望她，并带去6份关于林彪罪行的文件。他们向薛明详细地询问了贺龙的情况，对她说：“后一段时间，中央和贺龙失去联系，只有你一个人在身边。”

在周恩来的安排下，1971年10月薛明回到北京，周恩来把她安排在西城二里沟新疆办事处住了下来，并委托国务院科教组照管她，派国务院科教组副组长刘西尧看望她，让他们一家人团聚，薛明这才见到失散5年的孩子们。后来，邓颖超也去看望薛明，转达周恩来的问候。

10月24日，中共中央决定，向全国群众传达林彪叛党叛国事件。

10月27日，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各地揭发批判与林彪事件有关的人和事的情况。会议一致认为：武汉、成都两个军区问题较大，需中央给以帮助。

根据周恩来会前与毛泽东商定的设想，在京召开武汉、成都两地区党、政、军负责人座谈会，学习文件，深入批林。

10月27日，中央召集张国华、梁兴初等人到北京参加成都地区座谈会，汇报四川的工作？

10月29日，周恩来致信毛泽东，汇报政治局讨论意见，提出中央帮助解决问题的总的方针是：“遵照主席指示，治病救人，以利团结和工作。”

在北京参加成都地区座谈会汇报时，梁兴初如实讲了自己在庐山会议西南组的发言情况：

1970年8月24日,吴法宪在西南组作了发言后,当晚把梁兴初和成都军区第三政委谢家祥找到他的住处,对他们说:“我们是老同志,一定要发言表明态度,要毛主席当国家主席。”

梁兴初等人第二天按照吴法宪的布置,在西南组会上发了言,拥护毛泽东当国家主席。

吴法宪1970年8月24日晚找梁兴初和谢家祥的事情,在这次汇报前,梁兴初一直没有与别人谈起过。

汇报时,梁兴初还报告文化大革命期间两次到毛家湾的详细情况:“第一次是和张国华一起去的。林彪说,四川我们不放心,你们两人去了,就放心了,然后留我们喝了茶,第二次是请我们去看电影,这次人很多,林彪只和我握了握手,什么也没说就开始放电影了,林彪搞政变的事,我什么也不知道,他跑了以后10天才从中央文件上知道了详细情况。”

的确是这样,1971年9月14日,张国华电话告诉梁兴初:“庐山会议上第一个讲话的人,带着老婆逃跑了。军区接到通知要加强战备。”

梁兴初完全没有听明白,庐山会议上第一个讲话的是林彪,他不知道怎么记成了陈伯达。可是陈伯达已经被关起来了,怎么可能带老婆逃跑呢?那是康生?可康生逃跑用加强战备吗?梁兴初越想越糊涂,他拿起电话问黄永胜:“听说庐山上第一个讲话的人带着老婆跑了?”

黄永胜说:“是。”就放下了电话。

梁兴初又打电话问铁道兵政委宋维轼。宋维轼说:“我刚吃了安眠药,吃得有点多了,头痛得很。”

梁兴初到底没有搞清楚是谁跑了,直到10天后传达中央57号文件,才知道是林彪跑了。

11月12日,中央政治局局开会,听取来京参加成都地区座谈会的成都军区和四川省党政负责人关于揭批林彪反党集团的情况汇报。会上,对有关人员进行了批评,要求他们回川之后,继续揭批林彪一伙,并敢于接受批评,加强领导,搞好团结。

11月13日,周恩来向毛泽东报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情况报告和成都军区司令员梁兴初、政委陈仁麒的检讨。报告说:

十二日政治局会议听取了来京参加成都地区座谈会的成都军区和四川省党、政的负责人关于揭批林彪反党集团的情况汇报，并对成都地区有关负责人进行了批评帮助，要求他们回四川之后，继续揭批林彪一伙，并敢于接受批评，加强领导，搞好团结。他们拟明后日回川，主席能否在今明两日见他们一次，给以教育和鼓励。

毛泽东当天批示："待议。"

11 月 13 日，叶剑英办公室通知参加成都地区座谈会的成都军区和四川省党政负责人："14 日晚，毛主席要接见军区领导？"

11 月 14 日晚，毛泽东接见参加成都地区座谈会的代表张国华、梁兴初、李大章、陈仁麒等人，周恩来、叶剑英、张春桥、李德生参加。

毛泽东说："我讲了一路，一路都讲，无非是讲了一点材料。陷得比较深的是广州，他们现在搞得比较好。其次是武汉。"

周恩来："武汉检讨还没有写出来。"

这时，叶剑英进来了，毛泽东说："你们再不要讲他'二月逆流'了。'二月逆流'是什么性质？是他们对付林彪、陈伯达、王力、关锋、戚本禹。那个王、关、戚，'516'，要打倒一切，包括总理、老帅。老帅们就有气嘛，发点牢骚。他们是在党的会议上，公开的，大闹怀仁堂嘛！缺点是有的。你们吵了一下也是可以的。同我来讲就好了。

那时候我们也搞不清楚。王、关、戚还没有暴露出来。有些问题要好多年才搞清楚。"

周恩来："后来杨成武大树特树绝对权威。"

毛泽东："那是树他自己的。"

周恩来："也是树林彪的，李作鹏搞了一个讲话更厉害了，简直说得不象话了。"

毛泽东："问题搞清楚了，是林支持的，搞了一个什么'516'，打倒一切。搞得这一些人不能够到家，抬不起头来。八届十二中全会，陈毅把污水尽往自己身上刷，我说，你不要讲了。"

周恩来："万人大会斗陈毅，外事口的一些外国专家也参加了，当时搞不清楚。斗完后要把陈毅抓走，大会堂的服务员不让抓走。问服务员为什么不让抓？服务员说主席叫保我们就保。"

毛泽东："斗他的时候，向前向后三鞠躬，上汽车后又推翻了，又不

承认了,说是你们逼我讲的。”

毛泽东又问:“杨勇是怎么一回事?”

叶剑英答:“当时我也不清楚。”

毛泽东又问:“廖汉生为什么要抓?”

周恩来回答:“廖汉生是与贺龙有关系。就是对贺龙,主席当时也不同意这样搞。”

毛泽东说道:“杨勇这个事情是林彪支持搞的。林对我说过,后又不承认。”

谈到林彪集团时,毛泽东说:“那时,谁知道他是反革命呢?是副统帅、接班人嘛!”

“你们如果有时间,鲁迅的有一本书是值得看看的。《准风月谈》的后记里,有曹聚仁写的一篇《文艺座谈遥领记》。曾今可要开文艺座谈会,请了曹聚仁没去,报上登出来,他成了发起人。曹就问龙榆生,那天的会是怎么开的,龙说:就是吃点点心、喝喝茶。曹聚仁说:‘吃了人家的茶,就是人家的人啦!’这件事,可见那时斗争的复杂。现在,吃了人家的茶,就是人家的人?我看不一定。今天你们吃了我的茶,就是我的人吗?不一定。总理、康老都喝过他们的茶嘛!吃了他的茶,就是他的人,不要党,不要中央了吗?

《我的一点意见》写好后,第二天早晨总理、康老去找林彪,看了以后,他说同意了。《我的一点意见》当时没有题目,撇开一些问题,中心是个主席问题,我就撇开。那个司令部要我当国家主席是假,林当主席、林接班是真。也有一些人是真心要我当主席,和林彪不一样。有人说,我不当主席,老百姓通不过。我说,我不当主席有十几年了嘛。我这个人,同你们吹一吹是可以的,要我当国家主席,天天去迎接外宾,迎来送往,什么国书啊,那一套,无非是催我见上帝。”

叶剑英:“主席很忙,还有很多东西还没有写出来。”

毛泽东:“和大家吹一吹就是了。那些人整叶剑英的黑材料,我都看过,他们是步步升级,先是炮轰,后是打倒。后来他们看形势打不倒了,也就不打了。

‘红造’并不都是‘516’。整理的黑材料,有一条国民党报上的消息,说红军长征了,叶在江西投降敌人。他是跟着长征了嘛,你们这些

老同志都是长征的,哪有那个事呢?红军的传统历来不能自己打自己。”他指着张国华说:“你就是王佐部队的一个兵。”

周恩来:“后来是司号长。”

毛泽东:“王佐这个人无论如何是有功劳的,而且还加入了党。就是舍不得那个山头,吃不了苦。王佐这个人被彭德怀杀了,这就不好了嘛!哪有共产党的部队打共产党的部队?五军团的冀登同也不该杀。人还是少杀一点好。我们对反革命,不杀,保存起来对党有益,因为他们是活证据嘛。你把解方这样的人杀了干什么。”

周恩来:“那个王实味也可以不杀。”

毛泽东:“不杀,现在多好。国民党抓刘少奇、审判刘少奇的人,抓陈伯达、审判陈伯达的人还活着,这些都是活证据嘛。”

毛泽东说:“许多现象和本质不同。林彪的现象是拥护我,其实大树特树他自己。”

周恩来问:“《‘五七一工程’纪要》是否可印发大军区和省委常委?”

毛泽东同意,并说:“他们也幼稚得很,那样搞,怎么搞得成呢?”

谈到成都地区的问题时,毛泽东说:“你们的事,我也有责任,没有找你们谈。当然,东北、西北也没有谈,他们没有出事。广州陷得深,我和他们谈了,他们很主动,回去后马上就开会,把我同他们谈的问题都讲了。你们那里也是个别同志嘛,冲一下也必要,这是大是大非问题,要分清。我看你们比武汉爽快,武汉的报告还未写出来,他们有点顶牛。顶牛也好,不做墙头草。林的事发生已经两个多月了。你们开了半个月的会,我看你们的报告不错,写得好,不拖泥带水。回去开开会,继续做工作。没有什么问题了,错了改了就好。”

叶剑英说:“你们的报告,中央看过了,都同意,回去要把问题查清楚。”又接着讲:“有人说梁兴初到成都是去夺权的,这不对,梁兴初到成都,是我向毛主席建议的,是毛主席点的将。”

毛泽东说:“我也没想到会出现林彪事件。党章上写了的接班人,中央要负责,大家都举了手,不要把举手的人都当成林彪的人。鲁迅说曹聚仁‘喝了他家的茶,就是他家的人。’”他指着梁兴初说:“你喝了林彪的茶,不是林彪的人嘛。”

当天,11 月 14 日,经毛泽东审阅同意,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印发反革命政变纲领<“五七一工程”纪要>的通知》。

梁兴初对毛泽东说的鲁迅说曹聚仁“喝茶”这段典故不甚明了,但说自己“不是林彪的人”几个字,却听得十分真切。回去后,他高兴地对秘书岳广运说:“毛主席说我‘喝了林彪的茶,不是林彪的人’,是什么意思?”

岳广运也很激动:“这是明摆着的,毛主席帮你开脱了!”

11 月 15 日,张国华、梁兴初一行从北京回到成都。次日,他们到金牛坝开会。

金牛坝是四川省委高干招待所,位于成都西门外 5 公里处。据传,战国时期,秦惠文王欲伐蜀而不知道路,于是叫工匠雕了五头石牛,把很多金子放在牛屁股后,说这是牛拉出来的。并说这些石牛都是会拉金子的天牛,要送给蜀王。蜀王信以为真,即派五个力士拖石牛到蜀国。结果,秦军随着石牛拖出的道路达到了攻打蜀国的目的。成都金牛坝路即为当年石牛入蜀的遗迹。1958 年成都会议召开于此,为“大跃进”运动策源地之一。

这次召开的四川省委常委扩大会,很快发展成党委扩大会,要解决“梁兴初问题”。

会上的火药味越来越浓,要求梁兴初交代怎样“上了林彪的贼船”?九届二中全会上是怎么“搞串联”的?吴法宪如何窜到西南组?“913”前为什么“捂盖子,保林彪”?为什么一直没有揭发吴法宪在九届二中全会上的串连活动?梁兴初在九届二中全会结束时,违犯党的纪律,私自将林彪在九届二中全会上的那个动员讲话抄了一份,带回成都后,进行过一些扩散……意欲何为?怎样参加“林彪反革命政变”?为什么调走警卫营,给新警卫营配新式武器?为什么林彪摔死后还给黄永胜打电话?等等。

11 月 19 日,成都军区政治部通知梁兴初的妻子任桂兰,到金牛坝去敦促梁兴初交代问题。第二天,梁兴初被隔离审查,门口站上了岗。从此,梁兴初夫妇离开了工作岗位。

# 第1231回：查武汉，刘丰自杀未死成 邓小平，江西致信毛泽东

中央决定武汉军区的曾思玉、刘丰、张体学及河南省委的刘建勋、张树芝等人到北京京西宾馆开会，检讨“913”事件。

会上，武汉军区政委刘丰非常紧张。他检讨说：“我犯了严重错误，把毛主席南巡时向我们吹风的话都透露给了李作鹏，李作鹏很快就告诉了黄永胜，黄永胜又告诉了叶群，结果促使叶群、林立果调飞机与林彪仓皇出逃。”

11月15日，会议继续召开。作为武汉军区司令员的曾思玉，在会上批评刘丰的同时，也作了自我检讨。周恩来在会上说：“曾思玉同志要与刘丰划清界限。”

11月16日，中央政治局会议，约来京参加武汉地区座谈会的武汉军区和湖北省党政负责人谈话，了解对与林彪事件有牵连的人和事的揭批情况。

回去后，刘丰服药自杀，被送进了医院，抢救过来。

11月18日，周恩来致信毛泽东：

报告：

武汉地区的会不如成都地区开得好，但后期大有进展。

刘丰会后自杀未遂。

从现在情况看，武汉地区领导同志座谈会不宜再拖下来。

建议主席近期接见一次参加该地区座谈会的负责人。

毛泽东阅批：“同意。”

11月19日继续开会，对曾思玉和方铭展开了批评。有人用责问的语调批评曾思玉：“你给林彪当过‘高参’，50年代你又写文章歌颂林彪，解放战争时期你是四野的，又是林彪的部下，你还在武汉给林彪维修别墅……你能说你没有问题吗？你能说你没上林彪的贼船吗？你能说你不是林彪的‘死党’？”

曾思玉忍不住与其顶了起来:“我是写过《随同林彪军团长踏雪访黄河》的文章。红军时,我是红一军团的;抗战时,我是一一五师的,但后来,我到晋冀鲁豫工作了;解放战争时是华野的,后来又隶属一野呢。你们开口闭口说我是四野的,硬要往林彪山头上推,我是不赞成这种说法的。四野出了林彪,难道四野的其他同志就不行啦?我倒要问问大家,林彪当上国防部长、副统帅,让我们做些事情谁能不做?我承认,包括(给林彪)调秘书,招驸马,选妃子,这些事,有的我责成人做过,这些我都承认,我不能推脱责任,与执行的人无关;我也承认,由于自己马列主义水平低,没有执行毛主席讲的要跟党、跟路线、不能跟人,因此犯了严重错误,欢迎同志们批评。我也向毛主席、党中央、中央军委交了书面检讨。非要说我是林彪贼船上的人,那咱们到毛主席那里去讲。”

上午的会议把曾思玉的心情弄得极糟。散会前,曾思玉向李先念请假,要求下午休息。

11 月 20 日,李先念向周恩来和毛泽东作了报告。毛泽东说:“看来曾思玉有一股情绪,晚上叫他们来,一起谈一谈。”

当天晚上,在毛泽东的书房里,开始“谈一谈”。参加“谈一谈”的人,除曾思玉、刘建勋等人外,还有周恩来、叶剑英、李先念,以及刚刚从南京军区政治部主任调任武汉军区政委的王六生。

毛泽东一开始就问曾思玉:“我上次到湖北没有见到你,问题解决了吗?”

曾思玉一听,马上读已上交的检讨书。

毛泽东摆了摆手,说:“不要说了,你的检讨我看过了。你们大概不是死党,是活党。就是犯过错误的人也有好有坏,你是好人犯错误。共产党是大党,不是小派别了,管他哪个山头啊。……现在有一些同志犯错误,别的同志要采取宽容的态度,不要揪住不放。你犯了错误,从此就不信任了,我看不好。”

“我们党历来的方针,对犯错误的同志以教育为主,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目前有那么一些人,跟着‘副统帅’,跟着他上当,不光彩。还是跟着党,不要跟着个别人。统帅也好,副统帅也好,个别人容易起变化。五十年起了十次变化嘛,有许多都是跟个别的人。我跟的是路

线。你领导者路线正确,我跟。至于你路线不正确,我不跟。有人提出了新名词说‘紧跟’,我不愿听这个话,什么‘紧跟’。”

“对于犯错误的同志要让他们改,表示欢迎的态度。比如对林彪下面的几十个工作人员和秘书,那些人都不用了?我看那不行吧。要搞清楚,要教育,给他们工作做,不能不用。有些人是跟错了人觉得面上无光。连8341在毛家湾的那个中队也觉得无光了。这要解释:是党给的任务,是组织派到他那里去工作的嘛。他那时是‘副统帅’嘛,你怎么知道林彪要叛党呢?不知道是坏人嘛。要说无光,是中央脸上无光,也是整个党无光嘛,哪是一部分人脸上无光?他跑了之后,总理问我,我说他要跑有啥办法嘛。后来得到消息,从天而降,”

周恩来插话:“粉身碎骨。”

毛泽东:“除了一害,对于党和国家、人民有利,是个大胜利。”

毛泽东在这次谈话中再次提到鲁迅。他说:“我劝同志们看看鲁迅的杂文。鲁迅是中国的第一个圣人。中国第一个圣人不是孔夫子,也不是我。我算贤人,是圣人的学生。”

临了,毛泽东说:“湖北问题,我赞成你们的方针,赞成你们的检讨,武汉军区,包括湖北、河南两省的。曾思玉同志讲的比较清楚明白,方铭不会写文章,写了好几遍,这样也可以。”

方铭说:“我检讨不深刻。”

毛泽东说:“可以通过。曾思玉,你回去开个扩大会,要讲一遍,无非是北京这一遍。检讨我看可以了,允许人家讲。你身负重责,两个省1亿人口,要注意政策。还是宽大为怀嘛。整人要少,打击面要小,教育面要大。只要坚持这个,倒不了的。中央帮你的忙,大家帮你的忙。有大风大浪来了,我去一次湖北,你说可以不可以?”

“欢迎!欢迎!”大家异口同声地回答后,曾思玉立即表态:“请主席放心,我回去以后,一定按照主席指示,向湖北、河南两个省委和武汉军区做出检讨,放下思想包袱,轻装上阵,把武汉军区和省委的工作搞好,抓出成效。”

毛泽东在北京收到一封邓小平从江西省南昌市附近的新建县写来的信。此时的邓小平和妻子卓琳、继母夏培根一起,依然住在新建县望城岗原步兵学校那个小院的一幢两层红砖小楼里。

每天上午,他和卓琳一起去新建县拖拉机修配厂劳动。每当黄昏来临,他总是在小院子里散步。

1971 年 11 月 6 日,邓小平和新建县拖拉机修配厂工人坐在一起,听完中共中央有关“913”事件的文件传达。文件整整念了两个多小时,全场人大气不出地听了两个多小时。回到家里,邓小平一改往日的严肃和沉静,显得兴奋和激动。但只说了一句:“林彪不亡,天理不容!”

11 月 8 日,邓小平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写道:“在传达前,我对林彪反党叛国集团的事一无所知,只是感觉到陈伯达出了问题。对林彪则是非常突然的,所以在听到林彪集团那些罪该万死的罪恶行动时,感到十分震惊和愤慨! 林陈反革命集团这样快地被解决,真是值得庆贺的大事。如果不是由于主席和中央的英明领导和及早地察觉,并且及时地加以解决,如果他们的阴谋得逞,正如中央通知所说,即使他们最终也得被革命人民所埋葬,但不知会有多少人头落地,我们社会主义祖国会遭到多少曲折和灾难。现在终于解除了这个危险,我和全国人民一道,是多么高兴呵!”

在信中,邓小平向毛泽东汇报自己的情况:“我在主席的关怀下,到江西来整整两年了。这两年,我每天上午到工厂劳动,下午和晚上,看书、看报、听广播和做些家务劳动,除到工厂外,足不出户,与外界是隔绝的。在这时期,我遵照主席指示,努力通过劳动和学习自我改造,绝对遵守我向党作的保证,除自己亲属外,没同任何人有来往。我们的生活,由于组织上的照顾,没有什么困难。”

此后,邓小平写道:“我个人没有什么要求,只希望有一天还能为党做点工作,当然是做一点技术性质的工作。我的身体还好,还可以做几年工作再退休。报上每天看到我们社会主义祖国在国内建设的突飞猛进,和国际威望的空前提高,都使我的心情激动起来,想做点事,使我有机会能在努力工作中补过于万一。”

邓小平又写道:“此外,我希望能和子女们靠近一些,特别是两个较小的孩子(毛毛和飞飞)。毛毛(小女儿)分配到陕北农村已三年,现因我那个残废的大儿子在家,我们照顾不过来,暂时把她弄回来看

护哥哥。她一心想学医,过去通过自学,也有一点基础。飞飞(小儿子)在山西插队已三年多。他们由于我的关系,成份不好,没有组织上的照顾,是不可能得到较好的分配的。我们的岁数大了,不免为儿女挂心,希望他们能分配到我工作的附近,最好到工厂当工人,能有固定的收入,毛毛能学医当然更好。这些就是我的一些心事,顺便向主席诉说的了。当然我了解,这种事是完全应该听从组织的考虑和处理的。”

他在信中提到:“过去,主席交代我有事情找汪东兴同志,今年初因我大儿子的事写信给他,工作同志告我不要再写信了,所以十一个月来,我没有再写信。不知以后有事,是否还可以写信给汪东兴同志。”

信的最后,他写道:“我衷心地诚挚地祝愿主席万寿无疆,主席的健康长寿就是全党全国人民最大的幸福了!”

毛泽东看到这封信后,问汪东兴:“你怎么不管人家啦?”

汪东兴并不知道不让邓小平再写信的事,他向毛泽东答道:“没有不管啊。我跟你在外地,不在北京,就让中办副主任王良恩管着的。”

毛泽东对汪东兴说:“小平同志的信上讲了。他的事还要让汪东兴管!”毛泽东的意思也十分明确,邓小平的事情还是要汪东兴来管。在邓小平的来信的信封上,毛泽东批示道:“印发政治局。他家务事请汪东兴办一下。”

第二年,邓小平在农村插队的两个孩子都作为工农兵学员推荐上大学了。

1971 年,全国工农业总产值完成了计划的 104%,比上年增长 12.2%。其中,农业总产值完成计划的 98.4%,增长 3.1%,工业总产值完成计划的 107%,增长 14.9%。财政收入完成计划的 105.6%,国家预算内基本建设投资完成计划的 97.5%。

但是存在不少问题:

第一、积累率过高,基本建设规模过大。积累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1969 年为 23.2%,1970 年上升为 32.9%,1971 年更上升为 34.1%。

第二、职工人数急剧增多。随着基建规模和重工业生产急剧膨

胀。1970 年、1971 年,原计划全民所有制单位增加职工 306 万人,实际增加了 983 万人。到 1971 年年底,职工总数达到 5318 万人。

第三、工资总额和粮食销量控制不住。由于职工人数猛增,工资支出和粮食销量大大超过计划。原计划 1971 年全民所有制职工工资总额为 296 亿元,实际支出 320 亿元,原计划 1971 年销粮 794 亿斤,实际销出 855 亿斤。

这样一来,1971 年年底出现了“四个突破”:职工人数突破了 5000 万人,工资支出突破了 300 亿元,粮食销量突破了 800 亿斤,货币发行也突破了。周恩来说:“不只三个突破,货币发行也突破了。”“票子发多了,到了最大警戒线。三个突破不如这一个突破。”这“四个突破”,表明整个国民经济出现了危险的倾向。

1972 年 1 月 1 日,沈阳军区潘复生专案组于向中央报告:

潘复生原名刘开浚,1931 年入党,1932 年在济南被捕叛变。专案组提供的影印件说明,潘复生在反动刊物《南针》上发表了悔过书。潘复生被捕前是中共济南市少共部长,也是当时济南市一个青年进步组织“读书会”的负责人之一。对于读书会,他在悔过书里说,这是反动组织,作反动宣传,因我一时思想错误,误入歧途,今恍然悟前思想之荒谬,愿将过去的错误纠正。他在供认中,表示悔过:说共产党陷害青年,认识到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今后决心悔过自新,与共产党脱离关系。他在狱中,做敌人的“耳目”和“腿子”,充当“跑号”,积极向敌人告密,协助敌人破坏党的斗争。

1972 年,中共黑龙江省委转发沈阳军区专案组关于潘复生罪行的调查报告和罪证影印件。潘复生被定为叛徒、内奸、国民党反共分子。

1972 年 1 月 2 日,在人民大会堂三楼小礼堂,中央接见中央专案一、二、三办全体人员。接见时,江青提到杨成武的问题,她说:“‘二办’饶漱石这个专案是我负责的,而杨成武却对我封锁,还给我立了一个专案。让陈虹、王育民、朱铁铮三个人整我的材料。能有什么材料?只不过是我过去的一封公开信。杨成武这么干,我才下决心找我的这封公开信,还是春桥同志帮我找到的。这封公开信,很是说明我的问题:第一,我是坚决抗日的;第二,我是抵制国民党特务的……他们还提审扬帆搞黑调查。”

周恩来当即问道:“王育民来了没有？是怎么回事?”

饶漱石专案组副组长王育民站起来据实回答说:“审扬帆还是杨成武管‘二办’那个时期,是吴法宪参加布置的。”

王育民如实报告了第949回提到的1967年11月,杨成武传达江青关于提审扬帆1939年向中央发电报的指示情况。江青听后,立即否认说:“我怎么能叫你们去审问呢?”

会后,王育民被撤销了“二办”总支委员、支部书记和专案组副组长的职务,回空军转业。

# 第1232回：组班子，接待黑格先遣组 毛泽东，不再讲“二月逆流”

1972年1月3日，负责尼克松访华后勤工作的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副助理黑格准将，率领一个18人组成的先遣小组来到中国，与中方商讨尼克松访华期间礼宾、安全、住房、电视转播等所有具体问题。

中国方面也组成了一个相应的小组来接待他们，并对口与他们商谈。

首先出现的分歧是尼克松的专机。美方坚持，尼克松在华期间，包括将要去访问的上海、杭州两个城市，全部行程都要乘坐自己的专机。这既是安全考虑，也是他们的惯例。美方解释说：按照美国宪法，美国总统是唯一有权在24小时内发布战争令的人，所以总统无论跑到哪里都要和白宫保持联系，他乘坐的专机也随身带有核武器密码，坐中国飞机是不能保证这一点的。

而中方则认为，中美双方尚未建交，尼克松可以坐自己的专机到中国，但在中国境内则必须乘坐中国方面提供的飞机。因为中国很强调自己的领空权，不能允许未建交的国家从自己的领空飞过。而中国方面提供尼克松在中国访问期间乘坐的专机－——伊尔18飞机，是周恩来出访时乘坐的，安全绝无问题。

为此，双方僵持了很久，最后周恩来亲自出面说：“中国有句俗话，客随主便。尼克松总统既然访问中国，应该乘做中国人驾驶的专机。你们说美国总统过去没有乘坐过外国飞机，这次到中国来坐一坐，体会一下也很好嘛！我们飞行员的技术也不错。你们尽管放心。如果你们觉得不放心，我陪总统先生一起乘坐。”

美方做了让步，最后双方达成这样的协议：总统专机先飞到上海，上海飞往北京时，不必转乘中国专机，但是中方要派先遣小组带领一名领航员登机。尼克松在中国境内的访问——由北京到杭州、杭州到上海，则由周恩来陪同，乘坐中方提供的伊尔18飞机。

为“空军一号”做领航任务的,正是上次基辛格秘密访华为巴基斯坦飞行员担任领航的飞行大队长徐柏龄。

美国人一直强调的通讯问题是这样解决的:尼克松带两个通讯人员上中方的飞机,他们的“空军一号”跟在伊尔18专机后面飞,这样总统的信息随时可以通过通讯人员传到后面的飞机上。从技术手段上保证了总统的特殊使命。后来中方才知道,美国总统到世界任何一个地方都要乘坐“空军一号”,尼克松的中国之行的确是破了例。

空中交通问题解决了,地面交通工具又成了第二个分歧。美方一定要将自己的运防弹车过来,中方坚决不同意,因为不知道美国的防弹汽车里面装了些什么东西,中方又不好检查。所以坚持尼克松到中国后,要坐中国方面提供的汽车。美方最后也让了步,同意乘坐中方为尼克松准备的两辆防弹车。

第一次会谈后,还有两大问题需要解决:一是美国记者来采访的人数和接待,另一个是通讯问题。

本来觉得采访记者人数比较容易解决,所以第二次会谈先解决这个问题。美方提出:500名美国记者随尼克松总统来访,另外还准备邀请其他西方记者,如英法等欧洲国家的记者100名。

这让中方大吃一惊:“哪里有这样庞大的记者团?”中方原来以为最多也就有三、四十名记者,这已经很了不起了。其次,当时的北京,能接待外宾的酒店屈指可数,而能提供的设备更无从谈起。

双方差距实在太大。美国人再三解释,尼克松访美在美国新闻界是大事情,必须要报道,请中方能理解。而且美国媒体众多,对这次采访机会,大家争得一塌糊涂,美国政府都得应付讨好那些媒体,也不敢擅自拒绝、得罪他们。

中方工作人员认为:固然中美关系解冻是件大事,但也不能因此为美国宣传造势,还要顾及第三世界人民的感受呀。而且接待如此庞大的记者团对当时的中国来说,也实在难以承担。为此双方争议半天,没有结果。

报告打到周恩来那里,他的批复是尽量让他们来。周恩来说:“他们已经骂我们骂够了,他到这儿来总得报道尼克松访问、总得报道怎么谈判,他非得客观不可。他怎么报道回去也比他以前对中国的印象

要好一些,所以尽量让他们来。”

几经协商,最后达成这样的协议:文字记者和报纸、广播、通讯社的记者80多人;电视系统,包括记者、摄像、灯光师、制片人等,100多人,一共180多人,由新闻司和广电总局负责接待。最终来访美国记者288人。

美国来了这么多人,房子怎么解决呢?中央一句话:民族饭店腾空!于是从1972年1月起,民族饭店就腾空专留给记者。美国的其他工作人员,钓鱼台住不下的也全部安排在这儿。

还要组织中方的接待人员。外交部新闻司的英文工作人员不够,就决定从学校、文化部、体委、友协等,凡是有涉外工作的单位借调工作人员,组织了近100人的接待队伍。

还有一个通讯问题,就是如何把美国记者的新闻片传回去。在美国乒乓球队访问中国期间,是和民航总局达成协议:每天由民航负责把美国电视台的电视片空运到广州机场,广东省外办派人在机场等候,拿到片子后朝深圳口岸赶。飞机到了广州已是下午,他们连夜开着车,过3条摆渡,到了罗湖桥边也是第二天下午了。香港那边,美国电视媒体从总部派人到香港,在罗湖口岸对面接下片子再从香港转播。

乒乓外交可以这么处理,毕竟来的记者少,尼克松访华可是比那要重要几倍的大事情,因此美国方面提出:必须得有地面卫星站,一是为了美国总统随时可以与国内联系,解决美国内的问题,同时外国记者也可以通过卫星站把访问的有关消息快速传送到世界各地,他们要求在机场附近放置地面站,只要中方同意并指定地方安放设备就可以,其他事情完全由他们与中国广电部副部长刘澄清具体商议。

美国先遣小组的齐格勒还说:在美国和其他许多国家,几乎家家都有电视机,很多人想看到尼克松总统访华的实况。尼克松本人对这个也很重视。

但这件事在当时中国的外事活动中还从未遇过,关系重大,所以中方小组提议暂时休会,等研究后再讨论。

熊向晖召集中方小组讨论此事,国务院文化组负责人于会泳说:“我们绝对不能向美国人民和世界人民为尼克松进行电视宣传。首长

也是这个意见。”

“首长”毫无疑问是指江青。他这么一说,大家都不好说什么了。

中方谈判小组全体商议,即刻向周恩来汇报并请示。很快,他们和周恩来见面,把情况详细报告了。

当晚22时,毛泽东与周恩来谈话。1月4日凌晨4时,周恩来会见黑格。

黑格转达尼克松和基辛格的口信。美方在口信中谈及印巴冲突、越南问题、苏联在欧亚的动作后得出了苏联企图继续包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结论。由于美国对中国的生存能力(Ability to live)表示怀疑,所以美国准备力图抵消苏联对中国的威胁,以维护中国的独立及其生存能力。希望通过这次访问,加强尼克松总统的世界领袖的形象,这对双方都是有利的。

黑格的意思是:中国很弱,当苏联进攻中国时,美国方面关心中国的生存能力,所以我们愿意和你们联合起来,共同对付苏联。

黑格的言外之意是,中国需要美国来保护。

这是典型的大国沙文主义态度,有辱中国的尊严。中美谈判是建立在平等的基础上的,绝不是中国需要美国来保护。对此,周恩来毫不客气地批驳了黑格的这种态度。他说:“美方对中国的‘生存能力’表示怀疑,并声称要‘维护’中国的‘独立’和‘生存能力’的说法,令人惊讶。中国认为,任何国家决不能靠外力维护其独立和生存,否则只能成为别人的保护国或殖民地。社会主义的新中国是在不断抗击外来侵略和压迫的斗争中诞生和成长起来的,并一定会继续存在和发展下去。”

黑格起初还狡辩,说他没有这个意思。周恩来亲自查了许多外文资料,找了一些英文翻译,搞准了“Ability to live”的准确涵义,有理有据地驳斥了黑格的狡辩。最后,黑格不得不表示:他收回“Ability to live”的说法。

黑格对周恩来的批评还是心服口服的。他回到下榻饭店后对中方陪同人员说:“你们的总理真了不起。我对他早已久闻大名,今天一番话真是佩服之至。”

会见时,周恩来表示:中美两国接近,推动两国关系正常化,对中

美两国人民和远东各国人民都有利。

会见后,周恩来嘱熊向晖主持起草《对美方口信的答复》稿。

当天上午,周恩来到毛泽东处汇报会见黑格情况。

毛泽东得知黑格口信后,说:“包围中国要他们来救我,那怎么了得。”“顶回去!无非尼克松不来。不来就不来嘛。22 年不来了,再等 22 年。尼克松不来,土克松、砖克松也会来。”

1 月 4 日,周恩来召集与黑格一行会谈的中方人员开会,研究美方提出的尼克松访华期间的若干技术问题。

关于地面卫星站,周恩来稍作思考后,对国务院电信总局领导小组成员、副政委刘澄清和总理助理熊向晖说:“这是比较重要的事情,美国把通讯卫星安放在我国境内,这涉及主权问题,必须要妥善解决。你们谈判时必须申明立场,美国卫星站不能设立,尤其是不能由他们来主持和运作。”

周恩来又沉思一会,想出一个方法说:“你们下次谈判时,首先要阐明立场,这是涉及我国主权的严肃事情,然后可以提出来,我们可以考虑买下美方的设备,由我们来主持,只需要他们传授一些技术给我方人员就可以了。”

在第二次谈判时,中方小组遵照周总理的指示,提出这一立场和要求,齐格勒十分惊讶,当即回答:“你们要买下这套设备价格非常昂贵,需要数千万美元,而且你们在天空也没有通讯卫星,地面站用不上啊,你们再考虑吧。”

会谈休息空隙,熊向晖立即给总理办公室通电话呈报情况。周恩来指示:“目前买地面站可能有困难,可以提出租用,这就是和美方做买卖,他们没有理由拒绝。租用期间主权属于我方,运作也属于我方,租期 15 天(其中包括安装和拆卸)。会后你们再具体研究。”

于是熊向晖提出租用方案,否则就不安装了。

齐格勒说:“我没有经手租用过通讯卫星,但我想租金肯定很贵。尼克松总统访问 8 天,8 天的租金可能要 100 万美元。中国政府不必花钱租用,我们已经准备了卫星终端站,只要求中国方面在北京、上海、杭州修建地面工程,费用由我国承担。”

熊向晖一听,这是一笔不错的买卖。既然美国作了这方面的准

备,我们何苦去花100万美金呢?100万美金对当时的中国来说可不是个小数目。因此,熊向晖没有表示反对意见,只是说:“在中国修建地面工程的费用由中国负担,美国方面只要在技术上提供协助就可以了。”

1月5日,周恩来召集与黑格一行会谈的中方人员开会。当他听了熊向晖汇报没有反对齐格勒的意见时,严厉批评说:“这哪能行呢?让你商谈租用,你一听100万美元就想缩头。这不是花多少钱的问题,这是涉及我们主权的问题。在主权问题上绝不能有丝毫含糊。”

周恩来这么一点,熊向晖恍然大悟,羞愧难当,后悔当初自己怎么就没有想到主权的问题。

周恩来对熊向晖说:“你去告诉齐格勒,第一,请他负责为中国政府租用卫星终端站,租用期是北京时间1972年2月21日13时至2月28日24时;第二,在租用期间,卫星终端站的所有权属于中国政府。美国方面事先向中国政府申请使用权,中国政府将予同意。中国政府向使用者收取费用;第三,租用费和使用费都要合理,要齐格勒提出具体数目。我们通过其他途径了解国际上的一般价格,不做‘冤大头’。”

熊向晖把周恩来的三点意见对齐格勒说了。齐格勒服了。他说:“我第一次遇到这样的谈判对手。我完全接受中国政府提出的前两点办法。请放心,租用费一定合理。我知道,租用费和使用费是相互关联的。我现在提不出具体数目,但我可以设想,这两项费用之间将会划个‘等号’。我很佩服你们的精明,我更佩服你们处处注意维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尊严。我将把这一深刻印象报告尼克松总统,并告诉我的同事和亲友。”

齐格勒还对熊向晖说:“我还要坦率地说,现在我完全同意基辛格博士的看法,周恩来总理是世界上罕见的、令人敬佩的、伟大的政治家和外交家。”

6日中午12时10分至下午14时10分,周恩来和叶剑英到毛泽东处商谈外事工作。周恩来将《对美方口信的答复》稿交毛泽东审阅。毛泽东看后说:“好,我看可以给他讲。讲了以后,无非是吹了。他22年都没有来,再等100年嘛!你不顶他一下,他就不舒服。总而言之,无非是吹了。我看啊,过不了几年他还是要来的。”

周恩来问:“联合公报草案,除台湾问题外,美方没提,是不是就不动了?”

毛泽东说:“就不动,要动就动一点,把人民要进步改成人民要革命。他们就是怕革命,他们愈怕,我们愈要提。其实这个公报没把基本问题写上去。基本问题是,无论美国也好,中国也好,都不能两面作战。口头上说两面、三面、四面、五面作战都可以,实际上就是不能两面作战。当然写进去也不好喽!”

谈完外事后,毛泽东又说:“‘二月逆流’经过时间的考验,根本没有这个事,今后不要再讲‘二月逆流’了。请你们去向陈毅同志传达一下。”

叶剑英即赶往301医院向陈毅传达毛泽东的意见。

# 第1233回：病情重，一月六陈毅逝世 周恩来，态度明答复黑格

1971年11月初，陈毅开始呕吐。此后病情急剧恶化，不几天功夫，他已经完全不能进食了。

周恩来亲自批示，将陈毅转到北京日坛医院，并批准日坛医院给陈毅做了胃肠短路手术，以期解决进食的问题。

12月3日，北京日坛医院按预定计划，给陈毅做了胃肠短路吻合手术。手术是成功的。但是，日坛医院吴恒兴院长和给陈毅做手术的主刀医生们，内心却异常沉重。因为他们在手术过程中发现，陈毅内脏的癌细胞已有广泛转移，胃肠吻合手术只能救一时之急，与阻止癌细胞转移毫不相干。

一天清晨，夜色尚未褪尽。做完胃肠短路吻合手术20天的陈毅，突然用微弱的声音对陪在床边的女儿珊珊说："我要吃面条！"

珊珊心细，揉揉睡眼惺忪的双眼，证实是父亲在对她说话，随即回答："爸爸您等会，我就去端来！"

珊珊好不高兴，多少天来，爸爸吃什么都没有滋味，今天主动提出想吃面条，难道不是一个好征兆？一碗热汤面端来了，陈毅眼里闪动着欣喜的光芒。

珊珊搀扶父亲半坐起来，用筷子一根一根地喂着。

她看见父亲的食欲并不好，吞咽困难，但终究还是吞下了好几根面条，心里比蜜还甜。

这天医生查房时，陈毅眼里放着光，吃力地对医生说："今天是12月26日，毛主席的生日，我早上吃了面条。我要争取年底下床走一走！"

所有在场人的眼睛都湿润了。

珊珊这才明白，"爸爸是为给毛主席吃寿面才吃面条。"

更使她难以理解的，父亲卧床两个多月，病房里既没有挂历，也没

有人提醒他,他是怎么知道这天就是12月26日呢?这说明他在心里一天天地计算着日子,无须人提醒。

其实,这天是12月24日。

可是谁都不忍心纠正他,权当他提前为毛主席吃寿面吧!珊珊看见父亲病成这样,还想着为毛主席吃寿面,一时无法控制自己,泪水顿时模糊了视线。

陈毅病危的消息不胫而走……

周恩来不声不响地走进病房,搬把木椅紧靠陈毅坐下,像亲兄长似地款款细语。

眼睛失明的刘伯承由人搀扶着走进病房,用手抚摸着陈毅的脸和手,互相说着勉励的话。

朱德夫妇、聂荣臻夫妇、李富春夫妇都来了。

王震怕陈毅在病房寂寞,经常带着小孙女一起来,一坐就是几个小时。

叶剑英几乎天天都来。他怕陈毅说话多了吃不消,总是稍坐一会儿便退出来,一趟又一趟地在病房外来回踱步,久久不肯离去。

“珊珊,几点了?”

这是陈毅第三次问时间了。

他的病情还在加重,时而昏迷,时而清醒,出现了呼吸困难。

珊珊知道,这是父亲等着会见乔冠华。率领中国代表团出席完联合国大会的乔冠华,刚刚来了电话,说一会儿就到。

当乔冠华准时出现在陈毅的病房时,陈毅抬起身子,伸出双手表示欢迎,显得格外激动,连声说:“伟大的胜利,伟大的胜利啊!”

乔冠华泪光闪闪,久久握着陈毅伸出的手,动情地说:“在联合国遇到许多外国朋友,他们都让我转达对您的问候。他们都十分想念您。好几位非洲国家的外长,都请您病愈后再去访问。”

他还说,美国总统国家事务副助理黑格将带先遣组来到北京,为尼克松总统访华打前站,中美两国关系将翻开新的一页。

陈毅难得这样长时间处于清醒和兴奋状态,脸上出现少有的红晕,多次听到他说“谢谢”,“很好”。

1972年元旦刚过,1月2日午后,陈毅醒来额头上、身上热得烫

手,一量体温又发烧了。

这天下午15时,李先念来到病房。

陈毅的耳朵还好使,听到老战友到来,他费力地睁开眼睛,缓慢、艰难地说:“谢谢你了,老同志了……我不能多讲话。”

在陈毅的病床前,李先念默默地停立良久,当他离开病房时,再也不能控制自己的感情。他是流着眼泪走的。

这天深夜,陈毅总算缓慢退烧,神志少有的清醒。

几天前,周恩来特地关照过日坛医院:陈毅神志清楚时,须随时向他报告。

当天夜里,周恩来接到医生的报告,立即从人民大会堂坐车赶往日坛医院,直奔陈毅病房。两人久久地闭门长谈。

以后几天,陈毅又几度昏迷。

一天,陈毅从昏迷中苏醒,认出身边有大儿昊苏、女儿珊珊,嘴里说着什么,好不容易辨别出几个不连贯的句子:“红军……毛主席……路线斗争,坚持原则……”1月4日,极度虚弱的陈毅处于深度昏迷状态。

张茜领着儿女们守候在丈夫身旁,默默地祝愿丈夫平安,祝愿他尽快从死神的魔掌中挣脱出来,早日康复。

或许是精诚所至吧,陈毅的眼睛动了一下,一会儿慢慢睁开了,嘴唇嗫嚅着,喃喃有声。

他认出了守候在病床边的妻子和4个儿女,显得颇为动情。

珊珊眼尖,知道父亲有话要说,赶快把耳朵伸到父亲嘴边,终于听明白了:“……一直向前……战胜敌人……”这是陈毅留给这个世界的最后一句话。

1月6日,毛泽东让周恩来、叶剑英向陈毅传达他对“二月逆流”的态度后,叶剑英即匆匆赶到病床前告知病危弥留之际的陈毅。然而,此时的陈毅已经不省人事。叶剑英对陈毅说:“毛主席、党中央要我来看你,要你安心养病,会好起来的。我带来了毛主席的指示,让珊珊念给你听。”

叶剑英递给珊珊一页纸。珊珊弯下腰,在陈毅的耳边大声读道:“现在再不要讲‘二月逆流’了。当时是‘516’、王关戚,还有陈伯达打

击一大片,包括你(指周恩来)在内。当时那个情况有些同志要讲一些话,是应该的,是公开讲的。在党的会议上为什么不可以讲?有些事情看来过了几年就清楚了。”读完后,看到父亲已不能说话,但神智尚清楚,她就对父亲说:“您要是听清楚了,就闭闭眼吧。”陈毅闭了闭眼。珊珊又念了一遍,再问父亲听清楚了吗,陈毅已没有任何反应。几个小时后便与世长辞了。

1月6日当晚23时30分,周恩来同黑格第二次会谈,答复4日黑格转达的尼克松的口信,要点是:

一、随着中美领导人会谈的临近,某些敌对势力加紧破坏,中国对此已有准备。

二、尼克松访华公告发表后,苏联在欧亚的动作更暴露出它扩张主义的面目,次大陆也将从此动荡不已。

三、在越南问题上,中美之间有根本分歧,美国现行对越政策对于总统访华也带来不利因素。

四、美方对中国的生存能力表示怀疑、并声称要维护中国的独立和生存能力的说法,令人惊讶。中国认为,任何国家绝不能靠外力维持其独立和生存,否则只能成为别国的保护国和殖民地。社会主义的新中国是在不断抗击外来侵略和压迫的斗争中诞生和成长起来的,并定会继续存在和发展下去。

五、中美两国关系并未正常化,但中国方面将以应有的礼仪接待尼克松总统,并将为谋求中美高级会谈取得积极成果做出自己的努力。

六、关于台湾问题,中方在公报草案中已尽力照顾到美方的困难。中国人是有着非常强烈的感情的。如果美方真有改善中美关系的愿望,就应该在中美关系的这个关键问题采取解决问题的积极态度。

中方的答复相当强硬,同时又留有余地。答复稿中说:“……美方口信表示,期望通过访问,加强尼克松总统作为世界领袖的形象。对此我们难以理解。一个人的形象取决于他自己的行动,而不是任何其他国家。我们从不认为有什么自封的世界领袖。”当中方把答复稿念给黑格后,黑格只得说:可能我没有正确地转达总统的意思。基于此,在接待尼克松的问题上,中方低调处理。外电评论说,“是朴素而严肃

的”。

在会晤,周恩来还对黑格当天转达的基辛格口信作了评论。他说:中美两国关系没有正常化,贸易发展是有限度的,必然是缓慢的;但中美双方总要向远处看,中美关系总要走向正常化。

1 月 7 日,黑格一行离开北京,前往上海、杭州等地。因为黑格是打前站的,尼克松访华要去的城市,他都要事先去实地看一遍。

在黑格到达上海的第一天晚上,上海设宴招待黑格。徐景贤在讲话祝酒时,黑格没有站起来致答词。这使得徐景贤等人大为恼火,认为黑格看不起上海领导人。加上第二天美国政府发表了一篇对中国不太友好的讲话,徐景贤他们越发认为黑格的态度是有来头的。于是,他们找黑格辩论,向他提出抗议,把他训了一阵。黑格应该是没有经历过如此的外交场面,吓得大气不敢出。因为他的使命是来打前站的,如果当地领导人不配合,他完不成任务,回去交不了差。

上海方面还打电话到杭州,说黑格完全是帝国主义的态度,很坏,要求杭州方面接待要“降温”。结果,黑格一行到杭州后,受到冷遇。在安排黑格游西湖时,本来游船上摆好了吃的糖果和点心,后来都临时撤走了。陪同的领导也都一个个板着面孔冷冰冰的,不搭理黑格。

黑格一行莫名其妙,惶恐不安。他们心想是不是因为在北京同周恩来会谈时说错了“生存能力”的问题得罪了周恩来?

外交部陪同黑格的干部看到上海、杭州的做法后,心里也很不安。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很容易让黑格产生误会。如果让黑格产生中国改变了态度的误会,对维护中美关系的大局不利。基于这样的考虑,他们把这个情况向北京作了汇报。

周恩来得知后,向毛泽东作了汇报,并亲自打电话,严厉批评上海的做法完全是不顾大局。他说:

“主席授权我批评你们这种不顾中美关系大局的做法。黑格回到上海后,接待要‘加温’。主席指示,美国人爱吃糖,给黑格他们每人送 10 斤糖。”

原来,在基辛格一行第一次来中国,住在钓鱼台。按照总理指示,在客房中放的烟、茶、糖果等每天要换。第一天,放在他们房中的东西他们都没有动。第二天,发现放在他们房中的烟和糖少了许多。待他

们走后,给他们放在室内的糖果竟一扫而光了。大家笑着议论,客人是来时摸不清底细,不敢乱动;走时心情轻松愉快,行动也就随便了。

陈毅逝世的消息很快传到了毛泽东那里。他听后很长时间面无表情,无言无语。他望着窗外,零零星星的雪花一片一片地飘落在窗户上,渐渐融去。雪花就这么落下,融去,再落下,再融去……

是啊,扳着指头数数,那些和他一起出生入死打江山的元帅们,活着还有5位……

1月7日上午8时多,三座门军委二楼会议室召开会议,国务院办公室负责人吴庆彤对大家说:“陈毅同志于昨晚11点55分因病去世了,因为陈毅同志的关系已经转到军委,所以中央决定陈毅同志的治丧工作由军委牵头办理,中央和国务院有关部门协助。周总理征求了几位老帅对陈毅同志治丧的意见,总的精神是,由李德生同志牵头成立一个治丧小组,负责治丧的具体事宜。治丧程序与李天佑同志相同,规格略高。今天到会同志们的任务有三件:一是拟定新华社的新闻报导方案,由新华社的同志负责;二是为中央军委起草一个向党中央关于治丧问题的请示稿,由军委办公厅的同志负责;三是草拟一个悼词稿子,由总政治部的同志负责。现在就在会议室内开始工作,晚饭前完成稿子送审。”

在会议室负责组织工作的,除了吴庆彤外,还有军委办公厅主持全面工作的副主任金涛和总政治部秘书长王迪康。做具体工作的人员,新华社有3位,军委办公厅有两位,总政治部去了干部部第二任免处的干事刘岩。于是,撰写陈毅悼词的任务就落在了刘岩身上。

刘岩在机关里虽然经常参加起草公文之类的工作,但从来没有写过悼词,特别是陈毅这样一位在“文革”中颇有争议的人物,悼词中对他怎么评价?他心中无数。因此,再三面陈在场的几位领导,请他们讲一讲,哪怕是几句话也好,但谁也不愿意发表意见,不给定个基本调子。开始,周恩来从人民大会堂亲自打电话或让王良恩打电话给吴庆彤,对新闻报导和追悼会安排方面的问题不断作补充指示,但却没有悼词方面的具体指示。

最后,王迪康秘书长对刘岩说:“总理不是讲了吗,规格略高于李天佑同志,你就按略高于的精神先拟个草稿出来再研究吧。”

于是,刘岩只好下决心“自作主张”了

“规格略高于李天佑”是陈毅同志治丧的总原则,因此李天佑悼词理所当然就成为刘岩心目中的“参照物”了。但李天佑1955年授的上将军衔,而陈老总授的是元帅军衔,李天佑1970年9月逝世时是副总参谋长,而陈老总逝世时是军委副主席,无论两人的军衔还是军职均相差两级,所以刘岩考虑应当参考一下已经去世的元帅、军委副主席的悼词。在陈毅之前去世的元帅、军委副主席有4人,其中彭德怀、林彪、贺龙当时都没有悼词,唯独1963年12月逝世的罗荣桓有悼词。于是,经请示王迪康同意,刘岩给《解放军报》社打电话,将载有罗荣桓和李天佑追悼会消息和悼词的《解放军报》迅速调到三座门供参阅。

刘岩参照罗荣桓、李天佑的两篇悼词,按时完成了陈毅悼词的起草工作。下午,他把初稿交给王迪康审示。王迪康口头提了几点文字方面的意见,对实质性的问题没有提出异议,也没有动笔在稿子上修改。刘岩抄正后,王迪康交给在场其他两位领导过目,他们也没有提出什么意见。晚饭后,悼词初稿随同军委办公厅代军委草拟的治丧《请示》稿一并呈治丧小组讨论,这时悼词的呈报稿共为566个字。两件稿子经治丧小组通过,将《请示》打印后,将手抄稿附在《请示》件后面,由李德生签名“呈叶副主席阅示”,落款时间是“元月八日二时”。

叶剑英于“一月八日三时廿分”签名“呈总理阅示”。

# 第1234回：毛泽东，参加陈毅追悼会 政治局，在解决新疆问题

1月8日凌晨，周恩来收到叶剑英代表军委报送的陈毅治丧《请示》和悼词草稿。《请示》中提出，陈毅的治丧活动包括两项，一项是用3个半天向遗体告别，一项是用1个半天开追悼会。追悼会的规模建议组织1200人参加，其中党中央机关100人，国务院机关400人，军队系统700人，建议参加追悼会的领导名单有：

中央政治局的周恩来、叶剑英、张春桥、李先念、李德生、纪登奎、汪东兴；

中央军委副主席及办公会议成员徐向前、聂荣臻、陈士渠、张才千、刘贤权；

党中央机关的负责人耿飚、郭玉峰、王良恩；

在京的部分中央委员李富春、郭沫若、张云逸、张鼎乙、曾山、王震；

国务院业务组及外交部、外经部、外贸部、对外友协的负责人华国锋、粟裕、余秋里、苏静、姬鹏飞、方毅、白相国、王国权；

全国政协副主席傅作义、帕巴拉·格列朗杰；

北京市委吴德；

军委各总部负责人；

各军兵种、国防科委、军事科学院、军政大学、北京军区北京卫戍区负责人各1至2人；

陈毅生前友好。

周恩来审阅军委的《请示》时，在参加追悼会人员的名单中加上了乔冠华、韩念龙、李耀文、王海容、陈德和、马文波、李强7人。同时注明："因八宝山灵堂太冷"，江青、宋庆龄、廖承志只向遗体告别，不参加追悼会。

周恩来随后批示："拟同意。即专送康生（不送）、江青、春桥、文元

(不在)、先念、登奎、东兴同志批。周恩来1972.1.8五时”。

江青传阅时批了:“我可以去参加追悼会”9个字,其他4人圈阅完毕,早晨上班前,周恩来让值班人员告知治丧小组,可以按计划从上午9时开始向遗体告别。

1月8日,周恩来前往医院向陈毅的遗体告别。他静静地走近陈毅的床边,恭恭敬敬地向陈毅的遗体三鞠躬,而后,伸手掀起覆盖在陈毅身上的白布床单的一角,缓缓地握住陈毅的手背,泪水潸然滚落。

陈毅死后,301医院门口自发地聚集了许多从四面八方闻讯赶来的干部和群众。他们站立在寒风中等候,久久不肯散去,坚持要向陈毅的遗体告别。人数越聚越多,最终惊动了中央高层。

当天,周恩来审改了陈毅的悼词,补写对陈毅一生功过的评价:“功大于过,特别是皖南事变前后,他坚决执行毛主席关于新四军应渡江深入敌后作战以求发展的指示,在巩固和扩大新四军方面,做出了极大的贡献。”

改后,于当日夜间给毛泽东写报告,呈报陈毅治丧工作安排,重点是请示关于陈毅悼词的写法和修改问题。全文如下:

主席:

陈毅同志于一月六日深夜在抢救无效中逝世,七日已托张耀祠同志转报。今(八)日政治局、军委、国务院有不少同志前往医院向遗体告别,九日火化,十日下午在八宝山举行追悼会,只请内宾,不请外宾。

这里,有一个问题,悼词怎么写为好。军委建议、政治局传阅同意,悼词由叶剑英同志念,剑英审阅后的悼词如另稿。除第一页对陈毅同志在离职假期中患病不治而死必须有所交代外,对第二页有两个方案,一个照原稿除两三处小增改外均不动;一个照我的修改稿,增写一长句,删去用红笔勾的一短句,这样可免去悼词的老一套,也为陈毅同志作了一定意义上的估价。但陈毅同志是国内国际有影响的人,我增改的一长句,对党内有需要,但如发表在报上,可能引起不必要的猜想。究如何为好,请主席指示。

周恩来

一九七二年一月八日夜

因为悼词中已有“陈毅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是中国人

民的忠诚战士。几十年来,陈毅同志在毛主席、党中央的领导下,在长期革命战争中,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坚持战斗,坚持工作,努力为人民服务”的结论,毛泽东接到周恩来送来的陈毅悼词后,将周恩来补写的那段评价陈毅功过的文字悉数勾去,在稿纸一边批示道:“基本可用。删去两段”,“前面已作了结论,后面两段均可不要。功过的评论不宜在追悼会上作。”

当天毛泽东就圈发了有关召开陈毅追悼会的文件,包括陈毅追悼会的规格。

按照文件所定的规格:陈毅已不是党和国家领导人,陈毅的追悼会由中央军委出面组织。总政治部主任李德生主持追悼会,军委副主席叶剑英致悼词。定于1月10日下午15时在八宝山烈士公墓举行。

但是接连两天,副主席宋庆龄来电话,坚持要出席陈毅的追悼会;西哈努克亲王发来唁函,并提出参加陈毅追悼会的请求;许多民主人士也纷纷表示要前来悼念。

周恩来均以天气寒冷、场地狭小等理由反复劝阻他们前来。

1月10日中午饭后,按惯例毛泽东是要休息一会儿的。可是他裹着睡衣,在一侧堆满线装书的卧床上躺着,辗转不安。

张玉凤发现他翻来覆去睡不着,就劝他休息一会儿。他说要起来到沙发上坐一坐。张玉凤搀扶他走进书房。毛泽东坐下后,便随手抓起一本书,看了一会儿又放下,显得心事重重。

自从圈阅了陈毅追悼会的文件,他就一直这样意乱心烦,越加显得面色憔悴,腮边的胡须很长。

当时毛泽东手边没有日历,桌子上没放钟表,也没有任何人提醒他,在追悼会快要开始之前,毛泽东突然抬头询问张玉凤:“现在是什么时间?”

当张玉凤回答他是1点30分的时候,毛泽东拍打了一下沙发的扶手:“调车,我要去参加陈毅同志的追悼会!”说完,他便缓缓站起身来。

太突然了!毛泽东的这个举动,谁都没有想到。张玉凤回忆当时的情况:

“一月十日午饭后,照例,主席要睡一会儿。但这一天他却没有睡

意。我劝他休息一会儿,他说到沙发上坐坐。坐下以后便随手抓起一本书看。他显得那么烦躁,我们不敢多问什么,做完事就离开了他的房间。过了一阵,他突然问我:'现在是什么时间?'我告诉他:'现在是一点半。'他马上说:'调车,我要去参加陈毅同志的追悼会。'主席这个突然决定我一点都没有想到,我也不知道今天中午有什么安排。主席说要参加追悼会,我就赶紧地通知调汽车,又通知了汪东兴等领导同志。

这时,主席还穿着睡衣,下身是一条薄毛裤。我们拿着他平时出门见客时总要穿的那套灰色'毛式'服要给他换上,他说:'不要换了,我套在睡袍外面就行了。'我们给他穿好上衣,再穿制服裤子时,他便不让穿了。弄得我、吴旭君都感到无所适从。主席只穿着薄毛裤出门,怎么行呢?可是,主席的脾气我们是很了解的,有时候他要做的事情谁都别想阻拦,他不想做的事你动员他做也不那么容易。所以,我们只好在外面给他穿了件大衣。主席乘坐上五十年代苏联政府送给他的那辆'吉斯'牌轿车,沿长安街径直向西驶去。"

周恩来得到这一消息,立刻拨通了中央办公厅的电话说:"我是周恩来。请马上通知在京的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务必出席陈毅同志追悼会;通知宋庆龄副主席的秘书,通知人大、政协、国防委员会,凡是提出参加陈毅同志追悼会要求的,都能去参加。"

接着他又电话告知外交部:"请转告西哈努克亲王,如果他愿意,请他出席陈毅外长追悼会,我们将有国家领导人出席。"

周恩来搁下电话,忘记了自己身上还穿着睡衣,一边让卫士长张树迎赶紧调车,一边匆匆往外走。他要赶在毛泽东之前到达八宝山!

在汽车抵达目的地之前,周恩来才好容易将睡衣换了下来。而毛泽东则穿着睡衣走进了追悼会场。

1 月 10 日早饭后,参加陈毅治丧活动的工作人员就已进入八宝山礼堂布置会场,午饭由三座门食堂送到现场。

刚吃过午饭,现场总指挥吴庆彤把刘岩叫去说:"毛主席要来参加追悼会,另外还要增加宋庆龄等一批各界人士,你马上办三件事,一是让写花圈飘带的同志赶快准备笔墨纸张,给毛主席等领导同志新增加的花圈写飘带。毛主席的花圈怎么也不能比西哈努克送的差,八宝山

库存的花圈都不合适,已派人另行采购去了;二是重新测量划分场地,把中央领导同志站的前区位置多让出一块来;三是要求各休息室服务人员和门口的值班人员坚守岗位,保证秩序,保证安全。”

之所以要重新购买花圈,是因为西哈努克送的花圈是鲜花做的,八宝山没有鲜花圈。

开追悼会的1月10日,正值三九,是北京最冷的季节,而八宝山礼堂和各休息室都没有暖气设备,只能靠火炉取暖。但八宝山殡仪馆只有一般的小火炉,没有大炉子,国务院和总参管理部门从别处找到一些铁铸大火炉,但找不到大烟囱,只得临时上街定做。火炉取暖带来的问题是煤气中毒。为了保证安全,调防化兵部队的一个小分队,携带仪器进入八宝山,从8日晚炉子点火开始,昼夜检测,保证厅、室内既达到要求的温度,又要保持空气洁净。

周恩来比原定时间提前到场了。他一下车,就三步并作两步。一进八宝山休息室,就激动地通知张茜:“毛主席要来!”

神情黯淡的张茜听到这个突如其来消息,泪水流下。

周恩来安慰道:“张茜,你要镇静些啊!”

张茜强忍住抽泣询问:“毛主席他老人家为什么要来啊?”

周恩来没有回答。

毛泽东一下车就被人们簇拥着来到燃着电炉的休息室里。他的悲切和疲倦显而易见地印在明显苍老、憔悴的脸上。

张茜看到了毛泽东,令人心碎地惨然一笑,泪花在眼眶里盘旋:“主席,您怎么来了?”

毛泽东也忍不住凄然泪下!他握住张茜的手,话语格外缓慢、沉重地说:“我也来悼念陈毅同志嘛!陈毅同志是一个好人,是一个好同志。”

张茜激动地挽住毛泽东的手臂。她尽力抑制悲痛,对毛泽东说:“陈毅病危时,还想到主席的寿辰。12月26日那天,他进食已经很困难,但是还吃了一点寿桃、寿面,祝你老人家健康长寿。”

毛泽东眼眶红了,他深知陈毅的至情至诚。他关切地问:“孩子们呢?叫他们进来嘛。”

陈毅的4个孩子进来后,毛泽东和他们一一握手,勉励他们要努

力奋斗,深情地对孩子们说:“陈毅同志是一个好人,是立了功劳的。”

“陈毅同志26岁的时候第一次见到主席,从那时起,在你老人家的指引和教导下,他才走上正确的革命道路,也正是这样,才有了我们这一家。”张茜说。

毛泽东回应:“陈毅同志为中国革命、世界革命做出了贡献,这已经作了结论了嘛。”

听到这些,张茜心潮起伏,喃喃地说:“陈毅不懂事,过去反对过主席。”

“陈毅同志和我有过几次争论,那个不要紧嘛 ,我们在几十年的相处中,一直合作得很好。陈毅同志是执行中央路线的,是能团结人的。”毛泽东说。

谈话告一段落时,张茜真诚地请求:“主席,您坐一会儿就请回去吧!”

毛泽东微微摇头:“不,我也要参加追悼会,给我一个黑纱。”

张茜忍着泪水连忙说:“主席,那怎么敢当啊!”

有人进来报告:“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来了。”

毛泽东稍稍地一怔,立刻转身朝门外望。

西哈努克和陈毅相识了十多年,交往颇多,对陈毅的感情很深。陈毅去世后,他几次向周恩来提出要亲自来八宝山,参加追悼会。周恩来没有同意,因为当时定的规格是不请外宾。

毛泽东与西哈努克互致问候,然后对他说:“今天向你通报一件事,我那位‘亲密战友’林彪,去年9月13日,坐一架飞机要跑到苏联去,但在温都尔汗摔死了。林彪是反对我的,陈毅是支持我的。”

西哈努克惊异地望着毛泽东。林彪出逃,中国还未向国外公开发布消息,他是毛泽东亲自告知林彪死亡消息的第一个外国人。

“我就一个‘亲密战友’,还要暗害我,阴谋暴露后,他自己叛逃摔死了。难道你们在座的不是我的亲密战友吗?”毛泽东停了一会儿,又接着说:“陈毅跟我吵过架,但我们在几十年的相处中,一直合作得很好。他和另外一些人不一样,例如林彪,他要搞政变,搞阴谋投降苏联。”

毛泽东左顾右盼。在接着的谈话中,他不仅谈了陈毅,还谈到了

邓小平。他说:“邓小平的性质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

陈毅追悼会由于毛泽东的突然出现,原定较低的规格一下子提了上来。才接到通知的宋庆龄和一批民主人士也纷纷赶来。八宝山礼堂并不宽敞,一下子搁不了这么多人,很多冒着寒风赶来的老干部只能站立在追悼会场外为陈毅元帅送行。尽管1月10日那天下午气温在零度以下,阴沉的天空还飘散着零星雪花,寒风刺骨,可是没有一人退场,没有一人抱怨。

这时,叶剑英起身轻轻来到周恩来身边,把两页文稿交给了周恩来。

周恩来不解地问:“这是什么?”

叶剑英没有做声,只是望着周恩来,双手抱拳在他面前拱了拱,转身悄悄地回到了自己的座位上。

周恩来展开文稿一看,明白了。原来叶剑英要周恩来为陈毅致悼词。

追悼会下午15时整准时开始。会场内没有军乐队,只有一架留声机反复播放着哀乐。

这时,工作人员拿来了一块宽宽的黑纱戴在毛泽东的大衣袖子上,张茜搀扶着毛泽东,迈着沉重的步子,慢慢地向会场走去。

哀乐声中,毛泽东和全体人员面对鲜红党旗覆盖下的陈毅骨灰盒一鞠躬,再鞠躬、三鞠躬!

毛泽东凝重而深沉地弯下他高大的身躯,低下他花白的头颅,为他的战友致哀。当他再次抬起头时,泪光盈盈,久久凝视着陈毅肃穆的遗像……

追悼会上,周恩来念着悼词,深情地说:陈毅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是中国人民的忠诚战士。几十年来,他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在长期革命战争中,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坚持战斗,坚持工作,努力为人民服务。他的逝世,使我们失去了一位老战友、老同志,是我党我军的一大损失。

不足600字的悼词,周恩来竟读得两次哽咽失语……

1500多人的会场笼罩在深深的哀痛中,人群里不时传出低低的悲

咽声。

毛泽东站在队伍的最前面,高大的身躯略略前倾,他静静地听着,默默地望着,双唇不停地抿动,似乎有无尽的话要说……

追悼会结束后,毛泽东再一次握着张茜的手,久久不肯松开。张茜搀扶着毛泽东,一直把他送到汽车前。毛泽东双腿明显无力,几次用力迈步都没有登上汽车,最后,在工作人员的帮助下他才勉强坐了进去。

张茜和所有到会人员没有想到,这一次是毛泽东一生中最后一次参加的追悼会。

追悼会结束后,杜修贤一头扎进了照片的后期制作,暗红色的灯光下他熟练地将一张张白色的相纸放进药水中显影,没有一会功夫儿,白天追悼会上催人泪下的悲伤场景就跃然纸上。他在洗好的照片中首先选了一张全景照片,将它从毛泽东大衣下摆处裁去。这样就遮挡了毛泽东身着睡衣的痕迹。

第二天,《人民日报》等各大报纸都在头版头条以"首都隆重举行追悼陈毅同志大会,伟大领袖毛主席参加了追悼会"的通栏标题、用整版的篇幅报道了陈毅追悼大会,同时刊登了陈毅遗像、周恩来所致的悼词和西哈努克撰写的悼文。此后,在周恩来的安排下,新华社又连续播发了一些外国政府首脑和友好人士的唁电、唁函。陈毅追悼会及其影响大大超出了原先规定的范围。

1 月 14 日,周恩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各地工作情况。会议认为:新疆、江西、贵州、云南等地问题值得引起注意,尤其是新疆在批林整风运动中,仍将主要斗争矛头指向王恩茂,不利于团结对敌。会议商定近期约新疆党委和军区负责人来京一谈,以促进他们的认识和团结。

原新疆第一书记王恩茂在"九大"后既已调离新疆,在北京二七机车车辆厂劳动锻炼。

1 月 24 日,周恩来和部分中共中央政治局成员接见来京出席新疆工作会议的代表,并讲话说:"把批判矛头对准王恩茂的'两个主义'和'一个王国',是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中央的政策还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犯了错误改了就好。"

这里说的“两个主义”指“山头主义”,“宗派主义”,“一个王国”指“独立王国”。是文革开始后批判王恩茂的内容。

周恩来强调:“现内部最大的问题,是出了林陈反党集团,从‘913’至今,已经四个多月了,你们还没有自觉地深挖思想。”

他谈到邓小平,说:“林彪就是要把邓搞成敌我矛盾,而毛主席讲邓还是人民内部矛盾,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不能混淆。”又说:“听说新疆现在还有人讲‘二月逆流’,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叶副主席已经主持军委工作,你们听到那些话,为什么不批驳?”

最后,他要求代表们多作自我批评,互相帮助,搞好团结。

# 第1235回：年事高，毛泽东身患肺炎 性执拗，一月内两次昏迷

1972年的新年是寒冷的.严冬中的中南海，曾经郁郁葱葱的苍翠在寒风中迅速地枯黄、凋谢、飘零……1971年入冬前，毛泽东患大叶性肺炎。1972年初，医护人员又发现毛泽东的腿部开始出现轻度的浮肿，两小腿和足踝部都有明显的压痕。他的血压也在升高，以前，他的血压始终都维持在高压130毫米汞柱、低压80毫米汞柱的正常范围。可是到了1972年1月，毛泽东的高压在最高时竟然升至180毫米汞柱，低压也大多徘徊在100毫米汞柱左右。血压的居高不下导致了毛泽东的体力下降。他每日须遵医嘱卧床休息，便秘的症状也在加重，有时两三天才解一次大便。这期间，毛泽东的胃口又不好，食量的减少也影响了他的抵抗力。

参加完陈毅的追悼会后，毛泽东的身体变得更加虚弱。肺部感染也明显加重，并伴有低烧症状。两天后，他的双腿浮肿开始加重，浮肿部位向上蔓延。医生在检查中发现，毛泽东肺部杂音不断加大的同时，又出现了心律不齐等症状。尽管疾病呈现出发展的趋势，可是毛泽东仍然不同意注射抗菌素，只同意口服消炎药。

由于不断的咳嗽，毛泽东已经不能再像从前那样在床上平卧而眠了，他在夜间只能倚坐在卧室的沙发上睡觉。

1月18日，正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召集会议的周恩来出去接了一个电话，再进门时，只见他脸色灰白，挥挥手说："散会散会！"转身带着小跑往电梯方向赶去，已没有了往日的镇定。

卫士长张树迎扶着周恩来走进电梯，他明显感到周恩来的全身在发颤："到游泳池。"周恩来的声音也微微发颤。

张树迎心里一震："一定是毛主席那里出事了。"果然，一进中南海游泳池，就看见毛泽东卧室的门窗大开，平躺在床上的毛泽东刚刚从昏迷中苏醒过来，脸色发青，嘴唇发紫，正大口喘着气。周恩来如释

重负。

原来,毛泽东突然发生昏迷,这是自他患病以来从没有过的情况,让他身边的医护人员大为不安。中央决定立即成立专门的医疗小组为毛泽东治病。除原来毛泽东身边的医护人员外,又临时从北京医院、阜外医院、北京中医院和中南海门诊部等单位,抽调有治疗经验的内科医生多名,直接负责对毛泽东病情的检查和诊治工作。

经过医疗小组对毛泽东的会诊,一致认为应对他进行一次全面的身体检查,以期对毛泽东的病情做出最后确诊。

然而,当医疗小组把上述意见报告给毛泽东时,他仍然不同意做全面的身体检查。后来,还是周恩来对毛泽东说:“现在马上治疗,病情不但会好转,而且恢复也比较快,如果继续拖延下去,肺炎有可能转为其他疾病。从当前下肢浮肿有明显向上扩散的迹象上看,主席最好尽快做一次心电图的检查。”

毛泽东尊重了周恩来的意见,但他只同意做一次心电图,其他繁琐的检查仍然不愿意配合。经过医疗小组的再次力争,毛泽东最后只同意做心电图和X光胸透两种检查。

胸透片子出来以后,证实了毛泽东肺部感染已相当严重。医疗小组还发现,由于肺部感染长期得不到进一步的有效治疗,现已危及到病人的心脏。心电图显示毛泽东已出现了肺心病的明显症状。不仅如此,专家们还发现,心电图显现的结果已经进一步证实了毛泽东的病情转重,在肺炎的基础上,又发现了血性心力衰竭和阵发性心动过速。专家们通过X光和心电图检查所得到的结果,诊断并认定毛泽东1月18日的昏迷,就是因为肺性脑病所致。这是因为肺心病可以直接造成脑部的缺氧,所以也才有毛泽东平日精神不振及昏睡等相关症状。

尽管如此,毛泽东仍然坚信自己的病情并没有医疗小组所估计的那么严重。对于医疗小组提出的强心、消炎和利尿三大医疗方案,毛泽东虽然勉强接受,但是他仍然说:“不要搞得那么紧张嘛。”在医疗小组开始为他实施注射青霉素和口服抗炎药之后,毛泽东又派人去询问当时也生病住院的康生实施的治疗方案。当他听说康生只用抗生素,其他药品一概不用时,毛泽东又回到他原来固有的立场上来,决定马

上中断正在进行的黄胺制剂的注射。

毛泽东的病情继续加重。1月21日晚19时30分,周恩来和江青一起来到游泳池毛泽东住地。在听取医疗小组汇报的时候,周恩来也为毛泽东越加严重的病情及他本人仍没对疾病引起高度重视而感到忧虑。鉴于毛泽东的病情确实在悄悄转重,周恩来决定在当晚21时召开政治局会议,把毛泽东最近病情的变化及医疗小组的意见,一并提交政治局会议研究讨论,以期达成共识尽快制订一个让毛泽东能够接受的治疗方案。

怀仁堂灯火通明,中央政治局会议如期举行。会议期间,姚文元从会议室来到怀仁堂东大厅,接见了等候在那里的几位医疗小组成员和内科专家。

政治局研究毛泽东病情的会议一直进行到凌晨4时方才结束,叶剑英就和李先念再次接见了医疗小组的主要成员。叶剑英说:“政治局让我们再和你们谈谈主席的情况,你们不要有顾虑,把主席的病情讲清楚。”

医疗小组把毛泽东不愿接受医疗小组关于施行消炎、强心、利尿三套医疗方案,始终坚持自己病情并不严重等情况作了汇报。正是因为医生们无法改变毛泽东对医疗方案的观点,所以,本来可以早见疗效的肺炎竟久治不愈。如果继续这样拖延下去,甚至还有可能累及心脏。医生们认为,根据最近一次心电图显示,毛泽东已经出现了心律不齐和心肌缺血的情况。专家们把对毛泽东病情发展的估计,也向叶剑英和李先念作了汇报。叶剑英当即认为医疗小组关于毛泽东心脏已出现心室性早搏等情况是完全正确的。

在这次政治局会议上,中央决定由周恩来、王洪文、张春桥和汪东兴4人负责领导对毛泽东疾病的医疗救治工作。

毛泽东因心情不好而拒绝配合医疗小组的治疗,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972年2月初。在此期间,他只能倚靠在沙发上睡觉,咳嗽也越来越重,有时坐在沙发上就不知不觉陷入了昏睡状态。2月1日,他抱病会见巴基斯坦总统布托。

就在这时候,一个促使毛泽东主动要求治疗的契机出人意料地发生了。这就是中央政治局关于美国总统尼克松即将访华的请示报告

摆到了毛泽东卧室的茶几上。毛泽东批阅文件以后,顿时产生了快点治好病、准备在中南海会见尼克松的强烈愿望。毛泽东的这一突然转变,使得整个医疗小组成员的精神为之一振。由于毛泽东希望和尼克松会见的心情十分强烈,所以他这次对医疗小组的医治方案相当配合,不但接受了消炎、强心和利尿同时并进的方案,而且又同意在服药的同时进行静脉滴注抗菌素。

2 月 4 日的治疗刚开始不久,2 月 12 日凌晨,毛泽东突然休克,脸色发紫,呼吸极其微弱,几乎摸不到脉,已完全昏迷。起因是医护人员在为毛泽东进行肌肉抗生素注射后,他即开始剧烈的咳嗽。忽然,毛泽东咳上一口痰来,由于体力衰弱,这口痰竟然咳了许久也无法吐出来。卡在喉咙里的这口痰,使毛泽东当即发生昏迷。

由于发病突然,来势凶猛,使人措手不及。发病时,护士长吴旭君正在身旁,发现他突然精神不好,出汗很多,脉搏细弱,呼叫他也没有反应,意识到他发生休克,立刻大声喊人。正在警卫干部值班室的张玉凤,听到她的呼叫,几个人一起跑到已成为毛泽东卧室和治疗室的会客厅,医生也飞快地赶到了。毛泽东侧身躺在床上,像是“睡着了”。吴旭君正在给他摸脉。说不清楚是心急还是紧张的关系,她对在场的医生说:“摸不到脉。”

由于毛泽东游泳池住地内不准运进各种医疗器械,所以医疗小组一时无法采用吸痰器进行抢救。这样只好打电话求助于距游泳池住地尚有一段距离的中南海门诊部,让其火速将相关急救器械运到游泳池住地。

正在西华厅主持会议的周恩来,惊悉毛泽东再次发生昏迷,马上中断会议,赶到毛泽东居住的游泳池,因两腿无力,他许久都下不了车。

进了毛泽东的卧室,看见他高大的身躯,横靠在那张特制的大床上,背后用被子和枕头垫着。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用自己的身体顶住被子和枕头,不使它倾倒。周恩来疾步来到床边,双手握住毛泽东的一只手,大声地呼喊着:“主席啊,主席啊,我是恩来呀!主席,你听见了吗?”他的嗓子有点沙哑,而且有点发颤。毛泽东没有丝毫反应。毛泽东的脸色青紫,呼吸极其微弱,几乎看不到胸部的起伏。

大约15分钟后,抢救人员将医疗器械运到。这时,毛泽东仍处于昏迷之中,情况非常危急。

在将氧气瓶、吸痰器、呼吸机及大批相关药物运到毛泽东身边后,医疗小组和中南海门诊部的医护人员先对毛泽东注射强心和缓解气管的激素类药物,又用吸痰器将毛泽东喉咙中的痰块吸出。这时,毛泽东的脸色青紫,呼吸困难,医护人员马上为他加用了呼吸罩。在场的心脏病专家胡旭东扶起主席,用力并有节奏地捶主席背部,不停地呼叫着:“毛主席,毛主席。”

大约20分钟过后,毛泽东的面部由青紫渐渐泛起了淡红色,胸部起伏的呼吸动作也隐约可见。他慢慢醒来,睁开眼的第一句话就是:“我好像睡了一觉。”当他发现在自己床边围满了穿白衣服的医护人员时,才知道自己刚才因为一口痰咳不出而发生了极度的昏迷。

毛泽东清醒过来后,体温仍在摄氏38度以上。工作人员把周恩来、汪东兴请到毛泽东面前。毛泽东说:“谢谢你们。”并邀他们两位一起到沙发上坐坐。他们问毛泽东:“是否把刚才的情况告诉江青?”

毛泽东看看大家,又看看周恩来,说:“不要告诉她,告诉她只会添麻烦。”

周恩来当即在游泳池毛泽东住地召开医疗小组成员碰头会,总结这次抢救毛泽东的经验教训。周恩来在对医护人员紧急抢救并使毛泽东转危为安表示肯定之后,同时指出在毛泽东身边找不到吸痰器等医疗器械而险些酿成大祸。当他听医疗小组介绍说,此前不允许把各种相关医疗器械运进毛泽东住地的规定时,周恩来立即决定在游泳池毛泽东住地尽快安装必要的医疗器械。同时,他又和医疗小组一起研究了治疗毛泽东疾病的新方案。

由于医疗小组有效的输液和施用大剂量的利尿药物,毛泽东在18时就排出1800毫升积存在体内的尿液。这是毛泽东近一个月来排尿量最多的一次,也是他病情好转的先兆。

多时为下肢浮肿所困的毛泽东,得知自己忽然排出了这么多的尿液,顿时精神一振。他当晚亲自请医疗小组成员吃饭,再一次表示他希望以健康的身体在2月21日会见尼克松。

毛泽东的病情从这一天开始出现了可喜的新转机。医疗小组再

接再厉,不断为毛泽东的施治过程修改医疗方案。到了2月中旬,已经困扰毛泽东多时的下肢浮肿症状,由于排尿顺利而出现了明显的消肿,肺内感染也同时消除了,剧烈的咳嗽和低烧症状也随之缓解。到了2月17日左右,多时不能在床上平卧而眠的毛泽东又能够重新躺在木板床上睡觉了。从这时起,毛泽东开始遵医嘱施行戒烟。到了2月21日,美国总统尼克松抵达中国的当天清早,毛泽东已经能够在住地小范围行走了。

但是,经过这次重病以后,毛泽东的健康状况再也没有得到恢复。他离不开人了,常缺氧,随时需要吸氧。身边人小心翼翼地不使他再受凉感冒,因为受凉感冒对他可能造成严重后果。他大多数时间躺在床上,有时闭着眼,不说话,陪同的人难以判断他是睡着了,还是昏迷,只能用手到他鼻孔前试试才知道。他需要什么东西时,常常不开口,只是用手指指,例如要用热手巾、要换垫子等。但他的个性依然那么强,有什么不舒服,从来不说。高烧到摄氏39度的时候,一摸脸和手,烫极了,他还哈哈笑。有时正在输液,周恩来到了,他就说:“拔掉,用不着,我要到沙发上去坐。”扶着他走十来步到沙发旁,他还谈笑风生,说:“我什么事都没有。”有一次他要睡又躺不下去,憋气,吴旭君难过的掉下眼泪。

毛泽东说:“你哭了。”

吴旭君说:“没有。”

毛泽东说:“不要着急,我死不了。你不就怕我死吗?我要是见了马克思,马克思会讲你不要这么早来,会叫我回去,你这个国家钢和粮食还很少,不要这么早来。”

失去健康的毛泽东,整日躺在床上看大本线装书,可是就在此时,他又发现自己的眼睛不仅老花程度加深,白内障也随之严重起来,他的情绪越来越不好,在毛泽东身边工作了十几年的机要秘书张玉凤对此就深有体会。

曾经有记者问她:“毛主席向你们发脾气吗?”

张玉凤毫不犹豫地回答:“发!1970年以后,主席身体患了多种疾病,有时情绪不好,渐渐地,我就觉得毛主席也和平常人一样,也有喜怒哀乐。不过,他始终像父亲一样对待我们工作人员,是位非常慈祥

的老人！我们在他身边久了，他也熟悉了我们，就像对家里人一样。有时遇到我们做错了事，或是他的情绪不好，就会发脾气。当时我也觉得委屈，觉得自己已经尽责尽力了，还是挨批评。现在看来，这不能怪主席。他操劳的是国家大事，加上国际风云不断地变幻，国内形势也不稳定，他心头有很重的压力。这些都是我们年轻人无法认识和体会的。所以就不能准确把握主席的内心活动。比如，主席正在看文件，我见饭要凉了，就提醒主席说：主席，饭菜要凉了，还是先吃饭吧。主席一听，火了：你没有见我在看文件吗？不吃！不过，主席发脾气，从不往心里去，发完也就忘了，并不计较我们的过失。主席一辈子爱看书，他读书几乎达到手不释卷的程度。主席读书有个习惯，不爱坐着看，常常捧着书靠在床上看。他的眼睛老花，又有白内障，看不清字体，却又不肯配带老花镜，只好借助放大镜看书。放大镜是象牙做的框，很重，他竟能拿着看几个小时甚至更长时间的书。主席读书范围很广，历史天文地理文学，几乎没有他不读的。”

# 第1236回：历史性，尼克松总统访华 没想到，毛泽东当天接见

1972年2月17日10时35分，尼克松的“空军一号”从美国安德鲁斯空军基地起飞，开始了他的中国之行。这也是第一个美利坚合众国总统，访问社会主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几个月前基辛格访华的秘而不宣相反，这一次是公开而高调。飞机先在关岛加油，按照中美双方事先达成的协议，于2月20日21时到达上海。机门打开，按照中美事先约定，中方的7人先遣小组按礼宾顺序登上美国的“空军一号”：第一个是乔冠华，第二是章文晋，第三是王海容，然后两个翻译——章含之、唐闻生，还有礼宾司的唐龙彬及一位警卫人员。

尼克松与夫人对中国客人给予了很大的礼遇，带着他们从头到尾参观了美国的总统专机：最前面是总统套房，里面有床和卫生间，外面有个大会客室；第二个舱是高级官员乘坐的，有点像头等舱，可以坐六、七个人；再后面是通舱，技术人员会在靠前位置，记者们坐在靠后位置，这样总统可以随时发布消息。大名鼎鼎的“空军一号”并不是想象中那般奢侈，但是其内部设施的齐全给中国人留下了深刻地印象。

2月21日北京时间上午11时，尼克松的专机出现在北京的上空。周恩来和叶剑英、李先念等领导人从休息厅走出来，跑道两面站着衣装笔挺的三军仪仗队。

11时10分，美国总统的副机首先降落在东郊天竺机场。11时27分，美国总统专机“空军一号”降落在北京机场。11时30分，飞机平稳地停在候机楼前。

2月的北京依然寒冷，站在舷梯前的周恩来并没有戴帽子。尼克松考虑得的确很周到，他在飞机上问身边的工作人员，周恩来是否穿了大衣？得到的消息是肯定的。于是，尼克松也穿上大衣。

机舱门打开了，穿着大衣的尼克松总统与穿着火红呢子大衣的夫人帕特两人走出舱门。

按惯例,应该是随行人员先出现在舱门,而尼克松却早有安排,他让其他人员退后,自己第一个出现在舱门,他要人们看到中美领导人在第一时间照面的镜头,不能有其他美国人在电视镜头中出现而分散群众的注意力。这一安排,在抵达北京前,尼克松告诫基辛格和罗杰斯至少十几次。于是,国务卿罗杰斯和总统助理基辛格留在飞机里。

周恩来站在寒风中,旁边有叶剑英、李先念、郭沫若、姬鹏飞外长等中国要员。当尼克松下舷梯走到快一半时,周恩来开始鼓掌。尼克松略停一下,也按中国的习惯鼓掌相报。他步子很快,一边招手一边鼓掌,不等走下舷梯,尼克松已经微笑着伸出他的手,伸向了两、三米外的周恩来。

周恩来也迎上去,两双手紧紧地握在一起,足足有一分多钟。现场的100多部照相机随即发出一片爆豆子般的声音,大家都拍到了两国领导人握手的照片。

这意味着一个时代结束,也是一个时代开始。尼克松显得很激动,说道:“总理先生,我感到很荣幸,终于来到了你们伟大的国家。”

周恩来说:“总统先生,非常欢迎你到我们的国家访问。”

紧跟在周恩来后面的翻译冀朝铸翻译出尼克松那句有名的话:“我是跨越太平洋与中国人民握手。”

周恩来回答说:“总统先生,你把手伸过了世界最辽阔的海洋来和我握手。25年没有交往了啊!”

这一划时代历史性场面通过卫星电视传到全世界。

时任新华社中央组驻中南海专职摄影记者杜修贤抓到了俩人的手尚未握在一起、但又迅即在握的瞬间。它不但表现了握手的结果,更突出了握手的欲望,画面效果超凡脱俗,可谓是“决定性的瞬间”。就是这零点几秒的时间差,就是两只手之间这微小的间隙,使得这张照片在无数的握手照片中脱颖而出,成为经典新闻事件的经典新闻摄影之作。第二天全国的报纸都发了这张照片,世界各国的报纸也用了这一张。后来《尼克松回忆录》的封底也用了这张照片。

周恩来迎接尼克松(杜修贤 摄)

上面两张图片取自同一场景,角度不同,人物也有差异。下图是美国记者拍的,周恩来身后是冀朝铸,一个在美国长大的中国人,1948年考入哈佛大学,朝鲜战争爆发后,1950年他回到中国,就读于清华大学化学系。1954年4月在外交部工作,先后参加过日内瓦会议、万隆会议中国代表团的工作。但是,中国公布的这张著名中美“握手”照修掉了冀朝铸,突出了王海容。

躲在机舱里的基辛格和罗杰斯等人,直到尼克松单独一人和周恩来历史性地握手完满结束以后,他们大家才像变魔术似的走出机舱。

接着，在机场举行了简短的欢迎仪式，检阅了三军仪仗队。中国三军仪仗队的最高规格为151人，而此次欢迎的仪仗队员是这一规模的两倍。他们排成整齐划一的人群，对15人组成的代表团行注目礼，尼克松后来说，“中国仪仗队是我看到过的最出色的一个”。

这一刻，成为举世瞩目的时刻。此时正是美国东部标准时间星期日晚上10时30分，收看电视的黄金时间。中美双方精心挑选了这一时间，让美国总统尼克松和中国总理周恩来握手的时刻，出现在大洋两岸数以亿计的电视荧光屏上。

中美关系的冰河，从此解冻。

美国一家电视台在转播这一实况时，还插播了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在北京机场受到身穿彩装的几千名群众欢迎的场面。解说词说：尼克松访华历史事件是分水岭。同北京接待齐奥塞斯库规格相比，对尼克松的接待规格差多了。到机场迎接的官员很少，没有群众，没有儿童献花，没有各国的外交使节。美国记者还说：“除了仪仗队以外，在场的美国人比中国人多。”

欢迎仪式结束后，周恩来和尼克松随后一同进入一辆挂着帘子的防弹高级红旗轿车。

汽车驶进钓鱼台国宾馆后，在18号“元首楼”前停下，周恩来的夫人邓颖超、郭沫若的夫人于立群在此迎候美国客人。

尼克松、基辛格和白宫来的人住进18号楼。国务卿罗杰斯等国

务院人员住6号楼,记者和其他人员住在民族饭店。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中方不安窃听器,也不搞录音。在钓鱼台18号楼的餐厅里特意挂上了一幅毛泽东的诗句:“无限风光在险峰”,寓意深远。

在钓鱼台国宾馆,周恩来与尼克松漫谈了20多分钟,分手时已是中午13时多了。按照原定计划,中美双方将在下午16点30分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全体会议。可是届时周恩来和尼克松都没有露面。随访的美国记者在人民大会堂门前苦等应来参加会谈的尼克松而未果。一向守时的尼克松的“迟到”引起种种猜疑,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评论员对此评论说:“尼克松迟到了。尼克松平时是严格遵守时间的,这次迟到不知是旅途劳顿了呢,还是另有隐情。”还有人猜测说,也许尼克松对机场没有群众欢迎的场面感到不满。

下午17时,中方宣布全体会议推迟至18时开始。可是出人意料的是,17时55分,白宫发言人齐格勒突然宣布:“尼克松总统在到达北京3小时后,与毛泽东主席进行了认真和坦率的会谈。参加会谈的有基辛格博士和周恩来总理。”

这太出乎预料了。虽然事先双方商定的程序表上列有毛泽东会见尼克松这一最重要的会见,但没有确定时间,因为毛泽东正在病中,中国方面无法事先定下毛泽东何时能够会见尼克松。所以,周恩来走后,尼克松吃过午饭,正准备洗个淋浴,基辛格突然闯了进来,气喘吁吁地说:

“总统先生,毛泽东主席想见您。周恩来已经来到楼下。”

原来,下午14时30分,有人来告诉刚刚吃完丰盛的午餐的基辛格:“周总理有急事在会客室等着要见你。”

基辛格赶紧来到会客室,一见面,周恩来不像往常那样先寒暄一番,而是直接对他说:“毛主席想见总统。”并询问美方都有哪些人陪同参加?

这是一次人数受到限制的会见,双方参加人员都不多。基辛格回答说,尼克松总统让基辛格本人陪见,另派洛德去做记录。基辛格提出,希望中方不要告诉国务院的人,特别是洛德参加会见的事不能讲出去,新闻、照片、电视里都不要出现洛德。基辛格的意图十分明显,一是不让美国国务院的人参加,二是怕引起国务院的人不满,只好让

中方为此保密。

基辛格还问周恩来:“今天晚上的祝酒辞是温和的还是不温和的?”

周恩来说:“我待会儿给你看。现在主席等着,我们先过去。”

对于尼克松来说,与毛泽东会谈是早有所准备的,但是没有想到会安排得这么快,他内心充满了难以抑制的喜悦。

尼克松来华的日子,距离毛泽东突然休克的危急日子只有9天,他的健康状况仍然处在极不稳定的状态,随时都有恶化和发生危险的可能。能不能在这种情况下会见尼克松呢?毛泽东表现出惊人的意志力,决定仍会见尼克松,尽管人们当时几乎都不知道他的实际健康状况,外国新闻界盛传中国的最高领导人已经病重,甚至国外还有传言,他已逝世。

美国人显然知道这个接见的分量——1971年10月到1972年2月的近5个月里,毛泽东只在公开场合中出现过4次。

尼克松带上基辛格和洛德匆匆忙忙上车,只带了两个随身警卫。这两个警卫是在出发前一两分钟前才知道此事,当他们匆忙走出门外,看见中国外交部礼宾司唐龙彬正招手让他们上自己坐的车,将他们带往中南海。

这次会见,连美国国务卿罗杰斯等人都毫不知情,更何况那些跟随尼克松而来的大批美国记者。不过也有例外,英国《泰晤士报》和法新社的记者从一大早就派人在中南海外面蹲点,15时多,他们看到一个车队疾驰而入,马上发了第一条新闻。事后,美国记者非常气恼:美国总统的大新闻却不是美国人先发的。

尼克松到达北京前,护士长吴旭君给毛泽东念外电评论,其中朝鲜有一条说:“尼克松是打着白旗到北京来的。”这是说尼克松投降的意思。

毛泽东听完这条消息,笑了。他说:“我来给尼克松解解围。”

2月21日,毛泽东尽管昨晚工作到很晚,但今天却起得很早。他把吴旭君叫到床头,对她说:“希望立刻见到尼克松。”

此事非同小可,十万火急,必须马上准备。

吴旭君首先照顾毛泽东起床,扶他到卧室的沙发上坐好,然后,小

跑着出了屋,赶紧通知张玉凤,因为届时将由张玉凤负责搀扶老人家迎接客人。接着吴旭君又跑去告诉卫士兼理发师周福明,自从月初会见巴基斯坦总统布托以后,基本上卧床的毛泽东就没理过发。另外,周福明还要负责准备会见时的茶水。然后,吴旭君又跑到值班室,通知了毛泽东的贴身警卫李连成,再由他报告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副主任张耀祠和中南海西门门卫。另外还通知了秘书徐业夫。细心的吴旭君还通知了生活管理员吴连登,让他准备点食物,因为她担心老人家会见时有可能出现低血糖。

最后,她跑到因毛泽东病重而常驻中南海游泳池的医疗组,告诉他们即将会见的消息,请大家随时待命。办完这些事情,吴旭君赶回卧室,把老人家扶到会见厅,安排他坐好。自己又到医疗组,再一次检查了医疗器械和急救物品。

中南海内外很快被装饰一新,毛泽东书房里还破例摆满鲜花。理发师不仅为他修整了头发,还仔细地为他刮了脸;护士小张则特意拿出那套灰色的“毛式”中山装,小心翼翼地帮毛泽东换好……一切准备完毕,毛泽东便坐在沙发上,托起一本书,静静地等待着客人的到来。

下午 14 时左右,周恩来在第一时间得到毛泽东决定会见尼克松的消息。他很着急,立即让王海容将礼宾司代司长韩叙叫来,一见面就对他说:“赶快准备,赶快准备。”

一向精明能干的韩叙一时不知准备什么? 见此情况,王海容对韩叙说:“毛主席要马上接见尼克松。”

最后,周恩来做了分工:自己赶往尼克松所在的钓鱼台 18 号楼说明情况,再去游泳池检查会见准备;王海容去中南海游泳池,安排安全保卫及摄影、摄像等工作;另外,安排尼克松尽快前往毛泽东住处。

很快,美国客人就动身了。

中南海游泳池门口,周恩来在此迎候他们,并引领尼克松一行向陈设简单的书房走去。

按照惯例,外宾的警卫人员不能进入毛泽东住处。因此,汪东兴安排尼克松的警卫去怀仁堂休息。该警卫在此无法与仍在钓鱼台的美方警卫主管取得联系,尼克松去往何处,一时间成了空白。美国总统丢了。美国总统警卫主管如雷轰顶,并因此向中方诉苦。

# 第1237回：书如海，基辛格由衷感慨 说哲学，尼克松赞叹万分

尼克松、基辛格曾把斯诺的文章作为访华人员的必读材料，他们自己也都读过，因此，对于“毛酷爱读书”这一点并不陌生。尽管如此，走进毛泽东的书房时，基辛格还是发出了感慨。对美国人而言，这是一间中等大小的房间，四周墙边的书架上、书桌上摆满了古书。基辛格曾描述过：“这房间看上去更像是一位学者的隐居处，而不像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的全能领导人的会客室。”

从毛泽东的书房看不到外面的景色。巨大的窗户都藏在厚厚的大红窗帘之后，书房顶部装有日光灯，沙发旁边还有落地灯。在基辛格看来：落地灯圆形的灯罩大得出奇。此外，房间内的陈设就和屋子的外观一样，简单朴素。

毛泽东的书房

构成灰色主调的是那贴满墙壁的线装书，一排排一层层一摞摞砖

头似的书摆满了环屋的书架,许多书里还夹着白色的纸条,这是读书人留下思考和阅读的记号,乍一看还真像商店货架上的价码标签呢。

除了惊人的书“海”外,基兴格还在他回忆录中写道:“我们第一眼看见的是一排摆成半圆形的沙发,都有棕色的布套。每两张沙发之间有一张铺着白布的V字形茶几,正好填补两张沙发扶手间的三角形空隙。毛泽东身旁的茶几上总堆着书,只剩下一个放茉莉花茶茶杯的地方。”

这是毛泽东第二次使用自己的书房会见国宾。第一次是在20天前,1972年2月1日,病体未愈的毛泽东改在书房会见巴基斯坦总统布托。在此之前,他都是在人民大会堂会见外宾。1972年10月和11月,毛泽东强打精神,在人民大会堂会见埃塞俄比亚皇帝塞拉西一世和越南总理范文同后,再也没能到人民大会堂会见过外宾了。此时的毛泽东几乎大门不出二门不迈,与中南海新华门一步之遥的人民大会堂,在毛泽东政治生涯中已成为“遥远的地方”。

看见周恩来陪同尼克松他们走进书房,坐在沙发上等候的毛泽东在张玉凤的搀扶下站起来,他努力站直了身子,面露微笑地迎接尼克松。毛泽东的身体已不容许自己走到门口迎接客人了。

毛泽东伸出手来,尼克松马上也伸过手去,当两人握手时,毛泽东说:“我说话不大利索了。”

毛泽东握住尼克松的手约一分钟之久。他表示欢迎尼克松总统的到来,尼克松总统也说,他“非常高兴与主席会晤。”

随后,毛泽东又和基辛格握手,并上下打量着,说道:“哦,你就是那个有名的博士基辛格。”

基辛格连忙笑着说:“我很高兴见到主席。”

尼克松说:“你读过很多书。总理说你读的书比他多。”

毛泽东:“昨天你在飞机上给我们出了一个难题。说是我们几个要吹的问题,限于哲学方面。”

尼克松:“我之所以那么说,是因为我读过主席的诗词和讲话,我知道主席是一位思想深刻的哲学家。”

毛泽东手指基辛格说:“他是个哲学博士?”

尼克松:“他是一位思想博士。”

毛泽东:“今天请他做主讲人如何?”

基辛格:“我在哈佛大学教书时,曾指定我的学生研读您的著作。”

毛泽东说:“我写的这些东西算不了什么,没什么可学的。”

尼克松连忙接着毛泽东的话说:“主席的著作推动了一个民族,改变了这个世界。”

毛泽东说:“我没能力改变世界,我顶多改变北京附近的几个地方。我们共同的老朋友,就是说蒋介石委员长,他不赞成。他说我们是共匪。他最近还发表了一篇讲话。你见到啦?”

尼克松:“蒋介石把主席称为共匪。主席怎么称呼蒋介石?”

周恩来:“我们一般称他们为蒋介石集团。在报纸上有时也称他为匪。他们也回敬我们为匪。不管如何,我们是互相对骂罢了。”

毛泽东:“其实,我们跟他做朋友的历史比你跟他做朋友的历史长得多。”

尼克松:“是的,我知道。”

毛泽东:“我们两个不要垄断整个谈话,不让基辛格博士说说不行。”他对基辛格说:“你跑中国已经跑出了名嘛。”

基辛格:“是总统确定方向,决定方案。”

尼克松:“他这么讲,说明他是个绝顶聪明的助手。”

毛泽东和周恩来笑了。毛泽东:“他在夸你,说你这样做很聪明。”

谈到美国的总统竞选时,毛泽东说:“讲老实话,民主党如果再上台,我们也不能不同它打交道。你当选我是投了一票的。”

尼克松说:“我想主席投我一票,是在两个坏东西中间选择好一点的一个。”

毛泽东说:“我是喜欢右派,人家说你们是右派,你们共和党是右派,说英国的希思首相是右派,说西德的基督教民主党也是右派。我是喜欢右派,比较高兴这些右派当政。”

谈了其他许多问题后,尼克松说:“我希望同总理,稍后也和主席讨论台湾、越南和朝鲜问题。我还希望讨论关于日本的未来,次大陆的未来,印度将起到什么作用;还有,讨论美苏关系的未来。因为只有放眼全世界,我们才能对近在眼前和迫切的问题做出正确的决策。”

毛泽东:“所有那些麻烦的问题我不想再深谈。我看你的题目更

好——哲学问题。”

尼克松:“有意思的是世界大多数国家都赞成我们此次会晤,但苏联、印度不赞成,日本表示有疑虑。我们必须研究为什么会这样,同时决定我们应如何发展我们应对世界的政策,而不是诸如朝鲜、越南、台湾这样眼前的问题。”

毛泽东:“对,我赞成。”

尼克松:“比如说,我们必须问自己,苏联为什么向贵国边界部署的兵力比向西欧边界部署的兵力多?日本的未来是什么?我们对此存在分歧,那么,是让日本中立和全无防卫更好?还是让它在一个时期内同美国具有一些关系更好?我现在讲的属于哲学范畴,问题在于,在国际关系领域没有好的选择。有一点可以肯定:我们不能留下真空,因为真空会被填补。例如,总理指出,美国在伸手,苏联在伸手。问题是你们面临何种危险,是美国侵略还是苏联侵略的危险?有困难,但必须讨论。”

毛泽东:“来自美国侵略的问题,或者来自中国侵略,这个问题比较小,也可以说不是大问题,因为现在不存在我们两个国家互相打仗的问题。你们想撤一部分兵回国,我们的兵也不出国。可是我们两家也怪得很,过去22年总是谈不拢,现在的来往从打乒乓球算起只有10个月,如果从你们在华沙提出建议时算起,有两年多了。我们办事也有官僚主义。你们要搞人员往来这些事,要搞点小生意,我们就死也不肯。十几年,说是不解决大问题,小问题就不干,包括我在内。后来发现还是你们对,所以就打乒乓球。”

周恩来:“这也是尼克松总统上台后的事。”

毛泽东:“巴基斯坦前总统把尼克松总统介绍给我们。那时候我们驻巴基斯坦的大使坚决反对跟你往来,他说要比较一下约翰逊总统或尼克松总统哪个更好。但是叶海亚说这两个人没法比。他说一个像土匪——指约翰逊总统。我不知他从哪儿得到那么个印象。我们这方面也不那么高兴那位约翰逊总统。从杜鲁门到约翰逊,我们是都不那么高兴的。这个中间有8年是共和党的总统,那个时候你们也没有想通。”

周恩来:“主要是约翰·福斯特·杜勒斯的政策。”

毛泽东:“之前他和基辛格博士讨论过这事。”

尼克松:“但是他们握了手。我们知道中国并不威胁美国的领土。”

毛泽东:“你有什么话要说的,博士?”

基辛格:“主席先生,世界形势在那个时期也已发生急剧变化。我们学到了很多东西。我们原以为所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国家都千篇一律。直到总统当政,我们才理解中国革命的不同性质,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发展的革命道路。”

尼克松总统:“主席先生,我知道,多年来我对人民共和国所持的立场,是主席和总理完全不同意的。让我们走到一起的原因,是我们对世界新的形势有了一个认识,而我方认识到,重要的不是一个国家的内部政治哲学,重要的是它对世界上其他国家的政策,以及对我们的政策。这就是为什么——这一点我认为可以实话实说——我们存在分歧的原因。总理和基辛格博士讨论过这些分歧。”

毛泽东:“就是啰。”

尼克松:“我还想说的是,审视两个大国,美国与中国。我们知道中国并不威胁美国的领土。”

毛泽东:“也不威胁日本和南朝鲜。”

周恩来说:“任何国家都不威胁。”

尼克松:“我想你们也知道,美国对中国的领土没有企图。我们知道中国不想统治美国。我们相信你们也认识到美国不想统治世界。另外——也许你们不相信,但我相信——无论中国,还是美国,这两个伟大的国家都不想主宰世界。因为我们就这两个问题上持相同态度,我们不威胁彼此的领土。

因此,尽管存在分歧,我们还是能够找到共同的立场,来建立一个双方都可以在自己的道路上按照自己的方式去安全发展的世界构架。对世界上另外一些国家而言,则谈不到这一点。”

这次谈话本来预计只进行 15 分钟,却谈了一个多小时。谈话从 14 时 40 分持续到 15 时 50 分。在此期间,尼克松注意到周恩来在频频地看表,毛泽东向周恩来核对时间:“你看今天我们吹到这里差不多了吧?”

尼克松:“是的。我想在结束时说,主席先生,我们知道你和总理冒了很大风险邀请我们到这里来。这对我们也是一个很困难的决定。但是,我读了主席的一些讲话,知道主席是一个一旦机会来临就能看到的人,也知道你一定要‘只争朝夕’。

就个人而论,我还想说,这也是对你,总理先生你说的,你们并不了解我,因此你们就不信任我。你们将会发现,我从来不说我不能做到的事情。我总是做的比说的多。在此基础上,我希望同主席,当然还有总理,做坦率地谈话。”

毛泽东指着基辛格说:“只争朝夕的是他。我想,大概我像这种人,放大炮的时候多。无非是‘全世界团结起来,打到帝、修、反,建立社会主义’这些话。”

尼克松总统:“就是像我这样的人,还有匪徒。”

毛泽东:“你可能就个人来说,不在打倒之列。”他指着基辛格说:“可能他也不在内。都打倒了,我们就没有朋友了嘛。”

尼克松总统:“主席先生,主席的一生我们是非常熟悉的。你从一个非常贫穷的家庭登上了世界上人口最多、一个伟大的国家的顶峰。

我的背景,不那么为人所知。我也出身于一个很贫穷的家庭,并登上了一个非常伟大的国家的顶峰。历史把我们带到一起。问题是,我们的哲学不同,但我们都脚踏实地,都来自人民,我们可以实现一个突破,这个突破不仅有益于中美两国,也在今后的岁月中有益于全世界。这就是我来到这里的原因。”

毛泽东:“你的书,《六次危机》写得不错。”

听到这话,尼克松对其他人说:“他读的书太多。”

毛泽东说:“太少。我对美国了解不多。我要请你派一些老师来,主要是历史和地理老师。”

尼克松:“好哇,太好了。”

毛泽东:“我对埃德加·斯诺先生就是这么说的,这位记者在几天前去世了。”

尼克松:“真是令人遗憾。”

毛泽东:“是啊,非常遗憾。

我们谈得成也行,不成也行,何必那么僵着呢?一定要谈成?人

们会说话的。如果我们第一次没谈成,那么人们就会议论,为什么我们第一次没谈成?无非是我们的路子走错了。如果第二次我们谈成了,他们怎么说呀?”

在谈话时,洛德的口袋里发出一种奇怪的声响。他把手放进衣服口袋里摆弄了几下,却依然无法使声响停下来,只得无奈地从口袋里把发出声响的东西拿了出来。原来是一个微型录音机。也许是带子到头了,或出了什么故障,所以发出了声响。他本想在口袋中操作,把声响制止住,但没有做到,只好把录音机拿出来,尴尬地当众关上。

会谈结束时,毛泽东幽默地对尼克松说:“我就要去见马克思了,用你们西方人的话来说,就是要去见上帝了。”

尼克松和基辛格一时不知该怎么接这句话。两人商量片刻,尼克松说道:“您不会很快见上帝的,因为,要想同时容纳上帝和毛主席,天堂还不够大。(Heaven is too small for both God and the Chairman)”

毛泽东说:“我什么时候去见上帝,是中国自己的事。你们这是在干涉中国内政喔!”

大家起身结束谈话,毛泽东在工作人员搀扶着,站起来和美国人告别。尼克松握着毛泽东的手说:“我们在一起可以改变世界。”

毛泽东没有回应,只是说:“我就不送你了。”

毛泽东这次会见尼克松,是举世瞩目的大事。由于担心他在谈话中随时有可能再发生险情,周围的人都十分紧张。会见时,医护人员在附近房间里做好了随时抢救的准备。后来周恩来说:“真不容易,70多分钟,主席一声都没咳嗽,忍住了。”

会见结束时,毛泽东已十分疲劳,先在沙发上休息了30分钟,才上床休息。

尼克松后来回忆这次历史性的会见时,生动描写了毛泽东的境况和心态。他说:

“他身体的虚弱是很明显的。我过去时,他要秘书扶他起来。他抱歉地对我说,他已经不能很好地讲话。周后来把这一点说成是患了支气管炎的缘故,不过,我认为这实际是中风造成的后果。他的皮肤没有皱纹,不过灰黄的肤色看上去却几乎像蜡黄色的。它的面部是慈祥的,不过缺乏表情。它的双目是冷漠的,不过还可以发出锐利的目

光。他的双手好像不曾衰老,也不僵硬,而且还很柔软。不过,年岁影响了他的精力。中国人安排我们只会晤十五分钟。毛完全被讨论吸引住了,因而延长到一个小时。我注意到周在频频地看表,因为毛已开始疲乏了。”

同时,尼克松又记下了毛泽东这样的情形:

“毛很活跃,紧紧抓住谈话中的每一个细微含义”,他同时感叹这位“推动了一个民族,改变了整个世界”的伟人,“非凡的幽默感”,仍然有统帅整个中国的气度和魄力。

半个多月以后,聪明过人的基辛格,在其白宫那特具安静的办公室里,细心品位毛泽东和尼克松谈话的纪录稿时,欣然悟出毛泽东在谈话中实际已经勾勒出了上海公报的基本线条。就是说,这位伟人,不仅在思索中国的目前,还在构思中国和中国人民的未来。

对这次谈话,基辛格后来写道:“毛泽东是用一种故意显得很随便的方式来发表他的主要意见的。”“他巧妙地把台湾问题放在一个次要的地位,把它当作中国内部的一个不甚重要的争端;他甚至只字不提美国在台湾的驻军问题。”

会见结束后,总统安全官泰勒找到中央警卫局副局长杨德中说:“今天发生了很意外的情况,我们的总统跟我们失去联系70多分钟。我们不担心总统的安全,我们完全相信中国的保卫措施。不过如果在这个时间里发生战争导致核战争或发生其他的意外情况,总统不了解情况,没法处理。按照美国的法律,总统是任何人不能代替的。”

杨德中说:“这是两国领导人临时决定的,我也不清楚。”

# 第1238回：欢迎宴，美国总统“争朝夕”<br>漫天雪，急动员连夜清扫

2月21日晚，中美举行首次大范围会谈，商讨和宣布了会谈办法和公报形式与内容。会谈结束后不久，晚19时，周恩来举行欢迎尼克松总统宴会。

2月21日，周恩来总理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盛大宴会，欢迎尼克松总统及其夫人一行。

周恩来对此次尼克松访华的重视不言而喻。尼克松夫妇房间的布置周恩来都要亲自过问，而在欢迎晚宴上，甚至播放的歌曲也是周恩来亲自决定的。当时，一般国宴上的音乐都是中国的革命歌曲，这一次，周恩来让下面的人事先做好调查：美国人喜欢什么曲子？尼克松喜欢什么曲子？他最后选择了尼克松最喜欢的《美丽的亚美利加》，这也是尼克松就职时演奏的音乐。

果然，当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在宴会上为客人们演奏《美丽的

阿美利加》音乐一响,尼克松非常高兴。这种热烈的场面通过卫星传递在美国早晨的电视节目中实况转播,在美国引起了很大反响。

周恩来在祝酒时说:“尼克松总统应中国政府的邀请,前来我国访问,使两国领导人有机会直接会晤,谋求两国关系正常化,并就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这是符合中美两国人民愿望的积极行动,这在中美两国关系史上是一个创举。

美国人民是伟大的人民。中国人民是伟大的人民。我们两国人民一向是友好的。由于大家都知道的原因,两国人民之间的来往中断了20多年。现在,经过中美双方的共同努力,友好来往的大门终于打开了。……

“我们希望,通过双方坦率地交换意见,弄清楚彼此之间的分歧,努力寻找共同点,使我们两国的关系能够有一个新的开始。”

但是当天晚上的尼克松还是遇到了一点麻烦,不过这麻烦跟中方无关——美国国务院来的外交官、年仅28岁的傅立民(Chas W. Freeman)拒绝上台翻译他们总统的致辞。

傅立民是在当天晚上才接到尼克松的私人秘书霍尔德里奇打来的电话,通知他说:“总统要你在晚宴上为他的祝酒词做翻译。”

傅立民说可以,但要先给他尼克松总统发言的书面稿。霍尔德里奇答复是没有书面稿,傅立民坚持说肯定有。霍尔德里奇说他再去问问总统,回来后还是告诉傅立民说没有稿子。傅立民只好向霍尔德里奇摊牌说:“这里一定有鬼,因为祝酒词就是我本人起草的。”

傅立民坚持要尼克松的讲话稿,是因为他知道其中加进了一句毛泽东的诗词,他想知道是哪一句,不然上台把毛泽东的诗句翻错了,那就糟糕了。可是总统坚持没有书面稿,于是傅立民就拒绝上台翻译。

尼克松坚称没有书面稿,是因为他的记忆力很好,讲话稿过目不忘,想给外界留下一个即兴演讲而不是照本宣科的印象。他怕傅立民到时候拿出讲稿来对着翻译,那就穿帮了。其实傅立民的记忆力也很好,如果尼克松将实情告诉傅立民,他肯定会好好配合尼克松“演出”的。即便如此,尼克松会告诉他实情吗?

无奈下,美方只好求助于中方翻译。

尼克松在祝酒时说:“过去的一些时期我们曾是敌人。今天我们

有巨大的分歧。使我们走到一起的,是我们有超过这些分歧的共同利益。在我们讨论我们的分歧的时候,我们哪一方都不会在我们的原则上妥协。但是,虽然我们不能弥合我们之间的鸿沟,我们却能够设法搭起一座桥,以便我们能够越过它进行会谈。

“因此,让我们在今后的五天里在一起开始一次长征吧。不是在一起迈步,而是在不同的道路上向同一个目标前进。这个目标就是建立一个和平和正义的世界结构。……

“我们没有理由要成为敌人。我们哪一方都不企图取得对方的领土:我们哪一方都不企图支配对方。我们哪一方都不企图伸出手去统治世界。”

尼克松的讲话里果然有引用了毛泽东的一句诗,他说:“毛主席说过:‘多少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

“现在就是只争朝夕的时候了,是我们两国人民攀登那种可以缔结一个新的、更美好的世界的伟大境界的高峰的时候了。”

傅立民在那天晚宴上很郁闷,他后来被安排给姬鹏飞和罗杰斯当翻译,同桌还有李先念。李先念递给他一支烟。这是傅立民平生第一次抽烟,从那天起,他一抽便是30年。很多年后,傅立民才知道李先念递来的那支很像英国烟味道的香烟,是中国很有名的“熊猫牌”香烟。

尼克松显然对这次来访做了充分准备:在盛大的国宴上,在座的美国人大都不会使用筷子,只好拿着吃西餐的刀叉笨拙地对付中餐,唯独尼克松不同于他人,不紧不慢地用筷子夹取美味佳肴,他那挺像回事的一招一式,吸引了众多记者的镜头。原来,自从访华之事决定之后,尼克松和夫人就开始在家里练习如何用筷子。不仅如此,尼克松还学会了几句简单的中文,比如“你好”,“谢谢”。

宴会结束时,尼克松刚起身离席,加拿大《多伦多环球报》驻北京记者伯恩斯便快步走到尼克松的座位旁,一把将尼克松用过的筷子揣入怀中。有顷,人们才省悟到伯恩斯的灵敏反应。据传后来有人愿出2000美金买那双筷子。

宴会结束。尼克松夫妇走出人民大会堂,到北门外上车。尼克松夫人边走边兴奋地说:“太美了,可不是吗?太好了,可不是吗?确实

如此。”

尼克松总统一行在中国北京的第一天圆满结束了。

但是,基辛格和美国国务院的矛盾却凸现出来了。毛泽东和尼克松在中南海毛泽东书房内的会见,这是中美关系史上的重大事件,也是世界上的一件大事。但是美方陪同会见的人员中,除了基辛格,就只有一个洛德。连国务卿罗杰斯也无份,更不用说尼克松随团来华几百人中的其他官员了。这件事是谁决定的?当时愤愤不平的国务院官员都抱怨基辛格。

毛泽东会见尼克松时,双方人员基本上是对等的。中方只有周恩来在座,王海容做记录,唐闻生做翻译。美方代表团的翻译是傅利民,他是国务院的人,尼克松不但这次会见没有带他去,而且当晚在周恩来举行的欢迎晚宴上,尼克松发表即席讲话时,也是用的中方翻译唐闻生。中方谁出席或不出席都不会引起什么问题,大家的共识是服从组织安排。但美方就不同了。尽管中方在发表会见照片和电视转播时,按美方要求把洛德的镜头盖掉了,发新闻时也没有提到洛德参加,但明眼人一看就会发现,这次会见没有罗杰斯先生的份儿,按职位来说,国务卿不应低于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洛德陪见的事也难于保密。结果是尼克松和基辛格担心的事终于发生了:国务院的人怒不可遏,并把攻击的矛头指向基辛格。

第二天起,由周恩来同尼克松进行会谈,就国际形势和双边关系坦率而又深入地交换意见。

在台湾问题上,美方认可只有一个中国、不支持台湾独立、逐步从台湾撤出美军,但仍存在不同看法。

中方重申,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解放台湾是中国的内政,外国无权干涉。

2 月 23 日、24 日、25 日,中美继续举行三次限制性会谈。

从 2 月 22 日至 27 日,双方重就联合公报内容展开讨论。这次中方由乔冠华副外长主谈,美大司司长章文晋等协助。美方仍由基辛格主谈,只带洛德一人出席,有时也有霍尔德里奇参加。这次会谈涉及余下的各种分歧,包括中方声明中所述“人民要革命”一词,美方坚决不同意;美国声明中所述它对韩国和日本的条约义务问题;关于“双方

都不在亚太地区谋求霸权”的提法问题等等。最关键的分歧是中方要求美国无条件从台湾撤军问题。

公报草案中“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一句,是中方的底牌,争取不改。于是,乔冠华让中方谈判班子的人“集思广益,想想点子”。外交部业务组的王立因整理过尼克松的历次讲话,记得他多次讲到“革命”一词,很快就整理了一份关于尼克松讲到“革命”的语录材料,供乔冠华选用。

2 月 23 日,乔冠华在与基辛格讨论公报时,大量引用了尼克松在何时何地讲到支持“革命”的话,包括尼克松 1967 年 10 月 23 日说“在亚洲大部分地区的变化是革命的”,及 1971 年 1 月 3 日讲的:近年出现了“新的美国革命”等等。他质问:为什么你们的总统多次可以讲“革命”,中方在自己的单方声明中就不能讲这个词?再说,你们美国也是从革命中诞生的,中国也是革命胜利后立国的,我们都是革命的后代,关于“人民要革命”,我在联合国已经公开讲过了,为何现在不让讲?一席话说得对方无言以对,只好说:“把革命一词放进去吧”。

关于台湾问题,从中方的立场看,未在公报内提废除美台《共同防御条约》,只提要求美国从台湾撤军,已经是对美方的照顾和妥协;但美方强调公开宣布撤军将引起国内右派亲台势力的强烈反对。因此双方就此问题一直争论到最后一天。

2 月 23 日的限制性会谈在钓鱼台国宾馆 18 号楼进行。周恩来的车到达时,尼克松、罗杰斯、基辛格都站在楼门口迎候。

握手之后,尼克松亲自为周恩来脱掉呢子大衣。这个镜头,也被美国的电视记者拍下来传回国内播放。美国的报纸称:“在美国民众对周恩来表示极大好感时,尼克松为周恩来脱大衣,等于发表一篇极为动人的竞选演说。”

1972 年 2 月 23 日，北京，尼克松总统帮周恩来总理脱下外套

会谈后，晚 20 时，周恩来陪同尼克松一行在首都体育馆，观看了由国家体委组织的体育表演。就在看表演的时候，外面纷纷扬扬飘起了雪花，而且越来越大。这让中方的接待人员很揪心。按照计划，尼克松第二天的行程是去长城、定陵。虽然 25 日是机动的，但此时在《上海公报》的问题上，中美双方分歧还很大，还要留一天讨论，留给尼克松的只有 24 日了。此间，中方接待人员都知道，尼克松夫妇“最看重的是长城”，就是说，此次中国之行，长城，是尼克松夫妇一定要去的。

周恩来陪尼克松看体育表演，没有一点焦急的样子，神色如常。21 时 30 分左右，他出去打了一个电话，然后又一脸平静地回来继续看演出。待表演结束，从首都体育馆出来时，沿途已经有或扛着锹或拿着扫帚的军人和老百姓在扫雪。

第二天一大早，尼克松夫妇很惊讶地发现，昨天夜里厚厚的大雪骤然“消失”了，而路边堆着高高的雪堆。尼克松夫妇仍然按原计划向长城出发。

原来，头天晚上，晚会一结束，吴忠、杨德中、刘传新带着负责安全的部分人员，就赴长城等参观点去做实地勘察。雪确实下得很大，沿途积雪很厚，特别是从南口到八达岭一段，由于山路崎岖，更加危险。

回城后，他们紧急动员了几十部洒水车，连夜对次日游览要经过

的路面,进行喷洒盐水和清理工作。同时还安排人力,对登长城的步行道上的积雪,也进行了清扫。2 月 24 日出发前,有关人员又对所有驾驶人员,做了绝对保证安全行车的动员。

24 日上午 8 时,参观游览的车队出钓鱼台国宾馆北门,按照预定的路线奔八达岭而去。

# 第1239回：游长城，尼克松自称“好汉”到沪杭，《公报》稿基本就绪

叶剑英陪同尼克松登上长城。八达岭一片银装素裹。尼克松站在长城上赞叹着说：“这的确是一座伟大的建筑、人类的奇迹。”又说：“我们今天到了长城，成为主席说的‘好汉’了。但是，今天是爬不到顶峰了。”

叶剑英笑着说：“我们不是已经在北京进行着顶峰会谈嘛！”

1972年2月21日，尼克松登上长城，笑言自己从此就是“好汉”了

尼克松夫人帕特听了，笑着说：“为什么毛主席写诗只讲‘好汉’，不讲‘好女’呢？我们妇女不是也到了长城吗？”

尼克松和叶剑英听了都哈哈大笑。

那一天去长城的气氛格外热烈。此时，记者们也围了上来。意犹未尽的尼克松，即兴对记者讲了一番话。

为了这次来华访问，尼克松专门阅读了毛泽东的大量诗词和部分

哲学著作,此刻他踞高远瞩,感触颇多,讲到长城反映的中国历史,说长城是中国人民的伟大的建筑,他希望全世界的人都到长城来看看,了解了解中国,了解了解中国人民,也建立友好的关系。他还联系中美两国关系,说了一些含有政治寓意、哲理性的话。

这群“第一线”的记者们,推选合众国际社采访白宫新闻老资格女记者海伦.托马斯,代表大家以最快速度发出报道。她随即请求中国外交部新闻司记者处的陪同人员江承宗,想办法找到一部电话,以便打电话到民族饭店新闻中心做口述报道,再经由卫星地面站把报道转发出去。

此时江承宗到哪里找电话呀,那时也没有手机,他就劝她别着急,先等等。到第二站十三陵后,尼克松他们去地下宫殿参观,江承宗就带着托马斯到陵园管理处的办公区里找电话,还真在一栋小房子里看到一部电话。他们赶紧过去,结果被门口站岗的一名解放军战士拦住,不让进。

江承宗跟那位解放军解释,他是外交部的,那位是美国的记者,她要打一个电话告诉市里,去发报道。

解放军战士很有礼貌的说:“对不起,不能让你用这个电话。”

江承宗说:“没有人用啊?不会影响你执勤任务的。”

那位战士坚持说:“不行,我接到上级的死命令,这个电话只能让安全保卫的人用,别人一概不许用,没有办法。”

江承宗再三请求无济于事,情急之下,他找到了中央警卫团的政委杨德中来帮他说情。

那位执勤战士看看杨德中,说:“对不起,我不认识你,我是死命令,我不能让别人用。”

海伦.托马斯那个急呀,杨德中说:“放心,放心。”他又亲自去到了负责警卫的这个战士的连长,把连长找来,连长下了命令后才让海伦.托马斯这位外国记者用了这个电话,发出了这个报道。

尼克松夫妇登长城那天,零下好几度的天气,路边却有一些“村民”在下棋。当尼克松夫妇手挽着手经过的时候,“下棋人”仍低头下棋,对总统夫妇驾到无动于衷。尼克松说了一句:“这是做给我们看的。”

在场还有许多孩子穿着毛衣玩耍,天气十分寒冷,那些外国记者奇怪这些中国孩子怎么这么耐寒。等到他们上车后,看到那些孩子也都纷纷上了公共汽车。记者们说:“原来是做给我们看的。”

情况报给周恩来,他很生气:“这是谁安排的?”后来在与尼克松会面时,他很坦率地说:“我们有些做法比较虚假,是形式主义。”

1972 年 2 月 25 日,基辛格和洛德商量后,提出了如下的美方声明:“……它重申它对中国人自己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关心,基于这一前提,美国展望它将从台湾逐步减少,并最终撤出全部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

乔冠华副外长与中方官员略做商议后,对此做出了敏捷的反应。他说,“前提”的说法太重,而“展望”的说法又太轻,必须找到把“前提”减轻和“展望”加重的词句才行。乔冠华建议将“展望”改为“预期”一词。接着章文晋司长提出可将“前提”改为“前景”。洛德听到后马上点头示意可以接受。这时基辛格开玩笑说:“我们的洛德先生已经站到中国一边了。”于是大家哈哈一笑。基辛格表示接受这种提法,一个难题终于解决了。

尽管双方大部分时间唇枪舌剑,争论激烈,但有时会场也传出一阵笑声,这多半是基辛格又说了一句什么俏皮话。

有一次,在公报谈判处于僵局时,基辛格突然说起他 1971 年 7 月第一次访华时把衬衫丢在巴基斯坦旅馆的事情。他话锋一转,又说“我这次访华,可能是次外交灾难”,因为美国有句话,“丢掉背上的衬衫”,意思就是指某人“输得精光”。大家听了哈哈一笑。其实他的玩笑是有用意的,就是抱怨中方在公报稿上逼得太紧。

这时洛德出来打圆场说,“你不会输的,因为你的衬衫是借来的,是别人的,输不到自己头上”。

这又引起一阵哄笑。

基辛格又挖苦洛德说,“洛德先生这次随尼克松总统访华,把头发都剪短了,以便给中方一个好印象”。其实这是一句反话,因为在美国代表团中,洛德的头发是最长的。

直到 2 月 25 日下午,周恩来同基辛格举行会谈,中美联合公报稿中有关措词还没有确定下来。

这时,周恩来告诉基辛格:反正双方观点已经接近,我们也报告了毛主席,但还要设法用双方都能接受的最佳措词表达。

基辛格又提出将公报稿中“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的最后一句改为“人民要进步”。周恩来认为还是用原来的提法好,因为这一段讲的是中方的立场。基辛格没再坚持。

事后,周恩来解释说:“我们本来也想让一步,因为我国宪法里也有人类进步的说法。但把公报初稿送到主席那里,主席说:还是恢复‘革命’这个词。”

2 月 25 日晚,尼克松总统和夫人举行答谢宴会。尼克松在向他的东道主敬酒时说:“长城令我们想到,在几乎一代人的时间里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之间有一堵墙。在过去四天里,我们开始了拆除这堵墙的漫长过程。”

2 月 26 日凌晨 2 时,中美联合公报的全部文本基本落实,基辛格、乔冠华总算松了一口气,现在就等着公布了。

在北京,中方为美方每个房间都提供了北京果脯、巧克力等糖果,服务员第二天打扫房间,发现糖果盒空了;于是再放两碟,又没了。后来一个服务员整理房间时,偶然看到一位随行人员没盖上的行李箱中,下面一层全部是糖果。原来他们因为工作太紧张了,很多人根本没时间去街上买纪念品,眼看就要离开中国了,回去总要对亲友有个交代,周恩来知道后,决定在他们离开上海时,每人加送 10 斤糖果。

在连续几天的中美会谈期间,周恩来每天深夜或次日凌晨都要去毛泽东那里汇报情况,交换意见,往往一谈就是一两个钟头。正如周恩来后来所肯定的基辛格的说法:“中国总理的每一个步骤都是向毛主席报告的,等于毛主席参加了会谈。”

毛泽东的护士长吴旭君也说:“这段时间里,周总理经常带着王海容、唐闻生一起频繁出入中南海游泳池毛主席的住地,除了向毛汇报当天的情况外,还要磋商下次谈判的对策。那时,周和毛一样睡得很少,可是周仍然显得精神抖擞。我经常看到总理在前面大步流星地走,王、唐两人紧跟在他身后一路小跑。此情此景真使人感觉振奋。”

2 月 26 日上午,周恩来同尼克松在机场休息室举行第二次大范围会谈。接着,他们同乘中国的伊尔—18 涡轮螺旋桨专机,前往杭州。

就在尼克松总统一行前往杭州的飞机上,美国国务卿罗杰斯和格林助理国务卿看完刚打印出来的公报文本,大为不满。这固然有对公报本身的观点分歧,但更主要的是由白宫与国务院越来越深的矛盾引发的。国务院对尼克松、基辛格背着自己谋求中美关系正常化本来就有意见。这次对未让其参加公报起草小组也一直耿耿于怀。

到了杭州,尼克松被安排在刘庄,周恩来住在西泠。根据预先日程安排,下午是游西湖,周恩来和尼克松在花港观鱼景点会合。

由于工作人员没有领会好意图,周恩来的随行人员在花港观鱼的景点一直等到过了汇合的时间,仍不见尼克松一行的身影。现场保卫人员一阵紧张,周恩来也怕出什么意外,连忙吩咐有关人员立即联络寻找。

原来此时,尼克松一行就在距汇合点不远处的一片草坪上等候,他们也是准时到达的。负责外宾警卫的工作人员此时也在心里嘀咕:“一向守时的周总理,怎么没能按时出现在汇合地点?”

两边的人终于联络上了,但游西湖的活动却因此而稍有耽搁。

刚到杭州,罗杰斯就找到尼克松,对基辛格与中国商定的《中美联合公报》提出意见,并交给尼克松一份国务院工作人员认为公报应该加以修改的地方的清单,竟有 15 条之多。

尼克松接过那份清单,立即嘱咐罗杰斯国务卿,意见可以提,但回国后不得自行其是。他不想把白宫与国务院的关系搞得太僵。

21 日晚,拒绝为尼克松翻译祝酒辞的傅立民,在当时尼克松怒气冲冲的眼神下,觉得自己的外交生涯肯定就此结束了。但出乎他的意料,到了杭州,尼克松专门为这件事向他道歉。

在晚宴之前,尼克松把基辛格找来商量:“我已批准了公报,毛泽东也批准了,我们却又要单方面提出修改,中国人将会怎样看我这个总统?”尼克松近乎嚷了起来。

“再说时间也来不及了,全世界都在等着明天在上海发表公报呢。”基辛格忿忿地说道。

尼克松不停地来回走着,他处于两难之中。

基辛格当然理解尼克松的处境,于是建议说:“总统,您看是不是晚饭后由我再找乔冠华先生谈谈,能否在部分内容上满足国务院的

要求?”

尼克松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转过身对基辛格说:“亨利,看来也只能这样了。宴会之后你再去找乔先生谈谈吧!”

乔冠华听了基辛格的话后严肃地说:“博士先生,修改公报之事我做不了主,必须请示周总理。”说完就走出房间。

周恩来听完乔冠华的汇报后,点了一支烟,吸了一口,然后又将烟放在烟灰缸上,说道:“你说说你的看法。”

“美国人内部看法不一致,又要我们作让步,我们不能答应。他们自己内部有矛盾,就让他们自己去解决吧!”乔冠华大胆说出了自己的意见。

周恩来对美国代表团内部的动向十分关注,对国务院官员与白宫的矛盾早已看在眼里,记在心上。但此事非同儿戏,他立即向北京毛泽东汇报了情况,然后对乔冠华说:“主席指示说,除了台湾部分我们不能同意修改外,其他部分可以商量。主席特别强调,任何要修改台湾部分的企图都会影响明天发表公报的可能性。”

乔冠华得到指示后又回来和基辛格磋商,同意对公报中除台湾部分以外的大多数文字进行修改。凌晨2时,另一个“最后”公报草案终于完成了,并再次提交双方首脑正式批准。清晨,双方首脑批准认可。

27日,周恩来陪尼克松一行到上海。

一到上海锦江饭店,周恩来就去拜访住在13楼的罗杰斯国务卿,正好格林和傅利民等都在那里议论纷纷,他们对尼克松住15层总统套间没有意见,但对基辛格住14层不满。

周恩来一见面,就对他们说:这次中美两国打开大门,是得到罗杰斯先生主持的国务院大力支持的,几年来国务院做了大量工作,“我记得当中国邀请贵国乒乓球队访华时,贵国驻日大使馆开了绿灯……”一席话说得这些面有愠色的美国人开始笑逐颜开。

周恩来还对安排他们住13层(西方人忌讳的数字)表示抱歉,说这是中方人员的疏忽。说到这里,他还讲了不怕鬼的寓言,使气氛更加活跃了。更令他们高兴的是,周恩来当场答应赠送一部中国《二十四史》及《鲁迅全集》给国务院,另一套送白宫。周恩来还把章士钊先生新出版的《柳文指要》赠送美方翻译傅利民先生。这些国务院官员

一再感谢周总理,并表示今后愿致力发展中美关系。

周恩来为什么想到送美国人《二十四史》和《鲁迅全集》等书呢?这是有原因的。当尼克松在北京时,不喜欢用国务院的翻译傅利民,也不要国务院官员出席重要活动,他们闲来无事就到北京逛书店,想买《二十四史》等书,但没有找到。周总理把这些小事与国务院和白宫的矛盾联系起来考虑,所以决定买这些书,一份送国务院,一份送白宫,使两家皆大欢喜。

这天中午,基辛格和乔冠华又在上海花了两个半小时再次检查了新完成的文本。

# 第1240回：送熊猫，中国外交新局面 为吃药，江青那里又出事

2月27日，中美双方终于就《联合公报》达成协议。双方在中外记者招待会上公布中美《联合公报》内容。

在中美双方签订《联合公报》后，举行记者招待会前，周恩来特地把负责尼克松访华新闻接待的新华社副总编辑彭迪叫去，将最后签字的文件交给他，同时提醒他说：

“中美之间有时差，新华社发表时一定要注意时间，绝对要和美国同时发表。”

在当晚为尼克松举办的送别宴会上，中方在每人面前摆放了一盒“熊猫”牌香烟，香烟盒上憨态可掬的大熊猫立即引起了尼克松夫人帕特的注意。她拿起香烟盒，连声赞叹：“真是太精美了！我太喜欢大熊猫了！”

坐在旁边的周恩来指着画有熊猫的烟盒对尼克松夫人说：“我想送给你这个。”

“送我什么？香烟吗？”尼克松夫人一时有点摸不着头脑。

“不，不是香烟。我要送你们两只熊猫。”周恩来解释说。

帕特里夏·尼克松惊喜万分，对尼克松说：“理查德，周恩来总理说送给我们两只熊猫，真的熊猫！”

尼克松也一副惊喜的表情。尼克松马上召集身旁的基辛格等人，一起举杯庆祝。同在宴会厅里的记者看到这边发生了“骚动”，马上聚过来打探，然后饭也顾不上吃，匆匆赶回去发稿。有一位记者可能被绊了一下，摔了一跤，还没等服务员过去扶他起来，他已经爬起来又往外跑。

两个月后，中国的一对大熊猫定居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国家动物园，成为尼克松带回去的又一件大礼，也成了中美两国友好的特殊纪念。

尼克松决定,把两头麝香牛给中国作为回赠。

周恩来看似随意的话,其实背后早有一番深思熟虑。尼克松到达当天,送了中国一对别致的“瓷塑天鹅”作礼物,它是美国著名生物学家、陶瓷艺术大师波姆辞世之作,目前世界上仅存两件。中方在筹备自己的国礼时,也费了一番脑筋。在尼克松夫人参观北京动物园熊猫馆的时候,左照相,右照相,说要是美国有这样一对熊猫多好啊。其实当时中方已心里有数,考虑送熊猫了。但是中方并没有马上把这个决定透露给美方,直到所有的问题都谈妥了,周恩来才在送别的宴会上,传递了这一信息。

2 月 28 日,周恩来同尼克松在上锦江饭店举行第五次限制性会谈。

当天,中美《联合公报》正式发表。在《联合公报》中,美国表明对“一个中国”的原则不持异议,同意从台湾和台湾海峡撤出美国的军事力量,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与中国和平共处。《联合公报》既陈述了中美双方的共同点,也用各自分别表述的方式将彼此的分歧讲得明明白白,创造了世界外交文书的新风格。

2 月 28 日,尼克松满意地离华返美。第二天,周恩来也从上海飞回北京。毛泽东指示:“安排 5000 人到机场迎接周总理。”

离开上海的前一天晚上,周恩来告诉新闻组成员:“和你们一起聚聚吧。”大家看了场电影。新华社副总编辑彭迪的夫人钱行告诉周恩来,一个美国记者在文章中说:尼克松来居然达成协议,美国做了让步,所以在外交战上,这个回合中国以 21∶2(21 分是乒乓球比赛的分制)战胜了美国。周恩来先是笑了一下,问是哪个记者,钱行做了回答。

第二天,彭迪夫妇和周恩来坐同一架飞机回北京。飞机上,周恩来特地从前舱走过来,对彭迪等人说:“你们听着,千万不能按那篇报道的调子写,你们记住了吗?”他对负责新闻的工作组成员,一个一个地叮嘱。因为,周恩来知道尼克松是顶着极大压力来的,美国国内反对声音很强烈,如果中国国内报道也是这样的调子,那更会陷尼克松于不利。

到了北京,周恩来从机场直驱中南海,向毛泽东汇报说:“尼克松

高兴地走了。他说他这一周改变了世界。”

毛泽东说:“哦?是他改变了世界?哈哈,我看还是世界改变了他!”

中美《联合公报》在世界发生的影响很大。1954 年中英建立的代办级外交关系在1972 年3 月升格为大使级。接着,中国同荷兰的外交关系也升为大使级,中国同希腊建交。随之而来的是,当年 9 月下旬日本首相田中角荣的访华和中日建交,接着是中国同联邦德国、澳大利亚建交。这一年,中国同 18 个国家建交或提升外交关系级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同外国建交最多的一年。

3 月 1 日,毛泽东听取周恩来关于中美会谈情况的汇报。随后,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听取周恩来关于中美会谈情况的汇报。

3 月 3 日,周恩来在中央国家机关有关单位负责人会议上宣读中美《联合公报》。他说:“尼克松上台后,情况有变化,事物前进了,这就要求解们要在原则性基础上有灵活性。没有灵活性,就不能推进国际和平的实现。”

“此次中美高级会晤,第一,双方没有密约;第二,我们坚持原则;第三,谈不上那一方胜利。将来,要用实践证明《联合公报》是否有效。”

3 月 4 日,周恩来飞往河内,向越南党政领导人通报尼克松访华情况。

3 月 5 日,周恩来送审外交部关于中美联合公报向驻外使领馆等的通报稿。

通报稿中写道:“美国总统尼克松的访华和中美联合公报的发表,在美国引起了强烈反响,在国际上震动也很大。总的说来,对公报的反映是积极的,大都认为这标志着中美关系有一个新的开始,国际形势将发生重大变化。这是国际关系中的一个转折,其影响是十分深远的。但同时也必须看到,这些协议还是纸面上的,能否实现还要看美国今后的实际行动。今后事态发展还会有曲折反复,我们必须有所准备。对外表态时要谨慎从事,说话不要过头,特别是不宜由我正面宣传联合公报是我们的胜利,美国的失败。同美驻外官方人员的接触,我不主动,也不回避,应掌握不冷不热、不亢不卑的精神,注意礼貌、落

落大方。”

3 月 7 日至 9 日,周恩来前往平壤同金日成会谈,通报尼克松访华情况。

3 月 13 日,中英两国关于互换大使的联合公报签字公布。两国之间自 1954 年起建立的代办级外交关系升格为大使级。

接着,中国同荷兰、希腊、联邦德国等国家相继正式建交或实现外交关系升格。中国同西方国家的关系出现重大变化。

3 月 5 日晚上 19 时许,江青要秘书通知周恩来、叶剑英、纪登奎、汪东兴以及张春桥、姚文元马上到钓鱼台 17 楼“议事”,说出了大事情。

待周恩来、叶剑英、汪东兴到达时,江青正在纪登奎、张春桥、姚文元面前大发雷霆,指责她身边的工作人员要毒害她。她要纪登奎找护士赵柳恩谈话,要赵柳恩坦白交代“后台”。

周恩来一进门就劝说:“江青同志,有什么事慢慢说,不要激动。我们都来了,有事能讲清楚。”

江青大声地对周恩来说:“不是我说,而是要审判罪犯!我已经要纪登奎找赵柳恩交代罪行,交代同伙,还有她的‘后台’。”

这时,从会议室可以听到隔壁房间传来哭泣声。

周恩来对大家说:“先把情况搞清楚,我看先由汪东兴主任去找小赵谈谈,要她详细说说事情的经过。”

叶剑英表示同意:“我看也是,先由汪主任找小赵谈谈,了解一下事情的经过,再‘审’也不迟。”

汪东兴说:“现在纪登奎正和小赵谈着,还是看他谈的结果如何?需要时我再去谈。”

一会儿,纪登奎回到会议室,他对大家说:“小赵边哭边说,都是按常规准备的安眠药,没有犯什么罪。”

江青听后大叫起来:“这个小东西想耍赖,要她坦白交代。”

周恩来说:“还是由汪主任去谈好一些,要小赵冷静下来,认真地谈清事实。”

赵柳恩见到汪东兴,满脸泪痕,伤心地说:“汪主任,你还要我谈什么呀?刚才我已经向纪登奎同志都谈过了。”

汪东兴劝小赵不要哭了,冷静下来,把这次用安眠药的经过,详细说说。

赵柳恩抽噎地对汪东兴说:“江青同志用的安眠药是按医生的嘱咐准备的。每天睡觉前安眠药分三次服用:晚饭时服一次,临睡前服一次,万一睡不着再服备用药一次。昨晚她没有睡好,把备用药服了。她起床至中午饭后都没有事,到晚上快7点了,不知从何想起,说有人要毒害她。不一会儿,就说我毒害她。还说有‘后台’支持,大发脾气。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

汪东兴听完小赵的话,没有多问,回到会议室,向周恩来等人把小赵的话如实汇报了。

江青立时跳了起来:“小赵不老实,想逃避罪责,不要再谈了,马上进行审问。”

周恩来说:“还是用集体谈话的方式好。”

江青指着护士赵柳恩、秘书杨银禄、警卫周金铭大声说:“他们3人串通起来毒害我,对犯罪的人应当审问,不叫谈话。”

叶剑英说:“今晚在座的是7位政治局委员,还是谈话妥当,首先让他们讲清情况。”

汪东兴表示:“同意周总理、叶帅的意见,不能用审问的说法,还是集体谈话为宜。”

纪登奎也说:“用谈话的方式吧。”

张春桥、姚文元也同意用谈话方式。

江青只好同意大家意见,但又说:“你们都一致要谈话,那就要赵柳恩、杨银禄、周金铭站在我们的对面答话。”

这时,到了周恩来服药的时间,他的保健医生张佐良让服务员进会议室送开水的时候,顺便把药带进去。不料服务员却对他说:“我要去准备夜餐,你自己送进去吧!”

张佐良只好自己手里举着小药瓶,轻轻地开门进去。当他走近会议桌时,江青突然问他:“你不是跟总理来的张大夫吗?”

张佐良回答:“是的。”

“正好,你是个医生,懂得安眠药,你就坐在这儿听听吧!”

张佐良只好把药递给周恩来服下,然后在后排找了个位子坐下。

由于心里紧张,不一会,冷汗就把内衣湿透了。

周恩来吃完了药,用手指着对面的椅子对赵柳恩他们3人说:“你们坐下来谈,不要紧张,主要说说出事的经过。”

江青的秘书杨银禄、警卫周金铭、护士赵柳恩坐在那里一声不吭。许久,会议室里没人说话。

江青按捺不住,又大声喊起来:“你们要坦白交代罪行,交代你们怎么合伙毒害我!谁是你们的‘后台’?坦白从宽处理,不坦白从严处理!”

周恩来对江青劝说道说:“别着急,冷静些,还是让他们3人先讲讲。”

赵柳恩说:“刚才纪政委和汪主任同我个别谈过了,我是按常规准备的药。”

江青不依不饶:“你说,谁叫你给我多服一次剂量大的毒药?你们3个事先商量过没有?”

赵柳恩抬起头,以抗争的口吻激愤地说:“我没有毒害你,我是按常规准备的药。我每次都多准备一次药,怕你万一睡不着,可以再服一次,而且每次的剂量都一样。我也没有同杨银禄、周金铭商量过。”

见赵柳恩顶撞自己,江青气的拍着茶几跳了起来,朝门外使劲喊道:“来人哪!”

门外进来一名军人,站在一旁。

江青命令道:“你把她的领章、帽徽给我摘下来!”

“别动!”就在这一瞬间,周恩来大声喝住了军人的行动,挥手让他退出去,并对张佐良医生说:“这里没有你的事,快出去!”

周恩来这时也站起身来,朝坐在他右侧的江青大声地说:“江青同志,你不要这样激动嘛!事情还没有搞清楚,你怎么能这样!”

江青不说话了。

沉静了一会儿,周恩来又说:“杨银禄、周金铭你们两个讲一讲。”

杨银禄慢慢地说:“我作为党支部书记,工作上有缺点我负责任,但绝没有商量毒害江青同志的事,请组织上调查清楚。”

周金铭也争辩地说:“我是组织上派来的警卫人员,负有保卫江青同志安全的责任,哪能商量毒害江青同志?这是绝对没有的事,请领

导查明。”

江青仍不甘罢休:“你们不交代罪行,反而说是保卫我的,没有商量毒害我,那么,安眠药是谁放进来的?看来你们是不敢交代‘后台’,送公安部审问。”

周恩来见事已至此,便说:“时间不早了,已经12点多了,今天就到这里吧!让他们回去想一想。”

江青不同意,大声说:“不行,要叫他们作检讨!”接着,她突然又转换话题说:“为什么总理那里的大夫、护士都那么好,为什么不给我派好的?小许就很好。”

小许是周恩来的护士许奉生。周恩来离开会议室,走进电话间。卫士高振普跟在身边。周恩来问:“小许在哪里?”

高振普答:“她在西花厅。”

周恩来对高振普说:“是江青同志要找小许,你马上把小许接来。”

说完他又进了会议室。

许奉生接到高振普的电话,很紧张地问他:“总理怎么了?”

高振普说:“总理没什么。”

“那你半夜里来电话干什么?”

“有人看上你了,要你到她那里工作。”

小许未在意,以为是高振普同她开玩笑。当高振普说:“我真的不是开玩笑,是总理要我打电话叫你的,车子快到了,你马上来吧。”她这才断定是真的,马上哭了,从电话里传来了“不去,不干!”的声音。

高振普说:“那怎么行呢?你先来吧!总理在这里等着呢。”

约10多分钟,小许来到钓鱼台17号楼,只见她手里提个小包,低着头,进了楼。高振普看到她的眼圈已哭红了,顿时紧张起来,这怎么行呢?他给小许出了个主意:先到洗手间用冷水洗把脸,然后再进去。

高振普拉开会议室的门送她进了会场,随手轻轻地关上门,仍退守在外面。约两、三分钟后,会议室的门开了,是小许。她笑了,笑得很开心。

高振普走过去问她:“怎么啦?”

她边笑边说:“她不要我了,说我太紧张,手那么凉,一拉手吓了她一跳。”

高振普说:“那你快走。”小许飞快的上了汽车回西花厅了。

原来是凉水洗脸起的作用。

事情应该结束了吧?江青又出题目:“叶剑英不能走!还有颐和园军代表的问题。他们不可靠,要把他们抓起来。”她提出,这个房间空气不好了,换到礼堂东会议室继续开。

于是,7 个人先后向东会议室走去。叶剑英、汪东兴走在最后。叶剑英对汪东兴说:“又出新招!”

汪东兴:“情况不明,不好说话。”

叶剑英:“确实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情况,无法表态。”

进入东会议室,6 个人坐在一张长形会议桌旁,准备听江青讲颐和园军代表是什么问题。

江青坐在另一张小四方桌旁,桌上摆着为她准备的夜餐。

服务员进来报告周恩来,说夜餐准备好了。周恩来吩咐:“送进来吧。”

每人一碗挂面,一盘小菜。只有叶剑英不吃。

周恩来问他:“已经凌晨一点多了,还不饿吗?”

叶剑英说:“不饿,就是想睡觉。”

江青边吃边对叶剑英说:“你要休息,把问题解决了,可以先走。”

接着她说了“颐和园军代表问题”:“前几天,我到颐和园走走,园内的军代表对我进行刁难,限制老娘的行动。我看他们不像军代表,像便衣侦探。”

叶剑英说:“我对情况还不了解,待我把情况了解清楚以后再说吧!”

周恩来一听,随口说:“这件事情让有关单位调查处理吧。今天大家都累了,回去休息吧!”

散会以后,当走到 17 楼东门口时,叶剑英叫住周恩来和汪东兴,进入走廊南侧的一个房间。叶剑英说:“今天我们又中江青的计了,但我们没上她的圈套。她的矛头是对着汪主任和我的。她诬陷身边的工作人员,又诬陷颐和园的军代表。今晚我们顶过去了,但她还会无事生非。我们应该把今天发生的事向毛主席汇报。”

周恩来说:“事情来得突然,我们没有精神准备,但也没有匆忙表

态。向主席讲讲是必要的。我看这件事就由汪主任去报告吧!”

汪东兴说:“找个机会,我们三个人一起去好,我一个人怕说不完全。”

几天后,周恩来陪同毛泽东接见外宾,汪东兴在外屋。周恩来问汪东兴:“谈了没有?”

汪东兴说:“没有谈。如果主席今天精神好,我们一起跟主席谈。”

结果周恩来陪外宾回钓鱼台继续谈判,没有谈成。

过了几天,汪东兴见毛泽东饭后精神很好,就向他报告了这件事。

毛泽东听完后,批评了江青,表扬汪东兴他们顶得好。

汪东兴将毛泽东的话转告周恩来和叶剑英。

# 第1241回：看宁夏，西海固回民叛乱 张国华，心脏病逝世成都

宁夏固原地区，也称西海固地区，包括西吉、海原、固原、隆德、泾原五个县，是回民聚集居住区，占人口总数42.8%，个别县如泾原县回族占到97%。这里自然环境极其恶劣，1972年曾被联合国评为不适合人类居住地区。

由于解放后一些地区将群众正常的宗教活动视为“封建迷信”和“阶级斗争新动向”而严厉禁止，这里发生了几次“叛乱”。文革期间，1968年6月19日，海原县灰条沟附近几个村子的二、三百人在灰条沟举行伊斯兰教的“尔麦里”(amal)仪式时，突然被全副武装的县武装人员包围。原来是革委会命令他们到红羊公社灰条沟抓“坏头头”马生祥阿訇。武装人员先是对空开枪，然后下车在人群里搜查马生祥，没有找到，就要把马生祥的弟弟马生录带走。教民挡住不让带走，县里来的人开枪，当场打死3人，打伤1人。在场支左的解放军高喊：“不能开枪！”未能阻止。这年8月，马生祥被捕。海原县革委会把附近村庄的阿訇当作反革命阴谋暴乱的首犯，先后逮捕了十余名阿訇和乡老。固原县阿訇杨如德被指为反革命阴谋暴乱的首犯，与马生祥阿訇、田成仁阿訇、安克明阿訇等7人在1970年4月29日被判处死刑。

1970年3月，西吉县回族群众要求过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诞辰纪念日的节日——圣纪节，开放清真寺，进行宗教活动，也被确定为“预谋反革命叛乱案”。

1970年7月14日，宁夏自治区革委会发出《关于大力发展养猪事业的指示》，鼓励回民养猪。

1971年国庆节后的一天，公安部核心小组会上，时任公安部党的核心小组组长、革委会主任的李震传达国务院指示：“农林部的杨立功同志去了宁夏西海固地区，回来向中央汇报：西海固地区群众生活困难，发生过多次叛乱，一批批的‘匪属’产生，使一些生产大队发展党员

没有对象,征兵没有对象,选举基层干部没有人选。周总理决定公安部去个副部长带工作组蹲点调查,配合宁夏回族自治区的干部摸清历次叛乱情况,进行平反。”

杨立功,时任国务院农林部副部长。

1971 年 11 月,公安部革委会副主任施义之带了十几名干部,经银川到西吉、海原调查。他在后来的回忆中写道:

当地地处黄土高原六盘山区,自然条件极差,常年干旱,缺水少雨。山是光秃秃的,没有树,没有草,生态失衡,粮食亩产量很低。群众生活非常困难,吃的主要是土豆和返销的玉米、薯干等,白面很少。很少吃到盐,更没有油。我们工作组的同志与群众同吃同住,一天两餐,吃的是白水煮土豆、荞麦面饼,没有盐没有油,大家反映吃不饱。这里缺柴,烧的是牛粪和有限的麦秆、秫杆,不够烧就用铁丝耙草,连草根耙出来烧掉。这样年复一年恶性循环,黄土上的草越长越少。缺水,有的村庄只有个积少量水的水窖,大家都吃用这小水窖里的水。真是缺粮、缺柴、缺水、缺盐。我在刚进入固原地区的路上,看到一个老汉带了一个十二三岁的女孩,女孩身上只披了张羊皮而没有穿裤子,非常惊讶。到了村里,我看了一下,每家屋内只有土炕、土墩,炕上有一条破席和破旧不堪的棉被,有的只有破棉花套。一些极贫户到了冬天,一家大小就围在炕上,有的一家只有一套衣服,谁出去谁穿,回来又蹲在炕上。十二三岁的女孩子没有衣服穿,光了屁股,男孩子更不用说了。看到这样的景象实在不少,部队来的年轻卫生员都落了泪。

施义之他们还了解到,当地公社卫生院只有一两个医生,但没有药,更没有医疗设备。群众有病没处治,随调查组蹲点的医生、卫生员天天在村里给群众看病,给些常用药,或用针灸治疗,可解决不了严重的缺医少药问题。

这里水土流失严重,土地贫瘠,常年干旱,亩产量很低。农业生产只让种玉米、小麦、荞麦、土豆等粮食,不让种植固原地区过去常种的胡麻等经济作物,而小麦、荞麦亩产量只有几十斤,玉米有时长势很好,但常遇雹灾、霜冻等自然灾害。1971 年,固原地区产粮仅 26 万吨,除去种子、饲料,人均口粮所剩无几。人均收入仅 47 元。

当地是回族聚居区,但由于没有执行正确的民族政策、宗教政策,不尊重回民习俗,不提倡养牛养羊,不论汉民、回民硬要响应每户养猪的号召,引起回民群众的强烈不满,说:“现在强迫我们养猪,以后要强迫我们吃猪肉哩。”而且宗教活动场所甚少,甚至原来每村有一个阿訇负责念古兰经,负责宰牛宰羊,当时都没有了。

还有平叛扩大化的问题。解放后这个地区的回民发生过八次叛乱。在处理叛乱案件中,由于政策上没有分清主谋和胁从,不少被裹胁、被欺骗的群众也被打击,家属成了匪属,造成了平叛扩大化,解决矛盾的同时又激化了矛盾,形成了又一次恶性循环。

施义之回京后,向公安部核心小组详细汇报了固原地区的所见所闻。主持公安部工作的副部长李震让施义之写个书面报告上报国务院。周恩来看了报告后非常重视,把施义之叫去,沉重地对他说:“群众的生活那么苦,我们工作上有错误。”他当即批示对固原地区进行救济,将海军仓库积压的被服拿出来组织救济;指示国务院卫生部、总后卫生部、兰州军区卫生部等单位派出十多个医疗队下到固原农村,给群众检查治疗;同时批示宁夏回族自治区的干部来北京召开固原地区工作座谈会,指示施义之和农林部杨立功副部长参加。

当施义之汇报到他们正在对固原地区解放后发生的八次叛乱案情和档案进行了解时,纪登奎说:“不用那么细的查档案,宣布全部平反算了。”

1972 年 1 月 24 日至 2 月 12 日,北京召开了宁夏固原地区工作座谈会,由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主持,讨论叛乱和群众生活问题。会议认为,宁夏固原地区的主要问题是干部的大汉族主义,违反民族政策,不尊重民族习俗和宗教信仰,混淆两类矛盾,使少数敌人有可乘之机。会议明确:对“扩大化”的问题、对逼供信造成的假案必须平反,对错判、错管、错戴、错划的群众必须平反。

会后,形成了《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地区工作座谈会的报告》上报中央。

这个座谈会刚开完,2 月 29 日,固原地区隆德县又发生以糟占林、咸荣华、咸得有等人为首的叛乱事件,这是全国解放后该地区回民发生的第九次叛乱。他们以林彪的名义起事,串联了陕西省陇县,甘肃

省灵台、张家川,宁夏的隆德、固原、海原、西吉等县11个公社的150余人,杀死了前来阻止其叛乱的隆德县保卫处长君连升和保卫干事杨效智,并抢去他们的手枪。

中央仍派施义之、杨立功处理此事件。

3月1日,李德生、纪登奎召施义之和杨立功前去人民大会堂,告诉他们:武装叛乱分子和民兵正在隆德县中岔大队的山头对峙,要他们立即去平叛。

他们对施义之说:“你是21军出来的,21军在当地驻军,你去有很大的方便,临时需要动用一些兵力也好办。”

第二天,施义之和杨立功乘专机飞往西安,在那里又换乘空军小飞机到甘肃平凉。平凉没有机场,是在塬上用石灰画了一个大圈,作为临时机场。他们下飞机后在驻军63师师部吃了晚饭,赶到隆德县已是深夜。在那里见到了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康健民和隆德县委领导,听取了叛乱情况的汇报,知道叛乱分子糟占林是从外地来到隆德,自称是大依玛穆,刚从麦加朝圣回来,说“在北京见到了林彪,林彪领导西北五省区,要我领导西海固回民,在西安与林彪会师”等等。叛乱分子打死了干部,夺取了武器。大肆宣传欺骗群众说,打死了干部,共产党不会罢休,胁迫村民近200人上了山。

伊玛穆(Imam),是阿拉伯语单词的汉语音译,意为领拜人,最早源自对穆斯林祈祷主持人的尊称,又称领拜师、众人礼拜的领导者,原是阿拉伯语中的“领袖”,在伊斯兰教中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隆德县领导于3月1日拂晓组织了一个民兵营上山清剿。天黑后,叛乱分子下山占领村头的窑洞,民兵在外把守,想等天明后处理。

但是天明后,发现叛乱分子都跑了,首犯也没有抓到。

这次平叛武装冲突中,干部民兵死13人,伤12人,击毙叛乱分子咸荣华、咸有忠等13人,伤十余人。

由于叛乱分子有枪,老百姓害怕,民心不稳,天天跑反,影响生产。

3月3日,隆德县开了一天县委常委会,杨立功和施义之传达了中央的指示。同时施义之与兰州军区取得联系,兰州军区请示中央后,派21军一个连在交通要道将台堡驻下,稳定了民心。

3月6日,施义之建议到叛乱的现场——中岔大队去看看。他同

杨立功、自治区及县里的干部一起,分乘三辆车出发。来到中岔大队后,他们先看叛匪打死武装部干部的地方,再一家一户地看。有的家没有人,有的家只有老人、妇女和孩子。还有的院子里散着一地鸡毛,宰羊锅里散发出一股股腥臭味。

施义之走到一处院落门口坐下喝水后,顺便到旁边的院子里看看,发现一个40岁左右的妇女正在和面烙饼,烙的饼已有尺把高。在当地吃到小麦面是很不容易的,这引起了施义之他们的怀疑,上前问她家有几口人?那个妇女说两三口。怎么两三口人烙了那么多的饼?施义之让大家仔细观察周围的窑洞,发现一个窑洞上了锁,便让那位妇女打开。进门后看到炕上有被子,掀开被子、炕席,果然下边露出一个炕洞。

施义之问那妇女:“下面有人吗?”

妇女答:“没有。”

施义之的秘书王京宗用手电一照,发现洞里有一支带刺刀的枪。施义之觉得首犯可能就藏在这儿,就向下面喊话。

经过一番喊话,果然炕洞下面有枪送了上来,接着钻出来一人,竟然是公社革委会的委员,原来这立是他的家。

施义之等人向他问话,那个公社革委会委员支支吾吾,后来终于供出大依玛穆糟占林也在下面。施义之要他下去,把大依玛穆叫出来。经过初步审问,这二人便是发动叛乱的首犯和主犯,于是交县保卫处处理。

叛乱平息了。

1972年2月21日,张国华在成都主持解决四川大学问题的会议上,心脏病猝然复发,倒在会场上。党中央闻讯,立即派出专家小组,在周恩来的具体安排下,连夜飞往成都,依然抢救无效,不满58岁的张国华于次日凌晨1时左右逝世。

悲痛中,周恩来作出三点指示:“一、国华同志的工作由李大章代理;二、查清死因;三、骨灰送到北京。”

原准备2月24至26日送骨灰回京。正赶上此时周恩来秘密访问越南。周恩来一到越南,就对中国驻越大使王幼平伤心地说:“知道吗,国华同志死了。”

王幼平是张国华的老战友,大吃一惊。周恩来说起详情,边说边流泪,说到后来,二人相对而泣。

一直等到3月11日,周恩来回到北京,张国华的骨灰才运到北京西郊机场,周恩来从正在与尼克松会谈的忙碌中抽身亲往机场迎接。周恩来一生只去机场接过两个人的骨灰,除了张国华,另一个是陈赓大将。寒风中的周恩来接过张国华的骨灰,伤心得不能自持,潸然泪下:“中央正要重用他的时候,他却过早地走了……”旁边的其他领导人也都恸哭出声。周恩来和张国华的爱人樊近真在机场留影,对她说:“生活上的问题我会安排的。你在北京检查身体,有事到京西宾馆,让秘书告诉我。”

不久,中央召开解决四川问题的工作会议。周恩来询问毛泽东是否接见干部。一般情况,毛泽东总是满足地方干部的愿望,但这次,他拍了一下沙发把,神色黯然,许久,叹了一口气:“不见了,再见也见不到张国华了!”

张国华死后,有一些人联名上告说:“张国华是门诊部主任梁兴初的老婆任桂兰迫害致死的。”其实此时任桂兰已经和梁兴初一起被监禁审查了。但是,这还是给梁兴初又多加了一个罪名。

也就在张国华去世不到一个星期,2月26日,梁兴初也心脏病发作,中央批准他到北京301医院治疗,至9月出院。

黄永胜的儿女亲家、广州军区政委、广东省革委会主任刘兴元可能是在毛泽东南巡时给他留下了较好的印象,“913事件”后,他不仅没有被审查,而且在张国华去世后,接替了张国华的职务,主政四川。

3月11日、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成员两次接见了刘兴元、李大章等四川省负责人,宣布刘兴元任中共四川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委会主任。

3月19日,四川刘兴元、李大章等7人上报《关于继续深入开展反对林陈反党集团斗争问题的请示报告》。《报告》中说:

“林贼一伙把温玉成派来成都军区,又先后派出死党刘沛丰、于新野、刘锦平、王飞、鲁珉等人来川进行反革命串连,同丁钊(空军成指原政委)等人策划过反革命政变的阴谋活动。”

“梁兴初、陈仁麒、谢家祥三同志上了贼船,犯了严重的方向路线

错误和宗派主义错误。军区党委和省委遵照中央的指示,召开了几次会议,在狠批林陈反党集团的同时,本着毛主席‘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一贯方针,对梁兴初等同志所犯的错误,进行了严肃的揭发批判和耐心诚恳的帮助。犯错误的同志在会上作了检讨和交代,表示愿意改正错误,同林贼一伙划清界限,彻底决裂。”

此时,梁兴初正在北京治病。

3 月 23 日,中共中央[1972]14 号文件批转了四川省委《关于继续开展反对林陈反党集团斗争问题的请示报告》,梁兴初和陈仁麒、谢家祥,以及成都军区第一副司令员温玉成、成都军区空军司令员丁钊、民航总局政委刘锦平等 6 个人都被点名。

1972 年 8 月,成都军区向中央报告“四川省委、成都军区党委扩大会议总结提纲”,称:“在四川,梁、陈、谢上了贼船,梁兴初是头子。在九届二中全会上,梁参与了林彪反革命政变活动。”

8 月 9 日,周恩来、张春桥、纪登奎、李德生听取四川省和成都军区负责人刘兴元、李大章的工作汇报。中共中央发了[1972]31 号文件,批转“四川省委、成都军区党委扩大会议总结提纲”。

# 第1242回：再解决，两广、川、浙、赣与湘下通知，杜绝招生“走后门”

1972年3月18日至25日，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两广、四川和湖南等地批林整风中存在的问题。

3月21日，浙江省革命委员会和浙江省军区的负责人南萍、熊应堂、铁瑛、王子达、白宗善、马龙、张孝烈、万振西、夏琦、侯建新到北京开会。这次会议由许世友主持，联系浙江实际，揭发批判林彪、陈伯达。

当天，周恩来和中共中央政治局成员约见中共浙江省委负责人南萍、熊应堂，要求他们采取主动，将批林整风中揭发出来的若干问题说清楚。

3月27日，根据中央的指示，福州军区司令员韩先楚和江西省的领导程世清、杨栋梁、文道宏、白栋材、李登云、于德馨、黄知真、陈昌奉、熊振武、张志勇 邹文泗等11人，先后到达北京，听取中央政治局的指示，联系江西的实际，揭发江西的问题。

3月30日、31日，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江西、浙江问题。

4月21日，浙江到京开会人员向中央递交《关于继续深入开展反对林陈反党集团斗争的请示报告》。《报告》点了浙江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委会主任南萍和南京军区副司令员兼任浙江省军区司令员、20军军长、浙江省委书记熊应堂的名，说：

“林陈反党集团在《‘571工程’纪要》反革命政变纲领中对浙江十分重视。林贼死党叶群、林立果、周宇驰、于新野、江腾蛟、王维国、王飞、胡萍、鲁珉、李伟信、刘锦平、周建平、周赤萍等先后多次窜到浙江，与陈励耘等秘密串连、收集情报、策划反革命阴谋活动。杭州是林彪、陈励耘一伙进行反革命政变准备的重点地区之一。陈励耘一伙在浙江大造反革命舆论，极力搞他们反革命政变的‘基本力量’和‘借用力量’，并妄图‘固守浙江’、把浙江变成反革命‘根据地’。”

“在揭批林陈反党集团的斗争中,在浙江省出观了很大的阻力。这种阻力,主要来自南萍、熊应堂两同志。”

“南萍、熊应堂两同志在第十次路线斗争中,站错了立场,走错了路线。他们在检查交代中初步认识到,上了贼船,陷得很深,犯了严重的方向路线错误。一个月来,南萍、熊应堂两同志在中央政治局同志的多次耐心启发教育和与会同志的热情帮助下,态度逐渐好转,认识逐步提高。”

4 月 24 日,江西来京开会人员向中央递交《关于继续深入开展粉碎林陈反党集团斗争的请示报告》,点了程世清、杨栋梁、文道宏、李登云、于德馨 5 人的名,重点是批程世清。《报告》中说:

“程世清同志犯了严重的方向路线错误。根据揭发和程世清同志自己交代,早在‘九大’以前,程世清同志就上了贼船,并且制造谎言,篡改党的历史,积极吹捧林贼,散布反动言论。一九六九年九月,林贼及其死党叶群、吴法宪、林立果等人,窜到井冈山,阴谋策划在江西建立反革命‘根据地’,林贼还就国际、国内形势和党内路线斗争等问题,同程世清同志进行了广泛深谈。”“一九七〇年庐山会议期间,程世清同志与林贼及其死党叶群、吴法宪等多次密谋,向党进攻。庐山会议以后,程世清同志为法西斯分子林立果制造水陆两用汽车,特别是一九七一年六、七、八、九月间,林贼的死党周宇驰、刘锦平、查全伦、程洪珍、王佐、顾同舟、解耀宗等人,纷纷窜到江西,紧锣密鼓,进行反革命阴谋活动。程世清同志先后同周宇驰、查全伦、顾同舟、解耀宗见面谈话,相互送礼,行动很不正常。”

“几年来,江西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也受到林陈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严重干扰。根据揭发和程世清同志自己的交代,在许多重大政策问题上,程世清同志背离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犯了形‘左’实右的错误。例如:在农村中,不区别具体情况,违反多数群众的意愿,全面实行扩社并队;不根据当前农村经济的实际可能,不考虑群众生产、生活的方便,拆掉一批民房盖新村。在城市中,将集体所有制的合作商店全部解散;不区别一般民族资产阶级分子和反动资本家的界限,均按地、富、反、坏对待;要南昌市拆掉大批房屋,另建新城镇。在工农业生产和文教卫生工作中,存在有乱出主意,乱

提口号,强迫命令,瞎指挥的错误。在组织上,搞宗派主义、山头主义。在作风上,骄横跋扈,家长制,一言堂。尤其严重的是,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许多重要指示,有的严加封锁,有的肆意歪曲,有的弄虚作假,欺骗干部和群众。”

“杨栋梁、文道宏、李登云三同志,也初步检查了自己所犯的严重政治错误。于德馨同志检查了自己所犯的错误。”

4月25日,毛泽东约见准备派往浙江帮助贯彻中央精神、解决浙江问题的许世友、王洪文。这天,中共中央批转浙江到京开会人员向中央递交《关于继续深入开展反对林陈反党集团斗争的请示报告》。

4月26日,周恩来、叶剑英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以及许世友、王恩茂接见了来京的浙江省党政军负责人。周恩来说:

“文件主席已经批了,你们也看到了,回去后先召开省委常委扩大会,中央派许世友、王洪文去帮助。中央决定谭启龙、铁瑛同志参加浙江省委常委,担任书记。要把浙江搞好,常委扩大会是第一步,开的时间不要长。个把星期后转到第二步,扩大到师级、地委级,这一段要开透点。”

王恩茂1969年因为与时任新疆军区司令员龙书金的矛盾,离开工作了20年的新疆,到北京二七车辆厂劳动。1971年“913事件”后,他被安排到安徽芜湖任地委副书记。而这次接见浙江省党政军负责人也让他参加了。

再说时任舟山要塞区政委、舟山地区革委会主任的铁瑛,此时听到中央的干部任命决定,也感到非常意外。他参加革命以后,基本都是在部队工作。这次赴京开会前,他还在舟山群岛靠外海的一个前沿小岛上检查部队的战备工作。现在要到地方去,尤其是到省一级领导岗位,他有些突然。铁瑛向周恩来如实讲了自己的顾虑:“总理,我一直是在军队工作,只有抗战时期兼过一段县委书记。我对地方经济工作不熟悉,水平又低,恐怕干不了。”

周恩来说:“一边学习一边工作吧。只要认真,可以做好的。”

从1972年6月7日开始的中共浙江省四届五次全委扩大会议,至6月28日结束,参加会议共3038人。会议上报中央《关于南萍,熊应堂问题的总结提纲》,称会议“狠揭狠批了林彪及其死党陈励耘一伙的

反革命罪行,狠揭狠批了南萍、熊应堂两同志所犯的严重方向路线错误和罪行”,南萍,熊应堂虽还称“同志”,但已是“罪行”。

1972 年 6 月 29 日,中共中央批复同意浙江省的报告,对南萍、熊应堂采取离职审查的措施,并将二人送京交中央专案组继续审查。

在中央接见了浙江省负责人后的第二天,4 月 27 日,中共中央批转《江西来京开会同志关于继续开展粉碎林陈反党集团斗争问题的请示报告》。中央政治局还商定了江西省委主要领导人的排序方案。周恩来和政治局成员约见程世清、杨栋梁。

此时,毛泽东多次对老干部问题作出批示。

1972 年 3 月 5 日,毛泽东在原海军政委苏振华的来信上批示:“此人似可解放了。如果海军不能用他,似可改回陆军(或在地方)让他做一些工作。可否,请中央酌定。”

3 月 25 日,毛泽东在杨成武女儿杨俊生关于杨成武是受林彪等人政治陷害的来信上批示:“请汪印发政治局同志研究。此案处理可能有错,当时听了林彪一面之词。”

3 月 26 日,谢富治因病逝世。追悼会规格隆重。追悼会上,江青与谢富治的夫人刘湘屏抱头痛哭,可见悲痛之情。

3 月 31 日,纪登奎在国务院汇报干部会议时讲了三个问题:

一、在原则问题上不能让步。他说:“最近发了毛主席的谈话纪要,精神就是要解放干部。国家机关解放一批干部,解放了就要分配工作。有的要经中央批准,有的要经毛主席批准。过去是正部长如谷牧同志、胡耀邦同志都要报毛主席批。现在报的材料太简单了,手续也不完备,要报毛主席看,不行。最近苏振华同志写了一个检查,很认真检查了在地方工作时的错误,军队里犯的错误,一段一段很清楚,毛主席看了批了,可以安排工作。林业部一个副部长写的检查很认真,但我们整理时只说他犯了一般错误。他检查他过去支持了出版刘志丹的小说。毛主席说利用小说反党是一大发明,就是指的这本书,他那时的错误,就等于现在出版林立果的反党材料一样是反党性质的,但结论是一般错误是不对的。又如有个同志反对学习大寨,实行包产到户,是犯了走资派错误,他本人写得很深刻,但我们写得太轻了。不要在原则问题上马马虎虎,要批判从严、处理从宽,这样对他们有利,

也不会背包袱,否则到下面工作也不好。有个副部长在土改时有反攻倒算问题,没写清楚,这是个大的问题,路线问题,要在结论中写清楚,没有还的账一定要还,你忘了群众忘不了。欠了帐一定要还。各省委成立党委时,总理亲自抓,对这类似的问题都要回到原来的地方去检查,有的受了处分。这样对本人有好处,这笔帐要还,至少要写封信,回到原来的地方作检查。当了官也不行,欠了账要还,如果不愿意这样做就不好。"

二、整理材料问题。他说:"正部长和中央文革直接处理过的人的材料要报主席批,副部长报中央批。本人检查要用路线观点来说清问题,光用'滔天罪行'、'狼子野心'这些不能解决问题。不要在批判他的时候'滔天罪行',解放他时又不讲原则,原则是非要分清楚,不要写得太长,要实事求是,另外要写个报告,对这个人的政治历史问题,一贯表现和对他检查的要表态,提出使用意见。"

他强调:"组织结论要和本人见面,文化大革命大家都知道,意见不一致就不要分配。如有个单位对一个副部长的入党时间问题,他自己说是1937年入的党,但调查的是1938年,他一直保留意见,故必须把问题弄清楚。不要带着问题下去,矛盾不要带到地方去。结论是斗批改的最后阶段,思想要做通,不要把不干不净的分到地方去。哪些材料装档案,哪些不装还要研究。对副部长的材料各个核心小组的成员要看,领导不看材料不好。"

他提到一份材料上写着"一般的吹捧蒋介石",说:"这种提法就不确切,怎么叫'一般的吹捧蒋介石'?这也是斗批改的水平问题。前一段分配到各省市去的干部,大部分是好的,但也有问题,有人批评我们把'516'也派下去了。"

三、清查"516"问题。全国总工会汇报时,纪登奎说:"有人告状,江青同志把信转给我了。"

他问总工会:"你们单位有多少'516'?"

答:"有200人。"

纪登奎:"有那么多吗?这就是扩大化了。"

总工会说:"我们定了两个。"

纪登奎又问农林部有多少"516"?

答:“有100多。”

纪登奎说:“有这么多吗?会后全总和农林部的留下谈谈。”

接着,他又问了交通部有多少“516”?交通部的人没有说。

4月下旬,中央批准陈云返回北京。4月24日,陈云回到北京检查身体,并参加批林整风会议。在国务院的安排下,他参加了在中山公园举行的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游园活动。

5月12日,汪东兴传达毛泽东关于老干部出来工作的指示。指示说:“有些问题是逼供信搞出来的,我早就说过不能搞这个东西,逼供信在中央苏区搞过,在延安也发生过。逼供信搞出来的不可信,不能算。我们一些干部的看法不对,有的是形而上学,把干部一时的错误说成是一贯的错误,这样不能正确地认识一个干部。”

自从大学开始招收“工农兵学员”后,因为采取的是“群众推荐”方式,没有考试,而推荐的标准十分模糊,无法量化衡量比较,于是,有些干部利用职权,私留名额,内定名单,指名选送,授意录取等现象开始盛行。有权力的人又利用这种状况将自己亲朋好友的孩子送去上学,这种情况在部队干部中更为普遍,群众称这种现象为“走后门”。这在1970年招收第一批学员时就已经存在,到1971年已经成为严重问题,在群众中影响极坏。

1972年5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杜绝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中“走后门”现象的通知》,指出:“目前,高等学校1972年春季招生工作正在进行,遵照毛主席关于‘从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的指示,自1970年招生试点以来,招生工作的主流是好的。”“当前值得认真注意的一个问题是,各地招生工作中程度不同地存在着‘走后门’现象,有些地区和单位情况比较严重。据反映,有少数干部,利用职权,违反规定,采取私留名额,内定名单,指名选送,授意录取,甚至用请客送礼、弄虚作假等不正当手段,将自己、亲属和老上级的子女送进高等学校。有些招生主管部门和负责招生工作的干部,不按党的原则办事,讲私人交情,私送名额,或强令招生人员违章接收不够条件的人入学。”

《通知》要求:各级领导部门要加强对招生工作的领导,严格按照党的方针、政策办事,在方法上要切实执行“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

批准,学校复审”的原则。对招生工作认真进行一次检查。对检查出违反招生规定的问题,各级领导机关要采取有效措施,予以制止和纠正。“今后,如再有干部滥用职权、违反招生规定‘走后门’者,除对有关干部进行严肃处理外,也要把学生退回。”

《通知》还特别指出:“对干部子女应和广大工农群众子女一样看待,都要按招生条件办事,即:具有二至三年以上实践经验的优秀工农兵,年龄在二十岁左右,身体健康,一般是未婚的,具有初中以上的文化程度。”

# 第1243回：检查出，周恩来身患癌症 汇报会，中央发六个文件

5月3日，毛泽东向周恩来提出召开批林整风汇报会。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了毛泽东的意见。5月6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召开批林整风汇报会议的通知》，决定从5月20日起，召开一个全国性的批林整风汇报会议。

此时，周恩来的健康也出现了不好的症状。5月12日，中南海保健医生张佐良在为周恩来做每月一次的小便常规检查时，发现了4个红细胞。5月18日，经京、津、沪三地的著名专家确诊为膀胱癌，立即报告毛泽东。这对于大量内政外交事务都需要依靠周恩来的毛泽东来说，无疑是一个新的打击。当他一字一句看完周恩来的病情报告，心情是那样沉重，这种沉重的心情反映在他平时很少出现过的异样严肃的脸上和紧皱着的眉头上。他叮嘱这件事对外要保密，并指示："由剑英、颖超、汪东兴、张春桥领导医疗组工作。"他还告诫周恩来："应当休息，节劳，不可大意。"

毛泽东住处的沙发，原来的又大又笨，坐垫比较硬。对于长时间坐着不动的老年病人来说，很不合适。因使用这种沙发，毛泽东背上长起了褥疮。工作人员给他又设计了一种，坐垫是用海绵做的，下面钻了很多蜂窝形的小孔。毛泽东坐在新沙发上摇了摇，说："这种沙发好多了。原来的那种沙发又高又大，像我这样高的人坐上勉强可以，脚能着地，像总理坐上去就不舒服。他的脚就得悬着。"他嘱咐工作人员："总理现在生病，给总理送一个去。"

周恩来坐在毛泽东送来的沙发上，觉得很舒服。

对怎样治疗，毛泽东说："开刀容易扩散，有危险，是否可通过中医的方法，用中药来控制病情。""你们外科医生动不动就开刀，开一个死一个，陈老总不是开刀死了吗？谢富治不是也开刀死了吗？"他说要"防止扩散，注意营养和休息"。

5月20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批林整风汇报会。会议由周恩来主持,参加者有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中央和国务院各部委负责人、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和各大军区负责人、以及各省、市、自治区的负责人等。

这天,中共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下发参阅文件之一:《揭发林彪在历史上反毛主席、反党的罪行》,目录是:

一、朱德同志给毛主席、党中央的信 …… (1)
二、刘伯承同志揭发林贼罪行谈话记录(摘要) …… (4)
三、李富春同志揭发林贼的罪行…… (8)
四、陈毅同志给毛主席的信和揭发林彪早年的反党罪行 … (11)
五、聂荣臻同志给毛主席、党中央的信和揭发林彪的反党罪行 …
…… (21)
六、肖克同志对林彪的揭发 …… (34)
七、曾山同志揭发林彪的罪行 …… (46)
八、邓子恢同志揭发林彪的罪行 …… (48)
九、蔡畅同志提出的林、叶二贼有里通外国嫌疑的几个线索 ……
…… (50)

5月21日晨,周恩来前往毛泽东处汇报即将召开的批林整风汇报会议。谈话中,毛泽东对即将印发的《粉碎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武装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三)》的前言提出修改意见,说:“继续审查”那句话可以不写。大的罪状已经很够了,再多就是补充了。

当天,周恩来在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说:

“我们这次会议人数是312人,比去年的批陈整风汇报会议的99人扩大了。鉴于去年那个会议的人数比较少了一些,因此传达也就不很广。地方还好,中央的比如军事系统,中央文件发了60多份,可是军委办事组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他们就扣住了,只发了7份。所以当时批陈整风的传达,在军事系统,军委直属的,就非常狭窄。去年7月被主席发现了,说要继续跟各地方打招呼。犯错误就是要自己引以为戒,就要逢人便讲嘛,这才能够自己得到教训,得到警惕,人家可以监督,人家也可以引以为训嘛。这是主席对于历来犯路线错误的教导嘛。但是,当时黄永胜他们就不是这个态度。

这一次我们这个会议的名字改成批林整风了。九届二中全会以后,主席的一系列措施,都是教育一批干部,还要保林,使他自己知道那个错误的严重,在九届二中全会上也是如此。《我的一点意见》,把打击的矛头对准了陈伯达这个骗子,由于主席的教导使相信他的人、上当的人觉悟了,警惕起来了。使跟他搞阴谋的人就不要搞了嘛。所以,从九届二中全会到去年9月13日事件以前,一直提的是批陈整风。整个精神,从文件上你们可以看出,也是如此。但9月13日把这个问题真相揭穿了,头子就是林彪,而不是林、陈,不像高饶联盟那样。林彪搞的是阴谋活动,他反党、反主席的思想是长期存在的。刘少奇以后就是他挂帅来反对主席了。他是搞阴谋的,但是阴谋逐步要暴露,最后灭亡。这次第十次路线斗争,主要矛头就是要批判、揭露、粉碎林彪这个反党集团,教育大批干部,团结大批干部,是这样一个精神。所以,这次开的会议就定名为批林整风汇报会议。也不要再说林陈反党集团了,就是林彪反党集团。”

他说:“这一次批林整风会议,首先要学文件。文件相当多,要把它归一下类。政治局原来讨论了,昨天又请示了主席,刚才政治局又开会讨论,大概初步定为这样的一些文件,正式的会议文件,有六种。”

接着,周恩来分别介绍了文件之一:《九届二中全会公报和九届二中全会以来毛主席的文章、批示和重要谈话》。

文件之二:九届二中全会后毛泽东的八个批示、中央的有关文件、跟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武装政变有关的材料之一、材料之二。周恩来说:

“另外有一个单页电报,是批评新疆关于新疆日报擅自登出林彪大幅照片等严重错误的。这样性质的错误,不仅新疆有,浙江也有,比如这回安徽报告上检查也有。恐怕别的省这回讨论,你们回去自己检查也可能有。在去年九月十三日以后,我们只说以前已经发表过的文章,有林彪的话就不要勾掉了。但是还继续登林彪的照片,还不断地引林彪的语录,一直到10月、11月,吹捧林彪的话在报告上还有,这就是错误的了。因为有这种情况,所以把这件也印出来,大家再看一看。这都是发过了的,但是不见得到会同志都看过。这是文件之二。”

文件之三:就是粉碎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武装政变的斗争的材料

之三。周恩来说:“原来已经发了材料之一、材料之二;现在发材料之三。这个作为送审稿,还不作最后稿。主席在上面批了:‘同意印发,征求意见。’就是到会的312位同志都可以直接提意见,同时也可以拿这些材料深入地批判,深入地揭发。如果在批判和揭发当中,还有新的、好的材料,更有分量的材料,还可以补充进来。会后我们再进一步修改,作为中央文件发到各地去,层层下达。”

文件之四:是中央专案组关于陈伯达的审查报告。周恩来在介绍内容时说:“主席昨天还说了一件事,就是文字上我们应该写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他说这个形容词,修正主义还有革命修正主义吗?当然只指反革命了,你要写反革命修正主义,好像对立面还有革命修正主义了,说笑话的。那么文字上应该是反革命的,就是他这个性质是反革命又是修正主义,是这个意思。因为我们中国这个文字修辞若不那么严格,常言可以引起误解,主席昨天举了这个例子。”

文件之五:是《毛主席给江青同志的信》。周恩来说:“这个信只有政治局一部分同志看过,在座的你们各省市的,还有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没看过。就是在‘913’以后,今年印的吧?这封信是什么时候写的呢?就是在1966年5月18日政治局扩大会议林彪在河北厅讲话以后,林彪讲话经过多次改动,送到主席那里,主席总是有点不安,里头有些话过头,叙述政变那种写法也不当。但是当时是为的要发动文化大革命,鼓革命群众之气,要打击、扫除那种修正主义的风,所以说话有些过。但是当时的中央修改以后,还是请主席批。主席觉得不批,这篇东西不能发表,不是等于给群众泼冷水了吗?因为大家希望看到这篇东西嘛。实际上这里头有毛病,有些极‘左’的话,有些不恰当的。现在大家回想回想恐怕就会看出来。林彪那篇东西是不是可以作为参阅文件印给大家?刚才政治局会议没有讨论,再看一看。毛主席这封信一针见血。主席写这封信是1966年7月8日,在武汉写的,我是7月11日到的武汉。那时见了个外宾,我跟主席报告我到国外访问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以后,主席要我留一天。第二天上午见主席,主席就把给江青同志的那封信的抄件给我看。是一个底子,那个字是徐业夫同志抄的,有些字还抄错,主席还改了的。那个信可写的深刻,现在大家想想看,那简直是完全看到了这些问题。当然了,当

时不是说林彪这个人了,也可能想着利用右派来搞。那封信指的林彪那些极‘左’的话,这个极‘左’,就形‘左’实右,就落在林彪身上,是个右派。主席说7、8年后,结果6年就出现这个事了。只有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才能预见到这么清楚。这封信贯穿了整个文化大革命,大家可以看一看。当然了,那封信可能有些事情大家不大懂的了,将来我们参加政治局的做日常工作的9个同志分到各组里,还可以加以解释。这个大概明天可以印给大家。非常深刻的一封信。前天,我们政治局决定要请示主席,我昨天去请示主席,原来主席还说等一等,昨天一请示说可以。这个我们当然先印给到会同志看了,先不外传了。这是会议文件之五。以上这些文件现在有的已经发了,有的明天要印发。”

周恩来接着说:“我们的会议除正式文件外,还有参阅的文件,我们也是不多选,选那些重要的。

参阅文件之一,就是军委办公会议收集的批判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军事路线的罪行,有两本,我们现在选他第一本。就是从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一直到解放战争,也挂了一点抗美援朝。重点是抗日战争后期和解放战争。在土地革命战争初期,有人把他说成好像是了不起的。现在陈毅同志故去了,他生前揭发了一件事,这个文件上面也选了。就是说,从三河坝离开,朱德同志拍胸脯,要大家跟他走。因为他是在旧军队呆过,懂得怎么样能够避开敌人,还能把自己的革命同志团结在一起,来继续打仗。三河坝的时候,林彪仅仅是个连长吧?”

聂荣臻:“连长。”

周恩来:“连长。他也离开队伍。当时离队之风那就是很盛了。比如那个时候师长周士第就离队了,还有李硕新也离队。李硕新后来做白区工作牺牲了。林彪也带着钱,带着枪离队,走不出去了,才折回来。上井冈山,他仅仅是一个营长吧?”

朱德:“连长。”

周恩来:“还是连长。那怎么能把朱、毛会师说成了毛主席跟林彪会师呢?这是歪曲历史嘛。井冈山被林彪去逛了一下子,程世清同志他们就这样子写,这是错的。所以,从军事路线的斗争上看出,林彪的

‘左’倾路线是一系列的。我也犯了‘左’倾路线错误,那应该承认嘛,检讨自己嘛。那么林彪一点份没有吗?就那么正确吗?现在把他《论短促突击》印出来给大家看,他那篇文章最后一段是支持李德的,这也是关键性的文件了。长征的时候,在遵义会议上,他并没有发言。遵义会议以后,他不断地反对主席。给他的命令,他就反抗回去,不执行。到会理会议就更厉害了。军事科学院编写的那个军事文件上,对会理会议这部分,语言不详细,只有一两句。会理会议,他反对毛主席,要毛主席、朱总司令和我都下野,他推彭德怀挂帅。这一段,文件上没说几句。剑英同志,恐怕那要请你补充几句。主席现在在看,他对这个有兴趣,我们还可以补充几句。因为那一段会理会议只有几行,这是大事情。这个事情,荣臻同志也清楚。红军不少干部知道会理会议这个事情,但是不晓得内容。”

聂荣臻:“没有传达。”

周恩来:“没有传达,照顾了当时那个困难的环境,应该这样子。他到张国焘那里,他也动摇;到陕北,他两次写信给主席要到陕南打游击;东渡黄河,他也动摇。大相寺会议,批一军团的本位主义,批判了聂荣臻同志,他也有份嘛,他一句话不吭。一直到抗日战争的平型关战斗等等。他后期在苏联,回来崇拜国民党。现在还查出来,他就在莫斯科的时候,大概是共产国际动员他写了一篇文章,大捧蒋介石、陈诚,还把国民党空军司令周至柔的话引了一段,但是只字没提毛主席。这是在1940年7月写的,我们都回来了,我们是3、4月回来的。就是说,他的一些文章不亚于王明。他回来以后,解放战争,主席昨天说了,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他大概觉得他占了一个半。今天剑英同志说,恐怕他不止只认为一个半,是两个。因为主席说,辽沈战役是他指挥的了,平津战役有晋察冀、有华北的部队了,他算一半吧,所以一个半。实际上这一个半战役,主席说,最麻烦就是他了,不断地跟他商量,不同意又改,改了还不同意。总是主席的命令下去,三番五次地商量他才同意,有时硬不执行,几乎让东北的敌人跑掉,几乎让平津的敌人跑掉一部分。这个大家看文件就晓得。所以这本东西主席要去看,看了以后我们再印。”

接着周恩来又介绍了参阅文件之二,就是5月20日中央下发的

那份朱德、陈毅、李富春、聂荣臻、曾山、邓子恢等9位在京中央委员中的老干部写的书面意见。

参阅文件之三是高岗妻子李力群对林彪的揭发。

参阅文件之四是林彪在五次反围剿时写的《论短促突击》,是在军事博物馆的军事文献里找到的。周恩来说:“我看军博的那个管事的人大概也没去看,被我们耿飚同志派人去发现了,抄给我,是全文。”“他最后一段就是引用华夫的文章。华夫是谁呢?就是四中全会“左”倾机会主义王明路线统治的时期,当时,共产国际派来一个军事顾问,这个人是个德国人,中国名字叫李德。”

参阅文件之五,是中央联络部写的中苏关系11个问题,说明中苏关系是怎么造成的。

周恩来说:“今天政治局讨论,打算在会议文件里加一个之六。就是在两年半之中,前年九届二中全会到去年批陈整风,吴法宪、叶群先作了检讨,这个检讨都是前年写的,吴法宪检讨是9月29,叶群检讨是10月12,这个检讨当然不深刻,但是先给主席看了,主席批得很尖锐。这两个批件很值得学习。所以,我们打算把他们这两个检讨印出来。”“然后就是去年批陈整风汇报会议的时候,黄、吴、叶、李、邱五大将的检讨了,那个检讨他们都是对了口径的。我们有时候帮他改,说那些东西应该说的更深刻一点,因为他给我们看过嘛。”

周恩来最后说:“这一次是我们党内第十次的路线斗争,也是最尖锐、最严重、最复杂的一次阶级斗争。”

# 第1244回：江青谈，毛泽东的那封信 周恩来，再说明“伍豪事件”

周恩来在5月21日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上提到的文件之五：《毛主席给江青同志的信》，就是第86回提到的毛泽东1966年7月8日写给江青的那封信。根据中央政治局讨论的意见，周恩来在1972年5月21日晨请示毛泽东：可否将这封信印发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毛泽东表示可以印发作会议文件。这封信的全文如下：

江青：

六月二十九日的信收到。你还是照魏、陈二同志（注：指魏文伯、陈丕显）的意见在那里（注：指上海）住一会儿为好。我本月有两次外宾接见，见后行止再告诉你。

自从六月十五日离开武林（注：指杭州）以后，在西方的一个山洞（注：指滴水洞。韶山在杭州之西，故称“西方”）里住了十几天，消息不大灵通。二十八日来到白云黄鹤的地方（引者注：指武汉），已有十天了。每天看材料，都是很有兴味的。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过七八年又来一次。牛鬼蛇神自己跳出来。他们为自己的阶级本性所决定，非跳出来不可。我的朋友的讲话（注：指林彪五月十八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央催着要发，我准备同意发下去，他是专讲政变问题的。这个问题，像他这样讲法过去还没有过。他的一些提法，我总感觉不安。我历来不相信，我那几本小书，有那样大的神通。现在经他一吹，全党全国都吹起来了，真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我是被他们追上梁山的，看来不同意他们不行了。在重大问题上，违心地同意别人，在我一生还是第一次。叫做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吧。晋朝人阮籍反对刘邦，他从洛阳走到成皋，叹道：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鲁迅也曾对于他的杂文说过同样的话。我跟鲁迅的心是相通的。我喜欢他那样坦率。他说，解剖自己，往往严于解剖别人。在跌了几跤之后，我亦往往如此。可是同志们往往不信。我是自信又

有些不自信。我少年时曾经说过: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可见神气十足了,但又不很自信,总觉得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我就变成这样的大王了。但也不是折中主义,在我身上有些虎气,是为主,也有些猴气,是为次。

我曾举了后汉人李固写给黄琼信中的几句话:峣峣者易折,皎皎者易污。阳春白雪,和者盖寡。盛名之下,其实难副。这后两句,正是指我。我曾在政治局常委会上读过这几句。人贵有自知之明。今年四月杭州会议,我表示了对于朋友们那样提法的不同意见。可是有什么用呢?他到北京五月会议上还是那样讲,报刊上更加讲得很凶,简直吹得神乎其神。这样,我就只好上梁山了。我猜他们的本意,为了打鬼,借助钟馗。我就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当了共产党的钟馗了。事物总是要走向反面的,吹得越高,跌得越重,我是准备跌得粉碎的。那也没有什么要紧,物质不灭,不过粉碎吧了。全世界一百多个党(注:指共产党),大多数的党不信马、列主义了,列宁也被人们打得粉碎了,何况我们呢?我劝你也要注意这个问题,不要被胜利冲昏了头脑,经常想一想自己的弱点、缺点和错误。这个问题我同你讲过不知多少次,你还记得吧,四月在上海还讲过。

以上写的,颇有点近乎黑话,有些反党分子,不正是这样说的吗?但他们是要整个打倒我们的党和我本人,我则只说对于我所起的作用,觉得有一些提法不妥当,这是我跟黑帮们的区别。此事现在不能公开,整个左派和广大群众都是这样说的,公开就泼了他们的冷水,帮助了右派,而现在任务是要在全党全国基本上(不可能全部)打倒右派,而且在七、八年以后还要有一次横扫牛鬼蛇神的运动,以后还要有多次扫除,所以我的这些近乎黑话的话,现在不能公开,什么时候公开也说不定,因为左派和广大群众是不欢迎我这样说的。也许在我死后的一个什么时机,右派当权之时,由他们来公开吧。他们会利用我的这种讲法去企图永远高举黑旗的,但是这样一做,他们就要倒霉了。中国自从一九一一年皇帝被打倒以后,反动派当权总是不能长久的。最长的不过二十年(蒋介石),人民一造反,他也倒了。蒋介石利用了孙中山对他的信任,又开了一个黄埔学校,收罗了一大批反动派,由此起家。他一反共,几乎整个地主资产阶级都拥护他,那时共产党又没

有经验,所以他高兴地暂时地得势了。但这二十年中,他从来没有统一过,国共两党的战争,国民党和各派军阀之间的战争,中日战争,最后是四年大内战,他就滚到一群海岛上去了。中国如发生反共的右派政变,我断定他们也是不得安宁的,很可能是短命的,因为代表百分之九十以上人民利益的一切革命者是不会容忍的。那时右派可能利用我的话得势于一时,左派则一定会利用我的另一些话组织起来,将右派打倒。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一次认真的演习。有些地区(例如北京市),根深蒂固,一朝覆亡。有些机关(例如北大、清华),盘根错节,顷刻瓦解。凡是右派越嚣张的地方,他们失败也就越惨,左派就越起劲。这是一次全国性的演习,左派、右派和动摇不定的中间派,都会得到各自的教训。结论: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还是这两句老话。

久不通信,一写就很长,下次再谈吧!

毛泽东

七月八日

这封信写好后,毛泽东让机要秘书徐业夫誊清了一份,毛泽东看后改了几个字,交徐业夫存档。

1966 年 7 月 11 日,周恩来陪外宾到武汉去见毛泽东,毛泽东让他在武汉留一天。第二天上午,周恩来和王任重一同来到毛泽东那里,毛泽东将写给江青的那封信给他们二人看了,是徐业夫誊写的抄件,抄在直条纸上,上面有一、两处改动处,是毛泽东的笔迹,改动不大,有一处把“他就逃到一个海岛上去了”改成“他就滚到一群海岛上去了”。

周恩来当时阅毕,即向毛泽东建议:“此信可否给林彪看一下?”

毛泽东表示同意,说:“可以。”

1966 年 7 月 14 日,周恩来乘飞机到大连,向住在那里的林彪转达了毛泽东 7 月 8 日信件中的意见。林彪听到后吃了一惊,表示接受“主席的意见”,答应回京后修改 5 月 18 日的讲话。

毛泽东对林彪的悔悟之意表示满意,认为林彪只要今后改正这种作法,可以把他的信烧掉,信的内容不再下达。

在林彪从大连回到北京后的一天,叶群到钓鱼台找江青谈这封信

的事。叶群对江青说:“我们那位对那封信感到不放心,怕以后被人利用来攻击他。”

江青请示了毛泽东。毛泽东说:“那就把信交给叶群,放在他们那里好了。”

可是叶群还是不放心。因为放在他们那里,他们也不好随便处理。江青再请示毛泽东。毛泽东说:“那就烧了吧。”

于是江青把叶群叫到钓鱼台,当着叶群的面,叫戚本禹和卫士大孙把毛泽东给江青的这封亲笔信拿到窗外花坛上去烧掉。江青和叶群就站在窗前看着他们烧。不过,抄件保留了下来。

1972 年 5 月 21 日,在请示毛泽东同意后,这封信的抄件复印后发给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与会者人手一份,并形成中央文件。在铅印印发时,江青要求把原信开头的称呼“江青”改成“江青同志”。请示毛泽东,毛泽东没有同意,印发时仍维持原称呼,只是在作为中央文件印发时加上了一个标题:《毛主席致江青同志的信》。

这封信在在批林整风汇报会上引起的震动是巨大的。为此,5 月 25 日、26 日和 27 日,江青在批林整风汇报会议的华东组和中南组小组会上,先后作了 3 次发言,说明这封信的来龙去脉。她说:

“1966 年,中央在杭州开四月会议,当时我在上海,不知道会议情况。5 月初,中央在北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我还在上海,也不知道会议情况。1966 年 7 月,我收到了主席给我的信,当我读到:‘我的朋友的讲话,中央催着要发,我准备同意发下去,他是专讲政变问题的。’‘他的一些提法,我总感觉不安。’‘在重大问题上,违心地同意别人,在我一生还是第一次。’我当时虽然不知道主席指的是谁,但是我感觉到事关重大,心情沉重。当时和现在,我始终认为,这封信不是写给我一个人的,是写给全党、全国人民的。信中讲了世界革命问题,所以,也是写给全世界人民的。不过在当时,主席不好写给别人,只能写给像我这样的人。”

“听说主席写了这封信后,要秘书抄了一个抄件,并在抄件上做了亲笔修改。在主席那里(即白云黄鹤之处)首先看到这封信的抄件的,是总理、王任重。总理看了这封信后,提出他去大连说服林彪改正。主席同意。总理劝告林彪不要再作那种提法,据说当时林彪表面上是

答应了。因此,八届十一中全会后,中央专门发了一个通知。现在事实证明,他实际上是要了两面派。最近查了一下过去的批件,主席把林彪这个讲话,一直压到1966年9月20几号才批发。”

“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15年后才发表。毛主席的这封信,在6年后同志们就看到了。我们现在能看到这封信,是很幸福的,因为我们的毛主席健在,我们的党非常好,是团结的。”

“毛主席的著作,我没有全部读完,而且读的不好,时常是读一次领会一点。主席写的这封信共两千字左右,我觉得是我读过的短篇中很少见的重要著作。信的文字结构严谨,一气呵成,非常幽默,很有层次,通篇是说理,绝无剑拔弩张之处。这封信使人越读越有味道,越读越感到意义深远,涉及中国、外国、政治、历史、哲学,高度概括了国内外阶级斗争必然的发展规律,总结了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宝贵经验,贯串着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宝库里的光辉文献,对于指导整个社会主义革命,直至建设共产主义,都有着伟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从林彪叛党叛国以后揭发的大量事实来看,林彪是历来反对毛主席的。我们这儿的老同志们是否知道林彪的底细呢?我就不知道。可能有的老同志知道,但顾全大局,不说。毛主席是深知其人的,但是在同志们面前,在我面前,从来没有讲过。毛主席背后很少说人家的坏话,总是说人家的功劳。我是在同林彪的接触中,并同他进行斗争中,逐步地了解林彪并非一贯正确,更不是像黄永胜、李作鹏他们颂扬的那个样子。这几年来,他采取种种阴险毒辣的手段,想把我干掉,更加深了我对林彪这伙的认识。毛主席在写这封信时,已经看出林彪不讲马列主义,不讲阶级,不讲党的领导,不讲人民群众,专讲个人,讲宫廷政变,看出了林彪在思想上、理论上不是一个马列主义者。这是肯定的。但是,如果说,主席在写这封信的时候,已经看穿了林彪搞的全部阴谋诡计,那怎么解释‘九大’呢?直到林彪叛党叛国之前,主席和你们谈话时,还是要保林嘛,这怎么解释呢?毛主席对他一直是采取了团结、教育、保护的方针,真是做到了仁至义尽,这说明毛主席具有无产阶级政治家的伟大气魄。林彪干坏事,有一个暴露的过程,我们对他也有一个认识的过程。对这个问题,我们要采取历史唯物主义的

态度。主席是很尊重历史的。《我的一点意见》原件上有:找到林彪的几条,如获至宝。原件上陈伯达的名字后面也没有‘同志’两个字。原件是我们回到北京后,我向主席做了请求,主席批准之后,才看到的。林彪叛党叛国事件发生后,中央印发这个文件时,我们想恢复原件那样子,主席不同意,说这是历史,不要再恢复原件了。”

“林彪把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奉为钟馗,名义是打鬼,实际是为着实现他的个人野心。毛主席的信中说:‘蒋介石利用了孙中山对他的信任,又开了一个黄埔学校,收罗了一大批反动派,由此起家。’这段话,我个人现在看,是活龙活现地揭露了林彪的反动面目。林贼从当抗大校长到当国防部长,拉山头,结死党,‘打着 B——52 旗号,打击 D——52 力量’,这不是同蒋介石如出一辙吗?”

“在国际上,苏联的党变修了。这同南斯拉夫不一样,因为苏联是个大国,是列宁的故乡。它的变修,影响是大的。现在‘全世界一百多个党,大多数的党不信马、列主义了,马克思、列宁也被人们打得粉碎了,何况我们呢?’要知道苏修是怎么整我们的,可以看会议发的参阅文件之五。”

“毛主席虽然看到了国际国内这些阴暗面,但对革命的前途,充满着革命胜利的信心和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

“有人问,虎气和猴气怎么理解?我是这样理解,虎气和猴气是对立的统一,主席讲虎气为主,这就是说不能搞折衷主义。”

“毛主席说:‘在七、八年以后还要有一次横扫牛鬼蛇神的运动。’不到六年,林贼一伙就自己跳出来。现在全国人民更紧密地团结在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周围,同林彪反党集团进行着斗争。斗争并不是就此完结了,在整个社会主义时期,七、八年横扫一次牛鬼蛇神,以后还要搞好多次。我们决不能搞阶级斗争熄灭论。”

“毛主席说:‘中国如发生反共的右派政变,我断定他们也是不得安宁的,很可能是短命的,因为代表百分之九十以上人民利益的一切革命者是不会容忍的。’林彪反革命集团的阴谋政变,迅速地被粉碎了,这一事实,证明主席这段话是多么英明的预见啊!我们要很好学习马、列的书和毛主席的书,提高识别真假马列主义的能力,要有反潮流的大无畏精神,决不能让修正主义篡夺党和国家的领导权。”

“主席不知给我说了多少次,要我经常想一想自己的弱点、缺点和错误。我自己并不比同志们高明多少,主要是有毛主席这样的严师,不然尾巴也可能翘到天上去了。如‘天才’、不设国家主席的问题,在庐山会议上,我能坚持原则,是因为主席讲过多次,我对主席的指示是坚信不疑。因为我和主席共同生活,一起工作,已经几十年了,看到主席是说了就算数的。我们对毛主席的指示,要坚信不疑,要坚决贯彻执行。”

毛泽东致江青的信公布后,会议分组进行了讨论,大家的发言,基本都是:“读了毛主席的信,受到深刻的教育,”“毛主席高瞻远瞩,对林彪的问题早有察觉”等等。

邓颖超在发言中说,她从三十年代起就知道了江青,读了当时报纸上发表的江青致唐纳的公开信,认为江青是一位杰出的女性,林彪一伙要收集江青的黑材料,不是什么“黑材料”,而是“红材料”,等等。

5 月 27 日,毛泽东约见周恩来。从毛泽东处回来后,周恩来召开政治局会议,说:“要在批林整风汇报会议上,根据毛主席去年巡视南方谈话中着重提到的中共党内十次路线斗争的问题,讲一点个人认识和我个人在历史上所犯的路线错误。”

次日,5 月 28 日,周恩来又在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各组召集人会议上宣布此事。

5 月 28 日这天,周恩来在一则反映山东、江苏等地聚众抢扒援越物资列车事,批告在京参加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的山东、江苏、安徽、河南省负责人:“务望你们电话告省、地委、军分区、各县市,动员各公社和城市居民点进行群众教育,加以劝阻。有关地方,车站徒手军警加以宣传驱阻,但切不可动用武器,也不可打骂,还是实行‘四不’或‘五不’。”

5 月 29 日至 6 月 7 日,周恩来起草他准备在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上作的《对我们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六次路线斗争的个人认识》报告提纲。

5 月 30 日,周恩来致信毛泽东:“我现在正写一个讲话要点,写成后将先送主席审查,并请约我一谈,好当面请示。”

6 月 7 日,周恩来将所写的《对我们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六次

路线斗争的个人认识》提纲送毛泽东审阅。并附信说:“两次在主席处听到片言支语关于路线的教训,我更急于要写出初稿。”

毛泽东圈阅了提纲和附信。

当天,中央政治局会后,周恩来去毛泽东处。

6月9日,周恩来修改、补充《对我们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六次路线斗争的个人认识》提纲,形成二稿。

6月10日,周恩来将提纲稿送中央政治局成员阅。

6月10日至12日,周恩来连用3个晚上在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上作《对我们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六次路线斗争的个人认识》的报告。

报告依次就大革命时期的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瞿秋白盲动主义、李立三冒险主义、罗章龙右倾分裂主义、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和张国焘右倾分裂主义,以及抗日战争时期的王明右倾投降主义的历史过程、错误危害等详加论述和说明。

在谈到王明右倾错误问题时,他结合个人亲身经历,对自己作了严厉的剖析、检讨。并表示:“我入党50年,没有离开党的队伍。经过长期的复杂而又激烈的党内外、国内外的阶级斗争和革命战争的考验,我还在为党工作,继续坚持对敌斗争;年老了,也还有些革命朝气。这几年我党说按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做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但做起来也并不容易。我平常爱读鲁迅和毛主席的各两句名诗以自勉:‘横眉准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现在凡是在林彪反党集团的阴谋活动中沾了边甚至陷得深的同志,都应该得到启发,不应该有任何顾虑。要彻底交待,认真改正,改正得越迅速,越彻底,越好。”

6月13日,陈云以当事人身份,在中共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上就所谓“伍豪问题”说道:

“我当时在上海临时中央,知道这件事的是康生同志和我,对这样历史上的重要问题,共产党员要负责任,需要对全党、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采取负责的态度,讲清楚。这件事完全记得是国民党的阴谋。伍豪二百四十几人的脱党声明,是在恩来同志已经到达中央苏区之后。”

当天,陈云还写下书面证明:

“我现再书再说明,这件事我完全记得,这是国民党的阴谋。”

在此之前,1972 年 2 月 18 日,康生也病床上口授了一份记录:“所谓‘伍豪启事’完全是国民党特务的伪造,用来攻击诬蔑我们党和周总理的。”

另外,“913 事件”后,谢富治去世前,于 1971 年 9 月 20 日,也曾在医院说:“所谓‘伍豪启事’是国民党伪造的,毛主席讲过这启事是假的,毛主席和康生等同志早就知道这件事的真像。”

6 月 23 日,周恩来在最后一次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的全体会议上作了《关于国民党造谣污蔑地登载所谓“伍豪启事”问题》的专题报告,并宣布根据毛泽东和政治局的意见,把报告的录音和根据录音整理的录音记录稿以及有关文献资料作为档案,保存在中央档案处,同时由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各保存一份,以便党内都知道这个问题的真相,避免今后有人利用这伪造的启事制造事端。

周恩来对 1932 年国民党特务伪造“伍豪词的情况作了说明。还讲述了 1967 年 5 月 19 日就此事专门写给毛泽东的报告,公布了毛泽东 1968 年 1 月 16 日为此写的批示。并在会上公布: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和中央政治局的决定会后将把报告录录音记录稿以及其他有关文献资料存入中央档案,并发给各省市区存档。

# 第1245回：枪响处，军政委妻子被杀 余洪信，麦田中自杀身亡

1972年5月18日凌晨，几声枪响惊破了太原63军军部大院，军政委曹步墀的妻子邢玉荣被打死，军副政委杨兆魁和战士张彦平被打伤，杀人者竟是该军副军长余洪信，事发后潜逃。

自1969年秋北京军区各军增援内蒙，1969年12月19日，中共中央决定对内蒙古实行分区全面军管后，巴盟、包头分给了63军负责。巴盟“前指”主要负责人是63军副政治委员田荫东。1970年春，63军副军长、战斗英雄余洪信接替田荫东，并出任张家口一带的北方边界总指挥。

余洪信到巴盟后，工作很努力。但他从来没有当过地方“父母官”，把地方当军队一样管理，举手投足仍是百分之百的“军阀作风”，即部队做派。他在县百货商店看到手表不错，二话不说戴到手腕上，转身就走。第二天，商店的经理正在着急，余洪信派警卫员把钱如数送来了。

1970年7月底，石家庄地市代表团到巴盟慰问解放军。临河县没有组织好欢迎，余洪信在火车站当着上千群众的面把县革委会主任、武装部政委张兴旺骂得狗血喷头，谁也不敢阻拦。

1971年10月，余洪信到五原县复兴公社，看见办公室几个人正在打扑克，顿时大怒：“上班竟敢打扑克，谁给你们的胆子？都给我捆起来！”连闻讯赶来的公社领导也不由分说，统统被押进县城大牢，成了囚犯，小县城一时轰动。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失去制约，不受监督，大权在握的余洪信，其“军阀作风”很快就发展成为真正的军阀作风。他不仅当众辱骂地方党政领导，甚至还捆绑、扣押、打骂群众，甚至采取种种手段，强奸、奸污、侮辱妇女。对余洪信的种种恶行，老百姓敢怒不敢言。

1972年5月，中央军委决定在6月底前撤销北京军区内蒙古前线

指挥部领导小组及其办事机构,除参加地方“三结合”的人员外,其他军管人员一律返回部队。

余洪信也离开了巴盟。谁知他刚离开巴盟,告状信就寄到了周恩来那里,反映他生活腐化,乱搞男女关系,强奸、侮辱33名妇女的种种劣迹。

63军核查后,召开常委会讨论余洪信的问题。余洪信自知理亏,在军政委曹步墀主持的多次常委会上,他虚心接受批评,表示给他什么处分都可以,只希望保留党籍。

63军常委会充分考虑了余洪信的意见,给他留党察看两年的处分,行政撤销副军长职务,从12级降到17级。余洪信表示同意这样的处理,没有更多的意见。

63军常委会将处理意见上报北京军区,北京军区政治委员纪登奎批示:“此人错误严重,检讨不深刻。”

北京军区司令员李德生画了一个圈,退回了63军。

李德生和纪登奎历史上都与北京军区和北京军区的老部队63军无缘。余洪信这时体会到“山头主义”的好处了,如果北京军区是杨成武、郑维山等老首长坐镇,或许会对这位战斗英雄网开一面?他们是看着余洪信成长起来的,可惜他们在1968年3月“杨余傅事件”中都被打倒,如今不知被关到什么地方去了。

63军军长阎同茂是河北深县人,与余洪信是老乡。他1966年7月任63军副军长,1970年12月任63军军长,和余洪信共事时间比较长,对余洪信的历史和性格都比较熟悉。但也许正因为此,他更不敢替余洪信说话。

曹步墀和阎同茂传看了北京军区的批示,通了气,然后召开常委会,叫来余洪信,把纪登奎的批示念给他听,让他再作进一步的深刻检讨。然后叫他离开,继续召开常委会。

曹步墀说:“看来老余的问题上边看得很严重,我们两位书记研究了一下,老余的问题下一步各位常委就不要插手了,由我们两位书记负责,有事我们直接找他。”曹步墀一连说了几遍不要插手。

会后,惴惴不安的余洪信找63军副政委宋双来,也找了另一位副政委和政治部主任李立。他反复问:“我的错误这样处理还不行吗?

难道还要判我的刑吗？军区领导是不是还有其他批示？”

余洪信之所以第一个找宋双来，因为宋双来也是63军著名的战斗英雄，彼此关系不错。宋双来注意到余洪信的脸色很不好看，但因为曹步墀明确交代不让其他常委管，所以宋双来等几位常委对余洪信都没敢更多的劝解。宋双来坦率地告诉余洪信：“上边的批示内容就那么多，别的问题没有。”希望他把检讨再写深刻一些。要相信组织，着重是提高对错误的认识。

5月17日早晨，余洪信注意到军部小招待所的战士在打扫高级房间，得知是为北京军区张正光副政委准备的。此时余洪信非常敏感，他心想：张副政委来军里干什么？一定与处理他的事情有关，会把他怎么样？没准会宣布判他的刑？这些天，余洪信真成了丧家犬，走到哪里都成了议论对象。人们在远远近近的议论他的作风问题，当他走过时，大家又装作什么都没说，只用异样的目光偷偷打量他，男女作风问题使一个人的从前和以后都变得不光彩。

回到家，平时言听计从的老婆、女儿都在，可是没人理他。他在家里的地位也一落千丈，心中的落差可想而知。

5月17日晚上，部队文工团在军部礼堂演出《白毛女》。余洪信以前忙得四脚朝天，哪有时间看这类节目，现在他没事干，又心里烦闷，便跟老婆一道去消磨时间。他清楚，他老婆已经被组织上安排秘密监视他，所以走哪跟哪。偏偏这天演出《白毛女》，余洪信心情复杂极了。按说他也是大春式的英雄人物，怎么就成了人人喊打的黄世仁呢？

余洪信这个晚上根本睡不着觉。回到家，老婆和女儿都不理他。他越想越没有出路，决定孤注一掷。5月18日凌晨2点多钟，他乘老婆熟睡，从家中跑出来，到了军警卫连。哨兵见是副军长，以为他查哨，给他敬了一个礼，就专心站岗了。余洪信径直走进去，从挂在墙上的手枪中抓了两支往腰里一插，拔腿就走。

当他再次推门回到家里时，他手里有了一把枪。老婆诧异地问：“你的枪不是收回了吗？你怎么又有枪了？你这是怎么回事？”

他什么都没回答就朝着他老婆开枪了。他女儿警醒得比他的老婆快，抢先一步拦了他一下，子弹没打中他老婆。他喜欢他的这个小

女儿,所以也就没有朝女儿再开枪。

63 军军部大院里最初的两声枪响,就是余洪信向他老婆开的,因女儿拉住而没打到。余洪信的老婆从家中边喊边跑了出来,余洪信也从家里追了出来。

恰在此时,他迎面碰到听到枪声走出家来的杨兆魁副政委。杨副政委高度近视,还没看清提着枪的余洪信,刚问“哪里打枪?”已被余洪信抬手一枪,打到他的肩膀处,应声倒地。

余洪信没有再追他的老婆,而是提着枪来到 63 军军长家,敲军长家的门,里边没人应,没人开灯。他在军长家的门外站了一会儿,等着有人给他开门,谁给他开门……

没人开门,余洪信转身就往政委家走。政委家也黑着灯。他敲门,屋里的灯亮了,余洪信在暗处,透过敞开着的窗子,看见是政委的老婆邢玉荣开的灯,他等不及政委的老婆走到门口给他开门,透过敞着的窗子就从窗外就朝里打了几枪,政委的老婆一命呜呼。正在床上睡觉的曹步墀是战争年代过来的人,抗美援朝立过特等功,他见事不妙,一骨碌滚到床下躲藏起来,毫发未伤。

余洪信从军首长住的小院往外走,这时候,负责首长小院警卫的战士张彦平正一路循着枪声跑过来,看见迎面过来了一个人就赶紧问:“谁啊?”

话刚出口,子弹也到了,余洪信举手就朝着那位战士开了枪,战士受伤倒地,这是最后一个看见余洪信的人,自此,余洪信就在人们的视线里消失不见了。

余洪信跑了。

“913”事件发生还不到一年,又发生军级干部开枪杀人事件,此事非同小可。总政治部接到北京军区的紧急报告后,将余洪信案通报公安部。搜寻到第 12 天,余洪信仍踪迹全无,国家公安部连续两次向全国发出《查缉现行反革命分子余洪信通缉令》。

# 通　緝　令

各市、地、州、县公安机关军管会、革委会人保组，成都铁路局公安处军管会、人保组：

现将公安部一九七二年五月廿九日第二号通缉令转发你们，请按照公安部要求，立即传达布置，切实认真的贯彻落实，在未接到公安部通知前，不得撤销工作，不得放松警惕，发现情况，请速告我们。

（请勿张贴）

中国人民解放军四川省公安机关军管会
四川省革命委员会人保组
一九七二年五月廿九日

附：公安部通缉令（第二号）

现行反革命分子余洪信，于一九七二年五月十八日凌晨二时许，行凶杀人后，畏罪潜逃。

余犯现年四十七岁，男，身高约1.8米，身体肥胖，留短发，黑红长圆脸，肉泡眼皮，厚嘴唇；头顶稍后有拇指大的一块伤疤没头发（内有弹片），左右上眼皮留有做倒睫手术的伤疤，但不明显；上门牙中间镶有白色塑料牙缝；喉头下方偏右有子弹伤疤；右或左鬓角下有不明显的伤疤；右肩有伤疤，比左肩低。余犯操河北省武强县口音。潜逃时，着旧草绿色单军衣一身，戴一号新军帽，佩戴领章、帽徽（注意余犯化装），内着天蓝色府绸衬衣，驼色毛背心，浅鱼肚白色秋裤，穿黑色松紧口四眼鞋和驼色尼龙袜，携带"54"式手枪两支（枪号：后三码360、639），子弹若干发，以及电镀钢笔式手电。会开汽车、摩托。

各单位接此通缉令后，立即传达到所有工人、贫下中农、干部、职工、学生、居民及解放军指战员，并熟悉其特征，在车站、码头、边防口岸等地布置查找，发现后将其拘留，严防行凶、自杀、逃跑，并速告我部。

查缉余犯的各项具体措施，必须保证落实，各边防口岸必须严密控制，严防外逃。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
一九七二年五月二十九日

其中第二号"通缉令"称：

各省、市、自治区公安机关军管会：

现行反革命分子余洪信，于一九七二年五月十八日凌晨二时许，行凶杀人后，畏罪潜逃。

余犯现年四十七岁，男，身高约1.8米，身体肥胖，留短发，黑红长圆脸，肉泡眼皮，厚嘴唇；头顶稍后有拇指大的一块伤疤没头发（内有弹片），左右上眼皮留有做倒睫手术的伤疤，但不明显；上门牙中间镶有白色塑料牙缝；喉头下方偏右有子弹伤疤；右或左鬓角下有不明显的伤疤；右肩有伤疤，比左肩低。余犯操河北省武强县口音。潜逃时，着旧草绿色单军衣一身，戴一号新军帽，佩戴领章、帽徽（注意余犯化装），内着天蓝色府绸衬衣，驼色毛背心，浅鱼肚白色秋裤，穿黑色松紧

口四眼鞋和驼色尼龙袜。携带“54”式手枪两支(枪号:后三码360、639),子弹若干发,以及电镀钢笔式手电。会开汽车、摩托。

各单位接此通缉令后,立即传达到所有工人、贫下中农、干部、职工、学生、居民及解放军指战员,并熟悉其特征。在车站、码头、边防口岸等地布置查找,发现后将其拘留,严防行凶、自杀、逃跑。并速告我部。

查缉余犯的各项具体措施,必须保证落实,各边防口岸必须严密控制,严防外逃。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

一九七二年五月二十九日

考虑余洪信曾任巴盟前指总指挥,对巴盟边界一带很熟悉,怕他从巴盟越界逃跑,便在巴盟地区加强封锁。当地驻军和内蒙古建设兵团的知青都参与搜捕工作。

这天上午,一辆军用北京吉普从五原方向向乌不浪口疾驰而来,从车牌上看是巴盟前指的车。站岗的士兵举起手中的小红旗,示意停车检查。没想到北京吉普不但未减速,反而加大油门想冲过去。带班的见情况不好,迅速拔出手枪朝着天“啪啪”就是两枪。吉普车一个急刹车,停在了岗哨前。

停车后,吉普车司机往对面山梁上望去,立刻吓出了一身冷汗:只见山梁上架着一挺轻机枪,两个当兵的爬在机枪后边,已经瞄准了他。如果再不停车,肯定就是一梭子。

巴盟前指与巴盟军分区的关系一直不好。巴盟军分区是个师级架子,是地方部队,前指的人一直不把军分区放在眼里。在乌不浪口设卡的是军分区骑兵团的,而这辆吉普是前指的,自然没把他们当回事,于是发生了上述一幕。当然,车上并没有余洪信。

在潮格旗有一个空军的雷达站。雷达站的一辆汽车修理后在荒滩上试车。负责追捕余洪信的解放军战士从望远镜里发现一辆军车走走停停,怀疑是余洪信要越界逃跑,就向上级作了汇报。上级指示,必要时可将其击毙。解放军战士埋伏在汽车前方,待汽车离近后,一梭子冲锋枪打了过去。军车被打懵了,停在原地动也不动。战士们围过去才发现是空军的车子。幸好子弹没有打着人,只是把车身打成了

筛子眼。

各地的消息纷纷报来,到处都说发现了余洪信!

这一天,又有报告,黄河老牛湾那个地方漂着一具尸体,头上有疤,很像余洪信。中央专案组乌国庆等人申请了一架直升机,直奔老牛湾现场。

飞机降落到一个叫偏关县的地方。直升机降落到离地没多高的距离时,驾驶员忽然看见下边有电话线,飞机要是落到电话线上或是电话线要是缠到飞机上,那可就全完了,驾驶员赶紧关油门,惊魂未定中飞机就掉下去了……

直升机重重地墩在了地上,没有爆炸,但飞机上的暖壶水瓶都碎了。机上人员侥幸受了点轻伤,其实他们都心知那是侥幸地逃过一劫。

当地老百姓没见过飞机,这个稀罕啊,什么都不干了,纷纷从田间地头和家里往落飞机的那块地界跑,不一会儿就把乌国庆他们连同飞机都围上了。

乌国庆一行人下了飞机,不敢耽搁,就往现场奔。离开县城没多远就进到了沙漠里,车子在沙漠里走不了,乌国庆他们只好下来推。可是,那车子在沙漠里推也推不动,退也退不出来了,没辙,他们只好带上勘查检验现场必备的工具和照相器材,身背肩扛,在沙漠里走啊走,整整走了一个晚上,带路的人说离现场还远着呢。一行人一听几近崩溃,这时才觉出又困又饿,他们寻到一个老乡家,放倒身子睡了一觉,再走,到了中午 12 点,终于走到了现场。那儿的确横陈着一具尸体,已经腐烂了。一检验,乌国庆说,这个人不是余洪信。余洪信打仗时脑袋受过枪伤,弹皮留在了头皮里。这个人虽然头皮上也有疤,但头皮里没有弹皮。再有,余洪信的阑尾不在了,经解剖尸体,这个人有阑尾。这个人肯定不是余洪信。

来时的飞机摔坏了,乌国庆他们只能等救援的飞机。

救援的飞机降落时没有通知当地驻军,所以当地部队看着在空中盘旋来又盘旋去的飞机,以为是余洪信来了。等飞机一落,他们就把飞机包围了。机上的人赶紧跟部队说明情况,说是来接中央派来的办案子的同志。一说老牛湾,战士们说那远了,飞过几十公里了。

直升机重新起飞。这一回看见乌国庆他们几个人了。飞机在他们头顶的上空转了半天,最终把他们带到了一个实验机场。机场那儿有部队把他们往县城送,沿路看见到处都在设卡,跟他们同车的一个战士,长得有点胖,过卡下车接受检查时,人家就把他给按住了,非说他长得像余洪信。乌国庆他们解释半天,才让人相信他们是来抓余洪信的,并非余洪信。

1972 年 6 月,山西省榆次的一垄麦田,发现一具尸体和两把枪。发现尸体的两个后生不知深浅,一人用镰刀挑着一把枪,到支部书记那儿报告去了。而支部书记的目光不由自主地落到了桌子一角的那张通缉令上:一张盖着中国人民解放军省公安机关军管会和省革命委员会人保组红色印章的通缉令,后附公安部的二号通缉令。

书记看着通缉令,越看眼睛越发花,头皮越发麻。他一时无法把麦田里的那具尸体和两把枪跟这么大的一件事儿联系起来,一个全党、全军、全国人民都在抓的人,63 军副军长余洪信,居然就死在了自己管理的地界上?社会上早已把这件事传得沸沸扬扬了,远比通缉令上说得邪乎。通缉令上只说是行凶杀人后畏罪潜逃,杀了什么人?杀了几人?因何杀人?一概没说。传言满天飞,人们乐于听更乐于传,哪儿管传言有几句是真,有多少是假。况且,人们更为关心的是余洪信究竟逃到了哪里?接下去还会发生什么?

书记的眼睛盯在那两把枪上,冷汗顺着手心就流了下来。天下传言汹汹,现在最重要的事儿就是,不论那人是真的余洪信还是假的,都必须赶紧向上报告!

报告一级一级,从县到省,不敢延迟。省里派人去看,觉得没问题,63 军军长看后说就是余洪信,公安部报给中央。中央说:“那不行,不能说就是,得拿证据说话,首先要弄清是不是余洪信,如果是,怎么死的,自杀还是他杀。”

奉命抵达山西榆次的乌国庆看见了那片麦田,麦子倒伏。一个人就躺在一片麦子的倒伏里。

这个人到底是不是余洪信?从中央到地方,直至这一片麦田四周站满的人群,远的近的,看得见的看不见的,一层一层的人都等着乌国庆看后给出一个结果。

两支枪在。是被搬动过的那两支枪。那两个报案的后生头都不敢抬,生怕他们因动过那两支枪从此牵累到他们。

乌国庆仔细查枪号,余洪信的两把枪是从警卫连拿走的。枪号正是63军军部警卫连的。此人应该是余洪信。但这并不能足以就证明该人就是余洪信。

乌国庆又看那人头上的帽子,帽子上有余洪信的名字。

那人身上还有钥匙。紧急派人送军部,一串钥匙,有能打开他家门的,也有能打开他办公室门的。

血型,和余洪信档案里的血型一致。

这个人的头部有疤,头皮里有弹片。跟余洪信的特征一致。

再有,尸体腐败的程度,与余洪信逃出的时间吻合。

另外,让他的老婆孩子们看,他的老婆说,毛衣是我给他织的,鞋垫是他在内蒙古时,那些野女人给他纳的。他的孩子看了也说是。

乌国庆认定该人就是余洪信确定无疑了。

那么,接下来的关键就是余洪信是怎么死的,自杀还是他杀?

乌国庆鉴定为自杀:死者的头部同时各有接触射击的射入口和射出口,说明余洪信是用两支枪同时发射的。

# 第1246回：为治安，决定开全国会议 放汉生，恩来谈基础理论

“913事件”后，各地来北京上访、申诉和要求平反的人员一下子多了起来。由于北京外来人员激增，他们的心绪不平，导致1972年以后的北京社会秩序一度比较混乱，甚至发生了一些比较严重案件。在此期间中南海周围发生过危及安全的事情22起，71人次。其中闯门的11起，拦阻首长、外宾车汽车4起。投北海自杀、吞针、自焚、沿街卖子、白日打灯笼的5起。公开投递反革命信件、胸挂白布反动标语牌等2起。大会堂周围发生危及安全的事情6起，首长行车出过险情，上访人员企图闯门求见首长，反革命分子公开递交反动信件等。钓鱼台1972年5月发生过一起精神病人闹事。京西宾馆周围尚未发生什么问题。

这些事情多数是上访人员因为问题没有恰当解决而发泄不满。

6月2日，周恩来批示治安和警卫部门，对北京特别是中央核心驻地和办公点的安全保卫形势做一汇总和归纳，并制定出相应方略。

6月9日，公安部部长李震、副部长于桑、中央办公厅警卫处副处长兼中央警卫团政委杨德中、人民大会堂管理处处长刘剑，联名给周恩来写了一份报告，概述了1971年12月以来中南海、人民大会堂、钓鱼台和京西宾馆一带的治安情况，并提出了今后加强警卫的措施。

在叙述了中南海、大会堂、钓鱼台、京西宾馆四个重点地方的具体警卫措施后，报告还提出要采取内部保卫、治安管理和武装巡逻三结合的办法，加强工作，既有分工，又密切联系。日常工作和遇有重大活动，建议由中办警卫处实施统一领导。

报告还谈及中央重地和首都的安全与相邻地方的关系。因为最近几个月，华北和东北几个省来京上访人员又有增多，对社会治安发生不利影响，对安全保卫工作威胁较大。

周恩来在这份报告的许多段落旁边都做了批语。从批语上看，他

对这份报告不是十分满意,而且认为还有许多工作要做。他在报告最前面做了一个总的批示:康生(暂不送)、江青、春桥、文元、剑英、先念、登奎、德生、东兴同志:

兹事体大,务请德生、登奎、东兴、吴德、吴忠、杨俊生、李震、于桑同志邀集中办、国务院办公室、军委办公厅和杨德中、刘剑、刘传新、邬吉成等同志切实一商,务求合乎政策,件件落实,并保证情况在六月下旬能开始好转。

周恩来对李震、于桑、杨德中、刘剑报告做出批示时,已经是6月13日了,他要求保证在当月的下旬形势就呈现好转,简直是要立竿见影。于是,公安部和中央警卫局立即商议,拟订具体措施,进行部署,展开有效的工作。

在商议的过程中,大家普遍感到,从文化大革命开始至今,从事警卫的部队的战士已经因老兵退伍、新进兵员产生了一些变化,但警卫业务的学习却基本处于废止状态,只靠在执行任务的布置时简单的交代,是不能很好地胜任警卫工作需要的。因此对警卫工作人员进行警卫业务的教育,十分必要。

此外,在中南海、人民大会堂、钓鱼台等重点地方,都制定和采取了一系列加强警卫的措施。例如针对报告中提到的有人在北海大桥上往中南海这边投水自杀的情况,将北海大桥两边的栏杆加高了。第一次,加高的高度不够高,还是有人攀上去往里跳。周恩来提出再加高些,并且要求铁栅栏的顶端做成尖的,以有效地阻拦投水者。

因为1972年以后出现的社会秩序和治安问题,并非只在北京有所反映,而带有普遍性,在全国各地皆有所反映。而周恩来在6月13日批阅李震等人的报告时,也有“要正式提起沈阳军区、北京军区和有关八个省、市、区党委开会同志注意”批语,中央决定,于当年8月底,召开了全国的警卫工作座谈会。

此时,又有很多老干部给毛泽东写信,反映他们的问题。

1972年6月28日,毛泽东在原军事医学科学院院长贺诚的来信上批示:“贺诚同志来信请中央处理。我意应给予工作。”

当天,周恩来和叶剑英、李先念先后就贺诚工作事批告有关部门做出安排。

这天,毛泽东在会见斯里兰卡总理班达拉奈克夫人时对她说:“我们的‘左派’是一些什么人呢?就是火烧英国代办处的那些人。今天要打倒总理,明天要打倒陈毅。后天要打倒叶剑英。这些所谓‘左派’现在都在班房里头。”

7月5日,周恩来在上海送走斯里兰卡总理班达拉奈克夫人后,接见中共上海市委常委,同他们就国内外形势和当前主要任务谈话。他说:

“当前世界局势复杂,我们总的战略是利用矛盾,分化孤立主要敌人。团结朋友,包括间接同盟军,各个击破。推迟战争爆发。”

关于对外交往问题,他说:“凡是我们不能做的,不要人家做;越是小党小国,越要注意,否则是大国沙文主义。”又说,“二十多年,我们的国际地位提高,是事实,但同时又是‘盛名之下,其实难副’。”

在谈到国内问题时他说:“出了林彪事件,出现这么一个结局,谁也没料到,谁也无法导演。林彪之死,真是天造地合。这是必然性的结果,偶然性的出现。关于当前的主要工作,有两件事:一是专案审查,这么多人,要清查一下,排个队。要给他们政治生活、学习,不要搞政治隔绝;二是‘三支两军’,军代表、军宣队问题,要肯定基本成绩,但也有许多地方风气搞坏了,要改。”

廖汉生子女给毛泽东写信反映,其父在1967年被隔离审查后,毛主席曾几次提到要他出来工作,但至今未见动静,希望让其父回京治病,等待组织结论。7月7日,毛泽东在廖汉生子女的来信上批示:

“送总理阅处。我看廖汉生和杨勇一样是无罪的,都是未经中央讨论,被林彪指使个别人整下去的。此件你阅后请交剑英、德生一阅。”

7月8日,周恩来将毛泽东所批廖汉生子女来信,派专人送叶剑英、李德生、李先念、纪登奎以及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传阅。

7月10日,廖汉生被告知要回北京。廖汉生以为又要接受更大的批斗。他被押着来到石家庄火车站。列车开动后,看守班的战士没有上车,只有专案组的两个人寸步不离地跟着他,连上厕所也要跟着。到了北京站,车厢门口已经停着两辆车,一辆伏尔加小轿车,一辆是北京越野车。开始,他们叫廖汉生坐进伏尔加车,没过两分钟,又觉得不

对头,把他从伏尔加车里拉出来,坐上越野车。坐了一两分钟,他们又觉得不对头,把他又拉回到伏尔加车上,把廖汉生搞得莫名其妙。

汽车驶出北京站,廖汉生听到有人对驾驶员说了一声:“去宾馆。”猜想大概是押到北京军区的西苑宾馆。没想到,汽车驶过军事博物馆,向左一转,进入京西宾馆,在宾馆大楼前停下来。门口有总政治部的一位干事等在那里,问清楚情况后,把廖汉生带到二楼西头的一个大套间里,转身走了出去。过了大概一两分钟,那位干事进来对廖汉生说:“李主任要你去。”这次,专案组的人没有跟着,只有廖汉生一个人在那位干事的带领下来到另外一个房间。

李主任就是总政治部主任李德生,廖汉生不认识他。

李德生代表总政治部谈话,告诉廖汉生:“第一条,毛主席说的,你没有罪行,有错误。第二条,你从现在起解除监护。”

“什么监护?”廖汉生对这个词很生疏,心想:我不是被关起来吗,噢,这叫监护。

李德生又问:“五七一,你知道不知道?”

廖汉生回答:“我不知道什么五七一。”

李德生告诉他:“五七一,就是林彪搞的那个‘武装起义’计划。”

接着,李德生给他简要地讲了一下林彪的情况:阴谋发动武装政变,谋害毛主席,以及怎么摔死的。

随后,廖汉生向李德生讲了孩子们都被赶下乡的情况。李德生告诉他:“孩子们现在还不能回来,这是一项大政策。”

谈完话,总政干部部魏伯亭部长送廖汉生回到二楼西头的大套间。在那里,魏伯亭当着他的面对北京军区专案组的两个人说:“你们回去吧,他已经解除监护,今后就由总政负责管理。”

专案组的人走了,魏伯亭也走了,大套间里只剩下廖汉生一个人。他掐指一算,5 年多来,身边 24 小时都有人“监护”,“前呼后拥”的,也习惯了,现在突然一下子就他一个人了,又恢复了自由,真是百感交集,欲哭无泪!

一天,军委副主席叶剑英在楼下的会议室里开会,抽空上来看廖汉生。叶剑英告诉廖汉生,是毛主席要他来的。毛主席说:“廖汉生出来啦,你去看看他。”叶剑英关心地询问了廖汉生的身体状况。随即,

总政治部安排他到301医院检查身体,治病。

7月31日,廖汉生接到去人民大会堂出席“八一”建军节招待会的通知。他怀疑地问通知人:

“我还能出席‘八一’招待会呀?”

一会儿,廖汉生碰见了久违的王“胡子”——王震。王“胡子”问:“通知你了没有?”

廖汉生答道:“通知了,我能出席吗?”

王“胡子”语调重重地说:“当然能出席,一定要出席!”

7月21日,陈云给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写信:“请求中央根据我身体情况,分配给我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如果没有适当的工作可分配,希望能参加北京老同志学习班,在春秋季节到外地去看看,可否破例在往返的路上给一个能烧暖气的公务车。”毛泽东批示:“印发。请中央商定。我看都可以同意。”

毛泽东在第二天,7月22日阅后批示:“印发。请中央商定,我看都可以同意。请总理办。”

不久,陈云即参加国务院业务组,协助周恩来考虑经济特别是外贸方面的一些方针、政策问题。同时,参加了在京老同志学习班。

7月31日,陈云和王震、苏振华、杨勇、廖汉生等一起出席了国防部庆祝建军45周年的盛大招待会,陈云的名字前又冠以“副总理”的字样出现在报纸上。

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著名美籍华裔科学家杨振宁于1971年首次访华,在中国逗留了四个星期,看了不少地方,包括北京、上海、合肥和山西大寨,参观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生物化学研究所、生理学研究所及核物理研究院,及他的母校原崇德中学,当时已改名叫北京第三十一中学,并受到了周恩来的接见。这次访华,使他看到了当时的中国与1949年以前的中国比较,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看到了文革给中国人带来的巨大的精神变化。他回到美国后,做了多次演讲。其中,他于1971年9月21日,在美国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做的题为“我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印象”的演讲中,开宗明义地说道他在中国的感觉:

“我想归纳一下我所见到的变化,最重要的一点,也是最值得中国

人自豪的一点,就是:‘精神’。”

“‘为人民服务’已成为全中国人民生活的主调。”“到中国几天后,我就体会到这句话的巨大意义。因为这句话不但是同事们每天谈论的主题,而且也是他们每个人每天不论在公共场所或私下里用来批评自己以及批评别人的生活和工作的标准。”

杨振宁一开始也是带着偏见进入中国的,他说:“有一种流行想法,以为生活在强调‘为人民服务’的气氛下,一定使人成为奴隶,不能笑,心情一定不会是轻松愉快的。我自己也是存着这种想法进入中国的。后来,我发觉这种想法是完全错误的。”“我感到惊奇的是我看见人们谈到文化大革命时都似乎毫不紧张,而且表现得很轻松。事实上,他们还乐意以此为话题。”

对中国百姓的生活,他说:“今天中国普遍的生活条件依然很低,但最低限度不会感到粮食缺乏。农村和城市都是这样。不仅是米及面粉不缺乏,蔬菜及水果也是极多的。当我在北京、上海、合肥等地的街上行走时,我看到这现象。价钱方面也很便宜。我还留意学生们、工人们及农民们吃些什么。”

而农民精神面貌的改变更令他印象深刻。他说:

“以前的农民承受了数千年的传统,他们往往认为他们的祖先是贫穷、挨饿的,但他们却仍然会因循着祖先的旧路走去。相比之下,我们可以看见现在的中国农民在思想上和精神上的转变是何等的巨大。”

杨振宁的结论是,中国粮食问题的解决,和以大寨为代表的中国农村的巨大变化有关。

中国教育的巨大变化也令他印象深刻。他说:

“我在前面谈到的第三十一中学,位于北京市中心,以前是一所男生寄宿学校,现在学生增加到一千六百人,等于原来数目的四倍了。”

“教育上另外一个重要方面是学校的招生制度。要是认为这里的美国学校的招生制度,算是革命性的话,那么他们就更应去中国学习。”

对中国的中学生在毕业之后,要先到工厂、农村、部队工作两三年,然后再经过工农兵推荐的程序到大学学习。杨振宁说:

“我深切地感觉到用这种形式选择出来的学生中绝大多数具有非常良好的求学动机,而我也相信他们一般智力程度和以前任何旧制度下的学生一样的好。”

杨振宁的这次演讲,内容十分丰富,其中还涉及到了当时中国的医疗,包括针刺麻醉、避孕与堕胎、烧伤康复等内容,也还有他和大寨社员交流的感受以及科研、工业、市民的日常生活、妇女解放等方面的内容。

在演讲中,杨振宁也没有讳言当时中国存在的问题,但无论如何,他看到的是毛泽东时代明朗自信的人民,以及一派欣欣向荣,已经初步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中国。他认为中国的一切积极变化,都和人民群众掌握了毛泽东思想有关,所以,他深有感触的说:

“难怪中国人民都说毛泽东主席是大海航行上的舵手。

在演讲结束后回答问题时,杨振宁以一个美国人的身份感叹道:

“在中国,在物质上,很多方面仍然有着很大的需求。但我发觉到最令人感动的是在精神方面。回过头来看看美国这个国家,我怀疑是否因为过分注重物质享受,因而使到这个国家失去那份使她有今日成就的精神了呢?”

掌声响起。

1972 年 6 月,杨振宁第二次回国探亲,7 月 2 日凌晨,周恩来会见杨振宁。在会见中。周恩来对对杨振宁提出的中国应加强基础理论的研究和交流的建议表示赞同,他说:

“我们的理论太贫乏了,而且我们也不跟人家交流,恐怕这话有道理,你看到我们的毛病了。”“理论不提高,这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不能总结经验,再回到实践中去,再提高,二是对人家的经验不那么感兴趣,不能去多听多看。你有好的意见我们应该听取,我们应该能够学到一些东西,不要还是自高自大,听不进去你提的意见,或者表面上说好,接受,你走了以后就无所谓了。你热情指出我们一些缺点,我们要是听了当耳边风就很危险,我生怕我们老一代的科学工作者这样。”

7 月 14 日晚,周恩来会见正在中国参观、探亲的美籍华人学者参观团和美籍华人学者访问团全体成员。会见前,他与一些参与会见的中国科学家及相关单位负责人员谈及大学招生中的“走后门”问题。

他对北京大学的周培源说:“北大应招一些条件好的学员,给科学院培养。”

然后对中科院物理所、数学所的负责人说:“你们是见证,今天说了。”

他又问时任北京大学革委会主任的杨德中:“新学员水平问题怎样?”

周培源回答说:“新学员水平有困难。”

中国科学院的一位负责人秦力生说:“科学院从山西招了一百多学员,交各大学培养,都是县委书记的子弟,水平不够。”

周恩来很生气的说:“都给我退回去!”

秦力生:“也不都是县委书记子弟,反正都是干部子弟。”

周恩来:“我也知道不都是县委书记子弟。都退了,名单给我。”

秦力生:“我和岳志坚同志商量过,觉得这事不好办。”

周恩来:“你们没一点文化大革命后的样子。只在旁边说,不敢负责,没一点文化大革命后的样子。主席讲了,有些地方就是不办。以后这样就得搬开。”

岳志坚是国务院科教组一位负责人。

因为要接见的代表团就要进来了,谈话就此结束。

由于“走后门”上大学的情况当时已成风气,这批学生最终也没有退掉。

特权在文革前也有,但那时是以合法、明确的形式出现。文革开始后,特权已成过街老鼠,被批的臭不可闻。但是在局势稳定后,一些部队干部利用权力“走后门”却又变得如此明目张胆、肆无忌惮。当时各级革委会中的领导,大部分是部队干部担任,工作方法简单,其专横跋扈,听不进不同意见的现象,在个别地方甚至较文革前的地方干部有过之而无不及,民主似乎又开始离群众越来越远。当然,这是一种错觉,因为在文革前很多人并没有参与到民主中去,所以对民主的要求并不迫切。而经历了文革大民主后的中国百姓,对领导中出现的任何特权和专权的行为,都非常敏感,并且敢于表示反对了。所以,他们对一些部队干部压制民主的现象尤为反感。而“走后门”的行为,其实也没有人敢“明目张胆、肆无忌惮”的去做了,形式上都履行了当时的

相关规定和程序。但是,最后的结果是,干部子弟参军、上学的比例远远大于普通百姓,这不能不让经过文革洗礼的群众感到不公。有些人认为,仍然活跃在台上的一些积极分子此时已不再代表任何群众。无论是文革中的造反派还是保守派,一些人产生了上当受骗的感觉,群众之间的裂痕开始消弭,思想开始趋同。

周恩来在7月14日晚与美籍华人学者参观团和访问团谈话中,提出应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指导下,在广泛实践的基础上,加强国内自然科学基础理论研究工作。同时,他再次称赞杨振宁不久前提出的关于应加强基础理论研究和交流的意见,并对参加会见的周培源说:"你回去要把北大理科办好,把基础理论水平提高。这是我交给你的任务。有什么障碍要扫除,有什么钉子要拔掉。"

7月20日,毛泽东在商业部的一份报告上批示:"报纸上的文章太长,谁看?要改一下。"周恩来看到后说:"林彪就是搞这一套,批林整风要从整顿文风开始。"

这天,周培源致信周恩来,说"在北大传达周总理的讲话后,广大教师心情激动,深切感谢党中央的关怀。"信里也反映了许多教师仍然存在顾虑,主要是觉得搞"科研工作反复性很大,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来一次运动首先受到冲击的是基础理论研究","怕挨'理论脱离实际'的批评。"

7月23日,周恩来就周培源20日来信事批告国务院科教组和中国科学院负责人:"把周培源同志来信和我的批件及你们批注的意见都退给你们好作根据,在科教组和科学院好好议一下,并要认真实施,不要如浮云一样,过了就忘了。"

# 第1247回：换内阁，日中邦交正常化 震动大，西德施罗德访华

为加强中日民间交流，1972年年初，中国确定上海芭蕾舞团访日演出，中央决定由中日友好协会副秘书长孙平化担任上海芭蕾舞访日代表团团长。于是，正在“五七干校”的孙平化回到北京。一个星期后，7月4日，他率领从朝鲜演出归来后正在北京休整的上海芭蕾舞团，从北京坐火车出发，经广州到香港，再从香港转机去日本。就在这时，日本政局也发生了变化。

6月17日，日本佐藤内阁下台。7月7日，田中角荣就任内阁总理大臣。田中上任当天就在讲话中说：“在动荡的世界形势下，应该加速实现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邦交正常化，强有力地开展和平外交。”他还在第一次内阁会议上明确表示：“要以实现同中华人民共和国邦交正常化为急务”。

第二天，7月8日，周恩来召集外交部及其它外事和宣传部门负责人开会，研究日本田中讲话。他说：“新华社昨天送来的关于日本新内阁组成的稿子写得太简单，既不写新内阁是怎么产生的，也没摘他的外交政策方面的言论。我们对日本，过去只搞人民外交，不同官方往来。今后当然主要是搞人民外交，但同官方也要往来。形势变了，日本政府的政策也不能不变。情况变了，我们要积极工作，在报道上就要反映出这一精神。”

当晚，周恩来到毛泽东处谈话。

7月9日，周恩来在欢迎也门民主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团访问中国的宴会上讲话中提到：日本“田中内阁7日成立，在外交方面，声明要加紧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这是值得欢迎的。”

7月10日，上海芭蕾舞访日代表团抵达日本，在羽田机场受到日本各界2000多人的欢迎。

7月16日，周恩来在接见日本社会党副委员长时说：

如果现任首相、外相或其他大臣来华谈恢复日中邦交问题,北京机场准备向他们开放。

现在我们应该向前看,而不应该向后看,要解决今后的问题。田中政府采取这样向前看的政策反映了广大人民的愿望,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恢复日中邦交并不要反对哪一个国家,不是为了反对美国或者苏联。

以中国为中心,我不同意。如果说中日两国友好来推动远东的和平,那还可以。但拿中国作中心,那恐怕不恰当,是错误的。亚洲、太平洋地区所有国家应不分大小,一律平等,一句话,就是我们反对任何霸权,也不谋求霸权。

7月17日,以中国农林部副部长郝中士为团长的中国农业农民代表团抵达日本。周恩来委托随团访日的外交部亚洲司日本处处长陈抗,向正在日本的上海芭蕾舞访日代表团团长孙平化和7月3日晚刚刚抵达东京的中日备忘录贸易办事处新任驻日首席代表肖向前,转达"抓紧时机、多做工作"等重要指示。

陈抗一到东京,即来到中日备忘录贸易办事处驻东京联络处,向孙平化和肖向前传达周恩来的指示。为了保密,陈抗是通过当时日本小孩子用的简易文具板作的传达。他在文具板上写字,写完后一拉,字就消失了。这样既能防窃听又能防拍照。陈抗连写带说,一字一句传达周恩来的指示:

"田中要加紧实现日中关系正常化,我们表示欢迎。这是毛主席的思想和战略部署。毛主席讲,我们要采取积极态度。对方能来谈就好,谈得成谈不成都行。总之现在已经到了火候,这回不能只刮'旋风'了,要落地。"

周恩来在这里说"旋风",是指1971年中国乒乓球代表团在日本参加第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期间,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副秘书长王晓云,以中国乒乓球代表团副团长身份,在日本广泛接触日本各界知名人士,掀起了一股前所未有的"日中热",被当时的日本媒体称之为刮"王旋风"。

同时,周恩来还拿孙平化、肖向前的名字打比方说,孙平化就是要"把荒地化为平地,盖万丈高楼,平地起高楼",肖向前要"继续向前"

“永远向前进”,“只要田中首相能到北京当面谈,一切问题都好商量。

7 月 27 日,周恩来接见受田中首相委托访华的日本公民党中央执行委员长竹入义胜,并举行第一次会谈。

当天,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周恩来报告同日本竹入义胜会谈情况。

会议通过《中日联合声明要点(草案)》及复交三原则:

(一)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土,解放台湾是中国的内政;

(二)联合声明公布后,日本政府将从台湾撤出其使馆,并采取有效措施使蒋介石集团的使领馆从日本撤走;

(三)对日本的团体和个人在台湾的投资和经营的企业,在台湾解放时当予以适当照顾。

7 月 28 日,毛泽东审阅《中日联合声明要点(草案)》。

7 月 28 日、29 日,周恩来、郭沫若、廖承志等与竹入义胜继续举行会谈。

与此同时,中国与当时联邦德国的外交关系也出现了新的进展。

1971 年基辛格秘密访华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入联合国,同样在联邦德国引起了很大的震动,要求加快采取措施同中国关系正常化的呼声日高。

1971 年年底,联邦德国基督教民主联盟副主席、联邦议会外交委员会主席施罗德向记者表示,他愿意到北京去同中国领导人商谈两国关系问题。

1972 年 1 月,联邦德国外交部长办公室主任勃鲁纳在一个友人家里同中国新华社常驻波恩记者王殊会面时,建议两国外交代表在日内瓦或别的地方就两国关系问题进行谈判。

1972 年 1 月底,王殊在罗马尼亚驻联邦德国的招待会上看到施罗德,问到他曾两次对记者表示愿到北京去同中国领导人就两国关系交换意见。对此他有何具体想法?

施罗德想了一下,然后说,这里谈话不太方便,过些天他将打电话约王殊到他在议会的办公室去谈。

过了十几天,施罗德的秘书果然来电话,约王殊在 2 月 21 日下午到他的办公室去。

2月21日下午,王殊驻波恩新华分社的邢桂敏如约来到议会施罗德办公室。他们就欧洲和国际局势谈了两个小时,但始终没有涉及施罗德访华问题。王殊不免有些着急,便直截了当地问施罗德对访华的具体想法。施罗德表示愿在方便的时候前去访问。王殊问什么时间比较合适?施罗德表示听从中方的安排。王殊说,他将向国内有关方面报告后再来同他商谈。

王殊他们回到办公室后才知道,就在当天,施罗德的基民盟主席团已正式作出决议,要求政府迅速采取措施同中国实现关系正常化。王殊他们立即将与施罗德见面的情况报告了中国外交部和新华社。

3月,王殊收到国内电报,通知以外交学会名义邀请施罗德以联邦议会外交委员会主席的身份,可以在1972年7月14日到28日访问中国两周。王殊立刻告知了施罗德,他很高兴,说完全同意中方提出的时间,具体安排客随主便。他当晚就对报界作了宣布,在国内外立刻引起了震动。很多报刊和人士表示欢迎,认为"这是一个重大的事件","两国关系正在揭开新的篇章"。也有些报刊和人士冷言冷语地说施罗德"并不能代表政府",甚至说他是"从即将到来的大选的考虑出发谋求政治好处"。许多记者打电话或写信给王殊和施罗德,要求陪同访问,国内原来准备接待10个记者,后来不得不增加到30人。

7月15日,西德代表团在施罗德率领下首次来到中国访问。第二天,施罗德在同中国外交学会会长乔冠华会谈。施罗德说:他来北京前曾同勃兰特总理和谢尔外长讨论过两国建交的问题,他的印象是他们都欢迎建交。谢尔的设想是两国举行谈判就建交问题达成原则协议,他再应邀到北京正式签署协议。第三天,双方的会谈进入实质性商谈,施罗德说,他的想法是两国应尽快举行谈判,争取在当年11月内西德大选之前达成协议,到时像谢尔所设想的邀请他到北京签署建交公报。为此,他建议由他和乔冠华会长就建交问题达成内部谅解,以便他回国后报告政府。中方同意这个意见,经过简短商谈达成协议。双方在7月20日上午签了字。

20日下午和晚上,周恩来两次会见施罗德,进行了长达5个小时的谈话。

就在施罗德离开波恩赴华后几天,新华总社给波恩新华分社发来

急电,要王殊马上回北京。

7月21日晚,王殊回到北京。7月22日晚19时,周恩来、姬鹏飞、乔冠华等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他。

7月24日晚上21时多,王殊乘公共汽车回新华社宿舍,刚下车,就被早已等候在汽车站的外交部几个人拉住,欢喜若狂地对他说:“真是好不容易找到你了!”

原来,外交部在晚上19时左右接到通知,要王殊务必在晚上21时到外交部大门口。大家赶紧来到新华社宿舍找王殊,但是家里及邻居那里都没有。于是他们就在宿舍区内一面找一面喊,过了一个多小时也没有结果,最后决定到公共汽车站上等,终于等到了。当王殊来到外交部大门口时已近22时,外交部翻译唐闻生已在那里等他很久了。

上车后,王殊才知道,是毛主席要召见他。王殊心里那个激动呀,过去除了电影、电视之外,他还从来没有见过毛主席呢。当他忐忑不安、懵懵懂懂来到中南海,走进毛泽东书房时,看见老人家正坐在左边的大藤椅上,同周恩来、姬鹏飞、乔冠华、王海蓉谈话。

王殊激动的上前与毛泽东握手,周恩来介绍说:王殊过去在上海复旦大学上的学,学的是英文,长期在国外当驻外记者。毛泽东笑着说:“我也当过记者,我们是同行啊。”

王殊顿时觉得一股暖流涌上心头!

后来,有人估计,毛泽东这句话可能是指他过去编《湘江评论》和在解放战争时期给新华社写过不少评论和消息。

接着,毛泽东赞扬了王殊对西德和欧洲的看法,对他说:“你很了不起,可以当大使。”王殊非常激动,眼泪夺眶而出。

为缓和王殊情绪,毛泽东请他抽支烟。

王殊接过烟仔细端详,那是一支特制的尼古丁含量极低的小雪茄烟,他觉得太珍贵了,舍不得抽,放在身边的小茶几上,准备召见后带回家留做纪念。

可没想到,坐在他身旁的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顺手拿去抽了起来。屋内烟雾缭绕,香气扑鼻。王殊后悔极了,当初为什么不放在自己的衣兜里呢!

毛泽东说:“西方有些人正在讨论苏联的战略是向西还是向东,还是声东击西,有些人还在幻想祸水东移。”

“西方从第一次世界大战起就想推德国向东,不使它向西。现在,包括美国、英国、法国、西德都想推动苏联向东,推苏向华,西方无战事就好。”

他列举了中外史上一些声东击西的战例,接着说:“我讲过多次,中国是一块肥肉,谁都想吃的。但现在要吃呢,要用文的,用武的难,过去可以,过去清朝、北洋军阀、蒋介石的时候都可以。”

“在两个超级大国之间可以利用矛盾,就是我们的政策。两霸我们总要争取一霸,不两面作战。不过我也不大相信会打,但准备打。”

“苏联原来搞威胁,威胁不灵,威胁不搞了,只搞演习。如果是真要打,就不搞演习。”

“如果打游击我们就要准备,黄河以北它占不了好多,大城市我们也不放弃,在洞子里头照样打。如果俄国人真打中国,它就失败了。横直我们是打游击,不损失主力。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我能吃下的就吃一口,至于你要打我,横竖我就两条腿走路。”

“我的看法,苏联是声东击西,口里讲是整中国,实际上是向欧洲和地中海。有个英文刊物叫《新闻周刊》,有篇文章算了一笔账,说苏联是整欧洲的。它在欧洲那边包括在东欧驻扎的部队,有九十一个师,国内靠西边还有八十个师,对中国这边不过四十多个师。这种估计只当一种想法,你们外交部研究一下。我出点题目,究竟是声东击西,还是真正向东?准备它是要打。可以请一些人来,也可以派一些人出去,要搞些调查研究,情况弄得确实一些。”

“美苏争夺的重点在欧洲,双方的大军都摆在欧洲地区,争夺越来越激烈。西欧国家太多、太散、太软,受到美苏两霸争夺的威胁,要联合起来,维护和平与安全。”

“两个德国应该统一,搞两个干什么呢?无非是雅尔塔搞的。”

周恩来向毛泽东介绍了施罗德访华的情况。毛泽东说:“可以请一些人来,右翼的也请来,我也可以同他们谈。尼克松来,就在这个房间里,我们谈得还不错。欧洲矛盾很多,局势很复杂。没有什么明灯,全是胡扯的。可以请一些人来,也可以派一些人出去,要搞调查研究,

情况弄得确实一些。”

“我们外交部有条路线,中左路线,喜欢左派和中间派,就不喜欢右派。世界上就是右派当权,你怎么办呢?而我呢,都喜欢,特别喜欢右派,尼克松一类人,我就说服我周围的这些人。”

在谈到中国是否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的那件事时,毛泽东说:

“那个文件,我本来也是看了的,画了圈。后来到了晚上,考虑还是要请,就叫打电话。结果他们那边也是没有准备,就去请示东京的大使馆,马上发护照,就来了。”

毛泽东还说:“我们下一代要多找些人学外国语,把外国的好的东西学过来,坏的东西不要,好的东西批判的吸收。”

谈到国内问题时,毛泽东说:“这次我们国内开了300多人的会,他们都没有注意我的那几句话:‘在跌了几跤之后,我亦往往如此。可是同志们往往不信。’什么叫‘跌了几跤之后’呢?包括开除党籍,开除出政治局,赶出红军三四次,等等。我总是每一次就声明,要么就听我的,我就干下去,就要怎么怎么。要不然,我就滚蛋。你们再需要我来呢,那我就再来吧。”

毛泽东说的“300多人的会”,是指批林整风汇报会议。“开除党籍是指1928年3月,中共湘南特委代表周鲁到井冈山根据地传达1927年11月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决议,将开除毛泽东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误传为“开除党籍”。

关于培养接班人的问题,毛泽东说:“外国说我们现在年纪大了,寄希望于年轻人,说是我们死了就会变修。怎么办?我的意见就是要搞一点年轻人来当共产党副主席、军委副主席。所谓年轻人,就是年龄在30至40之间,要工人和农民,老年、中年也要。你们多找找,南方北方都找。文化水平低一点,用一批知识分子扶助。”

在这次谈话中,毛泽东还提到避孕措施的问题,说:“关于避孕,我看要送上门去,避孕药物、器械这些东西,免费,挨家送,因为人家不好意思来领嘛。人体的八大系统都要研究,包括男女关系这种事,要编成小册子,挨家送,不然人家不好意思啊。”

毛泽东精神爽朗,洋洋洒洒纵论国内外大事3个多小时。王殊第一次这样近距离聆听毛泽东的讲话,一代伟人善纳反面意见的胸怀,

深深感动了他。

之后,周恩来又在小会客室和大家谈了很久。他把经毛泽东批准的《外交部关于同联邦德国谈判建交的请示》给大家看,王殊看到周恩来在请示报告上写的“请主席考虑,如果有时间,接见王殊一次”,刚刚平静的心又一次翻起了波澜。

# 第1248回：说新疆，一份内参震天津 问“伍豪”，全军掀起退房潮

7月16日，经毛泽东审阅同意，中央转发新疆党委和新疆军区党委《关于贯彻在北京召开的新疆工作会议精神的情况和今后意见的报告》和《赛福鼎同志在两个党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央批语说：“新疆地处反修斗争前线，要百倍提高警惕，切实加强战备，团结起来，共同对敌，一切都应从这个大局出发。”

7月21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复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中共新疆军区党委电：“电话会议，除传达毛主席、党中央七一六批示和中央关于调整两个党委领导班子外，不要作过多解释，免生枝节。”

7月27日，经毛泽东审阅同意，中共中央、中央军委联合下发《中发28号文件》，批转北京军区党委、66军党委、天津警备区党委在“批林整风”运动中整顿军队纪律，纠正不正之风分别逐级上报的3个报告。批示指出：

“人民解放军在文化大革命中立了新功，因而有一部分同志滋长了骄傲自满的情绪，闹名誉，闹地位、贪图享受多起来了，这是一种危险的倾向。”“占用学校、医院和工矿企业的房屋，无偿占有地方的车辆和物资等情况，不仅天津一地有，全国许多地方也有；各级地方和部队党委必须采取坚决的措施予以克服。”

毛泽东在报告的批示中特别提到：“锦州那个地方出苹果，辽西战役的时候，正是秋天，老百姓家里很多苹果，我们战士一个都不去拿。我看到了那个消息很感动。在这个问题上，战士们自觉地认为：不吃是很高尚的，而吃了是很卑鄙的，因为这是人民的苹果。我们的纪律就建筑在这个自觉性上边。这是我们党的领导和教育的结果。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就是由这里头出来的。”

天津驻军66军党委和天津警备区党委报告的起因是新华社天津分社写的四篇内参：一、《天津驻军大量占用民房，严重影响军民关

系》;二、天津驻军领导人对此事的自我批评;三、天津驻军退还民房的情况;四、退房后天津军民关系得到改善。

其中第一篇内参《天津驻军大量占用民房,严重影响军民关系》是新华社天津分社记者杨继绳写的。5 月 1 日中央发出《关于杜绝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中“走后门”现象的通知》后,他到天津南开大学,想了解那里的学生走后门的情况。接待他的南开大学负责招生工作的一位负责人很干脆地回答说:“没有这回事!”

杨继绳要求查招生资料,校方搬来了。他仔细翻了一遍,每一份材料上都手续齐全。哲学系 60 多名新生,尽管一半以上是干部子弟,但也没有找到“走后门”的痕迹。调查失败了,他怏怏地离开了南开大学。在回分社的路上,看到一座原地方机关的门前有军人站岗,他马上联想到文革“支左”部队占用地方住房的情况,不觉眼前一亮,觉得自己在大学招生走后门的问题上抓不着,军队占用地方房子的事情总是滑不掉的吧!于是第二天,他在分社经济组研究报道题目时,主动报了军队占用民房这个题目,得到很多人的支持。

随后,他即到天津公用局开座谈会,了解了部队干部占用民房的情况。又调查了民园和体育馆两个房管所,了解了更多的情况。接着,他又去了市卫生局,卫生局的张玉昆向他介绍了天津第二工人疗养院被北京军区后勤部八分部占用、第一工人疗养院郑州道分院被天津警备区占用、河西区尖山一所大医院被天津警备司令部全部占用的情况。随后他又调查了天津师范学院八里台校区被天津驻军 66 军军部占用的情况,据此写出稿子,打印后交分社负责人任丰平签发,于 6 月 29 日,电传发给新华社总社,题目是:《天津驻军及部分负责同志占用民房过多严重影响军民关系》。这份内参写道:

“天津一些驻军的负责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占用了一批被查抄的爱国知名人士的私人住宅。这些住宅都是高墙、深院的小洋楼,设施讲究,环境幽静,在天津很引人注目。天津驻军有些师以上干部、一些区局的支左干部,大部分住的是独楼、独院、小别墅。”

“著名瘤科专家、市政协常委金显宅,私房一所十五间,被天津警备区政委(市委书记)占用,现在金显宅全家只住一小间。妇科专家、市政协委员林崧,私房一所十三间,被天津市公安机关军管会主任占

用。原天津一中心医院副院长、内科专家杨济时,私房一所十三间,被警备区副司令员占用,现在杨一家三口占一间地下室。河北省军区副参谋长、天津市革委会财贸组组长,占用了市政协委员乐肇基私房一所十间。”

“有的团级干部也通过各种手段占用小洋楼。某部团政治处主任,原来住房一间,文化大革命中换成六间,后来又换成九间三层小洋楼一所。他还把另外一个军人(已调走)占用过的房子私自分配给自己的熟人,房管站出来制止,他坐着小汽车去把女房管员骂了一顿。”

“现在天津睦南道、大理道、重庆道、常德道一带比较好的小洋楼,几乎大部分被部队占有。有的军队负责同志文化大革命中多次搬迁,每迁一次,房屋都大修一次。如睦南道一四八号市政协委员张重威三层八间小洋楼一所,张迁出后,大修一次,六十六军军长迁进;一年后,又大修一次,六十六军副军长搬进;又过一年,又大修一次,警备区副政委搬进。每修一次耗费几千元。而群众住房很难得到修缮机会。”

“天津驻军在文化大革命中,还扩大了机关办公用房,搞办事处,设招待所,占用了一大批房屋。六十六军三个师占用了相当五个师的营房。部队占用地方房产后就转为‘军用户’,以后地方就永远没有使用权了。据不完全统计,文化大革命中转为‘军用户’的建筑面积就达三十万平方米。群众最有意见的是:一些部队占用医院和学校,致使一些病人不能住院,一些学生不能上学。”

“天津一些驻军单位还用了规模较大的医院、疗养院五所,改为办公楼、家属宿舍、部队医院。天津市第二工人疗养院,是过去用工会会费修建的,建筑面积两万平方米,病床七百张,是全市工人唯一的结核病疗养院。现被后勤八分部改做办公室和宿舍,致使有些肺结核病人无法疗养。原河北省在天津的省医院是一个设备较好的大型医院,建筑面积两万平方米,病床五百多张,文化大革命中被天津警备区作为司令部办公楼占用,而把警备区旧址作为自己的招待所,天津市医院病房床位是很紧张的,不少需住院的病人无法住院治疗。在病床这样紧张的状况下,部队又占用了一些医院,引起群众强烈的不满。近四万平米的东风大学(原天津师范学院)被六十六军占用作为军部。学生无处上课。(天津分社)”

这篇内参稿件随即刊载于新华社编印的《国内动态》上。正在人民大会堂开会的周恩来,让新华总社将此稿加印若干份送到人民大会堂。

7月9日晚,北京军区党委派工作组到天津。

7月10日,北京军区司令员李德生、第一政委纪登奎、政委陈先瑞先后找天津警备区和66军的领导谈话,传达了中央领导指示。

66军、天津警备区等部队立即召开党委会,态度坚决,表示:“就是住帐篷也要退房!”

很快,新华社总社通知天津分社前往天津驻军66军听取刘政军长的自我批评,并写成内参。杨继绳和分社负责军队报道工作的马杰来到66军。刘政军长站在军部传达室门前迎接他们,一见面,就向他们立正,敬礼,说他已恭候多时。

7月12日,66军党委和天津警备区党委分别作出关于占用地方房舍、车辆的检查、处理报告。

66军党委的《报告》称:

“近几年来,我军先后占用地方房产六处,共50,367.3平方米。其中,占天津师范学院院址一处,36,260平方米;天津市农业技术中学校址一处,7,124.4平方米;天津市一轻局幼儿园一处,2,349平方米;桂林里七号小楼一幢,408平方米;常德道七十二号平房一处,225.9平方米;一九八师占用天津市唐家口新村新建宿舍楼两幢,4千平方米。

有的支左人员利用职权之便,不经正当手续,占用了地方的一些房屋。

占用地方小汽车六辆。其中,伏尔加一辆,华沙二辆,小六九一辆,天津吉普一辆,罗马一辆。”

《报告》表示:

“占用地方的房舍,除一轻局幼儿园的房舍缓退外,其余全部于八月一日前,打扫干净,退还地方。在师范学院增建的地面上的4,894.1平方米房舍、固定设备和两个地下指挥所及其固定设备一律全部移交地方。

前已移交地方的11,615平方米军产房,除原军部营房新华路二

十八号9,215平方米已报请天津市委还回外,其余2,404平方米仍归地方使用。

军司令部、政治部和部分直属分队搬回原军部营房(新华路二十八号),军后勤部、部分直属分队和部分机关干部宿舍,搬至海光寺大街一号(此处原为解放军二五九医院,后改为中国医学科学院血液研究所,房产也随之移交。一九七〇年该所大部分内迁四川,部分扩建为我军一〇六野战医院,房产随之移交),军工兵营移至汉沽营房。"

"占用地方的六辆汽车经检修后,于八月一日前交还地方。参加三结合的军队干部按地方规定乘坐汽车,一律使用地方车牌。"

"对支左人员个人占用的地方房屋,协同地方于八月一日前进行一次彻底清查,然后分别情况具体处理,该并者并,该退者退。凡利用职权之便占用的房屋,或占居的查抄、压缩的私产房屋,一律退回。"

天津警备区党委的《报告》称: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我们利用支左的方便和人民群众对军队的信任,在警备区机关扩大和独立师换防的情况下,占用了地方的不少房屋和车辆。如警备区六位领导同志和其他单位的三位同志,占用了属于高级知识分子和资本家自有的九个小楼;警备区机关占用了原河北省医院;独立师二团团部和一个营,占用了天津市滑翔学校等,共占用应退还地方房屋26处,计61,762平方米。同时,还占用地方小汽车九辆、中型轿车两辆。"

"我们决心在七月底前将占用的九所属于私产的宿舍、原河北省医院、市滑翔学校,全部交给地方。其它不应占用的住房,也要陆续交出,占用地方的车辆,一律于七月底以前退还地方。"

"同时对所属机关、部队的住房情况,进行一次彻底普查,凡是不该占用的地方房屋一律交出,住房过多的坚决压缩。"

"为了切实做好这项工作,在党委领导下,由党委书记许诚同志挂帅,朱彪同志和司、政、后部门负责同志参加,组成一个领导小组,负责具体的落实工作。

关于把全民所有制的泡沫塑料厂改变为我单位所有的问题,已有专题检查报告,目前正在移交中。

处理结果,容后再报。"

7月15日,北京军区党委向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总政治部提交《报告》:

“送上六十六军党委、天津警备区党委的检查报告两件。军区党委同意他们的检查和处理意见。”

《报告》检查了北京军区在这方面存在的问题:

“全区共占用学校161所,医院13所,工矿房舍111处,党政机关、企业、事业单位房舍369处,共239万平方米。”“通过各种关系接收了地方一些厂矿和农、牧场,一不上交利润,二不纳税,变全民所有或集体所有为部队某个小单位所有。”“长期使用和占用了地方一些车辆和物资。”“有的人利用职权,违法乱纪,走后门,抢购、套购物资,有的还用来投机倒把、从中渔利。”

北京军区表示对这些问题要坚决予以纠正。

7月19日,66军军部从天津师范学院,当时叫“东风大学”,搬回新华路28号原66军军部所在地,即原国民党陈长捷的警备司令部。66军从1951年朝鲜回国后,直至1985年番号撤销,军部一直都在这里。

之后,新华社天津分社的马杰先后又写出三篇内参,即:天津驻军领导人对占用民房的自我批评;天津驻军退还民房的情况;退房后天津军民关系得到改善。于是有了中共中央28号文件。

中央28号文件下达后,全军退出了大量在“支左”中占用的民房。军队退房也带动了地方。天津市委书记解学恭提出:“军队带了头,地方怎么办?”他要求政府部门也退出占用的房子。

7月30日晚,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接见上海京剧团演员、现代京剧《龙江颂》女主角的扮演者李炳淑,对几部现代京剧样板戏作了评价。他说:

《龙江颂》这个戏不错,我看过四次电视,一次电影。五亿农民有戏看了,你回去告诉他们,说我感谢他们为五亿多农民创作了一出好戏。现在结尾不好。《海港》太平,矛盾不突出,玻璃纤维吃了能有生命危险,人们都不知道,那个女演员太过分了。《红灯记》我原想一家三口都不要死,看了太悲,可那个时候的情况确实如此。日本人、国民党对我们的残杀是很厉害的,都改掉可能不行。《沙家浜》里阿庆嫂比

较好,也讲斗争,但未死人,一般人爱看。《智取威虎山》没有戏,只有一场“打虎上山”有戏,还是学的“林冲夜奔”,其实都是过场戏,特别是“定计”就是过场戏,大段唱腔搞得那么长。杨子荣上山孤军作战,八大金刚一个金刚也没有分化过来,杨子荣孤立得很。后来栾平跑上山,差点把他搞掉,为什么“定计”那一场不让少剑波审他而让杨子荣审他,结果又跑上山,人为地紧张。我看能够流行的还是《龙江颂》、《沙家浜》。

毛泽东又说:

现在剧太少,只有几个京剧,话剧也没有,歌剧也没有。以前说人家演样板戏是反样板戏,我说不要那么讲嘛,要允许人家有一个学习的过程,只要脸上不抹白鼻梁就行了。样板戏能有几个人看,大家都演了,看的人就多了。《龙江颂》拍成电影就好了,广大农民就可看到了。

8月1日,周恩来对外交部、新华社和《人民日报》有关人员说:“你们对极左思潮没有批透,‘左’的不批透,右的还会来。”后来又针对一些单位的情况说:“极左思潮不批透,你们就没有勇气贯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8月2日,周恩来接见回国述职大使和外事单位负责人时又说:“极左思潮,就是空洞、极端、形式主义,空喊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很抽象,这是违反毛泽东思想的;关于这个问题,如果我们不好好做工作,还要犯错误。”

8月3日,周恩来与李先念、纪登奎、汪东兴约周荣鑫和他的女儿周少华谈话,询问1967年南开大学“卫东战斗队”发现《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启事以及抄件送戚本禹的情况,并要周少华就此事经过情况写了一个材料,即《汇报我和张国忠通过戚本禹向中央报告国民党反动派捏造总理黑材料的经过》。

而南开大学化学系学生、“卫东”红卫兵二把手张国忠已在隔离审查期间,割断肠子自杀而死。

# 第1249回：邓小平，长信再致毛泽东 维特克，要求采访见江青

1972年“五一”节前夕，与邓小平一起住在江西南昌的邓朴方获准去北京看病，邓小平的女儿毛毛陪哥哥邓朴方一同前往。

他们到了北京，王震托人找到毛毛，要她上他家去一趟。

毛毛来到王震家。王震向毛毛详细询问了邓小平的近况后，对她说：

“我要向主席及中央上书，让你父亲出来工作。”

回到南昌，毛毛把“胡子叔叔”王震的话，转告了父亲。于是，8月3日，邓小平又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表示永不翻案。他在信中写到：

“对于林彪和陈伯达，我没有什么重要材料可揭发，特别是对于他们的历史我一无所知，只能回忆一下平时对他们的感觉。

对林彪，我过去觉得他很会打仗，我不相信什么百胜将军，不打败仗的将军是没有的，事实上他也不是每战必胜的，但认为他毕竟是一个军事能手。他的沉默寡言，我也觉得是一个长处。在历史上，我知道他犯了两个错误，一次是在长征时，他同彭德怀搞在一块，反对毛主席的领导，他历来标榜自己是反对彭德怀的，但在这样非常困难的关头，却同彭德怀结成同盟，搞秘密串连，如果没有主席的威望和坚强的领导，不知会成什么局面。再一次是抗美援朝，这也是一个严重的政治关头，他又出面反对主席的极端重要的政治决策，并且拒绝到朝鲜作战，按说他是比彭德怀要适当的人选，而他竟拒绝了，在实质上说，他是怕美国，不相信会打败美帝，不相信自己的正义立场和自己的力量。这两件事，一直到八届十一中全会，在大家的自我批评的空气中，他才轻描淡写地说了一下。

在全国解放后，我从一些事情中，逐渐觉得他是一个怀有嫉妒心和不大容人的人。这我是从他对罗荣桓、刘伯承等同志的态度中看出的。刘伯承同志在军事学院的教学方针中是有缺点和错误的，批判是

应该的,但是林彪和彭德怀一块,对刘的批评不是与人为善的,林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更是声色俱厉的,他们甚至说刘在二野没起什么作用,似乎只有我在那里起作用,当时我曾为此说过,没有那样能够很好合作的司令员,我这个政治委员也起不了什么作用的(我记得在常委也说过),对我这个态度,林彪当然是不高兴的。罗荣桓同志同林彪是老战友,按说他们应该是很好的,罗荣桓同志为人的朴实、诚恳和厚道,是大家所知道的,罗在干部中是很有威信的,林彪就说过,四野干部有事都找罗,不找他。记不得是在一九五几年,罗荣桓同志曾指出林彪在宣传毛泽东思想中,只强调老三篇,是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林彪非常不高兴,从此对罗的关系很坏。至于对贺龙的关系,大家是知道的。

对于罗瑞卿问题的处理,我是有错误的。在罗瑞卿问题出来前,我一直认为罗瑞卿同林彪的关系是不会坏的,我一直觉得罗是林的老部下,罗当总长又是林推荐的,应该没有问题,所以,当一九六六年初(一九六五年十二月)林彪提出罗瑞卿问题时,性质是那样严重,我的感觉是很突然的。而在叶群向我叙述罗瑞卿如何反对林彪,如何企图夺权时,又夹着一些罗如何轻视我的话,我听了并不舒服,我总觉得其中包含了一些个人的东西,在方式上多少带一些突然袭击的性质,这多少影响我在处理罗的问题犯下那样不容宽恕的错误。

对于林彪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现在看来,他的确是为的打着红旗反红旗,是准备夺权、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步骤,但是过去我一直认为他抓得对,抓得好,比我好得多。我过去的最大错误之一,就是没有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但是,过去在两点上我一直是不同意的,一是林彪只强调老三篇,多次说只要老三篇就够用了,我认为毛泽东思想是在一切领域中全面的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只讲老三篇,不从一切领域中阐述和运用毛泽东思想,就等于贬低毛泽东思想,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一是总感觉林彪的提法是把毛泽东思想同马列主义割裂开来,这同样是贬低了毛泽东思想的意义,特别是损害了毛泽东思想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反对国际修正主义运动中的作用,我从阿尔巴尼亚同志的态度了解到这一点,我是赞成强调毛泽东思想对于马列主义的继承、捍卫和发展作用的。

对于军队建设,我过去一直肯定林彪在这方面的作用。过去我只觉得他在强调人的决定因素的时候,忽略了军事技术和战术的训练。林彪多次说,只要人不怕死就会打胜仗,这是正确的,又是片面的。在文化大革命中,我见到“毛主席缔造的、林副主席直接指挥的”这样的提法,觉得有点刺眼,只觉得这是提高林彪威信的提法,不敢有别的想法,现在原形毕露,才恍然大悟了。”

信中对陈伯达也做了一些揭发和批判后,接着写道:

“主席知道,林彪、陈伯达对我,是要置之死地而后快的。如果不是主席的保护,我不知会变成什么样子的了。

我同全党全国人民一道,热情地庆祝在摧毁了刘少奇反革命资产阶级司令部之后,又摧毁了林彪反党反革命集团的伟大胜利!

关于我自己,我的错误和罪过,在一九六八年六七月间写的“我的自述”中,就我自己认识到的,作了检讨。到现在,我仍然承认我所检讨的全部内容,并且再次肯定我对中央的保证,永不翻案。”

邓小平在作了“永不翻案”的保证后,又继续检讨了自己在历史上犯过的错误。他说:

“我历史上最大的错误之一,是在一九三一年初不该离开红七军,尽管这个行为在组织上是合法的,但在政治上是极端错误的。”

“我另一个最大的错误,是在到北京工作以后,特别是在我担任党中央总书记之后,犯了一系列的错误,一直发展到同刘少奇一块推行了一条反革命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总书记的工作,我作得很不好,没有及时地经常地向主席请示报告,犯了搞独立王国的错误。在六〇、六一年困难时期,我没有抵制三自一包四大自由等资本主义的歪风,没有遵照主席指示抓好三线的基本建设,使不该下马的也下了马,推延了具有十分重大的战略意义的三线建设。在工业建设方面,我主持搞的工业七十条,没有政治挂帅,没有把主席的鞍钢宪法作为指针,因而是一个错误的东西。在组织上,我看错了和信任了彭真、罗瑞卿、杨尚昆这些人。特别重大的是我长期没有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揭露我和批判我,是完全应该的,它对于我本人也是一个挽救。我完全拥护主席的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完全必要的、非常及时的。”

“在去年(一九七一年)十一月我在呈给主席的信中,曾经提出要求工作的请求。我是这样认识的:我在犯错误之后,完全脱离工作,脱离社会接触已经五年多快六年了,我总想有一个机会,从工作中改正自己的错误,回到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我完全知道,像我这样一个犯了很大错误和罪过的人,在社会上批臭了的人,不可能再得到群众的信任,不可能再作什么重要的工作。但是,我觉得自己身体还好,虽然已经六十八岁了,还可以作些技术性质的工作(例如调查研究工作),还可以为党、为人民作七八年的工作,以求补过于万一。我没有别的要求,我静候主席和中央的指示。”

信的最后以“衷心地敬祝主席万寿无疆!”结束。

这封信通过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于8月5日转给了毛泽东。

8月8日,张春桥、姚文元找《人民日报》社几位负责人谈话,要他们注意:“批极左思潮不要过头”。

针对四川省委、成都军区党委在批林整风运动中,由于内部意见不统一出现的一些问题,8月9日,周恩来、张春桥、纪登奎、李德生听取四川省和成都军区负责人刘兴元、李大章等人的工作汇报,做了工作。

原高级党校校长林枫子女致信毛泽东、周恩来,反映被关押的父亲的病情,请求尽快将其父放出治疗。8月11日,毛泽东在林枫子女的来信上批示:“连原信一起,请汪印发政治局各同志。我意放他出来治病。林枫问题过去没有弄清楚,有些证据不足,办案人员似有一些逼供信。”当晚,周恩来约有关人员谈专案问题。

1972年7月20日,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在首都机场迎接一位来自美国的中国女历史学家,年方34岁,名叫露克珊·维特克(Roxane Witke),是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宾汉姆顿分校历史系的副教授,讲授中国近、现代史、古代史以及日本历史,研究中国现代历史,尤其是有关中国妇女问题的研究。

1967年,她曾经就毛泽东的早期作品写过一篇论文,题目叫做《毛泽东、妇女和五·四运动时期的自杀现象》(Mao Tse - tung, Women and Suicide in the May Fourth Era),发表在《中国季刊》上。露克珊·维

特克还与 Robert Riden 合作著有《红旗飘飘:“红旗飘飘”文集指南》(The Red Flag Waves:A Guide to to the Hung - chi piao piao Collection),于 1968 年在加州大学中国研究中心出版。

1971 年深秋,维特克例行到纽约参加哥伦比亚大学的现代中国研讨会,住在罗斯福饭店。恰巧中国赴联合国代表团也临时住在这里。维特克没有让机会从身边溜走,立即前去拜访,一位中国官员接待了她。他们用汉语、法语和英语彬彬有礼的交谈,谈到中国外交的转变,交换留学生的可能性以及在中美两国人民之间观念和思想相互交流的可能性问题。最后,维特克带着那位中国官员“下次再来”的邀请离开了。

几个星期后,维特克因为另一学术活动回到纽约,此时中国代表团已经住进位于西区第 66 街的饭店。维特克决定再次拜访他们。这次却不是那么容易了,她前前后后打了大概 20 个电话。其中有一个还被误接到台湾驻联合国的办公室,电话里传来一个狂怒的男人声音,咆哮着说:“共匪不住这里!”

最后,她终于接通了代表团的首席代表黄华的夫人何理良。当天下午,维特克前去拜访何理良,她们的谈话在汉语和法语之间变换(当时法语是她的主要外交语言),当时担任代表团二等秘书的高粱也参加了谈话。高粱身形魁梧,精力充沛,兴致也很高,他只说汉语。

中国代表团已经知道维特克正准备出版一本主题为“现代中国的女权运动”的书,她的研究方向使她对中国共产党革命前辈的革命经历很熟悉,而且她也是美国翻译中国革命回忆录《红旗飘飘》文摘的合著者之一。

维特克在谈话中提到她在 1967 年秋曾读了很多关于江青的报道,她对这位毛泽东的夫人很感兴趣。一位原来名不见经传的毛夫人,忽然成了中国政坛上的风云人物。维特克禁不住想放下手头的其他工作来进行一项几乎不能的计划:记述江青的故事。但是,直到 1966 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前,中国共产党的新闻界对她的个人经历,几乎很难看到,使得那些中国观察家们不得不进行臆测。

维特克觉得:“在纷纭众声中,也有一些上了年纪的中国绅士宣称了解这位复出的旧日明星,说她当初只是一个貌不惊人、也未曾引起

轰动的演员,但却以脾气乖戾、性格孤僻而闻名。与此相应的还有人们可以想象的各种桃色新闻,似乎在她走上政坛的路上,满是电影明星的罗曼史和一颗破碎的心。这些消息的准确性及其价值都很令人怀疑。如果所有这些传闻的主人公是位大权在握的男人,情况又会如何?”

当维特克向何理良他们谈到江青在国外的这些反映时,引起何理良他们的注意并感到愤怒。何理良说,江青是一个革命家,为什么总是要纠缠她的过去?“为什么不考虑研究年轻的妇女同志,特别是那些近几年提拔到中央委员会的女同志?”

何理良对维特克说:“你只有亲眼到这个国家看看,同人民群众直接对话,才能避免以国外图书馆里一些错误的,或是不令人满意的文献为基础进行‘学术性’写作的缺陷。”她问维特克,是否介意她和高粱代表维特克给北京写一封信,说维特克请求访问中国,研究革命的女性和文化?

几个星期后,高粱给维特克打来电话说,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已经邀请她在1972年夏天方便的时候,以个人的名义访问中国,她在中国期间的所有费用将由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负责。

1972年7月19日早上,维特克坐火车穿过九龙半岛到达深圳。由于天气的原因,第二天早上,她才乘飞机到达北京。

在下榻北京饭店不久,维特克被要求起草一份他的旅行路线计划,以及一份她想采访人员的名单。在维特克的采访对象中,包括邓颖超、康克清、江青。

在以后的三周时间里,维特克游览了北京,参观了西安,然后去了延安。每到一地,翻译都安排维特克和不同年龄的男女见面,维特克认为,“他们一成不变的政治性发言是令人苦恼的”,“绝大多数关于过去的旧社会和现在的新时代、罪恶的刘少奇和非凡的毛的汇报都极其简单,使我不得不告诉要对我的工作成绩负责的几位同伴,如果他们期望外国读者会读我的有关中国妇女的描述,那么我们的中心应该转移。不应该完全谈这些人民群众中的‘典型成员’,他们已经变得很普通因而外国人对他们没有兴趣,如果我见一些不平常的人,当然他们的姓名起码要为国外所知,展现出他们是怎样随着时代的步伐前进

的,这样不是更好吗?”

维特克的建议被采纳了。8月12日上午,周恩来总理的夫人邓颖超和中国红军之父朱德的从戎夫人康克清会见了她。邓颖超在那天上午,回忆了过去50年里的一些斗争历程,让维特克脑子里充满了过去那些激动人心的事情。

维特克提出采访江青的报告也呈送到周恩来那里。8月10日,周恩来写下了这样的批示:

“江青同志:如你这两天精神好,可以见见此人,谈上一个钟头就可以了……如不愿见,也可不见。”“在你尚在北戴河时,已请邓颖超、康克清两同志见她,谈谈长征。蔡大姐因身体不好,尚在北戴河,不拟见了。”

正准备去外地休养的江青看到了周恩来的批示,打电话给姚文元,约定翌日,即8月12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江苏厅,一起会见维特克女士。

8月12日下午,刚刚采访完邓颖超和康克清的维特克有些头昏脑胀。回到北京饭店后,她第一次睡了一个中国式的午觉,却被中方的陪同人员于世莲唤醒。她有些迷惑,因为每天这个时候通常都是中方人员打瞌睡的时间。

于世莲压低声音对她说:“今天下午一些年轻同志们可能会到你房间来拜访你。”

“谁?”维特克问。

“我也不知道。”于世莲答,“你最好收拾一下,我会准备一些好茶叶和干净的杯子。”她嘱咐维特克。

维特克赶紧收拾好整理桌子上的纸和书,这时候,茶杯的托盘、矿泉水和一盘堆着象金字塔的新鲜水果送了进来。于世莲又回来了,眼里闪烁着激动和兴奋:“她们已经在路上了。看起来似乎她们是江青同志派来的!”

15时整,维特克看到“两名具有严肃的革命风格、极具吸引力的年轻女性,站了在我的门前。徐尔维和沈若芸同我握手之后,带着高层党务工作者的诚恳作了自我介绍。我用汉语向她们问好,她们用标准的英语作了回答,带着上层英国人的口音。”

那是标准的牛津口音。

“江青同志想让你了解她的政治思想,她指示我们把她文化大革命期间的4次讲话读给你听。”

“为什么这么急?”维特克觉得很奇怪。

“我们对此也不知道。”她们微笑着回答,然后开始工作。

在随后的两个半小时里,她们用英语读着江青1966年在军队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期间仅仅因为喝水而中断了一次。在听这些辞藻华丽的或重复的篇章时,维特克时而将笔停下,她们中的一个或两个人一起就会盯着她,直到她重新写下去为止。

“为什么不让我自己看这些原文呢?”

“因为江青同志指示我们读给你听。”

维特克后来回忆说,她们给她念的是最原始的印刷版本,里面还战友般地提及到林彪和陈伯达,而此时,他们已是革命的敌人。

她们就这样读着,维特克不停地记着,一直到于世莲向徐尔维和沈若芸示意,已经17时30分了,她们才迅速收拾起她们的黑色塑料包和江青的讲话稿,匆忙和维特克告别。

于世莲告诉维特克:“最好洗一洗,收拾干净。”

但是维特克觉得,她和缔造新中国这个特别的社会秩序的女性们在一起谈了一个上午,然后又在热浪中写了一个下午,现在已经筋疲力尽了。她告诉于世莲,她只想晚上一个人静静地吃一顿晚餐,写下自己的一些想法之后,早点睡觉,好好休息一下。

“你不能那样,”于世莲坚决地回答道。

“为什么?”维特克不解的问。

“因为今天晚上江青同志有可能会有时间会见你,所以动作快点吧!”

一会儿,于世莲的这个“有可能”变成了“很可能”,接着变成了“肯定”。

“20分钟后出发!”于世莲匆匆对维特克说。

维特克赶紧脱掉从早上5时就一直穿在身上,已经被汗水浸透了的衬衫和裤子,冲进浴室洗了个凉水浴,吃了双份剂量的头痛药后,穿上于世莲为她选中的一套黑色连衣裙。

# 第1250回：忆往事，两位女人侃侃谈 说戏剧，共同观看《红灯记》

8月12日下午，人民大会堂，参加江青会见维特克的外交部相关人员都已到达接见厅。主管礼宾司的王海容也来了。按常规她是可以不来的，但这次是江青接见，她很重视，不敢出漏子。

一会儿，王海容急匆匆跑进来对大家说："来了，来了。"很快，在人们的簇拥下，江青和姚文元走进会见厅。王海容把外交部新闻司副司长张颖拉到江青面前说：

"今天外交部由她来陪见，首长认识她吗？"

江青一见，大声说道："原来是你呀，小鬼，去年范文同来访问的时候，我还见到你。是啊，嫁鸡随鸡，你就去了外交部。"然后挥了挥手，哈哈大笑起来。

张颖与江青在延安时都在鲁迅艺术学院，彼此认识。

王海容见江青还记得张颖，就先出去忙外边的事了。江青又对大家介绍说："姚文元同志你们大家都熟悉吧？他是当今最杰出的理论家、批评家。"

大家坐下后，张颖站起来，把对外友协负责人丁雪松请到江青面前介绍说："她是对外友协负责人，维特克来访是友协接待的，是否请她汇报一下情况？"

江青挥挥手说："你们写的情况，我全看过了，不用再说了，时间也差不多了，请客人来吧。"

维特克的车慢慢靠近人民大会堂前的广场。当她登上大会堂台阶的时候，新华社的摄影师一下聚到跟前，不停地拍照，电视摄影机也跑前跑后。走进大会堂，维特克不停地向周围的人点头致意，互相介绍姓名，其中包括王海容。

来到江苏厅。"江青同志准备好了！"有人通报说。

门开了，维特克看见江青昂首阔步向她走来，微笑着向她伸出手。

维特克也赶紧伸过手去,她们相互握手,彼此凝视着对方的眼睛,持续了约两分钟。

“你比我想象的要年轻。”江青说。

“我实际要比看起来老。”维特克回答道。

江青笑了,说:“我是越来越大了,马上就要60岁了。”

维特克忍着没有说出来,她觉得江青看起来要比实际年龄年轻得多。

在场的记者,咔嚓、咔嚓按快门,一阵耀眼的闪光灯过去了。江青将她旁边的姚文元介绍给维特克。随后将她们领进接待室。

江青豪不掩饰地仔细观察了维特克的脸、头发、衣着和高跟凉鞋。维特克也同样很好奇的观察着江青。

江青戴着一副褐色的塑料边框的眼镜,珍珠灰的裤子配着一件相衬的束腰外套,里面是白色丝质衬衫。和绝大部分中国人一样,她也穿着塑料凉鞋,虽然她的凉鞋是与众不同的白色。维特克还注意到,江青“还带着一个与我们无产阶级文化相匹配的白色塑料手提包。”她的装束的风格、裁剪和质量都和邓颖超的差不多,衣服的边角不是很精致。维特克想:“难道这些就是无产阶级风格的体现吗?”

她们先是用普通话开始了漫谈,彼此对对方的文化作一些恭维的评论后,便进入了彼此希望的谈话主题。由于维特克的汉语水平有

限,以后的谈话都通过译员翻译成了英语。担任翻译的就是下午给维特克念文件的沈若芸和徐尔维。

这次谈话被维特克称之为“是我在中国期间进行的最为活泼的谈话,谈的内容都是预想不到的,我告诉江青我已经完全忘了记笔记。她向我保证,所有的谈话内容都已经被录音,速记员也做了记录,在其他领导同志批准之后,会将谈话内容文稿的中文和英文版本交给我。”

“装在有盖子的青瓷色杯子里的茶送了上来,散发着芬芳的气味,茶杯是以宋代的模型制造的。除了江青的茶杯把上系着一根红色的细线,以及她身旁桌子上放着一个用毛巾裹着一个电控呼叫按钮外,她享受的服务与其他人没什么区别。”

谈话迅速、愉快地进行着。江青好像回到数十年前一样,非常亲热地对维特克说:

“我原来的名字叫李云鹤。鹤是一种轻盈美丽的鸟,两条腿很美。我小的时候,两条腿也是细长细长的,所以我父亲给我起名叫云鹤,鹤立鸡群嘛。就是出众呀。我特别喜欢这个名字,天上有彩云,仙鹤在空中轻盈地飞翔,多么美丽,多么富有诗意,真是美极了。”江青边说边加有一点演员的表演味道。

“后来为什么要改名字呢?那时我到了上海,找职业。组织上让我去电影厂,有一个导演给我取名蓝平,别人写错了字,才变成蓝苹。哈哈,蓝色的苹果,有新意。我用这个名字当演员,在舞台上也在银幕中……”江青微微仰起头,像是回忆什么……

“我是有艺术经验的。我很下功夫,背台词可不容易了。如果我没有经验,我能把样板戏排得那么好吗?”“唔,对了,今晚我要陪你去看样板戏《红灯记》,我们要到剧场去看。在剧场你会看到观众的情绪,……”

姚文元坐在近旁,显得沉稳,这时他插话:“江青同志既是艺术家,又是政治家,文化大革命的发动者、领导者。样板戏都是她亲自创作出来的,她的贡献很大,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个人。”

江青又挥了挥手,接着说下去:“后来我要革命,要到延安去,我自己取了这个名字。大海浩瀚,江水滚滚东流去,多么有气魄。江水也是蓝色的,清清的江水,多么迷人,多么有诗意。哎,青出于蓝而胜于

蓝呀,所以叫江青。哈哈哈哈。我最喜欢蓝色,以前我最喜欢穿蓝色的衣服,从月白到藏青,我都爱穿,蓝布旗袍,既朴素又大方……有意思吧,是不是?”

维特克:“非常有趣,我相信这是所有美国人都不知道而又非常愿意知道的。你真是当代中国一位了不起的妇女!”

江青:“不应该简单说妇女,我不做妇女工作。”

“我还有一个名字叫李进。你读过毛主席的一首很著名的诗词吗?我给你背一背:‘暮色苍茫看劲松,乱云飞渡仍从容。天生一个仙人洞,无限风光在险峰。’这首诗词是毛主席赠给李进的,李进就是我。”

江青继续说道,“喏,今晚我请你在这里吃饭,说是宴会也可以,你是我的客人呀。这里是江苏厅。”这时她站起身来,拉着维特克的手,很热情地带着维特克观赏江苏厅,“你看这周围装饰着江苏省的手工艺品,苏绣是世界闻名的。你看这围屏绣得多美,孔雀开屏。这是缂丝,是一种特殊的丝织艺术品,全世界都没有的啊。这里的厨师是特别从苏州请来的,他能做全国各地的名菜。今晚我还请你吃北京烤鸭,比全聚德的要好吃多了。”

维特克说:“那是我的最爱。”

江青大笑着说:“我知道”

江青拉着维特克的手,绕江苏厅走了一圈,边走边讲解,兴致很高。

晚宴上,江青对维特克说:“今天的菜谱是我亲自定的。我知道,你们美国人不讲究吃,尽吃牛排,是不是?我尊重别国人的习惯。但是中国菜是中国悠久文化传统的一部分,很有科学性的,营养价值更甭提了。我们还讲究食物治疗。喏,这个炸子鸡,绝对不能用冷冻的,完全新鲜。它的重量不超过一斤,否则太老。喏,这个鱼,我最爱吃活鲫鱼了,全是刚从河里抓来的,每条只有半斤多。还有这个烤鸭呀,不油腻,不能用太肥的鸭子,并且把油都去掉了,胆固醇对你还没有太大的威胁。”

维特克吃得很有滋味,她赞叹道:“江青夫人,你真是了不起,你对中国什么都懂。这几个小时,你教会我很多东西。”

江青说:“总理建议我应该接见哪些外国客人。当斯诺和他的夫人1970年9月来北京访问的时候,只有很短的时间来安排接待工作。通知我参加接待的时候,我正在休息。因为没有任何提前的通知,我一时不知道应该送给尊贵的客人一份什么样的合适礼物。而在斯诺夫人这一边,她也被弄得有些混乱,结果意外地把本来准备送给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的礼物送给了我!”

“你见过斯诺夫妇吗?”江青问维特克。

维特克没有见过他们,但是她和斯诺的前妻奈·威尔士有联系,因为她曾经在三十年代末期采访过中国的女性革命领导人,与维特克的研究有关。

“他现在的妻子对中国也非常友好。如果你见到她,请转达我对她和她的家人的问候以及欢迎她再次来访。你成为中国的朋友后,你也可以经常来看看我们。只要我还活着,我一定接待你。”江青说。

提到将来和死亡的时候,江青的情绪变得严肃起来。她望着桌上的其他人说:“辩证唯物主义者能理解人生老病死的规律。保持人政治上的年轻是可能的,但是永远保持身体健康却很困难。现在我承认我老了。”

姚文元说:“‘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曹操这几句诗写得非常好。”姚文元感叹道。

“这首诗的其他几句也很不错,”江青继续念道:“‘神龟虽寿,犹有竟时;

腾蛇乘雾,终为土灰。’后面还有四句,这是朴素的唯物主义:‘盈缩之期,不但在天。养怡之福,可得永年。’”

江青长期为病魔所累,已经把疾病和个人的敌人当作身体和政治上生存意志面对的两个并行的挑战。她的筷子飞快地掠过几道新上的菜,同时说道:“最近我一直在休息。但是因为你,我今天就过来了。近来我身体比较差,睡眠也不太好。我需要药物治疗和休息,也需要体育活动。”

“你一般都做什么运动?”维特克问道。

“游泳、骑马、慢走,还有整理花园,”她一边回答,一边把手伸进口袋拿出来一把气味浓烈的茉莉花,放到维特克手里。维特克的脸上充

满了惊讶和高兴。

“我还种一些中草药,”江青继续说:“我自己种茉莉花,还种各种各样的蔬菜。除此之外,我还种了一小块棉花。所有这些都帮助我精神上和身体上得到放松。”

江青话锋一转,又说到样板戏:“今晚我们去看的《红灯记》,是由我改编和导演的,连服装都得我亲自设计。他们不懂,他们没有这样的生活经验呀。那个导演顽固得很,简直是破坏,他就是不采纳我的意见。后来才知道,哼,原来他是个叛徒,现行反革命。小张,你应该认识他的,他原来的名字叫什么?”

“小张”是延安时期江青他们对张颖的称谓,早已多年没人叫了。此时外交部的人都已经叫张颖是“老张”了。所以,一声“小张”,张颖没有马上反应过来。江青本能的向她这里看了一眼,张颖这才猛然醒悟,赶紧答道:

“他原名叫符律衡,原来是杭州美院学美术的吧,到延安后才改名阿甲。”

张颖和阿甲是老同学,《红灯记》原是阿甲编导的。

江青又谈到美国电影《飘》:“这个女作家了不起,从小说到电影都是第一流的。中国能拍出这样的电影吗?喏,我看过大概有10遍了,每看一遍都很感动。”

姚文元轻轻地说:“从历史观点来看,内容是有缺点的,她同情奴隶主。”

江青:“电影可没有那么明显。”

吃完饭,江青站起来向大家说:“现在我们该去剧院了。”

车队从人民大会堂出发,经长安街、西单过西四。此时马路两旁灯光微弱,行人稀少。车队进入护国寺人民剧场。门外入场口,并无往常那种喧嚣之声,仅在剧场院内有个别的警卫人员。

剧场内灯光已经暗了下来,演出即将开始。只见旁门一开,全场灯光大亮,江青带领这一群人走了进来。楼上楼下所有的观众都起立鼓掌欢迎。江青依然是昂首阔步,向大家鼓掌致意,走向座位,然后回过头来向楼上楼下的观众颔首微笑,举手鼓掌表示感谢。

观众看见江青身边还有一个外国人,更是一片哗然,欢呼大叫。

戏剧结束后,江青把维特克引到剧场的一个会客室,她们又坐到一个大沙发上。关上门,散场观众的喧闹声都听不见了。江青专注地看着维特克说道:“我希望你走埃德加·斯诺的路,走斯诺夫人的路。”

“一个令人敬畏的榜样!”维特克回答道,颇有些诚惶诚恐。

“可能有人会说我们把你洗脑了,”江青笑道:“你害怕吗?”

“不,我不怕。这种洗脑是不可能的。”

“毕竟,”江青说,“尼克松总统和夫人也来过这里。如果我能陪同尼克松总

统和夫人,为什么我不能陪同你呢? 你都可以竞选总统!”

江青转到了更加严肃的问题,她说:“关于我本人的历史,从来没有对外国人讲过,你是第一个外国人。”

“您谈的都可以发表吗?”维特克问。

“你可以发表。但是你必须认识到我不是把你当成一名记者,而是一个好朋友。首先我还得请总理检查这次会谈的文字稿。我今晚告诉你的都是事实。很显然,我们走的是一条曲折困难的道路。即使我现在都快 60 了,我仍然有决心保持政治上的青春。”

江青又解释了“政治上的青春”和生活的其他方面的含义。

“这次没有时间了。下次你来中国的时候我们再谈。同时我会送给你一些纪念品。虽然我是一名技术不怎样的业余摄影爱好者,我会送给你一些我拍的作品留作纪念,也许这是‘班门弄斧’。我现在身上没带好的作品。我曾经拍过女民兵的照片,但某些人拿走了些好的。我回中南海的家里要好好找一找。”

……

江青和维特克握别时又说,她会找机会,再约见维特克,还可以详谈。

8 月 13 日,在《人民日报》刊登了这样一条消息:“江青、姚文元同志会见美国女作家维特克。”消息说:“参加会见的有对外友协秘书长丁雪松,外交部新闻司副司长张颖、以及单达圻、陈明仙、沈若芸、徐尔维、于世莲等同志。”

维特克在这次与江青的突然会见后,没有指望再见到江青。但江青咄咄逼人、机智善变的形象已经深深地印在她的脑海里。维特克感

到,江青虽然只是四亿中国女性中的一位,然而她独特的阅历将会为理解中国革命中的妇女和政治权力面临的最基本的困境提供线索。

第二天上午,维特克继续同邓颖超和其他妇女领导人讨论,她们的谈话连续进行了4个上午。每天下午,在她和邓颖超谈话之后,徐尔维和沈若芸两位使者就会来到她的房间,继续为她念江青的讲话。此外,她们还带来一些江青和毛泽东四十年代在延安的未发表的照片,一些江青人拍的彩色艺术照。其中,有一张是庐山的汉阳峰。在这张题为"庐山汉阳峰"的照片背面,江青用红色铅笔写了诗:

"庐山汉阳峰:江上有奇峰,锁在云雾中。寻常看不见,偶尔露峥嵘。江青摄,诗赠维特克夫人,一九七二年八月十二日"

8月13日上午,即江青与维特克见面后的第二天,外交部张颖到乔冠华那里,将陪同江青与维特克会见的情况向他做了简要汇报。乔冠华听完后,嘱咐道:"江青要说什么要干什么谁也管不了。你听了就算了。"

张颖又说:"江青说她还要见维特克,还要整理记录,这些是否都交给友协办呢?"

乔冠华愣了一下,想了会儿说:"再说吧。"

# 第1251回：归专案，周恩来见林立衡 赴广州，调总参测绘局长

林彪的女儿林立衡和她的男友张清林从北戴河转移到北京玉泉山后，开始接受专案组审查，专案组的负责人是谢静宜。

1971年11月，遵照上级指示，中央警卫局李钊副局长把林立衡、张清林护送到北京卫戍区警卫1师师部驻地。

林立衡给毛泽东写信，要求“跟毛主席谈话”。毛泽东把信批给了周恩来。

1972年8月，周恩来约林立衡到人民大会堂谈话。

林立衡走进大会堂谈话的房间，发现屋里坐满了人。除周恩来外，屋里还有汪东兴、纪登奎、李德生、张才千、田维新、杨德中以及谢静宜等。

周恩来一见林立衡进来，就对她说：“你一个小孩子家，胡写了些什么？我都看不懂。”

接着，周恩来说：“你要找毛主席谈，毛主席让我找你谈。我拖了八个月。不过，现在看来，晚点儿也好。”

“你也是有错误的嘛。空军给林立果搞了个可以指挥一切、调动一切的‘两个一切’，不也给你搞了个‘五条’吗？说什么事事要向你请示，处处要向你学习！”

林立衡说：“他们搞那个‘五条’的时候我不知道。我一知道，连夜搞了个针对‘五条’的新五条，都是反那个五条的。”

周恩来问到会的其他人：“是不是有这回事？”

有人回答说：“有。”

周恩来说：“那也是一个共产党员应当做的嘛。”

李德生说：“毛主席同意让林豆豆回空军参加运动，接受再教育。”同时宣布空军报社由于执行了林彪路线，停刊两年检查。

谈话结束后，周恩来站起来跟林立衡握手，其他人也站起来一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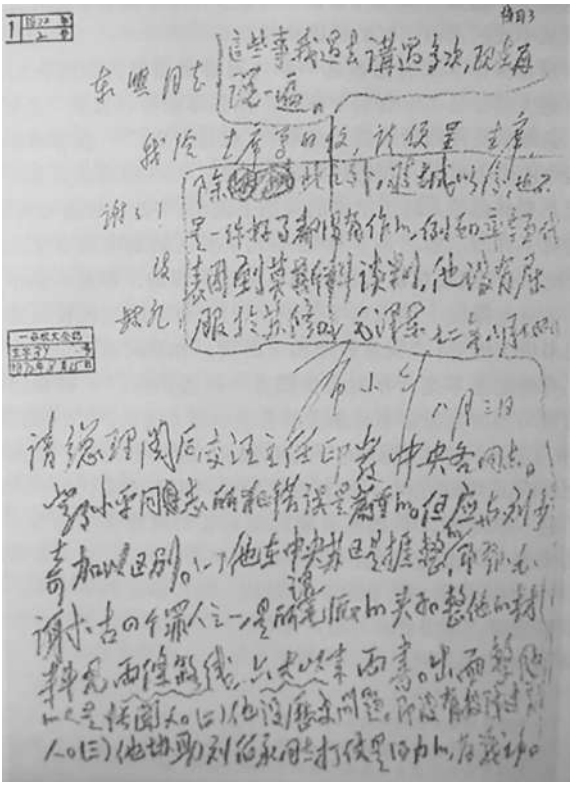
握手。林立衡觉得在这次谈话时,纪登奎和谢静宜的态度“特别凶”,所以没跟纪登奎握手,转身要走。这一细节,被周恩来发现了,他十分严肃地说:“还有一个呢!”

林立衡转回身来,跟纪登奎握了下手,走了。

8 月 14 日,毛泽东对邓小平 8 月 3 日的来信做出批语说:“请总理阅后,交汪主任印发中央各同志。邓小平同志所犯错误是严重的,但应与刘少奇加以区别。一、他在中央苏区是挨整的,即邓、毛、谢、古,四个罪人之一,是所谓毛派的头子。整他的材料见两条路线、六大以来两书。出面整他的人是张闻天。二、他没历史问题。即没有投降过敌人。三、他协助刘伯承同志打仗是得力的,有战功。除此之外,进城以后,也不是一件好事都没有作的。例如率领代表团到莫斯科谈判,他没有屈服于苏修。这些事我过去讲过多次。现在再说一遍。”

毛泽东提及的“邓、毛、谢、古”,即邓小平、毛泽覃、谢维俊、古柏,由于支持毛泽东,在 1933 年 4 月在中央苏区遭到王明路线执行者们的批判。

8 月 15 日,周恩来把毛泽东的批语和邓小平的信派人送往印刷厂排印。并于当天,批告汪东兴:“立即照办”。当晚,他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传达毛泽东的上述批语。会后,以中共中央名义通知江西省委,邓小平恢复党的组织生活,可以作一些调查活动。此后,邓小平即到江西瑞金、湖南韶山冲等参观访问、调查研究。



正在广州的江青也收到毛泽东8月14日对邓小平8月3日长信的批示了。她将秘书杨银禄叫到办公室,对他说:“小杨,你看看这份文件。”

杨银禄将文件接过来一看,是邓小平8月3日致毛泽东的信和毛泽东的批示。他看完后,望着江青。

江青严肃地对他说:“我今天违反了保密纪律,叫你看了这样重要的文件。让你看,主要是想听听你对主席批示的看法,你说说。”

杨银禄说:“我看了还没消化,不敢说,怕说错了。我想听听江青同志的意见。”

江青狠狠地瞪了他一眼,说:“你听我说,还叫你看什么?你说!说错了没有关系,不会定你什么罪,大胆说,不要有任何顾虑,你

说吧。”

杨银禄只好说:“第一,从主席的批示上看,邓小平同志与刘少奇是有区别的,是有本质上的区别的。第二,主席对邓小平同志是肯定的。就这两点看法。”

江青听罢,又问他:“你估计今后如何对待邓呢?”

杨银禄心想:“这可能是江青叫我看文件的主要目的吧。”于是就大胆地说:“可能主席准备要解放他,起用他吧。”

江青说:“第一点、第二点不用你说,主席批示讲得很清楚了。第三点,你分析得有一定道理,算你有一定的政治头脑和预测性。我看主席已经下定了决心,要重新使用他了,主席下了决心,我也不好再说什么了,只有服从了,下级服从上级嘛。我是主席的学生,学生听老师的,拥护和执行老师的决定。我相信主席的决定总是英明的。据说邓的信是汪东兴同志亲自送给主席的。汪和邓的关系很密切嘛。”

8 月 17 日夜,已看到对外友协的接待简报周恩来召集所有陪同江青会见维特克的接待人员开会,对大家说,江青已经乘专机飞到广州,行前决定,还要把维特克接去广州再谈。为此,他想听听大家的意见。

没有人说话。周恩来让对外友协负责人丁雪松先说。丁雪松觉得,没有必要再见了,因为维特克想了解江青的历史,那一天已说了不少了。

周恩来说,是否再了解一下维特克女士的情况:她的水平如何?她希望了解中国的目的是什么?他指着丁雪松和张颖说:“你们分别找她再谈一次,尽量多了解维特克本人的情况。”

张颖第二天来到北京饭店拜访维特克,问她在中国过得如何?所了解到的情况是否符合她的需要?其实她是想知道维特克的中文水平如何,及她对中国近代当代史的了解和研究的情况,她对中国传统文化知识的了解程度。但结果使张颖相当失望。维特克看不大懂中文报纸,中国近代史她知道些,但当代史特别是中国革命史张颖觉得她是一窍不通,但对国民党内部的某些奇闻轶事却知道得不少。其实这很正常,当时的中国人对美国社会又了解多少呢?大陆的人对国民党内部的奇闻轶事又知道多少呢?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铁幕”隔断了两大阵营之间人民的交流,更何况是海峡两岸、东西德、南北韩了。

8月18日,王光美子女刘平平、刘源源、刘亭亭第一次获准去监狱见妈妈。这时,王光美在狱中已被关押5年。见面时,他们惊呆了,因为出现在他们面前的母亲王光美如此这般:

“五年不见,妈妈已经瘦弱不堪。满头灰白头发,连腰也伸不直,穿着一身旧军装染的黑衣,神情麻木、迟钝……”

19日晚上,周恩来再次召集所有陪同江青会见维特克的接待人员开会了解情况。丁雪松了解的情况与张颖很有同感:维特克对蒋夫人宋美龄津津乐道,还有特殊的见解,认为蒋夫人在美国很有影响,所以蒋介石就能得到美国的大量援助。因此如果新中国要得到美国的援助,就必须把江青捧出来,使美国人对待江青也像对宋美龄那样。所以她对江青有兴趣,她要把江青介绍给美国人,使美国也援助新中国。她的这种见解令丁雪松和张颖她们觉得不可思议,中国的革命怎能依靠美国的帮助呢?美国又怎么可能帮助中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呢?维特克的这一说法,刊登在《友协简报》上,周恩来和江青都看到了。

8月21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发出《关于征询对三支两军问题的意见的通知》,《通知》后还附有《关于三支两军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

《通知》说,三支两军必须适应变化了的新情况,在一个地区,应当由当地最高一级的地方党委,对党政军民各个方面实行一元化领导。省军区、军分区、县人民武装部3级军事机构,除了保持军事系统的垂直领导和隶属关系外,同时是地方党委的军事工作部,受同级地方党委领导。驻各地的野战军,除了接受军事系统的垂直领导外,在与地方有关的各项工作上,也必须接受所在省、市、自治区党委的领导。“凡是实行军管的地方和单位,在党委建立后,军管即可撤销”。军管人员除少数需要留下担任地方工作的以外,其余调回部队。少数有某种特殊需要的地方和单位,对外可保留军管名义,对内不再行使职权。“已经建立党委的地方和单位,军宣队应即撤回部队”。“地方各级党委建立后,各级支左领导机构……及其办事机构应即撤销”。以后属于部队支援地方的各项工作,由部队政治机关负责;调整地方党委成员,更多地挑选一些熟悉全面工作的比较有经验的地方干部担任主要领导职务;继续留在地方工作的军队干部,除主管省军区、军分区、县

人民武装部工作的军政主要负责干部外,原则上不再兼任军职。文件发出后,自1967年1月派出的军队三支两军人员陆续撤回部队。

8月24日下午,正在上海访问的维特克被告知:江青正在广州回忆她的过去和革命的历史。她将会再见维特克一次或两次,回答维特克提出的所有有关她的问题。

8月24日夜,经过一天忙碌的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又召开了一次小型会议,只有接待过维特克的6个人参加。

周恩来显得很疲劳。他从办公桌边站起来走到大家身旁,双手交叉抱在胸前,来回踱步,然后停下来说:"对不起,这么晚还把你们叫来,有点急事。刚才中央办公厅来电话,说是江青在广州一定要见维特克,明天就把维特克接到广州,陪见翻译还是你们原班人员吧。今晚再商量一下看看还有什么问题。"

几个人都认为其实可以不见,江青让陪同维特克去上海的人带去了5部有关战争的电影,他们从上海打来电话说,维特克一部都没有看。据说维特克除了对江青个人的历史以外,她表示对什么都没有兴趣。

周恩来对张颖说:"不要谈什么战争。你到达广州以后把我的意见立刻转告江青同志,只谈文艺。再见一次就够了。"

然后又对礼宾司的人说:"维特克女士的签证是28日到期。她不是说要赶回美国开课吗?不要再延期了。"

说完,他停了一下,走到自己的办公桌旁,拿出一本《鲁迅诗选》交给张颖说:"这是老版本,《鲁迅全集》没有收进去。对了解鲁迅思想有参考价值,你带到广州交给江青同志,也许对她有用。"

在场的人看到周恩来如此关心江青,都深深的为之感动。

8月25日,从北京派出的一架飞机飞到上海。维特克一行人乘坐这架专机,于这天上午11时30分,降落在广州白云机场。张颖等人也是乘坐这架飞机从北京经上海来到了广州。他们被安排住在解放路广东省迎宾馆。而张颖则被单独拉到江青的住地。

游泳池池旁,身穿游泳衣的江青很高兴,亲热的对张颖说:"你们都来了?维特克也来了?很好,很好。"

江青拉着张颖的手,问起了她的工作情况,表示希望张颖到文化

组工作。事出突然,张颖不知江青所言为何,只好说:“文化大革命以前,我执行错误路线,觉悟不高。这几年我也不搞文艺了,现在许多事我也不懂,知道得太少……”

江青打断她的话说:“不懂可以学呀,你可以当领导嘛,在我的领导下工作嘛,算了,算了,现在不谈。”

张颖手中还拿着周恩来临行前交给她的那本《鲁迅诗选》。立即对江青说:“周总理让我转告您,维特克女士只有很少时间了,请您就谈一次文艺问题。这本诗选是他送给您参考用的。”并双手将那本《鲁迅诗选》交到江青手里。

江青接过《鲁迅诗选》,随手放在旁边的躺椅上,对张颖摆摆手说:“行了,行了,你走吧,下午3点钟来向我汇报维特克的情况。”

张颖回到迎宾馆,维特克已坐在会客室里等着她了。她的脸上不像往常那样微笑媚人。张颖和她握过手,刚坐下,维特克就迫不及待的说:“我和江青夫人第一次谈话的记录,相信你已经带来了,就请交给我吧,这对我来说,是十分宝贵的。”

张颖委婉的答道:“还没有整理好,需要修改和翻译。你要的不是中文原稿呵。答应过的事情,我们会一定做到的。”

维特克:“我必须亲自带走这份记录,明天你一定交给我。这是江青夫人亲自答应我的。”

“在你离开我国之前,第一次谈话记录,一定能交给你。今天下午江青夫人还要接见你。”张颖依然是不温不火的回答说。

8月25日下午15时,张颖按照江青的吩咐,又提前到江青那里。江青问她:

“维特克的情绪怎么样?在上海谈得有意思吧?几部有关战争的影片是否都给她看过了?她都说了些什么?”

“据说她一部战争的电影都没有看。小于告诉我,维特克自己说对战争什么的都没有兴趣。她只对你本人的历史有兴趣……”

“呵,你没有跟着去上海,算啦,她们也快到了,一切准备齐全了吧?”她们走进会客室,张颖看见四周摆满了舒适的小沙发,中间正对大门还有几张大沙发,显然是为首长准备的。离沙发不远处,有一张大长形桌,上面已摊开几幅大地图。矮矮的几处茶几上都放着一个或

两个麦克风,连接着录音设备。一会儿,一个穿军装的人从里间走出来,江青对张颖说:“你们认识吧,我的老战友,在西北战场我们一起作战。”

进来的是总参测绘局局长张清化,他和张颖抗战时期就同在重庆周恩来办事处工作,早就认识。但是对张清化出现在这种外事场合,张颖还是颇感意外的。

十几天前,8 月 13 日晚,正在青岛海滨休养的张清化,突然接到北京打来的电话,是当时主持总参谋部工作的副总参谋长张才千打来的。他告诉张清化:

“江青要会见一位外国记者,东兴同志让你回北京整理有关解放战争的军事材料。”

张清化对张才千说:“张副总长,我早就离开作战部门了。现在身体不好,是不是改派其他更合适的人?”

张才千没有再说什么话。

张清化抗战期间在重庆的“周公馆”任军事参谋。解放战争时期,特别在毛泽东转战陕北时,他又派往中央前方工作委员会的军事组,归汪东兴大队领导,一直跟随毛泽东转战陕北。也就是在那个时候,江青认识了张清化。可能就是这个原因,汪东兴向江青推荐了张清化。

8 月 16 日夜 23 时左右,从青岛来到长岛继续休养的张清化再次接到张才千副总长的电话,命令张清化立即返回北京。张才千对张清化说:

“汪东兴指名必须由你来完成这项任务。你连夜赶到山东烟台机场,那里有一架专机等你。”

8 月 17 日凌晨 2 时左右,张清化赶到了烟台机场,乘坐北京来的一架军用飞机,于凌晨 6 时降落在北京西郊机场,向张才千报到。张才千让张清化立刻赶到人民大会堂,说:“现在给你整理军事材料的任务。到哪里去?给谁执行任务?汪东兴同志会告你的。……要作为政治任务好好完成。整理材料所需资料报告我,由作战部负责提供。你去人大会堂找汪东兴同志接受具体任务,一切按汪东兴同志指示办理。”

在人民在会堂,汪东兴在等着张清化。张清化敬礼后,双方一握手,汪东兴多一句话没有,直接对张清化说:“给你一个任务,你去广州,为江青同志接见外国记者整理军事材料,到广州后按江青同志的具体要求办理。你要努力去完成这一任务。整理材料所需材料,由张才千副总长提供,这些已经告诉他了。”

说到这里,汪东兴从衣兜里拿出一份材料,是毛泽东当年转战陕北战场时的详细纪录——《李德胜(即毛泽东)同志行动日程(1947 年 3 月 18 日—1948 年 5 月 27 日)》。汪东兴指示张清化:“要按此材料标出 1:5 万、1:10 万、1:20 万等比例尺图各标 3 份,送江青一份,供江青使用和整理材料使用;其余两份给我,我转交总理一份。”

张清化随即向汪东兴请示:“是否可以多标出一份,以便留总参测绘局一份存档备用。”

汪东兴十分爽快地同意了他的建议。

张清化又提出:“江青所需资料请告诉张才千副总长由我带去。”

汪东兴说:“你明天就走,先去看看江青究竟要整理什么材料,再报告副总长张才千提供。你告诉张副总长,中央办公厅每天有机要通迅员去广州送文件,经江青处即可转给我。”

说完,汪东兴从衣兜中拿出一张第二天直达广州的飞机票,交给张清化。

8 月 18 日,张清化飞到广州,住在江青下榻的珠岛宾馆。江青要求他于 8 月 25 日前整理出“解放战争西北战场情况,包括毛泽东行动路线图,还要整理抗美援朝战争情况和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况。各种材料要简单扼要,都要附图。

当天晚上,张清化按照临行前的要求,向张才千在电话上报告了他到广州后的情况和居住地点,详细汇报了江青要他整理的 3 份材料和所附图表;报告需要整理这些材料所需要的资料。

张才千随即指示:“所需资料,由作战部即行办理,搞好送去。”并要张清化与作战部部长王扶之联系。

此时,已经看到桌子上摆开 3 张“西北战场图”的张颖,似乎明白到什么。她凑到江青身边,再次低声提醒说:“维特克夫人对战争没有兴趣。周总理叫我转告你,再谈一次就够了,只谈文艺,不要谈其他。

维特克夫人的签证是28号,不要再延期了。”

江青脸色一变,两眼瞪着张颖,“哼”地一声就转身走开了。但过了一会儿,她又转过脸来,笑嘻嘻地问张颖:“哎,小张,你看我今天穿的布拉基怎么样?藕荷色,也是我最喜欢的颜色,蓝色当然也是我喜欢的。”

这时张颖才发现,江青今天穿着一身真丝双皱料子的连衣裙,这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还是很难看到的。

江青又说:“我觉得女孩子穿裤子不好看,为什么不穿裙子呢?你们都没有裙子吗?”她叫来秘书说:“明天给她们每人发一条裙子,算我送的。”

# 第1252回：说战争，维特克再见江青 忆往事，饭桌上滔滔不绝

8月25日下午16时，当维特克听到接待人员对陪同她的中方人员说“江青同志准备好了”，知道她们可以去见江青了。三辆小轿车一路按着喇叭穿过广州人和牲畜挤在一起的混乱的街道，来到了郊外。坑坑洼洼的路上到处都是急转弯，两边都是高大茂盛的竹丛。

车子开过几户人家，数丛翠竹，看见一个宽阔的广场。车子停住了，只见场地上，中间有花坛：外层一圈是茉莉花，散出浓郁的香味；中间是各色盛开的鲜艳花朵；四周一根根柱子上还有圆顶的路灯。一幢漂亮宽敞的现代化平房别墅，坐落在寂静的自然保护区里，被热带花园包围着：颜色鲜艳的爬墙虎、木槿，池塘上漂着的淡粉红色的莲花，气味芬芳的木兰、茉莉和姜花，还有蝉儿有规律的鸣叫，以及小鸟毫无曲调的合奏。

“呵，这是一所多么美丽的乡间别墅呵，建在丛山之间，幽雅清静，超凡脱俗。按照中国的说法，真是世外桃源。”维特克用孩童般清脆甜蜜的声音说着，面带微笑走了进来。

江青迎了过来。她拉着维特克的手，一起走进大客厅，边走边说：“你是我的客人，所以特别请你到这里看看。……这房子是盖得不错，你看，前面有这样宽敞的走廊，夏天可挡太阳避暑，散步，冬天可以晒太阳而不受风吹。后边还有哩，一会儿我在里边请你吃晚饭。”

江青让维特克坐在紧靠自己的大沙发上，又向她介绍了总参的张清化局长：“他是我的老战友，谈西北战场，他是我的助手，喏，这些地图都是他准备的。”

维特克看到桌上的地图，有些吃惊，但立刻又镇定下来。她注视着茶几上的麦克风，轻声的问道：“关于战争，我懂得很少，我怎么能记录下你的谈话呢？我想这不是扩音器吧？”

江青：“这是录音机，我所讲的全部录下来，我不仅可以给你全部

记录稿,而且全部录音带都送给你,该满意了吧?”

江青又问:“听说你急着要走。”

维特克:“我将在30日离开中国。自从两星期前见到你以后,对时间的概念已不清楚了,不知今天是星期几,是几号。自从上次谈话以后,我看了一些你亲自培育的戏,也读了剧本又加以研究,我感到好像进入了不同的世界。”

江青:“你只知道一个方面,你总想和我谈文艺,这只是整体的一个方面。你同样板团谈就行了。”

维特克说她同样板团谈了,并对江青表示感激。

江青说:“我读了一个材料,说邓大姐已经见了你。当时我的飞机已准备起航,但我留下来了。如不见你,显得我骄傲、自满。所以临时组织了戏请你看。晚上回家,我想应该对你尽点义务。我还是起航,在这里休息了三、五天,是绝对休息,记忆力有了很大恢复。这以后知道你要写一本斯诺那样的书,我就有点担忧,有点替你着想了。当然也是为了对中国人民负责。”

她问维特克:“你到底想写一本什么书?是本浮光掠影的书还是有分量的书?”

维特克:“我确实希望写本书,描写文化和政治,文化和文化大革命的关系的书。如可能,想写本关于江青同志个人在改造文艺方面所起领导作用的书。过去外界对文化大革命有很大歪曲,他们在各方面都有误解,全然忽视文艺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作用,也不了解文化大革命在文化方面意味着什么。”

江青:“不仅是文化革命,是一场伟大的政治、经济、军事大革命,总之是一场全面内战。我不是对你说了吗?我为你着想。斯诺比你有优越的条件,因为他与毛主席进了长谈。此外还与周恩来和其他老革命者谈了话。而你呢,最老的是邓颖超同志。邓大姐工作历史长,但工作角度我比她宽。我为你这本书在做钢筋水泥的基本建设。这段历史可以生动地告诉你,可以使你了解长征和现在。但我不强加于人,你如不喜欢军事,我们就不谈,你愿谈什么就谈什么,你问的其他问题我没有准备,但我们可以漫谈。”

维特克:“你刚才谈的都很重要,至于谈什么和怎么谈,可以让你

来决定,军事也好,其他也好。你可以谈延安或上海时期,革命怎么进展的,还有你一生的情况。”

江青:“如果你了解我的历史,那谈起来就长了。我建议先不写我,而写中国革命的书。如有时间再写我。当然你也应该对革命过程中个人所起的作用有所了解,不然我们怎么能保持革命青春?但必须加上革命。”

“当人们谈到整个革命的全局的时候,任何个人的角色都显得很渺小。我自己的角色也非常渺小。”江青说。

维特克:“自从我来华后,使我感到惊讶的是我自己对文化大革命,特别是文艺方面了解得很充分。江青同志的作用在国外受到很大误解,对此我感到很难过,我想在今后的作品中予以纠正。我不是指外国人反对你,而是不了解你,他们不能正确地理解你。因为在国外材料很少。我认为我了解中国,我十分尊重中国的过去和现在,我感到你个人这方面的情况,应向外国人做出澄清。我愿做些事情,对此予以纠正,我对在外国介绍你在文化革命中的作用很感兴趣。我把自己当作一张白纸,在这张白纸上可以写任何东西。”

江青:“今晚能否谈解放战争时期?因为我跟随毛主席在西北战场作过战,我可以生动地介绍这段历史,不会枯燥的。不仅为你的书,也是为中国党、中国军队、中国人民。我好长时间想谈,你来了成了一个动力。别的问题,不瞒你说,广州的同志又搞掉了我两天时间,给1500人作个报告,给干部作的。我在这里是保密的。因为群众一发现就不得了了,我就休息不成了。”

这时江青站起身来,走近那张已摆着三张大地图的长方桌,拿起一根教棒,又叫服务人员摆好录音设备,向维特克讲起三年解放战争。

江青看到维特克在不停的做这记录,就说:“不做记录不是更好吗?”

维特克:“我知道不能用录音机,所以拼命记。”

江青:“记录很累,记录时不能听到我讲的每一件事。”

维特克:“你能否给我录音带?”

江青:“可以。我不是说过吗?录音也是为你准备的。”

江青看着地图说:“这张图是关于战略反攻的,……二野刘伯承司

令员、邓小平政委从大别山向武汉进攻。一边武汉,一边南京,敌人无法招架。……

“西北战场,毛主席坚持西北战场,指导全国。党中央分成前委、工委、后委,这张图标了敌人从进攻到完蛋的全过程,每个战役的数字都有,我就不详细说了。如果你同意,我们休息一下,然后吃饭。饭后再介绍西北战场的情况。”

维特克:“能否给我这些图的复制件?”

江青:“这些图就是为你的书画的,都是给你的。你看我把国家测绘总局局长都请来了。他也是跟我一起,跟随毛主席和党中央坚持在西北战场的。”

维特克:“那好,这样我就可以把你的解释和图联系起来了。”

江青:“今晚先把这个讲完,先讲三年半解放战争的概况,然后重点讲西北战场,这样可以讲得更生动,这就是我给你那本书所做的钢筋水泥的基础。工作非常累,因为得反复核实,拿出根据,别人驳不倒,这是历史,不能歪曲。”

维特克:“对任何提供的材料,我都很感谢。”

江青:“我告诉你的材料斯诺没有,今天我给你讲的比给斯诺讲的要深。我给你的这些材料很扎实。我搞了那么多样板戏,我自己没有实际经验,能帮助他们吗?我读了大量军事历史,不管正确的还是不正确的,甚至被歪曲的,我都读,单华北军区的历史材料就一大堆,我都读了,还到地方去调查,每个戏都要去调查。”

维特克:“经过军事研究,再打仗你们就容易得多了。”

江青:“一般人都知道怎么打仗,珍宝岛的战役就是没有打过仗的人指挥的。会打仗的人牺牲了,不会打仗的边防站站长出来指挥,只二十几岁,不满30岁,是我们党‘九大’代表,指挥得很好,叫孙玉国。”

已经是晚上21时了,江青站起来,拉着维特克的手说:“哎哟,说了这么多话,累了,也饿了,休息一会儿,咱们该吃饭了。”

坐在饭桌上,江青介绍说:“今天请你吃广东饭,中国有句老话:吃在广州,穿在杭州,死在柳州。因为柳州的木头特别好,而广州人特别会吃。这是盐鸡,味道不错,还有清蒸鱼,这种芥蓝菜只有南方生产……你最好同群众接触接触,到越秀山去看看,我现在不能去了,否则

成了展览品了。我在这儿必须保密,因为广州军区要为我的安全对中央负责。因为你是我们的好朋友,会给我保密,所以我请你到这里来。”

维特克:“希望你有时间好好休息。”

江青:“对,我应好好休息。但我怕把电报和文件压得太久,怕落后。我应有责任,我在这里同你谈话,我对广州军区的讲话已经经过政治局批准,我们是严格遵守纪律的。”

维特克:“我相信。”

江青:“当然我们不是从早到晚都很严肃的,不是这样的。过去当我能同主席经常在一起的时候,我们谈各种问题,经济、政治、文艺等等,我们从来不枯燥。你一定知道毛主席很会游泳,也很会打乒乓球。”

维特克:“这方面的照片我都有。最近我买了几幅毛主席打乒乓球的丝织画,我想带回去送给我爱打乒乓球的朋友。我知道毛主席早在1917年时就写过关于体育的文章。”

江青:“那时他的观点还不是马列主义的。毛主席对自己做过分析,开始他信孔夫子,后来他信资产阶级,以后感到这些都没用。五四运动时他是个领袖,带一个代表团去请愿。北洋军阀的总理叫靳云鹏,他拒绝见代表团,但代表团一定要见他。进去了,毛主席说过,当时出来一个人,这个人连话都说不清,后来这个人说,他就是靳云鹏,这个名字还得查一查。”

维特克:“这录音了吗?我怕丢了这一段,我可以记录吗?”

江青:“不需要,有人替你记录,你知道我们为你负责,为中国人民负责,为世界人民负责。不讲假话。”

维特克问:“你1933年入党,作为一个青年,你入党后的职责是什么?”

江青:“责任很大。我做各种超过我能力的事。我冒了生命危险找党。因为穷,几乎给流氓骗了。当然他不能骗我,但欺侮我。”

维特克:“什么样的流氓?”

江青:“有一次我弄了点钱,只够买三等舱的船票,是日本船。我的朋友送我,我朋友的朋友介绍了这个朋友给我,让他在船上照顾我,

因为我晕船。我坐过三次海船,还爬过崂山,爬山我是老虎,在女学生爬山中我是冠军。坐船是狗熊。这个朋友的朋友的朋友非常坏。我晕船,吐。因为他听说我下船时有朋友来接我,他就起坏心了。他说我们到上海,你的朋友不来接你没关系,我们开旅馆去。这样我就知道他不是个好人。那时我知道上海有专门为女人开的旅馆,我想女人总会帮女人的。如果没有人来接我,一下船我就叫个黄包车到女人旅馆去,那是我当时的想法。实际上后来我才认识到我的想法是不行的,因为要住那个旅馆,先得交15块钱的押金,所以我就绝望了。总向外边看,也不晕船了。这个坏蛋站在我后面,提着我的小行李,对我说咱们开旅馆去,我没有理他。下船后看到没有人来接我,我决心叫黄包车。就在这时候,来接我的人从人群中突然走过来,我什么都忘了,高兴得跳起来了,把那个坏蛋也忘了。他把我的行李拿走了。你对这一定最感兴趣。"

维特克:"你逃掉了。这是你作的最有战略意义的安排,通过这个例子可看出你在那时就有军事战略天才。"

江青:"文化大革命期间晋东南打得一塌糊涂。有一次,我开完会后读了一个文件,总理叫我休息,在人大会堂。突然间许多人拿着地图等东西进来。郑维山和他那一伙说,现在我们有权利开枪扫荡。那时两边都有几万人。郑维山是林彪集团的,当时还不知道。我说,那怎么行,两边都有几万人,不考虑人民的生命财产怎么行?他们说,我们现在宣传没用,要派坦克,挖战壕。我说,我要派比你们更多的军队,但远离现场,在坦克装扩音器。当时总参的副总参谋长也在那里。吴法宪说:哎呀,江青同志你也知道怎么打仗呀。我说:'我跟随毛主席几十年,连这点事还不知道?不能开枪。'总理支持我,半夜里总理打电话给我说,你的办法很有效。这以前榆次县开枪打起来了,但我不知道,是突然袭击,我1967年9月5日的讲话把这股风刹住了。"

维特克:"你刚才讲的情况对理解你9月5日的讲话提供了非常重要的背景。"

饭后,维特克从洗漱间走出来,一手拉住张颖说:"Miss张,我对战争的事听不懂,很难懂,尤其是中国这么复杂,我感到很困难。"

"你可以提出来,请江青夫人不再谈战争了,我想她也许愿意对你

谈别的,而且你的时间有限,后天就要离开中国,是不是?”

维特克:“是啊,学校要开学了,我还要讲课。”

江青带着维特克走进饭厅旁边的娱乐室,和张颖打了会儿乒乓球后,大家又回到客厅。张颖乘机悄悄走到江青身旁说:“刚才维特克女士向我表示,她听不懂战争,希望你能讲点别的,有关你自己的事。”

江青坐下,慢吞吞地对着维特克:“我讲的战争故事,不是非常有趣吗?你不愿意听?这就是我的事呀。西北战场的战争,就是我和毛主席亲自指挥的呀。”

维特克:“江青夫人,我非常有兴趣,只要是关于你的一切,我非常愿意听,听不懂,我可以学,是不是?这是你刚才对我讲过的……”

江青:“这就对了。这个图是毛主席的行动路线图,……那时撤离张家口不容易,撤出延安也不容易。很多人不愿意,这些人都是好人不是坏人,当然也有坏人的捣乱。中央那时决定要撤到后方去,那个决定是在王家坪作的。有些好心同志动员我去向主席讲讲,留在这里多危险呀,我也很傻瓜,就去说了。毛主席说,你是胆小鬼,你就走。我很冤枉,这不是我的意思,我是坚持留下来的惟一的女同志。我认为在艰苦的战争年月,应该有人照顾他,应该与他同甘苦共患难。开始毛主席和我带着李讷行军,李讷与你同岁,带孩子行军以示坦然。李讷当时6岁,白天还好,夜里行军孩子睡了,就不好办了。软了,甚至几个人都没办法对付她,更甭说一个人了。后来我就求毛主席,带着孩子不行,后来就让她与邓颖超同志一起过黄河,所以李讷一直叫她邓妈妈。我事先做好工作,她答应过河,但过去后,睡醒一觉,哭起来要回来。我就跟你讲这么多。”

但是,整个晚上,江青依然是在不厌其烦,十分详细、具体,甚至是诸天的向维特克讲述解放战争时期,西北战场及三大战役的全过程,一直讲到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毛泽东当选为国家主席。

维特克说:“现在感到越来越清楚。我没有想到这么多人为一个外国人服务。”

江青:“为中国人,信任你,相信你能写好书,我不信一个女同志不能写好书。”

维特克:“我原则上相信这点。”

江青:“你到联合国代表团去要求,谢伟思也介绍你来。见你以后,你给我印象是好的,你对中国人民友好,对世界革命……你不仅是个好的美国人,也是个好的知识分子。”

维特克学的很快,她说:“这是我最大的弱点。”

江青:“人是变的,但天不会塌。希望你逐渐进步,千万不能骄傲。‘谦虚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鲁迅讲:‘我经常解剖别人,更多的是解剖自己。’你对鲁迅看法不正确,可以举例子,反对托洛斯基。有西北战场的经验,才可以理解主席长征和遵义会议后四渡赤水河,那是为了甩掉强敌,其中一次在贵阳,两边强敌,毛主席出其不意,中间插入。我没有长征经验,但在西北战场跟随主席,知道如何对敌调来调去。”

维特克:“也许当我整理加工这些材料后,发现问题再来请你澄清。这些不仅够一本书,而是够几本书的材料。”

江青:“你知道我不是光搞文艺的了吧!”

维特克:“任何人不会像江青同志文艺上有才能,在舞台上能表现。有革命朝气的人不会是只搞艺术了。我开始从表面,进入肉,现在进入骨头了。”

江青:“今天重头戏过去了,以后可开神仙会了。今天9个小时多了,我也要睡大觉了,明天游泳后再开神仙会。”

维特克:“你把解放战争战略阶段一步步谈了,很清楚,下步你怎么谈?”

江青:“鲁迅,延安文艺座谈会。你还想了解什么,我可以重点告诉你。一生虽不长,也够曲折复杂了。你想了解的30年代都可以谈。”

维特克好像突然惊醒了似的,赶紧跑到大桌子旁边,抢起那些地图说:“这些都是送给我的吧?江青夫人,对于我这真是太宝贵了!”

江青:“是送给你的,不忙拿吧,我让人给你送去。你拿着不方便。”

维特克:“还是我自己拿走好,这些对我了解你的讲话是非常有用的。”

张颖慢慢地靠近张清化,在他耳边小声地问了一句:“审查没有?”
张清化小声回答说:“江青同志要我交给她亲自审查的。”
张颖没有再说话。
维特克双手紧紧抱着那几卷地图,走出门外,登上了汽车。
第一次与江青会见维特克的谈话文字手稿也很快交给了维特克。

# 第1253回：谈身世，从孩提到抗美援朝 回北京，要整理会谈记录

8月26日凌晨，维特克等人从江青处回到了广东省迎宾馆。虽是凌晨，广东的闷热仍让人难耐。张颖把两架电风扇打开，躺在红木躺椅上。这时，她听到轻轻叩门声，接着，住在她对面的于世莲和陈明仙轻轻推门闪了进来。

小于一进门就说开了，对这天江青谈话的内容感到奇怪。陈明仙也长吁口气后问张颖：

“不是说周总理只让她谈文艺吗？……”

因为江青在谈话结束时说：“明天游泳后再开神仙会。”就是说，她还要和维特克谈。所以，陈明仙继续问：“维特克后天就该出境了，她要赶回去开课的。谁该管这些事呢？”

张颖没有回答，陈明仙追问：“你们来时，周总理有交代吗？”

“有非常明确的交代：只谈一次，只谈文艺。我已经转告首长了。”张颖说。

“维特克的机票已全部订好了，她要赶回去教课，后天一定要到香港的。”

张颖说：“我知道，也着急。但看样子走不了，看这架势，恐怕挺麻烦。”

“你们从北京来时，不知道这些事吗？”

张颖摇摇头。

于世莲和陈明仙轻轻退了出去。张颖又躺到那张大躺椅上，还没有回过神来，又传来叩门声，进来的是翻译沈若芸。同于世莲一样，她一进门就嚷嚷起来，也是对江青的谈话内容不理解，而且也问：“明天还要继续谈，你看怎么办？”

张颖轻轻推推小沈，让她小声点，夜已深了，让别人听到不好。然后反问沈若芸：“你看怎么办？行前周总理的交代你也听到了，我今天

一到这里,就已经全部向江青转达,她显得很不高兴……”

小沈让张颖给北京打长途,请示汇报一下。

上午10时,张颖给北京外交部打长途电话找王海容,向她详细汇报了昨天江青与维特克会见的情况和谈话内容,请示如何处理?王海容说她一定转达上级。

刚过11时,张颖接到通知,江青要见她。张颖拉上外交部礼宾司的唐龙斌一同前去。

江青一见到张颖就问:“维特克女士对于昨晚的谈话有什么反应吗?她的情绪如何?”

“昨晚在汽车上,她又表示对战争听不大懂,想听你私人的故事。”张颖回答。

江青说:“我当然会给她讲的,忙什么,西北战场就是我的故事。”

张颖请示说:“明天,最迟后天维特克女士必须到香港,她的机票已订好,假期也满了。今天是否让她在广州附近参观一下,比如去佛山看看美术陶瓷,还有祖庙,这也是旅游点。下午4点以前可以回来。”

“你说什么?去佛山参观,那么远下午能赶回来?我去过,走一趟得8个小时。”江青当即表示反对。

“如果坐小汽车最多两小时可以往返的,下午准能赶回来。我可以陪她去。”张颖还要坚持。

没想到,江青的声音突然提高了8度,近乎是吼叫的喊出:“你以为我没有去过吗?我说8小时就是8小时,你敢顶撞我?!”

张颖吓了一大跳,睁大眼看着江青,本能的轻声解释说:“是三、四十分钟的路程。佛山是近郊,我们都是去过的。不信你可以问问大牛。”

站在江青身旁的大牛是江青的贴身警卫,一个山东大汉,为人耿直,对江青忠心耿耿,不离左右。

“报告首长,老张同志说得对,最多需要40分钟。”大牛如实回答。

江青那个火呀,向前走了几步,手指着张颖的鼻尖,一手叉着腰,大声的嚷道:“好呀,你们今天都是怎么了?围攻我呀?胆子不小呵,你要知道,围攻我的都没有好下场!”

谁都不说话了,怎么说呢?3人沉默了几分钟,江青让大牛把唐龙斌叫了进来,吩咐将维特克的飞机票改期。

训练有素的礼宾官唐龙斌,文质彬彬、心平气和、非常婉转地向江青陈述,这种事情很不好办,要涉及许多方面的关系。但是江青好像没有听见,仍然坚持把维特克的行期推迟6天。

下午18时40分至27日凌晨4时,江青与维特克又谈了将近10个小时,主要是江青讲述自己的身世,从孩提时代讲起。

所有在座的人,都不了解江青的身世,更没有听她讲过自己的童年经历。这晚,大家都饶有趣味地静静的听着。

吃过晚饭,江青开始讲她在上海的经历,最后说:

"1937年,我放弃上海的优越条件来到革命圣地延安。"

"在上海,一个电影明星,物质生活条件还是不错的。但是,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在国民党的白色恐怖统治下,心情郁闷得很呀!到了延安,一看到红旗就激动得潸然泪下呀!"

江青擦了擦眼泪,又指了指维特克说:"你没有我那种经历,是体会不到我那时的心情的。"

江青一直谈到次日凌晨。

8月27日傍晚,她们又移到了另一栋更大的别墅,江青讲了她去延安的前后经历,又从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讲到解放后对《武训传》和《清宫秘史》的批判,然后说到《红楼梦》,详细讲述了1954年关于《红楼梦》研究风波的来龙去脉,介绍了自己对《红楼梦》一书的看法。

晚饭后,江青和维特克又讲起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内的斗争。她叫人拿来一个皮包,从中取出16开本的文件和几卷纸,一件件放在身边的茶几上,然后拿起其中的一本,翻开来念。

……

维特克非常紧张地在记录着,突然,她停住笔问:"江青夫人,这太重要了,你这是印好的,是否也可以送给我呢?"

江青:"当然可以,这是为你准备的,喏,这里还有林彪的信、二月提纲……"

坐在旁边的张颖一听,吓出一身冷汗。因为江青念的关于建国以

来所有事件的大事记,在国内还是保密的;而林彪的信,在内部尚未传达,《二月提纲》也没有对外公开。这些,能送给外国人吗?她如坐针毡,急想对策……那张茶几正好摆在她和江青之间。张颖随手拿过那些文件,交还给工作人员,对江青和维特克说:“这些材料还需要翻译,以后和记录一起再送吧。”

江青又讲起了抗美援朝、中印边界反击战……她指着放在茶几上的地图说:“这里是抗美援朝时五次战役的地图,还有图解,也是送给你的……”

张颖赶紧起身把总参测绘局局长张清化拉到客厅外的走廊上说:“老张,首长今晚拿出来的地图,我想也是你带来的吧?因为我事先什么都不知道,这是朝鲜的地图,怎么能送给美国人呢?”

“我也不知道首长要送给美国人呵。”

“不管怎么说,这些图绝对不能送给维特克。”

“这是首长的吩咐,我没办法阻止吧?”

“如果要送,我们现在就去打电话请示周总理,他主管外事的。”

“首长的事谁敢阻拦,她发脾气怎么办?”

“首长发脾气我承担。如果把地图给维特克拿走,一切后果由你负责。”

他们又回到会客厅,各人坐到原位上。

会谈结束时,张清化匆忙走近江青身旁,小声地解释着。维特克起身告辞,双手去取茶几上的那些地图。张清化赶紧走过来,非常礼貌地说:“维特克女士,这些地图里面可能还有些地方需要修改,你今天不要拿,以后……”说着,他就把那些地图卷起来拿走了。

维特克用惊异的眼光投向江青。

江青笑着和维特克握别。

29 日下午 16 时,江青陪维特克游兰圃。她这天穿着乳白色连衣裙,戴着金丝眼镜。兰圃的一群女服务员,也都穿上藏青色裙子,白色上衣,拿着许多厚纸板,还有各种植物标本。

江青看见张颖,大声问道:“我送给你的裙子呢?为什么不穿?我不是让你们都穿裙子吗?”

张颖已经有许多年都不穿裙子了。那天,江青的秘书给陪同维特

克的5位女士送来5条黑色麻绸短裙,谁也没想到今天要穿。张颖只好抱歉地说:“江青同志,我的皮肤过敏,怕蚊虫咬,所以没穿。”

江青显然极不满意:“我都不怕咬,你就怕咬吗?”

张颖还想解释两句,江青的秘书赶紧过来拉着张颖轻轻地说:“快走吧,我用车子送你回去,换了裙子赶快来。”然后,又打电话到宾馆通知:“告诉所有女同志,通通穿上黑裙子。”

这天下午在兰圃,维特克为江青拍了很多照片。

晚上,女服务员引导大家走进一间大厅,长条桌上堆满了书。最引人注目的是放在木匣子里的线装《二十四史》,是清代版本,在国内已不多见。另外还有重印的线装《古诗源》,新版20本精装《鲁迅全集》,线装新印的《脂砚斋重评石头记》,还有不少其他各种书籍。

江青说:“你们看,这些书都是我预备送给维特克女士的,她是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没有一套《二十四史》怎么行?”

大家都有点吃惊,这样名贵的《二十四史》送给维特克个人?张颖说:“江青同志,这套《二十四史》,国内也不多见。按规定是不能送给私人的,你或者送给维特克女士所在的大学,也许更有意义。”

江青:“谁说不能送?我自己花钱买的,我爱送给谁就送给谁!”

“这是有关文物出口的规定,需要文物局批准的。”陈明仙轻声解释了一句。

江青火了:“谁的规定?周总理不是送给尼克松总统一套吗?周总理能送,我就能送。”

“周总理是用国务院名义,送给美国国会图书馆的。”沈若芸很认真地又说了一句。

这时,小于陪着维特克走进来了,服务员快步走上前去,把那盛满鲜花的盘子送过来,江青高兴了。她上前拉着维特克的手说:“这是茉莉花穿成的花球,你看还有小花环,你看还有白兰花,这样清香,这样洁白,美国有这些花吗?”

维特克:“也许夏威夷岛上有,我不清楚,不过不会有这么清香的花,真美,真可爱。”

江青:“这是我特意准备送给你的。休息的时候,我很喜欢穿花球,每天换一个,你看穿在扇子下边香得很。”

江青手上拿着一把檀香扇,下边坠着茉莉花球,她对维特克说:“这是我的檀香扇,送给你作纪念吧,这是新的,今年我才用。我用过的送给你,才更有意义,是不是?这把扇子是特制的,比市面上卖的要精致得多。”

维特克接过扇子和花球,细细把玩。江青这时拿出几串小茉莉花,笑着对张颖她们几个人说:“这是送给你们的,不然我就太偏心了。”

江青又对维特克说:“维特克,你是我的朋友,我还要送你一些纪念品:这是特制的书签和裁纸刀。你看,这是不久前从湖南马王堆出土的漆器上的花纹,刻在象牙的裁纸刀上。这是竹制的,也有雕刻。这样的手工艺品,又好看又有纪念价值,而且是我自己设计,特级技工为我雕刻的。除了我自己,谁也没有哩,送给你,作为永久纪念。呵,还有这一套瓷制的小猫,送给你的女儿,是景德镇的产品。你看看多么可爱!你知道景德镇是我国出产瓷器最好的地方,以后你应该去看看,那里的瓷窑有上千年的历史哩。”

维特克睁大眼睛,惊讶和喜悦使她不断点头微笑。

江青:“你看,那边桌上放着许多书,有《二十四史》,你当然知道的,作为中国问题专家,你应该有这么一套。这是我送给你个人的,不要不好意思,这是我自个儿花钱买的。她们让我送给你们大学图书馆,我一定要送给你个人。还有这本《古诗源》,这本书是我挖掘出来的,要他们重印,这对于研究中国古代文化,极为重要。”

太阳落山了。江青对维特克说:“今晚我请你吃山东菜。这里不是山东,但我有从山东来的好厨师,做我的家乡菜,你一定会喜欢的。你知道,在中国北方,山东菜是最负盛名的。比如说吧,北京烤鸭原来是从山东传过来的,在清宫廷得到皇帝和慈禧太后喜爱,就在北京流传下来了。山东菜也很有特色,与广东菜、上海菜都不一样的。”

8 月 30 日晚饭后,江青又一次接见维特克。这次主要是维特克向江青提出一些问题,希望江青补充或解答。

31 日上午 10 时,江青最后一次接见维特克,说是还有一些重要的问题要告诉维特克。

终于,维特克女士飞回美国了。所有陪维特克女士的人员,也于

31 日下午坐上飞机回到北京。

回到北京的第二天,张颖拿着从广州带回来的全部录音记录稿,去向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汇报。开始,乔冠华还饶有兴趣听,接着就不耐烦了,挥挥手叫张颖去找王海容。张颖又拿着记录稿去找王海容汇报,王海容听了说:“这事谁都管不了,等以后再说吧。”

张颖将记录稿交给王海容。

9 月 6 日上午,王海容匆匆来到张颖办公室,将她叫出门外,说:“首长有命令,要把记录稿赶快整理出来,还要寄给维特克女士,要你继续负责。今天 10 点在 129 室,大家集中讨论如何整理。”

张颖说:“你是否看一下那份记录呢?你不能提点意见?我认为这不是件小事,应该向上级反映!”

王海容说:“别啰嗦了。这种事儿我们都管不了,你还是赶紧去集合人吧。”

于是,除礼宾司的唐龙斌外,全体陪同维特克的人员全部来到外交部 129 室,包括穿军装的总参测绘局局长张清化。当大家知道是要整理广州的谈话录音,立刻就嚷嚷开了:

“怎么个整法呀?人家广州不是已经根据录音整理了吗?”

“为什么还要整理记录?维特克自己是作了记录的,没有这样的先例要为她采访整理记录。”

“整理记录的目的何在?为了存档还是干别的用,应该明确,不然我们也不好整。我们只是接待班子,这件事已经结束了,我们还有别的工作哩。”

“如果要送给维特克,那还得翻译成英文,得花多少功夫呵!”

王海容听着大家七嘴八舌,着急了,提高嗓门说:“首长秘书刚才来电话,要整理这份记录,我们只能照办。首长指示:第一步要按录音整理,一字不许错,等一会儿我去找几台录音机来,你们两人一组,轮流核对。”说完转身走了。

大家鸦雀无声,每人找把椅子坐下,然后分散在小屋的每个角落,准备核对。

7 个人用了整整 3 天时间,终于整理完毕。

# 第1254回：抓保卫，召开全国座谈会 说贵州，王洪文进京学习

8月26日开始，有中央部分有关单位的负责人和各省、市、自治区的主要负责人，及中央办公厅警卫处的负责人参加的全国警卫工作座谈会，按计划在北京召开。这次座谈会主要是汇报各个省、市、自治区的社会秩序和治安现状，警卫工作问题，应对措施等。

会议由华国锋主持。他从1971年毛泽东南巡后，林彪集团成员通报毛主席的行程，并策划刺杀毛泽东的行动说起，谈到了湖南存在的问题，湖南驻军的问题，最后转到警卫工作。

他说："从去年揭发林彪问题后，我们都感到当时的情况很危险，是伟大领袖的行动将敌人部署打乱了，想起来就让人后怕。看来警卫工作我们不认真抓不行，有的同志过去没抓过，从现在起就要认真抓。中央负责同志的安全，外宾警卫任务很重。这次开会，就是要交流一下经验，并对这方面的工作进行一番整顿。"

总政保卫部部长蒋润观在中央警卫工作座谈会上发言时说："1970年12月，谭甫仁同志被害，而警卫员贪生怕死，听到凶犯开枪，躲在房间里不敢出来。今年5月，63军副军长余洪信行凶，打伤该军副政委杨兆魁同志，打死该军政委的爱人。余犯行凶持续二十分钟左右，打了十几枪，当即有人报告警卫分队，竟无一人出来捉拿凶犯，甚至慌乱一团，有的吓得跳窗逃命，有的吓得趴倒在地。这两起案件是我军历史上没有过的。"

王洪文代表上海市在会上做了发言，他说上海的警卫权基本让"林贼"掌握了。他们利用警卫处搞中央情报，搞破坏。利用工作方便谋害毛主席。

随后发言的有广东的孔石泉，浙江的铁瑛，外交部的符浩，江西的黄知真。

在8月27日的会议上，北京卫戍区吴忠、江苏吴大胜、广东王元

生、河北郑三生、安徽李任元、中共中央联络部的杨玉衡、山东的张钰秀先后发言。

8 月 28 日在会议上发言的有天津的刘政、云南的武健、广西的刘重桂。

所有代表的发言皆与华国锋、王洪文的程式、内容基本相同,都是叙述了本地区或本部门文革以来的社会治安、警卫和接待工作情况,目前存在和亟待解决的主要问题。

像边境地区和有进出口岸的省份,都提到了边防形势严峻,有外部特务渗入的问题。如广西在越南战事紧张的时候,有大批人从越南过来,一来就是几千人,来了就不走,里面混有“苏修”的特务。云南在 1972 年几个月间就有敌特遣入 38 起,破获了 31 起,敌特将中央文件带出国境。广东接待外来人员的任务量大,外宾、华侨多,出入境 21000 人,是敌特混进来搞我们情报的一个渠道,1972 年发现特嫌 36 个。

外交和联络部主要谈的是外交及接待工作中的一些问题。如礼宾工作不规范,受到周总理批评;互通情况不够;资料发得不及时;中央接待部门规格不统一。存在大国沙文主义、无政府主义,出了索马里代办出席宴会受阻事件。还有联合国首席翻译的钱包在中国被偷事情,接待中铺张浪费问题很大等等。

大城市主要是社会秩序和治安问题,如天津 66 军政委费国柱的汽车让人给推跑了,其实可能是汽车的刹车没有拉,汽车自行溜出车库的。另外,社会闲散人员多,南京 1972 年 1 至 3 月,游散人员 1 万多,不少是劳改劳教分子,出现了一些行凶杀人案子老破不了的情况。交通事故频繁,仅天津 1972 年上半年就发生 46 起,死 36 人,伤 300 余人。

在最后一天的会议上,公安部部长李震对全国的治安情况进行了总的介绍,他说:当前国外阶级敌人加紧了派遣活动。国内散发投递反革命传单、匿名信,为林彪招魂的情况不少。有的反革命分子很嚣张,如武汉一电影院跑片员,到处散发反革命传单。有人公开为林贼招魂,广州军区政治部干部,在食堂贴 4000 字的大字报,反对批判林彪。

9月12日,贵州省蓝亦农等13位领导人给中央和毛泽东报告,汇报他们9月3日进京后,对贵州省地、师级干部批林整风汇报会议进行的总结。《总结提纲(修改稿)》称:

“在我党第十次路线斗争的重要关头,蓝亦农、张荣森同志都是站在林彪反党集团一边,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和宗派主义错误。蓝亦农同志的错误更严重。”

《总结提纲(修改稿)》将这些错误归纳为:一是在九届二中全会上,和梁兴初、谢家祥等人串连,提出在宪法上加上“三个副词”,坚持要设国家主席;二是转移批陈大方向,吹捧林彪;三是“九一三”事件后,不揭发批判林彪,不检查交代自己的问题,不听从周兴、王必成的命令;四是拉山头,搞宗派,与黄永胜、邱会作、黄志勇以及梁兴初、谢家祥、韦统泰等来往频繁。

9月15日,中共中央下发批转《贵州省地、师级干部批林整风汇报会议总结提纲》的通知。

周恩来1972年8月与林立衡谈话后,总政通过电话向空军报社传达了周恩来关于林立衡的指示:“林立衡经过前一段学习之后,应回到空军报社接触群众,一起学习,以党员相待,同志相称。她在空军报社是有错误的,要帮助她提高认识,接受教训,并要注意她的安全。”

为此,空军报社专门成立了一个陪同林立衡学习的小组,成员有后来任空军报社社长的金为华、张炳根,有各处处长和编辑徐臣、龚克平、石玉增、谭先德等人。并规定了几条:一是不许追问有关“九一三”事件的问题,不问也不许打听。林立衡写的材料密封,直接上送中央政治局和周恩来总理。二是学习情况由总政驻空军机关工作组组长、原总政直属政治部主任李平单独整理成简报上送中央和总政,每期印7份,由《空军报》的金为华执笔,经直接掌握空军报社学习的总政工作组成员李珉报工作组组长李平审核完稿后上报。三是真诚帮助林立衡提高认识,保证她的安全。

总政工作组组长李平在空军报社作了动员。他说:“过去她是仙女,你们夹道欢迎。现在不是仙女,你们也要欢迎。”

李珉说:“她是起义的,起义说明她也是有错误的。”

之所以说林立衡“起义”,是因为林立果1971年9月7日把谋杀

毛泽东不成就去广州另立中央,再不成就去苏联的计划告诉林立衡后,她后来说“当时怕林立果对自己下毒手,曾向林立果表示‘跟你们走。’”而9月8日晚,林立果乘飞机回北京时,林立衡尽管思想斗争激烈,不同意林立果的行为,却因林立果向她说过“首长也同意”而不敢去当面劝阻父亲制止林立果的活动。9、10、11日三天,林豆豆都在北戴河林彪身边,还去山海关游览购物送给父亲。她知道林立果在北京从事谋害毛泽东的活动,但没有及时向中央检举揭发,直到9月12日晚,林彪、叶群、林立果要逃跑之前才去8341部队打电话向中央报告。所以中央、总政认为她是“起义”。

说到林立衡的错误,主要是文化大革命前期,她在空军报社支持造反派批斗了一批政治部领导和二级部正副部长,还把报社5名正副处长,包括她所在的三处处长林毅、袁亮还有赵鹏、刘昌东、许广信打成“反党小集团”。1967年3月才参军的林立果被提升为空军司令部作战部副部长后,林立衡也同时被提升为空军报社副总编辑。

1970年8月3日,空军政治部党委第67次会议讨论学习林立果“讲用报告”,同时向空军党委建议提升林立果任空军副参谋长,林立衡任空军政治部副主任,并为空军党委常委。会议决定请林立衡给政治部干部作一次活学话用毛泽东思想的讲用报告。根据空军政治部党委这次会议讨论的意见,起草了一个紧跟林立果、林立衡的5条措施,其中规定:

“一切重大问题,例如工作计划、决定、报告、干部配备以及重要问题的处理等,都要及时主动地向立果、立衡同志请示报告,争取他们的领导,真正做到大事不遗漏,不延误,小事不干扰。对林立果、林立衡必须时时想到他们事事请教他们,处处保卫他们,要老老实实服从他们的调动,服服帖帖地听从他们的指挥……”

这就是8月周恩来接见林立衡时提到的“五条”。据说周恩来看到这5条之后,斥之为封建法西斯的东西。

1972年9月1日,林立衡在卫戍区警卫一师两名中年女干部程言翠、侯颜娥陪同下回到空军报社,报社为她开了欢迎会。林立衡说:

“受到总理和中央首长的接见,激动得两宿没有睡着。”

“毛主席对我很关心。”

“中央首长严肃的批评和耐心的教育对我的教育很大。我过去生活在林彪这样的家庭,有不少的缺点错误和罪恶,愿意向群众揭发交代。这一次一定要很好学习,改造世界观。”

“空军报社的问题很严重,这些问题的根子在我这里。我对不起人民对不起党,要向同志们请罪。”

当天晚上,她又几次对陪同她到报社来的程言翠、侯颜娥说:“没想到报社的同志这样热情,很受教育,很感动。”

以后林立衡每次到报社参加学习,都是由程言翠、侯颜娥陪同,为了保护她的安全。

9月8日,林立衡在小组讨论中发言时说,自己1971年9月5日在报社支委会上的那次讲话,错误是严重的。“我有时听到林贼一些反动言行很气愤,另一方面,还觉得他过去打过仗,理论上也有一套,想不通为什么会这样?也希望他早点死,保持个晚节算了。”

9月20日,林立衡在小组会上对林彪1966年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518”讲话作了一次批判发言,并参加了一次党小组会,大家反映较好。

9月28日,林立衡在同程言翠、侯颜娥闲谈中说:“过去我与林立果是同盟军,有些情况我是从他那儿知道的。在北戴河林立果叫我到他住的楼谈了两个多小时,我当时不得不表态‘跟你们一起’。我如果不表态,就暴露了。”

她还说:“张清林是我看中的,叶群看不上他。71年4月来北京,先在304医院学习,后住在邱会作家,到了8月8日,我们的关系才确定下来。”

29日下午,林立衡参加了报社批林彪的大会并发了言,大家反映较好。

9月初,在上海的王洪文接到北京张春桥的电话,通知他把工作移交一下,中央决定调他到北京去学习。王洪文感到很突然,又不敢问学习什么、怎么学习?

张春桥说:“学习要有一段时间,所以要带好衣服和生活用品,可以随带一个秘书。”

放下电话,王洪文赶紧找徐景贤、马天水和王秀珍商量,他们在康

平路市委小礼堂议论半天。

徐景贤说:“这次中央决定调老王去学习,肯定是毛主席的决策,因为毛主席在‘九大’就说过,要从工农积极分子中提拔干部……”

王秀珍嘴快,一拍巴掌:“哈,老王要进中央政治局了!”

王洪文赶紧制止她:“嘘,不要乱说。”

马天水频频点头:“林彪集团垮台以后,中央的人越来越少了,洪文同志去了以后,很有可能回不来了……”

9月6日晚上,他们几个在锦江饭店小礼堂设宴为王洪文饯行,9月7日上午,到虹桥机场为他送行,王洪文和秘书小廖提着手提箱向大家挥手告别,乘坐飞机,青云直上,向北京飞去……

到了北京,他们直接来到北京钓鱼台9号楼,这里的二楼住着姚文元和张春桥。从此,王洪文和廖祖康也住进了9号楼二楼的侧楼,和张春桥、姚文元成了邻居。当然,此时的钓鱼台9号楼二楼住着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一、二、三把手,自然也成了上海的大本营。

王洪文不知道调他进京干什么。而张春桥的心中,则是一清二楚。那是一天在中南海谈完工作,毛泽东忽然问他:“王洪文会不会写文章?”

毛泽东的话使张春桥感到意外。他答道:“王洪文也能写写。当然,比起姚文元来,要差得远。”

回到钓鱼台,张春桥琢磨着毛泽东为什么问起王洪文。他当然无法直接问毛泽东,便求助于江青。

江青告诉张春桥:“前几天,康老跟主席谈话。康老说,他过去一直是搞工人运动的,所以很关心文革中涌现的各地的工人领袖。他对主席说,上海的工人运动搞得很不错,王洪文是一个值得注意的人才……”

果然,几天之后,毛泽东更详细地向张春桥询问王洪文的情况。但是,毛泽东没有说明意图。

这次,毛泽东终于明确地提出,让王洪文到北京来。

毛泽东召见王洪文,使王洪文深感意外。在毛泽东的书房里,老人家紧紧地握着这个37岁的年轻人的手,犹如考官一般,提出了一个又一个问题,要王洪文谈观点,说见解。

“你在北京多看点马列的书,多听听各种会议的意见……”临别时,毛泽东对王洪文说了这番话。

毛泽东关照周恩来亲自帮带王洪文。以后,凡是周恩来主持的会议,他都通知王洪文参加,中央政治局的小型会议,中央处理七机部问题的会议,解决河南两派的会议,甚至连绝密的讨论运载火箭把人造卫星送上天的项目会议,都要王洪文参加并让他发表意见。与此同时,中央办公厅还给王洪文送来了完整的马、恩、列、斯和毛泽东的著作,供他学习使用。

刚到北京的王洪文,对那种昼夜颠倒的工作时间表很不习惯。可是,张春桥、姚文元都是这样工作的,他也不得不“同步”进行:每天不再是早上六点起床,而是下午三、四点钟起床。起来后,看看文件。吃过晚饭,出席各种会议。略事休息后,从午夜起开始办公,处理文件,直到清晨,吃过早饭,拉上灯芯绒窗帘,遮住那明亮的阳光,开始睡觉。

因为这是毛泽东的工作习惯。所以张春桥、姚文元要与毛泽东“同步”。王洪文呢,也只得随之“同步”。这种类似于上海国棉 17 厂的夜班工人的工作时间表,使初来乍到的王洪文感到疲惫不堪,不住地抽烟。但他还是兢兢业业,谨慎小心的开始了新的生活,像模像样地学习起来。

为了更好的学习,王洪文向徐景贤提出,要把上海市委写作组的肖木调去北京,当他的理论学习辅导员。肖木是写作组的主力,有理论水平,笔头又好,文采风流,徐景贤当然舍不得他走。但是王洪文指名要人,他不得不放。肖木帮王洪文订了一个学习马列著作的计钊,每天共同读两小时,工作再忙,雷打不动。

王洪文看到毛泽东认真学习英语,他也仿效起来,又通过徐景贤从上海复旦大学外语系物色到一位姓黄的英语教员,调往北京,辅导他学习英语。

王洪文很快适应了中央高层的工作习惯。实在闷得慌,他就给马天水挂长途电话,听听上海消息。自从他离开上海之后,张春桥指定由马天水主持上海的日常工作。上海依然是“三驾马车”,只是由“王、徐、马”变成了“马、徐、王”。如今的那个“王”,是王秀珍。

马天水的笔记本上,有一段当时王洪文的电话记录:

“到北京以后,太寂寞了!有时,一整天开会,又累得很!这几天,一连出席七机部的会、河南的会、湖南的会。下午3点出去,夜里3点回来。我看不进书。调到上面来,真不习惯,巴不得早一点回上海……”

也就在这个时候,张春桥向毛泽东反映了王洪文想回上海去的念头。

“他怎么能回上海去呢?”毛泽东笑了,“我想提议他当副主席呢!不过,这只是我个人的看法,还没有经过政治局讨论,你不要传出去,也不要告诉王洪文。”

毛泽东提议将王洪文由上海调来北京参加中央工作。9月20日,周恩来致信毛泽东告知:中共中央政治局成员同意毛泽东的提议。

# 第1255回：“言必信”，中日、中德建邦交 批极“左”，《文汇报》提出质疑

9月20日，周恩来单独会见受日本外务大臣大平正芳之托，带来日方准备的联合声明草案的古井喜实。周恩来就这个草案发表意见。中日双方同时发表关于日本内阁总理大臣田中角荣应邀访华的公告。

9月25日，田中首相一行应邀访华。9月25日晚，周恩来为田中举行欢迎宴会。

田中在宴会致词时谈到日本历史上侵华战争时表示：“我国给中国国民添了很大的麻烦，我对此再次表示深刻的反省之意。”

第二天会谈时，周恩来指出：“田中首相表示对过去不幸的过程感到遗憾并表示深深的反省，这是我们能够接受的，但是，‘添了很多麻烦’这一句话，引起了中国人民的强烈反感。”

田中解释说：“添麻烦”是诚心诚意地表示谢罪之意。

周恩来强调，“麻烦”在汉语里意思很轻。

田中表示，“我们两国之间需要互相理解，应当寻找能为两国国民所接受的表达方式。”

9月25日,26日,27日,周恩来同田中首相和大平外相举行三次会谈。

9月27日晚饭后,中国外交部礼宾司司长韩叙通知日方:“今晚8时或9时,毛泽东主席准备会见田中首相”。

20时刚过,周恩来前来国宾馆,亲自陪同田中首相、大平外相和二阶堂官房长官前往中南海。

到了中南海游泳池,田中一进门就提出要到洗手间去一下。

当田中一行走进毛泽东的书房,毛泽东迎上去与他们一一握手问候。田中显得十分的拘谨。毛泽东一边与他握手一边说:“欢迎你,我是个大官僚主义者,见你们都见得晚了。”

田中角荣、大平正芳、二阶堂进分别说了自己的姓名,并说“能见到毛主席感到很荣幸。”

毛泽东用日语说:“谢谢!”接着问道:

“怎么样,吵了架吗?总要吵一些,天下没有不吵的。”

“吵是吵了一些,但是已经基本上解决了问题。”田中首相很有礼貌地说。

“吵出结果来就不吵了嘛。”毛泽东说。

周恩来在旁插话说:“两位外长很努力。”

“是的,两位外长很努力。我们进行了非常圆满的会谈。”田中首相也补充了一句。

毛泽东侧过脸,对着大平外相说:“你把他打败了吧?”说着,他用手指了一下坐在周恩来旁边的姬鹏飞外长。说完哈哈一笑。这笑声顿时也感染了在座的其他人,大家都笑了起来。

“没有,我们是平等的。”大平外相不好意思地连忙解释。

田中首相接着大平外相的话说:“我们进行了非常圆满的会谈。”

“那就好了,天下太平。你们那个‘添麻烦’的问题怎么解决了?”毛泽东问。

“我们准备按中国的习惯来改。”田中说。

毛泽东对田中说:“中日有两千多年的来往。历史记载中,第一次见于中国历史的是后汉嘛。”

“你们到北京这么一来,全世界都战战兢兢,主要是一个苏联,一

个美国,这两个大国。它们不大放心了,晓得你们在那里捣什么鬼啊。”

田中说:“美国声明支持我们到中国来。”

毛泽东说:“美国好一点,也有一点不那么舒服,说是他们今年二月来了没建交,你们跑到他们前头去了,心里总有点不那么舒服就是了。”

毛泽东问:“你看这个世界怎样呢?”

田中说:“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一些大国想用实力政策进行侵略的做法到极限了,所以现在世界进入了新的谋求和平、以谈判解决问题的时代。”

毛泽东说:“不错。”

田中说:“我这次也到美国和尼克松总统进行了会谈。美国也承认日本来访中国是符合世界潮流的必然发展趋势的。”

毛泽东说:“是啊,他先来了嘛。”

毛泽东问:“两国联合声明什么时候发表?”

周恩来说:“可能明天,今天晚上还要共同研究定稿。”

毛泽东说:“你们速度很快啊。可以几十年、百把年达不成协议,而在几天之内解决问题。现在彼此都有这个需要,这也是尼克松总统对我讲的。他问是否彼此都有需要,我说是的。我说,我这个人现在勾结右派,名誉不好。你们国家有两个党,据说民主党比较开明,共和党比较右。我说民主党不怎么样,我不赏识,不感兴趣。我对尼克松说,你竞选的时候,我投了你一票,你还不知道啊。

这回我们也投了你的票啊。正如你讲的,你这个自民党主力不来,那怎么能解决中日复交问题呢?

所以有些人骂我们专门勾结右派。我说,你们日本在野党不能解决问题,解决中日复交问题还是靠自民党的政府。”

陪同会见的除周恩来、姬鹏飞外,还有外交部顾问廖承志。

当廖承志讲到他出生在日本时,毛泽东同田中开玩笑说:“你们如果要,把他带回去嘛”

田中也笑着说:“廖承志先生在日本是非常有名的。我前天对周总理说,如果他到日本竞选参议员,肯定可以当选。”

毛泽东说:“那他到日本去当参议员好了,好不好?跟你开始谈判吧!”

田中说:“看来毛主席身体很健康。”

毛泽东说:“不行了,我这个人要见上帝了。”

周恩来说:“他每天读很多文件,你看有这么多书。”

田中说:“今天使我感到不能借口忙就不读书了,要好好读书才好。”

毛泽东说:“我是中了书的毒了,离不了书,你看,”他指着周围书架及书桌上堆积的书籍,说:“我有读不完的书。每天不读书就无法生活。这是《稼轩》,那是《楚辞》。没有什么礼物,把这个送给你。”毛泽东指着书橱上六卷本《楚辞集注》说。

原来,田中在宴会上说的那句:“我国给中国国民添了很大的麻烦”,其中“添麻烦”一词,日语是“迷惑”めいわく,汉语拼音读 meiwaku,汉语意思是“添了麻烦。在《楚辞·九辩》中有“慷慨绝兮不得,中瞀乱兮迷惑”,那是“迷惑”一词的源头。

田中收下书,紧握着毛泽东的手,不住地点头说:“多谢,多谢。毛主席知识渊博,还这样用功。我不能再喊忙了,要更多地学习。那么,祝您健康长寿。”

会见持续了一个小时的,话题涉及政治、历史、文化、哲学、生活,气氛友好、轻松、活跃。

此次田中角荣访华,特地赠送毛泽东一份国礼,是日本著名画家东山魁夷的风景画作《春晓》,其意义应该是:中日之间明媚的春天即将开始。

9 月 28 日,周恩来和田中首相举行第四次会谈。

周恩来说:“明天发表建交的联合声明以后,大平外相根据田中首相的指示,准备对记者发表一个讲话,声明日本政府将跟台湾断绝外交关系,对此我们表示欢迎。这证明你们这次来是讲信义的,这是我们两国和平友好的良好开端。

我们重建邦交首先要讲信义,这是最重要的。我们跟外国交往,一向是守信义的。我们总是说,我们说话是算数的。中国有句古话说:言必信,行必果。你们这次来表现了这种精神。”

周恩来当场将“言必信,行必果”写出交给田中。

田中也将日本旧宪法上的一句话“信为万事之本”写成汉字交与周恩来。

9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讨论批准中日联合声明草案。当天,田中首相举行答谢宴会。

9月29日上午10时,人民大会堂,周恩来总理和田中首相在中日《联合声明》上签字。

《联合声明》说:

“自本声明公布之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日本国之间迄今为止的不正常状态,宣告结束。”

“日本国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重申: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日本国政府充分理解和尊重中国政府的这一立场,并坚持遵循波茨坦公告第八条的立场。”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日本国政府决定自一九七二年九月二十九日起建立外交关系。“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宣布: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放弃对日本国的战争赔偿要求。”

关于放弃对日本国的战争赔偿要求的条款,周恩来后来对大家说:这是主席决定了,不向日本索赔了。为什么不索赔呢?实际上因为我们中国也吃过赔款的苦头,赔款都是从老百姓的腰包里取出来的。中国人民在那么穷困的情况下,比如庚子赔款为一亿三千零三十七万两。庚子赔款每个中国人被摊派大约一两银子,实际上等于加重老百姓的负担。从这个角度,觉得战后的日本,也是从战争的废墟当中重建起来,重新发展经济的,尽管到1972年中日建交的时候,他们经济已经开始好转了。但是赔款毕竟还得从日本老百姓的兜里拿出来,是在加重老百姓的税赋。

对日本的侵华战争,《中日联合声明》中的表述是:“日本方面痛感日本国过去由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重大损害的责任,表示深刻的反省。”

9月29日,日本外交大臣大平正芳在北京举行记者招待会,指出,

作为日中邦交正常化的结果,日蒋条约已宣告结束。

这天,周恩来陪同田中首相到上海参观访问。第二天,周恩来送别田中首相回国。

9月29日这天,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政府代表会谈也顺利结束,外交部宣布: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政府代表在波恩就两国建立外交关系和互派大使以及与此有关的问题进行了会谈。会谈于一九七二年九月二十九日顺利结束。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长姬鹏飞邀请联邦外交部长瓦尔特·谢尔正式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联邦外交部长接受了这一邀请并将于一九七二年十月十日至十四日访问北京。

在访问期间,两国外交部长将签署和发表关于建立外交关系和互派大使的联合公报。此外,联邦外交部长将同中国政府就双边关系和国际形势进行会谈。

10月11日,中国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两国外长签署建交公报。

9月29日,国务院批转《国务院办公室关于老干部、高级知识分子和爱国人士住房情况的调查报告》。批语要求各单位认真检查老干部、高级知识分子、爱国人士3种人的住房情况,并规定住房被挤占的,原则上应予退还。

国务院科教组、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对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医学院、北京工业大学作的调查指出,这4所学校中的老干部(副部长级以上)、高级知识分子(三级教授以上)、爱国人士(全国人大、政协常委以上)共有208人,文化大革命前原有住房1036间,20105平方米。文化大革命中,住房被挤占的有189户191人,占上述3种人总数的91.8%。被挤占住房508间,共10101平方米。此外,这4所学校的9至12级干部中还有17人被挤占住房88间,687平方米,占原住房面积的41%以上。

10月6日,周培源《对综合大学理科教育革命的一些看法》一文登在《光明日报》上。文章提出:“工和理、应用和理论都必须受到重视,不能偏废”;“要批判‘理论无用’的错误思想”,“充分认识到科学实验和自然科学理论的重大意义”;“在学校中,基础课的教学工作一

定要做好,综合大学理科要对基本理论的研究给予足够的重视”。

这篇文章,原来是为《人民日报》撰写的。文章写成后,周培源在人民大会堂西大厅陪同周恩来接见外宾时,曾想请周恩来审阅一下。

周恩来问:“文章有多长?”

周培源说:“有5000多字。”

周恩来说:“来不及看了,你就拿出去发表吧。”

主管宣传工作的姚文元在审稿时认为,在《人民日报》上发表这样的文章,会干扰“批林整风”,就把它批到《光明日报》发表了。

10月14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整版反“左”的文章:一篇是署名“龙岩”的《无政府主义是假马克思主义骗子的反革命工具——学习笔记》,一篇是署名“纪众言”的《坚持无产阶级铁的纪律——读〈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的一点体会》,还有一篇是署名“李定”的《一个阴谋家的丑史——读〈巴枯宁〉》,批判无政府主义。

事情的起因是1972年3月,国务院领导李先念、华国锋、余秋里接见黑龙江省的领导,听取他们汇报哈尔滨几个老大难工厂的问题时,提出要反对无政府主义。于是,黑龙江省委写作组根据国务院这几位领导的讲话精神,写了一篇文章,署名龙岩,题为《无政府主义是假马克思主义骗子的反革命工具》。另外配了两篇文章,组成一块版,都是反“左”的,颇有声势。当时负责理论宣传工作的王若水审定后,交当时《人民日报》的负责人鲁瑛认可,于10月14日,在理论版上发出去了。

这块版立刻引起广泛关注。法新社当天就发了一条电讯,说龙岩文章是为老干部说话的,是批评红卫兵的。同时上海方面也打电话向鲁瑛查问:文章作者是谁,谁组织的,谁审定的,送给谁看过。还说“上海工人反映强烈”。

11月4日,上海《文汇情况》312期登了一篇上海工人座谈这个版的报道,说这一版的文章是“否定文化大革命”,是“批群众”。《文汇情况》一连发了三期,最后一期说,这篇反无政府主义文章,全国有九个省市报纸转载,八个报纸虽未转载,但也跟着发了反无政府主义文章。

姚文元叫新华社把法新社的电讯稿送给《人民日报》,随后又将

《文汇情况》转到《人民日报》,要看大样小组和理论部讨论,说:“同意不同意都可以”。当时理论部党支部书记是胡绩伟,管业务的是王若水。胡绩伟对王若水说:“怎么讨论啊,同意吧,它是错的;不同意吧,它又是工人意见,怎么好反驳?”

他们把“球”踢到看大样小组,让他们先讨论。看大样小组先后讨论了4次,也没有结论。姚文元没有办法,只好让大家学习中央文件。这下好,不学则已,一学反而更理直气壮了。1972年26号、31号、38号、42号文件,多次提到反无政府主义。而且,姚文元自己主持的《红旗》杂志1972年第11期中,也有反无政府主义的内容,说“刘少奇一类骗子散布无政府主义,是妄图从‘左’的方面来否定党的正确路线”。

于是,一个尖锐的问题提出来了:批林到底批什么?《文汇报》说要批右,11月6日,一篇评论说,“要反对刘少奇一类骗子所推行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几天后,又有一篇文章说,刘少奇一类骗子一贯是右的,只是在有的时候有的问题上,搞一点形“左”实右的东西。

# 第1256回：再商议，整理江青记录稿 湖南省，解决卜占亚问题

10月末的一个下午。王海容又找到陪江青会见维特克的张颖说："首长把你们整理的记录都看过了，大发脾气，说是整理得不像样子，你们是怎么搞的嘛。"

张颖："我不是把广州根据录音整理出的原记录送给你看了吗？而我们又一字不差地核对过一遍，连一个字都不差，这你很清楚呀。她的谈话一字不改就是这样。"

王海容说："别的事我也管不了。我是来告诉你，今晚6点你和徐尔维到首长那儿去，该怎么办，你去听她的。而且首长吩咐，这件工作还得保密。"

张颖和徐尔维来到钓鱼台，江青对她们说："你们都坐下。整理的记录我看过了，不行。完全照录音，有些地方就不通顺了，得重新整理，我亲自修改。你们不懂，把张局长也请来，他也可以出主意修改，你们作记录好了。"

总参张清化局长来了。江青一见他就说："老张，还是得把你请来，因为你是我的参谋，关于记录的事，还得请你来办，你知道，她们都不懂战争，而第一次谈的就是西北战场，没有你怎么行。"

张清化说："首长，核对录音的时候，我也参加了的，初稿校对，一字不差，但是还得修改，特别是文字润色。"

江青："那太好啦，那就不光是西北战场了，全部记录修改，你都来参加，我已经对她们两个说过了，我们修改，她们作记录，这样会比较快一些。"

这时张清化才看见张颖她们坐在对面一个角落，不无歉意地走过来和她们握手，并说："我们一起修改，一起修改。在文字润色方面，她们比我强，今晚我们先试试看，您看可以吧？"

在座4人，各人手里拿着一本铅印好的记录稿，开始修改记录。

徐尔维一句句念,江青手里拿着铅笔,在那份记录稿上圈点划线,不时停下来议论一番,然后在记录稿上改过来。到午夜时分,还没有改出几页来。突然江青叫停住,她站起身来,伸伸腰腿:“唉呀,都过 12 点啦。”她在椅子扶手上按铃,随即进来一位女服务员。江青吩咐:“带她们两个到大食堂吃夜宵。”

吃完夜宵,江青看见张清化局长自己在看那份记录,高兴起来,对张清化说:“哎,这份记录呀,请你先整理一遍,我们再一起来修改,好不好?这样就不会花那么多时间了。我忙,维特克女士还等着这些记录写书哩。”

张清化点头表示照办。江青又对张颖她们说:“你们随时听候招呼,随传随到,今晚就散了吧。”

张清化用他的汽车把张颖她们送回家。

3 天后,张清化、张颖、徐尔维 3 人又被召到钓鱼台 10 号楼,还是修改记录稿。这一次顺利多了。因为张清化已经改过一遍,把段落整理清楚了,江青表示很满意,只作了些文字上的修改,或者江青提出某些地名要核对,或者哪些人的名字应该出现在记录稿上等等。到凌晨 1 点多钟,西北战场部分的记录就完成了。江青十分高兴地对张颖说:

“小张,这部分记录今晚就算定稿了,你带回去交给外交部,铅印 10 份,编号留底,送给张春桥、姚文元各一份,请他们审阅。周总理那份我要亲自送去,外交部就给乔副部长一份吧。小徐,这份稿子不会有多大修改了,你可以着手翻译成英文,你就定稿吧,反正是送给维特克女士参考用的。都记住了吧?”

大家正要出门时,江青又说:“小张,我看张局长先整理一遍的办法很好,有一些个别部分你也可以照他的办法,把容易整理的先修改一遍,整理出来。比如关于《红楼梦》的部分,你可以先整理,把故事情节、时间顺序、诗词等等都与原书核对清楚。还有关于上海文艺那些,都可以先整理,这样我修改起来就省时间多了。”

一天,徐尔维对张颖说:“我说老张,从广州回来以后,你还没有向周总理汇报过吧?既然部领导不敢说话,你应该向周总理汇报,如果一点不向上级反映,那倒不对了。你去见总理也不是难事嘛,我想甚至可以反映我们大家的意见。”

张颖也觉得,找周恩来谈一次是应该的。于是她给总理办公室打电话,请秘书转达,希望能有机会见见周总理。

周恩来的秘书请示后,通知张颖去西花厅。当张颖走进西花厅时,看见周恩来正在他的办公室里批阅文件。他见张颖进来,花镜拿下来问道:“你们回来好多天了吧?我没时间找你问问情况。你有什么重要的情况,就先说说吧。”

张颖说:“如果要简单,那还真说不清楚。我们去广州前,总理的交代,我都转达了。但江青同志没有那样做。她和维特克谈了60多个小时,什么内容都有。现在还要整理成记录稿,翻成英文,寄给维特克。我们都感到这样做不妥当。所以要向您汇报请示……”

张颖上气不接下气,一连串说下来,倒惹得周恩来笑起来:“我看你要说的话恐怕不少,别那么急。今天我确实时间不多。今天你先向邓大姐说说吧,江青同志的情况我也知道一些。以后找时间再谈。”

说完,周恩来朝客厅那边喊邓颖超,张颖也走进那客厅。

邓颖超招呼张颖,让她慢慢说。

张颖和邓颖超很熟,所以谈起话来,也没有什么顾虑,那天下午,她们谈了整整3个小时。

过了几天,周恩来在国务院召开一个专题性会议,外交部张颖也参加了。会议结束后,周恩来向张颖招手,随他一起来到周恩来的办公室。进屋后,张颖看到办公桌子上堆满了书报和待批阅的文件,最显眼的地方摆着她们整理过的铅印好的江青谈话记录稿“西北战场”部分,江青亲笔写着“请周恩来同志审阅修改”的字样。张颖轻轻坐在周恩来对面的小椅子上。

周恩来说:“那天我实在忙,没有听你的汇报。不过小超同志已经告诉我一些情况,现在你和徐尔维是否还在整理记录呢?”

张颖点点头,接着说:“除了我和徐尔维,还有总参测绘局的张局长,他说比我们早到好几天,那些地图和材料是他预备的。”

周恩来:“啊,他也在广州吗?现在也一起整理记录?”

“关于西北战场这部分,是张局长先整理,又和江青同志一起修改,我和徐作记录,记他们商量好的定稿。”张颖回答。

接着,张颖说:“周总理,我认为这些谈话记录,最好不要送给维特

克,这不仅是我一个人的意见,参加会见的几个同志都这样认为。江青同志的谈话,内容很庞杂,且有许多不恰当之处,有些谈法影响也不好。”

“你们大家都这样认为吗?可是江青同志亲口答应维特克女士了,不给不好吧?”周恩来说。

送给张春桥和姚文元的那两份铅印记录稿,一字未改退了回来,只在第一页上各写了“已阅”两个字。周恩来那一份也退回来了,上面写了一行字,大意是,与事实不符之处作了些补充,错字都已经改过。

当年11月间,维特克从美国寄来数幅已经放大的江青彩色生活照片。维特克说她已经写好了一篇报道江青的文章,准备登载在美国《时代》杂志上,封面就用江青的彩色照片。由江青选择其中的一张,并盼赶快把所有记录稿寄去,以便她着手写书。江青收到照片后,打电话到外交部,把参加会见维特克的几个人,用一辆面包车拉到钓鱼台10号楼。

张颖他们到了10号楼,看见江青心情极好,她那张大大的长方形办公桌上,摆满了江青的照片,有维特克寄来的,也有不是维特克寄来的。江青让张颖他们帮助她挑选。

一天下午,周恩来召开了一次会议,把所有参加过接待维特克的有关人员都请来参加,专门讨论维特克与江青的谈话记录如何处理的问题。他征求每个人的意见。绝大多数人表示,这份记录无需送给维特克女士,因为她本人当场作了记录的。而维特克女士只表示要给江青个人写传记,有关江青个人的家庭情况、经历已经给维特克提供过一份详细材料。而后边江青与维特克的谈话,涉及到各方面的情况和问题,倘若要逐一核实,得耗费许多时间和人力。而且江青谈话的内容中,有许多是不宜公开发表的。

周恩来一言未发,只是在会议结束前说:“对这件事情,你们每个人都发表了自己的看法,这很好。但今天还是决定不了,还需要商量和请示。”

他对张颖和徐尔维二人说:“你们继续去作记录,根据江青同志的要求整理和修改。”

1972年岁末,周恩来又召集接待维特克女士访问中国的有关人

员,开了一个简单的会,宣布:“已经请示毛主席,记录不必送给维特克女士,一切工作都停止,所有记录稿全部清理封存,一份归入档案。”

第二天,张颖、徐尔维、于世莲把在北京的所有记录草稿、铅印修改稿等等,全部归总在一起,清理出一份完整的交给外交部档案室归档。余下的全都放进一个保险箱里,上锁加封条,交给外交部保密室。

江青与维特克谈话记录稿一事算是告一段落。

1972 年 10 月 19 日,广州军区司令员丁盛在广州接到北京汪东兴给他打来的电话,说是“毛主席有事和你们商量”,随即派专机把丁盛和广州军区政委任思忠接到北京。他们刚到北京京西宾馆不久,汪东兴便来了,对他们说:

“卜占亚在湖南出了问题。”

说着,将几份揭发卜占亚的材料交给丁盛和任思忠,要他们认真阅读。

稍后,周恩来、叶剑英也来了,交代他们两人这次来京的任务,要求他们协助中央解决好卜占亚的问题。

汪东兴带来的几份材料都不长。其中两份是湖南省委接待处工作人员写的:一份控告卜占亚不重视接待处的建设,对工作人员态度恶劣,而接待处是为以毛泽东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服务的,这表明他对无产阶级司令部缺乏感情;另一份说,毛泽东的表兄王季范在蓉园休息时,卜占亚对老人漠不关心,很不尊重,卜的妻子、接待处副处长谭淑珍又偷看老人的笔记本,惹得老人很生气。

还有一份材料,是摘抄林立果“小舰队”成员李伟信笔记本上写的,提到卜占亚是他们“信得过的人”。

几份材料只用个把小时便看完了,丁盛和任思忠悄悄议论,觉得前面两份材料实在上不了大“纲”,李伟信的笔记也不难查清,对卜占亚的审查这么兴师动众,是否有些小题大做呢?

第二天,10 月 20 日,由华国锋出面,召集丁盛、任思忠和刚从朝鲜访问归来途经北京的湖南省军区司令员杨大易,研究如何解决卜占亚的问题。周恩来、叶剑英、汪东兴也来参加研究。华国锋和杨大易揭发了卜占亚的一些问题。丁盛和任思忠什么也没揭发出来,只是一再表示坚决拥护中央决定,积极配合中央把卜占亚的问题早日查清。

这天,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根据毛泽东意见,约见来京参加解决湖南问题座谈会的广州军区和湖南党政负责人,就解决湖南问题打招呼。

10 月 21 日晚上,周恩来和叶剑英又来到丁盛、任思忠住处,说毛泽东今晚要接见他俩,稍后就会有电话通知。电话果然来了,周恩来去接。几分钟后,周恩来回来对他们二人说:“主席认为你们两个对卜占亚的态度很明确,他很高兴,觉得没有什么可谈的了。但是他还要我征求一下你们的意见:还有没有必要接见?”

任思忠认为见一见好,有些问题可以当面请示明确一下。丁盛却认为,“主席倾向于不再接见,我们尽量不要干扰他老人家,不接见也可以”。丁盛过去是任思忠的上级,任思忠不好再坚持自己意见,于是周恩来马上按丁盛的意见与毛泽东通话,决定不再接见。

大局已定,周恩来便来组织落实。他把华国锋、丁盛、任思忠、杨大易召到一起宣布:对卜占亚问题的讨论到此结束,下一步回湖南具体解决他的问题。决定此事由华国锋牵头,丁盛、任思忠协助,共同负责领导;湖南省委负责具体工作。

丁盛首先提出:“总理,我参加领导怕不合适。”

“为什么?”

“我和他是 20 多年的上下级关系,参与领导对他的审查多有不便。”

“噢!你这是要避嫌哪!”

“该避的还是避一避好。再说,我参加进去效果也未必好。”

周恩来迟疑片刻:“那丁盛同志就不参加了。任思忠同志,你可以吧?”

任思忠说:“总理呀,我和丁盛同志的情况是一样的,我同卜占亚也是长期在一个部队工作的老上下级关系。我也不参加了吧。”

周恩来真为难了。但是两个人反映的情况不能不予重视。他终于不得不改变原来的决定:“那就都算了吧。不过,你们两人要和华国锋同志到长沙走一趟,和省委、省军区的同志见见面,讲讲话,表示对华国锋同志的支持。中央明天就派飞机送你们回去。”

10 月 22 日,周恩来等领导人出席湖南问题座谈会。在谈到“三支

两军”问题时,周恩来说:“三支两军”的成绩是主要的,但林彪的一套做法助长了军队干部的骄气,党、政、军有好些好作风被破坏了。要认真进行教育,纠正不正之风。在会上还批评了军队党委凌驾于地方党委的错误做法。

当晚,周恩来继续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要求参加湖南问题座谈会成员回去后继续做工作,以推动湖南全省批林整风进一步深入。

丁盛、任思忠和华国锋一起来到了长沙。10 月 22 日下午,湖南省军区政委卜占亚接到通知,要他晚上到蓉园 1 号楼开会,但没有告诉他会议内容。卜占亚感到奇怪:华国锋不在长沙,他是湖南省的最高领导,怎么反而是别人叫他去开会?

当晚,满腹狐疑的卜占亚来到会场,一进门便目瞪口呆。会场鸦雀无声,参加会议的是省委常委和省军区领导,大家都把异样的眼光投向他。只见华国锋绷着脸端坐在主席位上,广州军区司令员丁盛和政委任思忠坐在旁边!

没人和卜占亚打招呼,他在有意留给他的座位上刚坐下,华国锋便讲话了:“我和丁司令员、任政委受中央委托,专程来长沙解决卜占亚同志的问题。卜占亚同志在第十次路线斗争中,追随林彪反党集团,犯有严重错误和罪行。‘913’事件后,中央耐心等待了他一年多时间,可他执迷不悟,始终不肯主动交代自己的问题,企图蒙混过关。现在中央不得不直接处理他的问题,最后给他一个机会。希望他认清形势,丢掉幻想,老实交代,不要自绝于党和人民!”

华国锋宣布要卜占亚交代的主要问题是:积极参加林彪的反革命政变阴谋活动;向李作鹏泄露毛泽东南巡讲话内容;仇恨“毛主席无产阶级司令部”成员,刁难、赶走叶剑英元帅,苛待毛泽东的表兄王季范,冷落、仇视张春桥;拉山头,搞宗派;捂盖子,不批林。

他给卜占亚一天准备时间,要求他 24 日在省委常委和省军区党委常委会上作交代。

华国锋请丁盛和任思忠讲话。丁盛首先说明,他和任思忠是去北京受领任务后,奉命和华国锋一起来解决卜占亚问题的。他虽然对具体情况了解不多,但从华国锋揭露的许多情况看,卜占亚的问题确实很严重。他代表广州军区坚决拥护中央对卜占亚进行审查,支持华国

锋对清查工作的领导。军区将积极配合湖南把卜占亚的问题彻底查清。他希望与会人员积极对卜占亚进行揭发批判,也希望卜占亚端正态度,老老实实交代问题。

任思忠除了表示赞同丁盛的意见外,还特别指出:“你卜占亚同志犯错误绝不是偶然的,这和你的骄傲自大是分不开的。你这个老毛病要不彻底改正,将来还要摔大跟头!”

卜占亚一时有些发懵,不知道此时此地该怎样说才好。最后,他终于表示:拥护中央对他的审查决定,老老实实检查交代自己的问题。

# 第1257回：要交代，如何连接北西东 谈问题，概括为“三专一通”

10月24日，卜占亚吃过早饭，来到会场，惊奇地发现，到会的除省委和省军区党委常委外，还有接待处的科长和3个女服务员。

华国锋又讲了一遍卜占亚问题的性质、重点和对他的政策以及会议开法，便要卜占亚作交代。

卜占亚还没讲完一个问题，接待处的科长就打断他的话说：

“不要讲了！你讲了半天，根本就没涉及要害问题！你不是什么思想认识问题，更不是工作中的错误，你的要害问题是投靠林彪反党集团，积极参与林彪的反革命政变阴谋，你到湖南来就是为林彪集团夺权的！”

接着，这位科长举了个卜占亚“仇恨毛主席”的例子：

“去年冬天，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表兄王老住在蓉园1号过九十大寿，你不准给老人家生暖气，差点儿把王老给冻病了，你这是什么阶级感情？你还限制王老的行动，不准他接触群众，怕群众向王老揭发你的问题；你老婆谭淑珍也怕王老搜集整理你的罪行材料，居然偷看王老的笔记本……”

王老即毛泽东的表兄王季范。1971年冬，华国锋从北京打电话给省委布置任务：王季范要到长沙过九十大寿，省委要把他安排到蓉园，保证他住好，吃好，休息好……

卜占亚不敢怠慢，亲自布置接待处做好接待工作。王季范到长沙时，陪同的亲属有他的儿媳，即王海容的母亲肖凤林和王季范的孙子、王海容的弟弟王启华，还有一个三、四岁的小男孩。人还没到，取暖锅炉就烧起来了。直到老人离开长沙，暖气一天没断，怎么会有接待处科长说的“不准给老人家生暖气”的事情呢？

说到谭淑珍偷看王季范笔记本一事，据说是王季范生日那天，卜占亚和省委常委于明涛、孙国治、万达等人到宾馆向老人祝寿，并举办

了寿宴。谭淑珍作为接待处负责人,在现场照料。参加宴会的领导人都劝她入席,因为是卜占亚主持宴请,她没有露面。开始上菜后,她便坐在王季范的房间内,翻看桌上放着的一本诗集。后来,谭淑珍谈起这段,还生气地说:“王海容的爷爷已经是90的人了,哪里还记什么笔记!我又怎么会知道他的笔记本里有卜占亚的材料!”

接着,3个女服务员也争先恐后地站起来揭发,并讲了王海容安排她们去北京向毛泽东汇报卜占亚问题的过程。

原来,1972年9月,中央专案组看到李伟信笔记本上在“信得过的人”中写有卜占亚的名字,于是展开调查。湖南省委接待处的一些人来到北京,其中就有接待处的这3个女服务员。

这些人到北京后,写了三份关于卜占亚的材料,两份是湖南省委接待处工作人员写的,控告卜占亚不重视接待处的建设,对工作人员态度恶劣。另一份就是说王季范在蓉园休息时,卜占亚对老人漠不关心,很不尊重,卜占亚的妻子、接待处副处长谭淑珍偷看老人的笔记本,惹老人生气。

女服务员在揭发时说,她们在北京时,专门去中南海“向毛主席汇报了卜占亚的问题。毛主席说卜占亚不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临走时,毛主席还送她们每人一部半导体收音机,握着她们的手说:“回到长沙,你们把收音机音量开得大大的,向他们示一示威!”那个时候,半导体收音机可是一般人看不到的。

卜占亚听了这几个女服务员的发言,犹如天方夜谭,将信将疑。但是,旁边坐着中央首长华国锋,他脸上并没有丝毫讶异和不快之色,卜占亚又不能不信。

当天散会后,卜占亚便被指定住在会场旁边的一个房间,吃饭由服务员送到房内,楼门口站有岗哨,只允许他在楼内活动。

会议连续开了9天。到会的省委和省军区的领导干部都发了言,华国锋向卜占亚提出的所有问题都讲到了。一些重点问题,反反复复被提出。但是,卜占亚对任何一个问题的交代检查,都未被认可和通过。

华国锋作总结讲话时认为,卜占亚态度很不老实,企图蒙混过关,要他打掉幻想,认真思考,准备在更大的范围检查交代。

两天后,召开省委、省革委会扩大会议。华国锋以中央代表身份讲话,然后叫卜占亚上台交代。开会的人多了,会议的气氛、温度也与前一个会议有很大不同。卜占亚上台讲了还不到10分钟,便被轰了下来,由几位领导干部带头揭发。

扩大会议开了10天,卜占亚仍然只肯承认错误,拒不承认和交代阴谋、罪行。华国锋决定进一步发动群众,召开全省县团以上干部会议,深揭狠批。

大会在省军区礼堂举行,参加会议的有1000多人。除县团级以上干部外,到会人员中还有几年来卜占亚所到过的各大小单位的领导或代表,他们的任务是揭发卜占亚在这些单位的"放毒罪行"。会议的开法与前两次相仿,只是"温度"更高。为了制造气氛,会场楼上楼下安了很多扩音器,不断有人抢麦克风,连揭带批加质问,有的还要求当场交代、表态。

湖南省军区司令员杨大易、政委张立宪揭发,1969年底,经毛泽东批准,广州军区新组建并部署在湖南的145师、146师两个陆军师是林彪准备用于政变的"黑部队"!此言一出,一片哗然,有人高兴,有人气愤。146师师长蒋金流和师政委陈怀琛一合计,以师党委名义给省军区和广州军区发了一份电报,要求对这两个师的性质加以澄清,否则他们无法保持部队的稳定。与此同时,部队也反应强烈,纷纷向省军区提出质问。在这种情况下,这两位领导人又被迫承认他们讲错了话。

在与会人员发言时,华国锋不时插话,引导会议方向。他在一次插话时说,林彪有一个反革命战略布局:西面的负责人是云南的雷远高(省军区政委)和贵州的蓝亦农(昆明军区副政委、贵州省革委会主任);东面有江西的程世清(省革委会主任、省军区政委);北面是河南的王新(省军区政委);卜占亚在中间,连接东西,贯穿南北,地位最为重要;再加上北京有个韦统泰(七机部军管组组长),是林彪的"情报部长"。这是林彪进行政变阴谋的基本班底。华国锋指名道姓地点了林彪在全国东、西、北、中各处的党羽,南面是谁?也许时机未到,他打了个哑谜。但是,谁不知道湖南的南面是哪里呀!

除了会上引导,华国锋还在会外与参加会议的省委、省军区领导

一一谈话,还把145师、146师和湖南省军区独立师的师长召到一起,讲卜占亚的问题,动员他们揭发批判。

要求卜占亚交代的核心问题是参与林彪政变阴谋。而其中最主要的问题可以概括为“三专一通”。

“三专”即专列、专线、专人。据揭发,卜占亚早就得知林彪要南逃广州,另立中央。他想当林彪的“开国功臣”。1971年9月10日,卜占亚率全省地、师级以上干部去汨罗参观,但唯恐误了“大事”,为了保证能及时赶到广州,他特地下令调用一列专车,停在汨罗火车站随时待命,这就是揭发的“专列”问题;在汨罗期间,他为了与林彪那边保持不间断的通信联络,特地架设了专线电话,即所谓“专线”;与此同时,他又把自己的老婆谭淑珍先期派往广州,准备接待林彪,即所谓“专人”。

“一通”即卜占亚向李作鹏通风报信,泄露了毛泽东南巡讲话内容。李作鹏又将此事火速密报林彪,引起林彪恐慌,提前发动政变,事败,仓皇驾机出逃,成为“913”事件!

专案组抓住“三专一通”这个要害问题穷追不舍。专案组在要卜占亚交代的同时,又根据揭发线索,展开调查取证。但是,卜占亚死不承认,取证工作也很让专案组泄气。

首先是“专列”问题。据专列的主要组织者之一,省委党委办公室主任阎文超提供的情况:去汨罗参观,原计划乘坐汽车。临出发前两天,卜占亚把李振军和阎文超找去商量:8月底、9月初因为接待毛泽东,接着又是将毛泽东南巡讲话精神向干部“吹风”,致使学习班的学习时间超出计划。去汨罗参观,如乘汽车,因这段公路路况差,又要耽误半天时间,而且汽车多了容易出事,不如改乘火车,可以晚间出发,在车上睡觉,省出半天时间。阎文超认为汽车已备好,改乘火车组织准备工作也很麻烦,以不变为好。李振军没有吭声。卜占亚最后决定:“这样吧,你们把铁路局军代表找来,请他们根据情况决定,争取坐火车去。”

军代表表示改乘火车无大困难。两天后,长沙铁路分局按要求挂了几节车厢,把学习班全体人员送往汨罗。在汨罗期间,卜占亚再未过问火车的事,更未指示将火车留在汨罗“待命”。此事的几位主要经办者说法一致。

再看“专线”的调查情况。卜占亚的秘书叶子鸿证明:卜占亚作为湖南省委的主要领导和省军区第一把手,外出到一个地方住下,为了保持与机关的顺畅联络,照例都是要架设专线电话,不需首长交代。卜占亚在汨罗期间住县武装部。出发前,叶子鸿主动通知省军区司令部通信处张处长,要求沟通汨罗县武装部与省委、省军区的专线电话。这条专线不通北京,更不知道如何与北戴河的林彪联络。

最后再说“专人”问题。据谭淑珍本人陈述,她到广州带有很大偶然性。9 月初,她们刚刚完成接待毛泽东的任务,广州军区招待处处长张小军便带着两名干部来到湖南省接待处,学习湖南接待毛泽东的经验。其实广东的接待任务比湖南重,经验自然比湖南丰富。湖南接待处的工作人员都很想到广州看看。大约是 9 月 1 日,接待处政委王信对谭淑珍说:“老谭,你对广州熟悉,就由你带几个人去广州参观学习吧。”于是谭淑珍带着接待处的一名科长、一名服务员和两位厨师,一行 5 人于 9 月 12 日夜乘火车出发,于 13 日中午抵达广州。这 4 个人都有名有姓,可以调查。

他们到广州时,丁盛已经接过周恩来的电话,整个军区进入紧急战备状态,丁盛一早便进入军区指挥所。而这天下午,不明就里的谭淑珍喜孜孜地去拜访丁盛夫妇,只有丁盛的妻子孟文虹和秘书在家。秘书一见到谭淑珍,便“唉”了一声问:“你这时候到广州来干啥?”

谭淑珍说:“我是来参观学习的。”

秘书问:“卜政委知道你来广州吗?”

谭淑珍说:“他到汨罗去了,我没告诉他。”

秘书说:“他已经回长沙了,你也早点回去吧!”

虽说彼此都是熟人,谭淑珍还是因秘书这番没头没脑的话而深感不快。不料,紧接着丁盛的妻子孟文虹又让她一头雾水。她们见面还没有寒暄几句,孟文虹便小声嘱咐她:

“你早点回去吧,今晚哪儿也不要去!”

谭淑珍满腹狐疑地回到住处,和几个随行人员研究了一番,最后决定,既然来了,总不能空手回去。

9 月 14 日、15 日两天,广州军区招待处处长张小军陪同谭淑珍等人先后参观了白云山下老虎洞为林彪修的房子,新建的南湖宾馆和珠

岛宾馆毛泽东、江青的住所。这中间,谭淑珍还带领她的几个部下参观了农民运动讲习所,看了广州市容。在参观过程中,张小军悄悄告诉谭淑珍,最近战备形势紧张,军区首长都进了指挥所,以后他也可能没有时间陪她们了。15 日晚,广州军区副司令员杨梅生夫妇请谭淑珍吃饭,她便在那里给卜占亚打了电话,卜占亚也催她赶快回去。当天夜间,谭淑珍便带着科长和服务员返回长沙。两位厨师则留在珠江宾馆学习粤菜技艺,半个多月后才回长沙。

谭淑珍来广州参加接待林彪问题可是个大案,“913”事件后组建的广州军区清查办公室查得也最仔细。谭淑珍在广州一共呆了 50 多个小时,经过反复排查,从头到尾,几点几分,她在哪里,干什么,都查得清清楚楚,都有人可以证明。结果什么可疑问题也没发现。她就是来广州参观学习的。可是时间上那么巧合,天下就有这么巧的事情!

“一通”问题,说的是 1971 年 9 月 4 日,李作鹏陪同外宾到韶山参观,卜占亚作为地主去大托铺机场迎接。李作鹏共在长沙、韶山停留 22 个小时。有人揭发,卜占亚在这段时间里,与李作鹏进行了 4 次密谈,向李作鹏泄露了毛泽东在长沙的谈话内容,导致林彪决定提前发动武装政变;李作鹏也向卜占亚作了“路线交底”,甚至告诉他“林副主席最近可能到广州”,叫卜占亚“思想要有准备”。

卜占亚辩解说,专机降落后,他便以主人身份陪同外宾赶赴韶山,李作鹏乘坐另一辆车,两人根本没机会说话。下午从韶山返回长沙,李作鹏和外宾都住湖南宾馆,卜占亚把他们送进房间便告辞了。但以后有人揭发卜占亚就在这时同李作鹏进行了“第一次密谈”。当晚举行宴会,卜占亚到李作鹏房间请他赴宴,免不了又讲些客套话。有人说这是“第二次密谈”。宴会之后又参加晚会,晚会结束时卜占亚把李作鹏送回住处。李作鹏已相当疲劳,卜占亚匆匆辞出。又有人说这是“第三次密谈”。次日 8 时左右,卜占亚去宾馆送行,这时李作鹏已吃过早饭,正坐在大厅的沙发上休息。卜占亚也坐到沙发上和李作鹏闲谈,一起等候外宾。大约十多分钟,外宾来了,卜占亚便陪他们一起去机场。这就是“第四次密谈”。

卜占亚说,他与李作鹏过去没在一起工作过,也没有私人交往,这次李作鹏陪外宾到湖南来,几次短暂交谈都是礼节性的,李作鹏从未

向他打听毛泽东来湖南巡视情况,他又何必主动透露?

其时,李作鹏在“913”前知道毛泽东南巡讲话的主要内容,是听武汉军区政委刘丰讲的。

关于卜占亚“怠慢叶帅”和“仇视春桥同志”的问题,是指1970年春,卜占亚刚到湖南时,叶剑英住在蓉园1号,他没有去主动谒见。在批斗卜占亚时,有人说,因为叶剑英“是毛主席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所以卜占亚对他特别仇恨。有人揭发,卜占亚刚到长沙,去蓉园洗澡时,别人问他去不去看叶剑英?他鄙夷地说:“看他干啥,不看!”

又有人揭发,叶剑英离开长沙,是被卜占亚赶走的。事实是,1970年5月7日晚,华国锋通知卜占亚到九所4号楼开个小会,华国锋说,他接到汪东兴从武汉打来的电话,毛泽东明晚要来长沙,要求明天上午便把毛泽东住的6号楼准备好。他特别提到:“汪主任讲,听说叶帅现在住在蓉园,万一主席要到那里散步,碰见怕有不便,最好把他迁出长沙。”

此事本来是与卜占亚无关的。但此时要揭发他的问题,自然也就算在了他的身上。更有人揭发说:“叶帅走时少交了2两粮票,卜占亚还派人追讨。”

卜占亚与张春桥可谓素昧平生,如果不是到湖南支左,也许永远和他挂不上钩。

1971年7月14日,卜占亚正在涟源钢铁厂参加现场会议。忽然省外事办公室打来电话,说张春桥将于次日陪同朝鲜党政代表团访问湖南,外交部指定由卜占亚出面接待。卜占亚考虑会议已到最后一天,总结不能不作,而总结稿又是他自己写的,不能由别人代讲,便提议改由杨大易出面接待。省外办将他的意见上报,外交部不同意。他不甘心,要省外办再次请示。外交部终于勉强同意。

张春桥陪同朝鲜党政代表团在韶山参观时,曾指出韶山毛泽东陈列馆第五展室的《遵义会议放光芒》油画存在问题,说画面的“这样安排恐怕不符合历史实际。其实当时的情况连外国人也知道一些,没有这个场面,也不可能出现这个场面。那时候比较出名的是王稼祥、张闻天。当然不能出现他们啰。当时毛主席和林副主席、周总理还没有这样的关系。这幅画在北京流行时,总理看到后不同意这样安排。说

当时他也是受批评的嘛。这幅画要很好地改一改。在遵义会议上不可能林副主席和周总理站在毛主席左右嘛。”

《遵义会议放光芒》是仿照文革期间那幅著名的毛泽东与林彪井冈山会师的油画而成,毛泽东在画的中央,林彪在毛泽东的左边,周恩來在画的右边。这也是当时韶山毛泽东陈列馆唯一的一幅有林彪的画。

1971 年 5 月 13 日下午,韶山正下着雨,细雨霏霏。邱会作和一行解放军的干部、战士,用了两天时间,从长沙走到韶山。韶山人上上下下都为解放军精神所感动,夹道欢迎,表示要“向解放军学习,向解放军致敬”。邱会作当时摇摇头说:

“我们是奉林副主席的指示来韶山学习的。韶山是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的家乡,是红太阳永远不落的地方,我们早就想来了。军内的斗争一个接一个,先是罗瑞卿、贺龙,后是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党内、军内阶级斗争一刻也没有熄灭呀。”

邱会作在韶山说话不多,手中始终捧着《毛主席语录》,在毛泽东故居门前、韶山毛泽东陈列馆门前、当时的第五展室《遵义会议放光芒》巨幅油画前各照了一张相。

对张春桥要求把《遵义会议放光芒》撤下来的意见,杨大易后来请示卜占亚。卜占亚稍加考虑后说:“这类事情要慎重。再说,把这幅画撤下来,一时又没有别的画补上,墙上空一大块,参观者问起来也不好解释。我看暂时先不要动。”

但是张春桥在离开韶山时也再三叮嘱,《遵义会议放光芒》那幅画要换一张,下个月他要派人来检查的。

韶山毛泽东同志陈列馆还是很尊重历史的。他们将《遵义会议放光芒》画换了下来。张春桥果然也在 8 月 5 日从北京派人前来检查。

1971 年 9 月 4 日上午,李作鹏陪同朝鲜军事代表团参观韶山毛泽东故居和毛泽东陈列馆。在第五展室,李作鹏没有看到邱会作曾经照过相的那幅《遵义会议放光芒》油画。他悄悄地问身旁陈列馆的一位小伙子吴大为,建馆后陈列馆展室有几次改动?吴大为扼要地作了汇报,特别提到张春桥的建议。李作鹏边听边点头。

在批判卜占亚时,将这些事情串联起来,似乎就有问题了。有人说,卜占亚不肯出面陪同张春桥,是因为张春桥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坚决捍卫者”,他“仇视春桥同志”。对于不肯撤换韶山展馆的油画问题,说他是“抗拒中央首长指示”,实际上还是爱谁恨谁的问题。

这自然又在会上引起公愤。

# 第1258回：批王新，王若水上书被批 毛泽东，逐步解放老干部

1972年9月7日至10月15日，河南省委、省军区党委常委扩大会议集中揭发批判河南省委书记、省军区政委王新。会议一结束，又都到北京。

1972年10月18日至11月1日，河南省批林整风汇报会议在北京召开。河省省委常委、省军区党委和驻豫部队三个军负责人30余人参加。江青、李先念、纪登奎、李德生、王洪文到会。

北京汇报会结束时，形成《中共河南省委常委省军区党委常委扩大会议关于河南省问题的报告》。这个文件当日呈报党中央、毛泽东。3天后，中共中央以中发〔1972〕42号文件形式，批准了这个《报告》。毛泽东批示："同意"。

河南省的《报告》写道：

"王新伙同刘丰攻击和陷害省委几位负责同志，阴谋篡权。他背着党中央和河南省党的核心领导小组、省军区党委，两次向刘丰等人送陷害刘建勋同志的黑材料。第一次是在一九六八年正在筹备召开九大的时候，王新把一份写有同名人刘建勋名字的敌伪档案材料交给了刘丰和黄永胜、吴法宪。第二次是在九届二中全会期间，王新将刘建勋同志的所谓五.一六问题的两份材料带上庐山，送给刘丰。"

"王新从一九六九年下半年直到一九七一年七月，不断传播：'林副主席有指示，现在的主要问题是，文化革命的成果有被小资产阶级抢走的危险。'他甚至到了林贼叛党叛国的九一三前夕，还猖狂叫嚣'现在是小资产阶级干扰，争夺领导权。''这个命不革不行。'"

"王新反对党的一元化领导，他通过省军区个别人，指示军分区党委考核、建立地、县委，胡说什么要把地方党委'军起来，''要占领阵地'。"

"九届二中全会后，他竭力扭转批陈整风，批林整风的大方向，硬

说‘河南的主要矛盾是派性’,大批所谓‘派党论’,他利用‘批陈整风’、‘整顿机关’和‘清查五.一六’之机,把派性与资产阶级专政,资本主义复辟混为一谈,把造反派与极左思潮,与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等同起来,蓄意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对许多地方新老干部和军队干部实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

1972年11月,张春桥回沪。他听取了上海市革委会各组办汇报工作。在汇报上海清查“516”的问题时,这项工作的负责人王绍玺首先先概述了一年半的清查情况:全市被群众大字报点名批判的有1000人左右,各系统立案的有100多人,审查重点近40人。但怎样才算“516”,还吃不准,如果按照既有三反罪行,又有秘密组织及黑手操纵的标准衡量,上海还没有查到一个像样的“516”。他还提到,艾玲的案子也没有进展,查不下去。这时,张春桥突然板起面孔,气呼呼地说:“怎么能说一个没有?艾玲总算一个吧!朱锡琪也总算一个吧!”

他换了一支烟,可能火气太大,划了几次火柴,才把烟点着。王绍玺正等着继续挨批,徐景贤趁机插话说:“在领导面前,你们讲话怎么能这样随便!你们要好好领会春桥同志的讲话,回去认真分析总结工作!”

徐景贤讲话语气的严厉,为以前少见。徐景贤这样讲了以后,张春桥没有再为“516”问题发火,改听其他方面的汇报了。

在张春桥这次讲话之前,全市各系统对所立案审查的“516”嫌疑对象,都已经因为难以认定,希望早早结案,予以解脱。那次会议以后,案件又拖了下来。

1972年11月11日,中南海门诊部医生卞志强、张佐良给叶剑英、李先念、李德生、纪登奎、汪东兴写报告说:

昨晚再次组织了有关的心脏科医生会诊,大家一致认为:恩来同志的心脏病发展是比较重的,动脉硬化的情况,特别是主动脉硬化引起主动脉瓣膜关闭不全的情况有所加重,导致冠状动脉供血不足及心脏功能均较前为差,要及时严重注意。平时虽随时研究病情,调整治疗,但药物的力量毕竟有限,宜特别注意休息,增加睡眠,采取减轻工作和其他一些可行的办法。

希望中央领导同志考虑,并给以指示。

叶剑英等阅后均同意报告所提意见,并转报毛泽东。

11 月 12 日,毛泽东在这份报告批道:

应当休息、节劳。不可大意。

毛泽东

1972,11,12

北京大学革委会副主任周培源 11 月 7 日就 66 届至 70 届的大学生毕业工资待遇等问题给毛泽东写信报告说:

在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和教育革命中,有一个问题急待解决,就是如何处置六六届至七〇届的大专毕业生。六六届已经毕业六年之久,至今仍未转正定级。目前这些大学生全国有八十万左右,处理好他们的问题关系重大。

周培源信中提出了几点建议:

鉴于我国科学文化急需加速发展,大学生还要继续培养,而且要培养质量更高的,他们的资格尤其是经济地位不能过低。老五届毕业生的待遇不能比六五年以前的毕业生降一级。大学生待遇改革应从新招的工农兵大学生算起。工资转正定级工作宜速完成,不要拖到参加工作七八年以后。

11 月 12 日,毛泽东在周培源 11 月 7 日的信上批示:

此事关系很大。印发政治局各同志,国务院文教组及北京市委各同志研究。请中央考虑作出决定。

11 月 28 日,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和外交部共同打报告给周恩来,请示即将召开的外事工作会议的有关问题。报告提出会议的任务:“联系外事工作的实际,以批林整风为纲,彻底批判林彪反党集团煽动的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研究和解决外事工作中的一些迫切问题,以便更好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

这一报告是根据毛泽东 1972 年 6 月 28 日与斯里兰卡总理班达拉奈克夫人的谈话精神写出来的。在那次谈话中,毛泽东曾指着在座的王海容、唐闻生对班达拉奈克夫人说:

“在外交部,她们这一派是‘右派’,就是保守派,靠边站,弄得吃不下饭,睡不着觉。外交部被那些‘左’派夺了权,一个半月,权不在我们手里,在那些所谓‘左’派手里。这些所谓‘左’派,其实就是反革命。”

11月30日,周恩来在病中看了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和外交部的这份报告,写了批示:“拟同意,请送耿飚同志会签后,再呈主席、康生(暂不送)、江青、春桥、文元、剑英、先念、登奎、德生、东兴、洪文同志批示。”

翌日,12月1日,张春桥在外联部和外交部的这份报告上批道:“送江青同志、总理再阅。”然后在下面写道:

总理:

我不了解外事工作的全面情况,但是,当前的主要问题是否仍然是极“左”思潮?批林是否就是批极“左”和无政府主义?我正在考虑。建议外事会议批林要批得全面一些,同时要讨论毛主席关于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指示。

妥否,供参考。

春桥

1972年12月1日

12月2日,看了张春桥的批语,江青表示完全赞同。她在文件上批道:

我个人认为应批林彪卖国贼的极右,同时批他在某些问题上的形左实右。在批林彪叛徒的同时也应着重讲一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因为,没有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暴露不出他们来,他们还隐藏下来,那时我们党和人民将造成很大损失。当然,天也塌不下来。

供总理参考,又及。

江青

1972年12月2日

12月3日,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对这件事进行讨论。根据政治局讨论的意见,外交部在修改时删去了原来报告中批判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的词句。

批林到底批什么?是批“左”还是批右?12月5日,《人民日报》副总编辑王若水写信给毛泽东,表示“很同意”周恩来不久前关于《人民日报》社等单位要批透极“左”思潮的意见,并反映了张春桥、姚文元等反对批极“左”的一些情况。

王若水的信发出的第二天,12 月 6 日,毛泽东约见江青,要她将这封信转给周恩来、张春桥和姚文元等,由他们一起找写信人谈话,解决这个问题。

当天,江青见周恩来,提出:“建议我们先谈谈,统一一下认识。否则,冒冒失失地找他们来,各说各的不好。”

12 月 6 日,周恩来在江青所送批件上批示:同意在政治局内部“先谈一下”。

王若水给毛泽东的信发出的第三天,他就听到一个觉得是不好的消息:12 月 6 日,张春桥、姚文元又一次谈话。姚文元说:“主席说,林彪历史上一贯是右的。”“林彪的理论和实践都是右的。”张春桥还提出:“只讲极‘左’思潮说服不了我。林彪也有个发展过程,只讲极‘左’怎么行?”“大乱是不是无政府主义?文化大革命初期,大乱是主席号召红卫兵造反。……停止党的组织生活,这是主席定的,不是无政府主义。文化革命刚刚过来,怎么能忘掉?没有大乱,哪有大治?生产搞不好,主要是阶级斗争,班子不团结,不是群众的无政府主义。只讲极‘左’怎么行?最后投靠苏修是极右。”

12 月 10 日,周恩来和江青谈话。

12 月 15 日、16 日,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讨论王若水 12 月 5 日信和对批极“左”问题的认识。

12 月 17 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后,毛泽东在住处召集小范围的会议,周恩来和张春桥、姚文元等参加。毛泽东从王若水的来信谈起。他说:“批极‘左’,还是批右?有人写信给我,此人叫王若水。我认识此人,不很高明。也读过一点马克思,参加过合二而一、一分为二、桌子的哲学……”

毛泽东接着说:“极‘左’思潮少批一点吧。王若水那封信我看不对。”

关于林彪路线的实质,他认为:“是极右。修正主义,分裂,阴谋诡计,叛党叛国。”

铁道部副部长刘建章在文革初期被捕入狱,从此音讯全无。直到 1972 年 6 月 8 日,专案组才准予家属探视。探视时,刘建章趁看守不注意,小声告诉夫人刘淑清说:“我几次向毛主席、周总理及中央写申

诉材料,都被专案人员当场撕毁。”并说,在狱中解决不了他的问题,让刘淑清想办法将他的情况“向周总理和毛主席反映……”

1972年7月20日,刘淑清写了反映丈夫1968年2月至1972年6月关押在秦城监狱时遭受虐待的信,“怎么才能将情况反映给毛主席呢?”刘淑清思来想去,想到了自己在外交部工作的大女儿刘润芬,她和能经常接触到毛泽东的王海容、唐闻生是同事。刘淑清认定,她们是将自己的信转呈毛泽东的最好传递者。

王海容、唐闻生得知了刘建章在狱中备受虐待,以及刘淑清准备上书毛泽东的想法,义无反顾地表示坚决支持。她们让刘润芬转告刘淑清,请她以家属的身份,将狱中对老干部的待遇如实写下来,并且认为,“如果这封信毛主席批了,将可以解救一大批遭受迫害的老同志。”

刘淑清的“上书”不久即由王海容、唐闻生呈交给了毛泽东。

1972年12月18日,毛泽东看过刘淑清的来信后,很快便找王海容和唐闻生询问情况,她们便趁这个机会,将老干部们的状况向毛泽东作了汇报。

对监狱中老干部的情况,刘淑清的信里有一段这样写道:“在探视过程中,我发现他(刘建章)体质很差,面黄肌瘦,胳膊不能高举,连说话有时也咬字不清。我对他的身体状况非常担心,加之监狱生活条件如此之差,每天饮水也有定量(每日三杯),再渴时就只得喝冷水,每天‘放风’只有30分钟时间……”

毛泽东震怒了,当即提笔在刘淑清的信上作了如下重要批示:“请总理办。这种法西斯式的审查方式,是谁人规定的?应一律废除。”

12月18日,接到毛泽东批示的当天,周恩来即批示公安部革命委员会主任李震、交通部革命委员会主任杨杰、国务院办公室党的核心小组副组长吴庆彤:

李震、杨杰、吴庆彤三同志:

请你们联合起来办三件事:

一、将刘建章保外就医。按他身体病况,或送复外,或送工农兵医院,并通知其妻刘淑清及其子女家属去看望刘。

二、将刘建章全案结论抽出送国务院先念、登奎同志批。

三、请公安部会同卫戍区将我在国务院当面提出过要清查北京监

狱待遇问题,再在年内做一次彻底清查,凡属主席指出的'这种法西斯式的审查方式'和虐待、殴打,都需列举出来,再一次宣布作废;并当着在押犯人公布,如有犯者,当依法惩治,更容许犯人控诉。

各事办好,请分别报来,附去主席批示件,请随第三事办好退回。

周恩来

1972 年 12 月 18 日

曾在 1965 年 1 月提出"干部特殊化如果不认真克服,干部和群众生活距离如果补逐步缩小,群众是必然会脱离我们的"八机部部长陈正人也被关了多年。在此之前,他也给毛泽东写信说:"记得您在井冈山曾亲口对我们说,要优待俘虏。可我们,现在的待遇比当年的俘虏却差远啦!"

12 月 17 日晚,毛泽东对周恩来说:"谭震林同志虽有一时错误,但还是好同志,应该让他回来。"

12 月 18 日,周恩来致信负责干部工作的纪登奎、汪东兴:

"昨晚主席面示,谭震林同志虽有一时错误(现在看来,当时大闹怀仁堂是林彪故意造成打倒一批老同志的局势所激成的),但还是好同志,应该让他回来。

此事请你们二人商办,他在桂林摔伤了骨头,曾请韦国清同志注意帮他治好。王良恩同志了解其情况,可问他关于震林同志一家的近情。

邓小平同志一家曾要求做点工作,请你们也考虑一下,主席也曾提过几次。"

12 月 27 日,纪登奎、汪东兴复信周恩来,提出:邓小平仍任副总理,分配适当工作。周恩来阅后表示:邓事待请示主席后定。

1972 年,外交部上呈周恩来的报告称,外交部有 20 余名"516 分子",姚登山、原"联络站"核心组头头王中琪等榜上有名。此外还有百余人被列为敌我矛盾,受到各种不同的处分。

外交部清查"516"的运动有乱咬、乱供的现象,也有逼、供、信,弄虚作假,以假乱真,真假难辨。有的嫌疑对象怕受煎熬,就乱咬、乱供;有的是有意为清查组专案人员设陷阱,胡诌瞎编。所以,打击面宽了。另外,文革初期挨造反派批的当权派,重新掌权后,自觉不自觉地对造反派伺机打击报复,彰显秋后算账的情绪。

总之,在外交部各个干校的专案组,在清查工作中都程度不同地出现了扩大化的倾向。

同年,复查工作由军代表李耀文领导,纠正审查偏向。经复查,一些在干校的“516”嫌疑对象得到解放,重新安排工作。少数人的复查结案拖了好几年。极个别人例如姚登山,一直到1982年才最终结案,办理离休手续,恢复原级别待遇。

外交部清查“516反革命组织”的结果表明:

第一,“打倒陈毅”、“封闭部党委夺外交大权”、“砸政治部”等重大事件,是少数狂热分子煽动起来极左的、过火的行动。没有证据说明是反革命阴谋活动。

第二,“火烧英代办处”、砸印度、印尼、缅甸等“三砸一烧”等重大涉外事件系无政府主义的乌合之众所为,并非有组织的反革命活动。

第三,外交部的一些过激行动不是“516反革命组织”搞的,而是狂热的姚登山、王中琪等人的极端行为。

第四,没有证据表明,“王关戚”是这些事件的幕后直接指使人。

1980年5月,外交部党委复查姚登山的案子时,党委内部有不同意见。刘振华副部长在党委会议上说,在外交部大家都说姚登山很坏,但也应该对他落实政策,是什么问题,作什么处理。他又说,姚登山有错误,有的很严重,但都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的问题,有其特殊的背景,应该实事求是地对他作个结论。人已坐了9年监狱,这个教训对他够深刻的了。

经充分讨论,按照当时的政策精神,外交部党委做出的结论是,姚登山在文化大革命时期犯有严重错误,他犯有反对周总理、坚持打倒陈毅等错误。对他的处分是:留党察看一年。自1971年11月至1972年11月止。外交部宣布此处分时,姚登山的处分期早已过了,对他已无实际意义。

姚登山不承认反周总理,只承认犯有“不应扩散王力、关锋、戚本禹的讲话、支持造反派《联络站》封政治部、参与研究改组外交部领导班子”等错误。外交部将他的申诉与结论一并归档。

1980年8月姚登山出狱,恢复原来的行政10级待遇,过起普通人的正常生活。1985年办理离休手续。1998年在北京病逝,终年80岁。

# 第1259回：杨易辰，批极右思想不通 议青岛，三司令致信林彪

12月19日，周恩来和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约《人民日报》社鲁瑛、吴冷西、崔金耀、王若水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一个小型会议，传达毛泽东关于林彪路线的实质是极右的指示。

会议由周恩来主持。他对王若水说："主席收到你的信后，批给我们办。""你所提的问题，就是'左'和右的问题。"

周恩来接着说："我8月1日讲极左思潮要批透，那是指外交政策，还有工作上的一些问题，不是讲林彪的整个路线。林彪叛党叛国，那是极右了。中央报刊上曾经指出过极左思潮，《红旗》杂志11期也提过，但我们没把林彪定性为'左'。至于表现形式，也有形'左'实右。说林彪是'左'原则上是错误的。这是中央务虚不够，不能完全责备报社同志。""《人民日报》批判无政府主义这篇文章，我看了一遍，是王若水的信来了以后才看的，觉得文章是错误的，因为理论上没有说清楚，联系实际也不恰当。把林彪说成无政府主义代表也不对，林彪也有他自己的政府嘛！一个时候，群众中有极'左'思潮、无政府主义，是个别的。有些地方说批林就是批极'左'思潮，这就批错了，批到群众头上了。不能把群众中的一些自由主义说成是无政府主义和极'左'思潮。现在批林是批林彪的反革命，揭露他，这是批判的主要矛头。"

接着，江青说："我对《人民日报》的事情不大清楚。我有一个感觉，这封信不管动机如何，客观上是对中央起着挑拨作用，我看了以后很不高兴。拿着总理在某一个场合某一个问题上讲的话来加以利用。林彪的路线，右到叛国了。""你这封信，好像春桥、文元同志跟总理闹别扭，我认为过分了。怎么可以把两个政治局委员和一个常委对立起来呢？""我今天还收到一封信，是理论部部分同志写的。我还突然收到几个口袋，都是对鲁瑛进行人身攻击。"

姚文元插话:“有些信那样写,把一个人的缺点收罗在一起,简直少有,只有黄色小报才那样写。”

江青接着说:“若水同志你要在中央面前把这个问题说清楚。”“这个版就是要在全国转移斗争大方向,不是批林。”“坏事也可能变成好事。《人民日报》一潭死水,搞活一些。我看王若水同志起个好作用,你敢不敢引火烧身?”她提出:“要从这篇文章入手,从这个版入手,从理论部入手。”

张春桥说:“《人民日报》不是王若水一个人的问题,《人民日报》还有人。这究竟是什么,需要研究。”然后,他又自己回答说:“我总觉得《人民日报》内部有一股力量、一股邪气,容不得外面的人。”“他们报社不但利用总理和我们之间,而且还利用中央、国务院各部看稿提的意见不一致,如先念同志如何看的。这种挑拨你们要注意。”

姚文元说:“阶级斗争这个时刻,你站到哪里去了?”“理论部我提了好几次,叫他们讨论,为什么不讨论?”

周恩来对王若水说:“要彻底认识这个问题。你的错误严重些说是立场问题。如果你确实感觉错了,那就要在自己的岗位上改,改了就好。”

12 月 27 日,纪登奎和汪东兴给周恩来回信,建议邓小平仍任副总理,适当分配工作。

此时,黑龙江省正在召开批林整风会议。他们在会上传达了周恩来贯彻毛泽东关于林彪路线的实质是极右的指示。在此之前有一种倾向,老干部的发言,重点批林彪的极“左”,而一些年轻人的发言则认为,主要应该批林彪反对毛主席,投降、叛变。

在学习毛泽东的这一指示时,造反派出身的省革委会常委范正美和原黑龙江省副省长、时任省革委会副主任的杨易辰有过这样一次对话。他们安排在同一个小组。一次,杨易辰在会上当众问范正美:

“小范,林彪明明煽动极‘左’,怀疑一切、打倒一切,怎么是极右?我想不通。”

范正美说:“林彪的罪行是分裂,投降卖国,而不是文革中的极‘左’错误。这是认识林彪罪行的关键。所以主席说:林彪是极右,是从这个角度讲的。主席点的很明确:搞修正主义,搞分裂,搞阴谋诡

计,都是右的。批极‘左’,就要联系文革,这样就要产生分歧。对于文革中的打倒一切,要分析是怎么来的,有些与林彪有关,有些不是林彪的问题。主席早在67年南巡时就讲了。所以,批极‘左’,就丢了林彪投降卖国的实质,放了他搞修正主义、搞分裂、搞阴谋诡计这些极右的东西,同时容易引起分歧,使批林走偏方向。《语录》不离手,万岁不离口,当面说好话是假,形‘左’;背后下毒手是真,实右。”

“你说的有一定道理,但我还是想不通。”杨易辰说。

范正美没有再说什么,心想:“我和你的思想体系不同,所以看问题、想问题的立场、角度相左。你想的是文革初期挨整,当时怀疑一切、打倒一切,对文革不满,对自己前期镇压群众、对自己在文革前的错误不认账,必然把林彪的文革错误放在重点,而淡化林彪叛逃、卖国、谋杀毛主席之罪。尽管我受潘复生的打击迫害,但我是文革的积极分子、造反派头头,我想的是,林彪后来要谋杀毛主席、否定毛主席,投敌叛变,要否定文革、否定无产阶级专政、否定中国无产阶级革命。”

范正美感到:“现在差不多的老干部不但解放了,而且都官复原职。他们在一起,就非难文革,只讲自己挨批、不讲50天、不讲自己有错误。对文革这也看不惯,那也瞧不上,在他们眼里,文革什么都不对,只有恢复文革前的那一套,才心安理得。”这些,肯定是范正美他们造反派不能同意的,他想:“这也是毛主席不能同意的。”

在传达毛泽东纠正批林彪极“左”的指示,范正美由衷的感到:“毛主席和我们心连心。”

他同时认为,毛泽东的这一指示,“显示了一个伟大的革命家、思想家、战略家审视世界的犀利目光;毛主席要求我们不要仅仅看到林彪极‘左’的表面,而要特别看到他投修卖国的实质。不能只批形‘左’不批实右。在毛主席看来,形‘左’原因复杂,如果只批形‘左’,就容易放走林彪实右的罪行;实右危险性最大,后果不堪设想。这些道理很浅显,主要在于自己的立场和思想感情。不是想不通,而是不愿意、不能够按照毛主席要求的无产阶级世界观、革命观,去审视林彪问题的真正要害。”

当时从中央到地方,对于批林彪其“左”还是右,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政治倾向,这实际上,是中国政坛上自建国以来两种力量的较量,进

而演化为以后的惊心动魄的政治风云。

12 月底,曾在绥化八一厂当过工人的范正美,担任绥化地区工作组组长,到绥化地区征粮。因为 1972 年,黑龙江省各地发生了大小不同的灾害,年成不好,粮食征购工作进展迟迟不力。于是,黑龙江省委向各个地区派出省委工作组。这是范正美重新工作后,新省委交给他的第一项工作。

接受这件工作后,范正美的一位同学对他说:“这是两面不讨好的工作。完不成任务,难向省委交差;完成任务,往往挫伤农民、引起农民不满。”

范正美带着工作组到达绥化地区后,先搞调查,天天坐着北京吉普车,跑村串屯,既看好的,也看差的,特别是受灾的村屯;既走访社队干部、察看场院,也走访农民家、了解农民的看法;既去地、县推荐的乡镇村野,也自己想到哪里就去哪里。有马上观花,还有下马观花,走马观花;拜访粮食部门有经验的专家和地、县有关干部。经工作组成员反复碰情况和磋商,和地委分头开会,最终取得了一致意见:原来所定任务十七亿六千万斤完成不了,只能完成十五亿斤,并且还需要下决心,做好工作;如果再拖下去,恐怕连这十五亿斤也难完成。

范正美明确告诉省里领导:绥化完成十五亿斤,是几个政策设定的情况下做出的估计。如:饲料地不给了;羊留饲料不给了;投肥粮减少了;农建粮减少了;有些地方口粮也节约了 10 至 20 斤;大牲畜也分开计算了,役畜留饲料少了;非役畜两个按一个算;种子每亩留 10 斤等。言外之意,这十五亿斤已经到头了,只能更少,不能更多了。

负责黑龙江省工作的沈阳军区副政委、黑龙江省委第二书记、革委会副主任刘光涛看完范正美的电话记录稿,表示同意他的观点和做法。

由于范正美开了第一腔,许多人开始渐渐说真话。随后,刘光涛又接到嫩江、松花江等地工作队上报的了大致相同的报告,促使他下决心调整了原来的计划和部署,妥善结束了有关催粮工作。

后来有人对范正美说:“谢谢你开了第一腔,帮了我们的忙。要不然,我们还得在农村呆下去。不能回家过春节。”

范正美万万没有想到自己的这么一个电话举动竟如此这般反应。

这使他感到十分吃惊。他第一次意识到,当官、搞政治不容易,在中国更不容易。讲真话、听真话两者都难。那一天,他回办公室找到了《韩非子》的《说难》,细细地品味起来:

凡说之难,非吾知之,有以说之之难也;又非吾辩之,能明吾意之难也;又非吾敢横失,而能尽之难也。凡说之难,在知所说之心,可以吾说当之。所说出于为名高者也,而说之以厚利,则见下节而遇卑贱,必弃远矣。所说出于厚利者也,而说之以名高,则见无心而远事情,必不收矣。所说阴为厚利而显为名高者也,而说之以名高,则阳收其身而实疏之,说之以厚利,则阴用其言显弃其身矣。不可不察也。

他掩卷思忖,想起当年"炮轰派"要求潘、汪晋见、反映情况,而横遭镇压,以及自己经历的桩桩往事,脑海掀起了狂澜,心跳一时无比激越:老百姓的生生死死,往往就在那些大官们的心绪好坏或手掌俯仰的一刹那之间。所谓明哲保身,就是熟谙世故、保官保命者吧。所谓说话要看对象,就是看人下菜碟、注意察颜观色者吧。所谓知人知面不知心,就是逢人且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者吧。

他想到这里忽觉好笑。这些都是旧社会人们得出的处世哲学。今天如果用以作为行为准则,岂不是对人民、对社会不负责任?中国自古就有所谓"以天下为已任"、"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传统,中国共产党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提出"实事求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等说法。遇到民间问题,应该如实反映,说真话、讲实情、用不着遮遮掩掩,去违心地办事。至于大是大非,涉及国家前途命运生死攸关的大事,更应该挺身而出,不能见风使舵,两面三刀,这才是共产党员、特别是年轻领导干部应该有的情怀和操守。

1972 年,青岛市委尚未成立,市核心小组内部思想不统一,加上社会秩序混乱,青岛干部和群众纷纷写信和上访,要求解决青岛问题。山东省委决定:由杨得志率工作组帮助青岛解决问题。

1972 年 10 月 16 日,山东省委 4 名常委来到青岛,参加青岛市党的核心小组批林整风会议。

通过谈话、座谈,山东省委认为,青岛市党的核心领导小组内的分歧,主要是青岛驻军支左代表和地方干部各为一方。分歧的焦点是要不要公开点名批判原北海舰队政委兼市核心小组组长易耀彩。部队

支左代表主张,青岛的批林整风,必须公开点名批判易耀彩,以“分清路线是非”,“重新调整班子”;地方干部则认为,易耀彩已于年初离开了市核心小组,青岛的落后局面,主要责任在现任领导。

山东省委认为,易耀彩的问题主要是表现在军队内部。“913 事件”后,经中央和军委批准,已对他进行了“离职审查”,没有发现重大问题,当时也没有做结论。因此省委认为,地方干部的意见是对的。经山东省委常委集体研究后,由济南军区政委袁升平代表省委讲话,提出“四个区别”,即:对待易耀彩的问题,军内和军外要加以区别;与市核心小组的集体领导要加以区别;与全市广大干部、群众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要加以区别;与广大支左人员的成绩要加以区别。并指出,对易耀彩的问题,在没有定性结论之前,只在内部讲,不公开点名批判。整风要坚持“三个为主”:领导问题同下面问题,以解决领导问题为主;当前问题与过去问题,以解决当前问题为主;政策原则问题与一般问题,以解决政策原则问题为主。到会绝大多数同意这些意见,可是也有俩人坚决不同意。他们认为袁升平的讲话是“和稀泥,不讲路线斗争”。

为了慎重起见,山东省委将青岛情况和省委解决问题的措施,发电请示中央,内容主要有三点:一是“九大”以来青岛形势估计问题;二是易耀彩的错误问题;三是逐步撤回军代表,由地方干部担任主要领导职务、发挥地方干部积极性的问题。并具体汇报了省委对青岛问题的“四个区别”、“三个为主”和青岛市核心小组中的两种不同意见。

11 月 12 日下午,中央政治局委员纪登奎给济南军区司令员、山东省委第一书记杨得志来电话说:“省委给中央的电报,周总理批示请政治局研究答复。中央政治局研究后,先电话上打个招呼。拟同意省委的意见,准备给省委发复电,并请毛主席批发。”

四天后,11 月 17 日早上,纪登奎又给山东省委来电话通知:“省委给中央关于青岛问题的电报,毛主席已经阅示,周总理到主席那里去了,要中央政治局帮助解决一下青岛问题。因此,中央决定,请省委杨得志、袁升平、白如冰、秦和珍 4 同志和青岛去 4 名同志到京解决问题。”

青岛去的 4 人是:驻军两名:马忠全、邓龙翔;地方干部两名;刘众

前、郑 干。

当日上午10时30分,中央派的飞机降落青岛,下午14时40分,山东8人登上飞机,直飞北京。

他们到北京后,参加了“山东青岛汇报会议”。但内容很快发生了变化,不是汇报青岛情况,也不是“解决一下青岛问题”,而是揭发批判杨得志和袁升平,重点是庐山九届二中全会上,山东7人联名写的“表态信”的问题,表态支持华北组的《六号简报》。参会人员也由原定的8人扩大到25人,要求山东省地委以上、济南军区军以上单位均派人到京参加会议。姚文元说他是“中央委派解决山东问题的组长”。

“山东青岛汇报会议”开了40多天,围绕着庐山会议问题,杨得志和袁升平先后作了3次书面检讨。期间又发生了追查许世友、韩先楚、杨得志三位司令员致信林彪一事。

原来,林彪出逃后,清查人员在林彪北京和北戴河的住处查到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福州军区司令员韩先楚、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得志在庐山会议期间写给毛泽东、林彪的那3封信,就是第1141回提到的“三司令同时写信”的事情。

信的抬头写的是“毛主席、林副主席:”,信封上写的是“汪东兴同志转呈毛主席亲启”。

3封信中,有一封信附有中办副主任王良恩给周恩来的呈阅件,其他两封都只是信封带信件。

这3封信,因为有林彪1970年8月28日对秘书于运深明确指示:“此件压10天。”故未送出。

据当年参与清查林彪住处的当事人回忆:“这几封信都在林彪办公室的档案中。我们在清查中发现后,感到不好把握,就一起交给办公室主要的负责人、中办副主任王良恩,他负责呈给上面。”

林彪专案办公室将从林彪住处查到这几封信送到王良恩处后,王良恩又上呈至周恩来。周恩来在专案办公室呈报的信件上批示:

此件是在传阅中被叶群扣压的。退。周恩来。

于是王良恩将信退回林彪专案办公室存档。

江青听到山东省反映在1970年的庐山会议期间,参加会议的山东省领导曾向中央写信,建议处理当时在庐山犯错误的人,马上嘱咐

查找。

信件很快摆在江青的案头,正是许世友、韩先楚、杨得志3人的信。信件涉及到周恩来、王良恩、许世友、韩先楚和杨得志等人。而王良恩则是由许世友推荐从军队调到中央的。

江青批到:“这几封信是支持林彪的表态信!”将信转报毛泽东。

接着,江青又在中央会议上提出要追查这几封信的问题。中央政治局决定派代表与这3人谈话,弄清情况。于是,许世友、韩先楚和杨得志三位大军区司令员和有关领导分批进京。

杨得志让秘书给福州军区韩先楚和南京军区许世友同志的秘书打了个电报,查问一下“表态信”上交的经过。结果这个情况被省委一位副书记报告了参加“山东青岛汇报会议”的江青。江青斥责他们“搞小动作”,组织了专场专题批斗。

会上,又有人提出:“1971年9月12日,毛主席路过济南时,杨得志擅离岗位,借故不见毛主席”,“袁升平带着保卫部长携枪进入车站,企图谋害毛主席”。这无异于又一个重磅炸弹,袁升平赶紧分辨说:

“9月12日凌晨4时许,我突然接到负责三支两军工作的张铿秀副司令员来的电话,说车站军管会报告,毛主席乘坐的专列停在济南车站,请杨、袁首长去接受接见。当时杨得志同志正在曲阜开会,我火速赶到车站,张铿秀同志已到,汪东兴同志在站台上会见我们,我告诉他杨得志同志不在家的情况。他说,主席还没有起床,杨不在家,天又早,不惊动主席了,列车马上就开。我说,那好,你们离开济南后,我立即报告中央。就这样,我们进站不到5分钟,主席的专列就驶向北京了。我立即回到宿舍将这一情况和主席离开济南的时间,电话报告了周总理。当时军区保卫部长晋国强同志下部队去了,根本不在济南。第二天凌晨5时许,我又接到周总理的保密电话,说‘庐山会议上第一个发言的人,带着老婆孩子,乘飞机跑了。’并指示我们:‘加强战备,稳住部队,做好工作。’总理虽然没有点名,我立即意识到是林彪叛逃了。我赶紧通知杨得志同志赶回济南,传达总理指示,共同研究落实了加强战备的措施,没有出任何问题。”

有些人仍不相信。

参会的汪东兴说:“主席原来是预定找杨、袁谈话的,是我事先没

有通知他们,想到济南再通知,结果杨不在家,没有谈成,不能怪他们。”

“山东青岛汇报会议”在讨论给中央的报告时,一些人坚持要点名批判杨得志和袁升平,并写上“山东省委执行了林彪路线”。山东省委办公室副主任刘文欣不同意,他说:“我是坚决不同意点名的。你们说杨、袁错误严重,该坐班房就坐,该杀头就杀,我不同意说山东省委执行了林彪路线。”结果,刘文欣因此被山东省委在京五常委撤销了他的到会资格和党内外职务。还有两名参会人员拒绝在报告上签名,其中一人以个人名义给中央写了一份报告,送给负责“山东青岛汇报会议”的中央负责人姚文元。

1972 年 12 月 25 日,许世友被叫到北京。中央找他谈话,了解他在庐山会议上和韩先楚、杨得志三个司令员给中央写信的事。追问他在信中写的“犯错误的人”指的是谁?信件为什么落到林彪手中?为什么三大军区司令员写的信件内容一样?是不是事先串连,搞非组织活动?

信中“犯错误的人”指的是谁?许世友当然不能说是张春桥。可是坏人是谁呢?秘书提醒了一句,许世友想起来了,毛泽东与他谈话时,说到陈伯达是坏人。“对,我们信中指的坏人是陈伯达。”

事情能不能说清楚呢?许世友血压陡升,心绞痛也犯了,住进 301 医院南楼。

许世友躺在 301 医院高干病房,又叫秘书继续回忆:“我跟林彪的事没什么说不清楚的。我看过林秃子几次,和他照过一次相,要警卫员打野鸡、野兔送过他。”

福州军区司令员韩先楚也被叫到北京。当他在京西宾馆一住下,就有中央领导同他谈话说:“你们有责任把自己的事情讲清楚。据了解,为写信碰过头的大军区领导还有好几个,中央对此事清楚,主要看你们的态度!”

韩先楚与许世友不同,他从延安到了山西,又随林彪到平型关。后来,林彪到东北,他也到东北,从东北一直到海南岛,他都是林彪的部下。

“我与林彪有什么黑关系?从打仗到部队建设,哪一条不是工作

关系？我同林彪照过一张相，林彪和多少人照过相？文化大革命要打倒我，是毛主席保的我！”韩先楚气呼呼地说。

关于信中所指“犯错误的人是谁？”韩先楚还真是有点搞不清楚。许世友听毛泽东批评了陈伯达，而韩先楚不知道，他当时还以为是“鳝鱼眼”张春桥，此时他当然不能承认是张春桥了。

而且，许世友的表态信是四条，韩先楚的信讲的是三条，第一条就是拥护林彪讲话。

而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得志就更说不清了。他从红军时期就在林彪麾下，是典型的“双一”干部，即红一军团、红一方面军。说杨得志给林彪写效忠信最符合逻辑。

1972 年底，江青又给中办负责人写了一封信，表示：一定要彻查许世友、韩先楚、杨得志 3 人的信是如何到林彪那里去的！

江青的信送到了中办秘书处文电组。信封上注有“办后退中央专案组”。

文电组的值班员将信送给了时任中办副主任，而且又是中央专案组办公室负责人的王良恩。他看了江青的批示心里一惊，迅速将信送给汪东兴。

12 月 31 日，姚文元通知开全体会议，继续批判省委办公室副主任刘文欣。下午 15 时，大家都到了会议室，等候中央领导到来。正在这时，周恩来意外地与中央其他领导一起来到京西宾馆，他宣布：“同志们在北京过个年，今天的大会不开了。”接着，批判刘文欣的一期大会简报也收回了。随后，周恩来主持接见了山东省委在京 5 名常委。他说：

“庐山的错误改了就好。林彪搞武装政变，没有你们的事。主席 9 月 12 日通过济南，袁升平同志给我打的电话，我亲自接的，他没有给林彪通风报信。”

他接着说：“今天晚上，请江青同志准备一点便饭，大家在一起团圆团圆。我因为有外事活动，现在见见面，晚上就不来了。”

当晚，江青同大家共进晚餐。第二天，又送了“新年祝词”：“祝杨得志同志和山东来京开会的全体同志新年好……”落款是：“江青 1973 年元旦。”

许世友到北京7天,住了5天医院。经中央同意,1973年元旦,许世友回南京休养。

一回南京,许世友马上召集常委会会同江苏省和南京军区的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一起回忆,写出检讨电报,由他签发给党中央和毛泽东。他说:

“庐山那封信是大家写的,我同意签发,有什么事我承担。没什么偏差,就是言词过激,干扰了主席的战略部署,不应该。”许世友承认,“林彪当国防部长时,我去看过几回,带过几次野鸡野兔。”

此事没有了结,下场如何还不清楚。眼看着程世清、卜占亚、蓝亦农、王新等省级部队干部在林彪事件中下台,许世友心中窝火,经常喝闷酒。

# 第五部下卷
# 各地文革章回索引

**北京：**

第 1202 回；第 1220 回；第 1238 回；第 1242 回；第 1246 回；

**军委办事组、中央军委：**

第 1201 回；第 1202 回；第 1203 回；第 1204 回；第 1206 回；第 1209 回；第 1210 回；第 1211 回；第 1216 回；第 1217 回；第 1219 回；第 1220 回；第 1221 回；

**清华大学：**

第 1202 回；

**空军：**

第 1202 回；第 1203 回；第 1204 回；第 1205 回；第 1206 回；第 1207 回；第 1208 回；第 1209 回；第 1210 回；第 1211 回；第 1212 回；第 1213 回；第 1214 回；第 1215 回；第 1216 回；第 1217 回；第 1221 回；第 1222 回；第 1223 回；第 1224 回；第 1225 回；第 1251 回；第 1254 回；

**外事口、陈毅：**

第 1203 回；第 1218 回；第 1220 回；第 1221 回；第 1226 回；第 1227 回；第 1228 回；第 1229 回；第 1230 回；第 1232 回；第 1233 回；第 1234 回；第 1236 回；第 1237 回；第 1238 回；第 1239 回；第 1240 回；第 1246 回；第 1247 回；第 1249 回；第 1250 回；第 1251 回；第 1252 回；第 1253 回；第 1255 回；第 1256 回；第 1258 回；

**五七一工程纪要：**

第 1206 回；第 1221 回；第 1224 回；第 1225 回；第 1230 回；

**五一六：**

第 1207 回；第 1223 回；第 1224 回；第 1225 回；第 1230 回；第 1242 回；第 1246 回；第 1258 回；

**中美关系：**

第 1207 回；第 1220 回；第 1226 回；第 1227 回；第 1232 回；第 1233 回；第 1236 回；第 1237 回；第 1238 回；第 1239 回；第 1240 回；

**海军：**

第 1210 回；第 1211 回；第 1242 回；

**总政：**

第 1217 回；

**专案组：**

第 1221 回；第 1231 回；第 1249 回；第 1251 回；

**贺龙：**

第 1230 回；

**王、关、戚：**

第 1230 回；第 1246 回；第 1248 回；

**杨、余、傅：**

第 1230 回；第 1231 回；第 1242 回；

**二月逆流：**

第 1230 回；第 1232 回；第 1258 回；

**邓小平：**

第 1231 回；第 1249 回；第 1251 回；第 1258 回；

**“走后门”：**

第 1242 回；第 1246 回；

**老干部：**

第 1242 回；第 1246 回；第 1249 回；第 1255 回；第 1258 回；

**文艺：**

第 1246 回；

**教育革命：**

第 1246 回；第 1255 回；第 1258 回；

**北京大学：**

第 1246 回；

**公安部：**

第 1246 回；第 1254 回；

**批“极左”：**

第 1248 回；第 1249 回；第 1255 回；第 1258 回；第 1259 回；

**文艺：**

第 1248 回；

**《红都女皇》：**

第 1249 回；第 1250 回；第 1251 回；第 1252 回；第 1253 回；
第 1256 回；

**刘少奇：**

第 1251 回；

**三支两军：**

第 1248 回；第 1251 回；

**上海：**

第 1202 回；第 1203 回；第 1205 回；第 1207 回；第 1208 回；
第 1209 回；第 1213 回；第 1214 回；第 1215 回；第 1216 回；
第 1217 回；第 1221 回；第 1222 回；第 1223 回；第 1224 回；
第 1225 回；第 1233 回；第 1239 回；第 1246 回；第 1254 回；
第 1258 回；

**天津：**

第 1224 回；第 1248 回；

**华北地区：**

**内蒙：**

第 1245 回；

**山西：**

第 1245 回；

**东北地区：**

**黑龙江：**

第 1231 回；第 1259 回；

**西北地区：**

**宁夏：**

第 1241 回；

**新疆：**

第 1234 回；第 1242 回；第 1248 回；

**西南地区：**

**四川：**

第 1201 回；第 1230 回；第 1241 回；第 1242 回；第 1249 回；

**贵州：**

第 1254 回；

**中南地区：**

**河南：**

第 1258 回；

**湖北：**

第 1203 回；第 1204 回；第 1216 回；第 1225 回；第 1230 回；第 1231 回；

**湖南：**

第 1225 回；第 1242 回；第 1256 回；第 1257 回；

**广东：**

第 1201 回；第 1202 回；第 1203 回；第 1205 回；第 1209 回；第 1213 回；第 1221 回；第 1225 回；第 1226 回；第 1242 回；第 1251 回；第 1252 回；

**广西：**

第 1242 回；

**华东地区：**

**山东：**

第 1259 回；

**安徽：**

第 1242 回；

**江苏：**

第 1203 回；第 1213 回；第 1217 回；第 1221 回；第 1222 回；第 1223 回；第 1224 回；第 1225 回；第 1259 回；

**浙江：**

第 1203 回；第 1205 回；第 1213 回；第 1214 回；第 1221 回；第 1222 回；第 1223 回；第 1224 回；第 1233 回；第 1239 回；第 1242 回；

**江西：**

第 1242 回；

**福建：**

第 1259 回；

# 文革史话

## 之

## 第六部

# 治理整顿

上卷

刘朝驹　著

中国文化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文革史话之第六部治理整顿 / 刘朝驹著. --香港:中国文化出版社,2021.9

ISBN 978-988-15988-5-1

Ⅰ. ①文… Ⅱ. ①刘… Ⅲ. ①纪实文学-中国-当代 Ⅳ. ①I227

| | |
|---|---|
| 书　　名 | 文革史话之第六部治理整顿 |
| 作　　者 | 刘朝驹 |
| 出　　版 | 中国文化出版社 |
| 发　　行 | 中国文化出版社　发行部(00852-21962638) |
| 总社地址 | 香港九龙弥敦道208-212号四海大厦 |
| 经　　销 | 香港九龙书店 |
| 总 编 审 | 中国文化出版社国内编审处 |
| 出版策划 | 宋艳丽 |
| 印　　刷 | 北京云迪印刷有限公司 |
| 开　　本 | 787×1092　1/32 |
| 印　　张 | 13.5 |
| 字　　数 | 390千字 |
| 版　　次 | 2021年9月第1版第1次印刷 |
| 书　　号 | ISBN 978-988-15988-5-1 |
| 定　　价 | 60.00元 |

您若想详细了解我社的出版物

请登陆我们出版社的网站 http://www.zgwh.cn/

# 目　录

## ◇上　卷◇

第 1260 回:流言传,复查谭甫仁一案
老公安,赵苍璧受命赴滇 …… 1

第 1261 回:出鸟事,警卫员与保姆通奸
细调查,“零一七”最终结案 …… 8

第 1262 回:抓电影,长影拍摄《艳阳天》
说山东,研究浙江约陕西 …… 14

第 1263 回:王良恩,中办开会被追查
继续谈,文艺工作者会议 …… 21

第 1264 回:谁曾想,王良恩悬梁自尽
注三国,三上将写信检讨 …… 28

第 1265 回:再赴京,湖南领导齐北上
下文件,只是为了卜占亚 …… 34

第 1266 回:武健华,奉命再进毛家湾
林立果,叶群卧室按窃听 …… 41

第 1267 回:二一五,基辛格五次访华
谈《水浒》,肖劲光也上“贼船” …… 50

第 1268 回:说贺龙,梁兴初下厂锻炼
见小平,周恩来治膀胱癌 58

第 1269 回:举世惊,邓小平重新复出
为谁泣,江青关心陈景润 66

第 1270 回:一封信,毛泽东潸然泪下
李庆霖,收到主席三百元 74

第 1271 回:空军会,三位司令员解脱
筹“十大”,中央召开工作会 80

第 1272 回:回上海,王洪文读《刘盆子》
国务院,召开知青工作会 87

第 1273 回:章士钊,九二高龄赴香港
看演出,江青细再提建议 92

第 1274 回:《新情况》,毛泽东批外交部
要读书,不同意“尊孔反法” 98

第 1275 回:问物理,又谈及儒法斗争
译古文,李庆霖申请入党 106

第 1276 回:叶向真,刘诗昆获释出狱
交白卷,张铁生的一封信 113

第 1277 回:备“十大”,上海议中委人选
山东省,撤销袁升平职务 121

第 1278 回:议人选,许世友颇有微言
做工作,周恩来几次哽咽 130

第 1279 回:周恩来,“十大”做政治报告
王洪文,冉冉升起的新星 138

第 1280 回:组班子,筹备开四届人大
回上海,周恩来思绪万千 147

第 1281 回:挨家访,邓颖超未见文静
张春桥,向中央提出离婚 154

第 1282 回:读书班,清华北大材料组
“反潮流”,武汉市风声再起 160

第 1283 回:浙江乱,江青接见刘诗昆
找李震,公安部部长失踪 168

第 1284 回:难置信,李震死于地下室
读书班,调学员参加破案 175

第 1285 回:定论难,华国锋到公安部
反复查,结论李震是自杀 183

第 1286 回:格瓦拉,重庆“十大宣传队”
一年内,基兴格两次访华 190

第 1287 回:告别宴,基辛格还要再谈
政治局,开会批评周与叶 198

第 1288 回:十天会,周恩来检查过关
毛泽东,提议司令员对调 205

第 1289 回:大军区,司令员互相对调
说“红楼”,毛泽东接见众将 213

第 1290 回:命令下,八大区对调完成
黄帅信,江西又分为两派 223

第 1291 回:元旦始,柴春泽的一封信
送材料,《林彪与孔孟之道》 231

第 1292 回:抓试点,邬吉成赶紧落实
王洪文,谈当前存在问题 239

第 1293 回:占岛屿,南越军舰进西沙
弱打强,中国海战获全胜 246

第 1294 回:解危困,肖永银“招兵买马”
走后门,钟志民申请退学 256

第 1295 回:一二四,驻京部队开大会
一二五,国家机关又动员 263

第 1296 回:周恩来,派人探访郭沫若
考教授,“梁效”写作组成立 272

第 1297 回:反“后门”,全国掀起退学潮
读书班,“十批不是好文章” 279

第 1298 回:再致信,讨论马振扶简报
批安东,叶剑英检讨“后门” 286

第 1299 回:情报所,恽仁祥收到回信
四机部,又发生“蜗牛事件” 294

第 1300 回:反黄帅,王亚卓的一封信
林立衡,第三次服药自杀 303

第 1301 回:“黑画展”,急叫停反“走后门”
毛泽东,提出分“三个世界” 311

第 1302 回:查罪证,两校进驻毛家湾
卡片多,林彪读书有特点 317

第 1303 回:一出戏,山西演《三上桃峰》
受批判,晋常委全体进京 323

第 1304 回:刘照常,公开质疑批《中国》
“整军队”,江青要“放火烧荒” 329

第 1305 回:晋批谢,主席说“到此为止”
淮南乱,江西组织上访团 335

第 1306 回:湖南闹,党委支持造反派
江城起,武汉释放胡厚民 343

第 1307 回:冰城反,云南又分成三派
省军区,通知大军区开会 351

第 1308 回:韩先楚,在兰州日子难过
“四联会”,望空都要扑到影 360

第 1309 回:病在身,毛泽东未见江青
邓小平,赴联大又生异议 367

第 1310 回:办《朝霞》,创刊后发生问题
王洪文,要求市委抓民兵 374

第 1311 回:不服气,陈冀德找徐景贤
告肖木,张春桥写信摆平 382

第 1312 回:批黑画,北京上海相呼应
梁漱溟,孔夫子也要继承 389

第 1313 回:促生产,计委召开座谈会
下《通知》,批林批孔定政策 397

第 1314 回:《枯树赋》,俩伟人最后合影
武汉市,数百人进京上访 403

**第六部上卷各地文革章回索引** 410

# 第1260回：流言传，复查谭甫仁一案 老公安，赵苍璧受命赴滇

1970年12月17日凌晨发生在昆明的谭甫仁夫妇被害案，“017案”的侦破工作已经历了一年之久，虽然已确定了凶手，但一直没有结案。其间发生了举世震惊的“913事件”。在批林整风期间，昆明的“017案”又与林彪反党集团联系在一起，于是，云南一时盛传“017”案件是“林彪死党制造的连环谋杀案”。其中一种说法是：

1970年12月中旬，谭甫仁突然接到北京密电，指示谭甫仁：某月某日，将有一架从缅甸飞来的民航机。该机经过昆明时，务必将其击落。

谭甫仁为人谨慎，狐疑难决。因为不明不白地打下一架民航飞机有悖常理。而上级命令又不能公开违反，于是他采取了退一步的办法，命令四架战斗机拦截这架从缅甸飞来的民航客机，并将其迫降在昆明机场。

飞机降落后，出来一个人，询问是怎么回事？

守候在机场的谭甫仁走到飞机的悬梯旁，只见从飞机上走出来一个气宇轩昂、风度翩翩的老人，谭甫仁一见腿都软了，差点没有跪下，说：“总理好！”

周恩来愤怒地问：“你们怎么还迫降我的飞机？是谁让你们这样干的？”

谭甫仁吓得不知说什么好，赶紧将电报的事哆哆嗦嗦的说了一遍。

周恩来说：“马上向中央写报告，把这件事情交待清楚！”

周恩来要走了谭甫仁的电报，在昆明没有停留就走了，回北京后，他将电报交给邓颖超，说：“等我死后再交给毛主席。”

周总理走后，谭甫仁彻夜难眠，他在灯下写检查，希望把事情交代清楚。他深知自己已经卷到政治斗争的最中心，如果交代不清，不仅

要犯罪,还要顶上谋害周总理这个遗臭万年的罪名,他也庆幸自己没有下令打下飞机,如果那样真是死有余辜了。

在这个神秘的夜晚,谭甫仁和他的夫人竟然离奇地在昆明军区大院警卫森严的住所内,被手持双枪的军区保卫科副科长在卧室内连开5枪击毙,那是林彪的死党在杀人灭口。不久,这位保卫科副科长和军区保卫部部长又相继自杀。因此,迫降座机和谭甫仁被杀构成了千古之谜。

谭甫仁被枪杀的消息传到国外,台湾国民党报纸也凑热闹,登了一条消息,称"云南匪首谭甫仁最近被反共主义战士王自正击毙"。

谭甫仁被害究竟与林彪集团是否有联系?枪杀谭甫仁的王自正是不是国民党派来的特务?到了1972年秋,汪东兴亲自将昆明军区副政委蔡顺礼和政治部副主任赵泽莽召集到北京,汇报此案件的进展情况。他听了汇报后对案件的侦破工作非常不满意,认为一年多来案件不仅无实质性进展,几个主要疑点未查清,而且还出现了几次严重失误,造成王自正与景儒林先后自杀。现专案班子又受到派性的干扰,对查清此案非常不利。他将情况向周恩来作了汇报,当即决定:将蔡顺礼留京接受审查;责令赵泽莽留京,住在总政招待所,提供情况,一个月后回昆明。同时,由中央办公厅选派有经验的侦破专家组成中央办案组赴滇指导破案,重组专案班子。

于是,中央决定,由刚被解放出来的四川省委书记处书记、副省长,时任四川省革委会政工组群工组负责人的赵苍璧,组成"017案"破案指导小组,去昆明协助专案组工作,认真对案件进行复查。

1973年初,赵苍璧被召到北京。汪东兴在中央办公厅向他传达了周恩来对"017"专案工作的指示:一要查清此案是否与林彪反党集团有联系;二要查清是否有同伙配合、集团作案;三要查清王自正和景儒林自杀的原因及教训,找出破案中的纰漏和原因。要求将案件的主要疑点特别是关键问题查得清清楚楚,不能含含糊糊。破案指导小组在云南省委和军区党委领导下工作。

公安部为赵苍璧选配了两名助手,一个是河北省公安厅一处处长刘刚,另一个是辽宁省公安厅二处处长徐生。后来,为了侦破工作的需要,中央专案组又从各地公安机关抽调了枪弹痕迹专家王广沂、指

纹专家赵向欣(女)、法医赵海波等。为了工作方便,公安民警一律穿军装,住在昆明军区招待所9号楼。

赵苍璧是老资格的公安干部,进城之初就担任北京市公安局首任治安处处长,后任原西南局公安部部长、四川省政法委书记,具有丰富的侦破工作经验。

昆明军区党委也调整改组了原专案班子,仍由新任昆明军区政委、云南省委书记周兴担任组长,昆明军区副司令员徐其孝具体负责,军区司令部副参谋长黄学义任办公室主任。同时,从各部队和当地公安部门抽调一批精干力量作为专案组成员。

赵苍璧到昆明后,参加了由周兴主持召开的省委和军区党委的联席会议。他在会上传达了周恩来的三点指示。经会议讨论后决定:一、由军区清查小组,结合清查林彪集团在云南的活动,查清与“017案”有无联系,由军区党委领导进行。二、专案组继续查清王自正的有关问题及一些疑点。破案指导小组与专案组一起开展工作。并明确规定,凡是破案计划、重大措施等都要报云南省委和昆明军区两个党委批准后才能执行,并适时向公安部汇报。

指导小组工作人员于1973年夏陆续到达昆明。破案指导小组都是外省市调去的,没有介入云南的“文革”,也没有参与前段案件的侦破工作,思想上是超脱的,也没有框框。

为了证实罪犯,并澄清是否有外人进入谭宅,消除对一些人的怀疑,需要认定作案人数。而认定作案人数的重要依据是遗留在现场的痕迹物证,因此,技术专家王广沂、赵向欣等人在32号院中心现场重新进行了艰苦细致的勘查检验工作。王广沂将击中王里岩眉间的弹头从王里岩卧室地板中挖了出来,经鉴定与在32号院提取的其他弹壳、弹头均系同一支59式手枪发射。

为了慎重起见,专案组还派人将在32号院和西坝俘管所提取的弹壳,弹头先后送到南京、上海复检,鉴定结果与原结论完全一致。

前专案组因在现场勘查中过于仓促,只在楼口门上提取了一个凶犯留下的指纹,而在楼上却未提取一个足迹和指纹。谭宅出入口等处有几十个已显现出来的指纹,发案后没有提取,在这次复查中全部提取下来。赵向欣在楼上楼卜、院内院外等处,光指纹就提取了150多

个。要从这150多个指纹中认定哪些是谭甫仁夫妇及其家人、工作人员留下的,哪些是战友们在抢救受害人时留下的,哪些是犯罪嫌疑人留下的,需要进行大量耐心细致的分析比对工作,同时,为了验证指纹遗留的时间,还需要多次进行现场试验;经过半年多的努力,终于做出了科学的鉴定结论:在排除了谭南仁全家、工作人员、战友等有正当理由留在现场的指纹之外,有三个是王自正留下的:一个留在了楼梯口,另一个留在了王里岩卧室的门上,另一个留在了谭甫仁屋门的外侧,除此之外,现场没有其他可疑人留下的痕迹。这与王文莹提供的只见一人从楼上下来,未见第二个人情况相符。因谭宅经常有人打扫卫生并擦拭门窗,对指纹遗留的时间,也进行了大量的试验和判断,证明指纹检验是正确的。

这是认定“017案”系王自正一人作案的可靠依据。

根据谭、王中弹后躺卧的地点、姿态及弹壳遗留位置、弹着点情况,从弹着点判断射击的方向和角度,并根据罪犯在现场上时间不可重复性和不可逆转性的规律特点,指导小组判断确定了凶手和被害人当时在现场的情况。

如王里岩见凶手进屋后,首先是起床奔向卫生间,以阻止凶手从卫生间进入谭甫仁的卧室,凶手在房门口打了第一枪,射击走向卫生间门口的王里岩,但弹头打在墙上未击中。第二枪击中王的腹部,王里岩头向卫生间仰面倒下。第三枪凶手站在王的脚下向眉间射击,弹头穿过头颅从后脑射出,斜向钻入地板内。

王自正追谭甫仁在后院走廊厨房门口打两枪未击中,弹头打在警卫员李洪亮的门框上,谭甫仁当时是敲李洪亮的门,因为手枪在李洪亮处,因此,谭甫仁当时是面向李门,第一枪从谭的外衣射入,第二枪是谭甫仁背向李门,从谭披的衣服内侧射入,两枪在衣服上的射击入口周围均有明显的擦拭圈痕迹。第三枪是凶手堵住通往夹道的路口,趁谭甫仁转身欲返回走廊时,击中右后腹部,弹头贯穿腹部打在走廊墙上。第四枪是在谭甫仁已负伤在走廊面向楼后门时,击中在上臂外侧,弹头卡在骨内。第五枪从谭甫仁的右太阳穴射入,由左上脑射出,弹头飞向院墙外,谭即倒在走廊上死亡。从现场提取的8个弹壳和7个弹头与西坝粪堆中发现的59式手枪进行弹痕检验比对,认定是同

一支枪发射。从而判明了凶犯杀害谭、王的过程,并确定是一人用同一支59式手枪作案。

现场出入口等处的足迹,是同一型号的鞋,与王自正胶鞋认定同一,是为一人所留痕迹。

为了证实王文莹所提供的情况,在发案的第三年,即1973年12月17日,当时气候条件、光线等与发案时近似,于拂晓时进行实验观察,对模拟凶手的面貌、休态特征所见程度,与王文莹所提供情况也一致。

西坝现场提取的3个弹壳,2个弹头(射入木夹板墙内弹头已提取),与王自正自杀手枪进行验证比对,确为此枪所发射。

因此,现场的再复查,物证技术鉴定,均可确定是王自正一人作案,手枪是保卫部丢失的两支59式手枪。

王自正自杀,死无口供,怎样来解释他的行凶动机以及一系列作案过程呢?除了搜集王自正生前日常表现外,很重要的是他的3本日记。王自正在被隔离审查期间,几乎每天都写日记,当天的天气情况,日常活动,思想动态等基本上都有记载。这些日记绝大部分都比较清楚,字迹虽说不上工整,但也不甚潦草。但是,有那么一二十篇却格外乱,似乎是在日记上乱涂乱写,很难辨别写的是什么内容,真像“天书”一样,难怪以前专案组的人也看过他的日记,但认为没有什么有用的东西,没有很好认真的研究。

富有侦破经验的中央专案指导小组认为,王自正这些乱七八糟的日记绝非随意涂着玩的,而是蓄意掩盖见不得人的内容。专门指定“老政保专家”刘刚研究这些日记。到后来,刘刚处长已经能够完全记住在哪本日记,哪页写的是什么内容,到了倒背如流的程度。

例如,王自正的日记中有一句类似《红楼梦》中的诗,刘刚他们就找了几个人,每人手抱着一部《红楼梦》查找,并研究这句诗在《红楼梦》中是在什么情况下写的?王自正写这句诗的意图是什么?又如日记中写有“阿庆嫂”,前后没有连贯的东西,于是对“阿庆嫂”是否有所指也进行了分析研究。

功夫不负苦心人,最终,他们对王犯杀人动机,潜出潜入西坝的情况,偷枪的情况等等,都从那些日记中找到了答案。

王自正有篇日记写道:“这件事(指历史问题)不是死刑也要劳改

终生,老婆孩子也要受到牵连,我这一辈子完了!”

原来,王自正自被隔离审查后,终日惶恐不安,自知真有血债,罪行是严重的,“将来不是受到极刑处置,恐怕也是终身服刑”,因此思想上总是处于紧张、绝望的状态,并试图尽量逃脱罪责。在承认与其堂兄到武拐村进行反攻倒算,那次确实打死了武不会的事实后,但他又提出开棺验尸,以证明自己没有杀人。其实这只是一种拖延时间手段,也存在侥幸心理,认为查不到枪眼就无法做出他开枪杀人的结论。王犯从他侄子来信中得知,当地群众强烈要求把他揪回原籍斗争予以处置,他感到末日来临,死罪难逃。自己下场不好,老婆孩子也会受到影响和牵连。想逃出西坝,在当时中国的情况下,他也感到即使逃走了,也难找到一处安全的藏身之所。在这种绝望的状态下,遂产生杀人报复的念头。

他在日记中写道:“自己不能这样死,要死的话也要杀几个人”,“能报复的只有杀人一条路”,“要多杀几个人”。

杀谁呢?他列出了军区领导人陈康、鲁瑞林、田维扬的名字,但后来又考虑,“不如杀谭,影响更大!用什么手段去杀呢?”王自正可能想到20多年前杀共产党的武委会主任用的是枪,如今杀共产党的大军区政委还得用枪,因此他写道:“要设法搞到枪,拿到枪半胜,见到人全胜。”

那么,他是怎么搞到枪的呢?

办案人员了解到,王自正当了多年的保卫部的秘书,他的办公室就是存放枪支的保密室,枪柜内存放着一批备用的59式手枪和子弹他是知道的。枪柜的钥匙就放在办公桌的中间一个不加锁的抽屉里,换了几任秘书历来如此,秘书从来是兼做枪支保管员。保险柜的密码,也是换人不换号,王自正管了几年枪柜,保险柜的密码自然是熟记于心,并且还记在了自己的日记本上。

王自正虽然被隔离审查了,但因尚未定性结案,他依然穿着军装,帽徽领章齐全!况且一般哨兵也不知道他正被隔离审查!因而军区大院和办公大楼他照样可以大摇大摆地出入。保密室的门锁多年来一直是只防君子不防小人!这是很普通的碰锁,门的缝隙很大,用铁片、竹片等硬质物件一捅就开,办案人员做了一下现场试验,结果没有

钥匙就轻而易举地捅开了门锁。保卫部的人员曾回想起这么一件事，有一次王自正忘了带钥匙，结果用苍蝇拍把屋门打开了。由此可以断定，王自正完全有条件，有机会偷出保险柜的枪支子弹，而无需他人协助配合。

军区大院三个营门和办公楼两个门均有岗哨，但不逐人查验证件，穿军装就可以进入，所以王自正混入大院极为方便。

由此可见，偷拿手枪、子弹是极为容易的事。他所以偷两支枪，应该是为了双保险，唯恐枪支出现故障达不到作案的目的，而且 59 式手枪全长 161 毫米，重 0．73 千克，装在衣袋内完全可以隐蔽。王自正就这样实现了他行凶的第一步，轻而易举偷到了枪支。

## 第1261回：出乌事，警卫员与保姆通奸 细调查，“零一七”最终结案

那么，王自正怎么可能从戒备森严的西坝俘管所出去呢？

西坝俘管所看上去警卫森严，大门口和王自正住室前均有岗哨，日夜警卫，规定王自正室内晚上不准熄灯，以便岗哨观察情况。到院南边的厕所，也要向岗哨报告等。可是偏偏警卫漏洞很多。

办案人员详细了解了战士站岗值勤的情况，发现这里边有很大的漏洞：1个班12名战士分12班，每班1人，值2个小时，换岗时需交班的到宿舍去叫接班的，接班的即使能立即起床，中间至少也有3至5分钟的空岗时间。据了解，有些战士往往贪睡而不能按时起床，常常要磨蹭一会儿。尤其是一个外号叫“小迷糊”的战士，每次接班都要耽误10到20分钟。

王自正发现并利用了这一漏洞。专案组从调查获取的4点证据中得出确凿无疑的结论。

其一，据多名战士反映，王自正经常同挂在大槐树上的马蹄表对表，这个马蹄表是战士们值班时掌握时间用的，王自正将自己的手表与马蹄表相对，显然是为准确无误地利用战士交接班时的空当而做准备的。否则，时间概念对于他这个被隔离审查的人来说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其二，从王自正的日记中可以看出，他对战士轮流值班情况进行了长时间的观察和研究！其日记中就有这样的记载；

“小迷糊几点至几点”，“大个子几点至几点”、“小山东几点至几点”……

其三，王自正的妻子李素云，儿子王冬昆、女儿王冬石都证实，王自正被隔离审查期间，晚上不止一次回过家：李素云交代，有一次王自正拿回去两支手枪，要放在家里，她死活没让放。

其四，院西南角厕所的围墙内外有蹬蹭痕迹，地上有杂乱的胶鞋

印痕,尺码与王自止的相符。

根据上述情况分析推断,王自正巧妙地利用了战士交接班时的空岗时间,从大门口潜出(大门只在里边插着栓,不加锁),虚掩上门,待下一个交接班时间再返回来。返回时如果点卡得准,那他就从大门进入;如果卡得不准,那他就从西南角厕所外越墙而入;万一被发觉,他就借口上厕所拉肚子,并且向上一班请了假,从而很容易掩饰过去。据警卫战士反映,他们多次发现王自正从南边走过来,问他时则答称拉肚子去厕所,岗哨误认为已向上一班报告过了,也未细查深究。这期间,住在里屋的谭崇访正在闭门酣睡,毫无警觉,怎会知道?在王自正潜出隔离室的两个小时当中,值班的战士只在院子里站岗,从不进屋察看。虽然从窗口可以看到灯光明亮的屋内,但王自止的床上吊着蚊帐,蚊帐内的被褥再稍加伪装,不仔细瞅,从外边是难以发现破绽的。专案组为此专门做了实地实验,证明上述推断是站得住脚的。

王自正又是从何时开始潜出隔离室的?共潜出了几次?由于王自正已死,惟一的知情者李素云拒不交代,她除了供认王自正往家拿过两支枪外,其他的一概不供,翻来覆去就是一句话:“俺是个家庭妇女,俺啥也不知道。”所以,王自正准确的潜出日期和次数已很难查清。不过,可以肯定,王自正开始潜出隔离室是在被隔离审查两个月之后。根据是,在他被隔离审查以后的前两、三个月之内,先后给其妻写过3封信,都是封好贴上邮票,从临街的小窗户扔到大街上,希望过路的小学生做好事替他投到邮筒。其实,这3封信先后都由捡到的人交给了专案组,在此之后他就再也没有往窗外扔过信,这说明他已有机会回家与老婆孩子团聚,不需要再用这种笨办法联系了。

由此可见,王自正潜出西坝,偷到枪支,作案后又返回西坝是完全可能的。他所以要返回西坝,也是为了掩饰自己,使人觉得一个隔离审查的人,不可能出来作案,从而达到逃脱罪行的目的。

王自正由于工作的关系,以往经常到谭甫仁居住的32号院去,对该院的环境、布局非常熟悉,同院里的主人和工作人员也都熟得很,对院内警卫班松松垮垮,形同虚设的情况也十分了解,因而潜入作案无所顾忌。

据了解,32号院的警卫班由站岗到坐岗,又由坐岗变为睡岗,是多

年来逐渐形成的,没有证据证明这种情况是由于某人故意而为。

至于干部食堂的狗,后来查明,是被几个馋嘴人偷去杀了吃狗肉了,与王自正没有任何联系。

谭宅院内共住有8人,除两人被害外,尚有6人。王文莹和吴小红住在楼内,均为谭、王的亲属,平时住在谭家,与谭、王没有矛盾。警卫员李洪亮是谭由军委工程兵调云南省时带来的勤务兵,主要负责谭甫仁家的生活起居、打扫卫生等勤务,不久前刚兼做警卫员,没受过正规的警卫训练,实际上仍作勤务员的工作。1975年,已被关得晕晕乎乎的李洪亮供认,谭甫仁遇害那一晚,他正和保姆睡觉呢。他以为是来捉奸,所以不敢开门。

警卫员正当年华,那保姆呢,据说是某国民党军官的太太,老公跑到了台湾,她一人就留在昆明老家替人烧饭浆洗度日,平日很爱整洁,成天都收拾得干干净净的,白皮肤,五官十分端正,年轻时一定是个美人儿。但不管怎么说,那时她毕竟已是隔日黄花,年龄应该不小,按照当时流行的阶级观点,应该从严控制的。可她偏偏却留在共产党高级领导干部的身边,演绎出这等鸟事,也实在让人啼笑皆非。

但由此可见,李洪亮与王自正不认识,没有私人关系,不存在参与王犯共同作案的基础。

保姆和谭家没有矛盾,与王自正也无来往,也不存在与王犯里外配合问题。门口的两个哨兵,他们领受任务是守好大门,防止坏人进来,上级没有布置过院内楼内的警卫任务,几个门卫都是新上岗的战士,与王犯不相识,无任何联系。发案当天只留两个哨兵,其它战士参加野营拉练,这也是上级早有的布置,纯属巧合,不是有意为王犯作案留出空隙。

经过反复审查和调查,这些人都无合伙作案的动机,因此,“里应”的问题也就不存在了。

那么,负责审查王自正的陈汉中,他同王自正究竟是什么关系?

陈汉中是军区政治部干部部的一位科长,他负责王自正的审查工作。王自正可以进出西坝,行凶后又到政治部宿舍大院找陈汉中,这些都与陈汉中有关系。是陈汉中为王自正的同伙,为他提供作案的方便和条件呢,还是其它原因?王自正为什么在杀害了谭南仁夫妇后又

去了陈汉中家？王自正为什么在日记中流露出对陈汉中恨之入骨，陈汉中为什么在王的枪口下侥幸逃生，陈衣服上的18个弹洞究竟是怎么形成的？

这一连串的疑问需要解开，也必须解开！

经过审查了解到，陈、王之间没什么私交，既没有共同的思想基础，也没有什么个人恩怨。陈汉中作为专案组的负责人，对于自己的审查对象一贯表现得比较“左”，管教方式比较严厉、粗暴，每隔十天半月就对王自正训斥一顿，批态度、批不承认血债、批顶撞哨兵不服看管等。因而，王自正最恨的是陈汉中，最怕的也是陈汉中。他的那些被故意涂乱的日记是其真实思想情绪的流露。例如：“陈汉中你好凶啊！陈科长好狠毒，太可恶。总有一天我要找你算账、报仇！”据此可以推断，王自正作案后到政治部家属院去找陈汉中，惟一的解释就是企图找陈报仇雪恨，而陈汉中到外地出差是他始科不及的，从而使陈躲过了一劫。

政治部家属院在军区大院北面，王自正也住在该院。他住的是原属于沈醉的小洋楼，而陈汉中住的则是单元楼，两家虽然相隔不远，但平时没什么往来，因而王只知陈家的大概位置，弄不清具体是哪个门，这才出现前面提到的王自正向马苏红打听陈家一节。

既然王自正对陈汉中恨之入骨，必欲除之而后快，那他向陈汉中开的那一枪为什么只伤其皮毛，而未击中要害或再多打几枪呢，陈汉中衣服上的18个弹洞又是怎么形成的呢？

办案人员重新勘查了王自正枪击陈汉中和李伯志的现场，结果在门口附近的胶合板墙裙上发现了一个弹孔，当挖开墙裙寻找弹头时，发现在胶合板与墙壁之间的鼠洞中有一只腐烂的大老鼠，在紧挨着死老鼠的半块砖头中找到了一颗手枪弹头，根据案发时陈汉中所处的位置，断定这颗子弹就是打在陈汉中身上的那一颗，但歪打正着，要打的却打偏了，子弹从陈汉中的肚皮上擦过去，却偏偏击中了躲在墙中的大老鼠，这只硕鼠竟当了陈汉中的替死鬼。经鉴定，这颗弹头同击伤李伯志的一样，就是王自正用以自杀的那支59式手枪所发射。而且，经过反复射击实验，大衣右上臂外侧射入口如是自伤，必须用左手持枪，枪与大衣口最远距离不能超过十公分，但在射入口末出现对纺织

物近距离射击时必然要有枪口火药气体形成的撕裂痕和火药残渣附着物。用左手自射也不能形成由后向前斜下的这样出入口角度,只有在身体向左下方半蹲,并用右臂略抬遮挡情况下,才可能形成大衣和其它衣服弹孔一贯的射线轨迹。由此而排除了陈汉中自伤的可能。

王自正射向陈汉中的这一枪怎么会在他衣服上形成18个弹洞呢?办案人员详细询问了陈汉中和李伯志当时的情况,并反复做了现场试验,终于弄清了事情真相。原来,当王自正从被子底下抽出手枪向陈射击的一刹那,正面向王自正的陈急忙侧转过身去,两胳膊往头上一抱,顺势蹲到地下。王自正的这一枪先后穿过其右臂和左臂的衣袖,又穿过腰部的几层衣服,最后钻入了墙裙中,陈汉中身上穿着大衣,罩衣,毛衣,衬衣共四层,加之扎在裤子中的上衣有褶子,所以形成的弹洞自然就多了。至此,揭开了一枪出18个弹洞之谜。这样,既揭穿了陈汉中所谓"英勇搏斗"的自吹自擂,也解除了他身上背的黑锅。

专案组认为,在当时十分紧急的情况下,王自正不可能准确地判断击中陈汉中的部位。因为谭崇访就在他身后,屋外又有荷枪实弹的战士站岗,为了迅速脱身,不至于落入法网,他只有仓皇地逃出室外,而来不及再多打几枪。

再说昆明军区保卫部长景儒林自杀一事。

景儒林在军区步校办学习班的第二天凌晨,在其住室内,用尼龙兜绳一端套在颈部,一端挂在蚊帐杆上,坐势下垂,形成颈部压力,压迫气管窒息死亡。在其颈部下方有由前到后马蹄形压痕索沟,这是明显自溢死亡特征,室内也无其它人加害于景的痕迹和迹象,证明是景自溢而死。景儒林深深感到谭被害的严重后果,自己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审查王犯是景直接负责领导的,对王自正要求开棺验尸要求,景儒林表示过同意,拖延了对王自正的处理,给王作案留下了时间。景儒林一直认为王不可能从西坝出来,直至马苏红辨认后仍持不相信的态度,坚持要再取指纹、鞋子鉴定,而没有采取果断措施,至使王犯再次行凶后自杀。当发现行凶枪支是偷保卫部的,景儒林才在事实面前无言以对。以前对袁孔祥逼供、诱供结果受到了彻底否定。所以他多次在言语中流露出负罪的心态,感到谭甫仁被杀是自己严重失职造成的,而在破案过程中,在几个关键问题上,他坚持的作法、观点都是

错误的、失策的,加之参加学习班即将受到审查,思想压力极大,深深的陷入沉重的负罪心理状态而不能自拔,使自己走上了绝路,这确实是咎由自取。在调查中没有发现景儒林与林彪集团在云南的活动有联系,也没有发现对王犯有意包庇、纵容,是属于严重失职、渎职问题,排除了是王犯的幕后指挥和同伙的嫌疑。

李素民是王自正的妻子。自从王犯知道有检举信后,并在被调查期间,李素民即回过原籍与有关人订立攻守同盟。王被隔离后多次潜出西坝回家,与李同床共眠互通情况。王作案清晨回家,曾提出将两支枪交李保存隐藏,李不敢而予以拒绝。李本人也做了被捕的准备,在其内衣就查出缝在衣服内的一千元存折。从李的交待中她也承认知道王的罪行,但从审查中没有发现李与王共谋同伙作案的情况,而是知情不报,有意隐瞒包庇王的罪行。

1973 年底,公安部和中组部商议后,以公安部核心小组的名义发电报给云南省委,告知赵苍璧回四川工作。赵苍璧于 1974 年春节离昆明返川。

1975 年 10 月,周兴在北京病危期间,汪东兴到医院探视时,问到赵苍璧在昆明工作情况,周兴大为吃惊地告知,赵苍璧早已回四川。

随着问题的逐步查清,各方面有了结果,指导小组人员也先后撤回,1977 年夏,两位处长也最后撤回。

经过前后两套专案班子反反复复、曲曲折折长达 7 年之久的侦查,复查,谭甫仁夫妇被杀案终于水落石出,真相大白。1978 年 6 月,专案组写出了结案报告,认定谭甫仁夫妇被害系王自正一人所为,既没有林彪反党集团插手,也没有同伙配合。之所以造成王自正伤人后自杀,是由于专案组缺乏经验,决策失误,措施失当。景儒林的自杀则是由于自愧自疚心理过重,思想压力过大所致。

结案报告经昆明军区党委和云南省委批准,上报了党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至此,这起在“文革”这一特殊背景下所发生的反革命报复杀人案终于画上了句号,其他凡因“017 案”而被隔离审查的人员都相继解除了审查,恢复了名誉。

# 第1262回：抓电影，长影拍摄《艳阳天》说山东，研究浙江约陕西

我们再回到1973年。自1964年7月31日，康生在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大会闭幕式上说，《北国江南》、《林家铺子》、《早春二月》、《不夜城》、《舞台姐妹》等电影都是毒草，应该批判后，到1966年2月，江青在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上，同与会人员观看了30余部影片，几乎批判了建国以来的所有电影和文艺作品，至文化大革命，建国以来，各电影厂生产的300多部影片，几乎都受到了批判，仅存《南征北战》、《平原游击队》、《战斗里成长》、《上甘岭》、《地道战》、《地雷战》问题较少。这几部故事片反复放映，反复看的结果，孩子们几乎背下了影片里的全部台词。有些台词甚至成了当时人们的口头禅或歇后语。如：《地雷战》中，伪军高司令讨好日军，竖着大拇指说："高，实在是高！"《南征北战》中，国民党张、李二位军长在电台上的对话："老兄，看在党国的份儿上，请你伸出手来，拉兄弟一把吧。""请你再坚持最后5分钟，最后5分钟……"几乎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时常被人在生活当中借用。人们将《地道战》、《地雷战》、《南征北战》这三部影片戏称为"老三战"。

为了解决群众对电影的需求，1969年前后，以批判的名义，各地的电影院先后放映了一批"毒草"影片，如《怒潮》、《红日》等等，都是由单位统一组织，人们趋之若鹜，电影院场场爆满，一票难求。每当银幕上的故事演到动人之处，尽管有画外音铿锵有力的批判讨伐之声，场内仍然不乏唏嘘之音。

1972年，在抗美援朝胜利22周年之际，又恢复上演了5部抗美援朝的电影：《奇袭》、《英雄儿女》、《铁道卫士》、《打击侵略者》和中朝合拍的《战友》。

后来，中国又陆续进口了阿尔巴尼亚、南斯拉夫、朝鲜和越南的一些故事片。曾几何时，一曲朝鲜的《卖花姑娘》，让多少中国人潸然泪

下;一首南斯拉夫的《啊,朋友再见》唱遍大江南北。由于常看这些进口片,一段顺口溜在民间流传:“朝鲜片又哭又笑,阿尔巴尼亚搂搂抱抱,南斯拉夫打打闹闹。”但进口片毕竟有限,杯水车薪,加上文化、传统等方面的差异,难以满足大家的需要。

其实,在1972年5月,长春电影制片厂已经率先开机拍摄根据浩然同名小说改编的故事片《艳阳天》。

这部影片的拍摄长影厂是在1966年初就已经确定了。当时是准备将浩然根据自己的小说改编的电影文学剧本《艳阳天》直接搬上银幕,并专门成立了电影摄制组,前往北京郊区昌平体验生活,准备开拍。但是由于1966年3月8日发生的河北邢台地区地震,波及到了《艳阳天》摄制组所在的外景地昌平,长影厂通知摄制组迅速回厂。随后文革开始,大家都投入到了文革之中,拍摄工作自然也就无人顾及了。直到1971年8月,原长影厂代理厂长苏云才解放出来恢复工作,主抓艺术创作。他上任不到一个月,就于1971年9月,在其他电影厂还在热拍样板戏的时候,就再次组织起了《艳阳天》的创作组。

1972年1月,长影厂向上级部门打报告,申请恢复拍摄故事影片。三个月后,报告被批准。苏云将《艳阳天》的拍摄计划提到议事日程,确定了导演、摄影和演员,并于1972年5月开机,当年11月完成摄像和录音的双片。

但很遗憾,这次拍摄在长影厂审片时没有通过。其中两个问题比较明显。一个是剧本的改编并没有一个再创作的过程,只是将原小说中的情节、人物进行照搬和缩写。这并不符合电影语言。结果导致主要人物的性格不突出,影片的结构很松散,好像什么都想说,但什么也没说明白,让人看后总觉得一头雾水。另一个就是演员的选择问题。据说吉林省主抓文艺的革委会副主任药天禄在审查影片后,认为男主角年龄偏大,要求重拍。

这次《艳阳天》男主角萧长春的扮演者庞学勤,是大家非常熟悉和喜爱的电影演员,曾在《古刹钟声》、《战火中的青春》、《甲午风云》、《独立大队》、《兵临城下》等众多影片中出演,很受观众的欢迎。在1966年组织的《艳阳天》拍摄组里,就是由他演男一号。但是到了1972年,庞学勤已经40多岁了,再扮演年轻的萧长春就显得年龄偏大

了。所以,当影片拍摄出来后,庞学勤扮演的萧长春没有得到大家的认可。

再加上一些其他的问题,于是长影厂决定,《艳阳天》重新拍摄。

1973 年 1 月 1 日,元旦,中央召开了电影戏剧音乐工作者座谈会,指出电影戏剧音乐方面存在的问题,主要是数量太少。周恩来说:

“不只是故事片,还有科教片。但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后的要求来说,太少了,这是我们的大缺陷。青年人喜欢新的东西,我们要拿革命的新东西给他们。总结七年来这方面的工作,还是薄弱的,文化组要把电影工作大抓一下。”

江青插话说:“不是七年,是解放以来,二十几年电影的成绩很少,放毒很多,取得经验太少,很糟。”

周恩来:“教学片也要搞一点,推动教育革命。文化组要把一些项目接过去,出版、图博你们还得接受呀,要拖到 75 年吗? 一年接一点嘛。要迎头赶上。进口以后再学嘛。群众提意见,说电影太少,这是对的。这是我们的大缺陷。”

有人提出:“1966 年至 1972 年 7 年内没有拍摄一部故事片,希望 3 年内填补空白。”

周恩来:“你们有什么要求,通过文化组提出,中央批准,党和国家就帮助。”

李先念说:“电影工业会议正在开,我听了一次汇报,有了几期简报。保定厂的生产形势还好,质量不稳定,还有些问题,比以前听到的消息好些。”

张春桥插话说:“不一定。我了解了一下,好多单位一块搞,比较复杂,电影工业包括化工等等,好多单位现在没有人统一管。邱会作插了手,破坏得相当厉害。单打一,把这门搞得水平很高,很困难。”

李先念:“其它上不去,它也上不去。”

叶剑英:“我们不要延续人家的东西,要创新。现在供不应求,要质量,也要数量。我们的片子不够,就要增加生产。”

他问八一电影厂的负责人:“你们是八一厂的吧,要配合军队搞一些教学片,什么地道战、地雷战、打坦克的、防原子的。”

江青说:“我抛砖引玉,你们思考。我应作自我批评,整了你们多

少年了。批评也可以说是爱护。每一次批得时候多,批得有的人混身疼。我可能有说过的,说错的,请同志们原谅,当然也要指出:批评对的,你们就要照着做。我还有一点要自我批评的,就是很久不见你们了,当然我也可以推卸,很忙,可是总理比我忙得多。我好久不见你们,该作自我批评。

我觉得电影工业是很重要的,是综合的工业,应该很好抓上去。电影在我国有很大的发展前途。因为我们的电视不发展。资本主义国家,修字号国家电视很多。电影才有50年的历史,有的国家已经开始衰亡了。美国的好莱坞已经成了游览的地方。我们上山下乡的十六毫米影片还很少,八·七五还没过关,彩色印染法还没有过关。我们黑白底片原来过关了,但遭到了破坏。我们应该攻坚。今年如果印染法能够拿下来,就可以大批生产出口,就很了不起。你们现在用的胶片,是伊斯曼,是先进的,这几个样板戏,光、色、构图有缺点错误的话,同志们要负责。当然我也有责任,批你们批得不够。有几个厂分散在各地。我不可能到各厂去,大家聚拢来谈一谈,我抓了一下北京的。我还抓了电视,用电视促你们的。我是不看电视的,偶尔看了一次,还不错。电视我是批过的,后来上去了,我们又表扬了他们一下。我就请了些同志看电视,看了不少次。为什么《智取威虎山》影片那么久出不来?那么为难,拍不出来。学费交得太多了。

当然总的说,64年会演以来,工农兵在我们国家是占领了舞台、银幕,把帝王将相、才子佳人赶下去了。但是太少了,同志们有责任,我们也有责任。有几个现成的,因为没有精力抓,也走了弯路。

你们批林整风学习也不够,批林整风要掌握武器,你们第一是受刘少奇的毒害,接着又是林彪。他们可不得了,要整死人的,为了一个八一厂,今天欢迎我们了,明天又赶我们走,叫演员吃冷饭,把嗓子都搞坏了。查查军委办事组的材料有一口袋。这几条汉子真可恶啊!现成的不给用。棚也不借给,搞得我们只好借地方。搞得我们好苦噢。我要问一下北影的新建厂建成了没有?”

答:“主要工程都完了。”

江青:“在我们这条战线上斗争是很激烈的,要揭要批。他们要破坏一个戏,使用种种手段。69年冬天他们千方百计整我们,我被他们

整得什么也吃不下去,突然耳朵都聋了。差点把我整疯了。没有被他们整疯就了不起。十次路线斗争很尖锐,在毛主席、党中央领导下,取得这成绩,还能站住,还能前进,这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胜利。73 年怎么上阵呢?首先是洗脸、洗澡。洗脸洗澡的先决条件是剥画皮,批判揭发林彪反党集团在各条战线上的罪行。我建议你们不要散,用一个星期到十天,首先是批林,其次是整风,不要搞倒了,先不要联系自己。

你们是有成绩的,不要翘尾巴。才作了一点成绩,人民给我们的荣誉太高了,不要把尾巴翘上天。要兢兢业业、勤勤恳恳、小心谨慎地为人民服务,要深入到工农兵当中去,真正向工农兵学习。还要鼓鼓气,大有潜力,我们已经走出一条路了,要继续干。现在我们的党和人民支持我们嘛,就靠我们干。怎么干?要揭林、批林,然后每一个戏,每一个团搞一点总结。"

接着,张春桥说:"73 年的第一天,政治局的头一个会,就是讨论电影。从接见到交流,这说明我们党根据毛主席一贯的教导,对上层建筑其中包括文艺是很重视的。你看大年初一就开这么个会,用不着多说,这个行动本身就很说明问题。"

张春桥回顾了建国以来文艺战线斗争后说:"问题是我们现在的队伍还不那么大,正在滚雪球。刚才叶帅说过去有几万人,过去不是有几万,是有几十万。现在有些人还在下边,下乡下厂,和工农结合,将来他们还是能搞出一些东西来。"

他说:"过去一提就是洋人,什么斯坦尼体系。连梅兰芳还写了几本书。资产阶级还是总结了一些经验的。所谓体系,就是他们经验的总结。但是他们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跟我们是根本不同的。所以不能照搬,照搬就会犯错误。"

"有的厂不在北京,回去也要向省委汇报,告诉他们七三年元旦中央政治局开了这样一个会,希望各省委、自治区党委也要重视。有的也重视,但不经常,不知道怎么抓。抓也不一定抓得很对。他们也要好好总结领导的经验。"

最后,姚文元也讲了话。

1973 年 1 月 4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讨论山东省批林整

风运动的问题。

1月5日,杨得志等22人给中央上报《关于深入开展批林整风运动的请示报告》,说道:“遵照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我们从去年11月17日起分批来到北京。”

在谈到山东批林批孔的情况时,《报告》说:

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同以林彪为头子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斗争,在我省表现得十分尖锐。林彪反党集团的黑手伸向了山东。他们在《“571工程”纪要》反革命政变纲领中,把“济南”列为“借用力量”。林彪死党吴法宪、李作鹏、江腾蛟、王飞、程洪珍以及林彪操纵的反革命别动队小“联合舰队”的其他一些骨干分子,先后窜来我省,与易耀彩(北海舰队原政委)、辛国治(北海舰队原副政委)、吴宗先(济南军区空军原司令员)、包玉清(十三航校原副校长)等,秘密勾结,互相串连,大搞反革命阴谋活动。他们大量秘密印发法西斯分子林立果的反革命“讲用报告”,林彪死党李作鹏还窜到青岛等地作反革命讲演,恶毒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大造反革命舆论。他们积极建立秘密的反革命组织,发展反革命势力,进行所谓“路线交底”,组织“左派骨干’”,成立“战备机组”,收集情报,安设反革命黑据点、联络点,极力为反革命政变做准备。

《报告》还说:

省委、济南军区党委的主要负责同志,在第十次路线斗争中犯有严重错误,他们在九届二中全会上,站错了立场,支持了华北组反革命简报,而且迟迟不觉悟,对自己的错误和第十次路线斗争在山东存在的一些问题捂了盖子。省委、军区党委对批林整风运动的领导也是有错误的。

接着在《报告》中列举了错误的各种表现,并表示决心改正错误,要认真接受经验教训,汇报了下一步的工作意见。

1月5日,周恩来约霍士廉谈陕西问题。

6日,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继续讨论山东问题。会议商定,王洪文赴浙江说服浙江省委主要领导,要看运动主流,不要纠缠于历史旧帐,助长派性,放松批林整风的深入。第二天,周恩来将政治局商定的意见报告毛泽东。

1月7日,中央下发山东省来京参加汇报会议24人的《关于深入开展批林整风运动的请示报告》,中发[1973]4号文件。

1月8日,江青请山东省委5位常委到钓鱼台她那里做客,大家一起打扑克。临走时送给大家两样礼物:一是1935年毛泽东在延安的大幅照片,二是送给杨得志几个辣椒。

1月9日,在毛泽东处举行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浙江及其他省、自治区批林整风运动情况。

# 第1263回：王良恩，中办开会被追查 继续谈，文艺工作者会议

随着中央办公厅批林整风运动的发展，办公厅副主任王良恩与林彪集团的一些问题被提了出来。1973年1月3日至8日，中央办公厅相继开了4天临时党委扩大会，主要围绕王良恩与庐山会议《六号简报》的问题、与林彪集团的关系及在中办工作中的错误进行批评和进一步的揭发。

在1月3日的会议上，主持人汪东兴首先对中办的揭批运动做了一番布置。他说："批林整风，各单位重新学习了。临时党委批林整风还要继续进行。这次又发现良恩同志犯了错误，做了两次检查，也是路线方向错误。对良恩同志还是按毛主席指示，犯了错误就改正。中央指示：办公厅就是批林结合实际，因此在我们这里就是批林整风，主要是批林。要反复读毛主席在外地巡视等讲话。"

他针对中央办公厅内部的情况说："林贼的流毒在我们办公厅有，如中警团战士中毒很深。阶级斗争不仅可以反映到我们队伍内部，也可以反映到我们在座的同志中。想开几次会，主要是对良恩同志进行批评，也可以联系到我们单位，如警卫处，还有秘书处等单位个别人的问题，也要开点会进行一下帮助。要成立一个运动的简报组。"

汪东兴说完，王良恩紧接着做检讨。他说："我列席参加了九届二中全会，九届二中全会后，我在批陈整风汇报会时做过一些检讨。"

王良恩将自己的错误归纳为五点：

"一、没有识破林彪、陈伯达的阴谋，听信了他们的谣言诡辩。听说有人反对毛主席，就跟着表态，支持设国家主席，毛主席当国家主席，支持林彪当副主席，但当时表明了最后要听毛主席的。

二、陈、李（李雪峰）反革命六号简报，毛主席及时察觉了，纠正了会议的方向。我是负责会议简报工作的。因会议不长，我建议出综合简报。总理、东兴决定分组出简报。

反革命六号简报如何出笼的？当时我参加东北组会议，晚11时到秘书组，我看了简报。当时就听到有些组气氛较紧张，特别是中南组，叶群还发了言，引了语录。处理时应该谨慎，有汪东兴、陈伯达的发言，没有送审。为反革命六号简报的印发开了绿灯，是阶级觉悟低的表现。

三、九届二中全会时，政治局常委带什么人由他们自己定，陈伯达带了政治研究室的某某某等人。29日陈秘书打了个电话说某某某他们没有事了，要先走。我就同意他们下了山。

四、我的两个小孩子当兵的事。叶群有一次突然来了个电话，问我有什么困难，我说没有。她说有小孩当兵的没有，我说有几个。她说可以放到部队锻炼。

五、12月6日，我看到几个同志给毛主席写的批林彪的信，不知怎么弄到林彪那里去了。看后进行了查问。总理曾问我给他们转过信没有，我总觉得这是个事。

在这件事的处理上存在两个问题，第一不应该看批件；第二不应该查问洪雪竹同志。我们没有给林转过信。我对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过去不认识，就是调到中央后，工作上有些接触，但没有私人关系。”

王良恩之所以提到时任中办秘书的洪雪竹，是因为许世友3人的信是庐山会议时华东组会议秘书洪雪竹转送的。所以，江青提出要彻查这3封信后，洪雪竹成为被调查的第一人。

王良恩继续检讨说：“犯了这些严重错误，没有向中央写检讨，路线觉悟低，盲目地相信他们（指林彪、陈伯达）。没有很好地学习马列、毛主席著作，分不清真假马列主义，因此上当……”

汪东兴显然对王良恩的检讨不大满意，随即接过话头说：“良恩同志说的这五个问题，都是我讲话时提出来的。”于是，汪东兴又点了几个具体问题：

“第一个问题，庐山只有5个旁听，王良恩同志编到东北组，做了发言。25日下午你的发言基调是拥护林彪的。周总理没有听到你发言，所以说你没有发言，我说你是发了言的。良恩同志在庐山这个发言是错误的，但老是躲躲闪闪的。你的发言某某是看了的，可当时良

恩同志的思想一直没有带起来。

关于简报,先说看过几页,后来听说是反革命的,就说没有看过。发简报前没有向我说,连个电话也没有打。发简报的人,关键是王良恩同志,而你却一不承认看过简报,第二说是12点后,已经睡觉了。现在你承认了看过,为什么不请示,为什么不打清样,为什么送得这么快?5点还打电话催过有关的同志,叫快印发,为什么唯独这份简报送这么快?据说有人给你打过电话,这个问题良恩同志要交代。

第二个问题,陈伯达带人上山你批准,要下山你不报组织就批准他们下山。

第三个问题,你的孩子当兵,我们许多同志的孩子也当兵,都检讨过,可你连句话都没有。你是嫡系,叶群直接给你打电话。

第四个问题,没有批给你看的文件,你为什么看,你对山东表态的材料怎么那样敏感?没有让你谈话,你为什么找某某某同志谈?为什么压了那么长时间?根据现在的材料,某某某带回来的材料就是交给你的。安徽的信就是你转到林彪家的。信封上都写着汪东兴转毛主席,可是我根本就没有看到。某某某交给你后,你交给谁了?

简报先说没有看,没有看为什么发了?今天我们当着面讲清楚,知情的同志可以想想。但还是治病救人。”

汪东兴的发言最后还谈到一些王良恩在中办工作上的问题,例如专案组有些材料没有给汪东兴看,有些材料不应该王良恩看的王良恩却看了等。

接着,与汪东兴提到的几个问题有关的参与、知情人员对王良恩进行了揭发,说王良恩曾吹嘘“调我到中央来,我的档案是林彪看过的”;还说王良恩在批林整风汇报会时,对江青流露不满,等等。

1月4日的会议由张耀祠主持。他在开场白中要求王良恩对几个问题要做认真交代:一是《六号简报》印发的过程;二是从北戴河林彪住所清理出的几封信,若按正常程序,这些信是要经汪东兴往上转的,但汪东兴并没有转,不知怎么“弄到林贼那里去了”。

这一天有关人员揭发出来的问题主要有:

将自己摆在不适当位置,有事不请示汪东兴,实质上是想将办公厅的权抓到自己手里。没有批由王办的事,王为什么经手,应视为抓

权。庐山批陈之后,安排陈伯达的人走,不请示汪东兴,明明是自己批准走的,有记录在案,后又查问是谁批的。

安徽小组在九届二中全会上表态的信,信上有王良恩的笔迹。

周总理批示送毛主席及其他常委同志的材料,为什么不送毛主席。

王良恩看不应该他看的文件。有一次看了二十几份文件,送回来时轻描淡写地说我翻了翻。1972 年 12 月 6 日偷看文件,那天 8 点 30 王良恩到办公室,本不属于王办的文件,王转到大桌子跟前,看到山东问题的文件,有参加会议名单,有问题内容。王看到文件后为什么会这样敏感,连续 3 天来查问题什么意思?

三次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录音,是如何转到林贼那里的?

再次提到 1970 年 8 月 25 日凌晨打电话催印六号简报的问题。王良恩给一位干部打电话指示:“快印快发。”那位干部当时向王讲了印刷厂的情况,王说你抓一下,将工厂改进一下。关于快印快发的催促,是什么人交代的?

到了 1 月 5 日的会议上,揭发批判的口气升级了,而且有不少上纲上线的言辞。例如“王良恩是给林贼搞情报的”,“死抱着林贼已经沉没的破船上的一块木板不放”等。

华北组《六号简报》,毛泽东曾称之为“反革命的简报”,上面有汪东兴支持陈伯达的发言,毛泽东因此批评了汪东兴。汪东兴也为此做了几次检讨。但他始终说:这个《六号简报》登了他的发言,却没有在印发前经他本人看,而且把一些不是他说的话,安在了他的头上。

庐山会议期间的简报印发工作的具体负责人是王良恩。但王良恩还有一个直接上级,即汪东兴。

在反映《六号简报》印发流程登记上,有组长李雪峰,副组长解学恭、吴德的签名,也有王良恩履行的手续。

又过了两天,以王良恩问题为中心议题的中办批林整风会议,在人民大会堂继续举行。如果说此前的会议还是以揭发问题为主的话,从这天开始,基本上就转成批判会了,对前几天揭出来的事情刨根问底,追究其“险恶用心”。

1 月 8 日的会议上,曾担任康生秘书的央办副主任李鑫发言时说:

“庐山会议,我们是去搞宪法的,林贼挑起的问题是从宪法问题上开始的。上山后我分到东北组。22 日传达了主席在常委会上的讲话,23 日就开会,24 日就发生了事情,25 日发出了简报。这中间某某变化很大,他两天没有回来(指搞宪法问题的小组成员),邱会作发言某某参加了整理。8 月 13 日王良恩同志问过宪法起草小组情况。某某在庐山的动向根子在王良恩同志那里。某某不回去就在王良恩同志处,在做什么呢?”

李鑫还说:“王良恩同志在专案组工作,对自己位置摆得不适当,那些文件他说发就发,他说不发就不发。还有电台问题,抄送林彪给周宇驰的信等,对中央同志很不尊重,很不光明正大,邀功诿过。”“关于到北戴河清理林彪住所查出的四封信,9 月以前,参加清查具体工作的人都没有看到过,但王良恩同志在此前就看过了。”

汪东兴做了当天会议的总结,他指出林彪集团对中办确实是插了手的,他点了几个人的名字,其中就有李鑫提到的某某,但没有把王良恩算在这些人里面。

1 月 9 日,江青在中办《批林整风简报》上批示:“王良恩危害党中央毛主席!”

当天,中央专案组全体人员和一、二、三办负责人,包括郭玉峰、吴忠、李震、于桑、吴德等人接到赴人民大会堂参加中央办公厅临时党委扩大会议的通知。

江青在会上说:“我要控诉,王良恩迫害我!”

原来,中央专案组从毛家湾查出了一封王力、关锋等人起草的关于“揪军内一小撮”社论清样上附的一封信:

“林总:江青同志嘱速送你批示,以便尽快发表!”

这篇社论后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这封信被发现后,做具体工作的两人同样送给了负责专案组的王良恩。王良恩看到后,即将这些材料转给周恩来,后存“五一六专案组”。江青应该是因此认为王良恩是在搞她的“黑材料”。

江青一直讲到会议结束,也没让王良恩分辨。最后,她说:“王良恩是野心家、阴谋家、大反革命、定时炸弹! 你们……”她用手指向中央专案组全体人员,“你们必须在 3 天之内写出揭发王良恩的材料!”

《揭发王良恩反革命罪行》的材料很快整理出来了。

1月14日,中央继续召开文艺工作者会议。周恩来在会上说:“现在开计划会议,计划会议给电影工业要加劲。进点口,作参考,但自力更生为主。进点口作参考,这才能超过。但不要寄希望于进口,要自力更生。上海、北京电影工业要协作,参考外国的东西,以便超过,一年不行,三年嘛,到1975年超过嘛。”

李先念说:“电影工业很复杂,是综合性的,是个重要部门。现在开了会,希望同志们搞上去,要有个志气,要迎头赶上。卫星都上天了,三座大山都打倒了。钢都超过两千万吨,主席讲了,我们还不是搞上去了。这个我们为什么上不去?现在好一些了。我们要很好做工作,还有派性。”

江青讲话,希望电影工业上,要“迎头赶上,不做爬行的奴隶。”她说:“这是用艺术手段宣传毛泽东思想,不然就是强加于人。用艺术手段宣传毛泽东思想,干巴巴地老是万岁万岁,人家最讨厌。”

张春桥说:“电影工业不仅是电影工业问题。”“轻工业部门有多少万种,头发夹子、钮扣、牙刷,这些东西也要搞,搞不好,群众也不满意。也应该重视,不过这些还有人抓。比较起来电影机、照相机更重要一些,也要有人抓。”“群众是关心工业发展的。要依靠群众,依靠革命技术人员,在党领导下是能够促上去的,是可以突破的。”

姚文元在讲话时说:“昨晚看了《海港》部分样片,召集这个会很及时。江青同志已讲了详细的意见。第一就是要把《海港》拍好,第二要促进整个电影工业的发展,也要把其他电影拍好。”

他说:“江青同志还是鼓励你们的。《龙江颂》是肯定的嘛,《奇袭白虎团》也表扬了嘛,就是今天《海港》有几个镜头江青同志也肯定了。希望你们搞好。”

1月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讨论同意陕西省委负责人来京汇报批林整风运动情况。

第二天,周恩来向毛泽东报告了政治局会议情况,经毛泽东同意,政治局拟于20日听取陕西来京负责人汇报。

1月24日,中央下发中发[1973]8号文件:《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室中央军委办公厅关于严防坏人进行诈骗活动的通知》。《通知》

指出：

“根据有关部门反映，最近一个时期，各地不断发生诈骗案件。有的私刻公章，伪造函件，冒充党、政、军干部或高干子弟，到处招摇撞骗；有的伪造中央文件，蒙骗群众，煽动一些人上访闹事；甚至有的模仿中央领导同志的声音、笔迹，冒充中央领导同志的秘书，用打电话、造假信、说假话等手法，进行诈骗活动。”

《通知》“严禁私自翻印、传抄中央文件。如发现伪造、传抄文件，要一面追查，一面上报。”

1 月 24 日，江青在国务院文化组成员于会泳的一封检讨信上批示：“戏、电影少了不能怪会泳同志一个人，而且少也是相对的。（国务院文化组里）正气不得伸张，原因是未抓紧批林。”

第二天，张春桥在于会泳的这封检讨信上批示：“同意江青同志的意见。文化组应当集中研究一下，把应当揭开的问题揭开，否则，拖下去，很不利。”

26 日，周恩来在于会泳的检讨信上批示：“告吴德，领导文化组（可扩大一些有关同志参加）集中研究和讨论一下，伸张正气，首先批林，激发出新的革命干劲。”

# 第1264回：谁曾想，王良恩悬梁自尽 注三国，三上将写信检讨

我们再说中办副主任王良恩，他先后写了4次检查，都过不了关。在最后一次批判会前，他又写了一篇检查。可是当他来到会场后，却发现气氛不对。一开始就有人要求发言，说有新材料要揭发。

“你曾给我们讲：江青同志作风霸道，经常干扰中央工作。江青同志是文化大革命的旗手，你说这话是何居心？你还讲：张春桥和姚文元同志是‘秀才造反，三年不成’，你这是恶毒攻击中央领导！”

这话引出许多人附合，他们纷纷揭发王良恩还恶毒攻击康生、毛远新等人。

“说！”

“你说！”

“你这是不是恶毒攻击党和国家领导人，反对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司令部。你是不是同林彪、陈伯达一伙狼狈为奸，篡党夺权，企图把中办改变成为实施林彪反革命阴谋的中央办公厅！”

王良恩的第5次检查仍过不了关。1973年1月26日上午11时55分，中央办公厅政治部接到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王良恩妻子王英的电话，说王良恩在家中卫生间内上吊自杀。中办政治部立即赶到现场，对王良恩进行人工呼吸。12时05分，张耀祠接到中办政治部的报告，与305医院的医务人员先后于12时15分和12时20分赶到现场。经医务人员积极的抢救，终因自缢时间过长，心脏停搏，抢救无效。随后，公安部派法医到达现场进行鉴定，经医生的检查和法医的鉴定，确认王良恩为自缢身死。

下午13时40分，汪东兴看了现场，并同王英谈了话，问了情况，讲了党的政策。在谈话中，王英说：“王良恩自己感到问题严重，前几天他曾说过，庐山会议后已经两年多了，自己犯了错误，没有作检讨。”“1月22日晚8时，组织上打电话找王良恩谈话前，他临走时对我说，如

果我坐牢了,他们来清文件时,你把这个钥匙交给他们,你们可搬到东厢房去住……”

在检查现场时,从王良恩上衣口袋的小本子里,发现留有向党申明的一页纸,承认他在党的第十次路线斗争中,犯有严重的方向、路线错误,对党、对人民犯了罪,否认与林彪反党集团有串通。在他办公桌抽屉里,还发现写给家属王英同志类同上述内容的一封信。

汪东兴、张耀祠当天写成报告,即送报周恩来。周恩来在这份报告上作了批示:“印送主席、政治局有关同志。”这份报告附有三个附件,其中附件一是王良恩的遗书,共有两份,一份是通过汪东兴、张耀祠给毛主席、党中央的:

东兴、耀祠同志并报毛主席、党中央:

我负责地向党申明,九届二中全会我是犯了严重方向路线错误,对党对人民有罪。但属于受骗上当范围,绝没有和他们死党有串通。

王良恩　一月二十六日

一份是王良恩写给妻子王英的,写在了一张纸的两面:

王英同志:

在党的第十次路线斗争中,我犯了严重方向路线错误,对党对人民是犯罪的。但与林彪死党绝无串通,请教育孩子们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革命到底。

王良恩　一月二十六日(正面)

有实际困难,可找政治部转请东兴、耀祠同志帮助解决,我相信他们是会按党的政策办事的。(背面)

1 月 29 日,中办召开临时党委扩大会议,讨论王良恩自杀问题。当办公厅领导称王良恩的自杀是“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时,马上有人在会上提出:“王良恩在庐山上的阴谋活动是死跟林彪的。没有问题为什么自杀呢?我们中办扩大会议开了六次,一次集体谈话,都是对他进行帮助。自杀充分证明他是林彪一伙的,这个人至死不回头。”

于是,有人代表王良恩所在的支部提出:“政治部支部同意清除王良恩出党。”

公安部部长李震也在会上讲了话,他说:“王良恩在第十次路线斗争中犯了严重方向路线错误,中央对他等待了两年之久,他一直捂盖

子。”“上了贼船,抱得很紧,就不下来,最后殉葬。”他的话越说越重:“他自杀是向党示威……他自杀灭口,是怕暴露他的同党,这是恶毒的,也是妄想的。”

这天的会议上,做出了立即向中办各单位传达王良恩自杀一事,并做好善后工作的决定。要求注意动向,注意安全。从那以后,中办下面的各个部门,包括在江西的中办五七干校,都开展了对王良恩的揭发批判,中办还出了专门的简报,这些简报按惯例都送给了中央领导。

王良恩死后,家被抄,家属被扫地出门。

王良恩是1966年8月从南京军区政治部副主任的职务上调任中央办公厅政治部主任,这是毛泽东的意思。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从各大军区选调一批德才兼备,又无政治背景的军级干部充实中央要害部门,其中就有中组部部长郭玉峰、公安部部长李震、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王良恩、杨德中等人。

当时中央办公厅主任是汪东兴,副主任是张耀祠,主要为毛泽东服务。从部队调来的王良恩和杨德中负责周恩来交办的事情。

1969年4月,王良恩任中共九大主席团副秘书长,负责会务和文件。

1969年11月15日,王良恩被任命为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兼政治部主任。

1970年8月,九届二中全会,王良恩负责大会秘书处。之后成立陈伯达专案组,王良恩出任组长。

王良恩的自杀,让时任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的谢静宜十分惊讶,她曾问毛泽东:“王良恩同志是从南京调来的,他很好啊,待人和气,接触中感到他没架子,很诚恳,为什么突然自杀了呢?中央办公厅怎么也这样复杂呢?吊死两个副主任了。”

她说“两个副主任”是指1966年自杀的田家英,连同王良恩,俩人都是副主任。

毛泽东听了谢静宜的话,抬起头来看看她,点点头,苦笑了一下,没说什么。

谢静宜又问:“主席,他们有什么问题,真的那么严重吗?”

毛泽东这时严肃地说:“我看不一定。至今我也不清楚有什么了不得的事。若干年后也许能搞清楚,也许还不一定。田家英是我的秘书,他为我做了很多工作,他爱学习,是个有才干的人啊!”

1966 年田家英自杀后,谢静宜也曾在毛泽东处谈及过此事。她说:“主席,因为我曾向田家英借过书,遵照您的指示向他求教过,田自杀后,他们还曾让我交代田家英为什么会借书给我读,与田有什么关系?”

毛泽东说:“田家英是我的秘书,他为我工作多年,经常到我这里来,关系不比你密切吗?是我让你去向他求教的,也是我让你去向他借书读的呀,接触一下就有问题了吗?岂有此理,没这个道理。”接着又说:“田家英究竟有什么问题,并没有搞清楚嘛。”

谢静宜说:“听别人说,田家英死之前,烧了您很多手稿,是真的吗?过去我去他家,向他请教学习之事时,多次看到他和大逢(逄先知)伏在桌上,非常细心地裱糊您过去的手稿,把原来很破旧的稿件裱糊得完好无损。裱糊的时候,我看他们是那样精心、爱惜啊,难道他会忍心再把它烧掉吗?”

毛泽东点点头,说:“我也不信,才别相信那些搞专案的人说的都是真的呢。”

谢静宜又说:“1961 年初,广州会议时,田家英在他住的房间里,边哭边给主席写一份他在安徽的调查报告。好像是一位农村妇女,丈夫死了,孩子才几岁,没劳力,她带着这个小孩下田种地,妈妈挖个坑,小娃娃在后面点个豆的情况。”

毛泽东马上说:“是的,我记得有这个报告,他是对的。但后来,他也有些改变。不过这也算不了什么呀,可以讨论吗,也不至于……”他没说下去,意思可能是也不至于去死呀!

中央办公厅死了人,许世友回到南京后也不写检讨。周恩来让许世友的老部下,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总政治部主任的李德生到南京去做许世友的工作。

李德生深知许世友的脾气,但这是经毛泽东同意的,无论如何得有个结果。所以,他想了个主意,让韩先楚和他一块去。名曰:“让他们两人一起回忆。”

许世友在家中接待了李德生和韩先楚。李德生知道劝许世友怎么办只会让他不高兴,他此行主要是帮两位老将分析情况,传达林彪事件后的中央动向。

果然,李德生的话让许世友思考良久。几天之后,他拿起红色电话机,要已到地方部队任职的秘书李文卿速回中山陵8号,他的家中。

李文卿一回来,许世友就大嗓门说道:“你帮我写个回忆材料,开始写毛主席派李、韩来南京,对我帮助教育很大;再写我过去没有同林秃子一起工作过,对他不了解。他当国防部长、主持军委日常工作后,和他是一般工作关系。庐山那封信,由我承担责任,就按以前讲的写。”

许世友下午就与韩先楚两人回忆了一遍庐山会议上写信的情况。最后,韩先楚说:“最多是上当受骗,我才不上纲上线呢!”

“对,最多上当受骗,不要上纲上线。”许世友同意,并嘱咐李文卿:“写两三千字就行了!”

许世友、韩先楚在南京合计写检讨。杨得志也在济南写。此事对杨得志而言,依然是照葫芦画瓢。

1973年2月1日,越南的党政领导访华。晚上,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接见他们,周恩来、张春桥、姬鹏飞在座。

谈到美国问题时,毛泽东说:“至于美国,中国有句古话,叫做‘百足之虫死而不僵’。那个时候,我们有些朋友不理解为什么我们要请尼克松到北京来。美国的困难大得很,别的地方紧张起来了,它一定要使东方有缓和的局面才能把主要的注意力放在它的国内,放在欧洲和地中海,他们到北京来的目的就是这个。他们天天讲平衡,而这个世界就是不平衡,天天讲从实力地位出发,实际上就是想跑嘛,其所以想跑,是因为这个地方实在吃亏了,再呆下去不好办,再就是别的地方紧张。”

谈到《巴黎协定》签订后的越南形势时,毛泽东说:“暂时休整一个时间很有必要,有些左派共产党就是不赞成啊,说最好你们再打下去,没有喘息的时间,这种话就是不好听,不好相信了。并不是不革命,哪有不革命的?停它半年、一年或者一年半就叫不革命?”

越南阮维祯说:“现在确实需要有一段休整时间,解决结束美国介

入的问题,然后再过来解决政治问题。”

毛泽东说:“对。只能是这样的方针,列宁从前就是这么做的,列宁那时候比你们弱得多,那时候有个人名叫托洛斯基,他反对同德国人妥协。列宁跟德国人订布列斯特合约,那时候苏维埃刚取得政权,也看到德国要垮了,美国整个垮还不是眼前的事,可是阮文绍垮,那是可靠的啊。一两年之后,或者什么时候,所谓一段时间,阮文绍要垮,我们将来还是多搞乡村和中小城市,让阮文绍把大城市占领了,让他被陷在那里,分散之,然后逐步吃那些大城市。”

1973 年 2 月 7 日,毛泽东通过姚文元要上海朱永嘉等人为他标点注释《三国志魏书》中的《张辽传》与《张郃传》。张辽原是丁原的部属,以后归属何进,董卓进京以后,他又归属于董卓,董卓被吕布杀了以后,他又以兵属吕布,跟了吕布到徐州。后来曹操打败吕布,他又带兵投奔曹操。从历史上讲,这个人太复杂,然而曹操还是用他了,相信他了。在曹操与袁绍对峙过程中,他屡立战功。以后与孙权作战,与蜀汉作战中,他也是战功赫赫。至于张郃,更是袁绍心腹的爱将,他是在官渡之战时,才背袁绍投奔曹操的,曹操把张郃的来归比之“韩信归汉”,此后他在魏蜀之间的战争立有大功。他是曹魏在关中与诸葛亮对阵主要的将领。毛泽东此时看这两篇传记是何心情呢?

这天,毛泽东还要上海标点注释《旧唐书李愬传》。李愬是唐宪宗时,打败蔡州藩镇吴元济的将领,他能够重用从吴元济那儿投降过来的将领,他相信和重用投诚过来的吴秀琳,他接纳吴元济手下的勇将李佑、李忠义,正是他们带兵夜袭蔡州,生擒吴元济。在这个过程中,李愬对敌营不杀一人,从而迅速平定了蔡州吴元济这个割据政权。

吴元济是淮西节度使,治所在蔡州(今河南省的汝南县)。唐代在边境地区设置节度使,本为加强边防的统一调度,故让边区将帅总揽辖境内诸州之军、民、财政,结果导致外重内轻,为安史之乱埋下了祸根。安史之乱以后,把节度使的制度推行于内地,称为方镇,地方的军、民、财政,由军队将领一把抓以后,时间久了,他就不听中央号令了。吴元济是淮西节度使吴少阳之子,唐宪宗元和九年九月,吴少阳去世,吴元济便自领军务,地方军政机构变成世袭了。是裴度与李愬成功地平息了蔡州的叛乱,唐王朝一度中兴。

# 第1265回：再赴京，湖南领导齐北上 下文件，只是为了卜占亚

冬尽春来，不觉三、四个月过去。湖南对卜占亚的揭发尽管不断加温，但对涉及“政变阴谋”的问题，卜占亚始终是死不认账。华国锋经过请示中央，决定进京解决。1973年2月4日，湖南省军区司令员杨大易、湖南省革委会副主任于明涛、万达3人一起通知卜占亚：准备第二天去北京，向中央汇报他的问题。省委和省军区几乎倾巢进京，除卜占亚外，计有：华国锋、杨大易、张立宪、万达、刘善福、赵广恩、罗秋月、赵处琪、唐忠富、刘春樵、程启文、孙正乾、徐芳春、陈新，共14人赴京，后期又加了张平化。

他们2月5日到达北京后，除华国锋在北京有家外，其他与会人员均住京西宾馆。卜占亚在到北京当天住的是套间。第二天，华国锋、杨大易、万达同卜占亚谈话。华国锋说：“你在湖南表现很不好，什么也没交代。你是王八吃秤砣——铁了心了。现在你来到毛主席身边，可不能再像过去那样执迷不悟，继续顽抗了。你现在交代还不算晚，还算主动坦白，可以请求毛主席对你宽大处理。想赖是赖不过去的，不承认也一样可以定案！你要好好考虑一下后果！”

还没等卜占亚表态，华国锋又说：“组织上关心爱护你，怕你一时思想不通，发生‘一念之差’，你就不要一个人住一个房了。现在就请你搬个家！”

卜占亚被搬到靠北面的一间三人房：最里面睡的是省军区副司令员徐芳春，外面是另一位副司令员孙正乾，卜占亚夹在中间。再一看：靠街窗子的把手都用粗铁丝牢牢地缠死，厕所的门把手也卸掉了。

到北京后的最初几天，大家反复做卜占亚的思想工作。但是，不管众人如何开导，却始终无法使卜占亚“豁然开朗”。

中央首长第一次接见安排在京西宾馆会议楼。卜占亚心中有些说不出来的苦涩：3年前，他正是在这里受到黄永胜等人的接见，受领

去湖南“支左”任务的,那时哪里想到3年后会以获罪之身又回到这里?

这次接见主要还是交代政策。参加接见的中央负责人有叶剑英、张春桥、李先念、李德生、汪东兴、华国锋等人。主讲是叶剑英。

叶剑英表情严肃地说:“卜占亚同志的问题本来在湖南就可以定案了,不需要到北京来。为什么又来了呢?就是要给卜占亚最后一个机会。毛主席、党中央要树立一个坦白从宽的典型,挽救那些在路线斗争中犯错误的人,对全党进行教育。希望你能彻底坦白交代,争取宽大处理。这是决定你政治命运的最后机会。希望你好好考虑,认真对待。”

话虽不多,力重千钧。

接见之后,华国锋又连续召开会议,给卜占亚打通思想,并积极准备向中央政治局汇报。

政治局汇报会仍在京西宾馆举行,到会的中央领导人仍是第一次接见时的阵容。省军区政委张立宪代表湖南省委和省军区,把经过整理的大小会议揭发的卜占亚几十条罪状逐一汇报,华国锋有时作些补充。听者都很认真,不时提问、插话。

卜占亚心乱如麻,不知所从,偷眼环视左右,但见与会者有的脸色严峻,宛若判官;有的大义凛然;也有的表情木然。他明白,此时此刻,是不会有人为他辩护的。就在他苦思冥想六神无主之时,张立宪已经汇报到他与李作鹏密谈问题。突然,张春桥从座位上站起来,大声问道:“卜占亚!这个问题你到底有没有?”

卜占亚一震,“承认,还是不承认?如果承认……如果不承认……”两种思想在他的脑子里飞快地转动……突然,一个“有”字从卜占亚口中发出,声音不大,却令全场震惊:这可是4个月来的与会人员一直想听到的呀!

张春桥不容卜占亚喘息,又追问一句:“你跟李作鹏都讲了些什么?

卜占亚稍作思考后说:“讲了‘三要三不要’,还讲了毛主席对付林彪集团的三种办法。”

李先念似乎有些不耐烦地说:“你讲痛快一点嘛!我问你:黄永胜

的问题,你讲了没有?”

“讲了。”

“卜占亚同志这次一定要竹筒倒豆子——一点不留,彻底讲清。”叶剑英给卜占亚鼓劲。

当张立宪汇报到刻薄叶剑英问题时,刚才还和颜悦色的叶剑英,脸色骤变。他伸手指着杨大易说:

“杨大易!你也算个老同志了。那年毛主席叫我到湖南搞点调查研究,我尽量不麻烦你们。我在湘潭钢铁厂搞调研时,住在湘潭宾馆。那天湘潭军分区司令员陪着你到湘潭宾馆,经过我楼下。分区司令员告诉你:叶帅住在楼上,要不要去看看?你把手一甩,说:‘不看!看他干啥,老机!’后来你们在楼下客厅里吃桃子,我都知道。你看我一下,我多不了什么;你不看我,我也少不了什么。我笑你水平如此之低!”

这段意外的插话,使会议气氛为之一变。杨大易满脸通红,很快沁出了汗珠,他结结巴巴地检讨:“我对不起叶帅,我向叶帅请罪……”。

他还想作解释,张春桥打断了他的话说:“我们今天主要解决卜占亚的问题,杨大易同志的问题以后再说!”

汇报继续进行。

当汇报到拒不接待张春桥问题时,张春桥又从座位上站起来,走到卜占亚的面前说:“你们诬蔑我反对军队,可是真正败坏军队形象的,恰恰是你们这些人!”

当汇报到“三专”问题时,张春桥再次走到卜占亚面前,厉声说道:

“中央对你是仁至义尽给出路的,对大家揭发你的问题、特别是‘三专’问题,只要你老实承认,我们就解放你。我们讲话是算数的!”

“是啊,春桥同志是代表毛主席的,他说话是算数的。这次你一定要竹筒倒豆子,一点不留,不要再有什么顾虑。”叶剑英也在一旁帮腔。

张春桥问卜占亚:“你说,你在长沙是什么时候得到林彪要南逃广州的通知的?”

“9 月 12 号 24 点。”卜占亚回答。当时,他正在汨罗。

“是谁打来的电话?”张春桥穷追不舍。

这可把卜占亚给难住了,北京适合打电话的人他一个也不认识。

“你注意听！我来给你提醒一下。”张春桥拿起一个小本子，念了黄永胜办公室几个秘书的名字。卜占亚摇了摇头，这些人他都不认识。

张春桥接着念军委办事组工作人员的名字。当念到宋城时，卜占亚小声说：“好像是宋城。”

宋城原是空军司令部办公室的处长，后调军委办事组，曾参加“批陈整风汇报会”做会务工作，负责中南大组简报，所以卜占亚对他有些印象。

“你肯定是宋城吗？”

“我记得是他。”

这可是宋城料想不到的飞来横祸！他在“913 事件”后已从办公室抓走关了起来。华国锋亲自到秦城监狱提审宋城，宋城当然不承认，结果为此事审了他两天两夜。

再回到会场。张春桥越问越细：“你用哪部电话接的？”

“用秘书屋里的电话接的。”

“谁叫你接的？”

“秘书回家了，是公务员叫我接的。”

“是保密电话吗？”

“不，就是普通电话。”

张春桥突然抬高了声音：“你不老实！这么重要的问题，他敢用普通电话？”

卜占亚说他也弄不清为啥这样。

这时李先念插话了：“这么重大的问题，我们不会光听你说的。你要老实交代。我们还要查问 39 局的。”

39 局是专司接转中央领导机关电话的内部电话局。

汇报会继续进行。既然要害问题都承认了，其他问题也就没必要再躲躲闪闪了，汇报中提到的问题，只要有人提问，卜占亚都一概承认。

临散会时，参加接见的中央领导对卜占亚的表现表示基本满意。张春桥说，如果卜占亚还有什么问题想个别谈谈，他们也愿意听。卜占亚表示，没有什么可讲的了。

散会后,杨大易等人撺掇卜占亚说:“哎呀,你这人真傻。中央首长愿意和你个别谈谈,这样的机会上哪里找去?你怎么能放弃呢?”

经杨大易等人这样一说,卜占亚忽然产生了一种想法:“如果中央领导单独接见,也许可以讲讲心里话。”

稍后,华国锋和杨大易等人又来到他房间。华国锋高兴地说:“这次进京,时间不长,你进步还挺快。原来我们还真担心你还像在湖南那样,王八吃秤砣——铁了心。不过,你交代的还不彻底,以后想起什么来还可以继续交代。”

“专案组就要起草我的结案材料了,要不要我参加?”卜占亚问。

“不必了,反正写好了还要给你看的。”华国锋说。

“春桥同志讲,中央领导同志还可以单独接见我一次,我希望能早点安排。”

“那你写个书面报告吧。”

卜占亚当即写了一个简短报告交给华国锋。华国锋又提醒他:“要给毛主席写个报告,谈谈自己对错误的认识和今后的决心。”

第二天,卜占亚写了一页多纸,交由华国锋转呈。

卜占亚希望中央领导单独接见的请求,很快得到落实。出席的中央领导只比前次少了李德生。人到齐后,叶剑英先问卜占亚是否是中央委员?卜占亚说不是。

“你为什么不是呢?”叶剑英略带神秘地说:“因为呀,林彪过去看不起你,所以你没当上中央委员。以后哪,他又看中了你,便把你安排到湖南了。”

“还有一件事,”又是叶剑英发问:“1969 年你们广州军区组建了 4 个陆军师,是怎么回事?”

卜占亚解释说,那是根据当时的战备形势需要,经毛泽东和中央军委批准成立的。他心想,你是军委副主席,会连这么大的事情都不知道?在叶剑英与卜占亚对答之际,张春桥一脸不快,听得很不耐烦。卜占亚看在眼里,感到事情不好,心情十分紧张。叶剑英不再提问了,他正想怎样开口把憋在肚子里的话讲出来,只见张春桥忽地从座位上站了起来,高声说:

“卜占亚!你今天的表现太让我们失望!你今天还不如昨天,你

这是倒退！我们今天到这里来，是想听听你还有什么新的交代，不是听你作诡辩的！我看你根本就没有诚意，照你这样解释，连以前承认的问题也可以推掉了！”

张春桥没求征求其他人意见，一挥手，喊了声：“散会！”头也不回的走了。

3 月初的一天，张立宪、于明涛、万达三人把一大本结案材料交给卜占亚，要他看过之后签字。这材料是以卜占亚个人名义写的一份检查报告，全部是由列席会议的几位“秀才”捉刀而成。卜占亚把材料拿在手里掂了掂，稍犹豫了一下，便对三人表示，他相信组织，材料不看了，现在就可以签字。他随即在材料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以后卜占亚对人说：“让我看纯属走过场，不要说大改不行，小改也通不过。何况这材料也不是修修改改的问题。所以，我根本不看，反倒比较主动。”

此时的卜占亚心里如同打倒了五味瓶，脑子一片空白。偏偏那位主要捉刀的秀才又来调侃他，笑嘻嘻地问道：“卜政委，这回你彻底放下了包袱，心里该痛快了吧？”

卜占亚一阵苦笑，比哭还难看。

在湖南整了 3 个多月，卜占亚死不承认的问题，到北京只用 20 多天便彻底解决了。1973 年 3 月 5 日在人民大会堂，政治局成员几乎全部到会，接见湖南的领导，周恩来亲自主持会议。他让叶剑英先讲。于是，叶剑英从林彪的罪行讲起，然后讲“批林整风”的伟大意义和已经取得的成绩，最后才讲到湖南卜占亚的问题。他说：

“卜占亚的罪恶很大。按照他的罪过，应该够枪毙了。但是，他认罪态度好，毛主席宽恕了他，还是给他出路。卜占亚同志，你应该幡然悔悟，重新做人，你年纪还不大嘛！”

卜占亚坐在后面最不引人注意的地方，低垂着头。细心的周恩来忽然发现卜占亚还戴着帽子，他站起来指了指卜占亚：“卜占亚同志，你把帽子脱掉，让大家看看你。今天来的有些同志还不认识你咧！”

卜占亚站起来脱下军帽，露出满头白发。

“哟！”周恩来有些惊讶：“你的头发怎么全白了呀？今年多大年纪了？”

“55 岁。”

“还是白得早了点。你恐怕老是戴着帽子,捂白了。”周恩来的话既风趣,又可作多种理解,不少人笑了。

周恩来当场宣布卜占亚另行分配工作。

3 月 6 日,经毛泽东审阅同意,中央以“中发 1973.12 号”文件转发华国锋、张平化、卜占亚等《湖南省关于深入开展批林整风运动的报告》。《报告》肯定了广州军区副政委兼湖南省军区第一政委卜占亚“在第十次路线斗争中的严重问题”。中央批语说:“希望你们充分认识这场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继续把批林整风这个头等大事抓紧抓好,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把粉碎林彪反党集团的斗争进行到底。为了加强湖南省的领导,中央决定调张平化同志任湖南省委书记、湖南省军区政治委员。”

1973 年 8 月,在总政招待所“熬”了近半年的卜占亚,终于被任命为兰州军区副政委。

后来 1976 年粉碎“四人帮”,卜占亚以为可以申述自己与林彪集团的问题了。没想到华国锋说,即使全国的案都翻了,卜占亚的案也休想翻!

1979 年初,卜占亚改任军区顾问。

1980 年 1 月,审判“两案”期间,卜占亚被免掉顾问,搬到军区大院外的一套团职房里去住。

后来在胡耀邦干预下,卜占亚的问题才得到解决。1982 年 12 月 7 日,根据中纪委批复,湖南省委[1982]第 63 号文件《关于卜占亚同志问题的复查处理情况的通知》,说“卜占亚同志在湖南工作期间有错误,但不是参与阴谋活动的问题”。经中央书记处批准,同意撤销中发[1973]第 12 号文件。

1983 年 8 月,卜占亚离休。

# 第1266回：武健华，奉命再进毛家湾 林立果，叶群卧室按窃听

1973年2月，中央林（彪）陈（伯达）反党集团专案组办公室的纪登奎、汪东兴提议，清查处理林彪在毛家湾的物品。此事，报经周恩来批准执行。汪东兴将这一任务再次交给8341部队副政委武健华。

这次主要是清查林彪和叶群在毛家湾的居所——毛家湾西院。那是一大片经过改修的精心设计，结构巧妙的新式平房，外墙都是灰色的，毫不引人注目。平房四周环绕着一条宽阔的回廊。林彪乘坐的大红旗防弹轿车，可以直接开到回廊里，在屋内上下车，既防风避雨，又有利于安全保卫。林彪出去转车，不能见风。就把毛家湾旁边的平安医院的地下一楼改装了，汽车从这边可以一直开到那边。

回廊环绕着一间一间的房间，所有房间的门窗，都开在回廊里，安全是绝对有保证的。这些窗户，均为双层，便于隔音和保持恒温，有的窗户上，还安装着防止外边用电子仪器窃听的铜丝网罩。房间里都是清一色的柚木地板，铺着暗红色的大地毯。之所以要造平房而不造楼房，一是因为居住者年龄大了，可以免去爬高之苦；二是为了保密、高墙里的平房外人无从窥探……

西院实际有4个会客厅。进了屋门，穿过回廊，便是第一个客厅。这个厅的面积不大，陈设也很朴素简单，就是几把软椅，旁边几只茶几，据说是专门用来接待一般来客的。客来了，小坐片刻，主人见面寒暄几句，不作深谈。有的时候，主人自己甚至并不见客，一切均由秘书代劳。

至于分量较重的人，则被直接请到里面的第二客厅。

第二个客厅面积很大，墙上挂着林彪手书的条幅："大海航行靠能手，干革命靠的是毛泽东思想。"大块地毯的四周，安放着一圈沙发，有单人的，有双人的，足足可以供一、二十个人围坐，这里就是林彪亲自接见来访客人的重要场所。

在客厅的一角,安放着一个硕大无比的军用地球仪,比之卓别林在影片《大独裁者》里面的那个地球仪,还要大得多。

大客厅的另一个角落,有一座三级平台的阶梯,每级可以站五、六个人,供林彪与来访者合影留念之用。

在两间客厅之后,有一个20来平方米的小会客室。室内的陈设十分平常,放着几把软椅子,没有桌子,窗户也都用窗帘遮得严严实实的。可是,室内的灯光却特别明亮,后壁的天花板两边墙角上,还特意安装了两盏小水银灯,灯光斜射下来,把整个房间照耀得如同白昼。后来才知道,这个特设的房间是叶群为子女挑选对象“相面”用的,工作人员将层层筛选后选中的“妃子”,“驸马”的候选人,带到这是来,由叶群暗中观察。

小会客室的后部隔着一堵墙,还有一个小房间,要从走廊里的另一扇小门进去。房里很暗,靠墙壁放着几只高凳子。跨上高凳,眼前正好有几扇玻璃小窗,就跟电影院放映室墙上的小窗差不多。从小窗望出去,下面那个被灯光照得通亮的小会客厅里的任何东西都可以看得一清二楚。当年,叶群叫人把选出来的“驸马”和“妃子”的候选人,带到外面的小会客室里,让他们随意地休息谈话,她自己并不和那些人照面,而是偷偷地从走廊上溜进后边的小房间,爬上高凳,从玻璃小窗里窥探那些青年人的相貌、身材、言谈、风度……因为外面的小会客室照明度很强,而后部的小房间里完全是黑漆漆的,所以,在会客室里谈话休息的男女青年,根本觉察不到有人正躲在暗处窥视他们,邱会作的妻子胡萍,就带过人到这儿来给叶群“相面”。

客厅的对面,有一个相当大的图书室,四周都是书橱。藏书的数量不少,内容也很丰富,有“二十四史”、《资治通鉴》等古籍,也有十八、十九世纪西方的现实主义经典文学作品。在图书室中央,有好几只卡片箱,装满了名人名言的摘录卡片。

在室内走廊的尽头处,有一座通往地下室的水泥扶梯,扶着一旁的栏杆往下走去,原来是个装饰得相当雅致的电影放映厅,是将原设计的防空洞改建成的。放映厅两边的墙上装饰着壁灯,前座是沙发,后座是软座,可以供20来人看电影。

从地下放映室走上来,拐一个弯,穿过门洞,走过甬道,豁然开朗,

呈现在眼前的是一座宽敞的室内游泳池,长25米,宽7米。

林彪怕水,连水声都怕听,为什么要建游泳池呢?原来,这座游泳池是吴法宪专门为叶群建造的,游泳池顶棚下的钢铁支架,也是吴法宪下令从空军调来的。叶群一年四季都要游泳,池水一直保持摄氏30度的恒温。游泳完毕,就在池旁的卧榻上休息,还叫专人来按摩。

林彪的住房有四间:一间做卧室,两间做会客室,还有一间专供林彪"晒太阳"。

林彪的卧室在整座大院的深处。房子不大,设施很简单,只是在房间的正中央,安放着一只六尺宽的大板床。林彪怕水,更怕听流水的声音,他听了流水声,肠子就要蠕动,跟着就拉稀。所以林彪房间旁厕所里的抽水马桶就被封起来了,而是在他睡的木板床的床板中央,挖了一个圆洞,洞下安放着便盆。林彪就蹲在床上大小便。

最令人称奇的是,在大床靠近林彪足部的一方,悬空竖起一块和板床同样宽度的大木板,和板床形成直角形,像是一堵照墙,同样用本色的白木板制成。原来是用来挡风的,后来却成了林彪的记事板,林彪自己用粉笔在上面写满了:

"吃鸡蛋会内热"、"吃芝麻可生黑发"、"喝茶叶会升高体温"、"地瓜吃多了膀胱出汗"……

这些"座右铭",有的是林彪从自己的厨师那里听来的,有的是他自己已的"生活实录",还有的是从医书里翻到的。

林彪或根据自身的"生活实录",或从医书上翻到的,或听身边工作人员日常讲到的,用毛笔写了许多字条,横七竖八,挂满卧室、书房等处。其中有:"笑一笑十年少,愁一愁白了头。""吃鸡蛋会内热,吃芝麻可生黑发,喝茶叶会升高体温,地瓜吃多了膀胱出汗……"

林彪的生活艰苦朴素,很不讲究。他睡的床下铺垫的是一床破棉絮网子,连个被套都没有。这床破棉絮,林彪走到哪儿就带到哪儿,到杭州,到北戴河,都要卷着带上。

在林彪卧室大板床的床头后面的墙上,挂着一帧装裱好了的条幅,是林彪用毛笔书写的八个大字:"天马行空,独来独往"。还有林彪写给叶群已经裱糊好了的条幅:"悠悠万事,唯此为大,克己复礼"。

屋角上有几个青磁大缸,装些字画条幅。卧室门口摆着一个屏

风,三合板钉的,水曲柳的板材。因为林彪有油漆过敏症,床和屏风都是白茬子,没有涂油漆。屏风上面写得满满的,乱七八糟。其中有两句:“吃了螃蟹脚心凉,吃了猪肝鼻子红。”还写着毛巾被是两度啊,毛毯是几度等等。

林彪战争时期受伤后,神经系统有问题,怕光怕风,对温度的要求达到了病态的程度。他穿的衣服,所有的口袋都是假的,都要给剪掉。剪掉口袋,是为了掌握好温度。一个毛巾被几度、一套军裤几度、一个毛毯几度,这都是有数的。一有口袋,就不好掌握了。

林彪的房间里有温度自动调节设备,必须保持恒温,要求在摄氏23度半。所以林彪所有的房间,卧室、办公室、楼道、窗台上,不远处就有一个温度计。各处都摆着温度计。

在房间靠窗的一隅,放着两只小沙发,上面安置着竹编的坐垫,因为林彪害怕出汗,坐在竹垫上可以透气,防止出汗。他每天要在沙发上坐上好几小时,活像老僧入定,或是昏昏欲睡,或是念念有词。

林彪室内既没有电视机,也不放收音机,只是在白木床板底下放着一只像樟木箱般的雕花箱子,只是略小一点。这是清朝宫廷里遗留下来的一架八音琴,现在成了林彪唯一的消遣品。打开箱盖,启动开关,连在齿上的轴心有一根根突出的小尖刺,当它徐缓转动的时候,便有规律地撩拨一根根钢丝,八音琴就会奏出古老而悠扬的乐音。林彪闭目静听、室内萦绕着一种神秘的气氛。

林彪喜欢八音琴,除卧室外,在会客室、书房等处都放有八音琴。武健华他们清点了一下,林彪、叶群从故宫博物院“借”来了大小造型不同的八音琴有8只。

在林彪书房中间,还放着一只大的蓝花瓷缸,里面摆满了一卷卷字画。移交前,工作人员把字画放到书房的长地毯上展开观赏。其中《清明上河图》的那些生动描绘,让人难忘。

因为他怕风,怕光,所以房间的窗户都紧闭着,还挂着厚厚的窗幔,室内的光线很暗。在他卧室的外边,有一间专门设计的晒太阳的房间,屋顶很高,上无片瓦,从顶上直到房前的窗子上,都安装着大块进口的石英玻璃,价格昂贵,能透过紫外线。逢到晴日,林彪的心情和身体都比较好的时候,他就到这儿来坐坐,晒晒太阳。

林彪的会客室,也就是办公室,里面有一个地球仪,一个单人沙发,对面是一个大沙发加两个小沙发。茶几上放着一部几乎翻烂的大药典,还有温度计、放大镜。其他什么也没有,没有任何办公设施,连办公桌也没有。林彪怕风,听文件要有一段距离,要秘书给他念,他就坐在对面沙发上听。

林彪喜欢吃杏仁茶,但不要杏仁,不要杏仁的味,只要冲的糊糊。吃时温度要控制在摄氏 80 度。炊事员做好杏仁茶后,就在碗上插着温度计,跑步给他端过去。

林彪的保健医生,几年都见不到林彪。林彪也不信任医生,他自己看药典给自己开药。他的药典,厚厚的两本,是上世纪 30 年代出的,让林彪翻得都快散架了。林彪在药典上到处批写,也有批写的时间,最早的 1936 年就有写的。

有一次,林彪给自己开了几味药,让医生给他开成药丸子。医生拿林彪的方子不敢擅自做主,得拿给叶群看。叶群一看,这里面有毒药,估计是有水银、汞这一类的东西。叶群就让医生给林彪偷换了,换成了维生素 C。制好了药,给林彪吃药。林彪很鬼,他只是把药含到了嘴里,没有吞下去。等卫生员走了,他吐出来一看是假的。按他的方子这个药应给是黑的,但这里面却是白的。林彪就拍桌子,大发雷霆,要警卫把卫生员抓起来。叶群也不敢承认是她指使的,给林彪打圆场。后来就稀里糊涂把卫生员打发走了。

林彪生活习惯非常怪,他身边的人,在背后都叫他怪物。

叶群房间有三间:一间做卧室,一间做会客室,还有一间做学习室。

叶群的卧室和林彪的卧室相距很远,隔了一个走廊。据叶群自己说,因为她希望室内温度要低一些,两间卧室太靠近了会影响林彪的室温,所以要拉开距离。

走进叶群的卧室,与林彪的卧室截然不同。林彪卧室简朴得不能再简朴了,而叶群卧室却非常奢华,简直难以言状。走进叶群的卧室,就好像走进了一个暴发户的储藏室。卧室左边靠墙是一长排红木制的玻璃橱柜,一层层,一格格、摆满了珍贵的文物古玩:有锈纹斑驳的青铜器皿、玲珑细薄的古瓷瓶壶、巧夺天工的象牙雕件、晶莹剔透的玛

瑙翡翠……在右边和中间的墙上,挂满了国画,仔细一看,几乎全都是张大千的画,有仕女,有山水……当然,文物的数量远远不止放在叶群卧室里的这一些,就在毛家湾林家大院的后进,有一条长廊,里面密密麻麻地陈放着“借”来的书画文物,总计起来,在毛家湾大院查抄出来的各种文物,总共有1000多件,当时价值就达数百万元,这些都是从故宫博物馆借来的。在这批国宝旁边,有一张文革初期以林彪“101”的代号开给故宫博物院的“借条”。

与这些古董极不协调的是叶群那张欧洲古典式的床,床架全部是用黄铜浇铸的,饰以金色的花卉图案,非常奇特。床上铺着松软而富有弹性的“席梦思”床垫,上面盖着当时还少有的电热毯。

床头墙上奶油色的镜框里,挂着一帧叶群的放大彩色照片,那是她到普陀山去游览时照的,穿了一身浅灰色的料子西服,头上戴着一顶同样颜色的鸭舌帽。像她平时的习惯一样,帽子总要推到头顶后,帽舌朝天,在帽檐底下故意露出一绺弯曲的前发,衬着她那张扁扁的脸庞,嘴角露出一丝微笑。

在大床的旁边,放着一张特制的餐桌。这张餐桌只有一条腿,像一架落地风扇的柱子一样,底部安装着有几个滑轮的支架,上部横里伸展出一块像报纸般大小的木板托盘,可以上下升降调节。这张餐桌是专供叶群进英国式早餐使用的,每天早上,睡够了懒觉的叶群醒来以后,并不起床,而是按电铃唤女服务员进去,侍候她漱洗完毕,就在床上像英国贵族夫人一样进早餐。服务员端着早餐进来,一盆盆,一碟碟地放在餐桌的木托盘上:鲜奶,烤面包、白脱油、火腿蛋、小牛肉,还有刚挤出的新鲜橙汁,搁在小盅上的水煮糖黄蛋……最后是冒着热气的咖啡、服务员把餐桌推到叶群的床边,伸展出来的木托盘正好对着靠在高枕头上的叶群。叶群,这个1935年就参加革命的老干部,依仗着林彪的权势和部队的特殊地位,文革的烈火不可能烧到她这里,此时的她,与当年那个投身“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的热血青年早已判若两人,在她的身上,已经连半点有信仰的共产党人的气味都没有了。

叶群大床的一边是一座英国式的壁炉,壁炉的目的就是装饰。壁炉的四周镶着精致的乌木雕花架,炉顶的搁板上放着一迭进口的画报,其中大都是半裸的女性照片,有一幅照片上,一个穿着三点式“比

基尼”泳装的金发女郎,娇嗔地斜躺在大海边的沙滩上,而她身上的泳装,实际上是几片极窄的网眼布条。在叶群卧室的衣柜里,就有和照片上的女郎穿着的网眼三角裤完全一样的泳装,是叶群看了照片以后,让人专门到香港去买来的。

更让人难以置信的是,在叶群床单下面居然还有一个人!是一个和真人同样大小的橡皮人,直挺挺地躺在那里。乍一显露,真是令人不寒而栗。再一细看,这具模特儿有着一副外国年轻男子的俊俏面容,光着身子,充气的躯体肌肉发达而富有弹性……

在检查叶群的文件柜时,发现了叶群在广州休养期间,黄永胜写给她的一首诗:

缠绵五周月,

亲手折几枝,

难是寒冬日,

黄叶热恋时。

这里的“黄叶”,应该指的就是黄永胜和叶群。这个“热恋”,自然是背着林彪进行的,但是,两人间的隐私和秘密,却被叶群的儿子林立果发现了。

叶群的卧床旁边,有一个床头柜,上面安放着一架红色的保密电话机。但她不知道的是,在叶群的卧室外边,一个隐蔽的屋角里,她儿子林立果从叶群的电话线上另外接了一根窃听线,一直通到他自己的房间里。

沿着这根偷装的线路,来到了林立果的房间。这个房间的陈设比较简单,房间里,放着两只四四方方的箱子叫做A箱和B箱,箱子的外壳上钉着“上海小组”的标志。打开A箱,里面是一部录音电话机,接上线头,就可以通话。万一林立果外出不在,“联合舰队”和“分舰队”的成员仍然可以直接打电话给他,重要内容都可以录在录音带上。B箱,是专门用来偷听偷录他人的电话的。林立果叫人偷偷地在叶群的保密电话机上安了一个窃听器,把线头接到自己的房间里,再接进B箱,就可以直接偷听、偷录叶群和别人的通话了。林立果秘密保存着几盘十分重要的录音带,已全被查出,其中就有黄永胜和叶群的调情录音。这是一次叶群生了小病以后,给黄水胜打的一个较长的电话录

音。录音一开始就可以听出叶群那故作娇态的声音：

“……我这几天病了，还发烧呐，心里可想你呢……”

“现在好一点没有？要多休息……“黄永胜用湖北口音关切地问。

“你也不来看看我……万一要有，如果弄掉的话，我希望你亲眼看我一次。”录音带里传出叶群的哭声。

“我一定来！一定来！你不要这样，这样我也难受。”黄永胜诚惶诚恐地问答。

“这几天在病中，我想了好多事情……我再就是怕你要追求生理上的满足闯出祸来。我跟你说，（我同）你这个生命（是）连在一起的，不管是政治生命和个人生命……”

“我懂的。我完全这样了解，完全请你放心。我一切都是很顺利的。”黄永胜赌咒发誓地回答。

“……我考虑到你今后，我们除了写一些诗，互相安慰以外，我觉得我们还应该读一点豪迈的东西。也说不定将来，你能在中国革命、世界革命的领域里，会起很大的作用。”

“在这个方面，我要向你学习。”黄永胜说。

“我愿意永远做你的助手，做你的秘书，而且我决不强加于你。我一定在你的领导下，以你的意志为意志。”叶群接着又说：

“我们都有孩子。我的孩子就是你的孩子，你的孩子也就是我的孩子。要考虑，每个孩子往哪方面培养。另外，连我的加到一块儿，至少有5个吧，连新朝6个……”

叶群说的“新朝”是吴法宪的儿子。

叶群开始安排起几个家庭的未来了：“这5、6个虎大将，将来都可以。国家这么大，他们互相不会矛盾，一个人把一个关口，也是你的助手嘛，你说是不是？”

“对，对！”黄永胜忙不迭地答应。

叶群：“你永远是元帅。我永远是元帅帐下的一个兵，一个传令兵……”“他（林彪）真正喜欢的只有你。”

叶群的房间堆满了衣柜，里面的衣物琳琅满目，尽是长裙，西班牙进口的。叶群出外时穿军装，回来家里后，就把军装脱掉了，换上长裙。长裙的拉链，像婚纱礼服一样，是开在后面的。

林彪喜欢听八音盒。叶群也搞了一个小的八音盒,放到她屋里。

叶群的两腿不一样长,一只腿长一只腿短。所以她的鞋子也是一只高一只低,有一只鞋子是垫上的。

叶群的屋里还有一个红灯设施。林彪到她屋里去了,就要亮红灯。这个地方的一切活动都停止了,走廊也不能走了。等林彪回到他的房间里来,再把红灯解除。工作人员才能够到这里走动。

林彪家是重男轻女的。林立衡和保姆一起住的是套间。林立果单独住的那个房间,是间很大的办公室,又高又大。里面有彩电,还有武器。其中有一把斯大林送给刘亚楼的手枪,上面有用俄文刻的斯大林的名字。屋子里还有微型冲锋枪等。

林立果喜欢自己开车,而且喜欢不断地换汽车牌照。屋里的汽车牌照,堆得像小山一样。

林立果的房间里还有一架进口高级照相机,装着一个望远镜镜头,从取景框里看出去,1000 米以外的树木、房屋等,清清楚楚地移到了眼前。只需调整好相机的清晰度,一按快门,远处的风景和人物,就会缩短距离,像在近处一样被摄入镜头,而且被摄的对象根本不会察觉自己已经被别人偷拍了。

林立果的这里的电话机,在海外早已有之,但在那时的中国,却是新鲜事物,所以类似这样的物件,都移交公安部技术部门做参考去了。

清查处理小组根据上级指示和实际情况研究制定了如下处理原则:凡属林彪的礼服、勋章、奖状及战争年代使用过的重要物件,一律转送党中央有关机关存储;凡是“借”来的文物古玩等均查清来源,完好地归还原主;凡搞不清来源底细的各种高档字画、古玩等物件,均移交故宫博物院酌处;有些有价值的大量唱片与音乐磁带以及林立果搞来的各式各样的新技术产品,分别移交中央有关部门如文化部、公安部等单位参考使用;没有多少使用价值的废品杂物统由机关事务部门处置。

经过分门别类、登记造册、严格手续、亲自交接等一系列艰苦细致的工作,他们在 1974 年的春天办完了这件事情。事后,给汪东兴写了报告,汪东兴看后又报送周恩来,周恩来最后批交在京的政治局委员传阅。

# 第1267回：二一五，基辛格五次访华 谈《水浒》，肖劲光也上“贼船”

1973年2月15日，基辛格第五次访华。

2月17日晚23时35分，周恩来带领基辛格、洛德走进毛泽东居住的中南海游泳池的书房。毛泽东由身旁的护士搀扶着站起来，与客人握手寒暄。

对于洛德1972年2月陪同尼克松和基辛格会见毛泽东，但不能公之于众这件事，周恩来一直惦记着。这次毛泽东会见基辛格，周恩来特别点了洛德的名，要他一同去陪见。

会见一开始，毛泽东就说：“我看起来还不差，但上帝已经对我发出邀请。”

他又对洛德说：“你真年轻，在座的属我最老。”

周恩来说：“我是第二老的。”

毛泽东笑着说：“你们也反对我们，我们也反对你们。所以我们彼此是敌人。”

基辛格：“以前的敌人。”

毛泽东：“以前的仇人，现在我们的关系说是叫做什么FRIENDSHIP朋友。”

基辛格：“这是我们的想法。我对周总理说过，我们还没有跟其他国家会谈得像跟你们会谈时这般开诚布公。”

毛泽东说：“不要讲假话，不要搞鬼。你的文件我们是不偷的。你故意放到那里试试看嘛。我们也不搞窃听器那一套，搞那些小动作没用，有些大动作也没用。我跟你们的一个记者EDGARSNOW（埃德迦·斯诺）谈过，我说你们的中央情报局大事也不行，不管用。”

基辛格：“这确实是真的。我们的经验是这样的。”

毛泽东：“他们做得不好，例如，他们就不了解林彪。同样的，他们也不知道你想来中国。你的事情干得好，到处飞。你是燕子，还是鸽

子？越南问题可以算是基本解决了。”

基辛格：“我们感觉是这样，我们现在需要一个走向平静的过渡时期。”

毛泽东：“对。”

基辛格：“基本问题已经解决了。”

毛泽东：“我们也需要嘛。”他手指基辛格坐的座位说：“你们的总统坐在这里讲的，我们两家出于需要，所以就这样，”毛泽东把两只手握在一起说：“HAND—IN—HAND。”即握手。

基辛格说：“是的，我们都面对一样的危险。有时我们会用不同的方法，但目标相同。”

毛泽东：“这样很好。只要大家的目标相同，就不会我伤害你，你伤害我。然后我们可以共同对付一个王八蛋！”说到这里大笑起来。他继续说：“当然，实际上有的时候我们会想批评你们，你们也会想批评我们。你们总统说是叫‘意识形态’的‘影响’。就是说，‘共产党去你的吧！共产主义去你的吧！’我们就说，‘帝国主义去你的吧！’有时我们也要讲点呢，不讲不行呢。”

基辛格：“我认为我们双方应该忠于各自的基本原则，实际上如果双方讲同样一个调子，只会使局势混乱。我对总理说过，在欧洲，你们出于自己的原则，可以讲得比我们更坚定。”

毛泽东：“我们希望你们跟欧洲、跟日本合作。有些事情吵吵闹闹可以，但是根本上要合作啊。”

基辛格：“主席先生，从我们这方面说，你们和我们之间虽然有时要进行批评，但我们仍要同你们协调行动。我们在任何时候都不会参与企图孤立你们的行动。至于日本和欧洲，我们同意在一切实质问题上要同他们合作，但目前欧洲的领导很弱。”

毛泽东：“他们不团结。”

基辛格：“不团结，而且不像你们那样有远见。当他们面临危险的时候，他们总想不费力气就使危险消失。”

周恩来对毛泽东说：“帮助蓬皮杜，他（指基辛格）同意。”

基辛格：“我们正在尽量这样做，回去后我们要争取做得更多。”

毛泽东：“现在蓬皮杜受到威胁，就是那个社会党和共产党联合起

来顶他。”

基辛格:“两家联合。”

毛泽东:“两家联合,苏联想要共产党登台。那个共产党我不喜欢,就像你们的共产党我也不喜欢一样。我喜欢你们,不喜欢你们的共产党。”

基辛格笑了。

毛泽东:“你们西方历来有条政策,两次世界大战开始都是推动德国打俄国。”

基辛格:“但是,推动俄国打中国不是我们的政策。因为如果在中国爆发战争,对我们来说,其危险性和在欧洲爆发战争一样。”

毛泽东::“我正是要讲这句话:是不是你们现在是推动西德跟俄国讲和,然后又推俄国向东进。我怀疑整个西方有这么一条路线。向东,主要向我们,而且向日本,也有一部分向你们,在太平洋和印度洋。”

基辛格:“我们并不赞成德国的政策。我们宁愿德国的反对党上台,德国的反对党不奉行这个政策。”

毛泽东:“我跟一个外国朋友谈过,我说要搞一条横线,就是纬度,美国,日本、中国、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欧洲。”

基辛格:“我曾告诉过总理,你们的行动方式要比我们直截了当和英勇一些。我们有时要采用复杂的方法,这是由于国内的形势所造成的。”

毛泽东:“英文什么叫做行动方式啊?”

译员:“MODE OF ACTION。”

基辛格:“不管公众舆论如何,我们对基本目标会有决断的。如果称霸的意图活跃起来,那末真正的危险会发展。不管哪里有这种意图,我们肯定都将予以抗衡。总统曾对主席说过,我们这样做是为了我们本身的利益,而不是为了对别的任何人表示善意。”

毛泽东:“你说的这个是老实话。”

基辛格:“这是我们的立场。”

周恩来对毛泽东说:“我们已经决定在双方首都设立联络办事处,以维持黄华和白宫的联系。”

黄华时任中国常驻联合国首任代表。

毛泽东问:“重要性何在?”

周恩来说:“联络办事处将处理一般民众的交流事务。至于保密性强以及紧急事务则不包括在内,这将交由黄华代表的管理处处理。”

毛泽东对基辛格谈了如果苏联进攻中国时双方的想法。毛泽东说:“中国,我今天对你讲,我们的打法是打游击,打持久战。他要去哪里就去哪里,让他去。欧洲和你们以为这一下子可好了,总希望这股祸水到中国那里去哩。世界上的事难说啊,我们宁可这么想比较好,从坏处想。”

基辛格笑着说:“不过,如果他们使用炸弹而不派兵呢?”

毛泽东说:“我们要怎么办? 也许你可以组成一个委员会去研究这个问题,我们将让他们猛攻一番,而他们将损失许多资源。”

基辛格说:“假如他们攻击中国,我们肯定会基于我们的理由反对他们。”

毛泽东说:“但是你的人民并未觉醒,欧洲和你们都会认为祸水流向中国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基辛格说:“欧洲想什么我无法判断,他们不会做任何事,因为他们基本上与此事无关。我们考虑的是假如苏联占领中国,将影响其他国家的安全并造成我们的孤立。”

毛泽东:“中国人排外得很。你们可以容纳很多民族。我们中国没有几个外国人。你们不同的民族有多少,你们美国有 60 万中国人,而我们恐怕连 60 个美国人都没有,我也不知道是什么道理,你们研究一下吧。从来就不喜欢外国人。包括日本人也很少。印度人一个都没有。”

基辛格:“这是因为历史上你们同外国人打交道不幸运。”

毛泽东:“有这么点理由。恐怕过去 100 年,主要是八国联军,后来日本人占领中国 13 年,占领大部分领土。他们过去占领中国领土不算,占领了北京还要赔偿。”

基辛格:“还有治外法权。”

毛泽东:“治外法权,多哩! 现在我们对日本,不要它赔偿。没法算,谁也算不清。赔不起。”

周恩来:“一赔就要增加人民负担。”

毛泽东:“也只有这样,人民之间才能由敌对变成和缓。”

这次会见进行了将近两个钟头,直到2月18日凌晨1时10分,在周恩来示意下,摄影师走进书房里来拍了合影,会见才算结束。

之后,周恩来与基辛格共进行了六次会谈。第六次会谈是18日午夜零时25分开始的,在钓鱼台三号楼。双方对此次基辛格访华的新闻公报的措辞进行讨论,很快就取得了一致的意见。2月19日凌晨2时10分了,周恩来与基辛格会谈结束。

2月22日,江青同中联部、外交部、对外友协一些人谈话时提到《水浒传》中的宋江,她说:

《水浒传》中的主要人物宋江,是真实的历史人物。《宋史》上《侯蒙传》就有关于宋江的记载。

我们应该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分析宋江等农民起义的领袖。对宋江首先应加以肯定,然后再分析他的阶级出身所带来的影响。他是一个了不起的历史人物,有智、有谋、有正义感,喜欢劫富济贫,能团结人,因此受人民群众的爱戴,人们称他作“及时雨”。在封建社会中,官逼民反,宋江被逼上梁山后,领导起义,同封建统治阶级坚决斗争,起了很大作用。这些积极方面,应充分予以肯定。另一方面,应看到宋江由于出身于地主阶级,有阶级的局限性和动摇性。他有一种正统观念,认为不能反皇帝,以至对皇帝的招安抱有幻想,认为可以戴罪立功,可以不犯法。宋江上梁山,不是轻易上去的。在杀阎婆惜(他杀惜是因为在政治上受到威胁)后,他起初宁愿被刺配到江州,也不愿上梁山。后来统治阶级要判处他死刑,他才下决心上山。林冲也是如此,他被迫害充军后,由于高俅派陆谦火烧草料场,谋害他的性命,他才被逼上梁山。在这一点上,李逵、鲁智深和武松等人不一样,他们是反对招安的。李逵的性格不象宋江那样复杂,他心直口快,坚决反对招安。《水浒》的一百二十回本中谈到李逵反招安,要造反。但由于他对宋江死也要跟着,所以宋江接受招安,他只好接受。

对宋江接受招安,还要从当时的历史背景来分析。当时,宋朝受辽、金等外寇入侵,需要抵御外敌。宋江接受招安,虽然反映了他的动摇性,但不能因此说他是两面派人物。金圣叹对宋江采取了憎恨仇视

的态度。他的节本损害了宋江的形象,而且还加卢俊义的一场恶梦,说梁山泊的英雄全被杀了。李希凡就不同意金圣叹的本子。还有一出戏叫《白水滩》,是续《水浒》,但写的不象样子。

解放以前,描写宋江的好戏不多,《浔阳楼》应该是一出好戏,宋江在那里吟反诗,抒发了自己的反抗情绪,但一直没有排出好戏。

《水浒》这部书写农民起义,但只讲建立一个政权,即有饭大家吃,有衣大家穿,乌托邦的幻想,但也不完全是幻想,《宋史》上有。

我们不能以无产阶级政党的标准去要求历史上的农民起义的领袖。他们有历史的局限性,在这方面《水浒传》七十回本把后边的删掉了,反而看不出农民运动的全貌。他们有些人就向统治阶级投降了。如宋景诗,他一生与地主斗,但以后被迫投降了。这一点不必回避。回避这个问题就违背历史。

1973 年 2 月 24 日,中共中央下发中发[1973]10 号文件,批转海军“四·五”会议的情况报告。

1972 年 7 月 17 日,海军党委在京西宾馆召开第四届五次党委扩大会议,简称“四·五”会议,传达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议精神,结合海军实际批林整风。参会人员,除海军党委成员外,另有师以上领导干部 200 多人,会议由肖劲光主持,开始主要是联系李作鹏、张秀川在海军的事情进行批林。两个多月后,9 月 21 日,周恩来请海军的肖劲光、苏振华、王宏坤、吴瑞林参加政治局会议。周恩来在会上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

“海军的会议,纠缠着历史问题。在批林整风运动中,在历史的旧账上纠缠,容易走偏方向。中央政治局约肖、苏、王、吴同志开个会解决一下。”

江青接着说:“还有,毛主席说‘首先是批林,其次才是整风’。”

张春桥说:“从去年中央 77 号文件以来,明确了批林是重点,‘九大’以来是重点,而你们把重点放在过去的问题上。”

江青说:“斗争的锋芒是对着文化大革命还是对着林彪,这是大是大非的问题。”

张春桥对肖劲光未报告就解放了海军 60 名干部一事做了批评。肖劲光解释。

周恩要求海军党委扩大会不能结束,“要按照主席指示精神继续进行”。

9 月 23 日,周恩来致信毛泽东,汇报批林整风中的云南问题和海军问题。毛泽东圈阅了这封信。

随后,海军的“四·五”会议开始纠偏,重点放在批林和“九大”以后。这就是后来说的“四·五”会议的第二阶段。在此之前为会议的第一阶段。

10 月,叶剑英在军委办公会议上肯定了海军“四·五”会议第二阶段的做法,对会议的总结报告提了一些修改意见。

11 月 28 日,中央政治局开会研究了海军党委扩大会议,即“四·五”会议的总结报告,认为海军党委扩大会议,第一阶段纠缠历史,走偏了方向,第二阶段重点批王宏坤、吴瑞林,颠倒主次,没有抓住重点,仍然没有把握住方向。中央不能批准海军党委关于会议的总结报告。

第二天,11 月 29 日下午,军委召集海军党委常委和按照军委首长指示赶来参加海军扩大会议的沿海几个军区的负责人开会。开始,大家以为是讲一讲扩大会议结束和下一步贯彻的问题,没有料到传达的却是中央没有批准海军会议总结报告的指示,海军扩大会议第二阶段又错了!

“913 事件”后,海军工作是由海军司令、海军党委第一书记肖劲光主持。1972 年 1 月,肖劲光将苏振华家属为苏振华写的申诉信转给毛泽东。2 月,苏振华从湖南关押地回到北京,改任海军第一副司令,分管作训工作。11 月 29 日以后,海军党委扩大会成立了以苏振华为首的领导小组,组织了 40 多人参加的会中之会,专门帮助肖劲光的认识问题。40 多人的小型会议以及整个海军党委扩大会改由张春桥抓总,苏振华具体负责了。

之后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小型会议”开了 30 多次,转向批海军司令员肖劲光上林彪“贼船”的问题,主要有以下几点:

1、1967,1968 年肖劲光给林彪写信,检讨自己,表示效忠;

2、“九大”前林彪找肖劲光等海军 5 人谈话,肖劲光同意全力支持李作鹏在海军的领导;

3、在“九大”选举政治局委员时,肖劲光没有选江青等人;

4、九届二中全会上,肖劲光在华北组的发言支持设国家主席;

5、利用准备与台湾海军作战的“七九方案”搞“北兵南调”,准备策应林彪的在南方另立中央等等。

所谓“北兵南调”是指1971年7月,根据敌情通报,台湾搞了一个中兴9号演习,以大陆福建沿海为目标,用一两个师的兵力演习登陆。于是,中央军委召开办公会议研究布置备战。李作鹏参加了军委办公会议,回来后吹了风,于是由海军分管作战工作的副司令吴瑞林牵头,潘焱参谋长具体负责,作战部昼夜加班,搞了一个作战方案。方案以东南沿海为敌主攻方向,以东海舰队为主,准备必要时将北海舰队的舰船向南调,南海舰队的舰船向东调,支援东南沿海的作战。因为海军的会议是7月9日开的,后来便把这个方案称为“七九方案”。这次东南沿海抗登陆演习从1971年8月开始,刚刚展开,因发生了“913事件”戛然而止。

肖劲光反复解释,不认为自己上了林彪的贼船,所以,多次检查没有通过。直到1973年1月,肖劲光的检讨几易其稿,终于承认自己上了“贼船”。2月20日晚,中央政治局在人民大会堂集体接见出席海军扩大会议的全体人员。张春桥在会上讲了经他修改后“情况报告”和“情况报告”的修改过程,给肖劲光做了上“贼船”的结论。

2月24日,中共中央全文转发了经张春桥修改的《海军第四届五次党委扩大会议情况报告》。“肖劲光上了林彪的贼船”以中央文件的形式通报全党。

之后,肖劲光由海军党委第一书记降为第二书记,不再主持海军的全面工作,在常委中分工管调研。苏振华接替海军党委第一书记,并被任命为海军第一政委,主持海军工作。

# 第1268回：说贺龙，梁兴初下厂锻炼 见小平，周恩来治膀胱癌

1973年2月29日，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对张春桥说："我看贺龙没有问题。我有缺点，听一面之词。"

3月1日，北京大学校党委举行扩大会议，讨论聂元梓、孙蓬一的审查结论和处理意见。专案组汇报：对聂元梓从1970年11月开始审查，现基本查清。主要有五大罪行：

（一）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主要从1967年开始就反对周总理；

（二）反军乱军；

（三）反对谢富治，反对市革委会；

（四）策划武斗，残杀群众，怂恿凶手打死三名无辜青年学生；

（五）破坏九大路线，反对党中央，在九届二中全会上追随林彪反党集团向党进攻。

汇报说，孙蓬一的主要罪行是：

（一）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特别是反对周总理；

（二）伙同聂元梓反谢富治，妄图颠覆市革委会；

（三）挑动武斗，怂恿凶手打死三名无辜青年学生，包庇凶手。

会议决定：同意给聂元梓、孙蓬一戴上"516"反革命分子帽子，开除党籍，报市委批准后，全校召开大会进行批斗。

会上宣布北京大学清查"516"运动到此基本结束。

1973年1月13日清早6时许，周恩来在批阅了大量文件后，去卫生间解小便时，突然排出大量鲜红色血尿，周恩来医疗组立即向党中央写了病情报告。

3月1日，周恩来出席在毛泽东处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听取浙江、湖南等地及海军批林整风运动情况汇报。第二天，周恩来约叶剑英、张春桥、汪东兴谈自己病情及检查治疗问题。

5日，叶剑英向毛泽东反映了周恩来病情发展、急需检查治疗的情

况,毛泽东同意先检查、后治疗的意见。

当天,周恩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关于湖南批林整风情况的报告,通过中共中央转发湖南报告的批示,并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湖南领导。同时作了透视检查。

3 月 6 日,周恩来去毛泽东处开会,听取姬鹏飞有关外事情况的汇报。会前,他将自己病情及检查治疗安排等向毛泽东作了简要报告。

3 月 6 日,军委副主席、总政治部主任李德生和总政干部部部长魏伯亭、保卫部部长蒋云观与成都军区司令员梁兴初和政委陈仁麒谈话,说中央决定他们到工厂“劳动锻炼”,并继续接受审查。梁兴初到山西太原,陈仁麒到甘肃兰州。3 月 26 日,总政干部部和保卫部各派一名干部,送梁兴初到太原,把他安排在离太原 35 公里的义井化工厂。周恩来指示:叫梁兴初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

义井化工厂让梁兴初在缠线车间,缠漆包线,打扫卫生。平时梁兴初住在离工厂半里路的招待所。活不重,“家”也不远,但经过一年多审查,他的身心受到沉重打击,1 米 78,体重不到 50 公斤,下班连上楼的力气也没有了。经请示总政治部同意,夫人任桂兰决定去照顾他,陪他一起劳动锻炼。每天梁兴初都不停地剧烈咳嗽,任桂兰帮他捶背,说化工厂的空气不好。梁兴初好容易止住咳嗽,长叹说:“工人受得了,我也能忍受,就是政治空气不好,让我受不了。没想到跟着毛主席干了 40 多年革命,出生入死,最后倒成了反对毛主席的三反分子。……”

梁兴初中年得子,非常疼爱两个儿子,而两个儿子梁晓东、梁晓源受他牵连,想当兵却通不过政审。梁兴初说:“我一生只哭过四次,一次是长征前于都河战斗,子弹从我颧骨打进去,脑后穿出来。没有药,伤口生蛆,痛得钻心刺骨,我哭了。第二次是在甘孜过草地,我的通信员小李掉进泥潭,我们没办法救他上来。小李说营长你快走吧,前面还有任务。说着他的头就沉到泥里去了。我边走边哭,很痛心。第三次哭,是 1938 年湖西‘肃托’,罗荣桓来救我,我跪下了,哭了,很伤心。第四次哭,我干了几十年革命,却成了反革命,在批判大会上我哭了,这次是太委屈,太伤心了。我相信组织,相信党,早晚会把我的问题搞清楚的。”

3 月 8 日,中央对外联络部、外交部和外国专家局联合举行招待在京外国女专家和中国女专家的庆祝三八妇女节茶会。会上,周恩来发表了讲话,对在文化大革命中一些专家及其家属受到不公正、不礼貌、非同志式待遇的情况逐个举例说明,表示:“这个责任我们要负,作为政府的负责人,我负更多的责任。”并当场向在座的一些专家赔礼道歉。

坐在周恩来身边并第一个得到周恩来赔礼道歉的是 82 岁高龄的英国女专家露丝·史密斯。她早在中国共产党创建之前的 1920 年就参与了创建英国共产党,在文革前 71 岁高龄时来到中国,先后在外文局和新华社工作。她对中国革命满怀热忱,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她积极参加,在 1967 年 3 月 8 日《人民日报》关于“在京外国女专家热烈赞颂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报道中,专门有一段对她的报道,其中转述她的感想说:

“我一生中最大的幸福是在我七十五岁的时候,在中国参加了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生活在无产阶级朝气蓬勃的中国,使我感到恢复了青春,充满了活力、信心和热情。”

但是她很快受到了怀疑,被迫回到英国。但她回去后没有说中国的坏话。直到 1971 年她 80 大寿时,新华社记者代表周恩来去看望她,向她转达了邀请其再次到中国工作的意向,她又高兴地重返中国,并在中国度过了她的余生。

一位在文革中受到不公正待遇的美国妇女,始终自愿继续在中国工作。她说:“我个人的遭遇事小……中国的前途和命运事大。”

参加过西班牙内战中的国际纵队英国旅的英国共产党员大卫·柯鲁克说:“现在我对革命的复杂性有了更深刻的理解,我们比以前更想留在中国。”

大卫·柯鲁克是 1947 年由英国共产党介绍,带着妻子来到中国。夫妻俩在河北武安县十里店村深入生活,采访搜集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后来写成了《十里店 - - 中国一个村庄的群众运动》一书,被英国许多社会学教师指定为学生必读书。1948 年,应中共方面邀请,柯鲁克夫妇留在中国帮助培养外语人才,成为参加创办北京外国语学院的最早的外籍教师。他积极参加文革,却被人捏造罪名,在监狱里度过

了将近4年。

在这次茶会上得到周恩来亲自赔礼道歉的,还有在“三八节”招待会前不久刚从监狱释放出来,曾参加“白求恩—延安造反团”,后来被打成“国际间谍”的爱泼斯坦与丘茉莉夫妇,六旬高龄的英国专家夏庇若等。

对于已经回国的专家,周恩来提出,如果他(她)们愿意回来,中国政府将诚恳欢迎他(她)们,以弥补当时我们未照顾好他(她)们的过失。在谈到今后的外国专家工作时,他说:“遵照毛主席最近批评的不敢同外国人交往的错误倾向,有关部门要努力克服保守、排外的观念,增进与外国朋友的友好往来。”

我们再说邓小平。他于1973年2月接到中央要他于近期返回北京的通知。2月19日,他们一家离开了南昌步兵学校的那个小院,在汪东兴的具体安排下,乘坐江西省委的汽车从南昌来到鹰潭。

2月20日上午11时,从福州开往北京的46次特快列车加挂了一节专用车厢,徐徐停靠鹰潭火车站。这天,铁路部门接到中央办公厅的指示,这节专用车厢将在鹰潭接待一个“东南亚外宾”。而今天搭乘这趟列车的“东南亚外宾”,却是邓小平。后面跟着的还有他一家四代老小:夫人卓琳、继母夏伯根、女儿邓林、邓楠、女婿张勤和一个出世不久的小外孙,还有秘书王瑞林。离开江西的时候,邓小平颇为感慨的说了一句话:“我还可以再干它20年!”

22日,回到北京的邓小平一家人,住进海淀区花园村的一栋两层楼房里。当晚,汪东兴前来看望。

很快,邓小平又带着全家去看病中的康生。哨兵不让进。康生的秘书黄宗汉出来接他们。邓小平全家见到康生,深深鞠躬。邓小平谦逊而恳切地说:“康老,我还是个壮丁,还可以工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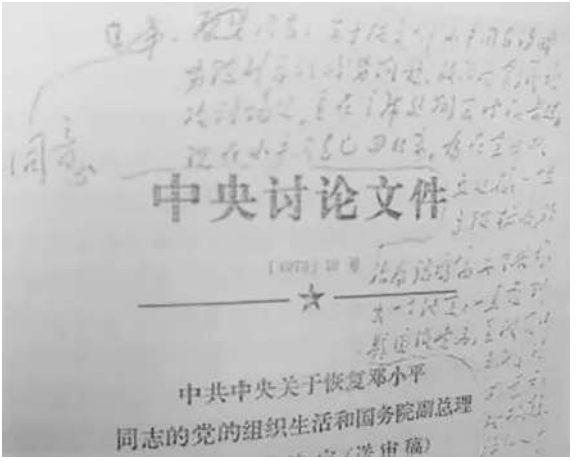
邓小平还去看望了李富春、蔡畅夫妇,到301医院看望身患癌症的陈毅夫人张茜。

从2月下旬到3月初,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恢复邓小平工作的问题。

3月9日,周恩来报送毛泽东审批中共中央讨论文件:《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的决定》稿,并在

送审报告上写道:“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国务院副总理职务问题,政治局几次讨论过,并在主席处开会时报告过。邓小平已回到北京。为了在全国树立这样一位高级标兵,政治局认为需要中央作出一个决定,一直发到县、团级党委,以便各级党委向党内外群众解释。”

《决定》说:“一九七二年八月十四日,在邓小平同志写给主席的一封信上,毛主席作了重要批示。中央政治局认真讨论了毛主席的批示和邓小平同志的问题。遵照批示精神,中央决定: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党的组织生活,恢复他的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由国务院分配他担任适当的工作。”




毛泽东当天批示“同意”后,周恩来指示汪东兴,将中央关于邓小平复职的文件及其附件送达邓小平本人阅,并对有关内容提出意见。

3 月 10 日,中共中央正式发出《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的决定》。

3 月 9 日,周恩来就公安部反映广东省宝安、珠海等地部分居民外逃香港、澳门的材料批告李先念、纪登奎、华国锋等:

“这份文件值得一看,并分别解决。请注意分配要公道,停止购过头粮。此事在计划要点上要提出一个供应指标,不能超过。对此类事公安部既有材料反映。就要有措施紧跟。”

周恩来在公安部的材料里提到宝安、珠海二县一些社队征购任务逐年增加,甚至强行征购社员口粮,取消或减少必需供应品等处分别批道:

“这如何能行?交了过头粮,减了口粮,交了库存粮,这笔帐怎么算?”

“这如何持久?不跑何待?”

当天,周恩来主持政治局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向政治局简要说明自年初以来自己病情的发展情况,及检查治疗的具体步骤。为此,他正式向政治局请假两周,去玉泉山治疗。

周恩来提议:在自己离开的两周内,政治局会议和报告由叶剑英主持和签署;组织宣传工作由江青、张春桥批办或上报;中央军委事务由叶剑英处理或上报;国务院事务由李先念和国务院业务组处理或上报。关于落实干部政策及干部处理问题,由纪登奎、李德生、汪东兴等提出先易后难的方案,送交政治局会议讨论后报毛泽东批准。

10 日,周恩来将政治局会议研究各事报告毛泽东:

昨晚开政治局会议,遵主席指示,简单地说明我的便血情况,需检查一次,分两步走,不要毕其功于一役,防止促进恶化。我向政治局请假,不管检查情况如何,我都留在山上两星期。一切外宾都可不见,会议可不参加。政治局会议和报告,请剑英同志主持和签署。组织宣传事请江青、春桥同志批办或上报。军委事请剑英同志处理或上报。政府事请先念同志和国务院业务组处理或上报。干部处理请登奎、德生、东兴同志提出先易后难的方案。周恩来从三月十日至二十四日在玉泉山做全面检查治疗。

毛泽东批示“同意”。当天,周恩来由邓颖超陪伴在玉泉山做全面检查治疗。经过膀胱镜检查,发现膀胱内有 3 个绿豆大小的肿瘤病灶,直径 0.5 公分,呈绒毛状,很表浅,当即做了膀胱镜切除手术,送病理化验,证实了原来的诊断——膀胱癌。根据临床经验,这种病易于复发,必须 3 个月进行一次复查,灌药治疗。

在著名泌尿科专家吴阶平主持下,经过多次检查,决定采取“电烧”的办法。经过电灼术治疗,效果非常显著,电灼术后数天,尿色就完全清澈透明,取得比较好的效果。

在此期间,周恩来委托邓颖超先后前往看望李富春和蔡畅、邓小平和卓琳,以及在301医院住院的刘伯承,告诉他们自己病情及检查治疗情况。

3月12日,经毛泽东审阅同意,中共中央转发兰州军区和陕、甘、宁、青四省区来京参加批林整风汇报会议的负责人《关于进一步深入开展批林整风运动的报告》。中央批语说:

希望你们充分认识这场斗争的尖锐性、复杂性,继续把批林整风这个头等大事抓紧抓好。兰州军区和陕、甘、宁、青四省区是三北地区之一,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你们一定要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和"备战、备荒、为人民"的伟大战略方针,加强备战,把各方面的工作做好。

3月16日,周恩来打电话给朱穆之,询问美国女作家维特克与江青谈话后写过什么文章?

3月24日,周恩来从玉泉山回到中南海西花厅。

3月28日晚,周恩来同江青、李先念约见邓小平。没有长谈,只是告知邓小平以国务院副总理身份参加国务院的工作。

3月29日,周恩来给毛泽东写信汇报了与邓小平见面的情况。信中写到:"他的精神、身体都好。29、30两日下午和晚上,等候主席通知到主席处开政治局会,到时当约小平同志来见主席。"

3月29日下午,毛泽东在中南海的书房里召开政治局会议。会前,周恩来约邓小平先到毛泽东那里。毛泽东握着邓小平的手,说了8个字:"努力工作,保护身体!"

毛泽东问起邓小平这些年是怎么过来的?邓小平说:"等待。"

当晚21时,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邓小平参加。会议进一步商定:邓小平"正式参加国务院业务组工作,并以副总理身份参加对外活动;有关重要政策问题,邓小平列席政治局会议参加讨论"

会议还研究了党的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筹备问题,提出在5月召开中央工作会议。为此,中央政治局成立政治报告起草小组、党章修改小组、林彪专案报告和决议起草小组、十大代表名额和产生方案起草小组四个工作机构,周恩来为政治报告起草小组负责人。

30 日,周恩来致信毛泽东,报告政治局 29 日会议商议各事,汇报了中央政治局会议关于邓小平工作安排的决定,又说“其他老同志和九届三四十岁的工农兵出身的中委和候补中委参加中央工作和学习问题,待安排方案拟定后再报”。报告还谈到关于党的十大筹备问题和关于召开四届人大和五届政协问题。毛泽东批示:“同意。”

# 第1269回：举世惊，邓小平重新复出 为谁泣，江青关心陈景润

4月1日，周恩来在中央国家机关各部、委负责人会议上传达了政治局会议关于邓小平工作的决定。

4月2日，周恩来又上玉泉山作手术。

4月3日，中共中央关于中发[1973]14号文件传达范围的通知：

1973.04.03；中发[1973]16号

一、中发[1973]14号文件是按县团级文件发的，可以口头传达全文到党员干部和非党员干部。并进行讨论。

二、中央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的决定（不包括邓小平同志的信和《我的自述》（摘录）两个附件），可以口头传达到党内外群众，并加解释。

三、对爱国人士，由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各部门负责人，按照本通知第二条规定，向他们作传达、解释。

4月9日，周恩来手术后，邓小平、卓琳上玉泉山与周恩来、邓颖超在玉泉山3号楼作了长谈，并共进晚餐。

江青也在钓鱼台10号楼约见了邓小平。她对邓小平说："邓小平同志，你在'文化大革命'中是犯了错误的，主席对犯了错误的人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主席对你宽宏大量，不计前嫌，把你与刘少奇严格加以区别，叫你重新出来工作，并把你安排在如此重要的工作岗位上，你应该感谢主席，你要一边工作一边改正错误。人不怕犯错误，就怕不改，改了就好。"

邓小平说："感谢毛主席，也感谢江青同志的提醒。"

4月12日晚19时30分，人民大会堂一楼宴会厅灯火辉煌，周恩来在这里盛宴欢迎视察柬埔寨解放区后来到北京的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这次晚宴，除了毛泽东以外的所有政治局委员都参加了。在大厅里，人们意外地看见多年未见到的中国第二号走资派邓小平！他是

以国务院副总理的身份参加这次宴会。

当时在场的匈牙利记者巴拉奇·代内什这样描述:

他孤独一人站在大厅里。他个子明显矮小,但体肩宽阔,显得刚毅有力。身着深色的毛式干部服,但袜子是白颜色的。此刻,他当然知道,从远处,从人民大会堂大厅里的许多圆桌旁边,数百双眼睛正好奇地注视着他,因为他是在消失之后又从被遗忘的角落里突然出现在人们眼前的。在那些7年前被“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一政治地震压倒在地,尔后又恢复名誉、重新出台的人中间,他是地位最高的一个。

在那次令人难忘的招待会上,等待着宴会开始的中国领导人,正在三五成群地寒暄交谈,而他孤身只影,缄默无声。然而,他那两只大而近似欧洲人式的眼睛,正扫射着所有在场的人,似乎这孤独丝毫没有使他感到难堪不安,相反,他正在察看形势,端详同伴,准备迎接新的任务和斗争。眼前的景象是:这边站着“文化大革命”的一些英雄,他们不久前剥夺了他的一切权力;那边是政治牺牲者。但他现在又站在权力的大厅里,是副总理之一。

这天晚上,筵席未散就抢先急匆匆地走下楼梯的不是外交官,而是各国的新闻记者。他们直奔近处的邮电总局,向全世界传播一件重大新闻:“邓小平复出!”

一位外国记者在报道中评说:“这是自1967年邓销声匿迹以后,第一次在公开场合同中外人士会见。虽然他坐的位置并不显眼,却吸引了全场的目光。他没有说一句话,甚至还显得有点孤单,但无论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都感觉到他重新登上中国政治舞台的分量。”

日本共同社驻北京记者发出的消息说:“这个晚上,所有的人都盯望着身材矮小而神色安定的邓小平,上千双眼睛都像聚光灯一般聚焦在他身上。他原来的反对者们,也不能不暗暗地打量着他,而晚宴原定的主角——总是携带着美丽夫人的西哈努克亲王反而成了陪衬。”

法新社驻京记者评述说:“邓小平的突然出现,说明他是强有力的,是打不倒的,这也是70年代往后的中国政治舞台要发生新变化的明确信息。”

港澳及西方所有大报都以大字标题,赫然报道了邓小平复出的消

息。同时,中国国内所有报纸发表了新华社的电讯通稿,在报道出席宴会的那些中央政治局委员名字之后,也见到了副总理邓小平的名字。

1973 年 3 月底的一天中午 13 时许,江青起床后吃完早餐,照例到办公室看文件。她在秘书杨银禄为她挑选的文件中看到一份《国内动态清样》,内容是关于数学家陈景润在极为艰苦的工作和生活情景下,对数学上的难题“哥德巴赫猜想”做出的重大贡献。文章大体是这样写的:

陈景润以惊人的顽强毅力,勇敢地向哥德巴赫猜想进军,他废寝忘食,昼夜不舍,潜心钻研,进行了无数次的运算。他把全部心智贡献给了这道很多外国数学家都未攻破的世界性难题。他的论文发表后,在国际上反映非常强烈,被外国著名数学家称之为“陈氏定理”,一个外国科学家给陈景润写信说:“你移动了群山!”

就是这样一位被外国科学家交口称赞的伟大数学家,学习、工作、生活的条件太糟糕了。他住在只有 6 平方米的小房间,这个小房间还缺一个角,原来楼下锅炉房长方形的大烟囱从他的 3 楼房间中通过,切去了房间的六分之一。窗子用报纸糊得严严实实。屋内的光线非常暗淡。小屋空荡荡的,连一张桌子都没有,只有 4 叶暖气片的暖气上放着一只饭盒,一堆药瓶,连一只矮凳子也没有。工作时把被褥一起翻起来,当桌子用。由于房间潮湿、阴暗,空气不流通,很污浊,陈景润患了肺结核。喉头炎严重,咳嗽不止。还经常腹胀、腹痛,有时难以忍受,他的两眼深深凹陷,面色憔悴,精神萎靡不振。

记者觉得屋内光线太暗,拉电灯绳想打开电灯,但拉了几下灯也没亮。陈景润告诉记者,有人用老虎钳子把我这个房间的电灯线铰断了。我看书就点煤油灯。他笑着说,不要电灯,电灯麻烦,用煤油灯一样工作……

江青看完这条消息后,立刻打铃叫杨银禄过来。

当杨银禄走进江青的办公室时,看到她正拿着一块小毛巾抹眼泪。杨银禄不知道她为什么流泪,也不敢问,就站在她的旁边,等待她先说话。屋里只有他们两个人,谁也不说话,安静得很。

过了一会儿,江青拿起那份《国内动态清样》,眼含泪水,慢腾腾地

对杨银禄说:“小杨呀,你看到这份清样了吧?”

“看到了,我还看得很仔细呢。”杨银禄回答说。

“你有什么感受吗?”江青试探性地问。

“陈景润是我国不可多得的数学专家,他的运算成果,不但对我国的数学领域是一个重大贡献,而且,对世界也做出了重大贡献。他的工作、生活条件太差了。”杨银禄说。

这时,江青还在不停地擦眼泪,也许是杨银禄的话使她更加激动了。她放下那份《清样》,用哭腔对杨银禄难过地说:

“哥德巴赫猜想,是数学领域内最深奥的理论,不少发达国家的高级数学专家都在研究运算,陈景润在这方面做出贡献,这是中国人的骄傲。而他的境况竟是这样,我们能不管吗?”

她说了这些话后就叫杨银禄离开了。

过了几天,江青又将杨银禄叫到她办公室,急急忙忙地对他说:“你再看看这份《清样》,现在有主席和我的批示。”

杨银禄接过那份《清样》,发现上边有江青批示:“主席,是否先救活陈景润为好?”

毛泽东批示:“请文元同志办。”

姚文元又批示:“陈景润的论文在哲学上有什么意义?”

江青问杨银禄:“你看完了吗?”

杨银禄说:“领导的批示我看完了。”

江青说:“姚文元‘书呆子’,他的批示文不对题。你给迟群打个电话,告诉他赶快到我这里来,关于陈景润的工作、生活条件我跟他讲一讲,这是他负责的领域,我命令他快快来。”

杨银禄问:“叫他到10号楼还是到17号楼?”

江青说:“快,快叫他到10号楼来。”

杨银禄从江青的办公室出来,立即通过39局总机给时任国务院科教组副组长迟群打电话。因为杨银禄以前没有跟迟群直接联系过,所以不知道他的电话,只能通过39局总机转接。不到半分钟的时间,电话通了。

迟群原来和杨银禄都是中央警卫团的,很熟悉,通话以后,他先很客气地问杨银禄结婚了没有?身体好不好?拉起家常来了。杨银禄

说:“迟科长,你别问这些了,江青同志叫你快到她这里来一下,她有紧急的事情跟你说,我们现在在钓鱼台10号楼,我已经通知钓鱼台东门的哨兵了,快来,请不要耽误时间。”

迟群解释说:“我手头上还有一件事,等我办完了马上就到。”

杨银禄催到:“什么事是轻重缓急你是清楚的,先到这里来,你的事回去再办好吗?”

迟群问:“老杨,什么事那么急?”

杨银禄说:“你来了就知道了,在电话里一时说不清楚,不要浪费时间了,快来吧。”

因为要查电话,又在电话里说了这些,此时已经20分钟过去了。江青等得着急了,打铃叫杨银禄去她的办公室,生气地问:“迟群现在怎么还没有来,看来他对我的命令也不在乎了!”

杨银禄赶紧解释说:“不是,我以前没有给他打过电话,不知道他的电话号码,是叫总机查到的,所以耽误了一点时间。他马上就到,请你稍微等一会儿。”

杨银禄岂敢怠慢,立即在楼厅等着迟群,半个小时后,看见迟群风风火火地来了。

杨银禄赶紧到江青办公室报告:“迟群同志来了,你看在哪儿谈?”

“我出去就在门厅谈,事情紧急,就不要讲究什么谈话形式了,谈完了叫他赶快去办。他这个人办事能力是有的,也雷厉风行。”

说着,江青拿起那份《清样》就到了门厅。她看见迟群,没有握手就叫他:“快坐下,我有急事跟你说。”

接着,她说:“今天我看到一份材料,使我心中很不安。”说着就把那份《清样》递给了迟群,叫他仔细看看。她接着说:“陈景润是我国,也可以说是全世界著名的数学家,许多外国著名学者都为他的刻苦钻研精神和伟大成果所打动。我们本来应该对他好好进行褒奖的,但是,你看看他的工作、生活条件多么差呀!不用说叫他搞科研,连起码的生存条件都不具备,可怜得很啊!主席历来尊重知识分子,他说,中国的革命和建设离开了知识分子是不会成功的。即使是成功了,也不会巩固,有人对主席关于‘老九不能走’一句话有误解,理解为‘老九’,就是把知识分子排在了第九位了,这不是误解是什么?主席说的

这句话是借用《智取威虎山》戏中的一句台词,‘老九’指的是杨子荣,杨子荣是英雄,是这出戏中的主角。你看科学院怎样对待陈景润的,我累了,难过极了,不想跟你再多说了,你自己看看材料吧。”

江青激动得再次用毛巾擦了擦含泪的双眼,说道:“我委托你马上去了解一下是不是像材料中所说的那样?如果真的是那样,马上改善他的工作和生活条件,你把了解的情况和处理的情况尽快告我!”

迟群表态说:“我按主席批示和江青同志的指示,立即去了解和解决,如果材料讲的属实的话,我也是有责任的。听了你的指示,我的心也不安。”

江青着急地挥手说:“你不要再说了,快去快去!”

第三天,迟群来电话说:“经了解,《清样》讲的情况属实,我们正在采取有力措施尽快改善他的身体不好和工作、生活条件不好的情况,请江青同志放心。”

一天的下半夜,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响彻了中关村 88 号楼 3 层寂静的走廊,住在这里的陈景润也被惊醒。一名身穿军装的男子在陈景润房间外边敲门边喊:

“陈景润同志,我是迟群,伟大领袖毛主席派我来看你了!”

陈景润出来了。迟群恳请他马上去检查身体。陈景润死活不肯,迟群不得不亲自动手,强拉瘦弱的陈景润,把他塞进了红旗轿车。几辆小车浩浩荡荡地开进清华大学,几名专家为陈景润会诊,虽然他只是患有慢性腹部结膜炎,还是住院了。

陈景润住院后,由北京医院内科主任和卫生部一位副部长进行了全面检查、得到了认真治疗和疗养。

在周恩来的安排和江青的过问下,陈景润的身体、办公、生活条件得到了大大改善。

江青与迟群谈话中提到毛泽东说的“老九不能走”,其实是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中的一句台词,说的是威虎山匪首座山雕下有“八大金刚”。解放军排长杨子荣假扮土匪上山后,被排在“八大金刚”之后,称之为“老九”。后来杨子荣假装生气欲下山时,“八大金刚”说:“老九不能走!”当时,社会上提到知识分子时,经常用“臭老九”称之。这一称谓应该是 1968 年从清华大学传出来的。

工宣队进校后,1968 年 8 月 25 日,《红旗》杂志发表了姚文元《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的文章,其中有这样一段话:

有些自己宣布自己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知识分子,一遇到工人阶级触动他那个小小的“独立王国”的利益的时候,就反对起工人来了。这种叶公好龙式的人物,在中国还是不少的。这种人就是所谓轻视工农、爱摆架子、自以为了不起的人物,而其实不过是现代的一批叶公而已。凡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不论是学校,还是别的单位,都应有工人、解放军开进去,打破知识分子独霸的一统天下,占领那些大大小小的“独立王国”,占领那些“多中心即无中心”论者盘踞的地方。这样,成堆的知识分子中间的不健康的空气、作风和想法就可以改变,他们也就有可能得到改造和解放。

这段话中的黑体字部分,是毛泽东亲笔加上的。

文章中这样一句话:“全国各地那些被资产阶级分子所把持的大大小小的独立王国里的公民们”,引起了一些大学生的反感。因为姚文元的文章中特别提到:

清理阶级队伍,稳、准、狠地打击一小撮特务、叛徒、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和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是工人阶级向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进行无产阶级专政、纯洁自己队伍、清除钻到内部来的阶级敌人的一件十分重要的工作,它为大批判提供了生动的活材料。

于是一天,清华大学工化系几个同学在一起聊天时,议论说:

“我们也成反面教员了,地、富、反、坏、右、叛徒、特务、‘走资派’,我们知识份子排行老几?老九!”

这话很快在同学中流传。1968 年 10 月的一天中午,清华大学“革命大联合委员会”学习班的成员正在学校荷花池食堂排队买饭,正好那天食堂咸菜中有北京的臭豆腐乳。正在排队聊天的同学说道:

“臭豆腐乳太臭,不能买。”

另一个同学说:“不对,臭豆腐乳闻起来臭,吃起来香。”

又有人说:“对啊!知识分子也是臭豆腐乳,闻起来臭,吃起来香啦!”

顿时,食堂里的人轰堂大笑,有的人笑得把嘴里的米饭都喷出来了。当时一起排队买饭的军、工宣队员听得也都笑了。于是,“臭老

九”几乎就成了全校同学的口头禅。

后来,清华大学军、工宣队负责人迟群在向全国大专院校到清华取经的人们介绍经验时说:“我们刚进校时,一些人对我们进驻学校不理解,有抵触情绪,他们自己说他们是‘臭老九’。”就这样,“臭老九”一词又被到清华来取经的人带回去传播到全国各地,流传开来。

# 第1270回：一封信，毛泽东潸然泪下 李庆霖，收到主席三百元

1973年4月25日，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边，读了由外交部副部长王海容转交过来的一封人民来信，他边读边想，竟然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泪水潸然而下。

信是福建省的一位小学教员李庆霖于1972年12月20日写的。他在信中写道：

尊敬的毛主席：

首先，我向您老人家问好！

我是个农村小学教员，家住福建省莆田县城厢镇，家庭成份是贫民。我有个孩子叫李良模，是个一九六八年的初中毕业生。一九六九年，他听从您老人家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教导，毅然报名下乡，经政府分配在莆田山区——荻芦公社水办大队插队落户务农。

在孩子上山下乡的头十一个月里，他的口粮是由国家供应的（每个月定量三十七斤），生活费是由国家发给的（每个月八块钱），除了医药费和日常生活中下饭需要的菜金是由知青家长掏腰包外，这个生活待遇在当时，对维持个人在山区的最低限度的生活费用，是可以过得去的。

当国家对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口粮供应和生活费发给断绝，孩子在山区劳动，和贫下中农一起分粮后，一连串的困难问题便产生了：

在山区，孩子终年参加农业劳动，不但口粮不够吃，而且从来不见分红，没有一分钱的劳动收入。下饭的菜吃光了，没有钱再去买；衣裤在劳动中磨破了，也没有钱去添制（置）新的；病倒了，连个钱请医生看病都没有。其他如日常生活需用的开销，更是没钱支付。从一九六九年起直迄于今，孩子在山区务农以来，个人生活中的一切花费都得依靠家里支持；说来见笑，他风里来，雨里去辛劳种地，头发长了，连个理

发的钱都挣不到。此外,他上山下乡的第一天起,直到现在,一直没有房子住宿,一直是借住当地贫下中农的房子。目前,房东正准备给自己的孩子办喜事,早已露出口音,要借房住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另找住所。看来,孩子在山区,不仅生活上困难成问题,而且连个歇息的地方也成问题。

毛主席:您老人家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我完全拥护……可是,当国家对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口粮供应和生活费发给断绝,孩子在山区劳动,和贫下中农一起分粮后,一连串的困难问题便产生了:首先是分得的口粮年年不够吃,每一个年头里都要有半年或更多一些要跑回家吃黑市粮过日子。在最好的年景里,一年早晚两季总共能分到湿杂稻谷两百来斤,外加两三斤鲜地瓜和十斤左右的小麦,除此之外,就别无他粮了。那两百来斤的湿杂稻谷,经晒干扬净后,只能有一百多斤,这么少的口粮要孩子在重体力劳动中细水长流地过日子,无论如何是无法办到的。况且孩子在年轻力壮时候,更是会吃饭的。

毛主席:您老人家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我完全拥护;叫我把孩子送到山区去务农,我没意见。可是,孩子上山下乡后的口粮问题,生活中的吃油用菜问题,穿衣问题,疾病问题,住房问题,学习问题以及一切日常生活问题,党和国家应当给予一定的照顾,好让孩子在山区得以安心务农。

现在,如上述的许多实际困难问题,有关单位都不去过问,完全置之不理,都要由我这当家长的自行解决,这怎么能行呀?有朝一日,当我见阎王去,孩子失去家庭支持后,那他将要如何活下去?我真耽心!

今年冬,我的又一个孩子又将初中毕业了,如果过不了明春的升学关,是否再打发他去上山下乡呢?前车可鉴,我真不敢去想它!

在我们这里已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中,一部分人并不好好劳动,并不认真磨炼自己,并不虚心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却倚仗他们的亲友在社会上的政治势力,拉关系,走后门,都先后被招工、招生、招干去了,完成了货真价实的下乡镀金的历史过程。有不少在我们地方上执掌大权的革命干部的子女和亲友,纵使是地富家庭出身,他们赶时髦上山下乡才没几天,就被“国家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需要”调用出去,说是革命干部的子女优先安排工作,国家早有明文规定。这么

一来,单剩下我这号农村小学教员的子女,在政治舞台上没有靠山,又完全举目无亲,就自然得不到“国家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的需要”而加以调用了。唯一的资格是在农村滚一身泥巴,干一辈子革命而已。

面对我们这里当今社会走后门成风,任人唯亲的事实,我并不怨天,也不尤人,只怪我自己不争气。我认为,我的孩子走上山下乡务农的道路是走对了。我们小城镇的孩子,平常少和农村社会接触,长大了让其到农村去经风雨见世面,以增长做人的才干,是很有必要的。但是,当孩子在务农实践中碰到的许多个人能力解决不了的实际困难问题,我要求国家能尽快给予应有的合理解决,让孩子能有一条自食其力的路子可走,我想,该不至于无理取闹和苛刻要求吧。

毛主席:我深知您老人家的工作是够忙的,是没有时间来处理我所说的事。可是,我在呼天不应,叫地不灵的困难窘境中,只好大胆地冒昧地写信来北京“告御状”了,真是不该之至!

谨此敬颂

大安!

福建省莆田县城郊公社下林小学

李庆霖敬上

一九七二年十二月二十日

这位小学教员的信,深深打动了曾经也当过乡村小学教师的毛泽东,他当即给李庆霖复信:

李庆霖同志:

寄上300元,聊补无米之炊。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

毛泽东

4月26日

毛泽东让汪东兴从毛泽东自己的稿费中取出300元,连同回信一起直接送邮局寄走。

周恩来当天即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毛泽东给李庆霖的复信,研究统筹解决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中的问题。

第二天,4月27日,周恩来继续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同政治局的部分委员听取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人关于安置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工作情况的汇报。全国自1968年以来,共计有700多万城镇知识青年上

山下乡,预计至1980年将达到1000万人。为此,政治局决定由周恩来、叶剑英、张春桥、李先念、王洪文、华国锋和吴德负责,以农林部和国务院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安置办公室为调研机构,参照北京等13个省、市、自治区报告中提出的问题,在近期内提出一个统筹解决的方案,其中包括指导思想、下放政策、准备工作、安置地区、干部带队、保健条件、三年补助、保护女青年、提供精神食粮、归侨青年安置等方面内容。该方案经中央政治局商议、毛泽东批准后,列入国家计划,提交5月中央工作会议讨论。

4月29日上午,也就是毛主席给李庆霖回信的第四天,新华社福建分社记者赖玉章突然来到莆田地委,点名要莆田地委宣传部通联站工作的下乡知青张玉钟陪他去办一件事。莆田地委宣传部通联站是个专门从事新闻报道的机构,共9人,其中只有张玉钟一个是莆田人,赖玉章每次来莆田采访基本都是由张玉钟陪同。

下午,赖玉章要张玉钟带他去城郊公社下林小学。张玉钟问他什么事?赖玉章一再对他交代:“要保密。”然后才告诉他说:“这个学校有个教师叫李庆霖,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毛主席不仅给他回信,还给他寄了300元钱。”

赖玉章将记录在笔记本上的毛泽东的回信内容念给张玉钟听,然后说:“这是中共中央办公厅通知新华社的,要先派记者来调查,连福建省委领导都还不知道呢。”

下林小学离城关只有两公里左右,他们坐了一辆人力三轮车到了这个学校。李庆霖正在上课,他们就在办公室等。

下课后李庆霖见到两个陌生人找他,神情很是惊异。待办公室没有其他人后,赖玉章开口问他:“你有没有给毛主席写一封信?”

李庆霖沉默很久都没答话。赖玉章微微笑着看着李庆霖,他终于重重地点了点头。

接着赖玉章说:“毛主席看到你的信还亲笔给你回了,并给你寄了300元钱。”

李庆霖听了脸上并没有露出笑容,而是紧张而严肃地反问:“毛主席是怎么回的?”

赖玉章给他念了信的内容,李庆霖脸上渐渐舒展开来,溢出兴奋

之情。

赖玉章说这件事还要十分保密,并告诉李庆霖,自己住在兴化宾馆某房间,约定晚上到宾馆细谈。

晚上19时多,李庆霖来到赖玉章宾馆房间。此时,他已经没有了白天那种拘谨严肃的神情,表现得非常高兴。他说话慢,语调也比较低,但完全打开了话匣子,从他家历史身世、儿子上山下乡遭遇的苦难,到自己如何想给毛泽东主席写信,都说得非常详细。他说:

那一天,自己在一张竹桌上写好了信,接着就写信封"毛泽东主席收",就拿出去邮寄。他一边走一边心里在打鼓,倒不是怕闯祸,主要是担心毛泽东收不到。因为这之前他也给周恩来写了一封信,却石沉大海。他想:"可能是周总理没收到,那主席要看到这封信就更难了。"走到半路,他脑子突然闪出一个念头,他经常看到报道毛泽东接见外宾时,外交部王海容都在场,不如把信寄到外交部王海容收,请她转交给毛主席。

他想到这里心里一阵激动,就马上折回家中,在信封上写上"外交部王海容先生收"。

张玉钟奇怪的问李庆霖:"王海容是女的,怎么称'先生'呢?"

李庆霖温和地笑了笑说:"'先生'是一种尊称,男女都可以用。"他还说他也给王海容写了一封短信,说自己家碰到天大困难,请她一定把信转给毛主席。然后就把给毛泽东的信套进去寄走了。

那晚,他们三个人谈到夜深才分手。

新华社福建分社记者赖玉章走后,李庆霖一连几日,心中惴惴不安。

5月2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将毛泽东主席的复信通知了福建省委,省委又通知了莆田地委和莆田县委。当时的县委书记是部队支左干部刘功,当他在电话里听到这一消息,激动地对着电话筒高呼"毛主席万岁!"

5月6日,邮递员给李庆霖送来一封信,是牛皮纸大信封,上面印着"中共中央办公厅"红色字样。李庆霖心里咯噔一下,直觉告诉他,这一定是自己那封信的回信了。他哆哆嗦嗦地将几页信纸展开,头页是毛泽东复信的打印件,毛泽东回信的原件留存在中共中央办公厅档

案室。李庆霖将毛泽东的复信读了一遍又一遍,泪流满面。他不敢相信这真的是毛泽东主席的回信。第二天傍晚,李庆霖才清醒过来,找到莆田县委大院,将毛泽东的回信给县委书记刘功看。他心想,这下好了,毛主席说统筹解决知青问题,同时也为打扰了毛主席他老人家而不安,但同时也担心就自己那一封信,全国几百万知识青年真的能改变自己的命运吗?

5 月 10 日,李庆霖收到毛泽东寄给他的 300 元钱,莆田县城厢镇的邻里们闻讯后来到居仁巷 15 号的李家,争相抚摸用大红绸挂在屋梁上的 300 元钱,叮嘱李庆霖:“这是毛主席送来的钱不能乱花了,要用红纸包好传给子孙后代。”

李庆霖立刻将 300 元钱存入银行,从那以后一直舍不得取出来用,后来也只是每年去取一次利息。

毛泽东的复信传到莆田县城,广大下乡知青及其家长们奔走相告,欢呼伟大领袖毛主席时时刻刻和人民群众心连心。

但是,毛泽东复信的消息传出,也让李庆霖受到当地一些干部的报复。县里派出两班人马对李庆霖信中揭露的问题进行反调查。县委信访办某负责人找到李庆霖的儿子就骂:“你这个二流子,不好好劳动,你还骗毛主席!”一些地方掌权的干部说:“李庆霖专门给领导过不去,这是对党没有感情。”

但是,这些地方官吏的怨言和责难以及小动作,在当时也只是“蚍蜉撼大树”了,因为有毛泽东的回信,往日忍辱含垢的李庆霖现在腰板硬得很。中共莆田地委专门组织了 20 名干部分赴下属四个县调查,发现知青安置中存在的问题比李庆霖信中说的还要严重。

# 第1271回：空军会，三位司令员解脱 筹“十大”，中央召开工作会

1973年3月18日至5月18日，空军四届五次党委扩大会议在京西宾馆举行。这是林彪叛逃以后，空军党委首次举行的高级干部会议。会议通过两个月“揭、批、查”，基本弄清楚了同林立果“联合舰队”有关联的人与事。

此时，许世友、韩先楚、杨得志3位司令员给毛泽东的检讨信也均在1973年5月上呈毛泽东和党中央。

5月4日，毛泽东接见韩先楚，对他说：“路线出感情，你和许世友同志对我还是有感情的。过去的事算了，以《国际歌》为界。”

“《国际歌》为界”指的是1971年毛泽东南巡时和许世友、韩先楚“打招呼”同唱《国际歌》。

很快，韩先楚的信印发政治局。他在信中检讨说：“我在党的十次路线斗争中犯了路线错误。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上，写了一封支持林彪反革命政变动员令的表态信，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我错怀疑过张春桥同志，在这里我向中央检讨，向张春桥同志道歉！”

但是，许世友的信却退了回来。许世友的检讨信是直接由李德生转呈毛泽东的。毛泽东批评许世友：“你的信只写给我，要不要交政治局看？还是给你退回去。”

5月5日，空军党委四届五次会议后期，毛泽东在他的住地询问空军会议情况后，对李德生说：“你到南京去一下，听说许世友同志天天喝很多酒，酒喝多了伤肝，你劝劝许世友同志，不要再喝那么多酒了……”

李德生受命后，于第二天上午乘空军伊尔-24专机从北京直飞南京，中午到达南京。许世友立即到招待所看望，见到李德生后非常高兴。

李德生向许世友转达了毛泽东对他的关怀和问候，许世友亲切地

拍拍李德生的肩膀说:“走,走,吃饭,吃饭。”

二楼小餐厅里,桌上早已放着两瓶茅台酒。李德生酒量不大,但饮酒风格同样很豪爽。他总是一开头就和熟悉的人一杯一杯地干,不拖泥带水,也不耍滑头,喝够酒量就不再喝了。这样,对手也不好意思勉强他,所以,他很少醉过。

李德生熟悉许世友的脾气,他按照许世友的惯例,头一杯酒端起来,一饮而尽。许世友高兴,连饮三杯。许世友喜欢李德生喝酒时豪爽痛快的脾气,也不再劝。

酒过三巡,李德生说:“你知道毛主席为什么派我来吗?”

许世友哈哈大笑:“你说,你说。”

李德生端起酒杯:“就是为了这个。”

接着他恳切地说:“主席是专门要我来劝你的,希望你以后少喝酒,更不要喝闷酒。这样吧,从今天开始,少喝一点吧,现在我喝多少,你喝多少。喝完了,咱们吃饭。”

许世友脸色阴下来说:“主席劝我少喝酒,总不会还是为了那封信的事吧。”

李德生说:“主席派我来劝你少喝酒,是怕你喝闷酒伤身。”

许世友停了一会儿,再现豪气,说:“少喝嘛,不是不喝。我还是老规矩,什么时候喝,什么时候不喝,我心里有数!”

许世友又喝了几杯,对李德生说:“我给你讲讲老百姓的顺口溜吧,‘语录不离手,万岁不离口,当面说好话,背后下毒手。”

李德生说:“这大家都知道是讲林彪的。”

许世友又说:“戴眼镜,夹皮包,能总结,会提高,思想一包糟,打起仗来朝后跑。”

李德生说:“前面几句,群众中早有传闻,后一句是你许司令的创作吧。”

许世友敛住笑容:“你回去报告主席,我许世友感谢他老人家的关心,我以后注意,少喝酒;我也请他老人家放心,我许世友是忠于党的,不会因酒误事。”

只停留一天,7 日,李德生就赶回北京,向毛泽东单独汇报了南京之行,又继续参加空军的会议。

许世友收到毛泽东退回的信后,改过抬头,重新送呈毛泽东及政治局,再没下文。

杨得志的信送上去后,也没回应,也没印发,看样子也是过关了。

5月15日,参加空军会议的代表和各军兵种的领导汇集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听周恩来代表党中央、中央军委作会议总结。周恩来的讲话,从夜里22时30分开始,一直持续到16日凌晨3时。他说:“空军这次会议是一次搞好内部的会议。林彪抓空军搞了许多阴谋活动,主席一直注意着各种势态的发展,感觉到林彪的思想不对头。”“空军党委不仅犯了政治路线错误,而且也犯了组织路线错误,违背了党性。党委的职责,就是要在关键时刻发挥作用,不问一个为什么,就会上当。”

周恩来要求新成立的空军党委在清查林彪的人与事时,要实事求是,要允许人家犯错误,也允许改正错误。

5月18日,空军党委向中央上报了《空军党委四届五次全体扩大会议情况报告》。

5月19日,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商定中央工作会议的议程,并通过出席会议的中央和地方党政军负责人名单。

当天,山东省委和济南军区5位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常委来到北京。他们一下飞机,就听到已在北京养病的一位山东省委副书记说:“杨、袁那个问题没有完”。

5月20日,周恩来向毛泽东报送参加中央工作会议人员名单,其中有:陈云、李富春、邓小平。

毛泽东对中央工作会议的指示中提到:只注意生产,不注意上层建筑。路线不对,要批判孔子。

5月20日晚,中共中央工作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周恩来主持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各省市区党委、各兵种大军区负责人及中央各部门负责人共246人出席了会议。

周恩来宣布会议主要议题是:

一、筹备召开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

二、讨论批林整风问题;

三、讨论本年度的国民经济计划。

周恩来指出:中共“九大”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都是正确的,“九大”是胜利的大会,但受到林彪的干扰,林是昙花一现的人物。今后,全党仍要继续高举“九大”团结、胜利的旗帜。

在谈到邓小平“复出”一事时,周恩来表示:“中央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职务的文件,是一个有代表性的文件,对此绝大多数同志都是满意的。小平同志今天出席了会议,同样情况的,还有其他一些人也出席了会议。”

周恩来还宣布:“根据毛主席的提议,政治局决定把王洪文调到中央,列席政治局并参加工作。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会议决定王洪文负责党章修改小组,起草修改党章报告,并提出新的党章草案。”

周恩来在会议上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一、项目多了,计划工作至今没有走上轨道;二、搞计划要依靠地方,以省、市、自治区为主;三、要把协作区搞起来。一旦有事好办。

会议印发了三个文件:

一是印发了林彪、叶群的笔记。林彪的笔记是他的内心独白。人们感到震惊,这位“语录不离手”的“副统帅”的内心,竟是那样龌龊、卑劣!印发这批笔记,为的是进一步开展批林整风。

二是印发《中央关于党的十大代表的产生的决定》,这是经毛泽东阅定的。中共十大的代表条件是:

(1)所有代表必须是中共党员;

(2)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特别是第十次路线斗争中经过锻炼考验表现好的,联系群众,为群众信任的,也要包括一部分犯了严重错误,作了检讨,愿意改正,并取得群众谅解的;

(3)本人历史清楚。

三是印发毛泽东核定的《中央政治局关于修改党章问题的请示》。

5 月 21 日,周恩来致信毛泽东,就中央关于党的“十大”代表产生的决定草案说:这个决定草案已在中央政治局讨论多次,总人数从“九大”1500 人减为 1200 人自然有些困难但是可以解释的。

他提出:在九届 279 名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当中,有 223 人均

拟推选为“十大”代表。

毛泽东圈阅了此信。

济南军区政委袁升平请示周恩来:“我们要不要在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上进一步作个检查?”

周恩来说:“你们去年在北京作了检查,回济南又作了检查,群众已经谅解,这次就不要再检讨了。”

袁升平又说:”杨得志同志和我都被提名为‘十大’代表候选人。”

周恩来说:“你们是上一届中央委员,按党的惯例,上届委员是下一届的当然代表嘛。”

5月23日,中央工作会议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周恩来就党的“十大”代表名额产生情况讲话。张春桥就党章修改问题作了说明。

5月25日晚,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根据周恩来的建议,董必武、朱德、许世友、陈锡联参加会议。

会上,周恩来汇报了中央工作会议各项议程进展情况。

毛泽东提出:要注意抓路线、抓上层建筑、抓意识形态,并要求学一点历史和批判孔子。

毛泽东强调:批林整风,要批判从严,处理从宽。他说:“以‘913’为线,以前是有错误,允许改正,犯过错误的,应该向党说清楚。今天不认识,可以等待明天,明天不认识,还可以等待。犯了错误的,只要自己承认了,允许改。”

他批驳了社会上流传的“文化大革命失败了”的说法,提醒政治局,要注意抓路线,抓上层建筑,抓意识形态,要学一点历史,要批判孔子和尊儒思想。

他说:“人要能上能下,我们的人就只能上不能下。我是多次又上又下,正因为这样子,所以有时候就能够得到机会读书。即使不是自己犯了错误而是被错怪了的,那也要安心读书,得机会嘛。”

谈到对待犯错误的人处理时,毛泽东说:“一面要坚持原则,一面水又不可太清。一点错误没有,没有这样的人。哪有那么清的,水至清则无鱼。”

他说:“政治局委员要懂得一点历史,不仅中国史,世界史,分门别类的政治史、经济史、小说史也要懂一点。从乌龟壳(指使用甲骨文的

商周时代)到共产党这一段历史应该总结。中国小说,艺术性、思想性最高的,还是《红楼梦》。读《红楼梦》,不读五遍,根本不要发言,因为你不能把它的阶级关系弄清楚。《红楼梦》的作者,是生在康熙、雍正之后的曹雪芹。在雍正年代他家是受整的,抄了家的。”

5 月 26 日,中央工作会议举行第三次全体会议。周恩来传达毛泽东 5 月 25 日在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内容。李先念讲解 1973 年国民经济计划。

周恩来说:“关于基本建设问题,从大跃进到现在都没有解决好,我们大家都犯过一些错误。关于开展对外贸易,我们主要依靠自力更生,但先进技术还是要学,要互通有无,平等贸易。”

5 月 31 日,中央工作会议举行第四次全体会议。周恩来在会上着重谈了国民经济计划问题。

会议讨论了《中央关于党的十大代表的产生的决定》,确定代表名额为 1740 人。

会议同意经毛泽东审定的《中央政治局关于修改党章问题的请示》中的各项规定。同意党章修改问题的重点是总纲部分;按毛泽东多次提出的现在还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进行修改,不写入“三个里程碑”的提法。不写入人名,增加毛泽东近年来若干新指示和“第十次路线斗争”的经验等内容。

会议决定由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负责中共党章修改小组,在中央政治局领导下,起草《中国共产党章程(草案)》。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会议宣布解放谭震林、李井泉、乌兰夫、李葆华、廖志高、江华、江谓清、王稼祥、秦基伟、李成芳、方强、陶鲁笳、曾希圣等 13 名老干部。

会议还宣布,经毛泽东提议,中央政治局决定王洪文从上海调中央工作,与华国锋、吴德两人列席中央政治局会议并参加政治局的工作。

会议当天结束。

6 月初,政治局确定党的“十大”《政治报告》起草小组成员并开始起草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

政治局确定的报告起草小组成员有周恩来、张春桥、王洪文、姚文

元、叶剑英、李先念6人,由张春桥执笔。

6月16日,中共十大政治报告起草小组开会,确定报告要点。当天,周恩来向毛泽东汇报政治报告起草小组讨论情况。毛泽东听完汇报,基本认可报告稿的要点,并提出具体补充意见。他说:政治报告中要指出时代的特点,现在,仍处于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这个与马克思主义与列宁所处的时代相同,要引用列宁在帝国主义论中所说过的话为证。同时还指出:报告中要指出一种倾向常常掩盖另一种倾向。此外,应多引用一些马、列的话。

当天,中共中央还对5月18日《空军党委四届五次全体扩大会议情况报告》作出批示,下发了中发[1973]22号文件,同意《空军党委四届五次全体扩大会议情况报告》。认为这次会议开得很好,弄清了路线,改组了空军领导班子,对深入批林整风,加强空军建设将起重大作用。

6月17日,周恩来就起草"十大"政治报告问题给张春桥的信,转告毛泽东的意见。

# 第1272回：回上海，王洪文读《刘盆子》 国务院，召开知青工作会

王洪文回到上海搞调查研究，同时为召开中国共产党的“十大”做准备。他一到市委康平路办公室，就急着要找市委写作组的负责人朱永嘉。为什么呢？王洪文说，在北京的时候，毛泽东要他读“二十四史”《后汉书》中的《刘盆子传》，因为是古文，很深奥，他读不懂，所以趁回上海之际，找朱永嘉给他“解惑”。

《刘盆子传》中写道：“刘盆子者，泰山式人，城阳景王章之后也。”式，就是式县，位于泰山脚下的泰安附近，今山东宁阳。“景王章”就是刘章，汉高祖刘邦的孙子，而刘盆子是刘章的后代，身上有点皇族血统，可以算是刘氏的宗室。但这些贵族过了几代之后，逐渐落魄，基本上都成了普通老百姓。到了刘盘子这一代，他已经就是一个放牛娃了，人称“牧牛童子”，社会地位极为卑微。

新莽末年，赤眉农民起义。“琅琊人樊崇起兵于莒，西攻长安”。有人给起义军的领袖樊崇出主意说：“今将军拥百万之众，西向帝城，而无称号……不如立宗室，挟义诛伐，以此号令，谁敢不服？”意思是说，要赤眉起义军领袖樊崇找一个刘氏宗室来做皇帝，以便师出有名，号令天下。樊崇也深知，老百姓心向汉室，此时任何一个异姓人出来称帝，无异于玩火自焚。于是，他采纳了这个建议，开始搜罗刘姓皇族的后人。这一搜罗不要紧，竟然搜罗出来70多个人，其中数刘茂、刘孝、刘盆子3人的皇族血统最近。究竟该挑选谁来当皇帝呢？樊崇等人商议，听说古时候天子带兵者称为“上将军”，他们就想了一个办法，找了3块小木片，其中一块木片上写了“上将军”3个字，和另外的两块空白的小木片，一起放置在一只方形的竹器里，规定谁摸到“上将军”3个字的木片，谁就当皇帝。

于是，他们在陕西华县的郑北地方筑起了高台，举行一个隆重的仪式，樊崇把军中的高级将领都请来，会集在台阶下，让刘盆子等3人

站在高台中间,依照年纪的大小先后到竹器里去“摸彩”。“牧牛童子”刘盆子的年纪最小,论到最后一个摸,却偏偏是他摸到了那块写有“上将军”字样的木片凭证。于是,大伙都说,就是他了!将领都向他膜拜称臣。

昨天还是放牛娃,今天就成了皇帝。史载,当时刘盆子“被发徒跣,敞衣赭汗”,即披发赤脚,身穿破衣烂衫,只有15岁,头脑一片混沌,忽然看见台下上百人就跪下山呼万岁,紧张得差一点哭起来。

当上皇帝的刘盆子对朝政一点都不感兴趣,依然我行我素,经常和一班放牛娃嬉戏……接下来,刘盆子就跟着起义军转战。就在他登基的这一年,起义军攻入长安,灭刘玄政权。尔后,因饥荒向东撤退,被刘秀部所包围。刘秀的军队和赤眉军进行了几场血战,赤眉军大败,死了十几万人,最后投降。刘盆子随樊崇等都成为刘秀的阶下囚。

可能是同宗同脉的原因吧,光武帝刘秀可怜刘盆子这个孩子,就封其为赵王郎中,赐荥阳均输官,食其税终身。现泰山天胜寨尚有刘盆子洞等遗迹。

王洪文的经历,在某些方面和刘盆子有相似之处,他原来的社会地位低微,从小也放过牛、养过猪,在东北吉林的田野里干过农活。早在1968年国庆节,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他时,他就向毛泽东汇报了自己的这段经历。毛泽东也曾经多次向别人介绍过王洪文的身世,说他是“三结合”的:务过农,当过兵,做过工,以后又当过干部。

王洪文清楚,毛泽东要他读《刘盆子传》,肯定是要他从中领悟些什么。他约朱永嘉第二天带《后汉书》到康平路大院,给他详细讲一讲《刘盆子传》。

朱永嘉接到通知后,在写作组办公室把这篇文章又认真读了一遍!读毕,拍案而起,对坐在旁边的市委写作组几个领导核心说:“意思很清楚,毛主席叫王洪文不要做刘盆子!”

接着,朱永嘉急匆匆地来到康平路市委小礼堂楼上徐景贤的办公室,和徐景贤商量怎么讲《刘盆子传》。他们都懂得:天机不可泄漏,毛泽东要通过《刘盆子传》传达给王洪文的意思,只可意会,不可言传。所以,徐景贤给朱永嘉出了一个主意:只做古文翻译,不发表任何议论,除了把《刘盆子传》用白话文详细讲解一遍以外,其它什么话都

不说。

第二天,朱永嘉来到康平路大院,坐在王洪文办公室里的沙发上,两个人翻开了《后汉书》。朱永嘉逐字逐句地讲解《刘盆子传》。王洪文听得很仔细,还自己捧着《后汉书》看了许久。

听完了,看完了,王洪文若有所思,一声不吭。过了一会儿,王洪文谈了一些别的事情,问了问市委写作组的工作,这项读书活动就算结束了。

6月10日,中共中央下发[1973]21号文件,转发李庆霖来信和毛泽东的复信:

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各大军区、省军区、各野战军党委,党中央和国务院各部委领导小组、党的核心小组,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党委:

伟大领袖毛主席一九七三年四月二十五日对李庆霖同志的来信作了重要答复。现将毛主席的复信和李庆霖同志写给毛主席的信,印发给你们,请印发至公社、街道以上各级党委,并传达到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和广大群众。各级党委要认真学习,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工作,严格检查,加强领导,总结经验,上报中央。

各省、市、自治区、各大军区在开党委扩大会议时,可分出一天时间,宣读学习毛主席的信,并对你们从五月中央工作会议带回去的《关于当前知识青年下乡工作中几个问题的解决意见》,以及这次印发给你们参阅的中共福建省委《关于认真学习毛主席给李庆霖同志的信的通知》,进行讨论。准备在六月下半月,由各省、市、自治区、各大军区各派一人(内有专管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工作的一人),来中央汇报和统筹解决这一问题。

中共中央

一九七三年六月十日

6月22日至8月7日,国务院在北京前门饭店召开了全国知青上山下乡工作会议,贯彻执行中央提出的《关于当前知青上山下乡工作中几个问题的解决意见》,全面调整知青上山下乡政策。在中央领导的高度关注下,各地痛下决心,相继解决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中存在的一些突出问题。

会议期间,一份新华社的《情况反映》引起中央领导和与会者的震动:云南生产建设兵团一营长贾小山,强奸女知青20余人;一师某指导员张国亮强奸女知青几十名;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一团长黄砚田、参谋长李耀东强奸女知青50多人;内蒙生产建设兵团被奸污的女知青达299人,罪犯中有部队现役干部209人。

周恩来看后怒不可遏:“公安部要速派人去,不要手软!”

李先念气愤地说:“这些人不是共产党,是国民党,至少是国民党行为,不知为什么得不到纠正?省委和军区难道说也不知道吗?”

在中央领导的关注下,各地大开杀戒,将以上罪犯处以死刑,以平民愤。

1973年6月国务院召开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上披露:“中央机关,各省市领导机关的高级干部子女,下乡的寥寥无几,至今仍留在农村的为数更少。”风气不正产生巨大的示范效应,当时“走后门”成风,参军、入学、招工、病退回城要“走后门”,连看电影,买自行车、获得配给的紧俏商品也要“走后门”。

6月下旬,福建省委和莆田地委、县委都得到了正式渠道传来的一个内部消息:毛主席对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说:要问一下福建的李庆霖是不是党员?如果是党员,可考虑推选他为“十大”代表;如果不是党员,有入党要求,可吸收他人党并参加“十大”,如果没入党要求,可让他出席“四届人大”。

福建省领导层内部都在紧张商讨如何落实毛泽东的这一指示,却没有一个领导正面向李庆霖透露。而身兼福建省党、政、军一把手的韩先楚接到毛泽东的这一内部指示后,即于6月23日,派专车将李庆霖接到福州,赞扬他给毛泽东的信写得很好,并说中央有交代,生活工作上有困难尽可直说无妨。李庆霖当时提了两个要求:一是1958年大跃进时,李庆霖因临时接手的一个基础差的班级,初考成绩低而被插上“白旗”,撤销了教导主任职务,工资由55元5角减为42元5角,他要求能拔掉插在他身上的这面“白旗”;二是其妻张秀珍原在莆田二中做工友,是“有户口”的正式公职人员,困难时期被辞退,要求给她恢复一份正式工作。

韩先楚说:“把白旗插到小学教员头上是错误的,这是资产阶级反

动路线,当然应该平反!”

这两件事韩先楚都认为合理,很快就解决了。李庆霖被调到莆田全县最好的一所小学即东方红小学,即现在的实验小学,担任领导小组副组长,相当于现在的副校长,还补发了从1958年到1973年被降低的工资,妻子也被安排到莆田第四中学当正式职工。

李庆霖在1973年8月11日“平反”后写的一份报告中可以看出他当时欢欣鼓舞的心情:

报 告

莆田县革命委员会:

我原是我县前黄石区惠洋小学的教导主任。不久,改调到前忠门区前坑小学。职务不变。因所教出来的应届高小毕业生,竟没有一个考上公立初中,全都录取在农业中学里。我被前莆田县教育局拔了“白旗”,受到降职降薪处分。

由于许多客观条件的限制,我对处分极其不服气,曾多次向上级领导提出过申诉。今蒙莆田县革命委员会政治组莆革政字(73)第041号决定,给我平反。这样,这个整整十五个年头(一九五八年至一九七三年)的冤案,一旦昭雪鸣平,真叫人高兴万分!我认为:这是伟大领袖毛主席英明领导的结果。我要又一次纵情高呼:“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十五年来,我受到错误处分后的政治上和经济上所蒙受的损失都是相当巨大的。结合当前我家庭的实际困难处境,我恳切要求上级领导在给我平反后能给我以适当的经济困难补助。是否有当,敬请批示。

谨致

崇高的革命敬礼!

李庆霖

一九七三年八月十一日

# 第1273回：章士钊，九二高龄赴香港 看演出，江青细再提建议

1973年5月25日的一天，一架来自北京的中国民航专机破天荒地降落在香港启德机场。乘坐这架中国政府专机的不是中共要员，而是以前国共和谈国民党政府代表章士钊及其家人。这一意味深长之举，轰动了香港。章士钊虽说是来探望他在香港的第三夫人殷德贞。但在他到达香港的头几天，香港及澳门的中、英文报纸都以极大的篇幅报道了章士钊到港的消息，并猜测章士钊此行必带有同台湾和谈的使命。

章士钊已是92岁高龄，他是在专门的医生、护士及亲属的陪同下，坐着轮椅被人抬下飞机舷梯的。中国有句古话，“九十不出门”，章老先生绝非仅为探视小夫人而来。作为中国近、现代史上一位有影响的政治活动家和学者，章士钊一生跨越了满清、民国和新中国三个时代，在思想、政治上走过曲折复杂的道路。

他在武昌求学时，与黄兴同住一室，成为莫逆之交。他参加过蔡元培、章太炎的爱国学社，与邹容是同窗好友。他还在南京学堂组织过反清学潮，并策划过行刺广西巡抚王之春的暗杀行动，并为此坐过大牢。他曾经编译过介绍孙中山革命事迹的书《三十三年之梦》。编译中因一时笔误，将孙先生的真名“孙文”与假名“中山樵”的两个字连缀成文，写作“孙中山”。后来该书出版，这个名字也随着传开，久而久之，竟成了孙先生的正式名字。

1970年，章士钊身边的奚夫人于因肺炎去世，他失去相依相伴的老伴，内心异常孤独。他是一个从不虚度光阴的人，从1972年下半年开始，他向身边的人谈了去香港为祖国的统一大业尽他最后一份力的念头。另外，殷夫人在香港，已阔别了9年之久，也希望一晤。

章士钊让他的小女儿章含之向周恩来总理汇报他去香港的想法，周恩来听后说：“与台湾方面的对话，行老（指章士钊）去是再适合不过

了。过去1962年、1964年行老两次赴港,做了大量工作。可惜后来中断了。但是,行老已92岁高龄,恐怕身体不允许作此长途旅行了。”

章士钊因为几年前曾从病床上掉下来造成骨折,致使腿部肌肉萎缩行动不便,只能靠轮椅代步。此事一度作罢,章士钊也只是作为遗憾而谈起,述说此生最大的心愿是想看到台湾回归,祖国统一。

1973年,章士钊患病住北京医院,写了一封信给毛泽东。信中说:“与其让我僵卧北京,不如到香港动一动。”

毛泽东在一次会见时,突然提到了章行老希望去香港促成国共和谈的事,并问章含之:“行老还有没有这个念头?”

章含之说:“有是有,老人常念叨,不过,总理和我都觉得他年龄太大了,恐怕去不了。”

毛泽东想了一下说:“我们如果准备得好一点,是不是还可以去呢?譬如说派个专机送去?”

章含之一时不知如何表示,她确实很怕父亲经不起旅途劳顿。

毛泽东将章士钊的信批转给周恩来,请周恩来考虑个周全的计划,是否可在保证章士钊健康的条件下送他去香港。

周恩来决定由外交部跟港英当局谈好,然后由民航派专机带上医务人员陪章士钊飞香港。

章含之将此事转告了父亲,章士钊很高兴,说:“毛主席懂得我的想法。”

周恩来做了周密、认真的筹备,安排了中国民航派一架专机送章士钊,随机派了警卫,并为章士钊配备了北京医院内科张惠芬主任及护士小丁同去。章含之和她大哥章可随行,还带了章士钊一个秘书、一名家中女厨工,照顾他生活的保姆……

到了北京机场,一走进宽敞的贵宾候机室,章士钊便看到了熟悉的周恩来总理!周恩来迎上前去,双手握起章士钊的手,叮咛保重。周恩来亲自来机场送行让章士钊非常感动,他眼眶湿润,抓住周恩来的手,久久说不出话来。半晌,才讲出5个字:“请总理放心!”

外交部为章士钊的赴港与港英当局进行了细致的洽商,当时台湾与香港通航,而中国民航则尚未开通,章士钊的专机成为第一架中华人民共和国飞降在启德机场的飞机。这次特殊的航班,加上章士钊本

人的资历、身份,特别是他在1949年就担任过国民党“和谈”代表,使这次“探亲”本身就成为一个向台湾发出的强大和谈信号。

阔别这么些年,香港变得更加繁荣了,而那些老朋友却苍老了许多。在送章士钊去殷夫人寓所的路上,宋希濂的哥哥、国民党候补中央委员、立法委员宋宜山说:“行老92岁还来香港为国事操心,敬佩呐,惭愧呐!”

章士钊只淡然一笑:“这次来是探亲,也顺便看看老朋友。”

原国民党宣传部副部长、时任香港中国文化协会副主席、《香港时报》管理委员会主任许孝炎会心地笑着说:“今天本港的中、英文报纸都以极大的篇幅报道了行老将到港的消息,并且做了种种猜测,很多记者都说行老带有和谈使命。”

宋宜山诚恳地说:“和谈不是早就被蒋公拒绝了么?可惜呀,可惜!不过,我们都愿意通过各种途径来促成国共两党的高级谈判。”

章士钊没有说什么,只是郑重地点点头。

许孝炎、宋宜山均为国共两党、大陆与台湾之间的联系人。

1957年4月16日,周恩来在北京为来访的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举行盛大酒会。卫立煌应邀出席酒会。

席间,周恩来向伏罗希洛夫介绍了卫立煌。当年,卫立煌统帅中国远征军在打通滇缅公路的战役中痛击日军,扬名中外。伏罗希洛夫对这段历史也是有所了解,便热情地握住卫立煌的手说:“只要我们团结一致,我们就是无敌的。”

周恩来笑着说:“国共两党过去已经合作了两次。”

毛泽东紧接着说:“我们还准备进行第三次合作!”

第二天,《人民日报》刊出这条消息,标题为“毛主席说,我们还准备第三次国共合作”。

时任中央文史馆馆长的国民党元老章士钊先生,主动请缨,要到香港找过去的朋友做蒋介石的工作,以实现第三次国共合作。毛泽东、周恩来同意了章士钊的请求,中共中央还专门给蒋介石写了一封信。信的结尾写道“奉化之墓庐依然,溪口之花草无恙”。

在周恩来的具体安排下,章士钊到香港会见了时任《香港时报》董事长兼社长的许孝炎。

许孝炎名为《香港时报》负责人,实则是台湾当局派在香港负责国民党文化宣传工作的。他与章士钊不仅是同乡,而且在抗战时期同为国民参政员,交往甚密。

章士钊向许孝炎谈了中共以和平方式统一祖国、实现第三次国共合作的设想与诚意,并拿出中共中央的信,委托他亲手转交给蒋介石。

事关重大,许孝炎不敢怠慢,当即从香港飞往台北,直奔“总统府”,亲手把信交给了蒋介石,并详细汇报了与章士钊的会谈情况。

蒋介石打算派人到大陆与中共面谈,最后敲定了许孝炎推荐的3人中的宋宜山。于是,宋宜山于1957年4月来到了大陆,周恩来亲自在北京有名的饭店东兴楼宴请了他。随后,统战部长李维汉作为中共代表,与宋宜山就第三次国共合作、祖国统一的一些具体问题进行了协商。

宋宜山回到香港,立即将他的大陆之行写成报告上报蒋介石,未获同意,从此,宋宜山留居香港。

这次章士钊到港,第二天就急匆匆安排会见各方面的旧友。一个星期以后,因为工作的需要,章含之要离港回京了。临行前,章士钊对女儿说:“转告毛主席和周总理,我很好,不要挂念。有点困难,主要是于髯老(于右任)等老朋友去世了,新的关系正在设法打通。”他深情地说:“事情办好后我就回去,我很想念北京。最多3个月吧,请周总理不要忘记派飞机来接我回去。”

然而,命运无情地使92岁的章士钊壮志未酬。就在章含之回京后不久,章士钊再一次病倒了。几天之内,他的病情迅速加剧,许孝炎等朋友请来了全港最有名的医生为他精心治疗,也不见有一点好转。6月28日,周恩来总理得知章士钊病危的消息后,十分焦急,立即通知章含之准备赴港,并指示医疗队火速赶赴香港,尽一切办法稳住病情,然后护送老人回京治疗。

7月1日凌晨,正当一切准备就绪,医疗队和章含之即将出发时,突然接到香港来电,章士钊已于凌晨带着未遂的心愿和遗憾永远离开了人世。

6月24日,江青观看歌舞演出时说:“怎么一看都是少数民族的东西,汉族的为什么不搞?汉族的歌舞也很丰富多彩,应该很好发展,要

攻汉族舞,要搞些短小的汉族歌舞。《霸王别姬》就可搞成一个很好的剑舞。京剧可说是集汉族歌舞精华之大成。《击鼓骂曹》可以搞成一个很好的器乐曲。要很好发展汉族舞蹈,不要都搞少数民族的。”

“弹筝的女同志不敢穿裙子,可以穿褶裙,设计几种,淡绿、淡蓝、银灰色的。”

“你看又不敢穿裙子。你们不敢穿我就带头穿。不要把女同志打扮得灰溜溜的。墨绿的、玫瑰红的都可以。褶子可以打在两边,可搞飘带,袖口、领边,可绣些小花。京剧的大包裙,中国不穿,朝鲜还穿”。

“你们不敢穿,我带头穿。”

6 月 25 日,江青看了京剧《杜泉山》后说:“柯湘主调音乐要京剧化一点。现在我跟你们说,京剧还是要姓京。”

7 月 1 日,江青观看中央乐团音乐会演出。她在演出期间及演出后评论说:

“伴奏的女同志还是穿裤子,不敢穿裙子。女同志‘夏穿裙,冬穿裤。’设法把裙子设计出来。女同志穿裙子,还要解决袜子问题。舞台上,生活中都要注意。出国要穿连衣裙,四幅,拼起来,直着垂下来。样板团的女同志要穿裙子。但不要穿超短裙。军队女同志服装也要设计得好看些,也可以穿裙子,还有衬衫。”

对正在进行的越剧改革,江青说:“南方的越剧正在改革,有人说改得好,有人说改得不好。我说改好,不改不适合时代的要求,不改怎么行?声部要改,搞音乐的要帮助他们去改。”

总政为落实江青 6 月 24 日观看歌舞演出时的讲话精神,出了题目为《落实江青同志等中央首长关于音乐舞蹈的指示》的两期简报。江青对其中提到她在 6 月 24 日讲话时说的“尽量少安排少数民族歌舞”一句,补充说明到:“不要片面性、绝对化。我不是说不让演少数民族歌舞,是比例太大,要提倡搞汉族舞。我一说剑舞,都去搞剑舞,也可以搞棍舞、刀舞,要举一反三。要有辩论法。剑舞可以穿古装,也可以穿现代服装。千万注意不要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穿裙子也不要那么死,也可以穿裤子。一不能辩证,二不能举一反三。”

她还说:“头发谁都不敢烫,我带头烫。不能都弄成三毛流浪记。总不该让 40 岁以上的女同志梳两个小髻。该烫的还是可以烫。当然

也不能搞成奇装异服。上海出现过这类现象,要煞一煞。但也不能乱蓬蓬。有的女同志,年岁大了,可以梳抓髻,结彩带。长发也可以,把长发盘起来。”

她传达了毛泽东的一条指示:“毛主席指示,将《杜泉山》仍改为《杜鹃山》。”

# 第1274回：《新情况》，毛泽东批外交部要读书，不同意“尊孔反法”

1973年6月16日，苏共总书记、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勃列日涅夫乘坐的飞机在美国安德鲁斯空军基地降落，开始了他对美国为期8天的访问。这是勃列日涅夫首次访问美国，陪同人员有外交部长、外贸部长、民航部长。到机场迎接的是美国国务卿罗杰斯。当晚勃列日涅夫被安排在戴维营休息。6月17日，美国总统尼克松白宫南草坪举行仪式，欢迎勃列日涅夫的来访。尼克松和勃列日涅夫就限制战略武器、经济、贸易等问题进行了广泛的会谈，其中争论最多的是防止核战争问题。苏联强烈要求签署一项防止核战争的条约。6月20日，美国驻华联络处主任布鲁斯紧急约见中国外交部负责人，面交尼克松致周恩来信的副本，正本已于6月19日由基辛格交给黄镇，并提出希望周恩接见的请求。外交部据此起草了周恩来会见布鲁斯的谈话要点，于6月22日报请毛泽东审阅。

报告说：“尼克松来信，主要向我国解释美国拟同苏联签订‘防止核战争协定’的理由，表示希望我国表达反对该协定的意见的方式不要使美国政策‘复杂化’。”

周恩来指示：“这是一件大事，值得注意，要好好研究。”

6月22日晚上，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会见马里国家元首兼政府总理特拉奥雷，周恩来在座。毛泽东提出“第三世界”的说法。他说：

“我们都是叫作第三世界，就是叫作发展中的国家。你不要看中国有什么展览会啊，其实啊，是一个很穷的国家。西方国家呢，不大行了，但无论怎么样，这些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是创造了文化，创造了科学，创造了工业。现在我们第三世界可以利用他们的科学、工业、文化的好的部分。”

特拉奥雷说：“我们马里共和国的人都认为你是一个天才，而且是

有史以来唯一的天才。”

毛泽东说:“你把我吹得太高了。”

特拉奥雷说:“法国人教导我,拿破仑是有史以来唯一的天才,但我认为同毛主席对世界的贡献相比,拿破仑不及毛主席的三分之一。”

毛泽东说:“拿破仑,无论怎么样,后人是对他表示尊敬的。你不要说我是天才,你说拿破仑好了。这个人相当聪明,他所以能创造法国的法典,就是因为他读过罗马法典。拿破仑晚年的政策不那么高明,一不该占领西班牙,引起广大的农民游击战争反对他;二不该去打俄国。”

特拉奥雷说:“我说一个人是天才,就是指他的思想。”

毛泽东说:“我是地才,地就是土地吧。”

特拉奥雷说:“我看了你的军事和政治著作。”

毛泽东说:“都是人民群众的经验,我作的总结。没有人民,啥事都干不成啊!请你少吹一点了,我的好朋友啊,你也不要强加于我。”

特拉奥雷问:“你们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什么时候结束的?”

毛泽东说:“还有一点尾巴。”

6月24日,毛泽东看了周恩来当日报送的外交部6月22日关于建议周恩来就苏美签订该协议会见布鲁斯的请示报告。毛泽东阅后,让王海容转告周恩来、姬鹏飞、乔冠华,“与资联合常忌斗争”。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周恩来在6月25日会见美国驻华联络处主任布鲁斯时指出:“我们对美苏签订的核协定持怀疑态度,中国政府仍坚持中美上海公报的立场。历史表明,签订这类条约是靠不住的,现苏联领导人访美给人以两个大国主宰世界的印象。我们不怕孤立,首先我们不丧失立场,同时我们又是现实主义者。说许多空话,不如做一件实事。”

6月26日,毛泽东看了周恩来与布鲁斯的谈话纪要后,当晚让王海容、唐闻生转告周恩来,“这才腰杆子硬了,布鲁斯就舒服了。”

按照周恩来“这是一件大事,值得注意,要好好研究”的指示,外交部美大司美国处、苏联东欧司苏联处几人讨论后,由副处长张再执笔,写成了一篇文章:《对尼克松—勃列日涅夫会谈的初步看法》,发表在1973年6月28日外交部内部刊物《新情况》第153期上。文章认为美

苏签订防止核战争协定以后,“欺骗性更大”,“美苏主宰世界的气氛更浓”。

周恩来对这篇文章批示:“值得研究。”又在给外交部的电话里说:“写得不错。”

7月1日晚,外交部王海容、唐闻生去见毛泽东,一进门就问张玉凤:“《新情况》写得不错,是根据周总理意见写的,你给毛主席读了吗?”

张玉凤说:“没有。”

于是唐闻生便给毛泽东读,不料毛泽东听后大为不满,说“放屁一通”。还举例说明简报的分析错误。

二十世纪70年代,美国、苏联两个超级大国政治、经济、军事力量几乎相等,出现了一种相持状态,但这并不意味着两者可以共同主宰世界,隐藏在表面之下的,是两国更加尖锐的斗争。二十世纪后期以来的历史发展证明,美苏之间的联合是暂时的,对立是不可调和的,直至苏联瓦解。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表现出了更高人一等的战略眼光。

周恩来从王海容处得知毛泽东的态度后,于7月3日,给外交部党的核心小组及美大司负责人写信,要求撤回该期《新情况》。信中说:“你们和美大组没能认真研究,在六月二十八日写了那个不对头的《新情况》(一五三号)。我应对此事负主要责任。在美苏会谈后,我们没认真研究讨论一次。希望你们也应以此为鉴,发挥钻研商讨的积极性,有时也可要求我召集短小的会来交换意见。外交部的检讨报告说:这次错误地认为美苏会谈‘欺骗性’更大,‘美苏主导世界的气氛更浓’,说明我们形势的看法是右的,对如此大事,核心小组没有认真讨论,决心从错误中吸取教训,一定要抓紧大事,认真研究问题,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不要怕我忙,为大事而撇开小事,应该学习主席的工作方式”。

当天,周恩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修改中国共产党“十大”政治报告草稿和修改党章报告草稿。次日,将两件草稿讨论情况及其它“十大”准备工作情况书面报告毛泽东。

7月4日,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约张春桥、王洪文谈话。毛泽

东说：

“你们俩位是负责起草‘十大’报告和修改党章的，今天找你们来谈几件事，大概你们也知道吧？美、苏两家开了两次会。外交部的观点，不如几个大使馆，驻法、驻瑞士、乃至驻叙利亚，其他还有许多，都比外交部的意见高明。外交部有一个什么《新情况》，先说大事不好，一说欺骗性更大，又说美苏主宰世界的气氛更浓。大概是铀——235，

大家都说好，都说此文不错。我一看呢，也许是我错的，你们贵部是正确的吧！不过与中央历来的、至少几年来的意见不相联系。比如说，中央总是说国内外形势大好。一个大好，也不是中好，也不是小好，更不是不好。而外交部说大事不好，欺骗性更大，美苏主宰世界的气氛更浓。这样浓下去，浓到明年，欺骗性变为更大，要升级了。这个欺骗性的问题闹了一年多了。”

毛泽东在批评了外交部那篇文章的观点后，又对王洪文、张春桥说：“你们年纪还不大，最好学点外文，免得上那些老爷们的当，受他们的骗，以至于上他们的贼船。”

据章含之在《跨过厚厚的大红门》中回忆说：毛泽东的原话是“‘免得上乔老爷、姬老爷的贼船’。后来的正式文件中‘乔老爷、姬老爷’被改为‘老爷们’”。

“对于越南问题，美国战略重点东移，我就提出重点西移。欧洲年嘛！人家自己讲的嘛！人家自己要撤兵，有一个国家死也不让撤，说是世界革命风暴在亚洲，亚洲革命风暴中心在越南。如果不打了，就不得了了。就是机会主义，右倾机会主义。咱们就是那号人物了。我是讲我，我这几年名声不好。世界上唯一的马克思、一盏明灯是在欧洲。那个地方放一个屁也是香的！奉为圣旨啊！我就不理！你奈何得了我吗？鄙人是右倾机会主义。‘明灯’是用我的名义写的，我就没有看。凡是这类屁文件，我就照例不看。总理讲话也在内，因为不胜其看。”

毛泽东所说的“明灯”，是指 1966 年 10 月 25 日以毛泽东名义发出的《致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第五次代表大会的贺电》，内中称“英雄的人民的阿尔巴尼亚，成为欧洲的一盏伟大的社会主义的明灯”。据王力说，这一贺电是他起草的。

毛泽东继续说:美国“究竟重点东移,还是西移,你们讨论一下。我看多少西移一点吧。人家要走路,死也要拖住。‘革命是不能妥协的。任何情况下也不能妥协的。’这是哪一条马克思主义?我们跟蒋介石妥协了两次。贵国的总统要来,请。坐在这里吹了一个钟头 。”

“又是外交部一个什么屁司(亚洲司),说是田中不能上台,上台也不能改善中日关系。(插话:二部认为田中上不了台,外交部认为田中要上台,但中日关系不会很快改变。)以五十步笑百步,弃甲曳兵而走,逃到五十步的笑一百步的。这是以数量而论。如果拿性质而论,都是逃兵,你去翻那个《孟子》。”

毛泽东由此谈起了读书:“所以我正式劝同志们读一点书,免得受知识分子的骗。什么郭老、范老、任继愈、杨柳桥之类的争论。郭老又说孔子是奴隶主义的圣人。郭老在《十批判书》里头自称是人本主义,即人民本位主义。孔夫子也是人本主义,跟他一样。郭老不仅是尊孔,而且还反法。国民党也是一样啊!林彪也是啊!我赞成郭老的历史分期,奴隶制以春秋战国为界。但是不能大骂秦始皇。”

张春桥、王洪文非常仔细地听了毛泽东的这一段话,因为这段话不光是批评了郭沫若,而且把“尊孔反法”与林彪和国民党联系在一起。

毛泽东说起了秦始皇:

“他乱得很。早几十年中国的国文教科书就说秦始皇不错了,车同轨,书同文,统一度量衡。就是李白讲秦始皇,开头一大段也是讲他了不起。‘秦皇扫六合,虎视何雄哉!挥剑决浮云,诸侯尽西来。’一大篇。只是屁股后头搞了两句:‘但见三泉下,金棺葬寒灰。’就是说他还是死了。你李白呢?尽想做官!结果充军贵州。走到白帝城,普赦令下来了。于是乎,‘朝辞白帝彩云间’。其实,他尽想做官。《梁甫吟》说现在不行,将来有希望。‘君不见高阳酒徒起草中’,‘指挥楚汉如旋蓬’。那时神气十足。我加上几句,比较完全:‘不料韩信不听话,十万大军下历城。齐王火冒三千丈,抓了酒徒付鼎烹’,把他下了油锅了。

又说是美国不行了,腰杆子硬不起来了。她们两个从联合国回来都说美国的肉、蔬菜都不好吃呢。尼克松本人也承认中间有夹肉面包,有三块肉咬不动,中国、欧洲、日本。这还不讲其他,第三世界。

经常吹什么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忽然来一个什么大欺骗,大主宰。总而言之,在思想方法上是看表面,不看实质。”

毛泽东兴致甚好,说古论今,谈及了共产党的党内斗争:

“历来我们党,一股风一来,就是随风转。比如王明路线吧,各根据地、各白区,主要领导权都拿走。不到四整年,呜呼哀哉!自称为百分之百的马克思主义,中央苏区的领导,就是指鄙人,丝毫马克思主义都没有。一股风一来,随风转。多啊,不是个别人。硬着头皮顶的是少数。幸得滕代远还没有死。他可以证明那个立三路线怎么个斗争法,剩下鄙人一票。就是怕孤立,为什么随风转呢?日本人最好挡住在石家庄、太原以北。可是日本人不听话。你怎么办?一直打到广西、贵州。我的意思是最好打到重庆、西安去,他也不听我的呢。我这个思想,跟列宁接近,叫做半败北论。公开拥护蒋介石抗日,反对顽固派,实际希望最好把蒋委员长也打死。现在此人还没有落气,但是不能见人了。我见了一个驻西德记者,叫王殊。被新华社整得要死啊!见了我就哭。这个外交是委托他去办才办成功的。专门勾结美帝、日本、西德、英国这些坏人的是我。

关于革命不能有妥协这个学说,不是马克思主义。列宁屡次说过,碰到强盗,要嘛就被杀死,要嘛就交出自己的手枪和汽车。他主张交出手枪和汽车,等到有朝一日有机会,把这伙强盗统统消灭,手枪、汽车都收回。

你们搞的托洛斯基文件,我还没有看完,看了一部分。他就是反对布列斯特和约的。列宁就是主张割地赔款,签和约。这个和约是闭着眼睛签字的。第一写上割地、第二是赔款。德国帝国主义跑了,对付西方,他也不能两面作战。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来地也没有割,款也没有赔,条约一张废纸,就像尼克松讲的。

我是半败北论。列宁是主张完全败北,主张政府军完全被打败。那时俄国和日本的军队在旅顺、大连、辽阳一带打仗。越彻底越好,革命就会起来了,俄皇的威信就会完蛋了。我们打日本,不能学他的全部,实际上要用他的。蒋介石王八蛋,你干什么?!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代表,几百万军队都是反革命的军队,跟我们打了十年,又有三次反共高潮。我是希望日本人对于中国的地方越占得多越好。

第二次王明路线的潮流就不同了,结果还是照我同一些要革命、有马克思主义的同志的意见。我写了一篇文章,叫《论持久战》,批那个速胜论。名为批党外的,实际上批党内的。又批亡国论。

这类例子多得很,包括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威廉几世,(插话:二世)姑且说是威廉X吧,威风凛凛,杀气腾腾,东西进攻,结果皇帝也不知道哪里去了。杀掉了,死掉了,跑掉了,我没有查清楚。军队全部覆没。

第二次世界大战,这位希特勒更凶。越凶越好,你信不信?越杀人就越要革命。第一次世界大战杀出一个十月革命,第二次世界大战杀出一个中国革命。其办法很简单。你杀得人,我就不能杀人?鲁迅在《阿Q正传》上写的,'和尚动得,我动不得?'"

毛泽东的话题,最后还是落到了外交部。他说:

"结论是四句话: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此调不改正,势必出修正。将来搞修正主义,莫说我事先没讲。"

插话:"有些人盼十大,开过十大,开人大,人大一开就要解决工资问题。"

毛泽东:"各有各的心事。贾母一死,大家都哭,各有各的目的。如果一样就没有个性了。哭是一个共性,至于个人想的,伤心之处不同,那是个性。我劝人们去看柳嫂子同秦显家的争夺厨房那几回。"

这天,周恩来到玉泉山做治疗。当晚,听取了张春桥汇报当天在毛泽东处的谈话内容。

7月5日,周恩来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由张春桥向政治局委员们传达了毛泽东的这次谈话内容。周恩来在会上详述6月下旬以来毛泽东对外交部工作的批评、指示内容。会议根据毛泽东关于国际问题的多次指示精神,对"十大"政治报告草稿中国际形势和任务部分进行讨论、提出修改意见。

这天,周恩来将7月3日写给外交部核心小组成员及美大组负责人的信和4日外交部核心小组就一五三期《新情况》问题写给周恩来并报毛泽东的检讨报告,一并送毛泽东阅,并附信说:"这些错误与我的政治认识和工作方式有关。"毛泽东圈阅了这个报告,并在周恩来3日写给外交部的信上批示:"此种顽症,各处都有,非个别人所有,宜研

究改正办法。”

7月6日,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宣读、讨论“十大”政治报告国际形势和任务部分,并商定由张春桥、姚文元再加斟酌后,印成修改送审稿报送毛泽东。

7月7日,毛泽东看了周恩来报送的几经修改并在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的“十大”政治报告送审稿,批示:“原则同意”。

7月10日晚上,毛泽东在他的住处中南海游泳池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即将召开“十大”的相关事宜。会上谈到由谁作“十大”政治报告。随后召开的一次由周恩来主持的政治局会议上,张春桥提出“十大”政治报告由王洪文作。无人反对也少有人附和。

7月12日,周恩来约外交部有关负责人开会,研究起草批评并纠正第153期《新情况》观点的文章。之后,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继续讨论此事。

7月15日,周恩来将外交部起草的《〈新情况〉一五三号错误何在?》一文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将外交部文章中“受到中央的严厉批评”一句中“严厉”二字删去。

周恩来附信提出:“关于错误的检讨,我当另写报告。”

毛泽东批示:“检讨不要写了。”

根据毛泽东意见,周恩来批告外交部:将《〈新情况〉一五三号错误何在?》一文及《新情况》一五三号除发原单位外,加发各驻外使领馆,中央和各省、市、自治区党政军部门。

# 第1275回：问物理，又谈及儒法斗争 译古文，李庆霖申请入党

1973年7月12日，杨振宁再次按原定计划第四次回国探亲。这次，夫人杜致礼同行。这是她1947年赴美留学后第一次回国，也是第一次回国见到自己的父亲杜聿明。前几次，因要照顾年幼的孩子，她没能随杨振宁一同归国。

回国后，接待人员照例问杨振宁："杨教授，您这次回来，想见哪些人，想访问哪些单位？"

杨振宁思索一番，突发奇想，说："我这次回国，想见毛主席。"

接待人员笑了笑，没有答话。杨振宁心中一震，也有些为自己的唐突话语感到不好意思，他觉得这是不可能的。可没想到，7月17日下午，他突然被周培源带进了中南海游泳池毛泽东的书房，说是"毛主席要接见你。"周恩来也在那里。

在周恩来和周培源的陪同下，杨振宁走进了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的书房。

毛泽东看见到他们进来，从沙发上站起来，表示欢迎。

"主席，这就是杨博士。"周恩来介绍说。

杨振宁十分激动，急忙抢上一步，握住了毛泽东的手，向他问好。

毛泽东笑着说："你是物理学家，你对物理学有贡献。"

谈话间，毛泽东问杨振宁最近在进行什么物理学研究？杨振宁说："正在进行基本粒子结构的研究。"

毛泽东很有兴趣地问起质子是否可分割？杨振宁说："最近科学界正在热烈讨论此事，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得出明确的结论。"

毛泽东听后，笑道："物质是可以无限可分的，有人说公孙龙是诡辩论，还有惠施。但是有'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之说，这就是物质无限可分的意思。还有'飞鸟之景，未尝动也'。地球哪里算中

央呢？惠施说过‘我知天下之中央，燕之北、越之南是也’。公孙龙说过‘白马非马’。马有白马、黑马、大马、小马，但是看不见‘马’。又比如人，有男人、女人，看不见‘人’。我经常吹这些，你们大概不愿意听。”

他开玩笑说：“如果物质分到一个阶段，变成不可再分了，那么一万年之后，科学家干什么呢？”

谈到杨振宁与李政道提出的宇称不守恒原理时，毛泽东说：“宇称守恒，宇称又不守恒。我是赞成宇称守恒又不守恒。我是搞政治的，不懂科学。”

杨振宁说：“我读了主席的《长征》诗，‘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特别是‘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我很想去看看。”

毛泽东说：“那是长征快完时写的。讲了一个片面，讲不困难的一面，其实里边有很多斗争，跟蒋委员长斗争、跟内部斗争。有些注释不大对头。如《诗经》，两千多年以前的诗，后来做注释，时代已经变了，意义已不一样。我看，过百把年以后，对我们这些都不懂了。”

谈到中国历史时，毛泽东又说到儒法斗争的问题。他说：“我们郭老，在历史分期这个问题上，我是赞成他的。但是他在《十批判书》里边，立场观点是尊儒反法的。”“法家的道理就是厚今薄古、主张社会要向前发展、反对倒退的路线，要前进。”

杨振宁问：“秦始皇对中国是不是有贡献？”

毛泽东说：“他是统一中国的第一个人。”

谈到中苏两党关系时，毛泽东说：“苏联说我们是教条主义，我们说他们背叛了马列主义。我见了柯西金说，你们叫我们是教条主义，我们说你们是修正主义，两家都不是马克思主义。我们在过去一段时间里反对教条主义。我那一篇文章，叫《矛盾论》，其中一段叫‘矛盾的特殊性’。矛盾的普遍性并不单独存在，就存在于特殊性之中。人类是看不见的，看到姓杨的、姓周的，看到大人、小孩，但是看不见‘人’。”

1973 年 7 月 17 日，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地会见杨振宁（右一）。周恩来和周培源（左二）参加了会见。

谈话进行了一个半小时。工作人员进来提醒,时间到了。大家都站了起来,毛泽东却站不起来。他笑着对杨振宁说:“你拉我一把。”杨振宁急忙上前搀扶他起来。

走到门口,毛泽东和杨振宁握手告别,说:“感谢你这位自然科学家,你对世界是有贡献的。我也很希望能够给世界有一些贡献,不过没能做到这一点。”

杨振宁感动地说:“我也要祝毛主席万寿无疆。”

毛泽东说:“你不要讲,这句话不对,不科学。”

当天晚上,中央电视台播送了毛泽东会见美籍科学家杨振宁的消息,引起全世界的瞩目。

7月28日,江青看《半篮花生》、《送货路上》、《两张图纸》、《园丁之歌》等样片。

对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摄的现代越剧《半篮花生》,江青说:“《半篮花生》很新鲜,并不难改。”

她评论湖南花鼓戏《送货路上》:“很活泼,内容不错,表演形式有好有坏。”

对《两张图纸》,她说:“把新干部说得一无是处。当前主席提倡提拔新干部,唱了反调。”

她对《园丁之歌》提出了批评:“剧名就不合适。园丁应是共产党,怎么是教师、知识分子呢?男教师是二流子。”

张春桥说:“教育路线也有问题,学生受教员摆布,女教师是热爱工农的,但最后给小孩子出了难题。”

江青继续说:“教室看不出典型环境。女教师还给男教师说好话,男教师转变也不合理。

‘没有文化怎能担起革命重担’,这句话问题大了,应是‘有文化能更好革命’。这句话简直是反攻倒算。”

对《园丁之歌》的表演形式她也很不满意:“女的表演简直是青衣花旦,化妆像少奶奶。矛盾也没有很好解决。”

她最后指示说:“全国创作蓬勃开展,要抓一下评论队伍。创作组要组织一个小的评论组,鼓励创作,指出方向。”

当天,江青在批判《园丁之歌》的稿件上作出批示:

请春桥、文元同志先阅,并请提出意见。

江青 七月二十八日

随后,姚文元批示:

看了一遍,觉得有两个问题需要研究:

一、是否要肯定教师的大多数是好的,文化大革命中也有进步,坏人是很少数。教育战线上两条路线斗争是长期的,此剧的路线,及其歌颂的人物,都是错误的。

二、关于学文化的问题,在批判这个电影的修正主义观点同时,是否要肯定学生学社会主义文化及学马列、毛主席著作也是必要的。以全面说明毛主席的教育方针是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

三、妥否,请斟酌批示。

(建议改后我们不再看了)

文元 七月二十八日

张春桥表示同意姚文元的意见。他的批示是:

同意文元同志意见,可以考虑先发两篇,看看反映再发别的文章。文章不多,在质量。批周赤萍小册子,一篇文章就收效。

春桥 七月二十八日

江青最后作了总结:

同意春桥、文元同志意见,请照办。

江青 七月二十八日

7月的一天,姚文元单独向上海写作组负责人朱永嘉单独布置任务,要他把《唐书》中的《李袭吉传》做好标点,交保密印刷厂排印出来,只送姚文元两份,不得给其他人。

这篇古文是毛泽东要姚文元读的。朱永嘉找了一下《二十四史》,在《旧五代史》卷六十的《唐书.列传第十二》,是为士人李袭吉立传的。当时《二十四史》的标点工作尚未完成,这一篇还未及标点。

李袭吉,唐朝末年黄巢起义时的读书人,自称是宰相李林甫的后代,父亲李图曾任河南洛阳县令。动乱起后,李袭吉等一批士人逃难到了山西,投靠了后唐的国君武皇李克用。李袭吉被任命为李克用的文人班子的负责人。

《唐书》本传对李袭吉的才识和文章多有称颂:“袭吉博学多通,尤谙悉国朝近事,为文精意练实,动据典故,无所放纵,羽檄军书,辞理宏健。”

当时割据势力最强的是河南开封的朱温与在山西太原的李克用,朱温的力量强于李克用,李克用修书信于朱温,谋求和好,但又不能示弱。这封信是李袭吉起草的,朱温看了这封书信后,赞不绝口,说李克用一隅之地,怎么会有如此文士!“如吾之智算,得袭吉之笔才,虎傅翼矣!”认为自己如能得到这样的“大秀才”辅佐,真是“如虎添翼”了!

7月末,毛泽东指示姚文元组织有关人员注释和印制大字本的《晋书·刘元海载记》。姚文元依然将任务下达给上海的朱永嘉。

朱永嘉找到他的老师、复旦大学历史系主任谭其骧,请他注释《晋书·刘元海载记》和《唐书·李袭吉传》。他们在8月间注释完毕上送。

《旧五代史·李袭吉传》按照姚文元的要求只上送了两份。

而《晋书·刘元海载记》中的刘元海是匈奴人,冒顿之后。西晋末,刘元海在今山西地区建立割据政权,国号后汉。刘元海是完全接受汉族文化的匈奴后裔,喜欢读书,曾对自己的同学朱纪、范隆说:“吾每观书传,常鄙随陆无武,绛灌无文。”这里的“随”是指随何,汉初辩士。刘邦击楚,他奉命出使淮南,说服英布归汉。“陆”指陆贾,汉初的政治家,曾说服南越王尉佗归汉,并建议刘邦用儒术治天下,他提出“马上固然能打天下,但要懂得马下才能治天下”的说法。“绛”,指绛侯周勃,“灌”指灌婴,二人出身贫贱,跟随刘邦起兵,均为武将,没有文化。但吕后去世后,是他们二人与陈平合谋,诛诸吕,拥立代王为汉文帝,都曾官至丞相。

1973年7月2日,福建省委在福州市召开6万人群众大会,贯彻落实中共中央21号文件、学习毛泽东主席回信和李庆霖信件。省委邀请李庆霖来福州出席大会并讲话。没想到平时沉默寡言的李庆霖口才不一般,他不用讲稿侃侃而谈约一个半小时,从学习毛主席回信的重大意义开始,说到他为什么给毛主席写信,后半部分他话锋一转说:“当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给我写信的事在社会公开之后,我们莆田社会上产生了一股不能小看的政治压力,企图对我倒咬一口,把此事

全盘推翻。我想有必要说它一下,让我们共同来提高对路线斗争的认识,也许有一点好处。”接着他讲了几个具体反对他的事,上纲到两条路线斗争高度,没有将矛头指向当地的领导。

新华社福建分社记者赖玉章,对李庆霖一直没有提出入党要求心里很焦急,他对陪他一起去采访李庆霖的莆田地委宣传部通联站的张玉钟说:

“小张,毛主席很希望李庆霖参加‘十大’。眼看‘十大’就要召开了,但李庆霖还不知道提这个要求,领导们可能不好当面问李庆霖这件事,你小青年干脆给他明确提一提,没关系的。”

张玉钟觉得这是件好事,就应允了赖玉章。7月7日,张玉钟一个人到了仓后路居仁巷15号李庆霖家,因为已经多次接触很熟悉了,张玉钟就开门见山问李庆霖对组织上还有什么要求?

李庆霖说,省、地、县领导已经解决了他向韩先楚提出的两件事,孩子在农村的困难,全国都在解决,相信也会好转的,他说他很满意了。

张玉钟看到谈话还不能进入有关入党的主题,就索性问他:“听说毛主席有对汪东兴说了一段你的事,你知道了吗?”

李庆霖说:“没有人告诉我。”

于是,张玉钟把毛泽东对汪东兴说的具体内容对李庆霖讲了,李庆霖非常惊讶和兴奋,问张玉钟怎么办?

张玉钟说:“入党要求必须本人有这愿望并自己提出来,别人不好代替,你要赶紧向组织上提出申请。”

李庆霖向张玉钟问了申请入党的具体事项,第二天就向莆田县委写了入党申请书。

莆田县委接到李庆霖的入党申请后,马上报告了地委和省委,接着各级领导及组织部门内部开始为李庆霖的入党紧张运作,进行内查外调,但最终没有在党的“十大”召开前解决李庆霖的入党问题。李庆霖失去了参加“十大”可能受到毛泽东接见的机会。

李庆霖入党问题被拖延,主要是在调查中发现敌伪三青团档案中有一份李庆霖在仙游师范读书时全班同学的名单,这份名单中有的名字前面打勾,有的没打勾,分辨哪一种是三青团员费了一些时间,到确

定李庆霖不是三青团员而决定发展他人党时,“十大”已经召开。

随后,李庆霖在担任了东方红小学领导小组副组长后,又被任命为莆田县教育组副组长、莆田地区知青办副主任、福建省高招办副主任。

1975 年,李庆霖出席了四届人大,并当选了四届人大常委会常委,还被任命为国务院知青领导小组成员。1976 年 6 月成为国务院知青工作领导小组成员。

1973 年 7 月 29 日晚,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会见刚果人民共和国总统马瑞安·恩古瓦比少校,周恩来在座。会见后,毛泽东与周恩来谈了党的“十大”筹备工作。

7 月 30 日,8 月 2 日,中共中央连续召开政治局会议,传达讨论毛泽东 7 月 29 日关于党的“十大”准备工作的指示。会议决定:“十大”代表分省、市、自治区在各地集中,召开不公开的预备会议,讨论“十大”文件草稿;中央“十大”选举准备委员会可先开预备会议,草拟各项人选项名单,此事拟由王洪文为主,张春桥、纪登奎、李德生为副进行工作。

# 第1276回：叶向真，刘诗昆获释出狱 交白卷，张铁生的一封信

“913”事件后的一天，周恩来对毛泽东说起：“叶向真还在监狱关着。”

毛泽东说：“一个孩子，关她干什么？”

于是，叶向真被放了出来。在此之前，叶剑英的两个儿子、两个女儿、两个女婿都曾被关进监狱，叶向真是最后出狱的一个。

叶向真回到家中，叶剑英发现她变得呆傻了，不会说话，只会呆呆的坐着。

带叶向真去看病，医生检查不出叶向真有什么病。叶向真被关了3年，没有人和她说话，她的语言功能有所丧失。3年中，基本没有听到过声音，听到收音机或者别人的说话声她就紧张。

在全家人的关怀下，一天，叶向真突然大哭起来，终于说话了：“都是我不好，是我连累了你们。”

叶剑英说：“不对，是爸爸连累了你们。”

叶向真入狱后，家里看孩子的保姆也被抓进监狱，叶向真的儿子毛毛由她的嫂子看管。叶向真出狱后没有工作，把毛毛接回来，在家看了一年多孩子。一年后，她才逐渐恢复正常。

江青到叶剑英家看望叶向真。她拉着叶向真的手说：“都是林彪害得你，林彪真坏，林彪还成立了专案组整我。我们都是受了林彪的害。”

江青要看看毛毛，叶向真把毛毛叫出来，让毛毛叫“奶奶”。江青说：“不用叫奶奶，叫江青同志就行了。”

叶向真心想：“太做作了！一个5岁的孩子，不叫你奶奶叫什么？”不过，叶向真这次倒是十分听话，改口叫“江青同志”了。叶向真从延安时期就叫“江青妈妈”。出狱后，就再也没有叫过“江青妈妈”。

叶向真的丈夫刘诗昆，因“里通外国，投靠苏修，苏修间谍”的罪

名,于1967年9月3日下午,被关进北京德胜门外的功德林监狱后,至此也有5年多了。他一个人关在与世隔绝的牢房里,不能与外界联系,每天只有一本《毛主席语录》,每天下午,发一份《人民日报》。下午发,晚上收回。不能留下一片纸在牢房里。

刘诗昆当时唯一的想法,就是要争取能够活着出去。而且,一定要留点字迹在身上,就是死了,也要说明:"刘诗昆不是间谍!"

有一天换牢房,地上遗留一张残存的烂报纸,可能是监狱管理人员没注意。刘诗昆突然觉得:"这东西能救我也说不定。"他如获至宝地把它叠起来藏在身上。

牢房每天发报纸,晚上收回来。任何一张报纸上,都可以找到你想要的任何一个字。每个牢房都有一把笤帚清洁卫生。刘诗昆就把笤帚撅下一根棍,在脑子里构思了一封信稿。他想要哪个字,就在报纸上找到那个字,然后用扫把的根去抠报纸上的那个字,在报纸上只留下一个小小的洞眼。每天抠十个八个字,报上留几个小洞眼,谁也不会注意。然后他将从每天的报纸上抠下来的这些字,用棒子面粥粘贴到原来得到的那半张报纸上。经过几个月的时间,终于贴出了一封长达千字的"信"。刘诗昆将这封"信"藏在衣服的棉花里,只等伺机送出。

1973年的4月,叶向真提出要到关押刘诗昆的监狱探监,而且是非去不可。经过一些周折,她终于来到秦城监狱一个接待室。当时刘诗昆被告知说:"你的前妻叶向真要来看你了,要探访你。"

同时,专案审查人员对他说:"我们给你规定一条纪律,你见她的时候,只准谈一些私生活的事情,不准谈任何涉连到你的案件案情审查的事情。如果你一讲,我们立刻就把你给带走,而且要加重对你的惩治。"

早有准备的刘诗昆带着他早已粘好的信来到接待室,几个审查人员和看守远远的盯着。刘诗昆和叶向真询问了些生活上的事情,问了儿子的情况,趁看守们不注意,刘诗昆迅速从袖子的棉花里面把那封"信"掏出来,从桌子底下,偷偷地塞给了叶向真。叶向真也很机灵,手一接到信,马上意识到了就攥在手里,若无其事地继续跟刘诗昆说着话。

回到家里,叶向真就把这东西给他父亲看了。叶剑英又将这封“信”送到毛泽东的面前。毛泽东看了后说:“立刻释放。”

1973 年 5 月 3 日,叶向真亲自开车将刘诗昆接回叶剑英家,由于当时刘诗昆的身体非常虚弱,叶剑英看了后,马上将他送到 301 医院住院疗养。

刘诗昆放出来后没有单位了,就送到中央乐团。他报到的时候,中央乐团全团人员已经上下皆知,都等在中央乐团的院里,院子里聚满了人。刘诗昆一进去,大伙就把他围住了,都是音乐界的,过去都是很熟的。当时大家最关心的一件事就是:刘诗昆还能不能弹琴?

因为刘诗昆已经有 5 年 10 个月关在单人牢房里,没有见过钢琴。出了监狱,又住了几个月的医院。大家将刘诗昆簇拥到排练厅,让他弹琴,非让他弹。刘诗昆就这样坐在了钢琴前。可是弹什么啊,以前所弹的全部曲子,都是洋、古、封、资、修,都不能再弹,再弹又要犯错误了,当时只有两个钢琴作品可以弹,一个就是钢琴协奏曲《黄河》,再有一个钢琴伴唱《红灯记》。这个《红灯记》没法单独弹,是要跟着京剧唱一块弹。可以单独弹的,只有《黄河》。于是刘诗昆就把钢琴协奏曲黄河四个乐章从头到尾弹了一遍。

大家都听得入神了。这时,一个乐团的人说:“刘诗昆,你这个曲子什么时候练的?”

是啊,《黄河》协奏曲创作的时候,刘诗昆已经被关到监狱里了。刘诗昆进监狱之前还没有这个曲子。

刘诗昆说:“这个曲子我没有弹过。在刚才给你们弹之前,我一遍都没有练过。”

大家很奇怪,就问他:“那你怎么会的呢?”

刘诗昆说:“我关在监狱里的牢房里的时候,远处有顺风的时候经常传来《黄河》钢琴协奏曲的琴声。这个《黄河》我一听就知道,是冼星海写的《黄河大合唱》曲调,这样听听我就听会了。”

刘诗昆从小就被他父亲练耳,就是在钢琴上同时按下很多键,发出很多音,这些音都不谐和,要求刘诗昆把每一个音都分解辩听出来,说出每个音的音域。所以当在监狱里的刘诗昆听到样多声的钢琴乐曲,每一个声音在他耳朵里,都是立体的,都是分解的每个音,同时发

出8个音,他能知道这8个音具体是哪个。这个就靠他小时候练就的童子功,其次就是靠他对音高的辨听力。

刘诗昆获释后,公安部成立了一个复查小组作了一个平反结论,给刘诗昆和叶向真平反。

8月5日,江青接见中央乐团的领导和刘诗昆等人。她说:“刘诗昆在运动中被捕,关了6年,放出来了。过去主席问过他,是新四条汉子(黄、吴、李、邱)不放,是想搞叶帅。刘还是有错误的,抓彭、罗、陆、杨,还有‘一·一九’夺权。最近主席又问了。这次接见是传达了主席对他的关心,希望他搞点名著的东西。‘战台风’改为钢琴、乐队。要刘恢复基本功,给他一个钢琴,让他跟乐团去日本。”

在接见时,江青谈到演奏钢琴伴奏《红灯记》和钢琴协奏曲《黄河》的钢琴演奏家殷诚忠申请入党一事时说:“关于殷诚忠入党,让吴德作他介绍人,殷跟我们走了多少年,一直要求入党。”

她还提到《沙家浜》中原阿庆嫂的扮演者赵燕侠,说:“赵燕侠可以去艺校工作。开始她是跟我们搞革命样板戏的,记一功。还可以回团演阿庆嫂,同时在艺校教书。”

江青还说到中央芭蕾舞剧团第一个演芭蕾舞《红色娘子军》中吴琼花的演员白淑湘,她说:“白淑湘是第一个演吴清华的,最近写了个检查,还不错,应该记一功的。去全团作检查,取得群众的谅解,还可以回团演吴清华。”

又说:“崔嵬,让他拍《平原作战》。崔检讨不错,我们欢迎,完全可以让他工作了。只要承认错误,愿意改,就可以了。”

江青提出:“要把各个历史时期好的音乐作品,很好加工排列,弄一套节目,应该是一条历史的长河,包括各个朝代的好作品,从最古的到革命歌曲,到现在的革命作品。”

她提到《梅花三弄》,还说到《广陵散》:“《广陵散》也有一段故事,嵇康,在杀他的时候,他还弹了《广陵散》,连反对他的人都痛心。”

她问:“刘邦的《大风歌》还有没有?”

李德伦答:“没有了,配曲吧!”

江青:“还是要原来的。那么古的从李白的《菩萨蛮》开始吧。唐明皇早几十年还好,后来就糟了,弄一套从古到今的音乐作品,要有一

套音乐资料。”

“要搞西洋音乐史,不抓不行了。”

“《战台风》很值得提倡,可以改编成钢琴,刘诗昆参加创作。”

8月5日这天,江青去见毛泽东。毛泽东向她讲述了中国历史上儒法斗争的情况,说:“历代有作为、有成就的政治家都是法家,他们都主张法治,厚今薄古;而儒家则满口仁义道德,主张厚古薄今,开历史倒车。”

毛泽东又提及了郭沫若。他指着郭沫若著的《十批判书》说:“我这是批判用的。”

毛泽东给江青念了自己写的《读<封建论>呈郭老》的七言律诗:

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

祖龙虽死秦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

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

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

毛泽东说,郭老的《十批判书》要批判。他又念了自己的另一首诗:

郭老从柳退,不及柳宗元。

名曰共产党,崇拜孔二贤。

8月6日,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江青在会上传达毛泽东8月5日有关儒法斗争的谈话及所写的七律诗,并提出将此内容写入“十大”政治报告。周恩来表示:“要理解消化一段时间”。

8月7日,《人民日报》发表广东省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杨荣国的文章《孔子——顽固地维护奴隶制的思想家》。该文共分两个部份:一、孔子的政治立场;二、孔子的思想——“仁”。文章认为:孔子“仁”的思想,“是为正在崩溃中的奴隶主贵族阶级的利益服务的”,就是“剥削有理,造反有罪”。杨荣国早在1943年便发表了《孔墨的思想》一书,是一贯反孔的学者。

这天,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讨论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党、政、军部门出席“十大”代表分别召开预备会议的有关问题。

当天,姚文元的秘书通知朱永嘉到上海兴国路市委招待所,给他看了毛泽东写的《七律·读<封建论>呈郭老》一诗,并告知:“不许

抄,只准记。”

8月8日,张春桥、姚文元召见《人民日报》负责人说:“在批林时要动脑筋,划清界限,不要过头”,批判“精神万能论”、“唯意志论”都是“过头”的例子。

8月上旬,毛泽东指示有关人员注释和印制大字本的柳宗元《封建论》。当天,姚文元向上海下达了标点柳宗元《封建论》一文为大字本的任务,而且要得很急。朱永嘉当晚即回到复旦大学历史系,依然把任务交给自己老师谭其骧。

谭其骧立即着手,与历史系胡裕树、中文系的顾易生等集中在复旦大学四号楼,连续两天两夜突击,至7日下午16时完成注释。9日上午8时30分,谭其骧、胡裕树、顾易生乘吉普车往中华印刷厂,由借调在写作组的历史系教师董进泉和历史研究所借调的人员刘修明一起校对,至下午14时30分校毕。朱永嘉与王知常在校译本上最终校读一遍,即让中华印刷厂付印。

8月11日,上海通过市委机要交通上送北京姚文元注释大字本《封建论》。这次上送,姚文元要求印了23份。

大学恢复招生后,由于没有文化考试,新生的文化水平参差不齐,大学老师教学困难,学校里颇有微词,更有甚者说:这些“工农兵大学生”是“大学生的年龄,小学生的水平,幼儿园的脾气。”面对舆论和现实教学中的问题,1973年的大学招生工作,在原有的“推荐”和“复审”后,又加了文化考试。8月10日,《人民日报》转载《辽宁日报》7月19日的报导《一份发人深省的答卷》,发表了张铁生写在考卷上的一封信:

尊敬的领导:

书面考试就这么过去了,对此,我有点感受,愿意向领导上谈一谈。

本人自一九六八年下乡以来,始终热衷于农业生产,全力于自己的本职工作。每天近十八个小时的繁重劳动和工作,不允许我搞业务复习。我的时间只在二十七号接到通知后,在考试期间忙碌地翻读了一遍数学教材,对于几何题和今天此卷上的理化题眼瞪着,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我不愿没有书本根据的胡答一气,免得领导判卷费时

间。所以自己愿意遵守纪律,坚持始终,老老实实地退场。说实话,对于那些多年来不务正业、逍遥浪荡的书呆子们,我是不服气的,而有着极大的反感,考试被他们这群大学迷给垄断了。在这夏锄生产的当务之急,我不忍心放弃生产而不顾,为着自己钻到小屋子里面去,那是过于利己了吧。如果那样,将受到自己与贫下中农的革命事业心和自我革命的良心所谴责。有一点我可以自我安慰,我没有为此而耽误集体的工作,我在队里是负全面、完全责任的。喜降春雨,人们实在忙,在这个人与集体利益直接矛盾的情况下,这是一场斗争(可以说)。我所苦闷的是,几小时的书面考试,可能将把我的入学资格取消。我也不再谈些什么,总觉得实在有说不出的感觉,我自幼的理想将全然被自己的工作所排斥了,代替了,这是我唯一强调的理由。

我是按新的招生制度和条件来参加学习班的。至于我的基础知识,考场就是我的母校,这里的老师们会知道的,记得还总算可以。今天的物理化学考题,虽然很浅,但我印象也很浅,有两天的复习时间,我是能有保证把它答满分的。

自己的政治面貌和家庭、社会关系等都清白。对于我这个城市长大的孩子,几年来真是锻炼极大,尤其是思想感情上和世界观的改造方面,可以说是一个飞跃。在这里,我没有按要求和制度答卷(算不得什么基础知识和能力),我感觉并非可耻,可以勉强地应付一下嘛,翻书也能得它几十分嘛!(没有意思)但那样做,我的心是不太愉快的。我所感到荣幸的,只是能在新的教育制度之下,在贫下中农和领导干部们的满意地推荐之下,参加了这次学习班。

白塔公社考生

张铁生

一九七三年六月三十日

应该说,张铁生的信确实是比较实际的反映了当时考生的情况。自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他们已经有7年没有看文化课本了。在没有任何准备和复习的情况下,你让他们参加文化考试,不是拿他们开玩笑吗?可是,不通过考试,又怎样把握考生的文化水平呢?

《人民日报》在《编者按》中指出:“这封信提出了教育战线上两条路线、两种思想斗争中的一个重要问题,确实发人深省。”《辽宁日报》

的《编者按》也说:“录取的主要标准,是根据他在三大革命运动中的一贯表现,还是根据文化考试的分数?是鼓励知识青年积极接受贫下中农和工人阶级再教育,努力钻研和完成本职工作,还是鼓励他们脱离三大革命运动实践而闭门读书?”张铁生“似乎交了‘白卷’,然而对整个大学招生的路线问题,却交了一份颇有见解、发人深省的答卷。”

# 第1277回：备“十大”，上海议中委人选 山东省，撤销袁升平职务

8月8日，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讨论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党的十大准备工作的通知》。从8月12日开始，中国各省市同时办起了“学习班”。共有34个“学习班”，都是为期一周，19日结束。

这些“学习班”戒备森严，“学习”什么，外界莫知。其实就是根据中共中央8月8日的通知，在全国各地以“学习班”名义，举办中共“十大”预备会议，讨论由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负责起草的“十大”文件，即《在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草稿）》、《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草稿）》、《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改草案》。

8月13日，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讨论王洪文主持下的中央“十大”筹备小组提出的“十大”选举准备委员会名单和“十大”主席团名单。当天，周恩来与王洪文联名写信给毛泽东，提出：“为使筹备和准备工作衔接得好，主任仍为洪文同志，副主任7人（周恩来、康生、叶剑英、江青、张春桥、纪登奎、李德生）均是在京政治局同志。”

毛泽东圈阅了此信。

据徐景贤后来在《十年一梦》中回忆：

8月中旬，中央通知上海的马天水、徐景贤和王秀珍去北京，参加党的“十大”预备会议，他们几个人到达京西宾馆的当天晚上，王洪文就来到了马天水寝室外边宽敞的套间里。王洪文坐在沙发上，马天水的秘书老房给他倒了杯茶，他呷了一口，开始说：

“这次我在‘十大’准备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内容突出强调‘要培养接班人’，‘着重从工人，贫下中农中选拔优秀分子到各级领导岗位上来’。根据列宁的思想，他指出在十月革命胜利之后，应当直接选拔优秀的工人进入中央委员会，因此，我们中央考虑这次‘十大’要大量增加工人中委，你们看上海有哪些人可以人选？”

马天水、徐景贤和王秀珍都感到意外，连声回答：

“我们没有想到!”

“这次来没有做这方面的准备。”

这时,徐景贤想当然地问道:“是否可以从这次的‘十大’代表里物色人选?”

王洪文显得很不高兴,批评说:“这次上海的‘十大’代表选得不理想,我们看了几遍材料,选不出几个中委候选人来……你们犯了战略性、路线性的错误!”

马天水挨了一闷棍,讷讷地说:“我们考虑不周……”

其实,早在1972年上半年,张春桥就向上海下达指令:“我们要培养工人大使。现在的外交人员,到联合国去的人,都是知识分子。”他特别强调:“还要培养女大使。”

根据张春桥的布置,上海市委组织部门当时选调了80名工人,在复旦大学专门办了一个外语培训班,对他们进行重点培养,以便有朝一日派到外交部门去。

1972年,王洪文在奉调北京前夕,又一次专门布置说:“上海要培养工人新干部”,“上海一定要打破按部就班的迷信,准备100到150名干部,随时打算抽调出去。”选拔这批新干部的标准,王洪文说一定要“领导熟悉,群众拥护”,一定要“老造反”、“对文革有感情的”。

据此,上海市委组织组负责人金祖敏,经过层层布置,层层筛选,搞出了一份厚厚的名册,总共100人,交给市委印刷厂作为绝密件排印出来,上报给在北京的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等人。

此时,王洪文再次追问道:“我不是早就提出要准备100人的名单吗?”

“那早已印好上报给领导了,”王秀珍嘟哝着,她是在上海分管组织工作的,“不过那批新干部还只是培养对象,准备陆续进读书班培训以后,再向有关部门选送,他们不是作为中委候选人的呀!”

“你们应该想到嘛!”王洪文急了,“我前几天还给老金去过电话,要他抓紧选人。可是选了派什么用场,这是绝密的,我在电话里不能讲呀……”

上海市委组织组的金祖敏确实接到过王洪文的电话,也向马天水他们汇报过,正在继续选人,可是谁也没有想到要马上挑选十届中央

委员候选人,所以还没来得及上报。

王洪文听说如此情况,大声说道:“现在离‘十大’开幕只有几天时间了,可是上海连一个人的名字都提不出来!”

马天水他们面面相觑:中委候选人的提名可不是一件小事,至少得熟悉这些人,了解这些人,可是他们对名单上的100人很不熟悉,对其中的大多数人还不认识,甚至没有见过面,也没有谈过一次话……

王洪文见此,又说:他和张春桥、姚文元已经商量过了,“工总司”的老头头们在上海都已经作了安排,这次不考虑了。这次中委候选人要直接从甚层单位选拔,最好是经过工宣队的锻炼、有一定实践经验的,同时要考虑这些人进了中委,将来都要调到中央各部门担任领导职务。

马天水想了一想,提出了补救的建议,他说上海市革委会副主任、市委组织组负责人金祖敏了解情况比较全而,而且他在上海,可以和有些人再当面接触一下,然后提出一个初步名单来,报给北京逐一讨论。

王洪文看别无他法,就在京西宾馆客房里要通了上海的长途电话……

这时已经是凌晨两点钟了。金祖敏从甜梦中被叫醒,睡眼惺忪,听说王洪文要名单,仍旧以为是按照过去布置的口径,准备向中央各部输送新干部的。他在电话里答应等天亮上班以后,马上和市委组织组的另一个负责人王日初商量,尽快拿出一个备选名单来。

王洪文听了大为生气,对看听筒吼起来:“老金,你想得不对呀!我要的人不是派那种用场的,他们担任什么职务,比你想的要重要得多!你懂了吧?”

“格末……究竟是到啥地方去啦?”金机敏操着一口绍兴官话回答,他还是没有听懂。

“你真笨!我电话里不好对你说呀!”王洪文急得几乎要跳脚,我告诉你:你马上要来参加什么会呢?你想一想,脑子怎么不会转弯?!”

“哦……”金祖敏想到了他即将去参加党的“十大”,他终于明白了王洪文要的是在“十大”增选的中央委员,但他也想不到要在“十大”代表以外另行找人,所以,他嗫嚅着说,“代表的简历、档案都已经

送上来啦!”

“那些不管用!”王洪文继续训示,“我要你另外找人,在代表以外找人! 等天亮再办已经晚了,现在我睡不着觉,也不能让你老金睡觉!你给我连夜找出人来,每个人还要当面谈过话。”

“好,好!”金祖敏连声允诺。

王洪文挂完电话,时间已近拂晓,他这才离开京西宾馆回钓鱼台去了。

马天水他们也不敢安睡,等到天亮,匆匆吃完早餐,就守候在电话机旁,等待上海陆续传来名单。

在上海,金祖敏和王日初两人半夜爬起来,紧张地找人谈话,可是实在来不及,临时又把市委常委、工交组的负责人黄涛拉上,3 个人分头接触有关对象,从中物色人选。他们每谈完几个人,就把这些人的简历、表现以及谈话后的印象,用电话传到北京京西宾馆,马天水的秘书老房一手拿着电话听筒,一手握笔记下这些预选人的材料。马天水、徐景贤和王秀珍坐在旁边的沙发上等着,边看边议,忙得不可开交。

中午刚过,上海已经传来了 10 来个人的材料,秘书老房还在继续记录、整理,王洪文又赶来了。他急于要商定名单,说是最后要请张春桥、姚文元两人拍板。于是,他们就在京西宾馆的套房里开始议论起预选名单来。只是,这 10 来个人有的根本不熟悉,有的也只有一面之缘,因此在议论谁该进中委的时候,都觉得心里发虚。但预选名单必须限时限刻上交,他们只好硬着头皮挑选,依据的就是电话中传来的简历,以及金祖敏他们连夜“相面”谈话的印象。

议了几个钟点,提出了一份初步名单,由王洪文带回钓鱼台去,和张春桥、姚文元商量。同时,通知上海的金祖敏,把这些候选人员的书面材料赶印出来,一式几份,派市委的机要交通员乘飞机专程送到北京,交给王洪文。

晚上,张春桥亲自来到京西宾馆的套间和马天水他们见面。他情绪高昂,人也显得年轻多了。坐在沙发里,拿起前面大茶几上放着的候选人员书面材料,翻阅了一下,然后抬了抬眼镜,用眼光扫视着环坐在旁边的马天水他们,慢条斯理地说:“这几天忙得够呛,没有时间见

你们。洪文已经跟你们说了,中央考虑,鉴于林彪反党集团窃取中央领导地位的教训,今后要加强工农中委在中央委员会中间的比例。这个考虑是前不久才定下来的,事先没法和你们通气,所以这次要上海提名就显得仓促一些……”

他微微笑了一下,抽了一口烟,继续陈述他和姚文元的打算:“这次增选的上海工人中央委员,将来准备陆续都要调到北京来,参加中央和国务院各部门的领导工作,比如文元就一再跟我商量,《人民日报》需要调一个上海的工人中委去,担任社长。那些知识分子不向我们反映报社里的真实情况……今后工人中委当了社长,他用不着看稿了,不必卷进具体的编辑业务当中去,稿子由总编编辑负责,社长专管政治。至少这些工人中委可以向我们反映些真实的情况。文元和我想让上钢一厂的周宏宝到《人民日报》去,他是产业工人,听说他在上海当过同济大学的工宣团负责人……”

“最近刚把他调到市民兵指挥部当领导核心。”王秀珍插嘴说。

“……他在大学是搞过一个时期工作,对上层建筑的文教部门有了一些发言权,所以文元一再指名要他。”

“洪文还提出,像公安部这样的重要部门,也要派工人中委进去,公检法不彻底改造不行。至于中央的工、青、妇机构,在‘十大’以后都要相继重新建立起来,我觉得: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和全国妇联等,都应该有上海的工人参与领导,我还考虑,从我们国家工人运动的传统来看,在全国还要成立一些有影响的产业工会,像海员工会,邮电工会等等。所以,名单里的海运局远洋轮的海员冯品德,参加中委以后,就可以考虑调到北京来,将来担任全国海员工会的主席……”

就这样,在京西宾馆的马天水套房里,经过了一个通宵的比较、酝酿和筛选,终于确定了一个使王、张、姚都比较满意的上海增选中委的名单:

周宏宝,上钢一厂车工,姚文元要挑选他担任《人民日报》社社长,后被张春桥调至国务院教育部任二把手;

祝家耀,原上海5703厂(飞机制造厂)工人,王洪文认为他是“老造反”,后任公安部副部长;

张国权,原江南造船厂船体车间冷轧工,后调至六机部任党的核

心小组成员,拟提副部长;

陈佩珍(女),原上海市第五百货商店营业员、支部书记,后担任上海市革委会财贸组领导核心;

汪湘君(女),原上海市纺织局停经片厂工人,后担任上海市妇联主任;

冯品德,原上海市海运局某远洋轮海员,拟调至全国海员工会任主席;

于会泳,原上海音乐学院民族音乐理论系教师,因参与搞样板戏有功,被江青、张春桥看中调至北京,在国务院文化组工作,后任文化部部长。

1973 年 1 月 19 日,“九大”后从总参军训部部长下放到济南军区当副司令的张宗逊写材料揭发袁升平,说他在“913”事件后传达中央 57 号文件时“泣不成声,话都说不下去了”,并在 2 月 11 日召开的山东省委和济南军区常委扩大会议上质问袁升平:“林彪机毁人亡,毛主席安然无恙,你不是哭林彪是哭谁?”

袁升平在 1973 年 4 月 9 日向毛泽东、党中央写信申述时说:

“这个问题,我感到有必要将我当时的真实心情,向主席、中央报告如下:1971 年 9 月 17 日(或 18 日),许世友同志等从北京开会返回途中,路过济南,我和杨得志同志在车站见到了他们。见面后,许等人向我们讲了林彪死党陈励耘、王维国一伙,妄图在杭州、上海等地谋害毛主席的种种罪恶阴谋和毒辣手段。我们听了以后,既愤恨,又沉重,确实感到第十次路线斗争惊心动魄。9 月 22 日,省委、军区党委常委召开联席会议,传达讨论中央文件。杨得志同志传达完文件后,我接着发言,首先我表示完全拥护中央文件,完全拥护主席对林彪叛党叛国事件采取的英明决策。尔后,揭发批判叛徒、卖国贼林彪的罪行。当我谈到林彪一伙妄图谋害主席时,想起了许世友同志等讲的那些内容,感到主席领导我们革命几十年,没有主席的英明领导就没有我们的一切,主席那样高龄了,仍然夜以继日为革命操劳,而林彪如此丧心病狂,要向主席下毒手,顿时心情激动,止不住了,流了泪,这就是我当时的真实心情。”

1973 年 6 月 17 日,纪登奎在二、六机部召开的一次有全国代表参

加的会议上也提到济南军区政委袁升平在传达“913 事件”时突然哭起来一事,他说:“有一个人听说林彪机毁人亡,痛哭流涕。”这话通过山东参加会议的代表,很快传到了山东。第二天,6 月 18 日,在山东省委和济南市委门前,就出现了一批大字报,指责“省委主要负责人偏离了斗争大方向,不批林,矛头指向群众”,“要求落实政策”,“揪出林线人物”。到 7 月 5 日,省、市委门前贴出了第五批大字报,开始公开点名袁升平:“不打倒袁升平,誓不罢休!”7 月 7 日,又发生到省学习班抢人的事情。7 月 8 日,枣庄 140 多人到济南上访静坐,越闹越凶。7 月中旬,山东 30 多人到北京上访告状。张春桥、姚文元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他们。很快,《赴京上访纪要快报》、《中央首长接见的特大喜讯》等宣传品传遍山东全省。

7 月 18 日,中央通知山东杨得志、张铿秀、白如冰去北京“做上访人员的工作”。临行前,省委常委开会分析研究了社会动态,讨论了向中央的汇报材料。

开完会,袁升平回到家里,不放心,又拿起电话找杨得志。因为下午 13 时飞机起飞,杨得志已经离家上机场去了。袁升平又打电话给张铿秀,他正准备出发。袁升平简要地说:“对他们的要求,要作具体分析,正确的接受,不正确不合理的要求,不能被迫接受。特别是说我们‘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这个问题坚决不能接受,要顶住!”

因为张铿秀急着要走,袁升平不能多说,但又怕没有说清楚,便再打电话到机场找杨得志。杨得志还没有到,是党委秘书接的电话。袁升平把对张铿秀说的电话内容又重复了一遍。

20 天后,8 月 8 日凌晨 2 时,袁升平突然接到汪东兴的电话,要他和山东省委副书记苏毅然去北京,说中央拟解决一下山东问题。

下午 5 时许,袁升平他们到达北京西郊机场。按惯例,过去每次进京,都由有关部门的领导和工作人员接站,可这次只来了一个秘书,冷清得很。袁升平问他会议开得怎么样,他吱吱唔唔,先说秘密的很,不知道,后又说情况很复杂。到了京西宾馆,见到济南军区工作人员,也都是对袁升平故意回避,不是装着没看见,就是绕着袁升平走,只有人低声对他说:“袁政委,情况复杂,您要提高警惕啊!”

袁升平进了房间,杨得志、白如冰等人过来打了个招呼,便赶紧走

了。离开饭时间还早,他想去省委几位领导的房间看看,可门都关上了。吃饭时,气氛也很异常,要么没话说,要么找话应付,瞎扯这菜怎样,那菜怎样。

晚19时,秘书通知袁升平:“晚9时中央领导在人大会堂接见,两家常委参加。”

袁升平问什么内容,他说不知道。袁升平想白如冰会知道,便去敲他的门,没有回音。再敲其他人的门,也都不在。他一眼望见杨得志的屋里还亮着灯,便在过道走来走去,这时杨得志开门出来,袁升平走上前去。他们进了东边的一个小会客室,关上门,走向凉台。

杨得志简单告诉袁升平会议的进展情况,然后说:“今晚的会你知道吗?就是斗你!你要有精神准备,……”“你一定要冷静,千万别发火。……古人常讲,‘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最后,袁升平说:“看来他们又在搞阴谋诡计,要在我身上开刀了。就是我坐班房,你在外面,不要忘记我们几十年的情谊,不要忘记现在你我讲的话,在适当的时候,希望你讲话,这样,我就是坐班房,也没有怨言。”

说完,他俩分别回到自己的房间。

当晚21时,人民大会堂山东厅,周恩来宣布开会。他的话音刚落,秘书进来请他去接电话,姚文元首先发言,他指责袁升平在文化大革命中表现一贯不好,“不支持造反派,不支持革命委员会,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并说:“凡是林彪死党,凡是走资派,都是支持复辟的反动势力,支持保守派,袁升平就是一个典型,他是山东复辟势力的总代表、总后台。”“中央解决山东问题,他要顶住。山东问题的根子就在袁升平。”

这时,苏毅然说:“山东的问题,我认为不能全由袁升平同志一人负责,重大问题都是由省委集体研究决定的……”

张春桥打断他的话说:“你不要讲嘛!”

苏毅然说:“我还有两句话就完了。袁升平同志虽然是省委第二书记,但……”

张春桥再次打断说:“我对你说了,你不要讲了!想不到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你的路线斗争觉悟还这么低!”

姚文元也跟着说:“你不要再讲了!”

与会人员纷纷批判袁升平,会议一直开到子夜,直到江青用手指敲着手表,对周恩来说:“已经两点半啦!”周恩来这才慢慢地对大家说:“那好吧,会议就开到这里。”他又说:“大家说袁升平同志有这些错误,提出来了,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嘛,改正了还是好同志。”说完,他站起身,走到袁升平跟前伸出手,握住袁升平的手说:“冷静一点,有错误就改,不要紧,改了就好嘛,你也是老同志嘛,要注意身体。”

袁升平表示:“感谢总理,我一定遵照总理的指示去做。”

接着,江青、张春桥也走过来,但袁升平转过身,扭头就走了。

第二天,8 月 9 日,除袁升平留在北京外,杨得志等人返回济南。山东进京上访的 30 多人也同机返回。当他们乘坐的伊尔 18 型飞机降落在济南西郊机场的时候,康生的儿子、山东省委秘书长张子石迎上前去,一一和他们握手,全场敲锣打鼓,表示欢迎。

8 月 11 日,中央宣布撤销袁升平山东省委第二书记和济南军区第二政委的职务,留京“检查交待问题”。

# 第1278回：议人选，许世友颇有微言 做工作，周恩来几次哽咽

8月13日，《人民日报》又发表了广东杨荣国的另一篇文章《两汉时代唯物论反对唯心论先验论的斗争》。

8月14日下午17时15分，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召集周恩来等人开会至晚上20时。他再次提出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要读经典原著的问题，特别说到一些工农干部应该脱离工作学习一段时间。

当晚20时30分，周恩来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根据毛泽东的倡导，中共中央决定专门举办一期工农兵中央委员学习班，吸收21名来自工农兵的中共第九届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参加。其中，在地方工作的19人，有上海的王洪文、山西的陈永贵、北京的倪志福、陕西的吴桂贤等；在军队工作的2人，一个是在抗美援朝空战中击落美军“王牌”飞行员戴维斯的空军一级战斗英雄张积慧，另一人是在国土防空作战中击落骚扰大陆的国民党军高空侦察机的海军战斗英雄舒积成。本期读书班从中央党校选调20多名教员专驻读书班为这些工农兵中央委员讲课，以提高他们的理论素养。

8月18日，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召集中央政治局部分成员开会，讨论召开“十大”的问题。毛泽东说：“希望这次会议开成真正是团结的、胜利的大会。”

19日，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讨论已列出的第十届中央委员、候补委员、中央政治局名额及其成员名单。随后周恩来、王洪文将讨论情况报送毛泽东。毛泽东作了圈阅。

20日，毛泽东阅“十大”政治报告，批示：“原则同意。”并确定由周恩来作政治报告。

当天上午8时，周恩来、王洪文报送毛泽东新改印的十届中央委员、候补委员名单，并在报送报告上说明：“昨晚政治局会议又对十届中委、候补中委名单讨论了一次，总人数加至三百一十四名。较昨日

下午送上的名单又加了五名。”毛泽东圈阅。

下午,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召集周恩来、张春桥等人开会,研究“十大”的相关问题。

根据毛泽东意见,周恩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介绍各地召开的预备会情况,以及对“十大”政治报告和修改党章报告讨论修改情况,并宣读中央专案组《关于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罪行的审查报告》,宣读和解释经毛泽东圈阅的“十大选举准备委员会”名单等,获一致通过。

晚上,104 名“十大选举准备委员会”委员在北京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周恩来主持。他介绍自 5 月中央工作会议以来“十大”各项筹备工作情况,宣布“十大选举准备委员会”即日成立。根据毛泽东的意见,王洪文担任选举准备委员会主任,副主任为周恩来、康生、叶剑英、江青、张春桥、纪登奎、李德生。并说,中央政治局内已先成立一筹备小组,由王洪文任组长。

关于政治报告,周恩来说:“这是最短的一个报告。但主席的要求还要严,他说最好写个五千字的报告,我们写了将近一万字,比起历来的报告还是最短的一个。”

他还说:“主席常说,能上能下,我们要做这个工作。‘九大’本来就是这个目的,后头被林彪在二中全会上这一闹,妨碍我们的工作进行。现在,工作应该加紧进行。主席说,今后的中央委员会包含政治局,都要三四十岁的人多一点才好。”

介绍完情况,周恩来立即请王洪文主持会议……

当天,中共中央下发中发[1973]34 号文件:《关于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罪行的审查报告》。中共中央批准的《关于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罪行的审查报告》共分三个部份。

第一部份说:根据已经调查核实的物证、人证,现已查明:

一、“早在九大前后,林彪就招降纳叛,结党营私,伙同他的老婆叶群,勾结陈伯达、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人,结成以林彪为头子的资产阶级司令部。”

二、“在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上,林彪反党集团向党发动的突然袭击,是有预谋的。”

三、“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以后,林彪反党集团立即秘密进行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的准备。”“林彪还企图勾结苏修,对我实行南北夹击。”

四、“林彪叛党叛国是有其历史根源的。林彪出身于大地主兼资本家家庭,入党以后,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得到改造。”

报告的第二部份说:“林彪反党集团的出现,是国内外激烈阶级斗争的尖锐表现。”“在这样的形势下,林彪反党集团作为国内外阶级敌人的代表,迫不及待地跳出来。他们为自己的阶级本性所决定,非跳出来不可。”

报告的第三部份说,“中央专案组建议党中央:

一、永远开除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反革命两面派、叛徒、卖国贼林彪的党籍。

二、永远开除林彪反党集团主要成员、国民党反共分子、托派、叛徒、特务、修正主义分子陈伯达的党籍,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

三、永远开除林彪反党集团主要成员、混进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特务、叛徒、卖国贼叶群的党籍。

四、永远开除林彪反党集团主要成员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的党籍,撤销他们的党内外一切职务。

五、对参与林彪反革命政变的其他骨干分子,由有关部门负责审查,按照党的政策,区别情况,提出处理意见,报中央审批。”

8 月 21 日凌晨,周恩来在回中南海的路上发现有些路段路灯停电,立即召集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万里和北京市电力、公用、建设部门负责人开会,要求把首都供电系统建成一个安全、稳定的电网。在听取汇报时,他询问起原北京市崇文区清洁队掏粪工人、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全国劳动模范时传祥的情况,得知他已被遣送回山东老家时,生气地说:“难道文化大革命要打倒一个掏粪工人吗?”当即指示有关部门将时传祥接回来,给他平反、道歉、治病。

当晚,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商议“十大”主席团领导成员名单。根据毛泽东的意见,担任“十大”主席团主席、副主席的人,也就是第十届中央委员会主席和副主席的人选。

主席团主席由毛泽东担任,没有任何异议。

当议到副主席人选时,会上先后提出 4 人,即周恩来、王洪文、康

生和叶剑英。

周恩来重申了毛泽东对王洪文的评价:王洪文做过工,当过兵、种过田,以后又在工厂里当了干部,工、农,兵、干部……比较企面,还主持过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工作,调到中央以后表现也是好的,所以要提拔这样的年青干部……

不料,周恩来讲完后,政治局委员们都不吭气,会场里沉默了半晌,使坐在一旁的王洪文感到十分尴尬。

过了片刻,许世友嘟囔着说:“我看只要一个副主席就行了!”他所讲的“一个副主席”,当然是指周恩来。

后来,他又认为“有3个老同志就够了”。

最后,还是叶剑英出来表态说:“重视提拔年轻干部,是主席的一贯思想,早在六十年代,主席就多次说过:群英会中诸葛亮只有27岁,孙策小霸王17岁、周瑜拜大都督时也只有30岁……”

叶剑英又调过头来做许世友等人的工作,“我们这些当军长、师长的时候,有的还不到30岁,现在王洪文同志已经38岁了,我赞成王洪文同志担任当中央副主席,名字排在总理之后……”

许世友又提议江青作候选人。

在叶剑英一再做工作后,同时在副主席预选名单上又增补了一名军队干部李德生,副主席的预选名单这才在政治局获得通过。事后,王洪文向徐景贤提到这件事……

许世友的态度,也代表了很多老干部的意见。为此,政治局决定再召集出席“十大”的中央和地方负责人开会,以便“打通思想”、“统一认识”。

8月22日下午16时,周恩来到中南海游泳池向毛泽东汇报中共中央政治局选举筹备小组关于“十大”组织人事安排酝酿的结果。

当晚22时,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商定:“十大”主席团主席为毛泽东,副主席为周恩来、王洪文、康生、叶剑英、李德生,秘书长为张春桥。

关于十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人选,除以上7人外,另增加董必武、朱德两人。

8月23日,毛泽东圈阅了周恩来关于“十大”准备工作的报告。

报告说:“昨日晚间开政治局会,先议主席团名单,继议十届中委和候补中委名单,再议有关主席团和十届中央委员会的关键问题。最后,议政治局常委,因主席、副主席六人为当然常委,春桥同志为政治局常委只一人,可否再加两人共九人。主席指示可提董、朱二老为政治局常委,大家认为好。”

8月23日,“十大选举筹备委员会”各小组协商通过“十大”主席团主副主席、秘书长及主席团全体成员名单。当天,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周恩来宣读并解释毛泽东圈阅的中共十大主席团名单、中共十届中央委员会委员(预选)名单、中共十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预选)名单。

8月23日晚,在周恩来主持下,召开了中央党政军直属机关和各省、市、自治区负责人会议,进一步协商将在“十大”产生的中央领导机构成员名单。周恩来在会上说:

“政治报告署了我的名字,但不是我写的,是张春桥按照毛主席的思想、路线起草的,经毛主席看过,报告是毛主席的思想,主席要我作报告。”

他着重说明毛泽东选调王洪文到中央工作的情况,表示:“主席讲的我要传达,因为主席给我不知说过多少次了。我们应该按照这一精神,重视选拔青年干部,不能看不起‘儿童团’。”他又说,“我年纪大了,但我还是要为党鞠躬尽瘁的,我们是立党为公,不是立党为私。”当他说到“我们有些老同志怎么会糊涂到这个地步”时,噙着泪水,几次哽咽,在场的人无不为之感动。

在讲到“十大”主席团增加了一些老干部,他说:“主席这几年苦心苦思想国家前途,想世界前途。”“邓小平同志说过,有的老同志身体不好,可以做顾问。毛主席对邓小平同志的意见很重视,提出组织一个顾问委员会,他当主席。这件事主席跟我一个人讲,我说不行,他又跟政治局同志讲,大家又都不同意。主席说,你们大家不赞成,我只好鞠躬尽瘁。”

到会的许世友仍很不服气,多次插话陈述自己的意见。

轮到王洪文讲话时,包括许世友在内的一些老干部都没有像听了周恩来讲话后那样鼓掌,而是沉默。

会议最后通过了新一届中央委员会委员、候补委员、以及中央领导机构全体成员名单。

8 月 24 日上午 8 时 30 分,周恩来将会议情况书面报告毛泽东。报告说:“昨晚政治局约集各省、市、自治区第一书记和中央党政军直属机关有代表性的同志座谈,提到老中青三结合时,说主席在九大后,特别在庐山会议和‘九一三’后多次说要提工农出身的同志为党的副主席、常委,并且具体提到洪文同志。今日下午在京西宾馆开大会预备会议。拟在今晚九时半过后,于人民大会堂请主席主持大会开幕。”

下午 16 时 30 分,参加“十大”的全体代表在北京京西宾馆大礼堂召开“十大”预备会。大约离开会还有三、两分钟,邓小平独自来到会场,引起会场活跃,叽喳声起。代表们对他出席大会其实早有充分的思想准备,但还是感到很新奇。

周恩来面带微笑率先步入主席台,代表们报以热烈的掌声。自左向右,在主席台上就坐的是:纪登奎、陈锡联、许世友、姚文元、江青、张春桥、董必武、周恩来、朱德、叶剑英、李先念、王洪文、李德生、汪东兴、华国锋、吴德。

大会由周恩来主持并讲话。他说:

“最近在主席那里开了个政治局会议。主席指示:希望十大真正开成一个团结胜利的大会。希望大家团结起来,不搞分裂,不搞阴谋诡计,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对外反对帝、修、反,对内反对刘少奇、林彪反党集团、死不改悔的死党。要坚持原则,但也不排斥必要的灵活性。党组织决定了,就应该服从它。这就是政治局会议上主席的指示。”

“国内外形势大好,美帝苏修内外交困。他们总要找空子,在我们内外找点空子,挑拨离间,造谣、中伤、诽谤、诬蔑,搞破坏,特别是苏修!现在我们的外交路线取得了很大的胜利,很多人到我国来,各国朋友来的更多,总有钻进来的坏人,到处打听消息,十大成为他们报道的中心。人是活的,这些人到处乱跑,到大会堂、中南海、钓鱼台,还有这个地方——京西。所以要严格保密制度,比上次还要严,不外出,不会客,不打电话。各地的工作,家里有人主持,必要时可以和我们打个招呼。我们还可以出去一下。比如今晚大会堂有个宴会,8 位同志去

参加:叶剑英、李先念、李德生、徐向前、姬鹏飞、王猛、庄则栋、丁国钰。你们8位可以去赴宴。你们赴宴,掩护了我们。明天亚非拉,也就是第三世界乒乓球邀请赛正式开幕。为了保持秘密,出席开幕式的是在京的中央负责同志、国务院副总理。不在京的抱歉了,不能去,你们一去就暴露了。”

“要十分珍惜这个大会。这一次是主席直接主持的,这一点与九大不同。当然,九大本质上还是主席领导的了。九大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都是正确的。九大的中委,三分之一以上出席了这次会议。有的故去了,有的因为工作没有来,让给年轻同志来了。只有一小撮是死党。有的人犯了错误是可以改的。这次没有参加会,将来还可以为党工作嘛!九大的组织路线是跟着政治路线来的,所以,九大的组织基础是肯定的。虽然出了‘913事件’,没有什么了不起,我们的党还在前进嘛!”

“选举准备委员会103人,分四个组。当然,这里也有一些争论,这也是正常的。”

“召开预备会,解决两个问题:一个问题是选举主席团主席、副主席,秘书长,主席团成员。主席、副主席、秘书长是7人,再加上141,一共是148人。比九大少了一部分。”

接着,周恩来主持通过了这个名单。

这一次大会通过的主席团的名单,采用了不同于任何一次全国党代会的主席团名单的排列方式:

毛泽东

周恩来　王洪文　康　生　叶剑英　李德生

张春桥

(以下按姓氏笔划为序)

江　青(女)　朱　德　许世友　陈锡联　李先念　姚文元

董必武　纪登奎　华国锋　吴　德　马天水　马　宁

马金花(女)　于会泳　邓小平 邓颖超(女)　王　体　王六生

王必成　王永祯　王秀珍(女)……

在这张名单上,王洪文已成为中共第三号人物!

在这张名单上,张春桥单列一行,因为他担任了大会秘书长!

会议通过“十大”的三项议程：

（一）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作政治报告；

（二）王洪文代表中共中央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

（三）选举第十届中央委员会。

周恩来强调“要坚决照毛主席的指示办，要照顾毛主席的健康，开短会。”为了节约时间，报告只念“一头一尾”。周恩来同时还告诫大家：“为了毛主席健康不要吸烟。”

最后，周恩来扬起声调说道：“我报告大家一个好消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等我们好几天了，今天晚上就开会。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主持我们的会议。”讲到这里，周恩来又说了一句：“我们坚决照主席指示办就是胜利！这是雷锋的话。”

周恩来的讲话，博得代表们一阵阵热烈的掌声。

# 第1279回：周恩来，“十大”做政治报告 王洪文，冉冉升起的新星

8月24日晚22时，中共“十大”在人民大会堂正式召开。除了年老体弱的以外，大多数代表们来到会场，不是乘车来的，而是通过漫长曲折的地下通道走进人民大会堂。而此时，人民大会堂三楼宴会厅正在举行亚非拉乒乓球邀请赛的酒会。

代表们在大会堂里等候毛泽东出场，等了许久不见他上台。原来，此时的毛泽东已患运动神经元病，或称内侧纵索硬化症，行走不便。所以他在后台练习走步，走了好一阵，适应了以后，才可以不用人扶，缓步登上主席台。当他出场的时候，大家没有像以往那样山呼“万岁”，因为怕惊动了楼上的外国朋友，只是热烈鼓掌。

中国共产党众望所归的最高领袖毛泽东已年届80。与4年前“九大”时相比，他已明显地苍老。

75岁的周恩来显得瘦削，脸上浅褐色的老年斑明显增多。

与年迈的毛泽东、重疴缠身的周恩来相比，38岁的王洪文步履轻捷，充满着活力。他依然穿着一身军装，但比出席“九大”时多了领章、帽徽。

在毛泽东用一口湖南话宣布“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现在开始”之后，周恩来先问：“主席讲几句不讲？”

毛泽东什么也没有讲，只是说：“请周恩来作报告。”

周恩来拿起政治报告排印稿，念了起来。

“十大”的政治报告由张春桥、姚文元起草，共分三个部分：关于九大路线；关于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胜利；关于形势和任务。虽然报告的基调仍是肯定“文化大革命”，但在批判林彪集团时用了一句颇为形象的话：“语录不离手，万岁不离口，当面说好话，背后下毒手。”

当周恩来读到报告中的“时代没有变，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没有过时，仍然是我们今天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时，毛泽东插话：“哎，

不错。”

当周恩来读到“应当强调指出:有不少党委,埋头日常的具体的小事,而不注意大事,这是非常危险的”时,毛泽东说:“对。”

在周恩来念完政治报告之后,毛泽东说:“请王洪文讲话。”

王洪文成为1200多位代表目光聚集的焦点。他开始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

拒当时借调到中央办公厅参加为筹备“十大”而成立的党章修改小组工作的上海市委写作组的肖木回忆:当时“要完成两个文件:一是党章修改草案;一是《关于修改党章的说明》。一个多月后(确切日子已记不得),毛在我们小组上送的《关于修改党章的说明》上大笔一挥,将标题中的‘说明’改为‘报告’,变成了规格大为提高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又亲笔署上报告人‘王洪文’三个字。”

王洪文在报告中,完全肯定了中共“九大”,只是说“九大”党章中那段关于林彪作为“接班人”的话必须删去:

“四年多来的实践充分证明,九大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都是正确的。九大通过的党章,坚持了我们党一贯的根本原则,反映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新经验,在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政治生活中起了积极的作用。修改草案的总纲部分,保留了九大党章关于我们党的性质、指导思想、基本纲领、基本路线等规定,结构和内容作了一些调整。条文部分改的不多,总的字数略有减少。九大党章总纲中有关林彪的一段话,这次全部删去了,这是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一致要求,也是林彪叛党叛国,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的必然结果。……”

王洪文在报告中,强调了“反潮流”精神:

“要有敢于反潮流的革命精神。毛主席指出:反潮流是马列主义的一个原则。许多同志在讨论修改党章时,联系党的历史和自己的经历,认为这是党内两条路线斗争中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我们党在民主革命前期,曾经几次出现过错误路线的统治,在民主革命后期和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占主要地位的情况下,也有过某种错误路线、某种错误观点一度被许多人当作正确的东西加以拥护这样的教训。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同那些错误的东西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并且取得了胜利。事关路线,事关大局,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就要出以公正,不怕撤职,不怕开除党籍,不怕坐牢,不怕杀头,不怕离婚,敢于反潮流。……”

在一片掌声中,王洪文兴冲冲地结束了讲话。

毛泽东宣布:“报告完毕,今天就到此为止,散会!”

说完,毛泽东两只手扶着椅子使劲往下压,他想让自己的身体能够支撑着站起来。护士长吴旭君见状,马上叫人过去搀扶,并把椅子往后挪,好让他站稳。这时,台上台下长时间地鼓掌欢呼,持续了10分钟之久。周恩来发现毛泽东的腿在颤抖,他让毛泽东坐下,毛泽东也就毫无顾忌地一下就重重地坐到椅子上,一动也不动。而台下的代表仍一个劲地向毛泽东欢呼。

尽管周恩来一再挥动双手指挥大家走,大家还是不走。周恩来急了,快步走到后台找护士长,卫士长等商量,当时既不能公开宣布毛泽

东的身体状况,又不便派人上台去把毛泽东扶下来。吴旭君建议,由周恩来当场宣布:“毛主席目送各位代表退场。”周恩来只得重新上台,对1200多位代表说:“现在,毛主席目送大家退场。请代表们分几路同时退场!”

毛泽东也说:“你们不走,我也不走!”

在这种情况下,总算有人带头退场。

毛泽东目送大家,又和身边的蔡畅等人谈话,代表们心中有一种不详的预感,可是看到毛泽东神态自若,又放下了心,大家边退场边回望,足足走了10多分钟。

中共“十大”与前几次代表大会比较,是节奏最快的一次:“七大”开了49天,“八大”开了12天,“九大”开了24天,而“十大”按预定的议程,只开5天。这因为“十大”肯定了“九大”路线,不用在制定政治路线上多花功夫,着重于补上因林彪集团下台而造成的空缺。

“十大”开会的方法和以前有些不同:先在各地区、各单位分别开预备会议,讨论为大会准备的三个文件,提出意见。这样做,为的是缩短大会的时间。

8月24日举行开幕式之后,花4天时间分组讨论。王洪文突然成为接班人,成为小组讨论的热点。

上海组马天水作了长篇发言,盛赞王洪文,给了王洪文有力的支持:

“我觉得洪文同志到中央工作以后,进步很大,看问题、讲话,都很深刻,很全面,对我教育很深。……”

马天水历数王洪文在上海的“造反”功绩,然后说:

“我和洪文同志相处工作多年,我觉得他看问题、想问题很全面,有组织工作、领导工作的能力,不是一个只会冲冲杀杀的人,这一点我可起誓!”

“春桥同志、文元同志长期在中央,上海是洪文同志主持工作。我觉得:洪文同志至少比我强得多!……”

这一席话,倘若出于张春桥、姚文元或者王秀珍、徐景贤、陈阿大之口,也许“感染力”就差了许多,由久经沙场的“识途老马”说出,便产生很大影响。

江青没有直接听到马天水的发言,但很快有人向她汇报,她跑来紧握马天水的手:“马老,你讲得好,讲得真好!”

8 月 27 日,在毛泽东处开会,汇报“十大”各项议程进展情况。毛泽东表示将不参加十届一中全会。

8 月 28 日,“十大”主席团会议。

周恩来讲话中说:“对文化大革命以来犯错误的省委第一书记,只要承认错误态度比较好,绝大多数都解放了,并都在这次提作新一届中央委员会候选人;对犯有严重错误的老同志,有的也还要保留,这是一个代表性问题,体现了毛主席的教育干部政策。”

毛泽东向中央政治局提出,他不再担任党的主席。周恩来在主席团会上讲:

“我跟主席讲,不要说全党、全国通不过,在我这里我就不能同意。”

会上传达说,有些代表提议江青进中央政治局常委。周恩来说:“我是理解主席的,主席不愿意的事情,我们就不要强加于主席。”

大会期间,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和主席团成员在京西宾馆东侧小会议室开会,小会议室外面的停车场,和主楼大院隔着绿茵茵的草坛,围着约半米高的白玉石雕龙护栏,相距不过 5 米,显得比大院稍高,凭此望去,代表们就可以目睹他们上下车或进出宾馆小会议室的风采。一些青年和学生代表见到周恩来等领导人从这里出入,便走近护拦,低声的议论。不知是谁轻轻唤了一声:“总理”,周恩来闻声,笑容可掬地朝他们这边走过来,双臂交拍,亲切地同代表们攀谈,甚至叫出那些曾经见过面的某某、某某的名字,并致以问候。周恩来同代表们如此一唤即到,毫无拘束的会见,虽然是短短的一瞬间,已令这些年轻人不亦乐乎、依依难舍、永记不忘。当他和年轻人挥手告别后,大家侃侃而谈,议论周恩来伟大的人格,久久不能平静。

8 月 28 日,“十大”通过了政治报告、修改党章报告和《中国共产党章程》。这天,代表们还以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中共第十届中央委员会。

大会按时召开后,却迟迟不见毛泽东登台,大家心中正在嘀咕,只听见周恩来宣布:“今天大会,毛主席请假;毛主席委托王洪文同志代

表他投票选举十届中委和候补中委。”

用不着作任何解释,1249 名十大代表恍然大悟,心知肚明:毛主席不委托别人而委托王洪文代表他投出这庄严的一票,说明毛主席最信任王洪文,毛主席亲自选定了王洪文做他的接班人!

接下来,当周恩来宣布投票开始的时候,穿着簇新军装的王洪文,毕恭毕敬地从他的座位上站起来,走到毛泽东的座位前面,拿起桌子上放着的毛泽东的选票。早在“九大”的时候,毛泽东就提议:谁赞成选票上的名单就不必一一画圈了,如果反对的话就在某人的姓名上打一个“x”,所以,这份不着一个符号的名单,就表示毛泽东完全同意。王洪文双手捧着这张选票,就好比捧着一份郑重的信任和嘱托,他缓步走向票箱,投下这庄严的一票……从周恩来以下的所有的人都注视着他,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他们不仅是为毛泽东鼓掌,而且是为接班人王洪文鼓掌。

在新当选的 195 名中央委员和 124 名候补中央委员里,除包括毛泽东、周恩来、叶剑英、朱德、董必武、陈云等老干部外,还有在“九大”没有当选的一批老干部,如:邓小平、王稼祥、谭震林、乌兰夫、李井泉、苏振华、杨勇、廖承志、陶鲁笳、叶飞等。

据周恩来说:这一届中央委员会中,“工人、农民、现役军人以及其他劳动人民合起来比例约为百分之六十七,其余百分之三十三,很大一部分是革命干部,这里边很多过去也是军人。”

“十大”新增选的中委、候补中委,很多都不是“十大”代表,没有来北京参加大会,他们自己还不知道。

大会选举一结束,会议公报还未发表,第十届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的名单尚未公诸于世,马天水就马上从北京打电话给上海市委办公室,急如星火。因为即将召开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所以要求市委办公室连夜通知新当选的中央委员、候补中委集中,乘飞机来北京,可是还不能告诉他们到北京干什么,需要暂时保密。

名单上有些人是被从睡梦中叫醒的,稀里糊涂地赶到集中地点,被飞机一股脑儿地载到北京。当他们掀开被窝的时候,还不知道自己已经在梦里当上中央委员了!

当天晚上,名单公布。第二天上午,在北京京西宾馆大礼堂旁边

的会议室里,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等人,接见了上海新当选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和大家一一握手,可是对有些人根本不认识,姚文元当场把周宏宝和张国权两个人的姓名和面孔都认错了。

握手已毕,大家围坐成一圈。张春桥笑吟吟地说:“你们都要有调到中央各部门工作的思想准备……本来我不大愿意从上海抽干部,多抽了又要说什么是‘上海派’。现在感到有需要,就要抽!”张春桥说到这里,自左至右把大家环顾了一周,然后问道:“你们想到过自己这次会到北京来吗?”

“想不到!”

“根本没有想到!”

众口一词。

“十大”期间,北京正在举行亚、非、拉乒乓球邀请赛。所以,从上海市第五百货商店选拔上来的候补中委陈佩珍直着嗓子说道:“半夜里通知我上北京,我还以为是要我参加亚非拉乒乓球邀请赛的接待外宾工作呢!”大家听了哄堂大笑。

“十大”闭幕那天傍晚。作为大会秘书长一直忙碌着的张春桥,端了个人民大会堂那种专供中央领导人开会进餐用的长方形景泰蓝漆盘,坐到靠窗的一张台子旁开始享受晚餐。这时,有人过来找总理,张春桥对他说:“总理在那个房间,大概在同几位专家商量大会文件翻译的事吧。”

那人走后,张春桥深为感慨地说:“总理懂得多国文字,组织文件翻译这样的事,只有他能做。他的学识,他的经历、能力和为人,我这一辈子想学也永远学不到了,你不佩服也不行。”他吃了口饭,喝了口汤,停了一会,略微提高了一下嗓音说:“有人说我张春桥想争这个,又想争那个,好像有什么野心。其实呢,要说有什么野心的话,我这一生最大的野心,就是想写一部《毛泽东传》。”

8 月 30 日下午 15 时 30 分,周恩来主持中共十届一中全会预备会,就选举中央领导机构成员事进行协商。预备会前,周恩来、王洪文联署致信毛泽东、康生,强调预备会协商、解释的必要性,提出:“不进行这个手续,就不能说民主,而且有二百多人,他们均不知道,这等于强加于人。”

周恩来在预备会上通报了毛泽东不准备出席十届一中全会,并说:“大的事情主席还是自己抓的。”

谈到顾问委员会的问题时,周恩来说:“过去我们党内没有这个制度,但文化大革命期间开始有了顾问一职,如中央文革小组、外交部等。毛主席讲,中央成立顾问委员会,他可做主席,我们听了都不同意。主席当时不是开玩笑,是真的要这样做。”

晚上19时30分,在周恩来主持下,十届一中全会选出新的中央领导机构成员。毛泽东再次当选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副主席是周恩来、王洪文、康生、叶剑英、李德生。中央政治局委员21名、政治局候补委员4名,政治局常委除主席、副主席外,还有朱德、董必武、张春桥3人。这个选举结果,和会前酝酿、协商的情况是一致的,符合毛泽东对党中央人事安排的考虑。

宣布选举结果后,周恩来说:“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在延安开的时候,当宣布当选的中央委员名单后,毛主席说,当选了中央委员的,不一定比不当选的强,有些没能当选的,因为工作的关系,分配不能那样十全十美,总是有缺点。”“主席在九届一中全会上又说,你们不要当了中央委员,做了官样子,一时心血来潮,忘乎所以。”“我们应该兢兢业业地为党、为人是服务,按照毛主席的指示,鞠躬尽瘁,尤其是我们老一辈的同志。”

十届一中全会还批准了中央军委29日提出的新军委组成人员名单,共计63人,其中保留原军委成员28人:毛泽东、叶剑英、刘伯承、徐向前 聂荣臻、丁盛、王树声、韦国清、皮定均、刘兴元、刘贤权、许世友、陈士榘、陈先瑞、陈锡联、李德生、张达志、张池明、张春桥、杨得志、杜平、萧劲光、冼恒汉、曾绍山、曾思玉、彭绍辉、韩先楚、粟裕。新增补军委委员35人:王洪文、李先念、纪登奎、汪东兴、张才千、张宗逊、詹海英、苏振华、孔照年、马宁、傅传作、张廷发、毛远新、孙玉国、迟浩田、白如冰、杨育才、胡修道、李志民、王昭堃、孔石泉、王必成、周兴、张贵武、秦基伟、张英才、王六生、陈代富、郝忠云、杨勇、赛福鼎、高焕昌、陶鲁笳、萧克、宋时轮。

“十大”结束后,陈永贵回到昔阳。9月12日下午,他在县直机关干部职工大会上作报告,介绍了会议的情况。他说:“古今中外还没有

把一个农民提到国家的领导岗位上的,马克思没有解决,列宁没有解决,毛主席解决了,这就是毛主席对工农分子的依靠和重用。”

张春桥当上了政治局常委,当他的女儿问他感觉怎么样时,他说:“没有怎么样。哪一块革命根据地是我开辟的?哪一支军队是我带出来的?哪一个战役是我打下来的?我只是主席一个秘书,主席叫我动,我就动;主席没有叫我动,我就不动。”

# 第1280回：组班子，筹备开四届人大 回上海，周恩来思绪万千

1973年9月11日，经毛泽东审阅同意，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准备召开四届人大的通知》。《通知》说："中央决定最近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为了便于议事，在一九七一年全国经过调整选举上报的三千六百零四名代表的基础上，减少三分之一。各省、市、自治区和军队调整选举的名单和简历，应在一九七三年九月底以前报送中央。"

9月12日下午17时，周恩来在中南海游泳池陪同毛泽东会见法国总统蓬皮杜。会见后，他与一同参加会见的王洪文向毛泽东汇报了筹备四届人大会议情况。

当天，周恩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四届人大会议各项筹备工作。商定：

（一）关于召开四届人大会议的通知，有关代表名额的调整，由中央指定的组织工作小组负责处理。

（二）关于修改宪法草案工作，拟选几个重点单位试作修改。

（三）关于四届人大的其它筹备工作，拟先在政治局内组成三个小组进行：

1、组织工作小组，暂定6人，王洪文（组长）、李德生、李先念、纪登奎、吴德、汪东兴，负责审查全部人事组成名单。

2、宪法修改小组6人，康生（组长）、张春桥（代组长）、江青、纪登奎、苏振华、倪志福，负责宪法的修改、整理工作。

3、政府工作报告起草小组7人，周恩来（组长）、王洪文、叶剑英、张春桥、姚文元、李先念、华国锋，负责政府工作报告的起草工作，并先于近期提出报告要点或大纲。

以上三组工作，均须在10月5日前进行完毕。

14日，周恩来向毛泽东报告12日政治局关于四届人大筹备工作商议情况，提出："这些程序如果进行得顺利，四届人大正式会议开五

六天就能解决问题。”毛泽东圈阅了报告。

9月15日,纪登奎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召开了四届人大组织工作小组第一次会议,明确组织工作小组的任务是负责代表名额的分配和代表选举工作,组织有关部门推荐四届人大常委的建议名单。讲到这里,他非常严肃地说,组织工作小组只管代表和人大常委,鉴于历史的经验教训,要对组织工作小组和中组部定个规矩:“不准议论和提名中央和国家领导人的人事安排问题(包括副委员长、副总理等)”。

9月14日夜,周恩来陪同法国总统蓬皮杜总统,坐上北京开往大同的专列火车。

法国是第一个与新中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西方大国。蓬皮杜又是首位访问中国的法国总统。毛泽东说:“接待法国总统的规格将比接待尼克松高一点。”

此时的蓬皮杜已身患骨髓癌。周恩来决定全程陪同爱好艺术的蓬皮杜,访问几处经过他精心选择的地点。而且这次,周恩来一反过去陪同国宾到中国各地访问时,从不让邓颖超随行的惯例,让邓颖超全程陪同,只是不在外宾面前露面。

周恩来与蓬皮杜的专列于9月15日上午9时15分到达大同。他们参观了大同的云岗石窟、严寺和九龙壁。接着于9月15日飞往杭州,16日游览了西湖,参观了花圃公园。并于9月16日下午,来到了中国最大的城市,也是蓬皮杜此次访华的最后一站——上海。当周恩来气度从容,面带微笑地陪同蓬皮杜总统走下飞机时,那些在虹桥机场上载歌载舞、挥动鲜花的上海欢迎群众,没有一个人会意识到:周恩来是抱病出行的。

蓬皮杜和他的随行人住在锦江饭店;周恩来和邓颖超,就下榻在饭店对面的茂名南路五十八号,当时的锦江俱乐部。

周恩来和邓颖超在五十八号楼下的客厅里稍事休息。他对上海陪同的领导说:“法国人很重视民族文化传统,所以我推荐蓬皮杜总统看看我们的云岗石窟。”

邓颖超在一旁补充说:“恩来和我也都没有去过云岗石窟,这次是从北京乘火车直接到大同去的,我们也开了眼界。”

在谈起一路上的观感时,周恩来高兴地说:“这次到杭州,最满意

的是在楼外楼吃的一餐饭。”

上海的马天水等人忙问原委,原来9月16日上午,周恩来陪蓬皮杜一行游览了西湖,送别外宾以后,时近中午,周恩来忽然提出要请身边的工作人员到楼外楼吃饭。

楼外楼就在西湖旁边的孤山脚下,以西湖醋鱼、龙井虾仁等菜肴著称。周恩来请他的秘书、医生和警卫人员等登楼就座。饭店的服务人员和厨师发现周总理来了,惊喜异常。周恩来点了几个菜,这一餐饭,由于没有尊贵的外宾需要应酬,也没有浙江省和杭州市的领导人作陪,他们一行人就像家人团聚一样,吃得很惬意,也很舒畅。

此刻,当周恩来在上海谈起这餐饭的时候,他幽默地说:“吃完饭我请饭店开账单来,这是我自己请客嘛,结果他们开了10块钱。我说,这么多菜,10块钱怎么够?重开、重开、哈哈哈……”他仰天大笑,双手交叉在胸前抱住左右两肘,脸上露出那最富于魅力的笑容。

从他爽朗的笑声和坦诚的气度中,人们根本觉察不到一个身患重病的人极易流露的哪怕是一丝一毫的忧悒和伤感。只有周恩来身边的工作人员,才知道这一切都是刻意安排的,这次全程陪同国宾到各地访问,也许是他最后一次了。所以,他终于同意趁自己的健康状况还能坚持的时候,和妻子邓颖超一道远行,亲眼去看一看祖国的文化瑰宝云岗石窟;在湖光山色交相辉映的楼外楼,请多年来为自己辛劳服务的工作人员吃一餐饭,为的是表达一点感谢的心意。最后他还要和邓颖超一起,去看望那座能够引起他们无限回忆和怀念的城市——上海!

这座城市的历史中,一些辉煌的篇页都是和周恩来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1927年3月,中共中央派周恩来到上海发动和领导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他担任起义的总指挥,取得了胜利,建立了第一个属于人民的上海市民政府。在这次陪同法国总统蓬皮杜访问上海期间,周恩来在一个偶然的机会,亲口讲述了当年一段久远和珍贵的记忆……

这天上午,周恩来较早地来到上海大厦十四楼等候外宾,王洪文和徐景贤迎上前去,负责外事工作的冯国柱副主任向周恩来汇报说,外宾出车要推迟一会儿,车队还没有从锦江饭店发车。周恩来在贵宾休息室小憩片刻,呷了几口茶,信步走上休息室外边的阳台。这里一

南一北有两个阳台,可以俯瞰苏州河,远眺黄浦江。

周恩来凭着石栏,眯起眼睛,眺望架在苏州河上的四川路桥和桥边的邮政总局……他神情严肃,目光凝重,缓缓地回过头来,扫视着波光粼粼的黄浦江。他的目光掠过外白渡桥,最后停留在桥边一座英国式的古老建筑物上,这便是当年苏联领事馆对面的浦江饭店。

左边是二十世纪的上海礼查饭店(今浦江饭店)

周恩来指着浦江饭店问王洪文他们:“知不知道这个饭店的原名?”

王洪文他们3人都回答不上来。

周恩来介绍说:“过去这里叫礼查饭店,是公共租界里一座比较豪华的饭店。我在这里住过,那还是在1927年‘四·一二’事变以后……”

周恩来陷人了深沉的回忆之中,他讲起了一段尘封了四十多年的往事。

“1927年上海工人武装起义胜利以后,蒋介石叛变革命,当时的形势很紧急……我们党想要和当时驻在附近的一支国民党军队取得联系,希望得到他们的支持,因为在这支军队里,有我们党内一个同志的弟弟,担任师长的职务,记得他是浙江人,我们以为他会同情我们的

……”

说到这里,周恩来的语气在平静之中略带激动:“那一天,我和上海总工会的几个同志,找上门去和这个师长谈话,他表面上装得很热情、和我们谈了很久,最后还留我们在那儿吃晚饭。实际上这个人完全是在应付我们,尽量拖延时间。”

周恩来的眼神里闪过一阵痛楚的光:“……我们上当了!白白拖掉了好几个钟头,等到我们从他们那儿出来,回到上海总工会的时候,已经晚了!上海工人纠察队的枪械都被缴掉了!还有一些同志被捕……就这样,根据党组织的决定,我和邓颖超住进了礼查饭店……”

周恩来停顿了一下,朝他们3人严肃地看了一眼,用一种深沉的语调说“这是严重的教训:应当相信我们自己的力量,而不应当把希望寄托在国民党右派的身上啊!”

蓬皮杜一行结束在上海的访问回国的那天,淅淅沥沥地下起雨来,周恩来坚持亲自到机场为客人送行。机场上还有千把名手持花束的女青年以及服装艳丽、跳着舞蹈的少年儿童。周恩来和客人一一握别,目送他们登上舷梯,进人机舱。正在这个时候,雨势陡然转猛,瓢泼大雨哗哗地从天而降。周恩来的身上淋湿了,欢送群众的身上也湿透了。

蓬皮杜的专机关上舱门、撤走舷梯、飞机发动、开始滑行……

雨越下越大,周恩来仍然站在那里,向飞机挥着手。他灰白的头发湿透了,一身浅灰色的中山装浸了雨水变成了深灰色。警卫急步上前,撑开一把黑色的雨伞,想要替他遮挡一下。没想到周恩来侧过头来,朝着随卫严肃地盯了一眼,又严肃地说:“欢送群众都没有雨具,我怎么能打伞?!”

警卫只好把雨伞拿走。大家的目光,都齐刷刷地集中到周恩来身上。只见雨水从他花白的头发上淌下来,从他的浓黑的长眉梢上淌下来,直灌进他的脖子里去,大家都不忍心看着他挨雨淋,外事部门的负责人走上来,悄声问道:“可不可以请总理先退场?”

警卫摇了摇头。大家都明白:站在他们面前的这位老人,是民族形象的楷模。在对外接待上,他一向热情、坦诚、礼貌、周到而又不失尊严,为全世界所共知。如今,他连雨伞都不肯打,怎么还肯先行退

场呢!

透过雨幕望去,专机上的信号灯已经前前后后地跳亮、闪烁起来,发动机开始由低到高地轰鸣;可是,从飞机发动到滑行,还有好几分钟时间呢,周恩来仍然巍然不动,久久地向飞机挥看手……

在场的徐景贤,实在心疼这位75岁的老人被滂沱大雨夹头夹脑地淋浇,他从后排的警卫手里接过一把黑雨伞,不顾一切地走到周恩来身边,把雨伞打开挡在他的头顶上。周恩来以为是警卫又来了,侧过头来正待发作,一看是徐景贤,略带责备的眼光马上变得温和起来,他对年青干部向来是宽容的,他忍往了,他知道这是年轻人对他的尊重和爱戴。

专机升空了,外事工作人员请周恩来上车,可是他没有,而是把机场的负责人叫到跟前,叮瞩说:"快把队伍拉到室内休息,马上给每个人喝一碗生姜糖茶,免得感冒……"等到一切关照妥当,他才挥手和群众告别。

9月18日上午,雨后初晴,天气凉爽,周恩来和邓颖超在王洪文、马天水、徐景贤的陪同下,在北京东路外滩的轮渡码头,登上了"上海号"游艇,乘船游览了黄浦江。

游艇缓缓地驶离外滩,向着吴淞口开去。黄浦江上,汽笛喧腾,百舸争流。周恩来注视着在眼前掠过的挂满各色旗帜的中外海轮,眺望着正在忙碌起吊的沿江装卸区的作业情景,详细询问了这个世界上为数不多的亿吨大港的通过能力。说:上海港是我国最大的内外贸综合港。与全世界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有贸易往来,目前的通过能力和经济发展不相适应,还要多建若干个万吨级泊位。他说不久将会委托国务院业务组的粟裕前来具体考察了解。

游艇驶抵吴淞口,这里便是黄浦江流入长江、然后汇进东海的所在。周恩来走到游艇的甲板上,久久地凝视着吴淞口的灯标,陷人了深深的沉思……去法国勤工俭学的时候,告别过雄伟的吴淞炮台;和胡志明在上海接上组织关系时刻,吹拂过江上的寒风;第三次上海工人武装起义的枪声,震荡过浦江两岸的土地;马斯南路"周公馆"的灯火,照亮过上海人民的心……

从周恩来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第一次到达上海,直到这一次的最后

告别,一晃五十多年时光过去了。五十年来的风风雨雨,犹在眼前;而如今,却要离去……他扶着游艇甲板旁的栏杆,默默无语。他清醒地知道:这也许是他一生中的最后一次了,对于这片他长期生活过,工作过,战斗过的土地,他无比熟悉;对于这座城市中他所挚爱的人民,他无比眷恋。可是,现在,身患绝症的他,知道自己将永远告别上海……

永别了,黄浦江!永别了,上海!永别了,上海人民!

# 第1281回：挨家访，邓颖超未见文静 张春桥，向中央提出离婚

周恩来陪同法国总统蓬皮杜访问上海期间，邓颖超专程到康平路市委大院看望上海领导人的家属。她先去了王洪文和姚文元的家，还爬楼进了徐景贤家，看望了徐景贤的妻子葛蕴芳和女儿徐遥、徐蕴，亲切地吩咐说："你们要和徐景贤一道，保持革命本色，一辈子跟着毛主席干革命！"

从徐景贤家的公寓楼下来后，她又去探望了市委常委、老干部王少庸的家属。张春桥的家紧挨着王少庸的家，张春桥的妻子文静也正在家里等候。但是，邓颖超从王少庸家出来后，径自登上停在门口的汽车，直接驶回茂名南路58号住处……她没进张春桥家。

当时住在"康办"大院三楼办公室的肖木听到一向宁静的大院忽而说笑声、鼓掌声热闹一片，便从窗口往下探望，意外的看到，在院子里和家属和孩子们说话的，竟是邓大姐——邓颖超！他后来是这样回忆的：

邓大姐访问了住在大院的市委领导新老干部和已故柯庆施的家以后，这时正在发表她的告别讲话，末了几句似乎是有意大声说出的话，我至今记忆犹新。她说："今天我是特地来拜访大家的。该去拜访的，都拜访过了，只有一家没有去。不去的原因，你们大家一想就可以想到的。"

张春桥的妻子文静，原名李淑芳，天津人，说一口相当标准的普通话。她的父亲，是天津大清银行的职员，以后又担任过中国银行天津分行的副理。李淑芳在天津读书时加入共青团，抗战爆发后入党，1942年到晋察冀根据地党校学习，1943年被分配到北岳区党委宣传部任宣传干事。

李淑芳当时喜欢写文章，而且写得一手男子气概的好字，经常给《晋察冀日报》投稿，笔名是李岩、李若文。当时，张春桥也在北岳区党

委宣传部工作,两个人趣味相投,由相识而很快进人恋爱阶段。1943年秋,张春桥和李淑芳准备向组织上打报告,申请结婚。

就在这时,日军对晋冀鲁豫的太岳地区,进行规模空前的“大扫荡”。张春桥和分局宣传部的工作人员一起,隐蔽到河北平山、阜平一带的山沟里,而当时已经调到平山县郭苏区任区委宣传委员的李淑芳,却在一个大雪天的早上,落到了突然进村的日本侵略军的手里。

李淑芳被押到石家庄,关进了日本宪兵司令部。为了苟活,她自首了。日军为了利用已经投诚的女共产党员,吸收李淑芳进宣传班进行训练,让她对八路军搞“心战”。她的上级是日本宪兵中尉矢野。于是,李淑芳留在石家庄日本宪兵特别警备队,番号甲一四一七部队,既撰写反共宣传品,又上日本广播电台播音,还参加宣传演出。她编写了《弃暗投明》、《我们不再受骗》,《李老太太的悲哀》等反共宣传文章和节目,污蔑中国的抗日军民,鼓吹“中日亲善”。

时隔不久,随着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节节胜利,八路军在华北大举反攻,驻石家庄的日军纷纷溃逃,把李淑芳她们抛弃了。正在阜平县任《晋察冀日报》副总编辑的张春桥,和中断了一年多联系的李淑芳,终于重新相会,张春桥安排李淑芳进了报社任编辑工作,从此,李淑芳正式改名为“文静”,并向组织上隐瞒了重大历史问题。

抗日战争胜利之后,张春桥和文静在张家口结为夫妻。

文静被捕、自首的这段历史,很快就被党组织掌握。在后来的审干,肃反等历次政治运动中,文静的政治历史问题受到了反复的审查淡。解放后,文静在上海市委办公厅工作,也只是做调研工作和编写简报的工作。

六十年代初期,新华社上海分社曾打报告,建议任命文静为上海分社的副社长。可是,市委宣传部部长石西民知道文静的那段历史,而且文静又是张春桥的妻子,宣传部不便表态,便把任命报告转报给上海市委。上海市委没有批准。

1968年4月12日,上海第二次炮打张春桥时,曾有大字报揭露文静是叛徒。此事后来虽不再提及,但文静的叛徒问题已是公开的秘密。当时外地一名女干部因为当年和文静一起叛变投敌,此事在文革中被揭发出来,这个单位的外调材料寄到了张春桥手里。张春桥沉默

了半天,说不见了吧,把外调材料退回去。从此,张春桥严令文静不要把手伸进市委。虽然文静暗地里还想插手,但王洪文、马天水、徐景贤等人心中有数,对她都敬而远之。在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扩大会议上,曾有一个群众组织头头想讨好张春桥,说“文静可以作为市革命委员会的候选人。”张春桥勃然大怒,当场痛骂,“你这种人算什么造反派?我们共产党从来就不搞夫贵妻荣!做了谁的老婆就可以当委员,这完全是封建主义和国民党的做法,哪里像个无产阶级革命派!”

中共“九大”后,张春桥当上中央政治局委员。随后,文静从上海的公众场合彻底消失。

但是,文静的历史问题毕竟是张春桥的一块“心病”。“913”事件后,从王维国那里搜查出文静的大量材料。

文革期间,张春桥每次回到上海,总是住在兴国路招待所五号楼。这里原来是英商太古洋行大班建造的一座别墅,前面有一个优雅的大花园。别墅的底层是张春桥的办公室兼会客室,二楼是套间,外间装着直通北京的保密电话,里间便是张春桥夫妇的卧室,安着一张双人席梦思大床,放着几把沙发和软椅等。每逢张春桥回到上海,文静就从康平路大院搬到兴国路招待所去住。张春桥习惯于晚上工作,他工作到什么时候,文静就守候到什么时候;张春桥半夜总要吃宵夜,文静就通知厨师做好,到时候由服务员端上来,由文静陪着吃。张春桥善饮,文静有的时候就打开酒瓶,陪张春桥喝上几盅。文静既会抽烟,又能喝酒,烟瘾很大,酒量也不小,这两方面都和张春桥很契合。文静和张春桥一共生了4个孩子,三女一男,不时还进行合家团聚,说说笑笑,气氛十分融洽。

1972年的秋天,张春桥从北京回到上海,依然住在兴国路招待所五号楼。也就是在这一次,他和文静作了最后的告别,然后分手。张春桥此后长期住在北京钓鱼台九号楼,文静也从此搬出了上海兴国路招待所,搬回了康平路大院内的家里。

邓颖超来到康平路上海市委大院的消息,不胫而走,大院里的家属们和工作人员们都奔走相告,可是为什么偏偏不去张春桥的家?大家都在背后窃窃私议:“邓大姐肯定不愿意见到文静。”

大人们不便公开议论,只有不懂事的小孩子叽叽喳喳,问个不休。

徐景贤的两个女儿就盯住他问:“爸爸,邓妈妈到了小红(姚文元的女儿)家,到了我们家,为什么不去毛弟(张春桥的儿子)家?”徐景贤只好回答:“不知道,可能邓妈妈没有时间了,小孩子别多问!”

以后的几天,康平路市委大院里不见了文静的身影。本来,每天早晨,她肩上袴着一架半导体收音机,一边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早新闻,一边在林荫小道上悠闲地散步;现在,她那矮矮胖胖的身影忽然消失了,又过了几天,听说文静的心脏病发作,住进了华东医院。

邓颖超来访的消息,当然也传到了北京,传进了张春桥的耳朵里。

过了一段时间,王洪文陪同外宾来上海访问。送走外宾的那天晚上,王洪文特意把马天水、徐景贤和王秀珍3个人找到康平路,在小礼堂楼下的贵宾室里闭门密谈。

王洪文坐在正中的沙发上,点上一支烟,开门见山地说:“我这次来,专门要告诉你们一件事,就是春桥同志决定离婚了。这件事他本来早就想解决的,因为中央不断有事,所以拖了下来。最近,他正式向中央写了报告,中央也同意了……文静那里,春桥同志自己会告诉的。”

在场的几个人都感到意外。马天水首先嘟嘟囔囔地说:“是不是有这个必要?”

王秀珍表示惋惜,因为她和文静的关系很密切。

徐景贤沉默了片刻,说了一句话:“我尊重春桥同志本人的意见。”

王洪文对他们几个苦笑了一下,继续说:“这件事已经定了,春桥同志的考虑是有道理的,什么原因你们也了解,我就不多说了。文静曾经提出:离婚以后她从康平路搬出去,另外找地方住,我和文元同志商量,暂时不必动了,文静仍旧住在康平路,这里是她和孩子们的家,这样对孩子们更好些。这个消息对外不必宣布,要考虑到影响。当然,春桥同志今后到上海不会再回康平路的家了,今后孩子们要看他,可以直接到北京去……”

1973年9月23日,周恩来和王洪文一起向毛泽东汇报了《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额分配方案》等相关问题。毛泽东在听取汇报后作了指示。当天,周恩来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由王洪文在会上传达毛泽东的指示。

王洪文说:“刚才,我同总理一起到主席那儿请示四届人大代表的问题。一、代表名额要增加一些,要到2650名或多一些。”

周恩来:“可能达到2700名左右。”

王洪文说:“主席表示:可以。”

他继续说:“二、知识分子代表要增加一些。在保证工农兵代表占优势的前提下,为了团结各方面的人,有利于团结、改造知识分子,可以增加一些知识分子代表。

三、特邀代表的一部分或大部分转入正式代表,很少一部分放特邀代表,资本家可以做特邀。”

毛泽东说:“胡厥文也可以做正式代表。增加知识分子代表,要照顾到北京、中央国家机关,上海也有。”“周谷城、谭其骧、苏步青、刘大杰、陈望道都可以做代表。”

周恩来:“除北京、上海外,还有广州、武汉、天津等地也要增加知识分子代表。”

王洪文:“另外,我同意登奎同志的意见,目前在实际工作岗位上起骨干作用的知识分子应多安排一些,其他方面的,这次考虑名额有限,将来可在政协安排。总之,老朋友要照顾,同时要多交一些新朋友。”

根据传达的毛泽东的指示和中央政治局讨论的意见,对《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额分配方案(草稿)》再次作了重要的修改。经过组织工作小组会议讨论后,纪登奎报周恩来审批。

周恩来对《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额分配方案》逐字逐句作了修改,并批准以中央名义给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和总政治部、中央国家机关发了电报通知。根据中央通知的精神,四届人大代表候选人的酝酿协商工作开始在各地、各单位进行。

当时确定代表名额增加到2700名,实际最后选出的四届人大代表是2885名。其中,工农兵代表占72%,妇女占22%,各少数民族都有代表。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规定,全国人大代表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鉴于当时的情况,不可能对人大代表实施普选,也没有条件召开省级人民代表大会。所以,中央确定由各省、自治区、直辖

市革命委员会召开协商会议选举出席四届人大代表。

根据周恩来的建议,经中央政治局讨论同意和毛泽东批准,四届人大首次设立台湾省代表团,由在内地居住的台湾省籍同胞中推举代表,在北京召开协商选举会议选出台湾省四届人大代表。会议还确定由林丽韫负责,中组部派人协助做具体工作。后来,在人民大会堂台湾厅召开了四届人大台湾省代表协商选举会议,正式选出 12 名台湾省籍同胞为四届人大代表,第一次组成台湾省代表团参加四届人大一次会议。

9 月 29 日,王洪文参加了四届人大组织工作小组会议。他在会上说:“人大常委,考虑大体三三制,三分之一工农兵,三分之一革命干部和军队干部,三分之一民主党派代表。请组织部、统战部考虑个名单。”

由于当时中央统战口各单位尚未恢复业务,统战部还是军代表领导,他们对民主党派的情况很不熟悉,研究来研究去只提了十几位科学家和民主党派的领导人,致使民主党派的四届人大常委人选迟迟定不下来。

中央政治局委托王洪文、张春桥主持召开会议进行讨论。由于他们对民主党派的情况知之甚少,讨论多次,名单还是定不下来。最后张春桥只得说:“我们都不了解情况,还是请总理来搞吧!”

纪登奎向周恩来汇报后,周恩来带病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约统战部及中央党政军有关部门负责人开会,从早开到晚,他一边吃饭,一边讨论,这才一个一个把名单定了下来,连名单的说明都是周恩来逐字逐句推敲审定的。此名单最后经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

纪登奎传达毛泽东的意见说:“毛主席提出他不做四届人大代表,也不出席四届人大会议。政治局讨论了毛主席的提议,一致拥护。总理考虑中央领导同志只有毛主席一人不做人大代表不好,还要有人陪毛主席不做人大代表。我在政治局会议上首先提出陪毛主席不做人大代表,后来又提出汪东兴同志也陪毛主席不做人大代表,政治局讨论已经同意,请值班室将我们三个人的名字从代表名册中去掉。”

# 第1282回：读书班，清华北大材料组“反潮流”，武汉市风声再起

1973年9月，报刊陆续刊登了批判孔子和“尊儒反法”的文章。

9月4日，《北京日报》发表署名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的《儒家和儒家的反动思想》一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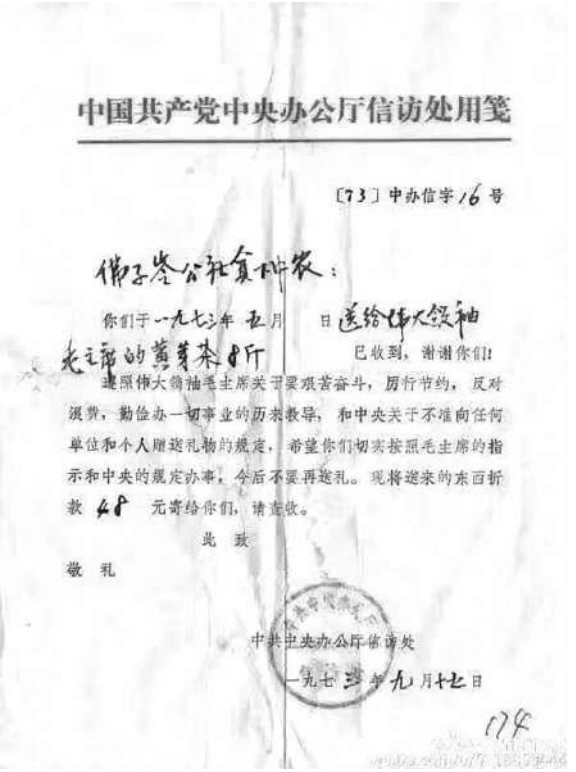
9月8日，“全国教育系统批孔座谈会”在国务院科教组负责人迟群主持下召开。

9月15日，“石仑”的《论尊儒反法》一文发表在上海《学习与批判》创刊号上，《红旗》第十期全文转载。

“石仑”是中共上海市委写作组的笔名。中共上海市委写作组成立于1971年7月。除了常用“罗思鼎”笔名外，还用石仑、康立、翟青、齐永红、石一歌、史锋、史尚辉、曹思峰、梁凌益、戚承楼、靳戈、方岩梁等笔名。核心成员是朱永嘉、肖木、王知常。

上海的《学习与批判》杂志挂着“复旦大学学报”的牌子，其实，它真正的编辑部设在上海市委写作组内，实际上是上海市委写作组的机关刊物，发行全国，印数颇大，当时在全国很有些影响。

9月中旬，安徽省佛子岭公社收到了中央办公厅信访处的下面这封信。



中国共产党中央办公厅信访处用笺

〔73〕中办信字16号

佛子岭公社贫下中农：

你们于一九七三年五月 日送给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黄茅茶8斤已收到，谢谢你们！

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要艰苦奋斗，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勤俭办一切事业的历来教导，和中央关于不准向任何单位和个人赠送礼物的规定，希望你们切实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和中央的规定办事，今后不要再送礼。现将送来的东西折款48元寄给你们，请查收。

此致

敬礼

中共中央办公厅信访处

一九七三年九月十七日

174

9月23日，毛泽东在会见埃及副总统沙菲时，又说起了秦始皇：

“秦始皇是中国封建社会第一个有名的皇帝，我也是秦始皇，林彪骂我是秦始皇。中国历史分两派，一派讲秦始皇好，一派讲秦始皇坏。我赞成秦始皇，不赞成孔夫子。因为秦始皇第一个统一中国，统一了文字，修筑了广阔道路，不搞国中有国，而用集中制，由中央派人到各地，几年一换，不用世袭制。”

9月27日，《人民日报》发表“唐晓文”的文章：《孔子是“全民教育家”吗?》。“唐晓文”是中共中央党校写作组的笔名，取“党校文”的谐音，成立于1973年9月。

紧接着，《“焚书坑儒”辩》、《秦王朝建立过程中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兼论儒法论争的社会基础》、《右倾机会主义和孔子思想》、

《资产阶级和儒法斗争》等文章整版整版相继刊出,使人想起当年批《海瑞罢官》的情景。

进驻林彪住处的专案组在林彪住处发现了许多林彪手抄孔子名言的卡片,谢静宜把这件事向毛泽东作了汇报,说林彪还有尊孔的言论。

毛泽东说:“噢,凡是反动的阶级,主张历史倒退的,都是尊孔反法的,都是反秦始皇的。”

他问谢静宜林彪有哪些孔孟的言论或者类似的语言,让谢静宜组织人搞一个材料送他看一看。

于是,谢静宜在清华大学抽调人员,组成“清查林彪与复制林彪罪证小组”进驻毛家湾。这个小组整理了一个初稿,只有两三页,谢静宜送呈毛泽东。

1973 年 10 月,毛泽东看了谢静宜送来的清华大学整理的那份《林彪与孔孟之道》的材料,不太满意。他说这份材料不行,可能是清华搞理科的关系,告诉谢静宜“要找北大的文科的老师一起搞。”随后,他在文件上批道:“我看可将冯友兰、魏建功吸收到两校大批判组当顾问,史料和文字可以请教他们。”

清华大学“清查林彪与复制林彪罪证小组”整理的《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也送给了江青,她看后批示:“东西不多,有些不够准确,还有一些个别的是牛头不对马嘴。”并立即将谢静宜和迟群找去,对他们说:抓这件事是非常重要的,是当前的一个大方向。

迟群和谢静宜提议:成立一个班子,专门下功夫好好地搞一下。江青同意这个意见,指示他们要老中青三结合。

10 月的一天,北京大学历史系党总支书记徐华民通知历史系大批判组的范达人:“明天,你到清华大学工字厅去开一个会。这个会很重要。会议内容,你不要对别人讲,回来也不需要向我汇报。”

第二天,范达人来到清华工字厅参加会议,发现参加这次会议的约 12 人,北大、清华各一半。

北京大学有中文系革委会副主任魏建功、历史系革委会主任周一良、历史系大批判组的范达人、哲学系的汤一介、人民大学哲学系转到清华大学马列主义教研室的徐琳、北大政工组干部龙协涛。

清华大学到会的有政治理论教研室的王世敏、国际共运史教员王朝文、清华大学哲学教研室孙中原、清华大学图书馆馆长史国衡等6人。

迟群说:“把你们清华、北大的同志找来,是为了编一份材料,前一段,我们去林彪住处发现他有尊孔的思想,我们向上汇报了,上头要我们组织老、中、青三结合的班子,继续收集和整理林彪尊孔的材料。”

迟群特别强调此事要保密,不得向外人泄密。

谢静宜也说:“找你们来,要你们编个材料,就是我们发现林彪有尊孔的言论,你们大家一起编个材料,这是上面的意思,这件事情很重要,但是要保密,不要给任何人讲,这个两校的这个合作,搞一个组织,叫做批林批孔材料小组。”

北大、清华批林批孔材料小组就这样建立起来了,迟群、谢静宜指定清华大学王世敏负责。

王世敏原是中国人民大学哲学教员,后转到清华大学政治理论教研室。她参加了清华大学“清查林彪与复制林彪罪证小组”进驻毛家湾收集林彪尊孔材料。一次江青提了几个有关历史和社会科学的问题,当时在场的王世敏反应敏捷,口齿清晰,对答如流,江青非常赏识,称她为“女状元”。

根据毛泽东的批示,迟群和谢静宜还请北京大学哲学教授冯友兰当顾问。一天,北京大学校党委政工组宋柏年通知冯友兰去清华大学开会,是关于北大、清华批林批孔材料小组的事情。宋柏年对冯友兰说:“你不必天天到,当个顾问吧。”

冯友兰来到清华,谢静宜拿着赵纪彬写的《孔子诛少正卯考》对冯友兰说:“江青要你看看。还要找你谈谈。”

1973年10月1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在庆祝国庆二十四周年发表的社论《认真学习,继续前进》中,发表了毛泽东的一条新语录:“要办好工农兵干部的学习班,每期三个月,一年办四期,一面读书,一面参加工作。”这是在1973年8月中央第一次举办工农兵中央委员学习班后,毛泽东发表的最新指示。参加1973年8月第一期“中央读书班”的21名“九大”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有12人坐在中共“十大”主席台上。

遵照毛泽东的最新指示,第二期“中央读书班”于1973年10月6日至1974年2月11日举办。10月6日晚,读书班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开学,周恩来率政治局部分成员接见本期学员和教职员。周恩来逐一点了40位地方学员的名后,将学员花名册递交给坐在他左侧的叶剑英说:“下面是部队来的同志,由你来点吧。”

叶剑英接过花名册逐一点了39位部队学员的名。被点名的学员站起来后,周恩来和叶剑英一般都要询问一些基本情况,与少数人的对话时间长达几分钟。点名完毕,几位政治局成员都讲了话。周恩来宣布:中央政治局确定,读书班由两名副主席王洪文和李德生分工负责。第二天晚上,王洪文、李德生到二里沟新疆驻京办事处小礼堂,向全体学员传达了本期学习计划。

读书班的学员编为地方和部队两个党支部,每个支部编4个学习小组。学员中有中共第十届中央委员18人、候补委员24人,其中的8人以后还担任了第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学员中有曾领导修建红旗渠的河南林县县委书记杨贵,三次蝉联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男子单打冠军的庄则栋,参加淮海战役被授予“钢铁营长”、“特等战斗英雄”称号的张英才,被树为解放军全军“好司务长”典型的孙乐义等。

遵照毛泽东“一面读书,一面参加工作”的指示,该期读书班学员先后参加了山东省在京举办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和四川省12个企业单位来京解决派性问题等会议。

“十大”提出的“反潮流”口号,在全国引起反响。1973年国庆节前后,武汉街头出现了“反潮流”的大标语和大字报。最早上街的是原“新华工”“红色造反团的”负责人聂年生和“钢工总”电车公司头头王华珍领导的“反潮流”队伍,虽然他们人数不多,活动能量还是很大的,不仅贴大字报、大标语,聂年生和王华珍还召开街头群众集会并发表街头演讲。后来,武汉肉联厂工人、“钢工总”武汉肉联厂二号头头谢妙福和“公安联司”的刘祖平等当时武汉的“街头派”也加入了武汉“反潮流”的行列。

“街头派”是武汉市“两清一批”以后出现的。1969年9月27日,中央针对武汉的“北决扬”组织下发了(69)67号文件,武汉开始清查“北决扬”,批判极左思潮。到了1970年以后,在清查“北决扬”和批判

极左思潮上,又加了清查“516”,故称之为“两清一批”。

1972 年春,武汉钢锯厂工人程贻新、省石油公司职工詹仕金、武汉城市规划设计院职工唐前坤等开始串连,要求为武汉在“两清一批”中被打成“北决扬”和“516”的造反派平反。此时,他们对文革期间的造反派头头们不满,认为他们在“两清一批”中放弃了抵抗。他们认为当权派靠不住,造反派头头也靠不住,于是决心“自己解放自己”,“把颠倒的武汉文革历史再颠倒过来”。他们以武汉街头为主要活动场所,以要求纠正“两清一批”错误为切入点,通过大字报、标语、传单宣传他们的观点。从 1973 年初开始,这批人逐渐增多,武汉街头的大字报、街头讲演、街头集会也越来越多,于是有了“街头派”之称。武汉当局开始不断抓人,1973 年 3 月,“街头派”王华珍、吴方义、何天泽被抓。4 月 30 日,省石油公司职工詹仕金被抓。5 月 6 日,武汉铁路公安处干部、原“公安联司”成员、武铁分局革委会常委刘祖平被抓。5 月 26 日,武汉肉类联合加工厂谢妙福被抓。但依然遏制不住街头活动的声势。

此时,湖北省的一把手、武汉军区司令员曾思玉因为毛泽东说话,已经从“913”事件中解脱出来。但是他对武汉出现的“街头派”似乎也没有一定之规,开始只是抓人,群众一闹又放了。同一个人多次放了抓抓了又放。谢妙福就在 1973 年 5 月 26 日、7 月 16 日、8 月 28 日三次被抓。

1973 年 8 月中旬,谢妙福妻子吴桂兰在汉口闹市的工艺大楼贴出大字报,聂年生随即在此处发表演讲。

“十大”以后,武汉三镇的大字报、标语、街头演讲等各种形式的“反潮流”活动风生水起,有声有色。特别是在汉口江汉路水塔、工艺大楼、六渡桥中南旅社、武胜路新华书店等地最为集中。各种大字报似雨后春笋,各种标语口号众口一词,都指向湖北“两清一批”。自此,武汉地区的“街头派”开始自称为“反潮流派”。他们的代表人物有原“新华工红反团”的聂年生、水运工程学院原“钢二司”的刘汉武、电车公司原“钢工总”的王华珍、国家物资部武汉储运公司原“钢工总”的武齐骅、原“新湖大”的程辉、武汉肉类联合加工厂的谢妙福、原“钢工总”江汉区办事处的朱汉清等人。他们发动和团结一些小企业、小单

位,特别是硚口区一些基层单位的造反派。

对“反潮流”上街这件事,已经结合进省、市革委会的武汉造反派头头似乎都没有太注意,认为那只是代表他们的小团体。1973 年 6 月,武汉的朱鸿霞、吴焱金和李想玉分别把他们的人事工作关系调到了省、市革委会。首先是省革委会副主任张立国、朱鸿霞提出将人事关系调到省革委会,省里同意了。武汉市也参照这种方式将李想玉和吴焱金调到市革委会。他们每人有 100 多平方米带阳台、洗手间的大办公室。市革委会还派来一位严处长为吴焱金当秘书,并为他们专门配了伏尔加小轿车。于是,“反潮流”的勇士们认为夏邦银、朱鸿霞这些曾经的造反派头头们“修”了,此时就是想保官,所以与他们的对立情绪很大。

1973 年 9 月 3 日,原湖北省省长张体学在北京逝世。葬礼于 9 月 6 日在北京八宝山举行。这天,中央领导李德生、李先念、纪登奎、华国锋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第一休息室,接见赴京参加张体学葬礼的中铁大桥局工人、十届中央委员王超柱和董明会、夏邦银、谢望春、朱鸿霞、张立国、毛菊元、马学礼,及曾思玉、姜一、赵修,询问了武汉的情况,表明了中央的态度。

李德生说:“武汉有大字报上街吧? 你们回去要做工作,劝他们不要搞了。用你们犯错误的经验去帮助他们。”

纪登奎说:“你们回去一定要做工作,不能搞了。”

李德生问:“有人骂你们吧?”

朱鸿霞、张立国回答:“有人骂我们‘老机’、‘右倾’、‘修了’。”

纪登奎说:“骂有什么要紧,干革命还怕挨骂?”

9 月 6 日开始,连续数日,武汉市街头的大标语、大字报都被清除。

夏邦银、朱鸿霞、张立国回汉后,将与“反潮流派”多有来往的武汉锅炉厂工人、“工总武锅兵团”勤务组成员王光照找去做工作,希望“光照同志要起好作用”。朱鸿霞说:

“我们要过五关——相信省委、相信曾思玉同志,正确对待自己,正确对待审查,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正确对待大好形势。为什么要人家退材料? 硬是要人家退材料、平反,势必挫伤另一部分群众,刺激人家,把自己摆在与群众对立的位置上,这有什么好处呢? 符合十大

精神吗？文化大革命前，你要人家来审查你，人家还不干。人家是受党委托，才来审查你。”“为什么要上街闹呢？你们自己总要拿出好的表现和行动，我才好反映与要求。”“我是绝不支持也不带头搞派性活动的，我过去带错了队，害了大家，以后不能再害大家了。”

夏邦银说：“我与谢妙福谈了，谈通了。出去又搞”。

朱鸿霞、夏邦银、张立国的这些观点传出去，“反潮流派”对他们更加反感，认为他们首先被“落实政策”、官复原职后，就站在官方立场上讲话了。

据吴焱金在《四十三年 望中犹记》中回忆说：

夏邦银、朱鸿霞和吴焱金又先后去做聂年生和王华珍他们的工作，让他们不要上街，结果当然是碰了一鼻子灰，无功而返。

武汉警备区抓了聂年生。

文革已经7年，大部分群众本来并不关心“反潮流”。但是聂年生和谢妙福被抓后，逐渐有人开始支持“反潮流”，他们强烈要求放人。特别是聂年生，他是“新华工”的老造反派，1966年冬天为发动工人造反起过重要作用，同各造反派头头都有战斗情谊。夏邦银、谢望春、朱鸿霞、李想玉和吴焱金也强烈要求警备区司令部放人。迫于压力，警备区先后释放了聂年生和谢妙福。

1973年10月至1974年2月，湖北省委在省二招召开造反派头头座谈会。座谈会开始没几天，谢妙福、王华珍等“街头派”的人认为光清谈，不过瘾，他们又去街头组织活动，也不来了。

1973年11月的一天，武汉又出现了“反复旧”以后的第一次示威游行，是“反潮流”群众组织的，从武胜路新华书店出发，游行队伍越走越多，越走越长，人们自愿参加行列中来，当游行队伍走到六渡桥时，群众放鞭炮夹道欢迎。

11月9日，“街头派”王华珍再次被抓。

# 第1283回：浙江乱，江青接见刘诗昆 找李震，公安部部长失踪

“十年河东，十年河西”，其实，时来运转并不用十年。1967年8月被赶出温州市的“温联总”在山区盘踞数年，终于迎来转机。1971年“913事件”后，支持温州“工总司”的浙江领导南萍、陈励耘、熊应堂等人被审查，“温联总”乘“批林整风”之机凯旋归城。“工总司”人马大批下台，一些头头被隔离审查。

1973年8月，“温联总”“工总司”两派终于在温州市区爆发大规模武斗，“工总司”占据五马街口的“温州酒家”和“五味和”商店，“温联总”占据对面公园路口的新华书店和“天津面馆”。这四座建筑物上弹痕累累，千疮百孔。

这次武斗和1967年的武斗有所不同的是老百姓没有逃到乡下避难了，胆大的年轻人还在五马街口的枪林弹雨下，砸开“五味和”商店旁的小店进行抢劫。

另一个特点是，此次参与武斗的两派基本群众，已很少有学生参加了，他们大都上山下乡去了。主要参与者是派性骨干分子和领取武斗津贴的工人和农民，以及社会闲杂人员。

浙江的乱还不仅是在温州。1973年10月，原浙江美术学院学生、时任浙江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的张永生，原杭州丝绸印染联合厂工人、时任浙江省总工会副主任、省革命委员会常委的翁森鹤，原杭州通用机器制造厂技术员、时任该厂革委会主任、市工代会主要负责人、省革命委员会常委的贺贤春，他们3人组织“控告团”、“上访团”，要求释放因为武斗中打死人，于1972年8月22日被抓起来的省革委会委员、嵊县县革委会副主任张全千，和同样因为武斗中打死人被抓起来的“绍兴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绍革司”的头头、绍兴地区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的杨金林，掀起了一股全省性的后来被称之为“闹监”的风潮。

10 月 5 日,周恩来就新华社的《国内动态清样》中一则反映浙江温州地区情况的报道,批告王洪文:“如今天大字报仍在街上,无论如何,要劝张永生、翁森鹤,将大字报改到机关、工厂内,这与目前开人大形势也有关系,请你再过问一下。”

10 月,国务院科教组召开理工科院校教育革命座谈会。国务院科教组负责人迟群在《教育革命通讯》上发表署名文章,提出教育界出现了一股翻案风,有人搞反攻倒算,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成果。

10 月 15 日,迟群在理工科院校教育革命座谈会上指出:教育界出现了复辟、回潮现象。他说:“9 月,科教组开的那个批孔会是正确的,大方向是正确的;科教组没有降调,谁降调谁负责。反对批孔,就是复辟。”当晚,周恩来听取迟群、谢静宜等人关于理工科院校教育革命座谈会情况汇报。

从 1973 年 10 月开始,清华大学开展反右倾回潮运动。清华大学的这场反右倾回潮运动,很快波及到北京和外省市的一些院校。

10 月 16 日至 19 日,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讨论四届人大会议筹备工作,并基本通过《政府工作报告》草稿。同时,各地、各单位出席四届人大的代表也陆续协商选出,人大会议的主席团和人大常委会的人选也拟出初步草案,待提交政治局讨论通过。10 月 20 日,周恩来就中央政治局会议情况给毛泽东的报告。四届人大似已召开在即。

一天下午,江青让吴德打电话给叶剑英的秘书,说当天晚上在钓鱼台接见刘诗昆。叶剑英听了后笑笑说:“看来这回是好意了”。

刘诗昆被告知在三座门等候。吴德的司机开车将他拉到钓鱼台。当晚,江青在那里接见了他。

江青见到刘诗昆,很热情地迎了上来,说:“刘诗昆,我们都等着你。主席对你很关心。主席说,你们要关心刘诗昆,要让他搞些民族的钢琴的东西,要让他继续演出。你的案子都是整叶帅的,是林彪和四条汉子他们搞的。他们不仅搞叶帅,还搞我呢,中央二办很坏,他们不但给叶帅立专案,还给我立了两个专案,我不怕。去年,我去看叶帅,见到牛妞,都怪我不好,当时忘了问起你。”

牛妞是刘诗昆和叶向真的女儿。说话间,江青拿了一些很小、很香的白兰花,交给一个穿军衣的护士,让她先放在冰箱里,让刘诗昆走

的时候带给牛妞。

当天在座的有姚文元、王洪文、吴德、于会泳、浩亮、刘庆棠、李德伦、殷承宗,共10个人。那天晚上,江青还安排放映了一部美国电影《红袖倾城》。那是一部讲述一个西班牙斗牛士故事的电影,里面有很多弹钢琴的镜头。

看完电影后,江青问刘诗昆:“你认不认识一个叫徐志婉的人?”

刘诗昆说:“认得,她是我父亲的同学。小时候,我还叫她徐姑姑。”

徐志婉是刘诗昆父亲当年在山东大学读书时的同班同学,江青当时在山东大学图书馆当馆员时,与徐志婉一直有来往。

“那你父亲现在哪里?”江青问。

刘诗昆说:“我父亲现在还被关在上海的监狱里。”

江青很惊讶的说:“真奇怪!”

她让王洪文问一下张春桥,王洪文答应。几天之后,刘诗昆的父亲被释放。

很快,刘诗昆和叶向真的复查报告也出来了,案子被定性为:“林彪反党集团制造的冤假错案,其目的是妄图打倒叶剑英同志。”上面有周恩来“拟同意”的批示,还有叶剑英等10位国家领导人的圈阅。

10月22日,公安部副部长于桑找刘诗昆和叶向真到北海旁边的中央军委办公厅所在地三座门谈话,询问他们二人对复查报告还有没有意见,如果没有意见就签字表示同意。就在刘诗昆和叶向真细阅案子纪录准备签字时,中央军委办公厅的红色电话机突然响了,于桑被告知:“公安部部长李震失踪了。”

于桑放下电话,立即就给平时与李震来往密切的陶鲁笳等3人打电话。然后,匆忙坐车走了。

李震,河北省藁城县人,1936年在北平参加学生运动。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被派往山西国民革命军官教导团,先后任太行军区第六军分区政治部主任,太行军区第六纵队十八旅政治委员,纵队政治部主任。1949年2月至12月任二野三兵团十二军副政委,当时,谢富治任三兵团政委。1949年10月,十二军进抵重庆,李震任重庆市委工人工作委员会副书记、重庆市工会联合会党组书记、重庆市总工

会筹委会主任。1950 年 12 月,十二军奉命离川北上赴朝,李震重返十二军任原职,1951 年 7 月,在朝鲜前线升任十二军政委。1954 年 4 月李震调任志愿军三兵团政治部主任。翌年 1 月,三兵团从朝鲜回国接收旅大地区的苏军防务,李震随部返国。1956 年 10 月,调任沈阳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后任主任、军区副政委。李震于 1955 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是抗日战争初期参加工作而被授予少将军衔的 10 人之一。

1966 年,公安部副部长徐子荣、刘复之、凌云先后被宣布“边工作边审查”后,1966 年 9 月 3 日,中共中央决定,调沈阳军区副政委李震任国务院公安部常务副部长。9 月 14 日,国务院副总理兼公安部部长谢富治向周恩来递交《关于李震到职和党组成员分工的报告》,公安部党组成员分工是:杨奇清任第一副部长,党组第一副书记;李震任第三副部长,党组第二书记,负责常务。副部长的名次排列为杨奇清、汪金祥、李震、于桑。

接着,公安部原部一级的领导除谢富治、李震外几乎全部被停职,相当一部份局处级干部亦相继被批斗、停职审查。为使公安部的正常工作不致停顿,12 月 3 日,谢富治向周恩来报告,调陆军 21 军政委施义之任公安部政治部主任兼参加党组,周恩来同意。在此前后,又调军队干部 41 人充实公安部。

1968 年 2 月 7 日,经中共中央批准,成立公安部领导小组,成员:谢富治、汪东兴、李震、于桑、曾威、施义之、赵登程。其中,汪东兴是以新的身份进入领导小组,李震、曾威、施义之、赵登程均为 1966 年至 1967 年间调入公安部的军队干部。

1968 年 4 月 1 日,公安部领导小组向中央领导、中央文革小组报送关于公安部改组情况的报告。主要内容:一是对公安部进行彻底改组,新的机构已组成,总数 126 人(以军队 41 名干部为骨干)。其余全部人员由解放军干部带领,已于 2 月 7 日离开机关到西郊政法干校集中学习,揭发批判;二是深入开展大批判,截至 1968 年 4 月 1 日,共挖出叛徒、特务、走资派和有严重政治问题的重点分子 101 人,逮捕 22 人,群众看管 79 人,其中包括 7 个副部长级干部。7 个副部长级干部中,徐子荣、汪金祥、凌云于 1967 年被逮捕,杨奇清、严佑民于 1968 年 3 月被逮捕,刘复之、尹肇之被监督劳动;三是称罗瑞卿、徐子荣、汪金

祥等是“罪大恶极的反革命”,“资敌通敌,里通外国”,“把黑手伸向无产阶级司令部”,要继续批深批透,批倒斗臭;四是建议由军队调来的曾威等4人组成审查清理档案小组,以曾威为组长,再从军队中选拔150人,担负审查清理档案的任务。

1969年1月19日,公安部领导小组向国务院报送《公安部运动情况简报》,称公安部机构组织进行了初步改革,将原来的11个厅、局合并为5个办公室(即政治、行政、侦破、治安、接待办公室),编制由1200多人减为100人左右。精简下来的1000多名干部,春节之后赴东北佳木斯农场,走“五七指示”的道路。

1969年4月,中央召开“九大”,公安部领导小组7名成员中,谢富治、汪东兴、李震3人当选中央委员。在随即召开的九届一中全会上,谢富治、汪东兴分别当选中央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此后,两人已甚少过问公安部的事。公安部的工作,由李震主持。到1970年的6月22日,中共中央同意国务院6月7日《关于国务院各部门建立党的核心小组和革命委员会的请示报告》,公安部核心小组由于桑、刘复之、李震、张其瑞、施义之、赵登程、曾威7人组成,李震任组长,于桑、曾威任副组长;公安部革委会由27人组成,主任李震,副主任于桑、曾威、施义之、赵登程。以李震为组长的公安部核心小组中,原单位老干部以于桑、刘复之为代表,军队干部以李震、施义之、赵登程、曾威为代表、张其瑞是公安部原十一局一般干部,为群众代表。

李震负责公安部的全面工作后,精神高度紧张。公安部副部长刘复之曾回忆了两件事:

一是叶剑英有一次请一位高级民主人士吃饭,看电影。北京市公安局军管会负责人刘传新派人盯梢,后来这件事不知怎么传了出去。叶帅办公室往公安部打电话来问,说叶帅请的客人有什么问题吗?把李震弄得很紧张,让刘复之打电话查问一下,一问是北京市公安局搞错了,是个误会。李震带上刘复之上叶帅家去道歉,去了叶帅家也就待了20多分钟,叶帅哈哈一笑,说是个误会,不必介意了。文革前曾有规定,坐吉姆车以上的人不能盯梢,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就乱了,这规矩也被破坏了。本来这件事情过去也就算了,叶剑英也没在意,阴差阳错下面干的,但李震依然很紧张。回去的路上,他对刘复之说:“唉

呀,要掉脑袋。”刘复之说:“不至于吧,没有那么严重。”

另一件事,有一次在人民大会堂开会,每人桌上放了一张纸、一支笔。李震当时不知在想些什么,信手在白纸上乱涂乱画。服务人员看到后感到很奇怪,问是怎么回事?又是刘复之给打的圆场,说他神经紧张,没什么事。

“913”事件后,公安部在揭批林彪的同时,多次召开核心小组会议和核心小组扩大会议,听取干部群众对公安部这几年工作的意见。

在核心小组会上,公安部核心小组副组长、革委会副主任于桑首先表示对军队干部在公安部的一些做法表示不满。他说:“我今天有意见,以后还是有意见的。”

在公安部全体职工大会上,于桑又说:“钟不敲不响,话不说不明。”动员大家把意见说出来。后来,提出的意见主要有:“砸烂公检法”,下放五七战校(当时全国都叫五七干校,唯独公安部叫五七战校),党的优良传统被破坏,社会治安方面发案率高,破案率低等。另外,对于“伪党”一案造成的恶劣影响,向李震、曾威提了许多意见。

“伪党”一案是指1967年10月“中国共产党非常中央委员会”一案,在1968年12月,因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实习研究员周慈敖屈打成招,制造出的“中国(马列)共产党”假案。

为此,李震对过去的工作做了检讨,并把检讨和部里“批林整风”情况写成简报,上报国务院。纪登奎看了简报后,把李震找去。李震回来在核心小组中传达了纪登奎的批评:“别的简报我不看,你公安部长检讨的简报我不能不看。你们公安部发生了‘算旧账’的苗头,带了一个不好的头……对各省、市公安厅、局会有影响的。”

李先念也曾批评:“‘算旧账’名义上炮口是对着林彪,实际上炮弹落在群众头上”,并要公安部核心小组成员各自做自我批评。

这样,公安部从核心小组到广大干部职工中产生了“算旧账”和反“算旧账”两种意见。一部分人认为“算旧账”是于桑、刘复之带头引起的,批评他们有“傲气”、“怨气”、“不服气”三气,而另一部分干部则不同意纪登奎的批评,认为公安部近年来的工作就是有问题。

关于“算旧账”问题的争论,在很长一段时期成了核心小组中矛盾的焦点,无论中央领导怎样批评,也无法使问题真正解决。遵照周恩

来指示,应该统一思想,统一思想后写报告报国务院。

1972 年冬召开的第十六次全国公安工作会议,总结了 1970 年以来的工作情况,研究了 1973 年的工作部署,在会上有人又一次反“算旧账”,批评于桑、刘复之。会议结束后要给中央写报告,李震起草的报告中写道:“‘算旧账’有损于文化大革命,有损于毛主席。”虽然中央李先念、纪登奎参加了会议,王洪文、张春桥、汪东兴参加了最后的总结大会,但由于于桑坚决反对,核心小组对此争持不下,向中央的报告迟迟未能定稿。

到了 1973 年 10 月,李震通知出差在外的于桑、刘复之回北京参加公安部的核心小组会。10 月 18 日,奉周恩来之命在天津办理一起匿名恐吓信案件的刘复之,接到公安部打来的电话通知,要他回京参加部党的核心小组会议。刘复之当天驱车回到北京。而在洛阳出差的于桑,10 月 19 日还没有赶回北京。李震让会议推迟到 10 月 20 日。

10 月 20 日,星期六,李震主持核心小组会议,继续讨论给中央的报告。会上,李震说:“算旧账”的事要收收口。但是双方的分歧还是无法统一,于桑同曾威甚至都拍着桌子争吵起来,几乎动粗。李震和刘复之都站起来进行劝解。刘复之说:“争论问题不要这样。”李震让会议暂停了下来。

10 月 21 日是星期天,李震去看望因发低烧和牙疼躺在家中的施义之时,心情很沉重,说:“你看昨晚又吵起来了”。

施义之劝道:“意见不一吵几句没有关系,只要你不吵就行了。”

领导班子思想不统一,无法向上交代,施义之非常同情李震。

# 第1284回：难置信，李震死于地下室 读书班，调学员参加破案

1973年10月22日，星期一，总理办公室打电话找公安部长李震，没有找到。问李震家里，说21日晚上有人打电话到李震家里，要李震到会议室开会，李震找手电筒未找到就出门走了，还是他女儿找到手电筒后追出去交给了李震。李震到会议室去了，当夜没有回家。由于往常也有类似情况，家里也没有问过。

22日上午9时左右，公安部常务副部长刘复之接到李震秘书郑爱萍打来的电话，说："上班时间已经过了一个钟头，李部长还没有来，我找了很长时间没有找到，不知道到哪儿去了？"

刘复之没有太在意，问郑爱萍："是不是李部长熬夜了？还是总理有事把他找去了？"他让郑爱萍到李震家里和五号楼找一找，向外面打电话问一问。

过了一会儿，郑爱萍又来电话说，还是没有找到。他显得有些焦急。这时刘复之觉得事情不对劲了，他要郑爱萍立即通知在家的核心小组成员到五号楼会议室碰头。

刘复之来到五号楼下西侧会议室时，曾威、张其瑞、从医院看病回来的施义之也陆续到了。正在三座门中央军委办公厅召集刘诗昆和叶向真开会的于桑，接到电话后也赶了回来。

郑爱萍向核心小组成员汇报了上班后四处寻找不到李震的经过。大家继续寻找，分成几路在院子里搜寻。刘复之和曾威找遍了五号楼的楼下楼上和三层的小阁楼，都没有结果。

这时，黄庆熙、刘湘屏等人也都聚在五号楼门前，郑爱萍和许多干部汇报说："到处找过，五号楼地下管道内也找了，没有。"大家的心情很沉重，气氛很紧张，惶惶然不知发生了什么事，呆站在那里。

于桑向周总理办公室打电话，报告找不到李震的情况。

忙乱一阵以后，有人发现李震的夹大衣在五号楼的过厅里挂着，

大家觉得更奇怪了。

组织人再去找,包括整个公安部大院的地下管道内都要找。将近上午11点钟的时候,有人慌张地跑来报告,说有两个工人在地下热力管道二三十米的深处,大约在李震房前东北侧那个小亭子的地下方向,发现李震吊死在管道上。工人出来时,正好刘湘屏回家路过那里,她马上叫人过来通知。大家闻讯非常震惊。施义之、于桑、曾威、刘复之、黄庆熙一同赶到那里。刘湘屏要于桑、曾威下去看看,关照不要动,不要破坏现场。他们二人从下面上来后说,李震是半躺半跪在地下管道里,脖颈勒有绳子,吊在管道上。

于桑又向总理办公室作了电话报告,接着,他接到周恩来的电话指示:不要动现场,保护起来,不要光由公安部的勘查现场的人员下去,要立即请北京、天津的专家一块来勘查。并且要卫戍区立即派一个加强连,加强警戒,把所有地下管道口都布哨封闭。

李震的尸体抬上来后,放在公安部礼堂东边的小会议室里,有人当时看后就说是自杀,有人背后说自杀。因为上吊自杀的征状非常明显,舌头伸出来了,绳子勒脖子的痕迹中间深,往两边逐渐浅下去。

得到李震死亡的噩耗,周恩来极为震惊。他是20日飞抵沈阳。与秘密来访的金日成就国际局势、亚洲和朝鲜半岛等问题交换意见后,22日刚飞回北京,当即于当天下午13时许,在国务院会议厅召开紧急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李先念、纪登奎、华国锋、汪东兴、吴德,还有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吴忠、公安部副部长于桑、北京市公安局局长刘传新等人。

当晚,于桑从国务院回来召集公安部核心小组开会,传达了周恩来的指示:“李震绝大可能是被害”,于桑、吴忠、杨俊生、杨德中、刘传新等组成破案组,从外地调来几名法医,着手破案。

23日,于桑、刘传新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到部里宣布对李震的秘书郑爱萍隔离审查。下午破案组与核心小组听取公安局勘察现场初步情况的汇报。吴忠说:“据周恩来的秘书讲,21日晚他给李震打电话时,李还谈笑风生。”

23日晚19时左右,周恩来把公安部全体核心小组成员找到国务院会议室,要他们谈各自的看法。

施义之说:“我同意周总理的判断,他为什么要自杀?极大可能是被害”。

刘复之说:“可能文化大革命以来的矛盾集中到他身上。”

周恩来指示:“由华国锋负责李震案破案工作,纪登奎、吴德协助,重大问题报政治局解决。”

在此之前,王洪文、张春桥、李先念、纪登奎、汪东兴均过问过公安部工作,但是华国锋从未参与其中。

周恩来指定破案组增加公安部核心小组成员张其瑞、中央组织部部长郭玉峰、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田维新。周恩来说,公安部核心小组要同心协力配合破案工作,主要是在部内发动群众提供线索。

会议刚开完,周恩来、华国锋、纪登奎、吴德即赶往人民大会堂,出席晚上21时30分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会后,周恩来写信将李震之死和政治局会议的情况报告了毛泽东。

由于情况突然发生了变化,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被推延。

24日,在案情分析会上,李震妻子反映:“21日晚李在家接到一个电话后去的五号楼,说是去开会。一夜没回,到了清晨问秘书郑爱萍,郑一点也不急,催问几次才去找。”

针对什么样的电话能把李震引出去,会上大家分析可能是山东的案子或是苏联派遣特务李洪枢案。在会上得知,除了李震死前服了大量安眠药外,在他死后口袋里还有安眠药,是潮湿的,有口袋布的压印,似乎是从口中吐出来的,正在取样化验,还不能确定死因。但大家的思路主要集中在“他杀”。

政治局会议决定,在公安部内进行“动员整顿工作”。

24日下午18时,毛泽东召集周恩来等政治局成员开会。晚21时,周恩来主持政治局会议继续研究关于李震之死的问题。

于桑组织技术人员,经过22日、23日、24日,3天的调查,做出结论:李震是自杀。

谢富治的爱人刘湘屏不同意于桑的结论。抗日战争时期,刘湘屏和李震同在太行地区工作,很熟悉。李震死的前几天还到过她家。在周恩来召开的会议上,刘湘屏极力说于桑处理得不对,说于桑是老公安,却明知故犯,破坏了现场。刘复之也看过现场。刘湘屏认为李震

是“他人谋杀”,于桑、刘复之就是后台。

周恩来对李震印象不错,他征求了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的意见。李震死后,沈阳军区的干部说:中央要人,我们将最好的干部送去,怎么到了中央落了这样的下场?

10月26日下午,郭玉峰、田维新通知公安部核心小组:周恩来要在人民大会堂召集公安部核心小组全体成员开会。大家一直等到26日晚快24时才接到前去开会的通知。

他们从人民大会堂的北大门进去。进去之后被引导往西拐,而以往他们常往东拐在福建厅开会。于桑走在前,曾威跟着他,然后是刘复之、施义之等。走了没多远,大帷幕后走出两个身材高大的8341部队的战士,一左一右把于桑架走了。于桑披了一件军大衣,他回头看了一眼,军大衣掉在地上。刘复之还没缓过神来,随之也被架走了。

跟在其后的施义之下了一跳,随即站住没敢动,等待也被架走。这时杨德中出来说:“周总理在里边等着你们。”即把施义之、曾威、黄庆熙、张其瑞引进福建厅。

厅里,周恩来、叶剑英、华国锋、纪登奎、陈锡联、江青、张春桥、吴德等已坐在那里,除朱德之外的政治局委员几乎全部在场。还有吴忠等人,稍后汪东兴到。

杨德中进来请示周恩来怎样向于桑、刘复之二人宣布,周恩来说:宣布“保护审查”吧。

杨德中出去宣布后回来,周恩来问于桑、刘复之有什么反映,杨德中说:“于桑问为什么,刘复之讲:‘好’。”

周恩来说:“这完全反映了这两人的性格,一个像恶霸,一个像军师”。接着讲“李部长是被害。我把陈锡联同志请来了,他很了解李震。李震在政治上中央是信任的,工作上中央是支持的,家庭生活是和睦的,没有自杀因素。李震死后,于桑、刘复之表现不好,破坏现场,幸灾乐祸。公安部长被害,建国以来是没有的,比谭甫仁案子还严重。李震死在党的‘十大’后,四届人大前,你们要想的深一点、远一点。”

他还说:“李震被害的教训是他政治上软,受到批评就知难而退,想回部队。”

接着,周恩来要施义之汇报公安部里“算旧帐”和反“算旧帐”两

种意见分歧的情况。

在施义之汇报过程中,纪登奎插话:“李震就是软,一软就转,一转就死。”

汪东兴插话:“他们(指于桑、刘复之)是反文化大革命、反党中央、反毛主席的。”

当施义之汇报到“我感到公安部有一股落后势力”时,江青插话说:“什么落后势力,是一股反动势力。”

在汇报了公安部核心小组内吵架的事后,施义之说:“我没敢想于、刘会是谋害李震的后台”。江青插话:“你们的思想还停留在吵架阶段,于、刘不是后台,跳到前台来了”。还说:“于、刘是转移方向,向党进攻。”

会上,叶剑英也强调要想的深一点、远一点。

在这次会上,周恩来指定施义之临时负责核心小组工作。施义之毫无思想准备,当即就说:“我各方面比李震差远了,负责不了。”

周恩来批评他没有信心,并说:“有事可以请示国务院嘛!”

江青说:“你不要把部队当成娘家,地方当成婆家,娘家、婆家都是共产党”。

周恩来指示施义之第二天就召开千人大会,充分发动群众揭发、提供线索,配合破案组,限一周破案。并指示吴忠、杨德中、郭玉峰、田维新参加大会,去撑腰。他还要吴忠加强公安部大院的警卫,要封闭公安部大院的两个旁门,有人提醒说,不要搞得太紧张了。周恩来也就没有再坚持。

回到公安部已是27日凌晨4点多钟,施义之立即找人起草动员提纲,并将起草好的提纲交华国锋审定。

下午15时正式召开公安部的动员大会,施义之作了动员讲话,第一句话就是“李部长被害了。”

他传达了中央指示,说明李震在政治上中央是信任的,工作上中央是支持的,作风正派,家庭美满,没有自杀因素,绝大可能是被害。事情发生在党的“十大”以后,四届人大之前,很不正常。动员大家以党性原则揭发可疑点,追查到底。还传达了中央指示他们关起门来整顿,停止对外工作联系等等。施义之在大组和治安组会上还表示了他

“不破此案,死不瞑目”的决心。动员会后,以自报公查的方式查了每个人21日晚的行动,牵扯了很多人。

揭发的线索,涉及公安部内部的由公安部查,涉及公安部外的由北京市公安局查。

10月27日,周恩来又一次书面报告毛泽东,汇报李震案详情及政治局会议情况。27日晚19时,毛泽东再次召开会议,研究李震事件。

27日晚,破案组来电话要施义之去北京卫戍区。在卫戍区办公室,吴德交给他一份审查对象的名单,有10多人,要他们隔离审查。

施义之看后提出人数是否多了,吴德说:“我请示一下总理后再说。”

接着他出去了,过了一会他回来后把名单交给施义之说:“名单没有变化,但审查方式改为隔离审查、在职审查、传讯三种。”

破案组决定对刘复之秘书莫国基、部长办公室公务员徐仲久、于桑秘书戴文殿、原一局处长,同李震一起搞专案的刘均等人组织群众专案组进行审查,专案组的人选是由核心小组讨论决定的。

李震死后,其家属被安排到了台基厂15号,和吴忠同住一栋楼。于桑、刘复之被关在交通干校,由北京卫戍区管理。因刘复之是华侨,有人说他是“特务”“里通外国”,这样牵涉的人就很多,他的家属和亲戚14人被隔离。其中有一对夫妇在天津。10月28日,华国锋打电话将天津市领导解学恭、王曼恬找来,布置了对刘复之、王万沐(日本华侨,刘复之的远亲,正在国内。在公安部的档案中被列为特嫌)和刘复之在天津的两门亲戚进行审查,当时在场的有吴忠、刘传新和施义之。对他们的审查,在天津的由天津市公安局负责,在北京的由北京市公安局负责。对刘复之、王万沐的审查是周恩来向毛泽东汇报李震案情时经毛泽东同意的。

破案组从“他杀”入手,在公安部逐人排查,凡是那几天见过、找过李震或李震秘书的,都要说清楚李震死的前五天到哪里去了,做了什么,与哪些人接触过,并要找到证人。发现有可疑现象要追查后台,就是不住在部里的老干部也成了怀疑对象,他们虽没有作案的可能,但有后台之嫌。对可疑之人要当堂对质。追查的范围越来越广,涉及116名机关干部职工,人人自危,机关工作基本上陷于停顿。

10 月底,施义之又被破案组叫到卫戍区,在那里,国务院办公室的刘冰清向他传达了周恩来亲笔写的对郑爱萍的十几个疑点内容的字条,并指示他们组织人查郑爱萍。回公安部后,施义之向核心小组作了传达。讨论决定由苏宇涵(专案三办办公室主任,文革前为公安部十三局(预审局)局长。)、姚伦(原预审局副局长,后抓专案工作)、侯西斌(原边防局长)负责查批郑爱萍的工作,破案组的刘传新、李久合(原交通保卫干部,干校回来后到北京市公安局工作)向他们传达了周恩来提出的疑点。过了几天,刘冰清又带来了周恩来的指示,要施义之亲自主持对郑爱萍的查批会。

在查批会上,郑爱萍提出了李震自杀的 11 条理由。

1973 年 10 月 29 日吃完晚饭,中央第二期读书班学员在上晚自习前,很多人逛商场去了。这时王洪文突然来到读书班,要值班的立即通知各小组 24 个召集人到小礼堂集合。人们走进小礼堂时,看见王洪文已坐在一张桌子前等待。人到齐后,他开口第一句话就说:“李震被干掉了!”大家听了都很震惊,一个个屏住呼吸全神贯注地听他继续讲。

王洪文继续说道:“这个事要保密,你们不要记录,不要外传。李震百分之九十九是他杀。中央对李震很信任,重大案件都交给他办,这是政治上的最大愉快,所以他不会自杀。”

他还说,李震“死前情绪没有异常,死后现场被破坏了”等等。最后,他要求从读书班学员中“划一部分人到公安部去”,参加公安部的整顿和破案工作。

王洪文说完就从礼堂出去坐车走了。王洪文走后,办公室的两个负责人和两个党支部的领导成员立即开会,研究选择赴公安部工作组的名单。

10 月 29 日深夜,两个党支部讨论通过抽调的 18 位学员名单确定后,读书班组成的前往公安部第 14 组宣告成立。这 18 人中,地方学员和军队学员各半数,地方学员是:杨贵、祝家耀、张世忠、董明会、杨坡兰(女)、唐克碧(女)、周宏宝、姚连蔚、梁锦棠;军队学员是:张英才、赵仁、李德保、王兆坤、张金华、李华、蒋顺学、张宏轩、侯志坚。

18 人中,有 10 人是中共中央委员或中央候补委员,分别是:杨贵,

原河南林县县委书记,中共第十届候补中委;祝家耀,原上海5703厂工人,中共第十届中委,时任上海市事务管理局局长;张世忠,北京市总工会副主任,首都工人民兵指挥部副总指挥,中共第十届候补中委;董明会,原武钢耐火厂工人,中共第九、十届中委;杨坡兰,原青岛国棉六厂工人,中共第十届候补中委;唐克碧,原四川女子石油钻井队指导员,中共第十届候中委;周宏宝,原上海钢铁厂车工,中共第十届中委;姚连蔚,原西安昆仑机械厂工人,中共第九、十届候补中委;梁锦棠,原广州电机厂工人,中共第十届中委;张英才,战斗英雄,陆军第13军副军长,中共第九、十届候补中委。

中央候补委员、第13军副军长张英才和中央候补委员、北京新华印刷厂革委会副主任、北京市总工会副主任张世忠是牵头人。下面分编为9个小组,每组由军队和地方各一名学员组成,规定进入公安部后以小组为单位活动,个人不得单独行动,不得随便表态,不得暴露公安部的秘密。

从10月30日开始,第14组的学员待命准备随时出发。

# 第1285回：定论难，华国锋到公安部反复查，结论李震是自杀

1973年11月上旬，吴忠向施义之传达了周恩来的指示："破案组要发动群众，至少要动员千人以上来揭发，要放几把火。要集中批郑爱萍、莫国基、戴文殿、徐仲久，对于桑、刘复之也要揭发。公安部要关起门来整顿。公安部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已发展到对抗，杀人夺权的地步。""我就怕侦察工作上赔了夫人又折兵，我们没有经验，帝修反是有基础的，斗不过人家"。吴忠说："对周总理的指示如何贯彻要听华国锋副总理的安排。"

从公安部到政治局存在截然相反的看法，华国锋亲自到现场察看，现场并没有像刘湘屏所说的那样遭到破坏，进去就是台阶，只有李震一个人的脚印：他走到里面，又走回来，到管子那儿吃了安眠药，然后上吊自杀。办案人员的脚印都可以核对出来，看得清清楚楚。那个地方很狭小，没有其他人的脚印。

华国锋如实向周恩来报告，引起了周恩来的重视。周恩来指示从北京、广州、上海、天津等地公安局调来技术人员进行侦破。虽然未告诉专家们死者是谁，但大家一致判定是自杀。

案件查来查去始终查不出"他杀"的证据，找不到凶手。吴忠和李震以前都是二野的干部，抗美援朝时还在一个军工作过，吴忠任师长，李震任军政委。吴忠倾向李震是"他杀"。陈锡联、纪登奎、吴德都去过公安部，也没有什么结果。

为了能以事实为根据，进行了多次验血，都证明李震吃进的安眠药和地上掉的安眠药是完全一样的。

但是，找不出李震自杀的原因，就难以服人。是不是有凶手，只有在一一排查后，才能下结论。公安部内部的清查仍在进行。

11月8日夜，周恩来找到刘湘屏和著名医学专家吴阶平、吴蔚然谈话，并请吴阶平解剖李震尸体。

11 月 14 日、15 日,周恩来召开政治局会议研究公安部的事。

11 月 14 日,华国锋对施义之说:“中央为了加强公安部的领导,已决定调杨贵、祝家耀、徐海涛到公安部,参加核心小组,部里也可以选人参加核心小组,不成熟的话,可以临时参加或列席会议。”

杨贵是中央候补委员,原林县负责人;祝家耀是中央委员,时任上海市事务管理局局长;徐海涛是原上海警备区独立师政委,时任总政保卫部副部长。他们都在中央读书班学习。

华国锋还说:“总理指示重点审查对象是郑爱萍,至少动员千人以上大会揭发批判,除查破对他们的疑点外,要批驳他提出的李震自杀的理由和他的目的。”“从现场看是自杀的样子,但分析没有自杀的因素,我们必须从阶级斗争高度来分析。吴忠去天津发现刘复之与王万沐的关系,问题就更复杂了。”“群众揭发的线索已不少了,下步要查与于、刘搞阴谋诡计有牵连的人和事,一起揭、一起批,实际上要与两条路线斗争挂起来,这样对破案有利。但要注意团结大多数,掌握好政策。”

后来在揭批过程中,出现了“上帮下促”的现象,这样把思想认识与破案线索混淆,扩大了批判面,不利于团结大多数,经纠正制止了。

11 月 15 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一直开到 16 日凌晨 1 时才结束。李震死亡的原因有争议,结论定不下来,问题不能得到妥善解决。在这次政治局会议上,王洪文汇报了派往公安部工作的人员名单。周恩来看过名单后说:“都是工人和部队的同志,我看还是让熟悉地方工作的杨贵同志去吧!”

杨贵,1942 年参加革命,1943 年入党,1954 年任河南林县县委书记,1965 年任安阳地委副书记兼林县县委第一书记。1960 年在国家经济最困难时期领导林县人民修建红旗渠,顶着压力,排除干扰,经过 10 年努力终于全线建成通水。杨贵以修红旗渠出了名。文革一开始,林县人民保护他,但是外地的群众来抓他。在新华社记者的帮助下,他躲在北京,在周恩来的保护下才获得解放。1968 年杨贵进入林县革委会,后任洛阳地委副书记、河南省委常委,“十大”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

中央读书班第二期开学的第二天,1973 年 10 月 6 日晚 10 时,周

恩来在福建厅接见全体学员,看着花名册,一一点名,询问每一个人的家庭情况、工作简历。71 个人分两个支部,地方支部和军队支部。地方支部大都是年轻的劳模和造反派,只有杨贵年龄最大,入党 30 年,担任县委书记 19 年,经受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考验。在读书班有这样资历的人凤毛麟角。会后,周恩来向纪登奎了解杨贵的情况。

得到政治局和周恩来认可后,16 日的晚上,王洪文和读书班总负责人、中央组织部的牛树声首先和杨贵谈话,通知他说:“周总理提议调你到公安部,明天华国锋跟你谈。”

接着,牛树声于16 日当晚,亲自将第 14 组送到公安部。在公安部会议室与公安部核心小组的施义之、曾伟、张其瑞见了面、互相介绍了双方的有关人员,然后施义之向学员介绍了李震之死的有关情况,说中央在亲自抓这个案子,中央认为李震是他杀,对于桑、刘复之采取了措施,就王洪文副主席派中央读书班同志来帮助他们工作表示感谢等等。曾伟讲了过去同于桑、刘复之有矛盾、有斗争,说于桑、刘复之看不起李震、施义之他们,说李震问题发生后,于桑等人认为是自杀的,因此在会议室里吵过架,曾伟还拍过桌子等等。其他人也都有些插话。会议结束已经很晚,会后张其瑞等人带着大家看了有关李震活动过的地方和发现尸体处的现场:在锅炉房看了地下暖气管道,从小东门内暖气道口进去向西约 30 多公尺处看了发现尸体的现场;看了办公楼环境和李震办公室,办公室窗帘绳被剪断。据介绍说,经过技术鉴定,剪绳的剪刀就是李震秘书剪信封常用的那把剪刀。

17 日下午,华国锋找杨贵谈话:“对于李震之死,公安部说法不一,有些人说是他杀,也有说是自杀。现在还没有发现李震有什么问题。他为什么会自杀呢? 问题还没有弄清楚。李震死后,于桑、刘复之这两位副部长以及李震的秘书等十几位同志被保护性地隔离审查,要很快将问题搞清楚。你明天就去公安部报到。”

杨贵觉得自己一直是做农村工作,到公安部工作不合适。他将自己的想法写封信,见到华国锋时,他谈了自己的想法,并将信交给华国锋,表示自己可以到公安部先干一段,在中央选择到合适的人选之后离开。

11 月 17 日,杨贵、祝家耀、徐海涛到公安部参加核心小组工作。

中央决定他们3人参加破案组,同时还增加了中央调查部长罗青长、卫生部长刘湘屏,并决定施义之也参加破案组的工作,由祝家耀分管政治部,负责内部发动群众。不久,徐海涛被调走。

公安部核心小组张其瑞把破案组在检查刘复之的文件时查到的一份公安部局、处领导班子配备名单交到核心小组。这份名单上有李祥,文革前为公安部七局局长,还有其他七、八名文革中曾入狱的局级干部。经核心小组大家讨论认定,名单中的原十二局副局长李阳是1972年获释恢复工作后不久因病去世的,他去世前,名单上的几名局级干部尚未出狱。推论这不是核心小组商定的公安部局级领导班子配备名单,而是刘复之自己确定的名单。随即向华国锋和破案组汇报,华国锋要他们写成简报上报中央。核心小组在简报中,将此事上纲到"翻案","复辟夺权"。

12月12日,周恩来让李先念找杨贵谈话。李先念说:"杨贵同志,总理让我跟你谈谈,听说你到公安部还不安心哪,要安心,你到公安部是总理的意见,华国锋兼部长,你去担任副部长,这个不能变了,你要理解总理的意思。"

12月的一天,公安部核心小组全体成员参加了破案组会议,听取了祝家耀发动群众的综合汇报。会上,华国锋说:"没有调查研究说李震是自杀是错误的;不调查研究说是他杀也是不对的,结论应该在调查研究之后。"

华国锋还传达了毛泽东在听取周恩来的汇报之后说:"为什么要杀人呢?要调查研究"。毛泽东举了明代发生的三大疑案。华国锋在会上嘱咐大家,这些指示由核心小组掌握,暂不向下传达,以免松劲,工作仍照常进行。

明朝三大疑案,是指发生在明末万历四十三年的梃击案、泰昌元年的红丸案和移宫案。三大案均与明光宗朱常洛有关,反映了明末宦官专权,党争不断,在皇位继承问题上充斥着激烈的明争暗斗。三大案均未能深究,尤其前两案更不了了之。

华国锋明确了有"自杀""他杀"两种可能。吴忠在卫戍区召开破案组会议,鼓励大家发言。这样大家慢慢才敢谈论自杀的根据。

李震的死亡时间大致在21日夜23、24时。从现场情况看,李震系

服用大量安眠药后上吊身亡。由于地下管道低矮,死者双膝跪地,身体向后仰着,上衣口袋里还有剩下的一些安眠药。经专家组技术分析,初步认定李震是自杀。

杨贵向华国锋作了汇报,并建议:“既然李震案件已经查清,就应该解除对于桑、刘复之和其他同志的审查。”征得华国锋同意后,杨贵在核心小组会上讲了李震案件的侦破结论,并谈到准备对于桑、刘复之等人解除审查的想法。祝家耀坚决不同意。会后,又提出了一个个的疑点,如:“李震是在被杀后,有人背进地道里的。”“李震口袋内的安眠药是死后有人故意装进去的。”“李震办公室窗帘上的尼龙绳被剪断一截,但上吊的绳子和窗帘绳的颜色不一样,是有人做了手脚。”“李震房间玻璃门上有个小洞,正好对着于桑卫生间的窗户,他们说是有人枪杀李震不成才把他勒死的。”

杨贵带领破案组一个疑点一个疑点突破:地下管道口小,一个人进去都费劲,根本无法将死人背进去。

经医科院和血型研究所取样鉴定,李震上衣口袋里的安眠药上沾有李震的唾液,是死者从口中吐出一部分装进口袋里的。

化验结果显示:李震上吊用的绳子就是从窗帘绳子上剪下来的。颜色不一样是因为窗帘绳子的下半段经常拉动而染的污垢。

杨贵和技侦专家又察看了李震房间玻璃门上的小洞,周围没有放射状裂纹。为了验证圆孔的成因,破案组做了一扇同样的玻璃门,杨贵亲自持枪,按照于桑房间与李震房间等距离进行射击,一枪打去,玻璃被打得粉碎……经过反复论证,李震自杀的结论无可置疑!

12 月 24 日下午 15 时,周恩来召集华国锋、吴德、纪登奎等部分政治局委员一起和吴忠、施义之等谈话,让他们回去在破案组吹吹风。

1974 年 1 月初,吴忠领导的破案组在事实面前,确认李震是自杀。核心小组研究决定分两步向下传达。先讲存在他杀和自杀两种可能,然后再讲是自杀。经华国锋批准后,召开了大组长和处以上干部会议,由杨贵按两种可能作了传达,并代表核心小组承担了前段审查工作中的责任。

杨贵在干部大会上,传达了破案组的结论,并代表核心小组承担了前段审查的责任。杨贵讲话后,解放了绝大部分受审查、受牵连的

干部,公安部内的气氛逐渐和缓,正常的业务工作慢慢开展起来。

会议宣布李震是自杀后,公安部内部没有再生事端。

1974 年 1 月 10 日下午,周恩来约华国锋、吴德及吴忠和破案组的人谈话。华国锋向周恩来建议,既然于桑与此无关,应放出来。

周恩来同意后,第二天,华国锋在北京卫戍区召开破案组和公安部党的核心小组会议。他将会议地点选在卫戍区,因吴忠是破案组的负责人,破案组会议一般都在卫戍区召开。卫戍区在公安部东门的对面,同在正义路上。

华国锋宣布:“经调查,李震的死与于桑无关,解除对于桑的审查。刘复之不能放,继续审查。除刘复之外,其他人都宣布解除审查。”

刘复之是华侨,有人说他有海外关系,那时有海外关系就是有特嫌。放刘复之,当时遇到的阻力很大,事情只能一步一步来。

华国锋当场要公安部党的核心小组的人员表态。他先问核心小组的负责人施义之,他是从部队来的,组织纪律性强。施义之说:“中央站得高,看得全面,我没意见,坚决执行,但要给点时间做思想工作。”

华国锋紧跟了一句:“给一周时间。”随后又说:“你和吴忠一起接于桑出来。”

因为于桑的家就在公安部院里,怕清查的积极分子一时接受不了,再闹出什么事来,有人表示为难。为了便于核心小组做善后工作,大家商定于桑出来后,先在万寿路招待所住几天。

会后,华国锋要施义之和他一起去人民大会堂向周恩来汇报,华国锋写的解除于桑保护审查的报告主要内容是:于桑与李震的死无关,但于桑在公安部的错误是严重的,回公安部后要接受群众的批判,自己要作认真的检查。

此时已是 12 日凌晨 1 时。周恩来说:“于桑回部后,你们要抓紧对他的错误进行批判。这个人什么都不在乎,批判他,一是挽救本人,二是教育大家,提高思想。”

第二天,施义之同吴忠拿着周恩来批准的报告给于桑看了,把于桑接到中组部招待所。后来于桑回部作了检查,经大小会数次批判后恢复工作。根据周恩来的指示,仍为核心小组成员。

华国锋向周恩来汇报,李震就是自杀,也应为他作一结论:“自杀,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3 月 3 日,周恩来在国务院会议厅召集李先念、纪登奎、华国锋、刘湘屏开会,由华国锋汇报。刘湘屏虽坚持自己的意见,但拿不出“他杀”的证据。这次会议从晚上 19 时一直开到 22 时多。为了缓和气氛,会议中间看了半个小时的电影《计划生育》。刘湘屏是卫生部长,看这个电影正在她的业务范围之内,可见周恩来用心良苦。

接着,周恩来又到人民大会堂召开政治局会议,取得了一致意见。

为了做公安部军队干部的工作,3 月 22 日晚 21 时在国务院会议厅,周恩来、华国锋、纪登奎一起找施义之谈话。此时,距案发已过去了 5 个月。

刘湘屏和公安部的一些人一直不同意自杀的说法,因此李震是自杀,“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结论就没有做成,直到 1977 年底召开的第十七次全国公安会议上才宣布:李是畏罪自杀。1977 年 9 月 12 日,公安部党组向中央报送了《关于将在我部工作的军队干部调回部队的请求报告》,很快中央就批准了。

自此,李震之死的案子基本结束。

1974 年底,在一次破案组会上,吴忠提出应解除对刘复之的审查,隔离久了对他的身体不利。华国锋表示同意,并具体指示:解除刘复之保护审查后安排回家,不恢复工作。大约在 1975 年 5 月,刘复之要施义之替他转给周恩来一封信,信中说他在卫戍区保护审查期间,曾威带人到他住处安装窃听器。周恩来批示要吴忠查。经吴忠查没有此事。华国锋让杨贵、于桑找刘复之谈谈。在一次华国锋参加的核心小组会上,杨贵、于桑汇报了同刘复之谈话的情况,会中有人说这不是对曾威个人,是对破案组的。华国锋说:“不是对破案组,实际上是对我的”。

# 第1286回：格瓦拉，重庆“十大宣传队”一年内，基兴格两次访华

“913事件”后，重庆市一直在接受“516”审查的造反派头头黄廉和周家喻又回到市委落实政策办公室去工作了，并由他们这些也在重庆清查“516”中受到审查的造反派，去给那些在清查“516”中被冤枉的人赔礼道歉。

1973年10月，四川省委李大章、段君毅、许梦侠、赵苍璧、明朗等人在省委四号楼分别找黄廉和周家喻谈话。

李大章对黄廉说：“你写给我们的信，我们都看了，搞‘516’你又被错整，从‘二月镇反’以来，你坐过牢受过打击，父亲也过世了，省委也知道了。事情都过去了，革命者的胸襟要宽广，你读了费尔巴哈的哲学和自然辩证法之后，才能调整过来，真正的辩证法是对军队的看法，他们支左立了些功劳，也有些倾向性，成都邓兴国他们好过点。我们也在不断的做工作，刘、张他们站在一派当干部也不对，除了我们谈的这些事，他们也还有事情要找你谈。”

黄廉说：“共产党的历次运动，从土改、公私合营开始，历次运动的积极分子，都能够得到党的正确对待，唯独文革的积极分子多灾多难。大章同志，你是个老同志，你来帮助我解释一下，你们老同志受了打击，说清楚了就解放，对我们动辄关押、批斗，这就公平吗？比较以往的积极分子，我们响应党的号召积极参加文革，所有的活动都是在众目睽睽之下的，反革命行为是在光天化日之下去施展的吗？毛主席、周总理，甚至李先念都表扬我们所做的工作，你们不承认是什么意思？你们把我当‘516’反革命来整。”

明朗说：“搞错了就平反嘛，跟你道歉嘛，不打不相识嘛，经过一次考验更看清了你，你得到锻炼了，道是无情却有情，在省革委会的各个场合，除了你就是周家喻。”

段君毅说：“黄廉，你是左派嘛，我算是个老布尔什维克，要对党和

毛主席有信心,军队对你的看法,都是客观存在的。”

李大章起身离开了,说:“留下一件事,他们来跟你谈。”

然后段君毅就开始讲话了:“问你一个事情,你是不是曾经想出国,是不是收到国外给你的信,说是拉美国际游击纵队很欢迎你,你知道不知道?切-格瓦拉你知道不知道?说副司令的位置给你留起的。”

黄廉看看这人,看看那人,像是听到天方夜谭一样,他不知道切-格瓦拉是什么意思?不明白段君毅讲的是什么?这时他看见赵苍璧、许梦侠也在相互看。

段君毅又接着问黄廉:“你都不知道吗?”

黄廉看着他,依然没有答腔。段君毅转而问许梦侠:“梦侠同志,你看呢?”

这时,李大章的秘书周宏元赶紧说了一句:“派性真是害死人。”

段君毅接着对黄廉说:“这是省委集体跟你谈话,是非常慎重的,今天我提的几点,你晚上加个班,把实际情况写清楚,明天我们继续谈。”说完之后,很严肃的看着黄廉。

许梦侠说:“明天我有事情就不来了。”

周宏元说:“就是摆个龙门阵,跟你了解一下情况。”

黄廉说不知道段君毅说的是什么?并坚持说他不知道段君毅说的是什么意思?段君毅沉思了很久,一言不发。

黄廉回去后,在一张纸写了几条,第二天交给他们。李大章简单看了一下,然后摇头说道:“如果不是我们这些老同志还在,这个派性怎么得了?”

他又接着说:“黄廉,你岁数不小了,还是抓紧时间做点工作,总理是看得起你的,也不要辜负毛主席对你的期望。”

四川省委组织部部长蔡学斌找到黄廉,笑嘻嘻的说:“如果不是这些老同志,说周家喻是叛徒固然要杀,你也跑不脱。”

回到重庆,重庆市委书记鲁大东对黄廉说:“揭露了这个阴谋是个好事,以前别人告你材料就在那里堆砌,你要他查他都不查。”

重庆市委书记处书记岳林说:“不要计较了,这绝对是敌人在策反,要么是派性诬告,现在已经结案,要不还能让你回来?”

他们说的这一切都是关于黄廉与切－格瓦拉联系的事情。

很快,重庆也开始了“反潮流”。重庆一些原造反派组织中的成员,及一些单位因各种原因受过打击、压制或自感不得志的人员,受到“十大”政治报告中“反潮流”号召的鼓舞,同时也受到上海市造反派头头王洪文当上了中共中央副主席的鼓舞,自行组织了一个类似于文革前期造反派组织那样的“十大宣传队”,以宣传“反潮流”精神的名义,想要再搞一次发动群众性的造反运动。领头的是广播电台的一个播音员,叫王汉东。

他们强占了市中心新修复的交电大楼上面的房间,从对面的和平公寓抢来了被褥,摆出一副要“长期抗战”的架势,并在交电大楼上架起广播喇叭,大声疾呼,鼓动市民起来“反潮流”。他们说那些进入革委会的造反派头头,都是自私自利的人,进入革委会后,只顾自己当官,不管群众。他们要按照“十大”的精神重组革委会,在打倒鲁大东的同时要打倒黄廉、周家喻。他们提出口号:“要吃糖,不要走、周、黄。”其中的“走”是指走资派。

怎样处理此事?黄廉等人提出办学习班提高认识。鲁大东未置可否,私下却说“十大宣传队”是有坏人利用操纵,街上的坏事都是他们干的,还宣布他们是反动组织。于是,“十大宣传队”砸了派出所,警察们上街游行示威表示抗议,于是鲁大东向中央汇报,请示如何处置。

为此,黄廉给中央写了3次报告。王洪文看到黄廉的报告后,打电话给四川省委,四川省委找黄廉、周家喻、鲁大东去省委商量,说王洪文指示要解散“十大宣传队”,要他们讨论一个办法。黄廉和周家喻草拟了一个意见,说在群众组织都解散之后,再成立组织是不合适的;他们做了一些过头的事情,被社会上的坏人所利用,以批评教育为主;建议办一个学习班,让他们提高认识,“十大宣传队”的问题在学习班里解决;他们合理的意见和要求,市委一定要解决。省委批准了这个意见,并上报中央。王洪文也同意了。

黄廉和周家喻挺高兴,于是回到锦江宾馆。却不知他们还在睡大觉时,市委书记鲁大东已连夜赶回重庆。当第二天早上黄廉和周家喻去他的房间一看,满屋子都是烟,厕所烧了很多文件,早已是人走楼空。他们赶紧打电话找重庆市委要车。等到他们连夜赶回重庆,鲁大

东已经把问题“解决完了”。

鲁大东回到重庆后,立即通知陈万明、李木森调动重钢的民兵,准备好棍棒都住在宾馆里,一早出动几千人把交电大楼包围起来,给他们宣布文件,说是黄廉和周家喻起草的,把“十大宣传队”的人抓的抓,赶的赶走。

黄廉要司机把车子开去交电大楼现场看一看,只见楼上用铁条焊了三个临时牢房,门上贴上字条“鲁大东关押在此间”,“周家喻关押在此间”,“黄廉关押在此间”。

黄廉感到很遗憾,他觉得,他们在群众组织解散之后进入革委会,与群众联系的渠道没有了,小报没有了,在革委会工作,确实难以为群众落实一些起码的要求,隔阂就这样随着时间流逝而加大。本来这一次在处理“十大宣传队”的事情上,他原想借机消除一些误会,结果被鲁大东这样一搞,反而加深了他们和群众之间的隔阂甚至是仇恨。“十大宣传队”的头头王汉东,原来是黄廉很好的朋友,在文革期间也受压很深,但是在革委会里面,黄廉他们确实什么也做不成。离开了群众这片“大堤”,在鲁大东这样的官场政治“高手”面前,黄廉、周家喻他们只有“栽跟头”的份了。

1973 年 12 月 26 日,中央领导人叶剑英、李先念等在中南海接见包括重庆望江机器制造厂、451 厂和大足汽车厂代表在内的四川重点企业赴京汇报会全体代表。中央领导人在接见时指出,重庆有人搞“民办十大宣传队”,还宣传“四川特别是重庆,从上而下是宗派主义统治”,这是完全违背“十大”精神的。

1974 年 3 月 10 日,周恩来就重庆市“民办十大宣传队”做出指示:如果群众已经公愤,能夺回他们抢去的武器,救了他们抓走的民兵,他们在群众中已经孤立,正是做工作的好机会。

于是,1974 年 3 月 12 日,中共重庆市委、重庆市革命委员会提出对“民办十大宣传队”的处理意见,指出:该“宣传队”不宣传“十大”精神,不批林批孔,脱离党的领导和生产工作岗位,应自动解散。各级党委及本单位负责人要多做思想政治工作,动员其成员返回本单位。随即,市委、市革委就出动民兵,由省革委常委、原“815”派负责人陈万明指挥,把“十大宣传队”的活动据点查封了。

1973年10月23日下午16时,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接见埃及副总统莎菲,周恩来、王洪文在座。

接见时,毛泽东说:“我们过去叫CHIN(秦),加一个A,变为CHINA(中国)。秦始皇在中国是有名的,就是第一个皇帝。中国历来分两派,讲秦始皇好的是一派,讲秦始皇坏的是一派。我赞成秦始皇,不赞成孔夫子。因为秦始皇是第一个统一中国的,统一文字,修筑宽广的道路,不搞国中有国而用集权制,由中央政府派人去各地方,几年一换,不用世袭制。”

10月29日,江青听取上海乐团音乐会。在整个观看过程中,她一直带头鼓掌,对演出的作品予以了充分肯定,说:“演唱所选的段落很好,可去广交会演出。”

她还说:“这个作品有中国声乐的特点,我们的东西就是好。我们最重要的,要创造自己的文化艺术。”

“要教育专业和业余文艺工作者,要重视自己的文化艺术,不要轻视,不要盲目崇拜。毛主席对刘诗昆说:‘要写自己民族的东西。外国的东西,有的是吹出来的,其实思想上、艺术上都不行。有人却把它们当作楷模,认为不可变。费城交响乐团来中国,听了我们的音乐,认为很好,而我们自己却不以为然。外贸部反映,外国人对《杜泉山》的反映很强烈,而我们有些人却不愿去看。”

“上海最近又有一些人反对现代革命作品,这些人中,有的是资产阶级权威,有的是旧上海乐团培养出来的观众。创办的创作评论小组,要对外国音乐进行评论,如对‘无标题音乐’。最近,土耳其有音乐家要来,要搞清他们演的节目内容,不要再象费城乐团那样。‘无标题’音乐是否没有内容,仅表示某种情绪,要研究。”

“要提倡和重视创作,可以把京剧的片段写成钢琴曲或管弦乐曲。‘穿林海’一段就很好。还有一些唱段。如‘狱警传’都可以搞成钢琴曲,突出人的作用。搞古代的要慎重,要推陈出新。有的可以不动,有的要出新,出新是很重要的创作。”

江青所说的“穿林海”是那天乐队演奏的京剧《林海雪原》中杨子荣打虎上山一场戏开始的一段唱腔。而“狱警传”则是《红灯记》中李玉和在监狱中唱的一段。

于会泳在传达江青的讲话时解释了江青说的“有的可以不动”是指的哪些作品。他说:“‘可以不动’如《水调歌头》、《十面埋伏》、《大起板》,可按原来的演。”

江青说:“有些曲子要选比较开朗的,不要选哀怨的,如《二泉映月》要演出,要改,要跳出来。要演激奋、反抗的曲子。象《三十里坡》可以改编。”

《三十里坡》是陕北民歌。

江青听了《咱们的领袖毛泽东》后说:“这个曲子好。”

听了《三六》后说:“《三六》可以改成管弦乐。《夜深沉》可以改编,以京胡、板胡三大件为主,我们不要老是捆住自己。”

于会泳在传达时解释说:“这段指示的中心意见,是对古代的选择要慎重,要提倡重视创作。”

对电影,江青说:“上海三个小戏电影,倾向是好的,但不敢接触矛盾(指《颂银针》)一接触就缩回去了。有的片子讲生产术语,看不懂(指《一寸之间》)。化妆搞假的眼睫毛。

《半蓝花生》是越剧,我们要提倡搞小戏。北京的河北梆子《云岭春燕》要赶快搞。”

江青提到当时社会上的一些议论,她说:“近来有些人又借故事片少,向我进攻,这些话是放屁。我们自始至终在抓。有些原因,电影工业跟不上,‘八·七五’放映机过不了关,林贼捣乱等等。”

对出国节目的准备,江青说:“要有历史长河,要有古代的,也要有现代革命的,但要以现代革命为主。”“《剑舞》要搞一个小会演看看。”

她谈到了艺校的招生工作:“五七艺校招生要贯彻阶级路线,但不能搞关门主义。要讲成份,但不能唯成份,不要查三代,要重表现。要坚持以工农兵子弟为主,但要防止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把一些有条件的学生弄掉。”

1973 年 11 月 10 日,美国国务卿兼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抵达北京。这是他同年的第二次访华。他打算在上次访华的基础上,再就中美双方的战略意图、军事技术合作等具体问题同中方交换意见,并达成默契。

外交部长姬鹏飞在当晚举行宴会,欢迎基辛格博士一行。周恩

来、叶剑英出席了宴会。

当晚21时25分,周恩来、叶剑英与基辛格、同行的官员洛德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了第一次单独会谈。基辛格先向周恩来简要介绍了5、6月他访问苏联时与勃列日涅夫会谈的情况。他特别提到这样一件事:

勃列日涅夫安排和他一起去树林打猎,实际上是从一个搭好的台子上射击驱赶来的动物。勃列日涅夫津津乐于此道,疲而不倦。打猎结束后,在用野餐时,勃列日涅夫忽然屏退左右,只留下翻译,郑重其事地对基辛格说:"苏联和美国有共同的责任阻止中国变成一个核大国。"

基辛格说他立刻意识到,在1964年中国原子弹即将试验成功之际,美国约翰逊总统也曾向苏联提出过相同的袭击中国核基地的建议,那时被苏联拒绝了。同样的建议这回再次提出,只不过双方调了个儿。于是他向勃列日涅夫表示:美国认为中国是一个朋友,没有认识到美苏两国有这样的共同责任。

勃列日涅夫不耐烦地吼着:"好吧,你们可以交你们想交的任何朋友,但你们和我们必须是伙伴。"他再次重复:"我们有共同的责任防止中国成为一个核国家。"

说完这件事,基辛格对周恩来说:"自那时候起,苏联已三、四次在限制核武器会上提出与我们交换有关中国的情报,他们这样做意味着苏联应与美国享有同等权力,并且还要有足够的武器摧毁中国,这些武器还应随着中国的形势变化而每年有所增加。"

周恩来对基辛格的这一说法提出疑问:"苏联有人造卫星,每天都可以观测中国。那他们还想要交换情报?"

基辛格解释说:"他们想从我们这里得到一个暗示,当作一个合作的标志,而不是单单情报。他们希望我们接受的是破坏中国的核力量的要求。"他还说,美国政府内部安排了一些研究,向中国提出可以使中国在遭到苏联突然袭击时减少军队伤亡和提前报警的技术建议,并表示可以由随行的豪尔司令来具体介绍。这件事只有四、五个人知道。

周恩来并不相信苏联马上要攻击中国,但他最后还是说:"不管怎样还是谢谢你的情报和忠告。"

会谈后,22 时 30 分,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听取周恩来等汇报会谈情况。

第二天,11 月 11 日下午 15 时 15 分,周恩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接见厅与基辛格举行第一次正式会谈。基辛格对周恩来说:“最初我们由于相互需要走到一起来了,但我们在此基础上怀着坦率、真诚,有远见的态度又进一步发展了这种关系。世界上没有任何别的国家领导人能像总理这样谈问题,原因之一是世界上其他国家的领导人都不能像总理这样全面思考问题。”

周恩来马上制止他的话说:“你过誉了。这些话可以用在毛主席身上,我作为战友向他学习,但学得不够。你刚才说我们的关系是有原则性的、坦率、真诚、有远见的。我们同意这一说法。本着这种态度,我们什么问题都可以讨论。”

11 日晚,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听取周恩来下午同基辛格会谈情况的汇报。

# 第1287回：告别宴，基辛格还要再谈政治局，开会批评周与叶

11月12日下午15时至17时25分，周恩来与基辛格在钓鱼台宾馆3号楼进行第二次会谈。然后两人驱车前往中南海。

17时40分，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会见基辛格，周恩来，姬鹏飞在座。

会谈时，基辛格说目前中东问题是防止苏联取得统治地位，他说："对于今天世界上主要的危险是谁，我们并无怀疑。"

毛泽东说："统治不了，野心很大，能力不够。我们现在跟你们有一点不同，我们什么问题都挡回去。你们是打中国式的太极拳，我们是打少林拳。你们总是说，我们自己也这么说，你们跟我们的观点差不多一样，就是苏联要打中国，有这个可能。"

基辛格说："我原来认为，这在理论是可能的。现在我认为，有更大的现实可能性。我已经公开对你们总理和大使讲过，我认为他们特别要摧毁你们的核能力。"

毛泽东说："我们的核能力只不过只有苍蝇那么一点，一个国家要兴起来，短时间是不可能的。"

基辛格说："正如我多次讲过，上次也向主席先生讲过的，我们认为，如果出现这种事情，将会对我们大家都产生严重后果，所以我们决心加以反对。我们已经决定不允许中国的安全遭到破坏。"

毛泽东说："苏联那个野心跟它的能力是矛盾的，它要对付这么多方面，从太平洋讲起，有美国、有日本、有中国，有南亚，往西有中东、有欧洲，总共只有100多万兵，守也不够，何况进攻？要进攻，除非你们放它进来，把欧洲、中东让给它，它才放心。这样才能把兵力往东调。我们也牵制他们一部分兵力，也有利于你们、欧洲、中东。比如在蒙古，它就驻了兵。所以我的意见是苏联野心很大，欧洲、亚洲都想霸占，甚至非洲北部，但是它力量不够，困难很大。"

基辛格说:“可能是这样。”“我们同苏联的交道中,没有什么你们不知道的东西。你们可以指望将来也会如此。”“我们知道苏联在中国边境每一个师的位置。”

对于台湾问题和中美建交的事,毛泽东说:“要把美国同我们的关系问题,同我们跟台湾的关系问题分开。只要你们跟台湾断绝外交关系,我们两国就可能解决外交关系问题,就是说,像日本那样。至于我们跟台湾的关系问题,那就复杂了。世界上的事情不要看得那么死,那么着急干什么呢?至于你们同我们的关系,我想不要100年。你们如果有需要就办,如果还不行,就推迟下去。”

基辛格说:“从我们的观点来看,我们是要同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的。我们的困难在于,不能立即断绝同台湾的外交关系,这是同我们国内形势有部分关系。但是我已告诉总理,我们希望在1976年期间完成这个过程。”

毛泽东:“这个问题不是一个什么重要的问题,整个国际问题是重要的问题。”

基辛格:“或者我们还是等待一下,因为从技术角度来看,联络处的工作是管用的。”

毛泽东说:“可以嘛,就是这样下去也可以嘛。你们现在还需要台湾。”

基辛格说:“不是需要的问题,是现实可能性的问题。”

毛泽东说:“哎,一样。”

最后,毛泽东说:“有一个问题想说一下,我相当怀疑你们那个民主党如果登台会搞孤立主义。”

基辛格说:“这是一个严重问题,我认为目前在知识分子和一些民主党人中,有孤立主义倾向,一是要从欧洲撤军,二是在挑衅面前不愿采取迅速而残暴的行动。”

毛泽东说:“所谓残暴就是指打仗吧?”

基辛格说:“如果受到苏联的进攻,我们将进行战争。”

毛泽东说:“打仗也不是打原子弹,打原子战争我们也不赞成。你们两家打原子战争,我也觉得不太好,要打,你们去打常规武器好了,原子弹,核武器,那个东西放到核武器库,不要动,吓人的呢。”

11 月 12 日、13 日,周恩来、叶剑英等与基辛格举行多次会谈,进一步探讨中美两国在各方面进行合作的可能性。

13 日,周恩来向毛泽东报送《中美会谈公报》的中方修改稿。周恩来在送审报告中说:“美方昨日会见主席后,提议发表一个公报。我们说可以考虑,请美方起草一个稿子。当美方昨夜交来后,外交部的同志修改成现在这个稿子,拟予同意。”毛泽东当天即圈阅了周恩来的报告。

按计划,13 日是基辛格离京前,周恩来同他进行的最后一次会谈。基辛格准备第二天早晨 7 时乘飞机离京。11 月 13 日晚,基辛格举行告别晚宴。

宴会后,当晚 22 时,基辛格提出与周恩来再次进行会谈。基辛格进一步提议:“我们可以在两个方面提供援助,一、如果这场战争(指苏联袭击中国)明显地会延长,我们可在装备上及其他方面给予援助。”“目前基于互利,我方应提供给你们不易被察觉的协助。在侦测导弹方面,我们有很好的卫星系统可提早预警。重点在于将情报快速传递给你们。我们准备在美国卫星与北京之间建立一条热线,几分钟之内就可以将消息传给你们。”“另一个方法是我们双方就防止突发性核战争上签署协议,就像我们和苏联签署的一样,并且也建立一条热线。”基辛格还说:“我只是在考虑如何建立一条直通北京,且能避人耳目的热线。我们也可以提供某种雷达的科技,但是你们必须自己去建造。”

对此,周恩来回答说:“至于你希望讨论的特殊议题,我必须先研究一下。”

当晚的会谈一直进行到次日,即 14 日的 0 时 30 分。

会谈结束后,周恩来对乔冠华说:“现在太急了,基辛格的问题要马上答复,要报告主席。”他们立即前往中南海向毛泽东汇报,但毛泽东已睡下。

14 日清晨 5 时左右,基兴格给西花厅打来电话,提出还要和周恩来见面,说有些问题还需要讨论。

按照惯例,周恩来立即给中南海游泳池打电话,向毛泽东请示,但回复说:“主席已经睡了。”

事发突然,没有不见基兴格的理由,而且双方的会谈公告也已完

成,当天就要发表,应该不会有太大的变故。即使有什么新问题,坚持既定的原则就行了。周恩来决定与基辛格见面。他立即通知王海容和唐闻声,驱车来到钓鱼台。

7时35分,周恩来在钓鱼台与基辛格举行了最后一次会谈。基辛格提出,继续讨论一下中美双方的军事合作问题。

关于战争问题,周恩来说:对中国来说,不能不设想最坏的一种情况,作最坏情况的准备,即在一个时期内孤军奋斗,这是我们的一个基本的作战思想;即使包括美方在内的几个方面同时向我们进攻,我们也准备了。

基辛格再次提出在中美之间建立热线联系问题。他说:以美国的卫星系统向中国提供早期预警,以便及时采取措施,保护中国的防空、防御系统(轰炸机、导弹等),或者在中美之间签订一个有关意外的核战争的协议(美国已草拟了文本)。

针对美方提出的需要继续商议的有关双方合作的几个具体建议,周恩来没有给予肯定的回答,只是说:"如果如你所提议的,能够在预警措施上合作,我们在情报上会有很大的帮助,当然,这也包括通讯网络。可是要做得不让人发现我们的合作关系。""如此一来,我们需要非常良好的磋商。"

基辛格说:"总理先生,要秘密地建立一条热线是不可能的。""但是一旦建立起来,其特定用途,应该是可以保密的。"

周恩来表示:"我们还要考虑,要报告毛主席,一切由毛主席决定。"

基辛格最后留下了两份协议,一份是建立热线的,另一份还包括共同防止苏联袭击的内容。

周恩来同意指定黄镇继续与基辛格交换中美情报合作问题。

送走基辛格后当天,9时30分,周恩来向毛泽东及在京中央政治局成员提交了送审基辛格访华公报稿的报告。周恩来在送审报告中说:"根据昨晚主席、中央批准的我方公报修改稿,双方进行协商,今晨三时半定稿。在这稿上,加了三句话,已用红杠标出。新加的三句话是:'基辛格国务卿转达了尼克松总统的问候,毛泽东主席向总统表示问候。''双方商定,应该继续扩大联络处的工作范围。'另外一句是加

在‘双方官员就共同关心的双边问题进行了对口会谈’之后的‘取得了良好进展’。”当日毛泽东及全体在京政治局成员圈阅了报告。

11 月 14 日,《人民日报》发表经中美双方商讨、修改的基辛格访华公报。

15 日早晨 5 时左右,中南海大门的警卫来电话报告:“王海容、唐闻生两位要见总理。”正在西华厅值班的张树迎赶紧报告,正在批文件的周恩来头也没抬说:“让她们来吧,先在中间会客厅里等一下,我批完文件就出来。”

当周恩来出来时,王海容她们已坐在会客室。她们拿着昨天清晨与基兴格会谈的记录稿,有些段落下面还画了红杠杠,征询周恩来的意见:“您是这样讲的吗?”

周恩来看后说:“对,这是记录稿嘛,我就是这个意思。”

后来,王海容、唐闻生来到毛泽东处,从张玉凤那里了解到周恩来这两天都没有见到毛泽东时,唐闻生说:“那就怪了,这么大的事,总理为什么不请示主席,也没和政治局其他人商量,就急忙去见基辛格,答复建立核保护?”

11 月 17 日上午,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召集周恩来、乔冠华、王海容、章含之、沈若云、唐闻生等谈对这次中美会谈的看法,他说:

“美国说苏联要打我们,才不要信他们的话呢。我那篇讲话,意思是把他的球踢回去,当心,北极熊要咬你们,要向西,到欧洲、中东和美国,对付他的‘当心!北极熊要整中国’。对美国要注意,搞斗争时候容易‘左’,搞联合时容易右。我看不跟他搞什么军事联盟一套,什么不称霸!什么不对付第三国!就是反对苏联。这回不提台湾,不提尼克松访华。台湾,我们必须提,一百年也要提。这回这个公报,我就欣赏一句话‘世界是在激烈的变动中’,美国人起草的。帝国主义自己承认世界是在激烈地变动。世界的事要看嘛,一百年。建交,意思无非是推迟。美国人甚至于可以承认不称霸呢!今天在座的,有年老的同志,中年的同志,青年同志占多数,要保持清醒的头脑,这个事要用点脑,有所分析。但是,不要忘记凤姐讲的话:大有大的难处。”

毛泽东谈到《红楼梦》,他说:“是部政治小说。从康熙到乾隆年

间,有两大派,一派胜利者即雍正皇帝,抄另一派失败者的家。写的是从兴盛到灭亡,贾、史、王、薛四大家族的兴亡史。‘坐山观虎斗’也是凤姐的话,‘大有大的难处’,特别对我们有用。‘千里搭长棚,没有不散的筵席’,美国、苏联就是‘千里搭长棚’。‘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出自林黛玉,没有调和的余地,这也是路线斗争呢!”他对在座的年轻人说:“你们这些娃娃要读一点古代的东西。”

毛泽东说:“有人要借我们一把伞,我们就不要这把伞,这是一把核保护伞。讲台湾问题有两种可能是错的,要打。在陕北时连那个小土围子,不打它就不投降。苏联‘野心很大,力量不够。’”

他还说:“当着你们的面讲,政治局开会,你们也可以来,在后面排一排椅子。谁要搞修正主义,那就要批呢。你们要有勇气,无非是取消你们的职务。”这几句话应该是让王海容、章含之、沈若云、唐闻生几个非政治局成员也参加会议。

当晚,周恩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传达了毛泽东对中美会谈的意见并介绍同基辛格会谈的情况。

会上,江青首先批评周恩来是右倾投降主义,言辞激烈。

翌日,周恩来两次向毛泽东书面报告政治局会议情况,表示自己在中美会谈中“做得不够”。承认自己犯了“修正主义”的错误,并表示完全接受对他的批评。

11 月 18 日,江青批示对外友协关于邀请土耳其两音乐家于 12 月上中旬来华作访问演出的报告:“建议今后少接待或不接待资本主义国家的文艺团体,其后果是严重的。”

19 日,周恩来又批:“今后尽可能地少接待,或有选择地接待,完全不接待不甚可能,但我事先可调查清楚,避免请来我无法接受或不了解其内情的文艺团体。”

上海、天津、北京等地发起批判资产阶级无标题音乐泛滥活动,号召大家与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开展斗争。

11 月 20 日,毛泽东看了罗瑞卿 11 月 15 日给他写的信,信中说:“我现在满身是病,两腿伤残。加上年龄条件,特别是我思想上、政治上的极端愁苦,恳求主席和党解除对我的监禁,给我一定限度的自由。”毛泽东批示:“似可释放,请中央酌定。”

从11月21日起,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央政治局每晚在钓鱼台17楼开会,批评周恩来和叶剑英。

11月21日这天,毛泽东看了两封共产党员的来信:

一封是上海市崇明县堡镇酱酒厂一名党员的来信,信中对张春桥是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表示怀疑,认为张春桥"做一个中央委员基本可以,做一个政治局委员是十分勉强的,做一个政治局常委是根本不行的。"毛泽东批示:"印发政治局,此种攻击不妥。但知有此类意见是必要的。"

另一封是署名"一个普通共产党员"的来信,是批评江青的,共提了八点意见,批评江青"民主作风较差",把文艺强调过分,在文艺工作中不执行双百方针,认为"一切为样板戏让路"的口号是不恰当的等等。

11月25日,毛泽东在批评江青的那封署名"一个普通共产党员"的来信上写了批语:

印发政治局各同志。

有些意见是好的,要容许批评。

毛泽东

1973,11,25

# 第1288回：十天会，周恩来检查过关 毛泽东，提议司令员对调

对批评周恩来的政治局会议，毛泽东指示："后排议员要参加批判修正主义。政治局会议多加几把椅子，外事口多出几个人，一块儿讨论讨论。"

于是，从11月25日起，批评周恩来的政治局会议改为政治局扩大会议，除了政治局委员外，外交部部长姬鹏飞、副部长乔冠华、仲曦东、中国驻美国联络处主任黄镇和担任中美会谈翻译的章含之、罗旭6人，被毛泽东点名到会，加上原来就一直参加会议的外交部王海容和唐闻生，外交部共有"四老四少"，还有中联部长耿飚和刚刚复出的邓小平，被扩大参加了政治局会议。会议地点也从钓鱼台搬到了人民大会堂。

会议主持人由周恩来改为王洪文。王海容、唐闻生作为联络员，随时向毛泽东报告会议情况。

会议还成立了一个"帮助小组"，由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汪东兴、华国锋等6人组成。开会前，帮助小组连同王海容、唐闻生一起先在钓鱼台开小会，研究如何贯彻毛泽东的指示精神。

会议时间很长，照以往的做法，参加会议的人到了该吃饭的时候，服务员会把饭送进会场，他们边吃饭边开会。可是这次，当工作人员把周恩来的饭准备好，请服务员送进去，时间不太长，饭一点没吃，却原样退了回来。周恩来卫士高振普很纳闷地问服务员怎么回事，服务员摇摇头说不知道。

一小时过去了，送去的饭又退了回来。服务员传话说："总理说不吃饭，也不叫再送吃的。"

高振普有点坐不住了，为什么不吃饭？工作人员想不出原因，只是等在外面干着急。高振普与大夫商量，该吃的药不能误时，于是请服务员准时把药送去。周恩来把药吃了，工作人员们稍微放松了

一下。

散会了。周恩来第一个走出来,他的脸色很难看,人显得很疲劳。高振普在回家的路上不放心地问他:

“您有什么不舒服?”

“没有。”周恩来的语气低沉。

“饿吗?”

“不饿。”

周恩来下午起床后,只吃了一杯豆浆冲鸡蛋。

第二天开会,周恩来装文件的皮包轻了许多。临进会场,他回头对高振普说:“开会中间不吃饭。”

高振普马上说:“药还是按时吃吧。”

周恩来让他们掌握。

为了保密,会场内的服务员只指定两人,其他人打下手,在场外等候。开会期间一位服务员进去送水,听到他们在指名批周恩来,她惊呆了,把几杯水倒翻在地,哭着跑了出来……以后再没让这位服务员进去,连打下手也没她的份了。

有一次,高振普把药交给一位服务员,让她送给周恩来吃。她还空药瓶时,避开高振普的目光,低着头跑进服务间。高振普觉得不对,紧步跟了过去,她正用手绢擦泪,转身看到高振普,就止不住地哭出声来,说:“他们还在批总理……他妈的,我不干了。”

高振普按捺住难过的心情,强忍住要滚出的眼泪,压低嗓音,对她说:“别哭了!别哭了!别叫别人看见了。”看她实在止不住哭声,高振普就把她让进了隔壁的福建厅。“你在这里哭一会儿吧,有事我来叫你。”

批评周恩来的火力如此猛烈,上纲越来越高,什么“丧权辱国”、“给美国人下跪”,甚至逼问周恩来在同美国人的会谈中究竟“干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等等,根本不由周恩来分辩。

据后来纪登奎回忆,邓小平也在会议上发了言,他对周恩来说:“你现在的位置离主席只有一步之遥,别人都是可望而不可即,而你却是可望而可即,希望你自己能够十分警惕这一点。”

如何完成自己的检查?周恩来想到乔冠华。会后,他叫住参加会

议的乔冠华、王海容、唐闻生和章含之,要他们一同到西花厅坐坐。到西花厅后,周恩来对乔冠华说:“冠华,我的检查请你帮着改改。”心直口快的乔冠华没有犹豫,爽朗地答应:“好啊,我帮总理看看。”

周恩来也请其他人帮着看看。

王海容说:“你自己写吧,我们不看了。”

这期间,周恩来的外事活动极少,其他的会议也不多,从早到晚脸绷得紧紧的没有什么表情,少言寡语。他不刮胡子,不理发,回家后呆在办公室里,进餐也大多在办公室,偶尔与邓颖超同桌吃饭,也听不到老两口的说话声……

1973 年 11 月 25 日,上海市委书记马天水找市委写作组肖木谈话,说刚接到北京通知,让他第二天到中央办公厅报到,还说这回是正式调动,不是借调。

26 日,肖木来到了北京王洪文所住的钓鱼台十六楼,王洪文热情地接待了他。对他说:“把你调来,就想请你继续做我的老师。这事我向主席和总理、春桥同志报告过,他们都同意。不过还是要听听你有什么意见?”

原来,肖木在 1970 年庐山会议后曾经辅导过王洪文读书。那是 1970 年 9 月中旬一个星期天的中午,上海革委会副主任徐景贤的爱人葛蕴芳让她的女儿叫工人作家、原上海市委办公厅党刊编辑室编委、现在市委写作组工作的肖木到她家去,说“爸爸有事商量”,还特别关照一句:“中饭不要到食堂去吃。”

肖木自幼吃素,又有偏食的习惯。为了不给主人家带来麻烦,他赶紧到食堂买了个馒头边走边啃,以为“吃过了”便有了辞谢午宴的理由。但是推不掉了。一桌可口的菜肴已经摆好,还有三只红得发亮的大闸蟹。更让肖木感到意外的是,徐景贤还带进来一个肖木既熟悉又陌生的人:熟悉是早已远远见过多次,陌生是面对面坐在一起还是第一回。这个人就是王洪文。

惯于字斟句酌的徐景贤向王洪文介绍说:“这是肖木同志,工人作家,曾做过铁路工人。”

肖木后来回忆说,传闻徐景贤与王洪文磨擦不断,这次一见,双方似乎有了团结的愿望,肖木挺高兴。

盛情难却,肖木只好再吃一顿中饭。不过那碗在当时颇为稀罕的赤豆豌米饭倒确是诱人,一嚼满口生香。徐景贤一边缓缓嚼着饭一边吹起了他的养身经:“这吃米饭,就讲究个细嚼慢咽。嚼呀嚼,待到嚼出甜味来了,再慢慢咽下去,那样才容易吸收。”

王洪文点头称是。

不料徐景贤的爱人葛蕴芳揭发说:“你省省吧!早一顿、晏一顿,冷一顿、热一顿的,都弄出胃病来了,还好意思说细嚼慢咽呢!”

王洪文侧起头颇感意外地问:“你有胃病?”

徐景贤有些窘,笑笑说:“有一点,还好。”

吃过饭,徐景贤把王洪文和肖木领到内室,关上门,两人表情严肃地向肖木大略传达了不久前在庐山召开的九届二中全会上的情况。肖木受到了极大的震动,同时也明白了他们二人能暂时相互紧紧握起手来的原因。因为庐山会议的风波,毫无疑问是对着张春桥去的。“大敌当前”,于是二人便都有了捐弃前嫌、团结对外的意愿。当然,这只是肖木本人的认为。

接着,徐景贤拿出文件,向肖木传达了毛泽东《我的一点意见》大意,和闭幕会上向全党发出的“学一点马列”的号召,然后说:“我们两人已商量好了,每天中午抽出两个小时来学马列,雷打不动。只是怕有些地方读不懂,所以要请你做我们的辅导老师。”

肖木心想:“你老徐完全可以自学,用不着什么辅导老师,无非就是想拉住王洪文一起学,才用心良苦地作了这样一个安排。”

后来这个学习一直坚持,还真是“雷打不动”,不久又扩大到马天水、王少庸等十余人。读的是30本马恩列斯的代表性著作。

可能就因为这个业余性的辅导,1973年筹备“十大”时,肖木被借调到中央办公厅参加为筹备“十大”而成立的党章修改小组,参加了党章修改草案和《关于修改党章的说明》的起草工作。“十大”结束后,深感自己缺少在中央高层应对各种复杂关系的能力的肖木,等大会闭幕留下的一些杂务全都做完后,就坚决要求重回上海,并于9月初回到上海市委写作组,准备重操他喜欢的文学创作工作。没想到,不到三个月,又被正式调到北京。

此时,肖木面对王洪文的征询,当然不敢再有任何意见,只是一再

说明做老师不敢当,但愿意尽自己努力做好工作。

王洪文对肖木说的:“前天,主席找我单独谈了一次话。主席说你的主要任务就是学习。学习着重就是读马列,有些不好懂,可以找个老师,查查资料。读书是学习,工作也是学习。工作上你有两个老师,一个是总理,一个是春桥同志。”

肖木到北京后,正赶上政治局批评周恩来,而且是由王洪文主持开会。每次会后,王洪文都把全部会议记录带回钓鱼台十六楼他的办公室,要他的秘书小沈再端端正正用相等于一号大小的字体重抄一遍,而且指定要用6B铅笔写,好让患有深度白内障的毛泽东看起来方便些。由于工作量很大,小沈每夜熬通宵也来不及,刚到北京的肖木自然责无旁贷去帮他抄一部分。

从11月25日至12月5日,中央批评周恩来的政治局扩大会议进行了10天。在此之前,毛泽东对会议指示:“要开成一个团结的会”。

会议最后责成周恩来做检讨。

周恩来要求面见毛泽东当面做检讨,毛泽东指示还是在会上做。

12月5日的会议照例是晚20时开始。出乎意料的是,会议只进行了3个多小时就散了,这次周恩来不是第一个出来。先出来的是那些部长们,他们严肃的面孔不见了,脸上露出了笑容。王海容更是直率地对高振普说:“你又可以‘吃’宴会了。”她以此透露,周恩来又可以见外宾了。

周恩来在会议上就自己的错误作了检查。毛泽东阅后批示道:“可以了。”

12月9日,毛泽东会见尼泊尔国王比兰德拉和王后艾什瓦尔亚。在会见时,毛泽东同周恩来长时间热烈握手,并且说:“总理啊!”他指着在座的女翻译说:“现在的小将不好惹呢。”“把他们提起来,整了你自己,也整了我。”“总理啊,你挨整了,听说他们整得你不亦乐乎啊,说是你爱插我的话,弄得你现在都不敢讲话了,把我搞成了一言堂。”

毛泽东会见之后,把陪同会见的周恩来、王洪文以及王海容、唐闻生留了下来,分三批先后同他们谈话。

毛泽东先是说:“这次会开得好,很好。就是有人讲错了两句话。一个是讲十一次路线斗争,不应该那么讲,实际上也不是。一个是讲

总理迫不及待。他不是迫不及待,她自己才是迫不及待。”

毛泽东说的这“两句话”后来在“四人帮”被打倒后的中央文件中说,都是江青说的。

毛泽东还说:“不能搞红卫兵上街贴大字报打倒总理、叶帅那一套,要内部开会解决。又要批评,又要工作,几个老同志和我,都是不久于人世的了。”

12 月 10 日,周恩来和江青谈话。

12 月 11 日,周恩来致信毛泽东,汇报根据毛泽东意见,外交部和中央军委办公会议准备召开扩大会议学习、讨论中央政治局“帮周”会议有关内容。信中提出:“外交部、军委既开这样的会议,中央直属机关和国务院也应安排开这样的会。”毛泽东圈阅批准了此信。

12 月 12 日晚 19 时到 20 时,毛泽东在中南海住处同周恩来、王洪文谈话。20 时 30 分,毛泽东在他的书房兼会客室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不是政治局委员的邓小平也坐在了茶几旁。

毛泽东说:“我和剑英同志请邓小平同志参加军委,当委员。是不是当政治局委员,以后开二中全会追认。”

他指着邓小平说:“你呢,我是喜欢你这个人的,咱们中间也有矛盾啊,十个指头有九个没有矛盾,就是一个指头有矛盾。”

他又对叶剑英说:“你以后胆子大一点吧。政治局要议政,军委要议军,不仅要议军,还要议政。军委不议军,政治局不议政,以后改了吧。你们不改,我就要开会,到这里来。我毫无办法,我无非是开个政治局会,跟你们吹一吹,当面讲。”

会客室里鸦雀无声,大家等着他下面的话。大家明白,毛泽东批评军委不议军,政治局不议政,虽然没点名,但实际上是批评周恩来。因为那段时间是周恩来和王洪文主持政治局工作,主要的还是周恩来在主持。

毛泽东再次批评政治局和军委:“政治局要议政。军委要议军,不仅要议军,还要议政。”说完,他停顿片刻,扫了大家一眼。

会客室里,静得掉下一枚针都能听得见。气氛有些紧张。

毛泽东也感觉到了。他缓和了一下气氛,换了一个话题:“我主张找各大军区的人,找司令员来,议什么事?要议军。我提议,议一个军

事问题,全国各大军区司令员互相对调。”说完这句话,他转向叶剑英:“你是赞成的。我赞成你的意见,我代表你说话。我先找了总理、王洪文两位同志,他们也赞成。”

周恩来点点头。王洪文也连连点头。

在政治局委员们一致同意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的提议后,毛泽东建议在座的政治局委员们共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于是,在毛泽东的指挥下,政治局委员一起唱歌。从九届二中全会以后,毛泽东已不止一次地在开会或接见下级时,让中央和地方领导人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毛泽东希望全党步调一致。

唱完歌,毛泽东又解释说:“步调一致,不一致就不行。陈锡联当北京军区司令员;李德生同志到沈阳军区去;杨得志同志跟曾思玉同志对调;许世友同志跟丁盛同志对调;韩先楚同志跟皮定钧同志对调。新疆、成都、昆明,他们都刚去,不要动。一个人在一个地方搞久了,不行呢,搞久了油了呢,有几个大军区,政治委员不起作用,司令员拍板就算。我想了好几年了,主要问题是军区司令员调动,政治委员不走。”

他指着叶剑英说:“你把大军区司今员、政治委员都找来吧,参加议军。”

散会后,政治局委员转到人民大会堂,在周恩来主持下继续开会。会议一致同意邓小平列席政治局会议和参加政治局工作,作为政治局成员,将来提到十届二中全会追认,并补为军委委员,参加军委和军委办公会议的工作;同意大军区司令员对调。

第二天,12 月 13 日,毛泽东找了政治局几个人谈话。一开头就问:“你们议了一些什么,行得通吗?”接着说:“在一个地方太久了不好。相互调动,又不开除你的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军区司令员,照样做官嘛,照样革命嘛,换个地方革命嘛。政治局要议政,军委要议军,不仅要议军,而且要议政。不议政,军队政治思想工作就提不起纲来。”

这天,中央军委办公会议部分成员开会,周恩来参加。会议讨论召开中央军委办公会议扩大会议和大军区司令员对调的准备工作,并提出初稿方案。

14日上午,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召集周恩来等开会。晚上,找政治局的陈锡联、李德生等人再谈大军区司令员互相对调的问题。他问:“大军区司令员调动,你们商量了吗?看有没有这个必要?一个人在一个地方做久了,就不大好了。调动也有问题,各省都要做工作,各省分两派的地方,要打一点招呼。”他指着陈锡联说:“比如,‘辽联’、‘八三一’就会批你。那也不要紧。辽宁‘八三一’、‘辽联’是两个小团体,彼此要照顾一下,不要偏了。‘辽联’、‘八三一’,不要批呢。各省都要做工作,分两派的地方要打一点招呼。我看呢,要招呼各地的政治委员,要欢迎呢。机关干部,找来一二百人,不要太多,军事机关。总之要欢迎。不然,‘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不大好呢。要开一个军长、政委,师长、政委见面的会吧。不认识一下呢,也不大好吧。比如东北吧,”他又指着陈锡联对李德生说:“要他在场介绍他(指李德生)。比如华北,要他(指李德生)在场介绍他(指陈锡联)。还有政治委员。”

毛泽东提议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

他又说:“现在请了一个军师,叫邓小平。发了通知,当政治局委员、军委委员。政治局是管全部的,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我想政治局添一个秘书长吧,你(指邓小平)不要这个名义,那就当个参谋长吧。至于德生同志走了,还兼不兼总政治部,我说,不要兼了吧!”

他再一次提议大家一起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然后说:“他们(指各大军区司令员)到了,开门见山,讲互相对调,不要吞吞吐吐。共产党员不要吞吞吐吐。我们都是共产党员,为什么要吞吞吐吐呢?就是直说。”

# 第1289回：大军区，司令员互相对调 说“红楼”，毛泽东接见众将

1973年12月15日，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周恩来传达毛泽东关于大军区司令员对调、邓小平任职等指示。

根据毛泽东意见，会议商定了来京参加中央军委会议成员名单，并研究了大军区司令员在地方一律不要兼职等问题。

清晨5时，周恩来向毛泽东报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对毛泽东13、14日两次谈话讨论情况的报告。报告说：“到会同志均表示完全拥护主席指示，坚决执行。会议商定，拟电十一个大军区和广西，约司令员和第一政委于16日来京开军委会。关于大区司令员兼省委书记问题，拟乘此调动机会，确定一律不兼。关于调动执行时的欢迎、欢送和向各群众组织代表人物打招呼等事，当按主席指示精神落实。”

当天，中共中央、中央军委联名发出绝密级通知，要求各大军区负责人火速进京，参加军委会议。通知结尾处特别注明：“开会事请勿下传，到时北京派飞机去接。”

这天，中央同济南军区负责人谈对调问题。

当晚，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部分政治局成员和北京、沈阳、济南、武汉军区负责人参加。谈到大军区司令员对调问题时，毛泽东说：““在一个地方搞久了，也不大好。要革命，哪个地方都可以革命嘛。”

他还说，“我还可以打一仗呢。要打就打嘛！天下大乱，包括中国嘛！我能吃饭，也能睡觉，所以要打，我最欢迎了。

从一个地方一走，有一派就要起梗子，要贴大字报。这个事情，要好好研究。你要贴，何必贴得那么早呢？比如那个“八三一”、“辽联”，他不要贴你的大字报？你那个出气的人、你不喜欢的那个人都走了，你还贴大字报吗？

互相对调，这个办法就是河南人发起的。这个军分区呆不了，就

调得远一点去,那个军分区就欢迎。从那个军分区调到这里,也欢迎。

我们还有一位李司令,到了没有呢?司令常来常往嘛!如果到那边不顺手,我们也可以商量一下。”

李德生说:“一定顺手!”

毛泽东:“靠不住。你不从坏处着想,单从好处着想。”

谈到听不同意见时,毛泽东说:“老吹不是一个好办法,要少吹多批。”

“有些同志专批人家,人家批他一句都不行,像挖了他三代的祖坟呢!动不动就说人家是‘三反分子’、‘五一六’。真是三反分子也不要紧么,中国人有那么多,有那么几万,几十万坏人,让他去吧,人民会管他们的,有什么要紧。”

“我们这个党不要杀人,包括反革命。保存活证据,不要杀。犯点错误呢,改掉就好。”

“准备打仗!内战外战都来!我还可以打几仗。人家的导弹打几千公里,一个氢弹就把北京消灭了,不过他有个大使馆在这里,也要消灭呢。我估计,他不会打北京。美国打日本,选了两个小城市打,一个广岛,一个长崎,东京、大阪这样的大城市,他不打。

一打来就可以分清,谁是真正愿意打的,谁是勾结外国人,希望自己做皇帝的。”

这时,毛泽东指挥大家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

他说:“步调一致才能得胜利。林彪步调不一致,所以不能胜利。什么大舰队,小舰队。选妃子遍及全国,某一个省就选了300人,这也是共产党干的事呵?!”

“互相对调,这个办法就是河南人发起的。这个军分区呆不了,就调得远一点去,那个军分区就欢迎。那个军分区调到这里,也欢迎。

杨得志同志带一个旅到延安,我才认识他。他是要抓逃兵的。我说逃兵不要抓,他不喜欢在你那里,让他走了算了,如果要抓,请他吃一顿猪肉,因为他不满意嘛。捆绑不能成夫妻嘛,捆绑能够革命嘛?”

他指着邓小平说:“我们现在请了一位总参谋长。他呢,有些人怕他,但是办事比较果断。他一生大概是三七开。你们的老上司,我请回来了,政治局请回来了,不是我一个人请回来的。你呢,人家有点怕

你,我送你两句话,柔中寓刚,棉里藏针。外面和气一点,内部是钢铁公司。过去的缺点,慢慢地改一改吧!”

“不做工作,就不会犯错误,一做工作,总要犯错误的。不做工作本身也是一个错误,那就要当老百姓。那个乡村里头,工厂里头批起来也厉害。动不动就说人家‘三反分子’、‘五一六’。甚至福建李庆霖的那一封信,我看了相当好呵,有人说那里头有刺,就是要有刺呢!我摆在这里几个月,经常看,看了三遍半,这才下决心写回信。辽宁发表了张铁生的一封信,也有人发议论,说是不对的。后头不是在《人民日报》登了吗?也说是不对的。

我看,在北京要把八大学院的教授集中起来,出一批题目,要他们考。他们总是看不起学生。”

毛泽东忽然又换了一个话题。“现在这么多人看不起儿童团,我也是儿童团过来的,你们都是吧。”毛泽东一边说,一边环顾在座诸位:“你们哪个青年时期、十几岁二十几岁就那么高明,我就不信。”

当天,毛泽东圈阅周恩来这天清晨报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情况的报告。

12 月 16 日,中央政治局同武汉军区负责人谈对调问题

12 月 17 日,毛泽东圈阅周恩来、王洪文 12 月 16 日夜报送的关于 15、16 日两次政治局会议讨论八大军区司令员调动情况的报告。

各大军区负责人全部到京。根据安排,由中央政治局成员分别同他们就对调一事谈话。

12 月 18 日,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了毛泽东关于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的提议。

19、20 日两天,政治局成员参加中央军委会议。21 日凌晨 2 时,周恩来、王洪文向毛泽东报送会议的情况报告,决定 21 日休会一天,对调的大军区分四组开会,介绍各自的情况,并协商欢迎、欢送和对各派做工作、打招呼的办法,拟于 22 日开全体会宣布结束会议。

21 日下午,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接见参加中央军委会的 46 位全体高级将领。朱德、周恩来、邓小平、江青等人参加了这次接见。

朱德和毛泽东有几年没见了。朱德走进屋里时,卧在沙发上的毛

泽东想站起来迎迎老战友,但身子已经太沉了。还是朱德快走两步,让毛泽东减免了不少负担。

毛泽东无限感慨,拉着朱德在他左边的沙发坐下,对朱德说:“老总啊,你好吗?你是红司令啊!人家讲你是黑司令,我总是批他们,我不高兴。我说是红司令,红司令。还不是红了吗?”

毛泽东对朱德说:“朱毛啊,你是朱(猪),我是朱(猪)身上的毛。没有朱,哪有毛,朱毛,朱毛,朱在先嘛。”

毛泽东的右首坐着刚复出参加军委工作的邓小平。周恩来、江青等几位政治局委员,依次站在毛泽东的右后侧。王海容站在毛泽东的左后侧,她是给毛泽东当“翻译”:把方言译成普通话。将要调动的八大军区司令员坐在面对毛泽东的前排。

毛泽东简单地讲了几句之后,便与站立在一侧的肖劲光、陈士渠、田维新和马宁4人握手。

他握着海军司令员肖劲光的手问道:“身体好吗?”

又握着工程兵司令员陈士渠的手问:“你还好吗?”

陈士渠立正回答说:“托主席的福,身体还好。”

“你是井冈山时候的,现在井冈山的没有几个人了。现在四方面军的人最多,华北的人最多,井冈山下来的人不多了。”毛泽东感叹了一句。

第三位与毛泽东握手的是总政治部副主任田维新。周恩来向毛泽东介绍说:“这是田维新。”

毛泽东问:“田维新同志,你是哪儿的人啊?”

“山东东阿人。”田维新回答。

“曹植埋在什么地方啊?”毛泽东又问。

“鱼山。”田维新回答。

毛泽东又问:“左边有个湖,是什么湖?”

田维新想了想说:“不是湖,是条河,黄河,从西南流向东北。”

“不,那是湖!”毛泽东以十分肯定的口气说。

“湖?”田维新心里反问自己,他想了一下,说:“嗯,要说湖,那离鱼山还远,是东平湖。”

“噢,那就对罗!”毛泽东考问完毕,话锋一转,说:“总政治部就交

你负责了!”

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总政治部主任李德生以北京军区司令员的身份调任沈阳军区司令员,总政主任一职实际空缺。毛泽东对田维新考问了一番后,说了这句话。

听到毛泽东的话,田维新毫无思想准备,感到很突然。不过他还是很快做出了反应:“德生同志走了,总政就我一个副主任了,让我继续留在总政工作是需要的,请主席派主任。”

“不,就是你负责了!”毛泽东以十分明确的口气说。

田维新说:“我资历、经验都不够,还是请主席派个主任吧!”

毛泽东不再回答,又与跟在田维新后面的空军司令员马宁握手。当马宁向毛泽东报告自己叫马宁时,毛泽东笑着说:

“哎,你姓马,我出个谜语给你猜,答个字吧! 这个字谜是:一个大来,一个小,一个跑来一个跳,一个吃血吃肉,一个吃草。你猜这个谜底是什么啊?”

马宁老实回答说:“我猜不出来。”

毛泽东看了看大家,在座的都没说话。毛泽东笑了笑,又幽默地说:“马(馬)字是王字头下拐个弯,四个磨石稳当当啊!”大家笑了,因为空军司令员不对调。

马宁后来才搞知道谜底,是个“骚”字,发牢骚的“骚”。

毛泽东和与会将领一一握手,几乎和每个人都说了几句话,有的是叙旧,有的问问对方的情况,有的是表露自己的感慨。

当他握着广州军区政委韦国清的手时,不无感慨的说:“老朋友,你不是韦国清吧! 样子变了嘛,胖了嘛。你要多帮助许世友同志。他到那里,人生地不熟啊!”

他同许世友握手时说:“我送你一本书,这本书比较好,叫做《天体运行论》。你到南京紫金山天文台去给我搞一本天文学的书,把字放大一点,放大一倍。”

对成都军区司令员秦基伟说:“你刚到四川吧,所以你不能调呢,刚到的人都不认识。”

对徐向前说:“向前同志,身体还好吗? 你是好人啊。”

对聂荣臻说:“荣臻同志,你是好人啊! 你现在还好吗? 你还记得

会理会议那一段历史,许多同志不知道那段历史。”

毛泽东说的“会理会议”那段历史是指1971年9月26日李富春召集的“老同志座谈会”,聂荣臻在27日、29日两天在会上作的长篇发言,揭发林彪在历史上的错误。其中说道:“三、遵义会议后,在渡金沙江前,林彪埋怨部队尽走“弓背路”(意思是走弯路),写信要求撤销朱德、毛泽东的指挥权,我批评了他的错误,后来他在会理会议上受了批评。”

毛泽东说:“我今天一晚没睡觉,我想看看同志们。你们呢,要交好班呢。有困难啊,人生地不熟。有些人就批你们,大多数呢,舍不得你们走。到一个新地方有很多困难呢,党、政、军、民都不熟。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慢慢来,就会顺手。”

“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一下好,人在一个地方呆长了,油了,不容易接受新鲜事物。对调一下有好处,到处都是干革命。在调动工作上要做好工作,打好招呼,调动要欢迎,不要冷冷清清。冷冷清清不好。要同军长、军政委,师长、师政委见面,包括司政后机关,一二百人见见面,不认识不好,如东北陈锡联,可以带李德生到沈阳军区熟悉熟悉;李德生可以带陈锡联到北京军区熟悉熟悉,相互当场介绍一下。”

毛泽东对李德生说:“你在北京干的时间倒是不那么久。”并开玩笑说,“你家出了个李铁梅,你就是李铁梅,不过你是陪绑的。”

大家都笑了。

毛泽东又风趣地说了两遍:“李德生活到九十九,上帝请你喝烧酒。”

他说:“你陈司令、济南杨、南京许,在一个地方搞得太久了。这个李德生同志,曾思玉同志,丁盛同志,倒是搞得不那么久呢。你们带个头呢,省军区、军分区、人武部就会照样去做。”

他对陈锡联说:“陈锡联,你在沈阳也10多年了。你同李德生对调。”

“李德生,你到沈阳当司令,家就放在北京,就像阿庆嫂唱的,‘司令常来又常往’嘛。”

毛泽东的话,又引来一阵笑。毛泽东接着说:“杨得志你在济南17

年了吧,曾思玉你在武汉也7年了吧,你们两人对调。许世友同志你在南京时间最长,19年了,你同丁盛同志对调。韩先楚同志在福州也是17年了,你同兰州皮定均同志对调。秦基伟在成都才1年,王必成去昆明才两年,这两个大军区就不动了。”

说到丁盛时,毛泽东说:“你到广州不久,把你换换吧”,又说:“你有心脏病,要注意休息。”丁盛有点儿感激流涕,顺从地点了点头。

说到四川的问题,毛泽东说:“不要相信那些屁话!我们在旧社会,国民党的报纸那么多,广播电台天天吹,又没有把我们就变成国民党了嘛。我们还是共产党。现在贴两张大字报,不要紧呢。

总是两面的。你们说了什么四川不行,有些不听话,不听调。这也是常事,养着嘛!有一个能办事的就好了嘛。你们呢,要交好班呢。有困难啊,人生地不熟。有些人就批你们,大多数呢,舍不得你们走呢。”

他对韩先楚说:“我不是跟你讲过嘛,这个世界上这类事啊,心放宽些,胆子壮些。心要宽,胆要大。无非是做官嘛,革命嘛,一个不撤,一个不批吧!你们想一想,总是有些缺点,十个指头有一个指头的缺点。一切错误都是我。我错误大呢,比你们大,所以屡次想辞掉这个主席。‘八大’我还设了一个名誉主席,就是为着我想当个名誉主席,让别人当主席。”“君不见朝歌屠叟辞棘津,八十西来钓渭滨。我正是八十岁,把你们‘钓’到中南海来。”

毛泽东问坐在前排的许世友:“我要你读《红楼梦》,你读了没有?”

“读了。”许世友回答得很干脆。

“读了几遍?”

“一遍。”

“一遍不够,要读三遍。《红楼梦》要看五遍才有发言权呢。他那是把真事隐去,用假语村言写出来,所以有两个人,一名叫甄士隐,一名叫贾雨村。真事不能讲,就是政治斗争。吊膀子这些是掩盖它的。第四回里边有一张‘护官符’,那上面说:贾不假,白玉为堂金作马。阿房宫,三百里,住不下金陵一个史。东海缺少白玉床,龙王来请金陵王。丰年好大‘雪’,珍珠如土金如铁。中国古代小说写得好的是这一

部。最好的一部。创造了好多文学语言呢。”

自从毛泽东要许世友读《红楼梦》以后,在座的高级将领几乎都认真读过这部古典文学名著。但是,无论是做军事工作的,还是做政治工作的,没有谁能大段大段地背诵《红楼梦》。80 高龄的毛泽东的这一番即席背诵,令在座的高级将领人人敬服不已。

他又对许世友说:“你就只讲打仗。你这个人以后搞点文学吧。‘常恨随陆无武,绛灌无文。’”

这段典故出自《晋书·刘元海传》中刘元海说:“常鄙随陆无武,绛灌无文。”毛泽东在这里将“鄙”字改为“恨”字。随、陆、绛、灌分别为汉朝的随何、陆贾、周勃、灌婴。

随何、陆贾,两人都为刘邦身边的文人谋士,他们不会指挥军队打仗。周勃和灌婴,两人都是刘邦得力的武将。周勃系沛人,与刘邦是同乡,靠织草席为生,给人家办丧事时吹吹打打,力气比较大,能挽强弓,但文化水平不高,灌婴是贩帛布出身,这两个人原来的身份地位都不高,但两人都能带兵打仗,作战勇敢。

毛泽东接着问许世友:“你能够看懂《红楼梦》吗?要看五遍。《水浒》不反皇帝,专门反对贪官。后来接受了招安。‘随陆无武,绛灌无文。’绛是说周勃。周勃厚重少文。你这个人也是少文。如果中国出了修正主义,大家要注意啊!”

许世友说:“把它消灭!不怕,那有什么关系!”

毛泽东:“不怕啊?你就作周勃嘛。你去读《红楼梦》吧。

到一个新地方有很多困难呢。不熟人,不熟地方,不熟党,不熟军。党、政、军、民都不熟。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

许世友:“有党,有同志们,可以学习。”

毛泽东:“慢慢来,就会顺手。”

“这个会差不多了吧。明天一天就‘聋子放炮竹’了。”

“聋子放炮竹”是《红楼梦》第五十四回中王熙凤讲的一句歇后语,意思是“散了”。

毛泽东:“还有什么话讲啊?明天开一个大会就散了咯。”

周恩来说:“还要起草一个命令,鼓励大家一下。”

毛泽东:“噢,这个好。你们带个头。底下的政委、参谋长、总部、

省军区、军、军分区,还有什么人武部,人也很多。这个问题不要紧。世界上总是这样的,”他把两只手合起来说:“总有两面。有廉洁必有贪污,有贪污必有廉洁。只有廉洁,没有贪污,也不行啊,那就只有一只手。这个手(举左手)是廉洁,这个手(举右手)是贪污。是对立统一。

我向基辛格讲了差不多三个小时。其实只有一句话:当心!北极熊要整你美国!一整太平洋的舰队,第七舰队,二整欧洲,三整中东。

苏联现在跟我们又在拉关系。最近有个什么文化部的招待会上,他们跟我们驻苏联武官处的人谈话。我们的条件,主要是两条:一要撤兵。撤到赫鲁晓夫时候那样。二要承认错误,从布加勒斯特会议开始。”

他问邓小平:“那次会议你去了吧?”

邓小平说:“那次我没有去,彭真、康生去了。”

毛泽东说:“彭真对于整苏联还是有功的。”

接着,毛泽东又说起党内斗争,说起贺龙、罗瑞卿、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等人。“我看贺龙同志搞错了,我要负责呢。当时我对他讲了:你呢,不同,你是一个方面军的旗帜,要保护你。总理也保护他呢。不过这个人经常身上有武器。”

周恩来:“一支小手枪,后来交了。”

毛泽东:“要翻案呢,不然少了贺龙不好呢。”

“杨、余、傅也翻案呢,都是林彪搞的,我是听了林彪一面之词,所以我犯了错误。小平讲,在上海的时候,对罗瑞卿搞突然袭击,他不满意。我赞成他。也是听了林彪的话,整了罗瑞卿呢。有几次听一面之词,就是不好呢。向同志们作点自我批评呢。SELFCRITICISM(自我批评),自我批评。”

他回过来对朱德说:“红司令,现在没有人骂你了吧!”

朱德:“没有了。”

“那好些了。”毛泽东指着朱德说:“这位同志跟我们一起几十年了。”

朱德:“40 年了。”

毛泽东:“我跟你,40 年了。”他又指着邓小平说:“这位同志也是。

邓小平同志现在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军委委员了。他呢,我喜欢他,有些人有些怕他。打起仗来呢,此人还是一个好人啊!姓邓,名小平。”

周恩来看会见的时间很长了,建议说:“唱个歌吧!”

毛泽东说:“就散了啊!”

接着,由福州军区政委、1958 年将军合唱团的总指挥李志民,指挥大家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唱了第一段,毛泽东说:“不错,就是这一条要紧。还有八项注意,第一注意,第五注意。第一项注意,说话要和气,第五项注意,是军阀作风不要呢!”他又亲自指挥大家唱完了这首歌,大家鼓掌。最后,毛泽东风趣地说:“这个会差不多了吧?明天就‘聋子放爆竹’吧。”

那天毛泽东接见用了 1 小时 20 分钟。朱德回到家里,跟康克清说着说着哭了。

# 第1290回：命令下，八大区对调完成 黄帅信，江西又分为两派

12月22日上午，中央军委会分组讨论，众将领对中央决定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一致表示赞成。

纪登奎与总政副主任田维新正好参加周恩来所在的那个小组讨论。讨论结束时，主管组织工作的纪登奎问周恩来："命令怎么写？"

周恩来指指田维新说："你问田维新。"说完就走了。

纪登奎拉住正要起身离开会议室的田维新说："老田，我没干过军队，不知道命令怎么写？"

田维新说："我也没有经历过调动八个大军区司令员的事。"

"那河北厅议。"纪登奎说。

纪登奎和中央组织部部长郭玉锋等人来到人民大会堂河北厅。看见田维新进来，纪登奎对郭玉峰说："玉峰，咱们老田当主任了，你给他找个副主任吧，就一块儿写在这个命令上。"

郭玉峰愣了一下，过了一会儿才说："副主任得主任找哇。"

田维新马上说："不要写，我哪能当主任呢？"

纪登奎、田维新、郭玉锋他们研究商定，拟出了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命令，但还是经验不足，写了这些司令员的新任职务，却没有免去他们的原职务。

这天下午，政治局开会讨论任免事项。当议到总政主任一职时，周恩来和叶剑英提议田维新任总政治部主任，应该是根据21日毛泽东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时与田维新握手时说"总政治部就交你负责了！"这句话的意思，但江青等人却力主由政治局常委张春桥出任这一职务。此事只好先搁置下来。

12月22日，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正式颁布命令：

为了加强军队建设和反侵略战争的准备；为了使军区主要领导干部交流经验，熟习更多地区的情况，经毛主席、党中央决定，北京与沈

阳、南京与广州、济南与武汉、福州与兰州八个军区司令员相互对调。特此任命：

李德生同志为沈阳军区司令员；

陈锡联同志为北京军区司令员；

许世友同志为广州军区司令员；

丁 盛同志为南京军区司令员；

杨得志同志为武汉军区司令员；

曾思玉同志为济南军区司令员；

韩先楚同志为兰州军区司令员；

皮定均同志为福州军区司令员。

望有关军区党委做好交接、迎送工作，做好军内外各方面的团结工作。上述相互对调的军区司令员，自接到命令之日起于十天内到职。

对调之八大军区司令（上下对应）。左起，上：李德生、杨得志、许世友、韩先楚；下：陈锡联、曾思玉、丁盛、皮定钧。

北京军区司令员李德生，时年57岁，河南新县人。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1970年毛泽东对林彪集团采取“挖墙脚”的办法，改组北京军区。李德生是总政治部主任兼任北京军区司令员，在1973年召

开的党的“十大”会议上,被选为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和中共中央副主席。

陈锡联,时年58岁,湖北省红安县人。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1959年任沈阳军区司令员,已达14年之久。

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得志,时年63岁,湖南省醴陵县人。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1955年任济南军区司令员,已达18年。

曾思玉,时年62岁,江西省信丰县人。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1967年任武汉军区司令员。

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时年68岁,河南省新县人。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出任南京军区司令员,到1973年担任本职务达18年。

丁盛,时年60岁,江西省于都县人。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1968年任广州军区司令员。

福州军区司令员韩先楚,时年60岁,湖北省红安县人。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1957年任福州军区司令员,担任本职达16年。

皮定钧,时年59岁,安徽省金寨县人。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1969年任兰州军区司令员。在任兰州军区司令员以前,他多年在福州军区工作,对东南沿海的情况比较熟悉。

当时全国共11个大军区,就有8个军区的司令员调动。没调动的军区司令员是:成都军区司令员秦基伟、昆明军区司令员王必成、新疆军区司令员杨勇。这3位司令员任职时间都很短。原任大军区司令员的秦基伟,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就没有了职务,1969年10月被疏散到湖南省汉寿县一个农场劳动,犁地、挑粪,一直干到1972年,后来,去长沙治病,又转移到一个疗养所。1973年的一天,身边的人员忽然接到上级通知“不能喊老秦了,要叫首长”。1973年6月,军委领导通知秦基伟到成都军区任司令员。

对调命令宣布当天,李德生便向总政移交了相关工作,随后陪同新任北京军区司令员陈锡联参加了北京军区的干部大会。

26日,在北京军区政委纪登奎的陪同下,李德生只带了一名秘书、一名警卫参谋,和陈锡联、沈阳军区政委曾绍山一道乘飞机前往沈阳。这天,恰逢毛泽东80岁生日。

一向雷厉风行的许世友,也是在宣布完对调命令,就飞往广州

上任。

12 月 23 日,杨得志返回济南,立即召开济南军区党委常委和山东省委常委会议,传达了中央军委的相关指示精神,交接了工作,于 26 日赶往武汉军区就职。12 月 31 日,他提笔给毛主席、党中央、中央军委写了一封信,信中说:“调动一下工作,对于加强部队建设,做好打仗准备,交流经验,不断提高自己,大有好处。我坚决拥护毛主席、党中央的战略决策,坚决执行中央军委的命令。”

与杨得志对调的新任济南军区司令员曾思玉也按照命令要求,在 12 月 31 日之前正式到任履职。临走前,在洪山宾馆召开军队师级以上干部、地方省革委会常委以上干部会议时,曾思玉说:“湖北清查‘北、决、扬’、‘516’搞了几十万,不该斗的斗了,不该批的批了,不该抓的抓了。我心里也很难受。很对不起,这个事情搞错了,向被整的人赔礼道歉。”

临走时,他发现工作人员将几件外宾赠送的礼品打包装车,忙喊人搬了下来。他说:“这是外宾送给武汉军区司令员的,不是送给我的。”

22 日这天,中共中央还下发了关于邓小平参加中央领导工作的通知:

1973.12.22;中发 [1973]44 号

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各大军区、省军区、各野战军党委,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党委,中央、国家机关各部、委领导小组或党的核心小组:

遵照毛主席的提议,中央决定:邓小平同志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参加中央领导工作,待十届二中全会开会时请予追认;邓小平同志为中央军事会委员,参加军委领导工作。

特此通知。

中共中央

一九七三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此通知可下达到县团级党委,并传达到党内外群众)

中共中央办公厅 一九七三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发出

在中央商议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期间,还发生了这样一件事情:

12 月 12 日,《北京日报》刊登了一个小学生的来信和日记摘抄:

《北京日报》编者按:我们热情地向读者推荐海淀区中关村第一小学五年级红小兵黄帅同学(女)的来信和日记摘抄,希望引起大家的讨论。这个十二岁的小学生以反潮流的革命精神,提出了教育革命中的一个大问题,就是在教育战线上,修正主义路线的流毒还远没有肃清,旧的传统观念还是很顽强的。

来信:

我是中关村第一小学五年级二班的学生。9 月听了红卫兵节目报道的兰州十四中学红卫兵帮助老师的事迹,受到启发,随后我给老师写了三篇日记提意见。顿时,师生的关系紧张起来,老师批判我“拆老师的台”、“打击老师威信”、“恶意攻击老师”。我认为,老师是“压制民主”,“打击报复”。这星期班上可热闹了,老师上课的主要任务就是鼓动同学训斥我,我去上课就是准备挨整。老师拍桌瞪眼在班里说:“直到现在,我还是公开号召同学们和黄帅划清界限”,“跟黄帅一起跑的人立场站错了”。班里还出了板报,点名批判我的日记。平时每日换一期,这篇板报老师宣布登一星期,并对板报组表示“感谢”。最近,班里同学在老师的率领下,不断对我嘲笑讽刺,大轰大哄地进行围攻,甚至个别同学提出把我“批倒批臭”的口号。

我是红小兵,热爱党和毛主席,只不过把自己的心里话写在日记上,也表示了日记中是有缺点的,如个别用词不当影响了老师的尊严,可是近两月老师一直抓住不放。最近许多天,我吃不下饭,晚上做梦嚎声惊哭,但是,我没有被压服,一次又一次地提出意见。

究竟我犯了啥严重错误?难道还要我们毛泽东时代的青少年再做旧教育制度“师道尊严”奴役下的奴隶吗?

海淀区中关村第一小学五年级二班学生 黄帅 一九七三年十月二十一日

日记摘抄:

一九七三年九月五日

今天,我班的×××同学犯了错误,当老师问他情况时,他带理不理,不像承认错误的样子。我看他那样,无意识的笑了一笑。老师把我叫起来,批评我不该笑。这点我虚心接受,一定改正。但是老师说:

“有同学反映你和×××……,你内心非常爱听×××骂”。这句话我不能接受。我敢发誓:除了他骂我,我跟他顶嘴以外,我再也没有和他瞎逗过。今天的日记如果错了,请批评指正。

九月七日

今天,××没有遵守课堂纪律,做了些小动作,老师把他叫到前面,说:“我真想拿教鞭敲你的头。”这句话你说得不够确切吧,教鞭是让你来教学,而不是让你用来打同学脑袋的。我觉得你对同学严厉批评很多,耐心帮助较少,拍桌子,瞪眼睛,能解决思想问题吗?希望你对同学的错误耐心帮助,说话多注意些。

九月二十八日

今天,老师批评我不该给他提意见。对不起,以后我有意见,还是要提的。象今天老师骂我装病,这就是唯心主义。×××的椅子丢了,站着上课。算术老师把老师上课时坐的椅子借给×××坐,这种关心同学的精神值得我学习。第三堂课时,你不应该把椅子夺回来自己坐。

十月十三日

今天,××在课上向老师提了意见,老师说是我起的头,说我提意见纯粹是为了拆老师的台,降低老师的威信。同学应该正确接受老师批评,老师应该冷静考虑同学的意见。

十月十八日

今天,老师在全班又批判我。我对老师的意见有些是能够接受的,但不能接受的很多。如“黄帅你也真表帅,从小就表帅,太帅了”,这不是讽刺是什么?你还说:“黄帅从现在起不许打篮球”,……我感到这更是报复行为。

十月十九日

最近我是天天受老师和同学的训,以下就是老师对我批评中的语言:“听校外群众说:中关村一小出了一个反潮流者,好家伙,这事儿都传到社会中去了”;“你在这次斗争中,当不了张铁生那样的人物”;“直到现在我还是号召同学对黄帅的错误要批判,不要跟着她跑,要和她划清界限”;“黄帅你这样折腾,也是没有好结果的”。

12 月 28 日,《人民日报》转载了《北京日报》刊登的黄帅的来信和

日记,加了“编者按”。一时间,全国掀起批判“师道尊严”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高潮。

“九大”以后,随着“一打三反”与抓“516”这两个运动的进行,除上海以外,全国其余各地造反派的骨干分子,包括首都北京在内,都先后被审查。文革初期他们曾被戴上过的“右派”、“黑帮”、“小邓拓”等政治帽子,这时,相当多人又重新以“反革命分子”、“打砸抢坏分子”、“516 分子”的罪名被打入了专政对象的行列。文革中因造反运动而产生的“革命委员会”依然在行使权力,但它的构成,很多地方只剩下了“三结合”中的军队首长与原地方领导干部。

此时,江西的“大联筹”又分裂为以洪都厂万里浪和江拖厂涂烈为首的两派。涂烈的“好个屁”,简称“P 派”;万里浪的“好得很”,简称“好派”。程世清离开后,曾经给毛泽东当过警卫员的陈昌奉任江西省军区司令员,他支持“P 派”。而一些江西地方领导干部支持人多势众“好派”。

1973 年 12 月 25 日,已位至江西省委常委的涂烈给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写信,揭发省委一些领导人“反攻倒算”的行为,列举了江西省委的九个问题,说江西省委有人借着批判林彪及其党羽程世清的时机“来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及其新生事物,否定党的九大路线”。信中点了一些省委领导人的名,说江西省委常委刘俊秀“传播政治谣言”,揭发他在省委的一次老干部会上说“毛主席最近有‘四句话’的指示,即‘打扫庙宇,请进真神,老帅就位,小兵回营’。会后,不少地、县委都传达了,有的单位以此为指导思想来调整领导班子,把文化大革命中上来的新干部‘打扫回营’”。信中还说,有人“捏造毛主席‘四个想不到’的指示,向下传达。传播的大意是:想不到文化大革把老干部整得这样苦,想不到林彪会反对我,想不到××告老还乡、躺倒不干(攻击康生),想不到×××当了政治局委员水平这样低(攻击姚文元同志)”……

12 月 30 日,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商定:通知所调任的各大军区司令员和政治委员均出席年底或元旦军民联欢会,并由新华社公开报道;将毛泽东 12 月中旬以来几次谈话要点下发各省、市、自治区负责人,口头传达至县团级领导干部;在中央政治局内成立读书班,自 1 月

1 日起开始学习毛泽东最近关于外交工作、政治局工作和军委工作的几次谈话,并联系当前实际斗争进行讨论。

1973 年 12 月 31 日,姚文元在《红旗》杂志编辑组召集人会上说:

红楼梦问题,主席讲过多次。主席要许世友同志看五遍。中国古典小说最好的是《红楼梦》。吊膀子是现象,本质是政治斗争,真事隐去,不好讲,恋爱是现象。过去评“红”文章多讲宝黛爱情反封建。争夺厨房,上次请你们读 59、60 回,主席提的。只有从阶级分析观点去看,否则看不出来,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处理阶级关系去看,才能看得懂。

主席指出“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招安,是两条路线斗争妥协的结果,是内部斗争。前半部斗争,是逼上梁上还是妥协投降?革命路线胜利。后半部是招安与反招安的斗争,错误路线胜利,革命失败,最后被搞死。

批孔,写进社论。批孔,苏修也叫,国民党叫得厉害,蒋介石新年文告有一半内容讲这个,反对批孔,如挖了他的祖坟,洪水滔天。国民党精神虚弱极了,不得了了,大叫大喊,说我们几十年搞批孔,五四从批孔起来。

# 第1291回：元旦始，柴春泽的一封信送材料，《林彪与孔孟之道》

1974年元旦，周恩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上，王洪文、江青传达毛泽东关于将他在去年12月21日接见军委会议全体成员谈话记录整理印发各地的意见。会议同意毛泽东的意见。

会后，周恩来与王洪文联名致信毛泽东，汇报政治局会议议定各事，共三件：一、通知新调任的各大军区司令员和政委出席年底或元旦在当地举行的军民联欢会，并由新华社公开报道；二、将毛泽东在12月间的几次谈话要点下发各地各部门，传达到县团级领导干部；三、在政治局内成立读书班，联系当前实际学习毛泽东近来关于外交工作和议政、议军等问题的指示。

“十大”以后，周恩来写给毛泽东的重要报告，都是由周恩来起草后和王洪文共同署名。这次报告也是如此。

次日，毛泽东就关于下发传达毛泽东去年12月几次指示要点通知事批：“没有必要，不要发了。”

1974年元旦，《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社论：《元旦献词》。《元旦献词》中说：“1973年工农业总产值比1972年增长百分之八以上。农业连续12年丰收。粮、棉、麻、糖、烟的产量达到了新的水平。工业生产大幅度增长。钢、钢材、有色金属、原油、电力、木材、机械等重工业产品，棉纱、棉布、化学纤维等轻工业产品，化肥、农药、农机等支农产品，都完成和超额完成了国家计划。”

“在新的一年里，首先，要继续深入搞好批林整风。要继续搞好上层建筑包括各个文化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要抓紧有利时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要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人民解放军要继续学习和执行毛主席的建军路线。”

《元旦献词》中还说：“要继续开展对尊孔反法思想的批判”；“中外反动派和历次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都是尊孔的，批孔是批林的一个

组成部分。”

进驻毛家湾的林彪专案组工作是由纪登奎具体负责。而在林彪的住处发现大量孔孟言论一事,纪登奎却从来没有向毛泽东和政治局报告过。于是江青在政治局会议上质问纪登奎:“为什么不把这些情况报告毛主席和政治局?”

纪登奎解释说:“专案组只负责查林彪集团谋害毛主席和他们的反党罪行,不负责理论问题。再说我只上过小学,哪懂得‘克己复礼’是什么意思。”

在1973年底的一次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批评江青:“你连登奎同志都不能团结,你还能团结谁?你懂什么呀?你懂农业吗?懂工业吗?你应该向登奎同志学习,你应该去蹲点!”

1974年元旦这天,江青亲自到纪登奎家拜访,作自我批评说:“主席批评我了,要我向你学习,我要去蹲点,你给我安排个地方吧!”

1月3日,《人民日报》发表中央党校写作组以唐晓文笔名的文章:《孔子杀少正卯说明了什么?》文章称:“孔子担任了鲁国管理司法、刑狱的司寇,并代行宰相职务。他上台不久,就利用职权,杀了革新派人士、法家的先驱少正卯”。文章认为:“孔子这个没落奴隶主贵族思想家,顽固地站在奴隶主阶级的立场,反对新兴封建势力的任何改革措施”。“主张倒退,搞反革命复辟,梦想阴挡历史的发展,这就是孔子和以他为代表的儒家学说的反动本质”。

1月5日,《人民日报》刊登文章《敢于同旧传统观念决裂的好青年——柴春泽》。《人民日报》的编者按这样写道:“这是下乡知识青年柴春泽给他父亲的复信,很值得一读。这封信,代表了我们的革命小将在思想领域里向老将的挑战:看谁敢于同旧的传统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

柴春泽,原是辽宁省赤峰市红代会副主任。1971年中学毕业后,他申请到风沙大、路途远、环境比较艰苦的翁牛特旗插队落户。半年后,农村青年点出现了一股“转点风”,他的父亲,一位194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八路军武工队队长,当时正在赤峰平庄矿务局当工作的老干部,也动员他转回赤峰县。柴春泽给父亲回信说:“爸爸,我是响应毛主席的指示来到农村的,您是一个具有二十七年党龄的共产党员,

我建议您考虑一下您的意见是否符合党的利益。”

不久,父亲来信做了自我批评,支持儿子扎根农村的决心。柴春泽感到很高兴,在农村干得更加出色了。

1973 年 8 月 31 日,已担任大队党支部副书记、公社党委副书记的柴春泽,刚刚参加完昭乌达盟团委召开的全盟号召全盟知青学习吴献忠有线广播大会回到知青点,就看到父亲的一封信。信封上还盖着印章,显然信中有秘密。知青们都用疑惑的眼光看着他。柴春泽想:“也许他们知道了信中的内容。”打开一看,原来是父亲告诉他有一个招工的机会,让柴春泽服从他和煤炭局的意见,准备招工回城。

按照当时的政策,知青插队两年以后就可以参加招工招生,所以,1973 年,在父亲想把柴春泽办回城里当工人,

柴春泽兄弟姐妹 5 个,他是老大,母亲因为身体不好辞职后,全家就靠父亲一个人的工资生活,日子过得比较紧,期间还有欠债需要还。父亲的想法是要柴春泽尽早地工作,减轻家里的负担。

怎么办?柴春泽刚刚作为知青代表在全盟知青学习吴献忠有线广播大会上发言。

吴献忠原是抚顺市第八中学品学兼优的学生,能歌善舞,是班干部、校革委会副主任。1968 年,她到辽宁省黑山县耿屯插队,并把名字“吴风琴”改为“吴献忠”

1970 年秋天,国家开始在“知青”中招工,耿屯队推荐吴献忠。她回答得很干脆:“我不走!”没有去参加招工评议会。有人不理解,说她眼界高,准备上大学。

不久,有大学招生名额下来,全体“知青”又异口同声推荐她,可她又把学习的机会让给了别的同学,说:“我愿意留在农村。”

后来,北大、清华这样的名牌大学也来招生,县、社领导根据村民的强烈呼吁,把吴献忠推荐上去。除了还差她的个人申请书外,已为她办好了入学的其他所有手续。尽管这样,吴献忠还是没有走。她在日记里写下这样的誓言:“铁下一条心,扎根在农村,甘愿吃尽天下苦,乐把青春献人民。”

吴献忠连着 9 个春节没回家跟亲人团聚,调她去市、县做专职团委书记她也不去。她曾说:“如果有人把农村比做荒山,把城市比做花

园,那么,我愿做荒山的开拓者,决不做花园的享乐人。”她的这一誓言一时间成为当时全国“知青”中最响亮、最有号召力的口号之一。自然,她也成为了“知青”典型中最突出的一个。随着事迹见诸全国各大报刊,随着名气越来越大,她获得的荣誉也越来越多。于是,她穿着农田鞋,穿着打补丁的衣裤,作为辽宁省“知青”的惟一代表,到北京参加党的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时,她已是耿屯党支部书记。

柴春泽在学习吴献忠有线广播大会上发言时表了决心,提出“扎根农村奋斗60年”的口号,难道现在就背弃誓言,招工回城?

柴春泽很不平静,觉得父亲思想上的反复,在一些家长中间很有代表性。为使知青点的同学相信我扎根农村决心是真的,他主持召开全点知青大会,在会上公布了他和父亲的通信。

柴春泽在9月2日给他父亲的回信中写道:

“敬爱的爸爸:

您好,近来工作一定很忙吧!八月二十日来信已于八月三十一日上午收到。爸爸,看完您这封信后,我心情不平静的程度简直无法形容。在党的培养教育下,在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下,特别是最近学习吴献忠同志先进思想和先进事迹以来,我脑子里所想到的是如何为共产主义在农村广阔天地奋斗终生的问题。同是一个党领导,同是一个阳光照,同在农村干革命,同奔共产主义大目标,吴献忠做到的,我为什么没做到?做为一个共产党员,我感到问心有愧。因此,我最近发下誓言:

向前看——共产主义金光闪。

途无限,扎根农村争取奋斗六十年!

向前看——征途仍然有艰险。

讲路线,建设农村不获胜利心不甘!

向前看——世界风云在变幻。

立大志,誓为全球红遍决裂旧观念。

爸爸,这是我发自内心的誓言,是我向敬爱的党,向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表达的真诚心愿。”

念完信,柴春泽说,“这封信我不发,请团支部书记刘惠贤同志去邮局发。”

知青们都惊呆了。

“柴春泽是不是疯了?”女知青刘英说。

会后,刘惠贤照办了。

柴春泽的父亲没有回信,他很生气,把柴春泽的信团巴团巴塞到炕底下了。

不久,辽宁省知青办派人来昭盟调查知青工作,从筹备全盟知青会的工作人员那里了解到柴春泽的情况。

“柴春泽是昭盟的吴献忠啊!”省知青办的人说。

11 月,旗、盟召开知青代表会议,会议安排柴春泽在大会上发言时,建议他讲一下和父亲通信的事儿。柴春泽在会上全文念了他父亲的来信和他自己的回信,反响很大。当时,上海、北京等地知青慰问团成员也参加了大会,一些代表要求印发柴春泽和他父亲的通信。

《辽宁日报》驻赤峰记者站记者陈连仲、金敬芝把此事写了内参,新华社记者也写了内参。

很快,《昭乌达报》刊发了中共昭乌达盟委通知,号召学习柴春泽给父亲的回信。

“这不把他父亲毁了吗?!”《昭乌达报》的一位干部在刊发此事的文章时说。

接着,《辽宁日报》头版以《小将的挑战》为通栏标题,刊发了柴春泽和父亲的通信。

1974 年初,辽宁团省委召开“学习吴献忠座谈会”,当时的辽宁省领导毛远新、李伯秋在座谈会上讲话,对柴春泽表示支持。

时任省委书记的李伯秋说:“黄帅出来把老师吓一跳,张铁生出来把教授吓一跳,柴春泽出来把老干部吓一跳。”

毛远新则对参加会议的柴春泽说:“柴春泽,你现在还没有发言权,在下面干三、五年就有发言权了……”

再说北大、清华批林批孔材料小组在 1973 年 10 月成立后,首先将清华大学在此之前搞的材料看了一下,觉得就几条,确实很单薄,所以提出要到毛家湾进一步发掘材料。他们向迟群、谢静宜报告后,得到

了批准。很快,一个面包车拉着他们去了毛家湾。

10 月中旬,他们第二次去毛家湾,在一个瓷缸里发现了很多条幅。其中一条是林彪写给叶群的:“悠悠万世,唯此为大,克己复礼”,还有叶群又回赠林彪的:“悠悠万事,唯此为大,克己复礼。”大家看了很高兴,因为杨荣国的文章已经提出,孔子的“复礼”就是恢复周礼,就是复辟西周腐朽的奴隶制,也就是复辟。北京大学的周一良、国文大师魏建功立即指出:“克己复礼”就是孔子思想的核心。大家认为,林彪尊孔思想在此已暴露无遗。此外,他们还看到林彪的笔记本上记有孔子的“小不忍则乱大谋”的警句。

1973 年 12 月,北大、清华批林批孔材料小组第三次到毛家湾,查找叶群书上的批语,发现有问题的,即抄录在卡片上。

经过一个多月日夜苦战,他们根据在毛家湾收集到的材料,编写出《林彪与孔孟之道》。

毛泽东看了批林批孔材料小组从毛家湾整理的许多材料后,对谢静宜说:“你们两边对照起来搞材料。”即将林彪的言论和孔子的言论对照着整理。

于是,1974 年 1 月,他们又到林彪住处核对《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所引用的原文,将材料对照起来以后,分几个标题加写了按语。

在编写过程中怎么定题目,采取什么方式,领导都有指示,批林批孔材料小组都是根据领导的指示组织编写的。实际上是毛泽东通过谢静宜,一直指导此事的实施。

这份材料仍然定名为《林彪与孔孟之道》。

材料编好后,江青和王洪文于 1974 年 1 月 12 日致函毛泽东,提出向全国分发这份材料:

主席:

我们看了北大和清华汇编的《林彪与孔孟之道》这份材料,觉得对当前的批孔有很大帮助。各地也迫切需要有这种简要的材料。我们提议,可否转发各省、市、自治区、各军兵种、各大总部、国务院各部,作为当前批林批孔的参考。现将材料呈上,妥否,请批示。

王洪文 江青 JY

一九七四年元月十二日

附上“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汇编的《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建议以中共中央名义转发全党。

毛泽东对王洪文、江青报送的《林彪与孔孟之道》批示:“同意转发。”

第二天,1 月 13 日,江青看到《解放军报》内部参考上刊登的关于 20 军军直防化连在批孔问题上的反映后,亲自给防化连写了信:

二十军防化连的全体同志,当我看到军报《内参》上有关同志们在批孔问题上有困难时,我正好收到了北大、清华汇编的《林彪与孔孟之道》和《名词解释》,这两个材料对你们会有帮助的。请谢静宜和迟群同志到你们那里宣讲,并送去二百份供批林批孔参考,有什么问题,可请谢迟两位同志转告我。

江青一月十三日

附送:

1.《五四以来反动派、封建地主阶级学者尊孔复古文章摘录》;

2.《秦王朝建立过程中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

3.《孔子是“全民教育家”吗?》;

4.《孔子的中庸之道是反对社会变革的》;

5.《读柳宗元的(封建论)》。

接着,江青又先后给空军司令员马宁、国务院文化组负责人吴德写信,送材料。

江青给空军司令员马宁的信中写道:

马宁同志:

听说,空军批林批孔有些困难,请苏元(延)勋同志送上《林彪与孔孟之道》、《五四以来反动派、地主资产阶级学者尊孔复古言论摘录》各 100 本,可能有助于批林批孔。苏元(延)勋同志一向受林彪死党吴法宪的压制,“九·一三”以后才引起大家重视,托他去传达,请指定一个连队,请苏元(延)勋同志参加座谈,有什么问题和意见,请告苏元(延)勋同志转告我。

江青

1974 年 1 月 13 日

苏元勋就是苏延勋，是谢静宜的爱人，在空军机要部门工作。“913”前曾被关进了监狱。“913”以后才受到了重视。

江青给国务院文化组负责人吴德的信是：

吴德同志：

我请谢静宜和迟群同志代我向你们问候春节好，此外，请他们带去北大、清华汇编的《林彪与孔孟之道》二百份《历代反动派、封建地主、资产阶级学者尊孔复古文章摘录》和《名词解释》各20份，材料不够，可翻印，我希望文化组的批林批孔运动能开展、深入下去，开花结果。

江青一月十三日

当天，江青把迟群、谢静宜等人找去，派他们分别到军委总部、海军、空军等单位送材料，并对他们说：“现在就把你们当炮弹放出去，去放炮。”

# 第1292回：抓试点，邬吉成赶紧落实 王洪文，谈当前存在问题

1月14日凌晨3时30分，负责钓鱼台警卫工作的中央警卫团副团长邬吉成突然接到江青警卫员姜宝元打来的电话，说江青要他马上到17号楼小礼堂。

邬吉成摸黑赶到那里。江青一见面就说："由于你有点自我批评精神，现在给你一点工作。"

江青说邬吉成"有点自我批评精神"，是指一年多前邬吉成随江青赴广州时，参加了广州军区领导的一次宴请。为此，江青让他做了检查。

接着，江青问道："担任钓鱼台外围的是哪个部队？"

邬吉成答："是北京卫戍区的警卫1师。"

江青又问："38军离钓鱼台最近的连队是哪一个？"

邬吉成说："这我不知道。"

"这样吧，"江青说，"我找人了解一下再告诉你。你准备带上两个有点文字水平、能记录的人，把批林批孔的材料送到连队去。"

她说："我们在毛家湾林彪的住所里清理罪证时，发现林彪写的许多条幅，都是抄的孔子的言论，他是孔老二的徒子徒孙。鉴于这一现象，我们要把林彪和孔老二联系在一起进行批判。所以我要你把这个材料送给基层连队，要让干部、战士们学习讨论，看有些什么反映。"

后来她又说："你还是带上几个记者去吧。"

邬吉成一听江青布置的这个任务，赶紧说："这个事我搞不了呵，我可是个大老粗，文化水平低呵。"

江青马上打断了邬吉成的话说："粗没关系呵，按我说的去做嘛，你可以先学习嘛。你不要胆小，这可是主席批准了的。"

"我不是这个意思，非要主席批准。我们是执行任务的，你批准了也行啊。不过我不一定能承担这个重任，这是一；第二，我还得就此事

向上面报告一下才行。”

江青说:“可以呀,你给汪东兴打电话,或者我给他打。这个材料是我抓的,我也要向他讲的。”

邬吉成顺水推舟,还是让江青给汪东兴打了电话。

1 月 15 日,谢静宜、迟群二人按照江青的指示来到南京军区 20 军,连夜向该军防化连全体干部、战士宣读了江青的信,并转交了江青送给他们的学习材料。

南京军区党委接到 20 军报告后,也连夜派人赶往防化连,于第二天,1 月 16 日来到防化连,请谢静宜、迟群二人转达他们对江青的感谢,并说:南京军区组织军区党委进行了认真的讨论。

1 月 15 日当晚,江青在北京召集新华社的负责人朱穆之、《人民日报》的负责人鲁瑛开会说送材料的事,提出这两家新闻单位也要派记者去。

开完会,邬吉成就依照凡事及时请示汇报的惯例,到中南海南楼向汪东兴报告了江青要他送“批林批孔”材料的事。

汪东兴对邬吉成说,江青已经给他打电话了,他让邬吉成先按江青说的去办。

江青选中送材料的连队,一个是北京卫戍区警卫 1 师 1 团的 6 连,就是驻京西宾馆的那个连;一个是北京军区 38 军 113 师 338 团的 8 连。邬吉成在去北京卫戍区 6 连前,先通过汪东兴给北京卫戍区司令吴忠打了招呼。

1 月 16 日,邬吉成和中央警卫局警卫二科的江涛来到警卫 1 师,向师长田占魁交代了江青要在连队搞“批林批孔”试点的情况。田占魁说已经接到了吴忠的指示,他们将组成有师、团负责人参加的试点小组,由师佟副政委牵头,准备于 1 月 17 日进驻警卫 1 师 1 团 6 连。

随后,他们一起到了 6 连,把江青搞试点的情况又在连队说了一遍。以后的 4 天里,由邬吉成和佟副政委分几次宣读了批林批孔的材料,即 1 月 18 日下发的 1974 年中央一号文件。办完了宣读之事,邬吉成和江涛就离开了警卫 1 师,而和他们一起去的《人民日报》记者杨杨,仍留在 6 连,了解试点“批林批孔”的情况。

1 月 18 日,中共中央下发中发[1974]1 号文件《中共中央通知及

附件》,即《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

毛主席批示:同意转发。

中共中央通知

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各大军区、各省军区、各野战军党委,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党委,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委领导小组或党的核心小组:

现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选编的《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发给你们,供批林、批孔时的参考。

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两面派、叛徒、卖国贼林彪,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孔老二的信徒。他和历代行将灭亡的反动派一样,尊孔反法,攻击秦始皇,把孔孟之道作为阴谋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的反动思想武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选编的这个材料,对于继续深入批林,批判林彪路线的极右实质,对于继续开展对尊孔反法思想的批判,对于加强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会有很大帮助。

这个材料的传达方法,请你们按照中发[1972]3号文件的范围,结合本地区、本单位的实际情况进行。传达以前你们要首先学习讨论,进行试点,训练骨干。

1月21日,邬吉成等人又赶赴驻扎在位于北京西南38公里处房山窦店村的38军113师338团8连。这里是江青亲自找纪登奎联系办的,因为当时纪登奎兼着北京军区的政委。和邬吉成他们一起来到8连的是北京军区政治部副主任李宣化。

1974年1月14日,王洪文在中央读书班作报告,谈到了“三个正确对待”,即“正确对待文革、正确对待群众、正确对待运动”。他说:

“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问题,给大家吹一吹,最近接触一些情况,有些省老大难解决不了,主要是路线没有搞对头,有些地方嘛,除少数坏人外,多数是领导人的路线没有搞对头,主要是没有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没有正确对待群众,没有正确对待运动。初期的冲击,如四川十二个厂的问题,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这个问题带有普遍性,今天吹一下,希望起这个作用,就是大家能把毛主席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的指示重温一下。同志们正在学习毛主席最近五次指示的重点,学习中央两报一刊元旦社论,这个问题已经涉及到了。抽点时

间学习讨论一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问题,很有必要。”

他首先讲“为什么要正确认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意义”,他说:“因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关系到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一件大事。”他回顾了文革的历程和毛泽东关于文革的一系列指示后说:“为什么讲这么一番?因为现在党内有些同志不理解”。

他接着又讲了当时党内一些人对文革的态度:“在我们队伍内部,包括党内外,有的同志直到今天对文化大革命还像七、八年前那样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有的甚至颠倒是非,混淆黑白;个别的甚至把文化大革命描绘得一团漆黑,简直像洪水猛兽一样;有的说,一搞文化大革命就毛骨悚然。十大党章中,党的决议中说,文化大革命以后还是要进行多次;有的说文化大革命是完全没有必要的,今后也不要再搞了。特别是高中级干部,说法是各式各样。有的说‘文化大革命在全国取得了伟大胜利,但是在我们这里看不到。’意思是说在这里看不到,在那里看不到,加在一起全国看不到,那还有什么必要呢?”

他谈到文革前修正主义的影响:“有的地方修正主义路线是相当厉害的,如旧中宣部,中组部,两个重要的部都不在我们手里。不要说被资产阶级专了多年政的文化战线了,就拿工业战线来说,修正主义路线影响还很深的。文化大革命以后就好得多了。专家治厂,管、(卡)、压、洋奴哲学,这一套不扔掉,工人阶级怎么成为工厂的主人呢?”

关于当前,王洪文说:“现在有些省市个别单位,关键是领导问题,不能怪群众,不能说群众不好。当然不是说那些都是坏人,有些是好人,但思想上是修正主义的,资本主义的,一旦把问题指出来,这些同志是会改正的。”“有些人不分青红皂白,有一些单位的坏事归罪于文化大革命,或者说是文化大革命的后遗症,这是错误的。这本来是修正主义的后遗症,怎么能说成文化大革命的后遗症?”“当然我们不否认个别单位有坏人捣乱,这也要发动群众才能把坏人孤立起来。把这些问题说成文化大革命的后遗症,实际上就是要把文化大革命以前的那一套搬出来,那就是越搞越乱。江西省就有人在干部会议上传达反革命谣言:‘打扫庙宇,请进真神,老帅归位,小兵回营’;把小兵全打下

去。最近看到一个电报,现在小兵都造反了,搞两个头头,弄得‘不亦乐乎’。压而不服,这是一条真理。我同江西的一些同志说过,你们那是要翻文化大革命的案。”

“还有人说,文化大革命好是好,但形式是不是非要这样搞?就是说不能搞四大,不能搞‘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他们不主张亿万革命群众,不主张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夺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无非是这么个问题。因为否定了这些,就否定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有些人说文化大革命群众不听话,动不动就贴大字报,开会七嘴八舌;这很对嘛!其实这是文化大革命带来的一个胜利。”

“群众起来搞‘四大’反潮流,我们应该赞成,为什么要害怕呢?只有搞修正主义的人才害怕搞‘四大’,凡是搞马列主义的,就应该支持革命群众的革命造反精神。”

“有人说:‘老干部过去南征北战,文化大革命七斗八斗’。这句话不对,而且也不符合老干部的心愿;应当说,老干部是我们党的宝贵财富,他们过去南征北战,有的受过伤,他们并不因此就认为自己可以脱离群众,就认为自己可以摆官架子,而是积极投入到文化大革命去,发现自己有缺点错误,就作自我批评,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立了功。这样的老干部不是一个、两个而是一大批。这才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真正的代表。至于说有的干部在文化大革命中受的冲击较多,这是要具体分析的。毛主席在视察三大区时说:‘有的干部为什么会受到群众的批判斗争呢?一个是执行了资产阶级的反动路线,群众有气,一个是官做大了,薪水多了,自以为了不起,就摆架子,有事不同群众商量,不平等对人,不民主,喜欢训人、骂人,严重脱离群众,这样群众就有意见,平时没有机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爆发了;一爆发就不得了,弄得他们很狼狈。’像毛主席指出的这些人,就不可以批判一下吗?你可以训人家,群众为什么就不可以批评你一下呢?”

“还有一种人,……对群众的冲击,总是耿耿于怀,解放了、上台了、一有机会就想整群众,江西省的干部就是如此。这样整的结果,想必会整到自己的头上;‘三气’不改总是要摔跤的,这个问题不解决,现在解放了将来还得被打倒。”

“有人说:‘文化大革命被揪斗,账总是要还的,不拿利息就不错了,出口气有什么不可以?’我们要向这样的同志大喝一声,太危险了,人民群众欠了你什么账呢?毛主席说:‘我们的权力是谁给的,是工人阶级给的,是贫下中农给的,是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广大劳动人民给的。我们代表了无产阶级,代表了人民群众,打倒了人民的敌人,人民就拥护我们。’‘共产党最基本的一条,就是直接依靠广大革命人民群众。’要是一定要向人民群众讨账的话,群众就有权再把你的权夺回来。”

“还有一种倾向,认为林彪的修正主义路线是极‘左’实质;其实林彪的修正主义路线的实质是极右,而不是极‘左’,右得不能再右了。但不久有个大学有人说:‘极左不批,是非不明’。最大的证明,是所谓17年的功过,谁人评说?已经评过了,文化大革命那么多大字报已经评过了,中央下发的《教育工作会议纪要》也早就评过了。就是说,教育战线上17年基本没有执行毛主席的路线,被修正主义专政了。”

“现在有人说这个《纪要》不灵了,说这个《纪要》是极‘左’思潮的产物,把这些话到处传。对某些人来说,批极‘左’、批林彪是假的,批文化大革命才是真的。”

“‘打扫庙宇,请进真神,老帅归位,小兵回营’,要害是后边两句,‘老帅归位,小兵回营’。不管什么叛徒、特务、走资派、统统都归位,包括刘少奇也要请回来,文化大革命新生事物要统统打下去。这是典型的复旧,或者说是复辟,也可以说是反攻倒算。这个谣言是从部队里的两个高级干部那里传出来的。”

“像刘少奇的反革命谣言,江西省当作毛主席的指示,在几百万人的干部会上传达,这些事情也不怪,原因在于我们的一些干部头脑里存在着谣言市场,谣言到手,立即贩卖,因此从阶级观点来看,就不奇怪。”

“培养接班人的问题,地方上的阻力还小些,军队阻力大些,我就主张找一个30多岁左右的人担任大军区司令员。”

“关于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究竟是好得很呢?还是糟得很?这个争论由来已久,可以贯穿文化大革命的全部过程。……二中全会以来有一股右倾思潮在各地时隐时现,如新疆的龙书金、四川的梁陈、

河南的干部都是这样的人物。他们转移批林斗争的大方向,企图对文化大革命进行反攻倒算。这种做法实际上是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是斗争的继续,这种斗争今后还会有。毛主席最近说:对‘文化大革命的问题,还要看十年’。这就是提醒我们要有长期斗争的思想准备。同志们最近看批林批孔文章,说秦始皇搞一种剥削制度代替另一种剥削制度的革命,被骂了两千年,何况我们的文化大革命呢?肯定有人要骂,有准备十年几十年以后还有人要骂,还有人出来为刘少奇、林彪翻案。孔子死了几千年了,还有人崇拜,秦始皇当时还是革命的,结果被人骂了二千年。”

“在我们一些同志的头脑中,不是把文化大革命看成是解放以来阶级斗争的必然结果,而好像是青天霹雳一样,一个早晨爆发的,甚至有人把文化大革命说成是一场大误会,非常反动。他们有套说法:‘老干部回岗位,新干部回单位,支左人员回部队,文化大革命是场大误会’。”

“今后出修正主义,还是在上层建筑领域。”

# 第1293回：占岛屿，南越军舰进西沙 弱打强，中国海战获全胜

从1973年8月份起，南越海军开始侵占中国南沙群岛的一些岛屿，并在西沙海域冲撞中国渔船，甚至抓捕中国渔民。1974年1月11日，中国外交部发表声明指出，南沙群岛、西沙群岛、中沙群岛和东沙群岛，历来就是中国领土，中华人民共和国对于这些岛屿，具有无可争辩的主权。在中国外交部发表声明以后的第4天，也就是1月15日上午，南越16号军舰《李常杰号》入侵西沙海域。

这天，中国南海渔业公司407船的船长杨贵正带领着两条渔船在甘泉岛附近捕鱼，南越16号军舰《李常杰号》突然出现。

吃水3000多吨《李常杰号》冲向吃水只有300吨的407渔船，将407渔船上的照明灯、航行灯和左舷网板全都撞坏。尽管渔民们出海都配备了武器，但他们还是忍住没有拿出来。并不是因为害怕，也不是讲究策略，而是因为他们觉得应该执行党中央的号召，坚决不打第一枪。

接下来，南越的士兵和中国的渔民在海上开始了对骂，什么语言都有：广东话、越南话、普通话统统都出来了。

南越士兵说这地方是他的，让中国渔民滚开……

中国渔民说："我们祖祖辈辈在这里打鱼、生活，这里都是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割的领土、领岛，我们有权在这里生产！"

第二天，1月16日，南越的4号军舰，《陈庆瑜号》也赶来与《李常杰号》会合。《陈庆瑜号》一到现场，就轰隆隆放下橡皮艇，往中国渔船上靠，渔船上的渔民一看，赶紧拿出枪堵着，警告他们说："你爬上来我就干你！"

南越橡皮艇见状，吓得只好在那里兜转、兜转，最后还是灰溜溜的回去了。

当晚19时30分，中国南海舰队奉命派出271、274两艘猎潜艇组

成编队,前往西沙群岛。几个小时以后,389 舰也接到命令,与另一艘扫雷舰 396 舰一起,组成编队前往增援。389 舰出发时接到的命令是:提供支援和运送给养。389 舰上人员中有相当一部分是新兵,前主炮当时参战 6 个人,其中有 3 个是新兵,有的战士上舰才一个多月。对于其中很多战士来说,这是他们生平第一次出海。

1 月 17 日的北京,寒气逼人。上午 10 时,工作了整整一个通宵的毛泽东尚未起床,一份报告已经摆上了他的案头。

这份报告是周恩来、叶剑英签送的,报告了近一个时期以来,南越军队在西沙永乐群岛海域侵犯中国主权的事件愈演愈烈……同时,针对南越军队的入侵行径,提出了应当采取的对策,即通过加强巡逻及其他相应军事措施,保卫西沙群岛!

毛泽东起床后,看了这份报告。

中国南海诸岛,共有岛、礁、沙滩 200 多个,分东沙、西沙、中沙和南沙四大群岛。西沙群岛位于海南岛东南约 330 公里处,由宣德、永乐两个岛群和其他岛礁组成,总面积约 10 平方公里。其中,宣德群岛由永兴、赵述和石岛、东岛、北岛及南岛组成,永兴岛面积最大(约 1.85 平方公里),是西沙的主岛。永乐群岛由甘泉、珊瑚、金银、琛航和晋卿等岛屿组成。这里,不仅是中国与东南亚各国海上交通必经之地,也是通向非洲、欧洲和大洋洲的重要航道。这些岛屿自然资源极其丰富,不仅盛产海参、海龟、燕窝、海藻及其他各种鱼类,是中国的优良渔港,而且还蕴藏着极为丰富的石油、天然气和其他矿物资源,有“第二个波斯湾”之称。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都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西沙群岛和东沙、中沙和南沙一样,是中国人最早发现、开发和经营的。早在 2000 多年前的秦代,中国造船技术就已达到一定水平;汉武帝时,便发现了西沙和南沙两大群岛,尔后便开始在这里开发经营。宋代时,中国将指南针应用于航海,使船舶能横跨大洋,从此开始了对这两个群岛的有效管辖。明代时,从 1405 年(永乐三年)到 1433 年(宣德八年),大航海家郑和曾率数万人“七下西洋”,并在这两大群岛上竖旗立石,一一命名。现在西沙群岛的“永乐”、“宣德”,就是那时命名的。

郑和遍历西沙群岛,比哥伦布发现美洲早了几十年。至于达伽马

发现好望角,麦哲伦绕地球航行,那更是以后的事了。因此,“西沙自古属中国”,中国人世世代代在那里捕捞、创业,留下了许多名胜古迹。只是到了近代,西方列强屡屡从海上践踏中华文明,使中国一度呈现出“有海无防”状态,二战前西沙曾被日、法帝国主义侵占,但战后即已归还中国。中国从来就没有放弃过对西沙的主权。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政府多次发表声明,一再表明中国对南海诸岛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西沙和其他三个群岛均为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一事实和立场,不仅受到世界各国的尊重和接受,而且得到包括越南民主共和国在内的世界各国和国际组织的承认。1974年,越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普通学校九年级地理教材,明确写道:“……从南沙、西沙各岛到海南岛、台湾岛、澎湖列岛、舟山群岛……这些岛屿呈弓形状,构成了保卫中国大陆的一座‘长城’。”书中地图清楚标明,西沙、南沙等岛屿都是属于中国领土。

然而,南越当局却无视这些历史事实。南越政权自“越南战争”爆发不久,即50年代后期起,便在美国支持和纵容下开始对中国提出领土要求,并先后派军队侵入中国西沙群岛中的一些岛屿,在岛上竖起所谓“主权碑”。但在中国政府多次严正声明、严厉警告和世界公正舆论的压力下,南越军队不得不一度从它非法占领的甘泉、琛航、金银三岛撤了出去,只在珊瑚岛上滞留了一个排的兵力。从1959年3月17日起,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中国海军舰艇部队开赴西沙海域,开始对西沙群岛执行巡逻任务。

1973年,“越南战争”进入尾声,此时美国急于从越战“泥沼”中脱身。但南越当局为了拖住美国,不断加紧在中国南海海域屡屡制造事端。据统计,至这年8月底,南越军队已侵占中国南沙和西沙群岛中的6个岛屿。同年冬,南越军舰还接连在西沙海域野蛮撞毁中国渔船,抓捕中国渔民。虽然中国外交部于1974年1月11日奉命发表声明,对南越的侵略提出严正警告,但南越当局置中国政府声明于不顾,依然于1月15日,先后派出海军驱逐舰《陈庆瑜》号、《陈平重》号、《李常杰》号和护航舰《怒涛》号,再次侵入中国西沙永乐群岛海域,对从事生产作业的中国南海渔业公司402号、407号渔船挑衅,并向飘着中国国旗的甘泉岛开炮射击,打死打伤中国渔民和民兵多人。对此,中国

政府作出何种反应,对于遏制南越当局及中国周边国家形形色色的霸权主义和扩张主义,都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

毛泽东拿起笔,在周恩来、叶剑英呈送的报告上批下两个字:“同意!”

1 月 17 日上午,南越军队在金银岛登陆,下午占领了甘泉岛,紧接着他们的指挥官何文锷也出动了。

何文锷大校 1935 年出生在越南北方。他的父亲因为被北越方面投入监狱而死,他就和他的姐妹逃到了越南南方。年轻的何文锷,先是进入一所商船学校学习,后来被招进了位于芽莊的南越海军培训中心,由于表现突出,最后被送到美国去进行各种训练,然后从小型的炮艇的艇长,登陆舰的舰长,最后是在 1974 年,担任巡洋舰驱逐舰的司令。

越南将中国的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分别叫做黄沙和长沙。他们的一些国民认为这两个岛屿是越南的领土。

早在 1973 年的夏天,何文锷指挥南越海军进行了一场代号为“陈兴道 22”的作战行动,占领了中国南沙群岛的几个岛屿。

那时中国整个的战略布局比较重视北边和东边,南海这边是被当成战略后方。当时从苏联买来四艘“鞍山级”的驱逐舰,全在北海舰队,在东海舰队也有国民党海军遗留下来的护卫舰和鱼雷快艇大队。南海舰队的护卫舰虽然有几艘,可是年久失修。剩下的就是吨位很小的扫雷舰和猎潜艇。

经毛泽东批示同意后,1974 年 1 月 17 日,正在中国南海海域执行巡逻任务的中国南海舰队的舰艇部队,按照中央军委的命令,协同海南军区派出的武装民兵,进驻西沙群岛的晋卿、琛航和广金三岛。

与此同时,周恩来亲自打电话给总参作战部,详细询问了西沙群岛情况和有无构筑工事的条件,随后又亲笔修改作战部代军委起草的、批复广州军区关于调动使用兵力的方案。

17 日 20 时,周恩来在北京主持召开有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和有关方面负责人参加的西沙群岛问题会议。会后已是深夜,应该是 18 日凌晨,周恩来又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并提议中央军委成立以叶剑英牵头,由王洪文、张春桥、邓小平、陈锡联参加的 5 人小组,讨论和

处理军委大事及紧急作战事项。稍后,他便与王洪文一起联名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再次表示同意。

此时,根据中央军委命令,广州军区已命令南海舰队广州基地扫雷舰队10大队396、389号舰和榆林基地猎潜艇73大队271、274号艇,进至西沙永乐群岛附近海域执行巡逻任务,并派4个武装民兵排分别进驻晋卿、琛航、广金三岛。

与此同时,猎潜艇第74大队281、282号艇也驶抵西沙永兴岛附近执行支援任务;同时命令南海舰队航空兵22团派两架飞机,在永乐群岛上空侦察巡逻,并命令广州军区空军再派一部分兵力进行增援。就这样,一场捍卫祖国尊严、保卫祖国神圣领土主权不受侵犯的西沙之战,悄然地拉开帷幕……

1月18日,南越海军巡洋舰驱逐舰司令何文锷从西贡飞到岘港,从岘港登上5号《陈平重号》,在10号舰的护卫下,前往甘泉岛支援,准备完全占领永乐群岛。

19日凌晨,周恩来让叶剑英召集军事5人小组,增加海军政委苏振华,研究商讨西沙群岛具体作战方案,部署自卫反击事项。随后,他又电话告诉总参谋部:

“西沙情况发展很快,恐怕今天就有可能打起来,因此经中央研究决定:由叶剑英、邓小平、王洪文、张春桥、陈锡联、苏振华等六人组成领导小组,代表党中央处理西沙作战问题,由叶剑英、邓小平同志负总责。”

19日上午,叶剑英、邓小平等领导小组成员来到总参作战部,直接部署和指挥打击南越入侵军舰的军事行动……

这天一清早,南越海军派出3艘驱逐舰和1艘护航舰,再次驶入西沙永乐岛海域。其中,《李常杰》号驱逐舰和《怒涛》号护航舰,从广金岛以北海面向中国海军舰艇部队接近;《陈庆瑜》号和《陈平重》号两艘驱逐舰,则从羚羊礁以南的外海向中国的琛航、广金两岛靠近。接着他们便首先向在此海域从事正常作业的中国渔民开枪开炮,再次造成中方人员伤亡。

中国海军南海舰队迅速命令396、389号两艘扫雷舰进至广金岛西北海面,拦截《李常杰》号和《怒涛》号舰;命令271、274、281和389

号4艘猎潜舰进至广金岛东南海面,监视《陈庆瑜》号、《陈平重》号两舰。霎时间,西沙海域风云际会,战斗一触即发!

从当时整个战场的形势看,明显是敌强我弱。从装备上讲,南越海军3艘驱逐舰和1艘护航舰,最大的1770吨,最小的也有650吨,总吨位达6000多吨,同时舰上还装有127毫米以下口径的火炮50门。而中国舰艇编队的4艘舰艇,最大的才570吨,比对方最小的还少80吨,小的只有300吨,总吨位加起来仅1760吨,还不如对方最大一艘舰船的吨位大。且中方4艘舰艇仅装备有85毫米口径火炮16门,其它大部分是双管小口径火炮。而"舰坚炮大"的南越海军,此刻正处于有利的外线阵位,中方则处于被动的内线阵位。因此,南越军舰并没把中国舰艇放在眼里。尽管中方几次发出严厉警告,但他们仍然不肯退却。相反,仿佛是要考验试探中国海军官兵的胆量一般,由《李常杰》号首先开足马力,大摇大摆地昂着炮首,径直向中国海军编队冲来……

面对吨位4倍于己的对手,中国南海舰队396、389号扫雷舰毫不畏惧,勇敢地迎上前去,同时再次发出严正警告,令其马上离开中国海域。

然而,《李常杰》号依仗其钢板厚实,非但不转变航向,相反却用舰首径直朝中方舰队冲撞而来,致使396号舰指挥台柱、左舷栏杆以及扫雷器等均遭严重损坏。接着,它又狂妄地从中方两舰中间横穿而过,驶向琛航、广金两岛附近,并放下4只橡皮艇,在中国海军官兵众目睽睽之下,护送40余名南越军人抢滩登陆。其中,登上广金岛的南越士兵还向中国守岛民兵开枪射击。中国守岛民兵马上奋起还击,当场即毙敌1人,伤敌3人。登陆南越士兵见状,赶紧狼狈地逃回舰上。

上午10时22分,《怒涛》号护航舰和《李常杰》号、《陈庆瑜》号、《陈平重》号三艘驱逐舰在占据有利外线阵位后,突然一齐向中国海军编队的4艘舰艇发起猛烈炮击,致使中方海军舰艇在其密集的炮火下接连中弹,再次造成人员伤亡。

根据敌我双方装备情况和战场态势,中国编队指挥果断命令采用近战手段与敌厮杀。接到命令,中国的4艘舰艇分成两个编队开始高速向目标接近:猎潜艇73大队271、274号艇分别攻击《陈庆瑜》号和

《陈平重》号两舰;396、389 号则分别攻击《李常杰》号和《怒涛》号两舰。

面对这种架势,南越海军立即远遁,并试图与中国舰队拉开距离,以发挥其远程火炮的威力。但中国舰艇紧紧咬住南越军舰不放,开足马力,穷追不舍,不一会儿,便与南越舰艇“船舷相接”了。接着,只见中方射速极快的小口径火炮,“嗒嗒嗒”地一齐吼叫起来……

仅仅经过 13 分钟激战,南越海军的阵脚被完全打乱了。《陈庆瑜》号作为南越海军指挥舰,虽几次试图以炮火优势重新夺回战场主动权,但中国 271、274 号艇却认准目标不放松,利用敌舰火力死角,集中攻击其主炮,很快便击中了其加强台和指挥通信设施,造成该舰通信中断,指挥失灵,舰上军旗也被打落海中,被迫拖着滚滚浓烟仓皇逃遁。

就在 271、274 号艇集中火力进攻敌指挥舰《陈庆瑜》号的同时,中方 396、389 号舰也贴近《李常杰》号驱逐舰进行集中近射,打得《李常杰》号驱逐舰舰面上频频爆炸,甲板上多处起火……

此时,南越海军《怒涛》号护航舰急驶向中方得 389、396 号舰驰援《李常杰》。中国两艘扫雷舰立即调转炮口,对准《怒涛》号要害部位一阵急射,一连串的炮弹落到敌人的舱面上、弹药舱,顷刻间《怒涛》号爆炸起火。

为不使受到重创的《怒涛》号逃逸, 389 舰继续穷追猛打,并向《怒涛》号逼驶而去。当 389 号舰在离《怒涛》号仅十余米距离时,389 号舰的战士们冲出舰舱,端起机枪和冲锋枪对准敌舰各战位一阵狂扫,同时投去一连串的手榴弹…… 南越军舰从未见到过这种海战阵势,一时慌了手脚。在一片慌乱的还击中,敌人的一发炮弹落在 389 号舰两部主机之间,顿时 389 号舰舱爆炸起火。舰上官兵一面坚持战斗,一面组织人力奋力灭火。火势最终扑灭了,但有 6 名战士牺牲在烈火中,其余不少人也被严重烧伤。

389 号舰遭到重伤,舰体开始倾斜,航速也明显慢下来。这时,一直在外围观望的南越《李常杰》号以为时机已到,掉转船头直向 389 号舰奔袭而来。此时,舰上的炮弹已经打光,舰长肖德万见状,当即命令装好仅有的深水炸弹,等敌舰靠近。恰在这时,中方 396 号舰赶来支

援。《李常杰》号见势不妙,怕遭中方两舰夹击,于是急忙掉头,逃往外海。

眼见《李常杰》号仓皇逃跑,《陈庆瑜》号和《陈平重》号也无心再战,分别朝西北、东南方向落荒而去。而南越的《怒涛》号因受损严重,被远远地甩在后面。这时,281 号艇从有利位置处全速向《怒涛》号接近,并仍以“贴身”战术靠近敌舰,接着用 10 条炮管一齐向“怒涛”号猛轰,致使该舰再次中弹起火,并于 14 时 52 分爆炸,沉没在羚羊礁以南海域。至此,西沙海战中国海军首战获胜!

一直在总参作战部坐镇指挥的叶剑英,听到前线传来海战胜利和《怒涛》号被击沉的消息,兴奋不已,连声说:“打得好! 打得好!”邓小平也捻熄手中香烟,平静地说:“我们该吃饭了吧。”接着,叶剑英迅速指示作战部马上将战况整理成简报,由他签名后向毛泽东报告,随后才谈笑风生地与邓小平等一起走出作战指挥部,向餐厅走去。

经报毛泽东同意,叶剑英、邓小平决定扩大战果,收复珊瑚、甘泉、金银三岛。

19 日下午,广州军区便据中央军委的指示,对这次登陆作战做出如下部署:由榆林要塞派出守备 10 团 3 个连队、1 个两栖侦察队和部分加强分队、民兵,共计 500 余人,分乘海军舰艇和南海渔业公司的渔轮出发,首先集中兵力攻打位于珊瑚、金银两岛之间没有坚固工事的甘泉岛;然后再向工事坚固、兵力较多的珊瑚岛发起进攻;最后攻取金银岛。与此同时,组织和部署海上力量,随时打击南越军队增援永乐群岛的海军舰只。

这次登陆作战,于 19 日当天即部署完毕。20 日上午 9 时 35 分,中国登陆作战部队和民兵按既定计划发起了收复三岛的登陆战!

此时,失去海军支援的南越军队,实际上已经根本无力抵抗,仅仅经过 10 余分钟的战斗,甘泉岛上的敌人便纷纷缴械投降。

随后,中国登陆部队和民兵开始兵分三路包抄珊瑚岛。不成想,珊瑚岛上的敌人也仅仅在中国军队发起冲击前抵抗了一下,待中国登陆部队一占领滩头阵地,守岛敌人便即刻放弃抵抗,四处逃窜、藏身。有的躲进草丛和树林,瑟瑟发抖;有的脱掉裤子,然后用刺刀挑起白裤衩从碉堡里走出来,举手投降……而这时,占据金银岛的南越军队也

因畏惧被歼,早已登船逃跑了。因此,中国军队的登陆作战,前后仅用了4个小时。而实际战斗加起来不超过20分钟,便顺利收复了珊瑚、甘泉、金银三岛,并将五星红旗再次插上了三岛的最高处。

在这次中国军民誓死保卫西沙群岛的壮烈海战中,处于劣势装备的中国海军,共取得击沉南越海军护航舰1艘、击伤驱逐舰3艘,毙伤其"怒涛"号舰长及以下官兵100余人的战绩。同时,在收复甘泉、珊瑚、金银三岛的登陆作战中,中国军队和民兵还生俘南越军队范文鸿少校以下官兵48人,并使美国驻南越岘港领事馆联络官科什也成了中国军民的阶下囚。

当然,为保卫西沙群岛,中国军民也付出了一定代价:中国海军274号艇政委冯松柏等18名官兵英勇牺牲,另有67名参战人员受伤;同时,我389号舰也遭敌军重创。

"119"海战的胜利,是在中国海军处于绝对劣势的条件下,完全依靠指战员的牺牲精神和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而取得的。因此,海战结束后,南越当局极力掩饰他们的失败,并在《怒涛》号被击沉当天宣布:中国海军在海战中派出了实力强大的"科马尔级驱逐舰",并在交战中使用了"冥河式导弹"。

西沙海战胜利后,南越当局为捞回面子,一度频繁调动飞机和军舰,准备报复。他们除了派出两艘驱逐舰开往岘港集结外,还派出6艘军舰从岘港出发向西沙群岛方向机动,同时命令这一地区的海、空军处于紧急戒备状态,再次向中国发出战争叫器。对此,中国政府授权中国外交部于1月20日当天再次发表声明,警告南越当局必须立即停止对中国的一切军事挑衅和侵略活动。同时,中央军委命令驻守在南海海疆的陆、海、空三军,时刻保持高度戒备、随时准备歼灭入侵之敌。

鉴于中国三军已完全进入临战状态,南越当局于1月21日做出了"应避免下一步同中国作战"的决定,偃旗息鼓,缩回头去。但他们咽不下这口气,试图通过南越驻联合国观察员阮友志,向联合国提交议案,要求安理会讨论介入西沙群岛问题。为此,中国常驻联合国大使黄华提出强烈抗议,再次声明:西沙是中国无可争议的神圣领土,属于中国内政,无需联合国讨论。最终,因中国及其他理事国的强烈反

对,南越的要求遭到否决。

1974 年 2 月 27 日,中国外交部发表声明,向全世界公开宣布,中国政府决定将在西沙群岛自卫反击战中俘获的范文鸿等 48 名南越官兵和 1 名美国联络官,全部遣返。

世界舆论一片哗然。各国高度评价和支持中国人民为捍卫国家主权、领土完整而从事的正义之战,强烈谴责南越当局侵犯中国西沙群岛的强盗行径。就连美国政府也在此前后采取了“不干涉政策”,并断然拒绝了南越当局请求美国第七舰队援助的要求。中国国民党当局同样强烈谴责了南越当局侵犯中国岛屿的非法行为。

1974 年 5 月,中央军委决定“从东海舰队抽调 3 艘导弹护卫舰紧急南下,支援南海舰队”。以往 20 余年,中国舰队从东海到南海,都是绕道走琉球群岛,入太平洋,过巴士海峡。这次,毛泽东要求这支舰队“直接通过台湾海峡”。蒋介石得到报告,说了句:“南海吃紧呀。”未加干预。

后来,张春桥曾对上海的朱永嘉等人说起:“邓小平指挥西沙战役时,是那么沉着和熟练,毕竟是经过长期战争考验,指挥过大的战役,能掌控全局的帅才。”

1974 年 1 月 20 日,中央政治局向毛泽东提议,将 5 人军事领导小组增至 6 人,加苏振华。并确定:军委 6 人小组大事视情况或直接报主席或经中央政治局讨论后再报主席。对内对外不行文,一律以军委名义下发。会后,由周恩来、王洪文联名向毛泽东报告此事,毛泽东表示同意。

# 第1294回：解危困，肖永银“招兵买马”走后门，钟志民申请退学

文化大革命是以反修防修、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保证红色江山永不变色作为理论旗帜的。但是随着文化大革命的深入，特别是林彪摔死以后，社会上一些不公平的现象却表现得越来越厉害。特别是被称之为“走后门”的不正之风开始弥漫、渗透到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如果说，文革前各级领导干部按行政级别的待遇，平稳有序的享受他们各自的特权，而不必担心违规。那么，这种特权在文革中已被打碎，人人都知道这样做是不对的，是搞特殊，是修正主义。但是，对权力的监督，除了“四大”之外，更有效的约束机制在当时，却始终没有建立起来。相反，为了改变大革命时期的无政府状态，文革中新建立起来的政权较之文革前，其权力更加集中。加上文革中、后期官复原职的老干部，有些人为了弥补自己在文革中受到的伤害，更加利用手中的权利，为自己的亲朋好友办事。这使当时“走后门”的现象表现得愈加严重。

为了躲避当时的上山下乡运动，很多干部子女，尤其是部队干部子女，大多数都当兵、上大学了，个别的也招工了，真正上山下乡的屈指可数。如：湖北省军区副军级以上干部子女59人，其中56人参军、1人进工厂、2人上大学，没有一人下乡；而福州军区安排了200多名干部子女上大学。1973年6月国务院召开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上披露：“中央机关，各省市领导机关的高级干部子女，部队军级以上干部子女，下乡的寥寥无几，至今仍留在农村的为数更少。”

其时，部队干部子弟不通过正常的征兵渠道参军入伍早已蔚然成风，司空见惯。这样做的第一人，恰恰是军队的最高领导，国防部长林彪。早在1967年3月，他就让自己的儿子林立果穿上军装，参军入伍。而那一年，因为文化大革命的原因，全国都没有征兵。但是，当时知道此事的人很少，在社会上没有什么影响。而且，以当时林彪在全国人

民中的威望,即使大家知道他的儿子没有通过正常渠道穿上了军装,也会认为这是在培养革命事业接班人,没有什么不对的。虽然经过了文革初期“联动”的闹剧,但“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来会打洞”的传统世袭观念,在中国人的脑海里还不会一下子扫除干净。因此,林立果的参军在全国可以说没有什么影响。真正成批量不通过正常渠道参军入伍的事情首先是发生在南京军区,而且事出有因。始作俑者乃时任南京军区装甲兵司令的肖永银。

1967 年一天,陶勇的四个孩子来到南京找许世友。

陶勇和许世友都是大别山金寨老乡,同时参加革命。他死后,他妻子也被说成是国民党派来使“美人计”的女特务,受到残酷迫害,被逼上吊自杀。此时,陶勇没有参加工作的四个孩子被赶出家门,无处可去,便失魂落魄地跑到南京来找许世友。当他们像一群在暴风雪袭击落难的迷途羔羊,惶惶然穿过庭院,来到许世友房间后,立刻放声大哭:

“许伯伯,救救我们吧!”

那悲惨惶惧的哭喊,让很少动感情的许世友眼圈一下子红了,他像一个多情善感的老妈妈一样,抚慰了这个又劝说那个……蓦地,许世友挺起身,两只手背到身后,急踱一阵步,叉腿屋中央,声震屋宇:“不要怕,这里就是红色保险箱!”

将这几个孩子放在哪里呢?

这天,南京军区装甲兵司令员肖永银接到驻在无锡的 27 军军长尤太忠的电话:“老肖,你好啊? ……你到我们这里玩玩吧? 我们这里蛮不错哟!”

肖永银知道,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正在无锡,尤太忠打电话叫他去玩,肯定是许司令员有事找他。于是,他爽快地答应了。

果然,一到无锡,尤太忠一见肖永银就说:“许司令找你!”

许世友见到肖永银,劈头就说:“抓部队! 把部队稳住!”

肖永银告诉他,坦克师稳如磐石。许世友又东拉西扯一阵后,像是漫不经心地说道:“陶勇的孩子到处流浪呀,怎么办? 你们是不是把他们收起来呀?”

尤太忠和肖永银两人相互看了一眼,最后商定,先将孩子送到尤

太忠处,再由尤太忠交肖永银安排。

肖永银回到南京,很快,陶勇的几个孩子由尤太忠秘密转送给他。孩子们从大到小排成一排站在他面前,最小的才13岁。肖永银鼻子一酸,摸着陶勇幼子的头说:“当兵吧……”

就在肖永银为东海舰队司令员陶勇的悲剧命运而叹息的时候,相隔两条街,南京宁海路上一幢灰色小楼里,南京军事学院院长张震,也满面忧愁地望着自己的爱子……自己将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他不清楚,唯有对自己的孩子放心不下,他要趁自己尚未丧失自由的时候,办完这件事。他想来想去,觉得只有把孩子交给一个人才放心,于是匆匆写了张纸条,塞给儿子张海宁说:“去,找你肖永银叔叔。”

肖永银看完用铅笔写的潦潦草草的纸条,愣了半天……最后,他写了一封信,交给孩子,叮嘱道:“你拿着我的信,今晚就走。悄悄地走。不管谁问你,你就说去串连,去杭州报名。记住,你爸爸是大树,树大招风,对谁也不要说出他的名字!”

张震的儿子,13岁的张海宁瘦小的身影消失在夜幕中……

于是,由陶勇、张震的孩子开始,便发生了以后被人称作“招兵买马”的事情。

各地的军队高级干部,通过多种渠道很快便获悉南京军区装甲兵司令肖永银这里有这么一块“净土”,于是从四面八方送来了自己的孩子:被“火烧”的云南军区后勤部长的儿子,官贬河南某农场、原六纵司令员王近山的几个孩子……乘火车的,坐轮船的,步行的,纷纷投奔而来,当然也包括许世友的几个孩子。肖永银无法拒绝这些昔日战场上“战神”们的后代,于是便说:“男的,只要是军队上干部的子弟,家庭不行的,就收起来。”

南京军区装甲兵的营房,倏忽间变出了一个“娃娃兵营”,大的十六、七岁,小的十三、四岁,爬高上低,你打我闹……

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有几个群众组织准备联合行动,到南京军区装甲兵军营抓人。这些将军的后代听到消息后,个个摩拳擦掌,有的找砖头,有的拿木棍,准备与来犯者拼个你死我活!

肖永银闻讯,来到军区作战部,开门见山地说:“给我两条船,夜晚用一下。”

对方问他作什么用？他说："你别管了。"

"那不行呀。船么，非军事目的不能随便动用。"

装甲司令火了，一拍桌子："我渡长江时，百万雄师就是坐木船来的！不给船，照样能过江去！"当晚，肖永银派人找了两条民用小木船，连夜把孩子们送到了江北装甲兵训练基地。这里是荒野山地，对外属军事禁区。

第二天，那些群众组织意外顺利地长驱直入来到营房，然而兵营里已经没有了一个小孩子。但是，这一状还是告到了周恩来那里。

几天后，一个长途电话打到了南京军区，总理办公室查问有无此事？军区几个负责人面面相觑，谁也不敢就此问题做出"是"与"否"的回答。有人忿忿地说："找肖永银来！祸是他惹的，兵是他招的，让他自己来回答。"

肖永银应召而来。听了总理办公室的电话内容，他却轻松地笑笑："总理问嘛，如实报告情况！我签名！如果总理找我去，当着群众的面，发脾气，甚至打我两耳光，我没意见！总理那么忙，我不应该给总理找麻烦！可是，如果我们两个人，门一关，我就要说：'总理啊，这是后代哟！'"说完，肖永银草拟了一份电报，如实地向总理报告了"招兵买马"的情况。电文拟完，他提笔签名：

"南京军区装甲兵司令肖永银 "

周恩来此后没有再过问此事。

然而，事情并未就此结束。一天，在军区司令部里，一位军区领导说了一句："我到了北京，上级问我收了多少兵，我说不知道。"

军区炮兵司令扯扯肖永银的袖子，不解地问道："他这是什么意思？"

肖永银笑笑说道"他的意思就是那么个意思。"

炮兵司令摇摇头，不知道他们打的什么哑迷。

这时，又有一个领导说话了："不像样子！收的兵不够格，弄几百小孩子，干脆办'儿童团'算了！"

总参谋部来电：你们装甲兵招了多少新兵？查查。够格的留下，不够格的清退回去……

"肖司令，我看事情难办呐，"装甲兵司令部参谋长满面愁容地说，

“即使我们想留,怕也不能全留下。真可惜,这些娃娃有的是太小了”

“娃娃嘛,总会长大。我们这么大的装甲兵,养几百个娃娃算什么?过几年就是一条六尺男儿。要当兵并不是反革命,红军时代得一个兵不易呢!……不能清退回去,退回去,他们好多人家已经没有了。”

“可怎么办呢?”参谋长拍拍桌子上的电报。

肖永银一字字,一行行,翻来覆去,看了半天。“嗨,有了!你来看,核心是不是这几个字?”他用手点着“够格”“不够格”:“我们全都合格,不就完了!”

装甲兵很快起草了一个报告:共招新兵多少名,经过半年的严格训练,考试及格多少名,在此期间,共发展党员多少名,团员多少名,多少名经过训练已补充部队,多少名还在继续训练……报告有鼻子有眼,完整详尽,无懈可击。果然,上面在接到这份报告以后,再没有“继续追查”。

“黑兵”风波过去一段时间后,许世友从大别山回到了南京。“哎呀,许司令,真难呀!我死顶呀!”肖永银一见许世友,连连跌足长叹。许世友哈哈一笑:“你顶,就顶住啦!”

上山下乡运动开始后,出现了很多问题,从李庆霖给毛泽东的信中已见一斑。而下乡后,对前途、出路的渺茫更如梦魇的压在绝大部分的知青和家长心中。此时,参军无疑是青年最好的出路:从部队复员回来可以留在城里安排工作,这是国家的规定;如果能够在部队提干,那更是前途似锦。于是,从那以后,部队干部纷纷利用自己的方便条件,将子女送到部队当兵。后来,那些战争年代曾在部队工作过的地方干部,也通过战友关系将孩子送到部队,如胡耀邦、刘子厚等等不一而足。汪东兴所在的8341部队进入的条件严格,他们无法将孩子安排在自己的部队,加上工作原因,他们与其他部队几乎不发生联系,他们孩子的当兵一时成了问题。这时,叶群、吴法宪出来帮忙,将8341部队的干部子弟都安排到了空军当兵,我们从林彪的警卫李文普的女儿在“913”之前的当兵经过就能看出。由此可见当时部队干部子弟不通过正常的征兵渠道参军入伍现象之普遍。

1969年,一些老红军说:“毛主席说了,送子参军,是我军光荣

传统。”

1971 年 5 月,有的支左部队干部在鼓励部队小兵到部队好好当兵时也说:“林副主席说了,子继父业,合理!”

当时,群众将这种做法称之为“走后门”。大学恢复招生后,因为无需文化考试,更给了“走后门”大开了方便之门。如果说参军主要是部队的干部,那么,上大学就让许多地方干部很方便的介入进来。有一位文革前的大学党委书记,“913 事件”后,准备恢复工作,先到医院治病。他在医院的病床上,为他战友的孩子写了几百张的条子,让学校的招生人员或其他学校他的战友,将他们招进学校。

这一切产生了巨大的示范效应。一时间,参军、入学、招工、病退回城要“走后门”,连看电影,买自行车、获得配给的紧俏商品也要托关系“走后门”。而林彪事件所产生的消极影响,也使不正之风有燎原之势。这对文化大革命初期所弘扬的“促进思想革命化”不能不说是一种莫大的讽刺。

文革前,群众对“走后门”这样的社会不公现象没有什么意见,因为相比于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曾经历过的晚清、民国的老百姓,他们已经觉得解放后共产党领导的这个社会很公平了。但是经过文化大革命,毛泽东让大家知道了:在同一个阶级中,人们都是平等的,任何特殊化的做法都是错误的。日益严重的“走后门”之风引起了社会群众的极大不满。

1974 年 1 月 18 日,《人民日报》以《一份退学申请书》为题刊出南京大学工农兵大学生钟志民的退学报告全文。

钟志民出身于军队高级干部家庭,父亲是参加过长征的老红军,时任福州军区政治部副主任。钟志民 1968 年在南昌二中初中毕业后,即响应号召回江西老区瑞金沙洲坝农村插队落户。但他在农村只劳动了 3 个月,于 1969 年初,占用一个社员的征兵指标参了军。在当了 3 年兵之后,凭借父亲的关系,于 1972 年 4 月被“推荐”到南京大学读书。在大学的一年半学习中,钟志民对自己上大学一事产生了新的认识,以自我革命的激情向南京大学党委提交了一份申请退学的报告。在报告中,他自我解剖说,自己没经群众推荐、招生选拔等合法程

序而由父亲给军区干部科打电话指名调选上大学。在列举此事的种种不良影响后,他恳切提出改正错误,退回部队。

《人民日报》为钟志民的《退学申请书》加了编者按。钟志民退学成了轰动全国的大事件。

此时,黑龙江范正美正带领省委工作组,在黑龙江大学进行全省基本路线教育的试点。工作队的领导成员是从几个高校调来的学校副职,他们当中有哈师院的李群、哈医大的王志真、教育厅的军代表王新民、电工学院的嵇华等。

他们来到黑龙江大学,学校师生反映最多的问题是党委书记白汝瑗利用权势让女儿走后门入学的问题。

由于白汝瑗为自己的孩子开了方便之门,学校其他领导干部的孩子也有走后门入学的问题。工作组了解到,白汝瑗在黑大工作肯干、努力,而且能够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正确对待群众、正确对待自己,在黑大有一定威信,是个好同志。就是因为给自己女儿走后门后,自己感觉腰杆不硬,工作缺乏力度。在当时,群众对领导干部在招生中"走后门"意见很大。

就在这时,1974 年 1 月 18 日,《人民日报》刊登了南京大学钟志民要求退伍、退学的消息。于是,工作组一方面发动群众贴大字报敦促白汝瑗;另一方面由范正美亲自找他们父女俩谈话,让他们学钟志民,走自己申请退学的道路。

白汝瑗迫于形势的压力,同意女儿走自己申请退学的路子。随即,他女儿写出大字报,表示"自愿退学"、"决不走后门"。范正美立即建议省委抓住白汝瑗这个典型,登报予以表扬,支持白汝瑗工作。

黑龙江省委领导很快接受了范正美的建议,在《黑龙江日报》头版头条报道了这一消息,并加了"编者按"。白汝瑗因此很快在黑大取得了群众谅解,在群众大会上受到了群众真心地欢呼。白汝瑗几次对大家说:"放下了包袱,从此可以理直气壮的讲话、抓工作了。"

# 第1295回：一二四，驻京部队开大会 一二五，国家机关又动员

1月22日，中共中央又下发了《补充通知中发[1974]2号》：

中央决定，在传达、学习、讨论中发[1974]1号文件时，增加以下学习文件和文章：

一、毛主席：《我的一点意见》

二、《毛主席致江青同志的信》

三、《毛主席在外地巡视期间同沿途各地负责同志的谈话纪要》

四、九大和十大的政治报告

五、《鲁迅批判孔孟之道的言论摘录》

以上为学习的第一单元。

六、《粉碎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一、之二、之三）

以上为学习的第二单元。

七、《五四以来反动派、地主资产阶级学者尊孔复古言论辑录》

八、《孔子——顽固地维护奴隶制的思想家》（杨荣国）

九、《两汉时代唯物论反对唯心论先验论的斗争》（杨荣国）

十、《孔子是“全民教育家”吗?》（唐晓文）

十一、《秦王朝建立过程中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兼论儒法论争的社会基础（罗思鼎）

十二、《对于孔子的批判和对于我过去的尊孔思想的自我批判》（冯友兰）

十三、《孔子维护哪些奴隶制》（高亨）

十四、《＜封建论＞的尊法反儒精神》（北京师范学院史众）

十五、《孔子的中庸之道是反对社会变革的哲学》（北京大学哲军）

十六、《反动阶级的“圣人”——孔子》（杨荣国）

以上为学习的第三单元。

江青在1月22日给海军政委苏振华写信：

现请谢静宜和迟群两位同志到海司去搞试点，并送上《林彪与孔孟之道》二百份，其他材料以后再送。七四年一月廿二日

这天，江青还给外交部党的核心小组写信：

外交部党的核心小组的同志们，为了使你部的批林批孔更好更深入地发展，特请谢静宜和迟群两位同志送去北大、清华汇编的《林彪与孔孟之道》二百份，《五四以来反动派，封建地主，资产阶级学者尊孔复古文章摘要》和《批林批孔文件汇编》各廿本，到你们那里宣讲批林批孔文件，希望你们在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直接关怀下，将批林批孔运动取得更大胜利。

江青一月廿二日

1974年1月22日，《火红的年代》、《艳阳天》、《青松岭》、《战洪图》4部国产彩色故事片在全国各地陆续上映。同时上映的新影片还有：彩色戏曲艺术片《沙家浜》（根据革命现代京剧《沙家浜》移植的粤剧影片），彩色木偶片《小八路》，彩色纪录片《喜看农业大丰收》（一）（二）（三）号，《工农业生产的好后勤》，彩色科教片《新法制革》、《海带》，科教片《南京长江大桥——施工技术》，彩色科教片《修旧利废》、《地震》、《向炉龄要钢》。

1月24日，农历正月初二，也就是春节过后的第二天，叶剑英召开驻京部队批林批孔动员大会。与会人员入场后，大会却迟迟不开……原来，叶剑英是在等江青给他写的一封信。信一到，会议开始，首先就是传达江青的信。

这封信，江青是写给王洪文、叶剑英、张春桥、邓小平的，全文是：

洪文、剑英、春桥、小平同志：

首先代我问候全军同志们春节好！相当长时间了，从许多材料看来，全国范围内的批林整风运动的发展是很不平衡的，批孔更是深入不下去。而林彪的思想体系与孔老二的关系更是不清楚。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搞的《林彪与孔孟之道》是可以帮助全体同志们解决这个问题。因此，我特请谢静宜和迟群二同志向全军指战员宣读中央的通知。他们已下过连队取得经验，可能对全军有所帮助。批林批孔是全

党全军,全国人民的头等大事,这是使国内外帝修反惊恐的事。全国党、政、军、民、学,通过这个学习,可以取得更大的团结和胜利。

现送上《林彪与孔孟之道》《名词解释》各二百份和《五四运动以来反动派,地主资产阶级学者尊孔复古言论辑录》二十本,《鲁迅批判孔孟之道言论摘录》和《反动阶级的"圣人"——孔子》各一份供同志们参考。文件,文章的份数是不足的,但可以翻印。有什么问题报中央,我们也要和同志们一起学习。我们将努力解答同志们提出的问题。我相信同志们会努力学习保持我军光荣传统,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知难而进。没有攻不克的堡垒,只要坚决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将批林批孔的斗争进行到底,胜利一定是属于我们的。任务是艰巨的,但也是光荣的。毛主席说能文能武,长恨随陆无武,绛灌无文。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学得文武双才,才能完成毛主席,党中央交给我们的任务。

致

无产阶级革命的敬礼

江青

74.1.24

张春桥同日也对江青的此信批示:"建议军委议一议如何抓好批林批孔,并商量一下江青同志的信如何落实。"

会议开始,叶剑英作了简短的讲话。他首先说,这个会是江青提议召开的。接着又讲了江青给空军写信,给海军送材料的事情,然后说:"我们对于批孔与批林的关系理解不深,指导不力,没有把批林与批孔结合起来,因此,批林批孔运动不够深入。"

第二天,1 月 25 日,中共中央下发中发[1974]3 号文件,转发《南京军区党委关于学习江青同志给二十军防化连的信的报告》,《中共陆军第二十军委员会给江青同志的来信》和《二〇八一部队防化连全体同志给江青同志的来信》。

1 月 25 日下午,北京召开有一万多人参加的党中央直属机关和国务院各部门"批林批孔"动员大会。周恩来主持大会。他说:"同志们,现在开会了,请王洪文同志领头唱一段《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全体起立,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接着,周恩来说:“中央机关、国务院机关和所属单位的同志们,今天在这里开个动员会,进行批林批孔动员。我们中央和国家机关已经落后了。昨天在这里军队已经大动员了。我们晚了一天,但是现在我们赶上去。中央对批林批孔问题已经发了两个通知,第一号已经发到你们手里了,第三号还没有到大家手里。”

周恩来说的这个第三号文件,就是1月25日,中共中央转发《南京军区党委关于学习江青同志给二十军防化连的信的报告》,《中共陆军第二十军委员会给江青同志的来信》和《二〇八一部队防化连全体同志给江青同志的来信》。

周恩来接着说:“去年‘十大’以后,国务院科教组召开的一次会议上,迟群同志向各省传达了准备批孔的问题,指出批孔是批林的组成部分。批孔在北大、清华两个学校是很早就进行了,最近又搞了一个材料,就是已经附在中央七四年一号文件上的这个材料。所以总是一步一步前进的。在这个过程中,由于江青同志的帮助和指导,把林彪是地地道道的孔老二的信徒方面的材料综合成几个问题,就是《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说明林彪是地地道道的孔老二的忠实信徒。这个材料受到了主席的称赞。”

周恩来念了王洪文和江青向毛泽东写的那份报告和毛泽东“同意转发”的批示。并作了自我批评:“主席还指示,由中央起草一个通知,一道发下去。但是发得晚了一些,开始时耽搁了一下。我有责任。这是一件大事,本来还可以更早一点。”周恩来念了两个通知。

他接着说:“在报告了毛主席并经主席同意转发后,印发的过程中,江青同志也是注意抓这个问题。”

接着,周恩来念了江青给20军防化连、空军马宁、国务院文化组吴德、及给军委几位负责人王洪文、叶剑英、张春桥、邓小平写的信,然后说:

“军委收到此信后,昨天在这里已经召开了动员大会。我今天早晨得到了这个消息,向政治局几位同志建议中央和国家机关的同志今天开这个会议。”

周恩来又念了江青1月22日给海军苏振华的信后说:“现在海军正在直属系统动员,第六封信是江青同志写给外交部的,这几天外交

部有外事活动,没有发出,今天我交给了仲曦东同志。”

接着又念了江青给外交部的信。随后说:“这是六封信的情况。除此以外,江青同志还直接作了试点,一个是38军,一个是警卫一师,再一个是江青身边工作的一个直属单位。这些单位都已经作了试点。我们现在收到各地的简报,在批林批孔中,广大群众已经开始发动起来了,我们也要求新华社,人民日报,军报的记者,要把这方面先进的经验,好的典型,及时推广出去。刚才说了,我们中央机关和国家机关是落后一步,今天补上这一课,请政治局在北京的同志也出席一下,开个动员会,我的介绍完了。”

然后,迟群说了江青委派他和谢静宜下连队的任务:“江青同志给我们两个人的任务有三条,下去以后,一个我们是送信,送材料,当通讯员;第二就是去学习;第三就是大家还有什么要求和意见带回来汇报。我们下去座谈和了解一些情况,许多同志提出一些问题来,当场有的时候我们临时作点准备,临时来回答,但是今天一下子开这么个大会,中央领导同志都来了,所以这对我们是一个很大的鼓舞,是一个很大的教育了。刚才总理的讲话,这些都使我们深深感到抓大事的重要。就是说要用什么样的姿态,去抓大事,抓路线,如何理解抓大事的重要意义,如何理论联系实际地去抓大事,所以中央给我们作了榜样,我自己要很好地学习,贯彻。因为在这一点,在我们自己所工作的那个部门,那个单位,问题都很多,差距是很大的,需要很好地赶上来的。”

迟群介绍了中发[74]1号文件材料的产生过程,他说:“这个材料是在我们主席,江青同志直接关怀下编写的,是在江青同志直接地,具体地指导下编写的。”

随后,谢静宜介绍了北大、清华批林批孔材料小组整理材料的过程,她说:

“当时我们提议,我们想成立一个班子,专门下点功夫好好地搞一下。江青同志同意我们这个意见,而且指示我们要老中青三结合,还提议我们要到毛家湾去,找资料。所以这样一来,东西就多了,他们那个里头的大磁缸子里头的东西,条幅,还有挂的条幅,横幅,我们反正到那里翻箱倒柜呀,东西很多,材料这样就丰富了。后来,就编了一

本,送给主席和江青同志,主席,江青同志看得非常细,连封皮标题,就是封面那个标题,前言,内容,一字一句地,不漏地看完,特别是在内容方面。”

“后来江青同志再让我们去毛家湾,看林贼大批的一些卡片,几十箱子,好多。”

“另外,我还再讲一遍,就是对批孔的文章,主席是非常关心的,听我们说到,就是说北大冯友兰也写了批孔的文章啦,主席立即让我们回去,说你回去拿,拿回来,给我看一看。所以我们当时就回去了,然后返回,把那一篇冯友兰的文章拿来给主席看,主席是一口气地把它看完。很长呐,字也很小,主席戴放大镜把它看完呐,一直都没休息,而且还看出了里头哪些标点错了,叫我们去改一改,很细。第二篇文章也是这样的,第二篇冯友兰的文章出来之后,又送给主席,主席又看了。所以主席总是看到这些老人的进步啊,主席是很高兴的,哪怕是微小的进步,主席就肯定。而且这两篇,江青同志看了,又转发了。”

迟群:“准备看第三篇。现在第三篇也出来了。”

江青:“我插一句。今天我们这个会,有一个缺点,忘了通知写作班子的同志来,我道歉。”

迟群:“这是我们的责任,没有想到这个事。”

谢静宜继续说:“所以,后来看了文章以后,我们说,我们学报要发表的。报纸有人给冯友兰要约稿啦,可能是要会登报的,所以,主席就说,那里面可是指了郭老的名字的,别批郭老啊。所以后来等到报纸发表的时候,郭老的名字,郭沫若的名字去掉了,连书的名我们都没有登呢,这是主席保护郭老呀。”

江青:“对郭老,主席是肯定的多,大多数是肯定,郭老的功大于过。郭老对分期,就是奴隶和封建社会的分期,是有很大的功劳的。他有一本书,《奴隶制时代》。郭老对纣王的翻案,郭老对曹操的翻案,这都是对的,而且最近还立了一个功,就是考证出李白是碎叶人。碎叶在哪儿呢?就在阿拉木图,就是说,那些地方原来是我们的。郭老的功勋是很大的,这点应该同志们知道。他这个《十批判》是不对的,听说,郭老今天来了。”

迟群:“这个材料的编写过程,当时组织了一个班子,江青同志是

建议叫组织一个老中青三结合的一个班子,就是找一些老教授,在这方面有些研究的,作点顾问。当时北大、清华组织了一个班子,其中有的是江青同志提名的,就是譬如说,北京大学的冯友兰、周一良、魏建功,清华大学的王世敏。这不是教授了,是个讲师了。还有我们提出来,江青同志同意了的,像清华的石国洪,此外还有一些同志了。今天因为时间关系,不在这里读了。一共有那么三、四十人。”

迟群在讲话中提到了联系实际的问题,他说:“还有些问题要不要联系实际呢?有的人成天在那儿讲批林批孔怎样联系实际啊,其实有的实际就在他的身上,就在他那个单位,那个地区,就在他的脑子里。”

他举了一个例子说:“我们有一个片子,是意大利拍的一个纪录片,叫做《中国》,我们翻译过来的了,据说是还给有关的外宾去看,去作为介绍中国面貌的一个片子。该片里头有很多话,我就举两句,因为有的没有记清楚,里头有这样的说明词,说是‘中国人他们的生活是痛苦的,但并不悲惨,他们怀念过去,但是他们既怀念过去,也忠实于现在。’他们尽拍了一些歪曲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一些镜头,我们有些个很好的一些个建筑,一些个场面,一些面貌吧,他不拍,专门突然地给你出来一个镜头,个别的我们有一个女同志和他们拉了一个车子,在那个胡同里头,他专门给你放大,一个特写镜头,他给搞你这个形象,所以像这样的片子,实际上就是一个间谍加汉奸搞出来的,难道不需要联系吗?而我们有的人,出去拍别人的,到国外去拍片子,拍什么呢,生怕露了一点资本主义国家的所谓的那一点表面的骗人的繁荣,对于广大劳动人民受剥削的受压迫的人民那些痛苦的生活,那种景况,一点也不敢往镜头里去拍,是什么指导思想?难道批林批孔不应该联系吗?”

纪录片《中国》是意大利著名电影大师安东尼奥尼拍的,他曾在1964年凭借执导的第一部电影《红色沙漠》在威尼斯电影节上获奖。1971年7月20日,意大利国家电视台向中国外交部新闻司发出公函,希望在中国拍摄一部纪录片,并委托安东尼奥尼担任导演。1972年5月,安东尼奥尼在中国政府的邀请下,带着他的摄制组来到中国。

这位自称是“一个带着摄影机的旅行者”在去北京前几个月,给北京寄去他的拍摄意向书,里边写道:“我计划关注人的关系和举止,把

人、家庭和群体生活作为记录的目标。我意识到我的纪录片将仅仅是一种眼光,一个身体上和文化上都来自遥远国度的人的眼光。”

当时,外国人到中国的行程是需要经过中国政府批准的,看的内容也是事先安排的。安东尼奥尼所到之处,学校、工厂、幼儿园、包括公园,人们整齐有序地做操、跑步、工作,脸上洋溢着幸福、自信的笑容,儿童们天真烂漫,歌声清脆嘹亮。纺织厂的女工们甚至在下班之后还不愿离去,她们自觉地在工厂院子里围成小组,学习《毛主席语录》,讨论当前形势。

但是,摄影机镜头是可以拍摄任何可以看到的地方。于是在《中国》这部纪录片中,一些未经安排的东西,不时会从某个角度冒出来。

在河南林县的某天,安东尼奥尼他们发现一群人行动举止异常,于是他们举起机器跟了过去,结果来到一个自发的集贸市场,人们带着自产的粮食、家禽和自制的食品,在那里做起了买卖。这个小小的市场有点紊乱,货物参差不齐。这些与另一组镜头中,北京某大商场的琳琅满目、肉类和各种时鲜蔬菜堆成小山的盛况,恰好形成鲜明的对比。

1973 年 1 月,这部纪录影片在意大利首都罗马首映,此后该影片在西方世界放映,并引起很大反响。

1973 年 12 月 11 日,中央广播事业管理局一名干部给江青和姚文元写信,反映安东尼奥尼的纪录影片《中国》有问题。姚文元批示:“转中组部业务组调查后写一报告。”

12 月 17 日,这名干部又在第二封信中说电影《中国》“完全站在帝国主义立场上,极其恶毒地污蔑中国,把中国描写成贫穷、落后、愚昧、灰暗的样子,完全歪曲了我们伟大中国的形象,令人非常愤慨。此片在世界上许多国家放映后,对我国影响极坏。”

1973 年 12 月 30 日晚上,在京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调看了电影《中国》,姚文元在放映结束后,当即给中央广播事业管理局负责人打电话:“今天政治局同志看了《中国》电视片,非常愤慨,简直不能看下去,这完全是有意地丑化中国人民,丑化社会主义中国,是一个非常恶毒的反共反华卖国的电视片。……这个电视片没有你们陪同人员做后台,不可能拍出来,……要认真对待,给中央写报告,不要写给我。

这个摄制组是怎么来的,谁请来的,陪同人员是谁?……,要写清楚。”

这就是迟群提到的“意大利纪录片”。

紧接着,迟群又提到“翻案”问题。他说:“我们有的人就在那里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案,搞五七干校执行主席的这样一个指示,他说要还给我青春。这样的人不应该联系吗?”

迟群又联系教育方面的实际,提到河南省发生的“马振扶事件”。他说:“譬如说这一次江青同志叫我们出去,同时叫我们顺路完成一个任务,就是河南的南阳地区唐河县马振扶公社一个中学所发生的事情,逼死了一个小女孩,十五岁,完全是修正主义教育路线逼死的,每天几乎是一次考试,考的那个学生简直是昏头胀脑。家长们都提出意见,说这样势必把学生身体搞垮,他们完全违反了主席的指示,不要把学生当作敌人,不要搞突然袭击,不要搞闭卷考试,要开卷,可以交头接耳,他们不,搞 A、B 题,要互相背着答题,每天考一次,所以这个女孩她就有反潮流精神,她就写了一些个意见上面,结果就给逼死了。”

他和谢静宜叙述了他们到河南唐河县马振扶公社的调查情况,认为这一事件“是路线斗争问题。”

# 第1296回：周恩来，派人探访郭沫若考教授，“梁效”写作组成立

“马振扶公社事件”发生在1973年7月14日。

1973年7月10日下午，河南省唐河县马振扶公社中学初二（一）班进行英语考试，张玉勤交了白卷，并在试卷背面写道，“我是中国的人，何必要学外文，不学ABCD，也能当接班人，接好革命班，埋葬帝修反”。为此张玉勤受到班主任杨天成的批评，并要她做出检查。

1973年7月12日，学校负责人罗天奇在初中班学生大会上不点名地批评了她，要求各班对此事讨论批判。由于老师批评方式失当，加上其他原因，张玉勤当日称病请假离校后即投河自杀。1973年7月14日在水库中找到她的尸体。

事情发生后，公社、县有关部门和学校都做了调查并处理。

1974年1月，江青在一份内部刊物上看到此事后，派迟群和谢静宜带人到马振扶公社中学重新进行调查。他们去后召开了两个半天的座谈会。在1月25日大会后的第二天，年1月26日写出《河南省唐河县马振扶公社中学情况简报》。《简报》指出：“马振扶中学学生张玉勤（张因考试不及格，受到批评后自杀）是被修正主义路线逼死的，该中学扼杀无产阶级教育革命的新生事物，向无产阶级反攻倒算，其实质是复辟。”

接着，迟群又提到“走后门”的问题，他说：“还有那个‘走后门’问题，批林批孔不要联系吗？那完全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背叛，对毛主席思想的背叛，所以当时江青同志要了一份关于南京一个大学生走了，叫钟志民，就是一份申请退学的书了，大家可以再看一看，我们是在路上听到了广播发表了这个消息，那个按语说得很好。讲了两条，根本问题就是说，要搞马克思主义，还是要搞修正主义的问题，那批孔，孔老二就是嘛，学而优则仕嘛，我们把自己的孩子看成是私有财产，看成是商品了，有的人。”

江青插话说:“叫钟志民。他的父母现在接受儿子的意见,作了自我批评,我们也准备在《人民日报》发表。”

姚文元:“这里顺便说一下,请《人民日报》把新华社的一些清样,就是关于父母接受批评,请你们把这些东西,采访的东西编一个报道,加上一个按语,加以支持。顺便插一句。”

江青接着说:“另外,还有一个很好的典型的例子,这不是一个人一个人了,而是一批上山下乡的青年,就是湖南株洲市办的厂社结合,他们派了最好的最有觉悟的贫下中农,男的女的都有,去照顾上山下乡的青年。这个点是《人民日报》的内参,我现在请《人民日报》的同志再去深入地调查研究,如果这个典型啊,能够普及呀,是可以减少城市跟乡村的差别,是可以减弱知识分子和体力劳动者的差别,这个是非常好的,大有前途的。这个还有一个事情,我想在这儿道歉,因为我的疏忽,在这个材料第二个补充通知啊,总理是要我帮他,因为有疏忽,第二个学习单元里应该有周一良教授写的有关唐朝柳宗元《封建论》的那篇文章,《人民日报》转载了,因为是我让他们转载的,这篇文章很值得看,这个我忘了,再补充一次。”

迟群继续说:“当时关于钟志民的问题,总理也有批示。就是当时他们叫说是退学,但是省里头决定,说是还保留他,在学校里学习,保留,就是继续学习。后来我们给他们打招呼,你既然申请退学,要造反你就彻底造反,不要人家造反,还不让人家造反。至于走后门问题,不只是这一个问题了,现在还有的单位,问题比较严重。譬如说,外交部、一外(北京第一外国语学院),很值得检查,那里首先就有一个清华大学的党委常委的一个孩子,是走后门进去的,所以我们首先作了自我批评,开了常委会的,在书记当中也专门作了研究,坚决退回,从一外退回来。但是,不光这一个人。所以,要想到我们的教育战线现在有一亿七千多万人,你开了这样一个口子,就不得了,它关系到上山下乡的问题,关系到一些人参军、招工、上大学等等,我们接班人的培养的问题。希望错了纠正,纠正的越快越好。另外,还有的单位,有一些个扯皮的问题,但是看我们正确与否,就是看我们是否执行了主席的路线,你是否团结了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和干部,没有做到这一点,谈不到正确,没有做到这一点,说别的统统是屁话!你什么正确,

你正确你团结不了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和干部。”

最后,迟群又讲了当时社会上存在的不正之风。他说:“现在有些单位,有一种不正之风,风气不正,最大的不正之风是什么呢?就是不抓大事,或者是抓得不够。”

接着,谢静宜作了补充发言。她说:“要破除迷信,解放思想。什么历史学家了,教育家了,文学家的事情,主席讲过嘛,最聪明,最有才能的是最有实践经验的战士,而且事实也是这样。”“不要盲目的迷信一些专家权威。就从考试一些教授来看,就破除了这个迷信了嘛,东北就考过嘛,而且这一次,北京市去年年底30号,当天国务院科教组,北京市科教组召集会议,上午,完了之后,就在清华出题,出完了下午5点钟到北京市集合20辆小车,同时到17所院校去考试,当时我们说的是开座谈会,到那个时候的时候啊,他们还真的拿着笔记本,还认为开什么座谈会。我们说,今天就是来突然袭击,给你考试,你不是看不起学生吗?这么一考啊,613名教授、副教授参加的,及格的是53名,占8.6%,不及格的是560名,占91.4%,还有200名教授、副教授是交了白卷,打了零蛋的。其中还有两所学校都是考零的。还有些学校是平均0.1分,0.4的,就是因为有那么一个教授大概考得好些,其他教授不好,那么一平均,还有0.1分,还有0.4分。”

江青说:“这个我还得要讲一下,有一些教授啊,他答不出来啊,是应该谅解的,因为他多年不搞了。多年不搞了,但是他经常用这种方法来整学生啊。我觉得是应该的,这个考教授,是从东北开始,就是张铁生。我呢,也冒了冒失,我也不知道谁搞的,我是在一次会议上说,我说这是大好的事情,后来不是说东北也不对嘛,东北考教授的这个人,他自己本人就是大学生,他自己先考了,结果他有几道题答不上,他说我总是个大学生吧,他这样考了教授。那么北京考了,北京考了,这两次考都有缺点了,说是没有出社会科学的题目。上海考的时候出了社会科学的题目了,你连基本路线都答错了,另外……”

姚文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是什么呢?有的教授答是注意清洁卫生。还有说是《水浒传》是讲什么东西呢?有的教授说是讲社会上很怪的事情。”

江青:“最糟糕的是,自命为社会科学家,但是对列宁的《帝国主义

论》哪,五大特点哪,一概答不上,那么,这就不能够说考得不对了。你自己专业是社会科学家嘛,列宁的名著嘛,《帝国主义论》嘛,有五大特征嘛,一个也答不上。”

姚文元:“有一位教授写了一首诗,我想也是暴露嘛,孔孟之道的危害啊,说,‘突闻考试实担心’,突然闻到考试,实在心里很害怕了,‘此事当年害学生’,这件事情当年害学生,指的从孔夫子下来害了多少人,搞资产阶级呀,修正主义呀,苏修那一套啊,‘此事当年害学生,今日临头试滋味,’今天临头我尝到了这个滋味,‘从今开始做新人’,从现在开始,现在是谁,以张铁生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

谢静宜:“所以考完了,考糊了,有的说什么,这一次啊,我对张铁生的信才有体会啊,所以教育革命,一些旧的制度,原来的一些旧的制度啊,非要改革不行,我们一定提一些积极性的建设性的意见,有些这样的,当然也有个别的还是不满意了,到现在也还是不服气,也有那样的。”

谢静宜提到下面反映的有关批林批孔的情况。她说:“从一个材料上看到,有些单位的领导同志,对于批林批孔的认识还有一些问题的。你譬如说,把批孔定出什么样的口径呀,批到什么程度啊,定出一个 什么标准哪,口号怎么提法,位置怎么摆法,什么还讲了不能搞运动啊,不能登小报啊,军区的小报上不要登批林批孔的文章,等等。这么多的清规戒律啊,这是实际上是下的禁令,就是不让你批孔,实际上就是不批林。也不知道那些东西是从哪里哪些框框来的,哪儿定的调子,所以才不要相信这些屁话的。我念念这个屁话吧。总政宣传部一个负责人在战备教育座谈会上关于批孔问题的一段讲话。关于批孔的问题,最近中央报刊发表了一批文章,军队怎么搞?总政宣传部根据总政首长的指示,拟了一个意见,已通知下去了。主要谈了三点,一是批孔的意义。二是批孔的位置,要把批林摆在首位。三是批孔的方法。对批孔再提两点,请大家注意。一是批孔的口径,批什么问题,批到什么程度,一定要以中央报刊为标准,不要乱批,不要乱提口号,不要乱点名。二是批孔的位置和声势,一定要按‘十大’精神办。实际上他没有按‘十大’精神办。‘十大’强调一定要把批林整风放在首位,批林可以联系批孔,揭露林彪利用孔子搞资本主义复辟的阴谋。连队

可以讲讲孔子是个什么人,批孔的意义,引导学习中央报刊的批孔文章,不能把批林和批孔并列,整个这一点,就是不能把批林和批孔并列,不要把批孔搞成运动。军队的小报要注意掌握,不要登载部队批孔的活动,发表批孔的文章在数量上也要控制,不能搞多了,内容也要很好进行审查。你审查什么不知道!”

江青插话说:“屁话! 就是主席讲的屁话。”

谢静宜:“批孔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在去年……”

江青:“不准批林,不准批孔就是不准批林。”

谢静宜继续:“批孔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在去年,在去年5月中央工作会议的指示嘛,那时候就讲过这个问题,而以后呢,主席又非常关心这件事情,这一次74年中央一号文件就是主席批示转发的嘛,是党中央同意的嘛。因为我们在下面的一些座谈会上,有的同志说,部队为什么不动呢? 他们说,一是有的同志把批孔与批林与贯彻‘十大’精神割裂开来了,对立起来了。”

谢静宜又提到“走后门”的问题,她说:“这个‘走后门’等不正之风啊,是资产阶级思想,是封建士大夫阶级的特权思想,是孔老二的思想,它严重地破坏了干群关系,军民关系,破坏我党的优良传统,所以在这一点上,我们在下面搞座谈的时候,以及我们在底下到学校的,在学校的工作,我们经常碰到的是这些问题,群众极其不满意呀。”“有些人总是口口声声说他忠于毛 主席,但是不照主席指示去做。可是某一个领导人,为了让自己的子女当兵上大学,什么一个批示,一点头啊,一个电话,比主席的批示都重要哎。这是为什么? 几千年的封资修的流毒,孔老二的一些流毒,旧的习惯势力,还有什么山头主义, 宗派主义,裙带关系,把一些人就给俘虏了,这些关系超过了阶级关系,超过了政治关系,超过了党的关系。我们的干部要坚持原则,要不受捧,不受压,不受软硬 兼施这一套东西。什么请客吃饭啦,他请客你可以不去嘛。所以有的群众就给我们说嘛,说‘酒杯一端,政策放宽;筷子一提,可以可以。’可是也就有那么些人有人愿意请他的客,他就愿意去吃饭,吃饭了你不干还好嘛,吃饭吃了就给人家干,几十年的原则他都能坚持,但是一两小时就被人家给拉过去了,俘虏了。”

“有的群众给我们说,他说有些领导,就是他那省的了,去给他作

上山下乡的动员报告,他说你上面在讲话,底下就议论,说你有什么资格给我们作报告,你首先把你的孩子叫回来嘛,你跟我们一块上山下乡,我们没有话说,一块去。可是你说话没有用。这样的人简直是革命的败家子,所以主席讲到文化大革命搞一次不行,要搞多次。当然这一方面例子很多,因时间关系我不多讲。”

当晚,周恩来派人前往郭沫若家中了解郭沫若的情况,并传达几点指示:

(一)郭老已是80岁高龄了,要保护好郭老,保证他的安全;

(二)24小时要安排专人在郭老身边值班;

(三)郭老家的房间和走廊内要铺上地毯,以防滑倒;

(四)请郭老从小间卧室搬到大办公室住,以保证充足的氧气。

1月25日大会,毛泽东事先并不知道。会后,王海容、唐闻生到毛泽东处,说起了大会的情况,毛泽东很不满意,指示大会的录音不要发。张玉凤打电话告周恩来,周恩来说:“有的省已经发了,不过我马上通知他们不放录音,没有的就不发了。”

毛泽东要大会的录音,说他要听。但是录音带拿来后,据张玉凤说,他一直都没再提听录音的事。

“1.25”大会以后,北大、清华批林批孔小组由编写材料转向了写作大批判文章,并正式改名为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北京大学朗润园后湖旁边有一座灰楼,其貌不扬,里边却陈设讲究,原本是北大专为外国专家准备的招待所。自从“批林批孔”运动以后,这座楼就成了常人不敢随便靠近的一个神秘处所。此时已经名噪全国的北大、清华两校大批判组把这里当作了常驻的办公地点。基本上一个人一个小屋,每人每月的伙食费是22元,相当于当时一名工人月工资的三分之二,这在当时已是相当好的水平了,个人掏伙食费10元,公家补助12元,加班有夜宵,节假日有会餐。这里警卫森严,一般人不得入内。里边的人也不能自由外出。来探亲访友的人都在门口一间豪华的接待室里面。写作组的成员,平时不准回家,只星期六晚上准许外出,星期天则必须赶回。

各个组写文章,各写各的,不能互相交流情况。写作组负责写文章,材料组负责编材料,互相不通气。

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的文章发了很多,后来姚文元通过《红旗》的编辑告诉写作组,建议最好用个笔名。北大历史系老师范达人就提议说:“是不是叫梁效,我们北大、清华两个学校。而这个‘梁’呢,也是个百家姓,人家以为还真是姓梁的呢,第三呢,梁效这个听起来也不难听,好像良好效果似的。”从 1974 年 5 月开始,北大清华大批判组开始使用梁效作为笔名。后来“梁效”也成了批判组的代称。

当时“梁效”的具体工作主要由三个组完成。写作组组长范达人,负责撰写批判文章,材料组组长汤一介,继续编写《林彪与孔孟之道》,供进一步深入批林批孔用。材料组后来分出一个注释组,专门为毛泽东注释诗词。北大和清华有 40 多名教员先后成为梁效的成员。他们当中有魏建功,冯友兰,周一良这样的学界名人,也有年纪轻轻资历尚浅的普通教员。

# 第1297回：反“后门”，全国掀起退学潮 读书班，“十批不是好文章”

1月25日，《解放军报》刊登钟志民在南京大学校党委常委1月17日约见他时的谈话记录《珍惜革命前辈鲜血换来的革命成果 决不躺在父母的“功劳簿”上过日子》。当天，新华社报道：《热烈支持反潮流的革命精神 南京大学党委批准钟志民的退学申请；全校师生员工纷纷表示学习他敢于反潮流，敢于自我革命的精神，进一步搞好教育革命》。

1月27日，新华社报道《钟志民的父母积极支持儿子退学的革命行动　让孩子听毛主席的话，坚决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

编者按：南京大学学员钟志民的《一份退学申请报告》在本报刊登后，钟志民的父母立即表示坚决支持儿子的退学要求，并检查和批判了自己“走后门”的错误。革命小将挑战，革命老将应战，值得欢迎。值得支持。

在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当中，我们一定要警惕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认真纠正“走后门”之类的一切不正之风。这是关系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反修防修的大事，必须认真对待。那种明知是错，只要“下不为例”就可以了的说法，既是为资产阶级思想打掩护，也是广大干部、群众通不过的。钟志民父母的革命行动，鲜明地表现了我们社会主义社会的新风尚，应当加以发扬。

随后的报刊发了大量关于揭露“走后门”的报道，一时间退兵退学的风潮铺天盖地而来，很快就形成了一个“反走后门”的高潮。

1月27日晚，周恩来率中央政治局在京的15位成员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接见中央读书班全体学员和教职员及记者学习班的代表。周恩来主持，他说：“同志们，现在开会。今天这个会是几个单位联合召开的，和大家见面谈一谈。找大家谈一谈批林批孔问题，请政治局同志来讲一讲。现在请江青同志讲话。”

江青:“非常对不起同志们,这个任务倒是给我几天了,这两天忙,没办法准备,好在文元同志准备了,我讲一讲,叫做开场白吧。说错了的地方给我提出来,错了就改。

我想把批孔,就我所知道的这一段情况,向同志们介绍一下。我大概是去年春天去看望主席,当时主席那里放着《十批判书》,已经印给大家看了。主席讲,送给你一本。他说:‘我的目的是为了批判用的。’这个问题,今天在这里没有什么秘密了,郭老功大于过,前天在会上,中直国务院系统批林批孔动员大会已当面对郭老讲了,好像当时主席就有一首诗五言绝句,我就记不下来了,后来八月份又给我说了,叫做‘郭老从柳退,不及柳宗元,名曰共产党,崇拜孔二先’。

去年五月中央工作会议,我病了,到外头去治病,工作会议我就请假了。听说五月工作会议讨论过,回来以后工作很忙,我甚至把这首诗也忘了。当时是在保密的情况下,好像我告诉过文元同志。

去年1973年8月5日,主席把我叫了去,叫我作笔记,写了一首诗,标题叫《(读封建论)呈郭老。毛泽东》当时主席还有一些话,我是尽我可能记下来的。但记得还是一个纲要,今天拂晓我翻箱倒柜地找了。可是有些话我就记不得了,不过我尽可能记下来的讲一讲,平常我是也不好问主席,这首诗我问了主席,有的字我都问了,记录虽然是大纲式的,但还是比较可靠,当时政治局开了会传达了,可是没有议,今天咱们就大范围里传达来议,你看好不好,总理?”

周恩来:“好,可以。”

江青:“这首诗是七律:

‘劝君少骂秦始皇’,就是说劝你少骂一点秦始皇。

‘焚坑事业要商量’,就是焚书坑儒这个事业要商量商量。

‘祖龙魂死秦犹在’,祖龙指秦始皇,秦犹在指秦国土现还在。

‘孔学名高实秕糠’,孔子的名望吹的很高,秕糠就是糟粕。

‘百代都行秦政法’,政在这里是名词,秦始皇姓嬴名政。

‘十批不是好文章’,十批,指《十批判书》。

‘熟读唐人《封建论》’,唐人指柳宗元。

‘莫从子厚返文王’,不要从柳宗元倒退到周文王那里去了。

底下附:《封建论》,作者柳宗元,就是柳子厚。

现在这首诗外边传得很广,连小孩都知道了,以讹传讹,还不如公开地原原本本地一个字、一个字地告诉同志们。

主席给我讲的话,总的有这么个意思,历代比较厉害的政治家,以及春秋战国的封建政治家的前驱者李悝、吴起,后来是商鞅、李斯,他们是荀子的学生。儒家和法家历来是斗争的。法家主张中央集权制,郡县制,明目张胆地,你犯了法就要判罪,在历史上一般地说是向前进的,他是厚今薄古的。而儒家呢?他满口是仁义道德,一肚子的男盗女娼,它是厚古薄今的,开倒车的。"

接着,江青举了汉朝的刘邦、贾谊、晁错、周亚夫等例子。她说:

周亚夫"他的营盘叫细柳营,有个温庭筠有一首诗:'铁马云雕文绝尘,柳阴高压汉营春。'这首诗是赞扬诸葛亮的,但也引用'细柳营'的故事。下面几句诗是:'天晴杀气屯关右,夜半妖星照渭滨,下国卧龙空寝主,中原逐鹿不困人。象床锦帐无言语,从此谁周是老臣。'唐诗中多用此典故,如户纶《皇帝感词》中:'校猎长枵苑,屯军细柳营。'李贺《送秦光录北征》中:'露水接船渡,营门细柳开。'等等。周亚夫带兵很严明,连皇帝进他的营盘门,守卫的都阻挡他,然后,周亚夫出来迎接皇帝,赔礼说:我的守卫阻挡皇帝了,我有罪。不然敌人来了就把你的营盘冲了。皇帝就是用他打平了封建割据的吴楚七国。后来不用周亚夫了。当时是执行郡县制,我们现在还是施仿郡县制,就是多了人民公社。我们现在是中央、省、地、县、公社,基本上是郡县制。

汉武帝为什么尊儒呢?因为他刚刚打平了封建割据的诸侯,为了巩固中央集权的统治,所以他就用了董仲舒。其实在当时有一个有名的大臣叫汲黯,汉武帝很尊重汲黯,很听他,但也有不听。汲黯信黄老,接近一点法家。你们看《史记》、《汉书》都有他的列传。汲黯看不惯汉武帝搞的那一套,他说汉武帝:你内多欲而外施仁义。汉武帝一听很生气脸就变了颜色,就罢朝回后宫去了,简直要杀人的样子,后来气消了,又想到汲黯的好处。"

周恩来:"主席说,实际上汲黯把汉武帝的心思说出来了。"

江青继续说:"《史记》上有记载:'天子方招文学儒者,上曰吾欲云云,黯对曰,陛下内多欲而外施仁义,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上默然怒,变色而罢朝,公卿皆为黯惧。上退谓左右曰:甚矣汲黯之憨也!'太

憨头了,汉武帝说汲黯太厉害了,这时很多人告汲黯的状,但这个人怎么样?汉武帝还是用了他。可见汲黯是有道理的。汉武帝打匈奴是有功的。我们这个汉能存留下来,他是有功劳的。有一天,汲黯见武帝,武帝没有戴帽子,吓得赶快钻进帐子里去了。汉武是尊重汲黯的,汉武帝崇儒,但并不是反法家。汲黯是崇法家的。法家是比较先进的,当时儒法斗争是比较激烈的。可是汉武帝名义尊儒,是为了保持他的统治,但是在他心里,还是有法家的。

匈奴基本上是汉武帝时打回去的,因为当时我们是先进的农业国。匈奴是游牧民族,每当秋高气爽、草肥马壮的时候,匈奴就来了,轻骑兵一个人两匹马,重骑兵一个人四匹马,粮食断了不要紧,可以吃马血,用锥子向马腿一刺,吃马血。那个地方的马比我们汉族的强壮。当时打匈奴有个大将军叫霍去病,霍去病是大将军卫青的外甥骠骑将军。霍去病当官为骠姚校尉,从大将军,击匈奴,合官号叫骠骑将军。他人是很少的,就是率轻骑兵深入敌后,后来他的功劳,他的官位高于大将军卫青。卫青是个奴隶出身,是平阳公主家的奴隶,霍去病是卫青的外甥。另一个外甥叫霍光,是宣帝的宰相啊!汉武帝这个人不完全是儒家,还有一个证明,就是他有一个皇后,是歌舞、奴隶,叫卫驶,卫青的姐姐,武帝是看得起奴隶的。……”

她又讲了汉朝以后的几个皇帝的故事,然后说:“主席那天还给我讲了,杨荣国教授说孔子是为奴隶主服务的,这样我才看了杨荣国的文章。主席给我讲:北京才怪呢,北京就不欣赏上海、广州的学者。现在北京不同了,北大、清华的教授、助教和青年三结合的班子搞出了《林彪与孔孟之道》这个材料,立了大功。”说着转向吴德说:“当时是批评你的。”

“《人民日报》也一样跟着说林彪是极‘左’,上海不同,说是右。《人民日报》发表了文章,可能转载了呢?这是王若水组织的。我们中央接见了王若水,王若水态度很不好。”

姚文元插话:“还给主席写了信,挑拨中央领导同志的关系。”

江青:“主席对这封信非常不满意。71 年上海也搞出了一篇文章,”

姚文元:“是根据林立果的观点写的,署名蔡康成。第二篇文章

《千万不要忘记党的基本路线》是批他的。这就引起了‘小舰队’极大紧张。”

江青:“主席还讲了黄、吴、李、邱这些人成不了气候。一个兵也调不动。搞了什么叫叶主任,通报全国向他学习。林彪就调不动,他们更不行了。果然调不动。主席说,那是屁话,搞特务,而且特务班子也不统一,挺乱的。一家四口人,四个心都有自己的特务班子,一家四口人,走了四个门。林立果那个反革命的房子有一把钥匙,‘小舰队’的人可以进去。连一家子都不统一。这些人都是心惊胆战的。总而言之,在中国想搞什么政变这类事情,难!因为不仅党是我们主席亲自缔造的,军队也是主席亲自缔造和指挥的,听他们的啊?当然听主席的话。在座的穿军衣的不少,你们听林彪、吴、黄、李、邱的,还是听主席的?”

众人答:“听主席的!”

江青:“这才像个样子嘛!”

她接着说:“主席举了几本书:《四书集注》、《紫阳纲目》,主席加了个注,是朱熹的。朱熹这个人才可恶呢!朱熹以孔孟为名,打着孔孟招牌,好像他有点信佛教。禅宗是佛教的一个派别,代表人物有几个。主席说,《红楼梦》上就论了禅宗。《红楼梦》大家知道吗?但是对《红楼梦》,主席说:‘到现在还没有写出马列主义的评价文章,这是不对的。’这点恐怕从政治局到各科写作班子都有责任。今天传达一下,到现在还没有写出篇马列主义的评价文章,主席说:‘这是不对的’,主席说:‘说《红楼梦》是吊膀子的书,屁话。’《红楼梦》是一部兴衰史,也是一部阶级斗争史,用文学艺术写出来的。曹雪芹只写了八十回,高鹗的后四十回,没有完全按照作者原来的意思写,主席认为文字还可以,所以现在发行的是一百二十回的《红楼梦》。

主席又讲,我就是批评这个《十批判书》,郭老从柳退,不及柳宗元,名曰共产党,崇拜孔二先。红卫兵抄家时,郭老慌慌忙忙,要全部献出他的书,吓死了。我保郭老,找周总理没有找到,找到了陶铸,让他找个房子把郭老保护起来,后来对你说了。”她对周恩来说。

周恩来:“说了。”

江青:“当时郭老吓的不得了。眼下郭老一点自我批评都没有。

那天我也讲了,主席说郭老功大于过,肯定他很多东西,如肯定他的历史分期,为纣王、曹操翻案,最后还立了一大功,考证了李白是碎叶人,就是说当时阿拉木图一带是我们的,这是可靠的,郭老的功是大的。所以一直保他没有说,后来也没有说,没讨论就拖了,越拖郭老越被动,找总理给郭老谈,总理有点怕,拉春桥去,春桥也有点怕。"

张春桥:"因为我找过他两次,谈不通,总理也谈过3个钟头。"

江青:"主席说,有些人要保护,有些人要当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特别是提到刘诗昆,说了多次没有实行。当天夜里我向政治局汇报以后,就接见他,文化组的吴德同志也在。刘诗昆是剑英的女婿。主席说要多做点思想工作、教育工作,叫他搞点民族音乐、革命的音乐。

后来主席又讲了李斯、韩非子都是荀子的徒弟。荀子原来是个儒家,后来变成了法家。主席讲到了苏修,他们骂我们的文章,只讲儒墨,不讲法家。过去不骂我们的时候,也只知道儒墨。昨天听说英国破口大骂我们批判我们无标题音乐的文章,是我推荐发表的。另外还有一篇我们骂贝多芬是资产阶级音乐家,这是天经地义的。主席后来说:'英国、美国、法国的学者也不愿意法家。'最近看到主席对基辛格的谈话说:你的家乡,你的老祖宗黑格尔就是不欣赏儒家,非常喜欢法家。

最后,最重要的,主席说,郭老对待秦始皇,对待孔子的态度和林贼一样。这个同志们可以看看《十批判书》,我是没时间看,只看了两头,最后大吹吕不韦,大骂秦始皇,甚至人身攻击,我看了两头,觉得很严重。他写出的时期,也是一个重要关键,这是抗日战争后期,1945年,王明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影响还没有肃清,主席那么说是有道理的。前天郭老的情绪好多了。主席对小平同志三七开,我觉得评价太高了,这是很高的评价。有人对我四六开,我就很高兴了。主席对郭老没有几开,但说他功大于过。《奴隶制时代》,我看这本书,写的好,对甲骨文也是有功劳的。"

前天我讲了一个人口数字,也对也不对,回去核实一下不准确。在唐朝李世民时,不满300万户,人口充其量1000万,可能不到1000万。到唐明皇,公元740年,有4000多万人口。我查了一下秦朝人口,有2000万。秦坑了460个儒,占十万分之二点二。春秋战国时老打

仗,开始人口没有那么多,后来增加了一些,唐基本上按照隋。李世民为什么一年多就统一了呢?就是因为有隋的基础。唐玄宗李隆基公元740年,4000多万人口,以后就没有人口数了,只是户,只是记载增多了多少户。唐朝最兴的时候是6000万。我们进城按5亿人口计算,杀了4000个现代的儒,就是反革命的知识分子,占十万分之九点二。主席说:'坑儒'我们超过秦始皇100倍。实际上主席用这个威势压那些反革命老爷们。梁漱溟之流批评我们是秦始皇,我们全部认账,而且超过秦始皇100倍。

主席去年看《十批判书》,看了5遍,先头还看了,这次集中看了5遍,下决心要批判。我记的,把我作的记录,大概向同志们介绍一下,作个序幕,说错了就改正。"

接着,姚文元作长篇"批林批孔"的理论报告。在此期间,江青曾打断姚文元的报告,连续提出5个问题考问总政治部副主任田维新,后又为河南省唐河县马振扶事件讲了好长一阵子。

最后,周恩来就"批林批孔"问题阐述了9个方面的问题:

(一)批林批孔要结合,批孔是批林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批孔是挖四旧的根子(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社会根子,故必须多做社会调查,依靠广大工农兵群众;

(三)批林批孔是一场长期、尖锐、激烈的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故必须参加试点;

(四)对运动中出现的每一事物,要有分析,要分主从,要看方向,要区别领导与群众;

(五)报道要符合实际,要全面,不能只报喜、不报忧,或只报忧、不报喜;

(六)军队分社和记者在新闻工作中要有勇气承担调查和报道任务;

(七)批林批孔可与目前城乡正开展的批林整风、进行基本路线和社会主义教育结合进行;

(八)要注意民族政策,不要涉及民族宗教的风俗习惯;

(九)要警惕国内外反动派造谣污蔑和挑拨离间。

会议一直持续到午夜以后才结束。

# 第1298回：再致信，讨论马振扶简报 批安东，叶剑英检讨“后门”

1月28日，江青再次致信王洪文、叶剑英、张春桥、邓小平、陈锡联、苏振华：

洪文、剑英、春桥、小平、锡联、振华同志，请转世友、紫阳同志：

请代我向广州军区全体指战员，海南岛，西沙群岛全体军民，同志们致以无产阶级革命的敬礼！祝贺西沙群岛全军，民兵，渔民同志们与敌周旋，取得维护祖国主权的伟大胜利。

我身在北京，心逐南海汹涌澎拜，虽不能与同志们一块持枪战斗，但在思想上，政治上正在进行着一场大斗争。这场斗争是大是大非，是路线斗争，是在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直接领导下，在上层建筑，意识形态领域中进行一场持久的斗争——批林批孔运动正向纵深发展，势若燎原。我们是心连心的，我们都要打倒帝修反，为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中国，各自在党分配的岗位上战斗着，为了表示我对同志们的祝贺，特请作家浩然同志，诗人张永枚同志，记者蒋豪济同志代表我前去看望坚持在前线的英雄们并送给你们

——《林彪与孔孟之道》500份

——《五四以来反动派和地主资产阶级学者尊孔言论辑录》500份

——《批林批孔材料(一)，(二)》各500份

——《鲁迅批判孔孟之道言论摘录》500份

学习的第一单元是毛主席《我的一点意见》，第二单元是《毛主席致江青同志的一封信》，第三单元是《毛主席视察南方时和沿途负责同志的谈话》以上三份文件请世友，紫阳同志为你们准备。中央的通知还会告诉你们其他读物。

致

无产阶级革命的敬礼

江青

74.1.28 凌晨5时

1月28日,江青给河南郏县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人民公社下乡知识青年的信:

请浩亮同志亲送

河南省郏县

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人民公社知识青年同志们亲启

江青

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下乡知识青年同志们:

我看了人民日报今天对于你们批林批孔的报导,十分高兴!为了使你们早日得到阅读材料,更为了使你们知道毛主席、党中央对你们的关怀,我特请浩亮同志和一名新华社记者同志前去探望你们,祝你们坚持乡村的伟大胜利!在批林批孔运动中也会得到更大的胜利!

送上《林彪与孔孟之道》及其附件二百份;《批林批孔文章汇编》(一)、(二)各二百份;《鲁迅批判孔孟之道的言论摘录》二百份;《五四运动以来反动派、地主资产阶级学者尊孔复古言论辑录》二百份。其他材料中央将来会发给你们。

要重新学习毛主席的以下著作:一,《我的一点意见》;二,《毛主席致江青同志的信》;三,《毛主席在外地巡视期间同沿途各地负责同志的谈话纪要》;四,十大和九大的政治报告和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新党章。这些文件你们可能还有,如果没有请河南省委帮你们解决。

致

无产阶级革命的敬礼!

江青

一九七四年一月二十八日

1月28日,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讨论迟群、谢静宜在河南省唐河县马振扶公社中学调查后写出的《河南省唐河县马振扶公社中学情况简报》。

1月29日,根据中央政治局会议的决定,周恩来为转发《河南省唐河县马振扶公社中学情况简报》起草中央通知:“要求河南省委对此事认真复核,严肃处理,并将处理结果上报。各地也应注意,检查有无类

似的个别情况。”

张春桥阅后批:“个别二字建议删去,复辟现象不是个别的。”

再说中央警卫团副团长邬吉成去38军8连送材料后,刚回到钓鱼台国宾馆,就接到江青警卫员姜宝元打来的电话,说是江青指派他给中央警卫局负责人打电话,要他们给江青找一支自动步枪和一支半自动步枪,她要看一看,看完后即将枪交回去。

邬吉成听了很纳闷,“江青看枪干什么?看枪到部队或警卫战士那里看一眼不就行了,干嘛还要拿到她那里去看?”

但他不好问,于是在第二天一早,给汪东兴和张耀祠写了一个书面报告,报告此事,并建议由中央警卫团的军械科提供两支枪。

正好中央政治局1月27日晚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中央读书班和教职员及记者学习班的代表,汪东兴也参加了。邬吉成临时赶写了一张条子,托人把报告送进会议厅交给汪东兴。汪东兴马上就做了批示:“请吴德、吴忠同志阅批。我们团没有半自动步枪,请借一支。”然后直接将报告转给了也在开会的吴德。吴德当场就批给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吴忠:“请吴忠同志即办。”

吴忠看到邬吉成的报告和汪东兴、吴德的批示,在后面接着批道:“由邱巍高同志办理。”

北京卫戍区的副司令员邱巍高责成有关人员把借枪的事给办了。这份报告兜了一个大圈子,又回到邬吉成手上。不过,他看过这份经过几手的报告,又生出疑窦:“我们中央警卫团明明有半自动步枪,汪东兴为什么说没有,还要到北京卫戍区去借呢?”

过了很长时间,他才琢磨过味儿来:自己处理问题还是有点简单。既然对江青借枪感到蹊跷,就应该思考出应对蹊跷的办法来,可为什么还是按正常情况来处理呢?

汪东兴对此事的处理就显得很谨慎,很有经验。他也不好说不借枪给江青看,但他也不把自己管辖的枪送给江青看,而是以中央警卫团没有某种型号的枪为由,让中央政治局的成员和北京卫戍区的人都知道有江青要看枪这么一回事,都参与批准此事。

1974年1月3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本报评论员文章《恶毒的用心卑劣的手法——批判安东尼奥尼拍摄的题为〈中国〉的反华影片》,

文章说：

“自从天安门广场上升起五星红旗，新中国宣告诞生的一天起，世界上各种政治力量就对我们国家发生的翻天覆地的社会变革和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的巨大成就，抱有不同的态度。亿万革命人民和广大国际朋友表示赞扬和同情，而一小撮反动势力则表现出极端的恐惧和刻骨的仇恨。这是古今中外一切大革命所必然遇到的一种现象。去年开始在一些西方国家放映的、由意大利导演安东尼奥尼拍摄的题为《中国》的反华影片，就是当前国际上一小撮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分子对新中国极端仇视的心理的反映。这个影片的出现，是一个严重的反华事件，是对中国人民的猖狂挑衅。”

文章批判道：“安东尼奥尼是在1972年春作为我们的客人到中国来的。他带着摄影机访问了北京、上海、南京、苏州和林县。但是，他的中国之行，不是为了增进对中国的了解，更不是为了增进中意两国人民的友谊，而是怀着对中国人民的敌意，采取别有用心的、十分卑劣的手法，利用这次访问的机会，专门搜罗可以用来污蔑攻击中国的材料，以达到不可告人之目的。在他拍摄的长达三个半小时的影片中，根本没有反映我们伟大祖国的新事物、新气象、新面貌，而是把大量经过恶意歪曲了的场面和镜头集中起来，攻击我国领导人，丑化社会主义新中国，诽谤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侮辱我国人民。任何稍有民族自尊的中国人，看了这部影片，都不能不感到极大愤慨。如果容忍这样的影片在世界上招摇撞骗，那就等于承认任意侮辱中国人民的反动宣传是正当的行为，那就是向国际反动派的反华挑衅投降。我们要彻底揭露和批判这部影片的反革命实质，回答国际反动派对中国人民的挑战。这是当前值得人们十分重视的思想和政治战线上的一场严重斗争。”

文章列举了电影《中国》“丑化”中国的镜头和攻击中国的语言：“明明上海有许许多多现代化的大型企业，影片的摄制者却视而不见，而专门搜集设备简陋、手工操作的零乱镜头；明明黄浦江边矗立着能制造万吨轮的造船厂，江上停泊着我国的远洋轮，而在安东尼奥尼的镜头下，黄浦江里的大货船都是外国的，小木船都是中国的；安东尼奥尼把林县作为“中国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山区”介绍给观众，其目的恰恰

是要污蔑我国的社会主义农村。在影片中,闻名中外的红旗渠一掠而过,既看不到‘人造天河’的雄姿,也看不到林县河山重新安排后的兴旺景象。银幕上不厌其烦地呈现出来的是零落的田地,孤独的老人,疲乏的牲口,破陋的房舍……。他大肆渲染林县‘农民的贫困’,把一个山村说成是‘荒凉和被抛弃的地方’,把一所乡村小学竭力加以丑化。安东尼奥尼还恶狠狠地说,在今天的中国,‘如果我们想发现一个农村天堂,那就天真了’。这不是赤裸裸地诬蔑解放了二十多年的中国农村是人间地狱吗?影片完全无视我国城市面貌的巨大变化,渲染北京‘依然是个古老的城市’,住屋‘非常简陋’,‘城市规划化令人失望’;苏州‘同它的古老的面貌差异很小’;安东尼奥尼攻击人民公社经历了‘失望’,胡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打乱了生产系统’,使前人遗留下来的古迹已剩下‘寥寥无几’,甚至借用打太极拳的镜头,造谣说‘新的领导人’要‘取消’这一‘古老的传统’。”

此后,全国各报刊纷纷紧跟,同时发表了很多批判安东尼奥尼《中国》的文章,持续了将近一年时间,仅1974年2月和3月间发表的部分文章就合编了一本200页的书,名为《中国人民不可侮———批判安东尼奥尼的反华影片〈中国〉文辑》,由人民文学出版社。

1964年安东尼奥尼曾凭借《红色沙漠》在威尼斯电影节上一举斩获“金狮奖”,那年他52岁。然而时隔10年,在1974年的威尼斯艺术双年展上,安东尼奥尼却在获得荣誉的地方遭遇了痛苦。作为威尼斯双年展活动计划的一部分,《中国》原安排在威尼斯最好的凤凰剧院上映,但最后更换了另外一家影院。影片放映之前,正要进影院时安东尼奥尼被突如其来的一大群观众包围了,这些人是亲华的意大利左派激进分子,他们对安东尼奥尼提出抗议和指责。

1月30日,叶剑英致信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检讨自己在领导干部子女入学、当兵等问题上的错误。

事情的起因是叶剑英的小儿子叶选廉,他在空军34师102团二大队当飞行员。

叶选廉因为不请假外出,一连几个月让部队找不到踪影而惹恼了他所在的102团2大队的行政副大队长。他在全大队的会上,点了叶选廉的名,说:“我不管你是谁的儿子,今后再这个样子,该去哪去哪,

不要回来了。”

飞行大队的干部战士,当然支持这个副大队长的正义行为,他们联名给叶剑英写信,说他的儿子是“一个只拿钱,不干活的飞行员”。

叶剑英亲自写信给34师党委,请求将其小儿子严厉处分,直至开除军籍。

此事江青也知道了,她在政治局会议上点名批评叶剑英,说群众举报,叶选廉是“一个只拿钱,不干事的飞行员”。然后对干部子弟“走后门”当兵一事大加批判,并和“林彪路线”连在一起。

会后,叶剑英于1月30日给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写信,就江青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联系实际批林批孔点名批评自己一事,表示接受江青等人在“批林批孔”运动中的帮助,检讨在领导干部子女入学、当兵等问题上的错误。

信写好后,叶剑英没有使用通常的党内文件传递渠道将信送到毛泽东那里,而是在31日凌晨3时,把他的警卫参谋马锡金叫到办公室,问道:

“马头,你对主席那里的工作人员熟悉吗?”

“马头”是叶剑英给马锡金起的绰号。

马锡金说:“有熟悉的。”因为马锡金是中南海中央办公厅警卫局调来的,那里的工作人员有些他比较熟。

叶剑英说:“我有一封信,想不通过收发室和秘书局,直接送给毛主席。”

马锡金说:“我联系一下。”说着,他就给毛泽东的警卫李连庆打了电话,把叶剑英的意思对他讲了。

李连庆回答说:“你送来吧!”

马锡金立即把联系的情况报告叶剑英。

叶剑英说:“好!你马上送去。”他亲自把信封好,又在信封上写上“呈毛主席”,然后将信交给了马锡金。

马锡金自己开车前往中南海。夜深人静,马路上空空荡荡。不到15分钟,他就从叶剑英的住地——军事科学院二号楼开到了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的住地,把信交给了李连庆,并告诉他:“叶帅想尽快知道主席批示的情况。”

当马锡金返回军科院二号楼时,已是凌晨4时30分。他看见,叶剑英的房间灯光还亮着,就去向他汇报。听完马锡金的报告后,叶剑英这才去休息。几个小时以后,大约在当天上午8时30分,李连庆给马锡金打来电话,告诉他说:“主席看了,但不知道怎么批的。”

等叶剑英起床后,马锡金又立即把情况报告了叶剑英。

后来,空军34师党委将叶剑英的小儿子叶选廉送到了东北农场劳动,作为对他的严惩……

此事又引起34师几个高干子女的不满,他们一起去安慰叶选廉,回来后,怒气未消,又狠狠地对人说:“江青这女人太狂了,早晚非倒霉不可。”

因为空34师是专机师,从来没有一支中国军队,像空军34师一样,拥有如此众多的将帅子女。上至元帅、各军兵种的司令员、大军区司令员,下至军、师长,都千方百计地把自己的子女安排进这支部队。这里不仅有叶剑英元帅的儿子,刘伯承元帅的孙子,彭绍辉上将的儿子,韩先楚上将的儿子,杨勇上将的儿子,许世友上将的女儿。军、师长一级、中将、少将、大校级军官的子女加在一起,也足足有100人以上。

高干子弟有他们非常好的一面,也有被工农子弟鄙视的一面。懒散、特权思想、玩世不恭是那个时代军队高干子弟的通病。不仅叶剑英的儿子如此,许世友的女儿许华山同样如此。1972年许华山已经连续几个月不在部队,没有向任何人请假。一天,许世友的电话打到了部队,问34师师长:“你们把我的丫头派到哪去了,怎么几个月没有音训?”这一下可急坏了34师的领导,他们原以为许华山在家里,谁知,家里反倒向部队要人。于是,34师调动所有的关系,满世界的找人。最后,还是从海军司令部一个高干子弟那里得知,许华山这几个月一直在上海芭蕾舞团学习跳舞。把34师的领导们气的脸一个个憋的活像猪肝……

这帮高干子弟,在34师随心所欲,为所欲为。韩先楚上将的儿子,是按普通地勤兵入伍的,到了部队想干空勤。胡萍师长,亲自下令改为空勤领航员。领航员干了没几天,又要学飞行,于是又成了飞行员。这些普通人要经过几年航校培训的事,在他们身上,就是这样轻

而易举地换来换去。

中国的女飞行员,是体现中国妇女地位的职业。第一、第二批女飞行员都是从极优秀的高中学生中万里挑一选出来的。而1973年分配到34师的第四期女飞行员几乎没有一个不是军、师以上领导的女儿。那一时期,女飞行员的职业,几乎成了高干女儿的专利。

当然,34师的高干子弟表现也有很好的,像刘迫承元帅在修理厂的孙子,有极好的口碑;独臂将军彭绍辉上将的儿子,是102团一名看似极普通的机械师,十分和气,没有一点干部子弟的架子。

# 第1299回：情报所，恽仁祥收到回信 四机部，又发生“蜗牛事件”

1月31日，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转发《河南省唐河县马振扶公社中学情况简报》的通知：“请河南省委认真复核，严肃处理这一修正主义教育路线进行复辟的严重恶果，并迅速将处理结果上报。各地也应注意，检查有无类似情况”。

这天，周恩来致信毛泽东，报告一个月来对内对外各项工作情况。他还和张春桥一起前往看望郭沫若，并将毛泽东所写《读〈封建论〉呈郭老》七律诗、柳宗元《封建论》及注释等书送给郭沫若。在探望时，周恩来对郭沫若说：“你那些书要清理清理，但到底有什么问题，我还说不清楚；你们大家都读书，我回去也读你的书，读完后再说，不要急于写批判文章。”

当天，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讨论批林批孔问题。鉴于运动开始后发生的一些情况和问题，会议提出：

“在党政机关、军队系统、生产部门和大中学校等应早一点规定一些政策界限，报经中央和毛主席审批后，下达全国试行。其中有：

各野战军和军委、各军区的作战、机要、通信、情报、运输、供给等部门不搞四大；

党政机关则应集中在一个易于观看的地方贴大字报，机关的学习初期可定半天，其他时间仍搞业务；

学校、工厂都不放假搞运动，学校可分出一定时间学习和批判，工厂可在生产外的时间搞，农村公社亦然。凡学习时不论哪个单位，都要有值班员，不致误紧急事件。”

会议还决定成立由周恩来、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华国锋和汪东兴7人组成的小组，代表中央处理批林批孔日常事务。军队系统则根据李先念的建议，由军委6人小组负责处理有关问题。

第二天，2月1日，周恩来、王洪文联名致信毛泽东，汇报1月31

日政治局会议情况。毛泽东圈阅了此信。

1月31日,中共河南省委在郑州召开有12万人参加的“批林批孔动员大会”,宣读江青1月28日由浩亮送来的信,并于第二天发出通知:

1974.02.01;豫发(1974)7号

全省各级党委、党支部:

江青同志一月二十八日给郏县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人民公社下乡知识青年写了一封信,并请浩亮同志专程亲送给知识青年同志们,充分体现了毛主席、党中央对下乡知识青年的亲切关怀。

江青同志的信,不仅是写给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人民公社下乡知识青年的,也是写给全省下乡知识青年的,是写给全省人民和各级党委的。

江青同志的信,传达了毛主席、党中央的伟大战略部署,是我们深入开展批林批孔斗争的强大动力。江青同志的信,是对坚持乡村的知识青年的莫大鼓舞和激励,是对我们各级党委的有力鞭策和教育。

省委决定,立即把《江青同志给郏县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人民公社下乡知识青年的信》,印发给全省下乡知识青年同志们,并发到全省城乡党支部,向广大群众宣读。我们要认真学习讨论,坚决贯彻执行,像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公社的下乡知识青年同志们那样,当批林批孔的尖兵,做革命的促进派,迅速在全省范围内掀起批林批孔的新高潮,坚决把批林批孔斗争进行到底。

中共河南省委

一九七四年二月一日

此后,“批林批孔”运动迅速在河南全省各地开展起来。

2月1日,《人民日报》报道《上海港务局第五装卸区工人一张革命大字报:要当码头的主人 不做吨位的奴隶》。《人民日报》编者按说:

上港五区工人的这张革命大字报,抓住了当前企业管理中的要害问题,具有普遍的现实意义。

社会主义企业,到底靠什么调动群众的积极性,靠什么把生产搞上去?这个问题不是小事,是大事。大字报向我们敲了警钟:党委不

抓大事,文化大革命中已被批判了的东西也有可能重新出现,社会主义企业仍然有可能走到修正主义路上去!

这天,《红旗》杂志刊登罗思鼎的文章《从王安石变法看儒法论战的演变——读<王荆公年谱考略>》和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的文章《林彪与孔孟之道》。

2月2日,国务院科教组在《教育革命简报》上登载一批教育系统批判"走后门"的材料,并加编者按语:在批林批孔中,要抓现实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严肃检查、批判和纠正走后门这种背叛马克思主义的不正之风。之后,一些高等院校开始揭发、追查"走后门"上大学问题。

随着"批林批孔"运动的开展,加上报纸上大量的"反走后门"报道,人们都以为第二次文化大革命又来了。北京以及全国各地的局势再次动荡起来。一些造反派又再次拉起山头,成立各种联络站、上访团、汇报团之类的组织。许多地方派性再起,到处张贴大字报,提出"矛头向上",各级党政机关受到冲击,社会秩序再度陷入混乱。

江青和王洪文一起,成立了一个专门处理全国各地主要是造反派写来的有关"批林批孔"来信的四人小组,每天要出几期《要信摘报》,上报毛泽东和分送在京各政治局委员。

2月5日,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讨论"批林批孔"运动问题。会议认为:"目前各地各单位运动处在发展不平衡状态,经验还不够多,如果过早地规定政策界限,可能对群众的发动定了框框,不如先看一看,搜集更多材料,多积累些经验,才好提出问题谋求解决。"

会议对军队系统要害部门不搞四大、由党委统一领导运动,以及野战军部队不另成立战斗队、不搞外出串连等问题作了布置。

2月6日,周恩来致信毛泽东,汇报2月5日政治局会议情况。并就一些地方和机关批"走后门"一事提出:"如果只研究走后门一个问题,这又太狭窄了,不正之风决不止此,而走后门又要分析,区别处理,才能收效。"

毛泽东圈阅了此信。

2月5日至8日,国务院科教组召开教育系统第二次批林批孔座谈会。会上传达了1月25日中央和国家机关批林批孔动员大会精

神。迟群在会上强调:不批孔,就是不批林;要求揪出各地复辟的代表,抓本地的马振扶典型。

2月6日,江青将迟群等反映“批林批孔”情况的材料转送毛泽东,并附信再次求见。

2月9日,毛泽东在江青2月6日信的信封上批示:

“除少数外大都未看。近日体温升高两度,是一场大病!一切人不见,现在恢复中。你有事应找政治局。”

2月9日,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讨论2月7日外交部关于几个开放城市(杭州、武汉、郑州、沈阳、上海)最近大字报上街情况的报告。

2月10日,中共中央下发《关于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对外宾、外交官员和在华外国工作、学习人员有关“四大”的几项规定(草案)》。《规定(草案)》提出:各单位、各地区张贴的大字报,除中央另有规定外,一般不许抄贴中央文件,大字报和大辩论均不许泄露国家机密。

2月10日,江青给国防科委情报资料研究所恽仁祥回信:

恽仁祥同志:

你一九七四年一月三十一日的信,我今天早上才收到。我很报歉,未能及时收到你的信。

你们的材料那么困难,我很惊讶!国防科委的批林批孔运动搞不起来,必有原因,得你们自己找。我相信只要按毛主席的教导去做,总会冲破障碍而前进的。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

现送上:

《林彪与孔孟之道》

《五四以来反动派、地主资产阶级学者尊孔复古言论辑录》

《批林批孔文章汇编》(一)(二)

以上材料各100份。如不足,我可以再送,请告我数字。

这封信可以给国防科委所有愿意参加批林批孔的同志看。不愿参加批林批孔的人要,也可以看。

不要再闹资产阶级派性了,敌人利用派性挑拨离间,要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原则基础上团结起来!批林批孔是路线斗争,要抓住批林批孔路线斗争这个纲,这就是目前我国党、政、军、民、学以及其他各界的头等大事。

胜利是会属于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同志们！

致以

无产阶级的革命的敬礼！

江青

一九七四.二.十.晨

恽仁祥是国防科委的造反派。清查“516”时，被关押3个月。1974年1月，他给江青写信，反映科委批林没有搞好、批林批孔的材料太少，并介绍了自己被迫害的情况。信写好后，敞着信封交给了正在主持情报资料研究所核心组会议的核心组组长刘毅民。刘毅民当即看了信的全文，提出了修改意见。恽仁祥按他的意见当场作了修改后，又交给了他。

2月10日，星期天，春节放假的最后一天。这天上午，恽仁祥正在菜市场买菜，中央办公厅两人在情报所一人的陪同下在菜市场找到他，对他说：“江青同志给你写了信，并送来400份《林彪与孔孟之道》等四种材料。”恽仁祥闻讯十分激动，接过信便赶回研究所，把信交给了情报所负责人刘毅民。两人一起拆开信看了全文，接着，刘毅民让恽仁祥陪他把信报送给科委领导。

当时的科委主任兼党委第一书记是陶鲁茄，他和科委副主任钱学森一起来到情报所参加全所大会，宣读江青给恽仁祥的信。就在这次大会上，有几个人站起来建议：“应尽快吸收恽仁祥同志入党、并参加核心组工作。”

恽仁祥所在的党支部书记站起来说：“我们支部早已安排计划发展恽仁祥同志入党，由于所里布置不发展党员，……”

不到一周，恽仁祥加入了共产党，并在不到半个月内当选为所党的核心小组副组长。

2月10日当天，情报所负责人刘毅民把江青给恽仁祥的回信复印了好几百份，并铅印了一部分。

过了三、四天，情报所政治部告诉恽仁祥：“周总理指示：江青同志的信，铅印件可以下发，影印件不要下发。”

又过了一、两天，政治部又通知恽仁祥：王洪文要看江青的信，并指定政治部领导陪他把信送到中南海西门传达室。

再过了两、三天,政治部把信还给了恽仁祥,恽仁祥发现王洪文改了信中一个错别字,即原信中是“我很报歉”,王洪文改为“我很报(抱)歉”。

不久,国防科委在首都体育馆召开万人群众大会,传达江青给恽仁祥的回信。

就在恽仁祥收到江青回信的那天,2 月 10 日下午 15 时,3 辆“大红旗”驶进了四机部机关大院,是江青来了!她下车就点名要见四机部设计院政治处宣传科的一位干事。

原来,1972 年,国务院批准从国外引进一条彩色电视机生产线,决定由当时的四机部、外经贸部、中央广播事业局和国家计委负责实施。于是,四机部组成了 12 人考察团,于 1972 年底先赴日本考察,将日本的电视机厂家松下、日立、索尼、东芝、三菱和夏普都看了个遍。一考察才恍然大悟,要生产彩色电视机首先要有彩色显像管,而生产彩色显像管又需要玻壳、荧光粉、荫罩、石墨乳和总装等好几条生产线,而这些中国当时根本没有。当时在日本要 4 家工厂才能把这个显像管弄齐。

回国后,他们了解到美国有一家叫 RCA 的厂家,这 4 种技术都有,于是又写报告,由外贸部向 RCA 寻价。对方报价很快就到了,接报价后,即组织翻译并邀美商来京并开始谈判。当时 RCA 报价一亿三千万美金,谈判结果降到七千三百万。1973 年 11 月 23 日,四机部这 12 人又组团到美国实地考察。参观完 RCA,考虑到各国的玻壳技术都来自于美国著名玻璃制造企业康宁公司,于是又到康宁公司进行考察对比,之后就准备回国了。

在机场,就在考察团即将登机回国之际,康宁公司国际部经理扛着一个箱子跑了过来,他从箱中取出一个个包装得很好看的硬盒子。打开一看,原来是送给考察团成员的礼品,每人一个工艺精致的玻璃蜗牛(sea snail)。当时谁也没有多想什么,很高兴也很礼貌地接受下来。回国后向部领导汇报工作时,大家还将这件礼品拿出来大家传看了一下,都觉着康宁的玻壳确实不错,透明度好,没有汽泡。同时,从康宁公司出版的工艺礼品册子中,发现这只小蜗牛价值 55 美元。

此时已临近春节,代表团向部领导汇报后,决定不放假,家在外地

也别回去了,抓紧总结,研究到底从哪个公司引进哪项技术。

这时,四机部设计院政治处宣传科的那位干事给江青写信,揭发美国康宁公司给四机部代表团送蜗牛一事是讽刺挖苦中国的“爬行主义”,。

春节也未休息的江青驱车来到四机部,在四机部大院里就指责说:“这是美方在污蔑我们”,“说我们爬行”,“我们绝不能屈服于帝国主义的压力”。

当时四机部王诤部长不在,值班的副部长高峻赶紧出来接待。江青怒冲冲地指着高峻问:“蜗牛放在哪里?给我拿来,中央要用它作展览!”“我们要向美国驻京联络处抗议”,“要把蜗牛退回去”,“这条彩电生产线我们不要了”。

高峻老头不知说什么好,只能点头哈腰的应付着。

因为适逢周日,写信人未上班。性急的江青又当场给那位干事写信说:“我十分赞赏你的爱国主义精神,中国人民在毛主席领导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站起来了!绝不能再受帝国主义的屈辱!”

四机部党的核心小组哪敢怠慢,随后立即接连召开了扩大会议和全四机部大会进行传达。大会对美国康宁公司以赠送礼品为名而“侮辱中国人民”的行为进行了谴责,强烈要求部领导不再从美方引进彩色电视显像管生产技术,并通过外交途径将“蜗牛”退回。有人还在会上严厉批评部领导思想右倾,对这一严重政治事件,既没有立即当作一件大事来抓,也未及时向中央报告。

2 月 11 日,李先念副总理召集国务院 4 个部门的领导开会,他在会上发脾气了,针对四机部发生的“蜗牛事件”骂道:“你娘个 X!人家给你个反动标语,你也不打开看看?”

同时,四机部也发了简报,通报全国。而且,各部委、各省市、举国上下各个单位都要查,这几年都收到什么礼品了?有没有类似“蜗牛”一样污蔑中国的东西?结果,有的单位就查出了黄牛和乌龟,乌龟是日本人送的,日本人认为是长寿,中国可不这样认为,乌龟那就是“爬”呀。黄牛也是一样,老牛拉破车嘛!

12 日,周恩来召集相关领导开会,责成外交部查一查接受礼品有什么规定,美国送蜗牛有什么讲究。中联部也找外国在华专家调查

一下。

接着,水利电力部、邮电部也先后于2月13日和14日先后召开全部声讨大会。大字报一张接一张,大小会谴责声也一浪高过一浪,眼看这个“蜗牛事件”就要波及到国务院的其他部门和全国所有涉外单位。

图为1973年底美国康宁公司赠给四机部赴美国考察团成员的玻璃蜗牛。此为1988年1月原四机部国际司司长邓国军捐赠

再说外交部2月12日接到周恩来的指示后,立即给中国驻美联络处发电,要求调查美国人送蜗牛的用意。14日,调查反馈回来了:在英语中,确有以蜗牛的速度来形容动作缓慢的习惯用法,然而蜗牛确系康宁公司生产的圣诞礼品,而且玻璃制品蜗牛或用巧克力制作的蜗牛,是美国人至爱的礼品之一,没有快呀慢呀的概念。还有外国专家称,蜗牛代表吉祥,美国还有歌颂蜗牛的诗歌。送礼品的目的,只是想讨好中国人,希望中国买他们的技术。

2月18日和19日,周恩来又两次指示外交部,对“蜗牛”礼品进一步调查研究后再作定夺。电报不向下传达。

21日,外交部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对赴美彩电考察组和出访人员

进行了认真的调查,并查阅了有关资料,写出《关于美国人送“蜗牛”礼品等事的报告》,认为对礼品或资料中发现的问题,应实事求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康宁公司对中国考察组给予了热情友好的接待,未发现有任何不礼貌的言行。

报告同时建议:“就礼品问题与外国交涉,则更须慎重,要区别不同情况和对象,坚持原则,讲究政策,妥善处理。对于美国康宁公司赠送的‘蜗牛’礼品是否为有意侮辱中国,据现在掌握的情况来看,我们仍做不出肯定的结论。”

周恩来看了外交部的这个报告,当日即批示:“外交部这一分析和所提处理意见较为正确、拟同意外交部这一报告,即呈毛主席批示。”

毛泽东圈阅后,表示同意。

在此期间,周恩来还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对“蜗牛事件”作了研究。会议决定,江青在四机部的讲话不印发,不下达,已印发的立即收回。

事情不再扩散了,对代表团成员自然也不做任何处理。

江青在会上没有争辩,只是悄悄派人将她从四机部拿回的玻璃蜗牛退回,写给那位青年的原信也要了回来。至此,喧嚣一时的“蜗牛事件”遂告平息。但彩电显像管生产线的引进工作也搁置下来,谁还再敢搞“爬行主义”啊!怎么办呢?四机部就让那个宣传科的干事带着设计院18个人到南京市741厂即华东电子管厂去搞“争气管”,但是一直也没有搞出来。

# 第1300回：反黄帅，王亚卓的一封信 林立衡，第三次服药自杀

1974年2月11日，中央电台早间新闻广播了《黄帅的一封公开信——复内蒙古生产建设部队十九团政治处王亚卓同志》。当天的《人民日报》一版头条也发表了黄帅的题为《为教育革命大好形势拍手叫好》的一封信，并加了编者按：

革命小将的来信和日记摘抄在报纸上发表后，广大师生和群众都积极支持黄帅的反潮流精神，热烈赞扬毛泽东思想哺育下一代新人茁壮成长。但是，也有人看不惯，出来指责，王亚卓同志就是一个。黄帅同学写了信，对他的错误思想一一加以批驳，值得一读。

《人民日报》编者按还指出：

教育战线两条路线、两种思想的斗争，仍然十分尖锐。是前进还是倒退？是支持革命还是折衷调和？是扶植和发展革命的新生事物还是对它横加指责？这是进一步发展教育革命大好形势必须解决的重要问题。

黄帅的《公开信》里说：

“你的来信提出了一些引人深思的问题，如当前教育战线上有没有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修正主义的流毒是否肃清了？要不要少年儿童参加教育革命？他们能不能革命？是把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进行到底，还是已经过了头？这些原则性的问题站在不同的立场有着不同的回答，这正反映了教育战线上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进行着你死我活的激烈搏斗……”

“因为我在日记中用了‘对不起’等词，却引起你这位很善于‘同情’的人怒火万丈，什么‘迫人太甚’，‘不通情理’，‘态度大错特错’，‘何不也检查检查自己’，‘自己做事没从路线出发’‘师长式的学生’，‘学生就能把老师当敌人’……甚至‘学道尊严’都上了阵，你的创造是从哪一家的圣经里拣来的？在你眼下，我们毛泽东时代的红小兵是

一群‘纠缠枝节’‘坏了大事’的顽童,快点来个‘高姿态’,‘心平气和’,‘诚心’地跪倒在孔老二门徒面前才有出路,你所宣扬的不正是从二千多年前孔老二僵尸中贩卖的‘仁’吗?想要我们这群毛孩子学会‘克己复礼’,甘心当被奴役的工具。每当‘儿童团’起来革命,刘少奇、林彪一类政治骗子就抱着黑‘修养’‘天才论’哇啦哇啦地叫起来,你爱什么,恨什么,不是很清楚吗!”

王亚卓何许人也?竟敢指责《人民日报》支持的黄帅,反《人民日报》的“潮流”?调查情况很快出来了。原来“王亚卓”并非一人,而是三人。

1974年元旦过后的一天晚上,内蒙古建设兵团19团政治处宣传股报道员邢卓和平日意气相通的宣传干事王文尧、电影放映员恩亚立一起议论黄帅,觉得这孩子太骄狂太无知,很有必要对她进行教育。言语中情绪都有些激动,于是,3人决定从每人名字中各取一字,成笔名“王亚卓”,由邢卓执笔给黄帅写了一封信:

黄帅:

看了报纸上你的信及日记,我想了许多许多问题,归根一点,对你的反潮流精神很佩服,对你信和日记中反映的问题觉得未免有些迫人太甚!

老师和学生是同一战壕里的战友,老师不能把学生当敌人,那么学生就能把老师当敌人吗?不是说你给老师提了意见,就把老师当敌人了,而是提意见的态度大错特错了。必须明白,老师也是我们的阶级兄弟,他们有缺点错误,我们是满腔热忱的帮助他,还是以抵触的情绪批评人家,反映了两种不同的世界观,当然老师有不对之处学生提出来,不应该强调提意见的方法,应该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但我们何不也检查检查自己呢?

如果我是你,检查一下自己的日记,再看老师的作法,决不认为是因为个别用词不当影响了老师的尊严,而会看到自己的语言中欠诚意,老师思想革命化程度不高,师生关系紧张了,并非是什么“师道尊严”在作祟,试想,假若对你身上存在的不足,别人不是找你做细致的思想工作,而也以你对待老师的方式,写几篇东西在纸上,用上对不起,骂,夺,拍桌子,瞪眼睛之类的词句对待你,你将会怎样想呢?自己

做事没从路线出发,又为自己的被压制作了些抵抗,这怎么能联得上不做旧教育制度“师道尊严”奴役下的奴隶一谈呢?

……

黄帅,我向你提意见,不单是对你个人的做法谈看法。现在许多学校里,老师都成了谨小慎微的君子,学生动辄就是大字报,谓曰“反潮流”,“做教育革命的闯将”,其实这是一股很不好的潮流,老师是我们的革命同志,在思想、政治上的帮助才是对他们的最大关心、爱护,才是革旧教育制度的命,光在枝节问题上纠缠,岂不坏了大事?这样下去,老师还能多说话,多负责么?

你的信和日记,细分析起来,很多地方不通情理,关键是矛头指错了,这方面,我不多说,请你拿出自己写的东西,三思!

……

要和你说的话很多,强收住笔。我不是学生也不是老师,教育战线上的事懂得少,分析能力又差,只是出于关心上层领域里的革命之心说几句话,想到哪写到哪,语无伦次,字又潦草,观点必定有不对之处,请你批评指正。以后有空,我还想再给你写信。即此

祝工作好、学习好。

内蒙古生产建设部队十九团政治处

王亚卓

七四年、元月、十四日

1974 年春节,王文尧、恩亚立分别回天津、北京家中过年去了,“王亚卓”中只有邢卓留守边疆。这期间,他收到北京黄帅的亲笔回信,信中言辞诚恳,说读了“王亚卓”的信后,想了很多很多,“自己年纪还小,许多方面还很幼稚,行为可能有不当的地方,需要更加努力地学习毛主席著作,作进一步的思考”,并表示愿意得到“王亚卓”更多的指点和帮助,使自己尽快成长起来,做合格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

北京。“王亚卓”寄给黄帅的信很也快到了迟群的案头,据说是黄帅的父亲送上去的。迟群在这封信的边缘批道:“要革命就有反革命,革命就是要革反革命的命。”

接着,《人民日报》总编辑鲁瑛收到了黄帅致“王亚卓”的公开信。

2 月 6 日一大早,内蒙古建设兵团 19 团政治处秘书李尚顺告诉邢

卓,凌晨两点时,人民日报社有长途电话从北京打来,问19团政治处有没有叫“王亚卓”的?李秘书脑筋灵活,虽然不知道“王亚卓”他们给黄帅写信的事,但判断出“王亚卓”一定是邢卓他们3人的联名,以为他们有什么大作将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兴冲冲按照来电要求把邢卓他们的年龄、性别、家庭出身、政治面目、工作性质详细作了汇报,并迫不及待向邢卓转达,连向邢卓恭喜好运。

听了李秘书的话,邢卓心里七上八下。他很清楚,他们并没有给《人民日报》投过稿,“王亚卓”仨字也只在给黄帅的信上用过。“报社是不是要发表我们给小学生的信?果真如此,说明我们的意见得到了上级部门的重视,……事情会这么简单吗?”邢卓猜不透……

而此时,人民日报社,鲁瑛在黄帅致“王亚卓”的公开信前安排了编者按,然后报送姚文元:

文元同志:

送上《黄帅复王亚卓的一封公开信》和编者按等,请审阅。据内蒙兵团二师十九团政治处李尚顺同志介绍,给黄帅写信的王亚卓是三个人,具体姓名和简单情况是:

王文尧,男,23岁,党员,家庭出身工人,是1969年从天津到内蒙兵团的知识青年,现任十九团宣传员。

邢卓,男,20岁,共青团员,家庭出身革命干部,是1969年从河北保定到兵团的知识青年,现任报道员。

恩亚立,男,20多岁,共青团员,家庭出身工人,是1969年从北京到兵团的知识青年,现任放映员。

致以

无产阶级的革命敬礼

鲁瑛

一九七四年二月七日

姚文元当天批示:“拟同意发表黄帅致王亚卓的公开信(王亚卓信的主要论点已有,可不发)。这封信回答了一些责难,写得也有力,即送洪文、春桥、江青同志审批。”

2月9日下午19时,江青在鲁瑛的报告上批示:“我改了标题。建议版面安排得突出些,生动活泼些。妥否?请酌。”

随后,王洪文批示:“同意”。张春桥圈阅。

2 月 11 日清晨,邢卓听到高音喇叭播放的中央电台早间新闻中女播音员高亢激昂的声音:“《黄帅的一封公开信——复内蒙古生产建设部队十九团政治处王亚卓同志》。

邢卓默立在刺骨的冷风中,怀疑自己是在做梦。他感到毛骨悚然,太突然了!“前几天小学生不是来信说我们的信对她很有教益,希望我们继续对她进行帮助么?怎么顷刻间就变幻出一副杀气腾腾的面目,要置我们于死地呢?”邢卓恍惚……

广播里播放的黄帅这封公开信写于 1 月 26 日,而她亲笔写给“王亚卓”的那封回信日期是 1 月 19 日,差 7 天时间。

宣传股长崔钦找到邢卓:“主任叫你去。你们可惹祸了。”

政治处主任面色严峻的对邢卓说:“你们真不知天高地厚呀。”“这把火烧得可不小哇。”

邢卓想辩白几句,但此时只觉得口焦舌燥。

政治处主任继续说:“兵团政治部和师部都来了电话要对你们的事进行调查,团长、政委作了指示,让你们把问题解释清楚。你把事情经过写一写,要快,写好后交给我,一定要实事求是。”

建设兵团和师部组成的工作组由兵团副政委挂帅开车来到了 19 团。王文尧、恩亚立被加急电报召回。他们一下火车便分别被吉普车接走,3 人被隔离审查。

工作组要他们交出后台。他们 3 人实在讲不出“王亚卓”背后有什么幕后操纵者。工作组围绕这个题目日夜攻心,终无所获。接下来是一波接一波对“王亚卓”的批判浪潮。“王亚卓”当年都是红卫兵,几年前皆亲历过批斗“牛鬼蛇神”的运动,见识过群情激愤、同仇敌忾、拳脚相加、干柴烈火的恐怖景象。但是 1974 年对“王亚卓”的批判会,已经没有了当年群众的激情,冷冷清清,不了了之。

后来,邢卓收到保定籍的战友从家乡捎回的一包食品,里面夹着一张字条,上书:“好自珍重。弟兄们也是迫不得已,切勿当真。”落款是“六连人民”。

原来,这是在批判会上登台读批判稿的六连战士写的,他们是要告诉邢卓,他们那样做都非本愿,六连的这组稿子被人整理后在《兵团

战友》报上发表出来,他们心里愈发不是滋味,苦于找不到机会向邢卓解释,因而有了食品袋和袋中的纸条。

经过十几轮批判和数不清的深刻检讨,“王亚卓”问题有了处理结果:给予王文尧党内警告处分,下放连队;恩亚立团内严重警告处分,下放连队;邢卓留团察看一年,下放连队。他们3人分别分配到离团部百里远的3个连队。

我们再说林立衡。她在1972年9月回到空军报社后,参加报社的学习。她的发言,大家反应也比较好。但是,自空军报社进入揭批查《空军报》的问题后,林立衡的态度开始发生变化。因为涉及到报社的文革运动,林立衡将报社中与她一派的人,说是同她一起“向林彪作斗争的战友”,把他们在文革中做的一些事情解释为“反林的方法策略问题”。因此,与其他群众的差距越来越大。于是,她就经常说要写材料,不到报社来参加学习。有时来了也不发言,私下对人说:“总政李德生主任不相信我,李平主任也不相信我。”“你们把我当敌人看待。”

1973年4月28日,林立衡在报社发言,讲了6个问题,主要还是说自己“一贯反对林彪”。对文革初期报社批斗5位正副处长的问题,她把责任推到苏天中副处长那里。苏天中原来是跟着林立衡写文章的,因为1968年,林立衡与空政保卫部陈干事谈恋爱,苏天中向叶群作了汇报,叶群不满,动手打了林立衡,她服安眠药自杀,被老保姆王淑媛发现送301医院抢救。以后林立衡也就不相信苏天中了。《空军报》宣传林立果的《讲用报告》本来是经林立衡审查大样之后发表的,她这时候也说“根本不知道”。

5月23日,林立衡出麻疹,送302医院住院治疗,5月29日出院。

6月,林立衡按照公安部革委会主任李震、组织部业务组组长郭玉峰的交代写材料,没有参加报社的学习。

8月,总政驻空军工作组向中央政治局建议:“根据林立衡的政治态度和思想状况,彻底转变其立场、观点,还需做长期、耐心的艰苦细致的工作,目前《空军报》即将投入复刊筹备工作,为了给她一个更好地接触工农,接触实际的条件,建议下一步到一个安全条件好的五七干校锻炼一个时期,争取边劳动边读书边搞大批判的方法,逐步把她的思想引上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轨道”。

周恩来说,将林立衡继续留在空军学习,再看她半年。

遵照毛泽东、周恩来的指示,空军在东交民巷空军报招待所新高干楼8号选了一处房,让林立衡从警卫一师搬进去住在这里。张清林回总后参加学习。他们还从各军区空军选调一些水平较高的女干部组成一个帮助小组陪同林立衡一起学习,报社的金为华、谭先德、石玉增等人参加。这个小组的组长是民航总局副政委、中国第一批女飞行员诸惠芬,《空军报》金为华任副组长,组员中有尖子女飞行员汪云、张玉梅,还有各军区空军选调的副指导员、排长、女军医、护士长等。警卫一师的程言翠、侯颜娥也到空军招待所同学同住。

1973年12月25日,总政主任李德生接见总政驻空军工作组组长李平和空军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高厚良。

1974年1月3日,李平、高厚良和小组负责人一起找林立衡谈话,让她搬到空军招待所。

1月7日,林立衡在小组会上作第一次检查,其中说道:“尽管个别人要搞阴谋,想刁难侮辱我,那也是办不到的。”

1974年春节,空军政治部领导特意在招待所安排一些酒菜,请林立衡和帮助小组同志一起欢度春节。

2月,林立衡向组里提出,要去警卫一师原住房取东西。金为华等人研究后,让负责安全的谭先德带两名女干部陪她一起去。谁知林立衡到了警卫一师,一进房门就反手上了锁。过了20分钟,谭先德呼叫无人应,门锁了推不开,只好砸了窗户上的玻璃进去,发现林立衡服药躺在地上。女医生用手指插进喉咙,迫使林立衡吐出一些东西。谭先德抱着她的头,摸她的脉搏都正常,随即叫车紧急送往空军总医院抢救。医生问她吃了什么东西,她不说,化验她吐出的东西,判明是安眠药片。

空军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高厚良接到报告后,立即吩咐转送301医院治疗。3天后,林立衡出院回到空军招待所。检查她手边还有安眠药非那更51片,乘晕宁16片,还有冬眠宁、安乃静等多种安眠药物。林立衡那天服下的安眠药有20片。服药的原因她不说。小组分析认为她自杀的原因之一是《空军报》复刊没有恢复她的领导职务,反而要她检讨在空军报社所犯的错误;许多问题她难以自圆其说,内心抵触

而服药自杀。也有人认为她手上还有很多致毒的药片没有吃,她这样做,并不是真想死,而是对组织的威胁。

2 月 13 日,林立衡就她自杀问题作了一次检查。说“事情发生之后,组织上和同志们非常关心,送医院治疗,我很感动。”但又说自杀是被迫的,关键在领导,不自杀没有出路。为怕她再出事,小组加强了防范措施。把住房窗户钉死,昼夜有两人轮流值班看护。

# 第1301回：“黑画展”，急叫停反“走后门”毛泽东，提出分“三个世界”

1972年底，北京饭店修建了新楼，周恩来指示北京宾馆从各地征集一些国画作品，用来装饰客房、大厅等。

文革开始后，很多画家受到了冲击和批判，基本上停止创作了。北京宾馆征集国画的消息，对于息笔多年的画家来说，无疑是一个令人高兴的转机。几个月后，2000多幅出自丹青名家的国画源源不断从祖国各地送到北京，题材大多是山水、花鸟之作，画技自然也是传统笔法。北京宾馆将其中的一部分国画送给钓鱼台国宾馆装饰。钓鱼台18号楼是接待外国元首级的高档客楼。楼里也悬挂了十几幅出自名家的国画。

1973年10月，江青在钓鱼台18号楼看到江苏老画家陈大羽画的一幅公鸡报晓图，很生气，认为这幅画有问题，是借题发挥，为资产阶级文艺路线鸣冤叫屈。

11月23日晚上，一个小型会议在北京友谊宾馆召开。会上，时任人民美术出版社的社长兼总编辑邵宇也提出了“黑画”问题，并举画家黄永玉画的一幅睁只眼闭只眼的猫头鹰为例。

黄永玉画猫头鹰久负盛名。可以说，自开始走上艺术之路那天起，黄永玉就与猫头鹰结下了不解之缘。早在1942年，黄永玉为儿童文学作家贺宜的《野旋童话》所作的插图中，第一幅就是《猫头鹰》，这也是他最早发表的木刻作品。从此，他爱画猫头鹰，乐此不疲。

属鼠的黄永玉，知道一只猫头鹰一年大概可食1000只老鼠，为人类节约1吨粮食，故喜欢根据所画猫头鹰数量，题上“一吨”、“五吨”的字样。

文革开始前，黄永玉赴河北农村参加“四清运动”，空闲时突发奇想，采取画配文形式集中创作一组“动物短句”。因为当时他家住北京罐儿胡同，所以后来出版时书名为《罐儿斋杂记》。所画动物中也有猫

头鹰,其短句为:“白天,人们用恶毒的语言诅咒我,夜晚我为他们工作。”

文革开始后,这些作品自然被揭发检举,指责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草,还在中央美术学院开会批斗黄永玉。

1973 年,结束在河北“五七干校”的数年劳动生活,黄永玉回到了北京。此时,正好北京饭店征集国画作品,黄永玉应邀前去,具体负责整座新楼的美术布展设计。同时,北京饭店中央大厅一幅围绕四周的《新长江万里图》大画,也交由黄永玉、袁运甫、吴冠中、祝大年 4 人负责。于是,1973 年 10 月,黄永玉 4 人便从北京到上海、苏州周游,然后再溯江而上直至三峡写生。

启程之前,黄永玉到他的老朋友、画家许麟庐的家中。俩家相距很近,不到 50 米远,只拐两个小弯,有时甚至端着茶杯,穿着拖鞋就溜达过去了。这天,许麟庐拿出一本册页,说是一位名叫宋文治的南京画家放在这里的,请他顺便约请朋友为他画点画。黄永玉那天因为在准备旅行的杂事,心情不安定,怕画不好。许麟庐说,你就随便来两笔猫头鹰吧!于是黄永玉就真的“随便地”来了这么一张“猫头鹰”。而这只“猫头鹰”,就是一个月后在北京友谊宾馆这个小型会议上,人民美术出版社的社长邵宇提到的那幅睁只眼闭只眼的“猫头鹰”。

此时国务院负责文化的部门名叫“文化组”,担任组长的是政治局委员吴德,主持日常工作的是副组长于会泳。

1974 年 1 月 31 日下午,于会泳在北京 28 条美术学院北院会议室召集“创作领导小组扩大会”,研究批林批孔的问题。于会泳在会上说:“运动怎样深入下去?批林批孔必须联系实际。什么实际?就是文艺上黑线的回潮、翻案,今不如昔,对此,有几种态度:一是不管,一是喊喊,一是用实际行动反击。”“无论如何要反击,打退他们,要结合路线教育。”

于会泳让美术部门的负责人高景德谈谈美术战线阶级斗争的情况。

高景德谈了两点,一是 1972 年与 1973 年两届美展创作中反映出来的一些问题;二是出口画、宾馆画和工艺美术方面的“黑线回潮”问题。他列举了许多具体事例,如:当时在国际俱乐部挂出的作品《猫头

鹰》、《残荷败叶》、《苍山如海,残阳如血》、《入蜀途中小景》等,并说美术方面“黑线回潮”主要表现在出口画和工艺美术方面。

他说完之后,于会泳说:“要搞文章,要系统,要核实。要写大好形势,也讲阶级斗争。抓住典型,画要搞来。攻击、影射、翻案、反攻倒算的放在第一档;第二是出的一些画,《猫头鹰》、《残荷败叶》、《苍山如海,残阳如血》、《入蜀途中小景》;第三是搞钱,影响青年。拿主席革命路线当标签,打着红旗反红旗。文章不能太长,不用理论上过多阐述。”于会泳所布置在《内刊》上发批判文章。

会后,于会泳派人到国际俱乐部、北京饭店、荣宝斋、北京画院、中央美术学院等单位,搜集了一批“黑画”。

1974 年 2 月 10 日,在人民大会堂举办了题为“批林批孔联系美术战线实际”的“黑画展览”,共展出 18 名作者的 215 幅“黑画”。画家们被组织到人民大会堂看展览。

当天下午,正在京西宾馆为广播事业局办学习班的国务院文化组王曼恬正式提出,要准备组织在报刊上发表批判“黑画”的文章。

2 月 15 日下午,国务院文化组于会泳、浩亮、刘庆棠又来到美术馆看“黑画展览”。展出的 200 多幅画,每幅画下面都有一句批判文字。

譬如黄永玉画的那只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猫头鹰,批判文字说是对社会主义的刻骨仇恨;李苦禅画的一幅池塘荷花,有的怒放,有的凋谢,有的含苞,刚好八朵,被说成是对八个样板戏的攻击;还有曾经是国民党党员、黄埔军校毕业的宗其香,他画的题为“虎虎有生气”的《三虎图》,刚好画了三只老虎,被说成是“三虎成彪”,是在怀念林彪,为林彪翻案!

黄永玉的《猫头鹰》开始还是挂在“黑画”的第七位,但很快就挂到了第一位。他在宋文治册页上所画的猫头鹰,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说是根据猫头鹰的习性而画。猫头鹰晚间捕食、活动,白天休息,但为了保持警惕,就常常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结果,这成了他“仇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社会主义制度”的证明。

随后,上海、陕西等地也办起类似的画展,受株连的画家和美术工作者达百余名。

再说黄永玉4人自1973年10月开始沿长江写生,经南京、上海、南通、庐山、黄山,然后沿汉口坐轮船溯江而上,经夔门、万县到达重庆,在重庆过了年。临返北京的前两天,听到一点风声,说北京正在开展一个“批黑画”的运动,且扩大到全国追查“黑画”,“由江青同志亲自挂帅”,其中主要的“黑画”是一张猫头鹰……

黄永玉听后还满不在乎,懒洋洋地说:“唉!画一张猫头鹰算什么呢?我不是也常常画猫头鹰的嘛。”

没料到,一回北京才知道,此画的作者就是他!

1974年2月,国务院知青办通知各省知青办,调查县以上各级干部中,已发现为子女走后门有多少人?现在已纠正的有多少?采取什么方法纠正的?要有好坏典型事例。

然而,2月15日,正在高烧中只吃流食的毛泽东,用他那看不清的双眼,在叶剑英1月30日给他的检讨信上写下了这样的回复:

“剑英同志:此事甚大,从支部到北京牵涉几百万人。开后门来的也有好人,从前门来的也有坏人。现在,形而上学猖獗,片面性。批林批孔,又夹着走后门,有可能冲淡批林批孔。小谢、迟群讲话有缺点,不宜向下发。我的意见如此。”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周恩来将毛泽东给叶剑英的这封信印发在京

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江青看到后,找周恩来问:“为什么要印发?为什么不给我看呢?”

周恩来告诉她:“是主席叫我印发的。”说罢把毛泽东的批件交给江青。江青看过批件,不再吭声。

16日下午,周恩来找迟群、谢静宜谈话,告诉他们:毛主席讲的“形而上学猖獗”,是批评江青的。随后,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毛泽东的批示。

当天,姚文元也对《红旗》杂志编辑组召集人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

“主席又批一件,关于走后门问题。

主席说:走后门问题很大,从支部到中央,牵涉到几百万人,批林批孔又夹杂着走后门问题,可能会冲淡批林批孔,(还是要紧紧抓住批林批孔)开后门进来的也有好人,走前门进来的也会有坏人,要防止形而上学片面性。(可能不完整)

我领会,还是要抓批林批孔这个中心,不要转移了,不能分散,要有分析,看稿注意这个问题。批林批孔还是路线问题,重点在领导机关。主席讲要抓住重点,不要片面,要一分为二。

大家反映,为什么经过文化大革命,走后门反而多了?知识分子也有反映。我说,文化大革命前不需要走后门,路线不对,搞修正主义路线,走前门,培养地主资产阶级接班人,前门就可以进去。文化大革命,学制改革,工农兵上大学,斗批改,前门无产阶级占领了,当然还不巩固,这样后门就突出了。”

2月18日,江青写信给毛泽东:“我做蠢事,对不起主席!”“今后当努力学习,克服形而上学、片面性。”

2月20日,中共中央下发关于“走后门”问题的通知,指出:“在批林批孔运动中,不少单位提出了领导干部‘走后门’送子女参军、入学等问题。中央根据毛主席的指示,认真讨论了这个问题。中央认为,对来自群众的批评,领导干部首先应当表示欢迎。但是,这个问题牵涉到几百万人,开后门来的也有好人,从前门来的也有坏人,需要具体分析,慎重对待。当前,批林批孔刚刚展开,又夹着走后门,有可能冲淡批林批孔。因此,中央认为,这个问题应进行调查研究,确定政策,

放在运动后期妥善解决。”

中央通知下发后,批“走后门”的活动戛然而止。

黑龙江省传达毛泽东的这个批示时,造反派出身的范正美好长时间想不通。他对于毛泽东的指示,向来是百依百顺的,总觉得“毛主席高瞻远瞩,说出了人人心中所有,人人口上所无的话语”。但这一次,他却对毛泽东产生了一种人老智褪的感觉。毛泽东在他思想上屹于泰山的地位第一次发生了动摇。他觉得:“毛主席一心想批林批孔不走偏方向,我理解。然而,长期以来在领导干部身上存在的特权思想,这时因官复位而来的走后门问题,群众大有意见,应该予以积极解决。人才择与同干部弄权是两个问题。万万没有想到,毛泽东只是从人才好坏的或然性来看待招生、参军走后门问题,而未着眼于干部利用特权谋私致使党风败坏的高度,提出解决的途径。”当时,他所在的工作组许多成员与他有同感。人们对于毛泽东的批示有许多近似公开的如此强烈的非议,在群众中这还是第一次。

2 月 21 日,赞比亚总统卡翁达访华。22 日,周恩来、王洪文陪同毛泽东会见卡翁达。谈话中,毛泽东进一步提出关于划分三个世界的观点。他说:“我看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美国、苏联原子弹多,也比较富。第二世界,欧洲、日本、澳大利亚、加拿大,原子弹没有那么多,也没有那么富;但是比第三世界要富。咱们是第三世界,第三世界人口很多。亚洲除了日本,都是第三世界。整个非洲都是第三世界。拉丁美洲也是第三世界。”

接见后,毛泽东问周恩来:“总理,你怎么样了?”

周恩来回答:“还可以。没抓好大事。”

毛泽东笑着问:“被人整得不亦乐乎吧?”

周恩来也笑了:“没有。自己犯错误。刚才在汽车上我还在说,抓大事还不会抓,没有抓好,常常抓了小事。”

# 第1302回：查罪证，两校进驻毛家湾 卡片多，林彪读书有特点

1974年2月22日，由北大、清华为主组成的“清查林彪与复制林彪罪证小组”正式进驻毛家湾，清查与复制林彪的思想罪证材料。具体出面组织这件事的是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的负责人迟群、谢静宜。2月16日，迟群，谢静宜在清华大学接见清华参加这项工作的全体人员时说：这件事“是中央交办的任务”，是“在中央的一次会上决定的”。

清查小组进入毛家湾时，8341部队武建华第二次清查处理毛家湾物品工作已基本完成，图书、卡片、条幅原件都已登记造册完毕，由留守的8341部队专人保管。

参加这次清查工作的先后有20多人，计北京大学13人，清华大学7人，公安部3人，文物管理局1人。清查小组成员的专业比较全面，涉及文学、历史、经济、哲学、逻辑等领域。公安部和文物管理局的人主要负责证据的采样和复制工作。公安部的人把摄影器材也都带来了。

清查小组的名称是中央工作组。组长是清华大学人事处长李世存，副组长是北京大学组织处负责人董金双。这两个人都是派到北大、清华的工人宣传队成员，李世存来自北京第三建筑工程公司。工作小组成立临时党支部，李世存任党支部书记，支部成员除董金双外，还有知识分子干部徐和德。

小组负责人李世存、董金双直接向迟群、谢静宜汇报工作。迟群的秘书也参加工作组的工作。8341部队毛副团长做了生活安排。清查小组全部住在一幢三层楼房里，每人一间，一层和二层还有能容纳四、五十人开会的大会议室。

负责这项工作的中央领导人是中央政治局委员纪登奎，他对这项工作非常重视。工作组住进毛家湾的当天，纪登奎就在毛家湾接见了工作小组全体人员。

毛家湾清查工作小组与中央专案组有很多工作往来。根据纪登奎的批示,从中央专案组调来了林彪笔记影印件和有关材料的底片。毛家湾清查小组查出的林彪存款情况,也让中央专案组接手负责继续调查。

纪登奎对毛家湾工作小组的清查工作全力支持,有过多次指示和批示。清查工作小组反映说,辨认不清林彪的笔迹,纪登奎批准他们可以找原林办的工作人员,让他们帮助辨认笔迹。纪登奎还批准清查工作小组找过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一级研究员杨向奎先生了解情况。清查小组为辨认笔迹,找过帮助叶群读书的原空军政治部文艺处副处长官伟勋,还找过在押的林案人员询问情况。

毛家湾清查工作小组的清查范围主要是林彪住地的图书、卡片和条幅,查找林彪、叶群批写的文字,收集他们的材料,分类整理,汇编成册。一些重要的物件还必须复制下来,复制工作由公安部、文物局和新闻制片厂的人负责。

林彪家里有7万多册图书,47盒手抄卡片,还有条幅和其他文字,数量很多。清查小组的工作重点是清查7万册图书,主要是清查林彪在书上的批注。清查工作分为三个小组,查书组、影印组、复印组。

林彪家中的图书来源很乱,大量的是从撤销学校的图书馆搞来的,盖有图书馆公章。图书数量多,种类繁杂,存放管理混乱,没有特别珍贵的版本书。清查的第一道工序是,两人看一本,一页页地翻看,查找林彪的批注和加上的字条,把有批注和字条的书籍挑出来,另外存放。然后再对批注文字和字条进行分析,有问题的就写在卡片上。每本书都是两个人看,以防遗漏。发现“问题”眉批单独造册。中央专案组大力支持,批准他们有什么不懂的,或字迹看不清楚的,可以讯问在押案犯。

清查工作小组成员的阅读工作量很大,上午4小时,下午4小时,晚上还要4小时。白天是分头翻书查“罪证”,晚上集体汇总一天所查的材料,讨论分析一下,由迟群的秘书写成简报上报。平日里大家都住在毛家湾工作,只有星期六可以回家,星期天必须回来。

清查工作小组管理得非常严格。小组人员进入林彪、叶群的客厅、办公室和卧室,必须两人同行,另有8341部队警卫战士伴随。取

出条幅或别的东西复印,均有严格的登记手续。

清查小组发现,林彪读得最多的是《四书五经》,眉批密密麻麻。其次感兴趣的是有关韬略的书。

清查小组在清查林彪笔记材料的过程中,逐渐熟悉了林彪的记录习惯、语言表述方式和独特的思想方法。

从林彪的笔记习惯和记录特点看,林彪的习惯是一想起什么来,谁在他跟前,就让谁写,听不懂呢,就照发音写上去。身边的小战士也没有什么文化,也听不明白林彪的湖北话,写出来的错字别字白字什么都有。不管香烟壳、破报纸、台历,撕下一块就写。写完林彪就不管了。叶群把这些破纸片当作皇帝写的御笔,都当宝贝收藏起来,给他收在保险柜里。

林彪不仅是他自己写,而且一家子还在一起写。有时你写了两句,他写两句。有的字条就是这样的,叶群写了几个字,林彪写了几个字,林立果写了几个字,林豆豆又写了几个字。

另外他们发现,林彪还是一个“灵感论”者。他们开始接触林彪写的这些文字,都感到很惊讶。搞阴谋诡计,琢磨怎么对付人,这都是些不能见人的东西,可是林彪为什么还要记下来?历史上那些搞阴谋诡计的人,都是只搞不记的。林彪却要写下来,生怕忘了似的。这是为什么呢?他为什么这样写?乱七八糟地什么都写下来。后来搞明白了,这是与他的思想方法有关系。林彪在他看过一本书的边页上,写了三个字:“灵感论”。

林彪说:“等候思想要像哨兵等待敌人一样,耐心等待灵感的涌现。”这是叶群抄的林彪原话。这话林彪不止在一处讲过,有很多笔记都讲到了这一问题。如:

“切勿浪费时间去呆读文件和听报告,免陷入迷宫束缚思想。”

“不要在文件和书里去找思想,而要冷静搜索自己脑内现有灵感,逐一罗列而论述之。”

“找个有识之士个别交谈,这是大智慧的来源。”

林彪、叶群和孩子的房间里,都挂有一个条幅,“莫道闲聊是闲聊,闲聊能出新思潮”。

林彪的思维特点是想到了就写出来。“动,抽,叫。”“动”就是动

脑子想问题,“抽”就是把问题抽象出来,“叫”就是立刻要记下来,很有特色。

林彪的卡片也是很有意思的。他让秘书搞了40多盒卡片。他的理论是“零件箱,大有用”。像“四个第一”,他就是让秘书们,从各种书上、各种文件上、大小报纸上找,凡是提到“第一”的,不管讲什么事,都给我抄下来。抄了一大堆卡片以后,他就“打扑克”,摆在地毯上,跪在那里,来回摆。这个给那个对上,那个给这个对上。不要的就给丢到一边去。这么倒来倒去,最后倒腾出来个“四个第一”。

林彪读书学习是很刻苦的。工作组查到他的一套伪满洲国地图,一大本子,空白的地方都写满了字,都考证出来了,但工作组看不懂。林彪的战役指挥部署想得非常细。

林彪的读书方法也是非常有特点的。林彪是会读书的人,绝对和常人不一样。他有个说法:“不能让书牵着鼻子。”

林彪读书,不是看这本书讲些什么,他是想什么问题,从书中看有关的部分,找点刺激,刺激他的灵感。像列宁的《哲学笔记》,有十几本。有的版本是完全一样的,同一年出版的。他看书不是从头看到尾,都是看其中的几节。比如谈谈辩证法问题,黑格尔讲的“一和多”的关系问题。每一本看的就是那几段,其他部分没动。每一本就那几节都是批得密密麻麻,但每一本的批注不完全一样。他还有许多心理学和逻辑学的书,就只读那几章,其他地方都没有动过。

林彪的读书笔记,都是抽象出来的简单几条,内容高度概括,就几个字。林彪还喜欢用代号隐语。工作组开始都看不懂,以后熟悉了,就知道林彪讲的什么意思了。比如说毛泽东,用“一号”,还用谐音“姨毫”,拼音“莫奥”,“mao”来代表毛。林彪的称呼是“101”,这是他在东北战场的代号。还用“老巴”,这是林立果说的老爸的意思。

林彪对一些政治概念也用简略语。“生力”、“生关”,指生产力、生产关系。“卞法”、“唯法”,指辩证法、唯物论。“内矛”,指人民内部矛盾。比如哲学的“一和多”的关系问题,林彪写的是“夷,朵,二”,就是讲“一、多、二”。

林彪的悟性很高,读书看得快,看得多。书对他来说,只是思想的工具。概括起来有两条:一是寻找新的刺激,刺激不了新思想的书是

没用的;二是要印证他脑子里想的观念。会读书的人,一本书要是能找出一两句话,这本书就没有白读。有些人读书是被书框住了,越读越糊涂。林彪说唱一首歌,就是上一堂政治课。希特勒《我的奋斗》中也是这样讲的。

林彪平时言语不多,沉默寡言,就是呆头呆脑地想问题。为林彪警卫的中央警卫团二大队副大队长于仁堂曾对工作组的工作人员说:毛主席在庐山会议上批陈伯达、批"天才论"。林彪下山回来以后很苦闷,就在这个三人沙发上,把脑袋顶着沙发背上,撅着屁股,一撅能撅一个小时。这是干什么?等灵感呢。

从林彪的笔记和读书札记上看,林彪的思想内容是很丰富的。可以对林彪的思想内容作一个简单的归纳。

林彪在认识论上是"灵感论"。他对辩证法的研究很有些心得,有系统的认识。比如他写的"黑说黑话,马半黑话"。就是说:黑格尔说的是黑话,晦涩难懂,马克思有一部分就是从黑格尔来的。他读列宁,读的最多的是《哲学笔记》,读别的东西很少。他对斯大林是看不起的,批评的最多。

林彪的唯物主义也很有特色。他在有的地方说:"唯物论加唯心论","唯物史观乃需要史观"。

林彪认为:生产是手段,生活是目的。一切生产都是生活,所谓"生产爱民总路线"。

林彪关于辩证法的思想,是比较系统的。概括起来说,讲的是"一多而异",这是从亚里士多德那里来的,但林彪的表述是不规范的,句子也是不完整的。讲什么"一多二义"了,"多种因素构成的",按某种标准分成两派,一派吃掉一派。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一物,一个东西,是由多种元素组成。以某一种标准划成两派。一派吃掉一派,剩下一派。就变成一了。他把讲宇宙运转的学说都变成政治哲学了。

林彪的中国传统文化的东西是根深蒂固的,对现代的东西知道的比较少。在他读书笔记中,传统文化的东西比较多。林彪的炼丹,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东西。秦始皇、汉武帝都炼丹。林彪看中医的书,相信中医,不愿见西医的保健医生,自己给自己开药方,这也是对传统文化的偏好。

林彪是搞两面派的人,表面上“万岁不离口,语录不离手”,私下里对毛泽东是有看法的,心里并不赞同他的一些做法。

在整材料的过程中,工作人员当时对有个材料整不整到“罪证”里面去,发生争论,说的是林彪读《联共(布)党史》,讲到布哈林的“缓冲”派,林彪就写道:“周胡子”,这是说周恩来。

工作人员感到,林彪好像从来没有反对毛泽东,为什么呢?第一,他似乎是把毛泽东看透了。第二,他是想怎么应付毛泽东。

林彪在当了副统帅之后,很注意和毛泽东的关系。他和毛泽东上了天安门,出席了什么公共活动,回来要看看新闻媒体是怎么报道的,用的什么照片。林彪写在他的《毛主席语录》本上有一句话,“毛最大忧虑,选举是否取得多数”。他在《毛主席语录》扉页上亲笔写下一些警句,如和毛泽东一起接见红卫兵时,或其他场合,要离毛泽东远一些,保持距离,以免超越。少说话,少表态。

这个语录本,平时是他警卫参谋李文普拿着,负责提醒他拿语录。

林彪应付毛泽东有些办法,他还把它写下来,作为经验。如林彪笔记上写:“仿恩之于马,斯之于列,蒋之于孙,跟着转,乃大窍门所在。”

林彪读《红楼梦》,在《红楼梦》上描写王熙凤如何得势的地方,林彪有一个批语:“老夫人,总路线,得一人得天下。”工作组认为,林彪死命地吹捧毛主席,就是奉行这个“得一人得天下”的总路线。

林彪对毛泽东、江青有不同的态度,这在他的笔记中也有记载:“一号叫,每次必到,Madan(夫人)叫,三次到一次。”就是说,如果是毛泽东叫他,每次都要到。江青叫他,三次去一次。

# 第1303回：一出戏，山西演《三上桃峰》受批判，晋常委全体进京

1974年2月28日上午8时正，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署名初澜的文章《评晋剧〈三上桃峰〉》，当天的《人民日报》也全文刊发了这篇文章。文章指出：1965年夏天开始，围绕着通讯《一匹马》和故事《三下桑园赎马记》，掀起了一股宣传热潮。这个“故事发生在经过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地方——河北唐山地区抚宁县，更加引起人们深思。”文章说，《三上桃峰》是经过精心炮制，有人批准，有人支持抛出来的。《三上桃峰》为刘少奇翻案的事实，是任何人也抵赖不掉的！

当天，很多西方媒体用惊叹的笔调发出电讯。路透社说：“有一出叫《三上桃峰》的戏剧创作者们，打算把（党的）决定倒退到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上去”，“中国官方的北京《人民日报》今天说，失宠的国家主席刘少奇的一些支持者在中国很活跃”；安莎社报道说：“出现在山西省，而只是略微改动了一下剧名的一部旧剧《三上桃峰》，被指责为美化刘少奇和他的妻子。据说负责上演这部作品的那群人，是‘山西省文化局艺术创作组’的”；英国《泰晤士报》发自北京的消息中说：“中国一批没有点名的人士被控利用一出新的戏剧来攻击毛泽东主席的政治路线，企图为失宠的前国家主席刘少奇翻案。”

在刘少奇已经被批臭、被打到多年后，怎么会有为他翻案的戏曲《三上桃峰》呢？此事说来话长。

早在文革前的1964年冬天，山西晋中地区青年晋剧团任编导的许石青，在下乡进行社教运动时，根据当地曾发生的一件“病马”的故事，编演了一个活报剧《一匹马》。演出后，受到当地广大干部和群众的欢迎和鼓励。

恰巧，1965年7月25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长篇通讯《一匹马》，报道的是河北省抚宁县大刘庄大队卖给刘义庄桑园生产队一匹病马后，很后悔，又新买了一匹大红马去“赎病马”，同时支援桑园生产队的

春耕生产,歌颂两队干部群众发扬互相关爱的精神,克服困难,发展生产的新风尚。许石青看到后,就根据这两件事情的素材,写成了晋剧《桃李争春》。

1965 年 9 月、10 月间,山西省文化局筹备现代戏曲调演,派人分头到各地区选调节目。省剧协副主席朱东、省话剧团导演方彦,还有刚从省人民出版社调到省文化局戏剧创作室工作的杨孟衡,一同到榆次看了晋中青年晋剧团对这出戏的连排,认为很不错。于是杨孟衡和方彦被留了下来帮助修改剧本。经过修改,剧名更名为《三下桃园》,剧本以"马"为中心事件,以三次赎马的行动构成全剧框架。剧情大体是杏园大队社员老六将一匹病马卖给了桃园大队,杏园大队女青年团支书李开英发觉此事后,坚持去桃园说明实情,赔情道歉,并带上原款拟将病马赎回,但就在此刻病马死去,由此引起一系列戏剧冲突,表现了两个大队之间团结互助的友爱精神,同时也揭露和批判了不顾全局、以邻为壑的本位主义思想。

1965 年 10 月,《三下桃园》在晋中地区行署所在地榆次首次公开演出,效果很好。随后,在农村巡回演出了两个多月,场场爆满,很受观众欢迎。时任山西省委第一书记的卫恒在晋祠招待所召开社教工作会议期间,看了《三下桃园》后特意召见了剧团领导和编创人员,并勉励剧团要在农村广泛演出。

1971 年秋,吕梁地区文化办公室接到省里关于准备"华北地区新创作剧目调演"的通知,召集各县剧团团长开会,要求各县积极创作剧目,参加调演。此时,原晋中青年晋剧团党支部书记贺登朝,已在文革开始后,下放回原籍柳林插队,并于 1972 年 4 月被任命为县剧团的党支部书记。于是,他将原《三下桃园》剧本翻印后,组织人员进行修改。在 1972 年 5 月 20 日晚,署名柳林县晋剧团集体改编的七场现代晋剧《三下桃园》首次登场试演。不知是不是王光美《桃园经验》的原因,试演结束后,大家建议剧名改为《三上桃峰》。然后于 5 月 24 日、25 日赴离石参加了地区文办组织的调演。

调演获得成功。当时,全区有 8 个剧团先后上演此剧,共演出过 477 场,观众达 55 万人次之多。该剧本在《吕梁文艺》1973 年第一期刊发,署名"吕梁地区《三上桃峰》创作组"。1973 年 3 月 10 日,《三上

桃峰》由柳林县剧团在省城太原和平剧院连演数场,盛况空前。

1974 年年初,全国文艺大调演。1 月初,山西省派出了由贾克任团长的山西省晋剧院《三上桃峰》剧组,穿过由省有关领导和群众组成的热情欢送队伍,信心百倍地赴北京参加调演。省文化局长芦梦亲自赴京坐阵。开始,在北京二七剧场带音乐连排时,特意邀请中央和北京市部分文艺界知名人士观看,受到了赞赏。第二天,1 月 23 日,晋剧《三上桃峰》在二七剧场彩排,请中央文化组领导及首都文艺界和在京的山西同乡观看审查。这一晚的演出,演职员个个尽心尽力,剧场效果特别好。但是,在大幕刚刚落下后,坐在首长席上的文化组负责人于会泳,一言不发走出剧场。

1 月 27 日,文艺调演第七期《简报》提到《三上桃峰》,说《三上桃峰》演出后,各代表团对这个戏进行了讨论,调演办公室邀请四季青人民公社、市建十五厂、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政治部的工农兵观众和北京、天津、内蒙古代表团部分同志举行了三次座谈,对剧本创作有许多不同意见。归纳起来:

一是题材不典型,不能反映人民公社化后的农村新貌和时代精神。

二是戏的矛盾冲突没有从阶级斗争方面挖掘,没多大教育意义,受‘无冲突论’的影响。

三是英雄人物的塑造不突出,“这个戏的好人并不算好,坏人并不算坏。”

2 月 1 日,江青指示于会泳:对于《三上桃峰》“以评论文章和座谈会形式进行批判”。

2 月 6 日,于会泳草拟了《批判〈三上桃峰〉的初步计划》。

2 月 7 日晚,文化部召集各演出代表团负责人在西苑旅社的中楼会议室开会。会上,于会泳宣布:《三上桃峰》是为刘少奇翻案的大毒草,要组织深入的揭发批判。于会泳强调:责任不在下边,演员没有任何错误。会上还宣布了一条决定:立即停止公演,只在内部演出,作为反面教材供大家批判。

2 月 8 日下午,于会泳召集在京的四个样板戏剧团和参加调演的各省、市代表团成员,举行批判《三上桃峰》会议。

2月9日,在北京展览馆,召开了由中直包括样板团在内文艺单位和各代表团共两千多人参加的批判《三上桃峰》大会。

山西省晋剧团的的演出人员白天揭发批判,晚上还要内部演出,演员们的压力很大。演好也不是,演坏也不是,处于两难境地。有一天,演员王爱爱终因压力太大晕倒在舞台上,演出被迫停止。

很快,调演办公室一连发出了30期简报,批判《三上桃峰》,一期比一期火药味浓。第30期简报以《动员起来,深入批判〈三上桃峰〉》为题,说"这是一场严肃的阶级斗争,是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回击翻案风和黑线回潮的战斗"。

2月中旬,华北调演已近尾声。2月17日下午,召开总结大会。国务院文化组吴德、刘益权、于会泳等人出席了大会。吴德首先讲话,他对调演剧目作了概括的分析总结之后,说"经过对《三上桃峰》的揭发、批判,又使我们从反面受到了教育,提高了路线斗争觉悟",指出《三上桃峰》不是一般创作倾向问题,从背景来看,是右倾翻案,是为刘少奇、王光美翻案。

这时,山西歌舞团有人汇报,说本来歌舞团排了一出歌颂大寨的节目,《拾豆豆》,是时任山西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委会主任的谢振华不让上,点名要晋剧《三上桃峰》。

好哇,全国学大寨,大寨在山西,为什么山西不排不演学大寨的好戏?为什么偏偏支持《三上桃峰》这样的大毒草?充满了这类质问的大批判文章铺天盖地而来,全国报纸的矛头都对准了山西。

太原街头乱了。冷落了几年的大字报、大标语潮水般的出现在省城太原。受压多年的"红总站"翻身跃起,刷大标语,贴大字报,揭发控诉,炮轰谢振华:

"谢振华反对陈永贵就是反大寨,反大寨就是反对毛主席!"

"谢振华支持《三上桃峰》,就是要为刘少奇翻案!"

"谢振华炮打毛主席司令部的陈永贵,曾经整理过陈永贵的黑材料。"

2月20日,中共中央电令以谢振华为首的山西省委常委全体进京,汇报工作。

2月21日,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讨论山西问题。决定王谦代理

山西省委第一书记。

2 月 24 日晚上,王洪文、纪登奎、陈永贵、倪志福 4 位政治局委员召集山西省委常委 16 人开会,陈永贵主持,纪登奎主讲。

陈永贵说:“今晚是中央领导同志第二次接见我们了。会议已经开了 4 天,提出了不少问题,解决山西问题,不要纠缠小事。”

随后纪登奎开讲。他先说:“我记得,在 72 年四季度,北京军区二十三次会议以前,大约在下半年,山西的批林整风方面,发生了一些问题,军队内部也发生了一些问题。一是批群众,你们军区的张照远,搞了一个批十条什么小偷小摸,迟到早退等等,不批林,专批群众,批极左。二是批个性,这件事毛主席知道了说:你们贵山西怎么批起个性来了呢,批了个性还有共性吗? 当时中央忙,拿不出时间来解决,总理说让在军内去解决,北京军区召开了二十三次党委扩大会议,会上批判了张照远,张照远感到冤枉,说是省委搞的,谢振华同志,曹中南同志到军区会议上旁听。”

曹中南:“我是正式参加会议的,谢振华同志是旁听的。”

纪登奎:“到中途你们还不自觉,我说:旁听什么,不要旁听了,干脆你们检讨嘛,后来你们写了检讨,送给毛主席,党中央。军区只能限在军内来解决,你们这样搞是违反中央违反主席思想的,因此,应该赶紧纠正,我现在不清楚,你们那个检讨向省委常委传达了没有?”

谢振华:“传达了,以省委名义来纠正。”

纪登奎提到的“批十条”,是 1972 年山西省新华分社的记者上报中央的一份内参,反映山西省军区副司令员兼省国防科工办主任、党委书记的张照远,在山西省国防科工办会议上列举了工业生产中无政府主义的十条表现,并予以批判,要求制止和纠正。

在这十条表现中,把小偷小摸,迟到早退等等都列上了,近同儿戏,无怪乎毛泽东在材料上批到:“不批林,专批群众”。最叫毛泽东哭笑不得的是“批十条”中有一条“批个性”。毛泽东问:“你们贵山西怎么批起个性来了呢? 批了个性还有共性吗?”

1972 年 12 月,北京军区举行的第 23 次党委扩大会议上,批评了山西省军区副司令员张照远。

接着,纪登奎谈起了学大寨,他说:“我给你们省委出了个题目,全

国学大寨,大寨在山西,山西怎么办?山西同志思想解决要有个过程,后来山西开了农村工作会议,搞了一个本本,我看了很高兴,这下要解决了。但还是没有解决,内部不能统一思想,学的劲头不如别的省。”

王洪文插话:“把学大寨看成是对陈永贵同志一个人的关系,这是不对的。农业学大寨不是陈永贵个人问题,学不学大寨是路线问题。”

纪登奎接着说:“大寨很好嘛!永贵同志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又是多年的劳动模范,你们为什么不能像别的省那样,为什么比别的省思想还难统一?是什么道理?三个正确对待哪里去了?为什么经过那么曲折的道路?”

“谢振华总想把自己说得那么干净,你在党代会的那几个报告,写得那么干净。我说,你说是抵制了陈伯达,那你就是有意勾结!难道你没跟他乱跑乱跳?你那么干净,为什么还把陈伯达的讲话印发?印的那么多?”

“我看你没那么高明,还是老老实实一点。你水平不高,不要那么聪明,受骗就是了,不要不认账。”

“陈伯达那个打井、养猪、积肥几句话,你们如获至宝。”

最后纪登奎下结论说,党指挥枪的原则在山西颠倒了。

谢振华没有说话,陈永贵也没有说话。

2月28日上午8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了初澜批判《三上桃峰》的文章。当天的《人民日报》全文转载了这篇文章。

3月8日,在首都二七剧场内,山西《三上桃峰》全体演职员在为接受批判而演出完毕后,身穿一身绿军装的江青和其他几位中央领导在一间贵宾间接见了剧组全体人员。江青说:“当年刘少奇领导四清运动时,他的老婆王光美三进桃园大队,搞出一个‘桃园经验’,今天你们山西又搞出个《三上桃峰》,居心何在?”她连呼了三声“炮轰谢振华”的口号,并特意解释说:“我今天穿了这身军装,就是为了来炮轰谢振华的!听说谢振华自称是军队的人,言外之意,我们就是老百姓,不能批判他,我今天就是带头炮轰他,你们也要起来同他斗争。”

# 第1304回：刘照常，公开质疑批《中国》“整军队”，江青要“放火烧荒”

这期间，南阳市橡胶制品厂青年工人刘照常给《人民日报》编辑部写了一封信，题为《为电影〈中国〉的出世而拍手叫好》。他在信中赞扬意大利导演安东尼奥尼“一眼便看出了中国的缺点”，“他的眼睛是雪亮的，胆是大的，值得我们钦佩”。从“他的几个论点来看，完全属于事实”。“安东尼奥尼先生无罪，他才是中国人民的真正朋友，”“安东尼奥尼不是修正主义的应声虫，他是真正的向修正主义开火的勇士。”“向安东尼奥尼先生致敬！”刘照常在信中说《人民日报》批判安东尼奥尼的评论员文章不承认事实，对电影《中国》进行了“充分的歪曲”和“污蔑”，“欺骗中国人民”，“中国人对他的攻击，也只不过是一些民族败类的一种丑剧的自我表演而已。事实为什么不让讲呢？做贼不要心虚了。”“可笑啊，可笑”。他在信中还说“现在的理论宣传家净说空话，光叫形势好，实际表现在哪儿？说的都是空的。”“把工业生产吹下降了，把人民吹怕了。”“由于文化大革命，对中国的生产力打乱了”，“工厂的劳动力产值不断下降。”“文化大革命前，市场上要啥有啥，现在要啥都没有了。”“你没有新的怎么让人家拍摄呢？那只好拍旧的，而拍后呢又嫌丢人。”“亲爱的修正主义者们，事实总是去不掉的，农村的拖拉机不能讲没有，但是农民的小毛驴、独轮车还占绝对优势，”“农民的贫困是不可否认的。”他在信的最后对《人民日报》说：“我料你们没有胆量发表这篇文章，又不敢来质问我。如果你们质问我，我也准备的够你们吃的。”他还说：“也可能为此事我要走上断头台。好嘛，我正想尝一尝这样的味道！”

刘照常在给《人民日报》编辑部写信前后，还给中共中央和河南省委写过3封信反对文化大革命，反对批林整风运动。他在这些信中说；“我也活了23岁，也差不多活够了。”“可能我的牢骚还没发完，便成为无头之鬼。”“我豁出去了。”“那么在我变鬼之前，只要我的手会

动,我的嘴会讲,我就要用这一些有利的东西,继续发我的牢骚,到我不能讲话为止。”

3 月 1 日,张春桥对《人民日报》汇报刘照常给《人民日报》编辑部写信一事批示道:“建议给登奎同志看看,这封信像一个 20 多岁的青年写的吗?什么样的环境长出这样的毒草?”

纪登奎当日批示:“同意春桥、江青、文元同志的批示。这封信是一株大毒草。写信者必有复杂的阶级背景。他同社会上出现的修正主义回潮是联系在一起的。此件,送建勋同志阅处。处理结果望告。”

刘建勋看到中央领导的批示后,当即指示省委组成调查小组进行调查。3 月 5 日至 12 日,调查小组在南阳搞了 8 天调查,3 月 15 日向省委提交了《关于南阳橡胶制品厂刘照常投寄反革命信件的初步调查》。

《初步调查》中写道:“刘照常是屡次跳出来公然向党向社会主义疯狂进攻的。除寄给人民日报的稿件外,我们还发现了他写给省委和中央的三封信,内容同样反动恶毒。”《初步调查》把刘照常的“主要反革命言论”归纳为四点:一、颂扬反华小丑安东尼奥尼及其拍摄的反华影片《中国》,攻击我国人民对这部反动影片的批判;二、全盘否定大好形势,攻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三、诅咒各级党委的领导,妄想变天复辟;四、气焰十分嚣张,疯狂进行挑战。

3 月 19 日,刘建勋根据这一调查报告,给纪登奎写信报告情况。刘建勋在信中说:刘照常这么反动,是有其复杂的阶级背景的,同当前社会上出现的修正主义回潮是联系在一起的。刘照常是南阳县红泥湾公社石灰窑大队范庄村人。这个村共53 户,有地主、富农14 户,地、富分子20 人,阶级关系比较复杂。他家在解放前不久买了40 亩地,土改时定为中农成分。他伯父曾当过伪乡政府的“师爷”,他父亲当过生产队副队长,因偷窃队里的瓜菜等东西下台。他大舅父曾因贪污被南阳交电公司开除,后来又混进南阳市做临时工。刘照常上过一年高中,1970 年进南阳橡胶厂当工人。文化大革命以来,这个厂革命和生产形势本来是好的。1970 年以后,由于王新推行林彪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和破坏,修正主义回潮现象严重,歪风邪气上升。该厂领导不抓阶级斗争,对厂内资产阶级复辟势力的猖狂反扑熟视无睹。这次调查

组到达时,有些同志仍然认为刘照常“生产上可以”,“政治上没有问题。”有些人还误认为是“反潮流的人物”。刘照常在农村时想进城当工人,当了工人又想上大学。去年工厂竟推荐他上大学,因未被批准,他极为不满,咒骂党的领导。他说,当工人“成天的埋头苦干”,使他“烦恼了一切”。从去年8月到现在,刘照常的思想情绪很反常。他多次嚣张地公开向党进攻。现在该厂正在发动群众深入开展批林批孔运动,对刘照常的问题,特别是他的政治背景,还有待通过群众的揭发批判进一步查清。河南省委迅速将上述调查情况向中央作了报告。

3月19日,刘照常被隔离反省,4月25日被拘留,同年9月22日被逮捕,1975年1月27日以现行反革命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同时开除了团籍、公职。

文革结束后的1978年5月23日,刘照常被无罪释放。5月25日,中共南阳市委给刘照常平反,恢复其团籍和公职,回原单位工作,补发其冤狱期间所停发的工资。

南阳市橡胶制品厂在2004年经法院破产清算,破产后有600名职工当时生活没有着落,不知其中是否有刘照常。

1974年3月5日下午,江青又把邬吉成找去,说:“38军8连七个战士写的反映,《解放军报》2月27日发表的《不为个人谋特权,全心全意为人民》的文章,方向是错误的……明目张胆地对抗中央八号文件。搞这个问题的是少数人,但有它的普遍性。请8连以战士的名义写成大字报,贴到军报主楼墙上,不能贴到大街上,也不能登报,让他们想一想,看他们如何?你现在就坐车去一趟,大字报写好后让两个战士给贴出去,新华社的记者也可以去。”“这个问题我负责。”

邬吉成仔细一寻思:“自己的主要工作在钓鱼台,江青让战士到军报社贴大字报,这事非同小可。江青这会儿说她负责,几天一过,情况有什么变化,她一改口不认账,我可担不起这个责任。”怎么办?还是依照老规矩,执行江青指令前,先向汪东兴汇报。

邬吉成找到汪东兴,对他说,自己认为这种作法很不恰当,后果不堪设想。但汪东兴还是让他按江青吩咐办。于是,邬吉成就带上参谋闵成立,于当晚去了8连,传达了江青的指示。并在传达完江青的话后声明:“我只是当通信员而已,这里面没有我个人的一点东西掺进

去,请你们向你们的上级党委报告。”

3 月 5 日晚,江青、张春桥召集于会泳和总政的陈亚丁等人开会,听取汇报。会上,江青说:“今天我是斗胆,不敢得罪军队。今天把你陈亚丁也请来了,就是要整一整军队。”“八一厂造孽了,军阀管你们。”“看来要夺权,陈亚丁你去把权夺过来嘛!我看军队的文化工作还是让陈亚丁管起来。”“放火烧荒,你们去三个人,去放火嘛。”

3 月 7 日晚 21 时,江青再把邬吉成叫去,说“8 连去贴大字报很困难,对军报振动不大,需要 6 连去支援,因为 6 连也是点,两个点都看出了问题。”她让邬吉成带她的指示给 6 连,找上几个能写的战士去看大字报,看后进行讨论,谈他们的看法。

两天后的晚上,江青又把邬吉成叫到 17 楼,对他说:“你们去一趟 8 连,给他们讲几个问题:1、他们来电话说其他连队也要去贴大字报,就不要再去了,有 8 连就够了,他们是代表。2、8 连的信收到了,说他们快要进入生产状态,可以搞,但给他们一条任务,就是经常看军报,发现问题,看出问题通过新华社的渠道及时向我反映。3、他们的学习还是按部队党委的安排进行,要害是‘克己复礼’。还要注意看和《红旗》,学习马列、毛主席著作,不要偏离大方向。还可以给我和主席来信。1 师 6 连的大字报写得好,谢谢他们。他们的学习照旧进行,要看军报,看得仔细些,发现问题通过新华社记者渠道报我。”

3 月 7 日,新华社《国内动态清样》中一则反映成都第四军医大学中高干子女走后门,并与其他工农兵学员对立情况的来信。

周恩来批示:“责成总后勤部派一检查组协同成都军区对此事事先调查处理,要求该校加强教育、整顿工作,以改变四医大的校风。”

年初以来,因劳累过度,周恩来病情加重。3 月上旬起每日便血达 100 多毫升。据此,医疗组决定对其病情作进一步检查、治疗。周恩来 3 月 8 日将医疗组所拟《检查治疗方案》作详细阅改、批注后,致信叶剑英、张春桥、汪东兴,提出:“治疗方针仍按照你们原报告在这次施行膀胱镜检查,如可能仍采用通过膀胱镜进行电灼或者电切除;如因病情变化,需采用手术切除,则此次不予考虑,以后再议。”

同日,叶剑英批示:“我和卞、张两大夫共同阅看了一遍,我赞成这一方案。于三月十日开始进行。”

“卞、张两大夫”即卞志强、张佐良。

3 月 8 日,周恩来对中共吉林省委办公厅转来通化某厂有人贴出针对周恩来的大字报的材料,批示:建议给吉林省委打一电话,对此人不要事先批斗,不要施以压力。

3 月 11 日,周恩来按照治疗方案到 306 医院作全面检查,确诊为癌症复发。3 月 12 日做第二次膀胱镜检查和电灼术治疗。15 日下午周恩来出院。当天晚上回家,在床上批阅积压的文件,达 4 小时之久。

3 月 8 日,中央军委要国防科委和七机部汇报批林批孔运动情况。会议由叶剑英主持,参加会议的军委领导人还有王洪文、邓小平、张春桥、陈锡联、苏振华和七机部领导人陶鲁笳、汪洋及一些代表,共计 20 多人。

汇报中,一些代表揭发科委 20 基地司令员李福泽的问题,发言激烈,气氛紧张。

原来,2 月 20 日,20 基地两位年轻干部,张参谋和杨技师给江青写信,说基地不开展“批林批孔”,压制群众运动等等。2 月 26 日,王洪文、江青给张参谋和杨技师复信,并赠送了学习材料。

邓小平听后说了一句:“听了不少新闻哦!”

最后,叶剑英代表军委做总结,他说:“会议温度不低啊!”关于 20 基地的问题,他对陶鲁笳说:“你们回去研究一下,派个工作组,去‘放火烧荒’”。

散会后,国防科委连夜开常委会传达叶剑英的讲话,决定向 20 基地派工作组,由吴凤翔任组长、杨萃民同志任副组长。会后,恽仁祥受常委委托,和另几人一道把汇报会的记录整理出来。

20 基地即现在的中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1958 年 10 月 20 日,国防部正式授予导弹试验部队 0029 部队番号,组建导弹核试验试验基地,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 20 训练基地。基地长途台的代号叫“东风”。后来,经总部批准,基地便正式将“东风”作为这里的名称。所以,时至今日,人们说到基地,仍习惯于称“东风”,而不是“中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

3 月 13 日,国防科委检查组带着江青、王洪文的复信和学习材料,乘飞机来到东风基地,并要东风基地在大礼堂召开大会迎接,同时散

发了东风基地张参谋和杨技师与江青、王洪文来往的信件。

当时的国防科委负责人还说:“不能小看这件事,这是20世纪70年代新的‘张杨事件’!20世纪30年代,张学良、杨虎城造蒋介石的反,因为蒋介石不抗日,却要打内战。张参谋、杨技师今天向江青同志写信,这是革命行动,是造基地领导的反,因为他们不批林,不批孔,还明目张胆地压制革命群众。”

检查组到东风基地后,揭发批判东风基地主要领导的“大字报”铺天盖地,贴满了整个办公大楼。检查组对基地常委成员全力展开所谓“帮促”运动。基地常委11名成员被逐个排队,其中10人被列为斗争对象,预定要打倒其中5人。检查组在统一时间采取统一行动,查抄了每个常委成员的家,收缴了枪支,并把分散在全国各地的基地各部“走资派”集中到东风场区批斗,配合对基地常委的“斗争大会战”。运动中,一些“造反派”骨干被吸收进党委常委,甚至出现了先参加党委后突击入党的现象。

3月22日,中央军委批准将李福泽隔离审查,令其检查交待;将基地副政委高震亚停职审查,接受群众批判。随后,又对东风基地司令部参谋长张超义、八部政委杜郁、四部副部长张孝德等人实行了隔离审查。

检查组还未到东风基地之前,李福泽因患肝炎,正在基地513医院住院治疗,后来根据病情,经张志勇副司令员向国防科委请示,转到西安第四军医大学附属医院治疗。检查组到东风基地后,说李福泽不到北京治疗,却躲在西安,一定要让他到北京去治。李福泽无奈之下,只好再转往北京,但等他一到北京,就被关押在了通县,一关就是4年之久。

5月11日,东风基地在东风大礼堂前面的广场上召开批斗基地副政委高震亚的大会。会上,高震亚背了个军用水壶,坐在台阶上,不慌不忙地看着台下黑压压的人群,渴了就拧开水壶喝上一口。群众叫他站起来他就站一下,再慢慢吞吞地坐下来,若无其事地听着那些对他狂轰滥炸的批判。

基地副政委田园这时也遭到了抄家和批判,说他是“黑秀才”。因为他以前曾在基地大礼堂宣讲过刘少奇的《修养》,父亲是一位有名的律师,他自己能在北京上中学和大学,肯定是地主家庭。

# 第1305回：晋批谢，主席说“到此为止” 淮南乱，江西组织上访团

3月18日，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中央政治局委员周恩来、王洪文、江青、张春桥、姚文元、邓小平、华国锋、纪登奎、汪东兴、陈永贵、李先念、陈锡联、苏振华、倪志福共有14人接见在京山西省委常委12人。周恩来因为有事，在会议已经开始后才到。

江青点名让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陈永贵第一个发言。谢振华对陈永贵的批评没有表态。

王洪文第二个发言，提出谢振华支持晋剧《三上桃峰》为刘少奇翻案，并厉声追问道：“是谁支使你干的？谁是你的总后台？”

谢振华大声反驳说：“我没有后台！”

江青当即质问说：“我为什么炮轰你？就因为你们的《三上桃峰》是为刘少奇翻案的！是谁指使你干的？谁是你的后台？”

谢振华冷冷地回答说：“我没有后台！”

王洪文生气的说：“你谢振华顽固到底，绝没有好下场！”

江青也火了，说：“你在山西支一派，压一派，搞派性，还给林彪修行宫，跟上陈伯达跑内蒙，这是你的罪行。”

谢振华反驳说：“为林彪修行宫是中央军委的秘密工程，我们根本不知道。我去内蒙是参加华北地区协作会议，和陈伯达没有关系。我派部队在平遥救过被围困的陈永贵，在晋东南救过被围困的李顺达，这不是搞派性。”

江青说起了往事：“1938年在延安的马列学院时，我和你是同学，你还是我们学员队的大队长，那时你可真是凶得很呐！”

谢振华纠正说：“我是在马列学院学习过，我不是大队长，只是小组长。”

王洪文最后以会议主持人和党中央副主席的身份，对谢振华说：“你回山西后，要认真接受群众的批评，接受造反派的批评！”

谢振华说:“好,他们批评什么,我就接受什么!”

周恩来说:“是你的你接受,不是你的你也接受,那怎么行呢?!”

中央成立了解决山西问题5人小组,有:王洪文、张春桥、纪登奎、陈锡联和陈永贵。

在京的山西省委常委会一直开到3月20日,整整开了一个月。会上揭发了谢振华扶西沟压大寨的问题,扶李顺达压陈永贵的问题,谢振华与陈伯达的关系问题,批林不力的问题,甚至还有生活上的问题。

3月21日,山西省委常委全体乘飞机返回太原,随即于3月24日召开了山西省委三届七次全委会议,贯彻中央汇报工作会议的有关精神,由陈永贵主持批判谢振华。从3月27日开始,山西省委三届七次全委会议扩大为山西省委三届七次全委扩大会议,山西省的各个部门,山西驻军领导,各地、市、县领导班子的主要成员都参加了会议。在会议全盛的时期,吃会议饭的就达四、五千人,与会者住满了太原的宾馆和招待所。会议期间,“炮轰谢振华”、“坚决拥护陈永贵同志主持山西工作”之类的标语口号贴遍了全城全省。

谢振华靠边站了,陈永贵还要在中央工作,太原北京两头跑。于是山西的这次省委扩大会,主事的是陈永贵,但日常主持会议的重任,落到了王谦头上。王谦作为当初“黑省委”的第二把手,现在又成了实际上主持山西省委的第一把手。

对谢振华的批判主要是三个问题:一、谢振华搞了《三上桃峰》这出戏;二、谢振华上了林彪的贼船;三、让谢振华交待批极左思潮的后台。

第一个问题先就批不下去,这个戏有分管的省委领导负责审查,谢振华对晋剧并无兴趣,根本就没有看过《三上桃峰》这出戏。再往深里批,谢振华无非就是负个领导责任而已。

第二个问题严重的很,可帽子好戴,证据难寻。扩大会开始后,陈永贵在大会上宣布:谢振华只要愿意下船,他还是愿意帮助谢下船的。

协助陈永贵坐镇的省委副书记王谦也在另外一个会议上谈到:“谢振华不是一般问题,是上了贼船了。”

参加会议的人以为这是中央定的性,便跟着炮轰。谢振华的朋友

和部下也替他惋惜,语重心长地劝他快点下船。谢振华就是不说话。在一次数百人参加的批判会上,在众人炮轰得正在火头上的时候,谢振华拿过话筒说:“我知道大家的意思,是叫我快点下贼船。我到现在还没有上去。”说完,把话筒推给别人,又不做声了。

会场里的人顿时傻了,陈永贵也拿不出证明谢振华“上贼船”的证据,中央也没有人说过谢振华上了林彪的贼船,会上一时尴尬得无法收场。

还有人揭出林彪在平型关修纪念馆,谢振华出了大力。但一查,原来那个纪念馆是北京军区修的,当时谢振华还提了不同意见,说“毛主席在红军东征时到过山西,渡过黄河首先到的石楼县。石楼还没有为毛主席修东征纪念馆呢,先修平型关纪念馆怎么能行呢?”

第三个问题也批不下去了。为什么?出岔头了:有人揭发谢振华有一个“黑九条”,像是九条施政纲领,是在谢振华秘书的办公室里抄出来的。批判者们说,谢振华的这个“黑九条”,是像彭真“二月提纲”一样的反动纲领。这事上了大会简报,好像铁板上钉钉了。但原“红联站”的一把手,时任太原市清徐县委副书记段立生去找王谦,说大会必须对这件事作纠正。为啥?原来所谓的“黑九条”,是段立生写给谢振华的一封信,是他对谢振华提出的九条工作建议。

王谦起初不信,以为段立生在替谢振华承担责任,听段立生说的信誓旦旦,二人难免发生口角。

王谦说:“即便是你写的那九条,谢振华看了,那就是他的思想。”

段立生回敬说:“谢振华还看《毛选》呢,毛泽东思想能成了谢振华思想?”

见王谦对此事不公开纠正,段立生就在会场外贴出一张大字报,说明那个“九条”,是他写给谢振华的工作建议,并非谢振华制定的什么纲领。这件事也就再批不下去了。

会上还有人对谢振华面对面揭发,说谢振华在1970年8月的庐山会议上跟着林彪“起哄”。这倒确有其事。会场上立即传出一片要谢振华老实交待的吼声。谢振华却冷冷地说:“庐山会议上起哄的又不是我一个!”

当有人追问还有谁时,谢振华冷冷地说:“咱们这会场上就有,我

不能说。”与会的人们马上就明白了。主持会议的陈永贵,当时在庐山会议上,也是起过哄的。

中共“九大”后,陈伯达曾来山西视察工作。谢振华作为山西省委第一书记,自然得陪同陈伯达视察,并将陈伯达送到了呼和浩特市。有人把这事也拿出来揭发,说谢振华跟着陈伯达“跑了一段”。揭发者言之凿凿,会场上却传来阵阵窃窃私语。那位揭发者,成了当天饭桌上人们取笑的对象:“你小子要能爬成个省委书记,中央下来个政治局常委视察,看你小子在人家面前,准跑得比谁也勤快!”

刘灏此时已是太原市北郊区的区委副书记,他又拿出了当年的劲头,在批谢振华的同时,将斗争矛头指向刚刚站出来的“老走资派王谦”:

“谢振华虽然没有看《三上桃峰》,但他支持了《三上桃峰》,这不对,是应该批判。但你王谦就没有责任?你也是省委的领导嘛!你明明知道《三上桃峰》是一出为刘少奇翻案的黑戏,你审查这台戏那天,你把我也叫上,是咱们一道看的嘛,你当时还带头鼓掌喝彩呢!你这是什么动机?……”

“《山西日报》每发一篇报道大寨的文章,必发一篇报道西沟的文章。谢振华拿西沟和大寨搞平衡,这也不对,但你王谦对大寨是什么态度?你是反大寨的老手了!你过去就反对人家陈永贵,还是先反省一下你自个的反大寨问题吧……”

“谢振华主持山西工作以来,成绩还是显著的嘛。比如说……比如说……再比如说……毛主席教导我们说,一分为二才是马列主义的辩证唯物观点,错误要批评,但成绩也要肯定嘛……”

“红联站”段立生的发言,基调与刘灏基本相同。而“红总站”的头头黄锐庵的发言,则代表了另一些人的观点,那就是将火力集中到谢振华身上。有一次,黄锐庵上台批谢,提到谢振华重用了“兵团”和“红联站”的人,举例时就点了山西大学88派的负责人侯光天的名。侯光天此时正在省委办公厅会务组,他听黄锐庵点了他的名字,当即上台主动发言批谢,也点了黄锐庵的名,说谢振华重用了造反派头头黄锐庵。批谢会上互相攻讦的乱象,可见一斑。

在扩大会议上是唇枪舌剑,在扩大会议下是大字报相见。刘灏又

拿出当年炮轰卫、王、王时的办法,在五一广场贴出了一张大字报:“致王谦的公开信”,奉劝王谦不要支一派,压一派,不要搅乱了山西文化大革命胜利发展的大好形势。

昔日山西“革命工人联合会”的总指挥、青年工人诗人张志安,此时已经调入太原市文化局文艺创作小组,做了专业诗人。他也写大字报,也以革命群众名义给省革委扩大会议秘书处送群众反映。他不用真名用化名,“工人联合会”被定为反动保皇组织,用真名不行,用化名天晓得是谁写的?他先将刘灏的言论批上一顿,再送刘灏一个爱称:“谢振华的贴身小棉袄”。

曾在1967年跟着刘格平夺了“黑省委”的权,坚决打倒卫、王、王的“决死兵团”,他们的头头杨成效被谢振华下令枪毙了,现在陈永贵、王谦开始掌权批谢,他们的大小头头都成了批谢的主力。陈永贵当年支持“红总站”世人皆知,“红总站”的各色头头们,如郝庭云、黄锐庵等,都跟上陈永贵和王谦,成了批谢的炮手。

这次扩大会议拖了4个月。会议期间,省委召开安排日常工作的常委会,由王谦主持,谢振华照样参加。他的第一书记职务还没免,照旧对日常的工作安排发表自己的意见和建议,就跟没事人一样。因为没有材料能证明谢振华犯了什么了不得的错误,这个会就成了既开不下去,也散不了场的马拉松会议。最后中央只好把省里的头头又召到北京,写了一个《十一条纪要》,批评了谢振华,让这个马拉松会议至此收场。

此后,谢振华被留在北京“治病”,王谦主持山西工作。谢振华给毛泽东写信,承认自己的错误。毛泽东在信上批了“到此为止”4个字。谢振华被送进中央党校学习,最终解除了山西省委第一书记和军内职务。

1974年2月初,江西“好派”的万里浪、张羽等人也到抚州、吉安、赣州、九江等地,发动揭发省委一些领导人搞右倾复辟的行为。

2月中旬,江西蔡松林等人组织“省、地、市上访团”,三次与江西省委领导人谈判,省委同意释放在“一打三反”中被关押的“杀人犯”和“打砸抢分子”224名。

2月18日,中央办公厅信访处转来江西省乐平县发生8名群众在

县委静坐绝食、要求解决问题的材料。周恩来批示:“要求中办负责人即与江西省委、乐平县委取得联系,劝说群众停止绝食,不可消极自毁;同时,告乐平县委应按中央有关政策妥善解决群众所提合理意见要求,对不合理、不合中央政策的部分,提要求者也应自动改正。”

2 月 20 日,王洪文在北京单独会见江西的涂烈,谈话 3 个多小时。涂烈一回到南昌就召集群众组织代表广泛开展批林批孔运动。

2 月 23 日,中央向江西省委和省革委会转发了涂烈 1973 年 12 月 25 日给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写的那封信,并指出“中央要求江西省委常委把涂烈同志这封信印发给省委委员、省革委会委员、省军区党委委员每人一份,并定期在二月中召开江西省扩大会议,凡属省委委员、省革委会委员、省军区党委委员,不论是否党员,一律参加,认真讨论批林批孔和涂烈同志这封信中所提出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原则问题。请江西省委把你们的意见及会议的情况和结果及时报告中央。”

涂烈的信以及中央文件的要求犹如在江西全境投下了一枚重磅炸弹,引发了各造反组织新一轮对江西省委黄知真、刘俊秀、白栋材等人的斗争浪潮。一时间,打倒省委领导的口号四起,标语贴满了整个南昌城。

江西省委、省革委会和省军区党委按中央要求,召开“三全会”,不少当年的群众组织头头参加了会议,会议从 200 多人一直增加到千余人。3 月 10 日,在江西省“三全会”大组召集人会上,省委书记余积德、白栋材、黄知真受到揭发批判,而且是会内会外结合。

在处境十分困难的情况下,黄知真给毛泽东写信汇报江西的情况,毛泽东很快做了批示,将江西省委领导人和造反派的头头召到北京汇报情况。

我们再说安徽的淮南。1973 年秋天,淮南市有个叫李庆云的人开始以“反潮流勇士”的面目出现在社会上。他在工人食堂、篮球场等地方到处贴大字报,不断发出海报组织集会,向大家宣讲“反潮流”。

李庆云是淮南煤矿机械厂支柱车间的工人。1966 年大家造反,他嗤之以鼻:“不识数,你们造谁的反?现在是谁的天下?想找死吗?”1967 年,“司令部”遍地开花,各种“司令”多如江鲫,李庆云动心了,拉了十多个十几岁的顽童,成立了“太阳升司令部”。而后“三结合”,他

成为车间的宣传干事。没过多久,因为报销上有作弊,小干事不能做了,仍然继续当普通工人。他有三个子女,妻子没有工作,生活困难。为了生计,他在家里养了母猪,有时自作字画偷偷出卖。

1974 年 3 月,李庆云大力宣扬“文化大革命七八年来一次,到现在正好八年——第二次文化大革命已经开始”。”

4 月,李庆云到处演讲,极力鼓动罢工、停产,成立造反组织,到处呐喊“对于各单位的走资派,能打倒的打倒,能打跑的打跑”,“我们要解放淮南、解放安徽、解放全中国、最后解放全世界!”他甚至在集会上吹嘘说:“我的名字已经压在了毛主席的玻璃板下”,“我什么都不怕,反正不是做张家祥,就是做王洪文!”

张家祥,就是当年淮南“红卫军”总司令,伤残退伍兵。1968 年因“火烧高皇寺”等武斗中杀人,以“反革命破坏罪”被枪毙。

在李庆云的鼓动下,一时间,淮南社会上的“反潮流勇士”到处都是,淮南市的工业主体“十矿三厂”一时间烟销火灭,全部停产。工人们去上班,没有人安排工作,只好自己把考勤表画满,然后回家。

没有煤就没有电,华东电网面临瘫痪的危险,华东五省一市的经济建设也将随之停顿!

4 月 29 日凌晨,李庆云被秘密抓捕。当天上午,“反潮流勇士”们得到了消息,逐渐猬集于李庆云家。有人提出:“‘反潮流’是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领导、坚决支持的,抓李庆云肯定是‘走资派’们干的事,是镇压革命群众,是‘资产阶级路线’的反扑,必遭失败!”

于是,当人员达到一定数量时,他们便冲击、砸毁了淮南煤矿机械厂的机关、当地的派出所、区政府机关,封锁了区境内的南北要道。第二天,“反潮流勇士”们在淮南煤矿机械厂门前马路上重新集结,拦截过往车辆,组成车队由西往东,一路扫荡过去,砸毁、抢劫了沿路所有的派出所、政府部门,接着又砸毁、抢劫了市委机关大楼、市检察院、市法院、市公安局、市档案馆。遭到破坏的档案资料如同山积,有人放火焚烧。最后,“反潮流勇士”们还冲击了监狱。自此,淮南市秩序大乱,女孩子大白天不敢出门。有很多人将家门用砖头砌上,阖家到乡下躲避。停水、停电、商户关闭,一向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淮南市一时间又变成了人迹罕见的“鬼城”。

“反潮流勇士”们并不甘休,他们组成了“上访团”来到了北京,哄抢南苑公社,拦截外宾汽车,要面见毛主席,结果被抓了起来,一个个“遣送”回淮南。

6 月 13 日,逮捕行动秘密展开,在案者没有一人逃脱,有人被当场击毙。专案组于 7 月初成立,开始了长达 3 个月的清算。

清算期间,对李庆云进行了残酷的批判,凡是遭他煽动、破坏过的地方都要召开批判会,他带着镣铐铁链在现场接受批判和辱骂。一场接着一场。1974 年国庆期间,“4.29、4.30 案件”举行公判,曾经自封“总指挥”的袁某某被枪毙,李庆云被判死缓。在全市范围内游街示众时,淮南驻军出动了数十辆卡车的武装人员帮助压阵。加上民兵,游行队伍长达两、三公里!

1976 年夏天,李庆云竟被执行死刑,罪名是在监狱里为清明节事件叫好,对“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不满。这样的罪名令淮南的知情者、有识之士们瞠目。

# 第1306回：湖南闹，党委支持造反派 江城起，武汉释放胡厚民

随着“一打三反”和抓“516”运动的开展，湖南造反派也再次跌入挨整受压的状况。文革初期曾被戴过“右派”、“黑帮”、“小邓拓”等政治帽子的造反派，在革委会成立后的“一打三反”和抓“516”运动中，很多人又重新以“反革命分子”、“打砸抢坏分子”、“516分子”再次成为专政对象。

批林整风开始后，湖南由于1972年底出现的卜占亚问题，逐渐演变为“批林、批卜”运动。这使得那些在“一打三反”和抓“516”运动中挨整受压的湖南造反派看到了机会，因为，曾经负责主持全省工作的卜占亚倒台了，那么，他所领导的湖南“一打三反”和抓“516”可能没有问题吗？

于是，从1972年底开始，长沙市革委会大楼后面不远的一条小街上，临街挂着一块小小“市工代会”木牌的两间不大的长沙市“工代会”办公室，渐渐成为造反派们悄悄串连聚会的场所，一些工人代表的省、市革委会常委、委员，也不时出现在这里，向在场的造反派们传递有关“批林、批卜”的消息，并发布一些秘密行动指令。因为这些工人代表的省、市革委会常委、委员，都是当年的造反派头头，此时基本也都是“工代会”的主任、常委或委员什么的，因此能够名正言顺地在这个小小的办公室里，并将这里变成了进行再次造反的“司令部”。

与此同时，大字报也上街了，主题是批判卜占亚和湖南省军区副政委、原长沙市革委会主任景林，称他们二人是林彪路线在湖南、长沙的代理人，将他们在“一打三反”和抓“516”时发布的指示与讲话公之于众予以批判，抨之为“对抗毛主席革命路线而否定文化大革命”、“重蹈镇压群众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等等。

1973年3月，张平化重回湖南任省委书记，主持工作。

很快在长沙市委大楼外墙上出现了一份名为“怎么办？”的长篇大

字报,引起很大的轰动,每天都有几千人围观,并且还得到许多留言支持。那份大字报是文革期间造反派、曾任公司革委会副主任的陈益南写的,实际是向重新回湖南工作的省委书记张平化做的一份进言,向他反映长沙造反派在“一打三反”与清查“516”时挨整情况,并希望张平化能解决这些问题。

1974 年 2 月,原“长沙工联”核心领导人之一、时任省革委会常委、“九大”和“十大”中央委员的唐忠富从北京读书班回到长沙,向湖南“工代会”的一些领导人传达了王洪文 1974 年 1 月 14 日在中央读书班作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问题》的讲话。他说:“这次到北京把头上的角磨尖了,而且还淬了火,回湖南要摆它几下”。“要依靠头上长角、身上长刺的造反派,同走资派作斗争。”

唐忠富与“长沙工联”一号头头、湖南省革委会副主任胡勇,“长沙工联”三号头头、时任省革委会常委、长沙市委副书记的雷志忠等人在湖南宾馆研究,由雷志忠负责组织写作班子,编写了《为革命造反派辩护》的传单,以“唐勇忠”名义铅印散发了 6000 份。强调要把“敌人、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派、资产阶级右派”“的权再夺回来。即算‘解放’了,也要再打倒,要给他们戴上死不改悔的走资派或资产阶级右派的帽子”。

2 月,唐忠富担任中共湖南省委常委,胡勇也进入了中共湖南省委委员的行列。

3 月,唐忠富提出:关键要解决省委领导班子问题,“要解决亮相干部和造反派掌权问题。”

3 月 11 日,经湖南省委批准,由唐忠富任主任的湖南省总工会与长沙市总工会联合召开 15 万人的批林批孔大会。随后,唐忠富、胡勇、雷志忠以“富勇忠”的笔名,在《湖南日报》上发表了《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的文章。

接着,湖南各级党委几乎都公开表示支持造反派,并迅速落实解决为造反派平反的问题。在“一打三反”与“清查 516”时整的那些档案材料全部退还。有部分档案材料在平反大会上当众烧掉。对一些被关在监狱的造反派头头,在平反工作的材料还没有准备好之时,省委常委便同意造反派们的要求,先将他们保外释放再说,“先下车,再

出票”。

同时,很多单位的原保守派人士,也都采取了一种不对抗的立场,以避免受到在“一打三反”与“清查516”中被他们整过的造反派们的报复。

这时,湖南造反派提出:“只有从组织路线上,同时也落实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落实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才能保证从政治路线上真正落实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落实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才有可能永远摆脱造反派总是挨整的命运!”

他们迅速让各级党组织吸收造反派的骨干分子入党,同时,将他们提拔到各级领导岗位。

3月,湖南省地市县及所有企业事业单位的党委体制下,成立“批林批孔运动办公室”,简称“运动办”。造反派便凭借这个“运动办”,在实际运行中与各级党委并行存在。

自4月份起,湖南为造反派的再次平反活动,以及几乎同时进行的大批造反派骨干分子入党活动,如火如荼展开了。

在大批造反派入党,并且有的还被正式提为领导干部后,曾引起过一些曾经的对立派公开表示的不满,如原“高司”派方面就有6个人写了一封公开信,贴到了大街上,对当时省委顺从造反派的一些意见深表不满;并且,有人针对“富勇忠”笔名,也以“穷志诚”的笔名,在长沙市中心广场,贴出了反对造反派观点的大标语。但是,这种公开的反对很微弱,在长沙市能够公开出头来这样做的人也很少,没有成为一种公开的、有组织的潮流,而其标语,很快就为造反派方面的标语所覆盖或撕毁。甚至,当时中共长沙市委,还专门召开全市领导干部大会,发文件,指责以“穷志诚”名义在活动的一派。

6月,唐忠富与胡勇、雷志忠研究,要陈大为对省委办公厅、组织部、宣传部和省计委、工交办、农村办、财贸办及大部分局的领导干部进行摸底排队,区分造反派和非造反派,为解决亮相干部和造反派掌权问题作组织准备。

8月底,中央对湖南批林批孔运动下达“八条”指示后,对原造反派头头平反、提干、入党的活动基本上停止了。

我们再来看湖北。“十大”后武汉出现的“反潮流派”一直要求释

放在“两清一批”中被诬陷为“湖北五一六总头目、北决扬幕后总指挥”的胡厚民。他们认为,省委如果有纠正“两清”错误的诚意,就应该首先释放胡厚民。1974 年 1 月,武汉郑汉卿、孟强良、戴州 3 人将“为胡厚民翻案”“强烈要求公审胡厚民”的大幅标语,在武汉三镇到处张贴。

1974 年春节后不久,“反潮流派”不断到省委游行示威,要求释放胡厚民、李想玉、杨道远、任爱生、魏绳武等人。

1974 年 2 月 8 日下午,“反潮流派”在中山公园门口举行了万人批林批孔誓师大会,会后举行游行。2 月 10 日再次举行游行,游行队伍在市公安局门前集会,要求释放 1973 年被抓的“街头派”詹仕金、熊旭东、何天泽、吴方义四人。

2 月 17 日,谢妙福、武齐骅等往市公安局面见局长王杰,要求释放詹仕金等 4 人。市公安局门前道路狭窄,聚集人多,致使交通受阻。这次活动历时 7 天,最终 4 人被放出。中南旅社革委会主任张爱兰因参加“反潮流派”,1973 年 9 月 8 日被判刑八年,经“反潮流派”不断呼吁,省高法于 1974 年 3 月 13 日撤销原判,张爱兰被释放。

1974 年 3 月 2 日,省革委会副主任赵辛初等省委领导召集造反派头头在洪山宾馆举行座谈会,主要谈胡厚民问题。聂年生、朱鸿霞、王光照在会上就释放胡厚民讲了几个小时。而此时,谢妙福、武齐骅率领的“反潮流派”也已经聚集在宾馆门外,准备往里冲。武汉市委第一书记、市革委会主任王克文让聂年生、王光照去“做做工作”。聂、王二人出来后,让“反潮流派”安静下来等待消息。当他们二人返回会议室时,省委已作出决定,立即释放胡厚民。

当夜,夏邦银、朱鸿霞等将胡厚民接到洪山宾馆。胡厚民从车里出来,站在花坛的高处,伸出双手,朝等候在那里的人群高声致谢:“谢谢同志们的关心!谢谢同志们的爱护!毛主席万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与此同时,李想玉、魏绳武也被释放,并和胡厚民一起恢复了他们在省、市革委会的职务和工作。但是“钢二司”的勤务员杨道远没有放出来。谢保安、刘汉武等部分“钢二司”成员找到省委要说法。省委常委、省委组织部部长薛坦出来接待了他们。当提到杨道远的问题时,

薛坦劝他们不要提杨道远的问题,说他的问题“是通过中央的,大家只提自己的问题吧。”

3 月 3 日,造反派乘着数百辆卡车,举行大规模游行,庆祝胡厚民、李想玉获得释放,继续要求释放任爱生、杨道远。

3 月 4 日,湖北省委发出《关于当前批林批孔运动的几点意见》,简称“七条”,承认省委在“两清”中出现错误。

胡厚民放出来后,立即投入到批林批孔之中。朱鸿霞根据胡厚民的想法总结归纳了对造反派要“放(人)、平(反)、补(台)、提(干)、纳(新)”五字方針。“放”,就是放人,将关押在监狱里的造反派头头一律释放,当年有一句名言叫“打开监狱找左派”,就是这个意思。“平”,就是为那些被打成“516”、“北决扬”、“坏头头”的造反派平反。“补”,就是要对各级革命委员会补台,把撵走的群众组织代表请回来,发挥群众组织代表在各级新生红色政权中的作用。胡厚民被补台到省总工会任副主任。“提”,指提干、提职,指在恢复的各级党委、工会、共青团、妇联等组织中要有造反派的代表。“纳”,是纳新,即吸收造反派入党,来源于毛主席 1968 年关于整党的指示:“一个无产阶级的党也要吐故纳新,才能朝气蓬勃。”

曹承义在第一冶金建设公司率先促进公司党委造反后,对湖北批林批孔的形势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武钢党委造反了,武汉建工局党委造反了,武汉燃化局党委造反了,武汉市二医院党委也造反了……一时间,党委集体造反、跑步亮相呈争先恐后态势,满街都是装着高音喇叭、举着党委造反牌子的大卡车游行队伍。在这种形势下,中共湖北省委第一书记赵辛初、省委书记赵修、中共武汉市委第一书记王克文表态亮相支持党委造反,支持革命造反派批林批孔。

胡厚民、李想玉被释放后,吴焱金曾带人到武汉市第一看守所要求释放也是 1970 年在北京学习班被抓的王锦铭。看守所坚称要上级指示才能放人,但破例让吴焱金见了王锦铭一面。以后他们虽多次要求省、市领导人放人,但没有结果。

3 月 15 日,“反潮流派”组成赴省委代表团,向省委提出五点要求:“强烈要求省、市委站在运动的前列,要求省委立即释放革命干部任爱生,红卫兵优秀代表杨道远,为胡、任、李、杨在全省公开平反”。

3月16日,湖北省委发出《关于湖北“两清”工作中的错误问题(征求意见稿)》,简称“六条”,承认湖北的“两清”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并且点名批评曾思玉。

3月18日,朱鸿霞、胡厚民、方斌前往长航与“反潮流战士座谈”,朱鸿霞说他们是为维护省委《关于湖北“清查5·16、北决扬”工作中的错误问题》提出的“六条”来“做反潮流战士的工作”,要求“反潮流派”支持省委“六条”。他说:“省委有这样的进步,我们应当拥护。”省委“六条”“也是反潮流战士促进所取得的。”“同志们的心情可以理解。几年没有见面了。今天毛主席革命路线又使我们汇聚到一起,感情是可以理解的。但我们的感情要服从于政治。”“在我们反右倾时,要防止出现革命队伍内部的极左现象,这样便于统一。”“要像王洪文同志所指出的那样,反潮流要注意四个方面,注意团结,注意党的纪律,注意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注意政策与策略。”“我们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不仅能够是旧世界的破坏者,而且一定能是新世界的建设者。”

造反派头头的这些努力没有效果。

1974年3月,武汉锅炉厂的造反派偶然在厂党委档案室发现毛泽东关于湖北省清查“516”搞过了一点,要刹车、纠正,并注意政策的讲话。刘丰在文件上批示“暂不传达”。于是,武重、武船、武锅、电信局,马上召集一些人到武汉军区门口静坐要求接见。新调来的武汉军区司令员杨得志、政委王六生、副政委张玉华在武昌炮校接见了造反派代表。

群众代表将刘丰封锁毛主席的指示,对抗中央精神,长期整群众的事当面向杨得志作了汇报。

杨得志问张玉华:“有没有这件事情?”

张玉华把眼镜取下来,又戴上去,又取下来。杨得志拍案追问,最后张玉华哭了,承认有这件事。

武汉市委第一书记、武汉市革委会主任王克文找吴焱金谈话,要他去做聂年生的工作。吴焱金不去,说去了也是自取其辱,除非同意增补聂年生为武汉市革委会副主任,他就去做工作。

王克文说:“增补市革委会副主任是不可能的,增补个常委可以

考虑。”

吴焱金说:“常委就常委,您说话要算数。”

王克文说:“我什么时候说话不算数?”

吴焱金说:“那好,一言为定!”

他立即赶到电车公司,聂年生、王华珍等人正在那里开会。吴焱金叫聂年生出来讲话,与会者一起喊:“不能单独谈,要谈公开谈。”

吴焱金说:“我找他纯属私事,顶多耽搁三分钟,请多包涵。”

吴焱金把聂年生叫到一边,转达了王克文的意见,聂年生略一思索,回答说:“可以考虑。”

吴焱金说:“你干不干? 我现在就去回话。”

聂年生果断地说:“那你回话吧!”说完他赶紧开会去了。

吴焱金向王克文报告了和聂年生谈话的经过,王克文笑了。增补聂年生为武汉市革命委员会常委的任命文件很快发下来了,聂年生从此进了市革委会。他进入市革委会比其他造反派头头晚了将近6年。他也没有去做“反潮流”同伙的工作,去了还会遭到痛骂,那些人仍在社会上继续闹。聂年生在市革委会同老干部王克文、伍能光、文祥、黎智等关系都非常好,尤其是和伍能光经常在一起。伍能光后来在一元路给聂年生解决了一套住房,许多人笑称聂年生是伍能光的干儿子。

聂年生从华中工学院毕业以后分配到湖北恩施的来凤县,聂年生坚持未去报到。为了解决聂年生的毕业分配和工作问题,吴焱金把他接收到武汉市无线电元件厂当技术员。

“工造总司”政参部长、1967年初《湖北日报》夺权时任《湖北日报》总编辑的龙梅生提出组织一个写作班子认真批林批孔。吴焱金立即采纳他的建议,由龙梅生组织人具体实施,他们共同给写作班子起了一个笔名:“杜则进”。湖北方言“杜”和“斗”同音,“杜则进”就是“斗则进”的谐音,因为当时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就是“斗则进,不斗则退,不斗则修”。

龙梅生组织了20余,夜以继日地写批判文章,每隔一周就在地处武汉三镇当时最繁华的闹市——汉口水塔民主墙出一个整版,署名“杜则进”。

1974年3月,“杜则进”发表第一篇长文是《炮打曾思玉》,小标

题是：

（一）参加林彪反党集团未遂政变的黑干将，阴谋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

（二）反攻倒算，倒退复辟，妄图改变党的基本路线，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急先锋。

（三）镇压湖北广大革命群众和干部的罪魁祸首，结党营私，以我画线，大搞法西斯专政。

（四）对抗批林批孔运动的顽固派，捂盖子、保同党，继续向党的“九大”、“十大”路线猖狂进攻。

（五）一切反动派都逃脱不了人民历史的审判。

（六）未结束的结束语。

“杜则进”的第二篇长文是《省、市委怎么办?》小标题是：

（一）湖北问题的严重性（揭露曾、刘、方、张四条汉子与林彪又粗又长的黑线，否定工代会，推翻各级革委会，全面镇压造反派）。

（二）几个关键时刻。

（三）现在怎么办。

“杜则进”在第三篇长文《我们怎么办?》中，公布了武汉三个单位挖“北决扬”的统计数字：新华瓦楞厂，挖出“北决扬”分子34人，占造反派人数的56%；武汉机床厂，挖出“北决扬”分子600人，占造反派人数的75%；武汉汽车配件厂，挖出“北决扬”分子1600人，占造反派人数80%。后来查证落实结果，一个也没有。

这样的长文写了有十几篇之多。

# 第1307回：冰城反，云南又分成三派 省军区，通知大军区开会

此时，东北黑龙江也有人乘势而起。1974年2月，黑龙江省原“捍联总”头头率人在省委大楼贴出了第一张“反复辟”、“反回潮”的大字报。接着，他们的大字报、大标语上街，提出“打倒黑龙江省的孔老二——刘光涛！”在哈尔滨街道两旁的电线杆上，用黑墨写的“打倒刘光涛”、“打倒黑龙江省的孔老二”等大标语几乎随处可见。

3月21日，哈尔滨第一机器厂、伟建厂、汽轮机厂等单位约80多人，进占中共黑龙江省委会议室，抢走省委文件，围攻省委领导人，强行要求省委交出他们向中央告省委的信以及江青等中央领导人批评他们的批语。黑龙江省委机关因此不能正常办公。

当晚，省委机关的张文鸣、栾锋等人急忙来到省委常委范正美的家中，劈头就问范正美的态度。范正美笑着说：

“你们不是知道我的态度吗？一不同意他们的观点；二反对他们的做法。”

栾锋激动的带着口吃说：“走，走，到我家去研究研究！”

于是，他们10来人，挤在阿什河街18号筒子楼栾锋家的狭窄的住屋里开起会来。

房门敞开着，门外还站了一些人。大家七嘴八舌，显得十分激动。范正美说：

“我们不能搞什么组织，因为批林批孔是文革的继续，而不是新的文革开始。这是我们的基本出发点。重要的是，我们必须坚持正确的方向，但是还必须在政策、策略上不犯错误。有两点应该明确：一是坚持批林批孔，反对复辟，反对回潮；二是支持省委、肯定省委工作。”“目前燃眉之急是解省委之围，恢复省委机关正常工作秩序。”

经过研究，大家决定在北方大厦门前广场召开群众大会，揭发、批判省委工作上的问题，阐明他们对批林批孔的基本立场和观点，把人

们的注意力引到外面来,促使进占省委会议室的人撤离省委机关。

那么,由谁出面召集这次大会呢?经过反复商量,大家认为范正美和哈市第二建筑公司工人、全国劳动模范骆中喜二人最为合适。因为两人都是“十大”代表,有知名度,对社会有影响,能够吸引群众参加。于是就以他们两人的名字作为发起人,发出海报,于3月23日,在北方大厦门前广场召开群众大会。

3月23日上午9时左右,北方大厦门前广场集合了不下10万人,召开了史称“323”大会。

大会由张文鸣主持,栾锋、范正美、宋树尧等人先后发言。范正美的发言题目是《打击革命造反派就是否定文化大革命》。他说:

“新省委成立后,纠正了资产阶级派性掌权。但必须严正指出:由于省委领导三个正确对待解决的不好,把林、潘反革命修正主义极右实质当作极左来批,特别是有的领导把自己对文化大革命的不满利用批极左的口号,发泄在革命造反派身上,适应和迎合了资产阶级复辟势力、旧的传统观念和旧的社会习惯势力的需要,为否定造反派的修正主义反动思潮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宋树尧的发言是揭露省委主要负责人汪家道挑动群众斗群众。

“323”大会之后,进驻省委办公大楼的群众离开了。

云南省的批林批孔运动开始后,全省,特别是昆明,形成了三大派:

一派是“齐向阳”,以原来“八派”的黄兆其和刘殷农为首,是省、市革命委员会中掌权的人物。这一派从上到下掌握着各级党委的批林批孔办公室和民兵指挥部。组成了以黄兆其、刘殷农、张奎林、徐宝兴、李树林、邹思浩、许少先、杜晨光为首的“八人核心”,下设文班子、联络站、材料室等,与部份省级机关,及十多个地、州、市和昆明地区十多个大中型厂矿以及部队联络,上下配合。他们在批林批孔中的方针是:狠批翻文化大革命案,层层揪复辟势力,解决权掌握在谁手里的问题。3至5月,黄兆其、刘殷农、叶秀锦等人多次在震庄商量研究,制定了“军队攻王必成为主,地方攻陈康为主,两个一起打”的方针,并决定“打三个战役”。

第一个战役打“蔡、马、雷、董”,即时任昆明军区副政委蔡顺礼、时

任昆明军区空军指挥所主任马杰三、时任云南省军区政委雷高和时任11军军长董占林。

第二个战役是打时任昆明军区司令员、省委第二书记、省革命委员会第一副主任打王必成。

第三个战役是打时任昆明军区副司令员、省委书记、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陈康。

除了“齐向阳”这派,还有一派是“大批判”派,以原“八派”的第二号人物,有名的武斗司令杨树先为首。这一派认为,省革委会成立以后,对权力分配不公,对他们这些造反有功的人没有分配给应有的权力。他们认为,现在的主要矛盾是造反派同复辟势力的矛盾,并提出了反复辟、反回潮、反倒退三大口号。他们认为:“掌握了实权的人物在搞复辟,在云南就是我们过去保过的人,有的还是我们过去的战友,这些人已经成了既得利益的维护者,有的成了新走资派。”他们指的就是黄兆其、刘殷农等人。

第三派是以原来的“炮派”李毅、方向东为首的“反潮流”。他们在云南的划线站队中受到压制,因此提出:批判谭辅仁,批判划线站队;为落实政策而斗争;为云南受害的人民伸冤。

1974年初,刘殷农同黄兆其编写《这是为什么》一文,揭露昆明军区副司令员、省委常务书记陈康对革命路线“刻骨仇恨”、“支持赵健民组织政治土匪武装‘滇西挺进纵队’,到处残害人民”,提出要“冲破阻力”对付“残暴与横逆”。

3月15日,黄兆其给江青、王洪文、姚文元写信,揭露陈康是“林彪资产阶级司令部残余势力”、“翻案总代表”,“复辟势力的急先锋”。

批林批孔运动期间,黄兆其与刘殷农、涂晓雷等共同商量,由涂晓雷、唐世华等人写了《发扬革命造反精神,彻底揭开省委盖子》、《把“云贵总督”王必成及其同伙押上历史的审判台》、《于无声处听惊雷》、《谁是刽于手》、《转嫁危机的新阴谋》等大量文章和传单,说云南省委是“毒蛇猛兽的巢穴”,“云南从上到下许多地方是走资派控制党委的局面”。还说昆明军区司令员王必成、省委书记陈康等领导干部是云南省委内的“复辟势力”。并说:“云南省委主要有三股势力,一股来自‘云贵总督’王必成;另一股来自蔡(顺礼)、马(杰三)、雷(远高)、

董(占林)的帮凶陈康和黎韦;还有一股来自社会上‘复辟势力’在省委内的代表人物”。提出大揪“复辟势力”,打“还乡团”,“向党内正在走的走资派第二次夺权”,“要从组织上把党、政、财、文大权夺回来”,“把现存的走资派思想体系和组织体系彻底摧毁”,“现存的云南省委必须解体”,“我们斗争的目的就是为了夺取这个政权”。

我们再看此时的福建。1974 年,批林批孔运动开始后,两位《解放军报》记者从北京来到福建省军区,搞“批林批孔”蹲点,在司令部、政治部找人谈话,党委会逢会必到。

2 月 14 日,福建省军区副参谋长赵东升在直属队干部会上,布置运动中的行政管理工作,指出“运动中要掌握政策,防止矛盾激化”。又说“军区首长都是爬雪山、过草地走过来的,都是经过战争考验的老干部,问题再大,也是人民内部矛盾,要掌握好政策”。

就这两句话,赵东升被说成是破坏“批林批孔”运动的“现行反革命”。

这时,福建省军区贴出一张大字报,揭发省军区政委倪南山、副司令员周子韬在 1971 年“批林整风”时,写材料揭发张春桥煽动江西造反派抢夺解放军枪支的事情。当时,省军区有人认为倪南山和周子韬恶毒攻击张春桥,是反革命行为。当时韩先楚曾召集福州、福建两级军区常委开会解决。虽然会上有人坚持认为倪、周两人的行为属反革命性质,但韩先楚最后总结时说:“倪南山同志是老红军,周子韬同志是老八路,都是老革命,怎么能是反革命?这应该是个基本的准头吧?他们给中央写信,说明自己的意见,这是党员的权利嘛。更重要的是,现在他们已经认识到自己的问题了,犯了错误还要允许人家改正嘛。这个问题到此为止,不要再提了。”

韩先楚讲完,大军区几位常委立即表态同意。省军区有人虽然不服,眼见胳膊拧不过大腿,也就没再说什么。

此时,在批林批孔运动中,福建省军区又有人就此事贴出大字报,让军报两位记者大惊失色,匆匆飞回北京。随后又从北京匆匆飞回福州,要福建省军区立即召开“对敌斗争大会”。

2 月 17 日上午,周子韬接到通知,下午召开“对敌斗争大会”。

周子韬心里纳闷:“省军区又出了什么敌人呀?”

会前,省军区给福建省委和福州军区发出电报,说下午两点召开“对敌斗争大会”,请省委和军区领导到会指导。

时任福州军区司令员的皮定钧接到福建省军区的电报“通知”后,很奇怪:省军区开会,他这个上级领导居然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他当即给主持军委工作的叶剑英打电话,请示“这是怎么回事?”

叶剑英回答说:“没听说这事呀?”

下午开会,周子韬和倪南山坐在台下第一排常委们的座位上。

大会一开始,首先宣布逮捕副参谋长赵东生,周子韬心里直嘀咕:“这是怎么回事儿?”接着就是政委倪南山,没想到下一个就是他自己了。先在台下撕掉帽徽、领章,然后被两个人扯手按肩作喷气式状押上台去批斗。

很快,在福州就流传这样一则笑话:“下级给上级发通知,第二政委抓起第一政委。”

会后,省军区又组织四卡车人到省委大院贴大字报,刷大标语,什么“打倒炮打中央文革的反革命分子倪南山、周子韬”、“坚决揪出把矛头对准中央文革的黑手”、“反对中央文革就是反革命”等等。

当天晚上,皮定钧听完“对敌斗争大会”录音,火冒三丈。第二天,他召集两级军区常委开会,没讲几句就拍起桌子:“你们好大的胆子!一不报告,二不请示,就把你们的政委和副司令打成反革命抓起来,你们眼里还有福州军区党委,还有我这个司令员吗?马上给我放人,赔礼道歉,什么规格批斗的给我什么规格平反!……”会后,福州军区党委致电中央和军委,报告了两级军区常委会议情况,说明“我们已经决定对倪南山、周子韬平反释放,并要省军区向倪、周赔礼道歉。”

傍黑,昨天宣布倪南山、周子韬、赵东生是“反革命”的人又来了,是来向“反革命”赔礼道歉的,好话说了几箩筐,还向他们征求意见。倪南山、周子韬、赵东生什么也没说,好像都失去了说话的功能。还能说什么,还敢说什么呀?

事情好像就到此为止了。但是半个月后,3月2日至4日,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讨论研究福建省委、福州军区批林批孔运动问题,并通过中央给福建省委、福州军区的复电。

3月6日上午,中央办公厅给福州军区来电话说:“中央有一架大

飞机给你们送文件,要派可靠的人去机场接文件。”

福州军区司令部三楼会议室,军区常委们都在等着中央文件。

文件到了,军区副司令、党委副书记石一宸启封,取出文件给大家读起来:

中共中央文件中发[1974]9号中央复电福州军区党委、福建省委:

一、倪南山、周子韬在文化大革命中,在江西工作期间,站在资产阶级反动立场上,擅自开枪,残酷地镇压革命群众,犯了严重的方向、路线错误,又对中央处理江西问题的指示怀恨在心,借着揭发陈伯达和林彪的机会,恶毒地攻击中央和中央领导同志,把矛头直接指向毛主席和党中央,性质是极其严重的。赵东升同志二月十四日的讲话对批林批孔的群众运动抵触不满,错误也是严重的。

二、对倪周的严重问题,你们过去不向中央报告,这次你们给中央的电报和对福建省军区检讨报告的批复中,未严肃指出倪、周、赵等人问题的严重性,并要省军区党委向他们赔礼道歉,向群众检查错误,这说明你们还站在倪周的反动立场上为他们辩护,支持他们翻案,妄图篡改历史,胆敢把矛头指向毛主席和党中央,这在政治上、组织上都是极其严重的错误。

三、福州地区批林整风运动长期深入不下去,在批林批孔运动刚刚起来又开什么纠正错误大会,把群众镇压下去,这同有些领导人长期捂盖子是分不开的。你们应该严肃认真地对待自己的错误,在批林批孔斗争中把福州地区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盖子彻底揭开。”

……

“完了!”

不是石一宸读完了,而是这下子全完了,完蛋了!

窗外,春日的太阳又红又大,蓝天万里无云,空气一尘不染。司令部大楼后右侧的林则徐墓,庄重肃穆,草木萋萋。马鞍山绿波连天,鸟语花香。

18天前,这里也是雷鸣电闪,那“雷公”、“电母”是这里的主人。而今,这里的空气好像凝固了,那电闪雷鸣却一声声要把人们震得灵魂出窍:

“把矛头直接指向毛主席和党中央!”

“胆敢把矛头指向毛主席和党中央!”

“胆敢!”

“胆敢!”

“你们胆敢!”

……

有人回忆说:有人当时就瘫那儿了。

皮定钧铁青着脸,呼呼喘气,一声不吭。

有人说:“老石呀,你赶快写个检查稿,我们不尽快检查,人家就不让我们检查了!“

这边写检查,那边通知两级军区和省委、省革委会的领导,立即到西湖礼堂开会。稿子写好了,人也到齐了,文件还未念完,一个造反派出身的省委书记有人就吼起来:“你们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还有什么资格讲话?!”

西湖礼堂的会还未完,大字报已经铺天盖地上街了,宣传车也在大街小巷广播。两级军区领导,除了反倪、周的几个人成了“正确路线的代表”外,都成了“胆敢把矛头指向毛主席和党中央”的“一小撮”。

19 天里,倪南山和周子韬被逮捕两次,撕掉帽徽、领章两次,那是彻头彻尾地晕头转向找不到北了。

福州军区司令部管理局车队队长陆刘生,原是韩先楚的司机,看到有人从街上抄回一份 9 号文件,他看了觉得可笑,告诉车队的人不要听信小道消息。第二天“大道消息”来了,军区机关开大会传达、学习 9 号文件,与“小道消息”一字不差。陆刘生还是不大敢相信这是事实:“韩司令走了才两个多月,怎么就变成这个样子了? 台上的首长还是那些熟面孔,国民党也没从大海那边爬过来呀?”

晚上,已在兰州的韩先楚妻子刘芷来电话,说搬家时不知谁把个公家的半导体收音机装箱运到兰州了,派公务员小宋送回来,问收到了没有,又问福州天气怎么样,兰州这边干冷干冷的。陆刘生说天气倒是挺好的,就是有个 9 号文件。刘芷问什么 9 号文件呀,他就把文件精神大概讲了一遍。

第二天,陆刘生上班刚到车队,一个自称是“管理局于参谋”的人

打来电话,说:“你给刘芷打电话,告诉她9号文件了?”

陆刘生说:“9号文件是中央文件,要大张旗鼓宣传的,还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吗?”

那人说:“你这是死保韩先楚!”

陆刘生道:“死保也好,活保也好,他有问题谁也保不了,没有问题谁也打不倒。”

那人说:“你说这话小心点!”

陆刘生大声道:“你代表谁说这话?管理局根本就没你这个人,你是谁?敢报名吗?”

后来得知,这人是《解放军报》来军区蹲点的记者。

下午,一位领导找陆刘生谈话,说:“你现在的态度很不好,要赶快用实际行动和韩先楚划清界限,挽回影响。”

陆刘生说:“我当兵12年,几乎年年立功受奖,从没被领导和同志们说个‘不’字,怎么来了个9号文件就这也不是、那也不对了?我不就是个开车的嘛。”

领导说:“我知道你是上当受骗的,不然凭这些话,今天你就不好办了。”

陆刘生火了:“我上谁当了,受谁骗了?10年前也是领导找我谈话,说韩司令那儿缺个司机,组织上选中你,这是对你的信任,又说这工作多么光荣,多么重要,今天就都倒过来了,都成我的罪过了?我一个小兵,党叫干啥就干啥,我把车开到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上去了?韩司令在时你们不也都说他好吗?才走这么几天就成坏蛋了?我们这些开车的、做饭的、当警卫员的,还有当秘书的,就都得跟着倒霉、完蛋呐?天底下还有这样的道理吗?”

9号文件下来后不久,在福州西湖大礼堂审判“反革命分子”倪南山和周子韬。周子韬在检查自己的“罪行”时说:写检举揭发张春桥的材料时,有人有顾虑,不敢写,周子韬说你不写,我一个人也要写。坐在台下的皮定钧听到这里,伸出大拇指,对身旁的石一宸悄声赞道:“山东好汉!”

几天后的夜里,王洪文代表中央给福州打来电话说:“9号文件是对着韩先楚的,不是对着你们的,你们要集中揭发韩先楚,把韩先楚的

盖子揭开。”

一些人顿觉拨开迷雾见晴天,一块石头落了地,立即披挂上阵,万炮齐轰韩先楚。

果然,韩先楚在福州16年,包括十几年前在他身边工作过的秘书什么的,有的只干一年半载几个月,能找到的都得揭发批判讲清楚,能弄回来的都得回来“办学习班”。唯有被韩先楚带去兰州的5个人,算是暂时侥幸漏网了。可那个回来送半导体收音机的小宋,一个不到20岁的小兵,下火车就被带走了,关了3个月。

不久,被带去兰州的唯一成家的秘书姚科贵,家在福州还未来得及搬,在家留守的妻子也被抓走了。

后来,韩先楚给叶剑英打电话:“我是‘林彪死党’,我是‘反动路线’,我‘反对中央领导’,我‘捂盖子’,我是‘罪魁祸首’,我‘罪该万死’,那帮人不就是要打倒我吗?那就对着我来呀,整这些人干什么,抓人家老婆干什么?欺负个女人算什么本事!……”

# 第1308回：韩先楚，在兰州日子难过 “四联会”，望空都要扑到影

已调任兰州军区任司令员的韩先楚，正在西北的荒漠看地形，对福州发生了什么事情，浑然不知。他到临潼时病了，发烧。从气候湿润、满眼绿色的福州，来到这黄土漠漠、干冷干冷的西北，一下子还真有点不大适应。随行的人劝他回兰州看看，他说有医生跟着，有好药吃着，已经是天堂了，一个感冒算个什么？

到宁夏居延海时，刘芷打来电话，说有要事，让他立即回去。韩先楚听出语声有些异样，问是怎么回事？刘芷把9号文件的内容大概讲了一下。

3月22日，韩先楚回到兰州。他这位在福州干了16年的老司令，成了兰州军区的新司令，欢迎他时的那种规模、热情，着实让他感动。有人还张开双臂跟他行了个外国礼。他在陕甘宁青战斗、学习、工作、生活了10年，论时间，仅次于在家乡和福州的日子。更重要的是，那是战争年代，是他人生中最难忘怀的岁月。所以，一到兰州，他就有种回家的感觉。

可当他这次一身风尘返回兰州时，一切都变脸了。

一盒“中华”吸没了，600多字的9号文件不知看了多少遍，他就在房间里转起来。

文革初期见到“打倒韩先楚”时，他气不打一处来，立即给林彪、徐向前打电话问：“凭什么打倒我？”后来见得多了，就见怪不怪习惯了。中央召集福建两大派组织在北京办学习班，准备实现大联合，成立革委会，造反派见到他就说：“管你先楚，还是后楚，打倒再说！”他听着，只是笑笑。运动期间，群众组织，爱怎么说就怎么说，那是人家的权力。可这次不同了，这次是从中央下来的红头文件，是上边的意思，那可是一打一个倒的。

9号文件的第三条提到：“福州地区批林整风运动长期深入不下

去,在批林批孔运动刚刚起来又开什么纠正错误大会,把群众镇压下去,这同有些领导人长期捂盖子是分不开的。你们应该严肃认真地对待自己的错误,在批林批孔斗争中把福州地区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盖子彻底揭开。”

这两个“长期”和“有些领导人”,不分明就是没点名的点名吗?有的大区也是人刚走,那边大字报就铺天盖地了,中央却不表态,唯独给福州来个9号文件,这不就是冲着他来的吗?

福州的情况韩先楚一无所知,真想知道,又真不敢“拖人下水”。1958年炮击金门时,他患急性黄胆肝炎,医生把他隔离起来,除了医护人员不准与任何人接触。如今他是“政治肝炎”了,和谁接触、联系,那可就是害了人家。

也不用问了,大字报已经从办公楼贴到韩先楚家门口了,看看那大字报就知道福州那边进展到哪一步了。“炮轰”、“打倒”、“砸烂狗头”、“罪该万死”之类大标语不看,就看自己的“罪行”,差不多赶上《刘少奇反毛泽东思想100例》了。不过最多的,也是最重要的,还是说他是“林彪死党”。

最让他难以容忍的,是电话也有人监控,谁来看他,何时来的,何时走的。车型、车号、车子颜色,马上就有人报告上去了。这家里会不会被人安了窃听器呀?

已无法正常工作了。研究战区作战方案。可地形没看完,战区情况还不熟悉,怎么研究呀?看地图,一张一张地翻呀看呀,看不下去了,就看《红楼梦》。毛泽东让许世友看《红楼梦》,还说看五遍才有发言权,那就看它五遍,看看能有个什么“发言权”,反正现在有的是时间,结果没看上五页就烦了。小儿子小平回来了,爷俩下棋,儿子变着法儿让老子赢,那也烦。那就出去转转,散散心。门口墙上贴张大字报:《韩先楚,看你下步棋怎么走》。

3月24日开始,韩先楚给“毛主席、中央政治局”写信,再三说明,陈述事实。他在信中提出:“希望中央将福州军区和福建省委在批林批孔斗争中,在贯彻中央九号文件中,对我揭发的问题转给我。群众的揭发会帮助我回忆自己的错误,以便进一步检讨自己。”

但是,这些信都没有回音。

福建那边召开福州军区、福建省军区、福建省委、省革委会联席会议,简称“四联会”。会上揭发说,韩先楚给林彪打电话、写信、去林彪家共160多次。韩先楚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林彪长期养病,作为老部下,打电话请示工作,有机会还去看望林彪,都是有的。但那都是工作,仅1962年紧急战备期间,韩先楚给林彪打的电话就足有100多次,1969年战备又打过很多电话,没有阴谋。

就像“913”事件后,从林彪家中搜出的他打给林彪的电话记录说的那样,中央、军委一再强调要请示报告,可下边请示报告多少次了,上边答复什么了?

1967年武汉“720”事件后,福州造反派抄了韩先楚的家,抄出林彪1961年到福建视察时与韩先楚的合影。当时林彪是副主席,这张照片很光荣。“九一三”事件后,这些照片就成了韩先楚“紧跟林贼”的证据。

1961年,林彪视察福建,吃闽江口的海蚌,感觉出汗少了,想带点回去。一年后,叶群又打电话,说林彪要吃藕粉,北京买不到纯藕粉。有人说韩先楚经常给林彪送海蚌、藕粉,“积极投靠林彪”。韩先楚辩解:“是给林彪送过这两样东西,但量很少,而且是经过军区党委讨论过的。给毛主席和周总理送得更多。”那又是积极投靠谁呢?当然,这句他不敢说。

还有人说,福州军区周赤萍写《东北解放战争时期的林彪》,就是韩先楚支持、批准出版的。韩先楚说这是诬陷,他根本不知道。是“913”事件几天后,福州空军司令杨思禄唠起周赤萍的小册子,韩先楚才知道还有这码事。周赤萍是福州军区政委,省委第二书记,这等人物写本小书出版,有什么难的?而那时林彪是副统帅,党章上写着的接班人,给副统帅、接班人写本小书,还算个问题?谁在台上就捧谁,这不是挺“正常”的事情吗?韩先楚不服。

1970年底,福建省召开工作会议,韩先楚告诉秘书,“要大造舆论,好好宣传一下林总。”12月4日,韩先楚在全省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有人说他“非常系统地吹捧林彪,有40多处,比周赤萍的小册子有过之而无不及。”

中央1971年57号文件说,林彪过去也为革命做了些有益的工作。

韩先楚传达时说:林彪虽然死了,对他的评价还是要实事求是,一分为二。有人说这是“公然为林贼翻案”。

有人揭发说,林彪在北戴河仓皇出逃前,给韩先楚打电话,说“福州方面就交给你了”。韩先楚当即表忠心,“请林总放心”,并再三让林总保重,“两个人足足通话17分钟”。

当时,福州军区副司令石一宸,政治部副主任周曼天,省委候补委员、《福建日报》核心组副组长、厦门大学学生黄兆芬等人,这些“韩先楚的黑干将”还没被打倒,还能说话。马上站起来表态说:“这还了得?!果真如此,那韩先楚不是死党也是死党了,赶快查,是你当时在场听到的,还是听谁说的,在哪儿听到的。”

几个人以攻为守这么一较真,揭发者就支支吾吾起来,说是在车上听到的。

“那是汽车,还是火车?”首长当然不会坐公共汽车,坐小车,无论伏尔加,还是北京吉普,除了司机,就是秘书。坐火车也是软卧、包厢,随行的差不多还是那几个人,是谁说的,自然好查。这么穷追猛打,揭发者又支吾到厕所里去了,说是在厕所听一个战士说的,那个士兵好像是通讯连的。几个人有的说首长路线斗争觉悟这么高,这么重大的问题,怎么不及时向党委报告呀?有的说首长年纪大了,记性差了,可这样的人和事,当时无论如何也该多看几眼记个准呀?或者直接带到保卫部去,当时就叫出个真呀?

这么说完了还没完,几个人都说为了对党和人民负责,谁揭发的问题谁签字画押谁负责。这下子揭发者可不支吾了,立刻像被蜂子蜇了似的叫起来:“不是我说的,我是听别人说的,反正我说的都是事实,反正我不签字画押!”

中央专案组很快查清,林彪晚年房间里根本没有电话,他从来不打电话。

9月13日凌晨,周恩来通知各大军区司令林彪出逃后,即下达战备命令,全军进入战备状态。韩先楚根据周恩来的命令和叶剑英的指示,调动有关部队,架设战备通讯线路,控制一些要害部位。同时指示情报部长孙如奎加强情报工作,对于苏联军队及当时蒋军有何动向,要随时向他报告。9号文件后,这些做法都被一些人视为“参与林彪

反革命政变的阴谋活动”。

大寨大队党支部书记郭凤莲到福建“传经送宝”,韩先楚未去车站迎接,被说成是“反大寨”。《龙江颂》剧组来榕演出,韩先楚没有接见,就是“反对革命样板戏”。如此定性,好像望空还能扑到点影儿。可韩先楚在福建提倡绿化,大搞植树造林,竟然也被说成“是为林彪树碑立传”。造“林”嘛,那个“林”不就是林彪的“林”嘛?!

在福州“四联会”上,深揭猛批韩先楚,把刘少奇和蒋介石都联挂上了,“批林批孔”热火朝天。兰州这边也不甘寂寞,却实在揭不出什么东西来,就说韩先楚顶风冒雪走边防、看地形,是“游山玩水”。

5月,韩先楚与北京的联系中断了。不是电话被拿走了,电话线被掐断了,过去在他有疑难时经常给他出主意的人,他逐一给他们打电话,那边回答不是“首长不在”,就是“首长出去了”,问去哪儿了,什么时候回来,那不冷不热、带答不理的声音几乎都是“不知道”。

他知道这回是真的不行了,彻底完蛋了。

韩先楚的女婿,北京军区军训部参谋李东生,眼见着风声越来越紧,因岳父常来常往,他们这些小字辈也跟着常来常往的几家首长,也没了来往,心里着急,给兰州打电话,怕有人监控也不敢说什么。岳父说你来一趟吧。

坐一天一夜火车,刚到兰州,消息就传出去了:韩先楚家去了个“特务”。

岳父确是想让女婿去完成一项特殊任务。

韩先楚给毛泽东写封信,让李东生带回北京,交给叶剑英,再由叶剑英转呈毛泽东。在此之前,先去陈云家说明情况,那信送不送毛泽东,什么时候送,一切由陈云定夺。

就这么几句话,那天晚上,他翻来覆去不知给李东生讲了多少遍。没写满两页纸的一封信,先让他装在军用挎包里,又让他揣在军上衣兜里,末了还是放在了衬衣兜里,并一再拍着他的脑袋:孩子,小心,千万小心,弄不好要掉脑袋呀!

刚一见面,李东生就觉得岳父苍老了许多。原本挺高的额头下,那双眼睛更加凹陷了,眼睛红红的,燃烧着怒火,也透着无奈,甚至绝望。

一楼20多平方米的客厅里,墙上挂着兰州战区及陕甘宁青四省区地图。临窗一张大书桌,一只木转椅,桌上两台电话,一只笔筒,还有个一人合抱不过来的塑料充气地球仪。翁婿俩谈到大半夜,其实基本就是他一个人在谈,而且大都是自言自语:

“毛主席被小人包围了,不行了,不行了!”

“孩子,我要是被抓起来或是怎么的了,你们可要好好看好你妈,别让她出事。你们年轻,好好工作,少说多做,为党工作,咱们都是党的人。”

“孩子,没事,不怕,不怕,我救过毛主席!我救过毛主席!”

……

到后来,不管什么话题,说上几句就会没头没脑地强调一句:“我救过毛主席!”

拄着拐杖,在客厅里边转边说。“熊猫”烟一支接一支,有的点着也不吸,就那么夹着,烫手了就随手扔在地上。有时也往烟灰缸里按,那手哆嗦着把握不准,就按到桌面玻璃板上。

韩先楚说着“我救过毛主席”时那张脸上交织着的绝望和希望之情。

下半夜两点多了,韩先楚说“你去睡吧”,又摸摸那封信:“你可要揣好呀,人命关天哪!”

也不知什么时候,李东生翻来覆去刚迷糊着,又被韩先楚摇晃醒了:“不行!不行!把信给我,不能留下字据,别把你装里了,要杀头的呀!”

翻出那封信,又说:“孩子,你回去就用嘴说,问陈云怎么办,问陈云怎么办……”

韩先楚去厕所把那封信烧掉了。李东生迷迷糊糊睡到天亮就醒了,见韩先楚还在客厅里转来转去。那眼睛更红了,但那神态已经平静了,跟过去差不多了。

韩先楚道:“你回去好好工作,照样工作,什么不用管,就当没这回事。”

李东生不解:“那……”

韩先楚轻轻吐出口烟:“该死该活屌朝上,爱怎么的就怎么的,随

它去。”

又像是自言自语:“共产党人连死都不怕,还怕什么?”

他交给李东生,后来又被他烧掉的那封信,开门见山,讲的是1936年2月红军东征时的一次战斗。时任232团团长的韩先楚,率团抢占黄河渡口,渡过黄河,即以两营兵力配合山西游击队围攻石楼县城,又亲率一个营进至石口镇一带,牵制敌人五个团,以配合主力作战。行进间,突然前方枪声大作,见有约一个营的敌人将红军一部压制在路边沟里。他立即命令部队跑步前进,发起攻击,将敌击退。可当韩先楚冲至近前时却大吃一惊,因为他看见了毛泽东和彭德怀,原来那里是毛泽东和彭德怀的指挥部。所以,在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时,毛泽东对韩先楚提到这件事,说“救我一命,欠你的情。”

自李东生来兰州的那个不眠之夜后,他就慢慢地恢复了常态。以前也见不出他有多么烦躁,那种表面的平静掩盖的却是内心的风暴雷霆。现在每天依然是吸烟、踱步,老人家是照样想念,那信隔上一段时间还是要写上一封的,写完了也就写完了。踱步踱累了,就和警卫员下盘棋,或是练练毛笔字、看看书,还竟然把上下两册砖头似的《红楼梦》看完了。

5月30日夜里,韩先楚觉得右肾一阵阵疼痛,愈痛愈烈,大汗淋漓,在床上翻滚。先找来医生,又送去医院,初步诊断为肾结石,需动手术。夫人刘芷立即给军委办公厅打电话,要求去北京手术治疗。按理,这种病别说中央委员、大区正职,就是副职去京治疗也不算个什么事儿,可眼下就是个事儿了,说要请示。也不知请示了什么人,答复是:缺什么药北京给送,需要什么医生北京给派,就在兰州治疗。

# 第1309回：病在身，毛泽东未见江青 邓小平，赴联大又生异议

联合国总部决定于1974年4月9日召开联合国第六届特别会议，研究原料和发展问题。这次会议是由阿尔及利亚以第四次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执行主席身份倡议召开的，也是联合国成立以来首次专门讨论国际经济关系问题的大会，因此得到了包括中国在内的一百多个国家的赞同和支持。由于这是中国恢复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席位后首次派遣高级代表团出席的大会，对谁来担任代表团团长的问题中共中央高度重视。此时，周恩来身患重病，不宜远行。3月中旬，外交部酝酿出席这次会议的中国代表团团长人选时，初步设想是在对外经济联络部部长方毅、对外贸易部部长李强、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三个人中选出一人率团出席。周恩来让王海容在方便的时候先听听毛泽东的意见。

3月19日，王海容见到毛泽东时，谈及出席联大特别会议代表团团长人选问题。毛泽东稍作沉思后对王海容、唐闻生说，“由邓小平当团长，乔冠华当他的参谋。”毛泽东嘱咐她俩：“不要讲是我的意见，应由外交部名义写报告请示中央。”

王海容连夜，严格说应该已是20日凌晨，将毛泽东的指示报告了周恩来和外交部长姬鹏飞。外交部就中国出席第六届特别联大会议的代表团团长人选问题请示毛泽东。

3月20日，周恩来致信毛泽东，汇报他的病情：

“主席：最近4年来，我的大便中偶有潜血出现，但因消化系统好，未进行肠胃检查。这两年又因膀胱癌出现，尿中有血，易于计量和检查，故医疗力量集中于治疗膀胱癌。现膀胱癌经过两次开刀，3次电烧，已能稍稍控制……今年开会后（注：指四届人大），大便中潜血每天都有……进行食钡和灌钡检查，始发现大肠内接近肝部位有一肿瘤，类似核桃大，食物经此癌肿处蠕动甚慢，通过亦窄……而这一大肠内

的肿瘤位置,正好就是40年前我在沙窝会议后得的肝脓疡病的地方。……”

那是1935年7月28日,周恩来随红一方面军主力长征到达松潘毛儿盖,就要进入草地了,他病倒了,高烧不退,几天来一直处于昏迷中。中央决定让邓颖超从休养连调到总部帮助照顾周恩来,并指示医生全力抢救治疗。经医生检查,并结合临床表现,确诊为“阿米巴痢疾”。这种病在当时死亡率极高,只有在患者化脓部位与肠接触的地方穿孔,脓液经肠子排出体外才可能得以生存。可是当时,根本没有做穿刺和开刀手术的条件,于是,医生们决定除了让周恩来服用易米丁药之外,还采用了古老的“冰敷”疗法,以挽救周恩来的生命。

医生们把冰袋放在周恩来的身躯上部。过了六七个小时,周恩来终于慢慢地清醒了,他不时地低声呻吟,说肚子疼,并排出了许多脓液,转危为安。

周恩来在信的末尾还写道:

“我因主席对我病状关怀备至,今又突然以新的病变报告主席,心实不安,故将病情经过及历史病因说清楚,务请主席放心。在去年两次开刀后,我曾托王(海容)、唐(闻生)两同志转报主席……但如需再次开刀,我还受得了。现在要好好地作此准备。”

几天后,毛泽东批准了对周恩来的治疗方案。自从周恩来患病,他一直关心和惦记着周恩来的身体状况。

“913”后,毛泽东身体一直不好,江青要见他都要事先请示。3月20日,毛泽东对江青的求见复信说:

江青:

不见还好些。过去多年同你谈的,你有好些不执行,多见何益?有马列书在,有我的书在,你就是不研究。我重病在身,八十一了,也不体谅。你有特权,我死了,看你怎么办?你也是个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的人。请你考虑。

毛泽东

74、3、20日

江青写信对毛泽东的批评作了检讨。她在信中说:“你的批评是及时的,是一剂对症的良药。我的头脑开始清醒一些了,我确实是用

一些小事干扰主席而不觉,我记起主席曾批过:‘小事,不理。’‘泰然处之。’‘观察一下形势。’‘总结经验’等等。发起浑来,就忘了,总是得你大喝一声,我才醒来。”

3 月 22 日,毛泽东看了江青的检讨信,批示:“已阅。”

3 月 22 日,外交部向周恩来送呈《关于参加特别联大的请示报告》,建议由邓小平任团长,乔冠华、黄华为副团长。考虑到国内情况,周恩来建议在联合国特别会议的三个星期会议期间,邓小平可以只出席一个星期,在大会上发表讲话,与多方要人接触后,便可回国。此报告向中央政治局大部分成员通报后,周恩来批示同意,并于 3 月 24 日送毛泽东审批,毛泽东当天圈阅同意。

就在毛泽东圈阅同意的当天晚上,江青把王海容、唐闻生找到她的住地,对外交部的报告表示强烈不满,要求外交部收回报告,重新考虑团长人选,改由一位部级领导担任团长。

王海容、唐闻生说:“毛主席已经圈阅,外交部无权撤回。”

周恩来得知江青有不同意见后,于 3 月 25 日下午,在参加毛泽东会见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后,提出与王洪文一起向毛泽东请示。毛泽东当时太累了,已不能面见,让秘书转告周恩来、王洪文:关于邓小平出国的事,他是这个意见,如果政治局大家都不同意,那就算了。

周恩来当即表示:“完全同意毛主席的意见。”并表示,“将在明天(26 日)向政治局传达。”

王洪文也说:“原来不清楚,既然主席这样说了,当照办。”

周恩来要王洪文向张春桥、姚文元谈一谈。

也就在 3 月 25 日下午,江青 4 次打电话给王海容、唐闻生,让她们撤回要邓小平率团出席六届联大特别会议的报告。王海容说:“我只是主管礼宾的,凡经毛主席、周总理批准的报告,都不能撤回。”

江青批评王海容:“你昏了头,脑子僵化。”

王海容、唐闻生遂于 3 月 26 日上午打电话请示毛泽东处:“毛主席是否仍主张由邓小平率团出国? 可否将是主席提议让小平同志当团长的意见说出去?”

毛泽东的秘书回话,除重述 25 日下午对周恩来、王洪文说的话外,还说:“毛主席说,如果实在不行,也可以说明,让邓小平去是他提

议的。”

王海容将毛泽东的话报告了周恩来。周恩来说:“昨天,主席对我也讲了同样的话。他说:‘关于小平同志出国的事,是他的意见,如果政治局的同志都不同意,那就算了。’”

3 月 26 日晚,政治局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开会,讨论邓小平率团出席联大特别会议的问题。会上,江青以“安全问题”和“国内工作忙”等原因,反对由邓小平担任代表团团长,并要求召来王海容、唐闻生。于是,周恩来让人叫王海容、唐闻生前来列席政治局会议。她们二人刚进入东大厅,江青就质问王海容:

“邓小平去联合国,是毛主席的意见,还是外交部的意见?”

王海容答:“请示报告是外交部写的,已经周总理批呈毛主席圈阅同意。主席今天中午还说,小平同志出国是他的意见。”

江青这才明白让邓小平出任赴联合国代表团团长“是毛主席的意见”。但她还是说:

“毛主席是允许我保留意见的。当年发动文化大革命前,毛主席并不同意批判彭真、吴晗,就允许我保留意见。后来我组织了批《海瑞罢官》的文章,毛主席还是支持了我,这样才开始了文化大革命。”

会议休息时,江青又把王海容、唐闻生叫到东大厅旁边的小房间里,对她们说:国外的事情相对次要,邓小平要留在国内,等等。

王海容、唐闻生未置可否。

从小房间回到会议室,江青还是批评王海容、唐闻生。王海容有理不让人,于是在会上同江青顶撞起来。

与会政治局委员均表示同意毛泽东的意见。

散会后,王海容、唐闻生两人从东大厅出来后,赶紧到游泳池把会议情况向毛泽东作了汇报。

毛泽东很不高兴。3 月 27 日凌晨,他写信给江青:

江青:

邓小平同志出国是我的意见,你不要反对为好。小心谨慎,不要反对我的提议。

毛 3·27

同时,毛泽东让秘书把信的内容打电话告诉了王海容、唐闻生。

江青收到毛泽东的信后,复信表示拥护毛泽东的提议。邓小平出席联大特别会议的事终于尘埃落定。

3 月 27 日晚,王海容、唐闻生陪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会见外宾时,向他汇报了毛泽东写信批评江青的事。周恩来说:“怪不得,江青已打电话给我,改变了态度,支持小平同志出国。原来是你们向主席反映了情况。”

3 月 31 日,在邓小平主持下,制订出中国代表团出席联大特别会议的方针、对策和讲话等文件。

4 月 2 日,周恩来召集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这些文件时,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均称病未出席。

4 月 3 日,周恩来将一则反映武汉市几家工厂工人包围银行、要求提款补发附加工资的材料批给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等,提出应以中共中央名义电复中共湖北省委,告知:不按国家有关规定,也未经党组织批准,采取包围银行、要求提款的做法是错误的,而银行拒绝付款的做法是对的。此事当由湖北省委“负责解决,劝说工人回厂,并将结果上报”。

4 月 3 日至 5 日,周恩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修改邓小平将在联大特别会议上作的主题发言稿。并研究中国代表团在出席会议期间的具体工作方针等。

周恩来、邓小平于 3 日、4 日联名致信毛泽东,报告联大讲话稿的修改情况。

4 日,毛泽东就此批示:“好,赞同。”并于当天约周恩来、邓小平、乔冠华等见面,谈了出席联合国大会的要求。

5 日,周恩来致信邓小平、乔冠华,告知:外交部将毛泽东 4 月 4 日批示件影印若干份,送中央政治局成员传阅后归档。

4 月 6 日上午,经毛泽东批准,在机场举行了隆重的欢送仪式。周恩来亲自抱病前往机场,率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在京的党、政、军各部门负责人以及各界群众 4000 余人,为邓小平一行送行。有西方记者报道说:邓小平复出不久,就作为政府首脑人物出席联大会议,这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这是至今为止出席联大的中共最高级官员,大多数中共政治局委员都到机场欢送,甚至包括打倒他的对手”。

“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是联大第六届特别会议的宗旨和口号,这是广大亚非拉国家为改变自身经济不平等地位,要求与发达国家建立经济平等关系的一次重大尝试。因此,在这次会议上,邓小平要向全世界阐述毛泽东前不久在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提出的“三个世界”的理论,表明支持第三世界各国在原料和发展问题上维护国家主权、发展民族经济、反帝反霸的立场。这个发言是乔冠华起草的。

4 月 7 日,周恩来就“新疆工交系统工人愤怒声讨苏修、深入批林批孔大会筹备处”请示召开万人集会的电报,批告中共新疆自治区委,提出:“新疆各地要开群众大会,一定要在各级党委领导和同意下,才能召开;在目前最好说服他们不开。”

当天,周恩来还就湖北省委机关被冲、一些专案材料和文件被抢事,瞩李先念将有关反映材料送在京湖北党政军负责人“一阅”,“并告省委负责追回被进出和抢走的全部专案材料和中央文件,不许遗失”。

4 月 7 日,邓小平抵达纽约。

4 月 10 日,邓小平在特别联大代表中国发言,在这期间,会见一些友好国家的领导人,并预定 4 月 14 日与基辛格博士会见,然后于 4 月 16 日晚间离开纽约经巴黎回国。

4 月 10 日,因为联合国秘书处的官员说“中国的一位大人物来到了联合国,今天要发表演说”,会场内外和观众席上都挤满了代表和观众。许多华侨携带子女在观众席上就座,人们的脸上也显出兴奋的神色。作为美国代表团团长的基辛格,特别注意观察这个穿黑色中山装的矮个子。从那敏捷深邃的目光和坚定的步伐中看,邓小平是个性格坚毅顽强的人。邓小平的复出在国际上产生了强烈的反响,此前,基辛格专门看过美国驻华联络处和中央情报局分别呈写的有关邓小平的材料,知道这是一个经历坎坷、身世不凡的中共高层领导人,而且在五、六十年代就曾多次代表中共与苏联打交道,使另一个矮个子赫鲁晓夫深感头疼,为此令毛泽东大为赞赏。显然,此次毛泽东让他代表中国出席联大特别会议,表明他就是周恩来的继任者。

邓小平健步走向联合国讲台。会场顿时安静下来,所有的目光都在注视着他。他个子不高,身穿黑色中山装,精神抖擞。宽敞的联合国会议大厅里,响彻了他那坚定、明朗、清晰、自信又带四川口音的中

国话。他阐述了毛泽东提出的“三个世界”的理论：

——两个超级大国是最大的国际剥削者和压迫者，是新的世界战争的策源地。

——处于超级大国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发达国家的情况是复杂的。它们当中的一些国家至今还同第三世界保持着不同形态的殖民主义关系；同时，所有这些发达国家，都不同程度地受着这个或者那个超级大国的控制、威胁和欺侮。

——广大的发展中国家，长期遭受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压迫和剥削。它们取得了政治上的独立，但都还面临着肃清殖民主义残余势力、发展民族经济、巩固民族独立的历史任务。这些国家地域辽阔，人口众多，资源丰富。这些国家受的压迫深，反对压迫、谋求解放和发展的要求最强烈。它们在争取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的斗争中，显示了无比巨大的威力，不断地取得了辉煌的胜利。他们是推动世界历史车轮前进的革命动力，是反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特别是超级大国的主要力量……

联合国大会召开时，一般不鼓掌，很少出现中断的场面。邓小平30多分钟的讲话，中间被多次热烈掌声所打断。结束时掌声更为热烈，响彻了整个会议大厅。中国代表团席位前排起了长龙，几十个国家的大使或者团长向这个中国矮个子表示热烈祝贺。大会因此中断了好些时候，这在联合国历史上也是少有的。

# 第1310回：办《朝霞》，创刊后发生问题 王洪文，要求市委抓民兵

1974年2月2日，上海市总工会在文化广场召开“上海工人深入批林批孔大会”。上海市各级工会负责人，各工宣队负责人共一万多人参加大会，市革会各组办，各区、县、局的常委书记和基层党组织负责人，也都被通知列席大会，市委常委全部出席。会上点名批判了上海铁路局党委，因为党委成员中没有造反派新干部；会上还批判了“复辟倒退”、“翻文化大革命的案”的现象。王秀珍在会上讲话，号召各级工会“发扬一月革命”精神，发挥工人阶级在批林批孔运动中的主力军作用，点了普陀区骊山中学和化工局办公室主任路佩珊的名，说他们是否定文革、否定文革中新生事物的典型。因为骊山中学有两个教师认为文革中教育质量下降，而路佩珊说文革是普遍换班排斥老干部。

2月13日，上海市革委会在延安西路200号原文艺会堂召开工会干部会议，徐景贤到会并讲话，提出“要正确理解一月革命精神”等等。他的讲话内容于2月14日，被《文汇报》以评论员“鲍蔚文”的署名发表。评论员文章将“一月革命风暴精神”归纳为：“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无产阶级革命精神”，还提出“要正确对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确对待群众，正确对待自己，努力改造世界观。一个革命者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也要注意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如果只注意革别人的命，而不注意革自己的命，那么在革命运动中就会成为‘昙花一现’的人物，甚至会成为革命的阻力”。

2月15日，市总工会常委黄金海对王日初说：“徐景贤讲话有问题，下面群众有反映，好像在‘收’嘛，这个讲话与我们市总工会前几天召开的批林批孔大会不一样。”

王秀珍听了王日初转达的黄金海意见后，马上将文章找来，看后也说：“是有问题，对一月革命的评价不对！一月革命最根本的经验是夺权，文章却没有讲。”

王秀珍让主持市总工会工作的叶昌明整理一份材料,然后以“群众来信”名义报张春桥。几天后,王秀珍将叶昌明、陈阿大、黄金海等人召集到东湖宾馆,告诉他们,她给王洪文打电话,王洪文很恼火,说以后市总工会开会不要徐景贤去讲话,还说:“谁叫你们发表《文汇报》文章的?你们知道在全国造成了什么严重后果?有的省批林批孔运动的火刚刚点起来,现在就等着《文汇报》文章去把群众运动压下去”。

2 月 27 日,马天水接到张春桥来信,批评了 2 月 14 日《文汇报》的评论员文章,说写得很不好。

马天水立即召开市委常委会议传达张春桥的来信。徐景贤在会上作了检讨,说自己的讲话“歪曲了一月革命精神”,并给张春桥写了一封检查认错的信。

3 月 6 日,王秀珍在东湖宾馆,向叶昌明等人传达张春桥的信。两天后的 3 月 8 日,正逢国际劳动妇女节,下午在市革会礼堂举行纪念“三八”妇女节大会,动员批林批孔。马天水到会讲话,也在讲话中传达了张春桥信的内容。

这时,王秀珍又得到汇报,说《朝霞》“有问题”。

《朝霞》是当时上海出版的文学杂志。

1970 年,根据姚文元的指示,徐景贤、朱永嘉、王知常和肖木 4 人组成了以朱永嘉为首的“上海市革命大批判写作组”,由张春桥、姚文元直接领导,专门负责给《红旗》杂志写文章。这是《红旗》杂志在全国惟一的组稿小组。

1971 年 7 月,张春桥、姚文元在上海康平路办公室对徐景贤说,经过反复考虑,决定正式重建上海市委写作组,由“上海市革命大批判写作组”的朱永嘉、王知常和肖木负责。张春桥强调说:“至少要培养一支 200 人左右的我们自己的理论写作队伍。”

此时,工人作家肖木断断续续试写了一篇反映文革的中篇小说《初春的早晨》。他请徐景贤提提意见,并趁机向徐景贤建议,能否向上面打个报告,在上海办一个文学杂志?当时全国各地的文学刊物都还没有恢复,徐景贤回答说:“这要好好想想。”

肖木还建议徐景贤:“有些政务你能否脱开一点,抽出时间写点文章。”在一旁的徐景贤爱人葛蕴芳也赞成说:“就是嘛,老不写,老不写,

笔头子会生锈的!”

这时徐景贤感叹一声说:“胡适说,做了过河卒子,只得拼命向前。我也是,恐怕想要回去也回不去喽!”

几天后,徐景贤主动找到肖木,对他的中篇小说《初春》提了很具体的修改意见,并一再鼓励肖木要努力把那个反映文革的长篇写出来,他一定做第一个忠实读者。但对肖木办文学杂志的事则是王顾左右而言他,不肯作正面回答。经肖木再三逼问,徐景贤才略窘的苦笑一声说:“肖木啊,你政治上总是太天真,有些事是可以做、不可以说的呀!”

肖木一时不知是什么意思。后来将徐景贤的话告诉了朱永嘉,朱永嘉一下就明白了。在朱永嘉的策划、组织下,肖木和上海市委写作组文艺组组长陈冀德等人一起努力,举办了工农兵创作学习班,从工农兵作者中征集稿件。到1973年5月,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上海文艺丛刊”第一辑,题名是《朝霞》,印数30万册。发行情况很好。各方面的反映也不错。写作组召开大型座谈会以示庆祝,将文革中没有打倒的作家和已经解放的作家全都召来了,扩大影响。

《朝霞》筹备出版丛刊的事并没有报批,但丛刊出版以后,张春桥、姚文元、徐景贤等上海市委的领导都送了,人手一册。这既是对领导的尊重,也带有一点试探的性质。虽然第二辑丛刊的组稿和编辑工作正在进行中,但是如果领导看到丛刊第一辑后提出了批评,那么丛刊就马上收手。

结果,没有听到批评。不仅没有批评,姚文元在看到丛刊第一辑题头为《朝霞》时,对他身边的人说:“你们知道朝霞是什么吗?它是早晨天空中的一种高积云。这种云的特点是它吸收阳光中的各种颜色,只反射红色,所以是红的,霞光灿烂。《朝霞》,这本书的书名起得好。”他在会见外宾时,还推荐《朝霞》为全国文艺刊物的“样板”。

《朝霞》这个名字来源于这本丛刊中史汉富一篇同名小说。随后在当年的8月、12月又出版了《金钟长鸣》、《珍泉》、《钢铁洪流》三本丛刊,与5月出版的《朝霞》共四本,标明是“上海文艺丛刊”,32开本。

因为有了姚文元的那句话,随后出版的另外八本丛刊,不再标名“上海文艺丛刊”,而是改为“《朝霞》丛刊”,包括了最早的四本“上海

文艺丛刊”。《珍泉》一书的“征稿启事”中说：

“本刊1973年已出《朝霞》、《金钟长鸣》、《钢铁洪流》、《珍泉》四辑。1974年开始，改名为《朝霞》丛刊，仍为不定期出版，主要发表小说、(包括中、短篇小说和长篇选载)以及话剧剧本、电影文学剧本等。从1974年起，还将同时出版《朝霞》月刊，每月廿日出版，是综合性文艺刊物，内容以短篇小说为主，兼发散文、诗歌报告文学、文艺评论等。”

而恰在1973年11月25日，《朝霞》的创始人和主编肖木被调到北京王洪文办公室工作。临行前，徐景贤在衡山饭店设家宴为他饯行。告别时，陈冀德死乞白赖地与他“约法三章”：1，审阅丛刊的每期发稿计划。2，审读丛刊的每期清样。3，继续不断地为刊物写稿。

这时，全国各地的来信来稿，堆得小山似的。原定三、四个月才出一期的丛刊，无论从内容的涵盖上，还是从反映现实生活的速度上，都赶不上趟了。经朱永嘉同意，从1974年起，增出《朝霞》月刊。

1974年1月20日，《朝霞》杂志月刊创刊，16开本。

《朝霞》的编辑和作者队伍都是由写作组自己培养，上海原有的文艺编辑和作者队伍几乎全部排斥在外，其中包括50年代和60年代上海涌现出来的一批工人作家，这引起文学界大多数人的不满。但《朝霞》编辑部依然我行我素。

《朝霞》月刊出到第三期，一场轩然大波骤然而降。

王秀珍在延安西路200号会堂找叶昌明、陈阿大、黄金海等几个人谈话，说她收到反映《朝霞》小说有问题后，找来看了，是用半周年事影射“工总司”的。

原来，1974年1月出版的《朝霞》月刊创刊号，即第一期上，刊登的作者姚真的小说《红卫兵战旗》，是讲红卫兵打破山头主义，搞大联合的故事，其中有个细节讲到一派红卫兵张罗成立半周年纪念活动，差点影响了革命大联合。

“工总司”1967年搞庆祝成立半周年一事，当年曾受到张春桥的批评。大家听说又提“半周年”事，都很生气，认为这事张春桥早就解决了，为什么还要提？会后，叶昌明找来小说看了，又要工总司下属的工人文化宫找人听听有什么反应。戴立清、黄金海二人则打电话给马

天水,问为什么隔了那么多年还要重提这件事情,什么意思?他们还打电话给王洪文的秘书廖祖康,要他向王洪文汇报此事。

3月20日,王秀珍到北京向王洪文、张春秋、姚文元汇报上海批林批孔运动的情况,也是为了进一步了解中央对批林批孔运动的意向。这是王秀珍与马天水商量,经张春桥、王洪文同意的,由王秀珍单独去北京。此事除了马天水,其他市委常委们都不知道。

王秀珍3月20日到京后,王洪文的秘书廖祖康将她接到钓鱼台王洪文住处。3月21日至23日,王秀珍在北京待了三天,除了两次短暂的外出,一次跟着王洪文出去打猎外,基本就是在钓鱼台等候张春桥、王洪文和姚文元的接见。三天中,王洪文断断续续和王秀珍谈过一些话,据王秀珍回忆,主要是两个方面:

一方面,军队九、十次路线斗争一些问题没解决,几个总部多次运动盖子没揭开,人换了,路线没换。王洪文批了铁道兵一封信等。第二方面的内容是要上海抓紧干部工作,配置亲信。我去北京,带了王洪文要上海筹办的党代会,人代会名单,还有准备参加各组办领导工作的人员名单,共三份名单。王洪文没仔细看,说,等张春桥、姚文元接见再说。主要上海准备二十几个人,选点人,抽上来,到各组办工作,作为准备,将来中央要调人。还说"上海的工作无非抓两条,一条是抓阶级斗争,一条是培养干部。林彪一伙都能培养周宇驰、于新野,我们为什么不能培养一些青年干部呢?""国家机关各部的工作很重要,这些部门解决了,对全国有影响"。

王洪文还对王秀珍说:

你们要抓好民兵,上海民兵是有战斗力的,文化大革命初期一调就是几十万人……军队不可靠,路线不端正,军队不能领导民兵,民兵的指挥权要掌握在市委手里。民兵现在比文化大革命初期战斗力更强了,这是一支好队伍,我是信得过的,你们可要抓好。

3月24日下午,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三人一起找王秀珍谈话,鼓励放手开展批林批孔运动,在运动中发现和锻炼干部。张春桥说:"上海工作,你们放手去做,出点岔子也不要紧。"

3月25日,王秀珍赶回上海,立即先向马天水汇报,再向市委常委传达。4月6日,上海市委在文化广场召开批林批孔经验交流大会,批

林批孔运动在上海全面铺开,许多工厂的大字报栏第二天便被贴满。

此时,王秀珍又收到市工人文化宫写的检举揭发《朝霞》“有严重问题”的材料,批判《朝霞》反文革,反工人阶级。

王秀珍首先在市工人文化宫的材料上批示:“朝霞问题很严重,要好好清查。”

马天水接着在上面批示:“同意。”

徐景贤在王秀珍和马天水的批示下面写道:“同意秀珍同志意见。”

王秀珍又将市总工会陈阿大他们叫到延安西路200号,对他们说,《朝霞》还有一篇讲民兵的小说也有问题,这次《朝霞》的问题大了,她和马老、老徐都批了要调查整顿。

此时正好负责上海在皖南后方基地工作的市总工会常委戴立清回沪向市委汇报请示后方工作,提出也要在后方开批林批孔大会,请市委派人参加。经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同意,由市工、青、民兵三家派领导参加以示支持。

3月28日,上海在皖南的后方基地工厂,联合机械厂,召开批林批孔大会。会上,戴立清提到了《朝霞》的问题。接着,市民兵指挥部、团市委、市妇联也相继召开批判会。写作组得到消息后派人去会场探听,结果被人认出赶出会场。

三位市委书记的指示让朱永嘉十分紧张,一时没了主意。他在看到市委批文的当天,就要王知常写信向张春桥、姚文元汇报。

而此时,《朝霞》编辑部还不知一场风波已起。他们正忙着第四期《朝霞》的定稿。第四期的稿件中有一篇文艺短评,作者是市总工会所属市工人文化宫文艺评论组成员,他在修改文章清样时,加上了一段话,大意是说上海近来有些作品否定文化大革命,否定红卫兵运动和工人运动,为林彪路线翻案。《朝霞》负责人陈冀德审读清样后,提出要删掉这段话,作者一反平时的谦和,坚持不肯删去。陈冀德感到事情蹊跷。

当朱永嘉把三位市委书记批示的市委文件摊在陈冀德面前时,她大吃一惊,知道捅了漏子了,而且是大纰漏。要不然,不管文教口的马天水不会画圈,管文教口的徐景贤也一定会替她挡一挡的。可是,“问

题究竟出在哪儿呢?”她像是在问自己,也像是在问坐在对面的朱永嘉。而朱永嘉看上去,心情似乎比她还沉重。他没有埋怨陈冀德,只是把自己了解到的有关情况告诉了她。

原来,要求《朝霞》停刊整顿的主要有两条:

一是《朝霞》月刊第一期上发表了两篇有严重政治错误的作品。第一篇是《红卫兵战旗》,作者姚真。第二篇是由段瑞夏执笔,以夏兴笔名登在第一期的《初试锋芒》,是歌颂民兵是公检法的好帮手。

听朱永嘉这么一说,陈冀德反而松了一口气。心也慢慢地定了下来。她对愁眉苦脸的朱永嘉说:“放心,没事的。别的不敢说,要说这两篇小说,我敢担保,绝对没问题。”

朱永嘉说:“你呀,你触到了人家的痛处了。”

“哪里?怎么会?”陈冀德不服。

朱永嘉问:“《红卫兵战旗》中有没有提到庆祝半周年的事?”

陈冀德说:“有。”

朱永嘉问:“你想想,谁曾经提出要庆祝成立半周年?”

陈冀德想不出来,说:“我不知道。”

朱永嘉说:“春桥同志批评‘工总司’要成立半周年的话,你没听说过?”

“也许听到过,不关我的事,早就忘了。”陈冀德回答。

朱永嘉继续提醒陈冀德说:“春桥同志在知道了‘工总司’庆祝成立半周年的事后,曾说过:这么着急?竟等不到一周年了吗?这样的话。你怎么就忘了呢?”

陈冀德说:“确实没有印象了。再说《初试锋芒》,它批判了文革前的民兵是‘墙头上的官,抽屉里的兵’,形同虚设。歌颂今天的民兵,活跃在街道里弄,配合公检法与坏人坏事作斗争,成为公检法的好帮手。这又有什么不对?”

朱永嘉说:“人家要当主力,你把他写成了助手,问题还不严重吗?”

关于《朝霞》停刊整顿的第二条原因是:《朝霞》编辑部重用的人,政治背景复杂。具体的说,就是2月出版的第二期上《闪光的军号》作者林正义,他是从空四军调来的,曾经是叶群“招驸马”中的候选人。

对于林正义“招驸马”一事,陈冀德是知道的。林正义与陈冀德去崇明农场深入生活时,曾向她说起过此事。后来朱永嘉也为此事找到陈冀德,责问她“怎么把一个做过林彪女婿的人,留在编辑部?”要陈冀德马上把林正义退回去。

陈冀德也不客气,回答说:“林正义一不是林彪的女婿,二也不曾想巴结去当林彪的女婿。他不过是选驸马这种丑事的受害者。听明白了吗?受——害——者!诛连九族,挨不着他。叫他走,还是叫我先走吧。”说完,就回到自己办公室忙着审稿了,把这事丢之脑后。

# 第1311回：不服气，陈冀德找徐景贤 告肖木，张春桥写信摆平

上海市委写作组文艺组组长陈冀德听朱永嘉传达了市委三书记批示后，很不服气，又去找徐景贤。

找徐景贤不那么容易，但陈冀德有办法。她知道徐景贤一般在家里用午餐，于是利用他吃饭的时间，把徐景贤堵在了家里。

对陈冀德的到来徐景贤并不突然，一见到她就说："你来了，是小张通知你的吗？"

"小张"，张家龙，徐景贤的秘书。

陈冀德说："我没接到小张的电话，是我自己来的。"随即开门见山，问他三位市委书记对《朝霞》的批示是什么意思？

徐景贤沉默片刻后说道："有些事情，我不便对你说。但有一点可以告诉你，不管我同意还是不同意，《朝霞》的停刊整顿，势在必行。这件事恐怕还不仅仅是王秀珍的意思。她是从北京回来以后，才把批件传到我这里要我圈阅。不过，这件事，对你是不会怎么样的。就算不再搞刊物，总有吃饭的地方。我就难说了。弄不好，吃饭的家伙都要保不住。"

陈冀德不明白，《朝霞》的事，怎么会牵涉到徐景贤脑袋不保？随口说到："那也不见得。无非不做官就是了。有饭一起吃饭，有粥一起喝粥。有什么了不起的！"

徐景贤一脸无奈。陈冀德见状，看出他有难处，也就没再多说，带着一片茫然从徐景贤家里出来了。

差不多就在陈冀德去找徐景贤的同时，朱永嘉也跑到王秀珍那里，表示愿意承担责任，并让《朝霞》编辑部做出深刻检查。只是停刊的事，是否缓一缓？

王秀珍毫不客气地回答说："你不用检查，我不要听你检查，你们知识分子写份检讨还不容易嘛。"

朱永嘉碰了一鼻子灰,只好把唯一的希望寄托在张春桥、姚文元身上。他指定写作组的小青年许国良,每天写一份简报,向张春桥、姚文元报告事件进展情况。他还要王知常每天给姚文元写信,讲《朝霞》“有严重政治错误要停刊整顿”,反映写作组成员的看法。

王知常给张春桥的信,汇报了《朝霞》有严重政治错误,要停刊。但没有提“半周年”的事情。

几天过去了,北京没有任何反应。

这时候又传来消息说,《朝霞》月刊创刊号在上海市面上被抢购一空,脱销了。有的人购买是出于好奇,但大多数是几十本一买,准备组织批判。

这一下,写作组惊慌失措了,不少人反戈一击,办公室的墙上贴满了批判《朝霞》的大字报。

朱永嘉稳不住了,几次黯然流泪。

王知常更是顶不住,把肖木抛了出来,说这三篇有问题的小说从主题到构思都是肖木的主意。

《朝霞》编辑部所在的上海人民出版社大院内,很快也贴满了大字报,连园内的葡萄藤架也从上到下被贴满。这是王知常发动和布置的,他要写作组的青年们,贴出批判《朝霞》及陈冀德的大字报。

《朝霞》编辑部的编辑开始清理抽屉,准备关门。而写作组的秀才唇亡齿寒,不觉惶惶然。只有陈冀德一个人态度强硬。大字报贴到了文艺组办公室的墙上,她就到自己的宿舍看稿子。

一天早上,朱永嘉站在陈冀德的面前。一边递给她一个点心,一边说:“你就在这里给我闭门思过吧。”这是把她隔离起来了。也可以说,是写作组把陈冀德保护起来了。

陈冀德不再去《朝霞》编辑部了,写作组派文艺组的余秋雨接替《朝霞》编辑部工作。

“我们究竟做错了什么?”陈冀德不甘心,但此时此刻,又能做什么呢?她想给张春桥写信,但朱永嘉和王知常不同意。“找朱永嘉?找徐景贤?还有用吗?要是肖木在的话……肖木,天哪!”陈冀德想起了肖木!“《朝霞》是他一手创办的,现在《朝霞》面临停刊,他会坐视不管吗?”虽然肖木远在北京,但上海市委与在北京工作的几位中央领导

之间的文件往来有机要交通,陈冀德送给肖木看的每期《朝霞》的清样,就是利用这条线路,非常便利,而且绝对保险。当天下午送到机要交通站,晚上北京就可以看到了。于是,陈冀德把这几天围绕着《朝霞》所发生的一切,一连给肖木写了几封信,将几天来的风波原本告知。

当天晚上,肖木就收到了陈冀德的第一封信。在此之前,他对上海《朝霞》发生的事情还真是一无所闻。他是王洪文的政治辅导员,本来王洪文在北京的秘书沈少良,看到认为值得看的简报,也都会送肖木一看。但恰恰就是这几天,肖木没有看到上海市总工会的简报。据王洪文在北京的秘书沈少良事后告诉肖木,是王洪文让他不要送肖木的,说"免得肖木老师看了心烦。"

此时的肖木,看了陈冀德的信后,非常气愤,先去向王洪文汇报说:《朝霞》这个事件,在上海闹得很大,两个作者都遭到批判,主编陈冀德已经靠边。

肖木情绪激烈地表示:"如果《朝霞》有问题,我第一个应该被批判,要批就批我好了,因为《朝霞》是我建议创办的,我在上海时也是《朝霞》的。为什么要去批革命小将呢?"

王洪文先一愣,继而笑笑说:"那是大水冲倒龙王庙了。你千万别在意,我叫他们不要批了就是。"

肖木又马上去找张春桥,将事情的过程对张春桥讲了一遍,尤其是"半周年"这个起因。张春桥听后,考虑了好一会儿,才说:"你回去吧,这事我来处理。我给马老打电话。"

1974 年 4 月 9 日凌晨 2 时左右,陈冀德听到朱永嘉办公室里电话铃响。稍微犹豫后,她还是去接听了。电话那头是肖木的声音,但他既不和陈冀德打招呼,也不问她是谁,更不容她说一句话,直截了当地说:"你马上去把朱永嘉找来,春桥同志要和他通话。"

肖木应该知道接听电话的是陈冀德。因为晚上只有陈冀德的宿舍才能听得到朱永嘉办公室的电话铃声。

陈冀德急急忙忙地跑到朱永嘉宿舍,把他找了过来。只听见电话那头说:关于《朝霞》的事,张春桥都知道了,他叫陈冀德不用检查。那两篇小说他看也没有什么错。有关《朝霞》的问题,他已经给市委写了

信。信的内容很快就会传达下来。

朱永嘉接电话时,陈冀德也在场。放下电话,二人百感交集,陈冀德更是泪流满面,回到寝室,依然兴奋得睡不着,浮想联翩。后来,她在给张春桥信中这样是这样描述的:“当时我和朱永嘉一边听电话,一边热泪直流,我们又一次感到‘革命方知北京近,造反倍觉主席亲’。”

她还对《红卫兵战旗》的作者说:“没有张春桥,你我都完了!”

4月9日清晨,朱永嘉突然通知写作组一个年轻人去上海人民出版社门口等候张春桥的秘书何秀文,让他陪同何秀文在出版社看大字报。

何秀文按时来到出版社,看了大字报后匆匆走了。

早上,朱永嘉召集写作组所属文艺组成员开会,传达张春桥的电话精神。他情绪激动,流着眼泪,边哭边讲。写作组一片欢腾,所有人都松了一口气。王知常高兴地说:“这下,可要好好看看市总工会这帮人了!”他马上指挥组里的小青年,把院子里的大字报全都撕下来。

第二天,朱永嘉要《朝霞》继续工作。

4月12日,主持上海工作的马天水打电话请朱永嘉过去,给他看一份张春桥的信,就是张春桥给上海市委的批示,谈的是上海的报刊工作,没有提《朝霞》事件:

天水同志:

请市委考虑:

1、朝霞、学习与批判、文汇报、解放日报,都不要发表批评外地报刊的文章。

2、如果要批,需请示市委。

3、这期朝霞准备批解放军文艺的文章,不要发表。

4、这些报刊的领导责任在市委,市委应负责,不要推给写作组。

如同意,请告朱永嘉同志。

张春桥

一九七四年四月九日

张春桥这封信中所说的批判《解放军文艺》,指原来第四期《朝霞》准备发的一篇批判“无冲突论”文章,是针对《解放军文艺》上的一篇文章。

信中,还附了一张字条:

天水同志:

此件本来是想答复朱永嘉同志,现在考虑还是寄给你,请你约秀珍、景贤、朱永嘉三同志一谈,不要再扩大范围了。

春桥

一九七四年四月九日

张春桥在信和纸条上签的日期是4月9日,实际上是4月12日才发出的,是通过张春桥的秘书何秀文转给马天水的。为此,张春桥还特别给何秀文写了一张条子:

何秀文同志:

我感冒了一次,发低热,拖延了几天,现在(昨今)体温已正常,如果家里知道这个情况,请转告,勿念。不知道的人就不告诉了。

材料收到。请你把总工会的刊物从创刊号寄给我一份。团市委的那个简报也找一份。如果你能够找到有关批《朝霞》的其他材料,我都要。事情来得突然,事先我一点也不知道。希望你能把来龙去脉打听一下。老马在电话里吞吞吐吐,说不清楚。当然,你要谨慎。只听不说。

另外,请转告市委两点,见另纸。

张春桥

一九七四年四月十二日,又是这个日子。

"又是这个日子"是什么意思呢?1968年4月12日,上海发生过第二次炮打张春桥事件。

张春桥信中提到的"工会的刊物",是市总工会的《情况交流》,是朱永嘉让何秀文转给张春桥的。

王秀珍看到张春桥的信后,立即通知总工会停止一切批判《朝霞》的活动。

王秀珍去找朱永嘉,说总工会一帮人不是对写作组有意见,而是对徐景贤不满,想不到徐耍滑头,一个批示把矛头转向了写作组,自己溜了。

写作组秀才们则指责总工会搞写作组是假,其实是炮打张春桥。

原来,市总工会叶昌明让市工人文化宫组织讨论会。这个讨论会

的会议通知上,本来底稿写的是“讨论会”,不知怎么打字打成了“批判会”。这个写成批判会的通知,被写作组的人拿到一张。结果被说是文化宫开会搞“炮打”,还说总工会要去“接管”写作组。

王秀珍召集总工会开会传达张春桥批示后,让叶昌明对文化宫开“批判会”一事调查上报。叶昌敏亲自写了一份给市委的报告,详述了经过情况,表明绝无“炮打”的问题。报告交张春桥。王秀珍再三向张春桥作检讨,张春桥表示:“我知道市总工会的头头是不会炮打我的。”

王秀珍后来一再说:“《朝霞》问题,要不是张春桥同志及时制止,那要闯大祸了。当时北方批《三上桃峰》,南方批《朝霞》,那乱了我们自己,国内外阶级敌人就高兴了。张春桥、姚文元最关心我们,使我们不犯大错误。”

“《朝霞》事件”平息后,上海市委写作组一切恢复原样,只是对《闪光的军号》作者林正义,张春桥表态说:小说涉及部队,部队的事情比较复杂,要慎重,像这样的人就不一定要保。林正义于是离开《朝霞》一个时期。其余两篇小说的作者都没有事情,陈冀德也回到原来的位置。不过,因为她在“《朝霞》事件”中受了刺激,事件结束后,身体很不好,徐景贤批准她去浙江上虞老家养病。将近半年时间里,由文艺组的余秋雨接替陈冀德的工作。

朱永嘉给张春桥写了封信,检讨写作组在此事件中该负的责任:

最近几天,市委的几位领导同志分别找我们谈了话。他们都作了一些自我批评,我也作了自我批评。我们的问题是有一些事情没有能够在事先及时请示汇报,有的文章发表太仓促,没有能很好征求各方面的意见,结果产生了一些原来可以避免或者说得清的问题。

在这封信中,朱永嘉还汇报了写作组与市总工会缓和关系的打算:

在工作方面我们也想争取多干点事来缓和矛盾。萧木那里前几天打电话来,说洪文同志要我们像上次搞民兵调查那样抓一下造船工业方面的调查。我们集中了20多人搞了十多个专题。

朱永嘉所说的“上海民兵调查”,就是1973年11月19日,以上海市革会名义所作的《上海城市民兵情况调查》,得到中央称赞,被国务院和中央军委转发全国。他提到的“造船工业调查”,是指王洪文根据

国务院要求布置的调查,这次写作组采取主动姿态,再为王洪文做调查。

张春桥在朱永嘉信上“市委的几位领导同志分别找我们谈了话”一句下面划了条线,在旁边写上:“我需要了解谁找你的,谈了一些什么,自我批评的内容”,要朱永嘉再向他详细汇报谈话内容。并要求朱永嘉:即日起,《学习与批判》、《朝霞》、《自然辩证法》,每期都送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他们审阅同意后再开印。

# 第1312回：批黑画，北京上海相呼应 梁漱溟，孔夫子也要继承

1974年3月25日，国务院文化组副组长于会泳给姚文元写了一封信：

文元同志：您好！

我们评论组在美术组的协作下写了一篇反击美术方面黑线回潮的文章。送上请审阅、修改。如可以希望在《人民日报》上发表。

经与△△、王曼恬等同志研究，这篇文章中点了两个人的名，即宗其香和黄永玉。该二人，在历史上、文革之前和文革之后，表现都是很坏的。

此致

革命敬礼！

会泳 1974.3.25

于会泳信中请示审阅的那篇文章是文化组创作办公室写作班子“初澜”写的《坚持文艺革命，反对复辟倒退——反击美术领域文艺黑线回潮》。

信中王曼恬之前用“△△”代替的那人，后来国画家黄永玉分析，应是著名版画家古元，当时在文化组里协助王曼恬负责美术工作。

3月29日，《北京日报》发表题为《评为某些饭店宾馆创作的绘画》的文章。作者署名“卫胜”，取“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果实”之义。黄永玉的《猫头鹰》不是为饭店所画，但此时却成了第一个被大力讨伐的对象。

文章写道：“在一批黑画中，有不少是以动物为题材的。什么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猫头鹰，恶狠狠的老虎，疲惫的骆驼，翻白眼的秃鹰，等等。是作者们为了帮助人们‘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而搞的动物图像吗？否！他们所以特别喜爱这些丑恶的形象，玩的不过是‘三家村’指

桑骂槐的老把戏。这样的黑画,都是指向社会主义,射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毒箭!

你看,这幅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猫头鹰,不是充分暴露了炮制者仇恨社会主义革命现实,仇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敌对情绪吗?这幅黑画的炮制者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就曾炮制过一系列以动物为题材的反动寓言,恶毒攻击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领域里的专政是什么蜘蛛的'罗网',谩骂大跃进好像'拉磨的驴'只能在原地转圈,等等。就是这个人,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革命群众对他的批判,一直心怀不满,甚至在图章上刻上"无法无天"的字样,妄想否定无产阶级专政的法,变社会主义的天。《猫头鹰》这株毒草正是炮制者这种反动心理的集中表露。"

"利用文艺作品翻案,是阶级敌人的惯用伎俩。过去曾经出现过有人写小说为高岗翻案。《海瑞罢官》的要害,就是为彭德怀翻案。《三上桃峰》的要害是为刘少奇翻案。林彪更是曾经大写为自己翻案的反动诗词。""《猫头鹰》的炮制者不是曾经疯狂地叫嚣,他的作品'要等到二十年之后才会被人承认'吗?他们伤心地看到,今天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锻炼的中国人民是不会'承认'他们的黑画的。这一点他们总算是看对了。但是他们把希望寄托在二十年之后,则完全是痴心妄想。"

文章对宗其香画的三只老虎的批判,也相当激烈和尖锐:

"再看这幅毒草:画了三只老虎,在'月晕而风'的夜晚,躲在草丛里,瞪着恶狠狠的眼睛,窥探方向,伺机而动,却题'虎虎有生气'五个黑字。炮制者是在歌颂什么人呢?联系到他的反动历史和反动言行,可以看出这三只老虎身上正寄托着炮制者,仇恨共产党、仇恨无产阶级专政、仇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反动思想。就是这个反动家伙还别有用心地在有些画里画上太阳,却把太阳画得暗淡无光,有的加上一个黑圈,有的让狰狞伸延的枝条遮住光芒,有的光轮遮一道黑云。这完全是炮制者在发泄他那种见不得阳光的反动思想感情!"

文章还点名批判了《任重道远》和《入蜀途中即景》两幅画。前者画面为沙漠中的两头骆驼,应是吴作人的作品;后者的画面为牛与山

水,应是李可染的作品。其它还有一些作品被批判,但均未点出画名。中国画常常出现的形象与意境,如荷花、杨柳、古树、怪石等,都被猛烈抨击。

文章中对这些作品的作者虽没有公开点名,但对京城的许多人来说,矛头所指显而易见。

第二天,3 月 30 日,《北京日报》又发表了《深入批林批孔反击修正主义文艺黑线回潮》的报道。报道称:“最近,本市了召开工农兵批林批孔反击修正主义文艺黑线回潮大会。参加大会的有来自各条战线的一万三千多人。市委和市革委会的负责同志出席了大会。市革委会负责同志在会上讲了话。……北京市美术创作人员赵志田等在发言中,批判了最近从北京某些饭店、宾馆揭发出的一些人画的一批黑画、坏画。”

4 月 5 日,《北京日报》发表了北京饭店开展批判“黑画”活动的相关报道,题为《联系实际狠批“克己复礼” 坚决反击文艺黑线回潮》,副题为“北京饭店党委带领广大职工联系出现黑画、坏画的问题深入批林批孔”。

报道中写道:“中央工艺美院的同志给这个饭店送来了两张大字报,针对饭店在筹备新建大楼房间陈设装饰工作中,找人画的国画,出现部分黑画、坏画的问题,尖锐批评饭店领导为文艺黑线回潮开绿灯的严重错误。这两张革命大字报对饭店领导震动很大。他们当天晚上召开党委会……

……还组织职工看了黑画、坏画展览,大家看了黑画、坏画以后非常气愤,很快掀起了批判高潮,在两周之内写出二百六十多份批判稿,召开了九次批判大会,七十多人发了言。”

与北京的批判遥相呼应,上海对《中国画》的批判,此时也在进行着。

《中国画》画册是由中国轻工业品进出口公司上海市工艺品分公司编印的一本出口画样本,八开彩印,中英文对照,系配合中国画出口的宣传品而非正式出版物。

《中国画》封面选用李可染的作品《山水》。画册前页,刊有出版

说明：

中国画是一个有悠久历史传统的古老画种，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和笔墨技巧。新中国诞生后，广大中国画作者在毛主席“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方针指引下，批判地继承和发扬了中国画传统，使作品具有新思想、新内容和新风格，颇受国内外中国画爱好者欢迎。

“中国画”样本的编印，是籍以简略地介绍给国外对中国画爱好者参阅。本公司收集中国画颇多，欢迎联系和订购。

画册除了选用郑板桥、任伯年、仇英、石涛、黄宾虹、吴昌硕、徐悲鸿等几位古代和现代著名画家的作品外，集中介绍了一批健在画家的作品，如潘天寿、李可染、林风眠、傅抱石、吴作人、黄胄、黎雄才、贺天健、宋文治、周昌谷等。这些健在的画家，大多在“文革”初期受到批判。

3月20日，上海《文汇报》就已经发表署名“陆民”的文章：《一本地地道道“复礼”、翻案的画册——评〈中国画〉》。接着，又在3月30日、4月5日、5月31日三天，以整版篇幅刊载檄文，前两次通栏标题为《深批“克己复礼”击退美术战线的复辟逆流》，第三次通栏标题为《批林批孔，把上层建筑领域的革命进行到底》。这些檄文对《中国画》进行了全面讨伐。

署名“上海美术设计公司布置设计组”的《用革命的美术作品占领布置画的阵地》一文这样写道：

“近年来，美术领域内出现了令人深思的‘怪’现象。在我们美术布置工作中，有的把那种名为仿古，实为复古的花鸟虫鱼、山山水水挂了起来；有的把过去的黑画，稍加改扮又请了出来；更有甚者，把明清时代封建士大夫阶级的作品也原封不动地搬进了社会主义的宣传阵地。”

《一本地地道道“复礼”、翻案的画册——评〈中国画〉》的文章中这样批判林风眠的《山区》：

“再举一幅题为《山区》的山水画，画的是在层层乌云阴霾笼罩下的深山，满山都是枯枝黄叶，山脚下有几间惨白的房屋，整幅画散发出

一片阴冷凄凉的活像修道院的气氛。这里的《山区》究竟是什么时代的山区呢？作者在这幅画面上加上几个细瘦的高压线塔，仿佛点明这幅画画的是社会主义的山区，这难道符合事实吗？在我们社会主义新山区里，亿万个新愚公，立下移山志，改造旧山河，人工渠绕山穿谷，大寨里片片新绿，到处都是生机勃勃，到处都是欣欣向荣。这才是社会主义祖国山区的真实面貌。《山区》的作者为什么对此视而不见，却臆造出这样一幅中世纪的乡村画来呢？而画册的编印者又为什么对那些描绘了社会主义新山区动人景象的好作品一点也看不上眼，却偏偏喜欢这幅歪曲、污蔑社会主义新山区的画呢？再深追下去，原来这幅画是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早已被批判过的作品，画册的编印者把它重印出来，岂不是明目张胆地妄图颠倒文化大革命的历史吗？”

署名“林承复”的《“黑山恶水”藏祸心》一文，集中批判李可染的作品：

“摆在我们面前的是一册《中国画》，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封面上的一滩黑墨，细一看，原来是一幅题为《山水》的中国画。这样一幅‘黑山恶水’画，居然放在封面上，居然还占据了封面的三分之二的版面，可见编印者是何等器重了。是因为这幅画的作者颇有‘名望’吗？是因为这幅画‘具有新思想、新内容’吗？是因为这幅画继承了中国画传统的‘独特的艺术风格和笔墨技巧’吗？或者是兼而有之吗？既然编印者如此器重，我们也不可小看。这里，让我们看一看这幅画究竟反映了一种什么意境和精神，其用心何在。”

姚文元在收到于会泳 3 月 25 日的请示后，于两周之后，4 月 12 日，用铅笔在于会泳来信的空白处做了批示：“关于批判一批‘黑画’的文章，在我这里压了一些时候。主要考虑到：这类画如一批判，在国外肯定身价倍增。可以卖更多的钱，且画较形象，易被敌人利用，造谣诬蔑我。因此想了两个方案，第一在北京日报上发，不转载。第二暂不发表，待在某一时候正面介绍我社会主义艺术成就时有一部分提到这些毒草。哪个方案较妥，请春桥、江青同志阅批！”

两天后，4 月 14 日，张春桥做出批示：“我倾向暂不发表，先在内部批，待适当的时候再讲，请酌。”

一天后,4 月 15 日,江青最后做出批示:“同意春桥同志的意见”。1974 年 3、4 月间,“批林批孔”运动已经开始了一段时间,全国政协直属组的成员差不多都发言表了态,拥护这场运动,只有北大教授、全国政协委员梁漱溟一直没有说话。实际上他一直在家中准备着长篇发言,最后终于和盘托出,表示对孔子不能全盘否定。

他讲了两个半天,共八个小时,引经据典,其中有毛泽东的一句话,他说:

“我记得毛主席讲过,自孔夫子至孙中山,我们都要讲究,这话就不是全盘否定孔子的意思。但我毛主席著作学得不好,查了一次毛选,却没查到,不知出自哪篇文章,但记忆中肯定是有的。”

第二天,在梁漱溟第二个半天讲话之前,全国政协常委赵朴初将全国政协直属学习组秘书汪东林叫过去,交给他一个纸条,说:“你把这张纸条交给梁老。昨天回家我查了毛选,梁先生昨天讲的没有找到出处的毛主席语录,我给他找到了。”

纸条上写着毛选第几卷第几页,题目是《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内容为:“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学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继承这一份珍贵的遗产。”

梁漱溟接到此纸条后深表谢意。

后来,梁漱溟写了一篇长达 30000 字的专文《我们今天应该如何评价孔子》,大胆提出对孔子在中国文化上的地位要公正评价。他在文中提出:“目前批林批孔运动一般流行意见,我多半不能同意。”他说:孔子在中国四五千年文化史上为承先启后的关键性人物,孔子的功罪或价值如何,应视中国文化在世界上表现出的成功失败而定之……“五四”运动中有“打倒孔家店”的呼声,而以“赛恩斯”和“德漠克拉西”相标榜,大体是对的。但不能抄袭他人的文章,仍须走自己的路。在这篇文章中,他还说:“时下批孔运动是由批林批孔引起的。因‘克己复礼’,便是林彪念念在心的大事,时论便集中批判孔子‘克己复礼’,认为孔子是要复周礼,林彪要复辟资本主义。其实林贼念念在心者不过是搞政变夺权,‘克己复礼’是其私下一句暗号隐语;他何尝有

爱于资本主义而立志为资本主义复辟。林贼搞复辟不搞复辟不足论，误以为孔子怀抱复古倒退思想则不容不辩。”他在文末注明：“1974 年 6 月 25 日改写稿，1974 年 11 月 8 日立冬撰写完成不发表”。他还在政协学习会上说：“你们非要我发言，我就讲：我的态度是不批孔，但批林。路线是公开的，可以见人的。不敢见人的，不是路线；从做人的角度说，光明是人，不光明是鬼，林彪就是一个鬼。刘少奇的主张很多，都是公开的。彭德怀给毛主席的也是公开信。”又说：“多年来，我是一直与中国共产党求大同，存小异的。我的思想恐怕要比林彪复杂，不那么简单，但我是公开的、光明的，而林彪则是利欲熏心，专搞阴谋诡计的。我堂堂正正是个人，但林彪身败名裂，不够做人的资格。”

3 月 31 日，周恩来就安徽省和合肥市总工会擅定召开批判李德生等省委领导人的十万人“誓师大会”一事，代拟中央复中共安徽省委（转告安徽省和合肥市总工会）电：“未经党中央的同意，就否定省、市委的领导作用是不妥的，望与省委常委协商进行。最好先不开这样大会。”

4 月 10 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批林批孔运动几个问题的通知，即中发［1974］12 号文件。

文件首先指出：“不要成立战斗队一类群众组织，也不要搞跨行业、跨地区一类的串连。”“对已经成立的联络站，上访团、汇报团一类组织，各级党委应做好工作，劝他们回本单位参加批林批孔，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

文件第二条是：“人民解放军广大指战员在三支两军中作出了巨大贡献。已经回部队的三支两军人员，不要再回支左单位参加批林批孔。如果对他们有批评意见，可以送到所在部队的领导机关。”

4 月 10 日这天，《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抓批林批孔 促工业生产》。

当天，周恩来对福州军区党委关于在 1967 年江西赣州“629 武斗”中负有直接责任的原江西省军区赣州军分区政委李胜回赣州一事的请示批示道：“李胜不能去赣州，有如赵永夫不能回青海一样。如去，生命难保！”并责成福州军区对李胜“实行监护”，提出：“如李有检讨，

或辩护,可许其书面上报。”

4 月 11 日,周恩来批示同意广东省委《关于大字报不要上街问题的请示报告》中所提两项措施,即:

一、教育干部、群众大字报不上街;

二、已上街的大字报要劝阻张贴者,告其将大字报贴在本单位。

他强调指出:“凡未经中央点名和批准的中央和省两级领导同志,不许贴他们的大字报上街。”

14 日,周恩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山东问题。

当天,他在中共福建省委关于福州街头出现针对李德生大字报的反映材料上批:应劝阻群众,此类大字报“不要贴到街上去”。

# 第1313回：促生产，计委召开座谈会 下《通知》，批林批孔定政策

4月14日，李先念、华国锋、余秋里、谷牧、袁宝华及有关部门负责人在国务院会议厅接见参加国家计委召开的“抓革命、促生产座谈会”的15省、市主要负责人。谷牧首先汇报了这次座谈会议的情况。当他说到“这次会议是根据先念同志批示召开的，计委给国务院的报告，洪文、小平、登奎、国锋同志都圈阅了”的时候，李先念说：“这次会议是中央政治局批准召开的，总理知道，主席也知道。我们要你们多开两天是为了等社论和12号文件。多留几天值得。”

当谷牧汇报座谈会上有11个省市发言，介绍批林批孔，抓革命、促生产的经验，然后研究怎么把煤、钢、运促上去时，李先念说：“车皮总是调度的不大合理。昨天晚上我在政治局讲了，津浦、京广两条干线不够畅通，只好把大同、开滦的煤绕道由大连上船运往上海。看起来不合理，但按目前情况，还是合理的。看起来不合经济核算，但总比在那里停着好。山西煤运不出去，可不可以把北京的汽车抽出几千辆去山西运煤，行不行？”

谷牧：“公路上汽车已经排满了，现在主要靠火车运。准备用大型机车。交通部准备派两个工作组去济南、武汉。”

李葆华：“还准备用内燃机车，火车在徐州不停。”

李先念：“这个现象是暂时的，会很快改变。通过现象看本质，批林批孔运动的形势好的很。”

当谷牧谈到座谈会还用了半天时间议了一下轻工市场，昨天又把广交会的供应问题谈了一下，大家都表示要保证供应时，华国锋问：“广东猪肉供应紧张，解决了吗？”

李先念对湖南的孙国治说：“你们湖南要支援广交会一下嘛！”

孙国治说：“我们给家里打了电话。”

当谷牧汇报到修正主义办企业路线回潮，很多问题牵涉到北京的

一些部,特别是国家计委时,李先念说:“修正主义办企业路线回潮,主要来自中央部门,一机部长春会议就反映了这个问题。一机部来人了没有?请打电话找来。上海工人同志提的意见是对的,我也有责任。有的批评不那么准确,不要紧,基本精神是好的,应该欢迎。如果要求人家的批评一点出入都没有,那就不要人家批评就是了。大概秋里同志讲了一些错话。”

余秋里说:“我昨天下午做了检查发言,同志们批评好的很,很中肯。”

谷牧说:“很多都是来自计委。如十条我们在计划会议上印发征求意见,中央批评后,我们收回来了,实际上这以前专业会议上,早就传下去了。”

李先念:“在怎样办好企业问题上,贯彻《鞍钢宪法》,依靠工人阶级,坚持群众路线,加强党的领导,还没有解决好。”

李先念看到天津市委书记孙健的发言简报时,问:“孙健你多大年纪了?”

孙健答:“38 岁。”

李先念:“哪里人?”

孙健:“保定人。”

李先念:“天津市有个工厂规定心跳 200 次、血压 > 90、发烧 40 度,才给病假。还规定工人一天只能小便两次,每次不能超过 10 分钟。这不是管、卡、压吗?这是那里规定的?这个问题揭的好,让他自己(指厂领导)先执行好了。”

孙健:“我们有责任。”

李先念:“有的同志就是喜欢压工人,根本没有群众观点。制度还是要的,但要依靠党的领导,依靠工人阶级,提高工人觉悟,不能光靠你的那个制度。”

“有些省看来很乱,但乱不能怨群众,还是领导的问题。有的对群众说不服就压,压不服就抓。阶级敌人是有,斗争是复杂的,要按政策办事。”

当谷牧谈到上海讲全局保重点,重点为全局时,李先念说:“全国要保重点,要保上海,上海不保怎么行呀!林彪反党集团就是攻上海。

上海这样好的城市,工人阶级觉悟又高。供应全国,支援世界,就是要保。”

当谷牧谈到大家学了《人民日报》社论及中央12号文件很满意时,李先念说:“12号文件发到县团级,可以向广大群众传达。但不能张贴。小平同志在联大特别会议上的发言,也要认真学习一天,不然你们回去被事务缠住没有时间学了。”“小平同志的发言,主席有个批语:‘好,赞同,毛泽东。’把法国、澳大利亚划到第二世界,他们感到很光荣。学这个发言和学习毛主席同布迈丁、卡翁达的谈话结合起来。要好好学一学这篇发言。整篇都是讲的战略、方针、政策、策略问题,很重要。”

他又说:“你们这次来,机会很好,正好发表社论和中央12号文件,可以好好学习。12号文件的基本精神是强调加强党的领导,放手发动群众,搞好批林批孔。”

“有个工厂有些人要求增加工资,去找党委书记,党委书记就带着他们去造劳资科的反。这怎么算党的领导?武汉有个银行,还是个很小的银行,他们对闹经济主义的就是不给开支,顶得好。中央打电话支持这个银行。你不合理,闹经济主义,就是不该发嘛!”

“12号文件的精神就是要加强党的领导,放手发动群众,深入开展批林批孔。要注意总结经验,不要搞串联,一搞串联,分成两派,就把林彪、孔老二放掉了。”

华国锋:“这个文件又把主席巡视大江南北的讲话重申了一下,要讲团结,不要分成两派,有缺点要各自多做自我批评。有一个同志到北京,乘公共汽车不买票,让他买,他说:‘批林批孔还买票,哪像个革命的样子。’他忘了要遵守革命纪律。”

李先念:“他认为‘满街没有大字报,不像个革命的样子。’你们回去向党委汇报要把商业抓一下。现在城乡交流有点不畅,现在不是没有猪,没有鸡,主要是没有很好的抓,对人民生活也有影响。要沟通城乡关系,加强收购工作。你们管工业的也要管管商业,经济领域修正主义回潮,强调制度多了,制度还是要的,但问题是制度建立在什么基础上,不能搞管、卡、压,要靠群众自觉地执行。还有否定文化大革命的问题,冶金部有个高扬文,他恶毒攻击文化大革命,对群众有刻骨仇

恨,高扬文的材料可以每人发一本,有个按语,江青同志、文元同志看了,认为写的还可以。要学一学小平同志发言,关心国家大事。

商业市场问题已经讲了,农业也不错。但农村的资本主义倾向不可低估,极少数地区有人煽动农民进城。对银行正确的东西要支持,围攻银行不是一个地方,要说服群众。是不是群众自发干的?不是的,背后是有走资派支持的,还有阶级敌人破坏。唐钢家属工200多人闹经济主义,到冶金部、中南海闹,查了一下是支部书记的老婆,还有几十个共产党员的老婆。我们就通知了河北省委,唐山市委连夜赶来。我说一定有后台,这个话说的厉害了些,共产党员动员老婆闹,不好嘛!这些人就回去了。一定要把坏人揭露出来,如果现在都搞临时工转正,附加工资等,就冲淡了批林批孔大方向。

大家回去把军工抓一抓。军工有个报告文字长一些,我签了,总理也批了。有个体制问题,要规定几条,军工生产今年下放下去,北京怎么样,上海一直是统一领导,要以地方为主来管。要在定型中研究先进技术,不能等你研究好了再来定型,部队拿不到的东西。造船工业要找交通部,六机部研究一下。要坚定不移地贯彻'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对进口的东西要审查,如造船工业我们有基础,可以搞,就不要进口运输船,要立足于国内。该进口的还要进口,为了抢时间,港口工程船要进口,把货单审查一下是必要的,港口堵塞,外轮老罚款,影响很不好。"

1974年3月11日,浙江报来反映温州地区发生抢夺武器、扰乱生产的几份材料。周恩来致信王洪文、张春桥,要他们酌处。3月16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电告浙江省军区:命令收缴被抢武器。4月,浙江省委书记铁瑛在省"三全会"上作《我的检查》。

他说:1972年的"批林整风"运动,"因个人问题出气,纠缠历史旧帐"大搞支一派,压一派,并以清查"516"和"反党乱军"分子对张永生等干部群众大肆整理黑材料,大翻"两个改组"(即周总理直接主持下改组省军管会和省军区领导班子)以及萧山、诸暨问题的旧案,"这就把矛头指向了"张永生和部分干部群众。"在我的错误思想指导下,省革委会四大组和许多地区、一些省属工厂、院校以及一部分县都成了'清查重点'。"

此后,张永生同翁森鹤、贺贤春向省委建议提干50余名,并以浙江美术学院为点,树立样板。

张永生还同翁森鹤、贺贤春提议,经省委批准,在全省59个县市(区)建立了民兵指挥部。

4月16日,周恩来在一则反映浙江省军区副政委夏琦情况的报告上批:“可在更小范围内与夏琦同志谈,欢迎他的揭发,也可直接写报告送主席、中央,对铁瑛同志也是一样。”

4月17日,毛泽东连续给江青写了两封信,一封是:

江青:

两信收。前后不一。党的大势不错,悲观不好。不要动摇。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要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不要主观片观(面)。千万注意。牢骚太盛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不要请假。钱可略增。无限风光在险峰。

毛泽东 74,4,17

另一封是:

江青:

两信都收到,并收到春风杨柳。后信打退堂鼓,不妥。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不可主观片面。多休息好。似不宜请长假。

毛泽东 74,4,17

这天,周恩来在中共云南省委、昆明军区党委关于昆明军区司令员王必成问题的请示电报上批示:“让王必成同志休息两天再谈,更不忙在两个常委会上公开揭发批判。”

“两个常委会”是指中共云南省委常委会和昆明军区党委常委会。

4月18日凌晨2时30分,周恩来在国务院会议厅找华国锋谈话,要华国锋复查贺龙的案子。

谈话后,总理办公室的秘书小纪很快就给华国锋送来了一包材料。其中一件材料是国务院参事李仲公1968年3月28日交的那两封信,内容是关于贺龙1927年想投靠蒋介石一事。

华国锋向周恩来汇报,要派人找李仲公复查。这时李仲公已经80多岁了。周恩来特别嘱咐华国锋要注意方式方法,不要把他吓死了。

4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云南问题。会议商定:以中

央名义复中共云南省委和昆明军区党委一电话,告如王必成本人同意,中央欢迎他来京面谈,免得在昆明继续追问,最易扩散。

次日,周恩来致信毛泽东,说明请王必成来京是“为防止王必成同志在云南那样环境中发生意外”。

5 月 18 日,中共中央下发中发[1974]17 号文件:关于批林批孔运动几个政策问题的《通知》,其中特别强调在运动中与林彪反党集团有关的人和事,“领导上必须注意清查的范围应限制在同林彪反党集团阴谋活动有关的问题,不要扩大化。在时间上,应当以毛主席一九七一年八、九月巡视各地打招呼为界;以听到传达中发〔1971〕57 号文件为界。在这以前的事,包括犯了严重错误,只要向党讲清楚,同林彪反党集团划清了界限,就不要再算这些老账。中央重申中发〔1971〕57 号文件宣布的政策:‘中央对于坚决同林彪划清界限的同志,不论他过去是否受过林彪的影响,是否犯过错误,都是同样爱护而不会轻易怀疑的。’中央希望在林彪问题上犯了错误,但是已经交代了问题的同志,放下包袱,振作精神,同广大群众站在一起,投入批林批孔,将功补过。也希望那些隐瞒了某些问题的同志,把问题讲清楚。凡属好人犯错误,都要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各级党组织应当为这些同志创造条件,使他们有改正错误的机会。”

《通知》进一步“确定陆、海、空军的军(省军区、警备区、科研单位、军事院校不含,野战军含)以下领导机关和部队,在批林批孔运动中,一律坚持正面教育。”

《通知》要求“加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队伍。”指出:“用马克思主义占领哲学、历史、教育、文学、艺术、法律等在内的整个上层建筑领域,还需要我们全党作极大的努力。”

# 第1314回：《枯树赋》，俩伟人最后合影 武汉市，数百人进京上访

1971年“913”事件后，关在河南滑县杨成武的大女儿杨毅突然死亡，开始说是自杀，后来又否认了自杀。

杨成武的二女儿杨俊生也被囚禁，她的专案组组长缪锡跃一直认为杨俊生没有罪。杨毅的突然死亡，引起缪锡跃的警觉，于是他建议杨俊生给毛泽东写信，并由缪锡跃通过叶剑英转给了毛泽东。

毛泽东接到信后，批给中央政治局说：“看来，杨成武是个冤案。”

与此同时，缪锡跃自己也偷偷地给周恩来写了封信，反映了杨成武一家被关押的一些情况。

周恩来立即派出两队人，一队到开封，一队到滑县，将杨成武和赵志珍接到了山西侯马，孩子们分别安排到河北石家庄、邢台地区。

1972年的一天早上，一个战士悄悄告诉杨成武：林彪出事了！

这天，树上的喜鹊叫个不停，赵志珍说：“莫不是有什么好消息？”

果然，院门开了，进来两个陌生的军人，他们径直走进杨成武住的房内。其中一个很客气地对杨成武说：“上级通知，让你们回北京治病。”

“回北京治病？”杨成武有些不相信地看着他们，问：“这是谁决定的？”

“我们也不知道，我们只是奉命来接你们回北京的。”

喜鹊还在院子里喳喳地叫个不停，杨成武对赵志珍说：“好事，咱们要解放啦！”

他们整理了一下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行装，跟着来人上了路。

经过一天一夜，他们到了北京站。来接他们的车子，直接开到北京白广路的一个招待所，第二天就住进了北京医院。接着，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来了，他对杨成武说，他是奉命来传达毛泽东的指示的：“毛主席在一次会上说：‘杨成武，我了解。杨余傅事件搞错了，是林彪

搞的。’”

听到毛泽东的话,杨成武顿时觉得热血直往头上涌。

汪东兴又简单传达了林彪在九届二中全会后的问题和最后出逃的情况。

杨成武说:“我要向中央、向毛主席反映林彪的问题。”

汪东兴说:“你先养病,把身体养好了再说。”

1974 年 2 月 7 日,中央讨论专案组整理的《杨成武问题的报告》。江青说:“报告的第二页对我个人意见不计较,但整中央首长的黑材料,写报告欺骗中央,不写不妥。”

周恩来说:“我认为杨成武同志没有历史问题,文化大革命中有路线错误,他自己可以写出材料。”

不久,专案组将整理的杨成武的材料上报政治局讨论,决定予以平反。

1974 年 5 月 22 日,杨成武接到通知:“周总理要见你。”快 7 年了,自从那天离开大会堂,再也没有见到过周总理! 杨成武感到有许多话要说。

明亮的会客厅里,杨成武看到很是消瘦的周恩来走了进来,忙迎上去,只叫了一声“总理”,就什么也说不出来了。

周恩来说:“你回来不容易啊,成武!”

接着又说:“林彪一伙是要害你的,如果不是毛主席保护,可能早就没有你了!”

周恩来在谈了杨成武被解放出来的经过后,语气沉痛地说:“有件事本不想告诉你,但我相信你能经受得住任何打击,你的大女儿杨毅同志不幸在河南滑县被迫害死了!”

直到这时,杨成武才知道几个孩子被带走之后,分别关押在河南滑县,进行劳动改造。这期间,姐弟几人相互不通音信。

周恩来安慰杨成武说:“战争年代,你多次为党和人民的事业流血。这次,你的亲人又失去了生命,仇恨要集中在林彪一伙身上!”

在艰苦的战争年代,杨成武先后失去了 3 个孩子——珍生、燕生、冀生。这 3 个孩子都是放在老乡家寄养的,尽管乡亲们用家中最好的食物喂养他们,可是恶劣的环境和病魔还是夺去了他们幼小的生命。

在“文化大革命”中,失去了自由的杨成武又有3位亲人——老母亲、大女儿和妻弟被折磨致死。

周恩来很动感情地说:“在我有生之年,要把你大女儿的问题处理好。”

后来,在重病和百忙之中,周恩来先后批示过三个有关杨毅问题的文件,要求有关部门妥善处理。最后一个文件,竟是在重病中躺在病床上,叫邓颖超念给他听后签发的……

5月10日,姚文元要朱永嘉组织人注释庾信的《枯树赋》、谢庄的《月赋》、江淹的《别赋》和《恨赋》,还有洪皓的《江梅引》、张元幹的《贺新郎》二首,以及辛弃疾的许多词。这些作品的曲调低沉而又悲凉,如《枯树赋》最后引桓温那首诗,“昔年种柳,依依汉南。今春摇落,凄怆江潭。树犹如此,人何以堪!”这是毛泽东让姚文元帮助他做的。

面对毛泽东越来越严重的疾病,经他身边医护人员的多次提议,1974年3月,毛泽东同意请眼科及神经科医生进入中南海,对他近乎失明的双眼和右侧身体麻痹等疾病进行一次全面的检查。眼科医生初步诊断毛泽东患了老年性白内障。而且,诊断毛泽东身患罕见而又无药可救的运动神经元病,也称内侧纵索硬化症,就是脑延髓和脊髓内,主宰喉、咽、舌、右手、右腿运动的神经细胞逐渐变质死亡。在国外文献报告上的统计,这种病如已侵犯到喉、咽、舌的运动神经细胞,最多只能活两年。因为喉、舌瘫痪,会引起肺部的反复感染,不能吞咽,不能正常饮食,必须经鼻道装胃管饲食。受影响的肌肉组织失去功用,呼吸困难。

此时,毛泽东读着江淹《别赋》“黯然销魂者,唯别而已矣!”“故别虽一绪,事乃万族。”而“是以别方不定,别理千名,有别必怨,有怨必盈,使人意夺神骇,心折骨惊。”“谁能摹暂离之状,写永诀之情者乎?”那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啊!

《恨赋》是《别赋》的姐妹篇,它开头的第一段:“试望平原,蔓草萦骨,拱木敛魂。人生到此,天道宁论?于是仆本恨人,心惊不已,直念古者,伏恨而死!”全赋最后一句:“自古皆有死,莫不饮恨而吞声。”

5月29日,周恩来陪同马来西亚总理拉扎克会见毛泽东。会见结束时,邓小平、乔冠华和主席告别后就走出书房的门,摄影师杜修贤一

看,周恩来还站在门旁……他没有参加他们的告别,只是默默地等待着,开始杜修贤还以为他等邓小平和乔冠华一道走,杜修贤想还是等他们都离去之后再走,于是就站在靠门边的墙根儿。

杜修贤突然有一种感觉:“总理可能要和主席握手告别。”他一动不动,似乎期待着什么又似乎不在期待。心里的感觉一时说不清楚。

毛泽东送客走到门边,和站在旁边的周恩来的目光相遇,瞬间,一脸的微笑飞逝而去,立刻忧伤地垂下眼帘,这速变的表情令杜修贤惊诧不已,他第一个反应就是端起照相机,镜头对准他们的身影……

镜头里,毛泽东忧伤地耷拉着眼皮,头稍稍地低着,苍老的脸上布满愁容和病容。花白稀疏的头发在脑顶闪出一片智慧的空间,整齐地向后披去。他迎着高悬的摄影灯,脸上的肌肉明显松弛,但很光洁。浅灰色的中山装随和地穿在身上,显得淡泊庄重。

已经十分消瘦的周恩来用温馨睿智的双目深情地正视着毛泽东。摄影光从他后侧射来,脑后和脊梁犹如披着一道光束,眉毛在逆光的面部依然黝黑浓密,充满着生气。曾洋溢乐观笑影的“酒窝”虽已被岁月的刀斧凿成两道深深的沟纹,却依然显露出执著。但是,一丝伤感的凝重神色却在眉宇之间徘徊。一种不祥之云笼罩着毛泽东的书房。

周恩来一边看着携手近半个世纪的毛泽东,一边慢慢地伸出手。毛泽东已经知道周恩来即将离开西花厅住院治病,他在5月19日、23日、25日曾三次发生缺氧病状,大夫劝他必须入院动手术。毛泽东也知道周恩来是绝症,没有医治的希望了。所以,当周恩来将手伸向他时,他深邃的目光里有难以诉说的痛苦和空寂。毛泽东也慢慢地把手伸了过去。两双指引着中国革命方向的巨手再次握在一起,组成了这神圣且又沉重的瞬间。当杜修贤“咔嚓”一声按下快门时,他万万没有想到这却是共和国第一位总理和中国共产党的伟大领袖最后一次对着摄影镜头握手道别。

1974年5月30日,周恩来和毛泽东握手,这是两位伟人最后一张合影

后来周恩来从医院飞去长沙和毛泽东就四届人大的问题又会晤过一次,但没有带记者同往,也就再没有留下他们握手的照片。

自4月份起,周恩来病情日趋严重,膀胱内每天的出血量从几十

毫升至200多毫升。周恩来的体质日渐虚弱,冠心病加重,面部轻微苍白,走路、洗漱等活动都会使呼吸与脉搏加快。

6月1日,周恩来住进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第305医院。从此,他都是在医院会见外宾了。

住院的当天,周恩来即做了第一次膀胱手术。手术非常顺利,按计划要3个月再做膀胱检查。

我们再看此时的武汉。

武汉“反潮流派”谢妙福等认为,他们继续向湖北省委提出释放任爱生、杨道远,解决“两清”问题等要求,一直没有结果,于是在水塔等处张贴公告,号召造反派上京向中央反映情况;同时在水塔内设立联络点,接受大家报名。3月26日,武汉“反潮流派”408人他们不顾省、市委劝阻,组成“武汉地区革命群众赴京控告团”,乘12辆交通车、一辆宣传车,在谢妙福等人带领下赴京。这些车辆有的是借的,有的是抢的。在胜利饭店抢车过程中还发生事故,致一人重伤,参与抢车的王友运死亡。

3月30日,“武汉地区革命群众赴京控告团”车队到达北京。车辆只准停在丰台,数百人步行,傍晚到陶然亭中央接待站,工作人员已经下班。陈端午看到接待站窗台上放着一把钥匙,用钥匙打开门,让老弱者进去避寒。第二天,中央接待站为他们在丰台南苑旅社安排了住处。

4月4日,“武汉地区革命群众赴京控告团”向中央接待站递交了《关于刘丰、曾思玉在湖北、武汉地区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反攻倒算的罪行材料》,署名为“湖北、武汉地区革命群众赴京汇报团谢妙福、刘祖平、程辉、周敏、陈端午、胡忠庭、李金祥(女)、周德清、何天泽、吴绪文、宫风雨、王登富、夏光明、陈俊、龚忠义、张记生、白世友等408人”。他们要求中央首长接见。不久中央接待站传达中央领导人指示:“中央领导同志不接见,有问题可以写材料交中央接待站转报中央。”

4月初,“反潮流派”在武汉市委封存了一批两清材料,同时抢走一些材料。

4月5日,“反潮流派”冲进市中级法院,抓走副院长等数人,要求释放“两清”中入狱的造反派。省委4月6日发出鄂发(1974)24号文

件说,“抢档案、揪走武汉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等六人,是违反公安六条的,所抢档案要立即追回,人要立即放”。

4月6日,武汉“反潮流派”发表《严正声明》,“反对冲击军事机关,反对乱揪军代表,反对经济主义,反对停工停产中断交通,不赞成车队游行成风,不赞成抢档案和乱放人”。

4月6日夜,武汉市委书记王克文在省二招接见未去北京的“反潮流派”聂年生、王华珍、武齐骅等人,吴焱金、李德裕陪同接见。

王克文告诉聂年生等,省委4月6日发出的鄂发[1974]24号文件,是省领导王六生、赵修、信俊杰6日上午来电话给“得志、辛初并省委、武汉军区党委、省革委会”说的内容,王克文还说:“任(爱生)杨(道远)要由中央决定,中央未批示之前,不要动。”并告诉他们,“中央对湖北要发一个正式指示”。王克文说,今天中央派赵修去做在京的谢妙福等人的工作,中央领导不会接见他们。两清“整了那么多人,怎么没有错哇!”“补台是要补的,什么时候补,恐怕现在还不适宜。”“去年开始写大字报时,我们对待这个问题上有错误,我本人也有错误。……当然是曾思玉布置的,我自己也有责任。”“对待反潮流问题,开始是有错误的。”

王克文还说:在京期间,赵修“根据中央领导同志指示,明确告诉他(谢妙福)‘任爱生、杨道远有严重的错误和罪行,不能放,不能平反,还要处理”。“反潮流派”不能接受,他们认为“这完全是个幌子,是企图嫁祸于中央的阴谋”。

5月10日,谢妙福文章坚持认为:这是“右倾复辟势力在背后搞鬼”,“我们还是奉劝省委某些人对任、杨两同志,早放早主动,晚放就被动”。

为了壮大北京请愿的声势,刘祖平、程辉、陈端午从北京回到武汉,召开上访汇报会,动员第二批上京。14日,陈端午、程辉带领一百多人,经在铁路工作的刘祖平安排,乘火车到达郑州,换乘河南铁路造反派在62次列车尾部加挂的一节车厢。行至石家庄被阻止,要求下车。

陈端午等下车后,在石家庄铁路造反派的帮助下,另乘货车到北京与第一批人员汇合。

4月21日,在北京的武汉“反潮流派”数十人在京西宾馆门前聚

集三个多小时,要求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的王洪文接见,反映问题。北京卫戍区负责人动员他们离开未果。王洪文在京西宾馆,指着聚集门前的武汉“反潮流派”上访团对湖北省委书记赵修说:“这些人不听招呼,中央斗争这么激烈,还上京干扰中央部署,要把他们管起来。”最后,北京民兵强行用汽车将这些人送到丰台区党校“进行教育”。

赵修派秘书金辉将谢妙福、刘祖平找去谈话,晚上,3000 北京民兵包围了武汉“反潮流派”住地,说“这么多人在北京有碍首都安全”,要求他们立即返回武汉。夏邦银前来传达了王洪文的指示:

“这些人就是不听招呼,上访帮了倒忙,中央现在斗争很激烈,干扰了中央的部署。”

北京民兵与武汉上访人员发生拉扯。次日凌晨 2 时,上访人员陈端午等人打碎一块窗户玻璃。4 时,北京丰台公安分局来人向陈端午宣读治安裁决书,说陈端午“未经(中央接待站)允许打开门锁,踢打首都民兵,打破房屋门窗玻璃”,予以拘留。7 天后陈端午被释放,首都民兵和公安人员已将其他人从丰台火车站送上火车返回武汉。丰台公安分局领导对陈端午说:“为了顺利将他们疏散回去,对你实行治安裁决是非常必要的。”

5 月 21 日,中共湖北省委办公厅作出《中央领导同志关于湖北问题的指示要点》,于 5 月 26 日向全省传达。《指示要点》明确指出湖北省的“两清”工作发生了严重错误,刘丰是林彪死党,曾思玉同志是好人犯错误。并说:“批林批孔运动一定要在各级党委统一领导下进行,要立即撤销一切山头,说服离开生产、工作岗位的人员回本单位搞好批林批孔,坚持抓革命促生产。”“反潮流派”将这个文件称为“红七条”,表示拥护。

6 月 12 日晚,武汉武胜路新华书店门前再次出现群众集会,据说有 3 万人参加,是“反潮流派”在召开“拥护红七条,揭批刘丰,迎头痛击右倾翻案妖风誓师大会”。刘祖平在会上发言说:“红七条下达后,省委一直没有采取积极措施进行认真贯彻,我们已经耐心地等待了二十多天了”。“我们的态度是:省委不揭我们揭,省委不批我们批。”会后游行,游行队伍经过设有“工农兵”广播站的工艺大楼时,宣传车喊口号:“七二〇是铁案,永世翻不了!”

# 第六部上卷
# 各地文革章回索引

**北京：**

第 1284 回；第 1290 回；第 1312 回；

**文艺：**

第 1262 回；第 1263 回；第 1273 回；第 1275 回；第 1276 回；
第 1283 回；第 1286 回；第 1287 回；第 1295 回；第 1298 回；
第 1301 回；第 1303 回；第 1304 回；第 1312 回；

**专案组：**

第 1263 回；第 1264 回；第 1302 回；

**军委办事组、中央军委：**

第 1264 回；第 1283 回；第 1288 回；第 1289 回；第 1290 回；
第 1295 回；第 1298 回；第 1301 回；第 1304 回；

**总政：**

第 1264 回；第 1288 回；第 1289 回；第 1290 回；

**外事口：**

第 1264 回；第 1267 回；第 1268 回；第 1274 回；第 1280 回；
第 1286 回；第 1287 回；第 1288 回；第 1298 回；第 1299 回；
第 1301 回；第 1309 回；

**中美关系：**

第 1264 回；第 1267 回；第 1274 回；第 1286 回；第 1287 回；

**印度支那：**

第 1264 回；

**五七一工程纪要：**

第 1266 回；

**《水浒》：**

第 1267 回；第 1289 回；第 1290 回；

**海军：**

第 1267 回；第 1293 回；

**贺龙：**

第 1268 回；第 1289 回；第 1313 回；

**邓小平：**

第 1268 回；第 1269 回；第 1288 回；第 1289 回；第 1290 回；第 1309 回；

**北京大学：**

第 1268 回；第 1282 回；第 1296 回；第 1302 回；第 1312 回；

**五一六：**

第 1268 回；第 1289 回；第 1290 回；

**《红都女皇》：**

第 1268 回；

**四届人大：**

第 1268 回；第 1280 回；第 1281 回；第 1283 回；

**“十大”：**

第 1268 回；第 1271 回；第 1275 回；第 1276 回；第 1277 回；第 1278 回；第 1279 回；

**清华大学：**

第 1269 回；第 1282 回；第 1283 回；第 1296 回；第 1302 回；

**上山下乡：**

第 1270 回；第 1272 回；第 1275 回；第 1291 回；第 1296 回；

第 1298 回;

**空军:**

第 1271 回;第 1289 回;第 1291 回;第 1298 回;

**批林批孔:**

第 1271 回;第 1274 回;第 1275 回;第 1276 回;第 1282 回;
第 1286 回;第 1290 回;第 1291 回;第 1292 回;第 1295 回;
第 1296 回;第 1297 回;第 1298 回;第 1299 回;第 1300 回;
第 1301 回;第 1302 回;第 1304 回;第 1312 回;第 1313 回;
第 1314 回;

**老干部:**

第 1271 回;第 1287 回;第 1313 回;

**教育革命:**

第 1276 回;第 1282 回;第 1283 回;第 1290 回;第 1291 回;
第 1292 回;第 1294 回;第 1295 回;第 1296 回;第 1300 回;

**公安部:**

第 1283 回;第 1284 回;第 1285 回;

**杨、余、傅:**

第 1289 回;第 1314 回;

**“一打三反”:**

第 1289 回;第 1290 回;

**“走后门”:**

第 1294 回;第 1296 回;第 1297 回;第 1298 回;第 1299 回;
第 1301 回;

**国防科委、聂荣臻:**

第 1299 回;第 1304 回;

**民兵:**

第 1310 回;第 1312 回;

**三支两军：**

第 1312 回；

**工交、铁路：**

第 1313 回；

**上海：**

第 1264 回；第 1272 回；第 1275 回；第 1277 回；第 1279 回；
第 1280 回；第 1281 回；第 1282 回；第 1283 回；第 1288 回；
第 1299 回；第 1310 回；第 1311 回；第 1312 回；第 1314 回；

**华北地区：**

**山西：**

第 1268 回；第 1303 回；第 1305 回；

**东北地区：**

**辽宁：**

第 1276 回；第 1288 回；

**黑龙江：**

第 1294 回；第 1301 回；第 1307 回；

**西北地区：**

**陕西：**

第 1262 回；第 1268 回；

**宁夏：**

第 1268 回；

**甘肃：**

第 1268 回；第 1308 回；

**青海：**

第 1268 回；第 1312 回；

**新疆：**

第 1309 回；

**西南地区：**

**四川：**

第 1268 回；第 1286 回（重庆）；

**云南：**

第 1260 回；第 1261 回；第 1307 回；第 1313 回；

**中南地区：**

**河南：**

第 1295 回；第 1296 回；第 1298 回；第 1299 回；第 1304 回；

**湖北：**

第 1282 回；第 1290 回；第 1306 回；第 1309 回；第 1314 回；

**湖南：**

第 1265 回；第 1306 回；

**广东：**

第 1268 回；第 1276 回；第 1312 回；

**华东地区：**

**山东：**

第 1262 回；第 1264 回；第 1271 回；第 1277 回；第 1312 回；

**安徽：**

第 1282 回；第 1305 回；第 1312 回；

**江苏：**

第 1264 回；第 1271 回；第 1294 回；

**浙江：**

第 1262 回；第 1283 回；第 1313 回；

**江西：**

第 1290 回；第 1294 回；第 1305 回；第 1312 回；

**福建：**

第 1264 回；第 1270 回；第 1271 回；第 1272 回；第 1275 回；
第 1294 回；第 1307 回；第 1308 回；第 1312 回；

# 文革史话

## 之

## 第六部

# 治理整顿

下卷

刘朝驹　著

中国文化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文革史话之第六部治理整顿 / 刘朝驹著. --香港:中国文化出版社,2021.9

ISBN 978-988-15988-5-1

Ⅰ. ①文… Ⅱ. ①刘… Ⅲ. ①纪实文学-中国-当代 Ⅳ. ①I227

| | |
|---|---|
| 书　　名 | 文革史话之第六部治理整顿 |
| 作　　者 | 刘朝驹 |
| 出　　版 | 中国文化出版社 |
| 发　　行 | 中国文化出版社　发行部(00852-21962638) |
| 总社地址 | 香港九龙弥敦道208-212号四海大厦 |
| 经　　销 | 香港九龙书店 |
| 总 编 审 | 中国文化出版社国内编审处 |
| 出版策划 | 宋艳丽 |
| 印　　刷 | 北京云迪印刷有限公司 |
| 开　　本 | 787×1092　1/32 |
| 印　　张 | 14.25 |
| 字　　数 | 430千字 |
| 版　　次 | 2021年9月第1版第1次印刷 |
| 书　　号 | ISBN 978-988-15988-5-1 |
| 定　　价 | 60.00元 |

您若想详细了解我社的出版物

请登陆我们出版社的网站 http://www.zgwh.cn/

# 目　录

## ◇上　卷◇

第 1315 回:天津站,工人讲儒法斗争
问吴岱,江青一去小靳庄 …… 417

第 1316 回:下部队,中国水兵无飘带
再《通知》,要抓革命促生产 …… 426

第 1317 回:批江青,毛泽东南下武汉
八一节,老干部纷纷亮相 …… 432

第 1318 回:赣州市,鸣冤成立“李调会”
不平反,江西省坚决镇压 …… 439

第 1319 回:八月热,召开“军队高干会”
亲自查,为贺龙恢复名誉 …… 448

第 1320 回:“好主意”,江青二去小靳庄
“风庆轮”,政治局发生争吵 …… 456

第 1321 回:王洪文,长沙汇报邓小平
谈人选,毛泽东批评江青 …… 464

第 1322 回:烧照片,登作品亦招阻止
叶剑英,用人想到张爱萍 …… 474

第 1323 回:列十条,罪名多停职反省
《绝命书》,审查中痛苦难捱 482

第 1324 回:叶剑英,三请张爱萍出山
邓小平,基辛格四次会谈 490

第 1325 回:李一哲,关于民主与法制
大字报,广州市众人围观 498

第 1326 回:手抄本,浏阳县逮捕张扬
赦战犯,山西省王谦落选 505

第 1327 回:拟名单,筹备开四届人大
几磋商,共准备三套方案 512

第 1328 回:周恩来,王洪文飞赴长沙
交检查,毛泽东谈学理论 519

第 1329 回:做传达,召开十届二中会
李德生,辞去中央副主席 526

第 1330 回:开人大,恩来抱病作报告
邓小平,提出“部队要整顿” 533

第 1331 回:离长沙,毛泽东来到杭州
批《创业》,恢复军委常委会 540

第 1332 回:下《通知》,“国民经济搞上去”
行动难,毛泽东患白内障 548

第 1333 回:武汉闹,枣阳县“杨垱事件”
治云南,论无产阶级专政 556

第 1334 回:赦战犯,释放全部老干部
三月一,姚文元发表文章 563

第 1335 回:下文件,开始抓铁路整顿
第一拳,万里首先砸徐州 572

第 1336 回:徐景贤,反映王洪文问题
巧施计,张爱萍主动出山 580

第 1337 回:真怪异,无尘车间“钟乳石”
又挖路,暖气修到猪圈里 588

第 1338 回:张爱萍,开始整顿七机部
大会讲,说“就是今不如昔” 597

第 1339 回:直肠癌,周恩来三次手术
返台难,张铁石香港自杀 605

第 1340 回:写文章,春桥论“全面专政”
董必武,蒋介石相继离世 611

第 1341 回:批《创业》,江青反经验主义
在广西,陈永贵骂张春桥 620

第 1342 回:三三制,毛泽东赞陈永贵
说经验,张春桥生病低烧 629

第 1343 回:周恩来,抱病主持常委会
见成效,四月份生产好转 636

第 1344 回:视力减,芦荻走进中南海
《贺新郎》,老人胸中涌巨澜 643

第 1345 回:提“敢”字,肯定七级部整顿
传阅信,张春桥稍有微词 649

第 1346 回:政治局,开会批评“四人帮”
钢铁会,提“三项指示为纲” 656

第 1347 回:形势好,万里二次下郑州
重安排,贺龙追悼会规格 664

第 1348 回:邓小平,上海召见马天水
国务院,政治研究室成立 671

第 1349 回:务虚会,江青写出检讨书
赴浙江,邓小平主持中央 679

第 1350 回:说两校,毛家湾清查结束
放周扬,周恩来想见朱德 687

第 1351 回:要裁军,下文件解决浙江
为《创业》,张天民“上达天庭” 694

第 1352 回:说“朝阳”,胡耀邦到中科院
毛泽东,完成白内障手术 703

第 1353 回:读宋词,情激动失声痛哭
说《创业》》,政治局审看《海霞》 712

第 1354 回:沸沸扬,文化部办学习班
小道传,江青与《红都女皇》 721

第 1355 回:在激化,派性转民族矛盾
抢武器,云南武装部遭劫 728

第 1356 回:七二九,大炮轰击沙甸村
唐双晶,请缨战死车白尼 736

第 1357 回:为铁路,万里三下郑州局
大暴雨,河南数水库溃坝 743

第 1358 回:通讯断,洪水如山压下来
得报告,中央组成慰问团 752

第 1359 回:慰问团,飞往灾区查情况
临现场,一幕幕惨不忍睹 759

第 1360 回:转安徽,调部队炸坝泄洪
查原因,水电部开会总结 772

第 1361 回:《献国策》, 李天德质疑文革
告迟群,清华刘冰等上书 780

第 1362 回:传信件,胡耀邦热情援手
读古文,毛泽东评论《水浒》 787

第 1363 回:陈永贵,对农村“五点建议”
回上海,王洪文大发感慨 796

第 1364 回:议工业,汪东兴广州讲话
周恩来,最后一次见外宾 803

第 1365 回:到大寨,江青讲话说《水浒》
聚昔阳,农业学大寨会议 809

第 1366 回:搞创作,电影界齐聚大寨
追谣言,评《水浒》说投降派 819

第 1367 回:谈《山花》,说拍长征、井冈山
王洪文,上海“民兵指挥部” 827

第 1368 回:周恩来,再做第四次手术
邓小平,亲自抓《汇报提纲》 837

第 1369 回:刘冰盼,周长庚的一封信
芦荻走,毛远新回到北京 845

**第六部下卷各地文革章回索引** 852

# 第1315回：天津站，工人讲儒法斗争 问吴岱，江青一去小靳庄

1974年6月14日，江青在人民大会堂批林批孔座谈会上提到了几位中国历史上几位著名的女政治家。她说：

“武则天得人心，是代表中小地主的。为什么女的能当皇帝？有20万人上书，主张武则天当皇帝，说明有社会基础，代表面广，是有广泛社会基础的，比李世民的阶级基础厚。

吕后要作单独一条宣传一下。汉高祖死后，天下大乱，吕后掌权，又重新统一了天下。吕后主要执行法家路线，是汉高祖的路线。

汉武帝的皇后卫子夫要宣传一下，是奴隶出身。

现在的文章有个毛病，很少提现在的儒。现在批林批孔，除林、陈外，不提现在的儒。现在有很大的儒，蒋介石就是，苏修也是，还有。不然搞这么长的批林批孔干什么？党内就有，刘、林就是最大的儒。中国长期伴随着儒法斗争，前期一定有儒，后期一定有儒，现在一定有儒。要不为什么批林批孔？

尽管有人反对，我还是坚持有现代的大儒，蒋介石、林彪就是现代的大儒。现在的批孔文章，一是不讲古代的无神论，二是不讲现代的大儒。

批判儒家宣传法家不能只限在知识份子和上层，是广大群众的事，全党全民干，与工农兵结合。……要搞得通俗易懂，对当前有用的东西，使全党全国要懂得儒法斗争的现实意义。这是百年大计，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要用马列主义总结儒法斗争经验，总结对当前有用的问题和经验。古为今用，不是单纯搞历史。这是百年大计。”

第二天，6月15日，江青召见“梁效”、“唐晓文”写作组时再次提到批儒问题。她说：

“现在的文章很少提到现代的儒，除了林彪、陈伯达以外，现在有

没有儒？有很大的儒！不然，不会搞这样大的运动。”

江青的这些话，引起了下面很大的猜测，这个“现代的大儒”究竟是指谁？

1974年元旦，江青登门向纪登奎作自我批评时，按照毛泽东的意见，提出要下去蹲点，让纪登奎给她安排。于是纪登奎就和北京市委书记吴德商量，觉得江青蹲点的地方不能太远，远了不安全，可是吴德又不愿意江青在北京蹲点。最后他们提议让江青去天津蹲点，江青表示同意。纪登奎通知天津市委给江青选几个村子，让江青从中挑选一个。天津市委领导人向江青介绍了天津四个学大寨的先进村，分别是：西郊区的房庄子、东郊区的赵沽里、静海县的杨家园和宝坻县的小靳庄。

江青听有关人员介绍这几个点的情况时，听到小靳庄办政治夜校，农民自己写诗、唱样板戏等事情后，当即决定就去小靳庄。天津市委书记解学恭提出，小靳庄离市内很远，交通不方便，还有一段土路。但江青坚持说：“骑马也要去”。

6月15日23时，汪东兴的秘书孙守明打电话给负责钓鱼台警卫的邬吉成，把他叫到钓鱼台17号楼。汪东兴向邬吉成交代说：

“江青要去天津，你们先去给打打前站，主要把住地安全和温度安排好。去的时候，带上10号楼的工作人员和医生。”

两个小时后，邬吉成带着8341部队的孙凤山处长就乘汽车从北京出发了。到天津的时候，已是凌晨3时。他们在天津市委有关人员陪同下，来到干部俱乐部，看了准备安排江青下榻的天津第一招待所。

文化大革命时期，这里基本上没什么人来住过，但楼房和庭院始终收拾得干净整洁，中央领导人一旦来了，保证马上就可以入住。

6月16日，江青看到“国内动态清样”上反映北京铁路分局天津站成立儒法斗争史研究宣讲组，编写《儒法斗争简史讲稿》，并进行宣讲的消息后，立即指示工作人员打电话通知正在北京的天津市委主管文教的书记、革委会副主任、国务院文化组分管全国美术工作的党组成员王曼恬，速将天津站的《讲稿》报来。

当晚22时，王曼恬将《讲稿》送交江青。江青说：政治局已经批准她去天津，要王曼恬马上回天津做准备。与此同时，中央办公厅给天

津市委打电话通知说:“江青要来天津,纪登奎同志一起来。”

6 月 17 日晚 22 时 22 分,江青由纪登奎陪着,带着迟群、谢静宜,还有“梁效”写作组及及北京大学冯友兰、周一良教授和于会泳、刘庆棠、浩亮、庄则栋等一批人马,乘专列抵达天津。

在天津站下车后,江青来到天津市干部俱乐部,住进 1 号楼。这座楼是 50 年代建的,卧室、起居室适中,但有一个跟排球场那么大的客厅兼会议室。纪登奎住进了招待所的 2 号楼。部分工作人员住在可以开会和放映电影的 3 号楼。

这次外出,对“梁效”写作组来说,显得十分神秘。他们上了专列,还不知道要去哪里,去干什么? 到了目的地,看了站牌,才知道是到了天津。住进了招待所,又向他们传达了三条纪律:不准写信,不准打电话,不准上街。

到了天津,江青对王曼恬说:“听说你们要请我们吃饭,不必请了,就算是个聚餐会,大家都出钱,这几个钱我们都还出得起。”

她转头问冯友兰:“你的工资多少?”

冯友兰说:“335。”

江青说:“比我的工资还多啦!”

她又对王曼恬说:“你看,聚餐费都还出得起吧?”

江青行政 9 级,工资 243 元,低于一级教授。

第二天,江青在招待所召天津市负责人来谈话,并和王曼恬进行了长谈。

18 日晚 19 时 30 分,她到干部俱乐部打乒乓球、羽毛球,在游泳池里游了会儿泳。

19 日晚 19 时 30 分,江青和纪登奎在干部俱乐部大剧场参加天津站工人宣讲儒法斗争史大会并讲话。

这是一次漫长的大会,从晚上 19 时 30 分开到次日凌晨,由天津站工人主讲“贯穿中国历史的儒法斗争史”。

天津站工人研究“儒法斗争史”是源于当时天津市委,根据《人民日报》元旦社论及有关文章,在第十四次全委扩大会议和市直机关全体工作人员大会上的报告中,提到了在批林批孔中要研究“儒法斗争”问题。北京铁路分局天津站得知这一精神后,通过他们在南开大学工

宣队的关系,派了几人参加南开大学举办的“工农兵批林批孔学习班”。天津站的领导研究了从南开大学带回来的儒法斗争材料,认为运动要进一步深入,可以从研究总结儒法斗争的历史经验入手,于是成立了一个儒法斗争史研究宣讲组,编写《儒法斗争简史讲稿》,并进行宣讲。之后写了总结报送天津铁路分局党委、市委宣传部和市生产指挥部,但均未引起注意。新华社天津分社得悉后,作为“国内动态清样”稿上报总社,总社又作为“国内动态清样”报送中央政治局。

江青也在这次宣讲会上作了长篇讲话,从古说到今,将荆轲说成是遗臭万年的小丑,提到卓文君的爸爸卓王孙是四川的大奴隶主,还有秦始皇焚书不多坑儒也太少,岳飞是法又是儒,蒋介石是大儒,刘少奇进城初期亲自祭过孔,1962 年还组织上千人到曲阜,林彪是大儒也是大骗子等等。

她说:“汉朝的女人,还是比较自由的,可以有‘面首’,什么叫‘面首’,同志们知道不知道?‘面首’就是除了丈夫以外,可以有男妾,男的小老婆。”

江青讲完话以后,要纪登奎讲话。纪登奎说:“毛主席曾经批评一些人不学中国历史,不知道自己的祖宗,不以为耻,反以为荣。我的历史知识很少,但我不是毛主席批评的那种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的人。我是深以为耻的!今后我要努力按照毛主席的教导,和大家一起努力学习历史知识。”

江青一直没有见到北京军区副政委兼天津市委第二书记吴岱,就问解学恭和王曼恬,他到哪里去了?他们告诉她,吴岱到宝坻县小靳庄去了,那是吴岱抓的一个点,是天津学大寨的一个先进生产大队。

小靳庄是天津市宝坻县林亭口公社的一个大队,位于宝坻县林亭口镇东南部、箭杆河畔,不过是一个只有 101 户、582 人的小村庄。解放前这里因地势低洼,水灾频繁,村民生活极为困苦,是当地有名的佃户村。“大水吞门白汪汪,土地不收颗粒粮。锅盖长在锅台上,妻离子散奔他乡。”这个民谣是宝坻地区大洼地的生动写照。解放后,经过土地改革,走合作化的道路,村民的生产、生活状况有了很大的改善。1969 年,王作山担任村支部书记,组建了新的领导班子,决心带领群众改变小靳庄的落后面貌。他们大干苦干,改造盐碱地,硬是把箭杆河

挖下一米多深,给村里所有土地铺上一层厚厚的河泥,使村里“旱收蚂蚱、涝收蛤蟆”的主要盐碱地块得到改良。人少地多的小靳庄的集体经济有了较大程度的提高,粮食产量由原亩产100多斤提高到“上纲要”的400多斤,人均吃粮也上升为420斤,每年春夏两季各上缴公粮10万斤,成为学大寨的先进单位。1971年9月,宝坻县委在小靳庄召开了一次扩大会议,推广了小靳庄学大寨上纲要的经验。于是,小靳庄继知识青年下乡典型邢燕子所在的司家庄、侯隽所在的窦家桥以及老典型大口巷村之后,成为天津第四个学大寨先进典型。

江青早在天津上报的材料中就看中了小靳庄办政治夜校这件事。说起小靳庄办政治夜校,那是从1971年开始的。1970年,宝坻县委在农村进行办政治夜校的试点。1971年小靳庄建立了政治夜校,学文化,学农业科学技术,学毛主席著作和时事政治。课前或课间休息时,经常有人唱样板戏和革命歌曲,或由“乡土诗人”朗诵个人的诗作,场面活跃,气氛欢快,受到村民的欢迎。1974年6月1日,宝坻县委下达文件,决定在全县推广小靳庄政治夜校的经验。

听说吴岱在小靳庄,江青立即提出要去那里看看。

第二天,邬吉成随天津的工作人员一起前往小靳庄探路,发现从火车站到小靳庄确实有一段土路很难走。天津市委的人提议派人把那段土路抢修成石子路。邬吉成觉得那样既浪费又影响不好,就向纪登奎做了说明。纪登奎赞成他的看法,只对土路进行了一番平整。

尽管路不好走,江青还是于21日下午乘专列来到宝坻县。

下火车后,江青乘汽车到达宝坻县城,先去一户职工和一户武装部干部宿舍看望。晚上就在宝坻火车站候车室,让“梁效”写作组讲如何批判《三字经》,直到次日凌晨3时30分。稍事休息后,于22日上午,江青召来在宝坻下乡的北京知青侯隽等一干人,从宝坻火车站候车室乘汽车前往小靳庄,于上午11时许到达那里,受到小靳庄的社员热烈欢迎。当社员们齐声高呼“毛主席万岁”时,不料江青却告诉大家说:“不要喊这个,不要学林彪那一套。”并说:“活到万岁也得死呀!”在场的人一时不知所措。

江青很快就要求下地干活。她身穿裙子,脚登白色凉鞋,在众人前呼后拥下,来到正在收割的麦田,非要参加割麦子。她下地割麦子,

受到大家的称赞。

出了麦田,江青又要去打麦场。途中,江青忽然发现随行的侯隽没有戴草帽,就要把自己头上的草帽送给她。侯隽不敢接受,江青反复说服她戴上了。

从地里回来,江青又看见了邢燕子。江青又要将这顶草帽让侯隽和邢燕子轮流戴,她自己则找小靳庄的社员又要了一顶。

江青让邢燕子、侯隽两人代表青年人给毛泽东写信,并说:“你们在信封上写江青同志转交主席就可以了。”

到了麦场,江青对场上的女社员说:“我身体不太好,到你们这儿来就是锻炼。”说着就要翻场,要实实在在地锻炼自己。

对于江青来说,翻场可能难度更大些,所以,她翻了半天,竟然一叉也没有翻起来。不过,她摸过的叉子,连同她用过的镰刀和割下的麦子,事后都被当作“革命文物”珍藏在小靳庄。后来的一段时间里,一批又一批来小靳庄参观取经的人们,大多都和这些叉子、麦子、镰刀在一起合个影。

看到麦场上新打出的麦子,江青买了5斤。陪同的大队书记王作山说:“我们今年麦子好,这是历史上没有的。”江青听了,又要买半斤,说:“挑大粒儿的,装在塑料口袋里,拿回去给主席看。”

午休时,纪登奎把大队支部书记王作山找来,两人蹲在村头的小树林下说话。王作山忙了一上午,情绪兴奋又紧张,满头大汗,也没顾上吃午饭。纪登奎对王作山说:“我知道你没吃上饭,给你拿了个面包,还有西瓜,先垫垫吧!”

新华社记者陈大斌这时也转到村头,参加了他们的谈话。

纪登奎详细听了王作山关于大队的生产情况汇报,然后说:“今后小靳庄是江青抓的点了。你们的确有很多优点、长处。可作为农村,不管是谁的点,今后主要任务还是种好地。要踏踏实实学好大寨经验,继续兴修水利,搞好农田基本建设,发展生产。生产上光种粮食不行,除了种大蒜,可否种点棉花?搞好生产,发展经济,这是农村工作的根本。生产搞不上去,农民没有饭吃,一切便无从谈起。”

吃过午饭,就在一户社员家睡了午觉。

下午,江青参加小靳庄批林批孔座谈会。

会前,批孔材料早已分发到了社员手中,江青谦虚地说:“材料给你们,这不是礼物,我们来向你们学习!”

开会了,最先开讲的是老共产党员王树青,江青不停地插话,先是同这位老共产党员一起声讨了大地主李九的“驴打滚儿”盘剥,接着批判孔老二的男尊女卑思想,并呼吁男女同工同酬。王树青讲完了,江青说要“半边天”讲,一个名叫郭淑敏的女社员开始发言,江青批评她说:

“下次你们要勇敢一点,啪的一下站起来,不叫男同志先讲”,还说:“你们这里现在还男女同工不同酬,半边天不是半边天,这是大男子主义。”

郭淑敏批判孔老二,越批越气愤,突然反问道:“孔老二说我们妇女无用,我们是无用吗?”

江青接过她的问话说:“马克思说生产力中劳动力是最主要的,劳动力是谁生的,是女人生的,这是超过他们的。”说着说着,江青突然说什么中央不合理,在政治局就她一个是单干户,“他们都是大男子主义,到了掌握政权的时候,都出来了,一把抓,就我这一个,他们没有办法,只好要我”。

在小靳庄,江青还很喜欢为人改名。见到每一个人,她好像都有“正名”的冲动,甚至连市委书记解学恭的大名,她也要让它革命化。她对解学恭说:“你那个‘恭’是温良恭俭让的‘恭’,是封建主义的,儒家的思想;要改成工人阶级的‘工’! 学工,向工人阶级学习嘛。”

果然,后来天津市委写给江青的一份报告,解学恭真的就签上了“解学工”三个字!

轮到又一个“半边天”王淑贤发言时,她刚自报家门,江青就怂恿她造自己名字的反,说是又有淑又有贤,《三字经》里全有。最后改成了“王树先”或“王先”,由王淑贤随意挑一个。

又有“半边天”于瑞芳,江青觉得“瑞”字特别要不得,同样透着《三字经》气味,于是去掉了那个“瑞”字,名曰“于芳”。

老贫农魏文忠刚报告“我叫魏文忠”,江青就批评他的名字太封建,后来,这个老农自己给自己改名为“魏文中”。

又有一个王孝岐,这个名字把江青吓了一跳:“啊呀! 你这个‘岐’

字改了吧,周文王啊!”最终,王孝岐获得了一个完全革命化的名字:“王灭孔”。

江青在小靳庄最著名的改名,发生在一个名叫周福兰的妇代会主任身上。周福兰也是负责接待江青的人员之一,江青见面就问她的姓名,又问是哪几个字,周福兰答:

“幸福的福,兰花的兰。”

“哎呀呀,‘福兰’这两个字太封建了嘛,我给你改个名字吧。你就叫周克周吧。”江青说。她见妇女主任一副不解的神情,解释说:“克周就是用咱们这个周,克他那个周,抵抗奴隶主头子周公。”

这些被江青命名的新名字,像周克周、于芳、王先、魏文中、王灭孔,等等,在随后公开出版的《小靳庄诗歌选》和《小靳庄批林批孔文选》里,都曾出现。

当名叫于瑞芳的“半边天”汇报自己写了74首诗时,江青直夸她“了不起”,又要她当场读了自己的诗作。批判会场自此转成文娱会场,于会泳、浩亮、刘庆棠一干人被江青传呼进来,然后是大唱样板戏,社员唱,浩亮他们也唱。浩亮唱了《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唱着唱着情不自禁表演起来,江青当仁不让做了李奶奶,浩亮仍旧演李奶奶的儿子李玉和。

演员出身的江青一下子就进入了表演状态,说:“铁梅,拿酒去!”

紧接着拿了碗,面对浩亮,一副庄严而又深情的模样,说:“这碗酒,你把它喝下去!”

浩亮做一饮而尽状,同样深情而庄严地说:“谢谢妈!”然后唱《浑身是胆雄赳赳》。

唱完了,江青故作神秘地问社员:“你们知道他们是谁吗?”接着把浩亮他们一一介绍给社员。社员见到了李玉和、洪常青,身体里即刻有了幸福的暖流。江青说:“他们是来向你们学习的。”“别看样板戏是我搞的,但你们唱得比我好。”

下午18时30分,江青一行离开小靳庄。临行前,江青唤人拿出带来的发卡,亲自为5位青年女社员卡上。她一边卡一边对女人头发进行阶级分析:“头发只能齐眉,所以古人叫‘齐眉穗儿’,地主阶级叫‘刘海儿’。”

又告诫紧跟在旁的天津市委第一书记解学恭:“要多生产发卡,为妇女们服务,不然把眼睛都弄坏了。”依依惜别之际,江青庄重地宣告小靳庄是她和解学恭两人的点,并敦促解学恭要多来,“我这个人也不知道白天黑夜地干,我的点几个月见一次面,没有办法。”

江青当天返回天津。在回天津的火车上,说起了三大战役。江青要吴岱介绍“平津战役”的经过。吴岱讲完,江青又问他原来是哪个部队的。吴岱刚回答是四野的,江青马上叫起来:“你是林彪的人!”江青这一喊不要紧,吴岱回到市里就住进了医院,心脏病犯了。

6 月 23 日,江青给毛泽东写信,汇报了她自 6 月 17 日到天津之后召开批林批大会和讯问宝坻县小靳庄大队的一些情况,信中说到:“我看了胜利油田后即回北京,如果能多给我些天当然更好。”

6 月 24 日,毛泽东在江青信上批道:“可以延长时间,做些调研工作,你太不懂群众生活了。”

24 日下午,江青来到天津重型机器厂,直接到金加工一车间转了一圈。

# 第1316回：下部队，中国水兵无飘带 再《通知》，要抓革命促生产

1974年6月26日下午，江青乘军舰到渤海油田四号油井视察。

当时，海军“211”新型导弹驱逐舰出厂才9天，突然接到紧急命令：迅速赶往天津塘沽执行一项重大任务。当这艘国产新型导弹驱逐舰以28海里的时速驶抵塘沽港后，舰长、政委才被告知执行任务的具体内容是：江青要乘该舰视察大港油田。

彩旗满挂，江青在纪登奎、于会泳等人陪同下登上了“211”舰的舰首。江青分三批与“211”舰的全体官兵合影。参加第一批合影的水兵中有一个名叫张建华的，小伙子长得很帅，被安排在江青的身旁。照相前，他悄悄将一条飘带拽到胸前。这条飘带引起了江青的注意。她顺手将张建华的水兵帽摘下，指着帽子上的飘带说：

“这玩意儿是拿破仑搞的，是纪念诺皮尔的。这是帝国主义造成的。”边说边将飘带弄到水兵帽里边，然后戴到小张头上。

身为中央政治局委员的江青，对飘带下的“指示”如此明确，而且亲自动手“果断”地处理，这无疑就是命令。在这张摄于6月26日的照片上，“211”舰数百名水兵的飘带销声匿迹了。

很快，8月1日，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中国式无飘带水兵帽”问世了。

6月26日这天，纪登奎突然来到天津驻军66军军部。当时66军正在开军党委常委会，纪登奎对大家说：“江青同志打算到部队来看看军事表演，你们这两天就抓紧准备一下吧。”

66军所辖的196师是对外开放师，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来华访问的外国友人经常来观看该师的军事表演。

27日上午，江青等人在天津市委书记解学恭，天津市革委会副主任、66军军长刘政等人的陪同下，乘专列到达杨村机场。已提前抵达这里的66军参谋长姚保钱和政治部主任王克及驻杨村机场的空6军

领导,将江青等人迎接并带到196师的接待室。不久,纪登奎等一行人也来到这里。在接待室,江青提议,与66军、空6军的陪同人员及196师宣传队的女兵大约80余人开个同乐会,其间江青对大家说:“我代表毛主席来问候你们!”并为活跃气氛,还率先邀请浩亮清唱了一段《红灯记》。

吃午饭的时候,加上陪同人员共三、四桌,桌上没酒。落座后,江青主动问:“有没有香槟酒?我想敬大家一杯。”

席间,有人问江青:“吃饭后是先休息一下,还是直接看表演?”

江青说:“不休息了,直接看表演吧。”

午餐很快就结束,江青等人立即来到靶场,先看了阅兵式,然后观看步枪、轻重机关枪、冲锋枪、迫击炮射击以及其他一些战术表演。战士们的射击成绩都很优秀。请江青打靶,她愉快地和大家一道打了几枪。

靶场表演结束后,要转到二、三公里外的另一个场地去观看侦察分队的军事表演:“抓舌头”。当时准备了几匹马,请江青等人骑过去,其他人则徒步走到表演场地。

到观礼台前,江青从马上下来,66军军长刘政把江青所骑那匹马的缰绳转交给饲养员,然后便陪同江青等人上了观礼台。

观看完侦察小分队的精彩表演后,江青等人又来到附近部队的宿舍。她在战士的床上坐了一会儿,问问战士“辛苦吗?”“伙食怎么样?”“想不想家?”“都有一些什么业余生活?”随后,又到宿舍外的战士俱乐部与战士打了一会儿乒乓球。

参观结束后,江青很高兴,写了四句小诗:

六十六军战斗队,

能文能武啥都会。

能文赛过汉隋陆,

能武赛过管周退。

她把这小诗送给了刘政,以表示对66军的感谢和敬意。

下午16时许,江青等离开196师营区到杨村机场,当晚乘专列回京两天。29日晚19时,又乘专列到津,仍然住在第一招待所。

7月1日晚19时,江青乘专列返京。

6月18日,国家计委向中央政治局汇报当前工农业生产问题。当时由于“批林批孔”运动,许多地方和企业的领导干部挨批挨斗,甚至被打倒打跑,许多地区和部门重新出现动乱的局面,国民经济再次下降。计委在汇报中指出:

农业方面,全国夏粮总产量预计840多亿斤(实际是922亿斤),超过了上年。

工业方面,1974年上半年工业生产不少地区和部门没有完成国家计划。“主要问题是煤炭和铁路运输情况不好,钢铁、化肥等产品和一些军工产品也欠帐较多,对整个国民经济和战备影响较大”。

1至5月份累计,全国工业总产值仅比去年同期增长1%。在这5个月中,前3个月还能勉强做到逐月略有增长,从4月份开始急剧下降。同3月份相比,4、5两个月平均日产值分别下降6%和3%。

1至5月工业产值比去年同期下降的有山东、湖南、贵州、内蒙、江西、浙江、安徽,山西、湖北、新疆和四川等11个省、自治区。其中贵州,1972、1973年两年工业生产连续大幅度下降,今年1至5月又比去年同期下降20.9%,全省工业基本上处于瘫痪、半瘫痪状态。

1974年1至5月累计,全国重点煤矿欠产835万吨,比去年同期下降6.2%,钢欠产188万吨,比去年同期下降9.4%;25个重点企业中,武钢、包钢、太钢等12个企业欠产较多。化肥欠产185万吨,比去年同期下降3.7%。煤炭减产,影响了整个工业生产和市场供应,造成不少企业停产和半停产。

铁路运输方面。由于发生动乱,很多路段不畅通,所通过的列车比正常情况少1/3左右。

铁路货运量1至5月份欠运2100万吨,比上年同期下降2.5%。全国20个铁路局有13个未完成计划。徐州、长沙、包头、贵阳等重要区段经常阻塞,使津浦、京广、京包、贵昆4条重要干线的列车不能畅通,“通过的列车比正常情况少三分之一左右”,严重影响了全国的货物运输,造成不少企业停工减产。由于铁路运输受阻,致使山西、河南的煤炭和其他物资不能及时外运,造成一些大中城市、工业基地和市场用煤告急。

财政收支方面,1至5月份,全国财政收支比上年同期减少5亿

元,财政支出比上年同期增加25亿元,出现财政赤字5亿元,而上年同期是收大于支27.4亿元。

国家计委的汇报认为,后几个月如不积极地把煤炭,把整个工业生产和交通运输抓上去,势必会影响抓农业,影响基本建设和战备,影响财政收支平衡和市场供应。

7月1日,中共中央办公厅转发6月18日《国家计委向中央政治局汇报当前工农业生产问题的汇报提纲》。当天,中共中央下发中发[1974]21号文件:《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通知》。《通知》在肯定总的"生产形势是好的"前提下,指出上半年还有一些地区和单位没有完成国家计划。"当前突出的薄弱环节,一个是煤。一个是铁路运输。一至五月,全国重点煤矿共欠煤炭835万吨,其中山东、安徽、江苏三省,河南平顶山、河北峰峰两矿,欠产煤炭760万吨。尽管开滦、大同、阳泉等不少重点煤矿,超产甚多,贡献很大,但三省两矿的大幅度减产,拖了全国的后腿。铁路运输多数单位是好的。主要是徐州、长沙、包头、贵阳等少数区段,经常堵塞。使津浦、京广、京包、贵昆四条干线不能畅通,严重影响了全国的货物运输。造成不少企业停工减产。钢铁、有色金属、化肥、水泥等产品的计划和军工生产计划,都完成得不好。这里有缺煤和运输的问题,也有企业本身的问题。武钢、包钢、和武汉重型机床厂、太原重型机器厂,成都一三零二厂等企业,大量减产。主要是内部因素。这些情况必须引起我们严重注意。"

《通知》认为:"有些省、市、区和城市以及一些企业单位的减产,最根本的原因,还是革命没有搞好,批林批孔没有搞好。林彪修正主义路线没有得到认真的揭发和批判。领导的思想和政治路线不端正,党的政策不落实,群众不满意。运动一来,有少数领导干部不是积极的站在运动的前面,领导好批林批孔,纠正错误,落实政策。许多人有错不认错,使矛盾激化。有少数领导害怕群众,不打自倒,一轰就跑;擅离职守,放弃领导;甚至躺倒不干,有少数领导干部,不坚持原则,违反党的政策,随意表态,造成了思想混乱,影响了群众的团结。还有少数的领导干部,捂盖子,保自己;支一派,压一派;挑动群众斗群众;煽动经济主义,以破坏生产来破坏革命。在这样一些情况下,党的路线、政策贯彻不下去,群众团结不起来,一小撮阶级敌人,乘机兴风作浪,进

行破坏和捣乱。”

《通知》表示:“中央希望所有革命的领导干部,都要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毛主席、党中央关于批林批孔的一系列指示,焕发精神努力工作,同群众一起,搞好批林批孔。在工作中犯有错误的领导干部,要作认真的自我批评,为上级和群众承担责任,取得群众的谅解。同时也教育群众和干部,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正确对待犯错误的干部,不准抓人打人。要认真落实党的政策,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把广大干部和群众团结起来,共同对敌。”

《通知》规定:“凡是擅离职守的领导干部,在听到本通知传达的半个月内,必须返回工作岗位。逾期不归的,停发工资。情节严重的,要经过群众讨论,给予必要的纪律处分,直至撤销他们的职务。其他擅自离开生产和工作岗位的人员,要动员他们迅速回到本单位,搞好革命和生产。经过说服教育,仍然不回来的,也要按照旷工处理。”

《通知》要求:“各级领导同志和革命群众,都要提高警觉,坚持原则,坚决煞住经济主义妖风。中央重申:当前为了集中力量搞好批林批孔,对于群众中提出的有关劳动工资和经济政策方面的问题,一律放到运动的后期,经过调查研究,具体分析后,统筹解决。”

《通知》批评:“那种不作阶级分析,笼统地讲什么:‘只要造领导的反,就是反潮流’的说法,是错误的。有的人不批林、不批孔,不上班、不劳动,违背中央一九七四年十三号文件的规定,继续搞跨地区、跨行业的串连,拉山头,打内战,还把这种行为说成是反潮流的革命行动,这是对反潮流的严重歪曲。还有人散布什么‘不为错误路线生产’的谬论,公然煽动停工、停产,对于这些错误言论,必须给予批驳。对于幕后操纵者,要发动群众揭发批判。”

《通知》强调:“坚决打击破坏批林批孔、破坏工农业生产、破坏交通运输的阶级敌人。对那些盗窃欺诈犯、杀人犯、流氓集团和各种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坏分子,必须实行专政,对于贪污分子和投机倒把分子也要进行打击。”

《通知》号召:“所有的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都要充分发挥作用,和广大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干部、革命知识分子、团结在一起,模范的贯彻执行‘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方针。要就地闹革命,

严格遵守劳动纪律,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夺取批林批孔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更大胜利。”

7月5日,报上刊登周恩来会见美国民主党参议员亨利·杰克逊和夫人的消息,首次披露了会见地点是北京医院。这是周恩来第一次大手术后首次会见外宾。他病重的消息,在全世界引起了震动。

上午10点多钟,亨利·杰克逊夫妇一走进病房,顿时感觉到周恩来身体的虚弱。周恩来坦率地对他们说:“我这段时间确实有病,毛主席要我疗养、休息,因此我6月整个月都没有见客人了,外国客人、中国同志都没有见。5月份接待了不少客人,也是比较勉强。所以这次你来,没有计划我出面。”

周恩来说:“你和乔冠华副部长谈话的要点我看到了,了解到你还是要求见我。昨天晚上正在想这件事,正巧因为别的事情和王海容部长助理通了电话,她又告诉我你这个要求。后来请示了毛主席,毛主席同意我见你,也报告了党中央……”

7月16日,周恩来在甘肃定西、庆阳两地区灾情反映上批示:“口粮不够,救济款不够,种子留得不够,饲料饲草不够,衣服缺得最多,副业没有,农具不够,燃料不够,饮水不够,打井配套都不够,生产基金、农贷似乎没有按重点放,医疗队不够,医药卫生更差等,必须立即解决。否则外流更多,死人死畜,大大影响劳动力!!!”

# 第1317回：批江青，毛泽东南下武汉 八一节，老干部纷纷亮相

6月中旬，毛泽东的健康状况再度出现明显问题。经神经科和内科专家会诊后提议，中央决定第二次为毛泽东专门成立医疗组，成员包括心血管内科、神经内科、麻醉科、耳鼻喉科、呼吸管理、外科、重病护理等方面专家。

7月中旬，身患多种疾病的毛泽东准备赴南方易地休养。他预感这次外出时间不会短，觉得需要在行前向政治局做出一些重要交代。7月17日，毛泽东召集在京中央政治局成员在中南海游泳池开会。才做过手术不久的周恩来也从医院赶来参加会议。

会上，毛泽东批评江青说："江青同志你要注意呢！别人对你有意见，又不好当面对你讲，你也不知道。"

毛泽东继续说："不要设两个工厂，一个叫钢铁工厂，一个叫帽子工厂，动不动就给人戴大帽子，不好呢！你那个工厂不要了吧。"

"不要了，钢铁工厂送给小平同志吧！"江青答道。因为毛泽东说过邓小平"内部是钢铁公司"。

"当众说的！"毛泽东挺认真。

"说了算！"江青不嘴软。

"孔老二说的，言必信，行必果。"毛泽东说到这里，把脸转向在座的其他政治局委员："听到没有，江青只是一票之权，她的话并不代表我，她代表她自己。但是有时真理在她手里，她有大功，揪出刘少奇，打倒林彪，都是她干的，我是听了她的意见才同意了她的。搞了文化大革命，相当一批人不拥护她，应该给人们一个认识的过程，我看从绝大多数人民的反映来看，她还是干了好事的，拥护者是多数，真正反对的人是少数。你们信不信呀？江青，你要搞多数人的工作，不要搞成小集团，她的问题并不大，但是要注意。对她要一分为二，一部分是好的，一部分不大好呢。"

“不大好就改。”江青说。

“你也是难改呢。”毛泽东说。

“我现在的钢铁工厂不开了。”江青表示。

“不开就好。”毛泽东赞同。

江青:“我一定特别注意,请主席放心。”

此时,毛泽东又转向与会者:“他们都不吭声呢。”

于是,周恩来提起了1月25日的“批林批孔”动员大会,江青一听,马上插话解释。因为毛泽东当时批评过江青在这次会上的发言。

毛泽东指着江青说:“此人一触即跳。”

江青反驳说:“我没有跳。我本来不想去,后来总理说大家都要去,我没有办法才去的。”

“我讲你的脾气。”毛泽东又朝众人说道,“总而言之,她代表她自己。”

江青谈到批林批孔把《弟子规》、《神童诗》、《女三字经》都找出来了,毛泽东说:“天津搞了一百条谚语,其中有的值得考虑,不能都废除,都批判。”

毛泽东询问了周恩来和叶剑英的身体状况。他对苏振华说:“苏振华啊,你要振作起来,要把中华振作起来,海军多功啊。”

毛泽东问邓小平:“听得到吗?”

邓小平说:“不大听得到,助听器有时灵有时不灵。”

毛泽东说:“你现在管外交啊!先念代理总理。”

当毛泽东说到准备请假外出时,周恩来说:“原来准备召开的各大军区司令、政治委员的会议,是不是等主席回来再开?”

毛泽东说:“你们开你们的,我就不参加了。都来开会,保护起来,韩先楚、李德生、许世友、刘兴元、丁盛、王淮湘,都是过去的事。林彪为什么不去广州,而往那边跑?就是听了我的话。一整人就一棍子打死,就不好了。我看省军区也要调整。对于有些同志,凡事不要太急。世界上的事,看一看再说。”

说着说着,江青又提到:“就是有一个电影叫《中国》,太坏了,但是汉奸帽子还没有戴,因为还弄不清楚是谁搞的。”

毛泽东没有对此事表态,而是对大家说,“她算上海帮呢!”并告诫

江青:“你们要注意呢,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呢!”

“现在登奎也搬进来了。”江青没有正面回答,只是说纪登奎也搬进钓鱼台住了,想以此说明住在钓鱼台的不都是上海的。

毛泽东还是说:“你那里要当心,不要变成五人了。”

这是毛泽东第一次提到“上海帮”、“四人小宗派”。他的话,让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颇为尴尬。

7 月 18 日,毛泽东乘专列到达武汉。

武汉的夏天格外热,毛泽东在重病之下仍然想到长江游泳。医生们得知后苦苦劝阻,他们认为毛泽东的病情已经不适于下水游泳,在游泳过程中随时都可能发生危险。然而毛泽东仍然认为自己的身体可以游泳,只是在医生的劝说之下,他才把去长江游泳的计划改为在室内游泳池进行。

7 月 21 日,毛泽东在武汉阅中央调查部部长孔原 7 月 13 日来信,嘱工作人员转告:“印发在京政治局委员。”

孔原在信中汇报了自己的近况,提出希望早日恢复党的组织生活,做点力能胜任的工作。

7 月 28 日,王洪文、江青请北京军区 3 位负责人和 38 军的 4 位领导到北京北海仿膳堂吃饭,第二天,王洪文、江青、陈锡联、纪登奎等到 38 军呆了一个晚上,召开河北省及驻保定军、地主要领导及 38 军 338 团 8 连全连参加的接见会,王洪文、江青讲话、赠书,江青又写诗夸赞 38 军。

1974 年 2 月后,林立衡再次找机会吞下了大量的安眠药,第三次决心结束自己的生命。但她的“理想”并未实现,301 医院再一次从死神手里把她拖了回来。

自杀就是“叛党”,就是“公然对抗运动”,因此,林立衡回到东交民巷招待所之后,“理所当然”地受到更严厉更严密的批斗与“管护”。她住的房间窗户全被封死,她深感浑身缺钙,要求晒太阳。看守人员回答说:“你晒什么太阳,毛泽东思想对你来说,就是最好的阳光!”

后来,由于天气转热,看守人员也受不了了。便允许在糊着报纸的纱窗上挖了两个洞透透气。林豆豆每天靠这两个洞晒晒胳臂。

到了晚上,蚊子也利用这两个洞飞了进来。没有蚊帐,蚊子“不分

敌我”,谁都咬,看守也受不了了,便在地上洒敌敌畏,天天泼。泼在地上蒸发时,看守人员躲出去,但是林立衡不能出去。20 多天后,她全身出荨麻疹,眼鼻口都肿得张不开,全身开始糜烂,后又发展到腹泻,憋气,胃疼,并患上过敏性结肠炎。此时,30 岁的林立衡,体重只剩下了 30 多公斤,头发大量脱落,还掉了 6 颗牙齿。有人暗示她赶快给毛泽东写信。

1974 年 7 月 31 日,毛泽东收到林豆豆的信,做了批示:“解除对林立衡的监护,允许她和张清林来往,她和死党分子有区别。”

接着,政治局也做了决定,送林立衡去农场劳动,并把张清林调往空军。空军组织部门还根据上面的指示,决定“批准”他们二人立即结婚。如果二人不同意结婚,则豆豆去开封,张清林去嫩江,永远不准再见面。

面对这一无可选择的选择,二人只好“同意”结婚,双双来到空军开封某师农场,养猪,做酒,干零活儿。在这里已不再像在专案组时天天开会受批判了。

7 月下旬,毛泽东在武汉提出:要把吕正操、杨成武等放出来,让他们出席庆祝“八一”建军节招待会,名单见报。这是林彪事件后常采取的“解放干部”的一种方式。

7 月 31 日,在京中央政治局成员接见吕正操、杨成武、余立金等。周恩来抱病参加接见。他代表中央宣布为他们平反,向他们传达毛泽东在 1973 年底关于八大司令员对调等讲话内容。

周恩来对吕正操等说:“你的事,毛主席早就批了,一直拖到现在,我有责任。过去的事情就过去了,不要记在心上!”

又对杨成武说:“你出来工作的事,我写了三次报告都不行。最后一次,主席发了脾气,才让你出来的。”他对自己 1968 年 3 月杨余傅事件时讲过一些过头话表示内疚。

第二天,国防部举行纪念八一建军节盛大招待会,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出席,叶剑英致祝酒词。吕正操、杨成武、张爱萍、王尚荣、梁必业、余立金、吴克华、黄新庭等一批很久没有露面的军队曾经的高级将领,相聚在人民大会堂的宴会厅。

根据江青的指示,天津的解学恭带领有关部门的人员以及宝坻县

委负责人于7月2日到小靳庄蹲点,住了8天,然后给江青、纪登奎写信,汇报了小靳庄办政治夜校出现的八件“新人新事”,并说“准备建议市委在全市推广小靳庄的经验”。江青于7月13日批示“小靳庄办政治夜校的经验值得推广”。纪登奎批示“可由新华总社派人认真总结经验,以便向全国宣传推广。”新华社记者很快写出报道稿,对原汇报的八件“新人新事”有所增删,经总社审改,报姚文元批准,于8月4日,新华社和《人民日报》同时播发和刊发了《小靳庄的十件新事》。这“十件新事”是:办政治夜校;培养贫下中农理论队伍;贫下中农登台讲历史;大唱革命样板戏;成立业余宣传队;开展群众性的诗歌创作活动;开办图书室;讲革命故事;群众体育活动蓬勃发展;移风易俗。一时间,全国各个报刊转载,立即掀起了学习小靳庄的浪潮。

8月4日,中共中央办公厅下发中办发[1974]16号文件:《关于不得擅自翻印、转抄、散发毛泽东和中央负责同志的指示、讲话及中央文件的通知》:

“根据中央指示,现在通知你们:中央最近发现,有些地区有的单位和个人,仍违反中央规定,擅自翻印、传抄、散发毛主席和中央负责同志的指示、讲话及中共中央文件。在翻印、传抄过程中,内容错漏严重,有的同原意出入很大,甚至歪曲了原意,有的则是冒名捏造的。这种做法,不仅容易为阶级敌人所利用,而且对保守党和国家的机密,贯彻中央的指示和政策,都是不利的,必须引起各级党组织的严重注意。要教育党员、干部和群众,进一步加强组织纪律性和敌情观念,向这种严重的无组织无纪律的行为作斗争,严防阶级敌人的捣乱和破坏。

中央再次重申:今后毛主席和中央负责同志的指示、讲话、诗词、照片以及中共中央文件,未经中央同意,严禁擅自翻印、传抄。对已翻印、传抄的文本,各地、各单位应采取坚决措施,认真追查收回,予以销毁。对于严重违反中央规定,不听教育,劝阻的单位和个人,应执行纪律,予以处分。对于那些造谣破坏,招摇撞骗,伪造中央文件和中央负责同志讲话的阶级敌人,必须分别情况,依法惩办。”

周恩来6月1日第一次膀胱手术非常顺利,按计划要3个月后再做膀胱检查。出乎人们的预料,没等到3个月,周恩来的小便又大量出血。8月7日、8日,尿血增加,病情出现反复,诊断为癌症转移。经

与医疗组商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同意,决定进行膀胱镜检查后,实施局部切除手术。9 日,周恩来致信毛泽东,汇报病情及治疗方案,并告:“在上次手术后。体力虽较弱,但自信尚能经受这次治疗。”

经毛泽东批准,周恩来于 8 月 10 日做第二次膀胱手术。这次手术后效果较好,止住了出血,结合其他预防性治疗,病情比较稳定,起居亦可自理。

1974 年 8 月,北京传来了指示,让傅崇碧坐飞机马上回北京。

但是天气不好,飞机不能起飞,就由两个干事,一个保卫科长陪同坐特快返回了北京,住在西直门原来给苏联专家盖的房子里,三大间,屋里有电话。傅崇碧没有打电话,7 年与人世隔绝,他已经不知道任何一个电话号码了。监护这时还有,但已不再进屋里来了。

到北京的第三天,叶剑英派孩子来了,给他送东西,说现在事情清楚了。肖克也跟他讲,说不要得罪……

第四天,周恩来身边的工作人员来找傅崇碧,说“总理想见你”,还派了个大红旗来接。过去周恩来身边的人傅崇碧都认识,现在来的这个不认识。他怕又出什么事,就问陪他来北京的沈阳军区的保卫科长,“去不去?”

保卫科长说:“我跟你一起去。”

但是保卫科长要上车,却让人家训了一顿,说:“你去干什么?”没让保卫科长去。

周恩来住在西华厅,过去,傅崇碧哪一天也要去个三回两回的,而这回车过了中南海西门还往北开,到了小西门,不进,又往北。此时,傅崇碧还有幻想,说可能从北门进。结果,到了北门还是没进。等过了养蜂夹道,还往北,傅崇碧以为完了,又受骗了。直到一直开到文津阁的一个院子。那地方傅崇碧知道,是中央文革材料小组的所在地,有七八间房子。他心说,“这回又骗了我了。”没想车还往前开,一直开进北京医院的院里,说“到了。”来接的人带傅崇碧进了第一道门,又进了第二道门,迎面看见穿着睡衣的周恩来。

周恩来紧紧握着傅崇碧的手,对他说:“见到你,我太高兴了。”

傅崇碧的眼泪下来了。见到周恩来,他才相信自己是真正出了牢笼了。

周恩来劝他说:“不要激动,你受了苦了。你的问题都清楚了,不要着急。”

他接着说:“八一建军节人没有出来,主席在长沙打电话问了两次,说为什么杨成武、余立金都出来了,傅崇碧没有出来?傅崇碧到哪去了?杨、余、傅事件搞错了,都要平反,贺龙要平反……中央政治局委员要见你们一次,除了你们3人,还有肖华、刘志坚。毛主席也要见你们。”

傅崇碧这才明白为什么要让他赶快从沈阳回来。

周恩来说:“这个问题清楚了,你放心,回来先住京西宾馆,把九大文件全部拿给你看,然后检查身体,到北京医院,不要去301。派人把房子整一整,给你派个人派个车。……”

周恩来一一把这些事交待完,然后说:“我的身体也不太好。”

傅崇碧说:“您该休息了。”

周恩来说:“不要紧。说你现在还落不了案,人家不让你留在北京,让你到广州去。我跟叶帅说,不要走,就在北京。叶也讲了这个意见。”“你回来还是搞卫戍区,主要是整顿。主要力量还是放在北京军区。”

傅崇碧说:“我搞了1年,关了7年,我不干了。”

话是这么说,第二天,傅崇碧就走马上任,担任了北京军区第一副司令,以后又担任了北京军区政委。有人主张换班子,傅崇碧不同意,他一个干部也没有动。他说:“当时不讲违心话就过不了关,这点我理解。”

# 第1318回：赣州市，鸣冤成立“李调会”不平反，江西省坚决镇压

1969年5月1日，江西赣州的红卫兵领袖李九莲被以“反林彪现行反革命罪”拘捕后，1970年1月29日，她所在的冶金机械厂向地区军管小组保卫部提出，将李九莲交厂群众处理的意见。保卫部同意。

但是，这个处理意见遭到赣州地区革委会副主任、“支左”部队的赵副师长坚决反对。赵副师长认定李九莲是“现行反革命分子”，其矛头是“直指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的，是直指社会主义制度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是在刘少奇的罪状公布以后为刘少奇进行辩护的……按毛主席的《公安六条》，她全都够格了”，认为交群众处理太轻。

他的意见没有被地区革委会多数委员接受，赵副师长一怒之下，携卷往省革委会汇报，要求重判。

1970年2月，江西省革委会主任程世清听了赵副师长的汇报，当即表示说：“像李九莲这样全面系统反林副主席的，全国罕有”。他在李九莲的案卷报告上批示：“性质是敌我矛盾，要从严处理”。

1971年1月5日 赣州地区革委会保卫部做出(71)赣刑字第3号判决书，以“恶攻林副主席现行反革命罪”，判处李九莲有期徒刑5年。

1972年，鉴于林彪折戟沉沙，有关林彪的案件开始复议，中共赣州地委也对李九莲案件做出新的结论：“性质是构成了现行反革命犯罪，但交待态度好，出身好，年轻……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调外县安排工作，拘留期间不补发工资。”

他们派人告知李九莲：“这样处理，你还是人民队伍中的一员，还可以革命。”

1972年6月20日上午8时，李九莲被释放出狱。

1972年7月，李九莲被安排到远离赣州城的兴国县画眉坳钨矿陈也矿区当电焊工，每月工资16元。

很快,严酷的现实又一次使她大失所望:敌伪时代的矿警都可以参加工会,她这个“年轻、出身好”的却没有资格;三年零八个月的拘禁、拷打、虐待,摧残了她的健康,使她有心而无力从事那种繁重的体力劳动,而附近一所中学因为没有英语教员,孩子们都上不了英语课,她要求去补这个缺,可有关人员回答说:宁可荒废孩子们的外文课,也不能答应她的请求;后经别人介绍,她同意嫁给一个因出身于地主家庭而35、6岁还没找到对象的光棍汉,这个光棍汉却在众人之前嘲笑她:宁可讨一个“破鞋”,也不要她这个“敌我矛盾内部处理”的黄花女……

诸如此类的刺激与屈辱,使李九莲认为是赣州地委和公检法部门欺骗了她、损害了她。她接连向赣州地区、江西省、中央有关部门申诉,并到北京上访,要求改变这个“是非颠倒”的结论。

1973年5月,李九莲向市、地、省投诉无效,进京上访。

1973年11月,公安部和江西省公安厅,把李九莲的申诉状转到了赣州地区公安局,要求对她的问题必须进行复查。但是地区公安局一位负责人却在上面批了四个字:“此信暂存”,然后束之高阁。

1974年3月初,赣州开始批林批孔运动,李九莲听从当年红卫兵战友朱毅的意见,给曾昭银写信,要求曾昭银帮其辩冤。李九莲同学丁承华为其送信给曾昭银。

1974年3月18日 李九莲去见曾昭银。曾昭银拒绝帮她翻案。

1974年4月4日,李九莲在多次申诉均无结果的情况下,不得不请一些同学,帮她写出一张《反林彪无罪》的大字报,张贴在赣州公园的围墙外,要求赣州地委和公检法机关为其修改“现行反革命”、“敌对矛盾”的结论,为她的3年冤狱彻底平反。

李九莲随后又陆续贴出《一评反林彪有罪——斥反林彪是唯心论的先验论》、《二评反林彪有罪——谁是反林彪的英雄》、《关于我的日记》、《血泪控诉》、《乱讲一通》……

这些大字报立即在赣州掀起广泛的同情与声援热浪。赣州市和赣州地区数以万计的工人、干部、学生、市民、知识分子,纷纷集会和张贴大字报支持李九莲。

4月13日,赣州地区中级法院、公安局、工代会张贴《联合声明》,

称“李九莲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攻击社会主义制度,攻击无产阶级大革命,确确实实构成了反革命犯罪,”“当前批林批孔是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对于一小撮阶级敌人捣乱破坏、翻案活动,必须坚决打击。”

4 月 14 日,冶金十三队工人刘庭荣张贴《评三家“联合声明”的反动性》大字报,公开支持李九莲翻案。

当天,地区公安局、地区工代会印发《李九莲有关罪行材料》,公布了影印的李九莲的“反革命匿名信”和“反动日记”供批判用。

4 月 16 日,下乡知青康为民贴出署名“李九莲辩护士”大字报《掀翻现行反革命李九莲一案》。气压机厂工人管佑龙张贴声援李九莲大字报《路遇不平,拔笔相助》……

4 月 17 日,应地区工代会强烈要求,赣州地委常委会议决议:重新逮捕李九莲。

4 月 18 日,李九莲去舒北斗家恳请他鼎力相助。

4 月 19 日,李九莲在最后一篇公开申辩《我的人生态度》中写道:“为了真理,我不惜再度失去自由而入铁窗!”“人民起来了,一切妖魔鬼怪统统都会被消灭!”“历史将宣判我无罪!”

4 月 20 日傍晚,朱毅由全南回到赣州,直趋地区公安局见领导,询问李九莲案。

就在这天晚上 22 时,在地区工代会人员参与下,李九莲再次被赣州市公安局拘捕,当晚押往兴国。因为此时她是在兴国县画眉坳钨矿工作,应由兴国县县委及县法院审理处置。

兴国县委领导拒绝受理。他们推辞说,李九莲在赣州市张贴大字报,她的家又在赣州市,这件事理该由赣州市研究处理。两地互相推诿。

4 月 22 日,朱毅、舒北斗、曾传华等 30 余人署名张贴《众手掀翻独霸天》大字报,称“李九莲精于学习,勤于思考,勇于实践,敢于探索,充满献身真理的精神。李九莲以对林彪的及时洞察表明了她是立志献身革命、酷爱真理、关心祖国的前途和命运,敢想敢为、无私无畏的好青年!”抗议地委和公安局重新逮捕李九莲。

4 月 25 日,赣州地、市 259 个单位签署要求立即释放李九莲的《联

合声明》。同日,赣州300民众乘车前往兴国县营救李九莲。得到兴国县革委会和公安局的支持和理解。

当天下午,赣州地区公安局、工代会、红代会紧急汇报赣州、兴国情况,江西省委书记陈昌奉下达“五点指示”:

一、李九莲是地地道道的现行反革命跳出来翻案。

二、赣州某些人争论李案,实际上是为现行反革命翻案。

三、冲击兴国监狱是起严重的政治事件,必须立即制止。

四、某些领导干部和公安干警在李九莲问题上严重丧失阶级立场,实际上是向反革命投降。

五、对于在李案问题上立场坚定、坚持原则的同志,应予表彰。

4月26日,“赣州地区李九莲问题调查委员会”,简称“李调会”,宣告成立。他们宣称:“还李九莲以本来面目之日,就是调委会自行解散之时。或者走向真理的光明,或者走向牢狱的黑暗。”

当天,省军区政委、省革委会主任陈昌奉派秘书召见舒北斗,同日赣州地委工交办主任杜昭约见舒北斗,苦口婆心深入反复地动员他和“现行反革命”李九莲划清界限。

“李调会”展开了声势浩大的宣传活动,并在群众集会上,与赣州地委工交办主任杜昭等人进行了激烈的唇枪舌战。

地委断然拒绝了“李调会”的要求。

4月29日,在地区工交办主任杜昭和家庭的压力下,舒北斗退出“李调会”。

4月30日,江西省委书记陈昌奉在省委三届八次全委会上斥责赣州有人为现行反革命李九莲翻案。

这天,“李调会”在赣州市体育馆召开第一次万人大会宣讲李九莲案真相。

5月2日,“李调会”在赣州公园门外设立讲坛,让民众自由发表对李九莲问题的看法。这一自由民主讲坛持续数月之久。

5月9日,江西省委下达有关李九莲问题的“三点指示”:

一、赣州地委常委陈万兆同志支持现行反革命李九莲翻案,严重丧失阶级立场、省委责成其停止工作,反省交待问题。

二、兴国县委、兴国县公安局主要负责同志支持不明真相的群众

为现行反革命分子李九莲翻案,严重丧失阶级立场,责成作出深刻检查。

三、赣州市公安局批林办4月24日的声明是向阶级敌人投降,责令立即收回,挽回影响,并作出深刻检查。

随之派人去兴国县,把李九莲押回赣州。

5月12日,省委电话指示省领导决定召见赣州“李调会”负责人。指名朱毅、刘庭荣、曾传华、黄智荣和赣州地区农林系统代表5人前往南昌解决问题。朱毅拒绝前往。

省委书记陈昌奉接见了刘庭荣、曾传华、黄智荣和赣州地区农林系统代表,调委会代表始终坚持李九莲的革命本质。

5月18日,“李调会”大字报提出:“取消公安六条,不能用法律保卫领袖!”“阶级斗争扩大化,百扩不灵!”

6月2日,“李调会”由184个单位签名的《联合声明》:省委的五点指示和两次三点指示,不仅是地委某些人片面汇报所骗取的,而且是省委分工负责李九莲问题的涂烈一手泡制的……

6月10日夜,原《赣南日报》总编辑、九二盐矿党委书记方道球在公园门前发表演讲,支持公开争辩李九莲案。

接着,1969年带领武装民兵第一次拘捕李九莲的冶机厂宋德恒公开演讲,揭露事实真相,公开支持李九莲翻案。

6月11日,国家公安部对李九莲案件作出批示:“按省委意见办理。”

6月14日,机床厂谢明写大字报《官官相护》。

6月17日夜,朱毅、方道球、孙成璋邀请地委书记田启松激辩李九莲案性质,赣州市万人空巷。

6月29日,大雨滂沱中,“李调会”主持纪念“六·二九”死难者七周年大会。6月30日,“李调会”李抹照、黄志荣、郭宗秀、路扬、陈富等12人就李九莲案赴京上访。7月4日,“李调会”孙成璋、徐声扬等4人再次就李九莲案赴京上访。

7月23日,赣州地区工代会、红代会为批判李九莲攻击“李调会”开办了刊物《投枪和匕首》,于是“李调会”小报《野草》创刊。以鲁迅杂文《野草》命名的刊物,寓意野火烧不尽。此时更名亦有在“投枪和

匕首”的寒光中萌发新叶之意。

8月,“李调会”连续三次就李九莲案继续派员赴京上访。

8月21日,继《静夜扪心录》9篇之后,朱毅开始写《九吐心丝》,从李九莲的真理执著、革命理想、人生态度,爱情观及在禁区中勇敢探索的人格力量和精神勇气等几个方面为李九莲全面辩护。

9月15日,朱毅发表《九吐心丝之九. 并非最后的话》动员解散“调委会”,以避免招致大规模镇压,但遭到“李调会”大多数人反对。

9月30日,朱毅、廖树才、康为民、罗汉进等“李调会”人员就李九莲案的第六次赴京上访。

10月中旬,赣州地区革委会副主任徐承中到“李调会”交际处解决停发工资事,地委以李调会“绑架”地委领导为由密电中央。

10月22日 江西省委陈昌奉等在京常委通过对李九莲问题的“四点决议”:

一、李九莲反革命案不能翻。

二、调委会是非法的,要立即解散。

三、阶级敌人正利用李九莲案攻击无产阶级专政。

四、李九莲案件长期得不到解决,一定有阶级敌人破坏。希望地委做好工作,发动群众,揭露和批判,打击一小撮阶级敌人。

10月23日,赣州地委提出取缔“李调会”的“八点意见”。

10月25日,为应对即将而来的大规模镇压,避免一网打尽,朱毅写《告全省人民书》,并将管佑龙、林锋、廖树才、卜谷、谢明、康宏垠等“李调会”骨干派往南昌。

10月28日,朱毅将《九吐心丝》底稿和《野草》等“李调会”文件交钟海源保存,以备不测。

10月29日上午,朱毅贴出《仍然并非最后的话》,说:“我们和赣州人民及其思想的女儿共同创造和度过了一段这样难忘的岁月……既然需要经过牢狱的黑暗,才能到达真理的光明,人民会相信面对铁窗的时候,我们的心情是坦然的……”。

深夜,朱毅被拘捕。

一个小时之后,曾传华、孙成璋、李抹照、刘挺荣……纷纷被保卫干部和武装民兵从家押出。

10 月 30 日凌晨 数百干警和五个武装民兵连查抄捣毁“李调会”广播站及有关场所。“调委会”负责人员和骨干被强制办班审查。

11 月 1 日,赣州“李调会”的《告全省人民书》和为李九莲辩护的大字报在南昌八一大道旁贴了一里路长。赴南昌人员在樟树被捕押回赣州。

李九莲在狱中无数次的反复吟诵臧克家的《弔屈原》:

宇宙这样宽大
却容不下一条身子
天地如此广阔
思想却无处安放
只好抱着贞节去追踪
带一颗眷恋的心跳下了泪罗江
(生命就是这样
不能去碰死僵冷的社会
就只有碰死在它身上!
——这三句显然是李九莲自己加上去的)
泪罗江的水
为诗人流了二千多年的清泪
到如今
上官令尹
依然在人间充沛……

所有这一切都被视为李九莲的罪证列入起诉。

11 月 29 日,“李调会”广播员钟海源、刘华英、肖国涵等 4 人在赣南采茶剧团撒发《强烈抗议》和《紧急告全市人民书》传单,传单如雪花从剧场空中飘落。因遭“线人”邹根保报告,4 人被当场拘捕。

12 月 3 日,赣州地委副书记吴清明在地市直属单位干部大会上作《关于处理“李调会”问题的报告》。他说:

“李九莲是个地地道道的现行反革命。她的思想是极其反动的,而且有言有行,通过写反革命匿名信和反动日记等手段,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攻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攻击无产阶级专政,攻击社会主义制度,罪行是严重的,罪证是确凿的,定性是准确的,处理是宽

大的。但她不思悔改,反而趁批林批孔之机,窜回赣州市,接过‘反潮流’的口号,以‘反林彪的英雄’出现,公布反革命匿名信,张贴反革命大字报,大肆进行翻案,气焰十分嚣张。为了打击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保卫批林批孔,我公安机关将她重新拘留,这是及时的、必要的、完全正确的。现已查明其翻案罪证确凿,决定逮捕法办。”

“李九莲的所谓‘反林彪’的问题。其实她是把文化大革命污蔑为‘毛林派’与刘少奇的所谓‘宗派斗争’,并认为对刘少奇的批判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这完全是攻击毛主席,为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鸣冤叫屈,怎么能说‘反林彪’呢?当然有一两句怀疑林彪的话,其实她是把林彪与毛主席联在一起反的,从根本上看她是攻击毛主席的。她的全部反动言行,正是按林彪的反动观点、反动路线行事的。”

关于“李九莲调查委员会”,他说:“调委会从非法成立那天起,到我们宣布解散为止,前后共发表过15份像‘声明’、‘公告’一类的东西,其中由朱毅一手泡制的就有13份。朱毅4月份写的《众手掀翻独霸天》是调委会纲领性的宣告,他们把我们无产阶级专政的天下说成是‘独霸天’,这和林彪‘571’工程纪要中污蔑我们无产阶级专政为‘独裁’是一个腔调。他们叫喊‘让我们扭转乾坤的双手,众手掀翻独霸天吧!’调委会叫喊要掀翻‘独霸天’,就是要推翻无产阶级专政!这就是他们的要害!”

“后来朱毅又露骨地说:‘现在要讲就讲翻案,过去讲重新审查是运动的策略,李案现在不翻,更待何时?’他们还说:‘翻李九莲的案不是我们的根本目的,而是突破口’,‘要把千千万万个李九莲的案翻过来,这才是根本的目的’,……等等。这就不难看出,调委会的某些人完全站在资产阶级的反动立场上,为一小撮阶级敌人鸣冤叫屈,为地、富、反、坏、右翻案,要变无产阶级专政为资产阶级专政,变社会主义为资本主义。他们的活动是有纲领、有计划、有组织、有目的。”

“参加和支持调委会活动的还有我们某些领导干部,有的领导干部在这方面的错误是比较严重的,有的给钱给物,甚至在背后出谋划策,支持李九莲翻案。”

1975年5月 以华国锋为部长的公安部党组讨论批准了赣州地区公安局关于李九莲问题的报告。

1975 年 5 月 30 日,赣州地区“公检法”以兴国县法院名义,对绝食中李九莲判处有期徒刑 15 年,剥夺政治权利 5 年。

李九莲拒绝在《判决书》上签字,也不上诉,并继续绝食以求一死。

1975 年 12 月 20 日,朱毅被以反革命罪判处有期徒刑 20 年,剥夺政治权利 5 年。

1976 年 5 月,钟海源坚持为李九莲鸣不平,被加刑 5 年至 12 年,押往南昌新建服刑。

其他被捕“调委会”人员,在反击右倾翻案风高潮中被判 5 至 20 年不等。

# 第1319回：八月热，召开“军队高干会” 亲自查，为贺龙恢复名誉

1974年2月，南京大学贴出了揭发和批判清查“516”运动的大字报。从3月18日起，《新华日报》编辑王晓智、余华明、王春南陆续写了6张大字报，总字数约8万多，贴到了省委大院、南京大学校园，以及南京市中心新街口。人们纷纷传抄、翻印，迅速传遍全省。江苏省革委会副主任许家屯对这些大字报尤为关注，让南京大学中文系的学生白天到校园或大街上去抄，晚上向他汇报。

恰在这时，南京发生了下放工人大规模上访的事。4月28日至30日，近万名南京下放工人包围机关，上街游行，拦截汽车，爬上火车，赴京上访，要求回城工作。江苏省委书记、省军区政委吴大胜给他们发了伙食费。随即，中央发了14号文件，批评吴大胜等人搞“经济主义”，破坏批林批孔运动。5月14日下午，许家屯亲自到新华日报社，布置写一篇批判吴大胜等人的社论，口授要点，并在报社坐等交稿。三名社论起草人都是南京大学毕业的，他们在社论中写进了许家屯没有提到的清查“516”问题。次日，这篇社论见报，标题为《牢牢掌握批林批孔这个斗争大方向 彻底揭开省委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盖子》。文中有这么一段：

“林彪自我爆炸以后，他们继续对抗毛主席、党中央的一系列指示，他们不批林，不批陈，以批极‘左’代替批极右，借深挖‘516’转移斗争大方向。同时，他们还向中央写假报告，隐瞒林彪及其死党在江苏的罪行，以及他们之间千丝万缕、不可告人的关系。”

6、7月份，江苏省革委会副主任、省委副书记彭冲和许家屯多次主持召开省级机关批林批孔代表会议，让吴大胜作检查，并对吴大胜及省委常委蒋科开展揭发、批判。会议重点之一是揭发吴大胜等人为林彪选“妃子”（儿媳）和“驸马”（女婿）。在6月17日的会上，许家屯一上来就问吴大胜：“主席说，选‘妃子’是谁干的？”

吴大胜爽快地回答:“主席说,选‘妃子’不是共产党干的。”

省委组织部一位姓马的干部揭发说,林彪先后10次派人来江苏选“妃子”和“驸马”,看了二、三十万女青年的档案和照片,还看了两、三万男青年的档案和照片,吴大胜等人积极配合。

会议的另一个重点是揭发吴大胜等人搞清查“516”的罪行。

从夏天开始,江苏对清查“516”问题进行复查。8月31日,省委下发《关于清查“五一六”工作的一些问题的处理意见》,承认犯了“扩大化”的严重错误,并明确指出,应由当时省委主要负责人吴大胜负主要责任。对清查中的问题,提出了六条处理意见。其中第二条说,“经审查不是‘五一六’,又无重大政治问题的,组织上仍应继续信任”。

1974年八一建军节过后,毛泽东南下之前提议召开的各大军区司令员、政治委员会议,又称“军队高干会”在北京召开了,各大军区负责人来到北京。

8月26日至9月10日,政治局在京西宾馆召集大军区负责人开会,解决李德生、许世友、韩先楚等人的问题。会议由王洪文主持,分成几个小组,对重点人物分别“批评帮助”,

王洪文传达毛泽东的最新指示:“各自多作自我批评,发言时别人不要插话,讲完了就完了。”

大家鼓掌。

李德生在这次会上受到了批判。他是“重点中的重点”,除了参加小组会,还在政治局全体会议上接受批判。

王洪文在会上说:“对于批林批孔中,各地揭发的问题,主席说,‘除若干同志外,有少数同志或多或少有些问题’,这个‘或多’就是指李德生!”

他将总政治部编写的几本《批林批孔大字报汇编》中的材料,归纳了李德生的12个问题,要求李德生做出交代。这12个问题是:

1、“第一号令”问题,即林彪1969年10月发布的“第一号号令”一事。当时李德生进入军委办事组已有几个月,所以要李德生承认他是“同意第一号令”,“同意不报主席”的。李德生辩解说他当时进入军委办事组只有几个月,这些大事他只有听的份,根本轮不到他经办,也不需要他表态的。毛远新批评李德生“态度不端正”。

2、销毁黄、吴、李、邱“黑材料”。1969 年 12 月 2 日,黄永胜、吴法宪批示将“污蔑”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黑材料”统统销毁,“请总政治部审批”。李德生并未直接处理此事,而是由刚上任的副主任黄志勇和田维新批示:“应按以往规定办理”,婉转拒绝。4 日,黄永胜等又批道:“是哪家的材料送回哪家自行处理”。此事与李德生本无关系,但这次作为“重要问题”追问李德生。

3、林彪 1970 年 5 月 19 日接见总政副部长以上领导干部,也是李德生上任总政主任后第一次奉召觐见林彪。这次,这件事情同林立果的“联合舰队”联系在了一起。

4、纪念军委扩大会议十周年问题。林彪 1960 年主持军委扩大会议,1970 年满十年,总政于年初要求学习古田会议决议和 1960 年军委扩大会议文件。大字报认为李德生这是为林彪篡权“造舆论”。

5、庐山会议,李德生与李作鹏秘密串联的问题。李德生与李作鹏在庐山上有接触,但没有单独来往,这是有登记可查的。因此李德生不同意秘密串联的说法。而且,陈伯达、吴法宪等在庐山上搞的那个“天才语录”,军委办事组的人手一份(黄永胜上山晚,“语录”已经收回了),李德生却没有。毛泽东曾数次对李德生说,你去向他们要,问他们“那个‘宝贝’为什么不给我呀?”尽管如此,大字报还是认为:李德生在庐山的表现,“起了炸平庐山,支持林彪集团搞政变的作用。”

6、1971 年 7 月,《解放军报》向总政写报告,要求登江青为林彪拍的那张学《毛著》照片,毛远新追查军委办事组为什么要向张春桥请示此事。李德生解释说:“收到军报的请示,觉得没有把握,所以没有提交办事组讨论,只请示了张春桥。”大字报认为这是故意给张春桥出难题。最后,那张照片在《解放军画报》上登了,军报未登。

7、1971 年干部工作会议,主要是解决基层干部困难和老中青三结合问题,是一次常规会议。此时,这个会议被说成是由林彪操纵的,为林彪上台做“组织准备”的会议。

8、林立果“讲用报告”。1970 年,总政派一位副处长到空军听了林立果的“讲用报告”,回去向宣传部汇报后就搁置了,谁也没当回事。但此时,被认定这是一个“大问题”。

9、北兵南调问题。即 1267 回提到的 1971 年 7 月,中央军委根据

敌情通报,台湾准备以大陆福建沿海为目标,用一两个师的兵力搞一次登陆演习。于是召开办公会议,研究布置备战。海军为此搞了一个作战方案,准备必要时将北海舰队的舰船南调,南海舰队的舰船向东调,支援东南沿海的作战一事。此事从1971年8月开始,刚刚展开,因发生了“913事件”戛然而止。而军委办事组讨论此事的办公会议,李德生因为有外事活动没有参加。但大字报仍然被质疑。

10、直升飞机问题。1971年9月13日,周宇驰等劫持直升飞机外逃迫降后,临时主管空军的李德生派人到现场,指示将收缴的文件资料送到空军。因此被质问:“为什么送到空军?”

11、“913”后“捂盖子”问题。因为李德生曾说过:“林彪的秘书是人民内部矛盾”这句话,因此质问李德生:“你和他们不是一个山头的,为什么搞到一起去了?”“为什么你说林彪的秘书是人民内部矛盾?”

12、“插手”总政。李德生是1973年12月底调出总政的,但是1973年总政的年终总结报告依然送给李德生看了,因此有大字报指责李德生是“插手”,“你想抓住不放”。

帮助会上纲上线越来越高:李德生“封锁主席”,“推行林彪路线”;李德生“站错了立场,走错了方向”;李德生“不是水平低,能力差的问题,不是上当受骗的问题”,“说小点,是参与了林彪的阴谋活动,说大点,是认为林彪指挥军队了,不是毛主席指挥了”,“是下贼船难的问题”。“要从立场上考虑,从世界观上考虑,从思想根源上挖一挖”;“总政治部究竟是搞马列主义,还是搞修正主义?”

李德生后来回忆说:“每天开完批判会,我回到京西宾馆,心情久久不能平静,吃了安眠药也不能入睡。我想到,我们党内斗争,怎么能这样呢?事无大小,无限上纲……非要置人于死地不可。”

会议处于胶着状态,明显看出不检查不能收场,李德生只得违心检查,承认“推行林彪路线”,“上林彪贼船”。

1974年8月,炎炎盛暑。在北京参加各大军区司令员、政委会议的将军们闷热难熬。这时,从号称三大火炉之一的武汉,风景秀丽的东湖梅岭1号别墅里,忽然吹出一阵清风,毛泽东指示:“要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一棍子打死就不好了。允许人家改正错误嘛,要给人家机会。”他还着重地强调:“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八

年。现在,以安定为好。全党全军要团结。”

毛泽的“八月指示”,使得政治寒暑表高处的水银柱一下降了下来。军队高干会上的将军们如沐春风,会议也很快散场。

9月5日晚,在中央召集的各大军区负责人会议上,韩先楚作了检查:

“我在党的第十次路线斗争中犯了路线错误。”

“(我在)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上,写了一封支持林彪反革命政变动员令的表态信,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我错怀疑过春桥同志,在这里我向中央检讨,向春桥同志赔礼道歉。”

9月10日,军队高干会结束。

会议结束的第二天,9月11日下午,叶剑英只身来到京西宾馆,看望李德生。他对李德生说:“该吃饭,吃饭,该睡觉,睡觉,该干啥干啥!”

9月4日,毛泽东在武汉会见多哥共和国总统埃亚德马和夫人及随行人员后,问陪同外宾前来的邓小平:四届人大“今年能开吗?”

邓小平说:“主要是人事问题。”

毛泽东又向邓小平提出:“贺龙要恢复名誉”。

邓小平回京后,立即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了传达。

贺龙案当时主要有两点疑问还没有解决:一是晏章炎1967年2月14日给中央写信揭发蒋介石诱降贺龙一事;二是国务院参事室李仲公揭发贺龙的两封信。

关于晏章炎揭发蒋介石派说客熊贡卿,又名熊瑞龄,到湘鄂西诱降贺龙的事,是因为贺龙早年在湘西当镇守使,和熊贡卿认识。1933年12月熊贡卿派梁素佛,又名梁天闻,送信给贺龙,要到苏区,要求接见,贺龙报告了湘鄂西中央分局。湘鄂西中央分局开会,“为要得到蒋介石对中央苏区及四方面军之破坏工作的消息”,大家都说可以让他来湘鄂西。熊到了苏区,企图收编红军,贺龙报告湘鄂西分局,经分局决定处决了熊贡卿。1934年3月17日,湘鄂西分局将此事报告中央,报告中写道:

“为要得到蒋介石对中央苏区及四方面军之破坏工作的消息,允许熊贡卿来到湘鄂西,在熊供述情况之后,即将熊事公开,举行群众审

判枪毙之。”

报告是由夏曦、贺龙、关向应联合署名,就存在中央档案馆。因此,此事是诬陷。

那为什么当时专案组没有做出这一结论呢?说是因为林彪于1968年9月指使专案组扣压了这份材料,未上报中央。但是林彪并不具体负责贺龙专案,他在1968年9月是怎样指使专案组扣压这份材料的?没有具体说明。

关于李仲公上交的那两封信,开始是由中央统战部多次将李仲公叫到统战部,核实此事。李仲公回到家中就生气地说:“童小鹏要我承认那两封信是假的。”他当即否认,坚持贺龙的“亲笔信”是真的。并对童小鹏说:“你说信是假的,难道是我李仲公造的不成?”

童小鹏说:“不是说你造的,如果是有人假借贺龙的名义写的,你也不知道。”

后来为此事,又把李仲公的弟弟李侠公接到北京。李侠公说,解放初期,李仲公在西南地区想得到地位高的职务,因贺龙反对没有当成,因而怀恨在心。文革爆发后,李仲公知道贺龙受到冲击,曾对他说:“现在我把信交出去,可以立功。”于是认为,李仲公的弟弟把情况说清楚了,这封信也不能成为贺龙的罪证。

这两件事的结论都是诬陷,周恩来让华国锋和纪登奎起草《中央专案组关于为贺龙同志恢复名誉的报告》和《中共中央关于为贺龙同志恢复名誉的通知》

9月13日,华国锋和纪登奎将写好的《报告》和《通知》交周恩来审阅。

但是贺龙的那两封信仅凭李侠公的说法还是没有物证呀。如果李仲公坚持说李侠公是撒谎呢?周恩来又和华国锋研究那两封信的笔迹,他对华国锋说,这两封信的笔迹不是贺龙的。而且,1927年时,贺龙也不用这个名字。

李仲公也承认笔迹不是贺龙的,但是他说贺龙可以找别人写嘛。

周恩来和华国锋又研究信纸是否是几十年前的。

9月23日,周恩来让华国锋找杨贵、施义之和王曼恬。

华国锋将公安部施义之、杨贵和天津的王曼恬找到中南海,拿出

这两封信对他们说:“这是国务院参事室李仲公上交的1927年贺龙写给蒋介石的求降信,请你们很好地研究一下,找有关单位做出技术鉴定,鉴别信的真伪,做出结论,并报周总理。”

杨贵从华国锋手中接过信件,与施义之、王曼恬仔细查看:信是用印有红色边框和竖线的纸张,毛笔书写,落款的年代距当时已有40多年,纸张已经发黄,字迹也已变暗,看上去,时间确已久远。杨贵认为,如果从辨别字迹来确认信的真伪,难度很大,因为人的字体会随时间的流逝发生改变。再有,万一是别人代写的呢?不如将辨认字迹和所用信件的纸张、墨汁同步进行鉴定。施义之和王曼恬同意杨贵的意见。

几天后,化验的结果出来了,信件所用的纸张是建国后生产的,与40年以前造纸用的纸张完全不同。书写用的墨汁也是解放后生产的,里面含有建国后才能生产的成分。由此可以确认,李仲公上交的贺龙“求降信”系建国后所写。

周恩来听说鉴定结果后,肯定杨贵等及时查清了李仲公诬陷贺龙案。

事实清楚后,杨贵非常气愤,向华国锋建议:“应该以诬陷罪给李仲公判刑!”

华国锋将杨贵的意见转告周恩来。周恩来轻轻嘘了一口气说:“算了吧,李仲公已经80多岁了,不要说给他判刑,就是把结论告诉他,也会吓死他的。”

周恩来迅速将《中共中央关于为贺龙同志恢复名誉的通知》上报毛泽东。1974年9月29日,中共中央发出[1974]25号文件,正式为蒙冤去世的贺龙平反,恢复名誉。

《中央专案组关于为贺龙同志恢复名誉的报告》和《中共中央关于为贺龙同志恢复名誉的通知》两个文件文字基本都一样,只是《通知》比《报告》简略一些。《通知》指出:

“林彪要整贺龙同志蓄意已久,早在1966年就向中央提出,贺龙同志历史上曾向国民党反动派‘请求收编’,和‘阴谋篡军反党’等问题,要进行审查。中央当时认为,把贺龙同志的问题搞清楚也是必要的,于1967年9月予以同意,要进行审查。在‘九一三’林彪事件发生

以前,对贺龙同志问题的审查,一直为林彪、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等人所把持。他们捏造事实,隐瞒真相,以欺骗和封锁中央,诬陷贺龙同志历史上‘通敌’和‘篡党夺权’。‘九一三’以后,中央直接对贺龙同志的问题进行了审查。毛主席多次批示,要抓紧给贺龙同志做出结论,予以平反,恢复名誉。……贺龙同志已于1969年6月9日病故。贺龙同志是一位好同志,在毛主席、党中央的领导下,几十年来为党为人民的革命事业曾做出重大的贡献。他的一生中,无论在战争年代,或在全国解放以后,他是忠于党、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忠于社会主义事业的。因此,中央决定,对贺龙同志予以平反,恢复名誉。中央的这个通知,印发到县团级,并口头传达到党内外群众。”

《通知》仍保留“中央当时认为,把贺龙同志的问题搞清楚也是必要的”和“病故”,这两种说法。

# 第1320回：“好主意”，江青二去小靳庄 “风庆轮”，政治局发生争吵

1974年9月16日下午，毛泽东与刚刚结束北京“军队高干会”回到武汉的武汉军区司令员杨得志谈话。说到刚结束的各大军区司令员、政委会议时，毛泽东说：“不要一棍子打死，就是要帮啊。现在要做工作，帮助他们。你们这些同志，老资格，现在掌握大权，可要谨慎小心。要分析问题。我要是不在了，你们要谨慎小心。还有一二年也不一定，阎王请我喝烧酒。”

当天下午，毛泽东又同武汉军区政委王六生谈话，说：“不管犯了什么错误都要团结起来。人都要犯错误，我也有错误。大事多商量，多分析，要跟中央商量一下。有同志不大讲政策，许多事中央都不知道。要好好工作。”

9月17日，毛泽东看了陈丕显9月9日来信。陈丕显在信中说自己不是叛徒、反革命、死不改悔的走资派，要求解除隔离审查，给一点可以做的工作。毛泽东在信上批示：“洪文同志：此人如何处理，请在政治局一议为盼！似可作人民内部问题处理。”

9月20日，江青在北京会见菲律宾总统夫人。随后两天，江青陪同马科斯夫人看文化展览，参观工厂。23日下午，江青向马科斯夫人提出延长访问的请求，说明天“有个出奇的好主意”。马科斯夫人同意延期。

原来，这个“出奇的好主意”就是参观天津小靳庄。9月24日下午，江青陪同菲律宾的马科斯夫人参观小靳庄，小靳庄的农民为两位来访的夫人表演了他们自编自演的文艺节目。

在参观牲畜栏、玉米地和面粉磨坊时，江青向菲律宾客人扼要重述了她仲夏时节在天津一次讲话的主题。

江青问马科斯夫人是否知道中国的武则天，说那可是一位“比男

人还有力量”的女皇帝。又问她是否听说过汉朝的吕后,说那是位“封建时代伟大的女政治家”。

晚上,江青陪同马科斯夫人到天津自行车厂参观。当晚,乘专列返京。

在天津,江青让人按照唐朝服装的样式,设计制作梅花百褶拖地大袍裙。又指导服装设计人员翻阅史籍,设计制作开襟领裙衣,当时人们称之为“江青服”,并以此作为“国服”在全国妇女中推广。

从仲夏到初秋,江青的两次小靳庄之行,使这个村庄很快在全国闻名。

9 月 27 日,毛泽东在武昌会见菲律宾总统马科斯的特别代表、总统夫人伊梅尔达·马科斯,他坦然告诉她:“我在养病,好几个月了,一身的病,不行了,老了。”

这天,他审阅中央政治局报送的国庆节招待会准备见报的名单,其中包括近几年没有露过面的老干部 40 多人,如胡乔木、孔原、伍修权、宋任穷、欧阳钦、林铁、孙起孟、屈武、马文瑞、张劲夫、李昌、李一氓、江一真、杨秀峰、孙大光、蒋南翔、肖向荣、刘少文、傅秋涛、王辉球、陈鹤桥、傅崇碧、薛明、范瑾等。当工作人员给毛泽东念这份长达 2000 多人的名单稿时,毛泽东又想起一些人,如肖华、侯宝林等,提出应把这些人加到名单里去,还询问商震是否已列入名单。

原国民党将领商震,1949 年辞职留居日本。这年的 9 月 19 日至 10 月 23 日到大陆参观访问。

9 月 28 日晚,周恩来在医院里审阅王洪文送来的出席国庆招待会人员名单,提议增加齐燕铭。9 月 29 日,又就出席国庆招待会人员名单致信王洪文并中共中央政治局。提议在爱国人士中增加起义四将领夫人,即卫立煌夫人韩权华、程潜夫人郭翼青、张治中夫人洪希厚和傅作义夫人刘芸生,指出;“四夫人对国内外影响也不小。”又告:“因林彪利用东北军一案大搞东北民主人士,现在吕正操同志已平反,张学思已死(此案亦应弄清)”,因此,有必要增加张学良之弟、张学思之兄张学铭。周恩来还将民革中央常委屈武等民主人士补进名单。同日,审定在国庆二十五周年招待会上的祝酒词稿。

9月29日,毛泽东又想到国庆招待会需要加上刘志坚。

9月30日晚,北京人民大会堂宴会厅里灯火辉煌,周恩来抱病主持盛大国宴,隆重庆祝建国二十五周年。几千名中外人士济济一堂,用热烈掌声欢迎周恩来祝酒词。参加这次宴会的党政军高级干部中,不少人是刚从“牛棚”或“五七干校”赶来的。

这晚,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在灯火通明的人民大会堂相遇了。面对着熟悉而又陌生的人民大会堂,他们怎能不感慨万千。6年前,逮捕他们的决定是从这里发出的,今天,他们又来这里出席宴会。

这是他们3人被“解放”后的第一次相见,该说点什么呢?该从哪里说起呢?

他们笑了,也只能笑笑而已。不管怎么说,他们还是出来了,还是重新登上了历史的舞台。

傅崇碧说:“一场噩梦。”

余立金说:“过去的让它过去吧。”

杨成武叹了一口气,说:“我们没被整死,要算不幸中的大幸。”

……

他们没敢再多说一会儿,如果逗留时间再稍长些,很可能会出现:“‘杨余傅’又聚会了”的谣言。

人言可畏啊!

国庆节刚过,10月4日,在北京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王洪文给毛泽东报告说:“10月3日晚政治局讨论了下一步的工作安排问题,主要是讨论了是否召开四届人大的问题。”“如主席同意年内(或春节前)召开四届人大,政治局最近一段时间的工作拟以此为中心全力准备。”

毛泽东圈阅了这个报告。当天下午,他让张玉凤打电话给王洪文,提议由邓小平出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并要王洪文向政治局传达这个意见:

张玉凤同志来电:

首长说,政府工作报告有三千字就够了。副总理要多几个,第一副由谁来当?(邓)

王洪文在当晚先向江青、张春桥、姚文元3人进行了通报。

10 月 6 日,王洪文将毛泽东的这一指示告诉了中央政治局和周恩来。听了毛泽东的这一决定,周恩来当天约邓小平谈话。

10 月 6 日晚,江青赶到周恩来住的医院,向周恩来提出她对人事安排的意见,主要是谈总参谋长的人选,谈了整整两个小时。

10 月 7 日、8 日、9 日,周恩来先后与王洪文、邓小平、李先念谈话。

10 月 11 日,毛泽东圈阅了《中共中央关于准备在最近期间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通知》,即中发[1974]26 号文件。《通知》说:"中央决定,在最近期间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在这个文件里,传达了毛泽东在武汉期间所讲"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八年。现在,以安定为好。全党全军要团结"的话。后来,毛泽东还说到:"说批林批孔是第二次文化大革命是不对的。"

10 月 12 日夜里,毛泽东离开武汉,前往长沙。当时,主持湖南省工作的省委第二书记张平化正在南县考察农业和机械化问题,接到省委"北京来人,已经出发了"的电话后,他连夜兼程,于 10 月 13 日凌晨 2 时回到长沙。刚刚坐下,秘书和警卫员便来报告:"毛主席的专列已经到了长沙。"他和省委领导立即赶往长沙火车站。

毛泽东的专列驶抵长沙。从武汉到长沙有 300 多公里路程。一路没有休息的毛泽东显得疲倦,在工作人员的搀扶下,费力地走下专列。看见前来迎候的张平化等人,毛泽东十分高兴。他同张平化边握手边说:"我这一次到这里,是来养病休息的。"

毛泽东问到张平化的爱人:"唐慕兰同志怎么样啊?"

"谢谢主席关心。"张平化答:"她很好。"

"那可是个好人啊!"毛泽东不乏幽默地说。

张平化看到毛泽东疲惫的样子,便劝他走上停在站台上的红旗牌轿车。张平化知道毛泽东"恋旧",安排的司机赵毅雍等工作人员,都是 1965 年陪同毛泽东从长沙出发上井冈山的老人。

去宾馆途中,经过湘江岸边。已是垂暮之年的毛泽东示意停车。他面对滔滔北去的江水,凝望秋色依然的山麓,沉入对往事的回忆。

"秋风万里芙蓉国"。10 月的长沙,正处于最好的季节。毛泽东下榻位于岳麓山下的湖南省委宾馆九所 6 号。那里原叫陈家山,是一

片丘陵地。中共湖南省委在那里盖了一个招待所,叫“九所”,专门接待重要的客人。

这是一处不大的院落。在毛泽东居住的平房前,挺立着一棵枝叶繁茂的桂树,院内的花坛里栽种着腊梅和茶花。九所有6幢小楼。毛泽东过去在九所3号住过,这一回住九所6号。

10月13日,江青看到新华社的内部刊物《国内动态清样》上一篇关于“风庆”轮的报道:《发生在风庆轮远航途中的尖锐斗争》。这是10月12日由姚文元批交新华社刊登的。该文写道:“风庆轮”1974年出航罗马尼亚,国庆节前夕返回上海港。在出航过程中,一些人提出:国产万吨级轮船早该远航,就因为修正主义路线造成的阻力,致使万吨级轮船没有及早远航。交通部派在“风庆轮”上工作的两名干部拒绝将此事作为崇洋媚外、卖国主义进行批判。船到上海后,王洪文指示把交通部的一名干部李国堂留在上海进行批判,并责令交通部严肃处理。

江青看后,致信在京的政治局委员:

我看了一九七四年十月十三日国内动态清样有关“风庆轮”的报道后,引起我满腔的无产阶级义愤。试问,交通部是不是毛主席,党中央领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部?国务院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机关,但是交通部却有少数人崇洋媚外,买办资产阶级思想的人专了我们的政。像李国堂这样的人,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共产党员,但是从反映的材料来看,他连爱国主义者都不是。这种洋奴思想爬行哲学,不向它斗争可以吗?李国堂是钻进革命队伍的阶级异己分子,沾满了一脑子买办资产阶级思想,他怎么能够做中华人民共和国“风庆轮”这艘万吨英雄轮船的副政委呢?政委,船长和广大船员抵制他是完全正确的,是值得赞扬的,应该鼓励的。政治局对这个问题应该有个表态。而且应该采取必要的措施。以上意见妥否,请批示。

王洪文10月14日批示:

完全同意江青同志的意见。我已在十月十二日告诉交通部,上海市委,先将李国堂留上海发动“风庆轮”职工进行彻底的揭发批判,然后再搞回交通部进行揭发批判。交通部必须对李国堂进行严肃的处

理,并将处理的情况报中央。

张春桥批示:

同意江青同志的批示意见。在造船工业上的两条路线斗争,已经进行多年了。发生在“风庆”号上的事是这个斗争的继续。李国堂不是中国共产党的代表,而是买办资产阶级的代表。建议国务院抓住这个事件在批林批孔运动中进行政治思想教育,使毛主席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在各个战线上进一步确立起来。

姚文元批示:

同意江青、洪文、春桥同志的意见。根本问题是路线问题,李国堂代表了一条修正主义路线,他仇视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对抗毛主席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反对革命文艺,批林批孔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他的崇洋思想是由他买办资产阶级的立场决定的。建议交通部和其他经济部门,在批林批孔运动中,通过这件事进行路线教育,坚持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批判修正主义路线,使我国造船工业和整个社会主义工业能够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多快好省地发展。

“风庆轮”是上海江南造船厂制造的一艘1.3万吨的远洋货轮。1973年12月,这艘货轮轻载试航,柴油主机一号汽缸磨损8丝。接船单位中国远洋公司上海分公司认为磨损过大,要求调换汽缸后再重载试航,接、交双方未达成协议。

后来,交通部远洋局担心国产的主机、雷达不过关,建议该船跑近洋。在“批林批孔”中,江南造船厂工人和该轮海员贴出大字报,要求“风庆”轮远航。

1974年3月22日,上海的马天水、黄涛搞了了一个接、交双方联合批判“崇洋媚外”大会,点名批交通部。

4月,国务院批准“风庆轮”远航,并派中国远洋运输总公司组织处副处长李国堂和宣传干部顾文广随船协助工作。“风庆轮”驶过非洲好望角后,张春桥、姚文元在北京先后接见上海的朱永嘉、黄涛,说:“‘风庆轮’已过了好望角,即使沉了也是一个伟大的胜利,回来后要好好地写一点东西。”

1974年国庆节前夕,“风庆轮”远航归来,朱永嘉按照姚文元的意

见,同上海写作班子的顾澄海、陈冀德等人登船召开座谈会,写了《扬眉吐气的三万二千里》的文章。姚文元亲笔加了"'风庆轮'远航对洋奴哲学、爬行主义之类的地主买办资产阶级思想,是一个有力的批判",并在《红旗》杂志1974年11期加编者按刊登。之后,朱永嘉又要《文汇报》、《解放日报》继续发表文章。

姚文元将"风庆轮"政委指示船员给李国堂、顾文广贴的大字报在新华社《国内动态》刊出。

10月14日,对江青关于"风庆轮"的信,邓小平圈阅了,周恩来也批了"已阅"二字。

当天,周恩来先后同汪东兴、叶剑英谈话。

10月17日晚,中央政治局召开例会。当会议快要结束时,江青把有关"风庆轮"的问题提了出来,说了自己的观点,并拿着传阅材料问邓小平:

"你是支持还是反对,要表示一个态度。"

邓小平说:"你批的材料,我已经圈阅了,还是要调查了解一下再说。"

江青逼问邓小平:"你,你对批判'洋奴哲学'到底是什么态度?"

邓小平回敬道:"你江青做的事不要强加于人,非要跟你后面批东西才行吗?你这种态度,政治局还能合作吗?"

张春桥、姚文元一起指责邓小平,江青更是对邓小平又喊又叫的。邓小平急了,暴跳起来,脸上的肉都直哆嗦,连声说:"我要调查!""我要调查!"愤然离开会场。

江青对其他的政治局委员说:"你们看看,邓小平表现得多么猖狂,今后还要斗下去。"

张春桥看着邓小平走出去,说:"我早知道你要跳出来,果然跳出来了。"

政治局会议不欢而散。张春桥称这次政治局会议为"二月逆流";姚文元则在日记中写到:"已有庐山会议气息"。

会后,江青把王洪文留下对他讲,她去看了周恩来,她向周恩来提出关于四届人大人选问题,主要讲了总参谋长的人选问题,周恩来表

态支持她。她对王洪文说:“我保留我提名的观点。”

回到钓鱼台,江青又召集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到17号楼商议。江青说,邓小平所以这样吵架,就是对文化大革命不满意,反对文化大革命。她说:“我们对邓小平的问题绝不能置之不理,如此下去怎么得了?毛主席在长沙,得向他反映。”

张春桥说:“邓小平所以跳出来,可能是与四届人大人事安排及对总参谋长的提名有关,这是一次总爆发。”

王洪文也附和道:“邓小平对文化大革命不满意,有气,不支持新生事物。”

“我们四个人之中,洪文去长沙一趟最合适。”江青说。

王洪文表示同意。

# 第1321回：王洪文，长沙汇报邓小平谈人选，毛泽东批评江青

10月18日清晨，王洪文给毛泽东写信：

主席：

最近在筹备召开四届人大的工作中和其他工作中碰到了一些问题，首先是在筹备四届人大在人事安排上政治局内部有争论，这些争论虽未公开化，但在别的问题上，已经表现出来了，矛盾已经表面化。如：十七日晚政治局会议上就关于交通部问题引起了争论，我们几个同志分析，表面是交通部问题，实质是与目前筹备人大问题有关，但跟交通部两条路线的斗争也是直接有关的，问题相当复杂，对于这些问题由于我们没有经验，我们几个同志商量，是否能当面向主席汇报，听取主席的指示，因为书面一时说不清楚。

来时由我一人先来，以免惊动别人，如主席同意我来，最好能争取在主席接待外宾之前，是否妥当，我们听候主席指示，随时待命。

王洪文

1974年10月18日上午7时

附江青同志的三份材料。

张玉凤向毛泽东请示后，同意王洪文来长沙。当天上午9时，王洪文从北京起飞。到达长沙后，中央警卫团团长张耀祠把他从长沙机场接到住地。下午14时，王洪文来到湖南省委9所6号楼毛泽东的会客室。

王洪文首先问候了毛泽东的身体情况，然后便转入此行的主题。他说："北京现在大有庐山会议的味道。我来湖南没有告诉周总理和政治局其他同志。我们4个人开了一夜会，商定派我来汇报。"

他说："总理虽然有重病，但昼夜都忙着找人谈话，经常去总理家的有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等同志。"这一切"和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有关。"

接着,王洪文又取出几份文件,问:“主席看过交通部发的有关‘风庆轮’在试航中发生的一些事情的文件吗?”

毛泽东说:“没有。”

王洪文说:“在政治局会议上为这件事情,江青同小平同志发生了争吵,吵得很厉害。”

他把江青和邓小平当时讲的一些话重复了一遍后说:“看来邓还是搞过去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的那一套。”“邓小平这么大的情绪是同最近在酝酿总参谋长人选一事有关。”

毛泽东说:“有意见当面谈,这么搞不好,要跟小平同志搞好团结。小平同志政治上强,会打仗呢。”

王洪文又说姚文元很爱读书……张春桥善于分析问题,工作有能力。对江青也说了一番好话……

谈话结束时,毛泽东让王洪文在这住几天,出去跑跑看看。王洪文说:“今天我还要回北京,他们几个人还等我传达主席的意见呢。”

毛泽东说:“那好,你回去要找总理和剑英同志谈,不要跟江青搞在一起,你要注意她……”

王洪文表示:“一定按主席指示办。”

当天下午,王洪文回到北京。当他的轿车驶入钓鱼台时,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已在那里等他。

听了王洪文讲述长沙之行毛泽东的指示后,江青得知丹麦首相后天将飞往长沙会见毛泽东,由王海容、唐闻生陪同。她于18日当天又打电话将王海容、唐闻生叫过来,要她们向毛泽东反映国务院“崇洋媚外”的问题。据王海容、唐闻生后来回忆:

江青说,邓小平在政治局会议发生争吵后扬长而去,致使会议无法开下去。她说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表现是又一次“二月逆流”。

江青还说:“国务院的领导经常借谈工作串连,总理在医院也很忙,并不是在养病。小平和总理、叶帅都是一起的,总理是后台。”她提议四届人大“王洪文任副委员长,排在朱德、董必武之后,宋庆龄之前。”

江青托王海容、唐闻带给毛泽东一封信,信中说:“听说主席身体

好,非常高兴。”并说:“王洪文同志带回来的桔子,味甚鲜美,使我想起一首唐诗:‘江上阴云锁梦魂,江边深夜舞刘琨。秋风万里芙蓉国,暮雨千家薜荔村。乡思不堪悲桔柚,旅游谁肯重王孙?渔人相见不相问,长笛一声归岛门。’”

对江青所讲的事情,王海容、唐闻生感到非同一般,便于翌日,10月19日,向周恩来原原本本作了汇报。周恩来告诉她们:“事情并不像江青所说的那样,而是他们4个人事先计划好要整小平。他们已搞过多次,小平同志忍了很久。”

这天,周恩来先后同华国锋、纪登奎、李先念和邓小平谈话,了解10月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情况及“风庆轮”问题。周恩来还嘱咐邓小平:“到长沙在主席面前不提此事。”

湖南的毛泽东在王洪文走后,突然提出要游泳。湖南省委的领导和刚刚从北京赶到长沙的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都不禁大吃一惊。此时他毕竟已是年过8旬的老人,不久前还休克了一次……

而且,毛泽东下榻的“九所”没有室内游泳池。省委的蓉园招待所虽有一处露天游泳池,也已年久失修。更何况眼下已是秋风萧瑟的10月下旬!

湖南省委经过慎重考虑,建议请汪东兴出面去劝说毛泽东。

其实不用别人提议,汪东兴也明了自己的职责。他寻找了一个机会,委婉地谈了大家请他不要下水游泳的建议。

谁知毛泽东一听就生气了:“你们不让我下水,我就到湘江里去游!”

最了解毛泽东脾气的汪东兴不再言语了。他又把球踢给了湖南省委书记张平化。

张平化赶紧找来湖南省体委主任张德隆:

“德隆同志,长沙,包括长沙附近,有没有室内游泳设施?”

“谁要用?”张德隆问。

“有位领导同志要来。”张平化爽快而又有分寸地回答。

“有,在省体委内。但是刚刚修好,还没有正式启用,是准备留作全国比赛时用的游泳馆……”

“那太好了!”张平化如释重负,“赶快检修试试……”

张平化刚刚亲自检查完毕新落成的游泳馆及警卫措施,毛泽东就坐车来了。

省体委院内从来没有出现过这么多警察,人们纷纷问:“是不是有哪位中央首长来了?”为了严格保密,每位知情者只能支支吾吾地予以否认。

毛泽东从游泳馆的更衣室出来,见到张平化便问:“唐慕兰同志怎么没来呢?”

张平化答说:“我没有告诉她。”

毛泽东道:“多年不见的老熟人了,你让她来嘛!”说罢,便下到水中。张平化则赶紧派车去接夫人唐慕兰。

唐慕兰乘车赶到省体委游泳馆时,看见毛泽东穿着毛巾浴衣,正坐在藤椅上休息,他已经在水里游了几个来回了。

唐慕兰赶紧走过去。毛泽东看见她,一边缓缓的伸出手来与她握手,一边一字一顿地说:“哦,久违了,慕兰同志,我似乎还是应当叫你‘花木兰’吧?”

原来,唐慕兰第一次见到毛泽东是在50年代,当时常香玉演的豫剧电影艺术片《花木兰》在全国风靡一时,加上“花木兰队”、“穆桂英小组”等词组正是新中国妇女团体最流行的名称,因而毛泽东见到她后便戏谑地一直称她为“花木兰”。

此刻,唐慕兰眼前的毛泽东已老态龙钟。唐慕兰坐到他身边的藤椅上,不禁百感交集,流下了晶莹的泪水,竟一时想不起该说些什么,只是喃喃地问“毛主席这些年身体可好?”

毛泽东不仅行动迟缓,连讲话也十分吃力。他慢慢地说:“慕兰同志,你是好人。你样子虽然有些变了,但还是花木兰吧!……”

在场的人都心里沉沉的。

10月20日下午,邓小平在长沙陪同毛泽东会见丹麦首相哈特林。谈话结束,送走外宾后,毛泽东问邓小平有什么事要说,邓小平说:“我没有什么要说的。主席有什么话没有?”

毛泽东叫邓小平坐下,说:“宪法里不要提我的名字。”

邓小平说:“人事问题北京在研究,想听听主席有什么想法。”

毛泽东说:“我不大懂北京的事,听说要开人大,我看不用那么急,

要看总理的身体情况,看准备工作情况。我不发表意见,你们去议吧。简单明了。法国派好。”

邓小平问:“把主席的话带回去?”

毛泽东点点头。

邓小平离开后,王海容、唐闻生留了下来。王海容、唐闻生向毛泽东转达了周恩来的意见,也转告了江青的话。

毛泽东听了后对她们俩人说:“江青有野心。她是想叫王洪文作委员长,她自己作党的主席。”

毛泽东要王海容、唐闻生回北京传达他的意见:“总理还是我们的总理。如果他身体可以,由他和洪文同志一齐给各方面商量,提出一个人事安排的名单。邓做第一副总理兼总长,这是叶剑英的意见,我赞成照他的意见办。战时有事,平时无事,挂个名。杨成武可以做副总长。王洪文来的时候没有这么明确,再明确一下。委员长一、二把手再考虑。总之,方针要团结,要安定。”

毛泽东让转告周恩来:

——朱德、董必武之后要安排宋庆龄;

——邓小平、张春桥、李先念为国务院副总理;

——其他人由周恩来主持安排。

他还要王海容、唐闻生转告王洪文、张春桥和姚文元,不要跟在江青后面批东西。毛泽东说:“‘风庆轮’的问题本来是一件小事,而且先念等同志已在解决,但江青还这么闹。”

在带去的江青来信上,毛泽东写了批语:“已阅。务望谨慎小心。注意团结不同意见的同志。”然后请王海容、唐闻生带回交江青。

10 月 20 日,周恩来与王洪文谈话。

邓小平回到北京以后,于 21 日上午,将他与毛泽东谈话经过致信王洪文,让他通报政治局成员。

王海容、唐闻生二人 22 日把毛泽东的指示向政治局作了传达。

10 月 22 日,周恩来见王海容、唐闻生,听取她们转告 10 月 20 日毛泽东谈话内容。

11 月 1 日,《红旗》杂志刊登“风庆”轮党支部的文章《扬眉吐气的三万二千海里》。《红旗》杂志编者按:这篇振奋革命精神的文章,很值

得一读。一九五八年,毛主席在《介绍一个合作社》一文中指出:“中国劳动人民还有过去那一副奴隶相么?没有了,他们做了主人了。”这种精神面貌在“风庆”号船员们身上又一次表现出来。“风庆”号首次远洋试航成功,是毛主席“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方针的凯歌,它长了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的志气,对于洋奴哲学、爬行主义之类的地主买办资产阶级思想,是一个有力的批判。它的意义决不限于造船业和海洋运输业。“风庆”号的革命精神,我们应当加以发扬。

11 月 1 日至 3 日,周恩来先后分三批约在京中央政治局成员叶剑英、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李先念、纪登奎、邓小平、华国锋、吴德、陈锡联、陈永贵、倪志福、吴桂贤等开会,解决“风庆轮”事件问题。

期间,还另约王海容、唐闻生谈话。

邓小平到江青处面谈,对她说:“两个钢铁公司碰到一块了,说话走火了,就算了。”

11 月 6 日,周恩来与王海容、唐闻生谈话,托她们向毛泽东汇报病情及其他问题。并致信毛泽东,汇报四届人大的准备工作进展情况。周恩来在信中说:“积极支持主席提议的小平同志为第一副总理,还兼总参谋长。”说明四届人大“代表名单、宪法草案和报告、政府工作报告,均可在 11 月搞出”;“人事名单估计 11 月下旬可搞出几个比较满意人选”。

周恩来的信中,提及了召开四届人大的具体时间。他考虑到三届人大是 1964 年底召开的,因此四届人大最好在 1974 年底召开。

关于自己的病情,周恩来称膀胱癌虽未治愈,但“我的身体情况比 7 月 17 日见主席时好多了,只是弱了些,如果 12 月能开人大,定能吃得消。即使照膀胱镜下烧不成,我还受得起再开刀,务请主席放心。我最希望主席健康日好,这一过渡时期,只有主席健在,才能领导好。”

当日,看过信的毛泽东批示:“已阅。同意”。

同一天,陪同外宾去长沙的李先念也向毛泽东报告了周恩来的这些意见。

李先念讲到“小平的问题解决了,没有问题了,一致拥护毛主席的指示”时,毛泽东说:“我拥护叶剑英同志的意见。”

李先念说:“我们坚决不动摇地执行主席要安定、团结的方针。”

“开一个会,问题就完全解决,不可能。”毛泽东不相信:“王母娘娘就不听呢!”

李先念说:“她的帽子公司多一点。”

毛泽东说:“钢铁公司厉害呢,又开帽子店。她这个人,别人心里不高兴她。”“非跟好多人闹翻不可。她是目中无人。”“此人的话不能全信。”“我三年来只同她吃过一顿饭,现在又是四年了,一顿饭都没有同她吃。总之,我在政治局交待了,政治局都知道,清楚了。叫她不要搞上海帮,她要搞。”

毛泽东听取李先念关于国民经济情况的汇报,提出:“把国民经济搞上去”。

11 月 7 日,周恩来与回到北京的李先念长谈。

这天,王海容、唐闻生来看周恩来,转达了毛泽东对江青的批评。

11 月 12 日,邓小平陪外宾飞抵长沙。同行的还是王海容、唐闻生。

毛泽东一见邓小平,就幽默地说:“你开了一个钢铁公司!”

邓小平不好意思的笑着说:“主席也知道了。我实在忍不住了!不止一次了!”

毛泽东说:“我赞成你!”

邓小平解释说:“她在政治局搞了七、八次了。”

“强加于人哪,我也是不高兴的,她们都不高兴。”毛泽东所说“她们”,指的是在座的王海容、唐闻生。

邓小平说:“我主要是感觉政治局生活不正常,最后我到她那里去了一下,钢铁公司对钢铁公司。”

毛泽东道:“这个好。”

邓小平谈及了自己:“最近关于我的工作决定,主席已经讲了,不应再提什么意见了,但是看来责任是太重了点。”

邓小平说的是毛泽东提议他担任第一副总理、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

毛泽东说:“没办法呢,只好担起来咯。”

这次,江青还托王海容、唐闻生带了一封信给毛泽东。江青在信中提出,谢静宜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迟群当教育部长,乔冠华当副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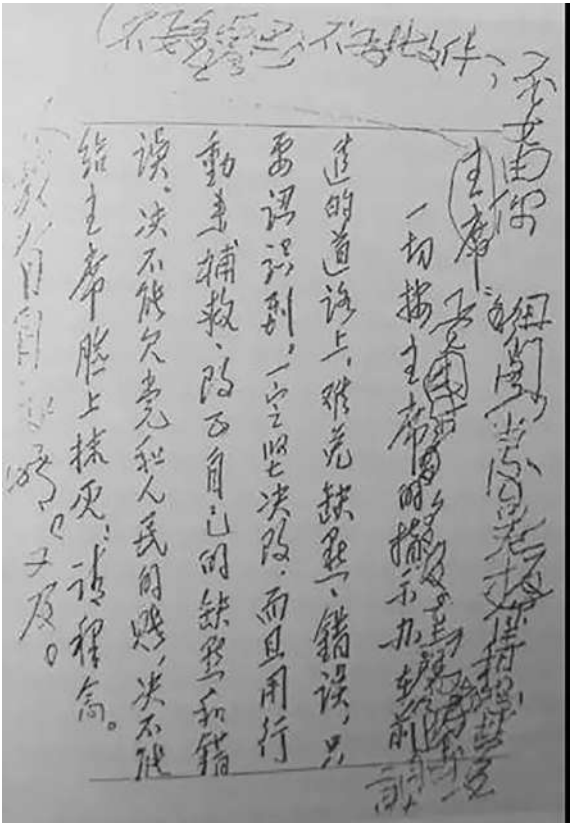
理，毛远新、迟群、谢静宜、金祖敏列席政治局，作为“接班人”来培养。毛泽东在长沙看罢江青来信，提笔在信上写到：

“不要多露面，不要批文件，不要由你组阁（当后台老板），你积怨甚多，要团结多数。至嘱。”

毛泽东写毕“至嘱”，看见站在旁边的汪东兴，搁笔问他：“对江青还有什么意见？”

汪东兴答道：“她没有自知之明。”

于是，毛泽东又提笔，加上一句：“人贵有自知之明。又及。”



毛泽东这些批语,由于眼睛看不太清,写得歪歪斜斜,有些字还重叠在一起,难以辨认,但他是十分郑重地对待的。

11月,长沙街头已凉风飕飕、树叶枯黄。毛泽东又提出要下水游泳。

有了前次的经验,省委立即在体委游泳馆内作好安排。

正巧,张平化的儿子张自全那天也在游泳馆玩,因而有幸目睹到现场的更多细节。

事隔几十年之后,张自全对那难忘的情景还记忆犹新,他回忆说:

那一天,毛泽东主席是在汪东兴同志和张耀祠同志的陪同下来到省体委游泳馆的。

我看到毛主席刚刚从更衣室出来,身体显得很虚弱。他由两名服务员扶着,脚杆似乎很细,脚面发肿,走路时仿佛因呼吸困难而总微张着嘴,喘着粗气,还时不时地咳嗽几声。他缓慢地走到游泳池边,坐在躺椅上休息,望着满池的碧波,凝视了好一会,久久没有做声……总之,毛泽东主席的身体状况,显然远不像平时报刊上宣传的那样健康。我心中不仅产生了一种莫名的凄凉之感,甚至出现这样的担心:毛主席他老人家还能不能下水游泳?

然而,几分钟后呈现的奇迹,又使我大吃一惊:毛泽东主席在工作人员搀扶下由扶梯下到游泳池内,立即就活泛起来,和在岸上判若两人!打什么比方好呢?对了,就同我们平时说的“蛟龙入海”一样!……

张自全回忆:游泳池水清澈极了,毛泽东先是仰游,四肢基本上不怎么动,双目微闭,安祥悠闲地仿佛睡着了一般,那“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的情致,无疑是一种难得的最好的休息。

张自全始终在池边跟着毛泽东走,看上去老人家就像是一叶破浪行进的小舟,很快就沿着游泳池转了一圈。

工作人员轻轻跟上来,提醒张自全:“不要打扰主席。”

正在池中遨游的毛泽东忽然一翻身,动作十分敏捷地变成了侧泳。张自全一下看呆了,感到毛泽东那神态、动作、气概,简直就和他当年在长江大河中搏风击浪、实践“万类霜天竞自由”的抱负完全一样,似乎不是满池碧波承载着毛泽东,而是毛泽东驾驭着一泓清水!

看到毛泽东在游泳池内,既不咳嗽也不气喘,面色也开始显出红润,仿佛因运动而完全焕发了青春,完全是一种“到中流击水”的生机勃勃的景象,张自全不禁感到由衷的欣慰。

工作人员走过来劝毛泽东:“主席,时间不短了,休息休息吧!”

毛泽东摇摇头,又鲤鱼翻身似地换成了仰泳。不一会,他又开始踩水,但脚却不大动,全凭水的浮力,身体就像轻盈地漂在水上一样。毛泽东在水中还令人叫绝地进行“全身活动”;时而揉揉胳膊,搓搓腿,捏捏脚……

# 第1322回：烧照片，登作品亦招阻止 叶剑英，用人想到张爱萍

11月15日，国务院、中央军委发出《关于严禁机关、团体、部队、企业、事业单位自行到农村采购农副产品的通知》：

据反映，最近不少机关、团体、部队、企业、事业单位，不顾中央三令五申，不顾国家政策法令，直接到农村社队和农村集市采购粮食、油料、肉类、食糟、水产品以及药材、皮张等农副产品。有的抬价收购；有的用化肥、煤炭、机器设备等国家统配物资换购；有的用公车代社队运输，换取农副产品；有的同投机倒把分子勾结起来，进行非法套购，甚至围攻殴打市场管理人员，扰乱市场秩序。严重的是，某些单位的领导人对这种不正之风和违法乱纪行动，不仅不去纠正，反而支持纵容。这是当前两个阶级、两条道路和两条路线在市场上的一种反映。如果任其发展下去，势必严重地冲击国家计划，破坏社会主义统一市场，使国家本来应该收购的东西收购不上来，能够供应的东西供应不足，造成人为的紧张。而且还会腐蚀我们的军队，腐蚀我们的干部队伍，影响工农联盟，助长资本主义自发倾向，为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大开方便之门。必须引起我们严重注意。

收到毛泽东11月12日的复函后，江青于11月19日给毛泽东去信：

“我愧对主席的期望，因为我缺自知之明，自我欣赏，头脑昏昏，对客观现实不能唯物的正确对等，对自己也就不能恰当的一分为二的分析。一些咄咄怪事，触目惊心，使我悚然惊悟。

今后当小心谨慎，不能为党为主席闯祸。当然，需要斗争需要牺牲时，我要有精神准备。

……

自九大以后，我基本上是闲人，没有分配我什么工作，目前更甚。在路线斗争起伏时我主动的做过一些工作。

江青 1974、11、19”

翌日,毛泽东在长沙复江青一短函:

江青:

可读李固给黄琼书。就思想文章而论,都是一篇好文章。你的职务就是研究国内外动态,这已经是大任务了。此事我对你说了多次,不要说没有工作。至嘱。

毛泽东

1974 年 11 月 20 日

李固、黄琼都是东汉人,李固曾任荆州刺史、泰山太守,黄琼则曾任尚书令、太尉、司空,李固《遗黄琼书》是中国古文名篇。“峣峣者易缺,皎皎者易污,阳春之曲,和者必寡,盛名之下,其实难副”便出于此文。黄琼曾称病不愿入朝做官,后来由于公卿推荐才前往京城。李固素来敬慕黄琼,写了与黄琼书。信中既批评了名士的孤傲,也指出名士往往“盛名之下,其实难副”。

9 月底,江青派她的秘书给杜修贤送来几百张她的摄影作品,要放大 38 英寸的。杜修贤从中选出了 78 张照片,分别放大 38 英寸、20 英寸和 6 英寸。

放大 78 张照片共用掉 1205 元材料费,杜修贤将照片和收费通知单一并交给了江青的秘书。因为毛泽东有规定,江青照相的费用都要由自己掏腰包。

钱一分不少,杜修贤如数收到了。可是这 78 张照片江青要做什么用呢?

原来,江青是将 18 号楼的国画全卸了下来,换上自己的摄影照片。她把工作人员和宾馆负责人叫去说:“外面的画都受了批判,我们国家级的宾馆里还能挂这些资产阶级情调的画吗?这次要拿掉。”

大家问:“取下了国画,墙上空着怎么办?”

“没有装饰也不行,我照了一些花卉照片,有牡丹、月季、海棠……各放一张,换上去。老一套也不行。照片我叫老杜放大,赶在外宾来之前挂上去。”

江青从杜修贤放大的照片中选了 13 张 20 英寸的照片,叫工人连夜加框,挂到原来国画的位置上。

照片只挂了3天,突然又莫名其妙地不见了。等警卫局保卫人员惊惶失措去看时,13幅国画重新又原封不动挂在老地方。

他们赶到江青10号楼想问问是怎么回事。一进楼,几个人呆若木鸡,江青几十张大照片就摊在楼厅的长桌上,任人随便索取。

“我这些照片就是为政治局委员准备的,他们喜欢我拍的花卉,我叫他们自己选。”江青对警卫局的来人说。

江青不是一个能够容忍反对她的人,这次怎么变了?大家议论纷纷,这事情变化得太蹊跷,除非毛主席才能制止江青。果然,这个反对她的人不是别人,就是毛泽东!

毛泽东虽然远在千里之外,可是江青在北京的一举一动都瞒不过他,当他知道江青又在钓鱼台挂她自己的摄影作品,气得批评她有什么权利可以随便换下国宾馆的画,挂上自己的作品?说她这是夜郎自大,这样要不得!让她统统取下来!

没过几天,人们又见江青从楼里抱出许多照片奔到院子里,将它们全都化为熊熊烈火。等警卫人员发现,冲过去抢那些照片时,已经晚矣,只剩灰烬了。

第二天,杜修贤到钓鱼台找姚文元送审照片,被江青叫去,让他看看她最近拍照的作品。

“老杜,你看这张牡丹,茎脉细部拍得多清晰,瞧,小水珠像一颗颗透明的珍珠,连上面闪的光都照出来了。你们不知道,拍这些镜头,要用耐心等啊。老杜,你看这张用的什么光?”

“是不是用的逆光?”杜修贤说。

“对啦,逆光。”江青兴致顿时高涨,“你再看这张,照活了。为了这张的构图我好几夜没有睡着,才照出这个效果。”

那是张北海的风景照片,画面没有什么特别,只是青天与白塔色泽搭配得十分协调,给人一种清爽明快的感觉。

江青又拿起一张照片对杜修贤说:“这张是在庐山拍的,云雾缠绕,有一种朦胧的美。老杜,你看这些能发表吗?可惜是黑白的。”

“这些照片都不错,如果想发叫秘书打个电话给《中国摄影》……”杜修贤说。

“嗯?你是负责《中国摄影》的,找你不行吗?”江青打断了杜修贤

的话。

“行啊,我带回去。”杜修贤答道。

“这张庐山汉阳峰的照片你拿去发表,我还配了一首诗。”说着,江青从沙发里站了起来,双手反背,头微微地扬起,朗朗地念道:“江上有奇峰,锁在云雾中。寻常看不见,偶尔露峥嵘。”

江青见杜修贤懵懂样子,就叫秘书记了下来,交给杜修贤。并对他说:“你不要告诉别人……是我写的。要保密,记住!”

杜修贤走出门外才想起,这首诗还没有署名。又进去问江青署什么名?显然江青也忘了署名的事,她想了一会儿,走到一张大地图前,用铅笔在上面寻找地方,“就用琅琊台吧,那是我山东的老家。”

这首诗拿回《中国摄影》杂志社,像一石激浪,轩然大波,谁都要惊诧一番,咀嚼一番。记者的本性就是不甘寂寞,又悄悄地干起“密探”的行当,四下打听,谁叫“琅琊台”?

杜修贤又气又急,把桌子一拍。“查什么!叫你们不要查谁写的诗。你们不怕我怕!你们想不想《中国摄影》平安无事?”

大家不理解杜修贤为什么发火,有意见,就说:“我们查一下作者很正常嘛,我们想知道是不是主席写的。”

“不是主席写的。我警告你们,不许再查!”

杜修贤严令禁止,但为时已晚。江青在钓鱼台已经知道《中国摄影》的记者私下在打听诗的作者。当杜修贤将照片和诗的清样送到钓鱼台江青那里时,江青只讲一句话:“先放在这里,以后我会找你的。”

随后就是一个摆手让杜修贤走了。

过了两天,杜修贤在人民大会堂遇见江青,问起她“琅琊台”照片的事,说刊物等着发稿。江青盯着杜修贤看了几秒钟,然后说:“诗和照片都不发了。”

“为什么?”杜修贤不解的问。

江青斜了他一眼,一声不吭,转身进了江苏厅。

原来,这件事又传到了远在南方的毛泽东耳朵里,江青立即收回了照片和诗。

1974 年 11 月 5 日,中国首次发射返回式遥感卫星,发射失利。

1970 年中国的“东方红一号”人造卫星升空后,即开始了返回式

遥感卫星的试验准备。1973 年夏天,上海航天部门研制的运载火箭和第一颗“长空一号”卫星运抵东风基地,这枚火箭被命名为“风暴一号”。1973 年 8 月 14 日,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主持中央专门委员会会议,听取上海试验队和基地关于卫星发射准备情况的汇报。当年 9 月 18 日,运载火箭点火升空后,因二级发动机发生故障,没有启动,致使运载火箭在飞行中失控自毁,连同卫星残骸坠落于甘肃省临洮县境内。

1974 年 7 月 12 日,第二颗“长空一号”卫星和“风暴一号”运载火箭再次进行发射试验。火箭点火起飞后,一级飞行段工作正常,但第二级火箭飞行到将近 200 秒时,主发动机突然发生故障,致使卫星未能入轨,残骸散落于广西横县、博白一带。事后,基地派出搜索人员,发动当地 20 多万群众漫山遍野地进行查找和搜索,收集到火箭、卫星残骸共 125 件。

这时,主持军委工作的叶剑英想到了文革前一直负责国防科技工作的原总参副总参谋长张爱萍。这是一位颇具传奇色彩的儒将,也是中国国防尖端科技事业的创始人之一。从 1956 年着手制定 12 年国防科技发展规划开始,到 1966 年文化大革命爆发,20 年间,张爱萍一直是中国国防科技事业的重要的领导者和组织实施者。

文革开始后的 1966 年 8 月 17 日深夜 23 时,张爱萍接到通知,让他第二天上天安门参加“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群众大会”,毛泽东将登上天安门,检阅红卫兵,这可是当时许多人求之不得的好事。然而,张爱萍早已经安排了与工程兵、铁道兵的两位副司令一起于 8 月 18 日一早飞济南,组织这两个兵种在那里实施抢搭黄河浮桥的演习。

毫无疑问,上天安门是一种政治亮相,是政治态度;去济南,是军事演习,是业务任务。张爱萍不去济南上天安门在当时绝对是无可非议的。但是张爱萍却简单的认为,第二天上天安门和过去的五一、十一没什么两样,自己又不是什么领导人,多一个少一个没有什么关系。而济南那边,部队都在黄河边等着,而且周恩来总理曾亲自向他交代过:在黄河上架设浮桥,不完全是军事上的需要,也关系到国计民生,每年黄河泛滥,解决好这个问题,将会减少国家和人民的损失。现在,参加演习的部队已经到位,一切工作准备就绪,自己怎么能不去呢?

他第二天没有上天安门,去了黄河边。

军队领导机关的“四大”开始后,一夜之间,大字报铺天盖地贴满了国防部大院,从总参到科委,从一楼到六楼,其中批判张爱萍的大字报就有5万多张。这样大的势头,在三总部是空前的。

张爱萍不上天安门而去黄河边……这无疑让许多人产生了想法,于是乎,“三反分子”、“疯狂反对毛主席、林副主席”、“恶毒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张爱萍”的大名,被用红笔打上大叉。“炮轰张爱萍!”“火烧张爱萍!”“把张爱萍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张爱萍不投降,就叫他灭亡!”到处可见。

而此时的张爱萍呢?有一张大字报写得更活灵活现:“张爱萍来看大字报,一副不屑一顾的样子,革命群众质问他,他用鼻子说:‘哼!’”

群众发动起来力量是巨大的,找你点问题并非什么难事。罪行分现实的、历史的、工作中的、平时生活的:

军委办公厅揭发:

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会议文件的附件“《人民日报》6月2日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上,在该文引用毛泽东的话:“危害革命的错误领导,不应当无条件接受,而应当坚决抵制”的空白处,张爱萍写道:“不要把反对自己意见的人,都看成是反自己,反党的。”

在彭罗陆杨罪行材料上批:“从材料上看,问题并不是那么严重。”

“在中央文革小组第61期简报上,张爱萍批写赞扬王光美在清华大学下食堂。”

再就是周围同事们的揭发了。

总政一位副主任揭发:“张说彭罗的材料就那么多,错误不那么严重。”

科委一位副政委揭发:“张住院时说,文化大革命是一场争权夺利的斗争。”

身边工作人员揭发:“张给邓小平写信说,有的地方饿死了人……”

而军务部揭发的最有意思。这是关于军马退役处理工作总结报告,有一句:“老实马使役时间太多,调皮马不用。”张爱萍在这句话下

画了两条粗杠,写道:“我军对人也是如此!!”

其中有一封检举信的故事很有意思:

《五一六通知》下发后,军委召开会议传达了《五一六通知》。一天,陈毅通知张爱萍到中南海周恩来那里去一下,说是有事要谈谈。张爱萍到了后,陈毅已在那里,他对张爱萍说:“总理一会儿就到。”两人就闲聊起来。

陈毅问张爱萍:“彭罗陆杨的事知道了吧,有些什么看法啊?”

张爱萍简单介绍了一下军委开会的情况,然后说:“对中央的决定我没有异议,但我就是看不惯有那么一批投机分子,人家在台上的时候拼命巴结,出了问题就落井下石,从什么时候起,我们共产党内搞成了这种风气。”

陈毅听了哈哈大笑起来,说:“知道叫你来干什么吗?”

张爱萍莫名奇妙的看着陈老总。

陈毅说:“说大也不大,说小也不小,你张爱萍身上无小事。你自己看看吧。”说着拿出一封信,“有人把你告了!”

张爱萍一看,是揭发他在会上说的几句牢骚话。就是坐在他旁边的两个人写的。后排的一个人做的证。

这时,周恩来进来了。陈毅说:“他已经不打自招了,看来他是搞阳谋的,不是搞阴谋的。”

周恩来听完事情的经过说:“弄清楚就行了。”

他有事要走,临出门时又转回来,再次叮嘱了张爱萍一遍,并指着陈毅说:“还有你!你们两个都要管住自己的那张嘴!现在是什么时候啊,可不要乱讲话哟!切记!切记!”

周恩来走后,陈毅又把张爱萍留下,两个人做了长时间的谈话,谈了对党内、军内许多不正常现象的看法,联系到历史,很中肯,推心置腹。

这封检举信,在军队领导机关的“四大”开始后,以大字报的形式公布出来。原信写于1966年5月23日,由总后、科委、总参作战部三位领导署名。信中说:“在向高级干部传达彭罗陆杨的会上。张爱萍在下面散布说,‘说好就好得很,说坏就坏得很,现在说坏,就那么坏?他(彭真)又不管军队工作,为什么军队的事情老向他汇报?还不是看

见人家势力大了,自己去挤!去靠!去年国庆节还请人家吃狗肉呢,现在讲起来倒这样轻松。我看,党内投机分子就是多,各种各样的投机分子!'张爱萍第一句和最后一句为最恶毒,要害指向毛主席、林副主席和坚持正确路线的同志。"

由此信引申:张爱萍之所以攻击林副主席信任的人,就是攻击在林副主席和他直接领导下的军队无产阶级司令部;因此,这就是站在了资产阶级司令部一边,反对"文化大革命",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由此导出,张爱萍,你就是资产阶级司令部的人,就是刘、邓的人,就是和彭罗陆杨一样的反党分子。

# 第1323回：列十条，罪名多停职反省 《绝命书》，审查中痛苦难捱

张爱萍因一江山的胜利、原子弹的成功、方巷社教的轰动效应，渐渐地把他推向事业的巅峰。而当一个人处在自我感觉良好的状态下时，噩梦就离他不远了。

其实，总参早在1966年9月就暗中布置收集张爱萍的所谓反党言行了，并打印了“关于张爱萍问题”的报告初稿，在后来罗织的主要罪名有：包庇罗瑞卿；同情刘少奇、邓小平；为彭罗陆杨鸣冤叫屈；诬蔑文化大革命；反对毛主席；反对林副主席；反对杨代总长……共18项。

1967年1月，总参测绘学院的群众组织抄了张爱萍的家，并将其扣押。周恩来知道后，要求马上放人。

1月25日，总参“文革”办公室传达上面精神的电话记录稿有这样的记载：“把张爱萍问题写个报告，把他的错误讲一讲，他属于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错误。我们本来要搞他，因为王（尚荣）雷（英夫）问题就搁下了。请你们好好研究一下，可叫校、院去搞，先把他放回来。”

1967年2月15日，总参《关于批判张爱萍的请求》报告写到：“张爱萍反对文化大革命，反对毛主席，反对林副主席，问题性质十分严重，要求召开党委扩大会议，对他进行追斗和揭发批判。”

林彪圈阅。

1967年3月8日，批揭反党分子张爱萍的大会开始。这个会一直延续到28日。

会上，张爱萍首先表态说：“我拥护总参党委把我作为批判对象的决定。同志们给我写了许多大字报，促使我重新认识自己，在文化大革命中彻底改造世界观，保持革命晚节。”然后是对彭罗陆杨问题表态。最后是对总参的领导表态。

3月8日这天，叶群收到杨成武的一封信：

叶群同志请转林副主席：

现将张爱萍的反党言行、信件、在文件上的批语等反党材料选印了若干份呈上，请阅示。现送上两份，请林副主席批呈主席一份。

此致

敬礼！

杨成武

1967、3、8

材料列举的罪状共10条：

一、反毛主席。《红旗飘飘》丛书上发表过张爱萍写的《少奇同志在淮北敌后》的回忆文章。

二、是彭黄反党集团的漏网分子，彭德怀的黑干将。

三、反林副主席。不同意在核试验基地修林副主席纪念亭。

四、对批判彭罗陆杨不积极，在京西宾馆讲恶毒攻击的话。

五、主张部院合并。

六、主张撤销防空军和公安军。

七、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每月给地主分子父亲寄钱；

八、同杨尚昆关系密切；

九、对批判罗瑞卿不满；

十、为驻地工作人员开办食堂，笼络人心，等等。

第二天，林办又接到杨成武的电话，一是问对送上的信有什么精神？再是请转告叶群同志，要求尽快解除张爱萍的职务，停职反省。

当天，叶群的批示就传回来了。总参3月9日电话记录：

传达首长指示，以党委名义写一个报告。根据张爱萍错误严重程度和态度恶劣的情况，会议一致要求，建议将张爱萍停职反省。这事，首长同叶群同志讲过。叶群同志说，很快写个报告，报林副主席批一下，再送主席批。

3月10日，总参给林彪，并报毛泽东、中央军委《关于张爱萍停职反省的请示》的报告送至叶群处。其中写到："张爱萍明目张胆地把攻击的矛头直接指向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公开的为刘、邓和彭罗陆杨鸣冤叫屈。""问题是十分严重的，是一系列的。""至今还对党采取对抗态度。"

林彪3月16日批示:“呈主席阅。十六(日)”

毛泽东在两个半月后批示:“此件压了很久,今天才看了一遍,现退还。5月30日”

周恩来批示:“周恩来已阅。”

军委办公厅向全军发过的一个通知,要求各单位送交揭发批判张爱萍反党言行的材料。

广州军区司令员黄永胜特地写来揭发信:“张爱萍和彭德怀关系很深。林副主席指示,军队中特别是高级干部中,不能埋下颠覆的种子。最近又说,兵坏坏一个,将坏坏一窝。我建议总参党委对张彻底审查。此信如你认为有必要,请转呈林副主席一阅。”

3月29日,《建议成立张爱萍问题专案组》的报告上送。

林彪批:“呈主席批示。”

毛泽东批:“照办。”

1967年12月1日,总参上报《建议将张爱萍隔离审查的报告》。林彪、毛泽东圈阅。

张爱萍问题专案组首先审查张爱萍的假党员问题。张爱萍是在家乡重庆达县参加的革命,入党介绍人达县地下党领导人张鲤庭和戴治安,他们相继在革命战争中牺牲了。当时达县地下党有3位领导人:张鲤庭、戴治安和牟仲宇。而尚存的牟仲宇曾于1933年2月被捕后脱党。在专案组两次找牟仲宇调查张爱萍入党问题时,牟仲宇都向专案组证实:张爱萍1928年已是党员。

1967年12月27日,牟仲宇再次被传唤。在此前,专案组在达县到处张贴打倒张爱萍的标语,并把批斗的照片和有毛泽东、林彪圈阅的隔离反省的批件给牟仲宇和他的家人看。这时的牟仲宇已被收监。于是,他写下了《更正过去证言的证明》:“自己过去把党团混淆了,1928年,达县只有团组织,没有党组织,张爱萍不可能在那时入党。”

12月26日,张爱萍被正式逮捕,关在一个不知何地的潮湿小黑屋中,收去裤腰带,走路要提着裤子,大小便要报告获得允许,憋不住时就解在裤子里。

接着,就是对张爱萍的轮番审讯。专案办副主任亲自审讯,他问:“如果有人证明,介绍你入党的人不是党员,怎么办?”

张爱萍只好说："如果介绍我入党的张鲤庭和戴治安都不是党员，那我当然也不算是党员了。"

专案组据此，于1968年1月6日，正式上报了《关于张爱萍假党员问题的定案报告》："张爱萍从来没有参加过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混入党内的假党员。"

次日，杨成武会同吴法宪把这份报告批呈上送：

林副主席，并中央：

在铁的事实面前，张爱萍自己供认他1926年入团和1928年入党是编造的。他不是团员，也不是党员，是在1930年来到闽西时混入党内的。即呈主席、总理、伯达、康生、江青、富治、叶群、东兴同志阅示。

接着，又审查张爱萍的特务问题。张爱萍在红14军时，曾在一次战斗中被打断了左臂，被秘密送往上海福民医院治疗枪伤，得到同乡彭丰根大夫的帮助，安排他们住进了福民医院。福民医院的院长顿宫宽是彭丰根日本留学时的同窗好友。

为调查张爱萍的这段历史，专案组来到上海，在上海市公安局得到这样一个消息，说1933年，彭丰根曾与另外两个中国人一起向驻南京日本武官佐藤幸造出卖过情报。再就是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本海军情报部曾设在福民医院内，并在医院设有无线电台。

专案组据此推定，彭丰根和顿宫宽是日本特务，福民医院是日本特务机关。而张爱萍能够在福民医院治伤，必是加入了日本特务组织。和前面的假党员联系，于是认定："张在大革命失败后，在四川混入党内，然后假借党组织的名义，蒙蔽了上海地下党，打入了红14军，完成破坏活动后，拿枪自残，打断左臂，借此潜回上海，在日本人的医院养好伤后，又被派往中央苏区……其反革命的勾当，一直延续至今。"

证据呢？那当然是彭丰根。在一个月的时间里，先后对彭丰根进行了20次审讯，逼迫彭丰根供认张爱萍加入了日本特务组织，但彭丰根始终否认，而且申明自己"掩护了张爱萍，是为共产党做了一件好事"。

最后，在专案组的反复威逼下，1968年2月，彭丰根不得不在以下供词上按下了手印："把张爱萍介绍到了日本特务机关——福民医院，

见了特务头子顿宫宽。顿宫宽亲自给张爱萍做了手术。在住院期间，顿宫宽又布置了日本警察、便衣搜查、逮捕，对张爱萍进行口供、签名，警察又找我询问张爱萍等威胁利诱的手段，把张爱萍圈入了特务机关。（手印）”

3月5日，专案组向总参党委和中央专案第二办公室写出报告：“张爱萍的日本特务分子问题基本可以定案。”

1968年4月张爱萍写下《绝命书》：

受凌辱，身名戕。落此下场心中寒，冤情辨明待何年?!

我现在被关在我也说不清是什么地方的一间黑屋子里。看管得很严。现在是冒着危险给你们写信，还不知能不能送到你们手中。不管能不能我都要写。

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入党问题和特务问题。他们说达县党是1930年建立的。我的入党介绍人张、戴也是1930年入党的。因此，我1928年由张、戴介绍入党是假的。他们说，调查我提供的证人有几个不是党员（这就怪了！不知他们什么时候退党的），他们都不承认与我发生过党的关系，也没有介绍我参加红14军和到中央苏区去。其他的证人找不到。究竟怎么回事，我也弄不清楚——他们怀疑我是国民党或特务组织设法让我混入党内、军内的。

我从未梦到我的历史上还会有这样蹊跷离奇的情节。真叫人哭笑不得。

我甘愿承受没有正式入党而冒充党员混入党内的罪过，愿接受任何处分。但我无法承认参加了特务或其他反革命组织。也不是怀有破坏党和革命的反革命目的而冒充党员混入党内的。

他们说，我受伤住进上海医院后，院长（日本特务）把我拉入了特务组织，或者让我承担了特务交给的任务，然后才送我到中央苏区的。

我反复回忆，在医院及以后，从未同日本人交谈过，更未参加什么组织接受什么任务。我无法承认。我说他们的说法是推论，没有事实，没有证据。他们说我不老实，不坦白交待，抗拒到底。

20天爬在床上写了25000多字的申诉（交代）。错的承认，罪责承担，不对的正面说清情况及道理。不知能不能起到点作用？也许还要拉出去斗争，还不知是怎样个结局?!

要实事求是,我是不应该被监禁的。我不是特务,没有反党、反革命的思想言论和行动,不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当然,工作中的错误是有的,并且有的很严重。但总不应该关起来吧。我几次要求上级来人给我谈话,就是没有人来。只是专案组的以群众名义来审、来定,态度粗暴、蛮横。

如不承认(我又无法承认)是混入党内的叛徒、特务、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就是抗拒到底死不悔改。很可能要判无期徒刑或死刑。

如能经陈总转告总理,在做决定之前,中央派人来听我的申诉,或许还有效,或许还有救。我知道这很难,也不知道陈总、总理现在怎么样了!

冤情难诉,证人不予证明,无可奈何,只好听天由命了!看来问题得不到解决了。悲惨的命运,只好背到无期徒刑或死刑去了。我也不怨。只是女儿的那句话"爸爸,我们还有出头的日子吗?"常在耳边回响。泪水不禁滚滚而出。苦了、累了你们一生!

你们应该在忠于毛主席、毛泽东思想、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基础上,奋发向上,挣个出头的日子。不要管我的死活。孩子们要把妈妈照顾好。我对她愧痛最深!你们大的要关心小的,帮助小的成长。我未能把你们培育成人,反辱你们终生,愧痛万分,死不瞑目。要把身体搞好,经受磨炼。

狱夜沉沉何时旦,心烦意乱不能眠,一家六口难团圆。

四十二年从党命,落此下场心中寒,冤情辨明待何年?!

泣泪于狱中

还有一些零星的纸条,上面写着:

"日夜唯一痛苦的是累了你们,日夜怀念你们的下落和健康。要是有法知道你们真是都很安健,可减轻我的一些痛苦。"

"衔冤情,无处张。受凌辱,身名戕。殃及妻儿女,愧痛难当!"

1968 年 5 月 8 日,张爱萍给中央写信:

"毛主席、林副主席、周总理并党中央,恳求在我的问题做最后决定前,能另派一人(一般工作人员也可)听我陈述一次(几个小时):我对我的许多问题,在当时的全面实际情况。一年多来,我一直还未得到充分陈述的机会。"

“在软禁我将近一年后,又将我监禁起来快8个月了!革命40多年,竟背个反革命罪名下场!精神上真是痛苦极了!在监禁中,受尽了折磨(时时辱骂,有时还要挨打,更甚的是常常不让大小便,逼得屎尿淌在裤子里)!恐怕许多沾满人民鲜血的战犯,也没有遭到这样虐待过!”

他又写下了长达2万多字的申述,从入党、在上海治伤,一直写到“文化大革命”。

7月,他又写道:

伟大领袖毛主席啊!林副主席啊!周总理啊!党中央啊!

我向您们保证:我的确不是特务反革命分子!我既未参加过任何反革命特务活动,也从未接受过任何特务的授意和参加任何特务组织。我跟随党和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几十年的实际斗争中,我未做过一件破坏党,破坏革命的反革命勾当。如果查出我是特务或做过任何反革命勾当,我甘愿接受任何严厉的制裁!

可是,总参已把我监禁7个月了!真是苦恼极了!我请求释放出狱,到任何艰苦危险的实际中去长期考察和改造,以期赎我所犯的罪过。

敬祝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

伟大领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永远健康!永远健康!永远健康!

待罪人张爱萍

1968年7月13日狱中

林彪倒台后,王震帮助张爱萍的家人,将申诉信交给了周恩来。

1972年3月31日,周恩来在申述信上批示:“同意李又兰见面。如需治疗可送阜外医院。周恩来于3月31日。”

1972年4月7日,卫戍区北新桥小院,张爱萍全家人一大早就等在这里。

上午,一个老人出现了。他满头稀疏的白发,面部浮肿得连眼睛也睁不太开了,两只手臂夹在腰上,慢慢地挪着步子,因为没有裤带,也没有鞋带。他差不多连路都不会走了!

这就是他们的亲人,新中国海军的创始人,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试验总指挥,中国人民解放军首次陆海空军联合作战的前线司令员,开

国上将张爱萍!

5 年了,他们积攒了多少话要说,可现在,这一切都化作了泪水。一家人相偎在一起,只是流泪和抽泣。本来规定是监视会面的,但现场卫戍区的人纷纷离开座位,这样悲恸的场面,没有人看得下去。

张爱萍反应非常迟钝,他说:“好多话想说,但不知怎么说。”5 年的单独监禁,没有人可以说话,好多词汇都忘记了。

否极泰来,本应该是欢笑。他说:“笑起来,脸上都觉得发硬发僵。5 年了,没有笑过。”

在关押期间,张爱萍折断了左腿,是股骨胫粉碎性骨折。张爱萍的妻子李又兰给周恩来写信,说即使从最起码的人道主义考虑,也应该给予治疗。

周恩来批准入院治疗,因未解除监禁,化名“张绪”。

1972 年 11 月上旬,在人民大会堂一个会议的间隙,周恩来问总参两位领导人:“这么多年了,还没有把张爱萍的问题搞清楚吗? 中国共产党内有那么多叛徒特务,今天我们还能坐在这里开会吗?”

中央专案组二办写了关于张爱萍问题审查报告,认为张爱萍犯有美化刘少奇、彭德怀的错误。

1972 年 11 月 22 日,周恩来批准解除监护。

当宣读了张爱萍被解除监护的通知后,有人提醒他是否应该对中央的决定表示个态度。张爱萍说:“强盗把你抓进去再放出来,你还去感谢强盗吗?”

# 第1324回：叶剑英，三请张爱萍出山 邓小平，基辛格四次会谈

1974年国庆节，张爱萍应召从正在治病的福州到北京出席国庆招待会。召他来北京的电话是副总参谋长胡炜从北京打来的："爱萍同志吗？"胡炜在电话里喊他："军委领导请你立即返回北京，……"

"干什么？"如梦方醒的张爱萍生硬地问。

"参加国庆招待会。"

参加"招待会"？这真是莫名其妙！张爱萍对此似乎无动于衷。他郑重地说：

"请你向中央军委转达我个人的意见：我的腿还需要继续治疗。招待会我就不参加了。"

然而，对方第二次来电话时口气更硬了："这是军委的命令。请你赶快回来吧！"

军令如山倒。这对一个老军人来说更是无可置疑的。更何况，来接张爱萍的专机，已经降落在福州军用机场了。

国庆节后，10月2日，叶剑英亲自到张爱萍下榻的京西宾馆看望，张爱萍不胜感动。

叶剑英询问了张爱萍治腿的情况后说："暂时不要去福建了，宋时轮想要你到军科去，我们想让你回国防科委。你愿意到哪里去？"

张爱萍说："我的腿还在治疗中，身体状况也不太好。我暂时还是不工作为好。"

叶剑英说："不单是因为腿的缘故吧？我知道这几年你受了不少委屈，但又有什么法子呢？贺老总不是被他们整死了吗？林秃子要不是自我暴露，他造成的灾难还要大。你看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军队，现在成什么样子了？"

这一下唤起了张爱萍潜藏心底的愤慨："毛主席怎么了？文化大

革命到底革了谁的命?”

叶剑英说:“这也许不是毛主席的本意。以后别这么说。”稍停片刻又说,“还是出来工作吧。我们考虑,国防科委更需要你。现在那里很乱,你们原来制订的计划基本上都没实现。国防科委管两摊儿,地方这摊儿,七机部和二机部,他们管不了,乱得很。”

张爱萍说:“我去了也干不好,过去是兼管,那里确实太复杂了。派性闹得厉害,光院部合并问题,就翻来覆去地整我。”

叶剑英说:“院部合并是正确的嘛。你再考虑考虑吧。如果腿还没完全好,上半天班也行,或者一天待上两个小时也行嘛!”

送走叶剑英后,张爱萍心里久久没有平静,但还是决定退避三舍,隐居南山。

就在上海第二颗“长空一号”卫星和“风暴一号”运载火箭实验期间,返回式遥感卫星第一颗发射星也于1974年6月完成了总装、测试,并于9月8日运往酒泉发射场。

1974年11月5日12时50分,发射第一颗返回式遥感卫星的运载火箭矗立在发射台上即将发射,调度指挥的扬声器里传出洪亮的口令:“一分钟准备!”宽敞的指挥控制室内,此时气氛异常紧张,人们屏住呼吸,等待那最后的时刻。

时间只剩下最后的几十秒钟,突然,听到卫星控制台操作员然失声报告:“发现故障! 星上大部分仪器断电!”

在这千钧一发时刻,只听到总设计师孙家栋的一声大喊:“停止发射!”

发布“停止发射程序”的命令是需要一级一级申报批准,按正常情况绝不该由孙家栋发布。但是如果按照正常程序逐级上报,等待指挥员发布“停止发射程序”的命令肯定是来不及了。

如果孙家栋没有很高的威望,指挥员也不会执行他的命令。基地指挥员杨桓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果断命令道:“停止发射!”此时,离点火仅剩13秒了。而孙家栋,也由于高度紧张而昏厥了过去。

四个多小时后,当日17时40分,处理完故障后的卫星和火箭又重新进入发射程序,“各系统转内电”的口令再次发出,随着“点火”口

令的下达,火箭在震耳欲聋的呼啸声中离开了发射台。但起飞仅6秒钟,即出现了越来越大的俯仰摆动,犹如醉汉般失去了平衡。飞行到20秒时,由于火箭姿态失稳,安全自毁系统启动,轰隆一声,运载火箭连同卫星凌空爆炸,一团巨大的黑红色的烟火在蓝天丽日下显得异常壮烈,爆炸残骸纷纷扬扬,散落在发射台东南方向大约500米左右的范围内,一间平房被一块火箭碎片砸透了顶,发射阵地周围的烟火燃烧了好半天才被消防人员扑灭。

半个月前,基地搜索人员曾在天仓北山以南10公里处发现一具美国制造的大型塑料气球。因此,一开始曾怀疑这次失利是否人为破坏所致。有关技术人员连夜对测量结果进行判读、分析,根据13台光学电影经纬仪记录胶片判明,火箭起飞正常,飞离发射台后仅6秒,运载火箭便出现明显摇晃,最后在飞行到20多秒时失稳爆炸自毁。而地面安全指挥员按照要求所发出的安全爆炸指令,比运载火箭自身作出的炸毁指令晚了0.4秒。

0.4秒,证明了火箭爆炸的原因不是人为的,基地上上下下松了一大口气。

为了进一步弄清爆炸原因,技术人员根据测量结果和对火箭残骸所作的解剖分析,最后发现,是运载火箭控制系统俯仰速率陀螺通道的一根导线有暗伤,因为点火起飞后受到振动而造成短路,运载火箭稳定系统未接到该通道的输出信号,导致火箭失稳自爆。

这时已经是凌晨5点多了。

爆炸事故分析结果报到北京后,主持中央军委工作的叶剑英向毛泽东报告了发射失败的经过。在汇报时,秘书人员看到,当毛泽东听了这一消息后,神色凝重,一句话也没说。

叶剑英打电话给发射中心的全体参试人员,勉励大家:“失败是成功之母,不要颓丧,要再接再厉、继续奋斗,一定要达到目的。”

第二天,11月6日,叶剑英在西山召见张爱萍,一见面就语气沉重地告诉他:“昨天发射的返回式卫星又没成功,起飞20秒后就掉下来了。”

张爱萍问:“什么原因呢?”

“说是一根导线没接好。”

“胡闹,真是胡闹!”

叶剑英说:“还是你来抓科委的工作吧。小平也认为你最合适,尽快把这一摊儿抓起来。形势严峻,我们不能再耽误时间了……”

没过多久,叶剑英又一次在位于后海的住处召见张爱萍,一见面就开门见山地问:

“爱萍同志,你考虑得怎么样?”

张爱萍的回答还像前两次那样,“我没有什么好考虑的。我的心脏不好,腿也有毛病。我没有办法再出来工作了。我要求休息。”

但是这一回,叶剑英没有像前两次那样把他放过。

“爱萍同志,你听我说。”叶帅耐心地开导着:”现在的情况你不会不知道吧? 七机部差不多处于瘫痪状态。这两年,几次导弹试验,没有一次成功! 现在不能再等了。毛主席最近有指示,要求把洲际导弹尽快抓出来。小平同志也点你的将。我们都信任你。你不要再迟疑了,赶快把这副担子挑起来吧!”

张爱萍静静地坐着。他既没有表示同意,也没有表示不同意。

叶剑英继续道:“有些情况你可能还不太了解。局面正在向好的方向转化。我们应紧紧抓住这个有利时机,促使局势的全面好转。……”

“好吧,我考虑考虑。”张爱萍最后平静地回答。

11 月 25 日,基辛格在海参崴美苏最高级会谈结束后乘专机来到北京。这次,他全家都来了,包括夫人南希以及儿子和女儿。基辛格在首都机场下飞机后,前来迎接的乔冠华在与他握手拥抱时说:

“博士,你过去来北京,都是从南面或者是从东面来的,你这次是从北边来的。”

这是弦外之音。基辛格很敏锐地回答说:“我从西、南、东三个方向都来过中国,所以这次就试着从北边来。”

乔冠华说:“不知道博士是否知晓,影响中国天气的西伯利亚寒流都是从北边来的。”

基辛格抵达的当天晚上,就携带全家在邓小平的陪同下去医院看

望住院治疗的周恩来。周恩来请基辛格给患病的尼克松捎去问候,但没有说给新接任总统的福特捎去问候。

接着,在11月26日、27日、28日,邓小平与基辛格连续进行了四轮会谈。中方在场的有外长乔冠华,美方有新任驻华联络处主任乔治·布什。

第一轮会谈开始时,基辛格为了缓和谈判气氛,指着摆在面前厚厚的三大本提要手册,说:“我将开始把这几本手册,从头到尾给你念一遍。”

邓小平幽默地说:“博士,你这几本手册有几吨重?”

基辛格故弄玄虚:“有好几吨重。还准备了不少,这仅仅是开场白。”

邓小平机敏而坚定:“我们方面没有任何手册,我们只有小米加步枪。”

在谈到中美关系正常化问题时,邓小平严肃地说:“我必须先放一炮。”

基辛格问:“对我?”

邓小平说:“是空炮还是真炮,看你喜欢哪一种。那就是,在这个问题上,如你们所说,你们欠了我们的。”

在这样的情况下,基辛格还是亮出了美方的观点。基辛格说:“在美中关系正常化的问题上,问题是我们怎样完成这一过程。我想将我们遇到的问题分成几部分:这就是台湾外交地位问题、与我们的外交关系问题以及我们在台湾的军事力量问题和我们承担台湾的防务问题。我们的问题与日本不同,或者说,在这个问题上不同于与你们已经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任何国家。首先,我们存在着正式的防卫关系,美台间订有《共同防御条约》;其次,在美国存在着一大群人,他们在历史上就是亲台派。在这种情况下,美方提出:第一,美国准备按日本模式解决美中关系正常化问题,需有一种变通,即我们在台湾维持一个联络处,在北京建立使馆;第二,确定美国从台湾撤军的时间表,到1976年夏天撤出一半,剩下的在1977年底全部撤出。但在撤军的过渡期,我们还没有找到妥善解决美台《共同防御条约》问题的方案,

希望中方声明和平解放台湾,以便美国考虑放弃美台防御关系……”

基辛格的观点,明摆着是美方在台湾问题上明显的倒退。邓小平对此十分不悦,不等基辛格将话全说完,他就打断他的话,问:“就这些啦?”

基辛格说:“是的。这是基本的,这是因为美国有法律上的问题。”

邓小平针尖对麦芒:“实际上这条法律是由你们自己制定的,对吗?”

基辛格问到:“哪条法律?”

邓小平说:“你们就是那些制定法律的人。就是你们对台湾防卫承诺的法律。那是你们自己确定下来的。”

基辛格回答说:“当然,这完全是真实的。”

邓小平就直截了当地指出:“好。既然你们可以制定法律,那自然你们也可以废除它。”

基辛格说:“这也是真实的。我们的观点不是那不能做。我们的观点是我向你解释的那些原因……”

基辛格有些吞吞吐吐。邓小平严厉地说:“你的考虑,从本质上说,还是‘一中一台’的变种!”

基辛格说:“为什么是这样?”

邓小平说:“主要是你们的立场倒退了,改变了联络处的立场。现在的情况是,你们在北京建立了联络处,我们在华盛顿也建立了自己的联络处,你们在台湾还保持着大使馆。这本身表明,还不存在关系正常化的必要条件。换句话说,如果你颠倒一下位置,在北京设立大使馆,在台湾设立联络处,这不是解决问题的方式。人民会得出一个结论,这实际上是‘一台一中’的翻版。因此我们觉得难于接受这个方案。”

基辛格说:“我们希望实现的,是同台湾一步一步地分离……”

邓小平打断他的话,寸步不让的说:“很明显,解决台湾问题的时机还不成熟。至于解决台湾问题的方式,就解决台湾问题而论,假定你们断绝同台湾的外交关系,台湾问题应该留给我们中国人自己来解决。至于我们用何种方式解决台湾问题,我相信毛主席已经在他的谈

话里讲得很清楚了。”

基辛格表示:“如果我理解正确的话,毛主席声明了两点:一个他相信问题最终要用武力来解决;但他也说,中国可以等待一百年使问题得到解决。”

“是的,他是那样说的。当然,一百年这个数字是象征性的。”邓小平毫不客气。

基辛格说:“当然,我理解。我要说的是,一百年以后,我将不再是国务卿了。”

邓小平加重语气说:“毛泽东主席已经把解决台湾问题是中国内部事务应该留给中国人来解决讲得很清楚了。”

基辛格:“我同意。这也正是我保存的谈话记录。”

在这几轮会谈中,邓小平和基辛格广泛地谈到了核武器、中东冲突、柬埔寨问题、中苏关系及能源危机等世界上别的问题之后,话题又回到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问题。邓小平重申了中方的关系正常化三原则。

邓小平说:“博士阁下,中方只能按照日本模式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一旦华盛顿终止了它与国民党当局的《共同防御条约》,台湾问题就成为中国人自己的内部事务。在这一过程中,任何形式的评判和保证,以及任何形式的卷入,我们都不予接受。如果是你们还需要台湾,以及你们国内还有困难,还有待于时间,那么,我们可以等待。”

在11月28日下午举行的最后一轮会谈中,双方各自谈了对世界形势的认识。基辛格说因为欧洲和日本不能构成强大的战略力量,所以美国基本上处于世界的“第一线”。邓小平委婉地反驳了美国在所有的地方都处在“第一线”的说法。

邓小平说:“……刚才博士几次说到开炮问题。似乎博士对炮火非常关注。”

基辛格说:“我要深挖洞。”

邓小平说:“我赞成深挖洞。可炮必须开。博士说,炮火的频率和精确度都提高了,由于精确度提高了,炮火能否停下来就不好说了。我认为,研究一下炮开得究竟有没有道理是必要的。因此,我想提出

这一点以引起你们的注意是有用的。也就是说,现在在许多问题上,美国正处于第一线。当然,美国也并不是在所有的问题上都处在第一线。”

基辛格正想说什么时,邓小平看了一下时间,暗示会谈该划句号了。邓小平最后以一句幽默作为结束:“阁下对炮感兴趣,可以多研究我们的大炮。”

由于美国从原有的立场上倒退了,当时美国的评论家们普遍认为,基辛格此次访华“受到了冷落”。尽管基辛格表达了包括会见毛泽东在内的全部的兴趣,但主人告诉他由于毛泽东正在长沙而“不方便安排会见”。后来基辛格从另外的渠道听说毛泽东在长沙会见别的外国客人,他只好悻悻然地去访问了苏州。基辛格再次见到毛泽东、邓小平,已经是10个月之后的事了。

# 第1325回：李一哲，关于民主与法制大字报，广州市众人围观

1974年11月10日，在广州市最热闹的北京路口，贴出了由67张大白纸组成的大字报：《关于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献给毛主席和四届人大》。连同“序言”这份大字报长达2.6万字，从头至尾贴了约100米，落款李一哲。

这张大字报抨击当时的民主与法制不完善，指出林彪反党集团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并对当时的“反复辟”、“反回潮”表示不满，对即将召开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提出了六点“期望”：

一、制定法律“保障人民群众的一切应有的民主权利”；

二、采取措施“限制特权阶层”；

三、采取措施保障“人民群众对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的革命监督的权利”；

四、制定条例严禁拷打、诬陷、草菅人命以及其他形式的“法西斯专政”；

五、政府和党的政策不要经常改变；

六、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

作者在序言中声称他们的“体系”“决不是异端于马克思主义体系之外的东西，我们只不过是企图以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武器，去对林彪体系的影响、祸害所及作一番认真的清理罢了”。

大字报一出，市民围观，水泄不通，车辆改道。入夜还有用手电筒照着读的。大家争相抄录，四处流传……

大字报空白处，写满了“好！”“好得很！”“说出真正问题！”“表达了人民的声音！”“向李一哲学习！”“向李一哲致敬！”等读者批语，也有反对的声音。广州市迅速掀起了一阵拥李和反李的大字报论战热潮。

广东省委迅速将大字报呈送中央。

《关于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认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式上说,实际是一个最广泛的人民的革命大民主,它是‘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是防止和反对社会法西斯主义的武器。”

“我们断言:‘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并没有完成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任务,因为它并没有使人民群众牢牢掌握广泛的人民民主的武器’。”

“1968 年夏季,社会主义的法治‘突然不灵了’,‘政权就是镇压之权’灵了起来。在范围广大地区内,到处在抓人,到处在镇压,到处是冤狱。社会主义法制跑到那里去了呢?据说,它没有用了,因为这是旧人大的宪法,而新人大还没开,现在是无法无天了!

这是在我国进行的一场社会法西斯主义的演习,演习的总指挥是林彪。”

“王洪文同志报告号召人们发扬‘五不怕’去反潮流。但是,现在的情况,没有‘大人物’或中央报刊的认可和宣传,任何思潮都不能形成潮流,尤其是不能形成涌来之势的潮流。古今往来,中国总会有人为了说话而不怕杀头的。鲁迅自然是不怕杀头的一个。但是鲁迅尚且可以到日本朋友那里去发表文章,今天‘五不怕’的人们又能到那里发表他们的文章呢?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幽灵,时常在他们的身边徘徊,他们不止一次地想到了恢复革命大字报的权威。但是,林彪体系压迫着他们,‘忠’字化的森严礼仪在束缚着他们,镣铐、铁窗、皮鞭和子弹在等待着他们。

1968 年以来的中国现实就这样严酷地向人们提出了这么一个问题: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死’了么?”

大字报在“序言”中写道:

“我们没有忘记代替一切,奖懒罚勤的突出(空头)政治,念经式的‘天天读’,越搞越虚伪的‘讲用’,越闹越荒谬的‘灵魂深处爆发革命’,鼓励政治投机的‘表忠’,不伦不类的‘忠字舞’,不胜烦琐的忠孝礼仪——早祈祷、晚赎罪、集会、集队、上下交接班、买卖东西、写信、打

电话,甚至吃饭等等,都涂上、罩上激烈的宗教色彩和气氛。总之,让忠字占领百分之百的时间,百分之百的空间,而这个‘好’那个‘好’的运动,则是‘左! 左! 左!’的比赛,‘……最……最……最’的竞争,不计其数的‘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实际上假、恶、丑行径的博览,‘一本万利’的赌场。

我们也没有忘记那损害工农群众基本利益的‘公产风’,‘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党风,鼓吹‘有用就是真理’‘立竿见影’的学风,提倡讲假话的‘新八股文风’,‘小节无害’论所鼓励的腐败恶棍的作风,以及‘当今社会走后门成风’……。

我们更没有忘记那些公式化的阶级斗争说‘教’、‘渣滓洞’式的牛栏比之历史上的‘三·一八’、‘四·一二’、‘五·卅’、‘六·二三’等有过之而无不及的屠杀——仅广东一省被杀害的革命群众、干部就近四万人,被关、管、斗的革命干部、群众上百万人。”

“为什么落实政策的号召发出5年多,经过30次申、50次令,才落实到贺龙同志那里呢?”

“我们发现1965年末到1966年初我们的报刊对历史人物的评价与现在我们的报刊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存在着多么巨大的矛盾呵!‘一切反动派和机会主义头子都是尊儒反法的’,可是无论是吴晗笔下的海瑞还是田汉笔下的武则天那个不是法家呢? 然而对他们的批判确确实实变成了第一次文化大革命的直接导火线。

我们认为,今天对历史人物的评价比1965年和1966年对历史人物的评价确实有了更多的历史唯物主义精神,这是革命深入的结果。但是,既然吴晗说海瑞是‘爱护人民的’,曾经遭到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第一篇文章的批判,那么,现在又有人说,‘法家是爱护人民的’,这岂不真是一个吓死人的‘回潮’吗? 海瑞无疑是个法家,而且是一个历史上难得的少数民族出身的法家。现在有人从秦始皇到孙中山,罗列了一大堆‘落实政策’的名单,可是为甚么对海瑞却要刻薄妒恨,拒不‘落实政策’,最近还要在报上臭骂几句呢?”

文章说出了作者对四届人大的希望:

一、要法制,不要“礼制”。

作者认为:“还有什么能比‘谁反对毛泽东思想就打倒谁’的原则更能成为维护林彪体系‘礼治’的神圣支柱呢?”

“这是一个极大的矛盾,一方面党的一元化领导决不可动摇,一方面‘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派’,而这些走资派恰恰是他们把持的地方和部门的一元化领导的具体体现者。”

“不用说党的领导应当细心倾听群众意见,也不用说人民群众对党的各级领导实行革命监督的权利,更不用说对走资派造反有理了,即使群众的意见是错误的,过火的,或者对党的政策某些方面不理解而发生不满,难道就可以‘说不服就压,压不服就抓’么?而且,香花与毒草、正确与错误、革命与反革命,又常常是不那么容易鉴别的,要有一个过程,要经历时间的考验,因此,我们不应当怕光明正大的反对派,界限是服从纪律不要搞阴谋诡计。

四届人大应当明文规定,除了杀人、放火、流氓、盗窃等刑事犯和挑动武斗、组织阴谋集团分子必须实行专政外,应当保护人民群众的一切应有的民主权利。”

二、限制特权。

作者说:“承认不承认中国正在出现一个如苏联那样的特权阶层(刘少奇、林彪等不过是他们政治上的代理人罢了),这是肯定还是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基本理论问题。”

“‘当今社会走后门成风’的现实从那里来?对社会的产品肆意挥霍,高级的惊人享受,是从那里来的?相当的部分高干子弟理所当然有财产权力的变相世袭从那里来的?新资产阶级占有方式和维护这种占有方式的政治手段凭籍的又是什么呢?文艺、教育、五·七干校、上山下乡、吐故纳新、上大学、培养接班人等等,几乎每个被人们称之为‘新生事物’的地方,都可以成为特权显圣的场所。难道我们不可以说苏联的演变是从苏联的高级干部实行了高薪制而向资产阶级专家看齐的么?在我们中国,对据说为革命流了很多血汗的老干部实行某种特殊的照顾,即使是传统所允许的,老百姓也没有表示多大的异议的话,但是我们能够轻视对政权的腐化作用和对新的社会关系带来的影响么?我们能够对正在产生和形成的新贵族、新的资产阶级熟视无

睹吗?

我们不是空想社会主义者,我们承认我们社会现阶段存在着种种差别,它并不是一个法令所能完全消灭的。但是,社会主义革命运动自身发展的规律,不是要扩大这些差别而是要消灭这些差别,更不允许这些差别扩大为经济上和政治上的特权。特权本身是和老百姓的利益根本对立的。为甚么我们要那么回避对于特权的批判呢?为什么要用所谓'好人''坏人'的问题去偷换'走后门'反映在路线上的大是大非呢?

四届人大应当明文规定限制特权的条文。"

三、保证人民对国家和社会的管理权

作者提出:"权力是最能腐蚀人的。一个人的地位变了,是最能考验他为大多数人谋利呢,还是为少数人谋利?能否保持为人民服务的精神,除了他自己努力之外,最主要的是人民群众的革命监督。而群众运动是一个革命者保持革命精神的最丰富的源泉。

应当怎样规定人民群众对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的革命监督权利呢?并且应当怎样明白规定,当某些干部(特别是中央机关的高级干部)失去了广大人民群众信任的时候,人民'可以随时撤换他们'呢?

四届人大应当回答这些问题。"

四、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制裁反动派

五、落实政策

作者说:"近年来,政策的多变,甚至'朝令夕改'(有认识上的原因但主要是反映了路线斗争的激烈)加上土政策层出不穷,造成了人们的思想混乱,甚至对党怀疑。我们认为四届人大应重申党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那些经实践证明是正确的应长期实行的政策,并应通过法的适当形式体现出来。"

六、各尽所能按劳分配

文章的作者李一哲,实际是3个人:

李:李正天,广州美术学院四年级学生,当过广州红色造反司令部"呐喊兵团"的头头,因为写过一张《炮打黄永胜是对他最大的挽救》大字报,1968年夏被通缉,从武汉抓回广州监禁;

一:陈一阳,广州十七中高中学生,是广州“红司井冈山公社”实际负责人之一,发表大字报时已分配到广东省紫金县古竹公社务农;

哲:王希哲,广州十七中高一学生,广州“红司井冈山公社”社长,广州“红警司”副司令,发表大字报时已下厂当工人,一直与陈一阳保持通信联系。

“913 事件”后,1972 年,李正天反对林彪、黄永胜的罪名不成立,但还要继续审查他反康生的罪行,就被押送到美术学院,当时更名为“广东省人民艺术学院”边劳动边审查,还是没有完全自由。

但是,李正天只要有一点点自由,就开始活动。他和广东人民广播电台技术部副主任郭鸿志、陈一阳、王希哲几个人经常在一起讨论社会问题。他们都认为,当时社会主义法制不健全很危险,想打倒谁就打倒谁,想剥夺谁的权利就剥夺谁的权利,这种无法无天的状态很可怕。民主与法制,这个饱含着“血和泪的命题”一定要向毛泽东和周恩来上书。

1973 年,听说四届人大要召开,他们于 1973 年 9 月 13 日写成《关于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一文,由李正天,王希哲署名,连同郑庆和、陈赞明写的海南岛东方县、儋县等地在“文革”中大规模屠杀群众的调查材料,以及一篇由李正天个人署名的《九个问题》一文,通过一个铁路工人寄给毛泽东和全国人大。结果,还没送到就被扣住了。广东省委在内部将这些材料定性为“反动信件”。

于是,李一哲他们决定:将《关于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一文直接诉诸大字报,让群众判断它是不是那么“反动”。

这篇大字报由“序言”和“正文”两大部分组成,共 23000 余字。其中“序言”12000 余字,开始是王希哲起草了一个很短的初稿,最后由郭鸿志主要执笔者完成。“正文”10000 余字,其中前五部分近 6000 字,执笔者一直是王希哲;第六部分 4000 余字,李正天起草了这部分的提纲式初稿,主要执笔者为陈一阳。

此外,他们 4 人还就这张大字报的内容与后来被打成“李一哲反革命集团”的其他一些人经过多次讨论、协商后,最终由王希哲整理归纳定稿。“李一哲反革命集团”骨干,基本是原广州十七中“井冈山”

成员,王希哲“部下”。

在大字报最后的“启事”上,留下了作者李正天的真名和联系地址:“希望广大革命同志能够在纸张上给予支持。”

12 月初,广东省委认为这是一张“反动大字报”,决定在内部组织批判。广州全市上下都大张旗鼓地动员起来,市委组织了数百场批斗会,动员了数百万人批判李一哲。省委宣传部还专门组织写作班子“宣集文”写批判该大字报的文章。

很快,这张大字报流传到海内外,引起强烈反响。

李正天、陈一阳、王希哲、郭鸿志 4 人在文革结束后的 1977 年 3 月 2 日同时被捕,1978 年 12 月 30 日获释。

# 第1326回：手抄本，浏阳县逮捕张扬 赦战犯，山西省王谦落选

1974年10月，《北京日报》编印的《内部参考》第960期，反映了手抄本《第二次握手》在北京一些单位群众中传抄的情况。10月12日，姚文元看到这期内参后立即批示："请找一本给我，并查一下作者在哪里！"

14日下午，他又打电话给报社："你们的内参反映一本坏书《第二次握手》，今天把书送来了。我翻了一下，这是一本很坏的东西，实际上是搞修正主义，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它写了一个科学家集团，如郭老、吴有训，写了许多人，如果不熟悉情况，不可能写出来。还写了与外国的关系，如写了吴健雄。不是一般的坏书，也决不是工人能搞出来的。要查一下，作者是谁，怎么搞出来的？必要时可请公安部门帮助查。"

在《北京日报》960期《内部参考》上，还有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丁国钰的批示："请传新同志一阅，似应查出此书是出自何人。"

《北京日报》将姚文元的指示雷厉风行地传达给北京市公安局，公安局成立专案小组追查，查明手抄本《第二次握手》的作者是湖南省知青张扬，立即给湖南省公安局发函。

继姚文元批示之后，新华社《国内动态清样》也在1974年12月7日第3297期上，以《北京市发现许多单位秘密流传手抄本反动小说〈第二次握手〉》为题，反映了这本手抄本的流传情况，并指出："这本书的中心思想是宣扬资产阶级恋爱观－－－－爱情至上，鼓吹资本主义国家科学先进，散布崇洋媚外的洋奴思想，鼓吹个人奋斗、成名成家的资产阶级白专道路"，"欺骗性很大"，"流毒很广"。

张扬，1965年下乡的老知青。其祖父是地主，父亲张效立在阎锡山部队办的"民族革命第九中学"当过教员，后因反对军官逼婚女学生，受迫害，逃到河南长葛县，办了一所学校，进行抗日宣传，组织过一

个农业合作社。1949 年 1 月,他父亲被当地地主开黑枪打死,他母亲连夜携子逃离河南。

1963 年初,19 岁的张扬到北京去看望在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物研究所任副研究员的舅舅周昌龄。

他的舅舅毕业于山东齐鲁大学理化系,曾任贵阳医学院副教授,日本投降后到南京美国驻华大使馆科技参赞处工作,全国解放后去北京中国医学院药物研究所从事药物研究工作。

张扬临行前,母亲和姨妈向他介绍起这位尚未谋面的亲人,在叙述中,姨妈不经意间说起了一件往事:

“有一天你舅舅下班回来,走到隔壁的书房里,脱皮鞋换拖鞋。舅母将饭菜端上桌,推开书房门叫舅舅吃饭,只见你舅舅全身像凝固了似的,两眼望着窗外。舅母回身走过去,把冲着院子的客厅门打开,一看,就在门口站着一位未曾谋面的女客人,长得很美,穿着也不像我们国内的。舅母很吃惊,当时反应不过来,你舅舅肯定是看到了院子里来一个女客人,他为什么不出来?

女客人很有礼貌地说出舅舅的名字,问是否住在这里,舅母答‘是’,并邀请她进屋。但这位女客人进屋后站了一会儿便向外走。走了几步又在门口停下,转身问随后相送的舅母:

‘您是他的夫人么?’

舅母答:‘是呀。’

女客人轻叹一声:‘您多幸福啊。’转身离去。

舅母回屋问舅舅:‘刚才那位女客人是谁?’

舅舅说:‘她就是 XXX 呀!’

舅母恍然大悟:‘原来是她! 唉,你为什么不请她进家来呢?’

……

带着一份好奇,张扬在北京期间有意从舅舅那里收集素材。并在舅舅家里听说了一些科学家如吴有训、钱学森等从海外回到祖国、从事科研的故事,使他深受感动。回到长沙,他根据这些故事,以自己的舅舅为原型,于 1963 年 2 月写了篇 5000 多字的短篇小说《浪花》。小说的开头,用的就是母亲和姨妈讲的那个“神秘来客”的故事。

1964 年,他把《浪花》重写,改名《香山叶正红》。

1965 年 9 月,张扬到浏阳县大围山区的中岳公社南岳大队中塘生产队插队。他利用闲暇时间再次把小说《浪花》改写成了 10 万字的《香山叶正红》。小说改写后,他拿给几位好友看。

1967 年,在湖南知青大逃亡的风潮中,张扬也逃回了长沙,并参加了长沙知青的反迫害活动,写出传单:《评〈造户口反无理〉》,点名批驳长沙“永向东”的大字报:《造户口反无理》,为知青“造户口反”的行动辩护。他还写了《控诉罪恶的新型农奴制度——刘氏上山下乡运动》的文章。

1970 年初,在轰轰烈烈的“一打三反”运动中,他成了追捕对象。起因是:浏阳有位知青罗孟寅,很赞佩张扬的文才,两人相互通信,引为知己。罗孟寅在给张杨的信中写道:“我是多么高兴地看到中国的牛氓利锐笔刺向那些骑在人民头上的‘吸血鬼’和‘寄生虫’,我更指望在祖国的大地上有真正的猛士举起斧头把那些‘林立的偶像’砍倒,或者像鲁迅先生那样铁面无情地揭开那蒙泰尼里人的虚伪面纱。”信中还抨击了“非神学的圣经”。这些话的含义一目了然:“林立的偶像”是指文革中的个人崇拜潮,所谓“林立的”,也可以理解作“林彪搞起来的”;“非神学的圣经”,则影射当时弥漫在全中国的“三忠于”“四无限”“早请示、晚汇报”“背诵老三篇”等行为;而英国女作家伏尼契的小说《牛氓》中那个蒙泰尼里式的人物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当时的“副统帅”林彪。

张扬年长于罗孟寅,阅历较多,对这封锋芒毕露的信,他没有正面答复,也未予揭发。但他曾在通信中提醒罗孟寅不要保存信件。罗孟寅没听,竟保存了 1000 多封。实际上罗孟寅早受到监视,“一打三反”运动中终被抄家,搜出成捆的“黑信”,其中就有张扬的几封。于是罗孟寅被定为“反革命集团”首犯,张扬也在劫难逃。张扬竭力逃避这次意外的打击,在朋友的掩护下开始了东躲西藏的漂泊生活。在逃亡的日子里,他重新改写书稿,加以充实,改名为《归来》,以喻书中女主人公丁洁琼教授不仅人从海外来归,最终连心也真正“归来”了。

1970 年 2 月下旬,张扬被公安部门缉获。书稿《归来》因预先藏在一位知青朋友家未被查获。此后,他在浏阳县公安局看守所“蹲”了近 3 年,罪名是“反革命”、“恶毒攻击文化大革命”、“恶毒攻击林副统

帅”。文革前先后担任浏阳县公安局局长和县委副书记的万晓阳是张扬案件的主审人,张扬在1967年写的那两篇反对“上山下乡”的文章浏阳县公安局也都知道,但并没有算作他的罪状。万晓阳说:“你是在文革中写的,又是公开发表的,即使文章观点错误,但并不违犯当时的法律。”1971年9月13日林彪外逃身亡,“攻击林副统帅”的罪名不能成立。于是拖到1972年12月29日,他被释放,重返大围山区。

1973年,他在肺病、肝炎折磨下,第五次修改书稿。至此,《归来》一书大体成形,脱稿后共20万字。但在此时,《归来》已不胫而走,首先在当地知青中辗转传抄,接着手抄本从湖南扩散到华北、东北、西北、北京等地,又经过许多无名读者的修改润色,衍生出不同的本子。有的本子将书名由《归来》改为《归国》,北京一位修理工将其命名为《第二次握手》。

《归来》的主要情节是:青年男女苏冠兰与丁洁琼在海湾的一次风暴救助中相识、相爱。由于家庭反对、社会动乱和小人离间,两人被迫离散。二十多年后,丁洁琼作为著名核物理学家不顾帝国主义阻挠,返回祖国效力。她却发现化学家苏冠兰已经与其干姐叶玉菡结婚,当丁洁琼悲伤地要离开北京时,周恩来总理亲赴机场进行说服,丁洁琼决心留在祖国。5年后,中国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

当时,在中国流传着一种故事梗概完全相同而文字长短不一的手写本读物被称为手抄本,其中包括《少女之心》等淫秽读物。《第二次握手》重彩浓墨的描写了苏冠兰与丁洁琼、叶玉菡三人之间的爱情故事,当然也被划入坏书之列。对此毫不知情的张扬仍在浏阳县的中岳公社,埋头改写小说。

1974年,湖南有关部门在《情况汇报》中反映了“坏书”《归国》的传抄情况。

1975年1月7日,张扬在大围山书塘生产队的土砖屋里第二次被捕,同组一起的9名知青,当时只有他1人“留守”在那个土砖屋里。他随即被送往湖南省公安局看守所羁押。

办案人员煞费苦心,特意邀请了湖南某大学中文系的几十名中文系教师和工农兵学员,以“帮助、鉴定”的名义,对张扬展开了全面的批斗与围攻。

功夫不负有心人,一位在当地颇有名气的教授凭借着他深厚的古典文学功底,以专家的姿态推断出了小说《第二次握手》这个爱情故事中所潜藏的重大政治含义。最终,《第二次握手》被定下四大罪状:一、利用小说反党;二、吹捧臭老九;三、鼓吹科学救国;四、明明不准写爱情了,还非写不可。

张扬被捕了,但《第二次握手》依然在青年中流传着,而且在部队的医院等干部子弟集中的地方更容易看到它,那个时代很少涉及的爱情描写,毕竟是年轻人喜欢看的东西。

这时,在山西,发生了省委主要负责人王谦在选举四届人大代表时落选的事情。

1974 年 11 月,山西省选举全国四届人大代表的会议在晋祠宾馆举行。原“红联站”和“兵团”的头头脑脑们,凡是有资格参加这次会议的,会前都抱定了不选王谦的态度。还有一些对王谦主持省委扩大会批判谢振华,用对待陈永贵来划线的做法有意见的干部们及各界代表人士,也要借此次的无记名投票,体现一次自己的意志。

选举开始了。发票,画选票,投票,唱票,结果出来了,王谦落选。

王谦是“文革”前的山西省委第二书记兼省长,是省委排名卫恒之后的第二把手。“文革”中先被打倒,投入监狱,出狱后又被下放到农村,在后来各地解放干部的大形势下,他又进入了新省委的领导班子,并在江青炮轰谢振华后,成了山西省委的主要负责人,协助陈永贵打倒谢振华。此次他在选举人大代表中落选,消息很快从选举现场向外界传出,省城太原立即出现了许多大标语:

“王谦落选大快人心!”

“王谦支一派压一派决没有好下场。”

署名呢,全是“革命群众”。

王谦落选让中共中央即刻表态,党中央副主席王洪文说:这是“共产党不选共产党的政治事件”。

很快,在太原解放路省委旁门的大墙上,立刻出现了题为“王谦落选事件的真相”的大字报。署名当然也是“革命群众”。直到 20 多年后,已经退休的原保守派“革命工人联合会”的头头张志安才道出了真情:“那阵子我天天往王谦那里跑,那张揭露‘兵团’和‘红联站’的头

头们会前串联好,在会上不选王谦的大字报,就是我写的。”

对王谦的落选,“红总站”也马上亮出了观点:“‘兵团’和‘红联站’一小撮坏头头以派代党,对抗中央绝没有好下场!”署名呢,还是“革命群众”。

山西两大派的争斗,全以“革命群众”的名义,又开始动真的了。

这些日子里,毛泽东的健康状况继续下降,他步履蹒跚,行动艰难,那浮肿得像发面馒头一样的两腿和双脚,没有人搀扶根本走不了路,但他在11月29日到12月4日,仍坚持在室内游泳池里游了四次泳。到12月5日,他慢慢地划着水,显得很疲劳,动作也有些勉强。他轻轻地对陪同他游泳的警卫队长陈长江说:“长江,我浑身没劲,手和腿也发软,看来,游泳也困难了。”他长长地叹了一气,让陪同在旁边的8341部队中队长陈长江感到震惊。这成为毛泽东一生中最后一次游泳。

此时的毛泽东没有忘记那些“老朋友”,老对手,要在有生之年解决这些历史问题。在长沙,他指示特赦国民党的战犯。时任公安部副部长的施义之后来在回忆录《我在公安部的十年》中这样记载:

他写道:“还有一批战犯,放下武器已关押二十多年了,还关着干什么。把他们释放了,可以来去自由。”

毛泽东还提了一个很长的名单,问哪个人关在什么地方,现在情况怎么样了?

建国后,从1959年到1966年春,全国共特赦了6批战犯。释放后,除一些知名人物在政协当文史专员外,大部分当工人、农民,在街道干杂活,由当地派出所管理。回农村的生活费每月最多15元,而当时烈士、工伤的遗属在农村抚恤金也就8元。当然,这些比他们在监狱时的生活要差。

文革开始后,特赦工作也暂停了。

因为文革中规定不准冲击监狱,因此监狱里的生活反而比社会上安全。1959年首批获得特赦的10名战犯之一的陈长捷,文革期间,被当作“牛鬼蛇神”卷入横扫之列,几乎天天都要遭到批斗。1968年4月7日,已是70多岁的的他,先用菜刀杀死了妻子,然后自杀。当人们推开他的家门时,看见的是立在墙边的瘦弱身躯,一碰他才倒下。已被

特赦的国民党军统特务沈醉等人,则主动要求重回监狱。虽然较之文革前,监狱里的物质待遇减少,生活水平下降,毕竟生活安定,衣食无虞,在押者可以安心学习。不少人利用这段时间阅读了马克思、列宁、毛泽东的著作。

医院里的周恩来,听到长沙的毛泽东提出特赦战犯的指示后,立即在病中找公安部长华国锋了解情况。华国锋责成公安部收集在押人员的当前思想动态,编成简报上报。

12 月 12 日,周恩来在简报上批示,要公安部开列全部在押战犯名单,以便在四届人大后特赦战犯。他同时通知中央统战部、中央调查部配合公安部工作。

# 第1327回：拟名单，筹备开四届人大 几磋商，共准备三套方案

12月17日，邓小平陪同非洲扎伊尔总统蒙博托到长沙会见毛泽东。会见结束后，毛泽东又与邓小平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

邓小平汇报了四届人大的准备情况，他说："四届人大正在搞名单，20日可以完成，准备先送给主席看了以后，总理和洪文来一下。"

毛泽东说："可以。"

谈到《政府工作报告》稿时，毛泽东说："看了一遍。"

邓小平说："工业十年来增加了1.9倍，每年递增百分之十一点几，这个数目还可以。"

报告想提出到1985年钢产量达到5500万吨左右，粮食达到7500亿斤左右。毛泽东说："钢五千五百万吨太多了。"

邓小平说："到1985年恐怕就10亿人口了。"

毛泽东说："人口非控制不可。"

邓小平说："《政府工作报告》不超过5000字，现在只有4900字，不超过主席的规定。"

毛泽东问："国际部分怎么样？"

邓小平说："我们研究了主席近来和外宾的谈话，报告中考虑用'革命和战争的因素都在增长'的提法。"

毛泽东说："天天讲缓和，天天准备打。"

邓小平说："战争的危险来自两个超级大国，主要来自苏联。"

毛泽东说："所以我说美国怕苏联。"

邓小平说："但最近挥舞战争大棒的是美国，石油问题和粮食问题，所以讲多了不好，还是说来自两霸，不为美国开脱。"

毛泽东说："可以。"

关于对外合作和贸易，邓小平说："当然，我们什么也不搞，也可以发展，但是速度慢些。现在国际上没有哪个国家可以脱离国际范围，

都是取长补短,包括美国。”

“以后国际环境可能还能争取到五年,主要是美国不敢打,铺得很开,苏联很集中。”

“我们要利用这五年时间,不能耽误。”

“归根到底就是主席讲的要安定团结。搞建设不安定不行。我觉得主要的关键是要有稳定的、有威信的省委,要能够发号施令,大家都听,当然要发得对。这么大的国家,都靠中央不行。”

“现在下边议论,大家不安,大家感到乱哄哄的。比如,搞科研的绝大多数没有做什么事,不是说群众不要求工作,是没办法。旷工不是个别的,少数的,而是相当大量,但这并不等于工人群众对现状满意。”

毛泽东说:“要先念、余秋里、你合作。”

邓小平说:“这个不成问题。恐怕还是革命和生产的位置怎么摆的问题。不安定,生产搞不起来,我看。主席讲,八年了。这里面包括怎样帮助省委树立威信。”

毛泽东说:“你这个想法好。”

12 月 18 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由邓小平主持起草的四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草稿)。

这天,叶剑英致信毛泽东:“今晚政治局会议上讨论并通过了总参谋部领导班子的名单,谨呈如下,请予批示。”“总参谋长邓小平同志,副总参谋长杨成武、张才千、向仲华、彭绍辉、李达、王尚荣、胡炜、何正文八位同志。”毛泽东圈阅了此信。

12 月 20 日,在多次审改的基础上,周恩来再次审阅经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修改的《政府工作报告》草稿,然后致信王洪文和邓小平:“我基本同意……”这天,周恩来忍着病痛,召开有王洪文、叶剑英、张春桥、纪登奎参加的会议。

12 月 21 日凌晨,周恩来亲笔拟定的《拟提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副委员长,国务院总理、副总理,各部部长、各委员会主任名单方案》,是在毛泽东已经确定“总理还是我们的总理”,邓小平、张春桥、李先念为副总理,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朱德,董必武、宋庆龄为副委员长的基础上,经过反复征求并集中了中央政治局委员的意见,提出了其他

副总理、副委员长人选的初步名单。

副委员长有:康生、刘伯承、吴德、赛福鼎·艾则孜、郭沫若、张鼎丞、蔡畅、乌兰夫、阿沛·阿旺晋美、周建人、许德珩、胡厥文或荣毅仁、李素文、谢静宜;

副总理有:陈锡联、纪登奎、华国锋、陈永贵、吴桂贤、王震、余秋里、谷牧、乔冠华、方毅。

另外,对陈云、徐向前、聂荣臻、韦国清、谭震林、李井泉等人如何安排,周恩来设想国务院设顾问。是作国务院顾问还是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还需请示毛泽东决定。

方案还列有:叶剑英兼国防部长,余秋里兼计委主任,谷牧兼建委主任,华国锋兼公安部长,乔冠华兼外交部长,方毅兼外经部长等。

说起王震任副总理,其中还有这样一段故事:

1969 年 10 月 18 日,王震及其全家离开北京疏散到江西,开始了两年的下放生活。1971 年“913”事件后,王震奉召于 9 月 29 日回到北京,不久被任命为国务院业务组成员。四届人大筹备期间,许多刚解放出来的老干部纷纷写信给周恩来,要求出来工作。王震受到鼓舞,也给周恩来写了一封厚厚的信。周恩来的秘书纪东把信送给周恩来时,周恩来示意他拆开,看看是什么内容。

纪东拆开信一看,真是字如其人,页数不少,字字斗大,16 开的信笺上,每页也就十几、二十来个毛笔字,字体虽不秀美,却粗壮有力。信中,王震汇报了自己的思想情况,检查了自己的错误之后,强调说自己的身体很好,还可以干体力活,还能扛 200 斤的麻袋。最后,他向毛泽东和周恩来提出,希望批准他组织一支以知青为主的垦荒部队,像当年南泥湾大生产那样,到陕北垦荒,改变延安地区的贫穷落后面貌,并表示一定做出成绩来!

周恩来听纪东读完信,笑着问:“你相信他说的是真话吗?”

纪东说:“王震同志决心很坚决啊!”

“哈哈! 这你就不懂了,他这是在要求给他安排工作。”周恩来又笑着说:“他的信先放着吧,这件事我记着了。”

几天后,周恩来找来国务院业务组成员李先念、纪登奎、华国锋、李德生、王震等人开会,商量四届人大人事安排的事情。会议中间,周

恩来对王震说:“胡子,主席想让你当个副的,你是想管外呢,还是想主内呀?”

听了这话,王震感到有点突然,但也听清了周恩来的意思,马上站起来,神态既激动,又不好意思。他“嘿嘿”笑了两声,小心翼翼地回答:“总理,您知道,我不懂外事,我还是在您和各位老领导的下边做具体工作吧。”

就这样,在四届人大的副总理的安排中,有了王震。

12 月 21 日下午,周恩来召开有王洪文、叶剑英、邓小平、张春桥、李先念、江青、姚文元、纪登奎、吴德等参加的部分在京中央政治局委员会议,讨论国务院各部委人事安排问题。

李先念提出铁道部让万里任部长,周恩来赞成。

会上江青、张春桥等人提出文化、教育、体育等部门的人事安排意见,建议当时兼国务院文化组组长的吴德任文化部部长。吴德提出负责北京市的工作已很繁重,又不懂文化工作,前一段负责文化组时很多工作也没有做好,他提出不能当文化部长。后来,张春桥又提出让吴德任国务院副总理兼文化部长,吴德还是想离开国务院文化组。

周恩来考虑要有一位政治局委员做人大常务副委员长,王洪文自己提出他不去人大。经再三衡量还是吴德比较合适。于是,周恩来对吴德说:总要有一位政治局的同志去人大,因为朱老总和董老岁数大了,彭真就是副委员长兼北京市委第一书记,还是你去做人大常务副委员长合适。

吴德建议文化部部长由文化界的知名人士担任,他提名上海的著名教授刘大杰当部长。江青坚决反对。有人提名,仍由原文化部长沈雁冰(茅盾)担任,张春桥和江青不赞成。最后,江青提名由于会泳当文化部长,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都一致表示赞成,这样就通过了。

有人提议让上海陈望道作教育部部长,江青反对,她的意见是让迟群作教育部部长。

会后,周恩来同李先念、纪登奎交换意见,认为教育部以周荣鑫掌管为宜,文化部、体委同意江青、张春桥的意见。

周恩来拟定的国务院各部部长、各委员会主任名单,主要考虑两部分人:一是启用一批有经验的老干部,如外贸部部长李强、二机部部

长刘西尧、煤炭部部长徐今强、石化部部长康世恩、水电部部长钱正英、轻工部部长钱之光、交通部部长叶飞、邮电部部长钟夫翔、财政部部长张劲夫等;另一部分是为了保持国家机关工作的连续性,留任了一批军代表作部长,如农林部部长沙风、冶金部部长陈绍昆、一机部部长李水清、三机部部长李际泰、五机部部长李成芳、七机部部长汪洋、商业部部长范子瑜等。

根据会议讨论酝酿情况,草拟出四届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副委员长和国务院副总理名单第一方案,并送叶剑英、邓小平、张春桥、江青等阅。

王洪文到中央工作不久,负责抓工、青、妇三个组织的筹备工作。他提出由北京、上海、山东三省市各推荐一名负责人。上海推荐金祖敏担任全国总工会筹备组组长,北京推荐谢静宜担任共青团中央筹备组组长,山东推荐杨坡兰担任全国妇联筹备组组长。在审定四届人大常委候选人名单时,周恩来提出,为了便于人大常委会议事方便,在京的人大常委要占多数。为此要调一批工农中委到工、青、妇工作,并兼人大常委,这批人大部分担任了工、青、妇筹备组副组长。

在酝酿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人选时,谢静宜是毛泽东指定任北京市委书记的,又兼任了共青团中央筹备组组长。江青坚持要谢静宜当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并且直接给毛泽东写了信,周恩来将谢静宜列为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人选。

全国妇联筹备组组长是原青岛国棉6厂工人、时任青岛市革委会副主任的杨坡兰。她到妇联工作不久,有人以“妇联机关部分党员”的名义给中央写信,反映她“特殊化”问题。纪登奎批示:请中组部派人调查,并把调查结果报告中央。郭玉峰派孙中范和中组部干部组魏焕章、李竹林去调查。他们找了全国妇联机关的老领导康克清和李宝光等人了解情况后,一致认为,来信反映杨坡兰“特殊化”的问题情况不实。杨坡兰是劳动模范,为人朴实,对自己的要求严格。中央安排工、青、妇筹备组的领导住在京西宾馆,她爱人出差来京,她不让爱人同住京西宾馆,而是住在附近的招待所。但是,大家普遍反映,杨坡兰是劳动模范,长期在基层工作,组织领导能力较差,打不开工作局面,很难胜任全国妇联一把手的工作。他们将调查的情况向郭玉峰作了汇报,

郭玉峰让他们以中组部调查组的名义给纪登奎并中央写了调查报告。纪登奎听了郭玉峰和孙中范的汇报后说:看来要考虑调整全国妇联的主要领导人。郭玉峰当场建议请邓颖超担任全国妇联主席,纪登奎当即表示同意,但他说“这要同总理商量后再作决定”。后来纪登奎传达周恩来的意见:“周总理坚决不同意邓大姐担任全国妇联主席,全国妇联主席的人选要再考虑。”纪登奎也曾向中央建议由蔡畅、邓颖超担任名誉主席,康克清任主席,周恩来还是不同意。王洪文、吴桂贤曾提议杨坡兰任主席,康克清、李宝光等任副主席。郭玉峰坚持杨坡兰水平太低,当不了妇联第一把手。这样,全国妇联的领导班子始终定不下来。

在一次纪登奎同李先念交换意见时,李先念提议李素文当全国妇联主席。经了解,李素文是沈阳一个副食商店的售货员,先后当选为沈阳市劳模、辽宁省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全国妇女“三八”红旗手;1963 年当选为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并在大会上作了《为革命卖菜》的发言,周总理带头多次鼓掌;1965 年被商业部授予全国财贸系统学习毛主席著作标兵,还在北京举办了“李素文学习毛主席著作展览”,李先念为展览剪彩并讲了话。当时她担任辽宁省委常委、省革委会副主任、团省委书记、十届中央委员。李先念对李素文比较了解,他的建议纪登奎完全同意,并让中组部给中央写了请示报告:建议蔡畅、邓颖超担任全国妇联名誉主席,李素文担任全国妇联主席,康克清、李宝光等任副主席。中央政治局讨论同意,后来全国妇代会因故未开成,此议没有成文。在周恩来同中央政治局同志酝酿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人选时,李先念再次提议李素文列入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人选,纪登奎赞成。周恩来同意这个建议,将李素文列为副委员长人选,报毛泽东批准。

关于人大常委会秘书长人选,周恩来曾经考虑由常务副委员长吴德兼任,吴德坚持说他的事情太多,照顾不过来,建议找一位能够处理外事活动的任秘书长。吴德提议让姬鹏飞任秘书长,他曾任外交部长,有外事工作的经验。周恩来同意吴德的建议,最后经毛泽东批准,由姬鹏飞任人大常委会秘书长。

12 月 21 日晚,周恩来审阅四届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副委员长

名单第一方案,增加陈云、韦国清为副委员长。

经过周恩来煞费苦心精心拟定的人事安排名单,提出了两个方案供毛泽东决策。其中大方案是,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人数多一些,包括一批老革命和各方面知名的代表人物,国务院安排的是一个精干的工作班子;小方案是如果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人数不宜过多,则将几位老革命安排作国务院顾问。

12 月 22 日,周恩来召开有王洪文、叶剑英、张春桥、纪登奎、华国锋、陈永贵、陈锡联、倪志福、吴桂贤等参加的部分在京中央政治局委员会议,讨论 21 日所拟两个方案名单。

根据讨论结果,形成了关于四届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副委员长和国务院副总理名单的三套方案。

在这三套方案中,有交叉,有区别,有的甚至尖锐对立。

会后,周恩来找来王海蓉、唐闻生谈话。

在 12 月 22 日下午举行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决定由周恩来、王洪文二人共同去湖南长沙,向毛泽东报告四届人大的准备情况,听取毛泽东的意见,特别是一些关键性的重大问题和全国人大、国务院的人事安排,请毛泽东最后决定,再提交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这天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结束后,周恩来与王洪文在送给毛泽东审阅的三套方案上,联合署了名。

这时的周恩来,便中再次发现潜血,按医务人员的要求,必须立即进行检查治疗。这时,负责周恩来医疗组工作的叶剑英对医护人员说:“为了党和国家的最高利益,眼下暂不能提(立即进行检查治疗)这件事。”他反复叮嘱随同周恩来前往长沙的医护人员:必须尽一切努力,控制住病情,要想尽一切办法无论如何也要保证周恩来安全回来。

# 第1328回：周恩来，王洪文飞赴长沙 交检查，毛泽东谈学理论

12月23日，毛泽东圈阅周恩来12月22日晚报送的关于四届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副委员长和国务院副总理两个名单的各三个方案。周恩来在送审报告中说："政治局协商情况，待我们明日到后面陈。"

12月23日，两架专机从北京飞往长沙。一架是王洪文的专机，他的身边坐着秘书廖祖康。另一架是周恩来的专机。

晚上19时，周恩来、王洪文来到毛泽东居住的湖南省委9所6号楼。自从7月17日周恩来出席中央政治局会议与毛泽东见过面之后，两人已经5个多月没有见面了。对于周恩来的到来，毛泽东显得很高兴。两位老人互相询问彼此的健康状况后，毛泽东说："多住几天。你们两位在这里，让邓小平在北京管事。"

毛泽东见了王洪文，摇着手对他说："不要搞四人帮！团结起来，四个人搞在一起不好！"

王洪文赶紧说道："以后不搞了。"

毛泽东接着对周恩来说："明年一月起，外宾我不见了。要求见。我也不见了。我吃饭、睡觉还好，游了5次泳。就是讲话、肺、腿。"

毛泽东谈起了邓小平。他说："你们留在这里谈，告诉邓小平在京主持工作。他政治思想强。"接着，他又指着王洪文，对周恩来说："邓小平Politics比他强。"

"Politics"，即英文政治。

王洪文不懂英语，有些茫然。毛泽东指着王洪文又说："他没有邓小平强。"一边说还一边在纸上写了个"强"字。这次王洪文似乎听懂了，十分尴尬。

周恩来向毛泽东汇报四届人大人事安排，谈到拟由叶剑英以中央军委副主席兼国防部长，邓小平以国务院第一副总理兼总参谋长时，毛泽东说："我看小平做个军委副主席。军委副主席、第一副总理兼总

参谋长。”

周恩来说:“我们都拥护主席的意见,小平作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第一副总理。”

毛泽东对周恩来说:“你的身体不行了,我也不行了,叶帅也不行了,康老也不行了,刘伯承也不行了,朱德也不行了,难啊。关于小平的事,我讲了几年了,他说他不如总理细致,我叫他找几个帮手。小平讲不只一次了,忍不住了。小平同志政治思想强,人才难得。”

说着,毛泽东又拿起笔来,在纸上写了“人才难”,周恩来看懂了,说:“人才难得。”毛泽东点了点头,把笔放下了。

毛泽东当场写了“人才难”三个字和一个“强”字。

毛泽东继续说到邓小平:“开二中全会补他为常委、副主席,并担任军委副主席、国务院第一副总理、总参谋长三个职务。”

周恩来谈到自己的病情,毛泽东问:“(癌)在膀胱,还是扩散了?疼不疼啊?怎么烧?是不是用钴六十?”

他转过头来对王洪文说:“总理还是我们的总理。”又关照周恩来说:“你身体不好,四届人大会后,你安心养病吧!国务院的工作可以让小平同志来顶。”周恩来点了点头。

讲到副总理名单时,毛泽东听到周恩来念邓小平、张春桥、李先念时,又加了一个陈字,即陈锡联。

毛泽东说:“邓、张、李、陈。张有才干,李较软弱。”

总政治部主任的人选,在周恩来去长沙时尚未有定论,毛泽东也在思考中。当周恩来讲到他设想的总政治部主任的三个人选:肖华、苏振华、廖汉生,还提出可否调冼恒汉时,毛泽东笑着说:“罗荣桓。”没有表态。

第二天,12 月 24 日,毛泽东要周恩来、王洪文“留在这里谈,告诉小平在京主持工作”。王洪文支支吾吾,说出了江青要他说的话。

毛泽东极度不悦的说:“江青有野心。你们看有没有?”

没有人说话。沉默片刻,毛泽东说:“我看是有。我比你们了解她,几十年,我对她做了工作。”

“我在做江青的工作,劝她‘三不要’:一不要乱批东西,二不要出风头,三不要参加组织政府(内阁)。”

“当然要一分为二。她在批刘、批林问题上是对的。说总理的错误是第十一次路线错误就不对了。”

“批林批孔,批走后门,成了三个主题,就搞乱了。搞乱了,也不告诉我。”

毛泽东对批孔是满意的,他说:“有人说批林容易批孔难。世界上事,说起来难,做起来并不难。比如‘四书’、‘五经’,以前不读不行,现在都不读了,孔夫子是文圣打倒了,一样可以治国嘛。关云长是武圣也打倒了。”

同时他又指出:“说批林批孔是第二次文化大革命是不对的。”

周恩来说:“主席关于安定的指示传达晚了,影响了一些地方的工作。抓生产晚了,特别是铁道问题是最大的耽搁。”

毛泽东说:“这就是曹操说的袁绍的短处‘见事迟’,要总结经验。”

毛泽东还说:“凡有两派的地方,民兵不要搞进去。”

“国民党那些战犯放出来,湖南、湖北、江西、安徽都可以去嘛,愿意回台湾的可以回台湾嘛。”

毛泽东问:“江青为什么反对邓小平出国?她说张春桥恐怕有点才干。”

他提出江青等人要作自我批评。

接着,他又批评王洪文道:“你不要搞四人帮!不要搞宗派,搞宗派要摔跤的。”

“我几次劝你,不要几个人搞在一起,你总是听不进去!这一次,你既然来了,就多住3天,好好想一想,写个书面检查给我!”

王洪文吃了一惊。

毛泽东听取了周恩来和王洪文关于四届人大人事安排方案的汇报。对周恩来在京拟定的四届人大副委员长人选名单的两个方案,毛泽东表示: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赞成大方案,即副委员长人数可以多一些。这样原方案列为国务院顾问或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几位老同志均明确做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人选。

毛泽东同意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提朱德,副委员长董必武、宋庆龄排在前两名。

在讲到人大常务副委员长人选时,毛泽东赞成吴德主持人大常务工作。

毛泽东不同意谢静宜列入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人选,他说:“副委员长,小谢不能放,人家对她不了解,提得太早了,不好。”又说:“小谢,官越作越大,搞共青团书记可以,当副委员长就不适当了。”

在讲到邓颖超、蔡畅的安排时,毛泽东同意邓颖超做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当周恩来坚持邓颖超不要当副委员长时,毛泽东没有再坚持。因此只安排蔡畅做副委员长。

在讲到民主人士时,周恩来提出:是胡厥文还是荣毅仁做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毛泽东同意在民主人士中放宋庆龄、胡厥文、许德珩三人做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还提出要将副委员长全名单排一次序。

毛泽东问:“章乃器、梁漱溟,人大代表没有他们啊?”

周恩来说:“梁漱溟是政协委员,章乃器的右派帽子还戴着。”

毛泽东说:“不要戴了。”

在讲到国务院副总理人选方案时,毛泽东赞成小方案,不设顾问。他说:“国务院副总理要能办事的,不是荣誉职务。”

在讲到乔冠华、方毅作国务院副总理人选时,毛泽东说:“要保护乔(冠华)、方(毅)、谢(静宜),但不要放。”

在讲副总理人选时,毛泽东曾问:“吴桂贤多大年纪?”

在谈到郭沫若时,毛泽东说:“回去代我问好。”

在向毛泽东汇报纪登奎提出要减少兼职的请求时,毛泽东没有表态。

毛泽东还提出在开四届人大之前开二中全会,并说:邓换李常委、副主席。李要他自己提出来,辞去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职务。

当谈到国际形势时,毛泽东说:“越讲缓和越备战,现在可以不提当前世界主要倾向是革命,而要强调备战紧张,各国人民对此要有所准备。”

毛泽东问:“苏联有什么人来跟我们架桥的没有?勃列日涅夫到北京来可不可以?”

周恩来答:“如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真想来谈,可作考虑。但我方不主动去请他。”

毛泽东表示赞同。

谈话后,王洪文回到住所,廖祖康跟他打招呼,他没听见,闷闷不乐的往床上一躺,一句话也没说。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周恩来于25日又起草了一份人事安排的名单,送给毛泽东审阅。毛泽东这天又同周恩来和王洪文谈了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他同意叶剑英以军委副主席兼国防部长。关于副总理人选,毛泽东在邓、张、李后加了一个陈(锡联),并提议张春桥兼任总政治部主任。毛泽东说张春桥:“有能力。”

周恩来建议,在四届人大前的十届二中全会上,增补邓小平为中央政治局常委或中央副主席,毛泽东提出以邓小平为中央副主席兼政治局常委。

周恩来重疴在身,原计划在长沙逗留3天,于25日返回北京。

25日,当周恩来前往毛泽东住处辞行时,毛泽东劝他再小住几日。

翌日清晨,毛泽东的客厅里,出现了异乎寻常的气氛:桌子上放着一盘湘潭灯芯糕,一盘交切,一盘寸金糖,一盘麻花条,桌子正中的花瓶里插着飘着清香的腊梅和纯白茶花。

毛泽东步入客厅,见到招待所工作人员如此布置,微微一笑,不说什么。他拿起一条灯芯糕,高高兴兴地当早餐。

哦,12月26日,毛泽东81寿辰!

这天,王洪文安排到韶山参观。

中午,毛泽东和工作人员一起吃面条,喝下一杯深红色的芙蓉酒。

晚上,周恩来在自己住处请湖南省委负责人和湖南方面接待毛泽东的工作人员一起吃面。

入夜,毛泽东邀周恩来到他的卧室,两位老人长谈直到次日凌晨。这也是相处近半个世纪的这两位老战友的最后一次深谈。谈话涉及两个方面:“一个人事安排,一个理论问题”。毛泽东批准了周恩来头一天起草的人事安排名单。在解决四届人大的问题后,放心不下的仍是他认为具有根本意义的“反修防修”问题。在周恩来后来整理并由中共中央印发的谈话要点中,毛泽东对“理论问题”主要讲了以下内容:

“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要写文章。要告诉春桥、文元把

列宁著作中好几处提到这个问题的找出来,将大字本送我。大家先读。然后写文章。要春桥写这类文章。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要使全国都知道。”

毛泽东还说:“我跟丹麦首相谈过社会主义制度问题。”

毛泽东这话,是指1974年10月20日会见丹麦首相保罗·哈特林时,曾经说过:“总而言之,中国属于社会主义国家。解放前跟资本主义差不多。现在还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变更了。”

“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等。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

“所以,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因此,要多读马列主义的书。”

“列宁说,‘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工人阶级一部分、党员一部分,也有这种情况。”

“无产阶级中,机关工作人员中,都有发生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的。”

谈到经济问题,毛泽东说:“要安定团结,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

毛泽东再次就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任职安排同周恩来交换意见,经过分析比较,最终确定了中共十届二中全会和四届人大会议上的人事安排方案。

12月26日这天,康生在病床上召见中央党校负责人,此时他讲话已经很困难,语句含糊不清,有的话还需要贴身秘书复述。康生断断续续地说,下部长瘤子,淌血,不行了。党内斗争复杂,你不了解,迟群犯了错误……我们党危险,要落到坏人手里。靠我不行了,但我不甘心死……

12月27日,王洪文写出一份检查:

主席:

这次来长沙向主席汇报工作,又一次聆听了主席的教导,受到了深刻的教育。特别是主席对我的批评“你不要搞四人帮”。主席的批评是完(全)正确的,我诚肯(恳)的接受主席的批评教育。这次主席批准在这里住三天,我应借这个机会来回忆,总结自己犯错误的经验

和教训。

两天来我认真的回忆了自己所犯的主要错误。

主席发现以后曾多次指示,“你们不要几个人搞在一起”,“你们不要搞上海帮”。我没有坚决的按主席的指示办事。当工作中遇有问题时不是和政治局多数同志商量,研究解决问题,而是只找少数几个同志。虽经主席多次指示,我仍然不觉悟,脱离不开小圈子。主席在离京前的政治局会议上又指示“你们不要(搞)上海帮”。以后有同志来找议事我仍然顶不住。因此就继续犯错误。10 月 17 日来长沙向主席汇报关于江青同志和小平同志为“风雷(庆)号”批示发生争吵一事我是犯了严重错误的。因为当时在提名总参谋长人选问题上小平同志有不同意见,这本是党内生活中允许的。但我不是依靠政治局多数同志正确的解决定问题,而是只听了少数同志意见。错误的把提总参谋长人选问题和江青同志批示“风庆轮”问题同小平同志争吵联系在一起,并且乱加猜测,因而就得出结论说可能有别的什么问题。因此我就提意(议)向主席报告。

在这个问题上的是(事)实是:小平同志并不错,而是我犯了严重错误,因为总理身体不好要我主持工作,而我不是全面的听取各方不同意见,而是只听少数同志意见,又不加分析就错误的向主席报告。干扰了主席。我的错误是严重的。

临别时,王洪文又对毛泽东说:“现在政治局里没有分工的不多了。登奎有国务院,还管组织部、中联部。文元管出版、宣传。春桥管党务、五卷。只有江青同志没有分工了。”

毛泽东回答:“她的工作是研究国际,读《参考》,两本。我也是啊。”

谈话到此结束。

12 月 27 日晚,两架专机离开长沙,飞回北京。

# 第1329回：做传达，召开十届二中会 李德生，辞去中央副主席

周恩来回到北京，亲自整理出毛泽东的谈话要点。12月28日，周恩来召开有王洪文、叶剑英、张春桥、邓小平参加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传达毛泽东在长沙的谈话内容，研究如何贯彻。会前，周恩来找江青谈了毛泽东在长沙对她和“四人帮”的批评，并在常委会上作了传达。

12月29日，周恩来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传达毛泽东在长沙的几次谈话内容，并且将经过毛泽东调整同意后的四届人大人事安排方案印发中央政治局。

会上，周恩来传达毛泽东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传达了毛泽东关于四届人大之后要实行特赦、释放战犯，先解决外部矛盾；同时，也要准备很快解决文化大革命以来关押和受监护的干部的问题的指示。毛泽东还说，不要原来管专案的人员参与这件事，要过去未管过的人去办。经周恩来提议，政治局决定：由汪东兴、纪登奎、华国锋、吴德负责办理、落实毛泽东的这一指示，成立专案小组，汪东兴任组长。到会政治局委员一致表示拥护毛泽东的意见，并通过周恩来25日起草、经毛泽东审阅批准的四届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副委员长和国务院副总理两项名单。

第二天，12月30日，江青写信给毛泽东：

“昨天晚上政治局开了会。会上由总理、洪文同志传达了主席的指示和对我的批评。我完全拥护主席的指示和批评。”“我希望人大之后离开北京，更希望能看到毛主席。我低温很久了，脑力有突变的危险－－－－一切都遗忘。”

周恩来从长沙回京后对纪登奎说：“上海、北京、东北都有人选了。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南方、西北也应有个年青人。”

他们商量江苏董加耕是个人选。纪登奎通知郭玉峰，让中组部派

人到南京把董加耕接到北京,纪登奎、吴德、郭玉峰等同董加耕谈了话。

董加耕是全国知名的返乡务农典型,事迹感人,受到过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接见,本来是一个合适的人选。但在谈话中了解到他是反许世友一派的,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就成为一个问题。纪登奎把谈话情况向周恩来作了汇报。周恩来为慎重起见,就没有安排董加耕作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人选,让他作了人大常委。

周恩来还提出西北也要有一位年青的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人选,并确定由陕西省委推荐,纪登奎直接给陕西省委第一书记李瑞山打电话。李瑞山同省委其他领导商量,据说李瑞山还征求了吴桂贤的意见,推荐了姚连蔚。

姚连蔚是西安847厂工人,有工农兵的经历,是生产突击手、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也是西安东郊一派群众组织的头头,当过厂革委会副主任,时任十届候补中委、陕西省总工会主任。纪登奎等中央领导看了他的简历并同本人谈了话,最后经周恩来审定,将姚连蔚列为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人选。

12月31日,中共中央转发《上海开展计划生育和提倡晚婚工作的情况报告》,肯定了"全国人口自然增长率,从一九六五年的千分之二十八点五,下降到一九七三年的千分之二十一,预计一九七四年将下降到千分之十九左右。"同时指出:"到一九七三年底,除人口稀少的少数民族地区外,仍有十三个省人口自然增长率还在千分之二十以上。"《报告》要求"充分发动和依靠群众,做好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在群众自觉的基础上,把生育计划落实到人,不要强迫命令。要普及节育科学知识,把避孕药具送上门,方便群众。""把计划生育工作搞得更有成效。"

1975年元旦,周恩来先后同邓小平、李先念谈话。同日,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四届全国人大有关人事安排问题。根据毛泽东要安定团结的指示,会议确定"基本不动,个别调整"的原则,讨论通过了邓小平起草的关于国务院的部、委设置和各部部长、委员会主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人选的报告。

讨论中,将报告拟定的交通、燃化、商业三个部的机构设置又作了

调整,并决定仍设立文化、教育两部,以避免国内外不必要的议论。由此,国务院系统共设置29个工作部门。

1月3日,周恩来主持有王洪文、叶剑英、邓小平、张春桥参加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研究十届二中全会的各项准备工作。

会上,周恩来传达毛泽东关于理论问题指示要点。

会后,周恩来留叶剑英谈话。

纪登奎和李先念两人受中央委派和李德生谈话,要他辞去党中央副主席的职务。因为党内从来没有辞职的先例,李德生听了以后很诧异,也很生气,为军队高干会整他的事分辨。纪登奎和李先念也只是奉命办事,很多事情他们也不清楚,不愿意和李德生争论,纪登奎便直截了当地对李德生说:

"德生同志,你应该明白,你是党中央的副主席,我们两人只是政治局委员,按规矩,我们是没有资格和你谈这个话的。要你辞职,这是毛主席的意见。"

李德生听了,便不再说什么了。1月4日,他正式向毛泽东写了报告。当天,毛泽东在李德生请求免除自己担任的中共中央副主席和政治局常委的报告上批示:"德生同志:同意你的意见。至于错误,改了就好。"

1月4日,周恩来、王洪文向毛泽东报送1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的四届人大人事安排方案。送审报告中说:"主席提出小平同志除任第一副总理外,还担任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春桥同志除任第二副总理外,还兼任总政治部主任,大家均同意。"毛泽东当天圈阅。

1月4日,毛泽东在江青12月30日给他的信上批道:"江青:不要来看我。有病文件可以少看。我已印两部文学史,暇时可以一阅。"

毛泽东信上让江青"暇时可以一阅"的两部文学史是指刘大杰著的《中国文学发展史》两册。

1月5日,中共中央下发关于邓小平和张春桥任职的通知:

1975.01.05;中发[1975]1号

毛主席已圈阅

毛主席、党中央决定:

(一)任命邓小平同志为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

(二)任命张春桥同志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

1月5日至11日,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举行预备会议,全体代表讨论了会议的主要文件和其他准备工作。

1月6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举行会议,继续研究十届二中全会各项议程。

1月6日这天,邓小平约胡乔木到他那里谈话,对他说:"正在考虑要你和吴冷西、胡绳、李鑫等同志当国务院的顾问。像过去钓鱼台的班子那样写一批反修反帝的文章。"

邓小平提出一些研究和写作的题目,如:三个世界的划分、苏联的社会性质、战争与和平问题、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问题等。

邓小平还说:"主席前不久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谈话,资产阶级法权问题,也应认真研究。这些问题都是国内外广大群众迫切需要系统解答的。要收集大量材料,写出系统的有充分说服力的文章,同苏修进行论战,并回答国际上左派党和组织认识不清的问题。"

邓小平还说:"从'九评'以后,多年来就很少那样系统地解答问题的文章了。现在的一般文章,只有结论,没有论证,总之一句话,不能说服人。"

胡乔木表示:"这些工作很重要,不过我做不合适,我的问题还没有做结论。"

邓小平说:"你的问题实际上已做了结论嘛!"

邓小平又交代胡乔木:"写这些文章要多找一些人,多带一些徒弟,组织一个写作班子。"

邓小平说明:"今天谈的这些,中央和国务院都还没有讨论过,只是随便交换意见。"

这次谈话以后,胡乔木即出席已经开始的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预备会。接着出席1月13日至17日的大会。自此恢复了正常的政治生活。同时,对邓小平提出的一些问题开始进行了研究。

1月7日,江青给张玉凤写去一封信:

玉凤同志:

那笔钱能否取出八千元？因为如从1968年算起，我应归还八千元，从1969年起我应归还七千元。当然，可以不归还，不过还了心安理得。这七八千元，主要用于照相、购买灯光装制，灯光我送给新华社了，没有算钱。是党和国家财产，不应算钱，不能慷国家之慷。如不取，请在主席暇时，报主席，再请主席给八千钱。

江青

1975.1.7

1月7日晨4时，周恩来将1974年12月26日夜，毛泽东在长沙关于理论问题的谈话要点的大字本送毛泽东审阅，并附信说："整理内容如无大错，我拟在十届二中全会上一读。"1月8日，毛泽东审阅时作了两处改动：一是将"林彪如上台"改为"林彪一类如上台"，二是将"无产阶级中，机关工作人员中，都有发生臭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的"一句中的"臭"字去掉。

1月9日，周恩来将8日经毛泽东审阅的关于理论问题的谈话要点送全体中央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传阅。

周恩来考虑中央政治局和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都有年青干部，国务院副总理中也应增加一名年青干部，就对纪登奎说："上海有王洪文，北京有倪志福，西北有吴桂贤，又增加了姚连蔚，东北有李素文，天津还没有人选，请天津推荐一名有一定领导经验的年青干部作副总理人选。"

1月7日上午，十届二中全会报到，纪登奎派郭玉峰到京西宾馆找天津市委书记解学恭，说明中央让天津市委推荐一名有一定领导经验的年青干部作国务院副总理人选。解学恭当即召集天津的中央委员开会，并且电话同天津市委的主要领导交换意见，市委一致同意推荐孙健，并且当天就把他的档案材料送给郭玉峰转报纪登奎并周恩来总理。

孙健是天津内燃机厂工人，从学徒工干起，当过班组长、车间主任、厂团委副书记、武装部副部长、厂党委书记、厂革委会副主任。1970年以后任天津一机局革委会副主任、天津市生产指挥部副主任、市委常委，当时任天津市委主管工业的副书记、十届中央候补委员。

周恩来看了孙健的简历，同意将他作为副总理人选，中央政治局

讨论通过,并报经毛主席批准,直接列入提交十届二中全会讨论的国务院副总理人选建议名单。

1月8日至10日,中共中央十届二中全会在京西宾馆举行。毛泽东依旧在长沙休养,没有出席会议。周恩来主持会议。会议讨论了四届人大的各项准备工作,讨论通过了提请四届人大一次会议审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关于修改宪法的报告》和《政府工作报告》;讨论通过了提请四届人大一次会议选举和任命的四个名单,即《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副委员长候选人建议名单》、《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和秘书长候选人建议名单》、《国务院总理、副总理、各部部长、委员会主任人选建议名单》、《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候选人建议名单》;讨论通过了《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主席团候选人建议名单》,提请四届人大第一次会议选举。

就在这次会议上,进行了重大人事变动:会议追认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批准李德生关于免除他所担任的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请求。

毛泽东指定邓小平起草的《政府工作报告》,考虑到周恩来病体虚弱,这次政府报告是历届人大中最为简短的,要求不超过5000字。

王洪文到京西宾馆看望上海参加十届二中全会的马天水、徐景贤和王秀珍,情绪低落。徐景贤安慰他说:“现在总理病了,中央还是你主持工作嘛。”

王洪文把烟头一掐说:“什么主持工作,现在权都是他的,国务院是他的,军队也是他的,我只能抓抓中央读书班!”他停顿了一下说:“这些都是主席定的呀!”

这里的“他”是指邓小平。

9日,周恩来打电话到长沙,请示毛泽东还有什么话要向二中全会讲没有,并表示“自己打算在二中全会结束时作自我批评。”毛泽东嘱咐身边工作人员,“劝总理不要讲,并指示二中全会闭会时由总理传达主席的指示:还是安定团结为好。”

1月10日,周恩来在中共中央十届二中全会上讲话时说:“这次中央全会结束前,我请示毛主席,有什么话要我向大家转达。毛主席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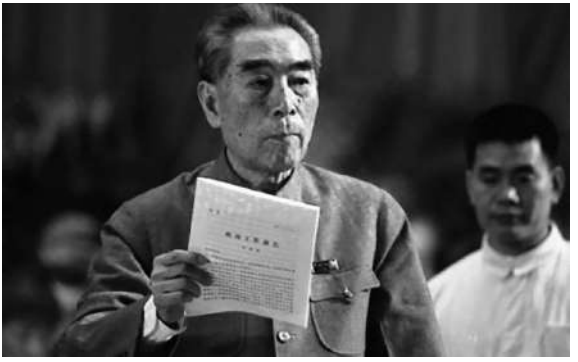
了八个字:‘还是安定团结为好’。现在,我要向大家讲的就是毛主席的这句话,‘还是安定团结为好’。希望中央政治局的工作,各省、市、自治区的工作,解放军的工作,各级革命委员会一直到人民公社的工作,都要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做好。1975 年是安定团结的一年,是争取跃进胜利的一年。我相信,在毛主席的谆谆教导下,安定团结,一定会把各项工作做得更好,不辜负党和人民的重托。”

# 第1330回：开人大，恩来抱病作报告 邓小平，提出“部队要整顿”

中共十届二中全会刚刚结束，1月13日，四届人大开幕。毛泽东仍然在长沙，但四届人大完全照毛泽东的指示进行。大会由朱德主持，周恩来作政府工作报告，张春桥作《关于修改宪法的报告》。

四届人大的开幕式是在晚上20时举行的。这么重要的会议放在晚上开幕是为了照顾患病的周恩来。

会场上，2800多名代表倾心静听了周恩来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熟知内情的人清楚，这可能是周恩来担任总理以来最后一次作《政府工作报告》了，从他那略显苍老、疲惫的声音中，人们仍然感到了坚定和希望。



1975年1月，周恩来在四届人大会议作政府工作报告。

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说：“我国农业连续十三年夺得丰收，1974年农业总产值预计比1964年增长51%。这充分显示了人民公社制度的优越性。全国解放以来，尽管我国人口增加60%，但粮食增产

1.4 倍,棉花增产 4.7 倍。在我们这样一个近 8 亿人口的国家,保证了人民吃穿的基本需要。工业总产值 1974 年预计比 1964 年增长 1.9 倍,主要产品的产量都有大幅度增长,钢增长 1.2 倍,原煤增长 91%,石油增长 6.5 倍,发电量增长两倍,化肥增长 3.3 倍,拖拉机增长 5.2 倍,棉纱增长 85%,化学纤维增长 3.3 倍。在这 10 年中,我们依靠自己的力量,建成了 1100 个大中型项目,成功地进行了氢弹试验,发射了人造地球卫星。同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动荡、通货膨胀的情况相反,我国财政收支平衡,即无外债,又无内债,物价稳定,人民生活逐步改善,社会主义建设欣欣向荣,蒸蒸日上。国内外反动派曾经断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定会破坏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现在事实已经给了他们有力的回答。”

他说:“遵照毛主席的指示,三届人大的政府工作报告曾经提出,从第三个五年计划开始,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可以按两步来设想:第一步,用 15 年时间,即在 1980 年以前,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

这天,张春桥也在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作了关于修改宪法的报告。

他说:“毛主席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同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原则,为我们制定了一条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毛主席说:‘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要认识这种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要提高警惕。要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要正确理解和处理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问题,正确区别和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不然的话,我们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就会走向反面,就会变质,就会出现复辟。我们从现在起,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使我们对这个问题,有比较清醒的认识,有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我们同刘少奇、林彪的斗争,集中到一点,就是坚持这条基本路线,还是改变这条基本路线。历史的和现实的阶级斗争都证明,这条基本路线是我们党的生命线,也是我们国家的生命线。只要我们坚

持这条基本路线,我们就一定能够克服一切困难,战胜国内外敌人,夺取更大的胜利。这就是我们的主要经验,也是我们这次修改宪法的指导思想。”

张春桥肯定“现在提出的这个修改草案,是1954年宪法的继承和发展。”同时说明了这次宪法的几点重要修改:

(一)“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我国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这是我国人民从一百多年来的历史经验中得出的结论,现在写进了修改草案总纲。草案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又规定:“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统率全国武装力量”。

(二)修改草案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规定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以工农兵代表为主体。又规定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和政策。农村人民公社和地方各级革命委员会,也分别写进了修改草案。这样,就明确地规定了国家的阶级性质,各个阶级在国家的地位。

(三)修改草案规定了国家机关一律实行民主集中制,又规定了公民的各项民主权利,其中特别规定了各兄弟民族和妇女的权利,还规定了人民群众有运用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权利。同时,根据毛泽东的建议,草案第二十八条增加了公民有罢工自由的内容。

(四)修改草案规定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和社会主义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是当时阶段中国主要的两种所有制形式。修改草案对于非农业的个体劳动者,对于人民公社社员可以经营少量的自留地和家庭副业,也作了规定。

(五)将“中国永远不做超级大国”写进了修改草案。

当天,周恩来参加了四届人大天津代表团讨论。

天津,是周恩来早年生活、求学和参加爱国运动的地方,对天津和天津人民,周恩来历来有着深厚的感情。面对关心自己的天津代表,他袒露了心音:

“我已经得了癌症,工作的时间不会太长了,这也是自然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现在,我正在医院里同疾病作斗争,在可能的情况下,我还要继续和大家一起奋斗,共同实现我们的宏伟目标。”

四届人大开过不久,江青把王海容、唐闻生找去,几乎对所有的中央政治局委员都骂了一遍。她要王、唐二人向毛泽东报告她的看法。

1 月 16 日,邓小平陪外宾到长沙。陪同前来的王海容、唐闻生向毛泽东汇报了江青对四届人大人事安排的不满。毛泽东听后生气地说:“她看得起的人没有几个,只有一个,她自己。”

“你呢?”王海容惊异地问毛泽东。

毛泽东摇摇头说:“不在她眼里!”

他接着又讲:“将来她会跟所有的人闹翻。现在人家也是敷衍她。我死了以后,她会闹事。”

1 月 17 日,四届人大一次会议全体会议,根据中共中央的提议,周恩来连任国务院总理,副总理为:邓小平、张春桥、李先念、陈锡联、纪登奎、华国锋、陈永贵、吴桂贤、王震、余秋里、谷牧、孙健。在国务院副总理的候选人名单上,原本还有李富春。不巧,他在 1 月 9 日去世,正值四届人大召开前夕。

1 月 17 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禁止抢夺武器问题的通知:

浙江、云南省委并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各军区、省军区党委:

毛主席最近指示“凡有两派的地方,民兵不要搞进去。”但目前,浙江、云南的个别地区、单位,资产阶级派性严重,两派对立,把民兵组织搞了进去,坏人乘机挑动,分裂民兵,抢夺武器进行武斗,破坏革命、生产秩序,危害人民生命安全。为了贯彻执行毛主席指示,实现“安定”、“团结”,发展大好形势,中央规定:

一、不论什么人以任何借口抢夺武器,利用民兵组织搞武斗都是错误的,都是不容许的。

二、凡因资产阶级派性严重,在思想上组织上还没有联合好的地区和单位,一律不要成立“民兵指挥部”或“民兵团”之类的机构,一律不要给民兵发枪。民兵组织要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下,在大联合的基础上逐步加以整顿,通过整顿民兵促进实现革命大联合。

三、凡已发生抢夺武器进行武斗的地区和单位,省委应责成有关部门立即收缴被抢的武器、弹药,集中封存,妥善保管。

1 月中旬,在北京召开各大军区负责人座谈会。1 月 19 日,邓小平在各大军区负责人座谈会上,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提出,军委只准备

两项工作:第一是召开军委扩大会议,其中一个大题目就是军队要整顿。第二是战备,要准备打仗,解决战备方针、装备等问题。他还指出:搞派性的军队非调走不行。所有闹派性的人一律调走,一个兵都不留,一个干部都不留。凡是有两派的地方,派性没有解决的地方,民兵一律不建立,枪也不要发。他说:军队也有安定团结问题。不管几项工作任务,今年内每个党委第一条是要安定,要团结。

1 月 25 日,邓小平作为总参谋长,在总参谋部机关团以上干部会议上和大家见面,发表《军队要整顿》的讲话。他传达了毛泽东“军队要整顿”的指示,分析军队的现状,批判林彪主管军队造成的混乱。

他说:“现在,好多优良传统丢掉了,军队臃肿不堪。军队的人数增加很多,军队开支占国家预算的比重增大,把很多钱花费在人员的穿衣吃饭上面。更主要的是,军队膨胀起来,不精干,打起仗来就不行。我想军队绝大多数同志是不满意这种现状的。所以毛主席提出军队要整顿。”

“我们要按照毛主席关于安定团结的指示,整顿军队。这些年来,我们军队出现了一个新的大问题,就是闹派性,有的单位派性还很严重。这个问题主要在干部。”

“要安定团结,就必须消除派性,增强党性。”

“再一个问题是军队的纪律很差。”

“现在提出加强纪律性,首先要从我们北京的机关、部队做起。不抓怎么行?所以,军队的整顿,一个是要提高党性,消除派性;一个是要加强纪律性。”

会后第二天,1 月 26 日,叶剑英致信给毛泽东,建议以西沙战后成立的军委 6 人小组为基础,扩大组成军委常委会,并提出了人选名单。

这期间,江青独自飞往长沙,住进蓉园王洪文和周恩来住的楼里,就在毛泽东住的楼下边,两处相距不远。警卫和工作人员从下面到毛泽东住的上面,都是步行走小径,穿过一个小门就到了。但首长去见毛泽东时,都是乘车走汽车道从下面到上面。临去长沙前,江青给随毛泽东在长沙的汪东兴打电话,让汪东兴确定由谁担任跟她到湖南的警卫负责人。汪东兴说:“还是让邬吉成跟你去吧。”

到达长沙后的一天,江青对邬吉成说:“你准备车,咱们到上面

去。”邬吉成想:她说到上面去,自然是要到毛主席那里和毛主席见面。但是,即便是江青见毛泽东,也必须先做请示批准。邬吉成以为江青已经联系好了,就调了车,并布置说:“去见毛主席。”

车来了,江青上了车,邬吉成跟在后面,直奔毛泽东住的楼。也就是一两分钟,车子就开到了毛泽东住的楼停车的门厅里。守在这里的警卫团一大队副大队长陈长江,见有车子进来,就走了过来,打开车门见是江青,说:“主席还在睡觉呢,请您稍等一下。”

谁知江青一见是陈长江,脸一下就变了,说话也紧张得有些变调:“不对,不对,怎么到这里来啦?不是到老汪那里吗?快走,快走!”因为她知道陈长江所在的一大队是紧随毛泽东担任保卫的,她此刻是在没有事先请示并获得同意的情况下,就闯到毛泽东的住所来了。她车也没有下,就叫陈长江赶快把车门关上了。

邬吉成这才知道江青对他说的到上边,不是到毛泽东这里,而是要到在江青上面,在毛泽东下面住着的汪东兴、张耀祠那里。

车子又转到汪东兴、张耀祠的住处,江青进去见了汪东兴,谈了很长时间。第二天,汪东兴又把邬吉成叫到他那里,问了许多有关钓鱼台里的情况……

毛泽东见了江青,对她说:“对你的意见,我已写信告诉你了。”“不要随便,要有纪律,要谨慎,不要个人自作主张,有意见要跟政治局讨论。人要有自知之明。”

1 月 29 日,张春桥、姚文元根据周恩来传达的毛泽东长沙谈话的指示,将摘录、整理的列宁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论述送毛泽东阅。毛泽东批示:“同意印发政治局委员。”

30 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举行会议,周恩来主持研究国务院副总理分工问题。

当天,周恩来主持国务院各部委负责人会议,他说:“今天没有什么议事,就是同大家见一见。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和中央的决定,我们从今天开始来完成四届人大以后的工作,把国务院的组织健全起来。今天是开始,恐怕我也只能完成这个开始的任务,将来这样的会,请小平同志主持。希望新的国务院成立以后,出现新的气象,争取今年第四个五年计划能够完成而且超额完成。”

2月1日,周恩来请邓小平将各副总理分工列出。当天下午,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主持召开了四届人大闭幕后的第一次国务院常务会议,国务院全体副总理出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列席。会议审定了国务院12位副总理的分工。确定邓小平“主管外事,在周恩来总理治病疗养期间,代总理主持会议和呈批主要文件;张春桥分管文化教育;李先念、纪登奎、华国锋三名常务副总理负责处理国务院日常事务。”。

周恩来在会上宣布:邓小平同志担任第一副总理,张春桥担任第二副总理,李先念同志担任第三副总理。他说:“这三位副总理的排位是毛主席定的,其他九位副总理由我们自己来排。”

他说:“我身体不行了,今后国务院的工作由小平同志主持。”

2月1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后,周恩来又主持召开有国务院各部、委负责人参加的国务院全体会议,他说:“今天没有什么议事,就是同大家见一见。我身体不行了,今后国务院的工作,由小平同志主持。医院是不想放我出来,但我还是想争取每星期来和大家见一次面……”

周恩来在讲话中,向大家传达了毛泽东在四届人大筹备期间所作的关于人事问题和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

周恩来说:“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和党中央决定,我们从今天开始来完成四届人大以后的工作,把国务院的组织健全起来。

今天是开始。恐怕也只能够完成这个‘开始’的任务了。以后的事情,主要是由各位副总理来做。

毛主席讲,小平同志‘人才难得’,‘政治思想强’。现国务院新班子以小平同志为首,一共12位。将来这样的会,请小平同志主持。我希望,新的国务院能出现新的气象,领导全国人民努力完成和超额完成今年的国民经济计划和第四个五年计划!”

接着周恩来宣布各副总理的分工……

邓小平也讲了话。

次日,周恩来致信毛泽东,汇报国务院各副总理分工情况。毛泽东圈阅了周恩来的信。

# 第1331回：离长沙，毛泽东来到杭州 批《创业》，恢复军委常委会

1975年2月2日，毕业分在吉林省镇赉县县委办公室工作的吉林财贸学院大学生郭冰，随同县委书记朱凤海下乡考察调研，一路上住的是公社招待所土炕，吃的是一饭一菜，每餐交四两粮票两角钱。

2月5日，他们来到吉林省镇赉县莫莫格公社。晚饭后，县委书记朱凤海对郭冰说：

“你先休息吧，我去看看老房东，老人家爱喝茶，我给他带了两斤好茶叶。”

朱书记去看望老房东、老贫农老潘头了，还给他送礼，这让郭冰这位大学生思绪万千，久久不能入睡。

次日他们又来到镇赉县岔台公社，这里东南几个村屯都是鱼米之乡。公社邢书记见到他们后说：“附近社员正在拉网捕鱼，一起去看看？”

县委朱书记高兴的答应了。

到了东北人称作“泡子”的湖边，大家下了吉普车，县委朱书记和社员们就像见了老朋友一样打着招呼。看得出来，他和社员们都很熟识。随后，朱书记也随手拿起一个铁钩子，非常熟练地和社员一起拉网。

干了一个时辰后，大家回到公社招待所休息。过了一会儿，公社书记来叫他们吃饭。到了食堂，只见餐桌中间摆着一盘硕大肥美的鲤鱼，桌上还放着四个酒盅。县委朱书记走到桌前，把酒盅摞起来，放在一边。公社邢书记说：

“不是特意准备的，赶上了，喝两口吧。”

县委书记不说话，摇摇头。

公社邢书记又笑着对郭冰说：“大冷天，喝点，暖暖身子。”

郭冰沉思一下说:“你的心情我们领了,县里有规定,干部下乡不许喝酒,咱们就免了吧。”

公社邢书记说:“好吧,你们慢慢吃,我就回家了。”

1975 年 2 月 3 日,农历腊月二十三,毛泽东结束了在长沙岳麓山下长达 114 天的休养,于早晨启程东进,前往江西南昌。

在长沙期间,毛泽东本想再去离这里不远的家乡韶山看看,拜访一下父老乡亲,到父母墓前再祭扫一次。韶山有关部门也已做好接待准备。但出于健康的原因,毛泽东没有能够如愿。他临走时对大家说:“我在长沙住了一百多天,你们已经很辛苦了。‘客散主人安’。我走后,你们好好过个春节吧!”一席话,说得周围的人们热泪盈眶。

深深眷恋着故土的毛泽东也许没有想到,这一次,竟是他同“生于斯,长于斯”的湖南的最后诀别。

2 月 3 日这天,中共浙江省委书记谭启龙刚起床不久,中央办公厅汪东兴在长沙通过保密专线打来电话,告知:“毛主席将在 2 月 8 日乘专列到杭州,请你们做好接待工作,并负责浙江境内铁路沿线的安全。”

几天前,谭启龙曾给湖南省委领导打过电话,湖南省委的领导告诉他:“主席在湖南还要住些日子……”谭启龙也考虑,“毛主席这次可能要回韶山老家看看,近期不能到杭州,”但是他“没想到毛主席这么快就要来杭州。”

放下电话,谭启龙没敢耽误,立即吩咐秘书将电话内容整理一下,派人给铁瑛送去。浙江省委工作现由他和铁瑛两人负责。

秘书走后,谭启龙仍然不放心,又亲自到办公室找到铁瑛。

毛泽东要来杭州,铁瑛和谭启龙一样内心里有一种复杂的情感。从内心里讲,他们希望早一点儿见到毛泽东。但是又担心毛泽东的安全。自“批林批孔”以来,浙江地区派性复发、武斗频繁,此时已成为全国最混乱的省份之一。

令他们最不放心的是毛泽东专列必经之地的金华地区,此时派性斗争更加激烈,派仗已发展到相互之间动用各种枪炮的程度。

“你看怎么办?”谭启龙看着一直在思考的铁瑛说。接到通知的那

一刻,铁瑛就没有停止过思考。上海刚解放时铁瑛曾负责过上海局势的稳定工作,当时的局面也很混乱,可以说什么样的场面他都经历过,但这次情况不同。铁瑛说:“专列进入浙江境内的安全确实是一个大问题,不怕一万就怕万一,我看安全问题除了我们自己全力以赴外,还是跟汪东兴联系一下,叫他们有个思想准备,承担起主席的安全保卫工作。”

谭启龙也有这个想法,他通过保密电话接通了汪东兴的专线,将现在浙江的情况向汪东兴讲了一下。特别提到了对毛泽东专列经过浙江时安全问题的担心。其实不说,汪东兴对浙江的情况也了解。汪东兴说:

“你说的情况我们都清楚,主席的安全问题,由我们随行的警卫部队负责,你们放心好了。”

见谭启龙还不放心,汪东兴安慰谭启龙说:“你们放心吧,毛主席走到哪里,哪里就安定,到了浙江你们那里就好了。”

汪东兴说的一点不错,别看派仗打得那么厉害,但是毛泽东一到哪里,哪里肯定安定,这就是他的威望所在。

话虽然这样说,谭启龙和铁瑛仍然轻松不下来,为确保万无一失,他们二人立即召开省委会议研究毛主席来杭安全保卫工作。会上决定,以省委的名义向金华两派群众下死命令。会议结束后,省委派专人到金华找到两派头头,转达了省委的命令:2 月 6 日,将有“重要外宾”的专列途经金华,在专列经过期间,不管哪一派都不许开枪肇事,要确保专列畅通无阻和绝对安全,否则,一切后果自负!

2 月 3 日,毛泽东乘坐的专列离开长沙,一路东进,直驶江西省会南昌,在这里停留了 3 天。2 月 5 日,又由南昌启程继续向东,于 2 月 8 日到达他此次南下的最后一站——浙江省会杭州。

杭州,是建国以后毛泽东常去的地方。从 1953 年冬天首次来杭,他几乎每次南下都要在这里住上一段时间,有时一年要来几次。毛泽东自己说过,“杭州是我的第二故乡”。杭州的群山留下他二十年来无数次足迹。在这里,毛泽东曾写下《五律·看山》、《七绝·莫干山》、《七绝·五云山》这些咏山的诗作,还写过《七绝·观潮》、《满江红·

和郭沫若同志》。

然而,这时的毛泽东,不仅再也无法像过去那样登山,就连出门散步也很困难。日渐严重的衰老和疾病,使这位年逾八旬的老人越来越不“自由”了。

就在毛泽东离开南昌的当天,2 月 5 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取消军委办公会议,恢复军委常委会作为处理军委日常工作的办事机构:

1975.02.05;中发[1975]3 号

毛主席已圈阅。

(一)为了加强军队建设和战备工作的领导,毛主席、党中央决定取消军委办公会议,成立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会。

(二)叶剑英、王洪文、邓小平、张春桥、刘伯承、陈锡联、汪东兴、苏振华、徐向前、聂荣臻、粟裕十一位同志为常务委员。军委常委会由叶剑英同志主持。

总参谋部第一副总长,总政治部第一副主任,总后勤部党委第一书记,军委办公厅主任列席常委会议。

(三)军委常委会是在毛主席、党中央领导下,处理军委日常工作的办事机构。对军内外一律用军委名义,不用军委常委会名义。

调整中央军委领导班子,是毛泽东不久前提出“军队要整顿”的一部分。尽管王洪文、张春桥也被列为军委常委会成员,但真正在军队日常工作中起主要作用的,是刚担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的邓小平。

此后,在叶剑英主持下,对编制、装备、科研、管理和干部等方面进一步进行调查研究,为军队整顿和军委扩大会议的召开做了一系列充分的准备。

2 月 5 日,姚文元在《红旗》杂志编辑组召集人谈话时说:

“主席讲商品制度,货币交换,八级工资,我们有经验,要研究。一个是三自一包,不限制商品交换,完全听价值规律起作用,发展下去就是高薪等等,资本主义泛滥。还有一种是完全取消商品生产。这次主席讲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一是在无产阶级专政下,一是限制。为什么要限制?为什么只有在无产阶级专政下才能限制?

人大开会时,住京西宾馆代表抢购东西。百货大楼,招待代表,享受资产阶级法权,这不是中央规定,北京搞的。”

他提到:“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有学生绝食。他们实行社来社去,一批学生不干,一条歪理,分配在国家机关、工厂也是为人民服务,不回农村。本来和农民差别不大,但是要求资产阶级法权。党委要本届改社来社去,他们要求下届才改,问题未解决,就绝食。”

他说:“两派问题,总要想办法,搞下去只能对敌人有好处,不能批资,也不能提高群众觉悟。主席的话不知说了多少遍,不听。这是一种社会现象。这次学习运动看能否解决一下。两派搞民兵互相打就糟了。”

姚文元还提到了电影《创业》。

早在1971年11月,长春电影制片厂副导演华克到大庆油田收集素材,培训油田创作人员。在当时大庆革委会、军管会的领导下,成立了由文化部门、宣传部门干部和基层工人及专业创作人员组成的“三结合”写作班子,由华克执笔完成了题为《钻塔战歌》的剧本初稿。

1972年夏,江青看了登载在1972年第7期《中国文学》上的《王铁人的故事》一文后说:“大庆红旗是毛主席树的,王铁人是站得住的”,“《中国文学》上的这篇文章很好,可以以这个材料作为基础,不要写真人真事,不要用'铁人'的名字,用他的材料,不要局限在大庆,多跑几个地方,视野开阔些,要塑造典型嘛!要从玉门写起,这是历史。”

江青的指示传达到长春电影制片厂后,厂部立刻加强原大庆剧本的创作力量,派遣美工和有关人员到油田体验生活。1972年11月26日,由导演于彦夫带队,编剧张天民、副导演华克、场记李瑞麟、美术王崇等一行7人到大庆,用了7个多月的时间进行调查研究,走访了4个油田和王进喜的家乡,阅读了几百万字的材料,先后与100多名石油工人和干部进行了谈话,最后决定剧本取名《创业》。

1974年底,这部电影终于完成,长春电影制片厂将影片送国务院文化组审查,获得了文化组成员的一致好评。身为文化组副组长的于会泳激动地说:

“《创业》是部好影片,我在看的时候,不止一次地掉泪。”

他还说:“这是文化革命又一个巨大的成果。我初步地归纳了一下,《创业》有十个好:剧本好,故事好,人物好,对话好,画面好,音乐好……思想也好。尽管还有些小缺点,但总的来说,是近年来少见的一部好影片。”

1974 年 11 月,国务院文化组通知首都各新闻单位去观看长春电影制片厂摄制的影片《创业》,要求各新闻单位做好对这部影片的宣传工作。

这时,正值全国“四届人大”召开前夕,摄制组为给大会献礼,先后四次上报国务院文化组审查,每次审查文化组都是一方面肯定,另一方面又提出一些修改意见,最多的意见是片子太长,要限制在两个半小时以内,多一分钟也不行。

《创业》在第四届人大会议的闭幕式上放映,受到了代表们的好评。

经文化组讨论决定,正式呈文上报中央,请示将这部影片于 1975 年春节在全国上映。

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先后批示同意,江青也圈阅同意。1975 年 2 月 5 日在《红旗》杂志编辑组召集人谈话时,姚文元再次提到了这部电影,他说:“评电影《创业》有无把握,我和江青都没有看。文化部写文章也要写缺点方面,有点见解,不要一笔带过,分析有好处,好的故事片。”

2 月 10 日,大年三十,《人民日报》在头版发表了《创业》将上映的消息,概括介绍了影片的内容,指出:影片《创业》的摄制,成功地塑造了主人公周挺杉在阶级斗争、路线斗争中的英雄形象,为我国工人阶级高唱赞歌。并以半版篇幅刊登了 5 幅剧照。

当天中午,正在午睡的姚文元,接到江青秘书的电话,姚文元的秘书作了记录:

遵江青同志嘱,打电话给文元同志:

今天,《人民日报》用了极大的篇幅吹捧《创业》,我建议《人民日报》和《红旗》今后不要再登这类东西。

另外,我建议,对《创业》电影组织一篇有说服力的评论文章。这

种评论权力我们不能放弃。可以评好,也可以批坏……

姚文元起床后,立即落实江青的电话指示。他首先给《人民日报》打电话,指示以后不要再登赞扬《创业》的文章,要登,需经他同意。接着又让秘书给《光明日报》莫艾打电话:“对《创业》电影的评论、剧照、材料都要送文元同志看,未看以前不要登。”

这些都做完后,姚文元给江青回电话说:“我完全同意江青同志的意见。中午我起床后就给《人民日报》打了电话,要他们以后不要登这类文章,要登要经我同意。我在电视上看了一半不到,给我的印象是很乱,不清楚……”

第二天,2 月 11 日,农历大年初一,《创业》按预定计划在全国正式放映。这是文革后中国自己摄制的第一部故事影片,由于创作和制作队伍的阵容强大,创作与制作过程都精益求精,精雕细琢,故事紧凑,情节生动感人,又符合当时的政治形势,所以,《创业》上映后,观众反应十分强烈,长影很快就收到了大量的群众来信。普遍认为“这是一部优秀影片”,“是一部开展爱国主义教育的好教材”,有的工厂和企业还做出了看《创业》,学习周挺杉的决定。

谁知,天有不测风云。就在第三天,2 月 12 日,正月初二,也是《创业》上映的第二天,江青一个紧急电话把于会泳等人召集到钓鱼台 17 号楼。她一见到于会泳他们劈头就问:“《创业》这片子这么糟,你们为什么批准发行?”

于会泳一时懵了,摸不着头脑,不知如何作答。

江青火了:“说呀! 回答我!”

于会泳这才回过味来,只好回答说:“我们向中央打了请示报告的。您也画了圈的……”

江青的火气更大了:“画圈又怎么啦? 画圈不等于同意!”她指着于会泳说:“你,吹捧得最厉害! 跟我说这部片子这样好,那样好,这是部什么东西!”

接着,江青对《创业》一通数落,在场的于会泳等人这才明白,江青对《创业》不满的关键,是其中有党中央给石油工人送毛泽东的著作《矛盾论》、《实践论》的情节。江青说:“你们知道吗? 当年这‘两论’

是谁叫送的？是刘少奇！把这个情节搬上银幕，是美化刘少奇！还有，当年主持油田会战的总指挥是谁？是余秋里、康世恩，全是走资派！这不是明目张胆地为刘少奇涂脂抹粉、替执行修正主义路线的老家伙评功摆好吗！还是文元同志的眼光敏锐，一下子看出了《创业》的要害！”

最后，江青命令道：“回去你们先讨论一下，这片子还有什么问题，然后叫长影修改，你们对此要做出检查！”

四届人大后，国务院文化组已正式组建为文化部。于会泳被任命为文化部长，浩亮、刘庆棠为副部长。挨了江青批评的于会泳等人，回到文化部立即召开了文化部核心组的紧急会议，迅速以文化部的名义，当日向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发出对《创业》不再印制拷贝、报纸上不发表评论文章、电视广播停止播放的通知。各方面组织的关于《创业》的评论文章，也都束之高阁。

# 第1332回：下《通知》，“国民经济搞上去”行动难，毛泽东患白内障

王洪文曾关照上海市委领导马天水和王秀珍，让他们多关心上海新选进“十大”的中共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给他们补上文化大革命这一课。1975年2月15日晚上，王秀珍带着原5703厂的祝家耀、上钢一厂的周宏宝、江南造船厂的张国权、海运局远洋轮的冯品德、纺织局停经片厂的汪湘君、上海市第五百货商店的陈佩珍等在上海的“十大”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来到上棉十七厂王洪文当年的办公室。因为调往公安部工作的祝家耀这次回上海后，就要返回北京了。王秀珍领他们到上棉十七厂王洪文当年的办公室，是对他们进行文化大革命的教育。

王洪文在上棉十七厂的保卫科办公室位于厂部办公大楼的底层，从大门进去一拐弯就是。办公室很小，只有10多个平方来，光线也很阴暗，里面要坐3个人。王洪文的办公桌在房间的角落里，又旧又矮，毫不起眼。唯一可以说明这张桌子的主人的标志，就是在桌面上的小玻璃板底下，压着一张当年写有“王洪文”姓名的选民证。

王秀珍介绍了王洪文的造反经历，告诫他们不要忘记这些历史。

以后，这间小屋被冠以“王副主席办公室”的称号，郑重其事地原样保存了下来。王秀珍要求，办公室里的桌椅都要按照当年的情况放置，那张压在玻璃板底下的选民证也不准挪动。

再看浙江。2月8日，为迎接毛泽东到来忙得不可开交的谭启龙和铁瑛，一切准备完毕。二人仍不放心，又来到毛泽东住的地方再次仔细地检查了一遍，见确没什么纰漏的地方后，才驱车来到杭州艮山门火车站。

按预定的时间，毛泽东的专列半个小时后就要到达这里。此时，整个车站被浓雾遮挡，一片朦胧。时间一分一秒地流逝，谭启龙和铁瑛等人心急如焚，他们不断向钱塘江大桥方向着急地张望.....

就在望眼欲穿的时候,一声长长的汽笛划破了晨雾中的静谧,毛泽东的专列冲破浓雾远远驶来,站台上等候已久的谭启龙和铁瑛一颗悬着的心这才放了下来。铁瑛对谭启龙说:“谢天谢地,总算没有出事。”

列车刚刚停稳,谭启龙和铁瑛两人便迫不及待地进入毛泽东的车厢。由于长时间坐车,毛泽东显得十分疲惫。

好长时间没见,年迈体弱的毛泽东比以前苍老了许多,见他们进来,他用手扶着沙发把手努力站起身,迟缓地伸出手同他俩轻轻地握了握手说:“让你们久等了,你们不是挨打了吗?”

毛泽东的话一出口,谭启龙和铁瑛二人心头一热,流下了眼泪。

那是半个月前,中共浙江省委在杭州饭店召开县以上干部会议,传达中共十届二中全会和四届人大一次会议精神。会议期间,金华地区的部分群众冲进会场,混乱中,强行将谭启龙和铁瑛从主席台上拖下来,架出会场,准备带到金华扣留。幸好警卫部队及时赶到,才将二人夺了回来。在这场“争夺战”中,谭启龙和铁瑛当然也挨了不少拳脚。他们没有想到毛泽东对他们的情况这样了解,感动之余,二人纷纷检讨说:“发生这件事,主要是我们省里工作没做好。”接着,他们又叙述了省委会议的详细经过。毛泽东注意听着,并默默点头,但未发一言。

车厢虽然有暖气,春暖乍寒仍有丝丝冷意。谭启龙对毛主席说:“我们回住地。长时间坐车,您也累了,您先休息一下,找时间我们再向您汇报。”

毛泽东听后点了点头表示同意。谭启龙和铁瑛一起携扶着毛泽东下车后,乘车来到刘庄。

中共浙江省委开会研究决定:毛泽东在杭期间,由一名主要领导负责毛泽东在杭期间的安全警卫工作,最后决定由铁瑛负责。会议结束后,为了方便工作,铁瑛搬到刘庄六号楼住下。这样,住在一号楼的毛泽东,便可随时在住地召见铁瑛,听取汇报。

铁瑛曾在1972年参加中央揭批林彪罪行的会议上,被周恩来称为“痛快”之人。这次在毛泽东面前,他汇报了“批林批孔”以来出现的种种问题,说:运动开始后,全省已有许多工厂停工,本来已经好转

的生产形势,一下子乱开了。如杭州钢铁厂,1973 年时已炼出特等钢,但“批林批孔”一来,群众又起来了,甚至还说,多生产几吨钢算什么?苏联钢多,还不是修正主义?此外,农村目前也受武斗影响,浙江本来是江南鱼米之乡,现在却不得不从北方几个省临时调运玉米面、地瓜干当口粮。他说:现在浙江各派都喊着改造党委领导,突击入党、突击提干,给省、市提出名单,要求按名单安排,“我们现在一直顶着,一旦放开,全省的局面就彻底垮了。”

浙江省这种混乱局面,显然超过了毛泽东的想象,在多次听取汇报后,他说:“浙江不能再乱下去了,你们的做法是正确的,我支持你们。”他对身边的机要秘书说:联系一下,派部队把群众占领的饭店拿回来。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中央军委批准调动浙江部队一个团,将“占领”杭州饭店的那派群众赶了出去。这一举动,向全省乃至全国发出了一个信号,浙江由此开始逐渐稳定起来。

本来,1973 年国内生产总值比上年增长 7.9%,其中工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 9.5%。但到 1974 年,经济出现严重滑坡。国内生产总值比 1973 年只增长 2.3%,其中工业总产值只增长 0.6%,几乎停滞不前,没有完成工业生产计划。主要工农业产品,除原油、粮食增长外,其他全都减产。钢产量比 1973 年下降 410 万吨。原煤产量下降 400 万吨。铁路货运量下降 5.3%,比 1973 年少运 4321 万吨。外贸逆差 13.4 亿美元。全年财政赤字 7.7 亿元。2 月 10 日,毛泽东在杭州批准《中共中央批转 1975 年国民经济计划通知》及其附件《1975 年国民经济计划主要指标》。按照这个计划指标,1975 年全国工农业总产值比上年预计数增长 11% 左右。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在中央的《通知》中,首次向全党提出“把国民经济搞上去”。

毛泽东到杭州的第四天,是农历正月初一。担任毛泽东警卫的战士们特意赶制了一个大蛋糕送给毛泽东以祝贺春节。毛泽东看到大蛋糕后非常高兴,警卫人员把他扶到蛋糕旁,他亲手切开蛋糕并吃了一块。他边吃边对身边的人员说:“你们也吃,大家一块来吃。”

毛泽东这次来杭州,主要是检查和诊断病情,进行休养。虽然经过前段时间的休养,但是,他的身体比在武汉、长沙时好不了多少:除

了双目白内障、说话含混不清外，两腿还时常疼痛，脚也肿得厉害，行动更加不便。每次来杭州，毛泽东工作之余或晚饭之后，经常会走出书房到湖边散步，有时也到枫树下休息、看书、朗读英语。这次因身体原因，每天早晚由人搀扶着沿园中的草坪散步，虽然步履维艰，但他仍习惯边踱步边吸烟沉思。

鉴于自己病情的日渐加重，毛泽东终于批准医疗小组再次对他的身体进行一次全面的检查。

春节前的一天，北京刚刚下过一场雪，气温骤降。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敲开了北京中医研究院广安门医院眼科负责人唐由之的家门。

进来的是位解放军，年龄大概 40 多岁，他对唐由之说："唐由之，是你吗？"

唐由之答道："是我。"

来人说："你有一些任务，需要出去几天。"

唐由之让家人给他准备出门的衣服，又问："粮票要不要带？"

来人说："不用带。"

唐由之拿了随身换洗的衣服和洗漱用具，就随那位军人上了汽车，去哪里？他没有问。

汽车一路疾驰，很快来到了北京南苑机场。在这里，唐由之看见了比他先到的他们医院的护士高培质。她问唐由之："咱们到哪儿去？"

唐由之说："不知道。"

但是，凭借之前多次给领导人治病的经验，唐由之断定，这将又是一次特殊的任务。果然，在飞机旁，他们见到了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汪东兴的出现，让唐由之对自己的任务有了一些预感。

记得不久前，1974 年冬天，48 岁的唐由之被通知到北京解放军 305 医院进行一次会诊。而当时的 305 医院是专门给党和国家领导人看病的医院，这次会诊，仅眼科大夫就来了七、八位，唐由之是其中唯一的一位中医大夫。

那天，唐由之一进 305 医院的会议室就感觉到情况有些异常，怎么来了这么多医生？有皮肤科的、有心脏科的、有呼吸科的、还有眼科的，有好几十位。按照过去会诊的习惯，报告完病例后就去看病人。

但这次不一样,由专人来报告病例,病人既没有姓名,也没有籍贯,更没有职业,只知道是个男性和大致的年龄。在报告病例的时候也不是专讲眼科,而是把整个身体状况系统性地讲一遍。

在报告完病史后,一位领导请各专业分头进行讨论,主要是:对这个病你们还需要了解些什么?初步印象是什么病?你们打算如何进行治疗等等。

眼科组的意见很明确,这是典型的老年性白内障。但是这个人白内障究竟发展到了什么程度还不十分清楚,根据病历分析只是知道他的视力看书已经很困难了。

在那次神秘会诊后的一个月内,唐由之又接连参加了两三次这样见不到病人的会诊,大家一致认为患者白内障的最佳治疗方案是进行手术。这时有人问唐由之是否需要一名助手,他提出由广安门医院的护士高培质来当助手。

这次,唐由之和高培质乘坐的飞机降落在了杭州。他们来到西湖,当晚住在雷峰塔那边。

原来,中央这次是从北京几家医院抽调了包括神经科、眼科、内科等著名专家在内的医疗组5人到杭州,为毛泽东做全面检查。其中为了加强医治白内障的力量,中央专门调来两位著名的眼科医生,张晓楼和唐由之。晚上,汪东兴告诉他们说:“明天你们要见到毛主席了,主席请你们来为他检查一下眼睛。”

知道要见毛泽东,大家既高兴又紧张。唐由之后来回忆道:想到第二天就要见到毛主席了,自己兴奋的一夜难眠。毛主席的光辉形象开始在脑子里不断涌现:红光满面、神采奕奕、精神焕发,身体很好。

怀着无限的憧憬,第二天吃过早饭,唐由之等人便坐着红旗轿车来到毛泽东的住处。医疗组的5个医生按照年龄的顺序排队走进了毛泽东的休息室,唐由之排第四,这是他平生第一次见到毛泽东,但是这次见面却让他大为吃惊。

只见屋里沙发上坐着一位老人,身上穿了一件带补丁的旧毛巾衣,脚上一双拖鞋,头发很乱,身子靠在沙发上。旁边有位女的,后来才知道是张玉凤。

张玉凤对坐在沙发上的老人说:“主席,医生们要来给你检查了。”

毛泽东一听,就要站起来。可是怎么也站不起来。张玉凤要搀他,大家一见,也赶快跑过去,对他说:“主席,您不要起来了。我们都是小辈儿。晚辈儿们过来替您看看眼睛。您不要起来,坐了,坐了。”

大家一一通报了姓名,第二个报名的是同仁医院眼科专家张晓楼。毛泽东一听他叫张晓楼,便说:“那你住的房子永远大不了了,你是小楼嘛。”

他这么一说,大家的情绪放松了许多,但心情却很难受。他们没有想到自己的领袖身体已如此的虚弱,更没有想到毛泽东这么朴素,穿的衣服都是带补丁的,拖鞋也是旧的。大家都强忍着自己的眼泪没有流下来。

专家组很快为毛泽东作了检查。这是一次规模较大的体检,在杭州前后共进行了4天。除进一步确诊毛泽东患白内障外,在这次体检中还发现,毛泽东还患有肺心病、冠心病、右臂部褥疮和血中含氧量过低等病。但是,究竟对毛泽东的上述疾病如何进行医治,医疗小组仍需向中央政治局汇报后,才能制订医疗方案。

医疗小组的部分主治医生从杭州返回北京,准备随时向中央政治局汇报毛泽东的病情以及这次对毛泽东全面体检的情况,以期中央尽早对医治毛泽东的疾病形成一个完整的医疗方案。

2月19日,周恩来带病从解放军305医院来到人民大会堂,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听取医疗专家的汇报。在京的政治局委员全部到会。医疗小组的4位医生分别就毛泽东的心脏病和肺病的治疗,双眼白内障手术以及心电图、X光肺片检查所得到的进一步情况全面系统地向政治局委员们作了汇报。此前,毛泽东病情的危重程度,只有周恩来、叶剑英和江青3人比较清楚,绝大多数政治局委员基本上不了解。所以在医疗小组汇报过程中,与会的政治局委员大都感到有些吃惊。

对于毛泽东的老年性白内障,专家组一致认为,毛泽东的双眼白内障已经到了膨胀期,光用药物肯定没有效,最好的办法还是进行手术。这里关键是用西医的方法,还是用中医的方法,或是用中西医结合的方法进行手术。

在给毛泽东检查的时候,他们发现毛泽东咳嗽得很厉害,咳嗽时

痰很多,自己也吐不出来。他身边有个痰盂,毛泽东经常要趴下身子,靠地心的引力让痰吐出来。对此张玉凤倒有一个技术,她人很瘦小。手指很长,她用毛巾裹住手,伸进主席口腔,从嗓子眼里把痰抠出来。当时专家组考虑,这个手术一般要缝5针,这时如果咳嗽得厉害,缝合处就容易裂开,哪怕,只裂开一两针,都不得了,眼睛里的其它组织如虹膜、玻璃体都有可能因受到挤压而往外跑,更严重的说不定还会出现问题。所以手术的风险很大。

专家组一致主张,毛泽东不能像过去那样看书和批文件。毛泽东听了专家的汇报后只同意先治右眼,留出病状较轻的左眼坚持阅读和工作。

中央政治局在听取4位医生对毛泽东的眼部、部分脑干神经系统和心肺系统进行分别检查后提出的治疗方案的汇报后,表示"完全赞成主席先治眼病的决定","政治局常委当负主要责任处理此事"。

对毛泽东老年性白内障的医治方案,政治局委员很快取得一致共识。认为毛泽东的双眼失明问题急需马上解决,至于究竟采取何种医疗方案,政治局同意首先要眼科专家选择几位和毛泽东年龄相仿的白内障患者进行医治,取得经验后再对毛泽东施行白内障摘除手术。

在中央政治局确定对毛泽东的医疗方案之后,医疗小组马上开始着手对毛泽东眼病的手术准备工作。

张晓楼和唐由之两位医生在会诊后提出,对毛泽东最好以较为安全的针拨白内障的手术方式,清除眼中的白内障。这主要考虑到这种方法是中国传统中医眼科的成熟技术,既能在手术过程中照顾到像毛泽东这样年迈多病的患者万无一失,同时又因手术的时间短,可以减少病人的痛苦。不过医疗小组同时提出:中医的针拨手术虽可减少病人术中的痛苦,但病人眼中残留的混浊水晶体仍有复发的可能。

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周恩来问西医:"到底有多大把握?"

张晓楼说他有85%的把握。

周恩来又问唐由之有多大把握?唐由之说:"我们也有85%的把握。"

考虑到两种白内障手术方案各有千秋,中央决定在毛泽东尚未从杭州回京之前,尽快在北京着手进行两种手术的病例医治,在分别对

数起病例进行成功手术并形成经验以后,再报毛泽东,由他自己选定其中一种适合自己的手术方案。

医疗小组立即开始白内障手术的准备工作。他们把中直招待所的两间小会议室辟成临时病室,同时为40名高龄白内障患者分别进行白内障摘除术和中医针拨手术。这40名患者分为两组,一组由西医做白内障摘除术,另一组由中医进行白内障针拨术。两组医生既注意对患者的手术过程,同时也注意总结术后经验。

# 第1333回：武汉闹，枣阳县“杨垱事件”治云南，论无产阶级专政

1974年11月，湖北省枣阳县发生“杨垱事件”。起因是枣阳县革委会孙副主任认为杨垱公社革委会副主任所办黑板报宣传派性、破坏安定团结，命令民兵将这位公社的革委会副主任绑起来在水利工地游斗。杨垱区革委会主任赵根连前去解释遭拒绝，于是发生杨垱农民殴打县里民兵，抢下那位公社副主任，并去水利工地指挥部找县孙副主任理论。孙副主任则命令民兵关上大门，在墙头鸣枪示警。农民翻墙夺枪，将孙副任打得当场认错后放走。事后，枣阳县委书记王金欣向襄阳地委报告说“杨垱有一小撮反革命分子搞武装暴动”，请求派兵镇压。襄阳军分区政委、襄阳地委书记、革委会主任李俊决定调集襄阳、随县、枣阳和襄樊三县一市的民兵对杨垱镇合围。枣阳县成立民兵总指挥部，发布公告，宣称要“粉碎资本主义复辟”。县委任命副书记陈世章为总指挥长，县公安局长王槐青任副总指挥长，指挥数万民兵、警察、部队，乘汽车、拖拉机、摩托车开往杨垱。

杨垱区革委会主任赵根连在到附近两个区农民的支持下，带领万余名农民拿起汉阳造、三八大盖、猎枪、土铳抵抗。

对峙中杨垱镇燃起大火，杨垱农民多人受伤，杨垱区革委会主任赵根连抵敌不住，带领200余人乘坐拖拉机退到毗邻的河南南阳境内。其中农民数十人跑出南阳，一部分上京，一部分由湖北襄阳地区革委会常委、造反派头头张永善带领去武汉“告状”。

不久，河南省南阳军分区司令员向赵根连传达中央副主席王洪文指示：把赵根连交枣阳处理。随即赵根连被押回枣阳县民兵指挥部。“杨垱事件”结束。

1975年1月4日，武齐骅组织的“武汉地区革造民兵总指挥部”在汉口六渡桥小学举行成立大会，会后游行，熊玉珍举旗。接着，10日、14日，“武昌区革造民兵指挥部”“汉阳区革造民兵指挥部”分别举行

成立大会,周德清、熊玉珍分别代表总指挥部表示祝贺并授旗。

1 月 20 日,四届人大开会期间,李先念等接见了朱鸿霞等四位湖北人大代表,点名批评了谢妙福、武齐骅等人闹事,为杨道远、任爱生翻案,不批林,不批孔,不安定,不团结,不生产,不劳动,闹派性,搞串连,拉山头,进驻饭店,扰乱秩序,希望他们立即改正错误。

1 月 25 日,谢妙福、谭光前带 40 余人进驻肉联厂的主管机关市二商业局,要求落实政策,同时成立接待班子,接待二商系统两清中“受迫害的人”。1 月 25 日和 26 日,市委、市二商业局分别派人向谢妙福传达“中央首长谈话记录”。谢妙福问“是哪个中央”,并把谈话记录称为“便谈纪要”。

谢妙福问“是哪个中央”,事出有因。因为这次与“湖北同志”谈话的“中央领导同志”,以武汉造反派反感已久的李先念为首,武汉造反派从来不认为李先念能够代表中央。

1 月 26 日至 2 月 6 日,谢妙福先后在长航、市二商业局等处召开九次会议,批判“谈话记录”。26 日,谢妙福起草的口号报写道:“执行新宪法规定的党的基本路线,反对《便谈纪要》改变党的基本路线!”“省委不贯彻四届人大,不宣传新宪法,不执行总理的报告,大传《便谈纪要》,究竟执行什么路线!”

1 月 29 日,谢妙福、郭洪斌等召集 100 多人开会,会上介绍了在二商业局“和当权派面对面交锋”的情况,“确定以市二商业局的行动为榜样,各系统都照这样去办,行动要快,有困难要相互支持”,“按系统、按单位进驻”,“一个一个系统打开缺口”,促使领导解决“两清”问题。

1975 年 2 月初,到武汉告状的河南襄阳地区革委会常委张永善带领杨垱来汉农民,在刘祖平、郭洪斌的安排下住进中南旅社,并插上“襄阳地区赴省控告团”的旗帜。

中南旅社位于汉口闹市六渡桥,旅社革委会主任张爱兰是原“工造总司”成员。2 月 13 日,经张爱兰和旅社革委会另两位成员同意,武汉“反潮流派”打着“革造民兵”旗帜进入旅社,设立广播站。广播站影响很大,四周日夜围着听广播的人。

2 月 16 日,襄阳张永善介绍“杨垱事件”情况,郭洪斌当即派人去杨垱调查、写材料。

当日深夜,百余名公安人员来到旅社,宣称对进驻旅社时的打人凶手实行治安裁决,同时收缴了广播器材。双方发生冲突,在场的“反潮流派”十余人被打得躺在地上,3 人当场被抓走。当时在现场听广播的有数百群众,有人喊“反对警察打人”,有人将横停在马路中间的一辆公安用车的轮胎放气,并拆下一个车轮。

从 2 月 17 日起,“革造民兵”在中山大道上,制作路障,断绝交通。并在路口上树起‘禁止车辆通行’的牌子,在这里召开广播大会,阻断交通达 11 天之久。

六渡桥交通断绝后,熊玉珍、芦小明、李华祥、韩彩、施汉生、丁小幺、李家骥 7 人组成“二·一七事件火线指挥部”。这就是武汉轰动一时的“中南旅社事件”。

2 月 17 日晚,熊玉珍等在中南旅社门前召开控诉大会。刘祖平在会上讲了话,“我说毛主席指示以安定团结为好,占据旅社的事情我不支持,但是用武力打伤群众,把群众打伤打残,这是资产阶级专政的方法。我最后说代表反潮流的战士,强烈要求省市委追查凶手和幕后指挥者。

刘祖平是穿着公安人员的白制服和大檐帽讲话的,当时影响很大。

2 月 18 日,武齐骅在中南旅社开会,号召大家写文章在舆论上配合。并要郭洪斌去枣阳杨垱组织惨案目击者和死伤者家属到武汉现身说法,壮大声势。

当晚,郭洪斌动身去南阳组织杨垱农民来汉,前后三批共 90 多人。

六渡桥的广播和大字报说“枣阳走资派动用正规部队,一晚上屠杀杨垱近千名老百姓,连八十岁老人和几个月婴儿也不放过。还纵火焚烧了百年古镇,烛天大火至今尚在燃烧!”绘声绘色描述的情景比日寇扫荡还毒辣!极大震撼武汉三镇。

2 月 20 日、24 日,刘祖平、何天泽等两次将熊玉珍、芦小明、李华祥、韩彩四人请到朱汉清家,给他们做工作,要求他们撤除路障恢复交通。两次都是指挥部七人中的韩彩、施汉生、丁小幺、李家骥四人反对,熊玉珍、芦小明、李华祥三人赞成,刘祖平等人的工作没有做成。

韩彩等四人反对的理由是:“撤与不撤,当权派都是要整我们的。”

2 月 27 日晨 6 时,江汉公安分局警察敲开了汉口贤乐巷 6 号 4 楼武齐骅的家门,对他说:“你被捕了。”

武齐骅下楼时一直高喊“革命无罪,造反有理!”他被直接带到市公安局七处一所。

27 日 8 时许,湖北省革命委员会发布 2 月 25 日经中共中央批复同意的《湖北省革命委员会通告》,要求通告下达的当天内,立即撤除路障,恢复交通,退出旅社,交出抢走的一切公共财物。违反《通告》的,由武汉市公安部门拘留审查,根据其情节轻重,依法惩处。中央批复是“湖北省委:同意你们由省革命委员会发出通告。并按照通告精神严肃处理汉口发生的破坏交通事件。”《通告》贴出后,大批公安人员来到六渡桥,撤除路障,驱散人员,对不服从者采取强制措施。

武齐骅被拘留后,“革造民兵”基本停止了活动。

武齐骅被拘留的当天下午,刘祖平、何天泽等 40 余人在武汉港 25 码头集会,何天泽说:“通告是镇压群众的信号弹”。会议决定立即举行营救武齐骅的示威游行。会后数十人分散前往六渡桥,正在举旗整队时被公安人员包围驱散,刘德镜等多人被抓。

2 月 28 日,谢妙福从河南抓回拘留。

之后,武汉“反潮流派”30 多人被以“破坏安定团结、危害社会治安”,“盗抢汽车、危害社会治安”,“为坏人翻案”,“打砸抢”、“反革命宣传煽动”等罪名被拘留,后判刑或送劳动教养。

3 月 2 日,陈端午在六渡桥贴出大字报《2·27 事件说明了什么?!》大字报说:“为什么在(通告)贴出之后,墨迹还未干的时候,就动用上千名民警围攻殴打革命群众?”这就充分显示了湖北不能安定的原因。“警车拖走了革命群众,不到二十分钟的恐怖时间中,为什么六渡桥的人群中突然飘起了数十面鲜红的红旗!响起了‘要新宪法,不要二·二七通告!’‘要无产阶级专政,要四大,要落实政策!’等等气壮山河的口号!”大字报说:“红七条已成泡影”,“湖北省委(74)46 号文件空喊一阵”。“2·27 事件说明了对谁恨,对谁亲”,“2·27 事件说明湖北是怎么能够团结安定”。

3 月 1 日,“反潮流派”在水塔及江汉路一带,贴出署名“武汉革命

群众”的口号报和大标语:“要无产阶级专政,不要资产阶级专政!要武齐骅,不要‘二·二七’通告!”“‘二·二七’通告是镇压革命群众的黑色信号弹!”“省、市委个别领导人非法抓捕武齐骅等同志是公然破坏新宪法的具体表现!”“‘二·二七’通告是(1967)三·二一通告、六·四公告的翻版,不许刘丰反动路线在湖北泛滥,还我战友郭洪斌、武齐骅!”

3月2日上午,刘祖平等人在街头集会,2月27日下午参加游行被抓、“教育后释放”的数人在集会上发言“控诉”。会后在街上刷写大标语,晚上300余人举行游行示威,呼喊“还我武齐骅,还我郭洪斌”。

3日中午,江岸区出现以武船、武重、武钢等单位名义贴出的口号报和“紧急呼吁”;下午,武昌区委门口出现署名“武汉革命群众”的口号报,内容都是抵制二·二七通告,表示“反迫害,反镇压,革命人民抓不完,打不尽,杀不绝”,“丢头颅,洒热血,奋战到底”。

关于“中南旅社事件”,一些造反派认为:“反潮流派”要求解决“两清”问题,要求平反、落实政策,都是正义的。但是断绝交通11天,太过激,这是武汉文革八年来从未有过的不得人心的举动。

针对云南在批林批孔中又分成三派的情况,1975年初,邓小平将云南三大派的6个头头调到北京,限令他们在2月11日春节之前“倒旗脱钩削山头”。

1975年2月17日至4月19日,中央又召集云南省委常委和昆明军区党委常委等32人到北京,举行两个常委扩大会议。会议中心议题是,解决领导干部的资产阶级派性,统一认识,纠正划线站队错误,落实党的政策。最后形成云发(1975)26号文件。

会后,中央对干部进行了调动,将部分军队在地方上任职的军队干部调回部队,将部分军队干部和地方干部调离云南。组织云南三大派的头头到北京、包头、大寨参观、学习、劳动。

2月18日,中共中央下发中发[1975]5号文件:《关于学习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的通知》。《通知》说:“根据毛主席指示摘编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论无产阶级专政的语录,不久将在《人民日报》《红旗》杂志上发表。也请你们认真学习,并且要努力多读一点马

列的书和毛主席的书。”

2 月 21 日,姚文元在《红旗》杂志编辑组召集人会上说:

“主席带信,叫我也写文章。”

“主席说:列宁语录要补充,改为马列论无产阶级专政,登《人民日报》、《红旗》,写编者按。很少接到画三个圈的。”

他再次提到电影《创业》:“电影《创业》,江青意见,群众说好,冷它一段再写。一分为二,可以写出来,好的肯定,缺点错误指出。题材是不错的,初步感到乱。党中央用飞机送《矛盾论》、《实践论》,调查一下,是怎么回事?再想想。文化部已通知各报不写评论。听听文化部有什么反映。我和江青的批语不要讲出去。我们积累群众的反映,先把文章写起来,不急,不一定马上就用。原来江青说,报告文学很动人,要他们看,但不要搞真人真事。历史背景要推敲,一直写到党中央。再研究,不做结论。影片乱一点,为什么从解放前写起来?”

这天,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成立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筹备组的通知,组长为谢静宜。筹备组随后于 2 月 26 日至 3 月 20 日召开了第一次会议,会议起草并讨论修改了大会的工作报告、共青团章程和研究了代表名额的产生和分配办法。

经毛泽东同意,《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论无产阶级专政》在 1975 年 2 月 22 日的《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发表。

为落实毛泽东提出特赦战犯的指示,经过两个多月的反复讨论研究,由公安部拟定一个名单,上报中央《关于第七次特赦问题的报告》。报告提出 13 人继续关押,不能特赦,其中有周养浩、谢代生等。公安部的报告经周恩来审阅后,送到杭州。2 月 27 日,毛泽东在杭州看了公安部关于释放战犯的报告和准备在人大常委会的说明后,做长篇批示:

“锦州、大虎山、沈阳、长春,还有战犯为什么没有?放战犯的时候要开欢送会,请他们吃顿饭,多吃点鱼、肉,每人发一百元零用钱,每人都有公民权。不要强迫改造。”

“都放了算了,强迫人家改造也不好。土改的时候,我们杀恶霸地主,不杀,老百姓怕。这些人老百姓都不知道,你杀他干什么,所以一个不杀。”

“气魄太小了。十五元太少,十三人不放,也不开欢送会。有些人有能力可以做工作。年老有病的要给治病,跟我们的干部一样治。人家放下武器二十五年了。”

毛泽东指示“都放了算了”,出乎大家的意料。事情一下子变得简单了,不必再研究如何分类处理。

华国锋先召开公安部核心组会议,传达毛泽东批示。然后火速在中南海召集会议。参加的有公安部施义之、姚伦,统战部童小鹏、调查部兼中央对台工作小组负责人罗青长、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江华、副院长曾汉华和解放军总政治部联络部、新华社和外交部的领导,研究落实方案。

首先是落实一个不留,都放了的指示。华国锋说:“大家要深刻领会,精心核对战犯数字,不要打埋伏。”他特别问施义之:“所有的名单是不是全了?你口袋里还有没有,要倒光啊,不能再留一个。”

施义之说:“口袋光光的,全部列上了。”

华国锋又亲自翻材料,释放的6次战犯和这次战犯的名单与1959年第一批特赦战犯时上报中央的战犯总数856名对上,一个也不少。调查部部长罗青长、统战部童小鹏等都说没有问题,华国锋这才放心。为了万无一失,华国锋说:“会后,公安部与解放军总政治部一起查明在锦州、大虎山、沈阳、长春被俘的战犯及处理情况。要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这个任务。”

查明后,华国锋如实一一报毛泽东。研究决定每人每月发100元,和以前特赦的头面人物一样,这样比北京地区17级国家干部还多2元。17级干部就是正科级,因多年不提工资,不少处长、局长也只是17级。

从1974年12月23日周恩来审阅名单到1975年2月27日毛泽东批示,名单人数由323人减为318人,又死亡5人。每次开会,华国锋都叮嘱施义之,在特赦之前不能再死人了,尤其是黄维,他是这次特赦中地位最高的,是国民党第12兵团中将司令,要采取一切措施不能出任何问题。施义之通知抚顺、北京、西安、济南4个管理所要有专人负责战犯的生活和治病。但是谁也不能打包票,因为他们多年患有各种疾病,高血压、心脏病。而且都是六、七十岁的人了。天遂人意,从2月27日后没有再出现新的死亡。

# 第1334回：赦战犯，释放全部老干部 三月一，姚文元发表文章

国民党的战犯都特赦了，共产党的干部呢？1975年初，毛泽东在谈到特赦国民党战犯时，对负责组织工作的纪登奎说："先释放国民党战犯，先解决外部，后解决党内积案。"2月27日吃完午饭，正在杭州的毛泽东又对秘书说："你打个电话催一下，释放老干部的工作能不能快点。"

毛泽东在杭州，打电话催问释放老干部的工作已经是第二次了。他在听取专案组汇报时曾对专案人员说："搞了这么多年不能结束，好像你们不搞出几个反革命就没有成绩！"

"913"事件后，在周恩来主持下，撤销了中央专案组"二办"，并于1972年春，让在京的、疏散到外地的、及在干校劳动的副部长级以上的干部回京检查身体，改善了他们的医疗条件和生活条件。同时，允许家属到秦城监狱探望。1972年9月，开始从秦城监狱、卫戍区营房、交通干校、政法干校等处放人。

当时，部一级干部或中央专案组专案中涉及的干部都由政治局开会讨论，中央组织部、总政负责人列席。

政治局会议一般在下午19时30分开始，一次会议通常讨论4位干部的审查结论。每位干部都有一份材料，包括本人的经历、被打倒的情况、甄别情况、审查结论。个别的还要附上必要的证明材料。这些材料，与会的政治局委员人手一份，材料发完，周恩来便宣布："大家先把材料看一看。"

会议往往到半夜24时也结束不了，通常吃过夜宵后一直讨论到次日凌晨3时才结束。争论之激烈、时间之漫长，令人难以忍受。1973年7月27日，在政治局讨论解放干部的会议上，叶剑英随手在一张纸上赋诗一首，抒发自己的感受：

一匹复一匹，

过桥真费力。

感谢牵骡人，

驱驮赴前敌。

他后来将这首诗命名为《会场素描》。

到了1975年初，中央负责的关押审查干部还有350人，每人都一大堆材料，要短期内将这项工作结束，就是看材料也来不及。1975年2月27日接到毛泽东秘书杭州电话的当晚21时，负责干部专案工作的纪登奎、华国锋、吴德3人来到305医院，向周恩来汇报，商量怎么办？周恩来想了半天后说："先放人，后做结论。""凡只有口供、没有证据的，就相信本人交代好了。""主席批了二十几个案件，作为典型案例。凡是和主席批示相类似的，一律按主席的意见办，不要再请示了。"

3月1日晚23时，周恩来再次约华国锋、纪登奎、吴德等到305医院谈释放老干部的问题，一直谈到次日凌晨1时55分。

纪登奎跟华国锋、吴德商量后，经过5天的紧张工作，写出《关于专案审查对象处理意见的请示报告》，以汪东兴、纪登奎、华国锋、吴德4人署名。汪东兴当时随毛泽东在杭州，由纪登奎代签。

《报告》说：根据毛主席关于尽快结束专案审查、把人放出来的意见，由中央专案第一、三办公室和"516"专案组所管的670个审查对象（不包括林彪反党集团有关人员）中，被关押的有350人。670人中"大多数人的问题已经基本查清"，"对上述审查对象，采取审查从严，处理从宽的方针，除极少数拟继续关押外，绝大多数予以释放。这些人，凡是专案组能够做出结论的，应做出结论；一时还不能作结论的，应先放出来，以后均由中组部会同有关机关和人员再作结论"。"这些人放了，中央专案'一办'、'三办'和'516'专案组即行撤销。"报告还对不同类别的审查对象提出具体的处理意见。

报告草就后，立即送到医院请周恩来审查。

3月7日当晚，周恩来硬撑着出来主持政治局会议，在会上通过由纪登奎、华国锋、吴德签名上报的《关于专案审查对象处理意见的请示报告》。《报告》提出：根据毛泽东关于尽快结束专案审查、把人放出来的意见，由中央专案第一、第三办公室和"516"专案组所管670名审查

对象,“大多数人的问题已经基本查清”。对上述审查对象,采取审查从严、处理从宽的方针,除极少数拟继续关押审查外,绝大多数予以释放。这些人,凡是专案组能够做出结论的,应做出结论;一时还不能作结论的,应先放出来,以后均由中组部会同有关机关和人员再作结论。”“这些人放了以后,中央专案一办、三办和‘五·一六’专案组即行撤消。”报告还对不同类别的审查对象,提出具体处理的意见。周恩来在“人民内部矛盾”一类中,加上“凡属问题性质严重而做人民内部问题处理的,应予释放,并将其结论在适当范围内宣布”。

政治局会议通过了这个报告,会后周恩来派专人将报告速送毛泽东。

3 月 1 日,《红旗》杂志发表姚文元写的,经过政治局讨论和毛泽东批准的《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在此之前,新华社已于 2 月 28 日向全国转发了该文。

3 月 1 日,张春桥在全军各大单位政治部主任座谈会上作了长篇讲话,对毛泽东关于理论学习的指示作了解释。他说:“我个人还有个意见,四届人大提出了一个很宏伟的目标,在本世纪内,也就是本世纪末,要把我们的国家建设得很强大,走在世界各国的前列,无非就是搞几千亿斤粮食、几千吨钢。但是,如果我们对理论问题搞不清楚,就会重复斯大林的错误。当时他们有几千万吨钢,粮食没有我们多,他们是卫星上天,斯大林的旗帜落地。”

张春桥在讲话中,强调了“反对经验主义”。他引用毛泽东 1958 年 8 月 15 日的讲话。毛泽东那次讲话说“现在,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

张春桥还说:“我觉得,学习问题,对经验主义的危险,恐怕还是要警惕。如果不解决这个问题,你说学习了,但没有用。主要是领导干部不是抓得很紧。现在,我们要以主席指示当作纲,联系我们部队存在的这些问题来学习。这些问题摆在面前,要解决。这些问题解决得好,我们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不但能够纠正一些错误,而且还会有新的前进和进步。如果不好好学习,再往前进,阻力会相当大。”

3 月 7 日,毛泽东收到《关于专案审查对象处理意见的请示报告》。他当天看后表示同意,对秘书说:“打电话叫他们把释放人员名

单送来,我要看一下都有谁。”

3 月 7 日,汪东兴打来电话:“毛主席看了报告,表示同意,还要看全部名单。”

接到汪东兴打来的电话,纪登奎几个人连夜把名单整理好。7 日当天,将全部名单汇齐送去。

8 日下午,毛泽东起床后,秘书将报来的名单给他。这次毛泽东没要秘书读,而是艰难地用患病的眼将名单看完后,用颤抖的手在报告和名单上批了“同意”,直接退中办办理。

这样,文化大革命以来被关押的几百名干部几乎全部解除监禁,许多人被安置工作或住院治疗。以后的一段时间,北京的一些部委家属大院经常可以看见有年轻人骑着自行车,手里拿着一个大旅行袋。当有人问他“干什么去?”时,他会兴奋的扬着手中的旅行袋,边骑车边大声的说道:“我爸放出来了! 给他领工资去!”

是啊,许多老干部从 1966 年就被关押,扣发工资。他们都是高干,月薪大都在 200 元以上,累积到此时,可不得用旅行袋装了。

与此同时,关于特赦战犯的各省公安厅局长、统战部长、法院院长、民政厅厅长“四长会议”,也于 3 月 5 日在北京召开,会议的内容一是释放 25 名起义投诚人员;二是为全部特赦战犯做好组织、安置、宣传等工作。到会 300 人,除各省的公安厅局长、统战部长、法院院长、民政厅厅长外,还有中央有关的各委,总政、总参以及新华社、《人民日报》等新闻单位。华国锋规定,每天的会议情况简报要报毛泽东、周恩来及中央领导。

10 日会议结束,当天公安部预审局电话通知辽宁抚顺、山东、陕西三地,指名起义投诚人员要在第二天,即 11 日到达北京,由中央统战部接待、安置。这次会议开得很成功。毛泽东看到简报,也很满意。

3 月 17 日下午,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举行第二次会议,讨论了周恩来根据党中央、毛泽东的指示提出的关于特赦释放全部在押战犯的建议。华国锋在第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上作了说明:

“这次特赦释放的战犯共 293 名。其中有:蒋帮军官 219 名,党政人员 21 名,特务 50 名;伪满战犯 2 名,伪蒙战犯 1 名。至此,在押的战

争罪犯,即全部处理完毕。

“遵照毛主席的指示精神,对这次特赦释放的全部在押战犯,每个人都给公民权;有工作能力的,安排适当工作;有病的,和我们干部一样治,享受公费医疗;丧失工作能力的,养起来;愿意回台湾的,可以回台湾,给足路费,提供方便,去了以后愿意回来的,我们欢迎。释放时,每人发给新制服装和100元零用钱,把他们集中到北京开欢迎会,由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并宴请一次,然后组织他们参观学习。”

19日,《人民日报》公布了特赦决定,国内外反应强烈。

这天清晨6时30分,和往常一样,抚顺战犯管理所,百十名大多两鬓斑白的战犯,在管教干部的带领下,来到礼堂,集中收听中央的重要广播。

发酵了一整晚的兴奋,在大礼堂上空积聚。18日晚,战犯们已经知道了这个“大道消息”:这是一次关于“特赦战犯”的广播。

播音员一字一句:“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决定特赦全部在押战争罪犯。”

整个大礼堂立即爆发出轰鸣般的掌声和“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声。“有的欣喜若狂,有的手舞足蹈,有的仰面无语,有的泪流满面。”这是当年的管教干部刘家常的回忆。

没有人想到会是“全部释放”。前一天晚上,战犯们已就“这次会特赦谁”的问题讨论了一整夜,几乎每个人都在暗地祈求残生能获得自由。在这座监狱里,他们已经呆了十几年、二十年,即便是最年轻的战犯,也已年过半百。

19日当天,最高人民法院在抚顺、济南、西安、北京各战犯管理所召开了大会,宣布特赦名单,发放特赦释放通知书。抚顺的特赦大会在俱乐部举行,抚顺战犯管理所所长金源宣布:“我宣布,从现在开始,‘抚顺战犯管理所’撤消了,改成了招待所。‘战犯’这个称呼也不存在了,你们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是我们的同志,先生!”一片“毛主席万岁”的欢呼声……被特赦人员心情激动,纷纷表示“感谢党和政府的宽大”。

2月中旬,负责国务院日常工作的副总理邓小平召集主管建设和工业的国务院副总理谷牧、铁道部部长万里和国家计委副主任袁宝华到他家里谈整顿问题。他说:铁路是国民经济的命脉,特点是“高、大、半”,即:高度集中,大动脉,半军事化管理,所以整顿经济必须从整顿铁路秩序入手,并提出整顿内容与要求。

邓小平要他们马上起草一个中央关于加强铁路工作的文件。于是,国家计委副主任袁宝华在办公室里整整打了一晚上的电话。文件起草后,马上又通知全国各个省、市、自治区工业书记到京开会。袁宝华提前住进京西宾馆,抱着电话,亲自给各个省、市、自治区第一书记打招呼。全国29个省市,他打通了28个,找各省、市、区革命委员会第一把手,告诉他们说中央的正式通知还没有收到以前,他先口头通知:小平同志有几条什么样的意见?什么时候开会?会议内容是什么?要他们按照这些内容准备,有什么意见可以提出来,并准备派分管工业的书记来京开会。

2月25日,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主管工业的书记会议,简称“全国工业书记会议”,比原计划提前一个星期在北京召开。会议开宗明义,讨论修改文件稿子。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计委主任余秋里和谷牧主持会议,袁宝华做会议的具体工作。

3月5日,全国工业书记会议结束前,中央领导接见会议代表。

开会的时间快到了,邓小平快步走进会场后,环顾四周。几位省、

市领导走上前来,笑容满面地想与他握手,邓小平却敏捷地举起右手说:“今天不拉手了,现在工业情况还不好,等你们工业搞上去了再拉手。”

王洪文主持会议,他宣布开会后,说:“请小平同志讲话。”

邓小平对他说:“你先讲。”

王洪文作了开场白,然后请邓小平讲话。邓小平说:

“现在有一个大局,全党要多讲。大局是什么?三届人大一次会议和四届人大一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都讲了发展我国国民经济的两步设想:第一步到1980年,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到二十世纪末,也就是说,从现在算起还有25年时间,把我国建设成为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全党全国都要为实现这个伟大目标而奋斗。这就是大局。”

他接着说:“听说现在有的同志只敢抓革命,不敢抓生产,说什么‘抓革命保险,抓生产危险’。这是大错特错的。目前生产的形势怎么样?农业还比较好一点,但是,粮食产量按全国人口平均每人只有609斤,储备粮也不多,农民的收入就那么一点。工业方面,那就确实值得引起严重注意。现有的生产能力没有发挥出来。去年一年,工业生产情况是不好的。今年是第四个五年计划的最后一年,生产再搞不好,势必影响第五个五年计划的实行。我们必须预见到这种形势,认真抓这个问题。”

他说:“当前的薄弱环节是铁路。铁路运输的问题不解决,生产部署统统打乱,整个计划都会落空。所以中央下决心要解决这个问题,今天就要发出《中共中央关于加强铁路工作的决定》。”

他强调对铁路工作要集中统一,建立必要的规章制度,增强组织性纪律性,并举例说:

“现在铁路事故惊人,去年一年发生行车重大事故和大事故755件,比事故最少的1964年的88件增加好多倍。这中间有许多是责任事故,包括机车车辆维修方面的责任事故。这说明没有章程了,也没有纪律了。现在有些规章制度要重申。火车司机不能下车吃饭,要带饭盒在车上吃,这是老章程,是有道理的。现在随便下车吃饭,经常误

点。值班不准喝酒,这是历来的规矩,现在也不严格执行了。喝醉了酒扳错道岔,就会造成火车相撞的重大事故。所以必要的规章制度一定要恢复和健全,组织性纪律性一定要加强。这个问题不光是铁道部门存在,其他地方和部门也同样存在。”

他说:“中央的决定还讲到反对派性。现在闹派性已经严重地妨害我们的大局。要把这个问题摆到全体职工面前,要讲清楚这是大是大非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光解决具体问题不行。”他举例说:“徐州那个闹事的头头本事可大啦,实际上是他在那个地方专政。对这种人不及时处理,等到哪一年呀?我说,只等他一个月,等到三月底。如果再不转变,顽固地同无产阶级对立,那样性质就变了。”

他强调:“铁路系统里闹派性的人同地方上闹派性的人是有联系的,反对派性,要把他们之间的联系切断。他们这些人懂得抓要害,把铁路一堵,事情就闹到北京来了。南昌铁路局的问题,省里就有人支持。一定要把铁路上搞派性活动的里外联系割断。这次确定,铁道部门的人事调动,还是由铁道部统一管理。铁道部有这个权。铁路上的派性问题,地方解决不了的,由铁道部解决。要把闹派性的人从原单位调开。当然是调头头。调动后又钻出个新的头头怎么办?钻出来再调。调两次、三次,总可以解决了吧。我们也不捉人,当然反革命的除外。闹派性的头头不服从调动怎么办?不服从调动不发工资。你的行业是闹派性,何必到我们这里来拿工资?总之,解决问题要有一点办法。”

邓小平的这篇讲话后来以《全党讲大局,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为标题收入《邓小平文集》。当然,那里边的讲话是后来修饰的,在现场讲话时他还说:

工业方面,确实值得引起严重注意。现在生产能力都没有发挥出来。去年一年,工业生产情况是不好的。当然,不平衡,有些行业好一些,石油是好的,电是好的。地区上有三分之一还可以,但有的地方受牵制。

第二个问题讲铁路。……铁路不解决,计划统统打乱?什么计划都要落空。解决办法,还是集中。……中央决定,是重申,根据铁路的特性,重申集中统一。

这次确定,铁路的人事调动,还是由铁道部统一管理。铁路与地方闹派性的人是相联系的,他们懂得抓薄弱环节,把铁路一堵就到北京了。你那个××市,铁路的问题,省里就有人支持。要把铁路这条线同地方切断,把铁路上里通外线的割断。根据中央决定,铁道部有这个权。地方解决不了的,铁道部解决,调开那里,同样还在铁路,到哪里都工作嘛。这个话要讲清楚,以后就这么办。向全体职工动员时,也这样讲。当然是调头头。调动后,他又钻出个头头怎么办?钻出来再调。

闹得厉害的人,两派的头头都要调离。××八个书记,有的不干事,有的可调省冶金局当顾问,当顾问去嘛,何必占着茅坑不拉屎。××快到二十年了,就没有人?没有从别的地方调。总之不能拖,拖到哪一年呢?社会主义等他怎么行呢?

# 第1335回：下文件，开始抓铁路整顿 第一拳，万里首先砸徐州

就在邓小平在全国工业书记会议讲话的当天，3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毛泽东批准的中发[1975]9号文件：《关于加强铁路工作的决定》。《决定》提出：

一、全国所有的铁路单位，都必须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提出的“还是安定团结为好”的方针。

二、实行全国铁路以铁道部领导为主的管理体制。中央重申：全国铁路必须由铁道部统一管理，铁路运输必须由铁道部集中指挥，铁路职工必须由铁道部统一调配，铁路的政治工作和运输指挥工作必须统一起来。

成立铁道部党委。铁道部所属各铁路局、工程局、设计院的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由铁道部党委和所在地的省、市、自治区党委双重领导，以铁道部党委领导为主。没有设铁路局的省、市、自治区内的铁路分局，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由铁路局党委和所在地的省、市、自治区党委双重领导，以铁路局党委领导为主。

铁道部所属各企业、事业单位的干部，由铁路部门的党委实行分级管理。这些单位领导干部的任免调动，由铁道部党委与有关省、市、自治区党委协商后负责办理。属于中央管理的干部，其任免调动由铁道部党委报中央审批。

三、各铁路单位的政治运动和地区性的社会活动，仍由有关省、市、自治区党委统一部署。

四、建立健全必要的规章制度，加强组织性纪律性，确保运输安全正点。对在抓革命、促生产中表现好的职工和单位，要给予表扬。表现不好的，要进行批评教育。对于少数资产阶级派性严重、经过批评和教育仍不改正的领导干部和头头，应该及时调离，不宜拖延不决，妨害大局。对严重违法乱纪的要给予处分。

五、整顿铁路运输秩序,同各种破坏行为作斗争,加强无产阶级专政。任何人都不准以任何借口妨碍正在进行指挥、调度和各种勤务的工作人员的正常工作。阻拦火车、中断运输、损坏列车和铁路设施,都是违法的,必须坚决制止。情节严重的,要严肃处理。对少数职工利用职权,内外勾结,搞资本主义的行为,必须坚决反对,严肃批判。要警惕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对制造事故、杀人抢劫、煽动停工停产、煽动哄抢物资、盗窃铁路器材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要坚决打击,依法惩办。

《决定》中第四条中的:“对于少数资产阶级派性严重、经过批评和教育仍不改正的领导干部和头头,应该及时调离,不宜拖延不决,妨害大局。对严重违法乱纪的要给予处分。”是邓小平增写的。

在全国工业书记会议结束时,主管交通的国务院副总理王震立下了“军令状”:铁路交通保证一个月内见成效。

3 月 5 日这天,交通部副部长陶琦在交通部讲话说:

“前几天部里研究长江问题时,算了一笔大帐。近十年来,国家投资,人员成倍增加,但产量、吨位增长幅度小,吨·公里下降。对天津港和新港船厂作了分析,虽然产量有所上升,但与人员,设备增加数相比,也是慢的。……搞得不好,就叫鼓足干劲,力争下游,少慢差费。”

3 月 5 日,铁道部长万里在铁道部讲话说:

“由于林彪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和破坏,思想搞乱了,组织搞乱了,阶级队伍搞乱了,企业管理也搞乱了。”

“共产党领导的事业比过去低了百分之几,低了一倍,很差劲,不象话。这一点不就表现了今不如昔吗?”

“明年是第五个五年计划的第一年,还达不到过去二十几年曾经创造过的最高水平,就太丢人了。”

“生产搞不上去,搞什么共产主义?限制什么资产阶级法权?”

“我们党委书记不抓技术教育,不抓技术培训,这个党委书记就不合格。现代化的企业,党委书记不敢抓技术教育,还算什么正确路线?……政治干部不懂业务不能做干部。”

“吉林局,《红旗》杂志上登了他们的文章,我在核心小组里讲:你看基层比我学得好。我派人下去看了,不是那么回事,是假的。你那

个班子乱糟糟的,是吹牛。……大家做点实际工作,不要吹牛,要老老实实,写到做到。今后登报纸,我派人下去核实。”

“你看病为什么专门去找高级医生看病,不去请赤脚医生?我万里就是找名医到家里来看的。”

铁路整顿的第一拳砸在哪里?徐州。徐州铁路分局的所在地徐州市,位于江苏西北部,东濒黄海,西接中原,北依齐鲁,南扼江淮,地处苏、鲁、豫、皖四省要冲,号称“五省通衢”,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其战略地位十分重要。进入近代以来,中国铁路的两条大动脉——津浦铁路和陇海铁路,在徐州交汇。徐州铁路局正处在两大铁路线的十字交叉点上,是全国铁路的枢纽之一,在全国铁路系统中的地位也十分重要。

1968 年起,徐州市先后开展了“清理阶级队伍”和“一打三反”。1970 年,徐州市又按照上级的部署,开展了深挖“516”反革命集团的运动。运动中,出现了许多私设公堂、刑讯逼供的情况,整个徐州市挖出了 6000 多名“516”分子。这些所谓的“516”分子,往往都是在“学习班”里被逼无奈而招供的,而且一个被打成了“516”,又被迫供出一批“516”,甚至有的人今天是审查“516”的,第二天就稀里糊涂地也成了“516”。一时间,人人自危,个个难保,群众中流传着“‘516’,家家有,不是亲,就是友”的顺口溜,给整个社会造成新的混乱,给人们的心理上造成很大的压力。

1971 年“913”事件后,徐州市的那些“516”分子陆续出了“学习班”,但善后事宜并未能完全处理好,一些影响仍然存在。

1974 年初,“批林批孔”开始后,原徐州“踢派”的头头之一,当时徐州市革委会常委顾炳华组织成立了徐州市“批林批孔联络站”,要求为“516”落实政策,并为此三天两头到市委闹,使得稍趋平缓的局势又复杂混乱起来。这一切,也影响到徐州铁路分局和徐州煤矿,造成铁路上大小事故不断,完不成运输任务,煤矿生产出现下降的局面。

1974 年 8 月 14 日,国家计委和江苏省委专门发出电话指示,要求徐州在党委的领导下进行“批林批孔”,抓革命,促生产,撤掉“山头”。徐州市委和省委派驻徐州铁路分局的工作组,以及分局各级党委反复做工作,将大部分“山头”挖掉。11 月,由江苏省委第一书记彭冲带

队,省级机关干部和省杂技集训班170多人和徐州的机关干部、驻军官兵等共千余人,到徐州铁路分局参加劳动,参加铁路运输大会战,想以此来促进徐州铁路运输任务的完成。江苏省委和徐州市委的一系列工作,一度缓解了徐州的混乱局势,铁路的运输任务也有所好转。

但是,到了1974年底,徐州的形势又发生逆转,顾炳华指责“党委是宗派掌权的山头”,要“揪出右倾复辟的代表人物”,指责徐州市委书记和市革委会主任汪冰石在徐州“复辟资本主义”,要打倒他。他们强占了徐州市委的办公大楼,致使市委不能正常工作。徐州铁路分局也因此再度陷入混乱。

1975年1月下旬,徐州的少数人冲入江苏省委大楼,进占办公室。

1月29日,江苏省委办公室发出《通告》,要求他们“立即撤出省委办公大楼,返回原单位”。可这些人不听劝阻,仍然爬门翻墙冲机关,延续了10多天。

与此同时,徐州也发生了冲击市委正在召开的会议,企图扣留徐州市委书记汪冰石的事情。

2月27日,徐州又有人纠缠围攻市委副书记王铁民。第二天,还在徐州市繁华街道彭城路上召开大会批斗王铁民,会后又押着王铁民冲砸徐州市民兵指挥部,砸坏民兵指挥部的牌子、喇叭和枪支。

徐州铁路分局也更加混乱。分局119台机车有59台停驶,生产运输处于半瘫痪状况。徐州铁路卡“脖子”对华东地区影响最大,上海、江苏、浙江等地的煤炭都需通过铁路从北方运输,徐州铁路分局这样一卡,再加上南京铁路分局的也闹得很凶,造成煤炭运不过来。上海市经常只有一个星期的存煤储备,没有煤,不能发电,许多工厂因此受到影响,铁路拖了全国经济的后腿。

2月28日,经过江苏省委与铁道部的协商,以铁道部万里和江苏省委书记许家屯的名义,向王震和谷牧两位副总理写了书面汇报,提出由江苏省委、铁道部及有关方面联合组织工作组,解决徐州铁路分局、南京铁路分局的问题;徐州分局以铁道部为主,江苏省委协助;南京铁路分局以江苏省委为主,铁道部协助;省与部均以主要领导亲自抓。待中央的9号文件《决定》做出后,立即在群众中大张旗鼓地掀起一个宣传贯彻的高潮,适当充实、调整两个分局的领导班子,整顿铁路

运输秩序和社会治安,狠狠打击个别阶级敌人和坏分子。

紧接着,在3月1日、2日两天,徐州顾炳华又在徐州两次召开“声讨民兵指挥部滔天罪行大会”。

3月5日,中央发出9号文件:《关于加强铁路工作的决定》。

3月6日,还在全国工业书记会议进行期间,万里即派铁道部党的临时小组成员李新率工作组先行来到徐州铁路分局了解情况。

3月6日下午,铁道部召开大会传达中共中央关于解决铁路问题的9号文件和邓小平在全国工业书记会议的讲话精神。

7日晚,铁道部召开全路电话会议,王震副总理参加。万里传达了中央9号文件和邓小平的讲话精神,以及如何学习、贯彻的意见。他反复强调:要把中央9号文件作为铁路整顿的纲,不换节目,不改镜头,一抓到底。他提出:“不唱天,不唱地,只唱9号文件这出戏。”“千条理,万条理,不安定团结没有理。”

王震在会上也讲了话,要求通过贯彻中央9号文件把全体职工团结起来,争取3月份全路装车5万辆以上,4月份达到5.5万辆。

万里连续3天召开铁道部党的临时领导小组会议,研究部署铁路整顿计划。

在铁道部紧锣密鼓地传达贯彻中央文件的同时,江苏省委和徐州市委也在研究贯彻中央文件的方案,研究如何对徐州铁路分局和南京铁路分局进行整顿。当得知万里将率工作组亲去徐州后,江苏省委决定派在北京参加工业书记会议的许家屯率省委工作组赴徐州协助万里工作,并指示徐州市委全力做好这项工作;省委第一书记彭冲主持省委工作,留在南京,领导对南京铁路分局的整顿工作。

有了中央文件,邓小平也发了话,徐州市委书记汪冰石立即和市委几位领导以及省委派往徐州帮助工作的省公安局副局长褚玉祥研究了抓捕顾炳华等人的方案。决定以徐州市革委会的名义发布《通告》,对顾炳华等打砸抢分子采取措施。

由于徐州市的派性很严重,为防止事先走漏消息,《通告》起草好后,3月8日,江苏省公安局副局长褚玉祥特地乘车从徐州赶到100多公里外的宿迁县,在那里用电话将《通告》内容报告省委。省委经过研究,决定用省革委会的名义发这个《通告》,并在南京印好《通告》,专

车送往徐州。

3 月 8 日,全国工业书记会议结束。当晚,徐州市委书记汪冰石就接到北京许家屯的电话。许家屯在电话中简要地通报了工业书记会议的精神,并告诉汪冰石他明天乘火车回南京,中途将在徐州下车,和汪冰石具体商量整顿工作。

3 月 9 日,万里和江苏省革委会副主任许家屯即前往徐州。当天,许家屯在徐州下车,同汪冰石研究了整顿的措施,决定对顾炳华采取果断措施,尽快解决“516”分子的平反问题。谈话之后,许家屯乘车赶回南京,向省委汇报。省委连夜召开常委会,研究贯彻中央 9 号文件的措施。

3 月 10 日,江苏省革委会副主任许家屯带领省委工作组重返徐州。

这天,徐州市的大街小巷张贴着江苏省革委会的《三·九通告》,街头的有线广播、宣传车,都在广播着《通告》。《通告》严厉指出“在个别坏人煽动下……拉山头,搞非法串联……强占办公用房,大搞打砸抢。”“徐州市少数人破坏安定团结,破坏革命,破坏生产,破坏铁路交通运输,给社会主义造成重大损失。”《通告》要求策划和指挥上述破坏活动的首要分子,必须立即到市公安机关检查交待自己的违法犯罪行为,否则将由公安机关拘留审查,根据情节轻重依法惩处。

当天,徐州铁路分局召开全体职工、家属参加的传达中央 9 号文件的万人大会,万里亲自传达中央文件和邓小平讲话。

与此同时,由汪冰石亲自指挥,徐州市公安机关、民兵指挥部派出人员,捉拿顾炳华。这天中午,据公安侦察员报告,毫无所知的顾炳华在铁路分局食堂吃饭。下午 13 时,顾炳华由 20 辆自行车开道护卫,来到市委大院,顾炳华看到市委大院和往常不一样,冷冷清清,便觉得有点不对劲,掉头就离开,前往他所控制的广播站。在彭城路上,公安人员和民兵将他拦住,他慌乱之中跑进路边的一座小楼,公安人员和民兵将楼团团围住,顾炳华见无法逃脱,便从后窗跳楼,结果正好跳进一个酱缸里,扭了腿,被当场抓住。

当天下午,徐州市委分 10 个会场召开大会,汪冰石亲自宣读《三·九通告》,宣布逮捕坏头头顾炳华。接下来几天,徐州市公安机关又

拘留了几个打砸抢的帮派分子,并将他们押往南京分别关押审讯。还清理收缴了打砸抢物品3000多件。经过这一系列的果断措施,大大打击了帮派分子的嚣张气焰,徐州市的混乱局势得到了扭转。

3月11日,在徐州市体育馆召开徐州市委、徐州地委党员干部会,江苏省委书记许家屯在会上传达了中央文件和中央、国务院领导在工业书记会议上的讲话精神,以及江苏省委贯彻中央文件的初步意见,表示省委全力支持和配合铁道部万里的工作,“以最大的决心,有力的措施,在3月份改变徐州、南京两个铁路分局和全省煤炭生产面貌,把问题基本解决”。万里也在会上讲了话,表示要坚决贯彻执行中央的《决定》,并感谢江苏省委、徐州市委对铁路整顿工作的支持。

12日,徐州铁路分局机务段举行誓师大会;13日,市委和地委联合召开群众大会。

接着,万里又深入基层,出席各种各样的群众座谈会。

对于群众中意见较大的“516”问题,万里会同江苏省委、徐州市委一起,加快平反工作,并做好善后处理。与此同时,还恢复建立各种规章制度,建立健全了岗位责任制、技术操作规程、质量检验制度等,还制定了违反规章制度造成事故的处罚方法。

工作组放手发动群众,对派性进行旗帜鲜明的、毫不含糊的批判,对派性头头批评教育,坚决整顿领导班子,改进工作作风,关心职工生活,建立健全规章制度,打击破坏铁路运输秩序的行为,克服有章不循和运输秩序混乱的状况。

3月15日,万里在徐州召集济南、上海、郑州三个铁路局领导干部会议,商讨解决津浦、陇海、京广三条干线不畅通的问题。万里在徐州领导整顿12天,雷厉风行而又扎实细致,使得徐州铁路枢纽迅速恢复正常秩序,津浦、陇海两条干线畅通,徐州分局结束连续21个月完不成运输任务的局面,4月提前3天完成运输计划。

3月22日,万里向邓小平等国务院领导汇报了他在徐州的工作情况及下阶段工作的部署,邓小平等表示非常满意,同意召开群众会议批判顾炳华等帮派分子,并询问了徐州煤矿的情况,强调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江苏省委、徐州市委要抓紧工作,要彻底解决徐海(即徐州、连云港)地区问题。第二天,万里即向江苏省委电话传达了邓小平等领

导的指示。

江苏省委常委会立即开会研究贯彻落实,省委决定,省委工作组继续在徐州帮助工作,力争彻底解决问题。同时,召开全省煤炭系统党员干部会议,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关于煤炭工作的指示。平反“516”冤案的工作也加快了步伐,到3月底,近90%的“516”分子得到平反,到4月底基本处理完毕,都恢复名誉,销毁不实材料,消除影响。铁路分局党委还注意充分发挥老工人老干部和技术人员的骨干作用,将他们充实到生产第一线和关键领导岗位。同时帮助广大工人群众解决实际困难,办好食堂、幼儿园等。

# 第1336回：徐景贤，反映王洪文问题 巧施计，张爱萍主动出山

3月10日，徐景贤给张春桥、姚文元写信，反映王洪文到中央工作后的一些事情。信中说：

“四届人大期间，洪文同志在钓鱼台请了两次客。第一次请客，吃的是中国菜，被邀去的有天水、秀珍、金祖敏、冯国柱、陈阿大、叶昌明、黄金海、马振龙、小仇（现兼做秀珍，敬标的秘书）等人。做菜的是从上海“莫有财”菜馆调去的厨师。席间喝了很多酒。吃完饭又留全体看美国电影《巴顿将军》，一直搞到清晨。

第二次请客，吃的是法国菜，是特意把锦江饭店的花师傅（四届人大代表）接到钓鱼台去专门做的，那天吃的有法国名菜‘烙蛤蜊’等。至于烙蛤蜊用的盆子（盆内有一个个半圆的孔，把蛤蜊放在上边）和新鲜的蛤蜊等，都是由小仇张罗，专门从上海运去的。那天的宴会，完全仿照接待西哈努克的规格（冯国柱的描述）：桌上放了很多刀叉和各式各样的酒杯，每个人面前斟满了白兰地、葡萄酒、茅台、香槟等名酒，每吃一道菜就喝一杯酒。吃完法国菜又放映了西德影片。”

“人大会议已结束，会务组通知上海代表集体乘专列火车回沪，少数有急事或年老多病的代表可买客机票。本来，天水、秀珍同志可以随团回来，或是提前乘民航机回沪（当时大会消息已发表）。可是，洪文同志却叫小廖打电话给上海民航局，把上海民航的一架新的三叉戟专机调北京给天水，秀珍等同志乘坐。”

“洪文同志调一架专机，简直像调一辆汽车那样容易。”

“洪文同志的这种追求享受，讲究排场的资产阶级生活作风，在十大以前即有滋长，在十大以后又进一步发展了。仅去年一年，黄涛去京开会三次，洪文同志就至少请了三次客，而且每次都有内部影片招待：第一次饭后看英国片《女间谍》，第二次请黄涛和敬标（当时刚从日本回来）一起吃饭，饭后看美国彩色片《十诫》，第三次饭后看《跳不完

的舞》。在钓鱼台住所请他们吃饭还嫌不够,洪文同志又专门到新建的北京饭店设了一席,招待黄涛和敬标。他们吃了回来,还啧啧赞美,说是北京最高水平的菜。但是,这要挥霍掉国家多少钱呀!”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领导同志提倡这类作风,下边就跟着学。就拿小廖来说,去年,前年来上海办事四次,几乎每次都有人大请其客。秀珍、敬标、黄涛和警卫处的康宁一政委等都单独请他吃饭,原工总司的人也纷纷请他吃饭,吃遍了各大饭店。有一次连马老也自告奋勇,特意在锦江请了两桌。我虽然没有请他,但他们要我作陪的也有三次。”

“有一次吃饭时,天水同志当着洪文同志和我们的面说:‘洪文同志到中央工作后,进步真大呀!’洪文同志则马上回话:‘不是我吹捧,老干部象马老这样的精神面貌,在全国都是少见的!’这一类话,出自两个党的高级干部之口,难道是正常的吗?再说,象小廖这样的秘书到上海时,不但有人争着请客吃饭,而且以秀珍同志为首,带领黄涛和原工总司的同志,大队人马到机场迎送,不止一次,这种曲意奉承,阿谀拍马之风,不正是宗派主义,山头主义的孪生弟兄吗?”

“洪文同志过去在上海时,对坐什么汽车,穿什么料子的衣服,着什么样式的皮鞋是很讲究的;到北京以后,通过某种合法、非法的途径要的商品更多。就我所知道的,他那里有可以拍连续动作的外国照相机,有晚上充电后白天可持续使用的日本袖珍收音机,有能够奏音乐的打火机,有可以作远距离操纵的彩色电视机,有工交组送去的国产盒装录音机,有轻工业局马振龙等送去的手表、照相机、酒芯糖、彩色胶卷等,有到上海定做料子服和皮鞋,有从上海公安局取去的猎枪,等等。直到二月十日,金祖敏赴京工作临上飞机以前,黄涛还偷偷地托他带了一枝特制的猎枪给洪文同志,这支枪是拆开后伪装在一个手提盒子内的。(林彪一伙用盒子装过冲锋枪,我们的同志为什么学他们的样呢?)

他们除了拿用的,还有吃的,还有货币。我们的张敬标同志除了给洪文同志多次送螃蟹,送蚶子,送水果等食品以外,还经常给洪文同志送钱去(去年春、秋,小仇就秘密去京两次)。”

“洪文同志变得更加自满,更加不注意努力学习和自我改造。我

们和他接触,听他谈话的内容,几乎极少提到学习马列和主席著作的,但是打猎呀,钓鱼呀,打扑克呀,打羽毛球呀,打靶呀,看电影呀,等等,却占据了他生活和话题的很大一部分内容。他到北京工作后来过上海几次,在每次短促的行程中都要用好几个晚上的时间打扑克,打羽毛球。在他的住所打扑克时,加上金祖敏等,往往打上几个通宵。

十大以后,特别是十届二中全会以后,我对洪文同志的担心增加了。”

据说,自王洪文到北京后,叶剑英经常约他一起钓鱼、打猎。1973年10月,王洪文任军委办公会议成员后,中央军委又给王洪文在玉泉山装修了一套别墅,当时称25号楼。江青听说后气得大光其火,要张春桥管管王洪文。不过,王洪文在这栋别墅里只住过一天,是在1975年2月10日,大年30那天晚上,叶剑英等人和王洪文在这里吃饭,喝了很多酒。晚饭后,王洪文就睡在这栋别墅里,第二天回到钓鱼台。

在召开全国工业书记会的同时,2月18日至3月11日,冶金工业部也召开了鞍钢、武钢、包钢、太钢、本钢、首钢、攀钢、马钢八大企业参加的“八大钢座谈会”。出席会议的这八大企业钢产量,占全国钢产量50%、铁产量65%。1975年1至2月,全国产钢288万吨、铁304万吨,比计划欠产钢95万吨、铁86万吨。其中这八大企业欠产钢63.6万吨、铁85.6万吨。因此,抓好“八大钢”对完成全年计划具有决定作用。

“八大钢座谈会”分析了钢铁欠产的情况和“上得慢”的原因,逐个分析了领导班子的状况,提出了解决办法、措施,增强了“3月份赶上来,二季度要大上”的决心,会后,各大钢铁企业都有一定进展,太钢尤为明显,但很不平衡。整个钢铁工业仍未改变欠产的状况,日产量老是在6.5万吨~6.6万吨之间。其中鞍山、武汉两大钢铁企业欠产最为严重,要完成年产2600万吨的计划,5月起日产量必须达到7.9万吨~8万吨。而钢铁如果上不去,什么都被拖住,农机、军工、基建,统统都谈不上。

3月22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要求做好工代会、团代会、妇代会的准备工作。《通知》说,同意中国工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筹备组、共青团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筹备组和中国妇女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

筹备组讨论通过的代表产生办法和分配方案。《通知》要求各省、市、自治区党委要加强领导,认真做好三个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工作。

再说叶剑英动员张爱萍出山一事被张爱萍婉拒后,叶剑英知道副总参谋长李达和张爱萍关系不错,就让李达去做做张爱萍的工作。

张爱萍的脾气那是有名的,他认准的事一般不好劝,李达也颇伤脑筋。这天,他来到张爱萍的住所说:“一起去参加个活动吧。”

张爱萍问:“什么活动?”

李达说:“别问了,就当是去散散心。”

张爱萍随李达来到一个会场,原来是讨论中程导弹定型的会议。张爱萍坐在那里旁听,听着听着,他忍不住了,激愤地指责说:“你们都是干什么吃的?这么多年了,还在争论中程导弹的问题,居然还都大言不惭地说是什么大好形势…… ”

全场愕然。

张爱萍主动找到叶剑英,叶剑英对他说:“形势严峻,我们不能再耽误时间了。军委已经决定,你任国防科委主任,陶鲁笳改任政委,同时恢复你副总长职务。”

1975 年 3 月 8 日,中央军委正式任命张爱萍为国防科委主任。

为了张爱萍的到任,国防科委机关着实忙乎了几天。他们都知道他的脾气,讲求纪律、秩序、整洁、宁静。而这在当时,确实很难做到。不过有两条是可以突击出来的:把办公楼打扫干净;按时上下班,不许迟到早退。

一切准备停当,连秘书也给他选好了。可是左等不见张爱萍,右等张爱萍也没来,谁也闹不清这位首长干什么去了?这时,七机部的头头们正在京西宾馆开“批林批孔汇报会”。听说老领导复职了,要来检查工作,于是熬了几个夜晚准备汇报材料。然而恭候多日,也不见张爱萍的影子。

张爱萍的确上任了。但他既没有进国防部大院内的科委楼,也没有去阜城路的七机部机关,更没有出现在京西宾馆的汇报会。

就在四处寻觅不见张爱萍的时候,接连好几天,紧挨故宫后墙、筒子河彼岸三座门里的一个会议室,海运仓总参第一招待所,突然变得热闹起来。一些戴眼镜的、秃发歇顶的、文质彬彬的人进进出出,忙忙

碌碌。张爱萍正在这里与他过去的老朋友、那些航天老总们拉家常哩！张爱萍上任伊始，连办公室的门还没有进，便把当时中国的航天专家们请来了。这些人意外地接到张爱萍的邀请，一个个奔走相告，有的还不请自来，主动来见张爱萍。

经过一系列的个别交谈，这天，张爱萍在三座门组织了一个由航天专家们参加的座谈会。钱学森、任新民、屠守锷、黄纬禄、谢光选……等等都到了，真可谓精英荟萃，群贤毕至。

张爱萍在门口躬身迎候，执手问好。

这9年变化可真大呀！泪眼相看，几乎相见不相识了。这些当年韶华俊颜一个个都变成了两鬓斑白，满脸风霜，蹙眉低首，忧心忡忡的小老头了！大有“问姓惊初见，称名忆旧容”之慨！张爱萍的心中不免一阵酸楚。

“大家久违了。这几年我消极怠工！”待老总们坐定，张爱萍风趣地开了腔。

老朋友劫后重聚，话题少不得是“互报平安”。然而，正是在这个话题上，使张爱萍触目惊心，痛心疾首！说到已死的熟人，免不了声泪俱下……有几张熟悉的面孔他是永远见不着了。其中死得最惨的，要数火箭材料研究所所长姚桐斌。

“姚桐斌同志究竟是怎么死的？”张爱萍痛惜地问。

“谁也说不清。”

“有一种说法比较可靠，说是被‘915’用暖气管子从背后砸死的！”

“天理难容啊！”

“1968年这一年，就死了3个专家！”

“你们能在这种情况下坚持搞事业，工作没有停，真不容易啊！”张爱萍由衷地说，“我在牢里的时候，从广播里听到我国的卫星上天了。我真高兴！”

当时张爱萍还激动得即兴赋诗，写了一阕清平乐。诗日：

闷雷骤响，漫天弥雾障。

火箭冲天心神往，环球高歌嘹亮。

犹念鏖战黄沙，何来恶梦囚枷。

莫道流年空逝,来日遨游天涯。

1975 年 3 月的一天清晨,当京城的老少爷们还在振臂晨练的时候,有一支小小的队伍,已经在京西八一湖畔的一个小松林子里集合待命了。这是张爱萍的小分队。这天,他还是没有去科委机关上班,而是率领这支小分队来到七机部下属的“老大难”单位:北京南苑七机部第一研究院,即中国运载火箭研究院。

小汽车出永定门,过大红门,驶向南苑东高地,眼前的便是第一研究院高大门楼……

进到一院,展现在眼前的景象顿时让张爱萍瞠目结舌!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几次怀疑是不是走错了地方。除了满墙大字报、大标语外,阴沉沉冷清清的庭院内,荒草凄凄,落叶潇潇。到处是垃圾,到处是断砖碎瓦,到处屋漏墙裂。昔日平坦光洁的马路甬道,变成了坑坑洼洼高低不平的“搓板路”。两旁的树木多年不曾修整,长得歪七竖八,枝桠横伸。乌鸦在头顶盘旋,不时发出只有在前朝遗老的败落户人家才能听得见的凄切的哇哇声!

曾几何时,这里曾是楼成群,树成行,机构配套,专业齐备,里里外外干干净净,安安静静,令诸多专家、学者惊叹不已、钦羡不止的中国最早的“硅谷”,此时竟成了这般模样!张爱萍虽然对文革期间的混乱状况有一定的思想准备,但怎么也想不到会这么严重!

拐杖声从一楼响到四楼。张爱萍走进总体设计部的总体方案研究室。这是整个研究院的大脑。想当年走到这里,人们都要自觉地把脚步放轻一点,以免打扰这里的人们在计算、推导、思考、论证。此时,偌大的房间,安静倒是还像以前一样很安静,但人迹寥寥,死气沉沉。

“人呢?人都干什么去了呢?”

墙上的小黑板回答道:“今日部里召开学习专政理论报告会!”

“经常这样吗?”张爱萍忍不住问。

“经常这样。”

“那么科研任务呢?工作呢?”

“科研要服从政治,要给政治让路嘛!”回答得理直气壮!

“张爱萍来了!”

“张主任来了!”

消息不胫而走,立时传遍了整个设计大楼。凡是没有去“抓革命”的“老黄牛”或者“逍遥派”,都自动向总体室拥来。但就是这样,人数也不多,统共加起来也不过20来个人。

“张主任您好!”大家好兴奋。

“同志们好!”张爱萍也好兴奋。

无拘无束的谈话开始:

“人呢?”张爱萍自然会问到这个问题。

“开会去了。”有人答道。

“其实总部那里不开会,办公室的人也多不了多少。”大家说。

“你们怎么没去?”

“‘路线觉悟’不高……”有人说。

“那么路线觉悟高的上哪儿去了呢?”张爱萍好生奇怪。

“抓革命呗!”

“革命只要开开会就行了吗?这个命也太好革啦!”张爱萍更加茫然了。

“除了开会的,还有在学习班学习的,……”

“还有在五七干校劳动的,下放到黑龙江军垦农场改造的……”

“为什么丢下技术,长期去搞体力劳动?难道农民不够,而技术人员太多吗?”张爱萍心里想,嘴上问:“为什么?”

“据说这些人都有些问题。”

“什么问题?”

“说不清。”

“你们是经过严格审查挑选才进这个大门的嘛。这我知道得很清楚。还有什么问题呢?”张爱萍说。

“……”

“泡病号的也不少。”

“还有的来办公室点一下卯就走了。”

“张主任,您知道吗?我们这里有个代号,叫8923部队!”

“不知道。”张爱萍摇摇头,“我关了那么些年,现在真是两眼一抹黑。”

不过,他也觉着疑惑:“你们早在10年前就集体转业了嘛!记得

老五院改成七机部的时候,我还来讲过话。怎么,现在又用起部队代号来了?”

“哈哈哈哈!”

张爱萍一本正经的回答,竟引得满屋子哄堂大笑!这一笑,笑得张爱萍更糊涂了!

“张主任,那是笑话!”

“所谓8923部队,就是说,上午8点上班,9点就走了;下午2点上班,3点就走了!”

“噢哈!原来是这个意思。”张爱萍也笑了,但那是一种苦涩的笑。

“还有更先进的哩!”

“先进到什么程度?”

“那叫8200部队。上午8点来点个卯,下午两点再来点个卯。”

“真是新鲜事!年轻轻的,都想养老啦?到了共产主义不是也得各尽所能嘛!”张爱萍浑身的血直往脑子里涌。

他不禁问到:“大家都不来上班,那么科研怎么办?任务怎么完成?国家急需的武器怎么能研制得出来呢?”

大家沉默了。这问题似乎谁也回答不上来,但谁的心里都明白!

终于,有人打破了沉默。

“都灰了心了。谁还干呀!”

“越干,罪名越多,越大!成天你斗我,我斗你。连设计方案都分了派。一派一个,互相攻击,挑剔,顶牛,拆台!不干还好些,要干就会惹出一肚子气来!”

张爱萍听着,久久地说不出一句话来。他在屋里踱来踱去。踱到靠墙的暖气片上,突然他觉得有一股刺骨的寒气不知从什么地方袭来。他用手摸了摸暖气片,刺人骨髓的冷!

“怎么?没有暖气?”

“暖气早就没有了。从文革开始就烧烧停停,即使烧了,也根本没有觉着暖过。”

# 第1337回：真怪异，无尘车间“钟乳石”又挖路，暖气修到猪圈里

一切都乱了套！经过两天看似不经意的走访、观察、交谈、检查，张爱萍工作组成员无不百感交集。从座谈会反映的情况看，张爱萍得到的印象就一个字“乱”！乱在组织、乱在领导、乱在秩序，中国唯一的从事运载火箭研发的七机部，整个乱套了，失控了。文革期间，七机部大大小小的群众组织不下几百个，总起来又分为两大派，派系内相互支持、帮衬、依存、声援。他们总结此时的七机部是“有事没人干，有人没事干，有人有事没法干”。

大家对张爱萍说：“您1965年规划的‘八年四弹’任务，到现在，都超过期限两年了，连影儿还没一半呢！去年三次洲际导弹试验，一发也没打成。急需攻关的项目没人组织，这叫‘有事没人干’；专家有的是，可只有参加政治学习、接受批斗的义务，没有参加研制项目的资格，这就叫‘有人没事干’；再有，你搞科研，就批你‘白专道路’，你按规章制度，把关质量，就批你‘搞资产阶级的管卡压’，这就叫‘有人有事没法干’。”

他们说，领导都被整怕了，遇事推诿，不敢负责，反复试验，永不定型。弄到现在，新的技术课题攻不下来，定型的武器又拿不出来。广大群众都有怨气，1974年“批林批孔”，牢骚怪话不少，其中一条是：一个儒家（陶鲁笳，当时的国防科委政委）；两个专家（钱学森、朱光亚）；就缺法家。就是希望来个厉害的领导好好整治整治。上面也派过些资深领导，但千头万绪、盘根错节的各类组织，怎么理得清？谁不说自己是革命的，对方大方向是错的。仅周恩来接见七机部造反组织代表就达37次之多，创下了文化大革命中的吉尼斯纪录。

张爱萍提了两个问题：一是，关键性的卡脖子的环节在哪个单位？二是，闹得最凶的派性头头在哪个单位？

答复是：“都在230厂。”

通过两天来的走访与思索,张爱萍也发现,七机部9年无宁日的“震源”,盘根错节的派性的总根,近几年导弹屡试屡败的罪魁,便是230厂和与之配套的第十三研究所。

这两个单位是研制火箭、导弹稳定系统陀螺仪的专业厂所,技术很尖端。但文革中也出了两个著名人物,一是现任七机部核心领导小组成员的舒龙山,七机部“916”派头头,1973年当上十大代表,后兼任部直机关临时党委书记。还有一个是叶正光,新四军第一任军长叶挺的儿子,也是“916”的头头。

张爱萍说:“好!就拿230厂开刀。”

他对小分队说:“从明天开始,我们要把工作重点转移到永定路去,着重去抓好那里的230厂和第13研究所。”

第三天,张爱萍就带着他的工作组来到了坐落在永定路七机部一院下属的230厂及配套的13所,开始了他后来被人们戏称为是“1975年七机部大地震”的整顿工作。

永定路的情况更糟,较之南苑有过之而无不及。

院子里垃圾成堆,汽车进出都是在垃圾上跑。马路都挖断了……

这一天,张爱萍来到号称230厂最尖端的42车间。

走进厂房,像走进了一座人迹罕至的的旧祠古庙。蛛网已经从墙头屋角延伸到路口来了,粘了张爱萍一身。

他用手杖拨开蛛丝,继续往里走,地面的积尘当即留下了一个个清晰可见的脚印。

“有人吗?”

没有人答应。倒是空洞的应声惊起了一群檐下雀。

再往里走,便是一台台机床。锈迹斑斑的机器上贴着封条,封条已经发黄变脆,看来封存已有年头了。

“把机器封起来干什么?”

“用不上。”闻迅从厂部赶来了几个人回答。

回答是理所当然的,一点也没有觉得什么不妥。“从文革一开始,这机器就没有用过。”

“为什么好好的机器,放在那里不用?”少见多怪的倒是张爱萍,“没有任务吗?不需要吗?”

“……”没有人回答得上来,但这问题又是谁也能回答得上来的。

“连车间大门也是经常锁着的,想干活也进不来。”倒是走过来看热闹的几位工人发了话。

“我上次想进来干活,大门关着,进不来。我就只好爬窗子。”

“你们不是工厂吗?”张爱萍奇怪地问,“车间大门紧闭,工厂里的工人不做工,那都干什么去了?”

“其实上班与不上班都一样。来上班的人,也不一定正经干活!”

张爱萍更奇怪了:“上了班不做工?那干什么呢?”

“干什么?”那工人反问了一句,好像张爱萍问的问题很奇怪。这么大个干部,连这点常识都不懂!“利用公家的设备干私活呗!”

张爱萍脸上的肌肉在抽搐“干私活?……”他再也没有说下去,但他什么都明白了!他已经发现,自己是多么悖时!他的思想离现实不啻是十万八千里!他一时竟又找不到合适的话来了。

前面有个地下室。底下很深。“这地下室是干什么的?”张爱萍问。

“下面就是我们最尖端的车间,全封闭的恒湿恒温无尘车间。也就是‘三无车间’。”厂领导不无自豪地急忙回答。

“三无车间?可以下去看看吗?”

“张主任请吧。”

张爱萍做梦也想不到,当他拖着残腿,一步一步走到很深的地下室后,在这个尖端中的尖端单位第一眼所看到的,竟是一块硕大的“钟乳石”!

张爱萍以为自己在做梦!这里不是江苏宜兴的缮卷洞呀?更不是杭州的瑶林仙境!

他不觉回望了一下那身后的层层阶梯。没错,他确实已经走到地下室来了。但这“三无车间”却多了一样不该多的、哪怕想象力最好的人也想象不到的东西,“钟乳石”!

为了证明不是自己年老眼花,张爱萍取下眼镜,擦了擦镜片,戴上,走近前去,看了许久,看了个真切。

啊,原来是一块高一米多、宽如桌面的大冰柱子!或者叫冰坨子!不,它最形象、最确切的名称还是叫“钟乳石”!

“什么时候,缮卷洞的钟乳石搬到这里来了?”张爱萍这时只觉得怪异与失望。

啪!他用拐杖重重地敲击了一下那冰柱子。冰柱坚硬得如石头一般。手杖弹了回来,震得他的手生痛!

有那么一瞬间,张爱萍的脸上的表情很难看。他真想发作,真想骂人,真想大吼几声!但他终于克制住了。张爱萍曾经给小分队约法三章:多看,多听,少说话。他得身体力行啊!

那冰柱子倒是十分美观。一层一层的,洁白晶莹,剔透玲珑。奇妙的花纹自然天成。若倒置金钟,如出土玉笋,似九级莲台……

“真是天下奇景啊!”张爱萍围着它左看右看,仿佛真的对它欣赏起来。“钟乳石长到尖端工厂最尖端的车间来了,这事本身就够尖端水平的!”

啪哒,一粒水珠滴在张爱萍的脸上,把他的眼镜片弄模糊了。

“张主任,快戴上。”车间干部不知从什么地方找来一顶草帽。

“难道戴上草帽水就不漏了吗?”张爱萍用衣角擦干镜片,抬起头来,寻找漏水的水源。”戴草帽不是办法,关键是要找出原因。这水究竟是从哪里流出来的?”

“检查了几次,也没有查出来。”厂和车间的干部都这么回答。

“查不出来?难道这水是变戏法变出来的吗?”

干部们这种明知国家尖端仪器设备受到严重糟蹋损失,却无动于衷,漠然置之的态度,太令张爱萍生气了!

“小王,跟我来。”张爱萍招呼了一下小分队的王干事。笃,笃。拐杖声有节奏地响着。张爱萍顾自走出地下室。他从地下室一步一步地走上一层。

在一楼,他细细地查看所有的水管、洗漱间、厕所的便池马桶。没有发现漏水的地方。又拖着残腿,从一楼一步一步地走上二楼,又从二楼走上三楼,走上四楼!

他一层一层地检查,一个个水管、一个个水龙头、一个个洗漱池、一个个便池马桶都细细地察看了一遍,还是找不出漏水的地方!

“再上!”张爱萍气喘吁吁地说,”万里长江还有个源头嘛!我不相信这水会凭空冒出来!”

这时他脸色青紫,额头沁出了细密的汗珠。他已经有些支持不住了。

“张主任……”

疾步跟来的干部们望着老人柱着拐杖吃力地上楼的身影,倒乎受到了莫大感动,也可能良心上受到了莫大的责备。

他们想劝阻他,又不敢劝阻。张爱萍的一身正气,张爱萍钢铁般的意志,张爱萍的认真负责与苦干实干,把他们给镇住了!

“您累不累?”王干事扶着张爱萍上楼梯的时候,悄声问。

“怎么能不累呢!”张爱萍悄声回答着,挣脱了王干事的搀扶。

这从地下室到五楼,实际上他走了十层!差不多近三百级台阶!他确实太累了。他的心跳骤然加快了。他的身子在摇晃。他倚在拐杖上,歇了片刻。

漏水的水源终于让张爱萍这个65岁高龄、拖着一双残腿又患有心脏病的老人找着了!

漏水的地方确实很难找,在五楼厕所里的一个抽水马桶上。那个马桶上的一条很小很细的裂纹便是工厂和车间的干部们遍找不着的“万里长江”的源头!

“只听说有滴水穿石的成语,现在你们这里又发明了一个新名词,叫滴水成石!”张爱萍说。

“这么一点小事,你推过来,我推过去,硬是没有一个敢于真正负起责任来的!你们的心究竟是用什么做的?你们对国家的财产怎么会变得这么冷漠!”张爱萍终于发作了,但他还是比较克制的。

“通过这件事要举一反三,把所有的厂房、设备、仪器、装备统统认真检查一遍!不要再出现这种叫人痛心的事了!”离开42车间时,张爱萍叮嘱着干部们。

“是。”回答得很爽快。这是一种心悦诚服的回答。

“还有,马上拿一个新的马桶来换上!”

“张主任,仓库里已经没有新的了……”

“没有新的就去买嘛!”张爱萍真想骂他们几句,“难道还要我来给你们当采购员吗?”

话虽这么说,下楼的时候,他还是叮嘱王干事:“小王,你明天到国

防科委营房处,去拿一个马桶来。”

中午时分,下班了。随着职工的人流,张爱萍向食堂走去。刚走到食堂门口,张爱萍再一次惊讶得驻足不前了。

要说眼前是一个食堂,不如说是一个室内操场。平展展、空荡荡的屋子里,连一张桌子、一把椅子都没有!

记得五院的基建结束,体制就绪,人员归位之后,张爱萍特意亲自来检查过所有工厂、研究所的厨房和食堂,特意关照人要把吃饭的桌椅配齐。这里的知识分子多,工人中老的多,工作也很辛苦,绝不能像战时的连队那样,让大家成年累月蹲在地上吃饭。

可是,现在变得空空荡荡,连桌椅的影子都不见了!

“嗬!这下打扫卫生方便了。”张爱萍不悦地说。

职工们陆陆续续打来饭菜,开始蹲在地上吃饭。好像也习惯了。饭厅里立时出现了一朵朵由人组成的梅花桩。

“我也来二两打卤面,二两炸酱面!”张爱萍站在卖饭窗口道。

伙食够单调的,主副食合一,只有面条。

张爱萍端着面条四处找能搁碗的站处。长期的军旅生涯练就了张爱萍吃饭的“蹲功”。然而,如今这条该死的腿已经不听使唤,蹲不下去了。

“首长,快到这里坐。”闻讯赶来的工厂后勤组组长,急急忙忙从里屋搬来了一张桌子、一条长凳。

“不用!大家都没有桌凳嘛!”

“首长,您这么大年纪,怎么能跟年轻人比呢!”后勤组长不由分说,把张爱萍扶到凳子上,自己也拿了一碗面条,站在一旁吃起来。

“首长,是不是给您炒几个菜?”

“不要不要!”张爱萍严肃制止,“大家吃什么,我就吃什么。”

张爱萍边吃着面条,边问后勤组长:”你是哪里调来的?”

“一军。”

“好嘛。”张爱萍高兴地道,“一军过去打仗是很有名的嘛!为什么把食堂搞成这个样子?”

“我……”后勤组长无言以对,他也是有苦难言啊!

“这么些桌子凳子到哪里去了?难道你会不知道?”张爱萍两只眼

睛盯着后勤组长,盯得后勤组长有点害怕。

“七机部尽出怪事!我在南苑,看到办公室的椅子像犯人一样,弄根铁链子锁起!”张爱萍顿了一下,把剩下的面条送进嘴里。”嘿,也难怪呀,谁让它们安了四条腿呢!既然安了腿,就会自己跑嘛!”

说得后勤组长笑也不是,哭也不是。不过,现在他的情绪已经稳定多了。他向张爱萍诉苦道:“这么些桌、凳,今天你搬一张,明天他搬一张,都搬光了。都搬到私人家里去了。我们阻拦了也没用。”

后勤组长说的是实情。

“该管的还得管!该管的不管,就是失职!”张爱萍严肃地说。

说着,他又下了个死命令:”限你在两个星期之内,把这些桌椅板凳统统找回来!”

“首长放心,我一定想办法把这些桌凳都找回来。”后勤组长毕竟是军人出身,他坚决地表示。

吃完了,张爱萍收拾碗筷。后勤组长一把将碗筷夺了过去。“首长我来,您坐着。”

后勤组长正准备离开,张爱萍又叫住了他:“还有,要动动脑子,把伙食搞好些。不能老让人家吃面条。还要让工人、科技人员顿顿都能吃上热饭热菜。加夜班的,还要保证有夜餐……”

第二天,当张爱萍他们再次来到230厂,厂门口的大马路地面上多出了一条大标语:“张爱萍,我们这里关你什么事?你从哪里来还滚回哪里去!”

张爱萍毫不示弱的说:“就这样欢迎我吗?那我今天就要踩着你走进去!”

一进大院,就看见大字横幅:

“张爱萍,你来干什么!”

“不许以生产压革命!”

在一幅“张爱萍滚回去!”的大标语前,张爱萍抄起手杖,将这幅大标语稀里哗啦地打个粉碎。昨天刚让他们修好的马路又挖开,工作组的人问是怎么回事?说是要从工厂把暖气接到猪圈去,猪也需要取暖。

张爱萍毫不动摇,今天,他要看产品。

230厂是研制陀螺仪的专业厂。陀螺,是稳定各种航天器的必不可少的心脏,诸多科技专家为之终身求索的尖端课题!

一个一个的陀螺仪用木盒子装上,一一摆放在车间的平台上。

“张主任,这边几个是我们‘915’派研制的。”技术人员介绍说。

“那边呢?”

“这边是我们‘916’的。”

“张主任请看,我们……”

“陀螺仪还分派?”张爱萍一挥手,打断了他的话,“技术嘛,它还管你哪条‘路线’?哪个派?我在230厂老碰上怪事。今天你这里又是一怪!”

平台上的陀螺仪各式各样,琳琅满目,目不暇接。有气浮陀螺、大锤式陀螺、小锤式陀螺,……

“你们这里简直像杂技团嘛!”张爱萍看了又好气又好笑。“你们到底有多少种陀螺?我看你们的陀螺比杂技团里的还多嘛。为什么一样性能,一样规格,一样型号的陀螺,还要这派造一个,那派造一个?这不是拿着国家的钱当儿戏嘛!我不管你是‘915’的还是‘916’的,哪个陀螺做得好,质量优,我就选用哪一个!”

当张爱萍的目光移向屋角一堆无人展出也无人理睬的陀螺仪时,他便只有气恼,再没有一点笑意了。

那是一堆废品!这些报废的产品,曾经当作正品装上导弹,致使导弹发射屡屡失败!

“一共报废了多少?”

“52套积分仪,54套陀螺仪,……”

“败家子,败家子啊!为什么非要把好好的家业败个精光才心甘呢?……”话已经到了嘴边,但张爱萍又把它咽了回去。笃,笃,笃!他只把手杖使劲敲着地面,以此来发泄心头的怒火。

过了好一阵,他稍稍缓过气来。他弯下腰,从废品堆里捡起一个仪器,仔细地看了又看。

“经过检修还能不能用?能用的要尽量修!实在不能用的,可以给导弹部队做教练实物使用。不要随便浪费!”他说。

这天下班的时候,职工们都在往家里走,张爱萍也柱着拐杖准备

回去了。突然,有一位女工从后面赶上来叫住了他。她看了看旁边没有别的人,便说:

“张主任,我们工人从心里欢迎你们来。七机部是得好好整一整了!……”

看神情,这女工单独向张爱萍表达这句话,而不是在大庭广众前,是怕由此引起派斗。

“谢谢你,谢谢你。”张爱萍从内心感激这位女工。

“同志,情况这么糟,你说怎么办?”张爱萍忧心地问她。

“一句话……”

“什么话?”

“去掉派性,一切按党性办事!”那女工回答得很干脆。

在230厂的一个座谈会上,女工史秀英对张爱萍说:“这几年我们是在吃社会主义。”

开始张爱萍还没听明白,问她:“怎么叫吃社会主义?”

她说:“拿着国家给的工资,不干活,有的人对公家的东西想拿就拿想砸就砸,这在哪个社会能行?这不是吃社会主义吗?”

“好!讲得好!”张爱萍非常激动,“我今天又学到了一个新名词。我跑了这几天,说这样那样的话都有,可是这句话我还是头一次听到。我今天很高兴。我要为你鼓掌!”

# 第1338回：张爱萍，开始整顿七机部大会讲，说“就是今不如昔”

张爱萍要召开230厂全厂大会，他就在大车间里开始了他的演讲：“我来，就是来快刀斩乱麻的！”

张爱萍讲话从来不用稿子，念稿子哪有煽动力？只见张爱萍从兜里拿出一张台历纸，讲开了：

“同志们，现在我是没有好话讲的，我想讲一点坏话。你们这个地方，讲这个派，那个派。说穿了，就是在利用派性掩护达到他们不可告人的目的，乘着文化大革命，捞取个人的名誉、地位、权力。利用派性搞他的阴谋活动，掩盖他做的坏事。我现在在这里就警告这些人，该猛醒了！我看广大群众、广大干部都是好的，只有你们这些派头头是坏蛋！”

会场上响起了暴风雨般的掌声。大家纷纷围拢过来听他讲话。

他骂得更难听的：“把我的专家、工程师都搞到哪里去了？统统找回来！那些狗屁不通的王八蛋，占着人家的位置，蹲在茅坑又不拉屎，还不都撵出去！”

“你们这里哪像是搞国防尖端科研的？简直像个大杂院。连大杂院也不如。北京街上哪家老百姓的院子也比你们要干净！什么文明科研，文明生产，搞得那么糟，还谈得上‘文明’两个字吗？厕所里的水从五楼一直漏到地下室，漏了多少天，都没有人管！到处肮脏透了，垃圾满地，好端端的科研大院围起来喂猪养鸡。我们都要当卫生部长了！你们自己说说，这种样子叫人看了怎么不生气？……”

几乎所有的人都来了，把一个大车间挤得满满的，窗口外都挤满了人，有的人还上到天车上。张爱萍边讲、边听、边回答下面群众提的问题。台下不断地鼓掌……那场面就像电影《列宁在1918》里的场景。

张爱萍叫台下的工人提问题，一个一个的回答。有时骂人，有时

说笑话,还有时讲故事,气氛活跃,经常是笑声、掌声不断,连一些工人家属都抢着提问题。

群众动员起来了,下一步就是要配好厂领导班子,而厂长是关键。张爱萍到230厂时曾选过一个人,是他的秘书推荐的。张爱萍为了保险起见,又从军队调了一个司局级的干部。他们都是个老实人,但都不是搞企业的人,不是合适的人选。后来由国务院政工组选人,他们推荐了卢晨征。这个人1953年就当厂长,干过4任厂长。

但是卢晨征听说推荐他做230厂厂长,就开溜了,跑到胜利油田。那里就像是个青纱帐,下到钻井队,就是油田指挥部也别想再找到。

张爱萍发火了:“人到哪里去了?给我找!”

过了一段时间,卢晨征以为事情过去了,就偷偷回了趟家。没想到,第二天一大早,刚起床,就看见窗外停了辆军用吉普车,这下堵住他了。进来的人说:“带你去见张爱萍。”

他死活就是不肯去。

七机部干部部来了人,劝他说:“你实在不去也可以,先见见汪洋部长吧,有什么想法先和汪部长说说。”

万般无奈,卢晨征去见了七机部部长汪洋。汪洋对他说:“张总长找你好几次了,你这样总躲着不好。还是那句话,有什么想法,就当着面和首长说说。”

不容卢晨征多说,汪洋带着他到了京西宾馆。

在外屋,他们见到宋彬成秘书。宋彬成说:“你就是卢晨征啊……”说着,就给了卢晨征一个本子一支铅笔,对他说:“拿着,张主任在里面等你,进去吧。”

卢晨征进到里屋,这是一间很大的办公室,墙上挂着地图,中间一个大条案,开会用的,桌上好几部电话,像个作战指挥所。屋里光线很暗,靠里的墙边上,站着个人,背对着他,好像是在看墙上挂的大地图。卢晨征猜到是张爱萍,他远远地站着,好一会儿,张爱萍看都没看他,说:“叫你来,怎么不来啊?”

声音很慢、很低沉。

卢晨征说:“张总长,你问我啊?”

张爱萍顿了一下拐杖,仍然背对着他说:“难道这间屋子还有其他

人吗?”

卢晨征壮起胆子对着他的背,讲了三条理由:说自己身体不好,经常吐血。在张爱萍面前,他不敢说自己年纪大。接着又说:“应该调精兵强将,像我这样的老弱病残是不适合的。再者,虽说在机械行业呆了20多年,但对运载火箭可一点也不懂。”

这些理由他自己都觉得牵强,最后还说了点实话:“七机部派性斗争的厉害,不是我说的,全国都知道,在这种地方,派任何人去,都是没有办法工作的。自己也很难不被卷进去,也实在不愿意再被卷进去了。”

卢晨征一边说,张爱萍一边还是看他的地图。听完卢晨征的话后,仍然背朝着他说:“你讲了三条,我只说一条好不好?拿本子记下来:明天上午10点钟到230厂上班。记下了吗?”

卢晨征说:“记好了。”

这时宋彬成进来送文件,卢晨征还想说什么,宋彬成拉了拉我的手,小声说:“别说了。”

卢晨征心想:“你非要折腾我,我也没办法,但我真的不想上任。”

张爱萍见卢晨征不说话了,回过身来,说了声:“坐吧。”

接着,就交代了情况、任务、干部、当前首要解决的问题,共四个方面的问题。记得他专门交代说:“要特别和几个人搞好团结,记住:和则兴、散则败。”

临走,张爱萍还当面交代秘书宋彬成说:“你明天9点50分到厂里去,检查卢厂长到了没有。”

宋彬成送卢晨征出来时说:“明天在家里等着,我去车接你。”

那时京西宾馆没有饭吃,卢晨征出来后,到附近七机部一个干部家里吃了碗鸡蛋面,心情特别沉重。他回到家,对老伴说:“有麻烦了,只能去拼命了,你给我打个行李卷吧。因为明天就要上班了,就要和张爱萍一起去拼命了。”

晚上,卢晨征又找了七机部几个熟悉的干部,问了一些情况,大家都说糟糕透了。他的心情更沉重了。

第二天,卢晨征在230厂办公室安了张床,就开始和张爱萍一起拼命了……

这天,张爱萍突然接到时任党中央副主席兼军委副主席王洪文的电话,请他到钓鱼台面谈。张爱萍如约准时赶到了钓鱼台10号楼。王洪文已经在楼前等候迎接了。

“啊!爱萍同志,您好!”

王洪文很热情。他谦恭地在张爱萍旁边的沙发上坐下。

“您的大名我早就知道了。爱萍同志,我是很仰慕您的。……”

“我原来也在华东军区工作,在27军当兵。那时候我就知道您是我们军区的参谋长。我们在朝鲜的时候,就听说彭德怀司令员本来想要您去担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参谋长,……”

谈话伊始,王洪文连连称赞张爱萍对七机部的整顿,并谦虚地说自己年轻,缺乏在中央的工作经验,请张爱萍多多给予指导。随后他问道:“上海的几个国防机构你知道吗?”

张爱萍回答说:“知道。”

王洪文说:“这几年来,他们的工作很不得力。我想今后由你统一领导吧。”

张爱萍感到突然,王洪文也看出了他的迟疑,遂说:“权衡利弊,还是归你统一领导为好。我给你写个条子,你派人去接收好了。”

又交谈几句后,王洪文问及七机部舒龙山的情况,张爱萍作了介绍。

王洪文说,七机部的舒龙山“没有水平”,“一锅老鼠屎,坏了一锅汤”。

他接着又说:“舒龙山是我的朋友,希望你支持他的工作,团结他一道工作。”

“爱萍同志,”王洪文最后说,“您以后有事,就直接来找我好了。我全力支持你的工作。”

七机部的干部们在阜成路七机部大院的二楼礼堂里开大会。会议的主题是听张爱萍讲话。

“这么多的人来参加开会!”张爱萍走上讲台,收起拐杖,在主席台上坐了下来。他朝台下望了望,黑压压一大片。参加会议的人数之多,超乎了他的预料。

“看来,多数是8年前见过面的,是老相识。同志们,8年了,整整

一个抗战啊!”张爱萍感慨万千,思潮起伏。

热烈的掌声响起来了。于是他望着台下的人们又大声说下去,“这8年我消极怠工,没有和你们大家在一起工作。今天我们又在一起工作了。我感到非常高兴!”

又是一阵热烈的掌声。

“你们鼓掌,是不是想要我讲一点好话啊?告诉同志们,我现在还没有好话对你们讲。等你们把工作做好了,我就专门来给你们讲好话。”

这是开场白,也是安民告示。紧接着话锋转了,嗓子也往上提了提:

“首先,我要来回答一个问题。我们刚到南苑的时候,有人写大字报‘欢迎’我们。说是:是谁派你们来的?现在不是老五院的时候。七机部是国务院的一个部,我们这里的事你管不着。你从哪里来还滚回到哪里去……”

会场上突然一片肃穆。尽管出了安民告示,人们对他的讲话还是颇感惊讶。想不到这老领导一上来就那么不客气,就提出这么个火辣辣的问题!

张爱萍接着道:“这个人对我们也太客气了!我们还没有进门,他就叫我们‘滚’!讲句真话,你们有哪个请我来过?是我自己要来的嘛!党把这方面的事情交给我,我自己不等你们邀请就来了。我这个人就是有点怪。怪就怪在这里,你们不要我来,我偏偏来了。你们如果欢迎我来,我还不一定来呢!”

会场的气氛越来越产肃。张爱萍慢慢扫视着整个会场。他的目光冷峻而又充满热情,严肃而又蕴涵着调侃的意味:

“什么大字报,大标语!字还是写得太小了!我的岁数大了,我眼睛不行了,太阳一照,灯光一闪,我就看不清了。你把大字报写得像房子那样大最好!可是,这又有什么意思呢?那样能够吓住我吗?

说什么‘滚’!我一辈子当兵,只知道向前冲锋,还没有学会‘滚’这个词!难道你来这一手我就害怕了吗?就能把我赶走吓跑吗?你这样施加压力就能把我压住了吗?做梦!我要是怕受压,早就不来了,早就退避三舍了!……

“搞这一派,那一派,什么你是我非,我这一派正确,你那一派不正确!什么左派右派!同志们,这是极少数派头头为了争名,争利,达到他们不可告人的目的所搞的阴谋!依我看,群众都正确,只有极少数派头头才是坏的。

拉山头无非是要想当官!不拉山头就怕当不成官!成天你整我,我整你,你们只想个人的小天地,小派别。你们把国家急需的任务放在一边,光顾自己的头!我说,这不是山头而是馒头,不是馒头而是我们四川的小笼包子!是一滴水,是一粒沙子,太阳一照就干了,风一吹就跑了!

现在,我们不能用党和国家的利益来继续等待某几个人了!已经等待9年了!已经给党的事业造成了多大的损失啊!当你睡到半夜三更的时候,你应该扪心问一问,还像一个中国人吗?你对得起党,对得起国家,对得起人民吗?难道你不惭愧,不悔恨,不痛心吗?满脑子的个人利益,满脑子的小山头,小宗派,馒头都不如,是桌子上的小水泡,很快就会干的。我要用毛主席的话大喝一声:同志,该猛醒了!再有,我们在技术上、工作上、与外界的协作关系上、后勤器材保障上等等等等,都怎么样呢?总之是乱、是糟就是了!”

话,越讲越尖锐,越说越激动。张爱萍列举了他半个多月来的亲见亲闻和亲历的种种怪现象、坏现象,并且严肃地毫无保留地进行了批评。

会场上连一丝儿的声音都没有,人们都像凝固了一样一动不动。这真是石破天惊!自从文革以来,还没有一个领导对工作问题做过如此的讲话!

舒龙山等几个人问到:“张主任,你今天讲的话什么意思?”

“没有什么别的意思。”张爱萍淡淡地送过来一句话,便柱着拐杖准备离开了。

“你这是公然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大好形势!”

“你是在算文化大革命的账!”

张爱萍冷冷地扫了他们一眼,说道:“我说过了,我没有别的意思。我要说的话都已经在会上说了。你们愿意怎么理解,那是你们的事。我对全国的情况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我讲的是七机部。这些事在

七机部难道不是事实吗？……”

“你是说今不如昔，今不如昔是不是？”舒龙山问道。

“什么今不如昔？”张爱萍起初一愣，随口又说道：“就是今不如昔吗。”

笃，笃，张爱萍手执拐杖向他的坐车走去。

阜城路大会的第二天，南苑和永定路又热闹起来。两张大字报，一张署名为“金胜锡”，另一张的落款叫“东兵”，向张爱萍发动了凌厉的攻势。

大字报历数张爱萍“攻击文化大革命”、“否定大好形势”、“谩骂诬蔑革命的新生力量”、“妄图一手遮天”以及种种“复辟回潮”、“反攻倒算”的言行。

然而，这两张大字报并没有产生文革初期那样的“轰动效应”，七机部很平静，230厂也很平静。看大字报的人不多。即使看过大字报的人，情绪也很冷漠。

过了几天，张爱萍开始在各种场合，对“金胜锡”和“东兵”做出了回答：

“有人说我讲‘今不如昔’，这话是别人强加给我的，那是抬举我，我还没有这么讲咧，但今天我就告诉你，就是这个意思！比比过去的老五院，天渊之别！你们说，是不是今不如昔？！他们的导弹、卫星能上天，你们行吗？记住，我会给你唱‘虎踞龙盘今胜昔’的，但今天不行，绝对不行，管你报纸上怎么吹，就是不行！”这是开场白。接着他说：

“说我讲今不如昔，就是否定文化大革命。告诉你，我不怕，泰山压顶也不能把我骨头压碎！”

“有人不是骂我‘复辟狂’吗？今天我还要讲几句‘复辟’的话。你们七机部比起过去老五院来怎么样？老五院的情况我是知道的。请老五院的同志回答，老五院那些好的传统、好的经验哪里去了？你们为七机部干了些什么？为国家干了些什么？我说，你们有些人不干事，不革命，不按党性办事！不要说是党性，就连人性呢？你们的良心呢？都到哪里去了呢？现在全国的形势正在好转，有的单位好转得很快。可是你们这里还是乱，虽然比过去好些了。同志们，不能再乱了！

再乱就是拖全国各行各业的后腿了！霸权主义那样地整我们，你们难道能忍心吃社会主义吗？有人向我反映说，现在我们这里有些人光顾自己的山头，互相勾心斗角，‘桌面上握手，桌子肚下踢脚’。我说这是新红楼梦！《红楼梦》里不是说过，王熙凤当面摆笑脸，脚下使绊子吗？请同志们不要再搞派性，不要光顾自己的山头，不要再唱新《红楼梦》了！”

这是张爱萍所要回答的第一个问题。接着，他回答了第二个问题：

“有人说，‘奉劝同志们不要小资产阶级摇摆。今后的形势还不知道怎么样呢！难道张爱萍能一手遮天吗？’同志们，这话很厉害呢！”

他接着说：“跟毛主席革命路线走，有错误，自己认识了，就坚决地改正错误。这叫什么？这不叫左右摇摆，这叫服从真理。这叫按党性办事！

什么‘一手遮天’！告诉你，我不是一手遮天，我是一手通天！

这里出现的好苗头，思想上和工作上的进步，改进，我都通了天了。我都告诉了洪文同志，告诉了小平同志，告诉了叶帅，告诉了华国锋等中央领导同志。他们听了很高兴，……”

群众的掌声，一次比一次更热烈。

“请同志们不要鼓掌。”张爱萍最后说，“现在还不是鼓掌的时候。等到你们‘今胜昔’的时候，那时候你们再鼓掌不迟。到那时候我同你们一道来唱‘天翻地覆慨而慷！’”

# 第1339回：直肠癌，周恩来三次手术 返台难，张铁石香港自杀

1974年底，周恩来又发现大便隐血，大便也不畅通。毛泽东得知后，非常伤感。他躺在床上忍受着近乎失明的痛苦，费力地一字一句地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去打个电话问问总理现在的情况怎么样了。"

每次审阅有关周恩来的病情报告时，他总是特别认真。这期间，毛泽东一度因白内障不能看东西，当工作人员给他读周恩来的病情报告时，他听得格外认真、细致，居然能记住周恩来每天失血的数字以及施行第几次手术等。

1975年3月6日，周恩来作肠胃镜检查，发现大肠内接近肝部有一肿瘤，类似核桃大，食物成便经此肿瘤处蠕动甚慢，通过亦窄。若此肿瘤发展，可堵塞肠道。不管是良性还是恶性，除了开刀取出外，别无其他治疗方法。政治局负责周恩来治疗工作的小组成员王洪文、叶剑英、邓小平、张春桥听取了医疗组的汇报，看了X光照片和录像电视，同意施行开刀手术并报告毛泽东。毛泽东看到报告，又仔细地询问了随身医生，认真地听了医生对病情的分析后，批准同意给周恩来做手术。

对于手术的后果，周恩来非常明白，考虑再三，3月20日，他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

"今年开会（指四届人大）后，大便中潜血每天都有，大便也不畅通。因此利用3月间隙，进行食钡检查，始发现大肠内接近肝部分有一肿瘤，类似核桃大，食物成便经此肿瘤处蠕动甚慢，通过亦窄。若此肿瘤发展，可堵塞肠道。灌钡至横结肠，在肿瘤下，抽出钡液无血；灌钡至升结肠，在肿瘤上抽不出钡液，待与大便齐出有血。在食钡检查时，食道、胃和十二指肠、空肠、小肠均无病变，更无肿瘤。而这一大肠内的肿瘤位置，正好就是四十年前我在沙窝会议（指1935年8月在四

川省毛儿盖附近的沙窝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后得的肝脓疡病在那里穿肠成便治好的,也正是主席领导我们通过草地北上而活到现在的。由于病有内因,一说即明。好了的疮疤,现在生出了肿瘤,不管它良性还是恶性,除了开刀取出外,别无其它治疗方法。政治局常委4同志(王、叶、邓、张)已听取了医疗组汇报,看了爱克斯光照片和录相电视,同意施行开刀手术,并将报请主席批准。"

信写好后,他又感到不妥,又写了一个纸条给毛主席的机要秘书张玉凤,在纸条上,他再三叮嘱张玉凤,关于病情报告"或在主席休息好后再读给主席听。一切托你酌办,千万不要干扰主席太多!"

3月23日,毛泽东休息起床后,处理完了国内有关情况的报告后,张玉凤见他心情不错,说:"主席,周总理针对自己的病情给您写了一封信,是不是念给您听听?"听说是周恩来的来信,毛泽东点了点头。张玉凤将周恩来的信缓慢地念给他听。毛泽东听后,长时间不语。张玉凤无法知道,这封信对于毛泽东心灵上的冲击和震撼有多大。但有一点她是清楚的,这封信给毛泽东又增添了无限的愁绪。过了很长一段时间,他对张玉凤说:"你替我打电话给总理,问候总理,叫他安心治病。"

张玉凤从杭州毛泽东住地给周恩来打来电话,说:"病情报告都念过了,主席很惦记总理,有几天睡不好觉。"

这些天铁瑛见毛泽东心情不好,有时间就过来陪他聊一会儿天。在一次聊天时,毛泽东对铁瑛说:国家面临着领导危机。

对于这种危机,别人无法理解毛泽东的忧愁。面对无法抗拒的生死自然规律,一种无奈时常折磨着他。一个多月里,在南方的毛泽东已多次接到周恩来的病情报告,他自然明白这意味着什么。这以前,张云逸、彭德怀、滕代远和李富春相继去世。对于年迈多病的毛泽东来说,这些消息增添了他更多的忧虑。他在1974年9月24日会见越南劳动党第一书记黎笋等人时讲,他感到党和国家面临着"领导危机"。此时的他,常吟诵或听读一些中国古典诗词,大多是民族英雄和爱国志士们的咏唱,它们或激昂豪放,或悲怆凄婉。这些诗词,成为毛泽东用来排解内心复杂而又难以言状的情感的一种寄托。有时候,他也向身边工作人员介绍诗人的情况和历史背景,并详细讲解作品的

内容。

3月中旬,他又指示有关人员注释和印制大字本汤显祖《邯郸记·度世》(节选)。3月21日,姚文元依然是把任务下达给上海朱永嘉,他们在4月初完成并上送。

《邯郸记》的作者汤显祖是明朝万历中后期的文学家,他的代表作是《牡丹亭》,歌颂男女爱情的自由,反对封建礼教,迄今还是昆曲的传统名剧。《邯郸记》是汤显祖生前根据唐代传奇《枕中记》的某些情节改写的最后一个剧本,主题思想是讲儒生们追求通过仕途寻求荣华富贵的生活,实际上不过是黄粱一梦。毛泽东在1929年所作《清平乐·蒋桂战争》上阕中就曾引用《枕中记》里面黄粱梦的典故:"洒向人间都是怨,一枕黄粱再现。"

《邯郸记》剧中主人公因黄粱一梦,感知人生如梦,便随吕洞宾出家去了,剧中的吕洞宾与何仙姑都是"八仙过海"故事的主要人物。毛泽东所选《邯郸记·度世》的两支曲子是故事的引子,前一支是写何仙姑扫花的情景和感想,后一支是何仙姑对吕洞宾的叮嘱,在昆曲中叫做《扫花》。

何仙姑相传是唐广州增城一小女子,住云母溪,十四、五岁时,食云母粉而成仙,行动如飞,在山中采果子奉母,后被吕洞宾收为弟子。

《度世》作为《邯郸记》的引子,是叙述吕洞宾向何仙姑告别下凡度人时,何仙姑对他的嘱咐。因为此时的何仙姑在天门扫花,由于她已"证入仙班",所以吕洞宾要下凡去度人来代替她的工作。何仙姑嘱咐吕洞宾这次下凡度人时,不要再去卖酒的贫穷东老那儿喝酒,以免醉酒误事。希望吕洞宾惦念着何仙姑在天上等他回话,不要在下界流连忘返。最后嘱咐吕洞宾若在凡间度了人就早些儿回话。如果太迟了,何仙姑进仙班以后没人打扫地上散落的桃花,她就会受人埋怨。

3月25日。邓小平主持召开国务院会议,讨论运用徐州经验推动铁路整顿的深入和整个工交战线整顿的展开。刚回京的万里在会上作了报告,汇报了铁道部贯彻中央9号文件的情况,介绍了徐州铁路的整顿工作。会议提出,中央9号文件的精神不仅适用于铁路工作,除体制外,也适用于各行各业。

当万里讲到徐州市委检讨很深刻,说3月底平反问题可以全部解

决时,邓小平说:“要借这个东风一块解决,七、八千人,八百人一批,分十批。搞群众运动的方法很快,念八百人的名字嘛,弄错了立即平反嘛。”

当万里汇报全国铁路系统贯彻中央9号文件问题多的3个铁路局和4个车辆工厂时,邓小平说:“要查一查,只要是确实的,要调走,军委下命令把他(按:指部队干部)调走,铁路系统的部里赶快调,4月1日行动。”

“看有后台没有,省委、军区有没有人支持,是不是有人不听中央指示,不听部里调动。有后台的要脱钩,不听铁路指挥的,调走嘛!从4月1日开始。中央、国务院下决心,你们报告嘛!犯错误我们承担,我们已经等了很久了。现在有9号文件,有脱钩的条件。”

“铁路局不听指挥的,4月1日就调,铁路第一步可先采取脱钩。如那个副局长,宣布撤职,不只是调的问题。”

“管你有理无理,这段闹就无理。党的方针政策,和群众见面解决问题比较快,也比较透,多数人对派性厌倦了,有百分之九十五的群众拥护主席安定团结的指示。只要这一条肯定的话,就充分发动群众,问题就好解决了。各部也要同省委商量一下,让能干的、强的同志和地方结合起来,搞几个点看看。××市就是老大难,在铁路,在地方都是典型的。××部这个基地,那个基地,这个单位,那个单位,相信只要群众起来了,问题就好解决了。相信采取这个方法是快的。主席讲过,有些人不怕领导批评,就怕群众,党委会有时不行,群众起来了就行了。现在看起来,问题可以解决了。要向干部和群众讲清问题。铁路不要等地方,四个厂不搞好计划要落空,你们无法修理,车开不动。铁道部要管,因为和铁道部关系密切,和地方一起搞。肯定有反对的,有怀疑的,有怕犯错误的,××市有人说:‘九号文件为复辟的文件’,这相当明显了。”

在3月25日的国务院会议上,邓小平提出:“下一步中心是要解决钢的问题。”

3月26日,周恩来进行第三次大手术,切除了结肠肿瘤。经病理检查,是结肠癌。

3月21日,来自沈阳的12次特快列车,停靠在了北京站。原国民

党第十二兵团中将司令黄维回到了阔别7年的北京,与他同车抵达的是新中国第七批、也是最后一批特赦的293名战犯。

作为这次特赦战犯的第一名,黄维代表293名战犯,给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写了一封感谢信,并在招待宴席上宣读了出来。一向“抗拒改造”、“连走路都挺着肚子”的黄维有此举动,令熟悉他的老朋友们惊诧不已。

22日,293名特赦战犯从抚顺、济南、西安、北京的战犯管理所来到北京的前门饭店,住在这里。

23日下午,北京饭店大厅灯火通明,举行宴会。人民大会堂建好后,北京饭店大厅就很少再举办宴会了。此时,只见会场上喜气洋洋,293名被特赦释放人员全部来了,他们身上穿着新的蓝色的军便服,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和几十年未谋面的老熟人打招呼。大厅里充满了欢声笑语。参加接见和宴会的除中央、国务院各部负责人和各界知名人士外,还有前6批特赦的在京的全国政协委员和文史专员杜聿明等,李仙洲特地从山东赶来。还有这次特赦的黄维等人的家属。

叶剑英、华国锋、吴德和政协副主席茅盾、最高法院院长江华步入会议厅,特赦人员全体起立,掌声雷动,万分激动。

叶剑英在会上讲话,会议气氛庄严、热烈,高潮迭起,场面动人,催人泪下。黄维、文强代表特赦人员发言,他们说:“我们过去维护万恶的旧制度,疯狂反共、反人民,把中国拖到了绝境,罪恶滔天。今天我们被特赦释放,获得新生,并给予公民权和妥善安置,这只有在毛主席、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中国才有可能。我们一定不忘共产党的恩情,决心努力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认真改造世界观,为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和祖国统一贡献自己的力量。”

他们十分激动,一边念稿子,一边带头喊口号。会议达到高潮。

宴会的情况简报及时送给毛泽东、周恩来。毛泽东很满意,决定再给每个被释放人员增加200元钱,100斤粮票。

当时200元的购买力有多少?那时,中国工人绝大多数是二级工,工种不同,在北京地区二级工的工资是35.5到43元不等,学徒工第一年只有十几元。而许多地区一个农民一年的口粮是430斤,还是带皮的原粮,100斤粮食可以够5口之家吃一个月的。

会后,特赦人员参观,会晤亲友,前门饭店人来人往,热闹非凡。4月2日,北京的活动结束,大部分特赦人员分散到各省市安置,前门饭店只留下10名报名回台湾的特赦人员,他们是王秉铖、周养浩、王云沛、蔡省三、段克文、杨南邨、张铁石、赵一雪、陈士章、张海商。除了蔡省三之外,其他人的亲属在台湾。因为宣布是来去自由,无须讲明理由,只要报名就批准。而最年轻的战犯蔡省三是蒋经国的“太子党”,临行前,他特地去王府井买了一幅刺绣,准备送给老上级蒋经国。

4月13日,这10人高高兴兴登上南下的飞机。14日由深圳到香港,中国旅行社香港分社安排他们住在兰宫饭店和帝国酒店。他们除忙于接待记者采访外,纷纷给台湾的子女、旧部打电话,告诉他们,已到了香港,用不了几天就可以回台湾团聚。他们的行踪、言论、顿时成为海峡两岸关注的热点,成为全世界舆论关注的焦点。

然而,来自台湾方面的声音却让他们大吃一惊。台湾方面以这些人是统战工具、是间谍为由,拒绝他们入台。

这让10名特赦返台的国民党前将领进退两难,只能焦灼地等待。但过港签证5次延期后,台湾方面的态度仍然没有改变。就在这时,10人中的张铁石突然失踪,20多天后,传来了他已自杀身亡的消息。

“张铁石的妻儿肯定希望他过去团圆,但那么近就是进不了家门,是很悲惨的事。他应该是彻底绝望了。”抚顺战犯管理所原管教刘家常说。

但张铁石的死并未让台湾方面的态度有所松动。申请赴台的特赦战犯们,4人去了美国,3人返回大陆,其余两人留在了香港。

# 第1340回：写文章，春桥论“全面专政” 董必武，蒋介石相继离世

1974年，设在湖北沙洋劳改农场的国务院农办、农政“五七”干校宣布撤销，清查“516”专案组也解散了。被关押隔离审查5年多的“516”分子，终于获得自由，被允许回北京同家人团聚。

但“516”问题并没有宣布结束审查，农村政治部副主任秦化龙因为“516”后台的问题和新疆叛徒问题依然关押在秦城监狱里，农林政治部宣传处处长、原上海警备区宣传部原副部长吴文平也依然关押在湖北沙洋监狱里。

一天，随秦化龙转业到农政的教育处长刘子兵和秦化龙秘书许人俊相约，一起去看望老首长，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兼公安局长刘传新。

刘传新曾经担任上海警备区政治部副主任，秦化龙是他的老领导，吴文平、刘子兵和许人俊都是他的老部下。多年不见，刘传新在天安门附近的办公室热情接待他们。对老首长秦化龙和老部下吴文平的悲惨遭遇，他早有所闻，也深表同情。刘子兵和许人俊希望从他那里探听一些有关“516”的消息。谁知他眉头紧锁，苦恼地指着办公桌上一大堆档案说：“你们看，我在北京市抓了许多‘516’，关在监狱里，材料一大堆，至今我还不知道怎么处理呢！”

接着，刘传新伤感地对他们诉说：“我在这里抓‘516’，我妻子在江苏却被人家当作‘516’抓起来，至今还关押审查啊！究竟什么是‘516’，我也说不清！”

恰在这一年，1974年，北京航空学院的李长喜、罗世忠和王精业3人受命对该学院原党委副书记程九柯的“新疆马明方叛徒集团”的历史及其有关人员的问题进行复查。经过5个月的调查，他们向中央写出了书面报告，指出：大量的材料说明，当年新疆监狱关押的那些中共党员不是叛徒，其释放是无条件的，过去那种因为他们都加入了国民

党甚至特务组织,所以才被张治中释放的说法,纯属讹传,应予否定。报告认为:“有些专案组还带着老框框”分析“新疆马明方叛徒集团”案,“中央二办曾封存过新疆敌档中有关说明这批人无问题的材料,不让下边查阅和引用”。报告请示:“等待中央专案组统一做结论”。

1974 年底,中央专案组“三办”奉命对“新疆马明方叛徒集团”案进行复查、结案。他们在查阅大量的敌伪档案材料和“二办”封存的档案材料后,又重新提审了原国民党中统局特务郑大伦,并调查了其他几个曾提供过重要伪证的人,从而弄清了原专案组据以“审查”、“定案”的所谓“活材料”的来源,然后于 1975 年 3 月写出了对该案的复审报告,从根本上否定了“新疆马明方叛徒集团”的存在。

报告上呈中央,周恩来阅后批示:把复审报告压缩到 1500 字左右,改为平反报告。同时他还让秘书将张治中 1967 年 8 月 16 日致毛泽东的信——《我经历事实的简述》中,有关新疆监狱中共人员表现的段落摘录下来,抄送中央“三办”,一并报送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审阅。

中央专案组“三办”按照周恩来的指示,很快写出《关于新疆马明方案的平反报告》,呈报上级,中央办公厅于 7 月 31 日以中办发〔1975〕10 号文件将该报告转发各省军级单位。文件中称:“毛主席、党中央已经批准对‘新疆马明方案’予以平反”,“马明方等绝大多数同志在敌人监狱里表现很好,没有自首叛变。”

就这样,因“新疆马明方叛徒集团”案被关押审查达 8 年之久的张子意、秦化龙、吉合、高登榜等人终于走出了监狱,获得了自由。但是许多人已经被折磨成终身残疾。而“新疆马明方叛徒集团”案中的马明方、杨之华、安志敏、李宗林、沈谷南等 24 人,则已离开了人世。

被囚禁 8 年之久的秦化龙是在 1975 年 5 月,拄着拐杖,艰难地移动残腿,缓缓走出牢门的。但是他的自由还是有限的。专案组不允许他在北京逗留,派人送他直接登上了开往河南的火车,来到新乡市干休所,并规定不得与亲人通信,不得与外界联系。

关于“新疆马明方叛徒集团”一事暂且可以告一段落了,我们再来看看 1975 年上半年,中国的政坛还发有哪些特别的事情。

3 月,余秋里来到上海。他在对上海工交口的干部讲话时说:

“最近不断出现许多小道消息,有了一定土壤和气候,一些阶级敌

人就纷纷从阴沟里出来放谣言。上海也有,听你们市委几位同志说,虹口还贴了大字报,说什么党中央政治局不同意人代会通过的国务院名单,还有什么的……”

上海工交口党委负责人插话:“中央几位首长的报告,”

余秋里:“是谣言,中央首长的报告是要本人过目过,再用正式文件发表的,哪有那么多的报告没有审阅过就满街传,满街贴,……”

上海工交负责人说:“还有不少北京来信、快讯、简报、号外、来电之类。”

余秋里:“都不是什么北京来的,也不是党中央内部透露,都是自己搞出来的,简直造谣造到党中央头上。人代会开完后,我们国务院开了几天会,我到了山东以后,就到你们上海来,上海几位代表还跟我一起讲话呢。哪来的余副总理在全国计划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上海工交负责人:“还是重要讲话,北京特急来信。”

余秋里:“全是毫无根据的胡说八道,还造得有声有色,我看不是阶级敌人就是别有用心的人搞的。大家要擦亮眼睛,别相信那一些阴沟里的消息。

还有一些同志抱怨我们只顾拼命支援兄弟国家,搞穷自己国家,牢骚一大堆,说什么‘朝鲜的尼龙纱,阿尔巴尼亚的小楼房,越南的炮和枪,西哈努的金饭碗,抽干我们的血和汗,还要下乡去放羊。’这种思想真是要不得,发展下去我看不是放羊,是放党吧!”

3 月 31 日晚,国家计委向各省市自治区发出电话通知并印发工交、农林、国防工业各部,要求迅速把中央《关于加强铁路工作的决定》的 9 号文件精神传达到整个工交战线干部群众中去,务必做到家喻户晓。要解决好领导班子的问题,促进安定团结,把交通运输和工业生产尽快搞上去。整顿工作开始在整个工交战线开展起来。

4 月 1 日,张春桥写的《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一文,经政治局讨论后,毛泽东批准,在《红旗》杂志第 4 期上发表,《人民日报》全文刊登。张春桥在文章中写道:

“为了加深对毛主席指示的理解,让我们看一看我国所有制变更的情况,看一看一九七三年各种经济成份在我国工、农、商业中的比重。

先说工业。全民所有制工业占全部工业固定资产的百分之九十七,工业人数的百分之六十三,工业总产值的百分之八十六。集体所有制工业占固定资产的百分之三,人数的百分之三十六点二,总产值的百分之十四。此外,还有人数占百分之零点八的个体手工业。

再说农业。在农业生产资料中,耕地、排灌机械的百分之九十左右,拖拉机、大牲畜的百分之八十左右是集体所有的。全民所有制的比重很小。因此,全国的粮食和各种经济作物,百分之九十以上是集体经济生产的。国营农场所占比重很小。此外,还保留着少量的社员自留地和家庭副业。

再说商业。国营商业占商品零售总额的百分之九十二点五,集体所有制商业占百分之七点三,个体商贩占百分之零点二。此外,在农村还保留着相当数量的集市贸易。

以上数字可以说明,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的集体所有制,在我国确实已经取得了伟大胜利。不但全民所有制的优势有很大的增长,而且在人民公社经济中,公社、大队、生产队三级所有的比重也有一些变化。”“由于这二十五年来,我们逐步地消灭了帝国主义所有制、官僚资本主义所有制和封建主义所有制,逐步地改造了民族资本主义所有制和个体劳动者所有制,社会主义的两种公有制逐步地代替了这五种私有制,可以自豪地说,我国的所有制已经变更,我国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已经基本上挣脱了私有制的锁链,我国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已经逐步地巩固和发展起来。四届人大通过的宪法,已经明确地记载了我们取得的这些伟大胜利。”

但是,“社会主义的公有制并不都是全民所有制,而是两种所有制,全民所有制在作为国民经济基础的农业方面还很薄弱。马克思、列宁所设想的在社会主义社会资产阶级法权在所有制范围内已经不存在了,是指的全部生产资料已经归整个社会所有。我们显然还没有走到这一步。我们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不要忽视无产阶级专政在这方面还有很艰难的任务。

我们还必须看到,不论是全民所有制,还是集体所有制,都有一个领导权问题,就是说,不是名义上而是实际上归哪个阶级所有的问题。”“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是否正确,领导权掌握在哪个阶级手里,决

定了这些工厂实际上归哪个阶级所有。”

“必须看到,我们的经济基础还不稳固,资产阶级法权在所有制方面还没有完全取消,在人们的相互关系方面还严重存在,在分配方面还占统治地位。在上层建筑的各个领域,有些方面实际上仍然被资产阶级把持着,资产阶级还占着优势,有些正在改革,改革的成果也并不巩固,旧思想、旧习惯势力还顽强地阻碍着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的生长。随着城乡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新资产阶级分子一批又一批地产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还是很激烈的。就是老一代的地主资产阶级都死光了,这种阶级斗争也决不会停止,林彪一类人物上台,资产阶级的复辟,仍然可能发生。”

“历史经验又告诉我们,随着无产阶级专政取得一个又一个的胜利,资产阶级表面上也会装作承认无产阶级专政,而实际上干的仍然是复辟资产阶级专政。”

4 月 1 日这天,《红旗》杂志还发表了北大、清华两校的文章:《孔丘其人》。

这篇文章是江青点的题。她当时共出了 3 个题目,其中之一是《孔丘其人》。2 月 26 日,迟群和谢静宜向北大、清华批林批孔材料小组布置传达了江青对这篇文章的具体要求:要突出两点,一是孔丘稍一得势就杀人,杀少正卯;二是孔丘到处碰壁,还要写上“孔丘压迫妇女”。迟群说,文章要“写得生动、深刻,不要太长”,“要在 5000 字之内”,在“3 月 8 日以前完成”。

接受任务后的当晚,北大、清华批林批孔材料小组党支部书记李家宽把材料小组历史组组长、北大历史系老师范达人叫了去,对他说:“上面让我们写篇文章,题目是《孔子其人》。这个题目口气很大,有来头的。现在这个文章写作任务交给你们组。”

范大人说:“行,我们试试看吧。”

李家宽说:“首先是通俗易懂来把孔丘这个人勾画出来,然后要写他稍一得势就镇压少正卯,少正卯就是革新派。”

接着又说:“要写他压迫妇女的。”

不久,稿子写完,交了上去。迟群、谢静宜看后说:“还差得远呢!”

迟群说:“文章要写得更深刻,更生动活泼,要把孔丘写得像过街老鼠,人人喊打。要写得好,3 月 8 日以后写成也行。”

3 月 8 日到了,迟群再次向他们布置:“要集中揭露这个人,但又不要孤立批孔丘,要和我党的路线斗争、阶级斗争联系起来。历代反动派、党内机会主义头子要抬出来……要在孔丘的家世上做文章,把孔丘的祖父、父亲的姓名写出来,注上音,以说明孔丘代表的是没落奴隶主阶级利益,不适应历史潮流的需要。”

范达人按照迟群的意见又写了一稿,但江青仍不满意。她对迟群说:“《孔丘其人》你们写得出来写不出来?写不出来我另找别人。”

迟群把稿子拿回来督促修改,几经反复,终于在 4 月 1 日登载出来。

4 月 2 日 7 时,中国共产党一大代表、国家代主席董必武病逝于北京医院。28 天前,1975 年 3 月 5 日,病重的董必武还用颤抖的手,在病床上写下了最后一首诗:

九十光阴瞬息过,吾生多难感蹉跎。
五朝弊政皆亲历,一代新规要渐磨。
彻底革心兼革面,随人治岭与治河,
遵从马列无不胜,深信前途会伐柯。

董必武去世,毛泽东特别悲哀。他是与毛泽东一起参加中共一大会议的代表,分别是两湖的代表,一个是湖北的代表,一个是湖南的代表。这天,毛泽东心情非常难过,不吃东西,也不说话,只是默默地一遍又一遍地倾听上海蔡瑶铣唱张元幹的那首《贺新郎》的录音:

梦绕神州路,
怅秋风连营画角,
故宫离黍。
底事昆仑倾砥柱,
九地黄流乱注,
聚万落千村孤兔?
天意从来高难问,
况人情老易悲难诉。

更南浦,送君去!

生岸柳催残暑,
耿斜河疏星淡月,
断云微度。
万里江山知何处?
回首对床夜语。
雁不到,
书成谁与?
目尽青天怀今古,
肯儿曹恩怨相尔汝!
举大白,听《金缕》。

这是毛泽东在给董必武送别。尽管张元幹写这首词是给胡铨送别的,作者有作者的情景,但毛泽东在反复听这首词,却是倾注着他自身的情感。

“天意从来高难问,况人情老易悲难诉。”自己老了,未来的结局如何?悲情难诉。

“万里江山知何处?回首对床夜语。”回首当年上海“一大”召开时,二人对床夜语。

“雁不到,书成谁与?”你去的地方,飞雁也不到,我有书信,由谁来传书啊!

“目尽青天怀今古,肯儿曹恩怨相尔汝!”你我都能目尽青天放眼天下,胸怀古往今来的国家兴亡大事,怎么会理会儿孙辈带来的一些个人恩怨私情呢?

“举大白,听《金缕》。”“大白”是酒杯的名称。《金缕》是贺新郎词牌的别名,毛泽东在此把它改成“君且去,休回顾!”这是给董必武送别的意思。

就这样,毛泽东让工作人员将《贺新郎》录音整整放了一天,那悲壮的旋律,绕梁入髓……

4月初,上海朱永嘉将注释和印制大字本汤显祖《邯郸记·度世》(节选)完成并上送。4月4日,毛泽东又通过姚文元给他们下达了注

释和印制大字本王安石《桂枝香》、张孝祥《六州歌头》,陈亮《念奴娇》,辛弃疾《贺新郎》、《摸鱼儿》、《水龙吟》、《水调歌头》、《永遇乐》、《汉宫春》、《破阵子》,随后还有蒋捷《梅花引》、《虞美人》、《贺新郎》,萨都剌《满江红》、《念奴娇》(《百字令》)、《木兰花慢》。

其中王安石的《桂枝香》、张孝祥的《六州歌头》、陈亮的《念奴娇》这三篇的主题都是怀古,地点都与金陵这个六朝古都有关。这期间,文化部为毛泽东录制了一套古诗词演唱磁带,有蔡文姬的《胡笳十八拍》、白居易的《琵琶行》、王安石的《桂枝香·金陵怀古》、秦观的《鹊桥仙》、辛弃疾的《南乡子·登京口北固亭有怀》、陆游的《渔家傲》、岳飞的《满江红》、陈亮的《念奴娇·登多景楼》、张元幹的《贺新郎·送胡邦衡待制赴新州》、洪皓的《江梅引·忆江梅》、萨都剌的《满江红·金陵怀古》等。这套磁带共有59盒,请一些词曲演唱家和乐器演奏家演唱配乐。

4月4日,迟群传达江青的电话指示:“我昨天接见工人同志们的讲话中,可能有不全面、不适合的地方,请同志们充分地讨论提出意见。因为完全没有睡好觉。

另外,我讲了春桥同志关于对资产阶级全面专政文章的重点。我还要补充另一个重点,就是现在我们的主要危险不是教条主义,而是经验主义,这个问题进城以后就屡次提出过,在全党没有提起应有的警惕。现在我们应该按照毛主席的教导,对经验主义的危险性,擦亮眼睛,要认识清楚,保持高度警惕。经验主义是修正主义的帮凶,是当前的大敌。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如不很好地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提高识别经验主义的鉴别力,就会变修。”

4月5日,江青在对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讲话时,再次强调:“党现在的最大危险不是教条主义而是经验主义。”

1975年4月5日午夜,从海峡彼岸传来一条消息:蒋介石因心脏病在台北士林寓所去世。警卫人员从收音机里听到这个消息都十分高兴,起床后,便将这个消息告诉了毛泽东。出乎大家的意料,毛泽东听后并没有高兴,相反一脸的凝重。他对身边的人说:“知道了。”此时,没有人能理解他内心的复杂感情。

1950年、1955年的三次台海危急,毛泽东将对台方针从武装解放

台湾转变为实现第三次国共合作,争取和平解放台湾。在1958年金门炮战中,毛泽东对中央领导人说:“台湾是要胡适、陈诚,还是要蒋介石,我看还是要蒋介石好。”从蒋介石退守台湾岛所经历的风波曲折中,不管出于何种政治动机和政治意识,他在坚持一个中国,反对两个中国和一中一台,确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立场是一贯的。在这个重大问题上,蒋介石和毛泽东有着强烈的共识,蒋介石在晚年多次公开反对“两个中国”的主张。1967年9月7日,蒋介石在与日本首相谈话时说:“美国由于不愿卷入蒋介石反攻大陆的漩涡,于是有了两个中国的想法,借此苟安于一时,殊不知两个中国的办法,是我所绝对反对,而也是中共所不能接受的,仅为一种幻想而已。”

到了文化大革命后期,毛泽东又在进行促进国共和谈与和平统一祖国的工作。1972年10月,他曾要求去美国的人前往纽约看望“政府外交部常驻美国大使”顾维钧,邀请他来大陆看看,还要告诉他统一祖国是海峡两岸爱国人士共同的愿望。

1973年春天,章士钊老先生飞香港,希望架通沟通大陆与台湾的和平桥梁,不幸病逝于香港。祖国统一成了他、周恩来、蒋介石、包括后来的叶剑英、邓小平他们这代人心中最大的夙愿。

1975年春节前后,蒋介石通过已经从美国回台湾担任“总统府”资政的元老陈立夫,经秘密通道向中共中央发出邀请毛泽东主席到台湾访问的消息。陈立夫和谈心切,在没有得到回音的情况下,在香港报纸上公开发表了一篇《假设我是毛泽东》的文章,欢迎毛泽东和周恩来到台湾访问,与蒋介石重开和谈之路,以造福国家和人民。陈立夫特别呼吁毛泽东“以大事小”,不计前嫌,开创再次合作的新局面。

毛泽东还没来得及将大陆的信息反馈过去,蒋介石已溘然长逝。而蒋介石的去世,对于统一大业来说无疑是一个损失。

以后几个月里,毛泽东同来华的外国客人谈话时,几乎每次都要提到这位曾经是中国人民反面教员的“蒋委员长”,并表示对最终解决台湾问题的关心。

# 第1341回：批《创业》，江青反经验主义 在广西，陈永贵骂张春桥

4月8日，文化部根据江青要求，召开系统各部门负责人会议，于会泳当众宣读他的检查及文化部对电影《创业》的“十条意见”。在此之前，文化部根据江青的指示，把《创业》摄制组的主要干部叫到北京，让他们“把来龙去脉谈一谈”，说明：“不论涉及任何人和事都没关系”。

同时，于会泳亲自执笔写检查，三易其稿，直到根据江青、姚文元的意见，形成了文化部对《创业》的“十条意见”之后，才获得了点头通过。

文化部“十条意见”的主要内容是：

1、不如报告文学感人，也不如报告文学脉络清晰；

2、笼统地提到党中央和中央首长，起到了给刘少奇、薄一波之流涂脂抹粉的作用；

3、较明显地存在着写活着的真人真事问题；

4、革命乐观主义精神表现较差；

5、周挺杉表现了一个鲁莽汉子的形象，是单薄的，有缺陷的，因而是不典型的；

6、有意用贬低周挺杉的方式来提高华程；

7、工程师章易之的转变有人为情感化的倾向；

8、有很多地方表达不清，让人看不懂；

9、回述了铁人的过去，造成结构上的拖沓；

10、主要人物的言语概念化。

对这“十条意见”，《创业》摄制组的人怎么也想不通，文化部的领导指示他们要反复学习讨论“十条意见”，并让摄制组或长影厂写一篇自我批评的文章。经过两个月的学习，摄制组的全体成员仍百思不解，文化部派人来监督检查，收集他们做自我批评的情况。

关于《创业》的风波,就这样沸沸扬扬地传播开来。

4 月 10 日,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江青在会上提出反经验主义问题,并要求政治局讨论。邓小平表示了异议。

4 月 11 日,周恩来同邓小平谈话。

4 月 12 日,周恩来同江青谈话。

此时的杭州西湖,春花绽放,柳枝摇曳,雀跃莺啼,一派生机盎然的情形。时间过得很快,不知不觉毛泽东到这里已经两个多月了。春天给他忧郁的心情带来稍许安慰。4 月 10 日上午,一直陪同毛泽东在杭州的中办负责人汪东兴、张耀祠通知毛主席警卫处负责人:朝鲜金日成主席将率领朝鲜劳动党和代表团访华,毛主席准备在杭州与金日成会晤,警卫部队要尽快做好准备。

前不久,毛泽东过 81 岁生日,金日成特地送来贺寿礼物——朝鲜苹果,毛泽东非常高兴。当他知道金日成眼有病时,立即调派国内最好的眼科专家到朝鲜为金日成治病。专家在朝鲜期间,毛泽东时刻关注着金日成的治疗情况,并亲自审阅有关诊治情况的电报。

得到金日成到杭州会见毛主席的消息,浙江省委负责毛泽东保卫工作的铁瑛立即责令警卫处制订方案。两天后,汪东兴和铁瑛一起听取了他们的汇报,各项警卫工作均按要求就位。

4 月 13 日晚 7 时,原来的计划突然改变了。当晚,警卫部门又接到通知,金日成不来杭州了,毛泽东决定回北京会见金日成。对如此突然的变化,一般都难免措手不及,但担负毛泽东警卫的部队不愧是一支经验丰富的部队,他们在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内,将毛泽东离杭州的车辆调配、行走路线、沿途警卫迅速确定。晚上 20 时,毛泽东在工作人员的搀扶下,缓慢地走出刘庄一号楼。这时,住地的一些工作人员已列队站在楼厅内外,送他离去。见到走路已十分困难、容颜苍老的毛泽东,一些前来送别的人泣不成声。毛泽东用疲惫的目光环顾一遍众人,无力地点点头,算是向大家告别。

这也是毛泽东最后一次告别他的“第二故乡”——杭州。

毛泽东突然离杭,使得当晚正在省委开会的谭启龙、铁瑛两位书记措手不及。在接到毛泽东要离杭的紧急通知之后,他们二人立即停止了会议,迅即坐车赶赴刘庄。但毛泽东已经离去。于是,他们又直

驶杭州车站。待赶到站台时,专列正徐徐启动。他们跑着来到毛泽东坐的车窗,只见车厢里的毛泽东隔着玻璃窗,正向他们频频挥手告别。

4 月 14 日,毛泽东结束了他 9 个月的南方之行,回到北京。

4 月 18 日下午 16 时,朝鲜金日成主席乘坐的专车到达北京。邓小平到车站迎接。当天下午,毛泽东就会见了金日成和他率领的党政代表团。邓小平陪同会见。

毛泽东同金日成的谈话,内容相当广泛。

谈话快结束的时候,毛泽东告诉金日成:“我们 PREMIER(总理)有病,一年里开过三次刀。一个是膀胱,开过两次。然后是大肠外面长了一个东西,又开了刀。”

金日成回答说:“邓小平副主席讲过这个事。”

邓小平说明:“专门请他们的玄峻极大使回去报告了这件事。”

毛泽东深有感慨地说:“董必武同志去世了。总理生病,我也生病,康生同志也害病,刘伯承同志也害病。你们好一些。”他谈到自己的健康状况说:“我今年 82 了,快不行了,靠你们了。”

金日成说:“谢谢。祝你保持健康,保持好的身体!”

毛泽东说:“我能想,能吃饭,能睡觉,这三个好。”

金日成说:“这也是很重要的,因为你的存在对中国人民、朝鲜人民、亚洲人民、世界人民、第三世界人民有很大的鼓舞,所以你长寿对我们是很宝贵的事。”

毛泽东说:“不行了。”

金日成问:“为什么不行?”

毛泽东答道:“上帝请我喝烧酒。”说完他笑了。

金日成说:“还早!”

毛泽东笑着说说:“还早啊? 你叫我不去啊?”

金日成说:“我们不希望你去。”

毛泽东又关切地询问金日成你们那里有没有找到石油,然后谈话直接涉及邓小平。

毛泽东说:“我不谈政治,”他指着邓小平说:“由他来跟你谈了。此人叫邓小平。

金日成回答道:“我们很早就认识了,他做过很多工作,是老朋友、

老同志了。”

毛泽东说:“他会打仗。”

金日成接着说:“不但会打仗,而且会做政治工作,进行思想斗争。”

毛泽东补充道:“还会反修正主义。”

金日成说:“是啊,我们很清楚他。我和邓小平副主席10年没见了。”

毛泽东解释说:“红卫兵整他,现在没事了。那个时候打倒了好几年,现在又起来了。”

金日成说:“很好,我们欢迎!”

毛泽东说:“我们要他!”

金日成再一次说:“我们也欢迎他!”

会见结束送走金日成后,邓小平就张春桥3月1日在政治部主任会议上强调“经验主义是当前主要危险”的讲话,当面向毛泽东请教,同时还反映江青在政治局会议上正式提出要讨论这个问题。邓小平说他不同意“经验主义是当前主要危险”的说法。

4月20日,姚文元送审新华社《关于报道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问题的请示报告》,其中也说到:

“在今后一段时间里,我们要大力报道各级干部认真读书,刻苦钻研,决心弄通无产阶级理论,反对学习中不求甚解的作风。特别要注意宣传各级干部通过学习,认识和批判经验主义的危害,自觉克服经验主义。”

4月23日,毛泽东在新华社《关于报道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问题请示报告》上批示:

提法似应提反对修正主义,包括反对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二者都是修正马列主义的,不要只提一项,放过另一项。各地情况不同,都是由于马列水平不高而来的。不论何者都应教育,应以多年时间逐渐提高马列为好。

我党真懂马列的不多,有些人自以为懂了,其实不大懂,自以为是,动不动就训人,这也是不懂马列的一种表现。

此问题请提政治局一议。

为盼。

毛泽东

1975 年 4 月 23 日

周恩来看到这份批示后,立刻叫陈永贵过去。陈永贵匆忙赶到医院,只见周恩来沉着脸问:“你在广西说什么话啦?”

陈永贵摸不着头脑,正在发愣,周恩来又问:“你跟许世友讲什么啦?”

陈永贵想起来了,说:“就讲张春桥在政治局会上训人,训我了。”

原来,1973 年 11 月,陈永贵参加了政治局批评周恩来的会议,中央的斗争让在“十大”后进入政治局的陈永贵震惊。但是,与许多工农干部一样,他们对毛泽东、周恩来等老革命的尊重和感情是难以割舍的。

1974 年 9 月 30 日,周恩来抱病主持国庆 25 周年招待会,受到与会人员的热烈掌声欢迎。当周恩来讲完话后,大家热烈鼓掌,坐在前边的陈永贵与众不同,他一个人从座位上站了起来,把两只手举过头顶,使劲地鼓掌,以此来表达他对周恩来的敬仰之情。坐在旁边的张春桥对此很不以为然。

陈永贵应该是感觉到了张春桥的态度,他对张春桥的作派也不习惯。一次开政治局会讨论解放老干部的问题,提出让谢振华出任装甲兵司令。陈永贵不同意。他说:“谢振华在下边尽搞小动作,我不同意。”说着还举出例证,说王谦在山西怎么被人跟踪,文革初期造反派整的材料至今不肯销毁等等。

张春桥不紧不慢的插话说:“有些人说别人搞小动作,他搞的那动作比别人大得多,说话也让别人看出来,做事也让别人看出来,拍手也让别人看出来。”

陈永贵顿时就不干了,瞪着张春桥问道:“你这是说谁的?”

陈永贵叫道:“党的会不许我说话? 我反映的都是事实! 大不了我回去种地! 哼,你也没那个权威!”说完黑着脸一坐,再也不吭气了。

这天的政治局会议是王洪文主持。在场的政治局委员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谁也不说话。

散会后,陈永贵大步往外走,纪登奎快步跟上去,伸出大拇指赞

道:“老陈,够勇敢的。”

回到住处,李先念、陈锡联先后打来电话来对陈永贵说“你老陈今天可是捅了马蜂窝……”

1974 年 12 月 23 日下午,陈永贵应韦国清之邀飞抵南宁,参加广西的贫下中农代表大会。一年前调任广州军区司令员的许世友专程乘飞机到南宁机场迎接。

许世友与陈永贵的关系很好。同为政治局里的大老粗,许世友专爱跟陈永贵往一块坐。许世友开会每每迟到,大大咧咧地进了门,“哟,我又晚了!”说着便往陈永贵跟前凑。曾经有一次开会,许世友闲着没事捅了陈永贵一指头。这位少林寺出身的将军一身好武功,一指头下去陈永贵便疼得大叫一声。结果政治局里全看陈永贵一个人了。有了这次经验,陈永贵就摆手赶许世友:“去去去。”许世友笑道:“不啦不啦,不捅还不行么?”说着就嬉皮笑脸地挨着陈永贵坐下,不时还跟他说几句话。许世友一开口唾沫星子乱飞,陈永贵不住地抹脸。

听说陈永贵和张春桥吵了一架,许世友特别高兴。他亲亲热热地拉着陈永贵坐进自己的小车,一块去找韦国清。

韦国清生了场病。到了晚上,在为陈永贵一行组织的文艺演出开始前,韦国清露面了。这 3 位老头坐在小休息厅里高声谈笑,许世友和韦国清当着服务员的面大骂张春桥。陈永贵受到鼓舞,眉飞色舞地把他和张春桥吵架的经过描述了一番。

3 位正骂得兴起,服务员进来提醒说,节目开演的时间已经过了 45 分钟,老将军一挥手说:“叫他们等着!”3 个老头又痛痛快快地笑骂了半个多钟头才高高兴兴地去看节目。楞把全场观众亮了一个半钟头。

许世友回去后便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状告张春桥训陈永贵。他说张春桥动不动就训人,口头上说支持工农干部,实际上根本不让人家讲话,一讲话就挨训。

谁能想到,一份关于理论问题的批示,背后还有如此多错综复杂的背景。这也是为什么周恩来看到毛泽东这份关于理论问题的批示后,急急忙忙的把负责农业的副总理陈永贵找来的原因。

周恩来细细询问了事情的经过,叹道:“说话要慎重。许世友不在

北京,不太了解这里的情况。这样吧,等我出院了,把你和张春桥的矛盾解决解决。”

陈永贵从周恩来那里出来,心里觉得发虚,对他的秘书张怀英说:“我可闯了大祸了。”

张怀英劝道:“你就按总理说的办吧,听总理的。”

4月下旬,王洪文秘书肖木有事要回上海,去向张春桥告别。闲谈中,张春桥说:“你顺便代我去向市委几位领导说一声:‘上海不要多出头。让北京、辽宁出头,我们在后面跟着学。’”

4月27日,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研究贯彻毛泽东4月23日批示精神。

会上,叶剑英、邓小平等在发言中批评江青、张春桥等人大反经验主义的错误。邓小平说:

“很明显,这是一次有计划、有组织的反总理的行动!”并对江青在1973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十一次路线斗争”、在批林批孔运动中以个人名言送材料等问题提出批评。

对经验主义的问题,江青在会上作了自我批评。但对邓小平、叶剑英的批评,江青等认为是对他们搞“突然袭击”、搞“围攻”,是1970年“庐山会议的再现”。

会后,王洪文致信毛泽东汇报政治局会议情况。

4月29日、30日,周恩来先后同邓小平、华国锋、吴德、陈锡联、、王洪文谈话,了解27日政治局会议情况。

5月1日,周恩来与王海蓉、唐闻生谈话。

说到陈永贵,他北京工作后,先是住在京西宾馆,和纪登奎是邻居。但是农民出身的他,长期住在这样高档的宾馆很不习惯,认为太奢侈浪费,所以几次向周恩来提出搬家。中央为此作了安排,汪东兴找到中央警卫团副团长邬吉成和钓鱼台管理处处长张振良,对他们说:“你们两个到京西宾馆,找纪登奎和陈永贵同志,跟他们说中央办公厅决定让他们搬到钓鱼台住。因为没有其他的地方好安排了。老住在京西宾馆也确实不是个办法。”

邬吉成和张振良到京西宾馆,分别向纪登奎和陈永贵转述了汪东兴的话,征求他们的意见。当时他们两人都流露出不太好意思的神情

说:“我们只要有个地方住就可以了,进钓鱼台不太方便。”当然最后也都表示:“不过组织上既然这么安排了,我们照办就是了。”

1974 年 10 月 29 日,陈永贵从住了几个月的京西宾馆搬到钓鱼台 3 号楼,纪登奎住进了 2 号楼,加上先前搬进来住的吴桂贤,钓鱼台除了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外,又多了纪登奎、吴桂贤、陈永贵 3 人,也是一人一座小楼。

钓鱼台的小楼里,到处是厚厚的地毯,端茶送水的服务员悄然出没,挺大的地方连个声音也没有。陈永贵在这里还是住不习惯。他热闹惯了,一个人在这清静的小楼里憋得难受,大口地抽烟,怅然若失地走来走去;眼看着堆在桌子上的文件,越发增加了愁绪;一个人占着一幢高级楼房,他觉得比住京西宾馆还要奢侈浪费,因此心里更加不安。对坐在办公室里听汇报、批文件的工作他也很不适应。高贵地居于钓鱼台里当副总理就是一天到晚除了文件还是文件地审阅与批示,这种待遇,对于陈永贵简直就是一种难以言状的折磨。他打心眼里盼望来个熟人和他说说话。山西老乡倒也有不少人想来拜访,可是进不来……

1974 年 11 月中旬,陈永贵跑到西藏转了一圈,又回到大寨住了 20 多天。随后,没在北京住两天,就又飞到广西和许世友一起骂了一通儿张春桥,从广西回来已经是 1975 年 1 月 1 日元旦了。

1 月下旬,中央要求刚刚当上副总理的陈永贵和吴桂贤到王洪文住的 16 号楼学习马列,好好啃读哲学和政治经济学。陈永贵没有理由不去。可时间偏偏定在中午,这正是陈永贵睡午觉的时间。一个星期下来,陈永贵不耐烦了:“这在这时,每天坐在这里念这个书,什么事也干不了!”没过几天,他便找了个茬儿回山西了,接着又去了福建的农业学大寨会,再接着出访了墨西哥。随后又是转新疆、看上海,他自然也是说得到做得到的。再住进钓鱼台已经是 1975 年 4 月 18 日了。没几天,被周恩来召去谈话。5 月初,趁一次和王海容、唐闻生见面的机会,陈永贵征询了她们的意见,然后请人代笔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说自己多年在农村,对城里的生活不习惯,宾馆的门岗也很严,“老同志、老劳模见一面都很费劲”,怕时间久了与外界隔绝;为了同下边保持接触,掌握情况,不脱离劳动,请求批准他经常下去跑跑,三分之一

的时间在昔阳抓点,三分之一的时间在全国跑面,剩下的三分之一时间在北京。他很明智地给自己设计了一套史无前例的职责,一套与中央政府的行政管理职能不即不离的职责。

在这封信里,陈永贵还向毛泽东申请搬出钓鱼台。

# 第1342回：三三制，毛泽东赞陈永贵 说经验，张春桥生病低烧

1975年5月3日晚22时45分，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召集在京政治局委员开会。

屈指算来，从1974年7月17日那次政治局会议见过面之外，大多数的政治局委员跟毛泽东“阔别”10个月了！周恩来也抱病从305医院前来。

毛泽东一进来，第一个与周恩来握手。周恩来说：“大家快一年没有见到毛主席了，非常想念主席！”

“怎么样？还好吗？”毛泽东因“老年性白内障”，看东西模糊，但思维依然敏锐。他眼望着周恩来，关切地问。

周恩来回答说：“开了三刀，消化还可以，前天向主席报告过。”

毛泽东跟叶剑英握手时，说了句：“喔，老帅！”

毛泽东跟邓小平握手时，说了句：“小平呀！”

在与陈锡联握手时说：“你要挂帅呀。”

在与纪登奎握手时，纪登奎主动说：“最近刚见过主席一次了。”

毛泽东跟吴德握手，依然是那句：“哦，吴德有德呀！”

在与吴桂贤握手时，吴桂贤说：“主席好，我是吴桂贤。”

毛泽东说：“我不认识你啊？”

吴桂贤说：“我64年见过毛主席，国庆节参加观礼的时候。”

毛泽东没有想起来，说：“不知道。”

吴桂贤说：“延安儿女问候你。”

毛泽东问：“你是延安人哪？”

周恩来：“她是河南人，陕西西安的纺织女工。到延安去看了。”

毛泽东与苏振华握手，对他说：“管海军靠你呀，海军要搞好，使敌人怕，我们海军只有这样大。”他比了一下小手指。

“现在大了一点了，现在这么大。”苏振华边说边用无名指作比。

毛泽东跟谢静宜握手时说得最多:“小谢,你当了大官啦,要谨慎呀!”

谢静宜连忙回答说:“我不想当大官,但是现在官却越当越大。”

毛泽东说:“试试看吧,不行就……”他作了个手势说:“搞不好就卷铺盖卷。”

他在沙发上坐下,慢声问道:“永贵同志在哪里啦?”

陈永贵坐在离门口不远的沙发上,赶紧答道:“我在这儿坐呢。”

毛泽东指着身边的沙发说:“哎,这来坐,来,来!”

陈永贵赶忙起身来到毛泽东身旁。毛泽东握着陈永贵的手说:“永贵呀,你那个三三制很好呀,三分之一在大寨,三分之一在全国,三分之一在中央。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嘛。”

毛泽东把陈永贵写给他的那封关于搬出钓鱼台和三个三分之一的工作计划的信还给陈永贵,上边有批示道:“同意。钓鱼台无鱼可钓。”

毛泽东接着说:“永贵提出搬出钓鱼台,我同意。钓鱼台无鱼可钓嘛。”他转向陈永贵和吴桂贤说:“你和吴桂贤都搬出来。”

到北京当副总理的吴桂贤,还是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此时仍然每月只拿西北国棉一厂76元的工资。她无论是在政治局开会或在国务院开会,喝茶水要交2角钱的茶叶费。所以,吴桂贤每次都只喝白开水,不喝茶水。服务员问她:“吴副总理,您为什么不喝茶?”她笑笑说:“我不爱喝茶,怕睡不着觉。”每次在人民大会堂参加宴会,她都会按规定交餐费。

陈永贵从普通农民当上国务院副总理后,不仅老婆和孩子仍是农村户口,靠工分吃饭,他这位堂堂副总理也没有城市户口,也挣工分。没有城市户口就没有粮票。每年秋后大寨分粮食,要专门拿出陈永贵的那份口粮送到公社粮店,换成全国粮票给陈永贵捎去。

江青来到会场稍晚。她进来时,见毛泽东正在跟别人打招呼,就在一旁坐下。

经过一阵子寒暄之后,毛泽东宣布开会,言归正传,进入会议主题。会场一下子变得严肃起来。

毛泽东说:“好久不见了,有一个问题,我与你们商量:一些人思想不一致,个别的人。我自己也犯了错误。春桥那篇文章,我没有看出

来,只听了一遍。我是没有看,我也不能看书。讲经验主义的问题,我放过了。新华社的文件,文元给我写了。对不起春桥。还有上海机床厂的十条经验,都说了经验主义,一个马克思主义都没有,也没有说教条主义。办了一个大学,很多知识分子,他们觉得外国月亮比中国的好。”

张春桥的文章就是4月1日发表的《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文章提出反经验主义问题。因为文章发表前曾送毛泽东审定,所以毛泽东说对不起张春桥。新华社的文件就是指那份《关于报道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问题的请示报告》。

毛泽东继续说:“春桥的文章是有理由的。因为1958年就写了文章,那时我还不认识他,好像不认识。”

张春桥答道:“见过面。在北戴河开会柯老介绍认识的。”

毛泽东说:“没有印象,那篇文章我写了一个按语,《人民日报》登了。《人民日报》那时是邓拓管的吧?”

张春桥答:“是吴冷西。”

毛泽东说:“只有两篇文章是拥护的,其他的都是反对的,所以他有气。”

毛泽东接着说:“还有上海机床厂的10条经验,都说了经验主义,一条马克思主义都没有,也没有说教条主义。”

他接着说:“要安定,要团结。无论什么问题,无论经验主义也好,教条主义也好,都是修正主义,都要用教育的方法,现在要安定团结。”

他说:“现在我们的一部分同志犯了错误要批评。‘三箭齐发’,批林、批孔、批走后门。”

“批林批孔都要这些人来干,没有这些人批林批孔就不行。走后门这样的人有成百万,包括你们在内。”毛泽东指了指王海容、唐闻生,又说:“我也是一个,我送几个女孩子到北大上学,我没有办法,我说你们去上学,她们当了5年工人,现在送她们上大学了,我送去的,也是走后门,我也有资产阶级法权。我送去,小谢不得不收,这些人不是坏人。在这里我同小平同志谈过一次。”

“你们只恨经验主义,不恨教条主义,28个半统治了4年之久,打着共产国际的旗帜,吓唬中国党,凡不赞成的就要打。俘虏了一批经

验主义。”

毛泽东用手指着周恩来说:“你一个,朱德一个,还有别人,主要是林彪、彭德怀。我讲恩来、朱德不够,没有林彪、彭德怀还没有力量。林彪写了《短促突击》,称赞华夫文章,反对邓、毛、谢、古。”

说到这里,毛泽东又指着邓小平说:“邓是你,毛是毛泽覃,谢是谢唯俊,古是古柏。其他的人都牺牲了,我只见过你一面,你就是毛派的代表。”

“教育界、新闻界、文化艺术界,还有好多了,还有医学界,外国人放个屁都是香的。害得我两年不能吃鸡蛋,因为苏联人发表了一篇文章,说里面有胆固醇。后来又一篇文章说胆固醇不要紧,又说可以吃啦。月亮也是外国的好,不要看低教条主义。

有经验主义的人多,无非是不认识几个字,马列也不能看,他们只好凭经验办事。历来对经验主义是没有办法,我是没有办法,慢慢来,还要十年、八年,二十年,三十年可以好一些。太急了不好,不要急,一些观念连不起来。

我说的是安定团结,教条主义,经验主义,修正主义,又要批评资产阶级法权,不能过急,你们谁要过急就要摔下来。”他打了个手势。

毛泽东在批评了教条主义之后,接着说:“不要分裂,要团结。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不要搞四人帮,你们不要搞了,为什么照样搞呀?为什么不和200多个中央委员搞团结?搞少数人不好,历来不好。这次犯错误,还是自我批评。这次和庐山会议不同,庐山会议反对林彪是对的。”

毛泽东再次强调“三要三不要”。他说,这三条重复一遍,“这一次还是三条,要马列不要修正,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就是不要搞宗派主义。这三条我重复一遍,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其他的事你们去议,治病救人,不处分任何人,一次会议解决不了。我的意见,我的看法,有的同志不信这三条,也不听我的,这三条都忘记了。九大、十大讲过这三条,这三条要大家再议一下。”

毛泽东接着面向王海容、唐闻生说:“教育界、科学界、文艺界、新

闻界、医务界,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其实也有好的,有点马列的。你们外交部也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讲错了没有?你们两个是臭知识分子,你们自己也承认。”

他又说:“老九不能走。”

毛泽东接着说:“我看问题不大,不要小题大做,但有问题要讲明白。上半年解决不了,下半年解决;今年解决不了,明年解决;明年解决不了,后年解决。我看批判经验主义的人,自己就是经验主义,马列主义不多,有一些,不多,跟我差不多。不作自我批评不好,要人家作,自己不作。中国与俄国的经验批判主义。列宁说:那些人是大知识分子,全是巴克莱学说。巴克莱是美国的一个大主教,你们去把列宁的书找来看一看。”

这时,江青插话问道:“主席是不是说看《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

“嗯。”毛泽东回答。

江青的这一句插话,把毛泽东的话题引到她这里来了。他问:“那是谁?”

张玉凤告诉他:“江青同志。”

毛泽东面对江青说:“江青同志党的一大半没有参加,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罗章龙、王明、张国焘,她都没有参加斗争,没有参加长征,所以也难怪。我看江青就是一个小小的经验主义者,教条主义谈不上,她不像王明那样写了一篇文章《更加布尔什维克化》,也不会像张闻天那样,机会主义的动摇。”

毛泽东又说:“不要随便,要有纪律,要谨慎,不要个人自作主张,要跟政治局讨论,有意见要在政治局讨论,印成文件发下去,要以中央的名义,不要用个人的名义,比如也不要用我的名义,我是从来不送什么材料的。”

毛泽东又谈到自己:“这一回跑了10个月,没有讲过什么话,没有发表什么意见,因为中央没有委托我。我在外面养病,我一面养病,一面听文件,每天都是飞机送。现在上帝还没要我去,我还能想,还能听,还能讲,讲不行还能写。我能吃饭,能睡觉。”

与会者都笑了。毛泽东最后说:“要守纪律,军队要谨慎,中央委

员更要谨慎。我跟江青谈过一次,我跟小平谈过一次。王洪文要见我,我说不见,要见大家一起来,完了。对不起,我就是这样,我没有更多的话,就是三句,九次、十次代表大会都是三句,要马列不要修正,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

“不要搞什么帮,什么广东帮、湖南帮,粤汉铁路长沙修理厂不收湖南人,只收广东人,广东帮。”

毛泽东由“粤汉铁路长沙修理厂不收湖南人”,说起了1920年至1922年在湖南搞工人运动,讲到当时工人运动比较高涨的几个铁路、矿山。他说:“湖南水口山锡矿,名曰锡矿,其实没有锡。”

毛泽东随口念了一首民谣:

无锡锡山山无锡,
平湖湖水水平湖,
常德德山山有德,
长沙沙水水无沙。

从“长沙沙水水无沙”,毛泽东又对自己所作《水调歌头·游泳》一词中的两句做了解释:

“我说才饮长沙水,就是白沙井的水。武昌鱼不是今天的武昌,是古代的武昌,在现在的武昌到大冶之间,叫什么县我忘了,那个地方出鳊鱼。所以我说才饮长沙水,又食武昌鱼。孙权后来搬到南京,把武昌的木料下运南京,孙权是个能干的人。”

毛泽东念了辛弃疾《南乡子》中的两句:

“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当今惜无孙仲谋。”

毛泽东让叶剑英背这首《南乡子》。

叶剑英随口背道:

何处望神州?
满眼风光北固楼,
千古兴亡多少事,
悠悠,不尽长江滚滚流。

年少万兜鍪,
坐断东南战未休,

天下英雄谁敌手，

曹、刘，生子当如孙仲谋。

毛泽东很高兴，指着叶剑英对大家说："此人有些文化。'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当今惜无孙仲谋'，看不起吴法宪。黄吴李邱不是曹刘，刘是刘震，曹是曹里怀，就是吴法宪不行。"

此时已是次日凌晨1时。周恩来见时间已晚，便对大家说："今天就到这里结束吧，主席休息一下。"

到会者与毛泽东一一握手告别。在与周恩来握手时，毛泽东说："还是三句话。"

在与王洪文握手时，王洪文说："按主席的指示办。"

毛泽东说："你不要……"毛泽东做手势翻过来翻过去。

江青说："听主席的。"

张春桥说："按主席的指示办。"

姚文元说："照主席的指示办。"

在与陈锡联握手时，毛泽东说："司令官呢。"

吴桂贤说："主席保重。"

这是毛泽东最后一次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

散会后，纪登奎拍拍陈永贵的肩膀说："你又受到毛主席表扬了。"

江青专门找陈永贵说："你有地方住，我搬出钓鱼台往哪住？"

因为毛泽东在政治局会上曾向其他政治局委员发问："陈永贵搬出钓鱼台，你们准备怎么办？"并指出：下去搞社会调查，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所有政治局委员，能下去的都要下去。

此时，面对江青的发问，陈永贵只能憨然一笑说："我只管我搬家，别人我管不了。"

会后，张春桥很有些悻悻的说："陈永贵那小子又投了回机，上了榜了。"接着，张春桥发了低烧，好长一段时间没有出席政治局会议。

王洪文建议陈永贵去探望张春桥："永贵去看看嘛，春桥发低烧，互相……"

陈永贵说："我算什么？张春桥是常委，是领导我的，我算什么我去看。我也没想当什么，能干就干，不能干我回家种地。"结果他到底也没去。

# 第1343回：周恩来，抱病主持常委会 见成效，四月份生产好转

第二天，5月4日上午，邓小平来到305医院，就贯彻落实毛泽东5月3日晚在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一事，与周恩来单独谈话，交换意见。

之后，王海蓉、唐闻生又来到医院与周恩来谈话。

根据周恩来提议，当晚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研究在政治局范围内讨论贯彻毛泽东5月3日讲话一事，周恩来抱病主持。出席会议的有王洪文、叶剑英、邓小平、张春桥。

由于5月3日会上有些事还没听得很清楚，于是常委会核对毛泽东的讲话记录。

关于毛泽东4月23日对姚文元报送的新华社请示报告的批示要不要专门发文件传达，王洪文传达毛泽东的指示：《红旗》第五期发表了文章，批示可以不下达。

《红旗》杂志第五期刊登的文章指的是署名田春的题为《精通的目的全在于应用》一文。田春是《红旗》杂志社写作班子的笔名。该文指出："我们在反对修正主义的时候，包括克服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这两种错误倾向。"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决定由中央发一文件，从正面阐述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及如何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等问题。

于是，5月4日、5日两天，周恩来扶病起草关于学习毛泽东理论问题指示和政治局工作等问题的意见稿：

对文化大革命、批林批孔、反修防修等问题，在学习过程中，需在一定时间内有针对性的加以宣传，把主席指示的反修防修目的讲清楚。对犯一般经验主义的人，要慢慢来教育改造。

在过去的一个多月里，有些报告、报刊社论、文章、新闻报道、内部清样中，只强调反修正主义的一项经验主义，放过另一项教条主义，有

些地方甚至连反修正主义主题都不提了,这不能不是一个错误。报纸全国转载,清样有时转至全国各地,军队报告发至下层,这不能不引起一部分地区、部队和一部分机关、学校,弄得争论不休,或者年老干部又不敢负责工作。因为有文章上说,资格老,能打仗的人就有背上经验主义包袱的。在上述情况下,单由红旗五期发表田春一篇文章,由人民日报、解放军报转载,恐还不够,为此,同意由中央发一个从理论到政策的文件。

对于毛泽东指出的江青等人的这次错误,拥护主席意见,有错误的,要有自我批评;此外,同意小平同志意见,愿自我批评就说,说多少都可以,不说也可以,不要强人所难。

关于中央政治局的工作和手续问题,必须遵守九大、十大方针路线,"三要三不要"以安定团结为好。凡要议大事,先在政治局常委谈一谈。各单位拟好文件的,除外交、国防事急需立即传阅送批外,其他总要在二三天前先行送阅待议。政治局同志有(除小事急事外)需提政治局讨论的,请先向主持人在两三天前提出。个人除自己管辖的单位外,其他需下达的事,必须经过政治局常委会或主管部门同意后以机关名义下达。个人交换意见,不能以个人或机关名义下达下送文件。个人通信,不能以指示口气来信或通电。

关于经济建设问题,不能再耽误了。

5月7日,新华社社长朱穆之就传达毛泽东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一事给王洪文写了请示报告:

洪文同志:

主席最近对我社关于宣传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请示报告的批示,对今后宣传报导关系十分重要,我们准备向正在召开的分社会议(即将结束)和总社有关同志传达,可考虑只传达前半部份。是否有当,请予批示。

朱穆之

五月七日

5月8日,王洪文、姚文元分别对朱穆之报告作出批示。

王洪文批示:"我意见暂不传达。请文元同志阅示。"

姚文元批示:“同意暂不传达。精神可以在新华社工作中贯彻执行。”

5月8日,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继续研究中央政治局讨论贯彻毛泽东5月3日讲话一事,商定:等邓小平出访法国回来之后,再召开政治局全体会议。

邓小平计划1975年5月12日至17日正式访问法国。这是中国领导人首次正式访问西方大国,也是中法于1964年1月建交后中国领导人第一次访问法国。

再看这时的铁路整顿。万里在3月亲赴徐州铁路局一炮打响后,接着又于1975年4月中旬,来到中国铁路又一个十字枢纽,京广铁路和陇海铁路的交叉点——郑州。

1974年“批林批孔”开展起来后,河南省直机关就开始批“省直黑茶馆”,省直各单位领导干部被揪斗。郑州市的一些群众开始四处串联,冲击市委,冲击监狱,要求释放已被拘押的打、砸、抢分子。开封市成立“批林批孔联络总站”。平顶山市有人抢夺枪支弹药,修筑工事,准备武斗,甚至抢砸公安、军事机关,还有人跑到武汉冲击武汉军区作战部大楼。各地都有人在搞“二次夺权”,一些前段时期因打、砸、抢或其他严重问题受到撤职、下放处分的人,此时又乘机大闹“平反”、“补台”,要求“纳新”、“提干”。到1974年上半年,河南全省突击入党18万人,突击提拔干部6.6万余人,许多单位的领导班子陷入瘫痪半瘫痪状态。1974年农业生产没有完成计划,粮食生产比上年减少4.6%,交通运输堵塞,企业亏损增加,亏损面达37%以上,财政吃紧,市场供应告急。其中1974年1至10月,郑州铁路局平均每天欠装煤273车,发生重大事故68起,货物列车运行正点率只有57.9%。但是,到了1975年,在万里前往徐州铁路局之前,郑州铁路局的生产形势已经开始好转。

万里到郑州后,继续沿用徐州的方法,即通过撤换派性头头,解决混乱局面。他剑指新乡“二七公社”的头头、新乡铁路分局革委会副主任、党委副书记兼政治部主任邢介江,准备撤换邢介江的职务。他在郑州与唐岐山等郑州铁路局主要领导人交换了意见。

郑州铁路局中,造反派“二七公社”占多数,掌权的老干部也是支持“二七公社”的。郑州铁路局党委书记是火车司机唐岐山,他是郑州铁路局“二七公社”的头头,九届、十届中央委员,时任河南省委常委、郑州市委书记。

此时,随着中央9号文件下达,全国铁路运输生产迅速恢复。4月,全国20个铁路局除南昌局外都超额完成了计划。日均装车达到53700辆,比2月增加上万辆,为历史最高水平。部属32个铁路工厂,除长沙田心机车厂外,其他31个工厂都超额完成计划。初步实现了铁道部在整顿开始时提出的目标:从根本上改变“一个突出”(国民经济中一个突出的薄弱环节)、“两个不适应”(不能适应工农业生产发展的需要,不能适应加强战备的需要),做到“四通八达,畅通无阻,安全正点,当好先行”。王震赞扬铁道部领导小组是一个硬班子,指出9号文件在各地引起强烈反响,表明整顿是党心所向、人心所向。

针对4月份南昌铁路局没有完成运输生产任务的情况,4月下旬,万里又奔赴南昌。

南昌铁路局的派性不仅仅是铁路内部的,还与地方派性斗争搅和在一起,连部队一些负责人也介入了。万里觉得,解决南昌铁路局问题的关键,就是部队不要再介入铁路的派性斗争。可是铁道部管不着部队,万里对此颇感踌躇。4月24日,他在去江西途中经过南京时,恰逢邓小平陪同朝鲜的金日成在江苏访问,万里乘机向邓小平汇报工作。

邓小平听了之后,立即明确指出:不管是谁,只要是支持派性的都不行,该调的就调。

第二天,4月25日,万里来到南昌铁路局。他大张旗鼓地批判南昌铁路局的派性,调整了领导班子,调广州铁路局党委副书记兼政治部主任过来任南昌铁路局党委书记,把几个主要派性头头一批一调,解决了南昌局的问题。

接着,5月2日,万里离开了南昌来到长沙,重点解决铁道部长沙田心机车厂的问题。

长沙田心机车厂是当时中国大陆制造电力机车的重点工厂,拥有

近万名职工和全套电力机车制造设备。这个厂在生产高水平电力机车的同时,还承担了部分内燃机车的生产任务以及广州、南昌、上海、柳州等铁路局大批蒸汽机车的维修任务,而且一直是铁道部和湖南省的先进单位。可是批林批孔运动开始后,由于派性影响,这个厂月月完不成国家任务,欠产严重,成了全国铁路系统32个工厂中的“老大难”。

万里来到田心厂,立即召开全厂职工万人大会,说:“今天我代表铁道部给你们厂党委以严肃批评,党委第一、二把手要在最短时间内,向全厂职工做出深刻检讨!检讨不好,就批评。检讨了还不算,还要坚决改正,改正得慢了也不行!”他话音刚落,全场掌声雷动。

在热烈的掌声中,万里又宣布了人事变动,调3人离职,到铁道部学习。并要求其他领导干部好好学习中央9号文件和全国工业书记会议精神,并以此来对照检查,只要认真检讨了,一律表示欢迎,改了就既往不咎,再继续闹的就坚决处理!

万里每宣布一项决定,全场就响起一阵热烈掌声。万里说:“我再强调一点:今后谁也不准再搞资产阶级派性,谁再搞,把他揭露出来,一定严加处理。现在我宣布一条纪律,从今天起我们田心厂职工不准再参加地方上的资产阶级派性活动,坚决不准参加,谁参加,就揭露,就批判,就要把他调出去;同时,凡是地方上搞资产阶级派性活动,到你们厂搞串连的,一律把他们顶回去!”

这次大会开得很成功。会后,全厂生产迅速回升,到5月底,仅仅20多天的时间,就超额完成了生产任务,一举摘掉了落后单位的帽子。至此,全铁路32个工厂全部超额完成了任务。

当时全国的煤炭生产也是问题很多。新成立的煤炭部领导,一方面积极贯彻中央关于整顿铁路的9号文件,促进生产、运输好的陕西、河北、河南、安徽及东北各矿,让他们多产、多运;同时重点解决在全国煤炭产量中占重大份额的山东省的枣庄、肥城、新汶,江苏省的徐州,即当时说的两省四矿存在的派性问题,使这一时期的煤炭生产上得很快。4月洗精煤的日产量创造了全国历史最高水平,统配煤平均日产75.4万吨,比计划超产1.9万吨。

4月,全国整个工业生产打破了停滞不前的局面。原油一直稳产高产,月月超额完成任务。4月平均日产量20.8万吨,比计划超产0.5万吨。化肥生产开始大上,达到日产7.5万吨、比上月多产1万吨。月发电量5.01亿度,比2月增长12%。棉纱、棉布等轻工业产品都有上升。全国工业总产值1~4月完成919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8%。4月比去年同期增长达19.4%。煤炭部要求上半年时间过半,完成任务过半。有11个省、市、区也决心实现"双过半"。

从5月8日起至10日,北京召开钢铁工业座谈会,有12个省、市、自治区管工业的书记、10大钢厂负责人和国务院有关部委负责人参加。李先念、谷牧主持会议,参照整顿铁路会议的方式,钢铁工业座谈会也是先起草出一个中央文件,即中央13号文件,代表们首先讨论这个文件和怎么样把生产搞上去。

会议提出,钢铁工业上不去,将会出现一个3年小徘徊。一定要通过整顿,认真解决好几家大企业的领导班子问题,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千方百计把钢铁促上去,坚决完成1975年生产2600万吨钢的计划。

会议结束时,邓小平讲话,提出:钢铁工业重点要解决四个问题:一是必须建立一个坚强的领导班子,从部到厂要建立起强有力的、敢字当头的、有能力的领导班子,不能软、懒、散。二是必须坚决同派性作斗争,寸土必争,寸步不让。三是必须认真落实政策,把受运动伤害的老工人、老干部、老劳模和技术骨干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四是必须建立必要的规章制度,大钢厂要有单独的强有力的生产指挥机构。他指出,冶金部的领导班子软,软就要加强。1975年计划生产2600万吨钢的指标不能动,欠产要补上,几大钢厂要限期扭转局势。

中央调整了冶金部的领导班子,调唐克、钱传钧二人到冶金部担任副部长,加强领导班子,并把冶金部不得力的干部调出来。结果,中央13号文件的精神雷厉风行贯彻下去了。

5月10日,周恩来同王海蓉、唐闻生谈话。

5月13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王洪文正式通知:讨论贯彻毛主席5月3日讲话的全体会议,待邓小平访法回国后再择日举行。第二天

晚上,周恩来给王洪文打电话,详细询问政治局会议的情况。

5 月 15 日,周恩来写信给毛泽东:“对主席这样重视的会议和指示,我们处理这样迟慢,报告又这样不及时,责任完全在我。”

5 月 17 日,毛泽东在中央军委关于贺诚任职的请示报告上写了两条批语:

“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

贺诚无罪,当然应予分配工作。过去一切污蔑不实之词,应予推倒。

印发中央同志。”

“傅连章被迫死,亟应予以昭雪。

贺诚幸存,傅已入土。呜呼哀哉!”

# 第1344回：视力减，芦荻走进中南海《贺新郎》，老人胸中涌巨澜

毛泽东自1974年春天开始，患“老年性白内障”，视力明显减弱了。后来，几乎是双目失明，每天的文件都是由秘书念给他听，然后代笔签阅。

毛泽东素来手不释卷，尤为爱读古代的诗、文、史。他曾经说过，自己可以一天不吃饭，但是不能一天不看书。如今双眼看不见了，身边的工作人员当中，却找不到一个可以给他读书的文化人。

于是，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和副主任张耀祠，委托当时的中共北京市委书记谢静宜，从北京大学中文系物色一个能帮着毛泽东读书的人选。没几天，谢静宜就送来北大中文系几位教师的档案，有林庚，孙静和芦荻等人。最后，还是由毛泽东选定说：“就让芦荻来吧！”

毛泽东为什么会选芦荻？原来，博览群书的毛泽东，读过中国青年出版社1963年出版的《历代文选》，其中的《触詟说赵太后》、《别赋》、《滕王阁序》三篇文章的选注者就是芦荻。毛泽东当时曾指出芦荻对“珪”字注解有错误，应改为马蹄形的玉。记忆力甚强的毛泽东由此记住了芦荻这个名字。

芦荻，本名芦素琴，1931年出生在东北辽阳，就学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后来进入解放区，改名芦荻。1954年执教于中国人民大学。后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

1975年4月的一天，芦荻因手脚烫伤发炎，带着孩子去协和医院理疗科治疗。恰在此时，系里工宣队谢师傅和芦荻教学组的一个人到她家来找芦荻，自然是扑了个空。从邻居那里得知，芦荻到协和医院去了。于是他们又马不停蹄的追到协和医院。此时，芦荻正要进行烤电治疗，谢师傅马上就要把她带走，负责治疗的女医生不干了，说：“必须做完15分钟的理疗以后你们才能带走她。你们15分钟以后怎么

处置她我不管,她现在是我的病人,我有这个权力……”

芦荻一直做完烤电治疗,谢师傅才把她推上车,往北大飞驰而去。

芦荻一看这个情景,不知道遇到什么事情,也不知道什么命运在等着她。她晕车,一路上直想吐。孩子还坐在旁边,她就跟谢师傅说:“能不能先把孩子送回家去?”

谢师傅说:“不用了,你赶快走。”

到了北大,汽车在北大党委所在的四院停下来,谢师傅对芦荻说:“你放心,孩子搁到这车上,我替你照看,我带他玩去。你啊,上面如果问你什么,你可好好考虑好再回答。”

芦荻不知是怎么回事情,她进到党委办公室,一屋子的人,尽是穿军装的。后来谢静宜走进来,对芦荻说:“喝水,坐下,今天请你讲一讲课。”

谢静宜的出现让芦荻颇感紧张,她说:“我没有带那个《离骚》来,我是从医院直接过来的,我没有教材。”

谢静宜说:“不用了,那我们就请你随便谈两个问题吧。”

一个月后的5月23日,北大再次派人将芦荻由家中接到学校住下,3天之后,谢静宜又一次出现了。她派人将芦荻叫下楼,告诉带着她所有的东西。

来人来对芦荻说:“作为一个革命者,一个执行任务的任何的一个战士,有几条纪律你要记下来。”

芦荻一边问“什么纪律?”一边赶紧拿出纸来记录。来人说:“一,不该问的不问;二,不该听的你别去听;第三,不该看的你不要看,特别是你不该说的你别说。这四个不,你要牢牢地记住,这是纪律。”

芦荻意识到,可能是叫她去给什么人讲课。那人接着说:“到哪去,这也属于不该问的你别问了,我跟你说清楚了,你就跟着走吧。”

下楼后,芦荻跟着谢静宜上了汽车。关上车门后,谢静宜对她说:“现在带你去,芦荻老师,去见毛主席。”

芦荻脑子嗡的一下蒙了,下意识的问了一句:“你说什么?”

谢静宜颇不以为然的说道:“我不是说了吗,带你去见主席,毛主席。”

芦荻一下呆在那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谢静宜问她:“怎么

了,怎么不说话啊,啊?”

芦荻说:“我说什么?”

谢静宜说:“叫你去见毛主席,叫你去讲诗词歌赋,……”

芦荻仍不相信地问:“我去见毛主席?”

谢静宜说:“是啊,我都跟你讲了,你好好想一想啊,你坐这快好好想一想诗词歌赋。”然后跟司机说:“开车。”

芦荻坐在车里就觉得晃晃荡荡的,她觉得自己已经没有思想了,仿佛进入了一个梦幻世界,身边发生的一切,似乎都与她无关。她不相信:“我怎么能见到主席呢,我这样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典型,怎么能见到主席呢?”

汽车行驶到西单红绿灯,谢静宜有些着急,她一看表,10 点 18 分了,连连说:“哎呀,这红灯,这红灯,小张,你看咱们能从别的路上过去吗?”她问司机。

汽车从中南海的西门进去后,终于停了下来。谢静宜开门下车,叫芦荻也下来。芦荻怀里拿着一包塑料袋子,迷迷糊糊一出车门,袋子里的东西全洒在了地上。1975 年的 5 月 26 日,44 岁的芦荻进到了中南海,见到了所有中国人心目中的红太阳——毛泽东!

她是随着谢静宜走进游泳池大客厅,只见里面的沙发围成一个小圈,灯光很亮,照得如同白昼。她进去以后,就看见一个老人,穿着一件白色的睡衣、一双黑色的布鞋坐在一个单人沙发里。这个老人面色苍白,头上稀稀疏疏的。芦荻被带到老人面前,她听别人说:“主席,芦荻老师来了。”

“这就是毛主席?”芦荻无论如何不能将眼前的这位老人和她脑海中毛主席的光辉形象连接在一起。那在天安门上检阅红卫兵的毛泽东主席是多么的神采奕奕。他红光满面,声音洪亮。而眼前的他,两眼呆呆地前视。茫然得很的,没有任何表情的脸上,一点血色没有。人的骨头架子还是很高大,坐在那里还显得很高,但是消瘦得很,头发已经基本都脱落了。

芦荻百感交集,她不敢相信,“这就是主席,这就是我们心目当中的神?”

直到毛泽东张口说出了第一句话,芦荻才最终确信,这一切都是

真实的。

当芦荻确信眼前的这位老人就是她心中的神,永远不落的红太阳时,就像见到了最亲最亲的亲人,不知不觉哭了起来。她不敢大声哭,只是站着那里默默的流泪、抽泣。

可能是毛泽东听到了她的抽泣声,就问她:“你喜欢秋天吗?”

芦荻觉得还是做梦吧,她没有吱声。毛泽东笑了,就问她:“你会背刘禹锡的《西塞山怀古》那首诗吗?”

芦荻本能的答道:“我会背。”

“那你背一个。”毛泽东说。

芦荻就开始往下背,无目的地背:

王濬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

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

人世几回伤往事,山形依旧枕寒流。

从今四海为家日,故垒萧萧芦荻秋。

背到最后一句时,芦荻忽然意识到,她的名字在诗的最后一句。怪不得毛泽东问她是不是喜欢秋天?是啊,你不喜欢秋天,为什么起名叫芦荻呢?

芦荻笑了。

接着,毛泽东又问了第二个问题:“北京大学英语怎么说?”

芦荻回答道:“university.”

毛泽东说:“发音不好。”

芦荻又不吱声了。这时,张玉凤过来说:“芦荻老师她们都学俄语的。”

芦荻心想:“我什么时候学俄语了?”

毛泽东指了指自己的双眼说:“我眼睛看不见了,要请你代读中国古文。”

芦荻这才明白了自己的任务。

游泳池大厅里开始放音乐,是昆曲南宋张元干的《贺新郎》。当唱到“梦绕神州路,怅秋风,连营画角,故宫离黍”时,毛泽东突然站起来,由两人扶着,在大厅里走了3圈。这时,芦荻发现,毛泽东走路已经不利索了。

屋子里一片寂静,没有人说话,几乎掉地上一根针都能听得见,那地上有地毯,红色的。毛泽东伴着《贺新郎》的昆曲节拍,口中低吟,在地毯上一步一步迈着步子。芦荻想,他此刻一定胸中感慨,心潮澎拜,究竟因何而起?她不知道。望着老人那高大魁伟的身姿和那刚毅、肃穆、威严的面容,一时之间,芦荻突然感到周围的一切都发生了幻化:老人的身影不见了,游泳池大厅的屋顶、四壁通通撤去了,簇拥着的众人也消失了,辉煌的灯光和广铺的红地毯,交织成一片金红色的天宇地方。在辽阔无际的天宇下,矗立着的是那根顶天立地的中流砥柱,是披云戴雪的巍巍昆仑。

此时的毛泽东,已经是眼不能视、言不能畅。目睹他老人家此时的神韵风采,芦荻不禁黯然神伤:“此时的毛主席,是在显示他仍有肩负四海、左右天下大势的威力吗?还是在瞻视未来、胸中有万马奔腾?还是,依然要坚强地,向步步逼近他的死神应战?还是,他要向汹涌而来的新的历史波澜挑战?”

这天晚上,毛泽东要芦荻读了庾信的《枯树赋》、江淹的《别赋》和《恨赋》,还读了阮籍的《咏怀诗》。为了《枯树赋》的注文问题,毛泽东还写过一个批示,说明他不同意清人旧说的意见。他后来曾让芦荻给他读过五遍《枯树赋》,赋末有“昔年种柳,依依汉南;今看摇落,凄怆江潭;树犹如此,人何以堪”诸句,每每读后,他便沉默不语。

毛泽东赞赏江淹《别赋》的情真意切,语丽辞清,还为《恨赋》写过批语,批评秦始皇统一六国后的骄奢满溢。芦荻后来回忆当时的情景说:为了解说这个“溢”字,主席还琅琅背诵了《西厢记长亭送别》中“泪添九曲黄河溢”的那一大段曲文。已是垂暮衰病之际,他老人家竟还有如此认真谈学、论文的盎然意趣和如此惊人的记忆力,这实在令人欣佩,令人惊奇!

芦荻和毛泽东的这次谈话持续了6个多小时,一直到第二天的凌晨4时。毛泽东越谈兴致越高,最后是在医生的干涉之下,方才罢休。之后,芦荻被送到离毛泽东住处很近的一幢楼里,住在底楼的一间屋内。除了她以外,底楼还住着好几位为毛泽东治病的大夫。谢静宜则住在二楼。每当毛泽东想要听古文、讲古文的时候,芦荻便骑着自行车,10分钟内就能赶到。

她的生活规律从此有了很大的改变:上午睡觉;下午闭门看书,为讲读作案头准备;深夜至凌晨,她来到毛泽东那里,为他读讲诗文。每当她前往毛泽东那里时,都是谢静宜陪同一起去。这时,毛泽东往往会对大夫、秘书说:“来,来,你们也来听听。”在听讲时,他还常常问大夫、秘书:“你们听懂了没有?”

芦荻亲眼目睹了晚年毛泽东的真实生活,原来心目中的“神”也在逐渐变成一个熟悉的老人。

毛泽东很喜欢刘禹锡的作品。一次,他跟芦荻聊起了刘禹锡,他兴致很高,见芦荻在一边只是听着,便笑道:“该轮到你讲了,就讲讲庾信的《枯树赋》吧。”

芦荻毫无准备。她凭着自己的记忆背诵起《枯树赋》,边背边讲,毛泽东听得很有兴味。接着,又谈起了那位“江郎才尽”的“江郎”——南朝作家江淹的《别赋》。毛泽东说:“江淹《别赋》中‘秋露如珠,秋月如王圭’。你的书中对‘王圭’的注释不很准确。”芦荻这才知道毛泽东曾看过她参加选注的《历代文选》。她对毛泽东的博学,真是打心底里佩服。

毛泽东公务甚忙,只能挤时间读书。有时是夜里23时,有时甚至是凌晨2时,毛泽东要读书了,就叫秘书打电话给芦荻,芦荻跳上自行车,前往500米外的毛泽东住所,到达毛泽东那里往往直喘气。后来毛泽东在他的书房里放了张桌子,让芦荻在那里看书,他需要读书时唤她进来。另外,她在书房里工作,也便于她可以借阅毛泽东的藏书。

# 第1345回：提“敢”字，肯定七级部整顿 传阅信，张春桥稍有微词

5月18日，邓小平访法归来。就在他快要结束对法国的访问时，邓小平突然要购买很多法国面包，他的举动使很多人感到奇怪，他带这么多面包干什么？后来才知道，原来这些面包是带给当年一同在法国勤工俭学的战友们——周恩来、聂荣臻和蔡畅。

1975年5月18日，邓小平访问法国归来，邓小平的夫人卓琳和邓楠等都去机场迎接

这天，邓小平回到北京，当天就赶到305医院去看望周恩来，将当年他们在法国勤工俭学时经常吃的法式月牙面包送给周恩来。周恩来抚摸着这种独特的面包，感慨万千。

第二天上午9时，邓小平同叶剑英、聂荣臻、陈锡联一起，在三座门中央军委办公地听取张爱萍、汪洋、钱学森等汇报国防科委工作和七机部整顿的情况。

一见面，邓小平就问张爱萍：“你的身体怎么样？”

“还可以。”张爱萍回答。

“你的心脏怎么样？”叶剑英也问道。

“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大病。”张爱萍依然若无其事地答道。

“可得要多加注意才是啊！”叶剑英关切地提醒说。

钱学森汇报了4月21日论证会后形成的航天“三步走”规划，特别强调重中之重是1977年前拿出射程8000公里的洲际导弹。军委领导一致赞成。

张爱萍在汇报时说：“作为战略核武器研制生产的核心单位230厂，实际上已经完全瘫痪了。4个车间1000多工人，只有4%在岗，96%的人已不来上班了。工人们说他们是8923部队，以后又改叫8200部队……”

“一位女工对我说:这几年我们是在吃社会主义!拿着国家给的工资不干活,公家的东西想拿就拿想砸就砸,这在哪个社会能行?这不是吃社会主义吗?”

邓小平说:“吃社会主义?这个话概括得好!”

工作组成员申丙辰插话说:“工人们说了,他们这里只剩下两项制度,一是开饭制度,二是发工资制度,其他的全没有了。”

“听说爱萍去七机部还有大字报?”邓小平问。

“不光有赶我走的大字报,还有攻击我们的匿名信呢!”张爱萍回答。

“你们要勇敢地干工作,不要怕说错话。说错话,有错误,这不要紧,做工作没有错误不可能,错了就改嘛!只要你们大胆工作,错了我们负责,我和叶帅负责……”邓小平说着,看了看坐在旁边的叶剑英。

“我完全同意。我们支持你们的工作,军委的同志都支持你们的工作。”叶剑英也说。

邓小平深吸了口烟,又掸了掸烟灰,似自语说:“大字报一万张都不怕。无非是再次被打倒。倒了,再起来;再倒了,就再起来嘛!”片刻又问张爱萍,“你还在七机部吧?没有被撵跑吧?要呆下去,不要怕抓小辫子。我这个人像维吾尔族的姑娘,就是辫子多。”

他接着说:“对那些继续搞派性的人不能等了。现在派性的性质变了,不同于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了,现在再搞派性,就是顽固的资产阶级派性。学理论也要解决这个问题嘛。……不能让国家利益、世界利益等待他们,这样下去太不能容忍了嘛!”

张爱萍斩钉截铁地说:

“七机部的问题,千条万条,我看就一条,恶人当道!”

“什么革命造反?什么保卫毛主席?什么反修防修?都是乘着天下大乱,打着毛主席的旗号,拉自己的山头,占山为王,称霸一方。不拿掉这批派性头头,就无法实现天下大治,就无法伸张正义,就什么事也做不成,就永无宁日!”

他接着说:“对那些继续搞派性的人,不管是谁,不管你是‘915’、‘916’,不管你是四、五十年的老资格,还是年轻的新干部,凡是搞派性的,老虎屁股都得摸,不然还得了!这么多年搞出来了什么吗?还在

那里闹,还说有理。把七机部闹成了这个样子,不要说社会主义,连爱国主义都没有。”

邓小平支持张爱萍的意见,他又点燃了一支烟,吸了一口,望着张爱萍说:“你们的计划我看了。按照你们的计划,没有多少个月了,没有多少天了。要实现这个计划,不下这样的决心不行。现在铁路系统定了一个月的时间。一个月改了的,可以教育的,留下工作;一个月不改的,坚决调开。别让这些人误了国家大事!你们也动员一下子,”吸了一口烟,邓小平接着说,“限定一个时间,7 月 1 日好不好?”

“好,可以。就定在党的生日那天。”张爱萍沉思了一下说,“对,党的生日。从 7 月 1 日这天开始,凡继续搞派性的,坚决调走。不管你老资格、新资格,干了多少年革命,统统一样。不这样不可能把事情办成。”

邓小平又说:“我们对铁道部说,只等一个月。现在对七机部也提出只等一个月,到 6 月 30 日为止。从 7 月 1 日起,要搞成七一派,毛主席派,党性派。过一个月以后,那就不客气了,对什么人也不等,管你是老虎屁股,还是狮子屁股,都要摸,都要斗,坚决地斗。”

邓小平又说:“现在应该这样提出问题,凡继续闹派性的,就坚决调开。你们调不动的,由军委出面调!”

据此,张爱萍以国防科委名义起草了一个决定,在国防科技和国防工业系统中坚决解散所有的群众组织,最后期限为 7 月 1 日,凡继续坚持搞派性活动的人,一律调离国防系统。这个决定上报了中央后,经毛泽东批准,以中共中央(1975)14 号文件的形式下发。

文件下发的当天,七机部在京西宾馆召开“坚决贯彻落实中央 14 号文件的动员大会”,王洪文出席了这次大会,张爱萍走上讲台。他说:

“同志们,如果说半年前七机部是处于瘫痪半瘫痪状态的话,那么现在的七机部,便是一个完完整整或者基本上是健康的人了!”说着,他不觉提高了嗓子:“七机部‘老大难’的帽子,从此之后就永远地丢掉了!”

在热烈欢乐的掌声中,在整顿中涌现出来的 94 个大小单位和 73 个先进人物,一一得到了表彰。其中当然少不了 230 厂与第 13 研

究所。

“同志们,”张爱萍在表彰了这些单位后说,“大好形势还要大家珍惜,还要大家巩固,还要大家发展!革命的人,首先要有革命的精神,革命的意志,革命的作风。但少不了要有武装的东西。完全否定物质的作用,那不是就变成了唯心主义者、变成神仙了吗?”

七机部提出把舒龙山调出。张爱萍毫不犹豫地表示同意。

5月21日,邓小平在国务院办公会议上的讲话,提出一个“敢”字,他说:

要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敢”字当头的,有能力的领导班子。

现在,在干部中有一个主要问题,就是怕,不敢摸老虎屁股。我看这是第一位的,资产阶级派性是第二位的。一个部门,一个企业的领导,不能怕这怕那。要找一些不怕打倒的人。条件就是中央支持他,省委支持他。允许犯错误,允许改正错误。没有这一些,扭转不过来。只要他按中央和国务院的指示办事,有错也不要紧,工作中那有不犯错误的。

鞍钢、武钢都有派性的问题。对派性不能“怕”字当头,要采取毛主席说过的原则,寸土必争,寸土不让,要搞就要坚决搞。

要“敢”字当头,要严格。该调的就调,该批的就批,该斗的就斗,不能慢吞吞的,总是等待。……如果闹派性严重,而又不改正的,就坚决调开。调出去又钻出来新的,那就再调,一年调它三百六十次,总不会吧!过去我们对铁道部说,只等一个月。现在我们对七机部也提出只等一个月,到六月三十日为止。从七月一日起,要搞成一个“七一”派,毛主席派,党性派,过一个月以后,那就不客气了,对什么人也不等,管你是老虎屁股、狮子屁股,都要摸、都要斗、坚决地斗。

落实政策,特别是对老工人,对有经验的干部,一定要落实好政策,因为运动一来往往伤害了这一部分人。我们说经验主义不好。可是把主义两字去掉,经验是宝贵的,不能忽视。这些工人和干部摸到的经验是可贵的。要培养多少年才行啊。这些人积极性不调动起来是不行的。

我们反对唯生产力论,但是搞社会主义建设,不能不搞生产,不能不搞科学技术,我们强调劳动生产率,强调科学技术,不能称作唯生产

力论,如果不讲这些,还能谈得上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吗?!我们总是要把革命和生产都搞好才行嘛。

我赞成这个文件(按指钢铁工业座谈会文件),要给你们上方宝剑。现在冶金部中心要抓四个问题:第一,要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敢字当头的,有能力的领导班子。从部到厂都要这样。第二,坚决同资产阶级派性作斗争。……甚至有的单位,三个人两派,一个人闹派性,两个人害怕。

一个是派性,一个是怕,首先要解决怕字。怕的人,一要支持他不要怕,再怕,不转变,也得调。不能让他站在位子上怕一辈子。部、省、企业都要研究班子问题,不行的坚决调,不要拖。部和省要研究一致了就调,调了公司再调厂,车间以上都要调整好。

5月21日,周恩来就传达毛泽东4月23日批示一事,致信全体在京政治局成员:

洪文同志阅后请转政治局同志和参加会议同志审阅:

五月三日政治局同志面听主席指示后,我提议政治局常委五人先谈一谈,弄清当时没听清楚的问题和如何传达主席四月十三日批示的问题。经过五月四、七两晚的会谈,洪文同志传达主席的指示,说红旗五期写了文章,主席的批示不要下达了。于是我们就考虑到中央是否需要再发一个文件,从正面阐明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和在中国如何实施限制资产阶级法权、逐步缩小三大差别等政策问题:(这在主席二十多年来提倡和规定的政策中已有许多),以利于学习和实践。当时,春桥同志说,如要搞文件,就需要一段时间。此事,请中央政治局同志讨论后报主席。

关于弄清当时没听清楚的问题,主要是文章中提到主席在一九五九年批判彭德怀反党集团时,提到“现在,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是在文元同志文章中,不在春桥同志文章中,三月份解放军报、人民日报两篇社论,也是根据文元同志文章引用的。小平同志也说,他向主席请教的是指的春桥同志在总政三月一日召开各大单位主任座谈会上的讲话,(当时还提到江青同志在政治局会议正式提出了这个问题—邓注)这在各大军区政治部向总政反映讨论情况三四月份电报中可以看出。当时,春桥同志说,在批林整风时,他就认为从一九五九年后批经

验主义不够,所以与我商量又将主席批印的《经验主义还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哲学小辞典》选辑重印一批发出。我们认为当时问题已弄清楚,就不要忙于向主席反映。现在政治局既开正式会讨论主席批示和指示,我已请洪文同志向会议上说明,现在补报如上。

如大家同意,亦请将此报告转呈主席一阅。

周恩来

一九七五年五月二十一日

5月22日,王洪文在周恩来的信上批到:“请剑英、小平、春桥、江青、文元、先念、锡联、登奎、国锋、吴德、振华、志福、桂贤、海容、静宜、闻生同志阅”。

当天,张春桥在周恩来的信上批:“总理的信,有些话不确切。但我不反对报主席。”

信传阅到邓小平。邓小平在信上加注:“当时还提到江青在政治局会议正式提出了这个问题。”

5月24日,江青在周恩来5月21日的信上批:“许多情况不了解。同意报主席。”

姚文元在这天批:“常委会讨论情况我不了解。如还讨论了别的问题,建议也说明一下。”

王洪文随后在5月24日批:“继续传阅,传完后送总理阅,是否呈主席请总理定。”

25日,这封信在政治局经过传阅之后,又退到周恩来那里。

周恩来看到张春桥5月22日写的批注,于5月27日清早5时,给张春桥写了一封信:

春桥同志:

我在五月二十五日晨收到洪文同志退回我的报告,要我决定是否呈主席。

在你的注语中,说我信中有些话不确切。我因头上皮下神经疱疹未好,脚上皮下毛血管麻痛未止,故晚了两天才将当时认为较确切的语言写出,请你审阅。

当时,你说,由于批判彭德怀反党集团时,主席建议印读两本书,都在半年读完。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有些组织和同志还读得多些和较

好些,而哲学小辞典三版选辑,却很少有人读,几乎没有什么反映,所以主席在批印的指示时就说:我们过去批判了教条主义,但是没有批判经验主义。现在,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而后,刘、林反党集团实施阴谋诡计,经验主义者就常常上当,所以你在批林整风时就提出将主席批印《经验主义还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再印一批发出。这次,主席指示要把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这个问题要搞清楚,才会防止变修正主义,如果不把资产阶级法权加以阐明和限制,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就很容易。因此,要多看点马列的书,还要你写文章。因此,你联系到十多年的思想,经验主义者由于不多读书,难于总结经验,易于上反党集团的当,甚至陷进去,故你在三月一日总政召开的各大单位主任座谈会上片面地强调经验主义的危险,这在三四月中各政治部向总政来电反映讨论情况,也可看出。

我这段回忆的文字,不知是否较为确切。如果仍不确切,请你以同志的坦率勾掉重改或者批回重写,我决不会介意,因为我们是遵守主席实事求是和三要三不要的教导的。

如你的低温已退,我很想在今天下午或晚上到你处一谈。盼复!

周恩来

一九七五年五月二十七日五点半

张春桥5月27日批:“总理:已在电话商定,不再改了。现退上。祝你健康。”

随后,周恩来当天批示:“呈主席批阅。”

# 第1346回：政治局，开会批评“四人帮”钢铁会，提“三项指示为纲”

5月27日当天，经毛泽东批准，由邓小平主持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毛泽东5月3日的谈话精神，批评“四人帮”。

会上，吴德发言说：“主席说：我的意见。有的人不信，不相信三条。九大、十大都讲反修正主义，三条。四人帮不要搞了。照样搞。听过三次。4月，12月，这次。

这次又讲。又引起注意。没有向主席讲清楚，没有在行动上实际改正。所以主席才要我们讨论。

对我们每一个同志责任更加重了。”

邓小平说：“3号，主席这篇话，很长。内容，对于我们党非常重要，因为主要是对政治局讲的，是党的核心。提到很多原则。首先是告诫政治局同志。

要安定、团结，要三要三不要。首先要政治局同志安定团结、三要三不要。只有这样，才能做出榜样，领导全国全党。很重要的问题。告诫、帮助我们。再三讲三要三不要。联系讲宗派主义，四人帮。主席问讨论的结果。讨论，无非是赞成不赞成，理解得深、浅。需要好好讨论。

4月23日批示。27日讨论。到会同志都讲了话。有同志说，这次会上的讲话过了头。有的同志说突然袭击，围攻。百分之四十也没有讲到。有没有百分之二十也难讲。谈不上突然袭击，过头。无非是讲了历史上路线斗争，有的来自经验、有的来自教条，我没有讲得主席那么清楚。历史都提反修，是否改变九、十大的提法？这没有什么过。对照主席的话，看得太浅。到是要提一个问题：三件事：批周、叶，批是完全应该的，当时钻出一个十一次路线斗争，这不是主席的，后来是主席纠正了。批林批孔，又钻出个走后门。提到对马列的背叛，当面点

很多人的名。学理论,是防修,反修,又钻出一个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来势相当猛。别的事不那么雷厉风行,这件事雷厉风行。机床厂。如果搞下去,这个面对几千万,比走后门大十倍。

主席提三个问题,钻出三件事。倒是问一问,为什么?

话是讲清楚。水平不够,讲不清楚。

纪律,不要送材料。

就是讲错,也有帮助。体委,18 号送材料。

不讲明白,没有好处。

27 日的会,没过头,没有讲。

这次会,我意见不应该把什么都讲。

这次,主席主要要我们讨论三要三不要。

重复讲。江青同志提倡论联合政府,是重要的,应当学。启发我学了改造学习、整顿三风,历史问题,57 年宣传工作会议。想想我们党,如果光有正确的风气,只有井冈山,九次决议,此外,在全国统治的是教、经,都是搞宗派主义,打击、排挤、勾心斗角,老同志可以想得到的。总结党的生活,怎样才能端正路线,弄清思想,团结全党,是延安整风。用完整的语言表达。对王明都要作具体分析。对四中全会。建党学说,列公也没有既弄通思想,又团结同志。

主观主义,导致宗派主义,对宗派主义,采取正确办法。山头主义,有些是历史形成的。有的不是。如张国焘,陈昌浩。非常耐心,又很严肃。才产生了七大报告。打败了日本,蒋。方针,政策,一片兴旺,五湖四海。高度统一。不是小圈子,是大圈。解放后,几次路线斗争,都是修正主义,没有宗派主义。三条是总括历史经验。搞小圈子,历来不好。这方面,要讲安定、团结,首先要搞马列,不搞修正。搞团结,更要注意。首先政治局要注意。理论、经济,三条。不搞掉派性不行。春桥那个分析,现在的派性同过去不同,我始终赞成。看不到宗派主义,四人帮,值得警惕。不是什么人挑起来的。我是相信主席的话。在不在四人帮,都警惕。政治局有责任把主席的优良传统贯彻下去。党不值钱,突击发展党。我们带头做到这一点。”

李先念说:“4 月 27 日会议,我认为没有过分。没有越轨。四人帮。主席又谈到四人帮。‘叫他们不要搞,他们还要搞。’”

陈锡联:“一个方针,三条原则,不要搞宗派,有问题,讲清楚。小平讲党的历史。大党。不能少数人,要多数人。”

王洪文在会上做了检查。他在1975年5月检讨提纲中写道:

“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我的错误。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初期我对批林批孔同贯彻十大的精神对立起来,因此我对批(林)批孔是不理解的,特别是关于广州召开十万人大会问题,当时查清楚是对的,但由于我自己不理解,也说过一些错话,在政治局也进行过争论。

当主席批示了北大、清华那份批林批孔的材料以后,特别是74年1月24、25两次大会。虽然我对于两次大会的召开未经政治局讨论,未报告过主席,关于反对走后门有些提法不妥,如混淆两类矛盾的提法,扩大了打击面等,也同个别同志交换过意见,(我也是赞成反对走后门的)但我没有及时向毛主席报告。这是我原则性不强,组织观念不强的表现。”

姚文元在政治局会议上说,自己的《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一文,只提批判经验主义,不提反对教条主义,是片面的。

张春桥亲笔写下这样的检查:“主席关于不搞四人帮的指示,一定坚决照办,并尽可能地作好团结工作。虽然不……”

张春桥写下“虽然不”,后来又圈去了“虽然不”三个字,继续写道:“至少不给主席增加负担。”

5月28日,周恩来同邓小平长谈。在此前后,他还与李先念、纪登奎、陈锡联、王洪文、苏振华等谈话。

江青给毛泽东处打电话,汇报政治局会议情况。接电话的张玉凤向毛泽东作了报告,留下一份有关这个情况的记录:

“一九七五年五月我向毛主席报告江青同志来电话说:这几天政治局开会对她进行围攻的情况(大意)。毛主席说:这个会有成绩,把问题摆开了。批评江青还是第一次。她这个人只能批评别人,很凶。别人不能批评她。批林批孔,什么叫孔老二她也不懂,又加了走后门。几十万人都走后门,又要这几十万人批林批孔。有走前门,就有走后门,几万年还会有。以上谈话,毛主席当时没有指示传达。张玉凤记,一九七五年五月。”

1975 年 5 月，周恩来在医院最后一次接见伊朗的阿什拉公主，左一为前驻伊朗大使华黎明

5 月，毛泽东与周恩来商定，改由邓小平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并主持中央日常工作。

5 月 8 日在北京召开的钢铁工业座谈会后来又增加到 17 个省、市、自治区和 11 个大钢厂及国务院有关部委负责人参加。5 月 29 日，邓小平接见钢铁工业座谈会代表并讲话。他说：

“解决冶金工业问题，重点放在四个问题上，按顺序来说：第一，必须建立一个坚强的领导班子。这样的班子，一不是软的，二不是懒的，三不是散的。

现在的问题是，有些领导班子，还是‘软’、‘懒’、‘散’。部里、省里和企业，过去和今后都免不了要在工作中犯错误，犯了错误改了就好，这是毛主席讲过的话。我就是犯过大错误的人，现在也难免说错话，我这个人象维吾尔族的姑娘。辫子多，一抓就抓几个。

现在的问题，是你们敢不敢接受中央的支持，敢不敢按这次中央批示的去办。”

他接着说：“第二，必须坚决同资产阶级派性作斗争。”“我们现在

反对的资产阶级派性,与过去文化大革命开始时自然形成的两派革命群众组织性质是不同的,那是革命群众组织,因此要大联合。现在还在那里闹派性,实际上是闹资产阶级派性。”“我们要把生产很快搞上去,必须坚决反对资产阶级派性。”

“第三,落实政策问题。”“有些该回领导岗位的调回来,摆到适当的位置上,当然,也不能说统统都回到原来的岗位上。”

“第四,把前面这些问题,通过放手发动群众认真搞好以后,紧接着还要发动群众把必要的规章制度建立起来。”“过去根本谈不上什么规章制度,可以上班,也可以不上班。制度可以执行,也可以不执行,这怎么行啊。现在搞制度,宁肯要求严一些。毛主席说,矫枉必须过正。现在不要求严,制度就建立不起来。”“例如不上班,就不发工资嘛。有人不干工作,就叫他离开,为什么老叫他呆下去,国家还照发工资呢?”

他说:“毛主席最近三条重要指示:一条是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要搞反修防修嘛。再一条是关于安定团结的指示。还有一条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这就是我们今后一个时期各项工作的纲。这三条重要指示,是互相联系的,不能分割开,一条也不能忘记。”并提到他在3月接见全国工业书记会议代表时的讲话受到了一些人的攻击,说:“上次我讲了话,就有人说是复辟纲领,这种人是有的,你不要怕。”

从邓小平这次讲话开始,“三项指示为纲”开始成为领导整顿的著名口号。

江苏省委在解决徐州铁路运输问题以后,即在全省宣传贯彻整顿方针,解决徐海地区,即徐州市、徐州专区和当时由新浦、海州、连云港组成的新海连市的问题。不到一个月,徐海地区也出现了稳定的新局面。徐州市所有停产的工矿企业全部恢复了生产。4月工业产值比上年同期增长36%。徐州矿务局4月日产原煤2.2万吨,比2月增加1.2万吨。

在江苏省整顿初见成效时,中共中央6月2日批转了《中共江苏省委关于徐州地区贯彻执行中央9号文件的情况向中共中央、国务院的报告》。

《报告》反映:在整顿前,“许多领导干部陷进了资产阶级派性的泥

坑。在相当多的单位中,不是用党性掌权,而是用‘派性’掌权。这一派上了台就整那一派,那一派掌了权又整这一派。几经反复,裂痕很深。”“近几年来,那些用派性掌权的同志,又借各种运动之机整另一派的干部和群众。批林批孔运动一来,原来掩盖的矛盾爆发了。”“坏人就趁机兴风作浪,浑水摸鱼”,“打着‘揭盖子’的旗号,欺骗、拉拢少数群众,向无产阶级专政进行疯狂进攻,妄图趁机推翻各级党的领导。”

《报告》总结解决徐州问题的经验是,紧紧抓住解决领导班子问题这个关键,对派性严重的领导干部,要敢批、敢斗、敢捅“马蜂窝”,限期改正错误,到期不改,采取组织措施。对群众坚持正面教育,防止互相攻击。对极少数坏人,把他们抓起来,在群众中批判。中共中央要求各地参考江苏的经验,解决各地区的问题。

全国许多地区推广徐海经验。

河南“刹住了突击入党、突击提干之风,把双突上来的十多万人,区别情况作了处理”。

浙江抓了翁森鹤,为张永生办了审查学习班。

6 月 3 日,中央政治局继续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开会,批评江青。根据张春桥的记录,会议开始时,无人发言,长时间的沉默。他的记录中是这样记述的:

沉默,沉默,又沉默。

接着,叶剑英发言,记录上这样记的:

政治局讨论批示、指示。三要三不要。我的体会:

1、56 宣传会议,批修。主要危险。五号文件以后,批资。形势很好。三月一日出现反经验主义。全国报纸跟着来了,用反经代替反修。不要只提一个,放过另一个。这个问题,马列弄通可是难。一定要学习。非常必要。不学好,没有武器。今后中央要带头学。有些同志读得多,不必拿来作私有财产,帮助我们。坚持,不是那一个人。

2、团结。不要分裂。不同于庐山。我理解:文革以来,文革许多人垮下去了。有些同志商量如何对付林彪,是对的。在情况变化以后,任何组织都变了。过去可以交头接耳,现在如果不变,就不利。团结的方法:一手是批评,一手是团结。过去一个时期不正常。如果保持,就有害团结。历来小组织存在,分裂。

3、请示报告,严守纪律。

十一次路线,事先未请示。

批走后门,也是事先未请示。

批经验主义,又是主席纠正。个人,组织,纪律。

以后提交政治局讨论。

引起严重注意。

为什么不请示?使主席有感觉?

事先不请示,事后来纠正。

不要干扰主席,最大的干扰。

背叛。村村点火,处处冒烟。

王洪文发言:

开了三次。讨论主席指示。经过反复学习,我也回忆了一下。

1、一年多来,总理生病,我主持工作,政治局发生的问题,主要由我来负责。包括不抓大事,四人帮。反走后门,我是赞成的。两次大会,我参加了。事先没有报告主席。

2、四人帮。前年十一月会议。七人小组。分组讨论。批林批孔,七人小组。李德生材料。其他事情也议过。去年十一月份,江、王,江、邓,争论,对我来说,只听一方意见,没听小平意见,觉得应向主席报告。征求过江、张意见,向主席报告是对的。对争论看法,有片面性。报告了主席。主席批评,错误主要是我。

3、抓大事。并不是都没抓。政治局学习,没有提出办法。国际问题,也有该研究没有研究。经验主义。虽然没发表文章、讲话,社论、新华社报告,我都看了。直到看到修、经验是主要的?我没有认识到问题在哪里,也没有引起重视。直到主席批示。以后要好好学习。有同志说我揽起来,因为事情经过我的手。

归根结底,还是学习问题。学习不刻苦。

以后,一定按主席安定、团结、三要三不要办事。

另外。二十七日会的看法,我认为多数同志的发言是好的,对我的批评,难得。

有两个保留:

(1)形势一塌糊涂。确实,有干扰。但形势总的是好的。

(2)11 月会议。“十一次路线”。决不能因批江、而否定十一月会议。会议大方向没有错。

江青：

二十七日会，自我批评不够，又有新的不恰当的地方。还要加深认识。上次会，有体温。我得消化一下。还得看一点东西。再作进一步检讨。

邓小平：

提议结束，讲多少算多少。给主席作报告。

# 第1347回：形势好，万里二次下郑州 重安排，贺龙追悼会规格

就在6月3日，北京人民大会堂政治局开会批评江青的同一天，万里在河南新乡体育场冒雨召开万人大会，解决这里的铁路问题。

6月，河南省委召开工业书记会议后，整顿工作在河南全省工交战线迅速展开。但是河南的铁路问题依然没有解决。

万里在徐州局旗开得胜，到郑州局，用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里的一句土匪黑话，却“溜子撞墙了”。

4月中旬，铁道部部长万里一下郑州，提出了撤换新乡铁路分局革委会副主任、党委副书记邢介江的意见，郑州铁路局的唐岐山等人未予理睬，从而引发“二七公社”对立面的指责，提出要揪“邢介江之流”，再次诱发郑州铁路局的派性对抗。本来1975年后，郑州铁路局的生产形势已经开始呈上升趋势。这么一闹，郑州铁路局5月份生产计划主要指标，火车车皮的“装车量”，与前一段时期相比，反而下降了。到5月份，全国20个铁路局都超额完成任务，只有郑州一个局没有完成任务，货物列车运行正点率仅为64.7%，重大行车事故不断发生。与全路形成了巨大反差。

在此情况下，铁道部决定调原兰州铁路局局长苏华任郑州铁路局第二书记，以加强领导力量。并于6月初，万里再率工作组二赴河南，解决郑州铁路局的问题。

这次，他还是从新乡铁路分局下手。6月2日，万里主持召开新乡铁路分局党委常委会，研究解决邢介江的问题，仍然是从组织上采取措施，罢免邢介江。

郑州铁路局党委书记唐岐山等人还是反对这一意见，双方在新乡开会僵持了一天一夜。最后，6月3日，万里直接在新乡体育场召开8000人大会，行使铁道部的权力。

当时天下大雨，与会人员浑身湿透，目不转睛地看着台上。万里

历数邢介江的罪状,他说:

“你们这里有个叫邢介江的人。这里有许多群众给我写信,我在3月份就说过,这个人在这里挡道,毛主席的三项指示就不能落实,9号文件就不能贯彻。他用各种权术,篡夺党的一部分领导权来搞资本主义复辟活动,那怎么能把新乡分局搞好?直到现在不处理,我是很有意见的。对这个人不处理是不行的。今天我宣布:撤销邢介江在新乡分局的党内外一切领导职务,令其检查。”

全场响起热烈掌声,“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的口号声此起彼伏。

接着,6月4日到9日,在万里亲自参与主持下,郑州局连续召开了几次党委会,围绕新乡铁路分局与郑州铁路局的问题,进行了激烈的争论。局党委成员中,有的人认为邢介江的问题应该由地方处理;有的成员则认为郑州局确实是派性掌权,问题严重,支持并拥护万里对新乡问题的解决办法。会上两种不同意见针锋相对,对立情绪已经到了僵持不下的地步。于是万里提出调整郑州局领导班子的方案,征得河南省委主要领导人刘建勋、耿其昌等的同意后,报国务院常务副总理纪登奎和李先念批示,两位副总理均表示同意。

于是,6月10日,郑州局召开干部会议。万里说:“郑州局处在中原之地,铁路交叉点,是枢纽,心脏,久拖不好,不能再等了。开会时跟联合国一样,你说你的,我说我的,整天开会,也解决不了问题,那就不好办了。所以,请示了中央,跟省委共同研究了以后,从组织上调整一下。”

接着,万里宣布了组织决定:免去徐达本郑州铁路局党委书记、革委会主任和他在郑州局的一切领导职务,调离郑州铁路局,由河南省和中央组织部另行安排工作;由不久前兰州局调来的老干部苏华代理郑州铁路局党委第一书记职务,主持党委工作;胡逸平主持郑州铁路局革委会工作,同时也调整了干部处几名干部的工作。

如此大刀阔斧地整顿郑州铁路局领导班子,有欢迎支持的,更有反对的。唐岐山等人认为万里到郑州是“挑起了派性”、“破坏了安定团结”、“打击了新干部”,他们搜集整理材料,多次向中央反映。

6月16日,万里又来到同样是派性斗争激烈的昆明铁路局。这

里,云南的“八派”、“炮派”长期对峙,内战不休。局领导班子中派性也很严重,成员情况复杂。他们中有坚持派性的;有老好人;有小病大养,不上班,不工作的。万里来到昆明铁路局后,召开了党委常委会,逐个听取了每个常委的汇报,同他们进行交谈,并做出了两项决定:第一、领导班子中派性严重的领导干部,必须带头向群众作自我批评,带头消除资产阶级派性,增强党性,搞好团结。第二、对问题严重而又不很好检讨的领导干部和群众组织头头,必须采取措施。

6月20日,昆明铁路分局召开干部大会,万里在会上说:“对闹资产阶级派性的干部和头头要‘寸土必争’‘寸权不让’,坚决斗争到底。”

万里宣布了调整昆明分局领导班子的决定,指出:昆明分局党委书记利用资产阶级派性干了很多坏事:非法动用枪支,指挥武斗,制造流血事件;威胁、欺骗群众,组织几千人,动用几十辆汽车,游行示威,制造混乱;结党营私,镇压群众,称王称霸……中央9号文件下达后,他不但不进行检讨,而且继续活动,顽固对抗。为此决定撤销他的党内外一切职务,检查交代问题,交群众揭发批判,然后再根据他的表现进行处理。同时,任命了新的分局党委书记。

到6月底,全国铁路形势变化显著,南昌铁路局5、6月都超额完成计划,津浦、京广、陇海、浙赣等主要干线保持畅通,运输生产大幅度提高。上半年货运量完成41607万吨,为年度计划的48.95%,比去年同期增长8.6%,创造了历史最高记录。在20个铁路局中,有10个局做到时间过半任务完成过半。

6月4日,中央转发冶金部党的核心小组《关于迅速把钢铁工业搞上去的报告》,并发出《关于努力完成今年钢铁生产计划的批示》,6月份钢铁工业的情况就发生了变化。6月一个月的钢日产量达到7.24万吨,这是历史上最高水平,超过了当时的计划水平,开始补还欠产。

总的说来,从3月铁路整顿开始,全国交通运输和工业生产一个月比一个月好。石油工业、森林采伐和海上运输,一直稳产高产,持续上升。到6月底,原油、木材等实现了时间过半、任务完成过半。煤炭工业和铁路运输一年多来一直上不去,电力、化工、机械、建材、轻工等行业年初生产一度下降,贯彻9号文件后,都很快赶了上来,接近完成

或超过全年计划的一半。原油、原煤、发电量、化肥、水泥、内燃机、纸及纸板、铁路运输量等,5、6月创造了历史月产最高水平。全国工业总产值上半年完成全年计划的47.4%,财政收入完成全年收入的43%,收支平衡,略有节余。

6月6日,贺龙的女儿贺捷生接到中共中央通知,中央军委等单位准备举行贺龙骨灰安放仪式,要求对外保密,不治丧,不致悼词,不献花圈,不报道,不宣传等。7日,贺捷生致信毛泽东,认为这样做不符合1974年中央为贺龙恢复名誉的通知精神,请求补行葬仪,挽回影响。

同日,贺捷生还致信周恩来,表示:如果照原来方案,将不参加这一仪式。

周恩来收到贺捷生的信后,于6月7日当天即转毛泽东,并附信说:

"今年6月9日为贺龙同志开逝世六周年纪念会事,我也知道,后因我3月开刀治疗,未再过问。此事系6月6日政治局决定,今得贺捷生同志此信,特送上,如主席另有指示,当与政治局设法补救。"

6月7日晚,周恩来与邓小平及王海蓉、唐闻生长谈。周恩来、邓小平要王海蓉、唐闻生将6月3日江青、王洪文等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情况报告毛泽东。

在陪同毛泽东会见外宾时,邓小平向毛泽东汇报了6月3日中央政治局会议的情况。根据中央办公厅秘书局提供的当时在场的唐闻生、王海容记录稿记述:

邓小平:会议的情况毛主席都知道了。

毛泽东:我看有成绩。把问题摆开了。

邓小平:最后他们否认有"四人帮"。

毛泽东:过去有功劳,反刘少奇,反林彪。现在就不行了,反总理,反邓小平,反叶帅,反陈锡联。

要告诉庄则栋,有事要找陈锡联,不要跑王洪文、江青,不然陈锡联不好办事。你(指邓)跟庄则栋讲一下,告诉他,不找陈锡联不好。跑江青、王洪文,司令不好办。

风向快要转了,在政治局。

邓小平:政治局的同志气很大,我说不要把话都说完,散了。

毛泽东:这个办法好,留有余地。大家清楚就行了。我准备找王洪文谈,叫他找你(指邓),听你的话。他威望不高。

邓小平:他最后的发言,政治局许多同志感到不真实。

毛泽东:江青也不喜欢他,专门在我这里告他的状。他应该好好工作。没有大问题。你要把工作干起来。

邓小平:这方面我还有决心就是了。

毛泽东:那好。

邓小平:反对的人总有,一定会有。

毛泽东:木秀于林,风必摧之。

邓小平:开始工作时,主席给我这个工作岗位,我说主席是把我放在刀尖上了。

毛泽东:这是叶帅提议的,我赞成的。

邓小平:总参谋长。

毛泽东:就是这样。

6月8日上午,邓小平约正在负责《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编辑工作的胡乔木谈话。他们先谈了《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编辑工作,接着邓小平就谈起成立国务院政治研究室的事情,他说:"上次谈的事要着手办,不过不要叫顾问了,打算成立一个政治研究室,由你们几个人负责。政研室是国务院的直属机构,主要任务是撰写反修文章,像过去钓鱼台写作班子那样。"

胡乔木提议负责人加上于光远,邓小平同意。胡乔木又提出:"是否多找一些革命造反派。"邓小平坚决不同意。

关于政治研究室的任务,邓小平提出,政研室成立以后要"代管学部",即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对此,胡乔木表示负担不了。

胡乔木曾在当年的1月6日与邓小平有过第一次谈话,随后研究了"资产阶级法权"问题。他认为这个译名欠妥。按原文的意思,还是译为"权利"比较合适。这次谈话时,他向邓小平提出对于译名问题的意见,认为宜译为"资产阶级权利"。邓小平立即对他说:这个问题不要提。

在1月6日谈话后,胡乔木于2月28日曾给邓小平写过一封信,说到"解放初期毛主席曾要我写一本关于唯物主义的小册子,一直没

有写,觉得非常对不起主席,现在想写写看,请求组织上考虑能否允许给他配备一两位助手。”

邓小平在这次谈话中告诉胡乔木:“这封信已送主席和中央各常委传阅过,主席也同意了。”邓小平说:“现在别的工作更重要,这事暂时放一下,以后再说吧。”

6月9日,毛泽东在周恩来关于贺龙纪念会的信上批示:“照总理意见办理。”

这天,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了“贺龙同志骨灰安放仪式”。周恩来坚决拒绝了所有医生的劝告,理发修面,拖着沉重的病体,同夫人邓颖超一起来到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参加为贺龙元帅举行的骨灰安放仪式。当工作人员扶周恩来下车后,他便没再让人搀扶,以极大的毅力,自己缓步走向摆着签到簿的桌子。

周恩来就是周恩来!他和往常一样,衣服整洁,没有一丝皱褶和污垢;头发一丝不乱;威武的浓眉下,两眼依然是熠熠放光,像火一样温暖着人,鼓舞着人。

但是,他毕竟是耗尽心血,被病魔折磨得衰老多了,瘦弱憔悴,再不能像往日那样神采奕奕,走路风一般轻快,举止洋溢出潇洒和矫健。他竭力让步子迈稳,以保持身体平衡;一步一步,走得很缓慢,又要保证连续性。他为此付出了怎样的努力?当他用笔签到时,手剧烈地颤抖着,以至于任何一位在场人都一眼就能看出来。当笔尖跳动着向纸面贴近时,每个人都提起了一颗心,屏住了一口气。

他终于将颤抖跳跃的笔尖按在纸面上,吃力地又是坚持不懈地移动着:周——恩——来!

签过到,周恩来便朝休息室走去,在门口他就大声呼唤:“薛明,薛明同志!”

周恩来近半年来,还不曾有这样响亮的声音。贺龙的遗孀薛明,闻声抬头,叫一声:“总理!”立刻奔过来,满脸是泪,周恩来张开双臂,一下子拥抱住她,身体由于悲恸而颤抖着。

“薛明啊,”周恩来哀声哽咽,“我没有把他保护好啊……”说着,泪如泉涌,四周围哭声立刻响成一片。

贺龙的女儿紧握住周恩来的手说:“周伯伯,您要保重身体,要保

重身体啊。”

周恩来无言地看着她,片刻,声音颤抖地说:“我的时间也不长了。”在场众人无不动容。

哀乐声起,周恩来起身到贺龙遗像前深深地一连鞠了7个躬。

叶剑英主持仪式,身患癌症的周恩来致悼词。他说:

“贺龙同志是一个好同志。在毛主席、党中央的领导下,几十年来为党、为人民的革命事业曾做出重大的贡献。在他的一生中,无论在战争年代,或在全国解放以后,他是忠于党、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忠于社会主义事业的。”他的逝世,“是我党、我军的重大损失。”

这次追悼会,报纸上未发消息。

事后,毛泽东指示要关心贺龙家属。有关部门据此写出报告,详细叙述了贺龙亲属及友好遭受残酷迫害的情况。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回忆:视力不好的毛泽东是躺在床榻上听读这份报告的。听毕,他又戴上眼镜,将报告看了一遍。他“一会儿把报告放在胸脯上,一会儿眼睛望着卧室的顶棚。看完后,他非常难过地把报告放下,一句话也没有说,两行热泪滚落在枕头上……”

# 第1348回：邓小平，上海召见马天水 国务院，政治研究室成立

1975年6月11日深夜，马天水办公室内红色保密电话机的铃声响了，电话是王洪文从北京亲自打来的：

“马老吗？明天邓要陪外宾到上海，他可能会找你谈话，你要有所准备……”

“他要找我谈什么呀？你看我怎么准备……”马天水问。

“反正你准备下学习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材料，着重介绍上海的经验，向他作口头汇报就是了，其它的事不要多谈……”王洪文说。

“好的……那我准备一下……”马天水迟疑地挂断了电话。

据后来徐景贤在他的《十年一梦》中记载：6月12日，邓小平到达上海。傍晚时分，刚把陪同了一天的外宾送走，邓小平就叫秘书打电话通知马天水，要他到瑞金花园邓小平的住处来一下。

在客厅里，灯火通明，宾主就座，服务员端来了茶水，就退了出去，沙发上只剩下邓小平和马天水两个人。马天水先寒暄了几句，问候邓小平的健康状况。接着，邓小平开了腔：“马老哪，你们最近在抓什么？……”

“我们，重点在抓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学习，树了几个典型……”马天水把事先准备好的材料，一五一十地汇报起来。

可是，邓小平对此没有多少兴趣，听了片刻，就不耐烦地打断马天水的话：“马老哪，我们都是老同志了，有些情况应该跟你通通气……最近，毛主席对有人批经验主义很生气，专门有一个批示，你知道吗？”

“我知道……”

“噢，知道啦，是什么人告诉你的？”

“这个……”马天水如实相告：“是新华社上海分社的同志……到

北京去开会传回来的。”

“你想过没有？他们要批的经验主义，中央的代表人物是谁？各省市的代表人物又是谁？”邓小平两眼盯住马天水的脸，拖长了声音慢悠悠地说，“再发展下去他们就要揪人啰……”邓小平的四川口音把“揪”字说得很重，马天水吓了一跳。

“这……我倒不知道……”马天水答道。

“我把这件事告诉你，是因为你在上海主持工作，对这种大事要注意了。”邓小平侧身看看马天水，进一步说道：“他们搞批林批孔，‘三箭齐发’。有的人还讲：批林批孔是十一次路线斗争的开始。这是什么意思呀？你听说过没有？是毛主席拨正了批林批孔的方向噢！”

马天水心跳不止，他想：“这又是讲的江青呀！”因为他清楚地记得，江青曾说过关于十一次路线斗争的话。马天水下定决心，紧闭嘴巴，绝不表态。

邓小平继续说：

“现在报纸上老是批‘唯生产力论’，谁还敢抓生产呀？还有，把什么都说成是资产阶级法权，真是荒唐，缺乏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常识。多劳多得是应该的嘛，也叫资产阶级法权，这在理论上和实践上站得着脚吗？对社会主义建设有什么好处？你有没有想一想……”

“上海批了林彪、陈伯达的‘唯生产力论’，生产还是上去了……”马天水咕哝了一句。

邓小平朝旁边茶几上的烟缸里弹了弹烟灰，转了一个话题，故意问马天水：“你在北京有没有老熟人啊？”

“熟人很多……”马天水一时摸不着头脑。

“先念同志、余秋里同志你熟吧？”邓小平继续问

“我跟他们可熟了……”马天水还是猜不透邓小平的葫芦里究竟卖的什么药。

“以后你到北京，可以找他们……也可以直接到我家去，找我谈嘛！”邓小平说。

“吓，原来他是要我直接去找他，不要我去找春桥、文元和洪文，我能这样做吗？”马天水毕竟是有着长期斗争经历的人，他立即明白了邓

小平的意思,可这是他心里想的,嘴上就是不表态,而是婉转的说道:

“唔……我跟先念同志很熟,过去在经济工作方面有事也经常找他的”马天水采取含含糊糊、“顾左右而言他”的办法,把最核心的问题回避了过去。

马天水告辞出来,天色已经昏黑。他脸色苍白,出了一身冷汗,连头上帽子的边沿,都是湿漉漉的。他乘上轿车返回康平路市委大院,独自一人在小礼堂的地毯上来回转圈子,连晚饭都顾不上吃。他不断琢磨着这次谈话的含意,又不断思量着自己的态度和对策。

思忖了许久,他还是找来了徐景贤和王秀珍两个人,把邓小平和他个别谈话的情况和盘托出。在叙述过程中,马天水情绪非常激动,声音都有些发抖:“邓的讲话可成问题啦!完全是文化大革命前跟刘少奇一起的那一套……他还攻击江青同志呐,什么‘批林批孔是十一次路线斗争的开始’,我一听就知道他指的是江青同志……”马天水越说越气愤:

“我没有顺着他的意思讲,他就对我不满意,这么晚了,连晚饭都没有留我吃,我只好饿着肚子回来……”

“呀,马老,当心你的糖尿病发作。”王秀珍关切地说。

马天水继续说:“他这次来,是有目的的,就是想来做上海的工作的。他不找你们,就找我这样的老干部。他说他知道王秀珍,过去当过劳动模范,现在是工人造反派;他说对老徐也很熟悉,是市委机关造反的。所以他不找你们,只找我,谁晓得我的立场很坚定,他拉不过去的,‘挖墙脚’没有挖成!他没有想到我这样的老干部,居然不跟着他走……”说到这里,马天水又得意起来,用他的习惯动作摇起了经常带着的黑折扇。

“马老,邓小平对你估计错误……”徐景贤说。

“上次文元同志讲,今年下半年要出点事,我一直在想究竟会有什么事。”马天水想起了几个月前姚文元的预言:“现在看来,要出事恐怕就出在邓小平身上。他还要我直接去找他,想得到美,我才不去呢……

“我要报告中央!”马天水急着想写报告,“告他拉拢人,搞非组织

活动,要挖上海的墙脚……”

6月14日,王洪文给毛泽东写信,汇报6月3日政治局会议情况。他在信中写道:

“这次会议上,大家主要对于‘批判经验主义’的问题,‘四人帮’的问题,‘以个人名义送材料’的问题,提‘十一次路线斗争’的问题等,进行了批评。会上,春桥、文元同志对于在讲话、文章中提出反对经验主义有片面性问题,作了自我批评。江青同志除了在四月二十七日会议上对批判经验主义问题上承担了责任、作了些自我批评外,这次会议上也谈了一下‘四人帮’的历史关系和工作上的关系。会后电话告我,她还要给主席写书面的自我批评。我在这次会议上对于在批林批孔、赞成批‘走后门’、两次大会没有向主席报告,对赞成‘批判经验主义’问题、‘四人帮’、‘不抓大事’问题上作了些自我批评。这次会议总的来说,开得一般。就我个人看,会议上对于四位同志(包括我)的自我批评是不满意的。”

在癌细胞的吞噬下,周恩来已经瘦得皮包骨,体重只剩下61斤。6月16日,他在病榻上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

主席:

问候主席,您好!我第三次开刀后,这八十天恢复好,消化正常,无潜血。膀胱出血仍未断,这八十天(从3月26日-6月16日)只有21cc(克)不到,但较去年11月12日到今年12月4日,中间还去主席处五天,一月开全会共两次,共八十多天只有13cc,还略多:那八十多天只有增生细胞二次,可疑细胞只三次,这八十天却有坏细胞八次,而最后十天坏细胞三次,所以我与政治局常委四位同志面谈,他们同意提前进行膀胱照全镜电烧,免致不能电烧,流血多,非开刀不可,十五日夜已批准-我现在身体还禁得起,体重还有六十一斤。一切正常可保无虞,务请主席放心。手术后情况,当由他们报告。

为人民为世界人的为共产主义的光明前途,恳请主席在接见布特同志之后,早治眼病,必能影响好声音、走路、游泳、写字,看文件等。这是我在今年三月看资料研究后提出来的。只是麻醉手术,经过研究,不管它是有效无效,我不敢断定对主席是否适宜。这段话,略表我

的寸心和切望！从遵义会议到今天整整四十年，得主席谆谆善诱，而仍不断犯错，甚至犯罪，真愧悔无极。现在病中，反复回忆反省，不仅要保持晚节，还愿写出一个像样的意见总结出来。

祝主席日益健康！

周恩来

75.6.16.22

信写好后，周恩来又给张玉凤附了一张便条：

玉凤同志：

您好！

现送十六日夜报告主席一件。请你视情况，待主席精神好，吃得好，睡得好的时（候），念给主席一听，千万不要在疲倦时念，拜托拜托。

周恩来

1975.6.16.22 时半

6月15日，邓小平在给政治局的关于成立毛泽东选集工作小组、编辑《毛选》第五卷的报告中，同时提到国务院政治研究室的事情。他提议："另，国务院政治研究室，先由胡乔木、吴冷西、胡绳、熊复、于光远、李鑫等同志组成，以后再吸收一些人，特别是年青一点的，培养作理论工作。此事亦请一并提政治局审议。"

经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报毛泽东圈阅同意，国务院政治研究室正式成立。负责人除上述报告中提到的6人外，又增加了邓力群。

6月22日下午，胡乔木即到中南海西四院上班。这里后来就成为国务院政治研究室编辑《毛泽东选集》第五卷所在地。

6月24日早上，胡乔木在中南海召集政研室领导成员开会，胡绳、吴冷西、熊复、于光远、李鑫等出席。下午即开始办公。

6月23日，姚文元对《红旗》杂志编辑组召集人传达毛泽东的指示。他说：

"传达一下主席最近的指示（我归纳的，不是原来的），有的我们要很好研究。"

"一、关于两条路线斗争问题。

主席说，我们现在还是两种可能，一个社会主义，一个资本主义。

王明、张国焘、高岗、彭德怀、刘少奇、林彪,他们是要搞资本主义。我们党五十年,有十次路线错误。其中四次跟苏联没有关系,陈独秀、瞿秋白、张国焘、罗章龙。六次跟苏联有关系。反对我们,分裂党,都失败了,党没有分裂,把他们排斥出去了。以后五十年,或者一百年,还有两条路线斗争,一万年还有两条路线斗争,到共产主义还有两条路线斗争,不然,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讲对立统一(用英语讲对立统一这个词),只说一个,就是形而上学,两个,就是对立的统一,对立的斗争。我相信马克思说的,列宁说的。”

姚文元解释说:“主席这段话的精神,在巡视各地时都讲过。我在文章中也引用过。争论中有一个问题,到共产主义还有没有两条路线斗争?仍然是有的。”

他接着传达:

“二、关于资产阶级法权问题。

主席说,我们正是列宁说的没有资本家的资产阶级国家。这个国家为了保护资产阶级法权,工资不平等,在平等口号的掩护下,实行不平等的制度。我们现在就是这样。还有多少年,还是这样,然后才能到共产主义。共产主义也有两条路线斗争,先进和落后的斗争,现在还不能讲得很完全。这些话我们是在报纸上公开说的。”

姚文元说:“主席这段话很重要。资产阶级法权的实质问题有争论。主席明确提出平等口号掩盖下实行不平等的制度。这是从商品、货币交换来的。这个不平等现在还不能解决,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我们的国家还是保护它,写上了宪法的。资产阶级法权问题还要继续搞点文章,还要逐步地去做,是长时间的事,这是公开说的,不怕明确说出来,例如编语录,公布主席指示。

他继续传达:

“三、关于反修防修问题。

主席说,道路是弯弯曲曲的,苏联从列宁时代,到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就不同了,将来一定还会回到列宁的道路。中国也是这样,将来可能也变修正主义,但最后还会回到马克思、列宁的道路。”

“四、有一个批示。有一位同志写信给主席,提出穷队、富队关系

问题。说限制资产阶级法权中,农村穷队、富队有差别,有种种原因,其中条件不同,土地肥沃不同,工分值不同,一般的一元,城郊二、三元,低的四五角,说除因阶级斗争抓得不紧,群众社会主义积极性调动不够之外,主要是因为存在着资产阶级法权。提出国家对农产品收购价格应根据不同情况来考虑。主席批示:'此事办起来甚复杂,应在几个公社试点。富队可能不高兴。富队也有贫户,贫队也有富户,看看结果如何。'农林部正派人进行调查研究,这是个大的实践问题和理论问题。农林部觉得很复杂,倾向于国家支持穷队的办法,实行收购价格上的这个办法困难。

这里提出了如何正确处理穷队富队、穷户富户的关系问题,应当采取什么政策。最近上海作了调查,寄来材料,他们的结论是贫下中农生活上升最快,但生活水平中农、富农中农最高,因为他们有技术,工分高,掌握货币最多的是地富,他们不买东西,存款。有具体的统计,不知实际情况是不是这样?这牵涉到对待级差地租的问题。如何看,作为研究的问题。

五、关于供给制问题。

主席说,我们解放初期曾保留了两年军事共产主义,党政军实行供给制,那时这些坏事比较少(指小病大养,无病呻吟,贪污腐化)。这个问题还可以研究。

六、不要照搬外国的问题。

主席说,南北朝有一个人,鸠摩罗什说,学我者病。他是外国人,会说中国话,翻译了很多佛经。问题要自己想一想。马克思说,他的学说是指南,不是教条。中国有一个人,叫严复,引了鸠摩罗什的话,称他中国名字叫什法师。严复会作翻译,翻(天演论)说的,他不说翻译,说达旨。《天演论》是赫胥黎写的,此人是英国人,拥护达尔文。不可知论就是他说的。赫胥黎说康德就是不可知论者,只能认识表面,不能认识本质。赫胥黎在自然科学上是唯物主义,社会科学上是唯心主义。他赞成印度的佛教哲学。马克思说他是羞羞答答的唯物主义。

七、还有一个反对经验主义、教条主义问题。

主席说,无论经验主义也好,教条主义也好,都是修正马列主义

的,都要用教育的方法。教条主义,外国人放个屁都是香的。我两年没有吃鸡蛋,因为苏联人说蛋黄胆固醇多,吃了血管在变硬,后来苏联又发表文章说,多吃不要紧。总之是外国的月亮好。教育、文艺、新闻、科学、医学,都有教条主义的影响。有经验主义的人多,不懂马列,只凭一点经验办事。我历来对经验主义没有办法,慢慢来,过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也许可以好一些。

八、最后,讲政策。

卫生部贺诚,写信给主席,说刘少奇、林彪都打击他,他主张卫生工作重点放到农村去,刘少奇撤了他的职,邱会作也打击他。两次打击他。

主席说:贺诚无罪,当然应分配工作。过去一切诬蔑不实之辞,应予推倒。‘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

# 第1349回：务虚会，江青写出检讨书 赴浙江，邓小平主持中央

经邓小平提议，从6月16日开始至8月11日，国务院召开计划工作务虚会，通盘研究整个经济工作的整顿问题。由主管日常事务和经济工作的副总理李先念、谷牧、纪登奎、华国锋、王震等主持。会议先后开了18次、近两个月。

会议研究了今后经济工作的路线、方针、政策，为编制第五个五年计划和十年长远规划作了准备。

务虚会认为，当前经济生活中的主要问题是散和乱，必须狠抓整顿，强调集中。务虚会对计划体制、企业管理体制、物资管理体制、财政体制的整顿以及整顿领导班子、加强职工训练、建立各项生产管理制度等提出了具体意见。如在计划体制上，要实行自下而上、上下结合，“块块”为主的管理办法，国家计划不能层层加码，也不能随意降低指标。在企业管理体制上，凡跨省市的铁路、邮电、电网、航运、民航、输油管和专业施工队伍、重要科研设计单位、重点建设项目以及大油田等少数关键企业，要以中央各部委为主管理，不能层层下放。会议还就如何发展钢铁工业、调整机械工业、缩短基本建设战线、安排好轻工市场、发展科学技术等问题，提出了一些设想。

务虚会上提出要搞一个关于工业整顿的文件，认真总结铁路、钢铁整顿的经验，对整个工业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一个切实的解决办法，做出一些必要的规定。这个文件即交国家计委负责起草。

6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卫生战线的深刻革命——纪念毛主席“六·二六”指示十周年》。社论说：

“十年来的经验证明，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是卫生战线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的一场深刻革命，是一个长期的艰巨的战斗任务。我国农村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百分之八十以上，长期以来缺医少药。做好农村的医疗卫生工作，对于巩固工农联盟，逐步缩小三

大差别,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坚持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这是卫生革命的大方向。现在,我们在这方面的工作,虽然有了良好的开端,但离毛主席提出的要求还很远,必须作坚持不懈的努力。”

“城市的医务人员要坚持到农村去,到基层去,参加三大革命运动,在斗争实践中接受再教育,改造世界观。要积极支持卫生战线的社会主义新生事物。”

“农村合作医疗和‘赤脚医生’,是亿万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依靠集体力量同疾病作斗争的创举。我们要具体地总结经验,从各方面创造条件,促使它成长起来。”

6月27日,加蓬共和国总统邦戈来华访问。毛泽东在病榻上写了一封信:

加蓬共和国邦戈总统先生阁下:

尊敬的总统先生,听到阁下又到北京,感到十分高兴。理应迎谈,不幸这两日不适,卧床不起,不能接见,深为抱歉,请赐原谅。祝阁下旅途顺利。

毛泽东倚枕

1975、6、27

由于健康原因取消同外国首脑的会晤、并亲自向对方致函道歉,这对毛泽东来说还不曾有过。信是毛泽东自己摸索着写的。短短几行字,歪歪斜斜地写了九张纸。自然,这是一封当时不能公开的信。

6月28日,江青向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交出一份书面检讨:

主席、在京的政治局各位同志:

我在4月27日政治局会议上的自我批评是不够的。经几次政治局会议上同志们的批评、帮助,思想触动很大,但是思想上一时转不过来。经过思想斗争,我以为会议基本上开的好,政治局比过去团结了……

“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问题,是我个人讲错了话,对不起恩来、剑英同志;批林批孔批走后门,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扩大了打击面,造成了不安定团结;关于个人自作主张到处送材料的问题,是无组织无纪律,破坏党的一元化领导;关于目前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的问

题,这一提法是主观片面的,会造成思想上的混乱,扩大打击面,严重地造成不安定团结。……

当我认识到四人帮是个客观存在,我才认识到发展成分裂党中央的宗派主义的可能,我才认识到为什么主席从去年讲到今年,达三、四次之多。原来是一个重大原则问题,主席在原则问题上是从不让步的。

江青

1975 年 6 月 28 日

6 月 29 日,邓小平约胡乔木谈话。他说:“政研室一定要把哲学社会科学部管起来。”

胡乔木建议:“由胡绳分工管,胡绳在十大时就是作为哲学社会科学部的代表出席的。”

邓小平同意。胡乔木又说:“不过学部的政治工作要请国务院政工组管,行政要请国务院办公室管。”

邓小平都同意,并说:“胡绳本来也不擅长这些。”

邓小平还提出:“学部要办个刊物。”

这次谈话之后,胡乔木就与有关方面酝酿学部领导人选。

6 月 30 日,周恩来对江青检讨的批示:

欢迎这一检讨。

今后政治局同志凡遇大事都经过组织讨论,事先请示主席,遵照主席指示执行,认真深入学习,联系中国实际,在实践中多听同志好意见,坚决改正常犯的错误,政治局的团结就会搞得更好。

建议将江青的检讨信送主席批阅。

在京的中央政治局成员传阅了江青的这份书面检讨。

毛泽东圈阅了此件。

6 月 30 日,毛泽东对蒋葆生反映原林彪办公室工作人员处理问题的来信批示:

中央:

林办各下级人员,责任较轻,不宜久在学习班。似宜早作结论,免予追究,分配工作,以观后效。

请讨论决定。

中共中央在1975年初让邓小平或纪登奎到浙江帮助解决问题。但是,邓小平和纪登奎都不太愿意去。因为浙江一直是由王洪文负责的。

1975年春,纪登奎去医院看望周恩来,周恩来几次嘱咐他要解决浙江问题,说:“不看僧面看佛面嘛,浙江省有几千万老百姓呢。”

这时,毛泽东发话了,让纪登奎和王洪文一起去浙江解决问题。根据毛泽东的意见,王洪文于6月下旬被派往浙江、上海帮助工作。

7月1日凌晨2时,叶剑英致信毛泽东,说:王洪文“去杭沪工作一短期,临行报告主席,提议在他来京前,政治局会议由剑英或小平同志主持。我因年老多病,精力不胜,提议请小平同志主持,以利党的工作。”

毛泽东当天圈阅同意。叶剑英通知邓小平和政治局。

7月1日,毛泽东对只是有“嫌疑”的受审查人员做出批示:“如无确证,只是嫌疑,则应释放,免于追究,以观后效。从实践中证明。”

7月1日,周恩来带病在李先念和乔冠华的陪同下和前来访问的泰国总理克立·巴莫签署了中泰两国建交公报。陪护人员嘀咕着,想趁摄影记者在的机会,跟周恩来总理合个影。他们都明白,这种机会可能不多了。他们的嘀咕被周恩来听到了,他笑着说:“好吧,我们大家一起照张相。”

送走客人后,按照事先的“谋划”,由乔冠华出面,请周恩来与大家合影留念,周恩来爽快地答应了。

工作人员赶紧出去叫住摄影师杜修贤,在大厅一侧选了地点,李先念和乔冠华也很快站到会客室的中间。不久,周恩来在值班护士搀扶下,微笑着缓步走到大家面前。随行人员、医护人员和部分在场的工作人员,个个像孩子似的围拢过来,在周恩来的身边站成两排,做好拍照的准备。

摄影师认真调好焦距和光圈,连按几下快门。拍摄完毕时,周恩来望着大家笑了笑说:“照可以照,但将来可不要在我的脸上画××。”

一句话说得大家都没了笑容,心情无比沉重。

1975 年 7 月 1 日，周恩来与李先念、乔冠华及部分身边工作人员最后一次合影

7 月 2 日，毛泽东读到了被称为 17 年“文艺黑线”的骨干人物，曾长期担任中宣部文艺处处长、后任中宣部副部长的林默涵于 6 月 17 日写来的一封信。

文革中，林默涵因受到周扬问题的牵连，被下放到江西。1975 年 5 月，中央宣布对他解除监护，恢复自由，安排在就近的一个钢铁厂工作，以等待结论。他在给毛泽东的信中，对中央的处理表示感谢，希望能“留在党内”，并表示“决心好好学习马列和毛主席著作，虚心当群众的小学生，把自己的一切献给党和人民的事业，直到最后一息”。

此时，毛泽东双目几近失明，他听秘书读罢此信，默然良久，最后，拿起铅笔，摸索着亲笔写了一段批示：

中央：

周扬一案，似可从宽处理，分配工作，有病的养起来并治病。

久关不是办法，请讨论酌处。

附林默涵来信。

毛泽东

一九七五年七月二日

7 月，毛泽东同邓小平谈话。

邓小平一开始就汇报:全国生产情况形势不错。钢没有完全达到指标,但是有希望。今年农业,夏粮是丰收了,秋粮还不错。接着,他又谈了解放干部问题、文艺政策问题。最后,他对毛泽东讲:“都说我两次讲话叫复辟,说是刘少奇的班底又起来了,有人不高兴。”

毛泽东说:“再过两三年就好一些了。”

邓小平说:“有人讲点,有好处,没坏处。”

毛泽东说:“是啊,无非是挨骂。我历来就是挨骂的。”

7月4日晚,叶剑英、邓小平、张春桥、江青、李先念、陈锡联、吴德、苏振华、吴桂贤在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接见中央第四期读书班。

邓小平说:“读书班有个规定,结业的时候要接见一下,这是个规定制度,必要的规章制度还是要建立,要恢复。这次见了大家,是不是每次都要见,下次还得研究。”

叶剑英问:“同志们先讲一讲学习心得吧,胡耀邦同志来了没有?”

胡耀邦答:“来了。”

叶剑英问:“你的身体还好吧?”

胡耀邦答:“还好。”

叶剑英指着胡耀邦说:“看了你的简报,讲的很好嘛?”

邓小平说:“见见面嘛,我讲两句话。第一句话是照毛主席三句话办事。这是这个时期各项工作的纲。一句是学习理论反修防修。第二句话是团结安定为好。第三句话是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这三句话是相互联系的,是一个整体,不能丢掉任何一条,不但要学理论,反修防修,而且要照毛主席的‘文化大革命八年了’。现在是九年了。要团结起来,安定起来。好多事情要办,国际方面的斗争,事情很多,国内也有许多事情要办,特别是我们的经济工作要搞上去。仗总是要打的。晓得哪一天打呢?可能争取五年时间,不能说死,要是两、三年打起来怎么办呢?也要把经济工作搞上去,能争取到五年更好。总之三句话是一个整体,不能分割,不能丢掉任何一条。这是第一句话。”

“毛主席说‘军队要整顿’,党有没有这个问题?我们党多多少少,也有这个问题。特别是党的作风。大家在学习中,到各部参加工作,一面读书,一面工作,理论结合实际,这个方法是好的。你们在工作中,可以看到相当一部分地方党的领导没有建立起来。没有党的领导

怎么行呢？毛主席语录第一条讲的，就是党的领导的核心嘛。”“各级都有这个问题。但关键是省委，关键是要建立省委的领导核心，什么事情都跑到中央来不行。在座的许多同志参加了省的领导。希望同志们通过这一段学习和实践，回去要知道把省委一级党的领导建立起来，使得省委说话有人听，能领导起来。一不是懒的，二不是散的，三不是软的。现在看来更多的是软的。”“最近，中央9号、13号文件，都讲到这个问题。中央对国防科委、和七机部，也把这个问题当作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来解决。”

“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都是违反马克思主义的，都是修正主义的范围。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学习理论中心是解决这个问题，中心是讲反修防修。二是反对宗派主义，最近我们解决问题，都是在反对派性嘛，提高党性，反对派性，消灭派性，就是资产阶级派性。”“我们文化大革命初期，也是自然形成的这个派、那个派，是无产阶级的两派，现在不能再搞派了。过了那么多年了，性质不同了，现在实际是少数人在闹，事实证明包括犯派性错误的群众，包括徐州的99%群众是厌恶的，只有把问题讲清楚了，群众就明白了闹资产阶级派性的头头，大部分可以教育过来。毛主席讲：‘安定团结，’但少数人继续闹，怎么能安定团结呢。徐州就那么一两个人，叫顾炳华。把共产党市委打入地下。那是为什么？”

“现在学习理论不够，提拔干部有问题，宣传毛泽东思想有混乱。过去林彪只讲学习“老三篇、老五篇”，割裂毛泽东思想。”“现在学生也不好好读书，现在读书都成了问题，你周荣鑫是教育部长，你还不发表演说？搞科学研究的，也不读书，也不研究外国情况，不到下班时间就回家搞家务，这样科学事业怎么能发展呢。”

“关于整顿问题，我向主席报告过，主席同意整顿。整顿的核心是领导班子。党也要整顿。整顿要有一股劲，要敢于整顿，不怕干扰，半年之内要突出一个敢字，不管你老的、中的、青的，老虎屁股都要摸。否则就是白讲。对闹资产阶级派性的，要发动群众，这些人最怕群众。只要敢抓，并不难解决。浙江一个月就解决问题，徐州把顾炳华一抓就解决了。

老中青三结合我从来不反对。三个方面都很重要。但是，不要忽

视中年。中年非常要紧。特别是四十几岁的县委书记,大厂厂长,只要是优秀的,弄到省里来,锻炼几年就可以当省委书记。好的苗子可以提的快一点,但是,要一个台阶一个台阶的往上提。台阶宁可矮一些,也要一个台阶一个台阶的上来。前一段从工农中提拔了一些干部,提的太快,一下子上来工作有困难。这样提上来,弄得不好,不是爱护他,反而害了他。军队这样提上来的干部,可以不免职,但要下放锻炼,叫挂职下放。”

关于经济工作,邓小平认为:“前一段解决铁路问题、钢铁问题,都是一个一个地解决,光这样不行,要通盘地研究。”

经中共中央、毛泽东批准,邓小平亲自组建的国务院政治研究室于7月4日召开首次全体会议,简称政研室。7月5日,国务院办公室发出通知:“经毛主席、党中央批准,国务院已设立政治研究室。由胡乔木、吴冷西、胡绳、熊复、于光远、李鑫、邓力群等同志组成。”

与此同时,经毛泽东批准,还成立了由康生、邓小平、胡乔木组成的三人小组,即“毛泽东选集工作小组”,负责《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编辑工作,具体工作也由政研室来承担。

# 第1350回：说两校，毛家湾清查结束 放周扬，周恩来想见朱德

迟群和谢静宜领导的“清查林彪与复制林彪罪证小组”自1974年2月22日到达毛家湾，经过一年零四个月的时间，于1975年7月5日撤离毛家湾。在这一年零四个月的清查林彪图书、卡片、条幅的工作中，他们主要完成了两项事情：第一项是从7万册书中找出了200多册林彪批注过的重点书籍，查出林彪读书札记等“罪行材料”1100余条，分为13个专题。这些“罪行”材料都附有影印件及底片，通过北大、清华两校党委上报了中央。第二项是由新华印刷厂、故宫文物印刷厂按原件复制的材料，共100余件。

在毛家湾清查期间，清查工作小组还将清查林彪“罪证”中发现的问题编成情况简报，经两校党委上报中央和中央专案组。其中，在林彪批写的东西中发现的问题编成《情况简报》，陆续约20期；根据林彪主要“罪行材料”编成《清查情况简报》，有10余期。

8341部队二大队副大队长于仁堂也参加了这个清查小组的工作。于仁堂是林彪住处的管理员，早上开门，晚上锁门，和清查工作小组的人一同吃饭。他在林彪住地从事警卫工作多年，是清查处理物品小组中一直跟到底的人，非常熟悉林彪一家的生活特点。

林彪的家庭生活很不正常，闹矛盾也很有意思，大家把话都是写在纸上的。这些纸，什么样的都有，有的是撕张日历，写在上面。所以，林彪家里闹的矛盾，都是有案可查的，这是其他人家不可能有的事。

有段时间，社会上传说叶群有特务问题，叶群很紧张。林彪就在她门上贴一个条子安慰她，要她有信心，要坚持。而叶群呢，则写了副条幅回送给林彪，吹捧林彪。

叶群与林立衡，即林豆豆，矛盾很大。林豆豆还在家里贴大字报，声明叶群不是她亲妈。最后搞得叶群没辙了，把林彪在东北的警卫员找了来，给林豆豆做工作。在战争年代，一次房子着火了，是这个警卫

员把豆豆抱了出去。他给林豆豆还画了一张画,说明这件事情。

为了给林立衡找对象,叶群发动了许多人帮忙,有总后勤部部长邱会作的夫人胡敏,有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的夫人田普,还有其他许多高级干部的夫人。但找来找去没有找到合适的,林豆豆就生气了,写了个大字条说:“给我找还是给她自己找,下一次我要亲自出马”。

叶群的私生活比较乱,与黄永胜在电话中谈情说爱的录音就在毛家湾,清查小组的人都听过。

清查小组的负责人李世存是工宣队队员,他对清查小组的知识分子总是居高临下,动辄训斥他们,致使清查小组的人对他都很反感。因为李世存40多岁就白头了,所以大家当面叫他李师傅,背后叫他“白狗子”、“老白毛”。

当时,“梁效”写作组写的文章中,有随意散播和拼凑林彪罪证的现象。比如当时在社会上流传的“打着红旗造反,叫人不易看穿”、“国营不如集体,集体不如单干”等话,都不是林彪亲笔写的,也无证明是林彪口授的。这些是林彪秘书收集各种词汇时写在卡片上的。又如《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二)初稿中,将林彪在不同场合写的话拼在一起,搞成了条目。“清查林彪与复制林彪罪证小组”的工作人员当时就给工作小组领导提出说:这是极不严肃的事情。不是共产党人的作风,而且后患无穷。

于是,工作小组陈志尚等几个人搞了一份“对照表”,对照“梁效”所使用的林彪材料与原件是否出入,指出这类问题达数十处之多。结果受到李世存的斥责,说他们是多管闲事,下令不准议论“梁效”和“梁效”文章中的问题。还质问:“难道你们不知道两校大批判组是谁领导的吗?”

在编《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二)时,清查小组看到了一张卡片上记着复旦大学教授周予同的几句话,原话是:“周予同:托古改制,复古改制,托封建主义之古,改社会主义之制……”

这几句话是林彪的秘书李春生从新华社《内部参考》上摘录下来的话。清查小组也找过李春生调查此事,不能证明是林彪或叶群口授的。但是,迟群、谢静宜他们想把它作为林彪罪证的一条重要材料,非要把“周予同”三字抹去,把这句话说成是林彪、叶群口授的,安到林彪

头上,清查小组的工作人员坚决不同意。

为此,“梁效”的李家宽、宋柏年、王世敏说:“这一条是上面定的”,“材料要为政治服务”,要在罪证照片上进行“技术处理”。清查小组的人和公安部来的马天禧当即拒绝说:“这是作伪证,我们不干。”气得宋柏年当场大骂:“你们这是资产阶级法律观点!”清查小组的人没有理会他们,坚持没有把这条列为林彪的罪证材料。

在清理工作即将结束时,迟群、谢静宜让李世存将清查小组编的林彪罪行材料500条本送“梁效”五套。对此,1975年6月11日上午,清查小组的魏敏当面给李世存提出:“林彪的材料送两校大批判组而不报中央,这不符合党的组织原则。”李世存当即给迟群作了电话汇报。根据迟群指示,他挨个找人谈话,说:“迟群、谢静宜是代表党中央的”,“反迟、谢就是反对党中央”,并骂魏敏“猖狂至极”,“从七·二七工宣队进驻清华以来就没有见过这么猖狂的人”。

清查工作小组的人拿着党章质问李世存:“迟群连中央委员都不是,什么资格代表党中央?在这个问题上,恰恰是你李世存犯了严重的政治上和组织上的错误。”

李世存被问得哑口无言,改口说他没有说过迟、谢代表党中央的话。这更让清查工作小组的人住把柄了,斥责他“缺乏共产党人光明正大的气概”,表示要跟他斗争到底。

《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二)初稿泡汤了。迟群非常恼火,大骂:“怎么找了这么一帮人来工作。”1975年7月5日,清查工作小组结束了在毛家湾清查工作,学校派车把他们拉到清华大学工字厅,迟群、谢静宜都在,桌子上摆了些西红柿以示招待。

谈话时,清查工作小组的张显扬、王贵秀问迟群、谢静宜:“李世存说你们代表党中央,这话对吗?”

谢静宜赶紧说:“我们怎么能代表党中央呢?”

迟群结结巴巴地说:“这不是帮倒忙吗?”

7月6日上午,毛泽东在会见伊拉克副总统马鲁夫后,与参加会见邓小平谈话时提到:“样板戏太少,而且稍微有点差错就挨批。百花齐放都没有了。别人不能提意见,不好。”

邓小平说:“现在文艺并不活跃。”

毛泽东又说:“怕写文章,怕写戏。没有小说,没有诗歌。”

7月9日,邓小平召集政研室负责人开会,7位负责人除邓力群未出席外都到会了。会议第一次阅读并讨论拟编入《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文稿《论十大关系》。邓小平向到会者传达了7月6日毛泽东同他谈话时对文艺工作的意见,然后说:

“除百花齐放外,还有一个百家争鸣的问题。要防止僵化。现在的文章千篇一律,是新八股。双百方针没有贯彻执行,文学、艺术不是更活泼、更繁荣。”

邓小平说:“毛主席最近关于百花齐放方针问题和文艺工作问题作了指示,我向政治局作了传达,准备讨论一次。”

邓小平说他不熟悉这方面的情况,要政研室帮他收集一些文化、科学、教育、出版等方面执行双百方针的材料。

邓小平还说到自然科学研究中的问题。他说:“现在对基础理论不重视,只搞应用科学,这样要赶超世界水平不行。”

邓小平提到毛泽东讲到:“对犯错误的人要一看二帮,不要幸灾乐祸。”

邓小平说:“现在很多人就是不实行这一条。”“党的基本路线一定要有一套具体路线和具体政策,不然路线就是空的。”“路线不是空喊。”

胡乔木向邓小平汇报了7月8日中组部确定、经国务院系统告知的哲学社会科学部临时领导小组人选:林修德、刘仰峤、宋一平。邓小平说:“学部在适当的时候要考虑安排学术界人士担任副主任。”

7月10日,胡乔木即召集政研室负责人开会,出席者为政研室的7个负责人:胡乔木、吴冷西、胡绳、熊复、于光远、李鑫、邓力群。会上,胡乔木先讲了政研室的性质、任务,接着传达了毛泽东7月6日关于文艺的指示,并说他“理解主席说小说诗歌没有,是指老作家的小说诗歌没有。”

会议根据邓小平关于进行调查研究,收集文化、科学、教育、出版四方面执行双百方针情况材料的要求,议论了题目与分工。胡乔木就教育方面出了四个题目:教育质量(包括毕业生的程度如何评价),学习时间,教师、学生的活动,基础课在课程中的地位。工作方式主要通

过个别联系,从自己熟悉的人那里了解有关方面的情况,征求意见。

政研室的人员和办公地点按任务分为两部分。以编辑《毛泽东选集》为主要任务的,在中南海西四院。胡乔木、吴冷西、胡绳、熊复、李鑫在那里办公。政研室的经常工作由于光远和邓力群负责,这一部分人在中南海武成殿办公。邓小平交的调研任务,主要由于光远和邓力群二人贯彻执行。

7 月 11 日,于光远、邓力群向刚调来政研室的王子野等 5 人传达了 10 日会议的一些内容,具体布置了任务。在这次会上,邓力群提出关于“三突出”这个题目。他说,现在一些文艺评论文章把京剧革命样板戏的“三突出”说成是适用一切艺术形式的创作原则是不妥当的。他请王子野翻阅报刊文章,把有关“三突出”的论述,摘抄整理成一个材料。

王子野等查阅了 1969 年以来北京、上海的几种主要报刊,在整理关于宣传“三突出”的材料时,发现自 1969 年 11 月以来“双百方针”提得极少,从《样板戏评论集》上发现以样板戏演出单位和“初澜”名义发表的好几篇文章,毛泽东关于文艺方针的四句话,都只引“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推陈出新”三句话,而不引“百花齐放”这一句,正好从指导方针和文艺理论批评方面同毛泽东 7 月初批评创作上“百花齐放都没有了”相印证。王子野等将报刊中砍掉“百花齐放”的情况也摘抄整理成一份材料。邓力群即把材料交胡乔木。

7 月 11 日下午,周恩来午睡起床后,在病房内做锻炼。这是他坚持多年的“八段锦”运动,只要身体条件允许,他都会坚持。

这时,他边锻炼边对身边工作人员高振普说:“你打电话问一下朱老总的身体怎么样了,他现在有没有时间?前些日子他想来看我,因为我当时身体不太好,没能请他来。今天可以了,看老总能不能抽空来。”

他又说:“现在是 4 点多钟,如果朱老总可以来,5 点钟能到这里,大约谈上半个小时,5 点半可以离开,6 点钟他就能回到家吃饭。按时吃饭是朱老总多年来的习惯。他有糖尿病,年岁又大,不要影响他吃饭。如果今天不能来,过几天他要去北戴河了,最好在去北戴河之前来一趟。”

高振普将此事报告了邓颖超,邓颖超让他直接给朱德的夫人康克清打电话。

高振普要通了康克清的电话,转告了周恩来的意见。康克清说:“请报告总理,老总的身体挺好,今天没有安排别的事。他这几天总想去,一直在等你们的电话。他是要见了总理后再去北戴河的。”

高振普将朱德可以来的消息报告了周恩来,周恩来在病房里踱着步,思忖片刻说:“换上衣服,到客厅去见老总,不要让他看到我穿着病号衣服。”

下午17时50分,朱德来了,周恩来起身迎向朱德,两人同时伸出了双手。

朱德用颤抖的声音问:“你好吗?”

周恩来回答:“还好,咱们坐下来谈吧。”

朱德此时已是89岁高龄,动作有些迟缓。工作人员扶他坐到沙发上。周恩来示意关上客厅门,大家都退了出来。客厅里,只有两位出生入死,为新中国建立了卓越功勋的老战友在交谈。

18时15分,周恩来送朱德走出客厅,两人紧紧地握手告别。

周恩来直到汽车开走后,才转身回到病房。

7月12日,胡乔木写就《关于〈论十大关系〉整理稿的几点简单说明》,指出:“这个整理稿是根据主席1956年4月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讲话和1956年5月在最高国务会议讲话两个记录稿综合整理的。”说明中列举了整理稿中一些内容和文字上的修改之处。

第二天,7月13日,邓小平将胡乔木主持重新整理的《论十大关系》送毛泽东审阅,附送了胡乔木写的“几点简单说明”。邓小平在送审报告中说:“《论十大关系》稿,已整理好,我看整理得比较成功。”“我们在读改时,一致觉得这篇东西太重要了,对当前和以后,都有很大的针对性和理论指导意义,对国际(特别是第三世界)的作用也大,所以,我们有这样的想法:希望早日定稿,定稿后即予公开发表,并作为全国学理论的重要文献。此点,请考虑。”

毛泽东审阅后,当天批示:“同意。”“可以印发政治局同志阅。暂时不要公开,可以印发全党讨论,不登报,将来出选集再公开。”

7月14日傍晚,毛泽东亲自找张春桥、江青,谈了调整文艺政策的

事情。他说：

“党的文艺政策应该调整一下，一年、两年、三年，逐步逐步扩大文艺节目。缺少诗歌，缺少小说，缺少散文，缺少文艺评论。”

“文艺问题是思想问题，但是不能急，人民不看到材料，就无法评论。”

“对于作家，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如果不是暗藏的有严重反革命行为的反革命分子，就要帮助。”

“鲁迅那时被攻击，有胡适、创造社、太阳社、新月社、国民党。鲁迅在的话，不会赞成把周扬这些人长期关起来。脱离群众。”

“已经有了《红楼梦》、《水浒》发行了。不能急，一两年之内逐步活跃起来，三年、四年、五年也好嘛。”

“我们怕什么？1957 年右派猖狂进攻，我们把他们骂我们的话登在报上，最后还是被我们打退了。”

“以前的《万水千山》没有二、四方面军，这不好。现在听说改好了。”

“文艺问题是思想问题，但是不能急，人民不看到材料，就无法评论。”

“《反杜林论》，柏林大学撤了杜林的职，恩格斯不高兴了，争论是争论嘛，为什么撤职？杜林这个人活了八十多岁，名誉不好。处分人要注意，动不动就要撤职，动不动就要关起来，表现是神经衰弱症。林彪不跑，我们也不会杀他，批是要批的。”

“蒋介石的时候，报纸、广播、学校、电影都是他们的，他们蒙蔽人民。我们都是从那儿来的。我学孔夫子、资本家十三年，就是不知道马列，十月革命后才学马列，过去不知道。反动派没有多少威力，靠剥削过生活，他的兵都是靠抓壮丁，所以我们不怕他们。怕死的是林彪，叫他打锦州，他不打，最后两天他去了，俘虏十万人。又消灭了廖耀湘。长春沈阳解放。

释放俘虏放得好，国民党怕得很。”

这份谈话内容是由江青亲自作的记录。到 11 月 15 日，毛泽东又对记录作了几处修改。

7 月 14 日当天，周扬就被放出来了。

# 第1351回：要裁军，下文件解决浙江 为《创业》，张天民“上达天庭”

7月14日晚上，毛泽东听芦荻读了两遍三国时少年才子、著名作家王粲的《登楼赋》。

王粲在汉献帝被董卓从洛阳逼迁长安时，随献帝西迁长安。后因西京扰乱，乃至荆州依刘表。刘表去世以后，劝其子刘琮归顺曹操，他自己也成为曹操的丞相掾，后为侍中，受曹操器重。

王粲为建安七子之首，诗赋俱佳，著名的五言诗为《七哀诗》，叙述其逃离长安时所见之悲惨景象。而《登楼赋》则是其抒情小赋，为王粲早年依刘表时的作品，当时便脍炙人口。

王粲在刘表那里并不得志，史称“表以粲貌寝而体弱通悦，不甚重也。”当时战乱遍地，只有荆州比较平静，士大夫流寓于荆州的人不少。《登楼赋》所登之楼是当时湖北漳县今当阳县之城楼，地处平原。第一段是写他登楼四望的感慨，宽广的原野，但这个地方“虽信美而非吾土矣”，毕竟不是自己的家乡。王粲在此借用三个典故抒发自己对故土的思念。

毛泽东在芦荻读了两遍后说：“王粲真正焦心的是‘惟日月之逾迈兮，俟河清其未極。’”

这是第三段开头两句，是说日月那么快的过去，等河水清不知要到何日。

毛泽东说：王粲守着刘表无所作为，时光白白流去，期待着天下太平，却迟迟无望，他自然痛苦，作者的最高理想是“王道之一平”，出现贤明的君主，统一天下，稳定时局，他就可“假高衢而骋力”，干一番于国于民有益的大事业了。

作此赋时，王粲流寓荆州已有12年之久。毛泽东在评论中引了“惧匏瓜之徒悬兮，畏井渫之莫食”两句，道出了作者的心事：他怕自己成为无用之人，终生碌碌无所作为。这两个典故都是喻示自己身心洁

白,才能出众,却没有用武之地。

毛泽东感慨地说:儒家讲“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王粲就不守这个信条,正因为天下大乱,他又处于穷境,却更要出来济世,这就高多了。知识分子一遇麻烦,就爱标榜退隐。其实历史上有许多所谓隐士,原是假的,是沽名钓誉,即使真隐了,也不值得提倡。像陶渊明,就过分抬高了他的退隐。不过陶渊明倒是真隐了,而且亲自种过田,情况有所不同。赋里含有的故土之思,人对自己童年,自己的故乡,过去的朋侣,感情总是很深的,很难忘记的,到老年更容易回忆、怀念这些。写《到韶山》就是想起了32年前的往事,对故乡是很怀念的。写《答友人》,“斑竹一枝千滴泪,红霞万朵百重衣。”就是怀念杨开慧的。他说:“开慧就是霞姑嘛!可是现在的解释不是这样,不符合我的思想”

最后,毛泽东问芦荻:“会不会背李商隐的《安定城楼》?”

芦荻说:“不能背。”

毛泽东自己背了出来:

迢递高城百尺楼,绿杨枝外尽汀洲。

贾生年少虚垂涕,王粲春来更远游。

永忆江湖归白发,欲回天地入扁舟。

不知腐鼠成滋味,猜意鸱雏竟未休。

背完后,毛泽东说:“这也是个年青人的登楼之作,也是有抱负而不得施展,中间还用了王粲写《登楼赋》作典,值得一读。”

安定,即泾州,是唐代泾源节度使治所,在现在甘肃泾川县北。唐文宗太和九年,王茂元任泾源节度使,开成三年,李商隐赴其幕下任掌书记,王茂元赏识李商隐的才干,将自己的女儿嫁给了他。时李商隐以博学鸿词科试,落选回泾州,登安定楼,故作此诗。

泾州城东有“美女湫”,广袤数里,诗的首句便是描述登高城楼上遥望绿杨枝外广阔的汀州。诗中第二句,讲了两个都是少年不得志的才子,一个是贾谊,一个是王粲。

第五、六句,用的是范蠡的典故,范蠡帮助越王勾践雪会稽之耻,便离开越国了,“乃乘扁舟,浮于江湖”。作者希望如范蠡那样,扭转中唐的危局,然后乘扁舟回归江湖。

七、八两句的典故出自《庄子·秋水》的第六节,讲庄子与惠施的故事。惠施是梁惠王的宰相,听说庄子要来看望他,于是忧虑庄子会抢他的位子。庄子见到惠施以后说:

“南方有鸟,其名鵷鶵,子知之乎?夫鵷鶵,发于南海而飞于北海,非梧桐不止,非练实不食,非醴泉不饮,于是鴟(即猫头鹰)得腐鼠,鵷鶵过之,仰而视之曰:‘赫!今子欲以子之梁国而赫我邪?’”意思是把个人的名位利禄比之于腐鼠。

芦荻走后,毛泽东再读《楚辞》。

6月24日至7月15日,军委扩大会议在北京举行,讨论、部署军队整顿的问题。军队领导干部70多人参加。会议分析了国际国内形势,认为战争虽不可避免但可能推迟,军队可以从处于临战状态转变为备战状态,争取时间,集中精力进行自身建设,准备打仗。会议集中讨论精简整编,研究解决压缩军队定额、调整编制、安排超编干部和调整领导班子问题。同时也讨论了加强部队思想建设,增强党性,反对派性,纠正不正之风,恢复发扬优良传统和作风,加强军事训练等问题。

7月14日,邓小平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用5个字形容部队存在的问题:“肿”、“散”、“骄”、“奢”、“惰”。

7月15日,叶剑英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的总结讲话时说:“你们要注意,现在有人到处送书、送材料、写信、把部队思想搞乱了。你们要抵制。以后没有军委的同意,任何人不得这么做。”

会上,徐向前、聂荣臻也都讲了话,一致赞同邓小平、叶剑英的意见。

接着,叶剑英一个军区一个军区、一个军种一个军种地分别找司令员、政委谈话,告诉他们:“毛主席说现在有个上海帮,你们要注意警惕,稳定部队,把部队掌握好。”

7月19日,中共中央批转了中央军委《关于压缩军队定额、调整编制体制和安排超编干部的报告》及叶剑英、邓小平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确定三年内军队总定额减少160万人。

王洪文、纪登奎到浙江后,先后在杭州、萧山、金华、兰溪、宁波等地做调查,多次听到流传在当地的“顺口溜”:“盼过九大盼十大,盼过

十大盼人大;人大开过了,还是一点没啥啥!”

7月9日,浙江翁森鹤被拘留审查。

7月13日,中共浙江省委向中共中央、毛泽东报送《浙江省关于正确处理突击发展的党员和提拔的干部的请示报告》。

7月15日,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这个报告。

7月17日,中共中央批准浙江省委的报告,作为中共中央(1975)16号文件下发。中共中央认为浙江省委提出的问题带有普遍性,在全国范围“对党组织从思想上、组织上进行一次整顿是十分必要的”。

接着,浙江省委以张永生犯了“疯狂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反对张春桥对抗江青”,“反对和阻挠工宣队进驻上层建筑”,“突击发展知识分子入党,企图改变党的性质,让臭老九骑在省委头上拉屎拉尿”等错误上报中央,要将张永生调离浙江监督劳动。后因毛泽东亲自批示“老九不能走”,未能实施。

7月2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做出《关于浙江省问题的决定》。《决定》说:

(一)以谭启龙为首的浙江省委、省革命委员会、省军区党委,是执行正确的路线,是执行中央的指示,中央是信任的,但对于他们工作上的缺点和错误,只能通过善意的批评和帮助,以利改正。

(二)派出工作组(队)是否正确的问题,不在派出工作组(队)的决定,在于工作组(队)是执行什么路线政策的问题。浙江省委、杭州市委派出工作组(队)协助基层单位“抓革命、促生产”的决定是正确的,必须防止任何阶级敌人利用工作组(队)的缺点错误削弱党的领导。

(三)铁瑛同志的问题是人民内部矛盾,应该本着团结——批评——团结的方式解决。即使是夏琦同志,只要不是坚持不改,或继续在错误路线上走,也应本着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态度,进行帮助,做到既分清是非,又团结同志,搞好党内团结的目的。

(四)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毛主席亲自缔造和领导的伟大的人民军队,是捍卫无产阶级的强大堡垒,是一个完整的整体。任何削弱、破坏和分裂军政、军民、军队内部关系的言行都是错误的,甚至是反党反革命的行为。为此,中央希望浙江省广大指战员必须牢记“既是工作队,

又是战斗队”的光荣传统,拥政爱民,搞好军政、军民关系,提高警惕,坚决粉碎一切阶级敌人妄图破坏军队内部团结的卑劣阴谋。

(五)中央重申,任何组织、个人,都不得以任何借口,组织派别活动,已成立者必须立即解散,并不得借故重新组织,或搞名亡实存的派别组织,对于由坏人组织操纵、或混进坏人的组织,必须予以取缔,首恶者依法惩办,对群众则予教育,既往不咎。

(六)中央责成中国人民解放军驻军指战员,公安机关、广大工人、农村公社民兵,在浙江省委、浙江省军区的领导下,坚决镇压一切破坏生产,制造交通事故、挑起武斗、干扰运动、进行反革命宣传、反革命暴动的反革命分子和一切证据确凿的杀人、放火、放毒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和阴谋篡夺领导权的地、富、反、坏、右分子,凡抗拒者应予立即逮捕法办。

(七)浙江省广大工人、贫下中农,应在解放军驻厂部队和工作组的协助下,尽快恢复生产。有关未能解决的工资纠纷,必须通过进一步学习和协商,以达逐步解决,学生应以学为主,搞好本单位革命,不要参加社会上的派性斗争,也不要干扰工厂和农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7月17日,分管科学工作的国务院副总理华国锋,找胡耀邦、李昌、王光伟谈话,传达中央决定:胡耀邦、李昌、王光伟3人到科学院工作。转达邓小平的要求:抓紧对科学院进行整顿,尽快把科研工作搞上去,不要拖国民经济的后腿。整顿首先是党的整顿,搞好安定团结。要坚决同派性作斗争。华国锋交代了三项任务:一是了解情况,经过调查研究之后,尽快向中央和国务院做出汇报;二是搞一个科学院发展规划;三是准备向中央提出科学院党的核心小组名单。同时,还确定中科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直接受国务院指导,仍由郭沫若任主任,派林修德、刘仰峤、宋一平组成临时领导小组,恢复正常的业务工作。

7月17日当天,胡乔木召集学部3位新领导林修德、刘仰峤、宋一平谈话,由教育部李琦介绍情况。胡乔木谈了工作方针与3人分工,对他们说:“不能再走老路,但对老路要有分析。”会上还确定准备把下去的业务人员调回来。

7月18日下午,胡乔木到邓小平处。邓小平告诉胡乔木:“《论十

大关系》整理稿毛主席已看过两次,作了批示。”并告知毛泽东的“批示”和“第二批示”。胡乔木向邓小平报告了有关编辑《毛选》的一些设想:“五卷编辑情况要写报告;六卷也要编出;及早翻译。”此外,就有关工作问题谈了以下几点:

一、胡乔木向邓小平汇报了经中组部批准的“学部”的人事安排和临时领导小组成员分工情况。

二、胡乔木带了三、四月间的一些关于反经验主义的报刊材料给邓小平。邓说:“这些算什么,有些文章还指着我的鼻子骂。”

三、胡乔木向邓小平汇报了熊复向人民文学出版社一干部了解情况遇到的困难,说明政研室收集文化、教育等方面双百方针执行情况需要组织。

四、胡乔木向邓小平汇报了他所了解到的关于电影《创业》受压制的情况和人们的议论,认为文化部对这部影片的处理很不对,过严过死,所以新片子少。这样领导文艺,很难达到创作繁荣、百花齐放的目的。邓小平表示同意。

关于电影《创业》的情况和看法,胡乔木的汇报主要依据是贺龙的女儿贺捷生给他送的一份材料。

贺捷生是长征开始前出生的,母亲抱着她参加了长征。按照国家的干部政策,她应该是参加长征的人中,年纪最小的,还在襁褓之中的老红军。

贺捷生当时在历史博物馆工作,离胡乔木家南长街 123 号很近,所以常去胡乔木家,她的独生女有时还寄居胡乔木家。当她听说毛泽东批评当时的文艺界连“百花齐放都没有了”,又得知邓小平正要了解情况,就主动表示愿意为此出力。胡乔木即委托她收集材料。

贺捷生回去后就约文艺界的几位朋友写材料,他们有同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工作的画家范曾,还有在八一电影制片帮修改剧本的部队作家白烨、在北京电影制片厂修改剧本的安徽省蚌埠市文化局的作家张锲和外文局《人民中国》杂志社的记者、诗人韩瀚等。很快,他们就写好近 3 万字的材料。

胡乔木看到这些材料,觉得材料内容不错,但也提出两点意见,一是应集中抓住电影《创业》和《海霞》两个问题来写,突出主要矛盾;二

是应注意策略,材料通篇直呼江青其名,这样容易把问题搞砸,毕竟江青的位置在那里摆着。同时,胡乔木向贺捷生转告了邓小平等中央领导的指示:“要站在全党的角度,检查一下我们的文艺工作,文艺要百花齐放,不要一花独放,材料要注意写事实,为了斗争的需要,现在不要急着点名。有些人的情况,政治局的同志都知道。”

在胡乔木的点拨下,贺捷生等商量后决定以《创业》为突破口,并由张锲执笔写了《(创业)问题的前前后后》的材料。

《〈创业〉问题的前前后后》将《创业》在1975年春节公映后如何备受群众欢迎,江青等人又怎样竭力压制,下令禁演,横加指责等情况,详尽写出。

胡乔木认为贺捷生他们写的材料虽反映了情况,但还不适于上送。所以,他希望贺捷生找《创业》编剧张天民,通过张天民上书。

这次谈话之后,胡乔木又请熊复找诗人李季写信反应《创业》问题。他说:“李季同志从延安时候起就有声名,那时毛主席就知道他了,现在又因受压制离开了文艺界,到了石油战线,他写这封信是最恰当的人选。”

后因李季患病住院,李季本人又没有参与《创业》创作,胡乔木对王子野代他起草的信稿不满意,故此信未写成。

此时,毛泽东关于文艺问题的谈话,已经在北京文艺圈里飞快地传了开来,也传到正在北京的《创业》编剧张天民耳里。于是他在7月18日,冒着盛暑,赶写了两封长信,一封致邓小平,一封致毛泽东。

这是因为他的一位作家朋友——白桦,拍着胸脯对他说:“你只管写,有人给你送。”

白桦说的这个送信人,就是贺捷生。

胡乔木当天就看到了张天民的信,他还是提出了修改意见,希望信的笔调不要太冷,一点就透的地方不宜说得过满;要冷静,客观,字字有据,不让人感到偏激,一定要建议让影片重新公演。

当天,张天民对信稿又作了一番修改。第三天,按照预先的约定,将写好的两封内容相同的信,由他的妻子赵亮送给贺捷生。

就在张天民写信的7月18日下午,胡乔木根据贺捷生提供的材料向邓小平汇报了他所了解到的关于电影《创业》受压制的情况和人

们的议论。

7 月 21 日,张天民怀着惴惴不安之情,离开了北京。

7 月 22 日,贺捷生把张天民写的致邓小平的那封信交给了胡乔木,又去找王海容,把致毛泽东的信托王海容转给毛泽东。

胡乔木很快将信送给了邓小平。邓小平又把这封信上报毛泽东。

张天民的信一开头就把故事影片《创业》的问题尖锐地摆了出来:“这部影片上映后,广大石油工作者和其他战线的工农兵观众,反映强烈,感到受到鼓舞,但在同时,也受到了领导上的严肃批评,指出影片存在着严重问题。直至今日,问题没有解决,认识没有统一。在叙述《创业》的创作过程时说:影片是实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产物,由有大庆工人参加的三结合创作组创作的。作者深入到石油工人中间去,用了 7 个多月的时间,进行调查研究,走访了 4 个油田和铁人王进喜的家乡,阅读了几百万字的材料,先后与 100 多位石油工人和干部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了解了石油工人成长的历史和他们的英雄事迹,所以创作起来充满着激情。同时,摄制组以石油工人为榜样,顶严寒、抗酷暑,用比较快的速度拍成了影片。这样的好影片,送审时也获得一致通过。”

张天民接着写道:“1975 年春节,《创业》正式在全国上映。可是就在上映的第二天,有关领导做出几项决定:不继续印制拷贝;报纸上不发表评介文章;不出国;电视电台停止广播。并通知了全国各地。不久,北影负责人传达了中央负责同志的指示,指出影片在政治上、艺术上都有严重错误,政治上美化刘少奇,艺术上写真人真事,公式化概念化。要求查一查背景,并写批评性的评论文章。这使文艺界受到了极大的震动。4 月 8 日,文化部核心组提出了十条批评意见。”

针对文化部的十条意见,张天民在信中阐述了自己的五条看法:“一、这部影片受到工农兵的欢迎,文化部、报社、制片厂都接到许多观众来信,在许多工矿企业中出现了学习剧中英雄人物的动人事例,这说明它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团结人民、教育人民的作用,对工业学大庆的群众运动是有好处的。二、影片多次写到毛主席、党中央对石油会战和石油工人的关怀,其中有的地方写到党中央给石油工人送主席著作,中央给工人调来帐篷,中央首长和全国人民期望着我们等等。

目的是想体现党在政治上、生活上、生产上都关心着石油工人,这个党中央指的是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是指无产阶级司令部。三、根据大量的生活素材,经过艺术概括塑造了党的干部华程这个形象。其主要的故事情节是虚构的。这个形象的塑造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但绝不是真人的传记,不是要为某领导同志树碑立传。剧中有的情节可以看出生活原型,就是十条意见本身也承认那不是一个人的原型,也承认这些情节与生活中的真事只是'类似'或'相似'。四、周挺杉形象塑造得还不够高大完美,但认为他对苏修卡我们脖子表示愤怒的动作是莽汉子似乎不妥。五、不能因为使用了主席语录、国际歌歌词而说影片语言概念化。"

最后,张天民要求:"如果这部影片的错误还没有到十条意见指出的那样严重程度,我建议应该重新上演。"

为什么称《创业》"政治上美化刘少奇"呢?当时担任文化部副部长的刘庆棠4月8日传达文化部核心小组对影片《创业》的意见,通称"十条意见"时说:"影片中三次笼统的提到党中央和中央首长,如毛主席著作'是党中央派专机从北京送来的'、'帐篷是中央从上海特调的'、'中央首长和全国人民期望着我们'。这些显然有意无意地起了给刘少奇、薄一波之流涂脂抹粉的作用。"

# 第1352回：说“朝阳”，胡耀邦到中科院 毛泽东，完成白内障手术

政研室理论组组长王子野7月11日接受了于光远、邓力群交代的任务后，带领理论组几个人集中查阅了从1969年9月到1975年6月间，北京、上海的几种主要报刊。他们在整理关于“三突出”材料的同时，发现了另一个问题：在《红旗》杂志、《人民日报》、《文汇报》这些报刊上，有18篇文章，在谈到党的文艺政策时，都只引用毛泽东“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推陈出新”三句话，而没有“百花齐放”这一句。王子野从中选出12处，整理成一份材料送给胡乔木、邓力群。

胡乔木、邓力群看后，感到材料很重要。胡乔木高兴地对王子野说：“你们只用了半个月时间，就取得一项重大成果，可喜可贺。”

7月22日晚，中央政治局在人民大会堂读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胡乔木列席。江青等认为稿子整理得还不大够，提出一些问题。邓小平说：“主席已看过两次，有什么问题，待最后付印时再请示。”

7月23日下午，邓小平和夫人卓琳去看望一位老干部，顺便到中南海西四院。胡乔木向邓小平谈了关于《毛泽东选集》第六卷编辑工作的一些打算。又谈了调干部的问题。邓小平说：“干部主要看是不是顶用，不要怕人家有意见。”

胡乔木将邓力群送来的关于周培源和王子野“三突出”的两份材料送给了邓小平。邓小平看后对胡乔木说：“这个材料能够说明一些问题。”

7月21日，李昌在中国科学院所属各单位领导干部会议上的讲话时，传达了邓小平“科学院要整顿，加强领导”的指示。

7月23日，胡耀邦等人来到中科院，立即开始了整顿，落实政策，反对派性，恢复所、室两级组织，加强后勤工作，解决科技人员生活困难，解决房子、票子（工资）、孩子（入托）、妻子（两地分居）、炉子（煤气罐）的问题，说是“五子登科”。同时强调科研工作是科学院的中心工

作,否定“开门办所”的口号和“知识私有”、“白专道路”、“技术挂帅”等提法,鼓励科技人员钻研业务。

胡耀邦召集各种座谈会,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是“伟大的新长征”,强调科学院就是搞科学研究,说“搞业务的台风要刮起来”,“刮八级不行,得刮十二级”。

7月11日,国务院副总理王震在援外工作会议上讲话:“农学院都学朝阳,我不那么赞成。”

朝阳农学院是1970年5月,由沈阳农学院水利连队,与朝阳农校、辽宁省水利学校、辽宁省农业科研所、辽宁省水土保持研究所合并组成的,是毛远新抓的一个教育革命的典型。学校实行从农村公社招生,毕业后再回到农村公社中去的“社来社去”方针,及根据农业季节变化和生产安排,“几上几下”的教学方法,开门办学。1974年12月21日至28日,国务院科教组、农林部和辽宁省委联合召开了学习辽宁朝阳农学院教育革命经验现场会,学习他们的教育革命经验。

教育部部长周荣鑫向新华社记者转述了王震的意见。此后,教育部和报刊停止宣传毛远新在辽宁抓的教育革命的典型朝阳农学院的经验。

7月24日,周荣鑫对新华社记者谈话时还说:

现在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知识分子问题更复杂化。学校小报批“知识私有”,北大把资产阶级法权在学校的表现归纳为好多条。反正运动一来,就是知识分子,他能有积极性?迟群同志在朝阳说,十七年培养出来的知识分子,对国民经济是个破坏。不久前他在清华大学还提出,知识分子是“知识私有化、经营个体化、成果商品化”。辽宁大批“知识私有”,“智育第一”。现在思想混乱,一来运动,骂一顿臭老九,这是毛主席的知识分子政策?现在到底是“知识私有”还是“不学知识”?到底应该怎样估计知识分子?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以后,走和工农结合的道路,知识分子不脱离劳动,不脱离群众,进步很大,有很大变化,但我们对这变化估计不足。现在总讲知识分子这也不成,那也不成,那大学不办就是了。

文化革命前,只讲“文化”,不对,现在不讲“文化”,这就对了?我们一讲就是消灭,这一消灭就消灭到高校来了。最近报纸上有些混

乱,一提就是消灭法权,消灭差别。现在,大学理科向工科靠,等于取消理科,那基本粒子怎么办?天体演化怎么办?北大把理科变成了机电系。复旦还有胆量,办了两个基础科学理论专业,但被贴了大字报,说是复辟。有的企业领导人,对企业一亏损,就高兴了,就再没人说我是利润挂帅了。现在有的教师实行无语教课法,上课不讲话,只在黑板上写,写完就走,因为太乱,没法讲课。去年五号文件下达后,河南有的教师自杀了。

1975 年 7 月下旬,毛泽东医疗小组做完了对 40 名白内障患者的手术,均告成功。与此同时,记录白内障摘除手术与针拨手术病例的报告也都呈送到毛泽东面前,他批准以中医针拨手术治疗困扰自己多年的白内障。

在研究毛泽东手术方案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唐由之预感到,手术的任务很可能落在自己身上,因为医疗组里只有他一人是中西医结合专家。而且他擅长中医金针拨障术,即在黑眼球与眼角中间处切一个不足 2 毫米的切口进行手术。这么小的切口不需要缝针,而且伤口也非常容易愈合。根据毛泽东的身体状况,很可能适合这一中医传统手术方法。想到这些,唐由之心里愈发紧张,40 岁的他血压一下子升高许多。

为了缓解唐由之的紧张情绪,周恩来特意派他去设计整套的手术室设备和器械,包括轮椅、担架都要设计。因为毛泽东曾强调:不要进口的,全部要国产的。

正像唐由之预料的那样,中央的决定确实是由他来给毛泽东做手术,先做毛泽东左眼的白内障针拨手术,另一只眼睛的手术暂定在 10 月中旬进行。手术时间确定在一个下午,手术室设在毛泽东卧室到客厅的宽大过道上,用布幔圈围而成。

唐由之特别激动。这时候还给了他另一个任务,就是要为毛泽东讲解白内障是怎么回事,药物治疗是否有效,为什么必须手术治疗,西医怎么做、中医怎么做。

工作人员告诉唐由之,毛泽东对医生的话是 10 句只相信 3 句。而且他这个人很自强。就是感冒发烧了,也常常去锻炼,提倡在大雨底下淋雨,他主张要动员自己身体内的抵抗力来克服病痛。毛泽东也

知道,医生对他肯定会是无微不至照顾,该是三分病也要说个五六分、七八分。他不想因为治病而影响工作。

在唐由之行医的一生中,毛泽东是他遇到的一位性格最特殊的病人。普通的病人在手术前总是追着问医生效果如何,有无并发症等问题,可是毛泽东却从来不问。有一天,毛泽东坐在沙发上,唐由之蹲在他的旁边,用手比划着给他讲解眼睛的构造。毛泽东很认真地听着,但始终不发问。让唐由之没想到的是,虽然因为白内障已经有一年多看不到东西了,但是最终说服毛泽东接受手术仍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对手术,毛泽东一直抱有怀疑态度。他担心,手术做不好会耽误时间,做得好又不知道需要多少时间。

不过,唐由之最终还是说服了毛泽东初步同意接受手术,而唐由之采用的办法还是"投其所好",从毛泽东最喜欢的古代诗词入手。唐由之对毛泽东说:"盒中空燃决明丸",就是说,有了病吃中医的药丸;"金针一拨日大空",是用针拨白内障,一拨当然就豁然开朗了。唐诗里都有这个说法,说明古人已经采用这种治疗的手段来治疗白内障。

毛泽东终于被说服了。

说服毛泽东这一关闯过去了,接下来的工作就容易了许多。为了不改变毛泽东的生活环境,唐由之把手术室改在了毛泽东的书房。手术前,毛泽东再次强调:手术用的全部器械都要用国产的,一律不要用进口的。于是唐由之便遵照周恩来的指示,把从苏州和上海定制的手术器械全部搬到了书房。

从第一次给毛泽东会诊到开始实施手术,唐由之和其他医生已经准备了240多天。为保证毛泽东手术的"万无一失",眼科医疗组进行了"真枪实弹"的准备工作。在唐由之的带领下,医疗小组反复研究、调整手术方案中的每一个细节步骤,并按步骤给每一个人做了细致的分工,保证在场的每一个成员都既有具体到位的分工,又有相互协调的配合。全套方案流程的精确与细致程度,几乎可以按秒钟计算。

麻醉针打得好不好,是手术的关键一环。为了保证麻醉一针到位、百分之百见效,医疗小组的张晓楼教授主动对唐由之说:"你在我们小组里轮着做一番麻醉练习吧,来,先给我打第一针试试。"

面对老师辈的学长,张晓楼的提议,唐由之没有拒绝的理由。他

按照以往操作的手法,把麻药打进去了。

“哎哟!唐大夫,你打得不错啊!现在药效已经起作用了。”第一个接受试针的张晓楼立即做出了评价。“刚才看东西还是彩色的,现在颜色开始褪成黑白的了……哎哟,看东西开始模糊了……更模糊了……现在连光感都很微弱了……眼球也不能自主转动了。”他继续描述自己切身感受到的麻醉反应。

这时,站在一旁的唐由之开始计算时间。一个半小时后,张晓楼又开始叙述,“现在恢复轻微的光感了……现在我看你们,就像看黑白电影一样……哦,现在看你们开始有色彩了……”

对于眼部麻醉,教科书上有详细的操作规程讲解,唐由之也不下千遍地给患者实施过麻醉。但是,能够边操作边听到患者用专业术语描述麻醉反应的全过程,在他还是第一次。这样的练习,令他对麻醉的变化进程有了一种形象的把握。

接下来,他又按要求给组里的高培质、张淑芳等一一试打。他们口述麻醉反应的结果如初,均一针见效。唐由之牢牢记住了这几次特殊的感受,也记住了医疗小组集体的支持与期待,从中,他领受到一股整体的力量,为了医治领袖的眼睛,中西医团结齐心,同闯难关的合力。

了解病人的情况,是医生必须做的事情。接下来,唐由之要从毛泽东的起居生活开始,进入实施工作的第一步。

“主席,我要对你的饮食起居进行24小时的观察。你同不同意啊?”唐由之问毛泽东。

毛泽东哈哈笑了,“为什么要这样观察呢?”

“我要给你制定术前、术中和术后的医疗护理计划。只有知道了你的生活习惯,我才能定出这个计划。”

“真要这么做吗?”毛泽东反问了一句。

“是啊。你不是教导我们说‘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吗?我不了解你的生活情况,就做不出合适的计划来。”

“哈哈……”笑声代表了认同。

就这样,唐由之带着观察毛泽东24小时起居生活规律的任务,走到了毛泽东的身边,住进毛泽东的书房。

手术前,唐由之还用10天的时间作药物过敏试验。

很快第10天到了,但是毛泽东始终没有发话。1975年7月23日那天,大家一直等到了晚上23时多,毛泽东那边还是没有动静。

这一天大家都很紧张:“怎么主席还不发话啊,到底今天做不做?”

就在大家焦急等待的时候,张玉凤从毛泽东的房间出来,告诉唐由之一个好消息,说:“今天主席睡了个好觉,真不错,刚醒,醒来已经9点多钟了。你可以去说了。”

最后,大家说:“还是请唐大夫进去问问主席吧。”

唐由之轻轻走进屋里,看到毛泽东半躺着,像是刚睡醒,于是对他说:“主席,今天是第10天,我们已经准备得差不多了,您看做不做啊?”

毛泽东席侧过头来问:“你们都准备好了?”

唐由之说:“准备好了。”

毛泽东说:“你准备当中有问题吗?”

唐由之说:“有些问题。就是准备中间我给您冲洗泪道的时候看您在沙发上动了一动,我知道我没有麻醉好,您可能有些疼了。”

毛泽东一听,“哈哈”地笑了,像在天安门向红卫兵招手一样的抬起手,一挥说道:“做!疼就疼了。”

这一挥手,如同下达了决战的指令。唐由之快步走出毛泽东的房间,迅速回到医疗组,面对着注视着自己的一双双眼睛,轻声地说:“主席同意做手术了。”一个“做”字,如雷贯耳,大家顿时感到时空都凝固在这一个字上了。

“现在,我们立即按预定的第一方案和程序,开始启动。”唐由之告诫自己,要用尽量平静的语气对大伙儿说这句话。可是,平静的语句带出的指令,就像赛场上的一声起跑的枪声,话一出口,医疗小组里的气氛瞬间达到了沸点。

在场每个人的心都狂跳起来。为了这一刻,他们准备了数百个日日夜夜,在无数次的演练中,心情已趋于平静地等待。可是,当这一刻真的来临,未曾料到的激动和紧张情绪,却难以控制地在临时手术室里蔓延开来。大家在这种气氛中,努力细想着第一方案中各自的职责和步骤,开始启动术前的最后准备。

唐由之依然像往常那样,面带微笑,伸出胳膊,让护士给他测数脉搏,这是保健工作的规定:为保证手术的安全,必须检查主刀医生此时此刻的身体状况。唐由之并没觉得自己紧张,可是测的脉跳:每分钟约120次,比他平时每分钟60多次的心跳几乎快了一倍。

按照预定方案,主刀医生唐由之、第一助手高培质、第二助手张淑芬、护士张菊敏和心血管监护医生吴旭东依次进入“手术室”,各就各位。这个手术室是在毛泽东的书房里临时改设的,里面用的都是唐由之从上海、苏州选购的国产设备。

突然间,“咣!”的一声,把大家吓得全都定了格。定神一看,是冲洗眼睛的小水壶被碰掉在地。只见吴旭东连忙蹲下身,正在手忙脚乱地收拾着。

吴旭东是心血管病专家,在这次手术中,负责主席术中的心脏监护工作。他当时紧张得手指僵硬,将冲洗壶都给碰掉了。

这“咣”的一声,把紧张到有些慌乱的气氛推到了极致。大家紧绷的心已经经不起任何意外的声响,不由得跟着“格登”地紧缩了一下,随之,目光都投向唐由之。

唐由之环顾四下,面带笑意地向大家示意:“不要慌,各就各位,对手术要用的所有东西再检查一遍。”沸腾得烫人的气氛,在他的镇定坦然中略微降了温,毛泽东书房里恢复了有序的肃静,手术准备进入最后的准备程序。

唐由之已经把所有的思考全部集中在一件事情上:“马上就要动手为主席做复明手术啦!唐由之,你是主刀医生,可不能慌张呀!否则,这个状态影响到别人,所有的准备工作都将前功尽弃!

他再次环视手术室,每个人都递给他确定的目光。“好!所有的准备、所有的托付,就要看这一下子了!现在就进去,到主席的卧室里去,把主席搀扶出来,做手术!”

张玉凤和唐由之把毛泽东搀扶出来了。这时,毛泽东问:“唐大夫,手术室内你都准备好了?没有想不到的吧?”

唐由之说:“我都准备好了。没有想不到的。”

毛泽东又问:“音乐你准备了没有?”

唐由之说:“音乐?主席,音乐我没有想到,我没准备。”

毛泽东哈哈大笑,说:“张玉凤你去放《满江红》的弹词吧!”

张玉凤用钢丝录音机播放了岳美缇演唱的岳飞《满江红》昆曲。23时30分左右,毛泽东伴着乐曲走进了由他的书房改造成的手术室。

吴旭东医生给毛泽东安放好心电监护仪探头;高培质医生开始做手术区域的局部消毒,偏偏这时,她发现自己的手不受控制地抖了起来,消毒棉球也跟着在手持的钳子上微微抖动着。“哎呀,怎么这么慌呀?别怕,别怕!手啊,你可别紧张!”她一边暗自责怪自己,一边深深吸了一口气,然后屏住呼吸,稳住手腕,终于稳稳地完成了局部消毒。接着,她给主席戴上了无菌帽。这是唐由之预先的设计,为了防止无菌巾盖在脸上引发呼吸不畅,他稍作了一些改变,用无菌帽代替了头部的无菌巾。

“哈哈!这下子我成什么了?是不是像个老和尚啊?”靠在手术椅上,毛泽东用调侃的笑语跟医生、护士们开起了玩笑。

“不像,不像!这个是消毒帽子。”高培质一板一眼地说,心里的紧张程度也随之减缓下来。

一切就绪,手术可以开始了。

聚光灯下,唐由之如入无人之境,他的心里,只有手术步骤;眼里,只有患者的眼睛;所有的注意力,凝集在区区几厘米的范围内。

“主席,我先给你点药水,同时要在这里打一针。”唐由之一边说,一边做。

“好,你打吧。”毛泽东说着,安静地靠在手术椅上,连头都不动了。

唐由之知道,这支麻药针打下去,比冲洗泪道要疼一些。眼球后麻醉打好了,毛泽东依然一动没动。“主席,我要给你点药水。这个药水是给你的眼睛做表面麻醉,同时把你眼睛里的泪水、不洁的东西给冲掉。不时会有水流下来,如果流到嘴巴里,是咸的。我们都消过毒,没问题的。”唐由之轻声地说着,实际上,他已经拿起手术刀,动手做开了。

这可是唐由之反复过几千次的动作,而且每次都是带着思考、带着观察、带着总结和超越的心情去做的。这套技术既不是西医教科书上现成的,也不是中医古籍里固有的。它由西医的眼科知识与中医的眼科手术部位结合而成,是一种新的白内障手术理念和技术操作,必

须在实践中不断创新、总结、改进。

而今,这种成熟的技术,正在经过它的发明人之手,施治于一位伟人——新中国的领袖毛泽东主席。几分钟过后,按预想的那样,手术顺利完成!唐由之用纱布包好毛泽东的眼睛,轻声地说:“主席,手术已经做好了。”说话间,一种前所未有的轻快感,溢满他的心间。

“这么快?我还以为你没开始做呢。”毛泽东没有动,似乎感到有些意外。

“做好了,挺顺利,挺好的。”唐由之又向他报告了一次。

《满江红》轻轻播放着,这是唐由之唯一一次听着音乐做的手术,虽然耳边响着音乐,但一句《满江红》他都没有听见,他的心神,全神贯注地注入视线,注入指端,运用精微的手法,在毛泽东的眼睛上,完成了白内障针拨术。

手术完毕,心脏病专家过来跟唐由之说:“祝贺你手术成功,我没想到主席的心跳一点没改变。”

唐由之听到后当时就想:“主席是经过风雨,见过世面的人,在大江、大海、战争年代都挺过来了。这一点手术对他来讲真是‘胜似闲庭信步’,根本无所谓。”他更觉得毛泽东是一个了不起的人。

周恩来不放心。尽管他自己的病情已经十分严重了,却坚持要到手术现场。为了不干扰毛泽东的手术,他和其他几位中央领导人提出不到手术室,不与毛泽东打招呼,就坐在手术室外的大厅里。

做完手术,毛泽东躺下,唐由之出来见到周恩来,正要详细汇报手术情况,周恩来却说:“你不要说,我都看见了。你很沉着、镇静。”

邓小平问:“手术完了谁护理呀?”

唐由之说:“我护理。”

邓小平又问:“你睡在哪呀?”

唐由之说:“就在这个沙发里边。”

周恩来说:“术后要防止感染、出血。”

唐由之说:“我会注意的。”

周恩来说:“那就好。”

# 第1353回：实叹服，“花开花落两由之”说《创业》》，政治局审看《海霞》

毛泽东休息了，唐由之在卧室外的走廊里守候着，值班用的那张长沙发，摆在宽敞的走廊一头，与毛泽东的卧室只有几步之遥。大约过了一小时，唐由之听到毛泽东说话的声音，比较含糊，他赶紧走进去，看看是不是毛泽东的眼睛有什么情况。

毛泽东的眼睛蒙着纱布，听见有人进来，便问：“谁进来啦？”

张玉凤说：“是唐由之大夫呀！”

毛泽东好像在喃喃自语，唐由之认真地听着，仍听不清他在说什么。唐由之有些着急，直接问道：“主席，你哪儿不舒服啊？你说什么啊？我听不懂。”

毛泽东用手示意了一下，张玉凤明白，“主席要写字了。”她赶紧拿来笔和纸，递到毛泽东手里。唐由之紧盯着毛泽东的手，想尽快知道他要表达什么……

毛泽东双眼隔着厚厚的纱布，摸索着，用铅笔在白纸上写开了。如同他以往的习惯，每个字都写得很大，但是，这次的“盲写”，每个字都没有按行“排队”，而是斜向一方，没写几个字，就得换一张纸。一会儿工夫，四行文字出现在他的面前：

岂有豪情似旧时，

花开花落两由之。

何期泪洒江南雨，

又为斯民哭健儿。

是一首诗！唐由之没有想到，一个小时前刚刚经历完手术的毛泽东，念叨的不是自己眼睛的感觉，而是一首诗。他敏感地发觉：诗中有两个字和自己的名字一样：“花开花落两由之”中的“由之”。

是不是毛泽东想到刚刚为他做手术的主刀医生叫唐由之，“由之”二字令他联想起鲁迅在这首诗里用过，便喃喃自语地念开了？不管怎

样,看来,毛泽东眼睛没有不良的反应,职业的敏感让唐由之轻轻地松了一口气,他的注意力也转到这首诗上来了。

写完这首诗的毛泽东,依旧没有睡意,他对唐由之说开了:这是鲁迅为悼念一位叫做杨杏佛的人写的诗。杨杏佛是爱国进步人士,被国民党杀害了。鲁迅要去吊唁,为防止无谓的牺牲,许多人阻止他前往。于是,鲁迅提笔寄托哀思,写下这首诗。说到这儿,毛泽东转向张玉凤,“你到我的左边书架第二层,拿《鲁迅全集》那卷来,翻给唐大夫看看。”

唐由之没听清他说的到底是第几卷,显然,张玉凤听明白了。她走到书架前,取书拿来一翻,果然就是这首诗。

看到张玉凤递过来的书,唐由之为毛泽东超强的记忆力震惊了:“眼前这位已经82岁高龄、每天日理万机的一国领袖,知道我的名字时,已经双目失明,不可能亲自翻阅这本书。此刻,竟然因我名字中的‘由之’二字生发联想,不但完整地默写出《鲁迅全集》编入有这两个字的一首诗,还清楚地记得这卷书在书架上的确切位置。这是要有怎样惊人的记忆力啊!”

再说岳飞《满江红·写怀》这首词曲的录制,曾由蔡瑶铣、岳美缇、计镇华分别演唱,这次却选中了岳美缇演唱的那一首,可能与她是岳飞第二十七代孙有关吧。

令唐由之没想到的是,手术的成功并不意味着结束,更大的考验还在后面。

手术后的第三天,唐由之要给毛泽东换药。通过这段时间对毛泽东生活和工作习惯的观察和了解,唐由之猜想到,毛泽东一旦发现自己能看清东西了,就肯定不会再让包上纱布。所以他事先叮嘱其他医护人员,千万不要给毛泽东拿镜子。

唐由之打开毛泽东的纱布,换好药后问他:“主席您看见了吗?”

唐由之站在一米开外,伸出手指试着让毛泽东看,并问他是几个。

毛泽东说:“都看见了。”

唐由之很高兴,就要给毛泽东把眼睛再包起来。

这时,唐由之担心的事发生了,毛泽东不同意再包上,他说:“我已经好了。”

唐由之说:“没有好,主席,你的切口还没有长好呢,还要包起来。”

毛泽东说:“我都好了,看得清清楚楚,眼睛也没有什么不舒服的感觉。”

唐由之耐心的说:“不行啊,等切口愈合后才可以和外界的空气接触,否则眼睛容易感染啊。”

毛泽东不同意包,唐由之一定要包,最后毛泽东做了一个他特有的动作,说得好听一点是“请你们走开”,说得难听一点就是“让你们滚蛋”。

大家一看,纷纷出了房间,只有唐由之一人还站在他面前不走。毛泽东睁开眼问道:“你怎么不走啊?”

唐由之说:“我不能走,平时您是主席,您的话我一定听。今天我是医生您是病人,你应该听我的。”

他们争执了好长时间,最后采取折中的办法,让毛泽东戴上一副唐由之事先为他特制的眼镜,是用塑料做,有一个套子,中间有一块11度的玻璃,罩在左眼上,这样左眼既能看得见,手又碰不着,东西也不会掉进去。毛泽东向唐由之伸出了两个手指头,做了个“V”字手势说:“你胜利了。”

为避免可能引起的任何感染,10个月里,唐由之一直密切照顾着毛泽东24小时的饮食起居。对于领袖的晚年日常生活,他看得无比真切。他发现毛泽东的饮食很简单,并不是后来传言的那样,每天都吃红烧肉。

毛泽东睡的是一张木板双人床。床头底,下垫着木头,床头高、床脚低。床单都是补过的,双人床上一半是搁书的,那个书搁得那么高,高高低低的好像是睡着一个人。床角的右边还摆放着电视机,唯一进口的电器。但是他那时已经不能看了。

毛泽东在唐由之面前有过一次激烈的情绪爆发。那是在白内障术后不久,毛泽东恢复得很好,不久就能自己看文件、看书了。有一天,唐由之在毛泽东的书房里陪他看书,忽然听到他大哭起来。这一场面令唐由之始料不及。

在唐由之陪伴在毛泽东身边的日子里,一直看到他很平和的,连脾气都没怎么发过,这一次看到他老人家哭得老泪纵横,非常凄凉,可

把唐由之吓坏了,一时间手足无措,急得自己也想哭。他知道,毛泽东刚动完手术,眼睛不能哭,一哭眼睛要坏的。他忙问毛泽东:“主席,你怎么了?怎么哭了?你眼睛不能哭的,要哭坏的。”

大约过了一刻钟,毛泽东稍微平静下来,叫人把他手里的书拿给唐由之看。

那是一首南宋词人陈亮写的《念奴娇·登多景楼》,第一句便是:“危楼还望,叹此意,今古几人曾会?”意思是说,登上高楼远眺,叹息心中无限的忧思与感慨。而古今之间,又有多少人能领会。

“鬼设神施,浑认作、天限南疆北界。一水横陈,连岗三面,做出争雄势。六朝何事,只成门户私计。因笑王谢诸人,登高怀远,也学英雄涕。凭却江山,管不到、河洛腥膻无际。正好长驱,不须反顾,寻取中流誓。小儿破贼,势成宁问强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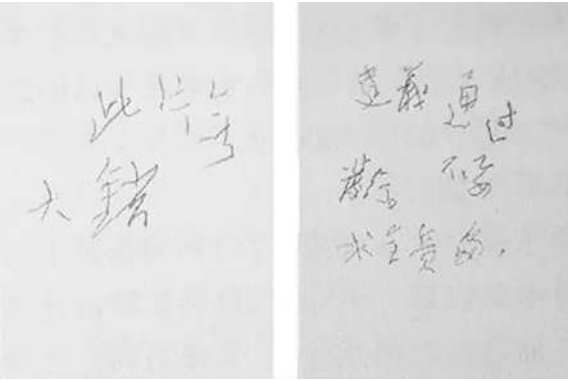
第二天,毛泽东便把这首词的复印件送给了唐由之。唐由之说:“主席,我要保存起来做纪念。”

毛泽东答应了,并在下面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手术后,唐由之在主席身边呆了3个月。离开中南海时,包括唐由之在内的医护人员纷纷要求跟毛主席合影。那天,毛泽东被请到了人群中间,他笑着说自己一下子成了老太爷,并高兴地说,请唐由之第二年来给他做另一只眼睛。离开中南海不久,唐由之便被派往朝鲜为金日成主席治疗眼睛。而左眼刚刚恢复视力的毛泽东就开始连续地接见外宾。

毛泽东眼手术复明后特别高兴,与医生唐由之、孟锦云、吴旭君、张玉凤、唐闻生、张耀祠等合影。

7月25日,刚刚做完白内障手术的毛泽东,听张玉凤读了张天民的信和所附江青等人的10条批评意见后,非常生气,即刻凭手的感觉写下批语:“此片无大错,建议通过发行。不要求全责备。而且罪名有十条之多,太过分了,不利调整党的文艺政策。”



批示仅 40 个字,毛泽东居然写了 6 张纸,而且笔迹紊乱,多有重复。

他对张玉凤说了多遍:“江青这个人不懂事,尽办些蠢事。”

毛泽东在批示下面又注明:“此信增发文化部及来信人所在单位。”

这一天,毛泽东心情一直不好,不愿吃饭,也没有睡觉,一直无法休息。

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在得知毛泽东对《创业》的批示后,立即召集文化部于会泳等人在钓鱼台 17 号楼会议室开会。

江青说:“张天民写了两封信,一封呈主席,主席没批。另一封由邓小平转给主席,是邓小平逼着主席批的。张天民告我的刁状,说我不让《创业》发行。不让发行是文化部的事,怎么弄到我身上?对这个片子我是有点意见,但那‘十条’可不是我的。要说有,也只是一条里有我的一点内容。”

张春桥说:“主席的这个批示很重要。不过你们要注意,主席用词向来很严格。你们要去仔细理解。主席说此片无大错,那还是有中错和小错误嘛!并没有说是优秀影片嘛!主席讲的是调整文艺政策,并没有说别的。”

在谈到如何落实毛泽东这一批示时,张春桥说:“电影自然要重新发行。还有,你们得给主席写个书面检讨,这份呈交主席的检查,依我

看有两点很重要。首先是文化部对《创业》提出意见的目的,是为了尽量减少错误,使它成为一部优秀影片,现在看来是要求过高了。其次,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你们在检查中不要涉及面太广,不要推卸自己的责任。该负的责任就应主动承担起来。找其他原因为自己搪塞,既不符合党性原则,主席也不喜欢。”

于是,于会泳和文化部的党组成员为《创业》停止发行一事,共同写出检讨呈送毛泽东,并在文化部的司、局级领导干部会上作了公开检讨。

上海写作组文艺组组长陈冀德为《朝霞》告状,给上海在中央的三个大员都留下深刻印象。张春桥主动让陈冀德直接给他写信反映情况。

陈冀德先后给张春桥写过四封信,张春桥给她回过两封信。第二次回信是让陈冀德谈对样板戏和电影《创业》的看法,并一再说不要外交辞令,要说真话。

张春桥还让陈冀德谈谈对第九、第十次路线斗争的看法。

毛泽东7月25日写了对《创业》批语的第二天,7月26日,邓小平同政研室7位负责人一起第二次读《毛泽东选集》的选篇《批判梁漱溟的反动思想》。正在读的时候,邓小平接到了毛泽东7月25日对《创业》的批示,他当场就向政研室的负责人宣读了一遍,然后说:“文化部处理问题太粗暴,连《创业》这样好的影片也不许放映,还有什么百花齐放?”

胡乔木讲了《创业》作者写这封信的情况,说文化部的10条意见绝大多数站不住。胡乔木还批评拿“三突出”原则作为一切创作的标准,就不符合百花齐放的方针,“文化部长期不提百花齐放,评论文章中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百花齐放、推陈出新四句话只说三句,把百花齐放砍掉了。”

胡乔木要邓力群把有关电影《海霞》的争论给邓小平讲一下。

《海霞》是北京电影制片厂摄制的反映海防前线女民兵与美蒋特务斗争的一部彩色故事片。编剧谢铁骊、导演兼摄影钱江、摄影李晨声、副导演陈怀皑、王好为等都是比较有名的电影工作者。

拍《海霞》缘于周恩来的一次讲话,也就是1973年元旦那次,周恩

来接见部分文艺工作者时说:“群众提意见,说电影太少,这是对的,这是我们的大缺陷。”他还对谢铁骊和钱江说:群众不只是看“样板戏”,也需要看故事片,希望3年之内把故事片这个空白填上。受此鼓舞,谢铁骊、钱江等决定将长篇小说《海岛女民兵》改编拍摄成电影《海霞》。

1975年初,《海霞》几经周折,终于制作完成。周恩来在春节期间调看了片子,给予了肯定,建议放映招待国际友人。文化部负责人根据江青意见,给《海霞》提了几十条“意见”。在谢铁骊等对《海霞》进行修改后,6月15日再报文化部,仍然没能通过,理由是有几处没有按文化部的意见修改。这样,编导只好向江青写信反映。文化部决定封存第二版,把原来的第一版拿出来放映。表面上看这是个好事,其实是把《海霞》作为“黑线回潮的典型作品”供批判用。这等于是雪上加霜,让谢铁骊和钱江等人感到有“罪加一等”的味道。不得已,他们开始为自己的冤屈而多方抗争。

这时,《海霞》副导演王好为的母亲张丹,也就是著名演员张瑞芳的大姐,为自己的女儿王好为和女婿李晨声,也就是《海霞》的摄影打抱不平。她向邓力群反映了《海霞》挨整、谢铁骊写信给周恩来等情况。邓力群听后表示关切,约李晨声、王好为夫妇到他家去谈《海霞》问题。邓力群向他们建议:“我给你们出个主意,你们给毛主席写封信,给你们送上去。只要主席批下来,你们的日子就好过了,你们敢不敢啊?”

王好为夫妇当即痛快地回答:“我们怎么能不敢?”

王好为夫妇回厂与军代表惠宏安商议,认为还是由谢铁骊、钱江出面,效果比较好。于是,王好为夫妇找到谢铁骊,讲述了详情,谢铁骊慨然允诺。决定由李晨声执笔写信。

7月22日晚,《海霞》编剧谢铁骊和8341部队驻北影厂军代表惠宏安到邓力群家中,向他反映了《海霞》受压制和争论的情况。谢铁骊说:“现在文化部决定既不按第二次修改稿放映,也不按第三次修改稿放映,而要回到第一稿,意在一边放映,一边进行批判。并且把几次的底片封存起来,不让原摄制组人员参加。”谢铁骊很着急,想直接给毛泽东写信申诉,要求邓力群帮助他转送这封信。

邓力群认为文化部的做法不妥,同意转信,但要他认真考虑道理是否站得住,即他们的影片在政治上和艺术上是否符合毛主席提出的六条标准和双百方针的指示。建议谢铁骊重读一下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的有关论述。其次,认真考虑信中写的事实是否站得住。邓力群说:“如果这两条都站得住,我可以转,否则我不能转。”

同时,邓力群还对他们带来的信稿提出建议,将信中大好形势之类的虚文全部删去,又指出:“要讲策略,先不要点江青、张春桥的名。要强调主席的‘六条标准’和‘双百方针’,主席的话更有说服力。”

7 月 25 日,谢铁骊就把信送到邓力群处。信开着口,署名的还有钱江。谢铁骊说他重读了毛主席的著作,认为是站得住的。

谢铁骊、钱江在信的开头,就直接向毛泽东申诉了写信的由衷:“最近我们被文化部于会泳、刘庆棠等同志整得实在没有办法,才向您写这封信。”

接着,他们在信中指名道姓说出于会泳、刘庆棠等对《海霞》及其创作人员的批判、打击和围攻,用词之尖锐泼辣,为上书中所少见。

邓力群将这封信交胡乔木请邓小平转送。

7 月 26 日这天,胡乔木把信转交给邓小平。邓力群在会上向邓小平简要介绍了这些情况后说:“有了《创业》的批示,关于《海霞》的争论就解决了。”

他又讲了一下关于“三突出”的问题,说:“一些报刊文艺评论文章把它说成是适用于一切艺术形式的原则,对‘三突出’有绝对化的倾向,我不同意。”

邓小平说:“是啊!我们社会主义社会里还需要有讽刺文学。人民代表大会每次都有侯宝林当代表,而且主席每次开会都要问一问有没有侯宝林。”

邓小平将胡乔木转交的谢铁骊、钱江联名写给毛泽东的这封信立即转送毛泽东。

周扬被放出来后,7 月 16 日,专案办公室给毛泽东和中央提交了一个关于周扬一案的处理情况的报告,说除 12 人已故外,周扬一案的人都释放或解除了监护,有的已经分配或正在分配工作,有的因有病

而养了起来。但在解放周扬等人的问题上,政治局内仍有不同的意见,因而这个报告仍说他“问题性质严重”,只是“拟分配适当工作”,生活待遇是“工资照发”。

7月27日,毛泽东听机要秘书读了这份报告以后,对周扬的定性作了重要修改。他命秘书把“问题性质严重”圈掉,改为“人民内部问题”。

7月27日,中共中央办公厅下发(1975)第181号文件,传达毛泽东对《创业》的批示。各省市立即重新上映《创业》。

7月28日,邓小平接到毛泽东对周扬定性作了重要修改的这一文件,立即要办公厅主任送中央政治局委员传阅。

这天,中央(1975)第181号文件送到长春电影制片厂,全厂一片欢呼!特别感到振奋的是石油系统的干部和职工。余秋里得知毛泽东关于电影《创业》的批示后,立即叫石油部政治部向长春电影制片厂订购了20部《创业》的拷贝。

7月29日,毛泽东对电影《海霞》编剧谢铁骊、导演兼摄影钱江7月25日写给他的信作出批示:“印发政治局各同志。”

7月30日晚,根据毛泽东的批示,邓小平、李先念等8位中央政治局委员审看了《海霞》最初送文化部审查的片子和修改后的片子这两个版本。江青称病没有去。谢铁骊、钱江参加。审看中,谢铁骊坐在邓小平和李先念之间,边看边谈。邓小平说:“这个片子政治上没有什么问题,至于艺术上还需要一些加工。”张春桥未表示不同意见。当晚,政治局讨论做出决定,《海霞》按作者修改过的影片公映。

毛泽东支持《创业》作者、批评江青、文化部的批示,在文艺界传播得特别迅速。大家奔走相告,热烈拥护。一时间,在人们心目中,向毛泽东写信,反映情况,提出建议,成为一种解决问题的最为简捷而灵验的方式。政研室负责人在转送《创业》作者的信以后,又陆续经邓小平向毛泽东送了若干材料。

# 第1354回：沸沸扬，文化部办学习班 小道传，江青与《红都女皇》

7月上旬，姚文元到上海，住在兴国路招待所。马天水向他汇报了邓小平和自己个别谈话的详细情况。

姚文元听了神情凝重，沉吟了半晌，一字一句地说："我早就说过今年下半年要出点事情……马老，你顶得对！对错误的东西就得顶！"

姚文元一回到北京，就把情况向张春桥和王洪文作了通报。

7月下旬，王洪文来到了上海，住在东湖路七号招待所。王洪文见到马天水时，仍要他详细讲了一遍邓小平与他谈话的经过。听完后，王洪文赞扬说："马老顶住了，顶得好！……有人说什么毛主席批评了我们几个，全是造谣，这些谣言，是冲着文化大革命来的！"

马天水向王洪文请示下一步怎么办。王洪文叮嘱说不要急，看看再说。

8月8日，邓小平同政研室7位负责人一起第三次读《毛泽东选集》的选篇。谈了以下一些问题。

8月初，胡乔木让国家计委整理一份关于企业党委的材料。计委为此找了北京几个企业的党委书记开座谈会，整理了一个材料。胡乔木阅后说："看后得出一个概括性的看法，现在很多企业里实际上实行的是'党委书记一长制'。"

邓小平听后说："现在需要解决企业的体制问题。如果将来工代会的制度健全后，革命委员会是否还存在？那时恐怕还是要实行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还说："部队里事事都集中到党委也不行，必须还有各种职能机构和指挥系统。"

在谈话中，提到泥塑老艺人杨士惠，谈到要开设专科学校，邓小平就说："现在许多专门人才都有后继无人的现象。北大有个半导体专家黄昆，现在学校让他改行了，很可惜。"胡乔木接着讲起华罗庚在哈尔滨几乎病死，科学院陪去的人不负责。说华罗庚死了还不知谁来后

继。还说李四光的遗著整理就很难。

邓小平对胡乔木说:“你送我看的科学院和冶金部关于调查首都和鞍钢技术人员使用情况的汇报材料已看过了,不必转送主席了。科学家张文裕有个很短的谈话,讲科研工作赶不上生产发展的需要。这个谈话好,已送主席了。”

关于《海霞》,邓小平说:“这部影片不算很好,但可以放映,文化部压制是不对的。”他还说:“文化部对一些问题的处理很成问题。现在的文化部恐怕办不好《人民文学》这个刊物。”

胡乔木说:“文化部搞反‘行帮’。实际上是压制不同意见。”

在这次谈话之前,胡乔木曾把《文汇报》1975 年 6 月 28 日发表的《儒家路线上台的历史结局——谈肖望之的宦海沉浮》和 7 月 12 日《赵高复辟有其深刻的社会基础》、《儒家势力存在,社会就不得安宁》三篇文章的剪报送给邓小平看。邓小平在这次谈话中提到此事说:“这些文章我早知道了,由他去骂嘛!”

从 8 月起,文艺工作者开始学习讨论毛泽东对《创业》的批示。毛泽东关于《创业》的批示和于会泳在文化部司局级领导干部会上所作的检查,传达到中央五七艺术大学音乐学院后,在 8 月 2 日和 4 日作曲理论系的学习讨论会上,青年教师李春光先后 3 次发言,得到好评。会后,他将发言整理成文,于 8 月 8 日以《在学习会上的发言》为题贴出大字报,被争相传抄。

李春光在这张大字报中,尖锐批判文化部负责人对毛泽东 7 月 25 日批示的消极抵制和炮制“十条”、扼杀《创业》的罪行。大字报写道:“主席的《七二五批示》惊天动地。我和许多同志一样,心里很激动。《批示》说出了我们的心里话。主席批示是一把火。伟大马克思主义真理之火。谁想扑灭是办不到的。文化部对待《批示》的态度如何?从今天的传达会来看,我很不满意。部核心组最后有个表态。我对这个表态的评论是四个字:言之无物。你们犯那样的错误,为什么连发动文化部全体党员、干部、职工、学生给你们提意见,帮助你们认错、改错这样的话都说不出来?为什么不发动群众帮助你们分析、批判《十条》?”

“不批判《十条》,不利于领会主席《批示》。正如《创业》是一部政

治上、艺术上都不可多得的好作品一样,《十条》也是一篇内容上,乃至语言上都不可多得的奇文。应该发动群众严肃批判。我认为《十条》在理论上是荒谬的,逻辑是混乱的,作风是霸道的,政治上是有害的,不利于安定团结,是和安定团结唱反调、唱对台戏的,是反对安定团结的。”“《十条》的产生非常奇怪。工农兵表示热烈欢迎的作品,中央批准了的事情,文化部竟然可以推翻。这是怎么回事?你们搞这个《十条》一不要马克思主义,二不要民主集中制,三不要群众路线,四不要无产阶级纪律,你们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后建立起来的文化部,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机关。可是你们却不爱工农兵所爱,你们的心不是贴着工农兵的心。你们这个《十条》给工农兵头上一棒,打得他们不知所向,你们这个《十条》向中央示威,表示中央决定了的,你们也敢于推翻。这岂非咄咄怪事?”

在大字报中,李春光还写道:“主席接着就指出‘而且罪名有十条之多,太过分了’。这个话是很愤慨的。十条大罪,哪一条站得住脚?哪一条有根据?无非是鸡蛋里挑骨头,不是骨头,也硬要说成骨头。颠倒黑白,罗织罪名,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不就是这么一回事吗?这是为什么啊!不知道哪里出来这么大的仇恨,什么提到党中央就是美化刘少奇,哪一个不带偏见的人会发生这样怪诞的联想,得出这样荒谬的结论?我实在不能理解,这种意见是怎么想出来的。实在是太过分了吧!太过分了!

所谓‘树碑立传’。请问,给谁树了碑?给谁立了传?我们在座的同志都去过大港油田,有的去过大庆,到那里的人谁能不受感动?千千万万石油工人,连同他们的领导,例如当年大庆工委那样的马克思主义的领导,他们忠于毛主席,忠于党中央,忠于马克思主义,忠于人民,他们的巨大功绩永世不可磨灭。他们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光荣代表。要说‘树碑立传’,这部影片是给中国无产阶级树了碑,立了传。不应当吗?不允许吗?做了这样一件完全正义的事情就有罪?就该死?就叫什么‘后患无穷’?真是岂有此理!真是欺人太甚!未免太过分了吧?”

大字报还说:“对有的文艺干部及作品,我们敬爱的周总理多次过问,可是文化部的几个头头就是不听。总理的话,你们可以置若罔闻。

你们是国务院的下属机构,你们竟可以不服从国务院总理!总理指示,对你们不过是耳边风,耳边风也不顶。对于全国人民、世界人民深深敬爱的总理,在毛主席、党中央领导下,几十年如一日,对党、对人民一片忠心赤胆,不避艰危,不辞辛劳,呕心沥血,鞠躬尽瘁,这样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党的好干部,你们采取这种态度,为亿万人民所不容!对于这件事,人民有权要求你们沉痛检讨,低头认罪!"

他直截了当地质问:"你们文化部头头有没有行帮?有同志发言尖锐地提出这个问题,而且指出你们有行帮,而且指出你们是文艺界危害最大的行帮。"

大字报还谈到解放干部、落实政策的问题:"例如干部政策。毛主席说,我们不能一朝天子一朝臣。说要团结干部的百分之九十五。说共产党只能搞任人唯贤,不要搞任人唯亲。文化部执行了多少?文化部的老干部解放了几个?使用了几个。难道真是洪洞县里没有好人,都该打翻在地,永世不许翻身?别人不了解,我讲一个马可,审查了六、七、八、九年,没有发现敌、特、叛之类问题,大体上是犯了路线错误。我和马可不熟,他根本不认识我。但据我看,马可这样一个同志,当年满怀激情,响应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伟大号召,参加过歌剧《白毛女》的创作,还有另外一些好歌。这些作品鼓舞过千百万革命战士冲锋陷阵,杀敌立功,总算是做过一点小小的好事吧?功劳不敢和你们比,比你们小一万倍,总还是有一点吧。我听说他向群众做检讨,末尾一句话是:如果允许的话,愿以有限之余生,为党和人民做一点力所能及的小小的工作。这句话你们听见没有?犯了点错,认了,下决心改,请求给一点小小的工作,以期将功补过。这个要求你们不能给予一点点小小的考虑吗?九年时间不算短,一个干部一生能有几个九年?这类事情群众早有意见,不能讲,讲了就犯罪。"

大字报贴出后,震动很大,群众争相传告。

邓力群有一个侄子,是中央音乐学院毕业的,星期天到邓力群家,向他讲了这张大字报。邓力群认为这是毛泽东关于《创业》批示传达后,第一个比较强烈的反响,即让侄子去抄来。但邓力群的侄子返回音乐学院抄大字报时,这张大字报已经被煤堆遮盖起来了。于是,他

找到了李春光家,征得同意,要来底稿,抄后送给邓力群。

邓力群看了大字报,感到虽不免有用语尖刻、提法欠妥之处,但总的说来写得很有气势,击中要害,应该向上面反映。他写了不到300字的简要情况,连同大字报抄件一起,第二天即交胡乔木送邓小平。

邓小平很快把李春光的大字报转送给毛泽东。毛泽东看后批示:“此件有用,暂存你处。”

8月11日,江青的秘书刘真用电话向于会泳传达了江青对电影《简爱》的意见:

“《简爱》这部电影,内容是很反动的,这部小说在英国文学史的地位也不高。

但是,这部电影在制作上是严谨、细致的。从改编剧本看,除了后边简爱出走那一段有某些多余以外,其它都还是可以有所借鉴的,因为一部长篇小说改编为一部一小时半的电影,是比较困难的事。”

她说:“这部电影的摄影技巧,那是值得我们借鉴的重要部分。它拍的早上是早上,中午是中午,黄昏是黄昏,采光技巧是相当高明的。例如:简爱的到达是黄昏,画面上没有说,但是可以直接看出是黄昏。罗杰斯特的摔马那一段,一看就知道是傍晚。接着就是晚上,第二天简爱在户外画画是早上,使人感到清晨的清新,颜色极为丰富,特别是绿色。”

“这一部电影我推荐给春桥同志看,暂留钓鱼台。你们四位要想这几天看,可以到这儿来看。以上意见,只是提供你们几位参考。如果你们这几天能有时间看,可以打电话找十七楼的康玉和同志。”

第二天,8月12日晚,于会泳去钓鱼台看片,8月13日重新整理此电话记录稿。

邓小平指示文化部办一个学习班,为了给文艺界解放出来的干部分配工作做准备。8月14日起,这个学习班在原文化部留守处开办。参加的人员有吕骥、周巍峙、徐平羽、黄稻、赵寻、张光年、张庚、吴祖光、马彦祥、凤子、郁风、华君武,还有不属“周扬一案”中的司徒慧敏、袁文殊、马少波、丁聪。大家主要学习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以来的文件,每周4个半天。这个学习班是文革9年以来文艺界各协会、各方面人士的第一次聚会。

从7月起,北京小道消息盛传,特别是有关江青的各种传闻……

“江青在中央挨批了……”

“香港出版了一本书,叫《红都女皇》,是讲江青的……”

“是新华社香港分社报告给了中央,中央有关领导在审读后认为此书的内容与江青1972年8月同维特克夫人的谈话内容一致,于是断定此书即维特克夫人著作的中文版,是江青让美国历史教授维特克撰写的……”

“朱老总将《红都女皇》拿给毛主席看。毛主席看了非常生气,挥笔写道:‘孤陋寡闻,愚昧无知。立即撵出政治局,分道扬镳。’周总理看到毛主席的这段批示,认为这是主席在气头上写的,指示‘暂缓执行’。”

这些传言说得有鼻子有眼,不由你不信。《红都女皇》在北京引起了轰动,可以说是街谈巷议,无人不知。

尽管如此,事后细问,却没有一个人见过《红都女皇》这本书。至今,在香港也未能找到这本据说是在香港出版的《红都女皇》。

后来,关于《红都女皇》的种种猜测也传到了国外,国际上沸沸扬扬,甚至传说维特克的部分手稿在哈佛大学的办公室里被偷走了,然后交给了中国当时主持工作的副总理邓小平,后来他又转手交给了毛泽东。

维特克确实写了一本关于江青的传记,但这本书是在两年后的1977年,在美国而不是香港,用英文出版的。书名也不是《红都女皇》,而是《Comrade Chiang Ching》,翻译成中文是:《江青同志》。封面上印着江青1945年在延安所摄一帧披着军大衣与毛泽东的合影照片。书前印着江青赠给维特克的一首诗的手迹,那是江青题写在她所拍摄的庐山汉阳峰照片背后的。全文如下:

庐山汉阳峰

江上有奇峰,锁在云雾中。

寻常看不见,偶尔露峥嵘。

江青摄

诗赠维特克夫人

维特克在返回美国后的一年多的时间里,江青通过中国驻联合国大使黄华和他的夫人何理良的外交渠道,与维特克互相交换了很多书籍和照片,还有两部故事片以及各种消息。但是,那些余下的录音文稿的交付时间却一直悬而未决。终于,1973 年 5 月,维特克正式接到何理良的通知,说她和江青的谈话记录“太长、很繁杂”,不宜作为有关党和政府的正式报道发表。何理良说,维特克可以自由出版与江青第一次会谈的手稿,也可以出版她自己的记录,但最好不要写成“传记”形式,这样做有违马克思关于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理念,最好是写一部中国革命史,其中包含一章或两章有关江青的内容。

维特克依然准备采用江青提供的口述材料,继续写一部关于江青的专著。1974 年 1 月,何理良再次劝阻维特克不要出版一本完全是传记形式的书,哪怕是用“江青同志眼中的革命史”也可以。并提出,可以给维特克相应的稿费予以奖励。

维特克拒绝了。她认为,出于对江青本来的愿望和对历史的尊重,她与江青会谈的这些独特的记录不应该被埋藏起来,她继续准备自己的出版计划。

维特克所做的,正是美国政府渴望知道的。基辛格的办公室、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都派了代表,通过朋友和同事直接或间接地向维特克索取那些录音文稿和她个人记录的完整复印件。维特克出于两方面的原因拒绝了他们的要求:

“第一,在中国,没有中国政府的代表把我当作一个美国政府政治信息的管道,谈话里面不涉及任何有关国家安全的问题;

第二,作为一位曾去过中国的历史学家,除了我自己以外我不代表任何人,在我亲自检查、确保准确和慎重的基础上,出版一本会让公众理解江青的不平凡生活及其与革命历史的密切联系的书之前,我没有义务把我的原材料交给他人。”

虽然没有得到江青组织工作人员整理的记录稿,也没有得到复制录音带,维特克还是根据自己的笔记,在美国着手江青传记的写作,直到 1977 年该书出版。由此可见,1975 年在中国大陆盛传的《红都女皇》与维特克是没有关系的。

# 第1355回：在激化，派性转民族矛盾 抢武器，云南武装部遭劫

在北京盛传小道消息的同时，7月29日，云南沙甸爆发了“沙甸事件”。

沙甸是云南省较大的回族聚居村寨，地处红河州两座工业城市——个旧市和开远之间，正好位于开远至个旧公路的中途，是昆明至个旧、蒙自的必经之地，也是红河州个旧市最大的回族聚居区。它有数百年历史，1500多户、7200多人，在其相邻处还分布了大庄、茂克、新寨等较小的回族聚居村。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沙甸回民与全国一样，也热烈响应并积极地参加。在破“四旧”高潮中，清真寺也被一些人说成是“四旧”，于是，有人带头鼓动，部分群众拿出了“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精神，疯狂地烧起宗教经典。回民的宗教信仰被当作封建迷信批判，群众组织“毛泽东思想大无畏造反兵团”、“毛泽东思想红色造反队”冲击并关闭了清真寺。回民的礼拜活动被禁止，阿訇、教长和虔诚信仰宗教的群众被批斗。

不同意这种作法的“民族政策捍卫兵团”站出来了，“红旗野战兵团”也站出来了。他们反对关闭清真寺，一场争夺清真寺的斗争于是展开。

后来，云南“炮派”控制了个旧，“八派”控制了开远，沙甸成了两派武斗的前沿。由于沙甸距个旧较近，60年代初划归个旧市管辖，因此与个旧的往来更频繁，联系更多。于是，个旧“炮派”就抢先到沙甸联系，使沙甸绝大多数人成为“炮派”，也有少数人属“八派”。在对待“清真寺”的问题上，“炮派”支持打开清真寺，“八派”反对打开清真寺。

到了1968年7月，主张关闭清真寺的“八派”包围了沙甸，武斗打烂了清真寺的屋顶和部分民房。双方都死了人，但是沙甸没被“八派”

攻破。

到了这年的8月,谭甫仁在云南开始了“划线站队”运动,凡是“炮派”观点,都被认为是站错队,被抓捕、揪斗和游街示众。因为沙甸的多数群众倾向于“炮派”,于是,与之相邻近的个旧、开远、蒙自等市县的许多“炮派”头头纷纷跑到沙甸避难,多达500余人。他们在沙甸写大字报,并派人到北京上访,要求中央派人来云南解决“划线站队、支一派压一派”的问题。而与之对立的“八派”则到处宣传:“沙甸集聚着炮派武斗干将,有上万人枪及四部电台,准备武装暴动”,这里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反革命基地”、“马蜂窝”。并称:解决“马蜂窝要用捅马蜂窝的办法,以巩固文化大革命成果”。

到了11月,省革委会派出一个由成建制部队组成的宣传队来到了沙甸,他们没有马上进村,而是先在村外进行舆论宣传,口号声、大标语铺天盖地。在强有力的宣传攻势下,12月8日,沙甸回民夹道欢迎解放军宣传队进村,并按照要求,将村里民兵的武器全部上交给解放军宣传队。

宣传队进村后就住在了清真寺。他们开始逐户动员,将外来避难的那些干部群众集中起来办学习班,然后带回各自单位。接着在沙甸开始清理阶级队伍,以“反军乱军黑干将”、“宗教复辟急先锋”、“跳梁小丑”、“赵氏小爬虫”等名目抓了沙甸回族群众200多人,将他们集中起来进行批斗。“赵氏”是指原省委书记赵健民。

在清理阶级队伍中,沙甸还搞了第二次土改,即发动其他民族的民兵对沙甸140多户地富及其子女家庭进行抄家,并把其中的40多户强迫迁到附近的苗族、彝族村子居住,称之为“包夹改造”。

1972年初,沙甸一些群众写信或到北京上访,要求落实民族宗教政策,开放清真寺,让群众进入寺内做礼拜,为受害群众平反。云南文山、玉溪等地的回族群众也不断向中共云南省委反映类似的问题,并反映一些基层干部多记工分、多分粮食,要求撤换这些人。但问题始终没有得到解决。

1972年8月21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发出《关于征询对三支两军问题的意见的通知》后,驻沙甸的宣传队中的建制部队撤离沙甸。但州、县工作队仍然存在,他们的任务依然是搞划线站队、清理阶级队

伍,并继续关闭清真寺。

1973 年 10 月,沙甸群众推举代表向沙甸大队党总支请求打开清真寺。由于工作队的反对,这一要求被拒绝。于是沙甸回民在马伯华等人带领下,强行打开沙甸金鸡寨清真寺。1974 年 2 月又打开了沙甸大清真寺。

消息传出后,红河州和蒙自县的革委会立即派出由 70 多名部队和地方干部组成的工作队再次进驻沙甸。

1974 年 4 月,“批林批孔”运动开始后,工作队说“批林批孔要结合批清真寺”,并在 4 月 16 日批判林彪“克己复礼”的大会上点了沙甸群众代表马伯华、马绍华、郑全书等人的名。5 月 6 日,马伯华等人上京告状。

5 月 10 日,马伯华他们到京后即写信给周恩来,希望中央责成云南省委撤走驻沙甸的工作队(宣传队),落实民族宗教政策。中央办公厅信访局将此信摘报中央政治局。

5 月 14 日,中共中央就沙甸问题指示云南省委:云南此类事件已多有发生。为此,应由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委会主任周兴亲自抓一下民族政策的落实,并把有关情况报告中央。

6 月 9 日,周兴按照中央要求亲自到沙甸调查处理,召开各种会议,听取群众意见。

群众的意见归纳起来有四点:

1、落实民族宗教政策,打开被关闭的清真寺。

2、纠正“划线站队”错误,为被批斗群众平反。

3、清理生产队工分账目,撤换多拿多占的基层干部。

4、将沙甸改为经济作物区,增加口粮供应,解决群众生产、生活上的困难。

周兴对开放清真寺,准许群众进入清真寺内做礼拜和纠正“划线站队”错误问题没有表态,对另两个问题表示可以解决。他承认共产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还存在,答复可以清查生产队的经济账目。

周兴在离开沙甸的当天晚上,召开了红河州、个旧市、蒙自县和云锡公司有关领导人会议,强调沙甸问题是少数坏人闹事,是要翻“文化大革命”的案,是“宗教复辟”,是一场复杂的阶级斗争。

周兴回到昆明，云南省有关部门在昆明召开回民工作座谈会，会后形成省委(1974)45号文件，指出：打开清真寺是对“文化大革命”的否定，规定：“已经关闭或改作他用的清真寺不得再打开作宗教活动场所，已经强行打开的清真寺，要在作好工作的基础上，由群众自行关闭。”文件还参照60年代初一些伊斯兰教人士提出“十禁止六保证”的个人公约，对伊斯兰教做出了十条管理规定。会后，要求在全省回民地区贯彻执行45号文件。

9月12日，省委发出通知，即省委(1974)45号文件，规定：“已经关闭或改作他用的清真寺，不得再打开作宗教活动的场所，已经强行打开的清真寺，要在做好工作的基础上，由群众自行关闭。”

这一通知传达下去，未被回族群众接受。10月，沙甸等地回民组织了几百人到昆明上访，要求落实政策，解决在少数民族地方存在的经济、民族、宗教方面的问题。他们回到开远时，打开了被卫生所占用的清真寺。10月23日后，又有红河、文山、玉溪等地回族群众1000多人到昆明游行，并两次爬上开往北京的火车，要求赴京告状，均被劝阻。

11月6日，红河州、个旧市、云锡公司、蒙自县在学习呼和浩特铁路局经验、保卫铁路会战时，在距沙甸仅一公里多的个旧市的工业区——鸡街，成立了“鸡街地区民兵联合指挥部”，并在“民兵联合指挥

部”成立时,民兵持枪组织游行,并写大字报声讨沙甸“一小撮反革命分子披着宗教外衣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

12 月 2 日,沙甸回族也针锋相对成立了“沙甸回民民兵团指挥部”,声称任务是“保卫回民、保卫清真寺、砸烂鸡街民兵指挥部”,但是没有枪。

12 月中旬,“鸡街民兵联合指挥部”与沙甸回民冲突,被当地群众徒手夺枪两支,沙甸回民也付出了死亡 1 人、重伤 3 人的巨大代价。

接着,从 12 月 17 日起,到 12 月底,在短短半个月中,开远、蒙自、建水等地又发生了多起民众抢夺军队枪支事件,并出现严重武斗,双方都有伤亡,并愈演愈烈。

云南的问题引起了中央的高度重视。12 月 31 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指出:最近一个时期,云南红河、沙甸、玉溪、文山等地区发生的武斗事件是错误的,中央决定通知沙甸的群众代表及红河州委、州革委、个旧、玉溪、建水、蒙自、文山、开远、通海等县市负责人以及省革委及其常委中的有关人员,即结合进省革委领导班子中的群众组织头头等共 34 人,于 1975 年 1 月 6 日到北京汇报,重点讨论解决云南局势的问题。并提出首先收缴武器,停止武斗,进而通过学习讨论提高思想,增强团结,恢复社会秩序。

12 月 31 日,沙甸回民冲击了蒙自县委机关和县武装部,双方死伤近 40 人。

1975 年元旦,中央通知马伯华、郑全书、马绍美等回民代表 10 人与云南省委一起赴京解决问题。

经过两天的思想工作,元月 3 日晚,回民代表与省委常委一起,乘坐国务院派来的专机抵达北京。

1 月 6 日,中共中央召集的云南赴京汇报会议正式开始,决定分两步贯彻执行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八年,现在以安定为好。全党全军要团结”的战略部署,第一步解决停止武斗,收缴武器恢复社会秩序问题;第二步学习文件,掌握武器,提高思想,增强团结,解决云南的是非问题。

在此期间,针对云南红河、浙江温州两地武斗不断升级的情况,1 月 17 日,中共中央发出 2 号文件《关于禁止抢夺武器的通知》,指出:

不论什么人以任何借口抢夺武器,利用民兵武斗,都是错误的,不容许的。没有在思想和组织上联合好的地区和单位,一律不要成立民兵指挥部和民兵团,一律不要给民兵发枪。责成有关部门立即收缴被抢夺的武器。

为贯彻中央1975年2号文件,1月24日,在京的云南省委常委制定了《中共云南省委贯彻执行中央{关于禁止抢夺武器问题的通知)的决定》,提出了6项措施。决定全部收缴武斗双方的武器、弹药和私造的匕首,解散武斗地区的"民兵指挥部"和"民兵团"之类的机构;要求所有擅自离开工作岗位、生产岗位的人员和集中起来搞武斗的人员,都要立即回到本单位抓革命、促生产。跨地区、跨行业的串连活动必须立即停止,"上访团"、"联络站"、"广播站"一律取消;如有再抢枪、搞武斗的,打死打伤人的,破坏交通运输的,必须采取有力措施,依法严惩。《决定》还附有云南汇报会全体代表给毛泽东主席、中共中央的报告,对中央通知"一致表示坚决拥护,保证无条件地不折不扣地贯彻执行"。在报告上签名的有省委、省革委会在京领导干部、部分地(州)县领导干部、原两派群众组织头头和回族代表共34人。

收缴武器执行小组返回北京后,回民代表与云南省委书记周兴等人又在"划线站队"中支一派压一派和落实党的宗教政策两方面展开了唇枪舌剑。回民代表向中央反映云南省"划线站队"的错误,要求周兴纠正"划线站队"的错误和云南省委破坏党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的行为,要求周兴落实党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

周兴首先对清理阶级队伍中违反政策又没有及时处理,以及对不尊重回民风俗习惯、宗教上"代庖丢菩萨"作了自我批评,同时也肯定"捅马蜂窝"和"批林批孔"是必要的。回民代表认为周兴是在诡辩。因为"捅马蜂窝"就是指工作组进驻沙甸的行为,周兴肯定"捅马蜂窝"是必要的,等于肯定工作队在沙甸的做法是正确的。

云南赴京汇报会结束后,为了贯彻省委的《决定》,云南省委专门成立了云南收缴枪支执行小组,由14军政治部主任冯治国任组长,蒙自军分区司令员李凤刚和沙甸的马绍美任副组长,开远、建水两县的县委书记邓子俊、黄昌岐以及回民代表马先庆、马恩俊任组员。这个组的分工是:马绍美、马先庆、马恩俊收缴回民方面的武器,冯治国收

缴其他民族的武器。半个月时间,沙甸等地回民上缴了全部枪支弹药。据冯治国等人说,其他民族的也缴清了。执行小组回北京汇报。

2 月 15 日,云南建水县馆驿回民到香木桥大队的双山村慰问一位因为参加回民上访被大队民兵揪去批斗而被打的阿訇。他们在途经香木桥村时,张贴了给大队党支部书记的大字报,这位支部书记便布置民兵持枪到双山村旁的山头上监视回民。

当双山村的回民发现山头上的民兵有枪时,十分气愤,因为中央已通知收缴民兵武器,为什么他们还有枪? 于是,回民追上山去质问,双方发生冲突。冲突中,民兵向回民开枪,回民又进行报复,双方均有伤亡。

事后,红河州、文山州和玉溪地区等地回民抬着尸体到昆明云南省委上访,要求惩办杀人凶手,抗议省委不执行中央收缴民兵枪支武器的文件精神,不收缴非回民民兵的武器。此次上访被称为第二次大规模上访。由于云南省委常委都在北京,一时间无法答复上访回民的问题,结果回民抬着尸体上街游行,中央赶紧派在京回民代表回昆明做工作,回民这才同意把尸体运回建水安葬,等待对此事的处理。

2 月 17 日至 4 月 19 日,在北京继续召开中共云南省委常委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有省委常委 17 人、昆明军区党委部分常委以及云南省军区、驻滇部队的主要负责人共 31 人。王洪文、陈锡联、纪登奎、华闽锋、吴桂贤、吴德、苏振华等参加会议。

3 月 1 日,云南又发生玉溪地区华宁县盘溪新村和大寨两个村的民兵张贴大字报,指责盘溪回民,被回民撕掉,再写再撕的事情,民兵开枪追赶撕大字报的回民,结果误伤了正在田间劳动的一个回族妇女,引起回民的愤慨,拥到工作组驻地。

因为工作组中的县领导曾在动员回民上缴武器的会上说过:“新村和大寨民兵的枪都上缴了,以后如果发现他们藏有武器,我们领你们去收。”此时这些回民责问工作组:“为什么只收缴回民的枪,不收大寨民兵的枪?”他们要求工作组履行承诺,领回民去收缴大寨民兵的武器。当他们拉着工作组的几位领导来到大寨村前时,工作组的县公安局副局长踩到地雷被炸断了双腿,一回民也被炸伤,二人随即身亡。

混乱中,工作组的其他领导走了,剩下回民与大寨民兵对峙。闻

讯赶来的回民为营救被围困在大寨村中的回民,放火烧了一堆稻草和一丘甘蔗,双方发生冲突。

接着,3 月 4 日,回民到玉溪、峨山、通海三县武装部抢枪,共抢得各种枪支 100 余支,以及手榴弹、炸药、雷管等一批武器。

为此,3 月 5 日,部队下命令包围了回族村镇纳家营和玉溪大营,并在玉溪、峨山、通海三县收容审查了上百名回民,还有几百名回民被强制进学习班,几十人被以“反革命打砸抢罪”判了刑。

# 第1356回：七二九，大炮轰击沙甸村 唐双晶，请缨战死车白尼

1975年5月初，云南省委向毛泽东主席、中共中央上报《中共云南省委常委扩大会议向中央的报告》，称：要纠正过去执行政策上的缺点错误，必须认真落实党的民族政策。据此，省委、省革委决定再次派出工作队，在解放军协助下进驻沙甸，将文件传达到基层。

5月23日，省委、省革委会决定派出工作队，在解放军的协助下进驻沙甸，落实中共中央安定团结的方针，认真执行政策，抓革命，促生产。

当天，云南省委发出《通告》，称：最近一个时期，沙甸一小撮人，煽动少数人抢夺和制造武器，挑起武斗. 行凶杀人，……继续对抗中央指示，变本加厉，为非作歹。……根据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指示，特派出工作队。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协助下进驻沙甸。不许任何人抵制工作队进村。

《通告》还宣布开远一中一位回民教师为现行反革命分子并予逮捕，田心清真寺教长是披着宗教外衣的反革命分子。警告沙甸几个头头，说他们已干了很多错事坏事，只有放下武器，转变立场，交出幕后操纵的坏人，立功赎罪，才是唯一的出路。

《通告》用飞机到沙甸上空散发。沙甸回民将几千份《通告》收集在几个大麻袋里，一群小伙子们簇拥着扛到工作队驻地——鸡街糖厂的大门口，一把火烧了。

5月27日，王洪文、叶剑英、邓小平、陈锡联、李先念、纪登奎等中央领导人接见了参加省委常委扩大会议的省委领导干部，强调：省委常委3个多月的会议，形成了一份文件，政治局议过，回去要坚决按文件办。

5月29日，中央批准《中共云南省委常委扩大会议向中央的报告》。

但是,沙甸群众对1968年部队进村“捅马蜂窝"的情景记忆犹新,成千群众在村口阻拦部队和工作队进村,坚持在北京解决问题的回民代表不回来不让工作队和部队进村。部队和工作队进不了村,在鸡街糖厂等地驻下,沙甸气氛猝然紧张。

6月12日,云南省委、省革委会联合发出《关于解决沙甸问题的通知》,检讨了一度搞了“划线站队”,清理阶级队伍搞了逼供信,该落实的政策没有落实,对回族的风俗习惯尊重不够,在宗教问题上,企图用强制的办法,说不服就压,压不服就抓,激化了矛盾。民兵工作没有从鸡街的实际出发,匆忙成立“民兵指挥部”,把民兵搞了进去,使矛盾激化,坏人乘机挑动武斗,破坏革命和生产。《通知》同时也对过去在沙甸采取的一些错误做法给予了肯定。

但是,回族群众与民兵的武斗事件继续发生,事态平息不下来,省里派出的工作队还是进不了村。

6月20日,云南省委向中共中央汇报,提出了“军事包围,政治解决”的意见,中央未同意。

当天,中央一些领导人接见了在北京的云南省委和红河州委负责人,指出对回民问题要有一个基本估计,要做好面上的工作。

这天,中央领导还接见了沙甸群众代表马伯华等10余人,指出云南回民问题主要是执行政策有缺点错误,被阶级敌人所利用,要马伯华等人作好群众工作,欢迎工作队进村,要彻底收缴散发在民间的枪支弹药,并指出要解散武装组织,停止串连等。

6月24日,云南省委再次将沙甸问题向中央报告,认为沙甸的少数头头,受一小撮阶级敌人的操纵和利用,煽动蒙蔽一些人,对抗中共中央指示,阻挠工作队和解放军进村。

7月初,王洪文等中央领导在北京最后一次接见回民代表,强调云南省委关于处理沙甸问题的意见是中央同意的。他要回民代表返回云南后,欢迎工作队、解放军进村。王洪文对回民代表说:“我们对你们还是抱有希望的,有错误,犯了罪,在实际工作中将功赎罪。我们不希望你们再干错事坏事,但你们要再干,也可以。今天把话给你们说清楚,不要以为是吓唬人的,不相信试试看。”王洪文还要回民代表回来带头批判“天下回民是一家”。他最后说:“如果再不让工作队、解放

军进村,就要打土围子了。”

7月5日,中央根据省委的报告,发出了经毛泽东圈阅的中发[1975]15号文件:《关于沙甸问题的批示》。文件强调要彻底收缴枪支弹药及武斗凶器,拆除武斗工事,不准在基层夺权,基层干部要回村抓革命促生产,回族群众应欢迎解放军及工作队进村。

回族代表马伯华等人听了中央文件指示后,于7月9日向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写了保证书,翌日即从北京返回云南沙甸等各村寨。

7月13日,10名回民代表回到云南各自的村庄。他们回村后,做群众工作,让他们同意解放军和工作队进村。

沙甸群众同意省、州、县工作队进村,不同意部队进村,并说:如果担心工作队员的安全,派少量部队就可以了,承诺保证工作队员的安全。这些意见遭到工作队的拒绝,工作队认为:沙甸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土,进驻沙甸是解放军的权利。沙甸群众认为,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沙甸没有驻过一兵一卒,现在突然进驻这么多,是另有用心。赴京回民代表把沙甸群众的意见向中央报告,并用大字报形式写成“给中央的公开信”,批评省委向中央反映问题“不符合实际情况”。

7月22日、24日,云南省委也向中央写报告,强调马伯华等人的错误是抵制对抗中央指示,还积极进行武斗准备。省委报告认为沙甸问题“性质变了”,并具体指出回族群众公开发出请帖,要在8月1日到沙甸附近的大庄过“圣节”。“这可能是进行暴动”,由此做出“政治解决已无可能”的结论,向中共中央提出应采取军事解决的请示。

而在此期间,云南回民将抢来的轻、重机枪一字摆在14军42师师部门前,扬言说部队敢出来就开枪扫射。还有传言说:回民准备趁“八一”部队放假时攻击14军军部,占领开远市。

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军委命令,云南省委书记周兴于7月28日凌晨开始调动已驻在沙甸邻近的部队近万人,对沙甸及附近大庄、新寨、茂克、车白尼等回族聚居村实行军事包围。

7月28日清晨,42师紧急集合,并于下午16时后接到“明日凌晨进攻沙甸村”的命令。

午夜时分,部队乘车至开远14军军部大操场,这时有人听到车外有人轻声呼唤他的名字,掀开棚布一看,原来是14军刺杀冠军、军司

令部军务处参谋唐双晶,他是解放军总后勤部副部长唐天际的儿子。

唐双晶问:“你们是不是去沙甸?”

答:“是。”

唐双晶说:“我跟你一起去。”

那人一听急了,说:“你是司令部军务处参谋,是我们领导,没有命令谁有那么大胆子!”

这时,带队的领导过来了,唐双晶又转而求他,那位处长一口回绝,说平时怎么都行,这时候了谁也不敢乱来。

唐双晶到底还是到了沙甸,和他一起来的还有军司令部作训处张参谋,他是14军老军长、昆明军区查玉升副司令的女婿。此时他们二人正并排立正站在14军王副军长面前挨批。王副军长把他俩臭骂一通,说要以严重违犯军纪把他们关起来,然后送军事法庭。

唐双晶最终还是参加了沙甸之战,后来战死在围剿车白尼村的战斗中。

7月29日凌晨3时,包围沙甸的部队开始行动。首先是侦察分队在熟悉沙甸地形和道路的人引导下,摸掉村边站岗的回民民兵,然后悄悄进入大清真寺后院——沙甸民兵团的办公地点,准备来个瓮中捉鳖。但是被一住寺人员发现,急忙登上叫拜楼三楼敲钟报警。

随着一排枪声,敲钟人应声倒下,熟睡的村民也被枪声惊醒。此时全村一片漆黑,电线已被掐断,村民们在漆黑中惊恐不已。

凌晨4时多,沙甸回民凭据地形熟,进行反攻。在付出上百人的巨大代价后,夺回了大清真寺。此时,沙甸西部的西营已被部队占领,后山、马家井、林家巷、金鸡寨、川方寨的部分生产队场院及民房也被部队控制。在这黎明前的黑暗里,街战、巷战、以住房为据点的攻守战在残酷地进行着。到天亮时,沙甸回民又收复了部分民房据点,但同时付出了几百人的生命代价。

部队遇到了回民“人民战争”。村民们利用早已挖好的地道打开了地道战。抱小孩的年轻妇女从营地门前走过,谁曾想她从婴儿的襁褓中抽出一颗手榴弹扔进战士居住的帐篷中。像这样的小股袭扰给部队造成很多伤亡。你分不清谁是老百姓,谁是敌人。

几小时后,部队指挥部监听到了“美国之音”详细报道了沙甸

战事。

中午,部队开始使用大炮,三所清真寺几乎同时被炮击。先是60炮、无后坐力炮,接着是85加农炮、120迫击炮、122榴弹炮,直至152加榴炮。

入夜,炮火虽有所减弱。但更有针对性,哪里有亮光,炮弹就轰炸那里。在炮声中,沙甸、茂克两村遭到毁灭性破坏,大部分房屋被焚。

事后总参总结时说,1950年剿匪时一个排就解决的战斗,这时一个连都啃不动,而炮弹消耗比得上淮海战役了。其中部队伤亡一半是误伤:很多炮弹打到自己人头上了。

30日,进攻的部队放弃对老沙甸村内的部分控制点,缩小村外包围圈,占领制高点及有利地形,对老沙甸村子进行更猛烈的轰击,火焰喷射器也用上,老沙甸成了一片火海。金鸡寨、川方寨炮火稍逊。

下午,老沙甸部分群众陆续撤到金鸡寨。入夜,马伯华带领部分群众也撤到金鸡寨。通过商议,决定做群众的思想工作,出村逃生,身体健康者可设法转移。

他们向部队喊话,要求解放军不要开枪,让群众安全出村。得到部队的允许后,2000多名老、弱、妇、幼、伤、残、病者于31目上午在马绍美的带领下集队出村。

出村后,马绍美等被认为是有问题的头头被关起来审查,其他人则被送到沙甸附近的鸡街铅厂、江水地砖瓦厂等地办学习班。

入夜,留在沙甸的回民突围转移未成,在川方寨发生遭遇战,伤亡惨重,马伯华脚被手榴弹炸伤,只好撤回金鸡寨。

此时,在炮火硝烟迷漫中,老沙甸与川方寨已没有抵抗力量了。8月1、2两日的昼夜,沙甸战事集中在争夺金鸡寨、川方寨的民房和制高点的争夺战。

8月3日,金鸡寨已被部队控制一半左右。8月4日下午18时许,炮火摧毁了金鸡寨南面几间仅存的小民房,马伯华等人在此殉难。入夜,又进行了最后的“清剿”,战斗始告结束。

工作队在部队清理了被炮击现场之后进入沙甸。此时他们的任务是,为被毁坏的房屋进行实际勘测,做出恢复重建规划,由原来各家各户分散式建筑改为相连式分户建筑,其中清真寺等公共建筑则在原

址按原面积恢复重建,计算出所需材料及费用后由省财政等有关部门落实实施。这些工作都是由分批来到沙甸的工作队具体实施的,直至一年以后才建成结束。

沙甸战事结束后,部队又奉命转到新寨、车白尼等回民村。

早在7月31日下午,驻扎宜良的一个团正准备“八一”会餐,突然接到上级命令,参加围剿沙甸的行动。一、三营和团直分队连夜上车赶到开远卧龙古下车,然后徒步急行军来到新寨对面高地,开无阳街的公社办公室。

8月1日晚19时分,部队开始对新寨行动。途中被回民打断高压线阻击,还被回民向部队投掷手榴弹,将负责进攻的排长等4人炸伤。

参加围剿沙甸的大部队转到新寨后,没有马上采取军事行动,而是将其四面包围后,首先进行舆论宣传,放“社会主义好”等革命歌曲,告知解放军不会乱杀回民,要求新寨回民放下武器从新寨出来投降。这样包围了5天做工作无效,正准备炮击时,时任昆明军区副司令员的查玉生空中巡察后又命令,暂不炮击,继续做工作。又做了两天宣传后仍无效果,炮兵开始向新寨炮击。随后,两个连队分为一、二梯队,相隔150米实施梯次进攻。

一梯队进攻受挫,二梯队改变主攻方向,从另一地点攻击到新寨一队后,于第二天早上,从新寨一队向一梯队进攻方向扩展,与一梯队一起攻占了新寨一队。随后,一营3连,三营7、8连继续做新寨二队的思想工作,二队回民列队欢迎解放军,该团赵副团长带领一营3连进入新寨,被后面回民投掷手榴弹,赵副团长果断指挥1、7、8、9连从内开花,于8月13日彻底占领了新寨。

新寨打完后,部队又包围大庄,依然是新寨的程序,首先是舆论宣传,做思想工作,欢迎回民交出武器投降,否则新寨就是例子。经过5天的军事包围和舆论宣传,大庄回民终于放下武器,欢迎解放军和工作组进村,一个营的部队和个旧开远工作组进驻大庄。第一个星期晚20时至早6时施行军事戒严。

沙甸平叛战斗结束后,云南省红河州蒙自县沙甸工作组拟写了“武装平叛沙甸叛乱”宣传提纲,共30条,其中有:沙甸等地回民村要武装叛乱,成立伊斯兰共和国,沙甸成立的“罕指奔位协”,派人与苏修

联系,妄图背叛祖国,反对中央领导,打砸抢、挑起武斗,反对省委、反对新生红色政权等等。沙甸工作组还举办“沙甸武装叛乱罪行展览”。在鸡街展出时,经历了这场战斗的不少沙甸人都去看了,他们发现这个展览把部队的新式武器说成是“沙甸叛乱分子”的,结果展览成了沙甸人辩解的场所。后来,该展览又到昆明展出。

“沙甸事件”后,因“沙甸事件”被判死刑和判刑的数十人,被强行进学习班的数百人。

文革结束后的1978年,“沙甸事件”被彻底平反。

# 第1357回：为铁路，万里三下郑州局 大暴雨，河南数水库溃坝

虽然万里二赴郑州，撤了郑州铁路局的两个书记，调整了郑州铁路局的领导班子，但是，依然没有解决问题。1975年7月，郑州铁路局煤炭运输仍欠装一万多车。

对铁道部处理郑州局的方针，河南省委有不同意见，双方搞得很僵。7月24日下午，李先念、华国锋、吴德等中央领导在京西宾馆接见了郑州局的主要领导人苏华、唐岐山、胡逸平等人，铁道部部长万里和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刘建勋参加。

会上，唐岐山等人认为，万里解决郑州局领导班子的做法是打击新生力量，是对“文化大革命”的否定，对一些领导干部，特别是对邢介江的处理是错误的。

苏华、胡逸平等人针锋相对，列举大量事实说明铁道部对郑州局的分析是符合实际的，调整郑州局的领导班子是正确的，大得人心，这些不能否定。

7月25日下午，李先念、华国锋、吴德等在听取了双方意见和激烈辩论之后，李先念讲了六个问题：

一、河南省委是支持铁道部的，铁道部是支持河南省委的。

二、学习理论要联系实际。要抓革命，促生产，你们总得开车，不开车，那不行。对破坏铁路运输的人要查办。

三、要做好思想工作，要用无产阶级党性去克服资产阶级派性。搞资产阶级派性是可耻的。领导干部千万注意，对本单位不同意见的群众，不能只站在一边，站一边是要犯错误的。要站在两派之上，要超脱。

四、凡是制造分裂，破坏团结，杀人放火，强奸抢劫，投机倒把，贪污盗窃，破坏铁路运输等，过了杠的，都要查办，一律专政。不管哪一派，都不能包庇。

五、河南一直比较稳定,对过去工作要有一个正确估计。新派去的同志和原来的同志要加强团结,互相支持,互相帮助,把工作一定要搞好。

六、邢介江拿国家车皮和物资,破坏国家计划,破坏铁路运输的问题严重,一定要查清楚,严肃处理。

华国锋、吴德表示完全同意李先念的讲话。华国锋说,河南形势是好的。解决邢介江的问题就是为了发展河南大好形势,邢介江破坏铁路运输,扣截铁路运输物资,投机倒把,问题性质很严重。铁道部解决郑州问题大方向没有错,不要只抓一两句话不放。

最后,李先念说:“中央9号文件很重要,如果没有万里同志到处去贯彻,铁路不会这么快畅通了。我对铁道部解决新乡问题是支持的。”

会议决定,由国务院副总理纪登奎牵头,铁道部与河南省委一道,共同解决郑州铁路局的整顿问题。

此时,纪登奎正和王洪文在浙江。接见后,李先念同纪登奎通了电话,他说:“郑州铁路局的事,没搞好,出问题了。登奎同志啊,你看他们两边,万里是你的老战友,建勋是你的老伙计,你还是去一趟吧,和他们两位好好谈谈,解决一下。”他催纪登奎尽快成行。

于是,8月1日,纪登奎由杭州飞抵郑州。而万里已于7月底三赴河南,与河南省委共同研究解决郑州铁路局的问题。

纪登奎一到郑州,立即与万里和河南省委领导在省委三所召开会议,解决铁路和地方的团结问题,要求“两派各自多做自我批评,消除派性,搞好团结”。

纪登奎亲自参加郑州铁路局党委常委扩大会议,严厉批评了闹派性的人,宣布成立由刘建勋、万里挂帅的工作组,共同负责郑州铁路局的整顿工作。

工作组成立后,发动铁路职工深入揭发批判帮派分子破坏铁路运输的言行,遵照邓小平关于“凡是帮派头子,有一个调开一个,再出一个再调开,一天调一个,一年调365个”的指示,撤了一批人的职务,将一些人调离原单位、原岗位,调整和加强了郑州、洛阳、新乡、信阳分局

的领导班子,生产运输形势开始好转。

在此期间,纪登奎还抓了个“三八女子乘务组”的典型,让分属两派的正副组长现身说法,搞好团结,带动全局。

但就在此时,河南省发生了一场特大自然灾害。

纪登奎抵达郑州的8月前,河南全省旱情严重,各级领导都在集中抗旱。谁知,8月4日,1975年中国第3号台风,“7503号”台风,穿越台湾岛后在福建晋江登陆,却没有像通常那样在陆地上迅速消失,而是以罕见的强力,越江西,穿湖南,在常德附近突然转向,北渡长江直入中原腹地。

8月5日,行径诡秘的“7503号”台风突然从北京中央气象台的雷达监视屏上消失……原来,由于北半球西风带大形势的调整,“7503号”台风在北上途中不能转向东行,于是“在河南境内停滞少动”,其具体区域在伏牛山脉与桐柏山脉之间的大弧形地带,这里有大量三面环山的马蹄形山谷和两山夹峙的峡谷。南来气流在这里发生剧烈的垂直运动,并在其他天气尺度系统的参与下,造成历史罕见的特大暴雨。从8月5日至8月8日,地处淮河上游伏牛山和桐柏山区的河南省驻马店、许昌、南阳地区连降特大暴雨。其中最大雨量在京广铁路以西河南泌阳板桥水库附近的林庄,降雨量达1631毫米,比河南正常年份两年的降雨量还要多,仅8月7日一天降雨1005.4毫米,其中6小时降雨为830.1毫米,超过了世界纪录。目击者称:暴雨到来的数日内,白天如同黑夜;雨水像从消防水龙中射出;从屋内端出脸盆,眨眼间水满;暴雨如矢,雨后山间遍地死雀。

而河南这个产生特大暴雨的地区,又恰是兴建水库的最佳区域——上百个山区水库,在这里星罗棋布。

1950年夏,淮河大水,灾害惨重。同年10月,国家政务院做出了《关于治理淮河的决定》,确定了“蓄泄兼筹”的治淮方针,具体制定了“上游应筹建水库,普遍推行水土保持,以拦蓄洪水、发展水利为长远目标”和“低洼地区举办临时蓄洪工程,整理洪汝河河道”的战略部署。根据这一部署,洪河上游修建了石漫滩水库,汝河上游修建了板桥水库。

石漫滩水库,按50年一遇的洪水量设计,于1951年建成,是新中

国成立后国家兴建的第一座水库。板桥水库,按百年一遇设计,于1952年建成。

板桥水库建成后,在使用中发现输水洞洞身裂缝和土坝纵横向裂缝,于是又于1956年对板桥水库进行了加固扩建,洪水标准按百年一遇设计,千年一遇校核。校核频率3天降雨量530毫米,洪峰流量5083立方米每秒,3天洪量3.3亿立方米,最大泄洪能力为1742立方米每秒,最大库容4.92亿立方米,其中调洪库容3.75亿立方米。而河南1975年8月的这次特大暴雨,涌入水库的洪水总量近7亿立方米,超出调洪库容3.75亿立方米近一倍。24小时降雨量既已达到1060毫米,大大超出3天降雨量530毫米的设计水平。

石漫滩水库建成后也于1956年和1959年两次扩建加固,按50年一遇设计,500年一遇校核。校核频率3天降雨486毫米,洪峰流量1675立方米每秒,3天洪量0.88亿立方米。经过加固,最大库容为9440万立方米,其中调洪库容为7040万立方米,最大泄量390立方米每秒。而这次特大暴雨时,洪水总量达到2.24亿立方,超过水库调洪库容7040万立方米的两倍以上。

就在板桥、石漫滩水库加固扩建后的3年间,中原地区的水库建设蜂拥而上。仅1957年至1959年,驻马店地区就修建水库100多座。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谭震林来河南视察时,将其归纳为“以蓄为主,以小型为主,以社队自办为主”。

当时一位名叫陈惺的水利专家指出:在平原地区以蓄为主,重蓄轻排,将会对水域环境造成严重破坏,即地表积水过多,会造成涝灾,地下积水过多,易成渍灾,地下水位被人为地维持过高,则利于盐分聚积,易成碱灾。

但是这一意见没有被重视,“以蓄为主”的经验大范围推广,很快推及安徽。在安徽境内,不仅丘陵地区涌现大批小水库,淮河流域的河道也被一道道“水坝”分割闸起,形成许多大大小小的“条状水库”,对淮河流域在后来数十年间水流造成影响。

陈惺是远东最大的平原水库——河南驻马店境内宿鸭湖水库的设计者。该水库施工时正值大跃进时期,省水利厅一位副厅长认为原设计过于保守,擅自作了几处改动。例如:他认为“闸门设计太大”,便

将原设计的12孔排水闸门砍去7门,仅剩5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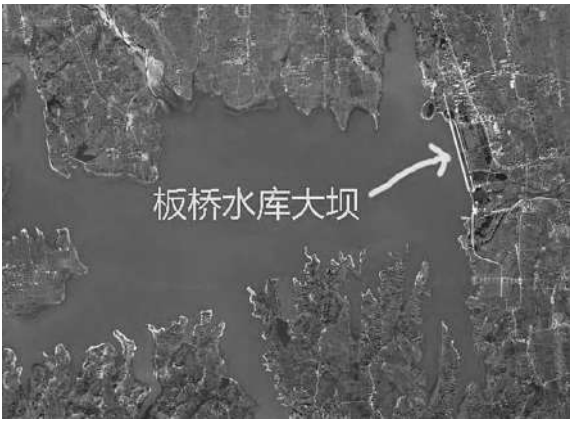
淮河豫皖交界处的班台分洪闸也是这样:该闸闸孔原按800秒立方米排水量设计,共为9孔,但由于“以蓄为主”的思想指导,只建造了7孔;1959年水闸建成后,1961年又被堵闭两孔。

1959年至1961年间,中原大地灾像频生,涝、渍、碱三灾闹豫。

1961年,刘建勋调任河南省委书记,他认为河南灾大,“是水利方面的问题造成的”。为纠偏,他到处寻找水利工程的“反对派”。在信阳,他找到了正在那里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陈惺。1961年,河南对全省水库进行了一次全面普查,对一部分设计标准偏低、施工质量较差、存有隐患的水库,包括一些大型水库,予以废弃。

但是,重蓄水灌溉,轻河道治理,重兴利、轻除弊的倾向还是存在。如石漫滩水库在溢洪道上增加了1.9米的混凝土堰,板桥水库在1975年8月前超规定蓄水3200万立方米。

人们过于笃信“百年一遇”、“千年一遇”等既定的洪水标准,自信石漫滩水库可驭控50年一遇的洪水,在500年一遇的洪水中也能自保;板桥水库可以驭控100年一遇的洪水,在1000年一遇的洪水中也可无恙。




然而,1975年8月,真正的特大洪水来了,暴雨区共产生洪水量

170 亿立方米,致使山洪暴发,大大超出河道排洪和水库防洪调蓄能力。几十亿立方的洪水汹涌而下,位于特大暴雨中心的板桥、石漫滩两座大型水库,终于在于 8 月 8 日 1 时左右,因洪水漫过坝顶,溃坝失事。

回溯这场特大洪水的形成,它是由三场暴雨造成的。第一场暴雨开始于 8 月 5 日 14 时,持续了 10 个小时。当日,板桥雨量站测得日降雨量为 448.1 毫米,最大 1 小时降雨量 142.8 毫米。而按水库"千年一遇"校核标准,最大日降雨量是 306 毫米。板桥水库水位迅速上升到 107.9 米,已接近最高蓄水位。

因灌渠阻碍泄水不畅,大坝外的洪水淹没了水库的坝基。板桥水库管理局院内,5 日晚积水达 1 米多深,电话总机室被水泡塌,电话线路中断,管理局与水库上游各雨量站全部失去联系。公路交通中断,板桥镇街积水二尺,供销社、信用社被大水冲倒,大部分民房倒塌。板桥公社干部在慌乱中组织力量转移老人和儿童,派出所干警则紧急抢救被水浸泡的档案。

很快,板桥水库的水位就超过汛限水位 1.18 米,超蓄水量 3200 万立方。到 8 月 6 日 0 时,板桥水库水位超主溢洪道 0.02 米,但是直到 5 时 45 分,主溢洪道才开闸放水,延迟了 5 个小时。

8 月 6 日早晨,刚从省里开会回来的驻马店地区革委会生产指挥部副指挥长陈彬到机关上班,发现指挥部成员已分头到基层防汛。此时,遂平县已对汝河随时可能溃堤提出警告,要求地区速送防汛物资。

上午,板桥水库管理局报告灾情的人员赶到驻马店,他们汇报的主要内容是"板桥镇遭淹"、"群众生活发生困难"。

地区革委会生产指挥部副指挥长陈彬提出:

一、立即派出一个十余人的医疗队,抢救伤病员。

二、群众家被淹,粮食也被淹,粮食部门要带粮食安排群众生活。

三、商业部门负责解决煤等其他用品。

四、通知邮电局抢修线路。

地委副书记补充:"以地委、地革委的名义慰问灾民和板桥水库的职工。"

当天,陈彬赶到板桥,地革委会生产指挥长刘培诚闻讯也赶到板

桥。当晚,刘培诚返回驻马店,陈彬留住板桥。

8 月 6 日 12 时到 7 日 4 时,第二场降水来到。到 6 日 23 时,板桥水库主溢洪道闸门输水道全部打开泄洪。但是水位仍在上涨,水库水位高达 112.91 米,而设计规定的最高蓄水位只有 110.88 米,超出 2 米多。

8 月 7 日 9 时,板桥水库做出决定,通知群众组织撤离,可只是通知副溢洪道下游撤离。因为在特大暴雨中,公路桥涵垮塌,通信线路毁损,连水库的电话总机也因房屋倒塌被砸坏,水库管理所和下游的公社、县乃至地区的对外通信联系中断、交通受阻,水库管理部门没有无线通讯手段,致使水库险情不能及时向上级报告,组织群众撤离的通知也无法有效传达。

7 日中午,陈彬召集板桥驻军、板桥公社、水库有关负责人开会,紧急会商防汛事宜。会议中发现,水库及板桥镇完全没有防汛器材,没有木料、草袋、铅丝,也没有准备应付意外情况的炸药。恰巧板桥有部队驻军,而且是炮兵,但有炮无弹。这时,通讯线路已完全中断。

午后,天奇黑,雨势更猛。从 16 时起,这次暴雨的第三场降水,也是最大的一场降水出现,持续了 13 个小时!

正在板桥水库的陈彬不懂水利,只感到“雨下得这么暴,库水泄得这么慢,情况有些不妙”。他再次召集会议,除了请当地驻军使用连队的报话机试图对外作接力通讯外,还紧急呼吁各级部门调集一切可以替代的物资参加防汛。

板桥水库位于泌阳县境内,该县县委书记朱永朝于 7 日傍晚也赶到了板桥镇。面对板桥水库的危急形势,他果断决定:立刻安排水库下游的板桥、沙河店群众撤离,并协助陈彬拟就一份告急电报,通过解放军板桥驻军发给驻马店军分区,再由驻马店军分区转给驻马店地区革委会生产指挥部。加急电称:“板桥水库水位急遽上升,情况十分危急,水面离坝顶只有 1.3 米,再下 300 毫米雨量,水库就有垮坝危险!”

这时的时间是 8 月 7 日晚 19 时许。

可是,由于驻马店地委的对外通信联络也中断了,因此,关于板桥水库的汛情,地委和地区革委会都无法向上级报告,包括这份由板桥水库驻地部队发给驻马店军分区又转给驻马店地区革委会生产指挥

部的加急电。

情况紧急,驻马店地委向军分区求助,可军分区的电话也打不通;又让邮电局总机想办法,也不行。

板桥驻军虽然没有炮弹,但是还有子弹。他们在板桥水库方面的要求下,跑到大坝南端发射红色信号弹,并举枪对空扫射报警,向水库下游的村庄发出疏散、撤离的警讯。信号弹发射了几十枚,但大雨使信号弹在50米范围外就看不到了,鸣枪一百多发子弹,但枪声被大雨盖住,也无人听到和看到。况且,由于事先没有约定危急时刻的报警信号,下游群众即使看到信号弹,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上涨的库水迅速平坝,爬上防浪墙,将防浪墙上的沙壳一块块掏空……水库职工还在作着无谓的抵抗,有人甚至搬来办公室里笨重的书柜,试图挡住防浪墙上不断扩大的缺口……一位忠实的职工在暴雨中用斧子凿树,以记录洪水水位……

这时的板桥水库大坝上已是一片混乱,暴雨如注,砸得人睁不开眼,相隔几步说话就无法听清。大批水库职工、家属正被转移到附近的高地,飘荡着的哭声、喊声和惊恐的各种声响在暴雨中形成一种惨烈的氛围。人们眼睁睁地看着洪水一寸寸地上涨,淹至自己的脚面、脚踝、小腿、膝盖……

突然,一道闪电,紧接着是一串炸耳的惊雷,万籁俱寂……

这时,就听一声惊叫:“水落了!”

刚才还在一寸寸上涨的洪水,在涨至小腿、膝盖、腹部,甚至向人们的胸部漫淹去时,突然间就“哗”地回落下去,速度之迅疾,使所有人都瞠目结舌——洪水的确在眨眼间退去。

就在那些“老婆孩子”欢呼“水落了! 水落了!”的时候,板桥水库管理局公安科长马天佑的脸色骤然间变白,刚才的那个劈雷,曾使他周身触电似的麻了一下;此刻,那座刚才还如同一只充足气的巨大气球的板桥水库突然间萎瘪,这意味着6亿立方米的库水正在令人恐怖地滚滚泄下。

8月8日1时30分,板桥水库水位涨至最高水位117.94米、防浪墙顶过水深0.3米时,大坝在主河槽段溃决,6亿立方米库水骤然倾下,最大出库瞬间流量为7.9万立方米/每秒。

决堤前的板桥水库

# 第1358回：通讯断，洪水如山压下来 得报告，中央组成慰问团

板桥水库溃坝洪水进入河道后，又以平均每秒6米的速度夺路狂奔，铺天盖地地向下游冲去，在大坝至京广铁路直线距离45公里之间形成一股水头高达5至9米、水流宽为12至15公里的洪流，仅仅6个小时，板桥水库就向下游倾泄7·01亿立方米洪水。

河道堤防漫溢决口

距板桥水库最近的沙河店镇首先被大水吞噬。尽管泌阳县委书记朱永朝在事前布置了紧急撤离，但因洪水势头凶猛，全镇6000余人中仍有827人遇难。

由于撤离的通知仅仅限于泌阳县内，驻马店方面没有也不可能向全区做出相应的紧急部署，与沙河县仅一河之隔的遂平县文城公社，群众完全没有得到洪水警报，因此文城成为这次洪水中损失最大的地区：全公社3.6万人口中，有1.8万余人遇难；该公社魏湾大队1700余人中有近千人丧生；该大队三小队256口人中仅存96口，有7家绝户！

幸存者说:“大水下来前,我们咋知道水库会有危险呢?”“天黑时,村里人看见河南岸沙河店那边影影绰绰有人在比比划划大喊大叫,可风声雨声太大,根本听不清喊的啥!”

村民魏长河回忆说:“喂饱牛时(约下午16时),雨已下得很大,天黑时,全队人都往地势较高的大队部躲。三个妮儿,俺家里的抱一个,我抱俩,手里还拉着一个12岁的小子,刚进院子,眼看着大水就从高高的墙头扑进来,像盖被子似的把满院子人都闷在里面。”

当时50岁的吴桂兰说:“俺和11岁的妮子被水闷住后,倒塌的墙就砸在俺娘俩身上,险些被砸死,幸亏一个大浪把俺们托起,掀了出去,妮子眨眼间就不见了,俺只觉着昏天黑地,抓住一张秫秸箔就随水飘走了。”

文城拖拉机站75匹马力的链轨拖拉机被冲到数百米外,许多合抱大树被连根抛起,巨大的石碾被举上浪峰。村民魏东山回忆:“我让老奶奶躲进拖拉机驾驶室里,大水下来时,水头将奶奶和拖拉机一起卷走了。”

当时已74岁的老大娘赵二妮,全家8口4人丧生。她说:“见大雨下得这个样,我就在屋里蒸馍,蒸了一屉子又一屉子,眼见着雨越来越大,我把衣服都翻出来,穿上了两条裤子,三件上衣,连袄都穿上了,就听儿子喊,快走快走,快上大队院!俺娘俩还没有走到大队部,就听见轰隆隆一片房倒的声音,还不及挪步,人就漂在水里了。”

魏长河回忆:“我抓着房上一只藤箩往下冲,一路冲到遂平城下,也不知喝了多少水。人说,县城南门、车站大桥和铁路是三道鬼门关,哪一道都是进去就出不来,我竟然都冲了过去,浑身的衣服撕得稀烂,一路上就听见大人哭孩子叫,一排排水鬼明晃晃的向你扑过来,后来才知道,那是露出水面的电线杆上的白瓷瓶。”

魏世兴回忆:“白花花的大水一眼望不到边,我在水里不知翻了多少个滚,憋得不行,一露头,见两个大淤杂(草垛、杂物形成的飘物堆)向我冲来,其中有一棵连根拔起的大桐树,上面攀着许多人,乱哭乱叫,有人喊:‘抱好东西!抱好东西呀!’我记得水里到处都有电灯一样明晃晃的东西。”

赵二妮老太太被卷到上百里外的阳丰大桥底下才被一棵树卡住,

她挣扎着从树棵里爬出,临时穿上的几件衣服早就被洪水冲没,浑身上下拉了许多口子,血肉模糊。

板桥水库底部高程为120米,文城魏湾的高程为100米,遂平县城的高程为65米,县城东部的高程为50米。洪水就这样借着高程的落差顺势而下,板桥水库8日凌晨1时垮坝后,仅1小时,洪水就冲进45公里外的遂平县城,遂平县40万人,此时有半数漂没水中,一些人被途中的电线、铁丝缠绕勒死,一些人被冲入涵洞窒息而死,更多的人在洪水翻越京广线铁路高坡时,坠入漩涡淹毙。洪水将京广铁路的钢轨拧成绞丝状,将石油公司50吨油罐卷进宿鸭湖中。昔日人欢马叫的遂平县城,俄顷之间一片汪洋。沉睡在梦乡中的人们,在浑然不觉中被埋在水底。整个遂平县境内,水面宽10公里,水头高3至7米。

我们再来看石漫滩水库,5日20时水位开始上涨,7日14时,石漫滩水库决定安排下游群众转移。至8日0时30分,石漫滩水库水位涨至最高水位111.40米、防浪墙顶过水深0.4米时,大坝漫决。库内1.2亿立方米的水量以2.5万到3万立方米每秒的流量,在5个半小时内全部泄完。下游田岗水库随之漫决。田岗水库管理所坚守岗位的16名抗洪救灾人员全部遇难。

约8.1亿立方米洪水向四面八方奔突,扫荡,又在四面八方合流扩展。在直立如壁的惊涛骇浪前,田园、村落、集镇,须臾间化为乌有……

而处于这次特大暴雨范围内,共有10座一亿立方以上大型水库,除板桥、石漫滩两座大型水库外,分别还有:

薄山水库,暴雨期间水位超过坝顶,但低于防浪墙;

宿鸭湖、孤石滩水库,水位超过校核水位;

宋家场、昭平台、白龟山水库,超过设计水位。

暴雨区内,还有竹沟、田岗2座一千万立方至一亿立万的中型水库,58座一百万立方至一千万立方小型水库,它们在板桥、石漫滩两座大型水库溃坝作用下,相继垮坝失事。

洪水铺天盖地向下游奔腾而去。所到之处,水库垮坝,堤塘决口。决口的洪水与上游来水合二为一,汇合成更大更猛的洪水一路狂奔,劈头盖脑地淹没了广大的城镇和乡村。驻马店地区的主要河流全部

溃堤漫溢。全区东西300公里,南北150公里,60亿立方米洪水疯狂漫流,汪洋一片。因老王坡滞洪区干河河堤在8月8日漫决,约有10亿立方米洪水蹿入汾泉河流域。

8月8日4时,板桥水库当地驻军冒着被雷击的危险,将步话机天线移上房顶,将垮坝情况通知驻马店军分区转报地委。4时30分,电报由驻马店军分区发往武汉军区,转到安徽合肥,再上报中央。

与此同时,水库汛情和溃坝的信息,也由驻马店地区水利局长辛鸿江报告河南省防汛办公室高明奎,高明奎随即转报省委副书记、省革委会生产指挥部指挥长王维群。8月8日凌晨5时,王维群报告了北京水电部长钱正英。此时钱正英已经从其它渠道得知水库溃坝的消息了。

板桥水库垮坝5小时后,库水即泄尽。汝河沿岸,14个公社、133个大队的土地遭受了刮地三尺的罕见的冲击灾害。洪水过处,田野上的熟土悉被刮尽,黑土荡然无存,遗留下一片令人毛骨悚然的鲜黄色。

8月8日晚,正在洛阳的纪登奎和刘建勋突然接到省委副书记、省革委会生产指挥部指挥长王维群打来电话,报告驻马店地区板桥水库出事了!因通信中断,具体情况还不清楚。纪登奎和刘建勋连夜返回郑州,听取汇报,了解情况,安排布置抗洪救灾,并向中央报告,要求派军队支援。

8月9日,纪登奎和刘建勋乘空军13师派来的安-24飞机,到达确山县的李新店机场,换乘吉普车走了近20公里后,因桥梁被洪水冲断,无法继续前行,只能从空军新乡基地调来直升飞机,赶到灾区驻马店一个学校的操场上降落。

先期到达驻马店的是省委副书记王维群和水利专家陈惺。这时,王维群返回郑州,负责抗洪救灾的后方支援工作,组织医疗队、防疫、各类物资器材等。而当时最紧急的是灾区群众的吃饭问题,首先要组织食品加工。交通断绝了,这些食品只能用飞机空投。

河南省抗洪救灾指挥部就设在驻马店驻军部队一所新建的干休所里。生活设施简陋,伙食也很简单,只有馒头,大家同吃同住。刘建勋年纪大了、体弱多病,紧张、忙碌、焦虑,饭也吃不下,觉也睡不好,医生劝他吃点安眠药,他说:“我有烟抽就行。”

水灾的情况陆续传来,但是相当混乱,前后不一。水库下游很多村庄,被洪水冲得没影了,死亡的人数,一会儿报来5万,一会儿又报来5万,一时间,说有十几万人淹死了,让人听得心惊肉跳!

有一个公社,有几万人,开始说,全完了,一个人也没剩下,都淹死了;过了两天又报告,联系上了,人找到了,绝大多数逃出来了,只死了几百人。

水库垮坝,库水下泄,滔天洪水突然涌来,下游较近的村庄,死的人最多,而且大都是老人、妇女、孩子,逃出来的,则是年轻力壮的男人;下游较远的村庄,死的人就少一些,老人、妇女、小孩大都跑到安全的地方了,死的反而是年富力强的男子。这是因为下游较远的村庄,洪水到来前,收到了县和公社的警报,农村基层组织,大队支部,基干民兵,动员起来了,组织群众疏散,往地势较高的地方跑,老人、妇女、孩子先走,大都逃出来了;而洪水来到时,有些干部和民兵因为组织群众疏散留在后面没跑出来,就被冲走了,因此,死的反而是年富力强的男子。

翻越了京广铁路的洪峰,从西平、遂平两县境内继续向下游冲击,驻马店地区4.5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尽成泽国。

大量的洪水涌入京广铁路和驻马店市以东著名的"险库"宿鸭湖水库,该库堤内堤外皆是白花花的大水,库堤只能容一辆卡车通过,苍茫中犹如一条飘飘欲断的细带。而就在这条细带上,拥挤着将近5万的灾民。

宿鸭湖水库技术人员赵搭拉回忆:当时只听"咚!咚!咚!",堤外一座座泡在水里的房屋垮了。上游冲下来的"淤杂儿"、人,挤在水库的进水处,像漩涡一样打着转转。"救人呀!救人呀!"哭喊成片。眼看着一个个人栽在水里就没有了。

侥幸的是,大水下来的8天前,宿鸭湖水库刚刚完成了抢修工程——由于该库常年隐患未除,下游有阻水工程,又因周围群众屡屡哄抢护坡石料而遭损坏,赵搭拉在1975年初两次上书国务院"报警",在中央干预下,有关部门终于批准了宿鸭湖水库抢修工程。可以想象,如果没有这次抢修,这座"险库"也必然会在这次大水中垮坝。

9日晚,洪水进入安徽阜阳地区境内,泉河多处溃堤,临泉县城被淹。至此,河南、安徽沿淮地区,千里平原一片汪洋,人民生命财产遭

受到巨大损失。

板桥、石漫滩诸水库失事当日,驻地距灾区最近的解放军部队近万名官兵便已奉令赶到驻马店地区抗洪救灾。自8月9日起,武汉军区的大批救援部队也昼夜兼程陆续抵达灾区。

8月9日,中央连续召开有关部门领导参加的会议,并立即组成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纪登奎为团长,中共中央委员、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乌兰夫,农林部长沙风,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卫生部副部长丁志辉,国家计委副主任邓东哲为副团长的13人中央慰问团,带着《中央慰问电》于8月11日飞往灾区进行慰问。新华总社派去随团采访的两名新闻记者是张广友和摄影记者王新庆。此时,纪登奎到河南已经十几天了。水灾后,他就一直在抗洪救灾的第一线。

8月11日,中央慰问团乘专机从灾区上空掠过。飞机经郑州南飞不久,进入许昌地区即进入灾区。俯瞰辽阔的豫中平原,往日一片绿黝黝的庄稼不见了,而是一片白茫茫的泽国,犹如汪洋大海,一眼看不到边。西平、遂平、上蔡、平兴、汝南等大部分县城都已经泡在水中,高大的烟囱大半截露在水面上,地势较高的地方和没被完全淹没的房顶上站着许多人……村庄的房屋和田野的庄稼几乎全部被洪水淹没,偶尔看到一些大树枝头还露在水面上……为了让大家看得清楚些,飞机低空缓慢飞行,经南部的泌阳、确山,从北到南飞行了30多分钟,最后降落在确山县李新店空军基地的机场。面对如此大面积灾情,大家普遍惊叹:没有想到,也没有看到过如此大范围的严重水灾。

被淹没的公路和村庄

8月12日天刚亮,中央慰问团就同已在这里的纪登奎和刘建勋一起,换乘两架米8直升机,准备到板桥等毁损的水库,亲自查看决堤的口子,估计损失的规模,研究抢险救灾的措施,也慰问受灾地区的群众。这时,刘建勋看到了陈惺,便喊他一起上了一号机。飞机前舱坐着慰问团长纪登奎和副团长乌兰夫,由刘建勋和陈惺陪同,后舱坐着慰问团的部分团员和工作人员。

飞机起飞后,先在空中视察京广铁路以东的地区,看了平原地区的汝河和小洪河。在所视察的汝南、平舆、新察、上蔡和西平县的范围内,见到的几乎都是一片汪洋,其中五个县城和条条块块分布的高地,如同散布在湖中的岛屿。

飞机飞行高度仅50米,清楚地看到每个“岛”上都是密集的灾民,被围困在洪水之中。有的“岛”因为人多面积小,或者地势低,有些灾民就不得不站在水里,或者爬在树上。他们不停地向上挥手。机上的人都凝神地注视着下面……

飞机返回李新店。午饭以后,中央慰问团再乘直升机到铁路西,先后视察被冲垮的石漫滩和板桥水库……

板桥水库,千米大坝决口350多米,近10亿立方米水量,倾库而泄,咆哮而下,将水库下游20华里宽、百余里长范围内洗劫一空,冲毁了京广铁路,奔向豫中平原。他们站在这座被冲毁的水库残骸南端向库区远眺,看到坝内库底朝天,坝下决口处被洪水冲出了方圆数千米的一个大坑,好像一个湖泊,里面是满满的水,据说最深处可能有十多米,有的说有几十米,究竟有多深,还没来得及去探测。冷眼看来,还以为这是水库呢。水库有关方面的领导们一再向中央慰问团解释说,水库的闸门都已统统打开了;溢洪道已经不起作用;是大水漫过大坝而冲毁的;主要是来水量大、时间集中;是不可抗拒的等等。

# 第1359回：慰问团，飞往灾区查情况 临现场，一幕幕惨不忍睹

12日下午，中央慰问团一行乘直升机到达驻马店地委所在地的驻马店镇。地委用直升机把该地区受灾严重的遂平、西平、汝南等7个县的主要领导接到地委。慰问团听取了他们关于灾情和救灾情况的汇报。

驻马店地委书记苏华说：这个地区是这次河南、安徽两省受灾最重的地区。区内有50多座大、中、小型水库垮坝（其中大型两个，中型两个）。仅泌阳县境内的板桥和舞阳工区境内的石漫滩两大水库垮坝之后，库内13亿立方米洪水，居高临下，倾库而出。垮坝时几十米高的水头，奔腾咆哮，呼啸而来，犹如一座大山压将下来，势不可挡。当时正是深夜，人们在熟睡之中，毫无思想准备，在梦中被洪水卷走。水库下游几十里宽范围的人员、牲畜和房屋财产，以及庄稼、树木等被一扫而光。

刚从水灾第一线回来的遂平县委书记李天寅说：遂平地处板桥水库下游，受灾最为严重。洪水所到之处，不仅地面上的一切一扫而光，有的甚至掘地三尺，刮走了地皮，留下一片沙砾，不仅冲毁了铁路路基、桥梁，冲翻了旅客列车，冲毁了工厂，冲走了机器，竟然把县化肥厂四吨半重的锅炉冲到宿鸭湖。炮二师靶场上的大炮被冲得无踪影。由于水库垮坝是在7日深夜和8日凌晨突然发生的，人们没有提防，水势凶猛，来得特急，水库下的绝大部分群众被洪水卷走……

溃坝后的洪水将三股铁道冲到一起

被洪水摧毁的京广铁路遂平段

京广铁路遂平段，50吨的火车车厢被冲走5公里，铁轨被扭成麻花形

李天寅说："板桥水库位于本县西部山区，居高临下，向东倾斜，控制着全县80%土地，只有岈山公社和少数几个公社局部地方不在它的控制范围内。它是悬在全县人民头上的一库大水，现在看来它是一颗"大炸弹"，板桥水库垮坝给遂平县造成的是毁灭性打击。现在全县电话线路已经全部被毁，消息中断，县里的各社队失去了联系，究竟死了多少人现在无法统计，我估计可能要在16万左右。其中包括200多名县里的机关干部。他们大多数是在贯彻'三项指示为纲'的驻队蹲点干部。"

舞阳工区领导说：三天来的暴雨，加上上游几十个中小型水库垮堤，致使石漫滩入库的洪水达3亿多立方米，超过库容量的两倍多。终于8日凌晨，不堪重负，水库大坝全部被冲垮，使洪河两岸一片汪洋，奔腾咆哮的洪水直抵西平，穿越京广铁路，进入豫中平原，沿途洗劫一空，死亡约3000至5000人。

他们恳切地说："现在，被洪水卷走的牺牲者已无法挽回，而灾区的500万灾民需要援助，特别是困在水中的100多万人迫切需要拯救。灾民们仓惶逃生已经5天了，只靠空投食物维持生命，白天受烈日烤炙，夜晚受寒气侵袭，已经筋疲力尽。有的还爬在树上和站在水中，其中的老弱、妇女和儿童，因为体力不支，堕入水中死去的惨剧每天都有发生。"说到痛切处，汇报的人泣不成声，听汇报的人也都潸然泪下。

而且，数百万灾民泡在水里，发病率迅速上升，据不完全统计，病人有113.3万……

听完汇报后,大家一致认为,为了救灾民,必须加快排除洪、汝河平原的积水。慰问团要陈惺说明情况和提出意见。

陈惺建议,在班台以上的刘埠口附近决开小洪河左堤,提早泄入分洪道,并炸开洼中的隔堤,使洼洪也能行洪,以加快洪水下泄入淮。

据驻马店和有关方面领导汇报:这个地区的洪河、汝河上游(同是淮河的支流),共有4座大型水库,除板桥、石漫滩之外,还有一个地处泌阳县境内的东风水库,库容量为1.2亿立方米,入库洪水已达2.2亿立方米;另一个是地处确山县境内的薄山水库,库容量为4亿立方米,入库洪水已达5亿立方米。这两座大型水库,虽然入库洪水也都已经超过库容量,险情严重,但没有垮堤坝。这是不幸中的万幸!中央慰问团的领导事后曾对河南省有关方面领导说:"你们应当组织有关方面认真调查一下:为什么同在一个地区的四座大型水库,两个垮堤,两个没垮?"

8月12日,水灾重点已经转到京广铁路以东,驻马店、许昌、周口等地区的20多个县范围。其中以上蔡、汝南、平兴、新蔡等县最为严重。平地水深一般都在2至5米。据初步估计,这一带被洪水围困的群众有200多万。于是中央慰问团领导决定,立即分头到灾区视察慰问。

8月13日清晨,中央慰问团分成几个小组,由各位副团长率领分赴灾区的各县视察慰问。

新华社记者随中央慰问团在副团长、农林部长沙风带领下,乘直升机前往灾区。他们到灾区时,看到纵横数百里的豫中、豫东大地上,一片汪洋,一片茫茫,水光接天,一眼看不到边际。还没有完全被淹没的屋顶上,露在水面的树枝上,还有一些还露出水面的堤坝或高岗处,密密麻麻挤满了人群,看到飞机来了,他们都齐刷刷站起来,举起双手,仰面朝天看着飞机,似在呼喊着什么……

在漫无边际的滔滔洪水中,随时都可以看到一些漂浮物,在顺水漂流。有蔬菜、木板、锅盖、箱箱柜柜;也有死猫、死狗、死牛、死羊,以及死人尸体……有时还看到一些漂浮来的房脊、房梁和麦秸垛,有的上面还扒着人和猫狗等动物……

由电线杆子看水深

汝南县灾民向高处转移

目睹这一幕幕悲惨情景,令人感叹,令人痛心!陪同慰问团的驻马店地委副书记、上蔡县委第一书记杜保全说:“上蔡县地势平坦,没有山区和丘陵,甚至小的土岗也很少。过去这里的群众有个习惯,水一来就上树、上房,水一过就下来,水来得快,走得也快,一般是一两天。可是这次水来得急,来量大,迟迟不退,现在全县有60万人被洪水围困,其中大部分是在屋顶和大树上,现在已经四、五天没吃到东西了。有些人已经无法再坚持下去了。特别是爬在树上的,几天几夜吃不到东西,睡不上觉,疲惫不堪,有的手脚麻木了,眼巴巴看着他们一

个个扑通、扑通地从树上掉下来,落水而死!躲在河堤上的群众,也因为几天来洪水不断上涨,无水地方越来越小,河堤不断塌陷,成群的群众眼看着被洪水冲走。现在这些地方一片汪洋,无路可走,有水无船,交通已经全部断绝,人出不去,食品运不进来,情况十分危急!人们处于绝望之中……”

说到这里时,他已经泪流满面。

经过上蔡、平兴、汝南等县察看之后,飞机最后降落在洪河和汝河交汇处的新蔡县,一路上所见和有关地方领导汇报情况大体相同。当前存在的突出问题是:洪水下泄的很慢,有的地方还在上涨,如何加快洪水下泄,及时抢救出这200多万人的生命,已经成为抢险救灾必须尽快解决的一个首要问题。河南省和各地有关部门领导一致认为,当前这些地方洪水下泄慢的主要原因是:洪河河道在河南与安徽两省交界处有拦洪闸,洪河和淮河河道有阻水工程,安徽境内的行洪区没有行洪,分洪区和蓄洪区没有分洪、蓄洪。因此,洪水下泄很慢。

解放军海陆空立体地向灾区数百万人进行着当年力所能及的施救。空投粮食,成了解决饥饿的幸存者口粮的唯一办法。那些从天而降的食物有了一个称谓:天馍。北京、广州、南京、兰州、济南、成都、武汉7大军区和北京铁道兵司令部、北海舰队、东海舰队、河南省军区等赶赴驻马店灾区抗洪抢险的部队,诸兵种达42618人

空军某部向灾民空投救灾物资

空中某部装运救生器材向灾区空投

解放军救灾民

解放军东海舰队救灾官兵为灾民送粮食

医疗队给灾民看病

医疗队向灾民宣读慰问电

灾害之惨重远远超出预料。此时,数百万灾民被浸泡在久久不退的积水之中,而头上被三伏天火辣辣的骄阳暴晒,驻马店各县群众在板桥、石漫滩水库垮坝后置身于水深火热之中。

8 月 13 日,新蔡、平舆东部水仍上涨,1 小时 2 公分,全区 200 万人在水中。

汝南:10 万人被淹(指尚飘浮在水中),已救 4 万,还有 6 万人困在树上,要求急救;全县 20 万人脸肿腿肿,拉肚子,无药。

新蔡:30 万人尚在堤上、房上、筏上,20 个公社全被水围住,许多群众 5 昼夜没有饭吃。

上蔡:60 万人尚被水包围。华陂公社刘连玉大队 4000 人已把树叶吃光;黄铺公社张桥大队水闸上有 300 人 6 天 7 夜没有吃饭,仍在吃死猪死畜。

宿鸭湖水库:大坝上 5 万人四五天没吃东西了。

平舆:还有 40 万人在水里,肠炎、脑炎流行。医疗队下去了,但没药物,很多地方出现了灾民有病哭、医生看了病没药也哭的情况。

8 月 14 日,全地区尚有 177.3 万人泡在水里。其中上蔡 64 万,新蔡 45 万,汝南 25 万,平舆 40 万。

汝南提出口号,保证每人 1 天 1 斤红薯干。

慰问团到达灾区后,纪登奎在同记者张广友交谈时说:“这次中央慰问团既是慰问团,又是‘工作团’,在做好慰问工作的同时,要尽可能地协助地方政府做些工作,解决抗洪抢险和救灾工作中的一些实际问题。”

张广友问纪登奎:“这次水灾如何报道?”

纪登奎说:“中央领导已经决定这次水灾不作公开报道,不发消息,特别是灾情不仅不作公开报道,而且还要保密。”

张广友当即反问:“为什么? 这么大范围的大水灾能保住密吗?”

纪登奎说:“这是中央领导的决定,已经告诉你们总社领导了,但这不是说你们就没有什么事儿了。你们的任务,不仅是同慰问团一道去灾区现场进行慰问;而且还要搞些内参,宣传抗洪抢救中的先进人物、先进事迹,如:舍己为人,舍小家顾大家,一方遇灾,八方支援的共产主义风格等;特别是要抓住一些重要问题深入实际,做些调查研究。”

这次水灾十分严重,纪登奎说:“两个大型水库和那么多的中小型

水库垮坝,所造成的人民生命财产损失相当于一颗小型原子弹!”“那么,这些水库,特别是两个大型水库为什么垮坝?又譬如,为什么洪河的洪水下泄的那么慢?”他说:“毛主席说:‘看来我们的国家还没统一,列国时国和国还有个协议……’”

纪登奎说:“豫皖之间水利纠纷由来已久,据说洪河入淮的河南和安徽边界处相距不远的地方,两省群众各修一座拦河大坝。水多了安徽那边把闸门关上,或者开的很小,河南的洪水就泄不出去;干旱水少,河南那边就把闸门关死,安徽那边就没水喝……这次中央决定要坚决拆除这些阻水工程,充分利用行洪蓄洪区,使洪河水尽快下泄……你们可以随团去到现场看看,搞些调查研究,掌握第一手材料。”

中央慰问团副团长、农林部部长沙风(右)在询问灾情

团长纪登奎布置陈惺和慰问团成员、水利部的盖国英察看大洪河,以决定是否采取分洪措施。他们乘直升飞机从驻马店到班台,向下往返对大洪河和分洪道进行察看,然后回驻马店。

纪登奎让陈惺和盖国英先讨论,他坐在一旁听。

陈惺和盖国英先议了一下大洪河和分洪道是否阻水。自班台以下,在大洪河和分洪道上多处可见一段水流平静,一段水流湍急,激成浪花和旋流。这正是在河道峡口上下常见的现象,说明河道上有阻水卡口。

然后他们讨论是否分洪。对这个问题可以有两种不同的考虑:一种考虑是,现在上游已经成灾,如果分洪则会造成下游也成灾,使水灾搬家;另一种考虑是,现在灾区晚一天退水,则要多牺牲一些人,分洪虽然可能扩大淹地面积,但主要是分洪道和蓄洪区,那里可以早作准备,不会有生命危险。

他们正下不了决心时,一直静听的纪登奎起身说:“不用再讨论了,我们现在的任务是救人,为了救人,多淹些地也是值得的。”

午后,纪登奎指示陈惺和盖国英再乘直升飞机去新蔡,接正在新蔡县视察的副团长沙风,陪同他在空中视察大洪河,然后返回驻马店。

8 月 13 日,慰问团和河南省委有关部门负责人要回北京向李先念等领导汇报。晚饭后 21 时许,陈惺在驻马店招待所突然接到通知,要他立即赶到慰问团。纪登奎对他说:“国务院要研究加速排水的问题,决定由你陪同沙风、盖国英去北京汇报。”

陈惺听完后匆匆出门,刘建勋跟着追出来,埋怨他说:“为什么走得这么急?我还有话向你交待。这次见到国务院领导,就说河南遭此大灾,感谢中央派慰问团来主持救灾主作。省委没有更多要求,只求中央批准加快排水,抢救困在水中的灾民早日脱险。”

陈惺一边点头答应,一边赶到临时机场。直升机于晚 22 时自驻马店起飞,23 时到李新店机场,换三叉戟飞机。

中央慰问团副团长乌兰夫在宿鸭湖大坝上慰问灾民

洪水中的救灾船只

1975 年 8 月,纪登奎和乌兰夫在遂平灾区慰问受灾群众。

“75.8”洪水淹没范围图(图中浅色部分)

# 第1360回：转安徽，调部队炸坝泄洪 查原因，水电部开会总结

8月14日零时12分，飞机降落北京西郊机场，国务院派来的汽车已经等在机旁。大家上车后直驰国务院。进入国务院会议室……

国务院会议室里，副总理李先念已召集中央各部委和中央军委负责人等候开会。沙风首先汇报中央慰问团和河南省委关于加快排水的意见。

李先念说："为了救人，你们说炸开哪里，我们就同意炸开哪里。"

河南省负责水利工作的陈惺在地图上指出需要爆破的位置，李先念在征求身边水利部长钱正英的意见后，表示同意，并要钱正英起草国务院和中央军委的联合命令。

在钱正英起草命令时，李先念又问陈惺还有什么问题，陈惺说，宿鸭湖水库尚未脱险。李先念要陈惺立即和河南通电话，采取紧急措施，确保水库安全。深受板桥、石漫滩水库垮坝事件刺激的李先念，痛心地说："宿鸭湖水库再也不能出事，再出问题，它就是催命鬼！"

钱正英起草好联合命令，李先念阅毕即和主持军委工作的邓小平通话，在得到邓小平的同意后，李先念下令武汉军区和南京军区的舟桥部队紧急出动，在中央慰问团的指挥下执行爆破任务。因为时间紧迫，李先念要求部队先行出发，由他亲手签字的命令随后由空军空投到各部队所在位置。

中央军委紧急派出3个师15个团的兵力和48架轰炸机赶赴灾区。

会后，慰问团和河南省委有关部门负责人和来时一样，又坐三叉戟和直升机，于14日晨返回驻马店。纪登奎、乌兰夫、刘建勋和武汉军区的参谋长等，已在慰问团院内等候。沙风汇报了会议情况和国务院、中央军委的联合命令。

纪登奎决定：由沙风任组长，盖国英和陈惺为成员，组成指挥小

组,负责指挥;武汉军区的领导随同指挥小组,负责执行排水任务。

陈惺又汇报了李先念要确保宿鸭湖等水库安全的指示,纪登奎说:“如果再有水库出问题,我们就得下地狱,绝升不了天堂。”他要陈惺立即说出灾区附近每个大型和中型水库的位置、工程规模和防汛任务的大小,由军区派驻军到水库负责防汛。陈惺每说一个水库,武汉军区参谋长就说出这个水库附近的驻军情况,并做出部队担任防汛任务的具体部署。

汇报后,陈惺随沙风、盖国英,以及驻马店地委书记等,乘直升机去新菜。县里已为他们准备好了一艘柴油机船,作为指挥船。他们第一个任务就是解决班台闸阻水问题。据河南省领导反映:这个地区洪水下泄缓慢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在河南与安徽两省交界处的洪河有两座拦河水闸:一座叫班台闸,是经两省共同协商于50年代建的,用以拦截和控制水位和流量。班台闸建成后,安徽总感到掌握不到控制权,于是,当地群众自发地在距班台大闸下游不到3公里安徽境内的黑龙潭拦河建立起一座大闸同河南对抗。

他们的小船犹如一叶孤舟航行在大海上。黎明前的黑暗,夜雾茫茫,视野不清,船上灯光微弱,只有柴油机嗒嗒……不停的响声,响彻在这辽阔宁静的夜空。当时,船上没有任何通讯设备,已经失去了任何联系。大家心情十分紧张,普遍担心的是怕遇上障碍物,发生事故,所以不得不走走停停,小心翼翼地向班台闸方向摸索前进。

就在他们在夜雾茫茫中寻找班台闸时,部队的快艇也上来了。带着他们,很快就来到了班台闸的位置。武汉军区副司令员孔庆德已经守候在那里。他登上指挥船,说明以后由他随同指挥小组活动,接受和执行任务。

此时班台闸的闸门全部大开,洪水已经从大闸上面漫过。整个大闸已经淹没在洪流下面,只有两岸高处的闸头还露在水面上。于是有人说:修建这样大的一座拦河大闸可不容易啊,现在洪水已经从闸上漫过去了,大闸不起作用了,在这种情况下还要不要炸毁大闸?然而部队是奉中央命令而来的,说什么也没有用了。孔庆德报告说班台闸已经装上炸药,请示开始爆破。沙风同意,将指挥船退出危险区。只听一声巨响,所有闸门、闸墩全部炸去,洪水汹涌向分洪道流下。沙风

他们又循大洪河向下察看到洪河口,并寻找黑龙潭,转悠了好长时间,找不到黑龙潭拦河大坝。原来,此时他们已经就在黑龙潭之中,这里已是一片汪洋,黑龙潭大坝早已不见了。因为黑龙潭大坝是个土坝,洪水到来不久即决口,早已被冲毁得无踪影了。

他们又转到东面的地理城,再循分洪道向上察看,至深夜经班台回到新蔡县城。

次日,8 月 15 日,舟桥部队星夜赶到,安徽省委也派来负责领导,配合做好群众的疏导工作。

班台闸炸毁之后,为了抢救被洪水围困的河南 200 多万群众,中央指示安徽省委,淮河的行洪区必须立即排除一切阻水障碍,全部行洪;分洪区和蓄洪区必须立即破堤分洪、蓄洪,绝不能再加高加固围堤。可是,圩区的农民群众思想不通,阻力很大。因为这里没下雨,他们不相信会有那么大的洪水,许多农民自发的纷纷上堤看守。于是,中共安徽省委派省委书记王光宇亲自带领有关部门领导,乘船前来现场检查督促贯彻中央的指示。纪登奎指示沙风一行乘船直达蚌埠,入安徽境内察看灾情。只见沿途各地都在鸣锣疏散百姓,由于班台闸被炸,大量河南境内的洪水向下游倾泄,致使淮河中、下游的形势紧张。淮河多年受重蓄轻排指导思想之害,行洪道上早已围堰丛生,如同处处设卡,本在 1956 年就已达到抗拒 1954 年大洪水标准的河道,此时的泄洪能力却已下降 30% -40%,河道上星罗棋布的“关卡”造成淮河“肠道”严重“梗阻”,沿途的淮河河道平堤流水,险象环生。

沙风一行在一条大船上见到了安徽省委的领导王光宇,他表示坚决服从中央命令,动员各分洪区、蓄洪区里的群众紧急疏散,立即撤离,炸堤分洪。但是,群众没有一点点思想准备,工作十分难做,围堤一炸开,蓄洪区就成大湖泊,不仅长势喜人的秋庄稼全部被毁,区内所有粮食、牲畜、机器等一切生产生活资料和财产都来不及挪走,只能是赤手空拳迅速逃到大堤上去。

指挥小组再次出发,一共用了两昼夜时间完成了预定的爆破任务。

中央慰问团在洪洼、蒙洼蓄洪区亲眼目睹围堤炸开时,围堤外的洪水滔滔流进圩内,圩区内群众扶老携幼,争先恐后纷纷逃向大堤的

凄惨场面:他们有的牵着牛羊,有的抱着孩子,有的站在大堤上流泪,有的看着被淹没的家园放声大哭……的确,这一刹那间,他们成为一无所有的无产者,在祈祷生命安全,在等待国家救济。安徽沿淮地区农民无雨遭灾,做出了巨大牺牲。据不完全统计,仅洪洼、蒙洼、邱家湖、姜家湖、南洞等地的分洪、蓄积,共淹没 18 万亩丰收在望的秋庄稼;有 17.3 万农民无家可归,一切物资财产全部被淹没。

当指挥小组于 17 日凌晨 3 时返回新蔡县时,因为水位下落,指挥船已不能开到南关,只能停靠河边的船码头了。新蔡水位 14 日最高达 38.63 米,洪、汝河平原积水最多达 35 亿立方米。由于 14 日炸开班台闸和 15 日完成其它爆破任务后,清除河道上阻水障碍,加速洪水下泄,水位迅速下降,河南 200 万被洪水围困的群众得救了。

在这次被称为“75·8”大水的灾难中,河南省最为严重,洪水退去的地方,到处可见人畜的尸体——尸体在烈日下腐烂,在洪水曾经肆虐过的地方罩起一层可怕的雾,一位曾经参加救灾的军人后来回忆,在漯河至信阳的公路两旁,沿途所有的大树树枝,都被黑压压的苍蝇压弯了。驻马店地区的数百万群众,就这样度过长达半个月的时间……

据统计,河南省受淹的有 32 个县市,347 个公社,耕地 1800 多万亩,受灾地区人口约 1000 万,死亡 3 万多;大牲畜死亡近百万头,倒塌房屋 500 多万间。洪水冲毁铁路大动脉京广线小商桥到确山县段 103 公里。其中毁坏最严重的有 16 公里,路基桥梁全部被毁,路轨被冲走,有的被拧成“麻花”。正在行驶到这里的一列客车被突如其来的巨大洪水冲翻,司机和车上的乘客无法逃脱,全部被淹死在车厢中。京广线中断行车 18 天,影响运输 48 天。受灾地区的公路全部被淹毁,电讯中断。而地处垮坝的板桥、石漫滩两个大型水库的下游地区灾情最为严重,板桥下游的遂平县县城被淹,一些工厂被毁,墙壁倒塌,房盖顺水漂走,机器设备被冲得无影无踪。水库下游的村庄和农田被洪水洗劫一空,死人最多。

安徽省受灾的主要是阜阳地区的 6 个县,耕地面积 300 多万亩,人口 150 万。其中比较严重的是阜南、临泉、界首、颍上等县。

慰问团回京之前,纪登奎对随团的新华社记者张广友和《人民日

报》记者安子贞说:“你们实际上是中央慰问团的成员,这次深入第一线参加抗洪抢险,调查研究掌握了大量第一手材料,这次中央慰问团给毛主席、党中央的报告,由你们来起草,内容要丰富,文词要简练,以不超过2000为好。”

他一再强调“不要超过2000字”。纪登奎对张广友说:“鉴于文字所限,有些内容归纳不进去,你们新华社可以写内参进行专题报道;有些问题还可以继续组织记者深入采访,进行全面的内部报道。”

在完成中央慰问团给毛泽东、党中央的报告草稿后,纪登奎要记者重访灾区,写内参进一步反映灾区恢复生产重建家园的情况。张广友和国内内参组吴明华于8月下旬到9月中旬来到河南、安徽沿旧路,从陆路重访灾区,在组织记者写上下两本抗洪抢险专刊的同时,写了5篇《河南灾区纪行》内参国内动态清样。

《关于水灾中死亡的人数问题》。这是记者此去河南灾区的重点调查内容,这篇内参原文如下:

新华社讯 这次河南水灾究竟死了多少人?具体数字到现在还搞不很清楚。但原来报的八万五千人的数字显然是多了,估计三万多人,最多不会超过四万人。

水灾发生时,人们对死亡人数估计得很多。原因是当时看到京广路以西的遂平、西平等县大部分被洪水洗劫一空,看不到人烟;京广路以东的十几个县在洪水包围之中,电讯中断。所以有人估计要死几十万,甚至上百万。八月十二日,遂平县委书记李天寅在向中央慰问团汇报时说:全县四十六万七千人,初步统计死十六万人。八月二十日,省委有个初步统计数字,说全省死亡八万五千六百多人,连同外地在灾区死亡的人数在内,最多不超过十万人。当时省委说,这个数字比较准确。所以中央慰问团在给毛主席、党中央写的关于河南、安徽灾情报告中,用了这个数字。

这次记者在河南、安徽灾区访问中,又对人口死亡数字作了进一步了解。对这次水灾总的死亡人口数字,尽管说法不一,有的说三万,有的说四万,有的说五万,但总的看来,说死亡八万多的数字是多了。原因是有些群众被洪水冲走了,有的冲得很远得救了。得救后因洪水没有下去,就地暂时安置了一下。现在洪水下去了,交通恢复了,基本

都回来了。

据记者了解,这次洪水死人最多的是驻马店地区。其他几个地区因洪水来时干部和群众思想上已有所准备,加上抢救得及时,所以死人不多。周口地区死了五百多人,许昌地区死了三百一十四人。驻马店地区上游的板桥、石漫滩两个大型水库垮坝,洪水来势猛,群众思想没有准备,所以死人较多。其中,板桥水库下游的遂平县死人最多,占死人总数的百分之九十以上;其次是石漫滩水库下边舞阳工区的两个公社。因此,把遂平县死人的数字搞清楚了,整个灾区死人数字也就基本上清楚了。而遂平县死人又都是集中在文城、阳丰、诸市等六七个公社。现在,遂平县各社队上报给县里的数字是死亡两万二千多人;舞阳工区两个公社死亡二千多人。据我们典型调查和遂平县委的分析,遂平县死亡人口不止二万二千人,可能是两万五千到三万人。加上其他地区,这次水灾中总共死亡估计可能是三万多人,最多也不会超过四万人。

驻马店地委负责人分析,这次洪水死人可能是三到四万人。但他们不主张现在再逐个核实。原因是现在群众情绪刚刚安定下来,一去核实死亡人口,又会勾起群众思念亲人的情绪。

80 年代初,纪登奎从中央领导岗位下来之后,到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工作,记者张广友和他经常见面。有一次在闲谈中,他们说起那次水灾不让公开报道的事儿,纪登奎说:“不叫公开报道是怕产生副作用,影响稳定;那个时候正是毛主席和周总理重病期间,不让公开报道,也是怕他们受刺激,内部报道也只能选择极少量给他们看,这种内部报道不会给他们看的。”

卫生部、解放军总后勤部及全国各地市的 198 个医疗卫生部门先后抵达灾区。空军从 9 月 1 日至 6 日连续出动飞机 248 架次,喷洒可湿性“六六六”粉 248 吨,覆盖了宿鸭湖以西 250 平方公里的地区。

郑州家家户户都在为灾民烙饼,然后空投到灾区。当时政府发的救灾粮全是白面,听说有人在烙饼中掺了杂粮,据说拆包抽查,结果没有一张烙饼掺有杂粮,却发现不少饼内有鸡蛋。可是政府并没有发鸡蛋呀。

郑州肉类联合加工厂动员大家给灾区捐些旧衣物,不要新的,也

不要捐钱。结果厂里一位姓程的工人特地做了一床新棉被去捐,被拒收。结果他和工作人员吵了起来,非说这床棉被是旧的,闹到厂革委常委袁庚华那里。袁庚华也知道这是床新棉被,但实在不忍心辜负这位工人的一片热心,就说是旧的,收了下来。

毛泽东身边的护士孟锦云为他读河南水灾的情况。当读到河南×县有成百上千的人仍处在危难之中,解放军的大队人马已赶到求援,但已有几十人丧生,几千人离乡背井时,小孟听到了抽泣声,她很奇怪,也很害怕,马上放下正在读着的报纸,走到毛泽东面前,急切地问:“主席,您怎么了。”

只见毛泽东眼睛里饱含着泪水,极为伤心的样子。小孟赶紧拿起沙发旁小桌子上的消毒毛巾,给他揩揩眼泪。

毛泽东说:“没事儿,你接着读报,我这人感情越来越脆弱了。我一听到天灾人祸,就忍不住伤心。”

1975 年 11 月下旬,水电部在郑州召开全国防汛和水库安全会议,会议由钱正英主持。他说:“对于发生板桥、石漫滩水库的垮坝,责任在水电部,首先我应负主要责任。我们没有把工作做好。主要表现在:首先是由于过去没有发生过大型水库垮坝,产生麻痹思想,认为大型水库问题不大,对大型水库的安全问题缺乏深入研究。二是水库安全标准和洪水计算方法存在问题。对水库安全标准和洪水计算方法,主要套用苏联的规程,虽然作过一些改进,但没有突破框框,没有研究世界各国的经验,更没有及时地总结我们自己的经验,做出符合我国情况的规定。三是对水库管理工作抓得不紧,对如何管好用好水库,对管理工作中存在什么问题缺乏深入的调查研究;有关水库安全的紧急措施,在防汛中的指挥调度、通讯联络、备用电源、警报系统和必要的物资准备,也缺乏明确的规定。板桥、石漫滩水库,在防汛最紧张的时候,电讯中断,失去联系,指挥不灵,造成极大被动。四是防汛指挥不力,在板桥、石漫滩水库垮坝之前,没有及时分析、研究情况,提出问题,千方百计地采取措施,减轻灾情,我们是有很大责任的。”

“板桥、石漫滩水库工程质量比较好,建成后发挥很大效益。但因兴建时水文资料很少,洪水设计成果很不可靠。板桥水库在 1972 年发生大暴雨后,管理部门和设计单位曾进行洪水复核,但没有引起足

够的警惕和相应的措施,所以防洪标准实际上很低。”

“由于事前没有考虑特大洪水保坝的安全措施和必要的物资准备,在防汛最紧张的时候,电讯中断,失去联系,不能掌握上下游讯情,不能采取果断有效的措施,也没有及早向下游遂平县发出警报,组织群众安全转移。”

洪水过后的京广铁路

# 第1361回：《献国策》，李天德质疑文革 告迟群，清华刘冰等上书

1975年8月13日，四川雅安的一名年轻人李天德投寄《献国策》的政论文。文章共分12条：1、节制生育，控制人口；2、缩小工农和城乡差别；3、为农业人口提供福利；4、教育革命问题；5、知青下放问题；6、医疗卫生问题；7、干部问题；8、纠正歪风邪气；9、刑法、定罪、治安问题；10、重新认识三面红旗、文化大革命、教育革命等问题；11、领导的任期与功过问题；12、关于共产主义社会的讨论。

对文化大革命，李天德在《献国策》中写道：

“关于文化大革命，坏处大大超过好处，(A)我们的许多好干部受到林彪一类的迫害；(B)我们的人民遭到前所未有的愚弄，受了坏人的唆使，像仇人一般互相厮杀；(C)让林彪一类大小坏蛋捞了便宜。小坏蛋搞打、砸、抢、抄、抓、奸淫；大坏蛋搞阴谋诡计、篡党、夺权搞法西斯主义。为一切仇杀、个人报复大开绿灯；(D)国民经济遭到建国以来仅次于‘自然灾害’年的空前破坏。中央当然不可能知道文革期间全国工农业产值的真实数目；(E)在精神道德方面，由于林彪搞的神秘主义、宗教迷信、极权崇拜，使人们变的不诚实、伪善、奸猾。”

李天德在上访人员接待站被捕，不久即被判处有期徒刑20年。

也是在8月13日，四川雅安李天德投寄《献国策》的当天，北京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惠宪钧、柳一安和校党委常委、政治部主任吕方正4人联名给毛泽东写信，反映清华大学党委书记迟群的问题。

清华大学自1968年7月27日工宣队进驻后，迅速制止和结束了清华大学的武斗，逐渐恢复并稳定了学校相对正常的生活秩序。从此，工宣队开始行使清华大学领导权力机构的全部职能，按照毛泽东“教育革命”的思想和理论，直接实行了对知识分子群体的领导、监督、改造和管理。当时工宣队总指挥是8341部队副团长张荣温。

在中国历史上，像工宣队这样一支直接从事“管理”知识分子和专

门进行“改造”知识分子的社会集体,可以说是独一无二的。他们首先要面对的是那些曾作为清华文革主力的青年学生。怎样对这些青年学生、文革中的闯将进行管理?工宣队按照毛泽东当时的一些指示,首先举办各种学习班,并通过学军、学农、学工等方式,对这些青年学生进行“再教育”,改造他们在旧的教育制度下所受到的资产阶级影响。于是,这些昔日被视为文革“天兵天将”及“革命小将”的青年学生几多心酸的感叹道:我们“革命小将是认不完的罪,站不完的队,写不完的检查,流不完的泪。”他们还用当时畅销的自行车品牌来描述学校不同阶层人的状况和心绪:“军代表是‘无敌’牌,工宣队是‘凤凰’牌,教师们是‘永久’牌,而我们是‘飞鸽’牌。”

这些青年学生是否想到当年他们造反批判别人时,是何等的意气风发,豪情万丈。如今轮到自己被管理,被教育,被批判,又是如此的沮丧。

1968 年底至 1969 年初,在校的 60 届至 63 届四届学生,除数百名学生因政治问题及文革中的表现问题被暂缓分配外,其余的一起毕业,分配工作。这四届学生一走,清华在校学生一下子减少一大半,而暂时还在学校的 64、65 两届学生在经过农场、部队、工厂的“锻炼”和“改造”后,也于 1970 年夏季毕业,走上工作岗位。于是,清华大多数的青年学生告别了他们自己曾叱咤风云甚至扭转文革形势的母校,真正成为接受工农兵群众“再教育”而“被改造”的对象。

干部政策逐步开始落实。清华大学原副书记刘冰于 1969 年 6 月“解放”,闲置一段时间后于 1970 年 1 月再次出任副书记。当时任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的还有率工宣队进校的 8341 部队政治部宣传科副科长迟群,位置排在刘冰之前。学校的党委书记是中央办公厅副主任杨德中,革委会主任是中央警备团副团长、8341 部队的张荣温,他同时还兼任校党委副书记。革委会副主任是海军后勤部副参谋长刘承能。

1970 年底,张荣温调回部队。1971 年下半年,杨德中也不再兼任清华大学党委书记。1972 年春天,海军的刘承能也调走了。于是,迟群任校党委书记和革委会主任,同时兼任国务院科教组副组长。

和迟群一起进入清华大学的 8341 部队译电员谢静宜,此时也由之前的党委常委提升为党委副书记、革委会副主任。后来又担任了北

京市市委书记。刘冰也担任了清华大学的常务副书记。清华大学原领导何东昌、胡健等也已“解放”,二人任学校党委副书记。

谢静宜的能力远不如迟群。二人都是8341部队来的,关系比较好。但是,在党的“十大”上,谢静宜当选为中央委员,迟群却不是。于是,迟群认为是谢静宜在毛泽东那里告了他的状,回来后就闹开了,经常无故找茬和谢静宜吵骂,还时常酗酒闹事。一次夜间,迟群为了找谢静宜闹事,竟在谢静宜的门口撒尿。影响极坏。清华大学党委的其他领导没有办法,只好找人把迟群看住,不许他出院子。

党委几个领导十分着急。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卫戍区警卫一师作训科科长惠宪钧和清华大学政治部主任、党委常委吕方正,他们两人都是军人,找到常务副书记刘冰,商量怎么办?最后觉得,还是把1968年“727”进驻清华时的工宣队负责人之一,来自北京市建工系统的柳一安叫回来。此时柳一安正在学部担任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主要负责人、学部领导小组组长,他一直看不惯迟群的跋扈作风,对迟群的所作所为早有不满,社会上对迟群的非议他也听到了许多。

当时学部也受国务院科教组领导,迟群是他们的上级。柳一安觉得在迟群这样的人手下工作,很是苦恼。1975年6月,他患了严重的失眠症。常常睡不着觉的柳一安便经常和平时谈得来的国务院教科组的干部、曾随他一起到学部工作的李兆汉及清华大学政治部干部任彦申在一起聊天,以排解心中的烦恼。

说到迟群,他们3个人的看法竟是出奇的一致,都觉得迟群人很聪明,但心术不正,是一个野心家。

柳一安说:“我想找迟群当面谈谈……”

“不行,不行。”李兆汉打断他,“迟群在清华大学一手遮天,称王称霸,你单枪匹马地和他斗争肯定不行。在清华领导班子内部反对迟群的人是多数,但敢怒不敢言,没有上级领导的介入解决不了迟群的问题,惟一可行的是向毛主席、党中央反映迟群的问题,在中央的过问下,问题才会得到解决。”

任彦申也觉得李兆汉说得有道理。

柳一安回到清华大学,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惠宪钧和校党委常

委、政治部主任吕方正跟他讲起迟群的情况,对他说:“迟群现在大吵大闹,对工作不管不问。他这么闹下去,我们怎么工作?在教职工中的影响怎么挽回?这样下去是个什么结局?”

听了惠宪钧和吕方正的介绍,柳一安也认为是要想办法解决,最好能把他调回8341部队。他们想和谢静宜商量一下,一起向8341部队的领导杨德中反映迟群的情况,让杨德中将他调回。后来觉得此议没有把握,因为杨德中是工宣队进驻清华后的第一任党委书记,迟群是副书记,当时迟群就不把杨德中放在眼里,杨德中能把迟群调回去吗?他们决定还是先跟迟群谈谈,希望他能有所收敛。

于是,3人来到国务院科教组迟群住的地方,跟他正式谈了一次。他们对迟群说:“你跟谢静宜这么闹,而且酗酒、吃安眠药这么折腾,对学校影响很大,这样就造成我们在工作上非常被动,这样下去是绝对不行的,所以你必须注意这事。”

迟群还听得进去。他说:“我就出不了这口气,我为什么当不了中央委员?”

迟群还请他们在他那儿吃了顿饭。他们3人对迟群的态度还挺满意。

但是过后,迟群依然是照闹不误。

他们3人又去找刘冰,4个人干脆把迟群和谢静宜召在一起,正式谈一谈。在会上,刘冰他们4人劝迟群和谢静宜二人要搞好关系,“教职工对我们有反映,你们两个关系不好,这对全校就是全局问题”

他们还劝迟群说:“你对谢静宜有意见,你们可以交换意见嘛。”

谢静宜当时表态说:“我做得不对,但是我不是要干预你当什么人,这不是我的事,你这么闹,这不是我愿意的,也不是我告你的状,我们工作这么长时间,你还不知道。”

但是后来,两人说着说着又吵起来了,打得不可开交。没办法,惠宪钧只好说:“算了、算了,我们打扑克吧。”迟群爱打扑克,几个人陪他打了会儿扑克,这才岔开了俩人的争吵。

这次正式的集体谈话也没有奏效。

7月上旬,柳一安找到惠宪钧和吕方正,说:“干脆直接给毛主席写信吧,向毛主席反映。”

惠宪钧和吕方正也都同意,认为作为一个党员向党的主席反映情况是应该的。同时,他们觉得,他们3人都是1968年7月作为工宣队和军宣队的成员进驻清华的,此事还应该征求一下清华大学的老干部、老副书记刘冰的意见,最好有他一起参加,这样影响才大。

1975年7月下旬的一天,北京市委在全国政协礼堂召开各单位负责人会议。会议休息的时候,惠宪钧、柳一安、吕方正将刘冰拉到休息厅的座椅上,向他通报了他们3人的想法:

"老刘,我们3个人经过慎重考虑,决定给毛主席写封信反映迟群和谢静宜的问题。"

"哦!"刘冰一惊。

"迟群的问题很严重,如果不反映,我们就是犯错误,对不起毛主席,也对不起共产党员的称号。你是老同志,我们信得过你,想听听你的意见。"柳一安说完后就目不转睛地看着刘冰。

刘冰欣然答道:"我同意。"并说:"如果你们相信我,我来牵头。"

见刘冰不但支持给毛泽东写信,还表示愿意牵头,柳一安等人都非常高兴。

政协礼堂的干部会后,当天晚上,他们4人就在惠宪钧的办公室里热烈地讨论起来。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商定了信的原则和主要内容:迟群、谢静宜的问题,要以迟群为重点;不要涉及教育问题,以免牵涉到毛主席的教育路线;要抓主要问题,要实事求是,要经得起历史的检验;主要反映迟群的政治野心,没有党的观念,破坏党的民主集中制,任人唯亲、违反党的干部政策,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等问题;这些问题都要注意分寸,留有余地,用事实说话。稿子写好后,标题再斟酌。信稿由吕方正执笔,集体推敲修改,最后由刘冰修改定稿。

他们还要单独写一份关于迟群问题的材料作为信的附件一并呈毛泽东主席。并商定,为了保密,草拟信稿要在晚上8点钟以后,在主楼接待厅进行。

为了尽快拟就初稿,他们让吕方正利用他将要调回部队的机会,回到家里集中时间赶写。

3天后,吕方正将草拟的信的初稿以及《关于迟群问题的材料》拿了出来。他们4人又用了两个晚上集体研究,逐条推敲,着重把事实

说清、说准,不说虚话、大话。最后刘冰又用一个晚上改了一遍。第二天,他们到惠宪钧的卫戍区一师招待所,字斟句酌地又改了一遍,唯恐有什么闪失。

之所以去一师招待所,还是为了保密。惠宪钧将情况向一师师长田占魁、副参谋长马清沅说明后,二人非常支持,立刻嘱咐招待所腾出专门房间,派出专门人员热情接待,并准备午餐。

8月的一天下午,清华大学教改处的负责人夏镇英找到刘冰兴冲冲地说:“刘冰同志,我今天去市委听传达,是8月3日邓小平在国防工业重点企业会议上讲话。小平同志在讲话中专门讲了对科技人员的政策。”

“怎么讲的?你详细说说。”刘冰一边示意夏镇英坐下,一边问。

“小平同志说要发挥科技人员的积极性,要搞‘三结合’,科技人员不要灰溜溜的。不是把科技人员叫‘老九’吗?毛主席说‘老九不能走’。这就是说,科技人员应当受到重视。他们有缺点,要帮助他们,鼓励他们。要给他们创造条件,使他们能够专心地研究一些东西。这对于我们事业的发展将会是很有意义的。”

北京市委要求传达邓小平的讲话,夏镇英向刘冰做了转达。一个小时后,刘冰主持校党委扩大会,由夏镇英在会上传达了邓小平的讲话精神。

这天夜里,迟群、谢静宜回到清华,知道了此事。第二天上午,谢静宜来到刘冰的办公室,大声责问道:“你昨天下午传达邓小平的讲话,为什么不先告诉我一声?我和迟群都告诉过你,凡是中央领导人的讲话,向下传达要经过我们,你为什么不先告诉我们?”

说这番话的时候,谢静宜满脸怒气,脖子上的青筋都鼓了起来。她反复说:“我们不是没有告诉过你,你为什么急着传达?”

刘冰不服,和谢静宜顶了起来,大声说道:“邓小平同志是党中央副主席,他的讲话为什么不能传达?而且这个讲话是北京市委在专门会上布置、让传达到各单位党委的。你是市委书记,应该遵守市委的纪律。市委规定要传达,为什么我不可以传达?为什么要经过你们才能传达?难道对党中央副主席的讲话,我这个主持党委常务工作的副书记没有权力和义务进行传达?”

刘冰的反驳无懈可击,谢静宜只好说:“不是说你不可以传达,而是说应当先告诉我们一下。”

刘冰说:“传达以后再告诉你们也可以吧?你为什么对传达这样恼火?难道就是因为事先没有告诉你?”

谢静宜无言以对,把头发一甩,扭头走了。

此时已是中午12时,刘冰走出办公室,在院子里迎面遇到迟群,两人都没有打招呼,径直走了过去。当天晚上,刘冰找惠宪钧、柳一安、吕方正,通报了上午他和谢静宜冲突的情况。

惠宪钧、柳一安和吕方正听刘冰介绍完情况,都坚定地支持刘冰。

柳一安说:“你顶得好!就是要她谢静宜知道,违犯党的原则是不行的。”

吕方正说:“在原则问题上不能让,咱们对谢静宜认识还不够。”

惠宪钧说:“她是帮迟群的。”

柳一安说:“干脆这封信把谢静宜也挂上。”

刘冰说:“咱们还是按原先商定的,对谢静宜和迟群有所区别,集中反映迟群的问题。”

这次冲突加快了他们上书的进程。信定稿后,如何送给毛泽东呢?

“请小平同志转。”刘冰说,“邓小平是副主席,正在主持工作,只要他能在我们的信上批‘送主席’3个字就行。”

大家都表示赞成。于是信的抬头写:“小平同志转呈主席”。

接着又研究如何能把信送到邓小平手里。刘冰想到了胡耀邦,他1953年到1956年曾在团中央负责办公厅的工作,那时胡耀邦是团中央第一书记,他们经常接触。1974年刘冰去看望胡耀邦时,他还问到过迟群、谢静宜的情况,认为这两人年纪轻是优势,但太骄傲,狂得很。刘冰觉得,请胡耀邦把信转给邓小平应该是比较可靠的。刘冰说出了他的想法,其他3人完全赞成。

他们还认为,按组织关系,北京市委是清华大学的直接领导,迟群的问题也应该报告市委第一书记吴德和市委科教组。但考虑到谢静宜也是北京市委书记,他们决定在给毛泽东的信发出一周后,再报告市委,这样既保了密又不失组织原则。

# 第1362回：传信件，胡耀邦热情援手 读古文，毛泽东评论《水浒》

一切准备妥当之后，刘冰给胡耀邦家里打电话，胡耀邦不在家，是夫人李昭接的电话，说他到科学院上班去了。刘冰说“有急事要找耀邦面谈，看什么时候合适？”

李昭说：“明天是星期天，你下午4点钟到家里来好了。”

第二天，刘冰准时来到胡耀邦家，但是胡耀邦、李昭和子女都不在，只有一位老保姆看家，她将刘冰领到书房里。

“星期天还上班呀？”刘冰问。

老保姆说：“耀邦、李昭星期天都上班。耀邦中午也不回来，带个饭盒，让人给热热就当午饭了。他呀，对自己严格啊！”

“啊！刘冰来了！”是胡耀邦的声音，人还没进屋，声音已经到了。

刘冰说：“四点钟我就来了，你星期天还上班？”

胡耀邦道：“有事就上班嘛！你有什么事？”

刘冰也开门见山，说：“有关迟群、谢静宜的问题。”

然后，他概略讲了一下这两个人的问题，说明他们想请胡耀邦帮忙将信送给邓小平转呈毛泽东。

胡耀邦问：“你写给主席的信，带来了没有？”

刘冰一边回答“带来了”，一边从口袋里拿出信稿说：“你看看行不行？”把信交给了胡耀邦。

胡耀邦戴上老花眼镜，把信仔细看了一遍后说：“你们的信要实事求是，要注意用事实说话。”

刘冰说：“耀邦同志，您说得对，我们特别注意了用事实说话。”

胡耀邦说：“你们信中的‘装疯卖傻’、‘乱蹦乱跳’，这些就是形容词，是空话嘛！”

刘冰解释说：“这不是形容词，他当时的具体情形就是这样，只能用这样的词，才能描述他的真实情况。”

胡耀邦说:“只要符合实际就行,切记不要说空话。”他接着说:“我支持你,能帮助就帮助你。我现在是科学院的负责人,你是清华大学的,和咱们在团中央时不一样,不属于一个组织系统,从这一点上说,我帮你转信不合适。我告诉你小平同志家的地址,你可以自己直接送去,这样更好。”

刘冰说:“小平同志不认识我,那怎么行呢?”

胡耀邦说:“你与南翔在清华,名字他会知道的。”

刘冰说:“事先没有联系,猛然到门口,让哨兵给捉起来,那才不好呢!”

胡耀邦笑了,接着问刘冰:“你从邮局给他寄去,行吗?”

刘冰说:“那样不牢靠,怕弄丢了。”

胡耀邦想了想说:“这样吧,你给小平同志的秘书打个电话,问问他信怎么送。”

胡耀邦将邓小平秘书的电话号码告诉了刘冰,刘冰当即拨通了电话。正好是邓小平的秘书王瑞林接的。刘冰将自己的单位、职务、姓名及送信的事讲了。

王秘书很客气,他说:“你的信可以送国务院。”

刘冰说:“我没有中南海的通行证,送不到国务院。”

“你从邮局寄也行。”

“我怕信件遗失。”

“那不会的,你寄好了。”

刘冰不好意思再和王瑞林讲下去了,对他表示感谢,把电话挂了。

刘冰打电话时,胡耀邦一直站在电话机旁边,看他放下电话,便问:“王秘书最后怎么说?”

“他还是要我从邮局寄。”

“那你就寄嘛!”

“不能寄,我不放心。”

“我看你还是直接送他家里,这最保险。我告诉你,他住在XX街XX号,门前面是个小胡同。你大胆些,怕什么!”

这时已是下午18点多钟了,刘冰不好意思再打扰他,便说:“耀邦同志,我就按您说的去办吧!谢谢您。”便和胡耀邦握手告辞了。

出了大门,坐在车子里,刘冰又犹豫了,这样贸然去邓小平家还是太冒失了,先回学校再说。他让司机拐了个弯,返回了学校。

路上,他忽然想到通过警卫部队是个办法。但是,邓小平家的警卫部队是8341,还是卫戍区部队?不管是哪个部队,要有熟人才行啊……他反复思索着,车子到家门口停了下来,他还坐在车上,仿佛什么都不知道。在司机提醒后,他才知道到家了,一进门就给惠宪钧打电话,要他们3人晚上20时在惠宪钧的办公室等他。

晚上4人见面后,刘冰先说了见到胡耀邦和给王瑞林秘书打电话的情况,然后讲了他在车上考虑的送信办法。大家都同意通过警卫部队送信的方法。惠宪钧说:“我先打电话问问那里是不是我们师负责警卫,如果是就好办了。”

惠宪钧当即给警卫一师副参谋长马清沅拨了电话。当马清沅得知是送信的事,立即热情地告诉惠宪钧,邓小平家正是一师负责警卫,可以把信直接送去。随后,他就让值班室把惠宪钧去送信的事通知了那里的警卫部队。为了更落实,马清沅又亲自给那里的警卫排排长打了电话。一切安排妥当后,马清沅就让惠宪钧次日上午9时准时赶到那里,还提醒他“要穿军装,军容风纪要严整,要告诉警卫人员,你是师部的,在清华支左,来这里送信,他们会接待你的。”

第二天,惠宪钧衣帽整齐,驱车准时赶到邓小平住宅门前。下车后,警卫人员礼貌地问了他姓名,引他到接待室。一位排长热情地接待了他,并说副参谋长昨晚打过电话。惠宪钧表示感谢,把信交给了他。那位排长旋即送进院里去了。过了不久,他满面笑容地回到接待室,对惠宪钧说:“王秘书正在忙,让我转告清华的同志,现在邓副主席在中央开会,中午回来就把信交给他。”

惠宪钧这时感到是一块石头落了地,想到邓小平今天就能看到他们的信,高兴得没法说了。

给毛泽东的信送出之后的第九天,刘冰和惠宪钧按照原定计划到北京市委,向市委科教组组长肖英和军代表作了汇报。汇报结束后,刘冰诚恳地说:“这件事对清华大学关系重大,请你们向市委汇报,我们希望市委第一书记吴德能接见我们。”

肖英也不无诚恳地说:“我们要把记录整理一下,会马上向市委领

导汇报的。市委有什么意见和指示我们一定及时转告你们。”

此后,他们就天天盼望着毛泽东他老人家的消息,盼望着吴德的接见。那心情,真如盼星星、盼月亮一样,焦急地等啊,盼啊,然而一直没有音信。

8月的一天,周恩来头脑比较清醒。他叫高振普拿来纸和笔,半靠在病床头,请医生和护士们退到病房外,这是他住院后从未有过的现象,也是他住院期间仅有的一次。

室内只剩下邓颖超和高振普两人。高振普帮周恩来坐稳后,知道他要写东西,正准备转身退出,周恩来叫住他,说:“不用出去。”

这时的周恩来已不能长坐,必须有人扶着他,所以留下了高振普。只见周恩来左手托着放好纸的木板,右手开始颤抖着写字。

邓颖超见状,便对他说:“你口述,我代你写。”

周恩来头也不抬地回答说:“不用了,还是我亲自写。”

高振普看见周恩来是在给毛泽东写信,提议由邓小平代替自己担任的国家和党内的职务。他将信写好后交给了邓颖超,让她转交中央,并向邓小平通报了信的内容。

为毛泽东陪读的北大老师芦荻从教的专业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主要的分工段恰好是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对这段文学的发展、创作和社会文化背景比较熟悉。自中唐以来,士大夫对魏晋南北朝的评价,除其间的书法、绘画和个别作家外,大多持批判的观点。北宋的大作家苏轼在他的《潮州韩文公庙碑》一文中,曾赞美韩愈所说的“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八代,指东汉、魏、晋、宋、齐、梁、陈和隋。“文衰”、“道溺”四字,可说是对魏晋南北朝批判观点的高度概括。这种批判观点,后来成为传统的定见,并一直为后世所承袭,直到新中国成立之后。

毛泽东不赞成这种因袭和定见。6月18日,他让芦荻找出苏轼的这篇文章,读给他听。他边听边摇头,说,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大动乱,大分裂,这不好,但当时的另一个方面是,南方的广大沃土,全面地得到了开发,生产技术普遍提高了。这是经济上的发展。说罢,他用右手按下半抬着的左手的一个手指。又说,许多少数民族,纷纷入主中原后,战乱频仍,南北对峙,这不好,但民族大融合,大家庭在新的组

合中稳定了,文化也交流了,丰富了。他还谈到当时的一些历史细节,说:谢安文韬武略,又机智又沉着,淝水之战立了大功,拖住桓温也立了大功,两次大功是对维护统一的贡献。桓温是个搞分裂的野心家,他想当皇帝。他带兵北伐,不过是做样子,扩资本,到了长安,不肯进去。苻秦的王猛很厉害,一眼就看到了他的意图。这是政治、文化方面的发展。说罢,他又按下第二个手指,说到文化思想。毛泽东非常激动,他说: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结果汉代只有僵化的经学,思想界死气沉沉。武帝以后,汉代有几个大军事家、大政治家、大思想家?到东汉末年,儒家独尊的统治局面被打破了,建安、三国,出了多少军事家、政治家啊!连苏轼自己在他的《念奴娇赤壁怀古》中也说:"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毛泽东还说:汉末开始大分裂,黄巾起义摧毁了汉代的封建统治,后来形成三国,还是向统一发展的。三国的几个政治家、军事家,对统一都有所贡献,而以曹操为最大。司马氏一度完成了统一,主要就是曹操那时候打下的基础。诸葛亮会处理民族关系,他的民族政策比较好,获得了少数民族的拥护。……这是他的高明处。又说:其实,魏晋南北朝时代是个思想解放的时代,道家、佛家各家的思想,都得到了发展。嵇康的《与山巨源绝交书》、阮籍的《大人先生传》很有名。玄学的主流是进步的,是魏晋思想解放的一个标志。正因为思想解放,才出了那么多杰出的思想家、作家。说罢,毛泽东不禁又按了另一个手指,而且还大笑着说,什么"道溺"!我送那时两个字,叫"道盛"!关于魏晋南北朝时代的文学创作问题,毛泽东谈得最多。他说:苏轼说那时期"文衰"了,这是不符合事实的。可以把那时的作品摆出来看一看,把《昭明文选》、《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拿出来看一看,是"文衰"还是"文昌",一看就清楚了。他又大笑着说:我再送给那时两个字,叫"文昌"。

在中南海期间,毛泽东让芦荻给他读的作品,大部分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诗文。毛泽东畅论魏晋的风流,赞扬曹氏父子的诗文,高度肯定曹丕的《典论 论文》,还背诵过曹丕的七言长篇《燕歌行》,认为在那时的七言诗中算是一篇佳作了。他更赞赏陆机的《文赋》,说曹、陆的这两篇文论,标志着文学创作新的里程碑和文学理论发展中质的飞跃。还说《文赋》的"诗缘情而绮靡",更揭示了诗歌创作的根本问题,

大大地发展了“诗言志”的口号。他认为,陆机能如此理解诗体,能提出“缘情”的命题和辞采华美的要求,这正是由魏晋以来文人诗歌创作的丰富实践所提供的时代认识,也是陆机个人辛勤创作的实践之心得与体会的结晶。因此,他不同意杜甫的“陆机二十为文赋”的断语,认为20岁的小青年,实践没那么丰富,是提不出如此成熟的诗论的。

论及魏晋南北朝文学创作的丰硕成果时,毛泽东多次谈论谢灵运和他的山水诗。他说,山水诗的出现和蔚为大观,是文学史上的一件大事。优秀的唐人诗作中,就有很多脍炙人口的山水诗。说着,他击节吟咏了李白的《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登高壮观天地间,大江茫茫去不还。黄云万里动风色,白波九道流雪山。”他说,这样的山水诗真是诗中的瑰宝。但是,如果没有魏晋南北朝人开辟的山水诗园地,没有谢灵运开创的山水诗派,唐人的山水诗,就不一定能如此迅速地成熟并登峰造极。因此,他认为,就此一点,谢灵运也是“功莫大焉”!又说,连李白都称赞谢灵运的“余霞散成绮,澄江静如练”,并“一生低首谢宣城”,为什么苏轼辈却大叫“文衰”了呢?

从多次有关魏晋南北朝作家作品的谈话中,可以看出毛泽东对隐逸、对乱世之中高蹈自洁等处世思想是不赞同的。对于一些热衷功名、攀龙附凤失败,却又故作清高的态度和文字,更是嘲、批有加。

起初,讲古代诗词,芦荻得心应手。多年来,她潜心研究中国古代诗词。毛泽东点什么诗词,她便可背出,并作讲解。毛泽东点古代散文,芦荻也还算能够应付。

可是,毛泽东涉猎面广。有时,要她读《二十四史》,那已越出了她的专业范围,她很生疏,有许多生僻的古字念不出来。这时,她往往停顿下来。毛泽东催促道:“念呀,念下去呀。”她只得如实说,遇上不认识的字,要查字典。不料,毛泽东随口说那字该怎么念,并大笑起来。芦荻一边深感自己学识不够,一边非常佩服毛泽东渊博的知识。

毛泽东对《鲁迅全集》很有兴趣。芦荻并不熟悉鲁迅的著作,只得赶紧借来成套《鲁迅全集》钻研起来。有一次,毛泽东记起来,鲁迅曾说过,烂苹果只消挖掉烂了的部分,仍然可以吃。他要芦荻查这句话出自鲁迅的什么文章。芦荻费了很大劲才算查到了原文。

有一天,张玉凤对芦荻说:“芦荻老师,主席说了,你也是教师,你这个教师一定是学富五车,是满腹经纶。”

芦荻说:“怎么会呢?”

张玉凤说:“主席说,因为你没有任何问题嘛。”

芦荻赶紧解释说:“不是的,我有很多问题想问主席。我学识很浅陋,基础也不好,大学没毕业我就工作去了,就到了解放区,我还正在学习之中,我有很多问题。”

张玉凤说:“那你怎么不提呢?”

芦荻说:“张秘书,我不是不能问吗,不是有纪律吗?”

张玉凤说:“没有,主席说你为什么不提问题,他觉得很奇怪,你怎么不向他提问题呢? 主席一贯的风格都是喜欢人家提问题的。”从这以后,芦荻每次和毛泽东谈话,都会问一些文学上的问题。

1975 年 8 月 14 日凌晨 2 时,芦荻接到毛泽东秘书的电话,说是要她过来读书,芦荻迅即前往毛泽东住处。像往常一样,毛泽东又跟芦荻聊起了古典文学问题。那天,芦荻和毛泽东谈起几部古典小说的评价问题。毛泽东先讲了《三国演义》、《红楼梦》,然后谈到了《水浒》。

当毛泽东提及《水浒传》时,芦荻猛然记起一桩往事:1974 年,《北京日报》一位负责人解玉珍忽然来到了北大,向中文系约写一篇评论《水浒传》的文章。约稿时,定下了调子,说《水浒传》“只反贪官,不反皇帝”,让北大就按这八字精神写。北大中文系明白这是上面的精神,猜想很可能是毛泽东说的话,但问解玉珍更详细的情况,她也不说。

当时,北大中文系正在写中国古代小说史,建国以来,一直是把《水浒传》当作农民起义的教科书来看,学术界向来对《水浒传》评价颇高。现在又说它“只反贪官,不反皇帝”。中文系的老师不得要领,三易其稿,还是没能通过。

这时,芦荻就问道:“主席,讲《水浒传》‘只反贪官,不反皇帝’,这八个字是您说的吗?”

毛泽东在床上哈哈大笑起来,把手一举,像孩子一样兴奋地对旁边的张玉凤说:“对吧,小张,那就是我在武汉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是我讲的呀,就是我讲的,就是鄙人讲的。”

张玉凤证实说："64年在武汉我看《水浒》时，主席就对我讲过：宋江是投降派，搞修正主义。招安就是投降，替皇帝办事。"

芦荻说："主席，我们真是猜测是你讲的，但是我们真的领会不了那个意思，那究竟这书还有什么好处呢？"

毛泽东大笑以后就晃着脑袋说："好啊，还是好得很啊，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

芦荻问："主席，这是什么意思，怎么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

毛泽东说："这部书宣传、宣扬投降主义好啊，那么今天你能够知道怎么由于投降，由于起义队伍的带头人投降了以后，使得这个队伍瓦解了，了解这个全过程，这就是一个教科书啊，你上哪里去找啊，这不好吗？不然你知道宋代的一个农民起义队伍都怎么死的？你们以为就是血腥镇压的嘛。你看看，就内部的瓦解，内部的叛变，就葬送了这只非常优秀的起义队伍。"

芦荻忙于记录。她觉得毛泽东的见解，颇为深刻。她只是从学术的角度，理解毛泽东的话。张玉凤毕竟是秘书，她从秘书的角度考虑问题。她以为，毛泽东的话就是指示。于是，她问毛泽东：

"主席，要不要通知出版界，把百回本的《水浒传》印出来？"

毛泽东答道："好。"

这时，张玉凤便对芦荻说："芦老师，你把主席的指示写一下吧。"

芦荻把毛泽东关于《水浒传》的谈话，择其主要观点，按照记录原文整理出来：

"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

"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摒晁盖于一百零八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宋江同高俅的斗争，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腊。

这支农民起义队伍的领袖不好，投降。李逵、吴用、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是好的，不愿意投降。

鲁迅评"水浒"评得好，他说："一部'水浒'，说得很分明：因为不反对天子，所以大军到，便受招安，替国家打别的强盗 - - - 不'替天行

道的强盗去了,终于是奴才。”(《三闲集流氓的变迁》)

金圣叹把《水浒》砍掉了二十多回。砍掉了,不真实。鲁迅非常不满意金圣叹,专写了一篇评论金圣叹的文章《谈金圣叹》。(见《南腔北调集》)

《水浒》百回本、百二十回本和七十一回本,三种都要出。把鲁迅的那段评语印在前面。

芦荻把毛泽东的讲话整理出来后,经张玉凤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看后表示:“可以。”

毛泽东的关于评《水浒传》的谈话,要交宣传出版部门执行。于是,汪东兴把毛泽东关于《水浒》的谈话记录报送主管宣传工作的姚文元。

# 第1363回：陈永贵，对农村“五点建议” 回上海，王洪文大发感慨

7月18日，陈永贵在太原晋祠开完山西省委会议，坐上自己的小轿车驶向大寨。这一路他多次停车查看孟县、寿阳、阳泉、平定的庄稼长势。自从两个月以前毛主席批准了他的“三三制”，陈永贵就很少在北京住着。两个半月以来，他转了河南、河北，又在大寨住了将近50天。一个副总理离京60多天总要出点活儿吧？陈永贵向毛泽东和党中央保证过，要随时了解下情，向中央提出建议。陈永贵看着路旁的庄稼，一些想法也渐渐地在心理清晰起来。他打算把他的这些想法推向全国。

回到大寨以后，陈永贵叫来了新华社记者宋莎荫，让他起草一份给毛主席的报告。陈永贵大口大口地抽着烟，把他琢磨了很长时间的想法归纳成五点，叫作“对农村工作的几点建议”，内容涉及所有制、评工分、扶贫、社员住宅和农民所欠的粮债。这是陈永贵的经验总结，是他本人主张的精华。

宋莎荫是有名的快手，按陈永贵的意思起草出来的给毛主席的报告很快就交到陈永贵手里。陈永贵微微动着嘴唇，仔仔细细地读了一遍。

“……农村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发展速度是很快的。合作化以后，只用了三年，实现了公社化。公社化到现在，已过了十八年。主席发了‘农业学大寨’的号召也十一年了。这中间，经过了文化大革命、批林整风、批林批孔，现在又开始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运动，农村的形势是很好的。好就好在了广大群众的路线觉悟高了，干劲大了，干部的经验也多了，领导水平也高了。我不是说农村就没有问题，农村的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还是激烈的，在一些地方资本主义倾向还是严重的。但是第一，这不是主流。第二，这也给我们出

了新题目,可以做点新文章,我觉得有些事情该办了。

“一、人民公社的基本核算单位究竟早一点向大队核算过渡好,还是晚一点过渡好?人民公社的所有制必须有一个发展过程。从昔阳的情况看,在人民公社化后的那一段时间,实行小队核算是完全对的。……后来经过几年的生产发展,情况有了变化,小队核算就不适应了。一是公社化初期‘四固定’的平衡打破了,队与队差别越拉越大;二是小队核算限制了大干;三是小队既积累不多,劳力又少,想搞点改变面貌的工程和机械化有困难。近两年我跑过的地方,许多搞得好的大队,大都是大队核算。我同不少县以下的同志们讨论过,他们也认为,农业要大干快上,要缩小队与队之间的差别,实现大队核算势在必行。

“二、人民公社的劳动管理怎么搞好?大寨实行的办法叫‘标准工分,自报公议’。所谓‘标准工分’其实就是评思想好、劳动态度好,既能大干又能干好的‘标准人’,自报工分,要同这个‘标准人’的条件比。实行这种评工制度,政治就挂帅了,可以从根本上摆脱‘工分挂帅’的烦琐哲学;可以适当照顾老、弱、病、残,防止两极分化;又可以限制那些不参军、不当工人、劳力多的地主、富农分红分粮过多,更有利于这些人的改造。而定额包工,死分活平这一套办法刚开始还适应,现在看就不行了。显出两个弱点。一是不搞政治挂帅,搞工分挂帅,不是把社员引向社会主义劳动,而是引向抢工分,不顾质量,腐蚀了思想,响了集体生产。二是没有对资产阶级法权实行必要的限制,扩大了人与人之间的差别。资本主义有调动资本主义积极性的办法,社会主义也应该有调动社会主义积极性的办法。讲积极性,不应该忘了‘社会主义’这四个字。有的同志总是在资本主义的旧框框里找办法,谁搞点社会主义的办法,就大喊大叫,什么‘没有普遍性’呀,‘平均主义’呀,总之,就是不能干。照此下去,社会主义农业怎么能大干快上呢?”

三、不准社员个人盖房,住宅一律由集体投资建造;

四、把社员欠集体的粮债痛痛快快全部免掉;

五、加强公社的经济实力,并由公社扶植穷队发展生产。

陈永贵读完自己的五条建议,觉得完成了一件大事。他叫后来当

了昔阳县档案馆馆长的任永福用他那一手漂亮的毛笔字整整齐齐地抄好,送往北京。报告后边签署的日期是:1975 年 7 月 20 日。

毛泽东读了陈永贵的五条建议。1975 年 8 月 14 日,他在陈永贵的建议上批示,让政治局讨论一下。

8 月 14 日当天,姚文元就看到了芦荻整理的毛泽东谈话记录。3 小时之后,姚文元的一份“请示报告”送到毛泽东手中:

为了执行毛主席提出的任务,拟办以下几件事:

一、将主席批示印发政治局在京同志,增发出版局、《人民日报》、《红旗》、《光明日报》及北京批判组谢静宜同志,上海市委写作组。附此信。

二、找出版局、人民文学出版社同志传达落实主席指示,做好三种版本印刷和评论的工作。我还看到一种专供儿童青年读的《水浒》,是根据七十一回本改的六十五回本,也要改写前言,增印鲁迅的话,否则流毒青少年。

三、在《红旗》上发表鲁迅论《水浒》的段落,并组织或转载评论文章,《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订个计划。

以上可否,请批示。

姚文元

1975 年 8 月 14 日

毛泽东阅后在信上批:“同意”。

8 月 14 日,中共中央中发(1975)196 号文件转发了毛泽东关于《水浒》的谈话。文件原文印发了芦荻纪录的毛泽东对《水浒》的评论。

8 月 15 日,姚文元对《红旗》杂志编辑组召集人谈评《水浒》等问题。

1975 年 7 月,王洪文突然回到上海,住在东湖路七号招待所里。他对马天水、徐景贤和王秀珍说:“我这次到上海是作调查研究的,恐怕要住一段时期。”

徐景贤问他需不需要安排一些项目和日程,王洪文说:“不要,有什么事我会告诉你们的。”

过了几天,王洪文在锦江小礼堂,找徐景贤和马天水、王秀珍谈话。他从公文包里拿出很厚的一迭中央军委任命干部的名单给他们看,这是经过毛泽东批准的各军种,各兵种,还有各大军区副司令员、副政委以上干部名单。他把这些名单放在桌子上面,用手拍拍任命的文件说:“邓小平这个人真厉害,他对军队的干部很熟悉,很多人都是他的老部下,他一当总参谋长,很快就把各总部、各兵种、大军区的领导班子搭起来,安排他自己信得过的人。中央军委讨论这些名单的时候,我和春桥同志都不熟悉这些人,对有些人的情况,根本不了解,讲不出反对的理由,只好通过。”

他说:“你们知道春桥同志最近说什么呢?他说,我这个总政治部主任不过是枚橡皮图章,人家搭好了班子,要总政向上报告,报告上盖的就是张春桥的签名章,可是根本不征求我的意见。”

王洪文又问:“邓小平和叶剑英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你们觉得怎么样?”

徐景贤说:“邓的讲话里提到整顿,还要改组‘软、懒、散’的领导班子,根本不作阶级分折,什么‘软’啊‘硬’啊,假如推行的资产阶级路线,领导班子越硬,那么危害越大。”

王洪文很赞赏他的说法,说:“老徐说的对!反对‘软、懒、散’,一点阶级分析都没有,实际上军队里对提拔新生力量,最保守了。全国只有沈阳军区毛远新当了政委,让孙玉国当了副司令。武汉军区算是有一个参加过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的年轻副司令。其它地区进领导班子的,都是一些老家伙。他们对文化大革命不满意。在军委扩大会议上骂娘。前一时期,社会上的一些政治谣言,都是从军委扩大会议后传出来的。”

马天水也插话说:“这个邓小平,我可了解了,他倒真是个‘钢铁公司’,他抓起权来很厉害,过去他当总书记的时候,主持中央会议,连毛主席在场,都不放在眼里。开会开到最后,也不征求毛主席的意见,就宣布散会。”

王洪文叹了口气说;“我最担心军队不在我们手里,军队里没有我们的人。这次,我把单文忠调到中央读书班。”

单文忠原是上海警备区的干部,此时已调到安徽省军区任副参谋长去了,他和王洪文关系密切。王洪文说:“我把他调到中央读书班,就想派他的用场。他在上海警备区真是个造反派,可是调到安徽省军区后,只担任个副参谋长,级别太低,起不了大作用。”

已是深夜了,服务员请他们吃夜餐。吃饭时,马天水问王洪文在上海住多久?王洪文说:“我给主席的报告没有讲日期,反正,我也不想很快回去。”

这时,徐景贤和王秀珍交换了一下眼色,因为他们曾议论过:“总理生病以后,中央曾决定由王洪文主持中央政治局工作,现在他跑到上海来,不是把大权让给邓小平了吗?”他们曾为此埋怨过王洪文,今天听他这么一说,徐景贤又试探着问:“老王,你本来是主持中央工作的,现在你到上海来,中央的工作由谁主持啊?”

王洪文说:“什么主持工作,还不是让我往火坑里跳!”“现在我有什么权?党中央和国务院是他(指邓小平)的,军队也是他的,我只有一个办工农兵读书班的权!这是毛主席定的呀!”

8 月 19 日,王洪文去上棉三十厂,临离开时他说:“只要我不被打倒,不死,下次还要来的。右派上台,我就来不了了”。

在回康办的路上,同行的王秀珍对他说:“你这句话讲得太露骨了,能这样吗?”

王洪文答:“要有这个思想准备。文化大革命谁胜、谁负的问题,远没有解决,有些人根本不承认我这个副主席,不承认文化大革命,不承认新干部,好多地方新干部都被打下去。还要围绕文化大革命再斗。你看邓小平的讲话,不就清楚了吗?”

8 月 20 日,海军司令员肖劲光给中央写信,揭发 1975 年 7 月 14 日上海《解放日报》发表的《刁小三的逻辑》一文和上海的《学习与批判》杂志第 7 期发表《八路军的“样子”》,说这两篇文章是攻击军委扩大会议,“都是以批判资产阶级法权为名,以刁小三来影射解放军,对解放军进行攻击和丑化,用意是很恶毒的。”

8 月 21 日上班后,胡乔木即给邓小平的秘书打电话,说有重要的事要向邓小平报告,时间只要 20 分钟就可以了,希望邓小平接见他。

随后胡乔木就到邓小平那里,当面向他转交了肖劲光8月20日的信和所附两篇文章,说:“肖劲光认为《解放日报》上一篇文章很不好,是针对军委扩大会议的。”

胡乔木很激动,指出这两篇文章发表的时间,就是影射攻击中央军委扩大会议的,并认为问题十分严重。

从邓小平那里回来后,胡乔木又要政研室的人查一下当时报刊上还有没有类似的文章。

下午,邓小平同政研室7位负责人一起第四次读《毛泽东选集》的选篇:《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读完后吃饭时,胡乔木问邓小平关于毛泽东评《水浒》的指示:“主席的指示是针对什么的?是不是有特别所指?”

邓小平说:“就是文艺评论,没有别的意思。是主席用三个月的时间听读《水浒》得到的看法,要人整理出来的意见。决不是指着当前党内斗争的实际。”

在此之前,邓力群已把中央音乐学院青年教师李春光写的大字报交胡乔木转送邓小平。在这次谈话中,邓小平说:“中央音乐学院的一张大字报已送给主席看了。”

胡乔木向邓小平谈到政研室调干部的问题,说:“我们想调一些能独立工作的中年干部,可是比较困难。”

邓小平说:“是啊,中年干部在全党全国都是缺的,现在最需要的是中年干部。”

邓小平讲到刘冰等人8月13日给毛泽东的信:“清华有人告迟群发酒疯,你们知道么?我把他们的信转给毛主席了。”

胡乔木问北大、清华的具体工作实际上是什么地方管?

邓小平说:“北京市委。”

胡乔木说:“北京市委怕管不了。教育部也不会管得了。当初毛主席抓六厂二校,情况是正常的,现在毛主席不再管了,不知谁在管。清华、北大是全国最重要的两个大学,办得怎么样,对全国是要发生影响的。要管还得由主席管。可能有些具体事情主席不知道,有机会把北大、清华的有些情况向主席反映反映,这样北大、清华的领导工作中

的问题才能解决。”

8 月下旬,江青召集于会泳等人开会。她说:“主席对《水浒》的批示有现实意义。评论《水浒》的要害是架空晁盖,现在政治局有些人要架空主席。”

8 月 28 日,《红旗》杂志 1975 年第九期发表了短评《重视〈水浒〉的评论》,又在“用《水浒》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的总标题下,发表了一组评《水浒》的文章。

8 月 31 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署名竺方明的文章:《评〈水浒〉》,并先行发表了 1975 年第 9 期《红旗》杂志短评:《重视对〈水浒〉的评论》。

由此,中国大陆开始了“评《水浒》”的运动。

# 第1364回：议工业，汪东兴广州讲话 周恩来，最后一次见外宾

毛泽东看到各方报纸对中国大陆特赦国民党战犯的报道、评论后，十分满意。7月14日，毛泽东在和江青谈文艺政策调整时，特意谈到此事。他说："释放俘虏放得好，国民党怕得很。"接着，毛泽东又让公安部释放在押的美蒋武装特务，释放、安置以历史罪判刑关押改造和刑满留在劳动改造单位就业的原国民党县团以上党政军特人员。

在押的美蒋武装特务人数比较少，很快就查清美蒋武装特务有95名，武装特务船船员49名，主要是从浙江、福建东南沿海上岸的。公安部写了《关于处理在押的美蒋武装特务的请示报告》报告情况并提出处理意见。这些武装特务关在浙江的劳改农场和广东的监狱。8月16日，毛泽东批准了这个报告。怎么把这些人送回去？从香港走，台湾肯定不敢让他们回去。而这些人基本都要求回台湾，船员都是台湾人。决定用船将他们送出海。9月22日，司法机关决定对在押的95名美蒋武装特务和49名武装特务船船员，全部宽大释放。至此，自1962年至1965年间捕获的美蒋武装特务及武装特务船船员，全部处理完毕。

8月18日，邓小平在国务院主持召开会议，对李先念主持起草的文件《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进行讨论。政研室负责人胡乔木、于光远、邓力群出席。邓小平就加快工业发展的有关问题讲了重要意见。此后，政研室即参加这个文件的修改。首先按照邓小平的意见增加几条：以农业为基础；整顿企业管理，加强责任制；质量第一；按劳分配；增加工矿产品出口，进口先进技术；等。文件由原稿的14条增为20条，于8月22日写成。8月31日下午李先念主持讨论。认为文件的政治部分没有提起纲来，前几条要重写。要找一些企业座谈讨论。

9月2日改出一稿，3日送李先念、纪登奎、谷牧。他们认为这个

稿子过于尖锐,还得改,不能拿出去。

9月2日,汪东兴在广州讲话时说:

“中央和地方的报刊和杂志最近都发表了不少批判古典小说水浒传的文章,批判水浒传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和党中央亲自领导下,一次极其深入、广泛的政治运动,是一场关系到党和国家命运严肃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结束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全国人民开始走向新的生活。同时也说明了用暴风骤雨的方式,用战争的手段夺取政权的阶段告一段落。中国已经从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进入社会主义革命阶段和社会建设时期。但是阶级斗争并不因此而结束,只是斗争的形式改变,斗争性质仍然是政权的斗争。这种斗争的表现,有时激烈,有时和缓。激烈时充满着曲折、尖锐和复杂,有时则呈波浪型,特别激烈表现在党内、政府内和军队内部的路线斗争,这种围绕着正确路线和错误路线的斗争会继续相当长的时间。每一个人都要有进行这种长期斗争的思想准备。”

接着,他列举了“彭德怀的‘万言书’,刘少奇的四清、二月提纲,林彪的‘五七一工程纪要’,到最近‘放下鞭、落下帆’、‘射人不射马,斩尾不革头’都是同一货色,它们不断的变换手法,用一个倾向掩盖着一个倾向,接过革命口号,拉起革命大旗,用合法的手段施阴谋、放暗箭。一方面高喊团结,一方面却在暗地里结党营私,招降纳叛,有计划有步骤的准备叛党叛国,投降社会帝国主义。我们过去说有些干部‘一打就倒,一轰就跑’,现在慢慢我们才发现他们是怂恿人来打,鼓吹人来轰,一打一轰,把一个个炮口最后轰上中央,轰上主席。”

“从四届人大以来这局势的变化看得很清楚,一小撮自命为共产党员的人,竟然暗中鼓吹两个议会制,党派轮流执政论,甚至于提出司法、立法、行政相立又相持,军队脱离党的领导,离开政治路线独立存在的观点。”

“六月份主席发现了这个问题,一针见血的指出:‘问题上下内外都有,根子在中央、在国外,这里就是有黑司令部,红黑分明。黑线断不了,有人搞鬼。’并坚决指示各省在处理基层干部的问题上‘半年一次,十年二十次检讨……’。在对上海和西安市的问题,主席一再指

示:‘敌我问题易处理,人民内部问题难处理,人民内部中混入敌我问题处理更宜慎重’。‘抓住阎王,放掉小鬼,不要钟馗抓鬼,要孙悟空打玉帝’。”

“针对着当前阶级斗争新形势下的新特点,毛主席发出‘批判水浒传’号召,是要从政治路线,组织路线,军事路线上去批判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粉碎它们的投降路线和政变的阴谋,挖掉这一小撮赖以生存的社会基础和思想根源。”

“宋江的问题主要有几点:

执行投降主义路线出卖农民起义,在革命起义节节胜利时,暴露他的地主阶级的本性,变节投降,卖官求荣,无耻屈膝甘当奴才,看周围,往上追,追这种人今天有没有。

宋江与高俅的斗争性质要弄清,进一步看看十次路线斗争,是刘少奇也好,林彪也好,他们之间有斗争,这性质又是什么?全国最近刮起一股翻案风,这是什么风向?不就是打倒刘少奇,“大为地方主义喊冤,打倒林彪又为刘少奇一夥叫屈”,把同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之间的派别斗争,说成是正确与错误路线的斗争。这事有没有呢?全国有,广东也有,广州也有。

摒晁盖于一百零八人之外,这事刚才谈过了,的确如主席说的有人搞鬼,不要大团结,搞小集团,施小恩小惠,笼络人心,封官许愿,招降纳叛,阴谋阳谋一起来,他们架空“谁”,宋江的衣钵,共产党里头也有人接班,这不是很奇怪吗?

只反贪官不反皇帝,这里头这样搞的大有人在,表现不反修不革自己的命,对外搞民族投降主义,对内搞阶级投降主义,他们对地、富、反、坏、资本家、阶级异己分子,叛徒特务、托派修正主义分子、国民党分子施仁慈,但对我们广大群众干部,对党内正直敢于同一切错误倾向的同志却恨之入骨,竭力排斥打击,造谣中伤,残酷斗争,无情围攻,何其毒也!这那里是反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这是维护修正主义利益,地主阶级的利益……”

胡耀邦等人在中国科学院经过20多天调查,起草了汇报提纲《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在邓小平指导下,经国务院政研室胡乔木等参与修改,形成一个《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的文件稿。《汇报提

纲》明确提出中科院今后十年科学研究的三项基本任务:积极承担国民经济和国防建设中的若干综合性的重大科研任务,开辟一批新兴的科学技术领域,大力发展基础科学研究。从十个方面阐述了关于科技工作的具体路线、方针和政策,辩证地分析了政治与业务、群众路线与专业队伍、理论与实际、对知识分子的教育与使用、哲学与自然科学等五个关系,并提出加强学习、落实政策、批判派性、调整班子、整顿机构等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进行整顿的内容和方法。9 月 3 日,胡乔木把修改稿面交邓小平。邓小平看后表示:“这文件很重要,不单管科学,而且可以适用于文化教育各部门。”

9 月 3 日,中华书局干部周妙中给邓小平的信,对发挥知识分子作用和社会科学研究、出版工作、图书馆工作等提出一系列建议。邓小平写了处理意见报毛泽东。毛泽东圈阅。

9 月 4 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开展对〈水浒〉的评论》,文中把芦荻记述的毛泽东评《水浒》的谈话,用黑体字印出来。

有了《红旗》评论,有了《人民日报》社论,有了毛泽东的“最高指示”,短短几天,全国就掀起了评《水浒》的高潮。

9 月 5 日,《人民日报》刊登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批判组的文章《投降主义路线的赞歌 批判《水浒》对农民起义的歪曲》。

《化石》杂志编辑张锋给毛泽东的信,反映办刊困难和科学院的一些情况,毛泽东 9 月 6 日给来信加了标题:“一封诉苦的信”,批示:“印发在京各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

9 月 7 日,中共中央军委批转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压缩军队定额、调整编制体制方案》。《方案》提出撤销的单位有:野战步兵 6 个生产师(保留的步兵师半数以上实行简编编制);守备部队 1 个师部、2 个守备区和 11 个团;工程兵 7 个工区、27 个建筑团;铁道兵 3 个师部、37 个团,海军 1 个基地和 6 个高炮营;空军 4 个军部、6 个高炮师;总后勤部 4 个办事处、10 个基地兵站、1 个兵站;国防科委 1 个基地机关。《方案》规定全军总人数精简 26.2%。陆军步兵部队精简 27.3%,工程兵、铁道兵精简最多,两者精简数占陆军兵种部队精简总人数的 92.1%。海军精简 17%,调整基地、舰艇、高炮和航空兵部队的编制体制,将部分工程建筑部队改为基建工程兵性质的部队,不计入军队定额;

空军精简16.4%,主要精简机关,撤销部分高射炮兵部队。工程建筑部队改为基建工程兵性质的部队。不计军队定额。各大军区及其直属单位精简38%;各总部及其直属单位精简16.6%。

按《方案》精简整编后,全军机关、保障部队比例减小,战斗部队、院校和科研单位的比例将增大,陆军所占比例将减小,海军、空军比例将增大,人民解放军基本上可以做到:小打,使用现有部队就可以,中打,稍加充实扩编就能应付,大打,由于保留了技术骨干和领导骨干,做好了民兵工作和扩编计划,能够迅速扩编,保证战争需要。这次精简整编,从1975年第四季度开始实施,但没有完成就停了下来;至1976年底,全军总人数比1975年减少了13.6%。

9月7日,周恩来在医院里会见罗马尼亚党中央书记伊利那·维尔德茨。这是他平生最后一次会见外宾。

周恩来说:"马克思的请帖,我已经收到了。这没有什么,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法则。"

周恩来颇为感慨地回首当年:"时间过得真快,就在10年前,我到布加勒斯特参加乔治乌·德治的葬礼,大衣也没穿,步行走了4个多钟头。现在,我可以告诉你,连4分钟也走不了了!"

"我现在病中,已经不能再工作了。邓小平同志将接替我主持国务院工作。邓小平同志很有才能,你们可以完全相信,邓小平同志将会继续执行我党的内外方针。"

周恩来声调变得激昂起来,他请维尔德茨转达他对罗马尼亚党政领导人及其它老朋友的问候。并表示:"具有55年光荣历史、在毛泽东思想培育下的中国共产党,是敢于斗争的。"

9月10日下午,邓小平同政研室7位负责人一起第六次读《毛泽东选集》的选篇。邓小平说:"要全面宣传毛泽东思想。现在的宣传有很大的片面性。现在对毛主席的思想各取所需,把毛泽东思想割裂了。"

"只有基本路线还不够,还要有各项具体路线和政策,不然,基本路线是空的。"

"主席讲我们不要吹什么中国第一,就是不要吹,社会主义不是靠吹能吹得出来的。"

“现在只讲斗争,不讲团结。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丢掉了。毛主席在‘七大’报告中讲的三大作风,延安整风报告讲的反对主观主义,反对宗派主义,反对党八股,都仍然有重大现实意义。要重新宣传毛主席这些思想,用来反对修正主义,反对派性,反对新八股。七届四中全会的决议有重要现实意义,要大讲增加党的团结,加强党的统一领导。”

邓小平要求政研室:“要抓紧写文章,要摆事实,讲道理。”

他谈到了上党战役,说:“这项战役是按照毛主席的军事思想指挥打的,有人写了一个关于这次战役的电影剧本,受了批判。”邓小平说他看了这个电影剧本,写得不错,可以拍成影片。

胡乔木向邓小平报告了政研室准备写关于评论《水浒》的文章。邓小平听后说:“好嘛!政治研究室不写评论《水浒》的文章还行?就是不要光讲现话,要讲几句新话。光讲现话没有人愿意看。”

胡乔木说:“还有点新意。”

邓小平说:“只要有新意就好。”

# 第1365回：到大寨，江青讲话说《水浒》 聚昔阳，农业学大寨会议

9月8日，江青带着众多随行人员来到大寨，还从北京运来4匹马、一卡车评《水浒》的印刷品和电影、电视片以及放映设备等。昔阳县委和大寨大队为她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仪式。

9月11日，江青在大寨的虎头山上挖了一条防空壕，并表示要给大寨的贫下中农做一次评《水浒》的报告。

骑马上山

第二天,9 月 12 日,在淅淅沥沥的雨声中,江青与大寨社员见面。她说:

“首先向同志们报告一个好消息,咱们的主席很健康。最近在接见西哈努克亲王他们的时候,主席的眼睛都能够看见西哈努克的白头发,听觉比我好。脑力清晰,记忆力强,吃饭好,睡觉好,心脏好。我是

到这儿来向同志们学习的,是经过主席和政治局批准来的。看!你们还是欢迎我这个学生,还喜欢教我。我做庄稼活不行,比不上同志们。现在天天学一点,不过我先告诉你们这些老师,我手上已经打了一个泡了。大寨是咱们毛主席树立的全国性的榜样,我到这儿来,好像到了休养所。我真的比在北京吃得也好,睡得也好,精神好多了。所以大寨不可以不来。同志们要原谅,我早就想来了,但是一来工作忙,老是身体差,带病工作,走不开,那就拖啊,拖啊,拖到今年。我来只做了三天的准备,怕发烧,因为我有低体温。我说:发烧我就走,我不给你们增加负担。结果我没有发烧。同志们,我吃得好,我老觉得饿,我睡得好。所以要感谢同志们,收留我这个学生啊!我是来学习的,学习同志们这种革命干劲,苦干、巧干、大干。我看了你们的科教片,那是很感动人的。我缺少发言权,因为我种庄稼不行,我只能剪剪花椒啊,什么掰掰棒子啊,这还可以。其它庄稼活儿啊,都不太懂。我只开过半年荒。在这个问题上,我不要献丑啦!"

"咱们的主席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就提出警告,要当心敌人裹着糖衣的炮弹,要是被这个炮弹打中了,就很难爬起来啊!进城前后有一系列指示。在旧社会工人失业,挨饿受冻,现在我们刚解放,工人能够有饭吃就好了,不要乱提加薪的口号。毛主席还说,军队和我们的党政机关搞供给制好。结果,主席的意见遭到抵制,52 年全部冲垮了,全部抄苏修,弄得现在咱们还挺被动的。大寨是大队核算制,而且整个昔阳都是大队核算制。同志们想一想,大寨,昔阳,旧社会是穷乡僻壤,荒山恶水呀!现在都能够搞成这个样子,亩产过千斤,有的至少也是五、六百斤。现在最好的地方有的还抓不好,为公家干活少,为他自己的自留地呀,自由市场干去了。有的即使搞公家的,因为领导班子不带头,也搞的不怎么样。另外中央也派了人做了三个公社的调查研究。大寨,昔阳能够做到的,全国为什么不能够做到呢?"

"美帝国主义狡猾,他有的资本家跟南朝鲜,台湾订了合同,钻探石油,美国政府就警告他的资本家说,你不能去。因为他怕和中国的关系搞坏,要留一招儿。这是很重要的。苏修你别看他张牙舞爪,他也不敢大弄。因为他们都是纸老虎。当然,咱们不能说世界上没有疯子。纸老虎里边有疯子,它们会发疯的。不然,搞那么多原子弹当饭

吃啊？搞那么多坦克、飞机是当饭吃啊？是要打仗。所以我们主席常讲‘备战，备荒，为人民。’现在讲‘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你们这儿深挖洞恐怕有些问题，我昨天去挖了一条防空壕。我还想在田边地头为你们挖一些一两人的掩体。你们可以去瞧一瞧，我那个挖得不标准。我手上那个泡就是在那儿打的。”

“主席从七届二中全会以后，进城的前后一些电报，都是要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但是被一些同志抵制了。有的地方好一些，有的地方就破坏的厉害。”“像浙江，那么好的地方，那么好的气候，那么好的水，那么好的土壤，它搞得一塌糊涂。它从刘少奇时候起，有些地方一直就是搞单干，砍掉了几十万合作社嘛！并不是浙江全省，就是浙南有那么一小部分，我老收到群众的来信。进城后土改反霸，这是属于资产阶级民主性质的革命，但是，是在无产阶级政党领导下完成的。”

接着，江青回顾了建国后批判《武训传》、《清宫秘史》，反右，批彭德怀等政治斗争的过程，然后说：“好，到了六十年代初期，又来了。叫做什么‘摘冠加冕，赔礼道歉’。叫我们工人，贫下中农，向资产阶级，向地、富、反、坏、右赔礼道歉。摘冠，就是摘掉帽子；加冕，冕是皇帝戴的帽子，可漂亮了！就是在广州开的会嘛！而且搞了许多名堂的高薪，高薪到1000、2000元。上海有一个唱京剧的叫周信芳，每月2000元，国家还要给他两个秘书，一个汽车司机，一个厨师，两个服务员，这些都要国家报销。他原来是黄金荣大戏院的老板。他老婆是银行家的女儿。那时候刘少奇这个集团把他捧到天上去了，他成了我们‘唯一的艺术家’啦！而他呢，就搞《海瑞上疏》。还没有弄出来，《海瑞罢官》就出来了。批判《海瑞罢官》大家知道吧？这已经是序幕了。进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序幕。”

她终于讲到了今天要讲的主题：“最近评《水浒》是我们主席亲自批的。《人民日报》引了一段。我把全文念给同志们听听。这个非常重要，要结合学习理论，结合批林批孔，都可以结合起来学。当然你们前面两小段已经知道了。看过《人民日报》啦？学习了一次吧？我再读给你们听……”

接着，江青将毛泽东和芦荻谈的对《水浒》的评论逐条念了一遍，边念边解说。当念到第五段时，她说：“这是主席下达的具体措施：

‘《水浒》百回本,百二十回本和七十一回本,三种都要出。把鲁迅的那段评语印在前面。’这是个什么讲究呢?同志们,一百回,一百二十回都是全的,写了宋江投降。七十一回是咱们搞的,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国家搞的,54 年搞的。砍掉了后头还不说,还伪造了一回,又把前面的楔子改为第一回,后头搞了个排座位。反正是没写到投降;里头把一些太露骨的还稍微改了。我最近查了一下,还有一个专门给儿童少年读的六十五回本,1973 年出的。你看,用心何其毒也!毒不毒啊?不仅毒害我们大人,还要毒害儿童少年啊!小朋友,你们看到六十五回的那个本子没有?现在要改,增加到八十几回。你们可以看到宋江那个奴才,阴谋家,两面派的丑恶面貌。

所以不要以为评《水浒》只是一个文艺评论,同志们,不能那么讲。不是,不单纯是文艺评论,也不单纯是对历史,对当代也有现实意义。因为我们党内有十次路线错误。今后还会有的。敌人会改头换面藏在我们党内。”

江青说:“有人他就不批林,不批孔。原因是什么?怕批到他们自己头上。他们跟他们划不清界线,或者就是上了贼船,潜伏在咱们党内的,所以破坏批林批孔,破坏理论学习。现在我们批《水浒》,看看宋江如何排斥晁盖,架空晁盖。他把那些土豪劣绅,武将文吏请到梁山上去,把重要的领导岗位统统占领了。”

9 月 13 日,新华社记者把江青在大寨关于《水浒》的讲话记录发到北京。时任新华社副社长的穆青看了,认为事情重大,应该向毛泽东反映。新华社其他几位领导并不积极,穆青便自己打电话给政研室的吴冷西,说有要事希望与他个别商量。吴冷西说:“我立即来。”他们约定在新华社后门见面。穆青随即赶到新华社后门等吴冷西。

吴冷西乘轿车从中南海北门出来,从东单绕了一圈,然后到新华社的后门,将正在路边悄悄等候的穆青接上车。

在车上,穆青把江青在大寨的讲话材料交给了吴冷西。

吴冷西拿着材料后即回到中南海武成殿,和胡乔木一起看完后都觉得吃惊,认为江青在大寨的这个讲话问题十分严重,是影射邓小平的。其时,他们已经看到 9 月 5 日《人民日报》和 9 月 11 日《文汇报》上评《水浒》的文章,此时看到江青的讲话更有一种大吃一惊的感觉。

于是二人带着关于“宋江架空晁盖”的两篇报纸剪报和江青在大寨的讲话,又迅速赶到邓小平的家中。

胡乔木对邓小平说:“江青在大寨讲话,报刊上评论《水浒》的文章,影射攻击你是宋江,讲宋江架空晁盖是影射你架空主席。”

邓小平说:“不会吧。”

胡乔木说:“这绝没有错。这可不是一个小问题,是一个政治问题。”

邓小平看了材料后说:“真的指我,那要送主席看。不过不能由我送,要通过别的途径。”又说:“不要紧,让他说。现在叫喊反复辟的人,自己就是搞复辟的。”

邓小平又谈到:“现在教育方面的问题积了一大堆。国务院将讨论这方面的问题。”

胡乔木谈到学部办刊物的问题,邓小平说:“要抓紧筹备,把刊物办起来。别人写文章,你们也可以写,但不要影射,要讲道理。”

还说:“《思想战线》的重要文章要交政研室审定,有些文章还要送中央和国务院审定。”

吴冷西向邓小平汇报了调干部的一些考虑。胡乔木也谈了纪登奎对政研室调干部要老、中、青结合的意见。邓小平听后说:“老中青三结合,主要是要调中年干部,调来了马上用,还要身体较好,可以出去搞调查的。要从地方上调,也可以从军队方面搞。”

胡乔木从邓小平家里出来后,又让吴冷西用车把穆青从新华社后门悄悄接出来。他们在车上商量如何才能直接把材料送到毛泽东手中。这时,穆青建议,由他找新华社负责中央领导人活动报道的记者李琴想办法。吴冷西同意。

穆青找到李琴,李琴满口答应。穆青和新华社社长朱穆之又联名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

9月14日上午,山西省委第一书记王谦从昔阳县城来到了大寨。因为第二天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要在山西省昔阳县召开,他是来邀请江青参加开幕式的。中午,王谦陪江青共进午餐,江青问他:“吉林省委书记来了没有?”

王谦说:“今清早刚到,是一位分管农业的副书记。”

江青说:“那也成。叫他马上来见我!”

工作人员立刻就去打电话。

快吃完饭的时候,工作人员已经领着吉林省委副书记急匆匆赶来了。他向江青作了自我介绍。江青坐在那里和他握手,听说他还没有吃午饭,马上又让他坐下来就餐。那天吃的是水饺,服务员很快就端来了一盘新出锅的饺子。

已吃完饭的王谦站起来说:“江青同志,我要先走一步,有些重要事情去处理。”

江青不高兴了,大声说:“难道我这儿的事就不重要?”

王谦没有说话,站在那里,既不好走开,也没有坐下,向后退了一步,两手交叉在胸前,靠在窗台边。

江青向正在吃饺子的吉林省委副书记说:“你们长影有个叫张天民的,竟然告我的刁状!这事你们省委知道不知道?”

刚刚用筷子夹着饺子正往嘴里送的吉林省委副书记,把饺子放到小碟里,回答:“事前不知道,事后才听说的。”

江青一见,忙说:“你吃,你吃。”

那位书记把饺子又夹起来,正要吃,江青又问:“你们省委对这事什么态度?”

那位书记又把饺子放回小碟里说:“省委对这事很重视。对他进行了严肃的批评!他也作了深刻的检查。”

江青对吉林省委副书记说:“你赶快打电话,给我把那个张天民叫来!”

9月15日上午,邓小平、华国锋和江青并排坐在昔阳县拖拉机厂的一个尚未装修的车间的条桌后边。在他们面前,3700位来自全国各地的省、地、县农业方面的负责人坐在小板凳上。这就是第一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开幕式会场,在主席台上就座的还有陈永贵、陈锡联、姚文元、吴桂贤、李素文等一批党政军要人。这是中共中央在山西召开的一次规模最大的会议。

实际上,召开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早在1972年就提出来了。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会议被一再延期。1974年7月,农林部召开了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预备会,研究了农业学大寨和农业机械化会议的准

备工作,确定把两个问题结合起来,作为会议的主题。1975 年 8 月 13 日,由华国锋、陈永贵领导的会议筹备小组向国务院提出《关于召开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的请示报告》,确定这次会议的内容是:“交流农业学大寨,特别是建设大寨式县的经验,研究进一步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和迅速改变穷队面貌的问题。同时,交流农业机械化经验和讨论 1980 年基本上实现农业机械化问题。”1975 年 8 月 16 日,邓小平批示了这个报告。

毛泽东对这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十分重视,他提议,凡能去的政治局委员,都去参加这次会议,并委托邓小平代表中央作重要报告。

邓小平是 9 月 15 日会议开幕的当天赶到大寨的。他先从石家庄乘火车到阳泉,然后转乘汽车到昔阳。到阳泉站迎接邓小平的有陈永贵、山西省委第一书记王谦及主持昔阳县委工作的王金籽等。

上午 9 时,大会开幕。开幕式由华国锋主持,陈永贵致开幕词。

当华国锋宣布:“现在,请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同志向大会作重要讲话”时,话音刚落,整个会场便爆发出热烈的掌声。尽管邓小平几次摆手示意大家停止鼓掌,但掌声不仅没有停止,反而愈来愈热烈。不少刚出来工作的老干部激动地掉下了眼泪,他们急切的想听到邓小平是怎样讲的。

如此热烈、如此动情的场面使邓小平也非常激动。他面对众多诚挚、热情的面孔,干脆推开讲稿,开始了他的讲演。他说:“这个会议是很重要的,可以说是 1962 年七千人大会以后各级领导干部来得最多的一次会议。”“这次会议涉及的问题,虽然不像 1962 年的七千人大会那样全面,但就实现 25 年的目标来说,这次会议的重要性仅次于那次会议,或相当于那次会议。为了完成周总理在四届人大上重申的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正视目前落后的现状,并下大力气解决农业现代化的问题。”

“从明年起,二十五年,我们赌了咒,发了誓,要干这么一件伟大的工作,这真正够得上是雄心壮志。我们相信大家能办到,但是不要疏忽大意,不要以为轻而易举。”

当时,对中国农业形势的看法不尽相同。邓小平比较悲观,他认为农业很可能拉国家建设的后腿,实现四个现代化,关键是农业现代

化,最费劲的也是农业现代化。他在开幕式的讲话中问道:“毛主席提出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我们现在积了多少粮?”他说:“全国还有部分县、地区,粮食产量还不如解放初期!”

邓小平讲到这里,江青插话说:“不能那么说,那只是个别的!”

邓小平说:“就是个别的,也是值得很好注意的事!”他进一步补充道:“据几个省、市、自治区统计,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农业产值按人口计算平均124元。最低的贵州,倒数第一,只有六十几块。四川倒数第二,九十几块。这行吗?类似四川一百左右的还有好几个省。这是讲产值,还不等于社员收入。社员收入有的很少,有的还倒欠账。这种状况,我们能满意吗?”

当时,对于听惯了“形势大好”的人们来说,邓小平的讲话使他们大受震动又大为感动。

随后,邓小平用了很长时间讲整顿:“现在全国存在各方面要整顿的问题。毛主席讲过,军队要整顿,地方要整顿。地方整顿又有好多方面,工业要整顿,农业要整顿,商业也要整顿,文化教育也要整顿,科学技术队伍也要整顿。文艺,毛主席叫调整,实际上调整也就是整顿。”

邓小平讲话结束后,会场响起热烈的掌声,许多代表干脆站起来高举双手鼓掌不息。

邓小平结束讲话后,江青表示,也要“讲几句”。这个要求挺突然,因为大会事先没有安排江青讲话。华国锋同意。

江青说:“这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能胜利召开,是在党中央、毛主席关怀下获得成功举行的。今天我是代表毛主席、党中央来和各地代表谈谈几个问题,重要的问题邓小平同志和华国锋同志已经和同志们说了,我在这里所讲的是一般性问题。

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今天在昔阳县召开,这是一个有重要意义的会议,二十多年前,大寨的舵手陈永贵同志,在这七沟八坡一块地的山沟,用人民的双手和智慧,改天换地,开出一块块良田,长出一片片庄稼,克服了各种自然灾害,一年比一年取得丰收,现在昔阳县是全国第一个大寨式的县份,今年的粮食产量每人平均一千五百斤,这是一个先进水平,如果在今后五年内,全国有三分之一的县都改变成昔阳县

一样,实现农业机械化的五年计划一定能提前完成。

当前全国农业生产是受到一定的困难,这中间除了自然灾害之外,还受到资本主义在农村复辟的危险,自然灾害是可以克服的,全国不是出现很多红旗渠吗?这就是全国各地同志们战胜旱灾的最好证明。资本主义在农村复辟是存在一定危险,这是因为刘少奇修正主义流毒在农村中还未彻底铲除。据说在某些地方的生产队还存在着三自一包的修正主义政策,这真是咄咄怪事!据江西同志的汇报,该省某些县份对于中央的农业政策不甚了解,对中央第五个五年计划中的五年内实现农业机械化有所怀疑,产生这种保守作风也是阻碍农业向前发展的绊脚石。另外,有些同志反映中央,对于发展农业经济,依靠农业银行是否行得通?我在这里再告诉同志们,一切发展农业生产,都必须遵照毛主席'自力更生,丰衣足食'的教导,不要靠农业贷款去搞生产发展,自力更生、奋发图强,才是最根本的办法,只有自力更生才能在困难中取得胜利。"

她说:"在来山西前,主席曾希望我转达他的意思:'全党动员,大办农业'。"

"最后一个问题是普及大寨县的问题,中央计划在五年后普及大寨县,这就需要今天到会的全体代表同志,回去后努力检查目前存在的困难,大批刘修遗毒,树立大干社会主义的雄心,到基层去蹲点,搞重点,然后普及全县,能不能做到?就看你们这些带路人,一定要思想及行动一致,才能解决问题。"

开幕式后,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应陈永贵邀请到了大寨,午饭后上虎头山。江青亲自为邓小平夫妇大寨之行照相留影。

邓小平一行当天回到北京。

# 第1366回：搞创作，电影界齐聚大寨 追谣言，评《水浒》说投降派

9月16日，正在延庆县山区农村体验生活的浩然，突然接到北京市委的电话，说江青让他到大寨去。

原来，正在大寨的江青一天忽然问文化部长于会泳："怎么浩然没有来？"

于会泳忙说，早就通知他了。前几天听说浩然因心脏病住了医院。昨天他又亲自给医院打了电话。浩然答应一两天就来。

16日的傍晚，山西省委办公厅郭栋材从昔阳县打电话到太原，找小说《吕梁英雄传》和电影文学剧本《我们村里的年轻人》等著名作品的作者马烽，及原山西省作协副主席孙谦，告知二人，说省委书记要他们俩第二天早上8点一定要赶到大寨。郭栋材说，原打算派辆小车连夜去接他们，恐怕第二天走就来不及了，还是让他们连夜从太原出发过来吧。于是孙谦和马烽匆匆吃完晚饭，拿了点日常生活用品就出发了。

当他们路过武家坪村的时候，顺便看了在此插队的孙谦女儿笑非。她悄悄告他们说：前两天江青来了，就住在大寨接待站。

听了这消息，孙谦和马烽有点忐忑不安。

浩然17日赶到了大寨。他在去大寨食堂的路上，看到江青。

江青问他："你听到什么谣言没有？"

浩然回答说："没有听见。我一直在乡下，那里闭塞得很。"

江青接着问在一起的诗人张永枚："有没有听说我是吕后、武则天的谣言？"

张永枚回答说"听说四川有……"

江青打断他的话说："不止四川，广东也有。"又说："我哪里比得上武则天！"

他们边说边走进食堂。

此时，正在黑龙江拍戏的《创业》影片中的男主角张连文跟《创

业》的另外一个演员李仁堂,也被接到了大寨。二人刚到,正赶上开饭,便被直接领进了食堂。他们一进去,发现已经满满地坐了一屋子人了,都不认识。突然有人站起来大声说:

“张连文你怎么才来?过来,坐这儿!”

张连文扭头一看,那不是江青吗?他赶紧走过去坐在她身边,同桌的都是文化部的领导。

江青突然又喊:“张天民来了没有?”

此时,张天民就坐在江青身后那张桌子,两个人背对背,所以江青没发现他。听到江青喊他,张天民赶紧应声道:“我来了!”

江青大声说道:“你告了老娘一个刁状!无大错,有小错!”

她又问:“张天民你多大?”

张天民赶紧答道:“我46了。”

江青道:“那你还是个娃娃。你告我刁状,老娘今天要教训你,有谁给你出主意?”

张天民答:“没有。”

江青继续说:“你谎报军情。”

张天民不语。

江青问:“你是不是再向中央写封信。”

在场的吉林省委第一书记王淮湘答:“要写封信。”

江青说:“你必须给主席写一检讨,你既敢给主席写信,就必须给主席写检讨,因为你说了谎,告了刁状。目前有人攻击文化部,给文化部施加压力,说文化部是大行帮,我替他们顶着,老子不怕。”

在场的人都为张天民捏了一把汗,不知他今天这关怎么过?没想到,江青接着又说:

“你必须给老娘写一部新《创业》!如今先跟大家一块好好学习。”

原以为的暴风骤雨就这样烟消云散了。

江青又追问张永枚关于“五条谣言”的事,张永枚站起来沉默了一分钟,说:“马克思死后,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说,马克思一生没有个人的敌人,有的只是阶级的敌人。一、文化部是个大行帮;二、把‘江青比作历史人物’……”

江青接过来说:“我知道你们文艺界里有人,把我叫杨贵妃,把主席叫唐玄宗,这些王八蛋,说我是吕后、武则天,她们是封建阶级的政治家,我没有她们那样大的精力。”

张永枚说:“他们攻击江青同志是皇后。”江青说:“他们攻击我,就是攻击主席。”

吃饭的时候,江青对电影创作提出了任务:要重写《创业》、大改《山花》、新创作《井冈山》、《长征》和《四渡赤水》。她让浩然和一位导演合作搞《井冈山》。

山西的孙谦和马烽也是17日一大早赶到了大寨。他们按照惯例先来到大寨招待所安顿。招待所所长是老熟人,已知道二人要来,房间都已安排好了。俩人匆匆吃完早饭,所长就领着他们去接待站找文化部长于会泳。

接待站在招待所后面的山坡上。那里是接待贵宾的地方。如今门口已站上了岗哨。一进大门正好碰上于会泳。所长介绍后,于会泳“嗯”了一声说:“来,先帮助抄稿子。”随即把他俩领进大门旁的一座屋子里。

屋里摆着一些桌子和凳子,已经有几个人坐在那里抄写东西。于会泳从一本扯开的笔记本上撕下几页给了孙谦,又撕下几页交给马烽。要他们往稿纸上誊抄。看样子是讲话笔记。他们正要动手抄写,忽听院里传来一个女人的喊声:“孙谦、马烽来了没有?”

于会泳立即应了一声:“来了。”随即对马烽和孙谦说:“别抄了,快去见首长。”

一出屋门,就看见有几个背着照相机,提着热水瓶的男女军人,拥戴着包着一块白头巾的江青,向大门口走来。她手里还提着个小竹篮。没等于会泳介绍她就大声对孙谦说:“这不就是孙谦嘛,我认识。”

孙谦从1947年开始,先后在东北电影制片厂、电影局电影剧本创作所和北京电影制片厂任编剧,创作了《农家乐》、《陕北民歌》、《葡萄熟了的时候》、《夏天的故事》、《谁是凶手》、《奇异的离婚故事》等10余部电影剧本。江青五十年代担任中宣部电影处处长时,曾给孙谦的电影剧本《葡萄熟了的时候》谈过修改意见,后来还带着孙谦去拜访过当时全国供销总社主任程子华。

江青和孙谦握手后,转身又和马烽握手说:“你是马烽,我知道。今天咱们先去虎头山上劳动!”

大家跟着江青走出大门。一出大门,江青就用右手挽住了马烽的左胳膊,这让在文革中饱受批判,此时刚刚解放出来的马烽一时不知所措,即有点受宠若惊,又不知江青的用意何为?内心着实诚惶诚恐,既不敢甩脱她的手,又不敢太靠近。只能尴尬的随她往前走。

而江青则挽住马烽的胳膊对他说:“你写的《我们村里的年轻人》,很不好。三角恋爱嘛!《扑不灭的火焰》还可以,可惜没拍好。我看可以重拍。”

说话间,他们来到大寨的饲养场。几位穿军装的警卫人员已经拉着几匹马守候在那里。江青把挽马烽的手抽回去说:“上山我要骑马。马烽,你也骑上一匹。”

马烽忙说:“我不会骑马。”

江青边上马边说:“你当过八路军的,不会骑马?”

有一个警卫人员悄悄对马烽说:“你赶快骑上,要不首长生了气,我们也不好办!”

江青在马上又扭头来说:“还有一匹,孙谦骑上。”

于是,马烽和孙谦俩人都骑上马,在警卫人员的保护下,沿着曲折的土路,来到了虎头山上。

到了一片花椒地,江青从马上下来说:“大家都来参加劳动!摘花椒。”怪不得她提了个小竹篮。

江青骑马上虎头山

江青摘花椒

剪花椒

摘花椒归来 左一为于会泳、右二为邢燕子、右一为浩亮

9月17日,江青在大寨对随行的录音组人说:

“今天和同志们讲一点事情,我们党内的斗争总是曲曲折折的。最近,就有人把主席的未经政治局讨论的指示传了出去,这是严重的泄密。我们党内有投降派。”

“最近,就有人造我的谣言,说我江某人犯了错误,下放劳动了,自杀了。还说中央有左倾,有极左派,说我是极左派的头子。……张永枚就听了五条谣言嘛!你说说。我们不是阶级斗争熄灭论者。57年反右的时候,主席就让右派放嘛。对于这些谣言,我是不怕的。帝修

反没有一天不攻击我,我不怕,顶多杀头嘛!上五七干校嘛!我怕这些就不是共产党员,我害怕的就是腻味地活着。”

“现在文化部压力很大,受不了了。我顶嘛。说文化部是个大行帮。文化部那十条是过了,我说《创业》是粗了一些,我们可以搞得细一点,我建议只在国内发行。我们重新搞一个好的,我帮你们构思。《创业》题材还是我出的题目、推荐的呢。《海霞》是什么玩艺儿!它和《创业》不一样,是两个问题嘛!管他拿的是第几稿,把一个资产阶级的大美人,找一群把眉毛剃得细细的人演我们工农兵的形象。那里就有一个人物我喜欢,是阿洪嫂。现在老子不批《海霞》,怕影响主席评论《水浒》的战略部署。”

“我现在是科教片迷,我推荐了几十部科教片。科教片厂好,长影不错,珠江差些,就是北影不好,新影也不错。那个谢铁骊、钱江,还有一个什么?”

有人答:“史萍。”

江青:“还有没有资产阶级的良心呀!就不用说是一个共产党员了,这是斗争啊!他们是有大后台的。”

“你们想一想,从六四年全国会演后,我们出了多少部音乐、舞蹈,——大的、小的、中的,诗歌。比文化大革命前多嘛!”

于会泳报了个数字。

江青:“从1871年的资产阶级文艺开始,那么多年,有多少东西?你们要想一想,那个资产阶级良心那里去了。现在有的厂子又搞三自由一中心了。”

江青说的“三自由一中心”是指文革中批判的电影创作中曾经流传的“自由创作、自由结合、自负盈亏、导演中心。”

江青继续说:“那个时候,我就向政治局的同志吹吹风,让他们看看《青松岭》、《火红的年代》、《艳阳天》。

同志们你们想一想,为什么主席提出批《水浒》,为什么?因为党内还有投降派。为什么主席的指示未经政治局讨论就传到下面去?个别的省委还往下传达了。同志们,还有人竟把主席的指示给篡改了。‘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对资产阶级法权加以限制’,把‘资产阶级’抹了。后来,通过斗争才把‘资产阶级’加上,所以同志们要好好

学习。”

“同志们,你们是生在福中不知福。我年青的时候是怎么看书的?在东安市场。一个大姑娘,要走几个书摊才能看完一篇文章。那时候在北大图书馆,我中午就吃一个烧饼,我每个月才花七块钱。有的人攻击说:有的团20多元伙食多了。我那是经过请示中央得到批准的。他们练唱、练功,费不费力气呀!听说有的飞行员眼睛得了色盲,不飞了,还每个月向国家要70元的补贴呀,这个资产阶级法权要不要限制?同志们,老子今天要骂人了!这些混账王八蛋拿这么多钱,不开飞机,不公平啊!”

当天,江青在大寨对北京电影制片厂、长春电影制片厂、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新华社、《人民日报》、法家著作注释组、北大和清华写作组等100多人讲话时又提到《水浒》,她说:

“不要以为评《水浒》这是一个文艺评论,同志们不能那么讲,不是,不单纯是文艺评论,也不单纯是历史评论,是对当代有意义的大事……”

“为什么主席现在指示批《水浒》,大家考虑考虑。《水浒》的要害是排斥晁盖,架空晁盖,搞投降。宋江收罗了一帮子土豪劣绅,贪官恶吏,占据了各重要岗位,架空晁盖,不然为什么晁盖头天死了,第二天就把聚义厅改为忠义堂,所以主席谈,林彪一类如上台搞修正主义很容易。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中说,对资产阶级法权要加以限制,我们说这是对马列主义的发展和贡献,但是有人胆敢把它删去。批《水浒》就是要大家都知道我们党内就是有投降派。……”

“评《水浒》就是有所指的。宋江架空晁盖。现在有没有人架空主席呀?我看是有的。”

“党内有温和派、有左派,左派领袖就是鄙人!”

# 第1367回：谈《山花》，说拍长征、井冈山 王洪文，上海“民兵指挥部”

9月18日，北京又有一些文艺工作者来到大寨。其中有北影导演成荫、崔嵬，还有演员谢芳，他们都是江青叫来的。

吃早饭的时候，江青把马烽、孙谦、崔嵬、谢芳叫到一个桌子上，开宗明义说，要让他们拍一部反映大寨精神的电影。

崔嵬忙说：“《山花》已经快拍完了。”

江青说：“我看过一些‘拉秀’，不成！要重改剧本，重拍。”

《山花》是一部反映大寨精神的电影剧本。1964年冬天，周恩来建议山西省委组织人写一部反映大寨精神的电影剧本，由北京电影制片厂拍摄。写剧本的任务落在孙谦和马烽的肩上。他们花了一年多的时间写出了初稿，取名《山花》。可在文革中，他俩却为《山花》挨过好几次批斗。

文革后期，北影提出要拍摄《山花》，谢芳是《山花》的主要演员。于是山西省革委会又把在农村劳动的孙谦和马烽调回来修改剧本。由于当时省革委会实际上也是两派，反陈永贵的一派虽不好公开反对，但对剧本提出了这样那样的问题，使得剧本这样改不行，那样改也不行，费了一年多的时间，前后修改了十多次，后来是在北影催促山西省革委会后，才算最后敲定，投入拍摄。此时江青说要重拍，马烽赶紧说：

“听说北影为这部片子已花了40万元……”

江青说：“40万有什么了不起？就算缴了学费吧！导演还是崔嵬，主角还是谢芳，编剧还是你两个，可以再吸收几个年轻人。这事我要亲自抓。一定要拍好！”

早饭后，马烽和孙谦悄悄来到陈永贵的家中，看见他正蹲在炕头上，就着咸菜喝“沙粥”。孙谦对陈永贵说，希望他能和江青讲一下，《山花》这部片子已经快拍完了，不要再另起炉灶重新写了。

陈永贵摇了摇头说:“老实告诉你们,这事我不便说,说了也不顶用。”

原来,江青一到大寨就和陈永贵谈了,她要亲自抓《山花》的电影剧本。还说:“现在拍的这个不行。两个老作者,精神状态上不去……”

陈永贵当时就忙对江青说:“这两个人对大寨倒是有感情的。”

江青“哦”了一声说:“那就告山西省委一声,把他俩调来。”

于是便有了急急忙忙把马烽和孙谦调来大寨的经过。

9月18日下午,江青要北影、长影等单位部分创作人员观摩了《康贝尔王国》、《简爱》等外国影片后,组织大家座谈。会上,江青说:

“主席说,文艺评论太少。我们要正确地对待马克思主义文艺评论,基本好,基本坏,把握住这两个大概念,这样才能繁荣文艺创作。我们不要怕评论,也不要怕人家骂。对自己的作品不能光讲好的一面,要通过评论了解缺点和不足。在文艺评论上,主席为我们作了典范。比如最近评《水浒》,批宋江。当然这不单是文艺批评问题,而是重大的政治斗争。主席对《创业》的批示,给了你们很大的鼓舞。我找你们来,也是鼓励,也是帮助。对作者,只要不是国民党的,都要帮助。国民党投降我们的,也可以帮助。

我们不搞无冲突论的作品,不搞阶级斗争熄灭论。像《康贝尔王国》这样的资产阶级电影,就注意写冲突。它矛盾冲突不断,一个高潮接着又一个高潮。主人公小康贝,有些书生气,把他打扮成英雄,所有资产阶级人物都帮助他,掩盖了资产阶级纸醉金迷的反动本质。摩根这个反面人物写得也不错。他是个小包工头,写他同大老板有矛盾,跟工人有矛盾,就是同那个胖司机,也有矛盾。”

她说:“‘三突出原则’不是我提的。这一点,文化部几位同志清楚。我只讲要突出主要英雄人物;对立面也要写好,不能写弱了,写弱了对主要英雄人物衬托不起来,影响塑造英雄典型。”

“电影创作要搞民主集中制,不搞导演中心制。一个创作班子,就像下棋,有卒子,有老帅,导演不懂这个不行。我们搞戏有这样的经验,既听群众的,也听专家的,不同的和反对的意见都要听。然后把好的意见留下,不好的意见排除,有些不好不坏的,可以暂时放一放。这

样最后集中了,就不是一个人说了算。经过充分民主以后,到了摄影棚,要听导演的。”

“技术我们还没有过关。技巧也没过关。技巧是艺术问题。在这方面,你们不要怕失败。”“在创作上,我鼓励你们敢于创新,勇于实践,不要想一举成名,要做垫脚石。我们的照相设备要改进。服装不能老穿新衣服。像《鸽子号》的男主角,就穿一条破裤衩,很真实。化妆要从塑造形象出发,多给演员想些办法,但不要把工农兵化成资产阶级大小姐。《山花》再拍的时候,女演员要加柔光镜。《南征北战》有些镜头没有加柔光镜,欠妥。电影演员要懂角度,不懂不行。影片《斗牛》的剪接就很好,斗牛时用替身,你都看不出来。我们有些戏,要在场地外景拍摄。场地景宽阔,便于拍运动镜头。”

她说:“《海霞》的基调很坏,再改也不行了,基调改不过来。现在,我还可以批这部片,基本方面不好嘛!”她还说:“他们给主席写信,主席就没批。政治局有些同志不了解情况,看了‘双片’表了态。他们压文化部,现在文化部压力很大,我替他们顶住,老子不怕,老子顶着。有人说我翻案,这不是翻案,我现在要打反攻。《海霞》要批,但现在不批,因为会干扰评《水浒》,将来还得要批。”

接着,江青说,她一直考虑,有许多新的斗争生活和革命历史应当反映,而且要反映好。她认为《山花》样片有的还不错。要重拍。拍宽窄银幕两种。剧本由原作者孙谦、马烽提出修改方案,报文化部。文化部也要提出意见,再上报。

然后,江青说她现在要抓两个重大题材的电影剧本:“一个是毛主席创建井冈山红色根据地;另一个是举世无双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她说:“再过两年就是建军五十周年,我决心要拿出这两部影片向建军节献礼!”

江青继续讲道:“毛主席教导我们‘生活是创作的惟一源泉’。写井冈山就得到那里去深入体验生活,写长征就得沿长征路线走一趟,”随即她点了几个人写井冈山,并指名要浩然负责。她说:“王树元同志尽快完成《杜鹃山》话剧本,浩然同志完成《金光大道》小说后,投入这一创作。导演由成荫同志担任。”

浩然说:“这是个重大题材,是一个光荣的任务。可是我不好办,

我有心脏病……”

江青说:“你可以带个大夫一块去嘛。”

接着,江青又点名要马烽和张永枚、薛寿先写长征:“张永枚同志把《八一的枪声》的文学剧本定稿,马烽同志把《山花》剧本完成后,投入这一创作。导演由崔嵬同志担任。”

马烽一听要他参加写长征,想起曾听北影导演成荫说过,前些时候,北京正在上演陈其通的话剧《万水千山》。有天,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等人观看了演出,并接见了作者、导演。陈其通对以前由成荫、孙谦改编的,由成荫导演的《万水千山》电影不满意,主要是嫌篇幅太短,许多该展开的情节没有展开。邓小平说可以重拍嘛。一部放不下,可以拍两部、三部。这就是说,那里打算重拍《万水千山》,这里江青又组织人另写长征,忙说:“首长不是要我们改《山花》吗?”

江青说:“改完那个再写这个嘛!”

马烽推辞说:“我水平有限,恐怕担负不了这一重大任务。要写长征必须沿长征路线走一趟,可我岁数大了……”

江青问:“你今年多大?”

马烽说:“已经五十出头了。”

江青说:“我比你大十来岁,现在不是还在继续工作?”

马烽说:“我身体不好,患有高血压。”

江青说:“我还患有冠心病呢!雪山草地气压低,可以坐飞机过去嘛!”

她又转过头对孙谦说:“孙谦同志,你的任务是和张天民合写一部新《创业》。”

孙谦说:“我从来都是写农村,对工业题材一点也不熟。连螺丝钉怎么拧都闹不清。”

江青说:“我是要你写人物,是要你去拧螺丝钉吗?”她说话的声调都提高了。

马烽忙用脚碰了碰孙谦的腿。孙谦咽了口唾沫,随即低下头,没有吭声。江青接着说:“剧本由张天民、孙谦两位同志和大庆创作组来写。孙谦同志完成《山花》剧本以后,投入这项工作。”

第二天早饭后,于会泳把大家召集到一起,宣布了经首长批准的

三个创作组组长名单:《井冈山》组浩然,《长征》组张永枚,新《创业》组张天民负责,由孙谦协助。

于会泳又向马烽和孙谦说:“首长要你俩随我们回北京,赶快改写《山花》。”

9月20日晚,江青在大餐厅和大寨社员代表开庆祝中秋联欢会。

回北京时,江青在火车车厢里找到张永枚,拍着他的肩膀说:“娃娃,你说的那个话,我查了一下,恩格斯没有这样说过,我怎么能和马克思比呀,马克思是无产阶级的导师,我是普通的中国共产党员,我不同意你这么说。”

火车开了之后,于会泳分头找各组说:“张永枚的譬喻是错的,大家回去就不要往外传了。”

于会泳和江青在大寨的合影

江青和陈永贵在蓄水池

江青在大寨打谷场扬麦。

9月18日下午,王洪文在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陪同下,在上海锦江饭店小礼堂接见了上海民兵指挥部领导小组全体成员。王洪文说:

“有一点同志们要清醒,关于上海民兵是经过斗争的,今后还是有斗争的。我们要谦虚谨慎,不要翘尾巴,特别是以后是不是站得住,同志们要注意,你们要做点思想准备,人家一巴掌打过来,看我们是否站得住。实践上都能站得住脚,将来就驳不倒。如我们在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站得住脚了,我也可以说话了。有些材料是有说服力的,如三位一体,民兵抓阶级斗争,这些都要很好的总结。

上海这个地方要立足于自己。关于130炮的问题,过去我和春桥同志商量过,还是要靠自己造,现在看来新八五站住脚了!比100的性能好。而且轻了三吨,我最欣赏的新八五是自行设计,自己制造的,比100优越得多。

上海民兵指挥部,要搞个编制,把武装部的人要考虑进去。如果上海民兵指挥部拆了,你武装部要把全部工作给我抓起来,你抓得起来?我不相信你抓得好!没有阻力不可能,就是有人把这个机构改过去了,我20年后还是要改过来。只要我不打倒,我不死,我还是要把它改过来。现在有人总是觉得过去的东西顺手,方便,还有人说民兵抓阶级斗争不正规化,还有人骂我们,上海搞第二武装集团。什么正规化呢,要服从阶级斗争的需要,要服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反正我知道一点。”

上海民兵指挥部是1972年9月10日,由上海市文攻武卫指挥部和市野营训练指挥部合并而成,一直得到毛泽东的关注。

1973年3月4日,已在北京的王洪文打电话到上海,告知"主席最近多次谈到上海民兵,""主席要军委给上海民兵发20万支枪。"

1973年4月,王洪文返沪主持上海市工会第五次代表大会,强调上海工人阶级要用枪杆子武装起来。

接着,6月8日,上海市委向党中央、国务院上报《关于上海民兵参加社会阶级斗争的情况报告》,称派出1000余支民兵小分队,深入上海各里弄等。

这年的7月27日,上海市委写作组完成了《武装工人阶级,建设城市民兵——上海城市民兵情况的调查》,首次提出要把民兵作为同党内资产阶级作斗争的工具,并称上海的工人武装是不穿军装的解放军,不挂牌的派出所,群众专政的铁拳头等。

到了11月19日,国务院、中央军委转发《"上海城市民兵情况的调查"的通知》。《通知》说:

上海市革命委员会调查组关于"上海城市民兵情况调查",总结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上海城市民兵建设的新经验,现转发你们,望结合当地实际情况进行研究,因地制宜地加强城市民兵建设。

城市尤其是大中城市,是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也是战时敌人攻击的主要目标,战争打起来,城市不能轻易放弃,有些城市要学斯大林格勒长期坚守。从上海的经验看,平时管理和改造城市,战时保卫和坚守城市,都必须依靠工人阶级,因此进一步加强城市民兵建设,着重武装工人阶级,建设一支以产业工人为主体的城市民兵队伍,加强城市的防卫能力,是非常必要的,应当十分重视。要积极组织民兵参加社会阶级斗争,打击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维护城市的革命秩序,充分发挥民兵的作用,把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落实到基层:同时要在阶级斗争中锻炼民兵,加强民兵与人民群众之间的密切联系,不断提高民兵的战斗能力。要在普遍搞好民兵三落实的基础上,按现有的武器装备条件,大力组训民兵武装基干营、团,民兵高炮营、团,和其他必要的专业分队,并随着民兵武器的增加不断扩大和加强。战争打起来,依靠这一批民兵的战斗骨干队伍,带动广大民兵和群众配合部队

保卫城市,坚守城市。

各级党委要发扬全党抓军事,党管武装的优良传统,仿效上海的办法,对民兵工作进行认真研究和落实,切实把城市民兵建设抓紧。

《上海城市民兵情况的调查》中说:

上海城市民兵,是在1967年7月根据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批阅的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关于武装工人,改造城市民兵的请示报告建立起来的。当时叫文攻武卫,人数不多,没有发枪,每人手拿一根棍子或长矛。到今年3月,已发展到80多万人(其中转业复员军人7.8万多人,有1.4万多人是打过仗的),拥有各种武器23700余件,高炮324门,建立了10个武装基干团,18个高炮团,5个独立高炮营,3个高射机炮连,1个摩步团,此外还有工兵、防化、通讯、运输等一批专门兵种队伍。

为推广上海民兵工作的经验,叶剑英亲自陪同王洪文到总参谋部讲话。但是,由于传统的民兵工作都是由武装部负责,再成立一个民兵指挥部势必与原有的民兵指挥系统发生重叠和矛盾,所以这项工作实施起来困难重重,应该说是阻力很大。

十大后不久,一次,刚当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的王洪文在人民大会堂参加一个会议。快散会时,王洪文忽然从主席台上跑下来,找到总政治部副主任田维新说:“田副主任,开完会你留一下,有一件事情我们商量一下。我已与李副主席讲了,我们三个人谈谈。”

散会后,也是中共中央副主席的总政治部主任兼北京军区司令员李德生从台上走下来。王洪文对他说:“关于民兵指挥部的问题,你们总政治部态度不明朗,《解放军报》也很少宣传。”

李德生说:“民兵是毛主席人民战争军事思想的一个组成部分。民兵历来都是由军区、武装部来管的。如果不让他们管,另外成立指挥部,这牵扯到一个体制问题,体制问题要慎重。”

田维新也说:“现在军区和武装部管民兵,战时民兵配合主力部队,平时管治安,发挥了很好的作用。军区和武装部有一套现有的组织班子和干部队伍,有工作经验,也没有出什么大问题。一下子要改造过来,要慎重。”

王洪文听到他们两人反对,就说:“毛主席不是说了,民兵也要改造,我们认为要改造民兵工作,民兵指挥部是最好的形式,同志,这是

个新事物,对新事物要敏感。”

田维新在军内虽然知名度不太高,但也是1937年参加革命的老八路。他和大部分老干部一样,并没有太把王洪文放在眼里。听王洪文这么一讲,便对他说:“王副主席,你和李主任谈吧,我家里有一大堆事,有文件要处理,先走了。”说完就离开了。

李德生看田维新走了,也说:“今天就谈到这里吧。”说着,也走了。

但是,毛泽东一直没有叫停这项工作,各地的民兵指挥部也都相继成立,直接由地方党委领导,与各地的省军区、军分区、武装部没有组织上的隶属关系。

# 第1368回：周恩来，再做第四次手术 邓小平，亲自抓《汇报提纲》

1975年9月19日，毛泽东审阅邓小平当日报送的外交部、中联部《关于同越南党政代表团会谈方案的请示》和《关于越南党政代表团访华接待计划的请示》。邓小平在给毛泽东的报告中写道："此事在政治局会议上谈过一次"。"这个问题较大，我想当面得到主席的指示"。"我还有几个重大的人事变动问题，也急需向主席当面请示"。《关于越南党政代表团访华接待计划的请示》中说到，拟请江青等出席欢迎越南党政代表团的宴会和专场文艺晚会。毛泽东对这两件请示批示："已办，退小平。""另，江青不要参加对越活动。"

这天下午，胡乔木找邓小平汇报说，准备写一篇关于全面宣传毛泽东"三项指示"的文章。其实胡乔木已经在9月18日布置邓力群负责写这篇文章了，并商谈了文章的主题和布局，要求一个星期写出来。胡乔木认为，报纸上宣传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文章太少，很需要写一篇全面宣传三项指示的文章，并提出了文章的布局。他在向邓小平汇报时说：

"开头总的讲，由于贯彻执行了毛主席的三项指示，我们的工作有了进步。但是由于没有全面执行，有的只执行了一项，有的只执行了两项，所以各地方的工作发展不平衡。接着分三段分别讲每项指示的意义和三项指示之间的相互关系，最后落实到全面贯彻三项指示，落实到整顿。"

邓小平听了很赞成，认为很重要，要抓紧写出来。还说："写好以后，可以约几位副总理一起讨论审查一下，然后再送主席，主席同意了，就交政治局议，政治局批准了，就可以作为《人民日报》社论发表。"

邓小平提出，政研室再写两篇文章，一是关于整顿党的作风，一是关于"双百"方针。邓小平还要求，以后每月写一篇，使政研室工作逐渐走上正轨。

他说:“今冬明春要整党。军队要整顿,地方也要整顿,工业、农业、文教、文艺等都要整顿。”

第二天,胡乔木把邓小平的意见告诉邓力群和政研室其他负责人。邓力群很高兴,立即找胡绩伟、余宗彦、苏沛、滕文生4人研究材料,讨论提纲,还请有关单位的人就全国贯彻执行三项指示情况和文章应怎样写法,开了两次座谈会,然后即写初稿。

9月20日,周恩来接受了第四次膀胱癌手术。这是一次大手术。如果发生意外,他躺在手术台上将永远不会起来。在进入手术室之前,周恩来让秘书调来他在1972年6月23日关于伍豪事件专题讲话的录音整理稿,在记录稿的第一页上,用颤抖的手写下:

周恩来　1972年6月23日

进入手术室　1975年9月20日

病重的他,漏写了“进入手术室前”的“前”字。

邓小平、张春桥、王洪文、叶剑英、李先念等一同来到医院,看望周恩来。

在进入手术室前,周恩来问:“小平同志来了吗?”

邓小平、叶剑英和张春桥闻声从休息室走出来。

邓小平走到病床前,周恩来紧握着他的手,努力高声地说:“小平同志,你这一年干得比我强得多。”

然后,他又对着叶剑英和张春桥说:“你们要帮助小平工作。”

邓小平退至门口时问张春桥:“总理说的什么?”

张春桥说:“总理叫咱们好好工作。”

进入手术室后,周恩来又大声说道:“我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

在场的邓颖超要汪东兴将此情况报告毛泽东。

9月24日,毛泽东会见越南党政代表团。他在与越南劳动党第一书记黎笋谈话时说:“现在天下最穷的不是你们,而是我们。我们有8亿人口。我们现在有领导危机。总理身体不好,一年开过四次刀,危险。康生身体不好,叶剑英身体也不好。我82岁了,我也有病。”他用手指着陪同会见的邓小平说:“只有他算一个壮丁。”

会见后,邓小平向毛泽东汇报最近工作。当谈到江青在学大寨会

议上的讲话时,毛泽东生气地说:“放屁!文不对题。那是学农业,她搞批《水浒》。这个人不懂事,没有多少人信她的,上边。”此时,毛泽东已经收到穆青和朱穆之的联名信及江青在大寨的讲话材料。他说的“上边”是指中共中央政治局。

学大寨会议开幕式后,华国锋请示毛泽东,是否转发江青在大寨的讲话稿,放她评《水浒》的录音。毛泽东指示:“稿子不要发,录音不要放,讲话不要印。”

再说胡耀邦等人根据邓小平的意见,在胡乔木的帮助下,主持写出了《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共分为六个部分:

1、科技部门一定要做到既有坚强的政治领导,又有切实具体的业务领导。党政领导干部,应当朝又红又专的方向努力。

2、科学技术也是生产力,科研要走在前面,推动生产向前发展,没有现代化的科学技术,也就不可能有工业、农业、国防的现代化。

3、发展科学技术要靠两支队伍,一支是专业队伍,一支是群众队伍。必须充实和加强专业队伍,必须逐步建设一批新的专业科学研究机构。科学实践也是一种社会实践,生产斗争是不能代替它的。不能不加区别地要求任何科学研究工作都要实行“以工厂、农村为基地”不宜笼统地提“开门办科研”这样的口号。

4、自力更生,又不闭关自守。为了争取时间,争取速度,有必要从外国引进一些先进技术、先进设备。

5、在搞好大量的应用研究的同时,要重视和加强理论研究工作。不能把理论研究与“三脱离”等同起来。鼓励学术上的不同意见的争鸣和讨论,改变学术空气不浓和简单的以行政方法处理学术问题的状况。

6、落实政策,把广大知识分子的积极性调动起来。

交国务院的《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讨论稿中提出:“对毛主席的革命科技路线,必须努力进行系统的、准确的宣传,并且注意防止和克服对这一路线的任何偏离、割裂或曲解。”并列举了五个方面,说明应该怎样全面认识与把握,防止两种错误倾向。其中说到,“一定要强调马列主义哲学对自然科学的指导作用,提倡科研人员学习自然辩证法,认为哲学对自然科学的研究没有指导意义,是不对的;另一方面,

以为哲学可以代替自然科学,以为不依靠科学本身的大量的辛勤劳动和精确论证,就可以简单依靠哲学的一般原理去推演出具体科学问题的具体结论,也是不对的”。

纪登奎对《汇报提纲》中关于哲学与自然科学关系问题的这段表述提出了自己的看法,邓小平于9月25日早上把胡乔木找去,对他说:“一定要搞一个毛主席和马恩列关于哲学不能代替自然科学的语录,作为附件,明天早上就要编好印发,因为有同志有意见。”

胡乔木当即要于光远组织政研室摘编。国内组孙小礼连夜编好一份题为《哲学只能概括、引导而不能代替自然科学》的材料,引用毛泽东的论述5条,恩格斯、列宁的论述12条,于9月26日印出。

9月26日早上,邓小平又将胡乔木找去,要他先去找纪登奎面谈一下。他还让胡乔木一定要参加下午讨论《汇报提纲》的会议。

胡乔木按邓小平的嘱咐去找纪登奎。纪登奎主张用毛泽东在《整顿党的作风》中关于“哲学则是关于自然知识和社会知识的概括和总结”的提法。胡乔木即引毛泽东的一些语录,说明《汇报提纲》中这样的表述是根据毛泽东《实践论》、《改造我们的学习》等一些讲话中的论述。其中有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的“马克思主义只能包括而不能代替文艺创作中的现实主义,正如它只能包括而不能代替物理科学中的原子论、电子论一样。”还有毛泽东在《整顿党的作风》中“哲学则是关于自然知识和社会知识的概括和总结”那一段。

9月26日下午,国务院召开科学院《汇报提纲》汇报会,除科学院胡耀邦、李昌、王光伟外,还有计委、建委、国防工办、国防科委和教育部负责人参加。胡乔木和吴冷西、于光远以及学部林修德也参加了这次会议。政研室连夜摘编的《哲学只能概括、引导而不能代替自然科学》的材料发到每个与会者手里。

邓小平在会上说到自动化提高后科学技术是生产力时,胡乔木插话说:“科学技术是生产力。马克思说生产力首先是科学。”

邓小平在会上谈到了哲学与自然科学的关系,还特别交代要将“哲学与自然科学写清楚。”

胡耀邦在汇报到“又红又专”的问题时说:“关于又红又专,现在不

敢讲红专。”

邓小平则干脆点破:“实际上是不敢讲专。”

陈锡联说:“一讲就挨棒。”

胡耀邦接着说:“进口资料很少有人看。”

邓小平:“各省都有(指进口资料),人不读,耗子读。”

李先念指示:“进口图纸要归口管,每年进口费用800万。”

胡耀邦又说:“每周只有四个半天工作。大家不满意。”

邓小平:“科研人员怎么会满意?不务正业,少务正业。”

那时一个星期是6个工作日,每星期有一天半是政治学习。

胡耀邦说到有些人喜欢抓别人“辫子”,挑毛病时,邓小平说:“辫子也确有一点,比我强一点。我是维吾尔族姑娘,辫子多,有时说错话,办错事。”

李先念:“是补台,还是拆台。”

邓小平:“办法是群众运动,群众讨论。那些人他们不怕党中央、国务院,但是怕群众。不高兴你们的是少数,希望改变现状的是百分之九十五,是百分之九十九以上。”

有人汇报上班时看电影时,邓小平说:“这一段,他们没有搞(科研),看电影,打派仗,少数人是秘密搞的,像犯罪一样,陈景润就是秘密搞的。这些人还有点成绩,究竟是红专还是白专?陈在世界上公认的有水平。他会数学,就是白专,有一点怕什么?应爱护,赞扬。他是不是人大代表?”

有人答:“是强迫通过的。”

邓小平:“强迫命令通过的。中央说可以当代表。有那么些成果,总是对国家有贡献的。有个医生说:有人愿看书,不敢看,外人一来,就用《矛盾论》盖上。你们有个老教授,搞半导体的,北大让他改行,他不会。让他在半导体所作报告,很受欢迎。学非所用,是个大浪费。为什么不让他搞半导体去?北大不用他,可调半导体所,让他当所长,给他配书记,配后勤。科学院整顿很重要,思想工作量很大,思想问题很大。强调领先工农兵是相对的。”

李先念:“‘九爷不能走’。70年章士钊向主席汇报知识分子情况时,主席很注意老知识分子的房子。”

胡耀邦汇报批判理论风时,邓小平说:“毛泽东思想、马列主义都是理论,都要批吗?各部都希望科学院稿理论,结果科学院批理论风。我们搞半导体,两千片才成功一片,日本的效率高得多,这就是我们的理论不行,我们是碰上的。对理论有个恢复名誉的问题。鞍钢有5000个大学生,但图书馆没有人去。鞍钢5000个科技人员并不算多。”

“思想整顿量很大。我国科学应照毛主席路线搞,认真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思想整顿是关键。广大科技人员实在想搞研究,整顿不是整这些人,是班子。那些一不懂行,二不热心,三有派性,为什么留着他?科研人员有水平、有知识为什么不能当所长?40多岁有经验,现在主要靠40多岁的人。后勤不忠心耿耿,都抓不起来。不能老让科技人员跑这些。科研没有后勤不行,后勤也得学科学知识。班子要那些党性强,作风好,能联系群众的。书呆子不行,但是搞科研的人,允许是书呆子。”

纪登奎:“不能搞‘双突击’。”

邓小平:“干部,科学院完全能自己解决,不用工厂派。”

李先念:“不发动群众,不知道哪个好。汇报提纲送政治局批准。用这发动群众。”

纪登奎:“我自己孩子大学毕业,可是不知道数理化。哲学不能代替自然科学。但哲学是有指导作用的。中国人不重视自己的成就,而是外国人重视。”

邓小平:“刊物太少了,水平低一点也不要紧。”

李先念:“文件争取批下去。很多企业的科技人员都当工人去了。当工人也不要紧,但到一定时间要发挥他们的专长,外行是指业务上,但科研政策和党的政策必须是内行。”

邓小平:“要建立科技人员档案,把好的、有前途的记下来。15万有1000也好。也许几十个人有成就,就了不起。要帮助他们创造条件,关心他们,包括有怪脾气的,毛病大的,都要支持。白专,只要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好处,比只占茅坑不拉屎的好,比搞派性的好。工厂企业要解决他们的困难,要解决他们的房子,把他们提到领导岗位上,孩子送托儿所,夫妇两地分居要帮助解决。后继要有人。

中心是教育。大学学什么?现在对‘以学为主’还有争论。‘以学

为主’是毛主席提的。如果学院只有中技水平,那你还办科技大学干什么?上海机床厂是个形式。但不是唯一的形式。科技大学要办好,选数理化好的,不能‘照顾干部子弟’。不懂数理化、外语,还攀什么高峰?中峰也不行。低峰还差不多。犯错误我检讨。”“科研人员,这些人是劳动者,科研是生产力。”

胡乔木:“马克思说,生产力首先是科学。”

邓小平:“哲学与自然科学队伍要写清,送主席、印发政治局。主席非常关心这个问题。连《化石》都关心。精力要放在整顿上,开展科研工作。

现在学习理论不够。提拔干部有问题,宣传毛泽东思想有混乱。过去林彪只讲学习‘老三篇,老五篇’,割裂毛泽东思想。罗荣桓带头反对,林就说罗晚节有问题。

现在学生也不好好读书,现在读书都成了问题,你周荣鑫是教育部长,你还不发表演说。搞科学研究的,也不读书,也不研究外国情况,不到下班时间就回家搞家务,这样科学事业怎么能发展呢。

关于整顿问题,我向主席报告过,主席同意整顿。整顿的核心是领导班子。党也要整顿。整顿要有一股劲,要敢于整顿,不怕干扰。半年之内要突出一个敢字,不管你老的、中的、青的,老虎屁股都要摸。否则就是白讲。对闹资产阶级派性的,要发动群众,这些人最怕群众。只要敢抓,并不难解决。浙江一个月就解决问题,徐州把顾炳华一抓就解决了。

老中青三结合我从来不反对。三个方面都很重要。但是,不要忽视中年。中年非常要紧。特别是四十几岁的县委书记,大厂厂长,只要是优秀的,弄到省里来,锻炼几年就可以当省委书记。好的苗子可以提的快一点,但是,要一个台阶一个台阶的往上提。台阶宁可矮一些,也要一个台阶一个台阶的上来。前一段从工农中提拔了一些干部,提的太快,一下子上来工作有困难。这样提上来,弄得不好,不是爱护他,反而害了他。军队这样提上来的干部,可以不免职,但要下放锻炼,叫挂职下放。”

汇报会后,胡乔木等又对《汇报提纲》中的那段关于哲学与自然科学关系的话作了修改,成为:“一定要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对自然科学

研究的指导作用。不积极组织科技人员学习毛主席的哲学思想、学习自然辩证法,不鼓励和帮助他们在工作中自觉地运用辩证法,不认真开展对自然科学领域中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批判,是不对的;另一方面,不注意哲学与自然科学的区别,以为哲学可以代替自然科学,以为有了哲学就可以不要各门自然科学的基础理论,以为不需要依靠辛勤的科学实验和精确的科学论证,只依靠哲学的一般原理就能推演出具体的科学问题的科学结论,也是不对的。”所附的材料,后来又补充了不少条,重新编辑,分两部分:(一)自然科学的研究必须以哲学为向导。(二)哲学不能代替自然科学。两部分都引用了“毛主席的论述”和“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论述”。题目改为:《必须用哲学指导自然科学的研究,但不是用哲学代替自然科学》。

根据会上邓小平的谈话,以及会下邓小平的交代,胡乔木又对《汇报提纲》作了若干修改,如:队伍,注明全国各专业科研机构五个系统共约25万人;明确要选拔科研人员担任正副所长等职;科技大学要从应届优秀高中毕业生中直接招生;整顿的内容还增加了“整顿科技出版工作”一项。9月30日晨,稿子修改好付印,午后送邓小平报送毛泽东。

教育部部长周荣鑫参加了9月26日的国务院会议。当天,他就开始主持起草教育部向国务院的《教育工作汇报提纲》,共分六个部分:一、教育革命取得了很大成绩。二、新的形势重新把“十年树人”的历史任务提到我们的面前。三、坚持党的基本路线,进一步搞好教育革命。四、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五、坚持两条腿走路,充分发挥两个积极性。六、整顿领导班子。

# 第1369回：刘冰盼，周长庚的一封信 芦荻走，毛远新回到北京

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8月将反映迟群的信送到邓小平家中后就一直没有消息。到了9月，仍然杳无音讯。一个星期天，刘冰来到北京市城建委主任杜春永家里。他和杜春永曾在河南一起工作过，比较熟悉，刘冰向他讲述了迟群、谢静宜的情况以及自己处境的困难，打听北京市委对清华大学的看法。杜春永对刘冰说，各方面对迟群的反映都不好。他问刘冰为什么不将迟群的问题向北京市委报告？刘冰说他已向吴德报告了。杜春永劝刘冰耐心等待。

又是一个星期天，正在清华大学上学的纪登奎女儿纪南到刘冰家里看望刘冰。因为刘冰曾在河南省委担任过省团委书记，纪登奎时任许昌地委书记，相互来往较多。但纪南这次来似乎有点神秘，她小声对刘冰说：

“刘叔叔，我爸爸让我告诉你一件事。”

刘冰把她带到办公房间，请她坐下来，慢慢谈。

纪南说：“我星期六回家，爸爸问到了刘叔叔，并让我告诉叔叔，迟群、谢静宜并不代表毛主席。爸爸还问候刘叔叔好。”

刘冰打心眼里感激纪登奎。纪南毕竟还是个孩子，他不便再问她什么，也不便向她谈什么，只是请她转告自己对她父亲的感谢和问候。纪南传递的信息，无疑对刘冰是重大的鼓舞和支持，他向惠宪钧、柳一安、吕方正3人通报了这件事。

此时，从外校不断传来教育部长周荣鑫在干部会、教师会、汇报会、座谈会等各种场合的讲话，其中许多观点都是与迟群、谢静宜尖锐对立的。但是，在清华大学看不到也听不到教育部长周荣鑫的这些言论。

9月下旬，柳一安得到一份9月15日邓小平同志在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开幕式上的讲话传抄稿。他们很高兴，认为要整顿，在清华首

先就要整顿领导班子,解决迟群、谢静宜的问题。可惜这是传抄稿,不能向下传达,刘冰每天都到机要室去询问中央和市委来文的情况。

9月27日,主持中央工作的邓小平向毛泽东报送了3份关于农村社队办企业的材料。毛泽东当天阅后批示:“小平同志:请考虑,此三件(两封信及一篇报道)可否即发在京各中央同志。”

邓小平报送毛泽东的三份材料,最主要的是1975年9月9日,由浙江省永康县银行干部周长庚执笔,浙江省部分财政银行干部给毛泽东、中共中央写的信。信中反映,由于《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的有关规定未作修改,中央未明确由哪个部门主管社队企业,致使一些基层单位的党政干部对社队企业不敢大胆支持和领导,社队企业处境困难。有的社队企业自流发展,有的社队企业走了弯路。有一些部门对办得好的社队企业千方百计要改变其体制,收归自己管辖,如企业不同意就不分配原料,不安排产品销路等等。来信“恳请党中央对这方面作些新的指示,动员全党和全国各条战线,学习推广北京、上海、河北、河南、湖南等先进省、市的典型经验”。信的全文是:

毛主席、党中央:

最近,我们读到《华国锋同志给湖南省委的一封信》,受到很大的启发教育和鼓舞。

这封信,说出当前广大农村干部和贫下中农的心里话。信中指出的问题,不仅在湖南省有,在全国各地有,特别是在我们浙江省更普遍存在。

在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指引下,浙江省广大农村的社(队)办企业,也如烂漫的山花,冲破种种阻力,到处开放。据全省六十五个县(市)的不完整统计:目前止,公社办企业已有五千多个,大队办企业有二万八千多个,每年总产值约达六亿多元。社(队)办企业的发展,对进一步壮大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加速农业机械化步伐,发展农业生产,支援大工业和外贸出口,改善城乡人民生活,逐步缩小“三大差别”,巩固工农联盟,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等方面,都起着积极促进作用。

但是,目前我省一些党政领导同志,对社(队)办企业这一社会主义新生事物,表现很不热情,至今态度暧昧,不敢大胆支持和领导,省里几个有关部门,至今还在“踢皮球”,你推我管,我推他管,弄得谁也

不想管,不愿管,不敢管。由于缺乏党的强有力的一元化领导,缺乏统一规划和部署,一些地方的社(队)办企业自流发展,也有偏离社会主义方向,走了弯路的。

为什么对社(队)办企业存在“三不管”倾向呢?我们由于工作上关系,曾多次向省、地、县党委和有关部门写信和走访。目前,比较明确的答复主要有二点:(一)是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六十条》有关章节,在中央没有明文修改前,对社(队)办企业问题,不能轻易表态支持,更不能全面规划发展;(二)是中央没有明确指定那个部门主管社(队)办企业;中央有关部门(如农林部、水电部、轻工业部、商业部和国家计委等)也都没有共同规划和部署的意见,省、地有关部门也不好决定由谁来主管负责。

同时,在实际工作中,我们还碰到这样一个问题:有一些社办企业的产品销路好,赚钱多,积累资金较快,省、地、县有的领导部门就眼红起来,千方百计要把这些社办企业转变体制,收归他们所管辖的企业范围,并说:“社办企业转大集体专业社、厂,大集体专业社、厂转全民所有制的国营工厂,是社会主义大方向。”如果不同意转变所有制,就不分配原材料,不安排产品销路。上面这种说法和做法,受到基层党组织和广大贫下中农的坚决反对和抵制,他们强烈地反映说:“人民公社办好一个企业就变一个企业,那么公社‘伟大的、光明灿烂的希望’在那里!?何年何月,人民公社才能把三级所有制,逐步地向基本上单一的公社所有制过渡呢!”许多基层党组织的同志,牢记着伟大领袖毛主席于一九五九年三月在第二次郑州会议上的讲话精神,为了抓紧创造条件,逐步实现人民公社“伟大的、光明灿烂的希望”而努力奋斗。

听说,最近中央即将召开全国农业学大寨的大会。我们特此写信反映一下这个方面的问题,恳请党中央对这方面作些新的指示,动员全党和全国各条战线,学习推广北京、上海、河北、河南、湖南等先进省、市的典型经验,共同努力进一步支援人民公社深入开展农业学大寨,支援农业机械化,进一步加强农业基础,为早日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努力奋斗!

随信附上华国锋同志的信抄件和河南巩县回郭镇公社总结的典型材料一份。供参阅。

此致

革命敬礼!

浙江省部分财政银行干部敬上

执笔者:永康县人民银行干部周长庚

一九七五年九月五日

随信所附《华国锋同志给湖南省委的一封信》即毛泽东批示中提到的两封信中的第二封信,是华国锋1974年12月28日看到湖南省社队企业局写的《社队企业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积极发展社队企业,加速实现农业机械化》两份调查材料后,写给中共湖南省委的。信中建议加强对社队企业的领导,信中说:"社队企业有如烂漫的山花,到处开放,取得了可喜的成绩。……这对于巩固发展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对于加速实现农业机械化,消灭三大差别,都具有重大意义。它代表了人民公社的伟大希望和前途。"信中指出加强党的领导,"社队企业就会由无到有,由少到多,由低级到高级的不断向前发展"。

附件中关于河南巩县回郭镇公社总结的典型材料即毛泽东批示中提到的"一篇报道",是《河南日报》1974年12月15日登载的题为《光明灿烂的希望——巩县回郭镇公社围绕农业办工业,办好工业促农业的调查》。

邓小平将这三份材料作为中央9月23日召开的农村工作座谈会的会议文件印发。

1975年9月,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举办庆祝建区20周年的活动,特意邀请已任辽宁省委书记、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的毛远新去新疆参加庆祝活动。9月27日,毛远新从辽宁赴新疆的途中路过北京,去见毛泽东。毛泽东向他了解辽宁的情况。

"外面的情况怎么样?"毛泽东问毛远新。

毛远新向毛泽东汇报说:"感到社会上有股风。就是对'文化大革命'怎么看,是肯定还是否定,成绩是七个指头还是错误是七个指头,有分歧。"

毛泽东问:"社会上有否定文化大革命的风吗?"

毛远新回答:"有,在72年批极'左'时就有,现在这股风似乎比1972年批极'左'还凶些。"

毛泽东问:“这股风来自哪里?”

毛远新:“我认为来自中央。我很注意小平同志的讲话,我感到一个问题,他很少讲‘文化大革命’的成绩,很少提批判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我担心中央,怕出反复。”

毛泽东问:“你担心中央出反复?”

毛远新:“1975 年国务院开务虚会,辽宁省有两个人参加,他们把讲话稿带回去,我看了,觉得国务院几个副总理讲话有些问题。特别是中央 1975 年 4 号文件发下去以后,群众反映很多。有人找我说,形势刚好,社员积极性也起来了,看了 4 号文件不理解,有情绪,还问‘主席知道不知道’。”

中共中央 1975 年 4 号文件即中共中央批转的《1975 年国民经济计划的通知》。此件经过毛泽东圈阅同意后下发。

毛泽东与毛远新进行了长谈,他的话使毛泽东陷入了深思。因为毛远新工作在基层,了解实际情况,了解群众情绪,而且他与邓小平没有任何历史恩怨关系,对邓小平没有个人成见,因此,他说的话应该是比较客观可信的。

由于目疾渐愈,毛泽东已能自己看书,芦荻虽仍住在中南海,但工作任务已大为减轻。她可以常常回家。9 月 11 日,芦荻在家里,忽接通知,说是毛泽东派她前往山西大寨。在谢静宜的带领下,她来到大寨,在那里见到了江青。

芦荻他们到大寨时,江青已在大寨做了关于评“水浒”的报告。于是组织他们听江青讲话的录音,然后讨论。轮到芦荻发言了,她说:“录音听不清楚。到大寨后,对大寨人战天斗地的精神十分感动,一时不知说什么才好。”

晚上,谢静宜找到芦荻,问她“真的对江青的报告没听清楚?”

芦荻说:“小谢,你是主席的秘书,你学习毛主席对‘水浒’的批示有影射的意思吗?”

谢静宜问:“你怎么知道不是呢?”

从大寨回到中南海,当芦荻来到毛泽东的住地游泳池时,张玉凤对她说:“主席今天要见外宾,还没起来。你到宿舍休息一下,可能张主任跟你谈话。”

张耀祠见到芦荻,第一句就是:“你这个知识分子啊,我那么嘱咐你啊,哎,你还是缺乏实际呀。”

芦荻不解的问:“张主任,我怎么了?”

张耀祠说:“我嘱咐你到那块儿要注意,就是说,不要人家知道你是在主席这里的。”

芦荻说:“张主任,我也没跟谁说我在主席这里呀。”

张耀祠说:“那江青怎么知道的?”

芦荻说:“江青不是我告诉的,这个你问小谢吧……”

张耀祠说:“不要再说了,不要再说了,你还是缺乏锻炼,快回学校好好教书吧。”

芦荻哭了,她说:“张主任,我回学校我早就愿意回去,不过我晚走三天。”

张耀祠问:“你有什么事吗?”

芦荻哭着说:“我要进去见主席。”

张耀祠说:“不行,你不能去见主席。”

这时,张玉凤出来了,她对芦荻说:“芦老师,你不能见主席。从昨天晚上到今天早上,江青同志来了三次电话,跟主席告你的状。后来主席也说算了,算了,惹这么多麻烦,回学校吧。”

张耀祠对芦荻说:“回学校好好学习,好好教书。”

9 月 28 日,芦荻离开了中南海。

这天,毛泽东阅读了邓小平报送的陆定一子女来信,批示:“请小平同志商有关同志,研究一下,提出意见告我。”陆定一子女在信中转达了陆定一对毛泽东的坚定信念,并期望毛泽东再次挽救他们的父亲。

当天,毛泽东还对广州军区原副司令员文年生的妻子苏枫来信批示:“请汪转小平、春桥酌处。可能是冤案。”苏枫在信中说:文年生由于不同意黄永胜等人镇压群众的做法,被撤销了军区党委副书记的职务及其政治和生活待遇,遭受打击迫害,在 1968 年去世。希望能平反昭雪。

9 月 29 日,邓小平请示毛泽东:上海“陈丕显曾多次提出到北京治病,未予置理。最近上海市委安排他为革委会副主任。我的意见,他

还年轻(不到六十),也有能力,是否可以考虑先调来北京,然后分配到哪个省去工作。”第二天,9 月 30 日,毛泽东在这份请示上批示:“同意。”

9 月 30 日,邓小平把经过修改的《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报送毛泽东。毛泽东提出文件中引用的“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句话,他不记得自己曾经讲过。

# 第六部下卷
# 各地文革章回索引

**北京：**

第 1326 回；第 1363 回；

**海军：**

第 1316 回；第 1319 回；第 1363 回；

**工交、铁路：**

第 1316 回；第 1320 回；第 1321 回；第 1332 回；第 1334 回（整顿）；
第 1335 回（整顿）；第 1336 回；第 1339 回；第 1340 回；第 1343 回；
第 1346 回；第 1347 回；第 1349 回；第 1357 回；第 1364 回（整顿）；

**“四人帮”：**

第 1317 回；第 1320 回；第 1321 回；第 1322 回；第 1328 回；
第 1329 回；第 1336 回；第 1341 回；第 1342 回；第 1346 回；
第 1347 回；第 1348 回；第 1349 回；

**专案组：**

第 1317 回；第 1328 回；第 1329 回；第 1334 回；第 1340 回；
第 1349 回；第 1350 回；

**杨、余、傅：**

第 1317 回；第 1320 回；

**老干部：**

第 1317 回；第 1320 回；第 1334 回；第 1343 回；第 1348 回；
第 1350 回；第 1369 回；

**中央军委：**

第 1319 回；第 1330 回；第 1331 回；第 1351 回；第 1363 回；

第 1364 回;

**总政:**

第 1319 回;第 1328 回;第 1329 回;第 1334 回;第 1363 回;

**贺龙:**

第 1319 回;第 1347 回;

**批林批孔:**

第 1315 回;第 1316 回;第 1317 回;第 1320 回;第 1328 回;第 1332 回;第 1340 回;第 1342 回;第 1350 回;

**空军:**

第 1317 回;

**五一六:**

第 1319 回;第 1335 回;第 1339 回;第 1340 回;

**邓小平:**

第 1320 回;第 1321 回;第 1328 回;第 1341 回;第 1347 回;第 1349 回;第 1354 回;第 1362 回;第 1364 回;第 1365 回;第 1369 回;

**四届人大:**

第 1320 回;第 1321 回;第 1327 回;第 1328 回;第 1329 回;第 1330 回;

**国防科委、聂荣臻:**

第 1322 回;第 1323 回;第 1324 回;第 1336 回;第 1337 回;第 1338 回;第 1344 回;

**总参:**

第 1322 回;第 1323 回;第 1327 回;第 1328 回;第 1329 回;第 1330 回;

**财贸口、李先念:**

第 1322 回;

**外事口:**

第 1324 回;第 1349 回;

**中美关系：**

第 1324 回；

**上山下乡：**

第 1326 回；

**文艺：**

第 1326 回（手抄本）；第 1331 回（创业）；第 1341 回（创业）；
第 1350 回；第 1351 回（创业）；第 1352 回；
第 1353 回（创业、海霞）；第 1354 回（创业）；第 1363 回；
第 1366 回；第 1367 回；

**公安部：**

第 1326 回（特赦）；第 1328 回（特赦）；第 1329 回（特赦）；
第 1333 回（特赦）；第 1334 回（特赦）；第 1339 回（特赦）；
第 1364 回（特赦）；

**学理论：**

第 1328 回；第 1329 回；第 1331 回；第 1333 回；第 1334 回；
第 1340 回；第 1341 回；第 1342 回；第 1343 回；第 1345 回；
第 1348 回；

**中苏关系：**

第 1328 回；

**北京航空学院：**

第 1340 回；

**农口：**

第 1340 回；第 1363 回；第 1365 回；第 1369 回；

**清华大学：**

第 1340 回；第 1350 回；第 1361 回；第 1362 回；第 1363 回；
第 1369 回；

**北京大学：**

第 1340 回；第 1344 回；第 1350 回；

**“走后门”：**

第 1342 回；

**教育革命：**

第 1342 回；第 1352 回；第 1361 回；第 1362 回；第 1368 回；

**《红都女皇》：**

第 1354 回；

**评《水浒》：**

第 1362 回；第 1363 回；第 1364 回；第 1365 回；第 1366 回；

**武装左派：**

第 1367 回；

**反击右倾翻案风：**

第 1369 回；

**上海：**

第 1320 回；第 1321 回；第 1329 回；第 1332 回；第 1336 回；
第 1340 回；第 1348 回；第 1354 回；第 1363 回；第 1367 回；
第 1369 回；

**天津：**

第 1315 回；第 1316 回；第 1317 回；第 1320 回；第 1329 回；

**华北地区：**

**河北：**

第 1317 回；

**山西：**

第 1326 回；第 1365 回；第 1366 回；第 1367 回；

**东北地区：**

**辽宁：**

第 1352 回；第 1369 回；

**吉林：**

第 1331 回；

**西北地区：**

**甘肃：**

第 1316 回；第 1319 回；

**新疆：**

第 1340 回；

**西南地区：**

**四川：**

第 1361 回；

**贵州：**

第 1365 回；

**云南：**

第 1333 回；第 1347 回；第 1355 回；第 1356 回；

**西藏：**

**中南地区：**

**河南：**

第 1343 回；第 1346 回；第 1347 回；第 1357 回；第 1358 回；
第 1359 回；第 1360 回；第 1369 回；

**湖北：**

第 1320 回；第 1333 回；

**湖南：**

第 1320 回；第 1326 回；

**广东：**

第 1325 回；第 1364 回；

**广西：**

第 1341 回；

**华东地区：**

**安徽：**

第 1357 回；第 1358 回；第 1359 回；第 1360 回；

**江苏：**

第 1319 回；第 1335 回（徐州）；第 1339 回（徐州）；
第 1346 回（徐州）；第 1349 回（徐州）；

**浙江：**

第 1331 回；第 1332 回；第 1341 回；第 1346 回；第 1349 回；
第 1351 回；

**江西：**

第 1318 回；第 1343 回；

# 文革史话

## 之

## 第七部

# 大幕落下

上卷

刘朝驹　著

中国文化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文革史话之第七部大幕落下 / 刘朝驹著. --香港:中国文化出版社,2021.9

ISBN 978-988-15988-6-8

Ⅰ. ①文… Ⅱ. ①刘… Ⅲ. ①纪实文学-中国-当代 Ⅳ. ①I227

| | |
|---|---|
| 书　　名 | 文革史话之第七部大幕落下 |
| 作　　者 | 刘朝驹 |
| 出　　版 | 中国文化出版社 |
| 发　　行 | 中国文化出版社　发行部(00852-21962638) |
| 总社地址 | 香港九龙弥敦道208-212号四海大厦 |
| 经　　销 | 香港九龙书店 |
| 总 编 审 | 中国文化出版社国内编审处 |
| 出版策划 | 宋艳丽 |
| 印　　刷 | 北京云迪印刷有限公司 |
| 开　　本 | 787×1092　1/32 |
| 印　　张 | 10 |
| 字　　数 | 308千字 |
| 版　　次 | 2021年9月第1版第1次印刷 |
| 书　　号 | ISBN 978-988-15988-6-8 |
| 定　　价 | 60.00元 |

您若想详细了解我社的出版物

请登陆我们出版社的网站 http://www.zgwh.cn/

# 目　录

## ◇上　卷◇

第 1370 回:国庆节,毛泽东由衷感叹
告迟群,农村过渡争议大 …… 1

第 1371 回:刘冰信,毛泽东颇不满意
未曾说,科技就是生产力 …… 8

第 1372 回:毛远新,开会帮助邓小平
清华园,楼内贴满大字报 …… 17

第 1373 回:八人会,继续批评邓小平
急召回,张爱萍就不认错 …… 24

第 1374 回:王洪文,十五日回到北京
刘冰等,参加政治局会议 …… 31

第 1375 回:清华园,召开万人批判会
“打招呼”,卫星升天再收回 …… 38

第 1376 回:见福特,张爱萍住进医院
康生逝,毛泽东坚持斗争 …… 47

第 1377 回:七五年,国民经济大发展
噩耗至,周恩来总理逝世 …… 56

第 1378 回:举国悲,周恩来遗体告别
北京城,十里长街送总理 65

第 1379 回:追悼会,毛泽东没有出席
选总理,毛泽东反复权衡 74

第 1380 回:二月二,中央下一号文件
召豫、甘,谈两地铁路问题 81

第 1381 回:春节后,“总理遗言”传全国
“转弯子”,北京开五省会议 88

第 1382 回:再召开,十二省“转弯子”会
找秘书,徐景贤上报材料 96

第 1383 回:先念病,李素文主管财经
江青忙,招十二省区领导 102

第 1384 回:看江城,再掀反击翻案风
追万里,《文汇报》“三五事件” 109

第 1385 回:小学生,抬花圈到天安门
三二五,《文汇报》再遭质疑 117

第 1386 回:看河南,大字报直指刘、纪
接建勋,政治局当面批邓 125

第 1387 回:南京市,悼总理群情激奋
大标语,明确打到张春桥 131

第 1388 回:清明节,雨花台数万之众
天安门,广场上花海诗潮 140

第 1389 回:政治局,忙开会紧急研究
做决定,要连夜撤走花圈 151

第 1390 回:冲会堂,广场上人潮汹涌
调民兵,北京市“四五事件” 158

第 1391 回:邓小平,再次被撤销职务
华国锋,党内第一副主席 167

第 1392 回:汪东兴,安排转移邓小平
为花圈,郑州有人被打死 175

第 1393 回:叶帅府,老干部来往频频
保定乱,陨石雨引发感慨 184

第 1394 回:告康生,章含之写揭发信
说江青、张春桥都是叛徒 191

第 1395 回:“怀疑论”,《北京日报》大讨论
要追查,《总理遗言》的作者 200

第 1396 回:华国锋,毛泽东写三句话
“亲启”信,景贤为春桥“找伴” 209

第 1397 回:湖南乱,保定农民开进城
朱德逝,叶剑英看华国锋 216

第 1398 回:七月七,皮定均飞机失事
七二八,中国唐山大地震 225

第 1399 回:急救灾,华国锋赶赴唐山
重庆市,百余干部奔成都 232

第 1400 回:山西省,书记王谦戴高帽
到天津,江青三下小靳庄 239

第 1401 回:见李敏,毛泽东依依不舍
到大寨,江青连夜回北京 247

第 1402 回:九月九,一代巨星陨东方
保遗体,政治局紧急会议 254

第 1403 回:闻噩耗,神州大地同悲哀
唁电多,五大洲为之震动 261

第 1404 回:齐哀悼,一个时代的结束
政治局,研究追悼会事宜 269

第 1405 回:华国锋,看病去见李先念
张平化,质疑米士奇电话 277

第 1406 回:上西山,李先念见叶剑英
争文稿,说“按既定方针办” 285

第 1407 回:九一八,毛泽东追悼大会
打内战,许世友儿子的信 292

第 1408 回:华国锋,定决心抓“四人帮”
下西山,叶剑英“狡兔三窟” 299

**第七部上卷各地文革章回索引** 308

# 第1370回：国庆节，毛泽东由衷感叹 告迟群，农村过渡争议大

1975年10月1日，国庆26周年。上午，毛泽东没有看书，也没有睡觉，独自靠在床头上，静静地想着。突然，他自言自语道："这也许是我过的最后一个国庆节了，最后一个'十一'了。"他随即转向身边的工作人员，平静地问："这可能是我的最后一个'十一'了吧？"

工作人员说："怎么会呢？主席，您可别这么想。"

毛泽东认真地说："怎么不会呢？哪有不死的人呢？死神面前，一律平等，毛泽东岂能例外？'万寿无疆'，天大的唯心主义。"

这段时间，毛泽东喜欢怀念往事，常谈起战争年代和建国初期的事情，愿意看这方面内容的电影。一次，中南海游泳池放映《难忘的战斗》。影片中，人民群众扭着秧歌、打着腰鼓，夹道欢迎解放大军进城时，毛泽东渐渐地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先是阵阵抽泣，流着眼泪问护士长吴旭君："当年欢迎的人群里有你吗？"

吴旭君流泪点头，毛泽东随即失声痛哭，哽咽不能语，大家哭成一片，电影也放映不下去了，工作人员只得将他搀扶退场。

这是毛泽东在看电影《雷锋》后的又一次流泪，当然，这次不只是流泪，而是失声痛哭。这也是老人家最后的一次看电影，亦是逝世前的最后一次无限悲壮的感情流露。有时，毛泽东还要来一些旧照片反复地看。据工作人员回忆，对两张旧照片，毛泽东看得津津有味：一张是他1942年穿着打补丁的裤子在延安给120师干部作报告，另一张是他1947年骑马行军于转战陕北的途中。

国庆节这天，经毛泽东批准，中央军委任命张廷发为空军政治委员、空军党委第一书记。任命之初，邓小平找张廷发谈话，问他："你现在是空军主要负责人，你对当前空军的工作有什么打算？"

张廷发简要汇报了空军存在的问题及准备用整顿的办法来解决的想法。

邓小平听后说:“好,就照这么干。部队要整顿,还是全面整顿好。”

不久,张廷发又见到叶剑英,他对张廷发讲的第一句话是:“廷发同志,空军的事情,就交给你了。”

这年10月,也是林彪的女儿林豆豆,即林立衡一生中的又一次转折。这一转折,使她被迫脱下她从小就看惯穿惯的军装,换上了便服,从此脱离了生她、养她、使她一直感到比家庭还温暖还亲切的中国人民解放军。

1974年3月“批林批孔”开始后,林立衡和帮助小组部分人员又从空军招待所搬回警卫一师招待所的二层小楼上,以保证她的安全为主。当时,谢静宜也住在空军招待所。林立衡给江青写信,称“江妈妈”,将信给交了谢静宜。谢静宜将信交给了周恩来。

4月11日和19日,林立衡两次写信给空军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高厚良,提出“组织上现在还没有把我定为林彪死党”,对派人看护她表示不满。

对林立衡的工作,空军一直是在总政主任李德生的直接领导下进行的。李德生调沈阳后,汪东兴向空军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政治局要再议一下,对林立衡要解除监护,她和死党有区别,准许她同张清林来往。让她到农场劳动锻炼,更多地接触群众。

于是,空军党委研究决定,将林立衡和张清林安置在条件较好的河南开封某空降兵师农场。1974年7月29日,高厚良向林立衡、张清林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林立衡表态说:“坚决拥护中央的指示,毛主席在百忙中还关怀我,确实感到我们党的英明伟大。自己各方面的错误很严重,今后一定要努力锻炼自己。”

当晚,张清林从总后搬回到警卫一师。二人打报告提出结婚,空军政治部批准他们结婚。

8月2日,空政干部部派人陪同林立衡夫妇到河南开封。

邓小平主持中央政治局工作后,1975年10月,决定让林立衡夫妇作转业处理。

当空军领导机关向她传达这一决定时,林立衡认为难以接受,要求留在部队,得到的答复是:如不服从,“从10月30日停发工资,粮

票”。

林立衡大哭一场。其实她还不知道,当时,原在部队工作的所有受林彪牵连的人,已经统统都转业到地方了。

部队为林立衡转业选了三个地方:郑州、开封和孝感。邓小平圈了郑州。

林立衡到了郑州,在一个汽车厂分厂任革委会副主任。因为她没有子女,而且表示不愿再生子女,所以分工她管计划生育工作。

10 月 2 日,正在清华大学“支左”的北京卫戍区警卫师干部惠宪钧和牛怀林,到钓鱼台担任警卫工作的中央警卫局干部孙凤山家串门。孙凤山不在家,他们就转到了邬吉成家。因为惠宪钧和牛怀林都是邬吉成在警卫师时的老同事。他们见邬吉成家里已有几个客人,就匆忙告辞。

邬吉成送他们下楼,惠宪钧家距此不远,就邀邬吉成到他家坐坐。因为好多年没见面了,又不过几步之遥,邬吉成就随他而去。

在惠宪钧家叙了一会儿旧,惠宪钧突然有几分犹豫地对邬吉成说:“我有件事想跟你谈谈。”

邬吉成问:“什么事?”

惠宪钧说:“我们还是到隔壁谈吧。”

他们来到了隔壁房间,惠宪钧跟邬吉成谈的是清华大学的事情,他说大学里几位老干部对迟群和谢静宜有意见,一是说迟群不民主,在大学里一个人说了算,校党委其他书记不敢说话;二是作风飞扬跋扈,经常大发脾气,有时还打碎东西,烧掉窗帘被服等公物,还得学校给换新的;三是迟群经常不上班,也不知在干什么事情;四是迟群对没有当上中央委员很不满,常说“吴德算个什么,为什么你们对他那么重视?”还说“主席身边的人都有职位了,为什么不给我安排?”等等。

惠宪钧还说:“这些问题我们曾通过有关渠道做过反映,但一直没有回音。我们想给张耀祠副主任写信,今天见到你顺便跟你谈谈。”说完,取出厚厚一叠材料交给邬吉成说:“我们已写了一份材料,反映了迟群违背党的原则的活动,希望能让毛主席看到,请你代我们把这份材料转给主席。”

邬吉成没接那叠材料,而是说:“材料我就不看了,而且也不能转,

干咱们这工作有纪律规定,不可以给首长转东西,这你们也清楚。我觉得你们还是按系统呈递的好。”

说到迟群,邬吉成说:“对他我不了解情况,你们对他有意见,应该在党委会议上,按毛主席的思想路线,从安定团结出发,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解决。通过这种方式,走小道是不对的。”

邬吉成还说:“迟群、谢静宜的组织关系,现在北京市,在清华大学,已不在我们部队过组织生活,我们党委也根本管不了他们。你们说要给张耀祠写信事,一则他没有时间过问,二则他也不了解你们那里的情况。我的意见还是不写为好。只要按组织原则办,问题应该是可以解决的。”

不久,清华大学的一份简报上发表了刘冰、惠宪钧等人的意见书,并且附有按语说8341部队的两个副团长,一个是张耀祠,一个就是邬吉成,支持他们的观点。

又过了几天,汪东兴突然把电话打到邬吉成的家里:“邬吉成,惠宪钧是不是到过你那里?”

“有这事呵。”

“你都跟他谈了些什么?”汪东兴问。

“谈什么?没谈什么,他想让我帮他转交一份材料,我没有同意给他转,而是让他按组织系统递交。另外,就只能讲应该按毛泽东思想办事这些大道理呗。因为材料我也没看过,也不知道具体的情况,还能讲什么嘛。”

“你现在就回办公室,写份检讨把事情经过讲清楚,然后马上交给我。”

重新把和惠宪钧见面交谈的场面细细回想了一遍,邬吉成觉得自己实在没什么可检讨的,就把见面的全过程,自己讲了什么话,都写了出来。当天下午就送给了汪东兴。汪东兴收起这份“检讨”,便再没了下文。

1975年国庆节后,毛泽东在中南海接见外宾,李先念陪同。会见结束,外宾离开后,李先念单独与毛泽东谈话,他说:“最近,有一些讲话,我觉得有问题,味道不对,似乎是否定文化大革命。”

1975年10月,浙江省委书记谭启龙和铁瑛与纪登奎研究了原浙

江省造反派头头、现任浙江省革委会副主任张永生的问题后,以浙江省委的名义给中央打报告,说张永生“在任浙江美术学院党委书记、革委会主任期间,利用职权盗窃国画库400幅国画”,以此要求将张永生调离浙江。

这个报告台头只写了“党中央”,没有写“毛主席”。所以,纪登奎接到报告后,便以中央组织部党的核心小组名义,将张永生送到河北省遵化县建明公社西铺(穷棒子)大队劳动锻炼。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许多歌曲因为词曲作者的原因都基本上不能唱了。比如国歌《义勇军进行曲》虽然是聂耳作曲,但是因为词作者是“四条汉子”之一的田汉,所以只能奏曲,不能唱词了。而冼星海的歌只有《救国军歌》和《到敌人后方去》允许唱,但也都被改了歌词。毛泽东做出调整文艺政策的指示后,音乐界就有人想改变这种现象。正好,1975年9月中旬,冼星海夫人钱韵玲因公自杭州来北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陈莲受《创业》批示启发,建议钱韵玲给毛主席写信,反映一下这个问题,钱韵玲同意,音乐界的李焕之、李德伦也十分赞成。他们议论到,7月17日,聂耳逝世40周年,国内没有表示,日本却开了纪念会;10月30日,是冼星海逝世30周年,如国内再无表示,苏联借此做文章,对我们国家不利。他们认为,从这点着笔,上书毛泽东,提出希望在10月30日冼星海逝世30周年开展纪念活动。他们又同政研室负责人于光远商量,得到于光远的支持。于是,由陈莲代为拟稿,以钱韵玲的名义给毛泽东写信,于9月27日写成,很快由胡乔木、于光远转邓小平送毛泽东。毛泽东赞成演出,并于10月3日批示将钱韵玲的信“印发在京中央各同志”。

毛泽东批示下达后,李德伦等积极组织纪念音乐会的排练。首都音乐界人士兴高采烈,中央各音乐团体争相参加,北京市专业音乐工作者和业余音乐爱好者也表现了极大的热情,民族乐队的人数达到100多人。国务院政研室的负责人邓力群参与了整个音乐会和纪念活动的准备工作。

纪念聂耳、冼星海音乐会确定在10月25日举行,李德伦写信邀请邓颖超出席。邓颖超回电话,说因“总理身体不好,音乐会不能到场”,但她同总理要一起通过电视看演出实况。

1975年10月4日,邓小平在农村工作座谈会上讲话说:“割裂毛泽东思想这个问题,现在实际上并没有解决。比如文艺方针,毛泽东同志说,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百花齐放,推陈出新。这是很完整的。可是现在百花齐放不提了,没有了,这就是割裂。”

10月7日,邓力群主持写出了《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的初稿。这篇文稿以实现四个现代化为出发点和归宿,全面论述了毛泽东要学理论、要安定团结、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这三项指示的内涵及其相互关系,宣传了1975年中央关于解决铁路问题、钢铁问题、国防工业问题、农业问题以及一些地区和单位问题所发出的一系列重要文件的精神,概括了邓小平全面整顿的思想,提出了“以三项指示为纲”,称得上是邓小平进行全面整顿的政治纲领。另外两篇已经基本形成的文件“工业二十条”和《汇报提纲》,则分别是经济工作的纲领和科技文教工作的纲领。

10月9日下午,胡乔木到国务院参加华国锋召集的会议,讨论华国锋在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的总结报告的修改问题。

10月10日,毛远新从新疆返回辽宁时路过北京,毛泽东决定把他留下,作为病势越来越重的毛泽东与中央政治局之间的“联络员”。毛泽东向政治局做了通报。于是毛远新就留在了中南海,住在怡年堂后边的一个小院里。

1975年国庆节前夕,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的3700多位代表从山西大寨移师北京继续开会。9月23日至10月21日,邓小平在北京主持召开农村工作座谈会,按照毛泽东的指示,讨论陈永贵提出的迅速过渡的建议。这次座谈会除了政治局委员外,还特地请了12个省的省委书记参加。既然不是所有的省委书记都来,请谁不请谁便大有名堂。陈永贵知道山西省省委书记王谦倾向于搞大队核算,就建议说:“让王谦来一下更好,说一下大队核算的好处。”结果,偏偏王谦没有来成,陈永贵老大不高兴。

座谈会上发生了激烈的争论。赵紫阳和谭启龙这两位大省的省委书记坚决反对大队核算过渡,连张春桥也表示不同意。陈永贵则力主过渡,一再强调大队核算的好处。争到上火处还忍不住高腔大嗓地嚷起来,以至后来有“陈永贵大闹12省书记会”之说。10月19日,第

一次全农会宣告闭幕,而这个平行进行的农村工作座谈会仍然没有争出一个结果。两天后,由于分歧太大,意见无法统一,座谈会无结果而散,陈永贵的提议被暂时搁置。

散会后,张春桥让上海派人去昔阳学习大队核算的经验,昔阳县委立即向陈永贵报告。陈永贵怒道:“不要给他介绍经验!到底搞什么鬼哩,政治局讨论时,他坚决不同意,为什么又偷偷摸摸到这里学大队核算的经验来了?”陈永贵既生气,又感到莫名其妙。发了一通火之后,还是以事业为重,改口说:“如果他是真的学,你给他弄点材料送去也可以。”

10 月 15 日,国务院副总理华国锋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在人民大会堂做了题为《全党动员,大办农业,为普及大寨县而奋斗》的总结报告。

做完总结报告,华国锋从会议大厅走出来,在江苏厅前碰见了陈永贵。两位山西老乡很亲切地走到一块聊了起来。华国锋说:“哎呀,我今天的报告不知怎么样?”话音刚落,谭震林出来了,只见他举着手笑道:

“今天的报告可好呀!”

没想到江青也在后边跟着,她走到华国锋和陈永贵面前,清清楚楚地说:

“这个报告说轻一点是修正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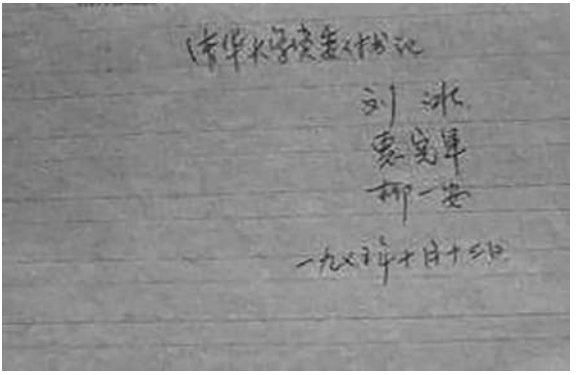
华国锋和陈永贵闻言不禁一愣。

# 第1371回：刘冰信，毛泽东颇不满意 未曾说，科技就是生产力

10月的一天，清华大学的迟群亲自召开全校工宣队队员会议，但是没有通知其他书记和宣传队负责人参加。迟群在会上说："现在有人要同我们保持距离。我们要准备迎接一场铺天盖地的大字报，我们有办法、有能力解决。我迟群还要做党委书记，有人盼着我走，办不到。"

刘冰预感到迟群已经知道了他们给毛泽东写信的事。此时，吕方正已调回部队，刘冰、柳一安、惠宪钧心急如焚，反复商量后，决定第二次上书毛泽东。

这封信由刘冰起草，于10月13日完稿。信的抬头是"邓副主席转呈毛主席"。随信附有《关于迟群同志的错误补充情况》。


清华大学党委书记
刘冰
惠宪钧
柳一安
一九六八年十月十三日

与前一封信相比，这封信写得更加尖锐，而且把谢静宜也摆了进去。信中说："联想起'十大'以后迟群发泄不满情绪时，她跪在迟群面前，握着迟群的手讲些不合原则的话，当时我们就实在看不下去。"这番情景是在开党委书记办公会议时发生的，谢静宜居然在迟群面前单

腿跪下,央求他不要再发牢骚了。此举将站在一旁的刘冰和惠宪钧、柳一安惊得目瞪口呆。

这封信写成后还像上次那样,送到邓小平住处,请警卫人员将信送王秘书。但王瑞林这回没有接收这封信,回答说:“这里不收信了,信可送国务院。”

刘冰他们的心情很沉重,王秘书不收信可能是头一封信出了问题。

事已至此,刘冰索性破釜沉舟,找到了抗日战争中太行山的老战友、原周恩来总理办公室副主任,时任教育部副部长李琦,请他帮助。

见面后,刘冰依然是开门见山说明来意,向李琦介绍了迟群、谢静宜在清华的所作所为,并告诉他这是第二封信,请他设法送到邓小平家里。

李琦听完后,非常高兴,说:“这件事太好了,你们做了件好事啊!我完全支持你们。小平同志的秘书王瑞林我很熟悉,我到国务院见到他时,交给他也行。你放心,信一定能送到。”

10 月 13 日当天,李琦就把信交给了胡乔木。

在向毛泽东写信的同时,刘冰等人还将同样内容的信送给当时北京市委的主要领导人,并向北京市委科教组负责人作了同样内容的口头汇报,要求北京市委调查处理迟群、谢静宜的问题。

从市委返回学校时,刘冰又想到了万里。于是,又找到他,向他详细地讲了迟群、谢静宜的问题,以及他们两次给毛泽东写信的情况,问他是否听说了,知道不知道主席有什么指示。

万里说:“你们给主席的信,我听说了,主席有什么指示,不知道。迟群、谢静宜的问题我知道一点。你可要提高警惕,要按毛主席的‘三要三不要’严格要求自己,不能让人家抓住你的把柄。”

刘冰说:“这些年来,我被整怕了,真想调离清华,你见到纪登奎同志跟他说说,把我调出这个是非之地吧。”

万里说:“刘冰!你现在可不能走!……尤其现在不能走,要从整个清华考虑……你要安心,只是工作难做就是了。这是斗争,很复杂。你只要坚持‘三要三不要’,他们对你就没办法。你给主席的信会有答复的。”

1975年9月,国务院政研室向党中央、国务院开列了邀请出席1975年国庆招待会的科技教育界、文化艺术界、新闻出版界人士的名单。这个名单相当广泛,在文艺界的名单中就有周扬。可是,临近国庆,周扬却一直没有收到企盼中的那张请柬。周扬未能在国庆招待会上露面。

国庆招待会后,哲学社会科学部政工组将学部出席招待会的吕叔湘、任继愈、俞平伯、顾颉刚、冯至、何其芳、丁声树、吴世昌、贺麟、韩幽桐、严中平等人对出席这次招待会的反映,整理成材料编印在《政工简报》第31期上。材料说:

学部有21人出席了邓副总理主持的以周总理名义举行的盛大招待会,庆祝国庆26周年。他们在招待会上听了邓副总理的祝酒词,看到一片朝气蓬勃、团结胜利的景象,非常兴奋。外国文学所原所长冯至说:"宴会充分体现了我国安定团结的大好形势。"宗教所原副所长任继愈说:"宴会是一个团结的大会,出席的有老年的、中年的,也有青少年,是我们党和国家兴旺发达的表现。"大家谈到,宴会充分体现了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精神。经济所原副所长严中平说:"参加这次招待会,说明党认真贯彻对待知识分子的政策"。文学所原所长何其芳说:"出席这次盛会,深切感到党对于犯过错误,承认有错误并有所改正的党员干部的关怀和鼓励。"大家听邓副总理讲要实现"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强国"这一宏伟目标,极为振奋,都表示要为完成这一历史任务贡献自己的力量。有的同志还认为,一些与国民党上层有过联系的人物出席这次招待会,对于党的统战工作有积极的影响。

胡乔木看到这份《政工简报》后,于10月13日呈送给邓小平,请他考虑"要不要转送主席"。并于当晚,将李琦当天转交刘冰等人反映迟群在清华问题的第二封信亲自送到邓小平家里。在此之前,康生秘书李鑫曾跟胡乔木说过:"清华、北大的事都是毛主席直接管的,你千万不要插手。"

邓小平于10月15日将31期《政工简报》批"送主席看看"。

第二天,10月16日,毛泽东在31期《政工简报》第一页的空白处批到:

打破“金要足赤”,“人要完人”的形而上学错误思想。可惜未请周扬,梁漱溟。

并嘱:送政治局各同志。

10月19日,中共中央转发华国锋在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的总结报告。

10月19日这天,毛泽东在会见外宾后同李先念、汪东兴等谈话说:

“现在有一股风,说我批了江青。批是批了,但江青不觉悟。清华大学刘冰等人来信告迟群和小谢。我看信的动机不纯,想打倒迟群和小谢。他们信中的矛头是对着我的。迟群是反革命吗?有错误,批评是要批评的,一批评就要打倒,一棍子打死?小谢是带3万工人进清华大学的。迟群我还不认识哩。”

他又说:“我在北京,写信为什么不直接写给我,还要经小平转。你们告诉小平注意,不要上当。小平偏袒刘冰。你们6人先开会研究处理。此两封信印发中央政治局在京各同志。清华大学可以辩论,出大字报。”

毛泽东说的“你们6人”是指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吴德、谢静宜、迟群。“此两封信”是指刘冰等人8月和10月的两次来信。

毛泽东早就收到了邓小平转来的刘冰等人8月份写来的第一封信。他看后,没有说什么,指着放文件的柜子对秘书说:“先放着。”

收到刘冰的第二封信后,毛泽东又把刘冰的第一封信找出来重新看了一遍,很不高兴。于是有了10月19日对李先念、汪东兴等人的谈话。

随后,李先念、汪东兴把毛泽东19日谈话的内容向邓小平作了传达。邓小平决定,把毛泽东19日的谈话,向中央政治局全体成员传达。

10月21日晚上,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会见美国国务卿基辛格,邓小平、乔冠华、黄镇在座。

基辛格说:“我们同人民共和国的关系赋予极大的重要意义。”

毛泽东说:“意义有一点,不大。”

基辛格说:“我们有一些共同的对手。”

毛泽东说:“对,你们(指基辛格和邓小平)吵了一架。”

基辛格说:“只是在为了达到共同的目标应采取什么手段上吵了一点。”

毛泽东说:“你昨天说美国无求于中国,中国也无求于美国。我看部分是对的,部分是不对的,小的是台湾,大的是世界,如果双方都无所求,你们为什么要来北京,我们为什么接待你们和总统?”

基辛格说:“你们对世界问题的概念是我们打交道的国家中最清楚的,而且大部分意见是我们都同意。苏联对我们是极大地危险,但并不在我们优先考虑的问题中占第一位。”

毛泽东说:“不对,超级大国只有两个,我们是最后,美国、苏联、欧洲、日本,我们是第五。你们就是踏着我们的肩膀跑莫斯科,现在这个肩膀没有用了。”

基辛格说:“我们不是想利用中国跑莫斯科,因为这种做法会是自杀性的。”

毛泽东说:“已经跑过了!”

当基辛格说美国准备曾试图表示在军事问题上提供帮助时,毛泽东说:“军事方面,我们现在不谈,等打起来再说。”

关于世界形势,基辛格说:“我重读了两年前主席与我的谈话,从中我读到了主席对世界形势极深刻的分析,我们十分重视。”

毛泽东说:“有些估计还要看。现在欧洲太软,太散,害怕苏联。西德和东德统一起来,就像(举拳头)这样,我们赞成统一。现在德国统一没有危险,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一致。日本自己要搞霸权主义。”

基辛格说:“日本称霸的潜力是存在的。”

毛泽东说:“你太忙,不忙看来也不行啊。风雨欲来燕子忙,现在世界不太平,风雨要来,所以燕子就忙了。推迟可以,但要阻止风雨难。”

谈话中,毛泽东还说:“第一,问候福特总统先生。第二,问候尼克松先生。”

基辛格说:“这两件事我都将十分愉快地去做。”

1975 年,已经 75 岁的四川省革委会副主任李大章向中央提交了辞职报告,说自己年龄大了,在一线工作有点力不从心,希望辞去四川

的职务,退下来。

李大章退下来,怎么安排?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的意见是任人大副委员长。那么,谁去接替李大章的工作呢?中央主管组织工作的国务院副总理纪登奎在开会讨论这个问题时,提出了自己的建议。他说:

“如果大章同志退下来,可以先担任中央统战部部长,全国人大开会后再任命为全国人大副委员长。”

对于时任中共四川省委第一书记、革委会主任的刘兴元,纪登奎说:“全国像他这样到地方主政的军队干部,早在前一年就陆续回归部队了,就让他回部队吧。建议赵紫阳到四川,任中共四川省委第一书记、四川省革委会主任、成都军区第一政委,三副担子一肩挑,一步到位。”

纪登奎的建议获得大家的同意。

10 月 21 日,邓小平报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事宜的报告。报告说:

政治局近日会议,讨论到主席在高级知识分子参加国庆宴会的反映简报上所作重要批示的时候,谈到党外党内有一批人,需要在政治上早点安排,都同意积极准备,早点召开全国政协会议。另外,政治局一致意见,拟于近日召开一次人大常委会议,补选两位人大常委副委员长,一为主席和中央已经决定的李大章同志,一为邓颖超同志。

10 月 22 日,毛泽东对邓小平报送的报告批示:“同意。”

赵紫阳参加了 9 月 23 日至 10 月 21 日举行的农村工作座谈会。会议即将结束时,邓小平约赵紫阳单独谈话,恰巧那天邓小平有事,改在了第二天,他和中共福建省委第一书记、革委会主任廖志高等一起去见了邓小平。

见面后,邓小平告诉赵紫阳中央决定让他去四川,问他有什么考虑?据说当时赵紫阳唯一的顾虑,就是与四川的一把手刘兴元如何共事?

邓小平鼓励赵紫阳大胆工作,不要怕第二次被打倒。他说:“你去了以后,要准备艰苦奋斗,就是搞得好,也要三年才能见效果。”

很快,赵紫阳在北京民族饭店的一个会议室与参加农村工作座谈

会的四川代表团部分代表见面。

10 月 23 日,赵紫阳乘四川代表团的包机入川,在家的四川省委领导和省委秘书长兼省革委办事组组长杜心源等人在机场迎接。

10 月 23 日,邓小平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传达了毛泽东 19 日与李先念、汪东兴等人关于刘冰信的谈话,并决定,按毛泽东的意见,召开清华大学党委扩大会议传达讨论。

10 月 25 日,清华大学人事处负责人林钧万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信中说:周荣鑫“组织上任人唯亲,搞宗派”,想把迟群“从政治上搞臭,组织上搞倒,把他从教育部门领导班子中赶出去”,“千方百计地要否定科教组几年来的工作”,“已在全国特别是教育战线产生了很坏的影响”。同时,说迟群“在文化大革命中,以自己的实际行动为教育革命做出了他应有的贡献”,“在教育战线上是有影响的,具有一定的代表性”,等等。

对这封信,毛泽东批示:“先作调查,然后讨论一次。”

10 月 25 日晚上,纪念人民音乐家聂耳、冼星海的音乐会如期举行。民族文化宫一派节日景象,大家喜气洋洋,气氛特别热烈。宋任穷、王震、陈丕显、周建人等出席,政研室胡乔木等 7 位负责人也都出席。在文革中被打倒的音乐界人士几乎都来了。演出大受欢迎,形成《创业》批示后文艺调整中的又一个高潮。民族文化宫剧场实在容纳不下各界观众。所以,演出两天后,又移到首都体育馆演了 3 天。从 10 月 30 日起,上海也参照北京的样子开音乐会,在人民广场演出了几场,广州、沈阳、大连也都开了音乐会。

10 月 27 日,邓小平、李先念、吴德、汪东兴联名向毛泽东写报告,准备向中央政治局全体成员传达毛泽东 19 日的谈话。报告里提到:“其中主席对小平、江青同志批评的内容,建议不传达。”毛泽东在这句话下面画了一条线,写了一个“对”字。

10 月 27 日这天,毛泽东对江青下去“蹲点”等问题批示到:“改一改,不要蹲点。军队、地方都不要蹲点,特别在北京,我在北京没有去个(过)任何一个地方,说话不要冲口而出。不要管,要顾大局,不要打电话,不要来看我,有事写信。”

10 月 31 日,邓小平将胡乔木转来的鲁迅之子周海婴关于鲁迅著

作的研究和出版问题的来信报送毛泽东。信中提出：

一、将戚本禹过去从文化部保险柜弄走的全部鲁迅书信手稿一千多封交给国家文物局负责保护收藏，由文物局负责全部影印出版，同时由出版局负责编印一部比较完备和准确的鲁迅书信集。

二、现在继续编辑出版一部比较完善的新的注释本《鲁迅全集》（包括书信和日记），需要动员一些认识和熟悉鲁迅的老同志来参加工作。

三、将1958年下放北京市文化局的鲁迅博物馆重新划归国家文物局领导，在该馆增设鲁迅研究室，调集对鲁迅研究有相当基础的人员，请一些对鲁迅生平熟悉了解的老同志做顾问，除和出版局共同负责鲁迅全集的注释外，专门负责鲁迅传记和年谱的编写工作。

周海婴的这封信写于1975年10月28日，是受1975年7月以来，文艺界发生的一些事情的影响，周海婴和鲁迅的弟弟周建人感到，应该乘这个时机，给毛泽东写信，反映鲁迅著作和书信的出版问题。10月下旬，周海婴到胡乔木家里，把有关情况和向毛主席写信的想法对胡乔木讲了一遍，请胡乔木予以指点。胡乔木支持周海婴给毛泽东写信，并对信的写法，详细地谈了意见。10月28日，周海婴的信写好后，又交给胡乔木转呈。

31日当晚，邓小平又致信毛泽东："我有些事须向主席当面谈谈，并取得主席的指示和教诲。明（一日）下午或晚上都可以。如蒙许可，请随时通知。"

11月1日，毛泽东对周海婴的信批示：

我赞成周海婴同志的意见。请将周信印发政治局，并讨论一次，作出决定，立即实行。

毛泽东

十一月一日

当天，邓小平指示汪东兴："即照主席批示印发。"

11月1日晚，毛泽东召见邓小平。见面时，毛泽东批评邓小平为刘冰转信一事。邓小平向毛泽东问及《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语言困难的毛泽东没有正面回答，而是说："汇报中说我曾说过'科学是生产力'，我说过这样的话吗？"

邓小平问这一时期以来,中央工作的方针、政策是否正确?

毛泽东说了一个字:“对。”

毛泽东的身体状况不容多谈,邓小平很快就告辞了。

在胡耀邦主持起草的《汇报提纲》前三稿中,从1969年编印的《毛主席论科学技术革命》的小红本引用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句话。科学院为起草《汇报提纲》而编辑的《十六条语录》中,对这一条注的出处是:“毛泽东:《在听取科学技术规划汇报时的谈话》,1963年12月。”邓小平赞成这个论点。

胡乔木接手修改《汇报提纲》后,曾经查对过这句话的出处,一时没有查对得很清楚。他决定暂时保留,送请毛泽东审定。于是,胡乔木把包括这一条语录出处在内的《汇报提纲第二部分中所引用的毛主席关于科技工作指示的出处》(共二十六处)印出,作为9月26日国务院讨论稿的附件之一,其中引了两句话:“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科学技术这一仗一定要打,而且必须打好。不搞科学技术,生产力无法提高。”并引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第三分册第369页的论述,作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句话的注释。注文为:“关于这一论点,马克思在讲到近代社会的劳动生产力时,有过这样的论述:‘所谓社会的劳动生产力,首先是科学的力量,其次是在生产过程内部联合起来的社会力量,最后是从直接劳动转移到机器、转移到死的生产力上面去的技巧’。”同时要求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的同志进一步搜集和整理马、恩、列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材料。

毛泽东对“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句话提出了疑问,于是胡乔木进一步作查对工作。他查到1963年12月16日毛泽东听取聂荣臻汇报十年科学技术规划时,列席的韩光、范长江、于光远在笔记上都记有:不搞科学技术,生产力无法提高等话。但是并没有“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句话。鉴于《毛主席论科学技术革命》中所引的“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一时查不清出处,于是,在《汇报提纲》退回后的改稿中删去了这句话,同时,在所附《出处》中也相应删去它的出处和引马克思的话所作的注释。

# 第1372回：毛远新，开会帮助邓小平 清华园，楼内贴满大字报

1975年11月2日，毛泽东看了胡乔木10月23日报送的作家姚雪垠的来信。姚雪垠信中说：

《李自成》第一卷于一九六三年在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后，我曾给主席寄上一部。一九六六年夏，得知主席看过了这部书，曾指示说：这部书虽然有些问题，但应该让作者继续写下去，将全书写完。这部小说共五卷，写成后估计有二百五十万至三百万字，第二卷已写成近两年，但还没有地方出版，请求主席帮助解决。

姚雪垠是小说《李自成》的作者，在武汉。因为毛泽东一向重视明末李自成领导农民起义这段历史，因此，1963年，《李自成》第一卷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后，作者姚雪垠即给毛泽东寄赠一部。1966年8月中旬，毛泽东在一次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上，对列席会议的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王任重说："你告诉武汉市委，对姚雪垠要予以保护。他写的《李自成》第一卷，分上下两册，上册已看完，写得不错，让他继续写下去。"第二天一早，王任重就给武汉市委书记宋侃夫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做出了不批斗，不游街，不抄家等"予以保护"的规定。这样，姚雪垠得以在文革中继续写作，并于1973年完成了《李自成》第二卷的书稿，于1974年抄出一份清稿征求意见。但是由于种种原因，书写成后无法出版，于是他按照《李自成》一书责任编辑江晓天的建议：上书毛泽东。

1975年10月8日，姚雪垠给曾长期担任武汉市委书记、当时调任中科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临时领导小组成员的宋一平写去一封长信，"汇报稿子的进行情况以及出版问题。"说明"我想给主席写一封简短而诚恳的信。"并详细叙述了内容要点，希望宋一平设法"通过什么渠道，将我的信转到主席手中。"宋一平接读姚雪垠信后，即向胡乔木作了汇报，很快复信表示支持，并嘱咐"给毛主席的信要用毛笔书写，并

且字要写大些。”

10 月 23 日，宋一平收到姚雪垠写给毛泽东的信后，即转交给胡乔木。这时，毛泽东对邓小平转交的刘冰等人的信已有批评。胡乔木与吴冷西等商量后，没有将姚雪垠的信通过邓小平转送，而是由胡乔木直接转呈毛泽东。为此，胡乔木于 23 日当天写了一份报告给毛泽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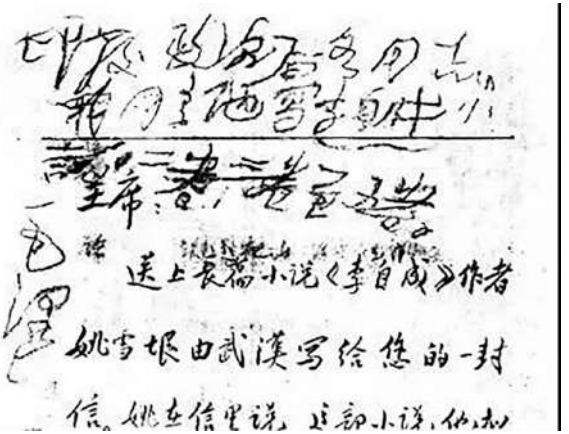
送上长篇小说《李自成》作者姚雪垠由武汉写给您的一封信。姚在信里说，这部小说他拟写五卷约三百万字，第一卷已改写，第二卷已写成近两年，但还没有地方出版，请求您能给予帮助。姚的信是宋一平同志托我转送的。宋现在哲学社会科学部工作，以前长期在武汉，所以姚把信寄给他。宋还把姚给他的两封信也给我看了。因为这两信可以帮助了解姚目前的具体困难，所以现在也一起附上，供您在需要时参阅。

11 月 2 日，毛泽东在胡乔木的报告上批示：

印发政治局各同志，我同意他写《李自成》小说二卷、三卷至五卷。

毛泽东

十一月二日


送上长篇小说《李自成》作者
姚雪垠由武汉写给您的一封
信。姚在信里说，这部小说他拟

尽管此时毛泽东已成功进行了眼科手术，但是这个批示的手迹仍是非常潦草，甚至无法完整地完成签名。

1975年冬,姚雪垠调进北京,《李自成》第二卷也得以发排。

11月2日上午,毛远新向毛泽东汇报时谈到对形势的看法。他说:

“今年以来,在省里工作感觉到一股风,主要是对文化大革命。”

毛远新列举了几个方面的表现:

1、文化大革命怎么看?主流,支流,十个指头,三七还是倒三七,肯定还是否定。

2,批林批孔运动怎么看,主流,支流,似乎迟群、小谢讲了走后门的错话,干扰,就不讲批林批孔的成绩了。口头上也说两句,但阴暗面讲得一大堆。

3、刘少奇、林彪的路线还需不需要继续批,刘少奇的路线似乎也不大提了。

毛远新说:“‘三项指示为纲’,其实只剩下一项指示,即生产上去了。”

“一些同志到一起总是议论文化大革命的阴暗面,发牢骚,有人把文化大革命看成一场灾难似的。”

毛远新说:“当前一方面要进一步落实主席的干部政策,另一方面也应该对干部教育,有正确的态度,应该感谢革命群众对自己的帮助教育。”

讲到这里,毛泽东说:“对。有两种态度:一是对文化大革命不满意。二是要算账,算文化大革命的账。”

“清华所涉及的问题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你找小平、东兴、锡联谈一下,说是我让你找他们,还有李先念、纪登奎、华国锋,到我这里来,当面你讲,不要吞吞吐吐,开门见山,把意见全讲。我已找小平谈了两次,昨天晚上又讲了。你要帮助他提高。”

毛泽东考虑了一下又说:“先找小平、锡联、东兴同志开个会,你把这些意见全讲,谈完了再来。”

当晚,毛远新按照毛泽东的意见,把邓小平、汪东兴、陈锡联召集到一起开会。他按照毛泽东的意见,开门见山的说,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这段时间的路线不正确,在各方面都有复辟现象,是否定“文化大革命”。

邓小平坐在那里抽着烟,默默地听着,没有讲话。当毛远新再一次重复地说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3个多月的路线不对时,邓小平把烟在烟缸中熄掉,说:

“这个问题还可以再想一下。你的描述,中央整个是执行了修正主义路线,而且是在所有领域都没有执行主席的路线,说毛主席为首的中央搞了个修正主义路线,这个话不好说。我是从今年3月‘九号文件’开始抓工作,主持中央工作是7月,‘九号文件’以后是什么路线,我主持中央工作三个多月是什么路线,可以考虑嘛,上我的账要从‘九号文件’开始算起。从九号文件以后全国的形势是好一点,还是坏一点,这可以想想嘛。对九号文件以后的评价,远新同志的看法是不同的。是好是坏实践可以证明。”

邓小平列举了3月以来做了哪些工作和讲了哪些话。并说:“昨天(即11月1日)晚上我问了主席,这一段工作的方针政策是怎样,主席说对。”

邓小平还说:“把生产搞上去,安定团结,是主席的指示,执行这个指示是对的。”

后来,邓小平表示愿作自我批评。

第二天,11月3日,毛远新向毛泽东汇报了他与邓小平、汪东兴、陈锡联开会的情况,毛泽东对毛远新说:“你没有精神准备,他也没有料到,顶了起来。你有理,顺着不好,顶了他,这就叫帮助。”

毛远新说:“小平同志后来收回了原来的话。”

毛泽东听了很高兴,说:“他要有个转弯,他开始转弯了,小平同志态度很好。”

当毛远新问下一步怎么办时,毛泽东说:“再开会,帮助邓小平,扩大一点人,李先念、纪登奎、华国锋、张春桥也参加,你们8个人先讨论,不怕吵,吵也不要紧,然后政治局再讨论。”

毛泽东说:“讨论限于文化大革命问题,做个决议。文化大革命是干什么的?是阶级斗争嘛。”“对文化大革命,总的看法:基本正确,有所不足。现在要研究的是在有所不足方面。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

“文化大革命犯了两个错误,一、打倒一切,二、全面内战。打倒一

切其中一部分打对了,如刘、林集团。一部分打错了,如许多老同志,这些人也有错误,批一下也可以。无战争经验已经十多年了,全面内战,抢了枪,大多数是发的,打一下,也是个锻炼。但是把人往死里打,不救护伤员,这不好。”

“你们8个人先讨论。一次开不好,两次,三次,不要着急。”

11月3日下午,清华大学的刘冰原定下午14时30分和惠宪钧、吕方正一起进城参观展览会。下午14时25分,他正准备出门时,有人敲门。

刘冰打开门,见是迟群办公室的一位工作人员,通知他说:“迟群让我通知您,下午3点在第二教室楼召开党委扩大会。请您务必参加。进城的车子我已通知车队不用来了。”年轻人说。

“好,我知道了。”刘冰说。

送走年轻人,刘冰立即打电话给惠宪钧:“迟群办公室来人通知3点钟开常委会,我判断是有关我们信的问题,请通知老柳迅速到我办公室商量对策。”

当刘冰骑自行车赶到办公室时,已是14时40分。此时惠宪钧、柳一安都在他的办公室。3人简单交换了一下意见,感觉几乎是一样的:“既然常委会的召开是关于我们信的事,开会前又不和我们商量,搞突然袭击,证明毛主席支持迟群,而不支持我们。怎么办?”他们紧张地商量着,认为还是要坚持真理,实事求是,一切按党的原则行事。既然是关于信的问题,很可能要他们在会上宣读,于是惠宪钧跑步到他办公室取来信的底稿,然后3人快步走向第二教室楼。

15时整。会议室满屋子的人,黑压压一片。除了常委、各系党委书记、校级各部处负责人外,还有很多北大党委的生面孔。

15时15分,吴德在迟群、谢静宜的陪伴下进入会场。他是根据中央政治局的安排,前来参加清华大学校党委扩大会议,传达毛泽东的有关指示精神。

刘冰站起来吴德他握手,吴德只是冷冷地点点头,刘冰已伸出的手只好收回来了。

大家坐定后,吴德从座位上站起来,清了清嗓子说:“这一个时期,清华发生了一件事,就是刘冰、惠宪钧、柳一安3位副书记和常委吕方

正4人给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写信,告了清华大学党委书记迟群同志和我们的市委书记谢静宜同志。伟大领袖毛主席对于他们的信作了批示,现在我把批示的主要精神给大家传达一下。”然后,他将毛泽东对刘冰等人上书的批评意见,用自己的话做了传达,可以清楚地听出来,毛泽东不支持刘冰等人的上书。

会场安静极了,几乎相邻的人都能听到彼此的呼吸声。

此时刘冰怎么也想不通:“本是一腔热血,出于对党和毛主席的忠诚才给主席写信的呀。怎么变成了反对毛主席呢?”

吴德说:“这个问题是什么性质?这个是非要弄清楚。要按毛主席的指示进行讨论,辩论认清问题的性质。”然后,他宣布:“这个会请清华大学党委书记迟群同志主持。”

迟群站起来,清了清嗓子说:“我们请刘冰把他们给毛主席写的信在这里念一念。”

刘冰定了定神,强迫自己镇静下来,然后站起来,拉过话筒,一字一句地读着那封曾寄予他们无限希望的信。他语速很慢,想让会场里所有的人能听清楚迟群、谢静宜存在的问题。

在念信的过程中,刘冰不断被来自各个方向的驳斥、批判、声讨、反对的声音所打断,几乎无法念下去。他几次提出不念了,迟群不得不劝阻大家暂停声讨,让刘冰把信念完。

刚念完信,刘冰还没坐稳,人们就纷纷站起来,争先恐后的批判刘冰他们,个个义愤填膺,人人慷慨激昂,都说刘冰他们是“诬告”,“恶人先告状”,“欺骗毛主席”,“用写信的办法反对毛主席”等等。

原来有些人对迟群和谢静宜是有看法的,但是一看这阵势,也都说自己是“上当了”,并且“走资派”、“投降派”全来了。他们说,“刘冰是走资派,你们三个是投降派。”

刘冰申辩说:“我们给毛主席写信反映问题,正是对毛主席、对党中央的忠诚。信里反映的问题都是事实。”

这时,吴德插话说:“刘冰!你应该老老实实,把你们的活动拿到桌面上,不要在桌子底下活动。”

刘冰说:“我们没有搞桌子底下活动,我们完全是按照组织原则办的,给市委科教组汇报过,给吴德同志报告过。”

吴德说:“你没有给我报告,你那是信。”

刘冰说:“信也算数吧!我们还两次请求你接见,要向你汇报,这是在桌子底下活动吗?”

吴德不说话了。

散会后,迟群要刘冰和惠宪钧、柳一安留下,给他们宣布纪律:“不准相互串联,不准到校外,不准请假,要按时上下班,不准迟到早退。”

第二天,二教楼会议室就贴满了大字报。其中最为显眼的是清华大学政治部副主任吴伟煜写的《走资派还在走》和《投降派确实有》这两张大字报。

8 点整,迟群、谢静宜来了。迟群宣布开会,他说:“昨天吴德同志传达了我们主席的批示精神,刘冰宣读了他们的信,大家应根据吴德同志讲的精神展开辩论,对他们的信可以提问,可以批判,刘冰他们也可以申辩。”

但是,整个会议过程都是一面倒,对迟群、谢静宜全是赞扬,对刘冰等人都是批判。不管刘冰,还是惠宪钧、柳一安,只要一说话就遭到围攻。

从那以后,清华大学几乎天天开会斗争刘冰等人,每天就像学生上课、工人做工那样,8 小时开会批判……规模逐渐扩大,到 11 月 12 日,批判会已经扩大到全校支部书记以上党内外干部 1300 余人参加。在这次会上,只有批斗者的发言,刘冰等 3 人已没有一言辩护的机会了。不是不让他们辩护,而是没人听他们的辩护,与会者也不给他们辩护的时间了。

# 第1373回：八人会，继续批评邓小平 急召回，张爱萍就不认错

11月4日，毛远新按照毛泽东说的，召集邓小平、汪东兴、陈锡联、李先念、纪登奎、华国锋、张春桥8人开会。他在会上传达了毛泽东的谈话内容，然后首先发言，从对毛泽东谈话的理解，说到邓小平的问题，批评邓小平否定文化大革命。

当晚，毛远新在中南海游泳池向毛泽东汇报了8人会议情况。他说："他们对邓小平同志主持工作以来意见也很大。"

当毛远新汇报到汪东兴讲，"主席一个时期批评这些人，一个时期批评那些人，为的是在路线上一致起来，不要一批评就要打倒似的"，毛泽东点头说："对，不是打倒，而是改正错误，团结起来，搞好工作。我批评江青也是这样。"

当他汇报到邓小平坚持说"要执行毛主席的指示，实现安定团结"时，毛泽东说：

"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斯大林在这个问题上犯了大错误。列宁则不然，他说小生产每日每时都产生资本主义。列宁说建设没有资本家的资产阶级国家，为了保障资产阶级法权。我们自己就是建设了这样一个国家，跟旧社会差不多，分等级，有八级工资，按劳分配，等价交换。要拿钱买米、买煤、买油、买菜。八级工资，不管你人少人多。"

当毛远新请示下一步怎么办时，毛泽东说："会议还要开，还要逐步扩大几个人，开会就是帮助他及大家，互相帮助，搞好团结，搞好工作。"

毛泽东说："对文化大革命，总的看法：基本正确，有所不足，现在要研究的是在有所不足方面，看法不见得一致。"

毛远新问："这次会议，争取在对文化大革命这个问题上能初步统一认识，对团结有利。目的是通过讨论，团结起来，搞好工作，是这

样吧?”

毛泽东说:“对。”他又嘱咐毛远新:“这个不要告诉江青,什么也不讲。”

11 月 5 日,邓小平给毛泽东报送外交部关于缅甸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国务委员会主席吴奈温访华接待计划的请示报告中说:“奈温已表示希望会见春桥、江青、文元同志,故我请外交部提出由我和春桥两人之一出面接待的方案。”“我觉得以后见主要国宾,由我一人出面,过于繁重,故拟请春桥出面如何? 请主席考虑指示后,再送政治局各同志审核。”

毛泽东阅信后批示:“由小平主持会谈,春桥可参加迎送及宴会。”并删去请示中提出“江青同志会见已有安排”一句,还把“由邓小平或张春桥副总理代表周总理主持”、“请邓小平或张春桥副总理讲话”、“请邓小平或张春桥副总理祝酒”中的三处“或张春桥”四个字圈掉。

11 月 5 日深夜 23 时许,正在大西北凤州视察工作的张爱萍接到陈锡联从北京打来的电话:“小平同志让我转告你,在外面不要乱讲话,要少说话。”

张爱萍感到愕然和纳闷,遂问陈锡联:“北京有什么新情况?”

陈锡联说:“说不清楚。”就把电话挂断了。

第二天,张爱萍向基地排以上干部讲话。他说:

“在七机部,我问他们,都是革命同志,为什么不能坐在条板凳上?即使坐在一条板凳上也不是面对面,而是屁股对屁股。我说,你们这里看不见友谊,都像仇敌一样,生活一天,会少活一年! ……

现在好了,改变了。有一位老工人说,像现在这个样子,我要争取多活三年!”

就在张爱萍说这话时,北京又给他来了电话,是催促他回京的。电话是副总参谋长胡炜打来的,这真是历史的巧合,1974 年国庆节叫张爱萍回北京参加国庆招待会的电话也是胡炜给他打的。

“中央请你尽快回来。”胡炜在电话里说。

“有什么急事吗? 我这里工作还没有完。”张爱萍说。

“有重要事情。”胡炜道,“电话里不好说。你回来就知道了。”

张爱萍还是推迟了一天。11 月 8 日,他准备飞绵阳,到九院去。

电话铃又响了,这次是中央办公厅电话:“爱萍同志,去接你的飞机,已经到了宝鸡附近的军用机场。中央领导同志有重要事请,你马上返回”

赶到宝鸡要坐4个小时的汽车,此时的张爱萍正发着高烧。

“真遗憾,我答应第九研究院的同志多少次,一定去他们那里看看。这次又去不成了!”坐在吉普车上,张爱萍不无遗憾地说。

军用吉普车在初冬陇西的寒风中疾驶。当日黄昏时分,在前往机场的途中,路过21军驻地。这个军有一个师,是张爱萍在抗日战争初期在淮北亲手创建起来的。已经多年没有来看望这支老部队了。但是,现在已经来不及了。北京要他当晚便赶回去。他只好“过家门而不入”。

在21军军部,张爱萍匆匆地吃了一顿晚饭,夜色迷蒙中,军用吉普恍穿过浓重的夜色,直奔军用机场。

回京的当天晚上,张爱萍的爱人李又兰给他服了药,看他极度疲劳的样子,原本不想再说什么了,只要他早点休息。但又担心第二天中央的紧急召见,没有一点准备也不好。于是,犹豫再三,还是告诉了最近清华大学刘冰的事情。张爱萍靠卧在沙发上静静地听着。通常他都是腰板挺得直直的,即使是坐在沙发上,腰从来都不靠椅背。下面垫两个沙发垫子,双手搭载在拐杖上,一副军人姿态。今天他是真不行了,高烧且有些胸闷,吸了会儿氧气,他什么也没有说,静静地、默默地听着。

很晚了,他睡下又爬起来要长途电话,是关于卫星发射的事情。

第二天,通知张爱萍去中南海开会。

参加会议的6个人,除张爱萍外,其余5人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华国锋、李先念、纪登奎、陈锡联,以及国防科委政委陶鲁笳。

会议是华国锋主持,李先念首先拿出一份文件,递给张爱萍说你:“先看看吧。”

张爱萍接过文件,只见文件标题是:《关于对我调离处理的申诉报告》,副标题是:《揭发国防科委主任张爱萍推行“今不如昔”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署名是230厂“916”组织负责人舒龙山。文件的上

方印有一行大字：

毛泽东11月2日批示："印发政治局各位同志，请总政酌处。此人是'916'左派。"

舒龙山的信是10月1日写的，内容基本上还是大字报上写的，叙述自己如何受刘少奇、王秉璋、张爱萍的迫害，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如何一次又一次救了他。

李先念问："看完了？怎么样？"

"不怎么样！"张爱萍的回答让在座的人都吃了一惊。

李先念本能的说道："什么？连毛主席的指示也不怎么样吗？"

"不怎么样，就是不怎么样！"张爱萍如同一头倔驴。此话一出，还说什么呢？大家一时不知如何以对，会场上沉默……

纪登奎率先打破了沉寂："我问你，'今不如昔'这句话是什么人说的？"

"是右派说的。"张爱萍再一次语出惊人，这不等于说自己是右派吗？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纪登奎没有马上回过味儿来，严肃地问道。

张爱萍："还用解释吗？告状的人不是左派吗？"

纪登奎："那你到底说了没有？"

张爱萍："还用我说吗？七机部的问题你不清楚？"

纪登奎："你看看你，讲的话就有这么厚厚一大摞！"

张爱萍："你都看过了？没有看到你自己讲过的话吗？"

纪登奎："你什么意思？"

张爱萍："'九年无宁日'，就是你说的。忘记了？"

纪登奎："你血口喷人！态度很不老实！"

又是沉默。

陶鲁笳站出来揭发：张爱萍任职后根本没来机关，一下子就跑到七机部去了，其目的是整那里的革命左派，污蔑七机部的大好形势，并动用部队的人力、物力到工厂笼络人心，以批判派性为名搞反攻倒算，在国防科委压制民主，个人说了算……

揭发批判后，又是难捱的沉默……

李先念："你说拿出能打到莫斯科的武器，什么意思嘛！"

张爱萍:“什么意思?阶级斗争为纲的具体化嘛!你们不是老喊高举阶级斗争的旗帜吗?”

会场再次出现沉默……

又是纪登奎发言,批判张爱萍的路线错误。

又是毫无顾忌地回击。张爱萍把自己在关押期间的所思所得完全发泄在这一场针锋相对的辩论之中。几位副总理一时间竟被张爱萍一个人顶得手足无措。

陈锡联用腿碰碰张爱萍,悄声说:“你承认了算了”。

说实话,这是百分之九十九的老干部在那种情况下会选择的态度,但张爱萍没有卖陈锡联的账,而是大声问:“你们要我承认什么?”

陈锡联:“承认犯了路线错误啊。我不也承认过嘛,也没有把我怎么样嘛!”

张爱萍大吼:“那是你!”

……

主持会议的华国锋一直没开口。冷场很久后,华国锋才说:“这件事很突然,对毛主席的指示需要一个理解和认识的过程。是不是请爱萍同志回去再想一想。就散了吧!”

鉴于张爱萍顽固的态度,4 个副总理谈话后的当天,政治局全体成员深夜驱车来到人大会堂,接见在那里等候多时的七机部和国防工业各部的党组成员们,向他们宣布了刚刚做出的决定:

张爱萍同志在七机部和国防工业各部门的工作中,犯有否定“文化大革命”和右倾翻案的错误,经政治局讨论通过,以中共中央的名义正式决定,张爱萍要接受群众批判。

随后,一行人又驱车来到三座门军委办公地点,向早已等候的三总部和国防科委的党组领导成员宣布了同样的内容。

在上述两个地方宣布决定时,邓小平都说了一句相同的话:“七机部和国防科委出的问题,责任在我。”

在此之前,11 月 6 日,毛远新报送毛泽东 11 月 2 日、3 日、4 日毛泽东与毛远新的谈话整理稿。毛远新在送审报告中说:

“为了集中讨论对文化大革命的看法,为了贯彻互相帮助,统一认识,团结起来,搞好工作的原则,也考虑到下一步逐步扩大,便于传达

讨论,我把前几次谈话中主席有关的指示整理一个材料,请主席审阅指正。小平同志确定明天晚上八个人继续开会,会后再向主席报告。”

11 月 9 日,毛泽东圈阅了毛远新 11 月 6 日报送的整理稿,并让工作人员告毛远新:“同意将这个整理材料印发到会同志。”

11 月 10 日上午,邓小平约胡乔木过去,对他说:“我现受批判,起因是转刘冰的信。”

并说:“主席作了很严厉的批评,我作了自我批评。”

胡乔木告诉邓小平:“信是由李琦交我,我交给你的秘书的。”

邓小平并不知道信是怎么来的,说:“信既要我转,总是说明写信的人认为我是同情他们的。”并要胡乔木不必提转信的事,以免事情复杂化。

邓小平说:“中央讲了,‘三项指示为纲’这个提法不对,只有阶级斗争才是纲。”

胡乔木说:“转信的事恐怕不是主席批评的根本原因,根本原因一定是主席对你早就有了不满。”

邓小平说:“过去把形势看得太简单了。”

胡乔木提到:“政研室今后要吸收革命造反派参加领导。”

邓小平听了马上摇头,说:“不要! 只要吸收年青一点的就行了。”

胡乔木报告了政研室正在写的关于《水浒》的文章的题目和构思,邓小平说:“写起来你直接送主席,不要经我转。”

11 月 13 日下午,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会见缅甸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国务委员会主席吴奈温。会见后,毛泽东与参加会见的邓小平、张春桥谈话,建议让胡耀邦、胡乔木、周荣鑫、李昌、刘冰等人列席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会议。他说:“他们参加会议也是对他们的一种帮助。”

毛泽东吸取了文化大革命发动前没有向广大干部“打招呼”以至许多领导干部被打倒的教训,于 11 月 13 日亲笔写了一个“关于打招呼问题”的批语:

“过去只有河南同百分之八十的县委书记打了招呼,所以没有受冲击。在多数人身上复杂一点。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何论魏晋。要估计这种情况。一些老同志打个招呼,如周荣鑫、李昌、胡耀邦、胡

(指胡乔木)、刘冰、李井泉等几十人也要打招呼。”

毛泽东在1975年10月以后指出:

“过去那些学校学的没有多少用,课程都忘记了,用处就那么大点,有点文化,能看书写字,有的能写点文章。很多书我也是以后看的,很多自然知识也不是课堂上学的,如天文学、地质学、土壤学。真正的本事不是在学校学的,孔夫子没上过大学,还有秦始皇、刘邦、汉武帝、曹操、朱元璋,都没上过什么大学。可不要迷信那个大学,高尔基只上过两年小学,恩格斯只上过中学,列宁大学未毕业就被开除了。”

“上了大学,不想和工人划等号了,要做工人贵族。就是普通的工人农民每天也在进步。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却是幼稚可笑的,包括我。往往是下级水平高于上级,群众高于领导,领导不及普通劳动者,因为他们脱离群众,没有实践经验。不是有人说大学生不等于劳动者吗,我说我自己不及一个劳动者。有些人站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立场,反对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改造。他们就不用改造了?谁都要改造,包括我,包括你们。工人阶级也要在斗争中不断改造自己,不然有些人也要变坏呢。英国工党就是反动的,美国产联、劳联也是反动的。”

“说教育有危机,学生不读书,他自己就不读书,他不懂马列,代表资产阶级。”

11月14日下午,国务院会议厅,邓小平和华国锋、李先念、纪登奎四位国务院副总理一起召集胡乔木、周荣鑫、胡耀邦、李昌开会,谈了周荣鑫、胡耀邦、李昌三人的错误,通知他们:政治局日内将开会谈他们几个人的问题。邓小平说:“你们跟我一样,文化大革命以来没有工作,不了解情况。”

又对周荣鑫说:“你是教育问题。”

虽然在14日的会议上没有谈胡乔木的问题,但他心中不免敲鼓,觉得“为刘冰等人转信,当是自己的问题之一。”会后,他一直为此事不安,于是在11月15日找到邓小平,说自己要对党、对中央讲清楚为刘冰转信的经过。

# 第1374回：王洪文，十五日回到北京 刘冰等，参加政治局会议

正在上海的王洪文看到清华大学给中央政治局的《简报》后，非常兴奋，把马天水他们找到东湖路七号招待所的会客厅，拿出清华大学的《简报》给他们看，说“毛主席已有批示了，”徐景贤他们鼓励王洪文回去参加战斗，王洪文说：“再等几天，现在是清华大学在开常委扩大会，但是政治局是否开会，我还要看一看。

11月14日，王洪文给毛泽东报送《关于上海召开大型文艺工作座谈会的情况简报》。他在《简报》中说：“最近听到下面有些人在传抄主席与江青同志七月十四日的谈话内容。因此我建议是否可以将主席这次谈话精神传达给各省、市、自治区，各大军区及有关文化单位。”

第二天，11月15日，毛泽东对王洪文14日报送的《简报》批示：“印发政治局各同志。请讨论一次。我讲的不完全，至少应该提到鲁迅提倡削烂苹果一篇，请文元同志找出此文印发，以供讨论之用。”

毛泽东批示中提到“鲁迅提倡削烂苹果一篇”，是11月14日，《解放军报》在《长征》文化副刊上发表的一篇题为《“刻烂苹果”及其他》的文艺短评。这是一位署名金辉的战士自发来稿。

“刻烂苹果”出自鲁迅的一篇题为《关于翻译》（下）的杂文。鲁迅在这篇杂文中说：“我们先前的批评法，是说，这苹果有烂疤了，要不得，一下子抛掉。”他主张，倘不是“穿心烂”，就把烂疤刻掉“还可以吃得”。所以，鲁迅“希望刻苦的批评家来做刻烂苹果的工作”。

这篇短评说：“对待有缺点的作品，历来有两种方法，就是鲁迅说的‘抛’和‘刻’。前一种，将有‘烂疤’的苹果，不问青红皂白，统统付之一‘抛’，判处‘死刑’；而后一种，对并非‘穿心烂’的苹果，既刻掉了烂疤，又保全了好的部分，乃是‘去掉落后的东西，发扬革命的东西’。毫无疑问，这后一种方法，才能更好地发展和繁荣社会主义文艺。”

短评说：“世界上没有绝对纯的东西，也没有尽善尽美的事物。金

要足赤,人要完人,那是形而上学思想。作品也不可能没有缺点,像是一个苹果,即使没有烂疤,也不会没有疵点。文艺作品是社会生活在作家头脑中反映的产物。由于客观事物的复杂性和人们认识能力的局限性,要求十全十美是不可想象的。马克思主义从来也没有苛求过某种东西一经产生便完美无缺。”

11 月 15 日,王洪文飞回北京。

当天,邓小平给毛泽东写报告说:“洪文同志已经回到北京。7 月份洪文同志到外地时,经主席批准,由我暂时代替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现洪文同志已回,按例,从即日起,中央日常工作仍请洪文同志主持。近日召开的 17 人会议,亦应请洪文同志主持。请主席批示(由东兴同志通知)。”

毛泽东当天批示:“暂时仍由小平同志主持,过一会再说。”

11 月 16 日下午 18 时,刘冰参加完清华大学的辩论会,身心疲惫地回到家,于 18 时 30 分接到谢静宜的电话,让他 19 时在清华大学西南门上车,去人民大会堂。

刘冰问:“干什么?”

谢静宜说:“你到大会堂北门下车后,告诉哨兵,你是清华大学的刘冰,他会领你进去。”

经过和妻子商量,刘冰决定去,但做好了被捕的准备。

刘冰较早来到人民大会堂,战士将他领到东大厅,只见屋里的座椅围成圆圈,前后两排,厅内有几个女服务员正在摆放沙发和茶几。后来汪东兴进来了,看见刘冰问道:“你哪个单位的?叫什么名字?”

刘冰答:“我是清华大学的,叫刘冰。”

汪东兴说:“啊!你就是刘冰!过去没见过面。”

这时谢静宜来了,她看见刘冰说:“你来了。”

然后她和汪东兴一边说话,一边走开了。

刘冰怕影响别人,赶快走到一个较远的沙发前坐下,等待着。19 时 55 分,陆续进来了一些人,先是政治局委员们,接着胡耀邦、胡乔木、周荣鑫、李昌也都来了。大家在摆成圆圈形的两排沙发入座,政治局委员在前排,其他人都坐第二排。

刘冰看到胡耀邦也来了,过去挨着他坐下。胡耀邦和他握了手。

纪登奎正好坐在他们前排,扭过头来也和刘冰握了手。刘冰小声致谢。

20时整,邓小平宣布开会。他说:“昨天主席接见外宾完了之后,把我留下,在场的还有张春桥,主席要胡耀邦、胡乔木、周荣鑫、李昌、刘冰同志参加政治局会议。主席说参加会议也是一种帮助。”

简短的开场白以后,邓小平走到张春桥面前说:“我耳朵背,记不详细,请你把主席讲的整理一下。”

张春桥说:“我不整理,我没有记。”

邓小平似乎没有听见,只是把两张记录纸放到张春桥面前的茶几上,然后回到自己的座位上。

这时姚文元说话了:“今天列席会议的他们几位,恐怕还不知道主席对清华的批示吧?是否给他们传达一下?”

邓小平没有说话。姚文元重复着自己的话:“今天列席会议的他们几位,恐怕还不知道主席对清华的批示吧?是否给他们传达一下?”然后指着刘冰等人问:“你们听过没有?”

刘冰回答:“我听了,吴德同志传达过。”

吴德马上说:“我没有传达,我只是说了主席批示的精神。”

邓小平说:“那好吧,请毛远新传达一下。”

于是毛远新翻开笔记本,念了毛泽东的批示:“清华大学刘冰等人来信告迟群和小谢。我看信的动机不纯,想打倒迟群和小谢。他们信中的矛头是对着我的。我在北京,写信为什么不直接写给我,还要经小平转。小平偏袒刘冰。清华大学所涉及的问题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

刘冰是第一次听到毛泽东批示的真实内容,此时的他如同晴天霹雳,脑子里一片茫然。后来他回忆说,“当时自己心跳加快,连呼吸都感到困难,感到这真是天大的冤枉。”他脑袋昏昏的,耳朵嗡嗡的,会场上什么人再说什么,他全听不到了,满脑子都是毛泽东的批示。

毛远新传达完后,邓小平说:“讨论吧!”

当天刚刚坐飞机回到北京的王洪文首先发言,他说:“我最近到上海去了一趟,听到许多反映,下面对周荣鑫意见很大。教育部搞教育革命,专讲一些旧观点、旧思想,搞旧的一套。这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

续革命的理论背道而驰。”“周荣鑫1975年1月出任教育部部长,按照邓小平的指示,在教育界也进行了整顿。”

张春桥附和着说:“都是一些旧的东西,周荣鑫不听我们的。”

姚文元也说:“报纸的记者也有反映,群众有意见。”

王洪文还指责胡耀邦在科学院进行整顿时的一些言论。

江青时而坐在沙发里,时而站起来走动,一边走一边说些什么,与会者也未必听得清楚,但明白她是支持张春桥、姚文元的。

邓小平一言不发地听着。叶剑英除了偶尔喝点水或偶尔用毛巾擦擦脸,一直在默默地记笔记,什么话都没说。

晚上23时许,邓小平宣布:“今天的会到此为止,明晚8点钟继续开会。”

做好被逮捕准备的刘冰,没想到居然走出了大会堂。他表面上若无其事,心里早已乱成一团。有人跟他打招呼,他只是下意识地做出反应,点点头,竟连什么人都没看清楚。等人们都上了车,刘冰才从台阶上下来,找到清华的车子。

回家的路上,刘冰一直在想:“主席说的‘参加会议也是一种帮助’含义是什么?应该要我们在会议上作检查,在会议上接受批判。那在明晚的会议上,我就该检查了。主席批示中说信的矛头是对着他的,又点名要我参加政治局会议,毫无疑问,我对主席批示持何种态度,主席定会注意的。但如何检查呢?”

深夜12点,刘冰回到了家里。妻子苗既英看到他能回来,非常惊喜,连声问道:“是怎么一回事?”

刘冰把参加政治局会议的详细情况,特别是毛泽东的批示告诉了妻子。

苗既英听完这番叙述久久说不出话来,一直用手绢擦眼泪,最后说:“这真是冤枉了!”想了一会儿又对刘冰说:“给他老人家写信反映情况是矛头对着他的,中央副主席给转个信也成了偏袒,怎么能得出这个结论呢?”

苗既英用怀疑的口气说道:“老人家是不是真的糊涂了?他80多岁了,人老了容易糊涂,这批示不是颠三倒四吗?”

刘冰说:“不全是糊涂,而是听了毛远新、谢静宜的一面之词。”

苗既英说:“按这个批示,就会给你定成反对毛主席的罪名。反对毛主席就是反革命!这批示如果编在《毛选》里,那我们不就永世冤枉吗?”

刘冰说:“是呀,现在已经到头了,没有地方说理。邓小平转个信是偏袒我,这不正常。现在只有检讨,争取留在党内。只要活着,过几年再说。反对毛主席的帽子现在已经被戴上了,我怕开除党籍,一旦开除党籍就不好办了。明天晚上政治局会议上,恐怕我们5个人要检查。现在要想想如何检查。”

苗既英说:“一个是检查,一个是不检查。我们没有错检查什么?”

刘冰说:“主席说矛头是对着他的,不检查行吗?不行!因为那样会再戴上一顶对抗主席的帽子,岂不更冤枉?几十年来,我们在亲身实践中看着主席领导我们取得了胜利,我们自己的成长也是他的思想哺育的。在这一件事上,即使是主席错了,从良心上讲,也不能对抗,让主席为难。”

苗既英说:“你不能过细检讨,原则上表个态就行了,不能给自己戴帽子。”

刘冰说:“毛远新是要给主席汇报的,不戴帽子,主席通不过。”

苗既英坚决地说:“要给自己留个余地,将来好翻案。你再仔细想想怎么办好。明天你好好准备一下,现在该休息了,已是3点钟了。”

他们都吃了安眠药,也睡不着,仍然商量着在政治局会议上如何检查的问题,直到东方发亮。

政治局扩大会后,王洪文给上海打电话,叫他们赶紧给他整理邓小平在各种会议上的讲话材料。上海市委很快就把邓小平的言论整理出来,交给上海市委印刷厂印成大字本,直接送给王洪文。马天水也急忙写了《邓小平策反我的过程》交给了王洪文,由王洪文批转印发给政治局参加会议的人。

11月17日晚20时,中央政治局继续开会,还是由邓小平主持。他首先让毛远新传达毛泽东听了16日会议情况汇报后的指示,接着转向胡耀邦等人说:“你们5位同志,主席要你们参加,你们有什么要说的吗?”

胡耀邦闻言站了起来,大声说:“我讲些意见。主席要我们5位同

志来参加会议,是对我们的关怀。我在这里对主席表示衷心的感谢。昨天晚上,王洪文副主席对我讲了许多话,我在这里郑重声明,他说的那些问题我没有。说我说了什么话,我没有说过,请求中央查证。我与刘冰在团中央一起共过事,他找到我要我给他转信。我对他说过我支持你,但是信要你自己送,因为我们不是一个组织系统的。我是科学院,你是清华大学。所以我不能帮你转信。完了!”

说罢,胡耀邦坐下。会场上一时间鸦雀无声,连受到反驳的王洪文也没有说话。

过了一会儿,邓小平说:“你们谁还说话呀?”

刘冰看看周围没人回应,待不住了,就说:“我发言。”

他刚要说话,邓小平说:“刘冰同志,我耳朵背,你坐在我旁边讲,好不好?”刘冰赶快走过去,坐在邓小平左边的座位上,然后说:“主席对我作了严厉的批评,我在这里向主席、向中央作检查。”

刘冰说:“主席严厉地批评了我,又要我列席政治局会议来帮助我,这是对我的关怀,我在这里对主席表示深深的感谢;我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抓了一些鸡毛蒜皮,罗织罪状,错告了主席派往清华的干部,我犯了诬告的错误,我在送信过程中,涉及到一些同志,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我对党、对主席应忠诚老实,不能隐瞒;我请求党中央和主席给我处分;我向主席和党中央保证在我的后半生,我将以最大的努力为党的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接着发言的是胡乔木,他讲到刘冰的问题时说:“刘冰同志的第二封信是我送给小平同志的。”

这时猛然从背后响起江青尖厉而有点沙哑的声音:“乔木!你反对毛主席呀!我现在才知道。”

只见她坐在一张铺着白布的桌子前,上面还摆着饭菜。她没有来得及吃晚饭,只能到大会堂边开会边吃。这时江青猛地站起来追问胡乔木:“你为什么给刘冰送信?”

胡乔木说:“我不认识刘冰,也不认识迟群,只是听说过他们,我对刘冰印象好一些。”

江青用她那颤抖的声音生气的说:“你是主席的秘书,你反对主席我没料到。”

胡乔木结结巴巴继续检讨。

随后李昌要求发言。他检讨说:“科学院在转整顿过程中,没有很好地理解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工作没有做好,我和耀邦同志都是有责任的。关于我提出从应届高中毕业生招考大专生的问题,主要是由于科学院缺少合格的实验员,于是我们就提出要办高等技术专科学校,直接从高中毕业生中招生,这违反了大学招生‘群众推荐,组织考察’的报送制度,错误是严重的,教训是深刻的。”等等

周荣鑫同志因为有外事活动来晚了,他最后发言。在他发言过程中,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江青4人不断插话,批评他“否定教育革命”、“搞资产阶级教育”、“搞修正主义”、“复辟、倒退”等等。

时间已经23时多了,因为毛远新宣读了毛泽东对邓小平的批评,说他“从来不抓阶级斗争”,所以在这天会议结束的时候,邓小平也做了检查,说:“我的根本问题就是不抓阶级斗争。”接着宣布:“今天的会就到这里,下次会议时间另行通知。现在散会。”

# 第1375回：清华园，召开万人批判会 “打招呼”，卫星升天再收回

1975年11月18日，清华大学在大礼堂召开全校师生员工万人大会，北京大学1600多人也参加了这次大会。

会上吴德传达了毛泽东对刘冰等人来信的批示全文。紧接着是开展大辩论。但是辩论的另一方此时却没有在会场。此时，刘冰被安排在校政治部办公室的一个角落里，面对着墙壁上“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大标语一坐就是一天，看管的人连坐向都不让改变。惠宪钧、柳一安、吕方正则被安排在会场之外。

大会开了整整一天。刘冰、惠宪钧、柳一安、吕方正四人在会上被称之为“正在走的走资派”、“投降派”、“右倾翻案风的急先锋”，说他们“否定教育革命，翻教育革命的案，算文化大革命的账”，“反党、反毛主席”。

清华大学贴满了大字报。大字报在批判刘冰等人的同时，也公开点名批判教育部长周荣鑫，说他否定教育革命，坚持资产阶级教育路线，和毛主席的教育路线相对抗，翻“文化大革命”的案。

与此同时，全国各地的大学来清华大学看大字报，参观学习，人达数十万人之多。他们的大字报被大量翻印，四处散发，内容迅速在各地传布，各地一些学校也相继开展了“教育革命大辩论”，大有1966年6月份的阵势。但是，1966年6月全国的大字报几乎是群众自发的起来的，领导想禁止都禁不住。而这次各学校学生和群众都不积极，看上去热热闹闹贴大字报，都是上级组织的，内容都是抄报纸，与1966年有着天壤之别。

11月底的一天下午，刘冰在家里听到一阵轻轻的叩门声后。开门一看，是一机部党的核心小组成员、副部长项南的女儿小米。

刘冰和项南建国之初都在团中央工作，彼此熟悉，但他对小米此时前来仍感意外，忙问：“你是怎么来的？”

项小米回答:“坐我爸爸的车来的,门外没有看到人。”

刘冰对她说:“我怕有人看到你来这里。”

小米说:“我不怕,他们敢怎么样?”

原来,她是和父亲项南一起到北大来看大字报,项南留在北大,让女儿进清华园看望刘冰,带话问候,要刘冰注意身体。

小米告诉刘冰:“现在就是清华和北大在批判你,其他单位和地方还没有动作。但是情况很紧张,很多人都知道了你给毛主席写信和主席的批示,一些老同志都不敢相互往来了。”她对刘冰说:“刘叔叔,要特别提高警惕,他们会用各种办法整你,也会搞人监听你的电话,你不要再打电话了。”

项小米的来访使刘冰感到了一丝温暖。

一天深夜23时左右,刘冰突然听到轻轻的叩门声,声音断断续续。根据以往被批斗的经验,刘冰迅速穿好衣服,还拿上了大衣下楼开门。

门打开一看,来人是工程物理系学生宋章元。

年轻人进屋后匆匆问候了刘冰的身体情况,然后说:“我今天夜里是专门来看看你。你们4个人的信,几乎所有的同学都抄下来了,很多人用复写纸复写了许多份邮寄到外地。大会上批判者说信的内容都是假的,同学们根本不信。迟群说开会是大辩论,要通过辩论搞清问题的性质。同学们在宿舍里说,既然是大辩论,怎么看不到刘冰他们出来辩论呢?有的同学说,大概是不敢让他们出来吧。这些话都表达了对迟群的不满。迟群、谢静宜在学校里不得人心,同学们表面上不敢说,实际上都同情你。你们并不孤立,你要保重身体,想开一些。”说完他就走了。

11月20日,中央政治局专门开会讨论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问题,对邓小平作了批评。根据毛泽东意见,提出由邓小平主持作一个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决议,邓小平用毛泽东的话婉言拒绝说:“由我主持写这个决议不适宜,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何论魏晋。”

11月21日,邓小平给毛泽东写了报告,由毛远新转交给毛泽东。报告说:“遵照主席指示,向一些同志打个招呼,免犯错误。现拟了一个136人的名单,并拟了一个打招呼的谈话要点,都是由政治局会议

讨论修改了的。现送上,请审阅批示。打招呼的方法是,把大家召集到一块谈,政治局同志都出席。政治局商量,准备把谈话要点发给各大军区司令员和政委以及省、市委第一书记,也给他们打个招呼。此点也请主席批准。”

邓小平还在这个报告的后面附上了“打招呼”谈话要点。这个要点中,毛泽东对刘冰等人来信的指示只有“清华大学刘冰等人来信告迟群和小谢。我看信的动机不纯,想打倒迟群和小谢。他们信中的矛头是对着我的。”没有后边“我在北京,写信为什么不直接写给我,还要经小平转。小平偏袒刘冰。清华大学所涉及的问题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这些内容。

第二天,毛泽东听工作人员读了邓小平的报告和谈话要点,在邓小平的报告上批道:“很好。但不仅只是老同志,要有中年、青年各一人同听同议,如同此次17人会议那样。即也要对青年人打招呼,否则青年人也会犯错误。请政治局再议一次,或者分两次开,或者先分后合。”

毛泽东的这个批示,由邓小平在政治局会议上做了传达。

但毛泽东很快又想到:本来是给老干部“打招呼”的会,如果有青年人参加,又会增加许多复杂因素。第三天,11月23日,他给邓小平写了一封信说:“还是你们议的好,先给老同志打招呼。青年问题暂缓。因有的还未结合,有的在打派仗(如七机部),有的貌合神离(如清华),召集不起来。”

11月24日,中央在北京召开“打招呼”会议,邓小平主持,并在会上宣读了毛泽东审阅批准的《打招呼的讲话要点》:

一、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等人,于一九七五年八月、十月两次写信给毛主席,他们用造谣诬蔑、颠倒黑白的手段,诬告于一九六八年七月带领工人宣传队进驻清华、现任清华大学党委书记迟群、副书记谢静宜两同志,他们的矛头实际上是对着毛主席的。根据毛主席指示,清华大学党委自十一月三日起召开常委扩大会议,就刘冰等同志的信展开了大辩论。会议逐步扩大,现在已经在全校师生中进行辩论。

二、毛主席指出:“清华大学刘冰等人来信告迟群和小谢。我看信

的动机不纯,想打倒迟群和小谢。他们信中的矛头是对着我(指毛主席)的。”中央认为,毛主席的指示非常重要。清华大学出现的问题绝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这是一股右倾翻案风。尽管党的九大、十大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作了总结,有些人总是对这次文化大革命不满意,总是要算文化大革命的帐,总是要翻案。根据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通过辩论,弄清思想,团结同志,是完全必要的。

三、清华大学的这场大辩论必然影响全国。毛主席指示,要向一些同志打个招呼,以免这些同志犯新的错误。中央希望大家认真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正确对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确对待群众,正确对待自己,同广大干部、广大群众团结在一起,以阶级斗争为纲,把各项工作做好。

随后,邓小平没有再说其他的话。

会后分组进行座谈讨论。

时任解放军总后勤部副部长的张震在会上见到邓小平,问候道:“身体好吗?”

邓小平说:“还好。”

张震:“你多保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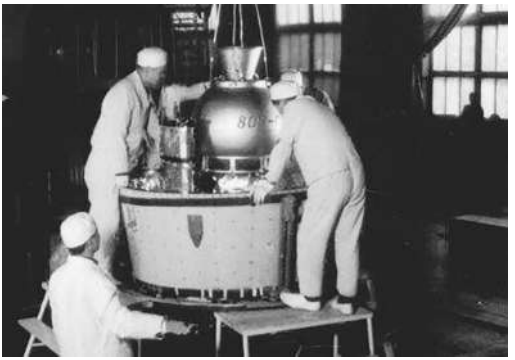
邓小平没有吭声。

11 月 26 日,中共中央下发[1975]23 号文件,转发了《打招呼的讲话要点》,同时,印了一份《通知》:

遵照毛主席的指示,中央最近在北京召开了一次打招呼的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主要是党、政、军机关一些负责的老同志,也有几位青年负责同志,共 130 余人。会上宣读了毛主席审阅批准的《打招呼的讲话要点》,会后分组进行座谈讨论。

毛主席、党中央决定,将《打招呼的讲话要点》转发给你们,希望你们在省、市、自治区党委常委,大军区党委常委,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党委常委或领导小组,党的核心小组成员,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党委常委中进行传达讨论,并将讨论的情况报告中央。

1975 年 8 月,返回式遥感卫星第二颗发射星完成了总装测试任务。



卫星组装。

10 月 16 日,产品专列到达东风场区。11 月 15 日,在技术阵地完成了总装测试后的卫星和火箭转到发射阵地。发射部队经过 10 昼夜的连续工作,完成了星箭对接和发射前的各项检查测试工作。11 月 24 日,试验领导小组负责人徐明、任新民、石荣屺、吴鹏联合签署了发射任务书,经批准,开始加注推进剂。

1975 年 11 月 26 日 16 时 29 分 23 秒,中国第一颗返回式卫星由“长征二号”运载火箭在甘肃酒泉基地发射升空。

1975 年 11 月 26 日,中国第一颗返回式卫星从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

但是,卫星在第一天仅运行数圈后就出现了气压波动。得知这一消息之后,钱学森和时任国防科委副主任兼科技部部长的马捷乘专机从北京飞赴西安。据亲历者回忆,钱学森竟然在隆冬的西安急的满头是汗,他必须向坐镇北京的张爱萍总指挥报告真实情况。好在祁思禹胸有成竹,判断卫星在姿态调整中启动制动火箭造成气压下降,卫星一定可以完成近50圈的预定在轨飞行任务。

不过,当卫星轨道上按计划运行了3天,完成了对预定地区的遥感任务,将要启动返回阶段时,还是出现了真正的险情:1975年11月29日,当地面测控中心将要发出控制卫星开伞的指令时,两台控制计算机竟然开始"打架",一个要发出指令,一个判断必须切断指令。此时卫星的速度接近每秒7千米,如果控制指令失效,卫星返回舱可能落入其他国家造成外交灾难。1959年4月13日,美国回收返回式卫星时由于弹射指令过早下达,机密胶卷落入挪威境内北部离苏联边境不远的地方,在国际上掀起轩然大波。

关键时刻,只见祁思禹一拳砸破机房和指挥室之间的玻璃,猛地撞进指挥大厅,三步并作两步冲到主控台前,嘴里不住大喊:"发指令!"原来是他见情况紧急,当机立断,来不及绕门冲进指挥大厅,干脆破窗而入。

主控台前的调度参谋立即对着麦克风喊出"指令发出"口令,顿时,整个西安卫星测控中心指挥大厅里鸦雀无声,大家都屏息凝神,盯住中心轨道显示屏上每秒更新一次的记录.....

突然,一个光点出现在显示屏中国地图的西南部。整个大厅的人员不约而同起立鼓掌,欢呼声如山呼海啸般响起!

卫星回收工作相当复杂,美国一般都在海上回收,中国当时还没有这个条件。经多方反复比较,决定在中国腹地四川省南部作为回收区。卫星从北往南飞,落在四川。但是如果卫星没有落下来,继续往南,很快就会飞出国外,很可能落到其他国家。为了防止出现这种情况,卫星里装了炸药包,一旦发现轨道不正常,往南跑得太多,就把它炸掉。

11时许,返回舱以20-30倍的音速,排山倒海般地呼啸着从宇宙

归来。渭南测控中心报告:“尖兵返回大气层,进入角……高度……速度……”它以每秒8公里的数度降落,巨大的摩擦力将周围的空气点燃,遍体通亮,经内蒙古、宁夏、陕西、甘肃,来到了四川。

由于返回式卫星裙部被高温损坏,再入段没有打开减速伞,650千克的返回舱没有落在四川预定区域。下一个后备的着陆点是在贵州。从这里飞过国境,也就几分钟的路程。

最紧张的时刻到来了。指挥室里,操作人员的手就按在炸药起爆按钮上。卫星飞过了预定地点,前面就是国境线!再等一等……

卫星着陆了,落在贵州西南部北盘江关岭铁索桥旁。经计算,轨道预报落点估计偏远了400余公里。

此时已是中午时分,贵州六枝盘公社一家煤矿上的4名矿工正坐在井口闲聊,突然看到一个圆乎乎的大家伙从天空飞落下来,“刷啦啦”一声,它将一棵大松树巨大的树冠一扫而光,接着蹦落在了地上。

发现天外来客的消息很快一级一级报了上去。下午18时,国防科委指挥所通告,贵州军区在六枝盘公社坡了大队发现一空降物,已派民兵保护现场。

这个消息令在北京国防科委坐镇指挥的张爱萍暗自惊诧:北盘江关岭铁索桥!40年前,他正是在这里率领红3军团先遣团抢渡白层渡口、阻击援敌并大获全胜的地方。几年前,他在关押中还在念叨,倘若有朝一日大难不死,重获自由,就到北盘江关岭边安个家吧……

当卫星回收测量部队赶到现场时,惊喜地发现返回舱没有摔坏,基本完好,裙部再入大气层时有烧损痕迹。“尖兵”取得了预定的遥测试验资料,返回舱携带着照相胶片等试验资料,所有胶片完好无损!只是返回舱的落点偏大了一点。

张爱萍当即挥毫写词一首:

“长征”万里遣“尖兵”,
巡行太空战鬼神。
力争朝夕越艰险,
获锦归来举世惊。

回收返回舱。

北京,叶剑英高兴地边看着返回式卫星拍摄的照片,边对大家说:“偏远了400多公里,没什么要紧嘛。我们第一次回收卫星,能落在中国大地上就是胜利!”

返回式卫星发射成功的新闻公报送到毛泽东那里时,他由于眼疾已经看不太清字了,就让秘书人员一字一句念,对一些字句作了修改,随即签发了公报。对卫星拍摄的照片他也吃力的、兴致勃勃地看了。

返回式遥感卫星发射、回收成功,是中国航天技术发展史上的一个新的突破。标志着中国航天技术跻身于世界先进行列。中国成为继美、苏之后第三个掌握卫星回收技术和航天遥感技术的国家。

就在卫星返回后的第二天,11月30日,军委要求张爱萍写检查。

卫星的成功返回,让许多人为张爱萍感到高兴。粟裕当时正在住院,他对前来看望的张爱萍妻子李又兰说:“卫星回来了,爱萍的压力会轻一些了。”遂在纸上写了几个字:“虎落平阳被犬欺!”

对张爱萍的检查,粟裕建议说:“可以听听宋时轮的意见,他点子多。”

宋时轮说:“你们就别操心了,就让我的秘书帮助写一个,文革的事经历多了,他已经练出来了。”

这份检查,陈锡联看了后特别高兴,说:“爱萍同志的检讨很深刻嘛,我看可以过关了。”

因为没有签字,又给退回来了,但就是这个名字,张爱萍死活不肯签。陈锡联很无奈,说:“你这个人怎么这么犟呢?检讨一下过了关不就算了嘛。”

12 月 1 日,《红旗》杂志刊登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的文章《教育革命的方向不容篡改》,提出:

坚持教育要革命的方向,就必须“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

坚持教育要革命的方向,就必须在三大革命运动中培养又红又专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

坚持教育要革命的方向,就必须正确看待教育质量,批判“智育第一”。

坚持教育要革命的方向,必须有工人阶级领导。

# 第1376回：见福特，张爱萍住进医院 康生逝，毛泽东坚持斗争

1975年12月1日，美国的总统专机“空军一号”降落在北京首都机场，刚刚步出机舱的福特的脸色是阴沉的。眼尖的基辛格已在总统夫妇身后兴奋地报告：“好哇，邓小平已在舷梯前迎候总统了。”福特的脸上这才露出了笑容，他知道，中方还是很重视他的来访。

邓小平在当晚以周恩来总理名义举行的欢迎宴会上说：“三年多以前，尼克松总统访华，中美双方发表了著名的上海公报。这是一个独特的国际文件，它明确阐述了中美两国不同的社会制度所决定的政策上的根本分歧，同时也指出了两国在当今世界上具有许多共同点，其中突出的一点是两国都不应谋求霸权，都反对任何其他国家或国家集团建立霸权的努力。公报为发展中美关系提供了基础，也指出了方向和目标。这一公报的发表，不仅符合两国人民的共同愿望，而且符合世界人民的利益，在国际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这些话是针对美方一系列违反《中美上海公报》的做法。福特这次来华，尽管不会给中美关系带来实质性的进展，却也不准备在会谈中提出原来准备的在北京设大使馆，在台湾设联络处的方案了。

在与邓小平的会谈时，福特告诉邓小平说：由于美国国内形势的需要，解决中美关系正常化问题须推迟至1976年大选后再照日本方式采取行动。在此之前，准备把驻台美军削减一半，即从2800人减少至1400人。他还一再强调说，美国不能在预期和平解决问题以外前途的情况下抛弃“老朋友”，“期待中国政府和平解决台湾问题”。

邓小平也明确地指出：所谓“日本方式”，也就是要接受（与台湾）断交、废约、撤军三个原则，美台间的民间贸易方式可继续保持；至于用什么方式解决台湾问题，属中国内政，应由中国自己来决定。邓小平还表示，在美国接受三原则之前，中国并不急于解决正常化问题。

福特总统一行抵达北京的次日，12月2日下午15时30分，中方

通知美方,毛泽东主席想见福特。于是,福特携妻子、女儿和其他随员,在下午16时离开宾馆,前往毛泽东的住处。

16时15分,邓小平副总理和其他中方官员在中南海游泳池的门口欢迎福特等人的到来,然后陪同他们进入室内。

毛泽东在中南海的书房里接见了福特总统与基辛格国务卿,邓小平、黄镇与美国驻北京联络处主任布什也参加了会见。

毛泽东和客人一一握手后,请大家入座。

毛泽东先问福特:“你好吗?”

福特点头并致意:“我很好,希望你也很好。”

毛泽东指指胸口又拍拍双腿:“我不好,我有病。博士好吗?”

基辛格笑着说:“很好。我很高兴来到您这里。”

毛泽东环视了一下在座的各位,问:“所有其他的美国朋友好吗?”

福特:“他们都很健康。”

福特:“主席先生,我们今天早上有一次很不错的讨论。”

像过去毛泽东亲自掌握着周恩来与尼克松、基辛格的会谈详情一样,毛泽东虽然已经疾病缠身,仍然很详尽地了解邓小平与福特会谈的具体内容。他好像是明知故问:“你们谈了些什么?”

没待邓小平开口,福特抢先说:“我们上午谈了国际形势。你的国家和我的国家有必要进行平行的努力,来取得对我们双方都有好处的结果。”

毛泽东眯缝着眼睛望着福特,以其特有的幽默略带讽刺地说:“我们没有这种本事,我们只能放放空炮。”

福特没有领悟出毛泽东是在含蓄地批评他放空炮,就说:“我不相信,主席先生。”

毛泽东继续用幽默表达自己的不满:“就是骂娘,这种本事我们倒是有一点。”

在座的中国人都忍不住笑起来。翻译成英语后,美国人才笑了。福特笑过后,领悟了其含意,这才露出了尴尬,说:“(骂娘)我们也会。”

毛泽东机敏地说:“你们也会?那就达成协议。”

福特说:“我们可以以很有力量的语言来反对某一个捣乱的

国家。”

毛泽东笑了:“不错,又达成协议。”

屋里的气氛很轻松了。毛泽东举起手来指着基辛格说:“总统阁下,你们国务卿干涉我的内政。”

福特与基辛格都紧张起来,望着毛泽东。

毛泽东却不紧不慢地说:“他不准我去见上帝。”

福特一时语塞,基辛格则不无得意地说:“我们坚持这一点。”

毛泽东又指着基辛格说:“上帝的命令他敢违抗啊!上帝请我,他不让去。”

基辛格佯作惊讶说:“要是你同上帝在一起,你们结合的力量就太大了!”

毛泽东已经十分习惯与基辛格进行幽默的对话,就很高兴地说:“博士阁下是无神论者,反对上帝,破坏我和上帝的关系,真是厉害啊!我拿他也没办法,只好听从他的命令。命令就是 ORDER。”

福特有点疑惑地问:“他是给上帝下命令吗?”

毛泽东反应敏锐地回答:“博士是向我下命令。”

毛泽东对中国驻美大使黄镇说:“黄镇同志,事情怎么样了?你还回美国吗?”

黄镇:“我听从主席的指示。”

毛泽东问福特:“总统先生,你们要他吗?”

福特:“我们当然要他回去。我们的关系好极了。大使先生回美国是很重要的,就像布什先生要是留在北京一样。”

毛泽东问布什:“你留在北京吗?”

布什说:“只有几天了。”

毛泽东:“你升职了。”

福特:“对,他升职了。我们将在一个月里,提名继任者。”

此时福特准备提名布什任美国中情局局长。

毛泽东:“我们不想让他走。”

福特:“他是一个出色的人,所以我要他回美国。但我们会找一个同样好的人来接替他。”

毛泽东:“那样挺好。我觉得,黄镇同志返回美国更有利。”

黄镇:“我将坚决执行主席的指示。我确实想回国,因为我驻外太久了。但是我将按照主席说的做。”

毛泽东:“你应该再在那里待一到二年。”

黄镇:“好的,我肯定会回去,坚决执行主席的指示。”

毛泽东对福特说:“有一些年轻人批评他。”

他说的是黄镇,接着他又指着在场的两个翻译对福特说:“这两个年轻人对乔老爷(乔冠华)也有一些批评。不能忽视这些人啊,否则你会在他们身上吃苦头的。这是一场内战。现在外面有很多大字报出来。你不妨去清华和北大看看。”

此后两位领导人的谈话围绕反对苏联霸权展开,涉及了日本、当时发生政变的葡萄牙、西班牙、意大利、比利时、希腊、土耳其、南斯拉夫、孟加拉、印度、罗马尼亚、安哥拉、扎伊尔、莫桑比克、南非。

在“就广泛的问题谈话”之后,毛泽东说了句:“那就这样吧。”

这时中方的摄影师进来拍照,福特知道会见该结束了。

美方人员站起来,同毛泽东握手道别。摄影师在一旁拍照。

毛泽东表示,他将“护送总统到外屋。”

在护士的搀扶下,毛泽东和福特一起走到外屋。在那里,美方人员又一次同他道别。

福特说:“感谢主席先生。”并且说他认为这样的谈话对双方都是有利的。

基辛格旧话重提,对毛泽东说他很高兴毛泽东听从了他的命令,“不去升天”。

这时福特鬼使神差再出昏话,说他“希望修正一下国务卿的说法,主席先生一定能够去天堂。”话一出口才觉得失言,连忙与基辛格一起忙不迭补充说:“希望这一天不会来得很快。”

还是毛泽东为客人解了围,坚称“自己上不了路,因为基辛格已经下了命令。”

基辛格则再次重申他的命令不变。

毛泽东主席与福特总统的会见就是在这样的幽默的气氛中结束了。

会见结束后,参加这次会见的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李一氓

没有回家,而是匆匆赶倒张爱萍家,对张爱萍的妻子李又兰说:“会见结束告辞时,小平同志专门提到了爱萍,他对主席说:‘张爱萍去七机部搞整顿,是我派去的。’主席接着就说:‘是你派去的,也是我派去的嘛!……对爱萍还是要帮嘛。’从主席的态度看,估计问题不致太严重。你赶快和爱萍说说,让他宽宽心。”

此时张爱萍正在301医院住院。他在一次参加批判会回来后,突患心肌梗塞,幸得301医院抢救及时,才得以脱离危险。

301医院的303(办)立即上报军委。叶剑英下达三条指示:1、对张爱萍的病要积极治疗、精心护理;2、不允许任何人干扰治疗,医院要负起责任来;3、没有我的批准,不能让张爱萍离开医院。他给张爱萍打电话说:“你的那些讲话,我都看了,没有什么错误。你沉住气,他们不敢怎么样。”

聂荣臻来看张爱萍,送来几只老母鸡,说是给张爱萍炖汤喝。他对张爱萍说:“不是要揪后台吗?让他们来找我好了,我就是你的后台!”

张爱萍住院期间,“帮促会”依然进行。但每次刚开始,医护人员就以输氧、输液、化验、检查或以“特殊治疗”为由,进行捣乱。弄得“帮促人员”情绪全无。他的病室门上,也总是挂着“不是探视时间不得入内”的牌子。

张爱萍住院期间,230厂、211厂的许多工人都来到301医院的大厅打听:“张老身体怎么样了?能不能去看他?”

凤州的工人对前来了解张爱萍问题的调查组说:“是张爱萍好还是你们好?我们不知道。但我们知道,他来了,我们还能分半斤猪肉,你们来了,我们连这点肉也没了。”

一天,陈锡联和李先念前去医院探望周恩来,周恩来握着陈锡联的手,很是酸楚地说:“温玉成同志不是我要关他的,……”周恩来指示,找一找温玉成在哪里,情况怎么样。

1975年12月,成都军区根据周总理办公室通知,将关押了6年的温玉成释放出来。

12月9日,《人民日报》刊登梁效的文章《反修防修的伟大革命》,提出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的问题。

12月10日,中共中央下发《关于扩大中发[1975]23号文件传达范围的通知》,邓小平的问题扩大到地、县级。其实,经过了9年的文化大革命的中国老百姓,早已感到邓小平又出事了。

12月10日这天,毛泽东对毛远新说:“江青当了政治局委员,什么也不懂,还板着面孔训人,架子那么大,要人家当奴隶。”

12月12日,文化部创作办公室向出版机关发出了一个《样板戏剧组文章若干提法修改方案》。其中第一段“关于文艺方针的提法”说:“69年以来,所有样板戏剧组文章,大都是提贯彻执行毛主席的‘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推陈出新’的方针,改为‘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方针的完整提法。”

12月13日,中共中央关于转发《中共中央关于陆定一问题的决议》的通知:

1975.12.13;中发[1975]25号

毛主席已圈阅。

中共中央通知

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各大军区、省军区、野战军党委,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委党委、领导小组或党的核心小组,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党委:

现将《中共中央关于陆定一问题的决议》和中央专案审查小组第一办公室《关于陆定一问题的审查报告》发给你们,可口头传达到党员和群众。

中共中央

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十三日

(此件发至县、团级)

1975年12月11日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陆定一问题的决议》是:

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并批准中央专案审查小组第一办公室《关于陆定一问题的审查报告》。鉴于陆定一是一个长期混入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反党分子,且有重大内奸嫌疑,按照党章的规定,将其永远清除出党。

中央专案组《关于陆定一问题的审查报告》建议:陆定一在审查期间态度恶劣,拒不认罪。遵照毛主席“给出路”的政策,建议释放,清除

出党,保留公民权,安置到外地,养起来,每月发给二百元生活费。陆定一的严重历史问题及政治问题对其子女不应牵涉。

12 月 14 日,中共中央关于转发《清华大学关于教育革命大辩论的情况报告》的通知:

1975.12.14;中发[1975]26 号

毛主席已圈阅。

中共中央通知

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各大军区、省军区、野战军党委,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委党委、领导小组或党的核心小组,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党委:

现将《清华大学关于教育革命大辩论的情况报告》发给你们。中央认为,这个报告很好,提供了在党委领导下开展教育革命大辩论的经验,可供你们参考。这个报告可以发到县、团级,大、中、小学可以发到党支部。

12 月 16 日,康生逝世。

12 月 18 日,毛远新给毛泽东的信:

主席:

上次请示是否可以把主席近一时期有关指示整理一下,开会时印发大家学习,主席同意可以试试。

我试着综合了一下。为便于大家学习理解,没有按时间顺序,而是根据内容整理的。

主要三个方面:

1、阶级斗争为纲

2、文化大革命(包括教育革命)

3、当前运动的方针,政策

这样编排是否妥当,送上草稿,请主席批评指示。

毛泽东当天批示:“可以。”

12 月 20 日晨 5 时,重病中的周恩来不停地重复着罗青长的名字,声音很低。高振普核准后,出去要通了罗青长的专线电话。

通知完罗青长,高振普回到病房,准备向周恩来报告。但是当他走近周恩来病床时,看见他已经睡着了。高振普站在床边,一直等到

周恩来醒来。

周恩来睁开眼看见高振普,便问他:“通知到罗青长了吗?”这次吐字特别清楚。

高振普汇报说:“已告诉他本人。”

周恩来说:“他一到就让他马上进来。”

罗青长这边接到高振普的电话后,到西花厅换乘了周恩来司机老杨开的吉斯车来到305医院。可是,当他赶到医院时,周恩来又陷于昏迷状态。他在外面等着,一直等到中午,周恩来才醒来。

高振普陪罗青长走进周恩来病房。罗青长疾步走近周恩来病床,看到正在输液的周恩来面色很憔悴。他握着周恩来的手,叫了声“总理”,就哽咽了。

周恩来说:“青长,我平时不病,没想到这时病成这个样子,我还能看到你。”

罗青长说:“我知道,老干部都很关心总理的健康,希望总理早日康复。”

周恩来示意罗青长坐在床边的一把椅子上,对他说:“我找你来谈台湾问题。”

罗青长汇报了台湾的有关情况,周恩来询问了台湾的近况和在台湾的老朋友。他说话声音很弱,罗青长由于难过和激动,又有些紧张,说:“听不清总理讲什么。”于是高振普把耳朵贴近周恩来嘴边听清后,再将周恩来的原话转述给罗青长。但有的事高振普听不懂,便问罗青长:

“你知道怎么回事吗?”

罗青长说:“懂,你就照传吧。”

谈话进行近20分钟,周恩来说:“我平常给你们讲的台湾那些老朋友,他们这些人,过去对人民做了有益的事情,你们将来千万不要忘记他们,一切对人民做过有益事情的人,你们都要不要忘记他们。”

讲到这里,周恩来实在疼痛难忍,只好说:“青长,休息10分钟吧,休息10分钟后,我们再谈。”

说着,周恩来用颤抖的手吃力地从病床旁拿起一本新华社编印的《内部参考》。罗青长接过来一看,只见上边转载的香港《七十年代》

月刊9月号刊载的《访蒋经国旧部蔡省三》一文旁边，有一段歪歪斜斜的批语，是周恩来的笔迹：

请罗青长、家栋对蔡省三的4篇评论的真实情况进行分析，最好找王昆仑、于右任的女婿屈武等人，弄清真相，以便＊＊（两字模糊）。

周恩来 九月四日

托，托，托，托。

香港《七十年代》月刊的这篇文章，是介绍蔡省三对蒋介石去世后台湾局势，的分析，其中介绍了将成为蒋介石接班人的蒋经国的经历等其他情况。周恩来批示中提到的“家栋”是指钱嘉栋，时任周恩来的秘书。

罗青长说：“请总理放心，台湾方面的工作会继续做，按照总理的交待多做工作，简报的事会更加细心，不会犯同样的错误。”

周恩来点点头说：“我要休息一会儿了。”

罗青长恋恋不舍地走出病房。

当晚，邓小平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他在会上做检讨，表示“感谢毛主席的教育和同志们的帮助，并介绍自己几个月来的思想情况。会后，他致信毛泽东，将检讨发言稿送毛泽东审阅。

# 第1377回：七五年，国民经济大发展 噩耗至，周恩来总理逝世

12月27日，江青给毛泽东写信说："盼望在主席认为方便的时候，让我去看看你。"

毛泽东当天批示："我近日有些不适，以不见为好。大局是好的。"

与毛泽东会见美国总统相隔不到一个月，1975年12月31日晚23时50分，毛泽东在书房里又会见了两位美国客人——美国前总统尼克松的女儿朱莉·尼克松·艾森豪威尔和女婿戴维·艾森豪威尔。

朱莉说："我带来了我父亲对你的问候，还带来了他特意写的一封信。"

在翻译读完尼克松的信后，毛泽东接过信，用英语念了信末的日期和签名，说："很好，谢谢他。我还要见他，President Nixon（尼克松总统），欢迎他。"

谈到中国的情况时，毛泽东说："中国有些成绩，总的来说是落后的。过了10年，你们再来看。"

当戴维说，感到最新的是中国的精神发展时，毛泽东说："Struggle（斗争）！我们这里有阶级斗争，ClassStruggle（阶级斗争）！在人民内部也有斗争。共产党内部也有斗争。不斗争就不能进步，不和平。八亿人口，不斗行吗？不可怕，我们不杀人。国民党过去的党、政、军、特人员，战争中俘虏的，现在都把他们赦免了，给他们公民权。"

戴维说："从你们的革命的角度来看，没有一个灵魂是不能拯救的。"

毛泽东说："帮助人家改正错误。比如批评10个人的错误，8个人批对了，有两个人没有错误，搞错了，批评他们了，以后取消，说他们没有错误，恢复名誉。"

朱莉指着王海容说："她告诉我说你有两首新词元旦将要发

表了。”

毛泽东说:“老的,有一首是批评赫鲁晓夫的。”

谈话至1976年元旦0时45分结束。朱莉、戴维注意到,他们面前的毛泽东尽管已被疾病折磨得筋疲力尽,“斗争”的话题却使他又“像青年人那样兴奋起来”,“他的头脑甚至比中国的年轻一辈更充满活力,更渴望斗争”。眼前的事实使这对年轻的夫妇不由得感叹:“不论历史如何下结论,毛的一生肯定将成为人类意志力量的突出证明。”

1975年是第四个五年计划结束的一年。由于各方面进行了整顿,1975年经济工作一个月比一个月好。虽然8月河南、安徽等省部分地区遭遇特大洪水,但1975年国民经济计划执行情况较好。对照调整后的“四五”计划纲要(修正草案)检查,工农业总产值达到4467亿元,完成计划的101.7%,超过了年度计划高限,比上年增长11.9%。农业总产值、工业总产值和大多数产品产量指标已经完成。农业战胜了严重自然灾害,取得丰收。农业总产值完成104.5%,比上一年增长4.6%,比1970年增长19.1%,平均每年增长3.6%。粮食产量达到5690亿斤,比上年增长3.3%,创历史最高水平。工业总产值完成100.6%,比1974年增长15.1%,同1970年比较,五年增长53.9%,平均每年增长9%。社会商品零售额1271亿元,增长92%。进出口贸易额147.5亿美元,超过以往任何一年。财政收入815.6亿元,完成98%。这一年尽管存在着基本建设战线过长,积累率过高,财政收支出现赤字(5.3亿元),职工人数增加过快等问题,但总的看来,1975年是这几年经济发展最好的一年。邓小平因为主持1975年整顿,赢得了大家的信赖。

12月底,周恩来进入了断断续续的昏迷状态,大家都做了最坏的思想准备,进入病危后,有一次他的呼吸突然停止,连心跳也骤然停止搏动。医务人员以为周恩来走到了生命的尽头。他们一边奋力抢救,一边通知中央领导人来医院准备作最后告别。

没想到周恩来是被一口痰堵住了,把痰吸出后,他又恢复了知觉,慢慢睁开了眼睛。一见身边围着的中央领导,周恩来脸上露出了笑意。他颤抖着伸出手,和大家一一握手。

张春桥是最后一个和周恩来握手的,他刚转身,周恩来就叫着他的名字。因为身体太虚弱,说话的声音太小,张春桥没有听见,站在那里没有反应。周恩来有点着急,又连叫了两声,这次身边的人听见了,告诉张春桥:“总理叫你。”

张春桥疾步来到周恩来跟前,俯身听他说道:“你和文元同志要好好帮助王洪文同志,他还年轻。”

张春桥一边重复着周恩来的话,一边表态:“总理,你放心!”

在场的人无不为之动情。

1976 年元旦,毛泽东的《重上井冈山》和《鸟儿问答》两首词发表:

《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

久有凌云志,重上井冈山。
千里来寻故地,旧貌变新颜。
到处莺歌燕舞,更有潺潺流水,高路入云端。
过了黄洋界,险处不须看。

风雷动,旌旗奋,是人寰。
三十八年过去,弹指一挥间。
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谈笑凯歌还。
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

《念奴娇.鸟儿问答》
鲲鹏展翅,九万里,翻动扶摇羊角。
背负青天朝下看,都是人间城郭。
炮火连天,弹痕遍地,吓倒蓬间雀。
怎么得了,哎呀我要飞跃。

借问君去何方,雀儿答道:有仙山琼阁。
不见前年秋月朗,订了三家条约。
还有吃的,土豆烧熟了,再加牛肉。
不须放屁,试看天地翻覆。

已处于病危之中的周恩来从昏迷中醒来,恰好从广播里听到,便让秘书去买来报纸,并让他们读。当读到“不须放屁,试看天地翻覆”时,周恩来的嘴角绽出几丝笑纹,甚至可以听到隐隐的笑声。可是,剧痛很快又使他双唇紧抿。秘书收起诗词,他虽然疼得额上沁满汗珠,仍然坚持示意让秘书把诗词放在他的枕边。

有一天,他醒过来,用微弱的勉强能听到的声音讷讷地问医生:

“主席,主席身体怎么样?”

“没有大的变化。”医生小声报告。

“只要主席健在,我就放心了。”周恩来说完后,又昏迷过去了。

元旦这天,全国各大报刊都在头版刊载了毛泽东10年前写的两首词:《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和《念奴娇·鸟儿问答》。标题下方,印着笔迹颤抖的“毛泽东”签名。

同时发表的经过毛泽东圈阅的“两报一刊”元旦社论《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写道:发表这两首词“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和现实意义”;“怎样看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当前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集中反映”。社论还公布了毛泽东不久前批评“三项指示为纲”时所讲的一段话:“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

1月5日凌晨,周恩来又作了第13次手术,也是他最后一次手术,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前来看望、守候。

下午至夜间,在京大部分政治局委员接到周恩来病危通知,分批前来探望。

考虑到周恩来当时的病情,康生逝世的消息没有告诉他。周恩来在病危时跟医生吴阶平说:“我这里不用了,你到康老那儿去吧!”

叶剑英白天黑夜地与吴医生保持联系,一再指示:“要想办法,能延长一天就延长一天,哪怕是多延长一小时一分钟,只要可能,就要尽到医疗方面的一切努力和责任!”

自周恩来病重后,特别是1975年下半年卧床后,叶剑英基本上是天天来。特别是在处理重大问题的前后,必来。开始,他常常与周恩来一谈就是3个小时。后来,减到了两小时。一月又一月,一天又一

天,周恩来声音越来越微弱,叶剑英越坐越贴近周恩来,谈话的时间也越来越短,连一个小时也无法坚持了。

终于,周恩来难以再说出声了。这时,叶剑英仍然坚持天天来,来了就紧贴周恩来坐下,轻轻握住周恩来的手,他们你望着我,我望着你,嘴唇一样地颤抖,一样地说不出话,就那么望啊望,望啊望……那种情景,那份情谊,任你是铁打的心肠见了也忍受不住,不能不躲出门外失声痛哭!

他们最后一次谈话时,叶剑英叫工作人员和医护人员都退出,无论是送水送药,不按铃不许进。叶剑英从病房出来后,把工作人员召唤到身边,声音很轻,严肃地吩咐说:“你们俩都准备好纸和笔,24 小时在总理身边,一刻也不能没有人。总理原则性很强,很多事,很多委屈闷在心里不讲,特别是对于中央的某些人,在最后时刻有什么内容要发泄,你们一定要记下来……”

然而周恩来始终没有说什么,直到停止呼吸。

在他逝世后,工作人员将雪白的纸交给叶剑英。叶剑英望着那洁净的白纸,眼里陡地涌起泪花,讷讷一声:“他一生顾全大局……”

1 月 8 日凌晨,弥留之际的周恩来要求见最后一个人,那就是调查部长罗青长,要了解对台工作。对罗部长,周恩来还没把心中的话说完,便再度陷入深度昏迷。

周恩来的卫士高振普守在周恩来的病床前,抚摸着他干瘦的左臂。这是周恩来住院后期,高振普养成的习惯。他的手臂发热,高振普就比较放心。此时周恩来转过脸来,看看高振普,高振普习惯地对周恩来点点头。周恩来没说话,他这几天说话已经很困难。卫士乔金旺走进病房,示意高振普休息一会儿。高振普轻步往外走。忽然电铃响了,这不是平时的电铃,而是为遇紧急情况专设的电铃。不好!大家快步跑向病房,几乎同时看到监护器上的心跳显示:心跳 70 多次。陈在嘉大夫说,一直是 100 多次,忽然掉到 70 多次,她急得说不出话来,周恩来心跳在继续下跌,60 次、50 次、30 次……

医生们按照原定的抢救方案,采用了所有措施,呼唤、人工呼吸……都不起作用。荧光屏上,时而显示一次心跳,渐渐地看不到心跳

了,只见一条直线。但是,抢救工作仍在继续进行,即使在心电图上已呈现出一条直线以后,又持续抢救了十多分钟。

吴阶平看了一下手表,他同旁边几位专家交换了意见之后,向大家宣告:“抢救工作可以停止了,把那些东西:全身上下的氧气管、输液管、引流管和心电图监护仪的电极板等都撤掉,用新床单将总理全身都覆盖起来。”

这就是1976年1月8日上午,时针指在9时57分!一代伟人的心脏停止了跳动,周恩来告别了人间。

还没有等吴阶平说完话,大家长久地压抑在心头的悲痛一下子爆发了出来,整个病房哭喊声一片……总理,人民的好总理,为人民的解放事业奋斗了60多个春秋的伟人,带着全国人民的敬仰,离去了。

专家、医生、护士与周恩来身边工作人员抽泣着,依依不舍地离开病床,大家都站到房间边上去,为党中央领导人到医院来向周恩来遗体告别腾出空间。

第一个来到病房的是邓颖超。她还在走廊里,大家就已听到了她的悲泣声,有人嚷道:“邓大姐来了。”

大家的目光都集中到房门口,只见邓颖超由工作人员搀扶着颤颤巍巍地走进病室来。她身上穿着大衣,帽子拿在手里,她顾不及梳理散挂在眼睛边那灰白色的头发,唏嘘不停,满面泪痕,边走边用手绢擦眼泪。

邓颖超走进病房看到眼前的一切全都变了样:这一年零七个月来她所熟悉的挡在周恩来床头的屏风、病床两侧的床头柜等物都被撤走了;心电图监测仪、输液架与输液瓶不见了,其他抢救用的医疗仪器都被放到了墙角边;她的亲人恩来无声无息地躺在床上,他,被白床单覆盖了全身;原先都围在恩来病床旁的专家、医护人员,此时,都站在离开病床的地方,房间里一片抽泣声,大家用尊敬、关心和同情的目光看着邓颖超。一位护士走过去揭起白床单,周恩来穿着蓝白相间病号衣服的上半身露了出来,稀疏的头发整齐地向后梳理着,脸上擦得干干净净,神态安详地闭着眼睛“睡着”了。邓颖超意识到,从此再也见不到同她生死与共的恩来了,他们就这样永别了。

这时,邓颖超再也无法克制自己长久以来压抑在心底的悲痛与无奈,她蹒跚地扑向周恩来床头,用哆嗦着的双手抚摸周恩来已经冰凉的面颊,顿时号啕起来,泪水扑簌簌地滚落下来,她嘶哑着嗓子哭喊着:“恩来呀!恩来呀!你走了,我来晚了啊……”

屋子里的人们悲声大恸,再次达到高潮。邓大姐弯下身子,低头吻着周恩来的额头,不停地抽泣着。几位护士主动搀扶并劝老大姐离开病室到隔壁房间休息。

中央领导人接到周恩来去世的消息后都急匆匆地赶来了。第一个走进病房的是江青,她走到离周恩来床头大约一米远处,就站住了,大声喊着:“小超,小超……”

邓颖超被人搀扶着走了出来,江青拥抱着她,向她表示安慰。

李先念走进病房,他弯下身子,双手紧握着周恩来的手,只叫了一声“总理……”便再也说不出话了,泪水一下涌了出来。他悲痛得双手发抖,站都站不稳了,工作人员赶快把他扶到沙发上。他坐在那里,双眼盯着周恩来的遗容,无言地抽泣着。

11 时 05 分,由邓小平带领,叶剑英、李先念、华国锋、陈锡联、纪登奎、吴德、汪东兴、陈永贵、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等走进周恩来病房,围在他的遗体前肃立。小平同志说:“恩来同志,安息吧!”然后向周恩来三鞠躬,目视着他的遗体,缓缓地退出了病房。

周恩来的遗体,经过精心整理,于当日 12 时许转送到北京医院。

当天,邓颖超向党中央提出了周恩来生前的请求:“骨灰不要保留,要撒掉。”

张耀祠赶到毛泽东卧室外的大厅,把周恩来逝世的消息告诉值班护士小于。小于哭着在通报纸条上记下这件大事。她把这张纸放在了毛泽东大厅里的条桌上。

护士孟锦云此时正在毛泽东卧室里值班。毛泽东躺在床上看一本《鲁迅选集》。小孟听到外面大厅里有人走动的声音,知道这是有人送东西来。她悄悄地走出去,看到纸条,泪水不由自主地滚到了脸颊。她把纸叠起来,放进了自己的口袋,擦了擦泪水,回到了毛泽东的卧室。毛泽东依旧在那里看书。他根本没有留意到小孟去大厅里的事,

小孟也便装作什么事也没有发生,只是又坐在了主席床边的沙发椅上,也顺手拿起了一本书,心不在焉地翻看着。她担心,周恩来去世的消息会给毛泽东沉重的打击。

中午吃过饭后,主席休息了两个小时,下午3点多钟,政治局派人送来了周恩来逝世的讣告清样。小孟收下来,看毛泽东睡醒觉,精神还算可以,她决定找机会把周恩来逝世的消息告诉毛泽东。

按照惯例,这时小孟要给毛泽东读报,读文件。她先读了些别的内容,而后稍稍停顿了一会儿,拿起那张讣告清样,她一向很高的嗓门,很快的速度,变得低沉、缓慢:“中国人民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周恩来同志,因患癌症,医治无效,于1976年……”

没等小孟念完,毛泽东已紧锁眉头,闭上眼睛,泪水流到嘴角,又流进脖颈……小孟自己已经哭出声来,泣不成句地坚持读完了讣告。

毛泽东始终没说一句话,只是任泪水下流……

此时的小孟,不知该说什么,也不知该做什么。无声的悲哀弥漫在毛泽东的卧室里,卧室里此时显得格外沉寂,仿佛这里的空气都凝固了。

早在1975年11月中旬,汪东兴和纪登奎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曾召开小范围会议指示:

“最近一段时间,中央领导同志多次听取了总理医疗组的汇报。经过几次大的手术,目前总理的身体非常虚弱,已不能下床,生命处于垂危之中。根据总理目前病情的发展趋势,中央领导同志商定,先在很小的知密范围内,指定少数同志对总理的后事预做准备。要准备的有:

(1)起草讣告和悼词,这是必须提前准备好的,一旦出现不幸事件,现写就要误事。

(2)拟定治丧委员会名单和遗体告别、吊唁活动、追悼大会等初步方案。讣告和悼词由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局长周启才执笔拟出初稿,治丧委员会名单和遗体告别等事项,由中组部部长郭玉峰和副部长郑屏年拟出初步方案。完成时间暂定十天。”

这次会议十分保密。根据会议决定,周启才完成了讣告和悼词起草工作后,报告了汪东兴。汪东兴指示:“两件文稿由你亲自封存和保管,什么时候用,等通知。”周启才把两件文稿密封在一个文件袋里,锁在了他专用的保险柜中。

1976 年 1 月 8 日上午 10 时许,汪东兴电话通知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局长周启才,要他携带周恩来的讣告和悼词初稿,到中南海西楼大厅同李鑫一起进行修改,并说此事他已告诉了李鑫。

李鑫是康生生前的秘书。不到 10 分钟,周启才和李鑫相继来到西楼大厅。周启才把讣告和悼词的起草情况向李鑫简要说了一下,并将两件文稿交给他看,告诉他,悼词中周恩来的革命简历可能写得不够全,已和中组部领导商量好,他们负责提供这方面完整、系统、全面的材料,今天派专人送来。

# 第1378回：举国悲，周恩来遗体告别北京城，十里长街送总理

1976年1月8日下午15时，中央政治局会议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召开，会议由邓小平主持。治丧办公室有关成员和李鑫、周启才列席了会议。周启才将讣告印件分发给到会成员。邓小平让周启才在会上读一下。周启才用较慢的速度，较高的声调，不到一刻钟读完了全文。经过讨论，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了这个文件。这时邓小平问汪东兴：

“悼词准备好了吗？”

汪东兴说：“在总理生前准备了一个初稿，正在修改，还没改好，今天会议讨论不成了。”

邓小平说：“那就等修改好了另找时间开会讨论。”

在讨论周恩来丧事过程中，治丧办公室提出请外地的李德生、许世友、韦国清和赛福鼎4位政治局委员来京参加周恩来的遗体告别和追悼大会的建议时，江青、张春桥反对。

当晚，谢静宜打电话给共青团北京市委，询问原定次日召开的北京应届高中毕业生上山下乡誓师大会的准备情况，她原准备大会照常召开，但在大家的强烈要求下，同意改期。

这一天，康克清把周恩来去世的消息向朱德隐瞒了一整天。1月8日下午，朱德还去接见外宾，接受国书。回来后，康克清先慢慢地对他说：

“总理病情最近恶化了。”

朱德听了后，沉默了一会儿，竟不肯相信。他认为有那么多的好大夫给周恩来治病，病情不会发展得那么快，但他的心情还是显得十分沉重。

到了晚上20时，朱德才得知周恩来已经逝世的消息。他先是一怔，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看到家人个个泪流满面的样子，他才肯定这是真的了。他坐在那里沉默不语，眼泪从他那饱经风霜的脸上流了

下来,滴落在衣襟上。在那么漫长的革命生涯中,女儿朱敏还是第一次看见她的父亲流泪。

当朱德听到周恩来在临终遗言中说要把骨灰撒在祖国的大地和江河里时,他喃喃说道:“过去人们死后要用棺木埋在地里,后来进步了,死后火化,这是一次革命。无产阶级的伟大导师恩格斯去世后,骨灰是撒在大海里的,而总理要把骨灰撒在祖国的大地上和江河里,这也是一次革命。总理为党、为国家、为人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是一个真正彻底的革命家。”他一边说,一边流泪,还问家人:“你们知道总理的革命历史吗?”

当天,邓小平给毛泽东写信报告说:“中央政治局专门讨论了周恩来同志的丧事问题,议定了三个内容,一是向毛主席的请示报告;二是关于周恩来逝世的讣告;三是周恩来治丧委员会名单。”邓小平请示:第二、三项“均须于今晚广播,现送请审批,退汪东兴办理”。

毛泽东在9日批示:“同意。”

9日,邓小平再次因周恩来丧事写信请示毛泽东:“总理逝世消息发表后,不少国家要求派代表团或代表来参加葬礼。”其中有阿尔巴尼亚的阿利雅,明晨动身;日本自由民主党总裁、日本内阁总理大臣三木武夫,明晨动身;斯里兰卡共和国总理班达拉奈克夫人,今晚动身。邓小平写道:“政治局对此作了专门讨论,决定仍按主席的批准方案(一律不请)执行。由政治局发一个正式公告,现送上请批示,以便发表。退汪东兴办。”

邓小平提出,由他自己约见阿尔巴尼亚驻中国大使,乔冠华约见日本驻中国大使,韩念龙约见斯里兰卡驻中国大使,予以说明。毛泽东批准了这一方案。

周恩来讣告和治丧委员会名单,报经毛泽东批准后,1月9日在全国各大报纸头版整版登出,当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开始反复向国内外进行广播,沉痛宣告了周恩来总理逝世的消息。

1月9日,中央电视台第一次通过国际通讯卫星,向世界传送自己的节目----《向周总理遗体告别》。这一天,中国人开始争购周恩来遗像,北京王府井新华书店灯火通明,门前的长队一直排到了东单。但北京的周恩来标准像只有200张库存。

“是不是打长途,在上海印刷59万张像?”王府井书店党委书记兼经理姚明,与调研科长孙忠铨悄悄商议说。于是,上海印刷二厂接到电话,立即加班印制周恩来像。

周恩来治丧委员会的人特地来看望朱德。考虑他年事已高,身体又不好,劝他不要外出活动,注意节哀,并建议他只参加一次周恩来的吊唁仪式。可他说什么也要参加全部吊唁活动。1月10日,朱德在女儿的陪同下,来到北京医院吊唁厅,向周恩来诀别。在车上他就要脱帽。天气太冷,大家劝阻了。当他吃力地走进灵堂时,就开始流泪,他缓缓地走近周恩来的遗体,专注地望着共事50多年的老战友,似乎有话要对他说,可这已经是不可能。他努力站得笔直,异常庄重地,颤巍巍举起右手,敬了最后一个军礼。千言万语都化在这崇高的敬礼之中。

1976年1月9日上午,中央政治局委员向周恩来总理遗体告别

1月10日,聂荣臻到北京医院向周恩来遗体告别后,又到邓小平的住处探望。

1月10日、11日两天,党和国家领导人,党、政、军各部门负责人,爱国民主人士的代表,以及首都群众代表一万多人,怀着敬爱和极其沉痛的心情,前往北京医院向周恩来的遗体告别。

1976年1月11日下午,根据周恩来生前的遗愿,他的遗体将送八

宝山革命烈士公墓火化。这对全国人民来说,不啻又是一声晴天霹雳。连日来,电报像雪片一样飞往治丧办公室,人民群众强烈要求保留住周恩来的遗体,以便今后瞻仰。治丧办公室里将他们的请求转告了邓颖超,邓颖超说,“感谢大家的好意,但烧骨灰、撒骨灰是恩来生前和我约定的,这也是一场革命,希望你们理解、支持。”她嘱咐罗青长和统战部副部长李金德主管好火化事宜。

下午15时许,周恩来的灵车缓缓地离开北京医院,驶向长安街。北京市万人空巷,十里长安街早已是人山人海,人们扶老携幼,冒着凛冽的寒风,自发地伫立在道路的两旁,秩序井然,像往日迎候着总理的来,今日又迎送着总理的去。灵车所过,哭声四起,撕心裂肺,人们翘首仰望,希望再看一眼自己的好总理,希望自己的好总理再看一眼他心悬不下的人民。

下午16时45分,周恩来的遗体由王洪文、汪东兴、邓颖超,以及治丧委员会工作人员和周恩来生前友好,隆重地护送到八宝山火化。周恩来的遗体静卧在鲜红的党旗下,党和国家领导人向他致以最后的敬意,邓大姐向她的亲人、战友作最后的告别,人们再也控制不住感情的闸门,任其宣泄,一下子扑向周恩来的棺椁,嚎啕大哭,希望唤醒总理,希望留住总理。最后的告别终于不可避免了,在人们的哭唤声中,身穿崭新制服的殡仪工人恋恋不舍地将周恩来的遗体送入粉刷一新的火葬炉,熊熊的烈火燃起,周恩来在烈火中得到了永生。

1976年1月12日至14日,周恩来的骨灰安放在劳动人民文化宫,供各界人士吊唁。

1月12日下午15时,由邓小平主持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继续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周恩来的悼词和追悼大会的有关事项。会议一开始,邓小平就说:

"总理悼词文稿,会前已经发给大家,为节省时间会上就不读了,请大家发表意见。"接着又说:"这篇悼词我仔细看过多遍,我认为写得是不错的。对总理一生的评价,对总理的革命简历,对以总理为榜样,号召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向总理学习的几段话,都符合总理的实际。我同意这篇悼词,认为可以用。大家有什么修改、补充意见,请讲。"

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纪登奎、吴德、陈锡联等都相继发言,表示同意悼词文稿。

当讨论悼词即将结束时,邓小平再次发言。他说:"大家讲得差不多了,对悼词文稿大多数同志表示赞成,会上没人提出具体修改或补充意见。我提一点具体补充意见,加一个字,印件中1922年总理担任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书记,应是总支部书记,加上个'总'字,符合实际。大家没有新的意见,悼词文稿就讨论到这里,政治局通过。个别文字修改后,报请毛主席审批。"并指示治丧办公室改后先送邓颖超过目,看邓颖超还有什么意见。

散会后,周启才和李鑫走到大会堂北门口,张春桥从后面赶上来对他们说:"悼词号召向总理学习的那部分,不必那样展开写,不必写得那样实,你们改一改,压缩一下,笼统地写几句虚的话就行了。"

周启才和李鑫听后一愣,没有马上回答。

张春桥又说:"你们听清我的话了吗?"

周启才和李鑫说:"听清了。"

事后,他们把此事报告给汪东兴。

会后,周启才和李鑫遵照会议指示,对悼词的个别文字进行了修改,并请邓颖超过目。这时,他们考虑应该在悼词中加上一句"坚决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考虑再三,他们把这个想法报告了汪东兴,得到了他的支持。他们驱车赶到邓小平家中,汇报了这一建议。邓小平看了一遍改好的悼词印件,提笔在"他衷心爱戴和崇敬伟大领袖毛主席"

这句话的后面,加上了“坚决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这句话。并在悼词首页写上“请主席审批”。签上了自己的名字和时间。

1 月 12 日,邓颖超对周恩来生前的两位警卫高振普和张树迎说:“恩来同志不保留骨灰的请求,毛主席、党中央已批准。你们俩跟随恩来同志工作多年,已向中央请示并得到批准,由你们 2 人执行撒骨灰的任务,这是你们俩为恩来同志办的最后一件事……”

邓大姐说到这里嗓子哽咽了,她强忍眼泪,克制住自己的感情,继续对他们说:“接到中央批准的消息,我高兴。高兴的是,恩来说过,他担心我替他办不成这件事,今天可以办成,就要成为现实了。咱们要共同为实现他这一愿望而继续工作。我很想亲自去撒,但是,目前条件还不允许我去做。再说,天气太冷,我岁数也大了,出动目标大。恩来同志是党的人,我委托你们二人去办,你们二人是党支部成员,我们靠基层支部。我相信,你们俩会很好地做好这一工作的。”

高振普向邓颖超提出,是否可以把周恩来的骨灰多保留几天,然后再撒。邓颖超摆了摆手说:

“我的请求,中央已批准,已有了安排,就不要再提了。我再向你们俩说一遍,你们要认清,撒骨灰也是一场革命。由土葬到火化是一场革命,保留骨灰到不保留骨灰又是一场革命。我死后骨灰也不保留,也请党支部负责。这是我和恩来同志的一次革命啊!我们一定要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

邓颖超让她的秘书赵炜和高振普、张树迎去看一看,哪个地方可以撒,最好撒在有水的地方。但当时天气寒冷,很多地方都结了冰,没有选中一个合适的地方。最后中央决定派飞机去撒,并规定了投撒的时间、地点。中央决定由中央组织部部长郭玉峰和台湾办公室主任罗青长代表中央治丧办公室,由张树迎、高振普代表周恩来生前党支部去执行这次特殊的使命。

晚 19 时 30 分左右,邓颖超带着周恩来生前的工作人员缓步走入大会堂西大厅,大家随邓颖超向周恩来的遗像默哀,然后由周恩来生前的卫士张树迎、高振普打开骨灰盒,邓颖超双手抚摸着骨灰,双眼含满了泪水,她喃喃自语,像是在向总理倾吐着心曲:

“恩来同志,你的愿望就要实现了,你安息吧!我们要永远跟随毛

主席战斗!”

在场的人无不动容,恸哭失声。

党中央决定由中央组织部部长郭玉峰和台湾办公室主任罗青长及张树迎、高振普等一行人穿过大会堂地下室,护送着总理的骨灰,离开了他生前熬过无数不眠之夜的地方,邓颖超的车紧随其后。大约晚20时许,他们到达坐落在北京东郊的通县机场,登上飞机。这是一架平时撒农药用的安—2型农用飞机。巨大的马达轰鸣声掩盖不住送行人的哭泣声,飞机缓缓升起,在深沉的夜幕下,透过朦胧的泪眼,仍然能看见邓颖超久久地、久久地挥动着双手,向他的亲人、战友做最后的告别……

周恩来骨灰撒放的地点,是邓颖超根据周恩来生前的遗愿,与中央有关领导反复商量后确定的,极具象征意义。第一个地点是长城,这是中华民族的象征,是我们民族的灵魂,周恩来曾提议将长城作为我国的国徽和国歌歌词的重要组成部分,以此激励民心、凝聚民心;第二个地点是北京密云水库,这是周恩来多次以普通劳动者的身份与劳动人民一起劳动的地方,在这里他与人民群众结下了深情厚谊,这里也倾注着他对首都建设的心血和对首都人民的关爱;第三个地点是天津海河,这是周恩来参加革命的发祥地,他在这里认定了自己终生不渝的奋斗目标,他也是在这里播下了爱的种子;第四个地点是黄河入海口,当时的垦利县,现在的滨州。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她为中华民族哺育了无数的仁人志士,最后又无私地融入浩瀚的大海。周恩来正是从这里走向世界,走向全人类。周恩来也要从这里走向他魂牵梦萦的台湾岛,去看看那里的台湾朋友……

整个过程经历了近4个半小时的飞行,中间没有停留,没有惊动任何人,更没有搞什么仪式。

郭沫若听到周恩来逝世的消息后木然呆坐,病情突然加重,以至无法行走、无法站立。1月13日,他写了《怀念周总理》:

革命前驱辅弼才,
巨星隐翳五洲哀。
奔腾泪浪滔滔涌,
吊唁人涛滚滚来。
盛德在民长不没,

丰功垂世久弥恢。

忠诚与日同辉耀，

天不能死地难埋。

1月14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刊出记者报道：《大辩论带来大变化》，开篇写到："近来，全国人民都在关心着清华大学关于教育革命的大辩论。"再次引起广大群众的强烈愤慨。有人在街头撕毁当天的《人民日报》，不少人打电话责问报社："你们是什么感情？"

1月14日的下午，又是孟锦云给毛泽东读报的时间，小孟读了准备在周恩来追悼会上由邓小平致的悼词清样。小孟读着，毛泽东不再是默默地听着，他泪如泉涌，失声痛哭，这在毛泽东是极少见的。他依旧没说一句话。他的痛哭，已诉说了他深厚的情感，这里有对患难与共的战友的哀伤，有对几十年来交往的回顾，有对自己暮年多病的悲凉，有对自己已无力回天的沮丧。周恩来的谢世，也许是一个时代的结束，一代人的退出。毛泽东大概也感到了一种"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的悲伤。14日的晚上，早已病重的毛泽东，身体又多次出现反复，他根本坐不起来，更不用说是站立了。小孟打电话请示汪东兴：

"总理追悼会的事，要不要告诉主席参加？"

汪东兴回答说："政治局未发出通知请主席参加追悼会，你们就不要问主席参加不参加了。"

那天晚上，在毛泽东看电视的时候，护士和陪伴他的人看到眼泪再一次从他衰老的脸上流了下来。

14日晚，在蒙蒙的夜色中，邓颖超在周恩来生前党支部成员的陪伴下，将周恩来的骨灰盒移往人民大会堂台湾厅，暂时存放。作为周恩来相濡以沫的知己，她知道周恩来最放心不下的就是台湾问题，她想让周恩来再在这里歇歇脚。人民大会堂台湾厅就是在周恩来的亲自提议下设置的，厅内的一切摆设都是按照他的安排摆放的。他为设立台湾厅曾倾注了大量心血。台湾厅的好多石头、砖块都是从台湾运过来的。厅中悬挂的一幅郑成功画像，是周恩来吩咐罗青长到故宫博物院，向国家文物管理局局长王冶秋调来的，周恩来同时嘱咐罗青长复制一幅，通过关系赠送给蒋介石父子。台湾厅的说明词也是周恩来亲自拟妥改定的。

# 第1379回：追悼会，毛泽东没有出席 选总理，毛泽东反复权衡

1975年1月15日，全国下半旗向周恩来总理志哀。下午，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首都各界群众代表5000多人，在人民大会堂举行隆重的追悼大会。

追悼会就要举行了。朱德的秘书见他悲伤过度，连续几天彻夜不眠，身体特别虚弱，怕他撑不住，就征求他的意见："去不去？"

"去，当然去！"沉浸在极大悲痛之中的朱德，根本没有考虑自己的身体状况，马上作了肯定回答。

可是，就要上车出发的时候，朱德却因两腿软得厉害，怎么也站不起来了。这使朱德非常不安，坐在沙发上，难过地叹气："唉，去不成了！这怎么对得起恩来？"

猛然，朱德想起什么，忙吩咐说："快把电视机打开！就是坐在家里，我也要参加这个追悼会。"

关于周恩来追悼会问题，毛泽东批示，由政治局拟一个意见。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朱德等表态，请主席出席追悼会；华国锋、陈锡联、吴德、纪登奎、王洪文、姚文元表态：请主席酌情（处理）；江青、张春桥、汪东兴反对主席出席。毛泽东在政治局的报告上，圈了华国锋、陈锡联等人的意见，批上一个"好"字。

周恩来逝世几天后，中央拟好了有关追悼会的规格，参加追悼会的政治局及党、政、军负责人的人数和悼词一并送毛泽东审阅。

毛泽东审阅时，张玉凤一直守候在侧。她和许多群众一样，心里存有一线希望，毛泽东或许也能像4年前参加陈毅追悼会那样，去参加周恩来的追悼会。在这之前，轮椅，氧气袋，一切抢救的措施都准备好了，准备毛泽东去参加追悼会。一句憋在张玉凤心里许久的话，不由自主地脱口而出，她像孩子般地问毛泽东：

"去参加总理的追悼会吗？"

一直处于悲伤中的毛泽东,这时,一只手举着还没来得及放下的文件,另一只手拍拍略微翘起的腿,痛苦而又吃力地对张玉凤说:“我也走不动了。”

听到这里,再看看眼前病榻上痛苦万状的毛泽东,张玉凤无法抑制自己的泪水……她后悔真不该这样问已经无力行动的毛泽东。

毛泽东不无歉意地说:“那几个人的追悼会,我也没能去。”那几个人,可能是指1975年4月去世的和他一起参加第一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董必武等人,以及其他几个老干部的追悼会。毛泽东让张玉凤递给他用惯了的那支红铅笔,在送审报告上写有‘主席’二字的地方端端正正地画了一个圆圈。悼词千言,这个圆圈寄托了他对周恩来深切的哀思,表达了他对周恩来的深厚情谊。

张玉凤后来在她的回忆文章中这样描述毛泽东当时的身体状况:

“他讲话困难,仅能从喉咙内发出一些含糊不清的声音字句。由于长时间在他身边工作,我还能听懂主席的话。每当主席同其他领导同志谈话时,我就得在场,学说一遍。但到了他讲话、发音极不清楚时,我只能从他的口形和表情来揣摸,获得他点头认可。当主席的语言障碍到了最严重的地步时,他老人家只好用笔写出他的所思所想了。后来,主席的行动已经很困难,两条腿不能走路。如果没有人搀扶,连一步都走不动了。”

1976年1月15日下午15时,周恩来追悼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送的花圈放在周恩来遗像两侧。

会场里还放着党和国家其他领导人送的花圈。

大会由中共中央副主席王洪文主持。邓小平致悼词。

这天上午9时15分,上海黄浦江上一艘或几艘船只拉响了汽笛,接着上百艘船跟着拉响汽笛。整个外滩被汽笛声笼罩,整整37分钟,既无事先布置也无串联。当天下午15时,上海黄浦江上再次响起汽笛声。人群从外滩沿江各个大楼涌出,汇集成浩荡的哀悼队伍,十几个人一列纵队,抬着花圈和周恩来遗像,从海关大楼直排到南京东路,转弯到江西中路,新的队伍不断加入,串流不息,直到深夜,所有的队伍都沉默而肃静无声。面对人山人海的悼念队伍,上海市委允许将花

圈送进外滩的市革会办公大楼大厅。

毛泽东没有去参加周恩来的追悼会。在后来几天每次给他读有关悼念活动的文章、各国的唁电,他都会默默地流泪。每当给他读文件的护士孟锦云发现时,自己也不忍再读下去了。她想起汪东兴的叮嘱:“主席岁数大了,身体又不好,就不要多读这样的文章了。”

此后,毛泽东的情绪一直很低沉,不愿讲话。他不顾医生的劝阻,借助刚治好的一只眼睛,不停地、无休止地阅读书籍和文件。张玉凤回忆:“由于他的身体过于虚弱,两只手颤抖,已经没有举起文件的力量了。为了满足老人家那艰难的阅读需要,我们在场的每一位工作人员都要帮他举着书或文件。”看得出来,他是在用这个办法来摆脱内心的痛楚。

周恩来去世,谁来当总理?每当毛泽东醒来,他总是在扳手指头,还问张玉凤,政治局成员的名字,张玉凤就一个一个地报出当时政治局委员的名字。

有一天,毛远新告诉毛泽东,上海一些人贴出大字报,说邓小平在悼词中把周恩来赞颂得过分了,“结论应该推翻”。

毛泽东明确的答复:“攻击周总理,人民一定不会答应。在总理追悼会上所作的悼词,其结论是不能改变的。要推翻这个结论,人民是不会赞成的。”

这可能就是后来的传言:“反周民必反,反周国必乱。”

1 月 20 日,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邓小平作了检讨发言。针对有人提出“为什么提出要见主席”的责问,他回答道:“我的意思是,想当面向主席讲自己错误的严重,特别想当面听取主席的批评和指示,我还想当面提出自己的工作问题。我觉得这种要求是正常的,我仍然抱有这样的希望。”

会后,回到家里,邓小平当夜致信毛泽东:

“在上次会上同志们要求我在讨论之先,由我讲讲要对主席当面说些什么,所以我在今晚的会议上作了一个简短的发言,现送上,供审阅。”

“我两次要求面见主席,除了讲自己错误和面聆主席的教导外,确实想谈谈我的工作问题。还在批判我的错误的时候,提出我的工作问

题是否妥当,我自己确很踌躇。提,怕觉得我受不得批评。不提,也有什么恋栈之嫌。再三考虑,还是想当主席面谈这个问题为好。”

“现在,已过去两个多月,批判还将继续下去,再不提出会妨碍中央的工作,增加自己的过失。因此,我首先向主席提出:解除我担负的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责任,恳请予以批准。”

“我自己再不提出,实在于心有愧。”

“至于我自己,一切听从主席和中央的决定。”

1 月 21 日上午,毛远新向毛泽东汇报了 1 月 20 日会上邓小平的检讨发言情况后,毛泽东说:对邓小平批还是要批的,但不应一棍子打死,“还是人民内部矛盾,引导得好,可以不走到对抗方面去,如刘少奇、林彪那样。邓与刘、林还是有一些区别,邓愿意作自我批评,而刘、林则根本不愿。”

毛远新:“还要创造条件,看实践怎样做到自己的申明,小平同志讲向主席陈述自己错误,听取教诲外,还想讲自己的工作问题。”

毛泽东:“小平工作问题以后再议。我意可以减少工作,但不脱离工作,即不应一棍子打死。”

毛远新:“还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

毛泽东:“对。”

毛远新:“上次主席讲征求几个人的意见,华、纪、陈提出国务院请主席确定一个主要负责同志牵头,他们三人做具体工作。”

毛泽东考虑了一下说:“要告诉王洪文,张春桥让一下。”然后他又扳着手指数政治局成员的名字,最后说:“还是华国锋比较好些。”

毛远新点头说:“是。”

毛泽东说:“就请华国锋带个头,他自认为是政治水平不高的人。小平专管外事。”

此后,邓小平不再主持中央的工作。

华国锋这时 55 岁,1938 年参加中国共产党。新中国成立时随军南下,到湖南工作,历任县委、地委和省委书记。“文化大革命”中担任湖南省革命委员会以及湖南省军区和广州军区的负责人,一九七一年调国务院业务组工作,后任中共第十届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公安部长。文化大革命前,毛泽东由于经常到湖南视

察,对华国锋是熟悉的。“文化大革命”期间,随着见面机会的增多,对华的了解也增加了。他认为:华国锋既有基层工作的经验,又有在省里和中央工作的经验;为人老实忠厚、办事“公道不蠢”。他甚至表示:“人家说他水平低,我就选这个水平低的。”

1 月 21 日下午,叶剑英打电话约熊向晖去他那里。谈话中,叶剑英提到,周恩来的追悼会,是他提出让邓小平致悼词,以此再给他一个在全国人民面前亮相的机会,想再扶他一把。现在看来还是不行。政治局批邓,越批越凶。叶剑英感到很为难:参加吧,没话好说,不说话呢,又不好办。家人建议他到广东去休息。叶剑英自己想去广西。他征求熊向晖的意见。

熊向晖说:“他们要整你,你到广西也逃不掉。他们要的不是你这个人,而是你的位置。我建议,你就学三国时刘备的韬晦之计,请病假,但是不要离开北京。这样,可进可退。”

叶剑英深以为然,说:“这个意见好。”

1 月 18 日,经中央批准,由国防科委和七机部联合召开批判张爱萍的大会。国防科研和国防工业系统,包括 230 厂职工及社会各界共 7000 人参加。地址选在先农坛体育场,中央、国务院机关和解放军驻京大单位及新闻媒体都被邀请参加。

张爱萍一早就起床了,他刮了胡子,对镜着装。在医院里住久了,会显得衰老疲惫。这是一个重要的日子,影响到他形象的事,在今天是决不允许的。

他一上台,还是那个习惯,对着麦克风,把他那根手杖在地上使劲地顿了一下,全场一下子鸦雀无声。7000 大众都想听听他的“检讨”。

张爱萍慢慢从军装口袋里掏出一张纸,全场一下子哄然大笑:是发言稿!张爱萍讲话居然也念稿子了!

主持人大声喊道:“严肃点!这是一场阶级斗争!”

张爱萍再次被冲击后,他拒绝做任何检讨,这次,他终于同意做检讨了,大家都想听他究竟能讲些什么?

只见张爱萍对着稿子念道:

“去年三月我重新工作以来,到了一些单位,接触了一部分干部群众,讲了一些话,也做了一些决定。假如我犯了路线上的错误,将由我

个人承担全部责任。与其他同志没有任何关系。”

读罢,张爱萍又把手杖狠狠地在麦克风前顿了一下,扭头就走了。他上车后说:“走,回医院。”

等在场的人回过味来时,张爱萍的车已经开走了。

张爱萍在7000人大会上就念了72个字,合到在场的听众每100个人才摊上一个字。此时,已经没人敢把他重新送进监狱,张爱萍还怕什么?早就看透了,顶多去山里开照相馆!

批判仍在持续不断。规模在六、七千人左右的批判大会,继1月18日后又开了多次,但是,张爱萍从此一律拒绝参加。他说:“你有本事就来绑架我吧!”

他还劝国防科委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肖向荣不要去参加批斗会。1975年张爱萍复出,就约了肖向荣和他一起干。肖向荣在被批斗后,也是心脏病发作,住进了301医院。国防科要求他参加群众批判大会,说“这是对待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问题,也是对待毛主席他老人家的态度问题,你好好想想吧!”

这番话对一个老革命来说,有着当今这代人难以想象的分量,肖向荣犹豫了。张爱萍对他说:“胡说八道的话,哪里能听他的。不能出去,要斗就叫他到医院来斗,骂就由他骂去,不过个把钟头。”

肖向荣说:“不去,政治上被动,毕竟是毛主席领导的群众运动啊。”

张爱萍说:“都到现在了,怎么还这样蠢!什么毛主席领导的?完全是派性斗争!他们算什么组织?宦官朋党,胡作非为!不要去!”

但肖向荣还是说:“毛主席有指示,中央也发了文件,作为一个党员,总要见见群众,去说一说真实情况也好。”

肖向荣,走了。

他真的是做到了据理力争。面对批判,他坚持自己和张爱萍到七机部整顿是执行毛主席、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指示的,是正确的,成效也是有目共睹的。但越是这样,对他的批斗就越是没完没了……

一天晚上,他伏案写交代检查,想到自己革命一辈子,竟然落得如此下场,悲从中来,不禁泪如雨下。爱人劝他早点休息吧,他说,待会吧,还差些没写完呢。一觉醒来,再看他还伏在案上,已经昏迷,身子

下还是那张没有写完的检查交代。送到医院抢救,终未能挽救回来。

闻此噩耗,张爱萍亲泪如泉涌,他激愤地敲着桌子:“为什么要出去!为什么不听话!……”泪如泉涌。

多少年过去了,每次提到这事,张爱萍都是那句话:

“是我找他出来工作的,他是代我受过而死。他比我更忠于这个党,他对党是真忠,真忠……”

# 第1380回：二月二，中央下一号文件 召豫、甘，谈两地铁路问题

由于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大量日常工作亟需有人主持，1976年1月28日，毛泽东正式提议由华国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

1月31日，毛远新给毛泽东的请示报告中说："我已和王洪文、张春桥谈过，传达了主席对华国锋、陈锡联工作安排的指示，他们表示完全拥护，保证支持。此事可由政治局指定专人分别向中央党、政、军部门进行传达。"

毛泽东阅后批示："同意。还应同小平同志谈一下。"

2月1日，姚文元的日记中写到：

天安门有反革命传单曰："打倒张、姚"，还有什么"打倒少壮派"。"少壮派"一类是国民党、苏修的惯用语。为人民的敌人所仇恨，"打倒"，不胜光荣之至。这本日记没有多少可看的东西，无非是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相互"打倒"而已。但革命讲政策。说厉害，是远远不及反革命派的辣手的。我手无寸铁，就一支笔，且是铅笔，"打倒"除杀头坐牢之外，就是把我这支笔剥夺掉。

2月2日，中央下达了1976年的一号文件《中共中央通知》：

1976.02.02；中发［1976］1号

毛主席批示：同意。

经伟大领袖毛主席提议，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由华国锋同志任国务院代总理。

经伟大领袖毛主席提议，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在叶剑英同志生病期间，由陈锡联同志负责主持中央军委的工作。

当晚，张春桥给叶剑英的秘书来电话，说要看看叶剑英。叶剑英马上打电话告张春桥，没有让张春桥过来看他。

真是历史的巧合，1975年的中共中央一号文件，是任命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

主持中央日常工作。而1976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是任命华国锋代总理。

2月3日,张春桥给王洪文的秘书肖木写了一篇读中央一号文件感想的文稿:

又是一个一号文件。

去年发了一个一号文件。

真是得志更猖狂。

来得快,来得凶,垮得也快。

错误路线总是行不通的。可以得意于一时,似乎天下就是他的了,要开始一个什么新"时代"了。他们总是过高地估计自己的力量。

人民是决定的因素。

代表人民的利益,为大多数人谋利益,在任何情况下,都站在人民群众一边,站在先进分子一边,就是胜利。反之,必然失败。正是:

爆竹声中一岁除,东风送暖入屠苏。

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

1976年2月3日有感

张春桥用中央前后两个一号文件时间仅隔一年形势已发生了"新桃换旧符"的大转变,教育、鼓励肖木要乐观。因为肖木当时对形势看法较为悲观。这个《有感》,张春桥给肖木看过后,随即锁进了保险柜。

周恩来逝世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毛泽东都未能摆脱悲伤的情绪。本来还可以说说笑笑的毛泽东,因为周恩来的去世,仿佛一下子带走了他本已不多的欢乐。那段日子里,他脸上几乎已无笑容,常常沉默着。

就是在这种气氛中,1976年2月4日,中国的传统节日春节到来了。但是在中南海游泳池,毛泽东住处外面一片昏暗,只有一排整齐的路灯闪着微弱的亮光。家家团圆之夜,毛泽东身边没有客人,更没有亲人,他的住所,依旧显得冷清而寂寞,只有身边几个工作人员陪伴着他。

年夜饭是张玉凤一勺一勺喂的。此时的毛泽东不仅失去了"饭来伸手"之力,就是"饭来张口"也十分困难了。他在这天依然像往常一样在病榻上侧卧着吃了几口他历来喜欢吃的武昌鱼和一点米饭。

饭后,张玉凤和孟锦云把他搀扶下床,送到客厅。他坐下后,头靠在沙发上休息,静静地坐在那里。

入夜时,中南海外边传来噼噼啪啪的鞭炮声,毛泽东听得那么真切,他意识到了这是除夕。他看看张玉凤,又看看孟锦云,用低哑的声音说:“放点爆竹吧。你们这些年轻人也该过过节。”

于是,张玉凤通知了正在值班室的其他几名工作人员,让他们在房外燃放了几挂鞭炮,毛泽东听到噼噼啪啪的爆竹声,脸上露出了一丝笑容。

按照规定,在中南海是绝对不准燃放鞭炮的,毛泽东的住地更是戒备森严。游泳池传来的爆竹声着实让中南海警卫人员吓了一跳。等人们弄清这一动静竟是来自毛泽东的住地后,一个传闻便在京城的政治圈中不胫而走:“毛主席在周总理死后放鞭炮!”还有人证明第二天亲眼看见从游泳池拉走了整整一卡车的鞭炮屑。非常夸张了。

一些人本来就对毛泽东没有参加周恩来的追悼会有看法,因为在周恩来逝世的一星期前,毛泽东还接见在“水门事件”中下台的美国前总统尼克松的女儿和女婿,而且在周恩来逝世后,很多单位还发出“不要用死人压活人”的“最高指示”,压制老百姓自发悼念周恩来的活动。

一些老干部私下里纷纷为周恩来抱不平,认为周恩来一生对毛泽东忠心耿耿,而毛泽东对周恩来的死却无动于衷,也实在太令人寒心了!这种情绪迅速扩展到整个社会。这次“鞭炮事件”更是火上加油,弄得整个京城沸沸扬扬。

2 月 4 日,大年初一,聂荣臻要女儿聂力打电话给邓小平的女儿邓榕,代表全家向邓小平全家祝贺春节,并要邓小平保重身体。

2 月 6 日,陈锡联第一次主持中央军委常委开会,参加会议的有王洪文、张春桥、苏振华、粟裕、汪东兴、徐向前、聂荣臻。邓小平、叶剑英、刘伯承没有到会。会议对去年 7 月中央军委扩大会议的文件作了检查。会后,中央军委向毛泽东、党中央写出报告,称 1975 年 7 月邓小平、叶剑英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有错误”,建议“停止学习和贯彻执行”,并要求全军积极参加“回击右倾翻案风的伟大斗争”。这一报告经毛泽东批示同意后,中共中央于 2 月 16 日发出“三号文件”予以批转。

2月6日这天,张春桥召见文化部部长于会泳,对他说,江青身体不好,以后文化部所有的事由张春桥管。凡请示件不要往她那里送了,样板戏剧团不需要报批的件,可以送。

张春桥向于会泳交待了几件他和江青商量过的事情,最后在谈到关于辽宁省要求提倡每个大队都办放映队时,张春桥说:“都这样搞不行,总要先解决吃饭穿衣问题,后解决看电影问题。文艺的发展要适应经济基础的发展,不能阻碍它的发展。我们现在的粮食只能说刚刚够吃。可能有的省发展快些,这是允许的。但都发展,就成问题了。”

2月7日,华国锋首次以国务院代总理的身份出面接见外国驻华使节。

2月8日晚,叶剑英再次找熊向晖去他那里。见面后,叶剑英说,他接受了熊向晖的建议,“跟聂帅商量以后,就打了报告给毛主席,请病假,已经得到了政治局的批准。”

关于华国锋为代总理的任命,叶剑英说,这个措施完全出乎他的意料。虽然王洪文告诉他,毛远新传达毛主席关于人事安排的指示时,说这是暂时的,但是叶剑英认为,“可以肯定的是,毛主席不想让江青、张春桥和王洪文接班。”他表示:自己虽然不了解华国锋,但是“已经给主席写信,拥护对华的任命。”

听说叶剑英生病了,空军副司令员吴富善特地去看望,一见面就问:“首长,为什么不干了?”

叶剑英回答:“谁说不干了?他们不叫我干,只好不干!”

国务院副总理余秋里从广州回来后去看望叶剑英,劝他到南方去休养一段,叶剑英回答说:“不,这个时候,我哪也不能去。”

还有许多人打电话、写信给叶剑英办公室,问候病情。“叶办”的人只好悄悄地如实以告:首长身体和往常一样。

陈锡联历史上和叶剑英实际上交往并不多。听说叶剑英想到广州居住,特地打电话劝说:“叶帅,你不能去广州。”

谁知叶剑英生气地说:“你怕我捣鬼吗?我如果想捣鬼的话在哪里不能捣?”

觉得自己被误解的陈锡联对妻子王璇梅说:“我留叶帅在北京,是想在政治局里能多留一票啊。”

王璇梅事后回忆这段历史感慨的说:“那时在中央工作的环境实在太复杂了。”

此时,兰州铁路局和郑州铁路局已经乱了起来。而且郑州铁路枢纽堵塞,危及全路,形势严峻!为此,中央不得不紧急召见河南、甘肃两省和郑州、兰州两局的主要领导干部来京解决问题。1月下旬,甘肃省委第一书记冼恒汉带领兰州局的赵滔、张恒云、陈平、蔺子安、章云等人;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刘建勋和省委书记唐岐山,带领郑州铁路局的苏华、王志庭、张建业、胡逸平、李克基等人于1月21日分别来到北京。

中央和国务院领导指示:“铁道部临时领导小组,要与河南、甘肃省委领导统一思想,统一意见,分别写出《关于解决郑州铁路局问题的报告》、《关于解决兰州铁路局问题的报告》,征得两省省委领导同意后,再上报中央批下去。”

铁道部临时领导小组根据华国锋等领导的指示,从1月21日起分别听取河南、甘肃两省和郑州、兰州两局领导的意见和批评,并据此写出检查报告和解决问题的意见。

但是铁道部与河南、甘肃两省的意见分歧依然很大。铁道部和部分铁路局的领导认为,去年解决铁路局的问题,是按照中央9号文件要求进行的,河南、甘肃省委领导也基本上是同意的。河南、甘肃现在的做法就是刘建勋、唐岐山和冼恒汉等人把自己的意见强加给铁道部,要铁道部领导在向中央提出解决郑州和兰州两局问题的《报告》中承认错误,否定铁道部对郑州和兰州两局问题的处理,从而否定中央9号文件。对此,万里不同意。但是有《打招呼的讲话要点》和毛泽东的最新指示,他也不能说什么。最后,万里以文件上点了郑州局党委代理第一书记苏华和铁道部政治部主任黎光的名字,说:

“他们都是我们派去的,执行的是我们的决定,错误由我来承担,要点就点我的名,我就这一条意见了,如果你们不同意,我就不签字……”

为此,僵持了一个星期。

2月8日,河南刘建勋、唐岐山给中央写了《关于解决郑州局问题的意见》。其中写道:“郑州铁路局的问题,主要是局党委代理第一书

记苏华同志刮右倾翻案风,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案。这是当前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绝不是孤立的。这是同铁道部主要负责同志的错误指导思想分不开的。”

他们认为,铁道部前一阶段在解决郑州铁路局问题上的主要错误:一是,把郑州铁路局的形势看反了,否定主流是好的。二是,把郑州局的主要矛盾搞错了,背离了党的基本路线。三是,没有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四是,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涌现出来的革命新生事物和新生力量。他们在意见书中写道:“铁道部和苏华搞的这一套,省委是完全反对的,并且一再指出过。”

与此同时,冼恒汉也写了一份与《关于解决郑州铁路局问题的意见》内容类似的《关于解决兰州铁路局问题的意见》。其主要内容:一是,错误的性质是“右倾翻案风”;二是,错误的事实是否定“文化大革命”;三是,责任全在铁道部,省委是反对的;四是,解决的办法,在省委统一领导下,回击“右倾翻案风”。

2 月 9 日晚,华国锋、纪登奎等国务院领导,把铁道部部长万里和副部长李新找去。华国锋批评他们在解决兰州和郑州问题上拖延时间。在谈到文件中点名问题时,纪登奎说:

“你的意见和要求可以理解,但,点谁的名,这是中央的意见,你们有不同意见可以保留……”

就这样,万里终于在文件上签了字。

2 月 14 日晚,华国锋、王洪文、纪登奎、吴德等,召见了河南、甘肃省委领导和铁道部党的临时领导小组成员,以及郑州、兰州铁路局领导。华国锋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领导讲了话。接见之后,把出席会议的铁道部临时领导小组成员全部留下,又对他们单独做了指示和批评,主要有:

一、你(指万里)的错误不少,你讲过“四个乱了——思想乱了、组织乱了、队伍乱了、制度乱了”;你把派性说成是主要矛盾,对形势看法有错误,把支流说成主流;主要责任不在你,而在邓小平;你过去敢,现在还要敢,要敢于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敢于承担责任,要批“右倾翻案风”。部领导小组一方面要检查自己的错误,另一方面要批邓,检查哪些方面你们执行了邓小平的路线,要划清界限。万里同志要转好

弯子。

二、你们对在文件中点黎光、苏华的名想不通。部里和省里的看法不同,甘肃要黎光回去是为了好做工作。黎光和苏华可以先不回去。到一定时间再说,现在有病治病。

河南刘建勋在北京开会期间,了解到中央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内幕,感到河南在1975年执行了邓小平的指示搞整顿,特别是整了造反派,不是小事情。他和纪登奎就如何稳定河南的问题进行了研究,决定把整顿期间从省直机关下放到基层的几个有影响的造反派头头马上调回省直工作,恢复职务。刘建勋把省委办公厅副秘书长赵俊峰叫北京,要他马上向省委常委汇报解决。

赵俊峰回到郑州,立即向省委常委作了汇报,省委当天发文件把几个影响大的造反派头头调回省直官复原职,还提拔重用了两个头头,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因搞整顿使刘、纪和造反派之间造成的紧张关系。

# 第1381回：春节后，“总理遗言”传全国 “转弯子”，北京开五省会议

春节后，社会上突然出现“总理遗言”。

“遗言”分两部分，第一部分是给邓颖超的，很短，全文如下：

小超同志：

你我都是共产党员，一起革命五十多年，我相信你一定经受得起。要向蔡大姐学习，要教育孩子当好普通一兵。

战友周恩来

1975.12.28

另一部分较长，也就是当时轰动全国、震惊世界的“总理遗言”，全文如下：

主席、中央：

我自第二次手术以来，病情曾有短期稳定。从下半年开始，癌症已经广泛扩散，虽然自觉尚好，但离见马克思的日子确实不太远了。我想有必要向主席及中央汇报一下近来的一些想法。

患病期间，主席对我亲切关怀使我十分感动，主席年纪大了，要注意身体。有主席为我们党和国家掌舵，是全国人民莫大的幸福，也是我莫大的欣慰。这些日子，主席在遵义会议时和我的谈话历历在目，百感交集。不能为主席分担一些工作，我十分难过。为了我们祖国和人民的前途，主席一定要保重。

洪文同志几年来，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解决问题上，提高都很快，对此我极为高兴，我们党后继有人，洪文同志今后要多抓全面性的问题，处理还要果断，为党多做工作。

朱德和叶剑英同志年事已高，要锻炼身体，当好主席的参谋，具体分工可以摆脱些，但你们所处的地位仍然是举足轻重的。我们老一辈人，跟主席那么多年了，要以高昂的战斗精神，保持革命晚节。

小平同志一年来几方面工作都很好，特别是贯彻主席的三项指示

抓得比较坚决,这充分证明了主席判断的正确。要保持那么一股劲,要多请示主席,多关心同志,多承担责任。今后小平同志的压力更大,但只要路线正确,什么困难都会克服。

春桥同志能力强,国务院的工作,小平、春桥要多商量。

同志们,长期以来的病假,使我有可能回顾自己所走过的路程。在这曲折的道路上,我永远不能忘怀那些在我们前面倒下的先烈,我们是幸存者。1926 年我和恽代英同志分别时,他说:“当中国人民都过上幸福生活的时候,我们能活着的人,一定要到死去同志的墓前,去告慰他们,死者会听到我们的声音的。”多少年来,我总想着,用什么来向他们汇报呢?……在此弥留之际,回忆先烈的遗言,对照我国人民的生活条件,我为自己未能多做一些工作而感到内疚……展望本世纪把我国建设成一个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的壮丽前景,我充满了必胜的信心。死对于共产党员来说算不了什么,因为我们把生命交给了人民的事业,而人民的事业是永存的。唯一遗憾的是我再也不能和同志们一起前进,加倍工作,为人民服务了。同志们一定要把党和人民的利益放在一切之上,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关于我的后事,我向中央请求:

将我的病情发展告诉全国人民,以免引起不必要的猜测。

追悼会主席不要参加,会应力求简单,请洪文同志主持,小平同志致悼词。

骨灰不要保存,撒掉。

永别了,同志们!

周恩来

1975.12.29

全国各地很快发现了数以万计的“总理遗言”抄本。而且,“遗言”还被世界各国 130 多个电台、通讯社反复播发。当时,几乎没有一个人怀疑这份遗言的真实性。说话的口吻,对中央高级领导人的评价,对中国革命历史的了解,文字的干净简洁……一切都像周恩来的风格。

但是,谁能相信,这份“总理遗言”的作者竟是杭州汽轮机厂的一

名年仅23岁普通工人——李君旭。

1976年2月上旬的一天晚上,阴冷的天空中翻飞着雪花,李君旭的同学“大耳朵”吕建树从他插队的农村回到杭州。“大耳朵”从乡下带回来一大块新鲜狗肉,那是他插队的房东知道他要回城后,将自己家里养的狗宰了送给他的。

“大耳朵”吕建树在杭州的几个同学袁中伟、刘建新、李晨光、李君旭都集聚到“大耳朵”家里。大家围着火炉烹狗肉议时政。“大耳朵”说,他插队的那个农村,农民都吃不饱饭,许多村民开始离开村子出去谋生了。大家又一起议论到刚刚下发的中央文件,议论到文件宣布的中央高层人事变动中没有邓小平的名字。对时局的忧虑,对祖国前途命运的担心,让这帮热血青年更有了一种“天将降大任于斯人”的使命感。

在他们中间,李君旭并不属于核心人物,此时却慷慨激昂地说:“我要当一颗铺路的石子,用我的热血去唤起民众!”

袁中伟同学说:“民众现在已经是一点即燃的干柴,缺的是点燃干柴的火星,我们是可以做火星的。”

那一天,大家聊得很晚,大家聊到了“总理逝世后会不会留下遗言?”这是当时大家都很关心的话题。随后又猜测“如果有遗言总理一定会说到哪些内容?”

李君旭没有说话,但脑子里一刻也没有停止转动,他将这帮热血青年你一句我一句的言论、观点、设想、猜测、希望……一丝一缕地融进自己的大脑。

“总理的遗嘱,就是骨灰撒掉这一句话吗?”

“肯定还有什么话被人封锁了!”

“我们不能再这样下去了,得行动起来,继承总理未竟事业!”李君旭觉得自己应该写一篇文章。

回到家里,李君旭展开稿纸,准备抒发心中的感想。但是提笔写了几个开头,都不满意。突然,他脑海中迅速闪过一个念头:“遗言!就以周总理的口气,写一封诀别书。”

1976年春节过后不久一个寒冷的晚上,当大家又集中到李君旭家时,他在昏黄的灯光下,拿出了两张薄薄的纸。那就是他精心炮制的

“总理遗言”。但他没有将真相告诉他的这些伙伴们,只说他是抄来的。

这似乎是不可思议。一位堂堂的国务院总理的“遗言”怎么会出现在一个小小的工人手里?可当时在场的几个热血青年看了以后,竟没有一个人问类似的问题,在议论了一番“和我们猜测的挺像”之后,全都埋头抄写起来。李君旭此时知道:他——成功了!

在场抄录这份“总理遗言”的人,无一例外地都将抄录的这份“总理遗言”拿给周围的亲人、朋友、同学看了。而每一个看过这份“总理遗言”的人,也都无一例外地埋头就抄……依旧没有一个人问及这份“总理遗言”的来源,也没有一个人对这份“总理遗言”的真实性提出质疑。而每一个抄录的人又都以最快的速度再传给他们周围的人,一传十,十传百,百传千,千传万……就这样,这份仅仅是出自杭州汽轮机厂一位23岁小工人之手的所谓“总理遗言”,却冠以周恩来的名字在短短的时间内像滚雪球一样迅速地传遍了几乎整个中国。

这是因为,“遗言”中的许多内容迎合了人们当时的心中渴望。许多人都是含着热泪反复诵读。特别是那句“回忆先烈的遗言,对照我国人民的生活条件,我为自己未能多做一些工作而感到内疚”,让无数人唏嘘。还有关于后事的三点请求,其中“骨灰不要保存,撒掉”,寥寥8字,更让多少人潸然泪下。人们的情绪在这样一份从天而降的“总理遗言”中找到了寄托。

这时,还有一首据说是毛泽东写给周恩来的《诉衷情》的诗也在广为流传:

一生忠贞为国酬,
何曾怕断头?
如今神州红遍,
江山靠谁守?
业未竟,
身躯倦,
虽未终,
鬓已秋.
自古忠臣多逆子,

宝黛真情两分离。

你我之辈，

忍将夙愿付东流？

2月初，中央召集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委、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负责人，还有当时问题较多的云南、四川、浙江、江西、福建五个省的领导，在人民大会堂三楼小礼堂召开了“转弯子”会议，云南、四川、浙江、江西、福建五个省前来参加会议的有29位省级领导。

主持会议的华国锋说：“这次找你们来，主要是来学习毛主席重要指示，打招呼，思想早转弯，放下包袱。因为你们有些省市过去传达过邓小平的一些东西，责任不在你们，在邓小平身上，你们可以揭、可以批，这样就放下包袱，思想上就好统一了。”

四川省委第一书记的赵紫阳和华国锋原来都在中南局工作，赵紫阳是广东省委第一书记，华国锋是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互相比较熟悉。会下，赵紫阳对华国锋说：“国锋同志，整顿工作中的很多事都是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决定的，有些界限一定要掌握好，不要把打击面搞大了。”

2月16号下午，四川组的代表讨论时，正在发言的四川省委常务书记段君毅突然就停下来不说话了，坐在他对面的省委书记，原四川石油管理局某女子钻井队指导员唐克碧觉得奇怪，再看看段君毅旁边的赵紫阳，怎么也不说话了？她顺着两人的目光侧过头，才发现穿着军装的江青正从她背后走了进来。

江青坐在赵紫阳的旁边，没有说话。可能是事发突然，会场上也没有人说话。过了一会儿，只听江青说道：“这几天，我等了三天三夜没睡觉，就等着一个人发言。”

她声音非常小，仔细听才听得到。唐克碧不知江青是在等谁发言，这时她看见赵紫阳的脸红了，红到脖子根儿，知道江青肯定说的是赵紫阳。

果然，江青提高了嗓门喊：“赵紫阳，就说的你呀！现在有些人对中央的会议不理解，有意见、有情绪，赵紫阳你是怎么想的？”

之后江青又说到关于她的谣言四起，特别是在广州！赵紫阳是1975年从广州调到四川来的。江青还说：

“赵紫阳你是毛主席重点培养的人,毛主席对你很信任,你不跟毛主席走,跟着邓小平跑,你怎么能这么对毛主席啊?还有你赵紫阳到四川,为什么一去就批造反派?”

江青提到时任重庆市革委会副主任的黄廉给她写的一封信。她说信写得很好,然后就开始念黄廉在信里写的诗,还说主席也看了。她说:

“赵紫阳,你要是不转弯子,我就把这封信谱成歌,搞成样板戏那样唱,到全国去唱。”然后问赵紫阳:“黄廉是个好同志,他入党了没有?”

赵紫阳回答说:“没有。”

江青:“那他有没有申请?”

重庆市委书记、重庆市革委会主任鲁大东说:“有。”

江青问:“申请了为什么没批准?”

鲁大东说:“当时没有介绍人。”

江青说:“没有介绍人?我来当他的介绍人!”

接着她对着坐在对面的唐克碧说:“克碧同志,我们两个当他的介绍人!”

唐克碧没有说话,大家都没有说话。唐克碧以为大家是在等着她回答,硬着头皮正要说,赵紫阳说话了:

“不是不介绍他,不让他入党,是他历史有点问题。”原来黄廉档案里有一些部队不好的评语,如“反右”时内定“右倾”等等。

江青大声问:“什么问题?哪个没问题?我们在座的哪个没问题?只有他有问题?我们这些老家伙个个有问题!”

接着,赵紫阳对他到四川任职及与邓小平的关系作了说明。他说:

“第一,我到四川来是中央决定的(不单单是邓小平);第二,当时我本来想到小平同志那去问一问还有什么说法,邓小平同志忙,就没去。第二天就不是我自己去的了,还有廖志高和其他人。我问了小平同志,我到四川去还有没有其他指示,小平同志说你去好好干就是了,把四川稳定下来,经济发展上去。从此之后,我没和小平同志有任何接触了。”

关于广州“谣言四起”的事情,赵紫阳说:“我确实听到过关于毛主席批评(江青)的话,是听韦国清同志说的,他说了以后我对任何人都没提过,包括我的老婆我都没说。我可以保证,我家里人都不知道。”

江青说:“哎哎哎,大家不要紧张,不要紧张,好好谈。”她说要送给赵紫阳两本书:“这两本书,我是用我的生活费买的,没拿公家一分钱,我省吃俭用,在生活费里节约出来给你买的。我是关心你们,爱护你们,因为你和廖志高都是毛主席亲自培养的,我也相信你们,所以买书送给你们。”

这两本书,后来是唐克碧去领回来的。

接下来,赵紫阳继续发言,他说要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这几年老同志总犯错误?”

这时,江青起身离开了会场。

说到黄廉给江青写信,是因为赵紫阳到四川后点了黄廉的名。

赵紫阳到四川后,主要精力放在农业上,对当时中央强调的清除派性的工作,他是和大搞农业结合起来搞的。在一次省委工作会议上,四川的干部们听到新来的省委一把手一个很令人吃惊观点:

“我们解放后的历次政治运动,都要涌现一批积极分子,我们对待‘造反派’,就要像对待政治运动中的积极分子一样,即使有错误,这样的错误也应该由我们来承担。”

在这样的方针指导下,尽管“批派性”的会开了很多,声势也很大,可是强调自我教育,不登报,也没有公开点名。赵紫阳指示:“对于搞派性干扰了‘学大寨’的干部,要进行批判,但不能单独作为派性来批,而是要他们在‘农业学大寨’中去立新功,改正错误。只要把‘农业学大寨’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派性、矛盾之类的事就会减少。”“重在搞清思想,处理上要慎重。对头头不是以他们的言论治罪,而是根据他们打砸抢烧、贪污盗窃等罪行。”

在重庆,赵紫阳曾用“四大名旦”来形容四川搞派性的情况,当时没有点名。到了1975年11月中旬,按照中央的决定,赵紫阳在一次会议上点了四川省革委副主任邓兴国、杨志诚、四川省革委常委周家瑜、重庆市革委副主任黄廉四个人的名,说:“这次我们‘批派’的方针仍然是自我教育,不点名。但是这四个人在运动中做了不少坏事,从未作

过检查,省委发了通知给他们,要他们在一个礼拜之内拿出检讨来。”

后来邓兴国、杨志诚、周家瑜三个人按省委要求,拿出了检讨,还分别找省委、重庆市委领导谈话。只有黄廉拒不检查。后来给江青写了信。

中央召集的这次“转弯子会议”于2月21日下午3时25分结束。中央首长退席时,江青走到大厅门口,看见时任中共四川省委书记、原重庆供电公司工人、重庆“反到底工总司”勤务组副组长汪友根,轻声对他讲:

“要给黄廉做工作,不晓得他能不能顾大局。”

1974年批林批孔运动中,保定地区武斗、混乱再起。至1976年,河北省委、省军区难以遏制,中央不得不再次动用早已脱离地方“三支两军”的38军。

1976年2月7日,河北省保定地区党委副书记杨连甲、杨志昌和常委吕毅要求召开常委会,持枪警戒,内外威逼,卡断联系。2月11日,他们控制的战斗队抢占地委大院,致使地委领导陈哲、杜森尧被迫离开机关。

1976年2月20至24日,保定市委召开各大口负责人会议,传达中共中央4号文件,布置“反击右倾翻案风”问题。23日,部分市委委员将市委主要负责人劫持到五一饭店,要强行解决市委的“翻案风问题”,压市委转弯子,没有结果。

# 第1382回：再召开，十二省“转弯子”会 找秘书，徐景贤上报材料

1976年2月12日，毛泽东阅吴桂贤2月1日关于上山下乡知识青年问题的来信，信中说：“收到陕西咸阳市北杜公社两位知识青年给主席和党中央的信，他们反映了对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安置、培养工作和招工中存在的问题。”

毛泽东批示：“印发政治局。知识青年问题，似宜专题研究，先作准备，然后开一次会，给以解决。”

2月13日，中国轻工业品进出口总公司黑龙江省分公司中山路仓库的汽车司机何庆华，在冰城哈尔滨发表了一篇《致北大、清华大批判组的一封公开信》。信中说：“一小撮假马克思主义分子，利用窃取的重要岗位，把自己伪装成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打着红旗反红旗”，“名义上搞大辩论，实质上是大镇压，谁要有半点不同意见就被打成反革命”。

2月14日，《人民日报》发表《在批判旧世界中建设新世界》，狠批教育界的“右倾翻案风”。

2月16日，中共中央批转军委关于检查1975年军委扩大会议文件的报告。报告指出：

军委常委于2月6日开会，对去年7月军委扩大会议的文件作了检查。

一、一致认为，这次军委扩大会议，遵照毛主席，党中央批准的议程，讨论通过的《关于压缩军队定额，调整编制体制和安排超编干部的报告》是正确的，应当继续贯彻执行。

二、军委扩大会议上的两个讲话是有错误的。建议停止学习和贯彻执行。

三、当前，回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正深入发展，全军要积极参加这场伟大的斗争。为了保持部队的稳定，随时准备打仗，军队的运动要

在各级党委的统一领导下,采取正面教育的方式进行。有的需要展开大辩论的单位,如国防科委,要经军委批准。

2 月 16 日,姚文元在日记中写道:

“外国人都说:宣传工具在左派手中,是‘宣传毛的主张’‘继续革命’的,但搞‘经济工作的是求实派’,经济工作什么时候能由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来领导呢?”

17 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批判“三项指示为纲”》,对邓小平进行不点名批判,说他是“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

2 月 18 日上午,重庆市解放碑的交电大楼墙上贴出了题为《我爱我的祖国》的大字报,署名是“祖国忠诚的儿子、重钢职工白智清”。大字报在重庆引发强烈反响,白天下雨,人们撑着雨伞看,夜里人们打着电筒传抄。有人在大字报上批道:“写得好,有胆量,说出了我们的心里话。”

白智清是重庆钢铁公司机修厂技术员。从 1974 年起,他就以“心赤客”的笔名,给李德生、周恩来、叶剑英、邓小平和江青写信,历数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批判江青,被公安部列为“心赤客反革命案件”进行追查。

2 月 23 日,福建省机械局干部刘宗利和他的妻子张梅英、父亲刘学旗在福州东街口邮电大楼门口的大理石廊柱前贴出一张署名“三名共产党员”的大字报:《“阿斗”的呼声》,写下了 6 点意见:

一、万分沉痛地哀悼周总理逝世,学习周总理高尚的革命品质,继承总理遗志,将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进行到底;

二、林贼虽死,阴魂不散,他们千方百计为林贼修正主义路线翻案,妄图推行没有林彪的林彪修正主义路线;

三、坚决粉碎当前社会上出现的一股分裂党中央,把矛头指向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反革命妖风;

四、邓小平同志人才难得,政治思想强,他是毛主席革命路线和政策的正确执行者,历史和人民会给他作出公正的结论;

五、廖志高同志主持省委工作以来,福建很有起色,大有希望,福建人民会给他做出正确的评价;

六、一小撮新生资产阶级分子和顽固坚持资产阶级派性的人,错

估形势,疯狂刮起右倾翻案妖风,必将受到人民的加倍惩罚。

许多工人、学生、战士在大字报上留言,表示赞同和支持。3 月 8 日,王洪文下令追查。

2 月中旬,北京市出现一份传单,说:“张、江、姚是林彪式的小舰队,是陈伯达式的政治骗子,他们欲把大批老同志置于死地而篡党夺权”。传单号召:“全国人民紧急行动起来,以实际行动向叛徒、野心家、阴谋家张春桥、江青、姚文元之流进行坚决斗争”。这份传单的作者是中央广播事业局的一位共产党员,名叫窦守芳。2 月 24 日,他被逮捕。

2 月 24 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抓阶级斗争,促春耕生产》,将毛泽东批评邓小平“三项指示为纲”的讲话公诸于世。

2 月 25 日,中共中央又召开了 12 个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负责人会议。与 2 月初的 5 省会议一样,也称“转弯子”会议。

在这次会议上,传达了由毛远新整理的《毛主席重要指示》。这些指示,是毛泽东在 1975 年 10 月至 1976 年 1 月的多次谈话内容:

“社会主义社会有没有阶级斗争?什么‘三项指示为纲’,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斯大林在这个问题上犯了大错误。列宁则不然,他说小生产每日每时都产生资本主义。列宁说建设没有资本家的资产阶级国家,为了保障资产阶级的法权。我们自己是建设了这样一个国家,跟旧社会差不多,分等级,有八级工资,按劳分配,等价交换。要拿钱买米、买煤、买油、买菜。八级工资,不管你人多人少。”

“一九四九年提出国内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十三年后重提阶级斗争问题,还有形势开始好转。文化大革命是干什么的?是阶级斗争嘛。”

“旧的资产阶级不是还存在吗?大量的小资产阶级不是大家都看见了吗?大量未改造好的知识分子不是都在吗?小生产的影响,贪污腐化、投机倒把不是到处都有吗?刘、林等反党集团不是令人惊心动魄吗?”

为什么有些人对社会主义社会中矛盾问题看不清楚了。毛泽东认为,“问题是自己是属于小资产阶级,思想容易右。自己代表资产阶

级,却说阶级矛盾看不清楚了。一些同志,主要是老同志思想还停止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对社会主义革命不理解、有抵触,甚至反对。对文化大革命两种态度,一是不满意,二是要算账,算文化大革命的账。”

“民主革命后,工人、贫下中农没有停止,他们要革命。而一部分党员却不想前进了,有些人后退了,反对革命了。为什么呢?作了大官了,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他们有了好房子,有汽车,薪水高,还有服务员,比资本家还厉害。社会主义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了,合作化时党内就有人反对,批资产阶级法权他们有反感。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一百年后还要不要革命?一千年后要不要革命?总还是要革命的。总是一部分人觉得受压,小官、学生、工、农、兵,不喜欢大人物压他们,所以他们要革命呢。”

关于“文化大革命”的评价。毛泽东认为,“对文化大革命,总的看法:基本正确,有所不足。现在要研究的是在有所不足方面。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看法不见得一致。文化大革命犯了两个错误:一、打倒一切;二、全面内战。打倒一切其中一部分打对了,如刘、林集团。一部分打错了,如许多老同志,这些人也有错误,批一下也可以。”

“全面内战,抢了枪,大多数是发的,打一下,也是个锻炼。但是把人往死里打,不救护伤员,这不好。”

“有的人受了点冲击,心里不高兴,有气,在情理之中,可以谅解。但不能把气发到大多数人身上,发到群众身上,站在对立面去指责。”

关于对待老同志和造反派。毛泽东说,“不要轻视老同志,我是最老的,老同志还有点用处。对造反派要高抬贵手,不要动不动就‘滚’。有时他们犯错误,我们老同志就不犯错误?照样犯。要注意老中青三结合。”

关于当前运动的发展。毛泽东主张,“当前大辩论主要限于学校及部分机关,不要搞战斗队,主要是党的领导。不要冲击工业、农业、商业、军队。但是,也会波及。现在群众水平提高了,不是搞无政府,打倒一切,全面内战。”

“过去不是,蒯大富、聂元梓无政府主义,现在比较稳妥。”

在《指示》当中,毛泽东点名批评邓小平,认为“他这个人是不抓阶级斗争的,历来不提这个纲。还是‘白猫、黑猫’啊,不管是帝国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代表资产阶级”。

但即便事情已发展到如此地步,毛泽东对邓小平仍留有余地,表示:对邓小平“批是要批的,但不应一棍子打死。”“他还是人民内部问题,引导得好,可以不走到对抗方面去。”

“要帮助他,批他的错误就是帮助,顺着不好。批是要批的,但不应一棍子打死。对犯有缺点和错误的人,我们党历来有政策,就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要互相帮助,改正错误,搞好团结,搞好工作。”

华国锋代表中共中央在12省“转弯子”会上说:“毛主席说,错了的,中央负责。政治局认为,主要是邓小平同志负责。”“深入揭发批判邓小平同志的修正主义路线”,“在揭发批判过程中转好弯子。”“当前,就是要搞好批邓,批邓小平同志的修正主义错误路线,在这个总目标下,把广大干部、群众团结起来”,“对邓小平同志的问题,可以点名批判。”

在“转弯子”会议之后,“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旗帜亮了出来。华国锋取代了邓小平,主持中共中央日常工作。

会后,张春桥把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叫到钓鱼台九号楼长谈。钓鱼台九号楼是张春桥的住所,朴素简单。他们谈了三个问题:一是痛骂邓小平,二是议论上海的人事安排,三是张春桥叮嘱上海方面今后要注意的几种倾向。谈话快结束的时候,张春桥似乎很不经意地对他们说:“我这里需要一个秘书,你们看看上海有没有合适的人……”

马天水哼哼了两声,朝徐景贤看看,轻声说:“老徐看,有什么合适的人吗?”

王秀珍是分管组织工作的书记,可是,给张春桥派秘书,要求高,条件严格,而且必须能写。王秀珍没有吭气。

徐景贤沉思了一下,一时也想不起比较合适的人。王洪文任党中央副主席后,曾向他要一名秘书,替他起草文件,撰写讲搞,翻阅资料等。王洪文指名要调市委写作组的肖木,他是铁路工人出身的知识分子,曾经担任过《上海铁道报》的编辑、《支部生活》的编委,他不但会写理论文章,而且会写杂文、散文,报告文学和小说……有较深厚的理

论修养,为人比较谨慎,随和。像这样的人到张春桥身边工作倒是非常合适的,可是王洪文已经把他挖走了。此刻,再要找一个像肖木这样的人给张春桥当秘书,难了……

张春桥看他们几个都没有接口,便不再往下说了。这时,徐景贤说:“这件事让我回去和写作组朱永嘉他们商量下,提出几个名单来,整理成书面材料,送给您看看再定吧!”

张春桥表示同意。

回到上海,徐景贤和朱永嘉从市委写作组下属的文学组、哲学组、经济组、自然辩证法组……中间,物色了条件比较相当的人选,都有一定的文化水平、理论修养和活动能力,能拿得起“笔杆子”,而且都比较年轻,没有家庭牵累,清一色的共产党员。他们从中定下3个人,朱永嘉特别向徐景贤椎荐一名青年骨干,既会写文章,又会开汽车。他说:“当了秘书跟着春桥同志出去,万一有什么事,马上可以顶上去当汽车驾驶员!”

徐景贤要市委写作组把那3个人的档案材料做了简要的摘录,打印出来,然后徐景贤写了一封短信,附上摘录材料,通过市委机要交通员直送北京,请张春桥圈定选用其中何人,或者他认为全然不合适,就把材料退回以便再选。

信和摘录材料送去以后,许久没有回音。

# 第1383回：先念病，李素文主管财经 江青忙，招十二省区领导

1976年3月1日，在国务院副总理纪登奎召集财政、商业、外经等各部部长会议上，宣布："经毛泽东批准的中央决定：在李先念副总理养病期间，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李素文负责主管财贸各部委和外经部的工作。"

3月2日，武汉市贴出"继承总理志，实现四个现代化"等大标语；即后又出现了《绝不对资产阶级野心家卑躬屈膝》的油印传单；同时，武汉锅炉厂召开有200多人参加的大会，公开点名批判江青、张春桥。

3月2日，江青在京西宾馆第9会议室，自己召集12省、区负责人开会，发表长篇讲话，说"邓小平是个谣言公司的总经理"，是"代表买办资产阶级"、"国际资本家的代理人"和"大汉奸"。

她从1974年"风庆轮"问题讲起，说："邓小平在外事问题上走得相当远了，但是由于主席对外事抓得很紧，所以有一些抓回来了。比方，他投投降三木，妥协，这个主席抓了，霸权问题不能妥协。这是个原则问题，妥协了苏修会高兴。关于台湾问题，邓小平拍布什的马屁，我就光看了外交部整的那个东西，其他的还不知道。我为什么敢在同志们面前讲他是个汉奸，代表买办资产阶级呢，有物为证。我全部带来了。""我给同志们念一下，不印，我是请主席参阅。邓小平完全是代表买办资产阶级利益的，出口原料和外国资本家订长期合同，等等。他还说过，要把杭州、苏州、还有广州，还有许多地方开放给外国人游览，吃喝玩乐，抓外汇。"

"邓小平把咱们的原油，咱们的石油，连煤炭，棉布统统压价出售。这些都是去年冬天干的。如果给了第三世界缺油的国家，那还情有可原，他是卖给那些大资本主义国家呀。燃料我们自己缺呀。所以我说他是买办资产阶级，代表买办，地主资产阶级，中国有国际资本家的代理人，就是邓小平。叫他汉奸，正确不正确？我们的主席还在保着他

啊,我说话是我个人的意见。”

“邓小平这种买办资产阶级破坏生产是历来的。他进口了好多外国设备,不晓得为什么都挤到今年上马。有的设备根本没有处理三废,现在毒害人啊。上海紧急呼吁。现在是救命呐。”“就是这个代表买办资产阶级的邓小平,他对第三世界是一点兴趣也没有,就是对美国,西德,第二世界有兴趣。那简直是一副奴才相,在我们面前可凶了。我曾认为他是一个团结的因素。”

“我根本不知道有邓小平什么事,特别是我还挺迷信他,74 年啊,可不知道噢,他一直对我都比较讲理的,通情达理的,我说他能团结人,他是骗了我,那时,他急了,暴跳起来了,骂,脸上的肉都直哆嗦。喊,我要调查。”

“自从邓小平到了政治局,政治局就成了一个摆设,懂吗? 像个花瓶。他不给思考时间,文件事前不发,发了也来不及看,到会上去一大堆,根本来不及看,他就说,政治局通过了,就送主席,强加给主席,然后就利用他陪外宾能见主席,又说,这是主席的,来镇压政治局。发展到去年斗我,我讲话,他说我不听你的。我不听你的。”

她说:“邓小平这种事,恐怕很多同志不知道内幕。当然我知道的也不太多。不过,我是一个首当其冲的人物。他在去年 4 月底,不请示主席,擅自斗争一个政治局委员,4 月底一直斗我到 6 月。

邓小平是个谣言公司的总经理,他的谣言散布得很多,据说去年查谣言,有的省查,有的省根本不查,还扩散,一查就查到北京,就查不下去。

最近,我们才开了窍门,人家揭发了,一个就是他那个政治研究室。胡乔木,这是一个坏人。这个政治研究室不仅凌驾在国务院之上,而且邓小平他们还耍了一个花招,把原来的‘毛选委员会’干掉了。他把胡乔木这样的人也凌驾在政治局之上了。主席不同意的,不赞成的。这可是一个相当大的谣言店。”

“现在看来,全国的谣言都是邓小平弄的。说我一切职务撤销,下放劳动啊,说我已经自杀了。”

江青接着谈到了文艺问题,她说:“连《创业》也是他授意的,作者那封信确确实实是邓小平转的,主席的批示无比的英明伟大,主席并

没有看这个电影。《创业》这个题材是我推荐的,拍得粗糙一点,当然也有一些问题。主席的指示无比的英明就在于保护了我们一系列的电影、戏剧,很多东西,不然都是毒草。

人家揭发邓小平看电影《春苗》,看了几本,就说,大毒草。他们就是重视那个《海霞》,而且下命令让中南海的放映员去抄文化部主要负责同志的家,而且下命令让所有政治局委员都要去看《海霞》。"

"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没有这样的情形,命令整个政治局看《海霞》,不只是《海霞》。"

"还有体委,整庄则栋整得厉害,这都是在后头的,整我在前头。"

江青问:"湖南的那个张平化来了没有?"

张平化站起身说:"来了。"

江青:"你对《园丁之歌》那样积极,造了许多谣,那个信说是你支持写的,搞的?"

张平化答:"是。"

江青:"你能够造主席那么多谣,而且你安排了给主席看,是不妥当的。你还说初澜就让他烂了吧。你让一个服务员造那样多的谣。我已经核实了,我对这个戏两点意见,有意见我没说,就是对内容有意见。那个戏是我和春桥、会泳三个人审查的。它叫《园丁之歌》。我觉得园丁首先应该是主席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工人、贫下中农,怎么会成了知识分子呢?

意见最多、最深刻的是春桥同志。

你是搞反攻倒算,但是我们当时说也不要批什么,就压起来了。后来是你们湖南自己批的。那只好上演,批嘛。

初澜的文章我没有看。初澜是什么人,我也不知道。文章没看,是因为那个字太小,不看。……毒草锄掉还可以作肥料。《园丁之歌》可以上映,不是不可以,但要允许马克思主义的评论,来评它。"

张平化:"现在没有见谁有这个想法。"

江青:"你是完全搞翻案!"

张平化:"不是。"

江青:"你是好得不得了啊!我看你那封信了。那只是有缺点吗?那应当说是有错误。你就是独独没有登评《海瑞罢官》文章的。

我今天提出来,就是你太积极了。告状告到主席那里。叫主席看,主席从来在这一类事上是超脱的。你叫服务员来探听,找了那么一大堆,然后说,这个戏好得不得了。你在那里搞翻案,你没有执行邓小平那一套?现在我都有份。”

“你那个湖南就不受影响?你看你气鼓鼓的,我平心地讲,你有问题,我在这儿跟你讲理哩。我就不信,你那个文件上没有啊?你说过没有?军委扩大会不传达怎么行呢?中央的文件不传达怎么行呢?一个错误路线来了,坑了多少同志啊,坑人呐,害人呐。你不值得委屈,不要气鼓鼓的。这属于执行问题。有的执行得坚决,有的执行得不那么坚决。”“所以这个事情啊,认识有差别。我和同志们有差别,我认识可能早一点,抵制他也早一点斗争早一些。希望犯错误的同志尽快回到主席革命路线上来,”“能讲话的要讲话。我就不相信有人就死心塌地地跟邓小平走。林彪都没有带走一兵一将嘛,是不是?我不相信,所以要帮助。我今天看了,不能镇压群众。有些省有些问题。”

她对张平化说:“你自己要作深刻检查,你如果镇压了,你要作自我批评。来的同志,能说话的就要说话。我很不希望像廖志高那样,一下飞机就给抓起来。在座的同志,我不知道是不是每省都有,这是个大局,要回去先给造反派学习主席的重要指示。你们现在自己在这儿学习了,回去找造反派先学。我忧虑这个。当然大多数省是可以学下去的,个别同志要有精神准备,回去就让人家给捉起来。廖志高就被捉起来,我做了工作,陈佳忠做工作,群众听他的呀。中央候补委员陈佳忠同志做了工作,群众说三条,你廖志高都没答复,人已经放了。能说话的同志的是不是还有。你看人家清华。现在据说整个北京市都点名了,不上街,很听话的。去了很受教育。”

江青接着讲到了她和邓小平在政治局内的斗争,说自己是“过了河的卒子”,要吃掉邓小平这个“反革命老帅”:

“4 月开始到主席那里告状,所谓请教,那个办法是告状。主席就批了一个文件出来。他就利用这个文件,说是学习主席的指示,不报告主席,就斗了我。

5 月 3 日,主席召集政治局会议,会上对双方都批了,内容暂时在这儿不说。但是他又是根本不讲主席批他们的,把对我们的夸大了,

特别是对我。”

江青说:“主席在5月3日批他们,建议要看列宁的《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说列宁说,那是一群人啊!都是大知识分子,大反革命,要坑人。这个邓小平绝口不提。说军队要谨慎,中央委员要谨慎,这个他也不提。主席说不要搞广东帮、四川帮、上海帮,结果他只提上海帮。说是外国的月亮比中国的好。还有很多了。这些都是批他们的。

我们的主席对文化大革命都说了三七开嘛,我上一次讲了,就不重复了。我多想三,受过冲击的同志,你们多想那个七。

三也要一分为二,主席说了。至于那个三,我以前想,那根本不是我的错误。打倒一切,怀疑一切,那是陶铸的,还有国务院也有一个文件,说要层层烧透。当时王、关、戚他们想拿出去,我写了一个报告给主席。主席说这个不能拿出去,要保护总理、副总理。全面内战我根本没份。……虽然这两个错误不是我的,但是它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间发生的,我是中央文革第一副组长呵!这就要总结经验教训。

邓小平不仅翻文化大革命的案,他是所有的案都要翻。完全是个反革命两面派,他暴露得比林彪还快。”

“同志们,包括一些跟他多年的老同志,我就不相信同志们会跟他走,除了个别的坚决要跟他的。如果我说了这些,广大的干部、党员、广大的指战员、广大的人民群众,能答应邓小平吗?在座的同志能够答应邓小平这样欺负咱们的主席吗?我请问,在座的同志,包括我在内,都受主席的保护呵!

邓小平这样欺负主席,这样残忍,我不能不说了。”这时,江青抽泣、哽咽地说:“同志们哪,我们都没有责任保护主席吗?我是觉得应该想一想呵!

我今天说的不仅是这个,他是个大汉奸,现在已经走得很远了。他要是上台,像我这样的人,那是千百万人头落地。

我公开在政治局讲,我已经有精神准备,杀头、坐牢,我不过只有一个头吧,从入党的时候,就作了精神准备。不过我这头也要保护自己一点,不能随便叫他们杀头、搞死。向来我身上没有一点儿钱,现在带那么几十块。”说着,江青就在她的包里找钱,没有找到,说:“噢,这

次又没带。弄不好,我就走。”

“据我知道的,在很早主席就跟我讲过,不要喊打倒刘邓路线了,要有区别,要把邓小平跟刘少奇区别开。我听招呼了,就不跟着喊了,因为大家都喊刘邓路线嘛。我们都一直是在顶着干呐,受伤都不下火线,他保护得好好的,养的那么健健康康的。我是确实对他满腔希望,因为我看到主席一番苦心,怎么样保护他,然后怎么调他回来,用什么方法来恢复他的名誉,来提高他的威信,这我都知道,都看在眼里。他回来,开始对我很好,两面派啊,我倒觉得邓小平是个通情达理的人呐,能够谈心的人,我可找到了这么一个人,觉得他可以。那时总理病重,我原来比较忧虑总理这个位置,后来就不太忧虑了,我甚至觉得他可是一个团结安定的因素,这个话对在座的那个同志讲过。他才不是安定团结的因素呢,才是一个破坏,分裂的大阴谋家呢。”

“我对邓小平有个认识过程。我想在座的同志可能比我熟悉他。我实在是不熟悉他。在座的有没有他的部下,或者是老的,大概也不熟悉,因为他这个人啊,可是不接触人,不接触群众。他到大寨去,连一个中午都不住,到老百姓家里都不去。

据这次揭发,他家里的常客是什么人呢?李井泉、胡乔木、胡耀邦,还有王海容、唐闻生。还有什么人,我搞不清了。那都是无话不说,交待任务的,别人不能去。”

“现在的资产阶级不在于荣毅仁,那个谁都知道,而在于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大官,在于咱们。

我资产阶级法权挺多的,我虽然老是自己限制,还有一些,有一些还必要,不然我就不能工作了。资产阶级糖衣炮弹那可厉害了,我曾经形象地说过,我是且战且走,打中了自己,擦干了血迹,包起来再上战场。要提高警惕,你看我们都住着楼房,我住宾馆,我没有住那个最好的,是因为怕爬楼梯,我住底下工作人员的房屋,我有汽车、警卫员、秘书、护士。我必须要有护士,因为我每天吃毒药——安眠药。我吃的量特别大,自己不能掌握。我没有服务员,我是女同志,不需要服务员。护士、战士、还有司机,在座的恐怕不少吧。所以咱们属于大官。

我有这么两句话:‘巡抚出朝,地动山摇。’确实要小心呵!确实有这个问题。像我这样的人,不要去要,人家就送上门来了。这里有不

少同志有我这种情况。我不需要走后门,别人就替我安排了。礼物给我送上门来,拒绝了。我到哪儿去,吃饭都是别人陪着吃,我后来想了个办法,每人出一份,会餐。革命化。”

“别人造谣我是武则天。我说,在阶级问题上,我比她先进,但在才干上,我不及她。有人又说我是吕后。我也不胜荣幸之至。吕后是没有戴帽子的皇帝,实际上政权掌握在她手里,她是执行法家路线的。”

“他们就是用下流的东西诽谤武则天,诽谤吕后,诽谤我。目的是诽谤主席嘛。还有比这个还厉害的,我就不能说了。这个事情涉及到主席,你们也不要去扩散。我建议你们也看看这段历史。……像我这样的人,因为文化水平是不高的,我用工具书就可以看懂。在座的大学生也有了,有没有?我反正只是个高小学生。蹲图书馆的时间多,大概有的同志比我们还低一点儿。就这样吧,我占用同志们时间很多,我要讲错了,同志们批评我。”

3 月 3 日,中共中央连续发出 4 号、5 号、6 号文件,下发毛远新整理的《毛主席重要指示》和华国锋在中央召集的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领导会议上讲话。当天,《人民日报》发表《批判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进一步不点名的批判邓小平。文件中毛泽东的指示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以他亲手写的文字为根据,毛远新只是加了一些“因此”、“所以”之类的连接词而已,并在整理好后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只改了一个字,即把邓小平说的“黄猫黑猫”中的“黄猫”改成“白猫”。

毛运新为什么写成“黄猫”呢?因为他查了邓小平的原话,说的是“黄猫”。

# 第1384回：看江城，再掀反击翻案风 追万里，《文汇报》“三五事件”

1976年春节，武汉的夏邦银、朱鸿霞、胡厚民、李想玉、潘宏斌、田学群、曹承义、彭勋、吴炎金和市档案处干部、市机关“红司”二号勤务员郑峰等人在“交通联司”一号勤务员傅廉家聚会，傅廉夫妇用很丰盛的酒席招待大家。胡厚民、曹承义、潘宏斌、郑峰和吴炎金比较能喝，大家又很久难得聚在一起，所以非常高兴，结果郑峰当场喝得大醉，吐了一地，连胆汁都吐出来了。

大家乘着酒兴，边吃边谈，说得最多的是胡厚民和彭勋，他们都表示，决心紧跟毛主席“重上井冈山”，坚决反击邓小平刮起的右倾翻案风。胡厚民提出要请“工总”核心组成员、时任武汉锅炉厂革委会副主任、武汉市革委会常委沈复礼出山，曹承义自告奋勇前去联系。另外还有“联司”的一号头头顾建棠，也要前去联系一下。

胡厚民提出：“这次批邓，要请两位造反派中央委员举旗子。”

这两位，一位是“工总”常委、省革委会常委、汉阳轧钢厂工人夏邦银，另一个是“工造总司”成员、武汉国棉三厂劳动模范谢望春。夏邦银是中共中央第九届、第十届中央委员，谢望春是中共中央第九届、第十届候补中央委员。

以后，他们又在“工造总司”头头、省革委会常委潘宏斌家多次开会，决定由夏邦银、谢望春、朱鸿霞、李想玉、吴焱金、胡厚民、顾建棠7人组成领导班子。

除了领导小组，他们还搞了一个参谋班子，参谋长是胡厚民，成员有顾建棠、沈复礼、聂年生、彭勋、曹承义。聂年生参加一两次会后自动退出了。这个参谋班子又戏称为摇鹅毛扇的鹅头鹅毛班，胡厚民被称为鹅头，其余都是鹅毛，大家常以此互相取笑。

就在2月，以中央委员夏邦银、候补中央委员谢望春领头，省市革委会中的造反派头头共22人署名的《给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致敬信》在

汉口水塔公开张贴出来了。由在汉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带头写大字报上街,在武汉文革史上还是第一次,在武汉三镇引起轰动,大字报很快被转抄、翻印。这份大字报是由参谋班子执笔写成的。

第一封公开信发表后,又张贴了第二封公开信。

中央4号文件传达后,里面有毛泽东的这样一句话:“对造反派要高抬贵手,不要动不动就‘滚’。”胡厚民等人经过研究,提出:为接受反复旧运动的教训,这次不组织大规模的群众运动,而是充分运用宪法保障的“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四大武器,以省委第一书记赵辛初1975年6月4日在省委扩大会上的讲话为突破口,在“滚”字上做文章,要把通过“两清一批”从各级革委会“滚”出去的造反派代表再“请”回来。办法是:“上促下攻,内紧外松,立足基层,统一行动。”这个口号是顾建棠提出来的,原来是1974年批林批孔运动中,夏邦银到中央开会听到的北京和上海经验,然后他打电话告诉朱鸿霞和胡厚民的。

彭勋拟定十几条顺口溜作为大标语,由曹承义派人刷遍武汉三镇。大标语有:“湖北有个赵辛初,扩大会上来讲话,手舞邓记尚方剑,六月四日大砍杀”,“六四讲话大毒草,滚出去要请回来”,“两清一批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对造反派要高抬贵手”等。

随后,彭勋第一个在武汉市建工局礼堂作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报告。

彭勋,共产党员、湖北大学青年教师、“新湖大”头头,有很好的口才。一次在同原湖北省省长张体学谈了五个小时的话以后,张体学很欣赏他的口才,说:“你真是个油嘴啊!搞得好前途无量,搞不好会成第二个梅白。”谈话时有其他武汉“新”派头头在座,“彭油嘴”的绰号很快传开了。文革中,江城父老不一定知道彭勋的大名,但一定晓得“彭油嘴”。

两封公开信和彭勋的打油诗标语以及随后朱鸿霞、李想玉、吴焱金、彭勋、曹承义等人在各系统和单位的演讲,把武汉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火点起来了,基层的造反派群众也迅速掀起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热潮。

3月5日是周恩来的诞辰,也是中国的学雷锋纪念日。新华社在

这天凌晨播发了沈阳部队指战员学习雷锋的电讯,内中提到了周恩来对雷锋的题词:“憎爱分明的阶级立场,言行一致的革命精神,公而忘私的共产党主义风格,奋不顾身的无产阶级斗志。”全国各报差不多都在3月5日全文转载了这一电讯。然而,3月5日的《文汇报》与众不同:第一版醒目地刊登文化部写作组以“初澜”笔名所写的文章。新华社那条电讯,《文汇报》安排到第四版,而且,删去了电讯中周恩来的那四句题词。

《文汇报》要闻部夜班编辑组是在3月4日晚上24时许收到新华社电讯稿《沈阳部队指战员坚持向雷锋同志学习》和通讯《雷锋精神永活在我们中间》。据说当时四个版面稿件已安排就绪,有的已出大样。要闻部夜班值班负责人经请示领导同意:将上述两份电讯稿交给国际版(第四版)编辑刊登,如果稿件太长,可以删掉一些。

编辑随即把《沈阳部队指战员坚持向雷锋同志学习》的消息作了删节,并把经删节的小样和第四版版样一并送交值班负责人审定,值班负责人说不看了,时间很晚了,赶快去拼版。

《沈阳部队指战员坚持向雷锋同志学习》的消息共删去四处,其中一处为“不少部队还培训了雷锋故事讲解员,结合各项政治和部队工作,向干部和战士介绍雷锋同志爱憎分明的阶级立场,言行一致的革命精神,公而忘私的共产主义风格,奋不顾身的无产阶级斗志,引导大家走雷锋成长的道路,作雷锋式的共产主义新人”。这段文字中的“雷锋同志爱憎分明的阶级立场,言行一致的革命精神,公而忘私的共产主义风格,奋不顾身的无产阶级斗志”是周恩来给雷锋的题词,据后来审查此事时编辑交待说,他在匆忙中未及检核,原文未标明出处,又未加引号,他“不知是周总理的题词”。

《文汇报》这样做,在当时的形势下,其影响可想而知。一时间,《文汇报》社的电话铃声响个不停,读者纷纷质询他们:“为什么删去周总理的题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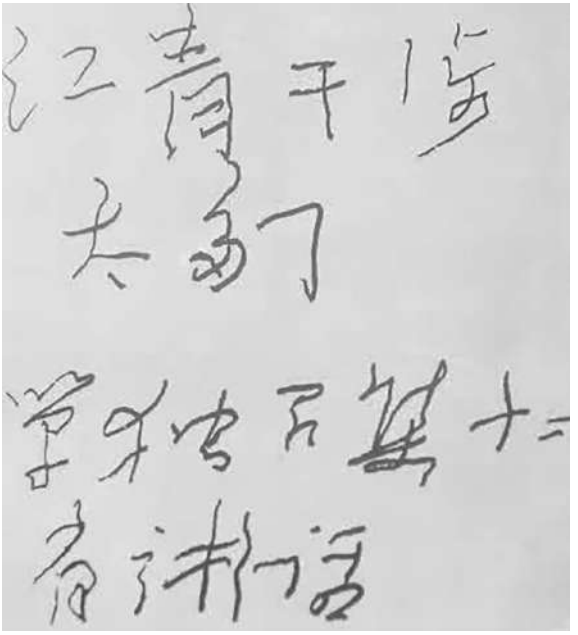
3月6日,南京市新街口,有人将《文汇报》第四版那篇删去周恩来题词的新华社电讯,用红笔圈出来,贴在墙上。南京新街口是南京最繁华的中心路段,上下班高峰人流很多。这张报纸引起了瞩目。消息很快就在南京人中间口口相传。周恩来虽然从小就去了天津,但是

他的老家淮安仍然把他当成自己的人,一个值得骄傲的老乡。从周恩来逝世到追悼会召开的7天内,南京共有2500多个单位的32万多群众前往周恩来在南京的故居——梅园新村凭吊。正值严冬,寒风呼啸,天暗云低,人们从四面八方赶来,在梅园新村纪念馆墙外排起了长队,追悼队伍从梅园新村街道向长江路、太平北路、北京东路、鼓楼广场延伸,长达二、三公里。此后,梅园新村纪念馆接到闭馆通知,被迫停止开放,许多群众公开责问:“为什么不让我们悼念总理?”

而这次,南京人愤怒了。

3月7日,杭州市贴出《马天水想干什么?》的大字报,署名“冯火”。作者是《浙江日报》的记者:李力和潘旭。

3月10日,毛泽东得知江青3月2日的讲话后批示:“江青干涉太多了。单独召集十二省讲话。”




他让转告华国锋:江青的这个讲话是不对的。对江青要求印发

“风庆轮”问题材料一事,毛泽东批示:“不应该印发。此事是不妥的。”

后来,张春桥问姚文元:“知道不知道江青、王洪文到省委书记会上去了?”

姚文元说:“不知道。”

张春桥说:“他们还会讲出什么好话,无非惹些麻烦,让我们也跟着受牵连。”

3月10日,《人民日报》发表经姚文元审改的社论《翻案不得人心》,不点名的指责邓小平就是“煽起右倾翻案风的那个人”。文章还直接引用了毛泽东对邓小平的批判:“合作化时党内就有人反对,批资产阶级法权他们有反感。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

这天,《诗刊》1976年二、三月号刊登了朱德委员长的两首词:

喜读主席词二首

毛主席76年词二首发表,聆,读再三,欣然不寐。吟咏有感,草成二首。诗刊索句,因以付之。

一

昔日上井岗,革命得摇蓝。
千流归大海,奔腾涌巨澜。
罗霄大旗举,红透半边天。
路线成众志,工农有政权。
无产者必胜,领袖砥柱坚。
几度危难急,赖之转为安。
布下星星火,南北东西燃。
而今势更望,能不忆当年。
风雷兴未艾,快马再加鞭。
全党团结紧,险峰敢登攀。

二

鲲鹏九万里,直上云海颠。
伟哉大宇宙,壮志充其间。

可笑蓬间雀,称霸欲吞天。
倏尔控于地,仙阁化为烟。
文革号炮响,帝修心胆寒。
春风化红雨,新枝壮且繁。
老中青一体,路线共瞻前。
阶级斗争纲,纲举目豁然。
掌握辩证法,统一宇宙观。
真心搞马列,地覆又翻天。

3月10日,贵州市中心紫林庵贴出一份3万多字、长达80多张纸的大字报,题为《关于目前形势和新的历史任务的几点看法》。文中提出:“把主要精力放到发展我国社会生产力方面来,使我国经济提高到世界先进水平,以保证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和无产阶级专政更加巩固……乃是我国在目前时期的首要问题和中心任务。”这篇大字报反映强烈,很多人表示“支持这张革命大字报”。

大字报的作者是几家工厂的普通工人:李洪刚、郭成望、王大卫、陈明云、叶忠源、黄维鸣、卢炎。这7名青工,还将大字报油印80余份,自费前往长沙、郑州等地散发。

张春桥接到上海《学习与批判》送给他的这份大字报摘要后,立即批示:“看来修正主义已后继有人”。

公安部下令,要贵州公安部门对这份大字报立案追查。

3月11日,福建三明市农机公司赵大中在三明市贴出了《论扩大共产主义思想的宣传——批判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张春桥》的大字报,文中说:“我把他的罪行公诸于众,可以唤起人们的注意,张春桥是个坏人!万一他的阴谋得逞,也要叫他的日子不好过。这样,我杀头也甘愿。”

几天后,赵大中再次写出了更为激烈的续篇……

2月下旬,中央关于解决郑州和兰州铁路局问题文件下达后,点燃了铁路部门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之火。铁路下属单位一些人纷纷从外地来京上访,冲击铁道部机关,在铁道部院内墙壁上刷着“打倒万里”,“揪出走资派、黑干将万里”,“揪出邓小平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急先锋万里”,“万里镇压造反派,罪该万死”,“万里不倒,火车不跑”

等大标语。同时,铁道部大院内也贴满了揭批万里和工作组的大字报。

这些上访人员,大部分是1975年铁路整顿期间,受过处分或批判的干部、工人。有男有女,有的还带着孩子。他们点名要找万里,找铁道部副部长、机关党委书记刘建章和有关工作组的领导。万里和刘建章分别用了一个多星期的时间,接见了太原、临汾分局和兰州第一设计院、郑州局和洛阳机车厂、昆明铁路局等单位的上访人员,听取了他们的意见和批评,动员他们回原单位抓革命,促生产。但收效不大,有的刚回去又来了。

上访人员越来越多,越闹越凶。他们别的领导不找,专找万里、刘建章,抓住了就不放,以致部领导小组会议无法在部里进行,不得不到二七剧场去开。为了应付这种局面,刘建章副部长不能参加部领导小组会议,专门接待上访人员。

由于一些地方领导的支持,来京上访人员越来越多。高峰日达400多人,铁道部招待所住不下,有些人就住在外边。兰州铁路局所属一些单位的上访人员闹得最凶,他们几十人强占了万里的办公室,在那里搞"进驻",吃住在那里。办公室内有直通全路各地的长途电话,于是万里、刘建章的办公室,就成为他们的"联络站"了。3月6日中午,万里部长办公室一屋子男男女女上访人员,还有孩子。地上、沙发上、床上、办公桌上、椅子上,以及窗台上,到处躺满了人,到处都刻着"打倒万里"……

3月11日,昆明铁路局40多名上访人员,要求万里到铁道部招待所会议楼回答问题。万里的秘书于廉和徐守和一看势头不妙,对新华社记者张广友说:"昆明局这些人今天找万里同志可能要闹事,你们去看看吧。你们一去即使不说话,对他们来说也是个威慑和制约,必要时你以记者身份说几句话,解解围,可能会起点儿作用。"于是,张广友和新华社另一位记者黄奉初随同万里到了铁道部会议楼的一间简易平房里,屋内大约四、五十人,一个个满脸怒气。

上访人员中一个人开始提问题:

"去年你去昆明局是否刮了'右倾翻案风'?"

"是根据谁的指示干的"

……

你几句,他几句,情绪越来越激烈,气势越来越凶,张广友一看不妙,赶紧站起来说:“有话慢慢说,一个一个地说,你们这么乱,我们连记都记不下来了……”这几句话还真灵,大家都回到了原座位,一个接着一个说。

已经是下午13时30分了,张广友站起来说:“现在已经是一点多了,该吃饭了。”

大家不干,说:“我们还没讲完呢。”

张广友说:“你总得让人家吃饭呀,而且你们也得吃饭呀,”他指着手表说:“你们看看都啥时候了?有什么意见以后再讲嘛!”他边拉着万里边往外走,边回答说:“找不到他,你们找我!”

两位记者在万里家里吃了午饭。饭后,他们坐在客厅的沙发上,边喝茶,万里边向他们介绍了铁道部的一些情况和他的一些看法。

万里说:“去年铁路整顿,大家的意见是一致的,成效是大家都看得见的,上上下下一致叫好。至于是否有缺点、错误呢?局部地方是不可避免的,这不是哪一个人的问题。我担心的不是我个人如何,我担心的是运输生产要受影响。现在他们的矛头实际上是对着邓小平的。邓小平不倒则罢,邓小平倒了,你们保我也没用。我对这些是很不理解的,但客观事实的确如此。前些天中央在解决郑州和兰州铁路局的文件中,为什么非要点黎光和苏华的名字,而不让点我的名字。我顶了一个多星期,最终还是中央决定了,我只好服从。”

在谈到大批上访人员问题时,万里认为:这个问题不是一般复杂,而是很复杂。去年我们铁路在全面整顿中带了头,批了派性,调整了一些单位的领导班子。这些人来闹,主要是借“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之机为自己翻案。

# 第1385回：小学生，抬花圈到天安门 三二五，《文汇报》再遭质疑

再说重庆的白智清在1976年2月18日的大字报上直书自己的名字后，没有受到来自任何方面的威胁。于是他又把第二张大字报写好，于3月3日深夜登上开往成都的列车，于3月4日早上8时许，在成都最繁华的市中心盐市口，把那份长达6千多字的大字报一张接着一张的贴出来。大字报的标题是：《试问，到底是哪家主义？——评张春桥的“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认为张春桥不是马列主义者，而是“打着共产主义旗号，给国家、给革命、给人民带来深重灾难的修正主义”。他批判张春桥在《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一文中所提到的“共产主义供给制”，认为1958年爆发的大饥荒，正是因为农村实行了“包吃、包穿、包住、包教、包治病”等等这样的“供给制”造成的。

这张大字报轰动蓉城，聚集起来的几万群众堵塞了交通要道盐市口。人太多了，后面的看不见，有人爬上道旁的法国梧桐，骑在树丫上高声朗读。闻讯赶来看大字报的人越来越多，晚上人们打开了手电筒，一直看到3月5日凌晨。大字报的空白处，写满了批语。

3月5日上午，成都硅酸盐厂的工人赶到盐市口，挤进人群去撕毁大字报，与围观的群众发生争斗，愤怒的群众把他们打得头破血流，然后一哄而散。这就是轰动成都“三五事件”。但是赵紫阳没有任何的表示。

3月10日，几百人冲击省委和成都市委机关，进驻省委大院三天两夜，提出“打倒二赵（赵紫阳、赵苍璧）—许（许梦侠）”的口号，要求揪出四川的“还乡团团长”。

3月13日，四川省公安厅下达了一份“由公安机关内部掌握，请勿张贴”的通缉令，称白智清张贴大字报“是一个重大的反革命事件”。

3月13日，四川部分群众挟持省委书记段君毅和许梦侠到北京告状，准备向中央递交揭露四川省委“抵制批邓”和“包庇反革命分子白

智清”的材料,要求改组四川省委的领导班子。国务院办公厅秘书长罗青长出来接待,批评他们挟持省委书记上访的行为是错误的,要他们放人。

3 月 19 日,北京朝阳区牛坊小学的师生来到天安门广场,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为周恩来敬献了悼念周恩来的第一个花圈。从这天起,北京人自发汇集到人民英雄纪念碑周围,献上花圈和花篮,把一朵朵白纸花扎在广场四周的松枝上。接着,无数的花圈、挽联相继出现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周围。天安门广场逐渐成为花圈的海洋。花圈在无言地倾诉,花圈上的挽联也在默默地交流着某种信息。走进这肃穆的海洋,你随时都可以读到感人至深的诗句:

“敬爱的总理,您回来吧,我们日夜想念您!”

“四个现代化刚刚着手,您怎么能离开人间?回来吧,回来吧!回来还去国务院。在那里把好人扶起,把坏人撤换!”

“一生奋斗,为中华新颜;灰撒江河,换大地常春。”

“九州埋忠骨,大地生辉,总理精神永驻;八亿仰英灵,民心承露,斯人浩气长存。”

“敬爱的周总理,我们日夜思念您。”

“人民的总理人民爱,人民的总理爱人民。总理和人民同甘苦,人民和总理心连心。”

“天地一声雷,地倾绝其维。顿时九州寂,无语皆泪水。相告不成声,欲言泪复垂。听时不敢信,信时心已碎!”

3 月 20 日,广东顺德大良轧钢厂工人杨振汉写信给毛泽东,批判张春桥。

杭州市“冯火”继 3 月 7 日贴出《马天水想干什么?》的大字报后,3 月 21 日又贴出《马天水在干什么?》的大字报。

3 月 24 日,北京市公安局指令天安门派出所“把送花圈的单位、人数、送了多少花圈等汇总上报”。

当天,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反击右倾翻案风中各地禁止来京上访的通知》。《通知》指出:“最近,浙江有几批学生,强行登上火车,要求来京上访和到清华、北大看大字报。经过阻劝,大部已经回去了。中央认为,这种做法是不妥当的,不符合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精神,影响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

中央要求各地要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重要指示和中央文件的规定,对强行登车要求来京的人员,应做好思想工作,坚决劝阻。告诉他们,整个运动要根据毛主席指示,在党委一元化领导下进行。不搞串连,不搞战斗队。在本地区、本单位搞好教育革命大辩论,深入揭发批判邓小平同志的修正主义路线错误,把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进行到底。”

3 月 24 日,南京江苏新医学院 73 级中医系的 100 多名师生要到雨花台去祭奠,江苏淮阴学生潘朝曦在祭奠条幅上写了:“革命先烈、敬爱的周总理永垂不朽”,落款为:江苏新医学院中医系七三年级全体同学。

这个花圈在被江苏新医学院中医系七三、七四级 200 多名工农兵学员和部分教职工抬着前往雨花台的路上,引起了人们的围观和议论,很多人大声叫好,并且尾随花圈,形成人流。

不料,到了雨花台,他们的花圈摆放好后,有一个挎着照相机,身穿工作服的 30 岁左右的男子过来,把写有“革命先烈、敬爱的周总理永垂不朽”的缎带扯掉了。这一下子,惹恼了中医系的同学,他们把这个人围住,问他为什么要扯下他们的缎带。该男子说,他刚从上海回来,听说上级有指示,不准悼念周总理。听他这么一说,学生们一下子就火了,把他揪起来就打。后来,班干部黄成惠、何文彬等人怕打出人

命,就让大家先把他抓到一个房间里审问。这件事在雨花台闹得沸沸扬扬,双方争执不下。

下午17时多,有同学跑回学校,把事情的经过告诉了先返回学校的潘朝曦。他一听就火了:“你不让我们悼念,我们非要悼念!”他对沈桂武等几个同学说:“走,我们上街刷标语去!”说完,自己就提着墨水桶,夹着白纸,带上大排笔,其他同学拎着几桶糨糊,一起来到南京市最繁华的新街口。他们在人民银行的围墙下,用两张白纸拼贴到一起,形成一个巨大的白色方块,然后,潘朝曦用大排笔写下:

“誓死捍卫周总理!强烈要求省市委严肃处理雨花台三二四政治事件!”

这28个大字,每个都有一人多高,非常醒目。落款是:“江苏新医学院”。

当时正值下班高峰,新街口人如潮涌。见到了这条标语,大家都围观上来,议论纷纷。很多人问发生了什么事情?雨花台政治事件是什么意思?潘朝曦和他的同学们一遍又一遍地大声解释,围观的人越来越多,引起了严重的交通堵塞。

晚上19时多,当潘朝曦他们筋疲力尽地回到学校,发现整座南京城就像一堆干柴一样被点燃了。学校值班室的电话一夜到天亮响个不停,南京各个大学和事业单位纷纷打电话来江苏新医学院询问,并表示坚决支持……

南京省委书记彭冲于第二天,3月25日凌晨5时多,驱车赶赴江苏新医学院,让校领导立即召集中医系七三年级学生和干部开会。忙了一天正在酣睡的潘朝曦等同学,被系党支部书记朱林森和年级辅导员杨慧玉等紧急叫醒。他们对彭冲的到来即兴奋又紧张,立即商量对策,决定让一部分同学去开会,拖延彭冲;然后,让班级的“秀才”杜文东把事情经过写成文章,潘朝曦和沈桂武分头抄写成两份大字报,派同学火速张贴到南京新街口中央商场对面和鼓楼广场主席台附近。

当彭冲在江苏新医学院侃侃而谈,试图稳住学生时,这两份题为“三二四雨花台政治事件真相”的大字报已经贴出去了。

而这一天,3月25日,上海再次发生轰动全国的《文汇报》“三二五事件”。起因是这天《文汇报》头版刊登的一篇标题是《走资派还在

走,我们就要同他斗》的报道中,有这样一句话:

“党内那个走资派要把被打倒的至今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扶上台。”

这句话再次引起了读者的震怒。

“被打倒的至今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是当时对邓小平的“专用代词”,大家一看就明白。但是,那个把邓小平“扶上台”的“走资派”又是谁呢?能让邓小平上台的只有毛泽东,毛泽东肯定不是“走资派”。毛泽东之下就是周恩来了,这不是在说周恩来是“党内那个走资派”吗!

“《文汇报》骂周总理是‘党内走资派’!”这消息一传十,十传百,短短几天内,《文汇报》就接到抗议信件420多封,抗议电话1000多次。

“《文汇报》如此狗胆包天,后台是张春桥!”本来,愤怒的汽油早已撒遍中国大地,《文汇报》“三·五”、“三·二五”事件的火花,再次点燃反张春桥的熊熊烈火。

《人民日报》3月10日社论《翻案不得人心》发表后,上海市仪表局党委中心学习组组织学习,《文汇报》记者就请仪表局办公室通讯员写了关于这次学习的报道,其中有这样一段话:局党委副书记戴梦鳌说:“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是孔孟之道的忠实信徒……他效法孔老二克己复礼,迫不及待地刮起右倾翻案风……”

本来,在上海市仪表局党委中心小组发言时,戴梦鳌是指名道姓说“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是孔孟之道的忠实信徒”的,但是因为当时中央还不允许公开点邓小平的名,所以见报时,删去了“邓小平”三字。

报道接着在批“举逸民”时又说:“党内那个走资派要把被打倒的至今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扶上台”,据后来相关人员说:前者“党内那个走资派”是指邓小平,是前文戴梦鳌那句话的省略用句,后边那个“至今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是指当时教育部长周荣鑫等老干部。

但是,很多群众对于周恩来逝世后的一些举措已经非常不满。而《文汇报》3月5日在报道中删去周恩来题词事件发生不久,3月25日又出现“党内那个走资派要把被打倒的至今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扶上台”的词句时,大家当然认为这是再次把矛头指向周恩来。

上海《文汇报》“325 事件不啻于对南京“324 事件”火上浇油。3 月 25 日下午,南京大学 50 多名工农兵学员抬着花圈来到梅园新村纪念馆,要求进馆内悼念周恩来。纪念馆未接到开放通知,没有开门,他们就翻墙入内开了大门,在馆内举行了悼念仪式。

此时,南京群众的情绪已经不可遏制了,几乎每个人都准备在清明节把悼念周恩来总理的活动再推进一步。南京大学数学系团总支书记李西宁准备在 4 月 5 日清明节那天,以数学系团总支的名义搞一个大动作。但是 3 月 26 日的晚上,他们系里一个叫陈海潮的学生跑来告诉他:“中央已经有文件下来了,说反对封建迷信,不准大家在清明节前后搞悼念周总理的活动。”

李西宁听到这个消息后,当即决定抢在中央文件公开传达之前采取行动。

第二天一大早,他就跑到学校办公室去借周恩来的遗像。学校办公室出来接待他的是当年南京大学“八大左派”之一的吴老师,一听是数学系团总支要搞活动悼念周恩来,就把周恩来的遗像借给他们。

随后,李西宁又去向校党委汇报,校党委模棱两可,并没有阻止他们。于是,李西宁又找到数学系的党总支副书记刘老师,他也很支持,并说:“你们布置好了以后通知我们一下,我们让系里面的老师们一起参加。”

3 月 27 日晚上,李西宁召集系团总支扩大会议,准备第二天举行悼念周恩来的活动。

3 月 26 日,湖北武汉锅炉厂 200 人集会,指名批判江青和张春桥。

也是在 3 月 26 日这天,北京,政治局开会,听取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两个学校汇报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情况,面对面批判邓小平。会议由华国锋主持。

这次会议的起因是 3 月中旬,江青对毛远新说:“两校批判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搞得轰轰烈烈,政治局的会却开得冷冷清清。应该请他们到政治局会上来介绍一下运动情况,可以面对面地批判邓小平。”

过了几天,在一次政治局会上,江青又提出:“清华、北大是主席亲自抓的点,主席要中央机关、各省来参加打招呼会的人都去两校参观

学习,他们反映效果比较好。政治局的同志都没去过,建议请两校的同志到政治局来。”

会后,毛远新把江青的意见报告了毛泽东,毛泽东同意。

3 月 24 日深夜,迟群和谢静宜在清华大学校部大楼党委会议室召集部分党委成员和“梁效”写作组的骨干分子张凤瑞、胡健、荣泳霖、夏镇英和党委办公室副主任吴敏生开会。在会上,谢静宜首先传达了毛远新的指示,大意是:中央要听我们汇报开展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情况,要选几个人到政治局去面对面批判邓小平,要给政治局透点新鲜空气。

3 月 25 日上午,迟群、谢静宜又召集他们几个人继续商量,最后确定由清华党委副书记周家悫在政治局会上主讲,其他人插话,并规定了每人插话的内容。迟群说:“中央要我们去汇报,就是要同邓小平一类修正主义大官们作斗争。”“谁也不要怯阵,发言既要有分量,又要有质量,要讲出水平来。”迟群还授意“汇报的内容要以对外接待提纲为基础,把接待介绍的第三人称‘他’,一律改为‘你’,‘你是一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让你们一伙人死了心吧!’……”他还讲:“汇报时要考虑到还有一层人,要突出揭发、批判、剥画皮,重点是经济问题和经验问题。”“主要由你们讲,我们俩见机插话。……”

3 月 26 日,政治局开会,清华大学周家悫当着邓小平的面说他是一个死不改悔的走资派,一贯倒骑毛驴向后看,一贯搞复辟倒退。

“梁效”写作组的胡健在发言中提到邓小平 1957 年 1 月在清华大学的讲话,说是“一个阶级斗争熄灭论的黑报告”,“大长了右派的威风,把右派全放出来向党疯狂进攻,使得清华大学 57 年就冒出了 560 个右派分子”。

“梁效”写作组的张凤瑞在发言中指责邓小平翻文化大革命的案,打击新生力量,称邓小平是“资产阶级民主派”,“只有搞修正主义的经验,只有走资派还在走的经验”。

谢静宜在插话时说:“75 年第三季度,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这个时期在八宝山给 32 名在文革中自杀的老干部开了追悼会,去参加追悼会的人很多,还有不少是坐着大红旗轿车去的。”

王洪文说:“贺龙的追悼会,周总理也去参加了……”

会上,张春桥说邓小平“是老牌机会主义者,连托洛茨基都不如!”

王洪文说:“邓小平去年6月到上海,私自找马天水谈话,让他有事不要找市委,要直接请示他,搞得我们几个市委书记都不管用了。”

姚文元说:“去年主席批给政治局的几条指示,怎么那么快就传出去了?还有那些小道消息,搅得人心惶惶,要查一下,根子到底在哪里?”

江青气冲冲地说:“根子就在政治局!国务院政治研究所就是造谣总公司,邓小平你就是总经理!下面还有分公司,分经理。”

会上,邓小平一言不发。

迟群质问他:“邓小平,你不吭声就是顽固对抗!”

江青无可奈何地说:“你们是少见多怪呀!政治局每次开批邓会他都是这个样子,死猪不怕滚水烫嘛!”

事后,毛远新把这次会议情况报告了毛泽东,说邓小平的态度不好,会上一句话不说,最后连个态度也不表。

# 第1386回：看河南，大字报直指刘、纪 接建勋，政治局当面批邓

我们再看河南。中央2月25日召开的12省打招呼会议后，河南的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已由教育界的大辩论扩展到全社会，在1975年整顿中受压的那些造反派纷纷组织集会、串联、游行、贴大字报，把矛头指向了各级党委，也指向了纪登奎和刘建勋。河南省委常委连续开会，研究如何“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如何转弯子，如何检讨等问题。3月17日，刘建勋在省委常委扩大会议上说，要一方面批邓，一方面检讨，向造反派认错。

纪登奎自“批邓”以来日子也不好过，尽管他作了检讨，纠正了一些“错误”，表示要“批邓”，为解决郑州铁路局的问题，纪登奎派人到河南“纠正错误”。他说：“去年处理邢介江的问题，你们去看看，全错全平，错多少平反多少”，“刮右倾翻案风，我到河南也讲了错话，群众批也是应该的”。

但是，河南依然毫不客气地贴出“走资派还在走，投降派确实有，革命派要战斗”的大字报，说“去年夏季前后，纪登奎追随邓小平在河南大刮右倾翻案风，错误极为严重。”

大字报还说：“在河南，刘建勋就是刮右倾翻案风的风口，纪登奎是河南右倾翻案风的积极策划者，是主谋。”

“革命无罪，造反有理！投降有罪，招安可耻。”

这时，郑州大学7名造反派领袖党言川、任延庆、张书震、李长杰、唐一兵、程天富、方复山写出了题为“郑州大学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历史不容颠倒——略谈纪登奎同志关于郑州大学文化大革命的几次讲话”的大字报，要求省委呈报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文中说：

“纪登奎、刘建勋在文化大革命中也支持过郑大师生造反。但事过九年，在去年夏季前后邓小平大刮右倾翻案风中，他们不是站出来反击，而是站出来帮腔。在许多重大历史问题上颠倒历史，混淆黑白，

竭力否定郑大文化大革命,为右倾翻案、复辟倒退的反革命逆流推波助澜。”

他们在大字报中向纪登奎提出了这样几个问题:

第一,“文革”初期,当权派把革命造反派打成反革命,究竟是像纪登奎去年讲的那样,因为我们这些人不太好,有些言论是右的,是群众自发起来抓我们的反革命,还是因为我们起来造了反,走资派挑动群众斗争群众,把我们打成反革命?对此,纪登奎应当清楚,郑大的文化大革命,毛主席、党中央当时是表了态的。请问,你这样讲,把毛主席的指示,党中央的决定置于何地?

第二,关于刘建勋同志的一张大字报。纪说刘建勋的一张大字报“意思是不要打他反革命,这样一来,他的资本就高了。”文革初期刘建勋的这张大字报,受到毛主席、党中央的表扬,是支持革命群众起来造反的。这绝不是只关乎党言川同志一个人的问题,而纪登奎现在这样讲,从根本上否定了这张大字报的政治意义,无非是说,刘支持我们的这张大字报是假的。我们没有忘记,纪还是这张大字报支持者和起草人之一。现在否定这张大字报,就是否定了郑大和河南的文化大革命,也等于否定了纪登奎本人。

第三,关于党言川同志反党中央反周总理的问题,纪登奎这样说是毫无根据的。……

第四,纪去年到河南,风尘仆仆跑到郑、洛、许、信等地,学着邓小平的腔调,大讲反派性,大骂造反派。什么“四大害”、“五大怪”、“八大金刚”、“四大赖”,总之使人们又感到还是“二七公社大杂烩,牛鬼蛇神排成队”。我们不禁要问纪登奎同志:“你这是不是要向邓小平表白自己,要和河南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划清界限?表明自己要追随邓小平的那条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

大字报说:“纪、刘在文化大革命中支持过我们造反,我们和河南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一起也支持了纪、刘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但在邓小平大刮右倾翻案风中,你们不看方向看风向,跟着邓小平大骂文化大革命和造反派,不是对造反派高抬贵手,而是动不动就叫‘滚’。有些人官做大了,薪水高了,高高在上,听不进不同意见,忘乎所以,不讲道理,到处骂人,以官大压人。纪登奎同志就是如此。”

大字报最后说:“现在社会上有人利用纪、刘的错误,要打倒他们,我们是坚决反对的。但我们决不保他们的错误。纪在右倾翻案风中受邓小平修正主义路线影响,说了错话,办了错事,使许多领导干部也跟着犯了错误。纪登奎同志必须向毛主席、党中央做出检讨,向全省人民做出检讨,主动承担责任,肃清影响,改正恶果。”

3 月 25 日,河南省清丰县交通局贴出大字报,题目是:“刘建勋为何觉悟得慢? ——兼评纪登奎的投降路线”。大字报一开始就说:

“那个曾经挂着‘支持革命造反派’随后披上‘革命领导干部’外衣的纪登奎正是一个靠河南革命造反派鲜血染红了外衣,随后被邓小平招安的投降派的典型代表,是混入‘梁山’的投机商,是当代的宋江。”

大字报认为刘建勋“觉悟不高”,河南各级领导转弯子慢,与纪登奎去年 8 月“从浙江窜到河南作的一番丑恶表演很有关系”。

大字报说:“从前,宋江投降后就去打王庆,王庆是宋朝河南的起义军首领,他打过王庆之后,就去打方腊,方腊是宋朝浙江一带农民起义军的首领。今天,纪登奎被邓小平招安以后,先去浙江镇压革命造反派,回头跑到河南大刮右倾翻案风,这种惊人的相似之处,简直是对古往今来投降派的极大嘲弄。”

大字报还写道:“我们说纪登奎是混入梁山的投机商,有文化大革命十年来铁的事实做见证。他靠河南革命造反派的鲜血染红了外衣,但是从来没有坚定地、真心诚意地支持过革命造反派。1966 年 8 月,就在郑大革命造反派刚刚宣布成立‘郑大联委’的时候,他一面假惺惺地表示支持,一面又为保守派的头目们出谋献策:‘他们成立联委,你们就不会成立战斗师呀?’于是乎,郑大原文革改头换面而成了战斗师。去年 8 月,他来河南煽动右倾翻案风,又一次美化那个保守派头目,赞不绝口地夸他‘品质好’,借此给邓小平送一个献媚的秋波。”

3 月下旬,郑州“二七公社”派在市公安局门前静坐、绝食,要求释放在 1975 年整顿期间被公安机关抓起来的造反派头头。同时,还组织数百辆汽车、拖拉机搞 10 余万人的大游行。刘建勋见形势紧张,赶快给中央发电报,请求中央给个解决办法。

华国锋接到刘建勋的电报后,找纪登奎商量解决办法,二人决定

派公安部负责人杨贵回河南帮助刘建勋工作,让刘建勋来北京向政治局汇报一下情况,政治局就河南问题提出个意见,再报毛泽东那里批示一下,这样刘建勋回河南就好办了。

3 月 27 日上午,以为河南局势已经失控的华国锋,指示河南省军区司令员张树芝负责将刘建勋等人护送至郑州军用机场。当天下午,华国锋派来飞机将刘建勋、省委副书记王维群等人接往北京,汇报河南的工作。

3 月 27 日下午 16 时许,刘建勋一行抵达北京,被安顿在京西宾馆。不一会儿,纪登奎即来宾馆看望,问了问河南的局势,说华国锋马上要来,“咱们去迎接他吧。”他们刚走出大楼,华国锋就到了,陪同前来的还有主持公安部工作的副部长杨贵。

一行人等来到一间会议室坐下,刘建勋即向华国锋检讨,说“我们工作没有做好,河南又乱起来了,给中央增加了这么多麻烦”等等,表示惭愧。

华国锋开导说:“建勋同志,你不要老作检讨,这个责任你也负不起来,河南乱的原因是有总根子的。总根子是邓小平。今天晚上政治局开会,听你们汇报,要批邓。”

华国锋还说中央准备派杨贵到河南帮助解决问题。

刘建勋向中央报告河南的情况,原本是请求中央给个指示、办法,或者派人来河南帮助工作,没想到被接到北京,而且还得在政治局会议上面对面地批判邓小平。这使他陷于两难境地,不批邓过不了关。批邓,意味着什么,他是非常清楚的。抗日战争时期,在太行山抗日根据地,他就是邓小平的老部下,他对邓小平太了解了。而今老部下要批老上级,用他自己的话说,“这回批邓,可是作了难啊!”

当晚 22 时多,刘建勋一行被接到人民大会堂,由工作人员领进一个不大的会议室,在京的政治局委员们都已神情严肃地在里面就座。杨贵列席会议。刘建勋等人一入座,华国锋就宣布开会:

“今天开政治局会议,研究一下河南问题。今天把刘建勋、王维群叫来汇报一下河南的情况。”

接着,刘建勋开始汇报。他先汇报了河南各地的混乱情况,检讨自己工作没有做好,边哭边说,很动感情。他检讨了 1975 年批判、下

放几十个造反派,把造反派得罪了,所以现在乱起来了。江青说:“你们不是整了几十个造反派,而是整了三千个造反派。”

接着,刘建勋开始当面批判邓小平。他说:“河南现在这么乱,原因是什么呢?今天你邓小平也在这里,我当面向你说清楚,就是由于执行了你的反动路线,河南才搞成这样乱的局面。我的身体不好,还没有照你说的要有十分干劲去干,就搞成这个样子了。如果按照你说的要有十分干劲去干,就要造成更大的恶果。如果再按你的办法,抓几个,调一些,那就得罪更多,乱得更厉害。你过去的反动立场没有变,检讨是假的,如果按照你的反动指示去办,就要亡党、亡国、亡头,你就是右倾翻案风的总后台,是复辟势力的总根子,是‘还乡团’的总头子。”

刘建勋说到这里,一些政治局委员忍不住笑了起来,又七嘴八舌问了一些具体问题。刘建勋擦了擦脸上的冷汗,一一做了回答。

邓小平一言未发,两眼盯着刘建勋,一根烟接着一根烟地抽。

华国锋问河南省委副书记王维群还有什么补充?王维群说:“情况建勋同志都说了。我说一点意见,河南不是整了3000造反派,是批了20多人,其他调下去的干部大部分是机关抽下去锻炼、培养的干部。”

江青打断王维群的话:“你扯谎!你们整了3000多造反派,按照邓小平的指示,你们整新干部,打击造反派,凶得狠!”

接着,江青开始批刘建勋“执行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还批纪登奎说:“毛主席那么关心你,培养你,而你却违背毛主席的指示,上了邓小平的贼船,执行邓小平的一套,到浙江、河南镇压革命造反派。你在浙江讲了什么?在河南讲了什么?我手头都有材料!你对不起毛主席,对不起革命造反派,对不起全国人民。”

于是,纪登奎也检讨了一番。

会议开到夜里0时休会,大家都去吃夜宵了。邓小平没有去吃饭,坐在那里抽烟。刘建勋、杨贵、王维群等人也没去吃饭,干坐在会议室里,谁也不开口说话,气氛十分尴尬。

夜班饭后,继续开会批邓。大约到了夜里一点多钟,华国锋说:“建勋啊,你再准备一下,另行汇报吧!”

这时邓小平问华国锋:“会议散了吧?”

华国锋说:“散会”。

邓小平立刻站起身,第一个走出会议室。

王洪文望着邓小平离去的背影说:“都说他聋,其实不聋嘛。一说散会,他拔腿就走,走得比谁都快。”

此时刘建勋已瘫坐在沙发上站不起来了,只能被人搀扶到手推车上,推出了会议室。这次“面对面批邓”如同他1966年8月写大字报支持学生造反一样,在全国的省委书记中都是独一无二的。

第一次汇报后,根据华国锋关于政治局再听一次河南问题的汇报的指示,刘建勋、王维群、杨贵等人在下榻的京西宾馆准备汇报材料,并向纪登奎要了几份清华、北大的“批邓”材料,作为参考。

一次,纪登奎与刘建勋谈话时问刘建勋在郑州水上餐厅和李井泉谈话的问题。刘建勋说:那天多吃了几杯酒,说的什么都不记得了。“不见邓副主席死不瞑目”不记得了。纪登奎说:“李井泉回北京后,都向中央汇报了。你这样的态度不对。”刘建勋听了这话很着急,回到京西宾馆后,就往郑州打电话,询问有关人员他当时和李井泉都说了些什么?别人都敷衍说不记得了。

# 第1387回：南京市，悼总理群情激奋 大标语，明确打到张春桥

1976年3月27日，北京市民兵指挥部奉命派员赶赴天安门广场“观察动向”。

3月27日，姚文元在的日记中写道：

南京冒出一批针对上海的大字报，还有“揪出赫鲁晓夫式的野心家”、“反对抢班夺权”一类标语，据说弄了一批学生（大多是高干子弟）上街。

这是阶级斗争尖锐化的表现。

每次运动发展到一定时候，反动势力都要跳出来“示威”一番。也好，让革命群众多看看。只是中央政治局太迟钝了。

又快到“四·一二”了，又要“炮打”了。

主流是好的，革命群众精神振奋地在批邓中前进。“同右倾翻案风对着干，敢挑千斤重担夺高产。”这是工人阶级的声音。朝农批资产阶级法权达到相当深度。

清明节将要到，发现南京、北京、太原都有借此搞“悼念”总理的活动而闹事的苗头。

也就是在姚文元写下这篇日记的3月27日晚上，南京大学数学系团总支书记李西宁召集系团总支扩大会议，把几个班的学生党支部书记也都扩大进来了。他对大家说：“我们团总支准备在明天举行一个悼念周总理的活动。”大家听了都一致表示赞成。开完会大家扎花圈，写横幅，贴通知，忙乎了一夜。

3月28日上午8时，李西宁和计算机专业一年级党支部书记秦峰及其他几位学生干部带领全系400余名师生，高举周恩来的巨幅遗像，抬着写有“光辉永照后来人”的花圈，排成数列纵队，绕道闹市区新街口、大行宫，向梅园进发。

为了防止发生意外冲突，李西宁把学生当中几个比较机灵的人派

出去当侦察兵,在大队人马前面打前站,一旦发现有什么异常就赶紧回来报告;另外又挑选了几个身强力壮的解放军学员组成一个方阵,保护在周恩来遗像周围。他们还带上老虎钳和小铁锤,准备到了梅园新村后,如果工作人员不给他们开门,他们就准备砸开锁强行进入。结果省里提前通知梅园新村开门接待他们。

这次游行示威在南京城里引起了轰动。第二天,3 月 29 日上午,南京大学数学系学生宋志杰等人,将 3 月 25 日的《文汇报》贴在校园里。他们用墨笔把“党内那个走资派要把被打倒的至今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扶上台”这句话勾了出来,上面写着:“看一看,想一想”6 个大字。接着,数学系的师生又在南京大学南园宣传栏下面和对面,贴出两条大标语:“警惕个人野心家,阴谋家篡夺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权!”“无数革命先烈和革命老前辈用鲜血打下来的红色江山我们也要用鲜血来捍卫!”

标语刷出后不久,就有人将“各级领导权”改为“最高领导权”。

紧接着,中文系抄贴出了 1957 年毛泽东写的《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一文;政治系在“是粗枝大叶,还是别有用心”的标题下公布了《文汇报》就 3 月 5 日事件给他们的复信。

这个消息不胫而走,人们纷纷涌向南京大学校园看大字报、大标语。为了进一步扩大影响,这天中午,南京大学有 11 个系的 800 多名工农兵学员,分成 20 个小组,在闹市街头进行演讲,在大街、车站和公共汽车车身上刷大标语,还在开往苏北、安徽、浙江等地的长途汽车上贴上了“谁反对周总理就打倒谁!”“文汇报 3.25 文章胆敢反对周总理罪该万死!”“揪出文汇报的黑后台!”等大标语。

3 月 29 日下午 16 时 30 分左右,南京大学数学系计算数学一年级学员胡同森与地理系 74 届学员白锦铭在新街口邮电局旁的宣传画栏,看本校地质系找矿专业的几个同学在刷标语,其中有围观的人说:“你们在这刷标语影响不大。为什么不到火车站去刷!”

胡同森闻言立即回校,提出要去火车站刷标语,并在晚饭前后串联到数学一年级的三个班的 10 个寝室的同学。他的提议得到他们的党支部书记秦峰等人的同意。18 时 30 分左右,秦峰亲自集合本年级 70 人,另加三年级 3 人乘公共汽车前往南京车站。

在车站工人的协助下,秦峰等人先后在通往成都、兰州、三棵树、上海、济南等5次列车的车厢上张贴或书刷标语,首先将从上海开往成都的22次列车的车厢两侧刷上了“文汇报把矛头指向周总理,罪该万死!”“文汇报向何处去?”“警惕野心家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等大标语。这些标语在热情的旅客护卫下,一直保留并带进了成都。

当天晚饭后,化学系无机二班李家胜也在宿舍里提议说:“我们也去刷几条标语吧!”得到同学们的响应。有人提出要把标语带到上海去。于是他们前往南京西站。李家胜等7人到了西站,在211次和405次列车车身上刷了6条标语。然后乘22时50分的405次列车来到新火车站,在这里遇到数学系的学员已在那里刷标语。这时数学系的墨汁已刷完,他们先行返校。李家胜等人又在刷完74、95次列车上刷上大标语,于凌晨1时30分左右回校。

3月29日夜至30日,南京江苏新医学院、南京大学、南京师范学院等更多学校的工农兵学员来到火车站刷标语。铁路工人对他们说:“刷的这些标语没有用,往北开的还行;往南开的,到昆山,就被人用水冲掉了,根本进不了上海。”

学生们闻言,在车站工人的帮助下,用不易被冲洗掉的水氯松、油漆、柏油,将标语刷在火车上。30日上午10时许,13次特快列车带着用冲洗不掉的沥青写的大标语开进了上海。南京邮电学院广播电视专业三年级学生,共产党员张夏阳还带头在车站和列车上高呼“谁反对周总理就砸烂谁的驴头!”等口号,并向旅客宣讲《文汇报》反对周恩来总理的问题。学生们用了10多个小时,在南来北往的火车上刷了近200条大标语。南京的消息,就这样被传播到了四面八方……

这几天,南京城沸腾了。遍地都是标语口号,到处有人发表演讲,南京几乎是全城出动。浩浩荡荡的游行队伍络绎不绝。每当游行队伍出现时,交通警察为他们开绿灯,车辆为他们让路,路边的群众驻足观看,鼓掌欢迎。

南京建筑五分公司人事科长龙连山喊出了“打倒江青!”的口号。

3月30日,南京工学院建筑系的工农兵学员贴出题为“十个为什么?”的大字报,提出“为什么悼念总理的影片至今不和广大革命群众

见面?”“为什么总理逝世后连一个回忆录、一篇纪念性文章也没有?”……

3月30日下午17时30分开始,南京最热闹的新街口、鼓楼、山西路西口,出现了南京警备区战士徐同新写的传单,上面写道:“他们正干着林彪没有干完的勾当,……把野心家、阴谋家、两面派张春桥揪出来示众!”

传单刚一贴出,便吸引了一大批围观的群众,人们念着、听着、抄着,高呼“把野心家、阴谋家、两面派揪出来示众!”当有人问道:“张春桥要不要打倒”时,现场几乎异口同声地回答:“要!”同时,传单还被复制成大字报在南京市内张贴。

3月30日,王洪文给《人民日报》打电话,要他们在南京的记者注意反映情况,并明确表态说:“南京事件是因为省委有走资派。”“南京事件的性质是对着中央的,是转移批邓大方向,他们借着《文汇报》删稿大做文章。”“那些贴大字报的是为反革命制造舆论。”“南京大街贴出‘打倒张春桥’的大字报,省委说没有办法。不是没有办法,是他们不管。”“南京事件是因为省委有走资派,省委的彭冲、许家屯,南京市的储江、贾世珍。”

王洪文说的这四个人是当时江苏省、南京市的主要负责人。彭冲是江苏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委会主任,许家屯是江苏省委书记、省革委会副主任,储江为南京市委书记、市革委会主任,贾世珍为南京市委副书记、市革委会副主任。

3月30日,中共中央在江苏省委给中央的报告上批示:“采取有效措施,做好群众工作,防止别有用心的人借机扩大事态,进行捣乱破坏。”

30日的晚上,姚文元在日记中写道:

南京冒出一批针对上海的大字报,还有“揪出赫鲁晓夫式的野心家”、“反对抢班夺权”一类标语……这是阶级斗争尖锐化的表现。每次运动发展到一定时候,反动势力都要跳出来“示威”一番。

此时,不仅是南京,天津、武汉、西安、太原、青岛、杭州、郑州、福州、重庆、昆明、贵阳和长沙等地都发生类似情形。而且,天子脚下,首都北京也不平静。

3 月 30 日凌晨,第二炮兵的 24 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了第一个来自军队的花圈:“周恩来总理永垂不朽!”

30 日,北京总工会工人理论组 29 位员工来到人民英雄纪念碑南侧,贴出第一张悼念周恩来和声讨江青等人的悼词。

接下来,数不清的悼词、标语、诗词、大小字报一张接一张地张贴在天安门广场。此时的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恩来的人群一日多于一日,送花圈的队伍长长排列在东西长安街上和前门两边。扎在松枝上的白花层层叠叠,好似早春里的雪。一首题为《满江红——悼念周恩来总理》的词作令许多人交口诵吟,人们噙着泪水读着:

星陨东方,
天地咽,
山河减色。
忍为民,
赴汤蹈火,
心血沥绝。
开天辟地奠国基,
踪迹环球创伟业。
问六十春秋昼与夜,
可曾歇?
瞻遗容,
泪不绝;
哭总理,
肝肠裂。
化举国之哀,
坚持马列。
岂忍江山付东流,
那堪神州再溶血。
将遗愿早日化宏图,
此心切。

3 月 31 日,北京市公安局遣派便衣工作人员“以群众面目出现,把小字报、诗词记录下来,全部报告”。

3月31日下午,南京汽车制造厂女医生王运德及其丈夫张精美,电工殷辉起草,贴出这样的大标语:

“深切怀念杨开慧烈士!”

“打倒大野心家、大阴谋家张春桥!”

“党和国家的报纸、电台要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

“批周必乱,反周亡国!”

“党内这个走资派在上海大搞独立王国不得人心!”

“舍都一身剐,敢把党内这个走资派拉下马!”

“用鲜血和生命保卫我们敬爱的周总理!”

“打倒文汇报的黑后台张春桥!”

标语张贴在厂大门、中山门、七一四厂、新街口、大庆路、新火车站的沿线上。

这天下午,南京市电信局三分局工会主席,测量班长秦世祚和他的同事,将一个直径两米的大花圈安放在南京鼓楼食品商店大楼二楼的阳台上。阳光照射下,两幅黑绸上书写的挽联夺人心魄:

心血操尽革命伟业如巍巍泰山立寰宇

骨灰撒遍祖国山河似点点春雨润人间

下午14时30分,南京汽车制造总厂制泵分厂的10多名职工在殷辉、王运德的带领下,在在南京市中山东路的一个部队机关院墙上,刷贴一条巨幅标语:“打倒大野心家、大阴谋家张春桥!”引起轰动。许多围观的群众齐声高喊:“把张春桥的名字倒过来!”“打×,打×……”

3月31日,《人民日报》社总编辑鲁瑛将在南京的一个记者反映的情况送给王洪文阅,王洪文立即转给江青。

晚19时,王洪文打电话给《人民日报》社,询问南京情况。

晚20时,张春桥给《人民日报》社打电话询问南京情况。

晚21时,姚文元给《人民日报》社打电话,并要求一有情况就向张春桥汇报。

姚文元将从《人民日报》那里得到的关于南京的消息告诉张春桥。张春桥忽然在电话中问姚文元:

“你读《红楼梦》,最欣赏的是哪一句话?”

姚文元茫然,不知张春桥为什么突然提及了《红楼梦》?

张春桥自己回答说:“赤条条,来去无牵挂!”说罢,一声长叹!

4月1日凌晨两点多钟,姚文元给新华社负责人打电话,批评南京分社把“南京事件”的原因说成是“南京人民对总理有深厚感情”,“长期以来江苏对上海的做法有意见”,说:“你们记者要有鲜明的立场。这明明是别有用心的人在捣乱破坏,煽动群众,反对中央,怎么能把这些说成是江苏对上海有意见呢?你们要对事物进行阶级分析,告诉你们记者,要提高警惕。”并要求记者:“要注意反映省委对电话指示的执行情况。”

4月1日,南京铁路中学教师厉传彬,学生王喜民在校园里和食堂门口刷出了每个字有一平方米大的悼念周恩来的标语,并在水泥地上写了“打倒张春桥,清除隐患,挖出定时炸弹!”一行大字。

4月1日晚,中央政治局召开紧急会议,讨论南京出现的周恩来悼念活动。叶剑英和邓小平未参加会议。会议认为当前全国各地流传所谓“总理遗嘱”、“总理给主席的诗词”欺骗了一些不明真象的人,干扰破坏当前的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南京已有人借机闹事,还要利用4月4日清明节搞什么扫墓活动,并要以纪念杨开慧烈士名义送花圈。北京等地也有很多类似的东西。这个动向值得注意。除电话答复江苏等地外,中央可以正式发一文件,说明所谓遗嘱之类,是敌人造的谣言,干扰破坏当前的斗争大方向,要追查,不要上当。会议中有人提出要改革今年“五一”节的庆祝方式,不搞游园活动。讨论结果,会议认为,“五一”节活动可以改革,但今年改变不利,不搞影响太大。要利用这个机会体现安定团结,庆祝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初步胜利,鼓舞全国人民。并建议邓小平不出席。

随后,中央政治局会议于当晚23时45分向江苏省委发出了电话通知。这一电话通知,是姚文元起草的:

毛主席已圈阅。

(一)据了解,最近几天,南京出现了矛头指向中央领导同志的大字报、大标语,这是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转移批邓大方向的政治事件。你们必须立即采取有效措施,全部覆盖这类大字报、大标语。对有关群众要做好思想工作,要警惕别有用心的人借机扩大事态,进行捣乱,破坏。

(二)对这次政治事件的幕后策划人,要彻底追查。

(三)所谓总理遗言,完全是反革命谣言,必须辟谣,并追查谣言制造者。

(四)任何人不准冲击铁路。

姚文元在会后的日记中写道:

南京“大字报”已点了张春桥的名,是“打倒”、“揪出”、“野心家”、“阴谋家”,……还是林彪在庐山会议上那一套。

昨晚政治局开六人“紧急会议”,我坚持起草一严肃的通知。今日主席即批准此通知,发江苏并发全国。估计这几条下去,会对这股猖狂反扑的妖风起当头一棒的作用,而使人民更加认识邓小平的反动性。但斗争不会就此止歇。

有一个地下资产阶级司令部在活动,这一点更清楚了。

4月2日凌晨,毛远新给毛泽东写了报告,报告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情况:

主席:

4月1日晚,政治局讨论了几件事:

一、当前全国各地流传所谓“总理遗嘱”“总理给主席的诗词”欺骗了一些不明真象(相)的人,干扰破坏当前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南京已有人借故闹事,还要利用清明节(4月4日)搞什么扫墓活动,并要以纪念杨开慧烈士名义送花圈。北京等地也有很多类似的东西,这个动向值得注意。

除电话答复江苏等地外,中央可以正式发一文件,说明所谓遗嘱之类,是敌人造的谣言,干扰破坏当前的斗争大方向,要追查,不要上当。

二、今年五一节活动。

有的同志提出不搞游园活动了,应改革一下,还有见报也不好安排等。

讨论结果,五一节的活动今后可以改革,一年搞一次(国庆节)即可。但今年改变不利,当前国内外敌人都说我们乱了套,要钻空子,历年有活动,今年不搞影响太大。要利用这个机会体现安定、团结,庆祝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初步胜利,鼓舞全国人民,今年五一节活动还是按

去年的办法不变。

至于中央同志登报排列,可分三个公园分别报导(道),不搞通栏,只登政治局同志、副委员长、副总理,不搞过去上千人的大名单。

建议邓小平同志不出席,其它(他)政治局同志尽量都出席。

三、3 月初主席指示,《毛主席的重要指示》暂时就传达到县团级,暂不扩大传达。目前干部已学习了近一个月,党员、基层干部普遍要求传达,是否可以考虑下一步再扩大传达到支部书记和各级机关的党员干部。

上述意见当否,请主席指示。

如同意,国锋同志准备正式向主席写报告。

毛远新

4 月 2 日

当天,毛泽东批“退 毛远新 四月二日”

4 月 3 日,毛泽东阅批:“同意”。

# 第1388回：清明节，雨花台数万之众 天安门，广场上花海诗潮

就在政治局讨论“南京事件”的同时，北京的局势也在发展。几天来，天安门广场上的英雄纪念碑周围已经摆满了花圈，北京市又打开了广场灰观礼台让群众摆放花圈。

1976年4月1日，北京市公安局负责人在公安会议上提出：“现在反革命破坏活动相当嚣张”，“凡是纪念碑前反动的东西，要坚决搞掉。”

4月2日，北京出现了第一支游行队伍。清晨，中国科学院109厂的职工，用4辆大卡车开道，抬着4个大花圈和4块巨型诗牌，牌上写着：

红心已结胜利果，
碧血再开革命花。
倘若魔怪喷毒火，
自有擒妖打鬼人。

游行队伍，高擎诗牌，穿过王府井大街走进天安门广场，把它放在纪念碑的最高处。几乎同一时间，北京重型电机厂工人制作的第一个铁花圈送到天安门广场。

巨大的诗牌、钢铁花圈，十分引人注目，这一消息在北京迅速传播。

4月2日，天安门广场灰观礼台上的花圈很快就摆满了，北京市委立即指示开放红观礼台，让群众上去摆放花圈。这几天，广场上的群众少时数万，多时十几万人。

4月2日，中央要求北京立即传达4月1日晚中央给江苏省委的电话通知，并派出警察和工人民兵干预制止北京的悼念活动，同时派出便衣警察逮捕或跟踪悼念者。中央还要求北京传达姚文元指示，说“清明节是鬼节”和“送花圈是四旧”，不要群众去天安门广场举行悼

念活动。

4月2日下午,江苏省委将中央的“四·一通知”传达到南京市和江苏省,各级组织开始出动大批人员,冲刷南京市面的大字报,大标语,并贴出大字报,说前几天的事件是“为反革命复辟、政变制造舆论”。

当天,南京大学一个教室的课桌上又出现一首署名“万万千作词,千千万抄写”的《捉妖战歌》:

妖风起处,定有妖精,
妖为鬼域,必显灾情。
乱党乱军,祸国殃民,
尾巴高跷,始露原形。
原名狸精(李进),化名蒋亲(江青),
妖态百出,不得人心。
攻击总理,手段卑鄙,
蒋帮敌特,配合密切。
欺骗主席,罪大恶极,
狐假虎威,借助钟馗。
鬼喊打鬼,贼喊捉贼,
当年武斗,它是罪魁。
有个同伙,妖法更多,
名叫蠢翘(春桥),最会奸笑。
两妖合作,收集喽罗,
篡权计划,有纲有目。
先夺舆论,伪装老左,
谈古论今,蛊惑人心。
侈谈什么,儒法斗争,
儒家法家,根本一家。
代表利益,剥削阶级,
事过千年,远离现实。
为其翻案,是何用意?
无非想当,封建皇帝。

自己复辟,不须放屁,
打击正直,排除异己。
滥用法权,施出诡计。
既想遮天,又想盖地。
激怒群众,四方奋起,
千军万马,口诛笔伐。
妖怪惊慌,却能变色,
七变八变,本质不变。
觉悟群众,岂能愚弄?
抓住尾巴,决不放松。
众志成城,妖有何能?
即取其道,还治其身。
学习总理,革命到底!
奋不顾身,捍卫总理。
总理遗志,定能实现,
人心所向,共产主义。

南京军区宣传站、虹桥、兰桥等地也出现了“野心家张春桥翻案不得人心!”“向张春桥的修正主义文化部,宣传部开炮!”“捣毁文汇报土围子!”这类传单。

4月2日晚,叶剑英将熊向晖叫去,对他说,他请病假以后,杨成武、王尚荣还经常向他汇报工作,叶剑英告诉他们不要来了,恐怕他们不方便。近来,已经很少有人看他了。他对熊向晖说:“你现在还信任我,我很感激。”说着流出了眼泪。

熊向晖说:“叶帅,你不能这样讲,首先是你信任我啊!”

熊向晖对叶剑英说:“王震发牢骚,说关键时刻,元老、重臣都不讲话了。”

“虽然他讲得有些片面,但是这说明老同志对叶帅是非常尊重的。”“我和王震一起去看聂帅时,聂帅说:决战是不可避免的,但是这场决战在什么时候发生,以什么形式发生,现在还不知道。不过聂帅也希望叶帅给毛主席写信。”

叶剑英说:“这些意见都对,但是我担当不了啊!”

熊向晖说:“现在就要用到毛主席当年给隐蔽战线制定的方针:精干隐蔽,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

叶剑英认为在这个非常时期,熊向晖到他那里会引人注目,多有不便,以后还是让他的侄子叶选基到熊向晖这里来,沟通消息。

4月3日,南京邮电学院工农兵学员以工人、农民、解放军战士的名义,在南京从山西路至三牌楼一线,刷出“反对周总理的一系列政治事件要彻底查清,揪出《文汇报》的黑后台”等15条标语,南京工学院的2000多名师生沿鼓楼、新街口、中山东路、梅园新村,举行悼念周恩来的游行。这一天,仅去雨花台烈士陵园送花圈的就有289个单位14万多人,比前几天增加了一倍。而全市在中央电话通知下达后的三天内,又有60万人参加了悼念和游行的活动。

4月3日,北京市委邀请各界群众代表座谈,征求对花圈的处理意见。到会的群众代表要求将花圈摆放到6日,这期间由他们出面做工作,花圈由群众自己取回,群众不取走的花圈,可以移送八宝山。

4月3日,姚文元在日记中写道:

继江苏、浙江等地后,反动标语开始在北京出现。昨天天安门人群激增,用所谓“悼念”总理发泄对运动的不满,发表反革命演说和反革命口号,有的还公开反共,这是没落垂死势力的挣扎和疯狂反扑的一种表现。他们是否已用完了它的后备力量,我看还没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如科学院、七机部)是它的基础。……而这一切说明:如果党内走资派得适(势),不仅是丧失社会主义革命成果,民主革命成果也会丧失。反共的“还乡团”会一起扑上来残杀、镇压劳动人民。还有一个搞匈牙利、林彪式政变的反革命口号是:“我们要民主!不要法西斯!我们要周总理,不要佛朗哥,更不要那拉氏。”还有的人煽动成立群众组织,“要坚强,要防止一个个被击破”。这也是林彪一伙的反革命口号……

中国这个国家,激烈的斗争不断,但解决矛盾(某一个方面、部分)却总是不彻底。为什么不能枪毙一批反革命分子呢?专政毕竟不是绣花。

王洪文坐着轿车在天安门广场转了一圈。回到大会堂后,他给从上海选拔到公安部中共核心小组的祝家耀打电话说:

“你还在睡觉啊！我刚到天安门去看了一下，那些反动诗词你们拍下来没有？不拍下来怎么行呢，将来都要破案的呀！要不，到哪里去找这些人呢？你们应该组织人去把它拍下来，要考虑到将来的破案！”

这时，张春桥也说：“要派便衣去！便衣很起作用，只有便衣才能深入到群众中去，了解最重要的情况。”

叶剑英也极为关注天安门广场的悼念活动，每天派人去那里了解情况，抄录诗词，边读边赞：“好诗，好诗，难得的好诗！”

4 月 4 日，农历三月初五，中国的清明节。这天，涌向天安门广场的人们达 200 万人次！天安门的悼念活动进入了前所未有的高潮！有诗写道：

清明的花圈如皎月，
嫦娥感慨同悲切。
清明的挽联像尖刀，
忠魂挥舞断贼腰。
清明的檄文放光彩，
进击大旗长空摆。
清明的诗歌披彩霞，
革命事业露新芽。
清明的歌声连广宇，
国际战歌不断曲。
清明的口号震乾坤，
人民永将正义伸。

上午 7 时，北京青云仪器厂职工，排成四列纵队，共 275 排，抬着 34 个花圈来到天安门广场，绕场一周后，举行了隆重的悼念仪式。

同时，曙光电机厂 3000 多名职工从东单出发，走进广场。

北京重型电机厂工人也把他们制作的第二个铁花圈抬进了广场。

……

是日上午,北京铁路分局青年工人王海力在天安门广场披展血书,上书:

敬爱的周总理！我们将用鲜血和生命誓死捍卫您!!! ——中国无产阶级的红后代。

场面感人。

上午11时，首都钢铁公司工人李铁华在天安门广场发表讲演，声泪俱下，感人至深：

“阳春3月的连绵雨水，那是我们8亿人民流不干的眼泪。”

“敬爱的周总理，我们慈祥的父亲！”

“您忠诚的儿女看望您老人家来了！”

“我们的好总理呀！您忠于党、忠于人民，对敌人大义凛然、横眉冷对；对人民父亲般地关怀，母亲一样的热爱。”

“您老人家光明磊落、胸怀宽阔、任劳任怨、从无倦态。您一辈子工作、战斗；战斗、工作，不辞辛劳，不分昼夜。您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英勇斗争，鞠躬尽瘁。您老人家是活活累死的呀！”

“您老人家的丰功伟绩，永远铭刻在我们8亿人民心中！您老人家高大的形象，永远树立在人民心中！人民心中的纪念碑，永远砸不碎！人民心中的形象，万代放光辉！”

“同志们，我们发现有那么一小撮人，把矛头对总准周理，这是我们绝不允许的！”

“谁反对周总理就打倒谁！”

“总理得人心，人民热爱总理。这就是历史最好的见证！”

“同志们，斗争是尖锐复杂的，但是，我们要坚定信心，把那些野心家、阴谋家统统揪出来，彻底打垮！”

罗小韵 摄

同日,纪念碑东侧贴出《叫人怎么办?》的诗词,公开为邓小平鸣不平。诗中写道:

8点钟上班,点上一支烟,倒上一杯水,翻开一本大参考,一看就一天。生产上不去,这是自然自然。自从去年'七一'后,面貌大改变,领导下基层,抓纲又抓线。任务明确方向对,群众心里好喜欢。加班又加点,卫星上了天。结果好话没听见,坏话一大篇。什么"人头要落地",却成了大灾难。这叫人怎么干?!是不是不干才喜欢?不,他们想一手来遮天。三人十只眼,阴谋篡大权,唯恐天下还不乱。同志们,怎么办?我们就要和他们顶着干,把他们的阴谋来揭穿!

下午15点多钟的时候,叶剑英悄悄地拉着解放军总医院护士周美华和绰号"马头"的警卫参谋马西金,开车到了天安门广场。他们车开得很慢,从纪念碑的右侧,绕到左侧,转了一个大圈。叶剑英几次要下车去看一看,都被随行人员劝止了。

同日晚21时,纪念碑东南角出现了《第11次路线斗争大事记》,引来众人的围观。有人在高声诵吟:"江青(在1974-75年间)扭转批林批孔运动大方向,企图把斗争矛头对准敬爱的周总理";"江青背着中央接见外国传记记者";"江青污蔑中央领导同志,并企图在四届人大争当总理";"邓小平同志重新回到了中央工作(1975),取得了斗争的初步胜利,全国人民欢欣鼓舞";……文中直接点出江青的名字,引起了强烈反响!……

山西坞城路三局机电队共青团员王立山在这里写下了《扬眉剑出鞘》的名作:

欲悲闻鬼叫,
我哭豺狼笑。
洒泪祭雄杰,
扬眉剑出鞘。

北京市外贸局青年干部李舟生写下了《今日在何方》:

请你们不要问我今日在何方;难道你们能不来到这天安门广场?请你们不要再费心到这儿来找我,这里早已经是人的海洋。像四海惊涛齐奔向英雄碑下,像五洲风云齐飞向总理身旁。像无数白帆满载着

圣洁的情感,我也扬帆催发呵,航行在这无边的海洋。……

当时,有一首诗,题目是《人民的总理人民爱》:

人民的总理人民爱,人民的总理爱人民。

总理和人民同同甘苦,人民和总理心连心。

不知是谁,写了一首儿歌《几个小丑嗷嗷叫》,一时被四下传抄:

蚍蜉撼大树,摇又摇:"我的力量大,知道不知道?"

大树说:"我知道,一张报,两个校,几个小丑傲傲叫。"

另一首诗是《向总理请示》,明骂江青、张春桥、姚文元:

黄浦江上有座桥,江桥腐朽已动摇。

江桥摇,眼看要垮掉,请指示,是拆还是烧?

当有人念完这首诗时,周围的人就高喊:"烧!""烧!"

一张题为《给〈文汇报〉开的诊断书》的大字报,署名"赤脚医生"。一个小伙子在高声朗读。一边读,人群中一边发出哄笑声:

给《文汇报》开的诊断书

《文汇报》负责人:

读贵报3月25日奇闻,真为你的身体担心,让我给你检查一下吧:哦,原来发了高烧,发烧引起神经错乱。建议赶紧治疗,否则亿万人民不饶。治疗方法:

一、把你们的意图写到题目里去,大张旗鼓地讲嘛!古云:人逢喜事精神爽,死到临头便发狂。可以再发表令人一目了然的文章。那时

人们的眼睛就会闪光——红光。同时你们的眼睛也会闪光——绿光。这样会收效如神。除不如仙人之外,自然病除。以为上策。

二、停刊万年吧。大为遗憾,不能除根,引为下策也。

说得对,吃我的药;说得不对,分文不取。见笑,见笑。

赤脚医生

丙辰清明

针对中央取消清明扫墓的通知,有人用诗痛斥姚文元:

谁说清明是四旧?

谁说清明习惯臭?

年年奠祭我先烈,

今发禁令何理由?

广州半导体材料厂青年电工庄辛辛从羊城写信给《人民日报》编辑部:

我们的呼声

支持邓小平!打倒张春桥!

支持邓小平!打倒姚文元!

支持邓小平!打倒江青!

敬爱的周总理,永远活在我们革命人民心中!

据统计,从3月19日北京朝阳区牛坊小学的红小兵在纪念碑前献上第一个花圈,至4月4日深夜,共有1400多个单位献上了2073个花圈!

银花簇拥在纪念碑四周,诗如潮,歌似海。

4月4日,天安门广场上的人群中发生争执殴斗,公安局也有很多人受伤,事态严重起来。

4月4日的南京,虽然是星期天,但怕出事,南京市各单位都不放假。即使如此,去雨花台的人数仍然有7、8万之多。

# 第1389回：政治局，忙开会紧急研究 做决定，要连夜撤走花圈

1976年4月4日晚上，中央政治局在紧张的气氛中召开会议，华国锋主持。往日，他出席中央政治局会议，不大开腔。眼下，他不能不明确表态。

以下是4月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抄自毛远新的记录本，文中的错别字是毛远新记录中原有的：

华：（国锋）今天研究一下天安门的情况。

很严重，很恶毒的，一批坏人跳出来了，写的东西有的直接攻击主席，很多攻击中央，煽动群众，打架。

吴德：在纪念碑前送花圈的2073个，单位1400多个单位次，有的不写单位，有的冒充某单位，3号507个单位送800多个，4号420个单位送450个，大的有6米直径，一部分写人民烈士的，一部分写总理。

3号有20万人，4号有7、8万人，最多的是七机部、科学院，其次是四机部、铁道部、外贸部。

北京市：广播器材厂（761），曙光电机厂、青云仪器厂。

重型电机厂，送了个钢焊的花圈。送的比较多的单位，都是问题比较多的单位。

多数人是出于怀念总理，有的是学校到那里去宣誓，批邓、教育干部。

4月2日就开始有恶毒的，有的煽动、讲演，反动的实质很清楚。

诗词、悼词、小字报，有48起是恶毒攻击主席、中央的。

敌人利用这件事，性质和南京是一样的。

采取的措施：

1. 当场取证、拍照。向群众说这是反动的。结果有的公安人员被打。

2. 看准了是反动的，有人盯着，离开人群以后再抓，拘留了10

个人。

拂晓前清理一次,把花圈取走。

看热闹的人很多,也还有坏人带着一帮打架的人也来送花圈。

基层工作。主要是把中央的电话通知发了下去,今天明显减少了,向群众说明是坏人利用群众的心情,攻击主席、中央、破坏批邓大方向,群众还是听的,很多人明白以后说不能去上阶级敌人的当,很多单位把花圈折了,大多数群众是拥护中央通知的,知道所谓"总理遗嘱"是敌人造的谣,广大工人说不能上敌人的当。

投入了5000民兵,3000公安人员,都着便衣,以民兵的身份出现,做了大量保卫、劝说工作。

对外部(地)进入北京的火车车辆,有各种大标语的都在丰台刷掉。

看来这次是一个有计划的行动。

邓小平从(19)74年——(19)75年他作了大量的与论准备,什么批林批孔是批周公,什么反经验主义是揪总理,并造了大量舆论说某某人要夺总理的权,今年出现这件事是邓小平搞了很长时间准备形成的。

明显地是拿死人压活人,是党内有走资派把矛头直接指向主席的。

性质是清楚的,就是反革命搞的事件。

文化大革命以来没有这次这样的逆流。过去是都是说想念毛主席,这次根本不提主席,敌人比过去更猖狂。

华国峰:这次有个迷惑人的借口是《文汇报》的3月6日、24日来骗人,说是《文汇报》实际上是攻击中央的。

这次利用清明节跳出来搞的是阶级斗争的表现,要追查谣言,深入进行批判。

……

吴德汇报完情况,王洪文问他:"你认为是什么性质的活动?"

吴德说:"肯定有一小撮在背后挑动,但是目前我们还缺乏证据。"

华国锋连声说:"是反革命在捣乱,是邓小平在背后操纵。"

这时,姚文元的秘书匆匆进来,递给姚文元一张纸条,这是《人民

日报》的负责人鲁瑛给姚文元送来的。姚文元看了一下,马上就说话了:

“天安门事件,究竟是什么性质?我来念一份大字报。这是刚刚在纪念碑前贴出来的,许多人围在那里看。《人民日报》记者也在现场,抄了下来,打电话传录,说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情况。标题叫《大事记》……”

姚文元念起了《大事记》,正是当晚21时在广场纪念碑东南角被朗诵的那份《大事记》:

一、74年1月,江青扭转批林批孔运动的大方向,企图把斗争矛头对准我们敬爱的周总理。

二、74年2月,江青背着中央接见外国传记记者,污蔑中央领导同志,污蔑文化大革命,并企图在四届人大争当总理。

三、75年1月,主席识破了江青的野心,召开了四届人大,邓小平同志重新回到了中央工作,取得了斗争的初步胜利,全国人民欢欣鼓舞。

四、75年7月,主席严厉地批评了江青,停止其在中央的工作,周总理养病期间,中央的工作由邓小平同志主持,斗争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全国民心大快。

1976年4月4日

江青听罢,拍案而起,像扫机关枪似的,冲着华国锋说道:

“这种大字报,贴在天安门,恶毒攻击中央首长,你管不管?中央的人身安全还有没有保证?是谁把党内的机密泄露出去,要不要查?写大字报的人,要不要抓?天安门广场闹得这个样子,你这个代总理、公安部部长,还管不管?如果你不管,我去找主席去!”

她从姚文元手里抢过那张《大事记》,站起来要走。

华国锋连忙请她坐下来。

江青气鼓鼓地坐下,朝毛远新说道:“远新,你好好记一记,回去向主席汇报。尤其是华代总理的话,你一句一句都要记清楚!”

华国锋一脸尴尬地坐着。

这时,张春桥不紧不慢地说道:“天安门闹事,使我想起了20年前的匈牙利,想起了那个纳吉。纳吉原先是匈牙利的部长会议主席,给

赶下了台。他在1956年就煽动闹事,发动叛乱,当上总理。我看,邓小平就是今天的纳吉,中国的纳吉!”

王洪文马上附和道:“春桥同志说得对。天安门闹事的总后台,就是邓小平!刚才文元同志念的大字报上,那些家伙不是说,‘中央的工作由邓小平同志主待,斗争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国锋同志,政治局该对天安门闹事采取强硬措施了……”

江青质问吴德:“你知道不知道这个情况?为什么允许反革命讲演?”

吴德说:“我在这里开会,怎么会知道。”

江青说:“这个反革命分子要马上抓起来,这样的人不抓有右倾。”她指着吴德说:“你中邓小平的毒太深了。”

吴德站起来检讨了几句,说思想上没有重视,有些麻痹。然后,就出去给卫戍区司令员吴忠打电话,问他是怎么回事?吴忠在电话中说的确有人演讲骂江青。吴德问这个人在哪里演讲?吴忠说就在纪念碑前,现在围听的群众很多,不好处理,待群众散开后能抓人时再抓。

吴德回来向政治局汇报了吴忠的意见,但没有获得同意,而是要求立即抓人。

吴德和倪志福赶紧出去传达布置。不久,吴忠打来电话说,那个演讲的人已经抓起来了。

此时已过午夜零时,江青说:“现在已经过了12点了,现在已是4月5日了。清明节已经过去,清明节的悼念活动应该结束了,你们完全有理由向群众解释清楚。现在就动手,天亮前必须把花圈全部送八宝山。”

吴德小心翼翼的说:“按天安门广场花圈的数量,需要调200辆大卡车,现在工人下班了,我们找不到足够的运输工具。”

江青说:“我不管,你们想办法。”

会议沉默了一段时间。

华国锋说:“老吴,你考虑考虑,动员力量,今天晚上解决了吧!”

没有人表示反对。

姚文元在4月4日——清明节那天的日记中写道:

今日高潮仍是国家机关、七机部、科学院等居多。有的花圈奇形

怪状,挂在吊灯上。

海燕在汹涌的波涛上迎风飞翔,共产主义战士在阶级斗争的大风大浪中锻炼成长。反革命活动会锻炼出一批革命派,这也是历史的辩证法——太顺利了不好。

晚政治局开会,我接到人民日报记者电话,告广场上有人进行反革命演说,直接点了江青的名,内容极坏,无人制止。我立即向政治局报告,激起了多数同志的愤慨和警觉,决定立即逮捕这两个反革命,清除花圈,派民兵、部队戒严、封锁道路,明天一律不准再送花圈。吴德和倪志福同志紧张地走了。不久,即听到这个坏蛋被捉住的消息。无产阶级专政总得有一点"专"的样子呵!太软了!

北京市还是努力做工作的。只是谣言一时难以全部肃清。问题还在部队中。

前两个月批邓中我曾说:如果下次再来比这次更厉害时,人们都当作只是一种可能性而已。但果然如此!从全国看,太原、西安、沈阳均有发现。凡不批邓的都在保周的口号下集合起来了。这是一次阶级阵线的鲜明划分。

4月5日凌晨,北京卫戍区和汽车运输公司出动200辆汽车将广场的花圈运往八宝山,小部分放在中山公园。在清理广场时,有57名在场群众遭审查,其中7人因抄诗或"可疑"而被捕。这天夜晚,在广场上抓了388人。

4月5日一早,天安门广场,昨天花圈的海洋没有了,广场上一片狼籍。

4月5日,毛远新就中共中央政治局4月4日讨论天安门事件的情况,给毛泽东写了报告。这一报告经毛泽东圈阅。文中错别字是原件中原有的:

主席:

4月4日晚,政治局分析了当前北京的情况:

几天来,向天安门前烈士纪念碑送了两千多个花圈,大的有六米。去的人每天有几万人,3日达二十万人次。最多的单位是七机部、科学院,其次是四机部、铁道部、外贸部,北京有的工厂在动员后仍送去钢铁焊成的花圈。多数是悼念总理,少部分有隐射攻击中央的,个别是

非常恶毒的。4月2日起,有不少人当场致悼词,读诗词,有的贴小字报、标语、传单。其中不少内容是以悼念总理为名,分裂、攻击中央,有的直接攻击毛主席,还有人上去发表煽动性演说,宣读十分反动的传单,语言极为恶毒,下面有人组织鼓掌,要求再读一遍。有的人上去读反动材料,周围有一帮打手,谁去干涉就挨打。4月4日晚有人公开读一个传单,说邓小平上台是决定性胜利,反击右倾翻案风是一小撮人搞的,某某人反总理,某某人想夺权等等,大群人围着听,(还有外国人)有人帮助照明,他连续五遍,完全是攻击中央,攻击主席的。

北京市委组织民兵、公安人员在现场,这几天已发生五十来起反动的案件,民兵一起去干涉,结果被挨打,已打伤很多人,公安派出所也要冲击,天安门的卫兵干涉一个人爬上旗杆发表演说,被打伤。这样大量的在天安门前集中那么多群众场合下,公开发表反革命的演说,直接攻击毛主席,是建国以来没有的。

很显然,这是有计划有组织的,不仅北京,全国不少地方都有。这是去年以来大量散布反革命谣言,造反革命与论准备的继续和发展,去年邓小平说批林批孔就是批总理,批经验主义就是揪总理(上海马老的揭发)。他带头散布了大量谣言,社会上吹得更凶,去年一直未认真追查和辟谣。今年邓小平的名声不好,就抬出总理在群众中作文章,攻击反击右倾翻案风是反总理,利用死人压话人,利用总理在群众中的威望来为邓小平效劳,编造大量所谓“遗嘱”、“诗词”、“谈话”等等东西美化邓小平,于是谁要批邓,谁就是反总理了。这种看法颇有些煽动性。

这次敌人活动如此猖狂,不足为怪,主席的重要指示,打中了资产阶级(主要是党内资产阶级)的要害,这次是反革命性质的反扑。当然送花圈的人多数是受人挑拨煽动,出于对总理的怀念,有的工厂(石景山)工人可以把“遗嘱”全文背下来,还边读边流眼泪,是上当受骗的。但是在清明节(这也是孔老二的一套)这样大规模的集中搞,显然有人在策划。

政治局的同志分析,阶级敌人猖狂跳出来是件好事,他们只能靠谣言、靠死人来煽动不明真相的人,说明他们日子实在不好过,也没有什么了不起。但是也要提高警惕,防止挑起更大的事端,这次看出存

在一个地下的“裴多菲俱乐部”,有计划地在组织活动。因此也要防止万一,采取一些必要措施。

在北京,第一,继续发动各级党组织作好群众的工作,揭穿谣言,教育群众不要上当。中央准备转发公安部一个报告,在全国揭露敌人的阴谋,并发动群众追查政治谣言,在“五一”前搞一次大的反击。(正起草)

第二,首都工人民兵组织好,(目前已准备了五万人)向广大群众作宣传、教育,打击暴露的反革命活动。公安机关密切配合破案。(目前已抓了十几个在天安门搞反革命宣传的人)

第三,卫戍部队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和组织准备,向干部战士讲清当前斗争的实质,防止敌人挑起更大事端。特别是八三四一部队,应向全体战士传达主席的重要指示,讲清当前天安门前是什么事,不能只看成是群众悼念总理的活动,而是反革命煽动群众借此反对主席,反对中央,干扰破坏斗争的大方向。否则一旦有事,战士可能同情闹事的人,甚至出现匈牙利事件那样,部队不愿意向反革命进攻。

第四,北京军区要稳定,指定一定的机动部队,以防万一。

政治局决定,鉴于纪念碑前反革命活动越来越猖狂,从今晚(4号)开始,清理花圈和标语,估计会有人捣乱,已调了三千民兵在广场周围,卫戍区三个营(尽量不用部队出面),明天开始,布置民兵围绕纪念碑,劝说阻止群众去送花圈和集会,不再允许进入这个范围。

截止目前(5日晨五时)在五万民兵和三千公安人员的包围下,抓住了当众宣传反革命传单的人及其保镖。把周围保护那个反革命分子一百多人集中起来,进行教育,肃清流毒,其中二十多人身上都有反革命的传单、材料。群众基本走散,现场正在清理,花圈都送到八宝山。进行得还顺利。

估计下一步会出现两个可能:一是暂时地平息下去;一是挑起新的事端,敌人会利用“中央有人反总理,连送花圈悼念活动都不许”的借口去煽动,以致导至战斗。

这样安排如有不当,请主席指示。

4月5日晨

毛泽东在报告的日期上边让张玉凤批了:“退毛远新”

## 第1390回：冲会堂，广场上人潮汹涌 调民兵，北京市“四五事件”

1976年4月5日凌晨5时10分，王洪文来到天安门广场人民大会堂旁的一个院子里的小楼，这里是广场联合指挥部所在地。北京市公安局的负责人和“首都民兵指挥部”副总指挥张世忠、马小六都在这里。

5时15分，通往广场的路口已有人把守，不准送花圈的群众进入，还设了劝阻站。人民英雄纪念碑由军队、警察、民兵组成的封锁线层层围住。但是，人们继续从四面八方向广场拥来。

6时许，北京市172中30名学生，在群众的支持下，冲破了封锁线，把花圈送到了纪念碑上。

7时30分左右，一名军人发表反对群众送花圈的讲话，受到群众斥责。过了一会儿，一个身穿蓝制服的人攻击周恩来，引发众怒。两个“便衣”上前解围被群众认出市公安局的便衣，其中一人向人民大会堂方向逃去，群众跟着涌向大会堂东门外，一时间集聚了10万之众！东西长安街上还有许多群众向广场进发。

联合指挥部开始往大会堂东门增调民兵、警察和部队。8时，一辆广播车在向广场群众作宣传：

“清明节已过，悼念活动已结束，请革命同志离开天安门广场，要警惕一小撮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

手拿广播喇叭的是个警察。有的群众骂他，他以牙还牙。这时一些群众忽地围了上去，夺过他的喇叭，并把广播车掀翻了。

9时，一个持有清华大学机械系听课证的人说：“你们这不是胡闹吗？人民万岁的口号不对，人民也分阶级。”“这样悼念不好。人一死，送花圈有什么用？周总理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派。”

此言一出，群情忿怒，几名群众一拥而上，将其扭送至中山公园派出所。同时，几十万人在大会堂门口高呼：“还我花圈，还我战友”的口

号,山呼海啸。大会堂东门外人山人海,水泄不通。警卫大会堂的战士同欲冲进大会堂的人们发生了冲突。有人指着解放军战士质问:

“你热爱不热爱周总理?不热爱回家种地去!”

战士眼里含着泪,有口难辩,有苦难言。

吴鹏 摄

中午,人群包围了广场的联合指挥部所在的小灰楼,群众派出4名代表向指挥部交涉,提出归还花圈、释放被捕群众、保障群众有悼念总理的权利三项要求,谈判无结果。

人群冲进了小灰楼。联合指挥部冒起了浓烟。当中央政治局一部分委员匆匆爬上人民大会堂楼顶,俯瞰事态,警民之间已互伤一片。

当天,召开政治局会议。叫邓小平也来出席。张春桥指着天安门广场对邓小平说:“你看看天安门前的情况,人家要推你出来当纳吉。”

邓小平一言不发,也没有与其他人交谈。

北京市公安局局长刘传新列席政治局会议,他汇报说:

“这次看:有组织的两百来人,有四、五千人是凑在一起的。今天提出一要花圈二要战友。说卫戍区抓了人,只要碰见战士民兵、公安人员就打。打伤168,重伤15人(4个战士、11个公安人员)。

砸了两辆,烧了四辆汽车。

‘新造反委员会’放火烧房子,把自行车砸了浇上汽油烧。

利用战士打不还手,伤了些人,下午决定只要歹徒动手打人,民兵可以还手,并配备了短木棍,敌人的气焰马上就下来了。在市委广播用天安门广场的喇叭以后,多数看热闹的群众就散开了,一万民兵带着短木棍包围上去,分批清理后,今天抓了38个人。以前三天捉了39个,大部分都有证据。贴写反革命小字报演说。”

他还说:“今天这个疯狂性看得更清了,杀人、放火,无所不为,地地道道的反革命事件。”

“整个活动来看,早有预谋,有组织、有计划。”

“只要允许挨打还手,民兵公安完全可以对付。”

北京卫戍区司令吴忠汇报说:“准备三万民兵在两个公园。”

“市区集结的9个营。”

“我估计不足,准备也仓促了,上午搞得不好,以为他想喘息一下。历史博物馆的楼、指挥部、营部,没想到他们真敢烧,从一楼点火要把人烧死。”

开会中,毛远新拿着毛泽东的几个批示的条子传达:“天安门事件的性质变了。”

王洪文听了毛泽东的指示后提出,要调10万民兵。

此时已近傍晚,吴德说:“北京的民兵没有上海训练得好。现在工人已经下班回家了,调不来这么多。”

王洪文问:“能调多少?”

北京市负责民兵工作的书记倪志福说:“最多也就是两三万人吧!”

吴德说:“广场上这么多人,调两三万民兵进去解决不了问题。广场上的人比能调动的民兵多得多,搞不好广场情况会更加混乱。”

张春桥说:“用广播的办法动员群众离开现场,可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

江青用手指着吴德说:“你是北京市革命会主任,你怕什么群众?应由你出面讲话,动员群众离开,把你的讲话录音,放录音带。”

华国锋、陈锡联、汪东兴等也同意让吴德出面发表广播讲话。

会议通过了吴德的广播讲话稿,并决定:5日下午18时广播,20时出动民兵。

华国锋说:“今天这件事开始估计不足,暴露了很多漏洞,总结经验教训。

敌人今天充分进行了暴露,烧了汽车、房子,打了人,进行反革命的宣传。

这是蓄谋已久的,全国搞的。

这几天是在大造舆论,煽动,下一步真正搞什么,是不是在广场不一定,明天指挥要沉着要看准,轻易不动,一出就要取胜。

测重分工,民兵和公安分工。

注意摸索线索,找司令部。

今天的事情是否要向全国发个通报。”

会议决定:

1、调动民兵解决问题,民兵可拿起木棍,由倪志福同志指挥。(原定要调十万,实际调了三万多)并指定晚八时动手。

2、先用广播的办法,动员群众离开广场,开始拟以广播电台的名义广播。后来政治局决定,由吴德直接发表广播讲话。

会未散,吴德和倪志福就赶到卫戍区同吴忠商量出动民兵的事。

吴忠听了传达后说:“天安门广场上群众那么多,民兵去一定会出问题,可能会发生流血事件,将来谁负这个责任?”

吴德说:“政治局已决定晚8时出动民兵,怎么办?”

吴忠说:“绝对不能8点出动,只有等群众走得差不多了,再出动民兵清场,否则肯定会出问题。”

3人商定:“吴德和倪志福在卫戍区,吴忠去历史博物馆现场指挥,由他把握出动民兵的时机。”

4月5日,中共中央通知:

1976.04.05;中发[1976]8号

毛主席已圈阅。

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各大军区、省军区、野战军党委,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委党委、领导小组或党的核心小组,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党委:

中央决定,将中发[1976]4、5号文件扩大传达范围,基层单位传达到党支部书记,党、政、军机关传达到全体党员干部。传达学习情

况,请你们综合报告中央。

傍晚18时30分,天安门广场上的华灯未像往日那样开启。吴德的广播讲话开始在广场上空响起:

同志们!

近几天来,正当我们学习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重要指示,反击右倾翻案风,抓革命、促生产之际,极少数别有用心的坏人利用清明节,蓄意制造政治事件,把矛头直接指向毛主席,指向党中央,妄图扭转批判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大方向。我们要认清这一政治事件的反动性,戳穿他们的阴谋诡计,提高革命警惕,不要上当。

全市广大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要以阶级斗争为纲,立即行动起来,以实际行动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保卫我们社会主义祖国的伟大首都,坚决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进一步加强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发展大好形势。让我们团结在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周围,争取更大的胜利!

今天,在天安门广场有坏人进行破坏捣乱,进行反革命破坏活动,革命群众应立即离开广场,不要受他们的蒙蔽。

广场上的群众陆续散去。

讲话稿是当天政治局会议决定,不是吴德的手笔。

晚上20时,华国锋、陈锡联不停地打电话找吴德,多次催问:“为什么还不出动民兵?”此时,他们都在人民大会堂里观察着天安门广场的局势。

吴德与吴忠在电话中商量怎么办,吴忠还是坚持说:“广场上有几万人,现在不能出动。”

这时,政治局找吴德,继而又找吴忠,要求汇报情况。吴德等商量好几条不能马上出动民兵的理由:

第一,工人刚刚下班,都是从家里找出来的,集合迟了。

第二,事先未通知交通警(东西长安街规定不许通过大卡车),民兵沿途受到阻拦,影响了集合时间。

第三,先到的都是商业系统的民兵,女民兵多,她们执行这种任务有困难。

华国锋等人听了汇报后,很不满意,说:“怎么搞的?”

其实,那些理由都是为了找借口、拖时间而编出来的。当时,民兵早已在中山公园、劳动人民文化宫集合好了。毕竟面对的是如此众多手无寸铁的群众,此事肯定是要载入史册的。作为当事人,还要面对自己良心的拷问,一旦做错,在历史上是永远也抹不掉的。

晚上22时30分,华国锋、陈锡联又打电话催问,陈锡联更为关心,他是北京军区的司令员,首都的安全问题最为重要。吴德再打电话问吴忠:“民兵可否出动了?”

晚23时,广场上的群众大都散去,剩下的人大概只有1000人左右了。吴忠打电话给吴德说:“现在集中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不肯离开的只有200多人了,可以出动清场了。”

广场上突然华灯齐放,大逮捕开始了。先由卫戍区的徒手部队把广场包围起来,万名工人民兵,手持木棍开始清场。来不及跑的人不时被打倒在地。叫骂声、喊叫声此起彼伏。很多人从广场上像拖死狗一样被抬到了路边的松树墙后面。有的人晕过去了,有的人头破了,有的人腿瘸了,不一会儿,他们被扔上汽车拉走了。天安门广场的水泥方砖上,可以看见留下的血迹……

国家计委经济研究所的孟连后来回忆说:

我正在纪念碑南侧抄诗,看见有人追打四散的群众,赶紧收起笔记本,绕到纪念碑北侧。只见北面也涌来好多人,我急忙跑下台阶,想冲出包围,但已来不及了,他们一边狂喊“回去! 回去!”一边舞着棍棒,劈头盖脑打来。猛然一脚,我被踢倒在地,十多人围着我,连打带踢,直打得我头晕目眩,不能动弹。等到我慢慢清醒了一些,才感觉还有一个人压着我的腿,胳膊旁边躺着另一个人,不远处传来人们挨打的惨叫声。他们发现我有抄诗的本子,便把我连夜押到了监狱。

姚文元在4月5日的日记中写道:

今天经历了惊心动魄的阶级斗争,我目睹了反革命暴徒在天安门广场的表演,并自始至终参加了镇压反革命分子的斗争。

下午二时,政治局紧急开会,人民(天安门)广场上发生了赤裸裸的反革命煽动,反革命暴动事件,打了解放军,烧了汽车,打了民警,打了革命群众,并且冲到人民大会堂东门。一批人在记(纪)念碑进行反

革命煽动,号召成立反革命组织,以“悼念”总理为名猖狂地把矛头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向中央,提出要邓小平上台,喊“总理万岁!万万岁!”一个有组织、有计划的反革命阴谋越来越露骨。

今晨,我已把人民日报一份记者手写的情况在政治局会上报告并请远新同志报主席。其中提到反击右倾翻案风是“一小撮野心家”搞的,邓小平主持工作是他们“决定性胜利”。听了这个情况,我提出此事已带有反革命政变性质,要立即采取措施,开短会,不要多议。当即决定:由吴德发表讲话,指出这是反革命性质事件,号召群众离开广场,然后立即组织民兵进行包围、分割后均(拘)留其骨干分子,予以有力打击。

三时散会,我先到人民大会堂北京厅外,看见了广场全景,四大批人拥来拥去,两堆火还在历史博物馆外燃烧。我即请政治局同志都上来看一看,在江西厅,大家都来了。这是触目惊心的反革命事件,一场匈牙利反革命事件的前奏。碑前核心部分有一批坏蛋始终不动,谁去反对就打谁,另有一伙人进行反革命演说,送花圈、贴传单。外面有好几万人,流来流去。再外面有一批骑脚踏车的人飞快地来回巡逻,看来是通风报信的。还有不少小汽车,有不少是部队的。不一会,解放军营房的小楼着火了,又一辆车着火了,火光熊熊,黑烟冲天。于是,看见楼上把被子、床单、衣服、书籍、纸张一批一批地从窗口掷了出来,掷到火中去烧。救火车无法接近。望远镜中,看见有一个家伙爬上纪念碑放了一个大花圈,用绳子把它围起来。政治局同志看到这一切,无不仇恨满腔,阶级斗争是这样尖锐,这已经是武装暴乱性质了!

大喇叭还不响,我们很急,一再查问。华国锋要求王洪文、张春桥、我留下来处理。我同意。终于,在六时二十五分,人民广场的大喇叭响了,吴德同志录音讲话反复讲反复播放。大喇叭一响,立即看见广场上的人大多数人潮水一样一批又一批向北退去,不到一小时,广场上人已大为减少,看热闹的走了,核心部分就越来越暴露在面前。

九点二十五分,民兵开始行动。

一小撮反革命分子在无产阶级专政威力下迅速被击溃。带着棍子的民兵雄赳赳、气昂昂地开进广场,从南北两方面加以包围,敌人彻底瓦解了。

晚,政治局开会听汇报。战果辉煌。

抓住了二百多人,放了一些之外,还留下一百多人,突击审查。

强大的“革命暴力”“摧毁”了弱小的“反革命暴力”。

《人民日报》的内部刊物《情况汇编》在4月5日前后不到一星期的时间里,一连出了十几期。

《情况汇编》的印数很有限,可是,作用很大。姚文元曾说过:“这个小报,比几百万张报纸的作用还要大。”

为什么呢?因为《情况汇编》直送毛泽东。卧病之中的毛泽东,主要依靠《情况汇编》了解外面的情况。另外,《情况汇编》也送中共中央政治局各委员。

4月4日,《情况汇编》上原本编入了一首来自天安门广场的《满江红·敬周试作》:

千古华土,脱蛹几只新苍蝇,嗡嗡叫。得宝成精,自鸣得意。伟人光辉形象在,岂容小虫来下蛆。激起我满腔怒火烧,拍案起。

志同者,团结紧,捏卫咱,周总理。拿起火与铁,准备决战。任凭熊罴掀恶浪,摆开架势对着干,揪出藏尾巴的恶狼,斗到底!

姚文元大笔一挥,斧去上半阙。再删去“捍卫咱,周总理”以及结尾句,只留下“志同者,团结紧,拿起火与铁,准备决战”。然后,姚文元加上批语:“这类反革命言论表明,幕后策划者是在言论之外,还想搞行动。”

4月5日,姚文元看到人民英雄纪念碑南面贴出的那首《扬眉剑出鞘》五言诗抄件后,把其中的“泪”字改成“血”字,变成了“洒血祭雄杰”。然后,又从抄来的许多诗里挑选了一首,加以删节,与那首五言诗连成:

欲悲闹鬼叫,
我哭豺狼笑。
洒血祭雄杰,
扬眉剑出鞘。
中国已不是过去的中国,
人民也不是愚不可及,
秦皇的封建社会已一去不返了,

我们信仰马列主义，
让那些阉割马列主义的秀才们，见鬼去吧！
我们要的是真正的马列主义。
为了真正的马列主义，
我们不怕抛头洒血，
四个现代化日，
我们一定设酒重祭。

姚文元把这首诗编入《情况汇编》，并亲笔加了这样的按语：

“所谓反对‘秦皇’，要真正的马列主义，完全同林彪反革命政变计划中的语言一样，是彻头彻尾的反革命煽动。这伙反革命分子把矛头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向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更加暴露了他们要在中国搞修正主义、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目的。”

4月4日《清样》刊载的一首题为《清明节呐喊》的诗写道：“……‘遥瞧’无罪？总理有瑕？桩桩件件，有目共察。追根寻源，海辽两家。名利熏心，欲立自家。……”姚文元在这首诗的后面加了一段话：“这除了上海之外，还把矛头指向辽宁，暴露了策划者的一部分意图。”

4月5日的《清样》写道：“有十来个小伙子，分别被闹事的人围打。据闹事的人说，其中两个是清华大学工农兵学员，一个是解放军。他们公开说了‘周总理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派’。因此，他们头上都被打起了几个大血包，脸浮肿，流着血。许多人叫着：‘打死他！打死他！’”姚文元删去了“他们公开说了‘周总理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派’”一句。

# 第1391回：邓小平，再次被撤销职务 华国锋，党内第一副主席

1976年4月6日，天安门广场戒严。

4月6日凌晨，中央政治局在京委员继续开会，确认天安门广场发生的事件是“反革命暴乱性质”，决定继续组织3万名工人民兵，在天安门广场附近集中待命，并派9个营的军队在京城随时机动。

凌晨3时，会议结束后，毛远新立即以书面报告形式，向毛泽东汇报：

主席：

5日夜到6日凌晨，政治局部分同志听取了北京市汇报，并研究下一步怎么办。

北京市公安局局长刘传新同志首先介绍情况，要点如下：

今天(5日)敌人闹得这么凶，我们估计不足，上午很被动，下午才扭转过来。

从现场来看，有组织地活动的约有二百来人；跟着起哄或表示同情支持的有四千多人，其中有十几岁的学生、社会流氓；其他是看热闹和过路的人。

昨天晚上的行动，捉了十几个，清理了花圈，今天他们早上六点就来了，提出1.要花圈；2.要战友。碰见民兵、战士、公安人员就打，他们利用战士民兵打不还手的纪律，硬往死打。总计：

伤：一百六十八人，其中：民兵六十一人。

战士：五十二人，公安人员五十五人。

重伤：十五人，已送医院抢救。

烧毁汽车四台，砸毁汽车两台，并放火烧了历史博物馆南侧的小红楼(现场市委指挥部)。烧自行车一大堆。

查出一个地下“新造反委员会”。

下午决定只要歹徒动手打人，民兵、战士、公安人员可以还手，并

配备了短木棍,敌人的气焰马上就下来了。我们的士气大振。

市委通过天安门广场的大喇叭广播以后,多数看热闹的群众都很快走散,一万民兵和五个营的战士及三千公安人员带着木棍把闹事的人全部包围,分批清理,多数教育释放,捉了最坏的三十八个人,前天捉了三十九个,大部分有证据。目前天安门前恢复正常。

刘传新同志说:这次事件有个特别明显的特点,即他们的矛头非常集中,各类演说、诗词、悼词、小字报、传单、字条、口号都集中攻击毛主席、攻击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这么多讲话、文章,就是不批邓,(有的公开拥护邓小平)不提走资派,不正面提毛主席(攻击的提),手法多样,朗诵诗词的,发表演说的,教唱歌的什么都有,很多不是这些年青人写得出来的,内容既恶毒又隐晦,是白头发的人编写的。

再一个特点是法西斯,不顾后果,疯狂已极,杀人、放火无所不为,(不是抢救得快,很多人会被打死)连提出不同意见的看热闹的群众都往死里打,是地地道道的反革命事件。在天安门广场光天化日下群魔乱舞,这是历史上没有的。

够立案侦察的有三百多起,反动的东西共三百四十多件。

此外,从整个行动来看,完全是早有预谋,有组织有计划的。今天这么凶猛的反扑,出我们的意外,原以为昨夜打击了他们,得喘息一下吧,谁知趁我们拂晓调整兵力部署的时机,突然组织反扑,我们过于天真了,看简单了。

今天得了教训,准备明后天新的反扑,已组织了三万民兵,九个营的战士,只要允许民兵挨打还手,不用战士也可以对付。

估计敌人会准备明暗两手,要防止他搞暗杀、破坏活动,他们什么都干得出来。

卫戍区司令吴忠同志说:

现在已准备了三万多民兵,集中在中山公园、劳动人民文化宫待命,市区内集结九个营的部队随时机动:

历史博物馆两个营,

小红楼一个营,

中山公园一个营,

劳动人民文化宫一个营,

市委机关一个营，

人大会堂一个营，

西单招待所一个营，

市公安局一个营。

另外，还有三、四个师驻扎近郊待命。

今天我们估计不足，准备也差，上午没搞好，没有集中力量，在今天上午烧汽车时就应出动，但调动不灵了，指挥部没（被）包围，冲进去放了火，在一楼浇上汽油、点火。要把楼上的全烧死。楼上有民兵指挥部的马小六、张世忠同志（中央委员），有卫戍区两个副司令，市公安局两个副局长，他们从后门跳窗才跑出来，教训太大了。

另外，打不还手是指人民内部，那样的反革命，烧汽车、打人还不还手，吃亏了，他们连外国人也打，想制造事端，我们估计不足；暴露了我们工作中很多弱点。

今天最后取得了胜利，但教训太深了。

政治局的同志一起研究分析了一下：

不要以为事情完了，天安门前大表演是在造舆论，下一步是不是在广场不一定，防止他们声东击西，准备更大的事件的发生。因此民兵明天不要轻易出动，指挥要从全市着眼，不要只注意广场，遇事要沉着，看准了，不动则已，一动就要胜利。

民兵要进行思想教育，讲清这根本不是什么悼念总理，是反革命暴乱性质。不要把民兵手脚捆得太死，“小人却动手，老子也动手”。请吴德同志代表中央去慰问受伤的同志。

公安局要侧重侦察线索，找到地下司令部，只打击了表面这些年轻人不行，要揪出司令部。

部队也要加强教育。防止敌人也拿起武器，包括枪枝。要准备几个方案，徒手、木棍、不行就动枪。

市委要进一步加强宣传教育工作，使全市人民知道天安门前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明天人民日报要发社论，组织全市人民学习，批邓提高警惕，准备应付更大的斗争。

国锋同志最后归纳了大家的意见，并建议由北京市立即把这两天的情况、性质、主要罪行，采取措施写个材料，中央尽快通报全国，今天

的事必然会传到全国,敌人会进一步造谣,制造混乱,挑起更大的事端,各省市不了解情况有所准备是不行的。

大家认为尽快向全国通报很有必要,起草后送主席。

主席还有什么指示,望告。

4月6日三时

毛泽东于11时批示:“士气大振,好,好,好。”

下午,江青也来到毛泽东住地,当面向他报告处理天安门广场事件的经过。张玉凤回忆:“她走到主席床前,对主席说:‘我来这以前,特意到天安门广场绕了一圈,一路上硝烟弥漫,一伙人烧房子,烧汽车。这是以死人压活人,邓小平是他们的总后台,我要控诉。我建议开除邓小平的党籍。’主席看了看她,没有说话。”

4月6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发表了《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的社论,坚持“批邓”,并再一次将毛泽东不久前说的话“翻案不得人心”,以黑体字标出。

4月6日,姚文元在日记中写道:

晚,政治局开会,毛主席听了民兵拿起武器非常高兴,说:“士气大振,好!好!好!”决定搞一文件,北京市委起草,通报全国。昨日紧急起草的一篇社论,今日已见报,毛主席批了,指出了对反革命政治谣言要严加追查,对反革命分子必须实行无产阶级专政。

4月7日上午8时5分至9时15分,毛泽东听了毛远新汇报,作了一系列重要指示。

以下是毛远新整理的谈话记录,向中共中央政治局传达:

(我汇报了4月5日、6日北京市的情况,谈到原来是打不还手,吃了亏,性质变了,应还手,并配备了木棍)

主席:谁人建议的?陈锡联?

(我:好像不是他,他是赞成的,他说战士只能挨打不行。政治局好几个同志一直在大会堂注视广场事态变化,和北京市委一起研究解决的办法,吴德去发表演说是大家的主意,动员一般群众离开,人少了才好动手。)

主席:好。

(我:目的是区分两类矛盾,一讲事件的性质,好人都离开了,当然

也有坏人聪明点的跑了,剩下人少了,我们的力量占优势再下手。)

主席:(点头)嗯。

(当我谈到政治局6日晚上研究的几件事,提到华国锋同志建议将北京发生的事通报全国,起草了北京市委的报告,中央发个文件——)

主席:公开发表。

(我:登报?)

主席:是。发表人民日报记者现场报道(指了指桌上人民日报的《情况汇编》三份),吴德讲演等。

(我:市委报告不发了?)

主席:不发。并据此开除邓的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以上待三中全会审议批准。

(我:太好了!将来召开三中全会时补手续。)

主席:(点头)嗯!

(我:由中央作决议,也公开发表?)

主席:中央政治局作决议,登报。

(我:好。上次会议,春桥同志当邓小平面说:你看看天安门前的情况,人家要推你出来当纳吉。)

主席:(点头)是的。这次,一,首都,二,天安门,三,烧、打、砸这三件好。性质变了,据此,赶出去!(用力挥手)

(我:应该赶出去了!我马上找国锋同志去。)

主席:小平不参加,你先约几个人谈一下,不要约苏振华。

(我把除邓、苏以外的政治局同志的名单列出,送主席看。)

主席:叶不找。

(我把叶剑英划掉。问:除这三人外,其他同志都参加?)

主席:好。华国锋任总理。

(我:和上面决议也一起登报。)

主席:对。

(我:我马上去通知国锋同志开会传达。)

主席:(挥手)快,谈完就来。

据毛远新2010年12月22日与阎长贵通电话时回忆说:“主席选

定华国锋做接班人,他还是希望张春桥做‘军师’,安心做副手,他让我向张春桥传一句话:‘遵义会议后我不就是做了十年的副手吗?’”其中“遵义会议”四个字毛远新怎么也听不清,毛泽东就用笔写了出来。另外,关于“天安门事件”的性质和对邓小平的处理意见也都是毛泽东亲手写的。

关于4月7日参加政治局会议的人员,毛远新先是传达毛泽东的意见,说朱德、叶剑英、李先念、苏振华不必参加会议了;但其间毛远新出去了一趟,回来后又通知除苏振华外,其他人都到会。苏振华前几次的会议都参加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不让他出席7日的政治局会议。于是,政治局会议直等到朱德、叶剑英、李先念都到达后才开始。

对于毛泽东“撤销邓小平一切职务”和“任命华国锋为国务院总理”的两项提议,与会人员都不说话。政治局当即拟定了文字稿。朱德戴上老花镜拿起文字稿看了一遍,一言未发。

在讨论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时,叶剑英不表态,朱德离开了会场。

在讨论开除邓小平党籍时,叶剑英起身说:“开除?把我也一起开除吧!”说罢也离开了会场。李先念不表态。华国锋、陈锡联、吴德、纪登奎提出:“要请示毛主席。”

接着,汪东兴提出增补江青为中共中央副主席,张春桥、姚文元和吴桂贤表示赞同。江青表示:“坚决拥护华国锋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我不当什么副主席,继续当批判邓小平的‘过河卒子’。”

此时,叶剑英、朱德已离开了会场,李先念不表态,华国锋、王洪文、陈锡联、吴德、纪登奎还是表示“要请示毛主席”。

毛远新立即将政治局决议的文稿拿去请毛泽东批示。毛泽东看了政治局的议案后,圈了华国锋为总理,并加上“第一副主席”,在江青名字上用方框圈了起来。他在政治局讨论纪要上,圈了叶剑英,批上:“是在指责我。”圈了李先念,批上:“还是给我面子。”圈了华、陈、吴、纪,批上:“意见相同,我还活着,留在党内。”

很快,毛远新回到大会堂,对政治局说:“毛主席已经批准了。”

4月7日上午,姚文元火急火燎地打电话给鲁瑛,说:“你和写天安门广场情况的记者,马上到人大会堂来,带着那几期刊登广场事件的

《情况汇编》来!”众人到齐后,姚文元立即布置新任务,说话中带着胜利的喜悦:“大好事!大好事!你们把反映天安门事件的几期情况,编成一篇公开报道。”

中午,姚文元把那些记者,领进了人民大会堂东大厅,与江青、张春桥、王洪文见面。

姚文元介绍说:“他们就是搞天安门情况的。”

王洪文马上以副主席的身份,表彰道:“你们有功劳呀!小小的《情况汇编》,比几百万张的作用大!”

江青的话最多,不断地说:“我们胜利了,祝贺你们!”

江青还“亲切慰问”他们:“你们挨打了没有?”

王洪文高高地举起酒杯,对记者们高喊:“都干一杯!我们为胜利干杯!”

江青也一一敬酒,表示祝贺。

干毕,张春桥说:“那帮家伙写反动诗,就是要推出邓小平当匈牙利反革命事件的头子纳吉。他们的后台,就是邓纳吉。我们的报道,一定要注意把天安门事件与邓小平挂起钩来!”

一番喜气洋洋的祝贺完毕,记者们便紧锣密鼓地开始把近几期的《情况汇编》,改写成《现场报道》。

“要快!写好1页送1页回去排印。”姚文元说:“用我的警卫车去送稿!”

下午,毛远新去见毛泽东,请示当晚就要广播的两个决议的问题。毛泽东没有什么新的原则性的补充,只是对任命华国锋为总理的第一个决议作了重大补充。他说:“还要任党的一个副主席,并写在决议上。”

晚上,中央政治局再次开会,宣读并通过了中共中央的两个决议。即《关于华国锋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的决议》、《关于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定》,具体内容如下:

中共中央关于华国锋同志担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的决议

根据伟大领袖毛主席提议,中共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华国锋同

志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中共中央

1976年4月7日

中共中央关于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议

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了发生在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事件和邓小平最近的表现,认为邓小平问题的性质已经变为对抗性的矛盾。根据伟大领袖毛主席提议,政治局一致通过,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

中共中央

1976年4月7日

1小时后,4月7日晚8时,中央电台向全国广播了这两个决议。

# 第1392回：汪东兴，安排转移邓小平为花圈，郑州有人被打死

在4月7日上午讨论毛泽东指示的政治局会上，江青等人谈到邓小平就是“天安门事件”的总后台时，说邓小平曾坐着汽车到天安门广场亲自进行指挥。

江青和张春桥说：“要做好思想准备，可能有群众要去冲击邓小平，把邓小平抓起来。”

华国锋说：“应该去向邓小平本人问一下，以便核实。”

于是江青说：“让汪东兴去吧。”

汪东兴认为此事事关重大，需请示主席。他从人民大会堂出来，并没有去找邓小平谈话，而是车子一拐，进了近在咫尺的中南海。汪东兴向毛泽东汇报可能有人会去冲击邓小平。毛泽东说：“不能再冲击，不能抓走。”并问汪东兴有没有办法？汪东兴建议，把邓小平转移个地方，可以转移到东交民巷那个房子去。毛泽东说：“可以。”

汪东兴立即布置，让中办警卫局马上准备东交民巷的房子。并交代滕和松立即做出一个警卫方案。交代完后，汪东兴让人通知邓小平的秘书王瑞林找邓小平谈话。同时，汪东兴通知警卫局的处长东方，让东方找个不显眼的车子，去把邓小平接到东交民巷。一切布置好后，汪东兴赶往东交民巷。在东交民巷，汪东兴将有关情况告诉了邓小平，问了他是否曾坐车到天安门进行指挥。邓小平说，他只有一次坐车去北京饭店理发，根本不是什么“指挥”。汪东兴对邓小平说：“可能有人要冲击你，不要出去，散步就在院子里。”之后，汪东兴又回到中南海，向毛泽东作了汇报。

当汪东兴赶回到人民大会堂时，已经是晚上了。这期间，中央政治局通过了“两个决议”，向毛泽东报告并得到了毛泽东的批准。江青等人问汪东兴：和邓小平谈得如何，邓小平是不是坐车到天安门直接进行了指挥？汪东兴照实回答，邓小平只是去北京饭店理发。张春桥

让汪东兴写个谈话记录。汪东兴火了,说:“让你们去,下次你们自己去问吧。”汪东兴没有把将邓小平转移到东交民巷的事情告诉任何人。

姚文元在4月7日的日记中写道:

清晨刚吃安眠药不久,又来电话把我叫去开会(引者注:指上面所引毛远新传达毛泽东在当天上午的谈话记录)。主席有重要指示。主席问了天安门的情况,当毛远新汇报到政治局准备发一内部通报时,毛主席说:“要公开发表,在报纸上发表。不是发北京市革委会的报道,而是发人民日报记者现场报道一、二、三和吴德同志讲话。并据此开除邓小平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以上待三中全会批准。1.首都:2.天安门;3.烧、打、砸这三件好,性质变了,据此赶出去!同时决定,华国锋任国务院总理,以上四件均登报。

这是在关键时刻,以果断行动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一举粉碎了反革命事件的首脑,将动员起千百万人民起来进行斗争,表现了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伟大气魄和决心。决不犯巴黎公社放松镇压反革命的错误。我热烈拥护主席的决定。会上决定,今晚八时广播。

我提出还有份刚发出的情况,是反革命分子在民兵强大威力下被缴械的报道,应补入。

由于人民日报是内部报道,把几份合成一份,时间极紧急,我立即把人民日报的鲁瑛、新华社的解力夫、广播局的邓岗、萧木四人找来,并组织了汽车,规定这些人一律不回去,成立指挥小组,每个单位准备了通讯联络工具,有事商量应由各单位负责人立即通过汽车送回。人民日报几个记者也来了。非常高兴,几夜没有睡了,眼睛都充满了血丝,但立即投入了写稿的战斗。

不久,毛远新向毛主席汇报回来了。主席还说:决定中要加上华国锋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当晚八时广播,还要译成外文。当讲到人民日报还有一篇时,主席说:对呵!正在看。同意要跟省、市、大军区同志打招呼。

稿子改、排、送,花了不少时间。终于在政治局修改通过了。报主席。在两个决议、一个讲话批回来以后,此件也批回来了。当时是六时四十分,离广播只有一个小时多了,还要先期录音,由于预先已准备好车子,广播局同志立即带了稿子离开,我说要坚决保证及时、准确地

完成任务。

七时开了一个北京各负责人会,只有十分钟,读了两个决议,要大家听广播。开完会,其他同志都走了,我决定留下来,听了广播再走。因为历次经验告诉我:这样匆忙地赶出来的东西必然在文字上会有误的,需及时校正。因而宣传单位的几个人也留了下来。一天身体已很疲乏了,但精神是十分振奋的。

一分钟、一分钟地等待着,八时来临。收音机响了!播音员宏亮的声音,十分有力地播出了四个文件,声音在大厅中如洪钟般震荡着。果然发现有个别错误,如"天安门"误写成"人民广场"等,立即进行校正。请同志们吃了饭,在这个战役取得决定性胜利后,我们这个宣传的前线指挥部解散了。各自回本单位,艰巨的、新的战斗任务在等着大家。

我怀着一种战斗的喜悦回到家时,英、三三、莉莉一起极为高兴地拥上来,都说:"好得很!""大快人心!"我很想多说几句,但这时又感到一种特别的疲劳,坐在沙发上不想多说了,一天吃了一餐,走了许多路,精神上的紧张……这时随着一个大战役的结束而迸发出来了。英劝我躺一会,我躺了一下吃了安眼药,但始终睡不着,又爬了起来。是的,不能骄傲,不能麻痹。无产阶级专政下革命的路还很长,还有许多政治、组织问题要处理。但是今天这一切,都以鲜明的阶级斗争的事实告诉我们:必须加强无产阶级专政。一是有力的面向国内的亿万劳动人民和全世界的宣传,把反革命的阴谋煽动彻底揭穿;二是武装起群众,坚决拿起棍子(必要时机);三是果断的组织措施。千百万人民懂得了阶级斗争的真象(相)和自己的任务,敢于善于拿起武器同反革命分子战斗,用铁拳狠狠打击反革命分子,同时中央机构及时地处理内部的资产阶级代理人,叛徒,从无产阶级利益出发,打破一切资产阶级民主的框框束缚(如要开会"选举"啊,要开"人大"通过啊……)

采取果断的清除坏人的组织措施,这是粉碎反革命政变的三项基本经验。

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在阶级斗争的大风大浪中胜利前进!毛主席万岁!

四期简报,均是我修改后发的,留此以作纪念。

姚文元把人民日报的《情况汇编》265 期等 4 期简报订在日记中，留作纪念。

4 月 8 日，《人民日报》登载了两个决议。

人民日报

毛主席语录

文化大革命是干什么的？是阶级斗争嘛，初步肯定阶级斗争搞天论，他自己就不是搞天，他要保护他那一堆黑货，耳党，林彪要打倒无产阶级，搞政变，想天了吗？

人民大众开心之日，就是反革命分子难受之时。

中共中央关于华国锋同志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的决议

中共中央关于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议

吴德同志在天安门广场广播讲话

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

1980 年 10 月，张玉凤在呈报中央的一份材料中，记述了毛泽东当时的情况：

“四·五”前后，主席对外面的情况一点都不知道。他病重动不了，由我们工作人员搀扶着才能走几步，就得赶快坐下来或躺下，呼吸困难，连讲话的气力也没有。根本不知道外面发生了什么事。连我们也不知道。

江青、毛远新为了控制当时的真实情况，曾给我们在主席身边工作的同志下了条规定：没事不要到外边去。毛远新还让汪东兴通知我们：现在外边很乱，最好不要到外边去，也不回家。让汪东兴在中南海找个房子，让我爱人和孩子临时到里边来见见就行了。这个安排我没

同意。这期间,我也没到外面去,对外面的事也是一无所知。

这些天,毛远新随时都来,他说:政治局的同志连夜开会,认为天安门发生的事件不是孤立的,是匈牙利事件在中国的重演。还说邓纳吉这类词。政治局还决定将天安门前所有的花圈烧掉;还通过了吴德同志的那篇讲话稿。这一时期的决定都是政治局议定后,报告主席。主席也无力细问,只能点头,表示知道了。这段时期,中央作出的一系列错误决定,让一个已经长时间不能说话、不能吃饭、连呼吸都很困难,卧床不起、只有一息尚存的病人负责显然是不合适的。

1976 年 4 月 5 日上午,八点左右,毛主席正重病卧床,值班医生和护士看护。这时,江青手拿一根木棍来到主席住处,问我:"主席醒了没有?我有事要同主席谈。"她走到主席床前,对主席说:"我来这以前,特意到天安门广场绕了一圈,一路上硝烟弥漫,一伙人烧房子,烧汽车,这是抬了死人压活人,邓小平是他们的总后台。我要控诉!我建议中央开除邓小平的党籍。"

主席睁开眼看了看她,没有说话。

江青又说:"政治局已经开了会,作了安排,你放心,过一会毛远新还要来向你报告政治局开会的详细情况。"

不多时,毛远新带着华国锋主持的政治局关于"四·五"的决议,让主席表态。主席听了毛远新的汇报后,用红铅笔在另一张纸上写了:"同意,要保留党籍,以观后效。"后来,人民日报发的《天安门反革命事件真相》和社论,主席没有看过。据说,江青、张春桥在天安门"四·五"运动平息后,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了庆祝酒会,华国锋同志亲自参加了。

1976 年清明节前,郑州市中心二七纪念塔下也摆放了一些花圈。和北京天安门广场一样,表面上看是纪念周恩来总理的,但仔细看其中的一些挽词和贴在旁边的大字报,就知道是针对当时正在开展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矛头直指张春桥、江青。

4 月 4 日清明节这天,郑州市肉类联合加工厂的一些人,到二七塔周围看了看,回厂就展开了讨论,他们听说北京、南京等地也有类似的情况,认为这是一股反革命逆流,决定要公开表达他们对这一事件的立场。

4月5日清晨,签着肉联厂几十人真实姓名的大字报《严正声明》,贴在二七纪念塔北边约200米的郑州市电信局营业大厅门前。

当天傍晚,新华社河南分社给肉联厂来电话,让签名写大字报的人派代表到分社去。代表们来到河南分社,一位记者接待了他们。他表情十分严肃,详细听取代表们的看法。最后,他告诉他们,他已将他们的大字报连同所有签名一字不漏地报告中央政治局。他还说,据他了解,这是全国第一张这样内容的政治声明。

谈话结束后,肉联厂的这些代表就在新华分社门口议论开了,大家说从这位记者的态度来看,他们没有作错。这时,有人建议:"去把那些有反动内容的花圈收了。"

说干就干,他们回到厂里,将一辆卡车开到二七广场,把一些他们认为有反动内容的花圈收到车上。在这个过程中,一些群众在围观,也有人问咋回事,肉联厂的人向群众宣传他们的看法。没有人阻拦。

花圈装上车,有人说"送到省委去,让省委表态"。他们就直接将花圈拉到了省委南院。值班员把办公室张副主任找来接待他们,张副主任不同意接受这些花圈。肉联厂的工人也不和他废话,就把车上的花圈卸下,一一摆放在省委南院正对大门的办公楼前,目的是让省委负责人都能看见。然后,他们又回到二七广场继续搬。这时候,突然开来几辆卡车,上面全是穿军装的军人,肉联厂的人下意识地背靠背聚在了一起,心中十分紧张。没想到这些当兵的,下车就热情的和他们打招呼,然后就和他们一起收花圈,打扫现场。原来,省委书记耿其昌打电话到北京,向纪登奎报告此事,纪登奎在电话里要耿其昌派部队协助肉联厂的人处理此事。

肉联厂的人回到工厂后,立即用电话或直接派人与和他们共同观点的单位联系,向他们通报了当晚的整个情况。最后签署了郑州肉联、郑州纺织机械厂、郑州交通运输公司、503厂等72个单位群众的《联合声明》,表达他们收花圈和对这一政治事件的立场,随即贴出。此时已是后半夜,他们几个单位的群众又走上街头,刷写表达这一立场的大标语和大字报,直到4月6日晨,才陆续回去休息。但还有少数人在继续刷写大标语。

但是,最后走的郑州市电信局职工焦春亮后来被十几个人围攻追

打,直至被活活打死在二七广场。听到这一消息后,各单位的群众又重新走上街头,声讨这一血腥暴行。这应该是“清明节事件”后唯一被打死的人。

郑州市革委会决定将焦春亮追认为烈士。这一年的夏天,郑州市公安机关按当时一贯的做法,将一批需要逮捕或交付审判的人员材料印成小本,发给群众讨论,征求意见。这本小册子中有郑州清明节事件中写匿名大字报的人员,同时,将当局侦讯后认定打死焦春亮的凶手刘敬列在这本小册子的第一位,加上“民愤极大”的语气,按当时的惯例,是要判死刑的。肉联厂的一些人已知道写匿名大字报的那些人和北京“清明节事件”的主要组织者、参与者一样,大多数是高干子女,也一样有很深厚的政治背景。他们觉得,在没有查清之前,就一判了之,这其中肯定有走资派的阴谋。于是,大家又署名写了一张大字报,呼吁“刀下留人”,并揭露省走资派企图“杀人灭口”的阴谋,大字报贴在市百货大楼门口。贴出去的第二天,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一副院长到肉联厂和写大字报的人员座谈,听取他们的意见。此后,刘敬等人的判决就被搁置下来。直至后来中央为“清明节事件”平反,他们出狱,打死人的刘敬等人又成了“四·五”英雄。也是在“清明节事件”平反后,郑州市委取消了焦春亮的烈士称号。当时参与反击这一事件的一些人在以后的“揭批查”运动中,也因此而获“反周”的罪状,在监狱和学习班里遭到了清算。

176 年 4 月 7 日,湖北、武汉的省、市革委会群众代表正在一冶开会,当他们从广播中听到“华国锋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的两个决议后,一片欢呼,紧急开会研究如何乘此东风促省委转弯子。曹承义则开了多辆广播车连夜到武汉三镇广播这激动人心的消息。广播车高音喇叭高呼:

“坚决拥护中央两个决议,拥护中央正确处理天安门反革命事件!”

“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誓死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

“紧跟毛主席,重上井冈山。打倒邓小平,消灭还乡团!”

“继续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

“转好弯,快转弯,诚诚恳恳作检讨!”

随后,曹承义又带人把大标语刷遍武汉三镇。

4 月 8 日,听说湖北省委上午要召开电话会议的消息,胡厚民说要到省委,大家都跟着去了。到了省委门口,大门洞开,哨兵也不拦阻,因为一辆满载武汉重型机床厂工人的卡车正冲了进去,全部是武重“工总”的队员。胡厚民他们紧随其后进入省委二楼会议室。赵辛初、赵修、韩宁夫等书记们正在开会,工人们不管三七二十一 ,上去就拉赵辛初等人,待到要拉宋侃夫时,吴炎金挡在前面说:“不关他的事。”将他留了下来。

吴炎金为什么要保宋侃夫呢? 原来批林批孔运动时,胡厚民和吴炎金曾去过宋侃夫家,他们谈得非常好,宋侃夫对造反派并无怨言,长期靠边站的他也不存在任何整造反派的问题。他虽参加省委开会,可他无职无权,把他抓去于事无补。

工人们带走省委第一书记赵辛初和赵修、韩宁夫,并临时决定在汉口闹市区武胜路新华书店门前开群众大会,请他们 3 人分别在会上表态。

从武昌水果湖到汉口武胜路的途中,赵辛初等人内急,一时无法找到厕所,胡厚民他们就让工人看着赵辛初他们在僻静处小便。当他们一行人到了武胜路新华书店后,工人们扶着赵辛初等省委领导,从软软的竹梯爬上大会主席台。大会由吴炎金主持,赵辛初、赵修、韩宁夫分别在大会上讲了话,都表态拥护党中央两个决议,表示坚决打倒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转好弯子,保卫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朱鸿霞、胡厚民也在大会上讲了话。参加大会的群众非常多。这一次活动又通了天,

中央很快打来电话:“抓走赵辛初等领导同志是错误的,应赶紧送回去。”此时,工人们已将赵辛初、赵修、韩宁夫等省委领导安全地护送回去了。

省委领导人很快与胡厚民他们达成了一些共识:一、省委是积极转弯子的,坚决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二、正确对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确对待造反派,“滚”下去的全部请回来。三、“两清一批”犯了扩大化错误。胡厚民他们最初认为是方向、路线错误,是右倾翻案、

否定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但是他们在涉及造反派头头入党、提干、补台的问题上意见未能统一,在湖北省委是否紧跟邓小平大刮右倾翻案风问题上各执己见,其中省委书记韩宁夫对立情绪比较严重。

街上的大标语依然是花样翻新、层出不穷的,省革委会副主任朱鸿霞就在通往长江大桥的龟山山坡上用红油漆写了“打倒邓小平”五个大字,署名朱鸿霞。

# 第1393回：叶帅府，老干部来往频频 保定乱，陨石雨引发感慨

4月8日清晨，上海市中心人民广场的上空升起了一面白色的旗帜，上面写着“沉痛悼念恩来总理”八个大字，还缝着周恩来遗像。升旗者是徐汇区服务公司建新机修厂工人黄水生。黄水生将旗子在广场中心的一个旗杆升上去后没有离去，就站在原地等着人来抓他。闻讯赶去的民兵将他拷上手铐。以后他被投入监狱，直到文革结束后的1977年2月16日，方被释放。

4月8日，《人民日报》刊登现场报道《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

四月五日，这种反革命活动达到了高潮。八点左右，一辆市公安局的广播宣传车被砸，车子被推翻在地，车身和喇叭都被砸扁了……

十一时五分，许多人又涌向天安门广场东边的历史博物馆。博物馆前一个女同志出来劝阻，马上被拉去打了一顿。这时，有一帮坏人围着广场东南角，钟楼旁边的一座解放军营房，砸了门，占了房子。几个理着平头的家伙，拿着半导体话筒，轮着用嘶哑了的声音煽动。将近十二点，有的闹事的人还宣布成立什么“首都人民悼念总理委员会”。一个戴眼镜的坏人扬言限公安局十分钟答复，不答应条件就砸烂公安部门。

……

请看，这伙反革命分子是怎样以极其腐朽没落的反动语言，含沙射影地、恶毒地攻击污蔑伟大领袖毛主席、党中央的领导同志的：

“欲悲闻鬼叫，我哭豺狼笑，泪血祭雄杰，扬眉剑出鞘……”

……九时半，数万首都工人民兵接到了北京市委员会的命令后，在人民警察和警卫战士的配合下，采取了果断措施，实行无产阶级专政。英雄的首都民兵士气大振，雄赳赳、气昂昂地排着队伍，开进天安门广场，进行有力的反击。他们把仍在纪念碑一带作案、闹事的坏蛋，

团团围住,将其中现行犯和重大嫌疑分子,拘留进行审查。这一小撮张牙舞爪的坏人,在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面前,不堪一击,一个个如丧家之犬,蹲在地上直打哆嗦;有的慌忙把身上的匕首、三角刀和抄有反动诗词的本本交出来;几个拔出匕首妄图行凶顽抗的罪犯,受到了应有的惩罚。

姚文元显得异常兴奋,他在4月8日的日记中写到:

各地形势多数均好。反革命仍有破坏,这也在预料之中。邓小平一动,地、富、反、坏、右即发出嚎叫,绝望者狂跳,没有什么奇怪,镇压就是了。问题还在党内。这次事件,我看有三种因素作用:(1)党内走资派(包括要保卫资产阶级法权的高干子弟);(2)社会渣滓,从刑事犯,到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到反动文人;(3)还有特务(国民党,苏修)。其中党内走资派是台柱,主心骨,凝结点。故征途尚长。

此次天下已定,作词一首,总括以记之,以待下次斗争参考对比。

水调歌头·天安门广场

巍巍雄碑立,堂堂大道通。

万千烈士鲜血,化作广场宏。

忽见群魔乱舞,阴火嚎风四起,恶鬼逞狂凶。

工农兵齐奋起,铁拳镇爬虫。

霹雳震,怒涛涌,扫黑风。

誓除阴暗丑类,旌旗耀碧空。

万里征程尚远,白发红颜携手,文武追敌踪。

回首火烧处,红楼倍鲜红。

4月8日,北京举行超过百万人的“庆祝粉碎四五反革命”游行。同日,邓小平给汪东兴写信。在信中,他向党中央和毛泽东表示:第一,拥护华国锋担任党的第一副主席和国务院总理。第二,对继续保留他的党籍表示感谢。

4月12日,《人民日报》编辑部收到署名为“一名现场的工人民兵”的来信,信封正面写着“人民日报总编辑收”,背面写的是“戈培尔编辑收”,信封里装的是4月8日《人民日报》第1版和第2版刊登的《天安门广场反革命政治事件》一文。这份《人民日报》刊头,“人民”两字被打上了黑叉,加上“造谣”两字,成了《造谣日报》。接着,在报

纸的空白处,这位工人民兵写了很长的批语,其中几句如下:

“令人震惊!党报堕落了!成为一小撮法西斯野心家阴谋家的传声筒!”

“明明是十来个青年进行挑衅攻击周总理,并得到大会堂里的人保护,你们说是冲大会堂打人了,谁人不知是江家小朝廷的?”

“你们演的这场‘国会纵火案’实在不高明,一篇混淆视听的假报导就能骗得了人民群众吗?从今日改为:法西斯党机关报。”

“打倒野心阴谋家江、张、姚!!!”

4 月 13 日,毛泽东对选印的天安门事件中诗文原件批示:“天下已定。此件杂乱无章,近于画蛇添足,不宜发表。”

4 月 13 日,毛远新给毛泽东的报告上说“十二晚政治局会议研究了八件事,其中第三件事是北京市委关于天安门事件的报告准备转发全国,”“报告要进一步修改充实,除介绍北京的经验外,要把这次事件的罪证选择一些影印附上,使全国干部更清楚天安门事件的性质。”

毛泽东划了横线并批语:“第三条不好。此计不妥。”

4 月 18 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天安门广场事件说明了什么?》,说邓小平是“右倾翻案风的总后台”。社论说:

第一,它进一步说明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就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

第二,它充分说明反革命分子确实有,而且他们的反革命活动是同党内走资派搞复辟倒退的阴谋紧密相联的。

第三,它又一次说明一切反革命都是短命的,没有什么了不起;广大人民群众是要革命的,绝不会容忍他们的反革命活动。

不过,经过文化大革命的中国老百姓已不像以前那样好管了。有人特地在大楼的墙角转弯处贴大标语,比如在墙尾写上“邓小平打不倒”,于是,有人叫好,也有去报告公安局,但警察来了转 90 度到墙那面,发现标语还有后半句:“造反战士非好汉”。这种合法的恶作剧简直是防不胜防,而且无可奈何。

4 月 18 日,张春桥在写信给儿子张旗(小名毛弟)的信中写道:

亲爱的毛弟:

这个月,我过得相当紧张。从南京到天安门广场,到处闹。四月

五日,我到大会堂,如同亲眼看到匈牙利事件一样。从望远镜里,看得很清楚。当着邓小平的面,我骂了他是纳吉,他态度恶劣,但没有话讲,只能点头。我有幸看到这个纳吉的丑恶末日,出了一点气。(这一段,别人不知道,你也不要吹出去)现在天下已定,正在扩大胜利。我感到上海现在镇压反革命劲头不足,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你到农场,要提高警惕。阶级斗争还是很复杂的,敌人不会认输。寄来的信,都看了。退给你。二炮一封,我留下了。内容我大体知道,近来接到不少类似的信。祝你好。我身体尚好,勿念。

爸爸

一九七六年四月十八日

在发生"天安门广场事件"的同时,4 月 3 日,聂荣臻写信给当时主持军委常务工作的陈锡联,告病假两个月,不参加军委会议。

事情的起因是 1976 年 3 月中旬,中央军委在听取国防科委、七机部关于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的情况汇报时,听到国防科委某负责人反映说,聂荣臻仍在插手国防科委的工作,"让他的秘书参加科委会议做记录,起草科委体制文件。"

原来,1975 年 3 月 16 日,张爱萍刚任国防科委主任,第一次召集国防科委负责人陶鲁笳、肖向荣、陈彬、马捷开会,没有秘书,便提出请聂办秘书帮个忙,到会做记录。

王洪文等听了汇报后说:"中央、军委没有分工叫他管国防科委、七机部的事情,他自己擅自插手管国防科委、七机部的事情,是完全错误的。现在怎么办? 是把他同邓小平一起批,还是先集中批邓?"

这时有人插话说:"关于点聂荣臻名的问题……现在运动开展起来了,势必联系到国防科委、七机部,就是要对聂本人触他一下,从刘少奇、林彪到邓小平到聂荣臻,凡是修正主义的东西都要批。"

于是,在国防科委系统,与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同时,又掀起了批判聂荣臻的高潮。

聂荣臻非常生气,他说:"从 1975 年 2 月重新参加军委工作以后,我除了在军委会议上对国防科委和七机部的工作发表过意见而外,没有单独找这两个单位的负责人谈过话,怎么又批起我来了?"于是在 4 月 3 日写信请病假。

4月5日,陈锡联在聂荣臻的信上批了:“聂帅,您的病情已向中央同志报告过,同意您较长时期休息,注意治疗。”

4月的一天,叶剑英办公室突然接到李先念的警卫打来的电话,告知李先念就在西山附近,想顺路过来看看叶帅。

叶剑英开始有些犹豫:“见还是不见?”

后来还是答应了。他让下面的人抬了两把椅子到院子里,

10分钟左右,穿着风衣的李先念如约而来。叶剑英起身相迎,风趣的问道:“什么风把你吹过来了?”

李先念答:“无事不登三宝殿。

叶剑英本来只想在院子里接待李先念,但后来还是把李先念从院子请到屋里的小会客厅。10分钟后李先念便告辞而去。

4月中旬,主持中央工作的华国锋建议叶剑英参加一些中央的工作。于是,叶剑英又开始在公众面前露面。4月27日,他出席了庆祝民主柬埔寨国家独立一周年的招待会。5月1日白天和晚上,分别参加了首都群众庆祝劳动节的游园活动和焰火晚会。5、6月间,叶剑英先后会见了巴基斯坦、法国、朝鲜等国家军方来访的领导人和其他贵宾。

此后,聂荣臻从城里来到西山,与叶剑英相邻而住,两人频繁交谈。而肖劲光、粟裕、宋时轮、杨成武、苏振华等军队的高级将领们,也经常来到叶剑英住处,在叶剑英面前表达他们对这“上海帮”的不满。大多数时间,叶剑英是只听不说。只是偶尔,他才会流露一点点内心的想法。

有一次,以脾气火暴、性情直爽著称的王震来到西山,在谈到江青、张春桥时,他说:“我看,干脆把他们几个抓起来,问题不就解决了!”

叶剑英没有说话,只是向王震伸出一只手握成拳头,然后竖起大拇指向上晃了两晃,接着把大拇指向下按了按。

叶剑英问及汪东兴的情况。曾经作为汪东兴上级的王震,七十年代中期又被毛泽东点名去协助汪东兴管理中央警卫工作。他很有把握的说:“汪这个人我是了解的,他以前做过我的下级,我在延安做卫戍司令时,他是我的部下,很熟悉,现在我和他一起工作,我了解他,他

是忠于毛主席路线的人。”

一天,李先念到北海散步,碰到正在钓鱼的陈锡联,两人是四方面军的老战友,陈锡联任师长,李先念任军政委。陈锡联主动对已请病假、基本不参加政治局会议的李先念说:“那几个人怎么办?要想个办法才行。毛主席不让他们搞‘四人帮’,他们照样搞,政治局一开会就吵架,江青打头阵,搅得政治局无法正常工作。”

李先念说:“办法总会有,你还是钓你的鱼吧。”

“四五事件”后,河北保定的杨连甲、杨志昌、吕毅等人,将保定地委第二书记杜森尧挟持到涿县关押起来。又把邹士杰、李升从保定押到涿县,强行召开保定地委第七次常委会,在会上免去3位地委书记职务,同时任命3名地委书记、副书记和95名县委常委、地直局级干部。从此,保定地区各级领导公开分裂。

1976年4月10日,保定7万军民集会、游行,表态拥护中央“四七决议”,保定市及周围各县又动荡起来。

4月13日,经毛泽东亲自圈阅,中央就清苑等县发生抢劫枪支、弹药、粮食事件电话通知,责成河北省委、河北省军区必须限期解决。

4月24日,中共河北省委鉴于保定地委不能正常工作的情况,发出17号文件,决定调保定地委常委到省委参加学习班,并派出吕玉兰、樊德玲、李铁、刘俊孝、王珏等11人组成临时领导小组代行保定地委常委职务,组织收枪工作队到保定进行收缴武器工作,但却遭到地委极少数人的阻挠和破坏。由于杨连甲等人不去省委,学习班没有办成。还有一些县的农民轮番进城,轰赶临时领导小组,小组被迫于5月12日撤离保定。而后,河北省委决定由原雄县书记杨凤鸣代理保定地委第一书记,保定继续大乱。

3月8日下午15时1分59秒,宇宙中一颗巨大的陨星,顺着地球绕太阳公转的方向,以每秒钟10多公里的速度,坠入大气层,在吉林郊区金珠乡上空爆炸。

陨星爆炸后,向四面散落,形成了世界史上一次极为罕见的陨石雨,其散落范围达到480平方公里,但更多的陨石却是散落在吉林大屯乡李家村和永吉县江密峰乡一带。

15时2分36秒,最后一块陨石坠地,穿破了1.7米厚的冻土层,

陷在地下6.5米的深处,并在地面上造成了一个深3米、直径超过2米的大坑,而它震起的土浪竟高达好几十米,土块飞溅到100米以外。

在这次陨石雨中,有3块陨石最大,都超过了100公斤。它们沿着原来的坠落方向,一直朝偏南方向飞去,分别坠落在吉林九站乡三台子村、孤店子乡大荒地村、永吉县桦皮厂乡靠山村。而最大的那块陨石重达1770公斤,大大超过了美国收藏的世界最大陨石:诺顿陨石的重量,1078公斤。因此它成了世界上最大的陨石。

这块世界上最大的陨石,很快被吉林市博物馆收藏,命名为"吉林陨石"。

4月22日的《人民日报》,刊登了新华社的电讯,题名为《吉林地区降落一次世界罕见的陨石雨——当地群众对陨石进行了观查、搜集和保存工作;科学工作者作了考察》。

这天,护士孟锦云给毛泽东念了这段陨石雨的消息,老人家听得非常认真。听完后,他让小孟停下来,扶他到窗口。他望着夕阳渐落的天际很久,望得出了神。

"主席,天上怎么会落下那么多石头呢?也怪了,还没伤人。"

"这种事情历史上可屡见不鲜啊。史有明载的就不少。野史上就更多了。"

毛泽东又讲:"中国有一派学说叫'天人感应',吉有吉兆,凶有凶兆。天摇地动,天上掉下大石头,就是要死人呢。三国演义里的诸葛亮、赵云死时,都掉过石头折过旗杆。大人物真是与众不同,死都要死得有声有色。"

小孟说:"那全是迷信,是古人瞎编的。您真信吗?"

毛泽东没有马上回答,沉思了一会儿,才说:"古人为什么要编造这些呢?"

是回答,还是提问?……

# 第1394回：告康生，章含之写揭发信 说江青、张春桥都是叛徒

4月25日，章含之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

主席：

去年夏季我们曾听到一件诬告江青、春桥同志的事件。现在想来，这是邓小平在幕后策划的。现将事件经过向主席报告：

去年夏天，大约八月，一天晚上，海容、小唐两位同志来找我说有件事要了解。她们说她们去看了康生同志。是邓小平带话给她们说康老想见她们，后来康老的秘书直接打电话与她们联系约时间。小唐说她们请示了主席，主席同意后她们才去的。

接着，她们说康老病很重，恐不久于世了，因此有件心事要托她们转报主席。康老说，江青、春桥两同志历史上都是叛徒，他曾看过春桥同志的档案，是江青同志给他看的。康老要海容、小唐找两个人去了解情况，一个叫王观澜、一个叫吴仲超。康老说这两个人可以证实江青、春桥同志是叛徒。海容、小唐说她们想问问乔冠华同志是否认识王、吴二人。乔说他只知有此二人，并不认识。她们又说，听说江青同志的历史叛徒材料在三十年代香港、华南的报纸上有登载，问乔当年在华南工作是否见到过这类消息和文章。乔说他只见过生活上对江青同志的攻击，从未见过涉及政治叛变这一类的东西。关于春桥同志的情况乔说他完全不知道。当时我说文化大革命期间听说上海有一派贴过大字报说春桥同志是叛徒，后来被压下去了。

当时我们都劝王、唐两位不要替康老传这些活。我们说如果康老有事向主席报告，他可以口授他的秘书写下来，而不应该叫两个不了解情况的年轻同志传这种活。我当时说尤其关于江青同志这些话更不应该传，这样做客观上矛头是对着主席的。小唐说他们这些老同志不会把江青同志的事扩大的，不过她应当退出政治活动，将来叫她养老，去看看她还是可以的。

以后我们再也没有问起此事。但是在她们谈此事后不久,有一次在人大会堂宴会散会时,我见到一个行动有点困难的老年人。正巧海容走过,我问她此人是谁。她说“这个人就是吴仲超。”不知这是否是她有意安排吴出席宴会的。

以上情况特报主席参阅。

含之

一九七六年四月廿五日

江青看了章含之的这封信后批道:“此类事逐渐会揭发出来,我看他们是否高超过林彪?据说,他们的大、小舰队活动有些雷同,有些不同。小舰队有过之而无不及。

吃的饱饱的、睡的好好的,打一场更大的胜仗!”

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李先念后来在1976年12月2日的四届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上,曾说过毛泽东当时对此信的批语:“毛主席批语乔‘借刀杀人’,‘借中央之刀杀王、唐’。”

章含之信中提到的王观澜,在《毛泽东书信选集》一书中《致王观澜》,曾有如下注释:

王观澜(1906-1982),浙江临海人。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曾任《红色中华》总编辑,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土地部副部长。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历任中央农民委员会主任、陕甘宁边区统战委员会主任等职。1948年曾到苏联治病。

王观澜在病中,毛泽东曾为之写信安慰:“既来之,则安之……”这封信在文革期间广为流传,成为慢性病者常常背诵的“最高指示”。

王观澜其实与江青的接触不多,但是他的妻子徐明清却和江青在上海有过很长一段时间的共处。

1937年底,王观澜在延安与来自上海的徐明清结婚。这个徐明清,原名徐明。因为当时延安中央党校也有一个人叫徐明,王观澜为了使妻子的名字区别于那个人,加了一个“清”字。此后,她便一直叫徐明清。

徐明清文革前任国务院农林办公室教育处副处长,浙江临海县人。她小学毕业后,考入当地最好的台州女子师范学校。1926年,随着北伐革命军节节胜利,豆蔻年华的少女徐明清,在学校积极参加了

共产党领导的进步青年活动,并加入了共青团,后转为共产党员。

1928 年,徐明清考入了陶行知在南京创办的晓庄师范学校。1932 年 10 月,受陶行知委派,参加了“晨更工学团”的创办,并成为负责人。当时“晨更工学团”是个公开、合法的教育团体,设有幼儿园、小学、特别班,以及农民、工人、店员识字班。上海的左翼“教联”、“社联”、“剧联”以及“左联”等组织,都纷纷派人参加“晨更工学团”的工作。其中“剧联”派出的是田汉的弟弟田沅。

一天,田沅带着一位山东姑娘来到“晨更工学团”。她细高个子,穿一件蓝布旗袍,长得俊俏而性情活泼。这姑娘就是李云鹤,即后来的江青,当时的名字叫李鹤。田沅希望她能暂时住在“晨更工学团”。

徐明清看江青不仅识字,还会唱歌演戏,团里当时正好缺教员,就把她留了下来,安排在店员识字班当教员。

当时团里的女教员只有徐明清、李云鹤和一个叫李素贞的宁波姑娘。3 人同住在小楼顶上的阁楼里,每天爬着竹扶梯上下,没有床,一起睡地铺,关系很融洽。彼此称呼都很亲切。江青叫徐明清“一冰”,徐唤江青“小李”,而对李素贞,她俩都称呼“宁波李”,“宁波李”是共青团员,受徐明清领导,江青因为没有组织关系,只是作为徐明清手下的一名普通教员、进步青年,没有参加党组织的活动。

1933 年冬天,从监狱被保释出来的李云鹤同居男友,国立青岛大学学生俞启威,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天津市的第一任市长黄敬,到上海找李云鹤。徐明清见他俩相亲相爱,就想方设法给他们腾出一个房间暂住。后来,俞启威找姐姐帮忙,在静安寺附近租了一间小屋,就和李云鹤一道搬过去住了。不过,李云鹤工作仍是在“晨更工学团”教课。

1934 年 1 月 28 日,上海各界举行了纪念“一二八”抗战两周年的示威游行,暴露了“晨更工学团”的进步面目,引起警方注意。俞启威为了避免再次被捕,决定和李云鹤一道离开上海去北平暂避。徐明清由于身份暴露,也很快离开了“晨更工学团”,去上海浦东办女工夜校。

没过多久,因生活难以维持,李云鹤独自从北平再去上海。经基督教女青年会劳工部的介绍,江青被安排在该会在小沙渡路办的一个女工夜校里当教员。小沙度路,即今日的西康路。江青在那里教女工

们唱歌、演戏、识字,同时还去徐明清那里的浦东女工夜校和其他几所夜校教女工们唱歌和排演话剧。这时,她用的化名是李云古。

有一天,江青走在大上海的马路上,忽然看见一张熟悉的面孔,她惊呆了!那人也认出她来,喜出望外。在这偌大的上海,这小伙子和江青能在当街相遇,真是个巧合。

此人名叫乐于泓,平常大家都叫他“阿乐”,他是中共地下党员,当年在青岛和俞启威、李云鹤一起参加革命活动。在俞启威突然被敌人逮捕时,是阿乐帮助李云鹤逃出青岛,送她上船的。

他乡遇故知,形单影孤的江青非常兴奋。此时阿乐担任共青团中央的交通员,公开身份是一家邮局的出纳员。此后,他们有了比较多的往来。

1934 年 9 月的一天,江青请阿乐为女工夜校的演出拉琴,两人约好在兆丰公园见面。这时,连阿乐自己也不知道,他已被国民党特工总部特务跟踪。兆丰公园即今日上海的中山公园,离北新泾不太远。那时,公园有两个门,其中一个门一出去,便通往英租界。阿乐在兆丰公园跟江青见面时,发觉有人跟踪,知道事情不妙,当即与江青分头而走。阿乐熟悉那里的环境,飞快地从那个通往英租界的大门出去,逃入租界,甩掉了特务,没有被捕。江青见阿乐朝那个大门走,她便向另一个大门逃,结果被特务截住,就这样被捕了,关押在国民党的上海市公安局看守所。特务们原本要抓的是阿乐,却把江青逮住。当时,特务们并不知道江青的政治情况。

在看守所里,江青遇到了一名她教过的小沙度路女工夜校的学生,此人在江青被捕后十多天即获释。江青便托她带口信给基督教上海女青年劳工部总干事钟绍琴,钟绍琴很快把消息传给了徐明清。

因为李云鹤是“晨更工学团”的教员和左翼“教联”的成员。徐明清获悉李云鹤入狱的消息后,立即向上级汇报,组织对她营救。

江青被捕后,既无叛徒指证,也没有任何证据,被关押了两个月,警察局经数次审讯后,认为从她身上得不到任何有价值的口供,遂允许保释。1934 年冬,江青得以释放。

出面保释李云鹤的是上海公共租界华人教育处处长陈鹤琴和法租界公董局何德奎。

出狱后的李云鹤在徐明清的家乡住了一段时间,并经徐明清的父亲,一位当地的老中医,治好了了肺结核,后去北平找俞启威。

1935 年春节后,徐明清从家乡回到上海,继续主持浦东女工夜校的工作。由于叛徒的告密,徐明清在 1935 年 4 月被捕。

徐明清被关进了拘留所,一关就是 3 个月,但敌人始终没有查出徐明清与上海中共党组织有什么关系。在此之后,徐明清又被转押到了杭州。

这期间,敌人对她严刑逼供,使用了各种刑具,使她的脑神经受伤,全身浮肿,头发脱落。但徐明清坚贞不屈,始终没有暴露共产党员的身份,没有给敌人任何口实。

从上海拘留所,到杭州反省院期间,陶行知先生和“教联”的同志一直在积极营救徐明清。陶行知先生亲自派人到拘留所探望徐明清,并通过上层关系找到当时的上海社会局局长潘公展,请他出面设法保释。但由于国民党内部相互倾轧,关系错综复杂,营救一时难有结果。

徐明清被转押到杭州后,陶先生又派女工朱冰如化装成上海市民政科科长李人超的亲戚,找国民党的浙江省要员批了条子,三次到杭州探监。她给徐明清送去了食品、衣物,还传递了外面的消息。

在陶行知先生及党组织的大力营救下,1936 年 6 月,徐明清才被释放出狱。但由于在关押期间她受到严重摧残,身体极度虚弱、全身出现浮肿,组织上允许她回家乡治病休养。两个多月后,徐明清病愈后再回上海。

上海工委考虑徐明清在上海被捕过,继续留下来工作会有更多的危险,因此提议她也去西安工作。

徐明清接受了组织的安排。临离开上海前夕,徐明清决定去看看江青。因为她听说,自 1935 年春天,江青三度来上海后,化名蓝苹,饰演娜拉一炮走红,后跟电影名编剧、剧评家唐纳恋爱、同居,成了上海演艺圈的明星,名气陡增。而过了一段时间,俞启威到上海,她与俞启威相见后又旧情萌发,感觉十分内疚和苦闷,遂与唐纳闹起了离婚。她离沪北上追随俞启威,唐纳追到济南,自杀殉情被救。于是蓝苹与他又携手返沪。这些文人明星的种种逸闻,一度被报界炒得沸沸扬扬。

那天,徐明清来到了蓝苹的家,那是一座花园式小楼的一层。她来时碰巧江青不在,是唐纳接待了她。

徐明清告诉唐纳,她是蓝苹的朋友,叫徐一冰,明天就要离开上海了,如果蓝苹有空,约她明天到火车站见一面。说完,她给江青留下了一张字条。

第二天,在上海火车站月台上,徐明清正在和前来送行的浦东女工夜校的学生们话别。直到火车快开时,才见急匆匆跑过来一个女人,是江青。江青此刻的样子和她想象中的相去甚远,她非常瘦,而且脸色蜡黄,根本不像一个正走红的明星。

“一冰,你上哪?”江青问道。

“我去西北。这一去,不知何时再见面了?”徐明清回答。看着江青那副黄瘦的模样,徐明清随后特意叮嘱她要多注意身体。

谁知江青听了她的话后,长叹了一口气,只说了一句:“真是一言难尽啊!”

火车开动了。她们来不及多说话,便匆匆分手了。当徐明清从车窗回眸望去,江青仍站在月台上向她挥动手臂。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不久,徐明清被调任新成立的中共西安市委,任市委委员,兼妇女工作委员会书记。并负责与八路军办事处联系,与当时在办事处工作的邓颖超、叶剑英、危拱之、蔡树藩等人成为很熟悉的同事。

1937 年 7 月下旬的一天,一辆黄包车忽然停在西安北大街幼稚园的门前,从车上下来一位穿着旗袍、打扮入时的小姐。她拎着一只小皮箱,说是要找徐老师。

徐明清闻声从房间走出来,见来人吃了一惊,喊道“李鹤,你怎么来了!”原来这位来者正是江青。

上海一别转眼就一年了,徐明清发现江青的气色好了一些。江青说她此次北上就是专为找她而来的。徐明清遂让她先在幼稚园住下。

安顿好了行李,徐明清和江青细谈起来。没聊几句,徐明清问起了唐纳的情况,“一言难尽呀!”江青叹了一口气,接着说:“情况糟得很。我与唐纳闹翻了,他市侩气十足,简直令我无法忍受。”

见江青不愿意多说,徐明清也就不便再问,她又换了一个话题:

“你现在还经常演电影吗?”

“唉……”江青又叹了一口气。“七七事变爆发后,上海局势动荡不安,大家哪还有心思看电影啊!现在,电影市场一直很萧条,我呆在上海也没有什么事可做啦!”

“那你现在怎么打算?”徐明清又问。

江青这才道出了自己的真正来意:“一冰,说真的,我来西安是想请你帮个忙。”尽管那时徐明清的名字已由一冰改为徐明,但江青还是习惯地叫她的老名字“一冰”。

“帮什么忙呢?”徐明清问。

“我想到延安学习,想请你帮我找个关系进去。”江青说道。

徐明清知道,当时有很多左翼文化工作人员和一批进步青年,纷纷冲破国民党的封锁线,千里迢迢,来到延安,寻找光明。

“你从上海带介绍信来了吗?”徐明清问道。她所问的介绍信,是指中共上海党组织的介绍信。

江青摇摇头,说:“有你在,会有办法的。”

在徐明清的帮助下,江青通过西安七贤庄八路军办事处去了延安。之后,组织审查江青历史,徐明清为她写了一份证明材料。一年之后,江青与毛泽东结为夫妻。

1938 年 11 月 20 日,徐明清和丈夫王观澜被邀参加了毛泽东与江青的婚宴。

文革开始后,徐明清和丈夫王观澜夫妇双双被挂牌游街批斗。在全国掀起抓“叛徒”的风潮中,她因在 1935 年 4 月曾被国民党特务抓捕,成了“审查对象”。1969 年初,徐明清被下放到湖北沙洋的国务院农口干校监督劳动,接受审查。她忍辱负重度过了 4 个春秋。始终坚信专案组最终会辨明是非,做出正确的结论。然而,她万万没有想到,1972 年,自己会被定为叛徒、开除党籍!她多次向上级反映实情,都被指斥为态度不老实。

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有人建议她给毛泽东、江青写信。徐明清想:江青此时已是中央政治局委员,有很大的影响力,她对自己被捕的情况是有所了解的。于是,她在 1973 年 6 月 2 日给江青写了一封信。她在信中写道:“30 年代我在上海参加革命活动的总的情况,想您是

有印象的。我的一生所作所为,想您大体是了解的。”

第一封信没有回音,徐明清想是江青没收到,又于6月19日再写一封,但依然石沉大海。但这发出的两封信都如石沉大海。一直挨到了11月份,心存一线希望的徐明清,再次提起了笔,给江青写了第三封信,恳请她能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为自己的历史清白作证。

三封信全都渺无音讯,徐明清这顶“叛徒”帽子便一直戴了下去。

江青在上海被捕时,关押在当时上海市公安局看守所,由国民党中央调查科上海区训练股审讯组赵耀珊,绰号“黑大汉”,在公安局特务股楼上审问。国民党中央调查科上海区训练股编审组长朱大启也参加了审讯。朱大启在解放后被捕。1958年5月19日,朱大启在狱中写下的供词中,有这么几句:“还有个女的李云古,左翼文化方面的,被捕后我同他(她)谈过话。”朱大启写这一供词时,并不知道“李云古”是江青。1968年2月20日,朱大启在供词中又一次涉及“李云古”:“李云古被捕案件:李云古,山东人,女性,1935年初(注:应为1934年10月)被捕,经过不详,当时经上海区训练审讯组长赵耀珊谈话,据赵谈李参加左翼文化组织。”此时的朱大启依然不知道“李云古”是江青。

1974年,康生陆续收到几封揭发江青和张春桥的信,说江青曾经被捕过。与江青一起被捕的徐明清被定为叛徒,她曾经给江青写信求救,说江青是了解她的。于是,人们纷纷传言:江青也是叛徒。

至于章含之信中提到康生说的那个吴仲超,时任北京故宫博物院院长。1936年4月,张春桥曾参加吴成志(即宋振鼎)组织的“中国共产党上海预备党员委员会”。在张春桥1950年填写的《简历表》上,“何时何地何人介绍入党、候补及转党年月”一栏中是这样写的:

1936年4月在上海经吴成志、林福生介绍入党。

1938年8月在延安经顾光斗、雄飞介绍重新入党。1939年2月转正。

张春桥既然在1936年4月入党,怎么到了1938年8月又要“重新入党”呢?

吴成志,真名宋振鼎,他对张春桥1936年4月在上海的入党经过是这样说的:

“我1932年9月被捕,1935年7月从苏州反省院自首出来后去上海。1936年4、5月间,我(化名吴成志)与原社联林福生(从苏州反省院出来的)、王德明等成立中国共产党上海预备党员委员会,曾经我介绍张春桥参加预备党员。这个组织没有党的组织领导,是我们自己成立的。成立不久,上海党组织派吴仲超找我谈话,指出这个组织是非法的,叫立即解散。我们当即解散,并通知到所有参加的人,也通知了张春桥。此后,我再未介绍过张春桥入党。”

北京故宫博物院院长吴仲超在1976年10月18日所写的证明也清楚表明:

1936年在上海,宋振鼎同一些叛变自首、住过反省院和不三不四的人成立了一个预备党员委员会,这是个非法组织。由我通知宋振鼎,宣布取消了这个组织。

解放前我不认识张春桥,文化大革命中,从外调的小将们口中才知道那个委员会内有张春桥。

吴仲超

1976年10月18日

# 第1395回："怀疑论"，《北京日报》大讨论 要追查，《总理遗言》的作者

1976年4月26日，《北京日报》以《两封针锋相对的通信》为题，连续两次刊登下乡知识青年黄一丁与刘宁的通信。在通信中，这对昔日的好友就"扎根"、"农业学大寨"、政治理论与实际生活的关系等等问题展开了辩论。在报纸上，代表正统观点的刘宁的两封长信均被全文刊载，持"怀疑论"观点的黄一丁的两封信却被大加删削。

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黄一丁与刘宁自幼相熟，从托儿所到小学，又到中学，一直是形影不离的好友。1969年，随着上山下乡运动的洪流，他们一同从北京来到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以后，刘宁上调团政治部宣传队，黄一丁始终留在基层连队。1975年黄一丁病退回京后，承刘宁母亲之托，给刘宁写了一封信，劝他尽快想办法回城。作为老朋友，黄一丁在信中无所顾忌，对一些社会现象表示了怀疑和困惑：

关于"农业学大寨"，黄一丁表示支持和理解，但对这场旷日持久的运动是否有足够的力量实现预期的目标他表示怀疑：

"我觉得，如果乐观一点看，它也许能够决定今后农村的命运，也决定我们兵团的命运，也许我们农工们会不再像今天这样受人愚弄，被人瞧不起，被人随意摆布了。因此，也决定我本人的命运。我常想，有许多的不能令人满意的事情是不能再继续下去了，可农业学大寨运动有没有足够的力量呢？"

对当时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树立的"扎根"典型高崇辉的事迹，他认为有些地方很敬佩，可有些地方并不想仿效。

他还用一种含蓄的口吻质疑到：

"有些政治教条，我们总是凭着激情一厢情愿地相信它，实际上并不明白，任何一种政治原则，拿到社会上去总是打折扣的。我们接受它的方法却常是错的。我们手中的信条未必能替我们解决实际生活中哪怕很小的一个问题。"

黄一丁曾经虔诚地参加过“农业学大寨”运动,宣传过“扎根”农村的大道理,也深切地体验到文化大革命后,社会上的许多不令人满意的现象。他自幼接受的是工农当家作主的教育,到建设兵团后,面对的却是无法主宰自己命运的现实。曾经的政治信条在社会现实的撞击下,他产生了疑问。

黄一丁的信是1975年11月29日寄出的,大约半个月后,刘宁给他回了一封数千言的长信。信中他批评黄一丁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今天的又一悲剧”。并警告说:“同志,好好想一想吧,在今后的道路上,我们究竟是同志还是敌人!!!”

接着,刘宁将双方通信的复本作为入党思想汇报的资料上交单位领导。他所在的团党委立即将这件事作为“阶级斗争新动向”上报师政治部,师政治部又上报黑龙江建设兵团政治部。

此时的黄一丁尚不知尽管事态正在扩大,当接到刘宁回信后,他意犹未尽,又给刘宁写了一封长信。他在信中说:

“人思维的本性就是怀疑的……而且我请教一声,难道现实中的许许多多的不能令人满意的事情和一些让人百思不解的问题的存在都不值得怀疑吗?仅仅轻描淡写地用‘这是前进中的问题’不能说服。”

“我们以前被社会左右得这样厉害,难道不正是因为太少怀疑的缘故吗?社会本身是辩证的(马克思主义正是这样教导我们的!)而人的怀疑只不过也是尽可能地辩证一些的自然要求罢了。总而言之,怀疑怀疑,天塌不下来,没有怀疑,马克思主义是不能前进的。”

1976年初,谢静宜从《北京日报》的内参上了解到他们二人的通信,认为是反击“右倾翻案风”和“返城风”的好材料,主张公开见报。于是4月26日《北京日报》以《两封针锋相对的通信》为通栏标题,将黄一丁、刘宁二人的第一次通信刊出。同时发表的《编者按》将两人的观点分歧说成是“两个阶级、两条路线、两种思想的激烈斗争”的反映,并称赞刘宁的复信“生动地表现了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锻炼的青年一代的战斗风貌”。

这时的刘宁,已被团党委授予“先进青年”的称号,并作为特邀代表参加了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农业学大寨会议,实现了入党的夙愿。

不久,他又作为先进典型回到北京,对黄一丁展开工作。生产建设兵团政治部和组织部也派人找到黄一丁,意在要他返回兵团。。

8 月 26 日,《北京日报》又刊出经过删节的黄一丁给刘宁的第二封信和刘宁的复信。

黄一丁的基本观点被归结为三大错误:反对学大寨;反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散布反动的“怀疑论”。

这场讨论的结局以黄一丁在《北京日报》上发表《我对“怀疑论”的认识和批判》而落下帷幕。文中,黄一丁自称在接受“深刻教育”后开始“猛省”,“看到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争夺青年激烈斗争的刀光剑影”,进而批评了“怀疑论”的五种“骗人手法”。但正是通过这场轰动一时的讨论,人们对知识青年中广有市场的“怀疑论”的基本观点,有了较多的了解,“怀疑论”的一些基本观点,也借这次“讨论”得以阐扬。

其实,一些知识青年到农村以后,才发现了一个与他们一直生活的城市完全不一样的世界,很多农村中司空见惯的贫困、落后、愚昧、封闭令他们感到震惊,城乡的巨大反差令他们惊愕,也极不适应。当然这些知识青年,应该对 1949 年以前中国农村的贫困、落后、愚昧、封闭的程度更不清楚和了解,对 1949 年以后中国农村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也没有切身地体会。林彪“913 事件”后,一些人感到自己上了当,受了骗。一些人因理想支柱的塌陷而四顾彷徨。

此时,“怀疑论”在知青中流行。为了寻绎扑朔迷离的政治风云的真正底蕴,也为了避免重蹈受骗上当的覆辙,许多知青开始求助书本。无论是在农村社队,还是在兵团、农场,知识青年中读书风气明显上升。他们涉猎的读物不再囿于早已熟读成诵的“红宝书”,而是闯过各种人为的“禁区”,阅读古今中外的文学、历史、哲学、政治经济学以及其他可以搜罗到的书籍。在一些文化素质较高的知青中,研读马列主义原著也蔚成风气。列宁的《哲学笔记》、恩格斯的《论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等等哲学著作,成为特定环境下知识青年寻找批判武器的重要方式。

云南西双版纳某农场机关在组织各队知青讨论刘宁和黄一丁的通信内容时,很多知青公开认为“黄一丁的信有水平”,符合现实;而刘

宁“太激进了”,“唱高调”,“动机不纯”。当时,黄一丁收到了数以千计的来信,许多人向他致意或表示支持。

1976年5月5日,一辆绿色的吉普车开进了杭州汽轮机厂。4个公安人员带走了正在工作的“总理遗嘱”的作者李君旭。中共中央在一周前发出了紧急电话通知:“总理遗言”是伪造的,是一份蓄谋的“反革命谣言”,要在全国范围内展开彻底的追查。国家公安部为此专门发了文件。

“遗言”制造者李君旭很快就被公安局网入囊中。事情至此本来可以迅速结案,人证、物证、本人供词一应俱全。然而,案子上报后,有关方面没有一个人相信这样一份轰动全国乃至世界的“总理遗言”居然会出自一个年仅23岁的青年工人之手,下令继续深入追查,一定要把隐藏在幕后的策划者揪出来。

对李君旭的轮番疲劳审讯开始了,他们不让他睡觉,整天用一百瓦的电灯泡照着他的脑袋,好几拨人轮换着反复问他同一个问题:“遗言”的真正制造者是谁?

李君旭从小就是软弱胆小的,上小学时,就常被同座的女生欺负而不敢吭声。当那些穿着制服的公安人员在他眼前晃来晃去,要他交代谁是真正的“遗言制造者”的时候,他害怕了,终于说出同学袁中伟的名字。整个案子似乎有了突破性的进展。因为当时北京认为:“总理遗言”这样大的政治案件显然隐藏着巨大的政治背景,而李君旭的知识分子家庭背景显然不可能。而袁中伟的父亲却是当年大名鼎鼎的浙东新四军游击队的老干部袁霄吟,其母亲也是当年绍兴的共产党地下工作者、老干部。

5月10日下午,在文革初期就被打倒,“913事件”后被解放,此时又刚刚靠边站的袁中伟的父亲,正在“菩提寺路蕙宜村1号”小楼,自己的家中,躺在一张老旧的藤躺椅上翻看书报,突然进来几个人对他说:“组织部的人要找你谈话,请你跟我们去一趟。”袁霄吟没有任何怀疑,只穿了一件老头汗衫,起身就要跟他们走。来人似乎不经意地看了他亲一眼,说:“再带一件外套吧。”就是这句话让站在一旁的妻子感到不安。这位当年曾是绍兴城里与日寇和汪伪特务机关斗智斗勇的地下党员,她的警觉和敏感超乎常人。

就在袁霄吟刚走出门,几个身穿警服的人突然从他们家的房后蹿了下来。他们出示介绍信,态度温文尔雅,叫袁霄吟家里人不要紧张。接着开始抄家。一些人爬上了黑咕隆咚的天花板,在蜘蛛网密布的阁楼上打着手电乱照;一些人将晒台上的每一只花盆连花带土倒在地上,用手慢慢地把土坷垃捻碎;更多的人则是拉开每一个抽屉打开每一口书橱翻查,只要看到带字的纸片、本子、信笺,无一遗漏,统统拿下。搜查的细致、深入、滴水不漏绝非文革初期造反派的抄家可比,让在场的人不寒而栗。他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也没有人向他们解释缘由。

袁霄吟的妻子拉着女儿袁敏的手走到晒台上,从那里,他们清楚地看到楼下路口的拐弯处停着一辆军绿色的吉普车,袁霄吟上车时回头看了一下,他应该是要和家人告别一下。

搜查一直从下午延续到晚上,他们将每一个房间的电灯都打亮了,整幢小楼灯火通明。

袁霄吟的妻子这时候显现出一种临危不惧的沉着和镇定,她从这个房间走到那个房间,不断地问他们要不要喝水,提醒他们这儿还没搜那儿还没查,最后甚至还把抄家者带到楼下厨房里,指着一大堆煤球说:你们把这儿也好好搜搜,从前我当地下党时最喜欢将秘密文件放在这种脏乎乎的地方,敌人往往想不到的。

来人哭笑不得地看着母亲一本正经的模样,尴尬地搓着双手,显然他们不太愿意扒拉这堆黑乎乎的煤球。

袁中伟的姐姐下班刚回家,也被便衣警察用“谈谈”的名义要从家中带走。她誓死不从,对警察说:“我妈妈有心脏病,要是你们不把我妹妹接回来照顾我妈妈,我就是一头撞死在这儿,也绝对不会跟我们走。”警察答应了她的要求,这才将她带走。

晚上,袁中伟在工厂上班的妹妹袁敏也被警察带走了,是被带回了家里。

他们向袁敏和她母亲宣读了一份文件,自此,她们才大体弄明白:袁中伟已于5月9日在上海被抓;他父亲和姐姐被带走,都是因为同一个案件:“总理遗言”案。此案件已先后被抓的有:李君旭、刘建新、李晨光、吕建树;以及李君旭的父亲,杭州第一医院的院长;刘建新的

父亲,浙江省某厅局的一位领导;刘建新的母亲,浙江大学的一位处长;李君旭前女友的父亲,省委组织部的一位处长。

他们还要袁敏天天在家陪着母亲,说这是他们对她姐姐的承诺。

年长的公安人员对袁敏说:“从今天开始你不用到工厂上班了,就在家里照顾你妈妈。工资照发。”

年轻的公安人员对袁敏说:“假如不是你姐姐对我们说,你妈妈有心脏病,要是我们不把你接回来照顾你妈妈,她就是一头撞死在这儿,也绝对不会跟我们走,那么我们就不会连夜到厂里把你接回来。现在你可以天天在家陪你母亲,我们对你姐姐是有承诺的。”他说:“你姐姐是我见过的最坚硬最厉害的姑娘。”

袁中伟是在上海被抓的,比他父亲早一天,5 月 9 日。袁中伟从小学就开始磕磕绊绊读《资本论》,对政治有一种天然的兴趣,从父母这一辈老共产党人身上传承的“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信念和抱负,更让他像“五四”运动中的热血青年。春节后,他去了很多地方:青岛、沈阳、大连、长春、锦州、哈尔滨,最后到了北京,参加了天安门事件的全过程。

他是在做社会调查的。他希望了解,在即将展开的路线斗争中,工农兵会站在哪一边?有人说,干部阶层是文化大革命中既得利益受损者,作为干部子弟反“四人帮”能否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为此,他重点跑了上海和东北,深入到工厂车间和产业工人促膝对话,甚至还到了长春的解放军红九连,和当时全军模范红九连副指导员于小平捧着高粱米饭彻夜长谈。最后,他得出结论:即使在“四人帮”控制的上海和东北,群众也是反对他们的。他把调查结论都详细地记在自己的日记本上。

袁中伟身上还带着一份父亲在京老战友的名单,他按着父亲提供的联络图上的名单和地址,一家一家登门拜访。这些老干部普遍对“四人帮”恨之入骨,几乎不约而同地对国家当时的前途和命运忧心忡忡。他们大多因为种种原因赋闲在家,但他们聊起国家大事还是滔滔不绝。袁中伟把这些老干部对“四人帮”的不满和对时局的看法都详细地记在日记本上。

他万万没有想到自己所做的这些社会调查后来会牵连一大批老

干部和他走访过的人,他为此痛悔不已,并且自此以后再也不记日记。

离开北京后,袁中伟5月7日到上海,住在姨妈家。姨父姨妈也都是很早就参加革命的老干部。5月9日那天,袁中伟的姨父突然提前下班回家,说:“今天公安局的人找到我下放劳动的工厂里去了,问是不是有个外甥住在家里,并说,这个外甥出事了,今晚要到咱家里进行抓捕行动。还很严肃地对我说:此事已经向马天水同志汇报了。天水同志说,你是老同志了,向你提三点要求:1、要积极配合组织行动,并以一个共产党员的名义担保不透露半点风声;2、你外甥到上海的每一个细节都要写成材料,上报组织;3、不能让上海的其他老同志知道你外甥被捕的情况。”

袁中伟的姨妈听完这些话脸色刷地白了。袁中伟一早就去探望他父亲的老战友了,她姨妈和姨父商量,是否等袁中伟回来后给他点暗示?正在这时,他们的儿子回来了。袁中伟的姨父让他立即到南京西路上的一家无线电器材商店的柜台上,找营业员米秋报信,要他告诉所有老同志,袁中伟出事了。米秋就是袁中伟那天去拜访的他父亲老战友的儿子。

那天晚上,袁中伟被反铐着押上了车,连夜送回杭州。在杭州市市公安局的贵宾接待室连续对他进行了40多个小时的审讯,主题就是一个:你是怎么伪造“总理遗言”的?

首先问:“你知道‘总理遗言’吗?”

随后是:“你是怎么伪造‘总理遗言’的?”

可那时,袁中伟并不知道“总理遗言”是伪造的。

审讯者说:“我们知道,你对反击右倾翻案风不满。”

袁中伟反驳说:“邓小平上台后,铁路通了,钢产量上去了,有错吗?”

袁中伟被他们审问得筋疲力尽,精神几近麻木,但他仍坚定不移地回答:“我没有伪造‘总理遗言’。”

审讯持续到第三天,袁中伟被押送到杭州市著名的监狱,小车桥。每天的提审依然集中在“总理遗言”上,即便审问者有时云山雾罩说一些不着边际的话,但最后肯定万变不离其宗,归于“总理遗言”。最后,袁中伟终于明白了,流传甚广的“总理遗言”并不是周恩来总理所写,

而是有人伪造的。但他当时确实还不知道“总理遗言”是谁写的,他坦然地认为,既然自己只是抄录了“总理遗言”,那么审查清楚后应该就可以被放出去了。

袁中伟在上海被抓后,公安局在杭州他家大有收获。他们在袁中伟姐姐房间的一张写字台的抽屉里发现了一叠信,每封信的落款都是同一个名字:阿胖。经调查,这个阿胖正和袁中伟姐姐谈恋爱,而阿胖的父亲时任浙江省委领导,更重要的是,他是浙江省去北京参加周恩来追悼会并面见邓颖超同志的三位省委领导之一。从这条线顺藤摸瓜,案子就渐渐纳入了上面希望的轨道。接下来被拖进这桩案子的人都是符合上面暗示的干部阶层要求的:阿斗和阿斗身为省厅局领导的父亲,其在浙江大学当处长的母亲,李君旭前女友那位时任省委组织部处长的父亲。

5 月下旬,一节从杭州到北京的软席包厢,将袁啸吟和袁中伟姐弟,蛐蛐儿李君旭和他的父亲,阿斗和他的父亲总共 7 个人,在互不知情的情况下秘密押送进京。在北京“保护性审查”18 个月。

直至 1977 年 11 月,提审人员向袁中伟宣布了审查结论:“经查,袁中伟同志和制造‘总理遗言’无关,但是在‘四人帮’搞乱浙江的很复杂的情况下,也说了一些损害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话,属于严重的政治错误。现解除审查,回原单位工作,工资照发。”

对这样的政治结论,袁中伟拒绝在上面签字。他后来回忆说:

“他们反反复复劝我签字,甚至明确告诉我,这个结论中央最高领导都已圈阅,等等。我想了足足 15 分钟以上。最后我在自己的结论上写下了一句话:‘这个结论我本人不同意,我保留向华主席党中央直接反映情况的权利。’公安部的同志看了这句话都十分震惊,面面相觑了好半天,研究了好久,也劝了我好久,最后还是决定先放我出去。”

在北京出狱后的第一个晚上,袁中伟在公安部招待所遇见了李君旭。他当时希望李君旭能告诉他事情的真相,但李君旭只是一个劲向他道歉……

其实,在关押期间放风时,袁中伟曾见过刻在砖墙角落上的一句话:“小弟(袁中伟),对不起。”他知道这是蛐蛐儿李君旭为他刻的。以蛐蛐儿内心的敏感和自尊,可想而知他当时承受的压力有多大!

“总理遗言”案主要当事人中学毕业后的第一次合影(左一,李晨光;左二,阿斗刘建新;左四,蛐蛐儿李君旭;左六,瓜子袁中伟;左七,大耳朵吕建树)。

# 第1396回：华国锋，毛泽东写三句话 “亲启”信，景贤为春桥“找伴”

1976年4月30日午后，毛泽东接见新西兰总理马尔登。华国锋陪同。

接见后，华国锋对毛泽东说：“我把外宾送上车，还来向主席谈几件事。”

毛泽东说：“好。”

不多会，华国锋返回来向毛泽东汇报工作。他说：

“最近我处理了几件事，现在有几个省发生一些问题，我已同政治局的同志研究，作了处理，签发了中央文件，形势正在好转。国际上也有些事。我经验不多，有事多同政治局的同志商量，看主席有什么意见。”

毛泽东说：“国际上的事，大局已定，问题不大；国内的事，要注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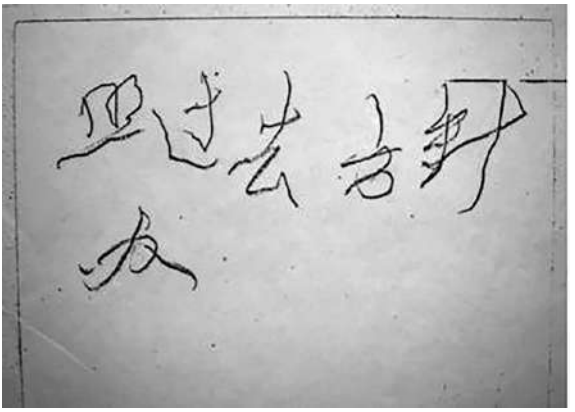
当时，毛泽东说话已经讲不清楚了，华国锋听不明白，在旁边的张玉凤就把毛泽东的话重复了一遍。

随后，毛泽东又讲了一句，张玉凤也听不清楚。毛泽东就要纸和笔，张玉凤扶着他在纸上写道：

“慢慢来，不要招（着）急。”

“照过去方针办！”

“你办事，我放心！”



5月11日,毛泽东突然发病,脸色苍白,呼吸急促并伴有全身大汗。经过检查,专家们确认毛泽东为心内膜下心肌梗塞,同时又伴有心律不齐,病情十分严重。这是毛泽东第一次出现了心肌梗塞迹象。中央决定由华国锋、王洪文、张春桥和汪东兴4人直接负责对毛泽东的医疗工作。医疗小组有关毛泽东的病情报告必须逐日向上述4人汇报、请示。同时决定:一般性中央文件不再送毛泽东批阅。重要文件经过四人批准方可送交毛泽东批阅,以减少毛泽东的工作量。

第二天,5月12日,毛泽东会见了新加坡总理李光耀。会见时,毛泽东由张玉凤和孟锦云搀扶着,走到接见大厅坐在沙发上。

当李光耀来到大厅,张玉凤和孟锦云把毛泽东扶起来,她俩便退到屏风后面,毛泽东刚站起来与李光耀握完手,就“扑通”一声坐下了,小张和小孟在屏风后看得清清楚楚,她们惊讶得差点喊出声来,她俩最清楚毛泽东的病情,这次突然坐下,是他实在无法支撑,不由自主坐下的。

毛泽东接见李光耀,仅寒暄几句,前后只有几分钟就迅速结束了。

当人们看到这次毛泽东接见李光耀的新闻照片时,无不感到震撼,与前几次的照片相比,毛泽东目光无神,已经不能正常地抬头,只能把头仰靠在沙发上。

1976年4月23日至5月10日,国家出版局在济南召开“鲁迅著作注释工作座谈会”,有13个省、市、自治区有关方面的代表79人参

加。会议传达了毛泽东1975年11月1日的批示,制定了《鲁迅著作注释出版规划(草案)》,明确了各地分工承担的任务。会后国家出版局写了报告,国务院于7月1日批转各地执行。

这次会议分为两段。第一阶段,在山东的济南南郊宾馆开;第二阶段,在北京国务院二招召开。

上海写作组陈冀德参加了济南鲁迅著作注释座谈会后北上北京,并去钓鱼台看了张春桥。

一天晚上,王洪文的秘书肖木把陈冀德从《红旗》杂志社的招待所接到姚文元的住处。陈冀德一直以为姚文元和张春桥是在一起办公的。肖木告诉她:"姚文元已经搬出钓鱼台了。"

姚文元的家属从上海迁到北京后,姚文元就搬出了钓鱼台,全家住到西单附近过去薄一波住的四合院去了。

来到姚文元的住处,陈冀德觉得这里像是一所过去京官的住所,有好几进深的老房子。姚文元的秘书接他们进去以后,在黑咕隆冬的走道里,弯弯绕绕走了好些时候,才来到一间感觉大而无当的会议室。

会议室只在进门的一头亮着灯。整个房间昏昏暗暗的。桌椅、墙壁看上去都非常陈旧。他们还没坐定,姚文元就进来了。

话题从济南召开的鲁迅著作注释座谈会说起。姚文元说:"周海婴给有关方面写了一封信,提出,当前在鲁迅的研究上,存在着否定一切的倾向。这就是召开这次座谈会的起因之一吧。"

还对陈冀德说:"《光明日报》的内参上,有你在这次座谈会上的发言摘要。我们都看到了。你的观点是对的。否定也是继承的一种方式。否定一切就不对了。鲁迅说的'拿来主义',倒洗澡水不要把澡盆里的孩子都倒掉了。都是这个意思。"

接着,他们说到发生在一个月前的天安门广场事件。姚文元说:当时,政治局的人都在人民大会堂开会。站在会议室的窗前,可以看到广场上的景象。人头攒动,一点不亚于毛主席接见红卫兵时那样的场面。现在看来,文化大革命是暴力,天安门广场事件,实际上也是暴力。还是恩格斯说得对,阶级斗争,最终还是暴力解决问题。

从姚文元处出来,陈冀德问肖木:"房子这么大,又这么破旧。办公厅的人怎么也不帮忙收拾收拾?"

肖木说:“他们哪里会把姚文元放在眼里。姚文元身上穿的军大衣,好几年了,都磨破了。没人管。还是张春桥说了话,他们才给换了一件。”

陈冀德也见了王洪文,但没有谈什么,只是请她看电影参考片,和几个陈冀德也不认识的人一起喝了喝茅台。

陈冀德觉得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3人的生活追求差别很大。王洪文生活奢侈,及时行乐,但张春桥、姚文元朴素,姚文元甚至有些寒酸。

5月16日,上海庆祝“文化大革命”发动十周年之际,徐景贤收到张春桥寄来的一封密信,是张春桥亲自写的信封,正中写一着:“徐景贤同志亲启”,在“亲启”下面特意打上两个圈圈。信封下方的署名直接写着“张春桥”,接着是发信日期。这封信背后贴着“密封”的签条。

徐景贤收到这封信的时候,愣了一下。因为他和张春桥接触这么多年,从来没有收到过他自己写的“亲启”信封。过去张春桥给他写信,往往只写在信纸上或写在文件的天地部分,信封是由秘书代写的,然后再由秘书密封,贴上签条,盖上机密图章,进行编号登记,再转送出去。即使是内容绝密的信件,他对自己的机要秘书,也是从来不回避的。在徐景贤的印象里,张春桥自己亲笔书写“亲启”件给他,这是头一遭。可见,这肯定不是一封普通的信件。

不但徐景贤意识到了这封信的重要性,而且连机要秘书们也都清楚这一点,这封信经过3个机要秘书之手,由张春桥在北京的严秘书登记后,送给张春桥在上海的秘书小何,再由小何转送给徐景贤的秘书小张签收。当这封信出现在徐景贤办公桌上的活页夹里的时候,和它一起收到的其它信件和文件,都由秘书拆封、登记编号,独独只有这一封信,仍然密封着,上面张春桥写的加圈的“亲启”两字,十分引人注目,谁也不敢动它一下。

徐景贤看到信,取出剪刀,急速地剪开封口,展开一页白色的薄道林信纸,纸上赫然跳出张春桥那熟悉而又漂亮的铅笔字行书:

景贤同志:

送来的材料收到了。老实说,我要的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秘书,而是想找个伴,关于我的情况,你是知道的,这几年来,有时想,反正说不

定什么时候就杀头了,何必去想这些事情呢?但有时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于是又想起了这件事。

你看,有没有合适的人呢?

祝好!

春桥

信纸下方还有一行小字:请阅后烧掉,免得引起不愉快的事。

徐景贤看了这封信,恍然大悟:原来张春桥根本不是要找什么“秘书”,而是要为自己找个伴侣。徐景贤为自己能得到张春桥的高度信赖而深感庆幸。

然而,要为张春桥“找个伴”,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他在信里对于找什么样的“伴”没有提出任何条件,只是提到希望有一个可以“说话”的人。光凭这一条,就难。

张春桥本来就是一名“大杂家”,谈起话来,国际国内,政治经济,文坛逸事、人事变迁……可以说,古往今来,天上地下,无所不谈。这和他过去长期从事新闻宣传工作,后来又进入中央领导层有关。现在,要找个能够经常和他“谈话”的“伴”,势必要求她有较高的思想政治水平,有较丰富的知识积累,能够做出机敏的反应,还要有驾驭文字的能力。

徐景贤开始小心翼翼的寻觅,不敢让其他人经手,经过几个星期的时间,结果却总是让他失望:凡是符合条件的那些“对象”,都是早已有了家庭的人;而有些独身女性,则是思想政治水平和文化素养等不够条件。他选来选去,觉得要从四十岁左右层次较高的女性中,找到至今独身并适宜成为张春桥的妻子的人,实在是难上加难。

正当徐景贤伤透脑筋的时候,一个竟外的机会让他“捕捉”到了一个理想的对象。这天,他到上海文教系统某机关去参加一个会议,听取向基层单位派出的专题调研组的工作汇报。当时一位40来岁的女性的发言,引起了他的注意:她讲话时口齿清晰,条理分明,有自己独到的见解;言辞敏捷但又不像某些女性那样咋咋呼呼。徐景贤插话问了她几个问题,她都能对答如流,还能列举出一些人员的具体情况作为左证,这说明她在调查研究时,对基层单位的情况摸得很透,工作作风很深人、很细致。徐景贤特别欣赏的是,她在发言中敢于对他的某

些看法表示异议,而且能够委婉而明白无误地说出她为什么不同意的理由,徐景贤认为这是一种难能可贵的品质,因为社会上阿谀奉承的人不少,在自常生活或工作中,顺从或是附和领导的意见,往往是一种比较普遍的风气,用沉默来表示异议已经算不错了,至于能当面说出不同意见来的,简直是凤毛麟角。

散会以后,徐景贤用随意交谈的方式,向会议的主持人同时又是这个机关的领导了解她的情况,会议主持人说,这位女性是共产党员,曾经做过多年的机关工作,又在一个重要刊物的编辑部当过编辑,有相当好的文字表达能力,在调查研究中发现了一个倾向性的问题,向领导写了书面汇报,受到领导上的重视,转给报纸公开发表并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徐景贤听了更为高兴,因为他看到了这份书面汇报,认为写得不错,提出的问题也有深度,所以特地上送给北京的张春桥过目,由张春桥批示同意后公开发表的。

那个会议的主持人看出徐景贤颇为赏识这位女士的才干,就进一步补充说:她的工作态度十分认真负责,下去调查研究的时候,往往全心全意,没日没夜地干,因为她现在是独身一人,别无牵累;她曾经有过一个不幸的婚姻,因为她不育,对方就和她分手离婚了。这样,她反倒把全副精力都扑在了工作上。

徐景贤听了心里更是美不可言,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这和给张春桥找对象的要求倒是非常吻合的,美中不足的是该女士的相貌平平,但是最重要的是她具有较高的内在素质,也就足以弥补外貌上的不是了。

拿定主意以后,徐景贤不露声色,请会议主持人把这位女士找来,由他单独和她谈话,讨论如何进一步深入调查研究的问题。通过交谈,徐景贤对该女士的思想水平,性格特征,工作作风,兴趣爱好乃至于生活经历,家庭情况等,都有了进一步的了解,谈话结束,他和她握手道别。

5月下旬,巴基斯坦总理布托来访中国,提出要会见毛泽东,当时布托已经来中国好几天了,一直等待毛泽东的会见,但由于毛泽东的身体状况不允许,所以一直没有安排。

5月27日,布托马上要离开中国,又一次提出见毛泽东时,毛泽东的秘书不得不把这种要求向毛泽东报告。此时,毛泽东刚吃了安眠药,但他依旧毫不犹豫地点头同意安排接见。这次会见,毛泽东已明显地面容憔悴,表情麻木,行动不便,连站起来的力气都没有了,只能坐着与布托会面、握手。

毛泽东问布托:“你好吗?”

布托回答说:“我很好,谢谢你。”

毛泽东说:“我不大好,腿不大好,讲话也不好。”

布托说:“主席创造了伟大的历史,你高举着人民革命的斗争旗帜。”

毛泽东说:“没有做出多少成绩。”

毛泽东会见布托,前后不过几分钟,然而,这是他的最后一次会见外宾。

1976年5月27日毛泽东最后一次在书房会见巴基斯坦总理布托

5月29日晚上8点23分,云南龙陵至潞西一带,发生7.5级地震,10点又发生了一次7.6级地震。由于地震预报部门对这次地震有预报,因此在中共云南省委的统一指挥下,伤亡和损失被大大减轻。

5月30日深夜,毛泽东的心脏病再次复发。他呼吸急促,大汗淋漓,并出现了短时间的昏迷,所幸发现及时,很快抢救过来。这次发病之后,毛泽东同意医生在他的耳垂上抽取血液进行化验,同时又配合医生使用当时属新式医疗器械的无线电遥测心电仪。这样,医生就可以在外室通过遥测心电仪随时监控毛泽东心脏的变化,以便及早采取治疗措施。在以后半个多月的时间里,毛泽东的病情较为稳定。

# 第1397回：豫湘动，保定农民开进城 朱德逝，叶剑英看华国锋

1976年5月23日至6月10日，河南省委在省委三所召开省委常委扩大会议，批判邓小平“罪行”，反击右倾翻案风。6月1日，刘建勋在会上发言，他说：“文化大革命以来，经过九、十次路线斗争，本来我们领导与群众的关系是好的，我们同新干部是有感情的，新老干部团结战斗，十年的老战友了。由于邓小平大刮右倾翻案风，我们跟着犯了错误，不仅伤害了一部分新干部，压了一部分群众，而且使党委的一些领导同志处于被动局面。根子在邓小平，责任主要在我。”

“同志们批评我怕邓小平，该顶的没有顶住，屈服了邓小平的压力。这个批评好。我思想上确有怕邓小平的一面。邓小平上台以后，我跟一些同志讲过，这个人很厉害，在他领导下工作要小心点。我对邓小平的这种印象，有历史的原因。文化大革命以前，我长期在他领导下工作。在抗日战争时期，他是大官，我还是小官。在太行时，我听到看到的有关他的事，就觉得此人厉害。去年邓小平大刮右倾翻案风，对我们河南的舆论也不少，什么‘地方主义’，‘一派掌权’，等等。对我们是有压力的。邓小平点了郑州铁路局的名以后，万里同志气势汹汹几次来整郑州铁路局。5月份那次来，他说：‘一进安阳就有人反对’。到了新乡，既不通知省委，也不同铁路局党委商量，就召开几千人的大会，点名批判，指桑骂槐，来了个杀鸡给猴看。到了郑州，说‘来到河南不受欢迎’，大骂郑州铁路局‘结党营私’，是‘修正主义’，要撤徐达本同志的职。我知道他有来头，不敢硬顶，急忙躲避，他到郑州，我就下乡。我跟几个地委书记谈过，万里那样凶，是有邓小平当后台，这不仅是整铁路局，而是要整我们省委。当时，铁路局党委的同志是同万里对着干的。8月份那次来，他进一步推行邓小平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这一次，我为了照顾关系，在铁路局党委常委扩大会议上，说了几句客套话，我说省委和部里是一致的。他回去的时候，说这次来

‘没有摸到老虎屁股,摸了鸡屁股。’可见,是要整我们的。”

“去年5月上旬,李井泉同志来河南,我陪他参观、吃饭,他散布:‘邓小平讲,干工作不要怕犯错误’,‘邓小平抓得很紧,先抓铁路,再抓工业,还要抓军队。’邓小平的所谓抓这抓那,就是要‘全面整顿’,要翻案复辟。当时我没有识别,也说了一些吹捧邓小平的话,说:‘他是我的老上级,我对他的印象是处事果断,言必行,行必果。’我还说有机会要见见他,把河南的问题说清楚。”

“邓小平把派性当成主要矛盾,借口反派性,整无产阶级革命派。我们在不同的地点和场合点名批判了一些人,而且多数是犯有这样那样错误的新干部。我向批判错了的同志道歉。”

“去年我们受邓小平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影响所犯的严重错误还集中表现在省委17号文件上。这个文件是对着新干部的,贩卖了邓小平的不少修正主义货色,是一个错误的文件。我们联系实际批邓,要批17号文件。”

6月4日,湖南继续在省委机关大院内召开“促转弯子”万人大会,唐忠富对前来参加大会的一些地、市总工会的负责人说:“你们要根据本地区情况大胆斗”,“把顽固分子的威风打下去”。“搞得张平化休想在湖南找到任何安定的绿洲”。会后,组织了230辆汽车上街,进行宣传。接着,邵阳、衡阳、黔阳等一些地区的运动陆续开展起来。

6月12日,新华社长沙讯(内参):

最近记者去湘潭江南机器厂采访,这个厂的工人欧阳凯主动向记者谈对运动的看法。他说了以下几点(主要的):

(一)我不怕坐牢,我声明,我是个反周派。在文化大革命中,我在外单位搞调查时,看到反革命分子的反中央领导同志的传单,上面就是没有提周恩来,这不是说明他有问题吗。毛主席发动批林批孔运动,就是反的他。这次反击右倾翻案风,也是反的他。邓小平上台只有几个月嘛。

(二)湖南的问题,光揪张平化有什么意思,张是个第二书记,湖南还有第一书记。可以断定,华国锋是周恩来的人。

(三)反击右倾翻案风这场运动,还只是才开始,以后的事情多得很,早着哩。现在中央的领导权算解决了,中央各部门的问题,文化

部、卫生部解决了,你们新华社解决了,人民日报只解决了一半,其他还没有解决,还有各省的问题。

欧阳凯在文化大革命中是厂里的“湘江风雷”派头头。他在同记者谈话前两天,(约在五月十六日前后)曾到长沙,会见了省里一些原湘派的头头,如叶卫东、李敬林等人,他说,李敬林曾向他谈了对运动的看法。(完)

7月19日,湖南邵阳一些人在长沙街头写了“打倒工团主义”,“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等标语,把矛头指向反击右倾翻案风。

唐忠富指出:这是“天安门反革命事件”。并与张厚、雷志忠调民兵把邵阳来的这些人包围在省委大院。

20日清晨,唐忠富、张厚等又增调了民兵达1000多人。双方发生武斗,打伤21人,其中重伤3人。

7月24日,唐忠富到长沙市委、市革委扩大会议上表态说:“张平化在各个关键时刻,都与毛主席的路线唱对台戏,我们要下决心同他斗争到底。”“不打倒张平化我不姓唐”。

7月26日,唐忠富与雷志忠、胡求生等7人来到北京。他在准备的“汇报提纲”中说省委及其负责人“顽固对抗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执行修正主义组织路线”,“支持纵容打砸抢”,“大造反革命舆论”。

同时,唐忠富还要求胡勇、张厚等人在湖南加紧工作:“你们在家闹得越大,我就在这里越坐得住。”

1976年6月14日,保定市部分市委委员发表《关于保定当前形势的声明》,认为市委主要负责人不反击右倾翻案风,有投降倒逆行为。为此,他们声明脱离市委,成立“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办公室”。15至18日,完县、博野、涞水、徐水等县的农民宣传车进城,支持保定市“部分市委委员”的声明。

6月27日,保定地委代理书记杨凤鸣从北京打来电话,根据中央指示,地市县“反击右倾翻案办公室”一律撤销,武斗人员回原单位,抓的人立即放出。市委向中央调查组的报告中称:今年3至6月,保定市有十余个单位发生围攻、揪斗领导干部事件。有9个单位发生抢公章、夺权事件。

1976年5月底,叶剑英的侄子叶选基来找熊向晖,熊向晖谈到自

己对华国锋的印象,认为华国锋不是极左派一伙的!因为他陪同华国锋接见杨振宁时,没有听到他提批邓,也没有说邓小平是天安门事件的后台。6月4日晚,叶选基和刘诗昆一起再次来找熊向晖。叶选基说,华国锋现在是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和国务院总理,叶帅长期在家里休息也不好。希望熊向晖动员叶剑英见见华国锋。

熊向晖表示:“这个意见很好,你们是不是向叶帅提过?”

叶选基说:“如果熊叔叔认为可以,请你向我伯伯提。”

熊向晖答应约个时间去谈。

于是,6月7日晚,叶选基来接熊向晖一起去叶剑英在西山的住地。在谈了其他问题之后,熊向晖把话题扯到华国锋身上。他对叶剑英说:“选基和诗昆的意见很好啊!”

叶剑英说:“我和华不过是在开会时点个头,对他不摸底啊!”

熊向晖拿出他特地带来得两份材料给叶剑英看。

第一份材料是1975年9月26日,邓小平等听取胡耀邦关于科学院工作的《汇报提纲》的说明时的汇报记录稿。当时有很多人的插话,其中就有当时作为主管科学院工作的副总理华国锋的一段插话。起初熊向晖并没有在意,华国锋担任总理后,熊向晖想起这件事,才把这个记录稿又找出来看。

插话中,华国锋讲了三大革命、四个现代化都要靠科学技术现代化,科学院整顿很有必要,讲到依靠工农是对的,可是不能把专业队伍搞得一塌糊涂。他特别对批判基础理论研究的事表示不满,说,毛主席对李政道、周培源讲了,周培源写了文章(关于重视基础理论研究的),《人民日报》不发表,《光明日报》发表,跟着就批。这种批判基础理论研究的风搞得科学家都不敢搞基础研究了。科技人员不敢看外国书,思想有顾虑。他还对当时极左派鼓吹的上海经验提出质疑:他们搞“三突”,学上海的经验,学那个?!

熊向晖把记录稿交给叶剑英,特别请他注意华国锋的插话。并说:“你看,这些话很尖锐啊!”

第二个材料,就是他4月17日陪同华国锋和杨振宁的谈话记录稿。熊向晖说:“华国锋刚当总理不久,和杨振宁谈了近两个钟头,没有一句批邓,也没有说邓小平是天安门事件的后台,只批了外交部那

个造反派的儿子。这就不简单了。”

然后熊向晖又给叶剑英说了两件事。一件是公安部副部长李震死亡的定案问题。当时对李震的死因,有两种意见。公安部门勘察认定是自杀,王洪文以及公安部另一负责人却认为是谋杀。华国锋主持国务院工作后,这个事情还没有结论。熊向晖参加了华国锋主持讨论这个问题的会议。他发现,华国锋不是坐在那里听,而是谁发言,他就站在发言人的后边听,既不插话,也不问话。有人说自杀,有人说他杀,就这么说了一夜。之后,他问:“还有人要说吗?没有,散会。”

第二次再开会时,他把两边的意见归纳几点,说他杀的有几点什么理由,说自杀的有几点什么理由。然后,他让主张是他杀的人再讲讲他们的理由,接着让主张是自杀的人反驳这些理由。结果,他杀的理由都被驳倒。最后,华国锋说:“这样看来,是自杀吧。还有什么意见?”谁也说不出什么意见来了。

另一件事,是在关于李震死因问题的第二次会议散会之后,大家在往人大会堂外面走时,华国锋叫住熊向晖,问:“怎么好久不见老罗了?”

老罗是指罗青长,时任中央调查部部长。

熊向晖说:“他病了。”

华国锋问:“住在哪里?”

熊向晖答:“在阜外医院。”

华国锋不解:“怎么不住北京医院?”

熊向晖说:“文革调整了他们的医疗关系到阜外医院,想住北京医院,可住不进去。”

华国锋站住了,说:“要住北京医院。”说着,就在人大会堂外的台阶上坐下来,从公文包中拿出一张纸,写了个条子:“北京医院并报刘湘屏部长,安排罗青长同志住院。”

就这样,罗青长住进了北京医院。

熊向晖对叶叶剑英说:“他这个作风也很好啊!”

叶剑英听了后,颔首说:“这个人是含而不露。”

熊向晖说:“我觉得华不错,不过他立足未稳,所以叶帅是否帮他一下。”

叶剑英表示,他会去见见华国锋。

6月10日,邓小平通过汪东兴致信毛泽东,希望与家人团聚:“我到这里来住,两个月零几天了,近一个月,卓琳眼病严重,住了医院。她在医院终日住在一个小房间,除医护人员外,不敢同任何人接触,也没有亲人去看她。这种状况如能改变,对疗效极有好处。所以,我们急切地提出同孩子们同住,或者首先允许她们来看望我们的要求。”

汪东兴将此信报知毛泽东。次日,毛泽东即指示,“可以同意邓小平来信请求。”

6月30日,邓小平接到可搬回宽街住宅的通知。7月19日,他们夫妇从东交民巷搬回宽街住宅。

6月26日,毛泽东的病情又发生了变化。心电图上显示毛泽东出现心律加快和间或发生早搏的迹象。尽管行动不便,但毛泽东仍然不时要求从床铺移至沙发上休息,后来又再次要求移回床榻之上。晚19时左右,遥测心电仪再次显示毛泽东出现心肌梗塞的迹象,而且这次心肌梗塞的面积较之5月11日那次面积略显扩大。华国锋、王洪文、张春桥和汪东兴等火速赶到游泳池毛泽东住地。经过医疗小组的全力抢救,到凌晨时分,毛泽东的血压又恢复正常。

当天深夜,在毛泽东病情较重之时,在京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都纷纷赶到游泳池毛泽东住地。他们依次走进毛泽东的临时病房。当叶剑英来到毛泽东身边时,毛泽东眼里露出光亮,他的手动了一下,这动作显然是有话要对叶剑英说。可是当叶剑英来到毛泽东身边的时候,毛泽东几次张嘴却又讲不出话来,他只能与叶剑英紧紧相握。那握手时的动作和眼神,似乎流露出一种依依惜别之情。

华国锋对毛泽东的这次发病极为重视,他当即决定由自己和王洪文、张春桥、汪东兴4人分为两班,日夜轮流住在游泳池毛泽东住地坚持值班。为了解决医护力量不足,又从北京几家医院调来数十名医护人员,做到医护人员24小时在毛泽东身边值班,每天三班倒,使毛泽东的病房昼夜不离人。这时,江青也从钓鱼台搬进了中南海。

在对毛泽东进行抢救的过程中,医生又一次向他提出使用胃管输入营养的建议,这次毛泽东没有反对。胃管插上以后,由于能进食,毛泽东的身体状况开始有了一定好转。他浑身也渐渐感到有了气力。

几天后,他又可以在护士的搀扶下下床走动了,尽管不能到室外散步。毛泽东的病情又一次出现了短期的稳定。

7月1日,政治局开会研究毛泽东的病况。江青等人起草了一个下发各省部委关于毛泽东病情的通知,其中说到:“毛主席病情比较稳定,不久就可以康复,主持工作。”

汪东兴反对写这句话,叶剑英也认为不能用这句话,会上和江青他们发生了争论。争到次日凌晨1时,一直没吭声的华国锋说话了:“争得差不多了吧?散会。”

叶剑英有些纳闷。可等他凌晨2时在家看到那天发出的电文,笑了。那句话,电文里没有。

7月1日,张闻天心脏病猝发,病逝于江苏无锡,享年76岁。

这天,《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联合发表社论,题目是:“在斗争中建设党”。

社论中转载了毛泽东1964年在八机部部长陈正人信上的批语:

一九六四年,毛主席在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一个批示中,曾经指出:“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毛主席又指出:“管理也是社教。如果管理人员不到车间小组搞三同,拜老师学一门至几门手艺,那就一辈子会同工人阶级处于尖锐的阶级斗争状态中,最后必然要被工人阶级把他们当作资产阶级打倒。不学会技术,长期当外行,管理也搞不好。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是不行的。”毛主席还指出:“这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领导人,是已经变成或者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他们对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性怎么会认识足呢?这些人是斗争对象,革命对象,社教运动绝对不能依靠他们。我们能依靠的,只有那些同工人没有仇恨而又有革命精神的干部。”

毛主席的这一批示以及文化大革命过程中特别是反击右倾翻案风以来的一系列重要指示,深刻揭露了刘少奇、林彪、邓小平一类党内走资派的阶级本质,分析了党内资产阶级的特点、根源和战胜他们的方法,对于我们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7月6日下午3时01分,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朱德在北京逝

世,终年90岁。临终前,朱德仍在断断续续地对周围说:“革命到底。”

闻听朱德去世。毛泽东叹道:“‘朱毛’‘朱毛’,不能分离。现在朱去见马克思了,我也差不多了!”

毛泽东一腔深情,用极其微弱的声音,吟诵起南北朝文学家庾信的《枯树赋》:

昔年种柳,依依汉南;

今看摇落,凄怆江潭。

树犹如此,人何以堪!

一天,叶剑英主动给华国锋打电话,说:“我想看看华总理。”

华国锋在电话中一听,赶忙说:“我应该去看叶帅。听说叶帅患病,我也不好打搅。”

叶剑英说:“你忙,还是我来看你。”

俩人争了半天,最后还是叶剑英说服了华国锋,由他去看他。因为叶剑英觉得,华国锋出行的目标比他更大,还是他去华国锋那里更为妥当。

叶剑英先到中南海看望了病重的毛泽东。回家途中,他让司机绕到北京东四史家胡同华国锋住地,第一次登门拜访华国锋。

华国锋住的地方,车不能开进院里。叶剑英汽车到时,华国锋已经等在门口。这个举动,令叶剑英很欣慰。华国锋亲自为叶剑英打开车门,然后扶着他走进院子,到客厅就座。

叶剑英对华国锋说:“你现在担子重啊!我年老有病,帮不上你什么忙,很惭愧。”

华国锋说:“您是九亿人民的元帅,怎么能这样讲啊。主席让我挑这个担子,我负担很重,推辞不了,只有兢兢业业。因为怕影响叶帅养病,所以没有打搅。今后还望叶帅指点。”

一句“九亿人民的元帅”,颇让叶剑英动容。

寒暄之后,叶剑英问了华国锋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你现在治国的方针是什么?”

华国锋说:“举一纲抓两目。举一纲,是阶级斗争为纲,抓两目,就是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安定团结。”

叶剑英说:“好。第二个问题是:周总理逝世了,董老、朱老总也都

逝世了,中央人事安排你怎么考虑?”

华国锋说:“除非主席有指示,人事问题一概不动。”

叶剑英说:“好。”

华国锋向叶剑英请教应该注意的问题,叶剑英告诉他:要注意民兵。解放军的传统是,指挥只能是一个,不能多中心。

华国锋表示同意。

# 第1398回：七月七，皮定均飞机失事 七二八，中国唐山大地震

1976年7月7日，福州军区司令皮定钧，乘直升机视察福建沿海前线，飞机失事，以身殉职。随机高级军官和皮定钧的儿子，全部罹难。

事后调查情况大体如下：

7月7日11时整，皮定均等人乘坐的米—8直升机逆风起飞，开始往北，然后转向东。规定的航线是；向东600，1200，1800，向西300、900、1500米。每600米一个高层。11点10分，米—8直升机与地面指挥中断联系。下午1时左右，漳浦县东坪村的一位民兵亲眼目睹一架飞机向灶山上的一块巨岩撞去，翻滚后解体，爆炸，起火……

大概在7月下旬，新华社负责人解力夫转给姚文元一封信，信封上写着："姚文元同志亲启"。

姚文元拆开信一看，是反映河南省委常委、组织部副部长李祥林在北京住院时，纪登奎的小儿子纪虎民去看望他时说的一番话。纪虎民说：

"北京一些人说，毛主席病重，恐怕不久于人世。毛主席一去世，把江青等人一逮捕，宣告江青是叛徒，张春桥是特务，他们就完蛋了。这事给你打个招呼，你可给河南的某些同志说一下，作个思想准备。"

随后，李祥林给驻马店地委常委、确山县委书记弓永章打电话，让他去北京一趟，说有事找他。

弓永章原来在省委组织部工作，与李祥林关系很好。弓永章到北京后，李祥林将纪虎民对他说的内容告诉了弓永章。

从北京回到郑州，弓永章将省委组织部部长董万里、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杨止仁、开封市委秘书长殷国华叫到省委统战部部长李剑波家里，将纪虎民的话向他们做了转达。杨止仁当即表示不相信江青是叛

徒,张春桥是特务的说法,同时认为纪登奎的儿子给李祥林传这番话,可能有来由。他说:“我们既不要相信,也不要再传播,连自己的老婆也不要说。”

事后,杨止仁向河南新华分社社长周民英说了这件事,并建议给毛主席发一个手抄件内参,说:“我们只相信毛主席。”

内参写好后,周民英派记者刘金同到杨止仁家,让他过目。内参是以组织部部长董万里和宣传部副部长杨止仁二人的名义写的。董万里知道写内参一事,杨止仁估计可能是弓永章对他说的。

随后,周民英派刘金同亲自将信送往北京新华社,时间应该是在1976年5月。

姚文元在1980年7月17日的《审讯笔录》中谈到这封信,他说:

我的思想状况。先从1976年7月下旬说起,新华社的解力夫转给我一封河南分社记者写给我的亲启信,并要求我把此信转给毛主席。这封信对我的思想有很大的影响。

问:信里写的是什么内容?

姚:这位记者写信反映河南省委组织部一位负责人,1976年初在北京养病期间,纪登奎的儿子去看他时讲的一番话。这封信写得很露骨,给我印象比较强烈的有:一,用很坏的语言攻击毛主席的病,意思是说毛主席活不了几天了;二,攻击华国锋总理没有能力,说他现在虽然担任了总理,但在工作上一边向李先念问问,一边向张春桥问问,这样把两边的意见凑起来做工作,还特别攻击他在外事工作上没有经验;另外,还有许多吹捧纪登奎的话,说他父亲如何有能力,现在不高兴多管事,不高兴出主意了;三,他还说现在政治局是新派、老派之争,说那些老派现在不开口,因毛主席还活着,只要毛主席一死,他们是要大干的,他们已经秘密串联,做了准备,到时候立即宣布张春桥为叛徒,实行全国军管,接下去就是血雨腥风之类的话;他还说老派、新派无论谁上台都要流血;上海是新派的地方,死了多少人呀!老派上台也要流血,但比较起来还是老派上台好一些。纪登奎的儿子还对这个组织部长说:要他回去给省委打个招呼,对将来的事情要做好准备。这位记者还反映河南省委在听到这个组织部长传达后的情况,如刘建

勋(河南省委第一书记)等人的态度。总之,给我的印象是写信人了解很多的秘密。当时毛主席已经病重,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和华国锋主席已搬进中南海。我看了这封信百感交集,一方面我不大相信,因为信中有些情况不确实,比如信中说毛主席患了喉头痛,就不对。另方面,又觉得是不是有某种根据。这里根据"文化大革命"的经验,就是有些小道消息常常加进些内部情况。我觉得不管怎么样,毛主席逝世后,我的确有垮台的可能。这封信收到后,我思忖再三觉得不能转给毛主席,因毛主席已经病重了。我又不愿转给毛远新。也没有送给华国锋主席,因为信里有些话是说他的。我更没有想到送给江、张、王。这封信就一直压下来了,像一块大石头一样压在我的心里。

姚:当时,正是毛主席病危的时候,华主席、张春桥找我谈话,要我和纪登奎负责准备文件,以我为主。我接受了这个任务,和纪登奎一起找了办公厅的周启才、李鑫等几个人。在中南海准备文件,包括《告人民书》等一整套计划,搞好后封存在那里。

7 月,毛泽东的进食已经很困难了。

毛泽东的心脏病暂时得到控制以后,医疗小组又发现毛泽东的其他病情仍在发展。更为严重的问题是毛泽东无法进食。当时的毛泽东,双手颤抖很厉害,无奈之下,他只能接受工作人员喂饭的现实。

不久,喂饭也成了难题,于是,医护人员为他配了鼻饲食谱。食物由医务专家和厨师根据人体所需的营养成分精心配制而成,每隔一段时间通过鼻孔下插着的管子注入一次。

没过多久,肺心病又开始折磨他,使他常常处于严重缺氧状态,嘴唇都憋得发紫。他的鼻孔下于是又插入了氧气管。后来即便是流质食物毛泽东也无法下咽,一到嗓子便呛住,引起心脏不适,只能通过胃管进食。

从保存下来的毛泽东的食谱来看,1976 年 7 月 11 日前为鼻饲,7 月 12 日至 9 月 8 日为胃管进食。其中除了 8 月 1 日到 13 日不到半个月的时间里进食情况较好、9 月 3 日进食一般外,其余时间都较困难。

7 月 17 日,河北唐山召开关于地震的"群测群防经验交流会"。

7 月 21 日,唐山白雾弥漫,欲下无雨,唐山人平生第一次因为气候

特异,在心情上蒙下一层疑忌的阴郁。

22 日下午 16 时,唐山的天空骤晴,寒气逼人,怕冷的人竟然穿上了春秋装。黄昏时分,西边天空的火烧云让唐山人感到万分奇妙。

7 月 23 日,有人提出包括北京、保定、张家口在内的京津唐会发生 6 级以上地震,时间在 29 日之前。但是人们没有接到这方面的通知。

7 月 25 日,唐山的鸡就像发疯了一样的,无缘无故地相互追逐,发出惊恐的怪叫。人们发现,猪不进圈了,而且活跃异常,陡水河水库的鱼大量翻白,飘在水面。由于上市的鱼量猛增,以至于唐山的鱼价大跌。

这一天,中国地质专家们用古地磁方法,第一次测出了 1965 年在云南元谋发现的元谋猿人年龄是 170 万岁,证明其为中国讫今发现的最早的古人类。于是,中国发现最早猿人的年代,推前了 100 多万年。

7 月 26 日清晨,唐山怪异的凉气袭人,一些大猪卧立不安,乱拱乱跑,忽而嚎叫,全是一副病态。而成百上千的青蛙爬出水面,伏在地上,显得有气无力,失去了往日的敏捷。这一天,整个唐山的自来水,突然变得混浊。

7 月 27 日下午 5 点,唐山的天变得湛蓝,西边的天空光彩四溢。夜色浓重后,空气又闷得人难以忍受,入睡困难。这天,许多公鸡没有打鸣,不愿进食;一些母鸡四处乱奔,有的竟像公鸡一样刺耳地叫起来,奇怪的是一些母鸡连续下 2 个蛋,入夜不愿归宿。不少的鸽子惊飞不安,猪不吃不喝;猫对老鼠视有若无;成群罕见的黄鼠狼迁徙。井水陡落陡涨……

7 月 28 日 0 时。前一天晚上的燥热,还在河北唐山至丰南一带延续着,人们闷得发慌。

2 时,天空不断闪电,刺目的白光连绵不绝,有大雨降临之势。野外不断有巨大的火球从低凹处喷射出来,急冲上天空后,缓缓落下,在地面上滚动着,耀眼的光照亮了田野。

3 时左右,“风声”大作,伴有“哗哗”的响动,一些没有睡实的人惊醒了。令他们感到惊恐的是,仅闻“风声”,却无吹拂的感受。在夜空中出现的许多亮光里,人们好象是在做梦。3 时 20 分,条带状的一束

束红光蓝光从地面掠过,远处天空眩目的闪电使大地景物清晰可辨,忽而又陷入一片黑暗。3 时 30 分,突然一道极亮的光从远处升腾,同时传来沉闷的鸣声。刹时,一切又都沉寂下来,如往昔的黑暗一般,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

3 时 42 分 56 秒,死神终于从地层 12 公里深处迸发出来。黑暗中突然闪出刺眼的光亮,地下沉闷的怪声由弱而强,由远及近,7.8 级的强烈地震在唐山爆发了,其威力相当于 400 个美国投在日本广岛的原子弹,地震有感陆地范围达到 217 万平方公里,北到满洲里,西至宁夏吴忠,南到河南正阳,东破渤海水疆。

唐山大地陡然倾斜了,几乎要陷落下去,骤而转入强烈的左右摇晃。

整个唐山土崩瓦解,71 座大中型桥梁和 160 座小桥、1000 余道涵洞、280 多公里的柏油路面遭到严重破坏,铁路轨道变形扭在一起,百年矿山成了一片废墟,驰名全国的唐山陶瓷工业彻底被破坏,能生产各种高中档瓷器近 4 千种的北方瓷都陷于灾难的深渊……

更让人震惊的是,唐山 106 万人口中有 63 万被压在废墟之中,在一瞬间,24 万人死去,另有 16 万 4 千人受到了重伤。

中共唐山市委第一书记许家信被抢救出来后,立即在市中心的马路上,建立起“抗震救灾指挥部”。4 时,一辆大轿车风驰电掣般驰过烟尘弥漫、余震频繁的大地,直奔市委而来,这是第一个向市委报到的人民汽车公司党总支副书记李玉珍和她的同事,她急切地抓着市委第一书记的手:“我们有 140 辆车完好无损,整装待发。现在,救护阶级兄弟需要我们,运输物资需要我们,宣传动员需要我们,下命令吧!”

据 8 月 25 日《人民日报》在《伟大的核心力量》中记载,“许家信望着文化大革命中成长起来的这个二十五岁的新干部,心情十分激动。”

尽管国家地震局办公楼里的测震仪记录被震动出了格,但直到 4 时 30 分,全国各处的地震台才陆续汇报测到的数据,而且在 7 级以下的或 8 级以上,相差极为悬殊,国家地震局一时难以作出定论。至于震中在哪里,大多数人说是在“北京附近。”为了尽地震工作者的职责,他们不得不分兵四路,在以北京为中心的 200 公里范围内,寻找震中。

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最早确定出震中的竟是邮电部,因为他们与各地的联络中,唯独挂不通唐山的电话。

清晨6时10分,震中唐山终于确定出来。

此时唐山的黎明,一个失去了往日喧闹、失去了生气活力、失去了生命的清晨来到了。曾忙碌的身影已无处追寻,天真的笑语成为绝音。但中共唐山市委的常委们却丢下个人的一切,纷纷赶到书记身边,在李玉珍的公共汽车里,举行了震后第一次常委会。许家信含着热泪,对大家说:“在严重的灾害面前,我们坚信毛主席、党中央一定会迅速援救唐山人民!”

许家信没有估计错,8时06分,国务院在中南海紫光阁召开了紧急会议,紧急部署救灾。

当天,党中央和国务院紧急调集解放军部队、医疗队和工程技术人员,日夜兼程,赶赴唐山灾区,抢险救灾。

上午10时,北京军区先头部队乘飞机着陆唐山。但,他们被眼前的情景惊呆了:整个唐山一片废墟,桥梁折断,烟囱倒塌,列车出轨,七零八落的混凝土梁柱东倒西歪,落而未落的楼板悬挂在空中,到处是断墙残壁……

唐山火车站,东部铁轨成蛇形弯曲,其轮廓像一只扁平的铁葫芦。水泥马路,被拦腰震断,一截向左,一截向右,错位达一米之多。

路边越堆越高的尸体山!头颅被挤碎的,双脚被砸烂的,身体被压扁的,胸腔被戳穿的……最令人心颤的,是那一具具挂在危楼上的尸体。有的仅仅一只手被楼板压住,砸裂的头耷拉着;有的跳楼时被砸住双脚,整个人倒悬在空中。这是遇难者中最敏感的一群,已经从酣梦中惊醒逃生,然而他们的逃路却被死神截断。有一位年轻的母亲,在三层楼的窗口已经探出半个身子,沉重的楼板便落下来把她压在窗台上。她死在半空,怀里抱着孩子,在死的一瞬间,还本能地保护着小生命。随着危楼在余震中颤抖,母亲垂落的头发在雾气中拂动。

当时除了双手几乎再没有其他可以用来营救的工具。人们似乎感觉不到指甲剥落、血肉模糊的手的巨疼,而往往是闻声便拼命扒,等扒出时却没了任何气息。

7月30日清晨6时,沈阳军区以最快速度,奔赴唐山,开始大规模营救。但是,当唐山需要医疗物质上时,中国却毫不犹豫地拒绝了外国的援助,认为那是“不怀好意的所谓人道主义。”

大量尸体在高温多雨环境下迅速腐烂,密麻麻的苍蝇在空中飞舞,腐烂味四处弥漫。传染病的发病率日趋上升,几乎接近暴发的程度。中央紧急命令快速集结防疫人员,调运杀虫、消毒药品400多吨,不分昼夜从空中、地面立体喷洒,向瘟疫作战。市区的蚊子几乎被消灭殆尽,但苍蝇仍大量孳生。在短时间内转移、深埋所有腐烂的尸体,难以尽数的尸体用棉被捆包后立即运走。

# 第1399回：急救灾，华国锋赶赴唐山 重庆市，百余干部奔成都

7月28日凌晨，毛泽东安安静静地躺在他那张宽大的木制床上。他那均匀的呼吸，那安详的脸庞，那微微张启的双唇，使护士孟锦云感到毛泽东今天睡很舒坦，她放心了。

毛泽东的睡眠一直就是老大难。进入80高龄的毛泽东，入睡，更成了难以解决的大问题。小孟来到毛泽东身边防工作之后，也常常为他的睡眠而发愁，使他能睡好觉，这成了小孟的一个很重要的护理任务。今天，看到毛泽东睡得好，小孟心里简直是一块石头落了地。不然，她又要在本上写下“7月28日1点－－4点，睡眠不好”的记录了。小孟想着想着，便迷迷糊糊地睡着了。

忽然，小孟觉得有人在用力摇她的椅子，她被惊醒了，马上站起来，发生了什么事？耳边传来了玻璃震动的哗哗的响声。她发现卧室里的窗帘正在抖动。她往毛泽东的床上一望，看见他依旧躺在那里，很踏实，好像什么事也没发生一样，只不过，已经睁开了眼睛，神态像是在想什么。

这时，护士小李、小俞已经急急忙忙跑进来了，只听小俞慌里慌张地说：

“小孟，地震了，大厅里的窗户震得好响。主席怎么样？没事吧？”

按平时的规定，她们不得允许是不能随便进入毛泽东卧室的，但今天是特殊情况。也就顾不得这些了。

也不知是谁的主意，小孟她们几个人，从毛泽东床边的小柜子里拿出一条床单，几个人一人抻一个角，撑在毛泽东床上面，为的是怕天花板上掉下什么东西砸着他。她们一声不响地抻着，几分钟过去了，毛泽东又睁开了眼睛，翻了翻身，他好像忽然发现了自己头上面的那条床单，那条白色的细棉布床单在他头顶上面抻着。他略微转动头，向上面，向左右看看，他有些奇怪了，微微一笑，然后说：

“怎么？抻床单做什么？”

小孟听见毛泽东笑着发问，便马上回答：“主席，刚才发生地震了，小李他们吓得不得了，赶快跑来，保护您呢。”

毛泽东听了，似乎觉得十分好笑，又很好玩。他不慌不忙地说：“地震了，越震我倒睡得越香噢，这叫地震不醒安如山嘛。”

小孟说：“我们都紧张坏了，您还有心思开玩笑。”

小俞说：“主席，这次地震可厉害了得很，比邢台那次感觉明显多了。”

“总有一天，会天塌地陷，自然规律么，不用怕。”

“您什么都不怕，我们可害怕死呢，可能还要有余震呢。”小李也补充了这么一句。

“怕也好，不怕也好，我看你们抻着单子倒没必要。房子塌下来，一条单子能顶住？”毛泽东做了个落下来的手势，他用手向下挥了两下，几个工作人员才把单子放下来，叠好放在一边。她们也觉得自己的行为有些莫名其妙。

大约4时59分，张耀祠来到了毛泽东的会客厅。他通知张玉凤和孟锦云：“河北省冀东地区的唐山、丰南一带发生强烈地震。根据预测，近期很可能还会有余震。主席目前住的房子不太牢固，需要让他马上搬家，搬到新建的202房间去。那所房子安全些。”

所谓202号就是一座占地面积很大的平房区，它位于游泳池住地南侧，1969年为战备的需要动工修建，1974年建成。202平房区有一条回廊可与游泳池住地相连。这所新宅的特点是防震抗震和适于当时的战备需要。

清晨，汪东兴向毛泽东报告唐山地震情况，建议他尽快离开目前的住处“游泳池”，搬到较为安全的地方。

毛泽东住的游泳池是60年代在中南海游泳池的基础上扩建的，不甚牢固，所以在地震之前就几次劝他搬家，但他始终不肯。这时，小孟根据张耀祠的意见，对毛泽东说：“主席，汪东兴、张耀祠都来过了，他们讲了这次大地震的情况. 还讲您现在住的这所房子不太结实，可能还要有余震，希望您赶快搬家。”

毛泽东对搬家的事没有表态，只是紧接着问：“这次地震的情况怎

么样？有没有简报？”

小孟赶紧把刚刚送来没多久的一份简报清样拿来给他读了一遍：

“……我国河北省冀东地区的唐山、丰南一带，7 月 28 日 3 时 42 分发生强烈地震，天津、北京市也有较强震感，据我国地震台网测定，这次地震为 7.5 级，震中在北纬 39.4 度，东经 118.1 度，震中地区遭到不同程度的损失。”

毛泽东听了之后，显出一种少有的焦虑，小孟还在催促毛泽东搬家，她赶紧说：“您不怕，我们还害怕呢，您也不替我们想想？”

小孟故意用这样的话去激毛泽东，没想到还真灵验了。毛泽东听了她的话，没有摇头，也没有摆手，而是闭上眼睛沉思了一会儿，然后说：“你们怕，那就搬吧。”

毛泽东终于被说服了。他同意搬家的消息，几分钟后就传到了汪东兴、张耀祠那里。20 多分钟之后，搬家就开始了。所谓搬家，其实，比一般人搬家简单多了。202 那所房子，虽然毛泽东一直末搬进去住，但一切都是按随时吃住在管理着，每天打扫卫生，开窗换空气，调节温度，里面的一切设施齐备，只要进来就能住。7 月 31 日，重病在身的毛泽东由警卫战士和医护人员抬上自动移动病床，沿着那条走廊向 202 平房区转移。

这时的毛泽东，许多时间是处在昏迷半昏迷状态。但在他清醒时，仍十分关心唐山震情。他身边的医疗组成员、神经病学和老年医学专家王新德回忆道：“送来的地震情况汇报，主席不顾个人病重，都要亲自过目。这场地震伤亡达 24 万多人，其他的损失难以估量。当秘书报告地震造成极其惨重的损失后，主席哭了。我第一次亲见主席嚎啕大哭。”

8 月 1 日，中共中央《关于唐山丰南一带抗震救灾的通报》递到了毛泽东床头。这是他生前圈阅的最后一份文件。看完报告后，毛泽东立即将主持政府工作的华国锋叫到床前，叮嘱他：“要全力救灾，这是最要紧的。”

8 月 4 日，华国锋受毛泽东的重托，率领中央慰问团赶赴唐山，传递毛泽东和党中央对受灾群众的关怀之情。

1976 年 8 月 4 日,华国锋、陈永贵受毛泽东委托,视察唐山抗震救灾。(钱嗣杰摄)

唐山地震的第二天,7 月 29 日,杨成武住进西山 5 号楼,与住在 15 号楼的叶剑英、住在 1 号楼的聂荣臻相隔不远。后来,王尚荣也住进西山 7 号楼。

说说这时候的重庆。6 月下旬,重庆市委召开部、委以上党员负责干部会议,市委书记鲁大东在会上作检查。黄廉、周家瑜等人对鲁大东的检查很不满意,就是通不过,不得不休会一周。到了 7 月中旬,部长会扩大成了局长会。局长会开了没两天,鲁大东被赵紫阳叫到成都汇报工作,局长们吵吵闹闹乱成一团,会也开不下去了。7 月 22 日,黄廉、周家瑜提出要赵紫阳来重庆参加会议解决问题。他们把赵紫阳电话的声音在会议上“现场直播”,让全体与会人员都听到。

赵紫阳在电话中说目前来不了重庆,希望大家把会开好。黄廉马上接过话头在电话中说:“你来不了重庆,我们就到成都来开!”

当天傍晚,黄廉、周家瑜调来几部大客车,拉上参加会议的三位市委书记和部、局长等大约 150 人,连夜去了成都。

从重庆公交公司调集来的车队浩浩荡荡,把 150 位重庆的干部拉到了成都市中心的锦江大礼堂,可是没有在大礼堂继续开会。根据省委的招呼,省里的各个部门对口接待了重庆的部局级干部,黄廉、周家瑜、李木森、陈万明、袁金梁五位文革中的造反派被安排在锦江宾馆住

下来。

对黄廉和周家瑜等人的做法,重庆一些老造反派,比如军工“反到底”的李木森、“815”的陈万明、熊代富等人有看法,认为这样搞不符合中央“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下搞运动”的精神。现在黄廉、周家瑜要闹到成都,很可能造成赵紫阳对于重庆造反派的错误印象,于是李木森和陈万明决定要向赵紫阳当面汇报自己的想法,就一起跟着来了。而时任重庆革委会副主任,原“815”的老工人袁金梁,两头都想讨好,但是两头都避他。他也跟着来了。

7 月 26 日,赵紫阳、段君毅在省委三号楼接见重庆的黄廉、周家瑜、李木森、陈万明、袁金梁,再次明确表示不同意局长会在成都开,认为那必然会影响各个专县都把会拉到成都来开,哪能行呢?回重庆去开最好,可以叫成都军区值班飞机送大家回去。实在不行,在成都附近专县开也可以考虑。但黄廉、周家瑜二人仍然坚持要在成都开,并提出如果回重庆开,赵紫阳就必须立即去重庆。

第二天上午,赵紫阳和段君毅在省委三号楼再次接见五位群众代表。赵紫阳说,他昨晚没有睡着觉,想了一个晚上,想出一个新方案:在成都开部委会,局长们在省委接见后回重庆去开会。但黄廉、周家瑜仍然不同意。赵紫阳不高兴了,干脆摊牌说:“如果硬要逼我对大家来成都一事表态,我只能说是错误的。但最好还是回避这个问题吧。”

7 月 28 日发生唐山大地震。在接下来的 28 日、29 日和 30 日上午,赵紫阳分期分批接见了重庆各部、委、局这次到成都的干部。

30 日下午,赵紫阳准备分别接见重庆的五位群众代表,他大概从前两次接见中已经看出五人之间有不同意见,就让他的秘书安排分成两批,先通知黄廉、周家瑜和袁金梁去。但黄廉、周家瑜不愿意与袁金梁一起,大概是怕他回来后会把有些话讲给李木森他们听。于是赵紫阳只好先接见黄廉、周家瑜二人,然后第二天上午再接见李木森和陈万明、袁金梁三人。但是李木森和陈万明也不愿意让袁金梁一起参加接见,也怕他把有些话传到黄廉、周家瑜的耳朵里去。赵紫阳又不得不只接见李木森和陈万明两人。这样,最后老工人袁金梁面子最大,赵紫阳在 31 日下午单独接见他了。

赵紫阳在 7 月 31 号上午接见李木森和陈万明,秘书也没有在场。

他俩向赵紫阳汇报的主要是关于鲁大东的评价问题。他俩明确表示：鲁大东绝不是什么死不悔改的走资派，按照中央的标准，他最多只是个“犯走资派错误”的干部。可是黄廉、周家瑜从“批邓、反右”一开始，就咬定鲁大东是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在中央“打招呼会议”后，他们硬说鲁大东没有全面传达中央首长指示，批鲁打鲁达到高潮。李木森和陈万明二人还明确表示了对赵紫阳的不满：“黄廉、周家瑜还不是党员，你赵书记就指示重庆要让他们列席市委常委会，还要他们协助市委工作，他们当然更认为自己有了后台，打鲁大东打得更起劲了。他们用你赵书记来压鲁大东，这都是在你支持下形成的恶果！”

赵紫阳听着，也不生气，说：“你们看到最近《四川日报》登的黄廉、周家瑜的文章没有？他们两人资产阶级派性克服得很好，亲自带头大讲团结，这就很好嘛……”

没等赵紫阳说完，李木森和陈万明就叫起来：“这哪是讲什么团结嘛，这完全是个幌子，这是在为黄廉入党大造舆论，这篇文章在重庆登不出来，他们只好拿到成都，通过你赵书记批示，才在《四川日报》登出来了，写得好像黄廉已经是个共产党员了。难道这一点你赵书记还看不出来吗？要说这就是讲团结，他们怎么不和我们这些群众代表讲团结？就他们两个人团结？”

李木森和陈万明二人不说则已，说起来就一泻千里，从他们与黄廉、周家瑜的矛盾，说到文革中重庆两派的矛盾，与军队的矛盾，各派内部的矛盾……赵紫阳听着，也不反驳，这么复杂的关系，或许他已经被搞糊涂了，只是说：“我刚刚到四川来，对情况不了解……”

此时的成都被唐山大地震闹得人心惶惶，常常半夜里有人叫一声“地震了！”立即全城惊慌，听说132厂就有人听到风就是雨，跳楼摔断了腿……重庆来的100多人也无心久留，赶快回去了，可会还没有开完啊，得继续。这次重庆历史上史无前例的“马拉松”部、局干部大会，从6月开始，从重庆开到成都又开回重庆，到8月13日才算正式结束。最后黄廉、周家瑜作了个联合发言，号召干部们起来“反潮流”。

8月15日下午，熊向晖得到叶剑英通知，到西山他那里见面。

地震之后，北京家家户户都搭起防震棚。叶剑英那里也没有例外，院子里一东一西搭了两个帐篷，叶剑英在东边那个帐篷里办公会

客。他对熊向晖说:“你对华国锋看得对。”他举了7月1日中央关于毛泽东病情通知的例子后说:“我经过观察了解,这个同志确实好,应该支持。我已经告诉王震了。”

叶剑英跟熊向晖详细讲了他和华国锋见面经过和他们谈话的内容,觉得华国锋说话做事很得体。他对熊向晖说:毛主席一下子把华国锋提为中央第一副主席,这是“非常之时,非常之人”,“还是毛主席巨眼识英雄啊”!

当天晚上,叶剑英留熊向晖在他家院中西边那顶帐篷里共进晚餐,还喝了茅台。

8月16日晚上22时06分,四川松潘至平武一带发生7.2级地震,成都和甘肃武都均有强烈震感。由于地震部门吸取了唐山地震的教训,对此次地震做出了提前预报,中共四川省委又在事前采取了防震措施,因而损失很小。

# 第1400回：山西省，书记王谦戴高帽 到天津，江青三下小靳庄

8月23日下午，山西省委第一书记王谦在太原被戴高帽游街批斗。

此事还要从1976年年初说起，当时北京、上海、天津煤炭告急。4月24日，国务院副总理纪登奎直接给大同市委书记赵力之打电话，要求大同保证煤炭运输，特别是京、津、沪的用煤。他说：

“老赵你要千方百计地想尽一切办法，把大同的煤炭运出来，无论如何要保证京、津、沪的用煤，假如国庆节总理举行招待会，电灯突然灭了，怎么办？这是关系到国际影响的大事啊！”

当晚，大同市委在大同铁路分局召开常委扩大会议，吸收分局党委常委、革委会副主任参加，传达纪登奎电话指示精神，研究贯彻执行措施。会后，分局党委常委、革委会副主任除留一人在局机关主持日常工作外，其余分三个组带领机关工作人员下到口泉站、大同站、机务段蹲点，认真耐心地做两派的政治思想工作，说服他们顾全大局，团结合作搞好煤炭外运，保证京、津、沪的需要。同时特别注重了恢复铁路运输的正常管理秩序和规章制度的执行。

经过整顿，大同铁路分局运输秩序有了明显好转，运量有了显著提高。担负外运主要任务的口泉站，平均日装车由4月份的759车，提高到6月份886车。为此，铁道部向大同市授旗予以表彰，铁道部长万里向大同市委表示感谢，省委要市委汇报，大同市委作了总结。之后，省委把大同市委的做法报告了中央。中央肯定了大同解决问题的做法，并于6月26日下发中央(1976)12号文件，转发了中共山西省委《关于大同铁路分局的情况报告》。

1976年7月中旬，王谦来到大同，主持召开学习贯彻中央12号文件精神的大会。大会以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精神为指导，经过49天的学习讨论，于8月21日结束，形成了会议纪要。

8 月 23 日,太原铁路局革委会在太原铁路局俱乐部召开抓革命促生产誓师大会,贯彻大同会议精神,并邀请省委第一书记王谦和市委第一书记黄志刚、副书记马杰等领导参会。

大会尚未开始,一群工人却将准备前去开会的太原铁路局党委书记谢治国等领导在机关拦截住,并拉上早已准备好的大卡车,戴上高帽子,挂上铁牌子,开始游街批斗。

为什么会出现如此情形呢?原来文革开始后,太原铁路分局也出现了两派群众组织。一派是“太铁红旗造反兵团”,简称“太铁红旗”;一派为“红色铁路造反总指挥部”,简称“红铁总”。“太铁红旗”最早是参加“红联站”,1967 年“七月会议”后加入了“山西革命造反兵团”,而“红铁总”则加入了“红总站”。

1968 年 9 月,太原铁路分局在 69 军派驻军管会首长的带领下,实现了两派大联合,成立了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军管会的部队首长任革委会主任,“太铁红旗”的政委、原太铁分局南机务段工会副主席张安邦和“红铁总”的头头、原太铁分局的一位列车长周万喜,他们二人作为两派的代表人物,都是副主任。

1973 年 3 月,“太铁红旗”的副政委、原太铁分局工会的宣传指导员王弼现,因为说说写写都行,在调入太原铁路局工作后,又被省委任命为太原铁路局革委会副主任,而原太原铁路分局革委会副主任、“太铁红旗”的政委张安邦则被任命为太原铁路分局党委副书记、革委会主任。另一位太原铁路分局革委会副主任、“红铁总”的周万喜呢,此时却在监狱里蹲着。原因是武斗期间,“红铁总”打死了“太铁红旗”一名通讯工段的工人宋锦。直接凶手被判死刑,周万喜作为“红铁总”的领导,负有领导责任,被判处 5 年徒刑,直到 1974 年,谢振华被批判,此案才被作为谢振华制造的冤假错案,于 1974 年的 8 月平反,周万喜提前出狱。但被分配做工人工作。

1975 年 3 月 5 日,中共中央下发《中共中央关于加强铁路工作的决定》,其中第四条规定:“对于少数派性严重,经过批评和教育仍不改正的干部和头头,应及时调离,不应久拖不决,妨碍大局。”在太原铁路局的整顿中,王弼现和张安邦被作为谢振华安排的干部被调离。而平反出狱的周万喜呢,则要求重新分配工作,认为被安排工人是错误的,

是谢振华路线对他的迫害。

1976年春,王弼现与张安邦等几位被调离的太原铁路路局和分局的干部去北京上访,经铁道部万里部长过问,又经铁道部和山西省委沟通,两家达成共识,让他们回来继续担任原职务。于是,王弼现和张安邦分别以太原铁路局党委常委、革委会副主任和太原铁路分局的党委副书记、革委会主任的身份参加了大同会议。而在大同会议快结束时,山西省委和太原市委、太原铁跌局党委又达成共识,让周万喜官复原职,重新担任太原铁路分局的革委会副主任。

太原铁路局政治部干事张金高、太原铁路局保卫科代理副科长种志远、太原铁路局公安处办公室副主任程子和、太原铁路局工程处技术员陈岳秋等人闻讯后,立即组织人马,决定阻止对周万喜的任命。当他们得知8月23日,太原铁路局党委准备在太铁俱乐部召开大会的消息后,张金高等人也决定,在大会开始前,揪斗局党委书记谢治国等局级领导,以阻止对周万喜的任命。

于是就有了大会前,太原铁路分局党委书记谢治国等人在机关被强行堵住,并被拉上卡车游斗一幕。

当王弼现和张安邦等其他领导来到俱乐部大会现场时,见坐在俱乐部贵宾室的只有省委书记王谦一位领导。原来,市委第一书记黄志刚在路上听到会场有变,小车掉头而去。副书记马杰的车被拦下,人被截走。王弼现和张安邦等太原铁路局、分局领导纷纷请王谦赶紧离开,以免意外。王谦却安坐不动,并指示王弼现等人坐上他的小车,阻止游斗谢治国等领导的行为。王弼现等人便钻进王谦的专车,去追赶游斗谢治国等领导干部的队伍。虽然他们追上了游斗谢治国的队伍。但不仅没有拦住队伍,下车劝说的王弼现反而被现场的工人骂为叛徒并遭到了殴打。当这些工人得知王谦在会场贵宾室的消息后,张金高、种志远、程子和、陈岳秋一干主要组织者紧急商议,陈岳秋提出要揪斗王谦。虽有不同意见,但陈岳秋却坚持干下去。他带人返回太铁俱乐部,将王谦绑架到一辆早已备好的邮政闷子车内,等车开出了太铁俱乐部,又将王谦架到了一辆大卡车上,开始沿街游斗。

在游斗省委、市委和太原铁路局、太原铁路分局主要领导人的过程中,一些工人还对王谦、谢治国等领导进行殴打,致使他们多处

受伤。

游斗结束后,省委办公厅立即将王谦送到晋祠 264 医院检查休养。

山西太原“823”揪斗省委书记事件震动中央,华国锋和陈永贵等人商量,准备抓几个人。华国锋在政治局会议上提出这个想法,姚文元不以为然地说:“这是群众运动嘛!”陈永贵大怒道:“群众运动?人都要打死了,什么群众运动?你去试试看,南京不过就贴了你们几张大字报,你们就受不了啦!”

华国锋见陈永贵火气太大,赶紧叫纪登奎把他拉了出去,随后宣布散会。

8 月 26 日,中共中央给山西省委电话通知,称之为中共中央的“八·二六”指示紧急下达:

山西省委:

据了解,8 月 23 日下午,太原铁路局召开贯彻中央(1976)12、13 号文件,学习大同经验汇报会议的时候,陈岳秋等个别坏人蒙蔽和煽动少数人,挑起了一次有组织、有计划的打、砸、抢事件,绑架、打伤省委第一书记王谦和太原铁路局党委书记谢治国,常委、革委会副主任王弼现等同志,破坏中央(1976)12、13 号文件的贯彻执行。中央要求你们立即严肃处理这一事件。

一、省委贯彻(1976)12 号文件,解决太原铁路局的问题是正确的,必须继续认真把这项工作做好。

二、任何人不准冲击铁路,对反革命、对打砸抢者必须实行镇压。对陈岳秋、梁永智等几个打人凶手,要立即逮捕法办。被揪走的太原市副书记马杰同志,要责令他们立即送回。任何人不准以任何借口非法抓人、扣人。

三、省委要继续领导广大干部和群众,认真学习毛主席的一系列重要指示,以阶级斗争为纲,集中火力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在这个总目标下,把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和群众团结起来,抓革命,促生产,发展大好形势。

四、各级领导干部要坚守工作岗位,站在运动的前列,带头学习,带头揭发,带头批判。有错误的同志,要同广大干部和群众一起学习,

一起批邓,转好弯子。对于犯错误的同志,要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要充许犯错误,充许改正错误,有错误就改,改了就好,不能揪住不放。

五、任何人不准串连,不准拉山头,不准搞战斗队,不准冲击、占据党政领导机关。现在占据省委机关的人,要立即退出,回到本单位抓革命,促生产。

中共中央

1976 年 8 月 26 日

(根据录音整理)

山西省委遂于 8 月 27 日上午,举行广播大会,贯彻中央指示,并责成公安机关,逮捕了这一事件的一批策划者、指挥者和打人凶手。而王弼现、张安邦又被作为 8 月 23 日事件的幕后策划者逮捕,并于 1978 年 12 月 27 日,王弼现被判无期徒刑,张安邦被判有期徒刑 20 年。其余张金高、种志远、程子和、陈岳秋等 22 人,分别给予了判刑和免于刑事处分。其中,张金高、种志远二人被判无期徒刑,程子和与陈岳秋二人被判有期徒刑 20 年。

王谦认定这一次揪斗他的恶性事件,必然是原“红联站”头头段立生、原“兵团”司令刘灏、副司令宋杰等人一手操纵和一手指挥的,于是以肃清“谢振华流毒”为名,给“段、刘、宋”设立专案组隔离审查。

许多慰问电飞向王谦。

“戴钢盔高帽重不重?”陈永贵笑着问王谦。

王谦笑道:“重倒是重,可重还问题不大,主要是扣得不行。”

“为什么不把这些东西搜集上来,摆了展览?”陈永贵说,“这些家伙给我们革命干部准备的刑法就是这些嘛。这可以教育我们的后代,是一件好的教育,反面教育吧。”

8 月 28 日凌晨 2 时 37 分,江青乘专列来到天津。因为是在发生地震之后,天津市区内有许多房屋倒塌,江青没有下车,就住在专列上。早饭后,她乘车去看看市内几条街道的震后情况。

路上,她将解学恭叫到她的车上,对解学恭说,要见见天津驻军,说她 1974 年 6 月第一次来津时,看望天津驻军指战员,天津驻军曾因此受到邓小平的批评,现在要为他们恢复名誉。她让解学恭转告 66

军军长刘政,把她1974年6月写给他的那个“66军战斗队”的顺口溜给抄来,并要给她拿套军装,说来时急,忘记带了。她还说警备区的部队也要去看看。

解学恭说,还有来津支援抗震救灾的67军,建议也去看看。

江青同意。

汽车行至津塘公路和京山铁路交叉口附近停车,解学恭下了江青坐的车。

随后,江青的专列又开往宝坻,她要去小靳庄看看。下午14时,专列抵达宝坻。这里受地震破坏也相当严重,断垣残壁随处可见,有的路段因房屋倒塌行走都受到影响。

下午16时许,江青来到小靳庄。她先到各处看了看,接着走进受灾群众住的地震棚里坐下,了解了一些情况。她看见一个青年女社员在临建棚里流眼泪,一问才知是激动的泪水。

社员们走上前来,纷纷表达对首长的思念之情,并且盼望首长能多来小靳庄。江青说:“我也想你们。我来一次不容易,主席不批准,我是来不了的,我有我的难处。”

她对社员们说:“可到家啦!”“整天看文件,把我憋坏了”,“到你们这里才幸福”。

江青照例要干些农活,她和社员及到这里抗震救灾的人员一起,参加了搬砖瓦等拆除危险房屋的劳动。因为那次去小靳庄没有带摄影记者,随行的中央警卫局副局长邬吉成就用自己随身带着的照相机,拍了一些当时江青活动的情景。

随后,江青来到小靳庄附近一支抗震救灾部队的驻地,高声说:“我还没有吃饭呐,我饿了,我还要吃药。”

她走进战士住的帐篷,让解学恭解散了围观的社员,然后吃了社员送来的玉米面饼和稀饭,在帐篷里睡了一个小时的觉。

江青睡好了,就在小靳庄召开座谈会。

小靳庄政治夜校前的场院里灯火通明,人们早已汇集在这里,除了小靳庄的代表,还有司家庄和窦家桥两个生产大队的代表,他们都摩拳擦掌跃跃欲试并且翘首以待。

首先发言的是小靳庄的党支部副书记兼民兵连连长王杜。王杜

他们去年年底就曾派人到北大、清华,从迟群、谢静宜那里了解批邓的精神,小靳庄的大批判也就由批孔转入批邓。就在昨天,迟群和谢静宜还来过小靳庄,送来了邓小平的“三株大毒草”。

小靳庄汇报完了,窦家桥的党支部副书记司福玉接着汇报。江青听说司福玉是知识青年侯隽的丈夫,就要他上前边来,让她看看。司福玉以饱满的革命激情汇报说:“窦家桥以小靳庄为榜样,坚决同邓小平对着干。”

江青评点说:“小靳庄受气了,名声太大,树大招风。”

司福玉继续汇报批邓,但没说几句,又被江青打断了。她说:“主席很宽大,邓小平犯了那么大的罪,主席却对他宽大得不得了。”她说邓小平还一直拿着国家最高的薪水,“享受超出资产阶级法权”,“他是个大家庭,有二十几口人,住最好的房子。他和孩子在一起,天天见面”。最后,她反问道:“你说主席宽大不宽大?”

解学恭在一旁应和:“留个反面教员嘛。”

窦家桥汇报完了,与知青邢燕子同村的司家庄党支部副书记焦清芝接着汇报。邢燕子介绍说:“焦清芝22岁,属马。”

江青很高兴地说:“我属虎,能吃你们。”

江青除了批邓,还讲女权。小靳庄的一位下乡女知青被选来专讲男女同工同酬的问题。

一直到晚上22时,江青他们才从小靳庄返回天津。

29日,江青到天津手表厂、第一炼钢厂参观,并在火车上接见了几位在津唐一带抗震救灾的部队领导。

当晚23时许,解学恭刚服安眠药睡下,突然来电话,江青让他马上到专列去。江青一见到解学恭,就十分严厉地说:“你见到了这个方案吗?”说着,她把一份天津驻军打印的“接见单位名单”甩给解学恭。原来江青安排次日要到部队去,驻军印了一份“接见单位名单”,直接送给了江青。江青板着脸说:“为什么称‘接见’?这是谁的主意?我是探望部队,不是接见,这是两个性质不同的问题,为什么混淆起来!”

她还说:“只有中央政治局在北京才是接见,我个人怎么叫接见呢!”

她越说越气愤,解学恭不知所措。江青最后说:“明天我不去部

队了。”

这时解学恭有点着急,部队已准备了两天,现在改变计划对部队怎么解释呢?解学恭想,或许自己承担了责任,事情还有挽回的可能,于是说“接见”这个词是他建议的,部队没有责任,部队准备了两天,不去恐怕不好,还是去探望一下。江青听到解学恭承担了责任,才说:“可以去。”江青讲话时解学恭简要记了一下,江青把解学恭的记录稿拿过去看后说:“大体还可以,有两个地方需要加一下。”

解学恭以为她要亲自改,但是江青是让解学恭自己用笔在上面加上她的话。最后对解学恭说:“请你把今晚的谈话给我整理成一个记录,并起草一个电话稿,报告华国锋同志。”

回来后,解学恭按江青的意见办了,把整理和起草好的记录稿、电话稿送给她看,她批了“同意”,并让解学恭抄清一份给她。

# 第1401回：见李敏，毛泽东依依不舍到大寨，江青连夜回北京

1976年8月30日下午，江青去天津毛条厂看望那里的支援天津抗震救灾的某军和警备区连队，当晚返京。

30日下午，解学恭起草的电话稿报到了华国锋处。

解学恭记的“江青同志谈关于探望参加天津抗震救灾人民解放军连队”的记录稿是：

（一）探望和接见是两个不同性质的原则问题，决不能混为一谈。军里的报告提出了接见方案，提醒了我。（注：‘接见’——这一建议是我向江青同志提出的，军里没有责任，责任在我——解注）探望也要按下列要求办：第一，首先是探望参加抗震救灾的基层单位——连队；第二，陪同探望的领导干部，也是参加抗震救灾的，军级干部不能多了，有一、二位就可以了，也是参加或指挥抗震救灾的；第三，中央决定在北京召开的唐山、丰南、天津市、北京市抗震救灾先进集体和模范个人代表会，届时中央要接见代表。这是接见。我到小靳庄探望贫下中农，同时也看望了在小靳庄参加抗震救灾的师指战员同志，在那里吃了社员王锡恩同志家的饭，其中也有九连战士的饭菜。这是探望，也不是接见。

（二）请转告在天津参加活动的新华社记者、光明日报记者、天津日报记者，请他们不要帮倒忙。一般不要用《内参清样》报道我的活动情况；如果要搞点内参报道，也要恰如其分，不要胡乱吹捧，言过其实。最好不搞。

解学恭整理于8月29日晚12时许。

解学恭起草的给华国锋的电话稿：

江青同志于8月28日到了天津市宝坻县小靳庄大队，看望了小靳庄的贫下中农同志，邢燕子同志所在的大队和侯隽同志所在的大队也派来了贫下中农代表和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代表。同时也探望了在

小靳庄参加抗震救灾的九连的指战员;在小靳庄吃了社员王锡恩同志家的饭,其中也有九连战士吃的饭菜。江青同志在9月29日又看望了在批林批孔推动下已经全面恢复了生产的天津手表厂、第一炼钢厂的工人同志。我建议江青同志接见一下在天津参加抗震救灾的66军、67军、天津警备区各一个连队和部分先进代表。江青同志告诉我,不是接见,是探望,不要把两个问题混淆了。中央决定接见抗震先进集体和模范个人代表,这是接见。根据江青同志的意见,在29日晚纠正了我的建议和安排,决定只探望三个军的三个连队,都是参加抗震救灾的。我认为江青同志这个意见是正确的,我的安排已经纠正了,特向你报告。

解学恭8月30日上午。

在毛泽东病情稍稍稳定的日子里,他又恢复了从前惯有的读书习惯,不满足工作人员为他读报,而是坚持用已经恢复视力的左眼,阅读那些线装书和大字《参考消息》。在唐山大地震发生后,毛泽东除不断关心灾区人民抗震自救的信息外,有时也在护士搀扶下,来到病房门外散步,只是他双腿仍然软弱无力。不过因有胃管不断输入营养,毛泽东的精神尚好。8月中旬,遥测心电仪又一次显现出心脏跳动不规律的迹象。而且在这期间,毛泽东的情绪变得烦躁起来,右侧肢体的偏瘫症状也变得明显加重,毛泽东只有在左侧偏卧才能保证呼吸畅通。这时,医疗小组重新调整了医疗方案,相机投入一些控制心脏早搏的药物。

鉴于毛泽东的病情,经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同意,8月28日上午,中央警卫局派车把毛泽东与贺子珍的女儿李敏接过来看望父亲。8341部队中队长陈长江在门口迎接她。李敏下车,见着陈长江便说:“陈叔叔,你好。”

其实,陈长江只比她大几岁,且她已做了妈妈,但她还是像年轻时一样称他叔叔。

“你胖了。”陈长江也打着招呼说,“身体好吗?”

“还好。”她笑着说,“好久没见了,你还是这样。”

“我也老了。”说到“老”字,陈长江又想起毛泽东的“老”,难过得再也说不下去。

当他把李敏送进毛泽东的卧室时,毛泽东正处在半昏迷状态。当张玉凤告诉他李敏来看他时,毛泽东居然醒了,使劲地微微睁开了眼,想看清站在床前的女儿,嘴巴张了几张。在场的陈长江等人听不清他说什么。张玉凤推断说:“主席在问,李敏:今年多大岁数了?”随后,毛泽东握住李敏的手,闭目不语。

过了许久。李敏以为父亲睡着了,将手慢慢抽出,谁知她的手被父亲紧紧地攥住,不肯放开。他再次睁开了双眼,但已饱含了泪水,望着女儿,用含混不清的发音慢慢地与李敏说话。陈长江明白自己应离开,便退了出来。

“姣姣(李敏的小名),你怎么不来看我?”毛泽东问。

李敏说不出话来,因为自她搬出中南海后,再要进到中南海,要经过层层批准,毛泽东哪知道这些呢? 他顿了顿,休息了片刻,又深情地说:“姣姣,你要常来看我,我想你啊!”

“嗯。”李敏流着眼泪点点头。

“你今年多大了?”毛泽东问。

“39 了。”

“不,你 38。”这句话,表明毛泽东的记忆是很清楚的。

不过,这一句话,似乎勾起了毛泽东对贺子珍的思念。他叹了一口气,想说什么,喉咙里发出混浊的声音。李敏听不清,只看见父亲用右手的拇指和食指连成一个圆圈。

生怕会加重毛泽东的病情,李敏不敢久留,含泪走出毛泽东的卧室。她在父亲的身边呆了一个多小时,然后,满含泪水地上车走了。她一直不明白毛泽东那手势是什么意思:会不会是要她向贺子珍问好? 因为贺子珍的原名叫“桂圆”。

8 月 30 日,江青头扎白毛巾,像陕北农民一样,出现在济南部队某团“登城首功第一连”。

9 月 2 日,江青给毛泽东写报告,说是要去大寨。起初,毛泽东没有同意。江青第二次报告,毛泽东同意。

9 月 3 日,江青到了山西昔阳县大寨,她兴致勃勃地提出,要看她上次带来让大寨人种的油莎豆长得怎样了。一听她这个要求,陪同她的大寨人顿生忐忑。因为油莎豆生长的合适地温在 30 摄氏度以上,

而大寨的地温天气热的时候也就20多摄氏度,大寨人为此耗了不少心力,但自然规律不可违,油莎豆长得高一丛矮一丛的。

果然,见油莎豆如此长势,江青的脸一下子就拉长了:“你们怎么搞的?啊!我的希望变成泡影啦!我送给你们这么好的种子,你们却种成了这个样子……”

幸亏负责种植油莎豆的大寨大队科研组长高玉良确实对油莎豆的种植狠费了一番心思,把这种子不适合大寨生长,大寨人为此进行了怎样的实验和努力条分缕析得头头是道,江青也就不说什么了。

继而,江青又提出要去看她上次来时带人挖的防空壕。但是这条防空壕已经填了。郭凤莲只好对江青实话实说。这下子江青气又上来了,说:“你们知道我是干什么来了吗?我是同修正主义斗争来了!你们毁我的战壕,也不向我打一个招呼……”

江青召集陈永贵、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公社、大队的干部,以及随同她的工作人员,一起学习中央1976年4号文件,即《关于华国锋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的决议》和《关于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议》。她在讲话时说:“你知道我这次来是干什么来了,我是和邓小平斗来了!……有人要想打倒我江青,要把材料送给毛主席。结果材料落到我们手里,他们的目的没有得逞。所以,我江青还活着!”

她在讲话时,将邓小平出国时带子女到机场给自己送行作为一条罪状提出,并让随行的中央警卫局副局长邬吉成作证。邬吉成如实说:“我没看见邓小平带子女到飞机场送行,但看到有资料说,邓小平出访法国归来时,他的子女曾到机场迎接。”

江青又说起了“母系社会”:“母系社会就是女人掌权。到了共产主义社会还有女皇,也要女人掌权!”

她还几次向大寨的社员、干部发问:“是随父姓还是随母姓?”

当她得到的回答都是随父姓时,很不以为然地说:“你们为什么姓了父亲的姓而不姓母亲的姓呢?以后一定要改过来。”

就在江青离开北京的当天,9月2日傍晚,毛泽东出现第三次心肌梗塞!这次要比前两次严重,面积也有所扩大。与此同时,毛泽东一度好转的全身性症状也在不同程度加重,例如呼吸急促、咳嗽多痰,尿

液也再次从正常水平降至每24小时不足300毫升。X光片显示,毛泽东的两肺再次发生感染。中央负责人闻讯后,纷纷赶到中南海202住地。中央政治局设立值班制度,常委两人一班,毛泽东身边昼夜保持都有人,其中,王洪文、汪东兴一班,张春桥和华国锋一班。众人轮流在毛泽东住地值班。

此时,毛泽东的身体已近衰竭状态。尽管如此,他的神智还是清醒的。这次心肌梗塞发生之后,他要求在9月中旬离开北京,希望回到阔别多年的故乡韶山滴水洞。但是,病情的发展已不允许他再次远行了。9月5日晚上21时30分,毛泽东突然丧失神志。值班的常委经过研究后,决定打电话给江青,告诉她毛泽东病危,请她火速返回北京。

汪东兴在电话中告诉负责江青大寨之行的邬吉成:"主席的病情很不好。"要江青马上返回北京。

关于回京的路线,汪东兴说:"你们返回北京有两个方案可供选择,一是你们乘火车到太原,我派飞机到太原接你们;一是你们乘火车到石家庄,我派飞机到石家庄等你们,你看哪个合适?"

邬吉成短暂地思考了一下说:"我看还是按后一个方案比较好。去太原的时间太长,路也不顺。到石家庄换飞机对安全有利,又节约时间。"

汪东兴同意邬吉成的意见。

放下电话,邬吉成立即将汪东兴来电话的事报告了江青。没过多久,江青的秘书刘玉庭,也接到了通知江青尽快返京的电话。

江青在听了电话传来的消息后,显得异常镇定,没有流露一丝不安的神情。随行而来的许多人员,包括陪同江青到大寨的陈永贵,在得知北京来电话催促江青马上返京后,都猜想这一定与毛主席的病情恶化有关,心情顿时紧张和沉痛起来,做好了立即动身的准备。

当晚23时,江青从山西阳泉上火车,于次日凌晨1时左右抵达石家庄。

在石家庄火车站,河北省革命委员会的负责人刘子厚、吕玉兰等,已经在那里迎接。他们陪江青坐上轿车,直奔飞机场,一架专机已在那里等候。

上了专机,飞行20多分钟,赶到北京。江青直奔中南海,赶到202住地时,毛泽东正在睡觉。江青要给毛泽东擦拭后背,涂爽身粉,并给毛泽东活动四肢。医护人员说不用,她不听。亲自为毛泽东做完这些,她才回到临时住处休息。

江青这次回来就住在了中南海内的代号201的家中,没有再回钓鱼台10号楼。

9月7日,毛泽东的病情进一步恶化。下午,除常来的几位常委外,叶剑英、李先念、陈锡联、吴德、吴桂贤等人也赶来了。没过多久,国务院副总理陈永贵也风尘仆仆地赶来。他布衣布裤,光着头,肩上搭着一块毛巾。陈长江迎接他进屋后,他只是简单地洗了把脸。陈长江问他道:“要不要吃点东西,点心什么的?”

他摇了摇头,痛苦地说:“我什么也不要,给我弄两包烟就行了。”

接着,他低头不语,边听汪东兴等人介绍毛泽东的病情,边一根接一根地抽着烟,烟瘾比往常出奇地大,抽得眼前满是烟雾。

随后,中央领导齐集在202南大厅开会,中心议题是准备安排毛泽东的后事。

9月8日1时10分,毛泽东看文件15分30秒……

凌晨,江青来到202住地。她要给毛泽东翻一下身。这时,医护人员提醒她说:“主席不宜右侧翻身。”可是江青不听,医护人员只好把毛泽东翻到右侧。果然,翻身后,毛泽东脸色变发青,呼吸也一度停止。守候在旁的医护人员立即进行抢救,毛泽东的呼吸才又告正常。

这天上午,毛泽东从休克中醒来,嘴里忽然发出微弱的声音。工作人员按照以往的习惯,连忙抓起笔和纸放到他的手中。只见毛泽东艰难地移动着铅笔,费了很大的劲,慢慢地划出了3道似乎在颤抖的线,就再也没有力气了。

看到工作人员并没有理解其中的含义,毛泽东非常焦急。过了好一会儿,他的手又可以慢慢抬起了,缓缓地,在木床上敲了3下。工作人员这才反应过来,试探地问到:“主席,您是不是要看有关三木的消息?”

毛泽东当即点了点头。

三木时任日本自由党总裁、内阁总理大臣,正在参加日本国内的

大选。

当工作人员给他读了大内参上有关三木和日本大选的消息,毛泽东满意地点点头,这才平静地闭目休息一会儿。

下午13时18分,毛泽东再次看文件12分钟。

16时37分,又看文件30分……

紧张的生命抢救与宁静的工作、读书展现出一幅伟人弥留前的感人画面。毛泽东的上下肢插着静脉输液导管,胸部安着心电监护导线,鼻子里插着鼻饲管,文件和书由别人用手托着。就在这种状况下,他在8日这天,坚持看书、看文件11次,时间共达2小时50分钟。每一次都是在工作人员的帮助下看了不长的时间,就又昏迷了。

9月8日下午16时37分,毛泽东在心律失常的情况下,仍然坚持看文件长达30分钟。

9月8日下午18时多,江青来到北京新华印刷厂,请工人们吃文冠果。这种壁厚的果子并不可口,江青说:“你们知道吗?文冠果的另一个名字叫文官果,象征着‘文官夺权’!”

当天下午18时至19时,毛泽东的血压开始下降,医生采取各种措施进行抢救。

# 第1402回：九月九，一代巨星陨东方 保遗体，政治局紧急会议

9月8日傍晚，202住地一片沉寂，毛泽东的病情在入夜之后忽然变得沉重起来。正在人民大会堂为西萨摩亚国家元首马列托亚·塔努马菲利第二殿下举行答谢宴会的华国锋得到消息后，立即让中央办公厅通知所有在京的中央政治局委员马上到202住地，同时通知在外地的政治局委员到京。华国锋在宴会上匆匆讲完话，没等宴会结束，便向外宾告别，迅速赶回中南海“202”。

在202住地那宽敞的临时病房内外，随着夜色的渐深，气氛也变得紧张起来。在毛泽东的病房内外齐聚着中央政治局的领导。尽管202住地内外人员众多，但却是静悄悄的，医护人员也一直在紧张忙碌着。毛泽东病房外的遥测心电仪上，仍然显现出毛泽东心脏跳动的曲线。所有的眼睛都紧紧盯着那条时起时伏的曲线。

晚19时，护士孟锦云来接班。这时江青也来了。

毛泽东要来日本三木武夫的电报，其中涉及中国内地与日本进行通联的商议。19时10分，他拿着这份电报，忽然感到心脏不适，呼吸急促起来，小孟过来，低头给他按摩胸部，毛泽东用很低的声音说：“我很难受，叫医生来。”

医生赶紧把氧气的管子放在他的鼻子处。他用手去拽，肯定是不舒服，过了几分钟呼吸开始平静起来，这时，医生看见主席的鼻孔里有一点嘎巴儿，就把输氧管先拿下来，用棉花签给他弄出来之后，又给他戴上输氧器时，他就一点反应也没有了，从此便陷入了昏迷之中。从傍晚19时起，一直到午夜零点，医护人员始终在紧张地对毛泽东进行抢救。用药、注射、导尿、量血压和输氧，一切都在紧张有序中进行。毛泽东已经陷入深度昏迷，他再也没有睁开眼睛。守在病房外的政治局委员和工作人员，都在静静观察着遥测心电仪上那条不停波动的曲线。忽然，曲线终于变成了一条骇人的直线，这时，时钟指向了9月9

日零时10分!

张玉凤奔出毛泽东卧室,疾步走向毛泽东书房,向守候在那里的华国锋、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汪东兴报告噩耗。

住处不过一箭之遥的江青,迅速得到报告,马上奔了过来。她头发散乱,神色慌张,进门便扑在毛泽东遗体上一面痛哭,一面呼喊:“医生呵!你们快救救主席呵!你们为什么不救救他呀!”

她嗓子都哭哑了,仍不肯离去。其悲痛之状,催人泪下。

在京的政治局委员们再次走进毛泽东的卧室,围站在毛泽东的遗体前,低头、默哀。

毛远新站在毛泽东遗体前

他们决定立刻召开政治局会议,商讨毛主席后事及相关事务。在京的政治局委员很快赶到。但是外地的政治局委员如许世友身在广东,坐飞机也需要一段时间才能赶到北京,因此政治局会议一拖再拖,等到凌晨2时许,只好由在京的委员先行召开了。

华国锋主持会议,紧急磋商3个问题:(1)毛泽东的后事;(2)毛泽东遗体如何处理;(3)是否邀请外国代表团来京吊唁。

这时,江青在会上又大哭起来,她说:“毛主席是被邓小平气死的”,她又说:“今天的会议忽略一件头等大事,就是要继续批邓!这是主席临终前一再叮嘱的大事!”

姚文元表示赞同。

华国锋显然感到为难,只得说:“对邓小平,当然还要继续批判,但目前需要马上研究的是主席的治丧问题……”

江青一听,极为不满:“对邓小平不能手软!我建议,政治局应该立即通过一个决议,开除邓小平的党籍,以绝后患!”

这下子使华国锋更加为难,因为毛泽东生前说过,“对邓小平保留党籍,以观后效”,怎么可以违反毛泽东的指示呢?可是,此时他又不便拿毛泽东的指示与江青顶撞……

毕竟叶剑英年长,富有经验,说道:“江青同志,请你放冷静一些,好不好?毛主席走了,我们都很悲痛。毛主席的丧事是国丧,一定要安排好。现在我们要办的事情很多,但是第一位是治丧。毛主席不在

了,我们处在最困难最严峻的时刻,在这种时候,最要紧的是要加强团结,要团结在以华国锋为首的党中央周围!”

江青说:“国锋同志是主席选定的第一副主席,我们当然要以他为中心,我可以号召政治局的每一个同志,要紧紧团结在以华国锋为首的党中央周围。”

这时,汪东兴已打电话给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局长周启才:“毛主席今天凌晨逝世,现在政治局正等着讨论讣告和悼词文稿,你赶快去。”

周启才急步走向“202”的会议厅,进门前,擦去眼角的泪水,定了定神,轻轻迈进会议厅大门,厅内灯光暗淡,一片沉寂。他走到华国锋面前,把密封的文稿放在他座位的茶几上。

华国锋拿起茶几上的两份文稿说:“现在继续开会,讨论中央预先准备的讣告和悼词文稿,今天主要讨论讣告文稿,会上要定下来,下午要对国内外广播,时间很紧。悼词文稿也过一遍,不讨论,会后印发给大家,另择时间开会商定。”

会议一致通过了《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决定9月9日下午16时对国内外广播。

如何处置遗体?毛泽东是一个时代的象征,在人民群众心目中享有如此崇高威望,有人提出,应学习苏联的做法,像保存列宁遗体一样,永久地保留遗体,让子孙后代都能瞻仰,以学习他的精神。但是,根据毛泽东的倡导,中央也早有决定,遗体实行火化为好,这又是毛泽东本人的亲笔指示。一时间,华国锋很难决断。好几个小时过去,还是没有结果。

这时,医疗小组的专家着急了,进来请示说说:“天气这么热,再等下去不得了……”最后,华国锋和叶剑英商议后,提出分两步走:先对遗体实施防腐处理,进行发丧、吊唁;然后再征求有关方面的意见,决定是火化还是遗体保存。

这个决定定下来时,天都快亮了。汪东兴从会议室出来后,匆匆地来到警卫值班室,打电话给卫生部部长刘湘屏,找专家研究遗体防腐处理工作。

因为时间紧迫,汪东兴说话很急,而毛泽东病危是高度机密,刘湘屏对毛泽东逝世毫无思想准备,对汪东兴讲的话,怎么也没听明白,不

得不反反复复地问了好几次。当她得知是毛泽东的逝世的消息,整个脑子都木了……放下电话后,她立刻赶到中国医学科学院,落实中央交给的任务。

刘湘屏来到中国医学科学院,同院党委书记杨纯商量后,决定派医科院基础医学组的党支部书记、形态学教研室第一副主任徐静,去执行这项特殊的任务。

徐静,1931 年出生于吉林市人。大学所学专业为组织胚胎学,1956 年赴苏留学。在苏学习期间,26 岁的徐静以科学上的惊人发现,推翻了“成年高等脊椎动物脑神经细胞不能分裂和再生”这一世界医学界公认了 100 多年的结论,从而轰动了苏联学术界,并获副博士学位。回国后一直从事组织胚胎学教学与科研工作,可以说,她的大半生时光都是在显微镜下度过的。

9 月 9 日凌晨 2 时,卫生部值班室秘书江焕波火速驱车赶往西城的百万庄去找徐静。

唐山大地震后,为了安全,北京市的不少人家还都住在楼间空地上搭起的抗震棚里。江焕波和司机在百万庄一带,心急火燎地在黑夜中摸索了两个多小时,直至凌晨 4 时才找到徐静的住处。由于他们彼此都不认识,江焕波只好小心地问道:

“是徐静同志吗? 我是卫生部的江秘书。”

徐静点点头。

“请跟找走,部里叫你去一趟,有紧急任务。”江焕波急促地说道。

徐静没敢多问,只说了声“你稍等一会儿”,随后迅速回到房里通知了丈夫一声,便登上江焕波的车,消失在夜幕中。

车速很快,在无人的马路上飞奔,向东单方向驶去。在车上,徐静努力猜想着可能接受的种种任务,但尚未来得及得出答案,车已经驶进了中国医学科学院大门。

这时,天刚蒙蒙亮,只见刘湘屏正在院子里急得打转。当见到姗姗来迟的徐静后,她劈头就对杨纯说:“你们医科院真成问题,一个基层教研室的主任、党支部书记,家中竟然不给安个电话?”

徐静听后,只感到好笑。

时间急迫,刘湘屏拉起徐静,换上自己的车,立即向西驶去。车子

缓缓驶入中南海的北门,在一排灰房子前停下。徐静后来才知道,这就是“202”室。

徐静紧随大步疾行的刘湘屏,走进了里面一个不算大的房间。

他们刚进屋,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就进来了,语调低沉地问道:“你是徐静同志吧?”

徐静答道:“我是。”

汪东兴坐下后招呼大家坐下,沉默了1分钟没有说话。此时,徐静感到屋里的空气几乎凝固了。她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但又不敢往那想。

终于,汪东兴说话了:“我告诉大家一个不幸的消息,伟大领袖毛主席已于今天凌晨逝世了,现在消息还没有公布。”

徐静脑子里顿时一片空白,她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召集你们来这里来,主要是想商量一下毛主席遗体的保护问题。”汪东兴说,“这是一个事关重大的头等大事。当年,印度总理尼赫鲁死后就想保存遗体,可因没及时采取防腐措施,遗体腐变,最后只好烧了。”

汪东兴站起来,走到徐静面前,目光里充满信任与期望:“我们大家都很清楚,毛主席是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万一主席的遗体出点差错,我们就无法向党和人民交代,无法向子孙后代交代。你们要以最快的时间拿出方案,报中央政治局。”

说完,汪东兴望着徐静,又问道:“你有什么要求吗?”

徐静理了理自己的短发,努力使心情平静下来。她思索一会儿,提出3个要求:“第一,需要回院和同行专家们共同研究方案;第二,要先看看毛主席遗体情况;第三,需要一点时间准备必要的器械、药品。”

汪东兴说:“完全可以,有什么问题及时向我汇报。”随即带领刘湘屏和徐静走进毛泽东卧室。

室内光线很暗,厚厚的紫色落地窗帘遮住了外面的阳光,室温已经被降得很低。毛泽东躺卧在大床的中央,身上从头到脚蒙着一条白色的毛巾被。徐静缓缓地走近床边,从侧面轻轻掀开毛巾被,仔细察看遗体的情况。

这是徐静一生中如此近距离地见到日夜想念的毛泽东,心情之激

动可想而知。但20多年的工作经验告诉她:作为一名医务工作者,理智必须战胜情感。现在自己面对的是领袖的遗体,稍有疏忽,就会给日后工作带来不可弥补和逆转的损失。此刻,最需要的是镇静、细心和大胆。她粗略计算了一下毛泽东的身高,仔细观察着皮肤有无损伤、褥疮等,轻轻地触摸了皮肤的弹性,轻轻活动一下关节,并一一牢记在心中。

202室的政治局会议一直开到凌晨5点多钟才结束,开的很沉闷。由于毛泽东在中国各族人民心目中的崇高威望,政治局决定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一个星期的遗体告别活动,以便让尽可能多的人民群众以及各界代表,向自己景仰的伟大领袖作最后的告别。

散会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进行了交流。随后,江青打电话找毛泽东的机要秘书张玉凤,想要毛泽东到南方的几次谈话记录稿,还有几件其它手稿。因中央办公厅对毛泽东文件的保管使用有明文规定,张玉凤不敢轻易把文件给江青。

9月9日凌晨。姚文元在怀仁堂召集新华社的朱穆之,《人民日报》的鲁瑛,《光明日报》的莫艾,《红旗》杂志的许健生,中央广播电台的邓岗,布置毛泽东逝世后的宣传工作。会后,他单独把鲁瑛留下。

姚文元说:“这几天如果发生什么事,我同你电话联系不上怎么办?你要有所准备,如果电话联系不上,你得独立处理问题。”

鲁瑛马上明白了姚文元的意思,他说:“毛主席逝世后,首先要注意军队,军队要掌握好。你也要特别注意安全,出入行动要小心些。”

姚文元说:“是要注意军队,还有个大民兵哩!”

又说:“主席逝世了,国内外阶级敌人会乘机捣乱和破坏,你们要密切注意情况,及时反映。对内部也要布置一下,做些准备,包括你们几个负责人的安全。”

根据姚文元的指令,鲁瑛当即返回报社找萧泽曜、刘治平(党组成员)进行布置、传达,派出民兵昼夜加强巡逻、值班,防止发生意外情况……

凌晨5时,中央电台新闻部主任被急促的电话铃惊醒,话筒那边传来中央广播局总编室值班员的声音:“有紧急事,请你马上到局长办公室!”

又发生了什么大事,竟然等不到天亮?

这种想法并非偶然,因为1976年发生的大事实在是太多了。主任匆匆赶到局长办公室,但邓岗局长不在,只有几位副局长坐在那里。他们低着头,一言不发。一位副局长抬起头,用低沉而沙哑地说:“告诉你一个极其不幸的消息,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去世了。”

“啊?”主任惊讶地大叫一声,随即,血凝固了,木然地站在那里,只觉得泪水顺着面颊流了下来。

十几分钟后,电台的一切,紧急运行了起来……

当年,中央电台共有4套节目,而且自成系统,各自按照自己的时间运行。不过,此时必须实行并机,把其中两套或3套节目联通,用同一时间播同样的讣告。这样,不管听众正在收听哪套节目,但却都能同时收听到讣告。此外,由于治丧规格不同,电台和电视台使用哀乐的时间长短也不相同,有的只用30多秒钟,有的要超过1分钟,而毛泽东逝世的哀乐,初步商定为6分钟。至于什么时间播讣告,由中央决定,但电台必须作好准备,作到随时能播,而且讣告之前的节目不能太欢快高亢,不能是打斗或轻松的节目。讣告播出之后,则要完全取消文艺节目,其他节目的播音基调也必须与整个气氛相适应,那些用了许多年的常用语必须立即取消,比如“毛主席万岁”和“祝毛主席万寿无疆”。

早晨8时,邓岗局长从治丧委员会回来,说中央已决定在黄昏18时播放《中共中央、人大常委会、国务院、中央军委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

中午11时,邓岗按规定向中央电台直接参与播出的部门和人员,传达了毛泽东逝世的消息,大家震惊不已,有的泣不成声。正在此时,中央突然通知,把《告各族人民书》的播出时间提前到下午16时。让人感到十分紧张的是,直到中午11时30分,中央电台才拿到《告各族人民书》的最后定稿。

正午12时,播音员夏青开始录音,他的声音哀痛而庄重。但录音结束后,局长们却一致认为不满意,要求重录。此时,夏青已因紧张而悲痛,近乎精疲力竭。于是,新闻部主任多了个心眼,决定保留第1次录音,并在夏青进行第2次录音的同时,开始复制第1次录音,以作到有备无患。

# 第1403回：闻噩耗，神州大地同悲哀 唁电多，五大洲为之震动

再说卫生部部长刘湘屏与中国医学科学院党委书记杨纯返回医科院院部后，研究确定，毛主席的遗体保护第一步处理就由徐静负责，张炳常和陈克铨参加，组成3人小组。此时，张炳常教授还在平谷县参加巡回医疗和教学改革。

趁张炳常还未赶回的空隙，徐静去拜访了她的老主任，全国著名解剖学家张鉴教授，想从他那里了解一些孙中山遗体的处理情况。之后，她又拜访了另一位病理科的教授。由于毛泽东逝世的消息尚处于保密阶段，所以徐静只能拐弯抹角地向他们讨教，搞得这两位专家也十分不解：这个徐静，怎么一大早会问起这些问题？

小组成员之一的陈克铨年仅38岁，也是形态教研室的副主任，是新成立的3人小组中最年轻的一个。得到通知后，他用了1个半小时的时间，备齐了必要的药品、器械，其中有些物品还是临时借来的。他仔细筛选，核对标签，清点数量，谨防出现差错。

9时左右，张炳常也从平谷风尘仆仆地赶了回来。离家数月的他顾不上回家，便直奔医科院院部而来。张炳常是1948年辅仁大学生物系毕业的才子。他一到，即根据多年的专业经验，提出了自己的意见，经过商议，被确定为实施方案。

还不到10时，徐静、张炳常、陈克铨携带药品、器械等已提前赶到中南海。

此时，政治局会议正在这里召开，3位医学专家来到会场，因为从未有见过这种场面，略感有些紧张。

汪东兴让徐静谈一谈遗体保护的方案。徐静向在座的中央领导做了详细的汇报，讲述了方案的依据、效果和实施的方法。

政治局委员们听后，又就遗体保存的有关问题，进行了认真的询问：列宁遗体是怎么保存的？孙中山的遗体为什么没有保存下来？

1972年长沙马王堆出土的女尸为什么能保存2000多年？世界上除了列宁、胡志明，还有哪一位领袖的遗体保存下来了？

徐静等人根据平时对于这些问题的了解，分别做了扼要的回答。她说：

列宁逝世于20世纪20年代，是哈尔科夫一位教授将任务承担下来。据说，对列宁遗体进行防腐处理，不是一次完成的。

孙中山的遗体，听老协和医院的专家们说过，是由于脸上长霉菌而无法保存下去了。

张炳常参加过马王堆尸体的考查，马王堆女尸2000多年保存完好，主要是在地下深埋，多层厚厚的棺和椁密封，形成了避光、避氧、低温的自然条件，这些条件对尸体长期保存很有利。

世界上除了列宁和胡志明外，还有曾长期担任共产国际执行主席的保加利亚人季米特洛夫，他的遗体也被长期保存下来了。他们的保存方法如何？都是各自国家的机密，我们知之甚少。

最后，张春桥站起身来，背着手，在两个沙发之间走来走去，他指着徐静的问："你究竟有多大的把握？"

徐静实事求是的回答："我们3人都是医学院的解剖学和组织学的教师，为了研究和教学的目的保存尸体和标本，少则几十年，多则上百年的尸体标本都有，只求不腐烂，而皮肤颜色、面容、体态都不重视，这种保存我们是有把握的，经验也是丰富的。但主席遗体的保存大不相同了，不但不能腐烂，还要栩栩如生，要让人民群众瞻仰，这我们没有做过，也未敢想过。我们只能努力去探索。"

华国锋说："政治局刚刚开过会，为了缅怀毛主席的丰功伟绩，要长期保护好毛主席的遗体，世世代代让人民群众瞻仰。这是一项光荣而又艰巨的政治任务，一定要做到万无一失。这是党和人民对你们的重托。你们完成好这项任务，党和人民是不会忘记你们的。"

汪东兴也说："这是一件庄严的政治任务，你们一定要完成好，政治局和全国人民感谢你们。你们要考虑长期保存。现在是20世纪70年代，你们一定要有志气、有雄心，把毛主席的遗体保护得比列宁的还要好。"

最后，华国锋拍板说道："就按你们的方案办。"

遗体处理工作的时效性很强,时间的稍许延误,都有可能造成无法挽回的后果。因此方案一经中央批准,徐静等人便争分夺秒地投入到实施方案之中。上午10时左右,徐静和两位助手一起,果断地往毛泽东遗体血管里注射了福尔马林、醋酸钾、甘油和酒精等药物,作了基础性的防腐处理,为今后的永久性保存作了准备。

他们又经过两个多小时的紧张工作,终于顺地完成了对毛泽东遗体实施防腐处理的全部操作。这时时钟已指向了下午14时30分。

许世友在9月9日凌晨在广州接到毛泽东逝世的绝密电报后,把军区事务安排完后,便坐飞机与韦国清一同赶往北京。

他到北京后,先去西山见了叶剑英等人,然后于当天下午15时,赶到毛泽东在中南海的最后住所。一进屋,他先向毛泽东遗体深深3鞠躬。当时,医护人员正在给刚把做过防腐处理的毛泽东遗体穿衣服。许世友俯身看了看胸腹皮肤后,绕遗体走了两圈,自言自语的说:“碰鬼,身上怎么有蓝斑?”又深深3鞠躬,敬了一个军礼,便走了出去。

下午15时,中央电台开始用悲惋的语气,向全体中国人发出预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各位听众,本台今天下午4点有重要广播,请注意收听。”

15时30分,第2次录音结束了。审听后,局长们再次一致认为,这次录音远远不如第1次的好,最终决定播出第1次录音。此时,新闻部主任已经作好了第1次录音的合成带,先是长达23分钟的《告各族人民书》,然后是6分钟哀乐,5分52秒的《国际歌》,再加上报时,台号,总共36分钟。

下午16时,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中央军委发布《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极其悲痛地宣告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名誉主席毛泽东逝世的消息。华国锋、王洪文、叶剑英、张春桥等375人组成毛泽东治丧委员会。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中央军委发布有关毛泽东治丧活动安排的公告。

中共中央9月9日发布“毛泽东治丧委员会”名单上:

华国锋 王洪文 叶剑英 张春桥

(以下按姓氏笔划为序)

韦国清 刘伯承 江 青(女) 许世友 纪登奎 吴 德

汪东兴 陈永贵 陈锡联 李先念 李德生 姚文元

吴桂贤(女) 苏振华 倪志福 赛福鼎……

一切都按着预先的安排有序地进行着。只是万万没想到,节目在第3遍播出时,发生了严重的错误,哀乐之后,播音员宣布:“现在广播周恩来同志治丧委员会……”于是,中央电台被各地打来的电话包围了,质问、抗议、谴责、强烈要求追查事故责任者的声音,让电台万分紧张,酿成了“九·九播音事故”。

毛泽东走了,终年83岁。自1935年遵义会议至1976年,长达41年。

这“83”、“41”,恰巧构成“8341”——他的警卫部队的番号。尽管这是偶然的巧合,可是却也是太巧的巧合。

毛泽东之逝,成为中国政治舞台上的一次最强烈的大地震。

在中国大陆,除了极少数的人之外,大多数的人始终认为:毛泽东每天日理万机,夜以继日地工作着。毛泽东永远是神采奕奕,精神矍铄。毛泽东总是如人们在书报上看到的照片那样,经常伏案执笔,批阅文件,在会议室里开会,在工厂家田头视察……

直到1976年9月9日,人们才在不知所措的茫然中结束了这种想法。

在中国这样一块特定的土地上,在20世纪70年代这样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毛泽东在中国具有特别的威望。他在占全世界四分之一的人们的心中,是生命、是希望、是光明、是永远不落的“红太阳”。

人们没有完全猜错,毛泽东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依旧在工作着,只不过他的工作方式、工作环境已截然不同了。在他的最后日子里,他总是去做他觉得应该是他做的工作,包括不断地会见外宾,只要秘书工作人员转告他,外宾请求接见,毛泽东从不拒绝,既使身体状况很坏。在他的头脑里似乎总是盛情难却,而没有量力而行。

最后一次会见巴基斯坦总理布托就是一例。布托已经来几天了,一直等待毛泽东会见,但由于主席身体状况不允许,所以一直没有安排。当布托马上要离开中国,又一次提出见毛泽东时,他的秘书便不得不把这种要求向毛泽东报告,果然,他毫不犹豫地点头同意。其实,

当时毛泽东刚吃了安眠药,正犯心脏病,但他依旧同意安排。因此,才出现了接见时面部表情麻木,直流口水的样子,也因此泄漏了毛泽东身体有病的绝密,这已是无法隐瞒的事实。

病魔缠身的毛泽东感情依旧细腻丰富,他依旧惦念着亲人,怀念着故交,关心着。女儿来看他,他会久久地深情地拉着她的手,用他不清晰的语音叙别话旧。来看望他,也会引起他的欣喜,引出不少话题。他在最后的日子里,也曾关心过金日成。

也许,毛泽东与金日成有着特殊和友情,有着特殊的情感。毛泽东生日时,曾对金日成送来的大苹果久久凝视,寄托一种异样的情思。当毛泽东听说金日成眼睛患病时,特意派曾给他治过眼睛的唐由之大夫去给他治病,那几天晚上,每次关于金日成治病的电报发来,主席总是认真地看。在朝鲜,在这片并不十分遥远的国土上,牵动着毛泽东的情感。

就在9月9日下午16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对外宣布毛泽东逝世消息后的15分钟内,包括路透社、美联社和法新社在内的世界主要通讯社便报道了毛泽东逝世的新闻。紧接着,世界各大媒体发表和转载了大量赞扬毛泽东和介绍毛泽东革命事迹的评论和文章,对他的赞扬和哀悼如潮水般涌来,一些第三世界国家的报纸甚至用十多个版面刊登介绍毛泽东的文章和照片。世界各国政府、各国际组织也纷纷对此做出反应,各国的领袖们,纷纷发来唁电,高度评价毛泽东。

美国总统福特发来唁电说:“在任何时代成为历史伟人的人是很少的。毛主席是其中的一位。”“毛主席是中国现代史上的一位巨人,他对历史的影响将远远超出中国的国界。”

美国国务卿基辛格以他特有的风格说:“我的孩子们谈到流行音乐歌手身上有一种‘颤流’,我承认我自己对此浑然不觉。但是毛泽东却发出了力量、权力和意志的‘颤流’。”

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发表声明说:“毛泽东是一代伟大的革命领导人中的一位出类拔萃的人。他不仅是一个完全献身的和重实际的共产党人,而且他也是一位对中国人民的历史造诣很深的富有想象的诗人。”“历史学家将会对毛泽东的事业和他对中国人民和世界的影响做出估价。”

日本首相三木武夫说:“毛主席作为世界的大政治家在历史上留下了巨大的业绩。”

日本外相福田纠夫则用带有崇拜的口吻评价说:“无论对他做多么高的评价,都是不过分的。”

联邦德国总理施密特对毛泽东赞赏有加,他称“毛泽东主席是世界历史发展的创造者之一,是给中国人民指出走向新的未来的道路的人。”

澳大利亚总理弗雷泽在唁电中说:“新兴的中国就是他永久的纪念碑”。

菲律宾总统马科斯发表声明道:“毛泽东主席是一位人类的领袖、历史的推动者。他是名垂史册的人物。”

法国总理雷蒙·巴尔说:“毛泽东主席将作为本世纪最伟大的人物之一而载入史册。”

英国首相卡拉汉这样评价毛泽东:“他的影响远远超出了中国的疆界,无疑他将作为世界闻名的伟大政治家而被人们所缅怀。”

巴基斯坦总理阿里·布托发表声明称:“毫无疑问,毛泽东主席是巨人中的巨人。”

巴基斯坦总统乔德里称毛泽东是“中国革命之父”。

联合国总部在毛泽东逝世的当天降半旗致哀。联合国安理会10日开会时,安理会主席致悼词,联合国秘书长瓦尔德海姆和与会各国代表都发表讲话表示哀悼。联合国秘书长瓦尔德海姆在联合国全体大会上发言时盛赞毛泽东的丰功伟绩:

“毛主席是一位伟大的政治思想家、哲学家和诗人”,“他实现自己理想的勇气和决心将继续鼓励今后的世世代代。”联合国大会主席高度评价毛泽东是“我们时代最英雄的人物”,“他改变了世界历史的进程”。

……

曾有记者这样写道:“9月9日下午4时这一悲痛时刻,似乎地球也停止了转动。”

虽然中共中央对外宣布:“不准备邀请外国政府、兄弟党和友好人士派代表团或代表来华吊唁。”但是仍有不少国家的领导人提出要来

参加毛泽东主席的追悼会。美国国务卿基辛格,副国务卿哈比卜,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斯考克罗夫特,前美国驻中国联络处主任布什,参议院民主共和两党领袖等都一拨一拨地前往位于华盛顿的中国驻美国联络处哀悼。

其他国家的中国驻外使领馆,吊唁的人也络绎不绝。在日本,毛泽东逝世后两天内就有1700多位各界人士到中国大使馆吊唁。日本还有一位从1967年开始就收听北京电台广播的朋友,他每年都把自己在5月里亲自采制的茶叶寄给毛泽东。在得知毛泽东逝世的消息后,他又带来茶叶委托大使馆转交给毛泽东的家人,以寄托哀思。意大利和西班牙的许多友好人士是带着全家老少来中国大使馆吊唁的,其中不少父母在毛泽东遗像面前给孩子们讲述毛主席的生平和中国历史,许多刚学会写字的儿童在吊唁簿上写上了自己的名字。

在毛泽东逝世后的10天里,共有123个国家的政府和首脑向中国政府发来了唁电或唁函,105个国家的领导人或他们的代表到中国使馆吊唁,53个国家降半旗致哀,许多国际机构和国际会议上也开展了悼念活动。

许多发展中国家对毛泽东的逝世表现出了更大的悲痛。毛泽东逝世的消息传到朝鲜后,朝鲜党政领导机关决定9月10日到18日为全国哀悼期,并规定18日全国停止一切娱乐体育活动。18日下午,当中国隆重举行毛泽东主席追悼大会时,朝鲜举国上下也就地肃立三分钟致哀。哀悼期间,朝鲜各党政机关的干部、群众团体的代表、工人、农民、人民军官兵、青年学生共一万多人到中国大使馆吊唁,中国驻朝鲜大使馆共收到朝鲜各界发来的唁电、唁函5200余封。

在中美洲的牙买加,一位没有留下姓名的黑人农民从百里以外的农村赶到中国驻牙买加大使馆,他送上了一束新鲜野花默默悼念毛泽东主席。还有很多前往吊唁的人一边痛哭一边唱着国际歌,悲痛欲绝。

在法国、联邦德国、埃塞俄比亚、巴基斯坦、斯里兰卡以及刚果等国,各界人士举行了各种形式的游行。在毛泽东逝世的当晚,联邦德国的一些马列主义组织就分别在几个城市举行了火炬游行。游行人群打着写有“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光荣永远属于毛泽东同志!”

“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万岁!”等大标语,高举火把,抬着用黑纱和鲜花簇围着的毛泽东遗像在大街上缓步前行。埃塞俄比亚借着纪念“革命日”两周年的机会,发动了有10万人参加的纪念毛泽东大游行,是所有国家中游行规模最大的。

9月11日,法国各界人士1万多人开始游行,游行队伍在巴黎公社社员墙前举行了追悼毛泽东的仪式。

刚果政府不但组织了游行,而且还决定今后每年将在毛泽东逝世周年纪念日举行正式纪念活动。

在巴基斯坦历史文化名城拉合尔,800名工人组织了哀悼游行。由于找不到巨幅的毛泽东画像,巴基斯坦著名画家马哈茂德·巴特便连续工作六个小时绘制了一幅,放在游行队伍的最前面。

世界上唯一对毛泽东逝世“不闻不问”的大国是苏联。就在联合国降半旗、各国政要发唁电、多国群众游行悼念毛泽东时,苏联却显得异常地平静。莫斯科的众多报纸甚至都没有报道毛泽东逝世的消息。苏联的《消息报》也只在倒数第二版的一个角落里发了一则寥寥数行的报道。而在苏联的另一份重要报纸《真理报》上却出现了针对中国的威胁性文章,文章称在毛泽东逝世后,如果中国不在一个月内采取与苏联和解的政策,那么苏联有可能采取某些“不可逆转的决定”。

# 第1404回：齐哀悼，一个时代的结束 政治局，研究追悼会事宜

毛泽东走了，最悲痛的还是中国的老百姓，中国的农民、工人。在河南农村的路上，一位农民正走着，听到了广播里传出的毛泽东逝世的噩耗，他突然就蹲在路边抱头痛哭，过路的人把他搀起来，他指着哀乐传来的方向说："不说别的，毛主席这些年把国家治理得多平稳！"任何一个普通群众可以写大字报，或者公开批评他的上级，没有哪一个农民或者工人有了重病，因为没钱得不到医治。这是中国有史以来都没有过的翻天覆地的新鲜事，但毛泽东领导下做到了，人民怎能不热爱他！

毛泽东逝世当天，武汉几个"反潮流派"来到唐恒山家，唐家小屋里坐满人。个个悲戚无言，两眼红肿。唐太婆边用胳膊抹眼睛，边在灶前忙活着。老人虽然做了满桌菜肴，谁也不愿走近桌前，一个个拉去坐了，谁也提不起筷子。唐恒山强打精神，清清嗓子："同志们，要化悲痛为力量，将革命进行到底，完成主席的遗志！"

小奚忽然叹口气说："要是死能代替，我真愿拿自己的命换来主席心脏重新跳动！"

她这一说，人们纷纷响应："拿我们所有人的命都成！"

唐太婆哭了："拿我一家四口性命我都愿干啊！"

结果，满满一桌饭菜，直到大伙散去，动也未动。

9月9日这天，黑龙江的范正美正在北方大厦主持全省招生工作会议。当他在省委机关听到毛泽东逝世的消息后，一路眼泪长流回北方大厦，直奔他住的房间，伏在床上的被上嚎啕大哭。良久，才极力收住眼泪，啜泣地对等在旁边的工作人员说："毛主席去世了，我们要遭罪了，中国人民要遭罪了。怎么办啊……"

他哀痛不已，极力控制自己的情感，但哀思奔流，万念俱生，无限忧伤，剪不断，理还乱，道不清，诉不完。到了招生会场，范正美向大家

报告了这一不幸消息,情难禁,看着与会者一个个震惊、悲痛的神情,他再次失声恸哭,台下也是一片哭泣唏嘘声。

人们无法控制自己的哀恸,因为在他们心中,毛泽东就是他们的大救星,是他领导中国人民奋斗,使一个曾经百孔千疮、到处是分裂、不义和蒙受奇耻大辱,被外国瓜分、蹂躏的国家,赢得了高度尊严和统一,让一个被外国人讥笑为“东亚病夫”的民族,顶天立地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令世人刮目相看。他是新中国的旗帜,新中国的擎天柱,新中国的象征;他是我们年轻人前进的指路明灯,人生远航的舵手。他的思想和哲学是那样富于思辨、流畅和明白,经得起时间和实践的检验。他教导人们无私地献身于人民,永远站在人民一边;他是一个难得的全才,不但是中国人民的领袖和导师,也是世界人民的领袖和导师。因为他,中国人民感到无比的自豪,充满自信而奋斗不息。如今他走了,人们再也听不到他的声音了,再也看不到他向人民挥手了。

范正美想:“我是唱着《东方红》长大的,照着他的指示学习、做人、战斗而成长的;他教导我爱人民之所爱、恨人民之所恨,为人民的利益坚持好的、改正错的。我的血液里流淌着他给的营养,脑海里充满着他灌输的思想。是他领导和指挥我们造走资派的反,造修正主义的反,斗争正未有穷期,谁胜谁负难分,他就离开了我们,叫我们今后如何生活和斗争啊?!”

这种永诀的感觉,让他的心在颤抖,五脏俱焚。这种难以排遣的巨大哀伤,联想今后国家前途、人民和自己的命运,使他的心情突然变成了一种不能名状的恐怖;他感到自己努力追求、向往的东西,共产党、毛主席带给我们的希望、动力和欢欣,似乎忽然都匆匆随着毛主席的逝世,一齐也离他而远去了,无可挽回了。这是他对国家未来可能发生的事变及其自我命运的预测、忧虑生来的恐怖,是一种神经恐怖、思维恐怖。难言述哀痛,只有泪如雨。“男儿有泪不轻弹”,此时哀思难禁,当着大家的面,他终于伏案放声大恸。

毛泽东的逝世,结束了一个时代,毛泽东时代。

9月10日下午,工作人员重新量了毛泽东遗体的尺寸,由红都服装厂的师傅们很快赶制出两套中山装,一套厚一点的深灰色,一套薄一点的浅灰色。经中央领导审定,给毛泽东穿了浅灰色的那一套。理

发师小周则为毛泽东重新梳理好头发,北京医院病理科马燕龙技师为毛泽东做了细致的化妆整容。

1976 年 9 月,上海蔬果市场,市民戴着黑纱悼念毛泽东

9 月 10 日晚 19 时多,王洪文的秘书廖祖康,带着在王洪文处协助工作的中办工作人员米士奇,来到中南海紫光阁值班。

廖祖康对米士奇说:“王洪文说,中办秘书处就不来人了,就你一个人值班。王洪文说了,有两件事,一是在毛主席吊唁期间各省市发生的重大问题,要及时报告;二是在此期间有些解决不了,需要请示的问题,要及时请示,就说是中央领导同志说的,让你给各省、市、自治区打个电话。另外,各省、市有事打电话就找你。”

米士奇问:“电话以咱们办公室的名义打吗?”

廖祖康说:“不、不、不,以中央办公厅的名义打。”

廖祖康还说:“上海不用打,北京也不要打。”

晚上 23 时,杜修贤在人民大会堂布置悼念毛泽东的吊唁活动的拍摄工作,杜修贤已经两天两夜没有合眼,困了乏了,就一支接一支地吸烟。几个小时后,毛泽东的遗体就要运至这里,明天还要拍摄瞻仰毛泽东遗容的场景,想到这里,他准备坐在大厅的沙发里休息一会。朦胧间,耳边有一个声音对他说“老杜,你带上相机跟我走。”

杜修贤睁眼一看,是汪东兴。当时,杜修贤身边没有带照相机,但

他想一定是有什么重要任务,他向其他同志借了一个照相机和三个胶卷,匆匆赶往汪东兴处。

汪东兴问他,“你带了几个卷?”

杜修贤说:“3 个卷。”

汪东兴又说:“不够,多带一些胶卷。”

杜修贤又去找别人借了几卷。

随后,汪东兴对他说“你和我一起走,坐我的车。”

他们一起走出人民大会堂,杜修贤坐上了汪东兴的随车,跟在汪东兴的车后面,驶进了中南海,但汽车没有驶进游泳池,而是停在另外一处院子里。下车后,杜修贤才知道,这里是毛泽东在中南海的另一处住宅,202,与游泳池相邻。

杜修贤被安排在一间不大的房间里,里面只有沙发和茶几,不一会,一位年轻的服务员给杜修贤端来一杯热茶。

大约过去了 40 分钟,杜修贤突然听见一声门响,随后几个人悄声走来,他看见是华国锋、陈锡联、汪东兴、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毛远新等人从里面的一个房间里走出来,华国锋一边走一边剔牙,看样子他们刚刚吃完饭。这时他才意识到,已是 9 月 11 日的凌晨了。

姚文元看到杜修贤,对他说:“老杜,我们到处打电话找你,还以为找不着你呢。你来了太好了,今天要你完成一个重要任务。”然后对身边工作人员说:“你先带老杜去,我们一会儿就来。”

杜修贤跟着这个工作人员,穿过走廊向北走,在一间北面房的门口,工作人员停了下来,对杜修贤说,“就里面,你自己进去吧,我就不陪你过去了。”

杜修贤应了一声,就一个人往房间里面走,一进门,杜修贤被眼前的情景震惊了,他怔住了,毛泽东躺在一张宽大的床上睡着,周围一片宁静。杜修贤想,是要他来拍摄毛泽东的最后遗容? 因为他知道,一旦毛泽东的遗体运到人民大会堂的灵堂里,毛泽东的遗体就要放进无氧罩里。杜修贤轻轻地调好焦距,小心翼翼把镜头对着毛泽东的遗体拍了一张半身的,又拍了一张全身的,他正拍着,身后传来门的响声,他听见姚文元在门口关照警卫员,要他们把门关好,不准其他人进来。

杜修贤放下相机,等待指示,这时,房间里已陆续进来了几个人,

还是华国锋、江青、张春桥他们8个人,他们围在一起,好像在商议什么,随后,他们几个人排成一排,脸上带着悲伤的神情,一个接着一个围绕毛泽东的床缓缓行走了一圈后,排成一行,低头站立在毛泽东的遗体前,直到这时,杜修贤才明白,他的重要任务就是给他们拍照……出人意料的是,江青、张春桥等人又手挽着手站立在毛泽东遗体前,他又按动了几次快门。

杜修贤想,叶剑英为什么没有来呢?虽然政治局委员不全,但副主席常委都在,就少叶剑英副主席,如果说只是负责毛泽东医疗组的中央领导人向毛泽东遗体告别,姚文元、陈锡联又不是医疗组成员。回到摄影部后,值班记者告诉杜修贤,说姚文元来过几次电话找他,杜修贤联想起汪东兴为此事亲自找到他,又想起江青的"你怎么就带来了一个闪光灯?还是平版光"的话,可见这次合影是计划好了的。

当晚,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警卫战士在中南海向毛泽东遗体举行了告别仪式。

9月11日凌晨3时20分,毛泽东的灵车来了。华国锋、汪东兴等护送毛泽东遗体出中南海西门,来到人民大会堂。毛泽东遗体被放在宽大的平担架上,由警卫战士抬着,缓缓走进人民大会堂北大厅。遗体在北大厅放定,专家们细心测定周围的温度、光照等。

9月11日上午10时许,吊唁活动正式开始。毛泽东的遗体被安置在人民大会堂的鲜花翠柏之中,身上覆盖着一面巨大的党旗,8名礼兵守护在遗体周围。

吊唁活动开始后,中央政治局委员们每4人一组,轮流为毛泽东守灵,其余的都在附近的房间里开会。

11日这天的会议临结束时,张春桥忽然提出了一个看似简单的问题:"主席的追悼大会由谁主持?由谁致悼词?"

几分钟过去了,没有一个人发言。最后还是叶剑英打破了这令人困窘的沉默:"我的意见,追悼会由洪文同志主持,国锋同志代表中央致悼词。"

众人把目光投向了另外两位副主席。

王洪文皱皱眉没有吭声。

“叶帅德高望重,还是请你给主席致悼词吧!”华国锋推辞着说。

叶剑英说:“你是第一副主席,你应该牵这个头。这也是主席生前的愿望。”

张春桥含笑补上一句:“打今年4月以来,主席就明确指示由你主持中央工作嘛。”

华国锋说:“我能力差,经验少,还是靠大家同心协力,靠集体领导。”

李先念说:“集体领导也要有分工负责嘛,你总不能让大家都站在台上集体念悼词吧。”

华国锋不好再说什么,事情就这样定下来了。

主持会议的王洪文环顾四周问:“谁还有说的?没有了就散会!”

这时,张春桥说:“国锋同志,有件事我要向你汇报一下。”

“什么事?”华国锋问。

“关于主席的遗体安置问题。”

“这件事不是中央有了决定,主席的遗体作永久性保存,以供后人瞻仰。”

张春桥点点头,郑重地说:“是呵,是呵,但我听医生同志讲,由于没有及时采取防腐措施,遗体已经变质,不能再作永久性保存了。”

张春桥说得很轻,可立即在会场激起一阵响动。

“什么?”华国锋更是着急,一下瞪大了眼睛。工农出身、感情朴实的陈永贵、吴桂贤顿时痛哭起来。

张春桥还是不紧不慢:“我听医疗小组的同志讲,凡未采取防腐措施而超过3天的遗体,便不能再作永久性保存。”

一听这话,江青抢先跳了起来,嚷道:“华国锋,这事你要说清楚,你为什么要毁掉主席的遗体!你安的什么心?你这样作对得起主席吗?”

吴德含着泪哽咽道:“要是主席的遗体真出点差错,我们怎么向全国人民交代啊!”

“既然中央已经作了保留遗体的决定,为什么不及时采取防腐措施呢?是不懂,是忽略,还是有别的什么原因?”陈锡联的语气十分严厉,带着责问的意味。

华国锋的额头一下渗出密密麻麻的汗珠。他神情慌乱,紧张地解释道:“这个,我实在是不懂,也实在是没有想到。”

“唉,你是第一副主席,这样大的事情怎么能没想到呢?吴德同志说得对,如果主席的遗体因为我们的失职而被毁掉。那中央是无法向全党和全国人民交代的。”张春桥痛心疾首。

江青对着华国锋大喊:“现在,我可把主席的遗体交给你了,要有三长两短,你要负责!”

华国锋急了:“为什么让我一个人负责?大家都是中央委员嘛!”

江青不依不饶:“你是第一副主席呀!你现在主持中央工作呀!”

华国锋额角青筋暴起,极力控制住冲动的情绪,从内心一字一字地吐出:“如果你们有意见,我可以辞去职务;但我决不能承担这个责任!”

叶剑英一拍扶手,大声道:“不,你不能辞职,江青同志说得很好嘛,你是第一副主席,你现在主持中央工作,主席的遗体你能不管吗?你能不负责任吗?”

华国锋更着急了:“叶帅,主席的遗体已经放了3天,我就是舍出性命也保不住了!”

“还不足3天,我们还可以想想办法嘛。”叶剑英安慰他。

秘书在叶剑英耳边说了几句话,叶剑英点了点头,轮到他守灵了。叶帅蹒跚地走出会议室,华国锋紧追几步,问道:

“叶帅,你说遗体还有办法保存吗?”

“当年胡志明同志逝世时,他的遗体就是停放了3天后才决定作永久性保存的,直到今天仍保存得很好。你可以给孙德胜同志发个电报,请他速派遗体保护小组的专家来。”

“好,我马上以中央的名义给孙德胜同志打电报。”

孙德胜,时任越南民主共和国国家主席。

由于临时使用的棺罩还未做好,毛泽东的遗体是敞放的。按照专家的要求,启动了大厅内全部的风冷设备。尽管室温已降到了15℃以下,厅内的人穿着大衣还觉得冷,但对保护遗体来说,这个温度却远不够低。更要命的是,瞻仰人群每人都是一个散热体,军乐队又在现场演奏,铜管乐器中喷出的也是热气,再加上厅内的灯光热量,到最后恐

怕连15℃也保持不住。

“不行,这样下去不行!”防腐小组的人急了。列席参加政治局会议的徐静提出,大厅内温度降不下来,不利于遗体保护,必须采取坚决措施……话还未说完,有人提出,要停止瞻仰、吊唁活动,改用照片代替遗体告别,等等。但是,如果这样做,其影响之大,可想而知。由此而产生的政治后果,也是很难预料的。会场上气氛十分紧张。这时,具体负责遗体保存工作的谷牧、顾明等人建议:立即撤去乐队,改为播放哀乐录音;控制厅内灯光总量,除了保留遗体顶上的那盏大灯外,其他的灯尽量少开,这样,吊唁厅的温度应该可以降下来。

他们的建议提出后,会议气氛才缓和一些。

下午,吊唁大厅的温度基本控制住了,华国锋赶回中南海值班。他处理完一些事情后,说身体不适,要去北京医院检查一下。然后悄悄给李先念打电话说:“我到你那里,只谈5分钟。”

李先念说:“你来吧,谈多长时间都可以。”

# 第1405回：华国锋，看病去见李先念 张平化，质疑米士奇电话

9月11日下午，华国锋带了警卫员小叶和秘书小于到北京医院看病。看完病后，华国锋对司机老孙说："咱们去看看先念同志。"

李先念是华国锋的老领导，1970年，华国锋到国务院业务组任副组长，李先念主持国务院的日常工作，他们经常一起参加政治局会议，在国务院研究工作，议论国事。李先念身体不好，经常犯心脏病。周恩来让华国锋负责李先念的医疗小组工作。华国锋常常到李先念家里去看望他。有时李先念躺在床上，华国锋搬个椅子坐在床边，两人谈得十分融洽。此时李先念住西黄城根9号院，离中南海不远。

9号院大门口值班人员一看是华国锋的车，急忙通知里面的人。李先念得到消息，从办公室出来，刚走到大厅，华国锋已快步进来。李先念将华国锋迎到办公室。秘书小于由李先念的秘书徐贵宝陪着坐在外面大厅等候。

华国锋坐下来，直截了当地说："我是以到北京医院看病为名来的，只能呆几分钟。我实在太忙，离不开，请你去找趟叶帅。'四人帮'的矛盾必须解决，请叶帅考虑，用什么方式、在什么时机解决为好。"

李先念连说："好，好，我一定去看叶帅。"

华国锋说完后即匆匆离去。两人谈话不到10分钟。

李先念将华国锋送上车，转身回到大厅。他微笑着轻声问秘书："你觉得国锋同志怎么样？"

徐秘书不知华国锋为何而来，也不知李先念问题的用意，停顿片刻，拘谨地回答："他给我的感觉……有些优柔寡断。"

李先念摇摇头，十分肯定地说："不！国锋同志非常有原则。"

当天，华国锋又找到汪东兴征询解决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四人帮"问题的意见。汪东兴态度明确，表示坚决支持华国锋解决"四人帮"问题。

虽然人民大会堂吊唁大厅的温度基本控制住了,但是,遗体可能保存的最好办法还是要使用能够降温、隔氧的玻璃棺罩。早在9月9日下午,谷牧就紧急召见了北京市计委副主任韩伯平、石油化工部副部长陶涛等人,让他们研究、制造能够降温、隔氧的玻璃棺罩。时间急,只有1天时间。无准备,他们只好找现成的,首先想到的是苏联1925年送给孙中山先生的水晶棺。当他们立即赶到碧云寺,打开一看,由于种种原因已不能使用。

制造玻璃棺,时间来不及,又不安全。于是,确定做一个有机玻璃棺,但北京只有一个小厂生产有机玻璃板,最长的板只有1.6米,而这次需要2.2米长。北京有机玻璃厂的全体职工,眼含热泪,日以继夜,边试验、边粘接,把短板粘接成2.2米的长板。他们克服了种种困难,只用十几个小时就将有机玻璃棺粘合成功。11日,工厂职工把玻璃棺送到人民大会堂北大厅,把毛泽东的遗体安放在棺内,使棺内成为一个"小环境"。

北京氧气厂和化工系统对棺内进行了充惰性气体的工作,使棺内的含氧量降到遗体保护要求以下。

谷牧请来了各方面的制冷降温专家和北京市冷冻机厂、医疗器械厂等各厂的领导、技术人员和老工人,采用了液体介质、气体介质降温,有明显的效果,但不稳定;北京市计委的谢飘和半导体专家们,又做出了半导体制冷降温的设备,综合降温,使棺内的温度稳定在7℃到8℃,夜里可以降到6℃。

当时,这些制作冷棺的工作人员,他们心脏的跳动都是随着棺内温度计的升降而变化的。这绝不是夸大其词,谷牧曾说过:"如果遗体保护不好,我们就会成为千古罪人。"

9月11日午夜,毛泽东的遗体被放入有机玻璃棺中,专家们所担心的问题终于得到了解决。

当晚,越南专家组也到了北京。

12日一早,华国锋去吊唁大厅守灵。还不知道这些最新情况的江青,一见到华国锋就着急地大声问道:"华国锋,主席的遗体怎么办?我要求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

华国锋连声说:"好,好,等一会儿就开。"此时他已胸有成竹。

江青边擦眼泪边说:“主席去了几天了,主席的遗体怎么办?”

……

开会了,姚文元摊开一大堆群众来信,对大家说:“这是从《人民日报》整理的群众来信汇编,群众要求保存主席遗体。”

江青再次说到:“可是,我刚才得到报告,主席遗体已经毁坏了,腐烂了。谁干的?政治局一定要追查!”

华国锋说:“我现在向大家宣布,经过越南专家组和中国专家的共同努力,主席的遗体已得到了妥善的保护,可以永久保存了。”

大家都鼓起掌来。华国锋接着说:“我提议,在天安门广场立即修建纪念堂,安放主席遗体,供全世界人民和我国人民瞻仰。”

他的话再次被掌声淹没。

江青与毛泽东遗体告别,左一为张玉凤

设立在人民大会堂的毛泽东悼念灵堂。

11 日晚和 12 日上午,米士奇按照王洪文秘书廖祖康的要求,用紫光阁休息室的一部红机,向全国各省、市、自治区打了 27 个电话。

西安,中共陕西省委书记李瑞山接到了中共中央办公厅的长途电话,亲自作了记录:

1976 年 9 月 12 日上午十点多。

中办:米思(士)奇电话:

中央领导同志指示：

主席丧期发生重大问题及时报告。有重要问题不好解决及时请示。

找米士奇同志联系。

“米士奇是谁?”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张平化接到电话后，颇觉蹊跷，他当即给华国锋挂了电话，问道：“这是不是中央的决定?”

“什么？重大问题要找米士奇联系？我不知道呀!”华国锋感到吃惊。他告诉张平化，“米士奇是王洪文那里的工作人员!”

米士奇，在中南海，人们喊他“小米”，中南海里的小字辈，1961 年北京二中毕业，正准备报考北京大学历史系，恰好中南海那年从北京应届高中毕业生中选 8 名“根正苗红”的学生当速记员。米士奇爷爷是工人，父亲是中农，本人是学生，出身河北保定徐水农村，没有很复杂的社会关系。中学六年，他六年当选三好学生，五年当选优秀团员，两度当选北京市优秀学生，自然被选中了。最初选了 8 人，后来筛去一半，剩 4 人，米士奇仍在其中。这 4 人被送去学速记，不久调往中南海，在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工作，为中央的会议当速记。

1974 年，他担任中办秘书处文件组副组长时，于 2 月 1 日被调往王洪文办公室临时协助工作。这样，他成了“王办”的工作人员。

身为中共第一副主席的华国锋不知“重大问题要找米士奇联系”的事情。他问另一位副主席叶剑英，叶剑英也不知此事。于是，华国锋马上要秘书以中央名义向全国各省、市、自治区打电话，发出通知，发生重大的问题，应向华国锋和党中央请示报告。

这天，汪东兴在人民大会堂接到张玉凤打来的电话，请示说：“江青几次提出，要看毛主席这里保存的文件，我不知怎么办好，是否可以给她看?”

汪东兴对张玉凤说：“主席那里的文件、材料、书籍、遗物等，未经党中央批准，任何人都不得翻阅、索取和搬动。”

这天，叶剑英在为毛泽东吊唁和守灵中间休息时，来到福建厅，主动和汪东兴打招呼。

汪东兴看到叶剑英，忙问到：“叶帅，你怎么来了?”

叶剑英说：“一方面我来看看你，一方面来听听你对形势的看法。”

“自9月9日以来,你是日夜操劳,没有很好地休息过,可不能把身体搞垮哟!很多事情还等着我们去做呢!”

汪东兴说:“事情的确多得很,瞻仰毛主席遗容还在进行。全国要求来京参加吊唁治丧的人民的来信来电像雪片一样。追悼大会正在抓紧准备。遗体保护问题专家们正在研究。去越南取经的专家尚未回来,预计遗体保存的问题可以解决,请叶帅放心。”

叶剑英叹了口气:“毛主席逝世是一件很不幸的大事,我们都很悲痛!可是还有人不顾大局多方干扰。江青在讨论毛主席丧事的会议上,闹着要开除邓小平同志的党籍。姚文元跟着起哄,不必去说它了。而政治局竟有人毫无根据地说主席脸色发紫,怀疑是医生害死的,弄得医生们很紧张。好在王洪文、张春桥都参加了主席治疗的值班,不然又要颠倒是非了。”

汪东兴深有感触……

叶剑英说:“你在主席身边工作多年,经历了不少难办的事情,这也是不可多得的一种锻炼。我虽然老了,但锐气还是有的……”

见周围无人,他低声问到:“现在江青他们还在中南海活动吗?”

汪东兴说:“江青这两天在中南海跑到毛主席住地,要看主席那里的文件,没有答应她,很不满意,又要闹事了。”

两人又谈了北京、上海、辽宁、天津、广东等省市的情况,感到形势不是很好。

9月12日,迟群、谢静宜以清华、北大两校师生家属的名义给江青写信,保证说:“一定为主席争光、争气,请江青同志放心。”两校还有人给江青写信,提出要江青当中共中央主席。

从9月12日起,一封封“效忠信”、“劝进书”寄往中共中央,也寄到江青手中。一封落款为“毛主席的共产党员”的信寄给“毛主席的中共中央”。信中写道:

“我以极其悲痛的心情向党中央写这封信。我们这些小人物最担心的是毛主席逝世以后,党中央的领导权落到什么人手里?我恳切的向党中央建议:江青同志担任中共中央主席和军委主席;增加张春桥同志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和军委副主席;增加王洪文同志担任军委第一副主席……”

还有一封寄给江青的信写道：

“江青同志：请您接受我以我个人和家属、亲友以及我单位全体工作人员的名义，深切悲痛地哀悼。您立即出来挑起这副重担！迅即宣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时乎不待！……”

李先念和陈锡联一起为毛泽东守灵，李先念去洗手间时，陈锡联随后也跟着去了，他悄悄对李先念说：“那几个人可能要动手，要当心。”

李先念急忙摆手，不让他说下去。

9月13日，党中央成立了以华国锋为组长的“毛主席遗体保护领导小组”。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是领导小组的执行机构，由国务院副总理谷牧担任办公室主任。办公室的办公地点设在北京市西城区西黄城根南街9号。办公室对外名称叫“国务院第九办公室”，简称“九办”。实际上国务院并没有第七、第八办公室。

9月13日，姚文元在日记中写道：

上午同国锋、洪文守灵；接待朝（鲜）、阿（阿尔巴尼亚）、罗（罗马尼亚）等国使节，许多外宾在主席遗体前失声痛哭，表现了各国人民对毛主席的深厚感情。

不知为什么，江青没有参加会见。后来她提出政治局开会，在会上，因为遗体问题和华吵起来。她的言词很激烈，大家都不满意，这样下去会很危险。主席不在了，有些人已开始疏远她。我不能这样做，要努力帮助她，支持她，要对得起主席。

下午审新华社稿和电视台的录像，没有江青的镜头，已让邓岗补上。《人民日报》社论又改了一稿，已送春桥同志。他，似乎有什么话要对我讲，过几日应找他谈一谈。

晚上，同英（注：指姚文元之妻金英）长谈，重点国内形势和党内斗争。她的政治嗅觉很敏锐，和我有同样的预感。主席逝世，一些人可能会趁机闹事，要提高警惕，要有所准备。我和英最担心的是孩子，他们尚小，不谙世事，能经受得住残酷斗争的考验吗？

孩子，又是孩子，我近来为什么老想到孩子，为什么变得这样多愁善感，这是意志消沉和怯弱的表现。我要振作起来，要充满信心，为了孩子，也要勇敢地投入战斗。

记住马克思的一句名言:“我喜欢的生活——战斗!”

9月14日凌晨,江青给华国锋打电话说:“我建议立即召开紧急政治局常委会议。”

华国锋问:“会议讨论什么问题?”

江青说:“主席那里的文件由谁清理?由谁保管?这些都要常委会定下来。”

华国锋说:“我同常委们商量一下。”

江青不耐烦地说:“有什么可商量的,都是急需要办的事。”

华国锋说:“我们商量以后再说吧!”

江青又说:“开常委会,我、文元、远新,还有汪东兴都要参加。”

华国锋没有表态,把电话挂断了。

华国锋随即将江青打电话的事告诉汪东兴,汪东兴说:“这个常委会不能开。管理主席的文件问题,听汇报就行了。如果常委会一开,他们一参加,身份就合法化了。他们是要夺权。”

华国锋又给叶剑英打电话,叶剑英也是同样地态度。

华国锋从中南海来到人民大会堂,准备同汪东兴、王洪文、张春桥一起讨论毛泽东遗体保存问题。当日下午,江青又打电话给华国锋,要求开会。华国锋问在座的两个常委王洪文、张春桥:“怎么办?”

王洪文、张春桥说:“就按江青同志交代的办吧。”

江青来到人民大会堂,一坐下就讲个不停,最后提出由她和毛远新清理毛泽东的文件书籍。理由很简单:她是毛泽东的妻子和秘书,列宁的文稿就是克鲁普斯卡娅整理的!

华国锋说:“毛主席是党中央的主席,汪东兴是中央办公厅主任,毛主席的文件应该由中央办公厅处理,由汪东兴负责。”

汪东兴也说:“主席文件,不是讲好要封存的吗?现在保存遗体的问题还没有解决呢。”

江青说:“这样吧,文件还是小张保管,她为人可靠,让她给我当秘书吧!”

王洪文、张春桥觉得这样也可以,华国锋、汪东兴没有同意。

江青说:“啊呀!你们不同意呀!是不是怀疑她有问题,可能是个特务吧!”

华国锋一看她又要折腾,赶紧说:“汪东兴同志跟主席几十年了,对主席的东西非常熟悉。按党中央过去的决定,主席的文件属于国家机密,应由办公厅负责清理,并向中央写出报告。现在大家忙于治丧,来不及清理,暂时还是由东兴同志封存起来。”

江青继续坚持,就这样一直吵了5个多小时,华国锋就在那里听着。最后他说:“今天的会议,连剑英同志也没有参加,不算常委会。下次他来了,人到齐了,再讨论。”

江青吵累了,回去了。

# 第1406回：上西山，李先念见叶剑英 争文稿，说“按既定方针办”

李先念9月11日下午接受华国锋委托后，于9月14日亲自给叶剑英打电话说要去看他。

叶剑英在电话中问：“公事、私事？”

李先念说：“公私都有。”

叶剑英说：“那你就来吧。”

李先念对工作人员说，心情不好，要去香山植物园散心。汽车快到植物园时，他突然对司机和警卫说：“去西山叶帅处。”

叶剑英在院子里迎接李先念，说：“久违，久违。是哪股风把你吹来的？”

李先念说：“东风。”

俩人先是寒暄问好，又在院子里走了一会儿，随后，叶剑英将李先念请到屋里，打开了收音机。

李先念向叶剑英转达了华国锋11日的意见，说：“这是你死我活的斗争。”

叶剑英也重复了一遍：“这是你死我活的斗争！”但是没有与李先念深谈，也没有提出解决“四人帮”的具体办法，只是向李先念打听了陈锡联的情况。

李先念走后，叶剑英把军事科学院第一政委粟裕大将、军事科学院院长宋时轮上将找来，将李先念所说之事告诉他们。叶剑英住地离军科院很近，军事科学院悄悄地加强了对叶剑英的外围警戒。

李先念从叶剑英处回来，当天就把同叶剑英谈话的情况和叶剑英的态度报告了华国锋。李先念还告诉华国锋，为了保密和联络方便，他要搬回中南海，以后便在国务院会议厅随时见面。

9月15日的吊唁活动结束后，叶剑英约汪东兴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南侧的一间办公室，又谈起江青的事情。

这天,《光明日报》社临时领导小组负责人莫艾作为毛主席治丧委员会成员,在人民大会堂守灵。在休息厅里,《人民日报》社鲁瑛对莫艾说,“明天有重要社论发表,是传达毛主席的临终嘱咐,解释‘按既定方针办’的。已通知你们《光明日报》到《人民日报》去取清样。”

过了半小时,有人给鲁瑛送来一大卷清样,鲁瑛便给在场的人分发。这就是9月16日要发表的《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社论的清样,题目是《毛主席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莫艾当晚回到报社,立即召开报社领导小组会议,传达鲁瑛同他的谈话,并组织大家学习这篇社论。莫艾根据社论内容,结合宣传报道,又谈了一些报道选题设想。他指示到有关单位组稿。

第二天下午,领导小组分管业务的几个成员和总编室同志一起研究选题问题。领导小组成员孙关龙提出到“梁效”约写一篇“按既定方针办”的文章。大家同意。

9月16日,华国锋召集李先念、吴德、陈锡联、纪登奎、陈永贵等人在国务院会议厅开会。其间,华国锋问到:“毛主席提出的‘四人帮’的问题,怎么解决?”

话音刚落,纪登奎就说:“对这些人恐怕还是要区别对待。”

其他人没再说话。

本来华国锋是想了解这些政治局委员们对解决“四人帮”问题的态度,可是,在当时的情况下,如此范围谈论如此敏感的问题,显然是不行的。华国锋决定改变工作方法,搞“个别串连”,先找信得过的人密商。

9月16日下午15时,中央政治局在中南海怀仁堂正厅开会,讨论毛泽东追悼会的悼词稿。开会前,下午14时多,汪东兴将周启才叫到他在人民大会堂的临时办公室,说:

“有两件事你代我报告国锋同志:一是,今天下午的政治局会议,我不能去参加,我要在这里保护主席的遗体,你替我向国锋同志请假。二是,悼词文稿我看过三遍,认为基本可用。有一条补充意见,就是在悼词文稿的适当地方加上主席讲的‘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这条重要指示。我认为加上主席这条指示,很有必要。”

周启才说:“好。我马上就去怀仁堂,国锋同志一到我就向他报告。”

下午14点50分左右,华国锋到达会场。周启才向他报告了汪东兴请假和对悼词文稿的意见。

下午15时整,华国锋宣布开会后,让周启才把汪东兴对悼词文稿的意见讲一下。

所有到会的其他政治局成员都没有反对。华国锋对姚文元说:“没人提出不同意见,那就把主席这条重要指示加到悼词的适当地方。”

9月16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联合发表社论《毛主席永远活在我们心中》。社论中这样写道:

毛主席与世长辞了。毛泽东思想永放光芒,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深入人心,毛主席开创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后继有人。毛主席嘱咐我们:“按既定方针办。”在沉痛哀悼毛主席逝世的时候,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永远遵循毛主席的教导,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把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进行到底。

按既定方针办,就是按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各项政策办。“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我们的一切胜利,都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胜利。我们党的全部历史表明: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党就发展,革命事业就胜利;违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党就遭挫折,革命事业就失败。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我们都要牢牢记住这个最重要的历史经验,坚定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勇敢地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在整个社会主义时期,要坚持批判资产阶级、批判修正主义,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坚持同党内走资派作斗争。当前,要把毛主席亲自发动的批判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继续深入地开展下去,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进一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只要我们按毛主席路线办,我们就无往而不胜。

在这篇社论中,以黑体字印着“按既定方针办”6个字。按照当时已经形成的惯例:在报纸上,凡毛泽东的话,均用黑体字排印。这“按

既定方针办”既然是用黑体字排印,就表明是毛泽东的话。

这句话,这篇社论的原稿上本来是这样写的:“毛主席在病中嘱咐我们”,姚文元审阅时删去了“在病中”3 字。

当天,叶剑英把《人民日报》送给华国锋。他用红铅笔在“按既定方针办”下面画了一根红杠,然后在旁边打了个大问号“?”。

华国锋看了,并没有在意。

社论发表以后,江青给张春桥打电话:“毛主席的临终嘱咐发表出去以后,有什么反应没有?我已对文元同志强调,宣传工作要以宣传毛主席的‘按既定方针办’为中心,要反复宣传。”

姚文元于 9 月 17 日、19 日、20 日、23 日连续给新华社打电话,要他们宣传好“按既定方针办”。

这天,张玉凤又给汪东兴打电话报告说:“汪主任,江青急于要看主席这里的文件,我不好办啊!你如果有时间最好来一趟,我有事向你当面报告。”

汪东兴放下电话,就驱车从人民大会堂赶到中南海“202”。张玉凤向汪东兴汇报说:“主席逝世后,江青每天都要来毛主席住处找我,多次要看毛主席的九篇文章原稿及修改稿,还要看毛主席的手迹。我觉得不妥,不符合组织手续,我不好随便给,没给她。这两天,江青又来非看文件不可,我只好给她看了。结果江青把毛主席和杨得志、王六生同志的两次谈话记录稿给拿走了。”

汪东兴立即去向华国锋汇报,华国锋问他文件是否重要?

“非常重要。里面涉及到主席关于总参谋长和一批军队高级干部的人选问题,如果扩散出去,会给中央今后的工作造成很大的被动。”

“啊!那你说怎么办?”华国锋问道。

“马上找江青同志要回文件,同时,政治局应指派专人负责保管主席的文字材料,以免流失和损坏。”汪东兴说。

华国锋立即表示同意,并指示汪东兴负责这件事。

汪东兴告诉张玉凤:“立即将这两份材料追回来。中央准备把主席这里保存的文件、材料、手稿等封存起来。”

张玉凤到江青那里要文件,江青写了一个条子给华国锋说,这两份文件很重要,要华国锋批给王洪文、张春桥看。然后将文件转给华

国锋。

华国锋拿到文件一看,上面到处是江青批改的文字。这两份文件本来是毛泽东1974年谈话的原始记录,但正文中却有江青1976年的多处批注,甚至还有这样的话:“对黄、吴、叶、李、邱要进行帮助。”叶群早在1971年9月13日就摔死在蒙古的温都尔汗了,毛泽东1974年谈话怎么还会这样讲呢!

华国锋于是扣下了这两份被江青改动过的文件。

9月17日上午,《光明日报》孙关龙等两位领导小组成员去“梁效”组稿,二人在汽车里讨论,文章应该用一个什么题目?商议结果,题目就定为“按毛主席既定方针办”。到“梁效”处谈了组稿意图后,“梁效”核心组随即按《光明日报》的意图将这一任务交给“梁效”写作组组长范达人。

当天下午,“梁效”给《光明日报》来电话,约定9月20日由范达人来报社谈写作提纲。

9月17日,新华社在发给各省市委、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委、各军兵种、各大军区党委的《内部参考》(第125期)上,报道清华、北大学习两报一刊社论时的讨论情况。

报道引述清华大学政治理论组中年教师黄安淼的发言:“敬爱的毛主席,您临终教导我们‘按既定方针办’……”

报道又引述清华大学工宣队员王玄元的话:“毛主席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刻,还在为我们党不变修、国不变色考虑方针大计。毛主席的嘱咐永远是我们行动的指南。”

也就在9月17日,上海的《解放日报》第五版,在“遵循毛主席的嘱咐按既定方针办”的通栏标题下,用了四个醒目的标题:

“按既定方针办,就要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按既定方针办,就要坚持与走资派作斗争”。

“按既定方针办,就要认真学习,深入批邓”。

“按既定方针办,就要坚持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

《解放日报》是中共上海市委机关报。于是,叶剑英又一次提醒华国锋。

他向华国锋指出:

第一,华国锋过去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曾经传达过,在1976年4月30日毛泽东在会见新西兰总理马尔登之后,华国锋向毛泽东请示工作,说及有几个省形势不大好,毛泽东亲笔给华国锋写了“照过去方针办”六个字。如今被改成“按既定方针办”,6个字中错了3个字;

第二,有人已经在说,“按既定方针办”是毛泽东的“临终嘱咐”。其实,这不是毛泽东的“临终嘱咐”。因为4月30日距毛泽东去世还有四个多月,那时毛泽东还在会见外宾,怎么能说是“临终嘱咐”?

经叶剑英这么一提醒,华国锋开始注意这件事。

9月17日下午,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在人民大会堂新疆厅召开。会议一开始,江青就抢先说:“主席处的文件清理保管工作,因汪主任忙于主席的丧事,无暇顾及,我提议把所有的文件、手迹、文稿及各种材料的清理保管工作统统交远新负责,远新有时间,又熟悉那里的情况。”

她滔滔不绝地讲了很多,还说:“张玉凤过去就不可靠,要偷主席的文件。现在要赶快采取措施,让毛远新来整理毛主席的文件。”

张春桥开始也表示同意,提出让毛远新登记毛泽东的文件、材料。

江青补充说:“毛远新是主席的联络员,懂得主席的思想,我也懂一些。应该让远新整理主席的文件,我也参加。”

王洪文和姚文元也表示同意,说毛远新是最合适的人选。

这时,汪东兴发言:“毛主席处的文件、手迹、文稿、材料以及各种信件,历来都是由中央办公厅负责收、发、保管、存档。从中央苏区长征出来一路上,直到延安,从西柏坡进城到如今都是这样做的。因为主席这里的文件、文稿、手迹、信件是我们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只能由党的有关组织来保管,不应交任何人来负责,毛主席生前确定的这些正确原则,现在仍应继续坚持。因此,毛主席处的文件、档案以及所有的材料,我认为仍应由中央办公厅负责处理。鉴于目前大家都在忙于主席的丧事,我建议现在暂不处理,先把它们封存起来,任何人不经中央批准,不得翻阅和取用。”

华国锋说:“同意将毛主席处的文件、手迹、文稿以及各种材料,按惯例仍由中央办公厅负责清理和保管。目前汪东兴同志的确很忙,同

意先把它们封存起来。”

江青还要反对,张春桥阻止了她。张春桥建议先让毛远新帮张玉凤清理,华国锋和汪东兴都没有同意。张春桥没有再坚持。

没有人再发表不同意见。

华国锋说:“没有什么意见,就这样决定了。”

根据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的决定,当晚20时,汪东兴和秘书高成堂一起,来到毛泽东生前的住处,把毛泽东卧室和书房的进出大门,贴上了加盖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办公厅公章的封条。

加封的时候,汪东兴向张玉凤交代:“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已经做出决定,把毛主席这里的文件全部封存,未经中央批准,任何人都不得违反规定。”

张玉凤说:“这样我就好办了。”

22时左右,江青由钓鱼台来到中南海“202”,看到毛泽东的卧室和书房的大门已被封条封住,气得火冒三丈,大发雷霆,质问张玉凤:“这是谁干的?”

张玉凤回答说:“是汪主任带人来封的。”

江青咬牙切齿地说:“好呀!汪东兴,你搞突然袭击!”

她回去后,马上给华国锋打电话,气急败坏地说:“汪东兴搞突然袭击,把主席的卧室和书房都加封了。这种行动是对我们的不信任。”

华国锋说:“今天下午常委会不是已经做出决定,可以先封存起来。”

江青说:“为什么连个招呼也不打就加封?”

华国锋说:“汪主任执行常委会决定,不需要再打招呼了吧。”

江青又质问“为什么要封主席的房子?主席尸骨未寒,你们就赶我走啊!”

华国锋耐着性子解释说:“办公厅封的是主席放文件的地方,没有赶你走。你有你的房子嘛。”

江青仍不肯罢休,又说:“我建议,明天开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这个问题。”

华国锋说:“我同意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两个问题:一个是毛主席处的文件处理问题,一个是毛远新回辽宁工作的问题。”

# 第1407回：九一八，毛泽东追悼大会 打内战，许世友儿子的信

9月18日下午14时50分，北京百万群众聚集在天安门广场，以最隆重的仪式举行“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追悼大会”。

同样的天安门广场，同样的百万人海，10年前天安门城楼上的毛泽东神采奕奕，广场上的民众更是沸腾不息。

然而10年之后，天安门城楼上已看不到毛泽东的身影，就连他彩色的巨幅画像也变成了黑白两色。广场上的百万民众不再沸腾，整个天安门广场鸦雀无声，静静地等候追悼大会的开始。而这种沉静不仅仅只在天安门广场，整个中国都沉静了……

这个追悼大会真是史无前例，全世界也没有这样规模空前的追悼大会，这天的追悼大会全世界都在关注。

9月18日，毛泽东追悼会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北京百万群众参加

15时整，追悼会开始。沉痛悲伤的哀乐从天安门广场漫涌，滚滚飘向广袤的天际，阴沉的天空下面是臂戴黑纱胸佩白花、悲痛不止的百万群众。他们默默地抽泣，为毛泽东主席的离去而沉痛哀悼。

悲壮的礼炮鸣响了3声，将新中国27年里最高规格的葬礼推向空前的高潮。

在天安门城楼下面正中央架设的追悼会主席台上，党和国家领导人站立成一排，王洪文年轻的脸上挂着和年龄不相称的沉重，今天这位最年轻的副主席要主持建国以来最高规格的追悼会。

华国锋站在王洪文的右侧，他要在百万首都人民面前用他浓重的山西口音宣读悼词。

叶剑英立在华国锋的右侧。短短大半年里，出生入死共同打江山的“老伙计”们一连走了3个，连领导人民打江山的毛泽东主席也走

了。这让他充实了半个世纪的精神世界一下变得空荡荡的……他扯着衣角,凄凉的情绪从他脸上每个纹路里自然地流泻出来。

张春桥站在王洪文的左侧。他的左侧就是裹了一身黑衫,头披长长的黑纱的江青。据说这是“庇隆夫人”式的丧服,黑纱把她的脸遮小了一圈,在这排人里显得极不协调。阿根廷总统庇隆 1974 年死于任内,他的夫人后来成为阿根廷的总统。

此时,整个中国大陆停摆,一切机关、厂矿企业、商店、公社、学校、军队里工作的中国人,一切正在街道上行走的中国人,均就地肃立,静默致哀,厂矿、火车、轮船、军舰均鸣笛 3 分钟。

接着,王洪文说:“现在请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华国锋同志致悼词。”

华国锋用尽可能标准的的山西普通话,一字一句地念起悼词。

华国锋的悼词没有毛泽东“按既定方针办”的遗训。

不久,追悼大会在《东方红》和《国际歌》中宣布结束,前后不到 1 个小时。

9 月 18 日,在追悼大会上。王震对聂荣臻说:“你听到了吧,批邓的调子还蛮高哩,这样下去可不得了,得赶快催促叶帅决断。”

聂荣臻说:“会后我们再去叶公那儿一趟,给他再烧把火。”

9 月 18 日下午 16 时,毛泽东的追悼大会刚刚结束,中央政治局会议又在人民大会堂的东大厅召开。参加会议的绝大多数政治局委员同意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的意见:毛泽东处的文件、档案,由中央办公厅负责清理和保管。目前因工作繁忙无暇整理,可先封存起来。至于毛

远新,应同意他回辽宁工作。

当天,聂荣臻来到小凤翔叶剑英家中。他对叶剑英说:“我们这些老家伙流血牺牲,跟着毛主席、周总理这些老革命家打出来的天下,决不能被那帮野心家、阴谋家篡夺。”

这天,王洪文的秘书肖木是从钓鱼台步行去天安门广场参加毛泽东逝世追悼大会的,足足走了三、四个小时。他是想收集民众对毛泽东逝世的反应,为自己写小说积累资料。追悼大会结束后,他回到住处,接到张春桥的电话,要他过去。张春桥平时与别人很少私人交往,能说话的人不多。肖木讲起自己步行一路的见闻,说毛主席逝世,大家都很哀痛并担忧中国的未来。肖木讲述时,张春桥不时地插些话。

9 月 19 日,姚文元给新华社的电话说:“你们处理各省市在追悼会上的重要讲话、表态,不要怕重复。重要的都要写进去。比如‘按既定方针办’,凡有这句话的都要摘入新闻,没有的要有类似的话……关于‘三要三不要’,消息中提到的要保留,没有的也就算了。”

于是,9 月 19 日,新华社关于 28 个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举行的追悼毛泽东大会的报道中,全部都写及了“按既定方针办!”中国大大小小的报纸上,印满黑体字“按既定方针办!”《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甚至多次用“按既定方针办”作头版通栏标题。

“按既定方针办”是“上海一千万人民的战斗誓言”之类话,也不断见报。

华国锋看到报纸上天天在登“毛主席指示”“按既定方针办”,又风闻张春桥说是毛泽东临终“拉着”他的手说的,开始意识到这句话背后的严重事态。

9 月 20 日,上海徐景贤接到卫生部部长刘湘屏的电话,要他带上海第一医学院的几位专家、教授,搭乘专机赶往北京,参加卫生部召开的毛泽东遗体保存研讨会。

徐景贤打电话请示张春桥同意后,连夜带上海的专家乘飞机来到北京。会议在人民大会堂小会议厅举行,由刘湘屏主持,开了一个通宵,结束时天已大亮。

徐景贤在会议快结束的时候,给张春桥通了电话,张春桥约他下午到钓鱼台去。9 月 21 日下午 14 时,张春桥的驾驶员开了一辆大红

旗轿车到人民大会堂,把徐景贤接到了钓鱼台九号楼。

九号楼楼下是大客厅和工作人员用房,二楼外间是张春桥的办公室兼小会客室,里间就是他的卧室。住所布置得简单、朴素,外间的办公室兼会客室里,中央放一张小圆桌,四周是四张软椅;临窗的一边安着一张办公桌,桌面上有一些活页夹。卧室里几乎没有什么家具,一张普通的双人床,两只小沙发,看得出主人的生活是简朴的。

张春桥让徐景贤在小会客室背窗的一只软椅上坐下。徐景贤向张春桥汇报了南京军区司令员丁盛提供的有关60军对上海构成威胁的情况。

丁盛8月去舟山群岛及长江口外,属上海警备区管辖的大、小洋山岛视察。视察后,他从吴淞口登岸,下榻在上海警备区所属的延安饭店。8月8日晚上20时左右,马天水、徐景贤和王秀珍知道丁盛在上海,相约去看他。

9月3日,丁盛再次来到上海,在延安饭店碰巧又遇到马天水等人。马天水问起,上海市委曾给南京军区转去一封信,是60军驻无锡部队一个什么人写的。信中说,在部队招待所查出了4个箱子,不知放了什么东西。马天水问丁盛收到转去的这封信没有?

丁盛回答说:“收到了。”同时说起军区也收到一封信,是许世友的儿子写给某医院一位护士的,信上说到毛主席百年后要打内战,丁盛说:“打内战可不得了,军区已将这封信送中央,送给陈锡联了。”

这封信,也报到了王洪文那里。信中说:

“前几天我见到爸爸,他对我说,主席逝世后,中国可能要发生内乱,主要是争夺最高领导权。如果北京有人闹事,他就率部队北上,占领北京城,控制中南海和钓鱼台,把那几个人全抓起来,统统杀掉。爸爸说,这些‘上海帮’坏透了,靠着有主席撑腰,恃权仗势,横行霸道,干尽了坏事,现在主席没了,他们也快完蛋了。爸爸还说,别看王洪文是军委副主席,张春桥是总政治部主任,军队没人听他们的,枪杆子全抓在我们手里,他们只能调动几个民兵师,成不了大气候。爸爸说,他只用一个军,就能把上海民兵吃掉。他把六十军摆在无锡,就是盯着上海的。”

据1980年7月12日王洪文在审讯时说:他看到这封信后,首先找

到毛远新,把这封信给他看了,毛远新建议以拉练的名义从沈阳军区调两个师到北京附近。

王洪文点头表示同意,又担忧地说:“远水解不了近渴,关键时刻还得靠民兵。”

于是,他又找到北京民兵指挥部的马小六和张世忠,让他们连夜调集3000名武装民兵,秘密住进中南海东侧的中山公园里,待命行动。同时,向北京公安局长刘传新和公安部副部长祝家耀通报了这个情况,指令他们派出大量便衣警察和巡逻车,对钓鱼台、中南海、人大会堂等几个重要场所进行重点守卫……

随后,王洪文又把信拿给张春桥看。

此时,徐景贤又对张春桥说:“丁盛还讲,驻在南京到苏州一线的60军他指挥不动,对上海有威胁,让我们要有所准备。”

徐景贤还向张春桥汇报了马天水已经向上海民兵增发枪支的情况。

张春桥听得很仔细,还问了60军领导人的情况。

在谈到上海的工作时,张春桥说:“要谨慎小心,特别是你们几个人讲话要注意。”

他特别关照说:“你回去再跟老马说一说,南京路上出现过的大字报(指要张当总理的大字报)再也不能贴了,这是毛主席单独向我作过指示的。今年年初我已经给老马打过电话了,你再说一下”。

张春桥对徐景贤说:“毛主席去世了,要有像毛主席那样有威望的领袖是不可能了。上海还没有经历过如林彪上台那样的考验,如果我有什么事情总是要连累你们的。”

徐景贤问张春桥:“最近身体怎么样?我们在电视里看到你为毛主席守灵的时候,几次用手抚摸心脏部位,是不是胸口发闷,有没有去检查过心脏?”

“当时我自己没有意识到。”张春桥笑笑说,“后来电视放出来我也看到了,可能那几天实在太累了。”

“还是要注意身体,现在有没有机会出去活动活动?”

“整天除了看文件,批文件之外,就是开政治局会议的时候出去一下。”

张春桥吸了一口烟,继续说,“不过最近我每天早上,在钓鱼台院子里走上一个小时,绕几个大圈子,坚持散步。”

“文元同志搬走以后,可以谈话的人就少了……”徐景贤说到。

“是呀,有时候我坐在这里看文件,一整天只说6个字:早晨服务员送早餐来,我说‘谢谢’,中午又是‘谢谢’,晚上还是‘谢谢’,这样,一整天3句话,6个字就过去了。没有什么人来,真的是‘门可罗雀’。”张春桥说到这里,长长地吁了一口气,又像叹息,又像自嘲。

听到这里,徐景贤深深地感到张春桥的寂寞和孤独:妻子离了婚,孩子不在身边,自己又没有什么特殊的嗜好,既不爱打牌,又不打网球,当了中央首长更不能随意外出,他是个爱聊天的人,目前的这样一人独处的日子实在难挨,不禁对他的处境寄于莫大的同情,他确实尽快需要“找个伴”,他已经59岁了。

谈话谈到这里,火候也到了,徐景贤当即把话转入了正题:“春桥同志,上次你写信要我办的事,我做了努力,但觉得很没有把握,今天想当面把情况向你介绍一下……”

张春桥轻轻地“嗯”了一声,便不再说话,一双眼睛在镜片后面微微地垂下眼帘,仿佛在凝视着远处的什么地方。但是,看得出他是全神贯注很仔细地在谛听。

徐景贤把找“对象”的过程作了概要的介绍,然后着重谈了他相中的那位女士的基本情况,叙述了和她直接接触的印象。当谈到该女士写的那份调查研究的专题汇报,就是经张春桥作了批示后在报纸上公开发表的时候,张春桥颇感兴趣地抬起头来问了一声:“是吗?”

徐景贤如实地介绍了该女士的政治水平和文化素养,也不加隐瞒地谈了她的相貌很普通以及她过去离异的原因……最后,徐景贤说他并没有把任何底细透露给该女士本人,而是想先听听张春桥的意见,如果可以考虑的话,他再和她接触,当然还要看她自己是否愿意。

张春桥从头至尾听完了徐景贤的介绍,沉默了片刻,深深地吸了一口烟,缓缓地说:“这件事今天先不定,我再考虑一下,以后再告诉你。”

徐景贤说:“那好,如果需要的话,我把她的档案材料调出来,那上面还有照片,一起送你看看。”

张春桥微微颔首。这次当面介绍的谈话就算结束。

徐景贤也将毛泽东遗体保存研讨会的情况向王洪文作了汇报。

1976 年 9 月 21 日联合国第 31 届会议开幕,全体代表起立哀悼毛泽东逝世

# 第1408回：华国锋，定决心抓“四人帮”下西山，叶剑英“狡兔三窟”

1976年9月21日，杨成武去看望已从西山返回城内的聂荣臻，报告了叶剑英的情况。聂荣臻对他说：“他们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要有所警惕，防止他们先下手。如果他们把邓小平暗害了，把叶剑英软禁了，那就麻烦了。他们依靠江青的特殊身份，经常在会议上耍赖，蛮横不讲理，我们只有采取断然措施，才能防止发生意外。”

聂荣臻让杨成武赶紧返回西山，把这个意思转达给叶剑英，并说：“这个意见，我们上次在西山议论过了，事不宜迟！”

杨成武连夜上山去见叶剑英。叶剑英怕隔墙有耳，把杨成武领到房前的小花园里，杨成武报告了聂荣臻的原话。

叶剑英听后，高兴地说：“听明白了，听明白了。”并说：“告诉聂总，请他放心。他跟我想到一起来了，有事随时通报商量。”

他还对杨成武说：“华国锋现在是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是毛泽东指定的接班人，所以要注意争取得到华国锋的支持。”

他还诙谐地说：“狡兔三窟哟，我要立即搬家。你告诉聂总，也要注意安全。”

9月21日晚，江青、张春桥以推荐中央办公厅副主任、中央警卫团副团长李鑫出任中央警卫团长为名，让李鑫详细汇报警卫团的人员编制，武器配备、警卫布置情况。张春桥对政治局委员居住地点和警卫情况询问得尤为仔细，并一一记录，还要求李鑫把中南海和人民大会堂警卫部队的动向每天向江青报告。李鑫满口答应后，即把江青和张春桥找他谈话的内容全部向汪东兴和华国锋作了汇报。华国锋当即提出以召开中央全会的方式解决“四人帮”问题，汪东兴以赫鲁晓夫利用召开全会把马林科夫搞下台的教训告诫华国锋：“中央委员里支持他们的力量要比你的多。”

李鑫则明确建议华国锋:“采取特殊手段、学苏共中央抓贝利亚的办法,把‘四人帮’秘密逮捕。”

为保密,华国锋当夜亲自前往李先念家中,请李先念向叶剑英转达:“我决心已下,请叶帅尽快下山来商定对策。”

当晚,叶剑英来到华国锋家。

这天,叶剑英与华国锋进行了历史性的晤谈。他首先解释了未与李先念深谈的原因,然后俩人进行两个小时的长谈。

华国锋谈了自己工作的困难,谈了最近发生的几件麻烦事:一件是王洪文在紫光阁安了新的电话,以中共中央办公厅的名义要求全国有问题时和他联系,这等于另搞了一个中共中央办公厅;一件是江青拿走毛泽东文件的事。最后他感叹地说:“他们完全不把我放在眼里,和他们共事实在是难。真要对付江青和那几个人,又怕影响了团结,影响了毛主席的形象,所以左右为难。”

叶剑英建议华国锋参照林彪事件之后,周恩来处置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的“先动手、后开口”模式解决“四人帮”。周恩来当时的做法是:把“四大金刚”调到人民大会堂开会,在会议上突然宣布他们的罪行,把他们当场逮捕,关押起来,然后再召开政治局会议做出决定。

华国锋对叶剑英说:“叶帅,你讲的那些我都赞成。不过,党内还有那么多老同志,不知道他们的意见怎么样?”

叶剑英说:“你应该多到老同志那里去走走,多找他们谈一谈,沟通思想,统一认识。”

华国锋有点为难地说:“叶帅,我这个人在老同志面前,论党龄,我是晚辈。论年龄,我也是晚辈。我去找他们,他们不理怎么办?”

叶剑英明确地说:“我支持你。你去找他们,我先帮你打招呼。只要你能站出来斗争,老同志们不会不支持。”

听到这话,华国锋“噌”地一下从沙发里站了起来,说:“只要你支持我,老同志支持我,我就干!”

当晚,叶剑英回到西山,立即打电话把粟裕、宋时轮两位将军叫到住地,高兴地对他们说:“今天我说服了华国锋。先给你们吹吹风,打

个招呼。”他用手指着粟裕说:“华可能找你,你做好准备,好好同他谈谈。”

粟裕说:“我们担架、草鞋都准备好了。”

原总政副主任刘志坚此时已解放,还没有分配具体的工作。他多次去见叶剑英,建议“先下手为强”。

总政副主任梁必业也是建议党中央采取“紧急情况”的支持者。

同时,叶剑英还与空、海军领导人张廷发、吴富善、肖劲光、苏振华以及北京军区、北京卫戍区的傅崇碧、吴忠、吴烈等领导人保持密切联系,要部队加强战备。

海军司令员肖劲光给叶剑英办公室打电话,只有一个要求:“速见叶帅!”叶剑英称肖劲光为“急先锋”,在小翔凤驻地与他见面。肖劲光一进门便说:“叶副主席,事不宜迟,再不动手,他们就要动手了!”

身为军委办公会议成员的张春桥分管海军,但海军司令员肖劲光根本不卖张春桥的账,两三个月也不向他汇报。有一次张春桥开会批评海军,批了一上午,肖劲光一声不吭,叶剑英也不发表意见。到了中午散会,肖劲光径直走到叶剑英面前,只跟他告别,好像其他人根本不存在,这让一旁的张春桥很是尴尬。

9 月底的一天,叶剑英办公室主任王守江来医院看望张廷发,传达叶剑英的话:“病要治,部队也要管。”张廷发当天就出院,到作战值班室坐镇,加强对飞行训练的具体领导。

9 月 22 日上午 10 时,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召开政治局会议,全体政治局委员都参加,由时任北京 305 医院的院长李志绥代表毛泽东的医疗组,向政治局汇报毛泽东的治疗过程和死亡原因。由于报告中涉及很多的医学名词,很多的政治局委员不明白,便不断打断报告进行仔细询问。

当汇报到 6 月下旬毛泽东病危时,许世友突然站起来问:“主席身体上为什么有青黑斑? 这是什么原因?”

医疗组人员解释说:“主席病危末期,呼吸困难,全身严重缺氧,所以才有这些现象。”

许世友听完后,满脸不相信的问道:“我打了几十年的仗了,见的

死人比活人还多,没有见过这个样子的。9月9日下午我去见主席遗体,看到这些青黑斑,我就问过主席生前有多少伽玛,现在又有多少。人都有24个伽玛,主席有多少,你们完全回答不出。”许世友接着又讲:“主席是被毒药毒死的,毒死的才有青黑斑,要审医生护士,是谁下的毒。”

在场的人全都一愣,你看我,我看你,没想到许世友竟说出这样一句话,这分明是怀疑毛泽东是被人害死的,医疗组的人都吓了一跳,这样的罪名是任何一个人都承担不起的。汇报的人员又结结巴巴的解释了一通。

许世友又说道:“肯定是上下勾结,串通一气,用毒药暗害?这非彻底查清楚不可。”

一下子全场都静下来。许世友在屋子中间双手插腰,边说话边转过头看着江青等人。

江青仍然穿着一套黑色套服,坐在沙发上两眼直看着许世友,一脸迷惑的样子。

华国锋向周围看了看,紧张地挺起了身子。叶剑英和旁边的李德生回过头来低声问医疗组的成员:“毛主席遗体上的青黑斑是怎么回事?”医疗组的成员小声的解释了几句。

这时,只见江青站起来说:“许世友同志,主席的医疗组辛苦了几个月了,你让他们把报告说完。”

王洪文也站起来说:“主席病危起,国锋、春桥、东兴和我就一直轮流值班……”

许世友将上衣的两个袖子捋到肘上,走到桌前,右掌猛地一拍茶桌,将茶杯都震翻到地毯上,大声吼道:“政治局会议不许政治局委员发言提问题,你们捣的什么鬼?”

华国锋立即说:“世友同志不要发急,有话慢慢讲。”

他让医疗组的人先回去。

江青气的满脸通红,说不出话来。汪东兴起身把许世友拉了回去,劝了几句。许世友仍然怒气冲冲。局面僵持着,华国锋见没人说话,便同旁边的叶剑英商量了两句,然后宣布会议结束。许世友同华

国锋和叶剑英打了声招呼便径自离开了。

9月23日,王洪文也住进西山紧挨着叶剑英那座宽大的15号庭院旁边的一座25号高楼里。从这里,可以清清楚楚看见叶剑英15号院子里的一举一动,就连进进出出的轿车号牌都可以准确无误地记录下来。

叶剑英知道王洪文的到来后,就搬到玉泉山9号楼去了。

过了一天,王洪文发现叶剑英不见了,一打听,才知道叶剑英又搬到玉泉山了,他跑去问汪东兴:“叶剑英怎么搬到玉泉山了?”

汪东兴告诉他:“9号楼是周总理住过的。他生前交待让剑英同志住那栋房子。”

在玉泉山期间,叶剑英行踪不定,独自往来于西山、玉泉山、军事科学院2号楼、城内后海小翔风之间,行踪莫测,有时候一晚上可以搬三次家,刚安顿好,躺下半小时,突然间一个电话:走,又搬家。又搬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他身边的工作人员也搬习惯了,身边的东西,都是随手一提就可以走的那种。他利用各种条件和时机继续约一些老干部个别商谈。有时一天之内要交谈多次。与倪志福的交流就是借垂钓之机进行的。

9月23日,王洪文的秘书肖木派机要员给上海市委写作组负责人之一的王知常送去一封信,信中写的主要是张春桥9月18日晚同肖木谈话的内容。根据当时的笔记和回忆,大意如下:

朱、王、王、陈、顾、章:

九月十八日晚,春桥同志找我谈了一次话,内容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我对春桥同志说:毛主席逝世后,处处都感到毛主席不在了,有一种失落感。春桥同志说:毛主席处处不在又处处在,毛主席虽然逝世了,但是他老人家的路线、制度、政策都留下来了。春桥同志又说:毛主席的身体是被邓小平搞坏的。邓小平欺骗主席,大搞翻案,被主席察觉,只好带病领导和发动了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硬是把身体累垮了。光凭这一点,邓小平的罪也就够重的了。

二,我劝春桥同志要为人民多保重自己的身体。春桥同志说:毛主席逝世,我心中难受得受不了,胸中时常感到气闷,守灵时用手摸了

一下胸口,啊呀!谁知被电视台的记者拍摄进镜头里了,引起好多人的不安。第二天,我看见春桥同志在院子里散步了。

三,我对春桥同志表示担心目前的形势,特别是军队不在这边。春桥同志说:现在的形势不能同马克思逝世时比,也比列宁逝世时的形势好得多,当年托洛茨基是红军总司令,威信比斯大林高得多。邓小平虽被打倒了,但资产阶级还有力量,问题在于谁挂帅。目前资产阶级的力量还没有集结起来,缺少挂帅的人物。

四,我问春桥同志:中央今后会出现怎样的局面?春桥说:主席不在了,看来今后中央只可能是靠集体领导了。如果今后要出修正主义,还是在上层,在中央,在党内的资产阶级。要吸取苏联的教训,警惕修正主义上台。苏联现在变修了,将来还是会出列宁的。中国即使修正主义上台,将来也还会出列宁。

五,我讲到主席逝世后,外地有些坏人关门饮酒,引起群众气愤,上门惩罚。春桥同志说:我倒担心这方面搞得太过分了,当然群众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人民是好的。有这样好的八亿人民,一定会涌现出自己的领袖。目前最困难的就是现在这一段时期,只要把这一段时期度过去就好了。现在要出邓小平这样一个人是不可能的,人民一定会起来反对的。

六,我对春桥同志说:广大群众普遍希望能尽快出版《毛泽东选集》五、六卷。春桥同志说:毛选五卷的书稿已被胡乔木搞得面目全非,目前要出有困难。还是考虑出单篇,一篇一篇出的好。国庆前争取选出毛主席论接班人五条标准的。

七,春桥同志对我说:主席逝世时,苏修也发来唁电。这样大的事外交部也不请示报告,竟然收下了,最后是我从外电消息中发现了这一情况,才让他们把苏修的唁电退了回去。

八,我谈到现在人们普遍对形势感到担心。春桥同志说:要树立信心,今后还是要强调批邓,要讲团结,这是大方向。你转告上海的同志们,要振奋精神,努力工作,准备斗争。

此信阅后即毁,不然,小人苦哉,大人苦哉!

萧木一九七六年九月十八日夜

信中提到的朱、王、王、陈、顾、章即:朱永嘉、王知常、王绍玺、陈冀德、顾澄海、章树焜。这6个人都看了此信。徐景贤也看了,是朱永嘉给他送去的。章树焜是最后一个看的,他看后王知常就将此信烧毁了。

章树焜在看信时将原文抄录在笔记本上。上边的文字就是根据章树焜笔记本上的抄页恢复的。

肖木后来解释他最后的那两句话“小人苦哉”,是因为张春桥并没有让他转达这些话,他怕张春桥知道后责怪,所以他要朱永嘉看后即销毁;“大人苦哉”,是担心如果自己对张春桥的这些话回忆或理解有误,会给张春桥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9月23日下午15时30分,江青通过刘秘书的联系,把张玉凤接到钓鱼台11号楼的会客室。等了30分钟,江青把张玉凤引到办公室坐下。

张玉凤问江青:“毛主席他老人家逝世后,我们党的主席怎么办?”

江青说:“党的主席未定。中央在开会,许多事情要讨论,斗争很激烈。你要清醒些,知道吗?”

张玉凤说:“知道。”

江青说:“党的主席中央要讨论,要党的全会决定。”

张玉凤说:“我想是你的。”

江青说:“阶级斗争很复杂啊!”

“怎么个复杂法?”张玉凤问。

江青说:“同修正主义斗,同走资派斗,要注意斗争策略。”

在这之后,江青又把毛泽东长征时的警卫员、江西省军区司令员陈昌奉接到钓鱼台11号楼,嘱咐他说:

“你是老红军,主席的警卫员,跟毛主席,拥护主席的。主席逝世后,你跟谁? 拥护谁?”

不等陈昌奉回答,江青接着就说:“要跟我,拥护我!”

陈昌奉说:“拥护你!”

江青很高兴:“是嘛! 我在文化大革命、批林批孔、反击右倾翻案风中,是正确的,你是知道的。”

陈昌奉又问江青:“我该怎么拥护你呀?”

江青说:“你要做工作,做宣传。你有部队干部,有老战友,都可以向他们做工作,但不要在大会上讲拥护我。”

9月24日,原康生办公室秘书、毛泽东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副主任、中央办公厅副主任李鑫,拿着姚文元写给他的一封信,找到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

原来,9月15日,在中央一次会议上,姚文元问负责编辑《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李鑫:“毛选五卷中多少篇是毛主席的手稿,有多少是整理稿?”

过了一个星期,姚文元又写信给李鑫,要李鑫将毛选五卷的文稿送给他。于是,9月24日,李鑫带着姚文元的信找到汪东兴。经过商量,9月25日,李鑫又把姚文元写给他的信,送给华国锋,建议党中央直接抓《毛泽东选集》五卷的出版工作,并要求面见华国锋。

9月26日晚上,华国锋约李先念和吴德谈话,说了他打算解决“四人帮”的决心。李先念马上表示支持,吴德也表示同意。

吴德说:“解决的办法,无非是两种,一是抓起来再说,二是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用投票的办法解除他们担任的职务。”

吴德开始偏重主张用开会的办法来解决,说:“我们会有多数同志的支持,反正他们最多只有四张半的票。在政治局投票,我们是绝对多数,过去他们假借毛主席的名义压我们,现在他们没有这个条件了。”

他说的那个“半票”是指政治局候补委员吴桂贤,她当时是政治局候补委员,没有表决权。

开会又分两种方式:一是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投票决定;二是召开中央全会投票决定。

李先念问吴德:“你知道赫鲁晓夫是怎么上台的吗?”

吴德说:“当然知道。赫鲁晓夫在苏共中央主席团是少数,莫洛托夫、马林科夫是多数。赫鲁晓夫借助朱可夫的支持,用军用飞机把中央委员从各地接来开中央全会,在中央全会上赫鲁晓夫的人占了多数,莫洛托夫、马林科夫遭到失败,被打成反党集团。”

吴德和华国锋明白了李先念的意思,他们分析了当时中央委员会成员的情况,都认为:在政治局开会投票解决“四人帮”的问题,有把握;但在中央委员会投票解决“四人帮”的问题没有把握,风险太大。因此,采取隔离审查的办法才是上策。

他们还分析了全国形势,认为“四人帮”在群众中是孤立的,在军队里是没有力量的。

那么,什么时候解决“四人帮”的问题呢?李先念和吴德都同意华国锋提出的“早比晚好,愈早愈好”的提议。考虑到毛泽东主席的治丧活动刚刚结束,全国人民的悲痛情绪还未调整过来,3 人初步议定:国庆节后,准备 10 天,然后再动手。他们的讨论一直持续到第二天凌晨 5 时才结束。华国锋再次委托李先念将他们 3 人的密商结果通报叶剑英,叶剑英获悉后,表示完全同意。

# 第七部上卷
# 各地文革章回索引

**北京：**

第 1378 回；第 1379 回；第 1382 回；第 1385 回；第 1387 回；第 1388 回；第 1389 回；第 1390 回；第 1392 回；第 1393 回；第 1395 回；第 1402 回；第 1405 回；第 1407 回；

**反击右倾翻案风：**

第 1370 回；第 1371 回；第 1372 回；第 1373 回；第 1374 回；第 1375 回；第 1376 回；第 1378 回；第 1379 回；第 1380 回；第 1381 回；第 1382 回；第 1383 回；第 1384 回；第 1385 回；第 1391 回；第 1392 回；

**清华大学：**

第 1370 回；第 1371 回；第 1372 回；第 1375 回；第 1385 回；

**空军：**

第 1370 回；第 1407 回；

**邓小平：**

第 1370 回；第 1371 回；第 1372 回；第 1373 回；第 1374 回；第 1375 回；第 1376 回；第 1379 回；第 1391 回；第 1392 回；第 1397 回；

**文艺：**

第 1370 回；第 1371 回；第 1372 回；第 1376 回；

**中美关系：**

第 1371 回；第 1376 回；第 1377 回；

**四人帮：**

第 1371 回；第 1374 回；第 1376 回；第 1377 回；第 1384 回；

第 1387 回;第 1394 回;第 1396 回;第 1400 回;第 1401 回;
第 1402 回;第 1404 回;第 1405 回;第 1406 回;第 1407 回;
第 1408 回;

**农口:**

第 1370 回;

**教育革命:**

第 1371 回;第 1373 回;第 1378 回;

**国防科委:**

第 1373 回;第 1375 回;第 1379 回;第 1393 回;

**中央军委:**

第 1382 回;第 1393 回;第 1407 回;第 1408 回;

**外事口:**

第 1376 回;第 1396 回;第 1403 回;

**老干部:**

第 1376 回;

**上山下乡:**

第 1382 回;第 1395 回;

**工交、铁路:**

第 1384 回;

**北京大学:**

第 1385 回;

**海军:**

第 1407 回;

**上海:**

第 1374 回;第 1382 回;第 1384 回;第 1385 回;第 1393 回;
第 1396 回;第 1407 回;第 1408 回;

**天津:**

第 1400 回;第 1401 回;

**华北地区：**

**河北：**

第 1381 回（保定）；第 1393 回（保定）；第 1397 回（保定）；
第 1398 回（唐山）；第 1399 回（唐山）；

**山西：**

第 1400 回；第 1401 回；

**东北地区：**

**吉林：**

第 1393 回；

**黑龙江：**

第 1404 回；

**西北地区：**

**甘肃：**

第 1380 回；

**西南地区：**

**四川：**

第 1371 回；第 1376 回；第 1381 回；第 1382 回（重庆）；第 1385 回；
第 1399 回（重庆）；

**贵州：**

第 1384 回；

**云南：**

第 1381 回；第 1395 回；第 1396 回；

**中南地区：**

**河南：**

第 1380 回；第 1386 回；第 1392 回；第 1397 回；第 1398 回；

**湖北：**

第 1383 回；第 1384 回；第 1385 回；第 1392 回；第 1404 回；

**湖南：**

第 1397 回；

**广东：**

第 1385 回；

**华东地区：**

**江苏：**

第 1384 回；第 1385 回；第 1387 回；第 1388 回；第 1407 回；

**浙江：**

第 1370 回；第 1381 回；第 1384 回；第 1385 回；第 1395 回；

**江西：**

第 1381 回；

**福建：**

第 1381 回；第 1384 回；第 1398 回；

# 文革史话

## 之

## 第七部

# 大幕落下

下卷

刘朝驹　著

中国文化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文革史话之第七部大幕落下 / 刘朝驹著. --香港:中国文化出版社,2021.9

ISBN 978-988-15988-6-8

Ⅰ. ①文… Ⅱ. ①刘… Ⅲ. ①纪实文学-中国-当代 Ⅳ. ①I227

| | |
|---|---|
| 书　　名 | 文革史话之第七部大幕落下 |
| 作　　者 | 刘朝驹 |
| 出　　版 | 中国文化出版社 |
| 发　　行 | 中国文化出版社　发行部(00852-21962638) |
| 总社地址 | 香港九龙弥敦道208-212号四海大厦 |
| 经　　销 | 香港九龙书店 |
| 总 编 审 | 中国文化出版社国内编审处 |
| 出版策划 | 宋艳丽 |
| 印　　刷 | 北京云迪印刷有限公司 |
| 开　　本 | 787×1092　1/32 |
| 印　　张 | 10 |
| 字　　数 | 308千字 |
| 版　　次 | 2021年9月第1版第1次印刷 |
| 书　　号 | ISBN 978-988-15988-6-8 |
| 定　　价 | 60.00元 |

您若想详细了解我社的出版物

请登陆我们出版社的网站 http://www.zgwh.cn/

# 目　录

## ◇上　卷◇

第 1370 回:国庆节,毛泽东由衷感叹
告迟群,农村过渡争议大 …… 313

第 1371 回:刘冰信,毛泽东颇不满意
未曾说,科技就是生产力 …… 322

第 1372 回:毛远新,开会帮助邓小平
清华园,楼内贴满大字报 …… 329

第 1373 回:八人会,继续批评邓小平
急召回,张爱萍就不认错 …… 335

第 1374 回:王洪文,十五日回到北京
刘冰等,参加政治局会议 …… 343

第 1375 回:清华园,召开万人批判会
“打招呼”,卫星升天再收回 …… 349

第 1376 回:见福特,张爱萍住进医院
康生逝,毛泽东坚持斗争 …… 359

第 1377 回:七五年,国民经济大发展
噩耗至,周恩来总理逝世 …… 367

第 1378 回:举国悲,周恩来遗体告别
北京城,十里长街送总理 374

第 1379 回:追悼会,毛泽东没有出席
选总理,毛泽东反复权衡 383

第 1380 回:二月二,中央下一号文件
召豫、甘,谈两地铁路问题 390

第 1381 回:春节后,“总理遗言”传全国
“转弯子”,北京开五省会议 398

第 1382 回:再召开,十二省“转弯子”会
找秘书,徐景贤上报材料 407

第 1383 回:先念病,李素文主管财经
江青忙,招十二省区领导 414

第 1384 回:看江城,再掀反击翻案风
追万里,《文汇报》“三五事件” 422

第 1385 回:小学生,抬花圈到天安门
三二五,《文汇报》再遭质疑 429

第 1386 回:看河南,大字报直指刘、纪
接建勋,政治局当面批邓 439

第 1387 回:南京市,悼总理群情激奋
大标语,明确打到张春桥 446

第 1388 回:清明节,雨花台数万之众
天安门,广场上花海诗潮 453

第 1389 回:政治局,忙开会紧急研究
做决定,要连夜撤走花圈 460

第 1390 回:冲会堂,广场上人潮汹涌
调民兵,北京市“四五事件” 466

第 1391 回:邓小平,再次被撤销职务
华国锋,党内第一副主席 475

第 1392 回:汪东兴,安排转移邓小平
为花圈,郑州有人被打死 481

第 1393 回:叶帅府,老干部来往频频
保定乱,陨石雨引发感慨 488

第 1394 回:告康生,章含之写揭发信
说江青、张春桥都是叛徒 496

第 1395 回:“怀疑论”,《北京日报》大讨论
要追查,《总理遗言》的作者 503

第 1396 回:华国锋,毛泽东写三句话
“亲启”信,景贤为春桥“找伴” 511

第 1397 回:湖南乱,保定农民开进城
朱德逝,叶剑英看华国锋 519

第 1398 回:七月七,皮定均飞机失事
七二八,中国唐山大地震 529

第 1399 回:急救灾,华国锋赶赴唐山
重庆市,百余干部奔成都 536

第 1400 回:山西省,书记王谦戴高帽
到天津,江青三下小靳庄 545

第 1401 回:见李敏,毛泽东依依不舍
到大寨,江青连夜回北京 552

第 1402 回:九月九,一代巨星陨东方
保遗体,政治局紧急会议 559

第 1403 回:闻噩耗,神州大地同悲哀
唁电多,五大洲为之震动 566

第 1404 回:齐哀悼,一个时代的结束
政治局,研究追悼会事宜 572

第 1405 回:华国锋,看病去见李先念
张平化,质疑米士奇电话 580

第 1406 回:上西山,李先念见叶剑英
争文稿,说“按既定方针办” 588

第 1407 回:九一八,毛泽东追悼大会
打内战,许世友儿子的信 594

第 1408 回:华国锋,定决心抓“四人帮”
下西山,叶剑英“狡兔三窟” 601

**第七部上卷各地文革章回索引** 612

# 第1409回：天安门，召开国庆座谈会 通情况，华国锋紧锣密鼓

1976年9月27日，江青带着1个警卫排，卡车上还装着几匹马，在谢静宜、迟群陪同下，来到清华大学团河农场。江青说，此行是看望教工，参加劳动。

9月27日晚饭后，肖木打电话给张春桥的机要秘书严忠实，说他要回上海，问张春桥有什么要交待的？严忠实当即报告张春桥。张春桥说："叫肖木来吧。"

大约是晚上8点多钟，肖木到钓鱼台9号楼张春桥住处的办公室，那天晚上张春桥与肖木谈了许多，谈到毛泽东对他的培养，谈了如何保护毛泽东的遗体，如何修建毛泽东的纪念堂，如何出版《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事情。但谈得最多的还是当时的形势。张春桥认为"资产阶级还有力量"，他们不愿自动退出历史舞台，这是中国当前很大的一股"危险"力量，必须像列宁所说的那样，"对资产阶级使用铁的手腕"。张春桥说：

"多难兴邦。"

"要提高警惕，要提高信心。"

"要看到资产阶级还有力量。"

张春桥还高度赞扬了上海的民兵武装，说这是一支有高度觉悟的工人组织，并要肖木转告上海的骨干分子，要作好准备，要经受考验。他说：

"上海还没有真正经受过严重考验。林彪、邓小平要搞上海，都没有搞成。林彪搞成的话，上海有大考验，要打仗。"

对于批判邓小平，张春桥更是念念不忘，语气中表现出对邓小平的仇恨和担心，并一再地强调，现在关键是由谁来担任接班人，如果这个班接不好，中国就会出现资本主义复辟，邓小平就会重新上台……

一向言语不多的张春桥这天晚上显得很健谈,情绪显得很不稳定。他们一直谈到23时多。

肖木临走时,张春桥对肖木说:“还有一件事情,想请你再次去找一下马老和景贤同志,请他们再抽空出面找文静谈一谈,尽快地将我们离婚的事情办了。”

张春桥强调:“你告诉马老他们,我没有别的什么要求,财产、孩子全归她,只要能离婚就行。必须要离,而且越快越好。”

9月28日,肖木从北京到上海,一下飞机就直接从机场赶到康平路市委常委学习室。将当时在上海的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王少庸、冯国柱、张敬标6名市委常委全都找来,详细传达了张春桥9月27日晚同他的谈话内容。当时,徐景贤在笔记本上作了记录:

阶级斗争形势要经常研究,一方面要提高警惕,一方面要提高信心。马克思主义刚出来时,中国这么一个大国还没有人知道。后来到了列宁,中国懂得马列的也很少。现在毛泽东思想在中国在世界传播了,比起那时候来懂得的人不知道有多少,所以要建立信心。当然要看到曲折,看到资产阶级还有力量,问题是谁挂帅。

上海的工作,转告上海不要急,不要多出头,许多事让外地去搞,我们要把工作做得扎实一些。上海不搞,别人还会拿出几条来讲你。老实说,上海还没有真正经受过严重考验,林彪、邓小平要搞上海,都没有搞成,林彪搞成的话,上海有大考验,要打仗。

现在批文件与过去不同了,没有人把关了。现在比列宁去世时好,那时斯大林威信不高,托洛茨基作过红军总司令,威望比斯大林高。

9月28日,江青来到北京昌平县南口镇附近的清华大学试验化工厂,当时称清华大学大兴分校。全厂教职工夹道欢迎江青。

在清华大学大兴分校,江青来到苹果园。在秋天的阳光下,苹果正熟。有人要给江青摘苹果,她说:

“苹果留着吧,留在最盛大的节日时吃吧!”

当人们给她拍照时,江青又说:

“胶卷留着吧,留着照最重大的政治事件吧!”

然后,江青又到办公楼听取汇报。她信口而说:

“什么叫生产力呢?我在政治局一次会议讲,生产力中最主要的是劳动力,劳动力都是我们妇女生的,你们在座诸位都是我们女人生的!”

她又说:“西太后你们知道吗?名为太后,实际上是女皇帝。”

她谈起了康熙皇帝:

“康熙皇帝这个人很厉害,六岁登基,身边有个大臣叫鳌拜,不让他掌权。他到了十六七岁的时候,就要求选一些少年进宫一起踢球、栽跟斗,这些人都会武术。有一天,鳌拜一人进宫,康熙就指使这些青年把鳌拜抓起来杀了。”

这天,江青在迟群等人陪同下又去了昌平驻军某部。而王洪文在这天到河北保定38军某部,张春桥在这天去了通县驻军某部。

9月28日,张春桥向李鑫要《毛选》五卷材料。

9月28日,毛远新给华国锋写了一封信,提出他是留下还是回辽宁的问题。

江青的昌平之行,没有通知中央办公厅警卫处,而是由北京市公安局局长刘传新安排的路线和现场的步哨和警卫,这是不符合正常程序的。当晚,中央政治局开会,结果没有找到江青。汪东兴给邬吉成打电话,问:

“江青到昌平去你知道不知道?谁布置的警戒线?”

邬吉辰说:“她去昌平我是事后知道的,谁布置的路线警戒我不知道。听说是通过北京市公安局刘传新布置的。”

“你马上派人去昌平,把她找回来,中央要开会。”汪东兴命令道。

9月29日下午,华国锋约李鑫到国务院会议厅个别谈话。在3个多小时的谈话中,华国锋主要是听李鑫讲。

李鑫说建议中央要“采取果断措施。”

华国锋说:“你的意见很好,我要再同几个同志商量一下。”

华国锋接着又说:“我很忙。我没有时间看很多材料。你注意一下报纸舆论动向,有什么情况,马上报告。”

9月29日,江青到清华大学原子能研究所。她说:“我在主席逝世

后的第一次中央会议上,就控诉邓小平,要开出他的党籍。”“我也要向你们年轻人宣誓,一定要锻炼好身体,和他们斗,阶级斗争、路线斗争还长着呢。形势是好的,你们看形势好不好?但是要警惕。”

江青还带了1000元人民币和一把剪刀。她说:“他们要害我,我随时准备着,剪刀是自卫的,钱在必要时可作路费。”

原打算晚上还安排活动,后因中央通知晚上开会江青才提前返城。临走时,她神秘地说:“你们等着特大喜讯,准备学习公报!”

9月29日夜,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开会,继续由毛泽东医疗小组的医生报告毛泽东的治疗过程和死亡原因,研究国庆活动安排。除刘伯承久病请假外,15名政治局委员,4名候补委员全部到会,华国锋主持会议。

江青首先发言。她说:“毛主席逝世了,党中央的领导怎么办?”

江青刚说完,王洪文、张春桥接了上来,要求政治局加强集体领导,要求给江青“安排工作”。

华国锋十分为难,不知该说什么好。

叶剑英为他解了围,他说:“江青同志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这本身就是很重要的工作。我不知道洪文同志、春桥同志提议给她安排工作,要安排什么样的工作?江青同志身体不好,坚持做好政治局委员的工作,已是很不容易的了。”

没有人再说什么。接着,毛泽东医疗小组的医生报告了毛泽东的治疗过程。

医生汇报完之后,又讨论了乔冠华在联合国的一个发言。其中有“按既定方针办”的话。

汪东兴说:“现在宣传上要注意,不要多去讲‘按既定方针办’,还是宣传中央两个文件。”

吴桂贤在发言中说,“按既定方针办”是华主席在计划会议上讲的。自己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成长起来的,要用生命保卫文化大革命等。

关于国庆活动,由于毛泽东刚逝世等原因,政治局决定:不举行游行、联欢等庆祝活动,只是召集一些工农兵的代表在天安门城楼上开

会;政治局的同志可分头到工厂、农村去看望工人、农民。

接着华国峰宣读了毛远新的来信,大意是:我是作为毛主席的联络员来工作的。毛主席逝世后,我要求回辽宁。当然中央如果有新的指示要我留下来,我服从决定。

李先念说:“还是让他回去吧,有事还可以再来嘛。”

江青马上表示不同意,她说:“毛远新应该留下,必须留下!只有他熟悉毛主席临终前说的话。”

张春桥、姚文元纷纷响应说:“毛远新应该留下。”

江青又说:“毛远新留下,是要处理毛主席后事的。”

华国锋问:“你不是说过,毛主席的后事,你不参加,毛远新也不参加吗?”

江青火了,一口咬定:“我没讲过!”

江青说话,常常出尔反尔。她似乎忘了,她对华国锋说她和毛远新不参加毛泽东后事处理时,王洪文、张春桥、汪东兴都在场。这时,汪东兴开口说道:“江青同志,你跟国锋同志说那句话时,我也在场,我也听见了!”

汪东兴的话,简直使江青下不了台。于是她歇斯底里的嚷道:“主席尸骨未寒,你们就这样对付我!你们想把我赶走,赶出政治局,我偏不走!我要留下!”

张春桥说:“毛远新同志可以暂时留在北京。他在主席身边工作过。主席晚年的字迹,他熟悉,能够辨认。”

江青接着张春桥的话说道:“让他留下来整理主席的晚年文稿。”

叶剑英说:“我同意国锋同志意见,毛远新同志是辽宁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理应回辽宁工作。”

华国锋考虑叶剑英、李先念年岁大了,会议已经开了好几个小时了,就劝他们先回去休息。叶剑英、李先念二人先走了。

会议继续开,江青坚持让华国锋表态把毛远新留在中央工作。华国锋、汪东兴等干脆不讲话了,任由她说。等到江青吵累了,说话声音小了一些时,华国锋问她接着做什么?

张春桥提出政治局委员有的戴黑纱,有的不戴,这样不统一,群众

看了会有意见。

江青说:“黑纱统统拿掉,毛主席逝世不再戴黑纱了,我带头,我第一个把它拿下来。”她说完就把自己臂上的黑纱拿掉了。并让其他人也拿下来,还站起身一个一个把别人的黑纱给摘下来。

后来,张春桥提议国庆节天安门开座谈会,由吴德准备发言。江青还提议要参加象征性劳动,大家没有同意。这时已经很晚了,江青又讲了很长一篇话,大意是:大家要团结,要同心协力,如果谁破坏团结,就让他从这里站出去。

她还没有讲完,许世友就站起来责问她:“你为什么要我们从这里站出去?”

江青解释说:“我并没有说你嘛。”

俩人又因此吵了起来。大家劝说住后,江青继续说:“‘十一’后召开十届三中全会,会上要做中央政治局报告,报告起草由张春桥负责,毛远新留下来帮助起草。会议要通过决议,开除邓小平的党籍。中央人事要有所变动,我提议由华国锋负责这项工作。”

此言一出,大多数政治局委员们都很吃惊,要召开十届三中全会如此重大的事,作为政治局委员的他们竟从未听说!

江青还在没完没了的说。她又提出,她要和华国锋谈些“家务事”,别人不愿意听的可以不听,“没有事的都走”。

时间已经很晚了,姚文元看到大部分人都很疲劳了,就说:“你们先走吧,让她一个人去讲吧。”

于是,人们站起来都走了,只剩下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和华国锋、汪东兴。汪东兴坚持留了下来,始终坐在华国锋旁边。江青一直喋喋不休说到第二天早晨5时。

会后,江青又向汪东兴索要毛泽东的文件。汪东兴下来后问叶剑英怎么办?叶剑英回答说:“毛主席在世,你保卫他的安全,现在老人家逝世了,他的文件档案你也要保管好,像保卫毛主席安全那样,有什么问题华总理和我给你撑腰。”

此时,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3人的沟通更加频繁。为了避免引起注意,他们从不开会,总是个别交谈,叶剑英对这一条把得很紧,他

对汪东兴说:“我们不能开会。”

汪东兴曾向叶剑英提出:“你年纪大了,还是由我来跑吧。”

叶剑英说:“你也不能到我那里去,因为目标太大。还是我到你这里来,你这个地方好,房子不显眼。”

叶剑英说的汪东兴的“那个地方”就是中南海南船坞汪东兴住的地方。

这天,叶剑英又赶到汪东兴那里谈了一个多小时。谈话期间,突然传来消息,说江青要过来找汪东兴,叶剑英赶紧起身离开。叶剑英后来嘱咐马锡金:“以后到汪东兴那里,进、出不能走同一个门。”从这一次起,叶剑英再去汪东兴家,如果是从西门进的,出去时就走东门。

有一次从汪东兴那里出来后,叶剑英问马锡金:“汪东兴的警卫怎么样?你打电话告诉汪,说,我对他的安全不放心!”马锡金将原话转告给汪东兴。汪东兴说:“是啊,有人要暗害我。”

叶剑英去史家胡同的华国锋家,也都是从运煤的后门进去的。有时在中南海或人民大会堂开完会,叶剑英让司机拉着他在附近转了几圈,再拐到华国锋家。

9月30日,暮霭浓重,天安门华灯初放。19时整,当时中国政治舞台上的核心人物,依照极为严格的顺序,鱼贯步入天安门城楼上的大厅,“工农兵学商”各界代表纷纷起立致意。领头的是当时中国的一号人物华国锋,留着平头,壮实的身躯,一身中山装。紧跟在华国锋之后,便是当时中国的二号人物,41岁的中共中央副主席王洪文。留着小分头,在这支高层领导人的队伍里显得格外年轻。在人们的心目中,他的接班人的地位,也是不言而喻的。尤其是1976年那三次举世瞩目的追悼大会,充分显示了他在中国政治生活中的地位:

1月15日,首都举行追悼周恩来大会,由中共中央副主席王洪文主持,由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致悼同。

7月11日,首都举行追悼朱德大会,由中共中央副主席王洪文主持,由中共中央第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华国锋致悼词。

9月18日,首都天安门广场举行百万群众追悼毛泽东大会,站在天安门城楼中央主持大会的依然是王洪文,致悼词的还是华国锋。

此刻,当他步入天安门城楼大厅时,不知因踌躇满志,还是年轻心急,竟快步疾行,走到步履稳缓的华国锋旁边,并排而行,眼看着要超前一步。突然,王洪文意识到在这种气氛严肃、讲究顺序的场合超前一步会招惹一场风波,他赶紧减缓步频,缩短步幅,跟华国锋拉开了一段距离,保持着“第二号”的位置。

在王洪文之后,是一位身穿军装、戴一副眼镜的长者——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兼国防部长叶剑英。

叶剑英对参加这次会议的安全问题十分担心。他几次向汪东兴了解当晚会议警卫工作情况,当明确城楼上的警卫是由汪东兴亲自掌握的中央警卫团的部队担任时,才最后决定参加会议。

在叶剑英之后,那长长的队伍依次为:张春桥、江青、姚文元、李先念、陈锡联、纪登奎、汪东兴、吴德、陈永贵、吴桂贤、苏振华、倪志福、徐向前、聂荣臻、陈云、谭震林、李井泉、乌兰夫、阿沛·阿旺晋美、周建人、许德珩、胡厥文、李素文、姚连蔚、王震、余秋里、谷牧、孙健。

在毛泽东的巨幅画像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主任吴德宣布开会。

按照事先审定的稿子、事先排好的发言顺序,“工农兵学商”代表一个个念着稿子。没有掌声,没有笑声,没有口号声,每一个与会者都端端正正地坐着,脸上毫无表情。

黄帅作为学生代表念完发言稿之后,吴德站了起来,对着话筒说道:“请中央领导同志发言。”

没容中央的其他人表示,华国锋就急着站起来走到麦克风前,说道:

“同志们,今天,在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主席创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二十七周年的前夕,我们参加首都工农兵学商代表举行的座谈会。我们向同志们学习,向同志们致敬。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二十七周年的时候,我们更加怀念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主席。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继承毛主席的遗志,把毛主席开创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进行到底。毛主席永远活在我们心中!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

在历年来中国首脑发表的国庆讲话中,华同锋这次的讲话可以说是最简短,几乎磨平了所有的棱角。

吴德意识到华国锋这样做是要快点结束会议。所以当华国锋一讲完,吴德就起来宣布散会,避免在这样的会议上发生什么问题。

王洪文坐上红旗牌轿车,突然,他对身边的秘书说:“明天,把摄影师喊来,给我拍几张标准照!”

秘书茫然,但又不好问“为什么”,只得点头道:“好。”

会后,华国锋、李先念、吴德等人到国务院小礼堂看电影。电影放映时,华国锋上厕所,李先念志也跟出来,问华国锋有什么事情吗?

华国锋说:“看完电影,你和吴德留下,有事商量。”

电影放映结束后,他们3人就到小礼堂旁边的武成殿小会议室再次商谈。华国锋通报了与叶剑英、汪东兴商定的解决办法,3人讨论了解决“四人帮”的时间和可能发生的问题。

# 第1410回：约吴忠，叶剑英“以快打慢”订计划，王、江继续下基层

10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的新华社关于这次座谈会的报道，突出宣传要遵照“按既定方针办”的“嘱咐”，深入“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

10月1日，江青又到清华大学发表讲话。她说：

“我们主席非常英明，说文化大革命七分成绩，三分缺点。三七开你们是不是都同意？文化大革命揪出了刘少奇、林彪，其实是他们自己跳出来的。邓小平也是自己跳出来的，4月4号他还参加了政治局会议。今年2月，他说洪文同志回来了，我就不干了，主席还是让他工作。天安门事件给他做了总结。主席是宽大为怀的。主席让我们选王明当中央委员，我们都不愿选他，主席做了很多工作，说当反面教员也要选。主席体格是非常好的，但刘少奇、林彪，特别是邓小平迫害主席。我在主席逝世后的第一次中央会上，就控诉了邓小平，要开除他的党籍，没有开除，要以观后效，还会有人为他翻案。”

江青还说：“主席非常英明，说文化大革命三七开，我是不属于有怨气的，是属于执行主席路线的，是中央文革第一副组长嘛。

我对三分不足，要有所认识，我这里只讲缺点，成绩让人家去讲，我这种态度，是否较好一点。

三分缺点你们也不清楚，不是毛主席的，也不是中央文革的。中央文革有坏人，自己端出来了。‘怀疑一切’是陶铸的。他的一篇文章和一个文件，送给主席，我们签了名，不同意，签名的也有坏人。他说要层层烧透，高举红旗的人也要烧透，说是主席以下都可以怀疑，实质上是可以怀疑主席。

作为我是亲自参加领导文化革命的，更要注意总结经验，尽管不是我们干的，也要作为经验，你们也要好好总结。”

10月2日,外交部部长乔冠华将《中国代表团团长在联合国大会第三十一届会议上的发言》送审稿报到华国锋那里审批。华国锋看到其中有:“中国人民将坚决遵循毛主席‘按既定方针办’的嘱咐,把支援世界各国人民反对两霸的斗争作为光荣的国际主义义务”这一句时,在“按既定方针办”的黑体字下面画了一个大问号。遂后他又发觉,这一发言稿中多处写着“按既定方针办”,就把这些话统统删去。然后在送审稿的天头上,写了这么一段批示:

剑英、洪文、春桥同志:

此件我已阅过,主要观点是准确的,只是文中引用毛主席的嘱咐,我查对了一下,与毛主席亲笔写的错了三个字。毛主席写的和我在政治局传达的都是“照过去方针办”,为了避免再错传下去,我把它删去了。建议将此事在政治局作一说明。

叶剑英和王洪文看了之后,都在自己的名字上画一个圈,写上“同意”两字。

张春桥也在自己的名字上画了一个圈,写上“同意”两字,却加了这么一段话:“国锋同志的批注,建议不下达,免得引起不必要的纠纷。”

这天,王洪文忙于拍摄标准像,总共拍了114张照片,其中穿便服、中山装的53张,穿军装的16张,办公照片21张,室外单人像24张。

拍完后,王洪文叮嘱摄影师:“今天就给我把照片送来!”

“这么急?”摄影师满脸惊讶。

“只争朝夕!”王洪文用毛泽东的诗句答复摄影师。说毕,狡诈地笑了一下,补充说道:“先是各印一张八寸的送来,我挑选一下。选中的,要仔细修版,要大量地冲印!”

“大量冲印?”摄影师又感到困惑。

“你去冲洗吧!”王洪文挥挥手,不作任何解释,把摄影师打发走了。

这位摄影师,还是杜修贤。

当摄影师杜修贤忙于冲印照片的时候,王洪文给上海廖祖康挂长

途电话,用上海话说道:“小廖吗?依勿要‘热昏’!”

前些天,廖祖康请假回上海结婚,婚礼定在10月7日。

9月底,叶剑英听说张春桥的弟弟张秋桥到昌平坦克6师蹲点,还把那里的一个团参谋长给换了,立刻引起警觉,特地交代苏振华,利用国庆节的假日,约卫戍区司令吴忠到密云水库去“玩玩”。

苏振华在晋冀鲁豫野战军任兵团政委时,吴忠任旅长,他们是老上下级关系。吴忠到北京任卫戍区副司令时,苏振华正靠边站。吴忠到不避讳,依然登门看望老领导。

10月2日,苏振华看望了华国锋,又找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吴忠谈话。他对吴忠说:“目前情况复杂,请务必掌握好部队,保持部队稳定,不受干扰,除了叶帅的命令,任何人都不能调动部队,特别是不准任何人调部队进京,保证部队绝对听从党中央的号令,千万不能出任何问题!而且要求绝对保密。”

苏振华特别对吴忠说:“叶帅对在坦克6师驻昌平的那个坦克团不放心。张春桥有个在军报工作的弟弟在这个团蹲点,把团的领导干部都换了。万一有人被煽动、蛊惑,把坦克开进北京城怎么办?”

苏振华所说的“把团的领导干部都换了”,其实就是这个团的参谋长人事调整,与张春桥等人无关。

吴忠回答说:“这个部队大门口就是警卫师的坦克团。卫戍区的坦克比他们只多不少,加上反坦克火炮,足以保证首都的绝对安全。”

下午15时许,叶剑英到中南海南楼汪东兴的办公室,再次与他商谈。两人分析了这几天的情况,一致感到形势逼人。原来设想的国庆节后10天动手,看来太晚了。叶剑英说:“该摊牌了,我们要立即找华国锋同志谈,要加速采取果断措施。兵贵神速,不能失掉时机,必须以快打慢,乘人之不及。”

在商量如何具体解决“四人帮”问题时,汪东兴提出,动用8341部队解决问题。叶剑英向汪东兴详细询问了8341部队的情况,完全赞同。他要汪东兴先拟订一个具体行动方案,再同华国锋一起商定。

两人一直谈到吃晚饭的时间。汪东兴留叶剑英共进晚餐,叶剑英欣然答应。由于谈得高兴,吃饭时两人一边吃狗肉,还一边喝了几杯

茅台酒。

晚饭后,叶剑英驱车到了东交民巷华国锋的住所,向华国锋谈了他同汪东兴商定的意见,华国锋表示完全赞同。两人决定等汪东兴提出具体行动方案后,再一起议定。

汪东兴送走叶剑英后,通知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张耀祠和中央警卫局副局长、8341 部队政委武健华来开会。汪东兴直接对他俩说:“中央已经下了决心,对‘四人帮’要采取行动。”汪东兴要张耀祠和武健华两人先琢磨出一个行动方案。然后他于 21 时,来到华国锋在东交民巷的住地,相互沟通了与叶剑英的谈话内容。华国锋对他说:“我和叶帅商议,由你先拿出一个执行办法来,我们再议定。”

汪东兴答应第二天即可拿出方案,到时再向华国锋汇报。

这天,华国锋来到同住东交民巷的吴德住处。他让吴德再想想:“把他们抓起来后,全国党政军民会有什么反应,应采取什么对策?北京市委如何配合中央的这次行动?”

华国锋又问:“他们在北京市还有什么人?”

吴德说:“有迟群、谢静宜、金祖敏等人,也该隔离。”

华国锋同意。他又说:“首都不能乱,首都一乱,全国就有可能发生大问题。稳定首都的问题,由你负全责。”

当天,吴德分别向北京市委书记倪志福、丁国钰打了招呼,明确告诉他们,中央要解决“四人帮”的问题,对他们隔离审查。

当晚,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耿彪突然接到华国锋打来的电话,要他过去商量事情。当耿彪来到华国锋处,看见在座的还有外交部两位副部长韩念龙和刘振华。

华国锋说:“乔冠华外长在联合国大会上的发言稿上,提到了‘毛主席的嘱咐’——‘按既定方针办’。我昨天见到这个送审稿时,在稿子上批了几句话。我说发言稿中引用毛主席的话,经我查对,与毛主席亲笔写的错了三个字。毛主席写的和我在政治局传达的都是‘照过去方针办’,为了避免再错传下去,我把它删去了。但是,乔冠华已去联合国,他带去的稿子上并未删去那句话,你们有什么办法?”

研究的结果,由韩念龙、刘振华回外交部去打电话,通知乔冠华在

发言中删去这句话。

韩念龙、刘振华两位走后,耿彪问:“从字面上看,‘照过去方针办’和‘按既定方针办’差别并不大,为什么要去掉这句话。”

华国锋说:“毛主席没有什么‘临终嘱咐’,不应该这么说。4月30日晚上,毛主席会见外宾,等外宾走后,我向他汇报了各省的情况。当时毛主席讲话时发音已不太清楚,他怕我听不清,就用铅笔写了几张字条给我看,其中有一张写的是‘照过去方针办’。这根本不是什么临终时的嘱咐,而是针对我汇报的具体问题,对我个人的指示。现在他们把六个字改了三个,把对我讲的变成了‘毛主席的临终嘱咐’。这样做,就可以把许多毛主席不同意的事情,都说成是‘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了。”

临走时,华国锋对耿彪说:“近日有事要找,你在家里等着。”

再说汪东兴从华国锋那里回到中南海后,立即与张耀祠、武健华一起商讨了抓捕“四人帮”的具体实施方案,对解决“四人帮”的顺序、处置待遇、行动时间、隔离地点、保密措施、分工配合等都做了细致的安排。他们一直研究到3日凌晨4时。

为此,汪东兴还成立了两个小班子:一个准备有关文件,包括“四人帮”历史和现行的罪证,由李鑫负责;另一个负责对“四人帮”实施隔离审查,人员由汪东兴亲自从中办和中央警卫团挑选并个别谈话。

2日深夜,李鑫突然接到中央警卫局副局长武建华的电话:“东兴同志要你马上来一下。他现在就站在电话机旁边。”

临走时,李鑫对妻子樊宁说:“我走了。我这是去做件杀头的事!”

妻子樊宁是李鑫地下党的战友和同学,面对可能发生的严酷命运,两人都很平静,没有握手,没有拥抱。樊宁只是镇定地说:“你去吧!你杀头,我最多是当个反革命分子的家属吧!要牵连也只有我和孩子……”

“你这样说,我就放心了!”李鑫登上接他的汽车,来到中南海汪东兴的家里。

汪东兴对李鑫说:“党中央决定,对‘四人帮’进行隔离审查。要我们尽快做好准备工作,你能不能参加一些工作?”

“我听从中央的安排!”李鑫回答。

李鑫建议说:“在抓‘四人帮’的同时,我们要高举毛主席的旗帜。这样有利于稳定形势。”“现在张春桥、姚文元想抓《毛选》,要《毛选》五卷材料要得很急。因此,用中央常委讨论《毛选》五卷的名义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会议,调他们来开会,他们一定会来。过去中央讨论《毛选》工作的会议,都是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的,他们肯定不会怀疑,一定会上钩的。”“另外,研究建造毛主席纪念堂的问题,这是中央政治局常委必须参加的,张春桥和王洪文无法推脱;再就是是在怀仁堂采取行动较为方便。”

李鑫建议中央要起草三个文件:

一、隔离审查‘四人帮’的决定;

二、关于出版毛泽东选集五卷的决定;

三、关于建立毛主席纪念堂的决定。

这个建议,在汪东兴报告华国锋同意后,即由李鑫从10月3日到6日起草出来。

汪东兴将李鑫领进另外一间小屋,向他交待说:“你就住在这里,帮助中央起草文件。我派人给你送水送饭。我从外面把门反锁起来……”

10月3日,武建华、张耀祠、李鑫拟好了行动方案。在这个方案中,解决“四人帮”的顺序为:在怀仁堂解决王洪文和张春桥,然后依次处置江青和姚文元。

10月3日,汪东兴到华国锋住地向他详细汇报了他和张耀祠、武建华商量的具体行动部署和行动方案。华国锋听后,觉得这个方案是“可行的”,但建议把时间“再缩短一些,争取提前解决。”

汪东兴也赞成提前行动,以提防江青这几个人“铤而走险先动手的可能。”

华国锋让汪东兴再向叶剑英汇报,看看叶剑英还有什么新的意见。

10月3日,王洪文根据9月29日政治局会议的精神:“政治局的同志可分头到工厂、农村去看望工人、农民”,来到北京东郊的平谷县。

王洪文在平谷县,用毛泽东的话说:“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他接着捏紧了拳头,大声地说:“打倒!”

王洪文接着说:“别人搞修正主义,我要打倒他;我搞修正主义,你们也来造反。”“最好是不出修正主义,但这只是个人愿望,实际上是不可能的。”他扳着手指头说:“建国以来,中国就出了高岗、饶漱石、彭德怀、刘少奇、林彪、邓小平,不出是不可能的。”“今后还可能出什么唐小平、王小平之类,要警惕!”“不只是邓小平搞修正主义,出是可能的,不出是奇怪的。”“我们要和贫下中农划等号,你们也要和工人阶级、贫下中农划等号,你们要在农村多呆一段时间,要把眼睛睁的大大的看着修正主义,包括我。我这个人又听人家的,又不听人家的。”

10 月 3 日,江青在二七车辆厂找老工人开座谈会。吴德陪同。

# 第1411回：看梁效，《光明日报》发文章 卫戍区，部队调动归吴德

10月3日下午，姚文元把《人民日报》负责人鲁瑛找到他家，告诉鲁瑛："现在报纸上大量出现'按既定方针办'，这句话传得不准确，要采取措施，从明天起，在报纸上逐渐减少'按既定方针办'的提法，你得亲自把关。"并要鲁瑛转告新华社解力夫和《光明日报》莫艾。姚文元还特别强调说：

"这是个很大的问题，你得有思想准备。有人要借社论引用主席这句话大做文章，攻击《人民日报》。"

"你不要小看这件事，从最近情况来看，表面上还是比较平静的，但是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今后还是要继续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还是要继续同走资派作斗争。现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有些反不起来了，有的可能要翻案。斗争是长期的，复杂的。"

吴桂贤在9月29日夜的政治局会上说，"按既定方针办"是华主席在计划会议上讲的。姚文元让鲁瑛派人了解华国锋在计划会议上传达的毛泽东的原话。

按照姚文元的指示，鲁瑛回到报社就直接打电话给卫生部长、谢富治夫人刘湘萍及谷牧等人核对，同时派出崔奇、张沛，调查华国锋在计划会议上传达的毛泽东的原话是怎么讲的……

其实，"按既定方针办"原来是一个错误的记录，最早出自1976年7月的全国计划工作座谈会。那是7月30日晚上，华国锋、王洪文、江青、吴德、纪登奎、苏振华、倪志福等人接见出席会议者。华国锋讲话时传达了1976年4月30日午后，毛泽东接见新西兰总理马尔登后，给华国锋写下的三句话。他说：

"毛主席最近有重要指示，给大家传达一下。第一句是'慢慢来，不要招(着)急'，第二句是'照过去方针办'，"刚说到此，王洪文插话说：

“第二句后面还有‘你办事,我放心’。”

华国锋说:“对,第三句是‘你办事,我放心’。”

由于王洪文的这一插话,在场几位记录者都没听清华国锋那句“照过去方针办”。因为当时没有用录音机,于是主持整理者就按照大概意思,写成“按既定方针办”。整理稿送审时还说明,这句话好像是这样的。但主审者也没有改动,便批准发出。华国锋看到后马上说:“不对,毛主席说的是‘照过去方针办’,我传达的也是‘照过去方针办’,怎么变成‘按既定方针办’了?”但他也没有当成大事追查和通知更正。但是此时,毛泽东逝世后,华国锋越来越重视了。

10月3日,苏振华去叶剑英处汇报,当天又与陈锡联商量,并根据叶剑英的指示,分头找有关单位负责人谈话。

这天,吴德到华国锋家,华国锋提到:“叶帅说北京军区在昌平有个坦克6师,张春桥的弟弟张秋桥常去那里活动,叶帅对这个师的情况不放心。”

他问吴德:“如果这个部队违抗中央的决定,支持‘四人帮’,把部队开进北京市区来,北京市有没有力量把它拦住。”

吴德说:“有无把握,我得问一问北京卫戍区。”

华国锋又问:“北京卫戍区靠得住靠不住?”

吴德说:“卫戍区司令员吴忠对‘批邓’是不满的,对‘四人帮’很反感。我是卫戍区的政委,了解吴忠的思想情况,在解决‘四人帮’的问题上,我相信吴忠是会听从党中央的指挥,和我们一致行动的。”

华国锋让吴德再和吴忠谈谈。吴德从华国锋家里出来,就去找了吴忠,向他谈了中央解决“四人帮”的考虑和决心。

吴忠向吴德保证说:“北京的卫戍部队有能力保卫首都安全,请中央放心。”

他还对吴德说:“在坦克六师旁边,卫戍区就驻有一个坦克团,如有情况,可以起作用。”

但是,北京卫戍区的部队调动,还需要主持军委日常工作并兼任北京军区司令员的陈锡联的批准,吴忠将这个情况向吴德说明。

与吴忠谈话后,吴德立即将情况给华国锋作了汇报。华国锋说:“新华社、人民广播电台、人民日报社、飞机场、邮电局等单位要由卫戍

区控制起来。卫戍区的部队就由你负责,你这就去找陈锡联,解决北京卫戍区部队调动的问题。”

华国锋对吴德说:“陈锡联是比较好的同志,他支持解决‘四人帮’的问题。”

吴德又马不停蹄的去找到陈锡联。在陈锡联那里,他看见陈锡联正与杨成武谈事。杨成武走后,吴德向陈锡联说明了华国锋要陈锡联安排卫戍区部队交吴德指挥的问题,陈锡联说他已知道,随即就打电话向吴忠交待:“卫戍区部队一切听从吴德的指挥。”并要吴忠立即到吴德处具体商量。

吴德踏进家门,吴忠已在他家中等候。他们根据1971年“913事件”中稳定首都的经验,商量了具体措施,共同部署了北京市内紧外松的戒严事宜。当时叶剑英担心的事情,一是坦克六师的问题,后来证明,这个师没有问题,不过当时二吴还是通过卫戍区坦克团做了防备工作。另一件是要防备学生从清华、北大等学校冲出来,造成混乱。为此,他们在清华、北大附近都部署了相当的兵力,如果有人往外冲,无论如何要把他们堵回去。在10月6日的那天晚上,对北京实行暗中戒严,外地进京的所有路口都被监视,防止外地的部队进京。

吴德把与陈锡联、吴忠商谈的情况和部署报告了华国锋。华国锋又亲自与吴忠谈了一次话。

10月3日下午,叶剑英派侄子叶选基到北长街请陈云过来。出门前,陈云把保险箱钥匙交给长子陈元,叮嘱他一旦发生意外,把保险柜里的文件收一收。然后随叶选基来到北京西山叶剑英住地。

到了那里,叶剑英正同邓颖超在一间屋子里谈话。

邓颖超是主动到叶剑英这里的。她向叶剑英表示了对局势、对党的前途的担忧。叶剑英给邓颖超看了毛泽东生前批评“四人帮”的几次讲话记录。他对邓颖超说:“这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解决他们的问题,是完成毛主席生前未来得及完成的大事,也是周总理生前的嘱咐。不能让党和国家的领导大权落到他们手里。”

邓颖超希望叶剑英带个头,想办法,解决好这一问题。

邓颖超走后,陈云进去。寒暄后,叶剑英先给他看了一份材料,是谢静宜记录的一次政治局会议的情况,就是他给邓颖超看的那份毛泽

东批评“四人帮”的讲话。然后问陈云:“怎么办?”

陈云说:“这场斗争不可避免。”

两人的共同意见是要解决“四人帮”问题,但如何解决,没有谈。

陈云问叶剑英:“这件事是不是告诉聂帅、徐帅?”

叶剑英说:“我就要去告诉他们。”

康克清也特意从城里来看望叶剑英,向他转达了朱老总临终之时的愿望。

10 月 3 日晚,从不对部下深谈高层政治的汪东兴,突然把邬吉成叫到中南海他的办公室,没头没脑地先说了一句:“他们有野心。”

邬吉成一下没有反应过来,不知他说的是什么意思。汪东兴开始了细细的解说:“最近一段的报纸连篇累牍地刊登毛主席的嘱咐‘按既定方针办’,那是捏造的。”

邬吉成不禁大吃一惊,心想:“捏造毛主席的话,那是多大的罪过。”

汪东兴告诉邬吉成,华国锋在外交部 9 月 30 日将由乔冠华做的《中国代表团团长在联合国第 31 届会议上的发言》上的批示和张春桥在这同一份文件上批示。

10 月 4 日,《光明日报》头版发表“梁效”的文章《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文中写道:

“按既定方针办”,就是按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各项政策办,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永远沿着毛主席指引的道路走下去,走到底。这是保证我们的党永不变修,我们的国家永不变色的战略措施。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就是背叛马克思主义,背叛社会主义,背叛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学说。

同时还强调:“任何修正主义头子胆敢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针,是绝对没有好下场的。”

这篇文章见报的当天清早 7 时,正在熟睡的华国锋被秘书喊醒,告知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李鑫骑自行车赶来,有急事报告。

李鑫紧急求见华国锋,就是把刚刚出版的《光明日报》送给华国锋。

李鑫还告诉华国锋,昨天,江青几个人在钓鱼台吃饭,把他也请去。席间,江青问起毛远新:“从东北调来的部队已经到达哪里?”

华国锋感到了事态的严重。

他立即给叶剑英打电话,说是有要事商量。

住在玉泉山的叶剑英,也已经接到下边的电话,报告今天《光明日报》上的文章。

其实,《光明日报》的这篇文章就是9月17日《光明日报》向“梁效”约的那篇文章,并没有其他人的任何指示。“梁效”负责人李家宽将任务交给了范达人。当时范达人已准备赴波兰工作,整天在学习英语,所以对《光明日报》的约稿兴趣不大。但是,李家宽既然找到头上,那还是要完成任务取的。他将此事告知两位组员何芳川和陈先达。

不久,《光明日报》副总编辑孙关龙应约来到“梁效”驻地,与李家宽和范达人小组的一起讨论文章的主题。他说:“按既定方针办是毛主席晚年的一项重要指示,因为1976年9月16日《人民日报》社论将这句话用粗体字刊出。”

9月20日上午9时,《光明日报》领导小组成员汪波清、孙关龙在《光明日报》社对范达人、陈先达、何芳川等人谈了对该文的要求。孙关龙说:“我们理论部几个同志研究了一下,这篇文章不对毛主席这一指示作解释,而要歌颂‘按既定方针办’这六个字的伟大意义。这六个字,字字千金,要歌颂毛主席的丰功伟绩。”接着,孙关龙对文章的路子、内容提出了比较详细的提纲,汪波清也作了补充。

在讨论结束前,汪波清把师海云找来,请他念了一遍华国锋在计划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记录,其中传达了毛泽东“按既定方针办”的指示。孙关龙和汪波清还给范达人他们看了新华社内参关于对“按既定方针办”的反应。

初稿完成后,由范达人执笔修改,未作大的改动,只作了一点非实质性的文字润色。这篇文章便于9月24日左右定稿。经李家宽等人同意后送《光明日报》。

9月29日,文章的综合清样交给莫艾,莫艾于当天深夜动手阅处,改动了几处,签了字写了一段话:“我略有改动,请和‘梁效’商量,听听他们的意见,然后见报。”

9月30日上午,孙关龙同范达人在电话中交换各自改动的情况。

9月30日下午,迟群给“梁效”核心组成员李家宽回电话:“我太忙,没时间,那四篇稿子不看了,你们看了,可以发。”这四篇稿子中,就有《永远按毛主席既定方针办》。

同日,《光明日报》排出清样,让“梁效”写作组再审一遍。清样复审后立即退了回去。校样上标明了《光明日报》最后定稿的日期是9月30日。

《光明日报》按照原定计划在10月4日头版头条显著位置发表了“梁效”的这篇文章。该文的标题是范达人起的。写作经过也没有江青或迟群、谢静宜授意。

10月4日晚,鲁瑛电话通知光明日报社临时领导小组负责人莫艾来人民日报社。鲁瑛对莫艾说:“关于‘按既定方针办’这句话,是主席患病期间谈的,传得不够确切,以后报上不要再用这句话了。”

莫艾说:“《光明日报》今天发表梁效的文章中,大标题就是讲这个的。”

鲁瑛继续说,“你回去把把关,遇到这句话要改掉。新华社发的稿件中,也要注意有没有这句话,有也不要用。这事你一个人知道就行了,不要下传,我现在也是亲自把关。”

莫艾回到报社以后,照鲁瑛的话办了。

10月4日,按已商定的意见,陈锡联带队去唐山视察地震救灾情况。

这天上午,江青带着30来人上北京景山上摘苹果。中午,在北海仿膳用餐。江青一边吃一边向同席者说:

“我一定要对得起毛主席,要加强锻炼。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最危险的敌人,斗争是长期复杂的……”

# 第1412回：箭在弦，汪东兴准备就绪 学毛著，江青还在摘苹果

10月4日下午，中央政治局在中南海召开毛泽东医疗组总结会，并会见毛泽东医疗组成员。张春桥提出尽早召开中央委员会，开除邓小平党籍。

散会后，华国锋要吴德到他住处，两人再一次全面检查了解决“四人帮”的准备工作以及哪些环节尚未完善需要补救等等。正谈着，汪东兴打电话来说，江青提出要到石家庄去，指定专列的车头要用二七车辆厂生产的内燃机车头，还要请二七厂的一些工人陪同她去。汪东兴请示华国锋是否同意她去。

华国锋拿着电话，看着吴德说：“江青去石家庄要干什么？她可能是试探，还是稳住她，同意她去。”

吴德点点头。华国锋当即答复汪东兴说：“允许她去，关于调车头及找工人陪同的问题由吴德去安排。”

就在华国锋与吴德商议的同时，叶剑英如约来到中南海南楼汪东兴办公室，汪东兴把抓捕“四人帮”的行动方案向叶剑英详细作了汇报。

汪东兴设想的行动方案是：以在怀仁堂正厅召集政治局常委会的名义解决。华国锋、叶剑英、王洪文、张春桥4人是常委，由中央办公厅发文件通知：一是审议《毛选》五卷的清样；二是研究毛主席纪念堂的方案和中南海毛主席故居的安排。

姚文元不是常委，就在文件上特定写明请他来做会议的文字工作，把姚文元也从钓鱼台或住地调到怀仁堂。

江青、毛远新本来就住在中南海，迟群、谢静宜等人由卫戍区负责解决。

解决顺序是：先王、张，再江、姚。

毛远新区别对待,就地监护。

听了汪东兴的汇报,叶剑英说:“我看这个计划比较成熟,安排也相当周全了。要特别注意保密。”

下午17时,吴德离开华国锋家,刚进家门,华国锋来电话又要他再去。吴德急忙赶去,见汪东兴也在华国锋家。汪东兴向华国锋、吴德通报了他和叶剑英商量后的行动方案。因为行动方案中涉及到北京卫戍区,所以叫吴德过来安排有关北京卫戍区的工作。

3人最后确定:

一、按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已议定的方案,华国锋、叶剑英在中南海怀仁堂,以召开政治局常委会研究《毛选》第五卷出版问题的名义,通知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到会,由华国锋宣布他们的罪状,随即由汪东兴组织人分别对其隔离审查。汪东兴派张耀祠到江青住处对她隔离审查。

二、对迟群、谢静宜、金祖敏等人的隔离审查,由吴德和吴忠负责。

三、中南海内如果出现了意料不到的问题,由吴德组织卫戍区的部队支援。

四、由北京卫戍区把人民日报社、新华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机关以及由迟群、谢静宜控制的清华、北大等单位,用内紧外松的方式戒备起来。要再检查一遍落实的情况,坚决杜绝一切意外发生。

在最后一次商议中,华国锋说:“就照这个行动方案办,经过5天的准备,如果不出意外,成功是会有把握的。”

10月4日,华国锋给耿彪打来电话,并派车把他接到东交民巷华国锋的住处。他亲自给耿彪倒了杯茶,然后接着10月2日的话题谈了起来。

耿彪说:“据我推测,三五天内他们可能会有行动。”

华国锋问:“你有何依据?”

耿彪说:“他们在上海搞了个功率很大的电台,增加了民兵,增发了武器弹药,那是他们的根据地。还有一种说法,他们计划10月8日在长沙开始搞游行,9日在上海搞游行,假借‘人民群众’的名义提出由王洪文(或江青)为党的主席,张春桥为总理。接着向国外广播,同

时北京也搞游行庆祝。北京有‘两校’还有几个部带头游行,逼着那些他们尚未控制的部门跟着参加。到那时形势就严峻了。”

华国锋说:“中央决定,有一项任务要交给你去完成,是叶帅提名的。”

耿彪一听,出于一个军人的习惯,不由自主地站了起来,回答说:“坚决完成任务!”

10 月 4 日晚上,汪东兴又把负责江青警卫工作的邬吉成和负责王洪文警卫工作的孙凤山叫到他的办公室。汪东兴先简单地询问了一下钓鱼台“那几个人”的活动情况,接着就问:“王洪文有枪吗?他平时是不是随身带着?”

“王洪文有枪,手枪他平时并不带在身上。但有时他出去带着猎枪。”

“唔。”汪东兴没再问。

汪东兴对邬吉成说:“明天,江青要去试乘二七机车车辆厂生产的内燃机牵引车头。二七机车车辆厂革命委员会的人也要参加。你做好准备,并通知有关人员做好组织。”

10 月 5 日凌晨 2 时,汪东兴到华国锋住地,向他汇报了行动准备情况。

上午 9 时 30 分,汪东兴又来到华国锋在中南海的秘密住处,向他汇报了这次行动的人选名单和具体部署。吃罢午饭,稍作休息,他和华国锋便分别乘车驶出中南海,直奔玉泉山九号楼叶剑英家,最后共同研究行动方案,以便取得统一认识……

上海,不知道从哪里吹起一阵风:10 月 10 日是“中华民国”的“国庆节”,蒋帮预定要在这一天“反攻大陆”。

尽管海峡风平浪静,可是,上海的民兵已开始集结,加强值班——理由是为了“备战”,为了粉碎来自海峡彼岸的突然袭击。

10 月 4 日,海军政委苏振华给叶剑英元帅打来电话,报告上海民兵的不正常的集结。“注意他们的动向!”叶剑英马上认为,这是上海的民兵在准备动手。

苏振华此时就在上海东海舰队司令部里。国庆节后,他与北京卫

戍区司令员吴忠见面后,就奉叶剑英之命,急匆匆飞到了黄浦江畔。

10 月 5 日,叶剑英案头的红色电话机里,又传来苏振华急促的话音:

“上海民兵闯入吴淞口炮台!”

“他们奉谁之命?”叶剑英用广东口音的普通话问道。

“奉王洪文的手令!”苏振华说道,“上海城里的红纸被抢购一空,据说,准备庆祝盛大的节日!”

“没有我的命令,任何人不许进入吴淞口炮台!”叶剑英对着电话话筒,大声地吼道。

“是,坚决执行您的命令!”苏振华非常干脆地答道。

10 月 5 日下午,叶剑英和汪东兴到东交民巷 8 号院华国锋住地紧急磋商,最后确定行动前的准备工作落实情况。汪东兴谈了他准备好的具体行动方案。从执行人员的挑选,隔离审查的地点、时间,以及每个细节的详细安排。他说:“这件事,要绝对保密,行动要越快越好,时间拖得越久越危险,越容易走露风声。”

3 人一致决定 6 日动手,华国锋随即向李先念通报,征求意见后说:“动手的时间,我告诉了先念同志,他表示完全同意。”

下午 15 时,正在唐山指挥抗震的陈锡联突然接到华国锋要他立即回京的电话。

15 时 45 分,陈锡联乘飞机抵达京城。他匆匆回到家里,然后直奔离他家不远的华国锋家。华国锋正在等他,告诉他:“四人帮”已经发出了篡党夺权的信号,因此要赶紧动手。华国锋还说:叶帅也来找过他,他已决定明天晚上行动。说着,他做了一个抓的手势。陈锡联一听就明白是怎么回事。

与陈锡联谈完话后,华国锋又在汪东兴的陪同下,亲自来到预备关押“四人帮”的地下工程视察,重点检查了几个隔离点的准备情况。看着一切准备就绪,华国锋说:经过 5 天的准备,如果不出意外,成功是有把握的。

当天,叶剑英指示总政治部副主任梁必业:“总政机关要提高警惕,保持稳定,要加强部队的管理教育。”

指示总参谋部代总长杨成武:“切实掌握好三总部,陆、空军和沿海边防,务必搞好战备,无论如何要保证军队不出问题。”

杨成武表示:“军队永远听党的话,听军委指挥。”

叶剑英让杨成武转告聂荣臻,对付“四人帮”的问题已经商量好了,请他放心。

从1975年开始,代理总参谋长杨成武、总政治部第一副主任梁必业、总后勤部长张宗逊、副总参谋长兼军委办公厅主任胡炜列席军委常委会,并设立“三总部联席会议”制度,军委明确杨成武是牵头人,三总部联席会议地点在三座门军委一号厅。往往军委常委会后,三总部负责布置、落实。叶剑英“生病”后,重大事情杨成武会先报告叶剑英,然后向聂荣臻汇报后再布置、落实。有时候梁必业也会和杨成武一起,但张宗逊从未一起去过。

当时总参的工作安排:杨成武负责总参全面工作,主抓作战;王尚荣副总长分管作战部并协助杨;胡炜副总长兼任军委办公厅主任。没有杨成武的明确意见或没有更上一级的指示上不了军委常委会议,而杨成武又听命于叶剑英。

陈锡联主持军委常委会,但不会有重大的事情决定,忙中央的事情更多一些。

因此,此时的实际军权仍在叶剑英、聂荣臻手中,通过杨成武落实。

叶剑英决定将对“四人帮”采取隔离审查的方案告诉陈云。他把王震叫来,对王震说:“你到陈云同志那里去一下,你给他讲,对‘四人帮’问题,再征求一下他的意见。”

王震到了陈云家里,把叶剑英说的解决“四人帮”的办法给陈云讲了。陈云经过反复思考以后,让王震转告叶剑英:“看来,只有采取抓的办法。不过,党内斗争,只这一次,下不为例。”

10月5日一大早,江青按计划,和二七机车车辆厂革委会的十余人、中办警卫处副处长、中央警卫团副团长邬吉成,副政委狄福才,乘上国产的内燃机牵引的火车,挂上了一节可以开会和会客的公务车厢,从北京始发到了保定附近。火车停在了于家庄的一个铁路专用线

上,她睡了一觉。下午返京途中,休息后的江青组织随行全体人员学习中央1976年第四号文件,车厢不时响起她的侃侃话语。

晚19时许,火车返回北京站。可江青的学习座谈还没有完,别人也不敢下车。邬吉成借口安全问题下了车,叫警卫参谋马清泉一次又一次地给汪东兴打电话,报告了不下五、六次,请示怎么办。

汪东兴回答说:“知道了,她愿意什么时候下来,就什么时候下吧。你们耐心等着。”

一直等到22时左右,学习座谈结束,江青离开车站,回到她在中南海201的住所。201就在菊香书屋西北不远的春耦斋,新落成后,江青更多地住在这边。

10月6日上午,经过华国锋签字同意,汪东兴用中央办公厅名义发出了开会通知:

根据华国锋同志的建议,兹定于10月6日晚八时在怀仁堂一楼召开政治局常委会,主要议程:

一、审议《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清样;

二、研究毛主席纪念堂的方案和中南海毛主席故居的保护措施。

因部分文献需要改动,请姚文元同志列席会议。

(签字):汪东兴

中共中央办公厅

1976年10月6日。

10月6日上午,江青打电话找杜修贤,叫他下午13时到毛泽东的住处游泳池去。

杜修贤提前来到游泳池。他已有几个月没有来这里了,今天猛然又来,一种说不出的亲切感油然而生。他仿佛又听见毛泽东主席在书房里走来走去的“踏踏”的脚步声和他沉重的呼吸声还伴有偶尔的咳嗽声……

渐渐,凄凉的秋风带走他温暖亲切的感觉,留下的只是孤独。杜修贤沉浸在深深的伤感之中……汽车的喇叭声打断了他的沉思。杜修贤一惊,那是江青的“大红旗”。他赶快回到门厅里的沙发里,迅速抹去脸上忧伤的表情,显得平和自然甚至还有些懵懂。

“老杜,你迟到了……”江青一进门就冲着杜修贤没头没脑来了一句。

杜修贤这次是真的懵了:“明明我来得最早!”

江青的下一句才让他明白所谓“迟到”的含意:“我们在这里学《毛选》已经学了好几天了,你今天才第一次来学。”

随后,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人和在江青身边工作的人陆续来了。七、八个人将小小的过厅坐得满满的。有人给杜修贤递了本《毛选》,他也照着其他人翻到学习的页码,一脸虔诚认真阅读的样子。可是心里老在不停地画问号:“江青为什么召集主席身边的人学习《毛选》?”

“小李,你接着昨天的继续往下念。”江青指了指身边的工作人员说。“咦?学了好几天,连一篇都没有学完?”她翻开书自言自语地嘀咕。

大家的目光跟着读书声一行一行地在书上移动,没有几行,江青一声高腔,惊得人们抬起头,读书声戛然而止:

“你们知道中央谁反对毛主席?”

大家面面相觑,谁也不敢搭她的话头。江青看着大家茫然的样子,拍了一下大腿说:“万里!”

杜修贤下意识地摇摇头,江青脖子一梗对他说:“你不信?哼!告诉你们,谁反对主席我都知道。这种事休想瞒过我!”她忿忿地望着大家,想得到赞同的共鸣,沉默许久,江青似乎察觉这是在“对牛弹琴”白费力气,突然朝着小李大声说:“念,往下念。谁叫你停的?念!”

颤抖的读书声又响了起来……

江青最后干脆不叫小李念书了,她开始大谈中央的局势:“中央领导人的排列顺序要按主席生前排列的排,谁也不能改动……谁要反对你们,不行,你们都是主席身边的人,反对你们就是反对主席……中央有人想整我,我不怕!……”

终于,江青讲够了,讲累了,她愉快地宣布:“今天就学习到这里,和大家合影,明天继续学习。”此时她的心里还装着明天和更多的明天……

走出屋子,大家来到草坪上。江青一身藏青色的中山装和一顶蓝

色男式便帽,游泳池拍摄后,杜修贤以为没事了,提着摄影箱想走。不料,江青又兴致勃勃叫住他:“老杜别走!我们一起去景山公园摘苹果,还要照一些照片。”然后她笑眯眯地坐进“大红旗”里“呼”地先走了。工作人员坐着警卫局的面包车,跟着“大红旗”驶出中南海。他们从景山公园后门进去,径直开到一片苹果园旁。江青满面春风从汽车里出来,非常高兴地对杜修贤说:“老杜,我们在这里劳动了好几次,特意留了几棵树今天摘,照些照片。老杜今天看你的啦!”

一棵果实累累的苹果树前,江青小心翼翼地踩上一个事先已经准备好的架子上,旁边的人七手八脚将她扶定,又在她的手边挂了一个小竹篮,让她放摘的苹果。白皙的的手握住粗糙的褐色树干,本身就是对比,一身素装和灿烂红艳的苹果,这又是对比。杜修贤拍下了对比的瞬间和对比的深思。直到晚霞染上天幕,江青才蹒跚而回。

# 第1413回：怀仁堂，一切均安排妥当 王洪文，欲反抗终难敌众

1976年10月6日下午15时，张耀祠接到汪东兴的电话，要他马上去一下。张耀祠来到汪东兴办公室时，武健华也已奉命到达。汪东兴直截了当地对他们说："中央决定在今天晚上8时统一行动，粉碎'四人帮'！"

为完成这次行动，经过反复挑选，从中央警卫局的局、处、科级和中央警卫团的师、团、营级干部中抽调了20多名干部，分成四个行动小组。第一小组组长李广银，负责解决王洪文。第二小组组长纪和富，负责解决张春桥。第三小组组长高云江，负责解决江青。第四小组组长滕和松，负责解决姚文元。

15时30分，汪东兴分别对每个行动小组进行动员，宣布这件事"是叶帅和华总理拍板的"，并宣布了两条纪律："一、要绝对保守机密。万一失密，将给予最严厉制裁。二、要坚决服从命令，听从指挥，任何人不得擅自开枪。争取不响枪、不流血解决问题，这是上策。"

10月6日这天，中央警卫局副局长邬吉成找了几个人到家里帮忙刮墙皮。因为地震后有些宿舍里的墙皮震落，钓鱼台管理处要对宿舍楼修葺粉刷，邬吉成是为家里的墙壁粉刷补修做准备。

过了中午，他感觉到有些不正常了。汪东兴的秘书一会儿一个电话打到邬吉成的家里：

"派你的司机小王，到某某同志处，接上他送至汪东兴同志处。"

"派你的司机小王，到某某同志处，接上他送到汪东兴同志那里"

……

汪东兴那里没车可调了吗？干嘛老用钓鱼台这边的车？

到了下午17时左右，汪东兴干脆直接给邬吉成打来电话："邬吉成，你在干什么呢？"

"我正在忙自家房屋的加固呢。"邬吉成回答。

“你马上来,到南楼。”

南楼,就是建在中南海南海东面船坞上面的一座楼,汪东兴的家就在楼里,他的家既是住所也是办公室。

邬吉成当时干活干得灰头土脑的,从电话里听出汪东兴不容延迟的口吻,赶紧放下手里的活计,洗涮了一下,换了一身军装,叫上司机小王,直奔中南海南楼而去。

他一走进汪东兴的办公室,汪东兴马上就站起来了,说:“今天晚上行动,你知道是什么事情吧?”

“不知道。但现在我已经可以估计个差不多吧。”邬吉成实话实说。几天来汪东兴的吹风、询问,邬吉成的观察思考,已经对可能要发生的事有所准备。

汪东兴也看出来了,所以没再费口舌,而是眼睛直视着邬吉成,顿了顿说:“你负责外面,武健华负责里边。通知孙凤山来,管理车辆,人下车后就把车调走。”

邬吉成知道汪东兴说的“里边”“外边”是指怀仁堂的里边和外边。

没有临战的动员,没有意义的解说,没有注意事项的巨细交代,他们之间已经形成了默契,一个非凡的任务,就这么寥寥几个字就布置完了。

当天的具体行动,都是汪东兴亲手布置的,执行抓捕任务的干部,汪东兴都是一个一个地谈,但他们彼此之间都不知道对方的任务。每个人站在什么位置,怎么抓,抓后放在哪里,汪东兴都一一考虑得很周到。

在怀仁堂的附近,已布好了一些岗位和暗哨,带队的是警卫团一大队的副大队长华方治。

怀仁堂里面负责警卫值班的,是警卫处值班室副主任丁志友。

18 时 30 分,各路行动人员就位。汪东兴指挥对怀仁堂正厅进行了布置:北侧放了一扇大屏风,东边增加一排小屏风,场内摆放一张长条会议桌,后面放了两把扶手椅,所有文具、茶具都撤走。

大约 19 时多,汪东兴来到怀仁堂前,看见守在怀仁堂外面的邬吉成,轻声问道:“怎么样,都布置好了吗?”

“布置好了。”

“都没有问题了吗?”

“没有问题了。”

汪东兴做了进一步交代:“他们来了,你把他们的随员,都放在五间房。他们的车子,都停在怀仁堂西边的庆云堂。”

五间房即怀仁堂南面的来福堂等堂院的统称。

“孙凤山来了没有?”汪东兴又问了一句。

邬吉成说:“他跟着王洪文去平谷,好像还没有回来呢,只要一脱开身他就过来。”

汪东兴叮嘱说:“一定打电话把他叫过来,让他管车。”说完,汪东兴进了怀仁堂。不久,孙凤山就赶到了怀仁堂前,负责车辆的调度。

第一个来到怀仁堂的重要人物,是叶剑英。

下午15时多,叶剑英从玉泉山9号楼的住地来到办公室所在地——军事科学院2号楼,为晚上的政治局会议做准备。叶剑英办公室主任王守江已经接到了中央办公厅的通知:晚8点,在中南海怀仁堂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题是审议《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清样;研究毛主席纪念堂的设计方案、中南海毛主席故居的安置。要求叶剑英提前一个小时到。看到这份通知时,王守江在心里嘀咕了一下:平时开会,只要提前10分钟到就可以了,这次为什么要提前这么多?但这一行的特殊纪律要求又让他把种种疑惑压在心里。

不过,叶剑英从玉泉山到军事科学院时,离晚上20时开会时间还有近5个小时,“离8点的会还早着呢,叶帅怎么这么早就来了?”这不能不让王守将感到奇怪。

像往常一样,王守江把会议要讨论的几份文件准备好,装进了叶剑英的公文包,又简单汇报了一下。叶剑英只是点头应着,表情也看不出任何有异于以往之处。工作人员让叶剑英先在卧室里小憩一下,但叶剑英有点坐不住,他说:“走吧,我去跟他们谈一谈。”他起身离开卧室,让工作人员备车去中南海。

叶剑英的警卫马锡金陪着他坐上红旗车。离开2号院时,王守江习惯性地抬腕看了眼手表:刚16时多一点。

在车上,叶剑英又亲自叮嘱:“开会期间,‘马头’站在会议厅门口

不能离开,老赵坐在车里不要出去。”

“红旗”车刚驶出军事科学院不久,坐在后排的叶剑英说:“‘马头’,你看看,机场的飞机还都在吗?”

那时的北京,树没那么多,楼也没那么高,从西山放眼望去,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不远处西郊机场里停的飞机。1、2、3……马锡金一直数到了“18”,“飞机都在!”——马锡金解释说,当时西郊机场本来有20架三叉戟,1971年林彪叛逃时带走了一架,后来机场自己出事故又损失了一架,就剩下了18架。叶剑英应了一声,没有说话。

车很快过了五棵松,一路向东急驶而去。过了一会儿,叶剑英又问:“‘马头’,怀仁堂正厅有没有后门?”

对中南海很熟悉的马锡金马上回答:“有,前面有个大草坪还能停车,东边还有一个门,平时毛主席都是从东门进来,进东侧休息室。”

叶剑英若有所思地点点头。

快到军事博物馆了,叶剑英又开口问道:“‘马头’,你看一下钓鱼台那边有没有‘红旗’出来?”马锡金赶紧盯住钓鱼台方向的来车,什么也没看见。

车行驶到六部口一带,叶剑英又问:“‘马头’,你对中南海熟悉吗?”

马锡金回答:“熟啊!”

说话间,车已驶入中南海。叶剑英又问:“你看中南海今天有什么变化吗?”

马锡金向四周看了看,平时进进出出很多车的中南海今天显得格外安静,“奇怪,今天怎么一辆车都没有……”他嘀咕了一句。作为中央警卫局的一员,马锡金曾参加过抓捕王力、关锋、戚本禹的行动。

17时多一点,叶剑英乘坐的红旗车停在了中南海怀仁堂门口,马锡金护着叶剑英下了车。平时来怀仁堂开会时,都是华国锋的车停在左边,叶剑英的车停在右边。而这一次车尚未停稳,便立即被门口的警卫人员调到他处。马锡金准备扶着叶剑英上台阶,也顾不上追问原因。

刚走上台阶,中央警卫局的丁志友拦住了马锡金:“随员一律不得入内。”丁志友其实也是马锡金以前的老上级,但今天显得格外严厉。

马锡金一看从门口到会场还有200多米,便搀着叶剑英执意要送上去。丁志友不放心,紧紧跟在后面走了一大半。眼看着快到会议室门口,丁志友坚决拽住马锡金不让他进;但走在前面的叶剑英又紧紧地拉着马锡金往里走,一拉一扯间,叶剑英的公文包就从马锡金的手里滑落,掉在地上。而叶剑英好像没看见这一幕,也没停下脚步,兀自往会堂里走。马锡金赶紧借送公文包的机会,尾随叶剑英进了怀仁堂。

当叶剑英步入怀仁堂正厅时,华同锋刚刚在怀仁堂正厅坐定。他见叶剑英进来,赶紧起身,请叶剑英在另一张椅子上坐定。华国锋和叶剑英请汪东兴就坐,汪东兴摇了摇手说:“今天是召集常委来开会的,我不是常委,我不能坐,我外边还有任务。”

马锡金把公文包递给叶剑英,却听到汪东兴、华国锋说:“今天用不着公文包了!”

马锡金没有明白是什么意思,他退了出来,出门时碰到中央警卫局副局长、8341部队政委武健华,忍不住一通抱怨:“今天是怎么了?车也被调走,人也被赶了出来!”

武健华看了他一眼,马上说:“你的位置在里面,进去吧!”

武健华是负责“里面”警卫工作的。

马锡金与汪东兴及其两个警卫秘书、华国锋的一个秘书、两个警卫都躲在了屏风后面,几分紧张又几分不安地等待着。

接着出现在中南海的人,是41岁的王洪文。那天晚上,王洪文从办公室里出来,看见值班的米士奇正坐在那里看电视。他了一下手表说:“还早。”就坐下来和米士奇一起看电视。

看了一会儿,快20时了,警卫员王爱清对王洪文说:“王副主席,该走了!”

王洪文站了起来,坐上车前往中南海怀仁堂,出席政治局常委会议。

负责抓捕王洪文的是第一行动小组组长李广银和队员吴兴禄、霍际龙、王志民。王洪文到后,行动组的几个卫士在走廊里把他扭住。

王洪文一边大声喊叫:“我是来开会的!你们要干什么?”一边挣扎。

因为王洪文年轻、有力气,前两个警卫没摁住他,他往前踉跄着冲

了一下,后面又冲上来两人将他摁住。扭着双臂送到大厅里。华国锋手里拿着一张事先写好的《决定》大声念道:

“最近一个时期,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趁毛主席逝世之机,相互勾结,秘密串联,阴谋篡党夺权,犯下了一系列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中央决定对以上四人进行隔离审查。中共中央。1976 年 10 月 6 日。”

还没等华国锋念完,王洪文突然大吼一声,挣脱开警卫人员扭缚,像头发怒的狮子伸开双手,由五、六米远的地方向坐在那里的叶剑英猛扑过去……警卫猛冲上去把他扑倒,死死地摁住。随后,几个人连揪带架把他从后门押走。

很快,张春桥从前门走了进来。

10 月 1 日,张春桥把徐景贤寄给他的关于电影《反击》问题的一封信,圈阅后退还给徐景贤,同时在信的右上角注了一行铅笔字:“你上次提到的某某单位那位女同志的材料,能否送来一阅?”

这封信没有写“绝密”“亲启”,是经过几个秘书的手,随文件一起送来的,当然,谁也看不懂右上角注明的那句话有什么含意,只有张春桥和徐景贤两个人心照不宣。

徐景贤不敢有丝毫怠慢,立刻抓紧办理:通过市革命委员会的有关部门,把那位女士的人事档案材料全部调来。为了避免引起猜疑,徐景贤故意同时调了另外不相干的几个人的档案材料,要有关部门一起给他送来。

当天晚上,徐景贤一个人在灯下打开了厚厚的牛皮纸档案袋,里面有那位女士的履历表,自传,入党志愿书,中国共产党党员登记表,历次政治运动小结以及组织上对她的鉴定等等。他从头至尾翻阅了一遍,总的印象不错,认为比较符合张春桥的要求,特别使他满意的是,在其中的几张表格上,贴着这位女士不同时期的照片。

10 月 6 日的上午,徐景贤把这个档案袋套上了一个大信封,由他亲自密封,写上“北京 中央办公厅 张春桥同志亲启”,交给市委的机要交通员直送中央办公厅,估计当天的下午或傍晚就可以送到张春桥的手里。

# 第1414回：十月六，春桥、文元作长谈 中南海，江青、远新皆被抓

10月6日下午，姚文元前去钓鱼台看望张春桥，作了长谈。他问张春桥："你在这段时间和国锋同志相处，觉得怎么样？"

张春桥说："我觉得一般还是能合作的，就是不大交心。""我对国锋同志讲了，我有主意尽量向你提出来，我的主意可能是错误的，但我绝不会出坏主意。"

他还说，他曾多次劝华国锋要和江青搞好关系。

姚文元也说："对华主席还是要帮，这是大局。"

张春桥说："尽量帮吧。""那个批邓的小册子，华主席压了很长时间没有批，我催了几次才批下来。那几本东西他根本没有看。"

张春桥问姚文元："最近和江青的关系怎么样了？"

姚文元说："还好，比较缓和了，内参的问题做了新的处理。"

张春桥说："你主动去看看江青，和她搞好团结。"

姚文元说的"内参问题"是毛泽东逝世后，新华社有篇内参，把江青怎么找手工艺工人做花圈，怎么讲文冠果是"文官国"，说得比较具体。不知哪些话江青不满意，对姚文元发了很大的脾气，又把新华社记者找到她家里，要他们重新写了才算完事。

张春桥还谈到出版《毛选》五卷的事，他说："已找李鑫谈过，我对出版《毛选》的具体意见给华国锋写了信。"

随后，张春桥又说："最近叶剑英接见了一个美国人，有个外事记者，你见到了吗？"

姚文元问："是9月27日他会见美国前国防部施莱辛格那一次吗？"

张春桥点点头说："他把杨成武也叫去了，讲的还是过去那一套。这些人，要改变观点也难呢。"

姚文元附和着说："那个记录我看过了，强调的还是海军。"

这是指叶剑英1973年接见基辛格时谈过海军问题,表示愿意和美国合作,为此他受到了毛泽东的批评。

最后张春桥说:“我想总要开三中全会吧,但还没有考虑好,你有什么想法?”

姚文元说:“华国锋当主席,应当在三中全会上正式通过,现在政治局办事的人太少,工农都有了,能不能增加一些革命知识分子的干部。”

张春桥没有说话。

后来,姚文元把新华社河南分社记者写的信中,揭发纪登奎的儿子,在看望河南省委组织部一位负责人时说的一句话,告诉了张春桥。他说:“我接到一封信,里边说毛主席逝世后,可能立即宣布某某某是叛徒。这种问题并不一定是真的,但应提高警惕。”

姚文元没有说出名字,张春桥听了后,也没有什么反映。

张春桥和姚文元谈完话,吃过晚饭,前往怀仁堂。他和往常一样,慢条斯理地走下车,朝怀仁堂走去。他的警卫“大熊”,紧紧跟随在张春桥后面。在研究抓张春桥的方案的时候,人们的注意力并不在张春桥本身,却是在反复琢磨如何对付张春桥身边的这只“大熊”。

“大熊”是跟随张春桥多年的贴身警卫。此人人高马大,腰圆臂粗,会儿套拳脚,三五个人难以对付。另外,此人双枪,左右开弓,枪法娴熟,十发九中。“十大”以后,张春桥升为政治局常委。汪东兴几次提出要给他调换两个年轻、英俊的警卫,张春桥都坚决不同意,一直将“大熊”留在身边。

国庆节前夕,汪东兴主动批准“大熊”回老家探亲。不料,“大熊”才离开几天就被张春桥秘密调回来。显然,张春桥已经预感到某种危险,暗中加强了戒备。这只“大煎”的意外出现,不能不引起汪东兴的忧虑,如果出手不利,被他察觉,后果不堪设想。

果然,在抓捕张春桥的时候,差一点出了大事,危险就出在“大熊”身上!

当张春桥的轿车一到,负责抓捕张春桥的“第二行动小组”组长纪和富就迎了上去,恭敬地朝他行个礼说:“首长好!”

张春桥上下打量着他,冷冷地问:“国锋同志和叶帅都到了吗?”

纪和富说:“到了,正在会议室等您。请随我来。”

这时候,“大熊”紧跟在张春桥后边,想跟着进去,被两名卫兵拦住了。

张春桥好像察觉有点不太对劲,两眼盯着纪和富警觉地问:“怎么回事?”

纪和富解释说:“首长的随行人员都在外面大厅里休息。”

张春桥迟疑了一下,对“大熊”摆摆手:“你就在这里等我吧。”说完,就随纪和富朝里走去。

当张春桥走进怀仁堂正厅的东侧时,进了小门,刚拐了两个弯,走廊的灯便突然灭了。在黑暗之中冲出几个人,将他紧紧扭住。张春桥惊恐地连声喊道:“你们要干什么? 干什么?”一只大手就把他的嘴也捂住了。还没等他明白怎么回事,行动小组的纪和富等两人已把他左右双手挽起,架到大厅里。张春桥眨巴眨巴眼睛,只见华国锋和叶剑英坐在沙发上,看着他。

张春桥明白发生了什么事,脖子一梗,问:“你们凭什么抓我?”

华国锋起身,手里拿着一张事先写好的《决定》大声念道:“张春桥你听着:最近一个时期,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趁毛主席逝世之机,相互勾结,秘密串联,阴谋篡党夺权,犯下了一系列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中央决定对以上四人进行隔离审查。中共中央,1976 年 10 月 6 日。”

张春桥脸色铁青,两眼微闭,自始至终沉默,一声不响。纪和富将他从后门押走了。

这时,张春桥的警卫“大熊”被领到一侧耳房休息。他进去后,见屋里还有几个警卫团的人,因为彼此都是老熟人,他也没介意,随便打个招呼,就坐在门口的椅子上一面喝茶一面闲聊。这个“大熊”别瞧他长得五大三粗,人还特别机警。他嘴巴哼哼哈哈应酬着,耳朵却紧听着外面的动静。可能是抓张春桥时有些响动,他“唿”地站起身就要往外走。在座的一位警卫团副团长见时机已到,便朝众人使了个眼色。几个小伙子刚要扑过去缴“大熊”的枪,没想到这家伙眼疾手快,抢先拔枪在手,猛转身把枪口对准了众人喝道::“不许动! 谁要过来我就打死谁!”

大伙一下全愣在那了,谁也不敢动。副团长就说:“大熊,你放下武器,中央已决定要逮捕张春桥。”

“大熊”说:“我只听汪主任的,他让我交枪我才交。”

副团长只好给汪东兴打电话,把情况简单报告了一下,然后把话筒递给“大熊”。只听汪东兴大声说:“现在张春桥已被抓起来了,我命令你,立刻把枪交出来,听候组织安排。”

“大熊”立正回答:“是!我服从命令。”随后,“大熊”就把手枪放在了桌子上。

王洪文被捕之后,钓鱼台并不知道怀仁堂里的剧变,“王办”还以为王洪文正在怀仁堂开会呢!

邬吉成发出通知:“王洪文办公室全体人员,集中在钓鱼台十六楼,出席紧急会议”等到“王办”人员到齐,邬吉成宣布中共中央办公厅命令:“王办”工作人员要参加学习班进行学习,不准对外联系。

姚文元不是政治局常委,所以汪东兴在起草会议通知时是:“请姚文元同志列席会议。”按预定方案,抓捕完张春桥和王洪文后,由华国锋亲自打电话通知姚文元前来开会。华国锋给姚文元打电话说:“今天讨论《毛选》五卷,大家意见很多。你对《毛选》比较熟,张春桥同志建议让你参加,你能不能马上来一下?”

姚文元答应马上过来。

华国锋放下电话,问叶剑英和汪东兴:“还要我们出面吗?”

叶剑英说:“免了吧。”

于是决定由武健华对姚文元宣读隔离审查命令,华国锋当场给武健华亲笔写下了手令。

姚文元住在闹市口附近,据说当时姚文元正在院子里散步。10月6日下午,姚文元同张春桥谈完话就直接回到家里。他的情绪很不好,总有一种恍惚不安的感觉。吃晚饭时,他对小女儿说:

“如果爸爸死了,你们不要难过。”

当时孩子吓坏了,不懂他这话的意思,姚文元赶紧安慰她说:“活着的人都是要死的,爸爸也不例外。”

孩子说:“你思想反动了。”

姚文元也没有多做解释。此时,他放下华国锋的电话,对妻子金

英说了声:“我要去开会。”拿着包就出了家门。离家时,连帽子都忘了戴。当妻子金英拿着帽子赶出去的时候,他已经上车走了。

中南海怀仁堂的事情解决完后,汪东兴拿起电话,对电话那头的张耀祠说:“这边已经结束了,快点把她弄走算了!”

晚20时,张耀祠和一中队指导员李连庆等十几个人先到毛远新住所,中南海怡年堂后院,离江青住处很近。张耀祠穿便衣,连手枪都没有带。警卫们穿着军装,也没有带枪。

毛远新吃过晚饭后,给在沈阳的妻子打了一个长途电话。接着,便坐在那里看电视。这时,李连庆突然走了进来。汪东兴选派了李连庆前去执行拘捕毛远新,一方面因为李连庆在汪东兴手下工作多年,忠实可靠,另一方面李连庆跟毛远新也很熟,派他去执行任务比较方便。毛远新见到李连庆,问道:

“老李,有什么事?来,一起看电视。”

李连庆答道:“想给你换个地方。”

毛远新:“换到哪里?我得收拾一下。”

李连庆说:“不用了,现在就走。”

这时候,毛远新听出李连庆话里的意思。双眼盯着李连庆,问道:“你来抓我?”

这时,张耀祠等人走进毛远新的办公室,毛远新立即站起来,关掉电视机。

张耀祠宣布:“毛远新,我接华国锋总理电话指示,党中央决定将你保护审查。为了你的安全,还住在这里,但要换一个房间。现在你把文件柜钥匙和手枪交出来,材料和文件由中央办公厅派人接收。你的生活、安全仍由李连庆同志负责,不准向外打电话,要遵守纪律。你写的交代材料交李连庆同志转交党中央。”

毛远新听完宣布,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事情,他愤愤地说:“主席尸骨未寒,你们就……”然后就不再说了。一个干部上去收了他的手枪和钥匙。

带走了毛远新,张耀祠他们又来到江青居住的春藕斋“201”所。

张耀祠找到正在洗衣服的江青保健护士马晓先,让她和他到江青那里去一趟。此时已经下班的马晓先意识到有事发生,“要不然局长

不会亲自来叫我去。”

春藕斋“201”所,张耀祠常来,有时一天要去一两趟。这次,他带着马晓先走到江青住所,朝门口的警卫点点头,就进去了。

江青刚吃过晚饭,正在沙发上闲坐,把脚跷在跷脚墩上。她见张耀祠进来,朝他点了点头,仍然端坐着。

今日非比往常,张耀祠走到江青面前,拿着一张纸条宣读道:“江青,……”

张耀祠一张口,江青马上投来惊诧的目光,因为平时张耀祠都喊她“江青同志”,随之,她听到了如下的宣布:

“我接华国锋总理电话指示,党中央决定将你隔离审查,到另一个地方去,马上执行!你要老实向党坦白交代你的罪行,要遵守纪律。你把文件柜的钥匙交出来。”

这段话中,“你要老实向党坦白交代你的罪行,要遵守纪律”一句,是张耀祠临时加上去的,其余全是汪东兴向他布置任务时口授的原话。

江青坐在沙发上一动不动,表面上没有丝毫的慌乱。只是在听完后轻轻地说道:

“我没听清楚,你能不能再说一遍?”

张耀祠就又重复了一遍。

江青沉默着,在沙发上坐了一会儿。此时的她关心的似乎是存放在这里的文件,她当即给华国锋写了一封信,信中说:“国锋同志:来人称,他们奉你之命,宣布对我隔离审查。不知是否为中央决定?”这才慢慢站了起来,取出一个牛皮纸信封,用铅笔写下了“华国锋同志亲启”7个字,然后从裤子口袋里掏出一串钥匙,将信和钥匙放入信封,再用密封签把信封两端封好,交给了张耀祠。

这时,江青提出要上一下卫生间。张耀祠同意了,同时吩咐江青的司机备车。

东西都收拾好了,江青还没有从卫生间里出来。马晓先进去一看,江青正坐在那里愣神思考着什么。江青随后出了卫生间,坐上了她平时乘坐的那辆专用轿车。

江青的秘书刘真忽然想起江青计划第二天上午要去清华大学视

察,还要作重要讲话。让秘书连夜写好讲话稿,便追上去问:“你明天的讲话稿还要吗?”

江青说:“不要了,撕了吧。”

接着又说:“你告诉李讷,不要找我。”

武健华上了车,轿车仍由江青的司机驾驶,驶往不远的地下室。

这是临时关押处,是汪东兴想出来的主意。汪东兴对中南海了如指掌。他知道,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随着中苏关系的紧张。在毛泽东所住丰泽园后门,秘密地建造了一个防空洞。这样,在面临特殊情况之际,可以把毛泽东安全地转移到这里。这是一个长期空置而又被人所知甚少的地下室。把“四人帮”临时关押在这里,可以说是绝好的去处。即便江青大喊大叫,外面也听不见。

10 月 6 日夜里,江青在中南海的一处地下室里度过。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当夜也押在那里,只是关在不同的房间。

江青押走后,张耀祠对江青的工作人员说:“这里发生的事你们不许对外面讲,从现在起,谁也不许打电话,不许回家。”这些人在春藕斋“201”所住了 20 多天,直到粉碎“四人帮”的消息公布后,才允许回家……

姚文元家的警卫是由卫戍区负责。汪东兴怕出意外,事先请吴忠在他办公室等着,如果姚文元不来怀仁堂,就让吴忠带人去他家里解决。20 时 25 分,姚文元来到怀仁堂。汪东兴怕再发生意外,经请示华国锋和叶剑英同意,没有让他进正厅,只让人把他领到东廊的大休息室,由警卫团副团长武健华向他宣读中央决定。

于是,行动小组人员示意姚文元进东房廊的休息室。姚文元刚一进门,3 个人上去扭住他。姚文元连声喊:“小朱! 小朱!”

小朱是姚文元的秘书,此时当然已被控制,无法应答。

姚文元又大声问道:“谁让你们干的?”

武健华向他宣读了华国锋刚写的手令:“中共中央决定,对姚文元实行隔离审查,立即执行。华国锋。”

姚文元被架走。他一直在喊:“我有话要说! 我有话要说!”

被押解上车以后还不住地喊:“你们是哪个部队的? 谁指使你们干的?”行动组只好用毛巾塞住他的嘴。

完成任务,正好是晚上20时30分。

此时,吴德与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倪志福、市委常务书记丁国钰一起守在电话机旁。

姚文元刚刚被带走,华国锋、叶剑英立即召见吴忠、耿飚。

叶剑英对吴忠说:“现在,最重要的事情是严密控制新闻媒介。中央已经决定由耿飚同志接管宣传口,你从卫戍区选调一批精干、可靠的干部,随耿飚同志到广播电台。”

耿飚当时按照华国锋的嘱咐,在家等着,华国锋果真来电话了,要他马上到怀仁堂来。

耿飚放下电话就往中南海赶。21时左右,他从中南海西门走进怀仁堂,看见华国锋、叶剑英正与吴忠等人在交谈。

耿飚问:“解决了吗?”

叶剑英点点头:“已经解决了。”

耿飚高兴地说:“太好了!”

华国锋说:“斗争刚开始,还不能太乐观。”他对耿飚说:“你到中央广播事业局去,要迅速控制住电台和电视台,不能出任何差错,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耿彪望了望四周,问:“人呢? 我带谁去呀?”

华国锋说:“我这里没人,等一会儿卫戍区的邱巍高同志和你一块去。究竟怎么搞法,你俩想办法。如何控制住电台、电视台,来不及细想,一切交给你去办了。总的原则是可以采取处理‘林彪事件’的办法:内部已发生了变化,但外面不要让人看出来。”

叶剑英说:“快去! 一定要赶快控制直播室! 要注意两条:一、要防止内部混乱;二、要防止向外泄密。你要防止发生异常情况,采取处理‘林彪事件’的办法。”

华国锋问他:“你要不要带支手枪?”

“手枪不必带了,但是须有你的手令。”

华国锋说:“好!”说完,他俯在桌上写了张条子,递给耿飚说:“你把这个交给邓岗,就说这是中央的决定。”

耿飚接过纸条看了看,上面写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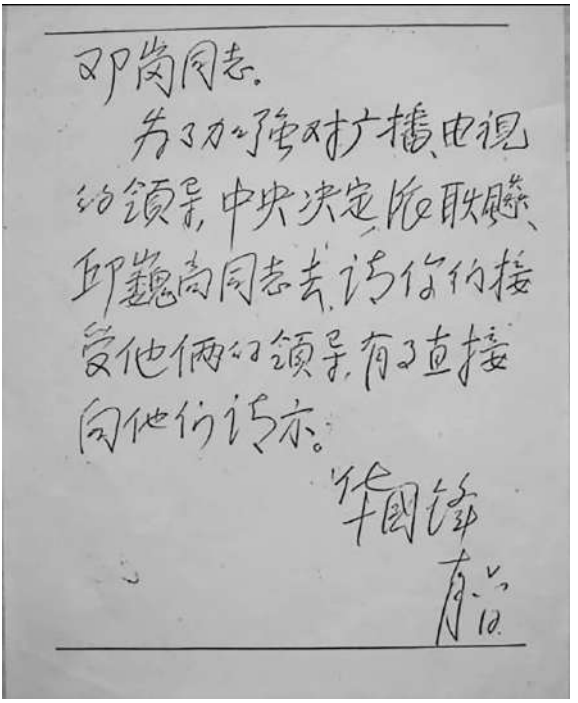
邓岗同志:

为了加强对广播、电视的领导，中央决定，派耿飚、邱巍高同志去，请你们接受他俩的领导，有事直接向他们请示。

华国锋

十六

月日


邓岗同志。
为了加强对广播、电视的领导，中央决定派耿飚、邱巍高同志去，请你们接受他俩的领导，有事直接向他们请示。
华国锋
十六日

“‘马头’！马上回家开政治局会议！”交待完任务，叶剑英对马锡金说。

听到叶剑英的指示，马锡金一时有些迷茫，问：“回哪个家？”

“玉泉山！”叶剑英回答。

“谁通知开会？”马锡金又问了一句。

汪东兴接过话来：“我来通知。”

马锡金陪着叶剑英向车的方向走去，刚走两步，叶剑英又叮嘱：

“一定要带好华国锋的车,别让他丢了。”将叶剑英扶上车、坐好、关上车门后,马锡金特地叮嘱华国锋的司机跟上。临出怀仁堂西门时,他从反光镜里看去,华国锋的车稳稳地跟在后面。

上了车,叶剑英告诉马锡金:“告诉王守江,立即通知开会!告诉孩子们立即上床睡觉!”

耿飚在怀仁堂等了一会儿,北京卫戍区副司令邱巍高来了。耿彪把中央决定接管电台的事简单说了一遍。随后问他:“你带武器没有?”

邱巍高说:“没有。”

耿彪说:“不带枪不行,你马上找两支手枪,咱俩一人一支。”

邱巍高答应一声出去了。工夫不大,就拎着两支手枪回来。他俩把枪挎在身上。

邱巍高还是有些担心地问:“就咱们俩人行吗?”

耿彪问:“你下面有部队没有?”

邱巍高说:“卫戍区在电台大楼有一个营。”

耿飚又问:“这个营属于那个团?”

邱巍高说:“三团。”

耿飚说:“你马上把这个团的团长找来,让他跟我们一块行动。”

于是,邱巍高又打电话把3团王团长找来了。耿飚一看时间不早了,就带着他们两人乘一辆吉普车,直奔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车上,他把考虑好的行动方案说了一下,邱巍高和王团长都同意。

# 第1415回：玉泉山，政治局紧急会议全同意，再做出两项决定

这时，叶剑英与华国锋的车相继到达玉泉山。叶剑英让华国锋一起到自己的卧室休息，工作人员立即端上牛奶、豆浆，华国锋对工作人员说："先照顾好叶帅！"

叶剑英则推辞着说："先照顾好华国锋同志。"

中央军委办公厅秘书处副处长兼叶剑英办公室秘书王守江接到马锡金的电话后，立即从军科院2号楼赶到玉泉山。正躺在卧室休息的叶剑英见到王守江，没有多说什么，只是用手比划了一下说："刚刚把他们抓起来了。"王守江一下子就明白了。用手势传递意思，也是叶剑英和手下人默契的交流方式。林彪出事第二天，叶剑英向王守江伸出第二个指头，只三个字："他跑了。"

当晚21时15分左右，汪东兴亲自用保密机打电话到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局长周启才办公室，对他说："那'四个人'的事，今晚已经解决了，进行得很顺利。中央决定，今晚10点在玉泉山9号楼叶帅住地召开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现在国锋同志和叶帅已离开怀仁堂，一同去了玉泉山。我正在通知在京的政治局成员去那里开会。你马上去玉泉山九号楼安排布置好会场，做好各项会务工作。还有一件事，你走前要安排好，指定秘书局收发处一个负责人，坐镇中南海西门收发室，对京内外所有部门送给那'四个人'的文电、信件、资料、报刊等，全部由他扣住和保管，不送文电处处理；秘书局文电处发给那'四个人'的文件、资料等，送到收发室后，也由他全部扣住，不发不送。听清楚了吗？"

周启才说："听清楚了，我立即去办。"

周启才到达玉泉山9号楼叶剑英住地，是晚上21时40分左右。叶剑英的警卫、秘书将他带到叶剑英卧室。

只见华国锋和叶剑英并排坐在叶剑英卧室床沿上，正在商议事

情。见周启才来了,华国锋说:

“老周,情况你知道了吧?”

周启才:“知道一些,东兴同志让我来向您和叶帅报到,听候指示。”

华国锋说:“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就在叶帅会客厅召开,你去安排布置一下。”

周启才说:“好。”就走出卧室。

玉泉山9号楼有一个小会议室,平时是叶剑英打乒乓球、看电影的地方,突然要来这么多中央领导开会,下面的工作人员一下子也手忙脚乱。有人说,干脆在乒乓球台上铺层东西当会议桌吧,这个意见又马上遭到否定。大家开始将乒乓球台抬出,搬椅子,忙得满身大汗。为华国锋、叶剑英准备的高靠背沙发,然后是单人短沙发,4人的长沙发,晚上21时50分左右,临时会场算是有了个模样。此时,从玉泉山看下去,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到已有车陆续地朝玉泉山方向疾驰而来。

考虑到皮沙发有些凉,工作人员又四处找来毛巾被铺在皮沙发上。马锡金后来说:遗憾的是当时没有留下照片作纪念,那些五颜六色的毛巾被,绿的、紫的——这么举足轻重的会议,现在想起来也有意思。

办公室的人又想起一件事:“这么多人,连夜开会,还要吃夜宵吧?”一旁汪东兴的秘书却不慌不忙地回答:“我早就安排好了,大会堂那边送包子、酸辣汤,护士、服务员也都一起过来。”

马锡金一下子想起,10月5日那天,中央警卫局负责玉泉山的李钊专门跑到玉泉山9号楼,问马锡金:“你们需不需要什么办公用品?”

马锡金觉得这句话问得有些莫名其妙:“大过节的,也没什么人过来,需要什么办公用品?”

听了马锡金的回答,李钊未再多说一言,扭头就走。

此时,马锡金想起那日情景,忽有所悟:“我现在想起来,他一是来看一下这边的情况,为第二天晚上的会做准备,另一层用意可能是想试探一下我们是否知道消息吧。”不愧在中央警卫局服务多年,汪东兴的确心思缜密、考虑周到。

为安全起见,与会人员的车到了玉泉山之后,都停在另一个地方,

然后步行一段距离到达9号楼。在会场还没完全布置好时,纪登奎就先赶来了,随后是倪志福、陈永贵、吴桂贤。

吴桂贤走进会场后,自言自语地说:“沙发座位不够啊。”

周启才说:“座位够,除两个主座外,随便坐。”

叶剑英的另一位秘书王文理回忆,李先念到玉泉山时,一进门便问:“怎么这么晚还开会?叶剑英病得很重?”他还以为是叶剑英生病了。

开会的人都到齐了,工作人员请纪登奎、陈永贵、吴桂贤等后面一排的人,坐到前面的空位上来,纪登奎说:“你的座位不够,还有4个人没有来呀!”

马锡金说:“人到齐了,请到前边来吧。”

他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还是没有到前边来。

这时,汪东兴说话了,他说:“‘马头’说得对,人到齐了,你们都到前边来坐。”

一头雾水的4个人犹犹豫豫地坐到了前面。

晚22时整,周启才向汪东兴报告,出席会议的政治局成员已全部到齐。汪东兴让他去叶剑英卧室报告一下,请示华国锋和叶剑英,是否按时开会?

周启才进入叶帅卧室,向两位首长报告了上述情况。华国锋听后看看叶剑英。叶剑英说:

“人到齐了,就按时开会,咱们去会场吧!没谈完的事,还可以在会上谈。”

华国锋先从坐的床沿上站起来,并伸手扶着叶剑英站起来。

出卧室门时,华国锋请叶剑英先走,叶剑英让华国锋先走。最后是两个人手挽着手,肩并着肩,同步走出卧室,面带微笑地进入会议厅,分别坐在预先布置好的两个并列的沙发上,华国锋面向会场居左,叶剑英面向会场居右。

出席这次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的有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吴德、陈锡联、纪登奎、陈永贵、苏振华、倪志福、吴桂贤共11人。李鑫和周启才列席了会议。

开始,华国锋请叶剑英主持会议并讲话。叶剑英说:“这次会议应

该由你主持,你是毛主席提议、中央政治局讨论批准的党中央第一副主席,一直主持中央的日常工作,责无旁贷,你就主持开会吧!”

“那我就先讲几句,再请叶帅主讲。”华国锋说,“今晚把大家请到这里来,是要向大家通报一个重要事情: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和姚文元乘毛主席逝世之机,秘密勾结,疯狂活动,阴谋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为了及时粉碎这个将给中国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反革命集团,今天晚上8时,中央已在中南海怀仁堂正厅以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讨论《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出版和建造毛主席纪念堂选址问题为由,在中南海怀仁堂正厅拘捕了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不是常委,通知他来怀仁堂列席会议,做些《毛选》文字的修改工作,他来后,在怀仁堂东休息室被拘捕了。江青是在中南海她的住地被拘捕的。根据他们篡党夺权的严重罪行,分别向他们宣布了由我签署的中央对他们实行隔离审查的决定。对王洪文、张春桥的拘捕是在怀仁堂正厅,叶帅坐镇,我分别向他们宣布的。江青和姚文元是由执行任务的有关负责人员向他们宣读的。对毛远新实行了保护审查。‘四人帮’在北京的几个骨干分子,由北京市委、北京卫戍区根据中央指示解决。”

华国锋在讲话中还谈到了对江青这几个人实行隔离审查的意义,他说:“这次粉碎‘四人帮’的伟大胜利,使我们党避免了一次大灾难,使我们的事业避免了一次大倒退。”

华国锋的话音刚落,叶剑英强调:“‘四人帮’这个提法,是毛主席1974年7月17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讲的。我们清除‘四人帮’不是政治局少数人的想法,也不是我们临时的决定,而是毛主席生前想解决而没有来得及解决的问题,我们粉碎‘四人帮’是继承毛主席的遗志。毛主席在世时,他们结成‘四人帮’进行分裂党的宗派活动。在毛主席病重期间和逝世以后,他们更加猖狂地向党进攻,迫不及待地妄图夺取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

接着,叶剑英谈到了毛泽东的“两着棋”和临终“嘱托”。第一着棋是指1974年、1975年毛泽东多次在政治局会议上当着在京的全体政治局委员的面,毫不客气地说江青有野心,批评他们不要搞“四人帮”。毛泽东还多次对叶剑英说:“四人帮”的问题一定要解决,“不然要出大乱子。”叶剑英进而解释说:“我牢记着毛主席的教导,协助国锋

同志进行了这场斗争。这就是说,我们解决江青这几个人的问题,不是中央政治局少数人的想法,也不是我们临时的决定,而是毛主席生前想解决而没有来得及解决的问题,我们是继承毛主席的遗志。”

叶剑英还列举了王洪文这4个人的几条罪状。其中之一,就是他们“结成宗派,想夺取最高领导权。”周恩来在世的时候,他们想打倒他。周恩来逝世后,他们“又要打倒新的国家领导人。”更有甚者,“他们已在准备三中全会的报告了。他们准备在三中全会上达到篡党夺权的目的。王洪文可能没有把政变的龙袍做好,但是准备悬挂的标准相已照好了。”江青还跑到清华大学,大造反革命舆论,“到了迫不及待的地步。”可见,“情况已经到了不破不立的紧急时候。”不破了“四人帮”,中央就不能立起来。不破了“四人帮”,我们这个党就很危险。在这个关键时刻,“以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采取了非常果断的措施,揭露和粉碎了‘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

叶剑英谈到毛泽东的第二着棋是指组织上的安排。周恩来病重以后,“四人帮”以为,按照原来的次序,政治局应该由王洪文主持,国务院应该有张春桥主持。但是,“毛主席就是不给他们。”邓小平被推下台后,毛泽东经过反复考虑,选定华国锋作为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毛主席为什么要下这盘棋呢?目的就是为了防止‘四人帮’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叶剑英评价说,毛主席的这两着棋非常英明,“为我们这次解决‘四人帮’的问题奠定了基础。”

接着,叶剑英说:“我们党同‘四人帮’的斗争是一场势不两立、你死我活的斗争。在毛主席逝世不久的情况下,采取什么样的斗争策略、措施和方法,做到既要把这个反革命集团彻底打掉,又要保证首都北京和全国局势稳定。这是一步险棋,怎么走好这步险棋,非同小可,要慎之又慎,做到万无一失。经过我和国锋同志及东兴同志几次个别交谈,统一思想认识,决定采取“以快打慢”的方针,用在怀仁堂召开中央常委会的形式,对‘四人帮’采取行动,实行隔离审查。在决策和实施这一重大行动过程中,保密问题重之又重,知密范围很小,参与人员十分精干。实战证明,这样做是正确的,未放一枪一弹,即迅速粉碎了这个反革命集团,取得了预期的胜利。”

叶剑英还说:“粉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是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

共同愿望,中央采取这样的措施,也体现了党、军队和人民的意志。许多老同志、老领导特别是聂帅和徐帅等在毛主席病重期间和逝世以后,曾通过各种方式向我表达这种强烈愿望,提出要采取坚决措施打掉这个反革命集团,绝不能让他们的篡党夺权阴谋得逞。这次粉碎‘四人帮’的胜利,必将得到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的衷心拥护。军队完全拥护和支持党中央的这一重大决策。”

华国锋插话说:“这场粉碎‘四人帮’斗争的胜利,我们的叶帅起了最为重要的作用。”

叶剑英说:“不能这样讲。解决‘四人帮’的问题,是毛主席的遗愿。毛主席逝世后,你是党中央第一副主席,主持中央的日常工作,又是国务院总理,这件大事,如果你不下决心,你不拍板,做起来就难啊!正是因为你下了决心,你拍了板,做起来就相对容易了。”

叶剑英又说:“在这场同‘四人帮’的斗争中,东兴同志具体对行动方案组织实施,胜利完成,是出了大力、立了大功的。8341 部队的参战人员也为党为人民做出了很大贡献。”

汪东兴插话说:“叶帅过奖了。在这场同‘四人帮’的决战中,我是在国锋同志和叶帅的直接领导和指挥下,做了应该做的一些事情。一个老共产党员,长期从事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的领导干部,为了党、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完成中央交给我的政治任务,是完全应该的。”

与会者听了华国锋、叶剑英的报告,一片欢腾,有的兴奋得当场犯了心脏病,紧急抢救。会议完全赞同叶剑英、华国锋处置“四人帮”所采取的行动。

叶剑英说:“在中央,我们从政治上、组织上解决了‘四人帮’问题,这是第一步,是初战的胜利,地方上还有些‘四人帮’的帮派骨干分子要清理。更艰巨的任务是彻底从思想上肃清‘四人帮’的余毒和影响,这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和多方面的努力。”

华国锋说:“毛主席离开我们快一个月了。乱党、乱军、乱国,妄图夺取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四人帮’反革命集团,被党中央及时果断地粉碎了。在此新的形势下,我向中央政治局提议,请我们叶帅担任党中央的主席,主持中央的工作。叶帅德高望重,长期在中央协助毛

主席、周总理、朱老总,处理国际、国内重大问题,多谋善断,有多方面丰富的实践经验,思想政治理论水平很高,在危难时刻,两次挽救了党。”

叶剑英站起来大声说:“国锋同志这个提议不妥。我年事已高,今年已79岁了,且长期从事军事工作,工作面窄。经过慎重考虑,我提议由华国锋同志担任党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他年龄比我小二十多岁,有实际工作经验,为人实在,民主作风好,能团结同志,尊重老同志,他现在是党中央第一副主席,主持中央的日常工作,我认为他是比较合适的人选。这个担子是不轻,我们大家可以协助。请大家考虑。”

接着,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了关于建立毛泽东主席纪念堂的决定、关于出版《毛泽东选集》和筹备出版《毛泽东全集》的决定。这两个决定在10月8日的政治局会议上定稿,9日见报。

会议研究即将召开的打招呼会议。华国锋说:“既要解决问题,又利于大局稳定”,“要破得彻底,立得正确”。

华国锋说:“我们同‘四人帮’的矛盾,是敌我矛盾。对于这一点,必须有清楚的认识。对跟着‘四人帮’犯了错误的人,要区别对待。在他们当中,参与‘四人帮’阴谋活动的是极少数,受‘四人帮’思想影响而犯了错误的是大多数。参与阴谋活动的,还有浅有深。无论是浅是深,只要把参与阴谋的那一套向党向人民讲清楚,同‘四人帮’划清界限,我们就欢迎。打击面要缩小到‘四人帮’及其一小撮不肯改悔的死党身上。至于受‘四人帮’思想影响而犯了错误的,更要着重教育,帮助他们分清路线是非,认识错误的内容、危害、原因和改正的办法。对犯错误的同志,‘一要看,二要帮’,‘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这是毛主席的一贯方针,是延安整风的优良传统。这个方针和传统,长期以来遭到‘四人帮’的严重破坏,我们要在斗争的实践中切实地把它恢复过来。”

会议研究了上海问题。

大家分析了上海的实际情况。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调到北京后,一直兼着上海的市委书记,张春桥是第一书记,姚文元是第二书记,王洪文虽是党中央副主席,却又是上海市委书记,排在张、姚的后面。张春桥是南京军区第一政委,但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历来看不

惯他的那一套。张春桥根本指挥不了部队。

华国锋讲:“只要把上海的问题解决了,其他各省市的问题就好解决。其他各省市闹派性的头头和‘四人帮’比起来就是小玩闹。”

华国锋说:“‘四人帮’在上海拉过警备区的四个领导干部,号称有四个‘枪杆子’,只有周纯麟没有拉过去。先让马天水和周纯麟来。先做马天水的工作。”他想了想又说:“同时通知丁盛、廖汉生。”

华国锋之所以让周纯麟与马天水一同来北京,有几个考虑:其一,周纯麟是上海警备区司令员,负责保卫上海。其二,“四人帮”一直整他,华国锋认为他可靠。其三,只叫马天水一个人来,他可能会生疑而不来,如果他不来事情就难办了。

这次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从10月6日晚22时开到10月7日清晨4时多,历时6个多小时顺利结束。

# 第1416回：赴电台，连夜控制广播局 北京城，到处传“四人”被抓

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散会后，中央警卫局副局长李钊等人引领中央政治局各成员和随行人员分别到事先安排好的各楼房间内休息。汪东兴指示中办秘书局局长周启才办几件事：

1、给上海市委书记马天水和上海警备区司令员周纯麟打电话，通知他们今天上午来京，中央领导同志有事找他们谈。你通知完后，安排好专机去接他们，到京后，住在京西宾馆。

2、从今天开始，中央政治局开会或集体办公或找人谈话或其他活动，都在玉泉山五号楼会议厅进行。领导研究决定，你列席中央政治局会议、集体办公会议，做好各项会务工作和中央主要领导同志临时交办的各项任务。

3、叶帅年事已高，行动不太方便，在此非常时期，中央会议频繁，开会时秘书或警卫又不能进入会场随侍左右。给你一项任务，叶帅在会场起坐和去卫生间时，你要进行必要的搀扶，特别去卫生间要注意防滑，保证安全。

周启才问：“是否事先要向叶帅讲一下？”

汪东兴说：“今天上午政治局开会时，我向叶帅讲一下。”

当天，华国锋住在5号楼。此后约半年时间，玉泉山成了中央一段特殊时期的办公场所，直至一切恢复正常，中央领导们又回到中南海。

当时不在北京的韦国清、许世友、李德生、赛福鼎等同志，是由汪东兴打电话通知的，告诉他们政治局的决定，并征求了他们的意见。他们都表示坚决拥护中央的决定。

第二天，陈锡联在玉泉山向中央写报告，要求“不再主持军委的工作，还是请叶帅来主持。”

华国锋说：“你这个报告先不要写，叶帅还要协助我处理国内的事

情,军队的事情你还要继续管一下。”他让陈锡联收回了报告。

10 月 6 日晚 22 时左右,几乎与政治局玉泉山会议召开的同时,在卫戍区副司令员邱巍高和王团长的陪同下,耿飚持华国锋手令赴中央广播事业局大楼。

那晚正好是邓岗在值班,他和耿飚曾一起在抗大学习过。文化大革命时,他也被打成走资派,和耿飚一起到“五七”干校劳动。直到 1974 年四届人大召开后,由周恩来提名,出任广播事业局代局长。

当耿飚走进邓岗的办公室,邓岗站起来吃惊地望着他问:

“你怎么到这来了?”

他实在想不出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此时到电台来干什么?

耿飚笑着说:“是啊,我来上班来了。”

“上班?”邓岗更摸不着头脑了。

耿飚把华国锋写的那张纸条交给他。邓岗仔细看了看,仍然愣愣地看着耿飚,似乎还不明白是怎么回事。耿飚只好说:

“派我来这里主持工作是华总理和中央的决定,你要不相信想打电话向姚文元请示也可以。但不许出去,电话就在这里打。”

邓岗扭头看了看守在门口的两名战士,勉强笑笑说:“我不打电话,没有什么要请示的,我服从中央的决定。”

耿飚接着说:“那好,你把领导班子的人统统找到你办公室,就说有事要商量。”

邓岗召集来的广播局核心小组成员有 11 位,耿飚在会议室门口放了两名卫兵,任何人只许进不许出。然后,耿飚把华国锋手令念了一遍,要求大家遵照党中央的指示,把工作做好。

这些人尽管是一头雾水,但仍忙不迭地连声说:“明白了! 明白了!”

接着,耿飚给华国锋打电话报告:“已经控制住了,领导人都在我这里,你放心。”

华国锋知悉后,高兴地说:“最关键的问题解决了。”

中央广播事业局内的人员,在晚 22 时以后,得知了“四人帮”被捕的消息,一传十,十传百,全局上下迅速知道了。杜修贤回忆说:“半夜,床头的电话震碎了我的苦梦:‘江青抓起来了,还有张春桥、王洪

文、姚文元……真的,我不骗你!’”

第二天,根据邓岗的传达,通知“中央三台”,不要再用“按既定方针办”这一提法。

10月6日深夜23时左右,叶剑英的警卫马头给北京后海小翔凤叶剑英在城里的家打电话,告诉正在那里的叶剑英的儿子叶选宁和侄子叶选基:“首长让我告诉你们,‘那四个人’给抓起来了。”

叶选宁和叶选基明白“那四个人”是指谁,马上决定尽快把这个大快人心的消息通知出去。他们叫上司机任天庆开车,先到西郊机场去找“头头”,叶剑英最小的儿子叶选廉,他当时是空军34师专机组的飞行员,告诉他这个消息。然后又从那里直接到了位于永安里的国管局宿舍“九层楼”,告诉了老大叶选平。

通知完叶选廉和叶选平后,叶选基稍睡了一会儿,第二天早上7点半,他就闯到了翠家湾王震的住地,将这个消息告诉了王震。王震听到消息,整个人都坐不住、站不住了,兴奋得不得了,马上驱车去陈云家,把这个消息告诉了陈云。

第二天,叶选基又到王震家,看见他手里捏了两个核桃,抓来抓去。叶选基好奇地问起,王震说是陈云给他的。原来,陈云看到王震如此亢奋,控制不住情绪,送他两个核桃捏一捏,可以平衡一下情绪。

再说7日凌晨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散会后,中办秘书局周启才局长立即按照汪东兴的指示去了5号楼,查看中央政治局开会的会议大厅、中央主要领导人的休息室、保密电话间、卫生间等的布置情况。接着,又在5号楼让总机值班人员接上海马天水和周纯麟的保密电话。

凌晨3时,首先接通了马天水的电话。周启才对马天水说:

“我是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周启才,中央领导同志指示我给你打个电话,请你今天上午来京,有事找你谈。”

马天水问:“谈什么事,中央领导同志讲了吗?”

周启才:“没讲。”

马天水又问:“徐景贤、王秀珍去吗?”

周启才:“没说要他们二位来。”

马天水:“上海还有别人去吗?”

周启才:“还有警备区周纯麟司令员。”

马天水:“我通知周司令。”

周启才:“不麻烦你了,总机正在给我接周司令员的电话。”

周启才在电话中告诉马天水,中央办公厅上午将派专机去接他们。

周纯麟司令员的电话接通后,周启才也讲了中央领导请他来京的事。周司令员听后说:“好的,我等机场通知。”

凌晨4时,公安部杨贵接到华国锋的电话说:

“王洪文、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我们已经隔离审查了,进展得很顺利。你要注意祝家耀。”

放下华国锋的电话,杨贵想,怎么“注意”祝家耀啊?他想起祝家耀喜欢看电影,于是就调来几部电影,叫祝家耀过来一起看电影。

7日清晨6时,在友谊医院住院的姚依林,从匆匆赶来报信的女儿口中得知“四人帮”被抓。兴奋不已的他立即出院,赶到陈云家报喜去了。陈云赞许地说:“剑英同志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

7时多,住在万寿路干休所的陶铸妻子曾志接到罗荣桓的夫人林月琴打来的电话:“告诉你一个好消息,那4个人昨晚被抓起来了!”

在曾志明白那“4个人”就是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之后,兴奋得手直发抖:“谢天谢地,谢谢你告诉我世界上最好的消息!”

她放下电话,赶紧把消息告诉给女儿、女婿。

7日早晨,因“告江青状”,从4月起就被停职反省的新华社李琴,在电话里听到王海容的声音:“那4个人抓了!”

电话随即挂断了,李琴一下子想到“那4个人”是谁。

同样因“告江青状”,从4月起就被停职反省的新华社穆青的妻子周萝,也在这天接到一个不知姓名的女人电话,就一句话:“祝贺你们了!”

晚上,也是因“告江青状”,从4月起就被停职反省的新华社朱穆之,晚上在家里迎来了朋友刘回年,他是悄悄走进朱穆之的家,告诉他:“那4个人都被抓了!”

7日上午8时30分,华国锋在玉泉山5号楼会议厅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首先由汪东兴汇报了清晨他给外地四位政治局成员通电话的情况:

“根据华主席、叶副主席的指示，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散会后，我分别给许世友、韦国清、李德生、赛福鼎同志打了电话，向他们通报了昨晚中央粉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情况和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做出的几项重要决定，他们都表示赞同中央对‘四人帮’采取隔离审查的措施，同意国锋同志任党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的决定。”

汪东兴还在会上讲了周启才给上海马天水、周纯麟打电话的情况。

接着，会议研究决定了召开“打招呼”会议的事情。华国锋说：

“从今天开始，在京的中央政治局委员按照原来分工，要分头迅速召集中央在京党、政、军各部门的主要负责人开会，向他们传达党中央粉碎‘四人帮’和政治局紧急会议做出的各项重大决定。而后开始分期分批召开各省、市、自治区、各大军区主要负责人参加的打招呼会议。会议地点在玉泉山5号楼，来京与会人员住在京西宾馆。”

接着，把外交部的一些主要负责人召到玉泉山5号楼，由华国锋、叶剑英直接向他们进行传达，李先念、汪东兴等在会上也讲了话。外交部有的负责人听完传达后，高兴得泪流满面。根据新的形势，会上研究部署了外事工作。

10月7日，吴德通知迟群、谢静宜到北京市委开会，在那里将他们二人抓了起来。

10月7日的《人民日报》，依然保持着过去的风格，头版头条登着：《继承毛主席遗志的最好实际行动——上海市掀起群众性学习毛泽东思想的高潮》，二版的通栏标题为《深入批判邓小平授意炮制的〈论总纲〉》，刊出梁效的长文《〈论总纲〉和克己复礼》。……《人民日报》如此，全国所有的报纸、电台也如此。

10月7日，《光明日报》按原计划发表了"梁效"的文章：《打着红旗反红旗的黑标本——批判〈论总纲〉篡改马克思主义的卑劣手法》。

7日上午，中央政治局要谷牧派精干可靠的人员到上海了解情况。

再说上海，中央秘书局的通知让上海的马天水感到有些突然，他立刻将时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的徐景贤和王秀珍叫到康平路市委学习室。

上午9时，当王秀珍步入康平路市委学习室时，发觉马天水穿得

整整齐齐,早已坐在那里。马天水向来朴素,只有在接待外宾时才穿笔挺的中山装,扣得紧紧的衣领里露出一圈雪白的衬衫领。不过,他今天神态木然,呆呆地坐在那里。

“马老,今天有外宾?”王秀珍问道。

“不,去北京开会。”马天水低垂着硕大、光秃的脑袋,颓然地答道。

“去北京开会?”徐景贤也进来了。他向来是个非常敏感的人,马上插话道,“中央最近一段时间没有会议呀,也不会有人事变动。”

“是呀,每次去北京开会,春桥、文元和老王总是事先来电话关照。这一回,怎么突然叫你去开会? 哪里来的通知?”王秀珍问道。

“中央办公厅一早打电话来,要我和周纯麟同志今天中午赶到北京。”马天水答道。

“你给春桥挂过电话吗?”徐景贤追问。

“我,我怕太早,他没起床,怕打扰他。”马天水支吾道。

其实,这个“马老”,乃是一匹识途“老马”,哪里还用得着徐景贤提醒?

马天水与周纯麟同行,王秀珍、徐景贤机场送行,他们再三叮嘱马天水的秘书房佐庭,到了北京“向三位首长问好”,并按惯例打个报平安的电话回来。

7 日上午,马天水和周纯麟司令员飞到北京,入住京西宾馆。

当天下午,叶选基去看望吕彤岩。吕彤岩是吕正操的女儿,叶选基的前妻。此时,吕彤岩已经从父亲那里得到了粉碎“四人帮”的消息。因为 10 月 7 日上午,陈锡联代表中央在西山召开在京三总部各兵种领导紧急会议,传达中央粉碎“四人帮”的决定,时任铁道兵政委的吕正操参加了会议。吕彤岩问叶选基要不要将这个消息告诉邓小平,叶选基让她立即转告。于是,吕彤岩马上打电话约见了邓小平女儿邓榕的丈夫贺平,告诉他“四人帮”被粉碎的消息。

正在单位上班的贺平听到这个消息后,骑上自行车“飞”一般地赶回宽街邓小平的住处。他一进屋,就连声说:“快来! 快来!”全家人一看他满头大汗、兴奋不已的样子,就知道一定有大事发生。

邓小平夫妇和邓林、邓楠、邓榕一起挤在紧闭房门的厕所里,又特意放开自来水,听贺平“传达”这一消息。邓小平耳朵不好,流水声又

太大,经常因为没听清而再问一句:

“‘四人帮’被粉碎了!”

“这是真的吗?”

他们简直不敢相信这是事实。震惊,疑惑,紧张,狂喜,一时之间,喜怒哀乐之情全都涌上心头。就在这间厕所里,在哗哗作响的流水声中,问着,说着,议论着,轻声地欢呼着……一向举重若轻,泰山崩于前而不惊的邓小平,此时也激动的连手中拿着的烟头都在轻微地颤动。他由衷地感到喜悦:“中国有救了,我可以安度晚年了!”一贯寡言少语的邓小平,还向大家解说“厚重少文”及周勃、陈平的典故,说“华这个人好,选对了”。

徐向前听到这个消息,连声高呼:“好得很,好得很!”

聂荣臻激动地说:“中国得救了!”

7 日下午,从“文革”开始不久就靠边站的《人民日报》副总编辑李庄正在看书,电话铃响了,对方未通姓名,只说了一句话:“你不是还有半瓶茅台吗? 喝了吧!”

李庄再也无心读书,挨到下班,一溜烟跑回宿舍,拿出茅台,一饮而尽。他后来回忆说:“电话是一位穿军装的老战友打来的,这是我们两人在特殊情况下为了避祸定的一种隐语,表示‘四人帮’覆灭了。”

当晚,从唐山返京的于光远,听妻子孟苏说了此事,于光远不敢相信,约了黎澍,黎澍又约了李新,4 人一起在大街上散步,分析了一番,确认消息是可靠的。于光远回到家里已是午夜 12 时,他打电话给国务院政研室的同事李昌、冯兰瑞夫妇,要他们马上到他那里去。于光远见到他俩就说:“5 个人都抓起来了。”接着,他讲了一些他听到的事情经过。李昌夫妇回到家后,兴奋得许久没睡。

7 日以后,李先念约邓颖超谈话,叶剑英派儿子叶选宁去看望胡耀邦,通报粉碎“四人帮”的情况。胡耀邦让叶选宁转告叶剑英三句话:“第一句,停止批邓,人心大顺;第二句,冤案一理,人心大快;第三句,生产狠狠抓,人心乐开花。”

# 第1417回：打招呼，马天水目瞪口呆 迟浩田，受命进《人民日报》

7日下午，中央政治局再次开会。由叶剑英提议，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华国锋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将来提请中央全会追认，通知“立即在党内传达”。

7日下午，党中央派专机将上海、江苏、山东、湖北等地的负责人和济南军区、武汉军区的领导接到北京。华国锋首先派人将江苏的彭冲接到玉泉山，说：“今天找你们来，告诉你们，中央解决了‘四人帮’的问题。”

当天晚上，中央政治局召集到京的上海、江苏、浙江、安徽、山东、湖北等省市和南京、济南、武汉三个军区的负责人开会，其中有上海的马天水、周纯麟，江苏的彭冲、许家屯，山东的白如冰，湖北的赵辛初、赵修，南京军区的丁盛、廖汉生，济南军区的曾思玉，武汉军区的杨得志、王平等。

马天水走进会场，见华国锋、叶剑英等在京的政治局委员中，王、张、江、姚四人没来，心里一惊，但没漏声色，热情地和大家握手，打招呼，一切如常。

华国锋宣布：“王、张、江、姚阴谋篡党夺权，党中央对他们采取了坚决措施，将他们隔离审查，除去了隐患。”会场响起热烈的掌声。

马天水愣了，简直目瞪口呆！他解开了紧扣着的中山装的领子，虽然也随着大家拍了拍巴掌，但那光秃的前额却在不断冒汗。

华国锋系统介绍了毛泽东从1974年起对“四人帮”的不满和历次的批评，介绍“四人帮”如何阴谋篡党夺权，以及对他们进行隔离审查的必要性。

会场气氛热烈，不少人插话。

华国锋手上拿着三份毛泽东的手稿，一份是“慢慢来，不要招（着）急”、“照过去方针办”、“你办事，我放心”；一份是“江青干涉太多了。

单独召集十二省讲话”;一份是江青要求印发“风庆轮”问题的材料时,华国锋向毛泽东请示报告,毛泽东在华国锋报告上的批示:“不应该印发。此事是不妥的。”

华国锋说:“他们大造舆论,几种报刊都是他们控制的。他们伪造毛主席临终嘱咐。其实是我在1974年4月30日,毛主席会见新西兰总理马尔登后把我留下。我报告主席,整个形势是好的,有几个省,浙江、江西、福建、云南有问题,政治局要讨论研究解决。主席写了三张纸给我三句话,一张是‘慢慢来,不要招(着)急’,一张是‘照过去方针办’,一张是‘你办事,我放心’。我正式给政治局传达前两张,后一张没有传达。‘按既定方针办’这句话在告人民书里,在悼念词里他们不写,在社论里讲了。六个字改了三个字,作为临终嘱咐大做文章。当时主席逝世,我们都很忙,忽略了这个事。乔冠华在联合国的讲话稿,讲了主席嘱咐,‘按既定方针办’。我在2日看了把这个字改了。张春桥又批了‘暂时不要传达’。到10月4日,《光明日报》头版头条发表《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这篇文章用梁效的名义,文章里说:‘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就是背叛马克思主义,背叛社会主义,背叛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的伟大学说。’陈锡联同志从唐山回来,对我说,我们都是叛徒了。在悼词里面不提‘三要三不要’,讨论时,陈锡联同志提出要把‘三要三不要’加上去,姚文元笑了一下,还是没有加上去。后来,汪东兴同志又向我提出,经我坚持,加上去的,张春桥表示写就写吧。”

会议一直开到8日凌晨,宣布几条纪律:不准私自向外面打电话,不准写信,不准外出,不准接待客人。

华国锋看了看表,说:“今天就谈到这里吧。晚上继续开,大家发言。”

散会后,周纯麟和马天水坐在同一辆车里返回宾馆。路上,周纯麟问马天水:

“你今天为啥不高兴?大家都很高兴啊!而你连记录都不做,回去怎么传达啊?”

马天水说:“我好像被打了一闷棍!这些事,以前我一点也不知道啊!”

周纯麟说:“这是全党全国人民的大事,也是上海的大事,今晚大家都还没来得及发言,明天你可要好好表个态!”

马天水却说:“这些材料说服力不强。毛主席去世还不到一个月,他们就那么坏吗?我不同意把他们抓起来这种办法,就是有错误,也应作为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给他们有检讨改过的机会嘛!难道四个人都是一样的错误吗?”

周纯麟说:“华主席讲话时,材料都说得很清楚,证据确凿,你又不是没听到。他们谋害毛主席、反对周总理,难道还是假的吗?你对他们的不少事情都是很了解的,应该老老实实地说出来。”

马天水的秘书房佐庭也整整等了一夜,因为不知道中央开会的内容,他一直未向上海报平安。这时,听到楼道里的脚步声,房佐庭赶紧出来,然后跟着马天水一同进屋。

走进房间,马天水实在熬不住了,冲口而出:“简直是突然袭击,宫廷政变!”

说罢,马天水似乎意识到自己失言,再也没有说话。

躺到床上,马天水辗转反侧,无法入眠。

他无法抑制自己的心情,又对秘书说出了心里的话:

“唉,今天还要去开会,会上不能不表态。表态难,不表态又不行。表示拥护吧,向上海怎么说?不表示拥护吧,恐怕就回不去了!”

再说上海,马天水走后,一直到7日晚上21时,他的秘书房佐庭按惯例的报平安电话也没给上海打回来。王秀珍着急,打电话到北京公安部找祝家耀,问他是否看到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祝家耀说,前几天看到了,是不是因为地震搬家了?

祝家耀,1955年3月至1959年4月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战士、副班长。1959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59年5月至1966年12月为上海5703厂工人,后在厂劳资科工作。1973年6月在上海市委组织组工作。1973年11月至1977年6月为公安部党的核心小组成员。中共第十届中央委员。

王秀珍又将上海市革委会副主任、上海市委常委、时任全国总工会“九大”筹备组副组长金祖敏在上海的秘书缪文金找来,让他打电话找马天水。

徐景贤也着急。10月7日深夜23时左右,他打电话给文化部部长于会泳,问北京有什么动向?于会泳说:“今天下午国务院办公厅主任吴庆彤通知他,中国文化代表团不出访了,是华总理决定的,很奇怪。”

徐景贤说:“中央突然把马天水找去开会,但内容没有告诉我们,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重大事情。于部长,你有什么消息要及时告诉我。”

接着,徐景贤又给卫生部部长刘湘萍打了电话。刘湘萍则告诉徐景贤:“没听说中央开什么会,江青原定今天晚上请她看戏,现在却找不到人了。”

她还说,人民日报社的鲁瑛昨晚也打电话问她发生了什么事情。

原来,10月7日,《人民日报》也发生了变动。

10月6日午夜,正在唐山抗震救灾第一线的北京军区副政委迟浩田,突然接到中央办公厅一个紧急电话:“你明天一早回京,中央派专机来接。”

迟浩田问:“什么事?”

“你来了就知道了。”对方说。

“在这个抗震救灾的关键时刻,怎么让我回去呢?”迟浩田坐立不安,于是,打电话到北京军区问秦基伟政委。秦基伟说,他也不知道,然后说:

“这大概是中央定的。叫你回来你就回来吧。”

秦基伟的回答更让迟浩田忐忑不安。这一夜,他脑海里“翻江倒海”,1973年底,《解放军报》的一幕,让他再也无法入眠。

1971年3月,迟浩田任解放军报社核心领导小组成员。1973年底,他调北京军区任副政委不到两个月,又被揪回军报,被批斗长达两年之久。这次回去,是不是还要回军报接受批斗?真是心有余悸呀!

第二天早上,到机场送行的人个个心情沉重,沉默寡言,告别的话都是一样的:“老迟,你这次回去吉凶难卜,望多保重!”那情景就像生离死别,仿佛这一去再也回不来了。

到了北京,来机场接迟浩田的是一辆黑色轿车。来人让迟浩田的警卫员和秘书回原单位,“不要跟着首长了”。秘书和警卫员心里

打鼓。

黑色轿车一直驶进了中南海。此时,迟浩田悬着的心放了下来。

中南海西楼会议室。一个白发苍苍、腰板挺直的长者迎上前来,高声问道:“你是迟浩田同志吗?”

迟浩田回答说:“是。”

他觉得曾在某个场合见过这位长者。认出来了,这是新中国第一位“将军大使”耿飚。

这时,耿飚伸开双臂欢迎迟浩田,并大声说:“告诉你个好消息,‘四人帮’被我们抓起来了。”

尽管迟浩田很不习惯这种外交礼仪方式,但他也毫不犹豫地伸开双臂,与耿飚紧紧地拥抱在一起。

迟浩田看了看会议室,在座的还有担任过教育部长的刘西尧和北京日报社社长孙轶青。

大家坐定以后,耿飚简单地向他们通报了粉碎“四人帮”的过程,迟浩田和在场的人一起露出喜悦的笑容。

这时,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北京军区第一政委纪登奎走进会议室。他一边同迟浩田握手,一边说:“这次叫你来,是想给你个任务。”稍停顿了一下,接着说:“上次你在军报,落了个‘复辟’罪名,把你搞得很苦,那是‘四人帮’搞的。这次中央让你到《人民日报》去,再搞一次‘复辟’,把权从‘四人帮’的手中夺回来。我们研究了一下,觉得你有工作经验,是最合适的人选。你愿不愿意去啊?”

迟浩田听了以后,不由自主地表示:“坚决完成任务。”

纪登奎接着宣布:“中央决定由耿飚同志牵头,主管宣传口。你们研究研究吧,我等着你们的好消息。”说完就匆匆离去。

时间紧急,千头万绪。耿飚对到会的几位同志说:“我们分分工吧。我到新华社,刘西尧到《光明日报》,浩田同志,你和孙轶青到《人民日报》去,你在《解放军报》干过,有经验了。究竟怎么办,大家先研究研究。”

迟浩田考虑到“四人帮”被抓尚处于保密阶段,建议兵贵神速,马上进驻。他建议由中央组织部写一封介绍迟浩田等人到人民日报社工作的公函,由人民日报社的负责人鲁瑛来接他们去。

耿飚当即表示同意,说:“事不宜迟,马上通知鲁瑛来。”说着,他就用红机子通知鲁瑛,要他马上到中南海开会。

鲁瑛,原是上海《解放日报》的一名中层干部,用张春桥的话说:“能力很弱”。但是,作为1966年陈伯达进驻《人民日报》的工作组成员之一,他也是工作组中唯一留在《人民日报》掌权至今的人。文革中《人民日报》只有临时领导班子,直到1975年《人民日报》才正式设立了核心小组和宣传小组,两个组长都是鲁瑛,集党务、编务于一身。鲁瑛在《人民日报》长达10年零9个月,是历任《人民日报》总编辑中任期最长的。

过了一会儿,鲁瑛坐着红旗轿车来到中南海,以为是来接受管宣传口的张春桥、姚文元的指示。可是到会议室,并不见张、姚二人的身影,却见一个魁梧的中年军人站在面前。

毫无思想准备的鲁瑛看了这位军人一眼,就坐下了,翘起二郎腿,等候张春桥和姚文元的到来。

这位军人就是迟浩田。这时,他用平缓的口气问道:“你是鲁瑛吗?”

鲁瑛答道:“是。”说着,抬头看了看迟浩田。

迟浩田很严肃地说:“我受中央委托和你谈话,请你先看看这封信。”说着,将中央组织部的介绍信放到鲁瑛面前。

鲁瑛满不在乎地把信展开,看着看着,脸上的肌肉开始抽搐,二郎腿放下了,背也不靠在椅子上了,神态来了180度急转弯。

中央那封信上是这样写的:

鲁瑛同志:

为了加强人民日报的领导,中央决定派迟浩田、孙轶青、郗汉生三同志参加你们核心组的领导,有重要事情向他们报告。

致敬礼!

中共中央组织部

一九七六年十月七日

鲁瑛注意到,信上,有这样的批示:

同意,请中组部办。

华国锋

十月七日

只有主持中央工作的最高领导人华国锋的批示,没有负责宣传工作领导人的批示,鲁瑛似乎意识到什么。

接着,迟浩田严肃地对他宣布了三点:

一、中央决定,过去管《人民日报》的那几个人已经倒台了,从现在起不能再领导《人民日报》了;

二、我们受中央委托到《人民日报》工作,在宣传、版面上要请示我们,不得擅自作主;

三、你要服从中央的命令,听从中央的指挥,不能擒小动作,不能泄露机密。在关键时刻你要接受考验。

迟浩田最后说:"一会儿我们坐你的车走,去报社召开领导成员会议,宣布中央的决定。"

交待完后,迟浩田等3人便坐上鲁瑛的车子,于19时50分,和鲁瑛一同来到位于王府井的《人民日报》办公楼。

迟浩田让鲁瑛在20分钟内把报社核心小组成员召集到到二楼会议室开会。

报社核心组成员,除挂名的王洪文秘书肖木之外,全部悉数到会。他们对事先没有通知,深更半夜召来开会自然是满腹牢骚。但一进入会议室,看到有几个生人,其中还有军人在座,立刻意识到出事了。大家面面相觑。

鲁瑛未作任何介绍便说:"现在请迟政委作指示!"

迟浩田对鲁瑛说:"你先念念中央通知吧!"

鲁瑛接过信,站起来开始念中央组织部的介绍信和华国锋的批示。到会者听了甚为震惊,会议室里陡然呈现严肃气氛。

迟浩田一面让鲁瑛给大家念中央的通知,一面观察在座人员神色。等鲁瑛念完后,迟浩田站起来,开门见山地说道:

"先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过去经常插手《人民日报》的那几个人,现在不行了。《人民日报》是党中央的机关报,从现在起要听党中央的。这是第一点。第二,我们到《人民日报》社工作,愿意和大家通力合作,把《人民日报》办好。希望大家同心协力,把应该干的工作干好,让党中央放心,让全国人民放心。第三,在关键时刻,每个同志都在经

受考验,在座的有人可能会不高兴,感到突然,这也不奇怪。不过,谁唱反调,谁逆历史潮流而动,谁就没有好下场。”

迟浩田要求到会的核心组成员表态。与会者简单地说了“听党中央的,按中央指示办”之类套话后,迟浩田对到会的人规定了三条纪律:“一、要严守机密。中央未公布之前,报社不要乱传乱讲,任何泄密行为都是党纪国法所不容许的。二、要坚守岗位,坚持正常出报。为便于工作,暂不公开身份,一切照常进行。”

散会后,迟浩田3人立即掌控了报社与中央联系的保密电话——“红机子”。报社的人说:“谁掌握了‘红机子’,谁就掌握了领导权。”鲁瑛失去了“红机子”,也就不能同中央联系了,什么事都得通过迟浩田等3人。

迟浩田3人当天夜里就睡在报社的办公室里。

第二天早上,人民日报社机关食堂里,前来用早餐的职工交头接耳,谈论一件秘闻:“报社昨天晚上又来了新的军代表!”

“嗨,这有什么稀奇!‘文革’以来,军代表来过几拨了。”传者有心,听者无意,表现的若无其事。

是啊,自文革开始,1966年6月,陈伯达带工作组进驻《人民日报》社,以当时的《解放军报》总编辑唐平铸为主。后来,唐平铸被揪回军报,上面又派来一个以总政宣传部钱抵千部长为首的“记者团”。不知什么时候,这个“记者团”也无声无息地离开了报社,《人民日报》由造反派掌权。由于两派矛盾,上面又派38军的一个师政委崔金耀,带着一批连排级干部来“支左”至今。所以报社对来了“工作组”这类传言,很多人并不放在心上。何况,报社“通天”人物多得很,有些人自然把来人不当回事。

这一回可不同寻常。来接管报社的迟浩田是一位著名的战斗英雄、北京军区副政委。他一来,38军崔金耀带的那拨人,根据上级的指示,无声无息撤了。

迟浩田他们进驻报社后,源源不断地向中央发去《简报》:

《第一号简报》(10月7日晚上):“中央:今晚七时五十分,我们由鲁瑛陪同进驻人民日报社。由鲁瑛召集报社在京的核心组成员九人开会,宣读了华国锋同志批示的中央组织部通知……”

《第二号简报》(10 月 8 日上午):“今天上午在不到一个小时内,他们那一帮子人两次给鲁瑛来电话,打探消息,进行串联。上午九时四十分,文化部于会泳给鲁瑛来电话,说他原来准备去阿尔巴尼亚访问,突然又不叫去了,问鲁瑛有什么情况? 十时三十分,上海徐景贤给鲁瑛来电话说,昨天凌晨,马天水、周纯麟以及邻近省的领导同志到北京开会,他们走后,联系不上。徐与春桥、文元的秘书也联系不上。他们心里很纳闷,向鲁打听有什么情况没有?”

# 第1418回：国务院，派上海八人小组 消息传，招待所白酒售罄

是啊，上海这边也很着急呀。10月8日清早，张春桥前妻李文静给王秀珍打来电话，说张春桥的儿子原定10月8日上北京，结果李文静给张春桥打了一夜电话都没有打通，不知道出了什么事情？

王秀珍闻言，亲自给王洪文打电话，就是打不通……

于是，王秀珍和徐景贤将上海市委常委、市革会副主任王少庸、冯国柱和市委常委张敬标都叫到康平路小礼堂商量，还将张春桥在上海的秘书何秀文、王洪文的秘书廖祖康以及肖木也都叫来。

廖祖康是回上海结婚的，还在蜜月中。

大家分头用各种电话号码，通过各种渠道，向北京打电话，包括8341部队值班室，姚文元的妻子、秘书，甚至王洪文的警卫员、司机、服务员，等等。但是都打不通。

廖祖康说："情况反常！"

……

正在这时，徐景贤突然拨通了《人民日报》负责人鲁瑛的电话。大家一阵兴奋。

可是，当徐景贤刚要问情况时，鲁瑛的声音却有些反常，没说两句，就急忙把电话挂上了。

耳机里响起一片忙音，这给上海这边在场的所有人，兴奋之后又是当头一盆冷水。

肖木马上说："坏了，鲁瑛肯定给监视起来了！"

此时，市委常委张敬标通过上海警备区接通了北京京西宾馆，找到了马天水的秘书房佐庭。房佐庭说会议不准往外打电话，马天水的身体不好，他自己的"胃病"也发作了，动不了了。

廖祖康抢过电话大声地问："你们到机场时谁去接的？"

房佐庭回答说："是穿军装的人接的。"

廖祖康又问:“有没有见到中央办公厅的人?”

房佐庭回答说:“没有。”

廖祖康接着问:“你那里不准往外打电话是谁通知你的?”

房佐庭回答说:“是我问别的省的。”

最后,房佐庭又一次告诉廖祖康,说自己的“胃病”发作了。

放下电话,廖祖康问王秀珍:“老房有胃病吗?”

王秀珍答:“没有听说过。”

廖祖康说:“这就怪了。那他说‘胃病’又犯了是什么意思呢?”

这时,上海警备区作战处向上海市委报告了中央军委关于加强战备的指示:

军委首长指示,部队战备工作转入正常后,发现有的单位有点松懈,请检查一下。战备工作不能放松,仍应提高警惕,注意敌情,边防(沿海)防止内遣外逃。

大家读了军委的电话记录后议论纷纷。

徐景贤说:“毛主席逝世之后,一号战备命令刚刚通知撤销,怎么现在中央又通知加强战备呢?而且这个通知里面还特别提到要防止内潜外逃,看来是有什么人出了事情。”

廖祖康接着说:“在北京的几个老帅,像叶帅、徐帅他们还是很有号召力的。”

说到这里,廖祖康便不再说下去了,屋子里的空气仿佛一下子凝固了,大家面面相觑,廖祖康后面未说出的话大家都明白,意思是几个老帅可能已经对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他们下手了,他们还没有想到江青也同时遭到这样的下场。

徐景贤当即说:“极可能发生军事政变!”

王秀珍接着说:“老帅动手了,右派上台了。”

王秀珍首先提出,下午她要找市民兵指挥部的几个负责人“打招呼”。

接着,王少庸提出,他在下午要找公安局的负责人“打招呼”。

负责分管宣传和新闻媒体的徐景贤也提出,他在下午要找广播电台和报社的新闻界负责人“吹吹风”。

这时,上海警备区又来通知说,总政原定在上海召开的全军图书

阅读现场会议不开了。

接着,徐景贤从上海人民广播电台负责人那里获知:“中央台通知停播《按既定方针办》等两首歌。”

上午,金祖敏的秘书缪文金通过北京熟人,也终于在京西宾馆找到房佐庭。房佐庭说:“马老正感冒,在洗澡。”

徐景贤再次拿起话筒,重新拨通了房佐庭的电话,声称一定要“马老”亲自接电话。

房佐庭回答:“马老不能听电话。”说完之后,他又说了一句:“我的老‘胃病’又犯了。”

房佐庭反复说他的老“胃病”又犯了,使徐景贤等人心中十分不安,可是又实在无法摸到准确情况。

而此时北京,国务院副总理谷牧正组织一个“八人小组”准备派往上海。

10 月 7 日晚,国家计委副主任袁宝华给秘书王守家打电话,让他第二天上班时先到袁宝华的办公室来一下。

10 月 8 日上午 8 时,王守家一进计委大楼就直接来到袁宝华的办公室,看到国务院副总理谷牧也在屋里,不免心中一惊,不知是什么事情。

很快,袁宝华的办公室又进来 7 人,都是王守家熟悉的。他们是:

徐良图,国家计委生产组副组长,负责北煤南运、南粮北调和海运石油,自封为“救火队”队长。

李景昭,国家建委核心小组成员。

周力,物资部调度局局长。

曹大澄,国家建委办公厅原副主任,国务院计划起草小组运输处处长,历届计划会议、经济工作务虚会简报组组长。

干志坚,国家计委干部,石油钻探钻头工程师,地下钻管、钻头专家。

王德瑛,国家建委燃料动力局负责人。

陈斐章,国家计委政策研究室负责人。

这时,谷牧向他们宣布:“昨天,党中央采取断然措施,把祸国殃民的四个大坏蛋抓起来了! 把‘四人帮’抓起来了!”

原来,7 日上午,谷牧到玉泉山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时知道了这个消息。这时,他仍然沿用玉泉山会议宣布的“昨天”。

在场的人先是愣了一下,接着使劲鼓掌,叫好。

谷牧等大家安静下来后,继续说:“上海是‘四人帮’长期把持的地方,现在我们对上海的情况一点也不了解,所以派你们八个人先去上海,执行秘密任务:了解上海深层情况,帮派的动态,每天把上海的情况告诉北京。你们到上海以后,先做秘密串联工作,通过熟人、亲戚、朋友了解上海动态。你们要做好经受残酷考验的准备。这件事要高度保密,不许对任何人讲,甚至对老婆也不能讲,只能说到上海出差。你们向外公开的任务是了解上海生产情况,了解计划完成情况。”

他宣布,派遣小组的名义是“抓革命促生产建设调研和督促组”,组长徐良图。

谷牧对曹大澄说:“你到了上海去找王一平同志。”

曹大澄、李景昭、王德瑛这 3 位国家建委的人是谷牧提名的。国家计委的徐良图、干志坚、陈斐章、王守家 4 人和物资部的周力是袁宝华提名的。当时,各省区市的计委(上海称计划组)、经委(上海市称工交组)、建委和物资系统对这 8 个管业务的干部都很熟悉。每年召开的全国计划会议上,都是这 8 个人和各省区市打交道,平时也经常联系,所以他们到上海出差,别人都会相信是真来抓计划、生产、建设业务工作的,不会怀疑另有秘密使命。

王守家在派遣小组中负责总务工作。徐良图要王守家立即到计委接待处订 8 张飞机票,越快越好。

王守家当即请计委接待室订妥次日晨第一班飞机票。订好票后,王守家立刻给上海市工交组值班室打电话,告诉接电话的人:“明天我们8 个人到上海出差。7 点 4 分起飞,8 点半到上海。请你们到飞机场接机,并安排住宿。”

谷牧为什么派曹大澄去找王一平“接头”呢?王一平和谷牧本是山东荣成同乡,青少年时代同学,1931 年两人同时参加革命。王一平1935 年底组织胶东起义失败后,到北平找谷牧接上组织关系,当晚住在西城辟才胡同谷牧租的公寓。1936 年 4 月 30 日深夜,两人同时被宋哲元的军警督察处逮捕,关押在府右街军警督察处看守所。出狱

后,两人一起到东北军学兵队。抗日战争时期,两人同在山东根据地。新中国成立后,同在上海市委工作。1955 年,谷牧调国务院任第三办公室副主任兼建委副主任。建委撤销后,谷牧任经委副主任。王一平在上海市委做组织工作,后任书记处书记,文革开始后就靠边站了,以后又被结合到上海市革委会,任上海市革委会副主任。

王一平和曹大澄都爱好书画。每逢王一平到北京办事,必邀曹大澄陪同去拜访黄胄、吴作人、李可染、李苦禅等老画家,因而王一平、曹大澄成为书画朋友。谷牧要曹大澄到上海先找王一平,就是私下以书画往来,掩护此行的秘密活动。

曹大澄想,这次到上海既然以以画会友为掩护,就要带上一幅画才好。晚上,他和夫人一起来到黄胄家。

黄胄已通过其他渠道,知道了“四人帮”被抓的消息。曹大澄一进黄胄家就看见画案上摆着几幅画,上面画有四只螃蟹,有的题诗句:“蟹肥酒香秋光好,看尔横行到几时。”有的题诗句:“人心大快喜若狂,除尽四害共举觞,神州欢呼新胜利,莺歌燕舞菊花香。”

曹大澄说明来意后,黄胄非常爽快地将案子上的一幅《四蟹图》卷起来交给他,说:“你给他带去,保你平安。”

也是在 10 月 8 日上午,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等在玉泉山五号楼会议厅接见了靠近上海的江苏、浙江两省党、政、军一把手,着重同他们研究了稳定本省局势和上海问题。南京军区政委廖汉生独自受命后匆匆飞回南京。

华国锋让苏振华和倪志福去做做马天水的工作。他觉得东海舰队驻在上海,苏振华是海军政委,可以指挥东海舰队,不怕上海闹事。而倪志福祖籍是上海人,又是工人、劳动模范,在上海有一定的影响。

8 日下午,苏振华、倪志福来到京西宾馆,先到周纯麟的房间,向他了解马天水的情况。

周纯麟说:“马天水情绪不好,一上午没有起床。他坚持说材料不真实,说服力不强,还自言自语道:‘看样子我是回不去了。’”

周纯麟又把昨晚在车上的话说了一遍。他们 3 人仔细商量后,一起来到马天水的房间。

马天水仍转不过弯来,向他们提出要见“四位领导”。

苏振华严肃地说:“马天水同志,你在‘四人帮’的泥潭中陷得太深了!现在你必须转变立场,不然你将犯更大的错误,甚至犯罪!希望你能猛省。”

谈话后,苏振华、倪志福、周纯麟又在一起商量。周纯麟提出:马天水虽是上海的总管,现在他乱了套,不如让徐景贤、王秀珍来京解决问题。苏振华、倪志福同意周纯麟的建议。

当天晚上,回到南京的南京军区政委廖汉生,召集南京军区各军、师的负责人开会,对上海周边的军队再次进行了认真的布防,防止上海出现突发事件,确保上海和整个华东地区的局势得到稳定。

8日,中央向党内高级领导干部发出“打招呼”的15号文件:《中央关于粉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的通知》。同日,中央做出建立毛主席纪念堂、出版《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及筹备出版《毛泽东全集》的决定,并下达了华国锋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的文件;还发出两条指示:中央军委关于加强战备的电话通知和广播电台停播《按既定方针办》等两首歌。

8日这天,“四人帮”被抓捕的消息传到驻北京的部队,招待所的酒顿时销售一空。

茅盾是8日从在解放军政治学院工作的儿子韦韬那里听说“四人帮”被抓的消息。韦韬也是偶然知道的。早晨,他在动物园附近等班车,遇到一位同校的熟人,她父亲是军队高干。她悄悄地对韦韬说:

“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四人帮’被抓起来了!”

“你说什么?”韦韬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千真万确,都抓起来了,是在前天夜里。”

“消息真的可靠吗?”

“绝对可靠,是我爸爸亲口说的。毛远新也被抓起来了!”

韦韬回到家就把这个“特大喜讯”告诉了家人:“‘四人帮’已经抓起来了!他们完蛋了!”

《黄河大合唱》的词作者张光年也是在这天知道的,但他不敢相信:“8日下午,老友李孔嘉同志来报喜,连说‘三个公的一个母的都抓住了’。我心知其意,心想哪有这样‘全捉’的好事,不敢插嘴。当晚,史会同志来报喜,坐下只是笑,未明说,以为我已知晓。”

82 岁的叶圣陶只在日记上略略写道:“临睡时听到可惊消息,今暂不记之。”

武汉。10 月 8 日,黄昏时分,周而复正在修改《上海的早晨》,王淑耘闯进来,迫不及待地说:“‘四人帮’给抓起来了!”又说:“中央昨天找到少数省市委负责同志到北京,开了‘打招呼’会议,中共上海市委书记马天水去了,湖北省委书记也去了。叶剑英在会上宣布,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和姚文元已经给抓了起来,没打一枪,没费一弹,就把反革命‘四人帮’粉碎了……”她接着说,湖北省委今天下午召开了紧急会议,厅局长一级干部参加,传达了中央“打招呼”会议的好消息。周而复说:“这一天终于来到了。”

周而复回忆:“我向市中心方向走去,走到武汉市委附近的丁字形马路上,我看到一条从未见过的大标语:打倒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革命‘四人帮’! 标语吸引了如梭的行人,有的伫立注视,有的一望而过,带着怀疑的心情踽踽而去。”

# 第1419回：急筹划，调民兵加强战备 防政变，要准备武装暴动

10月8日下午，上海王秀珍让金祖敏秘书缪文金随下午宋庆龄副委员长的专机回北京，去摸清情况，约定发生最严重情况时的暗号是："心肌梗死。"

14时，上海警备区副政委李彬山和上海警备区副司令员张宜爱被叫到康平路开紧急会议。徐景贤和王秀珍向他们打听和马天水一起去北京开会的周纯麟是否有消息来，他们都表示不知道。对军委的备战通知，他们也没有说出什么看法。王少庸问他们：

"警备区能调动多少人？"

张宜爱答："警备区只有调动一个连的权限，一个营以上都要经过上级批准。"

15时，上海市委常委紧急"打招呼"会议在康平路召开，徐景贤主持。他说：

"给大家通一个气，马天水7日去北京开会，通不上消息，房佐庭打电话回来，说是老胃病发了，估计中央可能出事。"

16时，徐景贤在康平路召开报社、广播电台、电视台等单位负责人会议。参加会议的有《解放日报》社的王景，《文汇报》社的沈国祥，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的刘象贤，新华分社的徐寿铿。

徐景贤将于会泳突然不出国，《人民日报》鲁瑛接电话十分反常，在京的三位"首长"联系不上，房佐庭又在电话里总说他"老胃病发作"等情况向与会人员作了通报。

接着，他说："中央电台通知停播的两首歌曲《毛主席永远活在我们心中》和《永远按既定方针办》，我看不出有什么问题。苏修军队侵占捷克时，捷克国家电台有一名播音员听中央负责人的指挥，坚持广播了一天的抗议声明，根本不听苏军的。"

徐景贤布置了各新闻单位的保卫工作，指示要调集民兵来保卫。

并要求这些人发表什么东西,都要告诉市委,把上海的舆论牢牢地控制起来。

会议结束后,徐景贤又给浙江省委副书记罗毅,福建省委常委陈佳忠分别打了电话。王秀珍也给辽宁省委副书记魏秉奎打电话,要魏秉奎给当时在北京的毛远新那里打电话。但是,几经打探,依然未能获得一点可靠的消息。

17 时,徐景贤在康平路常委学习室主持召开了常委扩大会,让一些骨干分子列席,他们是:

嘉定县葛隆大队党支书、市革会副主任、市郊区组负责人周丽琴;

上海先锋电机厂工人、市革会常委、团市委书记陈新发;

上海铁路局工人、市工交组负责人、市革会常委金传德;

市总工会的陈阿大和叶昌明;

上海市总工会常委、上海市妇联主任汪湘君;

上海豫园商场售货员、中共十届后补中委、市财贸组负责人陈佩珍;

上海海运局船员、中共十届后补中委、海运局党委负责人冯品德;

市委写作组的朱永嘉;

王洪文的秘书廖祖康、肖木;

张春桥的秘书何秀文等。

但是没有通知空四军政委武占魁和东海舰队副政委康庄。

会上,徐景贤说:“马老昨天接到中央办公厅电话通知,已去北京开会了。周司令也一起去的。我们想打电话问问几位领导,中央开什么会,但都找不到他们,一直到现在还没联系上。想找金祖敏问问,但全国总工会说找不到金,也不知道他在哪里。”

徐景贤说的“几位领导”就是指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

王秀珍说:“马老接到中央通知后,我们想问问王洪文,是开什么会?要作些什么准备?就打电话给他的秘书孙兆良,但电话没接通。又打电话给张春桥的秘书,也说没人接电话。不但秘书没有,连其他人也一个没有。电话局说对方没人来接电话。又打到姚文元家里,也是无人接电话。”

徐景贤接着说:“我 9 月下旬到北京去时,曾问过春桥同志,中央

最近是否开三中全会？他说最近不会开什么会的。所以我们接到马、周去开会的通知后，感到奇怪，就想打电话问问看。但一直找不到他们人。我们猜想是否中央正在开什么重要会议，所以不接电话。于是找了何秀文来，让他往张、姚两位领导那里打电话，还是找不到人。又找了廖祖康来打电话，也还是找不到人。廖、何都找不到人，我们就感到情况不大正常了。”

廖祖康说：“我打了几次电话，长途台都说没人接。怕是那边长途台不接，又用微波电话直线打到王洪文那里，电话铃响的，但没人接，说明家里一个人也不在。要是中央开什么重要会议，也不会家里连一个服务员也没有的。这种情况是从来没有过的。过去不管中央开什么会，几个秘书还是能打电话进去的。”

徐景贤：“后来我们打电话给周宏宝、祝家耀，问他们中央有否开会，他们都说没听说中央要开会。又问他们是否知道中央通知开会的事，也说不知道。”

周宏宝时任国务院教育部领导，原是上海民兵指挥部负责人。

徐景贤又介绍了给《人民日报》鲁瑛打电话的情况，并说：“马老去开会时，我们说好的，他到京后就打电话来，告诉一下是什么事情。但去了后一直没电话来。要是他自己开会没空，房佐庭总可以打个电话的。我们就打电话到京西宾馆去找马老，但那边却回答马老没来过，大约是封锁不让打电话的。因缪文金在京西宾馆住过较长时间很熟悉，就叫他打电话去找。缪文金装作是在北京打的电话，终于问到了马老是在京西住的。但电话打到马房间，是房佐庭来接的电话，要他去叫马老来听电话，过一会却仍是房佐庭来说马老有事不能来听电话。我就问他，中央开的什么会？他说话吞吞吐吐的，不说开什么会。我估计他身边可能有人监视，不好说什么。我就问他：马老身体怎么样了？为什么不接电话？他说马老有些感冒了，后又说自己也老胃病复发。我记得房佐庭是没胃病的，怎么又说老胃病复发呢？就让人去问他爱人，说他是没有胃病的。看来房佐庭说‘老胃病复发’是暗示我们出事了。”

“这次接到中办电话后，市委办公室就打电话告诉周司令，周说他已经知道了，是中办直接通知他的。周说他身体不好，能否请假？中

办说可带医生,一定要他去的。”

“我分析房佐庭说的‘老胃病复办’这句话,可能是指那些受到批判的老右们见毛主席逝世了,又在闹了。所以他说是‘复发’。现在可以肯定中央是出事情了,但究竟是什么事还不太清楚,我们已要缪文金马上回京去打听一下情况。”

王秀珍说:“今天正好有一架专机送宋庆龄来上海,就让缪文金搭这架专机回京。以往也有这种情况,和专机机组一说就行了。但今天他去搭专机却不一样了。反复问了缪文金的身份,问清是金祖敏的秘书,又电话请示了,这才同意让他搭机。”

朱永嘉也说了上海市委写作组与《红旗》杂志编辑部通电话的情况。

徐景贤说:“我们商量后,感到这是大事情,有必要向常委会说一下,大家有个思想准备,但还没有确切的消息,大家不要到外面去传。我们还要千方百计的打电话去联系,了解情况。有什么新情况,我们会及时告诉大家的。”

王秀珍:“这几天大家待在机关里不要跑开,要是出去,要告诉机关里人在那里,要有事就能找到人的。”

因为叶昌明和汪湘君正在基层参加劳动,王秀珍对他们二人说:“你们的劳动暂停一下,先回机关去。”

散会后,徐景贤回家吃饭。朱永嘉、王知常等4人又跑到徐景贤的家里商量怎么办?

徐景贤说:“我下午已经找报社、电台的人谈过了。国务院有几位部长在上海,今晚上看戏,我到剧场露露面,同时摸摸情况。你们到学习室等我,我一会儿回来再谈。”

晚上19时30分左右,徐景贤在剧场看演出时,接到文化部负责人刘庆棠打来的电话,说他们给钓鱼台江青住的那个楼打通了电话,是一个服务员接的,“说首长身体好,现在不在家”。徐景贤找个借口离开剧场,急忙赶回康平路。这时学习室里已挤满了人,气氛很紧张。

还未等徐景贤说话,警卫处的康宁一就急忙向他报告,说金祖敏的秘书缪文金从北京打来电话报告:“我娘心肌梗死。”这是他与王秀珍约定的北京发生了最严重情况的暗语。徐景贤顿时大惊。

廖祖康拿过电话,亲自给江青住的那个楼打电话,不通。接着他又给刘庆棠、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等处打电话,仍然不通,屋子里顿时乱成一团。

徐景贤的秘书张家龙接通了解放军总政治部保卫部部长、原上海警备区副政委徐海涛家的电话,是徐海涛妻子接的。

张家龙说:“徐景贤同志要和徐部长讲话。”

徐海涛的妻子在电话里慌张地说:“他不在,去办公室了,不要再打电话了。”

徐景贤听了秘书的通话情况汇报后,猜测徐海涛也可能被抓起来了。

屋子里再次出现混乱。

21 时左右,警卫处康宁一接到公安部祝家耀的电话,他在电话里说:缪文金 19 时的那个电话就是在他那里打的,缪文金到京西宾馆去过,看样子是“人员集中了,门上加销了,不好动了”。

康宁一又打电话,总算找到缪文金。缪文金说:“现在情况不明,还在诊断中,待诊断明确之后再告诉你们。”

紧接着电话铃又一阵急响,张家龙拿起话筒,是文化部刘庆棠打来的。他在电话里说:“马老不能接电话,我们文化部的几个人也都‘病’了。”

肖木听后立刻惊叫起来:“不好了,对文化部动手了,下一个就轮到我们了!”

他这么一叫,整个学习室里顿时又是一片混乱。

面对如此局面,徐景贤立刻制止,大声宣布:“谁也不能再往外打电话了。”

他立即召开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市委书记王秀珍、市委常委王少庸、冯国柱、张敬标,还有朱永嘉、何秀文、肖木、廖祖康、康宁一等人。

此时的徐景贤想起几天前,肖木说的张春桥的那段话:“上海要有大考验,要打仗。”他还想起了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过去说过的关于军队的一些话:张春桥说军队靠不住,姚文元说军队都是支持保守派的,王洪文说“军队里没有我们的人”……他想:“现在军队也许已经把枪口对准了张春桥他们了”,“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于是他问大家:

“下一步怎么办?”

平时话不多的朱永嘉,这时直截了当地说道:“我看这次是华国锋和汪东兴两个结合,除了他俩,其他人是搞不起来的。”

接着,了解中南海保卫情况的廖祖康说,他同意朱永嘉的看法,并说:“8341 部队是很厉害的,都听汪主任的,没有汪主任的指挥,一下子搞掉几个人是不可能的。”

朱永嘉接着又说:“他们先抓一个,然后再宣布一个决定,说这个人反党。这种手法,古今中外用得多了。我们要干,应该把民兵拉出来打,打它一个礼拜不行,打它三天五天也好,让全世界都知道,就像巴黎公社一样。”

朱永嘉出语惊人,没人敢回应,一片沉默。之前徐景贤、王秀珍检查民兵的战备部署,还是以落实中央军委的电话战备通知为理由。而朱永嘉的这个建议,则是要拉出民兵,举行起义。

稍后,王秀珍说:“我白天已经同民兵指挥部的几个负责人谈过了,现在我们有带枪的民兵 2500 人,已在各工厂集中,可以随时拉出来。还有 31000 人分散待命。”

王秀珍接着说,她已经给民兵指挥部的施尚英打了招呼。

分管公安工作的王少庸是老干部,过去是打过仗的,见徐景贤、王秀珍这几个从未上过战场的人都很自信,就出谋说:“光靠民兵不行,起码要有部队一个团的兵力才能形成一个拳头。”

廖祖康说:“那就把警备区的几个负责人带在我们身边。因为靠我们去调动部队是调不动的,只有通过他们下命令才能调动部队。”

接着,廖祖康提出要“带在我们身边”的人选,他们是:警备区副政委李彬山,副司令员张宜爱,警备师师长李仁斋。

冯国柱又补充了一个:“把杨副司令员也叫来,他熟悉作战。”

于是,市委办公室通知这几个上海警备区的领导过来。

廖祖康又提出,将上海市总工会的陈阿大、戴立清、黄金海、马振龙、叶昌明都找来,这样可以调动工人队伍。

朱永嘉表示支持,大家也觉得廖祖康的这个办法很好。

大家又议论说,应该撤出康平路大院,将人员分散在两个地方,以免被一网打尽。于是,决定将人员分作两处,设立两个指挥点:

一号指挥点由徐景贤带领,负责抓整个武装抗争的总指挥和舆论准备,最后行动的命令由徐景贤这里发布,地点设在华山路丁香花园。

二号指挥点由王秀珍带领,负责民兵和部队的军事行动指挥,地点定在市民兵指挥部。

确定了指挥点以及分工以后,徐景贤当场执笔开列了一份进入两个指挥点的人员名单。

一号指挥点名单有:徐景贤、市委常委王少庸、张敬标、警备区副司令张宜爱、警备师师长李仁斋及朱永嘉等人;

二号指挥点的人员名单有:王秀珍、市委常委冯国柱、警备区副政委李彬山、副司令杨新亚、王洪文的秘书廖祖康、市委警卫处处长康宁一等人。

徐景贤当场宣读了这份名单,大家一致表示同意。

这时,张敬标提出他留守康平路机关,朱永嘉也提出他去陕西北路写作组经济组找几个人,准备舆论,徐景贤同意了。

徐景贤和冯国柱、张敬标商量后,当场宣布几项决定:

一、现在开始作武装暴动的准备;

二、为了防止意外,我和王秀珍分住二地:王秀珍与冯国柱去民兵指挥部,我和王少庸去丁香花园;

三、部队方面要做一点工作;

四、张敬标仍留在办公室值班。

徐景贤又按照王秀珍提供的民兵数字和情况,亲笔写下了:

请民兵指挥部加强战备,3500 人集中,31000 民兵待命(即晚上集中值班)。请民兵指挥部立即派人加强对电台、报社的保卫。

然后交给了王秀珍。

散会后,朱永嘉首先到《文汇报》,告诉报社的领导,中央可能出事了,可以在个别骨干中打个招呼。然后回写作组,立即召集王知常等人,告诉他们:“中央那几位看样出事了,”“民兵已作了布置,工字头已进行动员”,“张、姚培养了我们十年,总得报答他们。我是准备杀头坐牢也要下决心干。”

他说:“他们倒了,我们也完了。”朱永嘉要立即行动,发表宣言,“明天就在报纸上拉横幅标语,‘坚决捍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王知常立即表态："市委决定干，我立即起草。"他马上拟出四个口号：

"还我春桥！还我文元！还我洪文！还我江青！"

朱永嘉又布置："找出一批《毛主席语录》，要有针对性；搞一个赫鲁晓夫上台的资料，明天见报。"

于是王知常又当即拟出几条毛主席语录："三要三不要"，"右派上台都是短命的"，"按既定方针办"，等等；又从《国际问题资料》中找出《赫鲁晓夫上台前前后后》一文，准备摘引。

接着，朱永嘉驱车赶到《解放日报》和广播电台分别打招呼，告诉他们，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可能出事了，如果市委决定，不发中央的消息，只发自己上海的消息，行吗？并要他们在少数骨干中个别打招呼。

晚22时，警备区副政委李彬山忙完正在召开的警备区党委扩大会议的简报审稿，回到宿舍，看到上海民兵指挥部施尚英和钟定栋已经等候多时。他们一起商量如何贯彻中央军委电话记录所要求的加强战备布置。商定：动用兵力按9月23日上海市委批准同意（按防震和9.9备战期间减少三分之二）的方案，第一批25000人，每区动用10辆摩托车；第二批11000人左右。指挥点放到基层单位，准备两个指挥点，江南造船厂作为一个点，已经确定下来了；东面准备搞个点，是否放到国棉17厂，还要研究一下。点上设电台。

研究后，施尚英打电话向王秀珍汇报，王秀珍要他们马上回民兵指挥部。施尚英、钟定栋、李彬山等于是都去了上海市民兵指挥部。

# 第1420回：十月九，中央播《两项决定》打招呼，上海市紧急部署

就在上海召开常委扩大会的同时，10月8日下午17时，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等中央政治局委员继续召集上海、江苏、浙江、安徽、山东、湖北等省市和南京、济南、武汉三个军区的负责人在玉泉山五号楼开会。华国锋、叶剑英等向大家介绍毛泽东对“四人帮”的批评和“四人帮”篡党夺权的情况。大家纷纷表示拥护中央的决策。

江苏、山东、湖北等省和南京军区、济南军区、武汉军区的人发言，纷纷对“四人帮”进行揭发和声讨，只有上海的马天水情绪消沉，不讲话。

最后，马天水神情紧张，脸涨得通红，不得不讲了几句拥护之类的话。紧接着，他就说个“但是”：“建议党中央正确处理和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张春桥在‘一月风暴’、‘大联合’中是有影响的人物，中央要慎重对待。”他不停地问：“这‘四位领导’，是不是篡党夺权，是不是一定要用抓起来隔离审查的办法，应该给四个人考虑的时间。中央是不是再给一些材料看看？”他还提出两个要求：一是让他再见见他们；二是希望中央对他们宽大处理，处理时要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

马天水的发言自然受到了其他人的批评，周纯麟也对他进行了劝告。

10月9日0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了中共中央在10月8日做出的两项决定：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共同作出两项决定：《关于建立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纪念堂的决定》和《中共中央关于出版〈毛泽东选集〉和筹备出版〈毛泽东全集〉的决定》。

当天,中央各报及各地报纸,包括上海,都在头版头条刊登了这条新闻。

也是在10月9日0时,上海警备区副司令员张宜爱和警备师师长李仁斋来到徐景贤和王少庸这里。此时,正好中央人民电台广播中共中央、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和中央军委的两个决定,徐景贤觉得出版《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与张春桥9月21日和他的谈话精神不符,当时张春桥是这样对他说的:

“考虑不准备分别出五卷、六卷,准备先把有主席手稿的,经主席审定过的文章先合成一册出版,免得五、六卷如何分期引起争论,同时,其他文章一时也审定不了。”

徐景贤据此认为,这个决定是在没有张春桥参加的情况下作出的。

王少庸问李仁斋:“究竟有多少部队?”

李仁斋答:“警备师大都是分散值班的,多的一个连,少的一个班。”

王少庸又问:“能拉出多少人?”

李仁斋回答:“最多是一个营,另外就是康平路附近的一两个连。”

王少庸问:“能调得动部队吗?”

李仁斋答:“调不动。”

朱永嘉回到康平路时,也听到了中央两个决定的新闻广播。他对留在这里的张敬标说:

“中央两个文件说出《毛泽东选集》,建毛主席纪念堂,是抓旗帜。看来中央确实出事了。我们要赶紧行动,要不然就晚了。要马上控制新闻、广播和交通、码头、车站,并发布告人民书,”这样“行动起来后,对我们有利,逼得他们不得不放人,”而且“对他们在中央的斗争也是个支持。”

朱永嘉打电话到丁香花园找徐景贤,要徐景贤布置9日的上海报纸不要转载中央的两个决定,张敬标也打去电话表示赞成朱永嘉的建议。但这两个电话徐景贤的秘书张家龙因为徐景贤已经睡觉,没有叫醒徐景贤接电话。

也是在10月9日0时左右,王秀珍、冯国柱、廖祖康、汪湘君等来

到上海市民兵指挥部。她让廖祖康打电话通知市总工会常委陈阿大、叶昌明、沈涵、黄金海、马振龙、王明龙过来。这些人除了文革前任市总工会副主任的沈涵是老干部,其他都是工人造反派的骨干。

王秀珍在市总工会的人到来之前,满脸愠容,环视了在场的人后,用压低了的声音说:“看来中央可能发生了右派政变,可能马天水以及上海去中央工作的几个领导同志都被抓起来了。我们要与他们对着干,血战到底。我们的民兵即使打两三天也好。枪声一响,全国都知道,全世界都知道!这几天康平路不能待了,否则一网打尽。”

她又说:“上海是一月革命的发源地,我们跟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血肉相联,中央出了修正主义,我们要对着干,就是死了,也要教育后代,让全国知道。”

在场的人都惊呆了。

王秀珍按照上海警备区抄报上海市委的那个电话记录的口径部署了战备,市公安局的薛干青做了记录:

8号

市委检查了发现有的单位战备有些松,战备工作不能放松,应提高警惕,注意敌情,注意空投、空飘、海漂,防止国内外阶级敌人突然袭击,检查我们战备工作有无松。

施尚英向王秀珍和冯国柱汇报了与李彬山商定的战备方案。王秀珍听后基本同意。只是对选择上棉17厂或上棉31厂作指挥点,认为太远,而且目标太大,要施尚英等从杨浦区另找一个工厂。

王秀珍将徐景贤写的那张纸条,交施尚英和钟定栋等人看,要求民兵指挥部夜里集中值班,加强对报社和电台的保卫。

廖祖康提到福州路和汾阳路两处的电话分局起着枢纽作用,特别重要。

冯国柱随即问在一旁的警备区副司令员杨新亚,市内电话局有没有警卫部队,杨新亚说没有。王秀珍即要求派民兵去警卫。

李彬山提出要加强对电台的保卫,“防止有人到电台乱说一通”。于是决定由上海警备区的警备师政治部副主任、时任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党委书记刘象贤,负责指挥警卫电台的部队。

冯国柱又问外区部队到上海需要什么手续,杨新亚答,外区部队

要越过防区,不经军委批准不行。

冯国柱又问警备区有没有机动分队?杨新亚回答说,市区只有一个连和摩托营。王秀珍要求尽快做准备。

冯国柱和王秀珍还问江苏和浙江的部队有什么消息?杨新亚答说没什么消息,“这次在杭州开会时,听说驻杭州的部队要到乍浦地区野营,驻苏州的部队要到昆山、太仓地区野营。”

当总工会的陈阿大等6人来到上海市民兵指挥所时,只见王秀珍、汪湘君、李彬山、杨新亚、施尚英、吴立义、钟定栋、廖祖康等人正在交谈。王秀珍、廖祖康见总工会的一干人到来,就出来将他们和民兵指挥部的施尚英、吴立义、钟定栋等人带到另一间屋里。

王秀珍对他们说:“中央出大事了,市委研究后认为有必要告诉大家一下。我和徐景贤兵分二路,他和王少庸在另外地方找文教口的人谈,我和冯国柱到这里找工会和民兵的头谈。”

接着,她将中央通知马天水、周纯麟去开会和一些反常的情况又说了一遍,廖祖康做了补充。陈阿大也说:“外经部长方毅正在上海,突然接到北京电话,说他家属病了,要他马上回京,他已经赶回去了。看来不会真是家属生病,而是和这件事是有些联系的。”

王秀珍说:“毛主席一直教导我们,要警惕修正主义,中央出修正主义,地方就要起来造反,文革就是为了反修防修的。现在毛主席才去世不久,他们就搞政变了,就像赫鲁晓夫一样。我们要跟修正主义对着干,要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保卫文革的胜利成果!”

她还说:“上海工人阶级是富有革命传统的,是毛主席肯定和支持的,我们现在就是要和他们对着干,不能当投降派,做王连举!”

大家纷纷表示赞同。

黄金海说:“很清楚,这是对着文革来的。主席在,他们不敢反文革,主席一死,机会到了,他们就迫不及待。我们要对着干,唤起工农干百万。”他对市民兵指挥部的人要求:“发枪吧,我们和你们一起干!”

王秀珍要求:“给总工会的头头打个招呼,要总工会贴大标语,组织工人罢工,发动群众!”

廖祖康说:“宪法上为什么要写罢工,毛主席说过的就是为了反对修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的。”

陈阿大挥舞着拳头说:“要大干,马上干!吴淞口只要沉一条万吨轮,就能把航道堵住。去几辆大卡车到机场,把钢锭甩在跑道上,就能把机场封住。”

黄金海提醒道:“最重要的是粮食!必要时可以动用金库去买粮食,万不得已可以到江苏去抢!”

戴立清说:“把民兵拉出来干。失败了,历史上会记上我们的功绩的!”

马振龙发出了同样的吼声:“我们要对着干。大不了完蛋,大不了掉脑袋!”

冯国柱走了进来,对王秀珍说:“我已和他们谈好了,他们要回去休息,问你还有什么事?”

冯国柱说的“他们”是指上海警备区的李彬山、杨新亚。王秀珍说:“没有事了,让他们回去吧。”

廖祖康说:“不能让他们回去,要叫他们睡在这里。把他们拖在身边,有事时,你市委下命令,还不如由他们打个电话快。”

王秀珍让施尚英在民兵指挥部给警备区的领导安排住处。

王秀珍又说道:“打电话找马老,一直没来接过电话,很可能不让他回来了,周司令可能会回来。”

廖祖康说:“他肯定能回来的,而且可能是中央派他来抓我们的。”

冯国柱说:“要是周司令回来是来抓我们的,那他回来时就不会告诉我们的,可能一回来就跑到天马山指挥部队来搞我们。”

廖祖康对王秀珍说:“应告诉民航一下,要是周司令回来,或有中央专机来,要马上报告市委。不要人已回来了,我们还不知道。也要告诉铁路一下,可能会坐火车来的。”

王秀珍同意,她让廖祖康去通知上海民航局,让陈阿大通知工交组转告铁路局。

冯国柱说:“中央也可能从南京派部队来的,要注意了解这方面的情况。”

廖祖康说:“南京调部队来,只要过来就能发觉的。反而是在上海的部队要注意,不要他们来动手了还不知道。”

施尚英说:“民兵一头是能掌握的,部队方面无法掌握。”

叶昌明说:“外面来的部队是易发觉的,就怕驻在上海的部队动手时,我们会措手不及。指挥部应派人到部队驻地附近监视动静。”

黄金海说:“警备区主要是松江、南汇二个师,可叫青浦派人到路口去监视,只要那里部队来市区,都要经过的,马上可以发现。”

施尚英说:“不用派人去的,要是部队调动,我们能知道的。”

有人说:“中央派周或其他人来时,不一定会从虹桥机场来,也可能从江湾军用机场来。”

陈阿大说:“叫他们用不成江湾机场也很便当的,只要叫把机场的电拉掉,就不能用了。其实不用拉电,只要开几十辆大卡车到跑道上去飞机就不能降落了。”

王秀珍说:“他们如果来抓人,那我们也要干的。”

廖祖康说:“要是真派部队来动手,那也只好大家板下脸来干了。”

冯国柱对王秀珍说:“要让小廖继续向北京打电话,设法打听情况。”“与北京的电话联系一定要保持畅通,不要有起事来,电话也打不出去了。”

冯国柱说,是否把市邮电局党委书记翁默清找来关照一下?

王秀珍同意。

这时,徐景贤来电话转告王秀珍关于中央台广播中央两项决定的消息。大家都感到奇怪,怎么在半夜里突然广播这么重要的决定,而事先一点没有消息?

沈涵问王秀珍:“市委是否知道要广播中央两项决定?”

王秀珍说:“没接到通知,市委事先一点也不知道。看来他们是要利用毛主席的威望,广播这两项决定来收买人心。”

廖祖康说:“现在北京的气氛和这两项决定怎么对得起来呢?北京现在是修正主义上台在抓人,他们怎么会真的纪念毛主席,无非是要块牌子。”

叶昌明说:“这么重要的消息,不发预告,又是半夜突然广播,这是有阴谋的。因为群众不了解真相,一听广播的是这两项决定,当然会拥护的。这样可把人心拉过去了。”

陈阿大等人也讲,广播这两项决定是在造舆论。

王秀珍担心上班时间快到,市民兵指挥部目标太大,她说:“这里

也不安全,不能多待。”

冯国柱问施尚英:“这里有几条出路?”

施尚英说:“只有一个大门出入。”

冯国柱说:“只有一条出路不行的,只要来一个连把大门一堵,一点办法也没有了,这个地方不能待。”

王秀珍对民兵指挥部的人说:“你们也不要待在这里,要转移出去。”

祖康廖问施尚英:“你们有指挥车吗?”

施尚英答:“没有。”

廖祖康不满意的说:“怎么搞的?指挥部早就该准备几辆指挥车了,现在连一辆也没有,你们转移出去后怎么指挥?”

他要施尚英拿出上海地图,边看边数落:“上次就告诉你们了,一张像样的地图也没有,这种地图怎么好打仗?”

叶昌明说:“城建局有地图的,‘工总司’过去向他们要过一套上海地图,很详细的,指挥部也可去要的。”

施尚英说:“上海的一般地图,指挥部都有的,已派人再作部署了。指挥问题也研究过了,决定把民兵电台分到各区指挥部去,电台昼夜值班,保持与市指挥部的联系。指挥部正好办了一期民兵电台通讯学习班,决定停办。部队来的人都回去,学员随电台分到各区去值班。”

廖祖康觉得:“你们的电台功率太小了,不行的。”

黄金海建议:“水产局渔业指挥部楼上有电台的,是指挥海上渔业生产用的,功率总可以的了,是现成可用的。”

施尚英说:“那电台不能用的。要是民兵台不行,还有市人防办的战备电台可用,这套系统联络是可靠的。”

叶昌明建议:“光电台联络也不行,还要组织一支机动通信联络队伍,保持我们相互的联系不中断。”

施尚英说:“指挥部已考虑过,要建立一支摩托通信队伍。”

黄金海说:“海洋渔业公司有一百多条船,有人有枪,又是机动的,是支较强的力量。指挥部订方案时可考虑的。”

王秀珍突然想到:“‘康办’还有王洪文和张春桥的家属,要加强力量保护好,特别是要保护好王洪文的家属,我们有责任保护好革命

后代。”

康宁一对施尚英说:“康办”的保卫力量还没落实,民兵还没去联系过。要告诉徐汇“区指”赶快落实。

施尚英让钟定栋去徐汇“区指”布置。

王秀珍又说道:“这里不能待下去了,要马上转移。我看还是找个工厂,到工厂去,群众会保护我们的。即使在工厂里把我们抓去,对群众也是个教育。”

黄金海提议:“还是到我们厂去,运动初期‘工总司’有一段时间常在厂里的。厂里老造反多,有基础,地方也大,前后有几个门可进出,即使他们来人也不容易找到的,转出去也方便。”

王秀珍不同意,说:“17 棉、31 棉这些厂都会受人注意的,不能去。”

王明龙提出可到闵行去,那里大厂多,工人集中,力量强,有起事来往市区调队伍也很快的。他还提到中华造船厂,说复兴岛地方大,又偏僻,不引人注意的。

施尚英建议到江南造船厂去,说:“江南,地大人多,背靠黄浦江,对面又有上钢三厂,易于隐蔽。要是不行还可转到浦东去。”

他还说:“也可以待在指挥部 101 艇上,在江中游动,谁也找不到的。”

廖祖康说:“到工厂去是不行的。厂里人多太杂,我们这些人突然去了,不更引人注意了?我们去的地方,要有三个条件,一是要隐蔽,我们进出不会引人注意;二是要解决我们的吃住;三是要有电话,便于对外联系。只要附合这三条,哪里都行。”

冯国柱说:“要么找个招待所,这三条都能解决了。”

大家赞成。

廖祖康提出到东湖路七号招待所去,那里距离康平路和丁香花园都近。王秀珍和冯国柱同意。

邮电局党委书记翁默清来到民兵指挥部,冯国柱带他去另外的房间。过一会儿,冯国柱回来对王秀珍说:“我和翁谈好了,你还有什么事要向他说的?”“翁说他到邮电局不久,情况还不熟悉,究竟哪些人可靠,还不知道。”“是否你再去向翁说一下,就让他回去布置。”

王秀珍和冯国柱一起去见翁默清。回来后,王秀珍就催着赶快转移,并对施尚英等人说:“我们走后你们也赶快转移出去,不要待在这里了。”

总工会一干人去了东湖路招待所。市民兵指挥部的人没有马上去东湖。9日凌晨2时,他们召集指挥部的作战组、特兵组、后勤组的负责人开会。决定在10个区和两个指挥点开设电台,另外再设一个电台在上海第三钢铁厂,并要求到下午18时之前沟通电台的联系。

9日凌晨2时,王洪文秘书廖祖康用红色保密电话给丁香花园徐景贤打来电话,说:

“王秀珍跟冯国柱他们商量,有一个意见就是要把部队守卫电台的连交给刘象贤指挥。”“原来守卫康平路市委的那个连交给市委办公室指挥。你如果同意的话,请你告诉李师长一下。”

徐景贤答应了,放下电话后,亲笔写了手令:

“电台由李仁斋同志告电台的连,注意警卫,听从刘象贤同志的指挥。

“三连由李仁斋同志告知一下,要听从市委的指挥。”

写好后,他让秘书叫醒了也睡在丁香花园的李仁斋,当面把这个手令交给了他,然后听到他去打电话,进行布置。

根据王秀珍等的要求,施尚英他们定下了两个指挥点的所在工厂:一个是江南造船厂,为第一指挥点,称“基指”,由施尚英和钟定栋负责;另一个是中国纺织机械厂,为预备指挥点,称“预指”,由吴立义和印玉泉负责。

上午9时,施尚英和吴立义、钟定栋召开了上海10个区民兵指挥部和5个直属民兵师的负责人会议,以王秀珍传达的军委紧急备战要求为口径,布置下达了与李彬山讨论的方案以及联络暗语,分配了各区、师兵力数字,要交运局组织100辆汽车值班待命,还要求区和师负责人全部昼夜值班在位。之后,施尚英和钟定栋便去江南造船厂和中国纺织机械厂两个指挥点现场布置指挥。

与此同时,各区民兵指挥部和一个民兵师,也都设立了指挥所;各指挥所共架设了15部电台,组成两个通讯网,沟通了联络,先后收发了79份电报,直至15日凌晨1时才停止发报。

# 第1421回：忙避难，还是在工厂踏实 九日晨，八人组抵达上海

中央召集上海、江苏、浙江、安徽、山东、湖北等省市和南京、济南、武汉三个军区的负责人在玉泉山五号楼的会议至9日凌晨2时才结束。会后，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等中央政治局成员同马天水谈话，周纯麟参加。马天水向中央表示，自己无法说服上海的那些人，建议还是将他们叫来北京，由中央亲自做工作。

周纯麟也建议中央将徐景贤和王秀珍叫来北京。

华国锋看了看表说："今天就谈到这里吧！"并对马天水说："你回京西宾馆后，立即给徐景贤、王秀珍打电话，告诉他们明天来京开会。"然后回过身来，对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局长周启才说："老周，派车，你送马书记回京西宾馆。"并向周启才使了个眼色。周启才理解是让他当面看着马天水给上海打电话，于是向华国锋点了点头。

10月9日，上海下起了细雨。冯国柱首先来到丁香花园。接着，王少庸、张敬标、张宜爱等市委常委也都到了。大家商量，对中央的两个决定如何表态？冯国柱建议，要表态拥护，但不要提"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中共中央"。

徐景贤已经从秘书口中得知朱永嘉半夜来电话表达的意见，反对刊登中央的两个决定。他虽然心里同意朱永嘉的意见，但又考虑到"中央这两个决定本身是广大群众拥护的，报纸不发的话会失去群众"，还是布置报纸刊登了。

王秀珍早晨从东湖招待所出来后，又去张春桥家和王洪文家看了一下，准备把王洪文、张春桥的妻子文静和崔根娣以及王秀珍自己的家属安排转移。把大孩子安排到工厂去，小孩子安排到工人家里去。

此时，王洪文的妻子崔根娣已经从总工会那里听到消息："王洪文出事啦！"

她一次次给王洪文挂长途电话，总是没人接。

她给上海国棉17厂厂医、她的一位好友挂电话。在电话里没说几句,她就忍不住哭了起来:“我怎么办?孩子怎么办?”

“到我这里来吧,暂且躲一躲。”她的好友劝慰她。

急匆匆,王洪文的妻子崔根娣拖儿带女,离开了康平路。

没有坐小轿车,悄然登上公共汽车,从上海西南角斜穿整个市区,前往东北角杨树浦,借住到厂医家。

这位厂医与她的友情,倒并非“造反之交”。她的丈夫从部队复员到上海国棉17厂,曾任厂党总支委员,“文革”前与王洪文有点来往。1966年,她的丈夫去世。1967年在与“联司”血战之时,她曾替崔根娣照料孩子。正因为这样,这一次崔根娣又想到了她,把孩子带到了她家。

她家不是个显眼的所在。金祖敏的女儿也托崔根娣一起带来了。顿时,厂医家里挤了一屋子人。

不久,这小屋里又增加了一名“逃难者”,她叫张融融,张春桥的第三个女儿。

张春桥的女儿怎么也躲到这儿来呢?原来,是崔根娣做的大媒,把上海国棉17厂青年工人徐百丰介绍给张融融。听说崔根娣在厂医家避难,张融融也以为这里安全,便过来暂避风头。

虽然这儿是工人宿舍区,远不如康平路高干宿舍豪华、宽敞,崔根娣心中反而踏实了。她与厂医挤在一张床上,说出了心里话:“不知道怎么搞的,这些年我的心总是悬着,担心洪文迟早会出事。现在,果真大祸临头……”

王秀珍到丁香花园后,说起安排家属孩子转移之事,徐景贤说王秀珍光抓小事不抓大事,家属不用转移。

北京,中央秘书局局长周启才奉华国锋之命送马天水到京西宾馆后,也跟着上了楼。一进门,马天水就对秘书房佐庭说:

“给我要徐景贤的电话。”

不一会儿,徐景贤的电话接通,秘书将话筒递给马天水。马天水说:

“我是老马,中央叫你和秀珍明天来京开会,有飞机接你们。”

“是马老吧?”接电话的是王秀珍,她一听见马天水的声音,高兴得

跳起来了。真的,从电话耳机里传出来的,是马天水那熟悉的河北口音。

“你身体好吗?”王秀珍问。

“好,好……”马天水答道。

“四位首长好吗?”王秀珍问了最关键的话。

“很好。”马天水居然这样答道。

“你见到他们了吗?”王秀珍紧紧追问。

“来京见面再谈吧!”说完,马天水放下了电话。

周启才返回玉泉山五号楼,把马天水给徐景贤打电话的情况,向华国锋、汪东兴作了汇报。

上海这边,王秀珍放下电话,急忙把好消息转告徐景贤。

徐景贤长长地松了一口气,顿时瘫在椅子上。连日的疲劳一下子袭了上来。

其他人也如释重负,都说是一场虚惊。

这天上午,当上海市委年轻的女委员、《朝霞》杂志总编辑陈冀德听朱永嘉说:“徐景贤、王秀珍与在北京的马老通了电话了。马老说:他们三个身体很好,工作很忙,中央正在筹备一个重要会议。”她顿时觉得心里的一块石头落了地,对朱永嘉说:“要是马老说了谎,这个玩笑可是开得不大不小。”

王知常说:“马老是老干部了,说谎不至于。”

中午,肖木来到陈冀德办公室,对她讲:“我可能马上要走了。”

陈冀德说:“北京究竟发生什么事情还不清楚,不会马上叫你回去的。”

肖木说:“不管出什么事,我都是要走的。小说我不想写了,也写不下去了,不管怎么样,人家都会说我写这部小说是为王洪文树碑立传的。”

陈冀德说:“那也不能这么讲,文化大革命总归还是要反映的,也总会有代表人物。”

肖木听后,让陈冀德替他保存小说已经印出来的部分清样。

在谈到当前形势的时候,陈冀德说:“不知会有什么变化,华国锋同志任主席的话,春桥同志可能会当总理。”

肖木情绪低沉地说:“恐怕事与愿违。以后看起来中央是集体领导了,不可能像主席在时那样,一切都可以由主席仲裁、决定。现在还没有像主席那样可以仲裁一切的人……”

10月9日,中央决定,从即日至14日,在北京市部分单位,包括文化部、人民日报社,及全国各地党政军领导干部中,分批传达《中央关于粉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的通知》。

这天一早,谷牧组织的“八人小组”准时在首都机场登机。8时32分,飞机降落在上海虹桥机场。大厅空荡荡的,找不到接站的人,大家都感到意外。王守家当即给上海工交组打电话问:“我们8人已经到上海虹桥机场,怎么没来接站?”

上海工交组的说:“已经写电话记录,报告工交组组长陈阿大了,他至今还没批下来。”

王守家反问:“难道安排住宿还要批准吗?”

对方在电话里支支吾吾,没有正面回答,又说:“上海的旅馆全都满了,没地方住了。”

王守家说:“我们已经到上海了,我们不能回北京了。实在没地方,就住在你们办公室吧!”这时,机场一名值班同志说了一句:“最近根本没有什么人来上海,旅馆怎么可能都住满了呢?”

工交组的人又说:“机场有车子吧?”

王守家斩钉截铁地说:“你们必须来接我们。”

上海工交组的说:“等我再联系一下。”

过了一个多小时,上海工交组来电话,说火车站可能还有旅馆,等他联系一下。

又过了一个半小时,上海工交组又来电话说:“真是对不起,一会儿我们处长去机场接你们。”

这位处长是上海市工交组下属的生产组负责人之一。生产组是工交组最重要的单位。

徐良图一行又在机场等了很长时间,那位处长才坐一辆小面包车过来。一见面都是熟人,那位处长忙说:“真是对不起,值班员没有交接好,让你们久等了。”

大家上车后,那位处长第一句话就问:“春桥同志好吧?”

大家不动声色,回答说:“都很好。”

从机场到市区的路上,路口设了哨卡,全副武装的民兵检查过往的行人,大家顿时感到形势不同一般。一路观察,他们觉得上海呈现的是大战前的紧张气氛,犹如箭在弦上,一触即发。

面包车把大家拉到距离锦江饭店不远的一座三层小楼,那位处长说:“工交组领导都出去开会了,我先安排一下,暂时先住在这里吧!”

安顿好后,那位处长就走了。

这座三层小楼十分简陋,单人房间,一桌一凳一张床,一个热水瓶,一个茶杯。还没有坐稳,生产组另一个副组长坐着车来了。因为工作关系,他与徐良图很熟悉。他一来就说:“怎么能住在这儿,太简陋了。”又让大家搬到衡山饭店。

衡山饭店位于徐汇区,离康平路市委大院很近,是上海有名的饭店,设备条件不错,但是大家很快发现情况不对头。曹大澄、王守家、徐良图、李景昭、王德瑛和陈斐章 6 人在四楼,干志坚、周力在三楼。但是楼梯被封死了,上下楼只能走电梯。更令人惊诧的是,楼道里的服务员虽然一身白褂褂,但每人腰间却斜挎一把套管大扳子,监视着北京来人的一举一动。他们在屋里开会,发现有人趴在门上偷听。从楼上向下看,宾馆两旁的街道衡山路、宛平路上也有三三两两的人正在巡逻。

王守家先到走廊巡视一番,发现有 3 个服务员在走廊里巡逻,再加一个把住楼梯口,总共 4 个人。王守家外出给大家买早饭,有人紧随其后。

徐良图立即召集紧急会议,安排工作。他说:“我们的任务是来观察上海动向,现在却先被软禁起来。我们唯有针锋相对,主动出击。”

他们商定派王守家、陈斐章到工交组找黄涛、陈阿大正面谈工业生产和交通运输问题,派曹大澄去拜访王一平探听消息。

徐良图说:“去工交组拜访陈阿大,被他们盯梢紧跟,还算是一个保镖。去王一平家的一定要甩掉尾巴,保证一平同志安全。”

于是,先安排干志坚出门快走。此公膀大腰圆,原就读上海复旦大学,后留苏学石油钻探,地地道道的上海人。他疾步走出门去,服务员紧盯不放。

过了5分钟,王德瑛慌慌张张地跑出去,去追干志坚。饭店服务员见状,也立即尾随其后。

稍后,周力下楼买烟,跟上一个尾巴。李景昭逛南京路,又跟上一个尾巴。

3个服务员都走了。这时,曹大澄最后下楼,和看门的服务员打招呼:“阿拉吃饭去!”

守门的服务员不能擅离门岗,只好看着他消失在人群中。

曹大澄出门后,三拐两拐匆匆来到武康路4号上海市委宿舍。进门看见王一平和一人正在桌边坐着谈话。王一平一见曹大澄就说:“谷牧同志在今天8点半,你们所乘飞机落地之后来过电话。我本想把10月8日晚,上海市委宣布全市进入一级备战的情况向谷牧反映。他阻止我,说电话里什么都不要讲,已派曹大澄来接头。”

王一平听到谷牧是用山东荣成家乡话拖腔说的“接头”,明白一定发生了重要的事情。

曹大澄拿出黄胄所作的《四蟹图》,王一平看罢此画,笑笑说:“我明白了。”曹大澄扼要地介绍了谷牧委派的任务。王一平介绍屋里的那人说:“自己人。”那人自我介绍,名叫李庸夫。

王一平介绍,李庸夫长期在上海市委秘书处工作,是原上海市委分管政法的书记梁国斌的秘书,上海市委办公厅秘书处处长。

王一平、李庸夫向曹大澄介绍了10月7日、8日两天,上海市的一些情况。他对曹大澄说:“我这里目标太大,你以后就和李庸夫联系吧。”

当即,李庸夫和曹大澄商定了下次接头地点。

事不宜迟,曹大澄马上赶回衡山饭店,向徐良图汇报,李景昭在座。大家一起研究,觉得形势严峻。徐良图对曹大澄说:“你今天就坐飞机回北京,当面向谷牧同志报告。”

李景昭说:“我回北京吧。曹大澄对上海人熟,继续了解情况。”

王守家买好票,当晚送李景昭上了飞机。

第二天,饭店服务员问王守家:“你们刚来就回北京?上午来,晚上走,他回北京干什么去了?”

王守家回答:“他回去拿东西。来时落了东西。”

李景昭回到北京后,立即将材料交给谷牧。谷牧的秘书胡光宝迅速编写成《上海来信》第一号,于当晚送交华国锋、叶剑英等中央领导。

中央政治局得到上海小组的报告后,将上海警备区司令周纯麟召到玉泉山5号楼。

周纯麟到玉泉山5号楼后刚坐下,李先念就详细地询问了上海警备区兵力部署和上海民兵的情况。接着,严肃地问他:

"周纯麟,你估计一下,'四人帮'被隔离的消息公布后,上海会出现什么情况?"

周纯麟思索了一下说:"我估计有三种可能,一种是大干,一种是小干,一种是没什么大的问题,比较平静。但是大干的可能性不大。"

李先念追问原因。周纯麟说:"因为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四个人被抓起来后,他们没有打旗的了,在上海有哪一个人能挑头?就是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也不行,树不起来。而小干呢,就是他们可能利用一下民兵,把我们警备区的机关冲垮,或把我们上警的几个领导同志抓起来。"

他稍许停了一会儿,又说:"不出问题的可能性较大。但先决条件是,要尽快地把'四人帮'的罪行向上海人民群众公布,使群众不再受蒙骗……"

接着,周纯麟又把马天水这几天的表现情况作了汇报。中央领导问:"徐景贤、王秀珍能来吗?"

周纯麟说:"中央要他们来,恐怕会来的。"他建议让马天水打电话通知他们。

周纯麟还汇报说毛泽东逝世后,部队处于一级战备状态,有一个师正在由青浦向上海方向拉练。

华国锋马上说:"马上停止,不能引起误会,逼出事来。要相信上海工农群众,军队一调动,马上就会引起恐慌了。"

这支部队接到命令后,很快就回去了。

# 第1422回：召徐王，上海市暂趋平缓 封梁效，小平拥护华国锋

9日下午，上海市委召开常委会，传达中央关于“两个决定”的15号文件。与会人员对15号文件都表示拥护。

晚饭后，徐景贤和王秀珍商量，撤销民兵的战备集中和待命决定，恢复正常，不然将引起误会。于是，王秀珍当即给民兵指挥部施尚英打电话，对他说：

“撤销五位数（即31000人，实际上只有11000人），保持四位数（即2500人）恢复正常。”

接着，徐景贤和王秀珍又将廖祖康找来，要他将东湖路招待所的指挥点撤了，让聚在那里的总工会的人都回去。廖祖康答应了。

晚上，马天水秘书房佐庭再次打电话通知徐景贤、王秀珍：马天水要他们两人去北京开会，空军会派飞机，情况来了会清楚的。

马天水要徐景贤接电话。徐景贤汇报了下午常委会开会的情况。马天水说：“还可以在马路上贴拥护中央决定的大标语，但开大会要等我回来。”

北京，听到徐景贤、王秀珍准备第二天到北京开会的回复后，华国锋、李先念等又找彭冲等人和南京军区的廖汉生、丁盛两位负责人谈话。

10月9日，叶剑英向华国锋提议：“赶快让小平同志出来工作，恢复他原来的职务。”华国锋未置可否。

紧接着，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叶剑英又正式提出这个问题：“我建议让小平同志出来工作，我们在座的同志总不会害怕他吧？参加了政治局、恢复了工作，总不会跟我们挑剔吧？”

李先念马上表态：“同意！应该让小平同志尽快地出来工作。”

华国锋还是没有表态。

10月10日，邓小平给华国锋写信，表达自己对于粉碎“四人帮”

的拥护和兴奋之情：

东兴同志转呈国锋同志并中央：

我衷心地拥护中央关于由华国锋同志担任党中央主席和军委主席的决定，我欢呼这个极其重要的决定对党和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意义。不仅在政治上思想上华国锋同志是最适合的毛主席的接班人，就年龄来说可以使无产阶级领导的稳定性至少可以保证十五年或二十年之久，这对全党全军全国人民来说是何等重要啊！怎不令人欢欣鼓舞呢？

最近这场反对野心家、阴谋家篡党夺权的斗争，是在伟大领袖毛主席逝世后这样一个关键时刻紧接着发生的，以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战胜了这批坏蛋，取得了伟大的胜利，这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胜利，这是社会主义道路战胜资本主义道路的胜利，这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胜利，这是巩固党的伟大事业的胜利，这是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革命路线的胜利。

我同全国人民一样，对这个伟大斗争的胜利，由衷地感到万分的喜悦，情不自禁地高呼万岁、万岁、万万岁！我用这封短信表达我的内心的真诚的感情。

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万岁！

党和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胜利万岁！

邓小平

一九七六年十月十日

10 月 10 日，是毛泽东逝世一个月，中央组织力量起草了《亿万人民的共同心愿》的社论，华国锋和中央政治局专门审议，在社论中加了毛泽东关于“三要三不要”的语录，并决定以“两报一刊”名义发表。

这上午，南京军区通知上海警备区，上海警备区政委李宝奇、副政委章尘、李彬山、副司令员张宜爱、杨新亚，马上去南京军区开会。临行前，李彬山与上海民兵指挥部施尚英约好，如果有事他将告之。中午，一行人乘火车离沪。

中午，彭冲、廖汉生、丁盛等回到南京。彭冲在省委常委一个很小的范围内传达了中央的精神。

马天水 10 月 9 日晚上打给上海的电话，再次引起上海的猜测：

“为什么马天水不回上海?”

“为什么又要上海去人?”

“为什么会议不是中央通知?”

10 日上午,徐景贤、王秀珍又通过各种途径向北京摸情况,当听到“四人帮”被抓的消息后,他俩又有点疑惑:“马老”的话,总不至于不可靠吧。

徐景贤、王秀珍、王少庸、冯国柱、黄涛、张敬标 6 个上海常委开会,研究、估计事态发展的几种可能性。

王少庸提出:“可能有问题,是否不去人,或者去一个人?”

徐景贤、王秀珍商量后说:“这是马老通知的,两人不去不好,去了一定打电话回来,如果没有电话就是出事了。”

他们听了《人民日报》社论《亿万人民的共同心愿》。社论写道:“历史证明搞垮我们党是不容易的。任何背叛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篡改毛主席批示的人,任何搞修正主义、搞分裂、搞阴谋诡计的人是注定要失败的。”徐景贤、王秀珍、冯国柱、张敬标分析后错误地认为,可能是有人反对华国锋,而江、张、姚、王是站在华国锋一边的。

徐景贤、王秀珍商量去北京后要及时通报消息。最后,他们决定让徐景贤的秘书张家龙随同去北京。

王秀珍说:“我们走后,你们几位就在康平路集体值班,注意各方面的动向,有问题在一起研究。”

徐景贤说:“我们两人去北京开会的消息,在场的人要保密,不要传出去。”

王秀珍马上又打电话给上海市总工会副主任叶昌明:“我和徐景贤要去北京开会,你那里不要动,有事要请示王少庸、冯国柱、张敬标,要听他们的指挥。”

临行之际,徐景贤、王秀珍也作了“一去不复返”的打算:“作最坏的打算! 如果我们去了以后,两三天没有消息,你们就决一死战!”

“一到北京,就给我们打电话!”冯国柱、张敬标、叶昌明都再三关照徐景贤和王秀珍。

下午 14 时 30 分,徐景贤、王秀珍乘空军专机飞往北京。

10 日,“四人帮”被抓的消息已经在北京市民中传开,人们半公开地议论,市场上白酒的销售量突然猛增。许多人去买三公一母一串的螃蟹,有人还敲打螃蟹:“看你还横行霸道不!”

1976 年打倒四人帮时宗其香画的《三公一母》横行霸道

黄永玉再画猫头鹰

10月10日,两报一刊发表的社论《亿万人民的共同心愿》,第一次在报纸上公开出现“团结在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周围”的提法。这被外电认为是暗示“四人帮”已失势。

10月10日,星期天。晚上,北京大学两校写作组的范达人从家里返回梁效的途中,走到北大哲学系的路口,天已经黑了,组织组的一个副组长刘隆亨碰见他说:“你还去上班?”

范达人答:“是啊。”

“你没有听到什么消息啊?”

“没有啊。你听到什么消息?”

“迟群、谢静宜篡党夺权,搞阴谋,抓起来了。”

“哎哟,”范达人心里一震,说:“怎么,怎么这样就抓起来了,这两个是我们直接的领导啊?”

回到梁效,范达人将迟群、谢静宜被捕的消息告诉了自己写作组

的成员,但是当时大家都没有想过事情会有多严重。

当晚,已经到了11日的凌晨2时了,写作组的人都进入了梦乡。突然,很亮的强光从窗外射了进来,吉普车、摩托车……部队将梁效包围了。接着进来一批人,有北京市委的,还有部队的,为首的宣布:“四人帮已经隔离审查了,迟群也隔离审查了,我们要查封梁效,中央下命令要查封梁效。你们马上离开,只能带洗漱用品,不能带任何资料文件。”

就这样,梁效的成员灰溜溜地出了楼房。也是从这一天开始,梁效成员被隔离审查。写材料,交代,接受各种形式的批判和审讯。作为《永远按毛主席既定方针办》等重要文章的执笔者,范达人是重点审查的对象。

1977年2月29日,北京大学召开“全校揭批四人帮及其篡党夺权急先锋梁效的罪行大会”,在全场高呼“打倒范达人”的口号声中,范达人从会场被直接押上了囚车。他被押往半步桥监狱。

1976年10月10日晚上,徐景贤、王秀珍飞抵北京。华国锋决定他们暂不参加政治局的打招呼会议,由马天水、周纯麟向他俩传达“四人帮”被隔离的情况。

听马天水、周纯麟讲了中央会议的精神,徐景贤和王秀珍一时无法接受。徐景贤谈了10月8日以来,他们在上海调动民兵、搞战备部署的情况。他觉得大势已去,要求与上海通一次电话,说“可能出事”。

经过书面请示中央办公厅同意后,徐景贤打电话给上海的冯国柱,对他说:

“我们已经平安到达,一切等我们回来以后再定。”

当晚,朱永嘉从上海市委回到写作组后,对大家说:“徐、王在郑州被勒令下飞机接受检查。”并说:“载他们的飞机不是专机,而是沿途把山东等省市书记放下后再到上海接的他们二人。起飞后也不是直飞北京,在中途又多次停顿。”

廖祖康也对聚集在东湖招待所的市总工会的人说:“徐、王是乘中央送开会的人回来的专机去北京的。专机到郑州后突然降落,检查了乘客的身份后,才再飞北京。这种情况过去也没有过的,好像怕有什么人会混进去似的。”

他又说:“中央分批开会,这架专机是送第一批开会的人回来,接第二批开会的人去的。其他省第一批开会的人都回来了,就上海没回来,又要去两个人。”

大家听廖祖康这么一说,都很担心,纷纷说:“为什么马老不回来又叫徐、王去?不要都不回来了。”

朱永嘉和冯国柱、王少庸、张敬标三位常委都觉得反常。到11日凌晨1时左右,朱永嘉又从市委给写作组打来电话说,他已和徐景贤通了电话,徐景贤叫大家不要动,等他们回来再说。

写作组的王知常马上说:“时机又错过了。”

11日中午,徐景贤、王秀珍聚在马天水的房间。周纯麟得知后,立即过去,刚推门进去,他们就不说话了。随即,徐景贤、王秀珍起身走了,马天水连忙招呼周纯麟坐下。

不一会儿,房佐庭到王秀珍房间送文件,徐景贤跟着也进来了。

王秀珍对房佐庭说:“毛主席逝世不到一个月呀,怎么一下子被他们搞起来了?是怎么一回事啦!老房,你在马老身边几天了,马老是怎么想的?”

房佐庭讲了马天水在中央表态的情况。

徐景贤说:“同意他们的会议精神,就是同意和平演变啊!”

王秀珍埋怨徐景贤说:“你怎么把调动民兵、分两个点的情况对周司令也说了,不能对他说的,周司令是党中央安排在我们市委那里的一支钉子。”

下午14时左右,陈锡联、苏振华、倪志福受中央委派,到京西宾馆会议楼,找周纯麟和马天水谈话。

周纯麟汇报了徐景贤、王秀珍的情况。马天水谈了10日深夜徐景贤、王秀珍提的一些问题。

回来后,周纯麟和马天水立即向徐景贤、王秀珍转达了中央领导的讲话内容。

10月11日,上海在不安中度过。这天,上海市公安局监听台不断听到国外电台报道“四人帮”被抓消息。

市委写作组的朱永嘉和王知常强烈主张要有行动。11日,朱永嘉说:“可能马天水被人家做工作做过去了,又怕担不了全部责任,今天

把徐景贤、王秀珍也叫去北京,徐和王回来,肯定是当钱谦益。”

钱谦益,明朝东林党领袖之一,官至礼部侍郎,因与温体仁争权失败而被革职。明亡后,依附南明弘光政权,官拜礼部尚书。清兵兵临南京城下,钱谦益率诸大臣在滂沱大雨中开城向清军统帅多铎迎降。

不过朱永嘉又认为,留下的张敬标、冯国柱、王少庸三个市委常委态度还是很坚决的,“民兵、总工会几个人坚决要干,我们应当干。”

朱永嘉说:“这一乱可好了,肯定会出现辛亥革命后的局面,军阀割据,谁也不听中央的。”

下午,朱永嘉在他的办公室里一边整理东西,一边对在场的王知常和陈冀德说:“你们也收拾收拾准备坐牢吧。就这么束手就擒,实在不甘心,也对不起张、姚两位首长。”

陈冀德说:“就是被抓去坐牢,也不做对不起他们的事。”

当晚,朱永嘉从“康办”回到写作组,带回了确切的粉碎“四人帮”的消息,说《美国之音》和英国 BBC 已经广播了。

听朱永嘉这么一讲,陈冀德情绪很激动,她说:“中央出了这么大的事情,与上海的关系又这么密切,我们这些共产党员、市委成员却都是从外电消息中知道的,这叫什么党内原则?事情早已发生,却一直把我们蒙在鼓里,这就叫马列主义?这就叫光明正大?”

# 第1423回：苏倪彭，组成三人工作组 听外电，上海市局势又紧

11日晚，上海市总工会的人又如约在东湖招待所碰头。民兵指挥部负责人施尚英等人，说上海警备区10日中午到南京军区开会的人都回来了，警备区李宝奇政委在浦东大楼团以上干部会议上宣布警备区正在召开的党委扩大会暂停，由董常云副司令负责战备工作。施尚英说："李彬山回来也没打电话给民兵指挥部，也没来过。战备工作原来是张宜爱抓的，怎么又换成董常云了，看来情况不妙。"

大家议论纷纷，觉得南京的会与中央发生的事是有关的。

这时，正在北京参加电影工业会议的原市委工业政治部机关造反派头头、时任上海电影公司党委副书记及电影技术厂党委书记的秦学能，从北京打来电话找陈阿大。陈阿大拿起电话，听了几句后，立即将工交组的工作人员肖云机叫过去，让他听电话，边听边复诵边记录。大家都围在电话机边，听肖云机复诵。

秦学能在电话中说："北京传说已传达了中央文件，内容据说是在钓鱼台揪出了一个反革命政变小集团，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毛远新、迟群、谢静宜等人已被抓起来了。北京街上已出现了打倒王、张、江、姚的大标语。"

围在电话机边的人都紧张起来，廖祖康立即给肖木打电话，他一边听着肖云机的复诵，一边给肖木转述。

叶昌明也马上给张敬标打电话。张敬标不在，叶昌明让"康办"值班室立即向张敬标报告，说北京有电话来，他们要求马上过去汇报。

叶昌明让肖云机立即把电话记录整理出来送"康办"。

这时，"康办"来电话，让叶昌明他们马上过去汇报。当他们来到"康办"时，已是22时左右了。在场的有王少庸、冯国柱、张敬标、黄涛四位常委及肖木、何秀文。

叶昌明他们汇报了秦学能北京来电的情况，送上了电话记录，又

讲了警备区去南京军区开会的人已回上海。

张敬标说:“朱永嘉刚走,已叫人去通知他来了。”“我们刚才和徐、王通了电话,他们说平安到京,参加了会,现会已结束,在等中央领导接见,明天就能回来了。要我向他俩家属转告一下,他们身体很好,明天回来。我们问是开什么会? 他们不肯说,只说等明天回来就可知道了。”

冯国柱和张敬标抱怨说:“他们在上海时也是急得要命的,也知道我们在等他们的消息。但到北京后就跟马天水一样了,不肯说什么情况,不知是什么道理。”

又说:“他们电话里对马老的情况一点也不说,只要向他们的家属转告,也不提向马老的家属说一下,马老到底怎么了?”

说起南京军区的会议,张敬标和冯国柱说,上海警备区去南京开会的五个人都回来了,原来李彬山和张宜爱都说好回来就告诉他们开会内容,但到现在也没有来电话。

叶昌明说:“李彬山和张宜爱不来电话,市委可打电话去叫他们汇报么。张宜爱是市委常委,李彬山是民兵指挥部负责人,来向市委汇报也应该的。”

张敬标和冯国柱说:“我们也考虑过了,他们既然不愿来电话,我们也不便去找他们了,不来就不来吧。”

原来,李彬山和张宜爱10日去南京军区开会,得知中央发生的情况后,深知事关重大,也对上海民兵备战发枪之事感到严重,从此一直待在警备区,不敢再与上海地方党政尤其市民兵指挥部发生任何接触,更不要说通消息了。为了摆脱警备区在这个敏感时期与市民兵指挥部的干系,李彬山又将守在中国纺织机械厂指挥点的上海警备区的吴立义召回警备区。

冯国柱说:“收听到外电广播,也说北京揪出了政变集团,几个大学的留学生听了外电后,还去问中国学生。情况已汇报上来了。”

王少庸讲:“公安局也侦听到敌台广播了揪出政变集团的消息。”

张敬标说:“重型机器厂有人在京开会,向厂里打电话说了这件事,厂里作谣言报到‘康办’来了。”

在座的人纷纷问:“我们问该怎么办?”

冯国柱和张敬标说:“他们既然说了明天回来,只好等他们回来再说了。”

叶昌明、陈阿大、施尚英、廖祖康回到东湖招待所,向等在这里的黄金海、马振龙、王明龙传达了“康办”所议论的情况。

廖祖康说:“说几位领导是反革命,我不相信!我跟王洪文这么多年了,这几年一直和他们接触的,还不知道他们的情况?他们一直是紧跟毛主席的,怎么会一下子变成反革命了呢?”

大家也都说不相信。

廖祖康又说:“中央可能会马上来电叫我回去的。”

在场的人都说不能回去,可以找个地方躲起来。

廖祖康说:“我已作好思想准备了,中央要叫我回去,我就回去。不回去也没用的,反正跑不掉的。社会主义国家不像资本主义国家,你能躲在哪里不出来吗?是躲不住,也跑不掉的。所以社会主义国家变修后,他的控制也更厉害了。”“马、徐、王他们可能已被中央拉过去了,否则不会让他们回来的。我们不能把希望放在他们身上,要靠我们自己干。”“马、徐、王回来后,很可能是来做工作的,要我们跟他们跑,只要看他们回来传达时,是否叫我去参加,就可看出他们的态度了。”

叶昌明说:“要是他们回来是做工作、劝降的,我们不能同意他们的。我思想是不会通的,准备去开会后不出来了。”“被抓的都是一直紧跟着毛主席的中央领导人和从文革中出来的新干部,把这样的人抓起来,就清楚的说明了是什么问题了。我们希望把这样的人抓得越多越好,这就更能说明问题。只要把被抓的名单一公布出来,群众一看就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了!”

陈阿大说:“不靠他们(马、徐、珍),我们自己干!”

他又问大家:“真要干起来,你们怕不怕?”

大家都说:“不怕!”

陈阿大又说:“要干就干到底,不能做叛徒。谁要做叛徒,我就先把他干掉!”

廖祖康说:“我们也要有点准备才行,不能光说说就算了。”

大家同意,并议论刷大标语,找一些可靠的老造反吹吹风,活动要

保密等等。

黄金海提出是否将正在干校的戴立清叫回来?

叶昌明、廖祖康他们同意。于是叶昌明以戴立清家里有急事的名义,让市革委会总机转五七干校所在的奉贤县县委,再由县委总机转到干校。

电话接通后,叶昌明对戴立清说:“你家里有急事,你连夜回来。要是干校没车,我们马上派车来。”

戴立清说:“干校有车,我立即回来。”

廖祖康清理了他房间里的东西,拿出一大盒糖来说:“原准备结婚时给你们的,现在分掉吧。”

叶昌明讲:“还是先放着,等事情搞完了,有机会再吃吧。”

北京。10 月 12 日上午,华国锋在玉泉山 5 号楼召开政治局会议。他说:“现在看来,上海市委这些人已无法工作了。他们顽固地站在‘四人帮’立场上,与党中央对抗,妄图发动武装叛乱;过去被‘四人帮’压下去的一派也准备搞串联;上海的群众也自发地起来了,需要正确的引导,中央应马上派人去接管上海,不然会出大乱子。”

倪志福在 20 世纪 80 年代回忆了这次会议:

在会上,叶剑英说:“我赞成国锋同志的意见,为了防止上海这些人狗急跳墙,搞武装叛乱,要派一位无论是在军队还是地方,都能压得住台的老同志去。”

他停了停,略一思忖后说:“我看振华同志堪当此重任。他资格老,林彪、‘四人帮’整得他很惨,但他斗争很坚决,在粉碎‘四人帮’的紧急时刻,起了重要作用。在战争年代,有指挥作战的丰富经验;在建国初期,担任过贵州省委书记,多次受到党中央、毛主席的称赞。再说,上海有海军东海舰队的基地,苏振华去上海,工作起来也有方便条件。”

陈锡联、李先念同意叶剑英的意见。

华国锋也表示同意,他说:“我赞成叶帅的提名。根据‘四人帮’控制上海的实际情况,中央去接管上海的人选,最好是在将来的一段时间内,能够取代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在上海职务的人。‘四人帮’和他们的余党不是说王洪文是工人阶级的‘领袖’吗?他是什么工人阶

级‘领袖’！我们要派一位真正的工人阶级领袖去，我看志福同志也一起去上海。”

李先念、叶剑英等表示同意。华国锋接着说：“过去上海和江苏的矛盾很尖锐，但上海和江苏不论政治、经济等各方面的关系都很密切，最好能从江苏调一位同志去上海工作。”

李先念说：“可以派彭冲同志去，他处事从容稳重，在江苏政绩突出，‘四人帮’往死里整他。他跟‘四人帮’斗争非常坚决，他去接管上海，有利于解决两地矛盾，上海经济建设上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将会得到江苏的有力支援和帮助。”

大家都表示同意。于是，中央政治局决定，苏振华、倪志福、彭冲3人组建中央工作组，并急电彭冲进京。

上海，下午14时左右，叶昌明打电话到“康办”找张敬标，他不在。叶昌明问值班室，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他们回来没有？回答：没有。叶昌明又问：

“什么时候回来，有消息没有？”

回答依然是没有。

上海总工会的陈阿大、叶昌明、黄金海、戴立清、王明龙和廖祖康、民兵指挥部的施尚英等人，又在上海市工人文化宫5楼会客室碰头。

叶昌明说：“人到现在还没回来，也没什么时候回来的消息，看来下午不可能回来了。”

大家怀疑，是中央把人扣下了，也有可能中央是对上海封锁消息，等布置好了就动手。

他们分析了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的几种可能，廖祖康说：“他们要是抵制的态度，中央是不会让他们回来的。要是能回来，态度就不行了，被拉过去了。”

叶昌明说：“总是态度变了，才让他们回来的。回来是做我们工作的，不能听他们那一套。”

廖祖康说：“各地都是两种观点的，我就不相信都听他们的。只要有人带头起来和他们干，就会有人跟上来的。现在就看谁来带这个头了！要是上海能带个头，周围几个省肯定也会起来干的。”

叶昌明说：“上海在‘一月革命’中是带了头的，现在也应起带头

作用。”

马振龙说:“要是马天水他们回来不干,我们可以自己干,不能投降。”

其他人也都表示了坚决要干!

他们议论要设个值班室,专供他们几个人联络用,对外保密,还要准备标语、口号。

民兵指挥部来电话找施尚英,说警备区李彬山来电话让施尚英马上去他家。

施尚英从李彬山那里回来后,对大家说:“李果然是找我去说南京开会的事,是军区开的,传达中央打招呼会议精神。说王张江姚是‘四人帮’,毛主席对他们有指示的。我问他,几位领导是否被抓起来了?他肯定的。我问他在会上是否表态支持了?他不吭声,表示默认的。我就与他吵起来对他说,你原来说过的,马没回来前,你是不去参加会的,怎么又投降了呢?李吞吞吐吐的说不出话来。我又问他,有没有文件?他说,没文件,口头传达的,但有几个影印件。他说,毛主席有三条指示:你办事我放心;照过去方针办;不要着急慢慢来。他抄在本子上,读给我们听的。说是在南京看到了毛主席手迹的影印件的。社论说的篡改毛主席指示,就是指篡改‘照过去方针办’这条。我说凭这些就能相信了吗?我要李详细说,他不肯多说。我故意与他吵,骂他,他也不吭声,但神色十分反常,只说不要急,等马他们回来传达,你就知道了。我怕你们等急了,就赶紧回来了。”

大家议论说:“照过去方针办”和“照既定方针办”不都是一样意思吗?怎么能叫篡改呢?他们问廖祖康是否知道这些事?

廖祖康说,从没听说过“四人帮”的提法,也不知道毛主席关于“四人帮”问题的指示。他表示不相信有“你办事我放心”的批示,认为“照过去方针办”和“照既定方针办”都是一个意思,不能叫篡改。

廖祖康还说,汪东兴是肯定参加这件事的,没有他参加,抓人是不可能的。

叶昌明打电话给张敬标,讲李彬山找施尚英谈话了,有重要情况要求马上汇报。

张敬标说常委在晚上碰头,可以晚上过来谈。

廖祖康建议:“还是先找黄涛去说一下。”他打电话给黄涛,讲有重要情况要汇报。然后和陈阿大、叶昌明、施尚英、廖祖康一起来到黄涛家,黄涛正在吃晚饭。

施尚英汇报了李彬山找他谈话的情况,大家问黄涛:“怎么办?”

黄涛说:“晚上‘康办’要碰头,等碰头时再商量一下怎么办吧!”

大家决定在黄金海工作的上棉31厂设秘密联络点,组织几个人24小时值班。叶昌明要黄金海马上去31棉落实。下午16时30分左右,黄金海和连夜赶回上海的戴立清,去上棉31厂找人布置值班事宜。

其实,就在10月9日,谷牧派到上海的“八人小组”找到市革会副主任王一平后,王一平即找到他的老部下,曾任杨浦区委书记,时任市委常委、市委办公室主任的张敬标,向他了解上海市委的情况。张敬标将徐景贤、王秀珍离沪前上海市委常委开会商议的内容交给了王一平。

张敬标接到叶昌明的电话后,又打电话给上海警备区政委李宝奇,说:“现在我们这里情况很紧张,工会和民兵指挥部的一些人情绪很激动,我们已经很难控制。”

李宝奇要他尽量稳住他们。

张敬标和冯国柱决定晚上在康平路碰头交换情况,通知王少庸和黄涛也到。说是市委常委扩大会议,实际就是总工会和写作组核心人员。本来张敬标打算四个常委先碰头商量一下,统一认识。但黄涛一直在忙工交组的日常工作,到迟了,常委未能先商量研究。

# 第1424回：要大干，众秀才情绪激动 再等等，四常委难下决心

10月12日晚上20时30分，陈阿大、叶昌明、施尚英、朱永嘉、肖木、廖祖康、何秀文等来到康平路学习室，和冯国柱、张敬标、王少庸、黄涛四位常委互通情况，都是四面八方传来的关于“四人帮”被抓的消息。

会议气氛非常紧张，吵吵闹闹的。

施尚英汇报了下午与李彬山见面的情况。

这时，写作组的王知常和总工会的马振龙也先后进来了。

听了施尚英的汇报后，王少庸说：“‘按既定方针办’和‘照过去方针办’有什么两样？我看不出有不同的意思，这种叫篡改吗？凭这一句话，就能把人打成反革命了？我想不通！”

其他人也都觉得这两句话没有本质上的区别。

张敬标说：“马天水他们说的今天回来的，又不回来了。”

大家要求再给北京打电话，于是冯国柱写了电话搞，读给大家听，征求意见。大意是：“上海现在传说纷纷，谣言很多，思想混乱，人心浮动，我们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你们赶快回来！”

冯国柱说：“要把情况说得严重一点，可以让他们早点回来。”

张敬标强调：“要再加一句，再不回来，我们要正式向中央发电报了。”

大家都同意张敬标的意见。

与北京的电话挂通后，大家都到学习室对面的小会议室，先是冯国柱与马天水通话。他按照电话稿的意思向马天水汇报了上海的情况，说：

“这里很乱……”

“又不是我们要乱！”

“不是不听指挥的问题，而是没人指挥。”

冯国柱问:“你们什么时候回来,明天能回来吗?”

北京那边,王秀珍又接过电话,冯国柱对她说:上海“谣传很多,你们要早点回来。”

张敬标插话说:“不回来要发电报。”

马天水说:“不能发电报。”

冯国柱又报了上海这边在场人的名字,说:“他们都很急。”然后将电话递给叶昌明说:“王秀珍叫你来听。”

叶昌明接过电话,只听王秀珍在电话里对他说:“小叶,你们一定要听指挥啊!”

叶昌明说:“现在不是不听指挥,而是没人指挥啊!你们再不回来,我们要急煞了!”

王秀珍说:“不要讲了,我们明天回来。”

叶昌明说:“下面各种传说很多,弄的人心慌慌,思想很乱的……”

王秀珍打断他的话说:“不要说了,情况我们都知道的,一切等我们回来再说。工会一定要听指挥啊!”

说完,就挂了电话。

大家回到学习室,冯国柱传达了马天水和王秀珍的电话内容,“说一切等他们明天回来后再说。究竟有些什么情况,一句话也没说出来!”

冯国柱问叶昌明:“王秀珍对你怎么说的?”

叶昌明说:“差不多的,也是说要听指挥,一切等他们回来再说,没等我说话就挂了。”

大家又是议论纷纷,对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很不满意。

冯国柱说:“我们急得要命,他们又不是不知道!一点情况也不肯说,现在不知打什么算盘,今天说明天回来,明天能否回来也不晓得,这样一天天拖下去怎么行?”

张敬标说:“马天水说10日回来的,结果不回来。本来说今天一定回来的,又不回来了。现在又说明天一定回来了。明天要是再不回来,我们一定要向中央发电报了,为什么把人扣住不让回来?这么大的上海,一个书记都不在,出了事谁负惩起这个责任?!”

大家着重议论了马天水、王秀珍讲的“要听指挥”、“一切等我们回

来再说”究竟是什么意思？最后认为：一种大约是他们的态度没有变，要回来和大家一起干的。怕上海这边先干了，他们不能回来。一种是他们态度变了，不会干了，怕上海自己先干了，所以这样说，不让大家干，他们回来是要做大家工作的。但后一种可能性大。

廖祖康说：“他们要是明天能回来，就说明态度变了，不行了！要是在中央坚决顶住的，是不会让他们回来的。”

叶昌明：“他们要是不回来，不一定是坏事，说明是顶的。要是能回来，也不一定是好事，可能是向中央投降了，回来做我们工作的。”

张敬标说：“周司令是部队的，他肯定会变过去的。马天水是老干部，变过去也不奇怪。徐景贤、王秀珍都是新干部，造反派，在上海时态度也很坚决的，为什么一到北京后就变了？我主要是对他们的态度变化感到奇怪，想不出是什么道理！”

王知常：“这有什么奇怪的？人总是会变的！”

冯国柱：“可变得太快了，总想不通是什么原因。”

王知常：“徐本来就是个软骨头吗！‘1.28’炮打时就已表现出来了，被弄到复旦后，什么都答应了。”

朱永嘉：“他们明天能否回来还是个问题，这样一天天拖下去也不是个办法，时机是很重要的，这样拖下去，就会坐失时机的。”

他突然站起来，两手把袖子卷起说：“我的意见，不要等他们了。要干就是今天。今天不干就失去时机了，明天就别想干了。”

王知常接着朱永嘉的话说：“现在不能再等他们回来做决定了，要么大干，要么不干！”

朱永嘉写了一张“民气可用”四个字的条子，在会场上传阅。

肖木也说：“现在不能再等下去了，等马天水他们回来，就来不及了。”

叶昌明表示赞同，陈阿大也说：“要马上干，不干会失去时机。”

冯国柱为难：“他们都没回来，怎么干呢？”

马振龙和王知常都是自己要求参加会的。马振龙到总工会后，听说“康办”正在开会，于是打电话要求参加。他到会后，见大家正在议论，流着眼泪说：

“我知道你们开会不让我参加，我是自己来的。问题很清楚，中央

出了修正主义,三位领导被抓,我们要为毛主席路线而干。我是提着脑袋干文化大革命,现在我们也是非干不可”,“我四岁死了父亲,是党培养了我,我这人从不流泪的,毛主席逝世,我也没有流眼泪,今天我流着眼泪说这些话,我们只有干,才能保住文化大革命的成果!”

这时,马振龙听了冯国柱的犹豫后说:“他们没回来,还有你们常委在,只要市委带我们干,我们一定干!”

马振龙一番话讲得慷慨激昂,朱永嘉马上过去拉着他的手,说:“过去我们有点矛盾,现在要团结起来一起干!”“我先提个建议,要马上派民兵进驻报刊、电台,不要让部队先去了。要马上起草告全国人民书,写好后给报纸连夜印出来,电台早晨6时可广播。这些都要在天亮6时前准备好的,晚了就不行了。报刊、电台我们去通知,民兵进驻不会有问题的。宣言由肖木起草,你们工会也带个头行动起来,只要民兵一动,我们就造舆论支持你们。要干就大干!现在不干,将来会在历史上留下惭愧!”

叶昌明说:“民兵也要进驻水、电厂等要害单位保护好,不要出乱子。我们可发动工人上街游行,刷大标语,号召群众起来保卫文革的胜利成果。”

王知常说:“写标语就要有针对性,要旗帜鲜明的。他们既然抓了人,我们就可以写:‘还我洪文,还我春桥,还我江青,还我文元!’还可以在报上用通栏大标题印出来。”

永嘉朱问王少庸:“上海的存粮有多少,能坚持一个月吗?”

王少庸答:“光吃是可以的。”

朱永嘉又问陈阿大:“煤呢?”

陈阿大说:“只供应民用,可坚持一个月。”

朱永嘉说:“除了维持一些必要的生产外,其他都停下来,把群众发动起来,粮、煤能坚持一个月就够了。巴黎公社打了9天,我们总可以打一两个星期吧?能打一两个星期就是很大的胜利了!可以让全世界知道,中国不像苏联,到底还是有人起来反抗的!如果被镇压,失败了,那么像巴黎公社一样,历史上也会记上我们的业绩的。我们这样斗了,也对得起几位领导了。”

王知常说:“要血战到底,就像巴黎公社一样,战死到最后3

个人。”

张敬标不无担忧地说:“上海要是这样一干,不是对几位领导的安全更不利了吗?马天水他们原可以回来的,一干起来,中央就不会让他们回来了。”

朱永嘉说:“不会的,历史上有例子的。楚汉相争时,项羽一次把刘邦包围了,要刘投降,刘不肯。项又抓来刘的父亲,在城下威胁刘,说不投降就杀他父亲。但刘邦不吃这一套,态度很强硬,项羽反倒不敢杀刘的父亲,还好好款待刘邦的父亲。这样的例子历史上还有。你越怕他,就越不行。你态度硬,他们反倒软下来了。只要我们一干起来,他们不会有危险的。中央可能会叫他们回来解决问题。还可能把几位领导也放回来。”

叶昌明和施尚英见朱永嘉、王知常态度如此激烈,不免有些吃惊。施尚英觉得,朱永嘉和王知常提出的方案,与前两天他和警备区制定布置的战备方案,性质是完全不同的。他感到事态的严重,但心里又极为矛盾:一方面担心中央是否真发生了政变?另一方面又深知拉民兵武装反抗中央政府责任重大。他悄悄对叶昌明说:

“他们的情绪不对头,我们要冷静些。”

叶昌明也对施尚英说:“对他们要小心些,不能听他们的去办。”

施尚英不同意朱永嘉提出的民兵占领电台的提议,说电台是军队警卫的,民兵和军队有分工的。

朱永嘉说:“不要紧的,我叫电台的刘象贤将你们民兵领进去。”

施尚英说:“调动民兵要市委下命令的。”

朱永嘉问施尚英:“天亮前民兵能调好吗?”

施尚英说:“来不及的,民兵分得散,……”

王少庸说:“那先调一个团行吗?”

施尚英说:“人调起来也有困难的,天亮前不行的。”

朱永嘉不满,廖祖康也问:“调这么点人,要那么长时间?”

施尚英说:“队伍调起来是很慢的,要是市委下命令调,我们去想办法。”

叶昌明说:“民兵太分散,调起来太慢。不像部队是成建制的,一下就拉出来了。要是来不及,还不如不调的好。不然,我们人没调好,

反暴露了。”

朱永嘉问叶昌明:“工会方面能否马上发动起来?”

叶昌明说:“也要市委点了头,下面才能动的。”

王少庸说:“这样分散怎么打仗,等你们拉出来,部队早就将你们包围了。”

于是,施尚英就在会议室,给正在市民兵指挥部的钟定栋打电话,要钟定栋检查各单位值班和战备人数。随后,施尚英又给钟定栋打电话,要钟定栋做一个重点目标的保护方案。

钟定栋接到电话后,即挂起了上海交通地图,从12日晚上一直做到13日凌晨2时,制定了两个方案。他给这两个方案取了两个名字:“捍一”、“方二”。

“捍一”是对市委,市革会办公处,以及重要目标的保卫方案。

“方二”是对上海外围进口的控制。

康平路学习室里,大家又议了一阵。

王知常说:“他们三位去开会的,可能投降了。马天水是老干部,徐景贤是软骨头,王秀珍是既得利益者,我们不能再等!”

张敬标问:“怎样干?”

陈阿大说:“我们工交组下面工厂有的是船,在黄浦江上弄条万吨轮一沉,就把江封锁了,外面进不来。在机场跑道上开几辆卡车,飞机就不能停了,就把机场封死了。再把电网拉下来,一断电,上海马上瘫痪。”陈阿大解开外衣纽扣,在屋子里走来走去,越说越激动。后来干脆坐在会议室门口的地上,堵住门,不准人进出,要大家表态是干还是不干。

廖祖康更是激动,说自己整个文革10年都跟着王洪文,对王洪文的绝大多数行动都知道,不相信王洪文会反对毛主席。

朱永嘉坚持“马上干!”

廖祖康说:“我是同意马上干的。”

叶昌明和施尚英也表示“同意马上干,但要市委下命令。”

除了四常委外,其他人都一一表示同意马上干。最后,朱永嘉要四个常委表态:是否同意下令调民兵马上干?

冯国柱和张敬标推脱说:“不能急,要好好商量。”

马振龙追问:“到底干,还是不干? 不能光说空话,浪费时间。”

陈阿大着急了,说:“你们不干,我们自己干,这样拖下去怎么行?!”

他叫叶昌明跟他一起出去,说不参加这个会了。

冯国柱、张敬标叫住陈阿大,说:“不要急,这是件大事,要好好商量,不能意气用事的。”

陈阿大说:“你们不愿干,还有什么商量的? 我不参加!”

叶昌明和其他人也劝陈阿大坐下商量,不要走。

廖祖康要四个常委表态。

张敬标对黄涛说:“你先说意见。”

黄涛说:“我同意他们意见。现在情况也很清楚了,再等下去也不是个办法。”

张敬标又要王少庸表态。王少庸说了很多,大意是他同意干的,但怎么干法要商量,是否马上干,要再看看情况定。

张敬标表态说:“我和大家一样,是决心要干的,但怎么干法,什么时候干,要研究。我意见还是等他们几个人回来,问一下情况后再干。”

最后冯国柱说:“大家坚决反修的精神是好的,也是很可贵的。要干的态度,我和大家一样的。要干,这个原则可定下来。但是否马上动手,我意见要等一天。因为北京究竟什么样情况,还不太清楚。他们既然说明天一定会来,还是等他们回来后,了解一下情况,可以更好的准备。”

有人问:“要是明天他们又不回来怎么办?”

冯国柱、张敬标说:“明天不回来,就不再等了,一定马上干。”

还有人问:“要是他们回来,不同意干,怎么办?”

冯国柱说:“明天他们回来,我们去机场接他们,先不回‘康办’,另外找个地方去,先扣起来。”

施尚英不理解,问冯国柱:“为什么要扣起来?”

冯国柱说:“你不懂,他们三个回来也可以代表市委下命令的。我们先问他们是什么态度,要是同意和我们一起干的,就一起干。要是做说客的,就把他们圈起来,不让他们出来,我们自己干。”

张敬标也赞同这个意见。

朱永嘉把陈阿大叫了出去。

一会儿,陈阿大进来又把叶昌明叫出去,施尚英也跟了出来,他们一起来到小礼堂。

在小礼堂,朱永嘉对他们几人说:“这几个老头子靠不住了,现在只有靠我们自己干了,你们有决心吗?”

叶昌明说:“市委不点头,是没法干的,光靠我们也是干不起来的。”

施尚英也说:“要是市委不通知下面党委,我们调人是调不动的。即使想调,下面打电话到市委一问,也就不行了。”

阿大陈也表示,市委不点头,干不起来。

这时,他们发现,除了四个常委外,学习室的其他人也都来到小礼堂了。市委组织部的王日初也来到小礼堂,他也是听到消息后,自己要求来参加会的。

朱永嘉问:“怎么都出来了?”

马振龙等人说:“张敬标说他们要开正式常委会,决定是否马上干的问题,叫我们都退出来。”

朱永嘉说:“这不行,这几个人靠不住了,不能只让他们几个人在里面,不能让他们打电话出去漏了消息!”

他马上对马振龙说:“你快进去,看住他们,不要让他们打电话。”

马振龙立即返回学习室。

会议室,四个市委常委。冯国柱说:“他们商量,我们四个市委常委也要商量一下。”

冯国柱、张敬标、王少庸意见一致,一定要稳住。

黄涛既不说干,也不说不干,踱过来踱过去,只说要准备,要准备。

小礼堂,朱永嘉对大家说:“几个常委不肯干,已靠不住了。现在要干,就要靠我们自己干了。”

王知常说:“要干就大干,小干没意思的。你们干不干?”

很多人说:“市委不下令干,是不能干的。”

王知常说:“现在伸头是一刀,缩头也是一刀,还有什么怕的?你们不肯干,”他对肖木说:“我们走!”

朱永嘉劝道:不要急,大家再商量一下。

王知常说:“你们不干,我们在这里干么?还不如回去睡觉。”

大家劝王知常、肖木不要走。王知常说:“你们这么胆小,还有什么好谈的,我不参加了!”说完,他就和肖木走了。

朱永嘉对大家说:“最好还是争取他们一起干。还是让我再去做做他们工作。”说完,他又回到了学习室,对四位常委说:

“8号就应该干,已经错过,今夜再不干,到了明天,一切时机就都丧失,要干就下决心今夜干,而且要大干,要以市委名义干,你们4人和我们一起干。”“今夜要不干,到了明天,他们3人一到,要干也干不起来了!那时我看你们只有唱两只歌的份了,要就只唱革命歌,我就算佩服你们;否则就唱投降歌,但是当你们回忆这段历史时,将会感到忏悔。”

其他人也回到了学习室,只见朱永嘉正站在屋子中间,说:“……这几天我想得很多,反正已活了这么几十年,还有什么怕的?要豁出命来干!”

冯国柱也说:“我也活了这么大岁数了,并不怕死的。”

张敬标对大家说:“常委正式决定,干是要干的,但一定要等一天。要是他们明天不回来,就不等了。要是他们回来不肯干,我们自己干!”

朱永嘉说:“今天不干,就别想干了,没时机了。”

主持会议的冯国柱逐个问大家的态度,都表示要干,会议室内已是极度紧张。张敬标说:“现在不好动,一动,周围和外面的部队就要进来,不能贸然行动。我已快60了,怎么样都没关系,你们还年轻,干革命还要靠你们年轻人,不能作无谓牺牲。”

叶昌明说:“等他们回来是可以的,但可否先做些准备,不然他们回来同意干的,再准备就来不及了。”

冯国柱、张敬标表示同意,说:“准备工作可以先做起来,但不能马上动手干的。”

大家都同意。

朱永嘉说:“不能大干,小干也别干了,还是保存一些力量吧。”

时间已经是10月13日凌晨,大家散去。临走前,叶昌明对冯国柱

和张敬标说,他要将中央发生的情况对下面的工会干部“吹吹风”,让大家有个思想准备。冯国柱和张敬标没有表示反对,只说:“吹风可以,但不要行动啊。”

叶昌明对陈阿大、施尚英、马振龙、廖祖康和王日初说:“已叫黄金海他们在总工会等了,我们是否到总工会去?”

大家同意,于是他们分乘两辆车前往总工会。

# 第1425回：十二日，政治局见马、徐、王 上海市，总工会往下吹风

10月12日晚22时，华国锋、叶剑英和陈锡联、纪登奎、吴德、汪东兴、苏振华、倪志福、陈永贵、吴桂贤等接见了马天水、周纯麟、徐景贤、王秀珍三人，一直谈到13日凌晨1时30分。李先念因劳累没有参加。

华国锋让马天水先谈。马天水汇报了几天来的思想认识过程，表示坚决拥护党中央对“四人帮”采取的果断措施。

华国锋拿出张春桥《一九七六年二月三日有感》的影印件，给了周纯麟、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每人一份，并对徐景贤说：“你给大家念一遍吧。”

徐景贤看出那个影印件确实是张春桥的手迹。当他念完《一九七六年二月三日有感》，陈永贵、吴德、吴桂贤介绍了“四人帮”反对周恩来的一些具体事例。马天水他们听后说：“真没想到他们这样对待总理，在我们面前他们表现得很尊重总理。”

华国锋又介绍了江青控制毛泽东文件的情况，他把江青改过的两个讲话文件拿给马天水他们看，还详细介绍了毛泽东逝世前后，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如何大闹政治局。华国锋说：

“摇鹅毛扇的是张春桥，这份《有感》是他的总思想，‘又是一个一号文件’，他恨主席恨得很。”

叶剑英说：“上海是受蒙蔽、受封锁的。主席讲，情况明，决心大，方法对。你们这次来了，情况就明了。张春桥的《有感》里，把阵线划得很清楚，‘他们’‘我们’，搞宗派历来是反党分子的做法。”

华国锋说：“主席不但想打烂‘四人帮’，而且还怕把新同志拉进去，所以在陈永贵同志报告上批了‘钓鱼台没有鱼’。”

华国锋介绍了毛泽东对“四人帮”的批评后说：“我们不会采取‘四人帮’对别人的办法，乱戴帽子，乱整人。有错误改了就好，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按毛主席的路线，以实践来检验，只要转变立场，我们

是欢迎的。揭发批判,我们欢迎。有些材料要保存好。你们一时思想转变不过来,是可以理解的。廖祖康、肖木,要来京办学习班,他们是青年,要帮助改正错误,我们相信你们能搞得更好。‘四人帮’解决了,全国的形势就会更好,你们过去对外省点名批评,但这次江苏对上海没有提意见。经济上我们一定安排好,煤、铁的供应决不能减少。对于‘好八连’以及其他基层同志的努力,都要肯定,不要因为某某某送过什么东西,就否定他们,要区别开来,群众是好的。”

华国锋还说:“江青和美国女作家维特克谈话,谈了六次,贬低主席,内容下流。‘四人帮’逼着外交部交出,特别是王洪文主持工作,他亲自写信,找乔冠华把材料要回来,后来中央决定,我们说花多少钱也要把这本书的版权买回来。”

叶剑英说:“上海是大革命开始的地方,上海的人民、工人觉悟高,对‘四人帮’的活动如果说以前受了蒙蔽的话,现在则应当看清楚了。你们不能再站在少数人的立场上。站在‘四人帮’的立场上,没有前途。要站在多数人一面,把上海的事情办好。”

中央政治局的人问马天水他们:“你们过去听说过‘四人帮’吗?”

马天水等人回答,从来没有听说过。

徐景贤、王秀珍汇报了这次来北京前,在上海曾和上海警备区的几位领导在一起,部署了民兵战备。现在了解了这几个人原来是篡党夺权的“四人帮”,感到极大的义愤,并表示坚决和他们划清界限,誓死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华国锋笑着说:“你们回去别人会骂你们是叛徒。你们把立场转变过来,就要振作精神,做好工作。”

随着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态度的转变,会议气氛渐渐变得和缓。散会后,周纯麟、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同政治局的人一一握手告别。到了京西宾馆,王秀珍后悔没有交代调动民兵数字的问题。一早,她又找到了会议上负责记录的人,告诉了上海调动民兵的数字,请补到记录里去。

上海,13 日凌晨,夜深人静。在蒙蒙细雨中,一辆辆轿车驶出康平路。其中的几辆朝东径直驶向外滩。

矗立在外滩的上海总工会大厦 400 室。1 时左右,陈阿大、叶昌

明、施尚英、廖祖康、王日初、马振龙等从康平路回到这里。黄金海、沈涵、王明龙、戴立清、市妇联主任汪湘君和市妇联副主任强玲英等人已经等在这里了,是叶昌明在“康办”开会时,看到大家都要“大干”,让总工会值班室通知总工会机关人员都来机关的。戴立清是12日晚上连夜赶回上海的。

叶昌明主持开会,他向大家传达了康平路会议的情况,陈阿大等人补充、插话。

说到几个市委常委时,他们说:“老家伙们都在耍滑头,一定要等马老他们回来。”

黄金海和戴立清听了表示:“等什么,再不干,等警备区将军队都布置好,我们就只能束手待擒了。”“这些老家伙,等马老是假的,其实就是拖延时间。”

叶昌明认为,这样大的事情,没有市委出面,单靠工会和民兵指挥部是没有足够号召力的。他说:

“既然常委已决定了要等一天,我们当然不能干的了。但看来等马老、徐景贤、王秀珍回来了,也不会再干的。但是市委不同意干,我们又不能干的。我讲:上海这个地方十分重要的,不管谁来掌权,都是怕上海乱的,乱起来对他们没好处的。现在看来,中央也会怕上海乱的,但我们是不怕的了。毛主席说过,右派上台是短命的,不得安宁的。我们要让他们不得安宁。现在要干,是不大可能的了。但知道情况的人太少了,应把情况告诉下面的干部,要让更多的人知道情况。这样即使把我们这些人都抓起来,下面也会有人和他们对着干的,使他们不得安宁。”

他提出,总工会马上召集区县局工会负责人紧急会议,把这些情况连夜吹下去。大家都表示同意。

再说上海民兵指挥部施尚英,他在13日凌晨回到江南造船厂的指挥点后,立即打电报给各区民兵指挥部,包括民兵直属师,要大家一定听从市指挥部命令,千万不要擅自行动。

凌晨1时30分,上海市总工会大厦五楼会议室,召开了39人参加的“吹风”会议,都是总工会机关各组室和总工会所属市工人文化宫等事业单位的负责人,是叶昌明派车分头将他们接来的。

会议开得很短,只有半个小时。叶昌明说:

“现在我们和去北京开会的马老失去了联系。

“据外地传来的消息,还有外国电台的广播,都说中央高级领导中出了事情。王副主席处境危险。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上来的一些同志,都被打下去了。

“对这件事我们要独立思考,经受考验。

“上海正面临着大考验。我们正面临着大考验。……”

凌晨3时,上海警备区副政委李彬山来冯国柱家,向张敬标和冯国柱讲述了他在南京开会时听到的消息。

送走李彬山,市委办公厅来电话:马天水等三人13日上午9时,由北京起飞回上海。

13日上午,市总工会紧急通知区、县、局和市直属大厂工会负责人共49人到总工会开会。会上众人议论纷纷。

有人说:“王洪文是我们工人领袖,不可能是反革命。”

有人说:“这是算文化大革命的账,翻文化大革命的案,是邓小平路线的继续。”

还有人要求总工会带领各级工会斗争,“头可断、血可流,坚决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保卫文化大革命成果。”

会议结束后,一些局工会又召集下面的工会再吹风,直到基层工厂的工会。

随着中央打招呼会议,“四人帮”被抓消息已经通过各种途径传到上海。许多工会干部有所耳闻。但因为不是正式渠道的传达或报纸刊登,他们不敢也不愿意相信这些传闻是真的。总工会的“吹风”证实了这些传说,让这些与文革共命运的工人造反派心慌和不知所措,都说要和修正主义斗争。

有人到总工会找叶昌明,问:“为啥还不赶快行动?”

叶昌明说:“怎么行动?几个常委都不同意马上干,要等他们回来再说。”

“等他们回来,要来不及了!”

叶昌明:“那也只好等啊!”

“也要想想法子。”

叶昌明:“现在没什么办法可想的,只有等他们回来,看是什么情况了。他们要干,会带我们干的。他们不同意干,你就毫无办法。所以只能坐等!”

上海总工会收到北京寄来的一封信,信封上写着:

上海市总工会

叶常明、唐行南同志 收

北京西单商店

唐行南,市总工会办公室负责人。

信是从白报纸上裁剪下来的小纸条,上面写着一行铅笔字:

叶:王、张、江、姚、金数十人被抓。 10 月 11 日

叶昌明看了信后说:“看来北京也是有反对派的,怕我们不知道这事,特地写信告诉我们。说明我们也不是孤立的。”

唐行南说:“这信看来也是匆忙中写的。”

叶昌明:“北京只有西单商场,没西单商店的,这个署名肯定是假的,写的字迹看来也是故意装的。”

因为信封钢笔字,信纸铅笔字,都写得一笔一划很呆板。

唐行南说:“北京知道我名字的,除了‘全总’的一些人外,就没什么人了。而信封把你的名字写错了,我的倒是对的。信纸上也只是提金祖敏,不提迟、谢,看来是‘全总’几个造反派写的。”

叶昌明马上派人将信送往“康办”,并打电话告诉“康办”值班室:收到信后即送张敬标。

再说谷牧派到上海“八人小组”的李景昭回北京后,10 月 9 日晚,留在上海的人继续外出访亲问友,曹大澄继续与王一平、李庸夫联系。和李庸夫的接头地点都是双方临时约定。为了保证曹大澄的安全,徐良图派王守家、陈斐章保护。他们 3 人坐一辆汽车,快到接头的路口,提前下车。曹大澄胆子大,走在最前面,中间是陈斐章,王守家随后,每人相隔十几米。就这样,曹大澄一趟一趟出去和李庸夫联系。

“八人小组”到上海,也极大地鼓舞了李庸夫和上海市委内反对“四人帮”的干部,他们将收集到的材料源源不断地提供给曹大澄。

怎样将情报送出去呢?曹大澄、王守家等在衡山饭店试验密写。他们用糨糊在纸上写出来,干了以后,什么都看不出来。到了北京那

边用碘酒一抹就出来了。听说上海四个市区轮流检查邮件,徐良图派王守家、陈斐章坐火车到苏州寄信。王守家、陈斐章刚到火车站,王德瑛赶来叫他俩回去,说不送了。大家回到衡山饭店才知道时间来不及,已另想办法,找老干部或军区打电话。

同时,他们也分头到各工厂了解生产情况。一方面是为了掩护秘密工作,同时也是为了接触干部、群众,直接观察社会动向,了解更多的政治情况。

10 月 10 日,谷牧又派出第二批人员去上海。这天上午,谷牧找轻工业部机械局局长谢红胜和轻工业部计划组副组长陈锦华谈话。谷牧一见面就开门见山地说:

“我是奉命找你们谈话的。中央已经对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实行隔离审查,现在中央最关心的是上海的情况,所以决定由各部委派一些人,以研究、准备明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名义到上海去。你们到上海后,要尽可能地接触各方面的同志,了解工厂的情况,了解社会上的动向,了解上海市委有什么动作,把所了解的情况尽快写信寄回北京,寄到北皇城根立新路 9 号,有专人处理这些信件,并随时向中央报告。”

谷牧要他们尽快动身到上海,可是,已经买不到第二天去上海的飞机票了,直到 10 月 12 日,谢红胜他们一行才动身去上海,于当晚 20 时 20 分到达上海虹桥机场,住进了国际饭店。

在从机场到市区的路上,他们看见沿路的墙上用很大的黑体字写着“永远按既定方针办”的标语,还有两三次看到背着枪的民兵在巡逻。当晚,他们中有人到衡山饭店去找徐良图。徐良图不见,让王守家下楼接待。王守家告诉来者,徐良图外出不在。徐良图这么谨慎,一是他没有接到谷牧的通知,二是大家一直处于被监视状态,不能贸然行事。

晚上 22 时许,已到上海的轻工业部计划组副组长陈锦华接到中国纺织机械厂党委书记张秀打来的电话,要他们北京来的一行人晚上睡觉警觉一点,并且说:“你们来的人,最好集中在一起,不要单独走开。”

第二天,轻工业部机械局局长谢红胜他们到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

工交组和纺织工业局、轻工业局了解情况,看到办公室人来人往,没有大的异常现象,也听到一些反映。于是,先后给北京寄了几次信。为了以防万一,第一封信没敢在上海寄,也是派人到苏州寄的。

13 日 8 时,王一平、李庸夫突然来到衡山饭店。因为他们听说:10 月 12 日晚,黄涛、陈阿大等人召开紧急会议,决定 10 月 13 日下午 17 时下班时间打响第一枪,原因是那时街上行人多,部队难以开枪还击。

徐良图觉得王一平、李庸夫亲自到衡山饭店来太危险了,因为他觉得服务员一直都在监视着他们,于是急忙将王一平、李庸夫迎进屋内。

王一平、李庸夫将他们听到王洪文的小兄弟决定今天下午 17 时发动武装叛乱的消息告诉了徐良图。

情况紧急,此时距离下午 17 时只有八、九个小时,如何将这份重要情报送到北京?飞机航班已过,坐火车也来不及。王一平提出,可以借用部队备战的红色电话机。于是,由王一平跟江湾路一号总后勤部驻沪办事处领导联系后,李庸夫陪曹大澄一起来到江湾路总后勤部驻沪办事处,曹大澄用这里的电话将消息告诉了谷牧秘书胡光宝。

谷牧 10 月 13 日的日记写道:“今天发走了上海问题第三、四、五号,三号是曹大澄用军用电话打来的,四号是密码来的,五号是(王)西萍亲自跑回来的。李伯宁(水利电力部副部长)也坐飞机回来了,谈的情况和西萍谈的一样,没有另写报告。”

# 第1426回：速返沪，说“大干”功亏一篑 实无奈，大势去唯有痛哭

1976年10月13日上午9时，中央派专机将周纯麟、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4人送回上海。

在飞机上，周纯麟对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说：一、回上海后，立即通知市属各大单位，说明“四人帮”被隔离了的事情是确切的；二、市委马上按中央指示办，逐层传达打招呼会议精神；三、各单位照常工作，不准任何人搞破坏；四、各级领导干部要听中央的话，一切听中央指挥。这四条，要由他们3人亲自给各有关单位打招呼。

上午10时多，飞机在上海虹桥机场降落，冯国柱、王少庸、张敬标在机场迎接，警备区没有派车接周纯麟，因为他们没有通知警备区。

马天水提出要到丁香花园开会。周纯麟感到，此时最要紧的事是要尽快掌握部队情况，坚持要先回家。

周纯麟一到家，就把警备区政委请来，询问部队情况。政委说，南京军区已传达了粉碎“四人帮”的情况，警备区部队已按南京军区的指示，作了调整和部署。周纯麟紧张的心情有所缓和。

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到丁香花园后，先向张敬标、冯国柱、王少庸3人传达了中央打招呼会议精神，徐景贤拿出毛泽东给华国锋的几张亲笔批示影印件给张敬标、冯国柱、王少庸看。

张敬标看罢，把影印件往沙发前茶几上一摔，用手拍打着说：“我以为你们带回来什么重磅炮弹呢！原来是这几张东西，上面又没头没尾的，谁拿到了都可以用嘛！”

徐景贤说：“这是毛主席的手迹。”

张敬标说：“谁知道是真是假，毛主席的手迹没头没尾，‘你办事，我放心’的‘你’是谁没有写明，叫人怎么相信？凭这么几张东西就可以宣布人家反党了?!”

说到头天晚上的情况，张敬标边哭边说：“我们老头子反正年纪大

了,死了没有什么……你们说服得了他们?革命革到现在,发生这么大的变化,弄成这样的下场,培养一批青年干部不容易,他们革命热情非常高。”

冯国柱也边哭边说:“自从你们走后,各路情况摸下来都是传四个人被抓起来了,警备区的几个人从南京军区开会回来也不敢来找市委了。总工会、写作组的人都要起来干,逼着市委表态,而你们在北京不断来电话要家里稳住,一切等你们回来再说。弄得几个在家的人两头受夹,度日如年啊!”

他们最后决定下午召开常委会,传达中央打招呼会议精神。

听到马天水和徐景贤、王秀珍3人已经回沪的消息,写作组的朱永嘉和王知常立即打电话给市总工会的黄金海说:“不能再迟疑了,要立即动手!”

黄金海回答说,叶昌明他们正在开会,要和他们商量后才能决定。

王知常限他们在下午2点半答复。

中午,张春桥的妻子文静让女儿打电话给朱永嘉和肖木,要他们去她家谈谈。到了文静那里,文静对他们说:“难道就这样完了吗?你们有没有什么办法?”

朱永嘉答:“常委说要等去北京开会的几个书记回来后再定,没有办法。”

文静不甘心地说:“他们不搞你们可以搞嘛。可以组织写作组的一些人到下面去,搞串联、发动。我不相信群众起不来。”

肖木也表示,要等北京开会的马天水等人回来后再说。

黄金海、陈阿大、叶昌明、施尚英等人午饭后来到工交组黄涛办公室。黄涛对他们说:“去开会的人都回来了,是廖祖康从机场得到消息后,打电话告诉我的。我没去接,是王少庸、冯国柱、张敬标去接的。”

叶昌明他们问黄涛:“你为什么没去接?”

黄涛说:“没通知我。”

大家说:“四个常委就你一个人不去,看来对你也是不相信的了。”

叶昌明:“看他们回来的这种情况,肯定是不会干的了。”

黄涛:“情况看来很不妙的!可能他们要先商量一下后,再叫我去。估计今天是要传达的。可能先正式常委开会,然后列席常委参

加。也可能他们商量好后,就一起开了。”

陈阿大:“他们是要做我们工作的,办学习班,思想通了才能出来。我准备去了不再出来。”

大家议论纷纷。

这时,接到“康办”通知,下午到“康办”参加常委会。

黄涛对大家说:“现在再要干是不行的了,还是先听他们的,还可以保存一下力量。”

叶昌明说:“准备去了不回来!”

黄金海:“我回厂去等你们消息。要是你们出不来,我带人去救你们。”

叶昌明:“我会打电话来说情况的,你们一定要等我电话,不要有行动。”

施尚英:“我在江南厂,有事可打电话来。”

下午14时30分,王知常又打电话催问黄金海:“你们到底干不干?决定干,我就带几个人一起来干!”

黄金海说:“施尚英不在,再商量一下。”

王知常很激动地说:“你们这些人这样动摇。动摇怎么行?算了算了,我们辛辛苦苦培养几年的力量,也不要拿出来了。好吧,等你们到4点,再不打来就算了!”

下午,总工会的叶昌明、陈阿大接到王秀珍的电话,通知他们去开会。恰在这时,正准备去开会的叶昌明在市总工会司机组接到了王知常的电话。

王知常问叶昌明:“‘康办’开会,你去吗?”

叶昌明反问:“朱永嘉去吗?”

电话那边停了一会儿,王知常说:“朱永嘉要问问你。”

叶昌明:“去的,去听听他们葫芦里卖的什么药也好的。”

王知常问:“你去开会,有什么准备吗?”

叶昌明:“没什么准备。”

王知常又问:“那你们打算干吗?”

叶昌明:“我马上要走了,你打个电话去找黄金海说吧。”

王知常:“你们大干,我就来。要是小弄弄,我是不来的。我这人

就是好走两个极端的,要么大干,要么就不干。”

叶昌明:“黄金海在那里,你找他谈吧。”

叶昌明当即给黄金海打电话说:“王知常打电话来,他现在还想要大干呢!我叫他给你打电话谈。他等会来电话,我马上去开会了。”

黄金海在电话中对叶昌明说:“要是情况不对,你马上打电话来。要是不能讲话,只要咳嗽两声,我就知道了。我带人来救你们。”

叶昌明:“我一定会设法来电话的,你们不要动。”

王知常打电话给黄金海,黄金海说:“人都不齐了,定不下来。”

王知常连声长叹:“好了好了,算了算了,束手待毙吧!”

当叶昌明他们到“康办”不久,办公室通知,会在别处开,叫开会的人集体乘车去。叶昌明和陈阿大在车上说:“不管到什么地方开,我们思想不会通的,反正不准备回来了。”

上海市委常委和列席常委会议到下午16时才在锦江饭店14楼召开。马天水在会上传达了中央打招呼会议的精神,徐景贤传达了主席对“四人帮”的一系列批评。

会场上气氛沉闷,没有人说话。

马天水说:“到北京参加会议,听了中央负责人的话后,我开始思想上是想不通的。所以上海打电话来,我不愿接,也不好说。会开好,我向华主席提出,我一个人来开会,回去工作难做,还有两个新干部书记没来,要求让徐景贤、王秀珍也来参加会,回去一起做工作。华主席同意了。所以我们没回来,又叫徐景贤、王秀珍去的。”

马天水他们拿出从北京带来的关于批判“四人帮”的材料。毛泽东手迹影印件“你办事,我放心”,成了众人争睹的重要文件。

黄涛问:“能相信这些材料吗?!”

马天水说:“想不通,允许想,也允许提出问题。但这材料是不能怀疑的。”

徐景贤说:“老实说,我们刚参加会时,也是想不通的,过去从没听说过这件事,为什么毛主席逝世不久,就要这样搞法!华主席在接见我们时,对我们说,‘四人帮’是两面派,你们只知道他们在文革中的情况,他们在中央搞的反党分裂活动,你们是不知道的,所以没有这个思想准备。一听到这件事,感到吃惊,有想法,也是不奇怪的。王张姚都

是上海的,你们的任务很重,回去要做好工作。我仔细想想,才慢慢想通了。过去我们只看到他们在文革中影响很大,所以相信他们。不知道他们背后搞了那么多阴谋活动。他们是背着我们搞的,与我们没关系的。老实说,就是'四人帮'掌权,他们也不会搞马列主义的,也是要搞修正主义的!"

黄涛说:"要是想通了,就意味着背叛!"

王秀珍说:"开始听了也想不通,多听几遍,多看看材料,就可以想通了。我们在北京就是这样的。"

徐景贤说:"我担心我们原来做的布置,向华主席说我们原来想不通,来开会前还做了点准备呢!华笑着说早知道了,你们还打了许多电话,这也没什么了不起的。马讲:这件事,会有许多人想不通的。我们要做工作,要允许有暂时想不通的人,允许他们想,允许他们提出问题来。但是不能反对。传达后,肯定会有人贴大字报、大标语的。只能贴拥护的,不能贴反对的。要是贴反对我们的,也不要去禁止。但对贴保我们的,包括反击那些反对我们的,要劝阻他们不要贴。现在这个时候,特别要注意不要去和群众闹对立。"

徐景贤还说:"不能贴华主席大字报、大标语,发现即覆盖掉,这是反革命。不怕大字报反对我们,就怕出现两派矛盾,所以一定不能反击。"

朱永嘉说:"这几天我又把几位领导过去的讲话、批示等看了一遍,看不出什么问题来。""我现在思想很乱,又是在这种情况下,还是不要出国了吧。"

徐景贤说:"朱永嘉是到日本去访问的'鲁迅代表团'团长,这两天就要去的。这件事,我们在京时,向华主席汇报过。华主席说,既然已定下来的,还是去吧。"

周纯麟、马天水、王秀珍也说:"华主席同意你去的,还是去吧。"

叶昌明开始听传达时,也是抱着不相信态度。但他听到毛泽东对"四人帮"问题的一系列指示后,感到很吃惊,特别是看到几分影印材料后,这才相信这是事实。他没有说话,但流了泪。这时,他意识到原来对情况的估计完全错了,他们这几天的活动也会成为严重的政治错误。他立即向马天水等人提出:

“其他人还在等我们的消息,今天是否就能向他们传达?”

冯国柱、张敬标标等人也提出,赶快传达。会议最后决定,今晚即在锦江小礼堂先向工、青、妇、民兵、写作组、组织组有关人员传达,明天上午在延安西路200召开组办、区县局、大专院校党委负责人会传达。

马天水出去接电话,回来后说:“是马振龙来电说要来参加会,我劝他不要来。他还问我们到底什么态度,干不干。他们急得不得了,我答应晚上就向他们传达。”

晚饭前,王秀珍和叶昌明、陈阿大、汪湘君、陈新发、陈佩珍等人在一起时,叶昌明问王秀珍:

“怎么说了张春桥和江青的一些问题,王洪文和姚文元没什么材料?”

王秀珍说:“主要是张春桥、江青的问题。张春桥是在后面摇鹅毛扇的,江青是在前面跳的,王洪文是被他们拉过去的。姚文元问题不多,他想跳出来,但跳不出来。”

王秀珍又讲了一些叶昌明他们过去不知道的江青的问题。

当晚20时,马天水在锦江饭店小礼堂向上海市总工会、市妇联、团市委、市公安局、市民兵指挥部头头传达中央打招呼会议主要精神,也在会上作了自我检查。会场上议论纷纷。马天水所传达的内容,无法说服众人。传达的毛泽东三句话:“你办事、我放心”,“慢慢来,别招急”,“按过去方针办”。黄金海对此表示不解:

“毛主席写的三张纸,三句话,其中一句是‘你办事、我放心’,但这同四人帮无关,传达下来,有什么意思,无非是叫大家不要讲话。”

尤其对将“按既定方针办”,说成是“四人帮”篡改毛主席指示,大家更是想不通:“这和‘按过去方针办’没有实质上的差别。”

马振龙说:“不能相信这些材料的,他们为什么要这样搞法?”

黄金海说:“这些材料根本不能说明什么问题的,即使他们有错误,完全可以在政治局开会帮助他们,为什么要把人抓起来?”“毛主席的指示很清楚的,批评他们是对他们的爱护、教育,为什么现在要这样搞?要是毛主席在世,是肯定不会这样做的!现在这种做法,党的历史上没有过的,这样搞法不能服人,无论如何想不通的。”

叶昌明也说:“他们有问题,但采取这种做法,我是想不通的。”“现在把他们说得那样坏,和我头脑中对他们的印像,根本对不起来的。要我恨是恨不起来的。”

戴立清说:“为什么要采取抓人的措施?有什么问题,完全可以开会批判么,这样做法,我想不通的。打招呼会上,中央也没拿出什么有说服力的材料来。”

稍有说服力的材料,是毛泽东关于:“四人帮问题上半年解决不了,下半年解决;今年解决不了,明年解决;明年解决不了,后年解决。”

会场上,更多的人选择了沉默,会场气氛沉闷。

据陈冀德后来回忆:朱永嘉催她表态。她说:“一是不相信,二是想不通。”站起身就走了。回到寝室关上门整整哭了一夜。

马天水说:“想不通也不奇怪的,允许大家想,也允许提出问题来,但材料还是要相信的,不能反对的。”

徐景贤、王秀珍也如是说。

会后,各自按所负责的系统,传达了中央的精神。华国锋新政权最担心的上海的反抗,终于没有实施。

当晚,谢鹏飞悄悄一个人来到马天水家里,对马天水说:

“这是政变,我们应该利用掌握的上海民兵武装,像巴黎公社那样,举行反抗,马老你带头,我们跟着你!”

马天水回答:“军队不在我们手里,民兵根本对抗不了军队。”两人抱头痛哭。

13 日深夜,上海有人在马路上刷出打倒王洪文、江青、张春桥和姚文元的大标语。

# 第1427回：大游行，举国上下齐欢腾 胡厚民，断定是“右派政变”

1976年10月9日，中央决定，从即日至14日，在北京市部分单位，包括文化部、人民日报社，及全国各地党政军领导干部中，分批传达中央15号文件：《中央关于粉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的通知》。

中央分批、分期召开的“打招呼”会议，于10月14日结束。每次会议由华国锋主持，华国锋、叶剑英做主要讲话。

华国锋讲话时，手上都拿着毛泽东的那三份手稿：

“慢慢来，不要招（着）急”、“照过去方针办”、“你办事，我放心”；

“江青干涉太多了。单独召集十二省讲话”；

还有一份是华国锋向毛泽东的请示报告关于江青要求印发“风庆轮”问题的材料，毛泽东在华国锋这份报告上的批示：“不应该印发。此事是不妥的。”

华国锋将这三份毛泽东手稿在会上向大家作了传达，然后，着重讲了毛泽东的第一份手稿。他说：“毛主席写的这件三句话手稿，是1976年4月30日晚上，我陪同毛主席在中南海主席住地会见新西兰总理马尔登后，我向主席汇报了我处理的几件事情和几个省的一些问题，听取主席指示时主席写的。当时主席说话已经很困难，有的话我听不明白，听不清楚。主席要秘书拿来纸和笔，写了这三句话给我。前两句是主席听我汇报工作后的指示，后一句是对我个人讲的。‘慢慢来，不要招（着）急’和‘照过去方针办’，我在此后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作了传达，‘四人帮’当时都在场。‘你办事，我放心’我没有传达。毛主席逝世后，‘四人帮’急于篡党夺权，他们密谋策划，把毛主席写的‘照过去方针办’的工作指示，篡改、伪造成‘按既定方针办’的毛主席临终嘱咐，在报纸上大造反革命舆论。由于当时全力忙于毛主席的治丧活动，对此没能及时处理。”

许世友在最后一次“打招呼”会上说:“在毛主席治丧期间,我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腰里都揣着手枪,如果‘四人帮’胆敢在会上闹事,抢班夺权,我就毙了这伙坏蛋。”

由于英国《每日电讯报》在1976年10月12日公开报道了“毛的遗孀被捕”的消息,在10月13日经世界各报转载,中共“最大机密”在国外人所皆知了。

这样,叶剑英原定“保密两个月”已经不可能了。于是,在10月14日,中共中央正式公开宣布粉碎“四人帮”的消息。同时,也公布了10月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做出的关于华国锋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共中央军委主席的决议。

全国沸腾了。首都北京处于沸腾的中心,全城洋溢着一片节日气氛。大游行席卷了北京。当时的北京人口为800万,半数以上的人参加了大游行。新华社这样描述北京的大游行:

天刚亮,游行队伍的锣鼓声、鞭炮声、口号声就响遍全城。一队队的工人、人民公社社员、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机关干部、革命知识分子、街道居民、红卫兵、红小兵,以及各界人民群众和爱国民主人士、台湾省籍同胞,源源不断地涌向天安门广场,全天共达250万人。他们抬着毛主席的巨幅画像、高举红旗和彩旗,不断振臂高呼:“热烈庆祝华国锋同志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打倒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整个天安门广场和东西长安街上,成了欢乐的海洋。

这里有一封北京大学当年跟着聂元梓一起造反的孙蓬一写给友人的信,可以看出当时人们的想法:

喜读来书,兴奋得不能自已,本要去洗澡,不洗了,先给你们写封回信。

四人帮之上西天的消息,我是十日知道的,已较迟了。他们的今日,早是意料中的事,我倒没有过速之感,相反,主席逝世后,他们还十分活跃,我都有些焦急了。消息传来之后,我的大脑皮层进入了超限兴奋状态,持续几昼夜,上下眼皮安定团结不起来,过了几个与近些年我的常伴——失眠性质迥然相反的不眠之夜;过去是委屈、悲愤、忧党、忧国,不眠的夜晚是难明的长夜,这次,是胜利、解放、宽慰,以前是

痛苦,此次是幸福的喜悦。一句话,太高兴了!这帮家伙不跨,再下去几年,神州会变成什么样子?!看到现在这副痛的局面,对未来则更加不寒而栗了。当然,对未来的最终结局,我从来是信心百倍的,不管道路将如何曲折,真理终将战胜错误,正义终将战胜邪恶,共产主义终将实现。

我们过去的行动,是对得起祖国的历史的,这是我们所追求的最大的安慰。至于个人的功罪,根本勿须任何人评说,我们是凭共产主义者、革命者的良心行事的,不求别的,只求活着时能问心无愧,死时能有颜面去见马克思,那就不枉此生了。生命是短促的,只有真正做一个忠于自己的信念——共产主义的人,生活才会真正从动物界里提升出来。我没有被四人帮压垮、消灭,活下来了,而且目睹了他们的可耻的今日,就是靠这种理想的力量支撑下来的。

对江青,我们是有个认识过程的,开始出于对毛主席的无限虔诚,当然也就对她十分尊敬,特别是当我们反王关戚时,王关戚的拥护者也有反她的,就更增加了她与他们不是同根生的假象。六七年师大的九·七事件以后,我第一次对她有了怀疑,因她在接见"五大领袖"时公然责难韩爱晶给总理写报告,责问韩:你还要不要革命了!

总理逝世时,我在战友相聚时是放声痛哭了一场。现在每当想到总理,我都禁不住要心酸眼湿的。总理是我们民族的骄傲,我们应永远以总理为光辉的典范,来安排自己短促的一生。

昨天,谢静宜第一次拉来北大批斗,迟群在清华批斗,然后两校再交换,最后还要合起来大会批斗。昨天我去学校转了一转,斗争会的主会场在俄文楼。全校听拉线转播,昨天主要批她反华主席。主会场由卫戍区的武装战士严密戒备,可能怕群众冲进去要了她的狗命。校园内外刷满迟、谢的大标语,物理系贴在海淀校门外的大标语是:彻底砸烂迟、谢的狗头!也倒怪有意思,砸烂狗头还要冠一"彻底"二字。大饭厅前,俄语系贴的大标语是:砍掉迟、谢的狗头,为敬爱的周总理报仇!二体打字标语是:敬爱的周总理永远活在我们心中。校内还早已贴出要求建立总理纪念堂的大字报。地质、哲学、生物先后贴出还我新北大的大标语。由于领导不得力,校内运动十分不理想,但群众的觉悟越来越高,所以可以说形势是越来越好的。

卫生部斗了刘湘屏,这个骚货,与江青一样,是个地地道道的臭婊子。群众给她总结了她与江婊子有十个一样,其中包括乱搞面首。她至今还领谢富治的工资。斗她时,说她反总理,她开始嚣张地抵赖。后来"刘办"的人起来当面揭露她说:抄林巧稚的家就是你让我去的!她傻了眼。事情是这样的:总理逝世后,林十分怀念邓大姐,几次电话联系未通,最后邓大姐接了电话,劝她不要去看她,林坚持要去,邓大姐答应了,但让她来看看就是,回去不要说什么,林去了回来后,家则被抄了。

六七年三月,戚本禹、陈伯达到北大俄文楼来召开"教改座谈会"时,会上戚公然将周总理排除在无产阶级司令部之外。我记得是因我们在计委保总理后,他才特意来放这顿屁的。计委的那次斗争的细节我已模糊了,只记得与对待余秋里同志有关。你们回忆一下,告我。还有六·五以后,宗式曾告我机院东方红有一个小子公开到校对你们讲,所以反我们,因我们被"老三"收买了,而文革只有打倒"老三"才能结束。这个材料早已上报过。

吴德在解释十六号文件时,在说到天安门事件不能翻案时说:如果说他们当时是反四人帮的,那在当时也是分裂中央,正如9·13以前反林彪一样。当场则引起大哗。事后几乎众口一词地遭到非议,以后吴收回了他的讲话。

想说的太多了,以后再谈。

祝

勇敢地战斗!

老孙　1976·11·18

10月14日,上海市委在延安中路200号召开区、县、团、局和大专院校的负责人以上干部大会,传达中央打招呼会议精神。

徐家汇、康平路市委机关办公的地方,群众已经开始冲进去贴大字报。马路上开始出现彻底砸烂"四人帮",打倒王洪文、姚文元、张春桥、江青的大字标语。

下午,"四人帮"被逮捕的消息陆续传达到上海群众。群众立即沸腾起来了。机关、学校、工厂贴出各种声讨大字报并迅速蔓延到街头。

一支支自发的游行队伍出现在大街上。群众游行队伍一层一层地包围徐家汇、康平路市委机关办公大院(楼)。

上海交通大学师生员工走在最前面,首先到康平路刷大标语:“砸烂反革命黑窝!”“揪出反革命的帮凶!”“清除四害,斩草除根!”他们还迫使徐景贤走出机关大院,接受师生们递交的抗议书,并要他转告马天水、王秀珍,要好好检举、坦白、交代!

10月15日凌晨,上海复旦大学、交通大学的师生,高举“欢呼打倒‘四人帮’!”的横幅,走上街头,举行自发的庆祝游行。就连许多集中待命的上海民兵,也加入了欢庆的队伍。

10月15日凌晨,上海市委给中央打了一个紧急电话,说:“我们估计,这类大字报一多,特别是联系上海市委的标语增多的话,有些思想尚未转过来的人,会贴出反击大标语。有的会出来支持市委,甚至可能贴出为‘四人帮’辩护、矛头指向党中央的大标语。如有打砸抢者,我们将采取坚决措施予以镇压。”

上海市民兵指挥部也在报纸上发表公开声明,上海民兵的“枪杆子永远听从党中央指挥”。

有人将江南造船厂的电台拿出来示众。

这天,《解放日报》和《文汇报》在头版报道了上海工人阶级掀起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的新高潮,决心坚持“三要三不要”的基本原则,同一切背叛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篡改毛主席的指示,搞修正主义、搞分裂、搞阴谋诡计的人斗争到底。这是上海报纸首次公开不点名地揭批“四人帮”。

当天下午,马天水在文化广场召开了万人大会,传达中央精神。徐景贤仍然称姚文元为同志。他的话激起群众的愤怒,大家将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轰下台,会议由周纯麟主持。周纯麟传达完中央精神,要求广大干部、群众坚决听中央的话,按中央的指示办事。从此,上海游行、集会,规模越来越大。

从15日开始,上海群众自发地连日举行游行集会,络绎不绝。数以万计的群众拥进康平路上海市委大院,质问上海市委为什么不传达中央关于上海是“四人帮”基地的指示。

徐良图小组及时将上海最新动态报告北京,谷牧马上编成《上海

来信》送交中央。18 日,《人民日报》报道:上海二百万产业工人坚决拥护中央两项重要决定,决心最紧密地团结在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周围,同修正主义、搞分裂、搞阴谋诡计的人斗争到底。

15 日,上海“长自轮”领导听到打招呼会议的消息,16 日传达给船员,当天下午起锚,开船去大连,17 日晚在船上传达给 48 个旅客,旅客无不兴奋。当晚,100 多名船员、旅客召开声讨大会,悬挂打倒“四人帮”的大幅标语。当时,辽宁省还没有传达中央打招呼会议的精神,大连的群众并不知道抓捕“四人帮”的消息。18 日子夜 2 时许,“长自轮”到达大连港,因挂有粉碎“四人帮”的标语,港监不让进港。“长自轮”将此情况报告上海远洋局。很快,大连港监上了船,气势汹汹地说:“没有信号不能进港。”船上用无线电话再三联系。旅大市委命令:“叫你们政委下来。”船上召开支委会,认为问题大,没有让政委上岸交涉。旅大市委第二次又命令:“一、不准进港。二、撕下大字报,自己与上海联系。三、给旅客做工作。四、接受地方党委领导,否则犯错误。”船上领导研究后,决定给中央、交通部写报告,再增加三幅拥护中央决定的标语。

“长自轮”的报告很快到了华国锋那里。华国锋说:“应该支持上海的工人。”

8 时 20 分,大连港接交通部的通知,准许“长自轮”进港。

因双方僵持了 6 个多小时,“长自轮”船员大怒,一上岸,拿着糨糊桶到处贴大标语,刷到 13 辆汽车上。“打倒‘四人帮’”“打倒毛远新”的标语一直刷到旅大市委。4 个便衣警察一直跟着船员,但是不敢行动。

华国锋高兴地说:“上海人民知道粉碎‘四人帮’的时间早,广大群众对‘四人帮’的愤恨像火山一样爆发出来,这实在好啊!这个消息实在好啊!我听了实在高兴,这些工人实在好。向上海工人阶级学习。”

10 月 7 日下午,中央派专机接湖北省委书记赵辛初、赵修、武汉军区司令员杨得志 8 号到北京开会。当晚,正在召开的湖北省革委会会议仓促结束。

赵辛初、赵修、杨得志 3 人回到武汉。10 月 12 日,湖北省委向省直机关传达“四人帮”被抓的消息。

胡厚民私下说:“我作好了坐牢杀头的思想准备。断定这是一次右派政变。”他嘱咐下面的造反派:“同志们准备迎接最艰苦的风浪,已经是考验同志们的时候了。”“你们以后不要乱跑了,特别是不要到上面头头这里来,把毛主席给江青的那封信好好回忆一下,自己领会就行了。”

一天,一些“二司”中学红卫兵的头头到谢保安家里聚会,武汉军区副司令员李迎希的儿子李江也来了,他说王张江姚被抓起来了。大家就七嘴八舌说是右派政变,还猜测上海那边会不会有动作,甚至说到要上山。

此时,已经过文革中多次折腾的谢保安多了一份谨慎,联想到自己可能会因此又有一段非常难受的日子,就让大家赶紧散了,不要再议论这个事情。

谢保安将“四人帮”被抓的消息告诉《长江日报》的邓国栋,他不相信。再接着就听说朱鸿霞他们下落不明了。谢保安想到自己的母亲刚刚去世,父亲去了株洲姐姐家里。他当时的工作单位在铁路上,分配在铁山,他觉得自己还是应该回铁山去。

因为赵修曾经带着谢保安到处宣传,说要给谢保安补台当武铁分局革委会副主任,所以他回到单位后,受到隆重的礼遇。此时下面还不知道“四人帮”被抓的消息。

但是当时气氛毕竟已经不是很正常,谢保安觉得还是应该先去探访一下父亲。他没有向单位请假就去了株洲,在那里和父亲一起呆了两天。果然,这是他和父亲的最后一次见面。

谢保安从株洲回到铁山,武汉铁路分局原“百万雄师”的头头陈文彩带了铁路的人来抓他。当时流传一个造反派的联络图,在这个图上谢保安的级别很高。很久之后,武铁分局的党委经湖北省委批准,才做出对谢保安进行隔离审查的决定,这个时候,他已经被关在地下室很长时间了,那一年的冬天特别冷。因为没有什么过硬的材料,到了1977 年春节的时候,放 3 天假让谢保安回家。以后就是在铁路上到处批斗,东起黄石,西迄十堰,北至广水,南到蒲蕲。

# 第1428回：打游击，云南也准备起事 心不甘，湘渝造反派无奈

1976年10月12日中午，云南黄兆其得知“四人帮”被逮捕的消息后，于13日、16日，两次召集刘殷农、涂晓雷、张奎林、徐宝兴开会商议。黄兆其认为这是“右派政变”、“修正主义复辟”。会上决定“学蔡锷起义”，搞“武装斗争”，“上山打游击”。并确定，由黄兆其、涂晓雷负责与部队叶秀锦等联系；策动军内的人出来“充当蔡锷式的人物”；选择楚雄等地为基地；由刘殷农、张奎林、徐宝兴分头给省、市级机关和各地区的同志“打招呼”，作好思想上、组织上和物质上的准备。

他们还研究了控制省建、煤机厂、海口三五六厂等单位的民兵和武器弹药；策划绑架军区和省委领导干部，占领广播电台，发布“告全国人民书”等。

云南文山州革委会副主任何立宽也是在12月12日中午得知“四人帮”被逮捕的消息，他认为是“右派政变”，希望发表毛主席致江青的信，希望国内爆发“革命”。10月13日，何立宽派任怀灿、马昭去昆明找黄兆其、刘殷农探听动向和行动计划。并向任怀灿、童永昌等人提出了上山打游击的问题。

10月14日，涂晓雷将武装起义的计划告诉了昆明军区的许梅康等人，同时参与分析了有关部队的情况，统一了搞武装起义的方案，确定要搞“云贵联合”。安排黄兆其与某副司令面谈的时间、地点。

10月14日至16日，刘殷农分别向昆明机床厂、煤机厂，省国防工办、省机械局、昆明铁路局等单位的人部署了任务，要他们“控制民兵”，“注意各地动向”，“学习蔡锷”，准备“上山打游击”。向楚雄的柯平、安且康、杨跃才、杜勇，文山的任怀灿、马昭等人，传达了准备武装叛乱的计划，要他们“作好思想上、组织上、物质上的准备”，“点起这把火”，到时间就到那里打游击，并要任、马二人“马不停蹄”地赶回去做准备。

10 月 16 日,涂晓雷将与军队许梅康等人联络的情况向黄兆其、刘殷农作了汇报,同时又进一步策划了武装起义的行动计划。

这天,刘殷农派吴福全乘飞机去上海探听武装起义的动向,黄兆其给省交通局张贤忠、煤管局金奕旦、海口三五六厂刘志宏等人打了“招呼”,要他们“准备迎接严峻的考验”,准备武装斗争。

10 月 17 日凌晨 4 点,任怀灿、马昭从昆明返回文山,立即向何立宽转告了刘殷农“粉碎四人帮是真的,走资派可能趁机翻案报复,我们要坚持斗争,要是真的干起来,要依靠民兵和产业工人,实在不行,就上山打游击;要与部队取得联系,争取部队支持;现在要作好思想和物资准备”的意见后,何立宽即与任怀灿、马昭、李玉芬、李传田、丁行红、蒋绍明、杨和昌等人,先后在李传田及其家中,策划了武装起义,上山打游击,地点选择在文山老君山;医药由李玉芬准备;车辆、汽油由蒋绍明、杨和昌准备,收发报机和报务员由余相德准备和物色,地图除原准备的 11 张军用地图用于上山打游击外,又从李传田处拿到文山州地图和云南公路图各两份,并搞到手枪。10 月 13 日和 19 日,又分别从丁行红处搞得五四式手枪 1 支、子弹 23 发、军用手榴弹 4 枚。17 日、19 日,何立宽又要任怀灿、马昭到文山驻军要武器弹药。

10 月 14 日,云南楚雄州委副书记刘光兴得知“四人帮”被粉碎的消息后,于 10 月 15 日下午,在州医院李国樑家召集邱立峰、赵文鼎、安且康、李国樑等人开会,认为逮捕“四人帮”是“右派政变”。刘光兴决定派柯平、安且康连夜上昆明找黄兆其、刘殷农联系。

10 月 16 日上午 9 时,柯平等人在刘殷农家找到黄兆其、刘殷农。

黄兆其对柯平说:“形势可能有大反复,要准备经受一场严峻的考验”。

黄兆其走后,刘殷农具体向柯平,安且康布置,要楚雄地区“做好武装斗争的准备”,“如昆明出现不利情况,你们楚雄将成为我们的基地”。刘殷农还表示“对楚雄寄予希望”并要求“要有转入上山打游击的思想准备,不要放弃民兵的领导权”。

16 日下午,柯平等人赶回楚雄,当晚刘光兴在柯平家与吴向忠、柯平、李国樑,安且康、邱立峰等人密谋策划武装叛乱。柯平传达了黄兆其、刘殷农的旨意后,刘光兴说:“我们的情况是好的,搞武装斗争是有

条件的,文的武的我们都要准备”。“要做好思想准备,重上紫金山,上山打游击。”当议论到武器问题时,刘光兴说:“只要分区有人参加,枪支不成问题”。

10 月 18 日晚,刘光兴继续在李国樑办公室内与吴向忠、柯平、李国樑策划武装行动计划。刘光兴说:“各县搞各县的力量太分散,为了便于集中指挥,要分东西两片”。会上确定上山时全州分东西两片。西片以楚雄为中心,楚雄、南华、牟定、禄丰四个县,大约有 3000 人左右,地点在哨区,由刘光兴和各县的头头负责;东片以武定、元谋为中心,大约有 2000 人左右,地点在武定元谋之间。由付永昭、王朝明负责。并决定分别向各县“打招呼”。

1976 年 10 月中旬至 12 月,黄兆其又与刘殷农等共同策划“改变策略”,组织第二套指挥班子。还由涂晓雷等写了揭批“四人帮”罪行《提纲》、《春城魔影》、《周兴是怎样死的?》等文章和传单。

10 月 14 日,听到“四人帮”被抓消息的湖南唐忠富与胡勇、张厚、雷志忠、胡求生等人在长沙汽车电器厂开会,分析形势,研究对策。唐忠富说:“十·六事件”是“右派政变”。会上提出“要分别找一些头头通气,要捆紧把子。”还议论了“上山打游击”。

会后,唐忠富找叶卫东秘密串连,告知了会议的内容。

但是,毕竟大江东去浪淘沙,得民心者得天下。此时“四人帮”已失去了中国大多数民众的支持,这计划终究都成东流之水,没有激起稍许浪花。

10 月 8 日,有人找到重庆市革委会副主任黄廉,对他说:“听到国外广播,中央发生了右派政变。”很快,重庆大学也传说出了大事,到 10 日的时候,重庆谣言满街都是了。

10 月 18 日,重庆市委在礼堂传达中央 17 号文件,周家喻、黄廉都坐在主席台上。当念到华国锋任职时,满场掌声,周家喻拍得懒洋洋的,黄廉更是抱着手,不鼓掌。结果下面就喊起来:“把黄廉拉下来!”

重庆市委书记鲁大东走到黄廉的背后说:“等下出场你坐我的车。”

黄廉没有理他。一散会,他走到主席台后面,许多人蜂拥而来,在他周围挥拳舞掌。黄廉表面上装得无所谓,内心却已深深地体验到了

一个政权将要覆灭的强烈感受:原来政权中间的聪明人,要抓住一切机会,踩着不识时务者的鲜血爬得高一点,每个人都在一霎那间都理清了思路:“自己要为将来准备一点什么。”

回到市委一号楼,鲁大东走过来问黄廉,粉碎“四人帮”他“事先晓不晓得?”

黄廉问他:“你晓不晓得?”

鲁大东说:“不晓得。”

黄廉此时还不忘讥讽鲁大东,说:“你跟邓小平那个好,他事先没有告诉你呀。”

晚上部队鸣枪,敲锣打鼓,第一批出来游行的是文化界的学校。

黄廉穿上军大衣,戴上棉帽子,把整个的游行队伍看完。他回到宾馆跟总台的寇玉林说:“前几天还在毛主席遗像前哭得天昏地暗的人、举手发誓的人,都到那里去了。”

寇玉林说:“你讲话要小心,周围搜集情况的人多得很,鲁大东已经布置了公安局。”

黄廉从宾馆回到木材站,很多人问他怎么回事,他说不清楚。长安厂来了几个工人找他,问他:“忍了吗?”“上山吗?”“有什么办法?”

也有人说要到体育馆去集合,准备上山打游击,黄廉要他们不要冲动,但内心一片茫然……

黄廉打电话给13军,回答说是一级战备,放假都没有了;打电话去民兵指挥部找李木森,电话里回答说:“他们来干什么,他来了还不一定走得脱。”

黄廉心想:“可以想见搞修正主义政变好容易了。”

有个13军的干部建议黄廉去尼泊尔,说可以告诉边防军放他过去。黄廉说:“我去尼泊尔干什么。”

10月20日黄廉去市委,当兵的拦住他不让进,说里头的领导在开会。黄廉说:“我就是领导。”

警卫说:“大东同志让你在外面等一下。”

此时,市委宣传部门口已经贴满了大字报,主要都是勒令黄廉、周家喻要老实交代与“四人帮”的关系。黄廉看了说:“是不是要回到文革初期那样,由我们当走资派?”

有个干部说:“恐怕还要恼火哟。”

10 月 16 日,李先念打电话征询陈云对粉碎“四人帮”后各项工作的意见。陈云谈了他所考虑的一些问题。李先念希望陈云把这些意见写成书面材料交给他。18 日,陈云将意见写成文字,在同王震、姚依林商量后送给李先念。送出前,陈云给李先念写了一张便条:

“十月十六日你在电话中要我把我向你提的意见写给你,现已写出,并与王震、姚依林同志一起议过,他们也同意。特遵命送上,供你参考。妥否,请酌。”

在这份意见中,陈云说:“政治局对‘四人帮’采取断然措施,处理稳妥,进展顺利,我认为很好很好。”

“一、要把反‘四人帮’的文件写好。着重说明为什么必须在十月六日采取行动。因为:八亿人民中多数还不知道他们阴谋的内幕,七亿农民是在农村和穷乡僻野。因为‘四人帮’中有一位是主席的夫人。着重说明为什么必须在主席逝世四个星期就采取措施。

二、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

三、支持各省市委工作。使党的这个重要环节能坚强地工作。包括上海在内,让他们自己与‘四人帮’划清界限,好好工作。

四、在外地的政治局委员要经常到北京参加政治局会议和工作,要成为制度。

五、准备在时机成熟时召开三中全会。

六、恢复党的好作风。因为毛主席倡导的许多党的好作风被‘四人帮’破坏干扰了。”

“防止这次运动扩大化。对还在闹派性的人,号召他们化悲痛为力量,上班工作,团结起来,共同革命;对他们的办法,只能是教育,一切也都为了教育;要防止又翻烧饼。各级领导机关,必须是老中青,只是不要聂元梓、蒯大富式人物。中央和省市领导同志不要提‘四人帮’中个人私生活的丑事,而要批判他们的反动路线和政治上的大事,这样做对党有利。要再查一查今年四月天安门事件的真相;当时绝大多数人是为悼念总理,尤其担心接班人是谁?混在人群中的坏人是极少数;‘四人帮’对这件事有没有诡计?”

10 月 18 日,中共中央向全党发出《中共中央关于王洪文、张春桥、

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事件的通知》,即中央16号文件,宣布对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隔离审查的决定,列举了他们反党篡权的罪行和毛泽东1974年以来对他们的批评。

《通知》在列举了“四人帮”的罪证后,首先指出:“我们党同王、张、江、姚反党集团的斗争,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马克思主义同修正主义之间的你死我活的斗争。”然后指出:在揭发和批判王、张、江、姚反党集团的斗争中,要注意政策。要坚定地相信群众的大多数。要切实执行毛主席的方针,“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要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人。对犯错误的人,要区别对待。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是受了“四人帮”的影响,说了错话,做了错事;又有极少数人是跟着“四人帮”干坏事,陷得很深的。要允许犯错误的同志改正错误,改了就好。不要揪住不放,不要纠缠历史的旧账,不要一棍子打死。中央热烈希望,跟随王、张、江、姚反党集团犯了错误,包括犯了严重错误的同志,尽快觉悟过来,同王、张、江、姚反党集团划清界限,揭发他们的罪行,转变自己的立场,回到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

《通知》要求将文件发至县团级,传达到全体党员群众。文件还说,有关这个反党集团的材料,“中央将继续印发”。

# 第1429回：告急电，中央工作组抵沪 双庆会，英明领袖华国锋

10月18日上午，人民日报社召开全体职工大会，正式宣布中央派迟浩田3人接管《人民日报》的决定。迟浩田登上讲台，会场鸦雀无声。当他宣读完中央决定，并发表讲话，表示要和报社同志团结一致，办好《人民日报》时，会场上猛地响起雷鸣般经久不息掌声。

10月18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刊登了新华社上海17日电讯：《上海二百万产业工人坚决拥护党中央两项重要决定 决心最紧密地团结在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周围，同搞修正主义、搞分裂、搞阴谋诡计的人斗争到底》。电讯中提到的“搞修正主义、搞分裂、搞阴谋诡计的人”，是当时对“四人帮”的特定的代名词。

10月19日，在玉泉山4号楼苏振华的住处，苏振华、倪志福、彭冲根据中央的部署，研究了接管上海的主要问题，便分头作必要的准备。

当天下午，上海交通大学的团委、学生会在上海文化广场发起召开了全市16所高等院校的“声讨‘四人帮’大会”。同时，不少听到消息后赶来的工人、机关干部共计3万多人也参加了大会。上海交通大学、复旦大学、上海音乐学院等单位的代表发言，这是上海最早召开的一次声讨“四人帮”的群众大会。大会通过了向中央的两点请求：(1)立即改组上海市委，组成新市委，领导上海人民进行揭批“四人帮”的斗争。(2)立即派中央调查组到上海，调查“四人帮”在上海的一切罪恶勾当。

这天深夜，上海市委向中央打了第二次告急电话，内容是：“原来打算在文化广场召开上海市委愤怒声讨‘四人帮’反革命罪行大会，但考虑到一百几十个单位定于明天(20日)在人民广场召开30万人的大会，带头的是交大。他们的负责人通知我们说，市委的大会是阴谋，他们要冲大会……市委机构整个已经瘫痪，急请中央予以指示。”

10月20日，苏振华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北京厅正式主持召开中央

工作组会议。苏振华说:“党中央决定立即派一个强大的工作组去上海接管党政大权,事情十分紧迫,请各位稍做准备,立即赶去上海。”

苏振华让人与上海海军方面联系,通知上海虹桥机场,说是海军方面有关领导将来沪检查驻沪海军的工作,并由海军方面自己派专车前来接待。

会后,苏振华一行 14 人立即乘海军的专机直飞上海,于当晚 18 时在上海虹桥机场降落,却没有见到前来接他们的海军部队。

秋日的上海滩,下午 18 时已近黄昏,机场上的灯光也开始亮了起来。苏振华等人从机窗向外看去,只见平时繁忙的上海航空港,此时却有些冷清,仿佛被一种异样的气氛包围着。再看看四周,那气氛让人觉得整个机场正处于严密的戒备状态。大家都不知道飞机外面的情况,不知道将会发生什么。

就在这个时候,有两名军人走进了机场保卫严密的贵宾候机室。这正是中央工作组想要回避的人,他们一个是上海警备区的领导,一个是上海市委警卫处的负责人。

苏振华他们在飞机上等了十几分钟,一直没有见到前来接他们的海军武装部队,不免有些着急,不知道从北京起飞之后在上海的地面上到底发生了什么情况。不知他们将面临什么样的严峻局面。就在他们焦急等待的时候,只见一支车队飞快地朝机场开来。苏振华一看,高兴地说:“好,我们的海军来了!”

这是海军派来迎接苏振华一行的车队,车上坐着全副武装的海军战士。到达机场之后,汽车一字排开,战士们跳下汽车,迅速将这架专机围了起来。带队的是海军上海基地司令员杜彪和政委康庄。二人向苏振华敬礼,并汇报说:“苏政委,我们接你们来了,迟到了一步,对不起。”

苏振华将手一挥,只说了一个字:“走!”

可是,当他们走出机场时,却被人拦住了。就是刚才先到贵宾候机室的那两个人。他们来到苏振华面前,向苏振华敬礼说:“请问各位首长,你们到上海是有事呢,还是路过?”

苏振华一听,不由皱起了眉头,问道:“我没有通知你们,你们怎么会到这里来?”

苏振华说完之后不敢久留,一行14人急忙登上海军基地的汽车,飞快地开走了。

中央工作组去上海,事先没有通知上海市委。直到深夜,中央才正式通知上海市委。

苏振华一行到了海军上海基地招待所住下后,就把马天水找去,问他从北京回来后做了什么?现在的认识怎样?

马天水结结巴巴地回答,从北京回来后,已把中央精神向市委常委和区县局干部作了传达,并印成文件发到基层。群众都起来了,冲击市委,我们已难于工作,现在中央工作组来了,我们就好办了,我们保证服从你们的领导。

苏振华对他说:"我们是工作组,主要是了解情况,市委的正常工作还是由你们负责,该怎么办就怎么办。过去,你们在'四人帮'的泥坑里陷得很深,现在要打起精神,将功补过,上海出了问题,还是由你们负责!"

徐良图小组将上海的情况源源不断地送到北京,谷牧据此源源不断地编成《上海来信》。谷牧日记:10月16日,发《上海来信》第十、十一号。10月19日,发《上海来信》第十六至十八号。10月20日,发出《上海来信》第十九、二十号。

20日晚,苏振华、倪志福、彭冲率中央工作组到达上海,谷牧停止编写《上海来信》。后来,叶剑英等中央领导还问谷牧,《上海来信》怎么没有了?谷牧说,中央工作组到了上海,上海来信就结束了。

10月21日上午,苏振华、倪志福、彭冲找从南京赶到上海的南京军区政委廖汉生、副参谋长张挺。苏振华提出,鉴于上海"四人帮"的余党贼心不死,蠢蠢欲动,请南京军区继续加强戒备,特别是江苏、浙江一线的部队要保持高度警惕,海上的情况由海军负责。上海警备区那两个与武装叛乱活动有牵连的人,立即调回南京。请南京军区另外抽调人员到上海。有人提议驻扎在无锡的野战军向上海方向拉练,造成一种威慑。叶剑英表示,不需要这样做,要相信上海工农群众,军队一调动,马上就会引起恐慌了。

在苏振华和南京军区领导谈话的同时,林乎加、严佑民找先期到上海的工作组成员开会。工作组把到上海这10天的情况向林乎加他

们作了汇报。

10 月 20 日,中共中央成立专案组,审查王、张、江、姚的反党罪行。专案组由华国锋负责,成员即政治局委员。专案组下设办公室,汪东兴兼主任,成员有于桑、严佐民、武健华、周启才、任子超、王志民。

10 月 21 日,中共中央通过广播和报纸,宣布一举粉碎“四人帮”,北京市 150 万军民举行声势浩大的庆祝游行。

10 月 21 日,《人民日报》发表任平的长篇文章《一个地地道道的老投降派》,揭露“狄克”反对鲁迅。“狄克”是张春桥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用过的笔名。这是报纸上批判“四人帮”的第一篇文章。文章只点“狄克”,没有提张春桥的名字。

1976 年 10 月 21 日,85 岁高龄的郭沫若作《水调歌头‘粉碎“四人帮”》庆贺:

大快人心事,
揪出“四人帮”。
政治流氓、文痞,
狗头军师张,
还有精生白骨,
自比则天武后,
铁帚扫而光。
篡党夺权者,
一枕梦黄粱。

野心大,
阴谋毒,
诡计狂。
真是罪该万死,
迫害红太阳!
接班人是俊杰,
遗志继承果断,
功绩何辉煌!
拥护华主席,

拥护党中央。

10月21日晚上,在海军上海基地招待所的会议室里,苏振华、倪志福、彭冲把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找来谈话。这次谈话的主要内容是通知他们:10月24日北京要开百万人大会,全国各地都要召开这样的大会。根据党中央的统一部署,苏振华和倪志福届时回北京参加全国的大会,彭冲回南京参加江苏省的大会。上海是"四人帮"篡党夺权的基地,开好这个大会尤为重要,对全国影响很大,你们一定要同全国人民站在一起,开好这个大会,这对你们也是最好的考验。谈完话后,苏振华、倪志福就回北京,彭冲回南京了。

21日晚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打破了多天的沉默,播发了新华社报道的北京游行盛况:"广大游行群众热烈欢呼粉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的伟大胜利,愤怒声讨'四人帮'阴谋篡党夺权的滔天罪行。"

22日,《人民日报》以套红标题《首都一百五十万军民举行声势浩大的庆祝游行热烈庆祝粉碎"四人帮"反党集团篡党夺权的伟大胜利》,刊登新华社21日夜报道的北京群众的庆祝活动。"四人帮"一词第一次公开见报。

22日,首都军民冒雨继续举行盛大庆祝游行,欢呼声、口号声、锣鼓声、鞭炮声交织一片,从早到晚响彻北京。

23日,北京的庆祝游行达到高潮。从天刚亮一直持续到夜晚。3天来参加游行的群众达580万人次。

从21日起,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的人民群众及解放军各部队纷纷举行盛大的集会和游行,纵情欢呼党中央为国除了大害,热烈庆祝这一伟大胜利。

在那些日子里,人们称颂华国锋"为党锄奸,为国除害,为民平愤"。

在那些日子里,人们称"人心大快",亦即"党心大快,军心大快,民心大快"。

在那些日子里,两报一刊社论用这样的话来形容中国:"万里河山红旗展,八亿神州尽开颜。"

当时,社会上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对林彪,一下子就恨起来了;

对刘少奇,是恨了很久才恨起来;对邓小平,是怎么也恨不起来;对“四人帮”,则早就恨在心里了。

新华社1976年10月23日的一则电讯在报道遵义的大游行时,把华国锋跟41年前的毛泽东相提并论,把粉碎“四人帮”跟遵义会议相提并论:

今天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继承毛主席的遗志,采取英明、果断的措施,粉碎了“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在社会主义革命深入发展的关键时刻,挽救了党,挽救了革命,这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

10月24日,北京的大游行进入最高潮。下午15时,北京百万军民在天安门广场隆重集会,庆祝华国锋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庆祝粉碎“四人帮”。这次大会被称作“首都庆祝大会”,也叫“双庆”大会。华国锋、叶剑英与其他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全都出席了这次大会。

这是华国锋作为中国的领袖,第一次在万众欢呼声中登上天安门城楼。虽说在一个多月前,他曾在一片凝重的气氛中,在天安门广场主持了毛泽东追悼会,但是那时他的身边站着王张江姚“四人帮”,他的领袖地位尚未确立。今日的天安门广场,却是以彩旗代替了上月的黑纱,以笑语代替了上月的啜泣。

这次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百万群众盛大集会,成了华国锋登上中国领袖地位的隆重庆典。

《大海航行靠舵手》这支歌,往日仿佛是毛泽东“专用”的。毛泽东总是在《大海航行靠舵手》的乐曲中登上天安门城楼。这天,华国锋在《大海航行靠舵手》的乐曲声中登上天安门,这意味着华国锋已经成了中国的新舵手。

新华社这样描述华国锋登上天安门城楼的热烈场面:

城楼上下,广场内外,一片欢腾,欢呼声、口号声、锣鼓声响彻云霄,最生动地表达了全党三千万共产党员,全国八亿人民对自己领袖华国锋主席和党中央的衷心拥护和完全信赖,对伟大的社会主义事业和光辉灿烂的共产主义前途充满信心。华国锋主席身着绿军装,高兴地频频向百万群众亲切招手致意。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主任吴德在首都庆祝大会上发表讲话,他说:

“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乘毛主席病重和逝世之机,迫不及待地妄图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我们面临着党变修、国家变色的现实危险。我们党处在一个严重困难的时刻。经过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生死搏斗,我们党胜利了,无产阶级胜利了,人民胜利了!”

“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采取果断的措施,揭露了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巩固了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使我党我军和我国各族人民能够继续沿着毛主席指引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航向胜利前进。”

“王张江姚反党集团不听毛主席的话,肆意篡改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搞修正主义。”

“他们崇洋媚外,里通外国,大搞投降主义和卖国主义。他们路线的实质,就是根本背叛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在国内,篡改我们党的无产阶级性质,颠覆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在国际,抛弃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投降帝国主义。”“王张江姚反党集团的所作所为,证明他们就上党内资产阶级的典型代表,是不肯改悔的正在走的走资派,是一伙资产阶级的阴谋家、野心家。”

这天,中国各地都举行了“双庆大会”。

10 月 24 日,上海百万军民云集人民广场,大会横幅上的字是这样排列的:

热烈庆祝华国锋同志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上海军民大会

热烈庆祝粉碎王张江姚反党集团篡党夺权阴谋的伟大胜利

人民广场上空,依然是马天水的声音——大会由他主持,头衔为“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市革会副主任”。

大会给“华主席、党中央”发去致敬电:

“敬爱的华主席、党中央!王张江姚反党集团篡党夺权的阴谋被彻底粉碎的特大喜讯传到上海,上海全市立即沸腾起来了!连日来,

全市一千万军民涌上街头,结队游行,热烈庆祝华国锋同志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热烈庆祝粉碎‘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的伟大胜利,愤怒声讨王张江姚反党集团的滔天罪行。上海的工人阶级、贫下中农、解放军指战员、民兵、革命干部、革命知识分子、红卫兵、红小兵和其他劳动人民,一致奋起。浩浩荡荡的队伍汇成了一股不可抗拒的革命洪流,奔腾不息;锣鼓声、鞭炮声和激昂的口号声,震荡百里浦江,响彻万里长空。千万张革命大字报铺天盖地,贴满街头,万炮齐轰‘四人帮’反党集团;揭发、批判、声讨‘四人帮’篡党夺权滔天罪行的怒潮,席卷全市,势不可挡,革命形势一片大好!”

在念致敬电的时候,坐在主席台上的徐景贤、王秀珍也不时跟随着大家鼓掌。

10 月 26 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决定改组上海市的领导班子,中央的通知是:为了加强对上海的领导,中央决定苏振华同志兼任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市革委会主任;倪志福同志兼任上海市委第二书记、市革委会第一副主任;彭冲同志任上海市委第三书记、市革委会第二副主任;撤销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在上海的党内外的一切职务。

在收到中央的通知后,中央工作组按照当时重大事件要组织群众祝贺报喜活动的惯例,决定组织上海市群众祝贺报喜活动,并派先期到达上海的国务院轻工业部计划组副组长陈锦华找上海市委商量落实。陈锦华当即从工作组的住地延安饭店到康平路市委书记办公大院直接找到马天水,对他说了中央的通知和工作组的意见,请市委、市革委会部署通知,祝贺地点定在外滩市革委会办公大楼,有关祝贺报喜和群众的游行顺序、交通指挥等,要一并做出妥善安排。

马天水表示立即照办。

10 月 27 日,市委召开区县干部会议,传达中央通知,苏振华讲话,宣读了中共中央改组中共上海市委的决定。

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也坐在主席台的最后一排位置。在会上,马天水以中共上海市委书记的身份发言,表示“坚决拥护”。

这一消息刊载在 10 月 30 日《人民日报》。

当天的会上已经有许多人发言揭批“四人帮”及其上海的余党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等。其中以文革前上海市副市长张承宗的发言

揭发最为尖锐。他在会上揭发说,马天水曾经让工厂突击生产几万副手铐,他质问马天水:你赶做这几万副手铐,要干什么?你要铐谁呀?谁让你这么干的?马天水没有回答。因为当时会议上围绕着武装叛乱、篡党夺权这个重大的政治问题,斗争的气氛极为紧张。

随着审查的深入,马天水患上反应性精神病,精神失常的状况越来越严重,直至确诊为偏执型精神病。

# 第1430回：派军队，解决保定府问题 要批邓，河南抓捕造反派

北京10月24日“双庆”会结束不久，要求“停止批邓”的呼声不断高涨。这一年的冬天，北京人还是不能安分。他们刚刚在天安门广场上向着英明领袖华国锋欢呼，可是一出来就觉得少了点什么。

“少了邓小平”，一个记者说。

叶剑英派他的小儿子亲自驾车把邓小平接到西山，亲自向他传达政治局会议精神。邓小平一见到叶剑英，万分激动，长叫了一声：“老兄……”两人的手便紧紧握在了一起。

叶剑英和聂荣臻等商量，多次向华国锋提议，尽快恢复邓小平原来的职务，赶快让邓小平出来工作。但是，遇到了重重阻力。华国锋对参加中央打招呼会的西北组高级干部讲话时说：“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毛主席亲自发动的，要继续批。”

10月26日，华国锋召集中央宣传口领导小组负责人开会，华国锋谈到揭批“四人帮”的问题，他说：“批判中要注意，凡是毛主席说过话的、点过头的都不要去批，比如，‘八个样板戏’还是要演，某个演员不好，换人就是了。”

华国锋在会上做了四项指示：当前，一、要集中批“四人帮”，连带批邓；二、“四人帮”的路线是极右路线；三、凡是毛主席讲过的，点过头的，都不要批评；四、“天安门事件”要避开不说。

10月末的一天，原外交部副部长王炳南等人到军科2号楼，叶剑英在军事科学院的办公室所在地看望叶剑英。叶剑英留他们一起吃饭。

席间，王炳南问：“我可不可以去看望一下小平同志？”

叶剑英说：“可以。”

王炳南在饭后回家的途中就闯到宽街去看望邓小平。当时邓小平家的人感觉很突然，卓琳婉言闭门谢客，让王炳南吃了闭门羹。

10月31日,叶剑英将熊向晖找到西山畅谈。叶剑英说:“现在大局已定。过去主席讲,从大乱到大治,现在是这个时候了。华主席谦虚、稳重、诚恳,有民主作风,是领袖之才。毛主席是慧眼识英雄。华受命于危难之机、非常之时,非常之事,非常之人,建立非常之功,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没有什么,主要是江青。她是主席夫人。敢于下决心把她抓起来,也只有华。这个人是大智若愚,有智有勇。把江青抓起来,我都没有想到。如果周总理在,周不会这么做。就是邓小平也不一定这么做,不像我们老家伙思想顾虑多。红楼梦大观园不好管。王熙凤有病,探春管,看起来文弱,其实厉害。主席讲人才难得,外柔内刚,绵里藏针,放在华主席身上更合适。他交班不交给别人,毛主席慧眼识英雄,文化大革命有他的功劳,难怪他讲一生中做了两件大事。”

1976年11月1日至8日,保定482厂发生武斗,厂革委副主任杜洪志被打死。11月6日,保定市委在给中央的一份报告中称,地震过后,保定又乱起来,半月来,来自定县、涿县、徐水、望都、清苑和郊区的500多农民进城,发生打、砸、抢、抄、抓事件多起,死4人,伤多人。

11月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发布解决保定地区武斗问题的《布告》,《布告》说:保定问题长期不能解决,根子就是“四人帮”。《布告》重申要立即无条件停止武斗。在此之前,中共中央已成立由秦基伟负责的解决保定问题领导小组,规定了解决保定问题的方针和政策。

11月15日,以北京军区第二政委秦基伟为组长,河北省委第一书记刘子厚、38军政委王丕礼为副组长,北京军区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吴岱、河北省军区司令员马辉、38军副军长李连秀为成员的“中央解决保定问题领导小组”进驻保定。于当天在38军礼堂召开大会。传达中央指示。

38军奉命于11月16日对保定地区各武斗据点实行武装包围。38军全军出动,分赴保定23个县、市的城镇和农村,宣传《布告》。同时投入20个团的兵力,封锁了保定地区所有交通要道,包围了192个武斗据点,收缴武器,抓捕坏人。在半个月的时间内,先后张贴和用飞机散发《布告》近300万份,1500个广播站反复广播,召开宣讲《布告》

的群众大会8000多场,到会群众570多万人次。通过强大的政治攻势,很快收缴各种枪支1.1万支,炮699门,弹药14.5万多发,手榴弹5.5万多枚,以及大批地雷、炸药和雷管;拆除工事,解散武斗班子,逮捕了21名民愤极大的首恶分子。

11月20日,中央解决保定问题领导小组在保定召开10万人公判大会,依法判处抢夺枪支、私造武器、抢劫、破坏交通、拦劫抗震救灾物资、杀人放火、强奸妇女的犯罪分子孙福山等16人死刑和有期徒刑。其中孙福山、褚万才、赵民众、王喜保4人死刑,立即执行。

12月13日,保定集中500余人赴京参加由解决保定问题领导小组举办的"学习班",同时,由河北省委和38军组建的联合工作组进驻保定,配合地、市委工作,形势迅速好转,保定方根本结束了10年的反复动荡。

11月15日至19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宣传工作座谈会。耿飚在会上宣读了经中共中央批准的《当前宣传要点的请示报告》,指出宣传工作的三个要点:一、突出宣传华国锋;二、大力宣传粉碎"四人帮"的伟大意义;三、彻底揭批"四人帮"。

11月18日,主管宣传工作的汪东兴在全国宣传口的会议上讲话,提到了邓小平的问题。他说:

"去年10月后,毛主席就发现邓小平的错误,而且错误是严重的,搞原来一套。毛主席见邓不行,另找华国锋,而邓小平的严重错误一直发展到天安门事件。"

接着他又说到"天安门事件":"天安门事件如果是悼念周总理,这又有什么不好呢?又有什么错呢?但是他们被反革命分子利用了。在批判邓小平错误的时候,反革命利用了这个东西,形成暴乱。"

他说:对批邓"毛主席已经有了个四号文件。四号文件里面不管怎样总是正确的,是毛主席的指示。"

汪东兴说:"当前斗争的矛头是'四人帮',但邓的问题批了一段也是必要的。"

接着他讲:"现在小道消息,说邓恢复了工作。"

他要人们注意,对邓小平,"毛主席讲过'保留党籍,以观后效'嘛!"汪东兴说:"邓那两下子比华国锋,差得远嘛!对邓小平试了一

下,不行嘛!”“对文化大革命还是不理解,三个正确对待做得不好。这个问题老同志要注意。老的与年轻的都要注意。”

“现在邓小平问题也没有划为敌我矛盾。谁划了?他还是‘以观后效’。”

11 月 30 日,吴德在四届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上汇报粉碎“四人帮”情况。他最后说:“凡是毛主席指示过的,凡是毛主席说过的,我们都要去做,而且要做好。他说过去四人帮’给我们很多干扰,现在清除了四人帮’的干扰,因此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关于纪登奎次子纪虎民谈话的内参在姚文元家被抄出后,纪登奎和刘建勋便以这件事为根据,将与这份内参有关系的董万里、周民英和杨止仁武装监护审查,说他们和“四人帮”有联系。同时进行审查的还有郑州铁路局党委书记唐岐山。他们 4 人被作为河南的“四人帮”在全省批斗。

11 月,已任河南原阳县委副书记的原开封“824”头头陈红兵在停职检查一段时间后,被押回开封隔离审查。他们从柳园渡口坐船过河抵开封上岸后,押送他的人掏出手枪朝天放了两枪,大概是庆祝胜利。陈红兵意识到:还没有审查,他们就已把他看成了敌人!

陈红兵 1967 年 10 月被选为开封师范学院革委会主任、开封市革委会常委。1967 年底分配留校,1968 任河南省革委会常委。1968 年底再分配到太康县解放军农场接受再教育 1 年。

1970 年初,他又被分配到新乡地区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陈红兵主动放弃原分配方案,要求到最艰苦的、河南有名的贫困县——原阳县农村插队。插队的村子叫下马头,陈红兵住在十一生产队两间泥坯草房的记工分用的屋里,生产队会计把一半的空间打扫干净,摆一张床,摆一张旧桌,就算是安下了家。他每天和社员一起出工收工,在庄稼地里忙活,在群众家里吃饭、拉家常,给五保户困难户担水,学犁地等农活,对农民生活加深了了解。

下马头大队属中等偏上的大队。大队有一台履带式拖拉机,一台天津铁牛 55 轮胎式拖拉机,一个小砖窑。各生产队有自己的菜园,农民生活虽不富裕,但没有一个人生活过不去,军烈属、五保户都得到照顾。中央表态支持“二七公社”、“开封 824”之后,原新乡地委书记耿

其昌一句话“贫下中农都是造反派”,稳定了农村局势。但农民心有不平敢于说话、敢于向干部提意见,大队干部谨谨慎慎,关乎大家利益的事情常开会向群众说清楚。农村干部学大寨积极性很高,平整土地、打机井抓得很紧。农村买拖拉机和城市比便宜很多,打机井国家出资为主,农民出力为主,群众对党的农村政策很满意。一般农民勤劳朴实,很善良,对待下放锻炼的干部学生,对待在政治运动中被批判过而下放到农村的人,从不歧视。不管上面说这个人如何坏,他们从来都有自己心里的评判标准。

陈红兵女朋友毕业后,也放弃直接分配工作的机会,要求和陈红兵一起插队。他们到福宁集公社登记结婚,生产队把记工分的屋子用砖墙隔开,这半间草屋就成了他们的新房。那天晚上,各生产队插队的大学生和乡亲们挤满一院子,笑着嚷着。他们两个向大家三鞠躬,唱一首革命歌曲,撒了喜糖,就算举行了婚礼。

他们婚后一起参加劳动,日子过得很香甜。因为他们知道,不到劳动者中间,怎样了解他们的需要?不了解他们的需要,怎样为他们服务?共产党不为大多数人服务,难道还叫共产党吗?

1970 年“一打三反”和抓“516”运动,学校里军代表将陈红兵的几个战友当作“516”嫌疑,就连刘建勋的秘书王书庆也打成“516”,关进了学习班。

“913 事件”后,“516”学习班渐渐撤销。开封师范物理系的一个“814”的头头在街上与陈红兵偶遇,对他没进学习班表示大惑不解。他紧抓住陈红兵的手,把他拉到路边,反复地问:“你真的没进学习班?你真的没进学习班?你这个大鱼真的没进学习班!”看得出,他的精神受到很大刺激。难怪毛泽东后来说“对造反派要高抬贵手”。

1972 年初,陈红兵和插队的学生们一起被分配工作,教育局局长和他谈了两句话:“红兵,就是这样了,也别有其他想法了,去农村教学吧!”他被分配到原阳县最边缘的祝楼公社高中教学。临行那天,祝楼派一辆马车前来县城接他们一家。大雪初晴,温暖的阳光笼在厚厚的雪原上。清脆的鞭响,嘚嘚的马蹄声,喜鹊蹬落的雪粉和欢快的叫声,打破原野的宁静。陈红兵和妻子以及执意要送他的长春地质学院学生李旭,摇晃着坐在装着铺盖行李的车上,未满周岁的儿子倚在妈妈

的怀里,好奇地看着这个世界。一只不知名的白色大鸟,忽然在路边沟渠未结冰的水面上掠了一下便腾空而去。赶车的老乡五十多岁,从旧社会过来,对生活很满足,一路上给我们讲一些风土人情、笑话掌故,大家爽朗地笑着,蜿蜒50里的乡路也不觉得遥远。

祝楼高中是个文革中新建的学校,班级不多,校长是个没有学历的农村基层干部,踏实为教师服务,任劳任怨,对造反派没有好感。他后来对陈红兵说:“听说分来个造反派头头,我心里不安了好多天。来了一接触,不是想象的那回事,人还不错,教学也有本事。你这个造反派我赞成!”

1973年3月,陈红兵在农村入了党,选拔到中共原阳县委担任县委副书记,兼靳堂公社书记。

# 第1431回：看渝鄂，造反派隔离审查 材料一，乔冠华免去外长

1976年11月8日，重庆市委书记鲁大东将黄廉喊到市委办公厅会议室，对他说："17号文件下达已经半个月了，你要好好思索自己的问题。你跟'四人帮'不是一般的关系。"

黄廉依然我行我素，反唇相讥说："你当初反对过中央文革了，是靠都靠不拢吧，你现在是不是落伍了？"

鲁大东说："文件下来半个月了，你还是这个思想，觉悟很差，态度很不对头，一个星期之后，你就带上用具去开会，会上要表态的，今天跟你谈话，是代表党和华主席跟你谈的。"

11月14日，市委来车接黄廉，他爱人问他还开什么会？黄廉对她说："此去恐怕不再回来了。"

黄廉到了市委，鲁大东、徐庆如、钱敏都在。鲁大东拿出一个文件夹说："跟你宣读个文件，根据华主席的指示，四川的邓兴国、黄廉、周家喻、杨志诚，从文件到之日起，停止工作，不接电话、不会客，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说清与'四人帮'的关系和问题，什么时候说清楚，什么时候解脱。"

钱敏对黄廉说："你把与王、张、江、姚的关系说清楚，取得党的谅解。"

黄廉依然嘴不饶人，说："你们需不需要说清楚？你们的级别比我高，跟上层接触比我多。"

鲁大东、钱敏和徐庆如起身都走了，屋里剩下的就是保卫人员。过了一会，一辆军用吉普车把黄廉送回木材公司。一进大门，就有3个解放军战士在门口站岗。三楼的一个房间，门窗已经用用厚木板加固钉死了，里面有四张床。政法学院的革委会主任柳传承对黄廉说：

"是市委清查组派我来的，我和公安局的杨、孙两位处长，三位在这里陪你学习，每天负责收集你的材料。我们早上8点半开始，下午

是接待外调的时间,晚上6点半休息,解手要有人陪同你去。天气冷的时候,有人会给你送东西,本单位已经管不了你了。”

黄廉偷空给周家喻家里打了个电话,知道他也被办学习班了。谁想,就这一个电话打出去,门口又给他加了两个岗哨。

12月,黄廉转移到五招待所,看守就换成军分区一个排的解放军了,还有两个民兵,吃的东西拿进来需要经过检查。黄廉除了跟他们吵架之外,几年时间一个字也没有写,也几乎不跟他们说一句正经话。

1976年10月29日,武汉市召开大会,批斗“四人帮”在武汉的骨干分子董明会、李想玉。

11月,武汉原“百万雄师”部分人员又成立了“工农兵”组织。11月上旬,“工农兵”头头研究决定,对造反派的主要头头要抓起来办学习班,交代问题。“武昌(汉阳)以武重、武锅、武船、汉轧的同志为主”,将“夏邦银、朱洪(鸿)霞、胡厚民、李湘(想)玉、彭勋等人抓起来”。“其目的有三点:1.掌握‘四人帮’插手湖北、武汉的情况和(有)牵联(连)的人和事;2.三钢头头打、砸、抢、抓、抄的罪恶行为;3.湖北、武汉个别领导干部与‘四人帮’的牵联(连)和支造的事实真相”。

很快,董明会、朱鸿霞、李想玉、沈复礼、王锦铭等人都被抓去,五花大绑地站在敞篷汽车上,胸前挂着“四人帮的黑爪牙”的牌子,整天在武汉三镇大街上游街。胡厚民等人也被“工农兵”关押一个多月。

12月12日,中共湖北省委发出通知,要求各级党委认真传达学习中共中央有关文件精神,联系湖北实际,深入揭批“四人帮”及其在湖北的骨干分子夏邦银、朱鸿霞、胡厚民、张立国的反革命罪行,彻底清查其帮派体系。

12月14日,全省批斗“四人帮”的骨干分子夏邦银、朱鸿霞、胡厚民大会在武昌洪山礼堂召开。

从1976年12月开始,一直到1982年7月,胡厚民、杨道远、夏邦银、朱鸿霞及原来因“北决扬”案件被抓的人都被关押在位于武昌民主路45号看守所。

我们再回到北京。11月24日,毛泽东纪念堂奠基仪式在北京举行。

11 月 30 日,吴德在全国四届人人常委会第三次会议上说:“凡是毛主席指示的,毛主席肯定的,我们要努力去做,努力做好。”

12 月 5 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凡纯属反对‘四人帮’的人,已拘捕的,应予释放;已立案的,应予销案;正在审查的,解除审查;已判刑的,取消刑期予以释放;给予党籍团籍处分的,应予撤销。”

12 月 10 日,华国锋仿照“913 事件”后,毛泽东处理林彪等人的做法,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向全党全国印发了中发[1976]24 号文件:《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罪证》(材料之一),要求“立即向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传达,并组织阅读和讨论,务必做到家喻户晓,人人明白。”

文件对“四人帮”的定性是:“披着马克思主义的外衣,搞修正主义,搞分裂,搞阴谋诡计,千方百计地反党乱军,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说“四人帮”“背叛党的九大、十大路线,推行一条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妄图在国内篡改我党的无产阶级性质,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在国际抛弃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投降帝国主义”,“他们是名副其实的党内资产阶级的典型代表,是不肯改悔的正在走的走资派,是混入党内的资产阶级阴谋家、野心家。”

文件说明,解决“四人帮”的问题,毛泽东生前就已有想法:“伟大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以他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洞察力,早已看透了‘四人帮’的野心,预见到身后他们会闹事。毛主席对‘四人帮’不断地进行了批评、教育和斗争,做到了仁至义尽。但是,‘四人帮’毫不悔改,变本加厉地进行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阴谋活动。毛主席采取有力的措施一个一个地打破了他们的阴谋,特别是极其英明地亲自选定了华国锋同志为接班人,有效地预防了‘四人帮’的反革命复辟。”

因此,“我们党同王张江姚反党集团的斗争,实质上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继续。”

文件说:“王张江姚专案组正在编辑《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罪证》材料之二、材料之三,以后将陆续印发给你们。《材料之一》,你们可以翻印,但应注意保密,不许丢失,不许外泄。《材料之一》的蒙、藏、维、哈、朝少数民族文字的翻译工作,由民族出版机构

负责。”

文件“四人帮”的罪证分为四部分：

第一部份，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四人帮”在党的十届二中全会和四届人大前后分裂党、篡党夺权的罪证。主要内容有：

一、批林批孔又批走后门，搞三箭齐发。

二、进行篡党篡军的阴谋活动，证据只有两条：一是江青提出要批“大儒”“现代的儒”，文件认为：江青提出的这个“大儒”就是指周恩来；二是1974年3月5日，张春桥、江青召集于会泳、陈亚丁等人开会。江青在会上说：“八一（厂）造孽了，军阀管你们。”文件认为这是攻击中央领导。

三、反党乱军，背着毛主席、党中央私自处理党政军重大问题。证据呢？主要是一些涉及军队的文件没有批给叶剑英。

四、在中央准备召开四届人大，酝酿国家机构的人事安排期间，进行篡夺党和国家领导权的阴谋活动。证据也很有意思：一是王洪文赴长沙“告状”，二是江青向毛泽东要工作，三是江青写的《琅牙台》那首诗：

江上有奇峰，锁在烟雾中，

寻常看不见，偶尔露峥嵘。

文件认为，这是“江青受到毛主席的批评，野心没有得逞。她心怀怨恨，准备把它写的这首反动诗，配上他照的庐山汉阳峰的照片一起，用‘琅牙台’的笔名在《中国摄影》上发表。诗中污蔑毛主席是‘烟雾’，野心勃勃地自比为江上‘奇峰’，企望有朝一日‘露峥嵘’，实现她篡党夺权的狂妄野心。”

就连“四人帮”的合影，也成了他们的罪证。

罪证的第二部份是说“四人帮”宣扬“经验主义是当前主要危险”，认为这是攻击周恩来和其他中央领导。这里有一条是说“四人帮”扣压、对抗毛泽东的批示，这在当时可是“罪莫大焉”，应该是一条很过硬的罪证。那证据呢？文件上列举的是1975年4月23日，毛泽东在姚文元送的新华社《关于报导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问题的请示报告》上作的批示：“提法似应提反对修正主义，包括反对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二者都是修正马列主义的，不要只提一项，放过另一项。”

“我党真懂马列的不多,有些人自以为懂了,其实不大懂,自以为是,动不动就训人,这也是不懂马列的一种表现。”时任新华社社长朱穆之请示是否传达,王洪文5月8日批:“我意见暂不传达。请文元同志阅示。”姚文元批:“同意暂不传达。精神可以在新华社工作中贯彻执行。”只有这一条。

罪证的第三部份是说“四人帮”反对华国锋任国务院代总理、总理、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妄图取而代之,妄图打倒一大批中央和地方党政军负责人。证据是王洪文在1976年1月下旬准备在打招呼会议上作的长篇报告;还有张春桥在1976年2月3日,华国锋任第一副总理、第一副主席后写的《有感》;上海在批邓时点了几个副总理的名;江青私自召集的12省、自治区会议上讲话;还有一条十分过硬的证据材料就是章含之写给毛泽东的信。文件说:“乔冠华和他的老婆章含之经过一番密谋策划,由章含之出面,于1976年4月25日写了一封名义上给毛主席,实际上送给了江青的告密信,密告康生同志揭发江青、张春桥是叛徒。江青气急败坏,写了一大篇话,恶狠狠地污蔑周恩来同志、康生同志、其他中央领导同志和坚持同‘四人帮’斗争的同志是什么‘大、小舰队’,疯狂叫嚣:‘吃的饱饱的、睡的好好的,打一场更大的胜仗!’”当时江青看了章含之的信后写的是:“此类事逐渐会揭发出来,我看他们是否高超过林彪?据说,他们的大、小舰队活动有些雷同,有些不同。小舰队有过之而无不及。吃的饱饱的、睡的好好的,打一场更大的胜仗!”

罪证的最后一部份是说毛泽东重病期间和逝世以后,“四人帮”迫不及待地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的罪证。证据是在毛泽东病危时,江青还到天津、大寨去“游山玩水,恣意取乐”;王洪文在毛泽东病重期间钓鱼、打鸟;在毛泽东病中,江青还向他伸手要钱;甚至在毛泽东逝世前5个多小时,江青到新华印刷厂也是在搞阴谋。

毛泽东逝世后,江青找张玉凤索要毛泽东的手稿,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新华社等给江青写“效忠信”,要江青当党中央主席的“劝进信”,王洪文照的“标准像”,这些当然也都成了他们阴谋夺权的证据。其中,“伪造‘按既定方针办’的所谓毛主席的临终嘱咐,为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大造舆论”,自然成为最有力的罪证。

最后,上海在“四人帮”被抓后的种种事情,作为“四人帮”在上海余党准备的“未遂暴动”,那更是不能放过的过硬证据。

12 月 10 日至 27 日,第二次农业学大寨会议在北京召开。华国锋在讲话中指出,王、张、江、姚是一伙“极右派”,我们要保卫和发展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

华国锋在 12 月举行的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的讲话中,针对叶剑英等要求邓小平复出的提议,说:“批邓是必要的,邓小平犯了错误,有错误就应该批判。”

才华横溢的外交部长乔冠华被免去外交部长的职务。1976 年 12 月 2 日的四届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上,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李先念,对此有如下说明:

“经华主席、党中央批准,这次会议任命黄华为外交部长,免去乔冠华的外交部长职务。现在讲讲为什么免去乔的外交部长。

王张江姚反党集团为了控制外交部,早就看中乔。乔错误地估计了形势,自觉卖身投靠“四人帮”,反对毛主席,反对周总理,反对华主席,参与了‘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他们明知道主席对‘四人帮’有严厉的批语,但他却在外交部当谣言来追查,说这是‘政治谣言,分裂中央’。他对毛主席指定华国锋同志担任总理,极为不满。他早知道毛主席给华国锋同志写的‘你办事,我放心’,却反对刁难。在批邓中,毛主席认为外交部的运动有问题,让他请示华国锋同志,他不去,他找江青,有意把外交部运动搞乱,要把知道‘四人帮’底细的王海容、唐闻生同志打成‘反革命’,为‘四人帮’篡党夺权扫除障碍。毛主席批语乔‘借刀杀人’,‘借中央之刀杀王、唐’。乔同他的夫人章含之反对周总理,把康老揭露张、江的叛徒问题向江青告密,态度恶劣,至今不能取得群众谅解。鉴于外交部工作的重要性,决定免除乔的外交部长职务,任命黄华为外交部长。”

《人民日报》组织专门小组,全面清查了报社内与“天安门事件”有关的人和事,写出了《“四人帮”在天安门广场事件中的阴谋活动》清查报告。1976 年 12 月 l0 日,以迟浩田、孙轶青、郗汉生 3 人名义报送宣传口并党中央。迟浩田为此特地写了一封信,全文如下:

中央宣传口并报华主席、党中央:

在揭批“四人帮”控制人民日报搞篡党夺权的反革命阴谋活动中，报社许多同志揭露了“四人帮”在天安门广场事件中搞的欺骗毛主席和党中央的罪行。我们觉得这一问题有必要向中央反映。现将人民日报运动办公室材料组整理的《“四人帮”在天安门广场事件中的阴谋活动》送上，请审阅。

迟浩田

1976 年 12 月 10 日

耿飚首先看了材料，他马上提笔给中共中央副主席叶剑英写信，说：“人民日报社许多同志揭露了‘四人帮’在天安门广场事件中搞的欺骗毛主席和党中央的罪行：他们于十二月十日整理出了一份材料，现送上，请参阅。”

叶剑英通过耿飚嘱咐《人民日报》社以后多给他送这方面的材料。人民日报社遵嘱按时给叶帅送去“内参”。

# 第1432回：为小平，李东民成反革命 材料二，说江青就是叛徒

1976年12月10日晚，邓小平因患前列腺炎，住301医院治疗。301医院进行了精心准备，将刚装修完的南楼五层还未起用的外科病房，供邓小平一人用。12、13日，吴阶平会诊，建议手术。

12月16日，华国锋收到邓小平给他和汪东兴的信，要求手术，马上批准，汪东兴也签了同意。24日，邓小平做了前列腺摘除手术。手术后，余秋里、徐向前、聂荣臻、宋任穷等许多老干部相继看望邓小平。但华国锋和叶剑英都没有去。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的几个教师和学生，开始收集数月前“天安门事件”期间天安门广场上流传的那些“反动诗歌”。京城的老百姓也真是奇特，那个春天里警察抓走了那么多人，可是没有被抓走的人居然会把那么多的“反动诗歌”隐匿起来。报纸上不住地批判，警察到处搜捕，民兵日夜监视，反复地清查清理，可就是找不出这些“反动诗歌”来。现在听说有人要把这些东西整理编辑出版，诗歌就从大街小巷里面纷纷涌出来。到了1977年1月8日，周恩来逝世整整一周年。为纪念周总理，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的师生给自己起了一个名字：“童怀周”，意为“共同怀念周总理”，并以此为笔名，居然把那些诗歌出版了，书名叫做：《天安门革命诗文选》，分上、下两卷，共计1032页，国人读之如饮狂泉。

同样在1977年的1月，也即周恩来逝世一周年的时候，还有更加露骨地为邓小平翻案的人，北京发生了震惊全城的“大字标语案”。大约十几个青年，在京城中心长安街上，用硕大的排笔写出大字标语：

“坚决要求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

“坚决要求为‘天安门事件’平反！”

警察立即出动搜捕，很快便抓到元凶，他叫李冬民，北京重型机器厂的工人。但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却是北京“首都兵团”的头头、中学红

代会的核心组组长、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常委。后来他参军,入党,复员,当工人。

于是,大街上谣言纷起,有人说“批邓”批错了,邓小平就要出山。还有人说毛泽东弥留之际对镇压天安门广场颇有悔意。辽宁省旅大市革委会大门口,有人在张贴大字报批评吴德和陈锡联,还要求为“天安门事件”平反。

对李冬民,吴德坚定不移地说:“反革命分子。”

接着,李冬民立即就被关进了监狱。

1977 年 1 月下旬,中央政治局在玉泉山召开会议,大家统一了认识,同意邓小平在适当的时候恢复工作。

此时,邓小平准备出院,华国锋与叶剑英商量邓小平出院后的住处问题,华国锋提出小平的住处靠近叶剑英比较安全,因此决定把邓小平安排到西山 25 号楼,原来给王洪文建的那处别墅。

会后,列席会议的周启才随叶剑英一起来到玉泉山 9 号楼,周启才对叶剑英的秘书王守江说,中央政治局已经决定邓小平恢复工作,让王守江给邓小平送文件,以便让邓小平熟悉情况。

当时邓小平还没正式出来工作,文件怎么送呢?周启才和王守江商量之后决定,给邓小平送的文件统统写上“王守江收”,由王守江转送到邓小平住处。

一天晚上,华国锋派车将邓小平接到玉泉山。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 4 个人一起和他谈话。华国锋等介绍了粉碎“四人帮”的过程,恢复邓小平看中央文件的待遇。

2 月 3 日,邓小平出院,直接去了西山军委 25 号。25 号楼在山上最高处,从车道下来就是叶剑英住的 15 号楼。出院后,邓小平第一个见到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是叶剑英。他住到西山 25 号楼后,叶剑英派小儿子叶选廉把邓小平接过去与他会面。

王守江第一次到西山 25 号楼给邓小平送文件时,邓小平正在打牌,收下文件后,只说了一句:“我打牌呢!没别的事我打牌了。”

据吴德回忆,华国锋在政治局会议上宣布政治局常委决定邓小平在适当的时候恢复工作时讲了三条:第一条是请邓小平出来工作;第二条是要在中央会议上堂堂正正地出来;第三条是要为邓小平出来工

作做好群众工作。

在这次政治局会议后,在李先念的提议下,李先念、陈锡联和吴德一起去西山看望邓小平,转达中央请他出来工作的愿望。

邓小平见到李先念他们很高兴,说:“很好啊!我可以过一个安宁的晚年了。这种方式好(指粉碎“四人帮”事),干净利索!”

李先念说:“我们还要请你出来工作呢!”

邓小平风趣地说:“出来干什么?”

李先念说:“起码官复原职。”

邓小平兴致勃勃地请李先念他们去看了为王洪文修的电影厅,说:“看,这就是电影厅。”

2 月 7 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发表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其中提到:“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必须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要始终不渝地遵循。”这就是后来说的“两个凡是”。

2 月 8 日,中南海发出通知,要求全国人民都不要相信北京传播出去的“政治谣言”。一时间,京城的气氛又紧张起来。坚决打击政治谣言的运动如火如荼地推行开来。

2 月 18 日,春节,邓小平的 25 号楼分外热闹。叶剑英、李先念、王震、胡耀邦、万里都来了。

过了春节后,华国锋、叶剑英专程到 25 号楼看望邓小平,并向他征求政治局人事安排的意见。

经过 10 年文革,中国人都知道,在中国大陆的“官场”上,要抓你的现行罪证那是很难的,《关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罪证》(材料之一),16 开本,近 200 页,真正过硬,能称得上是罪行的材料几乎没有。要将你打倒,最有力的材料就是你历史上的污点。同样是“刘邓路线”,刘少奇被彻底打倒了,永世不能翻身,为什么?因为他是叛徒。而邓小平没事,“913”以后又站出来了。因为他一直在部队工作,历史上从来没有被捕过,自然没有当叛徒的可能。

同样,“四人帮”是被抓起来了,人们也早就风闻张春桥和江青是叛徒,如果这条能够坐实,那他们自然也就没有翻身之日了。人们期盼已久的关于“四人帮”的历史材料终于在 1977 年 3 月 6 日与大家见

面了。这天,中央以以中发(1977)10 号文件印发《关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罪证》(材料之二)。

文件自然首先公布了张春桥的历史罪证,说他是国民党特务分子,证据是:

1932 年至 1934 年,张春桥在济南正谊中学读书期间,于 1933 年春,伙同李树慈和马吉峰两名学生在济南发起成立法西斯组织华蒂社。文件登载了"华蒂社"李树慈在 1976 年 11 月 13 日作过的交代:

我是一九三三年在济南由黄僖棠介绍,参加"中华革命同志会"的,后改为复兴社。在山东省的国民党复兴社正副头目是秦启荣、黄僖棠。三三年春夏,黄僖棠授意我,以编文艺刊物为诱耳,收买拉拢一批青年学生,成立了"华蒂社"。这个组织是由我和张春桥、马吉峰等人发起的。刊物也以《华蒂》为名。"华蒂",暗含"中华法西斯蒂"之意,以使这个反动组织的政治性质更加明确。我是"华蒂社"的负责人,也是刊物的主编。开始,在国民党报纸《历下新闻》副刊上出版《华蒂》周刊,后由黄僖棠向复兴社要求,批准每月三十元的印刷津贴,编印出版单行本《华蒂》月刊,出版了三期,均由复兴社经营的午夜书店印刷、发行。《华蒂》周刊出版后,黄僖棠就叫我写一份"华蒂社"社员名单交给他,以便上报复兴杜南京总部。名单中有张春桥、马吉峰等十余人、……张春桥是"华蒂社"中坚分子,积极为"华蒂社"发展组织,介绍了陈庆章参加"华蒂社"。……

张春桥 1917 年 2 月 1 日出生,1933 年 16 岁,初中生。按照文件所说,此时他已"充当国民党特务"。

文件继续说:"张春桥在 1935 年到上海, 在复兴社特务崔万秋的指使下,从事文化特务活动。"证据是:1935 年 5 月,中学毕业后的张春桥来到上海,在上海杂志公司做校对员。从 1935 年 6 月 6 日开始,给《大晚报》投稿,尤其是在《大晚报》的《火炬》副刊上登载的张春桥投稿文章,几乎每月都有一篇。1936 年 3 月 15 日,张春桥化名狄克,在《大晚报》副刊《火炬》上发表《我们要执行自我批评》,批评鲁迅为《八月的乡村》这部小说作的序言。鲁迅于同年 4 月 16 日写了《三月的租界》一文予以驳斥,于是"狄克"一时在上海滩上小有名气。

攻击鲁迅,这在当时已经就是"罪莫大焉"。更何况,文件说:《大

晚报》的《火炬》副刊主编崔万秋,明着是个左倾作家,而实质上是国民党复兴社的特务。为什么说崔万秋是国民党复兴社的特务?证据就是国民党军统局大特务沈醉的回忆文章:最早的一次是1962年,他在《文史资料选辑(第22辑)》中发表的《我所知道的戴笠》一文中是这样描述的:“还有些文人如崔万秋、高巩白等,也都拿军统的津贴,为戴笠效劳”。

粉碎“四人帮”后,沈醉于1977年1月8日又就崔万秋的身份作了细致的说明:“我于1932年冬参加复兴社特务处(军统前身)后,便在特务处上海特区当交通联络员,崔万秋当时已参加了特务处,是特务处上海特区领导的直属通讯员,每月薪金80元。上海特区有十多名直属通讯员,由区长直接领导,由交通联络员联系。我每月送薪金给他,并取回几次情报。”

既然崔万秋是特务,你张春桥给他投稿,于是“四人帮”罪证材料之二的文件做了这样的定性:张春桥是“在国民党复兴社特务崔万秋的指使下,从事拥蒋反共活动,疯狂反对鲁迅,积极参加国民党的反革命文化‘围剿’。”而且,文件继续揭露说:“1937年9月,张春桥离开上海,返回济南,奉山东复兴社特务头子秦启荣之命,由复兴社特务赵福成掩护,伺机潜入我根据地,1938年1月混入延安。”

张春桥的真实身份居然是潜伏在共产党内的国民党特务,而且官至政治局常委,当然比刘少奇的职务还差一点,但这也已经是在文化大革命10年之后,亿万人民群众几乎将全中国所有的干部历史像蓖头发那样的审查数遍后,又出现的“国民党特务”,不能不让众多国人在惊讶之余,内心却大呼“刺激”。

不过,文件丝毫也没有提到人们关心的“叛徒”问题,只是说张春桥1936年4月在上海参加了叛徒宋振鼎组织的一个冒充共产党的所谓“预备党员委员会”。不久,被上海党组织发现,由吴仲超代表党组织宣布予以解散,并责令宋振鼎通知了所有参加这个组织的人,也通知了张春桥。而张春桥到延安后,仍把他参加“预备党员委员会”一事向组织汇报,作为他参加革命的时间。但是这并不能说明张春桥是叛徒。是啊,张春桥参加革命后就没有被捕过,就是神仙也没有办法证明他是叛徒呀!

当然,张春桥的老婆文静叛变一事,那是板上钉钉的,在文件中肯定被大书特书了一番,甚至连文静的档案照片也给影印出来。

说到江青,文件中毫不客气的写到:“叛徒江青的历史罪证 ”。

首先是江青 1934 年在上海被捕的证明材料,这是事实。刘志坚在战斗中受伤被俘仅一天就被自己的队伍营救出来了,文革中不是照样被说成是叛徒吗? 因为你被俘期间这几个小时没有人能证明你没有叛变,更何况你江青在监狱里蹲了那么长的时间。

江青也曾经是崔万秋的座上客,既然崔万秋是复兴社特务,那你江青还能跑的掉吗? 何况江青在上海期间还参加过为蒋介石祝寿的演出活动……

但是,最重磅的证明材料还是曾经在江青最困难的时候接济过江青、在江青被捕后参与营救江青、并在江青投奔延安时帮助过江青的徐明清。

关于徐明清,在《文革史话》第七部第 1394 回中已有详细介绍。“四人帮”被抓后,举国上下一片欢腾。此时的徐明清也同全国人民一样高兴,以为文革中被定为“叛徒”的冤案终于可以平反昭雪了。

就在江青被抓起来的第四天,1976 年 10 月 10 日,中央专案人员敲开徐明清的家门。原来,江青被捕后,中央专案组开始审查她的历史,在清理江青的档案时,发现了徐明清在延安时所写关于江青历史情况的证明材料。那份材料清楚地表明,在三十年代,徐明清与江青有过密切的工作关系。

于是,专案组通过公安部找到了徐明清,要她揭发江青的罪行。那几天,公安部一位副部长带着一个书记员,每天乘一辆灰色吉姆车来王观澜家,一谈就是一个上午,非常严肃,连口水也不喝。他们要求徐明清站在党的立场上,揭发江青的叛徒问题。

江青在徐明清那里没有组织关系,只是普通群众,何来叛变问题? 这让徐明清如何揭发?

于是,有关方面以“帮助江青混入革命队伍,给江青写过信,长期包庇江青”的罪名,将徐明清关押在一个至今她和她的家人都弄不清楚地点的小房间里。房间的窗户都用报纸封糊着,屋里一团漆黑,白天都得点着灯。有四、五个女看守一直看管着她,连上厕所也要跟着。

这里既是隔离室,又是审讯室,写交待材料、逼供审讯连续不断地进行着。

徐明清如实写下的材料,被专案组认为是资产阶级的“客观主义”态度,“不老实”,认为她在“包庇”江青,总也通不过。每次谈完话,那些人都放下几张纸,让她继续写交待。几轮下来,他们仍没有得到他们想要的结果。这些人急了,大声训斥徐明清:

“你这个人,是吃罚酒,不吃敬酒。让你写江青怎么叛变的,你写了不就没问题了嘛,不就立功了吗!”

“你要立功啊!”

徐明清说道:“江青被捕和我不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我不知道她被捕后是否叛变?更不知道她叛变的细节,我怎么能写呢?我也写不出来啊。”

于是,专案组继续对徐明清实行“车轮战”,一天提审数次,就在这样逼供的情势下,1977 年 1 月 8 日,徐明清被迫写下了一份“交代”。

那一天,专案组人员给她拿来了一张 16 开大小的白纸,让她坐在接受审讯的小桌前,由他们口授,令徐明清一句一句照抄。

徐明清头脑昏沉,也不清楚整体内容是些什么。写完后,专案组又拿来纸,要她重新抄写。这时,徐明清才明白了这份材料的内容,完全是按照专案组的意思,假徐明清之手,炮制的一份假口供。

徐明清感到自己被耍弄了,内心非常痛苦,一再要求收回材料。但是没人理睬她,徐明清只能在黑暗的小屋里痛哭不止,最后陷入神志不清,以致不能控制自己的状态。

徐明清万万没料到,两个多月后,她写的这份交待材料被影印收入一份“红头”文件,即《关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罪证》(材料之二)之中,并于 1977 年 3 月 6 日印发全国。

文件中说:

1933 年秋,江青在上海晨更工学团当教员时,就与当时‘晨更’的负责人徐明清关系密切,后来两人先后被捕,自首叛变。

她们 1937 年混入延安前就订立攻守同盟,长期相互包庇……同年 10 月,江青隐瞒了自首叛变的历史,由徐明清出面作假证明,钻进党内。

1977 年春节过后,徐明清被宣布逮捕,押往秦城监狱。从关押到被捕,始终都是秘密进行的,甚至连她的丈夫王观澜和家人都不知道她在什么地方?她的户口也被强制吊销了。

入狱后,专案组仍会不断地来提审她。徐明清条件反射一般,反复重复着一句话;“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不能乱说!”对专案组提出的一些莫名其妙的问题,她更是无法回答,只好沉默。

专案人员还提审了已经在 1975 年获释的,曾在江青上海被捕时参加审讯的,原国民党中央调查科上海区训练股编审组长朱大启。专案组告诉他“李云古”即江青。面对专案组,朱大启在 1977 年 1 月 18 日写下一份材料,全文如下:

李云古,女,山东人,左翼文化组织成员。1934 年下半年被国民党特工总部上海区逮捕,关押在伪上海市公安局看守所,由上海区训练股审讯组赵耀珊在伪公安局特务股楼上审问,我参加过劝降谈话。有一次赵耀珊迫使李云古自首,打李一个耳光,我以伪善面孔劝李自首,说:“你的问题很简单嘛,只要转变就好了。”当时,李表现很可怜的样子。以后李云古就自首了,由训练股长阎松年和赵耀珊经办了自首手续,李的自首登记表和保证书我审查过,其中写了反对共产主义、拥护三民主义等内容。自首登记表和保证书由我报送了南京特工总部。1934 年间,自首的女性如张蕙芬等人的自首手续,都是经我报送南京特工总部的。

朱大启在 1977 年 1 月 18 日所写的这份材料,后来收入中共中央文件“中发(1977)110 号”,成为定江青为“叛徒”的重要依据。

当时传说,在西安,蓝苹曾向徐明清详细谈及自己 1934 年 10 月在上海被捕后,如何写“自首书”出狱的。但是,迄今为止,除了徐明清坚决否认的《关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罪证》(材料之二)中的那份影印件外,再也没有见到徐明清任何关于江青自首叛变的证明材料。

# 第1433回：庆诞辰，叶剑英《八十书怀》难阻挡，邓小平三次复出

1977年1月20日，北京大学哲学系总支、武保部向党委上报《关于聂元梓、孙蓬一的情况报告》。《报告》反映：聂元梓声称她是受“四人帮”迫害的，审查她是不对的；孙蓬一到哲学系闹，说他是受江青迫害的。

2月15日，校党委开会，传达市委负责人2月14日听取北大、清华运动汇报后的指示精神。市委领导讲，……凡是毛主席指示的，我们一定要坚决执行，包括两个估计。毛主席批准的，不能动摇。……十七年不能翻，两个估计不能翻，聂、蒯的案不能翻。

中央准备在1977年3月召开中央工作会议，叶剑英对中央为华国锋起草的讲话修改稿提了两条意见：一是天安门事件是冤案，要平反；二是对邓小平同志的估价，应把提法改变一下，为小平同志重新出来工作创造有利条件。

叶剑英的话说得挺委婉，华国锋对叶剑英的建议也点头称是，可是却没有按照叶剑英的意见修改报告。在报告中，他没有直接地谈邓小平的问题，而是把“李冬民反革命案件”的材料印发给与会者：“现已查明，有那么一小撮反革命分子”，“他们的反革命策略是，先打着让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的旗号，迫使中央表态，然后攻击我们违背毛主席的遗志，从而煽动推翻党中央，保王洪文上台，为‘四人帮’翻案。所以如果我们急急忙忙让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就可能上阶级敌人的当。”

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汪东兴拿出毛泽东的话说：“有人提出‘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搞错了，要把邓小平请出来，还要让他当总理，说他如何如何能干。邓小平这个人我是熟悉的，讲能力他是有一点，但错误更多。1975年，毛主席是想让他当总理，可试了试，不行，他那两下子比我们华主席差远了，所以，最后毛主席才选定华国锋同志做接班人。”

3月13日,陈云郑重地在中央工作会议西南组作了书面发言。这个发言稿,陈云会前请胡乔木帮助修改,然后约了王震、肖劲光、王诤几个老干部,到耿飚家里商量,得到他们的赞同。耿飚说:“稿子就要写到这样才好。”

陈云在书面发言中说:“我对天安门事件的看法:(一)当时绝大多数群众是为了悼念周总理。(二)尤其关心周恩来同志逝世后党的接班人是谁。(三)至于混在群众中的坏人是极少数。(四)需要查一查‘四人帮’是否插手,是否有诡计。”

陈云还提出:“邓小平与天安门事件是无关的。为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需要,听说中央有些同志提出让邓小平同志重新参加党中央的领导工作,是完全正确、完全必要的,我完全拥护。”

会议工作班子要求陈云按照华国锋讲话的口径修改这篇发言,被陈云拒绝。他说:“要发简报,就照我讲的,一个字不改地发。”中央领导得知陈云的态度后,决定会议简报不刊发陈云的讲话。

王震也在会议发言中提出了同样的意见。他针对汪东兴关于邓小平的讲话,举出毛泽东的一些话来说:“邓小平政治思想强,人才难得,这是毛主席讲的,周总理传达的。他是同‘四人帮’作斗争的先锋。‘天安门事件’是广大人民群众反对‘四人帮’的强大抗议运动,是我们民族的骄傲。谁不承认‘天安门事件’的本质和主流是革命的,实际上就是替‘四人帮’辩护。”

王震的发言会议简报也未予刊登。但他和陈云发言还是在会场内外传开,并产生很大的影响。

第二天,华国锋在会上讲话。关于天安门事件,他仍称确有极少数反革命分子“制造了天安门广场反革命事件”,但肯定“群众在清明节到天安门去表示自己对周总理的悼念之情,是合乎情理的”。他批评一些人一味在“天安门事件”上纠缠不休,让大家不要再争论这些问题;关于邓小平问题,虽然说“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决定的,批是必要的”,但明确表示邓小平根本没有插手天安门事件,准备“在适当的时机让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但要“等到水到渠成,瓜熟蒂落”。他在讲话的最后说到:“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都必须维护,凡是损害毛主席形象的言行都必须制止。”

3月17日,陈云在中央工作会议西南组发言时说:“时机成熟的时候,让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我很赞成。”不久,陈云的提议就在北京传开了,各省也都知道了陈云的提议。

胡耀邦也准备了一个长篇发言,事到临头却没有说。他也许觉得自己的地位和资历都还不能和陈云这些人并论,又是邓小平“错误道路”上的人,眼下还需静观时变,等待时机。

3月22日,叶剑英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中说:“这一年(指1976年),毛泽东在他的住所召见华国锋等,又一次谈到自己一生中的两件大事。他说:‘人生七十古来稀’,我八十多了,人老总想后事。中国有句话叫‘盖棺定论’,我虽未“盖棺”也快了,总可以定论吧!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与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去了。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对这些事持异议的人不多,只有那么几个人,在我耳边叽叽喳喳,无非是让我及早收回那几个海岛罢了。另一件事你们都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这两件事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不好就得‘血雨腥风’了。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

4月5日,1977年清明节,天安门纪念碑周围,主要是毛主席纪念堂工地的围墙上,贴了很多怀念周恩来总理和庆贺粉碎‘四人帮’的诗文。

4月10日,邓小平再次写信,不过,这一回不是写给华国锋一人,是写给“华主席、叶副主席并转党中央”。这次,邓小平的信是这样写的:

华主席、叶副主席并党中央:

我完全拥护华主席最近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完全拥护华主席抓纲治国的方针和对当前各种问题的工作部署。

我在七五年的工作虽然也作了一些有益的事情,但在工作中确有缺点和错误,我对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对我的批评和教导再一次表示诚恳的接受。

我感谢党中央弄清了我和四人帮没有关系这件事,我特别高兴在

华主席的讲话中肯定了广大人民群众去年清明节在天安门的活动是合乎情理的。

至于我个人的工作问题,做什么,什么时候开始工作为宜,完全听从中央的考虑和安排。

在伟大领袖毛主席逝世的时候,我曾向中央用书面表达我内心的悲痛和深切的悼念。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党和社会主义的事业,把国际共产主义的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

在党中央决定由华国锋同志担任党中央主席和军委主席的时候,我知道了以华国锋为首的党中央以最英明果敢、最正确的方式战胜四人帮的伟大胜利的时候,我在七六年十月十日曾向国锋同志和中央用书面表达我的真诚拥护和欢欣鼓舞的感情。

如果中央认为恰当,我建议把我这封信连同去年十月十日的信印发党内,究应如何处理,完全听从中央的考虑和决定。

顺致诚挚的敬礼!

邓小平

一九七七年四月十日

邓小平的信在权力中枢流转了23天。5月3日,中共中央转发了此信,并把邓小平在6个月前的那封信也找了出来,用党中央的名义将邓小平的两封信一并下发了。中央肯定了邓小平的意见。

5月14日,是叶剑英80岁诞辰。这一天,邓小平和在京的徐向前、聂荣臻元帅,粟裕、王震、杨成武、余秋里等,不约而同以“祝寿”的名义来看望他。

第一个到来的是王震夫妇。随后到来的是余秋里、杨成武。接着聂帅夫妇来了。徐帅也来了。

人们刚刚坐定,聂帅的女儿聂力便向众人透露了一个秘密:“爸爸手里有一首诗。”于是聂荣臻的诗篇展现在寿星和众人面前:

揭竿羊城五十年,

风雨齐州步履艰。
川西传讯忠心耿，
京华除害一身胆。
行若吕端识大事，
功成绛侯有愧颜。
八秩寿翁犹继志，
旗展神州贺新天。

徐向前元帅也补了一首：

吕端当愧公一筹，
导师评论早有定。
当年英，劲倍增，
八秩犹似四十前。
射虎屠龙宿有志。
二三鬼神一扫空。
千秋伟业断不坠，
辅佐堪作后者镜。

叶剑英一如往日的谦虚，连连说："惭愧、惭愧，不敢当啊！"

众人正谈笑间，邓小平和家人也驱车赶来了，邓小平一进门就十分高兴地说："老帅们都在这里盛会啊！我也来祝贺。"

听到邓小平的笑语，叶剑英赶忙迎上前去，高声说道："你也是老帅嘛，是我们老帅中领班的！"

正说着，粟裕最后一个赶到。邓小平开玩笑说："别让他进来，坐不下了！"

叶剑英起身，亲自迎粟裕进来。

邓小平叶剑英并肩坐下后，元帅、将军们如同众星拱月一般，很自然地围拢过来，和家人孩子们一起来吹寿烛。

插在寿糕上的寿烛是 8 根，因是叶剑英 80 大寿。邓小平建议再插一根。众人不解其意，邓小平笑道："这样变成 9 根，象征'长久'。"

叶剑英十分开心，和大家一齐吹起来蛋糕上的蜡烛。

入夜，"寿星"送走了战友、亲朋，独自坐在写字台前，回顾走过的人生道路，面对当时除掉"四人帮"后的大好景象，心如潮涌，情不自

禁,奋笔疾书,作七律一首:

八十毋劳论废兴,
长征接力有来人。
导师创业垂千古,
侪辈跟随愧望尘。
亿万愚公齐破立,
五洲权霸共沉沦。
老夫喜作黄昏颂,
满目青山夕照明。

这就是当时被广为传诵口的《八十书怀》。

5 月,华国锋召见汪东兴和李鑫,要他们去找邓小平面谈。

5 月 24 日,汪东兴和李鑫前往邓小平家中。谈话持续了好半天。汪东兴告诉邓小平可以出来工作了,但要求邓小平先写个书面声明,承认"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事件,被邓小平一口拒绝。

"我出来不出来没有关系,但'天安门事件'是革命行动。"邓小平说。

邓小平还说:"'两个凡是'不行。如果按照'两个凡是',就说不通为我平反的问题。"

汪东兴和李鑫不免面面相觑,他们终于明白,华国锋不是毛泽东,至于邓小平本人,不仅已经不再是 1971 年的邓小平,而且也不再是 1976 年 10 月给华国锋写第一封信时的邓小平了。

两个月后,7 月 16 日至 21 日,中国共产党十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叶剑英和中央其他领导人出席了这次会议。在这次全会上,终于一致通过了《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职务的决议》,恢复邓小平中共中央委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的职务。邓小平在全会上讲话,再次强调了对毛泽东思想应有一个正确的完整的认识,他说:"对我们的现状来说,我个人觉得,群众集体和实事求是特别重要。"

恢复邓小平党政军领导职务的消息公布,举国为之震动。在北京,没有像组织"双庆大会"那样鼓励大家上街游行,但有些城市还是出现了盛大的集会游行。7 月 30 日晚上,当邓小平突然出现在北京国

际足球邀请赛的主席台上,全场欢呼,掌声雷动。这哪里还是一场球赛呀,分明是一场政治集会。邓小平以73岁高龄第三次复出,不仅在国内引起轰动,而且引起世界轰动。

1977年8月1日,建军50周年招待会上,已经恢复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职务的邓小平、华国锋、叶剑英互相敬酒。

1977年8月1日,于会泳在接受批斗期间,在文化部的隔离审查地点,偷服了厕所里的消毒药水,自杀身亡。他被开除党籍,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

# 第1434回：十一大，十年文革大幕落 争论起，真理标准大讨论

1977年8月12日，中共十一大在北京召开，华国锋代表党中央作政治报告，叶剑英在会上作了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邓小平致闭幕词。

这次会议最为世人瞩目的是正式宣布：自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正式结束。8月12日，华国锋在政治报告中说："现在，'四人帮'打倒了，我们可以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实现安定团结，达到天下大治了。这样，历时十一年的我国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以粉碎'四人帮'为标志，宣告胜利结束了。"

这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终于落下了帷幕。此时此刻，回首十年，神州大地，上自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下至每一个普通百姓，在这场触及每一个人灵魂的大革命中，谁敢说自己在这场大革命中没有受到触及？谁的亲朋好友不曾在这场大革命中或多或少的受到过伤害？又有几人敢保证自己没有在经意或不经意间触及或伤害过别人？尘埃落定，多少人留下了不堪回首的往事，又有多少人在心中埋下不愿再被人提及的尘埃？放眼神州大陆，几乎无人不在想：如果没有这十年……

然而，文化大革命的许多问题还要解决。

1977年8月，《人民日报》刊登了署名"杨西岩"的来信，对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吴德提出批评。因为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事件的定性，是通过吴德之口宣布的。所以，杨西岩认为，天安门事件至今没有得到平反，是北京市委，主要是吴德在"捂盖子"。这封信的发表，在中央引起了震动，也引起了华国锋的不满。在一次会议上，华国锋特意谈到对《人民日报》发表这封信的意见：

《人民日报》前天发表了一个读者来信，说"捂盖子问题"。几个报都转载了，香港也转载了，而且加了标题："谁捂北京市委的盖子？"

这封信发表是谁决定的？政治局主席、副主席都不知道。报纸发表群众来信，支持群众是对的，但点政治局委员的名，为什么不请示？……北京市委的问题，中央是知道的，并委派先念、东兴、耀邦同志去解决。……《人民日报》是不大慎重，……这样一点名，北京很紧张，连夜开会，要检查，请示中央，政治局就要开会了。北京问题不是不准登，但要请示报告……

杨西岩的信虽然使《人民日报》招致了批评，但毕竟揭开了北京市委的“盖子”。稍后，吴德向中央提出辞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的职务，中央调林乎加任市委第一书记。

中共中央在1977年9月23日下发了37号文件——《中共中央关于转发〈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罪证（材料之三）〉的通知及附件》，文件中罗列了“外交部党的核心小组的揭发”、“新华社揭发姚文元利用职权掩盖江青里通外国的罪行”和“原总参测绘局局长张清化的揭发交代”。其中“外交部党的核心小组的揭发”说到1972年8月江青与美国女作家维特克的谈话：

“江青出于篡党夺权的野心，认为这是为她自己树碑立传、里通外国、投降帝国主义的大好机会，无视周总理批示，在北京一次就见了六个小时。”“江青与维一见面，就要维为她写传记。她对维 说，‘关于我本人的历史，从来没有对外国人讲过，你是第一个外国人’，‘我谈的都可以发表’，‘斯诺写了一本《西行漫记》世界闻名’，‘我希望你能走斯诺 的道路’。”“周总理指出：维来华后期表现不好，思想反动，来历又未弄清，要江青不要多谈，只谈一次，最多两次，只谈文艺，不要谈其他问 题。江青听了接待人员转达周总理的指示后，大发雷霆，叫嚷：‘我的事不用你们管！’‘你们胆子真大，敢来围攻我！’她一意孤行，又同维谈了六次，连同前一 次共谈了六十小时。”“江青为了掩盖她里通外国的罪行，伙同王洪文强令收缴有关江青与维特克的谈话材料，销毁罪证。”

张清化的揭发则称，江青“谈完后，当场即将《解放战争开始前形势图》、《我军战略反攻形势图》、《毛泽东主席行动路线图》、《西北战场作战过程形势图》、《辽沈战役概况图》，《平津战役概况图》、《淮海战役概况图》和《解放战争三年半战绩统计表》等重要图表，拱手送给

了维特克。”“以上图表的内容大部份是我们没有公开的。江青里通外国,出卖了大量的党和国家的重要机密。”

1977 年 12 月 8 日,中央党校哲学教研室几个人商量,派一人去见中央党校副教育长冯文彬,请他征求当时主持中央党校工作的副校长胡耀邦的意见,同不同意他们贴揭康生盖子的小字报。这人对冯文彬说:

“康生祸国殃民,罪大恶极,而又隐藏很深,我们不揭开康生的盖子,不仅中央党校的揭批查运动深入不下去,全国揭批查林彪和‘四人帮’的问题也深入不下去。现在中央对康生没有表态,而且有人还要保他。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考虑到不给耀邦同志惹麻烦,打算不贴大字报,而贴小字报,不贴在室外,而贴在 16 楼室内走廊墙上。16 楼是教务处所在地方,学员常来常往,能看到小字报,这就能把康生问题端到全国去。不知耀邦同志和文彬同志认为这样做行不行?”

当天中午,冯文彬征求胡耀邦意见后,答复此人说:“耀邦同志讲了,贴康生的小字报这件事,我们既不提倡,也不反对。”

这人高兴地说:“这个态度就是对我们广大干部和群众的极大支持。我们决定贴出去了。中央如果怪罪下来,责任完全由我们来负。”

下午,由韩树英、吴义生、卢俊忠、毛卫平等 5 人署名的第一张揭发康生的小字报贴出来了。标题是:《×××(指中央党校造反派头头)执行的是一条什么路线?》,主要揭发所谓“康老路线”与江青路线完全是一丘之貉。这张小字报贴在 16 楼一层走廊西头南墙上。几小时后,接二连三又有人写小字报,挨着第一张小字报往东贴,第二天、第三天……陆续又贴了几十张小字报,小字报从 16 楼的走廊一层南墙转到北墙,转上二层的楼梯,再转到二层走廊南墙、北墙,再转上三层的楼梯,到三层以后转入会议室。观者络绎不绝。

胡耀邦抑制不住内心的高兴,对身边的秘书梁金泉说:“听说 16 楼贴了揭发康生的小字报,好得很呀!咱们去看看吧。”梁秘书劝他不必去,说小字报底稿都会收集上来的,可以看到全部内容。有些学员知道了,奔走相告,晚间还有人打着手电筒去看。这些来自四面八方的地、司级以上干部纷纷写信、打电话回去,报告中央党校已开始揭发康生。这个消息迅速传播到全国。接着,各地也开始有人向中央打报

告,揭发康生。中央党校的小字报内容,通过《情况反映》反映到中央常委。

华国锋对胡耀邦说:“康生这人不好,干了很多坏事。不过中国人有个传统习惯,人死了也就不再追究了。”

1978 年清明时,天安门广场纪念碑周围贴的政治诗更多。1978 年 4 月 6 日,一篇署名霍华和尹明的大字报发出建议,文章说:“我们应当把这块阵地作为不中断的论坛,不闭幕的会场,不休战的阵地,随时把我们的思想言论写出来,把我们的作品发表出来,在这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在这里,每一个人都可以作为政治家、思想家、科学家、艺术家、理论家、作者,同时又是读者、听众、观众、批评家。在这里,每一个人都是社会的主人。”

1978 年 3 月 22 日上午,邓小平约见方毅、蒋南翔、刘西尧及北大的周林、高铁、韦明、汪小川,谈北大工作。邓小平问:“北大的运动怎样?”

有人反映冷冷清清。

邓小平问:“聂元梓现在怎样?”

北大党委书记周林答:“她要翻案。”

邓小平:“她有什么可翻。聂元梓,为什么你们不批? 这个人至少应该开除党籍,调到别处去劳动。她有一张大字报,对文革起了推动作用,康生说王八蛋也要支持嘛!”

4 月 1 日,北京市委批准将聂元梓、孙蓬一及打人凶手贺彦生三人隔离审查。

4 月 7 日,北大校党委向市委报送《对孙蓬一的审查及处理意见报告》。《报告》提出将孙蓬一定为反革命分子,清除出党,并建议依法惩办。

4 月 8 日下午,北大校党委召开“批斗聂元梓大会”,孙蓬一陪斗。大会由党委副书记高铁主持。中文系教员成美,经济系教员杨勋,生物系党总支书记胡寿文,西语系教员郑培蒂在会上发言,揭发聂元梓、孙蓬一。孙蓬一不停地喊“毛主席万岁!”当时专案组有人同情孙蓬一,想给他递一个条子,告诉他只是陪斗,别喊了。但条子未能递成,会也开不下去了。

4 月 19 日,聂元梓、孙蓬一等人再次被押上设在东操场的批判台,接受北大以及北大以外的许多人的批判。批斗会的横幅已经成了“批斗聂元梓、孙蓬一大会”。这次公安把孙蓬一的下巴卸掉了,他无法再喊了。在会上揭发、控诉的有:华东师范大学代表夏鹤令,北大生物系毕业生、湖南临湘县 572 分校教员樊立勤,地质系教师王永法。党委副书记韦明在会上宣布:经上级党委批准,决定开除聂元梓、孙蓬一的党籍,开除聂元梓、孙蓬一、贺彦生的公职,建议依法惩办。宣布后,专政机关正式逮捕了聂元梓、孙蓬一、贺彦生。

1978 年 5 月 10 日,中央党校的内部刊物《理论动态》第 60 期,刊登了经胡耀邦审定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第二天,5 月 11 日,此文在《光明日报》公开发表,署名是:本报特约评论员。当天,新华社将此文作为国内新闻头条,转发全国。5 月 12 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等首都和地方好几家报纸转载。

不料 12 日晚上,时任“毛著办”副主任的吴冷西给《人民日报》总编辑胡绩伟打电话,口气极为严厉,说这篇文章理论上是错误的,政治上很坏很坏,是砍旗、丢刀子、非毛化。“砍旗”,是指砍毛泽东思想这面旗;“丢刀子”,是毛泽东批赫鲁晓夫的用语,说他把斯大林这把刀子丢了,列宁这把刀子也丢得差不多了。吴冷西用这个话,意思是把毛泽东这把刀子丢了;“非毛化”,是说这篇文章否定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犯了方向路线错误。

吴冷西指责《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提倡怀疑一切,提倡真理不可信、不可知,相对真理不存在,真理在开初的时候不是真理,要经过实践检验以后才是真理等,是完全错误的。他说,照文章作者的看法,“四人帮”不是修正主义,而是教条主义,不是歪曲篡改毛泽东思想,而是死抱着毛主席的教条不放,因而现在主要不应该反对“四人帮”,反对修正主义,而应该反对教条主义。他还指责,文章说要粉碎人们的精神枷锁,要反对只有“圣经”上说了才是对的,要冲破禁区,就是要冲破毛泽东思想。

吴冷西点出了这篇文章的政治目的,就是要冲破毛泽东的禁区。吴冷西的指责,等于将当时中央上层的矛盾公开了。

5 月 13 日,有更多地方党报转载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

准》。

5月17日,分管宣传工作的汪东兴在《红旗》杂志新老主编交接的会上说:“最近发表的《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和《贯彻推行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两篇文章,不够慎重。首先,发表这两篇文章是哪个中央同意的,要查一下。”他特别指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是针对毛主席来的。”

第二天,5月18日,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刚刚开始,中共中央宣传部长张平化就被汪东兴叫去。张平化从汪东兴哪里回来后,将参加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的各地代表团团长请到钓鱼台,就这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文章说:

“这篇文章,听说有两种意见。一种认为文章很好,另一种意见说很不好。我到现在也还没有完全摸透。大家可以看看,小范围可以议论议论,发表不同意见。不要因为《人民日报》转载了,新华社发了,就定论了,要提高鉴别能力。”

这实际上代表中宣部表了态,是启发动员大家发表不同意见,也就是来批评这篇文章。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如火如荼的真理标准大讨论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头版刊发《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6月2日,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讲话,提出“实事求是”

是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根本点,尖锐批评了“照抄照转照搬”,号召“打破精神枷锁,使我们的思想来个大解放!”

与此相对立的是,6 月 15 日,汪东兴在一次讲话时说:“‘实践标准’这篇文章,党性不强,要接受教训,下不为例,文章被‘帝修反’利用了,挑拨中央常委之间的关系。”“有人要为‘天安门事件’翻案。毛主席定了嘛,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事件嘛。还有人要翻‘516’的案,要把文化大革命的案也翻了,最坏的是矛头对准毛主席。”“批‘梁效’?北大是毛主席抓的点嘛,你们也要批啊?”

罗瑞卿同胡耀邦一起,指导哲学家吴江撰写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的长文,系统批驳了坚持“两个凡是”者的观点,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6 月 24 日,《解放军报》在罗瑞卿的直接支持下,以特约评论员名义发表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这篇文章。《人民日报》在同一天刊登,《光明日报》在第二天全文转载。

华国锋没有阻止“实践标准”讨论,但也没有表示要收回“两个凡是”。

7 月 4 日,华国锋同胡耀邦、谭启龙谈话,对“砍旗”的帽子有批评:“现在有一种苗头,动不动就说矛头对准谁,就说你要砍旗子。这样说,你叫人家怎么办呢?胡耀邦说,我们搞‘四不’(‘四不’即不戴帽子,不打棍子,不抓辫子,不装袋子)。有人爱整人,结果整到自己头上。”

7 月 21 日,邓小平找当时的中宣部长张平化谈话,告诫他“不要再下禁令、设禁区了,不要再把刚刚开始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向后拉”。

7 月 22 日,邓小平又找胡耀邦谈话。他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是马克思主义的。争论不可避免,争得好。引起争论的根源就是“两个凡是”。

接着,理论工作者采取开研讨会、撰写文章、讲演等方式,大力推进讨论的发展。特别是,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和人民解放军各大单位主要负责人纷纷发表谈话,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新华社和《人民日报》将这些高级领导干部的讲话作为重要新闻,连续报

道,影响巨大。

7月,汪东兴到山东,在同中共山东省委负责人的谈话中,提出“一不要砍旗,二不要丢刀子,三不要来180度转弯”。

8月18日,胡耀邦在中央党校介绍了一个情况:“王任重问华主席,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是怎么回事?华主席说,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要搞清楚,从团结的愿望出发,达到团结。”

9月16日,邓小平在东北视察工作时,再次批评了“两个凡是”的主张。

1978年9月,《红旗》杂志上任不久的副总编辑方克主动请缨写了一篇文章,题为《实践标准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础》。方克是想借此参与“实践标准”讨论,摆脱《红旗》杂志几个月来的被动局面。但是,总编辑熊复根据汪东兴“按兵不动”、“不准介入”的旨意,不赞成文章发表。后此文经反复修改,到了第三稿,题目改为《重温<实践论>》。文章批判不可知论、怀疑论、“海外奇谈”。所谓“海外奇谈”,就是指香港那边有人说,大陆现在非毛化了。《重温<实践论>》以此为靶子,旁敲侧击:“海外帝修反,说我们非毛化,挑拨中央常委之间的关系。”

《红旗》杂志的文章送到中央,叶剑英认为,既然有不同意见,建议中央开个理论务虚会,让大家把意见充分摆出来,经过讨论统一思想,解决问题。

叶剑英的这个建议,是受了同年7月到9月李先念在财经战线召开的务虚会的启发。

1978年8、9、10月,全国掀起了真理问题的大讨论。

# 第1435回：西单墙，召开中央工作会 发重炮，陈云提六个问题

1978年9月10日，停刊11年的《中国青年》杂志出版了复刊号。这一期《中国青年》突出的重点是呼吁为“天安门事件”平反。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革命何须怕断头》，报道了“天安门事件”当事人韩志雄的事迹。他因悼念周总理被捕入狱，多次被毒打，但他坚贞不屈，当审讯人员要他交代去天安门的动机时，他说：“我就是对你们批邓不满，我不相信邓小平是搞修正主义。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关心群众生活有什么罪？”

这一期《中国青年》还刊登了“童怀周”选编的《天安门诗抄》。

这一期《中国青年》还发表了由中宣部理论局副局长李洪林撰写，经中组部部长胡耀邦审阅的，以本刊特约评论员名义发表的题为《破除迷信，掌握科学》的文章。其中引用了毛泽东在1954年讨论第一部宪法草案时讲过的话：“我们除了科学以外，什么都不要相信。就是说，不要迷信。中国人也好，外国人也好，死人也好，活人也好，对的就是对的，不对的就是不对的，不然就叫做迷信。”文章第一次系统提出“要破除现代迷信”，这也让一些人理解为破除对毛泽东的迷信。

9月10日下午，中国社会科学院《未定稿》刊物编辑部的人到街上买《中国青年》杂志，回来说，“买不到，不准再卖了。”

原来，负责宣传工作的汪东兴当天即下令禁止这一期《中国青年》发行，强制收回已发出的刊物。查禁的理由是：1. 刊物中登载了一些1976年四五天安门运动的诗抄，有为“反革命事件”叫屈的嫌疑；2. 杂志里没有登载毛泽东的诗词；3. 杂志里没有登载华国锋的题词；4. 有一篇文章中提出了：要破除“现代迷信”，即破除对毛泽东的迷信——这也是刊物被禁的最主要原因。

一石激起千层浪。中国社会科学院《未定稿》刊物编辑部的人觉得：“‘天安门事件’被定为‘反革命事件’，至今仍未平反，现在《中国

青年》挺身而出,公开正面报道,现在又遭封杀,肯定遇到巨大压力。我们应该尽力支持,让广大群众看到这些文章,读到这些悲壮的诗篇,以产生更大的影响。”

于是他们立即到《中国青年》杂志编辑部买回一份《中国青年》,编辑部的李凌和王小强、王晓鲁三人把杂志拆开,一页一页贴在大张白纸上,并在重点文章和诗篇上加了鲜明的大红标记,以引起读者注意。他们又用红墨水大字写上一段按语,大意说:这是今天出版的《中国青年》杂志复刊号,不知为什么,街上买不到了,现张贴出来,供大家阅读,请大家评议。

他们将《中国青年》贴好后,张贴到哪里呢?

李凌的家当时在复兴门外三里河中国科学院北门外的地震棚里,他天天骑车上下班都要穿过长安街,看见北京西长安街和西单北大街交会处,西单路口东北面有一段西单体育场的约2米高、200米左右的灰色围墙,而且那里有几路公共汽车站,有许多人在那里上下车,来来往往的人很多,常常有人在这排矮墙上张贴寻人启事和小广告,引人注目,于是建议把这份《中国青年》贴到西单那面墙上去,大家都赞成。随后李凌骑上自行车,编辑部工作人员聂峙砥乘公共汽车,他们俩带着这份大字报和一桶浆糊、一把笤帚,来到了西单路口。一到那段墙下,李凌就赶紧刷浆糊,小聂急忙往上贴,很快就吸引了很多人来看。谁知这时两名戴着红袖章的持枪战士前来干涉,吆喝:“不准贴,不准贴!”有一个士兵的两只手像铁钳一样,紧紧地抓住李凌的双臂,命令说:“你们不能贴!”“你跟我到我们领导那里说清楚!”

这时围上来的人更多了,有些人对李凌他们说:“我帮你贴!我帮你贴!”于是,有人帮刷浆糊,有的帮聂峙砥贴,更多人则是把两个执勤战士和李凌围在中心,并对两个战士说:

“干嘛?干嘛?这些都是今天出版的《中国青年》杂志,下午就买不到了,贴出来让大家看,这又不犯法!”

有的高喊:“你们怎么随便抓人?放了他!放了他!”

在大家大声嚷嚷的时候,那个抓住李凌的双臂的战士稍微犹豫了一下,人们一拥而上,把他的双手拽开,有人低声对李凌说:“赶紧走!赶紧走!”于是李凌得以脱身,跑回家中。

第二天早上,贴《中国青年》的西单墙上又贴出一些新的大字报。这一下轰动了北京城,成千上万的人们涌到西单墙去看大字报。很多人读后在这个墙上贴出短短的大字报和长长的小字报,表示反对禁止发售《中国青年》。

《中国青年》复刊号被封杀,一时成了北京热议的话题,要求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的呼声越来越高。这一年10月以后,《中国青年报》、《人民日报》、《工人日报》先后发表了许多在“天安门事件”中与“四人帮”进行斗争的事迹。

对于正在进行的“实践标准”讨论,10月,汪东兴对《红旗》杂志负责人熊复说,《红旗》杂志要一花独放,“就是不表态”。当熊复反映因为《红旗》不表态而受到党内外广大干部群众责难时,汪东兴说:“你不要怕孤立。伯什么!不要伯。《红旗》不参加这场讨论。”

从1978年5月《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发表,至10月,在这5个月中,《红旗》杂志没有发表一篇有关“真理标准”问题的文章。短时间内,“实践标准”与“两个凡是”的尖锐分歧,迅速由京城传向了全国。

10月11日,贵阳诗人黄翔和其同伙李家华、方家华、莫建刚,在北京王府井大街原人民日报社门前的巷口和巷内两侧,将一百多张大字报一长溜贴开。两个谷箩大的字“启蒙”在一支火炬背景上出现,跳入人们的眼帘。人们一下子全围挤了过来,整个大街交通堵塞。应人们要求,黄翔即兴朗诵了他写于1969年的《火炬之歌》等六首诗,总称《火神交响诗》。人们手挽手地将他围在中间保护起来,有人问:

“你所指的偶像是谁?”

结果问话的人被围观的人群打得口鼻喷血。几十份油印刊物《启蒙》朝人群中撒去。

此事当晚即震动北京。

10月到11月,北京市委常委扩大会议召开。会上,关于天安门事件的平反问题又一次了提出来。

11月8日,新华社根据北京市公安局审查的结果,宣布“天安门反革命事件”完全是一宗冤案,在这次事件中被捕的388人,没有一人是反革命分子。

此时,党政军各部门、各群众团体的主要负责人共219人,接到了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通知。他们大多数是在文革中被批判或被批斗、打倒过的老干部,用当时的话讲,受过“迫害”。

11月10日,中央工作会议开幕,一切似乎没有什么不同。毛泽东和华国锋的标准像,悬挂在主席台的上方。会议期间,很多与会者晚上还饶有兴致地去观看主办者为大家放映的内部电影。

华国锋在开幕讲话中为会议确定了三项议题:一、讨论如何进一步贯彻执行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尽快把农业生产搞上去;二、商定1979年和1980年两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安排;三、讨论李先念在国务院务虚会上的讲话。接着,华国锋提出,在讨论这些问题之前,先讨论一个问题,就是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

华国锋慢条斯理地讲了一个多小时,其间三次离稿讲话。他讲了很多经济建设问题,讲了国内经济形势和国际的有利条件,还讲了要善于利用这种形势,吸收国外资金和技术。华国锋还批评了领导干部的官僚主义作风,以及机关存在的同现代化建设不相适应的问题。他举了一个例子,说上海申请进口一套设备居然要盖18个大印。他还说,我国经济工作中“笑话很多”,特别批评不重视市场竞争。

会议开幕后的第三天,11月12日,陈云在东北组的发言中提出了6个问题:

一、薄一波等61个叛徒案,陈云在延安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7年,深知这一案件内情,认定“薄一波等61人出反省院是党组织和中央决定的,他们不是叛徒”。

二、1937年和1940年,中央组织部相继做出决定,就是从反省院出来履行过出狱手续但后来继续干革命的同志,经审查可以恢复党籍。陈云提出,“这些同志不是叛徒,应该恢复党籍。”

三、陈云对陶铸以及王鹤寿案件提出尖锐意见:“这些同志,现在或者被定为叛徒,或者虽恢复了组织生活,但仍留着一个尾巴,例如说有严重的政治错误。……我认为,专案组所管的属于党内部分的问题应当移交给中央组织部,由中央组织部复查,做出实事求是的结论,这些结论都应该放到当时的历史情况去考察。像现在这样既有中央组织部又有专案组,这种不正常的状态应该结束。”

四、“彭德怀是担负过党和军队重要工作的共产党员,对党贡献很大,现在已经死了。过去说他犯过错误,但我没有听说过把他开除出党。既然没有开除出党,他的骨灰应该放到八宝山革命公墓。”

五、“天安门事件”。陈云认为,“这是几百万人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不同意批判邓小平同志的一次伟大的群众运动,而且在全国许多大城市也有同样的运动。中央应该肯定这次运动。”

六、康生的问题。陈云提出:“文化大革命初期,康生同志是中央文革的顾问,康生同志那时随便点名,对在中央各部和全国各地造成党政机关瘫痪状态是负有重大责任的。康生同志的错误是很严重的,中央应该在适当的会议上对康生同志的错误给以应有的批评。”

陈云的发言,可谓“十年不鸣,一鸣惊人”。倘若从1962年算起,陈云已经保持沉默14年了,除了1977年3月,他为了支持邓小平复出,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作了一次书面发言,但那次的发言没有在大会简报上登出。这次,陈云的发言终于在大会简报上登出,使全体出席者都知道他在东北组扔出的这6颗“重磅炸弹”。

其实,一些老干部对陈云“放炮”并不感到意外。中央工作会议之前,他们已就一些问题有过沟通。

张爱萍之子张品,时任王震的秘书。工作会议前,王震委托张品,就“61个叛徒”问题征求了张爱萍的意见。

当时,干部子弟经常充当老干部之间的联络员。张品是一个,叶剑英的侄子叶选基、儿子叶选宁,以及胡耀邦的儿子胡德平,都是当时十分活跃的“联络员”。

中央工作会议召开前后,陈云、耿飚、王震、王诤等老干部都有过串联。叶选基和这些老干部的子女们有着密切的联系,并担负着通告消息的任务。

此时,华国锋已经很难让会议按着他原来计划的轨道运行了。在陈云发言后的第二天,华国锋要求转入农业问题的讨论。可是,各组在讨论时,纷纷对陈云的讲话做出强烈回应。万里、王首道、康克清积极支持陈云的发言,要求迅速解决陈云提出的6个问题;胡耀邦发言要求把文化大革命中遗留的大是大非问题搞清楚;肖克发言要求为“二月逆流”平反;杨得志提出要为武汉“7·20”事件彻底平反;陈丕

显提出,上海“一月风暴”的问题要搞清楚;胡乔木就“少宣传个人,不搞新的个人崇拜”提出建议。

这些在党内很有声望的老革命家,接二连三地发出重炮,把华国锋轰得晕头转向。

正在召开的北京市委常委扩大会议会议作总结报告时,北京市委第三书记贾庭三讲话,每个代表都发了一份铅印的报告稿。讲到后来,贾庭三离开讲稿,从旁边拿出一张小纸条,念了一段关于天安门事件的问题:

“1976 年清明节,广大群众到天安门广场悼念我们敬爱的周总理,完全是出于对周总理的无限爱戴、无限怀念和深切哀悼的心情,完全是出于对‘四人帮’祸国殃民滔天罪行的深切痛恨,它反映了全国人民的心愿,完全是革命的行动,对于为此而受到迫害的同志一律平反,恢复名誉。”

这段话,虽然并没有出现“天安门事件”五个字,但三个“完全”的连续运用,实质上是否定 1976 年 4 月群众在天安门广场的行动是反革命事件的。

新华社北京分社社长周鸿书听了贾庭三念的小纸条的内容后,觉得这实际上是为天安门事件平反,感到很重大,就找总社国内部主任杜导正,把这个情况给他谈了,问能不能单独发表这一段。

杜导正看了稿子后,非常支持周鸿书的提议,表示“争取一下试试。”

回到分社,周鸿书在起草会议的新华社通稿时,考虑到:虽然杜导正支持单发,但还要经过北京市委同意才行,如果北京市委不同意单发,他担心关于这一段就发不出来了。所以,他在写稿子时,就把这一段放在稿子里,而没有单独写一条。但是,在送审稿时,他还要争取北京市委同意单发,因为杜导正也表示了这样的意见。

11 月 14 日晚,周鸿书将稿子送北京市委书记毛联珏审查时写了这样一段话,大意是:“此稿总社有关领导看过。关于天安门事件那一段,建议拿出来单发,要否?请您审定。”

夜里 23 时左右,毛联珏来电话说:“老周,你的稿子我看过了。如果就照这样来发,我这里通过了。关于天安门事件那一段单发,我定

不了,这得请示林乎加同志。”

他沉了一下又说:“恐怕林乎加同志也定不了。”

于是,周鸿书给总社打电话通知“照大稿子发”。随后,又给杜导正打电话,说明了毛联珏的态度。

杜导正沉吟了一会儿说:“那就算了吧。”

1978 年 11 月 15 日早晨,新华社北京分社社长周鸿书听新闻联播,没有他写的消息;翻阅报纸,也没有。他感到奇怪,总社为什么没有发消息?因为按照惯例,北京市委开会的消息,新华社应该在当晚就发出电讯稿。

原来,杜导正看了周鸿书的稿子后,觉得报道关于天安门事件的内容非常重要,但淹没在长长的报道里,不突出。他认为这是应该重点突出的内容,所以,就和国内部的几位副主任于明、冯健等商量,能否就这一段发一个电讯稿。

因为事关重大,国内部总编室将稿子送给穆青、李普审定。穆青、李普表示支持。穆青告诉杜导正,他和新华社社长曾涛商量后再做决定。

因为要商量,所以新华社的电讯稿也就没有在当天发出。当晚,穆青与在京西宾馆开会的曾涛通了电话,也觉得天安门事件这样重要的问题,被淹没在市委扩大会议的长新闻里太可惜了。两人取得一致意见。

11 月 15 日,《北京日报》刊登了北京市委常委扩大会议的报道,关于“天安门事件”的那段话,也在这个 4000 字左右的报道里面。

同一天,《人民日报》发表《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社论,社会上感到一种“解冻”的气氛。紧跟着,南京群众纪念周恩来而引发的类似北京天安门事件的“南京事件”宣布平反;吴晗的历史剧《海瑞罢官》也宣布平反。

这时,新华社国内部由杜导正主持开会,立刻讨论如何落实曾涛的意见。讨论来讨论去,觉得有两个方案,一个是按照周鸿书原来写的稿子发,但在导语里突出天安门事件的平反;一个是单发,但大家都有顾虑,担心通不过审查。到后来,北京分社社长周鸿书说:“我讲个馊主意,看行不行。今天的《北京日报》已经登了会议的报道,里面有

关于天安门事件的那一段。我们是否可以从报纸里把这一段抽出来单发。”

大家认为,这个主意还不错,既单发还不用送审,两全其美……杜导正最后拍板说:“做两个方案,一个是摘出来单发,一个是放在导语里,但要把老周的稿子调整一下,最后送给穆青来定。”

穆青拿到稿子后,就通知国内部做好发稿的准备。标题是正在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人民日报》总编辑胡绩伟写的。

在此期间,曾涛还征求过林乎加的意见。林乎加回忆说:“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曾涛对我说:我们新华社想把天安门事件单独发电讯,行不行?我回答说:我们的讲话是经中央批准的,你们怎么发,是不是要请示,是你们的事情嘛,我可没有权力干涉。”

与此同时,曾涛与穆青之间,也为是否请示中央这个问题,电话来往不断。穆青回忆说:

这中间,我们还商量要不要向中央请示。我们俩商量是,不能请示,一请示就完了,就等于给否了。曾涛同志给我透了个底,在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云同志和很多同志都提出来应该为天安门事件平反。这么多老同志,这么高的呼声,看来这么做没有错。只要我们胆子大一点,完全可以这么做。所以我们才最后下了决心。如果没有会议上的信息传出来,我也不敢下这个决心。所以,这个事情是当时中央工作会议和新华社的编辑部来回协商,最后下决心共同负责。

到晚上7点临发稿了,曾涛同志又打电话给我,说:怎么样,穆青?下决心就这么发好不好。我说:好啊,我们大家都同意这么发。

曾涛像是开玩笑地跟我说:如果这篇稿子出了问题要坐牢,你可得陪我一块去。我说:行,我跟你一块去。

那天,我整整担心了一晚上。但是,第二天也没有什么事,而且反映是一片欢呼。华国锋给《天安门诗抄》题写的书名发表出来后,我们心中的一块石头才落了地。

# 第1436回：发电讯，“天安门事件”平反 划时代，十一届三中全会

1978年11月15日新华社发消息，11月16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在头版头条发表了新华社电讯稿：

引题：中共北京市委宣布

主题：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动

副题：对于1976年清明节因悼念敬爱的周总理、反对“四人帮”而受到迫害的同志要一律平反，恢复名誉

这一新闻在引起了极大的轰动。

11月16日，北京吕朴，音乐家吕骥的儿子，以真名和联系地址在西单墙上贴出大字报：《致宗福先和于无声处剧组公开信》。这张大字报后来被誉为点燃西单民主墙的火炬。

同日，一份署名“机修工0538号”的大字报，批判毛泽东犯下的历史错误。接下来，就进一步出现了要求肃清专制余毒、要民主、要言论自由的大字报，形成了西单墙一时间大鸣大放的盛况。

西单墙大字报不断地贴出，墙前驻足观看的读者越来越多，有时达四、五千人。有人宣读、笔记、照相和录音，中外记者夹杂其中采访、摄影，外国人与中国人随便交谈。有人撕毁大字报，有人维护张贴权利。

11月25日，华国锋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宣布了9条决定：

1、关于“天安门事件”，他承认“问题解决得还不彻底，还没有为天安门事件的性质平反”，并且代表中央宣布，“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的群众运动，应该为天安门事件公开彻底平反”；

2、承认“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错误的”，撤销有关的全部中央文件；

3、为“二月逆流”平反；

4、为薄一波等61人平反；

5、彭德怀的骨灰放到八宝山革命公墓；

6、为陶铸平反；

7、为杨尚昆平反；

8、对康生、谢富治进行揭发批判；

9、“文革”中的一些地方性重大事件，由各地实事求是妥善处理。

25 日大会开过，当天晚上，于光远到卫生部部长江一真的房间，同他商量是否指名道姓地批汪东兴。他们认为汪东兴在粉碎“四人帮”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但是要讲“两个凡是”的提法和对它的坚持，对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抵制，对平反“天安门事件”和邓小平出来领导党和国家工作的阻挠，对解决“文革”中的冤假错案和康生问题的消极态度等等，汪东兴欠的账就很多很多……不把他的名字点出来，许多事情就讲不透彻，许多问题就说不明白。

25 日晚，西单墙前出现了自发组织的“民主讨论会”。

11 月 26 日，邓小平接见日本社会党委员长佐佐木良时说：“写大字报是我国宪法允许的。我们没有权力否定和批判群众发扬民主，贴大字报。群众有气让他们出气。群众的议论并非一切都深思熟虑过的，也不可能要求完全正确，这并不可怕。”

11 月 26 日，中共中央转发湖北省委、省革委会、武汉军区党委《关于处理武汉“七·二〇事件”的请示报告》，为武汉“七·二〇事件”平反。

11 月 26 日，胡乔木在中央工作会议的东北组发言，希望华国锋在会议结束时讲一讲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算是对会议做的结论。他说：“真理标准问题本来是一个理论问题，但也是政治问题。”

于是，华国锋关于会议议程的安排又一次受到影响。代表们纷纷提出，大会暂不讨论经济问题，应该先讨论思想路线问题。这么一来，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一下子成了大会的中心议题。

就在胡乔木发言的同一天，时任卫生部部长的江一真在西北组发言时，指名道姓地批评了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的汪东兴。

随后，杨西光、于光远也批评了汪东兴坚持“两个凡是”、阻挠邓小平复出、压制真理标准讨论。

江一真揭发汪东兴在 1976 年 12 月说：“邓小平的那两下子，不是

试过了吗？就是不行嘛！”

杨西光也揭发了汪东兴一系列讲话的具体内容。比如，1978 年 5 月 17 日，汪东兴讲话说：“理论问题要慎重，特别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等文章，我们都没有看过。党内外议论纷纷，实际上是把矛头指向主席思想。我们党报不能这样干。这是哪个中央的意见？”

他们的发言在会议《简报》上登出后，其他各组也有人公开批评汪东兴。《人民日报》总编辑胡绩伟就是其中一个，他对事情发生的经过很了解，所举材料更为具体。在他发言之后，批评这位副主席的人更多了。

华国锋当时让大家敞开讲话，简报该登就登。当时最长的一份简报 42 页，整个会议出了 400 多份简报，放在地上有一米多高。

为让大家打消顾虑、畅所欲言，服务员一律不让进入会议室。以往都是由服务员给大家倒水，这次会议，主办者给每个会议室准备了两个暖水瓶，与会者自己倒水。秘书也不让听会，都站在会议室外面的楼道里。

11 月 27 日，邓小平在会见美国专栏作家罗伯特·诺瓦克（Robert Novak）时对民主墙涉及到重大问题公开表态。他说：“没有毛泽东就没有新中国”，并强调自己不是赫鲁晓夫，不会贬低毛泽东。他还否定了外界传闻的他与华国锋的矛盾，表示不赞同大字报对毛泽东的评价，也表示自己不会当总理。但对大字报、对群众的民主诉求，他表示理解和容忍：“这是正常的现象，是我国形势稳定的一种表现。”又说，“写大字报是我国宪法允许的。我们没有权利否定群众发扬民主，贴大字报，群众有气让他们出气。群众的议论，并非一切都是深思熟虑过的，也不可能要求都是完全正确的。这不可怕。”

谈话当晚 19 时，在西单墙前六、七千人集会，听取诺瓦克的朋友传达的邓小平与诺瓦克的谈话。随后集会群众从西单游行到天安门，在纪念碑下开会庆祝邓小平副主席支持西单民主墙。

第二天，28 日，邓小平的讲话，新华社做了摘要报道，接着全国各大报刊刊登。天安门广场再次集会，人数逾万。

捂得捂不得

西单民主墙

12 月 1 日晚上,邓小平和李先念找许世友、李德生、杨易辰、王恩茂、任仲夷、万里、陈丕显、段君毅、胡立教等人谈话。邓小平知道这些人对陈锡联、纪登奎等有比较大的意见,担心他们对陈锡联、纪登奎揪住不放。因此表示:像“天安门事件”、“720”事件等是要做出处理的,但是只能搞粗,不能搞细。一搞细就要追,追就会产生不利的效果。他说,找他们谈话是和他们谈判。邓小平说得很恳切,说这也可以“算我一个请求,要以大局为重”。他说,他是有意识地、自觉地和稀泥。稀泥必须和,有意识地和,否则不利;只有和稀泥,才是正确的。他说国内需要一个安定团结的局面,凡是有损于这个,给人以错觉,极为不利。邓小平说,常委意见,任何人都不能下,只能上,不能下。他讲这次会议在人事方面会有变动,对那“几个犯错误的同志”要批评,但不能动,现有的中央委员,一个不去,有的可以不参加会议活动,但不除名,对那些有意见的人,让他过关算了。

12 月 6 日,北京电工魏京生在西单民主墙贴出小字报:《第五个现代化:民主与其它》。魏京生认为自由民主比改善生活更重要,要求反省毛泽东的个人独裁和将政治民主化。这份小字报引起很大的反响。

西单墙大小字报的内容很多,有蒙冤受屈者的申诉,有批评建议,有揭发恶人丑事,有新闻消息。在最初的几个月,西单墙的大小字报

绝大多数的内容以申冤诉苦为主,只是就事论事,不大涉及政治内容。很多人到这里来,主要是为了发泄自己的怨情,寻找翻身解放的机会。

后期主要是政论。其中讨论最多的是民主与法制的问题。主要有以下几点:

1、从总结历史经验的角度来探讨社会民主问题。

2、主张民间办报、民主办报的问题。

3、要求言论自由,废除“恶毒攻击罪”的问题。

4、赞赏推崇西方民主的问题。

5、公开评毛泽东功过的问题等等。

形式各异,优劣参差,署名、笔名、匿名不一而同。。

北京在西单墙的活跃激发下,大中专学校和社会上一些青年们自发组织起来,兴办起自己的民间组织,出版自己的民间刊物,发表自己的政见、理想与追求,并不断地将它们张贴在西单民主墙上,或者散发给来往的群众,或者寄往外地的院校。仅北京就有 50 多种非官方刊物发行。来这儿的人越来越多,在北京的外国留学生和记者也跑到这里,采访并与行人和粘贴文稿者交谈,并向国外通讯社发送消息,这引起了中国公安部门和高层的注意。

与此同时,北京大学三角地也出现了北大民主墙。

1978 年 12 月 13 日,华国锋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式上的讲话中承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汪东兴也在这一天做了书面检讨。

华国锋说,1977 年 3 月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所讲的关于“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都必须拥护;凡是损害毛主席形象的言论,都必须制止”,这些话讲得绝对了。

他还说,1977 年 2 月 7 日中央“两报一刊”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的社论中,也讲了“凡是毛主席的决策,我们都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这“两个凡是”的提法就更加绝对,更为不妥。

华国锋承认,“两个凡是”在不同程度上束缚了大家的思想,当时对这两句话考虑得不够全面,现在看来,不提“两个凡是”就好了。

此外,华国锋还讲了一个集体领导的问题。他说:“希望今后各地区各单位向中央作请示报告的时候,文件的抬头不要写华主席、党中

央,只写党中央就可以了。中央党政军机关向下行文,也希望照此办理,也不要提英明领袖,称同志好。”

华国锋在讲话中说,中央政治局同意叶帅的建议,决定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专门召开一次理论务虚会。

12 月 13 日,邓小平在闭幕式上作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邓小平文选》收入这篇讲话时作了这样一个注释:“邓小平同志的这个讲话实际上是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

邓小平讲话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解放思想是当前的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他说:“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

第二个问题是“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条件”。他说,“当前这个时期内,特别需要强调民主……现在敢出来讲话的还是少数先进分子。我们这次会议先进分子多一点,但就全党、全国来看,许多人还是不那么敢讲话。”“在党内和人民内部的政治生活中,只能采取民主手段,不能采取压制、打击手段。”“群众提了些意见应该允许,即使有个别心怀不满的人,想利用民主闹一点事,也没有什么可怕。要处理得当,要相信绝大多数群众有判断是非的能力。一个革命政党,就怕听不到人民的声音,最可怕的是鸦雀无声。现在党内外小道消息很多,真真假假,这是对长期缺乏政治民主的一种惩罚。”“人民群众提出的意见,当然有对的,也有不对的,要进行分析。党的领导就是要善于集中人民群众的正确意见,对不正确的意见给以适当解释。对于思想问题,无论如何不能用压服的办法,要真正实行‘双百’方针。一听到群众有一点议论,尤其是尖锐一点的议论,就要追查所谓‘政治背景’、所谓‘政治谣言’,就要立案,进行打击压制,这种恶劣作风必须坚决制止。”

他特别强调:“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

关于经济的部分,他认为,“我国的经济管理体制权力过于集中,应该有计划地大胆下放”,“当前最迫切的是扩大厂矿企业和生产队的

自主权”,这就是中国上世纪80年代初期改革的指导思想。

这时,中共的“第一提琴手”,名义上虽然还是华国锋,但实际上已经是邓小平。

叶剑英在闭幕会上充分肯定了这次会议,他说:“这次会议的民主精神是我们党很多年来没有过的。……实行这样充分的民主,确实是一个很好的开端,带了头。”“一定要永久坚持,发扬下去,一定要推广到全党、全国去。”

他还说:“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体现了我们党内的民主,西单民主墙体现了社会上的民主,这些民主精神都要发扬,我们要在全党、全国造成真正民主的空气,使广大干部群众精神振奋、心情舒畅。”

12月13日,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但并没散会。与会者继续分组讨论了两天,会议到15日才结束。3天后,12月18日,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举行,从此拉开了中国经济改革的历史巨幕。

全会的具体议程是讨论通过中央政治局关于从1979年1月起提出的,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建议,同时审议通过关于农业问题的两个文件和今后两年国民经济计划安排,讨论人事问题和选举成立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

在三中全会上,叶剑英说:“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党内民主的典范,西单民主墙是人民民主的典范”这句话,后来在三中全会文献出版时被胡乔木删去。

与此同时,陈云特别指示《人民日报》派记者深入到西单群众中去了解动态,收集情况,反馈中央。

胡耀邦则表态道:西单的大字报是人民出自内心的呼声,是人民新的觉醒。

1978年12月21日,《人民日报》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人民万岁》。

文章开头就引述革命导师恩格斯的一段名言:“把革命的发生归咎于少数煽动者的恶意的那种迷信时代,是早已过去了”,大规模群众运动只能“是人民的要求和需要的自发的不可遏止的表现”。

“(天安门)运动发生之前,并没有谁来号召,谁来动员,谁来组织,

也没有谁来事先确定斗争的目标,拟定斗争的纲领,准备斗争的旗帜。人民群众既是这场运动的勇敢战士,又是杰出的组织者和指挥员。”

文章认为,我们的国家在革命胜利后仍然存在着“封建主义的残余势力”,存在着“反人民、反民主”的势力:

“‘四人帮’馨香祷祝的所谓‘社会主义’,原来只是涂着社会主义色彩的彻头彻尾的封建主义。”

文章接着写道,除了“四人帮”,还有一些共产党员和国家干部“在人民赋予他们权力之后,不是用这种权力来维护人民的利益,而是一味追求自己的锦衣玉食和高楼大厦,企图剥夺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甚至对人民进行压制、打击和迫害”,“人民就有权抛弃他们”。

文章号召:人民群众需要“坚持不懈地进行争取和保卫人民民主的斗争”“人民的民主权利,靠人民用自己的斗争去争取和保卫,而不是靠什么神仙皇帝来恩赐。”

文章为天安门所代表的民众力量觉醒和崛起而欢欣鼓舞,乐观地展望民间力量是新中国的希望所在:

“他们不仅鲜明地提出了自己的政治要求和经济要求,而且尝试着按照自己的方式、自己的手段、自己的步骤来推动实现这些要求的社会变革,尝试着给整个革命发展的进程打上自己的烙印。”

这篇文章是由胡耀邦策划,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副主任林涧青主笔,中央党校的阮铭参与撰写的。没想到,《人民万岁》见报后,立即受到邓小平的批评!

22 日晚,十届三中举行闭幕会,通过《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等文件,陈云、华国锋发表讲话,会议闭幕。

# 第1437回：务虚会，锋芒直指毛泽东 五否定，邓小平“看不下去”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如何评价“文化大革命”及这一时期的人和事，如何处理林彪、江青两个集团？当时曾经有两种认识：一种认为仍然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另一种认为完全是林彪、江青野心家集团的犯罪内乱，只能通过审判处理。

陈云认为：首先，要把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动机和后果区别开来。他说：“关于对‘文化大革命’的估计，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主要是为了防止中国变修，出现像赫鲁晓夫那样的事件，最初也不是要搞那么大。这个问题需要作一个总结，总结时要很慎重，要把林彪、‘四人帮’等人的破坏作用估计进去。”

1979年1月4日，陈云在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说：“我们党从1921年成立至今快58年了。是毛泽东领导我们取得了伟大胜利。邓小平对毛泽东的功绩概括得很清楚，他说：‘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没有毛主席，我们党很可能还在黑暗中苦斗。’民主革命胜利后，‘恢复经济和社会主义改造都很成功’，但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也有缺点、错误。要求革命领袖没有缺点、错误是不可能的，是空想。”

1月8日，周恩来逝世三周年纪念日，北京维权上访女工傅月华率领数千名上访群众，到天安门示威游行。他们手持白色床单做成的横幅，上书“反饥饿、反迫害、要民主、要人权”。

第二天，1月9日晨，傅月华被逮捕。《探索》、《四五论坛》、《中国人权》开展呼吁释放傅月华的抗议活动。

随着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唯一标准讨论的开展，西单民主墙大字报揭示的问题也越来越尖锐，越来越涉及敏感的禁区，出现涉及抨击共产党和现行制度、攻击中共领导人的内容。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对此做出了新的规定，要求大字报张贴者必须在张贴处的登记处如实登

记姓名、单位、住址等内容。登记处对大字报不加审查。张贴者应对大字报的内容负政治、法律责任。大字报张贴处禁止无理取闹、寻衅滋事。

1 月 9 日,刚担任中宣部部长不久的胡耀邦主持召开中宣部部务会议,正式确定了理论工作务虚会的议程,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由中宣部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联合召开,邀请中央和北京理论宣传单位 160 多人参加,各省市派来 1 位联络员。第二阶段,以中央的名义召开,邀请各省市的有关人员参加,规模扩大到四、五百人,改名为“全国理论工作务虚会”。

1 月 18 日,理论工作务虚会开幕,胡耀邦作“引言”报告。这份“引言”报告,胡耀邦会前曾送中央政治局常委审阅,并写了一封信。信中写道,第一段会主要是大家讨论、小组座谈和大会发言相结合,让大家把思想敞开,畅所欲言;第二段会请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等人到会讲话,引导大家集中讨论解决思想理论战线迫切需要解决的一些重要问题。先民主后集中,把思想统一起来,促进全党工作重心转移之后的理论工作做得更好。

胡耀邦的“引言”稿和信很快得到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同意。他在“引言”报告中说:

“我们召开这一次理论工作务虚会,要达到什么目的呢?第一,要总结理论宣传战线的基本经验教训。……建国三十年,理论宣传战线有许多好的经验,也有许多教训,要把这些正反两方面的经验都总结起来,……。第二,要研究全党工作重心转移之后理论宣传工作的根本任务。”

胡耀邦激情洋溢,挥舞着拳头,要求“冲破一切禁区”、肃清林彪、“四人帮”的“理论恶霸作风”。他的引言报告话声刚落,周扬就从邓小平家里匆匆赶来,传达邓小平的指示:“不要设禁区,不要下禁令。”

接下来是小组讨论。会议第二天,1 月 19 日,《人民日报》总编辑胡绩伟在第一组的小组会上宣读了他和《解放军报》总编辑华楠、《光明日报》总编辑杨西光、新华通讯社社长曾涛、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于光远、中央编译局负责人王惠德 6 人的联合发言:《关于真理标准讨论的情况》,长达两万余言,从十个方面批判坚持“两个凡是”的言论和

行动。

之后,各组都据此向会上的“凡是”派发难。一天之内,便掀起了揭发批判“两个凡是”的高潮。接下来就天天盯着“凡是”派,要他们检讨、交代。连主管全国理论宣传新闻出版工青妇等工作的汪东兴也被牵扯出来。会议开到后来,有人甚至提出要汪东兴到会上来说清楚。

接踵而来的就是批判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否定毛泽东。

王若水一马当先,在会上作长篇发言,题目是《文化大革命的重要教训是必须反对个人迷信》,公开批评毛泽东,甚至从道德、人品上谴责毛泽东。

接着,与会者从个人崇拜的表现、危害、理论和历史根源,直到个人崇拜的历史观基础,一路扫荡过去。什么语录歌,忠字舞,早请示,晚汇报,“万岁万岁万万岁”,“一句顶一万句”,“句句是真理”,“几百年出一个”,“顶峰”,“最最最”,“三个里程碑”,“四个伟大”,所有当时大家耳熟能详的东西,统统都在被批判之列,与会者感到痛快淋漓。当然,此刻他们是不会反思在他们认为的那个个人崇拜年代,自己是怎样表现的?又是怎样推波助澜的?

对个人崇拜的声讨同样也涉及到华国锋新的个人崇拜,北京大学外国哲学研究所的张显扬在会上做了题目为《从<东方红>到<交城山>》的发言。

《交城山》是山西的一首民歌,后来改了词,变成专门歌颂华国锋的歌。张显扬认为,《东方红》最初是陕北一个老农李有源的口头创作,作为农民的一种感情表达,没有什么不可以。可是,几十年来官方把它作为标准的颂歌,作为一种程式,每逢大会必唱。张显扬把《东方红》跟《国际歌》做了对比,说:

“《国际歌》说,‘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东方红》说,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是人民‘大救星’,完全是两种思想体系。毛泽东自己说过,《国际歌》是历史唯物主义。既然如此,他就应该拒绝‘大救星’、‘万岁’之类的历史唯心主义的歌功颂德、阿谀奉承。但是,他却非常欣赏。”

显然,张显扬的看法是片面的。《东方红》作为中国正式场合的颂

歌是不争的事实,但是没有任何官方将它作为正式场合标准的颂歌。将《东方红》作为正式场合标准颂歌的恰恰是广大群众,包括张显扬自己在内。而毛泽东对此是屡屡表示反对的。但此时,毛泽东的反对在与会者眼里已经都是虚假的了,他们将这一切都推到了江青、林彪、毛泽东的身上,似乎与张显扬他们自己没有任何的关系。

对个人迷信,一位与会者举出一个例子,说粉碎“四人帮”后他在某省见到了这样一件事:一天省城街上突然出现了游行队伍,锣鼓喧天,十分热闹。上街一看,原来是各单位到省委去迎接新发行的华国锋的画像。据说,华国锋的画像是由飞机运到省城,省委领导人已从机场迎回。这种迎请华主席画像的情况大致是这样:去时,各单位领导人站在队伍的最前面,抱着空镜框,回来时把画像放在镜框里面,抱着率队归来。一时之间,满城都是迎请画像的队伍。这位与会者最后慨叹道:“想不到我们党竟沦落到这个地步,连某些迷信团体也做不出来的事情我们却公开做出来了!”

随之而来的是批判毛泽东晚年极左的思想、理论、指示和决策,诸如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阶级和阶级斗争理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全面专政理论,走资派,党内资产阶级,等等。所有这些曾被认为是毛泽东对马克思列宁主义伟大贡献的东西,全都受到批判。

历史学家黎澍这样谈毛泽东本人的思想变化状况:“毛主席本人思想在变化。他在《论联合政府》和七届二中全会上都说过,全国解放以后,要保存资本主义一个阶段,并要让它有所发展。还说过,要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废墟上马上建设起社会主义是空想。可是不久他又说: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资产阶级必然要走资本主义道路,党内也会有一部分人借口中国落后需要让资本主义有一个发展,这也就是后来所说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新的社会制度一产生他就想超越经济自然发展阶段,这样也就带来了严重的问题。我们的社会主义搞成了贫穷的社会主义,还说贫穷能更快进入共产主义。”

经济学家许涤新也说了这样一段话:“三大改造后,对于如何搞社会主义,毛泽东同志和党内许多领导人的思想是不一致的。看来,毛主席他老人家在三大改造后认为在他的坚强的意志之下,中国是可以

很快进入共产主义的,于是就来了个‘大跃进’,大炼钢铁,吃饭不要钱,等等。但是国民经济却因此出现了极大的困难。看来,毛主席在‘大跃进’失败之后,就认为许多老党员、老干部,不能适应他的很快进入共产主义的思想,认为这些老家伙是修正主义,因此,反右倾,搞‘四清’,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接踵而来。……是不是可以说,十年‘文化大革命’的破坏,是主席他老人家唯意志论发展下来的结果?既然唯意志论成了主导思想,那么还有什么客观规律呢?他老人家是不考虑客观规律的。他心目中的平均主义就是共产主义。为了急于消灭三大差别,竟然要知识分子丢掉知识,丢掉科学文化。毛主席在哲学、政治、军事、诗词等方面有伟大的成就、功绩,就是不懂经济。”

会上对毛泽东思想是否包含错误的问题,有不同看法。有一种意见认为,正确的是“毛泽东思想”,错误的是“毛泽东的思想”,或“毛泽东的晚年思想”。许多人不赞成这种意见,认为毛泽东思想本身就是一分为二的,里面有正确的东西,也有错误的东西。

会议的发言已不回避公开指名道姓地评论毛泽东。

对新中国成立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与会者也提出质疑,认为反右派、大跃进、反右倾、四清、文化大革命,统统都是毛泽东左倾路线的产物,因此造成的冤假错案,都应该彻底平反。特别是文化大革命,被批得最凶。

第三组副组长、中央编译局负责人王惠德说:“现在全党面临着一个重新认识的问题。建国快要30年了,现在还有两亿人吃不饱饭。面对这种情况,全党、全民都在思考:我们一定是在哪里出了毛病。这个重新认识的要求是阻挡不住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搞理论工作的同志麻木不仁不思考,不去研究是不行的。”

该组组长周扬接着说:“首先有个对‘文化大革命’的定性问题。结论当然要由中央来做,但在理论上,我们必须弄清楚。究竟是出了林彪、‘四人帮’几个野心家、阴谋家造成的,还是在路线、理论上有问题?‘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是否存在着问题?这个问题不搞清楚,‘两个凡是’的问题也就搞不清楚。如果这个理论站得住,在这方面讲‘凡是’也许还可以;如果这个理论有问题,那就更不能‘凡是’了。过去,我们很多人都是‘凡是派’,现在‘凡是’不下去了。‘无

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是个根本问题,这个问题涉及到毛泽东同志,只有这个问题解决了,'文化大革命'的定性问题才能解决。随着,'两个凡是'的问题也不必争论就可以得到解决。"

会议还提出为要文革前的"十七年"正名。与会者认为:"四人帮"认为十七年许多领域都是"黑线专政",这是为发动文化大革命提出的最重要的论据。为了驳斥"四人帮",就要为十七年正名。大家举出许多事实证明,十七年都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统治,并无所谓"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可是,与会者是否想过,既然十七年都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统治,为什么还发生了那么多他们认为是错误的政治运动呢?既然十七年发生的政治运动统统是毛泽东左倾路线的产物,那又为十七年正什么名呢?而此时,狂热的与会者们已经顾及不到这些了,只要是涉及到毛泽东的,就都是错误的,都要反。

关于对外政策和防修反修,国际问题专家宦乡,从国际论战谈到国内的"左",直接批评"九评"。他说:

"20 年国内'左'倾思想的发展,同一定的国际条件也有关,特别表现在国际共运的论战中。当然,别人干涉我们的内政,或者企图损害我们的主权,进行反击是对的,可是当时的论战却大大加强了国内'左'倾思想的发展。尤其是因为苏联批评我们的'大跃进',我们就更发誓要比苏联更早进入共产主义,并且毫无根据地怀疑有些中央领导人暗中与苏联通气,因此加强了国内反右斗争。'九评'所提出的观点,有的已经'左'得不能再'左'了,尤其是《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吗?》和《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这两评,前一评是根本错了,斯大林说南斯拉夫不是社会主义国家而是修正主义的典型,赫鲁晓夫把它平反了,并亲自登门道歉,而我们却出来维护斯大林的无理判决,轻点说也是干涉别国内政。现在虽然已平反,但提到的错误观点及其影响尚待清理。这篇文章的文风也特别坏,东拉西扯歪曲利用人家的片断材料,无限上纲。这篇文章听说主要由王力起草,是王力的'名著'。'九评'对国际国内都有比较大的影响。对国内来说,从'九评'可以看到提出'走资派'的由来和发展,可以看到我们是如何从批判苏联的'奖金挂帅'和南斯拉夫的'市场经济'中发展我们的'政治挂帅'、忽视经济规律、忽视发展生产力的,也

可以看到我们是如何从支持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搞个人迷信而又转到提倡个人迷信的,林彪、康生、‘四人帮’利用这一点大售其奸。而‘两个凡是’实际上就是去鼓励继续搞个人迷信。”

“九评”是指20世纪60年代中央为反击苏共对中共的攻击,由特别组织的中央反修领导小组撰写的九篇论战文章,在当时的国际共运中有相当的影响。中央由邓小平负责,每篇均由中央书记处讨论通过。

会上还提出一连串问题:什么是修正主义?什么是社会帝国主义?苏联怎么是社会帝国主义?赫鲁晓夫怎么是修正主义?等等。并以肯定和同情的态度讲到南斯拉夫,说南斯拉夫是最先思想解放,突破禁区,摸索了一条自治社会主义道路,难能可贵。与会者还对赫鲁晓夫的经济改革,作了肯定的评价。总之,凡是毛泽东反对的,他们都要肯定。当然,与会者们都没有能够像毛泽东那样,预见到后来苏联的解体和铁托逝世后,南斯拉夫的分裂。

关于政治体制改革。严家其讲了废除终身制问题,李洪林讲了个人崇拜在制度上的危害,北师大的齐振海讲了民主是社会主义国家没有解决好的一个重大问题。齐振海说,因为没有民主,才使广大党员、人民30年来遭受多次大的政治迫害;反右派、反右倾、四清、文化大革命,都是因为制度不民主造成的,一个人决策,怎么能不犯错误?他还说,中国的“选举”被搞得声名狼藉,一定要给真正的选举恢复名誉。不搞选举,哪来民主?会上还对原来一直批判的资本主义国家提倡的自由、民主、人权、法治、人道主义等等作了肯定的评价。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一人提出建议:中央应将建国以来的历史经验,像40年代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一样,做一个总结,通过总结,弄明是非功过,统一对毛泽东的评价。

# 第1438回：形势变，取缔西单民主墙 写《决议》，河南刘建勋撤职

对理论务虚会的情况，中央书记处研究室主任邓力群认为："会开的时间越长，发言越多，离谱的东西就越多。最突出的是王若水，他否定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本人，从毛泽东的个人品质上，要连根拔掉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

胡乔木说："这个会越开越不像样，这个也否定，那个也否定。归纳起来就是五个否定，即否定社会主义、无产阶级专政、党的领导、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

邓小平说："看理论务虚会的简报，越看越看不下去。"

邓小平让胡乔木为他起草一个讲话，针对会里会外发生的一切，讲讲应坚持的原则。

1979年3月6日，陈云在会见马来西亚共产党总书记陈平时，专门谈到关于对毛泽东的评价问题，他说："'文化大革命'不能说毛泽东没有一点责任，但我们对毛泽东的评价不会像赫鲁晓夫对斯大林那样。在这个问题上，要平心气和，要掌握分寸，慎重考虑，不能感情用事。这不仅是中国的问题，也是世界的问题。"

1979年3月，任畹町等人在西单民主墙贴出《中国人权宣言》。

3月22日，《北京日报》发表《人权不是无产阶级的口号》一文。

3月25日，魏京生在西单民主墙贴出大字报：《要民主还是要新的独裁》，指名道姓批评邓小平"走的是独裁路线"。

理论工作务虚会原计划闭幕时华国锋的讲话是由李洪林起草的，务虚会一开始，胡耀邦和胡乔木就把他叫去，胡耀邦讲了一个大要，胡乔木说了详细的提纲，主题是继续解放思想，促进改革开放。会议第一阶段休会前，李洪林就把稿子打印出来交上去了。但是最后，华国锋不讲了，改由邓小平到务虚会去作总结讲话。邓小平的讲话稿起草工作由胡乔木主持，成员有宋振庭、吴江、李洪林、滕文生。

3 月 27 日,邓小平同胡耀邦、胡乔木等人谈话时,集中谈了讲话稿要表达的思想。他明确指出:四个坚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现在该讲了。他要求讲话稿要结合分析当时出现的几个非法组织的活动来讲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民主”,以动员群众同坏人作斗争。

3 月 28 日,理论务虚会第二阶段开始,原计划开 10 天,实际只开了 7 天。

3 月 29 日,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发布通告,明确指出:凡是反四项基本原则、泄露机密、违反宪法和法律的标语、海报、大字报、小字报及书刊、画册、唱片、图片等,“一律禁止”。

同日,中共中央转发公安部党组的请示报告,确认全国 87 个自发组织中,有 7 个组织:北京的“探索”、“中国人权同盟”、“兴中会”,上海的“社会主义民主促进会”、“上海民主讨论会”、“振兴社”和贵州的“解冻社”,“都是有极少数坏人控制、把持的”,“他们从纲领、口号到具体活动,都是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反对共产党领导,反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中共中央的处理意见是,打击首恶分子,分化和瓦解这几个组织。

当天,北京市公安局发布六条通告,禁止“妨碍交通的集会、游行”;“冲击党、政、军机关和企业、事业单位”;“造谣惑众,煽动闹事”;“拦截车辆,无票乘车”;“任意张贴和涂写标语、海报、大小字报”等活动。

《通告》发出后的当天,北京市公安局立即逮捕魏京生和陈吕。魏京生被捕的直接理由是出卖中国军事情报,“把我军毙伤越军一万多人的战报及自编我军指挥员名单、战略意图等资料,以 20 元人民币卖给外国人”。

3 月 30 日,邓小平在理论工作务虚会上作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长篇讲话。讲话后,各组进行讨论。与会代表都纷纷表态,认为这个讲话“非常重要”,表示“听后受到很大教育”。但不少代表也对报告中的一些提法提出修改意见或要求补充一些内容。比较集中的意见是:报告只强调反对右的一面,很少提到反对“左”的一面。对坚持“两个凡是”,甚至怀疑、否定和反对三中全会方针的错误思潮,也应

给予坚决的批判。报告后,就有人议论:中央现在“收”了,“转”了,“纠偏”了,务虚会第一段错了,等等。与会者建议报告对于三中全会前后思想路线论战的历史意义和务虚会在分清两条思想路线方面所做的工作、所起的作用,应予足够的评价。

4月3日,理论工作务虚会结束,胡耀邦作“结束”讲话。除了邓小平报告外,原定华国锋和叶剑英的讲话都取消了。

4月4日,“中国人权同盟”负责人任畹町在西单民主墙张贴大字报时,被便衣警察当场逮捕。

同时,数百人开始洗刷全城的大字报。除指定保留的西单大字报区外,天安门广场东侧、东长安街、王府井大街、前门大街、北京站和台基厂一带的街头标语大小字报均被洗刷干净。

全国和各省也开始采取相应措施,清洗大字报和封闭民办刊物。上海“民主协会”、“民主讨论会”、“人权委员会”共有十多个成员被捕。贵阳“解冻社”成员全部被捕,后来又全部释放。不过在87个自发组织中,除了认定有问题的7个外,多数自发组织,包括一些有重要影响的如“北京之春”,并未列入其中。对认定的7个组织的处理也留有余地,特别指示“不要把它们定为反动组织”。一些被拘捕的活动分子,经“教育”后又被释放。

6月18日至7月1日,在北京召开的五届二次人民代表大会讨论取缔西单民主墙的问题。胡耀邦在五届人大二次会议上表示:“我始终支持任何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希望大家都在宪法的保护下享有最大的自由。尽管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以及在这次人大会议上,不少同志点名也好或不点名也好,批评我背着中央、支持违反‘四项基本原则’的所谓民主化运动,助长无政府主义,但我仍要保持我自己的看法。”

对于魏京生的被捕,胡耀邦说:“我奉劝同志们不要抓人来斗,更不要抓人来关。敢于大胆提出这些问题的人,恐怕也不在乎坐监牢。魏京生抓了三个多月,他一死就会在群众中变成烈士,是人人心中的烈士。”

此照片拍摄于1979年9月3日北京西单民主墙前的人行道

自从“四人帮”被抓捕之后,华国锋就明确表示,与“四人帮”的斗争是敌我矛盾性质的斗争。既然如此,应该怎样处置“四人帮”呢?

随着真理标准的讨论,理论工作务虚会的召开,西单民主墙的传播,中国民主与法制的呼声越来越高。许多在文革中受到过审查的老干部对在专案组,或在批斗他们时不容他们分辩的作法深恶痛觉,他们认为,应该改变文革中的做法,依法办事,按照法律程序审判他们。他们觉得,这样做,不仅可以在政治上彻底打倒“四人帮”,还可以树立依法治国的榜样。

这时,人们突然发现,既然是依法审理,那么,依什么法?法在哪里?因为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还没有一部完整的刑法。在此之前,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了中国第一部宪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等5个组织法,标志着中国法制建设进入一个新阶段。这年10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法律室便开始着手刑法典的起草工作。到1957年6月,写到第22稿,上报中央法律委员会,据说毛泽东看了,评价不错,发给人大代表人手一册,并于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作出了决议,同意将第22稿刑法作为草案公布试行。1962年3月,毛泽东针对立法工作指出:“不仅刑法要,民法也需要,现在是无法无天,没有法

律不行,刑法、民法一定要搞。”在这次谈话精神的鼓舞下,同年5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律室在第22稿的基础上再次开始修订工作。经过多次的重大修改和反复征求意见,至1963年10月9日,写出了第33稿刑法草案。由于后来的“四清”和文革,这项工作就搁置了。于是,1979年2月下旬,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宣告成立,着手刑法典的起草工作。刑法又历经了5稿,终于在1979年7月1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获得一致通过。7月6日正式公布,并规定自1980年1月1日起施行。

1979年7月,中共中央决定成立对林彪、江青两个反党集团的党内审查工作,后来称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件”审理领导小组,胡耀邦为组长。“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件”审理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挂靠中纪委,对外称“中纪委二办”。

1979年10月,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0周年大庆,中央决定由叶剑英作一个重要讲话。邓小平提出这个讲话要对过去30年作一个总结,特别是对“文化大革命”要做出一定的说明。这篇讲话的起草是在邓小平直接领导下进行的。1979年8月下旬,邓小平同胡耀邦、胡乔木、邓力群谈话,提出讲话草稿“讲理论的东西多了,概念的东西多了,读后感到沉闷,需要做大的修改”,“要从林彪、‘四人帮’的事件中间得出几条基本的教训,要写得很准确”。

9月4日,邓小平再次同胡耀邦、胡乔木、邓力群谈话,提出讲话稿“还是要讲在30年的历史上毛主席是有伟大功绩的,我们的一切成就是在毛泽东思想照耀下取得的。我们的党、军队和人民是受毛泽东思想的教育,在毛主席领导下建立功勋的”,“要使人看了这个讲话以后得出一个总的印象,我们的党和人民现在是真正坚持毛泽东思想,是完整、准确地学习、运用毛泽东思想,是真正将毛主席为我们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付之实现,不是搞片言只语。这是个非常大的问题”。

叶剑英的讲话稿前后改了十八、九遍,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中进行了多次讨论,并在各民主党派中征求了意见。先后参加讨论的有三、四千人。

1979年9月25日至28日,中国共产党十一届四中全会召开。会上,许多与会者继三中全会之后,再次公开批评了中央一些领导干部,

包括纪登奎。

万里说:“活着的个别领导人干了错事坏事,必须自我批评,不要欠账。”

吕正操说:“你指的是纪登奎,说明白点。”

万里说:“对,就是指他。”

许世友的发言更加尖锐,他对纪登奎说:“你是造反起家,进了政治局,官不小了,还搞什么名堂,你基本是跟‘四人帮’走的。”

邓颖超也批评说:“你的检讨很坏,避重就轻,应把10年来在政治、思想、工作、作风、立场上与‘四人帮’是什么关系说清楚。建议中央也要查清,一批二保三看。有同志说你是翻云覆雨的政客,你今后还是政治局委员,希望警惕,不要利用权位报复我们。”

廖承志、程子华、谭震林等也都作了发言。出席四中全会的许多人都给纪登奎提了意见,有的意见还相当尖锐。纪登奎表示接受大家的批评,并做了检讨。

十一届四中全会上,中央决定纪登奎辞去他在中央和国务院的领导职务,但没有公开。纪登奎交出主要工作之后,邓小平找他谈过一次话,鼓励他还要继续做一些工作,又征询了他的意见。后来,中央安排纪登奎主管了一段时间的旅游工作。

十一届四中全会讨论并通过叶剑英代表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9月29日下午,讲话正式发表。讲话提出:

“中共中央认为,对过去30年特别是‘文化大革命’10年的历史,应当在适当的时候,经过专门的会议,做出正式的总结,但是,在庆祝建国30周年的时候,有必要给予初步的基本估价。”

讲话总结了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的主要特征和教训,对“文化大革命”10年的基本评价是“反革命大破坏,使我国人民遭到一场大灾难,使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受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评价是“中国人民将永远铭记毛泽东同志的不朽功绩,坚决捍卫和发展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

讲话发表后引起很大反响,要求在国庆讲话基础上,更加具体、充实、丰富,进一步做出一个历史问题决议的呼声日高。

同时,党内还有另一种呼声,就是觉得建国30年的历史留在以后来讲不晚,文化大革命的10年也要等待适当的时机来做出决定。这是三中全会确定的方针。

邓小平支持把《历史决议》的起草工作提上党中央工作日程。

1979年10月,邓小平同胡耀邦、姚依林、邓力群谈话说:常委研究,准备为五中全会、六中全会和十二大做点准备工作。第一,修改党章;第二,修改宪法;第三,讨论两年调整计划、十年长远规划;第四,起草建国以来党的历史问题决议,现在着手,六中全会讨论通过。邓小平还说,有了国庆讲话,《历史决议》就好写了。以讲话为纲要,考虑具体化、深化。这样,邓小平代表党中央正式提出起草《历史决议》,并在此后直接领导这一工作。

10月30日,具体负责《历史决议》起草工作的胡乔木在起草小组会上传达了邓小平的谈话,对《决议》起草工作进行了部署,提出以起草国庆讲话的班子为基础,再从人民日报社、新华社、解放军报社和中央档案馆抽调20多名理论工作者,集中起来,脱产工作。

11月,中共中央决定着手起草《历史决议》,由邓小平、胡耀邦主持,胡乔木、邓力群等组织实施。《历史决议》起草工作正式启动。

1979年10月,中共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党组经省委批复同意的《关于处理"北、决、扬"一案的请示报告》,认为"北、决、扬"不能定为反革命组织。鲁礼安、冯天艾等人免于起诉,先后释放。

10月16日,魏京生被以反革命罪及向外电记者出卖惩越战争情报为罪名,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

11月,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做出决议:取缔"西单墙"。

11月开始,在中央政治局、书记处领导下,由邓小平、胡耀邦主持进行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12月6日,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发出通告,规定除在自己所在单位张贴大字报外,所有大字报一律集中到月坛公园,且要填报真名和其他资料,禁止在西单墙和其他地方张贴大字报。

西单民主墙取缔的那一天,有一首墨迹未干的诗刚刚贴上。诗中写道:

我的朋友，
告别的时刻已经来临。
再见！
我能对你说些什么？
说春天的严寒？
说枯萎的腊梅？
不！
还是说欢乐吧！
说明天的欢乐，
说纯净的天空，
说野外金黄的花朵，
说孩子透明的眼睛。
我们应该带着尊严告别，
不是吗？
当时的月坛公园偏僻而无人问津。

1978 年 7 月，邓小平批评郑州大学揭批查有阻力，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刘建勋应声下台，全省又掀高潮。当年开封“八二四”头头陈红兵也被转移到开封烟厂严加看管。

1978 年 11 月 16 日深夜，陈红兵被正式宣布逮捕，戴上手铐，塞进一辆北京吉普，左右两人押送，沿着郑汴大道从开封向郑州驶去。后边还有一辆吉普车尾随着，里面坐着兰考县委书记张钦礼。

当晚，河南造反派的三大著名头头同时被逮捕。他们是：党言川，河南“二七公社”的学生头头；陈红兵，开封“八二四”的学生头头；张钦礼，“兰考卫焦”的头头。而“河南十大总部”、“河南造总”、“开封左司”、“兰考卫东林焦”的头头不仅一个没抓，并且这时大多数成了整造反派的掌权者。

1978 年 11 月 21 日，《河南日报》头版右下登载一篇消息：“中共河南省委决定 依法惩办反革命分子党言川、陈红兵、张钦礼”，全文如下：

本报消息：为了深入开展“一批双打”斗争，坚决打击“四人帮的社会基础，中共河南省委决定，将反革命分子党言川、陈红兵清除出党，

依法惩办;将反革命分子张钦礼,开除党籍,依法惩办。公安机关已将三犯依法逮捕。

反革命分子党言川、陈红兵恶毒攻击中央领导同志,反党乱军,大搞打砸抢,残酷迫害老干部,疯狂镇压群众,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罪恶昭著,不加惩办不足以平民愤。

原开封地委书记兼兰考县委第一书记张钦礼,恶毒攻击中央领导同志,包庇纵容坏人,反党乱军,大搞打砸抢,践踏社会主义法制,残酷迫害革命干部和群众,严重破坏工农业生产,擅自扒堤决口,使群众遭受严重损失,罪恶累累,民愤极大。

依法逮捕反革命分子党言川、陈红兵、张钦礼,大快人心,大得人心。当地党委正放手发动群众对三犯的反革命罪行深入进行批判斗争。

从这时开始,凡是曾经支持过造反派的干部,包括刘建勋、纪登奎,无一幸免成了被清查的对象;工厂里直到班组长,农村里直到生产队长,全省达一百万人。据当时省委领导人公布,全省开除党籍106000人,判刑2700人,实际比这更多。

1979年12月26日,陈红光接到对他的判决书(1979汴法刑字第365号)——有期徒刑20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而且指控他“拒不认罪”。

# 第1439回：徐明清，平反后风波依然 谈《决议》，刘少奇案全推翻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一部分了解徐明清历史的老干部开始不断反映徐明清的情况，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也开始着手调查。第一次透露徐明清冤案可能平反的信息，是从胡耀邦的一次报告中发出的。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的胡耀邦，着手清理冤假错案。他在一次报告中尖锐批评了乱抓人的问题，一口气点了20多个遭到乱抓人的名字，其中就提到了徐明清。

1979年3月的一天，秦城监狱的监狱长忽然来到徐明清的牢房，对她说："你身体不好，决定让你进城看病。"并让她把所有的东西都带上。

一会儿，一辆轿车把徐明清从秦城监狱送到了北京公安医院。徐明清被安排在一间单人病房，门口站着卫兵，虽然行动仍受到管制，但伙食有了改善，每天由医生为她检查身体，治疗调养。

在医院安住了一个多月。一天中午，徐明清正在睡午觉，秦城监狱的监狱长忽然走进了她的病房，通知她说："赶快起来，你现在可以回家了。"

"回家？"徐明清一下子懵了。

她百感交集地从床上坐起来，不觉大声反问："回家？我还有家吗？有家吗？"

监狱长和蔼地安慰她："有家，你的孩子们都来接你了，就在楼下等着呢！"

真是喜从天降，徐明清连忙穿衣下床，不过她细细一想，又站住了。

她连声问道："你们说我是'现行反革命'，说我是'叛徒'，这些帽子不摘掉，我不离开这里！我在监狱里写的材料，是被逼抄写，我不能承认！"

于是,徐明清被请到医院的一间办公室,由前来的中纪委、中共中央组织部、公安部和徐明清所在单位农业部的代表,向她明确宣布:“你身体不好,先回家休息。组织上正在对你的问题进行重新调查、核实,现在问题基本澄清,不久就会为你重作结论。请你放心。”

就这样,徐明清和她的孩子们一起,回到了家中。

不过,她的案子“通天”。被逼所写的材料,上了“红头”文件,并向全国转发。正因为这样,她的冤案的平反,不仅仅要由中共中央组织部进行仔细调查,而且要报送中共中央书记处讨论。

这一切,都在一步一步地进行。

1979 年 11 月 17 日,农业部做出撤销在“文革”中错定徐明清为叛徒的决定,中央组织部审批同意后,于 1980 年 3 月 10 日向有关单位下文,摘掉她“叛徒”的帽子,恢复了党的组织生活和行政 10 级的待遇,彻底为她恢复了名誉。

1982 年 7 月 7 日,中共中央组织部发出的《案件复查通报》第 1 号上,刊载了《关于徐明清同志是否包庇江青问题的复查结果》一文。

《复查结果》指出:“徐明清同志和江青的关系问题,经中央组织部核实,徐明清同志在延安给江青写的证明材料并未证明江青在上海北新泾有党的关系,与其他同志所写的证明材料是一致的,是实事求是的;徐明清同志在关押审查中被迫写的交代材料,在宣布她自由的当时,即申明推翻了。”

《复查结论》还说:“徐明清同志没有包庇江青的问题,中共中央组织部于 1981 年 7 月报告中央,上述各项报告,已于 1981 年 9 月 1 日经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同意。”

徐明清的冤案终于彻底得到了平反,从“文革”中抓“叛徒”开始,直到因江青问题蒙尘,风风雨雨 14 年,徐明清终于度过了漫长艰难的日子。

事情还没有完结。曾为中共中央领导人之一的王稼祥的夫人朱仲丽,写了一部《江青野史》,已于 1980 年 12 月在香港出版。书中参照中共中央 1977 年 10 号文件的说法,把徐明清说成是江青的死党。后来,此书又在大陆出版,影响很广,弄得徐明清是不明不清。自 1981 年 3 月起,徐明清开始向组织申诉此事。

1988 年,朱仲丽又出版了两本有关江青的书,徐明清的恶名仍在其中。怎么办?

那时候“通过法院,依法解决”非常的时髦和盛行,人们似乎认为,什么事情都可以用“打官司”的方式予以解决,就连李谷一和韦唯工作上的纠纷也闹到了法庭上,一时间,全国上下沸沸扬扬。

老革命徐明清此时也不能“免俗”,在万般无奈之下,她向法院提起诉讼。

1990 年 3 月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

“原告徐明清诉被告朱仲丽侵害名誉权纠纷一案,经本院审理认为,原状诉争之内容,已有有关部门处理,原告对原处理持有异议,应向有关部门申诉解决……驳回原告徐明清的起诉。”

中组部办公厅确实下发了关于“徐明清没有包庇江青问题”的文件,可是,中央 1977 年 10 号文件是向全国人民传达的,而中组部办公厅的决定,广大党外群众并不知道,朱仲丽也没有向徐明清赔礼道歉。徐明清的名誉仍然在受到极大地伤害。

徐明清又向市高级法院上诉,二审依然被驳回。理由是徐明清和朱仲丽都是共产党员,党组织既然已对朱仲丽进行过批评,也就是组织上已予以解决,无须再由法律机关介入。

更让徐明清伤心的是,自己写的文章,内地很多报刊都不予刊登。

1991 年初,在新中国影响很大的小说《青春之歌》的作者杨沫,为徐明清鸣不平,写了一篇《我为徐明清辩清白》一文。北京各家刊物都不刊登这篇文章,只好托人在香港《繁荣文摘》上发表了。直到 1993 年 5 月才终于在海南的《特区法制》上发表。

是啊,两名资格那样老的老党员,党内的高级干部,因为党中央工作中的错误引发的民事纠纷,居然要闹到地方法院予以解决,这不能说不是个笑话。

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朱仲丽引用中央文件上的材料进行文学创作,她有错吗?

徐明清受到如此莫须有的伤害,难道她就不该讨回她应该得到的公道和权益吗?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自内而外散发出来的那种勃勃生机和强大

的凝聚力已经不再。1949 年后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人民心目中的那种崇高的威望和尊严,也正随着历史的长河而渐渐地销蚀或大块的剥落。40 多年前,黄炎培在“窑洞对”中对毛泽东所讲的“周期率”似乎在显示着它的作用。

1980 年 2 月 23 日,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在北京举行,29 日结束。会议决定提前召开中共十二大;增选胡耀邦、赵紫阳为中央政治局常委;设立中央书记处,胡耀邦为总书记。通过了《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和为刘少奇平反的决议。《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关于为刘少奇同志平反的决议》中有这样一段话:

(3)原审查报告影射一九三〇年四月满洲省委大破坏,是刘少奇同志“提供情报”的结果。这是蓄意歪曲历史。根据党的历史档案(一九三〇年九月十八日中共满洲总行委第十二号《通知》)和敌伪档案(一九三四年日本大阪对支经济联盟编《苏联和满洲的共产运动》)、敌伪报刊(一九三〇年五月一日《盛京时报》)记载,以及上述当时在满洲党、团省委工作的赵毅敏、杨一辰、王鹤寿等同志一致证明,这次大破坏,致使党、团省委领导人及党、团员三十余人被捕,是由于杜兰亭(当时在团省委工作)四月十二日被捕后叛变,向敌人供出团省委机关的地址造成的(当时党、团省委负责同志正在那里开会,许多同志因而被捕)。当时刘少奇同志已经离开满洲去上海工作,这件事同他毫无关系。(4)刘少奇同志是在被捕半个多月后,统治阶级没有取得任何证据的情况下,取保释放的。据孟用潜同志一九六七年六月五日“补充材料”说:“对我的判决是‘煽动工潮,证据不足,不予起诉,取保释放’;对刘少奇也是‘不予起诉,取保释放’。”杨一辰同志一九六七年六月十七日和一九七九年四月二十四日两次证明,当时对刘少奇同志判决“检察却下,不起诉处分,取保释放”。还有饶漱石(当时任满洲团省委书记)、王广恩(原奉天纱厂协理)等人,也提供了类似的证明材料。

刘少奇翻案了,中央要给他召开追悼会。他的骨灰在哪里呢?他逝世后,骨灰是存放在开封驻军 1 军那里。1975 年,1 军和 20 军换防,1 军向河南省委提出把刘少奇的骨灰留在河南,刘建勋同意。

11 月 30 日,1 军保卫处处长张金贵向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刘建勋

请示关于刘少奇骨灰管理移交的问题。商谈后,1 军和河南省委联名给中央打了个报告。

12 月 8 日,中央给开封驻军的指示信:“同意××、××、××刘少奇骨灰移交河南省委有关单位管理。”

刘建勋与时任 1 军政治部主任并兼任开封市委书记的何俊德谈了交接细节,然后派省委副秘书长的霍云桥负责此时,并安排自己的老司机沈进奎去取回骨灰盒及相关手续,并指示霍云桥送到“省委档案处存放”并严格保密。这一过程,后来沈进奎的回忆也谈到了这一过程。

1978 年,霍云桥要调到天津工作,当年也参与这件事的省委办公厅机要处长戴衍钦对霍云桥说:“刘少奇的骨灰证是你经手接受的,你要调走了,刘建勋也离开河南了,此事应该向省委有个交代。”

于是,霍云桥写了一个报告交给省委常委、秘书长郭坦。

1979 年 3 月 5 日,郭坦接到霍云桥的报告,认为事关重大,立即报告了河南第一书记段君毅。段君毅召集第二书记胡立教、常务书记兼省长刘杰商量,决定把刘少奇的骨灰取回由省委保存。

恰在此时,省委书记赵文甫到段君毅办公室谈事,段君毅顺便将此决定告诉了赵文甫。

当晚,赵文甫让霍云桥立即去开封,把刘少奇的骨灰盒取回来。

刘少奇的骨灰盒于 3 月 6 日取回郑州,秘密保存在赵文甫办公室的保险柜里,一直到 1980 年 5 月刘少奇平反大会前迎回北京。

刘少奇的骨灰以刘卫黄的名义于 1969 年 11 月 14 日由 8172 部队,即 1 军送存,申请人写的是刘少奇的儿子刘原,编号 123,寄存年限 3 年,1972 年 11 月 14 日第一次续存 3 年,1975 年 11 月 14 日第二次续存 10 年,于 1979 年 3 月 5 日 23 时 30 分取走,登记表的上方醒目地写着一行字:

“1979 年 3 月 5 日夜 11 时半取”。

这就是霍云桥于 1979 年 3 月 5 日根据赵文甫的指示取走刘少奇骨灰时留下的记录。

我们继续说十一届五中全会。全会批准汪东兴辞去中共中央副主席职务的请求。

全会还批准了纪登奎、吴德、陈锡联的辞职要求,免除他们所担负的党和国家的领导职务。

全会决定增选两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即胡耀邦和赵紫阳。

全会决定成立中共中央书记处,选举胡耀邦为中共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万里、王任重、方毅、谷牧、宋任穷、余秋里、杨得志、胡乔木、胡耀邦、姚依林、彭冲为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

刘少奇的案翻了,由胡耀邦任组长,针对林彪、江青的“两案”审理领导小组经过初步审查,认定“两案”案犯既有违反纪律的问题,又有触犯刑律的问题。1980 年 2 月,中纪委根据对“两案”审查的结果,认为林彪、江青两个集团触犯了国家刑律,决定把“两案”主犯正式移交司法机关依法审理,追究刑事责任。3 月 17 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决定成立中央“两案”审判指导委员会,由彭真任主任,统一领导“两案”的审判工作。

3 月,“两案”审判指导委员会主任彭真在召集“两案”审理指导委员会讲话时说:

我看了对“四人帮”的起诉书和材料,没什么意见。对这帮人要有充分的估计:他们做了多少坏事?他们知道,我们不知道。所以,在预审中不能轻敌。轻敌就要打败仗。按司法程序办事,公安部要搞好预审,检察院要搞好起诉,法院要搞好审判……要通过预审先核对事实,弄清每个案犯承认多少罪行,不承认多少。在会上决定的事,要弄清是谁提的方案,第一个是谁提出来的,谁办的,谁拍板的,要搞得清清楚楚。调来预审的人,一个组对付一个人,人员不够还可以借调……一定要经过预审来核实。还有口供问题,法律上有证言,但我们办案一定要重视证据,只有口供没有证据不能定。苏联在证据问题上有沉痛的教训。只靠口供,搞了不少冤、假、错案,我们办这个案子同审理其他案子一样,只有口供没有其他证据不能判。

公安部要打头阵,检察院是第二道程序,法院出来就扎实了。起诉书要拿到书记处讨论,要报中央常委批准。一定要搞好预审,时间不要限制得过死,以搞好为标准。不要匆忙。不要过早登报。

假定“四人帮”罪行有一百条,挑最重要的上二、三十条就可以了。写三五条也可以判。要按法律程序办事。我从公、检、法的角度可以

管,但情况不熟。彭冲同志也刚来,“两案”审理领导小组要抓到底。

……起诉书应当以证据做后盾,以预审做基础。四道程序把关,公、检、法是三道关,中央领导小组是第四道。现在的起诉书(草稿)不能拿出去,要把罪行列出来。……有不少是路线问题,我们是审理罪行的,路线问题我们管不着,公、检、法没有资格审查党的路线问题,也不应过问这个事……

从事实做起,从调查研究做起。离开事实,谁讲也不算数。经过调查研究,有什么算什么。只有事实,案件才靠得住。林彪、“四人帮”他们搞专案,是先戴帽子,后搞材料。我们不能这样干。一定要注意三条:一是要客观,二是要全面,三是看本质。全面有两种,一是历史的全面,二是现实的全面。历史是指这个人一贯表现怎样?现实是看整个“文化大革命”中怎样?有个外国人讲,中国人非常怪,好的占百分之五十一就是好,坏的占百分之四十九就算坏。这样复杂的案件,不从事实出发怎么行。希望你们搞案子的同志,要很好学习毛主席《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那一篇文章,要有这样的认识论,我们党如果能按《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讲的观点办事,我们党的问题就好解决了。

要有个专门班子看原始材料。现在看原始材料的同志,将来审判时可以当顾问。必须把好人办错事和坏人办坏事区别开来。谁也不可能不说一句错话,不做一件错事。有的人把几十年前讲的话拿出来用今天的眼光去批判,那行吗?几十年以前的事,谁能看得那样准?有一年在怀仁堂,×××同志讲毛主席《关于体育之研究》,毛主席哈哈大笑说:我那是带封建性、资产阶级性的东西,你还讲这玩艺。不历史地全面地看问题是不行的……

3月19日,中央书记处提出一个审判方案,称“为防止在审判过程中泄露党和国家的最高机密而不公开审理。”

# 第1440回：写《决议》，邓小平多次指示四千人，讨论批判毛泽东

1980年2月，《历史决议》起草小组拉出一份仅供领导参阅的《〈决议〉提纲（草稿）》。邓小平看后感到平铺直叙，主题不够鲜明。3月19日，他找胡耀邦、胡乔木、邓力群3人谈话，专门谈《决议》总的指导思想问题。首先，从写法上讲："我看了起草小组的提纲，感到铺得太宽了。要避免叙述性的写法，要写得集中一些。对重要问题要加以论断，论断性的语言要多些，当然要准确。"

作为《决议》起草小组的具体负责人，胡乔木提出了起草《历史决议》的两个难题："一个是为什么发生'文化大革命'。说'文化大革命'是错误的不难，但是必须答复为什么发生这个错误的问题。不答复这个问题，《决议》就失掉价值。一个郑重的马列主义政党，就得对这个问题有个科学的分析。

另一个是，毛泽东思想的实质是什么。我们讲坚持毛泽东思想，是讲坚持什么。许多同志希望中央列出几条来。毛泽东思想同马列主义基本原则是一致的，但他与马列主义的已有的论点相比较又有所不同，有所发展。不能只说坚持武装斗争为主，农村包围城市，这些只适用于过去。还要讲适用于现在的，特别要讲适用于现在的。这个问题在这个文件中一定要答复。不答复这个问题，坚持毛泽东思想这个口号就没有力量。"

邓小平对胡乔木的意见非常重视，他提出三条"中心的意思"：

"第一，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这是最核心的一条。不仅今天，而且今后，我们都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对毛泽东同志、毛泽东思想的评价问题，党内党外和国内国外都很关心，不但全党同志，而且各方面的朋友都在注意我们怎么说。"

"第二，对建国三十年来历史上的大事，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错误的，要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包括一些负责同志的功过是非，要做出

公正的评价。”

“第三,通过这个决议对过去的事情做个基本的总结。还是过去的话,这个总结宜粗不宜细。总结过去是为了引导大家团结一致向前看。争取在决议通过以后,党内、人民中间思想得到明确,认识得到一致,历史上重大问题的议论到此基本结束。”

邓小平最后强调:“总的要求,或者说总的原则、总的指导思想,就是这么三条。其中最重要、最根本、最关键的,还是第一条。”

后来,邓小平又找胡耀邦、胡乔木和邓力群谈了一次,提出了一个重要原则:讲错误,不应该只讲毛泽东同志,中央许多负责同志都有错误。“中央犯错误,不是一个人负责,是集体负责。在这些方面,要运用马列主义结合我们的实际进行分析,有所贡献,有所发展。”

当时,有不少人主张不急于做这个决议,留待十二大甚至更后去解决。邓小平指出:“从国内来说,党内党外都在等,你不拿出一个东西来,重大的问题就没有一个统一的看法。国际上也在等。人们看中国,怀疑我们安定团结的局面,其中也包括这个文件拿得出来拿不出来,早拿出来晚拿出来。所以,不能再晚了,晚了不利。”

4 月 1 日,邓小平再与胡耀邦、胡乔木、邓力群谈对修改后的《历史决议》提纲的看法。他首先讲了 1957 年到 1966 年的 10 年间,党和国家经历的重大事件,并对这些事件作了基本评价。

在谈到如何安排决议的结构框架时,邓小平问道:“整个设计,可不可以考虑先有个前言,回顾一下建国以前新民主主义革命这一段,话不要太多。然后,建国以来十七年一段,‘文化大革命’一段,毛泽东思想一段,最后有个结语。结语讲我们党还是伟大的,勇于面对自己的错误,勇于纠正自己的错误。”

《历史决议》起草小组夜以继日。终于在 5 月 23 日再次起草出一个决议提纲。紧接着,又拿出了首次供中央书记处讨论的《历史决议》初稿。

虽然 3 月 19 日中央书记处对“两案”提出“为防止在审判过程中泄露党和国家的最高机密而不公开审理”的方案,但不公开审理的方案,被邓小平否决。

6 月 5 日,邓小平在会见美国和加拿大社论撰写人访华团时说,对

“四人帮”要进行审判,“对我们国内来说,是一种公开的审判形式。但审判‘四人帮’会涉及我们国家大量机密,所以,我们不准备对外公开。”

6月9日上午,邓小平同胡耀邦、胡乔木谈《历史决议》稿的修改问题,商定将“毛泽东晚年思想”改为“毛泽东晚年的错误”。

6月27日,邓小平谈了对初稿的意见,他认为现在的稿子没有很好体现确立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坚持发展毛泽东思想的要求。“重点放在毛泽东思想是什么、毛泽东同志正确的东西是什么这方面。错误的东西要批评,但是要恰当。单单讲毛泽东同志本人的错误不能解决问题,最重要的是一个制度问题。”

7月4日,《人民日报》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正确认识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文章指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不仅要消除“神化个人”的现象,而且要处理好领导班子中个人与集体的关系。不言而喻,这篇特约评论员文章是针对华国锋的。

7月30日,中共中央在发出的《关于坚持“少宣传个人”的指示》中说:当前在执行三中全会制定的要“多歌颂党和老一辈革命家,少宣传个人”的方针时,还存在着一些问题。这一指示,同样暗含对华国锋的批评。

8月下旬,彭真主持召开“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件”审判指导委员会扩大会议,要求按照公开审判做准备。

9月8日,中央政治局常委华国锋、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胡耀邦、赵紫阳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听取彭真汇报审判起诉四人帮及林彪集团的准备工作。彭真说:

关于“两案”的问题,书记处讨论了两次,9月4日及5日上午。现在主要情况弄清了,十名主犯的罪行基本查清了。一边是黄、吴、李、邱加江腾蛟,他是“三国四方”会议确定谋害毛泽东主席的指挥官。一边是“四人帮”加陈伯达,陈伯达同林彪、江青两个集团的罪行都分不开。五加五共十个人。送常委的起诉书(草稿),拟判十个人。除江腾蛟外,九个人都是举世瞩目。其他人另外审判,由最高人民法院、地方法院和军事法院分批陆续审判,十个人判了,其他人的问题就解决了。

他们的主要罪行弄清了,林、江是头子,康、张是军师,两个集团是

狼狈为奸的一伙。列入起诉书的罪行,都不牵涉毛、周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的过错,这个大原则中央已批准了的。起诉书还把周总理列入了被诬陷的领导人名单中。

起诉意见书上所列的犯罪事实,同毛泽东的晚年错误划分开了。起诉书不涉及路线问题,工作上的错误包括党纪、军纪、政纪问题都不涉及。这次审判只审罪行。

他们的问题用法律手段去处理,小平、国锋同志接见外国人时都讲过了。我们还是现在审好。中央领导同志对外讲过多次,为什么总不审?人家无非认为是罪不够,或者内部意见不一致。何时审,请中央决定。

我主张尽快审判!

这两个集团没法分开。你把这两个分开,康生、谢富治死了,这两个人算是哪一伙的?

一案起诉好处理。这两个集团有矛盾,矛盾在哪?他们做贼上一致,分赃上有矛盾。黄、吴、李、邱由军人组成的第二审判庭去审。这几个人一定要审,判刑可以轻一点,他们同江青不一样,历史上还做过一点好事,打过仗。

另外,公开审判好。罪行证据都公布,通过这一段时间的工作,证据完全能站得住脚。

彭真汇报后,邓小平说:

这个起诉书可以用。不能有一丝虚假,不能侥幸。

这次会议后,要扩大范围,征求党外人士的意见。

起诉的内容不能涉及毛主席、周总理的错误,这一点要特别慎重。

这两个案子不要低估林彪集团的罪过,林彪是掌握枪杆子的,比笔杆子不会差。

黄永胜等人有功,量刑可以轻一些,不能减罪,成立特别法庭,一审终审!

审这个案子叫“投鼠忌器”。务必抓紧,要不审,有人会说他们罪不够,或说我们意见不一致。

请彭真同志一抓到底。

最后会议确定了关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两案”审判方案,:将

“两案”合并为一案起诉;成立特别法庭,公开审判。

9 月 10 日,《历史决议》起草小组在改写出了完整的决议稿,把这个稿子发给各省、市、自治区第一书记座谈会讨论,9 月 21 日,胡乔木在各省、市、自治区第一书记座谈会上讲话时说:

“《历史决议》草案,经过很多同志的努力,小平同志、耀邦同志提了很多次意见,现在已经有了一个稿子。这个稿子,我也说不上是第几次的稿子了,一些主要的骨架,大概就像现在这个样子了,要作很大的变化,实在说我也变不出来了。经过大家交换意见,现在的写法跟原来的想法确实有了很多的变化。有许多问题,在党内也好,党外也好,争论是很尖锐的。”

9 月,五届人大三次会议对关于取消“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问题,正式作了决议。

9 月 26 日,中共中央下发《关于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的通知》,确定组织特别检察庭、特别法庭,一案起诉,分庭审理,一案判决,公开审判。中央和国家机关,省、市、自治区,各大军区,人民团体,民主党派将有几名代表参加旁听。不让外国人旁听。起诉的罪状是四条:(一)煽动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二)诬陷迫害党和国家领导人,篡党夺权;(三)迫害镇压广大干部、群众,实行法西斯专政;(四)指挥策动反革命武装叛乱。

9 月 29 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决定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特别法庭,对林彪、江青集团反革命案进行公开审判。

因为对《历史决议》稿争论很尖锐,10 月 12 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发出组织《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草稿)讨论的通知,要求发到各省、市、自治区讨论。由于预定参加讨论人数是 4000 人,所以称作“四千人大讨论”。

此外,经中央批准,当时在中央党校学习的 1548 名学员也参加了讨论。

这是一次规模空前的大讨论,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评价问题,仍然是讨论中争论的焦点。其中有不少否定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言论,个别人甚至主张《决议》里干脆不要写毛泽东思想这一部分。

例如:原稿提出,在17年中,多数情况我们党的路线是正确的,取得了伟大的成绩。许多人对这个结论不完全同意。他们认为:建国后虽然在某些方面的基本建设取得可观的成就,但政治方面不断地搞运动,出了很大偏差,整了几百上千万人。1957年,反右一下子整了55万,实际上远不只此数;1958年,搞“大跃进”,实际上是大饥荒,死了几千万人。

这可能就是后来传说三年自然灾害死了3000多万人的最早来源。但是,死3000多万人的依据在哪里?没有人提供这方面的材料,也没有人深究,更没有人站出来批驳。更多的则是人云亦云,三人为虎。直到30多年后,还是台湾人李敖出来指出此说的荒诞和不实。是啊,中国军事科学院编写的《中国抗日战争》一书中说,中国在抗战期间军民伤亡总数为3500万人。如果按照“七七事变”后的8年抗战时间计算,平均每年的伤亡人数是437.5万人,如果按照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的14年抗战时间计算,平均每年伤亡人数是250万人,这里面还不都是死亡人数,包括受伤的。而三年自然灾害期间,中国饿死人数居然是3000万!平均每年在1000万以上,是战争年代伤亡人数的两至四倍,这怎么可能呢?但在当时,这些荒诞的说法却任其传播,还有人煞有介事的千方百计予以论证,当然只能是徒留笑柄了。

在“四千人大讨论”中,还有人问:“文革前17年有没有路线错误?有,那么主要是毛泽东的错误,还是草稿所笼统说的是‘党的错误’?”

很多人强调:文革前17年存在一条“左”倾路线,而毛泽东就是“左”倾路线的总代表,因此在《决议》中不能回避,对此要有一个正确的评价。

很明显,大家认为,文革前17年正确的一面,取得的成绩那是党中央集体领导的成果,是必须肯定的。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彰显出文革的错误。但这些与毛泽东无关,因为在那17年的错误一面,主要是“左”的错误,则必须由毛泽东负责。

因此,与会者不赞成把毛泽东的错误归结为全党的错误。许多人提出,“晚年的毛泽东犯了大错误,那么‘毛泽东思想’是不是也应当包括毛泽东的错误思想?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是不是要排除他的错误思想?哪些是错误思想,怎么看?按原稿的意思,毛泽东思想只包括

正确思想,错误思想不属于毛泽东思想,这在逻辑上是不通的”,很多人反对。

讨论会另外一个争论点就是毛泽东的为人、行事作风。时任铁道部副部长的李颉伯说:“毛主席发动文革的动机不是为了反修防修,而是以整人开始,以整人告终,排斥他所不放心的人。这场浩劫实际上在1956年11月一次中央会议上就种下了根。这次会上,周总理讲话,肯定近年工作冒了;陈云、富春、先念都讲了类似的话,少奇还组织人写了《既要反保守又反冒进》的社论。会上毛主席没有吭声。后来乘反右斗争胜利和自莫斯科参加第一次会议归来,他很得意,1958年1月,他召开了南宁会议,在会上就发作了,说你们56年反冒进,就是反对我。你周恩来同志说了什么,陈云、富春、先念同志说了什么,少奇写了社论,你们把自己抛到了右派的边缘。谁晓得我身边有没有睡着赫鲁晓夫?将来有一天他作秘密报告。……会议的气氛十分紧张。有些人就把矛头指向这些同志。黄敬同志在散会后就得了精神病,后来得脑血栓去世了。”

此外,会议上有人认为华国锋粉碎“四人帮”虽有功绩,但他和汪东兴等人工作上的指导方针,都有错误,表示华国锋不宜再担任党中央和中央军委主席。

这次讨论从10月中旬开始到11月下旬结束,前后持续了一个多月时间。讨论情况不断用简报、快报等形式迅速反馈给起草小组和党中央,而一些相关的重大问题则以综合报告、意见汇编等形式上报中央政治局。

# 第1441回：生活会，华国锋无奈辞职 开庭审，黄吴李邱“四人帮”

1980年10月23日，中共中央发出《转发华国锋同志的信的通知》。华国锋提出，今后在公共场所不再悬挂华国锋同志的像和题词。于是，在粉碎“四人帮”之后，在公共场合并排悬挂毛泽东和华国锋画像的现象不复存在。华国锋的画像纷纷被取下。华国锋语录以及题词也被纷纷取下。至今，唯一被保留下来的华国锋题词，那就是天安门广场上的“毛主席纪念堂”六个镌刻在大理石上的金字。

邓小平在看了10月25日四千人大讨论的简报后，立即找胡乔木等人谈话，他说：“这次党内四千人讨论还在进行，我看了一些简报，大家畅所欲言，众说纷纭，有些意见很好。很多组要求把粉碎‘四人帮’以后这段补写上去。看来，这段内容势在必写。”尔后，邓小平“力排众议”，反驳一些人的错误观点：“决议稿中阐述毛泽东思想的这一部分不能不要。这不只是个理论问题，尤其是个政治问题，是国际国内的很大的政治问题。如果不写或写不好这个部分，整个决议都不如不做。”他强调，毛泽东思想这面旗帜丢不得。丢掉了这面旗帜，实际上就是否定了中国共产党的光辉历史。

邓小平还对如何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提出了具体的意见。他说，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就是恢复毛泽东同志的那些正确的东西嘛，就是准确地、完整地学习和运用毛泽东思想嘛。从许多方面来说，现在我们还是把毛泽东同志已经提出但是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我们讲拨乱反正，就是拨林彪、“四人帮”破坏之乱，批评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回到毛泽东思想的正确轨道上来。他坦诚地指出：“在‘文化大革命’前工作搞对的有我的份，搞错的也有我的份，不能把那时候的失误都归于毛主席。”他指出：“从许多方面来说，现在我们还是把毛泽东同志已经提出、但是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把他没有做

好的事情做好。今后相当长的时期,还是做这件事。当然,我们也有发展,而且还要继续发展。”

时任中纪委常务书记的黄克诚更是旗帜鲜明地支持邓小平的观点,针对前一段党内和社会上有人肆意诋毁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错误倾向,他指出:毛泽东所犯的错误是一个伟大革命家的错误,在纠正他所犯的错误、总结经验时,应抱着爱护尊敬的心情。“在中央来说,只要是开中央全会举手通过决议的事情,如果错了,中央都应该来承担责任。当然,毛主席作为中央主席要负领导的责任。过去解放全中国、建设新中国,我们这些老共产党员都尽了一份责任,功劳大家有份。现在如果把错误都算到一个人身上,好像我们没有份,这是不公平的!”

四千人讨论以后,胡乔木等人综合、研究各种意见,提出了一个“对于修改历史决议草稿的初步意见”,共 12 条。并在此基础上产生了一个“1980 年 11 月 22 日修改稿”。

1980 年 11 月 10 日、11 日、13 日、14 日、17 日、18 日、19 日、29 日和 12 月 5 日,中央政治局连续开了 9 次会议,专门讨论华国锋问题。除刘伯承、聂荣臻二人因病未参加(聂荣臻来信同意会议内容)和陈永贵、赛福鼎二人未通知到会外,实到政治局委员 21 人,候补委员 1 人。中央书记处 7 人列席,共计出席者 29 人。

召开这 9 次会议的原因,是自从 1980 年 8 月中下旬举行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以来,不少人向中央提出,华国锋不宜继续担任中央委员会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于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 9 次会议,对此进行讨论,并向十一届六中全会提出的人事更动方案。

11 月 11 日下午,陈云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了重要发言。陈云讲了三点意见:

一、揪出“四人帮”,是华国锋对党的“一个很大的贡献”。那时,华国锋“是负主要责任的”。但是,揪出“四人帮”以后,我们党没有能够实现心情舒畅、生动活泼这样的局面,使人“大失所望”。

二、“华国锋同志当主席不适当”。陈云说:“那一天我跟先念同志到国锋同志那里去的时候提出,国锋同志要有自知之明,在毕生的工作里头,加号是多少,减号是多少。加号指的正确的,减号指的错误

的。我讲了一句,希望国锋同志珍惜已有贡献,就是说,不要随便丢掉已经有的这一点贡献。”

三、“我认为这件事不能再拖了。十二大谁作报告决定下来,哪个当主席哪个作报告。”

胡耀邦在政治局会议上作了重要发言,列举了华国锋的5条表现,批评了华国锋对毛泽东晚年错误采取的态度。他说:“按理来说,国锋同志内心不是对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全都赞成的。我可以举一个例子,国锋同志很关心生产,至少有三次:第一,我们在湘潭时期,他对生产的兴趣很大;第二,他自己讲,1971年揭露林彪时,毛主席同他谈话,批评他:你满脑子都是生产;第三,1975年他在听取科学工作汇报提纲座谈会上的讲话。可是国锋同志在粉碎‘四人帮’后讲的却是另外的东西,什么基本路线,什么阶级斗争为纲,什么全盘肯定‘文化大革命’,什么继续革命,等等。但也不会是真心话。这里边就产生一个实用主义的问题。这就是要害的地方。国锋同志在对待毛泽东同志的问题上,是拣他的需要,只顾眼前,不顾后果,只考虑个人得失,不考虑党和国家的安危。这是一种典型的实用主义,这很不好。”“国锋同志继续当党的主席、军委主席,看来党内多数同志是不会赞成的。因此,国锋同志自己提出要辞去这两个职务,我觉得好。这对党、对华国锋同志自己都有好处。”

叶剑英在发言中做了自我批评,检讨自己在宣传华国锋中说过过头话,作了过高的赞誉,有“周公辅成王”的封建思想作怪。他回忆了毛泽东临终时欲言未语的难忘情景,说道:“据《三国志》第三十五卷《诸葛亮传》里记载,刘备在白帝城临终托孤时,对诸葛亮说: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之后,诸葛亮并没有照刘备的话去办,而是竭股肱之力,效忠贞之节,继之以死。毛主席临终的时候说,我不行,快完了。政治局的全体同志到毛主席那个房子,排队一个一个见主席。那时,他的心脏还没有停止跳动,看完后,退回休息室。过了一会,护士又把我叫到主席面前。当时主席看了我一眼,说不出话来,我又退了出来,不久,主席心脏就停止跳动了。当时我就想,主席为什么要第二次叫我呢?还有什么嘱托?”叶剑英讲到这里,心情激动,眼泪流了下来。他继续说:“我剖析毛主席在世时自己的心情,我确实把华

国锋同志当作‘后主’看待,尽管我自己精力不足,水平不高,还是想尽力扶助他。我对他还讲过一些过誉的话。这是一种旧的封建思想在作怪。借此机会,我应作自我批评。”

叶剑英说:“这次政治局会议确实开得很热烈。华国锋同志犯错误,我也是有责任的。当初刚刚粉碎‘四人帮’,我的头脑里也有愚忠愚义思想,有时明知华国锋同志的意见不对,但给他提出来后,他一拒绝,我也没有坚持,就这样酿成现在的局面。所以,这种情况,我也有份。”“如果国锋同志不愿意承担责任,那就由我承担好了。所有中央这四年来的错误都是我造成的,你们怨我、批评我都可以。我早就提出要辞职,今天在这个会上我再提一遍,我请求党中央让我离休。这是我雷打不动的意见。”

本来华国锋为自己做了很多的辩解,不肯承认错误,不敢承担责任。但是看到叶剑英这样说了,他表示不再辩解,愿意虚心听取大家的意见,接受批评。并提出辞去中共中央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的职务,要求在六中全会以前,不再主持中央政治局、中央常委和中央军委的工作。

华国锋提议由叶剑英担任中共中央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这两个职务。

叶剑英坚决推辞,再次提出批准他离休。

叶剑英和其他人一致提议由邓小平担任中共中央主席。邓小平谢绝。他认为,在60多岁的人当中,胡耀邦政绩显著,所以力荐胡耀邦担任中央主席,并对胡耀邦说要“当仁不让”。

但是邓小平说,他自己只愿意担任中央军委主席。

中央政治局会议指出,华国锋犯了“左”的错误和其他错误,但不要说成是路线错误。路线、路线错误、路线斗争等提法没有明确的科学含义,使用这些提法过去在党内造成很不好的后果,以后要尽量少用。中央政治局最后通过三项决议:向六中全会建议,同意华国锋辞去中央主席、军委主席的职务;向六中全会建议,选举胡耀邦为中央委员会主席,邓小平为军委主席;在六中全会前,暂由胡耀邦主持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常委的工作,由邓小平主持中央军委工作,都不用正式名义。

11 月 17 日,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陈云听取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审查“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件”领导小组副组长王鹤寿关于第五次全国“两案”审理工作座谈会情况的汇报,同意“两案”审理领导小组提出的除对少数罪行重、民愤大的人追究法律责任、进行党纪处分外,对有牵连的人采取宽大处理、区别对待的政策。经过一天考虑,19 日,陈云就“两案”审理工作写下重要批语:

“1966 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是一场内乱。但这是一场政治斗争。这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的政治斗争。这场政治斗争被若干个阴谋野心家所利用了。在这场斗争中,有许多干部、党员、非党人士受到了伤害。但‘文化大革命’从全局来说,终究是一场政治斗争。因此,除了对于若干阴谋野心家必须另行处理以外,对于其他有牵连的人,必须以政治斗争的办法来处理。对于这场政治斗争,不能从局部角度、暂时的观点来处理,必须从全局观点、以党的最高利益、长远利益为出发点来处理:这种处理办法,既必须看到这场斗争的特定历史条件,更必须看到处理这场政治斗争应该让我们党今后若干代的所有共产党人,在党内斗争中取得教训,从而对于党内斗争采取正确的办法。这是处理这场政治斗争的前提。”

1980 年 11 月 20 日下午 15 时,北京正义路 1 号,公安部礼堂,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正式开庭审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

法庭的主席台中央挂着一个特制的国徽,国徽下是 60 个法官和检察官的座位,面对着台下的观众。

检察官的座位和法官的座位同在法庭中央,这恐怕是全世界的法庭绝无仅有的事情。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

本来,法庭工作小组把法庭的布置已经安排好了,按照正常的惯例,法官们在中间,一边是检察官,另一边是律师。但检察官们不干,认为“我们怎么和律师是这么一个关系?”特别检察厅的检察长,也就是最高人民检察院的检察长黄火青,他是井冈山时期的老革命,他坚持检察院和法院是平等的,你代表国家我也代表国家。既然是这样的话,为什么你坐中间,我坐旁边?为这个事情争论了很久,彭真也没有办法,最后,就变成这个样子,两家并列。

墙边也有两排座位,一侧是被告辩护人,另一侧则是特别法庭书

记员……

参加旁听的人员除中央有关部门领导、民主党派代表、首都各界代表之外,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也派出10名或5名代表参加旁听,加上采访的国内记者,将整个大厅坐得满满的。在开庭审理期间,全国有6万多名代表旁听,他们也都发表了各自的量刑意见,更多的人直接投书法庭、审判长、审判员。

审判庭楼上会议室设有闭路电视,专供党和国家领导人观看实况。

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十名主犯被公审时的法庭全景

台下旁听席上有刘少奇的遗孀王光美、贺龙元帅的遗孀薛明和罗瑞卿的夫人郝治平。她们3人坐在前排中间,轻声地交谈,看得出她们都很激动。

正式开庭前,案件已经过多次预审,还做过彩排,证人都经过培训……

15时03分,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兼特别法庭庭长江华宣布开庭。

第一个被押上被告席的是王洪文。

在开庭前,特别法庭根据在预审时的表现,认为如果将江青第一个押上来,很有可能她会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大闹法庭,给以后的审

判带来困难。因此决定不按两案主犯原来的排列顺序,先押认罪态度较好的王洪文,然后再押张春桥等8名主犯。

当江华一声高唤“传被告人江青到庭”之后,整个大厅顿时一片寂静,近千双眼睛齐刷刷地转向同一个方位。

江青被两名女法警押着走了进来。此时的江青已66岁,仍然是满头青丝。今天,她将头发梳得非常整齐,配上那件合身的黑色上衣,显得十分得体。

只见江青目不斜视,大步走进法庭,对于射过来的近千双目光毫不理睬,一副旁若无人的样子。按照指定的位子安静地站在审判台前。

法庭上,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兼特别检察厅厅长黄火青宣读长达两万多字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起诉书》,对林彪、汀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陈伯达、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江腾蛟提起公诉。

起诉书宣读完毕,江华庭长宣布:对两案所涉及的10名被告人,将由第一审判庭和第二审判庭分别进行审理。由第一审判庭审判的被告人是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陈伯达;由第二审判庭审判的被告人是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江腾蛟。

接着,江华庭长向被告人宣布:被告在庭审过程中必须听从法庭指挥,不得违反法庭规则。被告有辩护和最后陈述的权利。

5时20分,江华庭长宣布休庭。

# 第1442回：为宽大，陈伯达被迫认罪 检察官，为证人出庭彩排

1980年11月26日，特别法庭再次开庭。江青身穿素色套装，依然镇定自若。

“被告江青在一九七四年秋阴谋阻止邓小平当副总理”。这是指控江青的第一条罪证，一个证人出来作证。这个证人是王洪文！

“谁指使你去长沙向毛主席汇报邓小平和周恩来的活动的？”

“江青下的指示。”王洪文面无表情的答道。

江青静心听了一会儿王洪文的诉说，突然大声提出要去厕所，审判中断一会儿后。当江青在回到法庭时，王洪文不见了。这时，江青大声质问道：“他在哪儿？王洪文在哪儿？”

没有人回答。

检查官宣读了张玉凤写的证词，江青坐得笔直，盯着前面。她方正、白净的面孔像一座雕塑。张玉凤没有到庭。

唐闻生和王海容出庭作证。

唐闻生说：“我们马上就看透了‘四人帮’的阴谋诡计。”

江青不屑一顾，歪着脖子，盯着天花板。

王海容也说：“毛主席对江青很生气。”

江青喊道：“我要发言！”

可是庭长没有让她说话。

11月27日，特别法庭审理张春桥，其罪名有：“长沙告状”；诬陷朱德、陈毅；提出“改朝换代”；指使、煽动“打倒刘少奇”。张春桥闭着眼，一言不发。

11月27日这天，陈伯达问监狱的监管员：“明天是不是该审我了？”

“你怎么知道的？”监管员知道通知他的时候还未到，有些惊异地望着他。

“是我计算的,前面4个我估计已审完了,该轮到我了。”陈伯达说。

当陈伯达得知要公审他的消息后,曾在1980年11月1日找工作人员谈话说:“我的精神、肉体都是属于党的,党对我怎么处理都行。”

中共中央“两案”领导小组和“两案”审判指导委员会在组织进行“两案”审判准备工作是定的一条根本原则,属于党内路线错误的问题,列入党内审查的范畴,不作犯罪事实起诉。因此,在起草起诉书中,经中共中央、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和“两案”领导小组决定,对陈伯达在庐山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上的一系列活动不提出起诉,只追究陈伯达触及法律的事实,认定陈伯达以推翻人民民主专政为目的,积极参与林、江反革命集团,是反革命集团主犯。

起诉书送到后,陈伯达监号里传出哭泣声。

冬日里的寒风卷着一个老头儿的哭声……

陈伯达陈述了对起诉书中一系列细节上的辩解,然后说:“我的问题是党内问题,运动开始哪有不犯错误的?党内处理可以体谅,现在罪大恶极,怎么处理都行,但不是救人的办法。”

最后,他又目光飘忽地说:“如果毛主席还在,说一句话就好了。我不轻易流泪,今天我哭了,现在没有办法了。”

预审期间,陈伯达对指控他的罪行均不承认。11月18日上午10时,陈伯达的律师甘雨霈、傅志人赶到复兴医院。他们对陈伯达目前的心理状态,作了分析,认为:陈伯达不坦白交待罪行,而采取对抗的手段,很可能会导致精神崩溃,不能正常出庭接受审判。因此两位律师决定给他释压。

会见开始,陈伯达先澄清了上次谈话中,关于对诬陷迫害刘少奇罪行的认识。这次不兜圈子了,十分明确地拒不认罪,说:“关于刘少奇的问题我昨天写了一下,……江青、陈伯达擅自决定批斗刘少奇,这事我完全忘了。如果我真正参加过这决定,是不会忘记的。我认为我没有参加这个决定。”然后又作了一些补充,说他曾帮助周恩来解过围,对围攻周恩来的人说:“周总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总理,你们不听他的话,听谁的话。”还说刘少奇在天安门上对他说,要找他谈一次话。又说:“江青与我结仇,她要把我送进监狱……”

律师对他说:“我们应该负责任地告诉你,方才你讲了那么多,对减轻你的罪责毫无作用。不仅不能从轻处理,还有可能从重处罚。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是不是想破罐破摔了。”

“当然不是……”陈伯达低着头,小声嘟囔着。

“那好,只要你和我们好好配合,经过我们努力为你辩护,还是可能争取到法庭对你的轻判。”律师软硬兼施。

“可能? 真的?”陈伯达倏然睁圆了小眼睛,望着律师,目光中掠过一道久违的光芒,马上又说:“那怎么可能呢?”陈伯达疑窦难解。

“可能不可能,要看你配合不配合了,”律师又开始攻心:“对你们10个被告人,法庭会区别对待的。这个区别又是依据什么呢? ‘以事实为依据’,就从连续犯罪时间来看,你是最短的,自1970年被隔离以后,你就再也没有犯罪。再有,林彪、‘四人帮’的几个重大罪行,如阴谋杀害毛主席、策动上海武装叛乱等你均未参与。所以按事实,你本应轻判。但如果你不配合,拒不认罪,我们又拿什么去和其他被告人的罪行相比较,从而得出你的罪行最轻呢? 即使我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为你辩护,得出你罪行最轻,应该轻判的结论,但是你一句不认罪的话,我们就前功尽弃了。如果你从现在开始认清形势,悬崖勒马,改变态度,还来得及。只要在认罪态度上有好的表现,加上我们据理力争的辩护,法庭一定会给你一个公正的、从轻的判决。”

“谢谢你们,谢谢你们,我一定,一定……”说到这儿,陈伯达哽咽无语,潸然泪下。

12月3日上午,江青大步走进法庭。她抚平衣服,理理头发,弯腰坐到椅子上。每位公诉人和证人面前都放着一杯茶,而江青面前只有一排麦克风。公诉人一再声明,江青要对刘少奇的“被迫害致死”和王光美被囚禁12年负主要责任。

证人中包括刘少奇的厨师郝苗,他曾在狱中呆了6年。

“我要发言!”江青刺耳的声音响彻整个大厅……

“住口,江青!”一位法官喝道。

“住口,江青!”6名法官异口同声地喊道。

公诉人拿出证据。江青曾指使搜查了刘少奇和王光美的家,以寻找他们“犯罪”的材料。

江青摘下眼镜放在右手中一挥,打断了江华庭长的话,她向法庭反问:“抄他们家值得大惊小怪吗?告诉我,你们现在难道没有抄过我的家?”她不顾一切地接着又说:“破四旧必然导致抄家,这是革命行动。”

检察长黄火青说,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第三十六条的规定,人大代表未经全国人大或常务委员会的决定不受逮捕或审讯。“那么,你江青有什么理由剥夺刘少奇和王光美的自由?”

可是,黄火青想过没有,抓捕“四人帮”时,“四人帮”也是人大代表,而且还是政治局常委、委员,华国锋和叶剑英、汪东兴又有什么理由剥夺他们的自由呢?

而且,黄火青、江华,当年你们领导农民运动时,又有什么权力组织农民抄没地主的财产呢?按照当时的法律,你们当年的做法是不是犯法呢?

当公诉人提到江青三十年代的活动是“反革命活动”时,江青又跳起来,对着法庭咆哮着反问道:“这些反革命活动是什么?”

法官们没有说话。

“江华,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江青透过她的金属眼镜框盯着这位法庭庭长。

江华似乎吃了一惊,但一会儿又冷静下来,说:“可以,你问吧。”

“法庭是不是刑场?”江青说话就像律师开始盘问证人一样。“上次法警扭伤了我的胳膊肘,使我受了内伤,现在我的右手都抬不起来了。”

她把她把左胳膊缓缓地放在右臂上,法官们在椅子上坐立不安。

“还有一件事,我们有约在先,江华你是知道的,我尊重法庭,可你们不让我说话,你们想妨碍我时就马上在法庭上叫人喝彩,作为对付我的武器。这就是你们对待我的方式,”江青说:“党内有许多事只是你们这些人不知道罢了,你们清楚,在那个年代,共产党做了哪些让你们抱怨的事,你们把什么都推到我身上。天啊,我好像是个创造奇迹、三头六臂的巨人。我只是党的一个领导人。我是站在毛主席一边的!逮捕我,审判我,就是诋毁毛泽东主席!”

一位法官插话想阻止她。江青冷笑着说:“既然你们不让我讲话,

为什么不在我椅子上放尊泥菩萨来代替我呢?”

江青投出一颗炸弹:“我要告诉你们一件事。”她对静下来的法庭宣布:“那天晚上毛主席给华国锋写‘你办事,我放心。’的话,”

她环顾四周,她的眼镜成了法庭中照相机的焦点。

“这不是毛主席给华国锋写的全部内容,至少还写六个字:‘有问题,找江青’”。

法庭上又是大乱。阵阵铃声中,江青再一次被拖出礼堂,听众席上鼓起掌来。

据后来给李作鹏当辩护律师张思之回忆,正式庭审前,特别法庭曾做过两次彩排,由李纪周模仿江青。此人伶牙俐齿,又了解案情,结果让那些法庭工作人员一时间都招架不住,于是提出:说江青要这样可怎么办啊?可怎么审啊?

果然在法庭上,有一些证人按照培训的方式出庭作证,结果跟江青吵了起来。特别是廖沫沙出庭作证时,跟江青当场吵得连法庭都制止不住。证人在法庭上成了控诉被告人的原告,而不是出庭作证的证人了。

12 月 4 日,特别法庭审理张春桥指挥“游雪涛小组”从事特务活动、制造上海康平路事件、支持济南“五·七”武斗事件。张春桥依然一言不发。

12 月 13 日,特别法庭审理张春桥组织第二武装;策动上海武装叛乱。他还是一言不发。

特别法庭还审理了张春桥授意清华大学蒯大富打倒刘少奇的事情,蒯大富出庭作证。

为此,蒯大富从北京市看守所转到了秦城监狱,生活待遇提高:单间,席梦思床;随时可以洗澡;一日三餐,早上是肉包子和肉丝面,中午晚上都是一菜一汤;还有图书馆,可以开借书单借书;放风场地也大。警察对他很友好,放风时会很关切的问他:“蒯大富吃得怎么样?”

秦城预审员让蒯大富把1966 年12 月张春桥在中南海西门传达室接见他的事情说一下,蒯大富如实讲了。

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的人又来跟他谈,要他出庭作证,并说:“现在对你的问题也没有做什么结论,听说你在监狱里表现也不错

嘛,大是大非嘛,‘四人帮’肯定是反革命了,你和他们不一样,你和他们划清界限嘛,如果有立功表现,我们就更好说话了。”

蒯大富的理解是,如果自己有立功表现,对自己的处理就可以更轻点。于是他按照特别检察厅的要求,将证词写好。

特别检察厅规定证词里不准提党中央,不准提毛主席,只提张春桥。并且明确提出:“你要提出来,在张春桥的指示下,在北京第一次把打倒刘少奇的口号推向社会,造成严重后果。”

出庭前几天,特别检察厅的人帮蒯大富修改了证词,缩减到只有一张纸。然后对他说:“一个字都不能动了。”

他们还要求蒯大富每天将证词背若干遍,连动作都教给他,为他特别设计了几个手势。背述到什么地方,做什么手势,用什么语调。就这样,特别检察厅让蒯大富排演了多次。

蒯大富曾提出:“在法庭上做手势不合适、不严肃吧?”

特别检察厅的人说:“不对!要有语气要有表情。比如手指着说:‘就是他!张春桥。他让我……’”

果然,特别法庭审理张春桥时,当江华说:“蒯大富,把张春桥见你的时候情况说说。”蒯大富就开始背那一段,还按照特别检察厅的指示,用手指向张春桥说。结果,法警过来制止说:“别做手势。”后来就不做手势了。

蒯大富作证时,张春桥依然什么表情也没有,眼睛都没抬。

# 第1443回：众法官，不允许江青说话 提要求，华国锋出庭作证

1980年12月24日上午9时至11时38分，第一审判庭对江青开庭进行法庭辩论。特别法庭庭长江华，副庭长兼第一审判庭审判长曾汉周和17名审判员出庭。特别检察厅厅长黄火青、副厅长喻屏和5名检察员出庭支持公诉。

审判长曾汉周主持法庭辩论，他宣布："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指控被告人江青的犯罪事实，本庭于11月26日、12月3日、5日、9日、12日和23日上午，先后6次开庭，已经调查完毕。现在进行法庭辩论。"

检察员江文起立发言，他说："经过6次法庭调查，对被告人进行审问，出示和宣读证据、证言，听取证人出庭作证，播放了江青的讲话录音，完全证实了对江青反革命罪行的控告。江青是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主犯，是"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头子……她犯下的罪行是十分严重的。她的主要罪行是：第一，伙同康生、谢富治等人诬陷迫害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制造了全国最大的冤案。江青硬把逼出来的假供当成定案的依据，结果造成了全国在文化大革命中最大的冤案。刘少奇终于被迫害致死。第二，江青肆意点名诬陷大批党政军领导干部和群众。至于江青个人究竟点了多少名，诬陷了多少人，这个数字现在是很难统计的。凡是被她点名诬陷的人，绝大多数都遭受了各种迫害。有的被整病了，有的被整伤了，有的被整残废了，有的被整死了，弄得家破人亡。第三，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勾结林彪进行了大量的反革命活动。第四，大量事实证明，在林彪反革命集团被粉碎以后，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继承了林彪的衣钵，继续进行篡党篡国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的反革命勾当……江青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92条、第98条、第144条，构成了组织、领导反革命集团罪、阴谋颠覆政府罪、反革命宣传煽动罪、非法拘禁罪、诬告陷害罪、

刑讯逼供罪、非法搜查他人身体、住宅罪,对国家和人民危害特别严重、情节特别恶劣,应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 103 条从重判处。”

审判长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 118 条的规定,宣布被告人江青有陈述和辩护的权利,有最后陈述的权利。

江青说:“我对他的意见,也就是刚才所讲的《起诉书》的那一套,整个地说,就是:颠倒是非,混淆黑白,歪曲、篡改历史,隐瞒捏造事实。你们说了我那么多罪名,没有一件能站得住脚。远的不说,那就更说不清了。就从 1966 年 5 月 16 日以来,也就是中共中央通过重要的通知,发动文化大革命以来,到毛泽东主席逝世,我没有什么自己的纲领,我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执行捍卫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指示和政策的,是执行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你们逮捕审判我,这是丑化毛泽东主席。审判我就是丑化亿万人民,丑化亿万人民参加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你们审判我就会使‘文化大革命’中的‘红卫兵’和‘红小兵’抬不起头来。”

审判员打断她的发言说:“我们是代表人民审判你的。”

这是江青的发言第一次被打断,她立即反唇相讥:“你代表人民,你知道什么是人民? 你还是戴上假面具吧! 不然,太丑了!”

审判长曾汉周按铃警告江青“你再扰乱法庭,就取消你的辩护权利。”

江青:“对不起,我可以方便一下吗?”

曾汉周:“带被告人退庭方便。”

江青站起身,又说:“算了,我不去了,我要念一念《我的一点看法》,你不反对吧?”

曾汉周:“你可以念。”

于是,江青拿起两页纸念道:

“《我的一点看法》

项庄舞剑,意在沛公。

投降叛变,授人以柄。

要害问题,两个纲领:

以阶级斗争为纲,纲举目张,继续革命;
以三项指示为纲,以目混纲,修正反党。
穷凶极恶,大现原形。
掩盖罪恶,画皮美容。
树立威信,欺世盗名。
标新立异,妖言惑众。
弥天大谎,遮瞒真情。
偷天换日伎俩,上下其手劣行。
张冠李戴,移花接木,暗中嫁祸他人。
转移人民视线,妄图洗刷臭名。
罗织诬陷中央文革,迫害灭口有关知情。
只手难掩天下耳目,修正主义螳臂之能。
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乃是人民大众英雄。”

江青说:“这是一,二还没有写完。如果需要,我还可以给你们解释。我不是为自己辩护,我是为了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为了捍卫亿万群众人民参加的文化大革命……”

江青接着说道:

“一张起诉报告,满纸胡说八道。要为真理斗争,我的声明如下:你们借助国家名义,拼凑了一个什么特别法庭,给我罗织了一大堆罪名,这些罪名一条也不能成立。我过去的一切都是根据中央的指示做的,我在工作中有错误,有偏差,但绝不是犯罪。……”

“我是执行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我现在是为捍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尽我的所能。你们承认不承认九大和十大?如果不承认,就是离开重大历史背景,隐瞒重大历史事件!”

江青的发言第二次被打断。

她继续说:“我和毛主席结婚已经38年了,我怎么能够反对毛主席呢?当初华国锋抓我的时候就捏造了许多谣言,这些东西现在提都不提了。为什么?不敢见人嘛。你们捏造的这些东西和国民党当年对我的丑化和攻击有何不同?我和毛主席的感情是用历史来证明的。战争年代撤离延安的时候,留在前线追随毛主席的女同志唯有我一个,你们都躲到哪里去了?!”

江青的发言第三次被打断。

江青质问法庭:“你们的起诉书把林彪这个要杀死我的人,作为我这个所谓集团的成员,怎么能把谋害人的和被谋害的搞在一起?说以江青为首的搞这个阴谋活动?然后罗列一些种种莫须有的罪名强加于我,十足地暴露出你们的无耻和卑鄙。通篇的文字,绝大多数是造谣嘛。比如说,你们的材料里说我说过邓小平是汉奸,汉奸这个罪名要有事实呀,我没有材料说他是汉奸呀。我什么时候说过这句话呢?没有,我从来就没有说过。就是又造谣嘛。不错,我和邓小平之间有斗争,我从来不否认这一点,但是我没有说的话怎么能承认呢?还有,我对时传祥这个人根本不认识,也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个人,我怎么会说他是什么工贼呢?这一些事实就说明了,这个起诉书采用了没有的给我捏造,小事情给我夸大,别人的加在我头上。用这样的方法来制造了这起大大的冤案。你们开了这个头,好,后人就会群起而效之,你们将来也逃脱不了这样的下场。就是现在不会这样,将来也免不了这样,这是你们首先挑起来的。”

江青的发言第四次被打断。

她继续说:“我同林彪是有你死我活的斗争的,我和这个卖国贼斗争的时候,你们还不知道在哪里呢!林彪和刘少奇一样,都是要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的,都是把亲手把他们提拔起来的毛泽东视为眼中钉、肉中刺,迫不及待地企图取而代之。我作为毛泽东的妻子和战友,为捍卫党的原则,和保卫毛主席的安全,我挺身而出是自然的。党中央授予我一定的领导权后,我始终就在这个权力的范围内进行我的工作,这怎么能说我是非法的呢?这样说,你们把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究竟置于何地?你们究竟还承认不承认九大和十大通过的政治报告和党中央的一系列的重要文件和毛泽东同志、周恩来同志的讲话和批示?

你们根据什么,竟能得出结论说什么有的人是犯了错误,有的人是有意要推翻无产阶级政权?难道毛主席亲自发动,亿万人民积极参加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为了推翻什么阶级专政、夺取什么政权吗?

这真是一个荒谬不堪的论点,是一个简直叫人难以置信的诬蔑和

构陷。你们这样说,就等于把全国人民的意志都强奸了。

我所干的这一切,邓小平、彭真、华国锋,包括你们现在在台上的绝大多数人都曾经异口同声地拥护过,参加过,你们又怎样解释你们当年的行为呢?”

江青的发言第五次被打断。

“毛主席早就对我说过,要警惕刘少奇、邓小平、陆定一、杨尚昆以及周扬、田汉、廖沫沙等人的翻案活动,他们肯定是要翻案的,这是一条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这一条预见,由于华国锋这个坏家伙和叛徒的出卖,你们暂时地得逞了。但是,有一点我要告诉你们,你们不要高兴得太早了。中国是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毛泽东思想熏陶的,人民是经过锻炼的,你们这些修正主义分子,人民将来是不会放过的,我也在这里要告诉你们……”

江青的发言又一次被打断。

她继续说:“林彪指使叶群和他们的小分队去抄郑君里、赵丹他们家的事情,我回顾了很久,这是林彪的罪恶和阴谋的一部分,郑君里和赵丹的死,我是在这里才听说的,你们把这些强加在我的头上,难道不是和林彪一样地对我的迫害吗?吴法宪那个王八蛋是他的走狗,他的话怎么能作为凭据呢?他早就对我和张春桥恨得咬牙切齿,这是人所共知的。

我再在这里申明一遍,林彪和他的小分队对郑君里和赵丹以及对秦桂贞的事情,和我没有任何的关系,你们也拿不出像样的证据来。我倒是怀疑,你们已经和吴法宪这类人串通好了,有意要陷害我,不然,为什么你们至今不让我和郑君里家里的人好好地对质一下事情的经过。你们这样做,就是要造成一种效果,好像我江某人在三十年代干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现在你们把要说的话都说出来嘛,我究竟有什么样的把柄攥在你们手里呢?没有,没有,根本没有。江某人在三十年代的所作所为是光明正大的。你们做出了林彪要做而没有做出来的事情,你们才是地地道道的林彪的同伙呢。其实,毛主席发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时候,就是把他们结合起来批的,只不过你们要把林彪的设想变成现实罢了。”

江青的发言第六次被打断。

她继续说:“你们所说的那个所谓诬陷八届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的事情,简直是有史以来的奇谈怪论。文化大革命中,群众对各级机关和部门的领导人提了很多的问题,揭发出许多历史上的丑行,我作为中央文革小组的第一副组长,向康老要一个有问题的人的名单,就成了所谓的诬陷的证据。难道说,革命群众揭发的那些问题,都是我江某人炮制出来的吗?难道说庐山会议上对彭德怀等人的揭发材料,。也是我江某人策划搞的吗?明明是党中央给他们定的案子,我看了材料给人们讲一讲,就成了我江某人的诬陷,这能说服历史和后人吗?我这里还只是说就算你们所说的材料是假的这个前提上,更何况党中央整理他的每份材料和定的案子都是正确的呢。照你们说来,文化大革命十年来,亿万人民群众参加的这场运动中,所有揭发出来的走资派和叛徒、特务以及一切牛鬼蛇神等等,统统都是假的,统统都是冤案、假案、错案,都是我江某人策划的,这可能吗?这岂不把你们的能力和才华都抹杀了吗?我江某人真要有这么大的本事,我怎么会坐到这个被告席上来呢?

我这样一讲,可能人民群众就能看清事实了,你们这个特别法庭搞的这一切,就是一个有组织、有计划地精心制造出来的大冤案。你们所采取的手段,就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然后扩大范围,把我搞臭。天地良心,你们的良心哪里去了?我还是毛泽东的妻子,你们就敢于如此,可见王洪文为什么到了法庭,到了这个地方吓得连话都说不出来了。”

江青的发言第七次被打断。

她继续说:“刘少奇的叛徒材料,是他自己三次被捕坐监所写出来的,难道是我编造的吗?他是怎样出狱的,连延安整风的时候,你们现在的中央里的人都提出过怀疑,还有揭发,就是因为证据不够,毛主席没有把这个问题提到桌面上来,而且刘少奇还受到重用。直到这次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小将和革命派揭发出来他们大批这样的问题,才进一步引起了毛泽东主席和党中央的高度重视,这才经过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研究和批准,成立了中央专案组。这个专案组所有的中央领导同志和中央文革小组都参加了,所有的材料都是集体审定和共同研究的,你们仅仅抓住我批准他们拘留了几个人的报告,就断定刘少奇的

专案是我江某一个人制造出来的,是不是编造得太离奇了吧?是不是难以让历史和后人所接受呢?除非你们和当时的中央是木偶人,否则这一套就是荒谬的,站不住脚的。”

“关于这个问题,我的意见已经说过多次了,你们爱怎么罪就怎么定吧,这个我也没什么。你们现在翻刘少奇的案,翻彭真的案,都是反对周总理,反对康老,都是反对毛主席,反对文化大革命。全国人民能答应你们吗?……”

“我现在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要向毛主席负责。现在整的是毛主席。我的家乡有句老百姓的话:‘打狗看主面’,就是说打狗呵,还要看主人的面子。现在就是打主人。我就是毛主席的一条狗。为了毛主席,我不怕你们打。在毛主席的政治棋盘上,虽然我不过是一个卒子,不过,我是一个过了河的卒子。”

“过去我经常说:革命要有‘五不怕’:一不怕杀头;二不怕坐牢;三不怕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四不怕开除党籍;五不怕老婆离婚。这第五条对于我不成问题了,二、三、四条已经三年多了,我经受了,第一条杀头,我久候了!……”

江青又说:

“清君之侧,目的在君。

罗织陷害,血口喷人。

利用专政,搞法西斯。

精神虐待,一言难尽。

破坏政策,凶悍残暴。

造反有理,革命无罪。

杀我灭口,光荣之甚。”

最后,江青大声地说:“这就是我的回答!”

江青的最后陈述,历时近两个小时。

曾汉周:“被告人讲完了吗?”

江青:“讲完了。”

曾汉周:“请把你的原文交给法庭。”

江青:“可以。”她将原文交给值警法警

曾汉周问:“你还有什么要说的?”

江青:“已经累了,到此为止吧。”
曾汉周:“把被告人江青带下去。现在休庭。”
此时已是上午11时38分。

江青在法庭上

# 第1444回：谁怕谁？法官与江青辩论死刑否？徐向前表示反对

邓小平看了江青在法庭辩论时的发言后，气恼地对彭真说："告诉特别检察厅的同志要准备一篇很好的发言，一条条地批驳这个娘们的诡辩，把她的画皮彻底地剥下来。这个家伙，我早就料定她会在法庭上表演这么一下子的。下次辩论的时候，她如果再继续攻击党的领导人，你们就采取措施，不能让她这样为所欲为。否则，就收不到我们审判的预期目的。"

彭真当即把这个指示通知了特别检察厅："你们再不能允许江青在法庭上攻击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如果她要再讲，你们就押她出去或者采取当庭制止的措施。总之，不能允许她继续如此。"

江华立即做了相应的布置。

5天后，12月29日上午9时至10时26分，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第一审判庭对江青继续开庭进行法庭辩论。

检查员江文对江青24日的辩护词进行了批驳："江青在长达两个小时的所谓辩护发言中，对本庭指控她所犯的严重反革命罪行，没有提出任何可以证明她无罪或者罪轻的证据，通篇不过是颠倒黑白，混淆视听，转移目标，掩盖罪责的谎言和诡辩……"

江文说江青的全部辩护言论，集中起来，就是攻击法庭对她的审判是什么"项庄舞剑，意在沛公"，说她的反革命罪行是代表毛泽东主席的，是按毛主席的指示办的，妄图把反革命罪责，推到毛主席身上，借以掩盖她严重危害国家和人民的反革命罪行，逃避依法应负的刑事责任。

江文列举的事实是，1974年7月14日，毛泽东席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的话："她（指江青）并不代表我，她代表她自己。总而言之，她代表她自己。"还举了1974年12月23日毛泽东的话："江青，一不要出风头；二不要乱批东西；三不要参加组织政府。你们看她有没

有野心？我看有。”及1974年年底，毛主席说的：“江青有野心，她是想叫王洪文作委员长，她自己作党的主席。”和1975年年初，毛泽东的说：“我死了以后，她（指江青）会闹事。”江文说：“毛主席的这些话，已经说得很清楚了。现在，江青还要继续把她的反革命罪行说成是代表毛主席的，是按毛主席的指示办的。这种谎言是骗不了人的！”

不过，江文想到过没有，毛泽东说的这些话，可是没有一句说江青是反革命呀！毛泽东生前也说过邓小平：“说是永不翻案，我看靠不住呀。”那是不是也可以由此判断邓小平也是反革命呀？

江文还批驳江青说的“审判我就是丑化人民”、“你们审判我就会使‘文化大革命’中的‘红卫兵’抬不起头来”。说这是对人民的公开侮辱，这是颠倒黑白的胡说。江文说：“江青代表什么呢，不过代表一小撮阴谋家、野心家、反革命分子……和形形色色的社会渣滓。”又说：“在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横行的10年中，毒害了广大青少年，严重损害了年青一代的成长。他们同广大群众一样，强烈要求清算你们的罪行。”

江文是这样驳斥江青质问法庭承不承认“九大”、“十大”和怎样看“文化大革命”等说法：“如果讲历史的话，你是文化大革命中的反革命，你所谓‘捍卫文化大革命’就是要捍卫打、砸、抢、抄、抓，刑讯逼供，诬陷迫害那一套，就是要继续把中国人民投入苦难的深渊，就是要掩盖你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累累罪行。”

对江青不同意将她与林彪集团说成是“互相勾结、狼狈为奸”一事，江文是这样驳斥的：“大量确凿的证据证明，林彪反革命集团和江青反革命集团，在1971年9月林彪反革命集团谋杀毛主席，策动反革命武装政变被揭露和粉碎以前，曾为了实现共同的反革命目的，或者是公开配合，或者是秘密勾结。他们有预谋地诬陷、迫害党和国家领导人，镇压广大干部和群众、颠覆政府，危害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这些方面，江青一伙同林彪反革命集团是狼狈为奸、勾结在一起的，如果说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内部后来有矛盾，那不过表明他们是做贼是一伙，分赃有矛盾罢了。”

江文最后再次提出说：“江青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92条、第98条、第102条、第136条、第138条、第142条、第144条，犯有

阴谋颠覆政府、分裂国家罪、组织领导反革命集团罪、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诬告陷害罪、非法拘禁罪、刑讯逼供罪、非法搜查罪。被告人江青所犯罪行对国家和人民危害特别严重,情节特别恶劣。为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尊严,体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我代表特别检察厅再一次提请特别法庭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03条对被告人江青从严惩办。”

江文反驳之后,审判长曾汉周问江青:“你还有什么话要讲?”

江青说:“我要看中共九大和十大政治报告。”

曾汉周说:“这与本案无关,予以驳回。”

江青认为法庭剥夺了她的发言权,大声抗议。

曾汉周按铃警告,江青不予理会,她说:“你们这个法庭根本就不敢把事情的真相讲清楚。华国锋和邓小平对我说的这些事情都有过赞扬的话。当初他们对刘少奇采取的是和我一样的态度。他们的一些表态和检查就在我的保险柜里,你们法庭可以去拿嘛。为什么你们不敢把他们传过来对证。我要和华国锋对证。他就是新的证人,你们……”

审判长打断江青的话说:“法庭已经传唤了证人作证……”

江青也打断审判长的话说:“你们完全是假的,为什么我要的证人你们不让出庭?什么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骗人的!”

李作鹏的辩护律师张思之后来回忆说,曾汉周把桌子一拍说:“江青,你是犯人,你是被告,你要怕我们!”

江青一愣,然后反应过来了,说:“什么?我要怕你?”

“对,你要怕我们。”

江青马上说:“怕你?你怕我!”

两个人这样来回几个回合,争论“谁怕谁”。后来江青哈哈一笑,说:

曾汉周一再按铃警告,江青根本不予理会,并大声喊道:“你问问坐在你旁边的江华,看我怕过谁?我就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

一句话把曾汉周提醒了,是啊,江青怕过谁啊?于是“谁怕谁”的辩论到此结束。最后向江青宣布:“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指控你的反革命罪行,本庭经过6次开庭,进行法庭调查,出示和宣读了大

量的证据、通知和传唤了证人及同案被告人到庭作证,播放了你诬陷、迫害干部的讲话录音,事实已经调查完毕。法庭给了你陈述和辩护的权利,给了你充分陈述和辩护的时间。但是,你回避指控你的罪行,不按照起诉书指控你的犯罪事实进行陈述和辩护。反而利用法庭辩护和最后陈述,继续诬蔑、诽谤党和国家领导人,诬蔑法庭和法庭组成人员、诬蔑公诉人,公诉人已指控你继续犯罪,特别法庭在评议时,将予以考虑。”

江青大声说道:“那就让我多长几个脑袋,割了算了嘛,我在这里……”

曾汉周打断江青的话说:“现在我宣布,本次开庭全部结束,把被告人江青押出法庭!”

江青一听,双手抓紧栏杆高声喊道:“革命无罪! 造反有理!”

两名女法警将江青双臂反扭,连拉带推,拖出了法庭现场……

一路上,江青不断地高呼口号:“革命无罪,造反有理! 革命无罪,造反有理! ……”

如何对“四人帮”和黄吴李邱量刑? 1980 年 12 月,解放军代表在京西宾馆对此案的 10 名主犯量刑进行过投票,并提出一张“单子”:

投票人数 88 人。

江 青:死刑并立即执行/33 人,死缓/48 人;

张春桥:死刑并立即执行/36 人;死缓/46 人;

姚文元:无期徒刑/65 人;20 年/11 人;

王洪文:无期徒刑/17 人;20 年/49 人;

陈伯达:无期徒刑/32 人;20 年/27 人;死缓/15 人;

这时,民革副主席屈武还转给邓小平一封信:

小平同志并转中央:

江青罪大恶极,死有余辜,如不处以死刑,则:1、不能为死者申冤;2、不能平民愤;3、使其余党存死灰复燃的幻想;4、使心有余悸的人担心将来变天。以上几点都不是从法律角度考虑,如按刑律,罪不至死当然可不判死刑;如依法应判死刑而不判死刑,则将铸成大错。

对江青,徐向前不同意杀。据徐向前的秘书李尔炳将在纪念洪学智上将的一篇文章《不朽的丰碑——纪念洪学智同志诞辰 100 周年》

中说：

“在审判‘四人帮’期间，有一天，洪老来看徐帅。一进门就说，老帅呀，唯一的一票啊，好啊，老帅的意见还是有作用的。什么唯一的一票？老帅事后才向我们讲了事情的来龙去脉。中央在讨论对江青的量刑时，多数同志主张杀江青，只有徐帅提出，从国际国内的大局考虑，建议不杀江青。中央采纳了徐帅的意见。”

据说，陈云也坚决不同意判江青死刑。

1981 年 1 月 25 日，特别法庭对“两案”的 10 名主犯做了宣判。

10 名主犯中，除王洪文、江腾蛟认罪外，陈伯达是在律师的谈话后，被迫认罪。而吴法宪却是积极认罪，但却对犯罪事实一概不知。其余 6 人均不认罪。

姚文元胸前依然别着一支钢笔，金鱼眼睛仍朝着天花板，对起诉他的事实，他只承认有错误，但不认为有罪行，是犯法。

张春桥胡子拉碴，双唇紧闭，从头至尾一言不发。他松弛了的眼睑低垂，一双眼睛更显得成了三角形。

他面对提问，不答；

送达文件，不看；

要他签字，不签！

有位法官，在法庭上反反复复地对他说：“张春桥，你不吭声，你沉默，就是承认对你的控诉了。”

其实，沉默是犯罪嫌疑人的权利，怎么能因为他的沉默就认为他认罪了？由此可见，这个看似要依法办事的特别法庭，其实法律常识是极低的，在审案的过程中一而再，再而三的犯下了许多法律错误，甚至依据 1979 年才通过的《刑法》去审理、量刑 1976 年以前发生的事实经过。

特别法庭最后对他们 10 人做了如下判决：

判处被告人江青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判处被告人张春桥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判处被告人姚文元有期徒刑 20 年，剥夺政治权利 5 年。

判处被告人王洪文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判处被告人陈伯达有期徒刑 18 年，剥夺政治权利 5 年。

判处被告人黄永胜有期徒刑18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
判处被告人吴法宪有期徒刑17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
判处被告人李作鹏有期徒刑17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
判处被告人邱会作有期徒刑16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
判处被告人江腾蛟有期徒刑18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

审判席上的姚文元

十名主犯被押进被告席上的铁栏里,左起:张春桥、陈伯达、王洪文、姚文元、江青、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江腾蛟

审判“四人帮”

江青后来对他的判决书写了大量批语。

对迫害刘少奇、王光美及其他人的“罪状”部分,江青写道:

“1966 年底,毛主席跟刘少奇谈话,我在场。

刘少奇问:‘我们现在是社会主义国家,也要造共产党的反吗?’毛主席说:‘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在共产党员内,就要造他们的反,不从党里抓要从哪里抓呢? 你读读列宁是怎样教导我们的。’毛主席把《国家与革命》中的一段指给刘少奇看:‘资产阶级思想家,特别是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家,迫于无可辩驳的历史事实而不得不承认,只有在有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地方才有国家,但他们又来‘改正’马克思,说国家是阶级调和的机关。在马克思看来,如果阶级调和是可能的话,国家就不会产生,也不会保持下去。在市侩的庸俗的教授和政论家们(他们往往善意地引用马克思的言论!)看来,国家正是用来调和阶级的。在马克思看来,国家是阶级统治的机关,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机关,是建立一种‘秩序’,来使这种压迫合法化、固定化,使阶级冲突得到缓和。在小资产阶级政治家看来,秩序正是阶级调和,而不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缓和冲突就是调和,而不是剥夺被压迫阶级用来推翻压迫者的一定斗争工具和手段。’‘看完了吗?’毛主席说:‘我的书和列宁的书中,都是这个观点。我们的修正主义者很奇怪。当他们打击左派的时候,从来也不讲法律,不讲民主,专门搜

集左派的材料,他们对我们可狠哪。无产阶级刚刚准备反击,他们的一切舆论就都来了,这难道是平等吗?这又能说明什么问题呢?'‘那以你之见,就这样闹下去吗?'刘少奇反感地和毛主席辩论:‘就不需要制定一定的规矩吗?'毛主席气愤地说:‘又是你们那一套党有党规、国有国法,是不是?以我看,革命就是要打烂一切条条框框,让群众起来彻底革命。在推翻走资派统治的斗争中,是不能给造反派指定那些陈规旧俗的。要不然,还有什么革命二字?'我把这段毛主席与刘少奇的对话,写在这里。立此存照,让世人、后人去评论我有没有所谓的‘罪行'。"

对于把江青等人和林彪集团搅在一起,江青写的批语是:"邓小平他们把我们和林彪集团并为一案审判,有着极大的阴谋。其一,林彪在毛主席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中批判过刘少奇、邓小平一伙。他们对所有批判过他们的人都怀着极大的仇恨,以百倍的疯狂进行秋后算账,所以他们要把批判他们的人一块进行报复;其二,毛主席领导全国人民开展了批林批孔,林彪集团已经臭不可闻。邓小平想把我们与林彪搅在一起,借助毛主席的号召,达到他们把无产阶级革命派搞臭的罪恶目的;其三,掩盖林彪集团的极右实质,为推行邓小平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鸣锣开道。他们和林彪是一丘之貉,都是极右派,都代表了官僚垄断阶级的利益。我还是那句话:我是最早坚决反对林彪集团的极右路线的人之一。"

# 第1445回：作《决议》，文革被彻底否定 紧接着，各地造反派判刑

1981年3月9日，邓小平同邓力群等人谈话，谈《历史决议》的稿子。他说："问题最大的是'文化大革命'前十年部分。现在稿子的调门不符合原先设想的方针。看完后，给人的印象是错误都是老人家一个人的，别人都对。我说过多次了，不能说成别人都对，只有一个人是错误的，这个人就是毛主席。历史不是这样的。这不符合实际。那时的错误，大家都有责任，主要是因为当时我们没有经验。"

3月18日，邓小平在听取邓力群、吴冷西汇报胡乔木对《历史决议》稿的修改意见时再次指出："决议稿的轮廓可以定下来了。我最早提出写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第一位的任务，是树立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这个问题写不好，决议宁可不写。在这一点上站住了，决议才能拿出去。这是中心，是关键。写好这个问题，才叫实事求是地分清建国以来党的历史上的是和非、对和错，包括个人的功过。"

他说："文化大革命前的十年，应当肯定，总的是好的，基本上是在健康的道路上发展的。这中间有过曲折，犯过错误，但成绩是主要的。""毛泽东同志要负主要责任。这一点，他曾经作了自我批评，承担了责任。这些事情写清楚了，再写'左'的思想的发展，以至于导致'文化大革命'的爆发。"

"关于'文化大革命'这一部分，要写得概括。胡乔木同志的意见，我是赞成的。'文化大革命'同以前十七年中的错误相比，是严重的、全局性的错误。它的后果极其严重，直到现在还在发生影响。说'文化大革命'耽误了一代人，其实还不止一代。它使无政府主义、极端个人主义泛滥，严重地败坏了社会风气。但是，这十年中间，也还有健康的方面。所谓'二月逆流'，不是逆流，是正流嘛，是同林彪、'四人帮'

的反复斗争嘛。”

1981 年 3 月,陈云先后同邓力群进行了四次谈话。

在第一次谈话时,陈云明确表示支持邓小平确定的三条总的原则:“《决议》要按照小平同志的意见,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小平同志提出《决议》宜粗不宜细,我是同意的。要在这个原则下面,是成绩就写成绩,是错误就写错误;是大错误就写大错误,是小错误就写小错误。”

在第二次谈话时,陈云认为在历史决议中要确定毛泽东同志、毛泽东思想的地位。为了在写法上使大家能够从这个决议上看得清楚,他建议:“增加回顾建国以来二十八年历史的段落。有了党的整个历史,解放前解放后的历史,把毛泽东同志在六十年中间重要关头的作用写清楚,那么,毛泽东同志的功绩、贡献就会概括的更全面,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也就有了全面的依据;说毛泽东同志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说毛泽东思想指引我们取得了胜利,就更能说服人了。”

陈云在第三次谈话中,具体讲到了建国前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在历史上的重要作用。他说,毛泽东同志的威望,是通过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建立起来的。在中央领导同志中间,没有一个人能够同毛主席相比,包括少奇同志、恩来同志。即使在毛泽东同志犯错误的时候,许多老干部被整得那么厉害,可是大家仍然相信他,忘不了他的功绩,原因就在这里。

陈云在第四次谈话时,建议《历史决议》要写上共产国际对我们的帮助,我们党是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成立的,建党初期共产国际起了好作用。在抗日战争期间和建国初期,苏联还是给了我们援助。“这样一些问题,《决议》应该如实地按照事情本来面貌写上去。要通过对这些历史问题的论断,再一次说明中国共产党人是公正的。”

3 月 24 日,邓小平亲自去看望陈云,并就历史决议的起草问题交换了意见。

陈云对《历史决议》稿提出两点意见:

(一)要专门加一篇话,讲讲解放前党的历史,写党的六十年。这

样写,毛泽东的功绩、贡献就会概括得更全面,确立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也就有了全面的根据。

(二)建议中央提倡学习,主要是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重点是学习毛泽东的哲学著作。在延安时,毛泽东亲自对我讲过三次要学哲学,我把毛泽东的著作认真读了一遍,受益很大。现在我们的干部中很多人不懂哲学,很需要从思想方法、工作方法上提高一步。要选编一些毛泽东的哲学著作,如《实践论》、《矛盾论》、《论持久战》、《战争和战略问题》、《论联合政府》等;还要选一些马恩列斯的著作。也要学点历史。青年人不知道我们的历史,特别是中国革命、中国共产党的历史。

3月26日,邓小平在同邓力群的谈话中转述了陈云的意见,他说:"前天我去看陈云同志。陈云同志对修改决议稿又提了两条意见。一是专门加一篇话,讲讲解放前党的历史,写党的六十年。六十年一写,毛泽东同志的功绩、贡献就会概括得更全面,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也就有了全面的根据。这个意见很好,请转告起草小组。二是建议中央提倡学习,主要是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重点是学习毛泽东同志的哲学著作。"

邓小平说:"这些意见很好,请转告起草小组,并报告胡耀邦。"

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举行预备会议,对提交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草案)》进行第四轮大讨论。从6月15日起,预备会议开始分组讨论,起草小组成员分别在各小组对《决议》的起草和修改情况作说明。各位中央委员认真讨论了8天。在这期间,中央还征求了在京党政军机关近千人的意见。

6月22日下午,中央常委召开各组召集人碰头会,了解讨论的情况,邓小平对决议草案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说:"总的来说,这个决议是个好决议。我们原来设想,这个决议要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实事求是地、恰如其分地评价'文化大革命',评价毛泽东的功过是非,使这个决议起到像一九四五年那次历史决议所起到的作用,就是总结经验,统一思想,团结一致向前看。我想,现在的这个稿子能够实现这样的要求。"

在统一认识的基础上,胡乔木、邓力群根据这次会上提出的新问题,对决议草案进行了提交六中全会审议前的最后修改。陈云看后,称赞道:“改得很好,气势很壮。”

6月22日至25日,中共中央在中南海怀仁堂邀请在京的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及无党派人士、全国政协部分老同志座谈,征求他们对决议稿的意见。

1981年6月27日,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一致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决议》对文化大革命有这样一段结论:

实践证明,“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它根本不是“乱了敌人”而只是乱了自己,因而始终没有也不可能由“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在我国,在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建立以后,尤其是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剥削阶级作为阶级已经消灭以后,虽然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还没有最后完成,但是革命的内容和方法已经同过去根本不同。对于党和国家肌体中确实存在的某些阴暗面,当然需要作出恰当的估计并运用符合宪法、法律和党章的正确措施加以解决,但决不应该采取“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方法。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进行所谓“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既没有经济基础,也没有政治基础。它必然提不出任何建设性的纲领,而只能造成严重的混乱、破坏和倒退。历史已经判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决议》发表后,紧接着就是一场声势浩大的“彻底否定文革”的宣传教育。但是,文革能够被彻底否定吗?对立范畴不乏二律背反。左彻底否定右的存在,上彻底否定下的存在,高彻底否定低的存在,大彻底否定小的存在,对彻底否定错的存在,唯心主义彻底否定唯物主义的存在,资本主义彻底否定社会主义的存在,市场经济彻底否定计划经济的存在,这些,可能吗?

说“‘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的内乱。这个领导者是谁?是中央领导吗?显然不是,就是指毛泽东。《决议》既要肯定

毛泽东,又将其说成是发动一场内乱的始作俑者,逻辑上似乎很不一致,尽管其中加上一句“被反革命集团利用”,仍然让人一看便知这场内乱的根源是毛泽东。

毛泽东当时的威信确实很高,但能高到在半年的时间内就让大陆几乎所有的人都狂热地投入到一场这样“既没有经济基础,也没有政治基础”的运动中去吗?而且这场运动看上去是与普通的百姓没有什么关系的。如果真是这样,那岂不是当时的中国老百姓都神经有问题了,只有邓小平、陈云等老干部头脑是清醒的?

文化大革命是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几乎人人都自觉参与的,广泛、深入的运动,连老太太和小孩都投身其中,挡都挡不住。《决议》将其说成仅仅是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这符合历史事实吗?

1982 年,上海司法机关审判江青反革命集团在上海的余党徐景贤、王秀珍等罪犯。鉴于马天水患有反应性精神病,决定暂不提起公诉,取保候审。后来,由马天水的弟弟马登坡作保,把他领回原籍养病。

马天水返回老家以后,病情时发,经常离家外出,在外胡言乱语。1998 年安徽《党员生活》杂志发表《马天水的暮年》一文是这样描述的:

一个寒冷的冬天,华北平原上最后一批庄稼已收割完毕,西风残照,衰草凄迷。一个孤独的老人毫无目的地踽踽独行,时而狂笑,时而嚎叫——他就是当年上海滩上不可一世的马天水。

马天水回到河北唐县老家已经一年了。他弟弟马登坡管束不了,向有关部门提出报告,要求解除担保,由政府处理。有关部门决定派员前往唐县,带回马天水,替他治病。

1983 年 4 月初,一行人来到河北省唐县一个村庄。没有料到,马天水一见到吉普车来到后,就像一匹受了惊的马,一味朝野外狂奔,不一会儿就消失在密密的树丛中了。经过两个多小时的寻找,最后才在一条水沟里找到了马天水。只见他趴在沟沿上,脑袋钻进了草丛,只一个屁股撅在外面。显然,他的精神病又发作了。在医生的帮助下,公安人员好不容易把马天水弄上车,离开他的老家。

吉普车在华北原野上奔驰。马天水安静下来了,他环顾着这熟悉的原野,向坐在身边的医务人员念叨起来:“我们在这个土坡上打过日本鬼子一个伏击,那儿原来有日本鬼子一个炮楼,后来被我们游击队炸飞了……”

对抗日战斗历史的明晰回忆,看起来马天水的神智是正常的。可是,一接触到“文革”,他就丧失了理智,胡言乱语。

徐景贤被判处有期徒刑18年,剥夺政治权利4年。

王秀珍被判处有期徒刑17年,剥夺政治权利4年。

# 第1446回：胡厚民，法庭作最后陈述 呼口号，黄廉不承认有罪

1982年6月10日，武汉市检察院以“阴谋颠覆政府”罪对武汉市造反派头头夏邦银、朱鸿霞、胡厚民、张立国向市中级法院提起公诉。7月9日至21日，武汉市中级法院开庭审理。

在法庭调查中，被告人朱鸿霞、夏邦银基本上承认起诉书所指控的犯罪事实。

朱鸿霞在第一次开庭审理结束后，在回监所途中看到新华路北湖一带建了很多新房子。他说：“这两年发展真快，我几乎认不出来了，不知道还要不要我参加建设。”他对管教干部说：“不错，法庭很文明，我原以为要拷上去、拷下来的。生活也不错，吃了两个面包。”

夏邦银第一次受审后说：“开庭的方法很文明，起诉书上写的都是事实，我应该认罪。”“刚接到起诉书的时候有抵触情绪，看守所干部跟我谈话以后，感到主要事实是对的，枝节也没有什么必要辩了。人总是在变的，经过这段时间一想，就想通了。”他还对管教干部提出：“我在法庭上有哪些不对的地方，你可以指出来，我好注意。”

张立国出庭受审时，对被指控的十九条罪行中的十条进行辩解，对法庭的审问，时而回答“这不是事实”，时而称证人是“有意作伪证”。被法庭认为是态度反复无常。回监后，张立国说：“法庭出示的证据不公正，只出示公诉人的证据，这个证据都是由公诉人任意取舍的。”

7月12日凌晨3时，张立国先后两次用毛巾勒自己的脖子自杀，被值勤民警及时发现制止。法庭调查后期，他的态度有所转变，能承认部分犯罪事实。

被告胡厚民对法庭调查的问题拒不回答。他回到监所后说：“嗨！还不是那么回事，都是些老掉牙的问题，我听了心里好笑。‘一月夺权’是毛主席肯定的，这算反革命夺权，那全国有多少反革命？”

他还说:“我对法庭没有信任感,我们的案子法院作不了主,他们也没有那个板眼做主。有人会为我们说话的。这不是我看不起他们,今天开庭有那么多小车,还不是头头们在看电视。对我们的处理,态度好坏无关紧要。王洪文的态度还不好?结果判了无期,比姚文元还重。态度越好越有鬼。”

他说:“人生能有几回搏,再不说,以后没有听众了。”“不管朱、夏、张判几年,我不管那些,我反正跟他们拼了。”

因此,胡厚民被认为是藐视法庭,破坏法庭规则。当法庭调查他策划1967年“126”夺权,并认定这是反革命夺权时,胡厚民只说了一句:“欲加之罪,何患无词”。

他还在法庭上喊到:“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胡厚民在辩护时全盘否定了起诉书所指控的罪行。他说:“自古以来,打官司两方面都可以说。但在整个法庭调查中,法庭只听原告的,不听被告的,很显然,是法官先生偏袒原告,压制被告,我认为这是不公正的,严格地说是违法的。第一,把‘126夺权’说成是反革命夺权是站不住脚的。第二,文化大革命的《十六条》规定要搞‘四大’,既然要‘四大’,我们搞的那些何罪之有?第三,还有什么诬陷迫害干部,也完全不是那么回事。把赵辛初、韩宁夫等搞到武胜路街头,不是阴谋。喻文斌等把省里几个领导人藏了几天,为什么不起诉喻文斌,不外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

公诉人批驳了胡厚民为自己进行的辩护,并提请法庭对胡厚民从重判处。

7月24日,胡厚民在法庭陈述:

尊敬的法官先生:

我认为我的问题决非个人问题,而是个社会问题。不为个人陈述,我要为千千万万在文化大革命中致伤致残致死、被批被斗被关的工农兵群众、干部、知识分子青年学生(包括他们的子女及亲友)在这里讲几句,为他们鸣冤叫屈。

我认为,既然文化大革命全错了,那就不是你是我非。更不能一派的受害者得到了公正合理的评价,而且得到了各种优厚的照顾;而

另一派的受害者至今不仅得不到公正合理的评价,而且仍然背着各种罪名(包括其子女及亲友仍然遭到歧视和排斥)。人民是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概念,人民法院不应该站在某一边讲话,应该为全体人民做主,伸张正义。决不能以曾经反过或者保过自己来做为判断是非、认定功罪的标准,而应该以法律为准绳、以事实为依据,大公无私,亲疏一视同仁,不是说在法律目前人人平等吗?我想在这里也应该是平等的。造反派这边伤害了那边的问题,我愿承担一切责任,那么"百万雄师"那边伤害了这边的人,该由谁来承担责任呢?总不能说这边是人民,那边就不是人民吧?

也许有人说我这是为民请命,对此我将理直气壮地告诉他,这是责无旁贷的。为此,我将代表这些受害者及其亲友特此向人民法院提出口头起诉,希望人民法院真正站在人民立场上秉公执法,严肃审理,为全体受害者做出一个实事求是的公正合理的结论。我起诉的内容如下:

第一、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出于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反修防修而积极投入文化大革命,被打成"三家村""四家店"牛鬼蛇神、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小邓拓等等罪名的工农兵群众、干部、学生、知识分子,如果这些人确负上述罪状,请按国家法律惩处;如果不是,应该给这些人员做出一个实事求是、公正合理的结论。该追究谁的责任?该追究什么样的责任?

第二、1967 年3 月17 日,全省上下一个晚上以反革命名义抓成千上万的人,关押时间不等,有的致伤致残致死,如果上述人员确系反革命,请按国家法律惩处,如果不是就应该给人家作一个实事求是、公正合理的结论。该追究谁的责任?该追究什么样的责任?

第三、1968 年底清理阶级队伍时,据曾思玉在总理面前汇报时说:湖北全省清理出几多万阶级敌人(我当时在场,曾有讲话稿)。如果这几多万确系阶级敌人,请按国家法律惩处,如果不是,就应该给这些人作一实事求是、公正合理的结论。该追究谁的责任?该追究什么样的责任?

第四、1969 年中共中央发出了九·二七指示(我有证据,这个文件是康生搞的),曾思玉、刘丰在湖北大抓"北决扬"、"516",全省上下被

打成“北决扬”分子,“516”分子的人,数以万计,被批被斗被抓致伤致残致死的人数是空前的,我个人就被打成“516”反革命集团在湖北的幕后总指挥,“北决扬”反动组织的总头目总后台,幕后主要操纵者。假如上述情况属实,请按国家法律惩处,如果不是,就该给上述人员做出实事求是、公正合理的结论。到底谁是“北决扬”?到底湖北有没有“516”?应向全省人民讲清楚,好像天津市委就宣布天津没有一个“516”分子,该追究谁的责任?该追究什么样的责任?

第五、1970年曾思玉、刘丰在大抓“北决扬”“516”的高潮中,每次批斗我时,都要提出一部电台来,并称这部电台是我私设并使用过的。然而,我活了40多岁,还不知电台是何许物也。请法庭审查,假如确认我私设电台并使用过,请按国家法律惩处;如果不是,请对这个轰动全省的奇案,应该做出实事求是、公正合理的结论。该追究谁的责任?该追究什么样的责任?

第六、1976年底以后,全省上下许多人被打成“四人帮”的黑干将、黑爪牙、黑爪毛等等,被抓被斗被关致伤致残致死者无法统计。如果上述情况属实请按国家法律惩处,如果不实就该给上述人员做出实事求是的结论。该追究谁的责任?该追究什么样的责任?

以上问题如果真正得到了实事求是公正合理的解决,枪毙了我胡厚民,我死也瞑目。如果得不到实事求是公正合理的解决,枪毙了我胡厚民,我死也不瞑目。但是我深信我们伟大的党,必定会做出实事求是、公正合理的结论。至于我是判死刑还是只判无期,那就随你们的便罢。但是为了向党向人民表明我的心迹,特写了二首小诗,题为法庭吟:

第一首:

肉躯刀可断,主义枪难灭。

身首异处分,魂尤信马列。

第二首

行至地狱入口处,当像游子返故居

入党当许献终身,捐躯岂能头反顾

一刀可将生命断,万枪难使真理屈

共产党人谁惜死,敢擎方寸照环宇

我的陈述完了,谢谢法官先生

胡厚民

一九八二年八月(七月)二十四日上午于武汉中级人民法院法庭上

重庆的黄廉,自1976年11月,被作为“四人帮”在四川的黑干将,关押审查了5年多,轮流在全市各单位批斗了4年多后,也于1982年进行了公开审判。黄廉后来回忆说:

那天我一出监狱就看到摄影机,到会议室之后,检察员给我念起诉书副本,说公安局已经结束了侦察。正式开庭是82年春节假期过后了,那个时候我身体很不好,他们送我去三医院看病,碰到一个熟人问为什么这么瘦,医生说为什么瘦,贫血、身体不好。我坚持不肯让他们抽血,也就算了。

公开审判一直进行了五天,常常上午是周家喻,下午是我。开庭回来之后有加菜,碗里有十几片油炸的肉,他们要我在法庭上听话,说审判完就好了。第一次审判是在政协礼堂,这个时候出门已经是正式的囚车了,我看到从监狱出来到礼堂,2000多米长的街道全部戒严了,机枪架起,阵仗很是吓人。把我押到被告席要我坐下,我就站在那里,看台上坐的是些什么人,所有人的前面都有牌子和标识,只有一个女人前面没有牌子,审判长介绍的时候也没有介绍她。庭长宣布开庭,宣布一下就往楼上看一下,估计是有个什么领导在楼上坐着。然后庭长问我叫什么名字,我不回答,最后我说,你连我的名字都不知道,把我弄来干什么?下面哄堂大笑。他们气得脸色发青,耐着性子跟我解释这是法庭程序,我说要他先回答我一个问题,然后才回答,他说可以。我就问,那个女人面前没有牌子,是刽子手吗?法官气得要命,说我咆哮公堂,要罪加一等。

法官接着就宣布我跟随四人帮颠覆政府,这遭到我的严厉驳斥。我说我是革委会副主任,我自己就是政府组成人员,自己颠覆自己吗?公诉人说提出抗议,说黄廉十分嚣张。我说嚣张,我是一个正直守法的公民,而且是一个正直的政府工作人员,你们拿不出任何证据,把我关了五年,你们自己才是违法乱纪。然后他们就放幻灯片,说黄廉在建设厂煽动反击右倾翻案风,我说这是为了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批邓是毛主席部署的,上午搞了几个小时休庭。

下午是证人出庭,石有中出来作证,说黄廉在粉碎四人帮之后,动员我们准备500辆卡车、5万斤粮食,准备上山打游击,问我是否事实?我说没有听清要再说一遍,他刚刚开始说,我就说石有中,你怎么这个卑鄙?他就再也说不起话,当时就想走掉。人看来不能干坏事,干了之后,自己也会看不起自己的,这个人最后在精神上就消沉下去了。

他们又说我犯有反革命杀人罪,我就说请问审判长,有谁被杀?死者是谁?在什么地点被杀?杀人工具何在?凭据何在?你这样的法官判案,冤案都不知道有多少?僵持完了又休庭。我回去之后,说我咆哮公堂,这次加菜没有了。我跟他们说,你们不把加菜送来,明天我就不去了,最后只好又端来了。

最后一天,我在法庭上进行最后陈述,针对检察院的起诉书提出的三个问题,说根据检察院的起诉书和法庭的证据,并不能证明我有罪,我参加文革是响应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号召;你们说我拥护四人帮,有些人比我的级别高,跟他们有更直接的联系,你们怎么不追究?就算他们是反革命,也不能因有关系而定罪;文革中间是有严重的派性,问题主要在于以刘邓为首的走资派派出工作组,组织搞抄家破四旧,形成打砸抢,毛主席宽容了他们,我自己就是他们资反路线的受害者,在文革期间屡遭迫害,最后得利的是你们干部,我们造反派只有血泪的付出;在你们所谓的粉碎四人帮过后,没有任何手续,没有任何调查和事实,也是你们以捕代审关押我五年,是你们违法还是我违法?我是革委会副主任,你们没有任何手续就抓,是你们政变还是我政变?文革是中央主导群众广泛参与的社会潮流,如果有错误也只能是中央负责,追究了江青还要抓群众,中国哪有那么多的反革命?你们说几个小丑就搞乱了七八亿人口的国家,把武斗的责任堆在我身上,你们根本没有分清是谁制造派性挑起武斗的,我根本无罪,你们是在闹一个历史的大笑话,我永远都不会服,历史将证明我无罪。我喊了毛泽东思想万岁,高喊革命无罪造反有理,对资反路线要永远造反下去,武警不让我喊,拼命地用劲把我撑下去,把我的肩膀都弄痛了,第二天宣判就不让我讲话了。

又关了两个月,上诉到省高院被驳回,省里面派人来与我吵架。然后就转移到大足省第三监狱关押,那个地方曾经关押过胡风,是专

门关押政治犯的。在我到来之前,他们把监狱进行了一番整顿,把所谓的帮派骨干分子都转移走了,有的到南充,有的到重庆。那个时候刘张还关押在那里,刘结挺已经病得快不行了,张西挺就像是叫化婆,他们就住在我隔壁。我想要去劳动,监狱方说没有劳动的条件,也不会让你与犯人接触的,要我看报学习,交代我不要去墙边,不要去接触武警。监狱政委来找我谈话,我告诉他不要用减刑来吸引我,你们愿意关押好久就关押好久,最多牢底坐穿,我要求他在生活上不要搞阴谋,不要法外加刑,枉法判决已经是无形的杀害,不要再搞法外执法,要他们别把我的东西弄丢了,我需要写信,而且我告诉他们不可能100%服从他们的。

# 第1447回：均判刑，覆巢下岂有完卵 难端平，十年风雨后人评

北京的“五大学生领袖”早在1970年抓“516”时即被隔离审查失去了人身自由。

谭厚兰，1968年10月，与当时的许多大学生一样，被分配到北京军区4627部队劳动锻炼。1970年6月，她是5人中最早作为“516分子”被调回北师大隔离审查的。1975年8月，审查结束，谭厚兰被送到北京维尼纶厂监督劳动。谁知粉碎“四人帮”后，1978年4月，北京市公安局又以反革命罪逮捕了她。

蒯大富，自1970年11月18日被带回清华大学后，即关押在工字厅的一个单独房间里，由工宣队派人24小时看守。蒯大富有什么反映，随时出简报报军宣队、工宣队总部领导。他就这样在清华大学一直被审查了3年，也没有明确的结论。1973年10月，他被下放到北京石油化工总厂东风化工厂监督劳动。1978年4月19日，他被带回清华大学，公开宣布执行逮捕。

韩爱晶，1971年3月8日被作为“516”分子从湖南带回北航隔离审查并批斗，同样没有明确结论。1975年9月8日，韩爱晶被送到北京密云液压件厂当翻砂工，监督劳动。1978年4月19日，他从北京密云液压件厂拉回北航批斗，并在会上公开宣布执行逮捕，带上手铐。

王大宾在清查“516”时，于1971年3月9日，仅比韩爱晶晚1天，从成都抓回北京地院关押审查。后来被作为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但一直没有正式的结论。

“四人帮”被抓时，他正在湖北地院李世忠教授领导下搞人造金刚石钻头研究，等待北京市委吴德给地院指示。因为没有结论，王大宾不好回原单位。

这时，人们都对王大宾说：“大宾呀！江青们完蛋啦，压你头上的大石头落地啦，你该彻底解放啦！”

但是,王大宾万万没有想到的是,1978 年 4 月 29 日,他等来的是武汉市公安局的逮捕令:经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纪登奎五位中央领导签字批准,正式逮捕王大宾。

随即,王大宾被戴上手铐,关进了湖北省武汉市武昌民主路 415 号、位于蛇山下的湖北看守所,罪名是“反革命”,依据还是当年清查“516”时的那些材料。

聂元梓,自 1970 年庐山会议后,即在北大开始批判她在庐山的错误,追查她的后台。但是,作为“516”分子,她是 5 人中最晚的一个。1973 年 3 月 1 日,她在全校大会被戴上“516”帽子,宣布开除党籍。1975 年 4 月开始,她在北京大学校办仪器厂监督劳动。“四人帮”被抓后,聂元梓认为自己是挨“四人帮”整的,便于 1977 年年初,从被关押的北京大学 24 楼跑了出来,到陶然亭公园对面的中央上访接待站,说自己被非法关押,逃跑出来向党中央申诉冤案,然后到北京市委门口,给北京大学打电话,叫他们来人把她接回北大。1978 年 4 月 19 日,北京大学东操场召开批判聂元梓、孙蓬一大会。随后,她即与孙蓬一一起被正式逮捕。

1978 年 12 月 27 日,北京市召开 30 万人大会,批判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谭厚兰、王大宾 5 人,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 3 人被押上主席台批斗。

北京日报
BEIJING RIBAO

市委、市革委会召开三十万人批判大会

揭批聂元梓蒯大富等五个反革命分子的罪行

大会的主会场在首都体育馆,下面还有若干个分会场。开场白后,首先宣布“把反革命分子聂元梓带上来!”然后北京大学的代表批判发言。发言完毕,宣布“把反革命分子聂元梓带下去,把反革命分子蒯大富带上来!”由1968年曾经被蒯大富打成反革命分子的清华大学贾春旺发言。之后,蒯大富被带了下去。把韩爱晶带上来。

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3人都是戴着手铐,脖子上勒着麻绳被押上台的。在批斗会上,聂元梓和蒯大富的绳子没起作用。而韩爱晶对大会发言者指控的许多罪名持“不同政见”,他多次用带着手铐的双手,将两个手的手指伸到脖子上的细麻绳圈里,紧握双拳,狠狠抓住绳圈,向左边跳起来,冲着那个发言的人大喊:“胡说!造谣!”“胡说!造谣!”。警察把他按下去,紧他的手铐。会场一次又一次出现骚动,场下群众发出惊讶的叫声。

1983年3月16日,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在正义路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同时被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刑。

聂元梓、蒯大富以反革命罪判刑17年,剥夺政治权力4年。

韩爱晶被判刑15年,剥夺政治权力3年。

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对指控他们的反革命罪均不同意,对起诉和判决都表示不服并上诉,北京高级法院驳回他们的上诉并维持原判。

“五大学生领袖”中的谭厚兰,“因犯罪情节较轻,认罪态度较好,免于起诉。”

谭厚兰是怎样做到“态度较好”呢?

原来,1981年,谭厚兰被检查出患有宫颈癌,住进了公安医院。后被保外就医。9月,回老家湘潭治病。1982年6月,北京市人民检察分院做出了对谭厚兰免于起诉的决定。1982年11月,谭厚兰走完了她人生的最后路程,终年45岁,一生未婚。

王大宾呢?1978年4月29日被正式逮捕后,他的妻子古宝琳心中不平,于1980年1月,疾笔而书,投函国务院信访部:

国务院信访部:

打倒“四人帮”以后,原北京地质学院学生王大宾于1978年4月29日被关押至今。这种长期关押是违反法律的,是错误的。说“王大

宾跟着四人帮干了很多坏事,破坏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种说法是言过其实的,是没有充分的事实作为依据的。

法律是应依靠事实来作证据的,而不能以某些“金口玉言”的空编来作为依据,并且,任何地位再高的人也不应把自己凌驾于法律之上,否则,法律又怎能取信于民呢?

对文化大革命中王大宾自己干的事情,应负起政治责任,但是要把当时地质学院学生所干的坏事情都归为是王大宾的错误和罪行,那么,王大宾就是一死也难以承担此罪了,况且,在那谁也管不了谁的年代里,这种归罪法又是多么地蛮横无理!按此法推理,浩劫中国的十年灾难又该归罪于谁呢?

如果说,王大宾只须对自己的干过的事情负法律责任,那么现在的这种关押是缺乏事实和证据的,是错误的。

现实中,不少上了林彪贼船或跟着“四人帮”干了大量坏事的人,现在依然是“官星高照”,他们所干的事情可以算是难以饶恕的,可是被饶恕了,而对于王大宾这样的青年人犯了些错误却审查清理了整整十年最后还关押起来,这是为什么?难道就是因为王大宾无枪无权,地位低贱吗?

文化大革命对中国来说是一场灾难,这场灾难是怎样发生的,中国人民心中是清楚的,谁也不会相信是几个学生在那里兴风作浪而掀起的文化革命。文革初期,王大宾跟所有青年学生一样,抱着一股革命热情,响应党的号召投入到运动中去,由于当时对中央所发生的错综复杂的路线斗争认识不清,因此,单纯的政治热情被“四人帮”利用了,犯了些错误,但是这些错误是跟当时的历史背景难以分开的。不是吗?在67年68年当时的条件下,中国到底有多少干部和群众抵制了“四人帮”的横行呢?中国共产党许多共产党员中到底有几个为正在被洗劫的中国人民说句话呢?要是当时大家都认识到这个问题,“四人帮”就不可能在中国横行猖獗十年之久了。既然当时的历史事实是这样,那么为什么对还是学生的王大宾要求那么高呢?要求他当时就能去抵制“四人帮”横行呢?

并且,十年来,王大宾一再表示愿意改正自己的错误,但为什么一直不允许他改正错误最后还要置他于死地呢?我们的党,我们的国家

不是经常说要允许人犯错误,允许人改正错误吗?但为何对一个当时还只是二十几岁的青年学生,就不能有这种宽恕的气度呢?

古宝琳

80 年 1 月

1982 年 6 月,湖北省公安厅七处周处长和负责王大宾专案的徐科长对王大宾说:

“你文化大革命中犯了许多错误,有的错误是严重的,但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和聂、蒯、韩不一样,你安心等待结论,不用急。”

1983 年的夏天,看守所和专案人员又通知王大宾,他们到北京找中央汇报请示后,情况是:“对你的问题,有人说:怎么只判‘天派’?‘地派’也要判!”

他们做王大宾的工作,要他顾全大局,要理解不能不对他也进行审判。他们还要王大宾在法庭上注意什么能说什么不能说;且保证量刑时会区别对待的。

结果,王大宾因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诬告陷害罪,于 1983 年 8 月 18 日,由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刑 9 年,剥夺政治权力 2 年。比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晚了 5 个月零两天。

后来王大宾才知道,说“怎么只判‘天派’?‘地派’也要判!”的人是陈云。

1983 年 10 月,中国共产党开始大规模整党。而清理“三种人”是这次整党的主要任务。

“三种人”,按照 1982 年 12 月 30 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清理领导班子中“三种人”问题的通知》中的提法,是指“追随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打砸抢分子这‘三种人’”。这一提法最早是陈云于 1981 年 7 月 2 日,在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书记座谈会的讲话中提出来的。他说:

“闹派性的骨干分子,打砸抢分子,一个也不能提拔到领导岗位上来。”

1982 年 1 月 13 日,邓小在中央政治局讨论中央机构精简问题会议上讲话说:“人一定要选好。还是老话,要坚决贯彻陈云同志讲的几条,几种人不能放进去啊!”

1月18日,陈云在中央组织部送来的材料上批示:“一、出重要,进更重要。二、进的人,必须不让‘三种人’进。”

2月12日,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发出《关于一些领导班子中仍有“三种人”的三个调查材料》。

1984年2月23日,“老红卫兵”孔丹和董志雄二人就一些单位在追查“三种人”时,对“老红卫兵”在文革中的一些事情进行追查一事,给陈云写信,全文如下:

陈云同志:

我们曾是“文革”初期“老红卫兵”的成员,现在想向您反映在整党中应当如何正确对待“老红卫兵”的一些想法。

所谓“老红卫兵”,是指一九六六年夏季一些出身于干部、工农家庭的中学生和大学生,受当时“左”的路线影响而自发组织起来参加“文化大革命”,又于同年十月中央工作会议提出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之后,陆续退出运动,在“文革”的中、后期一直受压抑的红卫兵。

在当前整党中,有人散布一种舆论,说什么“老红卫兵”也是“造反派”;有的地方和单位竟把“老红卫兵”在“破四旧”中发生的问题当作“三种人”问题来清查;还有的人仅仅因为担任过“老红卫兵”组织的负责职务或参加过“西纠”、“联动”这类在“老红卫兵”中名声比较大的组织,就被视为“文革”中有严重问题,而影响到对他们的使用和提拔。

凡此种种,我们觉得同中央有关文件、中央领导同志有关指示的精神都是相违反的,需要澄清和纠正。否则将不利于整党,不利于清理“三种人”和建立第三梯队的工作。

“老红卫兵”作为一种政治力量,其大多数人在“文革”各个重要阶段,表现是好的,是经住了考验的。他们对党、对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有深厚的感情,对“文化大革命”的“左”倾错误较早不满和抵制,对林彪、“四人帮”的倒行逆施深恶痛绝。

“老红卫兵”有没有缺点错误?有。首先,他们一般是学校中最早起来批判校领导的所谓“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这个大方向就错了。其次,他们中间的一部分人(主要是一些未成年的中学生)在“破四旧”运动中有过过火行为,有的动手打了老师,有的抄了“地富反坏右”

的家,极个别的甚至打死了人。但是,“老红卫兵”的这些错误与那些造各级党委反、造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反的造反派组织的错误,具有本质的区别,与“三种人”更是水火不容的两码事。

整个“文革”期间,贯穿着党的各级老干部、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与林彪、“四人帮”之间的殊死斗争。在这场斗争中,“老红卫兵”是站在前者一边,而为后者所忌恨的。如北京中学生中的“西纠”“东纠”,大学生中的“一司”等,都是周总理和党政军老干部极力支持、引导,用以控制局势、保护老干部、维持社会秩序(如保卫国家机关、保护档案、反对过火行为等)的组织。“联动”更是为了反对中央文革而成立的。他们于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前后都被中央文革压垮或镇压,打成“保守组织”或“反动组织”,其中一些受到程度不同的打击和迫害,林彪、“四人帮”还通过追查他们的“后台”来整老干部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从那时起,“老红卫兵”作为组织不复存在了,但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长期受着压抑,在诸如反“十二月黑风”、“一月夺权”,反“二月逆流”、“批林整风”、“批林批孔”、“批邓”、天安门事件这样一些“文革”的关键时刻,从思想感情到政治态度都是与林彪、“四人帮”对立的。而那些紧跟林彪、“四人帮”,自觉充当中央文革得力工具的造反派(无论是极左派还是“策略派”),却始终把矛头对准党的各级老干部,对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他们积极参与各地、各部门的夺权斗争,砸机关、抢档案,打派仗,制造武斗,揪所谓“叛徒”、“特务”、“走资派”,对老干部搞“专案”和进行所谓“群众专政”,围困中南海,组织批斗中央领导同志的各种联络站和大会,窃取、泄露党和国家的机密等等(当然,对这些造反派组织的成员,应根据党的政策和他们在各个时期的具体表现区别对待)。两相比较,“老红卫兵”在“文革”初期的活动、组织及骨干,与他们这些造反派的活动、组织及其骨干,在性质上都是根本不同的。把“老红卫兵”说成是“造反派”,势必把水搅浑,转移人们对“三种人”的视线。

在“文革”初期,“老红卫兵”中一些人也有打、砸、抄行为,如打了当时被认为是“阶级敌人”的人(如“地富反坏”,流氓等),抄了那些人的家,砸了当时被认为是“四旧”的东西(如一些寺庙,某些商标等)。这是在当时“破四旧”的号召下发生的,时间很短暂(个把月左右),我

们认为大多属于一般性错误。当然,对其中情节严重者,如个别打死人的,如果过去没处理过,也必须区别情况,认真处理。但这不能与“三种人”的打、砸、抢混为一谈。我们理解,所谓“三种人”,无论其中哪一种(包括打、砸、抢分子),都是以为林彪、“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服务为目的,都首先是严重的政治问题。而“文革”初期,“老红卫兵”中少数人由于年幼无知,搞了一些打、砸、抄的事情,并不是为林彪、“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服务的问题。如果把这类问题列入“三种人”问题,实际上就模糊了“三种人”的政治性。

“老红卫兵”和“三种人”基本是同一代人,现在大多三、四十岁。正如陈云同志指出的:谁对聂元梓、蒯大富手下的第二、第三、第四把手清楚?老同志不清楚。只有那个时候也是“红卫兵”、后来成为“保守派”、“逍遥派”的人才清楚,他们知道是谁整老干部的(大意)。因此,我们认为在这次整党中,“老红卫兵”虽然也需要结合自己的经历,总结经验教训,提高觉悟,但对他们在“文革”初期的缺点或一般性错误,绝不应当再予追究,对中央文革曾强加给他们的种种罪名,更不应该再拿来作为追究他们的依据。相反,倒是应当充分肯定他们在“文革”中的主流并调动他们的积极因素,依靠他们和广大的中青年和“三种人”进行斗争。

以上是我们个人的一些想法,不知当否,恳请指示。

此致

敬礼

国家经委干部、共产党员孔丹

冶金部干部、共产党员董志雄

一九八四年二月二十三日

2月28日,陈云将孔丹和董志雄的这封信转给胡耀邦、邓小平等人,并写了他的意见:

耀邦、(剑英暂不送)、小平、紫阳、先念同志:

我建议将此信和陈楚三的材料均印发政治局、书记处,并加发整党指导委员会和中组部。孔丹同志的意见是对的,有关部门应当研究。这些红卫兵不属于“三种人”,其中好的还应是第三梯队的选拔对象。清理“三种人”是一场政治斗争,要防止有人将水搅浑。像陈楚三

这样的人要特别警惕,绝不能让他们混进第三梯队,但也要给出路。

陈云

八四年二月二十七日

陈云所说的陈楚三的材料,是1983年,中组部青干局的处长李志民找到原清华大学“414”头头陈楚三,说中央大力平反冤假错案,解放一大批干部,这些干部多年关监狱、住牛棚,与世隔绝,对文革中的红卫兵怎么回事不太清楚,希望陈楚三写个材料,介绍红卫兵的起源和发展。陈楚三推脱不过答应了,但提出:各行各业都有红卫兵,很乱,他只写学校的红卫兵;红卫兵起源于中学,他对中学红卫兵不了解,只能写大学的红卫兵;其他大学的红卫兵他也不了解,因此,只能写他就读的清华大学的。李志民同意了。

此后,陈楚三花了大约半个月时间,用稿纸写了一万字左右,以私人信件寄给李志民。

当时,《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已经公布。陈楚三在信中认为:“毛主席确应对左倾错误负主要责任,但中央其他负责人也有左倾错误,例如,清华校长蒋南翔就是被刘少奇打倒的;红卫兵正是左倾错误的产物。”

信中简述了中学红卫兵产生的背景是左倾错误的影响:“遥想当年送苹果,江青阿姨多爱我”,以及他们后来成立“联动”,反中央文革被打成反革命。简述了大学红卫兵部分人因反中央文革也被打成反革命,举了地质学院朱成昭以及报纸上报道的韩爱民等例子。

信中着重叙述了清华大学“414”派和中央文革支持的蒯大富派的斗争情况,指出“414”派“全体是反谢(谢富治)的,骨干是反陈(陈伯达)的,核心是反林(林彪)的”。基本观点是,反对把红卫兵视为“洪水猛兽”,主张对红卫兵也要一分为二。

信中对红卫兵是跟着林彪、四人帮“受骗上当”的说法提出异议。陈楚三指出,“我是共产党员,应当听党的话。叶帅在接见军队院校师生员工大会上说过,林彪同志只有五十九岁,身体非常健康,这是我们革命事业胜利的重要保证,让林彪同志作为我们的副统帅,这是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最可庆幸的大事。周总理则不止一次说过,江青同志是文化革命的伟大旗手。不听林彪的、江青的,那么总理的话、叶帅的

话我们听不听？信不信？要是都不听，还能当党员吗？如果一定要说我们受骗上当，那就是受党中央的骗，上党中央的当了。”

他还提出，“中国共产党成立只有六十多年，而文革长达十年，占了六分之一；对长达六分之一的一段历史，不应当简单地‘彻底否定’，而应当认真总结，汲取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和教训。”

他在信中特别提出“八旗子弟”问题。他说：许多干部子弟运动初期敢于造反，紧跟毛主席和党中央；但当自己的父母受到冲击、被打倒，就患得患失，不那么“紧跟”了，有些人逍遥了，有的还因此对毛主席和党中央产生怀疑。比较起来，大批工人、贫下中农和普通干部子弟反而无私无畏，坚决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这封信没有留底，直接寄出了。后来李志民告诉陈楚三，当时中组部青干局局长李锐看过这封信，并批给几位处长、副处长传阅。李志民所在处的副处长刘泽彭也看了。据说，后来刘泽彭将陈楚三的这封信件通过某种渠道送到陈云处，于是便有了陈云对这封信的极其严厉的批示。

2 月 28 日，胡耀邦对陈云的信写下自己的意见：

按陈云同志的意见办。先送小平、紫阳、先念同志阅批。然后请乔石同志将所有批语及材料印成政治局文件，发各同志。

胡耀邦 二月二十八日

3 月 1 日，李先念也批复：

完全同意。三月一日

中央以中发[1984]2 号《会议文件》的形式转发了这封信，文件的标题是：《孔丹、董志雄同志给陈云同志的信》，并同时转发了陈云、胡耀邦、李先念的批示，及“（小平、紫阳、乔石同志已阅）”。

7 个月后，1984 年 10 月，孔丹任中国光大集团有限公司常务董事兼副总经理，相当于副部级。

文革中的风云人物至此基本都叙述完毕，各路神仙各自归位，《文革史话》写到这里也该收笔了。

时过境迁，白驹过隙，大革命的领导人均已作古，文革当年意气风发、豪情万丈的年轻人也已耄耋老矣。再回首，许多人发现，那是一段很难被忘怀的十年！“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这场大革

命的是是非非,只能留待后人评说,它的价值,也只能由历史的长河冲刷出其本来的面目。

十年风雨起苍黄,神州荡,终难忘。一腔悲愤,何处诉衷肠。百年回首应不识,尘满卷,忆如霜。

大梦一觉治伤创,平冤状,更弦张。书简留言,何止字千行。料得后世议难平,千秋业,何人抗?

一词《江城子》,作为本书的结束。

# 第七部下卷
# 各地文革章回索引

**北京：**

第 1409 回；第 1410 回；第 1411 回；第 1412 回；第 1414 回；第 1415 回；第 1416 回；第 1417 回；第 1418 回；第 1422 回；第 1425 回；第 1427 回；第 1429 回；第 1430 回；第 1431 回；第 1432 回；第 1434 回；第 1435 回；第 1436 回；第 1437 回；第 1438 回；第 1439 回；第 1440 回；第 1447 回；

**清华大学：**

第 1409 回；第 1410 回；第 1411 回；第 1422 回；第 1447 回；

**四人帮：**

第 1409 回；第 1410 回；第 1411 回；第 1412 回；第 1413 回；第 1414 回；第 1429 回；第 1431 回；第 1432 回；第 1434 回；第 1437 回；第 1438 回；第 1439 回；第 1440 回；第 1441 回；第 1442 回；第 1443 回；第 1444 回；

**中央军委：**

第 1410 回；第 1411 回；第 1412 回；第 1413 回；第 1414 回；

**北京大学：**

第 1409 回；第 1411 回；第 1422 回；第 1433 回；第 1434 回；第 1447 回；

**邓小平：**

第 1416 回；第 1422 回；第 1430 回；第 1432 回；第 1433 回；

**文艺：**

第 1433 回；

**刘少奇：**

第 1439 回；

**北京航空学院：**

第 1447 回；

**北京地质学院：**

第 1447 回；

**北京师范大学：**

第 1447 回；

**上海：**

第 1409 回；第 1416 回；第 1417 回；第 1418 回；第 1419 回；
第 1420 回；第 1421 回；第 1422 回；第 1423 回；第 1424 回；
第 1425 回；第 1426 回；第 1427 回；第 1429 回；第 1438 回；
第 1445 回；

**华北地区：**

**河北：**

第 1430 回（保定）；

**东北地区：**

**辽宁：**

第 1427 回；

**西南地区：**

**四川：**

第 1428 回（重庆）；第 1431 回（重庆）；第 1446 回（重庆）；

**云南：**

第 1428 回；

**中南地区：**

**河南：**

第 1430 回；第 1438 回；第 1439 回；

**湖北：**

第 1418 回；第 1427 回；第 1431 回；第 1446 回；

**湖南：**

第 1428 回；

**华东地区：**

**江苏：**

第 1418 回；第 1422 回；